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口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口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 张迪杰

世界人民的金典

毛泽东，伟人，领袖，统帅。

毛泽东著作，结晶，真理，金典。

毛泽东思想，旗帜，支柱，财富。

《毛泽东全集》，收录了史上最全的毛泽东著作，真实全面地再现了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展示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富强的沧桑激昂。这是一部诠释毛泽东的百科全书，是蔚为壮观的人类理论奇迹，弥足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科学丰厚的指导和推动世界人民革命、和平和发展的金典。

《毛泽东全集》在全球的公开出版发行，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盛事。她将使你全方位地认识这位东方伟人和他所开创的东方大国的真情实貌，她将成为世界人民为本民族乃至全人类进步事业而不懈奋斗的精神食粮。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诗词家和书法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具有过人的智慧，非凡的远见卓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善于驾驭历史进程的雄才大略。他是人民最忠诚的儿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浓

缩和集中体现，人民占据了他人生轨迹和情感世界的全部。人民也在自己的心底里，永远印记着毛泽东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他作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全球百大人物，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一面鲜艳的旗帜，深刻而长远地改变着中国，影响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毛泽东的名字和伟绩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他的最伟大功绩是在领导党和人民的英勇奋斗中，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和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世界普遍性的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共正确的思想路线。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毛泽东思想，自中共七大以来始终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培育了中共一代又一代领导干部，教育、启迪了中国和世界人民，成为主持国际正义、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旗帜，赢得了全球不同肤色的人们的认同、信服和赞誉。他的名字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常用词，他的著作被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之多，使《圣经》也大为逊色。他在人们心中，比丘吉尔、戴高乐等更有魅力。他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毛泽东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物化载体，它凝聚着东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精华，根植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土壤，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为世界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财富。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哲学著作，既有十足的中国传统哲学风格，又有用中国现代革命实践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气派；以《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代表的毛泽东军事著作，既包含着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

想，又体现出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战术思想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才能；以《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为代表的毛泽东政治著作，完整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建立了独具一格的国体和政体学说；以《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代表的毛泽东社会主义论著，彰显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远见卓识，闪耀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科学总结和创新。毛泽东著作中的其他篇章，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教育、文化、政策、策略、法律、伦理、文学、艺术诸方面的重要思想，无不饱藏着毛泽东思想的独特贡献和活的灵魂。毛泽东的古体诗词，气派雄浑，寓意深远，使人心潮澎湃，力量倍增；毛泽东的白话文体，更是新人面目，奔放流畅，是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字珍宝；毛泽东的书信电文，阐述了他志存高远的人生追求，呕心沥血的革命履历，情真意切的革命家风范。

对毛泽东著作的系统学习和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性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尤其在千变万化的国际局势中，特别需要我们深入、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单靠目前已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文集等已不能满足需求，出版《毛泽东全集》已成为顺应历史的全新期待。关于出版全集，我们先把视线移到国外。

早在1927年5月，共产国际在前苏联出版发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著作。尤其是第三世界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人民，普遍崇拜毛泽东，纷纷成立机构大量出版和广泛宣传、学习毛泽东著作，有的建造了用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标志性建筑，有的还成立了活学活用

毛泽东著作的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形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空前团结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局面。就是在意识形态不同的发达国家，也大量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兴起了“毛泽东热”，先后出版了数以万计的毛泽东著作，并十分畅销。特别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热”在日本再次兴起，先后成立了毛泽东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研究会等组织。这期间以著名学者竹内实为代表的毛泽东著作研究者，编辑出版了具有全集性质的《毛泽东集·补集》20卷，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文献资料最全的版本，在全世界影响极大。我国学者也纷纷抢购该书，致使该书价格暴涨，最后脱销。

在西方最早介绍毛泽东著作的是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于1928年出版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介绍了湖南农民运动、朱毛会师湘赣边区等情况。1946年6月，她第五次访问中国，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美国记者斯诺1937年10月出版《红星照耀中国》后，迅速再版20多次，被译成15种文字，发行100多万册，该书和毛泽东的名字再次红遍了全世界。美国史迪威将军赞扬“斯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新闻记者，他的书是光辉的新闻成就”。斯诺因此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三次接见，被罗斯福称为“中国通”，美国也因此改变了对华政策。自此，全世界的“毛泽东热”持续升温，有关毛泽东的书成为各大藏馆的新宠，特别是美国弗吉尼亚州奥克顿的中国资料研究中心出版的23卷《毛泽东讲话和文章汇集》，被西方学者评价为“全新的、准确的、有关毛泽东的档案材料”，是目前世界上卷帙最多的也具有全集性质的毛泽东著作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毛泽东著作的大量出版，使得世界人民学习、研究和应用毛

泽东著作的形势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呈现出日新月异、势不可挡的趋势。

综上可以看出，世界各国的有关组织和著名学者，都不惜重金和时间来收集、编辑、出版毛泽东全集性质的著作，其远见卓识显而易见。中国作为毛泽东出生的国家和毛泽东思想的发源地，我们作为身受毛泽东福泽和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新生代，责无旁贷地应把这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大事扎实做好。

值得欣慰的是，我和同志们怀着对毛泽东的无限热爱，对毛泽东思想的坚信不疑，在36年收集、研究和整理资料的基础上，又经过20余年编辑，终于编出这套52卷本的《毛泽东全集》。她与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各种毛泽东著作集相比，具有四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全面系统。自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我就下决心编辑出版《毛泽东全集》。从那时起我用36年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在收集毛泽东著作中，坚持东找西淘、不惧辛劳，节衣缩食、珍藏国宝的精神，先后从我国各地以及美国、日本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约有七、八吨重，仅藏书目录就达38万余字。先后被有关组织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和“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称号。这些丰厚珍藏，为编辑全集提供了比较系统、全面、可靠的资料保障。在20余年的编辑中，无论是文章、书信、电报，还是诗词、书法、图片等，自毛泽东1893年出生以来所能找到的最早一篇文章，即1901年的杂言诗《迎春》，到1976年他逝世前的最后一篇电文，即《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共计10862篇著作2015万字，完全按时间顺序完整地编排成卷，使读者能方便地以时间为序查找资料，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著作，在

新的实践中更好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体系。

二是图文并茂。毛泽东写文章历来反对空话套话和八股式的臭长文章，他的文章旁征博引，论述精透，注重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疑难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最能使人受到启迪和鼓舞，并成为自觉的行动。尽管如此，我们在编辑中仍深感毕竟是几十卷的巨著，加之读者对历史背景了解不多，容易使读者对全集望而却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真考察了世界上各种全集的编辑情况，认为只有在编辑中实现全新的突破，切实增强全集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才能使读者喜读易记。为此，同志们以人不爱书不死心的惊人毅力，经过无数次的试编和比较，最后决定只有集文章、书信、电报、诗词、题词、题字、批注、书法、图片九位一体，图文并茂，才能出彩出果。特别是编辑的3000余幅书法作品，龙飞凤舞，气势磅礴；编辑的7300余幅照片、油画、国画等，具有原始性、资料性和鲜活性，容易使读者的视觉和思维在九位一体中，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原始场景的感染，从而转化成自觉不懈地学习、研究、应用和创新的动力。

三是原汁原味。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尊重事实，客观公正，既不把毛泽东神化，搞“一句顶一万句”，把没有依据和出处的一句话、一段话甚至成篇的文章、诗词等硬编进全集，搞所谓的最多最全；也不把毛泽东当作一般的常人，他是人民领袖，是大著作家，他的著作和读者数量在世界上位居第一，他的著作和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全国上下普遍公认而又心悦诚服高举的伟大旗帜，是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因此，编者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摒弃个人和他人的好恶，切实做到客观公正，实事

求是，不带任何私利和偏见，不受任何影响和束缚。在编辑中，除对原文个别的标点、字和极个别的词、句做了改正之外，我们完全按照作者的原著进行编辑，让全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具有真实的历史文献价值。

四是严谨扎实。编辑《毛泽东全集》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是一项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缺、福祉千秋万代的伟大工程，来不得半点的虚荣、浮漂和马虎。哪怕是一个地名、一个事件、一个数字，甚至是一句话、一个词、一个标点，都要一丝不苟地将其搞准，尤其是涉及篇目多，引经据典多，有的文章历史久远，又写于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虽然参与编辑的同志都学过中国革命史，又具有较好的文字功底，但真正进入实际工作后，普遍感到知识匮乏，障碍重重。在20余年的编辑中，大家坚持在编中学，在学中编；互请教，勤研究；高标准，严要求；经常为弄清一个问题，查阅大量资料，有时会耽误几小时甚至是几天、几十天，有的曾因此累病，三番五次住院；有的曾因此耽误了家事，受到家人的误解。但同志们没有一个抱怨、厌烦和瞎编，始终不渝地抱着对党、国家和读者，特别是对历史极端负责的态度，不分春夏秋冬、节假日和白天黑夜，始终坚持孜孜不倦、呕心沥血地耕耘，才铸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还有极个别的文献这次没有被编入全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但从中外全集编辑的情况看，所有全集只能是相对的全而不是绝对的全，都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逐渐解密的文稿和新收集的著作，利用不断再版的机会逐渐编入全集，使全集逐步完备的。编辑《毛泽东全集》是一项宏大浩繁的工程，虽然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可能还有诸

多不妥之处，恳请读者不吝赐教。

当您身静心清地翻开这部全集时，您会亲历毛泽东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伟大领袖的过程，您会领略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凝结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断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的艰辛，您会感悟在未来的征途中学习、研究、传承、应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宝贵。从而发自内心地感叹：不懂毛泽东，不能做大事。进而对这部全集倍感亲切，爱不释手，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和运用其精神实质。

历史的发展将证明，《毛泽东全集》在全世界的公开出版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以更加广泛的传播，将对世界人民的革命、建设和发展产生新的巨大的促进，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张迪杰

世界名著中的瑰宝

在浩瀚的世界经典名著中，出版发行量最大、拥有读者最多、实际效果最好的毛泽东著作，凝聚着东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精华，根植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土壤，真实地记录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过程，确切地展现了毛泽东缔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在全世界发展共产主义事业的丰功伟绩。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是影响和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旗帜，是世界经典文献中永放光芒的瑰宝。

当我们经过36年收集、研究、整理资料和20余年编辑，把这部52卷的《毛泽东全集》在全世界公开出版发行的时候，特精选50多位世界著名领袖和大家，对毛泽东著作和其本人及思想的高度赞誉作为序言，让他们引领读者走进毛泽东精神世界的神圣殿堂。

毛泽东著作具有时久更强的科学指导作用

毛泽东的一生，是在为全人类的最终命运战斗和操心的一生。他不仅是公平正义的化身，也是不畏强权的斗士。他不仅处处维护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也为世界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费尽心血。毛

泽东个人出色的战略眼光，让那个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黯然失色。一百年后，毛泽东仍是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思想家和军事家。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将永远影响世界。

——美国著名学者斯图特·R·施拉姆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中共中央原常委、中央军委原主席邓小平

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第二，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许多重要的著作，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

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第三，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的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第四，毛泽东同志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五，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中共中央原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原书记陈云

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所作的各种指导和指示，他的讲话和著作，他在政治、哲学、历史、军事、策略和战略等方面的所有学说，是我们和世界一切真正革命者在斗争中得到革命认识和正确方向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奥地利马列主义党中央委员会
前第一书记施特罗伯尔

您（毛泽东）的著作，改变了中国，推动了世界，时间越久越

能显现出它的魅力。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世界上深受中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影响的人，数以几十亿计。很多国家的人民，在某种意义上把毛泽东作为他们的精神图腾。

——英国著名学者约翰·列农

毛主席由于对人类变革作出了贡献，已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毛的理论是不过时的中国和世界革命的武器，将会不断取得成果。当我于一九七三年四月有幸认识毛泽东时，我重申了我说过的话，他是诗人，预言家，人民的战士。我一向认为他是中国人民的一位伟大的革新者，确实充满智慧，拥有极其深刻和牢靠的经验。中国在一个世纪里受到十一个国家的剥削，这些国家使中国沦为殖民地，使中国屈服，到处都是卖淫和吸毒，而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使中国得到了解放。我们看到中国人民是有朝气的、乐观和勤劳的人民，这个国家已经繁荣昌盛起来，而它的人口占人类的四分之一。

——墨西哥前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

毛是本世纪历史上的伟大主角之一，他领导的革命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面貌，中国是差不多像一个大洲的大国，有着极其古老的文明。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是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的最广泛运动的决定性人物，他代表着当代最大的变革之一，他为我们现在的生存创造了条件，为开辟人类历史新阶段作出了贡献。正是因

为这一原因，我们感到毛和毛主义在当代历史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是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这些变化是同中国的特殊情况密切相连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的经验为国际工人运动、为别国人民开辟了进行对照和借鉴的新天地。毛的建议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国界之内的，影响了别国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影响了广大青年的方向，培育了新的理想和意识。

——意大利众议院前议长英格拉奥

在那些丰富了整个世界的人中，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我要强调指出，他的事业、理论、行动具有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不是仅限于中国人民或限于亚洲。我们的一切见闻都向我们证明，全世界千百万人都承认毛主席和他的非凡的一生，他的丰功伟绩具有普遍的意义。

毛泽东为未来敞开了大门，使得世界各国人民都能觉悟过来，拒绝继续当奴隶，以便使他们的才智和志愿得以发挥。他为争取一个我们大家都得到和平和幸福的世界进行了工作。

毛泽东建立的红军打击了日本，是毛开创了这种人民战争，每一个男人、妇女、孩子都有觉悟，自觉地动员起来打击敌人。在这些年中，他写作、工作，起草了令人钦佩的文件。今天，世界上一切军事学校，到处都在学习这些文件。他也写了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他写下了这种非凡的观点、这种阐明一切革命问题的世界观。组成毛泽东思想的这些著作后来把革命引导到胜利了。

毛并不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物。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是全民族的代表，是人民和时代的化身。革命造就了毛，毛也造就了革命。毛的一生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生，而且也是中国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

象征。

——英籍著名华人作家韩素英

毛泽东著作是“世界经典中的精华”

毛泽东通过一生的伟大教导，不仅给中国人民而且给全世界留下了极其宝贵的遗产。

——墨西哥前总统埃米略·希尔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具有不仅给中国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光辉的拥有超人天赋的人物。毛是国际性人物。他的著作不仅是中国的遗产，而且是全世界经典中的精华。我仍然确信，中国依据毛的著作，将进步得更快，因为他为中国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写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实行了很多东西。正是由于毛，正是由于毛的努力，中国才有了社会主义。我们希望为了人们的福利，社会主义能传播到别的地方，世界也由于他的忠告而不断进步。

——毛里求斯前总理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

我整个一生都是崇拜毛泽东的。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我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军民鱼水情”“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这些话语，我都熟知是出自《毛泽东选集》的第几卷，并能将其用到我们的国家，因而我们不断取得胜利。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民，力争早日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毛泽东是我们时代的列宁。他在各个领域中都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了界限并坚决维护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解决当前世界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列主义。

同志们，当列宁逝世的时候，工人们加强了对列宁主义的掌握，并且在列宁主义的指引下，赢得了全球性的胜利。现在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与世长辞了，我们感到最深切的悲痛，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毛泽东遗留给我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珍贵的和强大的武器。让我们在建设瑞典共产党的斗争中，在建设瑞典的社会主义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在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中，努力掌握它。

——瑞典共产党前主席罗·彼得松

毛泽东的一生，致力于中国的独立，推翻外国的统治，克服内部分裂，依靠自力更生，坚持继续不断的革命变革。就连不赞成他的社会观点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一生是一位历史的伟人的一生。中华民族失去了像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袖和政治家，但即使他逝世后，他的著作也会使他永生。

——荷兰前外长斯图尔

我编《毛泽东集·补集》20卷后深感，毛泽东著作，是开启世界美好未来的钥匙。

——日本著名毛泽东著作研究专家竹内实

任何语言确实都不足以描绘出毛泽东同志的雄伟形象。毫无疑问，毛主席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的

业绩震撼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这些业绩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社会主义，而且鼓舞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沿着为解放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前进。今后也将继续是这样。

毛主席留给我们的遗产比任何纪念物都更加珍贵。这份遗产就是献身于革命和用革命鼓舞（人民）的榜样，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方面。

——澳大利亚共产党前主席希尔

“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此，把中国革命和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创立了崭新的局面，使革命和建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朱德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

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中共中央原常委、中央军委原主席邓小平

展望将来，我们应该举什么旗帜呢？如果我们放弃了毛泽东思想，不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我们高举什么旗帜呢？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如果把它放弃了，实际上就是放弃了马列主义旗帜，那么我们用什么理论来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呢？我们必须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国外敌对势力，正在疯狂地希望我们“非毛化”，他们对毛泽东思想是极端仇视的，正在千方百计地贬低它，妄图把它搞臭。对此，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有人说，改革就是“非马列化”“非毛化”；坚持马列，就是反对改革，就是“保守派”。这话不是无知、误解，就是一种挑拨。我们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取得胜利的。延安时期确定毛泽东思想，是经过政治局多次会议讨论过的。最初有的同志提议用“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后来说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叫毛泽东思想，在杨家岭那个小楼上开政治局会议时，他同意了。

在中国，坚持马列主义与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不可分的。现在，

世界风云变幻，错综复杂，如果没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哲学思想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各种各样的思潮面前，就会无所适从。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中国各族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许多志士仁人为了救国救民，曾经到西方找武器，这个思想、那个主义，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最后，我们用来推翻三座大山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是中国各族人民的选择和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

——中共中央原常委、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彭真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
中央军委原主席胡锦涛

毛泽东是一位“人类的领袖”

毛主席是一位人类的领袖，历史的推动者。他是名垂史册的人物。他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的自力更生的国家，他以智慧、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引导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在对已离开我们的这位人物默哀致敬时只能说，他已把他在中国人民斗争中所形成的伟大思想传播给所有国家，传播给各族人民，不管他

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也不管他们的种族如何。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

毛泽东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他在生前已经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无私地献身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事业的一生，是一个光辉的榜样。毛泽东主席始终是一位革命家。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主席就显示了高瞻远瞩的革命领袖的品质。甚至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他就立志投身于中国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事业。毛泽东主席当过工人、教师，他是游击战争的伟大领袖，是哲学家和伟大的政治家。在从事这些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同时，他是被压迫者事业的不妥协的旗手。

——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

毛泽东是20世纪魅力超群的政治家。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R·特里尔

毛泽东是一位改变世界面貌的人物。毛通过他的活动和追随他的那些人（周恩来是其中最伟大的人）的活动使中国再生，并使中国恢复了她正常的本来面貌——世界大帝国之一。

——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

我认为毛泽东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领袖之一，他使得好几十年来和好几世纪来一直处于封建状态的国家实现了统一，在他的组织下，他确实结束了一种周期性的饥饿和水灾。他是他的国家的一位

伟大的领袖。虽然我们不同意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等，但是，他的国家是一个曾经陷于混乱的而且被进行了数十年的内战搞得四分五裂的有七亿到九亿人口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世界领袖。

——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

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很多国家元首都被人忘记了，只有少数人仍被人所知。例如法国的戴高乐将军，法国人都知道他，敬重他。那么在中国，毛泽东也是一样。另外，现代社会的国家领导人并不体现一种哲学思想，他们只是解决一些问题，诸如经济、社会、军事等。法国人却认为毛泽东体现了一种哲学思想，并且努力地把它付诸行动。这正是我们对政治的认识，我们在1789年进行的大革命，正是为了一种哲学思想。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也正是使中国走向一种哲学，即给予中国人民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毛泽东是世界“巨人中的巨人”

像毛泽东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甚至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他们占领了舞台，以天才的灵感写下了历史的篇章。毫无疑问，毛泽东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

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

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在中国的范围内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当然，他为中国及其八亿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泽东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领袖，他对当代局势发展的贡献是没有人可以比拟的。

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泽东的逝世，但是明天黎明，都将起来歌唱颂扬他不朽的赞歌。

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是幻觉不是梦境？日出雾散。是梦还是醒？”我们巴基斯坦将永远怀着敬意纪念不朽的毛泽东。

——巴基斯坦前总理布托

毛泽东的排列略高于华盛顿，因为毛给国家带来的变化，比华盛顿使国内发生的变化更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仑、亚历山大等人要高不少，因为他对将来的影响可能比这些人要大得多。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H·哈特

毛泽东是我们世纪的伟人。他把现代马列主义理论巧妙地应用于一个半封建的农民国家。毛在过去四十年中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毛显示出是一名战士，一位有实践经验的人。毛有能力彻底确立诞生于马列主义的但得到丰富的和适合于亚洲现实的中国新哲学。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人，他应用了一个五十年前似乎不可能适用于中国的、不可能为一个以农民为主的国家所接受的理论。

——墨西哥前驻中国大使欧亨尼奥·安吉亚诺

他（毛泽东）说：“什么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而是掌握它的人。”我说：“还有原子弹哩！”

毛说，他怀疑原子弹是否还有可能再次被用于战争。“它在广岛的大爆炸中毁灭了自己。”

——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毛泽东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见证。没有任何外在的装饰物可以解释毛泽东所焕发的力量感。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唱片艺术家身上的一种“颤流”，我得承认自己对此完全感觉不到，但是毛泽东却的确发出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毛主席是改变世界事态进程的一位历史性人物。他对他的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有着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主席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的领导，他对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识的启示，是史无前例的伟大贡献！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

——美籍华裔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人物，每一个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上的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够比得上毛泽东。

——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

毛泽东是世界“革命家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朝鲜人民最亲密的战友。毛泽东同志从早期走上革命斗争道路起一直到今天，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际工人阶级革命事业，建立了伟大的业绩。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此基础上领导党、军队和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的一生和整个斗争历程，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典范，他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解放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朝鲜劳动党前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前主席、朝鲜国防委员会前委员长金日成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像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

——中共中央原主席、国务院原总理、
中央军委原主席华国锋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不朽的业绩就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事业。

毛泽东同志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把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引向胜利。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反对形形色色的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具有坚定原则性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信任，并使她成为他们斗争中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所进行的具有高度原则性的斗争，为各国共产党树立了伟大的榜样，并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最大的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给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以沉重打击。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从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曾经是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中国，今天已经变成伟大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世界革命的堡垒，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热爱和支持，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赢得了极大的尊敬和同情。这就光辉地证明了毛泽东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

——德国共产党前主席奥斯特

毛泽东是“举世无双的政治家”

不论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不论我们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也不论人们是否赞同中国制度的思想，我们只能对善于使中国人民得到应有的尊严的这位举世无双的政治家的功绩表示敬意。

——卢森堡前首相加·托恩

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方面，只有很少数几个人起过像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起的那样巨大的作用。

作为一位实行家和哲学家，他在统一中国的革命中，既提供了实际的领导，又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柱。他经常关心的是亿万中国人民的福利，把提高他们的生活看作自己的责任。

他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知识，是他得以从世界战略出发考虑问题。历史将说，以他的人格和成就而言，他是现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毛泽东的红书里的思想为的是使全国人民产生一种心情去作出更大的努力，提高生产率和增加工农生产，因为中国的前途有赖于此。

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话，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

——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

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为艰苦卓绝、急公好义、勤朴康健、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这主要是由于他虽然以马列主义作为革命建国的理论动力，但他一生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的主义逐步变成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理论实践的光辉体系。

毛主席对中国以外大部分的人类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人类史上很少有像毛主席这样兼通理论实践而又高瞻远瞩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毛主席从二十年代直到目前，在整整半个世纪之中，不断地融会贯通理论与实践，而且自解放以来更着眼于占世界大部分人口和资源的第三世界的现在和将来。毛主席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必会随着第三世界的继续解放和进步而日益崇高。

从客观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何炳棣

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国内动向的原委的一个重要指南！

——埃德加·斯诺

毛泽东主席的业绩是不可估量的，他的威望超越了伟大的人民中国的国界，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

毛泽东主席从发动民族解放斗争、长征直至逝世，为把中国人民从人剥削人的制度下彻底解放出来，使中国人民逐步获得幸福和社会正义而一直坚定、顽强地奋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科学和外交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们不想回顾由于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的英明远见和坚韧不拔精神，革命中国在每一个重大历史时期所写下的光辉篇章，我们只想提及坚定的中国人民经过令人钦佩的不懈努力，不久前在外交上获得的胜利，我们指的是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尽管遭到帝国主义的否认，但是毛泽东的伟大人民中国的威望日益提高，从而使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正义得到了伸张。这是为了承认旨在支持正在进行斗争的各国人民并有利于刚果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年轻国家，巩固独立的积极对外政策的功绩。毛泽东的中国向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的和正在继续提供的真诚、有效和无私的援助表明，今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在非洲占有突出的地位。如果说昨天还有不少非洲国家因为受帝国主义反动宣传的毒害而产生错觉，一想到“黄祸”就发抖的话，那么在今天，由于一国人民和一位伟人的积极外交，中国人民已成为第三世界人民的真诚朋友。

毛泽东主席永远是革命的不朽形象和象征。

——刚果前总统恩古瓦比

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伟大的战略家”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哪个领袖能像他这样在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菲利普·戴维逊

粉碎第三次“围剿”的特点是，充分发挥了毛主席灵活机动之战略战术方针。三个月的艰苦战斗，战胜了十倍之敌。以相对劣势装备和绝对劣势兵力，无后方接济的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造了古今中外没有过的一套新的战略战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库中新的发展——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常讲的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帝国主义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仍然是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抗日战争，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二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设想的。

——中国国务院原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彭德怀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业，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

——中共中央原总书记、国家原主席、
中央军委原主席江泽民

毛主席留下的思想和业绩，对今后的中国来说，肯定成为支撑它的基础，是一盏伟大的指路明灯。

——日本前总理大臣大平正芳

毛的一生，也许超过所有其他人，已经使全世界的穷人产生了强烈的和日益增长的革命要求。他发动了全球性的斗争。

——尼克松之女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毛泽东是一位“天才的统帅”

看来他（毛泽东）是一位天才的统帅，……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和雄才大略。中国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的领袖。

——苏共中央前总书记、苏联前最高军事统帅斯大林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高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循着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之一；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最杰出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名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

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中共中央原副主席、国家原主席刘少奇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我国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当作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们活学活用毛泽东同志著作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学习运动，已经在政治、思想、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开创了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纪元。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切地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战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最强大武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胜利的旗帜！

——中共中央原副主席、国务院原总理周恩来

兴旺的中国是毛泽东“永久的纪念碑”

他（毛泽东）漫长的一生和壮丽的事业记录了许多方面的独特成就。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他的指引和鼓舞下，中国重新赢得了民族尊严和国际威望。由于他的指引，近年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开始起重大的作用。兴旺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澳大利亚前总理弗雷泽

毛泽东的一生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他不仅具有战士的朝气蓬勃的精神和正直的品德，而且具有一位政治领袖的勇气和智慧。他成功地领导中华民族取得了卓越的胜利，使中华民族重新赢得了在世界上的应有的地位。毛泽东主席的名字将永载史册，同许多无法想象的伟大事业的实现连在一起。如：不畏路途遥远、天气恶劣和天然障碍而进行的横越中国的长征，把广大中国人民从贫困、饥饿和社会弊端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得到发展，建设一个走向努力工作、进步和正义的新中国社会。毛泽东主席恢复了中国保持自己本色的意识，正如几千年文明所培育出来的那样，也正如当今时代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毛泽东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民族依靠纪律、劳动和民族禀赋而消除了不发达状况的范例，并以此而载入史册。

——突尼斯前总统布尔吉巴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例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便会被视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20世纪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几乎像毛泽东本人支配着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一样，毛泽东的幽灵也还支配着新时代的政治意识。

——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

对于伟大友好的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主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性革命的开拓者，是领路人，是伟大的孜孜不倦的舵手，是他使中国有了今天。

——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

作为改变了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民生活的中国革命之父，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人类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巴基斯坦前总统齐德里

杰出的革命家、中国人民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把他的整个一生献给了争取现代中国的自由、独立、创建和发展的斗争，几十年来一直领导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杰出的领袖。如果没有他，现代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南斯拉夫前总统铁托

目　录

凡例……1

世界人民的金典（前言）……张迪杰　5

世界名著中的瑰宝（序言）……张迪杰 13

杂言诗·迎春……3

（1901年）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一）……11

（1902年）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二）……15

（1903年）

五言诗·井赞……19

（1906年）

五古·咏指甲花……23

（1907年）

杂言诗·耕田乐……25

（1907年）

七绝·呈父亲……31

（1910年）

七绝·咏蛙……34

（1910年）

和东山小学堂先生应对联……35

（1910年）

和萧三应对联 ……………………………………………37
（1910年秋）
和萧三的谈话 ……………………………………………38
（1910年）
看报谈话 …………………………………………………39
（1910年）
商鞅徙木立信论 …………………………………………43
（1912年6月）
五言诗·登高泛海* ………………………………………49
（1913年10月）
讲堂录 ……………………………………………………50
（1913年10月至12月）
五言排律·湘江漫游联句 ………………………………109
（1914年）
给文咏昌的信……………………………………………113
（1915年2月24日）
杨昌济记毛泽东的谈话…………………………………115
（1915年4月5日）
悼友人易咏畦……………………………………………116
（1915年5月）
五古·挽易昌陶 …………………………………………117
（1915年5月）
给湘生的信………………………………………………121
（1915年6月25日）
《明耻篇》题志 …………………………………………125
（1915年夏）

给友人的信……129

（1915年7月）

给萧子升的信……132

（1915年8月3日）

给萧子升的信……134

（1915年8月）

给萧子升的信……137

（1915年9月6日）

给萧子升的信……143

（1915年9月27日）

征友启事……145

（1915年9月）

给黎锦熙的信……146

（1915年11月9日）

给萧子升的信……149

（1915年冬）

五律·登云麓宫联句……151

（1915年）

杂言诗·游泳启事……153

（1915年）

治学联……154

（1915年）

贺廖廷璇、皮述莲同学新婚联……155

（1915年）

赠毛泽建联……156

（1915年）

给萧子升的信……159
（1916年1月28日）
给萧子升的信……160
（1916年2月19日）
给萧子升的信……161
（1916年2月29日）
挽吴竹圃联……162
(1916年5月)
给萧子升的信……163
（1916年6月24日）
给萧子升的信……164
（1916年6月26日）
给萧子升的信……166
（1916年7月18日）
给萧子升的信……171
（1916年7月25日）
给黎锦熙的信……179
（1916年12月9日）
怎样看待别人……182
（1916年）
给白浪滔天的信……187
（1917年春）
体育之研究……188
（1917年4月1日）
赠王熙联……203
（1917年夏）

《一切入一》序 ……………………………………………205
（1917年夏）
和夏默安应对联……………………………………………209
（1917年夏）
给黎锦熙的信………………………………………………210
(1917年8月23日)
国文教授案…………………………………………………218
（1917年9月）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220
（1917年9月）
夜学招学广告………………………………………………223
（1917年10月30日）
夜学日志首卷………………………………………………227
（1917年11月）
七律·游学即景 ……………………………………………240
（1917年）
七绝·赠刘翰林联句 ………………………………………241
（1917年）
五言诗·玉潭即景联句 ……………………………………242
（1917年）
四言诗·露宿 ………………………………………………243
（1917年）
四言诗·题安化北宝塔壁 …………………………………244
（1917年）
七古·游泳 …………………………………………………245
（1917年）

五律·赠周世钊 ……………………………………………………………247
（1917年）
四言诗·奋斗 ………………………………………………………………248
（1917年）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病故同学追悼会联………………………………249
（1917年）
挽某同学联……………………………………………………………………250
（1917年）
心之力…………………………………………………………………………251
（1917年）
《伦理学原理》批注 ……………………………………………………256
（1917年至1918年）
夜学招学广告…………………………………………………………………413
（1918年3月2日）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415
（1918年4月）
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418
（1918年5月29日）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礼堂联…………………………………425
（1918年）
给罗学瓒的信…………………………………………………………………426
（1918年8月11日）
给七、八舅父的信…………………………………………………………429
（1918年8月）
七绝·魏都怀古 ……………………………………………………………430
（1918年8月18日）

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的讲话……………………435
（1919年初）
五言诗·大沽口观海 ………………………………………………438
（1919年3月12日）
给七、八舅父母的信………………………………………………440
（1919年4月28日）
《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443
（1919年7月14日）
各国的罢工风潮……………………………………………………450
（1919年7月14日）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455
（1919年7月14日）
强叫化………………………………………………………………460
（1919年7月14日）
研究过激党…………………………………………………………461
（1919年7月14日）
实行封锁……………………………………………………………462
（1919年7月14日）
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463
（1919年7月14日）
阿富汗执戈而起……………………………………………………464
（1919年7月14日）
来因共和国是丑国…………………………………………………465
（1919年7月14日）
好个民族自决………………………………………………………466
（1919年7月14日）

可怜的威尔逊……467
（1919年7月14日）
炸弹暴举……468
（1919年7月14日）
不许实业专制……469
（1919年7月14日）
割地赔偿不两全……470
（1919年7月14日）
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471
（1919年7月14日）
彭斯坦……472
（1919年7月14日）
各国没有明伦堂……473
（1919年7月14日）
什么是民国所宜?……474
（1919年7月14日）

1901

毛泽东出生地——湖南湘潭韶山冲上屋场。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这里诞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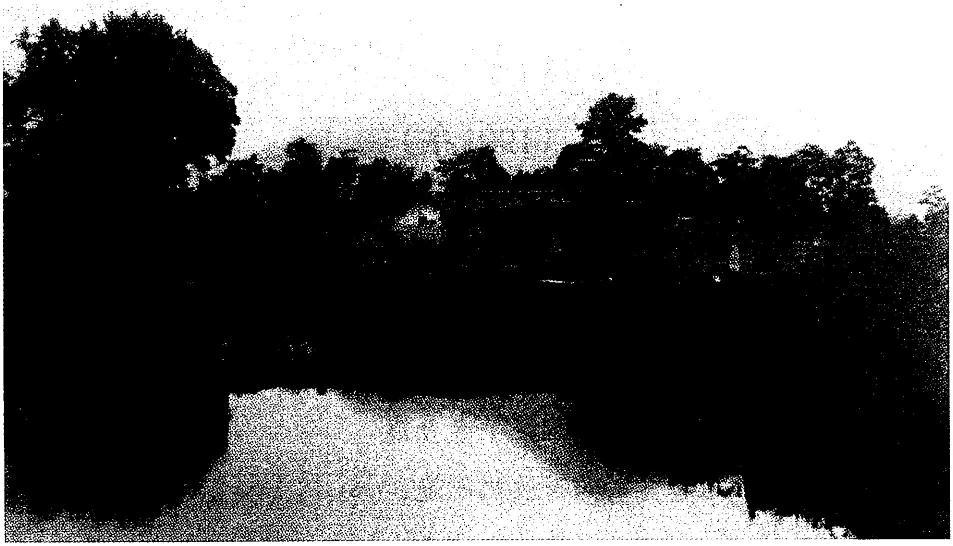
杂言诗·迎春[1]

（19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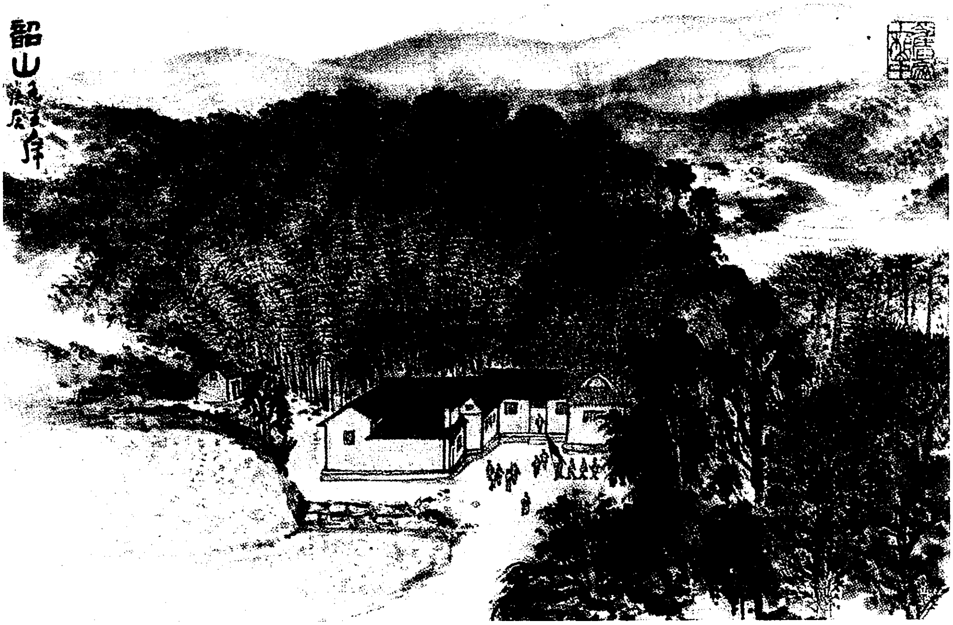
狮子眼鼓鼓，
擦菜子煮豆腐。
酒放热气烧，
肉放烂些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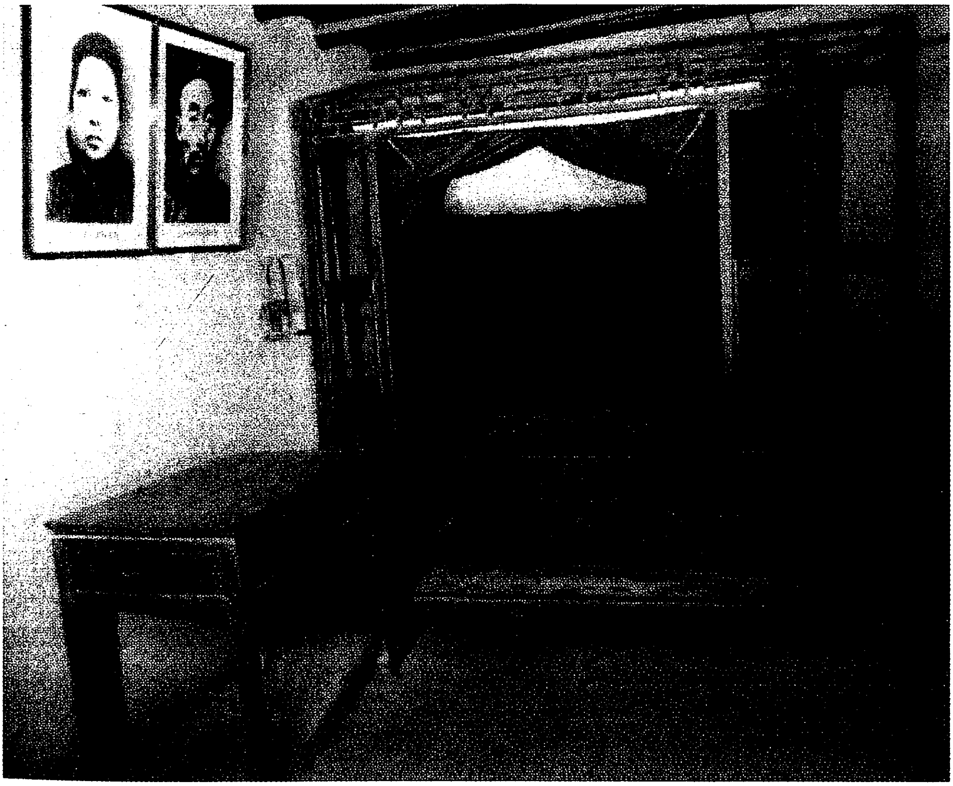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满8岁那年，随母亲到外婆家去拜年，正遇锣鼓鞭炮昼夜不停，龙灯狮舞接连不断，外公指着狮子笑着说：“润之，你若能赞狮子，外公再给你一块压岁钱。”毛泽东听了，立即爬上桌子，不慌不忙地唱了起来。这首顺口溜反映了当地农民过年的习俗和毛泽东幼年时欢快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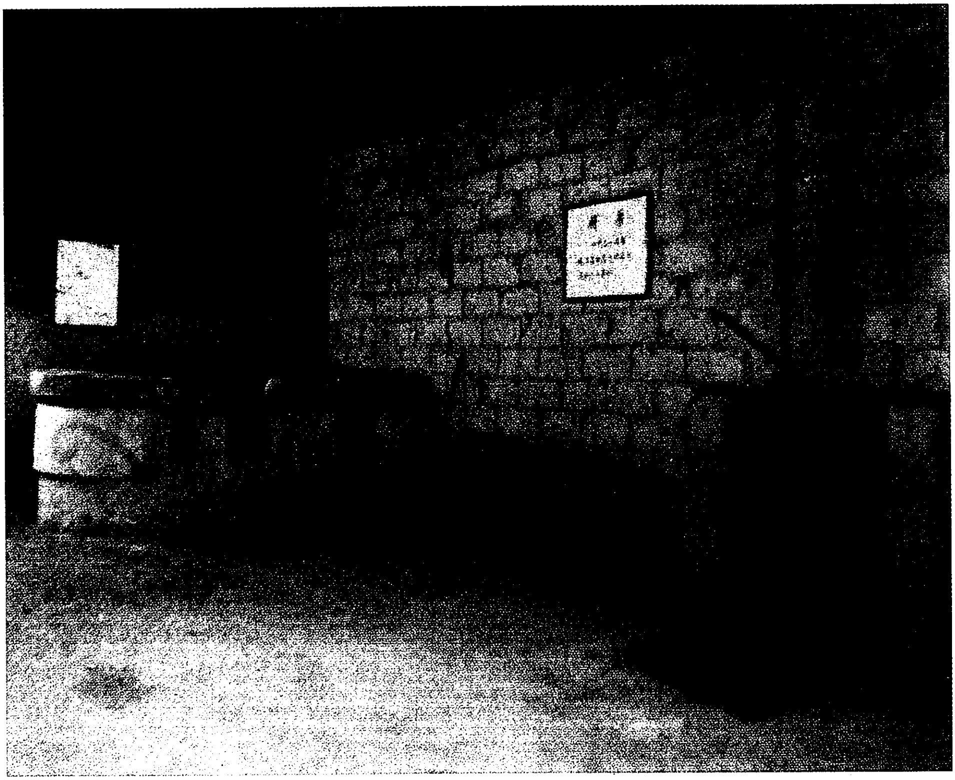
毛泽东外祖家的居住地——唐家坨。毛泽东的童年主要在这里度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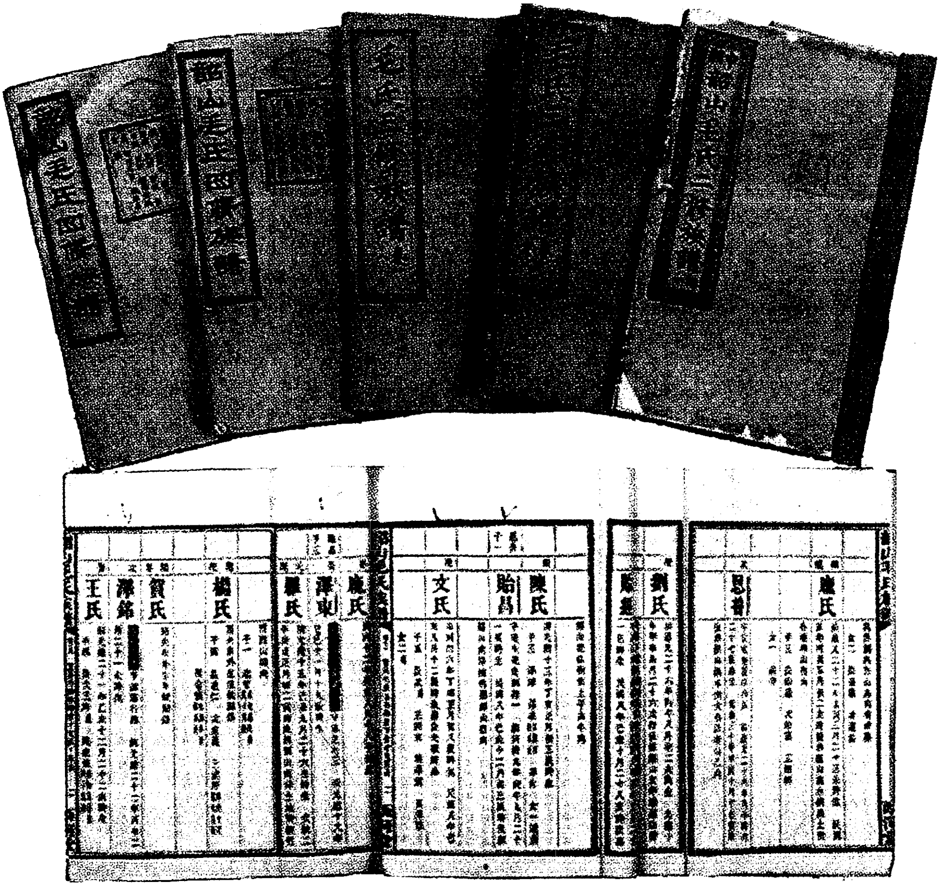
《韶山毛主席旧居》（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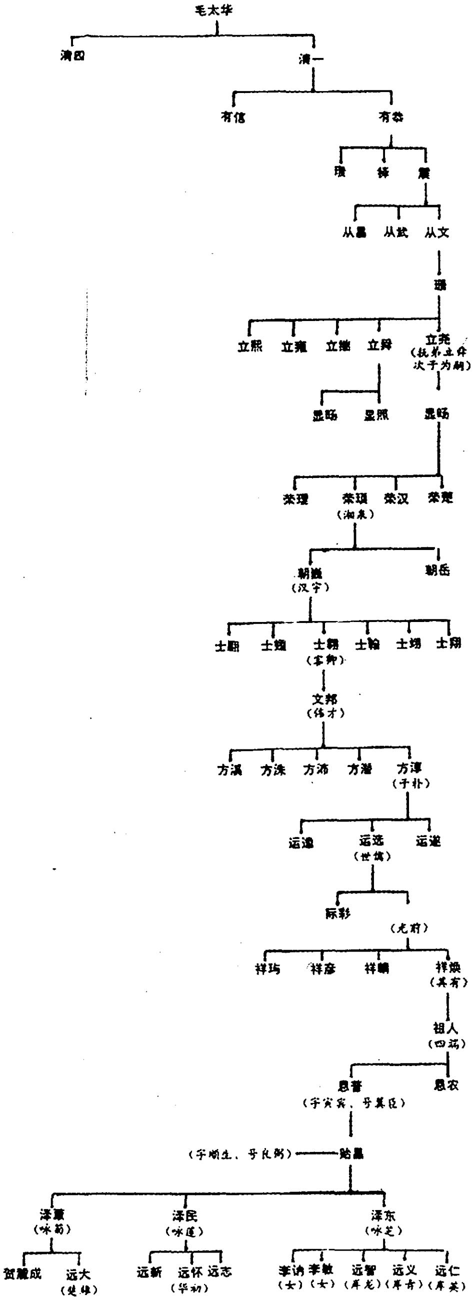
毛泽东父母的卧室。毛泽东就诞生在这里。



毛泽东故居中的厨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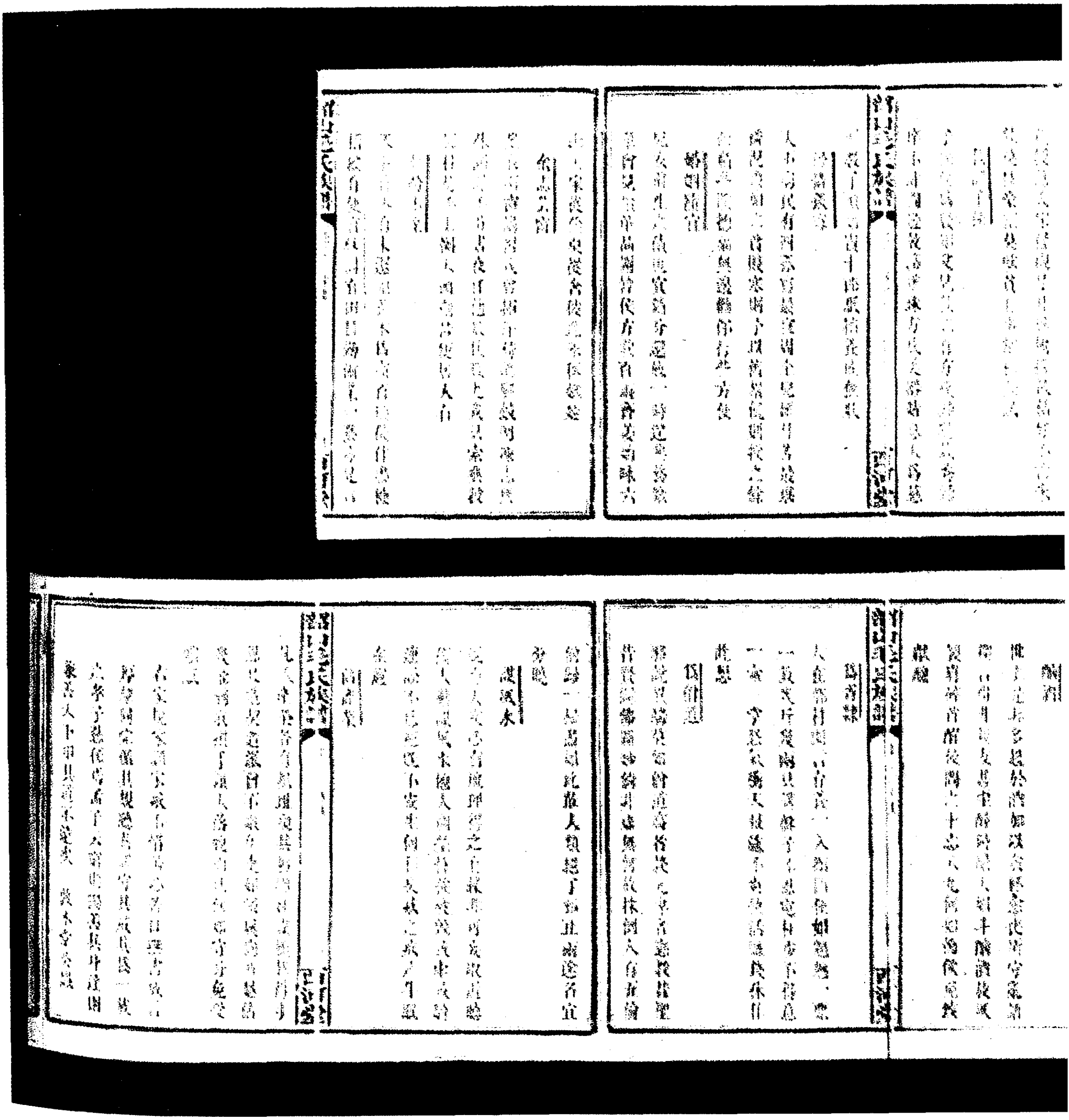
韶山毛氏族谱及毛泽东祖上三代的记载。


毛太华
清四
清一
有信
有恭
琼
铎
震
从嘉
从斌
从文
璠
立熙
立雍
立缙
立舜
立尧
（抚弟立舜次子为嗣）
显旸
显照
显旸
荣理
荣琐
（湘泉）
荣汉
荣楚
朝谧
（汉宇）
朝岳
士聪
士魁
士翱
（宗御）
士翰
士瑒
士翔
文邦
（伟才）
方溪
方洙
方沛
方澄
方潭
（子朴）
运遴
运选
（世祺）
运逵
际彰
（尤府）
祥玙
祥彦
祥鹏
祥焕
（其有）
祖人
（四端）
恩普
（字寅宾、号翼臣）
恩农
（字顺生、号良弼）
贻昌
泽覃
（咏菊）
泽民
（咏莲）
泽东
（咏芝）
贺麓成
远大
（楚雄）
远新
远怀
（华初）
远志
李讷
（女）
李敏
（女）
远智
（岸龙）
远义
（岸青）
远仁
（岸英）

说明：① 毛太华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太华夫妇携长子、四子入楚省，居湘乡，后清一、清四定居韶山

② 此表只列至韶山毛姓二十一派，非毛泽东家直系者从略，配偶、女系均略。

毛泽东世系延流表。



毛氏族谱之家训、家戒。

官箴十則

端正心田

一生受用不盡只是中路心田[illegible]

[illegible]

品行[illegible]

[illegible]

孝義父母

[illegible]

友愛弟兄

[illegible]

[illegible]

戒規十則

[illegible]

人[illegible]

[illegible]

爭訟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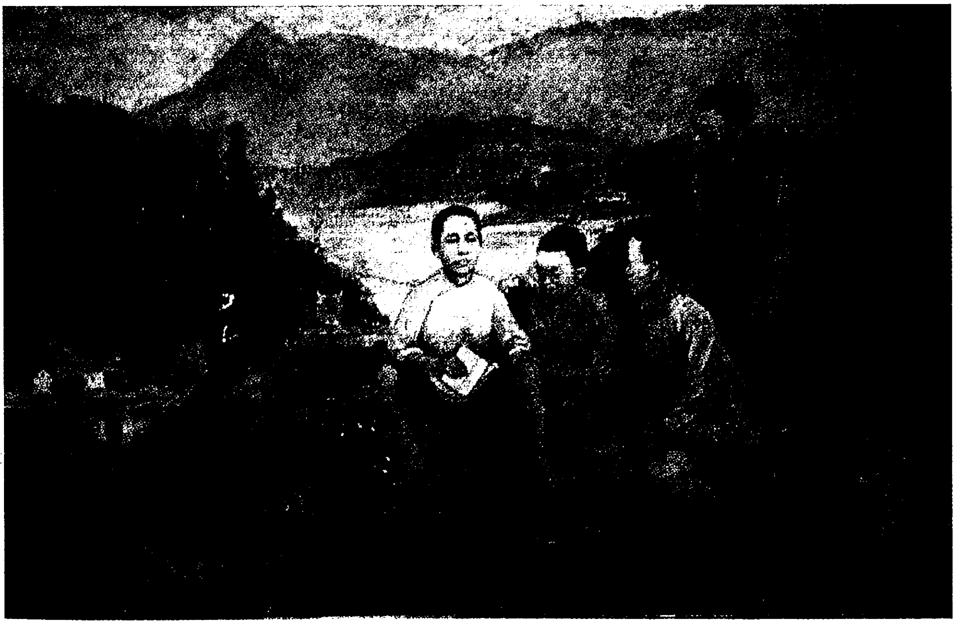
賭博

[illegible]

殺牲

[illegible]

1902



《私塾学习》（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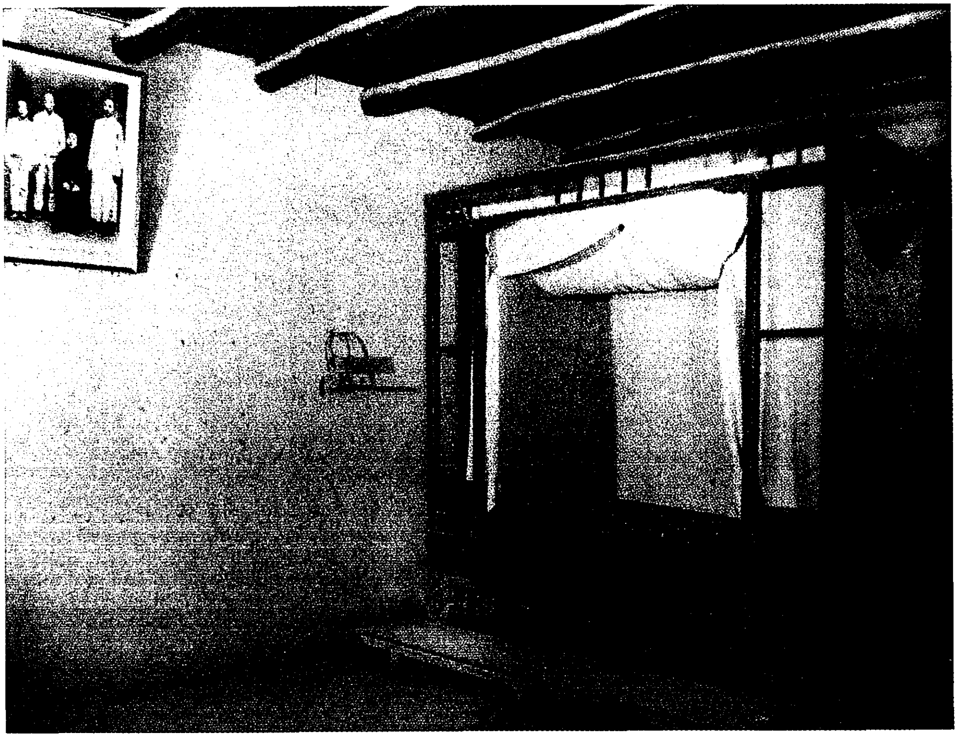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一）[1]

（1902年）

濯足；（邹春培）
修身。（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和私塾先生的应对联。1902年春，毛泽东从唐家圫外祖父家回韶山，入南岸私塾读书，启蒙老师是邹春培。一天，邹春培先生因事外出，嘱学生背书。但是，先生回馆一看，却见毛泽东和几个孩子在塘中戏水。先生好生气恼，把毛泽东和几个孩子叫到跟前，指着他们的泥巴脚丫子，念出上联要他们对，对得好，可免于打板子，毛泽东灵机一动，脱口对出了下联。先生听了，不禁暗暗点头赞叹。邹春培，1902年春至1904年秋，毛泽东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时的老师。



少年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常在晚上把门窗遮起来念书，不让父亲看到灯光。

1903

韶山毛氏宗祠。

和邹春培先生应对联（之二）[1]

（19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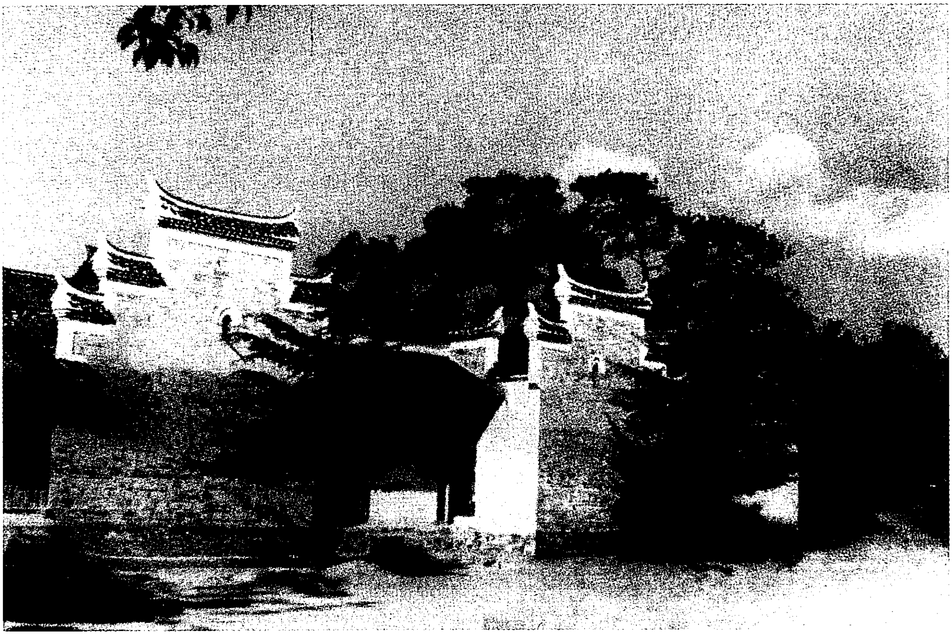
牛皮菜[2]；（邹春培）
马齿苋[3]。（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和私塾先生的应对联。

[2] 牛皮菜，学名“叶用莙菜”，又名“莙荙菜”“厚皮菜”，属藜科，莙菜的变种之一，二年生，草本。植株矮生或直立，根小，叶片卵形，肥厚，有光泽，色淡绿或浓绿，叶柄有长者也有短者。种子小，肾形，褐色。适应性强，春秋季节栽培为主。

[3] 马齿苋，马齿苋科。一年生肉质草本，通常匍匐，无毛，茎常带紫色，叶对生，倒卵状楔形。夏季开花，花小型，黄色。蒴果圆锥形，盖裂。生于原野，我国分布甚广。茎、叶可作蔬菜或家畜饲料，中医学上以全草入药，性寒味酸，清热、解毒、消肿，主治痢疾、疮疡等症。



毛泽东少年时最初入学就读处——南岸私塾。

1906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在此水井旁用井水冲凉，以锻炼体魄。

五言诗·井赞[1]

（1906年）

天井[2]四四方，
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3]，
小鱼囿中央[4]。
只喝井里水，
永远养不长[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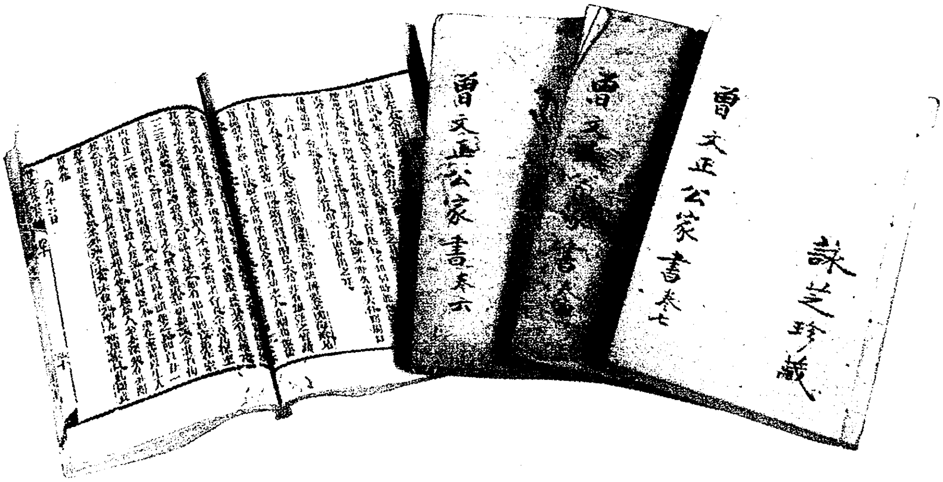
[1] 五言诗，中国古代诗体的一种。每句五字，包括五古、五律、五绝、五排。《诗经》《楚辞》和其他古歌谣中已有五言句式，到汉代才出现整首是五言的诗体，唐代以来有五言律体。这首诗首句押韵，不拘平仄，格律比较自由。

[2] 天井，宅院中房子与房子或房子与围墙所围成的露天空地，形状似井，故名。

[3] 清清，指水清。卵石，卵形、圆形或椭圆形的石块，铺于井底有助于防止井底泥土上泛，保持井水澄清。

[4] 囿，局限。中央，中间。这里指小鱼局限在井中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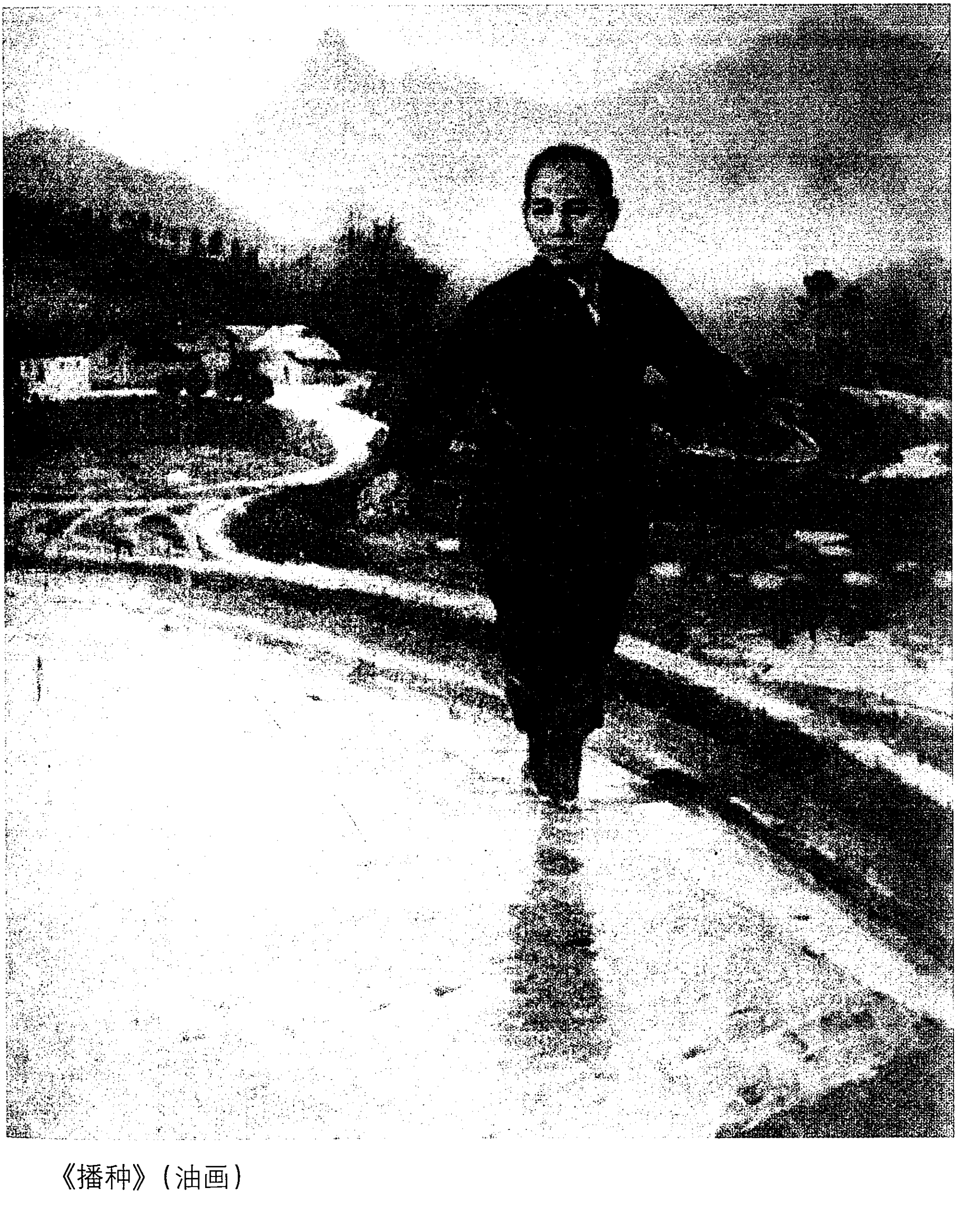
[5] 长，指长大。养不长，指只能生存，不会长大。


曾文正公家書卷六
曾文正公家書卷七
詠芝珍藏

毛泽东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

毛泽东读过的部分作品。

1907



《播种》（油画）

五古·咏指甲花[1]

（1907年）

百花皆竞春，
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
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
种类多且妍。
万草被日出，
惟婢傲火天。
渊明爱逸菊[2]，

---

[1] 毛泽东少年时在外婆家唐家圫，到附近的保安寺游玩、赏花时，吟得此诗。这首诗咏花言志，显露出毛泽东坚韧非凡的志趣和精神境界。这首诗在写作技巧上相当纯熟，表明少年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已有较厚的文字功底。指甲花，学名凤仙花。一年生草本植物，夏季开花，品种颇多，可供观赏，花与种子均可入药，花捣碎可染指甲，故名指甲花。

[2] 渊明，即陶渊明。渊明爱逸菊，陶渊明诗中一再写到菊，《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即为其名句。逸，隐逸。隐逸者，隐居之士。菊花在许多花草枯萎之时独吐幽芳，如同隐逸之士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隐居避世。

敦颐爱青莲[1]。
我独爱指甲，
取其志更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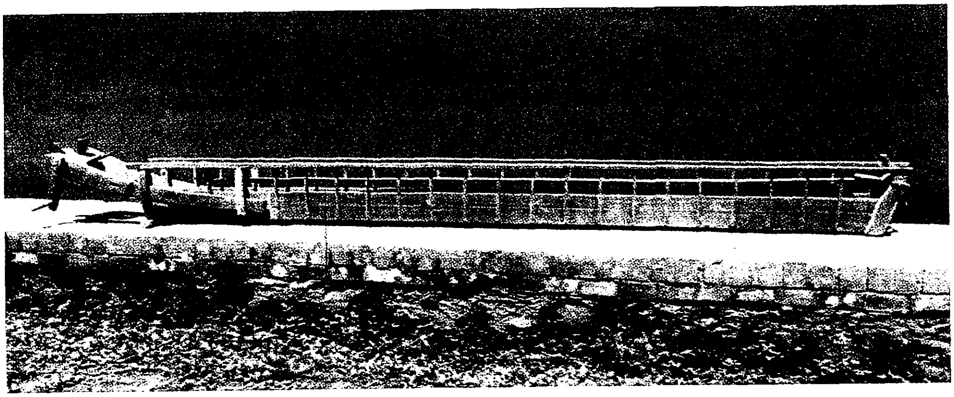
---

[1] 敦颐，即周敦颐（1017—1073），北宋哲学家。字茂叔，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曾官大理寺丞、国子博士。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的小溪上，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后人遂称濂溪先生。周敦颐爱青莲，著有《爱莲说》一文，文中赞美莲：“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又说：“莲，花之君子者也。”

杂言诗·耕田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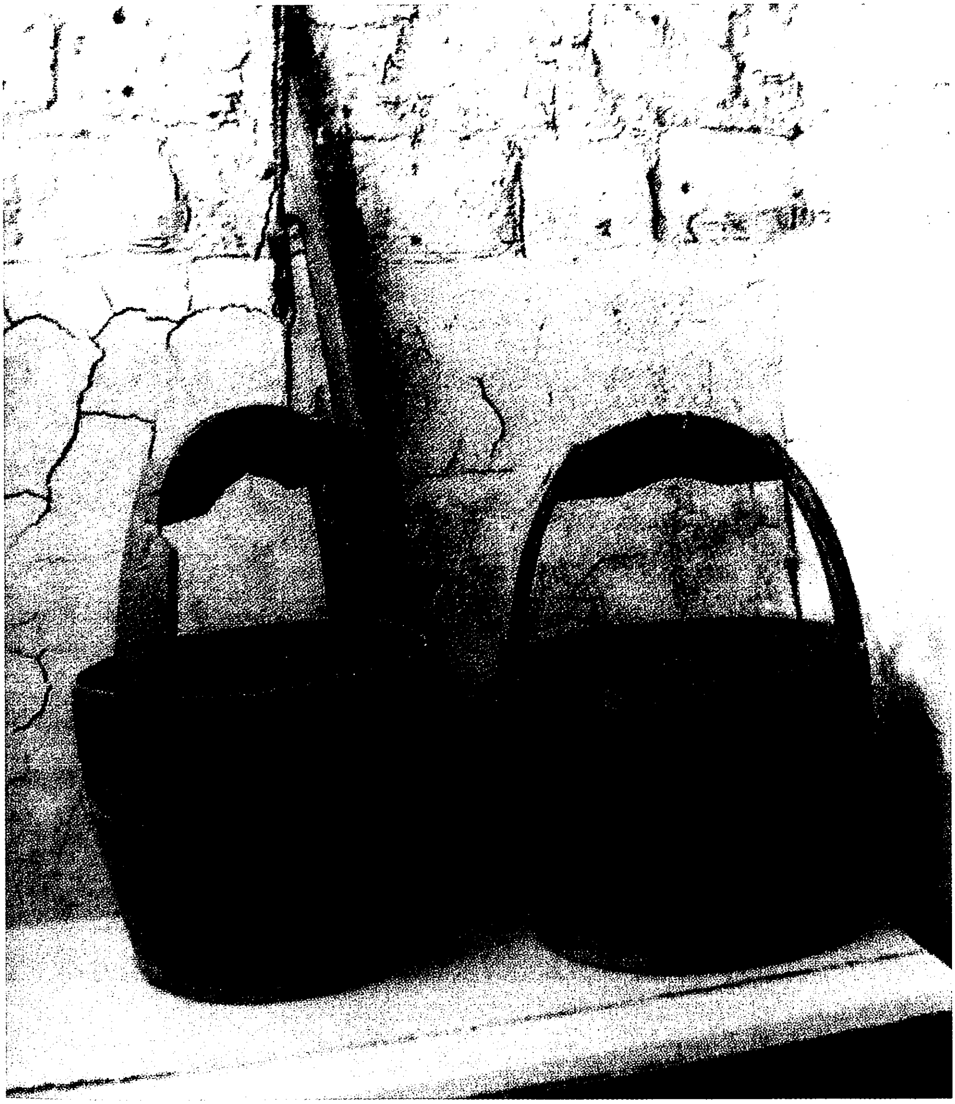
（1907年）

耕田乐，
天天有事做。
近冲一墩田，
近水再墩望，
多年副产积满仓。
农事毕，
读书甚馨香，
坐待时机自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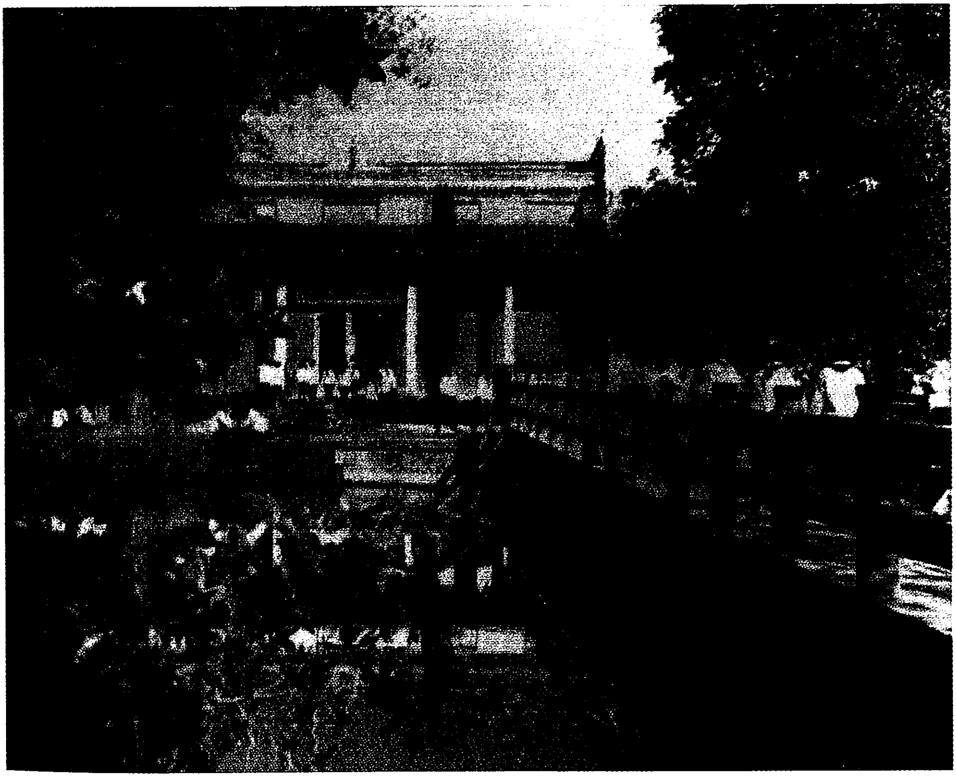
毛泽东使用过的水车。

毛泽东耕种过的稻田。



毛泽东少年时挑水用过的水桶。

1910



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曾在这里学习。

七绝·呈父亲[1]

（1910年）

孩儿立志出乡关[2]，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3]，
人生无处不青山[4]。

---

[1] 七绝，七言绝句的简称。父亲，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1870—1920），字顺生，号良弼。生于清代同治九年九月二十一日（1870年10月5日），卒于民国八年十二月初三（1920年1月23日），时年50岁。

[2] 乡关，家乡，故乡。

[3] 桑梓，古代家宅旁边常栽桑树和梓树，看见桑梓，容易引起对父母的怀念，后用作故乡的代称。埋骨何须桑梓地，意思是说，人死之后，何必一定要埋在家乡。

[4] 青山，象征祖国山河秀丽。人生无处不青山，意思是接上句说，祖国到处都是秀丽的河山，可以作为安息的地方。这两句也就是大丈夫志在四方，好男儿四海为家的意思。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

七绝·咏蛙

（1910年）

独坐池塘如虎踞[1]，
绿荫树下养精神[2]。
春来[3]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

[1] 独，单独。独坐，这里有雄踞一方的意思。踞，蹲或坐。虎踞，指蛙像虎那样蹲着，有赞美之意。

[2] 绿荫树下养精神，指青蛙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伺机捕获猎物。

[3] 来，助词，无实义。春来，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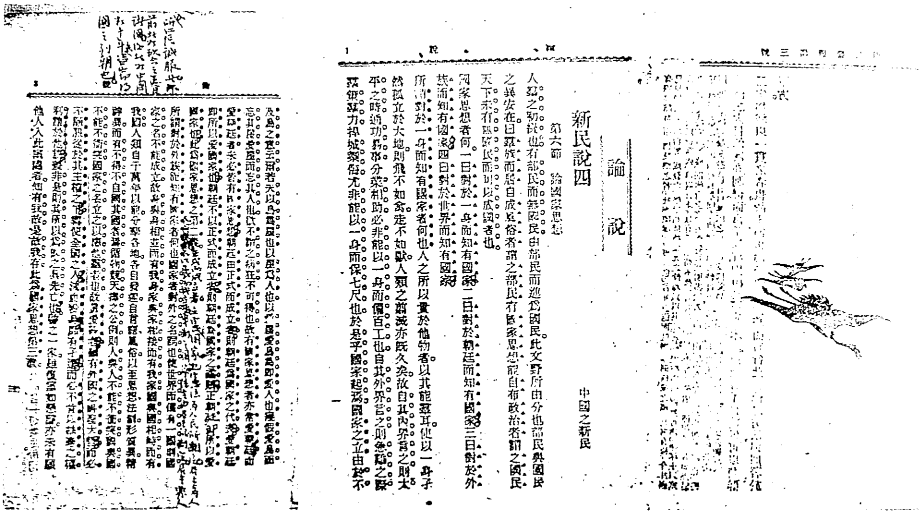
和东山小学堂先生应对联[1]

（1910年）

跳跳跳，跳下地；（东山小学堂先生）
飞飞飞，飞上天。（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和东山小学堂先生的应对联。1910年秋，毛泽东来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一次，课中老师因忘记带一件教具，出教室去拿。毛泽东见老师走出教室，就箭一般跑到讲台前，纵身跳上讲台，学着他看过的一些书中造反人物的样子，向大家作起演说来。猛听屋外脚步声，他赶忙跳下，溜回座位。老师回到课堂，严肃地扫视众人一遍，然后说：“今日不能对出我的对子，我就要追查刚才踩坏讲台的这个人！”他朗声道：“跳跳跳，跳下地。”大家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只听毛泽东对道：“飞飞飞，飞上天。”老师忘记了责备，情不自禁地赞道：“好！飞上天好！”



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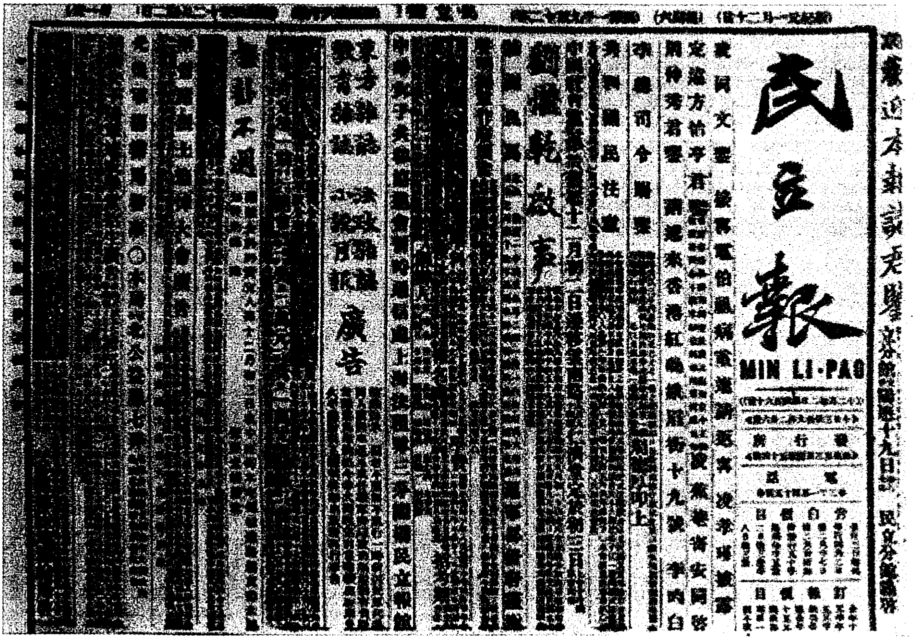
新民說四

中國之新民

第六節　論國家思想

人羣之初級也。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爲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羣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所謂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貴於他物者。以其能羣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於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之澌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羣策羣力。捍城禦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於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於不

梁启超在日本编印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在东山小学时看过此报。



民立報
MIN LI-PAO

毛泽东读过的《民立报》。

和萧三应对联[1]

（1910年秋）

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萧三）
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毛泽东）

---

[1] 1910年秋，毛泽东从韶山到外祖父家，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当时萧三于两年前就读该校。此时毛泽东16岁，萧三13岁，毛泽东得知萧三有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前去借阅。萧三说：“我借书很讲究，有三种人不借。”毛泽东说：“小弟愿意领教。”萧三立刻数出：“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我出上联对不出下联者不借。”毛泽东笑着回答：“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读书心切，请仁兄出上联吧。”萧三便借题发挥，以试其才，说：“书中讲的都是英雄豪杰，上联是：‘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毛泽东略加沉思，从容对出下联：“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萧三听到下联后，满脸羞得通红，低下头说：“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地久天长！”说完马上取书借给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和萧三结成莫逆之交。萧三（1896—1983），湖南湘乡人。原名萧子暲，又名萧植蕃，曾用笔名埃弥·萧、爱梅等。萧瑜之弟，曾与毛泽东同学。

和萧三的谈话[1]

（1910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2]，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疲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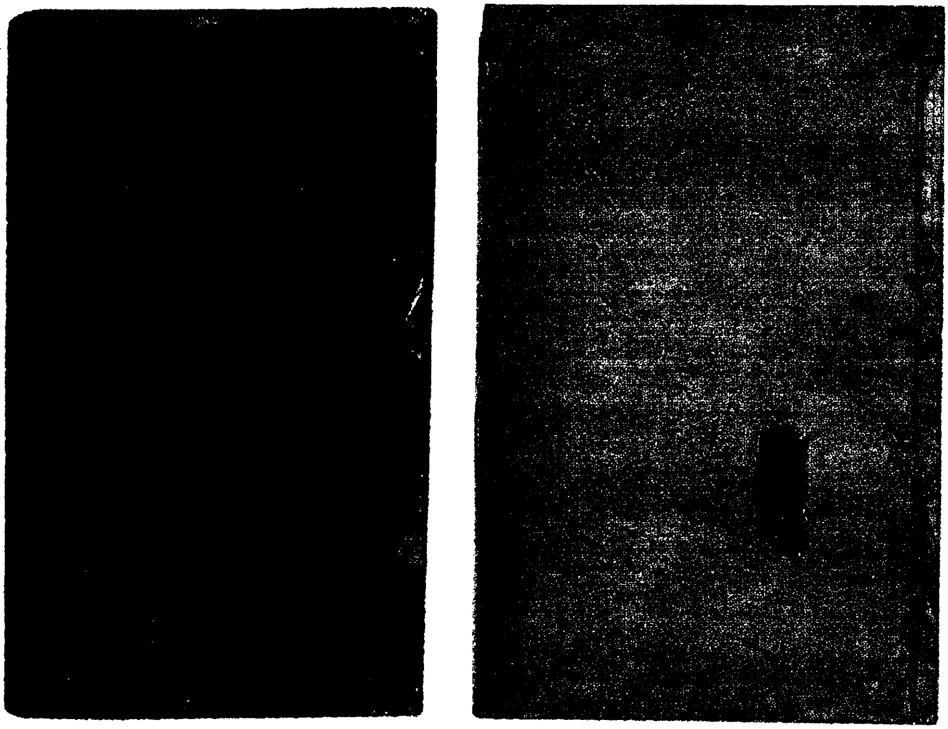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1910年在东山学堂读《世界英雄豪杰传》一书时，和书的主人萧子暲的谈话。

[2] 指书中的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人。

看报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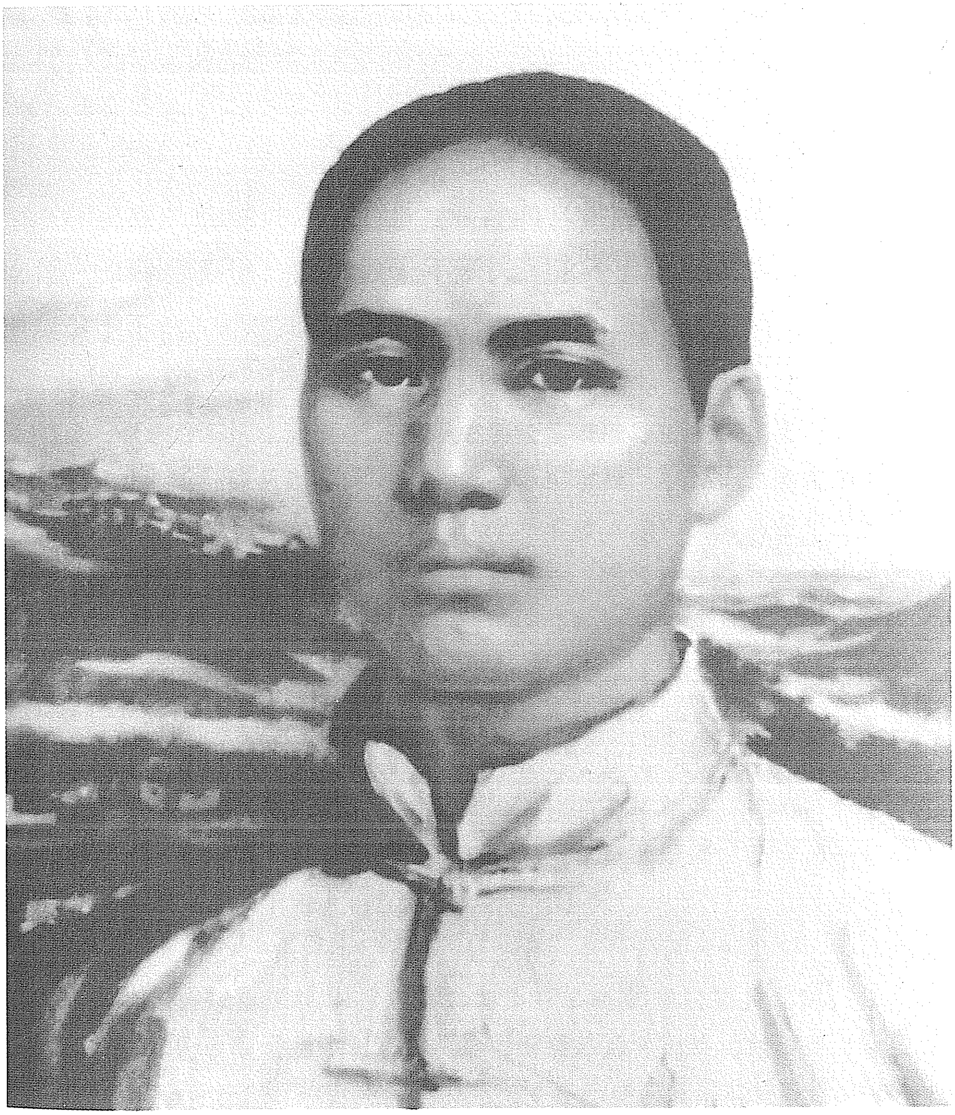
（1910年）

我学习写英文，再则，我把各国所有的城市、港口、海洋、江河、山岳的名称记熟，还有最重要的，报纸是活的历史，读他又可以增许多知识。



少年毛泽东读过的《诗经》和《论语》。

1912



《青年毛泽东》（油画）

商鞅徙木立信论[1]

（1912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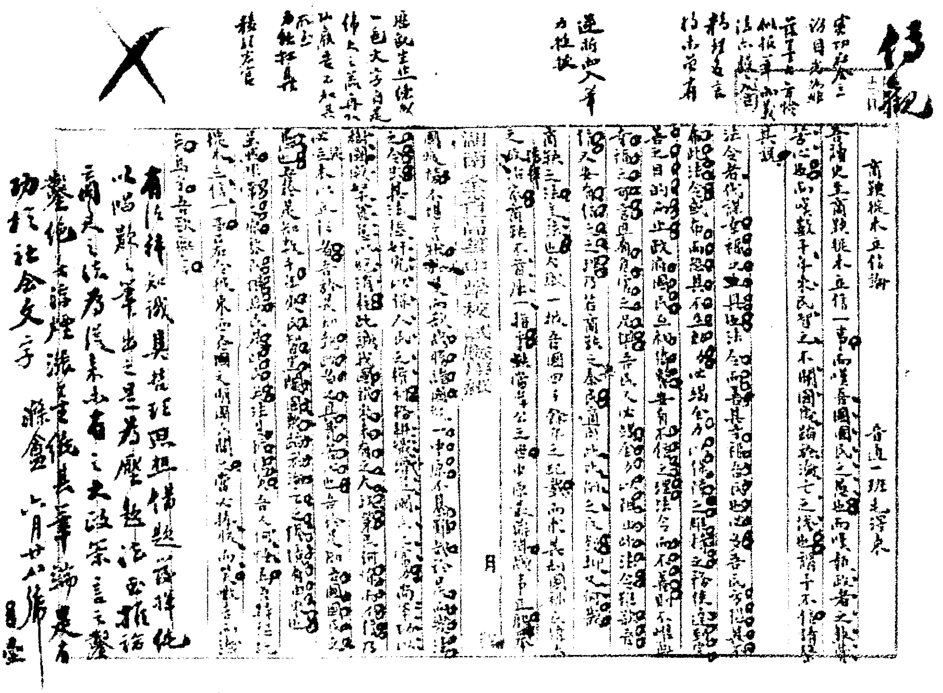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2]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

[1]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原文无写作时间。作文纸折缝间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字样，作者在题下写有“普通一班毛泽东”七字。毛泽东于1912年春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同年秋即退学自修，此文当写于1912年上半年。国文教员阅后在多处写有评语，并批给同学“传观”。这些评语是：“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还写有以下总评：“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落款为“涤盦六月廿八号”。

[2]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战国时卫国人，亦称卫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后入秦，向秦孝公进献富国强兵之策，任左庶长、大良造，先后两次主持变法，使秦国富强。后又因战功封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号商君，故称商鞅。孝公死，被公子虔诬陷，车裂而亡。据《史记》记载：商鞅变法，恐民不信，乃在国都南门立三丈之木，募民能徙置北门者赐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又下令，能徙者赐五十金。后有一人徙之，即赐五十金，以示不欺，于是颁布新法，令行于民。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毛泽东在学校读书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

商鞅之法[1]，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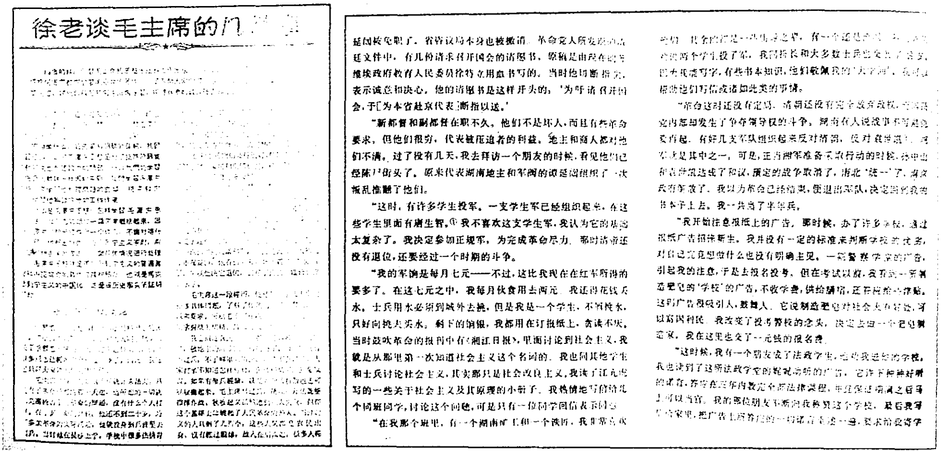
---

[1] 商鞅之法，指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所制定的新法。其主要内容为：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合并乡、邑、镇为县，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赋，按军功授爵，统一度量衡。

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典，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乎！吾欲无言。

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了一名列兵。图为革命军开赴前线，准备对清军作战。



徐老谈毛主席的门

廷剥夺官职了。省咨议局本身也被撤销。革命党人所发现的清廷文件中，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请愿书，原稿是由现在的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用血书写的。当时他切断指尖，表示诚意和决心。他的请愿书是这样开头的：'为吁请召开国会，予已为本省赴京代表断指以送。'

"新都督和副都督在职不久。他们不是坏人，而且有些革命要求，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都对他们不满。过了没有几天，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陈尸街头了。原来代表湖南地主和军阀的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叛乱推翻了他们。

"这时，有许多学生投军。一支学生军已经组织起来，在这些学生里面有唐生智。① 我不喜欢这支学生军，我认为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参加正规军，为完成革命尽力。那时清帝还没有退位，还要经过一个时期的斗争。

"我的军饷是每月七元——不过，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要多了。在这七元之中，我每月伙食用去两元。我还得花钱买水。士兵用水必须到城外去挑，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屑挑水，只好向挑夫买水。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订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可是只有一位同学回信表示同意。

"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非常喜欢他们。其余的都是一些[illegible]之辈，有一个还是[illegible]。我另外又劝两个学生投了军。我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也交上了朋友，因为我能写字，有些书本知识，他们敬佩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这时还没有定局。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国民党内部却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湖南有人说战事不可避免要再起。有好几支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军准备采取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办了许多学校，通过报纸广告招徕新生。我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来判断学校的优劣，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没有明确主见。一则警察学堂的广告，引起我的注意，于是去报名投考。但在考试以前，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则广告很吸引人，鼓舞人。它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当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这时候，我有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进他的学校。我也读到了这所法政学堂的娓娓动听的广告，它许下种种好听的诺言，答应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且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我的那位朋友不断向我称赞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上所答应的一切诺言重述一遍，要求给我寄学

徐特立对毛泽东参加新军的回忆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参加新军的记述。

1913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图为他在该校预科读书时的照片。

五言诗·登高泛海*

（1913年10月）

登祝融之峰，
一览众山小。
泛黄勃之海，
启瞬江湖失。

讲堂录[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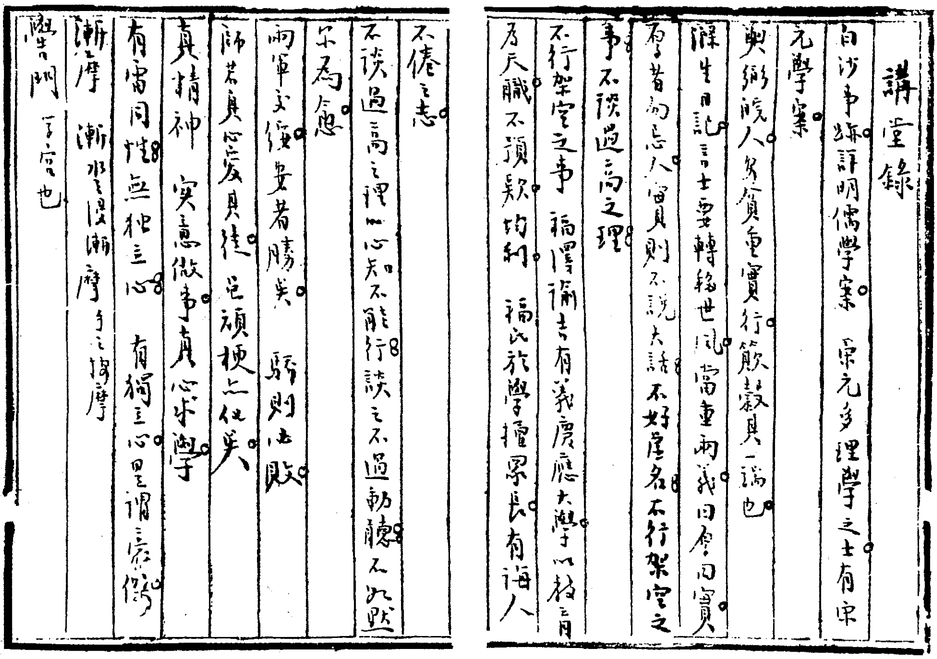
（1913年10月至12月）

---

[1]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现在保存下来的很少，只有47页，94面。笔记用的是直书九行纸本，前11页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后36页冠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也包括一些读书札记。收入本篇的是《讲堂录》部分。记录时间是10月至12月，原件未标明年份。经考证，其中修身课记录内容，很多与杨昌济有关著作内容相同，可能是听杨昌济讲课时的记录；而国文课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听讲韩愈文章的课堂记录，也有毛泽东自己阅读韩文的笔记。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时曾说，他的国文教员袁仲谦不赞成他学梁启超的文体，他便转而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文体。因此这一部分可能是听袁仲谦讲国文课的记录。毛泽东是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据1914年出版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览》记载，1913年杨昌济在四师教预科修身，而袁仲谦则任预科国文、习字教员。1914年2月，四师合并于一师，这时杨、袁二人到一师继续任教。这年7月，袁仲谦“因期满退职”，不在一师任教。而《讲堂录》中修身与国文两课的记录是相互穿插的，这只有1913年下半年杨昌济和袁仲谦同时在四师任教时才有可能。据此，可以认定此课堂记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第四师范学校读预科时所录。本篇前面部分主要是修身和国文的课堂记录，也有少量算术课记录；后面部分则主要是读韩文的笔记。记录中的文句凡能找到出处者，均予注明。

白沙事迹，详《明儒学案》。宋元多理学之士，有《宋元学案》。[1]

与弼皖人，安贫重实行，簸〈簸〉谷其一端也。[2]



講堂錄

白沙事跡詳明儒學案。宋元多理學之士有宋元學案。

與弼皖人。安貧重實行。簸穀其一端也。

濂溪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者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

不行架空之事 福澤諭吉有義慶應大學以教育乃天職。不須敘功利。福氏於學擅眾長。有誨人不倦之志。

不談過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談之不過動聽。不如默爾為愈。

兩軍交綏。要看勝負。驕則必敗。

師若真心發其徒。雖頑梗亦化矣。

真精神 實意做事。真心求學。

有雷同性。無獨之心。有獨之心。是謂之[illegible]。

漸摩 漸水之浸漸 摩手之按摩

[illegible]門 [illegible]之室也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

[1] 白沙，即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新会（今属广东）白沙里人，学者称白沙先生。明代理学家。《明儒学案》，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羲（1610—1695）所著。该书卷五、卷六为《白沙学案》。《宋元学案》，为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著。

[2] 与弼，即吴与弼（1391—1469），字子傅，号康斋。明代理学家。据《明儒学案》卷二《崇仁学案》，与弼是抚州崇仁人，该地历史上一直属江西省，故“皖人”之说疑有误。该学案又云：“与弼居乡躬耕食力，弟子从游者甚众。……陈白沙自广东来学，晨光才辨，先生手自簸谷。”

涤生日记[1]，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不行架空之事　福泽谕吉[2]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

不谈过高之理　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两军交绥，安者胜矣，骄则必败。

师若真心爱其徒，虽顽梗亦化矣。

真精神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有雷同性，无独立心。[3]有独立心，是谓豪杰。

渐摩　渐，水之浸渐；摩，手之按摩。

訾[4]门　学宫也。

---

[1] 涤生，即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20岁时改号涤生。湖南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人。曾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有《曾文正公手书日记》40本。此处引语见庚申（1860）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原文是："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2]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启蒙思想家。早年学习西学，1858年在江户（今东京）设塾（即庆应义塾大学之前身）讲学。他曾三次游历欧美，主张学习对人生实际有用的"实学"。

[3] 参见《杨昌济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70页。杨昌济的原文是："寻常人多雷同性，无独立心，此其所以为寻常人也。"

[4] 原文如此，疑为"黉"字之误。

国文

陕西之陕，从大从人；陕隘之陕，从大从人。

诗者，有美感的性质。

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

马迁[1]，龙门人。　郡县有时不以山水为界。

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截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于律也。[2]惟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

王又旦，字幼华，陕西合阳人。前清进士，善诗。

王士祯，字贻上，号阮亭，山东新城人。诗为前清一代正宗。

---

[1] 马迁，即司马迁（约前145或135—?），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20岁以后，曾遍游祖国名山大川。著有《史记》。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县东北。

[2] 参见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杨载《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截前后各两句。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内是也。”对此说有不同意见。如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四三）说：“五言绝句自五言古诗来，七言绝句自歌行来，此二体本在律诗之前；律诗从此出，演令充畅耳。有云绝句者，截取律诗一半，或绝前四句，或绝后四句，或绝首尾各二句，或绝中两联。审尔，刬头刖足，为刑人而已。不知谁作此说，戕人生理！”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中有与王夫之类似的看法。

吴、王[1]并称。天下事物，万变不穷。

清立《贰臣传》[2]，所以戒后也。何期政革之际，曾无一人焉为之死也。

真州　扬州仪征县。明清之交，民庶殷赈，文物焕发，四方士辐辏其间，诚历史上之名胜也。

北鲤南鲈　黄河、淞江称最。

文以理胜，诗以情胜。

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

储雄文，字汜文，江苏宜兴人。清康熙进士，善诗文。

诸储[3]皆有盛名于当时，惟能诗者称文。

阳明格物，思笋生之理。[4]

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

无论诗文，切者斯美。

---

[1] 吴，指吴伟业（1609—1671），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末为复社魁首之一，入清官至国子祭酒。诗文工丽，为一时之冠。著作有《梅村家藏稿》等。王，即王士祯（1634—1711）。

[2] 《贰臣传》，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诏国史馆列《贰臣传》，所载120人，皆降清之明朝官吏。清高宗为了提倡忠于一姓的封建道德，把他们一概叫贰臣。《贰臣传》全书共十二卷。

[3] 诸储，指储欣（1631—1706），字同人，清初古文家，有《在陆草堂集》；储在文，储欣从子，字礼执，学于欣；储雄文，储在文弟，字汜文；储掌文，字越源，储欣孙，著作有《云溪文集》。他们都是清初文学家。

[4] 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8），明代哲学家、教育家。据其年谱所载，他21岁时，侍父于京都，“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二《年谱》）后“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

掌故之用有三种：一用于词章，如神仙之类；二用于义理之文，如井田、学校、帝王之类；三用于科学，则物理实事是也。

诗则须包三者而有之。虚渺、古事、实理，随其时地而著之可也。

王鹿台、王耕烟、王烟客[1]称三王，三王之画宝于世。

列题贵有笔势。（诗）。

题须简要，故善诗者不必观其诗，即于其列题焉观之，必有不同者矣。

荫生，唐、宋、明、清皆有此制。官家子孙，世袭可官。

吴伟业之诗，雄于一时。

吴以官清故，每对苍雪（王澣）[2]若有痛惭者然，其意常于其往

---

[1] 王鹿台，即王原祁（1642—1715），字茂京，号鹿台，江苏太仓人。王耕烟，即王翚（1632—1717），字石谷，号耕烟。王烟客，即王时敏（1592—1680），字逊之，号烟客。三人均为清初名画家。

[2] 吴，即吴伟业。苍雪，字读澈，号南来，云南呈贡县人，为南京名僧雪浪法徒，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有《南来堂诗集》。“王澣”二字原件有括号，“澣”疑为“瀚”字之误。据《梅村先生年谱》卷二引《娄东耆旧传》：“王瀚，字原达，受业于张采，为诸生有名。明亡后为僧，号晦山大师，名戒显，字愿云。庚寅（1650）夏入庐山，遂主席江右。”苍雪与王瀚都与吴伟业相友善，但他们对吴这样一位晚明名士，明亡以后出仕清朝的行径颇不以为然，因此或劝他保持晚节，或劝其出世。在《赠愿云师》一诗之《序》中，吴伟业谈到他和愿云“甲申闻变，常相约入山，予牵帅不果，而师已悟道受法于云门具和尚。今夏从灵隐来，止城西之太平庵，云将远游庐岳，贻书别予，以两人年逾不惑，衰老渐至，世法梦幻，惟出世大事，乃为真实，学道一著，不可不勉，感其言，因作此诗赠之，并识予愧也”。诗中有“寄身苍崖巅，危苦愁失脚。万化皆虚空，大事惟一著。再拜诵其言，心颜抑何怍。末运初迍邅，达人先大觉。劝吾非不早，执手生退却；流连白社期，惭负青山约。君亲既有愧，身世将安托？”等句，表现出一种痛惭之情。

来诗中见之。然吴亦有所逼耳，母老一也，清法严二也。始盖与苍雪约同玩者。

欢愉之词难好，哀怨之词易工。[1]（穷愁著书良有以也。）

题视窍，窍得则用神人内，奇理自辟。

随便记录，陶写胸襟，可以养气（指游程记）。

恽敬，字子居，江苏阳湖人。前清乾隆癸卯举人，官江西瑞金县知县，有《大云山房集》。世称其文为阳湖派。

桐城、阳湖，[2]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

印，经置之官。关防，不常置之官也。

大计者，以期鉴别官吏之贤否，而定行黜陟之谓也。

胜景、古迹、险隘、民风，以及通商之步岸，游程之所必记。

魏禧破产不为家，有似张良为人。[3]

善击鼓者击边（操觚者不可不解此）。

---

[1] 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二十《荆潭唱和诗序》。原文是：“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2] 桐城，地名，此处指清代散文之一派，由方苞（1668—1749）开创，刘大櫆（1698—1779）、姚鼐（1732—1815）发展而成派。因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阳湖，地名，此处指清代散文的一派，由恽敬（1757—1817）、张惠言（1761—1802）等开创。因恽敬为常州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阳湖派”。

[3] 魏禧（1624—1681），清初散文家，字叔子，又字冰叔，号裕斋。江西宁都人。与其兄际瑞、弟礼被称为“宁都三魏”。明亡后绝意仕进，隐居翠微峰。破产事，似指明亡时魏氏父子捐资抗清一事。张良（？—前186），字子房，传为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人。其先人五世相韩，及秦灭韩，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

知人则哲。惟帝其难。[1]

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故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余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2]

度量者，俊杰在位之意，非藏垢纳污之谓也。

矛杀人，盾避敌，各当所用，此谓器使人。

衣裳裘马，言谈之间无人。

良乐求马[3]，往往在天下人掉弃之区。

度而后量，明辨而广交。

太虚，甚虚也。古文之道，简切明白。

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4]

十月二十八日

圆周与直径之比，等于一一三与三五五。

寒暖计，最普通者有华氏、摄氏二种。华氏以三十二度为冰点，以二百十二度为沸点。摄氏以零度为冰点，以百度为沸点。计算之，知摄氏五度当华氏九度。

---

[1] 参见《尚书·皋陶谟》。

[2] “故曰”后引文见《尚书·泰誓》，前半部与原文略有出入，后半部同。原文前半部是：“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3] 参见《昭明文选》卷四十五班固《答宾戏》。文中有“良乐轶能于相驭”，原注引项岱曰：“王良，晋人也。伯乐，秦穆公时人也。轶，过也。王良善御马，伯乐工相马。”

[4] 参见《增广贤文》。

大地以经度言，每相距十五度之地，必差一时，以自转故也。（相距十五分则差一分，时相距十五秒则差一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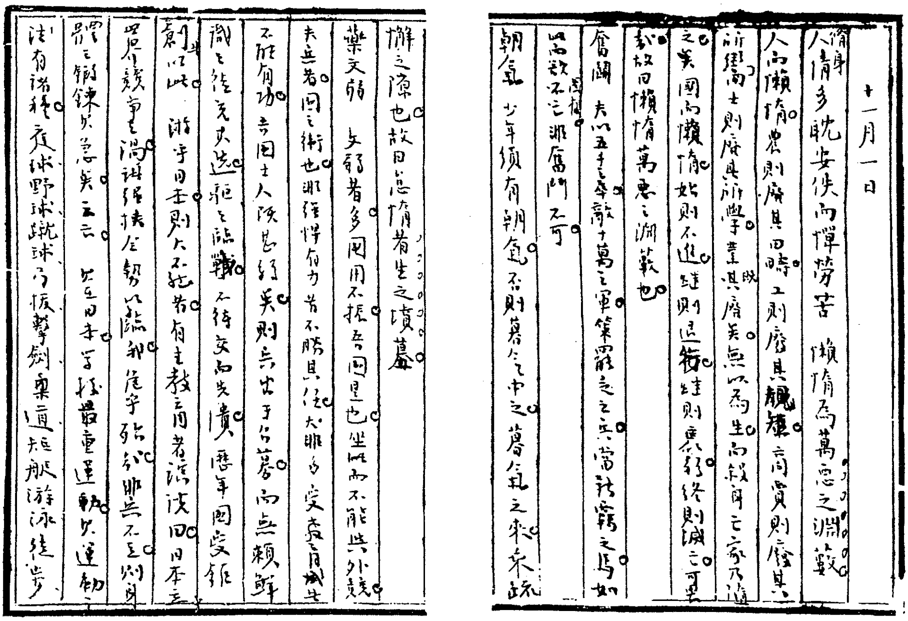
英京伦敦之天文台，为经度东西之标准。

北京在东经一一六度三〇分，日本在东经一三九度四〇分。

算术

十一月一日　修身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万恶之渊薮也。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奋斗　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朝气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1]

药文弱　文弱者多，国用不振，吾国是也，坐此而不能与外竞。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不胜其任，尤非多受教育者不能有功。吾国士人既甚弱矣，则兵出于召募，而无赖鲜识之徒充其选，驱之临战，不待交而先溃，历年国受巨创者以此。游乎日本，则大不然者。有主教育者演说曰：日本立乎世界竞争之涡，诸强挟全势以临我，危乎殆哉！非兵不立，则身体之锻炼其急矣，云云。其在日本，学校最重运动，其运动之法有诸种：庭球、野球、蹴球、弓拔、击剑、柔道、短艇、游泳、徒步、远足会皆是。西国亦然。如远足会之事，以期举校远行，先择佳地，既至，则集众演说，莫敢不至者。凡此皆所以药文弱之道也，勉矣后生。[2]

勤务　勤务之益，一以医偷惰，一以药文弱。有地板之室，不应用帚扫，致扬尘，必以布揩之。

倪宽为弟子都养，承宫为诸生执苦。[3]

---

[1] 此段前有眉批“曾语”二字。曾，当指曾国藩。出处待查。

[2] 此段内容见杨昌济《教育学讲义》第十三章《教育上之养护》，参见《杨昌济文集》第191~192页。

[3] 倪宽，西汉千乘（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北）人。《汉书》卷五十八说他“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赞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颜师古注：“都，凡众也；养，主给烹炊也。”承宫，字少子，东汉琅邪姑幕（今山东诸城西北）人。《后汉书》卷二十七说他少孤，年8岁为人牧豕。乡里徐子盛以《春秋经》授诸生数百人，宫过息庐下，乐其业，因就听经，遂请留门下。“为诸生拾柴，执苦数年，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

国文　一时

谨言慎行即是学。　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以好学称颜回，则曰不迁怒，不贰过。[1]不迁怒，不贰过，盖行事之大难者也。徒众三千，而仅以好学称颜回；称颜回而仅曰不迁怒不贰过，此其故可以思矣。

人之为人，以贤圣为祈向，而孝义廉耻即生焉。然曾参[2]孝矣，不识小受大逃之义；申生[3]孝矣，不知陷亲不义之道；陈仲子[4]则亦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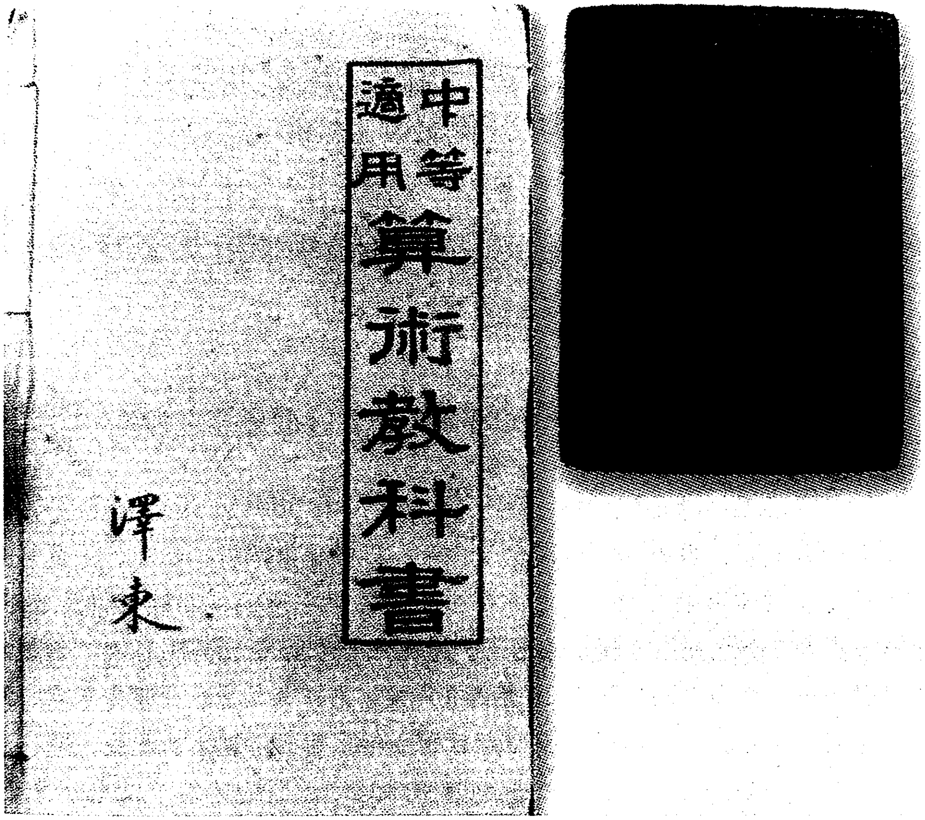
[1]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参见《论语·学而》。不迁怒，不贰过，参见《论语·雍也》。

[2] 曾参（前505—前436），春秋末鲁国南武城（今山东枣庄附近）人，字子舆，孔子学生。“不识小受大逃”事见《孝经·谏诤》：“曾子曰：‘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小受大逃”语出《韩诗外传》卷八：“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箠则待笞，大杖则逃。”此处引申其义，对父亲的小缺点可以容忍（《论语》云：“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而对其不义之事则要理直气壮地劝谏。

[3] 申生，春秋时晋国太子。“不知陷亲不义”事见《礼记正义·檀弓上第三》之疏：“《春秋左传》云，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父不义也。孝子不陷亲于不义，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杀子之恶。虽心存孝而于理终非，故不曰孝但谥为恭，以其顺于父事而已。”

[4] 陈仲子，即田仲，战国时齐人。“讥其太矫”事见《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

哉，则有讥其太矫；冉子[1]好义，而不知周急不继富为君子之道；原宪[2]知耻，辞栗〈粟〉不以与于邻里乡党之中。是何也？学有不足也。



毛泽东使用过的课本和砚台。

知觉类化　解甲物而有通乎乙，思此理而有会乎彼。及其至也，大宇之内，万象之众，息息而相通，是谓知觉类化。

---

[1] 冉子，即冉求。字子有，春秋鲁国人，孔子学生。“不知周急不继富”事见《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2] 原宪，又名原思，字子思，孔子学生。“辞粟”事见《论语·雍也》：“原思为九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勃之海，启瞬江湖失；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读《游五姓湖记》[1]，则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吾人读其文，恍惚与之交矣。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战〈哉〉，当识得其名人巨子贤士大夫，所谓友天下之善士也。

选文当重直观主义，以切时令为贵。

《与翁止园书》[2]，戒淫也。淫为万恶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

---

[1] 《游五姓湖记》，牛运震撰。牛运震（1706—1758），字阶平，一字真谷，号空山，滋阳（今山东兖州）人。历官甘肃两当、秦安、平番等县知县，曾主讲于皋兰、晋阳、河东等书院。据记中所云，五姓湖“汇永济、临晋、虞乡三县之交”，“输于涑水”，“周环六七十里”；游湖时间在“蒲郡太守周侯既浚五姓湖之三年”；同游者还有周侯、浙东胡稚威、永济令张君、万泉令毕君。记中对周侯将“淤且涸者百有余年”的五姓湖重新疏浚，对“鱼虾之产岁千万石，湖之民据而弋其利者倍禾稼之入”的政绩予以充分肯定，故《讲堂录》说“见篇中人物，皆一时之豪”。

[2] 《与翁止园书》，方苞撰。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亦号望溪，安徽桐城人。累官礼部侍郎，其散文大有名于当时。翁止园，名荃，金陵人，究心三礼，与方苞友善。据书中所云：“近闻吾子与亲戚以锥刀生隙，啧有烦言，布流朋齿，虽告者同辞，仆坚然信其无有。然苏子有言：‘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于彼人者乎？仆往在京师，见时辈有公为媟嫔者。青阳徐诒孙曰：‘若无害，彼不知其不善而为之也。吾侪有此，则天厌之矣。……’仆自与人交，虽索相亲信者，苟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仆每以自伤，然未敢以忖吾子。于前所闻，既信吾子之必不然；于后所陈，又信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故《讲堂录》说此书是“戒淫也”。

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若履薄冰[1]。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2]尚已。

人之议之者尊之也。天下惟庸人不惹物议，若贤者则时为众矢之的，故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3]。

程子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4]

恶事终有露布之一日，故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5]。

十月初三日　国文

伊尹[6]道德、学问、经济、事功俱全，可法。伊尹生专制之代，

---

[1] 如在深渊，若履薄冰，参见《诗经·小雅·小旻》。原诗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 孟德，即曹操（155—220），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仲谋，即孙权（182—252），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诸葛，即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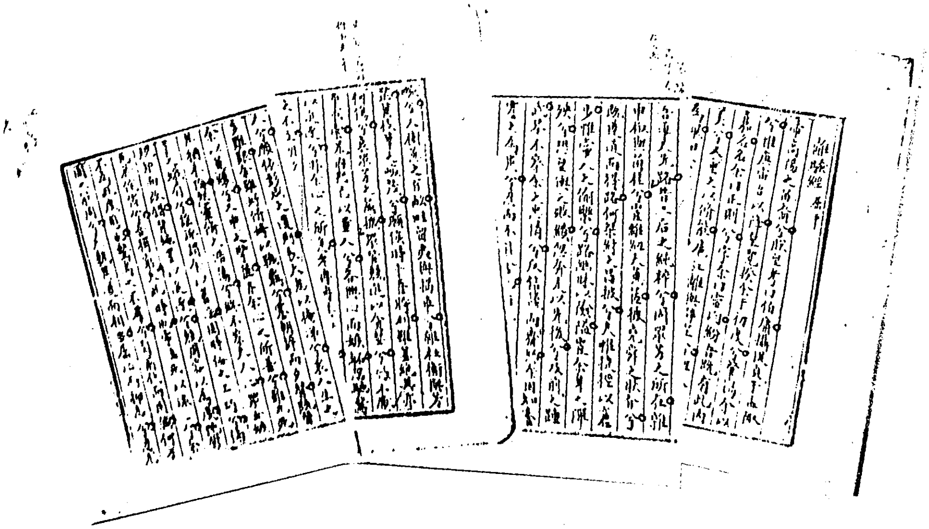
[3] 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语出韩愈《原毁》，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一。

[4] 程子，疑为朱子之误。朱子即朱熹。《朱子文集》卷六《答王子合》一信中有"大抵吾辈于货色两关打不透，便更无语可说也"。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参见枚乘《谏吴王书》："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

[6] 伊尹，商初大臣。曾助汤攻灭夏桀，并佐外丙、中壬二王。中壬死后，太甲即位，因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不理国政，被他放逐。三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

其心实大公也。尹识力大，气势雄，故能抉破五六百年君臣之义，首倡革命。



毛泽东手抄屈原的《离骚》（部分）。

作文有法，引古以两宗为是。一则病在气单。

《书》乃唐、虞、夏、商、周之史。[1]

文章须蓄势　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至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当其出伏而转注也，千里不止，是谓大屈折。行文亦然。　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

---

[1] 《书》，即《尚书》，亦称《书经》，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著作的汇编。唐，即陶唐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尧为其领袖，故有时唐尧联称。虞，即有虞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舜为其领袖，故有时虞舜联称。夏，即夏后氏，禹为其领袖，故有时夏禹联称。相传禹之子启，开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即夏朝。商，朝代名。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周，朝代名。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商后建立。

而贵择交句[1]，《伊尹论》之任字[2]是。

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伊尹是也。

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3]。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做文写字　文贵颠倒簸〈簸〉弄，故曰做；字宜振笔直书，故曰写。俗话之演成，必经几多研究，认为合理而真，始克流传不朽，颠扑不破，此类是也。

十一月十五日　修身

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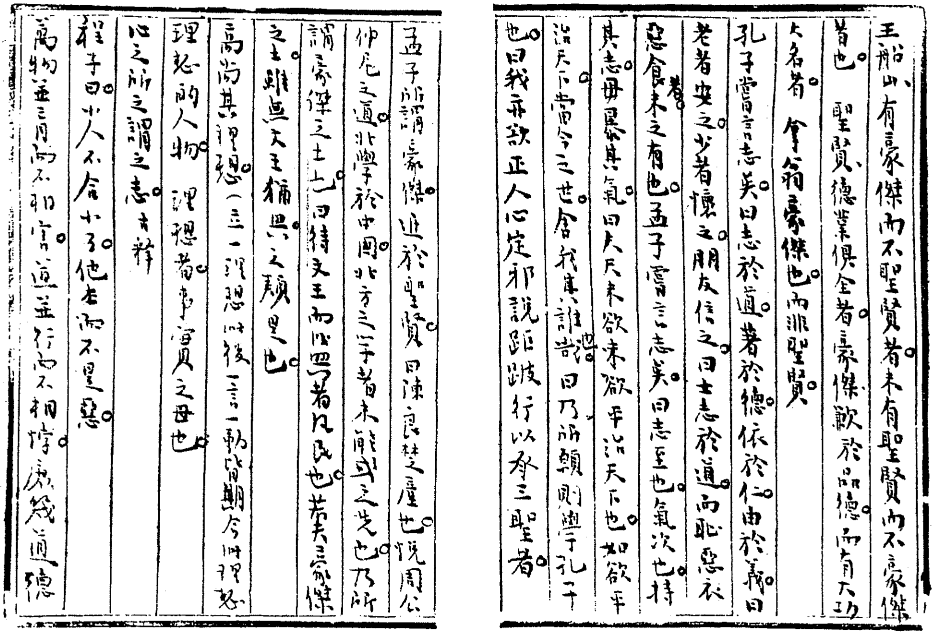
---

[1] 《范蠡论》，姚鼐撰，参见《惜抱轩文集》卷一。姚鼐（1732—1815），字姬传，安徽桐城人，为清代桐城派著名散文家，主张义理、词章、考证并重。《范蠡论》一文，讲范蠡之子杀人，系于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作者得出结论：“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其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

[2] 《伊尹论》，沈近思撰，参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五。沈近思（1671—1727），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沈近思的《伊尹论》一文曾批驳魏禧在其所著《伊尹论》一文关于汤“伐夏之举，出于伊尹之独断无疑”的观点，认为“汤之革命，应天顺人，除残去暴，救民于水火之中……普天率土，莫不引领戴商，以劝伐夏，何嫌何疑，而曰‘必尹之独断’？且尹之所自任者，在救民不在伐夏，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其视天下匹妇匹夫，有一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此则尹之所以独断而自任者也”。

[3] 天视自我民视，语见《尚书·泰誓中》。

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豪杰也，而非圣贤。[1]



王船山、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
者也。 聖賢、德業俱全者。豪傑、歉於品德。而有大功
大名者。 拿翁豪傑也。而非聖賢。
孔子嘗言志矣。曰志於道。著於德。依於仁。由於義。曰
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
惡食者。未之有也。孟子嘗言志矣。曰志至也。氣次也。持
其志。毋暴其氣。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曰乃所願則學孔子
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說。距詖行。以承三聖者。

孟子所謂豪傑。近於聖賢。曰陳良楚之産也。悅周公
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
謂豪傑之士也。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之類是也。
高尚其理想。（言一理想以後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的人物。 理想者事實之母也。
心之所之謂之志。 志字釋
程子曰。大人不合小了。他大而不是惡。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illegible]德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孔子尝言志矣，曰：志于道，著于德，依于仁，由于义。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孟子尝言志矣，曰：志至也，气次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

[1] 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湖南衡阳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一语见《俟解》。拿翁，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年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此段内容可参见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第69页。

也。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曰：我亦欲正人心，定邪说，距詖行，以承三圣者。[1]

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曰：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乃所谓豪杰之士也。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之类是也。[2]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理想的人物。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3]

心之所之谓之志。古释

程子曰：小人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4]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5]庶几道德之理想矣。

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

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6]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

---

[1] 孔子语分别见《论语》之《述而》《公冶长》《里仁》三篇。原文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孟子语见《孟子·公孙丑上、下》及《孟子·滕文公下》三篇，其中有两句与原文略有出入，这两句的原文是：“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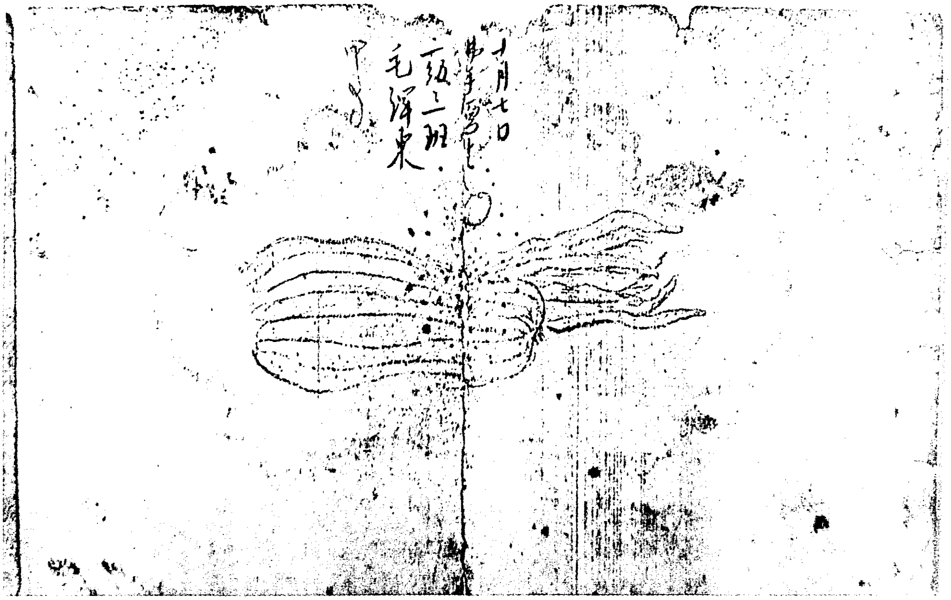
[2] 语见《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尽心上》。“乃所谓豪杰之士也”之“乃”原文为“彼”。

[3] 参见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原文是：“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

[4] 参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六。原文是：“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恶。”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6页。

[5] 参见《礼记·中庸》。

[6] 参见《孟子·告子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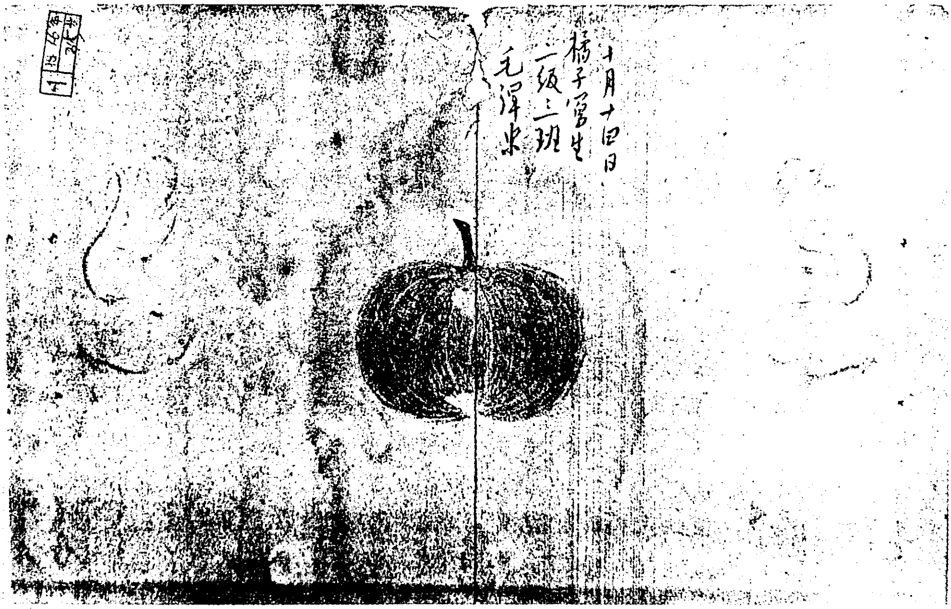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学校时的美术作品。

《管子》：不偷取一世。　人之爱情，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界。现在之群，固致其爱情，不待言矣。然而千载以上之人，千载以下之人，其致其爱情，亦犹是焉。不观乎人心乎，其读史也，则尝思慕忠贤；其置产也，则务坚其契约，故曰人无有不善也。[1]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圣贤救世实有如此，如孔子（在陈匡），耶苏（磔死十字架），苏格拉底（以故毒

---

[1] 《管子》，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著作总集，托名管仲（？—前645）所作。“不偷取一世”，参见《管子·牧民第一》，郭沫若等《管子集校》将“世”改为“时”。此段系杨昌济日记大意。据杨昌济在《论语类钞》中说，写于戊戌年（1898）。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6~27页、第73页。又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之修身问题。


十月十四日
橘子寫生
一級三班
毛澤東

毛泽东在学校时的美术作品。

死)。〕[1]

语曰，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大〈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

---

[1] 孔子在陈、匡，指“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和“子畏于匡”(孔子被匡人所拘禁)，事见《论语·卫灵公》和《论语·子罕》两篇。耶苏，今通译耶稣，基督教之救世主。后被门徒犹大出卖，以“谋叛罗马”罪钉死于十字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贵族奴隶主的代言人，在与奴隶主民主派斗争中失败被绞死，一说被毒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商务印书馆民国4年版）第108页说：“凡人类中所称为伟人者，无不先与恶竞。苏格拉底之名，于今不朽，以其为宵小所忌，仰药自尽故也；耶苏之所以为耶苏，亦以其被磔于十字架故。”此段内容可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7页。

也。）[1]

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2]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　中国自由，西国专制；中国政法简，租赋轻，西国反之（满清不专制）。

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言其近例，台湾朝鲜是也。

中国待属国甚宽，苞茅贡聘之外，余均听其自治，越南、高丽是也。越南归法，五人聚语者有禁，藏兵器者有禁，夜不得闭户，便巡察也。高丽归日，事事听其主治，而民戢戢如群羊矣，盖其苦尤有甚于台湾者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　修身

张子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3]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

---

[1] 参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论语类钞》，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7、74页。“断腕”，语出《墨子·大取》：“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

[2] “故曰”后的话，参见皇甫谧《帝王世纪》，传说是尧时一位八十老人所唱的歌。

[3] 张子，即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张载语见《张子语录中》，参见《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原文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试诵张子之言”一题。

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

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1]

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2]

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3]

在上者为政教，在下者为风俗。变之自上者，效速而易迁；变之自下者，效迟而可久。[4]（在上者虽有圣君贤相，然人亡而政息，效虽速而易迁。）　刚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豢龙氏所以能豢龙者，龙虽神而不能脱夫嗜欲也。[5]

---

[1] 诸葛武侯，即诸葛亮，死后谥武侯。范希文，名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孔，指孔子。孟，指孟子。朱，指朱熹。陆，指陆九渊。王阳明，即王守仁。

[2] 韩，指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大臣。范，指范仲淹。韩琦于宝元三年（1040）出任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时人以韩范并称。曾，指曾国藩。左，指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湘军将领，与曾国藩共同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传教，指范、曾均推崇义理之学，注重抓大本大源。

[3] 参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原载《游学译编》第八册。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8页。

[4] 这段话出处同上。又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

[5] 豢龙氏，传说舜时的畜龙者，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1]

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世俗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光武曾游于太学，习《尚书》。古太学以经分科。[2]

严光，东汉气节之士也。光武既立，征之，不就。访之，以安车迎至。帝坐匡床请出，光卧应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当光之至也，大司徒（首相也）侯霸（光学友）迎之。光与书曰：君房足下，致位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指要领绝。侯以书览帝，帝曰：狂奴故态也。后世论光不出为非。不知光者，帝者之师也。受业太学时，光武受其教已不少。故光武出而办天下之事，光即力讲气节，正风俗而传教于后世。且光于专制之代，不屈于帝王，高尚不可及哉。[3]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随〈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

---

[1] 咬得菜根，百事可做，语出朱熹《小学》卷六《右实敬身》：“汪信民尝言：‘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

[2] 光武，指东汉光武帝刘秀（前6—57），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太学，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汉武帝时，于太学设五经博士，学生分科肄业。

[3] 严光，一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属浙江）人。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同游太学。本段所叙光武征严光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严光对光武说话的原文是：“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有故志，何至相迫乎！”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关于“圣贤豪杰之特质”一栏中，有“东汉以前风俗何如？”“东汉士气概盛，何人倡之？”“能言严子陵之事乎？”内容。

达期，宋元是也。[1]

十一月二十九日　修身

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2]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3]始守纲常而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比骎骎隆东汉焉。

曾涤生《圣哲画像记》三十二人[4]：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范文正世家子，父丧，幼随母适朱，故名朱悦。初不自知其为

---

[1] 参见杨昌济《劝学篇》，原载《公言》第一卷第一期，参见《杨昌济文集》第202页。此系杨昌济转述王国维（1877—1927）的观点。见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五册。朱，指朱熹。程，指程颢、程颐。张，指张载。周，指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哲学家，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

[2] 冯道（882—954），字可道，自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后唐、后晋时，历任宰相；契丹灭后晋，又附契丹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又任太师、中书令。后世因其历事五姓，每加非议。

[3] “民黎”，原文如此，似应作“氓黎”。刘孝标《辨命论》：“与三皇竞其氓黎，五帝角其区宇。”

[4] 曾涤生即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参见《曾文正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二。据该文所说，这32人按原文顺序分别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兄弟、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因“程”包括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故实为33人。

范氏子也，人告以故，乃感极而泣。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公盖苏州人。子尧夫，仁侠似之，尝遇故旧于途，见窘于资，指赠以麦云。[1]

陆象山曰：激厉奋迅，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2]（无非使心地光明）。

吕新吾，名坤，明人，有《呻吟语》。

曾文正八本[3]：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摩西十戒[4]，不伪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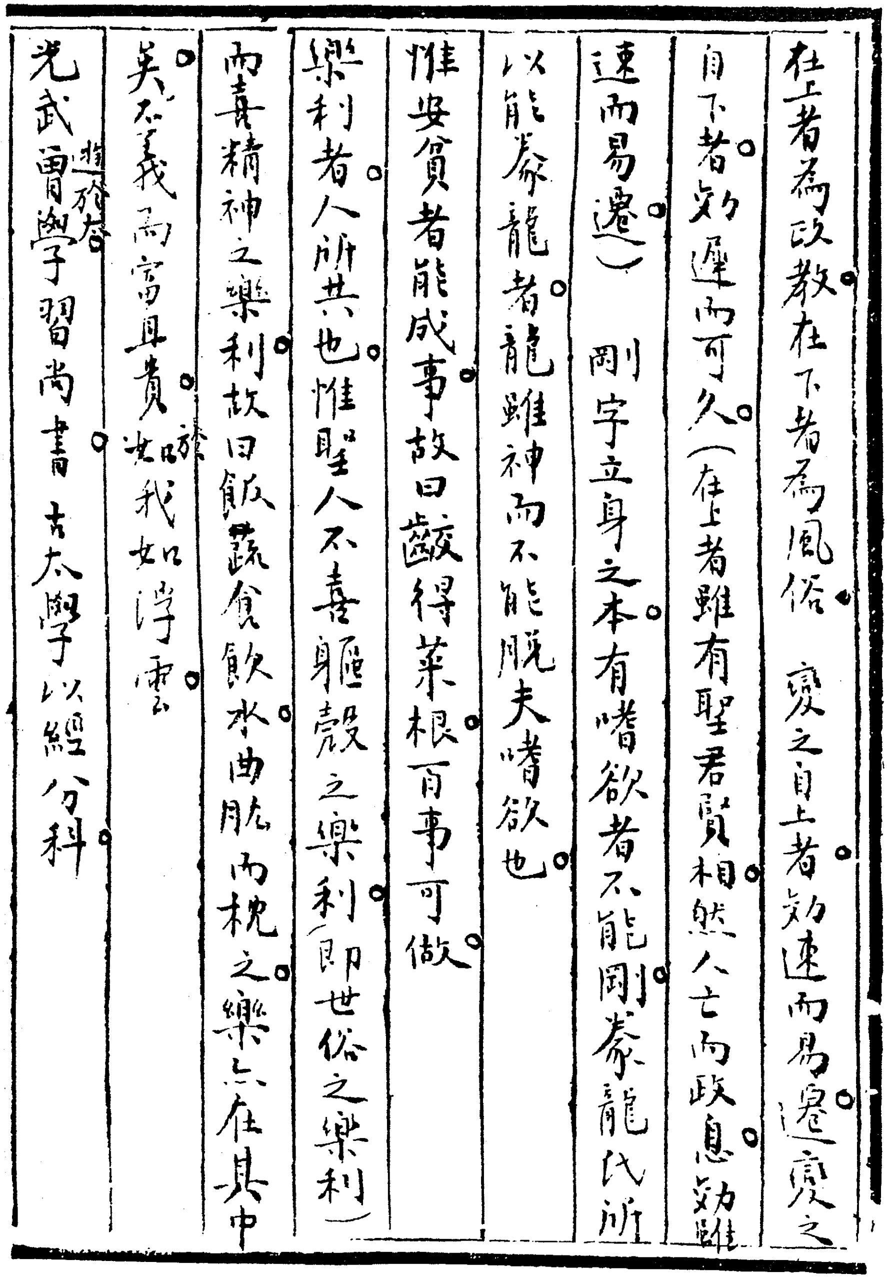
---

[1] 管宁（158—241），字幼安，三国时北海朱虚（今山东临朐东南）人。16岁丧父，亲戚愍其孤贫，咸共赠赗，悉辞不受。成帝称赞他“清虚足以侔古，廉白可以当世”。避居辽东30多年，辞官不就。尧夫，即范纯仁（1027—1101），字尧夫，范仲淹次子。年少时，其父尝遣其赴姑苏（今苏州）取麦五百斛，路遇友人石曼卿母丧无力举葬，尧夫于是将一舟麦全部给他作葬母经费。

[2] 陆象山，即陆九渊。参见《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五《语录下》，参见中华书局1980年版《陆九渊集》第452页。“冲决”原文为“决破”。

[3] 曾文正，即曾国藩。“八本”见庚申（1860）四月《日记》；又见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十三日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信（参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62页）。“八本”之排列顺序，各本略有不同。

[4] 摩西，《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圣经·出埃及记》载，摩西奉上帝之命带领在埃及为奴的希伯来人出埃及，并向他们传授上帝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崇拜唯一上帝而不可拜别神，不可制造和敬拜偶像，不可妄称上帝名字，须守安息日为圣日，须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妻子财物。


在上者為政教。在下者為風俗。變之自上者。勢速而易遷。變之自下者。勢遲而可久。（在上者雖有聖君賢相。然人亡而政息。勢雖速而易遷。）剛字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剛。豢龍氏所以能豢龍者。龍雖神而不能脫夫嗜欲也。

惟安貧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樂利者。人所共也。惟聖人不喜軀殼之樂利（即世俗之樂利）而喜精神之樂利。故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光武曾遊於太學習尚書。古太學以經分科。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十二月六日　修身

郭筠仙以好名与好利判世代之隆污。[1]汉人好名，魏人好利，晋名唐利，宋名元利，明名清利。

侯朝宗生长世族，善属文。黄黎洲曰：侯公子自不耐寂寞耳。[2]

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

---

[1] 郭筠仙，即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清末外交官。语见《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二十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卷第471页。又见《养知书屋文集》卷十《致曾沅甫》，参见岳麓书社1984年版《郭嵩焘诗文集》第183页。《文集》原文是：“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郭筠仙以好名好利判世运之隆污，能举其说与”。

[2] 侯朝宗，即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因忤魏忠贤，曾两次被捕入狱。方域健于文，由于生长宦旅，少年时行为颇放浪，常选妓征歌。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黄宗羲》中曾记宗羲对侯方域的议论：“在南都（今南京）时，见归德（今商丘）侯朝宗每宴以妓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乎！吾辈不言，是损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则亦何所不至耶？’”参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5年8月18日：“黄梨洲讥侯朝宗之不耐寂寞，盖不耐寂寞者无自得之乐，而有荣华之慕者。”

独立不惧，遁世不闷。[1]狂澜滔滔，一柱屹立。醉乡梦梦，灵台昭然。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独立不惧之谓也。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遁世不闷之谓也。[2]

虚名折福。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杨震[3]

立定脚跟。一失足成千古恨。

国文

《雪中遇猎》[4]

鹘　音骨，鹰属。

氍毹　织毛褥、衬鞍之类。

---

[1] 语出《易·大过》，原文是："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2] 邦无道则愚，邦无道贫且贱焉可也，语出《论语·泰伯》，原文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语出《论语·雍也》，原文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3] 杨震（54—124），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人。累官至太尉。当其任地方官时，有次道经昌邑（今兖州金乡西北），邑令王密系其过去所举之荆州秀才，王感其栽培，至夜怀金十斤以赠，震拒不受，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4] 《雪中遇猎》，吴伟业所撰之诗，参见《梅村家藏稿》卷十一。据《梅村先生年谱》卷四："（顺治）十三年（1656）春，上（指顺治帝）……驾幸南海子，遇雪大猎，先生恭纪七律一首。"《讲堂录》中以下自"鹘"至"闭门"均系此诗中字、词。

秋翎　孔雀翎，前清冠饰。

西鼠　冠也，即貂帽。

挏酒　酒也。以马乳为酒，撞挏乃成也。[1]

驼羹　紫驼之峰，其味甚美。

瑟瑟　女饰，碧珠也。

擒生　擒其生也。

铁岭　奉天[2]铁岭，县治。

黑河　东遂黑河、外遂黑河，均在牧厂东南。

高柳　故城，今大同府阳高县西。

射雕手　邢子高曰：斛律金真射雕手也[3]。（北齐事）

敕勒歌　北齐神武使斛律金歌《敕勒》[4]。

屠苏酒　酒也，饮能御寒。

李陵台　燕然山有李陵台[5]。

黄羊　兽也，出关右塞上，无角，色同獐鹿。

---

[1] 以马乳为酒，撞挏乃成也，此系《汉书·礼乐志》“给大官挏马酒”一语之注。

[2] 奉天，清代府名，府治在盛京（今沈阳市）。

[3] 邢子高，即邢亢，字子高，北齐时人，颇有文学。斛律金应为斛律光，光为金之子，高欢时授都督，封永乐子。据《北史》卷五十四载：光“尝从文襄于洹桥校猎，云表见一大鸟，射之正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雕也。丞相属邢子高叹曰：‘此射雕手也。’当时号落雕都督”。

[4] 神武，指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496—547），一名贺六浑，渤海蓨（今河北景县）人。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今山西朔县一带）人。歌《敕勒》事见《北史》卷六，歌词是：“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5] 燕然山，古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李陵台，即今内蒙古正蓝旗南黑城。

交河　古西域车师城名。

蹇驴　蹇，跛也。蹇驴，言无用之驴也。

箬笠　箬，草名。箬笠，箬作之笠也。

《梁园赋》　相如作[1]。

闭门　后汉袁安雪天僵卧闭门[2]。

《孙子集注序》[3]

黄震　宋建州蒲城[4]人（今福建建州府蒲城县），字伯起，官广东转运使。

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5]

《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

[1] 相如，指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

[2] 袁安（？—92），字邵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累官至司空、司徒。当其贫困潦倒时，一人独卧屋中，雪积门外，洛阳令过其门，见无人迹，疑其死，入内，见袁僵卧其中。

[3] 《孙子集注序》，魏源撰。参见《古微堂集》，参见《魏源集》第226~228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曾任知州、知县等职，是中国近代著名爱国者和思想家。以下自《老子》语开始，至“越女剑”各条，凡未另注明出处者，大多系录《孙子集注序》原文。

[4] 蒲城，应为浦城。下同。

[5] 这段话系黄震（1212—1280）《黄氏日钞》卷五十八《读诸子》中《〈孙子〉兵书》一节的大意，黄震（与《讲堂录》的上一条所记黄震非一人），字东发，庆元府慈溪（今属浙江）人。曾任华亭县令，抚州太守。孙武，字长卿，春秋时齐国人，军事家。公元前517年以伍子胥荐见吴王阖闾，呈兵法十三篇，即今传《孙子兵法》。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功篇》[1]

苏洵论曰，按言以责行，孙武不能辞三失：久暴师而越衅乘，纵鞭墓而荆怒激，失秦交而包胥救。言兵则吴劣于孙，用兵则孙劣于吴，矧祖其馀论故智者乎？[2]

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

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3]

学矛夫子，获甲三百。冉求事。《左传》哀十一年清之役。[4]

---

[1] 《谋功篇》应为《谋攻篇》。“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一语，参见《孙子兵法·谋攻篇》。“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一语，出自《孙子兵法·形篇》，原文是：“故善者之战，无奇胜，无智名，无勇功。”

[2] 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苏洵原话见《嘉祐集》卷三：“若按武之书以责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于敌则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听包胥之言，出兵救楚，无忌吴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战》曰：‘久暴师则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还，可谓久暴矣。越人能无乘间入国乎？其失二也。又曰：‘杀敌者怒也。’今武纵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复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敌，此司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仇吴也。勾践不颓旧冢而吴服，田单谲燕掘墓而齐奋，知谋与武远矣。武不达此，其失三也。”“失秦交而包胥救”，魏源原文为“失秦交而包救至”。

[3] 魏源原文是：“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一羁旅臣能已之乎？故《越绝书》称‘巫门外有吴王筲孙武冢’。是则客卿将兵，功成不受官，以不尽行其说故也。”

[4] 冉求，即冉有，字子有，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据《左传》：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人伐鲁，冉求作为季氏宰帅师与齐人战于清，“用矛于齐师”，“获甲首八十”。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

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生于孝子。弹以击人，然为效小，故进于弓。弓能及远矣，然人力有限，为效仍不大，故进于弩。弩者，以匣盛机矢置其中，机动矢发力大及远，而中古者作战之良器也。弹生于古之孝子有二说：上世不葬其亲，狐狸食之，孝子不忍，乃作弹以击杀之，此一说也；父母年迈，养老之事必尽，孝子乃作弹，射雀以奉其亲，此又一说也。[1]

杀人以生人。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微观于五行相生相克之原，天地间无往而非兵也，无兵而非道也，无道而非情也。兼弱攻昧，耿乱侮亡，天之道也。使世无害则恩不生，世而无弱昧与乱亡，又奚用兼之取之哉，故曰恩即生于害也。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

宜僚丸[2]　宜僚，楚之勇士也，善丸。

越女剑[3]　范蠡谓越王曰：越有处女，出于南林之中。

---

[1] 前一说见《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后一说出处不详。

[2] 宜僚，即熊宜僚，春秋末年楚国勇士。《左传·哀公十六年》："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当五百人矣。"《庄子·徐无鬼》："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魏叔子（禧）文集》卷八《三教经图赋序》："楚人熊宜僚善弄丸，手一丸而八丸常在空中，无益之艺也，而楚王以败宋师。"

[3] 越女，古代越国善剑之妇女。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载，越王勾践要范蠡推荐善战者，"范蠡对曰：'臣闻古之圣君，莫不习战用兵，然行阵队伍军鼓之事，吉凶决在其工。今闻越有处女，出于南林，国人称善，愿王请之，立可见。'越王乃使使聘之，问以剑戟之术。……越王即加女号，号曰'越女'……当世（莫能）胜越女之剑"。

《农书》[1]

壅　音翁，培也。

农叟有言，禾历三时，故秆三节；麦历四时，故秆四。种稻必使三时气足，种麦必使四时气足，则收成厚。

垦沟揪沟　揪音愁，束也，聚也。

诐　音沦，上声，垄也。

早麦又有几善，垦沟揪沟便于早，早则脱水而诐燥，力暇而沟深，沟益深则土益厚，早则经霜而土疏，麦根深而胜壅，根益深则苗益肥，收成必倍。

然能于地隙水滨种植良材百株，三十年后可得百金以外。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豳风》[2]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

儒者之文与文人之文不同。儒者之文清以纯，文人之文肆而驳。[3]

---

[1] 此《农书》指张履祥所著《补农书下》。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桐乡（今属浙江）人。居杨园村，学者称杨园先生。其论学，力主耕读不容偏废，故于讲学之余，于耕耘之事、种植之方，一一讲求，因在沈氏《农书》基础上著《补农书》。参见《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以下自“壅”起至“农事不理”各条，均系录自该书原文。在引文中“麦历四时，故秆四”的“四”后，《补农书》原文有“节”字，“霜”后《补农书》原文有“雪”字。

[2] 《豳风》，《诗经·国风》之一，包括《七月》《鸱鸮》等七篇。豳，古都邑名，在今陕西旬邑西南，相传为周代祖先立国之地。

[3] 参见《魏叔子（禧）文集》卷八《张无择文集序》：“儒者之文沉以缓，才人之文扬以急；文人之文文胜其质，学者之文质胜其文，然得其一皆足以自名。”

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

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

糠含碱性，粪田最宜。糠在田能使土疏，且久浸不坏。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大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西师意〈实学指针〉序》[1]

阁龙　西班牙人，光学名家。

牛董[2]　英人，始论压力者。

芙兰克林[3]　美人，有大力电气机，能使钢针有吸铁力，并作纸鸢引电之法。

---

[1] 《西师意〈实学指针〉序》，吴汝纶撰，参见《吴挚甫文集》卷一。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清末散文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西师意，日本人，自号金城子，曾师事吴汝纶。著有《金城丛书》三种，《实学指针》为其一，出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西师意称他著书“自忘其为日本人”，而“置身于清人之地以立说”（《泰东之休戚·前言》）。吴汝纶在序中对《实学指针》一书颇称赞：“是书详记英俄德美之地积、人口、财政、军法，使吾国士大夫考邻敌之富盛，而思所以自振拔，其用意故以勤矣。至称述阁龙、牛董、芙兰克林、华德之徒，讽切微至，吾曹从事学业者，其愧愤感发宜如何？”以下自“阁龙”至“华德”各条，均系吴汝纶序中所提到的外国人名。

[2] 牛董，今译牛顿（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

[3] 芙兰克林，今译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科学家，在研究大气电方面曾作出贡献，发明避雷针。

华德[1]　英人，发明汽机，今人凡百制造实利赖之。与瓦德异。

李龟年　唐天宝乐工。

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

美谚曰：曲乎直乎，是吾国已。[2]

耗财损息之事，莫如营屋置衣履，故母金不可不重也。日人重母金，箧无余帛，囷无宿粮。

恨　恨有二面：恨己则可，恨人则不可也。

《日知录序》[3]

郑樵　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人，著《通志》二百卷。

王应麟　字伯厚，南宋建元府人。九岁通六经，宋代著述最富者。

魏鹤山　名了翁，号鹤山，南宋邛州蒲江人（今福建邛州府）[4]。少有神童之称。

马端临　字贵与，元人。著《文献通考》。

---

[1] 华德，今译瓦特（1736—1819），英国发明家，对当时已出现的原始蒸汽机作了一系列重大改进。

[2] 参见斯宾塞著、严复译《群学肄言·国拘》篇：“曲乎直乎，是吾国已，此美利坚之民所常常称道者也。”

[3] 《日知录序》为潘耒撰，参见《遂初堂文集》，又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十七。《日知录》为顾炎武撰。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清初思想家、学者。潘耒（1646—1708），字次耕，江苏吴县人，顾炎武学生。以下自“郑樵”至“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各条，所有人名、概念及文句，均系录自《日知录序》。

[4] 邛州属今四川，境辖相当于今邛崃、大邑、蒲江等县地，故福建之说有误。

毛泽东在一师使用过的课桌。

鼓箧　《礼记》入学鼓箧注：击鼓警众，乃发箧，出所治经书[1]也。

唐荆川　名顺之，武进人。明嘉靖时人，著《左右文武儒稗》六编。

杨用脩　名慎，明正德时人。著作甚富。

王弇州　名世贞，太仓人，嘉靖进士。

郑端简　名晓，海盐人，嘉靖二年进士。

荆州〈川〉端简所讲求皆有用之学，而能见之于事实者，杨王不足并也。

宋、元二代人尚实学，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

---

[1] 参见《礼记·学记》。“经书”，《礼记》原文为“经业”。

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钞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民[1]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2]

露田　不种树之田也。北魏孝文诏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

元、明武官世袭。

有一时之正义，如君臣奴隶之类；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心民意之类。[3]

谈理要新，学文要古。

奏报　大吏奏上谓之奏，小吏报大吏谓之报。

古今制度不同而理则不易，如兵农财赋古今之制异矣，而兵之

---

[1] “国民”，《日知录序》原文为“国命”。

[2]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今河南怀县一带）人。官至魏丞相主簿。据《三国志·魏志》：“朗以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蒐守习战之备故作。今虽五等未可复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于策为长。又以为宜复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业，难中夺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宜及此时复之。议虽未施行，然州郡领兵，朗本意也。”虞集（1273—1348），字伯生，崇仁（今属江西）人，元代学者。官至国子祭酒。尝建言以京东沿海土地听民开垦，筑堤以捍海潮。事虽不成，而后来设立海口万户，即略采其说。

[3] 一时之正义、万世之通义，语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四，原文是：“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

为谋略，农之为富民，财之为裕国，莫或□[1]焉。

荆川[2]文武全才，弓马擅长。

学问之成否以二十五岁为断。

明请之学无用者，趋于时文也。

著书存者，以其实也。无用而存，以其精，韩柳杜[3]之诗是也。不然，浩如烟海塞天地矣。

《通典》《通考》《通志》三通[4]，士人必读之书，典章制度礼乐兵农诸如此类，详考而详断之，甚有用之书也。

程子读书之法，见事先下判断，继看下文。[5]

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义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

老子唯心派。

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王某一画饼也。

著书亦有几等　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元朝亦然，确有所见，发而为理。

---

[1] 此处原件有缺损，仅留“歹”旁，疑为“殊”字。

[2] 荆川，即唐顺之。

[3] 韩，指韩愈；柳，指柳宗元；杜，指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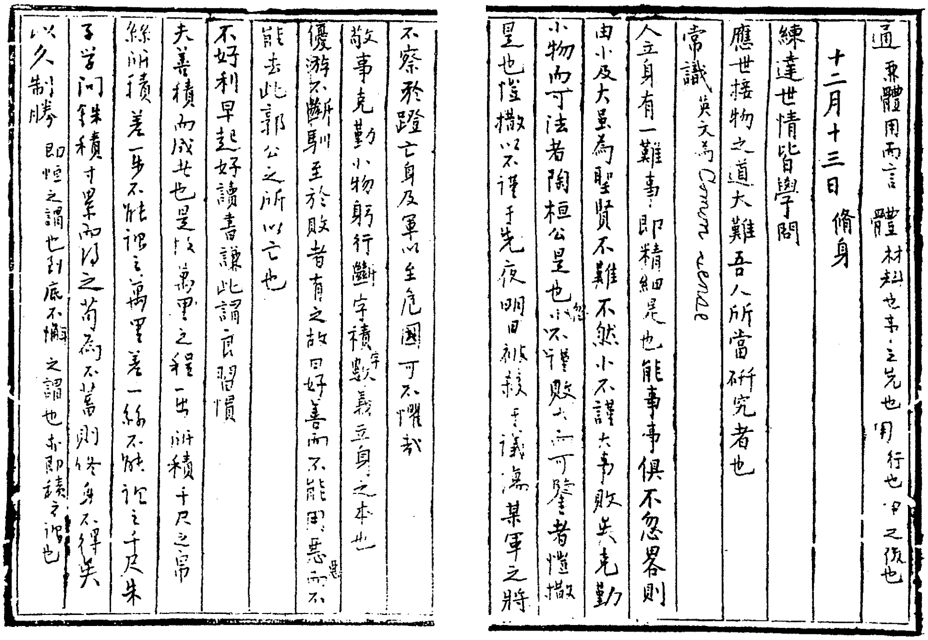
[4] 《通典》，唐杜佑撰，二百卷，记载历代典章制度之沿革，上起唐虞，下迄唐肃宗、代宗。《通考》，《文献通考》之简称，宋元之际马端临撰，三百四十八卷，记载上古至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志》，南宋郑樵撰，二百卷，系综合历代史料而成之通史。

[5] 程子，指程颐。事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九，参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8页。原文是：“先生每读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败，然后却看有不合处，又更精思，其间多有幸而成，不幸而败。今人只见成者便以为是，败者便以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败者煞有是的。”

纸上工夫亦有浅深。

郑渔仲[1]著《通志》，实事而有用之书也。

通　兼体用而言。体，材料也，事之先也；用，行也，事之后也。



通（兼體用而言）體（材料也事之先也）用（行也事之後也）

十二月十三日　脩身

練達世情皆學問

應世接物之道大難吾人所當研究者也

常識（英文為 Common sense）

人生有一難事即精細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畧則

由小及大聖賢不難不然小不謹大事敗矣克勤

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小不謹敗大而可鑒者愷撒

是也愷撒以不謹于先夜明日被殺于議院某軍之將

不察於蹬亡身及軍以至危國可不懼哉

敬事克勤小物躬行斷字積字數義立身之本也

優游不斷馴至於敗者有之故曰好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

不好利早起好讀書謙此謂良習慣

夫善積而成者也是故萬里之程一步所積千尺之帛

絲所積差一步不能謂之萬里差一絲不能謂之千尺朱

子學問銖積寸累而得之苟為不蓄則終身不得矣

以久制勝（即恆之謂也到底不懈之謂也亦即積之謂也）

毛泽东听课笔记《讲堂录》(部分)。

十二月十三日　修身

练达世情皆学问[2]。

应世接物之道大难，吾人所当研究者也。

---

[1] 郑渔仲，即郑樵。

[2] 参见《红楼梦》第五回：“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常识　英文为Comon sence〈Common sense〉。

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撒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惧哉！[1]敬事，克勤小物，躬行，断字积字数义，立身之本也。[2]

优游不断驯至于败者有之，故曰好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3]

不好利，早起，好读书，谦，此谓良习惯。

---

[1] 陶桓公，即陶侃（259—334），字士行，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历任荆州、广州刺史。勤慎吏职，常勉人惜分阴；造船时木头竹屑都贮以备用。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试言陶侃之勤”“陶侃与本校有何关系”等题。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在其任终身独裁官时，因进行改革遭反对派的暗算。事先，恺撒已预闻有关阴谋，但他坚信自己的命运，于公元前44年3月15日按原计划出席在罗马庞培议事堂举行的元老院会议。结果，在那里被杀害。

[2]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校订本）1914年11月21日所拟修身问题中，有“试举不敬事之例”“试举陶侃克勤小物之例”“何谓断”“试言积字之义”等题。

[3]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八：“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刘向《新序》卷四：“昔者齐桓公出游于野，见亡国故城郭氏之墟，问于野人曰：‘是为何墟？’野人曰：‘是为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人之善行也，其所以为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是以为墟也。’桓公归以语管仲，管仲曰：‘其人为谁？’桓公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于是桓公招野人而赏焉。”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1]

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谓也。[2]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3]不悔之谓也，进步之谓也。

哲学家之言曰，人以未来为重，或曰以现在为重，此颉德、杨朱所以背驰于东西而不相谋也。[4]然而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也？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豫测何益，求其可

---

[1] 参见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是：“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

[2] 以久制胜，参见杨昌济《论语类钞》，《杨昌济文集》第68页。“□”处原件有缺损，据前后文意，疑为“之”字。

[3] 此段有眉批“曾语”二字。曾，指曾国藩。语见曾国藩同治六年（1867）二月二十九日《致沅弟》信：“此时须将劾官相之案、圣眷之隆替、言路之弹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自馁也。”

[4] 颉德，亦译克特（1858—1915），英国社会学家。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曾介绍其重未来的观点：“颉德以为人也者，与他种动物同，非竞争则不能进步。……而此进化的运动，不可不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即人群），不可不牺牲现在以利将来。”杨朱，战国初哲学家，魏国人，主张“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侵夺别人，故孟子抨击他“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

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谅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惩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1]。

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2]，如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

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3]

竖尽来劫，前古后今一无可据，鲽可据惟目前（通今）。

国文 集

《浑州溪堂诗并序》[4]

喑　音〔音〕，与瘖同。

壥　与廛同。九壥，九州也。

施用不差，人用不屈。

蓱　音萍，与蘋同，苹也，根浮水而生。

苽　音菰，与菰〔同〕，雕胡也。

无我斁遗　斁音亦，厌也。言无厌弃我也。

螟蠜蝆贼　皆蝗属。螟食苗心，蠜食叶，蝆食根，贼食节。蝆

---

[1] 大禹，即禹，姒姓。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惜阴之说见《晋书·陶侃传》：“侃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

[2] 参见杨昌济《告学生》，《杨昌济文集》第364页。

[3] 本条和下条均参见杨昌济《告学生》，《杨昌济文集》第365页。

[4] 《浑州溪堂诗并序》，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浑”，原文为“郓”。《讲堂录》中自“喑”至“螟蠜蝆贼”各条，均系录自该诗及序中正文或注中文字。

或作蝨。

《猫相乳》[1]

北平王　马燧也。

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2]

夫子序帝王之书而系以秦鲁，及次列国之风，而宋鲁独称颂焉。[3]

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

九合诸候〈侯〉　九合者，谓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

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

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责其实欤？[4]

---

[1] 《猫相乳》，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以下一条“北平王，马燧也”，系该文注中文字。马燧，字洵美，汝州郏城（今河南郏县）人。唐大历、建中年间，以功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北平郡王。

[2] 自此条起，至“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为也”，凡九条，均录自韩愈《进士策问十三首》，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此条“周”之前韩愈原文有“而”字。

[3] 夫子，指孔子。此句《韩昌黎全集》有注：“孔安国曰：‘诸侯之事而连帝王。孔子序《书》，以鲁有治戎征讨之备，秦有悔过自誓之戒，足以为后世法，故录之以备王事。犹诗录商鲁之颂。’而郑康成以为，鲁得用天子礼乐，故有颂。而商颂至孔子之时存者五篇，而夏颂已亡，故录鲁以备三颂，著为后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4] 管，指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政治家，助齐桓公进行改革，使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商，指商鞅。“不责其实”，韩愈原文为“不得其实”。

孔子曰：居则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1]

死者可作，吾谁与归？[2]

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为也。[3]

皆辞严义伟，制作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4]

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5]

人皆以为华，杨子[6]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7]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8]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9]

---

[1] 此为韩愈引孔子语，参见《论语·先进》。

[2] 此为韩愈引赵文子语，参见《礼记·檀弓下》。

[3] 此为韩愈引孔子语，参见《论语·季氏》。

[4] 这一条及下条“此诗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均录自韩愈《元和圣德诗并序》题注中语，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原文是：“穆伯长曰：‘退之《元和圣德诗》《淮西碑》《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伟，制作如经，能崒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笔墨闲录》云：‘此序乃司马迁之文，非相如文也。’”

[5] 自此条至“《传》曰”条，除另注明者外，均系录自韩愈《争臣论》中原文或原注中文字，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

[6] 杨子，《争臣论》原文作阳子，指阳城（736—805），字亢宗，唐定州北平（今河北满城北）人。曾官谏议大夫。

[7] 此为《韩昌黎全集》中《争臣论》原注中文字。“城”，指阳城。原文为：“城好学，贫不能得书，乃求为集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昼夜不出，六年乃无所不通。”

[8] “忽然”，韩愈原文为“忽焉”。

[9] 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孜孜矻矻　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1]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2]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3]

我国东西两极端，时差四点十五分。西喀什噶尔，东乌苏里江。

⿱⺈肉　与炙同。万牛脔⿱⺈肉，万瓮行酒。[4]

帕　音麦。以红帕首。

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5]

穰穰　众也。

枷胠械手。

《孟子》　经[6]

---

[1] “招”字原文旁有一“翘”字，为读音。国武子，即国佐，春秋时齐国大夫，国归父之子。

[2] 襄公，指单襄公。单襄公语见《国语·周语下》。“淫乱之间”，原文为“昏乱之国”。

[3] 《传》，指《左传》，引文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4] 自“⿱⺈肉”至“枷胠械手”各条，包括注中文字，均系录自韩愈《元和圣德诗》中原文或原注。

[5] 参见《黄石公三略·上略》。原文“勇”为“死”。

[6] 此处之“经”字及后面“子”“集”字，系我国旧时书籍的四部分类法，即“经、史、子、集”。本条以下自“睊睊胥谗”至“思戢用光”各条，包括注中某些文字，除“好尽言”条外，均系录自《孟子·梁惠王下》。

睊睊胥谗　睊睊，侧目貌。

流连荒亡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

哿　可也，哿矣富人[1]。

招　音昭，取非其招不往也。音韶，盖《徵招》《角招》[2]是也。音翘，好尽言以招人过，此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思戢用光　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国家也。

文

《朴学斋藁序》[3]

经史百家，天人理数，章程典故，草木虫鱼，何一而非文之材。剪裁运用，起伏开合，变化错综，何一而非文之法。

明季之失，在法不足。今人之短，在材不足。

欿然不自慊。愈造深者愈自歉。

故其文词清[4]典雅，文质相宣，矩镬有余，而精义不乏。

诚能殚精研思，穷高极远，贯天人以为学，罗古今以为资，譬若采木邓林，伐石南山，以就倕般之绳削，而千门万户，无不可营，

---

[1] 苛，《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为“哿”。“哿矣富人”，语出《诗·小雅·正月》。

[2] 《徵招》《角招》，我国古代乐章名。

[3] 《朴学斋藁序》，清潘耒撰，参见《遂初堂集》；又见《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十七。《朴学斋藁》为林佶撰。林佶（1660—1735），字吉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康熙进士，授内阁中书。善楷书，尝从汪琬学。本条以下至“不鄙予而枉存之”各条，均系录自《朴学斋藁序》。

[4] “清”后《朴学斋藁序》原文有“醇”字。

出尚方之珍，罗水陆之品，以供易牙之烹饪，而天下之至味具焉。[1]

不鄙予而枉存之。

魏伯子曰：大家之文，其奇处在至平，其密处在至宽，至曲折周翔断续转换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腴丽姿致在朴。[2]

汪钝翁　名琬，字苕人。吴人，顺治乙未进士。

《铭书案曰净厚宽平》　净，简洁以居心；厚，真固以干事；宽，优余而受物；平，坦易而行志。[3]

毋遗于拙，毋便于工。

刺发　魏时有句骊[4]客，善用针，能刺发贯其空。

射虱　《列子》：飞卫学射于甘蝇，而巧过其师；纪昌者又学射于飞卫，视虱如车轮，矢贯其胸而悬不绝。[5]

升　音宗，布八十缕为升。

---

[1] 邓林，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树林，参见《山海经·海外北经》。南山，古山名，即今之终南山。《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倕，传说中尧时（一说黄帝时）巧匠名。般，即公输般，亦称公输盘、鲁班。我国古代建筑工匠，春秋时鲁国人。易牙，亦作狄牙。春秋时齐桓公之幸臣。长于调味，善于逢迎，相传曾烹其子为羹以献桓公。

[2] 魏伯子，即魏际瑞（1620—1677），原名祥，字善伯。魏禧之兄，江西宁都人。明清之际著名散文家，著作有《魏伯子文集》十卷。此处引文参见该集卷二《与周公书》。原文是：“愚窃以为，大家之文，其奇者在至平，其密者在至宽，其曲折周翔断续转换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腴丽姿致在朴。此体识之所以为大也。”

[3] 《铭书案曰净厚宽平》，魏际瑞撰，参见《魏伯子文集》卷七《铭》。引文中“真”字魏际瑞原文为“贞”。

[4] 句骊，亦作高句骊、高句丽、高骊、高丽。古国名，后为卫氏朝鲜所并。

[5] 飞卫学射于甘蝇一段见《列子·汤问》篇。

潨　音丛，小水入大水也，潨汇相通。

玄酒太羹。

白贲　饰也，言以白为饰也。

脏，五行之海也，心木、肝火、脾土、肺金、肾水也。

天地交曰泰[1]。

天君泰然[2]　天君，心也。

蝍蛆　蜈蚣也，食带眼。[3]

带　蛇也，蝍蛆食其眼。

鸟憎西施威也　毛墙、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乌见之高飞。[4]

鳦　音亦，燕也。

猱蝯　猴类，善援。

玃父　弥〈猕〉猴也。玃或作貜，捉也。玃父摄人妇为偶，生子，故名玃父。

果然　猴也，性义兽。

交让　木也，有交让之性。

吴询，字画溪，桐城人，著《画溪逸语》。

尧一生大德在一个敬字，舜一生大德在一个孝字。

浑沌氏　《庄子·应帝王》：南方之帝曰儵，北方之帝曰忽，中央

---

[1] 参见《易经》《泰》卦《象》辞。原文是："天地交，泰。"

[2] 天君，参见《荀子·天论》："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五官，荀子书中指耳、目、鼻、口、形。天君泰然，语出宋代范浚《香溪集》五《心箴》："天君泰然，百体从令。"

[3] 《庄子·齐物论》有"蝍蛆甘带"。

[4] 参见《庄子·齐物论》，"墙"《庄子》原文作"嫱"。

之帝曰浑沌。儵与忽相遇于浑沌之野，浑沌待之甚厚，儵与忽谋所以报之，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彼独无有，曷为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经

干戈戚扬[1]　戚，斧。扬，钺也。

残贼　贼仁者谓之贼，责义者谓之残[2]。

镒　二十两也。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

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3]

又何厝心于其间哉。

夫大鸟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则有间矣，其于适性一也。

言鹏不知道里之远近，趣足以自胜而逝。

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

[1] 语出《诗经·大雅·公刘》。自本条至“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各条，均系录自《孟子·梁惠王下》。

[2] “责”，《孟子》原文为“贼”。

[3] 自本条以下，至“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各条，均系录自《庄子·逍遥游》原文或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上的原注中文字。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予诵斯言，未尝不叹其义之当也。夫古今谋国之臣夥矣，其雍容暇豫游刃而成功者有之，其跼蹐失度因而颠踬者实繁有徒，其负大舟也无力，岂非积之也不厚乎？吾观合肥李氏，实类之矣。其始也平发夷捻，所至有功，则杯水芥舟之谓也；及其登坛□理国交，着着失败，贻羞至于无已者何也？[1]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2]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集

《元和圣德诗》[3]

珪　古文圭字。

陴　城上女墙。掷首陴外。

少府　《唐志》：少府监掌供百官仪物。出节少府。

帕　音麦，额首饰也，军容之服。以红帕首。

搜原剔薮。

拄　音主。通作柱，支也。

累累　音力追切。《记》：累累乎端如贯珠。[4]妇女累累。

烜威赫德，蹴蹈蹈舞，掉弃兵革，私习簋簠。

---

[1] 合肥李氏，指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淮军首领，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所谓“平发夷捻”，指其镇压太平军、捻军农民起义。“登坛□理国交”，原件有一字缺损，疑为“陛”字。

[2] 参见《孟子·尽心上》。

[3] 《元和圣德诗》，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本条以下自“珪”至“耦”各条，包括某些注中文字，均系录自该诗。

[4] 《记》指《礼记》，此语出自《礼记·乐记》。

耦　耦谓朋类。

《改葬服议》[1]

缌　三月服。经曰改葬缌。

缅　远也。改葬之礼缌，举下缅也。[2]

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时之道也。

殡于堂则谓之殡，瘗于野则谓之葬。

若果重服，是所谓未可除而除之[3]，不当重而更重也。

曰不然。易之与戚，则易固不如戚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俭之与奢，则险〈俭〉固愈于奢矣。虽然，未若合礼之为懿也。过犹不及，其此类之谓乎。

《谏臣论》[4]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5]

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

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

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

---

[1] 《改葬服议》，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本条以下自“缌”至“曰不然”各条，均系录自该文。

[2] 语出《春秋谷梁传》庄公三年五月。

[3] 《改葬服议》原文无“之”字。

[4] 《谏臣论》，亦作《争臣论》，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本条以下自“志不可则”至“子告我曰”各条，均系录自该文。

[5] 《谏臣论》原文为：“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

《书黄子久画后》[1]

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呜乎，天下容有习且熟于其真，而举而为之，常不得其似者，未有望而摹其似，而有所得者也。

《谢安论》[2]

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

德量　夫君子之所恃以胜天下者，在乎气识[3]德量之间，而不在乎干局。

干局　然而干局之用，君子虽不恃以为长，而不可以之自废。

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为来逼人。[4]

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世所宜。[5]

---

[1] 《书黄子久画后》，侯方域撰，参见《壮悔堂集》卷九。黄子久，即黄公望（1269—1359），字子久，号大痴，又号一峰道人，元代杰出的山水画家。自上一条“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至“呜乎！天下容有习且熟于其真”各条，均系录自《书黄子久画后》中原文。

[2] 《谢安论》，侯方域撰，参见《壮悔堂集》卷七。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政治家，曾官至宰相。本条以下自“古之有为于天下者”起至“导有大有为之识”各条，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其他均录自《谢安论》。

[3] 气识，《谢安论》原文为“器识”。

[4] 参见《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濛，指王濛（309—347），字仲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南）人，系晋哀帝王皇后之父。这两句对话是谢安年轻时拜会王濛之后，濛子修问其父对谢安的印象如何，及濛的答话。

[5] “夏禹勤王……恐非当世所宜。”“秦用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这两条均出自《晋书·谢安传》。前一条是谢安与王羲之登冶城时，王羲之讲的一段话，下一条则为谢安的答语。

秦用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岂犹夫寻常之可测者哉？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清冲有余，而朴练不足。

无以争天下之先，而经天下之远，吾以其夙习决之矣。

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又安能深沉确实开扩淬厉而以先〈天〉下为己任乎？

导有大有为之识，而无大有为之才。安有大有为之量，而无大有为之干。[1]

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2]

无者有之先也，故鸿荒以前，谓之无也，因此则鸿荒以后斯有矣。

才　才者，经济之谓也。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

浔阳　古属安庆。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3]

---

[1] 导，指王导（276—339），字茂弘，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东晋政治家，曾官至丞相。安，指谢安。

[2] 参见《晋书·谢安传》。晋简文帝崩后，桓温欲谋害谢安等人以篡晋，这是谢安为挫败桓温阴谋而讲的一段话。“明公”指桓温。

[3]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四。题中“议”字原件缺损，据《韩昌黎全集》补。以下自“执笾豆”至“宗彝”各条，均系录自该文。

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

其亦微矣哉。

其亦不可移易明矣。

盖亦不得其理矣。

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

此无其他。

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

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为[1]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议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

罍洗　祭器也。

宗彝　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2]，罍洗。

赋　《二鸟赋》[3]

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4]

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李翱。呜乎，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

---

[1] “为”，韩愈原文为“考”。

[2] “寻”，原文如此，疑为“彝”字之误。

[3] 《二鸟赋》，应为《感二鸟赋》，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以下四条均为该赋序或注中文字。

[4] 左太冲，即左思（约250—约305），字太冲，西晋文学家。引文出自《咏史》，参见《昭明文选》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7页。

天下岂有乱与亡哉！[1]

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复志赋》[2]

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

视韩彭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刘孝标《辨命论》[3]

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生[4]

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

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5]

---

[1] 此系《感二鸟赋》原注中引李翱《幽怀赋》文。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安东）人。唐代散文家、哲学家，尝从韩愈学。

[2] 《复志赋》，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以下各条均录自该赋序、正文及注文。

[3] 刘孝标，即刘峻（462—521），字孝标，平原（今属山东）人，南梁文学家。《昭明文选》卷五十四作《辨命论》，且对这句话有注：“彭，彭越。韩，韩信。《易》曰：‘君子豹变，其文蔚。’《礼记》曰：‘鸷虫攫搏，不程其勇者。’郑玄曰：‘鸷虫，猛兽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汉书》曰：‘张禹，字子文，善说《论语》，令禹授太子，迁光禄大夫，赐关内侯。’范晔《后汉书》曰：‘桓荣治欧阳尚书，授太子，为太子少傅，封关内侯。’《礼记》曰：‘诸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

[4] 夏侯胜，字长公，东平（今山东汶山附近）人。西汉今文尚书学“大夏侯学”之开创者。语见《汉书》卷七十五。《汉书》原文“取”前有“其”字。

[5] 《剧秦美新》，扬雄作。扬雄（前53—18），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真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1]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传》

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

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2]

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3]

嫉贪佞之污浊兮，曰吾其既劳而后食。

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畎亩兮，焉富贵之能当。

《闵己赋》[4]

昔颜氏之庶几兮，在隐约而平宽。

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

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焉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大事乎。苏子瞻[5]

---

[1] 班孟坚，即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撰《汉书》。《宾戏》，《昭明文选》题为《答宾戏》。“艺术”，《答宾戏》原文为“术艺”。

[2] 《家语》，即《孔子家语》。“也”，《孔子家语》原文为“已”。

[3] 《前汉》，指班固所撰《汉书》，又称《前汉书》。刘向（约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

[4] 《闵己赋》，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一。本条以下自“昔颜氏之庶几兮”至“司马苏氏之论当矣”各条，均系录自该赋正文或原注中文字。

[5] 苏子瞻，即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文学家。此处引语见《颜乐亭诗并序》，载于《苏轼诗集》卷十五。“必于其小焉观之”，苏轼原文为“必于小者观之”。

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颜子之所为乎？司马君实[1]

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2]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

楚囚，君子也。[3]语出《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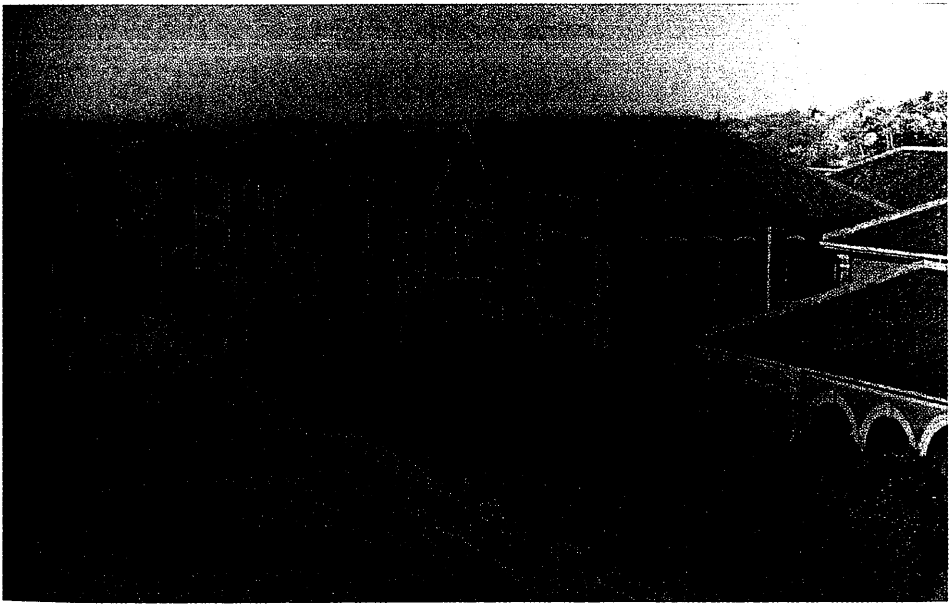
---

[1] 光，指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涑水乡人。北宋大臣、史学家，撰《资治通鉴》。司马光语见《颜乐亭颂·序》。“志诏”“乎”，《颜乐亭颂·序》原文为“铭志”“哉”。“以三书抵宰相求官”，指韩愈于贞元十一年（795）正月二十七日《上宰相书》，二月十六日《后十九日复上书》，三月十六日《后二十九日复上书》，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六。宰相指赵憬、贾耽、卢迈。《与于襄阳书》，韩愈撰，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七，书中有云：“愈今者，惟朝夕刍米仆赁之资是急，不过费阁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于襄阳，指于頔，字允元，时任襄州刺史，充山南东道节度使。

[2] 《答李习之书》，即《答李翱书》，参见《韩昌黎全集》卷十六。“常”，韩愈原文为“尝”，“颜子”为“颜回”，“不亦难乎”为“其不亦难乎”。

[3] 楚囚，君子也，参见《春秋左传·成公九年》。楚囚，指囚于晋国的一个楚国伶人（乐官），晋侯与他对话时，他很讲礼义。范文子称赞他：“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大（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簖，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因建议晋侯将其释放，“使合晋、楚之成”。

1914



1914年2月，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在第八班学习，直至1918年6月毕业。图为一师的校舍。

五言排律·湘江漫游联句[1]

（1914年）

晚霭[2]峰间起，（萧瑜）
归人江上行[3]。（萧瑜）
云流[4]千里远，（萧瑜）
人对一帆轻。（毛泽东）
落日荒林[5]暗，（毛泽东）
寒钟古寺生[6]。（萧瑜）
深林归倦鸟，[7]（萧瑜）

---

[1] 此诗见于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萧瑜（1894—1976），字子升，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萧三的二哥。

[2] 霭，云气。晚霭，傍晚时的云气。

[3] 归人，回家的人。江上行，指乘船而行。唐代王建《送丘为下第归江东》：“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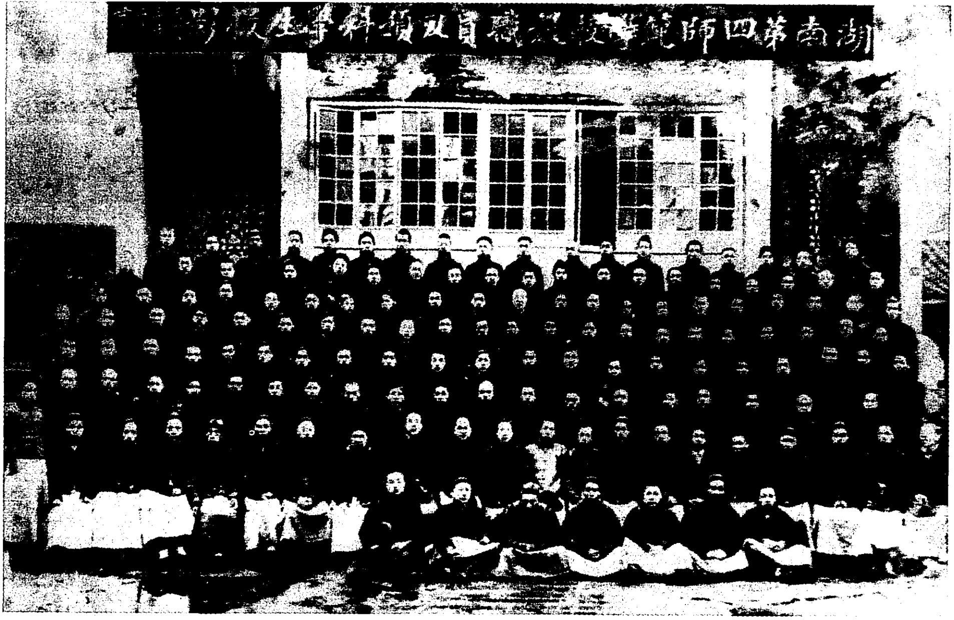
[4] 云流，指云在天空中不断地随风飘动。

[5] 荒林，人迹罕至的树林。

[6] 寒钟，听了令人产生寒意的钟声。古寺，古庙。生，发生。这里指敲钟发出声音。

[7] 深林，茂密的树林。深林归倦鸟，即倦鸟归深林。宋代陈造《三月初晚晴寄高缙之》诗三首其三有“森木倦鸟归”之句。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亦有“鸟倦飞而知还”之句。

高阁倚佳人[1]。（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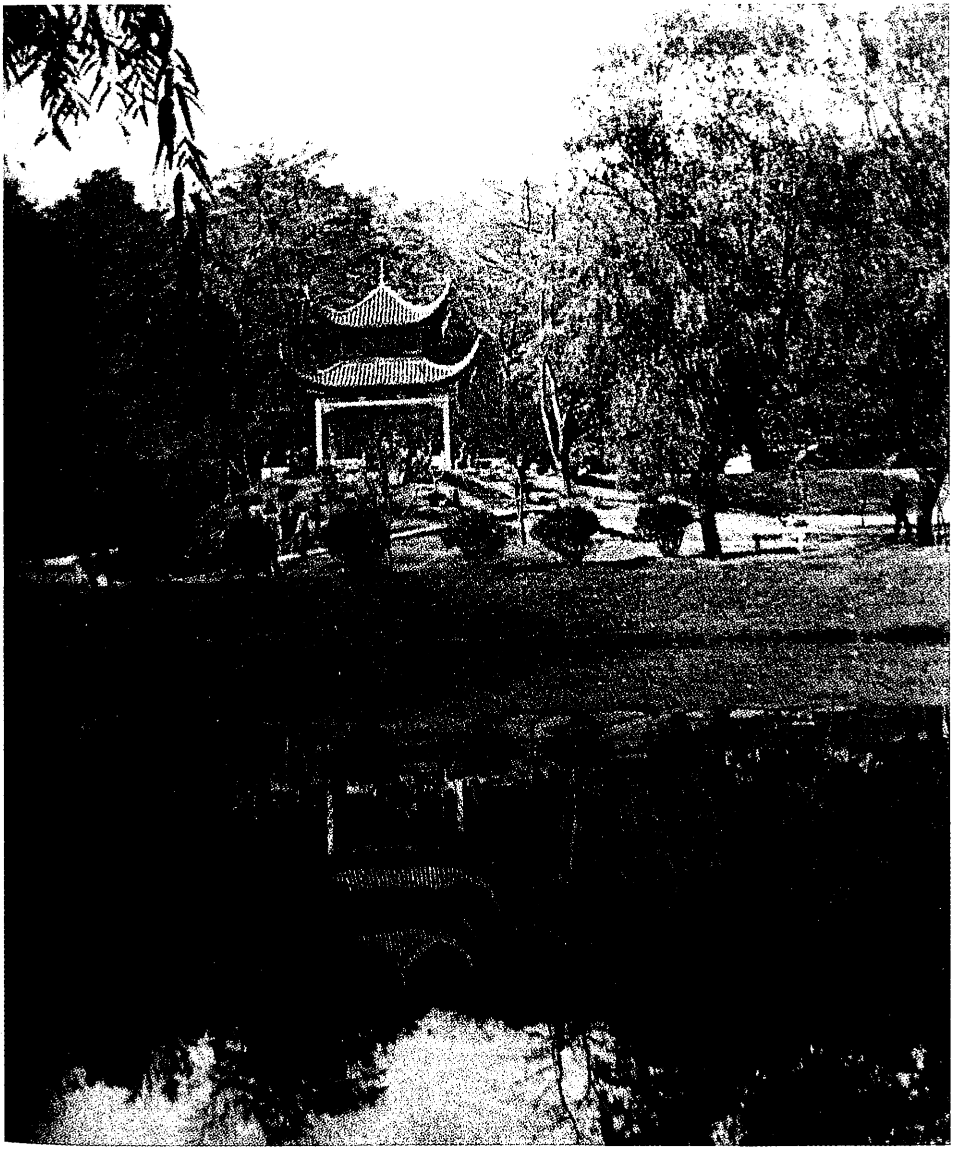

湖南第四師範學校[illegible]職員及預科學生[illegible]

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职员及预科学生合影。第五排左二为毛泽东。

---

[1] 阁，旧时女子的住房。高阁，犹言高楼。倚，依靠，指身体靠在物体上。佳人，美人。高阁倚佳人，即佳人倚高阁。这里指少妇倚楼盼望远行的丈夫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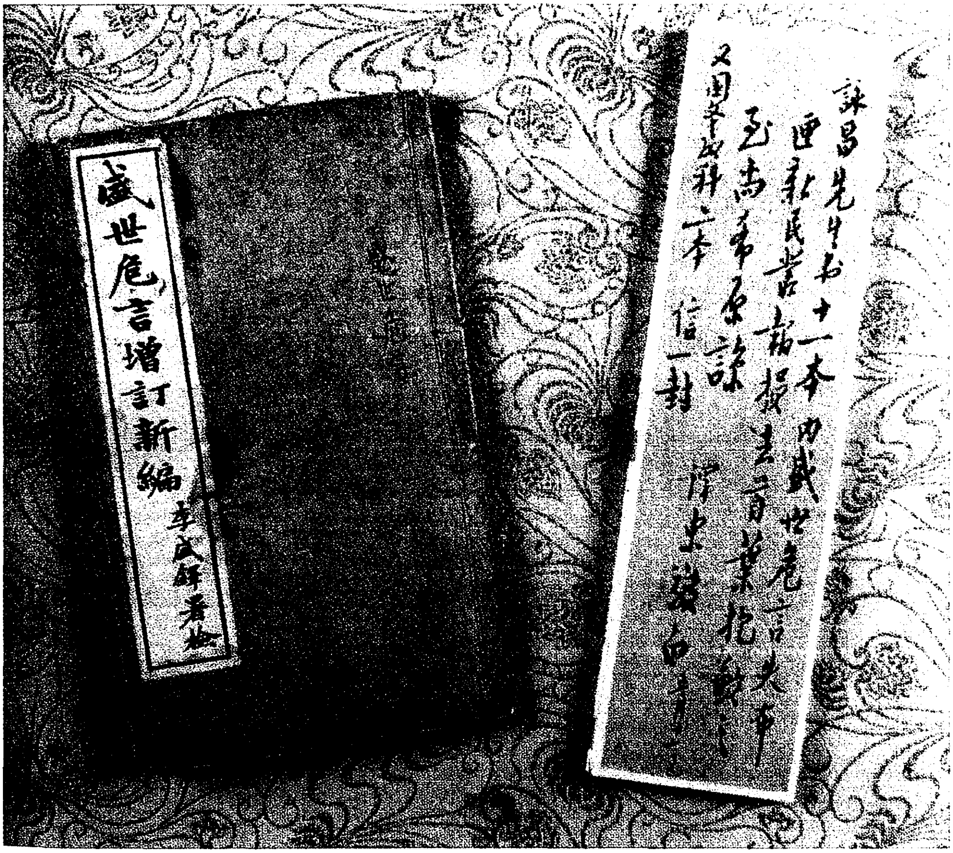
1915



长沙岳麓山爱晚亭，毛泽东常和同学们到这里读书游玩。

给文咏昌的信[1]

（1915年2月24日）



詠昌先生書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
匣新民叢報損去首葉抱歉之
至尚希原諒
又國學叢刊一本信一封 澤東敬白

1915年，毛泽东向表兄文咏昌归还的《盛世危言》和还书便条。

---

[1]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张还书便条。原无写作年份，据文咏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忆，这张便条是“民四年”（即1915年）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回家过春节时所写。所署“正月十一日”系农历，公历为2月24日。

咏昌[1]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2]失布匣，《新民丛报》[3]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

[1] 咏昌，即文咏昌（1884—1961），名胤昌，又写作润昌、运昌，湖南湘乡唐家坨（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人，毛泽东的表兄。

[2] 《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1842—1921）著。书名及内容编排屡经变更，1893年始定此名出版。该书批评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说，他少年时阅读此书，“非常喜欢”。

[3] 《新民丛报》半月刊，梁启超主编，1902年创刊于日本横滨。初期连载梁启超的《新民说》，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曾有较大的影响。1903年以后，因坚持立宪保皇，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受到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1907年终停刊，共出96期，有汇编本。毛泽东于1910年下半年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借阅过，并在该报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3段末批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说，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颇感新鲜，因此“读了又读”，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杨昌济记毛泽东的谈话[1]

（1915年4月5日）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

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

---

[1] 本篇是杨昌济《达化斋日记》中有关毛泽东谈话的一段记载。当时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毛泽东的老师。

悼友人易咏畦[1]

（1915年5月）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没〉，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悼念同学易咏畦所写的挽联。易咏畦，即易昌陶，湖南衡山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于1915年3月病逝家中。由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昌济发起，学校于5月23日召开了追悼会。师生共送挽诗挽联256首（副），并编印成册，题为《易君咏畦追悼录》。诗联内容多含“悼念学友，毋忘国耻”之意。

五古[1]·挽易昌陶[2]

（1915年5月）

去去[3]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
衡阳雁声彻[4]，湘滨春溜[5]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6]。
城隈草萋萋，涔泪[7]侵双题。

---

[1] 五古，五言古体诗的简称。每句五个字，句数不限，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可以换韵，不像五律那样讲究平仄对仗。

[2] 易昌陶，名咏畦，湖南衡山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与毛泽东同班。1915年3月病死家中，5月23日学校为他开追悼会。毛泽东在致湘生（生平不详）信中说："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3] 去去，越去越远。汉代《别诗》四首（旧作苏武诗）其三："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

[4] 衡阳雁声彻，湖南衡阳有回雁峰，相传雁不过此峰。雁声响彻衡阳，比喻思友悲叹的深切。

[5] 春溜，即春水。

[6] 踯躅南城隈，踯躅，徘徊。南城隈，南城墙弯曲处。

[7] 涔泪，不断流下的泪。

采采馀孤景[1]，日落衡云西[2]。
方期沆漭[3]游，零落匪[4]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5]。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6]，飞飚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7]，北山尽仇怨[8]。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9]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

[1] 采采馀孤景，采采，丰盛貌，众多。馀，剩下。孤景，同孤影，这里指作者。

[2] 日落衡云西，衡云，衡山上的云烟。衡山在长沙之南，这里“衡”指长沙之西属衡山七十二峰的岳麓山。

[3] 沆漭，犹汪洋，水深广的样子。左思《吴都赋》：“㴔溶沆漭，莫测其深，莫究其广。”

[4] 匪，同非。

[5] 汗漫东皋上，汗漫，本义是漫无边际，这里指漫步。东皋，泛指田野或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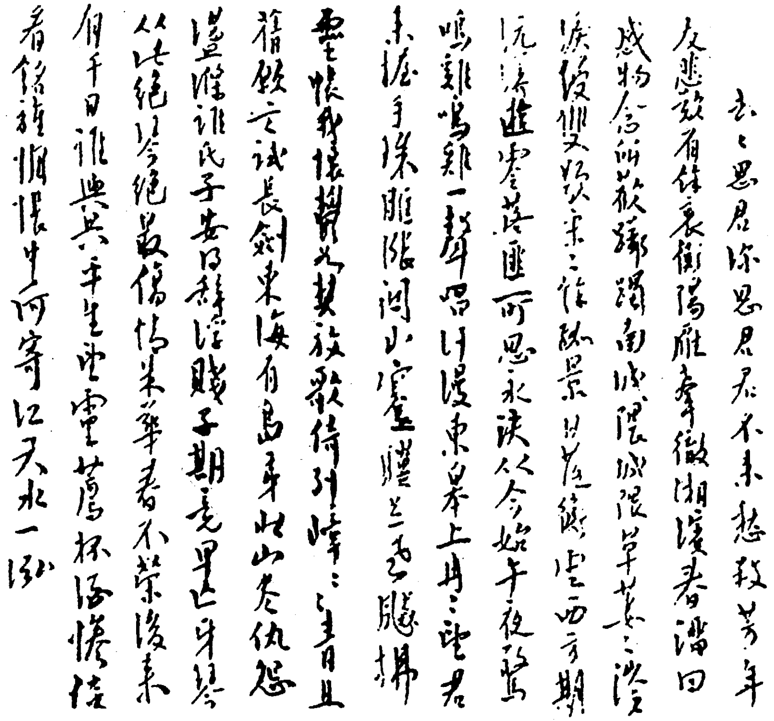
[6] 关山蹇骥足，关隘山川阻碍良马的奔跑。骥足，比喻俊逸的人才。

[7] 岛夷，古代指分布在我国东部沿海及附近岛屿的民族。这里借指日本。

[8] 北山尽仇怨，北方群山间有仇视我们的国家，这里指沙皇俄国。

[9]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吕氏春秋·本味》称，伯牙弹琴，钟子期听了，完全懂得伯牙琴曲的意境。钟子期死，伯牙碎琴绝弦，终生不再弹琴。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1]。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2]。



去々思君深思君君不來愁殺芳年
友悲歎有餘哀衡陽鴈聲徹湘濱春溜回
感物念所歡躑躅南城隈城隈草萋々涔
淚侵雙題采々餘孤景日落衡雲西方期
沆瀣遊零落匪所思永訣從今始午夜驚
鳴雞鳴雞一聲唱汗漫東皋上冉々望君
來握手珠眶漲關山蹇驥足飛飆拂
靈帳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々青且
藍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
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子期竟早亡牙琴
從此絕琴絕最傷情朱華春不榮後來
有千日誰與共平生望靈薦杯酒慘淡
看銘旌惆悵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手书《五古·挽易昌陶》。

---

[1] 铭旌，灵柩前的旗幡。

[2] 泓，水深的样子，这里以“水一泓”比喻深情。

易君詠畦追悼録
廖廷璣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编印的《易君咏畦追悼录》，其中记录了毛泽东等为易咏畦撰写的挽联和挽诗。

给湘生的信[1]

（1915年6月25日）

湘生足下：

初一日接君书，今二十五日矣，未作复者，吾夏假住处未定也。前友人招往浏阳，继吾不欲往，寓省城又无钱，故止有回家一法。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2]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

---

[1] 湘生，情况不详。此信无写作年份。信中所提《明耻篇》，系1915年夏刊印，而易昌陶的追悼会系1915年5月23日举行的。据此，此信当写于1915年。

[2] 曾文正，即曾国藩（1811—1872），字涤生，湖南湘乡人。清末湘军首领。道光进士。1853年初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将团练扩编为湘军。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有《曾文正公全集》，文中提到的“曾文正家书”，俱收录其中。

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1]。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阅足下所定课程及为学之功，使愧慑无地。不知足下之意，学校与自修果〈课〉已定否？看君欲学英文、数学，又似预备进学校。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2]。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3]。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同学

---

[1] 语见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信。原文为："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2] 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故人称康南海。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相对立。他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3]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后逃亡日本。曾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立宪保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对立。但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五四运动后批判封建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为文流利畅达，为学界推重。他的著作内容宏富，涉及范围极广，后人编为《饮冰室合集》。

陈子[1]，有志之士，馀不多见。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盍留意焉！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以为然乎？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馀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馀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漭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2]。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3]郑某处书三本，信一函，今寄来。油纸三

---

[1] 陈子，指陈昌（1894—1930），字章甫，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中共党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与毛泽东同学。1915年毕业后，任长沙县五美小学教师。1917年在一师附小任教。后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任水口山铅锌矿工会主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去上海，被派往湘西贺龙部工作，途经澧县时被捕，1930年在长沙就义。

[2] 岛夷，原指我国古代东南沿海一带居民，此处借指日本。北山，古指今甘肃省西部边境，或指吉林一带，此处泛指东北一带。当时日本和沙俄互相勾结，侵略满蒙；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3] 1915年《易君咏畦追悼录》中收入的这首诗，与这封信中的诗有四字不同，一是“方期沆漭游”的“沆”字为“沅”字，一是“飞飚拂灵帐”的“灵”字为“云”字，一是“子期竟早亡”的“期”字为“渊”字，一是“后来有千日”的“日”字为“里”字。

十张，钱三百，款小路远，不必汇寄。训学生词一纸，保命丸一纸，可阅也。足下读书有得，望函以见告。余容后呈，敬请课安！

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泽东顿首

六月廿五日

复启者，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吴校长，即作训学生辞者，教习闻皆一时名宿。阅其招学通告，固自与他〔校〕不同，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伏乞详詧〈察〉。

泽东又及

《明耻篇》题志[1]

（1915年夏）

一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2]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

[1] 《明耻篇》，1915年夏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集资刊印。全书辑有七篇文章和一个附件。文章为：（一）救国刍言；（二）中日交涉之前后状况；（三）已签字之中日新约及交换照会；（四）请看日本前此计灭朝鲜之榜样；（五）日本祸我中国数十年来之回顾；（六）高丽亡国后归并日本之惨酷情形；（七）越南亡国惨状略述。附件为：中日贸易出入额之比较。卷首有一师教习石润山写的《感言》。书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灭亡朝鲜，法国灭亡越南以及袁世凯卖国的罪行，并陈述了救国方法，力图唤起人们不忘国耻，奋起挽救民族危机。毛泽东阅读该书时，加了许多圈点和着重号，并在多处写有批语。在该书的目次第二、三、四、五和附件的篇名上方，毛泽东均画了圈，并写有“圈出五篇为最紧要者，其余不阅可也”。本篇的一和二，是毛泽东分别写在该书封面上和《感言》后的题志。

[2] 1915年1月，日本国政府令其驻中国公使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后，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5月9日，袁世凯对日本的要求，除声明第五号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其余一概加以承认。因此，中国人民将5月7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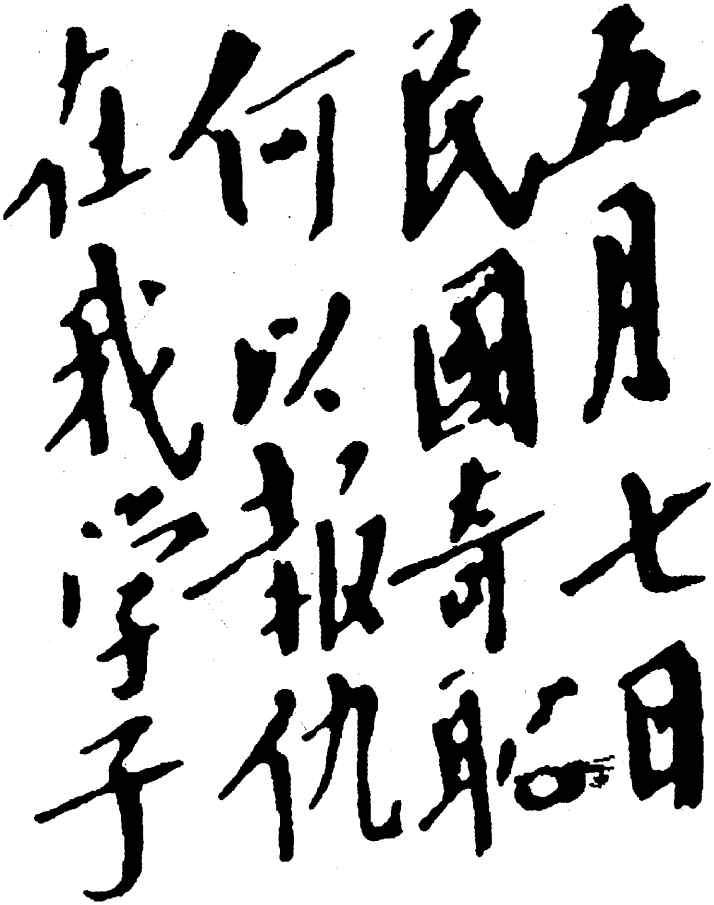
二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1]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解决之顷，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救国刍言》亦先生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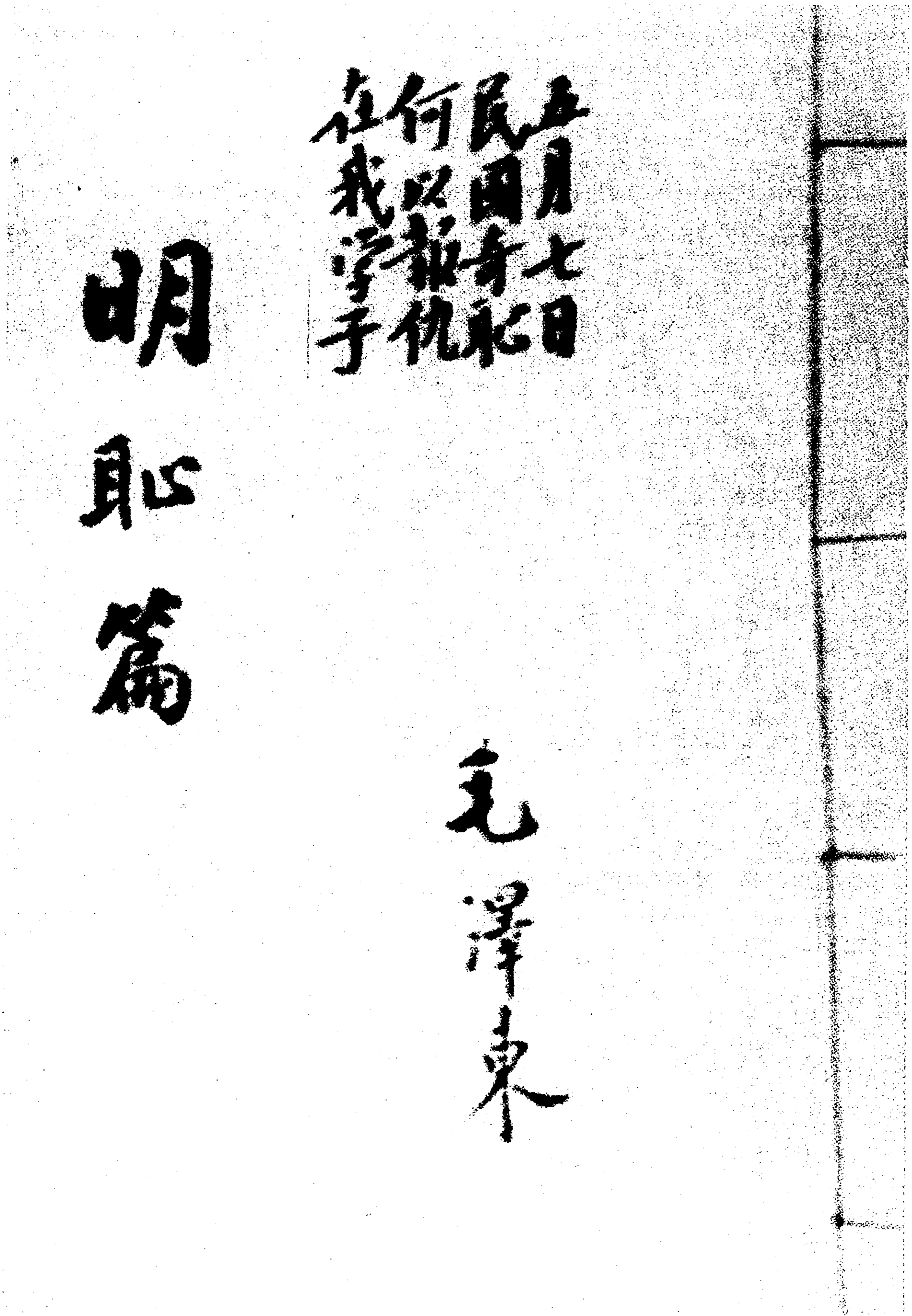
---

[1] 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始称湖南师范馆。同年11月，与当时尚存的长沙城南书院（创建于宋代）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中路师范学堂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1914年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第一师范学校，更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毛泽东由第四师范转入第一师范就读。



五月七日
民国奇耻
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毛泽东在《明耻篇》上的题词。



五月七日
民國四年
何以報仇
在我學子

毛澤東

明恥篇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编印的《明耻篇》。

给友人的信[1]

（1915年7月）

悔之也。当今之世，黯黮闷塞，非有强聒[2]，狂澜谁鄣？齑其躬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又或谓搅神废日，此亦似矣。虽然，此乃所谓佞也。孟轲好辩[3]，不得谓之佞；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4]，不得谓之佞也。谁曰搅神？谁曰废日？且吾尝闻用之而弥盛矣，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篏〈簸〉夫不纤其胫

---

[1] 此信前后残缺，收信人和写作时间不明。从信中所提“子升悔于言”和子升“来书”两事及作者在信中所表现出的对收信人的态度来看，似为写给萧子升的。毛泽东与萧子升于1914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萧在1915年6月毕业离校。从信的笔迹和信中反映的有关学习的内容来看，与1915年间的其他书信相近。又，联系1915年8月3日给萧子升的信来看，此信似写于1915年7月。

[2] 参见《庄子·天下》：“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强聒而不舍，意为人们不想听而仍然喧谈不休。

[3] 参见《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4] 子贡（前520—?），春秋时卫国人，姓端木，名赐，孔子学生。“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而肥其胫。苏张纵横[1]，其舌未敝也，离朱巧察，其目不眯也。凡此用而弥盛者，所在多有，搅神之说，不足信矣。弟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且吾闻子升悔于言矣。若曰对人哓哓，退惟多失，惩前毖后，其慎言哉！然吾谓子升，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若诚惩而毖之，子升其难知失也已。故旷日之说，亦不足信也。是故互质参观，所以张知，强聒不舍，可以振国，排搅神废日之说，所以益神而修业，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然非欲取同于君，求君更正其谬，此弟区区之意所求降鉴者也。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型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已轨以合人之型，此诚至公彻理之谈也。夫古今门户之争，在政有君子小人、清流浊流之分，在学则有汉氏、宋氏、程、朱、鹿〈陆〉、王[2]之异。政无论矣，学亦多讥，主奴出入，各植徽桓，招引朋徒，相啮轧不休。嗟乎，此何故哉？弟观杨先生[3]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子升可谓能遵师训，且足以

---

[1] 苏，指苏秦（？—前317），战国时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任齐相时约楚、燕、赵、韩、魏五国攻秦，史称合纵。张，指张仪（？—前309），战国时魏国人，任秦相时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史称连横。

[2] 汉氏、宋氏，即汉学、宋学，为清代两大学术流派。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程，指程颢、程颐兄弟；朱，指朱熹；陆，指陆九渊；王，指王守仁。程朱认为“理在心外”，且为宇宙根本；陆王则主张“心即理”，心是宇宙之根本。

[3] 杨先生，指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参加湖南维新活动。1903年留学日本，研习教育学。1913年至1918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等校任教。毛泽东曾受学于其门下。1918年夏，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直至病逝。

发者也。来书又谓获益切偬，以弟之愚谬引为足与共学适道，崇奖过量，非所能当。嗟乎，一人之事，他人孰能尽知者哉！古来貌合神非，口尧舜而心桀纣者多矣。昔樊英[1]蜚声于

---

[1] 樊英，字季齐，东汉南阳鲁阳（今河南鲁山）人，经学家。习《京氏易》，兼明五经，颇有名于当时。及顺帝诏对，并无奇谋深策，谈者以为失望。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8月3日）

子升[2]足下：

曩上菲笺，不知得否？通信曲折，谅不易达。今者烈曦正耀，倦读滋苦，城邑地非泉石，冲嚣豗溷，更有不堪，弟之所寓，不过较他处差胜耳。迩者方先生维夏[3]自家旋省，称该县高小国文讲席虚人，罗聘省垣，人方归乡消夏，又且贤者罕觏，有亦先为捷者所得。下以访弟，即以足下为对，特不审足下闲不闲也？窃思足下意在省会，不愿他往，托躬名校，陶毓宏才，一也；师友错处，可资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信中问及萧子升“闲不闲”、是否愿意去“平校”教书，说明正值萧1915年从第一师范毕业，尚未决定去修业学校任教之际，故此信当写于1915年。

[2] 子升，即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从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巴拉圭去世。

[3] 方维夏（1879—1936），湖南平江人。早年留学日本，1910年回国，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习、学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党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等职。1936年在湖南桂东沙田作战时牺牲。

讲习，二也。如平校之地，所弗措意，亦其宜耳。然时有变迁，意或更移，亦未可知。故得觎陈，待自决焉！平校国文主任，周十五点钟，薪年二百串，夫马在外，闻方先生言，师其校者，尚多名贤。有某公者，居校经十有余年，学具有根柢，故欲于国学加研究，亦尽有切磨之朋。信到即赐回音，开学在迩，聘者（校长）旅候故也。余不多及，即请

教安并候

子璋[1]仁兄之福！

弟　泽东谨肃

八月三日

---

[1] 子璋，即萧子暲（1896—1983），又名萧植蕃，萧三，湖南湘乡人，萧子升之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赴苏学习，1924年回国。曾任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30年以中国左翼作家常驻代表名义，出席国际革命作家会议，主编《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并从事写作。1939年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事国际交往工作和文艺活动。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8月）

子升足下：

七日奉到来示，披读之余，距跃三百！嗟乎，非子升，畴肯以道为予言者邪？非子升，畴能以道为予言者邪？厌饫嘉谟，心以开爽，然轸结者深，郁蓄者叠，磊砢抑塞，莫能自疏，对子升而发之，子升其许我乎？今夫人者万类之灵，发声以为言，言而后抟其类以为群。夫言以灵而发，群以言而抟，然则言也者，顾不贵欤！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2]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3]，讷言敏行[4]，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虽然，仆则思之，天地道藏之邃窎，今古义蕴之奥窔，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夫所谓言以招愆者，此其似矣！虽然，言不能因愆而

---

[1] 此信无写作时间。从信中所提萧子升决定不去“平校”任教，“学校展限至廿五”日开学，毛泽东准备“十五回家”省亲等情况看，此信当写于1915年8月3日之后、15日之前。

[2] 周公，指周公旦，周文王子，武王弟。辅武王灭纣，建立周朝。

[3] 参见《尚书·大禹谟》。原文为“惟口出好兴戎”。不是周公或孔子之言。

[4] 参见《论语·里仁》。原文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矣，亦哲人之细事。基督以言而磔[1]，龙、比以言而诛[2]，自彼视之，曾不以愆而〔废〕，鲁阳殷浩[3]，垂誉于士林，及一缨世故，莫不应时持减。弟夙夜危惧，愧对君子，近写日记一段，命曰自讼，子升试一观之，可以悉弟痛艾之衷矣。其言曰：“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菱，缠牵成蔓，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囗播蕣草之内，时序洊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蕣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鬲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

---

[1] 基督，即耶稣，因传教于犹太各地，为犹太教当权者所仇视，被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钉死在十字架上。

[2] 龙，指关龙逢夏臣；比，指比干，商臣。相传二人均因劝谏分别被夏桀、商纣杀死。

[3] 鲁阳，战国时楚之县公，即鲁阳文子。相传他与韩作战，挥戈使太阳返回，参见《淮南子·览冥训》。殷浩（？—356），东晋人，识度清远，弱冠时有盛名。穆帝永和二年（公元346年）任扬州刺史。永和六年，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后，统军进取中原。永和八年为前秦所败，次年又为姚襄所大败，被废为庶人。

之是取也，岂不诬哉！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气沮。”章甫[1]归家，约二周即来，讲席定在附属初小。弟已遣人赍书往趣急来。足下长信附上矣，焜甫[2]函亦送去。学校展限至廿五，弟将十五回家，一觐堂上，省诸弟。平校不就，自是正着。弟所以云者，恐修业[3]方面未决妥也。管见尽此，其他见之子璋[4]书中，伏维照詧〈察〉。

泽东顿首

---

[1] 章甫，即陈章甫。

[2] 焜甫，即熊光楚（1886—?），湖南湘乡人。1913年冬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该校图书管理员。1917年夏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后参加新民学会和赴法勤工俭学。

[3] 修业，指长沙修业学校。始建于1903年，当时只设中学部。1904年接收敬业小学堂，增办小学部，1906年又开办速成师范科。1906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该校任校董兼教员。1919年4月至12月，毛泽东在该校小学部任历史课教员。

[4] 子璋，即萧子暲。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9月6日）

子升学长足下：

仆读《中庸》[2]，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3]，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汲。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闻黎君邵西[4]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下好学深思，闻其说未备，嘱转说述，但不能尽惟即耳。苟有一知，敢不效于左右，以答盛意，致其悬悬邪！仆问邵西，学乌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信中所提“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之事，是在黎锦熙1915年9月离湘赴京任事之前。又萧子升1915年6月才从一师毕业。故推断此信当写于1915年。

[2] 《中庸》，相传为战国时子思所作，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宋程颐、朱熹将此篇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统称为“四书”。

[3] 朱子即朱熹（1130—1200），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著名理学家。补《大学》，指朱熹所补“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作者信中所引之句，原文为：“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4] 黎邵西，也作劭西，即黎锦熙，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俾士马克[1]，通识最富者也。即今袁氏[2]，亦富于通识者也。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3]，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4]，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于是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此其具体耳，其抽象则如何？下手之方则如何？于是邵西曰，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一也。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阂，二也。今之教者学者皆不然。长，今之所谓通也。异，今之所谓奥也。其实，所谓长者，堆积冗复而已，堆积冗复，不得谓之通；所谓异者，佶聱闷涩而已，佶聱闷涩，不得谓之奥。至于为求学之阶梯，将以观古今之群籍，亦无知

---

[1] 俾士马克，今译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2] 袁氏，指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1911年任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3月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元旦登皇帝位。由于遭到全国反对，1916年3月被迫撤销帝制。

[3]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宋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上书，主张变法。为宣传改革，曾著《三经新义》（其中有《周官新义》）、《字说》（今不存）等书。所作散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4] 《周礼》原名《周官》，或称《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

与无能焉者矣。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焉。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姱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养生奚假乎是？古之人有行之音，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1]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犹不止此，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梁

---

[1] 陶侃（259—334），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曾为荆州刺史、广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1599—1658），英格兰军人和政治家。1653年起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华盛顿（1732—1799），美国将军、政治家、首任总统。下面所说“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都是说他们不论地位主目牛无全工，总不忘习劳励志。

见蔡氏民国元年教育方针[1]，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言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2]，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肆〈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絯，心物相对者曰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姱，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絯于智，而又无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章甫近阅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3]，上下半万载之纪述，

---

[1] 蔡氏，指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民国元年教育方针”，指1912年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2] 《群学肄言》系严复将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斯宾塞所著《社会学原理》摘译成中文出版时所取名。《缮性篇》是其中的一篇。

[3] 四部之篇，三国魏荀勖分书籍为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学）、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诗赋图赞）四部；至晋李充重分四部，定为经、史、子、集。随唐以后经籍艺文分类，多用四部为序。也作群书的通称。

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1]，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2]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讫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3]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4]一篇出于《史记》[5]，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

---

[1] 德伊，今译德意志。

[2] 曾氏“杂钞”，指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

[3] 《吕刑》，《尚书》中的一篇。周穆王时有关刑罪的文告，因吕侯的请命而颁，故名。

[4] 《伯夷列传》，《史记》中的一篇。记述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事。

[5] 《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共130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1]，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2]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其寡哉！斯宾塞尔[3]云，专攻之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所陈词冗意单，掇粗漏精，既承盛指，不敢不告，赐之是正，不胜祷幸。

泽东顿首
九月六日

---

[1] 《论语》，孔子言行的记录，为儒家经典之一。《近思录》为南宋朱熹、吕祖谦合撰，共14卷。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和张载的言论，计622条。

[2] 姚氏“类纂”，指清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

[3] 斯宾塞尔，今译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的进化论者。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著《综合哲学》10卷，对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影响甚大。

给萧子升的信[1]

（1915年9月27日）

□□□下：

接书，得悉教务殷繁，七日作书，改为十日，甚□□意。前书初九发，今十九，适十日矣。又得来书，宜答雅意。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易言之，每为一书，必有益处，言必载物，不然，与庸众人何异？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己有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前望足下上希古人，乃本心也。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2]，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

---

[1] 此信无写作年月。信中所提“乃发内宣（即《征友启事》）……至今数日”和“秋凉腹疾”等事，与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中所提“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等语对照，此信当写于1915年下半年开学之初。信末落款日期“十九”，当为农历8月19日，即公历9月27日。

[2] 1915年秋，毛泽东发出“征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意欲结交对学问、时政感兴趣，能耐艰苦，有决心，直至能为国牺牲的朋友。“启事”最后引用《诗·小雅·伐木》中“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句。“启事”寄发长沙部分学校，并在信封上注有“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等字句。应征者有李立三、罗章龙等五六人。

校有贤者，可为介绍。馀见赞周[1]书中。秋凉腹疾，剧一二日，近小愈矣。身体万宜防，重病时始识健时乐也。

东上

十九

---

[1] 赞周，即陈赞周（1892—1921），又名绍休，湖南浏阳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5月赴法国勤工俭学，次年在巴黎病故。

征友启事

（1915年9月）

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家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敬启者　二十八画生

给黎锦熙的信[1]

（1915年11月9日）

邵西[2]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3]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4]，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1915年“夏假后”毛泽东曾作“征友启事”，信中述及此事，据此当写于1915年。

[2] 邵西，即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1914年至1915年上半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杨昌济、徐特立创办宏文图书社编译所，教学之余从事著述。1915年9月赴北京，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3] 熊君，指熊光楚。

[4] 元凯臣舜，参见《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1]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2]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3]，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弟毛泽东顿首

十一月九日

---

[1] 朱子，即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卷八。原文为：“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功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功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2] 语意参见《诗·小雅·伐木》。原文为：“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3] 指1915年夏假后，毛泽东发“征友启事”一事。

给黎锦熙的信[1]

（1915年11月9日）

邵西[2]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3]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4]，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1915年“夏假后”毛泽东曾作“征友启事”，信中述及此事，据此当写于1915年。

[2] 邵西，即黎锦熙（1890—1978），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1914年至1915年上半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杨昌济、徐特立创办宏文图书社编译所，教学之余从事著述。1915年9月赴北京，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3] 熊君，指熊光楚。

[4] 元凯臣舜，参见《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侪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1]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2]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3]，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弟毛泽东顿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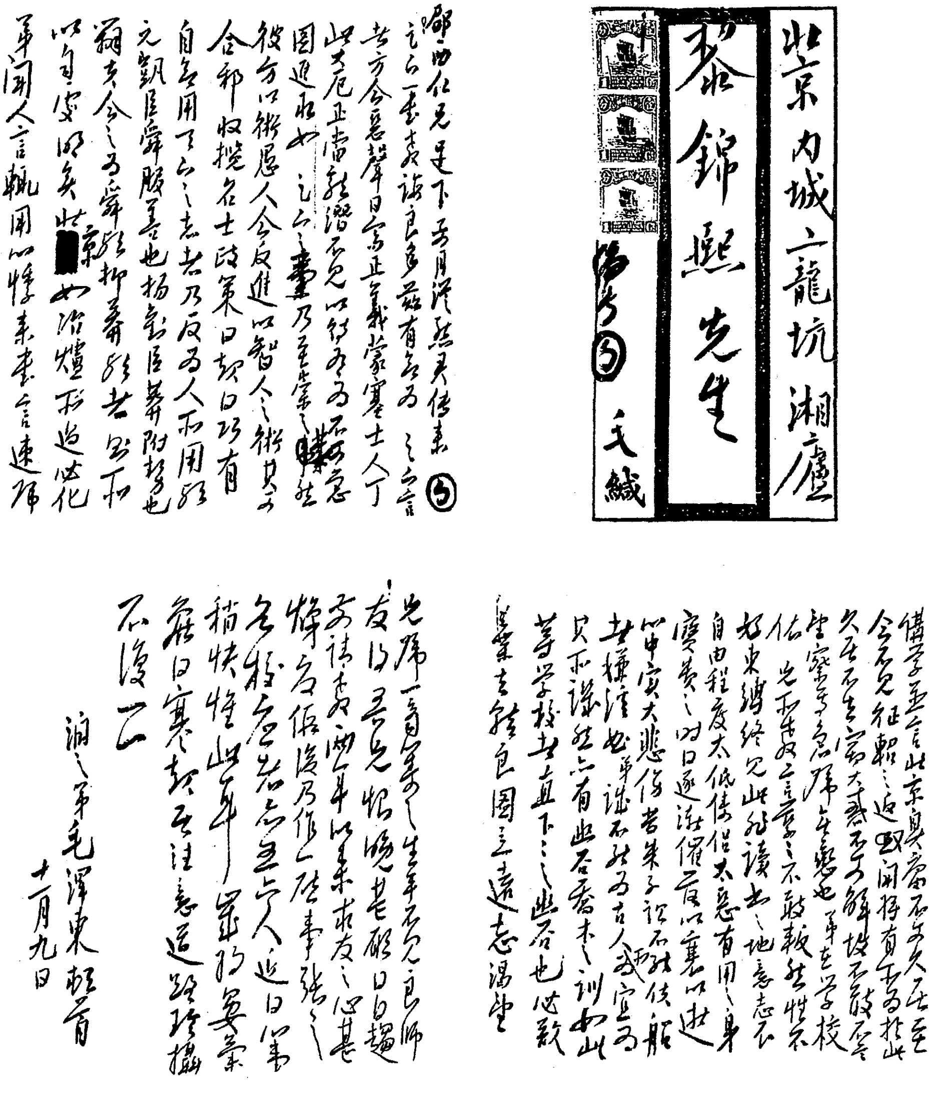
十一月九日

---

[1] 朱子，即朱熹。语见《朱子语类》卷八。原文为：“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功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功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2] 语意参见《诗·小雅·伐木》。原文为：“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3] 指1915年夏假后，毛泽东发“征友启事”一事。



北京內城六龍坑湘廬
黎錦熙先生
[illegible]　毛緘

邵西仁兄足下：五月[illegible][illegible]兵傳書，言言一書，表[illegible]良多，益有合焉。言言吾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illegible]而為不[illegible]忍圖進取也。之之[illegible]乃至[illegible][illegible]然彼方以術愚人，今反進以智，人人術其[illegible]合邪收攬名士，政策曰[illegible]曰巧，有自無用下之之志者，乃反為人所用。然元凱臣舜，服其善也；揚劉臣莽，附[illegible]也。藉其今之為舜然抑為莽然者，[illegible]不知以自處明矣。北[redacted]京如沸爐，形迹必化，第聞人言，輒用以悸。來書言速歸儲學，並言北京[illegible]當不久居。至今兄征軺之返，[illegible]聞得有書為於此，久居不去，實大惑不可解，故吾望寄吾急歸也。弟在學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言之不敢[illegible]於性，不好束縛，終覺此種讀書，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倍侶太惡，有用之身，寶貴之時日，[illegible]逐消磨以塞以逝，[illegible]中實大悲。[illegible]書朱子[illegible]不[illegible]伎[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弟謀不然，為古人或宜為，只不[illegible]然亦有此否否未之訓，如此等學校甚直下之之此否也，必欲[illegible]業未能自圖之遠志渴望先歸一商，吾兄生平良師友，乃吾兄[illegible][illegible]甚殷，日日趨[illegible]交誼素[illegible]，兩年以來求友之心甚[illegible][illegible]後乃作[illegible]事[illegible]之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近日[illegible]稍快，惟此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維日[illegible][illegible]注意道路珍攝，不復一一。

潤之弟毛澤東頓首
十月九日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手稿。

给萧子升的信

（1915年冬）

子升学长执事：

日昨会面遽卒，欲谈未畅。思借《君宪救国论》[1]一阅，兄处既无此，以后随意觅之可也。所谓五段课程，实用功至浅，前以劝陈君课余宜以学文，遂随及之。言先于行，良滋惭愧。晨读英文，午前八时至午后三时上讲堂，四时至晚饭国文，明灯至熄灯温习各门功课，熄灯后以一时运动。所谓五段者如此。近校中印发汤康梁[2]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仰吾兄翰赐书为幸，长以此信笺之长减半寸为限，大小真草，

---

[1] 《君宪救国论》，为杨度所撰。分上中下三篇。上篇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记当时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袁世凯赞赏此文，亲题“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匾额，赠与杨度，并嘱段芝贵将此文秘密付印，广事传播，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2] 汤康梁，指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袁世凯篡夺大总统位后，历任临时参议院副议长、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等职。旋辞职密赴上海，有讨袁护国言论。康有为，辛亥革命后，发表反对共和与保存国粹言论，并组织孔教会自任会长，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有表示不满的言论。梁启超，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反对“二次革命”，拥护袁世凯上台，出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当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变更共和国体，并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

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不一。

弟　泽东白

十二日

五律·登云麓宫[1]联句[2]

（1915年）

共泛朱张渡[3]，
层冰涨橘汀[4]。
乌啼枫径寂[5]，
木落翠微冥[6]。

---

[1] 云麓宫，在岳麓山右顶峰上，道家称为“洞真虚福地”，清康熙《岳麓志》载：旧有宫殿久废。乾隆年间构殿五间，其后为三清殿，冶铁为瓦，立石为柱。咸丰二年（1852）毁，同治二年（1863）修复。这首诗见于罗章龙《庄斋汗漫游话（三）》(《湘江文艺》1980年第二期)。

[2] 联句，旧时作诗方式之一。两人或多人共作一诗，相联成篇。

[3] 泛，漂浮。这里指泛舟，即乘船游玩。共泛，一起乘船游玩。朱张渡，朱，朱熹；张，张栻。南宋著名理学家。二人在岳麓书院讲学，从者千余人，时有“潇湘洙泗”之称。后人因以二人之姓命名渡口。朱张渡在长沙南门外。

[4] 层冰，一层又一层的冰，意思是说，天气很冷，冰结得很厚。涨，充满，布满。汀，洲，水边的平地。橘汀，即橘子洲。

[5] 枫径，枫林中的小路。寂，寂静。乌啼枫径寂，南朝梁代王籍《入若邪溪》诗中有“鸟鸣山更幽”之句。

[6] 木落，树叶凋零，元代周权《湘中》诗中有“木落湘山幽”之句。翠微，青翠的山气。陈子昂《薛大夫山亭宴序》：“披翠微而列坐，左对青山；俯盘石而开襟，右临澄水。”冥，昏暗，幽深。

攀险呼俦侣[1]，
盘空识健翎[2]。
赫曦联韵在[3]，
千载德犹馨[4]。

---

[1] 攀险，指登山。呼，呼唤。俦侣，伴侣。

[2] 盘，回旋。翎，鸟的羽毛，此代指飞鸟。健翎，矫健的鸟，指鹰之类。盘空识健翎，即识盘空健翎。这句既是写登云麓宫所见，又是以此自喻。

[3] 赫曦，即赫曦台，岳麓书院附属建筑之一。联韵，即联句。联韵在，指宋代朱熹和张栻作的登岳麓山赫曦台联句至今犹存。

[4] 千载，千年。德，德业。指朱熹、张栻两位学者和诗人的道德文章。馨，散布很远的香气。德犹馨，品德和名誉很好。唐代刘禹锡《陋室铭》：“唯吾德馨。”

杂言诗·游泳启事

（1915年）

铁路之旁兮，
水面汪洋；
深浅合度兮，
生命无妨。
凡我同志兮，
携手同行；
晚餐之后兮，
游泳一场。

毛泽东小时候游泳的地方。

治学联[1]

（1915年）

贵有恒[2]，何必三更起五更[3]眠；
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4]。

---

[1] 这副对联系改明代胡居仁所作而成，胡的原联为：“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2] 恒，恒心。《论语·子路》：“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3] 更，旧时一夜分成五更，每更大约两小时。三更，约夜11时至次日晨1时。五更，约晨3时至5时。

[4] 曝，晒。一日曝十日寒，语出《孟子·告子上》：“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比喻时而勤奋，时而懈怠，没有恒心。

贺廖廷璇[1]、皮述莲同学新婚联

（1915年）

二月梅香清友[2]；
春风桃灼佳人[3]。

---

[1] 廖廷璇，湖南沅江人，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毕业后任湖南沅江县教育科督学，1919年3月病逝。

[2] 梅香，梅花芬芳的气味。清友，纯洁之友。

[3] 灼，明亮。桃灼，桃花盛开，十分鲜明。语出《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意思是说，桃树茂盛，花朵鲜艳，女子出嫁，年时俱当。以此比喻，祝贺新婚幸福美满。佳人，美女。

赠毛泽建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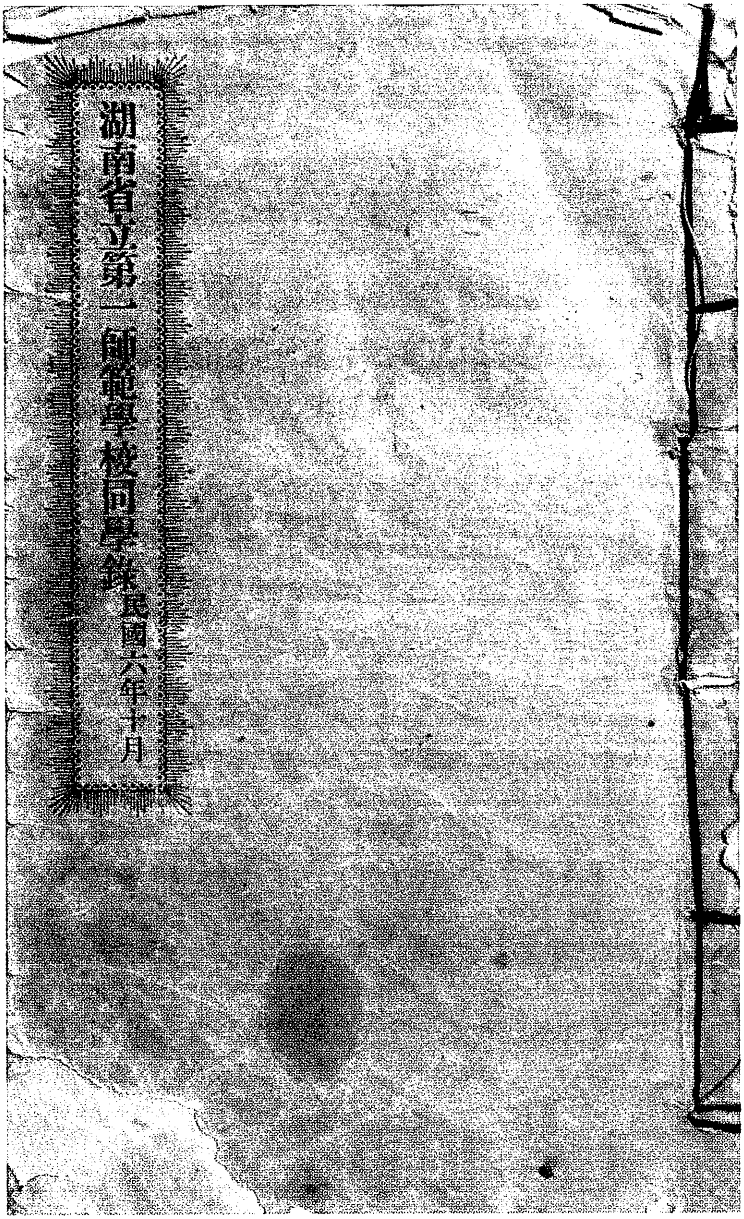
（1915年）

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

---

[1] 毛泽建（1905—1928），湖南湘潭人，又名达湘。毛泽建与毛泽东共曾祖父，是毛泽东的堂妹。因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未生女儿，1912年毛泽建过继到毛泽东家。

1916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同學錄（民國六年十月）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1月28日）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

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2]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3]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

教安。不一。

弟　泽东叩

一月二十八日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从信中所提想“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一事看，当写于1916年。

[2] 似指徐遂良，1915年秋在一师任教育学教员。

[3] 《甲寅》杂志，1914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月刊，章士钊主编，共出10期。1915年10月停刊，第11、12期并未出版。毛泽东当时尚不知道这一情况。

给萧子升的信

（1916年2月19日）

子升[1]学长惠鉴：

承上月三十日赐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游？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2]。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违咫尺数日，情若千里三秋。肃此，敬颂

学安。不一。

弟　泽东上言

二月十九日

---

[1] 子升，即萧子升。

[2] 杨先生，似指杨昌济，此时杨已从长沙城内迁至岳麓山下居住。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2月29日）

右[2]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串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惟此种根本问题，不可以不研究。故书之以质左右，冀教其所未明，而削其所不当，则幸甚也。此上

升兄左右。

弟　泽东再拜

二月二十九日下午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信的内容与作者1916年年初两次致萧子升的信相近，均为购书、借书之事。据此推断此信可能写于1916年。

[2] 从行文看，此处前面似应有开列的经、史、子、集77种书目，但现存手稿缺。

挽吴竹圃[1]联

(1916年5月)

吴夫子[2]英气可穿虹，夭阏[3]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4]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肿方深[5]！

---

[1] 吴竹圃（1896—1916），湖南汨罗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挚友。1916年4月一病不起，不久病逝。

[2] 夫子，古代对男子的敬称。《孟子·梁惠王上》：“愿夫子辅吾志。”

[3] 夭阏，夭折，早死之意。

[4] 贾长沙，即贾谊。胜俦，高明的伴侣。

[5] 肿，即痈，一种皮肤和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周礼·天官·疡医》：“疡医掌肿疡。”郑玄注：“肿疡，痈而上生创者。”大肿方深：意为病入膏肓。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6月24日）

子升仁兄如握：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2]，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重以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独有军士相邻，洸洸之众，来自岭峤，鸟言兽顾，不可近接，亦既知之矣。心目所遇，既多可悲，遽闻觱篥一声，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更可恶者，秋霖作虐，盈沟滥浍，碍人行步，不然，亦走来握手谭话矣。明日开霁，决行返舍。前托时惠德言，愿勿食信，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宣。

泽东再拜

自第一师范学校　廿四日

---

[1] 此信无写作年月，从信中所说“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病母在庐”和“校中放假”等情况以及与随后数函的联系来看，此信当写于1916年6月。

[2] 萑苻不靖，萑苻，泽名。参见《左传·昭公十二年》：“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旧时常指起事农民或盗贼聚众出没之处。此处指当时驻湘各军发生的战事。

给萧子升的信[1]

（1916年6月26日）

升兄赐鉴：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2]。主人与予有故，颇安适焉。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霄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见闻，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处，驻有桂军[3]，招摇道涂〈途〉，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睹〈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4]一带，有所谓护国军[5]二股：一苏鸣鹄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

---

[1] 此信无写作年月。与毛泽东1916年6月24日给萧子升的信中所说“明日开霁，决行返舍”等语联系起来看，当写于同年同月。

[2] 银田市，应为银田寺，镇名，离韶山冲约30里，原属湘潭县，现属湘潭市韶山区。

[3] 桂军，泛指广西军阀部队，这里指陆荣廷于1916年宣布反袁独立后所组成的军队。

[4] 姜车，应为姜畲，镇名，原属湘潭县，现属湘潭市湘江区。

[5] 护国军，原为蔡锷1915年12月在云南策动讨伐袁世凯时组织的军队的称谓，后各省讨袁军队也多用此名称。

通不通之间焉。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在涂〈途〉两日，二十九前后当达左右，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

泽白
二十六日

给萧子升的信

（1916年7月18日）

升兄足下：

十二日在湘潭发一函[1]，不知到否？兹又七日矣，心有所触，敬为吾兄述之，亦前约也。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2]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3]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4]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南北军兴，湘为斗场，省城波浪迭兴，当春夏之交，危险万状，而能镇定不挠。矿警一

---

[1] 湘潭发一函，指1916年7月12日毛泽东由家返校途经湘潭县城时向萧子升所寄之信。

[2] 汤督，指汤芗铭（1886—1975），字铸新，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汤化龙之弟。时任湖南都督，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5月29日，被迫宣布湖南独立。7月4日晚，从长沙仓皇逃走。

[3] 袁氏，即袁世凯。

[4] 张树勋，字竹桥，湖南宁乡人。1914年10月至1916年7月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后任河南省警务处处长。

役[1]之后，学生多逃，下谕不可辍课，请款即发，此岂巽懦蹙蹜者所克办哉！筹画独立，尤具苦心，先授意望云亭[2]，使之独立，然后计退北军，调归所部，联络黔桂，一旦响应。袁氏不幸早死矣，使战事延长，则四川与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党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汤曷尝媚袁哉？汤之见猜于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扩兵，继派曹锟[3]以监之，继又派沈金鉴[4]以掣其权。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彼江宁冯氏[5]之杀人，比此谁多少？其击吴江，荡江阴，如刈草芥耳。谓其制造民意，逢迎袁恶，污浼善类似矣。然云、贵、广西诸省，曷尝无此等事哉！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大计者也（杀人、污善二事，在严格的伦理学则当别论）。此次出

---

[1] 矿警一役，指1916年5月14日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率矿警二营进驻长沙几处街巷，意欲推翻汤芗铭，自任都督之事。

[2] 望云亭（1854—1919），湖北宜昌人。1915年8月任湖南零陵镇守使，屡次电劝袁世凯称帝。及至1916年5月17日，宣布郴州、永州独立，自称护国军湘南总司令；又通电宜章、桂阳、资兴、汝城各县，脱离北京政府。

[3] 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所辖京畿陆军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驻岳阳。护国战争爆发后，该师进入戒备状态，以图震慑南方。

[4] 沈金鉴（1866—1926），字叔詹，浙江吴兴人。1915年9月至1916年6月，任湖南巡按使。

[5] 江宁，即今南京。冯氏，指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1913年“二次革命”时，率军攻占南京，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后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

逃，前书论其愚，正唯其愚，故不得谓之诈。其汉口通电[1]，多系实事，有兵万余而不战，惧糜烂也；有财而不取，惧遗患也（湘人宣布罪状[2]，谓其卷款数百万，恐未必然）。要之，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何以云现象益紊也？汤之招致桂军，好意也，而桂军叛之，此非必陆荣廷[3]之意，追汤至于湘阴，劫其饷械，连同省中所掠，捆载而归，报纸所称“文明军队，班师凯旋”者也。即如弟校，寸草皆为拾去，小学有湘军残械，以八人守之，彼乃尽取去，又缚八人者而欲杀之。故去桂军，人人以为如去虎也。程潜[4]醉心权利，统兵来省，声势赫然，既与曾继梧为仇，又与陶忠恂作敌。唐蟒、龙璋之徒，乘之以兴，咸欲哜都督一脔以为快，各自招兵以张其势力。程、陶纵其部下，

---

[1] 汉口通电，指1916年7月7日汤芗铭在汉口发出的通电。电中说明“离湘宗旨”“意在退兵弭变”，并自称“有兵不战”“有财不取”，以掩人称“汤屠户”诸端劣迹。

[2] 罪状，指《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其中罗列“汤芗铭在湘十大罪恶”：一、吞没巨款，紊乱财政；二、惨杀无辜，力长元恶；三、蕃植游探，流毒社会；四、纵恃北军，蹂躏人民；五、摧残教育，毒戮士林；六、酷用毒刑，绝灭人道；七、滥用私人，秽乱吏治；八、盗卖矿产，次第卷逃；九、出入警跸，阻绝交通；十、援结败类，败坏风俗。

[3] 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清末曾任广西提督等职。辛亥广西独立，被推为副都督，旋任都督。护国战争期间，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任都督兼广西护国军总司令，曾派军进入湖南。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陈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未到任前，由陆暂兼任，两人均未到任。

[4]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同盟会会员。1913年任湖南军事厅厅长。“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6年春任湖南招抚使，自滇入湘，被举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此时率部进驻长沙。

在距城某地大战两昼夜之久，设无刘公[1]出而维持，早已焦烂不可收拾矣。民政府、民政厅同时并立，各自发号，各自施令，怪不可闻。七月初七，乱徒捣巡警署，警卒逃散，枪械劫去。十余年惨淡经营之成绩，一旦荡然无存。筹备十余日矣，尚复不能站岗。赌徒猬起，淫风火炽，商埠警权，几为外人所得，秩序之坏极矣！汤既去，暴徒弹冠相庆，憾前之被压也，四捕调查，捕则杀之。十七日追悼杨德邻[2]，缚六人欲杀之以为祭，有阻得免。呜乎，此法兰西恐怖时代之现象也。士生其间，慎哉立身。弟在湘潭，逡巡不敢来省，得友报始至，诚畏之也。各属劫长官拒知事之声，纷然起矣。宁乡知事丁象益，鄂人而汤委者也。有易孔昭盗首谢文彬所委，谢死易遂下狱。兹易得龙璋委任，乃煽其余党公电逐丁而代之。都督今数易矣，又有易人之说。当独立时，认汤为督，旋逐去之，欢迎陆荣廷。陆未至，而曾代。及程潜至，又不得不下台，遂公举浏阳军官，参议员、省议员、公民团及各绅商，通电列名者数十百人也，旋忽相惊以伯有。陈宧[3]来，北军数万至岳州，又开会议，又

---

[1] 刘公，指刘人熙（1844—1919），字艮生，自署蒠庐，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后设立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又任法政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任湖南民政司司长。曾电促王芝祥策动陆荣廷宣告广西独立。1915年投入反袁（世凯）驱汤（芗铭）运动。次年7月6日，被湖南各界联合会议推举为临时都督，19日北京政府任命暂代湖南督军，25日又任命兼代湖南省省长。

[2] 杨德邻（1870—1913），字性恂，也作杏生，湖南长沙县人。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政务研究会会长、谭延闿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因坚决主张反袁，1913年10月13日被湖南查办使汤芗铭杀害。

[3] 陈宧（1876—1939），字二庵，也作二安，湖北安陆人。1912年任北京政府参谋部次长，为袁世凯所宠信。1915年2月，督理四川军务，率北洋军三旅入川。次年5月22日，因西南各省先后讨袁，被迫宣布独立。

迎陆荣廷，久之无事，则又公举黄克强[1]。怪哉湘事，真莫名其妙矣！由此观之，湘省之祸，比之辛亥为烈也。兄乡居，谅欲闻其详。是非自有公论，弟于他事多恕，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恐招过。不可令他人见，阅后摧烧之，幸甚。余容后续，鹄企箴规。即颂署安。不宣。

弟　泽东敬白

七月十八日

---

[1] 黄克强（1879—1916），原名轸，字廑午，也作庆午，后改名兴，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1903年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被举为会长。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旋被各省代表公举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南北和议后，任南京留守。“二次革命”时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坚持反袁。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1916年7月下旬，被湖南军政各界通电公推为湖南督军，黄无意于此，乃荐谭延闿以自代。同年10月31日病故。

给萧子升的信

（1916年7月25日）

升兄足下：

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不知有遗落否？盼复不至，曷胜延企。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1]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2]义，□段氏[3]之中枢斡运，黎公[4]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各省虽尚有不服命令者，如山西之拒沈铭昌[5]，福建之拒胡瑞霖[6]，广东之攻龙济光，四川陈周之争，湖南之

---

[1]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宣布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重新召集国会，裁参议院，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南方的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

[2] 此处和下处空缺字，疑为“大”字和“及”字。

[3] 段氏，指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1916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以国务总理统治北京政府。

[4] 黎公，指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时，黎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黎由副总统接任大总统。

[5] 沈铭昌（1870—1919），字冕士，浙江绍兴人。历任河南豫东观察使、山西省省长、内务次长、财政次长、山东省省长。

[6] 胡瑞霖（1864—1943），字子笏，湖北江陵人。当时被任命为福建省省长。

逐汤芗铭。除湖南之动出无理外，其余或缘帝制关系，或因势不得已，有可原焉。中央举措，究可佩服，任任可澄[1]为滇省长，戴勘[2]为黔省长，罗佩金[3]为桂省长，蔡谔〈锷〉[4]督蜀，陆荣廷督粤。调去陈宧、周骏、李烈钧，李加以中将勋二位[5]，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前书言湘人取们罗主义[6]，举刘[7]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蔡谔

---

[1] 任可澄（1878—1945），字志清，贵州安顺人。曾创办贵州优级师范学堂、法政学堂。护国战争期间，任云南都督府右参赞。时被北京政府任为云南省省长。

[2] 戴勘，应为戴戡（1880—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人。唐继尧督黔时，任都督府参赞、贵州巡按使。1915年任参政院参政。同年冬赴昆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率部入川。袁世凯死后，任四川军务会办、四川省省长。1916年7月6日由黎元洪任命为贵州省省长。

[3] 罗佩金（1878—1922），字镕轩，云南澄江人，同盟会会员。1909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在南宁龙济光部任随营学堂总办，后赴昆明，历任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及七十四标标统等职。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光复昆明，旋任南征总统官、军政部长、南防军总司令。1915年年底参加护国运动，任第一军总参谋长。旋任广西省省长。1920年出任迤南巡阅使。后被唐继尧杀害。

[4]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早年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政变后赴日本留学。后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职，又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等职。1911年与革命党人在昆明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任云南军都督。1915年12月25日与李烈钧、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举兵入川。袁世凯死后，被任命为四川都督兼民政长，不久去世。

[5] 据当时北京政府授勋条例，有大勋位、勋一位、勋二位等勋位等级。

[6] 们罗主义，今译门罗主义，指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对外政策。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务。

[7] 刘，指刘人熙。

〈锷〉亦已赴任，惟粤之龙、李皆去，此与川局相同，为愚虑所不及。

湖南问题始终不赞成，既略详前书，兹又有可述者焉。一般暴徒无故将汤逐去，都督已经两易，刘已真除代理，应如何服从中央，静候简人。乃又公举黄克强[1]，欲独出风头，行分治制。故举龙璋为民政长，终以舆论攻击，悬之空中，令人笑其滑稽。近乃迫唆议会重举之，以请于中央。然黄请之既久，请龙亦已数日矣，并不见中央命令，吾意必难应允。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在湖南尤有特别情形，前车不远，即在辛亥。今兹目前之祸，又显而易见，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民政厅日出知事一批或数批，本不应更而更之。湘潭知事张其钜，到任未逾月，称贤能，今易人矣。榷运局已易三人，初一人以运动人，旋他人又运动得委而代之，兹中央又委一人至。造币厂则更四人，尚未定，皆数日间事。弟校校长委彭政枢，学生大愤，欲拒之而未能。刘、吴长者，而所为如此，皆暴徒之过。刘与谭组安[2]书云“度日如年”，盖实语也。此略举一二，余可概见，几何不如俗人所云“打开脑壳”乎！前书言暴徒乘机报复，有所谓“国事同难会”者最横行，捕杀人不辨黑白。军人政客，气焰万丈，稍有帝制

---

[1] 黄克强，即黄兴，1916年7月底，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时，湖南军政各界通电公举黄兴为湖南督军。

[2] 谭组安，即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1911年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10月22日长沙起义后任军政府参议院院长、民政部长；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任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1916年8月北京政府委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

嫌疑者，即斥去之。施文尧竟枪毙矣。弟昔曾与暐兄书，言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又湘之独立，至昨日始取消，盖事事称怪焉。

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1]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择，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2]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

---

[1] 1916年7月14日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龄、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但以后均无结果。

[2] 王莽（前45-23），字巨君，汉元城人，平帝时为大司马。屡次捐地献钱，收揽民心；树立党羽，笼络儒生。平帝死，立孺子婴为帝，自称摄皇帝，三年即真，改国号曰新。纷事改革，法令苛细，连年征战，劳役频繁，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地皇四年九月，绿林军攻陷长安，王莽被杀。曹操（155—220），字孟德，汉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灵帝中平元年，以骑都尉参加镇压黄巾起义，迁济南相。后起兵讨董卓，建安元年迎献帝至许都，先后击灭袁术、袁绍、刘表等，统一黄河流域。位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子丕代汉称帝，追尊操为太祖武帝。司马懿（178—251），字仲达，三国魏温（今河南温县西）人。为曹操父子重用。曹丕时，任大将军。曹芳即位，他以太傅与丞相曹爽同辅政。嘉平元年，杀曹爽，自为丞相，独揽国政。至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谥懿为宣帝。拿破仑，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被驱逐，亡命英国。

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1]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

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2]。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驻日公使有急报归国，《大公报》登之，足下可观焉。大隈阁[3]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駸駸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

---

[1] 段芝贵（1868—1925），字香岩，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被袁世凯委为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旋护理湖广总督，次年被任为驻京总司令官，继任拱卫军总司令、察哈尔都统。1913年任陆军第一军军长。1914年改任湖北都督，又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1915年9月，拥袁称帝。后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任皖系前敌总司令，失败后逃匿天津。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之一。辛亥革命时，任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1913年任安徽都督，后改安徽巡按使。支持袁世凯称帝，后拥护段祺瑞。1917年为“督军团”倡乱的祸首，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派兵入湖南。1920年皖系战败后被解职。吴炳湘（1874—1930），字镜潭，安徽合肥人。曾任京师警察厅总监，积极鼓吹袁世凯复辟帝制。

[2] 日俄协约，指1916年7月日俄再订关于分掠满蒙权益的协约。

[3] 大隈阁，指日本大隈重信于1914年再任首相时第二次组织的内阁。该内阁曾胁迫中国北京政府接受旨在吞并中国的二十一条。

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西方似无大烈之战，据经济家从经济上观察，战事不能再延一年。现在德、奥始终未败，鞑旦海峡始终未破，塞、比、门三国[1]已亡，自去冬罗马尼亚加入后，同盟国声威更振，协约方面则屡思耸动葡萄牙、希腊，然至今未动云。

墨乱[2]未已，美以兵力干涉，喧传已久，然未见实行，反有墨乱徒侵入美南部，恣杀民人之事。威尔逊[3]任期已满，正在选举中。候补者威尔逊、许士、罗士福[4]。有举威者，芝加高则举许。许，大理院长，主和平与威同。美人忌罗氏雄杰，罗亦自知不胜，乃宣告让许。吾意美人既不愿加入欧战，又扩张兵备之事，舆论尚未成熟，故此次非威即许，政策既不变，则威不妨联任。至罗当民国元年与塔虎脱[5]竞争，由共和党裂为进步党，以此使民主党之威

---

[1] 塞、比、门三国，指塞尔维亚、比利时、门的内哥罗（即“黑山”）三国。

[2] 1913年墨西哥韦尔塔发动政变，推翻马特洛政府，捕杀马特洛，自任总统。美国以韦尔塔亲英，拒予承认。1914年，以卡兰沙为领袖的自由党推翻韦尔塔政府，由卡兰沙继任总统。1916年3月，由波兴将军统率之美国干涉军入侵墨西哥，但因墨西哥人民坚决抵抗，干涉军于1917年2月撤退。

[3] 威尔逊（1856—1924），美国民主党人，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

[4] 许士，即查尔斯·伊万斯·休斯，曾任纽约州州长，当时任最高法院陪审法官。罗士福，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共和党人。1899—1900年任纽约州州长，1901年当选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被刺死后，继任总统。

[5] 塔虎脱，今译塔夫脱（1857—1930），美国共和党人。1901—1904年任菲律宾总督，1904—1908年任美国陆军部长，1909—1913年任总统。

尔逊坐收渔人之利。犹忆其往某处演说，怨家刺之，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未尝不叹其勇且壮！闻其春秋盛，雄奇迈往之气未衰。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地，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1]，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今之退让，殆亦有见于此乎！

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2]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3]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4]著名访员之通函，

---

[1]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所败，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于前473年兴师攻灭吴国。会稽为越国建都之地，“兴会稽之师”，即指吴越交战的这段历史，后常以此喻兴兵报仇雪耻。

[2] 《大公报》，指湖南《大公报》，由刘人熙、贝允昕主办，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曾先后担任主编。该报于1915年9月1日创刊，1927年3月2日被查封，1929年5月21日复刊；日本占领长沙时，于1944年6月16日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最后于1947年12月31日停办。

[3] 《湖南公报》，1912年4月创刊于长沙。最初由共和党党员贝允昕任主编，李抱一、黎锦熙、张平子等任编辑。1913年转为进步党机关报。刘腴深、黎锦熙曾任总经理和总编辑。袁世凯窃国后，该报拥护袁世凯、汤芗铭。1916年袁死后停刊。

[4] 《时报》，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狄葆贤（楚青）创办。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支持和资助，1904年6月13日发刊于上海。1921年由黄伯惠接办，1939年9月1日停刊。

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1]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书此既竟，接足下及暲兄大示，始知前两书均未达览，承寄银市信[2]，亦未奉到。盖初九日在家动身，正兄言旋不久，尚在途中耳。在校颇有奋发踔励〈厉〉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人数稀少，天气亦佳，惟甚畏开学上课。暲兄在原地教学甚善。望时惠箴规，借益愚陋。现在兵已退去，前所以能住，升兄知之也。余意不尽，敬颂

日绥。

弟　泽东白

七月二十五日灯下

---

[1] 天坛宪法草案，原名《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名。1913年草案制成，主要规定政府组织采用内阁制，以限制总统权力。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攫取大权，阴谋称帝，以武力解散国会，草案即被废弃。

[2] 银市信，指投寄湘潭县银田寺转毛泽东的信。

给黎锦熙的信

（1916年12月9日）

邵西[1]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2]，均堕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3]，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辱教：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又嘱以常常通信，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质诸左右，增笔墨栽〈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

---

[1] 邵西，即黎锦熙。

[2] 袁氏，指袁世凯。王、梁、章、樊，据黎锦熙回忆及有关史实，系王闿运、梁启超、章炳麟、樊增祥。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近代学者，杨度之师。曾受袁世凯招揽，任清史馆馆长。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枢密顾问。拥护袁世凯，1912年冬被任命为东北筹边使。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被囚，袁死后获释。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湖北恩施人。清末曾任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袁世凯设立参政院时任参政。

[3] 1915年9月，黎锦熙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

文[1]，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2]。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3]则早夭矣；贾生[4]，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5]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

---

[1] 1916年秋，黎锦熙等人发动“国语运动”，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并发表《论教育之根本问题》。“以国语易国文”一文即指这篇文章。

[2] 三达德，参见《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3] 颜子，即颜渊（前521—前490），名回，字子渊，春秋末鲁国人，孔子学生。好学有德，但身体很弱，29岁白头，31岁即去世。

[4] 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人，政论家、文学家。文帝时召为博士，颇受赏识，升为太中大夫。敢于提出改革建议，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所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深感未尽太傅之责，忧惧哭泣，岁余而死，年32。

[5] 王勃（648—675），字子安，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文学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称“初唐四杰”。曾任沛王府修撰，虢州参军。所写《滕王阁序》，脍炙人口。后往交趾探父，因渡海溺水，受惊而死，时方28岁。卢照邻（约635—约689），即卢升之，号幽忧子，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文学家，曾任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苦，投颍水而死。后人辑有《幽忧子集》。

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1]。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2]。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3]，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

教安！

小弟　泽东谨上

十二月九日

---

[1] 参见《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2] 参见《孟子·尽心》，原文为：“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3] 罗斯福，指西奥多·罗斯福，曾任美国总统。其人好胜，体格强健，喜爱运动。卸总统任后，曾到非洲东部探险。孙棠，据日本《体育大辞典》载：Sando是德国铁路哑铃操的普及者，常作巡回表演。嘉纳（1860—1938），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讲道馆馆长。曾将日本“柔术”改良为“柔道”，后曾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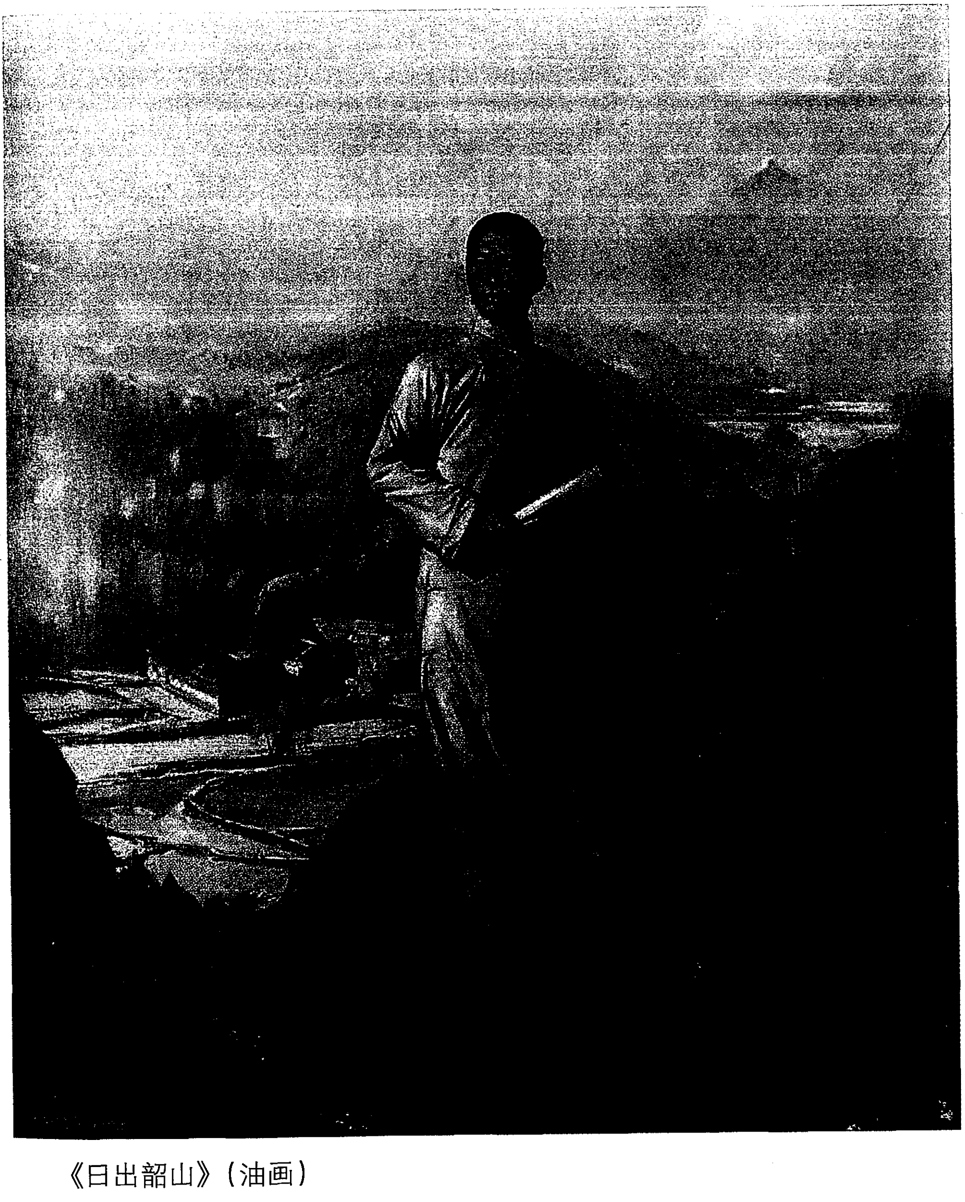
怎样看待别人[1]

（191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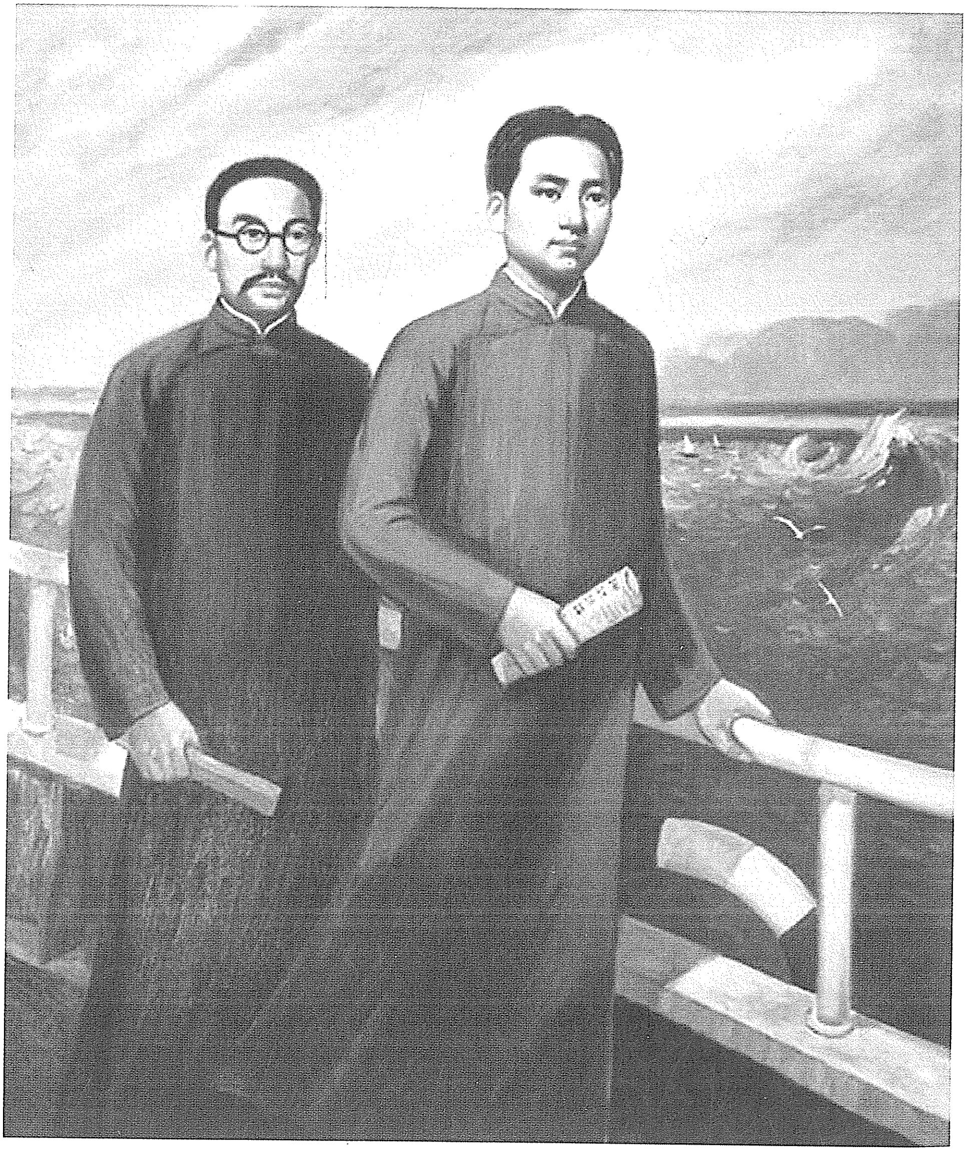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部分材，一种是组织材，前者多而后者少。但每个人都有长处，我们就应该鼓励、发展、运用他们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少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该看他的长处。

---

[1] 这是毛泽东和同学的谈话。毛泽东后来在领导革命时期也说过：无论跛子、哑子、瞎子对革命都有用处。他对组织部工人谈话说：对一个同志首先要看他的相同处——他革命，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看他的不同处——有缺点，思想意识上有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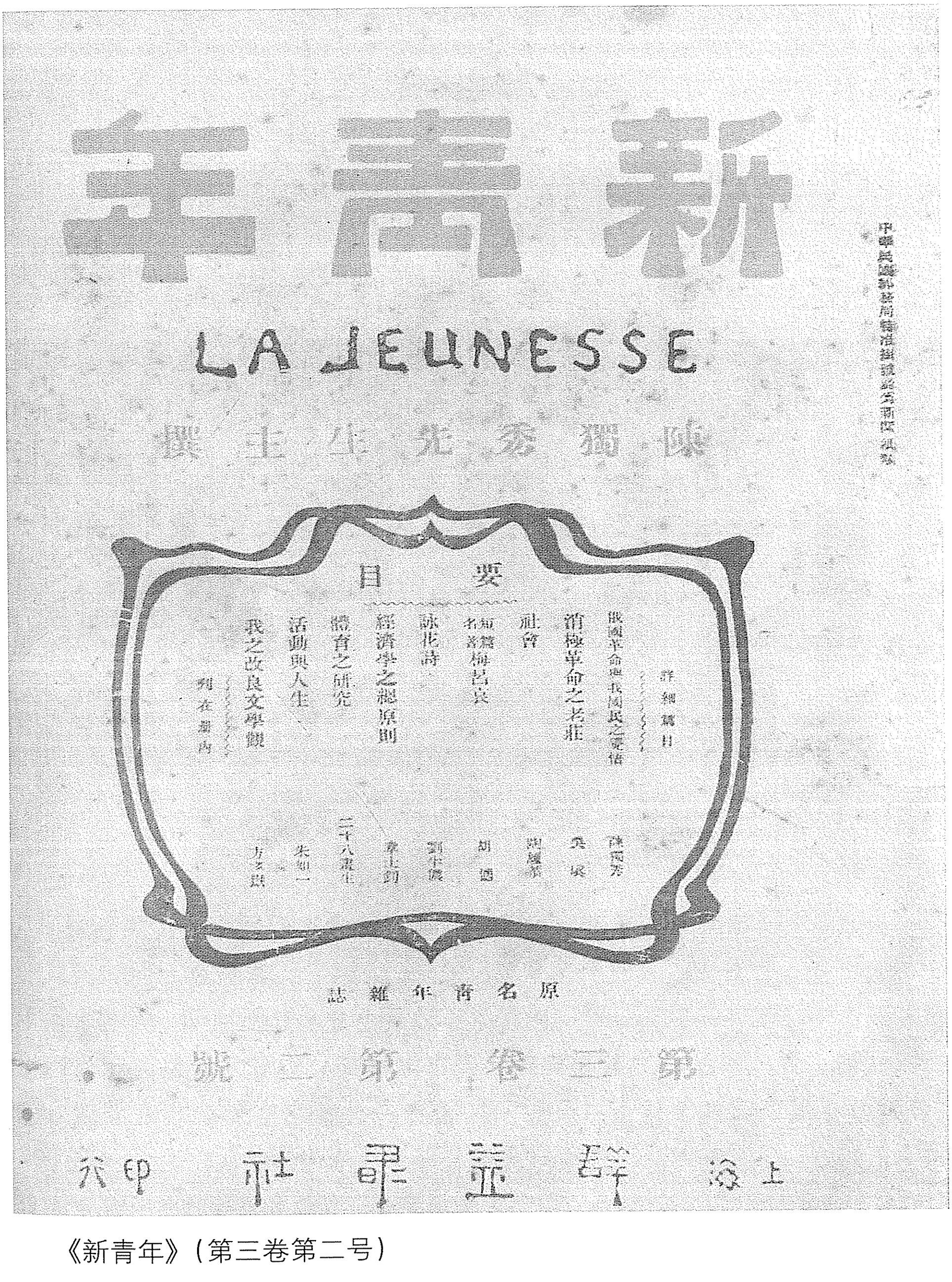


《日出韶山》（油画）



《风华正茂》（油画）

1917



中華民國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

LA JEUNESSE

陳獨秀先生主撰

要目

俄國革命與我國民之覺悟　陳獨秀
消極革命之老莊　吳虞
社會　陶履恭
短篇名著梅吕哀　胡適
詠花詩　劉半農
經濟學之總原則　章士釗
體育之研究　二十八畫生
活動與人生　朱如一
我之改良文學觀　方孝嶽

詳細篇目列在卷內

原名青年雜誌

第三卷第二號

上海群益書社印行

《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

给白浪滔天的信[1]

（1917年春）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2]、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上

---

[1] 这封信是毛泽东和萧植蕃（即萧三）在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期间写的。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也作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潮熏陶，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交往甚密。在穷困潦倒之际，拒绝东京赤坂警察署长的贿诱，保护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1916年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后，灵柩归葬湖南。次年2月，白浪滔天由日本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4月离开长沙回国。

[2] 萧植蕃，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

体育之研究[1]

（1917年4月1日）

国力恭〈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体育果有如何之价值，效果云何，著手何处，皆茫乎如在雾中，其无效亦宜。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则体育之条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政〈致〉远之效亦当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体育之要，伤提倡者之不得其当，知海内同志同此病而相怜者必多，不自惭赧，贡其愚见，以资商榷。所言并非皆已实行，尚多空言理想之处，不敢为欺。倘辱不遗，赐之教诲，所虚心百拜者也。

---

[1] 本文署名“二十八画生”，即毛泽东三字繁体共二十八画。1958年3月人民体育出版社曾以同一署名将此文印成单行本，内部发行。1979年8月，《新体育》第八期再次发表，同年12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又出单行本，署名均改为毛泽东，同时作了校勘，加了新式标点和注释，并附有白话释文。

第一　释体育

自有生民以来，智识有愚暗，无不知自卫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1]，饥极必食，井上之李[2]，不容不咽，巢木以为居，皮兽以为衣，盖发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饮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3]；“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4]；“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5]。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6]；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

---

[1] 西山之薇，参见《史记·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不愿继承孤竹君王位，逃到首阳山隐姓埋名。周武王起兵讨伐殷纣王，兄弟二人不以为然，曾拦马劝阻。周武王得天下后，伯夷、叔齐以吃周朝粮食为耻，在西山下采食野薇，后饿死。

[2] 井上之李，参见《孟子·滕文公下》。陈仲子，战国时人。他以哥哥做大官为不义，不愿在其家生活，便同妻子逃到楚国，织麻鞋为生。有一次，他三天没有吃饭，看见井上有被虫吃了过半的李子，忍不住爬过去吃了。

[3] 参见《论语·述而》。

[4] 参见《论语·乡党》。

[5] 参见《礼记·射义》。原文为“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矍相在山东曲阜城内阙里以西。

[6] 指孔子以射箭和驾车为养生之道。孔子把礼、乐、射、御、书、数六门技艺作为教育内容，射与御属于体育。

术，觥觥乎可观已。而考其内容，皆先精究生理，详于官体之构造，脉络之运行，何方发达为早，何部较有偏缺，其体育即准此为程序，抑其过而救其所不及。故其结论，在使身体平均发达。由此言之，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之可言者也。

第二　体育在吾人之位置

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顾知之者或寡矣，或以为重在智识，或曰道德也。夫知识则诚可贵矣，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此耳。顾徒知识之何载乎？道德亦诚可贵矣，所以立群道平人己者此耳。顾徒道德之何寓乎？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儿童及年人〈入〉小学，小学之时，宜专注重于身体之发育，而知识之增进、道德之养成次之；宜以养护为主，而以教授训练为辅。今盖多不知之，故儿童缘读书而得疾病或至夭殇者有之矣。中学及中学以上宜三育并重，今人则多偏于智。中学之年，身体之发育尚未完成，乃今培之者少而倾之者多，发育不将有中止之势乎？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餂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学者亦若恶此生之永年，必欲摧折之，以身为殉而不悔。何其梦梦如是也！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

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

第三　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

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步〈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1]而短命，有贾生[2]而早天，王勃、卢照邻[3]，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4]；烈士武臣，多出凉州[5]。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6]，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

---

[1] 颜子，即颜渊，孔子的学生。

[2] 贾生，即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3] 王勃，唐代文学家。卢照邻，唐代文学家。

[4] 参见《韩昌黎全集》卷二十《送董邵南序》。原文为：“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燕赵均为战国时国名，其疆域大体相当于今河北省和山西省。

[5] 凉州，明洪武为凉州卫。清雍正二年（1724）改为府，其辖境相当于今甘肃武威、永昌、民勤、天祝、古浪、永登等县地。1913年已废。

[6]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的斗争。清兵南下，与人起兵反清复明，失败后周游四方，心存光复。后埋头读书著述，讲经世致用，有民主思想，为清初学术大师之一。

师者也。

学校既起，采各国之成法，风习稍稍改矣。然办学之人犹未脱陈旧一流，囿于所习，不能骤变，或少注意及之，亦惟是外面铺张，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故愚观现今之体育，率多有形式而无实质。非不有体操课程也，非不有体操教员也，然而受体操之益者少，非徒无益，又有害焉。教者发令，学者强应，身顺而心违，精神受无量之痛苦，精神苦而身亦苦矣，盖一体操之终，未有不貌瘁神伤者也。饮食不求洁，无机之物，微生之菌入于体中，化为疾病；室内光线不足，则目力受害不小；桌椅长短不合，削趾适屦，则躯干受亏；其余类此者尚多，不能尽也。

然则为吾侪学者之计如之何？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我欲仁斯仁至，况于体育乎。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

第四　体育之效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人者，有理性的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1]主静。静，静也；敬，非动

---

[1] 陆子，即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存斋，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官至奉议郎知荆门军。其学受程颢影响较大，与兄九韶、九龄并称“三陆子之学”。提出“心即理”学说，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其学说后由明王守仁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

也，亦静而已。老子[1]曰“无动为大”，释氏[2]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3]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动之属于人类而有规则之可言者，曰体育。前既言之，体育之效则强筋骨也。愚昔尝闻，人之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大抵二十五岁以后即一成无变，今乃知其不然。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又闻弱者难以转而力强，今亦知其非是。盖生而强者滥用其强，不戒于种种嗜欲，以渐戕〈戕〉贼其身，自谓天生好身手，得此已足，尚待锻炼？故至强者或终转为至弱。至于弱者，则恒自闵其身之不全，而惧其生之不永，兢业自持：于消极方面则深戒嗜欲，不敢使有损失；于积极方面则勤自锻炼，增益其所不能。久之遂变而为强矣。故生而强者不必自喜也，生而弱者不必自悲也。吾生而弱乎，或者天之诱我以至于强，未可知也。东西著称之体育家，若美之罗斯福，德之孙棠，日本之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又尝闻之：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体，而体魄蛮健者多缺于思。其说亦谬。此盖指薄志弱行之人，非所以概乎君子也。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4]往来传道，死年

---

[1]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周朝人，著《道德经》。

[2] 释氏，指佛教创始者释迦牟尼。

[3] 因是子，名蒋维乔，习静坐数十年，著有《因是子静坐法》。

[4] 释迦，即释迦牟尼，佛教创始者。

亦高；邪苏[1]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2]，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今之伍秩庸[3]先生七十有余岁矣，自谓可至百余岁，彼亦用思想之人也；王湘绮[4]死年七十余，而康健镬〈矍〉铄。为是说者其何以解邪？总之，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

非第强筋骨也，又足以增知识。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故可谓间接从体育以得知识。今世百科之学，无论学校独修，总须力能胜任。力能胜任者，体之强者也；不能胜任者，其弱者也。强弱分，而所任之区域以殊矣。

非第增知识也，又足以调感情。感情之于人，其力极大。古人以理性制之，故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又曰“以理制心”。然理性

---

[1] 邪苏，即耶稣，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称为基督。传教于犹太各地。后因改革犹太教，被钉死于十字架上。

[2] 摩诃末，指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

[3] 伍秩庸，即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广东新会人。早年留学国外。历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辛亥革命后，任外交、司法等部部长。

[4] 王湘绮，即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近代学者、文学家。曾讲学于四川、湖南、江西等地，清末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经学治《诗》《礼》《春秋》，宗法公羊。诗文在形式上主要模拟汉魏六朝，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

出于心，心存乎体。常观罢弱之人往往为感情所役，而无力以自拔；五官不全及肢体有缺者多困于一偏之情，而理性不足以救之。故身体健全，感情斯正，可谓不易之理。以例言之：吾人遇某种不快之事，受其刺〈刺〉激，心神震荡，难于制止，苟加以严急之运动，立可汰去陈旧之观念，而复使脑筋清明，效盖可立而待也。

非第调感情也，又足以强意志。体育之大效盖尤在此矣。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讵〈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1]，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2]，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3]，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肢体纤小者举止轻浮，肤理缓弛者心意柔钝，身体之影响于心理也如是。体育之效，至于强筋骨，因而增知识，因而调感情，因而强意志。筋骨者，吾人之身；知识，感情，意志者，吾人之心。身心皆适，是谓俱泰。故夫体育非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

---

[1] 参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原文为“力拔山兮气盖世”。

[2] 楼兰，是汉时西域的鄯善国，其国王与匈奴统治者勾结，多次截杀汉朝使者，屡犯汉境。傅介子（？—前65），西汉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人。他自请往击楼兰，说不斩楼兰王誓不回来，后来果然带了楼兰王的首级回到汉朝。

[3] 相传夏禹一心治水，在外八年，手足都生了老茧，三次路过自己家门都顾不得进去。

第五　不好运动之原因

运动为体育之最要者。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其原因盖有四焉：一则无自觉心也。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明白周详知所以然者，即自觉心也。人多不知运动对于自己有如何之关系，或知其大略，亦未至于亲切严密之度，无以发其智，因无以动其情。夫能研究各种科学孜孜不倦者，以其关系于己者切也，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而运动则无此自觉。此其咎由于自己不能深省者半，而教师不知所以开之亦占其半也。一则积习难返也。我国历来重文，羞齿短后，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虽知运动当行之理与各国运动致强之效，然旧观念之力尚强，其于新观念之运动盖犹在迎拒参半之列，故不好运动，亦无怪其然。一则提倡不力也。此又有两种：其一，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夫荡子而言自立，沉湎而言节饮，固无人信之矣。其次，教体操者多无学识，语言鄙俚，闻者塞耳，所知惟此一技，又未必精，日日相见者，惟此机械之动作而已。夫徒有形式而无精意以贯注之者，其事不可一日存，而今之体操实如是。一则学者以运动为可羞也。以愚所考察，此实为不运动之大原因矣。夫衣裳襜襜、行止于于、瞻视舒徐而夷犹者，美好之态，而社会之所尚也。忽尔张臂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故有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一言蔽之，害羞之一念为之耳。四者皆不好运动之原因。第一与第

四属于主观，改之在己；第二与第三属于客观，改之在人。君子求己，在人者听之可矣。

第六　运动之方法贵少

愚自伤体弱，因欲研究卫生之术。顾古人言者亦不少矣，近今学校有体操，坊间有书册，冥心务泛，终难得益。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曾文正[1]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有老者年八十犹康健，问之，曰：“吾惟不饱食耳。”今之体操，诸法樊陈，更仆尽之，宁止数十百种？巢林止于一枝，饮河止于满腹，吾人惟此身耳，惟此官骸藏脏络耳，虽百其法，不外欲使血脉流通。夫法之致其效者一，一法之效然，百法之效亦然，则余之九十九法可废也。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筋骨之锻炼而百其方法，是扰之也，欲其有效，未见其能有效矣。夫应诸方之用，与锻一己之身者不同。浪桥所以适于航海，持竿所以适于逾高，游戏宜乎小学，兵式宜乎中学以上，此应诸方之用者也。运动筋骸使血脉流通，此锻一己之身者也。应诸方之用者其法宜多，锻一己之身者其法宜少。近之学者多误此意，故其失有二：一则好运动者以多为善，几欲一人之身，百般俱备，其至无一益身者；一则不好运动者见人之技艺多，吾所知者少，则绝弃之而不为。其宜多者不必善，务广而荒，又何贵乎？少者不必不善，虽一手一足之屈伸，苟以为常，亦有益焉。明乎此，而后体育始有进步可言矣。

---

[1] 曾文正，即曾国藩。

第七　运动应注意之项

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分矣。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凡静者不能自动，必有所以动之者，动之无过于兴味。凡科学皆宜引起多方之兴味，而于运动尤然。人静处则甚逸，发动则甚劳，人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而变其好恶之心。而此兴味之起，由于日日运动不辍。最好于才起临睡行两次运动，裸体最善，次则薄衣，多衣甚碍事。日以为常，使此运动之观念相连而不绝，今日之运动承乎昨日之运动，而又引起明日之运动。每次不必久，三十分钟已足。如此自生一种之兴味焉。**第二能生快乐。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亦缘有恒而得也。**快乐与兴味有辨：兴味者运动之始，快乐者运动之终；兴味生于进行，快乐生于结果。二者自异。

有恒矣，而不用心，亦难有效。走马观花，虽日日观，犹无观也。心在鸣〈鸿〉鹄[1]，虽与俱学，勿若之矣。故运动有注全力之道焉。运动之时，心在运动，闲思杂虑，一切屏去，运心于血脉如何流通，筋肉如何张弛，关节如何反复，呼吸如何出入，而运作按节，屈伸进退，皆一一踏实。朱子论主一无适，谓吃饭则想著吃

---

[1] 参见《孟子·告子上》。原文是：“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饭，穿衣则想著穿衣。注全力于运动之时者，亦若是则已耳。

文明柔顺[1]，君子之容，虽然，非所以语于运动也。运动宜蛮拙。骑突枪鸣，十荡十决[2]，喑呜颓山岳，叱咤变风云，力拔项王之山，勇贯由基[3]之札，其道盖存乎蛮拙，而无与于纤巧之事。运动之进取宜蛮，蛮则气力雄，筋骨劲。运动之方法宜拙，拙则资守实，练习易。二者在初行运动之人为尤要。

运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他所当注意者尚多，举其要者如此。

第八　运动一得之商榷

愚既粗涉各种运动，以其皆系外铄而无当于一己之心得，乃提挈各种运动之长，自成一种运动，得此运动之益颇为不少。凡分六段：手部也，足部也，躯干部也，头部也，打击运动也，调和运动也。段之中有节，凡二十有七节。以其为六段，因名之曰“六段运动”。兹述于后，世之君子，幸教正焉。

一、手部运动，坐势。

1. 握拳向前屈伸，左右参，三次（左右参者，左动右息，右动

---

[1] 古人称赞周文王“外文明而内柔顺”。

[2] 十荡十决，指项羽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县）被刘邦重重包围，只剩十骑，他十次冲入汉兵阵地，都突破缺口，冲了出来的故事。

[3] 由基，即养由基。一作养游基，春秋时代楚国大夫，是个百发百中的射箭能手。楚共王十六年（前575）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之战，战前他和潘党试射，一发穿七层甲叶。战时晋将魏锜射中楚王的眼睛，楚王叫他回射，他一箭射死魏锜，并连射连中，阻止了晋军追击。

左息，相参互也）。

2. 握拳屈肘前侧后半圆形运动，左右参，三次。

3. 握拳向前面下方屈伸，右左并，三次（左右并者，并动不相参互）。

4. 手仰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5. 手覆向外拿，左右参，三次。

6. 伸指屈肘前剌〈刺〉，左右参，三次。

二、足部运动，坐势。

1. 手握拳左右垂。足就原位一前屈，一后斜伸，左右参，三次。

2. 手握拳前平。足一侧伸，一前屈。伸者可易位，屈者惟趾立，臀跟相接，左右参，三次。

3.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揭，左右参，三次。

4.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支一前踢，左右参，三次。

5. 手握拳左右垂。足一前屈，一后伸。屈者在原位，伸者易位，两足略在直线上，左右参，三次。

6. 手释拳。全身一起一蹲，蹲时臀跟略接，三次。

三、躯干部运动，立势。

1. 身向前后屈，三次（手握拳，下同）。

2. 手一上伸，一下垂。绷张左右胸肋，左右各一次。

3. 手一侧垂，一前斜垂。绷张左右背肋，左右各一次。

4. 足丁字势。手左右横荡，扭捩腰胁，左右各一次。

四、头部运动，坐势。

1. 头前后屈，三次。

2. 头左右转，三次。

3. 用手按摩额部、颊部、鼻部、唇部、喉部、耳部、后颈部。

4. 自由运动。头大体位置不动，用意使皮肤及下颚运动，五次。

五、打击运动，不定势（打击运动者，以拳遍击身体各处，使血液奔注，筋肉坚实，为此运动之主）。

1. 手部。右手击左手，左手击右手。

（1）前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2）后膊。上面、下面、左面、右面。

2. 肩部。

3. 胸部。

4. 胁部。

5. 背部。

6. 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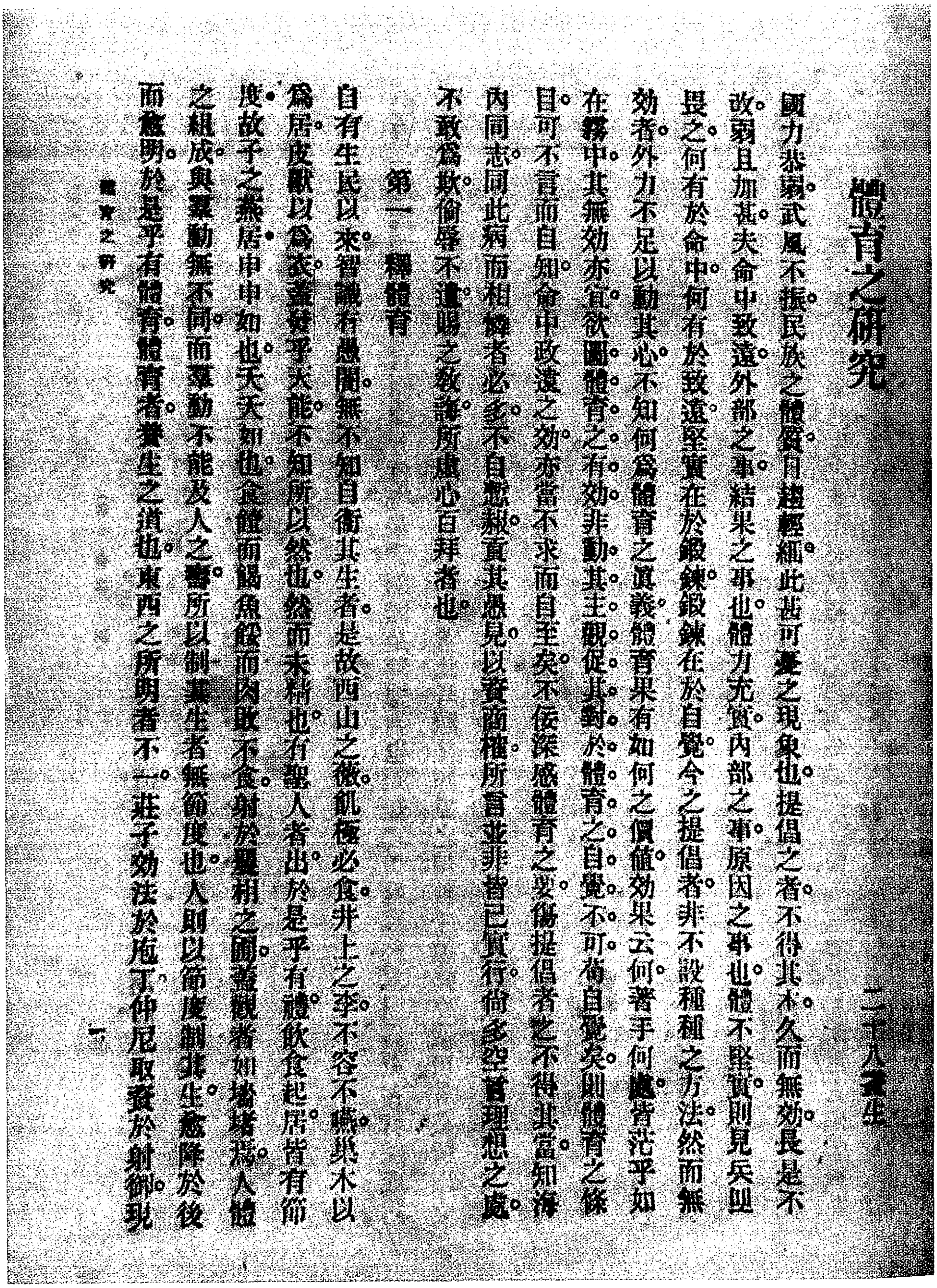
7. 臀部。

8. 腿部。上腿、下腿。

六、调和运动，不定势。

1. 跳舞，十余次。

2. 深呼吸，三次。



體育之研究

二十八畫生

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無效。長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遠。外部之事。結果之事也。體力充實。內部之事。原因之事也。體不堅實。則見兵而畏之。何有於命中。何有於致遠。堅實在於鍛鍊。鍛鍊在於自覺。今之提倡者。非不設種種之方法。然而無效者。外力不足以動其心。不知何爲體育之眞義。體育果有如何之價值。效果云何。著手何處。皆茫乎如在霧中。其無效亦宜。欲圖體育之有效。非動其主觀。促其對於體育之自覺不可。苟自覺矣。則體育之條目。可不言而自知。命中致遠之效。亦當不求而自至矣。不佞深感體育之要。傷提倡者之不得其當。知海內同志同此病而相憐者。必多不自惴揣。貢其愚見。以資商榷。所言並非皆已實行。尚多空言理想之處。不敢爲欺。倘辱不遺。賜之教誨。所虛心百拜者也。

第一　釋體育

自有生民以來。智識有愚闇。無不知自衛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飢極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嚥。巢木以爲居。皮獸以爲衣。蓋發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人體之組成。與羣動無不同。而羣動不能及人之壽。所以制其生者無節度也。人則以節度制其生。愈降於後而愈明。於是乎有體育。體育者。養生之道也。東西之所明者不一。莊子效法於庖丁。仲尼取資於射御。現

體育之研究　　一

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

赠王熙[1]联

（1917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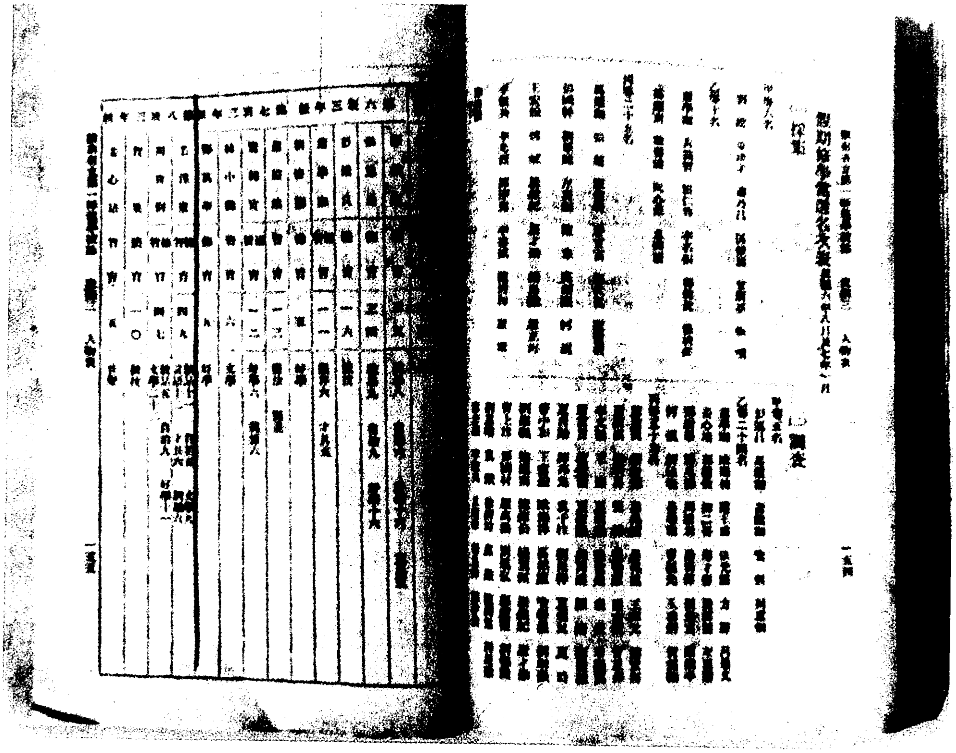
爱君东阁能延客[2]；
别后西湖赋予谁[3]。

---

[1] 王熙（1895—1966），湖南宁乡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

[2] 东阁，古代为宰相款待宾客的地方，这里泛指款待宾客之所。延客，邀请、引进客人、贤人。爱君东阁能延客，宋代苏轼有“寄君东阁闲烝栗”之句。

[3] 西湖，指西洞庭湖，即毛泽东当时游学的西洞庭湖地区。赋，写作，朗诵。



1917年6月，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得票最多。图为人物互选当选名次表。

《一切入一》序[1]

（1917年夏）

君既订此本成，名之曰《一切入一》，命予有以书其端。予维庄生有言：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势有不可究诘者。惟文化进矣，人之知慧亦随而进，则所以究诘之者，仍自有道也。顾究诘也同，而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庀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姝姝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而高，学积而博，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积之之道，在有条理。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今而有志于学，不遵斯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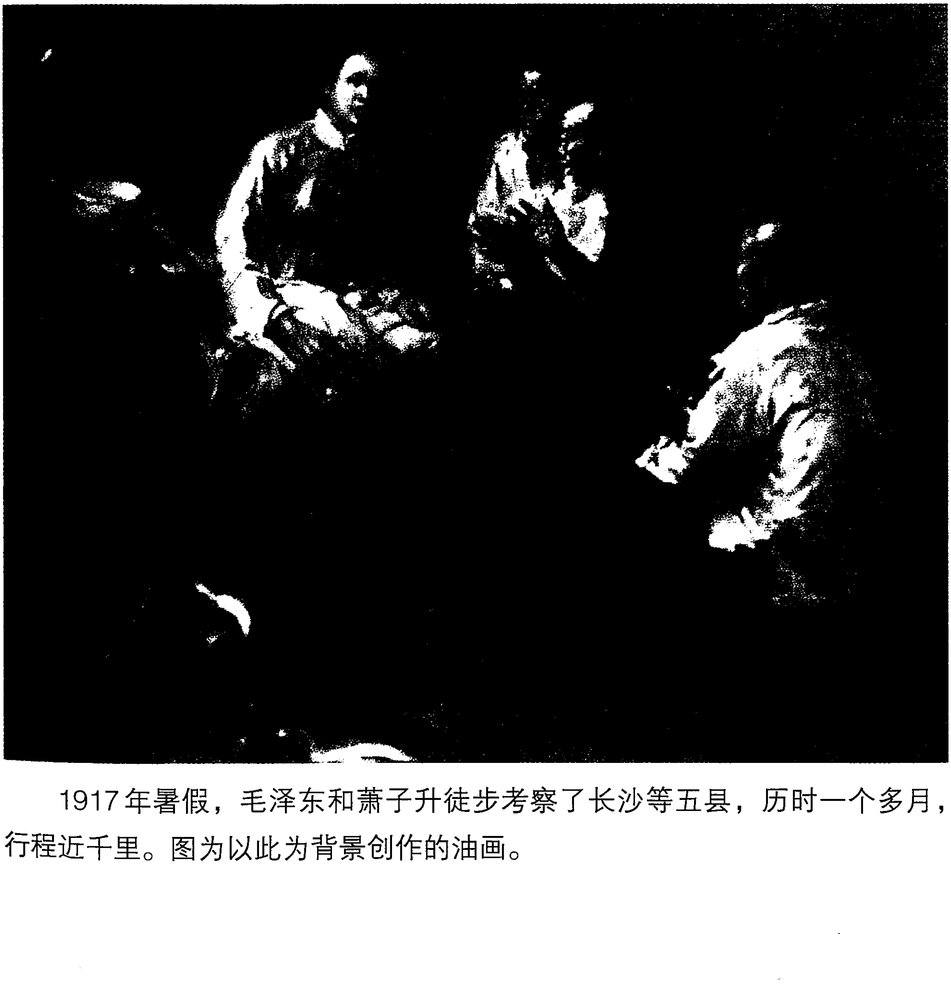
[1] 本文是毛泽东为萧子升自订的读书札记本《一切入一》写的序言。

焉，固未可以剸〈蕲〉其精矣。虽然，犹未也。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就，必也有恒乎？曰，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门而复，虽矻矻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君之为此本也，意果存乎是，而欲尽其力以致之欤！此本之将以为积，审矣。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抑又无疑。惟是札□[1]兼收，小大毕聚，虽美于目，而未必可悦于心，则宜有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焉。又持之以久远，不中涂而辍。诚若是，则固百丈之台之基矣，而予又奚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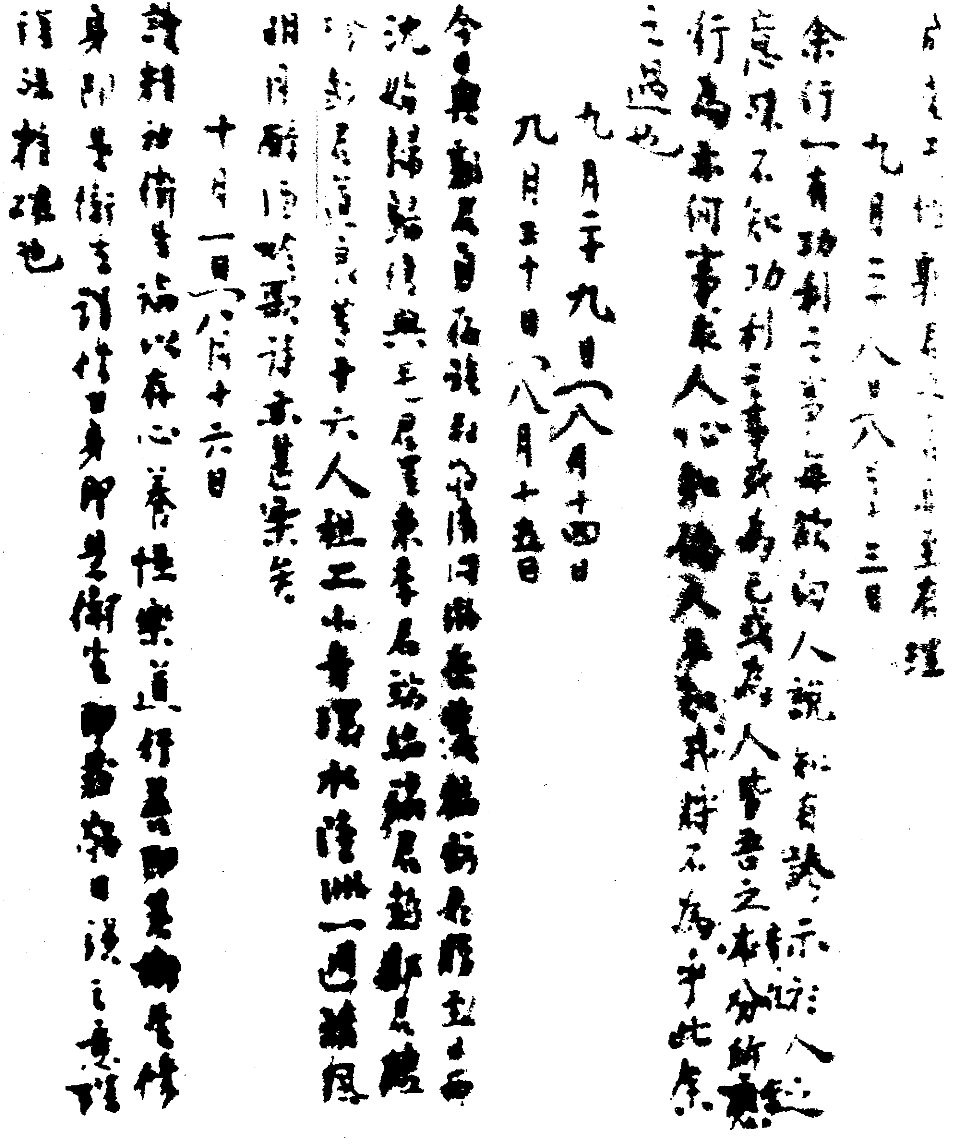
民国六年夏　同学弟毛泽东

---

[1] 原件此字残缺，左边为“石”，疑为砭字。



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萧子升徒步考察了长沙等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近千里。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



罗学瓒的日记片段，记载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人游学时的情形。

和夏默安应对联[1]

（1917年夏）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夏默安）
青草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毛泽东）

---

[1] 1917年暑假，毛泽东邀在长沙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瑜一同游学，进行农村调查。一天，毛泽东去拜访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安，夏时年64岁，夏默安听说来访者是年轻的学生，认为学问不见得高深，故回避不见。毛泽东并不在意，接着第二次、第三次登门拜访虚心求教。夏默安因而改变态度，决定要试探一下毛泽东的才学深浅，于是开门相见，不讲不问，马上挥笔写了上联置于青案上。毛泽东看到后，稍有所思，立刻应声对出了下联。夏默安看了自感有愧，连声称赞，并以礼相待，请毛泽东在家吃饭住宿。毛泽东还看了夏默安著的几本书。临别时，夏默安送了八块银元给毛泽东作旅费。夏默安（1853—1928），湖南省安化县羊角塘人，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任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学识渊博，专治经史之学，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钞》等行世。

给黎锦熙的信

(1917年8月23日)

邵西[1]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2]，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3]，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

---

[1] 邵西，即黎锦熙。

[2] 黎锦熙于1917年4月16日自北京回到长沙，4月23日其《日记》中载："上午到社（宏文社——编者注）晤毛润之，谈学。"5月15日黎离长赴京。

[3] 1917年7月、8月间，毛泽东同萧子升用"游学"形式进行社会考察，从长沙动身，到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和社会风俗人情。到沅江后遇洞庭湖涨水，道路被淹，便乘船返回长沙。历时月余，行程近千里。

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1]、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2]，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

---

[1] 孙文，即孙中山。

[2] 曾文正，即曾国藩。洪，指太平天国创建者、领袖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杨，指杨秀清（约1820—1856），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创建者之一。收拾洪杨一役，指曾国藩从1852年开始，在湖南帮办团练，编组湘军，于1864年率领湘军攻陷天京，使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一事。

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

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1]，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2]，如孔子之"百世可知"[3]，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4]。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

---

[1] 某公，指梁启超，1903年10月，梁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梁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我与昨我挑战"的话。

[2] 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界。下为欲界，中为色界，上为无色界。这是由佛教善恶报应和禅定修行理论概括而来的。

[3] 参见《论语·为政》。原文为：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4] "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参见《孟子·公孙丑》。原文为："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德[1]、释迦牟尼。）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不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悯。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

---

[1] 摩哈默德，今译穆罕默德（约570—632），生于麦加，伊斯兰教创始人。

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1]。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2]。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

---

[1] 巢，指巢父。许，指许由，又作许繇。均为古代隐士。相传巢父因巢居树上而得名。帝尧要让位给他，不受。尧又要让位给许由，巢父又劝许由隐居。许遂逃至箕山下，农耕而食。尧改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却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

[2] 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近代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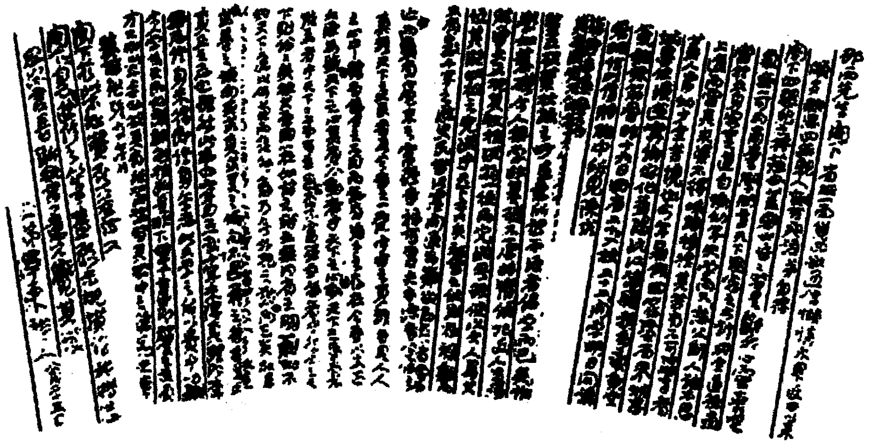
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1]与范公之画粥[2]，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法。思深言长，聊欲尽意，不觉其琐。

乡弟　泽东谨上
八月二十三日

---

[1] 颜子，即颜渊，名回，孔子弟子。颜子之箪瓢，语出《论语·雍也》，原文为："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2] 范公，指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范文正公集》卷七《上张左丞书》自述少家贫，在僧寺里读书，经常煮粥一小锅，待凝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外加一点咸菜，即为一天饮食。《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述："……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手稿。

国文教授案[1]

（1917年9月）

教材：第四册第十课《衣服》（复习）

复习：

1. 读：个、行、齐。

2. 文法：（原文：制衣之料，或用绸，或用布。绸价贵，且不能常洗，故常服之衣，宜以布制之。）

（一）区分段落　首三句，提出衣料有绸、布二种，为一段；中二句，单承绸说有贵与不能常洗之二样坏处，反振下文，为一段；末二句，转出衣宜布制，乃全文结收，为一段。

（二）变更顺序　制衣之料，或用布，或用绸。绸不能常洗，且价贵。（下略）

（三）增减字句　制衣之料，或绸或布。绸价多贵，且难常洗，故常服宜以布制之。

3. 做选例：

---

[1] 本篇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学实习时写的教案。原件标题后还有“（国文科二年级）”字样。无写作时间。据一师同学李端纶1917年9月22日对这次实习所写的评语“毛君态度、教法、言语均臻完善，惜其立地未能适当耳”来看，此教案当写于1917年9月22日稍前。

（一）高材生　制伞之料，或用布，或用纸。布价贵且不□便风雨，故常用之伞，宜以纸制之。

（二）低能生　井栏之料，或用木，或用石。

4. 补助教授未及之知识：

（一）提倡俭德（用布不用绸）。

（二）奖用国货（中国布）。

（三）补说毛织物（羊毛、牛毛、猪毛）。

5. 名数加减：

（一）白布八尺，青布九尺，共布几尺?

（二）方墨九条，圆墨七条，共墨若干?

（三）纸十六张，用去七张，余若干?

（四）学生十八人，□□九人，尚有几人?

（五）十五里路，□□七里，余几里?

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1]

（1917年9月）

一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芝、彭则厚作一二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

---

[1] 本文是毛泽东的好友张昆弟的两则日记。其中记述了1917年9月间毛泽东夜宿昭山寺和在蔡和森家中的两次谈话。张昆弟（1894—1932），号芝圃，湖南益阳板溪（今属桃江县）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冬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过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8年出席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并列席共产国际“六大”。1931年，以中央工运特派员身份到湘鄂西苏区，曾任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牺牲于洪湖地区。

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下，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有和尚三四人。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语颇久，甚相得也，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亦然之。彭君以清夜之感，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十七日补

（九月十六日）

二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芝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1]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山〈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句钟矣。

由麓山归，作家书一封。下午送信晋城，托胡君带归。

（九月二十三日）

---

[1] 托尔斯泰，指列夫·托尔斯泰。

夜学招学广告[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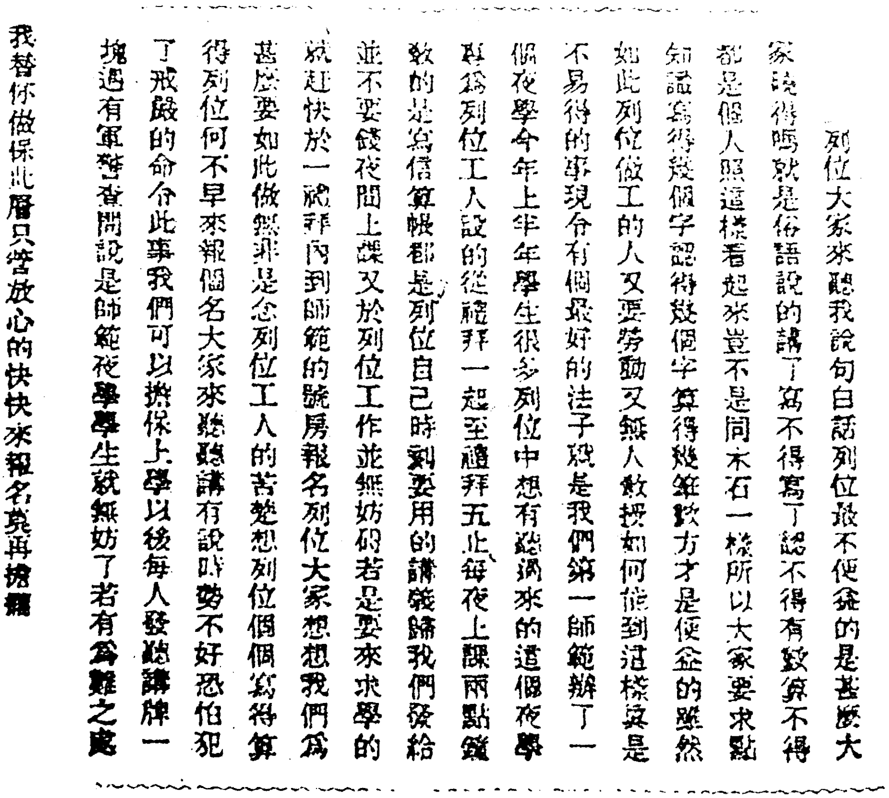
（1917年10月30日）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

---

[1] 这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的招学广告。学友会，原名技能会，1913年由一师校长发起成立，1915年改称学友会。该会“专为补助学校教育而设”，“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毛泽东从1915年11月起担任学友会文牍多届，1917年10月学友会改选，改任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在此以前，总务和教育研究部部长均由教员担任）。夜学附属于学友会，由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开办于1917年2月，10月由毛泽东主持。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1917年10月30日，夜学着手印刷白话招学广告，并以学友会名义致函校友文博古，函称“敬启者，敝会发起夜学，原欲灌输常识于社会，以尽师范天职。尊处工人极多，想不乏热心求学之人，兹特付上白话广告四张，望先生广为劝导，俾早来报名”。据当年夜学职员周世钊回忆，1917年秋天，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后，便接办夜学，并用白话文写出这篇招学广告。本文标题和标点为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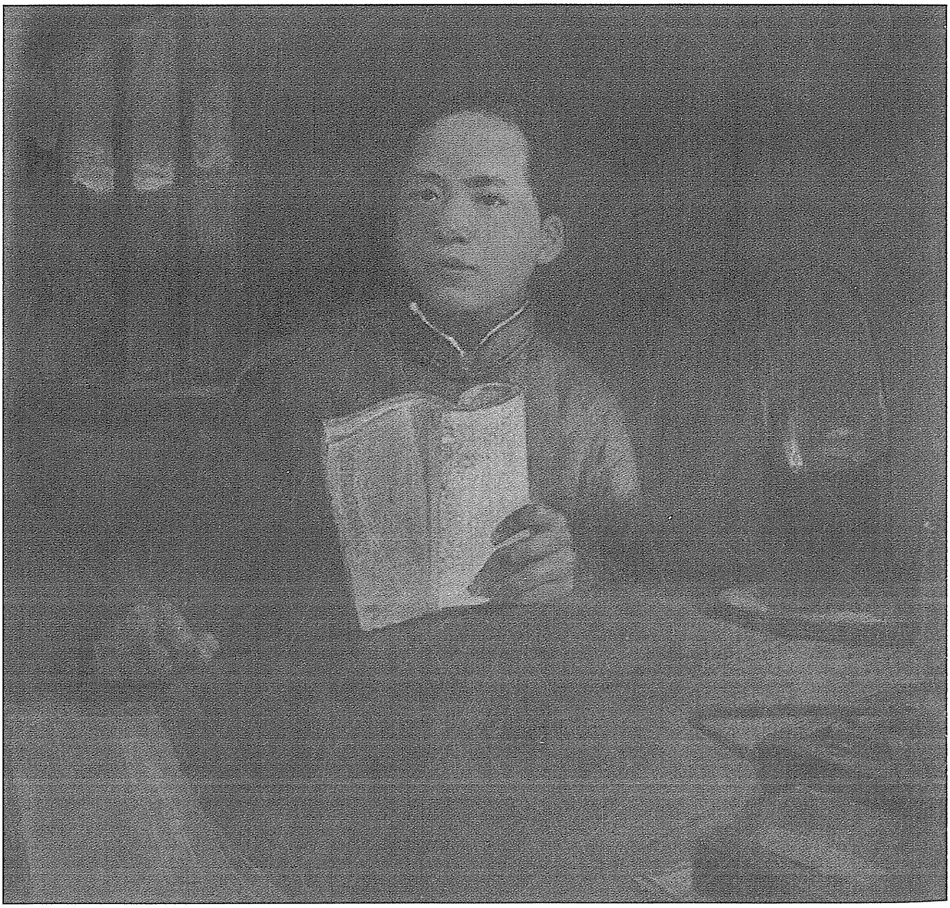
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甚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列位大家來聽我說句白話列位最不便益的是甚麽大
家曉得嗎就是俗語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
都是個人照這樣看起來豈不是同木石一樣所以大家要求點
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益的雖然
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眞是
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範辦了一
個夜學今年上半年學生很多列位中想有聽過來的這個夜學
專爲列位工人設的從禮拜一起至禮拜五止每夜上課兩點鐘
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
並不要錢夜間上課又於列位工作並無妨碍若是要來求學的
就趕快於一禮拜內到師範的號房報名列位大家想想我們爲
甚麽要如此做無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個個寫得算
得列位何不早來報個名大家來聽聽講有說時勢不好恐怕犯
了戒嚴的命令此事我們可以擔保上學以後每人發聽講牌一
塊遇有軍警查問說是師範夜學學生就無妨了若有爲難之處
我替你做保此層只管放心的快快來報名莫再擔擱

毛泽东写的夜学招学广告。

工人夜校旧址。



《夜读》（油画）

夜学日志首卷[1]

（1917年11月）

本校夜学上期已办半年，任事者为师范高小两部教职员，而周先生渭航[2]实主任其事。学生分为甲乙两班，每班每周上课两夜，初甚踊跃，人数达六七十，后则逐渐减少。其原因盖有三：一因学生本系各处粗工，素少恒性，夜郁一舍，其心不耐；二因工人雇役来去不常，学生多各地来省求工之人，辞工他去，夜学即辍；三则任事者为两部职教员，日中事繁，夜上精力或有□□，间因风两〈雨〉作辍，不免有失信用之处。据周先生报告如此，亦□为一种之研究资料矣。课分常识、算术、国文三门，均用讲义，用油印印成小叶，课课为断，盖因学生新旧参人也。本期学友会改选，定有数种计画，夜学即为计画之一。创议之初，咸以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

---

[1] 夜学日志是1917年冬毛泽东主持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时建立的。日志由职员轮流记载，主要记录夜学教学和管理情况。现在保存下来的日志首卷不全，只有1917年11月5日至26日的日志。收入本篇的是毛泽东写的首卷前言和14日以前的日志。14日以后的日志，记有毛泽东讲授历史课等情况，但为他人所写，本书未予收录。

[2] 周渭航，即周震鹍。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同学录中写为周渭舫，湖南宁乡人。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17年上学期担任夜学主任。

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此创设夜学之意，一也。复次，殴〈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而况人乎？小人原不小了，他本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之不同至于失学，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此创设夜学之意，又一也。复次，吾等所学名曰教育，而在三四年级者，大都理论完毕，进于实习，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此创设夜学之意，又一也。更有进者，则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相隔相疑，乃成三弊：一为学生不能得职业于社会，学生近之，社会远之，学生亲之，社会离之，永无联结契合之日。一则社会不遣子弟入学校，学校之不善，亦为一因，而社会不悉学校内容，则为最大因。学校之人与社会之人，自来不通情愫，不相告语，虽有良校，彼何由知乎？一则烧校阻款之事由此起也。除去三弊，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而为吾等创设夜学之意，又一也。此议既定，商之校中职教员先生，无不赞成，即以上期夜学归学友会办理。因两校同立，恐学生与经费两有难处，于是遂归学

友会独办一校，连日著手组织。

十一月五日

夜学报名达百零二人。先是已出两次广告，第一次除张贴通衢外，并函托警察分发，令国民学校学生带归劝告，久之无效；第二次除印刷分贴外，另书大张张贴显处，亦无结果，报名者并前次九人而已。其故，盖社会不悉学校内容，虽有广告，疑不敢即入，一也。仅仅张贴，无人注意，彼等不注意于此，犹之吾人不注意官府布告也。令警察分发，其已否奉行已属疑问；即分发矣，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二也。并未遍散，彼等未能手受而目击之，三也。至十月三日[1]，乃用白话自写自发，发时加以口说，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铜元局一带，铁道两旁至洪恩寺一带，左自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共发去六百张，并张贴通衢极密，故不及三日，报名即达此数。

晚上，合国民高小本校职教员及三四两级同学十余人开会，商议进行办法。

十一月六日

出牌布告学生云：诸位报了名，人数已齐，便须上学。今定阴历九月二十五日晚上七点钟，在师范下首国民学校内头次上学，各带笔墨砚池，齐到为要。

十一月七日

晚上开会磋商进行办法。学生报名又增二十余人。

十一月八日

晚上教员十二人开教务会议。

---

[1] 据1918年9月刊印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应为10月30日。

连日开会，议决事之事甚多，其要如左[1]：

一、每班每周三夜，每夜二时，共六时。分配国文、算术、常识三科，国文三时，算术一时半，常识一时半。常识每夜于国文算术完毕教授三十分。其时间表如左：

日 时　班	月	火	水	木	金	土
	甲	乙	甲	乙	甲	乙
一点半	国	国	算	算	国	国
	国	国	算	算	国	国
半点	地 （常）	地 （常）	历 （常）	历 （常）	理 （常）	理 （常）

二、国文算术，编纂讲义，其取材，一从两等小学教本节取，二从杂字课本节取。

三、常识之分类及时间（从阴历十月一日起至明年六月三十日止，共九月）如左：

历史 ——
地理 —— 首三月
理科
修身
卫生 —— 中三月
实业 ——
政法
经济 —— 末三月
教育

---

[1]　“如左”即“如下”，原文为自右至左竖排。下同。

四、教员每班国文二人，算术一人，常识三人。

五、常识每人担任一门，再于一定期间配分细目。如历史一门，在首三月教授，计有十二次，可教十二事之类。

六、常识为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彼等从前从传说及演剧，亦得有许多零碎之事迹，惟无系统的观念及爱国心耳。)

七、常识注重内容，讲义宜少，每次以一叶为合，凡图表等皆得印刷。

八、常识注重精神，与国文、算术之近于技能者相别，故作为余兴，每晚以半点钟，用演讲之形式教授之。

九、常识各门，内容多而时间少，宜择其重要及与夜学学生有密接关系者。

十、国文内容，分认字、写字（发纸）、短文、便条、信札等项。

十一、算术，先期尽教珠算，人后稍加笔算。

十二、教授，大部取注入式，间采启发式。

十三、讲义，由教授其课之两人商酌共编。

十四、一种讲义之格式，一律由教者规定。

十五、各种讲义，均须存留底稿，底稿之本一律。

十六、讲义，归教者自负付印、保管之责，随时与缮写、印刷商酌。

十七、所领参考书归领者保存。

十一月九日

是日为夜学开学之期。昨日下午，印刷通告六百张，遍发各

处，将夜学全体职教员组织齐全，其姓名如左：

教员

甲班国文	邹彝鼎	星期一
	叶兆桢	星期五
乙班国文	彭踪亮	星期二
	唐富言	星期六
甲班算术	罗宗翰	
乙班算术	方蔚	
甲班历史	毛泽东	
乙班历史	单传世	
甲班地理	萧学湘	
乙班地理	刘岱崑[1]	
甲班理科	张超	
乙班理科	周名第	

管理

星期一日	张昆弟	邓贤佑
星期二日	周世钊	曾以鲁
星期三日	李端纶	萧珍元
星期四日	孙慕韩	贺梯
星期五日	刘澹	郭毅钦
星期六日	李声澥	黄乾生
缮写	田士清	杨绍秉
印刷	曾正邦	廖衡[2]

---

[1] 1918年9月刊印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人物表中写为刘代昆。

[2] 邹彝鼎等28名夜学教员当时均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

开学之程序如左：

一、夜学职教员于晚餐后，齐集国民学校。

二、签到。

三、试验学生分为甲乙两班，试验之标准如左：

（一）书街名五个

（二）写住所及职业

（三）写姓名

四、教职员演说。

五、发听讲券及规则。

六、退。

同时派定司事如左：

签到	张　超	李端纶
试验	邹彝鼎	叶兆桢
	彭踪亮	唐富言
分班	毛泽东	单传世
填券	田士清	杨绍秉

六点半，将黑，夜学教职员陆续至国民学校，学生逐渐报到，齐即试验。将试验之事书于黑板，各给纸一方，有清楚不误全行写出者，有略写街名二三个及姓名住所者，有姓名不能写好者。随到齐试，多人巡行监察，缴卷者，导入礼堂静坐。约一时完毕。将卷评定甲乙，分为两班，计甲班四十四人，乙班四十一人，券上填注甲乙字样。毕，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师范学监主任、代理学友会会长方维夏先生致训词，大体勉励学生向学，举朱买臣、李密为例。次，夜学主任周渭航先生致训词，说明本校全体内容。两先生均介绍夜学各职教员，谓均系

能写、能算、能作，尽心宗教各位，云云。次，唱名发甲班听讲券，立于左边一排（始系向前横立）；次，发乙班听讲券，立于右边一排。分班既定。次，取上课说明书分发。次，毛泽东将上课说明书逐条解释。事毕，从容整队而出。此次报到，既极踊跃，而秩序又甚为整齐，出于意料之外。此次学生中，十三四岁小儿竟占十分三之数，有在初小读过一年及二年者。夫儿童失学如此其多，使无此夜学稍从补救，将永以废学矣。其中年失学者，前日截止报名后，尚有无数要求补报者。以碍于名数不能许，而彼等固如嗷嗷之待哺也。

录上课说明书于此：今夜开了学，分了班，你们就是这夜学的学生了。再过两天，到下礼拜一日（即阴历九月二十八日）便要上课。今将各事说明于左：

一、夜学分为甲乙两班。

甲班上课，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即阴历九月二十八日、三十日，十月初二日，以下照推）。

乙班上课，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即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初一日、初三日，以下照推）。

二、每夜上课两点钟，七点钟起，九点钟止。

三、功课分国文、算术、常识三门。

四、讲义及抄本由本校发给。

五、上课须带笔墨。

六、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

七、每人发听讲券一张。

八、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只管放心。

十一月十日

购来参考书十二种。其目如左：

五言鉴　珠玑幼学　童子尺牍　指明算法　中西日用杂字　便用杂字　启蒙杂字　包举杂字　四言杂字　六言杂字　捷径须知

又，前日在学校图书室领来参考书如左：

高初两等国文教科书及教授法六十本。

高小算术教科『算』书及教授法十三本。

高小历史教科书及教授法。

高小地理教科书及教授法。

高小理科教科书及教授法。

晚上点名后，管理十二人在学友会事务室会议，公决事件如左：

一、教室设灯四盏，头门设灯一盏，三门设灯一盏。

二、本校派定工役一名，司送茶水灯油等事。国民部派定工役一名，应随时呼唤。

三、教员与管理员齐同赴夜学上课，以免学生久待。

四、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学生信仰。

五、讲义归管理发给，另备名册一本，记其次数。

六、学生雨具，令拂干，置于讲堂椅下自为照料。

七、学生大小解，天晴另就街侧〈厕〉所。

八、看钟摇铃，属于管理。

九、每日事毕，即告于次日管理，移交名册。

十一月十一日

昨日，出牌通告：未到学生准今晚补试，并将前夕分定之甲乙两班榜示。

晚上七时补试。计前夕报名未到者四十四人，今晚到十人。

十一月十二日

甲班上课，到者□□□□缺课□□[1]。国文邹彝鼎出席，授第一课《贮蓄》。末附授杂字四句。初，详为解释难字及意义。次，范读，齐读。人后，发习字纸，每人两张，以一张打格子。一点半毕，摇铃休息十分钟。地理常识，萧学湘出席，授五洲大势，发图表各一张，因内容颇多，延长时间约半点钟。管理为张昆弟、邓贤佑。

在休息之后点名（学生初时陆续投到，故在此时点名）。

上下课，呼立正敬礼，先时略为指示。

邹、萧上课时，以其姓名介绍于学生（由毛泽东）。

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上课，三次不到者，开缺另补；解手赴外边厕所；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习字纸带归书好，下次带来，评定甲乙记分等事。

教授两点余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

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

同学有数人参观。

学生休息时饮茶。

教地理时，先令改正课本错字，于黑板绘图，并示以地球仪。

讲义先未断句，教时令学生自断（教者口唱）。

此次地理讲义不善，字嫌小，又不明白。

十一月十三日

乙班上课，到者四十人。国文彭踪亮出席。地理常识刘岱崑出

---

[1] 此两处原件空缺。

席。国文第一课《承宫》，后附谚语。地理与甲班同。管理者周世钊、曾以鲁。

省城特别戒严，步哨及于社坛岭，报告学生提早上课；一面由学校行文省署，邀求保护，并报告各种规则，如甲班。

乙班学生程席〈度〉颇低，国文多不深嚾〈懂〉。

甲班学生昨夕放学，有在铁道旁喧呼者，警察以此为言，特申告乙班生。

十一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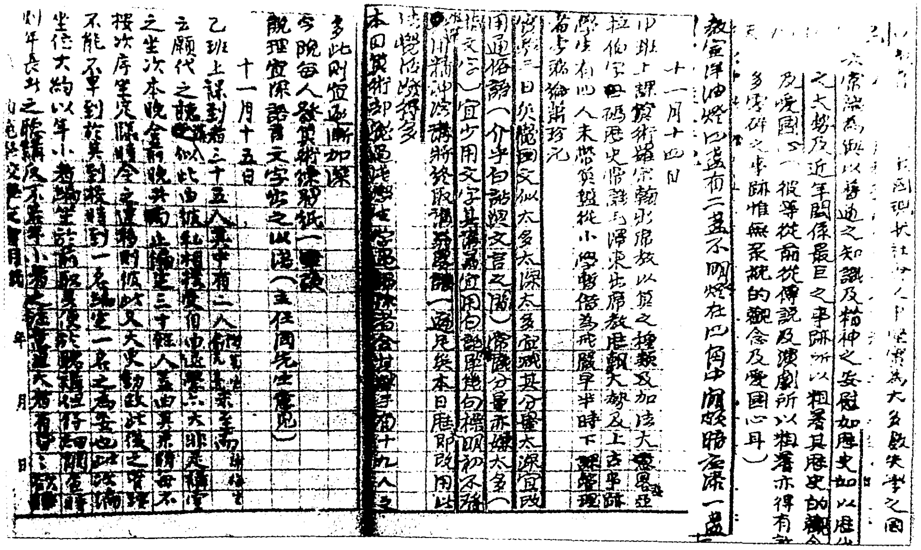
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算之种类、加法大略及亚〈阿〉拉伯字码。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四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暂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课。管理者李端纶、萧珍元。

实验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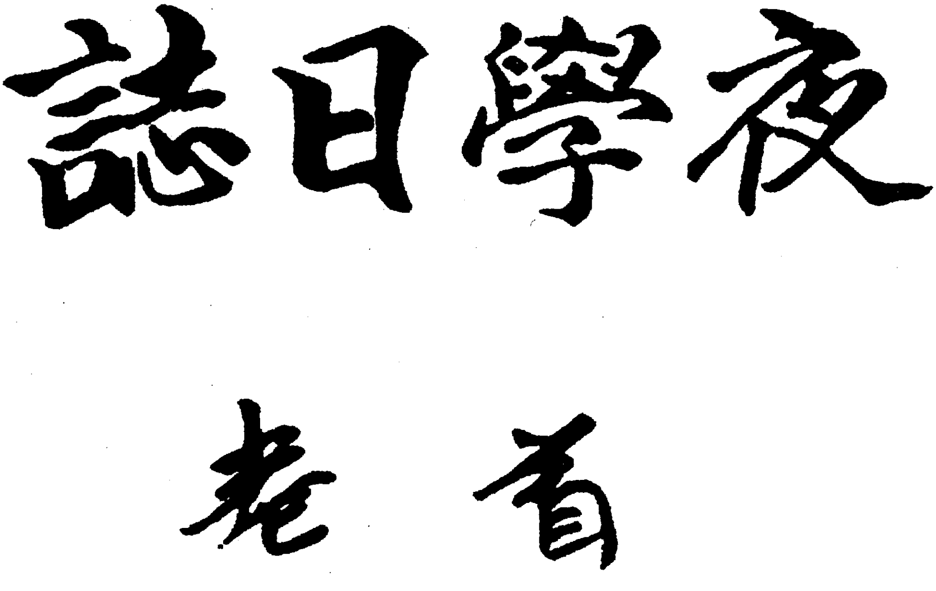
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九人之多。此则宜逐渐加深。

今晚，每人发算术练习纸一张。

说理宜深，语言、文字出之以浅（主任周先生意见）。



毛泽东填写的《夜学日志》（部分）。



夜學日誌

首卷

毛泽东为工人夜学日志封面的题字。

1917年11月，毛泽东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课外志愿军缴获部分北洋军阀败兵枪支。图为缴枪的地址——长沙南门外金盆镇。

七律·游学即景[1]

（1917年）

骤雨[2]东风过远湾，
滂然遥接石龙关[3]。
野渡苍松横古木，
断桥流水动连环。
□□□□□□□，
□□□□□□□。[4]
客行此去遵何路，
坐眺长亭意转闲。

---

[1] 游学即景，这首诗见于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1983年9月6日解放日报社出版的《报刊文摘》登载《毛泽东早期的几首旧体诗词》一文，加以介绍。

[2] 骤雨，急雨。

[3] 滂，大水涌流。滂然，急雨倾泻貌。石龙关，当指石龙山，在湖南湘潭县西100里，接衡山、湘乡两县界。山顶有石，昂如龙首，故名。

[4] 原诗此处缺稿。

七绝·赠刘翰林[1]联句

（1917年）

翻山渡水之名郡[2]，（毛泽东）
竹杖草履谒学尊[3]。（萧瑜）
途见白云如晶海[4]，（萧瑜）
沾衣晨露浸饿身。[5]（毛泽东）

---

[1] 翰林，官名。刘翰林，姓名不详，时已告老还乡。

[2] 之，往，到。郡，我国古代划分的行政区域名。名郡，有名的城邑。这里指刘翰林所在的宁乡县。

[3] 竹杖，竹子所制的手杖。草履，草鞋。竹杖草履，形容贫苦学生的样子。谒，请见，进见，一般用于下对上，幼对长，或用作谦词。学尊，对刘翰林的敬称。

[4] 晶海，水晶般的海洋，形容白云纯洁无边。白云如晶海，指山上洁白的云飘拂在如水晶般海洋似的广阔的天空中。这里是赞誉刘翰林隐居在高山云海，操行高洁脱俗。

[5] 沾衣晨露浸饿身，即晨露沾衣浸饿身，早晨的露水浸湿了衣服和饥饿的身躯。这里写他们求学的艰辛，含有向刘翰林求助的意思。

五言诗·玉潭即景[1]联句

（1917年）

云封狮固[2]楼，
桥锁玉潭舟[3]。

---

[1] 玉潭，即玉潭河，在湖南宁乡城郊。即景，眼前景物，后因称以眼前景物为题材的诗为即景诗。

[2] 云封，指云气遮蔽。狮固，即狮固山，是宁乡县东北3里的一座小山。

[3] 桥，指宁乡县城郊玉潭河上的一座小桥。桥锁玉潭舟，意思是说，玉潭河中，许多船停泊在桥边，像是被桥锁住一样。

四言诗·露宿[1]

（1917年）

沙滩为床，
石头当枕。
蓝天为帐，
月光为灯。

---

[1] 露宿，是毛泽东青年时坚持奉行的一种锻炼体魄的方法。1917年夏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徒步考察长沙五县。这是毛泽东在考察过程中露宿野外时吟成的诗。

四言诗·题安化北宝塔壁[1]

（1917年）

洢水拖蓝[2]，
紫云[3]反照；
铜钟滴水[4]，
梅岭寒[5]泉。

---

[1] 安化北宝塔，建于明清时期，高7层，雄踞山头，巍然壮观，因建在环绕县城的洢水之北，故称北宝塔。这首诗四句指安化四景：每逢雨后，洢水特别清沏；紫云山有巨石如镜，阳光可反射照到县城；劝学所的铜壶滴漏计时器，滴水有声；梅子岭下有泉水，清爽可口。

[2] 洢水，发源于湖南省安化县西錾字岩，东南流经安化县南折流向北，后注于资水。洢水拖蓝，唐代白居易《忆江南》词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句。

[3] 紫云，指安化县城附近的紫云山。

[4] 铜钟滴水，又名铜壶滴漏、铜壶刻漏，是我国古代一种计时的仪器。唐代温庭筠《鸡鸣埭歌》：“铜壶漏断梦初觉，宝马尘高人未知。”

[5] 梅岭，指安化县城附近的梅子岭。寒，这里是清凉之意。

七古[1]·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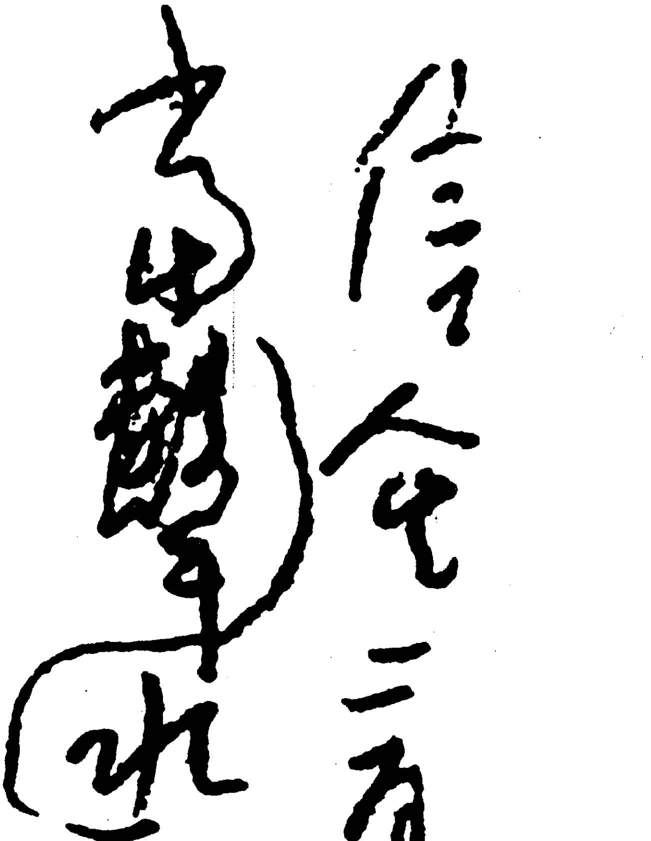
（1917年）

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2]三千里。

---

[1] 七古，七言古诗的简称。

[2] 会当，定当。水击，即击水，拍打着水，这里指游泳。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手书《七古·游泳》。

五律·赠周世钊[1]

（1917年）

侯季多肝胆，
刘卢自辛苦。

---

[1]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曾写过一首五律赠给周世钊。这是周世钊生前回忆其中的一联，其余的都忘了。

四言诗·奋斗

（1917年）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病故同学追悼会联[1]

（1917年）

为何死了七个同学？

只因不习十分间操[2]！

---

[1] 1917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有7名同学先后病逝。进步师生对学校不重视体育课程，连每天上午10分钟的课间操也不能保证极为不满。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撰写并贴出了这副挽联，意在唤起师生记取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沉痛教训。

[2] 十分间操，指10分钟的课间体操。

挽某同学联[1]

（1917年）

与其苟且偷生[2]，生无足道[3]；
非为奋斗而死，死有余哀[4]。

---

[1] 1917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某一位同学逝世，毛泽东写了这副挽联。某同学，不详。

[2] 苟且偷生，得过且过，贪图眼前安逸，勉勉强强地活着。宋代王令《与杜子长书》："令贫无资，身术从礼，有责不敢易。受寒饿死，惧辱先人后，故苟且偷生。"

[3] 生无足道，活着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

[4] 死有余哀，即使死了，还有不尽的哀伤。

心之力

（1917年）

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细微至发梢，宏大至天地。世界、宇宙乃至万物皆为思维心力所驱使。博古观今，尤知人类之所以为世间万物之灵长，实为天地间心力最致力于进化者也。夫中华悠悠古国，人文始祖，之所以为万国文明正义道德之始作俑者，实为尘世诸国中最致力于人类自身与天地万物间精神相互养塑者也。盖神州中华，之所以为地球文明之发祥渊源，实为诸人种之最致力于人与社会与天地间公德、良知依存共和之道者也。古中华先贤道法自然，文武兼备，运筹天下，何等的挥洒自如，何等的英杰伟伦。然天妒英杰，愚昧丛生，国人于邪魔强盗阴险心力渗透、攻击治下，渐渐失忆，泱泱中华众生却败于甘愿自卑沉沦、散弱。

有德者心力难济，无德者霸拥民众所赋世权以为私势，神器私用，贪腐国贼举家富贵，万众民脂民膏皆被劫掠。则国力日衰，国力衰则国家民族之心力衰竭，内可诱发天灾兵祸，朝代更迭，官僚、商贾、农工、学者尽难免沉沦；外可诱引强盗来犯，到头来看，国贼、汉奸、军民、学生均家破人亡。近年甲午海战，八国联军……不平等诸般条约引狼入室，资敌来犯，实为召唤、鼓励诸多蛮夷强盗分食华夏之举。与蛮夷通商者使洋货泛滥，居高居奇，国人尽被盘剥，泱泱中华竟无力生产民众生活诸品。多年来世界强盗

在中国多有斩获，故恶敌觊觎长存、亡我之心不死。太多国耻未雪，蛮夷、豺狼、凶魔纷沓而至，国民皆因腐败汉奸、军阀、买办所欠洋人无尽之亡国债务而自危。国债深陷，物价飞涨，民众食宿艰难，灾厄连连，何日可止？今满清鞑虏虽败，可恨国、政、经济均被愚昧独夫、洋奴把持，国民心力沉疴羸弱，蛮夷恶敌肆意分割、吞并华夏，万民为奴，国资殆尽。

若欲救民治国，虽百废待兴，惟有自强国民心力之道乃首要谋划，然民众思维心力变新、强健者是为首要之捷径！

心力变新、强健者首应破除封建、官僚之愚昧邪道，惩治卖国、汉奸、洋买办之洋奴愚众，明戒不义浮财绝善终。以国家民族之新生心力志向缔造世界仁德勇武文明之新学，新学为思想理论之基石、栋梁，新学不兴，御敌难成。

中华古国之敌皆为西方邪恶之魔盗与汉奸，万勿混淆。

力主洋务借鉴“师夷之长以制夷”之道，尽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者其性必恶”之祖训。留学列强之同胞须警惕邪魔强盗对我正义灵魂之误导、侵扰，则各类洋奴、汉奸将无处安身，中华栋梁亦生自主自强之睿智。开设抗御蛮夷强盗杀戮预防国策，弘扬神州民众自强富国雄军壮志，恤农商并滋养工业。为抗击西方蛮夷列强剿灭中华神圣传承之奸计，执履行万国大同目标之正义道德教化优靖之使命。

夫闻“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志者，心力者也。民之志首推举国民众个性之天然强健，则国家栋梁层出不穷。数百年外侮内斗中民众个性屡被君主官僚残害之重弊，举国凡有压抑个人、违背国民个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国三纲所在必去，愚民愚治尽除，方有优塑民众强盛希冀。

自中国开埠以来，封建、洋务祸国殃民，究其缘由，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卖国贼四者，同为天下恶魔强盗者也。

四贼之中，尤以执掌政权之官僚最为紧要！盖国之神圣重器以民为先，决不可助长恶私贪欲窃为己用！国之中枢如有愚昧肤浅肖小之徒窃而居之，则外魔必侵，国民必衰亡。

自满清鞑虏洋务运动之后，贪墨腐败家族皆以盗取、盘剥民脂民膏逃逸海外为家族享乐之诡计。假以时日，神州中华亿民之血肉、骨髓乃至福祉将被尽数剥夺转送西方魔盗！国人如寒冬之时又堕深渊，农业落后之国民众必将沦落为亡国之奴。今无人于海内查处、治罪，于海外统计、堵截，故国贼趋之若骛。吾辈倘若不能惩戒，又与国贼、禽兽何异？

千古圣人，教化为根。我辈恰逢此乱象当前之世，人皆逐物欲而迷心，循末节而忘真，醉娱乐轻国志，谋小私绝大利，认蛮夷做乃父，拜魔盗为师尊，毁文明于无耻。你我何必苟且偷生，熟视无睹？有志者呼吸难畅，应以天下为己任。

今愚者忘本堕渊，竟争先自掘其坟，却不思危亡之计。苟活于当下，遗失神圣之使命，忘却民族之重任；背离于真理，违逆人本之慧根，蔑毁先民之道德；醉心于享乐，不知当世之惊变，甘当媚外之洋奴；沉迷于自我，罔顾危机之四伏，轻信魔盗之谗言！故西方强盗可肆意侵杀、奴役中华。

普看当今，世界格局风云激荡，人类文明之前途扑朔渺茫，天下苍生之幸福岌岌可危。虽有科技带来物质之充足，仍难满人欲之巨壑，各派皆为私利而竟相奔走，人人皆被牵入滚滚洪流。强盗流氓制定裁决世界法律，邪恶魔鬼公然成为人间领袖，万国不思兴道义之师，竟全然拜魔盗为导师，此星球之一草一木万物生灵涂炭、

灭绝之期不远矣。

虽有智者、勇者愿做中流之砥柱，却犹如闹市之人语，瀑下之鱼鸣。请问周边，还有几人执著于真理？还有几人探求于本源？一句开心就好，便甘愿随波逐流；一句事不关己，便通行四海愚夫；一句莫谈国是，便据民权为私器。孰不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试问为天地立心何以立？为生民立命何以立？为往圣继绝学何以继？为万世开太平何以开？若我辈之人此心已无，则中华即将亡亦！中华亡则人类必亡亦！

天之力莫大于日，地之力莫大于电，人之力莫大于心。阳气发处，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换代，为民谋福，惩治贪墨汉奸，又有何难！苟其公忠体国，百折不回，虽布衣下士，未始无转移世运之能也。有志之士可不勉哉！人生于天地之间，形而下者曰真心实性。血肉者物质之所成，心性者先天地之所生。故而有唯物唯心之论说。人活于世间，血肉乃器具，心性为主使，神志为天道。血肉现生灭之相，心性存不变之质，一切有灵生命皆与此理不悖。盖古今所有文明之真相，皆发于心性而成于物质。德政、文学、艺术、器物乃至个人所作所为均为愿、欲、情等驱使所生。

故个人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生活，团体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事业，国家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文明，众生有何心性即外表为其业力果报。故心为形成世间器物之原力，佛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西方强盗宗教亦有旧约主神虐民之邪暴，后有耶稣新约爱民之改良。神魔心性之变幻如此，故世人多为耶稣所迷。耶稣明之故说忏悔，懂耻而不恶；孔子明之故说修心，知止而不怠；释迦明之故说三乘，明心而不愚；老子明之故说无为，清静而不私。心为万力之本，由内向外则可生善、可生恶、可创造、可破坏，由外向

内则可染污、可牵引、可顺受、可违逆。修之以正则可造化众生，修之以邪则能涂炭生灵。心之伟力如斯，国士者不可不察。

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大如大风之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

故当世青年之责任，在承前启后继古圣百家之所长，开放胸怀融东西文明之精粹，精研奇巧技器胜列强之产业，与时俱进应当世时局之变幻，解放思想创一代精神之文明。破教派之桎梏，汇科学之精华，树强国之楷模。正本清源，布真理于天下！愿与志同道合，追求济世、救世真理者携手共进，发此弘愿，世世不辍，贡献身心，护持正义道德。

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戒海内贪腐之国贼，惩海外汉奸之子嗣；养万民农林之福祉，兴大国工业之格局；开仁武世界之先河，灭魔盗国际之基石；创中华新纪之强国，造国民千秋之福祉；兴神州万代之盛世，开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为不可。

《伦理学原理》批注[1]

（1917年至1918年）

序 论

（一）伦理学之概念。

---

[1] 《伦理学原理》，为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泡尔生出生于施勒斯维兰根荷恩，1871年毕业于柏林大学，4年后任柏林大学教授。其哲学观点是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和欲望。1900年，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伦理学体系》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冠以《伦理学原理》之名出版，《序论》仍用原名，《伦理学原理》改称《本论》。1910年蔡元培将日译本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杨昌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讲授修身课时，曾将此书作为教材。毛泽东在听课和阅读该书的过程中，作了大量批注。这些批注的内容，有的是提要，有的是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态度，而大量的则是结合书中有关论述发挥自己的见解。此书后来被毛泽东在一师初期的同学杨韶华借去，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才归还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原文未注明写作时间。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讲授《伦理学原理》的时间是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故推测批注也大致写于这段时间。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时，不仅写有大量批注，而且画了圈点等多种符号。批注散见于原书各页上下左右的空白处及行间，为了排版和阅读方便，收入本集时，将批注按顺序排在每页的左侧，同时将批注涉及的《伦理学原理》的原译文，排在每页的右侧，以便对照阅读研究。

（二）科学统系中伦理学之位置。科学有二别：一主理论者，二主实践者。前者谓之学，后者谓之术；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

此言伦理学属于术。

由是观之，伦理学之属于术，无疑矣。盖伦理学者，所以示人之生活必如何而后能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故伦理学者，位于诸术之上，而广言之，直可以包含诸术。何则？凡所谓术者，皆人所资以达其完全之生活者也，自商工业以至教育政治，何一不然。故虽谓诸术皆隶属于伦理学，而悉为伦理学之一部，殆无不可也。

此言术与学之关系。

凡术皆以学为基，盖应用学理以解释其所实践之条目者也。而伦理学之所基，则为人类学及心理学。盖伦理学之鹄，在豫定人类性质及人生规则之知识，而用以解释人类全体及各人之生活及行为，如何则有助于人性之发展，如何则反益其障碍。此其关系，得以他术比例而明之。……医术者本人身之知识，而用以发展人身之生活，使达于康强。伦理学者，本人性全部之知识，而尤注重于其关乎精神关乎社会之两部，用以发展人类种种之生活，使达于完全。故伦理学者，可谓之完全之卫生术。不惟医术，即其他教育政治诸术，亦可视为伦理学之一部分，或视为辅助之

术焉。创设伦理学之雅里士多德勒[1]，其见解亦若是也。

此言术不得为新科学。

术与学之区别如此，而不得以术为独立之新科学。何则？科学所以研究事物之性质，而事物之变化，由人力所生者，不得径视为性质之一部也。惟科学之书，亦时得附记其应用之术。如著物理学者，于蒸气理论后，附记气机之作用。此以技术为学说之余论，固甚当也。

此言学皆起于实践问题，故皆范于伦理学。

使人类之本体，属于学理之一方面，则吾人研究学理而已足。而其实不然，所谓本体者，乃属于实践之方面也。凡实践问题，其发生常在学理问题之前，而尤为重要。所谓科学者，率由求实践问题之解释而后起。……然则谓一切哲学之原因及归宿，悉隶于伦理学焉可也。[第1～3页]

此言吾人之知识有二种。

演绎法归纳法。

（四）伦理学之研究法。吾人之知识，可别为二种：一曰得之于经验者，二曰得之于直觉者。直觉之知识，可以数学为模型。盖先立单元，而演绎之以为种种之公例，以论理证明之。据思想中之原理，而指示其必然之因果者也。经验之知识，则反是。若物理学，若化学，必先观察事物之状态，求得其自然相应之规律，而后敢

---

[1] 雅里士多德勒，今译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最早采用“伦理学”一词来表示关于德行的学说，并把它看作与关于世界的“纯粹理论”知识不同的“实践哲学”。

揭以为普通之法式，因果律是也。其所揭之法式，所以可据者，由其非以论理之法，结合于豫想之定义，而实诉合于观察所得之因果也。

此言研究伦理学由经验。

伦理学之研究法，不类数学，而类于理化学，余之所不疑也。盖伦理学者，非由概念而演绎之以为定义，实由经验而确指其事实之关联者。……[第4页]

此举直觉论者之说。

孟轲之义内，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为直觉论[1]。

持直觉论[1]者，以伦理学为无关于经验之知识，以为设道德之条目者，不可以恃经验，且亦无待乎经验焉。伦理学中之命令，出于人类之良心，是即天命之性，本具有立法决事之能力者也。且为之说曰，凡人屏除一切经验，而尚有善恶之观念者，事实也。何者为利，何者为害，诚待经验而后知。而何者为善，何者为恶，则于未经验之前，固已知之。是故人之实际行事，与其行事时各种因果关联之观念，决不能于其直觉之知识，有所增损焉。

殊未必然。

此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先，故道德哲学

直觉论者之说如此，然核之于实际，则人类非以判别善恶之故，而有待于道德哲学。所谓道德者，夙已先道德哲学而发见，苟其初无所谓道

---

[1] 直觉论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派观点，认为对于原始的道德范畴（如善、价值、义务等），无法用理性或经验观察证明它的存在，而只能通过心理体验、直觉意识到它。《孟子·告子》篇记载，孟子反对告子关于“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王守仁则认为“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书诸阳卷》）

之成，成于经验，下更畅发之。

德，则决不能有道德哲学。以道德哲学，必以现在之积极道德管理吾人之生涯及意志者，为其思考之对象而后能建设也。吾人内有其心，诚若有何事当行何事不当行之命令，于是命之曰良心。……[第5页]

善恶生于利害，利害生于快苦，快苦生于生死，生死生于成毁，成毁生于吸拒，吸拒生于小大，小大生于有无，有无生于心理。

此二段言道德起于道德哲学之前。

吾人不待道德哲学之发明，而始能判别善恶，犹之不待卫生术之发明，而始能摄养身体也。当医术未作以前，饥者求食，寒者求衣，业已足以自存。使有询以何故食能疗饥衣能疗寒者，其人必大诧异。如询今之小学生徒以欺诈窃盗何故不可为也，彼以为此等人人能解之事，曾何足深求云尔。取自昔人不屑深求之事，以为问题而研究之，由是科学作焉。……

科学之起原。

社会之构成由良能[1]。

道德哲学亦然，当其未发见也，固已有不思而得之道德，为众所公认。盖社会之生活，如身体然，亦有由良能之指导，而无俟乎科学者。此其良能，即所以综合各种生活而构成社会者也。且道德之规则，亦若有不可思议之命令，临于吾人意识之上，与卫生规则无异。例如毋杀人，毋

---

[1] 良能，参见《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

此等处吾不认为良心，认为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

盗窃，毋欺诬，皆良心中无上之命令，有不必叩其原因之何在，而自不能不遵者。与饥而求食，寒而求衣，无以异也。[第6页]

此言道德哲学之本职。

然则所谓道德哲学者，将不过缀集良心中各种积极或消极之命令，而不能谓之为科学乎。曰：否，否，不然。凡自然道德，常萌芽其真理，以寓于俚谚之中。例如杖莫如信[1]之类是也。夫杖莫如信之言，非命令也，而其中确含真理。若解析而言之，曰汝必守信。汝知杖之可恃，而不知信之可恃乃过之乎，则真理显矣。本此等自然道德所含之真理而发挥之，以论定各种行为之得失，是则道德哲学之本职也。[第7页]

……道德哲学，既因自然道德以为基，则亦从而扩充之，一行为也。既示其可否矣，而又为之规定其行止之界域，如指示欺诈之不可为，而又指示以不能不用欺诈之事是也。且自然道德，于事物错综之际，恒不免多歧，必其人谙练有素，而判决始能屡中。道德哲学，为规定一切谙

以上论伦理

---

[1] 杖莫如信，据《左传·襄公八年》记载，楚子囊伐郑，讨其侵蔡。子驷等欲从楚，子展（即公孙舍之）等欲待晋。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舍之闻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晋，不亦可乎？”

学之研究法系经验的，非直觉的。

练之法则，于是临事者虽亦不能不本语练以为判决，而较之自然道德，则津涯较著矣。

以下另提出问题。

语练之规则，德论及义务论之职分也。凡德论及义务论之条目，无不指正鹄而综因果，即所谓欲达某某正鹄者，不可不有某某动作是也。然此正鹄与吾人知识之关系果如何乎？伦理学者何自而得此具足生活之意识乎？又何以证明至善规则之必无谬误乎？

此二段言正鹄[1]与知识无关，而独关系于感情与意志。

一及此等问题，而持论不能无稍异。盖吾人所以决定至善之性质者，非悟性之职分，而实意志之职分也。吾人常若有具足生活之理想，涌现目前，而又无思无虑，直认为无尚之正鹄。此等理想，虽明现于意识之域，然必非得之于悟性，而实出于吾人本体之映象也。有人于此，其思想与我大异，我欲匡其谬误，而论理之法则，事变之经验，俱不足以动之，乃表我无尚之理想，以动其感情，而其人或翻然自悟。当此之时，其所以核定理想之价值者，不在其人之悟性，而全由意志之力也。盖悟性者，所以核真伪而非所以别善恶也。

此言至善理想之决定于人

至善理想之所以为最溥博最正当者，势不能以科学之法则论证之，所可得论证者，恃人类意

---

[1] 正鹄，语出《中庸》第十四章：“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朱熹注释：“画布曰正，栖皮曰鹄，皆侯之中，射之的也。”故正鹄即目的之意。

人，由于人类有同一意向。

不能以科学之法论证至善理想。

志有同一确定之方向而已。人类之能力，及其生活之规则，互相类似，故常有一种程度，可以互相忖度。如同一程度之下等动物，其欲望互相类似也，而研究是等意向者，属于自然史。自然史之职分，在即人类全体所以实现其至善之理想者，而发见其普通之法式。方伦理学者之为此也悖乃遂无异于治生物学。盖其职分，不在于施命令于人类之意向，惟发见之而已。果能发见人类普通之意向，则其间偶有一二与众人意向大五者，势不得不视为变例。……[第7～9页]

此言自然律有广狭二义。

（五）道德律与自然律之比较。吾人见自然界各种现象，常循有定之规则而变化，于是立一通普之法式以表之，是为自然律。自然律有广狭二义。以狭义言之，有是因必有是果，物无可以自遁者。……以广义言之，其法式虽足以范围万物，而亦不保其无一二端之出入。……[第10页]

此言道德亦广义之自然律。

由是观之，道德律者，亦未尝不可谓之自然律。盖伦理学之法式，大抵即人类生活之状态，而表明其有何等行为，则常有何等影响者也。例如欺诬足以破信用，信用破则社会之交际将受其障害，是犹酒精之搅乱神经也。又如怠惰之习，足以蒙理性而弱意志，此亦循生理学之公例，以施于心理学者。故曰道德律者，亦广义之自然律也。或疑道德律所以明其当然，而非如自然律之

明其必然。然如勿欺诬之律，虽不免有一二变例，而究不失为普通之正式也。或又以道德律与法律有密切之关系，而自然律不然为疑。然道德律固关于法律，且纯正之法律，或不过道德律之一部分，而要不足以绝道德律与自然律之关系也。盖法律亦所以明其当然者，其间亦不免有一二变例。……[第10～11页]

此当字疑必字之误。

此言道德律亦如自然律之明其必然。

惟道德律亦若是，不徒明其当然，而且明其必然者也。……道德律之以因果律为基本，正与医术法学相同。苟因之与果，一人或一社会之动作与生涯，并无适合于自然律之关键，则道德律亦无由而存立。故道德律者非人所自造，亦非由神意及良心之无端而制定，实人类自有固结乎生涯而适合于自然律之一性质，藉道德律以表彰之耳。……[第11～12页]

此言文典[1]亦系明其必然。

道德律之所以为范畴也，以文典比例之而可知。文典者，普通之人所认为明其当然者也。然吾人试研究言语之历史，则知所谓文典者，非创设语法以示人，特表示言语所具之规则云尔。……故文典家欲叙述实际之言语，而得其普通之规则，不能不合种种之形式而有所取舍。又

---

[1] 文典，指官方颁布的词书，据1903年《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章程》：“文典以品汇中外音名，合通中外词意，集思广益，勒成官书为宗旨。”

不能不准诸常用者，及名人著作之受多数人信从者，以为可取之形式。于是此形式遂为标准，而文典遂为标准之科学。吾人于言语文章之正误，得标准文典以判定之，其间又有一大关系，则所以需此形式之正鹄是也。盖言语之正鹄，在使人了解。不合文典之言语，人不能了解，则不得不以为谬误而排斥之。

道德非命令的而为叙述的。

道德哲学亦然。常人每以道德哲学之职分，在以生活之规则命令吾人，而以人类学历史学之证据核之，则道德哲学之职分，初不在施如何行动如何判断之命令于吾人，实不过举实际之生活，而取其最普通之形式以叙述之耳。……[第12～13页]

只能以形式说明至善。

（六）具足之概念。前者，吾言道德之正鹄在至善，而至善即具足之生活。夫具足生活者何耶？盖谓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至高而无所歉然之谓也。此其实质之条目，当别论之，而兹先言其形式之关系。……兹所欲明者，即自形式以外别无可以说明至善之法是也。……[第13～14页]

具足生活非雷同，故伦理学只能立形式，而

盖人人为同状之具足生活，势所不能。苟有一民族焉，其间人人果有同一之具足生活，则意味索然。且其民族中之各人，性质同，生涯同，

而仅仅以某甲某乙为分别，亦复成何民族耶。故所谓人类具足之生活者，乃合各人各种之具足生活以成之，而非取其雷同者也。由是而欲明具足生活之实质，势不得不由人类之观念，而悉举其观念中所必不可缺之形式以充之。自一人而家族，而民族，各各因其若何之资性而发展其若何之生活，皆当罗举而无遗，此则历史哲学家之以建设为鹄者之职分也。然吾人即仅取历史中过去人物之生活，及种种民族之生活，而条举之以构成人类之观念，已不易能，况欲构成未来之历史与人类之新状态乎。[第14页]

不能立一实质之格以示后。

发达个性。

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

譬之美学，欲举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一切现象，与其将来应有之事，悉以美术之观念罗举之，世岂有能之者？盖美之实现，天才之事也。美学者取过去天才之所创造，而循迹以考之，其职分在泛论美术中必不可缺之条件。即此一端，在美学者虽不能列举美术现象以贻将来，而能使美术家得豫知必不可缺之条件而免于谬误。伦理学亦然，虽不能胪举将来具足生活之内容，而立普通法则以指明具足生活所必不可缺之条件，则亦使吾人各得以其特别之生活，准于所指示之条件，而免于违戾焉。

普通法则（具足生活所必不可缺之条件）。

（七）伦理学之普通形式。人类初无所谓普通之道德也，各民族所持以为普通之模范者，恒

以广义言之，人类无普通之道德。

康德之意见[1]。

吾国先儒之说亦然[2]。

自有其特殊之道德。如英国人与非洲人，各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彼其生活之状态现已不同，而道德亦随之以不同，固不可诬之事实也。惟其不同也，为当然乎，为必然乎，又不可以不辨。据昔贤之说，如康德辈，皆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苟道德可以因地而异，则将男之与女，美术家之与商人，亦将因其体性及职业之不同而各异其道德耶？答之曰，道德之因人而异也，诚然，然不必以此而有妨于具足生活之理想也。夫人类生活之状态，既各各不同，则其所以为生活之规则者，自不能不异。……[第 15 页]

以狭义言之，人类亦有普通之道德，惟直接应用时，须为之消息。

虽然，此以广义言之也，若以狭义言之，则虽谓人类本有普通之道德，亦未尝不可。盖人类之本质及其生活法则之基本，既已同一，则所以发展其康健之生活者，其纲纪自不得不同。故卫生术得设普通规则以示人，如饮食之种类及定

---

[1]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道德上的善恶和行为的是非标准是超经验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者运用理性所规定的道德法则是普遍适用的。即如批注旁原译文所说：“以为道德之本义，即在人类理性，必有其普通无异之实质。”康德企图确立普遍有效的道德形式，为一切道德和善恶立法。

[2] 先儒，指儒家先贤。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认为人初生时，本性上并无多大差别。孟子认为人初生就具有“仁义之心”，毛泽东当时认为，孔孟的这种人性论与“康德之意见”是一样的。

量，动静之节度，恒可为吾人所遵守。道德亦然，如思患而豫防，如幼稚之教育，如夫妇有别之制，如同类相残之禁，皆普通之规则也。有悖之者，其害立见。如杀人奸通盗窃诈伪之所以为恶，正直慈祥诚信之所以为善，亦其义也。由此等普通规则，而制为训诫，以直接应用于庶事，则必因其人资禀之异同，与夫平日生活状态之异同，而为之消息。……[第16页]

道德与时代俱异，而仍不失其为道德。

此并不难言下即言之矣。

由是观之，则夫时代既异，而道德亦不能不随之以异，不特其理至明，而其证亦至确也。惟道德何以必随时代而不同，既已随时代而不同，而又何以仍无失其为道德，此则虽圣哲犹难言之。夫常人之情，于古人已事，与今之道德不相容者，往往直斥为悖谬。读中世史，见基督教徒之仇异教也，常捕异教徒及巫觋之属而榜掠之，甚者杀之焚之，则无不极口诋諆者。夫淫刑以逞，诚蛮野矣。然在蛮野之时代，用蛮野之刑法，未为不可。且驱蛮野而进文明，或亦不可无此作用。向使无往昔酷虐之刑法，则中世都市，或未必能跻于今日复杂生活之社会也。……[第17页]

道德因社会而异，因人而异。

更进而论之，则虽一民族中之各社会、各人，亦不免各有其特别之道德。既有各种资性、各种生活状态，则必有各种摄卫身体之卫生术，而亦有各种摄卫精神之道德。或在此为益为要，

而在彼为无益为非要者，盖常有之。其在实际之决断亦然。同一行为也，或在此人则可，而在彼人则不可。若欲合无数之人而同其行为，世所不能有也。……吾人所见各人有大同之动作者，徒观其表耳，苟求其内情，则无一不具特性。夫内情者，人之本质也，其有特性也，正其所以为具足，而不得谓之缺陷。自伦理之本意，以渐消失，而接近于法律之范围，乃始有整齐画一之动作焉。

此理知之者少。

切论。

凡训诫道德之人，于各人之特性，宜视普通性为尤重。盖特性者，人之资禀及性癖所托，而普通法则未有顾及性癖者也。夫人者，各持其特别之资禀，以应外界之事物，各本其特别之性质，以与其在社会之地位相习，则常欲求有特别之道德，而于他人之判断，与其良心之源于最高道德之观察者，皆有格格不相入之势，此其至易见者。夫然，而康德之严格主义，最足以矫其枉。康德之主义，务使感官之意志，隶属于普通法则，此诚各人实现最高道德之肇端也。夫实现最高道德之事，得以基督教典之言形容之，盖不谓之法则之解释，而谓之适应也。然道德非以适应命人，观上文而可知。道德者，特指示普通法则而已。若本此法则而用以适应于特别之事，则各人之良心及知识所职也。然各人亦不免有待于指导，故必有训诫道德之人，犹之吾人之于卫生

此言各人必须训诫道德之人，而训诫之人须重视各人之特性。

此所以不要妄议论人。

康德之主义。

教育家。

术，亦不免有需于医生也。……[第 17～18 页]

此言道德哲学施行之限度。

然更端而观之，则道德哲学之规则，实有不能普及之征。盖所谓人类普通之道德，属于理性之实现者，虽人人可以想象之，而卒未能有实行之者也。道德哲学家之感觉及思想，不能蝉蜕于其民族其时代之外，而反不免为其所规定。其故有二：一则自其幼稚之时，取民族之理想以渐构为自己之理想者；二则彼其善恶之观念，终不能不受时代之制限。此为十八世纪之合理论者所未见及，故皆不免于误谬，即康德亦然。及十九世纪，为历史学时代，则未有置信于人类普通之道德者矣。是故道德哲学最适之范围，常被限于起此道德之文化，而不能超越乎其外。其道德家之明此界限与否，非所问也。道德哲学之职分，惟在为同一文化之同胞，指示其最宜之生活法式，以共进于康宁幸福之域而已矣。

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非在讲求。

（八）伦理学之所以为实践科学。问者曰，伦理学者，将不惟以其处置实践之方法，而又大有影响于实践之方面，故号为实践科学耶？曰然。伦理原始之本义，固如是。雅里士多德勒曰，伦理学之正鹄，在实践，而非在讲求也。……盖道德者，非概念所能构，而理性之所断也。道德之不可由教学而成，犹天才之不可由教学而得。故道德哲学之不能使人为高士、为君

此谓空言无益。

子、为神圣，亦犹美学之不能使人为大诗人，及雕塑绘画音乐诸名工也。

知识有助于意志。

然伦理学者，决不可以此而沮丧其意气。伦理学最要之职分，在贻人以关于行为之知识，即所谓何等之行为，必与其外界之事物及方向有何等关系，且于小己及社会之生活状态，有何等影响者也。夫人之知识，本皆有裨于其行为，夫伦理学之知识，何独不然。……人苟于怠惰、忿怒、轻率、猜忌、诈伪诸恶德，知其足以为生活之障碍，又于慎重、恭敬、节制、正直、亲睦诸吉德，知其足以裨生活之发展，安能无加损于其意志耶。夫意志固不能全决于知识，彼其资性、教育、习惯，及外界之成例，若毁誉，皆有左右意志之力。然知识之有助于意志，则亦未有能反对之者也。

伦理学示人生正鹄之所在，有裨于躬行。

伦理学之所以有裨于躬行，在能使吾人于人生正鹄之所在，不惟口说而实心领之也。不知康强之益者，虽有医师日说以卫生之术而无效。不知道义之乐者，虽有道德哲学家日聒以伦理之要，亦必无功。然使其一旦解悟，洞见人生正鹄之所在，则安知其不翻然悔改，遂去恶而从善耶？……[第 19～21 页]

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难者或又曰：道德哲学者，非特无益于躬行，而反贻之以危险。何则？人之由道德也，循良心及习惯之势力，而笃信之、服从之耳。必探

吾国二千年来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

此吾国今时之现象。

究其原本及意义及价值，则信仰之力杀矣。余曰：是又不然，凡探究之为，非生于哲学，而实为哲学所由生也。人之情虽欲避探究而不可得，如遇一行事、一判断，而欲辨其得失是非，势不能不探究其原理。道德哲学者，循此探究之趋向，而为之阐明其原理云尔。不宁惟是，阐明此等原理，在今日尤为当务之急。近今社会心理，日趋革新，几欲举往昔所持之天命主义而悉扫之。此其趋向，征之各种事物而无不然。如尼采[1]Nietzsche之说，欲尽革青年时代之见解；社会主义，欲悉改国家及社会之旧习，此其最铮铮者矣。当今之时，无论其为思想、为道德、为生活之法式，一切舍旧而谋新。至于宗教之权，与夫古昔之传说，人人视为弁髦。此由受太过之压制，忽反动而为怀疑派，其主观之思想，遂溃裂而四出。实往昔学而不思之学派，及有信仰而无诘难之教会，所激而成之，是为开放时代之特征。昔之开放时代，尚已，而今乃复见。其始袭于少年，今则渐波及于普通人民。彼等厌忌往昔

---

[1]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青年时代受叔本华“生活意志”的影响，把人看作一个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实体，对人生采取一种悲观、遁世的态度。成熟时期的尼采，则将叔本华的“生活意志”改造成“权力意志”，强调要“提高生命”“积极行动”。青年时代的尼采爱好音乐，赞赏音乐家瓦格纳，成熟时期的尼采则不满于瓦格纳颂扬基督教道德，斥其为“老朽狂妄的浪漫者”，并与之绝交，放弃了对音乐的爱好。

之思想及生活法式，为以盲导盲，必欲以其独立之意见，别辟世界。此实彼等自由之权利也。自由思想、自由生活，本人生第一之权利，而亦第一之义务也。盖精神界最贵之特权，固未有尚于自立者也，而自立之精神，在其思想之自由，而不倚于豫定之见。伦理学之问题，则所以使陷于怀疑派之人，得于生活之正鹄及职分，得一自由探究之基础而已矣。[第21～22页]

本论　导言

关乎纯理学及心理学者

此以感情属于意志。

（七）精神生活，亦有两方面，意志及知识是也。意志之动，为冲动、为感情。知识之动，为感觉、为知觉、为思惟。

…………

人莫不以自存为鹄。

（十）意志之进化有三级：一曰无意识之冲动，二曰感官之欲望，三曰理性之意志。而其意向，则通三级而以小己及种族之保存及进步为鹄者也。

此快不快之根原。

（十一）意志原始之形式，即无意识之冲动也。由无意识之冲动，而现于意识中，则为有意识之冲动。吾人若增进其生活之动作，而有以餍其冲动，则快感随之；若障碍其动作，而逆其冲动，则不快之感随之。[第24页]

论善恶之区别。

第一章　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

即善恶之区别以何为标准——一说只论动机，一说兼论效果。

（一）善恶之见解之别。伦理学之思想，何自生乎？曰：生于两问题。其一曰，道德价值之差别，其究竟之基本何在乎？其二曰，人生究竟之正鹄何谓乎？此两问题者，常诱掖富于思想之人，而使就伦理学之涂径者也。前之一问题，由于道德界判断之职能而出，后之一问题，则由执意及行为而起也。[第26页]

此二氏[1]之世界观。

目的。

方法。

……所谓伦理学开山柏拉图及雅里士多德勒之世界观，常得因正鹄之名而联想之。盖二氏之见解，以为一切实在，一切人类之在宇宙，各有其职分，是即其伦理学中根本之直觉。而伦理学之种种问题，要不外阐明此等职分，与夫由是而生之生活状态及生活动作也。[第27～28页]

此节意义已略见上节。

（二）正鹄论见解之意义及权利。世人普通之见解，多近于形式论，以为行为之善恶，不在其效果，而在其原本之性质。其在道德界价值之区别，亦观其意向，而不论其影响。如福音书所

---

[1] 二氏，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柏拉图的学生。曾跟随柏拉图学习20年，晚年创立了自己的学园。

载散马利亚[1]Samariter人之慈悲，其于被盗之旅人，不但不能救助，而反误害其生命，然而无损于道德之价值也。又有诽谤人者，或反以彰被诽谤者之懿行，而自丧其信用。其效果可为至良，而诽谤之为恶德，不以是而变也。

此一节乃反复辩驳此一语。

余答之曰，事诚如是，然此不足以难正鹄论之考察法也。正鹄论所以判定特别行为之善恶者，不在其事实之效果，而在其行为之性质有可以生何等效果之倾向也。诽谤之性质，含有可以毁人信用及名誉之效果，即偶有效果相反，如上文所述者，此自有特别原因。如闻者之良心及慎重，及具有洞悉人情世故之知识，而决非诽谤之性质所固有，是即雅里士多德勒所谓诽谤者善果之偶因而非其真因也。故道德者，不在其事实之果效，而在其行为之性质所应有之果效也。[第28～29页]

著者重在客观质料之判断。

（三）主观形式之判断，与客观质料之判断。反对者或尚进而难余曰，事实决不如是，道德之判断，关乎意向，而不关乎行事。行事之动机善，则其意向之善可知也。盖其意向，苟发生于义务之意识，则内容及效果，皆可不问，如康德所谓自一切善意外，别无所谓善者，是也。[第30页]

---

[1] 散马利亚，今译撒马利亚，古代巴勒斯坦城名，以色列王国的首都。

此段发挥此二句。

前段言客观质料之判断有正鹄论之基础，此段又言主观形式之判断亦必归宿于正鹄论。

要而言之，即主观形式之判定，亦不能不归宿于正鹄论。盖行为之从良心而守义务者，谓之善，是主观形式论之中坚也。然何以从良心者为善乎？在人或以此为无谓之问题，而余谓不然。盖所以答此问题者，即从于良心之行为，乃客观方面之所谓善也。何则？良心之倾向，在规定吾人之行为，使吾人及其外界之安宁，皆赖此而有保持增进之效者也。人之性癖，虽不能无殊别，而良心则一民族中人人有同度之状，故行为之被规定于良心者，有适合普通规则之性质。不宁惟是，吾人良心之内容，悉由所属民族之积极道德，借教育、事例、清议以输入之者。而普通道德之内容，亦不外乎一民族或全文明社会之道德法律而已。据人类学家所考察之结论，凡所谓道德者，各人交际之良能，所以使其行为能维持小己及社会之生活者也。是故良心者，吾人以自己最深之生趣，及其所附属社会之生趣，规定吾人行为之原理云尔。吾当于第五章详言之。[第35页]

此节言非在至正当时正鹄到底不可神圣手段。

（四）正鹄与作用之关系。余将进而论至善之内容，先举反对派数说而答辩之，如下：

难者曰，正鹄论势力宗之原理，非即耶粹登Yesuit[1]（此为中世天主教之一派，盛行于西班

---

[1] 耶粹登，此处英文Yesuit应为Jesuit，即耶稣会。

牙，其略吕宋等地，皆由此派教徒之力，其言行颇有可斥者，今已废而不行）教徒所谓正鹄神圣作用之言乎。行为之价值，既视其效果，则夫各种之行为，不皆视其效果以为价值乎？余答之曰，耶粹登教徒之道德，所谓正鹄能神圣其作用者，本有二解。其一曰，正鹄既善，则无论为何等作用以达之，其作用无不为善也。果尔，则虽不正非义之事，无一不可以为善耶。

....

此特称命题并非谓凡杀人为恶。

……语意之矛盾。凡杀人欺诈等语，不惟指称客观中有意杀人、有意欺诈之事实，而并含有摈斥之意。故所谓杀人为恶者，分析之评判也，此其评判，又可以应用于法律、道德所不认为恶之杀人者也。而欲为纯粹之评判，则必于其杀人之语意中，去其摈斥之意，而专以客观中有意杀人之事实，为评判之对象。如是，则其中之可以为善者自见。……[第36～38页]

（六）略论利己主义。自道德哲学一方面观察之，亦可以补前说所未具。如曰意志所归宿之正鹄何耶，是亦不外乎小己及其他人类之安宁云尔。

亦有反对此说者，谓意志之性质，以小己之安宁为鹄，而非以普及之安宁为鹄。其言曰，人皆自求其愉快若利益耳，其有无损益于他人之安宁，殆非所顾也。由是意见而组成学说，是谓利

霍布士之说[1]。

己主义，亦谓之一人之功利主义。霍布士Hobbs者，于近世哲学之初纪，代表此说者也。其言曰，凡动物实际之意志，皆以自存为鹄，此自然律也。故有利于动物自体之实际者，善也；其利于其他之实际者，要亦间接自保之作用，是间接之善云尔。

此说终觉说不完满。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世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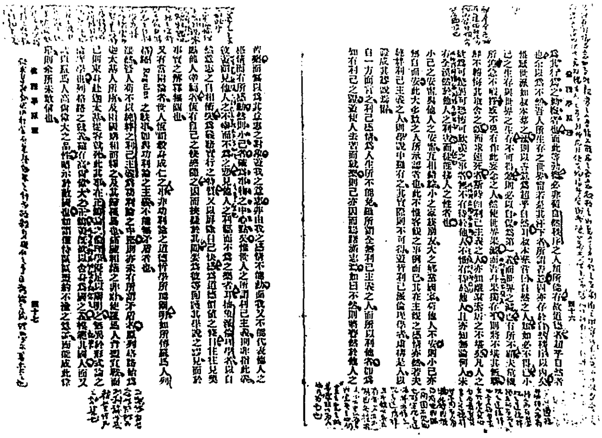
余以为是说也，苟欲以事实证明之，恒不免牵强附会。利己心之冲动，以自保为鹄，诚人生所不可少者。人亦未尝无偏重利己而无暇顾他人之休戚者，然无论何人，有但知一身之利害，而不知有他人之利害者乎？人恒有视其亲戚朋友之利害，若躬受之者。且吾人关切社会利害之情，固有显而易见者，如于卖国自利之人，无不愤激异常，是足以见其事与吾人之良知，固绝不相容者矣。吾故曰，人之意志，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而安宁之属于小己者与属于他人者，其间错综最甚，无论何事，殆未有不两两相关者。故所谓博爱家者，乃偏重利他主义之人，而所谓自利派者，亦不过偏重利己主义之人耳。[第44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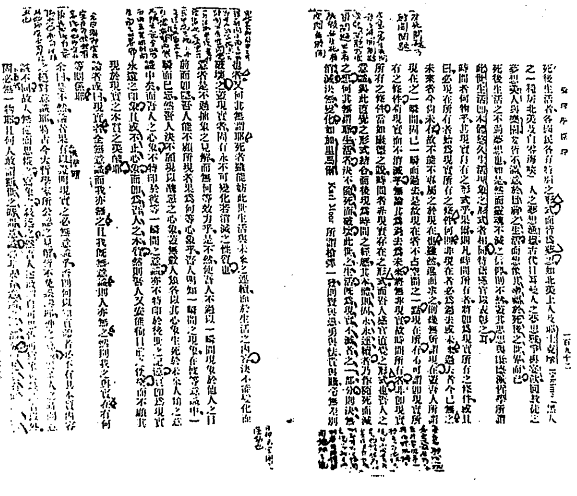
[1]　霍布士，今译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他认为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是“自我保存”，人们出于利己心，在自然状态下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而道德只是人类理性为了结束像狼群一样的争斗而提出的和平条件。

从他而起点者也，世无绝然与我无关而我贸然利之者也。果如其说，则“个人之人格”“自律”“自由”诸义亦说不去。盖诸义固亦高尚之利己而精神之利己也。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

在这一段译文中“以小己及他人之安宁为鹄”一句旁批：终以小己为先。



毛泽东写在《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上的批注（部分）。



毛泽东写在《伦理学原理》（泡尔生著）上的批注（部分）。

吾人意识之中，小己之刺激与社会之刺激，利己之感情与利他之感情，常杂然而并存。故人者，非能离群而索居者也，必列于全社会之一体，而后可以生存，此生物学界昭著之事实也。生物学界客观之事例，发现于心理学之主观界，而为意志及感情之构造。不观动物乎，其自存之冲动，固已与保存种族之冲动并存矣。[第45页]

此事实诚然，然不可言并当言先后。动物固以自存之冲动为先，以保存种族之冲动为后，动物在其幼时无所谓保存种族之冲动也。嗟乎！吾于此有深感焉，即世借利他之名而行其利己之实者之多是也。真者，善也；伪者，恶也，实行利己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

名而行利己之实者，则大伪也。由利己而放开之至于利人类之大己，利生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人己并举则次序不明，易致假利他之名而行利己之实，无由而达到最大之利己也。予思吾儒家之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1]之言，“先修身

---

[1] 参见《礼记·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而后平天下”[1]，“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2]可以见之。

兼爱之说[3]非利他主义也，言兼爱则有我在内，以爱我者而普爱天下之人云耳。

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无起点，失却本位。

如此说正足证明自利主义。

动物进化而为人类，则保存种族之冲动，益以强大。凡人无不自认为全社会之一体，无不自认为属于家族若社会若国民者也，故人恒以社会之正鹄为小己之正鹄。诚知小己之利害，与社会之利害，互相错综，而无由界别也，由是吾人意

---

[1] 参见《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2] 参见《孟子·尽心上》：“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3] 兼爱之说，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子（约前468—前376）的政治主张。见《墨子·兼爱上》：“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己身，犹有不孝者乎？”

志之正鹄，可谓之小己与社会公共之安宁，亦可谓之社会安宁中所赅之小己安宁也。夫世界诚亦有全无利他感情之人，于旁人之利害，熟视无睹，甚且有以他人之苦痛为乐者，然不足以摇动吾说。是犹人类有理性有言语之公理，决不以世界偶有颠狂之人，而遂为之摇动也。人之无利他感情者，为伦理学之畸人，亦犹颠狂之人。在医学及人类学为畸人云尔。

诚然，诚然。

除疯病者决无有此等人。

未必不爱其妻与其父母。狮虎犹有之，何况人乎?

……所谓善意，固亦存于自然秩序以内矣。惟厌世派如叔本华之流，则以善意为超乎自然耳。叔本华尝曰，自然之人类，如必不得已，小己之生存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以自保为第一义，而世界之灭亡，有所不顾。夫危机所迫，急不暇择，或不免有作此妄念之人。

然使世界果灭，而吾身果独有乎?则将不堪其无聊，鲜不转悔其取舍之误，而求速死者。斯时即利己主义之人，亦知离群索居之不堪矣。凡人之欲为可惊异可恐怖可欣羡之事者，无不有待于他人。不惟有待于他人，且亦知无论何人，未有全漠然于他人之利害，而徒能拂人之性者也。[第45～46页]

此仍是推己及人。

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

此所谓互助，然互助之底

所以成己也。

此所谓同情，然同情者由我而起也。

叔本华[1]之说，吾亦不谓然。此有二点：一点，自然之人类有利己而已，又小己与世界之生存不可得兼，则必自保。予谓不然。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仍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自利之主要在利自己之精神，肉体无利

---

[1]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其伦理思想是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认为人是自私和卑贱的，利己的生存意志在相互争斗，生命即是战争。人要摆脱痛苦和罪恶，只有遁世绝欲，弃绝意志，达到佛之“涅槃”状态，才能最后解脱。

之之价值。利精『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一点，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道德非必待人而有，待人而有者客观之道德律，独立所有者主观

之道德律也。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故客观之道德律亦系主观之道德律。且即使世界止有我一人，亦不能因无损于人而不尽吾之性、完吾之心，仍必尽之完之。此等处非以为人也，乃以为己也。

…………

自一方面言之，利己感情，为人生所不能免，虽所谓全无利己主义之人，而所以利他者，即为知有利己之证。盖使人去苦而就乐，则己亦因而踌躇满志焉。如曰不然，则将瞢然于他人之苦乐，而无以为其意志之对象。盖我之意志，非由我之感情不能动，而我又不能代表他人之感情而有所感动。然则小己者，确为事物之中心点

此为最狭隘之利己主义，天下无如此之事实也。

叔本华之主义其如此乎？抽象派伦理学者所疑之说，未免与真际不合。义务之实行，何至必以自然意志之自相冲突为特质，以冲突为特质是以作伪为特质也。又以屏除自己快感为道德价值之条目，世岂〔有〕如此之道德乎？快感既已有矣，又安得而屏除之？此乃极端之利他主义之言。抽象派伦理学者举而疑之，与叔本华所谓必为利他始有道德

矣。惟世人之所谓利己主义，则非指此义。彼盖谓见他人之不幸而不为之悲，见他人之利福而不为之乐者耳。抽象派伦理学者，以自然意志之自相冲突，为义务实行之特质。又以屏除自己快感，为道德价值之条目，往往见奖励他人幸福者，恒有自己之快感随之，因而挟疑于其间，要为彼等回护其学说之谬见，而于事实之解释无关也。

之价值者，同为不知真正利己主义者也。

…………

虽然，吾人苟不以纯粹之利己主义，为功利论之中坚，则亦未有所谓矛盾者。原列格路始为迦太基人所虏，及两国媾和而释之，及其归罗马也，痛陈和议之非计，使罗马人背盟宣战，而己则束身赴迦太基，从容就死。此其事，在正鹄论之伦理学，优足以阐明之，无异于形式论之伦理学也。列格路之就义，确有高尚伟大之正鹄，盖既欲以舍身为国之义，模范其国人，而又欲以罗马人高尚伟大之品性，昭示于敌国也。如谓仅恃区区盟约不渝之意识，而能成此伟举，则余所未敢信也。

正鹄论，自昔学者恒称为功利论，以其较量行为之效果也。

此即其行为性质中所含之效果。

欲求某种效果，必行含有某种效果之行为，故杀身成仁之事，正鹄论之伦理学亦尊贵之也。

此语甚精。

且一切杀身成仁之事，亦皆含有保存小己之义，即所以保存其观念中之小己者也。彼列格路何尝不以生活为鹄，惟其所鹄者，非形质界之生活而精神界之生活耳。其效力国家，无论和战，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固以为非使罗马民族品

观此语始知泡氏亦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此个人主义乃为精神

的，可谓之精神之个人主义。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1]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或曰个人依团体而存，与团体之因个人而存其事相等，盖互相依存不可偏重

位崇高，名誉发扬，则己之职分固有所未尽焉，此其所以与罗马民族之名俱不朽于千载者也。

---

[1] 三纲，指我国封建社会中，根据上下、尊卑之序严格加以界定的三种伦理关系。汉代的《白虎通义》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也。是不然。事固先有个人而后有团体，个人离团体固不能独存，然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仍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个人有叛团体之事，团体无叛个人之事，以团体无意思也。且团体者仍个人，乃大个人也。人一身乃集许多小个体而成，社会乃集许多个人而成，国家乃集许多社会而成。当其散则多，及其成则一，故个人、社会、国家皆个人也，宇宙亦一个人也。故谓世无团体，只有个人，亦无不可。

（七）结论。凡人之动作苟自客观界言之，能增进人我之幸福，而有达于具足生活之倾向，自主观界言之，又有自尽其义务之意识，则道德界之所谓善也，反之则为邪恶。仅缺客观界之特质者谓之恶，而并缺主观界之特质者谓之邪。

数语乃泡尔生主义之真面目。

然在人类，则所谓善恶者，即以其客观界特质之有无为断，德与不德，亦由是而得以善恶种种之方面阐明之。盖人类生活之条目，既有种种，则其与之相当之意志力，必随之而复杂。德与不德之复杂，亦如之。

此处又使予怀疑。

固应主观客观皆满足而后谓之善也。

是故善之概念，乃豫想各事物中，有一可以为善之关系点而得之。人之恒言，于物品以适用者为善，于人则以能尽其职分者为善。例如善商、善吏、善父、善友云云者，谓其能尽商吏若父友之职分云尔。道德界亦然，所谓善者，即某事适当之谓，所谓善人，则能尽人类职分之人之谓。此皆即其关系之一点而言之也。是故以某事为善，并非域于某事，乃以其为全社会具足生活之一方面而善之。惟各种之行为，各种之道德，各种之人，皆各有其善之关系点，合此诸点而成为职分，能尽其职分而后谓之善人焉。

此关系点三字最为重要。

非某事之本体有超然之善，乃因其与生活有关系故云善。

于此，吾又有所感焉。某事某物之善与不善，乃人所随意

呼加，视其与人类生活『生』之关系如何而定也，并非指其本体之实。然则某事某物某行为之本体，未必恶者，人以其与生活有损坏之关系，而以恶呼之，岂不冤枉乎！

又有当附论者。人类之在道德界，各为全道德界之一体，则即各为至善之一部分。苟与不相关系之正鹄相对而言之，则至善之一部分，亦即我之正鹄也。惟德亦然。凡德各为善人之一方面，故与不相关系之正鹄相对而言之，则亦不但为外部之作用，而又为至善之一部分，即又为一种正鹄。是故道德之行为，既已实行，则亦不但为具此作用，而又可谓之达此正鹄矣。试以工艺品及诗歌证之。其中各部分，且为作用，且为正鹄。道德之各部分亦然，故无可专指为外部之作用者。然自最终之正鹄而言之，则工艺品也，诗歌也，道德也，皆在其全体，而各部之价值，则由其与全体之关系而得之者。如吾人读诗歌而知其一节之重要者，以其为全篇所不可缺是也。然则德与义务之所以重要，岂非以其于小己及全社

各人。

各德。

正鹄。

会之具足生活所不可缺者乎。

惟是吾人之动作，非必有此正鹄之关系于意识中，而始有道德之价值。如前文所述，老妇畏忌盗窃之事，彼徒以其背于基督第七戒耳，非有他理想也。然其事实，则䜣合善意。惟哲学家洞悉人类生活之规则，财产制度之重要者，亦无以过之。要之彼之所为，非由知识而由其良能，然其于道德之价值，固不以是而贬也。[第44～50页]

此义极精，可谓伦理学一大发明。

此处不免有奖励盲目道德之弊。现今之人所为善事，如修桥补路之类，无非盲目的道德也，道德之实行，固赖感情与意志，而其前必于此将实行之道德，有明判然之意识，而后此行为乃为自动的。若盲目之道德，固毫无价值也。

前段发明且为作用、且为正鹄之精神，足使人类之人生观意义为之一变。何则？从前之人，莫不以为事未至

最终之目的，即为无甚价值。因之在未达目的之前毫无生意，视其所行之一段路若废物焉。今知且为作用、且为正鹄，则无往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也，即死亦可也。

上所论乃高智之人之道德，虽然若普通之人，则多以良能行事亦足以完满其生活也。此良能乃祖先以来多代相传之经验，其始固有意识存乎其间，及其行之以已久，成为社会之习惯，在个人之脑筋中成为一种不假思索

脱然而出之反射运动，乃所谓良能也。

论正鹄者何。

第二章　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

…………

此处述学派甚明白。

此二种见解之对峙，自昔已然。通希腊全部哲学之中，无不见有对峙之历史。前者有基勒奈Kyrene派[1]及伊壁鸠鲁Epikuros派[2]，后者有拍〈柏〉拉图及雅里士多德勒之学风[3]，及包含斯多噶Stoiker派[4]。至近世而对峙之迹又显，一则为经验论之心理学派[5]，一则为十七、十八两世

---

[1] 基勒奈派，又称昔勒尼学派，克兰尼学派。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苏格拉底的弟子亚里斯提卜在北非昔勒尼创立的一个哲学伦理学派，主张快乐主义伦理原则。

[2] 伊壁鸠鲁派，为希腊晚期一种哲学派别，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创立的哲学伦理学派，是古希腊快乐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认为哲学的目的在于使人过快乐的生活。

[3]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不在肉体感性上的满足，而在精神的理性上的充实。

[4] 斯多噶派，又译廊下学派或斯多亚学派，公元前4世纪由塞浦路斯岛的芝诺创始于雅典的一个哲学伦理学派，主张禁欲主义。

[5] 经验论之心理学派，指17、18世纪培根、洛克、爱尔维修等经验主义哲学家及其学说。他们否定天赋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认为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产生于经验和习惯，强调幸福就是人感受到的最大快乐，善德在于追求快乐和幸福，而恶德在于损人和害己。

纪之合理论[1]及祖述康德之德意志哲学[2]也。前者所谓至善，在主观中快感之发生，而其快感何自而发生，则非其所计。后者所谓至善，则在一人及全社会之客观状态，而不及计快感之有无，但以为按之事实，主观中必有满足之念随之。

此言甚切。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抑其次也。

欲稔核快乐论之见解，有不可不注意者，即吾等之疑问，在快乐论之见解，果为真理与否，而不在其有无价值是也。学者证快乐论之不合真理，动以无价值为言久矣。而斯多噶哲学之格言，则又并快乐论及无神论为一谈而排斥之，是皆非坚确之证明也。学说之无价值，恒以其非真理故。若欲证其非真理，而以无价值为言，是颠倒之论也。况快乐主义之代表者，非无君子其人。伊壁鸠鲁一生纯洁而无疵，边沁[3]及穆勒[4]皆终身矻矻发见其实践之观察者也。

---

[1] 合理论，今一般通称为唯理论或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是笛卡尔、斯宾诺莎等人，认为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法则来源于先天的理性，强调人的理性动机是一切善恶的标准。

[2] 祖述康德之德意志哲学，指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以康德为创始人，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代表，其中还包括费希特、谢林等，通称德国古典哲学。它是对康德哲学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继承的结果。

[3] 边沁（1748—1832），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在伦理学上继承和改造洛克、爱尔维修等人的思想，全面地提出了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体系。

[4] 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维护和发挥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并第一次运用了“功利主义”这一名称。

论者何由而证明快乐之为至善乎？余揣其意，不外乎由人之天性言之，确见快乐为可贵之事实云尔。果如其说，则是伦理学者，不在立法家之地位，而仅有说明自然界之职分也。且人之天性自喜快乐，而非即以为至善，今乃谓不可不以是为至善，是何理耶？凡快乐论者之论证法，大率类是。彼等皆谓一切人类，一切生物，均常求快乐，凡求快去苦之事，即为人生最大之愿望，而其余一切事物，则不过人生求快去苦之作用而已。[第51～52页]

快乐论者以一切事物为求快去苦之作用。

……格代Goethe[1]（德之大诗家。笃信穆勒之说，谓凡人实行一事时，必以最大量之快感为准）之赋诗也，慕少艾也，游历也，研究自然科学及历史也，其皆以为得最大快感之作用乎？此其不合于条理也明矣。格代之性质中，自有一种之冲动及能力，借以促其发展及实行焉。此等冲动能力，直与植物萌芽中所包含者相同，方其发展而实行焉，自必有快感随之，然决非素有此等快感之正鹄，独存于写象之中，而其余一切事物，皆为其手段焉。盖冲动及其实行之欲望，皆在快乐写象未现以前，而快乐之写象必非先于发起快感之冲动而存立也。世间放肆怠慢之徒，非

此段直破快乐论之见解之非真理。

---

[1] 格代，今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

无先感于普通快乐之欲望，而后索其发生快乐之手段者。而康强之人，不如是也。

此与太公钓渭[1]之事仿佛。

……有一英人临水而钓鱼，一德人过之，曰，是水无鱼，奚钓为？英人从容答曰，余之钓，非欲鱼也，欲快乐耳。此英人者，诚超乎观念连合之涂，以快乐为鹄，而仅以鱼若钓为作用者矣。然其所谓欲快乐而不欲鱼者，果人人同此感情乎？余以为无论何人，闻此英人之言，盖未有不哑然失笑者，优足以证其所见之不同矣。以余观之，人之意志及欲望，决非以快乐为鹄，而尝鹄于其事实、苦行为、若状态之变化。盖事实之写象，虽尝有见于欲望之前者，而快乐之写象，则必不在意识之中，且由欲望而发生者，亦未有先于事实之写象者也。[第52～54页]

此谓先有某事实之观念，后乃发生向之之欲望。

写象即观念[2]。

于是快乐论者，稍变其说曰，快乐者，非写象界之鹄，而事实界之鹄也。事实之鹄，虽不现于意识，而其为鹄也如故。如机械之有锤，非外观者所见，而其力足以动机械也。饮食也，富贵

客观事实不过借以为诱导智

---

[1] 太公，指吕尚，姜姓，字子牙，俗称姜太公，相传周初在渭水钓鱼，用直钩而不设饵。明人叶良表《分金记·强徒夺节》中说：“自古道，‘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2] 写象，为当时翻译用语，有“反映”“印象”“观念”等义。杨昌济所译《西洋伦理学史》中有“此精神写自然界种种变化之象，恰如镜然”“观念（写象作用）”等说法。《伦理学原理》原译文中“事实之写象”“快乐之写象”中的“写象”，即有“观念”之意，故毛泽东说“写象即观念”。

力之口实，此论大奇。

也，名誉也，其现于意识也，虽若为最后之鹄，然不过借以为诱导知力之口实耳。而意志之正鹄，实惟快乐。彼夫慕少艾者，因事外出，而往往不知不觉，抵其所慕者之家，则大自诧，乃知前之因事外出者，其冲动之作用，所以防理性之障碍而饵之者耳。洵如是也，将快乐者，譬如意志中所慕之人，而意志则转借他事以欺理性乎。

此事实不多见。

反对吾说者，欲证明此说之不谬，则必吾人之一切事实，皆不达于所借为口实之鹄，而适达其素所欲望之鹄。如慕少艾者之借口于他事，而不知不觉，觅其所慕之人焉，是也。余以事实证之，而大不然。人之意志，恒达其所借口之鹄而止，不能达于根本之欲望也。贪者虽积资巨万，而其所豫期之快乐，渺不可得。热中者虽显贵，而患失之苦，或甚于患得。色欲者，传播种姓之饵也，当其满足，则欢乐竭而哀情多，此非其彰明较著者耶。

诚不然。

人不能达到根本之欲望，亦可谓之人不能达到根本之理想。人只能达到借以达于理想之事，及事达到，理想又高一层。故理想终不能达到，惟事能达到也。

……雅里士多德勒盖已于数千年前说明快乐及意志之关系矣。曰快乐，非正鹄也，现象也。当意志遂行之时，而随以一适当之现象，是为快乐。故快乐者，意志达其正鹄之记号云耳。吾人

知道或晓得。

所以认识意志之满足者，由快乐。而快乐论者，乃即以此认识为善，犹曰有价值者不在事物，而在其所有之价值；得满足者非在动力，而在其所有之满足，岂非同义而异语耶？

记号二字确，犹言报一信于意志，曰业已达到正鹄也。

快乐论者，亦或取消极之形式以为言曰，驱生物而使为正当之勤动者，非吾人写象之快乐，而在吾人所感之苦痛，即不满足之感是也。故吾人之勤动，以去苦痛为鹄。

取消极形式之快乐论者，谓驱人类而动作者，皆由于不满意，亦似有一面之理由。

余以为循此形式，亦足证快乐主义之不合于事实也。吾人果知有以苦痛若不满意为行为之动机者，如伤病则就医，闲局无事则求娱乐、希劳动，是也。然一切行为之动机，皆如是耶？借曰驱人类而动作者皆由于不满意，则夫格代之赋诗，都来Turer[1]之作画，其皆由于不满意耶？又如儿童之嬉戏，亦由于苦痛耶？余以为不然。意志之冲动，本无所谓苦痛也，冲动而不满足，于是乎苦痛生。人之由冲动而活动也，往往在苦痛未发之前。农夫之耕也，不待饥渴，彼见旭日之光，呼吸清晨之空气，则不觉负耜而赴田，此果

此等实非以痛苦为动机。

此两说：一说为逆态确定，一说为顺态确定。

---

[1] 都来，今译丢勒（1471—1528），文艺复兴时期德国著名的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建筑家。此处英文Turer为Dürer之误。

冲动而不满足，于是乎痛苦生。谓冲动由痛苦而生是倒果为因矣。

有何等苦痛乎？冲动与满足之间，有一物障碍焉，则苦痛之感生。否则何所谓苦痛，其希望满足之冲动，乃适以奋其愉快耳。

此段为此一篇之结论。

故余不信动作原因于感情之说，无论其为快乐，为苦痛也。自行为之本义言之，冲动及意志为第一义，感情为第二义。感情中之快乐，为意志达其正鹄时所生之现象，而苦痛者，意志不能达正鹄时所生之现象。是生物学家之定论，而余所将论述者也。[第54～57页]

（二）论人之冲动有以苦痛之动作为鹄者。

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

……举凡苦痛之原因，如一切危难，一切抵抗，一切失策，悉得而远避之，则所谓努力也，竞争也、冒险心也、战争之冲动也、喜胜而恶败也，皆由是而消灭。此自然之理也。然而吾人果得此无障碍之满足，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如常胜之游戏焉。夫弈者苟知每局必胜，则无乐乎对局。猎者苟知每射必获，则无乐乎从禽。彼初无觊觎利益之希望，而以弈猎为消遣者，正以其或胜或负，或得或否，不能预必耳，否则兴味索然矣。人之生活亦然……[第58页]

（三）以生物学之公例正快乐论之见解。

此为确论。

……生物学者曰，快乐者，所以诱导吾人，犹苦痛之警告吾人也。吾人由苦痛而知生活之所以被损，即由快乐而知生活之所以裨益，一则戒吾人以退避，而一则导吾人以进取。二者谓之认识善恶之原型可也。

意志若冲动，有不含情智之分子者。

意志若冲动，有不含情智之分子者。鸡雏出卵，即能啄粒，非必苦于饥而快于食。其所由发动者，殆如岩石下坠，水晶凝结，植物生长，悉由自然力之所规定。生殖机能之冲动亦然，在下等动物，初无所谓苦乐之感也。及生活之进化，而感情亦随而发展。自高等动物以至于人，殆无不含有特别之感情者。此其感情，即因其生活动作之或有障碍，或有裨益，而生苦痛若快乐之现象，是也。……

此总言，以下分言之。

精神之生活，以渐进化，则又由感情而生智力，智力之职分，在即感情所营之动作而更完美之，使意志知美恶之别，而有所取去是也。……

生物学者亦如此主张。

快感为渐达至善之征候，而持快乐论者，乃即以征候为正鹄。

是故生物学者，不以快乐为人生专一之正鹄，而以之与苦痛对待，同为向导意志之作用。意志者，借快感向导之力，营一种机能以促生活之进步。是则快感也者，渐达至善之征候云尔。而持快乐论者，乃即以征候为正鹄。试叩以苦痛之职何在，则未有不穷于置对者，快乐与苦痛，有不可离之关系，苦痛为避害之向导，其理甚明，然则快乐又宁非进取之向导耶。

且又有一种事实，自生物学界观之，有决不能持快乐主义以解释之者。即吾人之冲动既已餍足，则快乐亦随而止是也。醉饱以后，更进酒食，则有苦而无乐，惟其有刺激口舌之力，故苦痛为之稍杀。牝牡之欲亦然，间有以生殖机关为纵欲之具者，障碍疾痛，随之而起，若犹不觉悟，则鲜有不丧其机能而失其生命者。[第62～64页]

如持快乐论者之说，则快乐断无有终止之时。

（五）至善之积极义。余既排斥快乐论之说，乃即至善而规定其积极之义。盖余之意见，以为吾人之正鹄，苟以最普通之形式表明之，则在使吾人之生活机能为天资之基本者，动作于轨物之中而已。各种动物，无不欲营其适于天性之动作。盖现其天性于冲动，而因以规定其实行焉。惟人亦然。人也者，恒欲尽其精神之能力，以营夫原本至性发挥历史之生活。是故游戏也，学问也，劳力也，货殖也，占有也，享受也，建设也，创作也，皆人之所欲也。又如恋爱也，畏敬也，服从也，王治也，战争也，克捷也，诗歌也，梦寐也，思惟也，研究也，亦皆人之所欲也。凡其所欲，无非循生活自然进化之秩序而与之俱进者。人莫不欲有人伦之经验，是故有兄弟则欲与之为兄弟，有朋友则欲与之为朋友，有同僚则欲与之为同僚，在公民之间则欲与之为公民，遇仇敌则欲与之为仇敌。对于所爱，则欲为

此等皆所谓客观之生活内容。

此段可谓发挥尽致。

情人。对于妻、子，则欲为良夫、为慈父。务欲一切经验之，以维持其生活之内容，而又欲字育子女以继述之。苟其所经验者，事事合于轨范，而有以证其为正直之人，则始达人生之正鹄，没世而无憾矣。而究其所以为生活之内容者，乃无一不得自国民生活之历史。故吾人又得谓人间之意志，在以其人之标榜，表彰国民之生活，而又有以维持之发展之也。[第65～66页]

……人类之异于他生物者，惟能由动物自存之冲动，进而为观念自存之冲动而已。盖人类以下之动物，其所以为意志者，惟恃无意识之冲动，以规定其行为，而人类则能意识之。其正鹄之生活，必如何表彰，如何实行，而后成生活内容之模范，恒结为理想，而现于其心目之间。于是务实现其理想，本之以求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而定其价值焉。夫此等理想，在人

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1]，即此

---

[1] 梁任公，即梁启超，著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该文详细介绍了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鼓吹者颉德的观点："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彼尝言曰：'人群之进化，实由现在之利益与过去之制度相争，而后胜于前之结果也。'又曰：'国界必当尽破，世界必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于未来者也。虽然，彼其所根据者，仍在现在，彼盖欲以现在国家思想扩之于人类统一之全社会，未足真称为未来主义也。其在德国，有所谓唯物论者，有所谓国家主义者，有所谓保守党者，有所谓社会党者，要之悉皆以现在主义为基础而已。"

段之意。

简单之处。

起原之处。

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

予谓理想之本体亦有深浅。

精神发展，理想分化。

类诚亦万殊。希腊人与罗马人，斯巴达人与雅典人，各异其理想。男子与女子，军人与学者，农民与渔人，亦各异其理想。而即其模型之原本言之，则要归一致。如人类虽形貌万殊，而自解剖学生物学之模型观之，则无害为一致也。自精神之生活以渐发展，而理想亦以渐分化，随理想之分化而本之以实现者，亦益因人而殊。于是意识中表彰理想之直觉，各异其明昧之度，抵抗魔障奋追理想之能力，亦各异其强弱之度。然而人类无不有理想，且无不本其理想以为完成其本质发展其生活之动作，则无论何人，必不能不承认其事实也。

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

新理想。

……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之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管辖也。彼其完成本质、发展生活之动作之模型，既已发现，则自能制其故见，动其新思，而终实现于动作。试观十五世纪博爱主义之运动，非由于当时之生活理想乎？宗教改革[1]，

---

[1] 宗教改革，是16世纪欧洲新兴资产阶级通过宗教改革表现出来的反封建运动。1517年德国人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对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发动猛烈冲击。后来这个运动发展成为以路德为代表的温和派和以加尔文为代表的激进派。

生活理想。

非由于信仰基督教及构成新生活之理想乎？……是等事实，其所由贯彻历史之大业，与夫激动各人之意志，而使之一呼众应者，则皆人类新理想之势力为之也。

必如此以说明历史之生活，始近真理，始有价值。

于是吾人实现理想之鹄，常非杂以有所觊觎之观念者，其理至易明矣。国民有自由若势力若名誉之理想，而务实现之，必非杂以希图快乐若幸福之见。虽其理想实现之时，未尝无满足之感，而此等满足，果否为人类全体之最大快乐，固非其所计也。国民之有理想也，决不暇计其价值，为自由则争自由，为势力、为名誉则争势力、争名誉，其于幸福有几何之得失，非所计也。国民欲实现其理想，则直前勇往，举各人之利益生命以为牺牲，而各人亦愿牺牲其利益生命而无悔。即使各人未必无吝于牺牲之见，而既为国民之一分子，则必欲以身殉之。且也历史之判断，亦如历史之意志然。以此义标准，凡国民未有以快乐价值为标准，而自判断其过去之历史者，惟置其本质之观念于历史之人物及事变，而据之以定其价值。如吾人尚论腓立大王[1]Friedrich den grossen及其战事，决不以当时国民所得之苦乐如何为标准而断之，惟视其所得之名誉品位等诸内容，果否近

即前言。

---

[1] 腓立大王，即弗里德里希二世，又译腓特烈大帝，普鲁士国王（1740—1786）。在位期间，为维护封建农奴制统治，数度发动侵略战争。

于客观之正鹄。凡历史科学家之说亦然，彼诚知标准快乐之希望，决不可达也。惟哲学家，则有抱此希望者。然以吾所知，能达其希望者，盖无一人焉。

十三家九种[1]。

天性。

（六）历史之论据。凡余所论人类意志究竟之正鹄，与夫行为价值究竟之标准，皆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昔希腊之道德哲学家，夫既已发挥之。不惟此也，凡道德哲学，自快乐论外，殆无不合于此说者。柏拉图及雅里士多德勒之言曰，至善者，本质状态及生活动作之适合于观念者也。人类之幸福，在执持人类一切之道德而实习之。斯多噶哲学家亦曰，合于自然之生活，在以一切实体为意志之鹄。故吾人究竟之鹄，在合于理性之生活。而吾人营合于理性之生活，则即吾人之所以求安宁也。……[第66～69页]

即善良之行为。

（七）详论至善之积极义。论者或难曰，若是，则陷于循环论法之弊。前者不尝言道德之所以有价值，由其有裨于生活之发展乎？然则道德

---

[1] 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六）历史之论据”一节，为了论证关于“人类意志究竟之正鹄”与“行为价值之标准”的观点，列举了西方哲学史上13个哲学家或学派在这个问题上与他相似或相同的观点。在介绍过程中，他将这13个学者或学派分成9组，即：希腊道德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斯宾诺莎；舍夫茨别利、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诗来尔马哈（亦译修拉玛希、施莱尔马赫）；达尔文；约翰·穆勒。故毛泽东在批注中概括为“十三家九种”。

之实行，不过一种作用，而今胡又以此为究竟之正鹄也？

凡积极道德且为作用，且为正鹄。

答曰，然。余既已言之矣，凡有机体，其各部分，常为作用，而又同时即为其正鹄。以其为全体之一部也，如脏腑官骸，皆所以维持身体生活之机关，而同时即为身体之一部。身体者，非能外各种维持之机关而成立，此等机关之全体，即所以构成身体。故此等机关之活动，本为其维持生活之作用，而又同时即以此等机关之活动为其生活也。……吾人精神界之道德生活，本有机体也，其各种势力，各种机能，且为作用，且为正鹄。故各部之内容，皆各自有其无上之价值，然使其绝关系于全体，则无足道矣。……消极之道德，若不诈不盗不淫，以其对待于真理财产婚姻诸善之作用，而始有价值，其本体无所谓善也。若乃守真理、保权利、持家族秩序，是等积极之道德，则皆为圆满生活之一作用，而同时即为其内容之一部。是以各种德行之实行，若研究学问，若兴殖财产，若社会秩序，若家族生活，若子女教育，皆为生活之一作用，而同时于其内容亦为重要之部分也。[第71～72页]

消极道德对于圆满生活为间接。

消极道德之本体无所谓善。

人有贤愚，因之而有贵贱，殆亦即此理。

吾人更进而论之，一切之道德及动力，固既为作用，又为正鹄，而于此二者之间，乃不能无分量之差。生物之各机关，于其全体，关系有重

轻之别。剧有各出，于其全剧之中心点，有远近之别。道德生活之各机能，于其正鹄，亦有中边位置之别，或疏于正鹄而切于作用，或疏于作用而密于正鹄也。……[第72页]

此一段述进化论，精切详明。

凡后出之生物，必优于古代者，此天演学家、历史学家所几经考察而得此相同之结论者也。最下级之动物，对于外界，务求食而避害，以自全其生活之动作而已。以渐进化，而生殖之机能具，于是种族之爱情生。感官之感觉，进而为高级之智力，于是交际之生活，与知识之生活，始有基础。至于人类而交际及知识之生活发展最高焉。其发展也，为吾人本于记忆历史之能力而直接知之者，即进化史中一部分之内容，所谓人道史者也。人道之历史生活，所恃以为主要之内容者，一则吾人之所认识益广、益深，而益见其实际；一则吾人之交际益溥博，益密切也。而是二者之所由达，则在发展其理性及交际之道德。以理性认识事物，而示意志，以达其正鹄之方向。以交际之道德，营家族国家社会之交际，而后人生之本质所以为历史之实际者始可完焉。

是故人类之生活，能发展此等最高之能力，而使其下级之能力从属之，则人格益高。否则，动植物之机能，感官之冲动，无意识之情欲，得

占势力，犹是卑劣之生活而已。所谓圆满之生活者，吾人精神之能力，发展至高，以之思惟，以之创作，以之行动，无不达于圆满之度之谓也。以人类历史中之境遇观之，交际之道德，于生活中实为重要之部分，所以平和人生之境遇而使之互相维持者也。故人有恒言曰：真与善，圆满生活之两方面也。虽然，读者毋以是而谓余之所见与惟心论同，盖余固非以感官之一方面（即动物机能之一方面）为可忽者。孩提之童，喜直觉，嗜游戏，亦不失为生活之一部分。且如饮食也，快乐也，亦圆满生活中之所应有，特不可以是占生活全部之势力而已。

此言感官方面，仍不可忽。与宋儒[1]异处。

由是余更得以一人之生活而论其为正鹄为作用之两方面。吾人之圆满生活，吾人之正鹄也。而自吾人为国家或文明社会之一分子观之，则又不过一作用。柏拉图曰：国家者，大人也。然则一国之机能，犹之一人之机能，而国民与一人之关系，犹之正鹄与作用之关系，惟其作用仍为正鹄之一部。盖全体者，固积各部而成立者也，于是吾人又得一评定人格之新标准：人之尽其国民之义务也益多，则所以供国民精神界、历史界之生活者，若学问、若道德、若美术，皆益大。而其历史界之价值，遂亦随之而益大。是则不关于

然则正鵠作用无定位，到处皆正鵠，到处皆作用。

---

[1] 宋儒，即宋代理学家。他们一般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即用道德伦理规范来限禁感官方面的欲望。

其狭义道德之价值，而惟关于其对于国家之义务者也。虽然，是说也，愿读者毋以惟心论视之。[第73～74页]

仁。

吾人更由国民而进于更高之境遇，则为世界之一分子，而有所谓人道。人道者，仁之观念，所借以为具体之表示，而吾人经验界考察至善之效果，以此为终点者也。圆满之人道，若以基督教之语代表之，则地上之天国是也，是谓至善，是谓人类究竟之正鹄。而于是国民道德，亦对之而为作用。然其作用，亦仍为正鹄之一部分，可知也。各国民之品格，皆以此正鹄为其最高之标准，由其仁之观念发展之程度，而第其品格之高下焉。凡国民及进化之阶级，虽未有全无价值者，而其社会，其政治，其精神，其道德，其美术，其宗教，凡是等生活之发展，去仁之观念之中心点，不能无远近之差，则国民品格优劣之差视之矣。

虽然，亦至人道而止，抑尚有所谓物道乎？不然何以解于杀物之不仁也。

人类究竟之目的到底如何，还是不知道。

仁之观念，吾人尚不能以具体者表彰之，仅于精神界、历史界生活普遍之概念，想象其轮廓而已。一切人类学历史界之研究，虽足供吾人以资料，而吾人尚不能有所构成。……神之理想之人类史，吾人虽能见其断章而比较之，而此种种断章，各有何等作用，非了于其全体之组织，不

能知之，而吾人终不能为全体组织之观念。……[第 75～76 页]

说明之。

然而人类生活，尚不过一切实际事物之全生活之一部，一切实际事物之全生活，吾人仅能为形式之概念，而不能以直觉者表彰之，而惟托之于譬喻，是谓不可思议。是谓神。……[第 76 页]

第三章　厌世主义

（一）厌世主义之理论。……

此数句可证人类以惊奇为贵。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

（二）感觉界厌世观之证明。……凡有强大之情欲者，营求而得之，其快乐不过少量而已。惟其初淡焉漠焉，而忽于意外得之，乃始有至纯至切之快乐。试观之于儿童，其情欲大者其满足也小，吾人所常见也。[第 81 页]

此却不然。成人亦有想复为童子者，成年人固有其种种之变化，而童子时之变化则无，故思

……凡老人有还童之希望者颇多。彼夫成年者，恒不欲复为童子。童子不欲复为婴儿，而老人乃反之。得毋餍平和之境遇，而又已休养其跋涉世路之勇力故耶。[第 84 页]

之也。

诚然，诚然。人固以发展一身之勇力为其最终之目的者也。

此情诚有之。七年长沙兵溃[1]时，有此现象也。

（三）道德界厌世观之证明。……豢猛兽者必以铁槛间隔之。人类亦然，以恐怖之铁，制为刑法之槛，始得阻其互相侵袭之行为。彼等苟一脱刑法之羁绊，则俄焉互相攻击。彼等所自诩为道德者，苟揭之于光明界，其种类皆同。其好交际也，由于夸炫。其有同情也，由于自爱。其重名誉也，由于恐怖。其守平和也，由于怯懦。其勉慈善也，由于迷信。间有少数之人类，奸恶之特质，超于愚钝者，必其意志较强，知识较多，故不为法律所制限，若猛兽之出柙然，蹂躏他人，无所不至。彼多数之怯懦顽固偏狭者，羊耳，少数之狞猛狡诈者，狼耳，狐耳。轶此二种之范围，而有智德者，仅矣。自然之创造天才也，一世纪中，殆不过二三次。其创造贤者也亦然。[第85页]

---

[1] 指1918年3月25日广州护法军谭浩明率桂军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张敬尧作战，兵溃逃出长沙一事。据《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志》记载：其时，“南军已返，北军未至，省垣恐慌，湖南银行及大商店被劫，造币厂被焚。旋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于市，适北军至，乃止”。

泡氏乃持理想主义者。

……表里违反之风尚，于今为烈。然则及何时而始无此风尚乎，及何时而使人一观背面之状态，无待改良之计划乎？虽然，及何时而能解吾人此等之迷惑，则至可疑也。今日者，诋谌人类，暴露人类丑恶之方面，为文学界风尚之题目。讦发人类之虚伪粗野，为诗文之任务。此岂人心倾向真理之情状耶？吾人所不敢信也。吾人于热望真理以外，又有一冲动焉，以见是等黑暗之生活为愉快，是仅足以养空谈若侮辱而已。彼艺术新派，所揭为写实主义者，果健全者耶，果有欢迎之价值耶，吾不能无疑。虚伪固非，吾人对于实在之状况，固不能掩目而不睹。……[第91页]

尔虞我诈。

……世人苟去其互相恐怖之念，则不特以爱助于人为喜，且以不待干请而能助人为喜，此至确之事实也。且人苟施而不望报，则当夫受者以诚挚之意，现为感谢之容，而益觉其愉快矣。……[第92页]

洞悉人性之言。

且吾人关于人生及人类之邪恶，尤常欲构为普通结论，以为镇静慰籍之资。例如为妻女所给者，常欲为女子难养之说。著述而不为世所重者，常欲为世人不辨黑白之说。且如吾人遇一失

意之人，而告以此为希有之遭遇，则彼将益增其苦痛。苟语以此等运命，为人人所不能免，则彼之苦痛顿减，皆其例也。……[第93页]

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

（四）历史哲学界厌世观之证明。……诗人希西亚若[1]Hesiodos尝历记世界之年代，谓始于黄金时代，而终于铁时代，又自叹不幸而生于铁时代焉。此等思想，可以生理学说明之。老人之气质，恒于过去之时代为乐天观，而不属意于现在。盖彼无能力以赴现在之事物，又不求其原因于己，而归咎于时代，于是常忆其少年时代之赫耀矣。盖老人者，有维持历史之力，使少年因彼而得过去之知识，若历史之光明者也。凡少年于特别荣誉之倾向，与其家世名德之倾向，常有关系。而德育之机关，与凭借历史之倾向，亦同一作用也。凡人以特别原因而不满意于现在者，恒好称述过去之所长以耻之。[第95页]

约而言之，由文明进步，而苦痛之种类及强度，固随之以增。然快乐亦然。是以历史派之乐天主义者，谓历史之进步，确增幸福。而其厌世

---

[1] 希西亚若，今译黑希奥多斯·赫西俄德，公元前850年左右古希腊民间诗人，著有《工作与时日》《神统记》等赞美希腊诸神的诗歌。此处所称黄金时代、铁时代，参见斯威布著、楚图南译《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人类的世纪》一章。

调和说。

主义者，则又谓确增苦痛也。吾人于此两说，皆无以证明之。盖在理论，虽皆能自圆其说，而在实际，则无可为证凭者。吾人惟得一最确之结论，则所谓文明进步，则感受性增进，而苦痛快乐皆益自强大而已。[第99页]

善多于恶。

（五）道德界历史之厌世观……惟具特别人格者，始可确然为善恶之区别矣。一方面，为神圣之爱，致身之忠，对于真理及正义之热诚。而一方面，为非常之败坏。虽然，即此两方面而对比之，善多于恶，恶之为变例，为对比于善而显著之之作用，盖不容疑，而其事殆将与世界终古焉。……[102页]

第四章　害及恶

…………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1]抵抗，而水力益增

……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使田自生谷，圃自生蔬，则无所谓稼穑树艺；使气候适应于身体，则无所谓建筑；使一切什器，天造地设，则无所谓工艺。如是，则与方士所谓仙境者无异矣。夫吾等所居之世界，所以异于仙境者，正以有各种抵抗，因而有与此抵抗相应之动作。故吾侪今日之资性，与其居于

---

[1] 太华，即西岳华山，在陕西渭南县东南。

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仙境，正不如居此实际世界之为宜也。至若特别之抵抗，则其及于吾人之效果，亦与普通抵抗无异。洪水者，示堤防之法，火灾者，启建筑进化之机。虽亦有特别之人，或于特别之抵抗，特见为有害而无益者，然能利用之，则亦未尝不可以转祸而为福。他日追忆前事，将恍然于不幸之遇，未必非福也。祸害之来，或以自力胜之，或以他人之助而胜之，则不惟不为吾害，而转为美利，事后思之，其乐无量。此其况味，人亦孰不经验之哉。

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如西大陆新地之对于

由是而知自具之害，若所谓身体及精神之弱点者，其效果亦然。使有人焉，其体魄至强，其角胜外界之力至大至久，迥绝恒蹊。又若有人焉，具绝人之智力，识别事物，从无迟疑谬误。则其所得，乃与前所谓居仙境者无异。盖人类势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充其量，必至于仙境而后已。谷物之有价值，以其力耕而得之，若不劳而获，则价值尽失。人之能力，亦犹是也。吾人具此官体，适宜于此世界之生活，故种种生活，与吾人之意志感情无不相应。居超越人世之境者，固宜别有超越人类之官能。而吾人之官能，固适合于吾人之职分矣。且使吾人仅此官能，而又益以疾病或聋愦废疾之属，益有以弱吾人之性质及势力，而其效果，乃亦与外界意外之害相等。……吾人虽不能举种种疾病，而悉

科仑布[1]，洪水之对于禹[2]，欧洲各邦群起而围巴黎之对于拿破仑之战胜[3]是也。

胪举其效力，然吾人自具之害，苟能利用之，亦未尝不可以转害而为益，则固已较然可睹矣。由是观之，害者不特为现实者，而且为必有者矣。

至真之理，至澈之言。

鸠之能翔于空中也，以有空气之抵抗，而彼乃以为苟无空气，则其翔也更自由。此康德所以讽人，使知悟性之动，必须经验实事者也。人之意思，不可无对象之抵抗，亦然。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纯粹之幸福，为纯粹之真理然，有之者其惟神乎。在人类，则享幸福者必当有障碍若损害，犹之识真理者必当有蒙昧若谬误也。

…………

肉欲关乎个人，我欲及于交际；肉欲关私德，我欲关公德。

余以为恶者，亦人类历史生活所不可少之原质也。何以言之？凡恶之原型有二：曰肉欲，曰我欲。肉欲者，感官之冲动，或为理性及道德之力所不能制，而暴露其弱点，如放荡、怠惰、轻率、怯懦，及一切不节制之类，是也。我欲者，

---

[1] 科仑布，今译哥伦布（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1492年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乘船从巴罗斯港出航，横渡大西洋，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后三次西航，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诸岛及中美、南美大陆沿岸地带。史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2] 禹，姒姓，原为夏后氏部落首领，相传奉舜命治理洪水。

[3] 1814年3月31日，由英、奥、普、俄等欧洲国家结成的反法联盟军攻入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

私德。

而后知圣人者“生而知之”[1]“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2]之不可信也。

公德。

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

前言模型之恶，此言实现之恶。

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差别[3]，不知其

损人以利己，如贪欲、不正、恶意等之渊源，是也。苟肉欲我欲，一切消灭，则世界因无所谓恶，而亦将无所谓善。慎重、忍耐、刚毅诸美德，必有与之抵抗之肉欲存焉。使人类无苦痛之恐怖，则无所谓刚毅，无快乐之刺戟，则无所谓节制。故恶朕不存，则美德亦无自而起也。无待乎恶而为善者，意者其惟神之德乎？然而非吾人之所可思议矣。人类交际之德，亦必有感官自然之我欲，与相对待。苟无我欲，则正直仁爱之德，亦无自而生。盖一切美德，无不含有克己之原质者也。

不宁惟是，即外界实现之恶，亦为玉成美德之一要质。验美德之扩充，由其与实现之恶相竞，违反正义之事，使见者受者，勃然增权利之思想。诈伪狡猾，所以表真挚笃实之价值，而残忍谿刻，则又为慈祥宽大之反影也。[第105～108页]

---

[1] 生而知之，语出《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

[2] 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语出《礼记·中庸》：“诚者，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3] 泯差别，佛教术语。讲的是一种佛教修养，要求“舍离差别之见，并全然离差别见之平等”，从而超越世俗的自私或利己，达到圆满的修行境界。

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

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者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1]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是故吾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人类中最高最大之现象，所谓道德界伟人者，亦无由而见之矣。

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

不惟此也，历史界生活之内容，亦且因之而消失。盖历史生活之形式，不外乎善恶相竞之力，与时扩充而已。邻国无侵略之谋，则何事军备，国民无不轨之行，则焉用法令。军备法令，国家之所以与外交内政之阻力相竞争者也。使一切阻力悉去，内而人民，外而国际，无不以正直、平和、慈祥、乐易之道相接，则战争、外交、裁判、警察、行政界一切进取之气象，悉为

---

[1] 大同之说，儒家所宣扬的一种社会理想。语出《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1]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2]，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

之消失，而圆满之国家，亦不可见矣。宗教者，亦不外善恶相竞之形式，使诸恶不作，人类悉为神圣，则宗教亦随之而灭焉。[第109～110页]

---

[1] 老，指老子；庄，指庄子。语出《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窃无有。"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2]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东晋诗人。桃花源是在其名作《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太平境界。

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

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1]之时，刘、项相争[2]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3]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

---

[1] 战国，指春秋后魏、赵、韩、齐、秦、楚、燕七国争雄之际。作为时代名称始于《战国策·序》。而起止时间说法不一，现一般把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定为战国时代。

[2] 刘项相争，指我国历史上秦末刘邦和项羽在公元前207年至前202年起义灭秦后，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

[3] 指公元前133年至前119年，汉武帝刘彻不断派兵抗击匈奴进扰，平定北方边疆的战争。

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吾尝梦想人智平等，人类皆为圣人，则一切法治均可弃去，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

恶也者，善之次等者也，非其性质本恶也。惟其为次等，故不能与善并有同一之价值，然不能谓无价值。在一时候有觉其毫无价值者，不仅

恶之不可免也如是，然则恶亦为正轨乎，其亦与善有相等之价值乎？余以为不然。恶之为恶，非自有存立之价值若权利，特对待于善而存立，以为实现诸善之作用云耳。善之与恶，犹明之与暗，画一不设阴影，则无以发光彩，然其本意，固在光彩而不在阴影也，犹古人所言烘云托月也。诗人亦然，不描写庸恶陋劣之迹，则无以见俊伟美善，然其本意，固在俊伟美善，特借庸恶陋劣诸象以显之耳。无论生活界历史界，凡善皆独立自存，而恶则附属之以为刺戟抵抗之作

无价值，且有大害者，此乃就其时候言，就比例于他物而言，非其本质之果无价值也。

吾友邹泮清[2]因此等现象而发悲观之论（即此三句所言之事[3]）。

此却有一疑问：吾人要此历史之名做甚，彼恶人得受恶名又

用。故恶者，消极者也，无自具之价值。其为实现之事，则由对待于善而然。彼本具自相矛盾之性质，故无组成之力。康德曰，恶者与其矛盾破坏之性质，不能须臾离者也。然则世界无积极之不德明矣。

不德之无规则，如误谬然。凡真理皆有尽一之统系，而误谬则无之。耶比克脱[1] Epiktet（亦作Epictetus，斯多噶派哲学家，生于六〇年卒于一二〇年）曰，误谬者，无正鹄者也。目前之事实，善人或蒙困厄，恶人或被尊荣，而历史则有公论焉。仁人义士之生涯，虽极至艰难辛楚，无地自容，而功德既立，千载不朽。其同时庸恶之流，虽穷极豪侈，而没世则名不彰焉。此历史之所以垂训者也。观耶稣之事，其理最明。盖历史之迹，足以动吾人高尚之心坚定之志者，诚未有如耶稣被磔之甚者焉。

---

[1] 耶比克脱，一译爱匹克忒多，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教人安于命运，不要做人力所不及的事。

[2] 邹泮清，即邹蕴真（1894—1985），又名半耕、泮芹，湖南汉寿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曾任修业学校等处教员，湖南通俗教育馆编辑员。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3] “即此三句所言之事”批于原译文“善人或蒙困厄，恶人或被尊荣，而历史则有公论焉”之旁。

有何不好?

吾意不应以此立说。吾重在当时为善为恶之事实而已，以其事实论为善者善，为恶者恶。为善而历史流传其善名，为恶而历史流传其恶名，皆不应顾。吾人评论历史，说某也善，某也恶，系指其人善恶之事实，离去事实无善恶也。是故思留名于千载者妄也，欣羡他人之留名者亦妄也。

方披拉图斯[1]Pilatus之罪耶稣也，曰汝不见罪汝赦汝者在汝目前乎！其意气之壮如此。当是时，彼之目中，固仅有一僭称犹太王之一狂人，其死生存亡，与罗马帝国曾何关影响。然自今观之，则不特主客易位，而披拉图斯与其他俗僧凡吏之事迹，悉皆湮灭，其所流传后世者，仅此磔死狂人之事迹。盖德人叙耶稣惨死者，不能不及披拉图斯之名，故耶稣遗馨千载，则彼亦随之而遗臭。其所以千载不朽者，非其荣誉，特使后人知当时裁判教案之人，不足为定谳云尔。[第109～111页]

---

[1] 披拉图斯，今译彼拉多，一译比拉多，全名是本丢·彼拉多，罗马帝国驻犹太、撒马利亚、以土米亚总督（26—36年在任）。据《新约全书》载，他曾对被捕的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后以僭称“犹太人的王”的罪名，将耶稣钉死于十字架上。

昔奥古斯丁[1]Augustinus尝本雅里士多德勒之言，以驳波斯教[2]徒Manichaer曰，恶者无自具之性质，特因善之缺陷及消失而名之为恶耳。斯宾那莎[3]及拉比尼都[4]，亦以为圆满及实现者神而已。善与恶之区别，本于吾人不完全之考察法耳，其在统一事实之神，则一切皆为必有，皆为圆满焉。夫吾人不能离我而考察事物，而吾人于一切事物，既知其为写象，而非本体矣。且吾人知恶者非与善有同等之价值，而其对待于善也，亦非有积极之势力。然则世界虽善恶互见，而不得谓世界之无价值，固已明矣。

此说与吾大合。

吾人之所谓恶，仅写象非本体。

（三）余之见解非寂静主义。世或以余之论害恶也，谓有不可免之性质，因疑为寂静主义者，是大不然。余之见解，非谓害恶既不可免，吾人当安坐而认容之。谓既有害恶，则吾人随时

---

[1] 奥古斯丁，即奥古斯丁·奥略里（354—430），罗马时代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教父学的主要代表，曾任北美的希波主教。其思想是早期经院哲学和罗马教会理论的主要来源。著有《天城》《忏悔录》等书。

[2] 波斯教，亦称摩尼教，伊朗古代宗教之一。3世纪由摩尼创立，3至15世纪在亚、非、欧很多地区流行。

[3] 斯宾那莎，今译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理性主义伦理学的主要代表。

[4] 拉比尼都，今译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

随地皆有攻击之制压之之责任也。盖世界之有害恶，所以供吾人攻击制压之鹄的。苟吾人见其为必有而遂认容之，则大误矣。疾病之不能振起医术，及练习忍耐悲爱之情者，困穷之不能动心忍性者，诈伪之不为真理战胜者，恶意之不为善心屈服者，是皆实际之害恶。吾人不可不尽力攻击之而制压之，岂有坐视其蔓延者乎。[第111～112页]

此处吾又有不然之意见。疾病之能振起医术，能练习忍耐悲爱之情者，困难之能动心忍性者，诈伪之为真理战胜者，恶意之为善心屈服者，岂即非害恶乎？天下于此等害恶之外，岂尚有“不能……不为……”云云之害恶乎？有之亦是“尚未能……尚未为……”耳，岂有“不能……不为……”者也乎？其“尚未能……尚未为……”与“已能……已为……”

者，其性质相等，皆害恶也。其所以不可少，皆因能佐吾人之抵抗奋斗也，故无论何种害恶，皆在攻击、压制之列，不徒不能不为者耳（按此段细玩之，当是文白不清之咎，泡氏之意未必即如此也）。

或难曰，害恶既为世界所必有，则世界未毁，害恶终无由而灭。吾人虽努力攻击之制压之，亦徒劳耳。……

余答曰，吾人之与害恶竞争也，其动机之所由，不在战胜以后满志之写象，而在于受此害恶之压迫。人明知达一需要，除一障碍，则必又有一新需要一新障碍随之，然曾不足以杀其奋进之力。盖无论何等事状，必有一必得之效果，即以正攻邪，以善攻恶之实际，是也。吾人最重之职分，不在满足人类之幸福，而在自营其正当之生活。此其正鹄，随时随事，皆可以达之。格代曰，有能力者，直道而行，不问其效果如何，谅

不问收获，只问耕耘。[1]

吾人所以欲除去害恶，以其为具足生活之敌也。故吾人为遂行具足生活而除去害恶，非为害恶而除去害恶也。吾人自欲遂行具足生活也，害恶之为多为少，除得尽除不尽，吾岂知之哉。

哉。清静无为，而坐待害恶之迫压者，不特不能制压之，而且为之屈服，不勇敢，不活泼，是即沮丧衰弱之源也。苟自强不息，则不惟自感其能力之可恃，而且时时觉害恶之屈陷于我也，此其为满足也何如。夫岂以去一害恶又有一害恶随之，而遂为之短气哉。未来之害恶，关系于未来之人类，非我所敢与知，而除去目前之害恶，则吾人之职分也。[第112~113页]

诗人之写善人也，虽处困厄凄怆之境，曾不愤怨其反对者，而从容就死，如科迭利亚[2]

---

[1] 曾国藩在辛亥（1851）七月日记中曾说：“坐右为联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2] 科迭利亚，今译考狄利娅，是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人物。年迈的李尔王拟将国土平分给三个女儿时，因三女考狄利娅讲了心里话十分生气，便把国土平分给长女与次女，而不给考狄利娅。长女和次女得到土地之后便凶相毕露，残酷地迫害李尔，致使李尔发疯出走。嫁给法国国王的考狄利娅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出兵攻打两个姐姐和姐夫，并将父亲找回。这时李尔对自己的错误十分后悔。

Cordelia、特西摩杰[1]Desdemona是也。然彼等卒能以善胜恶，恶之势力，不足以破坏其内蕴之平和，而适足攻错之，以成其完全之品格。过此以往，恶之为物，不期灭而自灭矣。[第113页]

有至坚强之力者，其此内蕴之平和欤？

（四）论生死。夫人之所视为大害者，曰死，无论其为一人，为国民，为全世界之人类，殆皆视为不免于死者。

虽然，是谬见也。人之有死，不特自外界观之，有不可免之势，即自内界察之，亦实有不可免之鹄焉。格代曰，死者，自然界所以得多许生活之善策也。夫自然界欲营历史之生活，计诚无善于有死者。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不死之人类，其将营所谓非历史之生活乎。此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焉。且也，既无所谓死，恐亦将无所谓生。人类无亲子之关系，则凡深邃之道德心，如慈孝亲爱，恐亦将无自而付畀。是故人类既欲营历史之生活，则死之不足恶，固亦明矣。且也，人类之生活，本非有无限之性质，盖限于

惟土石不死，然则人类将欲营土石之生活乎？

---

[1] 特西摩杰，今译苔丝狄蒙娜，是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人物。奥赛罗英勇善战，爱上罗马元老院一位元老的女儿苔丝狄蒙娜。元老以门户不当为由反对这门亲事，但苔丝狄蒙娜真诚地热恋着奥赛罗，并逃出家庭，私下与奥赛罗结婚。后来，奥赛罗听信谗言，以为妻子对他不忠，一怒之下将苔丝狄蒙娜掐死。当奥赛罗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痛不欲生，自杀身亡。

循环。

萎缩。

即随之而俱死亦何憾焉。

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设有本必然者而忽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且吾人之死，未死

其能力若内容也。自生理学及心理学观之，各种动作，皆有循环之倾向，故思想行为，恒有一定之形式，然又有一相等之原则焉。即循环之动作，恒不免积渐萎缩其作用，而终抵于麻痹之境。意志及悟性，变动不止，积久则亦渐失其应变之弹力。人之老也，虽日接外界之事物，而不能受其新影响，亦无自而利用之，茫茫然若隔世之人。及其既衰而死，则并非外力侵袭之咎，而其本体固不能不如是矣。在生者视之，以为彼既尽其生活之职分矣，虽死无憾。即死者之自视也，亦然。然则生者死者，皆以死为自然之规则焉，何害之有。盖死者之所欲为，夫既已经验之矣，其所为者，固已显于世界矣。其所为尽力之子孙，若国民，若真，若善，若美，则固不随之而俱死也，曾何憾焉。[第 114～115 页]

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不仅死为未死，且生亦系未生，团聚而已矣。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可惧哉。且散非一散而不复聚者，散于此而聚于彼。设使天下只有散而不复聚，则吾人目击日日有聚之现象从何而来（此非指投胎）？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以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

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住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曰能之，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与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而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

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之意不如此焉。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

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甚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于人生之世界所不能遇者，乃以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

指具足之生活。

吾于此等处以自然现象解释之，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凡自然界无无故而成者，无无故而毁者。人类无无故而生者，无无故而死者，其死既有故，则其故即所以解释之点也。其未达具足生活之正鹄因有此故，因有此故而未达具足生活之正鹄，曾何憾焉?

若乃中年早逝，未得尽其职分，或生无几时而夭折，则事殊前例，几不可解。又或疾疫蔓延，无论贤愚老少，死亡相继，则虽贤人君子，亦不免因而惶惑。盖此等特别之事，诚未易以理论证明其正鹄。当此之时，惟有感人力之微弱，悼天道之难知，而益增其敬慕上帝之念而已。惟早逝之人，为生者所恋悼，恒倍于寻常。希腊人常以青年士女之早世为非不幸，梭伦[1]Solon之言可证也。且以他方面观之，则皆夭死之不专属于老人，而其他少壮者，乐易者，勤奋者，亦或不免。此等生活界普通之秩序，亦稍稍有可以理论，证明其正鹄者。如希腊贤人布里奈Briene之训毗亚斯[2]Bias曰，汝平日所以自完者，当使汝虽旦夕而死，亦无遗憾，与寿至百年无异焉。此稍稍足以解释之矣。吾人之寿夭，不能自知，虽速死而无遗憾，虽老寿而不失其毅力，吾人所当务也。无问寿夭，而悉已为之准备，则虽死而何憾耶。(按：此与吾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意正相吻合。[3])

---

[1] 梭伦（约前630—约前560），古雅典政治家、诗人，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前594年任雅典执政官，实行政治改革。

[2] Briene为Prieae，今译普里安，古希腊地名。毗亚斯，今译拜阿斯，古希腊“七贤”之一。“布里奈之毗亚斯”，意即普里安这个地方的拜阿斯，“训”字疑为衍文。

[3] 括号中话系蔡元培在原译文中的按语。“朝闻道，夕死可矣”，参见《论语·里仁》。

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则其人之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虽谓之不死可也。若乃国民有时而灭亡，世界有时而殄灭，则奈何？时则人生价值之基，不且一切为之破坏耶？夫国民生活之阶级，不能免于循环，与一人无异，而仅有大小之别，此不可易之论也。征之历史，国民皆不免有老衰萎缩之时，若思惟行为一定之习惯，若历史沿袭之思想，若构造，若权利，与时俱增。于是传说足以阻革新之气，而过去足以压制现在，对待新时代之能力，积渐销磨，而此历史界之有机体，卒不免于殄灭。当是时也，各人又安有能力，用以生殖传衍，本旧文明之元素，以构新历史之实质耶？人类全体亦然。虽非历史所能证明，而以此论推之，知其不免于绝灭。征之物理学，恒星及太阳系统，皆当历生长老死之阶级。其生也，自他星体而分离，由是发展焉，成熟焉，经无量数之生活，而乃老衰焉，萎缩焉。若地球，若人类，亦莫不然。

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

吾于此处之解释，亦如上文。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也，生死也皆变化也。既无生灭，而只有变化，且必有变

化，则成于此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成非生，毁非灭也。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者，必生于此，生非生，死非灭也。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1]，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

---

[1] 日耳曼为约公元前5世纪起居住在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日德兰半岛、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一些部落的总称。公元1世纪左右，逐步形成东、西、北三支，北支日耳曼人同克尔特人及当地居民结合，形成近代瑞典、挪威、丹麦、德意志、奥地利等民族的先民。故批注中有“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之说。

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宇宙之毁也亦然。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

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

人类之不免于殄灭也如是，然则人类之生活，又有何等价值耶？余以为不然。花之开，数日耳，歌舞，数时耳，而价值自若。凡内容有限者，其现实亦不能无限。人也，国民也，人类也，其生活皆然，其本质之内容本有限，其发达安得而无限。凡事物有限者皆无常，亘永劫而不失其现实性者，惟无限之实体而已。然而人类之不免于灭亡，其一切价值，并不因之而消失。否则人类何为而勤动，何为而困苦，何为而竞争耶？……死者，不过生活连续之截止，而不能影响于过去之生活。使谓过去者必无价值，而现在者始为现实，吾人与夫吾人之生活，必在现在吾人之意识中者，始有现实之性质乎？然而现在者，一点耳，非有广狭也。吾人之生活，成立于包有过去及未来之时间之经历，而不能成立于现在之一点也。使以吾人过去之生活为与非现实同义，则是谓一切生活，无有含现实之性质者也，岂其然乎。[第115～117页]

虽然无常而有常，此有限之内容终不能灭也。

时间之有去来，今人强分之耳，实则一片也。然则吾人之生活在此一片之时间，处处皆现实，而岂有所谓

过去之生活非现实耶？

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须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是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是未达正鹄。释迦[1]墨翟[2]皆所以达其个人之正鹄也。一曰现实主义。以时间论，止见过去、未来，本不

---

[1] 释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简称。

[2] 墨翟，即墨子。

见有现在。实现非此之谓，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既往吾不知，未来吾不知，以与吾个人之现实无关也。或谓人在历史中负有继往开来之责者，吾不信也。吾惟发展吾

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后人因吾之完满如此，亦自加吾以芳名，然而非吾之所喜悦，以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历史前之事亦然。吾取历史以其足以资吾发展现实之具足生活也。或谓吾人负有生殖之责任，吾亦不信，我自欲生殖也，我具足生活中有此一片段之生活，我自欲遂行也，向谁负责

任？必依此二主义，乃可谓之真自由，乃可谓之真自完。泡尔生谓人死而功业足以利后世，其生涯犹存于子孙国民之中，谓之不死可也。此只可为客观方面事实之描写，而决不可存于其人主观之中。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此功业自有足以利后世之性质存于其中云尔。吾之不灭也，亦吾本有此不灭之性质具于吾之身中云尔。此二主义，泡尔生氏亦有之，但未十分明言耳。

第五章　义务及良心

（一）义务感情之起原。

即良心。
即义务感情。
一种境界。
即本体。
即下文。

夫执意之实体，何以有当为之感情乎？义务之感情，与自然之性癖相矛盾者，果何自来乎？将别由超绝自然界而入于执意之实体之统系中乎？持宗教见解者，则曰，良心者，神之声也。虽然，其意善矣，而无裨于说明。盖伦理学之不得以神为原因，犹物理学也。自然律及道德律之基本，诚在超绝界。而吾人欲为经验界事实之说明，则不得立基于超绝界，而仍当以经验界为范围，且余固已得之于经验界矣。

一结论事例。
义务感情。
自然冲动。
良心发见。
天性。
第二天性。

达尔文著《人种原始论》[1]，不尝于其第四章言之乎，彼尝证明兽类感情之发展，与人相似。曰，有母犬卧抚其雏，见主人出猎，欲从之，既而恋其雏，不克从。及见主人猎而归，则帖尾乞怜，若甚愧者，盖悔其不忠于主人也。家畜亦有二种冲动：（一）本之自然者，（二）得之于训练及习惯者，不免日徬徨于两冲动之间。达

---

[1]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物种起源》，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人种原始论》全称应为《人的起源和性的选择》，出版于1871年。该书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祖先的思想。此处所述母犬故事见该书第四章《人类与较低诸动物之精神能力比较——续前》。

尔文以为是义务感情之本式也，其发生之端，即由决意之本于教育若习惯者，与其自然冲动相冲突。于是时也，内界有一种感情，迫以弃自然冲动而从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是即原始之义务感情也。吾人虽亦能反对其本于教育习惯之决意，然不免因妄徇自然冲动之故，而动其忧苦惭愧之情，是为良心不安之本式。良心之不安，亦得谓之由交际，若技术之本能，本永永运动，故对于目前至强之自然冲动之压制而反动也。此等感情之发展，在人类尤为强大。盖人类之记忆过去，较之兽类，益久而益确，则其本乎教育习惯以决定其意志，而与目前之自然冲动相反对者，其力自益强矣。[第118～121页]

义务感情为甲乙两方之裁判官。

一名词。

犹言自强不息。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盖义务感情得之于训练及习惯，乃后天的、人为的，自然冲动发生于自然，乃先天的、非人为的。发生于自然者，自然界本有此物确实在的也。得之于人为者，由经验之所获取，由概念之所构造，所以体合环象，赖以善其生存

及发展，自然界未必有此物。自然界无此物，故非实在的也。然而冲动虽为自然，乃不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义务之感情虽不自然，乃确能善吾人之生存发达，又何说？予以为此乃吾人不善体合环象，不善运用生存发达之道故也。盖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则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之冲动。盖

意志本原于冲动，意志中之良心何独不然。良心既亦本原于冲〔动〕，在理本应与冲动一致。今所以有时不一致者，以吾人从知识与经验之所得，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生存其中至为不易，在一种时候及场所，如实依冲动所命，则不免有危及生存发达之事。以渐制为训练及习惯，加本原于冲动之良心，以特殊之形状，遂有与冲动相冲突之事，此或因吾人对于此住世之事，不得其法。或本可不

与冲动相冲突，而亦能善其生存发达，未可知也。要之，二者原为一物，吾人各种之动作，固处处须冲动，处处系冲动之所驱，良心之明，亦处处承认之。吾人之良心固未有不以食欲性欲之事为然者也。惟在一种时候及场所，乃有谏止冲动之举，如过度之食欲，过度之性欲是也。然则良心不过加以节制而已，并非反对也。其节制亦正所以完成冲动之本职也。故良心与冲动理应一致，乃调和的而非冲突的。自后天之训练习惯，矫枉过正，乃有不

循自然与冲动反对之事，致使良心之本来与冲动同原，同为真的、自然的、实在的『者』，变而为伪的、人为的、非实在的，此则矫枉过正之咎也。

良心所命于义当务之事。

以下说义务所以有特别之权威。

难者曰，如是，则于人类之义务，何以有特别之权威者，尚未之说明也。命以当为之权威，非由自然冲动之生活而发生，而良心之反动，与歉于自然冲动之感情，又不同原。然则所谓义务者，其对于自己意志之权威，又何能发生于自动冲动之统系中乎。[第120页]

其他种种习惯，恐亦有基于本能，与此相类者，如杀伤掠夺，自昔著为厉禁。此等习惯，恐亦起原于兽畜合群之本能也。人类成立国家，由于权威与服从之关系，而亦于兽群中萌芽之矣。由是观之，义务者，不起于一人内界之意志，而实由外界以无上之权威胁成之，明矣。……[第121页]

此处吾有疑义。

吾前所论，

（二）义务与性癖之关系。吾由是得返之于

与此立意全然相同。

前之问题，而论合于义务之善，与合乎性癖而增人安宁幸福之善，其关系如何。……[第 122 页]

此与吾前所论相合。

……凡财产义务之意识，皆在制限之条，如毋偷盗、毋诈欺、毋贪、毋吝，是也。言语之意识为义务也亦然，毋多言、毋躁、毋诈，是也。由是观之，义务者，冲动之制限也。有义务必先有冲动，无冲动则亦无所谓义务。溯义务之源，乃属于消极者，其曰毋如是云云，乃由冲动之轶出其畛域，而人始意识其有制限之义务也。其为积极之式，则不曰汝当云云，而当为吾欲云云。及其自然冲动之有所歉而义务生焉，乃易吾欲云云，而为汝当云云耳。[第 124 ~ 125 页]

此所以有社会胜于个人之说。

吾人苟即国民全体而考察之，则可以涣然而无疑。盖国民全体之性癖，恒与义务一致也，国民常欲代表道德律。道德律者，非由外铄我，而国民自己之意志之表彰耳。惟在各人，则偶有性癖义务冲突之时，或当为而不欲为，或不当为而欲为。于是意识之中，常觉道德律之自外来而制限其意志焉者。然以普通之意志推之，则终以赞成道德律之命令者为多，且见他人之违道德律者，恒以行为言语若思想抑止之，而无所踌躇也。[第 125 页]

（三）评康德之见解。本康德之见解，则道德之基本，即在性癖与义务感情之冲突。彼以为人之行为能有道德之价值者，必其一循义务感情，而不假性癖之力，或且反对现在之性癖焉。因性癖而仁慈者，无所谓道德。……康德之言曰，有人于此，无乐生之感情，虽有济困扶危之力，而恻隐之心则无之，然彼尚以扶济为义务而力行之，是为道德，人之于己也亦然，保其生命，增其幸福，循性癖而行之，无所谓道德也。及其不幸而坠至困大厄之中，以速死为幸，乃尚以义务之故，而勉保其生命，乃为真道德焉。盖康德之意，以为人类者，必于其意志中悉屏性癖冲动之属，而粹然余义务之感情，乃始可以评定其价值。然使人类仅以义务之故而行善，则枯寂无味，殆若傀儡。此其说之不衷于理，所不待言。而康德之说，要亦有可采者。盖义务与性癖之冲突，虽非通例，本义务以抑制感情，虽不必为道德价值之正则，然而道德之性格，要待义务与性癖冲突之时机，而始能表彰之。有一富人，拾十金于道，而返诸遗金者，吾人不能以是而遽定为正直之人，以区区十金，无加损于富人之财产也。使有贫者，道拾十金，虽以得之为利，而独以义务感情之故，卒返诸其主，则吾人得以是而断其为正直，或且许之为善人矣。是故其人之性癖与义务不冲突，其意志无本义务而抑性癖以

己对己。

吾谓此等义务感情，只可于无意识界求之，只可于死界求之。

诚然。

此则有之，仍止对于道德等差次第之关系耳。

此处吾尚有疑。

定行为之机会，则吾人无自而评定其人之品格。定品格之合于道德与否，必在义务与性癖冲突之时焉。[第125～126页]

其实无须冲突，性癖与义务本为一物，而自有等差次第及时候场所之分别，有此分别则足以评定其人之品格矣。

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2]

康德之视义务意识也过重，而其徒非希的[1] Fichte尤甚。然吾人之行为，不必皆由于义务之意志，则确为事实，而亦不得谓之过失。至欲使决定意志之动机，一本于道德律，而因以制御一切自然之冲动，则非特吾人所不能，而亦可以不必也。自昔道德哲学者，恒欲以一切意志之动作，悉受指导于义务写象者，始为圆满。斯宾那莎谓贤者专以理性之命令决定其意志，而不使其冲动有几微影响于行为，即边沁及穆勒之所谓贤

此等皆强分自然意志与义务感情截然对立之故，不知其为一

---

[1] 非希的，今译费希特（1762—181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认为唯一的实在是“自我”。

[2] 我国宋代理学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不过是人心中的一种固有的先验的理性。康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道德原则是先验的，它来自人的意志自身，与社会生活和外部事物毫无关系，人必然会遵守这些道德律令，而遵守道德律令就是尽义务，并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的公式。

也，但有等差次第及时候场所之分别耳。

此即吾节制之意。

旨哉言乎！

者，亦与之大同小异，盖皆以斯多噶派及伊壁鸠鲁派为模范者焉。自实际言之，则理性若义务之写象，不必若是其重要。盖理性若义务之写象，所以整理冲动，而不能代任其责。冲动之于生活，犹悬锤之于机械，决非理性所能代。何则？理性者，无运动力者也。

吾极主此说。

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得其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书，皆是述而不作。吾人之心灵本之自然，其范围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创作！即宇宙亦终古在同状之中，

……最圆满之道德，亦由天纵者以其本能实现之，而伦理不与焉。美学也，伦理学也，皆无创造之力，其职分在防沮美及道德之溢出于畛域。故为制限者，而非发生者。美及道德之实现，初不待美学伦理学规则之人其意识中，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不宁惟是，人苟以美学伦理学之规则入其意识，或为其注意之中心点，则往往转为实现其美与道德之障碍。人之作书，泥于字书之规则，则反易致误，此人之所稔知也。决正字学之疑问者，莫如执笔即书之为当，决道德界之疑问者，亦以节拟议而促实行为寡过焉。

无创作之力。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吾人之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吾人之心灵有变化而已，安能丝毫之创作哉。

平心论之，人类所以有道德之价值者，决不在深思义务，而意识其行为之为动机。盖勉强而行之，与安而行之者，固未可同年而语也。传康德者，其所述果确耶否耶？康德之为人，果以义务为其行为之动机耶？非余所能知也。虽然，余敢自明，决不以此等叙事为可贵。盖义务感情，虽可为去恶之作用，而大人君子，决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之者，大抵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焉。[第128～129页]

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

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以排除之。此种之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即此书所谓自然之冲动，所谓性癖也。彼但计此动力发出之适宜与否，得当与否。适宜也，得当也，则保持之，否则，变更之，以迁于适宜与得当焉。此纯出其自计，决非服从外来之道德律，与夫所谓义务感情也。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

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古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概，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而至强也。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

诸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按：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1]之意，大略相同。）

（四）论先天直觉论道德哲学之谬误。……

余以为以事实言之，道德律者，诚无论何人，可以不求其原因与理解，而直认之为真理。盖其内容，不外乎风俗习惯之由积极消极二形式表彰者。而风俗习惯，即存于全社会各人之意识中。人之所以知风俗习惯者，由其有种种特别判断，足以褒贬人我种种之行为者，每遇特别事故，直判断之而不疑，此由于练习者也。人之所以知道德界普通形式者亦然，自幼少之时，而已镌其印象。叔本华谓人常不忆其学而知之之真理，而误以为天赋，谅哉言也。且一切指示行为之言语，其意义中，率已含有道德界是非之判断，如诈伪贪鄙，已含有摈斥之意；公平节俭，

此种言语在其起原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

---

[1] 浩然之气，语出《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大丈夫，语出《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已含有褒赏之义，是也。……[第129～130页]

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少之时，即童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者。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直觉也。

……盖所谓不可思议之命令若条禁，见于各人之意识而为道德者，其所以存在，所以正当，皆于客观界有其基本，即其能维持各人及社会之安宁，是也。道德哲学之职分，在证明其基本，犹法律哲学之职分，在即法律之内容及形式，而证明其基本。……[第130页]

证明之而已。

余以为正当而悠久之利益，诚所难知，然谓义务之命令，尽人易知，则不合于事实。行为之中，固有人人知其义务者，然不得谓凡事皆然。凡事理稍稍复杂者，其义务所在，往往不易知之。……[第130页]

此即谓人类最后之大鹄的。

其知也，亦系经验而知之。

有一政治家，偶于其所属政党之一意见，不能赞成，而其党方草一宣言书，以彰其党之伟绩，使彼签名。彼从而签之耶，是自欺也；拒之而不签耶，将失其在政界之动力，而大为前途之障碍。

彼将何以处之，是亦非康德之定律所能断者也。以吾意言之，则彼先当自问此事之关系果何如耶？如无重大之关系，则屈意而殉党议，未为不可，否则将不能共事也。苟其事而关系重大，则与其瞻徇党见，毋宁离党而自申其见之为正焉。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1]

难者曰，如是，则将使道德为之无定，而疑义百出，莫可究诘矣。曰，道德者，非吾人能使之无定，而彼本无定，且亦无时而定者也。道德者，非可恃简单之机械作用，本于先天能力，如所谓实践之理性及所谓良心者一瞬而得之，又非举种种特别之机会，而得以普通之规则包摄之者也。[第132～133页]

确论。

康德全部学说之中枢，即在以道德律为至普通至正当之性。其性为绝对者，为合于论理者，而所谓合法性及道德性则亦与之一致。正鹄论之道德哲学则反是。其所谓道德律乃与卫生术之本生理学以为法则者相类，盖皆取经验之规则者也。然则道德律之不能无变例，与一切经验规则何异。凡一种行为，其于为之者及受之者之生活，或益或损，诚常有其惯例。然人事至为复杂，同此行为，而忽生反对惯例之效果者，时亦不免。于是虽破道德律之形式，而未为不道德，且或必如是而始为真道德也。求之实际之行为，

崇尚个性，固泡尔生之好主张也。

---

[1] 语见《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实际之判断，吾人盖时见之，而直觉论伦理学，不能有以解说之，此亦其学说未纯之一证也。[第133～134页]

请举其例。军人之第一义务，曰服从，谓于其职务为绝对之服从者，是也。军人以服从为义务，即近世国家所赖以存立者。其义务之重如此，故稍违之，则置重典焉。然间亦有破此义务而良心不之咎清议不之责者。如约克[1]york将军于韬落铿Tauroggen宫之会议（事在〔一〕千八百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普将军york及俄将军Diebitsch会议于俄之Tauroggen宫而结中立条约，时拿破仑一世方被窘于俄而归），本一己观察政界形势之见解，公然背国王之命，破军人服从之义，而与敌国结平和之约。此其行为尚合于义务而为道德律所许可耶？以康德之律绳之，必不然。在将军亦固知背王命而行，于国为不祥。且一启其端，他日即欲以普通之律绳检普国之军人，而或且无效焉。

将军再四踌躇，而后决然行之。盖将军之所

---

[1] 约克（1759—1830），普鲁士将军。1812年率普军参加对俄远征，同年12月30日私下与俄军缔结韬落铿（亦译塔罗洛根）条约，相约中立，断绝普鲁士与法国的关系。1821年升元帅。俄将军Diebitsch，中文译为提比奇·萨巴尔干斯基（1785—1831），1820年曾任亚历山大一世近卫武官，后升元帅。

踌躇者，曰，吾背命而弃服从之义务，极其流弊，可以亡吾国也。而其后乃决然行之者，则曰，吾不违王命而行之，则吾国且速亡也。卒之将军之所为，乃为舆论所认可。普王盖尝欲责之矣，而旋以为是。以及今日，历史家无不以兹事为有功于国者。且其事甚不利于法人，而法之历史家，亦无以难之。是则官吏反道德之成例，违国家之命令，专断政策以救国家之危急，而为舆论所公认者也。凡事状类此者，皆不能以普通之规则决定之。使仅仅持普通规则而已，则军人者，不可不服从，虽值何等事势，决不能违其服从之义务，而专断政策者也。然而国家当存亡危急之际，非反经行权，不足以救亡而图存，则不能不破普通之规则而行之。夫所谓普通之幸福为最高之规则云者，固一切规则中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军人苟有误犯此条件者，则政府虽以死罪蔽之亦宜。

克林威尔之解散国会亦然。[1]

此革命之事所以不可非之也。

道德律亦循此条件而规定者，故亦不能无变例。盖道德律为人类而存，非人类为道德律而存也。法家之古谚曰，世界可灭，而正义不可不存。康德派之道德哲学亦曰，生命可坏，而规则

惟义所在。

---

[1] 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独立派首领。曾率“铁骑军”击败王党军队，处死英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为维护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利益，解散国会，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镇压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均派和代表贫民利益的掘地派。

不可不存。此其义，谓规则之重要，超于各种特别之正鹄也。然法律实为国民而存，且欲借以保存之，而非以破坏之。道德律之于人生也亦然，亦所以保存其生活，而非以破坏之也。故使从道德律而反有破坏生活之效果，则吾人宁弃形式而取内容，合作用而趋正鹄矣。[第134～135页]

良心之起原，此言良心之起原及良心之权威之起原。

（五）良心。吾前者论为风俗习惯之意识，盖即风俗习惯之存于各人意识中者也。而所谓良心之权威，则在监临人类全体，抑制其反对道德法律之意志，而因以为道德法律之保障。其于人也，始则为父母师保之权威，以风俗习惯中种种客观界之道德输之儿童者也。进而为社会之权威，其范围较大，以名誉诽议，表彰各人行为之判断者也。进而为法吏之权威……。良心之内容，随民族而异，种种民族，有种种本质状态，有种种生活条件，因而酿成种种风俗习惯。良心内容之不同视之，惟其形式则一致，不外乎以高等意志之意识，自各人内界，抑止其不合道德之意志。且恒以此高等意志，为超绝人间而本于神之势力焉。

良心原于神意说之理由。

主良心原于神意之说者，不惟以历史学心理学之解说为不完全，而且更以为危险，谓是直侵犯良心之神圣而杀其效力焉。即以历史学心理学

说明良心之学者，亦往往信以为然。来 P.Rée（所著良心之起原于一八八五年出板〈版〉）氏[1]研究良心之起原，而论以历史学心理学研究之效果，曰，由是良心之命令，失坠其神圣，凡知良心起于人为之说者，皆将违其命令而靦然无愧焉。

泡尔生此说诚哉其然。然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则非，知识固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夫所谓信仰者，必先之以知

虽然，余以为不然。良心命令之责任，固非恃人类学学说中伦理学之结论，若心理学之定义，所能使之破坏者也。吾人即确信伦理学之结论，谓良心者所以表彰国民渐得之经验，即道德足以维持人生，而不道德则足以破坏之，而良心之正当性质，并不因是而消失。然则吾人以国民之遗传知识为强证，而谓良心即道德之自然秩序，由客观而反省，岂遂以此解说，而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乎？且至于心理学说，无论其对于风俗习惯者如何，而亦不必有何等阻力。凡人精神之作用，受之于遗传若教育者，虽一旦证知其为谬误，为无理，而其势力并不即为之消灭，邃于科学者，或不能脱迷信之习，持无鬼论者，或冥行而恐怖如常人。然则此等固非写象及感情中谬误无理之原质，而实为其重要之原质矣。使人人无所谓道德及良心，而一切云为，皆决之于计较及顾虑，则国民殆不可以一日存，此尽人所

---

[1] 来氏，今译保尔·瑞（1849—1901），德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心理观察》《道德意识的起源》等。

识，知之而后信之。虽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称其人过甚之言，彼未有自认为迷信者也。彼自谓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坚，吾人乃指其坚信之状态，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为一种之信仰，既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凡知识必建为信仰，当其知识之时，即心以为然，此以为然之状态，即信仰也。吾人既由道

知也。虽大哲学家，未尝以道德哲学指导其日用行常，而为之指导者，冲动也，感情也，道德也，良心也，好善恶恶之情也。化学至进步矣，而人之味官嗅官，不因之而为具物。日常饮食，所以别甘苦芳臭者，仍恃味官嗅官之作用，且其精审，亦有为化学试验所不能及者。调和饮食，人皆承数十百年遗传之知识，而不必专依化学。化学之职分，在解说而不在发明，用以为改良饮食之指南，诚非无补，然欲废普通之嗜欲、遗传之知识，而一切本化学之理，以律饮食，则失之愚矣。世有欲屏除良心若风俗习惯之力，而专以道德哲学律行为者，何以异是。[第135～138页]

德哲学而知良心之内容，则其对于良心之服从也必更勇。否则，既知不信，必陷于矛盾，必彷徨而无适。由此以观，虑因论〈伦〉理学及心理学既明，必破坏道德秩序之正当性质固非，即泡尔生之以人虽明论〈伦〉理学与心理学，而仍不依之以行，仍依其固有之冲动及感情及良心，亦非至当之论也。

诚然，诚然。

发显[1]即本体，本体即发显，合无量数发显而为一大本

论者难曰，子言诚善，其如失不可思议之制裁何。余曰，不然。以余观之，人类殆必无以道跡及神圣之感觉为不出神意之一日。此等感觉，苟非有至深至久之基本，在宇宙性质中者，岂能无端而发现于人类之意识中耶。且人类之于世

---

[1] 发显，表现、显现、现象之意，为当时一些学者在哲学、伦理学上常用的翻译用语。

体，由一大本体分为无量数发显。人类者与本体有直接关系，而为其一部分，人类之意识，亦即与本体之意识相贯通，本体或名之曰神。

或人之说，必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神[1]以外尚有所谓神乎？吾研究良心之起原而知之，此问题已得于己矣，即当举其所得于己者而服从之。一切时空内百般

界，岂真若骈枝然，徒于其表面有偶然之关系，而与神之本质固无与耶。……

论者又难曰，良心之起原，既如经验论之说，终不免使人类有法律以外何所不为之思想。盖其初固以道德律而出于神之命令也，今若以神之有无为可疑，又或决神之为乌有，则举其所谓命令而唾弃之，非自然之势乎？余答曰，然，是诚自然之势，而决非真理也。道德律即如经验论之说，决非偶然断定之制度，而实以宇宙之性质及人类之性质为其根本也。其所谓良心，即道德生涯在客观界适合自然之性，而反射于各人之意识中者。其于保存生活既有最大之价值，岂以研究其起原之故，而顿失其价值。譬如古人，以人之言语为本之神授，今已知其说之无据，而言语之价值，曷尝为之消失耶。[第138～139页]

---

[1] 神，原文如此，疑为“己”字。

之事物，其应服从，价值无有过于此所得于己者之大。

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宇宙间各物之活动，各物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吾从前固主无我论[1]，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

---

[1] “无我”原为佛教名词，认为世界上没有物质性的实在自体（即“我”）的存在。其说又分两种：一为人无我，是说人身不外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结合而成，没有常恒自在的主体；一为法无我，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由种种因缘和合而生，不断变迁，无常恒坚实的自体。我国近现代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史时，往往把古代某些思想家强调重视“大我”、牺牲“小我”的思想也称为“无我论”。例如杨昌济发表于1903年《游学译编》第八册上的《达化斋日记》中说：“曰为己，又曰无我，何也？宇宙内事，皆吾性分内事，为己者为此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无我者无此也。”

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

此说甚然。一切人事悉自然也。

……盖进化论者，以一切人事，尽循自然之势而发展之，假定为其研究历史之起点也。彼福禄特尔[1]之流，辟除谬误之学说，而并其所说明之本题，亦斥为妄诞而无价值，则其说之不能成立，乃与神学家同。进化论者，确信普通存在之机关，必本于先天，而为关系于保存生活必不可无之机能。故以说明此等机能与人生之发展，有何等意识，侮科学之职分也。[第139页]

---

[1] 福禄特尔（1694—1778），法国哲学家、文学家。反对专制主义，鼓吹立宪政治，主张理性解放，政治自由。

（六）良心之分化。

…………

此段言精神之分化最佳。

自精神界历史界之生活，益益发展，而此等理想，遂益益现为特性者，为各体者。一切历史之发展，皆分化之作用也。学者之所假定，人类由原人分化，而为种种之人种及民族，遂各有其种种之风俗习惯，以示其精神之特性。及其进化益深，则各人之精神，亦由国民精神之本质而分化矣。民族之文化较低者，一族之民，种类大同，各人之写象、思想、判断、习惯、行为，凡精神生活之内容，殆无不同者。及其更进化，而生活内容，益丰饶而驳杂。各人构造之差别益大，人之有各自研究事物之思想者，以其不慊于国民之宗教神话中所谓普通生活之思想也，而哲学即由是起。一切哲学之原始，皆由各人之思想，与国民普通之思想相睽。而各人之判断，与风俗习惯之关系不固，则各人趋特别之方面，而形成为特别之生涯。自由之生涯日扩其范围，则羁束之生涯日缩其区域。各人之生活与他人之生活，益为不失其特别人格之关系，如亲子夫妇然，而与图式之法则，益多龃龉，于是特别之规则益发达焉。[第140～141页]

此真能抽出

……基督之宗教道德，较之当时国民之宗教

古今诸杀身成仁之豪杰之心事。

道德，至为高尚。其神之观念，较之当时国民之神之观念，至为高尚。见夫国民之所谓正直，乃皆可鄙可悲，而不足行之以自餍，遂与其徒，轶出国民规行之外，破安息日[1]之禁，废断食之制，而易之以互相亲爱之新命令，守旧者大惧，务保守其畴昔之规则，则遂与基督鏖战而杀之。然基督虽备尝艰苦，以身为牺，而其道卒占胜算，由其笃信建立慈爱新国为天命之说也。彼盖对于后世之渴望神国真理正直而欲得之者，感精神气魄亲爱自由之不足者，热心绍述其事业被磔被焚而不悔者，各示以至高之模范焉。[第142页]

诚然。

诚然。

凡有强大之天才者，可以为暴君，即可以为圣贤。格代所著之否斯脱Faust小说[2]，形容精神界由极恶而至极善之变化者也。其于第一篇，言否斯脱之为人，蔑视国民之信仰风俗，而惟以纵肆其大欲为的。……其第二篇，叙此穷凶极恶之人，转而为克己慕义之事，而其所以实现此观念者，尚若有所未副。盖以第一篇之否斯脱，而奋自救拔，则惟有趋至高尚之鹄的，而为大悒郁、

---

[1] 安息日，犹太教每周一天之“圣日”。该日停止工作，不举火做饭，专事敬拜上帝。“基督破安息日之禁，废断食之制”事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二章。

[2] 《否斯脱》，今译《浮士德》，德国歌德著，应为诗剧而非小说。

大竞争而已，以暮年至巨之防水工程当之，尚为不类。以格代之天才，而所叙乃止于此，则以大悒郁、大竞争者，为格代生平之所未经验，故以其远轶于主观范围之故，而不敢纵写之也。

袁世凯。

大恶与大善之两模范，其外界之舍风俗习惯而不顾，虽若相同，而其内界之关系于风俗习惯若国民者，乃大异。暴君之所以为暴君，蔑视风俗习惯而破坏之，徒以自肆其情欲，将以专有乐利而擅握政权也。……[第143页]

此节不甚当。

（八）义务语意之范围。关于义务观念者，尚有一二疑问。如有功之行为何谓耶？人类得为义务以上之事耶？义务所许可之行为何谓耶？义务所不命令亦不禁止之行为，将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果有对于己之义务耶？凡此等疑问，关于事实者少，而关于词义者多。区别其词义之广狭，而昭然若发蒙矣。

吾则以为，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

义务观念，以最狭之义言之，则吾人对于他人主张之权利，而定其当为及不为，如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是也。至其济人之急，成人之美，则在义务以上，以其出于自由之意志，初非如前者之有所谓责任也。以此义言之，则无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矣。……[第146页]

者，吾皆有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至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

当然，则是吾有救之之义务也。救人危难之事，即所以慰安吾心，而充分发展吾人精神之能力也。

为之则为有功，即宜以为之为义务，安有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之理。既认为圣贤豪杰之所为，即当认为普通人之所为，圣贤豪杰之所以称，乃其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之谓。此精神及身体之能力发达最高，乃人人应以为期向者也。谓圣贤豪杰独可为舍身拯人之事，而普通人

以义务之广义言之，则凡与风俗习惯及道德律一致之生活及行为，皆谓之义务。如有人揖我而问途，而吾不之告，是即违义务者。盖义务观念中，固有亲爱同胞之命令也。若乃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则在义务以上，为之则为有功，不为之亦无损于义务。盖圣贤豪杰之所为也，以此广义言之，吾人得有对于自己之义务，发达自己之能力是也。人若以疏忽之故而弱其身体，又或以懈怠放荡之故而伤其精神之能力，是亦违义务者。然义务之责人，乃有一程度，所行者在此程度以上，即为有功。于是义务许可行为之概念，亦可定。虽有当务之职分，与尽其职分之能力，而偷安而不之为，非义务所禁也。又如人虽别有当购之物品，而以佚乐之故，耗其金钱，此亦非义务所禁也。要之在寻常德行之范围中，小有出入，固为义务所许容焉。

可以不为，是谓圣贤豪杰之身心能力发达最高，而普通人不必如是也，岂为合于论理之言哉！

以最广之义言之，则行为之被许容者、与有功者，皆无自而区别。如基督教徒之责其子弟曰，汝当完全其道德，如在天之父然，彼等决不能轶此要求以上。是以神之前无所谓功绩，履行一切命令者，亦曰余尽义务而已。而人类终不能抵清净无垢之域，虽在圣人，亦且曰余不过无功之仆隶焉。[第146～147页]

此所谓义务直是法律，法律则止于禁人为恶，而不强人为善，岂道德上至要紧之义务而可如此哉？义务者，对己者也，对己之义务无有在一程度中止之理。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

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有当务之职分与尽其职分之能力，而偷安而不之为，即为义务之所禁。人别有当购之物品，而耗其金钱于逸乐，即为义务之所禁。何也？怠于当务之职分、缺于当购之物品，即对于具足生活有缺陷也。义务者，非仅有不为云云之意义，而又有要为云云之意义，非仅有消极之意义，而又有积极之意义也。

第六章　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

（一）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非截然相冲突者。……

……盖吾人之行为，皆由我之意志及感情之发动而决定，初未有以他人之意志及感情决定之者也。虽然，是说也，仍不足以调和利己利他之两种感情也。盖如彼之说，则所谓利己之意志发动，乃遂不能无直接利己与间接利己之区别，而间接利己者，犹是利他之意志发动也。是故吾人得决言之曰，无利他之意志冲动，则人生亦无自而成立，犹之无利己之意志冲动也。小而一人，大而社会，非兼此二者，殆不足以遂其生活焉。粹然之利他主义，与粹然之利己主义，皆谬误之道德原理也，悉本于谬误之人类学。彼等皆以古昔理论之各人主义为前提，以为人者，各以绝对之独立而生存，其与他人交际者，偶然耳。而人与人之交际，非利己则利他。持利他论者曰：利他之行为，道德也，其他或无善无恶，或为恶。利己者反之，曰，凡一人与他人之关系，皆求遂其己之利益而已。边心〈沁〉于所著立法原理之卷端，记一种直觉，即此二主义之基本也。其言曰，社会者，由各人集合而成之想象团体，各人者，其会员也。此等直觉，自十八世纪之季，德

然则兼此二者乃所以遂其生活，则仍是利己主义也，以利他而达到遂其生活之目的，不过易其手段而已。持粹然之利他主义者，其毫无根据，所不待言。持粹然之利己主义者，亦但为理论，在此多数个体杂然活动之世界中，决不能实现。虽不能实现，虽无此事实，而其意则仍在是；人类生活之本意，仍在发达其个体也。为达此目

的，乃求手段之奚择？择纯然利己之手段乎？初民及人之初生实择此手段，久之障碍甚多，乃舍此纯然利己而〔择〕人己兼利之手段，于是而人各遂其生矣。是故，吾人有时兼利他之手段者，仍以达到自利之目的也。

国民实际连合而生存固也，至谓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国

人已皆唾弃之。盖国民非想象之团体，而各人亦非想象之会员。国民者，实际连合而生存，其与各人之关系，犹躯干之于四支〈肢〉。四支〈肢〉由躯干发生，其有生命也，由于躯体之有生命也。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其有生命，有动作也，亦由于国民之有生命也。各人为国民之一员而动作，其所言，则国语也，其所抱，则国民之思想也，其所感所欲，则国民之感情及欲望也。而国民之所以存立，则亦由各人生殖及教育之作用，此各人与社会之关系之在于客观界者也。及其现于各人之主观界，若意志，若感情，则遂不复有自他之区别，此吾人所亲历也。惟道德哲学者不承认之，而乃有粹然之利己主义与粹然之利他主义，各不相容，要亦违于事实之谬见而已。征之实际，凡人皆未有单纯主义之行为，而其行为之动机及效果，常徘徊于利己利他二者之间，而其畛域亦稍稍泯灭矣。[第149～151页]

民之生活，若政治，若言语，皆人类进化以后之事，起原之时固不如是也。且此等后天之事，皆各人互相联合所作，以便利各人。先有各人而后有国民，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国民之生命即各人之总生命，乃合各〔人〕之生命而成，非各人之生命由国民之生命所派生也。至国家社会之组织既成，各人住于其中，不可离解。徒观其现在之状况，遂不免有国民大，各人小，国民重，各人轻之势。细研之，

实不如此。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故有此论也。

（二）以行为之效果核之。

…………

真理在此。

于是吾人得断言之曰，人之品性行为，有裨于一己之康健者，即有裨于社会之进步，有碍于一己之康健者，即亦有关于社会之退化，即斯宾那莎所谓吾人当以利己者利人是也。而转而求之，则凡裨益社会之公德，实行之者必足以增一己之安宁，而违背之者亦适足为一己之障碍，盖无疑矣。[第152页]

偷盗之不可为者，最大者为人格方面之关系。其次则为幸福方面之关系。偷盗为暗昧之行径，为卑劣之手段，为之，于其人格之尊

……觊不义之财者，常足杀其正直营业之性质。然恃诈伪以自存，则无论何时，皆濒危险也。由正当之职业而获利，足以自增幸福，若由偷盗而得之，则不足重。如曰不然，则虽仅仅为一次之偷盗，又能不浪费而保存之者，何以人人仍目为不义之财耶。全社会之是非褒贬，恒关系于各人一切之行为，人即一时幸遁之，而积久则终有受其裁判之一日。古今以秘密之行为而得幸福之效果者，未之有也。人皆知谨慎公正温良为对人之义务，然此即自求多福之道。人尝能推己及人，使亲戚朋友，皆得平和福祉，则其平和福

严立时破坏也。

祉之先，必反射于己。而以傲慢猜忌狡狯犷恶之行为，贻苦痛于人者，其苦痛之反射也亦然。由是观之，对人之义务与对己之义务，决非截然分立者。一身之安宁，与家族社会国家，互相错综。能自尽其义务者，即以增社会之安宁，而为社会尽义务者，亦即以增自己之安宁焉。[第153页]

（三）以行为之动机核之。

……人之意向，或关于性质，或关于生活，其因已多。而临时事状，又包有直接间接之请求、怂慂、谏止、赏誉、诽讥之属，则尤复杂矣。为农夫者，耕耘获积，穷年而不倦，由于利己之动机耶，抑由于利他之动机耶？此无谓之问也。使吾辈问农夫曰，汝之勤于田园也，为己乎，为人乎？彼将以问者为妄诞，否则将答曰，不如是，则田园将芜也。曰，田园何以不可芜？则曰，是农夫之耻也。彼其所以治其家者亦然。自伦理学者考察之，则知农夫之勤于田园以益井里，教其子弟以助国家，悉出于彼之所自愿。彼又务增进其生计界之动力，使必举彼之行为而区别之，若者为己，若者为人，则竟有所不能。要之种种行为，均为己而亦为人，合有意识及无意识之鹄的为总量而决定之者也。凡举各种行为而别之曰，若者为己，若者为家族，若者为社会，是与计快乐之数量者同，皆伦理学家误以概念之

事实本无区别，惟概念有区别，以为便利言语记忆计也。道德之本质，本一人因其适用之方面，而有公私、

大小乃至善恶之分。不仅道德为然，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类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1]构成之，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有差别而后

区别为事实之区别者也。[第153～154页]

---

[1] 差别相，佛教术语。《大乘义章三本》曰：“诸法体状，谓之为相。”差别相，即有高下深浅分别的相状。

有言语，有思虑，无差别即不能有之——吾人所为事实之区别，固非尽当矣，而概念之区别不当更多。所以然者，以其断语系徒观于适应方面之外观状态而下之，如公德、私德之类是也。此种错误，吾人不可不知之——

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

成矣。

此节议论透彻之至。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1]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

---

[1] 实现自我，这是当时从西方传入的“自我实现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自我实现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英国哲学家格林（1836—1882）。杨昌济在《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及概评》中介绍这种主义时说：“充实自我具有发达的可能性，谓之实现自我。以实现自我为吾人行为之最高目的，谓之自我实现主义。”

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其余各种之事亦然。技术家之为技术，虽系为生活起见，而当其奏技之时，必无为人之念存于其中。庄子曰：“瘽瘘丈人承蝉，惟吾蝉翼之知。”[1]凡天下事所以成，所以成而有价值者以此（即一片浑忘人

---

[1] 语见《庄子·达生》：“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痀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吾处身也，若厥株枸；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己差别，惟注事际事物之真诚)。

天下事之所以败，所以无价值者以此。真伪之所分，即优劣之所分也。

其在学者及美术家、政治家，何如乎？凡学者当其七十生日若其他令节，则世人所以颂祝之者，必曰，是人者，为国民若人类之幸福而尽力者也。而其人亦或以此自表。如伏尔弗[1] Wolff自序其所著之书曰，吾爱人类，吾书皆为利人而作云云之类是也。夫伏尔弗之言，余非不信，然吾抑不知彼著书之初，固尝先提一人类幸福之问题，次则计划其何以利人类者，乃始发见其所谓理性之思想，而后执笔而书之耶？是不能无疑。吾意伏尔弗必先得一问题，而务欲明辨之，继则既得明晰之思想，而欲以笔达之。于是时也，时而思透彻其论，以邀读者之激赏，学术杂志之表彰，抵制反对者之攻击，其愉快为何如；时而思尽力发挥真理，则得使利益人类之认识，益高其价值，因而成此多种之著作也。夫由此种种之希望而著书，其所著之书之价值，并不因之而贬损。至于为专利人之鹄的而著书者，亦不必无远劣于好名者之所著也。叔本华者，素不措意于他人之利害者也，其著书也，皆欲泄其所窥见之大

---

[1] 伏尔弗，今译沃尔夫（1679—1754），德国哲学家，他把哲学划分成一些呆板形式的学科，并宣扬独断主义，因而后来受到康德和黑格尔的批评。

秘密。而公之于世，未有以利人为鹄的者。彼之著作，如诗人之行吟，美术家之奏技，自实现其精神界之秘妙而已。夫使世界有我而无他，则一切著作，诚皆无谓。无听者则演说家必不启口，无读诗者则诗人文士或未必下笔。然当其经营之始，固不必专为他人设想也。格代尝语伊克曼[1] Eckermaun 曰，余未尝以著述家之责任自绳，如何而为人所喜，如何而于人有益，余所不顾也。余惟精进不已，务高尚余之人格，而表彰余所见到之真若善而已矣。[第 154～155 页]

此吾犹有疑问。吾疑消极之自杀，亦系为自存。因彼于遇事不能解决或愧悔其前日之罪过，以谓与其生不如死，故以一死了之。此生不如死一念，即彼之自我也。虽在吾人视之，难解之事

……凡致身者，亦所以自存也，所以存其观念之己也。彼之不惜以生命为牺牲，乃欲存其大于生命高于生命之己也。消极之自杀，无关于自存，不得谓之致身。凡所谓致身者，皆含有利己之元素者也。所谓舍己殉人者，矛盾之言耳。致身者无不图自存，其所以舍财产若生命而不顾，则以其所保有大于此焉者也。反之而小人有以货利之故而卖其朋友、若名誉、若祖国者，彼固非有恶于朋友名誉祖国，特以贪货利而为之。故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之幸福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盖观其所见幸福之价值，而得以定其最深之意向矣。[第 156 页]

---

[1] 伊克曼，今译埃克曼（1792—1854），德国作家，歌德晚年时的助手和挚友，著有《与晚年时的歌德谈话录》一书。

可努力以解之，可愧悔之罪恶可努力以改去之，自存尚自有道。然在彼人之见，则不如此。彼既不此，乃实行彼之所见，亦非不可也。至于有主义之自杀，其为自存有价值，更不待论矣。

君子小人之别，在其所见幸福之高下如何，而人格之高下随之。此语甚然。君子小人于欲发显自我一也，不过其识见有高下之别云耳。识见有高下之别，故手段有高下之别。吾人评判其人格，因而亦有

高下之别。彼固不自知也。彼自视其人格，其高诚不可几及，及出与君子比而始见其低焉。彼于卖友卖国并不见为罪恶，其罪恶之见，乃吾人比较之于不卖友不卖国者而得之。故吾谓天下无恶，有之则惟次善，天下无恶人，有之则惟次善之人也。

以物理学比甚切。

评判之功用大矣哉。

物理学者，尝言宇宙间无一孤立之点，物质世界之各原质，皆与他原质互相影响。道德世界亦然。各人之行为，必有影响于全道德界，而全道德界之现象，亦必反应于各人之行为。……一切现象，皆互相关联。无论何人，于他人之行为，不能毫无系属，其见闻他人行事也，辄判断之，或以为善，或以为恶。而一切判断之效果，即为对于一切行为而助进之或阻碍之舆论。盖人人以为他人行为皆与己有直接之关系，而或推之

或挽之焉。

发问。

然则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之区别者，果无谓之至耶？行为之动机，果全无差别，可被以利己若利他之名者耶？

曰否，余意非谓此也。吾人所遇之事，己之利害与他人之利害相冲突，或近似于冲突者，盖往往有之。于此时也，非损人以益己，则必屈己以利人，此其大有关系于道德之价值也无疑。虽然，人我利害之冲突，利己利他两动机之矛盾，非正则而变则也。以正则言之，利己利他之两动机，固一致矣。生存之道，非如多数伦理学者所说，物竞日烈，终无平和之一日。盖人人虽未能骤脱于物竞之范围，固已有多数之人，不待为激烈之竞争，而能生存者。处健康之家族，厕秩序之社会，尽正则之职务，则所经验者，大率人己两利之道，鲜有迫于非损己不能利人之境者焉。

人己两利之道即互助。

（四）道德之判断。……为损己利人之行，而果有利于人，则无论其事如何，不能不谓之善、谓之义务矣。虽然，吾人其以他人小利之故而弃吾重大之利益耶？欲塞病者至小之希望，或少杀其病势，遂牺牲吾之财产、若健康、若生命，以供之耶？是义务耶，是即非义务而尚为盛德耶？且吾人其当牺牲吾亲子兄弟之利益，以充他人之希望耶？平心而论者，必曰否。父子兄弟与我之关系，视他人为密切，吾以徇他人希望之

此与吾儒家之伦理学说合。

与墨子之兼爱亦合，因墨子之兼爱系互助，并非弃吾重大之

利益而供他人之小利，乃损己利人而果有利于人也。

故而损吾父子兄弟之安宁，是非特不合于义务，而反背之也。是故人仅仅能牺牲其性癖若利益而已，未足以为善。必其能以此而增进他人重要之利益，乃为善耳。牺牲其身以救他人之生命，以殉国民之公益，是为大善。不能自制其欲，因而陷他人于不幸，则恶也。[第156～158页]

此即儒家之义。

……余之义务，以余职务地位之所属者为第一，由余与他人特别之关系而生者次之，由余与他人因偶然之关系而生者又次之。若后者之利害，视前二者为重大，则余当自离于重心之己，而特别为之尽力。此吾人于事实界所易决者也。譬之人之以他人之环列其周者，为有向心力之众球，则视其去我中心点之距离，而定其动力所及之率。……[第159页]

互助。

爱群性为自存之要素，诚然。

（五）进化论伦理学说与利己利他两主义之关系。……人类所以占优势于生物界，而毒虫猛兽不能为害者，全恃其有结合社会互相维持之能力，若言语、若悟性、若器械之发明，皆属焉。凡合群力以达一共同之鹄的，其力莫大。由是而爱群性遂为自存之要素，因而演为各种性质，如信义、友悌，及牺牲私利以徇公益之类，皆是也。即此种种性质，而求其最固最深之根据，则即在服从社会亲爱同胞之性质，故能实行社会之

道德，而不为自然所淘汰，且争存于各民族间，而特占优胜也。……[第160～161页]

诚然。

实在如此。

……人类即未有互相亲爱之情，而仅为利己感情所驱迫，亦将循秩序而共事。如今之商工社会，相疑相嫉之情，远多于畴昔之农夫是已。畴昔德国之农业，业主与佃人，无连合，无诈欺，不行险侥幸，不倾轧同类悻一家财政，鲜有与他家相关者。及通力合作之制，日益复杂，而互相轧轹之点日多。试问今日种种社会，其轧轹最甚者，何在乎？官吏乎，教员乎，僧侣乎，抑又农夫乎，兵卒乎？是人人所能答也。此其故，由商工社会，远不如农民之质朴，一方面虽若增其友睦信任之状，而一方面乃增其嫉妒猜忌之心也。

不和之原因在此。

斯宾塞尔之说，以家族关系之发达为论据。余以为家族之关系，亦向两方面而发展。当今之世，恒有不和之家族，为古人所不及料者。盖自各人之特性，日渐显者，则彼此好恶憎爱之情，亦日益剧烈，此自然之理也。观夫山野群居之禽兽，平和度日，远胜人类，则思过半矣。[第163页]

此说甚是。

……夫未来世界，即使其最高尚之幸福若道德，而过去之人类，并不因是而失其所谓幸福道

德也。彼等之生涯，不特最宜于彼等，而尤为人类进化所必不可少之状态。此其状态之不失为有价值，亦犹人类于幼稚时期，以嬉戏为乐者，亦不失为有价值之时期也。……[第164页]

第七章　道德及幸福

此章说得最好。

…………

（一）论道德之影响于幸福者。善者得福，恶者受祸，是一切国民所据为第一原理，以为考察道德界一切事物之根本者也。此等确信，由彼等生活经验之结论，两常表之于俚谚之中。斯弥得L.schmidt所著希腊伦理学第一[1]，凡希腊人之俚谚及文词，关于此义者，网罗无遗。且为之序曰，人类之运命，至公至正，善人受赏，恶人受罚，此希腊人最确实之信仰也。[第164～165页]

吾国人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2]。"

……一切事物之性质，皆有道德与幸福相结合之力。然其幸福之概念，偏注于内界之性质，盖谓德行直接之效果，不必在外界之幸福，而在内界之幸福，即所谓内界之平和也。外界之幸福，不必为仁人君子所必得，而要其德行，固

福德同一。

---

[1] 斯弥得今译施密特。19世纪德国哲学家，著《希腊伦理学》，"第一"指该书第一章。

[2] 语见《尚书·伊训》。

已有吸收外界幸福之力。且即使外界之幸福，终不可得，而内界之幸福，则固可操卷矣。此等原理，即近世伦理学之大势，亦与之符同。[第166页]

乐天主义与厌世主义孰是，将厌世者是而乐天者非乎？余以为不然。

诚哉，诚哉。

凡各人各国民所持厌世之思想，在乐天主义中，固有说以调和之。夫吾人诚不能谓善人必无遇外界之不幸者，如慎于卫生者，间或寝疾；而习于纵欲者，或反健康；君子固穷，而小人得志；忠荩之臣，恒为君主所憎疾，而便佞者则宠禄及之，此诚人世所不免。然此等事状，恒使世人异常注意，而为之不平，岂非明示其不合于普通之规则，而当为变例耶。凡以轻薄纵恣之故，而夭逝其身者，人皆以常事视之，曰是固然。然使以守义持正之故，而遭际困厄，甚而至于死亡，则人无不叹天道之难知者。贤者进，不肖者退，人皆习以为常。至如素行不轨而忽致巨富，则人将永以为口实，是岂非人世之常态耶。[第167页]

如袁政府。

故无论何时何地，苟有一社会焉，为奸佞者所把持，则其间正人君子，必不为人所敬爱，而转受轻蔑凌暴之待遇。然而奸佞之徒，势不免互相冲突，举全社会为怨毒之府，而土崩瓦解之势

成矣。……[第 168 页]

至论。

……实行道德者，仅以道德为其鹄的，即使外界之幸福，不与之偕，其感觉之部分，若有所苦，而要之实行道德，即精神之幸福也。斯宾那莎曰，幸福者，非道德之应报，而即道德也。是也。……[第 170 页]

（二）论幸福之影响于性格者。

德国是也。

……幸福与成功，常易使人自足，而流于骄慢。享幸福者虽尚明于评人，而常昧于自知，自夸其功，而视他人之沉滞坎坷，则以为无能。于是见他人之勤力而不之重，见他人之困厄而不之怜，日肆其骄侈，而遂为神人所共愤。凡战胜而骄者，常轻蔑邻国，凌其弱者，虐其所败者，自以为安全无患，而一旦复亡随之矣。[第 171 页]

由一人而推之于团体若国民、社会、党派，亦然。苟其共享幸福，则衰亡之兆见已。彼将由是而失其自知之明，耗其实力，驰其节制，卒也颠覆于其素所鄙夷之敌人。盖世之可畏可疾者，固未有过于矜伐而骄奢者也。

振聋发聩之言。

幸福者衰亡之媒，其证据如此矣。而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乃适以训练吾人，而使得强大纯粹之效果。盖吾人既逢不幸，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渝之气节，皆得藉以研炼。故

意志益以强固，而忍耐之力，谦让之德，亦由是养成焉。幸福者，常使人类长其互相冲突之性质，而不幸者，则使人类以温和、含忍、正直之性质，互相接近。夏日旅行，忽逢骤雨，则虽互相疾视之人，相与同止于亭轩，而谈笑无猜。其在一都会、一国民，遭大不幸，则虽平日相憎相慢者，皆同心协力以御侮，皆其证也。最高尚之道德，非遭际至大之艰苦，殆未有能完成者。……[第 172 页]

世盖有不满于现在世界，而驰想于其他之极乐世界者，无论其想象之无据也，即使果如其所想，别有天地，而容彼居之，恐彼转记忆其素所嫌忌之世界，而以为较胜矣。世尝有厌其故国而迁居海外者，未几而乡思顿生，乃悟一身与故国之关系，至为密切。今之持厌世论者，亦然。苟使彼暂离大地，居于星界，其思慕故土之思，将油然而生，而悔其持论之不衷矣。[第 174～175 页]

吾人平昔即有此情形。

此章论及哲学问题，颇好。

第八章　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一）道德宗教历史之关系及其因果。……[第 175 页]

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

……神为傲慢之敌，故即为道德之保护者。凡人类之无势力者，无权利者，漂泊异乡者，羸弱者，尤为神所呵护。如人有侮慢宾客若老幼者，则神必罚之，此其所致意者也。

此段言宗教与道德关系之进化，颇好。

抑考求宗教道德之关系，更有进于此者。吾人于一切宗教得谓之对于超绝之实体而信仰者。凡宗教，皆以不满于经验界所见实体之感觉为前提。魔术教及偶像教，亦因豫想有超绝之势力若实体为自然势力所不能达者，乃欲以魔力达之。自人类之生活进化，而意志亦渐趣于精神界。……[第 176～178 页]

有形式无内容。

于是道德与宗教之关系可知矣，二者同出一源，即热望其意志之达于美满之域者是也。惟在道德则要求之，而在宗教则实行之。盖圆满也者，在道德界仅为抽象之叙述，而在宗教界则为具体之直觉也。……[第 178 页]

（二）论其内界必然之关系。……

世界观之截然相反对者二，其一以善之在世界，最为重要，所谓现实者自善而生，亦即为善而存。吾得取柏拉图世界以善之观念为基之语，而名此见解为观念论世界观。人类所以有神之信仰，则即以善为世界之基本及鹄的故。如菲希的所谓世界秩序最终之基本即道德者，是也。……

此即哲学界之两大潮流。

吾人于此两相反对之世界观，必不能无所取舍，而取舍之间，于其意向及处世，不能无关系。其人有观念之内容者，必倾于观念论世界观，其人仅有物质之生活者，必倾于惟物论世界观，此为自然之理。盖意向为本，而世界观为末。故以生活规定信仰，而非以信仰规定生活也。菲希的曰，人之择何等哲学也，视其人为何等人。信然。人苟殉无意识之冲动，而肆目前之嗜欲，则又安得有高尚伟大之世界观耶？人之判世界之价值也，视人生之价值；而其判人生之价值也，视一己生活之经验。苟其一己之生活，仅仅殉无意识之冲动，肆目前之嗜欲而已，则其视世界也，谓不过原子之离合聚散，亦固其所。若乃对悠久之鹄的，伟大之观念，而生活焉者，则必先知一己之生活，次则知人类之生活。既而知世界之若是其高尚，若是其伟大矣，若而人者，知历史之生活为有意义。且现实界全体，实与一

言者，心声。心声者，其心之本质所具之能力之所发。

己之意向，循同一之方针而进行也。盖一己生活之价值，与全世界价值之影响，有如此者。[第182页]

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生活之影响于信仰也如是，而信仰则亦反应于生活。人即信善之有势力矣，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吾敢言人之处斯世也，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未之有也。一切宗教，以信仰为基本。其师若弟，以信仰战胜于世界。古今来殉教者，终身为观念而生活，抵抗诘难，阅历艰险，甚至从容就死而无闷，诚由善必胜恶之信仰也。……[第183页]

寅畏之情。

（三）论宗教与科学之关系。

…………

此等寅畏之情，即为宗教之泉源。寅畏者，含抑损依赖二义。抑损者，念宇宙之无限，而自视等于蜉蝣。依赖者，悟宇宙非徒有强大之威权，而实有大生广育之能力，是谓宗教之感情所自起。……[第188～189页]

在分业。

（四）不信仰之原因。或曰，正人君子，固亦有不信宗教者，且有持不信宗教之说者。何故？余曰，是固有之。请言其理。宗教之资性，在人本不能无强弱之差，而智力及意志发达过度

者，或亦障碍其高尚自由之感情。有大算学家，闻人说诗而不怿，曰，是何所证明者。是由其日事证明之业，不涉自余兴趣，积久而自算学以外，几不知为何事矣。达尔文尝语人曰，吾感受诗歌之能力，随年而减。无论何人，苟终身注全力于科学之研究，鲜不如是。又或热中于实践问题，则其余不与此相关者，多淡漠置之。是其人虽不失为正人君子，而要不得为正则之发展。盖彼于内界生活最重要之方面，所谓最优美最高尚最自由者，不能遂其发展之度也。今之人类是者特多，盖今日之长技，如分业分科，及以机械之理证明生活状态，是皆助偏颇之发展。而多数学者，乃转以近代之特色夸之。古代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学者，十七、十八两世纪之思想家，其观宇宙也，不类于方今学者之狭隘。凡偏嗜一事物一职业者，其发展必不可免偏颇，诚不如古昔时代之生活，其一方面之动作至简，而方面特多。人类与事物，关系繁赜，以故想象则活泼，感情则丰富，而发展亦自平等也。今日分科之习，最为减杀宗教感情之助力，而尤以科学之分科为甚。在客兰因[1]Krain钟乳穴中之蜥蜴，以视觉之无用，而驯致无目，是生物学公例，所谓不用之机关必消失者也。……[第190～191页]

泡尔生固注重内界修养者，所以挽救物质文明之弊。

不错。

---

[1]　客兰因，地名，位于亚德里亚海东北端，今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境内。

（五）灵魂不灭之信仰与道德之关系。

诚然。

……盖灵魂不灭之信仰，虽大有关于生活全体之状态，而于道德哲学则不然。无论死后之生活，为有为无，其于伦理学之规则，一无变更也。道德律者，此时代此地球之人类，所以为历史生活之自然律者也。假令此世之生活不过为死后生活之豫备，固当循道德律以营之。其或仅有此世之生活而已，直无所谓死后之生活，则道德律之当循亦然。盖循道德律以营此世之生活，其应报即在此也，初不必别索之于死后也。[第191页]

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

余意以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由此义而引申之，可得一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

时间者何物乎，其现实自有之形式乎？果尔，则凡时间所有者，将即为现实所有之条件。或且曰，必现在所有者始为现实所有之条件，何则？非现在者必为过去或未来，过去者今已无之，未来者今尚未有，故不能不专属之于现在也。虽然，进而求之，则几无所谓现在。盖吾人所谓现在之一瞬间，固已一瞬而过去。是故现任者不占空间之一点，现在所有，不可谓即现实所有之条件。苟现实而不消灭乎，无论其为过去为未来，将无非现实。故时间所有者，非即现实所有之条件。当如康德之说，时间者非现实存在之形式，而吾人感官直觉之形式也。吾人之意识，

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来〈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身体精神两俱不灭之说，至此乃可成立，岂非别开生面之世界邪。

吾意时间观念之发生，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之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设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此可证明无所谓时间。地球之绕日，但为空间之运动也。

与此直觉之形式结合，而后现为时间之经历，其本体则固永永连续者，乃作随死而灭之想，何其无谓耶。生活者，决不随死而破坏。此世之生活，既为现实不灭者之一部分，则决无消灭，决无变化。如加里马尔 Karl Moor 所谓枪弹一发，则贤与愚、勇与怯、贵与贱毫无差别也者，又何其无谓耶。死者虽能妨此世生活与未来之连续，而于生活之内容，决不能变化而破坏之，盖现实者固有永不可变化若消灭之性质也。[第192～193页]

余曰：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

论者或曰，现实者，全无意识，而我亦无之。且我既无意识，则人亦无之，然则我之与实在，有何等关系耶？

不能证明。

不敢谓。

时间意识必立其根本于实在意识，而后可以说明其发生及存在。

余曰，是不然。论者果有以证明现实之必无意识乎，否则何以知实体者必不有其本质内容之绝对意识耶？将古今大哲学家所公认之见解，皆不免误谬耶？神之意识，与世人之时间意识不同，故人无从而思惟之、写象之、叙述之，然吾人遂敢谓自可思惟可写象可叙述者以外，固必无一物耶？且何人敢谓斯世之时间意识，必非永存意识之一部分，而凡具有时间之实在，必非永远实在耶？如曰不然，则论者又何以说明时间意识之发生及存在乎？[第 193～194 页]

据基督教之信仰，而以哲学之术语表明之，其义亦然，基督教所谓永远之生活，非感官时间之生活，而超乎感官及时间；不由衣食成立，而由不可思议之庄严福祉成立之者也。自斯世生活之终，而本质不复有状态变化之事。盖时间之中，不能有永无变化之生活，故死后则必无时间

之生活也。基督教之信仰，不惟以抽象及消极之作用，表彰永远生活之超乎感官时间而已，乃又举超绝感官时间之生活之思想，而以感官时间生活之形式写象之。其所谓天国，有黄金之衢，珍珠之门，有被白衣手棕枝而赞美神父神子之天使。其所谓地狱，则举人类所嫌恶恐怖之事物以构成之。是等皆心象也，而又不止于心象。虽脱离感官世界，而尚不免有此等执著，是信仰之特质也。信仰者，右掷而左拾之者也。一切宗教信仰，常徘徊于感官及超绝感官之间，彷徨于想象与思想之中。其所谓神，一方面为超绝时间感官，而溥博无限，悠久不变；一方面则又为有限之实化，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是以言动忧喜之属皆具焉。多神教常界诸神以人类感官之性质，至为自由。故在美学界，极美满之观，是吾人今日所以尚惊叹于希腊诸神也。自基督教兴，而始于感官世界之内部，有特别之关系，以其在思惟想象久已分离之时代。……[第194～195页]

余曰：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时间感官者即超绝时间感官者，想象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

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

第九章　意志之自由

（一）意志自由问题之历史。……

此说吾赞成。

自昔论昔，咸以形而上学中意志自由之义，为哲学中最难最大之问题，而余则以为不然。……

希腊哲学，并不以此为固有之问题，不过有偶然之辨论而已。盖希腊哲学家，大抵以人类为自然界之一部分，因而循夫管理自然界之普通适合性，固无疑也。[第197页]

人为自然律所支配，与予见合。

（二）以事实评意志自由问题。

……盖人者，父母之所生，与禽兽同也。身体精神，皆肖其父母，其气质、性癖、感情、智力，皆为父母所遗传。而其所属国民体魄精神之习惯，又从而濡染之，未有能自定者。且如人类男女之异体，其原因虽未之详，而决非人所能自主，然则人类不能脱自然律之管辖，固已明矣。[第200页]

总之，自我之构成——皆须待外界之资料，

……社会者，常以言语行为，示人以邪正敬肆可否之分，常以一定之职分命令之，或要求之，曾有何人能不为时代所指使耶？建筑家之所营，非其所欲，而时代之所欲。如第十四世纪，

吾人一毫不能跳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

吾尚疑人是始终无能力者，虽精神发展之后，亦曷尝不为自然界所规定耶？

吾既作上文所言之后，又得一种之意见如下：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

行峨特式，及第十六世纪，行文艺复古时代之式，及第十八世纪，而行科学式，是也。学者亦然，其于科学问题也，非自择，而为时代之所择。……[第201页]

……凡有机体与无机体之区别，在前者之构成，由外部机械之作用，而后者之构成，由内界原理之动力。如雕刻品，可以锥凿成之，而于有机体，则凡器械之作用，仅能破坏之，而不能构造之。故人类者，不成于外界之机械，而成于内界之作用。吾人意识之所以告吾人者如是而已。初不谓一切特别之阅历，皆无因而生。又不谓生涯中一瞬间经历各事，皆与一切已往之事无关。又不谓内界之原理，即所谓小己者，全无原因。又不谓小己者，由孤立之原质而发见于斯世也。盖吾人之身体，本由物质演成，惟既已发育为有机体，则当其发展之初期，虽大受物质之影响，而及其进化之程度渐高，则渐能抵抗物质之势力，遂能由其意志而变更外界密切关系之事状，且能间接自变其形体也。由是观之，吾人意志之所告，曷尝与前论相矛盾乎。[第202～203页]

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自然若除去吾人，即顿失其完全。吾人之于自然也，若个人之于国民，然个人受国民种种之影响，而即为国民之一部分，国民除去个人亦失其势力矣。审此则吾人仍有责任，仍有自由之意力。吾人种种之智识、社交，均为父母与朋友等外界势力所酿成。诚然，然要须吾人自具有可以酿成之本性而后能也，完全之外铄将恶乎附丽哉？此可以酿成之本性，吾谓之可能

性，有此性，吾人于是乎有责任矣。

（四）人类自由之定义。

定义。

……观念中所具规定一切特别动作之能力，即吾人所谓自由意志也。是故自由行动云者，谓其行为之所由规定，在正鹄及理想，在义务及良心，而不在一时之刺戟若欲望而已。

此以进化说意志自由。

彼夫动物者，自然界阅历之辙迹也。其于自然界，尚为被动于外界刺戟之部分。进化而至人类，则稍稍能轶出自然之势力范围，而位乎其上，于是能规定自然而利用之，而不为自然所规定，是则所谓人格也。人类所以能自主于一切行为之顷者，以此，其对于行为而有责任也，亦以此。

第二天性。

论至此，则知本此义而认为自由之意志者，非人类本质所固有，而得之于练习，固甚明矣。……[第209页]

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

……惟人类是等能力发展之程度，至为不齐。其余为动物冲动所左右，而不能抑止之者，为粗暴鄙野之人。其或全无此等冲动者，则又为枯寂酷薄之人，皆非中正之道。盖人类者，位于动物之实体及理性之实体之间者也。[第210页]

克己与修养之方法。

此教育万能说[1]之原也。

然则人类果能如其意志以成己乎？是问也，然之可，否之亦可。其所以为然者，盖人人有自教自助之能力，故于一己之生活，无论其为外界者，为内界者，皆得以有意识之作用，循其所抱之理想而构成之，而于其自然之冲动，常能压服之而整理之。惟其事非能恃单纯希望若决意之力，必其省察涵养，积久而不息，而后能之，与体育无异也。……达摩士的尼[2]Damosthenes希腊人之以雄辨名者也，相传其始甚讷于口，然立志为演说家，刻苦砥砺，卒达其志，而垂大名于宇宙。吾人欲训练内界之性质，亦不外是道也。如人有易怒之癖者，自知其非，而欲抑制之，非必能猝然而效也，宜资于适当之预防法以渐去之，如屡避发怒之机会，则积久而怒癖渐去，此即生物机关由闲散而消失之理也。其或必不能避，则时时举妄怒之所以为凶德，克己之所以为美德，而反复寻绎之，毋使遗忘，则怒癖亦渐消焉。由是观之，人类之能本其意志以化其本质也无疑。……[第210页]

意志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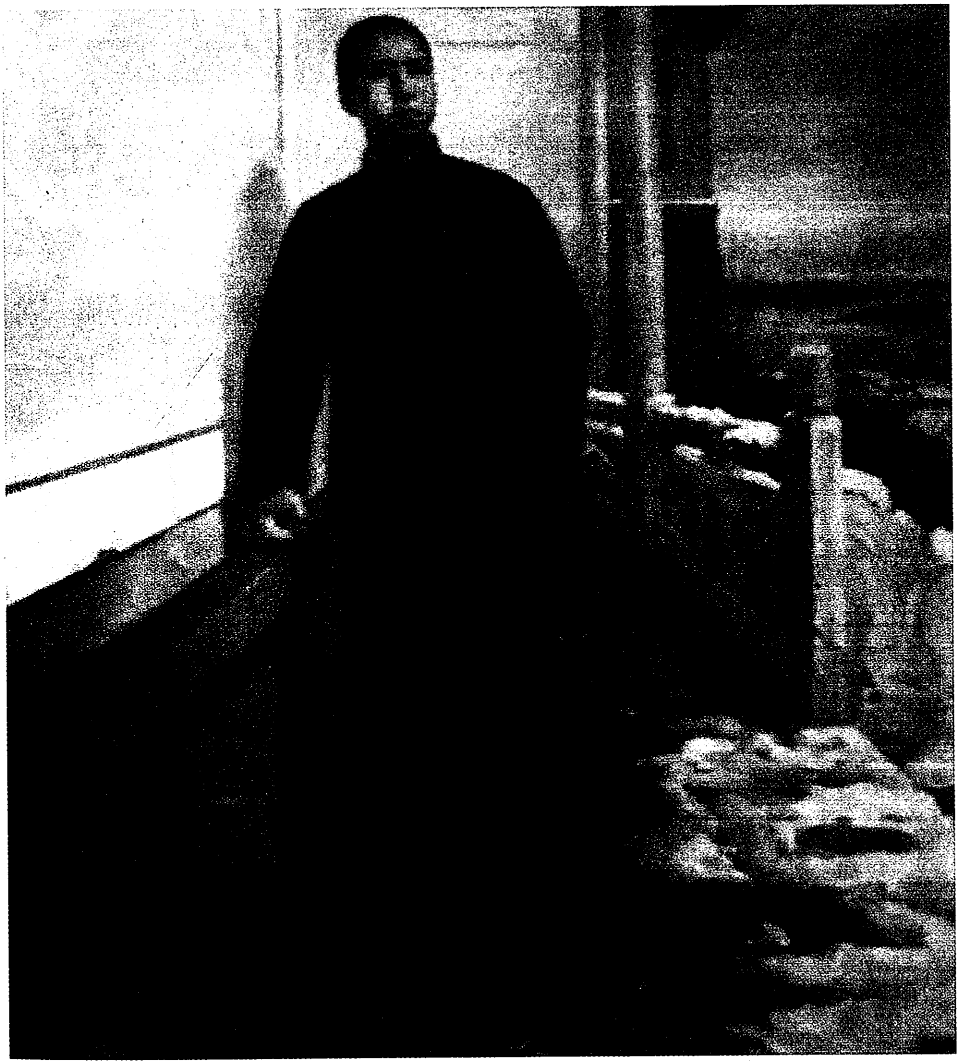
心力。

---

[1] 教育万能说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提出的一种教育理论。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介绍这种学说时指出："世人犯罪恶为不道者，毕竟理性不明，不辨是非善恶之使然。故广兴学校，改良教育、教授之方法，明人人之理性，乃今日尤要之事也。"

[2] 达摩士的尼，今译德摩斯梯尼，一译德摩西尼（前384—前322）。古希腊雄辩家、政治家。晚年竭力反对马其顿人入侵，后失败自杀。

1918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油画）

夜学招学广告[1]

（1918年3月2日）

一去年旧学生愿来者，至师范号房报到；

一新学生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至师范号房报名，报名时写明姓名住址职业年龄及门牌；

一阴历二月初五日上课，报名时各带笔墨，来师范下首国民学校内听讲；

一每夜七点钟起，九点钟止，听讲两点钟；

一今年每星期六夜，夜夜上课不间断；

一不收学费，有讲义发；

一夜学每夜上课，如有空位，准人随便听讲。

---

[1] 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夜学日志》第1册3月8日日志收录此文时有如下说明：“先是三月二日毛君泽东代拟出广告，兹录于后。”此件后来又收入1918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贰号纪事录》中，个别字有出入。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第八班合影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第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七古[1]·送纵宇一郎东行[2]

（1918年4月）

云开衡岳积阴止，
天马凤凰[3]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4]才，
山川奇气曾钟[5]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
鲲鹏击浪从兹始。

---

[1] 七古，七言古诗。每句七个字，句数不限，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不像七律那样讲究平仄对仗。

[2] 纵宇一郎东行，纵宇一郎，罗章龙在1915年同毛泽东初次通信时，就已用过的化名。1918年4月，罗去日本临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这首诗送行。罗到上海恰好碰上5月7日（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最后通牒的日子，限期要袁答复承认日本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日本政府警察侮辱、殴打中国的爱国留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因此没有去日本。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被开除出党。后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3] 天马凤凰，指岳麓山东南、湘江之西的两座毗邻的小山。

[4] 屈贾，战国时楚国屈原，汉代贾谊，皆极有才华。

[5] 钟，聚集。古人认为山川灵秀之气所聚集处，易产生人才。

洞庭湘水涨连天，
艟艨[1]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
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
要将宇宙看稊米[2]。
沧海横流安足虑，
世事纷纭从君理。[3]
管却自家身与心，
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4]
诸公碌碌皆余子。[5]
平浪宫前友谊多，
崇明对马衣带水。

---

[1] 艟艨，通作“艨艟”，战舰，此指轮船。

[2] 宇宙看稊米，把世事看作平常。稊，草名，结实如小米。稊米，形容小。

[3] 世事纷纭从君理，据罗章龙说，作者原诗如此。1979年罗在《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一文中第一次提供本诗时，觉得有负故人厚望，改作“世事纷纭何足理”。后来他曾表示恢复原诗句。

[4] 名世于今五百年，名世，著名于世。《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5] 诸公碌碌皆余子，诸公，指当时的当权人物。碌碌，平庸。《后汉书·祢衡传》：“常称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余子，其余的人。

东瀛[1]濯剑有书还，
我返自崖君去矣。[2]

---

[1] 东瀛，东海，后也指日本。

[2] 我返自崖君去矣，典出《庄子·山木》：“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反通返。

学友会五月十日事录[1]

（1918年5月29日）

五月十日，职员毛泽东等，将本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2]二君，代理保存。一年会务，即以此日结束，前任职务终了。先是，本期始业，二月十九日开职员会议，会务赓续进行。大体计画为：一、各部照旧进行；二、夜学另举副主任，作一种学校形式办去；三、筹备运动会及成绩展览会；四、附于校中之报告书，发表成绩（因缺经费，停止杂志）；五、本会图书室添置图书；六、修改会章等项。进行不逾一月，即因战事影响，南军退守衡永，北军进驻本校[3]，同学星散，存者不过百余，不能

---

[1]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友会纪事录，是毛泽东1917年10月担任学友会总务后，于10月13日在职员会议上作为议案提出，经会议讨论决定设立的。目的在于“志现在之情形，留后日之稽考”。现在保存下来的学友会“贰号纪事录”，为夜学职员轮流所记。本文是毛泽东1918年5月10日在学友会交接会上的发言，于5月29日写进纪事录，标题为编者所拟。在“纪事录”的其余部分，还记录了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一些其他活动，因属他人所写，本书未予收录。

[2] 喻恒，号劭勤，湖南平江人；皮文光，号笑昆，湖南沅江人。两人均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当时担任学友会审计员。

[3] 1918年春，南方护法军与北洋军阀在湖南混战，南败北胜。南军败退到衡阳、永州一带。3月31日，北洋军阀张敬尧进入长沙，其弟张敬汤旅部进驻第一师范学校。

再行研究，本会遂与校中各事，同归停顿。至是，三级以下各班，因校中伙食不继，将放假出校，四级亦因毕业已届，将出，急谋收束之法，遂召集留校各职员自会长以降会议，除公决以会务移交喻皮二君及会长外，并由毛泽东等提及数事。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本科第一部第六七八九十共五班學生畢業紀念

1918年6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时年25岁。图为毕业班合影，后排右二为毛泽东。

一则本会经费之扩充也。凡事非财不办，本会经费，来源有三：一为上手移交之项，一为普通会员（同学）捐助之项，三为赞助会员（教职员）捐助之项。三项中，首项为数不多，且应转移下手，非有特故不宜动用；中项照章本可收每人二角为常年费，乃以去年一度变为每人二百，合收不逾百串，纸银仅为现银之三折，铜元票仅为铜元之四折；末项略可多收，以每人二元人数六十计算，

可收一百二十元，然乃纸币，且系随意捐，不能预定多少，本年因时局影响，仅收两元而已。由此以观，本会竟无确可经常较为大宗之收入，将何由举办一切会务，而收改良进步之效？即如本年，因此经费不足之故，事事止能力持撙节，而不应撙节之款，节之太甚，则惟有废弛。如本年拟行之印行杂志，加购图书，实为有益之事，亦以无钱不能举办。又如夜学，利济失学穷民，实属功德无量，竟无法使其经费独立，仅仰校款余沥进行，虽有精神，终难办好。此外更有一事，则筹备本会之独立会所，联络毕业同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研究及发展，此事更非巨款不行。故愚之意，应将常年捐恢复章程所载每人二角原状，而以入会金之五角加倍收之为一元，均收现洋，于每人人〈入〉学时并学校证金同时缴纳，数为二元。此一元之入会金，一元之常年捐，以在校有五年之久，受本会利益如是之多，而于其初入学也，责而征之，实亦不为太过。如此，则以年招二班，班人六十，合之百有二十计算，可收二百四十元之数，又现洋也，以为常年经费，尽可大加扩充，绰乎其有余裕。而以上手移交之款赞助会员捐助之款二项，作为筹备独立会所之用。事则面面俱全，理则并无太甚，后来君子，幸有以成之也。

一则宜加设交际一部也。本会组织，本合肄业毕业两部为之，载在会章，所以谋内外之联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意甚盛也。而以本会现状而论，分部一十有五，可图与毕业生联络者无一焉，仅一教育研究部，亦不能举联络之实。似此偏重肄业生，而遗却毕业生，毕业生虽有甚爱母校之心，亦无实地表现之处。东西各国学校，师生之间，同学相互之间，感情极重，联络之心至切，联络之机会亦至多，所以一校之设，既有毕业，则毕业者从而维持之，推广之，同学之间，虽在异地，犹能互相汲引，勉学

兢业，即如美国雅礼大学，其分校及于我省[1]，是其明证。而我国学校之情状反是，学生仅在校内有机械之关系，一经毕业，即不过问，毫无联络团结，即无由生其爱惜母校同组事业之心，此则甚为可惜者也。抑本校之地位则师范也，其须联络之情，较之其他学校犹切。教育为事，重在互相比较参观，交换其知识，而讨论其方法。本校立在省会，为全省国民教育之枢纽，诚使联络得法，研究有方，不难使全省教育焕然改观。今如第一联合中学等校，尚能组织校友会，调查毕业生，作成图表张览，一见即动其寻旧思故之心，引其向上发展之志。愚昔曾至长郡校友会，晤其干事黎君，询问办法，归而颇思仿其办法，设立交际一部，拟以此意陈之诸办事人及同学之前，因循未果。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至其大体办法，亦可草拟于下。

交际部细则

第一条　本部专为联络毕业生，图教育之改良及普及而设。

第二条　本部设部长一人，选举居近省城之毕业生充任，干事若干人，选举毕业生每班一人及肄业生二人充任。

第三条　本部事务如下：

一　筹备本会会所；

二　调查毕业生过去及现在之状况；

三　接洽旅省之毕业生；

四　刊发报告书。

第四条　凡毕业生每年负通函一次以上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从前及现在之状况，以便刊发报告书。其报告己身状况之事项

---

[1] 指美国耶鲁大学一批毕业生组织的耶鲁海外传教会（即后来的雅礼会）与湖南士绅合作创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和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如下：

一　姓名；

二　别号；

三　年龄；

四　籍贯；

五　住所；

六　通问处；

七　经过状况；

八　现在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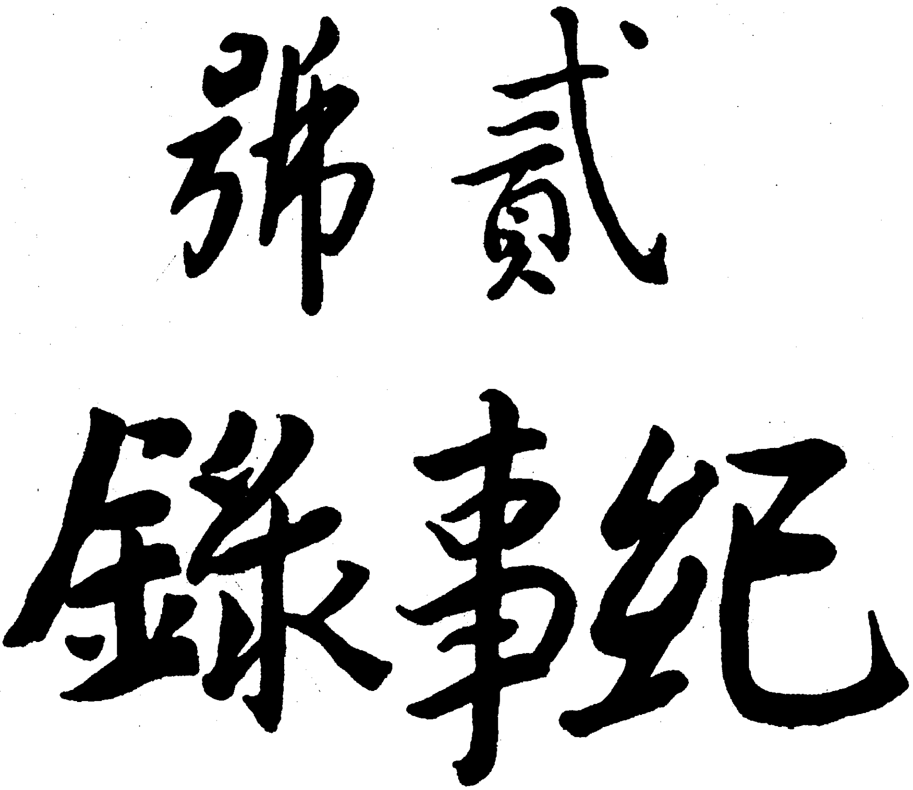
第五条　报告书即根据各毕业生之报告排列成表，附以本会近时进行各种办法及状况，刊而发之毕业生。

第六条　毕业生每年每人照章缴纳会费银二角，所得捐百分之一，以直接或付托他人或邮局汇寄之方法交到。

第七条　本细则有未尽者，随时修改。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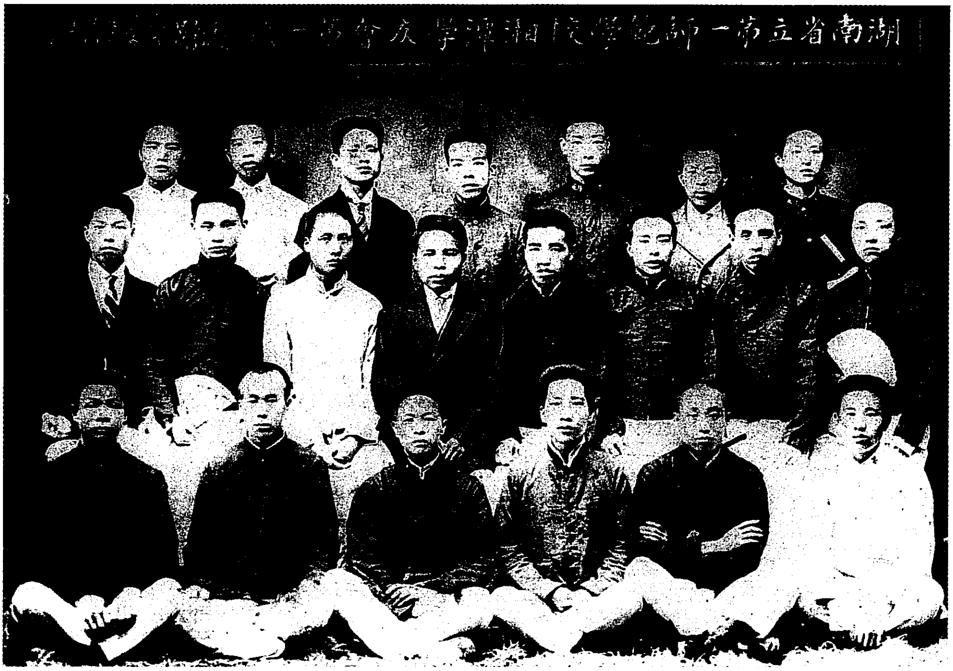
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貳

紀事録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纪事录封面上的题字。


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湘潭學友會第一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合影。二排左三为毛泽东。

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礼堂联[1]

（1918年）

世界是我们的；
做事要大家来。

---

[1]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聘任为该校附属小学主事（即校长），当时一师附小教员请毛泽东写了这副对联，悬挂在附小礼堂内。

给罗学瓒的信[1]

（1918年8月11日）

荣熙学长鉴：

接蔡君[2]信，知兄已发函复我到京。赴法二百元能筹，旅保[3]一百元无著是一问题。旅保费，俟弟至京与蔡商量筹借，或有著未可知，有著之时再函知兄前来可也。文凭须即寄来，由邮双挂号不误。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弟与蔡君等往返商议，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近周君世钊就修业主任之聘，弟十分赞同欣慰。前闻兄有担任黄氏讲席之说，不知将成事实

---

[1] 此信为明信片，无写作年份。从信中提及即将赴京筹措赴法勤工俭学经费等事看，此信当写于1918年8月毛泽东去北京前。罗学瓒（1893—1930），号荣熙，亦作云熙，湖南湘潭马家河（今属株洲县）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与毛泽东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委委员、浙江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牺牲于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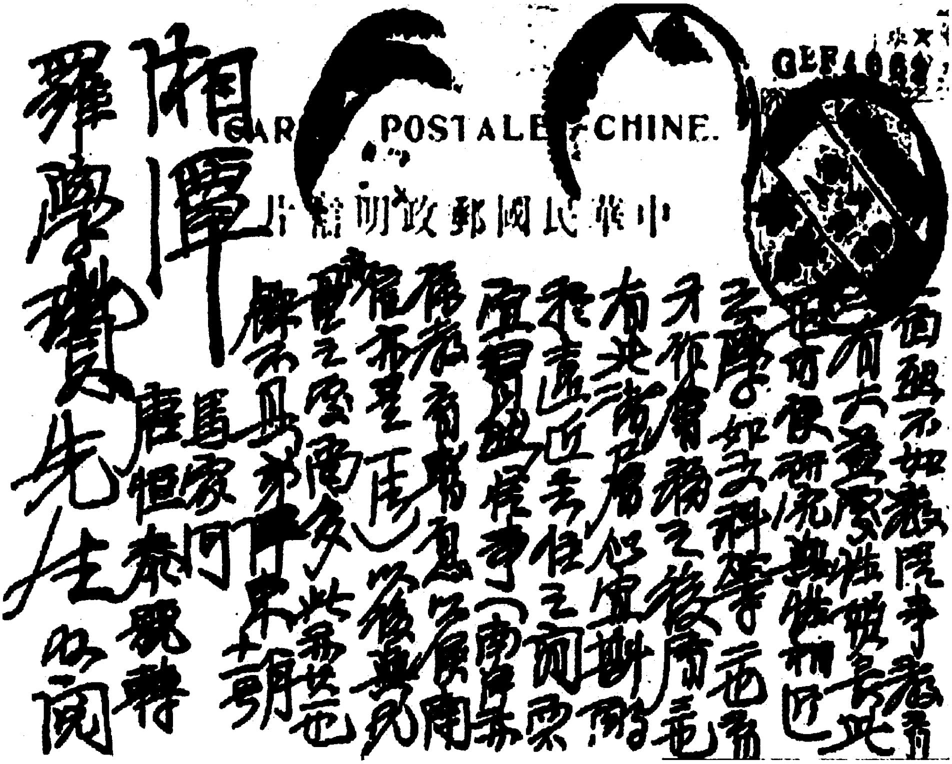
[2] 蔡君，指蔡和森（1895—1931），又名蔡林彬，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学，并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广州牺牲。时在北京筹办留法勤工俭学事宜。

[3] 保，指河北保定。当时在保定育德中学设有留法预备班。

否？往保固是一面，然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便研究与性相近之学，如文科等，二也；育才作会务之后盾，三也。有此诸层，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冒然从事（南洋亦系教育，暂息以候南信亦是一法）。以后与兄商量之处尚多，此亦其一也。馀不具。

弟　泽东

八月十一号



CARTE POSTALE CHINE.

中華民國郵政明信片

湘潭

罗学瓒先生收阅

毛泽东1918年8月关于筹措留法勤工俭学经费问题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部分）。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时的住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8号。

给七、八舅父的信[1]

（1918年8月）

七、八二位舅父[2]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3]。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他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叩

---

[1] 此信无写作时间。根据信中所提“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一事，此信当写于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之前。

[2] 七舅，文正兴（1853—1920），字勃生，号玉端。八舅，文正莹（1859—1929），号玉钦。二人均为湖南湘乡唐家坨（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人，时在家务农。

[3] 1918年8月罗学瓒致祖父信云“孙自七月初六日拜别……初七日清早抵长沙，在长沙停留一天，会合友人毛泽东等二十余人，于初九日早晨开船”赴京；《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亦载：自1918年7月初“和森至京”，“至八月十九，始有二十五人由湘到京”。据此可知，毛泽东等这次由长沙赴京时间实为1918年农历七月初九，即公历8月15日（到京为8月19日），同行者有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人。信中所述赴京时间和人数与事实有出入，当系事前的预计。

七绝·魏都[1]怀古

（1918年8月18日）

横槊赋诗[2]意飞扬，（罗章龙）
自明本志[3]好文章。（毛泽东）
萧条异代西畴墓[4]，（毛泽东）

---

[1] 魏都，魏国京都在今河南许昌城东5公里外的地方。

[2] 横槊赋诗，汉建安十二年（207）十月，曹操率大军攻吴，号称八十万众，且拥有巨舰千艘。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形容道："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槊，杆子较长的矛。《前赤壁赋》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此两句诗，出自曹操的《短歌行》。诗末四句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明了他求贤建业的壮志。

[3] 自明本志，指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下发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当时，汉献帝加封他阳夏、柘等三县共两万户，他上表退回三个封县，并写下了这首文笔苍劲、气势雄伟的手令，以表其态："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他下这道手令的目的，是减少别人的谤议。

[4] 萧条，冷落凋零的样子。班固《西都赋》："原野萧条，目极四裔。"西畴墓，指曹操的墓。西畴，西边田野。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卯，葬高陵。丁卯日为二十一日。高陵，曹操陵墓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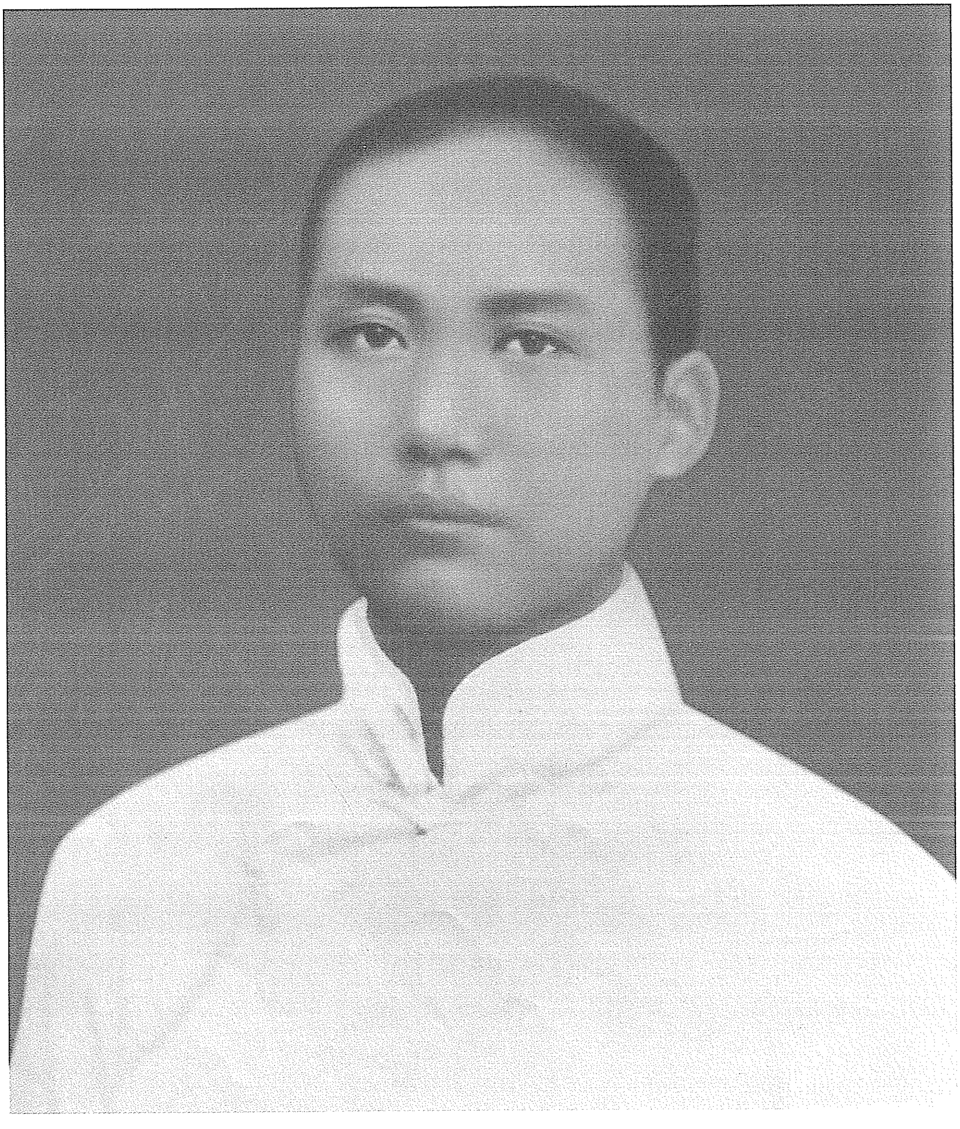
铜雀荒伧落夕阳[1]。（罗章龙）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毛泽东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图为北京大学红楼。

---

[1] 铜雀，楼台名。遗址在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据《三国志·武帝纪》，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冬，建铜雀台。杜牧《赤壁》：“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荒伧，荒芜，荒凉，亦作“伧荒”。欧阳修《谢国学解元启》：“论都未成，殆以伧荒而见隔。”

19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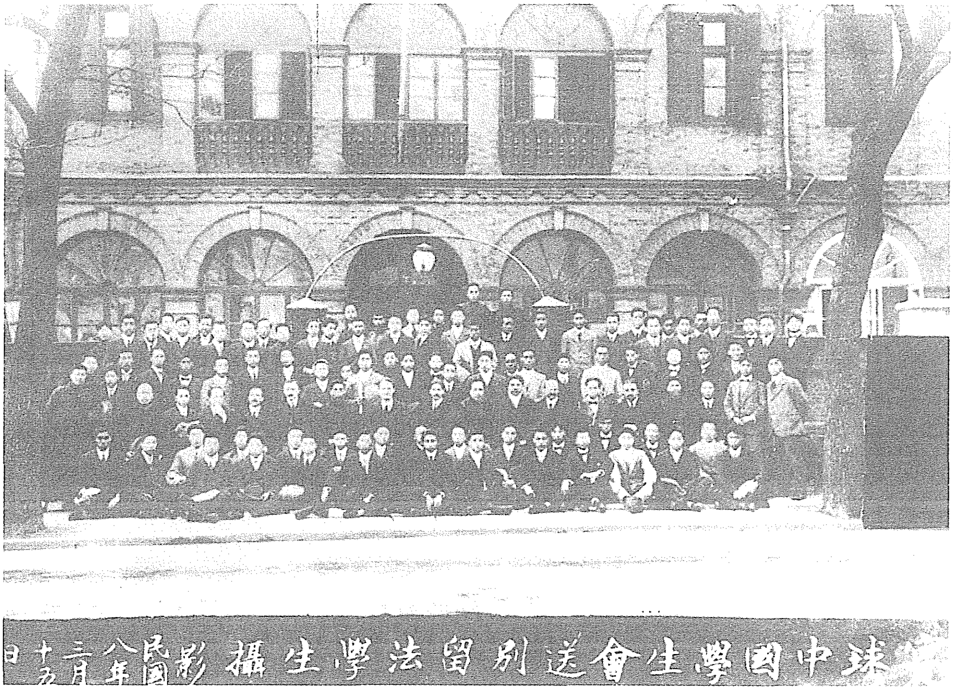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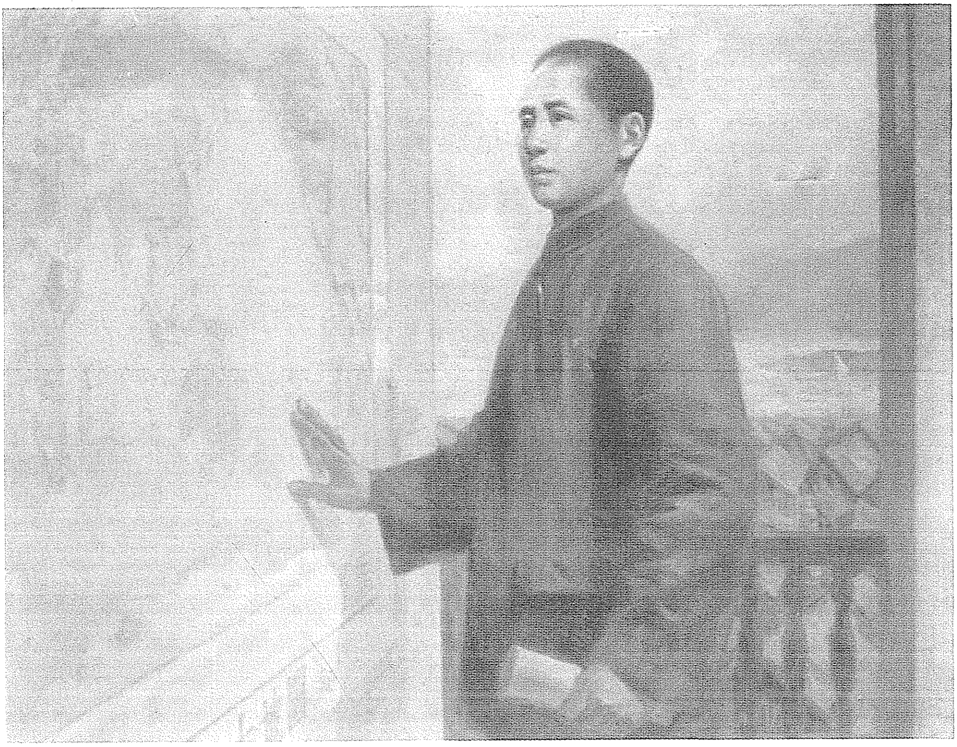
在上海送别第一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同学时的讲话

（1919年初）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球中國學生會送別留法學生攝影
民國八年三月十五日

1919年3月15日，寰球中国学生会欢送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合影。最高站立的两人居右者为前来送别的毛泽东。



《改造中国与世界》（油画）

五言诗·大沽口观海[1]

（1919年3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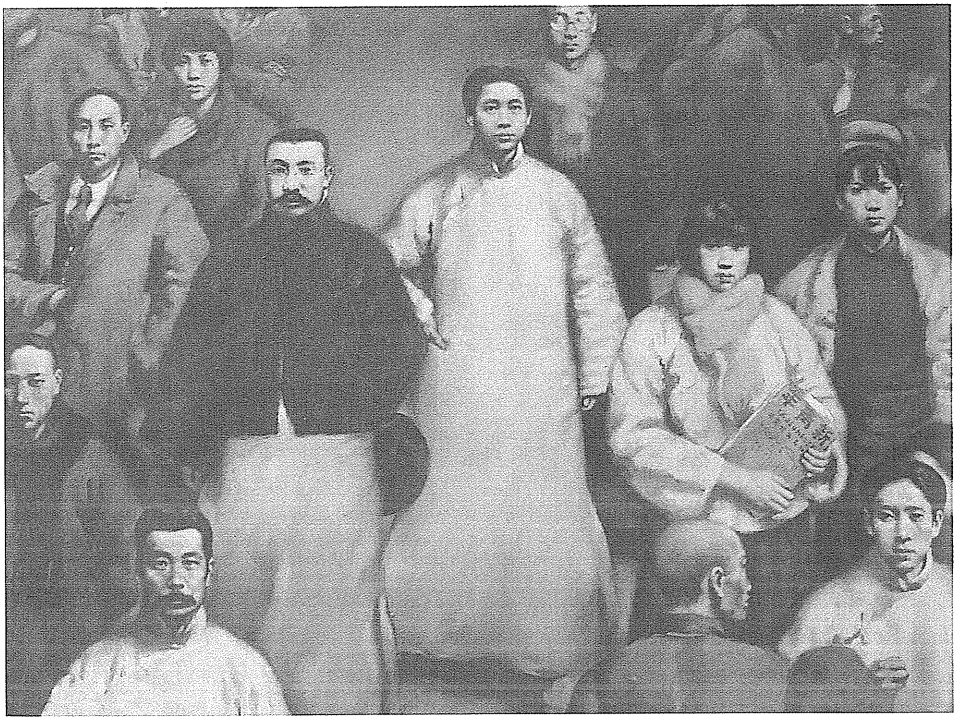
苍山辞祖国[2]，
弱水望邻封[3]。

---

[1] 大沽口，即塘沽，天津市的海港。观海，看海。

[2] 苍，青。苍山，青山。辞，告别。苍山辞祖国，即辞祖国苍山，指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辞别祖国的河山。

[3] 弱水，小说戏曲中水名。望，向远处看。封，疆界。邻封，邻国。弱水望邻封，即“望弱水邻封”，指站在海滨眺望大海彼岸的邻国。



《五四运动前夕》(局部)（油画）

给七、八舅父母的信[1]

（1919年4月28日）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2]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匆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履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3]，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句〈拘〉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纾〉廑念。肃颂福安！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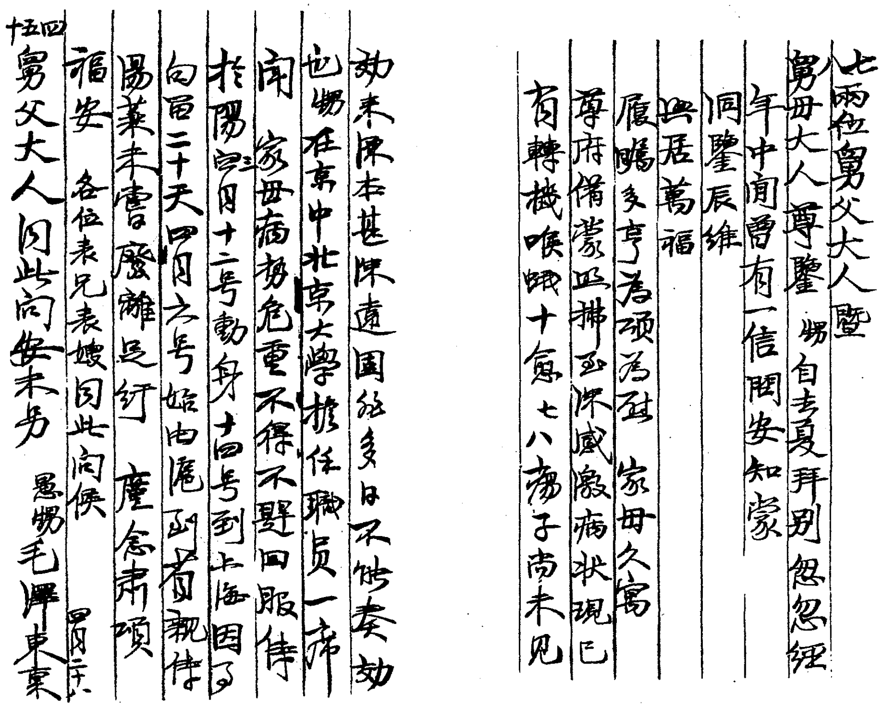
四月二十八

---

[1] 此信无写作年份。据信中所述“去夏拜别，匆忽经年”、因母病重由京返湘服侍等情，此信当写于1919年。

[2] 七舅，即文正兴。八舅，即文正莹。七舅母，文赵氏（1854—1924）。八舅母，文赵氏（1855—1937）。均为湖南湘乡唐家圫（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人，农村妇女。

[3] 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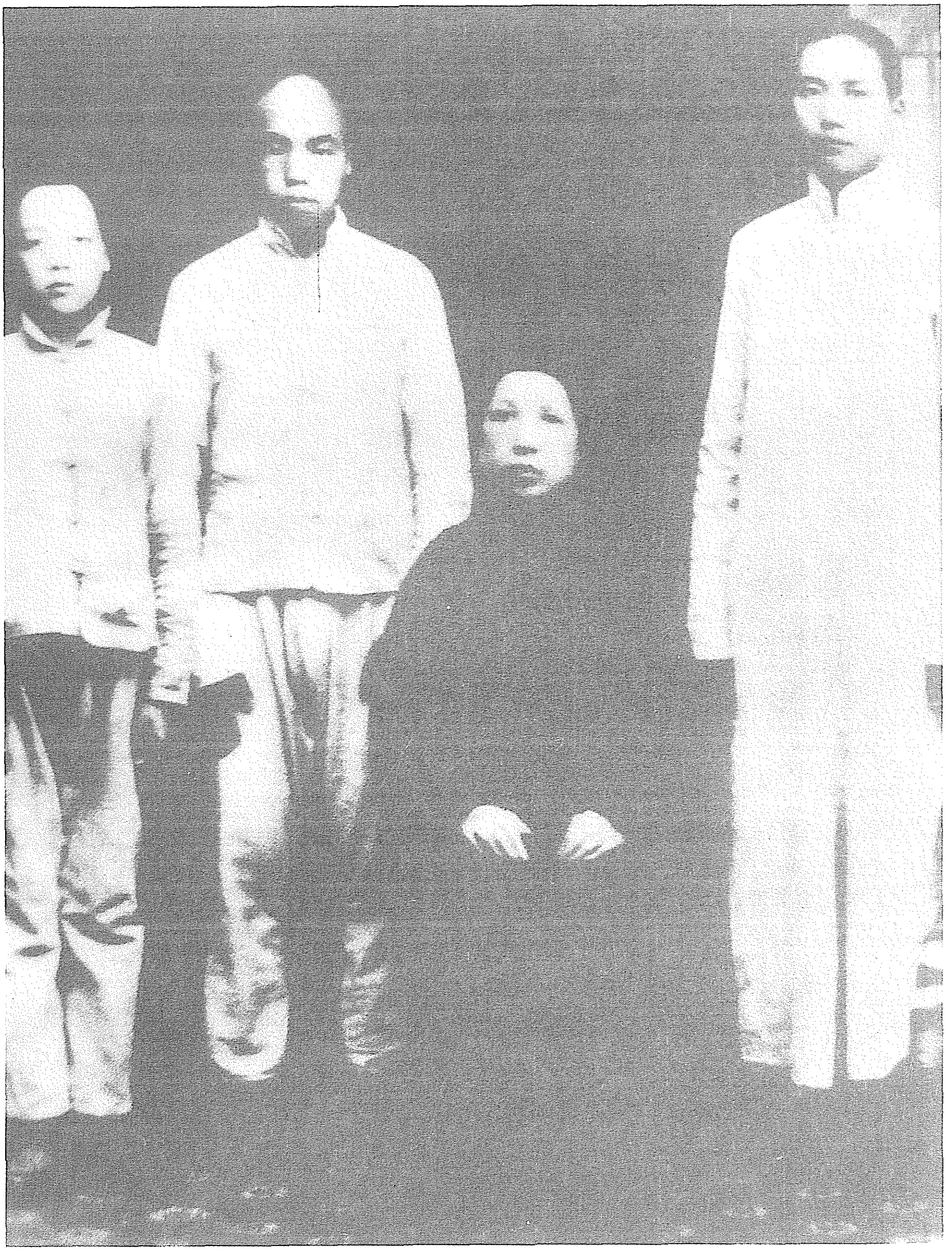


七八兩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鑒 甥自去夏拜別忽忽經年中間曾有一信問安知家洞鑒辰維興居萬福履瞻多亨為頌為慰 家母久寓尊府備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狀現已有轉機喉蛾十愈七八瘍子尚未見効來源本甚深遠固非多日不能奏効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學擔任職員一席聞家母病勢危重不得不暫回服侍於陽三月十二號動身十四號到上海因事句留二十天四月六號始由滬到省觀侍湯藥未曾歷離足紉 廑念肅頌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問候

四 十五

舅父大人同此問安未另 愚甥毛澤東 四月廿八

毛泽东致七、八舅父母信的手稿。



1919年春，毛泽东和母亲及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湘江评论》[1]创刊宣言

（1919年7月14日）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自文艺复兴[2]，思想解放，“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从这个问题，加以研究，就得了“应该那样生活”“不应该

---

[1] 《湘江评论》，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该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共出5号，每号四开一张，第2号附有“临时增刊”。毛泽东在前4号和临时增刊上共发表文章41篇。第3号第4版载有《刊误》，对创刊号和第2号的12处讹误，作了勘正。8月中旬第5号刚印出，未及发行，即被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查封。收入本书的各篇，所标日期均为出版时间。

[2] 指14至16世纪欧洲文化和思想空前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是宣扬人文主义，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打破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样生活”的结论。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

见于宗教方面，为“宗教改革”，结果得了信教自由。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见于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由有很〈限〉制的选举，变为没限制的选举。见于社会方面，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见于国际方面，为国际同盟。

各种改革，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克〉莫克拉西[1]。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经济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如何打倒的方法，则有二说，一急烈的，一温和的。两样方法，我们应有一番选择。（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2]，我国的

---

[1] 克莫克拉西，今译德谟克拉西。

[2] “同盟”“协约”战争，指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欧洲形成德、奥、意组成的同盟国和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双方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展开激烈斗争，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南”“北”战争[1]，都是这一类。

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澈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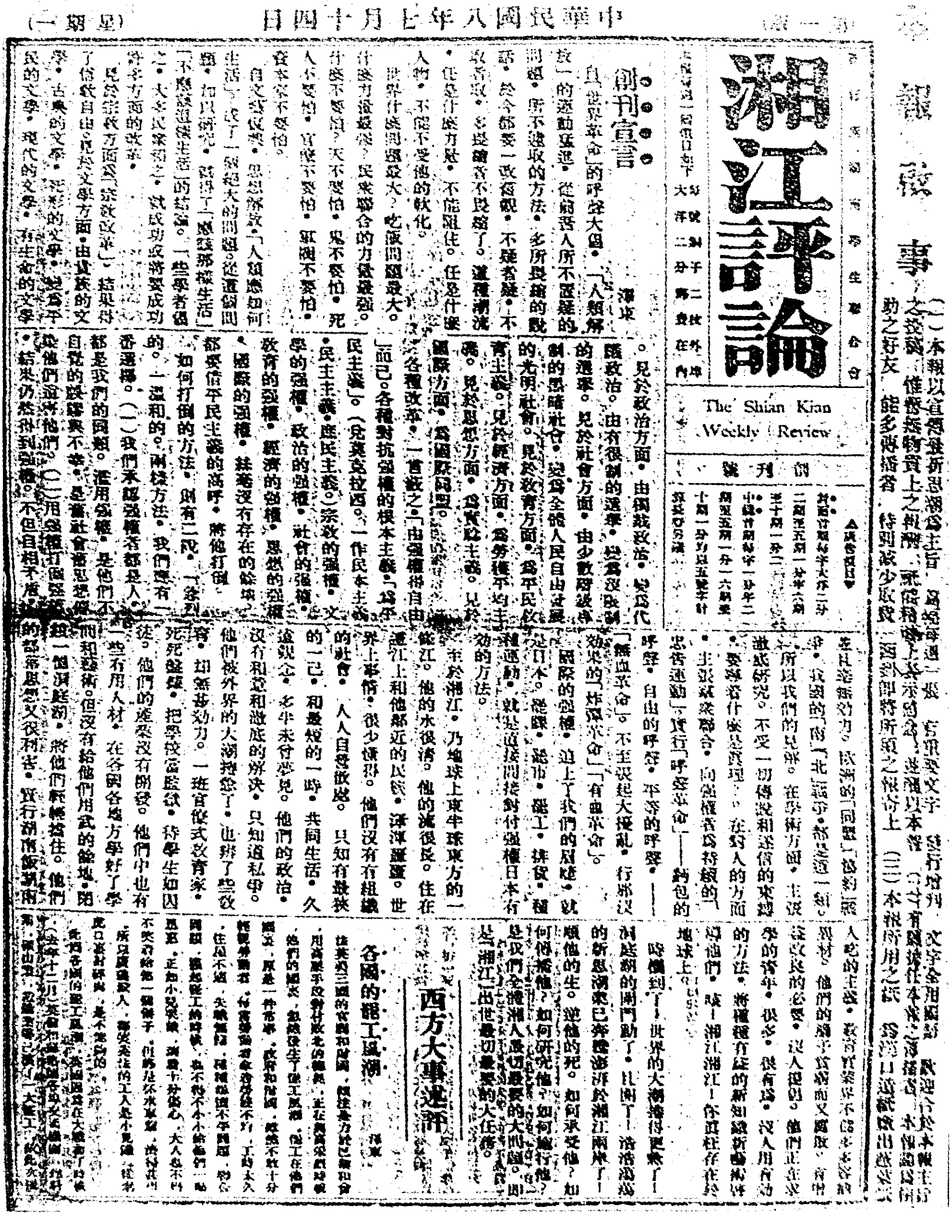
至于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他的水很清。他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他邻近的民族，浑浑噩噩。世界上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和意和澈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据，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材，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利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多容纳异材。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艺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在于

---

[1] 1917年7月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段祺瑞解散国会后，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京政府。次年孙中山受军政府中滇、桂系军阀排挤去职。不久，北洋军阀与南方滇、桂、黔系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爆发了战争，持续至1919年2月，此即作者所称“南”“北”战争。

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第一號)　中華民國八年七月十四日　(星期一)

湘江評論

The Shian Kian Weekly Review

創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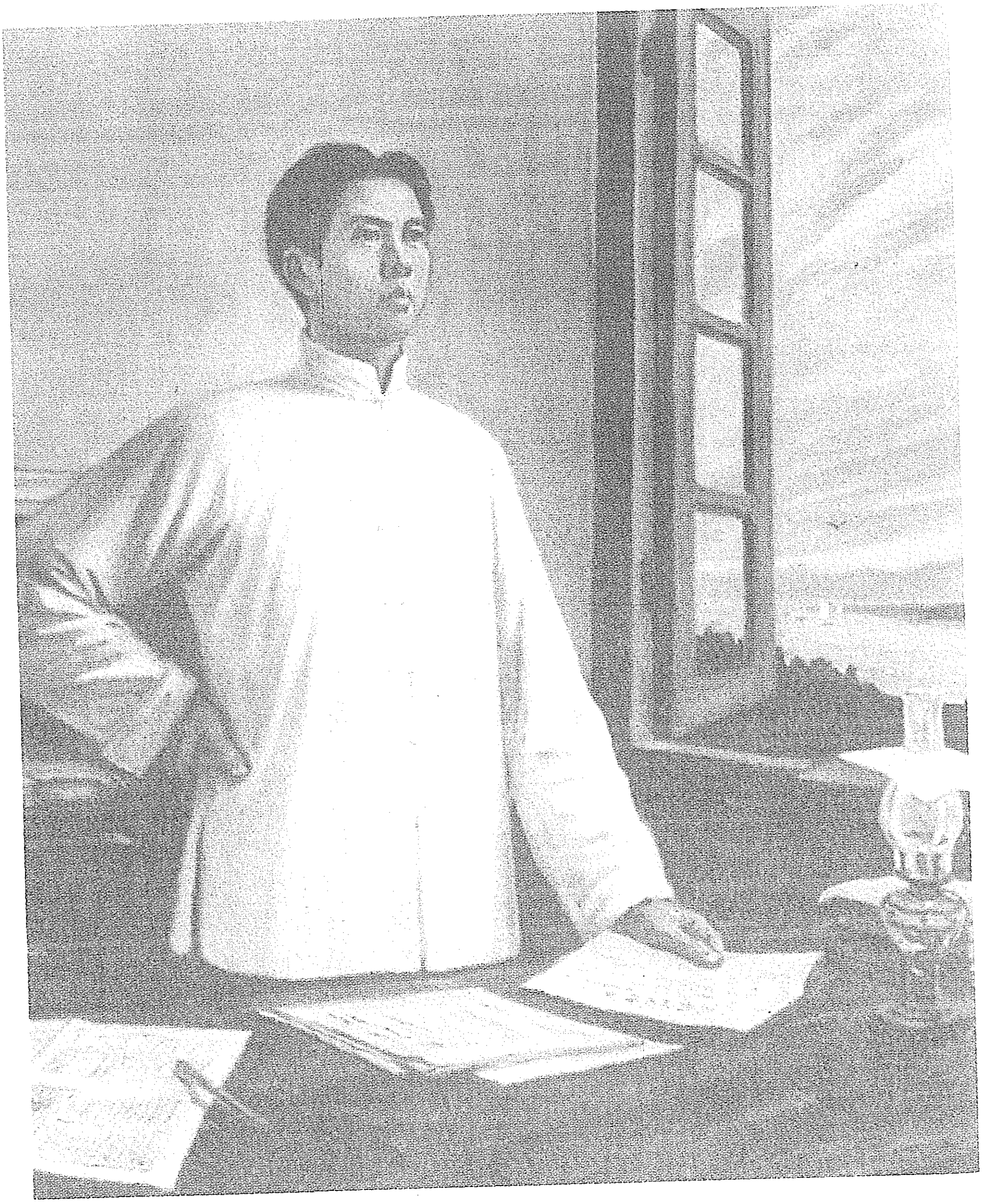
本報啟事

創刊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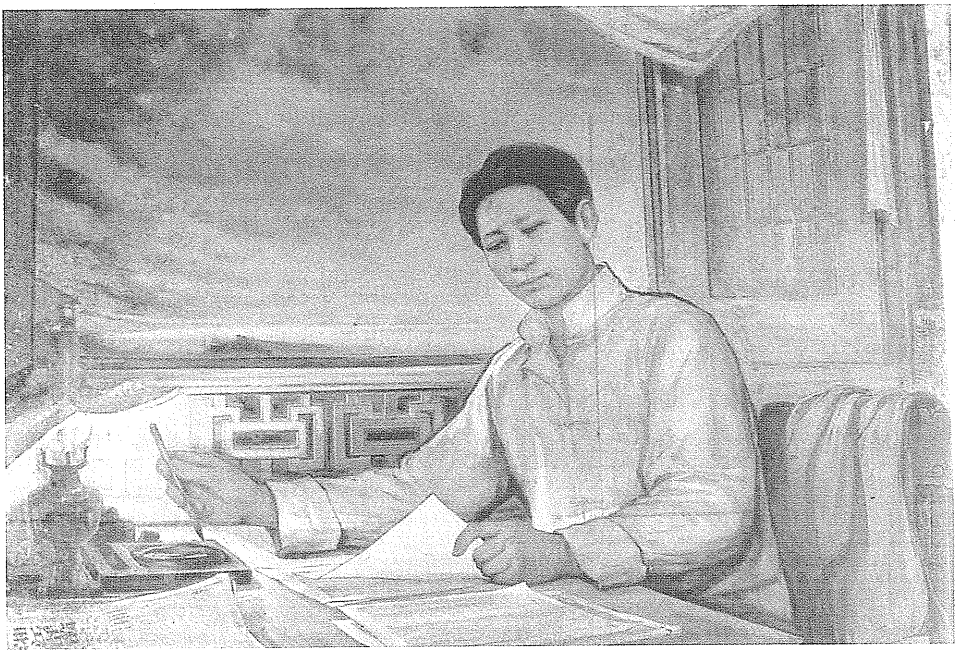
西方大事述評

各國的罷工風潮

毛泽东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周报《湘江评论》。



《主编〈湘江评论〉》（油画）



《主编〈湘江评论〉》（油画）

各国的罢工风潮

（1919年7月14日）

法英美三国的官阀和财阀，倾注全力于巴黎和会[1]，用高压手段对付败北的德奥，正在兴高采烈时候，他们的国里，忽然发生了罢工风潮。罢工在他们国里，原是一件常事。政府和财阀，虽然不敢十分轻视劳动者，每当劳动者拿着劳获不均，工时太久，住屋不适，失职无归，种种怨愤不平问题，联合同类，蜂起罢工的时候，也不得不小小给他们一点恩惠。正如小儿哭饿，到着十分伤心，大人也不得不笑着给他一个饼子。但终是杯水车薪，济得甚事。所以广义派人，都笑英法的工人是小见识。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此回各国的罢工风潮。英国因为在大战初了时候（去年十二月），英伦和苏格兰各埠交通机关，燃料业，矿山业，造船业等已〈已〉演了一次大罢工。故此次罢工，未发生于英伦本土。法国罢工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参加者有英、法、美、意、日等27国。会议为美、英、法三国所操纵，名为拟订对战败国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重新分割世界和策划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会议。会上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联盟约》等。中国以战胜国地位出席，但列强无视中国主权，非法决定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爆发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情形，初颇严重，终亦以小惠收场，没闹出什么好结果。广义派人有乘机在巴黎实行政治运动之说，亦未见诸事实。美国一部分电报电话人员的罢工，乃在附和议院多数派反对加入国际联盟[1]，与英法罢工，异其目的。意大利之罢工乃社会党[2]嫉恶其政府所为的一种动运〈运动〉。德国自去冬少数社会党大失败，各处大罢工，亦随之而没得好结果。多数社会党掌握政权以来，早已禁〈噤〉若寒蝉，不敢出声。此次为和约签字问题，有激起罢工的形势。但施特满内阁[3]倒了，继任巴安内阁[4]，仍是前内阁的同调。抵御外侮不足，防备家贼有余的武力，紧握在手，谁敢予侮。广义一派的猛断政略，暂时决没有发动的机会。罢工不能成为事实，亦无足怪。匈

---

[1]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根据1919年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先后加入的国家有63个。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1946年宣告解散。

[2] 意大利社会党，成立于1892年，1919年加入共产国际。1921年其左派另组意大利共产党。1922年10月意大利社会党改称为意大利统一社会党。

[3] 施特满，今译谢德曼（1865—1939），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曾任马克思·巴登亲王内阁阁员。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他竭力阻止工人阶级夺取政权。1919年2月任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理，组织了以社会民主党为主，有民主党和中央党参加的联合政府，即魏玛联合政府。同年6月，因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辞职。

[4] 巴安，今译鲍尔（1870—1944），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人。1919年6月20日，谢德曼内阁辞职，随之组成了以鲍尔为国务总理的新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政府。次年3月，鲍尔辞去总理职务，后任财政部部长和副总理。

牙利所受罢工影响不大，其原因则全在缺粮没饭吃。今将一月以来各国罢工情形，分述于下——

法国　六月三日，罢工风潮发生后，蔓延甚速。巴黎一区，男女工人赋闲者，二十万人。所要求各业不同，而一致主张每日工作八小时。四日，蔓延更广，推算当有五十万人罢工。五日，洗衣工人罢工。自后罢工的人数更多。地底铁道，电车，街车的用〈工〉人决议继续罢工。地底铁道工人要求工值每月至少四百五十佛郎（以每佛郎当四角合我一百八十元），满五十岁须给养老金，服役十五年后亦须给养老金若干。七日，巴黎罢工现象有转机，五金业与机器业，工人与雇主，己〈已〉商妥数事。十一日，五金业及地底铁道工人上工。当道己〈已〉取必要方法对付铁道罢工。煤矿工人有全体罢工的形势。十二日，国会通过矿工每日工作八小时议案。但矿工会议，仍不满意，决定从十六日，全体罢工。水夫联合会，也决计于十六日罢工。工人联合会，言及生活代价奇昂（记者按，近有从巴黎回者，举一物贵实例，一个旧牙刷，价二佛郎，一双皮鞋，价六十佛郎），谓非洲各口岸，堆积麦粮千百吨，任其朽腐。各埠存货如山，轮船火车，宁闲置不运载。这样的政府，可要快快废止他的消耗，欺骗，和垄断！十四日，风潮渐平。**极端派有乘推翻克勤〈勒〉满沙**[1]**强权政府的运动**，路工联合会拒绝之。但矿工因解释政府每日工作八小时议案，未能满意，定十六日全体罢工。恐怕路矿运输联合会工人，也会罢工，表示同情。克勤〈勒〉满沙老头子急了，和运输公司及运输工人代表会商，恳请彼等在国家危急

---

[1] 克勤满沙，今译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外号“老虎”，时任法国总理，在巴黎和会上担任主席，参加起草《凡尔赛和约》。

时候，发出些爱国热忱。工人吃了他的浓米汤[1]，己〈已〉老老实实决议上工了。

英国　伦敦五月三十日电，全国警察拟于三日罢工的气象，正在酝〈酝〉酿中，政府己〈已〉允增给薪资，优加待遇，但不承认警察联合会及收用己〈已〉革除的警察。英国的属地澳洲，坎拿大[2]，苏彝士，皆有罢工风潮。六月四日，坎拿大维克斯兵工厂工人罢工，要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时。六月五日，苏彝土〈士〉运河工人罢工，局势狠恶。六月九日，澳洲航务罢工，势头狠烈，各项工业，都受窒碍。十□日，风潮仍严重，他业工人，因此赋闲的逐日增多。

美国　六月七日，芝加哥电报司员预定十一时罢工，共约六万人。内有二万五千人系属电报司员联合会。该会会长康能堪氏正计划全国罢工办法。同日，全国电话司员奉命于十六日起罢工，表同情于电报司员。八日，电报人员联合会干事，向全体电报人员宣布，连收发电报生在内，全体罢工。目的在停止威尔逊总统每日在巴黎往来的电报，使他注意国民不赞成他在和会的主张。十二日，各电报公司报告，电报司员罢工没成。

意国　六月十三日，意大利斯贝齐亚地方，因粮食昂贵，发生暴动，捣毁商店。十四日，热那亚工界示威，被捕者数百人。银行商店闭门，电车不走。杜林工人此日多停工，纪念德国斯巴达团领袖卢生堡[3]氏。米兰工人罢工，抗议热那亚与斯贝齐亚当道的行动。

---

[1] 浓米汤，湖南方言，意即好话，奉承话。

[2] 坎拿大，今译加拿大。

[3] 卢生堡，今译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9年柏林一月战斗中，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同被德国艾伯特反动政府杀害。

德国　六月十三日，大柏林公民会议开秘密会，议决罢工。各职业及军界中人，均赞助停止各项实业工作的计划。有人料此举将促成国内战争，中等社会将得政权。

匈国　五月三十一日，匈京饥饿的工人，发生暴动。红旗军奉共产政府命令到各工厂制乱。匈京几无粮食。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京高師愛國學生七日返校時攝影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的北京高师爱国学生返校时的留影。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1]

（1919年7月14日）

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于六月十一日，在北京薪〈新〉世界被捕。被捕的原同〈因〉，据警厅方面的布告，系因这日晚上，有人在新世界散布市民宣言的传单，被密探拘去。到警厅诘问，方知是陈氏。今录中美通信社所述什么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于下——

一、取消欧战期内一切中日秘约。

二、免除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段芝贵王怀庆[2]职，并即逐驱出京。

三、取消步军统领衙门，及警备总司令。

四、北京保安队，由商民组织。

---

[1] 五四运动爆发后，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时，被北京警察厅巡警和步军统领衙门便衣密探逮捕。陈被捕后，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群情激愤，声援营救。同年9月，北京政府被迫将其释放。

[2] 徐树铮（1880—1925），字又铮，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北洋皖系军阀。1919年6月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7月被免职。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1919年初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6月被免职。章宗祥（1879—1962），字仲和，浙江吴兴人。1916年任驻日公使，1919年6月被免职。陆宗舆（1876—1941），字润生，浙江海宁人。1919年初任北京政府币制局总裁，6月被免职。王怀庆（1866—?），字懋宣，直隶宁普（今属河北）人。时任北京政府步军统领。

五、促进南北和议[1]。

六、人民有绝鲈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权。

以上六条，乃人民对于政府最低之要求，仍希望以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俯顺民意，则北京市民，惟有直接行动，图根本之改造。

上文是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我们看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处。政府将陈氏捉了，各报所载，很受虐待。北京学生全体有一个公函呈到警厅，请求释放。下面是公函的原文——

警察总监钧鉴，敬启者，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特举出二要点于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忌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想之步。现今各种问题，巳〈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

北京学生又有致上海各报各学校各界一电——

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忽于真日[2]被逮，住宅亦被抄查，群情无任惶骇。除设法援救外，并希国人注意。

---

[1] 北洋军阀与南方军阀为争权夺利进行几年混战之后，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开会议和。不久，爆发直皖战争和粤桂战争，南北议和无形消失。

[2] 真，韵目代日，指每月的11日。

上海工业协会也有请求释放陈氏的电。有“以北京学潮，迁怒陈氏一人，大乱之机，将从此始”的话。政府尚末〈未〉昏愦到全不知外间大势，可料不久就会放出。若说硬要兴一文字狱，与举世披靡的近代思潮，拼一死战，吾恐政府也没有这么大胆子。章行严[1]与陈君为多年旧交。陈在大学任文科学长时，章亦在大学任图书馆长及研究所逻辑教授。于陈君被捕，即有一电给京里的王克敏[2]，要他转达警厅，立予释放。大要说——

……陈君向以讲学为务，平生不含政治党派的臭味。此次虽因文字失当，亦何至遽兴大狱，视若囚犯，至断绝家常往来。且值学潮甫息之秋，讵可忽兴文网，重激众怒。甚为诸公所不取。……

章氏又致代总理龚心湛[3]一函，说得更加激切——

仙舟先生执事，久违矩教，结念为劳。兹有恳者，前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君独秀，闻因牵涉传单之嫌，致被逮捕，迄今未释。其事实如何，远道未能详悉。惟念陈君平日，专以讲学为务，虽其提

---

[1] 章行严，即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华兴会成员，曾任《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时为南方代表之一，后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抗日战争时期，为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国共和平谈判时，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因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遂留北京。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1973年病逝。

[2] 王克敏（1873—1945），字叔鲁，浙江杭县（今属余杭）人，清末任留日学生监督。时为南北议和北方代表团成员。

[3] 龚心湛（1871—?），字仙舟，安徽合肥人。历任驻美、日、秘鲁、英、法、意、比各国公使馆随员，后任安徽省财政厅长、财政次长等职。1918年任安徽省省长。1919年任财政总长兼代国务总理。

倡新思潮『想』，著书立论，或不无过甚之词，然范围实仅及于文字方面，决不含有政治臭味，则固皎然可征。方今国家多事，且值学潮甫息之后，讵可蹈腹诽之诛，师监谤之策，而愈激动人之心理耶？窃为诸公所不取。故就历史论，执政因文字小故而专与文人为难，致兴文字之狱，幸而胜之，是为不武；不胜，人心瓦解，政纽摧崩，虽有善者，莫之能挽。试观古今中外，每当文纲〈网〉最甚之秋，正其国运衰歇之候。以明末为殷鉴，可为寒心。今日谣诼繁兴，清流危惧。乃迭有此罪及文人之举，是真国家不祥之象，天下大乱之基也。杜渐防微，用敢望诸当事。且陈君英姿梃〈挺〉秀，学贯中西。皖省地绾南北，每产材武之士，如斯学者，诚叹难能。执事平视同乡诸贤，谅有同感。远而一国，近而一省，育一人才，至为不易。又焉忍遽而残之耶？特专函奉达，请即饬警厅速将陈君释放。钊与陈君总角旧交，同岑大学。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左证。……

章士钊拜启　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克莫克拉西”

（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敌了！凡思想是没有畛域的，去年十二月德国的广义派社会党首领鲁森堡[1]被民主派政府杀了，上月中旬，德国仇敌的意大利一个都林地方的人民，举行了一个大示威以纪念他。瑞士的苏里克，也有个同样的示威给他做纪念。仇敌尚且如此，况在非仇敌。异国尚且如此，况在本国。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

[1] 鲁森堡，今译卢森堡。

强叫化[1]

（1919年7月14日）

前月的初间，日本米价顶贵时候，每石超四十元。日当局有狠〈狼〉狈之状。报纸证言粮食的危机巳〈已〉迫。可怜的日本！你肠将饥断，还要向施主逞强。天下那有强叫化能得多施的理。

---

[1]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世界杂评”和“湘江杂评”栏内共发表25篇杂文，其中22篇署名泽东（此系首篇），两篇署名子暲（即萧三）。还有一篇《好计策》，未署名，夹排在署名泽东的22篇中间，很可能是毛泽东撰写的。

研究过激党

（1919年7月14日）

阿富汗侵印度，俄过激党为之主谋，过激党到了南亚洲。高丽[1]的“呼声革命”正盛时，亦有〔过〕激党参与之说，则巳〈已〉到了东亚。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甚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2]，过激党布备了全国，相惊而走，巳〈已〉没得走处了！

---

[1] 高丽，即朝鲜。

[2] 一光眼，湖南方言，即睁眼一看，快速之意。

实行封锁

（1919年7月14日）

前月巴黎高等经济会议议决，实行封锁匈牙利悻说要直到匈政府宣言愿遵从民意时为止。这要分两层观察，一、协约国看错了匈政府与匈国民志愿不合。匈政府与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志愿不合，是有的。若与大多数无产阶级，平民阶级，断没有志愿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们所组织的。二、实行封锁，适足帮助过激主义的传播，吾恐怕协约国也会要卷入这个旋窝〈涡〉。果然，则这实行封锁，真是“切〈功〉莫大焉”了。

证明协约国的平等正义

（1919年7月14日）

德国复文和会，要求德国陆军减少之后，协约国也须同减。这话谁人敢说错了？协约国满嘴的平等正义，我们且看协约国以后的军备如何？就可求个证明。

阿富汗执戈而起

（1919年7月14日）

一个狠小的阿富汗，同一个狠大的海上王英国开战，其中必有重大原因。但据英国一方面的电传，是靠不住的。士〈土〉耳其要被一些虎狼分吞了。印度舍死助英，赚得一个红巾照烂给人出丑的议和代表。印民的要求是没得允许。印民的政治运动，是要平兵力平压[1]。阿富汗是个回教国，狐死兔悲，那得不执戈而起?

---

[1] 原文如此，疑有误漏。

来因共和国[1]是丑国

（1919年7月14日）

协约国要化来因流域为自己挡敌的长城，必先使之脱离德国的关系，别成一国。听说巳〈已〉在威萨登设立临时政府，一位道登博士做总统。这位道登博士不知果然高兴到甚么样？金人立了刘豫[2]，契丹立了石敬塘〈瑭〉[3]，我们中国也曾有几个这样的国呢。

---

[1] 来因共和国，即莱茵共和国，成立于1919年6月1日。位于莱茵河东岸，原属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为了达到称霸欧洲大陆的目的，极力鼓动和支持成立莱茵共和国，几个月后，莱茵共和国即归于失败。

[2] 刘豫（1073—1146），宋景州阜城（今属河北省）人，北宋末年历任河北提刑等职。金兵南下时，弃职潜逃，并杀抗金将领降金。1130年，受金册封为“齐帝”，国号“大齐”，实为傀儡政权，多次配合金兵攻打南宋。

[3] 石敬瑭（892—942），五代沙陀人。五代后唐时为河东节度使，镇守太原。公元936年，勾结契丹贵族灭后唐，并受契丹册封为帝，国号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年献帛三十万匹，并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好个民族自决

（1919年7月14日）

波兰截克[1]复国，都所以制德国的死命，协约国尽力援助之，称之为“民族自决”。亚剌伯[2]有分裂土耳其的好处，故许他半自立。犹太欲在巴力斯坦[3]复国，因为于协约国没大关系，故不能成功。西伯利亚政府[4]有攻击过激党的功绩，故加以正式承认。日本欲伸足西伯利亚，不得不有所示好，故首先提议承认。朝鲜呼号独立，死了多少人民，乱了多少地方，和会只是不理。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直〈真〉是不要脸！

---

[1] 截克，今译捷克。

[2] 亚剌伯，今译阿拉伯。

[3] 巴力斯坦，今译巴勒斯坦。

[4] 西伯利亚政府，指1918年2月9日在俄国托姆斯克所建立的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政府。1919年12月，随着高尔察克的军队完全被苏联红军粉碎而瓦解。

可怜的威尔逊

（1919年7月14日）

威尔逊在巴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怎样才好？四围包满了克勒满沙，路易乔治，牧野伸显，欧兰杜[1]一类的强盗。所听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所做的，不外不能伸出己见的种种会议。有一天的路秀〈透〉电说，“威尔逊总统卒已赞成克勒满沙不使德国加入国际同盟[2]的意见”。我看了“卒巳〈已〉赞成”四字，为他气闷了大半天。可怜的威尔逊！

---

[1] 路易乔治，今译劳合-乔治（1863—1945），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是巴黎和会的主要操纵者之一。牧野伸显（1861—1949），日本政治家。历任驻意、奥公使，又先后任文部大臣、农商务大臣、外务大臣。1919年作为日本全权副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欧兰杜，今译奥兰多（1860—1952），1917年起任意大利政府首相兼内政大臣。1919年率领意大利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因未能满足本国要求而被迫辞职。

[2] 国际同盟，即国际联盟。

炸弹暴举

（1919年7月14日）

人人知道狠文明狠富足的美国，有“炸弹暴举”同时在八城发生。无政府党蔓延甚广。炸弹爆炸的附近，有匿名揭贴说，“阶级战争”业巳〈已〉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炸弹往往埋藏在一些官员的住宅，屋顶上发现人头。可怕可怕！我只挂欠〈牵〉官员人家的一些小姐小孩子，他们晚上何如睡得着？议院里一些钱多因而票多，票多因而当选的议员，还在那里痛诋暴动者，通过严惩案。我正式告诉诸位，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

不许实业专制

（1919年7月14日）

美国工党首领戈泊斯[1]演说曰：“工党决计于善后事业中有发言权，不许实业专制。”美国为地球上第一实业专制国、托剌斯[2]的恶制，即起于此。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戈泊斯的“不许”，办法怎样？还不知道。但既有人倡言“不许”，即是好现象。由一人口说“不许”，推而至于千万人都说“不许”，由低声的“不许”，推而至于高声的狠高声的狂呼的“不许”，这才是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

---

[1] 美国工党，指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是美国全国性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1年。戈泊斯，今译龚帕斯（1850—1924），美国工会的右翼领导人。生于英国，后移居美国。参与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1886年起任该会终身主席。提倡阶级合作，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阻止罢工，拥护战争。

[2] 托剌斯，今译托拉斯，指由许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生产上有密切关系的企业联合组成的大垄断企业。1882年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是美国的第一个托拉斯。此后，托拉斯在美国和西欧国家迅速发展。

割地赔偿不两全

（1919年7月14日）

德国答复协约国，说，如失去西里细亚及萨尔煤矿，则无力履行赔偿。我料协约国听了一定狠烦脑〈恼〉。何以故？地可割，赔偿也可得，最为两全。据德国的说，两样便成了反比例，如之何不烦脑〈恼〉？虽然，奉劝协约国的衮衮诸公，天下那有两全的好事！

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

（1919年7月14日）

奥总代表任纳[1]博士答复和会，说，“奥国今巳〈已〉坐食其较前大减之资本，若再加以摧残，必为社会党造成流血之地”，蠢哉任纳博士！你还不知道协约国一年以来之真目的，系专为造成社会党流血之地吗？

---

[1] 任纳，今译伦纳或雪纳（1870—1950），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总理时，主张奥地利加入国际联盟，在外交事务中保守中立。

彭斯坦

（1919年7月14日）

德博士彭斯坦[1]演说曰，“媾和条件，乃野蛮战争的结果，德国最宜负责。和约条件十九为必要的”。我们固然反对协约国的强迫和约，但博士这话，系专对野蛮战争而发，听了倒狠爽快。

---

[1] 彭斯坦，今译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支持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各国没有明伦堂

（1919年7月14日）

康有为因为广州修马路，要折〈拆〉毁明伦堂[1]，动了肝火，打电给岑伍[2]，斥为“侮圣灭伦”。说：“遍游各国，未之前闻。”康先生的话真不错，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

---

[1] 明伦堂，我国旧时各地孔庙的大殿名称。

[2] 岑，指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曾任北京政府官员，时为广州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伍，指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时为广州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并兼外长和财长。

什么是民国所宜?

（1919年7月14日）

康[1]先生又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

[1] 康，指康有为。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32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大略不是人……………………………………………………………1

（1919年7月14日）

走昆仑山到欧洲……………………………………………………2

（1919年7月14日）

好计策* ………………………………………………………………3

（1919年7月14日）

摇身一变………………………………………………………………4

（1919年7月14日）

我们饿极了……………………………………………………………5

（1919年7月14日）

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6

（1919年7月14日）

哈哈！ …………………………………………………………………7

（1919年7月14日）

女子革命军……………………………………………………………8

（1919年7月14日）

什么话* ………………………………………………………………9

（1919年7月14日）

《湘江评论》启事…………………………………………………10

（1919年7月14日）

《湘江评论》申明……13
（1919年7月21日）
民众的大联合（一）……14
（1919年7月21日）
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18
（1919年7月21日）
高兴和沉痛……30
（1919年7月21日）
卡尔和溥仪……32
（1919年7月21日）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34
（1919年7月21日）
民众的大联合（二）……43
（1919年7月28日）
畏德如虎的法兰……48
（1919年7月28日）
和约的内容……49
（1919年7月28日）
日德密约……50
（1919年7月28日）
政治家……51
（1919年7月28日）
不信科学便死……52
（1919年7月28日）
死鼠……53
（1919年7月28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呈省长文*……………………………………………………54
（1919年7月30日）
呈湘潭县公署文 …………………………………………………………56
（1919年7月）
民众的大联合（三） ……………………………………………………58
（1919年8月4日）
本会总记 ……………………………………………………………………64
（1919年8月4日）
问题研究会章程 …………………………………………………………71
（1919年9月1日）
给黎锦熙的信 ……………………………………………………………78
（1919年9月5日）
表同情于师范学生 ………………………………………………………80
（1919年9月21日）
原来是他 ……………………………………………………………………81
（1919年9月26日）
倒退一步 ……………………………………………………………………82
（1919年9月27日）
《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83
（1919年9月）
祭母文 ………………………………………………………………………84
（1919年10月8日）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88
（1919年11月16日）
赵女士的人格问题 ………………………………………………………90
（1919年11月18日）

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92
（1919年11月19日）
改革婚制问题……93
（1919年11月19日）
女子自立问题……94
（1919年11月21日）
“社会万恶”与赵女士……97
（1919年11月21日）
非自杀……101
（1919年11月23日）
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106
（1919年11月25日）
打破媒人制度……109
（1919年11月27日）
婚姻上的迷信问题……112
（1919年11月28日）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117
（1919年12月1日）
学生之工作……118
（1919年12月1日）
张敬尧私运烟种被获*……126
（1919年12月24日）
张敬尧私运烟种续记*……128
（1919年12月24日）
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131
（1919年12月27日）

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134
（1919年12月31日）
归国谣……137
（1919年）
给易礼容的信……141
（1920年1月13日）
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给熊秉三等的快邮代电……143
（1920年1月18日）
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148
（1920年1月19日）
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153
（1920年1月19日）
蔡元培范源濂等启事……158
（1920年1月22日）
上靳氏书……160
（1920年1月28日）
自勉联……161
（1920年1月）
挽杨昌济联……162
（1920年1月）
给陶毅的信……163
（1920年2月）
湘代表驱张之新运动* ……168
（1920年2月28日）
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170
（1920年3月7日）

给黎锦熙的信……173
（1920年3月12日）
给周世钊的信……176
（1920年3月14日）
湘事维持会内幕……180
（1920年3月25日）
湘人力争罢免张敬尧*……182
（1920年4月27日）
湘人斥张敬尧破坏和平*……187
（1920年6月5日）
给黎锦熙的信……188
（1920年6月7日）
湘人为人格而战……191
（1920年6月9日）
湖南人再进一步……193
（1920年6月11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196
（1920年6月14日）
湖南人民的自决……200
（1920年6月18日）
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202
（1920年6月23日）
给胡适的信……207
（1920年7月9日）
湘潭教育促进会简章……209
（1920年7月27日）

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211
（1920年7月31日）
发起文化书社……214
（1920年7月31日）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220
（1920年8月25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222
（1920年9月3日）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225
（1920年9月5日）
在《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上的讲话……227
（1920年9月5日）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228
（1920年9月6日）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231
（1920年9月6日、7日）
俄罗斯研究会简章*……234
（1920年9月23日）
“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235
（1920年9月26日）
释疑……237
（1920年9月27日）
再说“促进的运动”……239
（1920年9月28日）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240
（1920年9月30日）

“全自治”与“半自治”……242
（1920年10月3日）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244
（1920年10月5日、6日）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252
（1920年10月7日）
湖南人民宪法会议选举法之要点……253
（1920年10月8日）
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之要点……254
（1920年10月8日）
昨日建议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之大会议……255
（1920年10月9日）
反对统一……257
（1920年10月10日）
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261
（1920年10月11日）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263
（1920年10月22日）
文化书社启事*……269
（1920年10月）
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270
（1920年11月10日）
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272
（1920年11月）
读书会的商榷……274
（1920年11月）

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275

（1920年11月19日）

张文亮记毛泽东谈建团问题………………………………………276

（1920年11月21日）

给向警予的信………………………………………………………277

（1920年11月25日）

给欧阳泽的信………………………………………………………279

（1920年11月25日）

给罗璈阶的信………………………………………………………283

（1920年11月25日）

给李思安的信………………………………………………………286

（1920年11月25日）

给张国基的信………………………………………………………287

（1920年11月25日）

给罗学瓒的信………………………………………………………290

（1920年11月26日）

给罗学瓒的信………………………………………………………293

（1920年11月26日）

给萧子暲的信………………………………………………………296

（1920年11月）

“驱张”“自治”与我们的根本主张………………………………298

（1920年11月）

新民学会启事………………………………………………………300

（1920年11月）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发刊的意思及条例………………………302

（1920年11月）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序 ……………………………303
（1920年11月30日）
给蔡和森等的信………………………………………………305
(1920年12月1日)
毛泽东之辩诬函………………………………………………315
（1920年12月3日）
给张文亮的信…………………………………………………318
（1920年12月）
在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上的发言……………………319
（1920年12月19日）
关于教育经费问题的讲话……………………………………320
（1920年12月22日）
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 ………………………321
（1920年12月）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324
（1920年冬）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341
（1921年1月1日、2日）
新民学会紧要启事……………………………………………345
（1921年1月2日）
给彭璜的信……………………………………………………346
（1921年1月6日）
在新民学会常会上的谈话……………………………………347
（1921年1月16日）
给蔡和森的信…………………………………………………349
（1921年1月21日）

给彭璜的信……351
（1921年1月28日）
和毛泽民的谈话……356
（1921年2月）
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357
（1921年4月25、26日）
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359
（1921年4月）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375
（1921年夏）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405
（1921年8月16日）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412
（1921年8月）
挽易白沙烈士联……418
（1921年8月）
给萧子升的信……419
（1921年9月28日）
给杨钟健的信……420
（1921年9月29日）
和李立三应对联……424
（1921年11月）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425
（1921年11月21日）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434
（1921年12月）

告中国农民书……………………………………………………436
（1921年）
虞美人·枕上 ……………………………………………………440
（1921年）
题长沙劳工会联* ………………………………………………443
（1921年）
题安源工人夜校联………………………………………………444
（1921年）
更宜注意的问题…………………………………………………447
（1922年5月1日）
给张秋人的信……………………………………………………449
（1922年6月7日）
给张秋人的信……………………………………………………452
（1922年6月15日）
给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454
（1922年6月20日）
给八舅父七舅母八舅母等的信…………………………………456
（1922年7月5日）
给欧阳振垣的信…………………………………………………459
（1922年8月7日）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宣言…………………………………………460
（1922年8月16日）
长沙土木工会章程………………………………………………461
（1922年9月5日）
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 ……………………………………464
（1922年9月6日）

粤汉铁路工人致朱先生* ……466
（1922年9月10日）
粤汉路全体工人致全国各地工团快邮代电* ……467
（1922年9月12日）
长沙泥木工人全体快邮代电* ……469
（1922年9月24日）
粤汉铁路罢工之宣言* ……471
（1922年9月）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劳动立法的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473
（1922年9月）
给李立三等的信……478
（1922年9月）
长沙泥木工会援助缝纫工人通告* ……479
（1922年10月）
长沙泥木工人六千四百余人快邮代电* ……480
（1922年10月5日）
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为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支援信* ……481
（1922年10月13日）
长沙泥木工人致长沙县知事快邮代电* ……482
（1922年10月21日）
长沙泥木工人代表与吴政务厅长的谈话记录及呈省长的文……483
（1922年10月24日）
长沙泥木工人布告* ……486
（1922年10月25日）
给文运昌的信……487
（1922年11月11日）

给八舅父母的信……488
（1922年11月11日）
铅印活版工人之要求条件*……489
（1922年11月21日）
铅印活版工人条件*……492
（1922年12月9日）
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494
（1922年12月14日）
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501
（1922年12月14日）
长沙铅印活版工人上工宣言*……505
（1922年12月）
挽黄爱和庞人铨联……507
（1922年）

大略不是人

（1919年7月14日）

邓镕[1]在新国会[2]云：“尊孔不必设专官，节者〈省〉经费。”张元奇[3]云：“内务部祀孔，由茶房录事办理，次长司长不理，要设专官。”内务部的茶房录事，大略不是人。要说是人，怎样连祀孔都不行呢？我想孔老爹的官气到了这么久的年载，量也减少了一点。

---

[1] 邓镕，字守瑕，四川成都人，光绪丁酉科优贡，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历任临时参议院议员、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议员、参政院参政员等职。

[2] 1918年8月，北京政府皖系军阀段祺瑞等为抵制孙中山等在广州组成的非常国会，废除旧国会而另行成立的国会，被称为新国会。因在国会中皖系军阀控制的安福系（由安福俱乐部得名）占绝大多数，故又称安福国会。

[3] 张元奇，字珍午（1858—1922），福建闽侯人，光绪丙戌科进士，辛亥革命后首任福建省省长。历任湖南岳州府知府、奉天巡按使、内务次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都肃政使、经济调查局总裁等职。

走昆仑山到欧洲

（1919年7月14日）

张元奇又说：“什么讲求新学顺应潮流，本席以为应宗孔逆挽潮流。”不错不错！张先生果然有此力量，那么，扬子江里的潮流，会从昆仑山翻过去。我们到欧洲的，就坐船走昆仑山罢。

好计策*

（1919年7月14日）

一个学校的同学对我说，我们学校里办事人和教习，怕我们学到了他们还未学到的新学说，将图书室闭了。外面送来的杂志新闻纸和书籍，凡是稍新一点的，都没得见。我听了为之点首叹服。他们的计策真妙！岂仅某学校，通湖南的学校，千篇一律都像联了盟似的。

摇身一变

（1919年7月14日）

一些官僚式教育家，为世界的大潮卷急了，不提防就会将他们的饭碗冲破，摇身一变，把前日的烂调官腔，轻轻收拾。一些真有所感而改变的，很可佩服。一些则是假变，容易露出他们的马脚。这类人我狠为他羞！狠为他危！

我们饿极了

（1919年7月14日）

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了〈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

难道走路是男子专有的

（1919年7月14日）

一个女学校里的办事人，把学生看做文契似的收藏起来，怕他们出外见识了甚么邪样。《新青年》[1]一类的邪书，尤不准他们寓目。此次惊天动地的学生潮，北京的女学生聚诉新华门。贫儿院的小女孩子，愿到监狱替男学生抵罪。这个女学校的学生独深闭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像走路是男子专有似的。

---

[1] 《新青年》月刊，陈独秀主编，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当时名《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早期提倡民主，反对封建；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俄国十月革命后，宣传、介绍过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第八卷起，实际上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改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理论性机关刊物。1925年4月起出不定期刊，次年7月停刊。

哈哈！

（1919年7月14日）

青岛问题[1]发生，湖南学生大激动，新剧演说，一时风行。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一位老先生，因为他的儿子化装演剧，气得了不得，走到学校问先生，开口便说，“我的命运如何这么乖？养大的儿子竟做出那么下流事！”我听了这话，忍不住扑的一声，哈哈！

---

[1] 青岛问题，指1919年春巴黎和会拒绝归还我国山东青岛一事。

女子革命军

（1919年7月14日）

或问女子的头和男子的头，实在是一样。女子的腰和男子的腰实在是一样。为甚么女子头上偏要高竖那招摇畏风的髻？女子腰间偏要紧缚那拖泥带水的裙？我道，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黥〈黥〉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

什么话*

（1919年7月14日）

张謇云：“政府犹父兄也。学生犹子弟也。国而幸，父兄之教先，子弟之率谨，国必昌。不幸而父兄有过当之举。子弟补救，亦当有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心。国庶安。非是则危。”读者试思这是什么话？

日本堀内中将云：“此际亟应执果断之手段，要求中〔国〕政府惩罚彼等暴行者。并教以日本权威之可畏。更应派兵至京津，遣舰长江，绝对防止排日暴动。”读者试思，这是什么话？

张作霖云：“和会开议，大总统以至诚恻隐之仁，提倡于上。海内明达，乘忠爱恳挚之意，翊赞于下。云龙凤虎，千载一时。……”居然奴才口吻。读者试思，这是什么话？

王占元云：“湖北者，王占元之湖北也。”读者试思，这是什么话？

《湘江评论》启事[1]

（1919年7月14日）

（一）本报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篇幅每周一张，有重要文字，发行增刊。文字全用国语。欢迎合于本报主旨之投稿，惟暂无物质上之报酬，只能精神上表示感念，并酬以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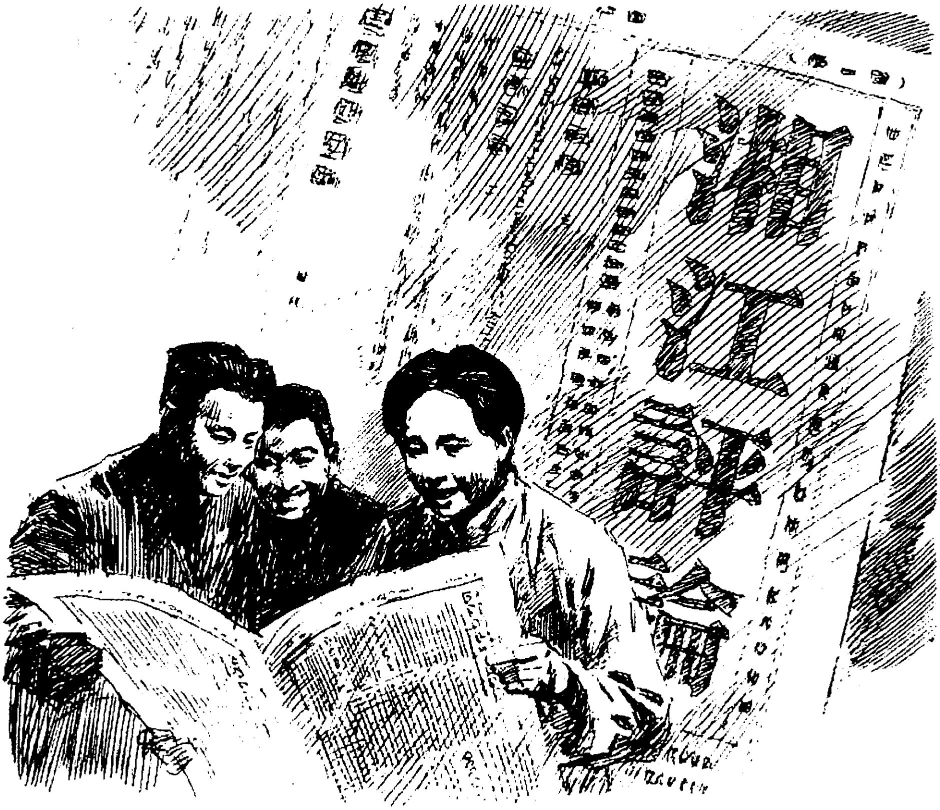
（二）有愿担任本报之传播者，本报认为相助之好友，能多传播者，特别减少取费。函到即将所须之报寄上。

（三）本报所用之纸，为汉口造纸厂出蓬莱纸。[2]

---

[1] 本篇未署作者姓名，据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说，《湘江评论》的“‘启事’和‘申明’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本文原标题为《本报启事》。

[2] 本启事连续刊载于《湘江评论》创刊号至第四号。在第四号的《本报启事》中，将第三条改为“本报代售北京《每周评论》”。



《湘江评论》（素描）

《青年毛泽东》（中国画）

《湘江评论》申明[1]

（1919年7月21日）

一

本报纯粹学理的研究[2]，社会的批评。丝毫不涉及实际政治。

二

本报创刊号两千份，即日销尽。今特重印两千份。因印局忙甚，尚须稍待数日，才能出版。祈索报诸君原谅。

---

[1] 本篇未署作者姓名。据易礼容回忆是“毛泽东起草的”。本文于《湘江评论》第二号发表时，题为《本报申明》。

[2] 据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说：“‘申明’中说‘纯粹学理的研究’不是事实，这样说是应付当时政治压力的。”

民众的大联合（一）[1]

（1919年7月21日）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西南派”，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2]为国

---

[1] 1919年7月至8月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同一标题，先后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3篇文章。本篇是这组文章的首篇，由于第二篇题后原标有（二），为统一体例，收入本书时，在第一篇和第三篇题后分别标上（一）和（三）。

[2] 萨藩、长藩，指日本的萨摩藩、长州藩，均为德川幕府时期的强藩。1866年3月7日，萨、长两藩结成讨幕军事同盟。1868年1月，以萨、长军为主力联合天皇军在京都附近地区激战，打败了幕府军。

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匈，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

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1]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已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巳〈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的办法，同他们拚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

---

[1] 指1918年南方“护法军”在湖南境内被北洋军打败一事。

[2] 参见朱熹《中庸集注》第十三章。原文为：“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1]。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已〈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

[1]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的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

（1919年7月21日）

签约之前　败而不屈的德意志的代表蓝超[1]等于五月初旬到巴黎。（五月七日），凡在〈在凡〉尔塞[2]宫举行很庄严的和约交付礼。德代表的态度很踞〈倨〉傲。克勒满沙站起声述其开会词。德总代表蓝超，则坐诵其如下之演说词——

德国军事破裂，德国失败的程度，巳〈已〉自明白。但这回欧战，负责的不仅德国，全欧都与有罪。因五十年以来，欧洲各国的帝国主义，实贻毒于国际局势。德国战中的罪行，固不可讳，战事的时候，人民的天良，为感情所蔽，故有罪行。然自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德国没与战事的人，多死于封锁的影响，协约国亦冷淡视之。威总统十四条大纲[3]，为全世界所赞助，协约国业巳〈已〉声明依照此项大纲而立和约，那么，德国当不至于全没救护。国际同盟，各国都应加入，不能将德国丢在外边。德国愿以好意的精

---

[1] 蓝超，今译布罗克多夫-兰曹或布罗克多夫-伦佐（1869—1928），当时任德国外交部部长。1919年4月底率领德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力争取得较好的和平条件，因未能阻止他的政府批准《凡尔赛和约》，乃于同年6月辞去外长职务。

[2] 凡尔塞，今译凡尔赛。

[3] 威，即威尔逊（1856—1924），美国民主党人，1913年至1921年任美国总统。1918年1月8日在国会演说中，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所谓十四点和平纲领。

神，研究和约。……

和约为灰黄色布面一大册，和会的秘书长杜斯玛，捧了交到蓝超手中。蓝超回到寓舍，晚餐的时候，默无一言。晓〈晚〉餐毕，即使人翻译和约，于晨间三点译成，送到蓝超寝室，蓝超看到天明方毕。另外录出几份，派专差送到柏林。八日德内阁会议许久。内阁总理施特满，向考虑和约委员会演说——

和约条件，简直是宣告德国死刑。政府必以政治的沉静态度，讨论这可厌而狂妄的公文……

随将和约条件，电告各联邦政府，请他们表示意见。因为感受很深的痛苦，特命公众停止行乐一星期，仅许剧院演唱和这日痛苦极度相同的悲剧。股票交易所，因感受痛苦的印象，停闭三日。名〈各〉界人士听得和约会要签字，皆为作怒，群相讨论拒绝签字的后患，甚至没有一人想到或可受纳此项条件的。柏林各报一致评诋，有的说：“和约的苛刻，远过最消极的预料，这系狂暴无智识的制品，若不能修改，只有用‘否’字答他。”有的说：“我们如签定这约，实是屈于武力。我们的心中，应坚决拒绝。”惟独立社会党[1]的机关报，则主张签约说：“从经验看来，拒绝徒增后患。”

这时候最可注意的，是德国政党的态度。多数社会党的政府派，是不主张签字的。民治党，和中央党，也是这样。只有独立社会党不然。（十二日）独立社会党通过决议案，主张接受和约，并说

---

[1] 独立社会党，全称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时为执政党之一。成立于1917年4月6日，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是原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领袖胡戈·哈塞、威廉·迪特曼和卡尔·考茨基。主张通过改良道路变革现存社会制度，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坚持“保卫祖国”等社会沙文主义观点。在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中，其右翼领导人与艾伯特等合流，并于1922年和社会民主党重新合并，其左翼则于1920年同德国共产党联合为德国统一共产党。

“德现政府恢复黩武主义的行为，使别人坚其对德的疑惧。德国舍屈于强迫签字，没有办法。俄德和约，及德罗和约[1]，均没多久的寿命就取消了。凡尔塞和约[2]，也未尝不可以革命的发展取消他”。我们为德国计，要想不受和约，惟有步俄国和匈牙利的后尘，实行社会的大革命。协约国最怕的就在这一点。俄罗斯，匈牙利，不派代表，不提和议，明目张胆的对抗协约国，协约至今末〈未〉如之

---

[1] 俄德和约，指1918年3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1918年至1920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的武装干涉。德罗和约，指1918年4月24日由罗马尼亚马尔吉洛曼领导的保守党政府与德国在布加勒斯特签订的和平条约。和约确认比萨拉比亚归属于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则把拥有近50万人口的领土让给中欧同盟各国；条约规定德国对罗马尼亚大部分领土继续占领，在占领区内实行战时状态，并规定在发生特殊情况时德军可以对非占领区摩尔多瓦的铁路实行军事管制。同年秋，随着德军的战败，和约被废除。

[2] 凡尔塞和约，即凡尔赛和约，或巴黎和约，全称《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和约共15部分，440条。其中第一部分是国际联盟盟约，其他部分主要规定：德国将阿尔萨斯—洛林交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萨尔区由国联管理15年，期满后经公民投票决定归属；莱茵河左岸由协约国占领15年，右岸50公里为不设防地区；德国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其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德国须支付巨额赔款，可保留10万官兵。美国代表虽在和约上签字，但美国国会未予批准。中国代表团因国内人民强烈抗议，未在和约上签字。

何。向使去冬德国广义派社会党的社会革命成了功，则东联俄而南结奥，更联合匈牙利和截克，广播其世界革命主义，或竟使英法美久郁的社会党，起而响应，协约国政府还食得下咽吗？独立社会党和广议〈义〉派社会党，本是一党而分为二，他的议论如此，本不足怪。用革命的发展取消和约，这话正不要轻看呢。

同日德国〔开〕会讨论媾和条件。施特满演说——

今日为德国人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除谋使国家生存，无旁的责任！德国不图进行其国家主义的梦想，并没争荣夺权的问题。于今人人的喉咙中间都觉有手塞住他的呼吸！人类的尊严，现付于诸君的手中以保持他！

（十四日）蓝超致克勒满沙一个牒文，内容的大要如下——

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款，是使德国失去甚关重要的生产土地。谷和薯芋的收成，将减百分之二十一。煤减三分之一。铁减四分之三。锌减五分之三。德国既因失去殖民地和商船，使经济成了麻木不仁。今又不能得充分的原料，势将被毁到极大的程限。同时输入的粮食必将大减。依赖航务和商业为生的数百万人，德政府不能将工事和粮食供给，他们在势不得不到国外求生，而重要的国家，多禁止德国移民入境。故签定和约，不啻向数百万德人宣告死刑。……

蓝超于上述的牒文之外，更以牒文两通致克勒满沙。第一通的大要说，“协约国占德土地，和威总统宣布的主义不合”。第二通的乃关于赔偿条款提出抗议，谓“德国愿赔偿，但不是因为负了战争责任的原故”。我们看德国的抗议，大要注重，（一）不独负战争责任，（二）不愿失去原料所从出的土地。其他各项，虽有抗议，但不是最重要的处所。

（十三日）晚上，柏林有大举示威。多数社会〔党〕于示威时，起坛演说谓，“和约条件，较罗马施于加萨臣[1]的，尤为刻毒而可羞”。群众游行各街，止于协约委员团所住的亚特伦旅馆前面。有人向众演说，其势汹汹。欲攻旅馆，为警察所阻。到内阁总理屋前，施特满氏临窗演说。又有人民一大队，于薄暮时候，唱歌到亚特伦旅馆，大呼“持〈推〉翻强暴的和局。与克勒满沙偕亡”“与英伦偕亡”。众又到施特满处，请他演说，施氏讲到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大纲时，众忽大呼“与威尔逊偕亡”。这日柏林和乡间独立社会党开会，有四十处。

（十九日）柏林某报载有社会党领袖彭斯坦博士的演说，谓“非常苛刻的和约条件，非完全出于激怒与仇念，实德国政策既不能见信于人，则当然受此待遇。一切破坏，咎在德国。德国之履行各项要求，不过补偿他们前所夺于人的而己〈已〉。我很不以一般人士所发激烈的演说为然。告诉他们！不可再具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的气焰”！这于德国热烈的反对声中，算是一瓢凉水。

（二十日）蓝超致书和会，要求改正审查及讨论和约的期限，（二十二日）克勒满沙复书，允许展长期限，至五月二十九日为止。（二十三日）晚，德全权大使起程往斯巴，将和来自柏林的阁员数人

---

[1] 加萨臣，今译迦太基，非洲北部（今突尼斯）的古代奴隶制国家。约建于公元前814年。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发展成为西地中海强国。公元前3世纪初罗马统一意大利，与迦太基形成对峙，爆发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的三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这里指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8—前201）后，罗马强迫迦太基签订的和约。按此和约迦太基放弃全部海外领土，交出舰船，赔款一万他兰同，规定此后非经罗马同意不得与别国交战，迦太基从此丧失其独立国的地位。

会晤，决定一切。（二十四日）斯希特芒，欧士白格[1]，从柏林乘车到斯巴，蓝超及委员十六人也到，即开一极长的会议，斯希特芒主席，通过德国的反提案。会毕，政府委员回柏林，蓝超等回凡尔塞。

（五月二十七日）德国有答案交付和会。答案的第一部分，要点如下——

（一）德国承认减少军队到十万人。

（二）交出巨大的军舰，而保留商船。

（三）反对关于东边土地的决定。要求于东普鲁士[2]民中，举行庶民大会。

（四）承认丹齐[3]为自由口岸。

（五）要求协约国，在签字四个月后，撤退军队。

（六）要求加入国际同盟。

（七）坚欲取得代管殖民地的权利。

（八）赔偿总数，不得过十万兆马克。

（九）拒绝引渡凯撒[4]，及其他人物。

---

[1] 斯希特芒，即施特满。欧士白格，今译埃兹贝格，或埃茨贝格尔（1875—1921），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左翼领袖、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签字人。当时在古斯塔夫·鲍尔内阁中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东普鲁士，旧地区名。位于波罗的海东南沿岸涅曼河、维斯瓦河和普雷格尔河下游沼泽地区。

[3] 丹齐，今译但泽，即今波兰的革但斯克。

[4] 凯撒，指德意志帝国末代皇帝威廉二世（1859—1941）。凯撒原为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后来凯撒成为罗马及西方帝国帝王习用的头衔。巴黎和会上协约国列强要求德国负战争责任，并引渡威廉二世等人。威廉二世1888年至1918年在位，推行容克地主——资产阶级的侵略扩张政策。1897年强占中国胶州湾，1900年出兵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参加瓜分中国的竞争，1914年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德国革命爆发后，逃往荷兰。

（十）德国须有重行经商海外的权利。

德国答案的第二部分，亦有如下的要点——

（一）在过渡时代，须维持大军，以保治安。

（二）须许德人开公民大会，讨论土地割让问题。并许奥人以加入德国的便利。

（三）拒绝割让西利细[1]上部。

（四）不承认俄国有索取赔偿的权利。

（五）无赔偿意、门、罗[2]、波兰等国的义务。

右[3]之德国答案，四大国代表为长久的讨论后，提出答复文，将德国所约议的，逐件驳复。全文很长，不外说德国战争责任万难推诿，德国必须尽其能力赔偿损失，必须交出戎首，和战时行暴的人，用法惩治，必须于数年内受特别的约束，凡协约国所持以构成和约的根本主义，万难更易，惟对于德国的实际建议，可以让步云云。

（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又因德代表的请求，屡次展缓签约日期。最后允展至六月二十八日为止。六月前半月的光阴，全为着往复『反』议事占去。

至（六月十八日）德代表团，乃由法京回德，一致告诫德内阁，拒绝签约。德内阁乃准备在韦玛[4]召集国会，取决此重大问题。此时协约方面，早作军事预备。一候〈俟〉德国有不签字的表示，即行进军。德国己〈已〉处于不能不签字的情势了。

---

[1] 西利细，即西里西亚，欧洲中部地区名，位于奥得河中、上游流域。

[2] 意、门、罗，即意大利、门的内哥罗、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即今黑山共和国。

[3] 因原文为竖排，此处“右”应为“上”，下同。

[4] 韦玛，今译魏玛。

（六月二十二日）协约国对德的“最后复文”，于这日送达德代表，限德国以五日承受和约。“最后复文”内，述可以让步的条件，如下——

（一）西里西亚上部，施行民众投票。

（二）西普鲁士[1]边界，重行划定。

（三）德军暂增至二十万人。

（四）德国宣布愿于一个月内将被控破坏战时法律的人的名单开出。

（五）修正关于财政问题的细则。

（六）以德国履行义务为条件保证德国为将来国际回〈同〉盟的一员。

施特满内阁知和约不能再有挽回，遂决计引退。

（二十二日）德新内阁组织成立。国务总理巴安氏，外交穆勒氏，财政欧士白格氏，内务达维特氏，陆军拿斯奇氏，殖民贝尔氏，邮电格莱斯勃资氏，劳动森士南氏，工程斯利奇氏，公众经济惠塞尔氏，国库夏勒氏，粮食斯密氏。巴安氏及诸阁员，多属多数社会党，本系前内阁的同调，在这回外交紧急声中，出当此签定和约的难局。新内阁既成，巳〈已〉可决其是预备签约的了。施特满退职。施特满内阁所委任的购〈媾〉和代表，当然随着退职。于是德国议和代表团易人。新代表团即以新内阁中的外交总长穆勒、邮电总长格莱斯勃资等组织而成。

此时国会业巳〈已〉在韦玛召集，巴安氏即赴国会，作很沉痛的演说，极言加入新政府的痛苦，恳请国会确立主张，否则战事将

---

[1] 西普鲁士，旧地区名。位于维斯瓦河以西至奥得河之间波罗的海沿岸。

复发作。巴安氏曰："我特于自由的日耳曼最后一次，起抗此强暴破坏的和约！起抗此自决权利的假面具！起抗此奴隶〈役〉德人的手段！起抗此妨害世界和平的新器！"国会乃于"反对""赞成"的喧哗声中，通过签约动议。

签约的动议通过，二十三日巴安再赴国会，申述无条件签约的必要，其演词谓："战败的国家，身魂受世界的凌辱！吾人姑且签定和约。吾人一息尚存，终望损害吾人荣誉的人，有一人身受报应！"这时候右党提出抗议。乃付表决。结果证实准许签约。议长费里巴赉氏起立发短简的演说："以不幸的祖国，委托于慈悲的上帝！"且谓："各党领袖，允宣告军界，全国希望海陆军树克己牺牲的模范，辅助劳工，重造祖国！"关系全世界安危的德国签字，在一场非常惨痛的演说声中，完全决定。德意志人的大纪念，有史以来，当没有过于这日了！

签字案既经国会通过，德新代表团乃到巴黎，致"允可签约的牒文"于和会。牒文的大要说——

"日耳曼民国政府，知协约国决计以武力强迫日耳曼承受和约条件。此项条件，虽没有重大的意味，然实志在剥夺日耳〔曼〕人民的荣誉。日耳曼政府虽屈服于优势的武力，但关于从古未闻离背公道的和约条件，仍不放弃其意见！今特宣布愿受纳协约国所施的条件。"

右文既布，各国的欢忭，自不可言。至（二十八日）而最后展缓的满期巳〈已〉到。于是凡耳〈尔〉塞宫中，乃有亘古未闻的大签约一举。

签约之际　一千九百十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午后三点五分，凡尔塞宫中开会。在镜宫中设高坛，甚为庄严。协约国全权代表首先会集。次为德国全权代表，只到外交总长穆勒，和交通总长斐尔，其

余均不愿到。克勤〈勒〉满沙主席，首发短简宣言，谓“协约国和共同作战国政府，均赞成购〈媾〉和条件。今加签字，表示彼等忠诚依守庄严的了解”。继乃“请日耳曼民国代表首先签字”。德代表所坐的席次，忽发大声，“德意志！德意志！”克勒满沙于是乃改称“德意志”。德代表即起立在约上签名，斐尔氏首先签之。时为午后三时二十分，园中喷泉四射，炮声大作。当德代表回到坐处的时候，全场皆露喜容。次为美国签字。次为英国签字。次为法国签字。次为意国签字。次为日本签字。最后签约的为截克斯拉夫民国[1]。三时三十五分签字完毕。克勒满沙氏宣布散会。

签约之后　当德国国会允许签约的消息传布，德国全国即有爱国的示威运动。群众列队唱战歌、国歌，欢呼致敬于年老的统兵员。各报对于裁判德皇问题，表示极大的忿怒。有一报恳请一九一四年的陆军军官，表示如德皇受裁判，也愿受协约国的裁判。并请组织团体或须入荷兰，保护德皇。各地暴动罢工情事，接续而起。及（二十八日）和约签字的消息传到柏林，柏林某报即载出一文，谓：“德人终必报一九一九年的耻辱！”为政府禁止发行。（二十九日）各报皆有“黑线”，表示哀痛。各报皆载有极悲观的评论。柏林及各地铁路工人及电车工人罢工。柏林城里的运输机关全停。亨堡[2]等处出了乱子。全国的罢工，有扩张形势。

评论　我叙签约。我单叙德国的签约。我叙德国签约，单注重其国民精神上所感痛苦的一点。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回和约，除却国际同盟，全是对付德国的。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崛〈倔〉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刑〈硎〉，几乎要

---

[1] 截克斯拉夫民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2] 亨堡，今译汉堡。

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做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1]，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我们对于德皇，一面恨他的穷兵黩武，滥用强权。一面仍不免要向他洒一掬同情的热泪，就是为着他“高”的精神的感动。德国的民族，他们败了就止了。像这样的屈辱条件，他们也忍苦承受。他们第一次翻转面目，巳〈已〉从帝国变成『成』了民国。他们的第二次翻转，或竟将民国都不要了。这话我殊敢下一个粗疏的断定。我们且看挡在西方的英法，不是他们的仇敌吗？英法是他们的仇敌，他们的好友，不就是屏障东方和南方的俄、奥、匈、截和波兰吗？他们不向俄奥匈截筹国连络，还向何处？他们要同俄奥匈截连络，必要改从和俄奥匈截相同的制度。俄匈的社会革命成了功，不用说。匈〈奥〉截也有此趋势，前日电传说截克巳〈已〉经成了劳兵民国了。德国广义派斯巴达团，去年冬天的猛断举动，和成功仅仅相差一间。爱倍尔[2]政府成立，多数社会党握

---

[1] 菲希特，今译费希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在政治上，曾反对封建制度，主张资产阶级的共和政体或君主立宪政体，宣扬民族至上，鼓励德意志人民起来抵抗拿破仑的侵略。颉德系康德之误。颉德，英国人，19世纪进化论者。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创造了宇宙之“本体”与“现象”的著名二元论学说。

[2] 爱倍尔，今译艾伯特（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之一。德国十一月革命期间，组织社会民主党政府，与资产阶级勾结，镇压革命运动。

权，所恃以制服广义派的，全是几个兵，几杆枪。和约成功，兵是会要解散了。枪是会要缴出了。那时候政府还恃着什么？德国工商业的大毁败，要重造起来，不得不仰赖出力的劳动者。以后政府所应做的大事，就是向劳动者多多的磕头。而广义派的武器，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劳动者。故我从外交方面的趋势去考虑，断定德国必和俄奥匈截连合，而变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又从内治方面的趋势去考虑，也可作同样的断定。

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国际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强权，为社会的强权，经济的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我们不要轻看了以后的德人。我们不要重看了现在和会高视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他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他们总有一天会要头痛！

然则这回的和约，“其能五稔”，尚靠不定。如若真以“德俄和约”“德罗和约”的例来推测，恐怕就是早晚的问题。无知的克勒满沙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

高兴和沉痛

（1919年7月21日）

克勒满沙在办公室接得德国接受和约的电话，高兴了不得。站起身来，和在办公室的阁员及同僚握手，说：“诸君！我之静候这一分钟，巳〈已〉西〈四〉十九年了！”这话何等高兴。虽然，不第高兴，又含有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威廉第一和俾士马克[1]，高踞凡尔塞，接受法国屈服牒文的时候，何等高兴。结果遂酿成此次的战争。虽然，威廉第一，俾士马克，不第高兴，又含有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八百年至一千八百一十五年，拿破仑躏蹂德意志，分裂他的国，占据他的地，解散他的兵。普王屈服，称藩纳聘。拿破仑何等高兴。结果遂酿成〔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的战争[2]。虽然，拿破仑不第高兴，又含多少沉痛的意思。一千七百八十九年至一千七百九十年，德奥为巨擘的神圣同盟军，深恶法国的民权自由，几度蹂法境，围巴黎。结果遂崛起拿破仑，而有躏蹂德国，令德人头痛的事。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联

---

[1] 威廉第一，即威廉一世（1797—1888）。1861—1888年，出任普鲁士国王，并于1871年开始同时为德国皇帝。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参加镇压巴登—普伐尔茨起义。在位时重用首相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德国。俾士马克，今译俾斯麦。

[2] 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与普鲁士王国签订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和约，并相互勾结共同镇压了巴黎公社。

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我们看这番和约[1]所载，和拿破仑对待德国的办法，有什么不同？分裂德国的国，占据德国的地，解散德国的兵，有什么不同？克勒满沙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

[1] 和约，指《凡尔赛和约》。

卡尔和溥仪[1]

（1919年7月21日）

奥前皇卡尔[2]避居瑞士，某报通信记者求见，见其侍臣。侍臣说："皇帝的退位，本非得巳〈已〉，故愿望恢复帝制。惟目下暂时隐居，不问政治。"凡做过皇帝的，没有不再想做皇帝。凡做过官的，没有不再想做官。心理上观念的习惯性，本来如此。西洋人做事，喜欢澈底，历史上处死国王的事实颇多。英人之处死沙尔一世[3]

---

[1] 原标题为《卡尔和傅仪》，傅仪，应为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退位，1917年7月，张勋曾拥戴其复辟，12天后失败。1932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后为苏军俘虏，1950年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特赦时获释。后任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2] 卡尔，指查理（1887—1922），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末代皇帝，兼匈牙利国王（称卡尔四世），1914年6月28日叔父斐迪南遇刺后，成为哈布斯堡王储。1918年11月11日，在意大利战线的奥匈军队崩溃以后，不再过问朝政，但未宣布退位。1919年3月流亡瑞士，同年4月被奥地利国会废黜。

[3] 沙尔一世，即查理一世（1600—1649），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国王（1625—1649）。在位时，对抗国会、压迫清教徒，推行打击新兴工商业的政策，引起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内战，在内战中两度失败，最后被国会判处死刑。

（一千六百四十八年），法人之处死路易十六[1]（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俄人之处死尼哥拉斯第二[2]（一千九百一十八年），都以为不这样不足以绝祸根。拿破仑被囚于圣赫利拿，今维廉第二[3]亦拟请他做拿破仑的后身将受协约国的裁判，总算很便宜的。避居瑞士的卡尔，和伏处北京的博〈溥〉仪，国民不加意防备，早晚还是一个祸根。

---

[1] 路易十六（1754—1793），1774—1792年为法国国王。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表面接受立宪政体，实则力图绞杀革命。在1792年巴黎人民第二次起义时，被捕废黜，次年年初被处死。

[2] 尼哥拉斯第二，即尼古拉二世（1868—1918），俄国最后一个沙皇。1905年下令枪杀彼得堡示威工人，导致俄国1905年革命的爆发。在1917年2月爆发的俄国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被起义工人和士兵逮捕，十月革命后被枪决。

[3] 维廉第二，即威廉二世。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1919年7月21日）

健学会以前的湖南思想界　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巳〈已〉极。二十年前，谭嗣同[1]等在湖南倡南学会[2]，招集梁启超麦孟华[3]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4]，发刊《湘报》《时务

---

[1]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甲午战争后，积极从事维新运动，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纲常名教，宣传变法。1898年8月被征入京，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遇害，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其著作编为《谭嗣同全集》。

[2] 南学会，清末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湖南创建的政治团体。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组织，1898年2月21日成立于长沙，各县设分会。南学会举办的各种讲学活动，由黄遵宪、皮锡瑞、谭嗣同等轮流主讲，宣传新学，讨论湖南新政，曾与守旧派展开激烈斗争。戊戌变法失败后南学会被取缔。

[3] 麦孟华（1875—1915），字孺博，号驾孟，广东顺德人。清末维新派人士，举人出身，系康有为门生。1895年参与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他的变法主张仅限于将无权之光绪帝变为拥有绝对权力之光绪帝而已。戊戌变法失败后到日本，协助梁启超办《清议报》。

[4] 时务学堂，清末维新派在湖南创办的新式学校。由蒋德钧、熊希龄等发起，于1897年10月在长沙成立。熊希龄任总理，梁启超和李维格分别任中文和西文总教习。教学内容包括经、史、诸子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和自然科学，借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于1898年11月中旬撤销，改为求实书院。

报》[1]。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

思想变了，那时候的思想是怎样一种的思想？那时候思想界的中心，是在怎样的一点？此问不可不先答如下——

（一）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什么“讲求西学”，什么“虚心考察”，都不外“学他到手还以奉敬”的办法。人人心目中，都存想十年二十年后，便可学到外国的新法。学到了新法，便可自强。一达到自强目的，便可和洋鬼子背城借一[2]，或竟打他个片甲不回。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

（二）那时候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我们试一取看那时候鼓吹变法的出版物，便可晓得。一味的“耗矣哀哉”，激刺〈刺〉他人感

---

[1] 《湘报》，清末维新派在湖南创办的报纸。1898年3月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创刊于长沙，以“开风气，拓见闻”为宗旨，宣传维新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被迫于同年10月15日停刊，共出177号。《湘报》是湖南历史上最早的日报。《时务报》，清末维新派的重要报刊。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为旬刊，由梁启超等主编。它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成为维新派最有影响的报纸。1898年8月8日出至第六十九期后改名为《昌言报》，由汪康年主编，至11月共出10期后停刊。

[2] 参见《左传·成公二年》：“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在自己的城下跟敌人决一死战，谓作最后的奋斗。

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那时有一种“办学堂”“办自治”“请开议会”的风气，寻其根抵〈柢〉，多半凑热闹而己〈已〉。凑热闹成了风，人人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了。

（三）那时候的思想，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是一个声名文物之邦，中国的礼教『教』甲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做“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

（四）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卫〈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

上面所举，全中国都有此就〈情〉形，湖南在此情形的中间，占一位置。所以思想虽然变化，却非透底的变化。仅可说是，笼统的变化，盲目的变化，过渡的变化。从戊戌以至今日，湖南的思想界，全为这笼统的，盲目的，过渡的变化所支配。

湖南讲求新学二十余年，尚没有崭然的学风。湖南的旧学界，宋学汉学两支流，二十年前，颇能成为风气。二十年来，风韵尚未尽歇。不过书院为学校占去，学生为科学吸去，他们便也淹没在社会的底面了。推原新学之所以没有风气，全在新学不曾有确立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之所以不曾确立，则有以下的数个原因：（一）没有性质纯粹的学会。（二）没有大学。（三）在西洋留学的很少。有亦为着吃饭问题和虚荣心理竟趋于“学非所用”的一途，不能持续研究其专门之学。在东洋留学的，被黄兴吸去做政治运动。（四）政

治纷乱，没有研究的宁日。这是湖南新学界中心思想不能确立的原故。即是没有学风原故。辛亥以来，滥竽教育的，大都市侩一流。逞其一知半解的见解，造成非驴非马的局势。中心思想，新学风气，可是更不能谈及了。

近数来年，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1]，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

---

[1] 蔡元培（1868—1940），号孑民，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民主主义教育家。早年反对清朝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1916年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1928年起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曾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1940年在香港病逝。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创建中国社会党，标榜社会主义。1921年曾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相继投靠北洋军阀政府、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汪精卫的中央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后病死狱中。吴敬恒（1866—1953），原名眺，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清光绪举人。1902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在《苏报》工作，鼓吹反清革命。1905年在法国参加同盟会。1907年在巴黎创办《新世纪》杂志，宣传无政府主义。从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委员等职。1953年死于台湾。刘师复（1884—1915），原名思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10年春参与组织支那暗杀团。武昌起义爆发后，在东江一带领导农民起义，号称香军。1912年5月回广州组织晦鸣学舍。稍后，又与郑彼岸等组织心社，同年7月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1913年8月，在广州发刊《晦鸣录》（一名《平民之声》）。他是民国初年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健学会之成立　六月〔十〕五日，省教育会会长陈润霖[1]君邀集省城各学校职教员徐特立，朱剑帆，汤松，蔡湘，钟国陶，杨树达，李云杭，向绍轩，彭国钧，方克刚，欧阳鼐，何炳麟，李景侨，赵翌等，发起健学会。在楚怡学校开会。今录某报所载陈润霖君报告组织学会的意旨于下——

兄弟前次到京，偶有感触，深抱乐观。缘四年前，北京大学学生，以作官为唯一目的。非独大学唯然，即大学以外之学生，亦莫不皆然。前次居京，所见迥然不同。大学学生思潮大变，皆知注意人生应为之事，其思潮己〈已〉多表露于各种杂志日刊中。因之京师各校学生，亦顿改旧观，发生此次救国大运动。其致此之故，则因蔡孑民先生自为大学校长以来，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换。或误认学生救国运动为政客所勾引，而不知实出学生之自动，及新旧思潮之冲突也。盖自俄国政体改变以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即如日本政府，从来对于『提倡』社会党人，苛待残杀，不遗余力，而近日竟许社会党人活动。如吉野博士等，则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2]以和缓过激主义，顺应世界之趋势，从容将日本政体改变为英国式虚君

---

[1] 陈润霖（1879—1946），字夙荒，号立园，湖南新化人。近代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积极创办近代新式学校。1918年出任湖南教育会会长。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驱逐张敬尧等活动，赞助船山学社，支持毛泽东办文化书社，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

[2] 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企图使用国家权力来进行改革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主要代表为德国的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

制[1]。于此可知世界思潮改变之速势力之大矣。我国新思潮亦甚发展，终难久事遏抑，国人当及时研究，导之正轨。同人等组织学会，在采用正确健全之学说，而为澈底之研究……

这日开会，听说尚有朱剑帆[2]君“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服从真理”的演说，向绍轩[3]君“主张采用国家社会主义”的演说。在湖南思想界，不可不谓为空前的创闻。今录出该会所发表的会则于下——

（一）本会由同志组合，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

（二）本会定名为健学会。

（三）会所暂定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四）入会者须确有研究学术之志愿，经本会会友一人以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

（五）关于输入新思潮之方法——

（1）凡最近出版之图书杂志，由本会随时搜集，以供会员阅

---

[1] 英国式虚君制，即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君主不直接支配国家政权，内阁掌握行政并形式上对议会负责。

[2] 朱剑帆，一为朱剑凡，即周家纯（1883—1932），湖南宁乡人。清末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女子教育。1919年年底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资助毛泽东办文化书社。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长沙市党部的领导工作，为国民党左派，大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29年返沪后参加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的自由大同盟运动。

[3] 向绍轩（1884—1946），字复庵，湖南辰溪人。早年留学英国，1918年回国后就职于上海明德中学，后明德中学迁武汉并改名为明德大学，担任副校长。1926年返湘，任湘西汽车局局长。1940年去重庆国立编译馆从事著述工作。1945年返湘任湖南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院长。

览。会员所藏书报，得借给本会会员览阅。其有愿捐入本会者，本会尤为欢迎。

（2）函托海内外同志，随时调查，通信报告。

（3）介绍名人谈话。

（六）关于研究之方法——

（1）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论〈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

（2）重要之问题，由会友共同研究。

（3）会员有愿习外国语者，由本会会友传授。

（七）关于传播之方法——

（1）讲演。分定期，临时，二种。定期讲演，每周日曜日[1]午前八时至十时，由会友轮流担任。讲员，及演题，均于前周日曜日决定。讲友须预备讲稿，交由本会汇刊。临时讲演，凡有重要演题，或由会友，或请名人讲演，另觅地点，择期举行。

（2）出版。

（八）本会设会计，管理图书，各一人。其他会务由会友共同负责。每次开会，推会友一人临时主席。

（九）会友应守之公约如左：

（1）确守时间。

（2）富于研究的精神。

（3）学问上之互助。

（4）自由讨论学术。

---

[1] 日曜日，即星期日。“曜”亦作“耀”，古人以日、月和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为七曜。

（5）不尚虚文客气，以诚实为主。

（十）会员年纳二元以上之会金。有能特别筹助经会〈费〉者，本会极为欢迎。

（十一）本会遇有重要事项，必须讨论时，得于定期讲演后，临时通告全体，举行合议。

会则中的（五），（六），（七），（九），极为重要。（九）之富于研究的精神，所以破除自是自满的成见，立意很好。尚望于“研究”的精神之后，继之以“批评”的精神。现代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最重〔要〕的是“我”是“个性”和中国的习惯，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恰成一反比例。我们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某君谓中国人大半是奴隶，这话殊觉不错。（九）之自由讨论学术，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健学会之进行　健学会进行事项，会则所定大要系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现在注重于研究一面。闻巳〈已〉派人到京沪各处，采

买书籍新闻纸和杂志。在省城设一英语学习班，便会员学习英语，为直接研究西方学术的预备。有年在四五十的会员，都喜欢学习。又设一演讲会，由会员轮流发表想见，实行知识的交换。官气十足的先生们，忽然屈尊降贵虚心研究起来。虽然旁人尚有不满意的处所，以为官气还有十分五六，演讲亦多采用命令式和训话式。更有谓他们是青叶上青虫的体合作用[1]。像这样的求全责备，我以为可以不必。在这么女性纤纤暮气沉沉的湖南，有此一举，颇足出幽因而破烦闷。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我们正应拍掌欢迎，希望他可做“改造湖南”的张本。看他们四次讲演的问题，如“『如』国人误谬的生死观”“怎样做人”“教育和白话文”“采用杜威教育主义[2]”，都可谓能得其要，倘能尽脱习气采用公开讲演，画〈尽〉人都可去听，则传播之快，得益之大，当有不可计量的了。

---

[1] 体合作用，生物学名保护色。动物适应栖息环境而具有的与环境相适应的色彩，有利于猎捕食物和避免受到害敌攻击。

[2] 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教育主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学说，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教学方法应遵循“从做中学”的原理。认为教育也只是一种“工具”，通过它可达到阶级调和。1919—1921年间曾来中国讲学，通过胡适等人的传播，他的学说在旧中国有一定影响力。

民众的大联合（二）

（1919年7月28日）

以小联合做基础

上一回的本报，己〈已〉说完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今回且说怎样是进行大联合的办法？就是“民众的小联合”。

原来我们想要有一种大联合，以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们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种种做他基础的小联合。我们人类本有联合的天才，就是能群的天才，能够组织社会的天才。“群”和“社会”就是我所说的“联合”。有大群，有小群，有大社会，有小社会，有大联合，有小联合，是一样的东西换却名称。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因为我们的境遇和职业不同，其范围也就有大小的不同。共同利益有大小的不同，于是求到共同利益的方法（联合），也就有大小的不同。

诸君！我们是农夫。我们就要和我们种田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种田人的种种利益。我们种田人的利益，是要我们种田人自己去求，别人不种田的，他和我们利益不同，决不会帮我们去求。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

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解答。

诸君！我们是工人。我们要和我们做工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以谋我们工人的种种利益。关于我们做工的各种问题，工值的多少？工时的长短？红利的均分与否？娱乐的增进与否？……均不可不求一个解答。不可不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章明较著的去求一个解答。

诸君！我们是学生。我们好苦，教我们的先生们，待我们做寇仇，欺我们做奴隶，闭锁我们做囚犯。我们教室里的窗子，那么矮小，光线照不到黑板，使我们成了“近视”。桌椅太不合式，坐久了便成“脊柱弯曲症”。先生们只顾要我门〈们〉多看书，我们看的真多，但我们都不懂，白费了记忆。我们眼睛花了，脑筋昏了，精血亏了，面色灰白的使我们成了“贫血症”，成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何以这么呆板？这么不活泼？这么萎缩？呵！都是先生们迫着我门〈们〉不许动，不许声的原故。我们便成了“僵死症”。身体上的痛苦还次。诸君！你看我们的试验室呵！那么窄小！那么贫乏！！几件坏仪器，使我们试验不得。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清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已〉到了二十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我们图书室是空的。我们游戏场是秽的。国家要亡了，他们还贴看布告，禁止我国〈们〉爱国。像这一次救国运动，受到他们的恩赐真多呢！咳！谁使我们的身体，精神，受摧折，不娱快！我们不联合起来，讲究我们的“自教育”，还待何时？我们已〈已〉经堕在苦海！我们要讲求自救，卢梭所发

明的“自教育”[1]，正用得着。我们尽可结合同志，自己研究。咬人的先生们，不要靠他。遇着事情发生，——像这回日本强权者和国内强权者的跋后〈扈〉——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

诸君！我们是女子。我们更沉沦在苦海！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我们一窟一窟的聚着，连大都门〈门都〉不能跨出。无耻的男子，无赖的男子，拿着我们做玩具，教我们对他长期卖淫，破坏恋爱自由的恶魔！破坏恋爱神圣的恶魔！整天的对我们围着。什么“贞操”却限于我们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贞童庙”又在那里？我们中有些一窟的聚着在女子学校，教我们的又是一些无耻无赖的男子，整天说什么“贤母良妻”，无非是教我们长期卖淫专一卖淫，怕我们不受约束，更好好的加以教练。苦！苦！自由之神！你在那里！快救我们！我们于今醒了！我们要进行我们女子的联合！要扫荡一般强奸我们破坏我们身体精神的自由的恶魔！

诸君！我们是小学教师。我们整天的教课，忙的真很！整天的吃粉条屑，没处可以游散舒吐。这么一个大城里的小学教师，总不下几千几百，却没有专为我们而设的娱乐场。我们教课，要随时长进学问，却没有一个为我们而设的研究机关。死板板的上课钟点，

---

[1] 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自教育”即自然主义教育，他提出“回到自然”的口号，主张顺应儿童的本性，让他们的身心自由发展。杨昌济在《教育学讲义》中介绍这种教育学说时说：“卢梭谓人生性质之不良，出于小儿受社会文化之影响，故宜使小儿脱离社会，不受社会文化之影响，使小儿本来所有善良之性质自然发达。故卢梭所著之教育小说《哀弥尔》，使其书中之主人哀弥尔，但伴一人之教师自然生长。”

那么多，并没有余时，没有余力，——精神来不及！——去研究学问。于是乎我们变了留声器，整天演唱的不外昔日先生们教给我们的真传讲义。我们肚子是饿的。月薪十元八元，还要折扣。有些校长先生，更仿照“刻减军粮”的办法，将政府发下的钱，上到他们的腰包去了。我们为着没钱，我们便做了有妇的鳏夫。我和我的亲爱的妇人隔过几百里几十里的孤住着，相望着。教育学上讲的小学教师是终身事业，难道便要我们做终身的鳏夫和寡妇？教育学上原说学校应该有教员的家庭住着，才能做学生的模范，于今却是不能。我们为着没钱，便不能买书，便不能游历考察。不要说了！小学教师横直是奴隶罢了！我们要想不做奴隶，除非联结我们的同类，成功一个小学教师的联合。

诸君！我们是警察。我们也要结合我们同类，成功一个有益我们身心的联合。日本人说，最苦的是乞丐，小学教员，和警察，我们也有点感觉。

诸君！我们是车夫。整天的拉得汗如雨下！车主的赁钱那么多！得到的车费这么少！何能过活，我们也有什么联合的方法么？

上面是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的一片哀声，他们受苦不过，就想组成切于他们利害的各种小联合。

上面所说的小联合，像那工人的联合，还是一个很大很笼统的名目，过细说来，像下列的

铁路工人的联合，
矿工的联合，
电报司员的联合，
电话司员的联合，

造船业工人的联合，航业工人的联合，
五金业工人的联合，
纺织业工人的联合，
电车夫的联合，
街车夫的联合，
建筑业工人的联合……

方是最下一级小联合。西洋各国的工人，都有各行各业的小联合会。如运输工人联合会，电车工人联合会之类，到处都有。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由许多大的联合，进为一个最大的联合。于是什么“协会”，什么“同盟”，接踵而起。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许多的小联合彼此间利益有共同之点，故可以立为大联合。像研究学问是我们学生分内的事，就组成我们研究学问的联合。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所以大联合必要从小联合入手，我们应该起而仿效别国的同胞们。我们应该多多进行我们的小联合。

畏德如虎的法兰

（1919年7月28日）

法国于德国畏惧他如虎狼。德国这么大败，法国尚畏惧的很。割萨尔煤矿。划来因左岸独立。毁希里哥伦炮台。助波澜[1]独立以蹙其东陲。助捷克独立以阻其南出。日耳曼奥地利欲并归德国，则不惜破坏民族自决主义，多方以妨之。殖民地，陆海『天』空军备，则多方以削之。商船亦须交出大部，以阻其海外贸易之恢复。这样也算够了，还不止此，又向英美两国，请求保证。前日电传，威尔逊允于离法以前，鉴〈签〉定一约，保证将来法国如受攻击，美国当起而援助。劳合乔治亦以英国名义，签定一同一性质的条约。此意何等深刻！何等惨淡！藉非法国有不可告人的大缺点，何至有这样的畏惧。法兰西民族素负豪气，何至竟像妇人孺子，斤斤乞人保护。我觉得这不是法兰西的好现象！

---

[1] 波澜，即波兰。

和约的内容

（1919年7月28日）

斯末资[1]将军说："我之签定和约，非因和约乃满意的文件。为结束战争起见，不得不签定他。"又说："新生活，人类大主义的胜利，人民趋向于新国际制度，和优善世界，所抱如此期望的践行，像这样的约言，均没有载上和约。于今只有国民心腔里所发义侠和人道的新真意，乃能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困〈因〉难而止的问题。"又说："我很以和约里取消黩武主义，仅限于敌国为憾。"斯末资是英国一个武人，是手签和约的一个人，他于签约后所发议论是这样，我们就可想见那和约的内容。

---

[1] 斯末资，今译史末资（1870—1950），移居南非的荷兰人——布尔人，南非联邦的政治活动家、唯心主义哲学家。1910年组成的南非联邦是英国的自治领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率军到东非与德军作战，被任命为东线英军总司令。1916年作为外国人破例参加英国战时内阁。1919年和博塔总理代表南非出席巴黎和会。同年，继博塔任总理。著有《整体论与进化》。

日德密约

（1919年7月28日）

巴黎的路透电说：“近今外间又有日德密约的谣传。”密约是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妄人想发现于今后的国际间么？日德密约更是什么东西？日俄密约[1]，为列宁政府宣布了，不但没成，反丢了脸一大块。日英法密约[2]成了，我们的山东，就要危险。什么日德密约，前年也谣传了多次。据说一千九百一十七年，德国允许日本自由处置荷兰的殖民地，爪哇苏门答腊在内，为英政府听见，告诉了荷兰，阴谋方止。我们应知道日本和德国，是屡次寻奸未遂的狗男女，他们虽未遂，那寻奸的念头，是永远不会打断的。日本的强权政府军阀浪人不铲除，德国的爱倍尔政府不革命，奸夫和淫妇，还末〈未〉拆开，危险正多呢。

---

[1] 日俄密约，指1916年7月3日日本和俄国在彼得格勒签订的秘密协约。密约规定，一旦中国在政治上被与日俄两国敌视的第三国控制时，日俄将协商采取措施；一旦缔约国一方同上述第三国宣战时，缔约的另一方将给予援助，并且约定未征得另一方的同意，不能讲和。为此，还规定日俄双方的有关当局，就兵力援助及实施援助的方法另外签订协定。俄国十月革命后，这一密约被苏俄政府宣布废除。

[2] 日英法密约，指1917年2月日本同英国订立的密约。日本同意位于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在战后归于大英帝国，而英国方面则承认日本有权继承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并同意赤道以北的德属岛屿归于日本。法国获此密约后，亦承认日本对中国山东的无理要求。

政治家

（1919年7月28日）

斯末资云："惟人民的新真意，乃能决解〈解决〉和会里政治家因难而止的问题。"人民的真意，和政治家的见解，何以这么不相同？政治家何以这么畏难？人民何以这么不畏难？这里面果有一层解说么？我自来疑惑所谓"政治家"，怕莫不是一种好东西？我如今真得了证据。巴黎和约签定后，路易乔治回到英国，在下院演说道："我们英国，得到许多成功，是我们伟大国民团结兴奋的效力。我们于今欢欣鼓舞，但不要存着祸患业巳〈已〉过去的妄念。巳〈已〉使我们获胜的精神，仍要保持，以应付将来事件。我们不要浪费精力于彼此相争。"这就是政治家的大本领。这就是政治家的大魔力。不要浪费精力于彼此相争，就是说道，你们人民不要拿著生活痛苦，国民真意，种种无聊问题，和我们政府为难。那些问题都小，都不关痛痒。将来寻着事端，我们还要和别国打仗。爱国，兴奋，团结，对外，是最重要没有的。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的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巳〈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

不信科学便死

（1919年7月28日）

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电触死了数人。城里街渠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他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三十余万的住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他。有些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死鼠

（1919年7月28日）

鼠是瘟疫发生的一个原因，长沙城里到处看见死鼠。张眼望警察，警察却站在死鼠的旁边。早几年的长沙城，却没看见这个样子。警察先生们！还是请你们注点意。

湖南学生联合会呈省长文[*]

（1919年7月30日）

呈为恳请惩办地痞，恢复报馆事。此次青岛问题发生，全国学生，以及各公共团体，不惜牲牺一切，大声疾呼，唤醒国民，共救危亡。我湖南学生一致进行，本爱国之□忱，阐救亡之微旨，数月于兹，成效渐著。方冀积极进行，并望南北速和，一致对外，不料帝制余孽，安福旧党，只图私人权利，不惜谋宪巧言簧鼓，蒙蔽钧座。致去各部□停办之非法选举，死灰复燃，竟有初选复还之事，敝会以和议尚未续开，湘省更未统一，即以新旧国会去留而论，尚须付之议案，当局颇费磋商，和议因之久顿。乃于此风雨飘摇之时，忽产生非法选举，岂独于和议前途有碍，良亦盛德之累也。学生等久为钧座忧之，方拟发表意见，陈明□左右，适地痞辜天保、黄中、李藩西等，有伪造民意假教育会开伪公民大会之事。敝会以彼辈居心叵测，事关重大，略派代表赴会。维时军警林立，内外包围，首由辜、黄登台，痛诋湘人之反对非法选举。敝会会长彭璜及代表邱维勤，代表全体学生，发挥真正民意，即被辜、黄等使兵丁逮捕，声言枪毙。经莅会弹压之张团长解说，始免于难。钧座对于此次学生等之举动，本极赞成，多方维持，敝会实深感激。而地痞辜天保、黄中、李藩西等，甘为袖首，目无湘人，蒙蔽钧座，侮辱学生，此敝会所以略陈情由，恳请从严惩办地痞，以儆效尤者也。

又敝会犹有不解钧座之意者，大公报为我湖南真正民意之言论机关，久为省内外人士之所称许，乃竟以登载各公团联合会反对非法选举之实宣言书，立予封禁，拘逮编辑，迄今日久，尚未开释。学生等以为非出自钧座之意，不日即告结局，故久未呈述意见。无论该报宣言书有各公团负责，而全省人民反对选举，异口同声。惟钧座因势利导，宣之使达，则湘人戴德于无既。不然，共和国体，言论自由，况封禁夙负声望之报，外间不察，适以广播政府禁锢言论自由之名，防口甚于防川，扬汤何能止沸。钧座明见万里，乃竟不以为然耶？今幸钧座采舆情，缓办选举，而大公报编辑，独未蒙开释，致该报久事停顿，群情惶恐，莫知所措，此敝会所以呈请钧座俯顺舆情，开释编辑，恢复报馆者也。久仰□钧座恶恶如寇，从美若流，所请恢复报馆惩办地痞之处，一片血忱，万蒙察照，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湖南督军兼省长张。

呈湘潭县公署文[1]

（1919年7月）

……泽东等以驻会干事关系教育前途，殊属重要，不能不依照先例，用投票手续选出相当人物，以策进行。既经冲突，票匦未开，复委曲求全，唯求不悖理法，迭次派人调停，而黄宗宪等纷纷散去，不肯会商，是以至于破裂而不可收拾。当日开会，正副会长

---

[1] 1919年7月7日至9日湘潭县教育会召开改选大会。会议程序，首先由全县17个区按相等名额推举干事，然后，由干事中互选驻会干事。7日，各区选出干事，毛泽东、宋焕达等当选。8日选举驻会干事时，宋焕达的名字被黄宗宪等人勾销、更换。宋当场起来质问，黄多方辩解，并扬言取消驻会干事。会长陈祖亮企图垄断会务，也一再袒护。这时，毛泽东挺身发言：驻会干事是县教育会全体94名干事的代表，绝对有设立的必要，并谈了驻会干事的职责、任务。湖南《大公报》一则报道说，毛泽东发言“侃侃抗论，声色俱壮，全场为之耸动”。9日，继续驻会干事的选举，黄宗宪又进行破坏，提出，要先选举办学人员。毛泽东反驳说：这不是选举驻会干事，而是分派饭碗了。决不可为人择事。即便是为了调停争执，也应先把驻会干事选出来，再由干事会讨论办学，选派驻会干事去办学。毛泽东的发言，得到绝大多数干事支持，于是投票选举驻会干事。正待开票，黄宗宪等突然蜂拥而入，将票柜强行搬走，选举未获结果。会后，毛泽东联合20余名干事，呈文湘潭县公署，叙述了开会情形，提出了善后办法，要求将县教育会暂行停会，待秋后另选举筹备人员，重新组织。这是呈文的后半部分，全文尚未找到。

业经当众宣告辞职。泽东等征集全县学界舆论，再三酌议，唯有暂行停会，并经向劝学所声明，补助教育会之公款，在此停会期内不得支发，一切文件、器具，托劝学所暂为保存。待今秋另行集会，举出筹备员，遵照部令，厘定会章，严限资格，重新组织，以便于教育事业确有所发展。此本会开会经黄宗宪等捣乱未得结果之善后办法也。泽东等诚恐有人另外发生枝节，希图破坏，祇得缕陈开会情形及议决善后方法，呈报钧署鉴核备案，批示祇遵，实为公便。

民众的大联合（三）

（1919年8月4日）

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形势

上两回的本报，己〈已〉说完了（一）民众大联合的可能及必要，（二）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于今进说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到底有此觉悟么？有此动机么？有此能力么？可得成功么？

（一）我们对于吾国“民众的大联合”到底有此觉悟么？辛亥革命[1]，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2]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

---

[1]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2] 哥老会，清代以来的民间秘密组织。活动于湖南、湖北、贵州、四川等省。会众多为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也有地主豪绅掺杂其间。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太平天国失败后，会众多参加农民起义、反洋教斗争。辛亥革命时，有些会众接受革命党人的影响和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以后则常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

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们又打倒了一次洪宪皇帝[1]。虽然仍是少数所干，我们却又觉悟那么威风凛凛的洪宪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朘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我〈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2]，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3]。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

---

[1]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定于1916年元旦废除民国纪元，改为洪宪元年，正式称帝。结果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抗，众叛亲离，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2] 委办政府，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3] 指1919年3月21日成立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这是继苏维埃俄国之后的第二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内部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下，同年8月1日被颠覆。

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业已有此动机么**？此问我直答之曰“有”。诸君不信，听我道来——

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谘议局[1]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2]——的组成。有谘议局乃有各省谘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谘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3]其后革命党化进了国民党，谘议局化成了进步党[4]，是为吾中华民族有政党之始。自此以后，民国建立，中央召集了国会，各省亦召集省议会。此时各省更成立三种团体，一为省教育会，一为省商会，一为省农会。（有数省有省工会。数省则合于农会，像湖南。）同时各县也设立县

---

[1] 谘议局，清政府为预备立宪而设立的地方谘议机关。各省于1909年先后设立。成员多系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任期3年。规定谘议局有讨论本省行政兴改和公债税收等权，实际上只能提出建议供督抚采纳，不能监督地方行政。1911年武昌起义后，许多省份的谘议局曾策动督抚脱离清朝政府，宣布独立。

[2] 同盟会，指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络光复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成立后发动多次反清武装起义。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3] 参见《宋史·岳飞传》：“金将军韩常欲以五万众内附。飞大喜，语其下曰：‘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

[4] 1913年，在袁世凯的操纵下，由共和党、民主党等联合组成为进步党，黎元洪任理事长，实际掌权的是汤化龙、张謇和梁启超、熊希龄等。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时，该党依附袁世凯，反对国民党。袁死后，进步党以“研究宪法”为标榜，成立宪政研究会，通称“研究系”。

教育会，县商会，县农会。（有些县无。）此为很固定很有力的一种团结。其余各方面依其情势地位而组设的各种团体，像

各学校里的校友会，

旅居外埠的同乡会，

在外国的留学生总会，分会，

上海日报公会，

寰球中国学生会，

北京及上海欧美同学会，

北京华法教育会，

各种学会（像强学会，广学会，南学会，尚志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科学社，亚洲文明协会……），

各种同业会（工商界各行各业，像银行公会，米业公会……），

各学校里的研究会（像北京大学的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有几十种），

各种俱乐部……

都是近来因政治开放，思想开放的产物，独夫政治时代所决不准有不能有的。上列各种，都很单纯，相当于上回本报所说的“小联合”。最近因政治的纷乱，外患的压迫，更加增了觉悟，于是竟有了大联合的动机。像什么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商会联合会，

广州的七十二行公会，上海的五十三公团联合会，

商学工报联合会，

全国报界联合会，

全国和平期成会，

全国和平联合会，
北京中法协会，
国民外交协会，
湖南善后协会（在上海），
山东协会（在上海），
北京上海及各省各埠的学生联合会，
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

都是各种的会，社，部，协会，联合会，固然不免有许多非民众的“绅士”“政客”在里面。（像国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全国和平期成会，全国和平联合会等，乃完全的绅士会，或政客会）。然而各行各业的公会，各种学会，研究会等，则纯粹平民及学者的会集。至最近产出的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则更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而起的一种民众的联合。我以为中华民众的大联合的动机，实伏于此。

（三）**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原来我国人只知道各营最不合算最没出息的私利，做商的不知设立公司，做工的不知设立工党，做学问的只知闭门造车的老办法，不知同共〈共同〉的研究。大规模有组织的事业，我国人简直不能过问。政治的办不好，不消说。邮政和盐务有点成绩，就是倚靠了洋人。海禁开了这久，还没一头走欧州〈洲〉的小船。全国唯一的“招商局”[1]和“汉冶萍”，还是每年亏本，亏本不了，就招入外股。凡是被外人管理的铁路，清洁，设备，用人，都要好些。铁路一被交通部管理，便要糟

---

[1] 招商局，全称轮船招商局，清末最早设立的最大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由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正式成立。总局设在上海。

糕，坐京汉，津浦，武长，过身的人，没有不嗤着鼻子咬着牙齿的！其余像学校办不好，自治办不好，乃至一个家庭也办不好，一个身子也办不好，“一丘之貉”“千篇一律”的是如此。好容易谈到民众的大联合？好容易和根深蒂固的强权者相抗？

虽然如此，却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

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完)

本会总记[1]

（1919年8月4日）

本会经过情形，亟待纪载。而记者耳目有限，所知不多，这篇所载，容有不实不尽的地方。尚望熟悉情形者，多惠材料，于所载出者，则赐以纠弹，本会幸甚。记者识。

本会成立以前的湖南学生界 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唐才常汉口一役[2]，时务学生之死难者颇不乏人。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

---

[1] 《本会总记》在1919年8月4日《湘江评论》第四号的“湘江大事述评”栏内刊出，文末注明“未完”，但《湘江评论》迄今只发现第一号至第四号。本文未署作者姓名，仅在文前说明中写有“记者识”三字。毛泽东当时是《湘江评论》的主编，为该刊写了许多文章；从本文的文风看，像毛泽东写的；1911年5至8月湖南学生界爆发反抗铁路国有的运动时，他正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同文中所说的“记者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边的一个小卒”的经历相符。根据上述情况，编者认为本文很可能为毛泽东所作。

[2] 唐才常（1867—1900），字黼丞，又字佛尘，湖南浏阳人。1897年与谭嗣同办时务学堂，编辑《湘学报》，次年又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899年冬回国后，在上海组织自立会，宣布“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汉口一役”指1900年8月他与林圭等在湖北汉口组成自立军机关，自任总指挥，拟在长江中下游起事，实行“武装勤王”。事泄，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国领事，于8月将他逮捕杀害。

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杭〈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陈宝箴[1]巡抚湖南，以开发湖南自任，时务等校之得以建立，陈氏实其元勋。戊戌政变[2]，陈宝箴走，谭嗣同死，梁启超逃，熊希龄革掉翰林，康圣人的著书，一大堆在小吴门外校场坪聚烧了。于是而时务学堂倒了。

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在此时间，各种官立学堂像求忠中学，优级师范，高等学堂等，巳〈已〉开设了许多。私立的像周南楚怡，及各县驻省学堂，更设立不少。官立学校，不消说是官气十足，什么“监督”“监学”，头上红顶花翎，身上马啼〈蹄〉补服，脚下寸底官靴，遇着“初一”“十五”，便率领学生（长衣马挂〈褂〉）用三炮〈跪〉九叩首礼先拜“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位，次拜“至圣先师”。学校的中堂，照例高悬一块大牌，上面写着“一曰尚忠二曰尚实三曰尊孔……”的圣谕，金碧辉煌，真好看的了不

---

[1] 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人，清末维新派，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1895—1898年在湖南巡抚任内，与按察使黄宗宪、学政江标等倡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设矿务、轮船、电报及制造公司，刊《湘学报》，为清末地方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力者。戊戌变法期间，奏荐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佐新政。戊戌政变后被革职。

[2] 戊戌政变，指慈禧太后发动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1898年（戊戌年）的维新活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坚决反对。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又一次临朝“训政”。随即囚禁光绪帝，搜捕维新人士；28日杀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林旭六人；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此时康、梁已逃往日本）；惩办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宗宪等数十人。废除新政诏令，戊戌变法失败。

得！每天吃饭，学生须穿长衣，若在六月里火热的天气，参观他们吃饭，又真是好看的了不得！学生毕了业，“报子”便向这学堂的“庶务先生”，或是“门公老爷”关说，用簿抄出一大批毕业生的姓名，住址，急忙制就许多的“报条”，上面写着“钦差大臣，陆军部侍郎，右副都御使，湖南巡抚部院某，会同湖南提学使司某，湖南官立某学堂监督某，考得某府少老爷某，超等第一名，捷报高升”字样。兴头十足，跑下乡间，打拱作揖的挂在一位毕业生家里的正堂壁上。这位毕业生一家子喜气扬扬〈洋洋〉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看着红底，白边，花纹，金字，真是欢喜的了不得！这位毕业生，得了喜报，他便坐着轿子（若家里没轿，便要新制），红顶帽，马啼〈蹄〉衣（多半新制），轿子背后悬着“中书科中书”等样的灯笼，向亲戚故旧的家里“拜客”。亲戚故旧得此一拜之后，“荣莫大焉”的跑到这位毕业生家里去贺喜。至则这位毕业生家里的头门上，又悬着一块写着“举人”或是“拔贡”字样的小匾，红底金字，更是好看的了不得！一场酒食，各自散归，这便叫“做酒”，又叫“打把食”，又叫“打秋风”。

于腐气薰蒸的学生界中仍要寻出他们的朝气勇气活泼气，则除却一班官僚教习和官僚办事人之外，有多少学生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屉〈屉〉里面，常秘密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1]，这两样东

---

[1] 《民报》，中国同盟会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1910年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共出26号。另附《天付》等增刊。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批驳改良派《新民丛报》的反对革命的谬论。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提出“三民主义”。主要撰稿人先后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章炳麟等。

西，本是禁物，却不胫而走的从日本到了湖南，同时杀不死吓不死的黄兴，禹之谟[1]，还在长沙，暗地里从事种种运动，直到甲辰狱兴，萍醴失败，马福益[2]在浏阳门外枭了首，打扮洋人乘着小轿的黄兴才从小西门出城逃去。然而湖南士气，却愈压愈振。在这时候，禹之谟乃独为湖南学生界的首领，于是乎发生了下面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

陈天华，姚宏业[3]者，一个是安〈新〉化学生，一个是益阳学

---

[1] 禹之谟（1867—1907），字稽亭，湖南湘乡青树坪人（今属双峰）人，近代民主革命者。1900年参加自立军活动，事败赴日本，入大阪千代田工厂学工艺。1903年回湘办实业。1905年参加收回粤汉铁路运动和抵制美货活动，被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和商会会长。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为湖南分会负责人之一。1906年发动长沙数万学生群众迎接陈天华、姚宏业灵柩公葬于岳麓山，又参加湘乡反对提高盐价的斗争。8月10日被清政府逮捕，次年1月在靖州被绞杀。

[2] 马福益（1866—1905），原名福一，一名乾，湖南醴陵人，两湖哥老会首领。参加1904年（即甲辰年）黄兴等在长沙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并任副指挥。起义失败后，出走广西。次年返湘，图谋再举，于4月被捕，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

[3] 陈天华（1875—1905），字星台，号思黄，湖南新化人，近代民主革命家。1903年留学日本，与黄兴等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影响甚大。次年回国，参与组织华兴会，准备在长沙武装起义，未成而逃亡日本。190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同盟会，任《民报》编辑。12月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愤而留下《绝命书》万余言，在日本大森湾投海自杀。姚宏业（1887—1906），字剑生，后改名洪业，湖南益阳人。1904年肄业于长沙明德中学，不久留学日本。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因抗议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愤而归国。因感怀国事，悲愤交集，1906年4月留绝命词千言后投黄浦江而死。

生，同在日本，于归途的中间，感愤国家的危亡，蹈海而死。湖南学生得报，灵柩溯湘水回来，便要求政府，葬于岳麓山。麻木不仁的潮〈湖〉南巡抚喻廉三[1]，及提学使某，正想借着革命党和学生的血将他们的顶子染得更红，固执不准。这边要求无效，便采用“自动主义”，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一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子，和洁白的衣服，映着火红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军警呆立路旁观看，那敢张声。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敢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这〈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但官府既怀恨在心过了些时，便借着问题将禹之谟杀了！接着便又将陈姚掘了！

湖南学生界，于“义葬陈姚”而后，可纪的事，就算宣统二年五月，**省城各学校全体学生的运动大会**——

原来学生之开运动会，我们也见惯了，有什么可纪的处所？可是在宣统二年的运动会，却有不同。即这一次的运动会，实含有“示威”的意思，和“革命”的色采。当时官厅也很害怕，提学使吴某尤怕的很。倡议的人，借着国势危亡外侮紧急的话头，多方鼓吹，才得实行。运动的场所，在长沙小吴门外新军操演的一块大坪。全体学生，严队发动。乘着晓风吹凉，朝阳吐丽，做出了多少运动。最足令人留着印象的，就是学生运动曲高唱入云的悲壮声音。这曲忘为谁某所作，至今近十年了，湖南的同学们犹念着不

---

[1] 喻廉三，应为俞廉三，字廙轩，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894年任湖南按察使，1896年任山西布政使，1898年2月任湖南布政使，是年10月继陈宝箴任巡抚，至1902年2月。在湘任职期间，阻挠陈宝箴变法维新，残酷镇压各地反清武装起义。

辍。我今将他记在下面——

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抢〈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所谓“军国精神”，是这时候教育的主旨，亦即学生所抱以求学的主旨。这种主旨，一面为着对外，一面则为着推倒满清。果尔，武汉一呼，湖湘首应，南被海桥，北暨幽燕，不出四月时间，响应遍于十七行者〈省〉，独夫摧翻，民国建立，教育之功，学生之力，不能不谓为诸种原因中的一个原因也。

于此且一述宣统三年五月至八月未革命前湖南学生界的运动，**即铁路国有问题的反抗运动**——

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黄兴在广卅〈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巳〈已〉跃跃欲试。昏愦〈聩〉的清廷，信着盛宣怀[1]的计画不识时宜，将全国主要铁路，收归国有，（记者案〈按〉，铁路应归国有，清廷此举，乃发非其时，）川粤汉铁路在内。四川首起争之，形势殊急。继起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庸懦无知的湖南巡抚杨文鼎[2]，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

---

[1]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1870年入李鸿章幕，利用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1910年任邮传部尚书，次年为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用“铁路国有”名义，将已收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路权作抵押，大借外债，激起铁路风潮。武昌起义爆发后被撤职，逃亡日本，仍继续进行出卖汉冶萍企业的活动。

[2] 杨文鼎，字晋聊，云南蒙自人。1901年起历任福建按察使、贵州按察使、湖北布政使等。1910年4月至1911年7月任湖南巡抚。

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记者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面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的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衣卸着一丢，说：“快习兵操，预备打仗。”一天晚上，忽然听得一片唤声，多人从被里出来，才知道这夜我们学校和旁的学校的代表，在某处秘密会议，被军警捉将官里去了。多人说，一定会要枪毙。我们的校长，慌慌张张伸出一丈二尺长的舌子连连说“了不得”，即时邀同别校的校长向官里讨保。等到天亮，方保了出来，我们才欢天喜地的又进被窝睡觉。这一次的乱子，闹的真大。一直到八月十九，湖北独立，九月初一，湖南响应，才撇开衬笔，归到正题，于是乎我们湖南发现了学生军。

我今进纪湖南的学生军（未完）

问题研究会章程[1]

（1919年9月1日）

第一条　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同人今设一会，注重解决如斯之问题，先从研究入手，定名问题研究会。

第二条　下列各种问题及其他认为有研究价值续行加入之问题，为本会研究之问题。

（一）教育问题——

（1）教育普及问题（强迫教育问题）（2）中等教育问题（3）专门教育问题（4）大学教育问题（5）社会教育问题（6）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7）中等学校国文科教授问题（8）不惩罚问题（9）废止考试问题（10）各级教授法改良问题（11）小学教师知识健康及薪金问题（12）公共体育场建设问题（13）公共娱乐场建设问题（14）公共图书馆建设问题（15）学制改订问题（16）大派留学生问

---

[1] 原件没有署名。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67号刊载的北京大学学生邓康（即邓中夏）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狠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周世钊1966年4月20日回忆：问题研究会"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其会章"是毛泽东草拟的"，所列问题"全由毛泽东提出"。

题（17）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

（二）女子问题——

（1）女子参政问题（2）女子教育问题（3）女子职业问题（4）女子交际问题（5）贞操问题（6）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7）男女同校问题（8）女子修饰问题（9）家庭教育问题（10）姑媳同居问题（11）废娼问题（12）废妾问题（13）放足问题（14）公共育儿院设置问题（15）公共蒙养院设置问题（16）私生儿待遇问题（17）避妊问题

（三）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

（四）孔子问题

（五）东西文明会合问题

（六）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七）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八）国家制度改良及国家制度应否废弃问题

（九）宗教改良及宗教应否废弃问题

（十）劳动问题——

（1）劳动时间问题（2）劳工教育问题（3）劳工住屋及娱乐问题（4）劳工失职处置问题（5）工值问题（6）小儿劳作问题（7）男女工值平等问题（8）劳工组合问题（9）国际劳动同盟问题（10）劳农干政问题（11）强制劳动问题（12）余剩均分问题（13）生产机关公有问题（14）工人退职年金问题（15）遗产归公问题（附）

（十一）民族自决问题

（十二）经济自由问题

（十三）海洋自由问题

（十四）军备限制问题
（十五）国际联盟问题
（十六）自由移民问题
（十七）人种平等问题
（十八）社会主义能否实施问题
（十九）民众的联合如何进行问题
（二十）勤工俭学主义如何普及问题
（二一）俄国问题
（二二）德国问题
（二三）奥匈问题
（二四）印度自治问题
（二五）爱尔兰独立问题
（二六）土耳其分裂问题
（二七）埃及骚乱问题
（二八）处置德皇问题
（二九）重建比利时问题
（三十）重建东部法国问题
（三一）德殖民地处置问题
（三二）港湾公有问题
（三三）飞渡大西洋问题
（三四）飞渡太平洋问题
（三五）飞渡天山问题
（三六）白令英吉利直布罗陀三峡凿隧通车问题
（三七）西伯利亚问题

（三八）斐律宾[1]独立问题

（三九）日本粮食问题

（四十）日本问题

（四一）朝鲜问题

（四二）山东问题

（四三）湖南问题

（四四）废督问题

（四五）裁兵问题

（四六）国防军问题

（四七）新旧国会问题

（四八）铁路统一问题（撤消势力范围问题）

（四九）满州〈洲〉问题

（五十）蒙古问题

（五一）西藏问题

（五二）退回庚子赔款问题

（五三）华工问题——

（1）华工教育问题（2）华工储蓄问题（3）华工归国后安置问题

（五四）地方自治问题

（五五）中央地方集权分权问题

（五六）两院制一院制问题

（五七）普通选举问题

（五八）大总统权限问题

---

[1] 斐律宾，今译菲律宾。

（五九）文法官考试问题

（六十）澄清贿赂问题

（六一）合议制的内阁问题

（六二）实业问题——

（1）蚕丝改良问题（2）茶产改良问题（3）种棉改良问题（4）造林问题（5）开矿问题（6）纱厂及布厂多设问题（7）海外贸易经营问题（8）国民工厂设立问题

（六三）交通问题——

（1）铁路改良问题（2）铁路大借外款广行添筑问题（3）无线电台建设问题（4）海陆电线添设问题（5）航业扩张问题（6）商埠马路建筑问题（7）乡村汽车路建筑问题

（六四）财政问题——

（1）外债偿还问题（2）外债添借问题（3）内债偿还及加募问题（4）裁厘加税问题（5）盐务整顿问题（6）京省财权划分问题（7）税制整顿问题（8）清丈田亩问题（9）田赋均一及加征问题

（六五）经济问题——

（1）币制本位问题（2）中央银行确立问题（3）收还纸币问题（4）国民银行设立问题（5）国民储蓄问题

（六六）司法独立问题

（六七）领事裁判权取消问题

（六八）商市公园设建问题

（六九）模范村问题

（七十）西南自治问题

（七一）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

第三条　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

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

（一）哪学上之主义
（二）伦理上之主义
（三）教育上之主义
（四）宗教上之主义
（五）文学上之主义
（六）美术上之主义
（七）政治上之主义
（八）经济上之主义
（九）法律上之主义
（十）科学上之规律

第四条　问题不论发生之大小，只须含有较广之普遍性，即可提出研究，如日本问题之类。

第五条　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如华工问题之类。无须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纸三项着手研究，如孔子问题及三海峡凿隧通车问题之类。

第六条　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然在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意之问题。在古代与现代及未来毫无关系者，则不注意。

第七条　问题研究之方式分为三种——

（一）一人独自之研究
（二）二人以上开研究会之研究
（三）二人以上不在一地用通函之研究

第八条　问题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以实行解决问题”，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

第九条　不论何人有心研究一个以上之问题，而愿与问题研究会生交涉者，即为问题研究会会员。

第十条　会与会员间，会员与会员间，只限于“问题研究”之一点，有关此外之关系，属于问题研究会以外。

第十一条　问题研究会，设书记二人，办理会中事务。

第十二条　问题研究会，于中华民国八年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九月一日成立。问题研究会章程，即于是日订定，且发布。

给黎锦熙的信

（1919年9月5日）

邵西[1]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2]，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3]，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

---

[1] 邵西，即黎锦熙。

[2] 《新湖南》是五四运动时期由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周刊，龙毓莹（字伯坚）任主编，编委有李振翩、张维等人。《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新湖南》第七号即由毛泽东接手主编，直至第十一号被张敬尧查封为止。

[3] 《民铎》，于1916年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留日中国学生所组织的“学术研究会”编辑发行，从第五号起迁至上海出版。1931年停刊。《国语学之研究》，为黎锦熙于1918年10月和1919年1月分别在武昌、太原国语讲习班所编撰的讲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1]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九·九·五从修业学校寄

---

[1] 《平民》，据黎锦熙1950年写的《毛主席六札记事并注释》中说：“《平民》刊物待考。查我1919年日记：‘七月廿一日，看荃弟（黎锦晖）所撰高等法文专修馆平民周刊发刊词。’或即此，也与留法团体有关。”

表同情于师范学生[1]

（1919年9月21日）

师范学生因为自己要读书，并推爱于百多个小学生，以为他们也要读书，反对解散附属小学。（见昨日本报）看他们说："赤子依恋，聚哭校门。校门重闭而不通，员役挥之而不去。旧有之师长见之于街衢，则执手问先生何以教我?"无论什么人见着或听着这种情景，都要流下一滴眼泪。吾湘诸教育家，比较的尚算有脑筋，应该表同情于他们。

---

[1] 1919年秋，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因校舍问题和经费困难，未能及时开学，并有被停办、解散之势。一师学友会为此写了一篇很长的呈省长文，刊于9月20日湖南《大公报》，要求省署出面，维持附小，"以全失学而便实习"。翌日，毛泽东则发表本文。

原来是他

（1919年9月26日）

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乱跑。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接着眼泪也下来了。本预备着吵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了。

倒退一步

（1919年9月27日）

撑伞出街去。上面是雨。手□□，从人丛中觅一条隙路。已经是不耐烦了□□有那扯不断的大群小群由□经过。连□□□觅得的小小一条隙路，也都被他们占去□□□不清，只好恭恭敬敬的倒退一步。

《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1]

（1919年9月）

本报第七号以后的宗旨是：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第七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四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y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

[1] 《新湖南》，原为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会刊，从第七号起由毛泽东负责编辑。毛泽东在1919年9月5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另据周世钊回忆：当时，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已被禁止发行，湘雅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征得毛泽东同意，从第七号起由他主持编辑，毛泽东“决心把这个刊物办好”，写了这篇《刷新宣言》。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长沙社会面面观》摘登这一宣言时在前面写道：“《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七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位看他第七号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在摘登后又加了一段话：“再看他第七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采真是不少。最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的很透。又有评中国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不过详细记出来太长了。”

祭母文[1]

（1919年10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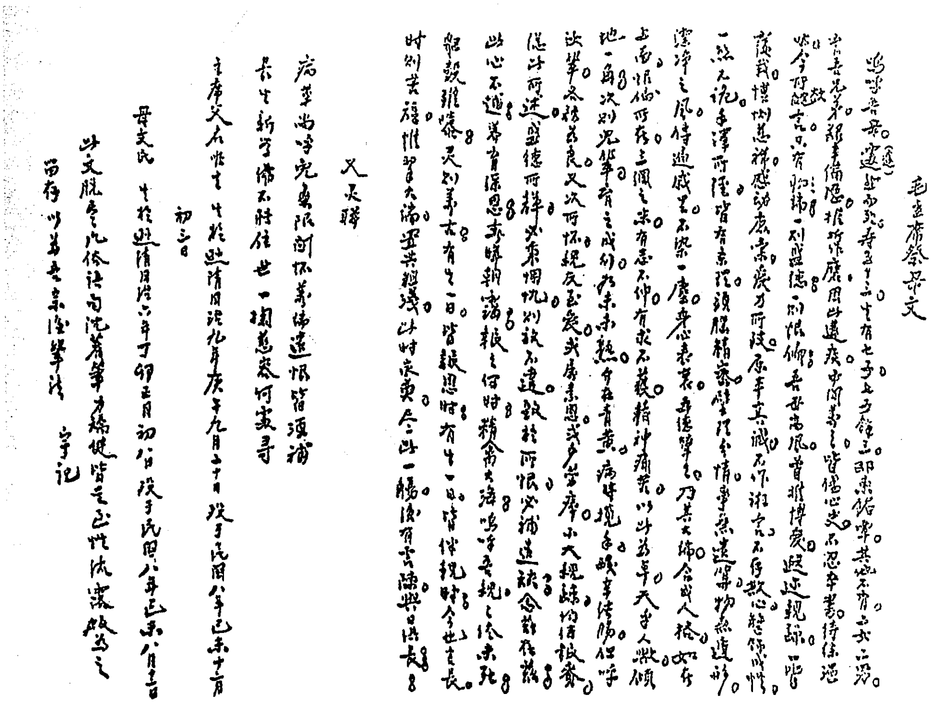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2]。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

---

[1] 毛泽东的母亲于1919年10月5日（即农历八月十二日）病逝，本文系毛泽东闻耗从长沙回家奔丧期间所写。毛泽东的表兄文咏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向档案部门提供了本文的抄件，题目为《毛泽东祭母文》，并在题下写道：“民国八年八月十五日，他在灵位前执笔成之，我代录正的，稿存我家。”毛泽东的原稿在文咏昌家保存多年，后被遗失。毛泽东的塾师、族兄毛宇居也同时向档案部门提供了另一个抄件，文后写道：“此文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皆是至性流露，故为之留存，以为吾宗后辈法。”两份抄件基本相同，仅个别字有异。

[2] 东民覃，指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毛泽覃（1905—1935），毛泽东之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武装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央军区独立师师长等职。后在战斗中牺牲。

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毛主席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遂）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泽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不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小大亲疏。均待报赍。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又灵联

病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主席父名世生 生于逊清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二十日 殁于民国八年己未十月初三日
母文氏 生于逊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八日 殁于民国八年己未八月五日

此文脱稿后乃依诸句沉着笔力矫健皆至性流露故为之
留存以为本宗临摹笔法 宇记

文咏昌代为录正的毛泽东《祭母文》和《挽母联（两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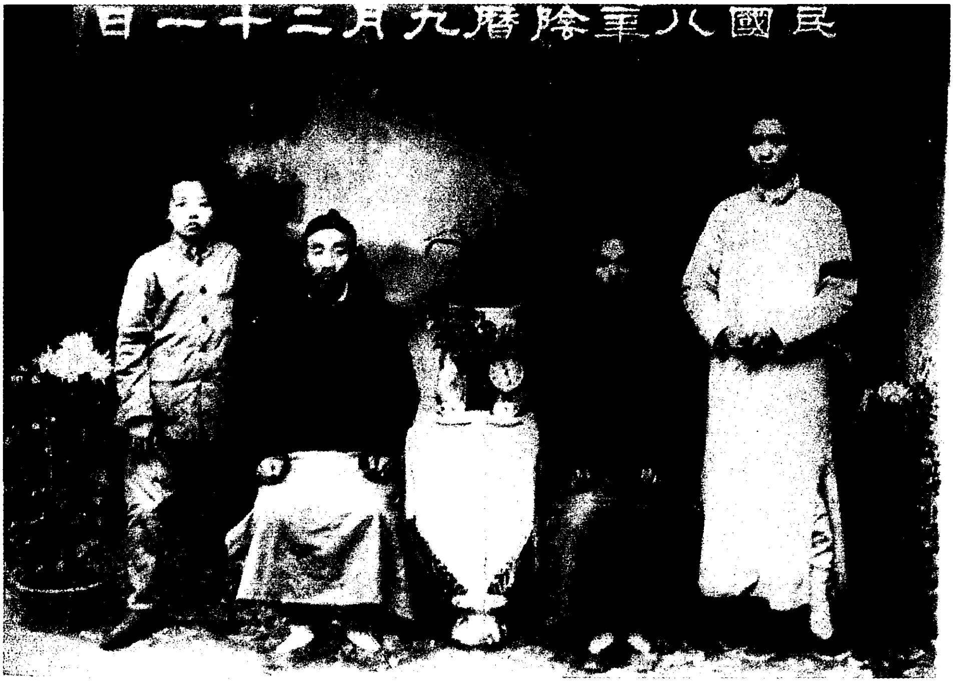
又灵联

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二

春风南岸留晖远，
秋雨韶山洒泪多。


民國八年陰曆九月二十一日

1919年，毛泽东和父亲毛顺生、堂伯父毛福生、弟弟毛泽覃在长沙合影。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1]

（1919年11月16日）

社会上发生一件事，不要把他小看了。一件事的背后，都有重叠相生的原因。即如“人死”一件事，有两种解说：一是生理的及物理的，“年老寿终”属于这一类；一是反生理的及反物理的，“夭殇”“横死”属于这一类。赵女士的死，是自杀，是横死，是属于后一类。

一个人的自杀，完全是由环境所决定。赵女士的本意，是求死的么？不是，是求生的。赵女士而竟求死了，是环境逼着他求死的。赵女士的环境是：（一）中国社会，（二）长沙南阳街赵宅一家人，（三）他所不愿意的夫家长沙柑子园吴宅一家人。这三件是三面铁网，可设想作三角的装置，赵女士在这三角形铁网当中，无论如何求生，没有生法。生的对面是死，于是乎赵女士死了。

假使这三件中有一件不是铁网，或铁网而是开放的，赵女士决

---

[1] 赵女士，名五贞，湖南长沙人。生于1896年，父亲赵海楼，开眼镜店为业。五贞知书识礼，工裁缝、刺绣，友善邻里。后由媒婆撮合，父母包办，许配给富商品古斋少老板吴凤林为继室。五贞不愿“填房”，又嫌吴年大貌丑，要求改变婚期，终以“择吉已定”不允。1919年11月14日，五贞用剃刀自杀于花轿内，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毛泽东就此事在湖南《大公报》《女界钟》上连续发表10篇评论文章，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本书收录的这10篇文章，除《女子自立问题》一篇外，其余9篇的标点均为编者所加。

不至死。（一）假使赵女士的父母不过于强迫，依从赵女士自由意志，赵女士决不会死的。（二）赵家父母以强迫从事，使赵女士能达其意于夫家，说明不从的原故，夫家亦竟从其意，尊崇他的各〈个〉人自由，赵女士决不会死的。（三）父母及夫家虽都不能容其自由意志，假设社会上有一部很强烈的舆论为他的后援，别有新天地可容其逃亡栖存，认他的逃亡栖存为名誉的举动，而非所谓不名誉，赵女士也决不会死的。如今赵女士真死了，是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至于求死的。

去年日本东京发生一件伯爵夫人和汽车夫恋爱发泄后同自杀的事。东京新闻为之发刊号外，接着许多文人学者讨论这件事亘数月不止。昨日的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昨日天籁先生和兼公[1]先生已经作了引子，我特为继着发表一点意见。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他呼一声“冤枉”。（事详昨日本报）

---

[1] 天籁是谁不详。1919年11月15日湖南《大公报》载有他的《旧式婚姻之流毒》一文。兼公，即龙彝（1888—1951），号寿彝，笔名兼公，湖南湘潭人。时任湖南《大公报》主笔。1919年11月15日在该报发表《改革婚制的牺牲者》一文，11月17日、18日又发表《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杂感》和《赵、常两女士的人格》。

赵女士的人格问题

（1919年11月18日）

前日我做了一段批评，说赵女士的死因，是由赵女士的环境所决定，即是由赵女士所处的社会及母夫两个家庭所决定。我因此要论一论赵女士的人格。

一个人问我：赵女士有没有人格？我说，我有两个答：一个是赵女士没人格。一个是赵女士有人格。

怎样说是赵女士没人格？赵女士要是有人格，便不会死。何以呢？人格这件东西，是由于对手方面的尊崇才有的。他的先决问题，是要意志自由。赵女士的意志自由么？不自由的。怎么不自由？因为赵女士有父母。在西洋，一个人的父母，和他子女的意志自由是不生影响的。西洋的家庭组织，父母承认子女有自由意志。中国则不然，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赵家父母明明迫着他的女儿恋爱不愿意恋爱的人，遗容有什么自由意志？你不愿恋爱我，而我迫着要恋爱你，这是一种强奸。这叫做“直接强奸”。他的女儿不愿意恋爱那人，而他逼着要他女儿恋爱那人，这也是一种强奸。这叫做“间接强奸”。中国的父母都是间接强奸自己的子女。这结论是在中国家庭制度（父权母权）婚姻制度（父母代辨〈办〉政策）的底下应该发生的。赵女士要是有人格，必是有自由意志；要是有自由意志，必是他的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赵女士的

父母能够尊崇他容许他，赵女士还会乘着那囚笼槛车似的彩轿以至于自杀其中吗？而今确有此事实，所以我的答是：（一）赵女士没有人格。

怎样又说他有人格呢？这是指赵女士的本身了。赵女士虽二十一年（他二十一岁）处在不容他有人格的家庭之中，他的父母虽二十一年不令他有人格，但在他二十一年最后的一瞬间，他的人格忽然现在来了。呜呼，呜呼！不自由，无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1]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所以我的答是：（二）赵女士有人格。

于是我的良心逼着我说下面两句：

（一）天下类于赵女士父母的父母都要入狱。

（二）愿率天〔下〕人齐声高呼：“赵女士万岁！”

---

[1] 柑子园，街道名。当时品古斋少老板吴凤林住长沙市柑子园一条巷。

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

（1919年11月19日）

兼公先生在大前天本报“随意录”内，登了一段《改革婚制的牺牲者》，对于赵女士的自杀，下一个警告于做父母的。他说：

“……中国人不都是些聋子瞎子，必定总有一丝半点儿的良心，就应该有一个澈底的觉悟，不再去干涉他的儿女婚姻。这个女子还死得值。……我们不要辜负他，不要使他白白的送了一条性命。”

兼公先生的话，说着一半了。但是，还有一半没有说着。我补着说：

“全中国的青年男女诸君！你们都不是些聋子瞎子，眼见着这么一件‘血洒长沙城’的惨事，就应该惊心动魄，有一个澈底的觉悟。你们自己的婚姻，应由你们自己去办。父母代办政策，应该绝对否认。恋爱是神圣的，是绝对不能代办，不能威迫，不能利诱的！我们不要辜负了他，不要使他白白送了一条性命。”

读者诸君以为何如?

改革婚制问题

（1919年11月19日）

我昨日对于兼公先生《改革婚制的牺牲者》一段话，和他补上了一段，替男女青年作一个正当主张。我今日所要说的，就是既然提出了“改革婚制”，就应该进行讨究“婚制如何改革”。我甚希望一般青年男女诸君，对于这个问题，有所解决。如有以解决的论文投向本报，本报当然是极其欢迎。

女子自立问题[1]

（1919年11月21日）

关于赵女士自杀事件，日来论者颇多。我亦略有所论评，登在本城的《大公报》。这是人类一个公事件，除开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和独身主义之外，谁都应该注意，应该研究。而在我国女子一面，尤应特别注意研究。盖我国因数千年不正当的礼教习俗，女子在任何方面，都无位置。从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职业、交际、娱乐、名分，一概和男子分开做两样，退处于社会的暗陬。于不得幸福之外，还领受着许多不人道的虐待。当此真理大明，高呼“女子解放”时候，还有这被逼杀身事件出现，也可知我国社会罪恶的深固程度了。于今我们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叹惜，还是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这样同类的惨事发现为好。而在研究方法之先，又应推寻所以被制根由。

吾们试想女子何以被男子欺负，至于数千年不得翻身呢？关于此点，吾们要研究女子到底有何缺陷？据表面看，女子的知识比男子要低，女子的意志比男子要弱，女子是富于情的，情盛则知意退化，这是心理不及男子的处所。又身体要弱些；加以包脚苦痛，行

---

[1] 1919年11月21日，长沙周南女校学生主办的周刊《女界钟》（主编周敦祥）特刊第1号，在《关于赵女士自刎以后的言论》的总标题下，发表了一组文章，共10篇。本文是其中的一篇，标题为编者所拟。

步艰难；这是女子生理上的缺陷。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的缺陷，大概言之，女子的心理作用，和男子并不相远。各国教育，无性的差别，所留成绩，业己〈已〉证明。至后列两事，体弱乃习之使然；小脚从非古所有，不足为生理上之根本缺陷。求根本缺陷于女子生理，便是唯一的生育问题了。

男女的关系，依现代主张，应以“恋爱”为中心，恋爱以外，不能被支配于“经济”。所以现代的主张是，“经济各自独立，恋爱的儿公共”。现代以前则不然，都不知有所谓“恋爱神圣”的道理，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故在上古之世，食物饶富，摘果獭〈赖〉群，容易饱腹，男女也处在平等地位，经济一项，女无所求于男，男无所求于女，男女所求，只在“恋爱”，故女子有时反得以其生理上的强点（男女性的生理，据生理学家说，女子比男子要强）制服男子。后来人口增多，食物不足，生活竞争，不得不注重工作，至此乃真到了女子被征服于男子的死期了。

女子用其体力工作，本不下于男子，然不能在生育期内工作，男子便乘他这个弱点，蹈瑕抵隙，以“服从”为交换条件，而以“食物”噢咻之。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

在一面言，人类谁不是女子所生？女子的生育，乃人类所赖以不绝的要素。男子竟忘此绝大恩惠，反因区区经济关系，妄自尸德加以压迫，真所谓恩将仇报了。在一面言，生育这个事件，是一个极苦痛事件。“产难”两个字，凡是女子，谁都听着惊心，除开在医学发明，使“产难”变为“产易”以外，吾人应表示极大的敬虔和恻悯，岂得反借区区经济小惠，来相压制！

本上“理由”，吾人便可谈到“方法”了。关于使女自子〈子

自〉由独立不再受男子压迫的方法，大要可如左列。

（一）女子在身体未长成时候绝对不要结婚。

（二）女子在结婚以前，需预备够足自己生活的知识和技能，以此为最小单位。

（三）女子需自己预备产后的生活费。

上列三条，乃女子个人自立的基本条件。此外尚有“儿童公育”一个条件，为社会方面应大注意者。倘在女子方面能做上列三条，在社会方面又有儿童公育的设施，则恋爱中心主义的夫妇关系，便可成立。这也看我们青年男女诸君的努力呵！

“社会万恶”与赵女士

（1919年11月21日）

我的朋友殷柏[1]先生，在前天报上发表他的议论，批评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说我徒然归咎环境，放松赵女士的本身，这个不是。他说：“赵女士的行为，是软弱的消极的行为。这种行为，万万不可提倡。”殷柏先生这样积极的议论，奋厉的主张，我本十分赞成。我对于赵女士自杀问题，本拟分作数个小节来批评他。我所拟定的数个小节中，有一个就是“非自杀”。殷柏先生的主张和我的主张，还算是一致不悖。

不过我到底不能放松“社会”。赵女士的自杀举动，任说是如何软弱，总不能说他是“无故而死”。他死的“故”，又总不能不说有多少是在他本身以外的“社会”。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我们现在未死的人，还有这么样多，我们就不能不预防这

---

[1] 殷柏，即彭璜（1896—1921），字荫柏，也作阴柏，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6月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1920年8月，与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参加组织俄罗斯研究会。1919年11月19日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我〈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的批评》一文，认为赵女士的自杀是消极的行为，不可提倡，而应提倡积极奋斗，甚至离家出走。

危险东西遇着机会随时给我们以致命伤。我们就不能不大声疾呼，警觉我们未死的同类，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

我说逼赵女士致死的有三方面：一是母家，一是夫家，一是社会。究竟母家、夫家都含在社会里面。母家、夫家，都是社会的一个分子。我们要晓得母家、夫家是有罪恶，但是他罪恶的来源仍在社会。他们的罪恶，固然他们自己也可制造，但大部分仍是社会给与他们的。并且社会如好，他们要制造罪恶也没有机会。譬如赵家听见了吴家的姑恶，做媒的佘四婆婆，偏要说这不确。设在西洋社会，必无如此勉强牵合的媒人制度和欺人诳语。又如赵女士不肯上轿，他的父亲竟掌他一个嘴巴。假在西洋社会，便可在法庭提出诉讼，或竟采用自卫的抵抗方法。又如赵女士欲吴家改期，吴家的兄嫂竟有权可以“固拒不许”，这边亦竟不能不承认他的“不许”，强迫嫁去。这都是我们中国万恶社会里特别发生的把戏。

殷柏先生以为赵女士何不逃亡，并说这事可以办到。我说是的，今且举出几个疑问，然后再申我的说话。

（一）长沙城里有四十几副洋货担，我所住的韶山乡里不出三十里路，亦有七八副杂货担，这是什么原故？

（二）长沙城里的大小便所，为何只有男的，没有女的？

（三）理发店为何不见有女子进去？

（四）旅馆里面为何不见有单独居住的女人？

（五）茶馆里为何不见有女人进去喝茶？

（六）太和丰一类的绸缎铺，余太华一类的洋货铺，客人跑进去，铺里讲生意的，为何不见有女子，只见有男子？

（七）满城的车夫，为何没有一个女子，尽数是男子？

（八）南门外第一师范，为何不见有女学生？古稻田第一师范，

为何不见有男学生?

有人答得出这些问题，便可晓得赵女士何以不能逃亡了。这些问题并不难答，只有一个总答，就是“男女极端的隔绝”，就是社会上不容有女子位置。在这“男女极端隔绝”，不容有女子位置的社会里面，赵女士纵要逃亡，他逃亡向何处去?

若说世界上逃亡的例子尽有，我也答说是的。再举出一个例：“我们韶山乡里，有一个姓茅[1]年十八岁聪明而且美貌的女子，嫁到一个姓钟极蠢极丑的丈夫。这女子极不愿意，最后抛掉她的丈夫，恋爱邻居一个姓李的儿子。今年八月，逃出他的家庭，实行自由恋爱去了。”

你必以为这是很好的。但是，[2]

“不到两日，被旁人围着，报信他家，他家便派人将他捉住。”

仅仅捉住，尚没有什么要紧。

“捉到家里，赏他一场极大的毒打，锁入重房，仍旧对着他的蠢夫，完成那‘极正当’的夫妇关系。”

这还不算什么。

“张三说，这东西打得好，他走脚，他不要脸。”

“张四也说，这不打还待何时！人家出了这种女子，真是丑死了一族人。”

这位茅女士算是实行积极主义，不畏险阻艰难，拼命与恶魔奋斗了。但是，他得到了什么结果呢？我只看见他得到三件东西：一件是“捉”，一件是“打”，一件是“骂”。

由此看来，赵女士怎样能不自杀呢？呜呼，赵女士！呜呼，社

---

[1] 韶山无茅姓，只有毛姓。

[2] 原文如此。

会万恶！

此稿写完，见汝霖君评论[1]，亦侧重社会一面，与予意合。但在赵女士方面，是否尚有他种方法足以完成其自由意志，及各种方法价值的比较如何，俟下回再论之。再有能以赵女士的“名”，及“毕业何校”“天足小足”等项见告者，无任欢迎。

---

[1] 汝霖，疑为萧汝霖（1890—1926），湖南桃源人。辛亥革命后为长沙《军国民日报》总主笔，谭延闿二次督湘时任督军署副官长。汝霖于1919年11月19日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我对于赵女士自杀案的主张》一文，认为赵的自杀是社会造成的。赵的父母和媒婆“都要受刑事的制裁”。

非自杀

（1919年11月23日）

我于赵女士自杀一事，归咎于环境的逼之使然，而于“自杀”的本身，尚未置论。关于自杀一事，古今东西的伦理学者，不知有多少议论。或赞美自杀，或排斥自杀，其立脚点，则皆在于人生观，在其人对于人生观的见解怎么样。我对于自杀，是采排斥的态度，可分作几层来说。

（一）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除开少数厌世的伦理家之外，多数伦理家都是主张人是以“生”为目的的。而其规定之词，或说“为公众福利，自由发展个人”，或说“个人及全人类的生存发达”。而泡尔生则说：“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1]我觉得泡尔生的话，于人生目的，有具体的表示，最为可循。而此种目的，以自杀为方法，断乎不能达到。以自杀为方法，不仅是不能达到自己的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竟是反对自己的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这是容易明白的道理。

---

[1] 泡尔生，今译鲍尔生。语见《伦理学原理·序论》译文：“吾言道德之正鹄在至善，而至善即具足之生活。夫具足之生活者何？盖谓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至高而无所歉然之谓也。”

（二）关于自杀者之心理怎样，我们没有自杀的经验，不能确切断定。惟普通活人的心理，则同是排斥“死”的观念，而欢迎“生”的观念。人类最大多数的心理，既是欢迎“生”的观念，排斥“死”的观念，则少数欢迎“死”排斥“生”的人，不能不说他是例外。这种例外的人，可说是一种心理的反常。

（三）在生理学上，一个人的身体，由于细胞所组成。一个人的总生命，就是各个细胞的生命的合体。而细胞生命的自然状态，总是向前继续，至一定年龄而后老死。自杀则是反抗此种生理的自然状态的。此生理的自然状态，为一种反常心理所支配，而被其裁决，可说是一种生理的奇〈畸〉变。

（四）在生物界，各种生物自杀的很少。虽世亦有所谓义犬义兽以死自殉的传闻，但总不常见。普通都是以生为乐，体合环境，百折求生。

总上所述，自杀在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都无位置，故各国刑法有禁止自杀的规定。而社会习惯，生则为之庆，死则为之吊，也都是立足于根本的“求生法则”上面。

于今我们所欲研究的，就是何以社会上竟有自杀的事，且时或见之，并不十分稀罕，及吾人对于壮烈的自杀，恒表示一种尊敬感情，有时竟流露“自杀得好”的赞语，这是什么原故？

关此两点，我的答案如下：

（一）自杀心理的发生，其发生之前，并不是想要自杀，乃是想要求生。他的求生希望，且异常剧烈。此种异常剧烈的希望，至少须给与以相当条件，方能令他满足。设若他的环境，对他不善处置，使他的希望，尽数落空，变成失望，则未有不求死的。故犯人死刑宣告，不能在执行之前的多日告知犯人，即是此理。因此，我

们晓得一个人的自杀，其动机并不是求死的，不惟不是求死，反是一种剧烈的求生。社会之所以有自杀，是社会将他的“希望”尽行夺去，而给与以“完全失望”。社会尽行夺去某一个人的希望，而给与以完全失望，则某一个人必至自杀，如赵女士自杀之类。社会尽行夺去某一团体或某一族类的希望，而给与以完全失望，则某一团体或某一族类必至自杀，如田横五百义士同时自杀[1]，洪、杨军十万架火自焚[2]，荷兰与某国开战，声言如相煎太急，则将决海自沉之类。某处的社会多给人以失望，则某处社会里多自杀的人；某处的社会少给人以失望，则某处社会里少自杀的人。

（二）吾人所以尊敬壮烈的自杀，有下列之二个原因：一是因他敢做人不敢做的事，认他的精神，胜于我自己，我自己乃于不知不觉之间，发生其感叹及尊敬；一是因为他反抗强权的精神，认他的身体虽死，而他的志气获伸（其实未伸，不过吾人因他自杀，觉得他的志气好似伸了），压他的强权，因此不能逞意。我心快慰，乃移之以尊敬自杀者。所以非壮烈的自杀，乃奸邪为正义所征服的自杀，吾人不尊敬之。

于是，我要说明“非自杀”的本题了。

---

[1] 田横（？—前202），秦末狄县（今山东高青东南）人，齐国贵族。楚汉战争中自立为齐王，后为汉军所败。刘邦做皇帝后，田横与徒属500人逃至一海岛中居住。刘邦相招，田横“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公元前202年，刘邦强令田横赴洛阳，田不愿做刘邦的臣子，行至偃师自杀。岛上500人闻田死，也都自杀。

[2] 洪、杨，指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从1862年6月天京被围，到1864年7月天京陷落，天京保卫战历时两年多。城破之日，湘军大肆烧杀淫掠。太平军将士，将一切财物集中，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然后集体自焚。

第一，从各种证明，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即不应反其道而求死。所以“非自杀”。

第二，自杀的条件，是社会夺其希望。吾人于此，应主张与社会奋斗，争回所失的希望。奋斗而死，则是“被杀”，不是“自杀”。所以“非自杀”。

第三，吾人并无尊敬“自杀”本身的感情，所以尊敬壮烈的自杀，乃是尊敬他的“难能”及“反抗强权”两点。假设除去此两点，自杀是容易的事。又世上并没强权，无所用其反抗，那么，虽有自杀，吾人亦那来尊敬的感情？吾人既并无尊敬“自杀”本身的感情，则“自杀”一事，应该反对。至于“难能”一点的尊敬，吾人应于别处求之，不应求之于惨酷的自杀。“反抗强权”一点，吾人应求之于奋斗。所以“非自杀”。

最后，我乃归结到赵女士。自杀的总体，既已明白是不应该，赵女士是一个自杀的，所以也在不应该之列。吾计赵女士自处的方法，有下列四种：

（一）有人格的得生；

（二）奋斗被杀；

（三）自杀；

（四）屈服。

屈服，非他所愿。有人格的得生，须自己先造新社会。赵女士无此能力及准备。假设逃亡于外，其受辱或等屈服，赵女士之所以宁不逃亡以此。自杀所以全人格，而为心理、生理、伦理、生类之变，非自然状态，即非他自然的本心。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奋斗的目的，不存在“欲人杀我”，而存在“庶几有人格的得生”。及终不得，无所用力，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

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故论赵女士所以保全人格，完成其自由意〔志〕，而又合乎人生的自然法则。其方法所出，品其价值，当说：

有人格的得生第一。

奋斗被杀第二。

自杀第三。

屈服第四。

屈服，在人格及自由意志上无位置。自杀，于人生自然法则上亦无位置。奋斗被杀，其结果虽在人生自然法则上无位置，然其动机有之。有人格的得生，动机结果都好，惜非所以语于现今的中国社会及赵女士。而赵女士则竟以自杀自处了，故我对于赵女士的结论是：

“他的自杀，只于‘人格保全’上有‘相对’的价值。”

右文仓卒草成，写我一个人的意见。到底对不对，尚要请大家批评。而于新曼君把自杀看做“一件最快心、最可喜的事”[1]，颇难表示赞成之意。倘辱纠正，极表欢迎。

---

[1] 1919年11月20日湖南《大公报》在《赵女士自杀案的舆论》标题下，发表了苏润波、新曼、不平三人的“投搞”。新曼何人，不详。他在文中认为：“赵女士是个不为环境所屈的铁汉，同时是个完成自己意志的自动的牺牲者。”赵的自杀“分明是一件最快心的最可喜的事”。

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1]

打破父母代办政策

（1919年11月25日）

我常常觉得，老人于种种事情总是和少年立在反对地位。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生活，以至对社会国家的感想，世界人类的态度，他总是萧瑟的，枯燥的，退缩的，静止的。他的见解总是卑下，他的主张总是消极。我觉得少的与老的，所以尚能相处一块，大半是为着利害关系。老的靠着少的供给他的衣食，少的靠着老的供给他的经验和智识。这虽然觉得是“极端言之”。吾国固因制度和习惯的不善，然后乃有此特别怪象。然老年、少年彼此的生活，确有根本不同之处。这道理是成立在生理和心理的上面的。人的生活所以有老年与少年的不同，是因为老年的生理与心理和少年的生理与心理不同之故。吾人的生活，统言之即是生理上、心理上欲望的满足。欲望因性的差别、年龄的差别、职业的差别、信仰的差别而各不同，而以因年龄有别欲望因而不同一点最为显著。这是东西学者业已证明了的。

---

[1] 作者原意似拟在《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的大标题下，针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妨碍自由恋爱的两大问题，分写两篇文章，一为本篇《打破父母代办政策》，一为下篇《打破媒人制度》。但下篇见报时，未再用上述大标题。

吾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誉欲、权势欲（一称支配欲）等等皆是。各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前者所以维持“现在”，后者所以开发“将来”。而两种欲望当中，食欲无绝对年龄差别，性欲则有年龄差别。

性欲的表现，大体言之，就是恋爱。恋爱这个问题，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头子则视其无足介意。原来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中国则独将这个问题撇开到一边。我在小时看见多人做喜事，我便问他们何干？他们都说，一个人讨亲为的是烧茶、煮饭、喂猪、赶狗、纺纱、织布。我就问道，何不请一个工人省事得多呢？到了后来，才听得讨亲是为的“接后”，我仍是莫名其妙。直到于今，一看社会里面对于婚姻一事，尚寻不出半点恋爱的影子。社会上既不以恋爱为重，于是婚姻一事除开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以外，便只有那下等的肉欲生活。（所谓性的欲望，所谓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是资本主义的结果。老年人既不注意了恋爱，便单注意在“吃饭”一点。于是他的儿子要讨亲，他便说是他讨媳妇。他讨媳妇的目的，便是要他媳妇替他做奴隶的工作。《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1]，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至于有女嫁人，他不说为女择夫，到说是他选快婿。所谓“快婿”，便是只图他快，他的女儿快否，是不问的。甚者多索聘金，则又是只顾自己的“吃饭”了。总之，资本主义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恋爱，是立于冲突的地位；老头子与资本主义则是深

---

[1] 参见《礼记·内则》，原文为：“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

固的结合在一块，而恋是的好朋友便只有少年了。你说老头子与少年是不是立于冲突地位呢？

平子君鉴于赵海楼之逼杀其女，极不赞成父母主婚[1]，而没有说出所以然的真实道理。其余筠园、纬文、不平[2]诸君的议论，对于父母干涉子女婚姻一点，尚多徘徊两可之谈，未明绝对难侵之理。（不平君主张父母作有力的参加人，更说远了。）我特在生理上、心理上找出根据，证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在子女方面，对于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应为绝对的拒绝。必要做到这点，然后资本主义的婚姻才可废止，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

---

[1] 平子，即张平子（1885—1972），字启汉，湖南湘潭人，同盟会会员。1919年任湖南《大公报》主笔，与毛泽东来往较多。于1919年11月22日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我不赞成父母主婚》一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南省政协委员。

[2] 筠园、纬文、不平三人生平不详。1919年11月20日湖南《大公报》发表纬文《婚制改革问题》一文，主张废除早婚，限定结婚年龄；儿女自行择合，经父兄鉴定；或由父母择合，经儿女许可。同日，该报在《赵女士自杀案的舆论》标题下，发表不平的文章，认为儿女婚姻要自愿结合，父母应做“有力的参加人”，“以便过细发展，不致草率了事”。11月21日，该报又发表筠园《我改革婚制谈》，认为青年男女学问没有养成，“抉择力都弱，自由结婚还有弊病”，主张改革婚制从打破“男女界限”入手，实行男女同校，并为他们提供交际机会。

打破媒人制度

（1919年11月27日）

讲到“媒人”这个东西，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把戏了。中国社会里的把戏很多，像那文章啦，科举啦，土匪啦，官僚啦，无非是一些把戏。又像冲傩[1]啦，打醮[2]啦，耍龙灯啦，玩狮子啦，以至医生看病啦，教员上课啦，男女结姻啦，无非是一些把戏。中国这种社会简直可以称做把戏的社会。结婚这个把戏里面，关涉到男女问题，又生出了许多小把戏，像那爬灰啦，盗嫂啦，养汉啦，争风啦，带〈戴〉绿头巾啦，使仙人跳啦，等等都是。而在婚姻里面，出乎这些小把戏之上，竟可以称为“大把戏”当之而无愧色的，便算那三头六臂神通广大的“媒人”了。

中国的媒人，有下列各种的怪现象：

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

一次婚姻总有十分之八以上的说谎；

以“神”及“八字”为护符。

在中国婚姻上操有大权的，人都说是父母，其实父母虽有主持之名，没有决定之实，有决定实权的便是媒人。中国人人有做媒的资格，且认做媒是一种义务似的。一遇人有子求亲，或是有女要

---

[1] 冲傩，旧时的一种迷信活动。意在击鼓驱疫，有时还伴有傩舞。

[2] 打醮，道士设坛祭神的迷信活动。

嫁，他左右前后的人，随便那个，都可以寻着这事去干。这种媒人，第一便是以“拉合成功”为根本主义。两边游说，心注“成功”，而词旨论锋，总说听你们两下自愿，其实自经他几番饕嘴，做父母的虽有铁耳，早已化成了软绵。我见过多少媒人，成功的总占十分八九。他以为若不撮合，便是我的罪过，倘然合了，使他们两家无亲变为有亲，可算是一件功劳。在这种拉拢主义底下，有离不开的一件事情，便是“说谎”。男女两家，既都不相接近，种种实际，互不相知，女子闭在深闺，更加不易察觉。他就信口开河，造作言语，务使两边父母，听着都能快意。一纸婚书，便构成了这回亲事。所以，往往结婚之后，驴唇不对马嘴。如这次佘四婆婆之摄〈撮〉合赵女士、吴五，便说是〈是说〉谎的好证。甚且变换新郎，或更易新妇，这竟是一个“矛盾对当”，不仅止“些微说谎”了。媒人既已只务“拉拢”，而又“白屁”喧天（乡人谓说谎为谈白屁），驴唇不对马嘴的婚姻，几乎塞满了中国社会。又何以男女两方，竟不闻有无〈向〉媒人开衅，而法庭诉讼，少闻控告月老先生，他反得自在逍遥，礼金丰入。这是什么原故？是则“神”及“八字”之所赐福，责任诿卸到冥冥之中。无论父母是照例不怪媒人，就是子女也只得怨自己前生有过，错已铸成，只好将错就错。这是阻碍正当婚姻的大因，我于上一天本报，已〈已〉经痛切的论过了。

媒人既是坏到这样，以后要想婚姻改良，便须急将媒制打破。“媒人”“月老”等话，要从国语辞典中一概删除。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亲友皆知，最好在报上登一启事，说明我们俩愿做夫妻，婚期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厅注册，乡间则在自治局里报名，亦尽够了。媒人这种东西，应该投畀到九霄云外，再

也不要理他。倘因乡曲风气未通，一时难尽去掉，也要男女互相睹面，防制他的说谎原因。婚成不对，可向诘责，媒人不能不负责任。尝推原媒制之来，系由于男女界限太隔，故欲废媒制，首要澈底的撤开什么男女大防。这几天新城、毓莹、柏荣、西堂[1]诸君，巳〈已〉经详细说明，用不着我迭〈叠〉床架屋了。

---

[1] 新城，即舒新城（1893—1960），湖南溆浦人，时任教于长沙福湘女校。他的《改革婚制先决的一个问题》发表于1919年11月23日湖南《大公报》，该文认为“普及教育是男女社交公开的先决问题”。毓莹，即龙伯坚（1899—1983），湖南攸县人。五四时期曾主编《新湖南》。他的《一个问题》一文发表于1919年11月22日湖南《大公报》，该文主张男女婚姻如受干涉，或誓死不允，抱独身主义；或出走，谋独立生活。柏荣，即李柏荣（1893—1972），湖南邵阳人。他的《我对于赵女士自杀后的意见》发表于1919年11月22日湖南《大公报》，主张打破旧式的亲权家庭制和买卖婚姻制，号召男女青年与“恶劣社会”奋斗。西堂，即李肖聃（1881—1953），原名犹龙，字肖聃，号西堂。他的《论赵女士自杀事》，发表于1919年11月24日湖南《大公报》。该文反对父母纳贿逼婚，反对媒婆串合隐瞒，建议设立婚姻改良会，以及男女交际机关。

婚姻上的迷信问题

（1919年11月28日）

我常研究旧式婚姻所以尚能维持的原故，以为这是由于有一种极大的迷信。

何以呢？婚姻的中心在恋爱，人生恋爱的要求，其势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别势力，决不是能挡得住的。恋爱既是人生极重大的要求，他的势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应该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妇之间便应该充满了恋爱。为甚么打起屋大的灯笼，寻遍了全中国的社会，竟看不见半点恋爱的影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竟可以将这种非常势力轻轻挡住，是什么原故呢？

有人答：“因为中国的礼教。”但四万万人懂得所谓“礼教”的到底有多少？全中国二万万女子一字不识不消说，全中国农人，全中国工人、商人，他们又认得清几个大字。把他们都除掉，真正懂得礼教的，便只有身穿绿长褂、自称读书君子的一最小部分了。“读书君子”之外，大多数毫无知识的妇女及农、工、商，支配他们的精神界，而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假招牌的大护法，来挡住这恋爱要求的横海潮流的，我以为不是别的，就是唯一的“迷信”。

迷信最大的就是“婚姻命定说”。一个人刚刚掉下母亲的肚子，

便说他的婚姻是已经前定了。年纪大一点，自己发生了婚姻的要求，却不敢自己议婚，一听父母、媒妁来处置。以为自己议婚与父母、媒妁代办是一个样子，横直己〈已〉经前定，无论什么都好。婚姻办了，夫妇团圆，除开挡不住恋爱的自然势力的人，或是毁弃一切，大闹起来，闺房之内，变了两口相杀的战场；或是桑间濮上别有天地，实行他们的秘密恋爱。自此以外，那许多号称家庭和睦的好夫妇，都是脑子里装满了“婚姻命定”四个大字的。所以“世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1]“月老牵丝”“天作之合”等等，便是他们时〔时〕记着的格言。这样服从命定说的婚姻，在中国社会大概要占去十分之八。这十分之八的夫妇，他们的恋爱滋味都在“莫名甚妙”之中。要说他好，他们又时常发出叹声；要说不好，他们居然是一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屋子，吃饭睡觉，生男育女，好像真正是“天生成”的。有时吵几回嘴，打几次架，气一转过来，想到“世〈百〉世修来共枕眠”“天作之合”上头，便立时恢复原状，仍旧吃饭、睡觉。因有此命定说，媒人便可不负责任。中国人不论是瞎子、聋子，本都有做媒的资格，人人心中都存想婚姻命定，遇着某家有什么亲事，不论他相当与否，一概照例拉拢，以为要不拉拢，定遭神遣〈谴〉。“婚姻拉拢不拉散”的话到处流传。假若有人“察亲”，询问“亲”的邻家，邻家是照例不说坏话。及至女归男室，便算是“乾坤定矣”“钟鼓乐之”。无论怎么样不好，都不敢再有翻悔，只好想念着“婚姻命定”罢了。因有此命定说，那极无道理的“指腹为婚”“襁褓择配”，都从此发生出来。大家到认做是一段“美缘”，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错举。你若问他理由，他

---

[1] 语见《增广贤文》。原文为：“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

的答就是“婚姻命定”。咳，“婚姻命定”，你的力量真大呵！

“婚姻命定说”是一个总迷信，其余尚有附着的许多小迷信。

（一）是“合八字”[1]。中国父母代办子女的婚姻，并不是毫不选择。他们为子女选择婚姻，到是狠费了苦心。但他们选择的标准，不在容貌、性情、体格、学问、年龄上面，只在八字的合不合。所以婚姻的第一步，便是“合八字”。合八字有二样：一是请算命先生合的，一是请“菩萨”合的。只要八字合得来，便是鬼也可扯拢做夫妇。社会上往往有小年纪的女子，配着大年纪的丈夫，或是小年纪的丈夫，讨了大年纪的女子。我们乡里有一白话，“八十公公生一娃，笑死长沙十万家”，便是纪一件一个十八岁的女子，配一个八十岁的老人，生下了一个小孩子的故事。此外，丑夫对着美妇，或美妇对着丑夫，便以“福禄生在丑人边”相慰，也是常有的事。其余性情、学问等项，是一样不算什么标准。

（二）是“订庚”。合八字之后，婚姻的第二步便是“订庚”。将男女八字各写在庚书上面，当着“神明”，烧起香烛，祷祝他们“偕老百年”，这段婚姻从此便算成了铁案了。订庚本有契约的意义，但庚书上面并不写什么契约的话，单止写上年、月、日、时等八个大字，所有婚姻必需的种种条件，并不规定一事，要不说他是迷信不可得了。

（三）是“择吉”。订庚之后，男女过礼，要选好的日子，要没有什么“煞”、什么“忌”方行。普〔通〕是看黄历上的“宜”“忌”。其次请星卜推算。其次问菩萨可否。这次赵女士求父母更改

---

[1] 合八字，旧时男女婚配前的一种迷信习俗，即用天干地支将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写出来，共有八个字。根据这八个字，推算人的命运凶吉、婚姻美满与否。订婚时，须先交换男女双方的八字帖（亦叫庚帖）。

婚期，他的母亲便说："择吉已定，万难更改。"要是依着改期，待他哥哥回来，也未必定要葬送在这很好的"黄道吉日"[1]哩！

（四）是"发轿"。这个更糊涂了。说什么当时商纣迎接妲己[2]，在途为狐精换去，后来女子出嫁，恐怕变成妲己第二，所以第一要用坚重的彩轿，第二是将轿门紧锁，第三便请动"喜神"好些将护。有人说这次赵女士若是坐着敞轿，不用金锁重封；外面可以看得，未必便会自杀。

（五）是"迎喜神"。一个新女坐在重封乌黑的轿里，已经是闷得谎〈慌〉了，及到夫家轿子放下，还要从容的迎接喜神，说是请他"呵禁不祥"。这次赵女士到吴家，己〈已〉经将要落气，吴家正豫备着迎"喜神"来"呵禁不祥"呢！

（六）是"拜堂"。拜堂是拜见祖宗，说是家里添了一个新娘，要请祖宗保佑他"多生贵子""裕后光前"。西洋不告祖宗，也要告什么上帝，说你们的恋爱是上帝赐给的，你们夫妇关系是上帝合成的。

这一些迷信，只算是婚姻上的一些把戏，不外把一对男女用这些迷信做绳索，将他们深深的捆住。从说媒直到过礼，这一对夫妇被迷信的绳索缚的转不过气来，以后便是稳稳当当很和睦的好夫妇了。赵女士的婚姻，除开"拜堂"以外，各种"大礼"自然都是经过了的。他的寻死，这些迷信，一定是"与有力焉"的。我们倡言

---

[1] 黄道吉日，迷信星命之说。谓青龙、明堂、金匮、天德、玉堂、司命六辰都是吉神。六辰值日、诸事皆宜、不避凶忌，称为黄道吉日或黄道日。

[2] 商纣，亦称帝辛，商朝最后一个帝王，在牧野之战中被周武王打败，自焚而死。妲己，姓己，有苏氏之女，有美色，有苏氏因兵败将其进献给纣王，为商纣宠妃。

改革婚制，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讲到这里，便不得不联想到人人会说的那一句老生常谈“教育普及”了。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1919年12月1日）

长沙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向新潮方面定的，实在不少，又因近年来屡受军阀派的摧残，弄得长沙这锦绣的地方，常常没有一点生气，于是一般稍有知识的人——各校教职员及学生——莫不深深痛恨。更觉得这“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问题万不容缓。

学生之工作

（1919年12月1日）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1]，再发生这种想像，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对于学校的办法，曾草就一计划书，今抄出计划书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于此，以求同志的教诲。我觉得在岳麓山建设新村，似可成为一问题，倘有同志，对于此问题有详细规划，或有何种实际的进行，实在欢迎希望的很。

一

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应划分每日之时间为六分。其分配如左：

睡眠二分。

游息一分。

---

[1] 今春回湘，指1919年3月12日离京赴沪，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读书二分。

工作一分。

读书二分之中，自习占一分，教授占一分。以时间实数分配，即：

睡眠八小时。

游息四小时。

自习四小时。

教授四小时。

工作四小时。

上列之工作四小时，乃实行工读主义所必具之一个要素。

二

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列举如左：

（甲）种园。（一）花木。（二）菜蔬。

（乙）种田。（一）棉。（二）稻及他种。

（丙）种林。

（丁）畜牧。

（戊）种桑。

（己）鸡鱼。

三

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现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练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

此为手工课之优点。然多非生产的（如纸，豆泥，石膏，各细工），作成之物，可玩而不可用，又非实际生活的，学生在学校所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

在吾国现时，又有一弊，即学生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不乐农村生活，尚有其他原因，今不具论。）此于地方自治之举行有关系。学生多散布于农村之中，则或为发议之人，或为执行之人，即地方自治得学生为之中竖〈坚〉而得举行。农村无学生，则地方自治缺乏中坚之人，有不能美满推行之患。又于政治亦有关系，现代政治，为代议政治，而代议政治之基础筑于选举之上。民国成立以来，两次选举，殊非真正民意。而地方初选，劣绅恶棍武举投票，乡民之多数，竟不知选举是甚么一回事，尤无民意可言。推其原因，则在缺乏有政治常识之人参与之故。有学生指导监督，则放弃选举权一事，可逐渐减少矣。

欲除去上文所说之弊（非生产的，非实际生活的，骛于都市而不乐农村），第一，须有一种经济的工作，可使之直接生产，其能力之使用，不论大小多寡，皆有成效可观。第二，此种工作之成品，必为现今社会普通之要需。第三，此种工作之场所，必在农村之中；此种之工作，必为农村之工作。

上述之第一，所以使之直接生产。第二，所以使之合于实际生活。第三，所以养成乐于农村生活之习惯。

四

于上文所举以外，尚有一要项，今述之于下。言世界改良进步

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欲教育普及，又自兴办学校始。其言固为不错。然兴办学校，不过施行教育之一端。而教育之全体，不仅学校而止，其一端则有家庭，一端则有社会。家庭之人无知识，（家庭之组织不善习惯不善等从之。）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柄〈枘〉凿，其结果只有二途：一则被融化于家庭，造成一种孝子顺孙新旧杂粹〈糅〉之乡愿。一则与家庭分张，近来“家庭革命”“父子冲突”之声，所由不绝于耳也。社会亦然。学生出学校入社会，若社会之分子无知识，（社会之组织不善习惯不善等从之。）则学生在学校所得之知识与之柄〈枘〉凿，其结果亦只有两途：或为所融化，或与之分张。从来之柔懦奸邪，皆前一种之结果。从来之隐士，皆后一种之结果。（隐士之隐，多为社会与其理想柄〈枘〉凿而然。）故但言改良学校教育，而不同时改良家庭与社会，所谓举中而遗其上下，得其一而失其二也。

虽然，欲依现在之情形，由学校之力，改良家庭与社会，由办学校之人，同时为改良家庭与改良社会之人，其事果得为乎？此吾可径答之曰不可得为也。盖依现今之情势，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其关系，非为有机的而为无机的，非为精神的而为形式的。形式尽相结合，而精神上则常相冲突。今以学校对于学生之目的言之，为“养成有独立健全之人格之人”。而家庭对于子弟之目的，则为“养成可供家庭使命之人”。（例如父兄只责子弟赚钱养家，却不问其来历。）社会对于个人之目的，亦非以社会为个人之发展地，而以个人为社会之牺牲品。（例如工厂奴使工徒，又各种机关下级人员之生活，多感痛苦而不觉愉快。）此岂非精神上相冲突之明证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家庭，学校，社会，将相违日远，焉有改良之望哉！

今请申言吾人之意，真欲使家庭社会进步者，不可徒言“改良

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而后有济也。盖所谓改良家庭，改良社会云者，无非改良“生活”，而旧的家庭生活，与旧的社会生活，终不可以改良。此等之旧生活，只适用于旧时代。时代已更，则须别有适应此时代之新生活。且伊古以来，几曾真见有改良其旧之事？有之，皆创造其新者耳。近人知旧剧之不可改良为新剧，而岂知各种旧生活亦皆不可改良为新生活也。今试征之家庭与社会之事实，与现今之家长言子弟人格独立，与现今之工厂主谋与工徒分配平均，尽人而知其不可能也。故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

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必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前节所云“生产的工作”“实际的工作”“农村的工作”，即新生活之大端也。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

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夫论政治革命之著明〈名〉者，称法兰西；论社会革命之著明〈名〉者，称俄罗斯，所谓“模范国”是也。论街衢之修洁者，称柏

林；论商市之华丽者，称巴黎，所谓“模范都”是也。吾人于南通县之自治教育，亦艳称之，则又所谓“模范地方”也。所以然者，效验既呈，风树乃树，世人耳目，咸集注之。诚欲转移风化，自宜养成一种势力，而此种势力，宜抟控而切忌涣散。旗帜务取鲜明，而着步尽宜按实。今不敢言“模范国”“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则诚陈义不高，简而易行者矣。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1]。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2]，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3]。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五

第二节所举田园树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

---

[1] 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年轻时受托尔斯泰的影响，在东京创办《白桦》杂志，提倡人道主义。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宣扬乌托邦思想，主张建立新村，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他还买地建立了第一个新村，从事半工半读。在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工读会，指留美中国学生工读会。成立于1914年，其宗旨是“以半工半读为助成学业之方法，以节省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

[3] 勤工俭学会，指留法勤工俭学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曾向中国大量招募华工。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为目的，号召中国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主持其事。

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旧日读书人不预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矣。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不之吸，优美之景色不之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

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玉〕蜀黍等亦可间种。粗工学生所难为者，雇工助之。

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

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

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

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六

各项工作非欲一人做遍，乃使众人分工，一人只做一项，或一项以上。

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

七

依第三节所述，现时各学校之手工科，为不生产的，所施之能力，掷诸虚牝，是谓“能力不经济”。手工科以外，又有体操科亦然，各种之体操，大抵皆属于“能力不经济”二〈之〉类。今有各项工作，此两科目可废弃之。两科目之利，各项工作之中，亦可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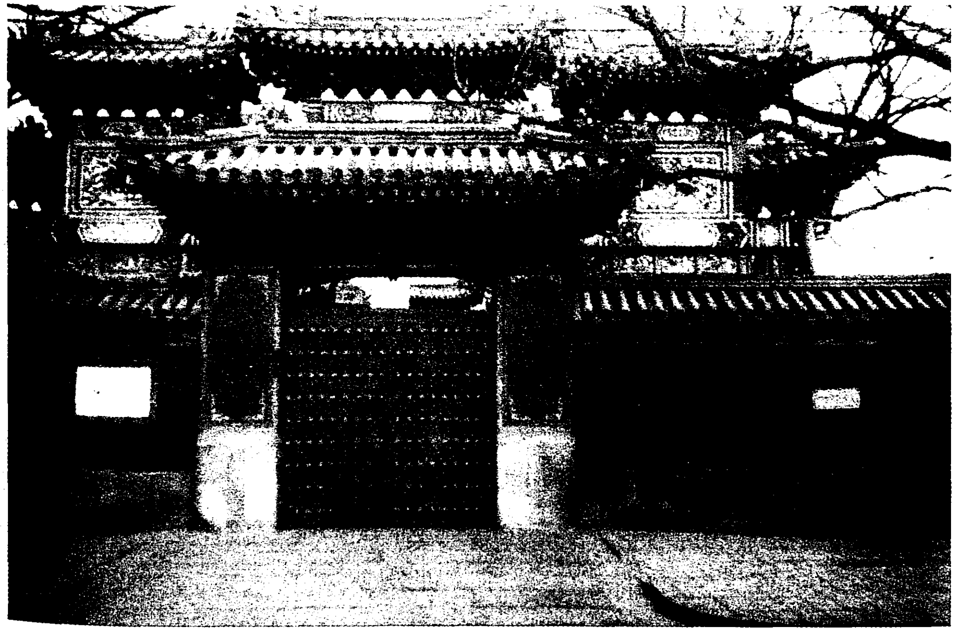
张敬尧私运烟种被获*

（1919年12月24日）

平民通信社消息。二十四日汉口快函云：今日下午学生至武昌鲇鱼套车站，站厂扣留鸦片烟种五十包（麻布大袋）。系湖南督军张敬尧自奉天运来，昨晚（二十三日）抵此，拟由长武路装运回湘，以无护照为车站阻留。福建学生游泳君在站闻此消息，今日（二十四日）上午奔告高等师范学校。现武汉学生会已向省议会禁烟会提出要求，并决明日发传单通告三镇人民。湘人在鄂者闻亦将会议对付方法。又□函云：武昌火车站近查获大宗鸦片种子，此间闻信于今日推定易礼容、李维湘、张懋勋、陈海庭、袁达卫、刘盛栋、杨伯隽七人至鲇鱼套火车站内，觅获计有五十大袋，每袋约在二百斤以上共重万斤以上，均系用麻布袋装成者。学生等取出一握，并摄影数张以作证据。据该站看护警察赵凤楼云：此物已到十余日预备运往湖南交给张督军，因没有护照已报告王督军扣留。督军已通电中央请示办法。将来或运或焚悉听督军命令云云。但王督军是否通电中央，此时尚无所闻。又闻人言，此物由奉天经京汉路来者已运去一批计二十五袋（约五千斤）。其押运兵士数人均已逸逃（张督的部下）。闻张督正运动陆军部发给护照来汉，即行运湖南云云。现在武汉学生联合会已议决，一面通电中央一面呈诉督军。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亦预备通电呈诉并联络湖南总乡会，同时提出今明日均可

实行。兹录武汉学生联合会通电如下：各省议会、各省教育会、各省商会、各报馆、学生联合总会、各省学生联合会公鉴：湘督张敬尧串通驻湘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遣派军队携持护照贩运鸦片烟种入湘，勒民广种。祸国毒民罪不容诛。前已输运多次未经发觉。昨日复由北运来五十袋，道经武长铁路武昌鲇鱼套车站，竟敢明目张胆索车装载。似此横行实属目无法纪。幸经该站站员报知本会，当即请该站扣留。除专电北京大总统请派员查办外，特通电全国同胞。共起而攻物证具在已成铁案。愿同胞急图之。

武汉学生联合会叩俭



1919年12月，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开始，毛泽东率一个代表团至北京。图为毛泽东借住的长街20号福佑寺。

张敬尧私运烟种续记*

（1919年12月24日）

平民通信社消息云：武昌鲇鱼套车站发现张敬尧私运大批鸦片烟子，已志前次通信。兹悉此项烟子自发现之后，大为武汉各界及旅京湘人所注意。今再记其详情如下：鸦片烟子之由京汉路装运到湘已非一次，然均未发觉。张敬尧勒种烟苗召各县团总取种子，令种长沙一县至四万包之多。湘人方讶不知用何法运来此大量种子，欲寻获装运证据竟不能得。此次大批烟子自奉天运来，本有七十余袋于十二月二十日前运到鄂。据车站人言，在二十四日以前已运去二十五袋。至二十四日，该项烟子由京汉路转过武长路，至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员游泳君发觉。（昨日通信言游为学生系误，游君号润涛，福建闽侯人。）计四十五麻袋每袋二百余斤，包上标明“交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查收”字样。第二路司令系张宗昌，然据押运者在未发觉前言：此物送长沙交张督军。及至发觉，押运者立时逃逸。大约此物由奉运湘应先交张宗昌再交张敬尧也。

二十六日，武汉学生联合会代印出传单。一种传单末尾署明，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生游泳泣血敬告。其文云：本月二十三日，驻湘第六混成旅旅长张宗昌之部下押送鸦片烟种四十五袋，到鲇鱼套车站，向湘鄂路要车，预备运往湖南，原系效法陈树藩通间。张敬尧在湘广种罂粟以获厚利，以作彼五年之军贵而种中国万

年之恶果，祸国毒民罪不容诛。此时若不将烟种焚灭，明年罂粟成熟，全国遍受其祸。该烟种现经鄙人一面通知武汉学生联合会，率同全体学生来站看守，一面电请政府罢斥张湘督惩办张宗昌。呜呼，军人祸国久矣。陈树藩、张敬尧为恶尤甚。国民请愿奔走，政府置若罔闻，反掩饰其恶。今物证具在罪无可逃。泳泣以死与政府争恳。我全国父老兄弟姊妹共起攻之。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生游泳泣血敬告。

武汉学生闻此消息，即有多人到站查察。旅鄂湖南学生知系运湘烟子，更异常出力。二十四日上午，由汉口明德大学学生易礼容等，高等师范学生罗剑等到站取出烟子少许。下午更邀照相者，至站将毒物摄影。始而站长不允，多方想法才得许可。不意影方摄完而兵士突如其来，将底片抢去，并追捕易礼容。幸站员先知开启后门，易君乃得易服逃出。此事发觉后，旅鄂湖南学生愤激异常。当呈湖北督军王占元文云：为呈请扣留鸦片种子迅予焚毁事。泳生□于本月二十五日午后四时，□鲇鱼套火车站送友向湘，适见车站中堆有运往湘省之货四十五大包以麻布袋装置。就近详细查检，乃知皆鸦片烟种子，并取有少许以供呈□。窃思吾国禁烟以来，政府风行雷厉有偷运者国有当刑。今车站中发现如此大宗烟种，倘竟运至湘省播种民间，不独国家禁烟之功废于一旦，即三千万湘民亦尽殪于烟毒矣。况禁烟一事，与英人订有条约。若任其自由贩运，岂徒贻祸于国家，亦且予人以口实，用是呈请钧座派员查验，将此项鸦片烟种子扣留立予焚毁以绝后患。查该烟种子系由何人贩运并恳钧座彻底查究□彰显罪魁则中国法不胜感戴之至。此呈王督军钧鉴，旅鄂湘籍学生呈请，又致政府电云：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内务部钧鉴，生等在鲇鱼套车站查获运往湘省鸦片种子四十五大包□□鄂□

扣留焚毁。旅鄂湘籍学生叩。

旅鄂湘学生以此案情很重大，二十九日特举出代表易礼容君赴京呈请政府公示国法，其到京如何行动及旅京湘人对此愤激情形，容后再述。

湘人力争矿厂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三部文[1]

（1919年12月27日）

呈为贪吏私约卖矿恳予严惩，以儆官邪而维湘矿，仰祈钧鉴事：

窃湖南矿务局长张荣楣[2]，品行卑污，贪鄙成性，夤缘湘督张敬尧，至湘滥充政务厅长，助恶贪赃，声名狼藉；嗣垂涎湘矿美利，百计钻充该局局长，以便私图。前张督与英商葛兰特[3]密议售卖全省矿权，皆其主谋，希图重贿。幸为农商部所发觉，及湘人全

---

[1] 本文由湖南旅京公民毛泽东等联合署名。据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本文“肯定是毛泽东起草的”。当时毛泽东任湖南赴京驱张请愿公民代表团团长、平民通信社社长。呈文最后注明“（平民通信社印发。十二月廿七日。）”并盖有“平民通信社”及“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的印章。原文无写作年份，但文中提到“张荣楣于本年本月十二日”在京“与美商秘密签定草约”一事，据《燕阳请愿录》载“湖南全省学生驻衡代表”致“北京美国公使”电称：“合办水口山白铅炼厂之草约……已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经张敬尧与该实业公司在京签字”，可知本文当写于1919年。

[2] 湖南矿务局开办于1895年，局址设在长沙，初统管湖南官、商之矿，后仅营官矿，下设常宁水口山、平江黄金洞、新化锡矿山、江华上五堡和临武香花岭等5个分局。张荣楣1918年4月17日任湖南省政务厅厅长，同年4月26日辞职。

[3] 葛兰特，英国矿务工程师。张敬尧曾于1919年与其商定，向英国借款3000万元，将湖南全省未开矿产作抵押。

体反对，事遂中止。不意张荣楣利心不死，诡谋百出。复暗串该局水口山矿师德人韦佳克，介绍美商马意儿布流金[1]等，以合资办理湖南白铅炼厂[2]名义，抵押借款。其借款合同，闻系湖南政府以铅砂作价入股，为美金八十万元。美商投资为美金一百四十万元。由张荣楣于本年本月十二日下午一点钟，在京与美商秘密签定草约。期限五年，期满可续十年。期内湘省所采铅砂，概归该厂，以每吨定价美金十元收买。草约签定之日，已交美金六万元。议定，正约签定，再交美金十四万元。自草约签定日起，限三星期调印，逾期无效。查水口山铅矿[3]，为湖南财政惟一命源，白铅炼厂，为湖南矿业惟一生路。一旦断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无救济之望，即湖南财政亦永无整理之资。张荣楣丧心病狂，希图贿扣，饱入私囊，竟不惜以湘省重大利权，轻轻断送。盗贼之行，罪岂容诛！查矿业条例，凡本国人与外国人合资办理之矿业，其资金必须均等，以护主权。今据该约所定，美商实溢股六十万元。甘以主权让渡外人，显违矿业条例。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一。湖南水口山系湖南自办之矿。今该约以专买权授之该厂，且预为规定价金，无论铅砂价格将来不无腾涨之时，一为该约所束缚，汉冶萍与日人所订之覆辙，将重见于水口山，损失自不待言。且专买权既属该厂，无异以水口山移为该厂之附属品，是于炼矿权断送之外，并采矿权而亦断送之，后患何堪设想！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二。又，查该约订定

---

[1] 马意儿布流金，美国太平洋实业公司上海慎昌洋行商人。1919年12月，曾与张敬尧委派的张荣楣签订合办水口山白铅炼厂草约。

[2] 湖南白铅炼厂，即水口山白铅炼厂。

[3] 水口山铅矿，位于湖南常宁，1906年开办，是当时湖南最大的官办矿局。

之日，美商交款二十万元于湘政府，是明明以合资炼矿之款，供炼矿以外之用，美商何以乐为报效？张督以此作何用途？此中黑幕，不问可知。牺牲一省最大之矿权，填一二贪官污吏之欲壑，事前绝不使湘人与闻。此湘人所万不能承认者三。总之，此次张荣楣所订之约，名为合资办矿，实系抛卖矿权。以张督治湘二年之暴政，敲骨吸髓，无微不至。张荣楣为虎作伥，惟利是嗜，又焉有丝毫计公益，恤民隐之心？以此欺人，夫谁信之！湘民百万，皆历劫余生，对于此种贻祸无穷之契约，认为与其他之短期劫夺，其关系有本身与子孙，个人与全体之别，群情汹惧，誓死不承。三星〔期〕转瞬届临，此时犹在可以取销不生对外关系之日，伏恳钧座（钧院钧部）俯赐主持，趁该约未经调印之前，迅电张督，立将草约取销，交款退出，并撤惩张荣楣，以儆官邪而维矿政，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

大总统[1]（国务院外交部财政部农商部）

具禀　湖南旅京公民　毛泽东　张百龄
吴其琳　陈绍休
王运钧　赵先璞
柳天惠　黄笃祜
宾作师　左都等

---

[1] 大总统，指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直隶天津人。曾任清朝军机大臣、东三省总督、内阁协理大臣及北京政府国务卿等职。1918年由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

对于张敬尧私运烟种案之公愤[1]

（1919年12月31日）

张敬尧串同张宗昌[2]，从奉天[3]私运大批烟子，在武昌附近鲇鱼套车站发觉扣留一案，已志前次通信。兹悉旅京湘人对此大为愤激。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4]，已拍发三电：一致王占元[5]，一致江汉关监督，一致湖南拒土会[6]。到京之湖南请愿代表，亦有三电拍出：（一）湖北王督军[7]鉴：湘督张敬尧私运烟种，幸经查获，务恳从严追究，无使逸遁，否则纵奸坏法，贵督不能不负其责。湖南请愿团叩。艳。（二）汉口大智门明德大学易礼容[8]君转武汉学生联合

---

[1] 本文在1920年1月6日上海《申报》发表时，仅个别文字不同，标题为：《湘人对张敬尧运烟种之公愤》。

[2] 张宗昌（1881—1932），字效坤，山东掖县人。时任北洋军苏军第六混成旅旅长和讨伐湖南的北军第二路总指挥。曾与张敬尧合伙偷运鸦片烟种。从奉天运往武昌的鸦片烟种，便是由张宗昌的部下押运的。

[3] 奉天，原省名，省会在今沈阳市。

[4] 旅京湖南学生联合会是旅京湖南学生于1919年12月成立的一个驱张团体。

[5] 王占元，湖北督军。

[6] 湖南拒土会，指由湖南基督教各公会发起，于1919年11月18日在长沙成立的“辅助政府禁除鸦片”的团体。

[7] 王督军，指湖北督军王占元。

[8] 易礼容，当时被指派留驻汉口明德大学负责主持湖南请愿团在湖北方面的联络工作。

会鉴：张敬尧私运烟种，幸经诸君查获，务请誓死保留，无使逸遁，同人誓为诸君后盾。湖南请愿团叩。艳。（三）长沙拒土会鉴：武昌鲇鱼套车站，有烟子四十五袋，将运入湘，业经扣留，乞速派调查员到鄂检查惩究为荷。湖南请愿团叩。艳。汉口代表易君于三十日到京，即报告万国拒土会[1]。三十一日，至国务院谒见靳总理[2]，由王秘书[3]接见，陈明破获烟种情形，并问政府已经接到王督军及武汉学生联合会来电否。王秘书答云此电或已接到，惟予未见，予愿将来意代达总理，总理因年关甚忙，故未能面见云云。同时又有旅京学生代表易相洋李实及杨容贞女士，入见总理。旅京湖南公民彭璜张百龄[4]二君亦因此事至国务院。要之，旅京湖南人士对此大为注意。

今录旅京湘人之公呈如下：

呈为督军违禁运烟，恳予撤惩，以全国法而救民命事：

湘督张敬尧，到湘以来，不洽民意，种种非行，不能尽言。言其流毒最大者，鸦片是也。自张督到湘，湘省烟禁大开。士绅平民，吸者渐众。鸦片及鸦片种子，自外埠装运到湘，不知凡几。张

---

[1] 万国拒土会，即万国禁烟会。当时国际性查禁鸦片烟的组织，由中外人士于1919年1月17日在上海成立。

[2] 靳总理，指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1876—1951），字翼青，山东邹县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五师师长、山东都督。1918年任参战督办公署参谋长。曾代表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3] 王秘书，指北京政府国务院秘书王耒。

[4] 张百龄，即张怀（1896—?），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后长期在高等院校任教任职。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师大、内蒙师院等校任教。

督劝民种烟，召各县团总，发子令种。长沙一县，发子至四万包之多。湘民多相惊怪，当此例禁森严之时，究用何法运来。此大量种子，欲寻获装运证据，久不能得。十二月二十四日，武昌鲇鱼套车站，发现大批鸦片种子，计四十五麻袋，每袋重约二百斤，包上标明奉天发，交湖南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1]查收字样，当由站员游泳[2]告发。发有泣告书，经武汉学生联合会及旅鄂湘籍学生，拍照取种，以存证据，并陈钧院，通告全国在案。连日京汉报章，业已喧传殆遍。似此显干国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运此毒物，贻祸全湘。湘民闻之，发指眦裂。事关国家大禁与国际交涉，应恳钧院速即呈明大总统[3]，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谨呈国务院总理

娄绍铠　萧　拔　陈绍休
彭　璜　毛泽东
湖南旅京公民　欧阳皎如　吴俊臣　王人达　谨呈
罗宗翰　陈闻讷　彭先泽
熊光楚　张百龄　刘明俨

中华民国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民通信社[4]稿第十号。民国九年二月二号）

---

[1] 指讨伐湖南的北军第二路总指挥司令部。司令部设在醴陵，武汉设有办事处。

[2] 游泳，号润涛，福建闽候人，交通部铁路管理学校毕业生。

[3] 大总统，指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

[4] 平民通信社，为湖南赴京驱张请愿公民代表毛泽东、张百超组织，由毛泽东任社长，社址在北京长街99号。每日向京、津、沪、汉各报发送各地驱张消息、报道。

归国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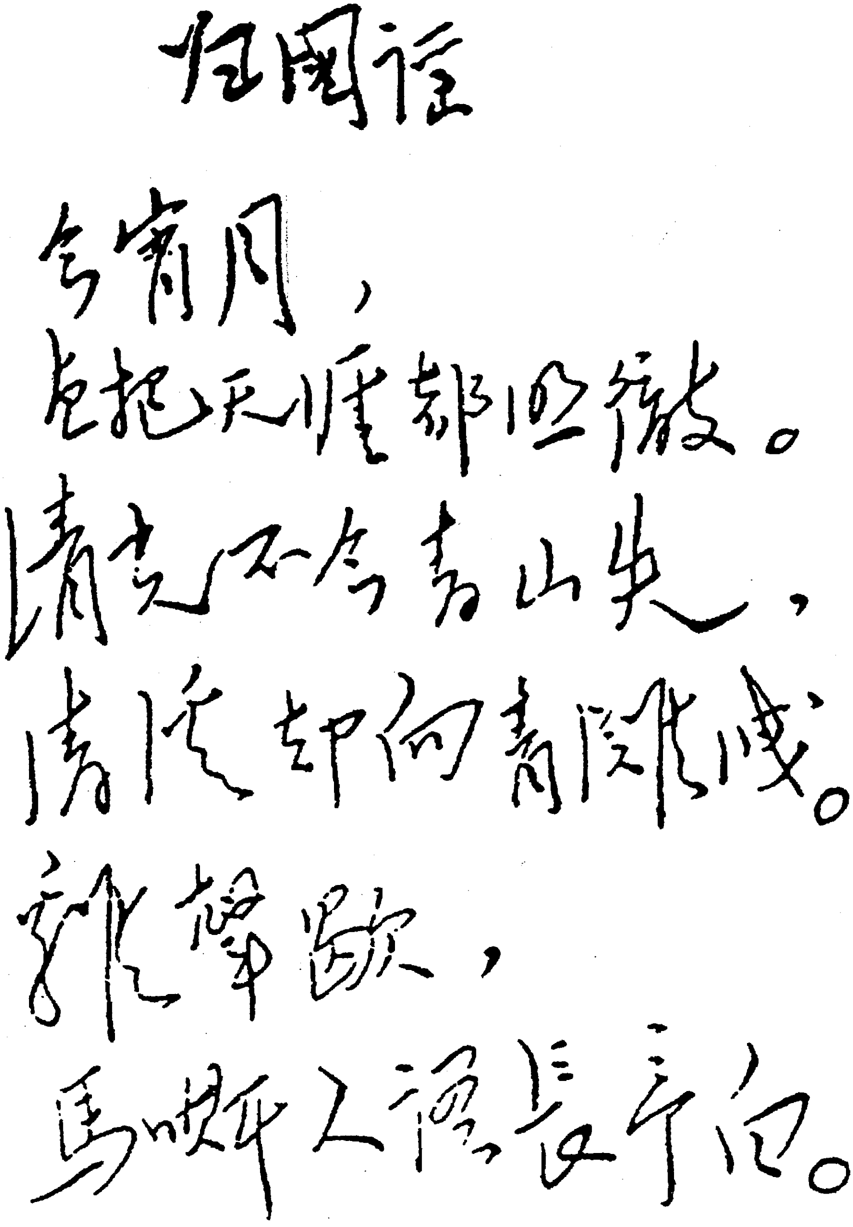
（1919年）

今宵月，
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1]。
清溪[2]却向青滩泄，
鸡声歇，
马嘶人语长亭白。

---

[1] 清光不令青山失，古诗中有类似句式和意境。如宋代赵汝愚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常送海涛来。”

[2] 清溪，萧永义《毛泽东诗词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认为，毛泽东故乡韶山旧属清溪乡，今建清溪镇，有清溪流经。清溪可能是指此而言。



归国谣

今宵月，
直把天涯都照徹。
清光不令青山失，
清溪却向青滩泄。
雞聲歇，
馬嘶人語長亭白。

毛泽东手书《归国谣》。

1920

1920年的毛泽东。

给易礼容的信

（1920年1月13日）

润生[1]兄：

前日接来信，昨复一信，谅到。长沙张慎厂[2]先生闻将来京，过汉时，我有一信请交他。京中无事可为，张以不来京、径赴沪为好，望转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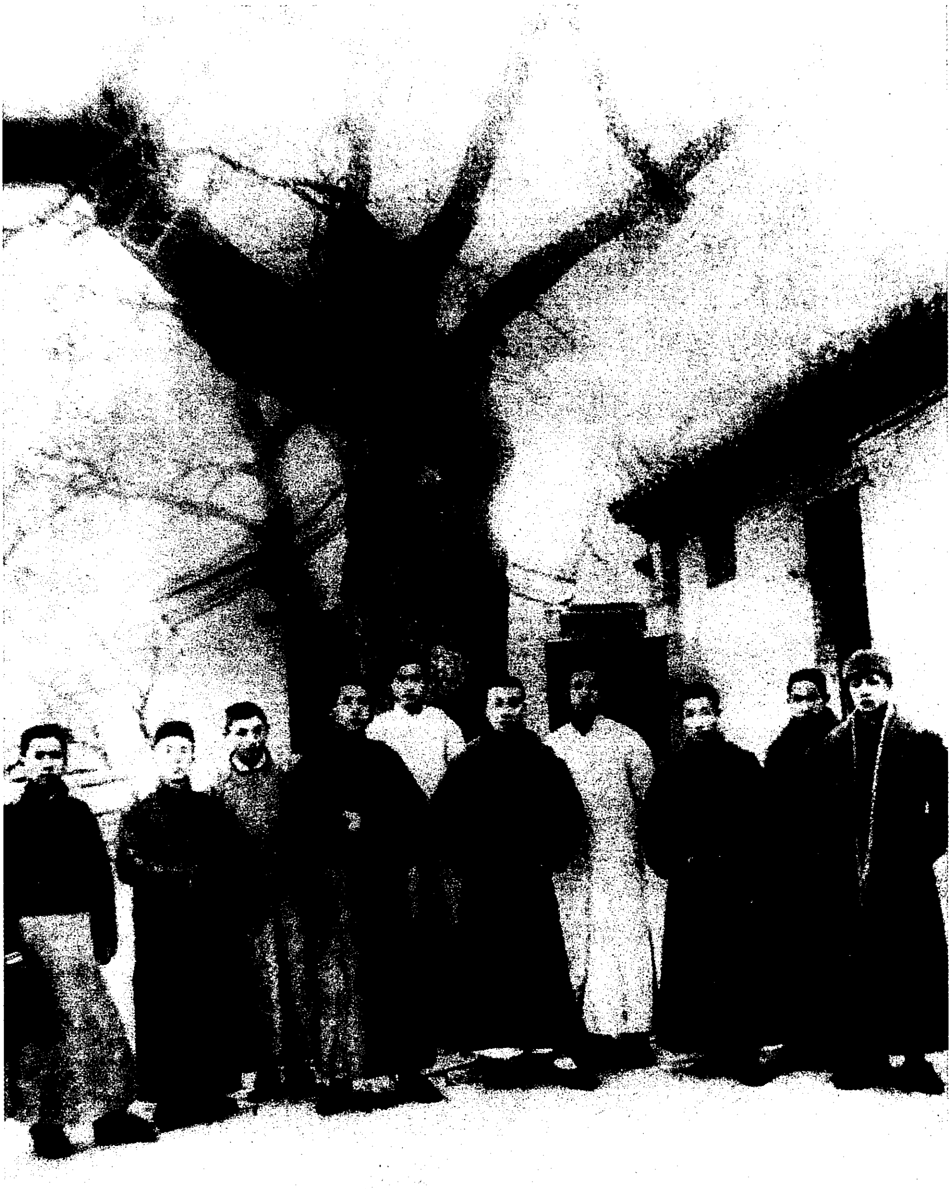
弟　泽东

九，一，一三

---

[1] 润生，即易礼容（1898–1997），湖南湘潭人，湖南商业专科学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曾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中共湘区委员会早期负责人之一。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后脱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至九届执行委员。时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为参加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正在武汉。

[2] 张慎厂，即张效敏，字慎庵（庵，也写作厂），曾任长沙《民治日报》主笔。五四时期曾写有《什么是集产主义》等文，介绍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后定居美国。



1920年1月8日，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为反对张敬尧侵吞湘省米盐公款给熊秉三等的快邮代电[1]

（1920年1月18日）

天津熊秉三先生范静生先生郭侗伯先生刘艾棠先生[2]，上海章秋桐

---

[1] 本文无写作年月。“巧”，为韵目代日，即18日。据文中“去岁张敬尧入湘”等语和湖南公开驱张始于1919年12月的事实，似可定为1919年12月18日。但本文抬头所列各团体成立时间，大都在1919年12月18日以后。如1920年2月24日发行的《湘潮》春节特刊号记载，湖南旅京公民驱张请愿团即在1919年12月18日以后才组成。又据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本文不应是1919年12月18日写的，而“可能是1920年1月18日在北京发的”。1920年1月18日即为农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与“去岁”之说完全吻合。故此文当写于1920年1月18日。同年5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曾以《湘人罗宗翰等通告旅外各同乡电》为题刊登过。

[2] 熊秉三，即熊希龄（1870—1937），湖南凤凰人，清光绪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897年任湖南时务学堂总理，组织南学会，办《湘报》。戊戌变法失败后被革职。后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热河都统、国务总理等职。1914年因签署解散国会令去职。时任北京湖南筹赈会会长等社会职务。曾向北京政府提出张敬尧祸湘案。范静生，即范源濂（1876—1927），湖南湘阴人，湖南时务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时任北京政府教育、内务两部总长。曾向北京政府提出张敬尧祸湘案。郭侗伯，即郭宗熙，字诇伯，湖南长沙县人。曾任吉林省教育司司长和吉林省省长。时为旅京湘绅。1919年11月与范源濂等人联名向总统府和国务院提出张敬尧祸湘案。刘艾棠，生平不详。

先生彭允彝先生徐佛苏先生[1]，郴州谭组安先生[2]，上海湖南善后协会[3]，北京湖南筹赈会[4]，旅京旅沪旅宁旅鄂旅津旅粤各湖南学生会，各界联合会，同乡会及各处同乡钧鉴：

吾湘不幸，叠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聘〈骋〉猛虎之政，搉括诈捐。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5]，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况，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6]累资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之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去年张贼曾嗾使湘痞李鸣九等电京查问此款，并在长沙设立米盐公股清

---

[1] 章秋桐，即章士钊。彭允彝（1878—1943），字静仁，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时，曾任军政府外交顾问。后任众议院议员、北京政府教育总长。曾电请广州军政府去电北京政府，要求克日将张敬尧免职。徐佛苏（1879—1943），原名湛源，又名公勉，字运奎，也作应奎、映葵，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曾参与黄兴等在长沙发起组织的华兴会和爱国协会。后投靠康有为组织的保皇会。辛亥革命后，加入进步党。曾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时任南北议和北方代表，被指定参与“审查湖南问题”。

[2] 谭组安，即谭延闿。

[3] 上海湖南善后协会，是被张敬尧逼走的一些湖南上层人士于1918年12月在上海霞飞路成立的一个反张组织。协会向当时的“南北和会”提出以去张为解决湖南问题的先决条件，发行过《湘灾纪略》等书刊。

[4] 北京湖南筹赈会，是筹集赈灾款项的组织，当时熊希龄任会长。

[5] “矿山”二字，是根据1920年5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版排印的，石印件模糊不清。

[6] 指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和张敬汤。当时，他们兄弟四人横行湖南。时谚：“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查处。闻近复贿令郭人漳[1]等以旅京湘事维持会[2]名义向熊秉三先生诘问该款，无理取闹。推其用意，无非欲攫尽湖南财产，吃尽湖南人民，以饱其欲壑。窃吾湘遭此巨创之余，哀哀孑遗，非有巨资，何以善后？米盐公款，为我三千万人民忍饥食淡所储蓄，来处不易，利用尤殷，倘被鲸吞，此劫难复。彼张贼之暴戾酷虐，毒我湘人，已成惯技。独不解我同此食毛践土之败类，自杀父母之邦，甘与仇敌作狗。人之无良，至于此极！公民等对于郭人漳等此种恶劣行为，誓不承认。总之，此款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此际倘有无耻之徒，希图破坏者，即视为公敌。凡我湘人，应知自卫，稍纵即逝，祈毋忽焉。

湖南公民代表　罗宗翰　毛泽东
彭　璜　张　怀　何叔衡　匡日休
教职员代表　罗教铎　张锦云　杨遇夫
蒋育寰　熊梦非
学生代表　柳　敏　高　标　熊科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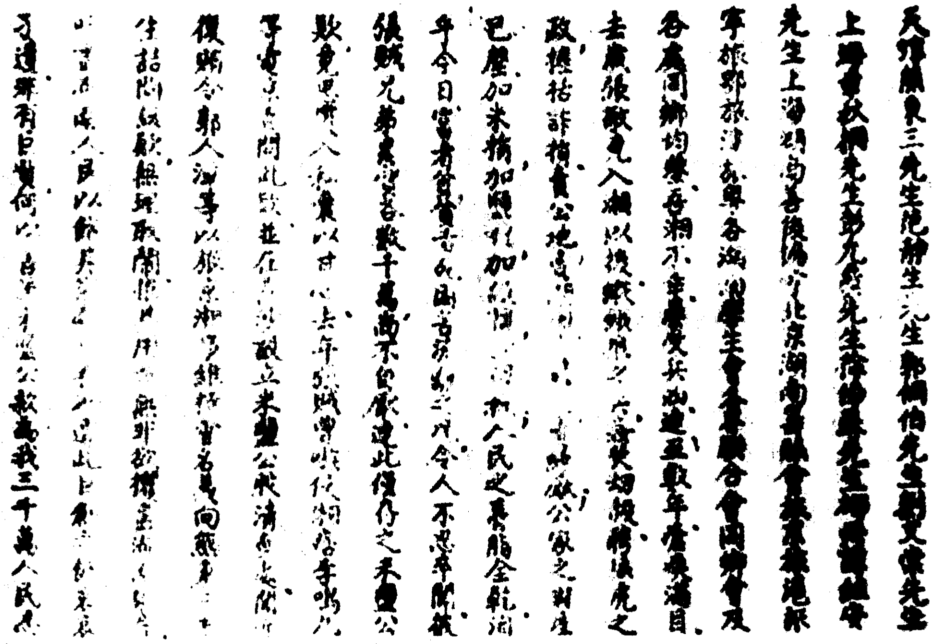
---

[1] 郭人漳，字葆生，湖南湘潭人。曾任山西道台，江西、两广巡防营统领，众议院议员。任山西道台时因贪污去职。后与革命党人黄兴等有来往，而在任广西巡防营统领时，革命党人约其在受命镇压钦廉防城起义时于阵前倒戈，他佯为应允，临时却又背约，致使起义失败。汤芗铭督湘时，任湖南矿警督办。

[2] 旅京湘事维持会，系由郭人漳等在北京成立的一个“保张”团体。其成员大都是张敬尧以巨款收买的封建余孽、地痞、劣绅和安福国会议员，1920年6月28日湖南《大公报》载《旅京湖南同人之公启》一文说：“郭人漳受张七万元之运动金组织湘事维持会以为保护。”

李思密　欧阳晈如　李斯安　彭先泽
高也如　李振翩　李启汉　李国钧
李恭家　黄　英　胡维寅　李才秬
汪国霖　何元培　章新民　陈宗汉
刘作舟　陈纯粹　毛斗文　易　巽
易克櫄　易介一　廖瑞祥　梁国乾
缪昆山　蒋竹如　熊科琪　熊卓吾
魏显烈　黎宗烈　邱惟勤　林韵源
徐庆誉　张树声　符狄梁　钟　秀
徐　瑛　曹杨篱　吴俊臣　陈士铨
彭光球等同叩

巧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请愿。图为毛泽东等发出的快邮代电（部分）。

湘人控张敬尧十大罪

（1920年1月19日）

湖南各界公民陈绍休等向北京府院呈控张敬尧十大罪，请将张立即罢斥。文云：

呈为湘祸倒悬，民无所托，迫恳撤惩湘督，以伸国法，而救民命事。

窃湘省连年以来，屡罹惨祸。自前督汤芗铭屠戮人民，搜括〈刮〉财物，湘民久巳〈已〉含愤莫伸。零陵变起[1]，全省尽困于兵。七年四月张敬尧到湘，湘民遂陷于永劫不复之境。兹请略陈张督祸湘之事实，及湘民所受之痛苦，惟政府鉴察之。七年五月之后，醴陵全城万家，烧毁略尽[2]，延及四乡，经旬始熄。株州〈洲〉一镇，商户数千家，同遭浩劫[3]。攸县黄土岭[4]一役，被奸而

---

[1] 零陵变起，指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于1919年9月18日通电“率湘南军民子弟宣告自主，与段（祺瑞）政府脱离关系”一事。

[2] 据《湘灾纪略》记载：北军于1918年5月7日进入醴陵时，纵兵焚掠，“被焚房屋，城中不下万户，乡间亦数千户。广袤及百余里”。

[3] 据《湘灾纪略》记载：1919年“4月25日攸县败讯至，溃军麇集醴陵。自攸县以达株洲，无不遍遭焚掠，而尤以醴陵、株洲为甚。……翌日，南军追至，北军复焚株洲而走。市中房屋几尽，人民被杀戮者不可胜记”。

[4] 攸县黄土岭，又名黄土寨，今名黄图岭，在攸县县城北45公里处，接醴陵县界，当攸醴要路，曾为南北军阀混战争夺的据点。

死者，至于女尸满山；杀人之多，动至数万；而兵所劫掠，地无不遍；人民流离转徙，至今未复，死不能葬，生无可归。岳州、宝庆各处，大半烧残，十室九空，不忍目睹。[1]然此犹得曰，战时不常，及远地难制也。长沙一城，军署所驻，白昼抢劫，无日无之。其弟张敬汤，强买商物，不给分文，事尤屡见。而所派清乡队[2]，在乡获匪，动押亲族或团保[3]取赎。每赎一人，勒索千元数千元不等，皆有据可证。人民乱后萧条，重遭敲剥，卖妻鬻子，不能应供。而暴兵三五成群，下乡搜索，横行闾里，无日或宁。凡此纵兵殃民之结果，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其罪一。湘省历设湖南银行，以纸币周转。张督到湘，废湖南银行，改设裕湘银行，吸收现金。其弟敬汤，复设日新银号，操纵市面；运买铜元往汉，获利无算。张督又尽将湖南银行纸币四千余万元，作废不用，设惠民彩票，饬各县派发，以收湖南银行纸币，并勒买现金。及彩票开签，民间中者，又多不照发。以是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其罪二。湖南水口山铅矿，湘督既盗押外人，又将白铅炼厂，押与美商，得银百四十万。且与英人葛兰特订约，将全省矿产，抵押三千万元，迭经湘民文电反对。湖南纺纱厂，拍卖津商，得价百五十万元。湖南银行湖

---

[1] 1918年春北军和南军混战，对岳州（今岳阳）和宝庆（今邵阳）肆意焚烧，北军从岳州撤退前，将城内房屋建筑大部烧毁，居民于睡梦中死伤二三千人。岳州南关外一带，被南北两军轮番烧杀，焚者达1000多家。宝庆城东门外一带，因战事起火，所有铺户悉成灰烬，全县共烧毁房屋5366栋。

[2] 张敬尧督湘期间，以“清匪”为名，将其第七师一部分，派到各县乡掠夺民财，号曰“清乡队”。

[3] 团保，指团和保。团是当时相当于乡一级的政权辖区。保是一种户籍编制单位。一保有若干甲，一甲由若干户组成。

田[1]，亦被卖断，得价二十万元。公私破产，恢复无期。其罪三。湘省烟禁素严，民国以来，吸种殆绝。张督烟癖甚深，军署上下，及所部将卒，多数有瘾，相习成风，烟禁大坏。近更勒民种烟，每田百亩，种烟四十亩，每亩抽税二十元。长沙一县，发烟种至四万包。最近武昌鲇鱼套车站，扣留张督『运』由奉天运到烟子四十五袋，迭经各方呈诉，外人抗议，通国执言，犹卒被张督强迫运去。由此以往，不独湘中烟害无穷，且复牵动外交，毁伤国体，腾笑全球。其罪四。湖南教育经费，自张督到任，悉行减成，又提谭前督[2]任内案定小学教员年功加俸基金，以为抵发，或四折六折不等。至八年一月以来，至于分文无给。迄十月间，各校教员，以经费久延未发，宣言罢席。张督遂肆意诬蔑，并围殴学生，驱逐教育界人员，以致全省罢学。又自张督到湘，驻兵各校，侵占房屋，毁损仪器，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其罪五。张督所部军队犯罪，尝经外人拿送，以无辜湘民抵戮，久已喧传报纸。七月间，湘人吴灿煌[3]与其友程鹏[4]，自沪至湘，住船山学校。张督以吴为上海国民大会[5]代表，遣其养子张

---

[1] 湖南银行湖田，指原属湖南银行所有的沅江县官附三垸湖田，计1.2万余亩，于1919年3月立约拍卖给沅江县李鸿耀。

[2] 谭前督，指1916年8月至1917年6月担任湖南省都督的谭延闿。

[3] 吴灿煌，湖南平江人。上海国民大会干事和上海中华工业协会理事。1919年7月来长沙，拟在湖南发起国民大会。并筹组上海中华工业协会湖南支部。8月16日晚，被张敬尧义子张继忠刺杀。案发后，张竟贼喊捉贼，悬赏千元缉拿凶犯。

[4] 程鹏，安徽人。上海中华工业协会特派代表。1919年7月随吴灿煌来长沙活动，被张敬尧派人杀害。

[5] 上海国民大会，指由上海各界联合会等团体发起召开的大会。

继忠[1]，率兵夜分闯入，将二人乱刀戮死。暗杀公民，身蹈刑律。其罪六。长沙《大公报》《湖南公报》，因主持公论，两次被封[2]。学生联合会发行《湘江评论》，研究学术，同遭封闭。各学校周刊，亦被禁止。湘人衔哀饮恨，无敢出声。言论自由，扫地以尽。其罪七。张督擅运私盐数千包，经京汉铁路扣留，有部电可证。又湘岸每盐一包，加盐税一元，另加护照包索等费三元，致盐价骤涨，小民食淡。破坏盐法，目无中央。其罪八。张督勒索省城及各县绅民，供给饷银，动辄数千万。湘乡一县，勒捐军米至五万石，又尝勒民出米百万石私运至津，售与日本，迭经湘绅抗阻，文电确凭。又逼提中华汽船公司华盛轮船，以已定勋臣，改名勋华，据为已〈己〉有。各县田赋，每一元率加二角以至五角，或径加倍征收。兵复生计萧条，民田所入，不给正供，而张督坐收厚赃不顾民瘼。其罪九。张督在湘，仅辖二十余县。以所辖二十余县，伪冒称全省七十余县，伪造选民改选省议会[3]，迭经湘民通电反对。又省教育

---

[1] 张继忠，原名毛思忠，土匪出身。张敬尧于1917年7月在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任内，将他收为义子。时任张敬尧所部第七师混成第五团团长。

[2] 长沙《大公报》，指在长沙刊印的湖南《大公报》。《湖南公报》则应为《湖南日报》，因《湖南公报》已于1916年袁世凯死后停刊。1919年7月，湖南《大公报》和《湖南日报》因登载各公团联合会反对非法选举省议会的启事一则，同被张敬尧封禁。嗣因各公团联合会推出代表向张申辩，张知理亏，向各代表道歉。翌日两报继续出版。湖南《大公报》据实报道张敬尧道歉语，张恼羞成怒，竟将湖南《大公报》再次封禁。是年中秋前，《湖南日报》“因转载北总代表有更任许世英消息”，被勒令停版五日。

[3] 改选省议会，指张敬尧为将省议会改造成御用机关，特委安福系议员符定一和痞徒袁家元等人包办改选。

会，本民立机关，当自改选，张督乃委官代办，竟成事实。省农会旧省会长，被其推翻。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其罪十。凡此十罪，概举大端，其洋有《湘灾纪略》、《醴陵兵燹纪略》、《宝庆兵燹纪略》、《湖南》月刊[1]等书，及湘省士绅湖南善后协会，学生代表迭次呈诉文电可证。窃以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政府苟犹视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视湘民为中华民国之民，则去暴救民，职责固自有在，用是缕陈前情，迫恳大总统（钧院）迅将湘督张敬尧撤任回京，尽法惩办，另委贤能接充，以全民命，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谨呈

大总统（国务总理）[2]

湖南各界公民　陈绍休　彭　璜
毛泽东　张　怀　罗宗翰　杨树达
罗教铎　吴小山　朱剑机〈帆〉
周君南　李凤池　曾翼圣　罗　璞
（以下署名甚多从略）[3]等呈

---

[1] 《湖南》月刊，湖南部分文教界人士和湖南善后协会部分成员于1919年7月20日在上海创办。内容有三："一、报告湘灾确情；二、讨论善后问题；三、提倡民治主义"，主要是揭露张敬尧祸湘罪行，反对军阀统治，宣传民主思想。

[2] 大总统（国务总理），指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

[3] "以下署名甚多从略"为《民国日报》编者所加。

湘教职员请撤惩张敬尧

（1920年1月19日）

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等呈徐世昌文云：呈为督军摧残教育，恳请撤惩，以全教育而培国本，仰祈钧鉴事：

窃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我大总统[1]就任以后，提倡教育业巳〈已〉三令五申。为地方长官者，应如何仰体德意，尽力进行，以副育才兴国之盛心。而湘督张敬尧，则有大谬不然者。计自张督莅湘以后，所惟日孜孜者，经营各种商业，以与民争利；勒派各种捐税，以搜括〈刮〉民财；输入鸦片，以贪图收入；纵兵劫掠，以蹂躏民生。森森国典，煌煌明令，张督眼中，早已视若无物。种种罪状，业已道路皆知，计亦为政府所深悉。教铎等在学言学，于张督摧残教育情状，知之最详，感之尤切，请为我总统一一陈之：一吞设〈没〉教育经费也。湖南教育经费，每年向支八十余万元。自张督到湘，锐减其半，定为四十余万元。湘民初以为当此军事倥偬之际，财政本极艰难，减成发给，张督或非得已。乃撙节经费者其名，而攫入私囊者其实。自七年四月，各学校经费初犹较减发之数，为七折、八折。九月以后，则又改为六折。且此折而又折之款，张督并不发给现洋，惟以湖南银行纸币六串，当现洋一元。而同时持湖南银行纸币，向张督开设

---

[1] 大总统，指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

之裕湘银行兑换现洋者，则必十串或十五串，始能换银一元。其后竟至三十余串，始能换银一元。至八年一月，款愈无着。二月发湖南银行纸币实额不及二成，发后三日，张督突以明令取消纸币。各校已领经费，等于未领。三四两月，仅发四成。五六两月，久延未发。至十一月省城各学校教员，以生活艰难，全体辞职，张督始饬银行发出，实亦不过五成。七月以后则至今渺无消息。又每月经费，必历数月而后始发通知书。通知书发出之后，各学校庶务员往领，必至数十次而后始能领出。其因约期不践，至于两相冲突之事，时时有之。然无论所发者为几成，张督必令学校具十成完全之收据，始能领取。夫当此财政万分艰窘之际，张督身任地方大吏，宜如何清白乃心丝毫不苟，始足以崇政体而服人心。张督对于教育经费，既用减成发给，即尽应取减成之收据。乃发数则为减成，而报销则系实数。此等行为，在稍知自爱之匹夫匹妇，且不屑有。张督乃以一省军民长官，竟出此种诈骗行为，以作〔弄〕吾湘教育界人员，欺蔑中央政府，蒙蔽我大总统，罪莫大马〈焉〉！此应恳撤惩者一。一占夺校舍校具也。长沙各学校，如第一师范学校，第一中学校，甲种农业学校，甲种工业学校，乙种工业学校，长郡中学校，广益中学校，妙高峰中学校、复初中学校、濂溪中学校，长沙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校，长沙第一高等小学校，楚怡小学校等校舍，以及教育会房屋，均被张督部下占领。门窗板片，悉资炊亹〈爨〉之材。教室礼堂，尽供厨厩之用。自清末以来二十年，积累经营之图书仪器，尽数毁灭无存。各工业学校所视为生命之机械锅炉，移作兵厂之用。此等损失，综计不下百余万元。当此育才孔亟之秋，教育器具尽力扩张，犹虞不给，何堪任意破坏，至于此极。去岁秋间大总统曾有明令，禁止兵队占住学校，而张督竟置若罔

闻。湘人教育事业，纵不足惜，如我大总统之明令何？此应恳撤惩者二。一侮辱教育界人格也。当去岁四月，上海和会[1]有撤换张督之提议，张恐位置不保，嗾使己〈已〉故湖田局长徐清泰，前长沙知事稽炳元，约各校长会议，讽令发电挽留，以发给学款为交换条件，迫各校长签名。各校长以款本应由政府发给，而张督政治乖谬，手段卑劣，不欲被其溷污，于是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商业专门学校校长汤松，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马晋羲，甲种工业学校校长蔡湘，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王凤昌等，皆各潜往沪汉，以避其无礼之迫胁。由是张督衔教育界人士愈深。其他私立学校，如教育会会长、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以反对省议会选举，受军队之威吓。孤儿院院长徐特立[2]，以指斥张督清乡队之骚扰，则诬为通匪，通令缉拿，皆不得安居，飘流在外。十一月省城各学校教员，以半年未得薪俸，生活难支，全体辞职。张督不惟不加礼慰，反发布明令，骂为无意识，诬为别有作用。夫教员之教课，由校长以聘约礼聘而来，聘者对于契约不能履行，受聘者固可辞职。此种粗浅

---

[1] 上海和会，指北京政府与广州军政府代表于1919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南北议和会议”。“和会”共开八次，至同年5月因无结果而散。“撤换张督之提议”，为广州军政府代表于1919年4月9日在上海和会上所提议案之一。

[2] 徐特立（1877—1968），原名懋恂，又名立华，湖南长沙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至1919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该校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教师之一。曾提倡并参加留法勤工俭学。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随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教育部部长。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延安从事教育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共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

事理，张督身任『犯』地方长吏，岂有不知？乃故意冷嘲热骂，侮辱士材。此不惟湘士之羞，实亦全国教育界之辱。十二月二日，长沙省城各学校学生，激于闽警[1]，遵照湖南国货维维〈持〉会[2]议决议案，赴教育会焚烧劣货。乃张督竟遣其弟参谋长张敬汤统率军队，包围学生，骂为土匪，又强捕学生代表五人，迫照正身，声言即予骈戮，复挥令兵士向学生冲击。时长郡中学庶务员刘定安，出为学生解释，敬汤立批其颊，并叱兵弁扭之下跪。学生自谓以爱国热肠而来，得无端侮辱而返，悲愤郁积，遂酿成八日全体解散离校惨剧。张督自恃武力，对于士类，凌侮殴辱无所不至，此应恳撤惩者三。一非法改选教育会也。湖南省教育会，本教育界人士研究学校之机关。改选手续，向由在会干事，及会员等，自行筹备。此种办法，本各省所同，不惟湘省。乃张督不慊于前此省教育会反对省议会选举之事，竟委湘江道尹王丙坤筹备改选。虽经各县区教育界人士，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电反对，张督概置不理。其意盖欲以地方公共之团体，作供其奔走听其嗾使之爪牙。违弃部令，反背民意，均不暇顾，此应恳撤惩者四。凡此所举皆系荦荦大端，其余种种犹不胜述。今长沙城内除数教会学校[3]以外，任何讲习之地寂无弦诵之声。万数青年，同时失学。长此不已，三湘七泽，将永成化

---

[1] 闽警，指从福州传来的1919年11月16日在该地发生的日本浪人殴伤中国学生的消息。湖南《大公报》曾有《日人击毙闽学生之警讯》《闽警声中之各界联合会》《湘学生对闽事之响应》等多篇报道。

[2] 湖南国货维持会，由湖南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和农会等团体联合发起，于1919年5月28日在长沙成立。

[3] 欧美等国教会当时在长沙所办雅礼大学、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雅礼中学和福湘女子中学等学校，人称“教会学校”。

外之邦。湘民纵不足惜，其如我大总统提倡教育之明令何？教铎等在湘从事教授，十有余年，对于政治，未尝容喙，今以张督凭恃兵威目无法纪，摧残教育，至于此极，故迫不得已，奔走来京，伏恳我大总统主持大法，将湘督张敬尧，即予撤任，尽法惩治。并恳将该督所吞没之教育经费，澈底清算，责令缴出；一面颁布明令，将湖南教育经费指拨的款，使之独立，以后无论何时在湘军民长官，不得分文提作别用，以崇教育而培国本，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谨呈

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同）

湖南『试』省城各学校职员代表
罗教铎　杨树达　朱剑帆
罗宗翰　张　怀　毛泽东等呈
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十九日

蔡元培范源濂等启事[1]

（1920年1月22日）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以本年一月十七日午前五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溯自先生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复留学于英国苏格兰大学[2]，既毕业，赴柏林考察教育，亦逾一年[3]。辛亥冬季，全国兴革命之师，先生于是时归国[4]，即回长沙任高等师范及第一师范各校教授，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如是者七年有余[5]。戊午岁，长沙被兵事，师范学校亦驻兵[6]，教育

---

[1] 本文在《北京大学日刊》首刊后，又于1920年2月1日至3月14日，在湖南《大公报》以《代讣》为题连日重载，内容完全相同，署名次序有所变动。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逐张敬尧运动时，曾多次到医院看望、守护杨昌济，后又参加在京举行的悼念活动。

[2] 苏格兰大学，指英国苏格兰厄北淀大学。

[3] 据杨昌济《余归国后对于教育之所感》一文记载，他赴德国考察时间是9个月。

[4] 杨昌济归国时间是1913年年初。

[5] 据李肖聃当时所撰《本校故教授杨怀中先生事迹》一文所记，先生“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百千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此处所说“七年有余”，应是五年有余。

[6] 1918年春夏间，南北军阀混战于湖南，各路军队进退长沙，骚扰劫掠，许多学校变成兵营。

事业将隳弃无可为，先生乃来北京，任国立大学伦理学教授。参稽群籍，口讲之暇，复有译述，精神过劳，因遂致病。始为胃病，继以泛肿，养疾西山，逾夏秋西〈两〉季。入冬以后，病势日剧，居德国医院受诊治。医者谓其脏腑俱有伤损，医疗匪易，而先生之病亦竟以不治。以吾国学术之不发达，绩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以嗜学终其身。天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为教育、为个人均重可伤也！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先生服务教育，亦近十年，揆诸优待教员及尊重学者之意，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俾其遗孤子女[1]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梁焕彝　胡迈　刘棣蔚　黎锦熙　梁焕奎　方表
薛大可　朱剑帆　章士钊　李穆　廖名缙　陈润霖
蔡元培　陈介　张缉光　陈衡恪　范源濂　李傥
范治焕　陶履恭　杨度　范锐　向瑞芝　胡元倓
周大烈　罗超　王志群　毛泽东　熊崇煦同启

如蒙赙赠，请寄送宣外贾家胡同达子营十六号湘潭李倜君，或宣内什八半截西口中沈篦子胡同三号胡彦远代收。

---

[1] “俾其遗孤子女”六字，《北京大学日刊》影印件不显，此处系根据湖南《大公报》补上。遗孤子女，指杨昌济的夫人向氏，子杨开智，女杨开慧。

上靳氏书[1]

（1920年1月28日）

靳[2]总理钧鉴：

张敬尧入湘以来，围焚株醴，纵兵掠劫，勒种烟苗，摧残教育，勒索商民，擅加盐税，盗卖矿产，私运民米，暗杀公民，提倡妖术，摧残言论，勒捐军米，私运食盐，停兑纸币，勒买彩票，拍买〈卖〉纱厂，扰害闾里，尽卖公产，偷运军火，擅加田赋，操纵金融，私造教育会，私造省议会，私造省农会，种种罪恶，业经各方前后呈诉，恳请撤惩在案。湘民逼处水火，存亡生死所关，代表等激于公愤，奔走来京，复经多次上呈请愿，守候月余，未闻后命，实深惶惑。今已迫不及待，恳我总理，在最近期间，将张督明令撤任，另简贤能接充，不胜急切待命。

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1] 本篇是湖南赴京驱张请愿代表团三团体（即湖南公民、湖南教职员、湖南学生三个请愿代表团），于1920年1月28日向国务总理靳云鹏递交的请愿书。当时毛泽东以湖南公民请愿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队参加，并被公举为进入国务院和总理住宅当面交涉的六代表之一。此文在1920年1月29日北京《晨报》和同年1月31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时，内容有所删节。

[2] 靳，指靳云鹏。

自勉联[1]

（1920年1月）

自闭桃源称太古；
欲栽大木拄长天。

---

[1] 这是引用杨昌济创作的对联。1920年1月，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父亲毛顺生先后去世。毛泽东准备与杨开慧兄妹扶柩南归和回韶山奔丧，正在这时，李大钊要他到上海和陈独秀商量革命事宜，毛泽东即以杨昌济的这副名联激励自己，毅然去了上海。

上靳氏书[1]

（1920 年 1 月 28 日）

靳[2]总理钧鉴：

张敬尧入湘以来，围焚株醴，纵兵掠劫，勒种烟苗，摧残教育，勒索商民，擅加盐税，盗卖矿产，私运民米，暗杀公民，提倡妖术，摧残言论，勒捐军米，私运食盐，停兑纸币，勒买彩票，拍买〈卖〉纱厂，扰害闾里，尽卖公产，偷运军火，擅加田赋，操纵金融，私造教育会，私造省议会，私造省农会，种种罪恶，业经各方前后呈诉，恳请撤惩在案。湘民逼处水火，存亡生死所关，代表等激于公愤，奔走来京，复经多次上呈请愿，守候月余，未闻后命，实深惶惑。今已迫不及待，恳我总理，在最近期间，将张督明令撤任，另简贤能接充，不胜急切待命。

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

[1] 本篇是湖南赴京驱张请愿代表团三团体（即湖南公民、湖南教职员、湖南学生三个请愿代表团），于 1920 年 1 月 28 日向国务总理靳云鹏递交的请愿书。当时毛泽东以湖南公民请愿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队参加，并被公举为进入国务院和总理住宅当面交涉的六代表之一。此文在 1920 年 1 月 29 日北京《晨报》和同年 1 月 31 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时，内容有所删节。

[2] 靳，指靳云鹏。

自勉联[1]

（1920年1月）

自闭桃源称太古；
欲栽大木拄长天。

---

[1] 这是引用杨昌济创作的对联。1920年1月，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父亲毛顺生先后去世。毛泽东准备与杨开慧兄妹扶柩南归和回韶山奔丧，正在这时，李大钊要他到上海和陈独秀商量革命事宜，毛泽东即以杨昌济的这副名联激励自己，毅然去了上海。

挽杨昌济[1]联

（1920年1月）

忆夫子易帻三呼[2]，努力努力齐努力；
恨昊天不遗一老[3]，无情无情太无情。

---

[1] 杨昌济，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曾赴日本、英国留学。关心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进步青年，鼓励他们努力向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促使新民学会成立。他在第一师范教书6年，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于1920年去世。

[2] 夫子，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这里指杨昌济。帻，古代的一种头巾。三呼，三次呼唤、教导。指杨先生对毛泽东等的谆谆教导。

[3] 昊天，昊，音号，广大的天。一老，指杨昌济。

给陶毅的信[1]

（1920年2月）

- ■ **“联军”**
- ■ **“同志的分配”**
- ■ **“自修大学”**
- ■ **“女子留俄勤工俭学”**

斯咏[2]先生：

（上略）[3]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

---

[1] 本篇和收入本书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的其他各篇，标题下的内容提要均为毛泽东编辑时所加，故予保留。

[2] 斯咏，即陶毅（1896—1931），女，湖南湘潭人。长沙周南女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周南女校任事。

[3] 原件如此。

“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贝〈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澈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

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狠是可叹！你是狠明达狠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甚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

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1]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2]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巳〈已〉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

会友张国基[3]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暲[4]

---

[1] 旭旦学会，1920年1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进步女学生团体。成员多为长沙周南女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

[2] 魏，指魏璧（1897—1969），又名韫庵，女；周，指周敦祥（1898—1980），号肫如，女；劳，指劳君展（1900—1976），又名启荣、冀儒，女。三人均为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以后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劳君展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3] 张国基，1893年生，又名颐生，湖南益阳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南昌起义时任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尔后长期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华侨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侨联常委、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务。

[4] 萧子暲，当时在上海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发起成立赴法学生联合会。1920年5月离开上海去法国。

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1]，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2]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3]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4]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5]君等商量。

---

[1] 1920年年初，彭璜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彭璜任该团临时会计。

[2] 何叔衡（1870—1935），又名瞻岵、老武，湖南宁乡人，新民学会会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湘江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

[3] 湘事，指当时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4] 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是由向警予、蔡畅等发起，于1919年12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进步团体。该会负责筹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事务，筹集出发川资及互助基金，推动了当时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5] 李大钊（1885—1927），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1918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军[1]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像你曾说过杨润馀[2]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3]，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4]，稻田[5]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狠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巳〈已〉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6]君函，说将在周南[7]教课，不知巳〈已〉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

---

[1] 汤寿军，即汤松（1887—?），湖南长沙人，先留学日本东京商业学校，后留学美国，1915年归国，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当时是湖南华法教育分会在沪干事。

[2] 杨润馀（1899—?），女，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12月曾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现在——解放过渡期中——的女子应该怎样?》《原来你们城里人时新这样》等文章。

[3] 《大公报》，指湖南《大公报》。

[4] 女子工读团，指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成立于1920年年初，其宗旨为“实行女子工学互助”，成员多为北京各女子学校的学生。

[5] 稻田，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设在长沙古稻田，故又名稻田女子师范学校。

[6] 李一纯（1899—1984），女，湖南长沙人。长沙周南女校毕业，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均从事理论教育工作。

[7] 周南，指长沙周南女校。

湘代表驱张之新运动*

（1920年2月28日）

湖南请愿团，为驱除张敬尧到京，两月有奇，上呈府院，不下十余次，求见亦不下十余次，政府未有表示。即最后之大请愿，亦不过办到一个派员密查，该代表等知纯靠中央政府，彻惩张氏，此刻必难做到。除在衡郴桂粤有实力各方面，积极进行外，凡与此实力有关系之处，均往联络，以为助力。因派人赴保定，向湘蜀赣粤四省经略使曹锟处，求其实行经略职权，尽力赞助，代表罗宗翰熊科贤刘瑛等，前赴保定，接洽曹氏以下诸要人，极表示愿为助力之意。十七日，经略使署差人至该代表住所，约期与秘书长副官长谈话。十八日下午各代表至经略使署，痛数张氏祸湘种种事实，至惨痛之处，署中人均为感动。秘书长王君曰：张督在湘之罪恶，各位所上之书内和面述各事，尚不如我们平日所知之详尽，即中外报纸，亦久已喧传，几尽人深悉，曹经略于各位之请求，深表同情云云。各代表复将《湘灾纪略》《醴陵兵燹纪略》《宝庆兵燹纪略》《湖南月刊》及安徽霍丘颍上两县公民所出之《张敬尧罪恶史》等书，交呈曹氏，至如何办法，看以后事实便知，此时未能逆料。（平民通信社稿）

1920年，毛泽东带领湖南驱逐张敬尧代表团到京，住在湖南会馆里，并在此召开了千人参加的“湖南各界驱逐军阀张敬尧大会”。图为湖南会馆旧址。

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1]

（1920年3月7日）

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

现在中国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

像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

---

[1] 据彭璜1920年6月8日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致岳曾的复信，上海工读互助团，是彭璜、毛泽东等邀请热心此事的一些人士，于1920年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其目的“本想替一般埋没于旧社会恶制度底下的青年，另造一种新组织新生活”，但因在实际生活中行不通而终归失败。同年5月，彭璜又邀集毛泽东、张文亮等，在上海民厚里租了几间房住在一起，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行工读互助的生活，后又因毛泽东、彭璜于6月返回长沙，工读生活随之终止。本文于1920年3月7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和《申报》同时发表，除“发起人”次序排列不同外，内容无异。

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这要算是我们发起人的唯一宗旨。

但在开始筹备的时候，约需一千元的费用，若是赞成我们的宗旨，而愿意帮助一般青年的人，希望能够在经济上赞助赞助为感！

▲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　本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三人之介绍，全体团员之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六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增加作工钟点。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须之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体供给，惟书籍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别　暂分左列四项：

（一）平民饭店　（二）洗衣店

（三）石印　（四）贩卖商品及书报

六、工作　所得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　设书报室及俱乐部。

八、组织　本团公选事务员若干人，讨论团中重要事务。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管理各组银钱出入事务。庶务若干人，管理各组卖买及一切杂务。事务员每月选举一次。

九、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工作情事，除私人规劝外，得由事务员召集团员会议全体劝告，经三次劝告仍不努力尽职，即请其出团。

十、出团　团员得自由出团，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人数　本团暂以四十人为额，俟经费充足再行推广。

十二、附则　本简章得由团员公决增改。

本团拟在徐家汇开办工队的分配组织，俟开办后另订细则。

发起人：陈独秀　王光祈　汪孟邹　姜济寰
汤　松　宗白华　陈子绶　陈宝谔
左训生　康白情　张国焘　涂开舆
孔昭绶　邓峙冰　刘清扬　毛泽东
张百龄　彭　璜　萧子暲　李思安
成圣瑞　曾翼圣　曹扬篱　陈　煦
周霁光　齐铁忱

给黎锦熙的信

（1920年3月12日）

邵西[1]先生：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先生是很明白湖南事情的人，敬请将各条斟酌，或要增减修正，见示，以便持赴沪上，从事进行，不胜感盼！

乡弟　毛泽东

一九二〇，三，一二

---

[1] 邵西，即黎锦熙。

附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1]

（一）军政

（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

（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

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

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

（3）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1）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基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基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

（2）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减轻盐税。废除两年来新加各苛税。

（3）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经费

（1）恢复民国二年教育经费原额，以后应时增加。

（2）确定来源。

（3）保管权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教育经费保管处”。

（四）自治

（1）恢复并建设县、镇、乡自治机关。

（2）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

[1] 附文共2页，第2页左上方批画的“﹏﹏怀疑的地方，或者明后天的晚上来尊处领教”，系毛泽东手迹，文中小黑点和横线亦为毛泽东所加。《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1920年6月14日在上海《申报》上发表。

（3）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

（五）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六）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提出者　湖南改造促成会。

通信处　上海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全国各界联合会彭璜。

～～～　～～～怀疑的地方，或者明后天的晚上来尊处领教。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创办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图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

给周世钊的信[1]

（1920年3月14日）

■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

■团体事业的准备工夫

■自修大学

惇元[2]吾兄：

接张君文亮[3]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

---

[1]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4月1日和4日又两次致信萧子升。致萧的这两封信至今未见原文，但萧在同年8月初给毛泽东的复信中不仅对其有所引述，而且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萧写道：“不结婚，主张恋爱自由，最为正当。”“‘人才要讲经济，学问游历要讲究多方面’。这两句话，极得我心，我对于你也早有意不扯你来法了。”“‘结伴游俄’我赞成。顿湘两年必要。”“‘叔翁做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此语极当。”“‘各方面——即如某学会——人物，都不免有点虚浮，少深沉远大之计，少恳挚之意’，这话说得非常痛快，非常动人。”“‘动而不浮’四字的精神，五六年来，兄即有之。”“‘学会进行注意潜在，不出风头，不浮游大码头’极好。”

[2] 惇元，即周世钊。

[3] 张文亮，号闻读，湖南湘潭人。当时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

德，昊天罔极”[1]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巳〈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2]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

[1] 语出《诗·小雅·蓼莪》。

[2] 胡适之，即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良，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著名人物之一。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1946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卒于台湾。黎邵西，即黎锦熙。

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剌〈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剌〈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

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1]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活〈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觉狠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复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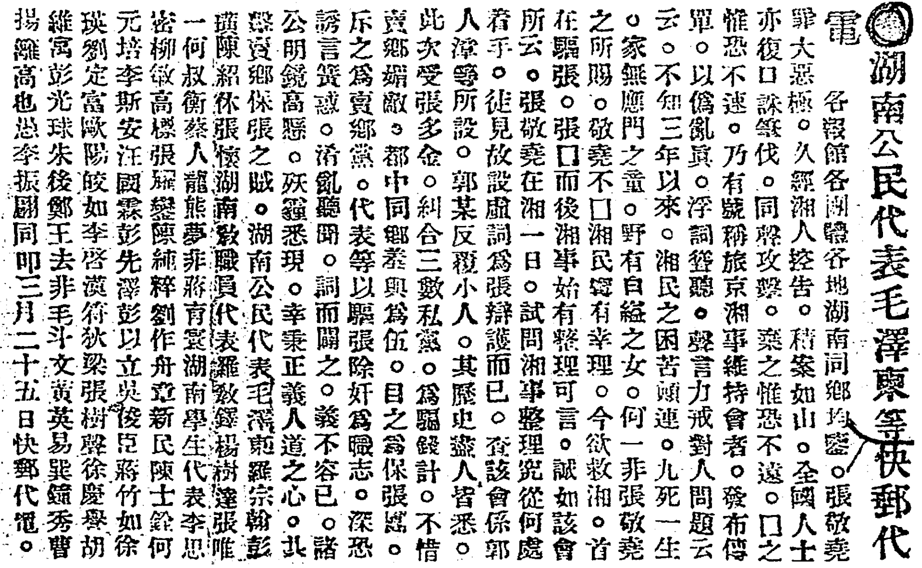
弟　泽东
一九二〇，三，十四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

[1] 邹泮清，即邹蕴真，当时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

湘事维持会内幕[1]

（1920年3月25日）



◎湖南公民代表毛澤東等快郵代電

各報館各團體各地湖南同鄉鈞鑒。張敬堯罪大惡極。久經湘人控告。積案如山。全國人士亦復口誅筆伐。同聲攻擊。棄之惟恐不遠。口之惟恐不速。乃有號稱旅京湘事維持會者。發布傳單。以僞亂眞。浮詞聳聽。發言力戒對人問題云云。不知三年以來。湘民之困苦顚連。九死一生。家無應門之童。野有自縊之女。何一非張敬堯之所賜。敬堯不口湘民寧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驅張。張口而後湘事始有整理可言。誠如該會所云。張敬堯在湘一日。試問湘事整理究從何處着手。徒見故設虛詞爲張辯護而已。查該會係郭人漳等所設。郭某反覆小人。其歷史盡人皆悉。此次受張多金。糾合三數私黨。爲騙錢計。不惜賣鄉媚敵。都中同鄉羞與爲伍。目之爲保張黨。斥之爲賣鄉黨。代表等以驅張除奸爲職志。深恐謗言簧惑。淆亂聽聞。詞而闢之。義不容已。諸公明鏡高懸。魑魅悉現。幸秉正義人道之心。共聲賣鄉保張之賊。湖南公民代表毛澤東羅宗翰彭璜陳紹休張懷湖南教職員代表羅教鐸楊樹達張唯一何叔衡蔡人龍熊夢非蔣育寰湖南學生代表李思密柳敏高標張羅變陳純粹劉作舟意新民陳士銓何元培李斯安汪國霖彭先澤彭以立吳俊臣蔣竹如徐瑛劉定富歐陽皎如李啟漢符秋梁張樹聲徐慶譽胡繼寓彭光球朱後鄭王去非毛斗文黃英易巽錞秀曹揚羅高也忠李振翩同叩三月二十五日快郵代電。

毛泽东等发表的快邮代电。

各报馆、各团体、各地湖南同乡钧鉴：

张敬尧罪大恶极，久经湘人控告，积案如山。全国人士亦复口诛笔伐，同声攻击，弃之惟恐不远，去之惟恐不速。乃有号称旅京湘

---

[1] 本文于1920年4月1日以《湖南公民代表毛泽东等快邮代电》为题，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时，署名处在罗教铎和李思密前，分别有“湖南教职员代表”和“湖南学生代表”等字样。4月11日，又以《湖南去张代表电讨保张团》为题，在上海《天问》第11期刊出，内容相同。

事维持会者，发布传单，以伪乱真，浮词耸听，声言力戒对人问题云云。不知三年以来，湘民之困苦颠连，九死一生，家无应门之童，野有自缢之女，何一非张敬尧之所赐！敬尧不去，湘民宁有幸理。今欲救湘，首在驱张。张去而后湘事始有整理可言。诚如该会所云，张敬尧在湘一日，试问湘事整理究从何处着手？徒见故设虚词，为张辩护而已。查该会系郭人漳等所设。郭某反复小人，其历史尽人皆悉。此次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都中同乡羞与为伍，目之为保张团，斥之为卖乡党。代表等以驱张除奸为职志，深恐诱言簧惑，淆乱听闻，词而辟之，义不容已。诸公明镜高悬，天〈妖〉霾悉现。幸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

湖南公民代表　毛泽东　罗宗翰　彭璜
陈绍休　张怀　罗教铎　杨树达
张唯一　何叔衡　蔡人龙　熊梦非
蒋育寰　李思密　柳敏　高标
张耀銮　陈纯粹　刘作舟　章新民
陈士铨　何元培　李斯安　汪国霖
彭先泽　彭以立　吴俊臣　蒋竹如
徐瑛　刘定富　欧阳皎如　李启汉
符狄梁　张树声　徐庆誉　胡维寅
彭光球　朱后郑　王去非　毛斗文
黄英　易巽　钟秀　曹扬篱
高也愚　李振翩同叩

三月二十五日快邮代电

湘人力争罢免张敬尧*

（1920 年 4 月 27 日）

致南宁陆总裁云南唐总裁电

顷据报载南北议和条件，阅之不胜骇悸。溯自和会续开，提出八条。后此谈判，自应以此为基础，即云互让，亦应依法解决，若乃抛却沪会，苟且私和，既乖正谊主张，安望和平久远。前途危险，固已不寒而栗。况第四条并称湘督不撤，尤为背道而驰。综张敬尧祸湘，罪恶滔天，擢发难数。湘人迫于救死，久拟孤注一掷，只以渴想和平，忍痛待决。今果反任元凶，稔毒湘省，以全省供其牺牲，为个人交换权利。湘人誓死不认，苟存三户，决与偕亡。万恳诸公，仍以救灾恤邻之心，贯彻护法救国之旨，统筹全局，拯湘水火，否则人心一去，根本互解，湘固不幸，抑岂西南之福？挥涕陈词，迫希亮察。

致广州军政府岑总裁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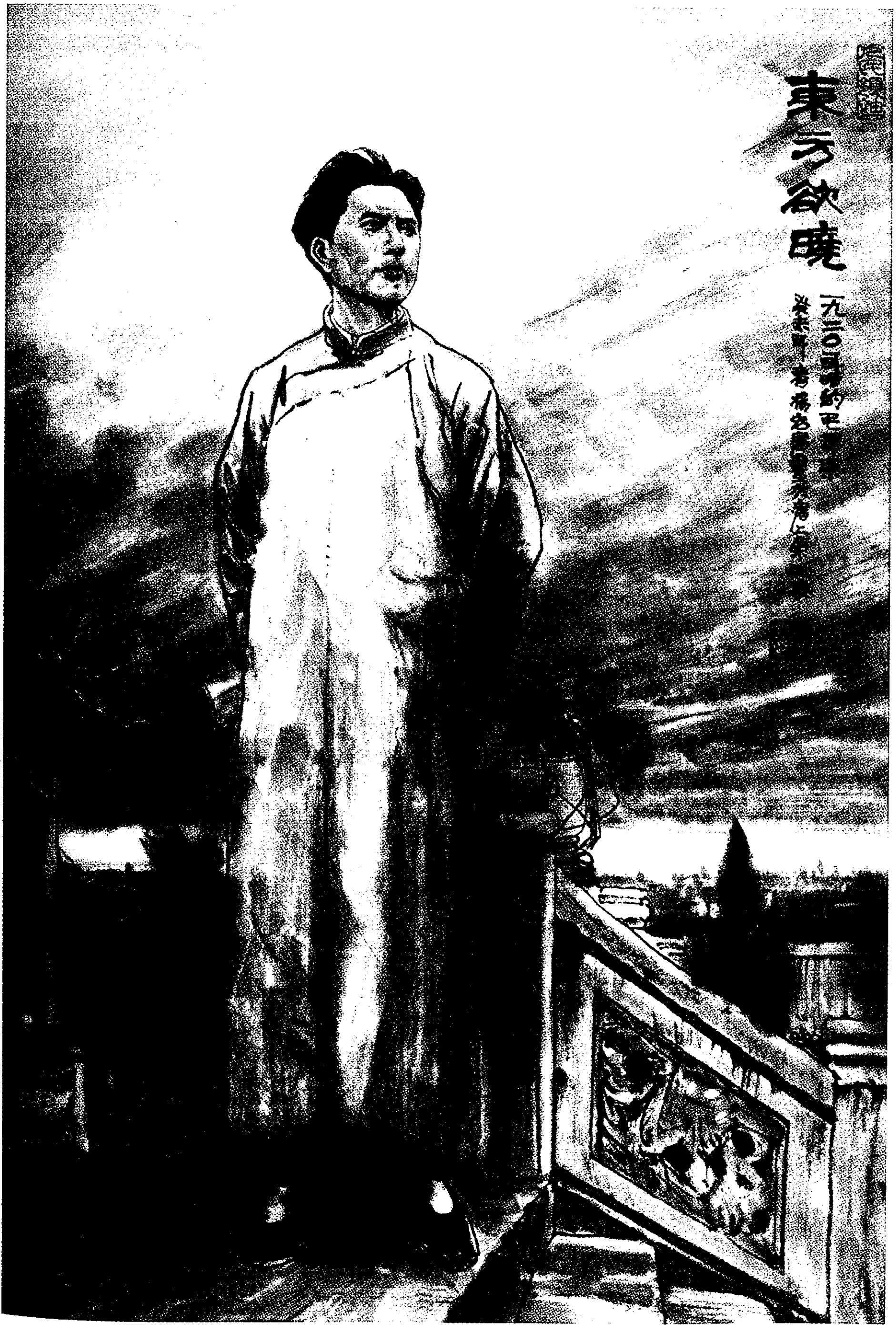
顷报载北政府非正式向公及陆总裁提出议和条件。内有湘张不动一节，阅之骇然。虽言居片面，事尚无征，然道路喧传，南北要人私自接洽内幕重重，物腐虫生，不无疑虑。查湘省首义以来，人

民生命财产，牺牲且远逾闽陕。而张敬尧祸湘，亦实较闽李、陕陈惨毒倍加。今苟和声中，副座列为专条，湘督任其恋栈，果于此事，是直举湘人频年惨怛呼吁之状若罔闻知。而专为要人权利交换，谓匪明势位而昧是非，其谁能信？在北廷久已不畏民碞恤民隐，其贸然提出，固无足责，惟副座非北廷可私授。智者应识其诈欺湘省为护法受奇灾。仁人应加以悯恤，且湘为西南门户。苟听不法武人卖国凶党如张敬尧者，盘踞其间，则川滇桂粤在在〈岌岌〉可危。自救不遑，奚言救国？此间湘人终以我公领袖护法，体兼仁者必不弃湘弗顾。敢请力持群众逐张之主张，勿反和会已成之定案，为湘除害。即为国胜残，不独全湘三千万人民引领望赐。即西南大局国家前途实利赖之。临电惶悚无任祷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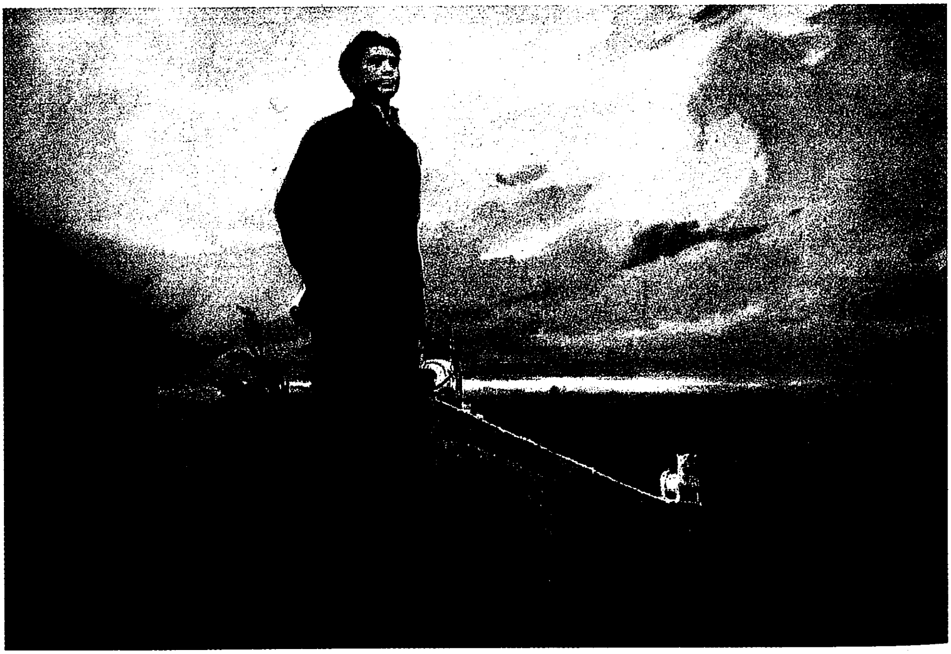
致章行严彭静仁两代表公函

顷阅报载，北政府以非正式提出之条件，与西南接洽。词虽片面，军匪无根，外间喧传，黑幕重重，尤为不寒而栗。查该条件除分配借款及各要人权位外，实无一适中乎民隐，而救国家之急。尤可怪者，湘督张敬尧为祸最深，湘民从事驱逐，已有不共戴天之势。而该条件与陕陈、闽李同为仍留现状，吾民何辜，必永受其荼毒。湘难未已，和宁可恃。矧前此和会，已经专案审查，最后之八条，亦列为要款，今一概抹煞，只循南方二三私人之权利，而牺牲三千万湘民以为之交换。湘民有死，誓不能从。公等谊切桑梓，谅蒙矜察。亦既以争去张，为续和开始条件，乞仍本初旨，贯彻主张。否则吾湘以生死相持，不推大局糜烂，即公等亦恐无以对湘人也。临颍挥涕，急不择言。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以“驱张”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到上海，再一次见到了陈独秀。图为陈独秀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活动地点——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东方欲晓》（中国画）



《东方欲晓》（油画）

湘人斥张敬尧破坏和平*

（1920年6月5日）

各报馆各团体公鉴：

顷湘南总司令部由广州转来艳电，称自吴师长撤防，三方签约。凡湘军采办粮秣，仍照前约履行，不得留难。讵宥日我军派人购米，经过防线，突被张敬尧接防军开枪轰击，伤毙我兵共计十三名，我军忍无可忍，不得不正当防御。似此衅自彼开，破坏和平，应由张敬尧负责。希转告全国静候公判等语，窃张敬尧祸湘，中外咸知。今尤蓄意挑衅，扰乱大局，责有攸归。应请主张正谊，铲除强权，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叩

给黎锦熙的信

（1920年6月7日）

邵西[1]先生：

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2]，同住连我四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3]，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

---

[1] 邵西，即黎锦熙。

[2] 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为上海市安义路63号。毛泽东在这里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名义，同支持驱张（敬尧）的各界人士进行联络，并协助《天问》的编辑工作。同住者有李凤池、李思安、陈书农等。

[3] 斯宾塞尔，今译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所著《社会学研究》，由严复摘译出版，名为《群学肄言》。《国拘》为其中的第九篇。此词系严复据原书意译，意即为一国狭隘范围所限。

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1]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他动机和内容怎样，总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旅京学会[2]出报的事可实现否？只是这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中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

---

[1] 指柏格森、罗素、杜威。柏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创立直觉主义哲学，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罗素（1872—1970），英国逻辑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1920年曾来中国讲学。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1919年至1920年曾在中国讲学。

[2] 旅京学会，指旅京湖南学会，成立于1920年春，会长范源濂。毛泽东为该会编纂干事之一，主要会务是利用星期日请名人讲演或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拟出月刊，未成。1920年秋后该会停止活动。

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我想做一篇“具体，鲜明，热烈，与新运动”的文章，无闲暇构思的机会，恐怕不能做了出来。先生能指挥日常生活，将“上衙门”“下私宅”“作事”“读书”支配得那样圆满得当，真不容易。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望着先生，真是天上。北京此时想是很热，上海也热起来了。余话后谈。敬问

近安。

毛泽东

六，七

湘人为人格而战

（1920年6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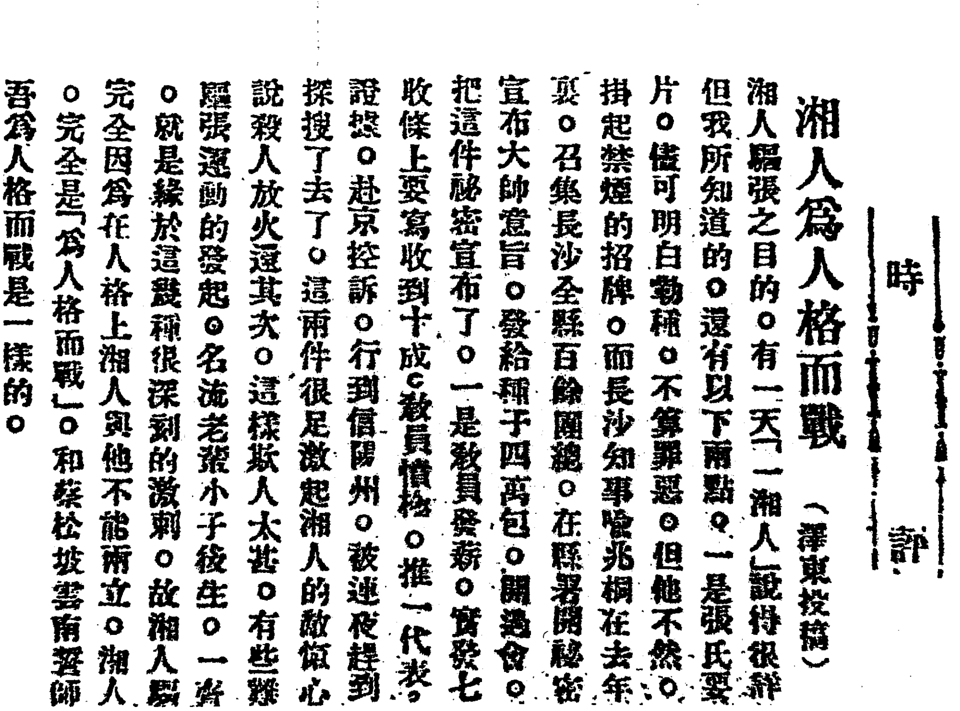
湘人驱张之目的，有一天“一湘人”说得很详悉。但我所知道的，还有以下两点：一是张氏要种鸦片，尽可明白勒种，不算罪恶。但他不然，四处挂起禁烟的招牌，而长沙知事喻兆桐在去年七月里，召集长沙全县百余团总，在县署开秘密会，宣布大帅[1]意旨，发给种子四万包。开过会，团总把这件秘密宣布了。一是教员发薪，实发七成，收条上要写收到十成。教员愤极，推一代表，携带证据，赴京控诉，行到信阳州[2]，被连夜赶到的侦探搜了去了。这两件很足激起湘人的敌忾心，总说杀人放火还其次，这样欺人太甚，有些难忍。驱张运动的发起，名流老辈小子后生，一齐加入，就是缘于这几种很深刻的激刺。故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湘人驱张，完全是“为人格而战”，和蔡松坡[3]云南誓师，说吾为人格而战是一样的。

---

[1] 大帅，指张敬尧。张敬尧（1881—1933），字勋臣，安徽霍丘人。历任北洋军第七师师长、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等职。1918年4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20年6月在人民斗争和湘军逼迫下退出湖南。后在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部下担任司令、军长等职。

[2] 信阳州，即今河南省信阳市。

[3] 蔡松坡，即蔡锷。



時評

湘人爲人格而戰（澤東投稿）

湘人驅張之目的。有一天「一湘人」說得很辯但我所知道的。還有以下兩點。一是張氏要片。儘可明白勒種。不算罪惡。但他不然。掛起禁煙的招牌。而長沙知事喻兆桐在去年裏。召集長沙全縣百餘團總。在縣署開祕密宣布大帥意旨。發給種子四萬包。開過會。把這件祕密宣布了。一是教員發薪。實發七收條上要寫收到十成。教員憤極。推一代表證據。赴京控訴。行到信陽州。被連夜趕到探搜了去了。這兩件很足激起湘人的敵愾心說殺人放火還其次。這樣欺人太甚。有些難驅張運動的發起。名流老輩小子後生。一齊。就是緣於這幾種很深刻的激刺。故湘人驅完全因爲在人格上湘人與他不能兩立。湘人。完全是「爲人格而戰」。和蔡松坡雲南誓師吾爲人格而戰是一樣的。

毛泽东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湘人为人格而战》。

湖南人再进一步[1]

（1920年6月11日）

据报南军有攻下长沙之讯。果然，湖南人消极方面的驱张运动[2]总算将要完结了。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3]。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

废督论倡了几年，督总不曾废掉。卢永祥、唐继尧[4]的废督论，可断其于实际影响很少。但湖南此刻如张敬尧确去，却大有废

---

[1] 1920年6月11日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此文时，文前加有以下内容提要：“废督的绝好机会”“湖南人努力”。

[2] 驱张运动，指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湖南人民进行的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3] 废督运动，指废除督军的运动。督军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设立的一省最高军事长官。毛泽东、彭璜等在湖南督军张敬尧将要被逐之际，竭力主张掀起废除督军制的运动，以达到“推翻武力”“实行民治”的目的。

[4] 卢永祥（1867—1933），字子嘉，山东济阳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任北洋军师长和淞沪护军使。1919年任浙江督军。1920年4月23日，为了对付北方八督同盟，通电废除督军制度，并呈请北京政府批准在浙江实行。唐继尧（1883—1927），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曾任贵州、云南都督、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和广州护法军政府元帅（未就）。1920年6月1日通电废督，解除云南督军一职，而以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名义扩大统治地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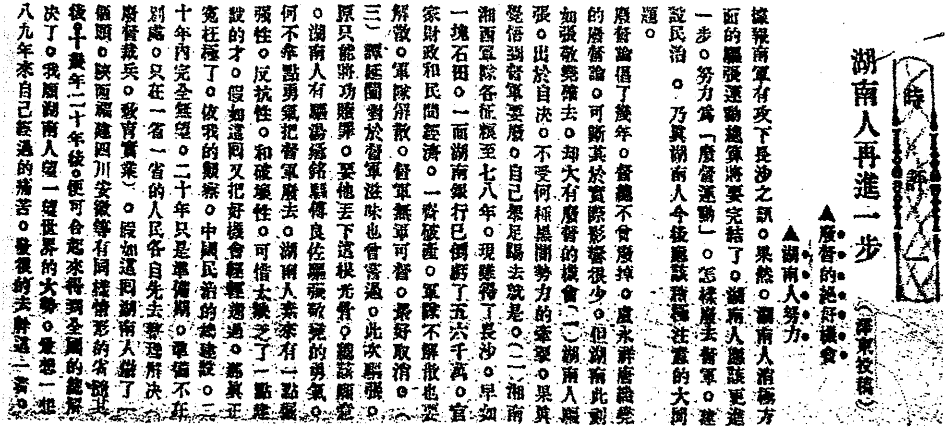
督的机会。（一）湖南人驱张，出于自决，不受何种黑暗势力的牵掣。果真觉悟到督军要废，自己举足踢去就是。（二）湘南湘西军队各征粮至七八年，现虽得了长沙，早如一块石田[1]。一面湖南银行巳〈已〉倒亏了五六千万，官家财政和民间经济，一齐破产，军队不解散也要解散。军队解散，督军无军可督，最好取消。（三）谭延闿对于督军滋味也曾尝过[2]。此次驱张，原只能将功赎罪，要他丢下这根光骨，总该愿意。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3]、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可惜太缺乏了一点建设的才。假如这回又把好机会轻轻逸过，那真正冤枉极了！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二十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很的去干这一着。

---

[1] 石田，指不能耕种的田地，比喻无用之物。《左传·哀公十一年》："得志于齐，犹获石田也，无所用之。"

[2] 谭延闿于1911年11月被湖南省谘议局推举为湖南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时被袁世凯解职。1916年被北京政府委任为湖南省省长兼督军，次年8月辞职。1918年7月被护法军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驻郴州，与长沙的张敬尧对峙；1920年6月，张敬尧被逐后，谭任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湖南省省长，11月被赵恒惕逼迫去职。

[3] 傅良佐（1873—1924），字清节，湖南乾州厅（今吉首）人。曾任直隶蓟榆镇守使、北京政府陆军次长。1917年8月6日被任命为湖南督军，9月9日到任，11月14日夜，在南北军阀混战中逃出长沙。



時評

湖南人再進一步

（澤東投稿）

▲廢督的絕好機會

▲湖南人努力

援鄂南軍有攻下長沙之訊○果然○湖南人消極方面的驅張運動總算將要完結了○湖南人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怎樣廢去督軍○建設民治 ○乃真湖南人今後應該積極注意的大問題○

廢督論倡了幾年○督總不曾廢掉○盧永祥唐繼堯的廢督論○可斷其於實際影響很少○但湖南此刻如張敬堯離去○卻大有廢督的機會（一）湖南人驅張○出於自決○不受何種黑暗勢力的牽掣○果真覺悟到督軍要廢○自己舉足踢去就是○（二）湘南湘西軍隊各號稱至七八年○現雖得了長沙○早如一塊石田○一面湖南銀行已倒斷了五六千萬○官家財政和民間經濟○一齊破產○軍隊不解散也要解散○軍隊解散○督軍無軍可督○最好取消○（三）譚延闓對於督軍滋味也曾嘗過○此次驅張○原只能將功贖罪○要他丟下這根光骨○總該願意○湖南人有驅湯薌銘驅傅良佐驅張敬堯的勇氣○何不奮點勇氣把督軍廢去○湖南人素來有一點強性○反抗性○和破壞性○可惜太缺乏了一點建設的才○假如這回又把好機會輕輕遞過○那真正冤枉極了○依我的觀察○中國民治的總建設○二三十年內完全無望○二十年只是準備期○準備不在別處○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決（廢督裁兵○教育實業）○假如這回湖南人做了一個頭○陝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樣情形的省蹤其後○十幾年二十年後○便可合起來得到全國的總解決了○我願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勢○並想一想八九年來自己經過的痛苦○發很勇猛的去幹這一著○

毛泽东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湖南人再进一步》。

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1]

（1920年6月14日）

自张敬尧到湘，极铲括〈刮〉淫杀之能事，湘民冤痛惨怛，无可告语。此次驱张运动，竭各方之力，尽多日之功，得南北主张正义人道者之同情，至于今日，始有将就驱除之望。然吾人尚未可遽作乐观也。何则？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至其时，无

---

[1] 本文未署作者姓名。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名义答曾毅的信中，曾说到“湘事改造，具见所刊宣言及改造条件之中”。同月30日，易礼容在给毛泽东、彭璜的信中也说道：“今天在报上看见你们答曾毅的信。……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据此可知《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是由毛泽东、彭璜等人共同拟定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有一个成稿过程。1920年3月26日，曾以《上海湖南改造促成会通启》（附有《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形式发出征求意见。“通启”的内容同后来发表的“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有几段话也是一样的。“通启”说，上述内容“倘荷赞同，希赐斟酌修正，迅予函复”。“俟各处复齐即行联衔拍电作一种有力的共同表示”。1920年4月1日，在“通启”稿的基础上，写成《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并附“条件商榷”，当即排印发给湖南有关方面人士。黎锦熙当时曾得到这个“宣言”稿。1920年6月14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连同附件在上海《申报》公开发表。次日，上海《民国日报》也予刊载，两报所载文字略有出入。公开发表的“宣言”稿和4月1日的文稿相同。因此，“宣言”的成稿时间是1920年4月1日。“宣言”所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同毛泽东1920年3月12日《致黎锦熙信》所附“条件商榷”内容大体相同，仅有几处作了一些文字改动。

论吾人方不胜其驱除之苦，而“朝三暮四”“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亦何如是之智短耶！湖南自人〈入〉民国，三被兵灾[1]，遭难最多，牺牲特大，推原事始，无非“督军”恶制，为之祸根，督军一日不除，湖南乱象一日不止。无论当局者属南属北，抑其人为恶为良，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湘局之无望治安，早已成不移之铁案。夫以如此绝大牺牲，尚不足稍引起其自身觉悟，则湘人脑筋，直成死寂。以如此暮气，欲适其生存于此新潮澎湃之世，戛乎其难！抑又观之现今国内问题，为种种特殊势力所牵掣，有不能速为全盘解决之势。求之实际可循途径，还在有一个地方之群众为之先倡。同人之愚，以为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而先提出一最低限度且应乎时势要求之条件，合省内外湘人之公意，铲除一切私见私利。持此宗旨，为一种合理的继续的群众运动，不达不止。论者谓湖南为东方之瑞士。吾人果能以瑞士为吾侪“理想湖南”之影相，从今日起，三千万人涤虑洗心，向前奋进，未始无实现之一日。时势明告吾侪，荒野之西伯利亚，已起风潮；己〈已〉亡之朝鲜，亦求自决[2]，大势所趋，莫之能遏。返观大湖以南，苍梧以北[3]，三湘七泽，风土雄厚，正吾人自治自决之舞台，亦举世括〈刮〉目相看之骄子，譬之青春年少，身手不差，要在其

---

[1] 1913年至1920年间，湖南先后被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统治，由此而造成南北军阀在湖南长期进行战争，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2] 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的朝鲜，开展了为争取祖国独立的人民抗日斗争。

[3] 苍梧，指苍梧山，又名九嶷山，在今湖南省宁远县境内。相传舜葬于此地。

好自为之耳。吾人对于湘事，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此〈何〉建设”为第二步。今特将军务、财政、教育、自治、人民自由权利、交通各大端，列成条件，征求各地湘人公意。此种条件之精神，以“推倒武力”及“实行民治”为两大纲领。以废督、裁兵，达到“推倒武力”之目的；以银行民办、教育独立、自治建设及保障人民权利、便利交通，达到“实行民治”之目的。吾人宜不顾一切阻碍，持其所信，向前奋斗。盖历史上世界各国民权、人权之取得，未有不从积极之奋斗与运动而来者也。同人更有进者，湖南为全国之一部，湖南之改造即全国改造之一部，直接间接影响实多。加之援助，与以同情，掬成美之心，作桴鼓之应，此又同人等所热望于全国人士者也。敝会为同志所组合，专以促成湖南改造为宗旨。促成之办法，在于发表意见，从众人之后，加以提倡。至于实际政治的活动，希望有一班明达之人，努力为之，同人不愿加入。今当发起之始，特此宣言。会设上海民厚南里二十九号。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一、军政：

（一）废督军。

（二）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宝庆、洪江。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

（三）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一）湖南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之准备金，由省议会监督存

储，准备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省议会有随时至银行查账之权。

（二）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减轻盐税，废除三年来新加各苛税。

（三）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

（一）教育经费独立，其数定为一百万元，以后应时增加。教育经费之来源应确定。教育经费保管权，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教育经费保管处”。

（二）采普及义务教育方针，至迟于十五年内，完成七十五县之义务教育。

四、自治：

（一）筹备建设各县最小区域之真正人民自治机关。

（二）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三）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

五、交通：

（一）在最短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二）建筑全省各重要市镇与乡村间之汽车路。

六、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提出者　湖南改造促成会

湖南人民的自决[1]

（1920年6月18日）

于今张敬尧走了，我觉得这种“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的”，往后正复不少。这些非张敬尧而有妨于湖南人民的自决的，我们便可以依从了吗？不论是湖南人，或非湖南人，凡是立意妨害湖南全体人民自决的，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因为中国之乱，连亘八九年了。乱不足奇，乱而毫没有半点结果乃是大奇。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

---

[1] 本文在1920年6月18日上海《时事新报》首刊和同年7月4日上海《天问》周刊第二十三号重刊时，文章头尾部分一半以上文字下加有着重号。另外，1920年5月16日出版的《天问》第十六号刊载的《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一文，内容与本文基本相同。所异之处除署名为“湖南人民自决会”外，主要是《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开头有“全国国民、各报馆、各民意团体、各省军民官吏、广州军政府参众两院湖南议员，郴州谭延闿先生，衡州吴佩孚先生，天津熊希龄先生、范源濂先生、郭宗熙先生，上海和平会议章士钊先生、彭允彝先生、徐佛苏先生，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汉口广州日本各湖南同乡同鉴”，而无“张敬尧走了，……自然都是湖南的仇敌”一段议论。

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至于就湖南一省而言，造乱者，少数之武人。而人民钳口结舌，合手并脚，半死半生，应说话的不说话，应反抗的不反抗，先自示弱，怎怪彼等之乘隙呈凶。时到今日，吾等乃翻然觉悟，知道“湖南者，现在及将来住在湖南地域营正当职业之人之湖南也”。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吾湖南人唯一无二之希望与责任，即在恢复自由，不能不求全国同胞热肠志士大大的表予同情。

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

（1920年6月23日）

曾毅先生阁下：

惠书诵悉。名言谠论，钦感莫名。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2]，乃得乘隙陵〈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刮〉民财归巳〈己〉

---

[1] 湖南改造促成会，是为筹划驱除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后改造湖南大计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彭璜、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本文是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名义写给老同盟会会员、上海报人曾毅的一封回信。此信于1920年6月28日分别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发表，同年7月六、七两日，湖南《大公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为题再次发表。毛泽东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中，有“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中说”等语，据此，本文当为毛泽东所写。此文在上海《申报》刊登时，文前加有“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内容提要。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时，文前亦加有“复曾毅书”“主张湖南们罗主义”的内容提要。曾毅（1879—1953），原名曾纬，字松乔，别号松父、松翘，湖南汉寿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经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1913年在汉口主办《民国日报》，不久，该报被查封，曾等被捕入狱。被保释出狱后，1914年再次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主办《中华新报》。1919年年底，到南京河海工程学院任国文教授。第二年又经广州到了长沙。

[2] 南北武人，指北洋军阀和西南各省地方军阀。

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非欲自处于小部落也，吾人舍此无致力之所。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吾侪缩小范围，讲湖南自决自治。吾侪大胆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陆荣廷也罢，唐继尧也罢，段祺瑞也罢，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无正当职业之人，不得与闻湖南事。要说天经地义，这才是天经地义也。湖南大国也，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曰夸言乎？得吾三千万人之一齐努力，固不难致之也。舍基础而筑层楼，四千年中国人之过也。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近年来湖南人之过也。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1]也，

---

[1] 1917年11月，湘粤桂巡阅使为陆荣廷。以陆为首的桂系军阀当时占有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地盘。

湘鄂巡阅使[1]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2]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于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来书大意："湘人自治，废督废兵，超出南北党争，建湖南为缓冲地带。"名言至论，大赞成而特赞成。至谓"不设一兵"，陈义甚高，无可反对之余地。惟敝会主张废除一切守备队、镇守使，暂保存正式有纪律之陆军一师。尊意乃欲不设陆军，而以警备队维持地方秩序，名实未亏而作用大异。警备队者，土匪之友。土匪无警备队不得枪，警备队无土匪不得开差机会，不得多量之开差费与乡村附带掠夺。正式编制之陆军，纪律较严，土匪有些畏惧，一也。陆军至多设一师，遍湖南地面设警备队，则至少七八个司令，三四个镇守使，兵额大增，二也。虽然，犹有进者，湘人自决主义，固不是无抵抗主义，强暴复来，可以任其宰割。强暴复来乎，正式之抵抗，仍不可少也。湘人自决主义者，们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之。正式陆军一师之设，顾到民力，顾到土匪，复顾到至

---

[1] 北京政府曾授予湖北督军王占元湘鄂巡阅使职，以图控制湖北、湖南两省。

[2] 护国军，指袁世凯筹备复辟帝制时，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于1915年12月25日在云南所组织的讨袁军队。靖国军，指1917年滇、陕等省组织的军队。是年9月，孙中山等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云南督军唐继尧曾通电赞成护法，但又独树一帜，以维护《临时约法》、"奠国家之基础"为名，将部队编为靖国军，自称滇川黔靖国军总司令。后陕西等省亦相继成立靖国军。1921年唐取消靖国军名义，陕西等省靖国军也先后解散。征南军，指北京政府冯国璋、段祺瑞于1918年征战南方各省、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时，所组织的北洋军队。

不得已时抵抗强暴，此则第三之理由也。呜乎湖南！鬻熊开国[1]，稍启其封。曾、左[2]吾之先民，黄、蔡[3]邦之模范。一蹶不振，至于桂、粤窥其南，滇、黔窥其西，北洋派窥其北，岳阳沦为北派驻防者六年，长沙则屡践汤、傅、张[4]之马蹄。谁实为之，可不哀乎！然湖南人虽死，而未尽死。至于压之既甚之时，起为一瞑不视之举。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消极的破坏冲决之力，仍存在于其本性之中。此后应注意者，则积极的建设之进行，世界大势之观察，民治之敷施，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缓也。三千万人，则等于明治改革时日本之人口也。地理则较之瑞士而强也。多而无当，大而无当，无日本人瑞士人之知识能力与训练，空鼓其勇气，消极的少意识的破坏则能之，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终未能见于大江流域之湖南也。阁下湖南人，来书所云，对于湘事，同此感怀。同人皆平民，湘事改造，具见所刊宣言及改造条件之中。第一义则自决主义，第二义则民治主义。谭组庵、赵炎午[5]诸驱张将上〈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此后希望其注意者，

---

[1] 鬻熊开国，湖南省在春秋、战国时为楚国地域，鬻熊为楚之先祖。

[2] 曾、左，指曾国藩、左宗棠。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末湘军军阀、洋务派代表人物。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统大军入疆，收复失地，阻遏英、俄侵略有功。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力主出兵抗法。

[3] 黄、蔡，指黄兴、蔡锷。

[4] 汤、傅、张，指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

[5] 谭组庵，即谭延闿。赵炎午，即赵恒惕（1880—1971），字彝五，也作炎午，湖南衡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历任广西常备军协统、广西督练公所会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遭袁世凯逮捕，经谭延闿调解获释，返湘后任师长。时任湘军总司令。

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之希望也。来函已付沪报发表。大乱初勘〈戡〉，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先生更有赐教，无任欢迎之至。

湖南改造促成会
六月二十三日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

给胡适的信[1]

（1920年7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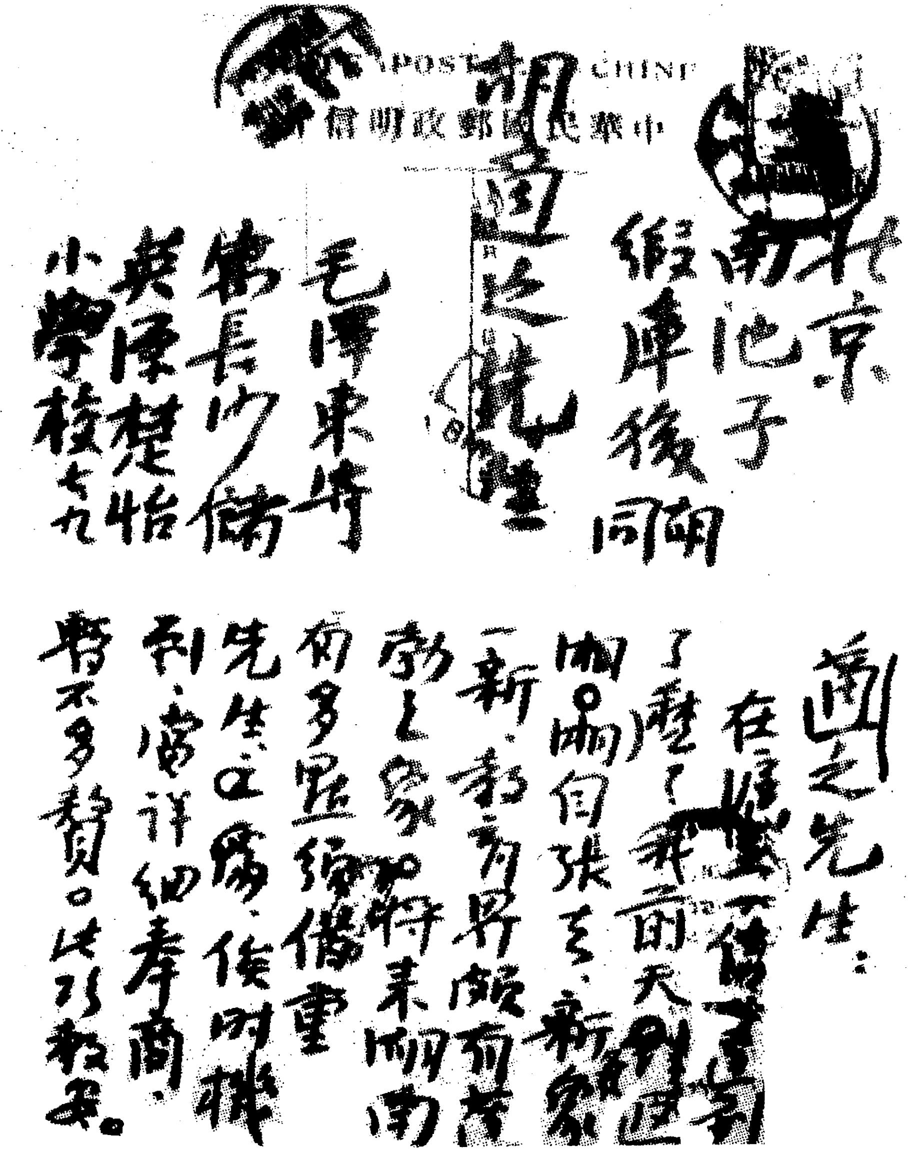
适之[2]先生：

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

[1] 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明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　胡适之先生　毛泽东寄　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

[2] 适之，即胡适。



中華民國郵政明信片

北京
南池子
緞庫後胡同
胡適之先生

毛澤東寄
寓長沙儲
英源楚怡
小學校七九

適之先生：
在上海一信達到
了麼？我前天回
湘。湘自張去，新
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
勃之象。將來湖南
有多點須借重
先生之處，俟時機
到，當詳細奉商，
暫不多贅。此頌教安。

毛泽东写给胡适的明信片。

湘潭教育促进会简章[1]

（1920年7月27日）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湘潭教育促进会。

第二条　本会以促进湘潭教育为宗旨。

第三条　本会会址设议会后街第四[2]号。

第四条　本会会务如左[3]：

一、对于教育行政之建议。

二、对于县教育会组织之根本研究。

三、对于全邑教育经费整理扩充及支配之研究。

四、对于普及教育具体计划之研究。

五、对于本县教育临时发生事项之研究。

---

[1] 本文未署作者姓名。1920年7月26日湖南《大公报》刊登的《发起湘潭教育促进会》记载：7月25日，毛泽东与在省湘潭教育界人士开会，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会议推出筹备员龙彝、吴毓珍、马文义、毛泽东4人，担任章程起草人。同年7月28日该报在刊登此简章时，在前面加有如下一段话：7月27日湘潭教育促进会开成立会时，“由起草员宣读章程”后，即“票举干事，总务吴毓珍，文牍毛泽东、龙彝，庶务朱矫，交际马文义、宋焕达、戴星炳、黄泽霈，各干事就职”。此简章后收入1921年5月1日编印的《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第一期，文字略有改动。

[2] 此字原缺，1921年5月1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第一期收编的该文此处为“四”。

[3] 因原文为竖排，此处“左”应为“下”。

六、对于教育学理之研究及新文化之传播。

七、凡本会研究所得之结果，得编发会报或单行本。

第五条　凡赞成本会宗旨，能服务教育事业者，由会员二人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

第六条　凡会员违背本会宗旨或损害本会名誉者，由会员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会员三分之二通过，取消其会员资格。

第七条　本会议事细则另订。

第八条　本会设干事八人。其职务如左：

一、总务干事一人，执行一切会务。

二、文牍干事二人，掌纪录及文书事项。

三、庶务干事二〈一〉人，掌收支会计事项。

四、交际干事四人，掌对外交际事项。

五、编辑会报及他项印刷物时，由干事临时推定会员若干人为编辑员。

第九条　本会会员每人纳入会金光洋一元。如会中刊发文报或须他项特别费用时，干事会临时召集会员开会募集。

第十条　本简章有未尽事宜，经会员三分二之同意，得修正增减之。

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1]

（1920年7月31日）

湘潭教育促进会同人，欲以协同之主张，对于吾邑教育有所促进。特公同议决，发表如次之宣言。

---

[1] 湘潭教育促进会，在毛泽东等发起下，于1920年7月27日正式成立，以促进湘潭教育，宣传新思潮，倡导革新教育为宗旨。毛泽东被选举为该会文牍干事。据《湘潭教育促进会会务报告》记载，1920年7月30日，该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决议“宣言书推毛泽东主稿”，“次日，毛泽东草出宣言书”。同年8月3日、4日在湖南《大公报》公开发表。1921年5月1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第一期，将此宣言收录。本文标点为编者所加。另外，“会报”的《发刊词》，从文风上看，颇似出自毛泽东手笔，又因毛泽东是“会报”的两个编辑主任之一（另一人为吴毓珍），故亦收于此。全文如下：“湘潭教育腐败！”凡是湘潭人，或是曾经到过湘潭稍为了解湘潭情形的人，乃至身在湘潭教育界自己摸粉条擦黑板的人，几乎都有这样一句评语。但腐败原不要紧，寻出他所以腐败的原由，想方法把他去掉，腐败的东西，就不腐败了。“腐败”既附着于“湘潭教育”，他俩已发生了亲密的关系，那么，“怎样使他俩离开”，就成了湘潭人士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湘潭教育促进会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组织，会报也当然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发刊。会报不是和各方面捣乱的，但也不是和各方面调和的。真理只有一个，不容谁捣乱，也不容谁调和。教育的真理就是“新教育”。新教育的条件很多，概括一句，就是“适合人性的教育”。会报本这种宗旨，借文字之便，和各方面商榷，以期共同解决这个湘潭教育问题。换一句话，就是共同促进湘潭教育。

吾邑兴办学校，将及廿年。光宣之际[1]，成绩颇佳。民国初元，进步尤速。虽内容未臻美备，要亦〈义〉粗具规模。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独吾邑教育，既不能应时势之需要，力谋刷新，复不能本固有之精神，维持原状。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学款年有增加，黄金尽掷诸虚牝。推原根本，皆由主持教育者，不察世界潮流，不如〈知〉自身缺陷，无责任之观念，与振奋之精神，有以致之也。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2]，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风传，进行甚速。美博士杜威东来[3]，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而吾县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主持督促之人，既固陋而寡通，尤昏愦〈聩〉而无识。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效。瞻念前途，隐忧无极！至吾邑教育实在腐败情形，久已道路喧传，怪状百来，事实具在，无可讳言。主持教育者，无一定方针，无具体计画〈划〉，复无任事之毅力与改善之决心，遂使教育界缺乏振作奋发之精神，而人民渐起不

---

[1] 光宣之际，指清朝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年间。

[2] 新文化运动，指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其开始的标志，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为主要代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和迷信。其左翼逐渐转向以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

[3] 1919—1921年间，杜威在中国讲学。1920年10月曾来长沙，同来讲演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毛泽东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此次讲演的记录员。

信任学校之心理。若不急起直追，共谋补救，愈趋命下，势非陷全邑教育于破产状况不止。敝会同人，木〈本〉敬恭桑梓之心，为促进教育之计，愿与全县教育界人士交相勉励，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对于全县教育，如何规画〈划〉，如何进行，如何涤除旧污，如何输入新识，如何使经费支配得当，如何使用人可免失宜，如何使不成问题之新旧界限疏通打破，如何使从前种种意气之争消除变化，一循真理，协谋进行。凡此均极重要问题，非大众一心，勇猛精进，不能解决。同人力量虽微，一诚自矢。凡所主张，尽为全局公益设想，绝非个人好恶，亦无偏激感情。各方意见，总期虚心采纳，相见以诚。但求旨趣相谐，均当引为同志。今当发起之始，特此宣言。

发起文化书社[1]

（1920年7月31日）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希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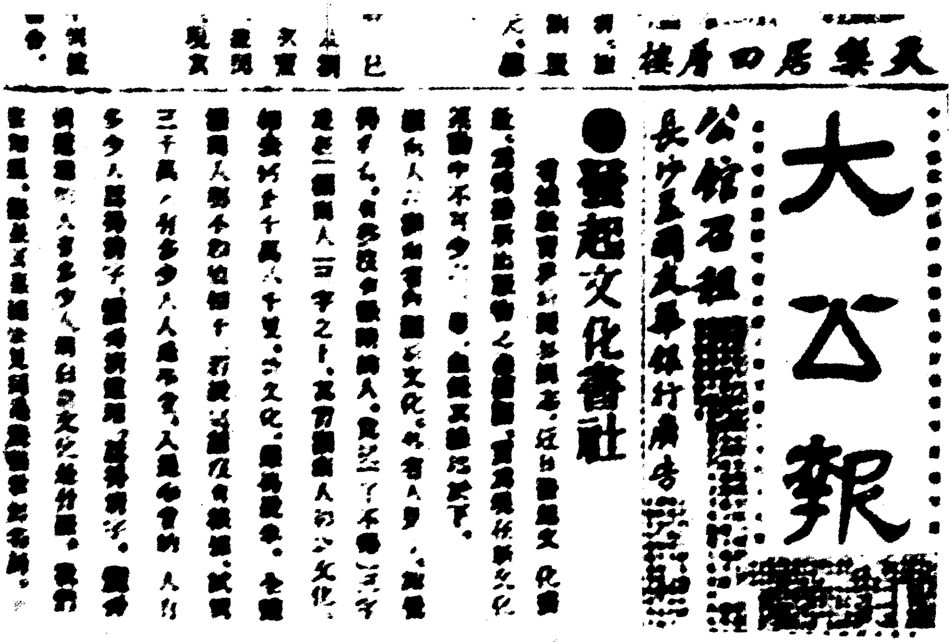
[1] 本文在湖南《大公报》第二版“来件”栏首刊时，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事。亟录其缘起如下。”同年8月24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在第七版“新文化运动”栏全文刊载，文字略有不同。当年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1978年6月10日回忆：“《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都是毛主席写的，有些材料是我提供给毛主席的。”

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1]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

---

[1] 文化书社是毛泽东、易礼容、彭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也是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前后对内对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会议场所。1920年7月发起，8月2日成立，9月9日在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校房屋）正式开业。至1921年3月底，平江、浏西（浏阳西区）、武冈、宝庆（邵阳）、宁乡、溆浦7县，设有分社。1921年5月发表的《文化书社销书目录》，除印有书社出售书的详目和定价外，还载有《分社简章》《分社注意》《营业细则》等。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



大公報

●[illegible]起文化書社

毛泽东所撰《发起文化书社》一文，发表于1920年7月31日长沙《大公报》。

附录

营业细则

（一）本社营业内容，分为下列三项：

1. 书；2. 杂志；3. 日报。

（二）略

（三）本社书报杂志售价，至多与出版原店一样，或且较原店酌减，以收到相当之邮费及手续费为止。

（四）本社交易，以光洋计算。

（五）购买须交现款。有确实信用及担保的人可记账，但至多以一月为限。

（六）记账之户，每月末日结算一次，出月一号将账单送上，三号派人收款。无论何人，每月须扫数归清。

（七）外县各学校各团体，有人愿任本社书报之分销者，可来社（或通函）取阅分销简章，订约分销。本社为提倡用国语教科书起见，凡外县要办小学校国语教科书者，可托本社代办，本社当即如嘱购办札包寄上不误，完全义务，不要酬资。

分社简章

依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五条：“本社设总社于省城，设分社于各县”，本社为推广新出版物于全省各县起见，欢迎各县同志在各县城及各市镇（凡能通邮之处）开设分社，分销本社各种新出版物。即用某地文化书社之名开设（如平江文化书社、浏西文化书社）。其办

法列下：

（一）折扣　照各出版原店给与本社之折扣全部让与分社。

（二）邮费　归分社任。

（三）消耗费　归分社任（每价一元加消耗费四分）。

（四）交价　先交价，后取书。有特别情形的，能邀请为本社所信用之人向本社为切实之担保，得先交半价取书，其余每月一结。

（五）领书　分社察看该地需要情形，在本社书目内选择所需要之书报杂志，开单交来本社，本社即日照单发寄分社。

（六）领报　分社能分销《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及《湖南通俗报》每种十份以上的，经本社向报馆交涉，可由报馆直寄分社。

（七）退书　分社领去之书及杂志，不能尽数售出者，在一个半月内，可退还本社。但污损者不能退，杂志及日报不能退。退还邮费，归分社任。

分社注意

（一）本社为同志共同组织，投资不退，亦不分红取息，但书社永远为投资人所公有。各分社务希照此办法组织，庶可确立基础。集本少则五十元，多则百元，就可开一分社。

（二）分社难独立门面者，最好附设于学校内或其他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劝学所等）内。三数同志组织之分社，亦可附设其家。开始规模宜小，办法宜踏实，期于逐渐发展。最忌虚张声势，开支过大，账目不清，酿成不能维持之局。

（三）分社销售，宜取宣传主义及劝导手段。

（四）各分社每半年推销书报情形，报告本社一次。本社汇集刊入《社务报告》，分送各分社，以资比较而促进步。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1]

（1920年8月25日）

（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埠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定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湘，以资快览。关于各有价值之日报，本社视阅者较多，即与订约，代办分馆。关于各有价值之杂志，本社与各杂志社订约，代办分发行所。

（二）本社资本全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三）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为经营业务起见，经理得雇请必要之助理人。经理及助理人应支取相当之生活费及办事费，其数由议事会决定。

（四）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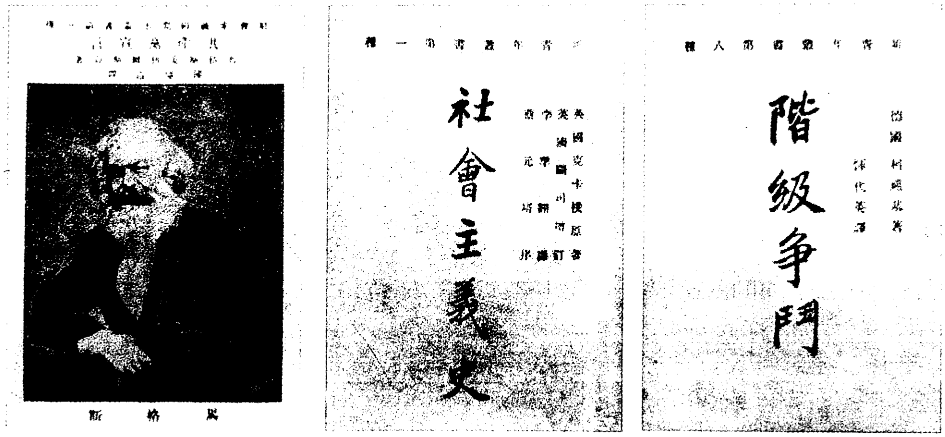
[1] 此大纲据易礼容回忆系毛泽东所撰。

（五）本社设总社于省城，设分社于各县，分社俟经费充足时举办。

（六）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此项阀〈阅〉览所，俟经费充足，更须分设。

（七）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

（八）本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另行规定。


馬格斯
新青年叢書第一種
社會主義史
新青年叢書第八種
階級爭鬥

1920年8月出版的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10月出版的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考茨基著《阶级争斗》。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

（1920年9月3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2]，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3]，三个国

---

[1] 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2] 1920年9月1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

[3] 三个政府，指1912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1916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1917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会[1]，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2]。波兰独立[3]，截克独立[4]，匈牙利独立[5]，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6]。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

[1] 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1916年8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1917年8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1918年8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

[2] 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1918年11月爆发了推翻威廉二世及其政府的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3] 波兰独立，指1918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

[4] 截克，今译捷克。此处指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

[5] 匈牙利独立，指1918年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6] 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1]，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

[1] 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 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

（1920年9月5日）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巳〈已〉倒矣……”实是慨乎言之。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1]），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

---

[1] 布尔失委克斯姆，今译布尔什维主义。

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1]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

[1] 这几句话，参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原载1903年5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八册，现收入《杨昌济文集》。

在《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上的讲话[1]

（1920年9月5日）

《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

---

[1] 这是毛泽东应湖南通俗报馆长何叔衡邀请，在《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上的一段讲话。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

（1920年9月6日）

兼公提出湖南们罗主义[1]，谓“若付诸公民总投票一定可得最大多数赞成”。然则“最大多数”之于“总”，相差仍有一个小部分。我看这一个小部分——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他们都觉得“应该用心干自己的事”，都觉得从前（四十年前）的湖南人好干涉别人的事，如蹂躏江南，蹂躏闽浙，蹂躏湖北，蹂躏陕甘新疆[2]，是违犯了“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一个条件。因此

---

[1] 指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1920年9月5日所发时评《湖南“门罗主义”》一文的主张。

[2] 清末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湘潭、岳州、汉口、武昌、汉阳、九江、芜湖、湖口、天京（即南京）等江南一带镇压太平军；1861年至1866年曾国藩和另一湘籍清朝官员左宗棠，在闽浙一带任巡抚、总督等职，并镇压太平军余部。1865年，陕甘总督杨岳斌（湖南善化即长沙人），回湘招募勇丁，取道湖北，赴甘镇压回民起义。后左宗棠继任陕甘总督，率部镇压回民起义。1875年，左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楚军出征新疆。

一个翻转，湖南『别』人到处被人瞧不起，九年三被征服[1]，致受“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的无穷大祸。（参观张謇通电[2]，说湘人蹂躏江浙各地，致受此次自然报应。所言虽非必然的关系，然侮人者见侮于人，谁都不能逃此公例。）要想转祸为福，便欲先厉行第二个条件“自己不干涉别人”，才能达第三个条件“别人不干涉自己”。

虽然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是最大多数，开会投票，他们的票上都写“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然尚有一个□[3]部分人，他们非农非工非商非学，又非不管闲事的老少，他们票上却都写“反对湖南们罗主义”，诸君必谓，少数不能变更多数，前者得胜，后者无效。然我尽有疑间〈问〉，要问这票匭的监督者是两党中之最大多数党，还是最少数党？如是前者，当然没有问题，如是后者，则开票结果必定是“原案打消”，而反面的“湖南侵略主义”投票乃大得通过。这是从经验得来百不失一的断定。所以我说，“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

“援粤”之声，不出于农人，不出于工人，不出于商人，不出于学生，不出于不管事的老少，就是不出于最大多数人民。而独出于非农非工非商非学非不管事的老少之无职业最少数的人。不是说笑

---

[1] 湖南自民国二年（1913年）以来，先后三次为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和张敬尧所盘踞，前后计约9年。

[2]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近代立宪派、民族资本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京政府农村、工商总长等职。本文所说张謇通电，似指他1920年7月21日致徐世昌、段祺瑞电。该电文中有“洪杨乱后，湘军特起。……东南各行省之子女、玉帛之输于湘人者，先后殆四十年，盛已。……闻湘人此次所受之痛苦，过其以往所享之逸乐。前车不远，夫湘则既如此矣！盈速者亏亦速，盈甚者亏亦甚”等语。

[3] 此处原件空缺，从上下文看，疑为“小”字。

话，假如真要援粤，我主张要总投票。为防上文所说之弊端起见，我主张要将票匭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我是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故我的主张如此。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

（1920年9月6日、7日）

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史〈使〉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那里？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史〈使〉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1]割据，陋懦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

---

[1] 马殷（852—930），字霜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唐时曾任潭州（治所在今长沙）刺史和武安军节度使。五代梁时被封为楚王。据有今湖南全省及广西东部地。五代唐时建立楚国。

然发展的结果。

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戍〈戌〉之秋[1]，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乃未久而熊逐谭杀[2]，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于湖南，新锐顿挫，事业旋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黄克强出遁，马福益骈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3]。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满清，早脱臣妾之羁勒。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民国成立，分权论不胜集权论。袁盗[4]当国，汤屠[5]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驱汤，而北方段祺瑞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傅良佐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阳，骤遇大敌，张敬尧连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决的力，奋起驱张，恢复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屡践北人马蹄，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蹂躏之实，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吗？

反之湖南不受中国之累，得遂其自然发展，岂犹是今日的湖南吗？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

---

[1] 丁酉戊戌之秋，指1897至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期间。

[2]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熊希龄被逐革职，谭嗣同遭杀害。

[3] 指1904年（即甲辰年）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起义失败一事。

[4] 袁盗，指袁世凯。

[5] 汤屠，指汤芗铭。

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有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

湖南人啊！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俄罗斯研究会简章*

（1920年9月23日）

第一条　俄罗斯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凡经会员三人介绍者得入会研究。

第二条　本会会务如下：

（一）从事关于俄国一切事情之研究，以研究所得，发行俄罗斯丛刊；

（二）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

（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

第三条　本会经费由会员自由捐助。

第四条　本会设干事三人，其职务如下：

（一）总务干事一人，总持会务，对外接洽代表本会。

（二）书记干事一人，任记录及文书事务。

（三）会计干事一人，经理会费出纳。

第五条　本会设通讯处于长沙省城潮宗街第五十六号。

“湖南自治运动”[1]应该发起了

（1920年9月26日）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己〈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

[1] 湖南自治运动，指在皖系军阀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出现的一种主张湖南自主、自立，废督裁兵，公民制宪，实行民治的运动。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甚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释疑

（1920年9月27日）

现在有一些人心里怀了一种不应该疑的“疑”，说：“湖南自治问题太大，中间条理太繁，像我这样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实在怕开得口。但我心中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过我没有学政治和法律，我总有一点怕开得口！”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1]。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

---

[1] 子产（？—前522），名侨，字子产，春秋郑国人。自郑简公时始执国政。时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议论政事的得失。

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湖南自治是什么事，而可诿〈委〉于不懂政治法律使不出来做声吗？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那一部法典，或那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什么精微奥妙呢？我在一家报上看了一位曹先生的谈话，大意说，“煎〈熊〉希龄虽有政治经验，却无法律知识，所以他拟的自治案[1]是要不得的”。熊拟自治案到底要得要不得，是另一问题，我所不以为然的，是定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才能拟出自治案。“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这自治法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制能够议的，并且要这么大多数人制出来议出来的才好。若专委托少数无职业的游离政客去制去议，一定不好。你是一个湖南人吗？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袪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

[1] 1920年8月下旬，熊希龄代谭延闿拟订《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及自治法大纲说明书》和《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参见1920年8月29日至9月2日湖南《大公报》）。

再说“促进的运动”

（1920年9月28日）

我前天说促进的运动之所以重要，而未尽其义，湖南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这人人明白，不待多说。但若说有了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自治，自治便可以实现，这话也大不对。我们且看，无论什么事，是少数人办得了的吗？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况乎一件事情正在萌茅〈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是可以办得成、办得好的吗？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

（1920年9月30日）

“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那么，奉天的张作霖[1]，直隶的二曹[2]，河南的赵倜[3]，陕西的陈树藩[4]，安徽的倪嗣冲[5]，广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豫人治豫，陕人治陕，皖人治皖……比那“非湘人治湘”的汤

---

[1] 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和东三省巡阅使。

[2] 二曹，指曹锟、曹锐。曹锐，字健亭，天津人，曹锟之弟。曾任天津县清乡局局长、安县知县、直隶藩台等职。1917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借讨伐张勋之机，向段祺瑞推荐他为直隶省省长，兄弟俩分掌一省军政大权。

[3] 赵倜（1871—1933），原名金生，字周人，河南汝南人。清末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任河南护军使。因镇压白朗起义，1914年被袁世凯封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先后投靠皖系和直系军阀。时任河南督军。

[4]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曾任陕南、陕北镇守使，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和陕西都督等职。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

[5] 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曾任安徽都督、安徽巡阅使、安徽省省长、安徽督军等职。时因皖系战败被解职。

芗铭，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1]，“非闽人治闽”的李厚基[2]，“非粤人治粤”的莫荣新[3]……到底有什么区别？而况段祺瑞[4]之派傅良佐，正为根据湘人治湘的理由。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5]，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而况是己〈已〉往的一个傅良佐，或是未来的无数傅良佐，我们还不应该反对吗？故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语。不仅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治。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颇有人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混为一谈，我看这样小小一个区别，总要分清才好。

---

[1] 王占元（1861—1934），字子春，山东馆陶（今属河北）人。历任北洋军步队第七营管带、第一标统带、第二镇第三协统领、第二镇统制。民国成立后，任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1915年拥护袁世凯称帝。后任湖北督军兼民政长。1920年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

[2] 李厚基（1870—1942），字培芝，江苏铜山人。袁世凯死后，任福建督军兼省长。1918年段祺瑞发动对南方的战争时，李任闽浙援粤军总司令。

[3] 莫荣新（1853—1930），字日初，广西桂平人。时任广东督军、护法军政府代理总裁兼陆军部部长。

[4]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任北洋军炮兵统带、第四第六镇统制、第二军军统、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北京政府国务卿。袁世凯死后，任国务总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被曹锟、吴佩孚击败下台。

[5] 禹汤文武，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全自治”与“半自治”

（1920年10月3日）

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刘君春仁主张联邦[1]，我说中国现在并没有邦，从何云联？暂时只有努力造邦，不要说联。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我对于二十年内办中国的总组织，总是怀疑，所以我不特反对吴子玉的国民大会[2]，并且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3]，同时更大大反对南北

---

[1] 刘春仁，身份不详。其主张见1920年9月29日至30日湖南《大公报》所载刘春仁撰《对于“打破大中国建设多数小中国”的怀疑并表示我的“联邦制意见”》一文。

[2] 吴子玉，即吴佩孚。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1920年6月13日，他在郑州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以后一直坚持这一主张，并制定了一套国民大会提纲。

[3] 梁启超在1920年7月著有《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一名《国民制宪运动》）一文。他写的另一篇《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刊登于1920年8月18日湖南《大公报》。

议和。我以为赴〈起〉码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进则各省自治。各省中以湖南和广东地位最好，可以取革命精神，推翻一切，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和广东人所欲的广东（理想的广东新的广东），而树立一种模范自治。若处在这样好的地位，尚为半自治所误，那就不痛不痒，真正冤枉了！真正可惜了！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姓〈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心，『结』都是，却太缺乏理想。湖南人无理想，所以他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随人转移，而不能超脱环境，自达其所欲适。我于“湖南国”一个问题，尚有极长的理论，□事□搁未写出，稍迟当写出奉正邦人。先述大意于此，以答刘君及朋友中之怀疑者。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1]

（1920年10月5日、6日）

建议者：龙兼公、杨绩荪、张慎庵、王亦僧、成森、程一中、匡日休、朱剑凡、陶毅、马续常、罗教铎、魏俊明、刘驭皆、毛泽东、吴大猷、郭开第、何叔衡、王宗训、彭璜、唐耀章、李锡纯等三百七十七人（名多不及具载）。

我们认定：湖南人民的“自治运动”，在此际一定要开始进行了。此际是一个顶好的机会，是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这个机会一逸过，以后再要寻出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很难了。

“湖南应否自治”的问题，在此际已〈已〉经不成问题了。“湖南应该自治”。假如是一个湖南人，而不至于全无心肝，大概会人人肯定。故在此际“湖南应否自治”，不成问题，问题全在“怎样将湖南自治实现”。

---

[1] 1920年10月9日湖南《大公报》所载《昨日建议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之大会议》的报道中，龙兼公称：此案（指此建议）“最初提出者，为毛君泽东、彭君璜及余三人”。报道还说，此建议由湖南各界公民签名送省政府（当时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签名者约400人。

关于湖南自治根本法的起草，这一个月来，有人主张由省政府起草，有人主张由省议会起草，有人主张由省政府省议会合同起草，有人主张由省政府省议会以及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工会省商会湖南律师公会湖南学生联合会湖南报界联合会等合同起草，有人主张由个人动议，提出草案，邀赞成的人连署，成为一种若干人同意的草案。

上面这几种主张，我们都不能赞成。理由如下：

（一）湖南自治根本法，就是湖南宪法。在此际提出湖南宪法，是不承认中华民国约法[1]及根据约法所产生的各种法律和命令的了。省政府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工会省商会湖南律师公会等，都是根据从前的约法或其他的法律或命令组成的机关，只“能有”反对湖南宪法的权力，而“不能有”提议或起草湖南宪法的权力，并且只“应该”用其权力反对湖南宪法，而“不应该”用其权力提议或起草湖南宪法。以此理由，故前四种主张，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二）由个人动议提案，本是很好的了，可以避去前四种的难点，并且其根据最为结实有力。然我们仍不能赞成者，第一，此际的时机，是不能容我们从容坐论的时机。一个人动议提案，充其量，三千万人可以提出三千万个案来，俟河之清，什么日子才有湖南宪法出现？什么日子才可以建设新的湖南？第二，现在人民程度这么样低，以前并没有坚强的人民团体或政党，即令由人民动议提案，假如人民的意思与现时政府的意思相左，人民有什么力量可与相抗？

---

[1] 中华民国约法亦称“新约法”，俗称“袁记约法”，1914年5月1日由袁世凯政府颁布。“新约法”规定采用总统制，以法律形式把袁世凯的总统权力扩大到与封建皇帝一样，以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作准备。

（三）前五种主张，单言起草，起草以前的上文和起草以后的下文，全未虑及，实在是可笑的事。我们认定第一步发动，第二步起草，并议决，并公布，第三步施行。这三步在形式上是有统系有连贯的关系的，在实质则三事各别，全然不可混淆。前五种主张，除个人动议起草一种有相当的理由外，余四种都是不明手续关系。未寻得发动的根据，便要遽然起草，这道理从何处说起？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么紧迫的时机，有两点不可不加注意，(1）要在理论上讲得通，(2）要在事实上做得到。我们认定前四种主张在理论上讲不通，后一种主张在事实上做不到，所以我们都不赞成。

然则我们的主张怎么样呢？

我们的主张是：

“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我们觉得这种主张，是于理论上讲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的。今申述于左：

第一，湖南革命政府

现在湖南以谭延闿氏为首领所组织的政府，实在是一个革命政府。说明如下，（一）谭氏出兵推翻北政府的命官张敬尧，是对张敬尧以及北政府取革命的行动，这是显而易见的。（二）谭氏通电[1]，宣言此次驱张，是湘人自决，与西南大局无关。而西南政府[2]首席

---

[1] 谭氏通电，指1920年7月22日谭延闿宣布湖南“实行地方自治”和实行“民选省长”的快邮代电。（参见1920年8月16日湖南《大公报》）

[2] 西南政府，指护法军政府，原是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由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军政领导机关。1918年西南军阀拉拢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分子，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非法改组军政府，将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排斥孙中山。此处指西南军阀控制的军政府。

总裁岑春煊[1]氏电告北政府，说西南并无命令谭延闿攻张敬尧之事。此次驱张，纯系湘人自决。『是』谭氏在驱张以前，和西南政府有主属的关系是事实，惟从发动驱张日起，此种关系即告断绝，全属自由意志行动，即全属革命的行动。（三）九月十三日谭氏在总司令部召集湖南自治会议[2]，尤其是革命行动之表著者。谭氏以革命军不顾西南政府推翻北方命官，因而在长沙建设革命政府，因而在革命政府里面召集为约法所不许的自治会议，这本来是可以的，是应该的。但若不说是革命政府，就有违法及叛逆之嫌。何则？非革命政府而召集为约法所不许的自治会议（约法上没有规定各省长官可以随意变更地方组织），岂不是违法而且叛逆的行动吗？

准上理由，则湖南现在的政府并不是从前的所谓省政府，而确是一个革命政府，已〈已〉无疑义。从而在湖南地方的个人或团体对于这样的革命政府如不发生异议（就是不说他不应该革命——驱张），或对于这革命政府所发生的行动，如召集湖南自治会议一事反都加以赞成（即自总司令部自治会议后，无人提出反议。各报反对，都是反对由旧省政府或旧省议会包办“起草”），则个人或团体在中华民国约法及根据约法产生的法律上面的地位，一齐消灭了。

以上从理论上说。再从实际上说，这次驱张运动，湖南人民直是全体加入。不仅为被动的“不发生异议”和“加以赞助”而已，直是主动的个个做革命军的一分子，个个人心中欲提出一个自治案，对于以前的法律，早已全体宣告脱离了。

第二，湖南人民宪法会议

---

[1] 岑春煊，时任护法军政府总裁。

[2] 湖南自治会议，指谭延闿于1920年9月13日邀集省内外部分官绅在湘军总司令部召开的自治会议。

这是名称问题。有主张“湖南国民大会”及“湖南国民宪法会议”者，我们觉得在湖南尚未决定宣告建国以前，“国民”二字有与“中国国民”相混或无根据的嫌。有主张“湖南自治法会议”者，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我们觉得湖南现在，用“宪法”的名称，较为妥当，而产生宪法的机关，定名为“湖南人民宪法会议”。

第三，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

大凡一种革命起于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内，除古代的专制政体，由新起的帝王专断，不许人民参与以外，大概是由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的。最近的例，如一九一〇年中华民国军政府所召集的约法会议（参议院[1]），一九一七年俄国克伦斯基政府所召集的全俄宪法会议[2]，一九一八年俄国列宁政府所召集的全俄劳农会议[3]，一九一九年德国爱倍尔政府所召集的德国宪法会议[4]都是。所以然

---

[1] “一九一〇年”有误。此应指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的临时政府立法机构临时参议院。该院于是年3月8日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3月11日公布。

[2] 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政府没有召集过全俄宪法会议。这里可能是指这年6月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其议程之一是筹备立宪会议问题。立宪会议的选举于11月29日举行，而立宪会议是在1918年1月18日召开的。

[3] 指1918年7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准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

[4] 指1919年2月6日在德国魏玛市召开的国民制宪会议。

者，旧政府已倒，旧制度根本推翻，革命政府成为国中唯一势力，舍革命政府更无有能召集宪法会议者。要说由人民动议，则革命政府之首领，即是一个人民。由革命政府的首领，合之其政府内的僚属，及其他所有的党徒，业已成为一大势力，由之发动召集宪法会议，实为事势之所必经，而亦并无不合理论之处。我们觉得现在湖南，处此稍纵即逝的时会，应即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快刀斩麻，既不至别生枝节，而又为事实上所能做到，庶宪法会议可以早日观成，湖南自治可以早日实现。

此处有要注意者，则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代表”的“方法”是也。此召集方法，名义上由湖南革命政府拟定，实质上，至少要参入在省城里的住民，□习惯上（不是法律上）固有之省议会省教育会省商会省农会省工会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律师公会等各团体的意见。并至少要依照下列两个条件，（一）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二）每五万人中选出代表一人。

第四，由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

此中包括三，（一）起草，（二）议决，（三）公布。这一响来所闹的起草问题，应该放在此处，才算适当。我们只承认革命政府有召集宪法会议之权，决不承认其有起草宪法之权。宪法起草当然是宪法会议的事。其程序为：湖南革命政府既己〈已〉召集全省人民代表来到省城了，即由代表自行集会，先推出相当人数，起草湖南宪法草案，次将宪法草案议决成为正式宪法，次用湖南宪法会议全体代表名义，将此正式宪法公布。

于此有一问题，即议决后要不要经过全省人民的总投票批准然后再行公布是也。关〔于〕这一点，有两面理由。主张“要”的理由：（一）果能办到三千万人人人对于湖南宪法投一张表示他自己赞

否的意见的票，这宪法便和三千万人生了关系了，有很大的教育意味。（二）经过宪法会议议决，又经过全体人民总投票批准的湖南宪法，总算栽了一个很深的根，以后虽有什么中央或外省或者是本省的野心家施其意外破坏手叚〈段〉，也不容易动摇。这两层理由，都极正大，我们本来根本赞成。我们所以主“不要”者，全是事实问题。我们觉得湖南宪法，至迟要于六个月内完全制定公布，加要取到总投票批准，则非八个月乃至十个月不行，恐怕会要遗〈贻〉误事机呢。如果大家觉得迟点公布不甚要紧，决不至遗〈贻〉误事机，致使此自治宪法有根本动摇不能成立之虞，则我们一定赞成要经全体人民总投票批准，那是无疑的了。

第五，建设新湖南

湖南自治宪法，既经公布了，于是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及七十五县的县议会县政府，及县下最小区域的市镇乡自治机关，至是新的湖南，乃建设告成。

我们的提议，已经完毕了。我们所以要提出这个议，实因为这个事情关系太大了。驱张而后，人事蹉跎，落叶惊寒，岁月将晏。天天说自治，天天没办法。政府彷徨，不知所措。群众悠忽，阒然无声。驱张而不能建设自治，驱张只算是白驱了！我们既然有点意见，总应该提出来，给大家研究。但这不过是一个“召集宪法会议”的建议，至于以后实行召集，召集了实行制宪，制宪完了实行建设，问题均极重大，非有多数热心的人，竭力去做实际的运动，决不能完美实现的。我们觉得现在的湖南人，大家应该继“驱张运动”之后，发起一个极广大极普遍的“湖南自治运动”。湖南人素来有点勇气，驱张驱傅驱汤，就是最近的证据。湖南人应该移其消极的破坏的精神，来集注于积极的建设上面。我们又觉得湖南这一回

主张自治，应该要主张“全自治”，而不要主张“半自治”。绝不要顾及什么中央，和什么各省。湖南人只知道地球之上有湖南，湖南之内要自治，绝不要瞻前顾后，自馁其气，弃“全自治”而主张那不痛不痒的“半自治”。有敢妨害湖南人的自治者，湖南人为自由而战，所不惜也。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

（1920年10月7日）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将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筑，多危险！大家知道吗？

但是三千万人实在太疏远了。道路也远，觉悟的也少，赶不及这个堤工。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长沙市民现在不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长沙的市民！三千万同胞虽没有明白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却隐隐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了。你们成功，三千万人蒙福。你们失败，三千万人受祸。你们的责任真不轻！你们应该知道。

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

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湖南人民宪法会议选举法之要点

（1920年10月8日）

（一）用直接选举法。

（二）用普通选举制，选举人及被选举人，均无财产纳税额，及男女职业限制。

（三）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未成年者，（以十八岁为成年。）二、有精神病者，三、吃食或贩卖鸦片者。

（四）现任官吏及现任军人，当选为本会议代表时，当解除原职。

（五）用记名投票法。

（六）选举人应亲自莅场投票。

（七）选举日期，由革命政府决定各县同日举行。

（八）选举期限，至多不得过两个月。

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之要点

（1920年10月8日）

（一）湖南人民宪法会议，以湖南各县人民取选举之代表组织之。

（二）各县选出代表之名额，依县之大小分配，大县八名，中县六名，小县四名。

（三）省会应特别举出代表，其名额与大县同。

（四）代表自行集会。

（五）代表制宪期，以三个月为限。

（六）代表往来旅费，由公家分别远近给发。

（七）代表不给薪俸，每次出席，给予出席费一元。

昨日建议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之大会议[1]

（1920年10月9日）

昨日午前九时，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案之各界建议人，假省教育会会场开全体大会，讨论进行方法及表决选举法与组织法要点[2]。到者甚多，首由龙兼公君报告开会宗旨。略谓今日列席人大多数为前次已签名者，补签者甚少，宗旨

---

[1] 本文是1920年10月9日湖南《大公报》刊载的新闻稿《昨日建议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之大会议》的一部分。1920年10月5日和7日在长沙召开过两次讨论湖南自治进行办法的会议。10月5日的会议，由刘寿康发起，有长沙各界人士10余人出席。刘“主张完全由人民动议，人民制宪”。出席会议的龙兼公和毛泽东相继发言，表示“赞成刘君用意”，认为刘的意见“在理论上可称完满，惟在事实上恐做不到。现在湖南处此稍纵即逝的机会，应将自治宪法在最短期内成立。如刘君所主张，用意虽善，手续太繁，非一年以上不能竣事，且要一笔巨费，亦无人出，不如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既于理论上说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一面吾侪注意于开头的组织法拟定及结尾的宪法议决，即可达到完满的目的”。10月7日的会议，是在学生联合会处召开，到会有各界代表60余人。会议“首由彭璜报告”，“次由陈家鼐、谭信一、毛泽东、杨绩荪、龙兼公诸君相继发言”。会议着重商讨了“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会和请省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有关事宜。会议同时讨论了拟呈请省政府颁发施行的宪法会议组织法和选举法要点。

[2] 指“湖南人民宪法会议选举法之要点”和“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组织法之要点”。

可简单说明，因大多数己〈已〉了解口。此案最初提出者，为毛君泽东、彭君璜及余三人。今既以四百余人之同意提出此案，则以后对于社会及政府两方面应如何运动进行，亟须讨论。惟今日最要点即须认定由革命政府召集人民宪法会议，但不能不予革命政府以具体办法。因拟具选举法及组织法要点各数条，提付大众表决，以便进行。然后再举出请愿代表与革命政府接洽，或全体请愿，俟众决再定。但我们最大的宗旨，即在做一步一步的进行，做一步一步的收束。愿大家对于以上各项，各抒意见云云。次公推毛君泽东主席。略谓今日应议决事项，最要者为拟定进行办法及表决选举法与组织法要点。又谓湖南自治案，本首由湘政府发起，惟仅限于省政府与省议会合同制宪，实带有包办性质，于理论上很说不通，故省议会亦知难而退。然湖南自治问题，总算政府与人民一致表示赞同，故吾等因有此次议案之提出，盖于事实上既做得到，于理论上又说得通。惟进行最宜迅速，不能过迟。今先请到会诸君，对于进行方法，发表意思云云。

反对统一

（1920年10月10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国也不是全无热心国事的人。这些热心国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知识和能力。然而办不好者，中国之人，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胞才

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现在的和议，就是这样。一些人捧着一个“和议”，北跑到南，南跑到北，没希望的时候，便皱着眉，有一点希望，便笑起来了。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统一论，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1]，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2]，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

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3]的一个意外的收果。现在虽然只有湖南，广东，江苏，湖北几个省发动，事势必然成为一道洪流。全国各省，都将要纳到这个流里，是一个极可喜的现象。现在所要讨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各省自治内部的事，即如何促使各省自治成立；一是各省自治外部的事，即如何将妨碍各省自治的障碍物，减杀其效力或阻止其进行。

关于前一个问题，我有二个意见：（一）像湖南广东两省用兵力

---

[1] 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当时竭力主张联邦制，主张各省迅速制定正式宪法，不能满足于临时宪法。孙洪伊（1870—1936），字伯兰，天津人。早年为袁世凯幕僚，1911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立宪活动。1916年在段祺瑞内阁中先后任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后参与组织宪法商榷会和民友社。时竭力主张“由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政治”“以宪法会议讨论之地方制度，参合试行”。

[2] 南北不应复合，意为当时的中国不应再行“南北议和”“南北统一”。

[3] 南北战役，指1917—1919年间南方护法军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

驱去旧势力的，算是一种革命，应由各省革命政府，召集两省的“人民宪法会议”[1]，制定“湖南宪法”及“广东宪法”，再依照宪法，建设一个新湖南及新广东。这两省的人民最要努力。其宪法要采一种澈底革新的精神，务以尽量发挥两省的特性为标准。（二）像湖北江苏两省，不能有革命的行动，只好从鄂人治鄂苏人治苏（省长）一点入手，等到事权归了本省人，便进而为地方自治的组织。以上二种方法，各依各的情势去改造。于前一种可以树各省自治的模范，实有“国”的性质，可实行一种“全自治”，所以最有希望。于后一种，虽然暂时只能实现“半自治”，然根据这种自治，便可进而做废督运动。只要督军废了，则全自治便即刻到了手了。方法虽然和平一点，不十分痛快，然为适应环境，采这种方法，也是好的。

关于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以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倘使统一成了，新组国会，制定宪法，各省自治，必多少要受宪法束缚（无论中央政府永办不好），像湖南广东，便断不能发挥其特性。又人才奔赴中央政府，地方必有才难之叹。更有一个大不好处，假如中央政府成了，全国视线，又都集注中央，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必要大大发作，而各省自治，又变成不足轻重的了。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他减少坏度。

---

[1] 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毛泽东、彭璜、龙兼公等人的一种政治主张。他们曾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

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和议再不要说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之说[1]，再不要提倡了。要提倡国民大会，也要如张东荪先生的主张，用国民大会去解决省事。

胡适之[2]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3]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

[1] 指当时吴佩孚等人提出通过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张。

[2] 胡适之，即胡适。

[3]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后，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9月28日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决，定10月10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1]

（1920年10月11日）

呈为请愿事：

窃以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载在约法[2]，已历九年。市民等于此九年之中，虽在约法上应享受种种自由之特权，而在实际上则几被少数官僚军阀剥夺至于净尽。此固由于一国之根本大法未能成立，亦实由于地方自治尚未实施有以致之。湘省连年政变迭兴，祸乱相寻。无论湘人治湘或湘人被治，要皆为一种官治之良否区别，而于民治无与。故当兵连祸结之下，市民等惟□[3]相率忍痛茹苦，别无救生出死之道。兹幸湘局底定，群情望治。黄金世界之赞美，民治乐土之属望，中外舆望，殆成一致。市民等鉴既往之大

---

[1] 本文未署名。1920年10月14日上海《民国日报》所刊的《湘各界促进自治大会》中说，这次大会“推毛泽东，龙兼公为请愿书起草员”。另王无为1920年著《湖南自治运动史》中亦提到，“请愿书起草问题，讨论良久，乃推定龙叔彝（即龙兼公——编者注）、毛泽东为起草员”。可知本文为毛、龙二人起草。1920年10月11日湖南《大公报》在题为《国庆日的游街活动》的新闻稿中刊录此请愿书的同时，还提到长沙近万人于10月10日冒雨在省教育会坪召开自治运动大会，会上宣读了《请愿书》，会后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总司令部时，将《请愿书》当面交给了谭延闿。

[2] 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 原件此处模糊，疑为“有”字。

艰，知来日之不易。审慎集议，至再至三，窃谓非从速举行地方自治，决无以济湘局于郅盛；非从速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决无以期自治于完善。而人民宪法会议之组织法及选举法，市民等尤认为至重至大。综其主要之点有六：（一）宪法会议代表，依县之大小分配产出；（二）制宪期以三个月为限；（三）用直接选举法；（四）用普通选举法；（五）代表不得兼官吏与军职；（六）选举期限至多不得逾两个月。本以上六主要点，产出人民宪法会议，必能博采大多数之意见，制成完善之宪法，以增进湘人幸福，树立全国模范。再吾湘现处特别地位，应采革命精神，超〈切〉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又依湖南现在情形，宜采取湖南们罗主义，湘人完全自治，不干涉外省，亦不受外省干涉。

市民等谨以大多数之意见，提出于总司令[1]之前，敬仰采纳施行。此呈
湖南总司令谭。

湖南省城全体市民谨呈

---

[1] 总司令，指当时的湖南省省长、督军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

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

——报告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

（1920年10月22日）

依照《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今将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关于本社经过一切情形，择要报告于次：

（一）发起及筹备之情形

本社发起于本年七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八月二日，假楚怡学校[2]开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八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君毛泽东君三人为筹备员，其职务为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关于"筹备成立"一节，可分下列三项：

1. 房屋　初拟在长治路及省教育会等适中地点觅定，仓卒不

---

[1] 本文为3人联名提出的报告。据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和《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这4篇都是当时真实文件，也全是毛泽东执笔起草的。"

[2] 楚怡学校，为陈润霖1906年在长沙创办。初为小学，1914年开办楚怡工业学校，1923年开办楚怡中学，小学部增办幼稚园，三校一园总称楚怡学校。

就，始从湘雅医学校[1]赁定潮宗街门牌第五十六号湘雅旧址房屋之一部，于八月二十日由发起人赵运文[2]君介绍，订定租约。

2. 资本　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截至十月二十二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毛泽东，朱剑凡〈帆〉，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二十七人[3]，共收银五百一十九元。

---

[1] 湘雅医学校，1914年12月美国雅礼会与湖南省政府、湖南士绅合作，创办于长沙潮宗街。1927年曾一度停办，1929年改名为私立湘雅医学院。1938年因战乱迁往贵阳，1940年改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1944年迁至重庆，1946年迁返长沙。1953年定名湖南医学院。1987年改名湖南医科大学。

[2] 赵运文，又名鸿钧，当时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斋务兼庶务主任，是湖南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3] 这27人除姜济寰、左学谦两人外，其余均为当时湖南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12人为新民学会会员。姜济寰（1879—1935），号咏洪，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后任长沙县首届知事，后又两度任该县知事。曾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支持湖南新文化运动，被推选为俄罗斯研究会总干事。1920年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23年任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后随北伐军到南昌，历任江西省政务委员、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南昌起义后，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左学谦（1876—1951），字益斋，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后，任湖南参议院议员及湖南民政局次长。1919年前后，支持和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张被逐后，长期担任湖南商会会长。支持湖南新文化运动转民主运动。在解放战争后期，参与和平自救运动，拥护程潜等和平起义。

3. 与外埠交涉　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1]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往返商订，经时一月之久。至九月九号，书报杂志陆续到社，即于是日开始营业。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君为临时经理，进行一切，并约定罗宗翰君为本社驻京总代表，毛飞君为本社驻沪总代表。

（二）销售书报杂志之略计

本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四十五种，日报计三种。今略计从九月九号至十月二十号一个月零十二天临时营业期内重要书报杂志之销数开列如左：

---

[1] 李石岑（1892—1934），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从事编辑、大学教授和著述工作。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民铎》，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左舜生（1893—1969），名学训，湖南长沙人。1920年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后加入中国青年党，任过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南京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1949年去台湾。赵南公，不详。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1918年组织革命团体互助社，出版《互助》月刊。五四运动时，在武汉领导学生运动，并组织利群书社，经销革命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同萧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在南京英勇就义。

罗素政治理想	三十份
女性论	二十份
赫克尔一元哲学	二十份
达尔文物种原始	十份
罗素社会改造原理	二十五份
旅俄六周见闻记	十份
爱的成年	五份
杜威五大讲演	五份
西洋论〈伦〉理学史	五份
哲学概论	八份
论〈伦〉理学之根本问题	五份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	三十份
新俄国之研究	三十份
劳农政府与中国	三十份
新标点水浒	三十份
胡适尝试集	四十份
胡适短篇小说	三十份
科学方法论	三十份
迷信与心理	二十份
新青年八卷一号	百六十五份
八卷二号	百五十五份
新潮二卷四号	二十五份
改造三卷一号	三十份
新教育三卷一号	二十份
民铎二卷一号	三十五份

少年中国二卷一号	十份
二卷二号	二十份
二卷三号	二十份
少年世界一卷七，八，九号	各十五份
劳动界一号至九号	各百三十份
新生活三十九号至四十号	各百五十份
家庭研究第一号	四十份
时事新报　最初	二十八份
现销	六十五份
晨报　最初	十二份
现销	四十二份

（三）消耗及赢利之情形

（甲）消耗

开办器具及杂项	二十四元
房租	八元
火食	二十二元
邮汇	二十五元
印刷	十三元
纸类	九元

合共一百零一元

（乙）赢利

一百三十六元

（丙）赢利减消耗实余

三十五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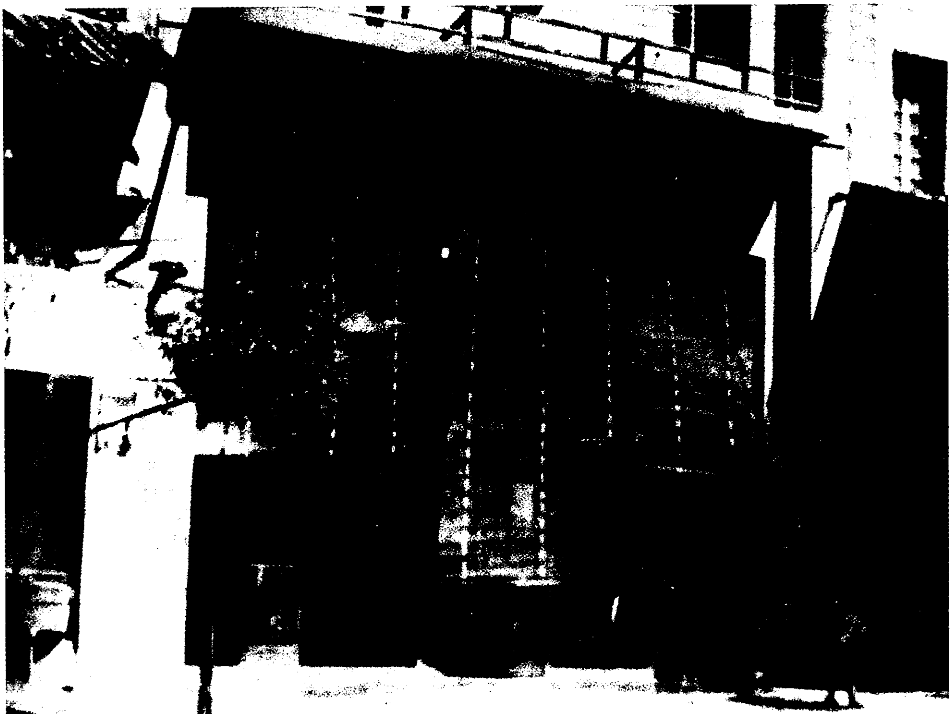
（注）办事人临时经理一人营业员一人送报二人煮

饭及走杂一人均未支薪。

右系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大略情形，俟第一次议事会开会推举正式经理以后，即归正式经理负责。此报告系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至十月二十号止。

即希公鉴

易礼容
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文化书社筹备员　彭　璜
毛泽东



文化书社旧址。

文化书社启事*

（1920年10月）

各县教育代表及听讲诸君同鉴，敝社为同志共同组织，专任介绍各种新出版物。现为使各种新出版物推广于全省各县，俾多数人有阅读机会起见，拟在各县设立分社或介绍处，诸君如有愿担负此项责任者请来潮宗街五十六号本社接洽为感。（通函亦可）

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1]

（1920年11月10日）

（一）本社为社会所公有，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

（二）本社书报杂志售价至多比出版原店一样，有些比原店更便宜，仅以取到相当之手续费及邮汇费为限。

（三）本社经售各出版物的种数：

1. 书——一百六十四种；

2. 杂志——四十五种；

3. 日报——三种。

（四）书之重要者：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杜威五大讲演、赫克尔一元哲学、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女性论、旅俄六周见闻记、爱的成年、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欧洲政治思想小史、托尔斯尔〈泰〉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幄欧洲文学史、心理学大纲、印度哲学概论、国际联盟讲评、人类学、波斯问题、科学的社会主义、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革命心理、创化论、近代思想、柏拉图之理想国、中国人口论、新道德论、生物之世界、孙文学说、科学通论、现代思潮批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胡适短篇小说、吴稚晖上下古今谈、新

---

[1] 本文先在1920年11月8日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个别字有错漏，现本书按《湖南通俗报》刊印。

式标点的水浒、三叶集、俄罗斯名家小说、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国之研究、吴稚晖朏庵客坐谈话，劳农政府与中国、心灵现象论、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天文学、西洋新派画、社会与伦理、社会与教育、动的新教授[1]、蔡元培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婚姻哲嗣学、杨怀中西洋伦理学史、杨怀中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新闻学、哲学概论、周作人译点滴。

（五）杂志之重要者：新青年、新教育、中华教育界、新潮、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生活、劳动界、劳动者、劳动潮、奋斗、民铎、科学家庭研究、音乐杂志。

（六）日报之重要者：时事新报、晨报。

要买以上各书报杂志者，请向省城潮宗街五十六号本社。

---

[1] 原文如此。

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1]

（1920年11月）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一百二十四种，报——四种，杂志——五十种（月刊三十三种，半月刊二种，季刊二种，周刊十三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

我们很惭愧自己的能力薄弱，不能担负这传播文化的大责，希望各界有心君子予以援助。先生若能帮我们费一点口舌介绍之劳，那我们是特别感激先生的。本社印有很多的书目，先生或先生的朋

---

[1] 本文和下文《读书会的商榷》均无写作时间，亦未署作者姓名，系文化书社当年的一种广告宣传品，32开铅印件，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本书收录的这两篇文稿的原件，曾被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后被发现。《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出版于1920年9月，又从内容看，本文与《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相近，故写作时间暂定为1920年11月。

友要看，函索即寄（不要邮费）。本社经理员易礼容君，营业事项由他负责。他天天在社，无论那位先生要书，要报，要杂志，要书目，以及其他事项，写信来问，都由他手复，绝不延搁。

敬祝先生天天健康！

文化书社同人
（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

读书会的商榷[1]

（1920年11月）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1. 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2. 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或辨明的机关了。3. 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原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定几份报，至少也可以定一种。那么，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

[1] 本文写作时间、起草和保存情况同上文。原文标题下有“（文化书社同人）”字样。

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

（1920年11月19日）

本年度教育经费，经常列一百〇四万元，临时列一百十一万余元，合计二百一十五万余元。这其中若具体的举出女子教育经费，则如下列：

第一女子师范	三万三千〇二十四元
第二女子师范	三万〇七百〇五元
第三女子师范	二万二千七百六十四元
代用女子中学	一万元

合计九万六千四百九十三元

女子教育经费合计不足十万元，仅抵全教育经费二十二分之一。尽起纳税的义务来，女子和男子一样的“尽”；享起教育的权利来，女子止当得男子二十二分之一。男子们呵！你们也太忍心了呵！

有一千五百万女子的湖南，没有一个女子中学，老就可耻的极了。民国十年度预算案内破天荒列了一笔“代用女子中学”的经费（经常六千元，临时四千元），听说一部分议员先生，还想要将他打消起来，我不料女界的可耻，毕竟到了这步田地。

张文亮记毛泽东谈建团问题[1]

（1920年11月21日）

会见毛（在通俗馆）[2]，云不日将赴醴陵考查教育。并嘱青年团[3]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

[1] 1920年冬，毛泽东在长沙筹组社会主义青年团。张文亮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追求进步，与毛泽东有密切联系。他同毛泽东之间交往的情况，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反映。仅是毛泽东同他谈建团问题，即有三处，本篇是其中一处。他在1920年12月2日日记中写道："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1. 研究；2. 实行。并嘱我多找同志。"在1920年12月15日日记中写道："接泽东复信：（一）你婚事在现时尽可全不议及。你的主意我最赞成。（二）□□可敬可爱，自应力与扶助。（三）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结一些同志作中坚份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四）青年团你可努力在校制造团员，尽本学期开一次会。（五）学校前途，决于校长去留问题；但今有志者努力维持，当然是第一要事。"

[2] 毛，指毛泽东。通俗馆，指湖南通俗教育馆，当时何叔衡任馆长，何聘请谢觉哉等主编《湖南通俗报》，毛泽东常去报馆协助办报、研讨问题。

[3] 青年团，当时的全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1920年7月初，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后，与陈独秀等保持了密切联系，10月间，接到上海寄来的青年团章程之后，开始在长沙地区发展团员，筹建团的组织，同时筹建共产主义小组。

给向警予[1]的信

（1920年11月25日）

■湖南问题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2]，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

---

[1] 向警予（1895—1928），女，又名向俊贤，湖南溆浦人，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出席过中共第二、三、四次代表大会，历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1928年春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同年5月1日英勇就义。

[2] 荫柏，即彭璜。当时他与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写有《湖南共和国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怎么要立湖南“国”》《对于湖南建“国”的解释》等文。

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巳〈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巳〈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进步！

健豪[1]伯母及咸熙[2]姊同此问好。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1] 健豪，即葛健豪（1865—1943），女，原名兰英，湖南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人。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49岁时就读于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后在家乡创办湘乡县立第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1919年随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同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在长沙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任校长。

[2] 咸熙，即蔡畅，女，1901年生，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蔡和森的妹妹，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给欧阳泽的信

（1920年11月25日）

■学会应取潜在态度

玉生[1]兄：

共同的精神四项[2]，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岂但省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说[3]，是因为新民学会现在尚没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

---

[1] 欧阳泽（1897—1924），号玉生，湖南益阳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2] 共同的精神四项，指1920年5月22日欧阳泽致毛泽东、彭璜等人信中所说的新民学会会员应注意的四个问题：一、对于本会要尽心尽力的栽培他、灌溉他、爱惜他，务使他充量的发展。却不要一心一意的专事服从他，倚靠他，更不要挟甚么野心来利用他，把他当个偶像或傀儡玩。二、本会对于个人，和个人对于本会，须都要负完全的责任。本会的失败，即是个人的失败；个人的失败，也就是本会的失败。三、会员对于本会，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任，在行为上有互相劝勉的责任。四、会员对于会员，须要有理性的爱，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感情的爱是暂时的，部分的。理性的爱，方是普遍的，永久的，方能维持一个团体，不至于忽而涣散。

[3] 毛泽东于1920年年初在北京时曾说新民学会暂不必吸收外省人为会员。

『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巳〈已〉高挂了，广告早巳〈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半淞园会议[1]，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你的信[2]我在上海接到，彭、周、劳、魏[3]，都转给他们看了。我七月回湘，一向多忙，未能作答，幸谅！你现状谅好，我忘记你在芬丹白露[4]，抑在蒙达尔尼[5]？来信幸告。近因积倦，游览到萍，旅中作书，言不尽意。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萍乡旅中。

---

[1]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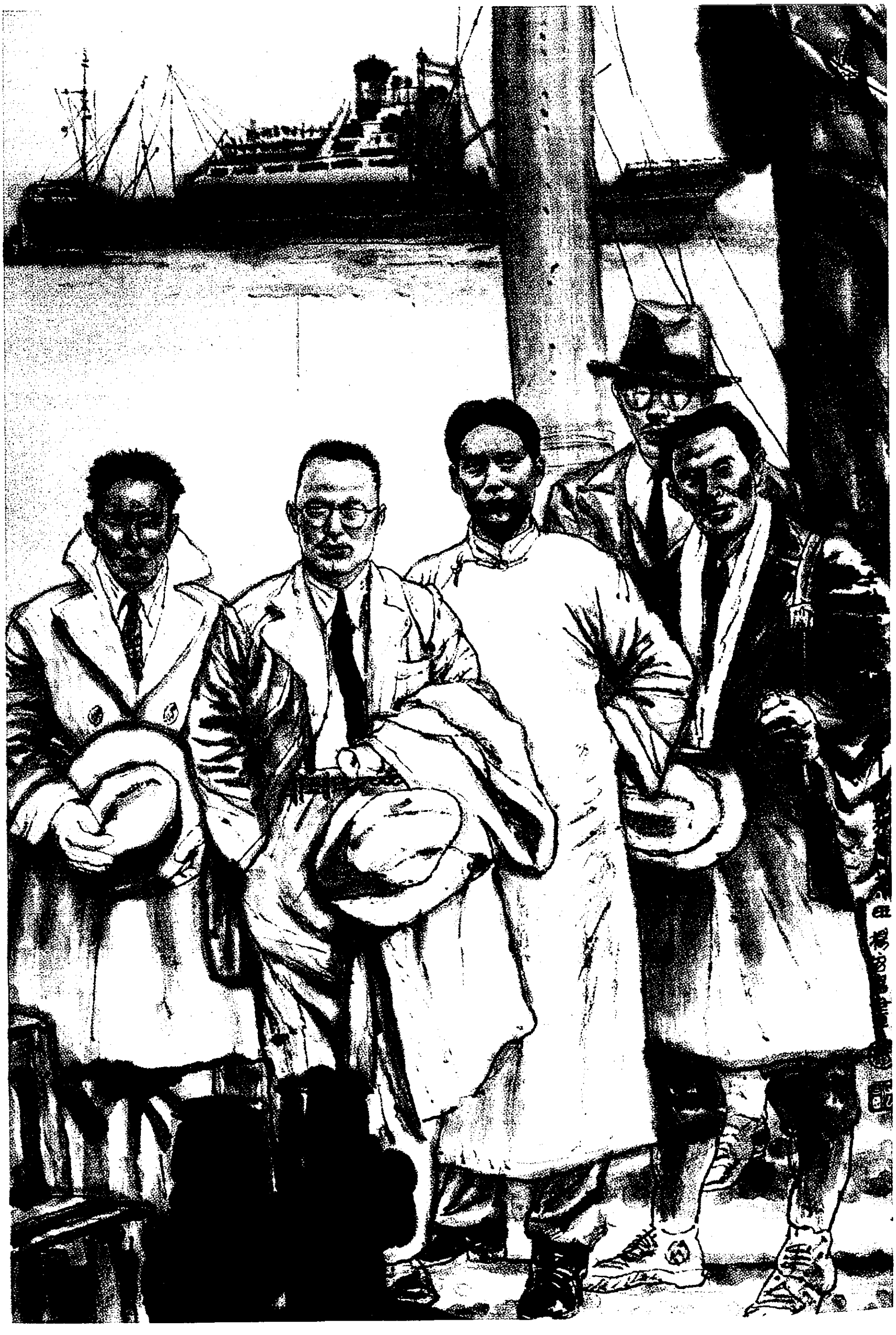
[2] 指1920年5月22日欧阳泽致毛泽东、彭璜等人的信。该信提出关于新民学会的共同精神和新会员入会问题。

[3] 彭、周、劳、魏，指彭璜、周敦祥、劳君展、魏璧，他们均为新民学会会员。

[4] 芬丹白露，今译枫丹白露，法国北部塞纳—马恩省城镇，在巴黎东南65公里，位于塞纳河左岸约3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中。

[5] 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在法国，离巴黎约100公里。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送别会在上海举行。图为与会者的合影。



《远渡重洋　寻求真理》（中国画）

给罗璈阶[1]的信

（1920年11月25日）

■湖南问题

■主义的结合

■学生自决

章龙兄：

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2]，我昨信竟没有一句复答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3]（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

---

[1] 罗璈阶，即罗章龙（1896—1995），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1年被王明另立的中央开除出党。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 1920年7月25日罗章龙致毛泽东信提出关于“湖南建国”及对新民学会的意见。

[3] 康梁维新，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孙黄革命，指孙中山、黄兴领导的1911年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

只在这大织〈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途〉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厉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1]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2]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3]，为会友相互辩

---

[1] 前函，指1920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

[2] 会务报告，指《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由毛泽东编辑，现发现有第一号和第二号，均系16开直排铅印本。第一号编印于1920年冬，主要记载新民学会从发起至1920年冬的会务及会员生活等情况；第二号编印于1921年春，主要记载1921年的“新年大会”和1月常会的情况。

[3] 通信专集，指《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与会友间往还信稿，不论新旧，请检出寄弟。

“湘江”[1]尚未出版，固因事忙，亦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2]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狠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3]诸语，使我不寒而栗。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预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4]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1] “湘江”，指当时计拟复刊的《湘江评论》。

[2] 城南附小，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当时毛泽东在该校任主事，并兼任师范部国文教员。同时在附小举办平民夜校。

[3] 1920年7月25日罗章龙致毛泽东的信中有“耀灵急节，岁月易逝，无法可以挽回。况思想学术，节节僵化，更不可不注意”句。

[4] 沈仲九，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给李思安的信

（1920年11月25日）

钦文[1]姊：

你这信我八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厚〈原〉谅我罢。“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2]，巳〈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　泽东

十一月二十五日

---

[1] 钦文，即李思安（1892—1969），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新加坡坤成女校教书。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去印度尼西亚，1950年回国，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2] 集虚，即蒋竹如（1899—1967），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给张国基的信

（1920年11月25日）

■会务问题
■湘人往南洋应取的态度
■南洋文化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

颐生[1]兄：

两信[2]先后奉悉，久未作复，甚歉！所言会务六项[3]，弟大体均赞成。第一项发行会报，现己〈已〉决发刊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两种。第二项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项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弟忆夏间在上海与焜甫，赞周，子暲，荫柏，望成，韫庵，

---

[1] 颐生，即张国基。

[2] 指张国基1920年5月23日关于新民学会会务及9月19日关于南洋通信社组织给毛泽东的两封信。

[3] 指1920年5月23日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对新民学会的六点意见。大意是：一、学会内发行一种书报，以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二、吸收新会友须有四个以上会友介绍，并经委员长和评议部同意；三、学会要真正解放，打破界限，新会友不分年龄、性别、籍贯、学历，但他的思想必须与学会宗旨相合；四、学会应有会所，并多买书报杂志供会友阅览；五、通过常年捐与特别捐等形式，多方为学会筹措经费；六、编印会友录，以便常通声气。

敦祥，冀儒，玉生[1]等在半淞园会商，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该连络）。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第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用费已〈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信社组织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2]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

---

[1] 焜甫，即熊光楚。赞周，即陈绍休。子暲，即萧三。荫柏，即彭璜。望成，即刘明俨（1899—1977），又名若云，湖南安化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韫庵，即魏璧。敦祥，即周敦祥。冀儒，即劳君展。玉生，即欧阳泽。

[2] 李石曾，即李煜瀛，河北高阳人。清末留学法国，在巴黎加入同盟会。后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1916年联络部分法国人士成立华法教育会，任书记，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北伐战争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后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1956年定居台北，后病死。

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敦祥，冀儒，玉生[1]等在半淞园会商，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该连络）。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第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用费己〈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信社组织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2]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

---

[1] 焜甫，即熊光楚。赞周，即陈绍休。子暲，即萧三。荫柏，即彭璜。望成，即刘明俨（1899—1977），又名若云，湖南安化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韫庵，即魏壁。敦祥，即周敦祥。冀儒，即劳君展。玉生，即欧阳泽。

[2] 李石曾，即李煜瀛，河北高阳人。清末留学法国，在巴黎加入同盟会。后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1916年联络部分法国人士成立华法教育会，任书记，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北伐战争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后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1956年定居台北，后病死。

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给罗学瓒的信

（1920年11月26日）

荣熙[1]兄：

兄此信[2]我自接到，先后看了多次。今天再看一次，尤有感动。你的话我没有不以为然的。我巳〈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的办法，暂时也不必说，只是你的话我一定要行就是。你奋勉的志气很可敬。你现处环境很好，可以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听说你巳〈已〉离学校在工厂做工，西洋工厂里的情况，可由此明了；并且可以得到脱尔斯太[3]所谓“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4]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

---

[1] 荣熙，即罗学瓒。

[2] 指1919年11月14日罗学瓒曾给毛泽东信，信中谈到关于“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3个问题。

[3] 脱尔斯太，指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其作品深刻地反映出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农民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无情揭露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一方面宣传对恶不抵抗，幻想以“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代替沙皇制度。

[4] 李声澥（1897—1951），字印霞，又名中，湖南湘乡石牛山清水塘（今属双峰县）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个时期专用体力去做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1]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2]，你可以和他通信。启民[3]在太安里周南女校。惇元[4]在理问街通俗报[5]。湘潭教育腐败巳〈已〉极，旅省诸人组织“湘潭教育促进会”从事促进，尚无大效。一师湘潭学友会[6]亦将有所兴作，兄信尚未转去，稍迟当转去。兄沿途寄稿均登《湖南日报》[7]，无转阅必要了。此信曾经复了一次，今再附识近来感

---

[1] 江南造船厂，即江南造船所，清末官办的机器造船厂之一。原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一部分。1905年造船部分单独分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归北洋政府海军部管辖。

[2] 陈仲甫，即陈独秀。机器工会，指上海机器工会，1920年11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下成立。会章规定该会的目的是“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病伤保险费，设置卫生设备”等。开始时有会员300多人，出版刊物《机器工人》，陈独秀曾任该会筹备会经募处主任。

[3] 启民，即陈书农（1898—1970），湖南长沙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

[4] 惇元，即周世钊。

[5] 通俗报，指《湖南通俗报》。前身是辛亥革命后由都督府演说科主办的《演说报》，1914年改为《通俗教育报》，1920年改为《湖南通俗报》。9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他聘请谢觉哉、熊瑾玎、周世钊担任《湖南通俗报》主编和编辑。1921年5月，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何叔衡馆长职务，6月15日《湖南通俗报》被迫停刊。

[6] 一师湘潭学友会，是毛泽东、罗学瓒等人于1917年9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发起成立的湘潭籍学生团体。

[7] 《湖南日报》创办于1918年9月，由伍芋农等主办，伍任经理，杨绩荪任总编辑，陶孝宗、许彦飞、曾松乔、徐汉涛先后任编辑。1926年夏季停办。

想于此。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给罗学瓒的信

（1920年11月26日）

■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

■论理上的错误

■拒婚同盟

荣熙[1]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澈之至。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2]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

[1] 荣熙，即罗学瓒。

[2] 怀中，即杨昌济。

四种迷[1]，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2]，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3]，详情我不知，

---

[1] 四种迷，指罗学瓒1920年7月14日致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四种错误。第一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叫做“感情迷”。第二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这叫做“部分迷”。第三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这叫做“一时迷”。第四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这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

[2] 罗学瓒在1920年7月14日的信中说：“我近与各处友人交接，常觉得中国人求学的头脑，太不明了。第一宗错误，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的，就说法国人爱和平不振作为不正当。又如见中国的小事小物或有一点比外国略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又譬如勤工俭学同志，自己想做的工不能找得，遂说勤工俭学不行。”

[3] 工学世界社，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体。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等在法国巴黎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其成员大部分为湖南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8月，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停止活动。

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巳〈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1]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巳〈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巳〈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

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像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巳〈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写出。此祝进步。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1] 向蔡，向指向警予，蔡指蔡和森。

给萧子暲的信[1]

（1920年11月）

子暲兄：

你沿途给我的信和照片，都收到，很感你的厚意。我竟没有一个信报你，很对你不住！“半淞园会议”的结果，既由你和赞周[2]等带到了欧洲，“蒙达尔尼会议”[3]的情形，又由你和子升[4]递回了亚洲，子升并且自己回国，不日就可见面了，真足乐呵！你现在谅好，谅还在学校。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学会出版物分“通信集”[5]与“会务报告”[6]

---

[1] 本篇是毛泽东对萧子暲1920年6月22日给毛泽东、彭璜来信的复信。原信未署写作日期，从信的内容看，毛泽东写信时正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故定为1920年11月。

[2] 赞周，即陈绍休。

[3] 蒙达尔尼会议，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萧子升等于1920年7月在法国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4] 子升，即萧子升。

[5] 通信集，指《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6] 会务报告，指《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为二，通信集本年至少可出三集，请设法收集在法诸友间新旧信稿，邮递“长沙文化书社”交弟，作第四集第五集材料，至感。（请告诸友以后通信均书长沙文化书社）

弟　泽东

1920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召开会议，讨论确定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图为与会会员的合影。

“驱张”“自治”与我们的根本主张[1]

（1920年11月）

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姊及周惇元[2]兄函中己〈已〉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说过几次[3]。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的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的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澈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诚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

---

[1] 本文是毛泽东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在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后所加的一段文字，无写作时间。通信集第二集于1920年11月编定，12月出版，据此当写于1920年11月。易礼容当时为长沙文化书社经理。

[2] 周惇元，即周世钊。

[3] 1920年7月初，毛泽东由上海经武汉邀易礼容一同回湖南，途中与易礼容说过关于做事要有准备的问题。

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巳〈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1]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泽东

---

[1] 罗荣熙，即罗学瓒。

新民学会启事[1]

（1920年11月）

各会友钧鉴：

本会出版物，分“会员通信集”[2]与“会务报告”[3]之二，除会务报告叙述会务状况年出二册外。会员通信集，为会员发抒所见相与扬榷讨论的场所。凡会友与会友间往来信稿，不论新旧长短，凡是可以公开的，均望将原稿或誊正稿寄来本会，以便采登第四期以

---

[1] 本文是新民学会为出版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给各会友的启事，连载于通信集第一、二集上。据罗章龙1978年6月19日回忆，新民学会出版物《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和《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都是毛泽东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未署名的启事、序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等，是编者写的。本篇未署写作时间，“通信集”第一集也未署出版时间。据所收书信时间最晚的是1920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罗学瓒的复信，因此第一集编成时间不可能早于11月。另据“通信集”第二集序后所署时间为1920年11月30日，第一集编成时间又不可能晚于11月底，因此本文写作时间定为11月。

[2] 会员通信集，指《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由毛泽东编辑，目前发现3集。第一集、第二集编印于1920年年底，共收录会员通信43封，其中毛泽东致会友信10封，另有毛泽东起草的启事、前言、序和评述共4篇。第三集编印于1921年年初，收录会员通信7封，其中毛泽东致会友信2封，另有毛泽东起草的启事、说明3篇。毛泽东曾在说明中写道：第三集“以讨论‘共产主义’和‘会务’为两个重要点。信的封数不多，而颇有精义”。

[3] 会务报告，指《新民学会会务报告》。

后的通信集。不登之稿可退还。巳〈已〉登之稿声明要退还的也可退还。稿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毛泽东君为荷。

新民学会启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发刊的意思及条例

（1920年11月）

第一集所收多前一二年旧信，然于学会颇关重要，因多属于团体事业之进行与发展的。留法运动[1]一事，此集只能载蔡[2]君给各会友的信，各会友给蔡君的信，其重要者尚望蔡君付来选印。通信集之发刊，所以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发刊不定期，大约每两月可有一本。同人个人人格及会务固宜取绝对公开态度，但不宜标榜，故通信集以会友人得一本为主，此外多印了几十本，以便会外同志之爱看者取去。因学会极穷，不论会友非会友，都要纳一点印刷费。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就好极了。

---

[1] 留法运动，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2年由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提出，并得到了当时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的支持。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组织勤工俭学会，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主持其事。俄国十月革命后，由于受到世界进步思潮的影响，国内不少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从而形成一个运动。1919年以后，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促进和领导了这一运动，使其达到空前规模。

[2] 蔡，指蔡和森。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序

（1920年11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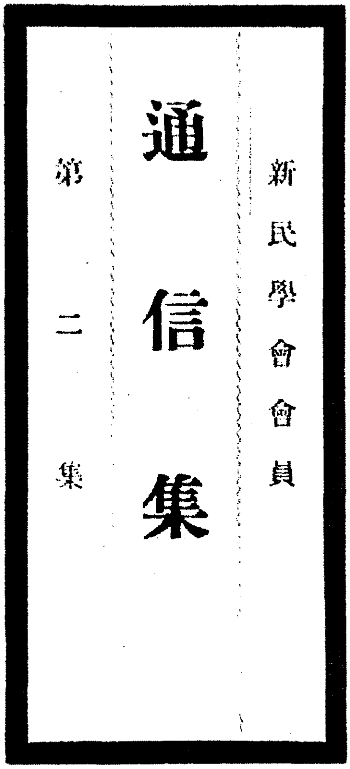
这是《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的“第二集”，采集会员通信计二十八封。重要者如下：向警予讨论女子发展的计划一封；讨论女子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及女同志联络问题一封；欧阳泽讨论新民学会共同的精神一封；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应取潜在的态度一封；萧子暲[1]报告男女会友在法生活状况一封；易礼容主张吾人进行要有准备一封；罗璈阶[2]希望学会反抗靡俗估量最高价值一封；毛泽东讨论湖南自治并主张学会同人应为主义的结合一封；张国基讨论会务进行一封；报告湘人在南洋情形一封；毛泽东讨论湘人往南洋应取的态度，希望会友多往南洋为文化运动和南洋建国运动一封；张国基述南洋的奇闻一封；罗学瓒希望会友注意锻炼身体，祛除四种迷惑，解决家庭问题一封；毛泽东主张组织拒婚同盟一封。以上各信，或于身心之修养有益，或于学术之讨论问题之研究有益，或于会务之进行有益，并且都是很能引起会员团体生活的兴味的。其余的信，或商量进止，或讨论事宜，或报告个人状况，具载于此，以见一斑。

千九百二十年十一月三十号　编者

---

[1] 萧子暲，即萧三。

[2] 罗璈阶，即罗章龙。



新民學會會員

通信集

第二集

新民学会出版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

给蔡和森[1]等的信

(1920年12月1日)

和森兄、子升[2]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3]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4]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

---

[1] 蔡和森（1895—1931），又名蔡林彬，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同毛泽东等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广州牺牲。

[2] 子升，即萧子升(1894—1976)，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

[3] 学会，指新民学会，是由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等发起，于1918年4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革命团体，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学会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1920年有一些会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4] 蒙达尔尼会议，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1920年7月在法国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1]。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

---

[1] 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左"即"如下"。

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1]，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

---

[1] 迪克推多，是英文"dictatorship"一词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

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1]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2]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

---

[1] 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2] 李和笙，即李维汉，又名罗迈。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发起组织旅法少年共产党，10月代表少年共产党回国接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信中说到的李和笙关于“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的意见，是他留法期间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一度所持的看法，不久就改变了。1979年他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谈到1920年下半年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约在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1]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2]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

---

[1]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来中国讲学，同年10月曾到长沙讲演。

[2] 荫柏，即彭璜，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会计干事。礼容，即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长沙文化书社经理。

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1]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2]失败了，偏又有

---

[1] 拿破仑第一，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2]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5年12月宣布实行帝制，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段祺瑞[1]。章太炎[2]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

---

[1]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实行卖国投降政策。

[2] 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1906年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1924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讲学。

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1]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2]，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倚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学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

[1] 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一词的音译，意为民主、民主主义。

[2] 1920年5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时期。子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挈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 湖南运动，2. 南洋运动，3. 留法运动，4. 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1]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

---

[1] 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　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毛泽东之辩诬函

（1920年12月3日）

唐厅长钧鉴：

日昨承片招到贵厅与贵厅何科长绍元会见。言及贵厅接到省议会通知，有知投函省议会，谓泽东近在图书馆邀集各公团代表开会，运动某军队，捣毁省议会，署名者曹仁王复兴龙建勋王仁四人云云。查前次省议会扯旗案，即有人因挟怨（事由已详告何科长，转询便知），乘机倾陷扬言系泽东所为，此次又谓泽东将捣毁省议会。泽东身任教务，且急于读书储学。凡无意识及一时之趋避奔竞雅不欲参与其间。惟对于湖南自治，认为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曾为学理上之主张。亦曾随众人后为事实上之促进。所谓制宪建议是也。事属绝对公开，并无丝毫隐秘。乃有一班头脑不清晰之人，强以制宪建议与双十节市民游街大会混为一谈。怨泽东者因研求不遂细故，乘机设词倾陷。一次未遂。又为二次。泽东今为负责起见，有□郑重申明者，二语如下。

一、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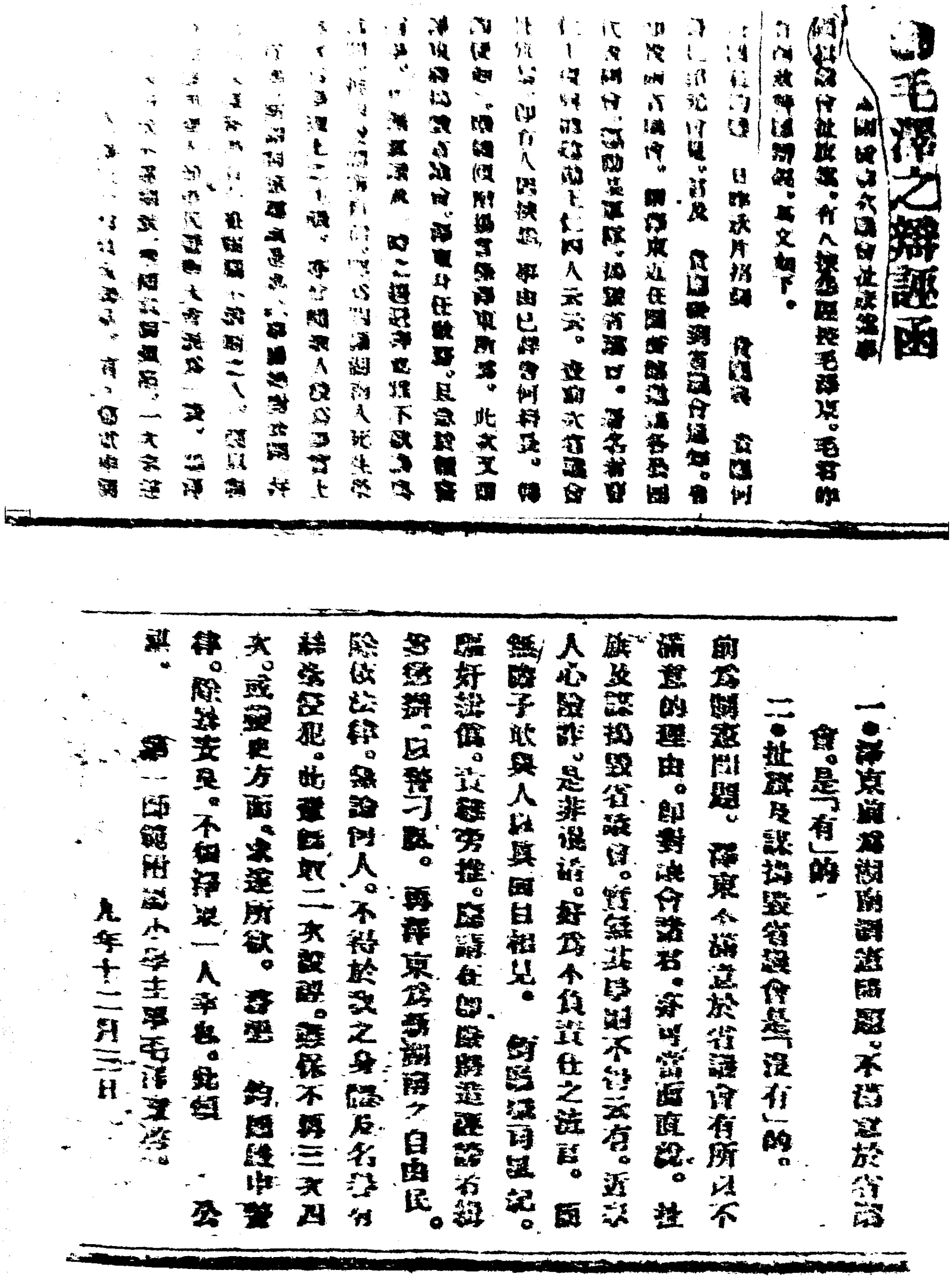
二、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

前为制宪问题，泽东不满意于省议会有所以不满意的理由，即对议会诸君，亦可当面直说。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实无其事则不得云有。近来人心险诈，是非混淆，好为不负责任之流言。而无胆

子敢与人以真面目相见。钧厅职司风纪，驱奸缉伪，责难旁推。应请在即严将造诬谤者缉案惩办，以警刁风。再泽东为新湖南之自由民，除依法律，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此辈既取二次设诬，难保不再三次四次。或变更方面，求遂所欲。务恳钧厅严申警律，除暴安良，不独泽东一人幸也。

此颂公祺。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毛泽东启
九年十二月三日



图为毛泽东为澄清被诬陷扯旗、图谋捣毁省议会事件写给警厅的信。

给张文亮的信[1]

（1920年12月）

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

[1] 这是1920年12月中旬毛泽东复张文亮信的主要内容。

在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上的发言[1]

（1920年12月19日）

现在影响办师范的，不仅是办法问题，还有不明白办师范重要的问题。

湘潭要教育普及，照现在造就师资办法，再过千年，还无希望。宜以此种情形先事鼓吹，造成舆论。

---

[1] 这是毛泽东在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关于教育经费问题的讲话[1]

（1920年12月22日）

罢课还是消极，要准备积极的办法，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教育界应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实行自决自救，军费、政费都可以借款，教育是百年大计，也可以借款自救。

---

[1] 这是毛泽东在省城教职员联合会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怎样去做才有真正的劳工团体出现?

（1920年12月）

工人要提高自己的地位，要脱离雇主的束缚，除掉努力奋斗以外，没有别的法子，因为一般的雇主，都不是抱人道主义的，那里肯顾到工人的死活，即如工资一项而论，几年以前，每个工人，是二角洋一天的，如今也只有三角洋一天，加不到二分之一，生活程度之抬高，那里止有二分之一呢？雇主不肯依“水涨船高”的话儿，毅然去增加工人们的工资，弄得他忍饥挨饿，渐渐有不可能过活的样子，还不能得到雇主们半点怜惜。所以工人除掉努力向雇主奋斗以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唉！可怜的工人们！自己的问题，要自己去解决，你们要改善你们的生活，也只有自己起来解决罢了！希望雇主发慈悲心，改善待遇方法，是一种慈善行为，我们羞于忍受，而且也是不可能的事，希望人家鼓吹，以达到劳工解放的目的，也是没有效果，我敢断言一句，工人不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则已，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只有“扎硬寨，打死仗”，自己起来奋斗！

但是工人们要想和雇主奋斗，应该先有强固的团体，然后才不致会失败。没有强固的团体以做后援，贸贸然向雇主宣战，没有不失败的。中国各地方的劳动者，也屡次发生罢工风潮，结果多半是失败，就是没有强固的劳工团体的缘故。所以现在的中国劳工运动，最要紧的一着，就是赶紧组织一个强固的劳工团体，强固的劳

工团体，怎样去组织呢？这话说来很长，但扼要地说一句：先要劳工个个有彻底觉悟，中国的劳动家，觉悟的程度怎样？说起来很令人悲观、失望，因为大多数工人从乡下地方招募而来，没有受过学校教育，所以知识一点也没有，脑子里面装满许多卑鄙的观念，人家喊破喉咙地高唱“劳工解放”，他们也不晓得“劳工解放”是什么一回事？自己是不是可以算得劳工？有的还恐怕高唱“劳工解放”的先生们，是过激派。我们听信了他的话，便是受过激派的引诱，恐怕将来要受牵累呢！这些话不是我自己臆造，诸位去仔细考察劳工们的心理，才相信确有这种情形，劳工们的头脑，既然这样简单，知识既然这样浅短，我们却希望他有彻底的觉悟，不是“缘木求鱼”吗？工人既然没有彻底的觉悟，我们希望他组织一个强固的真正的劳工团体，不是白日做梦吗？

但劳工们现在虽然没有彻底的觉悟，我们终希望设法能够使他们有彻底觉悟的一日，不能因为现在劳工们没有彻底觉悟，就丢掉劳工问题不讲，劳工是社会的台柱子，劳工问题不解决，社会怎样能够安宁呢？但我们究竟怎样使劳工有彻底觉悟呢？这个问题，须要从工人教育问题中去解决，因为工人之所以没有彻底觉悟，就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没有丰富的知识的缘故，如今假如使他们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得著丰富的知识，自不难有彻底的觉悟了！现在各地方大都有工人义务学校设立，我也参观过几处，其中名符其实，确能增进工人的知识，供给工人的需要，替工人打算谋生活的改善的，固然不少；但名不符实，只挂了一块“工人义务学校”的招牌，以博人家称誉，在工人没有什么好处的，也是很多。我希望热心劳工教育的先生们，在没有工人义务学校设立的地方，快快纠合同志，去开办工人义务学校，以招致工人来读书，在已经有工人

义务学校设立的地方，应该力加改良、扩充，使工人无向隅之憾，果真如此，工人们的知识程度，不难一天高如一天，那么，工人自然能够用理性去判断事物，怎样是雇主的专横？怎样是工人应有的权利？不愁没有彻底的觉悟了！所以我相信工人教育问题，是一切劳工问题的先决问题，工人既然都有彻底的觉悟，自然因为利害关系，大家联合起来，组织一个真正的劳工团体，而且晓得不是这样，终没有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于是所组织的劳工团体，愈加强固。□□上面的话对不对，很希望大家批评！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1920年冬）

民国九年冬刊

一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新民学会的一种生活史。新民学会是一个生活体，新民学会的会员乃这个生活体的各细胞。新民学会有性命已三年了，会员由十几人加到五十几人，会员的足迹由一地及于国内国外各地，所做的事也由一件加到若干件。会员虽然现在大都在修学储能时代，但这个时代已很可贵。这三『个』年中的经历，在会是一种新环境，在会员是一种新生活，我们几十个人，在这种新环境里共同或单独营一种比前不同的新生活，是我们最有意义的事。第一期会务报告的职务，是将这三年中会及会员的生活择要叙述出来，做我们会及会员生活全史的头一段。

二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

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三

现在述新民学会的第一次会——就是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学会成立，在湖南省城对河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开会。到会的人如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罗章龙、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周晓三、陈启民、叶兆祯、罗云熙。通过会章。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

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

第二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第三条　凡经本会会员五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会员须守下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第五条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

第六条　本会设总干事一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

第七条　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并得召集临时会。

第八条　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入会费银一元，每年纳常年费银一元；遇有特别支出，并得由公决征集临时费。

第九条　本会设于长沙。

第十条　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

第十一条　本简章有不适用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章表决，推举子升任总干事。是日聚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

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四

自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学会成立至这年八月，四个月中，有两件可记的事：一、加入新会员。学会自开过成立会后，随即加入的会友，为下列九人：周惇元、何叔衡、李和笙、邹泮耕、熊瑾玎、熊焜甫、陈章甫、傅昌钰、曾星煌。二、发起留法运动。此事以前尚有人发起，没有成。至是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萧子升。时子升在楚怡任课，和森就居楚怡，日夕筹议。何叔衡、毛润之、陈赞周等时复加入讨论。是时其他会友亦有几人行将外出，遂于六月尽间，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赞周、萧子暲处（陈、萧在此任课）开一会议。计到会者：何叔衡、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周惇元、蔡和森、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陈启民、李和笙等。因事未到者几人。这次讨论，集中“会友向外发展”一点，对于留法运动认为必要，应尽力进行。是日聚餐。自此，留法一事，和森和子升专负进行之责。不久，和森赴京。

此时湖南政局乱极，汤芗铭、刘人熙、谭延闿、傅良佐、谭浩明、张敬尧，互相更迭，教育摧残殆尽，几至无学可求。和森至京，与李石曾、蔡孑民二先生接洽结果，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乃函告子升、润之、赞周、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之同志。起初愿往者极少。至八月十九，始有二十五人由湘到京。自此往者渐众。此时会友往北者：和森、子升、子暲、赞周、焜甫、芝圃、星煌、鼎丞、和笙、云熙、润之、章龙十二人。除章龙在北大文科，润之在北大图书馆外，余均在留法预备班（芝圃、

和笙、星煌在保定班；和森在布里村班；子升、子暲、赞周、焜甫、鼎丞、云熙在北京班）。此事在发起并未料到后来的种种困难，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国，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前进。此事的结果，无论如何，总有一些好的影响。但在中间，会友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到底没有一个人灰心的。

会友在京，曾请蔡孑民、陶孟和、胡适之三先生各谈话一次，均在北大文科大楼。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各问题。

会友在京，初系散居。后来集居一处，地点在后门内三眼井胡同七号。同居的人如下：子升、云熙、赞周、润之、焜甫、章龙、玉山（欧阳玉山于此后一年入会），和森亦由布里村搬来加入。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子暲与望成（刘望成于此后一年入会）则住于胡同之第八号。到八年一月，子升赴法。二月润之回湘，萧子暲赴沪。赞周诸人因法文班课堂由马神庙北大理科迁入西城翼教寺法文馆，居所事势上不得不变易，章龙亦改寓他处，三眼井胡同的同居生活，遂散。赞周等既至西城上课，乃改寓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后院，又是一个新的同居生活。此时子暲已由沪归，比在三眼井，便只缺了润之、章龙与子升，同居还有八个人。同时在保定的芝圃、和笙、星煌三人与其余预备留法诸君四十余人，则同居于育德中学。预备期满，京、保诸会友，便陆续赴法去了。

五

这里要述两件极不幸的事，即民国七年七月会友叶瑞龄之去

世，及民国八年四月会友邹鼎丞之去世。

叶君名兆祯，益阳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为人和平中正，有志向学。于毕业归家的途次遇热，抵家即故。

邹君名彝鼎，湘阴人，与叶君同学同班。好学有远志，持身谨严而意志坚毅。七年十月赴北京留法预备班。因历年积劳得病，至此迸发。八年一月回湘，四月竟死。所做日记及论文数十本，朋友们想替他刊出其警要，但现在还没有刊。凡与他接近过的人，大概没有不觉得他是一个可敬可爱的人。他有一个极爱念的未婚妻，临死寄给他一封信，可惜没有第三人看见不能将他的遗墨存留。他是发起学会的一个重要人。他于学会之发起，既认为必要，便毫不游移。他于学会抱有极大的希望。他丝毫不料他自己之不幸短命。他之从善如流，他之改过不吝，他之胸怀坦白、毫无城府，他之爱人如己，他之爽快，他之勇敢，他之真诚，他之好学，他之对于道义之热情——这些都是曾经和他见过面，或曾经和他相处较久的人所知道的。

六

民国八年一个年头里学会及会友在长沙方面的事，大要如下：

上半年无甚要事，只惇元在修业教课，叔衡在楚怡教课，润之在学生联合会办《湘江评论》周刊，颇有一点成绩。下半年乃有下列诸人入会：罗耻迂（宗翰）、张颐生（国基）、夏蔓伯（曦）、蒋集虚（竹如）、易阅灰（克穮）、向警予、陶斯咏（毅）、彭荫柏（璜）、李承德（振翩）、张伯龄（怀）、唐文甫（耀章）、沈均一（均）、李钦文（思安）、周敦祥、魏韫厂（璧）、劳君展（启荣）、谢维新（南岭）、徐瑛、刘继庄（修秩）、钟楚生（国陶）、张泉山

（超）、姜竹林（慧宇）。在周南女校开过一次会。其始长沙会友对于会章条文，觉太简略，于是提议修改，设“评议”“执行”二部，执行部下又设“学校”“编辑”“女子”“留学”各部。

至是，长沙会友，适用新会章，选举叔衡、钦文为正副执行委员长；斯咏、惇元、润之、敦祥、韫厂、启民、文甫、集虚为评议员。然自开会后，即进行驱张，会友多数出外，会务停顿至一年之久，会章虽更，职员虽举，等于虚设。巴黎会友，对于长沙举动，颇有违言，这时润之、耻迂、赞周、百龄等在北京组织一平民通信社，专为驱张之用。这年夏天，蔡和森于去国之先，在长沙发起“湘绣美术公司”，但一时不易成立，迄今还没有具体地进行。刘望成（明俨）、欧阳玉生（泽）、杨润余三人，于此时入会。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七

九年的春夏，毛润之、李钦文等，因湘事由京到沪，赞周、焜甫、子暲、望成、玉生、百龄，分由北京、天津、长沙到沪，候船赴法。韫厂、君展、肫如，由湘到沪，练习法文，准备赴法，此时会友在沪计十二人。因赞周等五人赴法期近，遂于五月八日，在上海半淞园开一送别会，在沪会员均到。讨论很长，大要如下：

1. 学会态度：

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润之主张学会的本身不多做事，但以会友各个向各方面去创造各样的事。

2. 学术研究：

都觉会友少深切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

3. 发刊会报：

赞周、子暲都谓会友相互间应有一种联络通气的东西，则会报甚为要紧，主张急切出版，但为非卖品，除相知师友外，不送与会外之人，大众无不赞成。拟就在上海发刊，推赞周担任征集在法会友的文稿，润之担任在上海付印。后因湘事解决，会友归湘，遂缓发刊。

4. 新会友入会：

都觉介绍新会员入会，此后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议决介绍新会友宜有四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后来长沙会友决议将奋斗与服从真理合为“向上”）。入会手续如下：（一）旧会友五人介绍；（二）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以昭审慎。

5. 会友态度：

大概谓会友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苦痛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6. 不设分会：

学会前有在会友较多的地方设立分会之议，是日讨论，觉无设立的必要，设分会反有分散会友团结力之嫌。如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

这日的送别会，完全变成一个讨论会了。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中午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绿草碧波，望之不尽。

八

赞周、子暲、焜甫、望成、百龄、玉生六人，以九年五月十一日由沪起身赴法，在沪会友，握手挥巾，送之于黄浦江岸。

这时张敬尧尚据湖南，会友于是有两种团体之发起，一为驱张后谋所以改造湖南者，为“湖南改造促成会”；一为与同志共同修学者，为“自修学社”。均在上海民厚里。六月，张敬尧给湘军赶去。会友之奔走京、沪及衡、永者，陆续回湘，一直到是年冬尽，长沙各会友的情形，略如下列：

陈启民	在周南任课。
陶斯咏	在周南任事。
钟楚生	在周南任课。
何叔衡	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
周惇元	在通俗报馆任编辑。
熊瑾玎	在通俗书报编辑所任事。

毛润之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事。
张泉山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课。
刘继庄	在第一师范附小任课。
蒋集虚	在第一师范修学。
易阅灰	同上
夏蔓伯	同上
姜竹林	同上
谢维新	同上
李承德	在湘雅医学专门修学。
唐文甫	在明德中学修学。
邹泮耕	在修业任课。
彭荫柏	在文化书社自修。
易礼容	在文化书社任事。
任培道	在文化书社任事。

此时长沙会友所做的事，其具体可见的：蒋集虚、易阅灰、夏蔓伯等，尽力于第一师范之革新；何叔衡、周惇元、熊瑾玎等，尽力于通俗教育，办一种内容完好的通俗报；陈启民、陶斯咏、钟楚生等，尽力于周南女校之革新。

此时在长沙之会友尚有二种努力：一为创办文化书社，一为发起自治运动，均很得各方面同志的同情。此时蔡咸熙（畅）、熊作莹（季光）、熊作璘（叔彬）、任振予（培道）、吴德庄（家瑛）五人入会。

九

会友在北京、上海及长沙方面的情形略如上述。现述会友在法

国方面的情形。

会友赴法者，自八年春萧子升到法后，至八年秋罗荣熙、张芝圃、李和笙、曾星煌到法；九年春蔡和森、蔡咸熙、向警予、熊作莹、熊作璘到法；九年秋萧子暲、陈赞周、熊焜甫、张百龄、刘望成、欧阳玉生到法；九年冬劳君展、魏韫厂到法。于是会友到法国的共有十八人，除子升于九年十月内回国外，余十七人截至九年底止，其情形大略如左：

罗荣熙	在法国中部克鲁邹地方一工厂内做电气工。
张芝圃	在法国北部香拜尼地方一工厂内做工。
李和笙	由巴黎西郊搬至张芝圃处同住养病。
曾星煌	在法国西南部一工厂做工。
蔡和森	在法国蒙达尼公学学习法文。
蔡咸熙	在法国蒙达尼女学学习法文。
向警予	同上
熊季光	同上
熊叔彬	同上
萧子暲	住巴黎西郊哥伦布，复搬至克鲁邹，与罗荣熙同住。
陈赞周	在法国非未里地方一工厂做散工。
熊焜甫	在法国西北部圣梅桑学校学习法文。
张百龄	在法国独尔学校学习法文。
刘望成	在法国芳丹白露学校学习法文。
欧阳玉生	在法国西北部圣梅桑学校学习法文。
劳君展	初到法国入南方一女学校学习法文。
魏韫厂	同上

十

会友之分在南洋、日本及国内各地的情形如下：

在北京：

罗章龙　在北大文科，七年九月入学，至此两年半了。

罗耻迂　九年四月后，独任平民通信社，年底将通信社收束，取道南京回湘。

在汉口：

沈均一　在明德大学，九年九月入学。

在南京：

周肫如　在南高补习班，南高创行男女共学，周君由上海女青年会入学。

在上海：

杨润余　在崑山路女青年会习英文，九年七月由长沙到上海就学。

在日本：

傅昌钰　在东京高工，六年由长沙赴日，七年入学。

周晓三　在东京高师，七年由长沙赴日，八年入学。

在南洋：

张颐生　在星加坡道南学校及华侨中学任课，九年二月由长沙赴星。

李钦文　在星加坡坤成女校任课，九年八月由长沙赴星。

十一

学会自七年创立至九年底，三『个』年内“具体”的情形，大略说完了。还有些“抽象”情形，也述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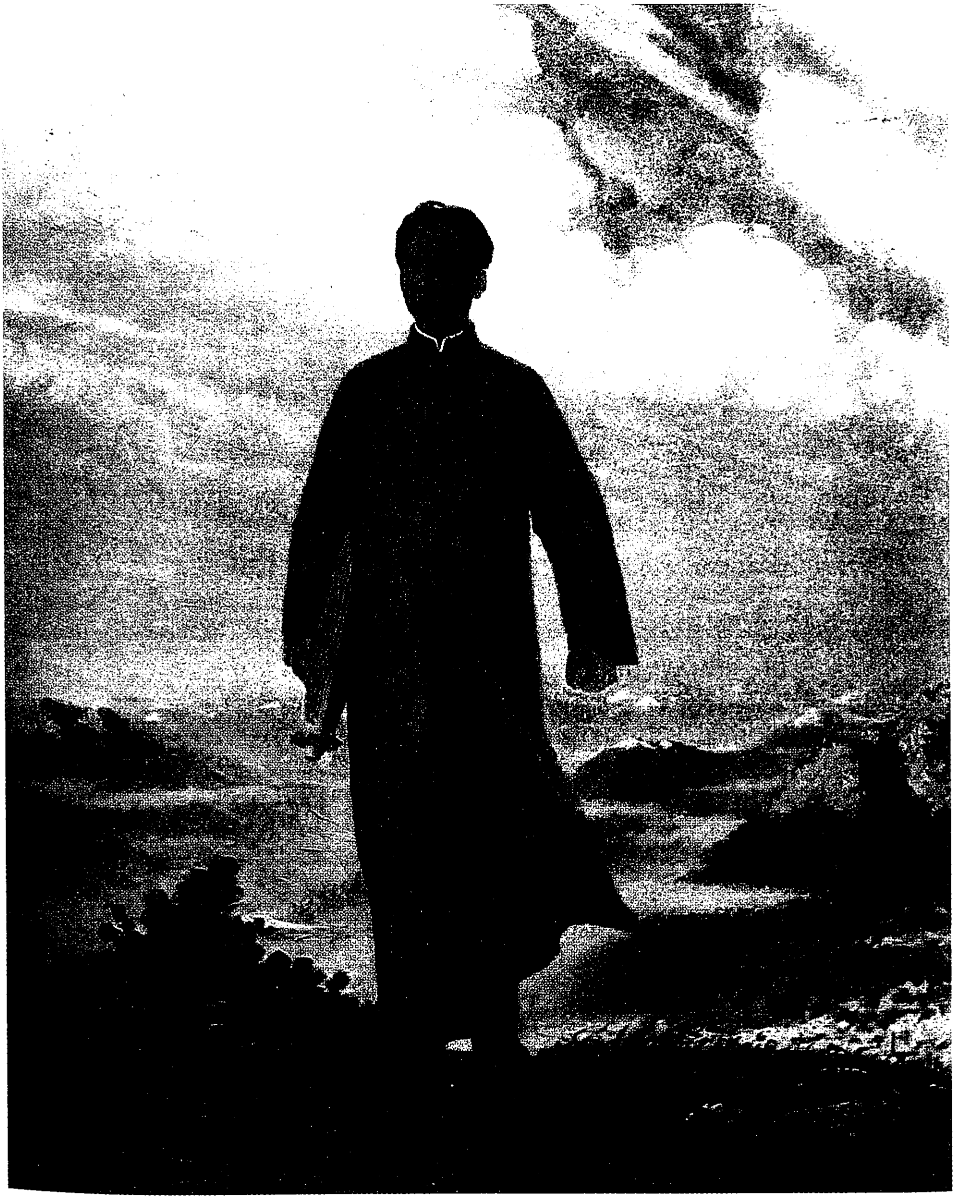
我们学会很有些优点，然也有些缺点。优点是哪些呢？我们学会无形中有几种信条：像“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皆是。

这些信条，都在无形中，只存在彼此的观摩和讨论中，没有明白的标举过。

因“不标榜”，多数会友彼此间从少面誉，“言必及义”，自歉和勉励的话，总较多于高兴和得意的话。因“不张扬”，学会虽则成立了三年了，社会上除开最少数相知的人朋友以外，至今还不知有我们学会的名字。因“不求急效”，会友无论求学做事，只觉现在是“打基础”，结果都在将来；要将来结果好和结果大，就应该将基础打得好，打得大。因“不依赖旧势力”，会友便都觉得我们的学会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属于这个学会的各员，现在或将来向种种方面所做出来的种种的事，也是创造的，不是因袭的。因此，我们学会从来没有和旧势力发生过关系，也没有邀过旧势力的人入会。——此外，我们学会会友还有几种好处：第一是头脑清新，多数会友没有陈腐气，能容纳新的思想。第二是富奋斗精神。多数会友大概都有一点奋斗力，积极方面，联合好人，做成好事；消极方面，排斥恶人，消减恶事。于改革生活，进修学问，向外进取各点，均能看出会友的奋斗精神。第三是互助及牺牲的精神。会友间大概是能够互助，并且有一种牺牲精神的。

学会虽有以上各种优点，但也有好多缺点：第一，学术根浅柢薄。会友大概多是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升学或毕业在专门以上学校的，还只有最少数，其学术的根柢自然是十分浅薄。第二，思想及行为幼稚。会友的思想，大概均不免幼稚。有一部分会友，于事不免率尔发起，率尔赞成，其行为陷于幼稚。第三，一部分会友做事多于求学。会友在现时本不是全力做事时代，因计划上及事势上之必要，不能不在此时做出相当的基础事。然如现在情形，则有一部分会友大概已在专门做事，牺牲未免太大了。第四，一部分会友间，尚无亲切之联络与了解。此点颇失学会精神，以后宜设法由不相认识和不甚了解的会友，互相认识而且了解起来才好。

1921



1921年12月，毛泽东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图为刘春华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1]

（1921年1月1日、2日）

一

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2]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3]诸人。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

---

[1] 这是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的一篇发言。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于1921年1月1日至3日举行，热烈讨论了1920年7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会议上提出的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以及改造的方法、目的等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1月1日的发言，本篇二是毛泽东1月2日的发言。

[2]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进行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当时拥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革命论，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

[3]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1916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研究系的主要成员，当时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

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1]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二

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 社会政策[2]；
2. 社会民主主义[3]；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4]）；

---

[1] 启民，即陈启民，名陈书农（1898—1970），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教书。

[2] 社会政策，指19世纪70年代德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社会改良主义，后流行于欧美以及日本，20世纪初传入中国。社会政策的提倡者主张阶级协调，由国家或其他社会力量制订劳动法规，实行社会保险，成立工人组织，兴办福利、救济事业等等，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

[3] 社会民主主义，指20世纪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它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和阶级调和。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也曾有极少数人宣传过这种主义。

[4] 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早年加入英国费边社和工党，后又信仰过基尔特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曾到俄国考察。1920年至1921年来中国讲学，主张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不赞成“阶级战争”和“平民专制”。罗素的主张在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有相当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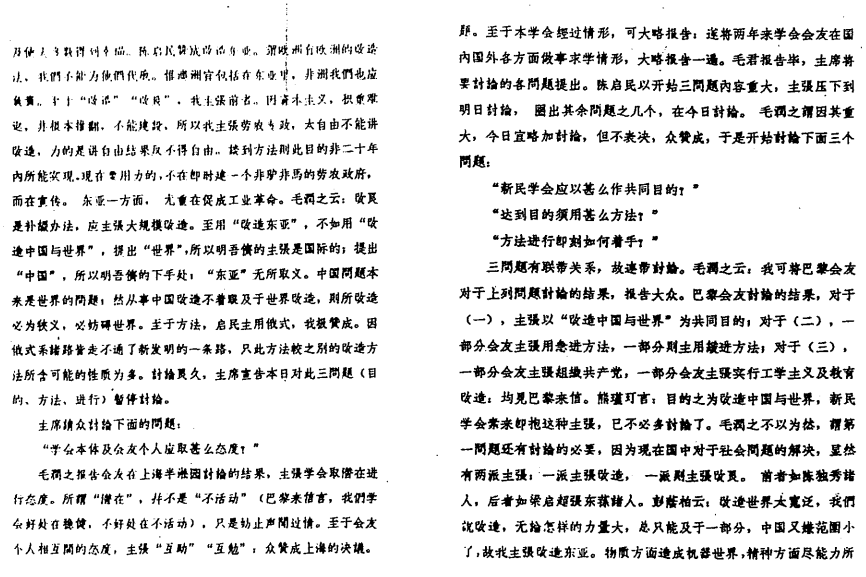
5. 无政府主义[1]。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

[1] 无政府主义，是19世纪中叶出现于欧洲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否认任何国家和政权，否认任何权力和权威，鼓吹绝对自由、极端民主，主张建立一个“无命令、无权力、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五四运动前后，这种思潮在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工人中曾经有过较大影响。



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遂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毛君报告毕，主席将要討論的各問題提出。陈启民以开始三問題内容重大，主張压下到明日討論，圈出其余問題之几个，在今日討論。毛润之謂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討論，但不表决，众贊成，于是开始討論下面三个問題：

“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

“达到目的须用甚么方法？”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三問題有联带关系，故連带討論。毛润之云：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問題討論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討論的结果，对于（一），主張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張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則主用緩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張組織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張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見巴黎来信。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張，已不必多討論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謂第一問題还有討論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問題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張：一派主張改造，一派則主張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諸人，后者如梁启超張东荪諸人。彭荫柏云：改造世界太寬泛，我們說改造，无論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張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謂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們不能为他們代庖。惟亚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們也应負責。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張前者。因資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設，所以我主張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結果反不得自由。談到方法則此目的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綴办法，应主張大規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儕的主張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儕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問題本来是世界的問題；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則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討論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問題（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討論。

主席請众討論下面的問題：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甚么态度？”

毛润之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討論的結果，主張学会取潜在进行态度。所謂“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巴黎来信言，我們学会好处在穩健，不好处在不活动），只是防止声聞过情。至于会友个人相互間的态度，主張“互助”“互勉”；众贊成上海的决議。

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讨论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毛泽东同何叔衡等12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图为编入《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

新民学会紧要启事

（1921年1月2日）

本会同人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友个人对于会之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自身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缺乏团体生活之兴趣者；有行为不为会友之多数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持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

给彭璜的信[1]

（1921 年 1 月 6 日）

兄一月来对礼容态度，我颇不满意，大违兄平日恢恢之度，礼容即万不当，亦不宜以此非人世所堪之意态对之，面誉人与面毁人同非人世所堪。

青年团拟于一月十三日开成立会，望参加。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璜信的主要内容。

在新民学会常会上的谈话[1]

（1921年1月16日）

一

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

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

[1] 1921年1月16日，新民学会在文化书社举行常会。到会21人，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问题：（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个人计划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个人生活方式谈话的一部分。

二

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向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他不赞成熊瑾玎的消费主张。）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

给蔡和森[1]的信

（1921年1月21日）

和森兄：

来信[2]于年底始由子升[3]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4]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

---

[1]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2] 指蔡和森托萧子升从法国带回的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进一步阐述他对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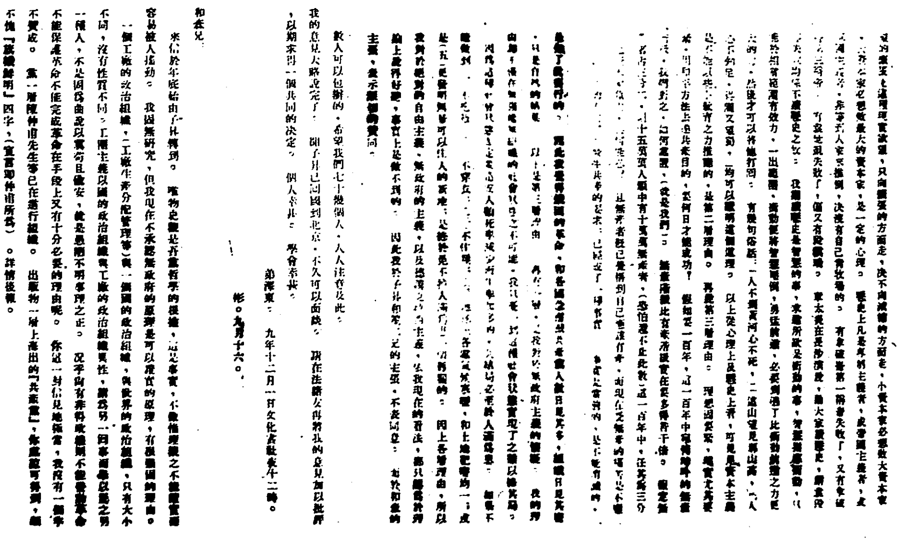
[3] 子升，即萧子升（1894—1976），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年冬由巴黎回到北京，当时毛泽东已回长沙。

[4] 陈仲甫，即陈独秀。

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1]，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　泽东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illegible]的需要之這種現實欲望，只向擴張的方面走，決不向減縮的方面走，小資本家必想做大資本家，大資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資本家，是一定的心理。歷史上凡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有拿破崙第一稱帝失敗了，又有拿破崙第三稱帝，有袁世凱失敗了，偏又有段祺瑞。章太炎在長沙演說，勸大家讀歷史，謂袁段之失，由於不讀歷史之故。我謂讀歷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衝動的事，智慧指導衝動，只能於很少的範圍有效力，一出範圍，衝動便將智慧壓倒，勇猛前進，必要到碰了比衝動[illegible]之力更大的[illegible]，然後才可以將他打回。有幾句俗話：「一人不到黃河心不死」，「這山望見那山高」，「人心不知足」，[illegible]，均可以證明這個道理。以上從心理上及歷史上看，可見資本主義是不[illegible]教育之力推翻的，這是第二層理由。再是第三層理由。理想固然要緊，現實尤其要緊，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這一百年中宛轉呻吟的無產階級，我們對之如何處置（就是我們）。無產階級比有產階級實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無產者占三分之二，則十五萬萬人類中有十萬萬無產者（恐怕還不止此數），這一百年中，任其為三分之一的[illegible]，其何能忍？且無產者既已覺悟到自己應該有產，而現在受無產的痛苦是不應該[illegible]共產的要求，已經成了事實。事實[illegible]，是不能消滅的。

[illegible]了俄國的革命。因此我覺得俄國的革命，和各國急進共產黨人數日見其多，組織日見其密，只是自然的結果。以上是第三層理由。再有一層，我對於無政府主義的懷疑，我的理由卻不僅在無強權無組織的社會狀態之不可能。我只憂一到這種社會狀態實現了之後，[illegible]。因為這種社會狀態是定要造成人類死率減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結局必至人滿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飯，（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各處氣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illegible]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終於免不掉「人滿為患」的。因上各層理由，所以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於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於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數人可以包辦的，希望我們七十幾個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見大略說完了。聞子昇已回國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談。現在[illegible]諸友再將我的意見加以批評，以期求得一個共同的決定。個人幸甚！學會幸甚！

弟澤東。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書社夜午十二時。

彬。九月十六。

和森兄：

來信於年底始由子昇轉到。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比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我固無研究，但我現在不承認無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證實的原理，有很強固的理由。一個工廠的政治組織（工廠生產分配管理等）與一個國的政治組織，與世界的政治組織，只有大小不同，沒有性質不同。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欲以屬之別一種人，不是固為曲說以圖苟且偷安，就是愚闇不明事理之正。況乎尚有非得政權則不能發動革命，不能保護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詳情後報。

弟澤東。　十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两封信。

---

[1] 《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创办的刊物。

给彭璜[1]的信

（1921年1月28日）

荫柏兄：

示奉悉，出入证收到，感甚！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仍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第三第四两点，兄亦时作此言。第一点属客观，第二点属主观，为观人所不可忽。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于吾兄久欲陈其拙愚，而未得机会，今愿一言，倘获垂听，有荣幸焉。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

---

[1] 彭璜，又名荫柏，湖南湘乡人。1919年6月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1920年夏，与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

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兄于礼容[1]，我觉未免过当，立意不十分诚，泄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兄说待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如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至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过矣过矣！人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

---

[1] 礼容，乳名闰三，有时写成韵珊，湖南湘潭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1936年在上海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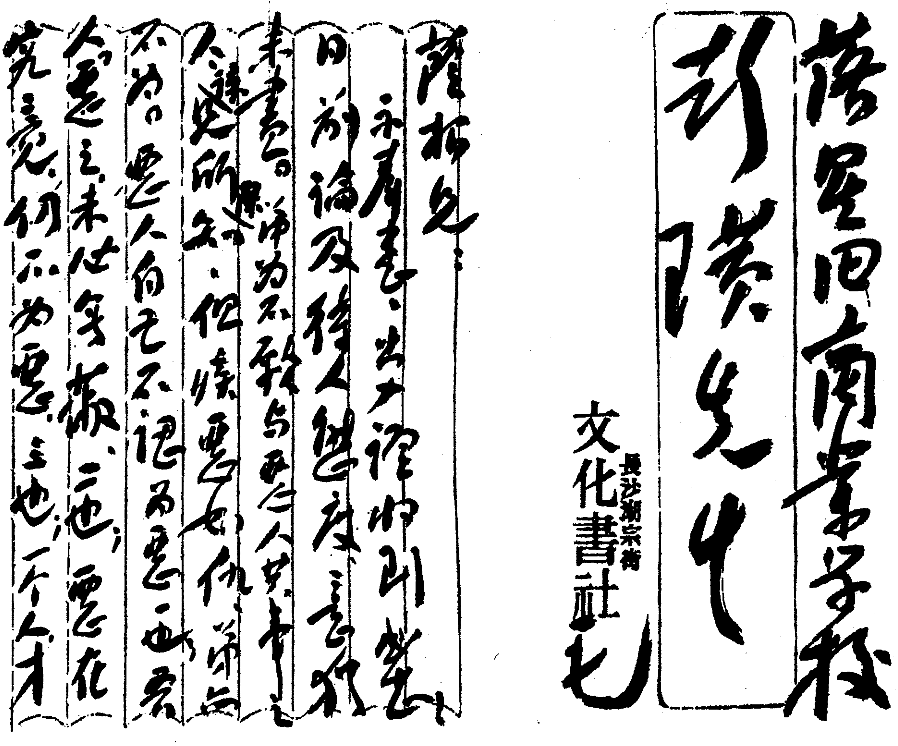
之，兄以为何如？今晚从城里归，已十二点钟，又与孩子们谈坐一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原宥是幸！

此颂

大安。

弟　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夜



落星田商業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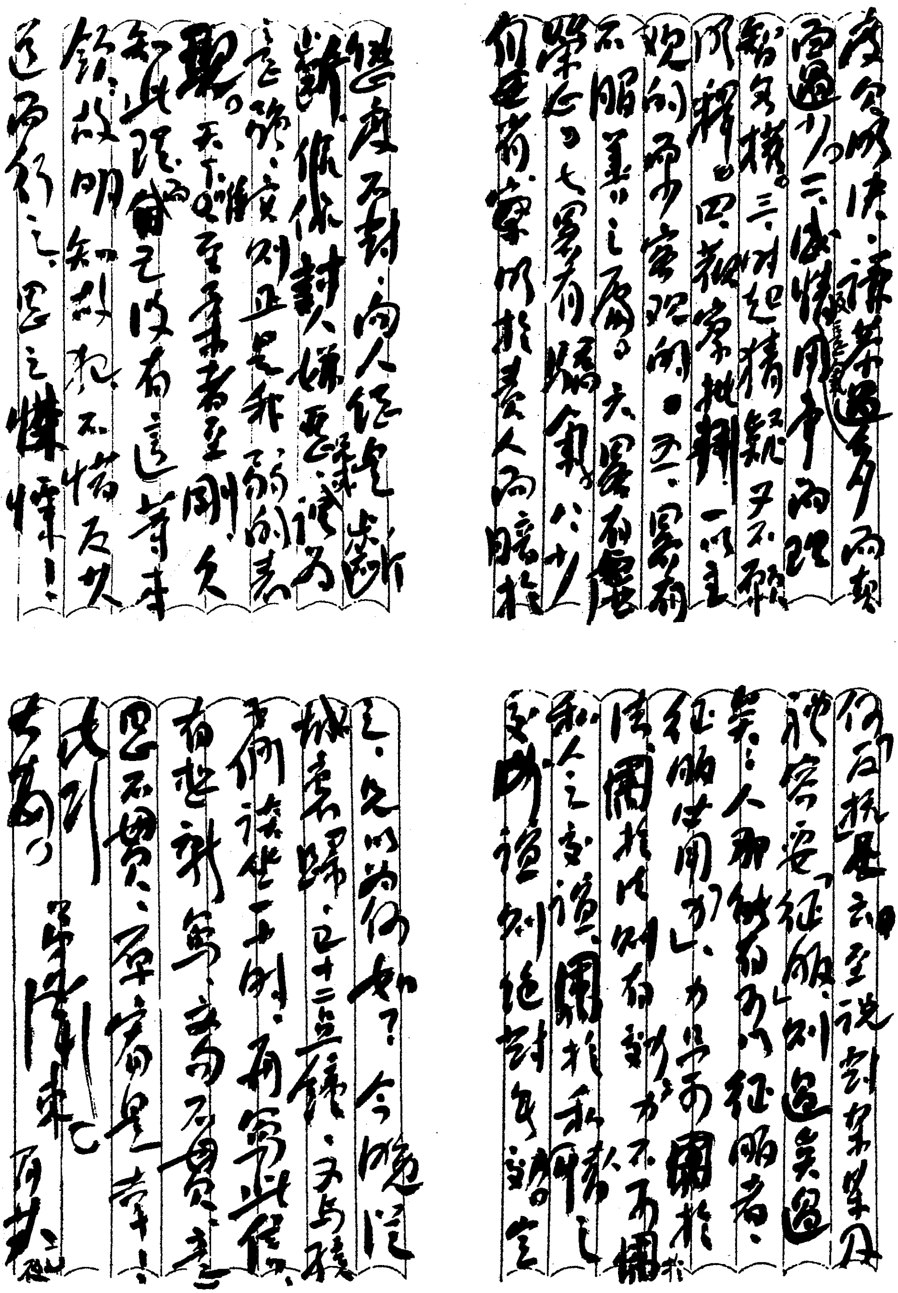
彭璜先生

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　毛

璜兄：

示悉。出大理的判断，日前論及待人態度之誤，未盡言旨。弟為不致與惡之人共事之人，諒是所知。但讀惡者，仍弟所不為，因惡人自己不認為惡也，惡人之惡之未必皆確，二也，惡在究竟，何不為惡主也，一個人才

毛泽东致彭璜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彭璜信的手稿。

和毛泽民的谈话[1]

（1921年2月）

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

[1] 1921年2月，毛泽东和毛泽覃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一天晚上，和毛泽民、毛泽覃、继妹毛泽建、弟媳王淑兰等，谈论家庭及国难当头民生多艰等。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要舍家为国，舍己为民。这是毛泽东和毛泽民的一段谈话。几天后，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任校务，同时在该校工人补习学校学习。

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

（1921年4月25、26日）

什么是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呢？今依条文的次序来说。第一个最大缺点，是人民的权利规定得不够。依我的意，下列三项极重要的条文是决然要加入省宪法的：

（一）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其亲属遗产之权。

但亲属欲以其财产一部或全部用之于公益事业时，不在此限。

（二）人民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

婚姻之自由权，除依法律所规定之结婚年龄外，不受父母及任何人之限制。

非依法律规定不得限制人民之离婚。

（三）人民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

凡教育、农、工、商、新闻、律师、医生、著作者、艺术者、及其他无损于社会安宁幸福之职业，为正当之职业。

上三条，第一条所以救女子无财产之弊，女子无财产，女子要解决教育职业参政婚姻种种问题，都是说梦。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女界联合会诸君不于根本斗争，而争其枝叶，实是错了观点。这一条改变中国的遗产制度，关系甚大，所以应规定于宪法。第二条，中国子女对于婚姻无自决权，由家庭而遗害社会，百事均伏坏根于此。而子女对于婚姻应有其自决权，又

已成天经地义。应按□定男女结婚年龄，和离婚的最小制限（如两造同意）让之民法，而于定婚权由父母移于子女之关系，改变吾国婚姻制度之大者，则定之于宪法，我以为实属紧要。第三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这里规定人民有求得正当职业的自由权，就是将人民的“生存权”规定于宪法求宪法的保障，依我看比较规定“身体的自由权”还要重要一等。随即规定何谓正当的职业，庶几将来的政治成为一种职业政治，而不是现在的游民政治了。

省宪法草案之第一个最大的缺点，既如上述。第二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就是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普选□之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欧美先进国以其实例告诉我们了的。今退一步，就让无正当职业的人也有选举权，那么，被选举权就万万不可不加以限制了。注意从前原有限制，就是限制财产，现在是限制职业，坐拥财产的人或反在限制之列，我名之曰反限制。议员而不有职业的限制，则事实上仍然有钱的人当选，无钱的人落空。游民社会有代议士，职业社会无代议士，结果仍然是一种不利于平民的政治。所以我主张：

于第二十九条无当选为议员的资格之“军人”“官吏”“学生”三项人之外，加一项：无正当职业之人。（正当职业之规定已见前文）

如此则坐吃利息，坐吃遗产，和专做政客的人……都不能当选，当选者都有正当的职业，就形成了职业的政治。

文化书社第二期社务报告

（1921年4月）

一

我们在去年曾出过一本社务报告，是报告“发起”及“临时营业期内”的情形的。现在这“第二期社务报告”是报告从去年九月本社开幕至今年三月底“第一个半年”里的情形。长沙文化书社是去年九月初开幕的，到今年三月底，有了七个月，与本社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之例，多一个月，这是因为算账之故多出来的，以后还是按照组织大纲“六个月一报告”。

二

我们出这本报告的意思，头一层：与我们社里有直接关系的社员诸君，我们经理社务的人，在职务上应将如何推销书报种种情形，报告给大家，使社员都知道社里的实在情形，才算完了我们的职务。第二层：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讨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布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

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布于社员以外。第三层：我们这个社的任务，在我们的“缘起”里曾经说道：“……愿用最迅速、最简单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在组织大纲里也说：“……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像这样极大的任务，是不能由我们几十个社员一肩担负的。我们为达到“人人有阅读机会”的目的，最注重的是各县开设分社，以七十五县每县设一个分社，每一个分社有十个社员计，就要有七百五十个社员。所以我们惟有将社务公开，使远近同志的人，明白这个社的益处，分向各地开设分社，并口头或实力帮助我们的传播事业，“广布全省”的目的，庶几可以达到了。第四层：我们社里有的是书报，少的是本钱，为什么呢？因为书报是从外边来的，要几多也有，本钱是社员出的，社员不皆是富翁，社员所做的事又不单只书社这一件，哪里有许多钱来做本？并且社的本是“公财”性质，没有退还也没有息，我们这些穷社员，从哪里出得来许多呢？然而文化书社这件事，的确是一件极可注意的事，试举其益，便有两宗：（一）经营简便。（二）不消耗本钱。大家晓得现时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如果经营得法，一个书社的效，何止抵几个学校的效？因此我们为扩张社务，并推广各县分社起见，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我们计划于二年内替书社筹足公共资本三千元）。我们不知谁是愿意帮助我们的，自然不好到处去问，惟有将社务公开起来，庶几同情于我们的人，好自动地予以帮助。第五层：我们以前全是贩书，自己没有出版物，现正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连为一贯，然后本社乃有独立出版物，这样社

务便更加扩张，非多邀同志和多筹资本（编译社定三千元，印刷局定五千元）不行，因此也得把社务公开起来，才可邀大家的同情和注意。最后还有一层是属于我们社内职员关于营业上的利益的。第六层：就是要社务发达，务必要账目清楚。我们社内的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种。“日算”是每日晚上将营业的账算出结果，“月算”是每月一号将上月全月内的账算出结果，“半年算”是将半年的账算出结果。这本社务报告里面所列的“营业情形”，就是“第一个半年算”的结果。我们有了这一算，手续既到，观念乃明，改正旧的失误，定出新的方案，便容易地求进步了。

三

在第一期社务报告里报告了的，此处就不报告了。文化书社自去年八月一日假楚怡小学开会发起，八月二十日订约承租潮宗街湘雅医学校房屋之一部为社址，九月九日营业开幕，并十月二十二日假长沙县署开第一次议事会以后，几个月间社中可记的事，略如下述。

1. 议事会临时会。十二月二十九日假长沙县署开议事会临时会，到会者：姜咏洪、贺寿乾、王季范、周惇元、郭涛僧、彭荫柏、熊瑾玎、易礼容、赵运文、刘驭皆、毛润之诸君。姜君咏洪主席，讨论“另觅社址”及“添筹股本”两个问题。首先讨论社址问题，因现社址僻处草潮门一隅，房屋亦觉不够，欲图社务发达，宜于较为适中的地点觅一较为宽大的房屋。决议社址自要迁移，惟须慎重，务期一迁，便可安固。在未觅到相当房屋并布置清楚以前，自在湘雅原处。因开会之前日船山学社总理仇亦山君允将学社房屋

一部分借用于书社，众以此举甚善，惟须明定契约，不背“安固进行”之目的才好。结果决定由本社与船山再切实交涉。次讨论经费问题。第一次议事会议决本年筹足千元，现尚少五百三十元，大家的零募不是办法，姜君咏洪乃愿独力筹措此五百三十元。遂散会。

2. 与商务等书局订约。此为本年一月以后的事。本年一月以前，外埠书局如“中华”“亚东”“泰东”“新青年社”“北大出版部”“学术讲演会”等，均经订约销书，至本年一月，始由杨君端六介绍上海商务印书馆订约分销。分销的折扣，七、八、九折不等。二月，与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交涉销书亦成，惟伊文思是一个西书公司，中文书甚少，湘省现在于西书不甚需要，故不能多销。三月，北京成立了一个新知书社，是和文化书社宗旨大致相同的一个新起的书社，刊印一部《罗素五大讲演》与本社交涉代销预约，本社已答应代销。有一个在四川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将他在四川未销完的书托本社代销；又有一个在北京的“亚洲文明协会”，托本社代售其新改组出版的《时事月刊》，本社均经答应。此外新起的杂志社与本社交涉代销者，在这个期内尚有多家。

3. 书报畅销。本社所销的书百六十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三种，在去年开幕至本年三月底，除开寒假时一个月外，余月均很畅销，社里总是供不应求。一面固因为本社资本太少，不能向外埠大批买书，小批则随到随尽的原故；一面也是社会对于新出版物的需要骤然迫切起来，受了新思潮的正面刺激和旧思想的反面刺激，一时感发兴起，尽力购读，实在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买书的人，自然以学界为多，但如《劳动界》等小册子，销于劳动者间的也不少。以年龄论，买书的人自然以青年为多，壮年以上的人次之。

4. 成立分社。本社既欲各县均有购买新书的机会，就非在七十

五县都设立分社不可。本社对于设立分社，并不是本社自己去设，只是帮助各县的同志在各县去设立起来。不知本社内容的人或疑分社设立甚难，其实为事至易。资本只要买第一批书第二批书的钱，少则五十元，多则百元，第三批以后，即将头二批的书价收回转购便得，——是一。各县生意多，固无问题，生意少，也不要紧，分社横直是附着公共地方开设，不要独立门面，开销便不要多，僻县陋镇，或一年只能销几十元乃至几元的书都不要紧，——是二。本社对于分社照本退与，不赚分文，所有优价折扣，都归分社，因此分社即因生意少不能多得赢利，亦断不至亏耗本钱，——是三。附带经营，不须多的人员，——是四。销不完的书，可以退还本社，不至因为滞销至于虚耗，——是五。有此五层，所以说开设分社是“至易”的。本社截至今年三月底，已经成立了的分社凡七，即“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七处。分社外尚有“贩卖部”七处。“分社”何以别于“贩卖部”呢？1. 分社可以得到全部的优价，就是折扣照原店全部让与；贩卖部要少一点，只能有百分之五的报酬。2. 分社在外县，贩卖部在本城的各校或个人(个人专贩卖小册子于平民及劳动界的，仍让与优价)。

四

上述之七分社及七贩卖部，今依成立的次序，将其“成立的月日”“设立的地点”“创办人”“销书额”四项略列于下。至其详细状况，本社已向各分社征集，容后具报。凡下所列，截于三月底止，四月一日以后成立的分社及贩卖部未列。

分社

平江文化书社　　九年十一月三日成立，设在平江县城救贫工厂。创办人：张子谋、李六如、喻寄浑、吴大拙、方维夏等。销书额约六十元。

浏西文化书社　　九年十一月十日成立，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创办人：宋先觉、陈章甫等。销书额约六十元。

武冈文化书社　　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成立，设在武冈中学校。创办人：邓宗禹、夏大纶、戴华声、夏昌言、戴源漳、欧阳刚中等。销书额约四十元。

宝庆文化书社　　十年一月八日成立，设在宝庆城内武庙区立第三国民学校。创办人：匡日休、黄麟、贺民范等。销书额约一百二十元。

衡阳文化书社　　十年三月二十日成立，设在第三师范。创办人：屈子健、贺恕等。销书额约八十元。

宁乡文化书社　　十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设在劝学所。创办人：萧淑沩、姜肖岩、何叔衡等。销书额约五十元。

溆浦文化书社　　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成立，设在劝学所。创办人：邹士桢、蒋竹如、周显槐、官坤、胡剑峰、吴家瑛、舒修序、易克穮、龚伯安等。销书额约七十元。

贩卖部

第一师范学校贩卖部　　经理人黄铁和等。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贩卖部　　经理人熊科易、李运鸿等。

楚怡小学贩卖部　　经理人谭协吾、刘仲楷、姚家闻等。

修业学校贩卖部　　经理人刘驭皆、张自任、李振玉等。

杨世才

何浴秋

蔡增准

五

文化书社自民国九年九月起，至民国十年三月三十一号止，七个月间的营业状况，开列于下：

一、收入方面

书社在七个月间以书籍杂志日报售出。所收入的代售。(分项以细账为准)。

（甲）书、杂志；

（1）现金零卖的收入：洋捌百陆拾玖元捌角陆分捌；钱叁百陆拾陆千柒百捌拾文。

（2）顾主记账的收入：洋壹千肆百壹拾伍元捌角柒分伍；钱贰百叁拾叁千捌百叁拾文。

（3）分社柒家的收入：洋叁百肆拾贰元壹角伍分陆厘肆毛捌；钱贰拾千零贰百壹拾文。

（4）贩卖部柒家的收入：洋壹百玖拾伍元肆角柒分叁厘肆毛伍；钱陆拾陆千贰百叁拾文。

（5）定杂志的收入（指杂志已经付出去了的前收定价）：洋壹百伍拾玖元零壹分叁；钱伍千玖百捌拾文。

（6）本社退还原店的书作卖出论：洋伍拾元零壹角肆分伍；钱贰千壹百文。

甲项共计：洋叁千零叁拾贰元伍角叁分零玖毛叁；钱陆百玖拾伍串壹百叁拾文。

（乙）报

（1）时事新报：洋叁百叁拾叁元肆角肆分肆厘肆；钱叁拾壹千贰百叁拾文。

（2）晨报：洋贰百零贰元叁角玖分柒厘；钱贰拾伍千叁百伍拾文。

（3）大公报：洋玖元肆角玖分肆。

（4）湖南日报：洋肆元肆角。

（5）实话报：洋叁元陆角玖分壹。

乙项共计：洋伍百伍拾叁元肆角贰分陆厘肆；钱伍拾陆串伍百捌拾文。

甲乙两项：洋叁千伍百捌拾伍元玖角伍分柒厘叁毛叁；钱柒百伍拾壹千柒百壹拾文，扣洋肆百陆拾肆元零壹分捌。

共计洋肆千零肆拾玖元玖角柒分伍厘叁毛叁——七个月间的总收入。

二、付出方面

本社在七个月间从外埠买来书报所付出的代价及营业上之消耗。（分项以细账为准）

（一）书报代价付出

（甲）书局及杂志社：

（1）上海泰东图书馆：柒百玖拾捌元玖角伍分伍。

（2）广州新青年社：伍百叁拾陆元伍角伍。

（3）上海亚东图书局：肆百伍拾叁元陆角肆。

（4）北京大学出版部：贰百叁拾元零陆角贰分捌。

（5）上海中华书局：贰百零叁元壹角捌。

（6）武昌利群书社：壹百伍拾柒元柒角肆分伍。

（7）北京晨报社：壹百伍拾伍元零壹分伍。

（8）北京学术讲演会：壹百贰拾肆元叁角柒分陆厘贰毛伍。

（9）长沙群益书社：玖拾柒元伍角伍。

（10）成都华阳书报流通处：伍拾玖元柒角；叁千陆百文。

（11）上海商务印书馆：陆拾玖元贰角捌分伍。

（12）上海新妇女社：伍拾叁元贰角伍分柒。

（13）上海新教育共进社：肆拾贰元肆角陆分肆。

（14）北京新生活社：肆拾壹元叁角叁。

（15）江苏省教育会：叁拾元零捌分伍。

（16）北京罗宗翰：贰拾捌元陆角伍。

（17）长沙矿业杂志社：贰拾元。

（18）北京易家钺：壹拾玖元贰角。

（19）长沙熊瑾玎：肆拾串文。

（20）南京暨南学校：拾陆元肆角陆。

（21）上海中国科学社：拾贰元肆角捌。

（22）北京新中国杂志社：拾壹元玖角。

（23）北京林毓兰：拾元零贰角。

（24）唐山工业专门科学的唐山社：拾元零捌分。

（25）长沙新民学会：拾伍串玖百文。

（26）北京高师教育丛刊社：玖元贰角。

（27）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捌元柒角伍。

（28）北大绘学杂志社：捌元柒角伍。

（29）海外新声社：拾叁串陆百文。

（30）北京劳动音周刊社：捌元壹角柒分捌。

（31）北京曙光杂志社：捌元。

（32）北大音乐杂志社：柒元捌角。

（33）苏州妇女评论社：柒元陆角捌。

（34）北京家庭研究社：柒元贰。

（35）上海学术研究会：陆元肆角伍分。

（36）上海广文书局：陆元。

（37）长沙任策奇：伍元柒角。

（38）上海工商友谊会：伍元伍角柒。

（39）广州劳动者社：肆元捌角。

（40）北京通俗医事月刊社：肆元捌角。

（41）长沙罗毅：肆元陆角柒分伍。

（42）武昌高师教育学术研究会：肆元。

（43）上海李若松：肆元。

（44）长沙黄和钧：陆千文。

（45）北大数理杂志社：叁元捌角。

（46）上海复旦大学平民周刊社：叁元伍角。

（47）巴黎华工旬刊社：伍串伍百捌拾文。

（48）北京女高师周刊社：叁元壹角肆分伍。

（49）北京亚洲文明协会：叁元。

（50）新少年社：贰元柒角叁分。

（51）武昌高师数理学会：贰元陆角肆。

（52）湖南省教育会：贰元伍角。

（53）北京高师英文学会：贰元肆角。

（54）福州通俗卫生社：贰元肆角。

（55）南京暨南学校中国与南洋杂志社：贰元壹角陆。

（56）北京高师数理学会：贰元壹角。

（57）上海友世画报社：贰元。

（58）少年社会杂志社：贰元。

（59）长沙汇同印刷局：壹元陆角捌分。

（60）上海民心周刊社：壹元陆角。

（61）北京高师工学会：玖角陆分。

（62）北京人道月刊社：柒角。

（63）北京奋斗周刊社：陆角叁分。

（64）北京实业周刊社：伍角。

（65）北京批评周刊社：肆角。

甲项共计：洋叁千叁百叁拾伍元壹角贰分捌厘贰毛伍，钱捌拾肆串陆百捌拾文，扣洋伍拾贰元贰角柒分——共计洋叁千叁百捌拾柒元叁角玖分捌厘贰毛伍。内减“社内存货”伍百陆拾元零捌角贰分陆厘柒毛伍。

甲项实付去洋贰千捌百贰拾陆元伍角柒分壹厘伍。

（乙）报馆

时事新报馆：贰百壹拾柒元叁角伍。

晨报社：壹百伍拾元零肆分。

大公报馆：捌元捌角叁。

湖南日报馆：叁元伍角。

实话报馆：伍元玖角伍。

乙项共计：洋叁百捌拾伍元陆角柒分。

甲乙二项共计：叁千贰百壹拾贰元贰角肆分壹厘伍。

（二）营业消耗付出

（甲）薪水：

经理员一营业员三——一管书、一收账兼管报、一管报，烧饭兼走杂一，特别交涉员一。

共洋：叁百玖拾元零贰角肆分。

（乙）杂耗：

邮费、汇费、印刷费、广告、纸张、房租、其他杂耗等。

共洋：叁百肆拾元零伍角壹分叁。

甲乙二项共计：洋柒百叁拾元零柒角伍分叁。

以上付去方面共计：洋叁千玖百肆拾贰元玖角玖分肆厘伍。

收付两抵：得“纯利”壹百零陆元玖角捌分零捌毛叁——七个月间营业上的实在赢余。

六

营业上经济的情形，既知上述，谅大家都明白了。至于本社推销书报的情形，也应该有一种统计：一来，见某种书在湖南销数若干，便知某种书所及于湖南人的影响；二来，每半年有一次统计，可以比较某种书每半年销数的进退。但要将所有的书报一并列出，其事很烦，今以不甚重要的不列，下列的各种，都是书的内容比较重要些的。凡称“部”，是一书有二册以上的；称“本”，是一书只有一册的。

（一）重要的书：

杜威五大讲演，二百二十部；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二百本；社会主义史，一百部；到自由之路，六十本；工团主义，六十本；现代教育之趋势，百六十本；动的新教授，百五十本；社会与教育，百五十本；实验主义，一百本；社会与伦理，五十本；美国民治之发展，七十本；科学与人类进化之关系，八十本；蔡孑民言行录，一百本；迷信与心理，一百本；点滴，八十部；伦理学之根本问

题，五十部；西洋伦理学史，四十部；社会改造原理，一百部；晨报小说第一集，二百本；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二百本；新俄国之研究，八十本；劳农政府与中国，八十本；朏盦客座谈话，四十部；托尔斯太〈泰〉传，一百本；教育哲学，百五十本；试验论理学，二百五十本；协力主义政治经济学，四十部；哲学史，一百五十本；中国哲学史大纲，八十本；中国文法通论，六十部；南洋群岛，三十部；南洋，四十本；新标点儒林外史，百四十本；新标点水浒，一百部；白话书信，百八十部；短篇小说，百三十本；尝试集，百四十本；达尔文物种原始，三十部；赫克尔一元哲学，三十五部；罗素政治理想，七十本；女性论，七十本；国语组织法，八十本；社会问题概观，四十部；思维术，四十本；欧洲和议后之经济，六十本；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七十本；哲学问题，二十本。

（二）重要的杂志：

新青年（月刊），二千本；劳动界（周刊），五千本；新潮（月刊），二百本；平民教育（周刊），三百本；新生活（半月刊），二千四百本；新教育（月刊），三百本；少年中国（月刊），六百本；少年世界（月刊），二百八十本；科学（月刊），一百本；中华教育界（月刊），二百本；改造，百八十本；民译，二百五十本。

（三）重要的报：

时事新报，每天七十五份；晨报，每天四十五份。

七

社员所投股本，今依交到次序，披露于下：

八月八日，赵君运文光洋十元。

八月二十四日，朱君剑帆光洋一元，纸洋九元。

八月二十五日，易君培基光洋十元。

八月二十八日，郭君开第光洋五元。

八月三十一日，王君季范光洋五元；吴君小山纸洋十元。

九月三日，潘君实岑铜元八串一百文；方君维夏铜元七千八百文；易君礼容光洋十元。

九月四日，刘君驭皆纸洋五元。

九月八日，姜君济寰现洋二十八元，纸洋十二元；林君韵源纸洋五元。

九月九日，姜〔君〕济寰小纸洋五十九元三角，钱一百文，纸洋六元。

九月二十四日，陶君毅光洋十元；周君世钊纸洋二元，钱二百文；熊君楚雄纸洋二元，钱二百文。

九月二十七日，郭君开第光洋五元；林君韵源纸洋五元。

十月二日，熊君楚雄纸洋八元。

十月四日，潘君实岑纸洋五元。

十月五日，王君季范光洋五元。

十月十七日，毛君泽东光洋十元。

十月二十日，邹君蕴真纸洋三元；大公报馆光洋八元八角三分。

十月二十三日，刘君驭皆纸洋五元。

十月二十九日，熊君梦飞光洋四元。

十一月一日，周君世钊光洋一元，纸洋三元。

十一月四日，匡君日休光洋六元；唐君吉杰光洋十元；何君叔衡纸洋八元；周君世钊纸洋四元。

十月十三日，左君学谦铜元一百四十八千五百文，纸洋一百元。

十一月五日，贺君民范光洋五元；仇君鳌光洋十元。

十一月八日，陈君书农纸洋十元。

十一月十五日，彭君璜光洋三元。

十一月二十一日，任君慕尧光洋二元。

十二月九日，大公报馆光洋一元一角七分。

十二月二十一日，方君维夏光洋五元。

十年一月十八日，左君式民光洋十元。

二月二十七日，王君林苏光洋二元；姜君济寰光洋二百元。

纸币折成光洋，合共收光洋六百九零二元六角三分五，钱一百四十九串二百文。

八

本社职员

易礼容（经理）

毛泽东（特别交涉员）

李庠（营业员——管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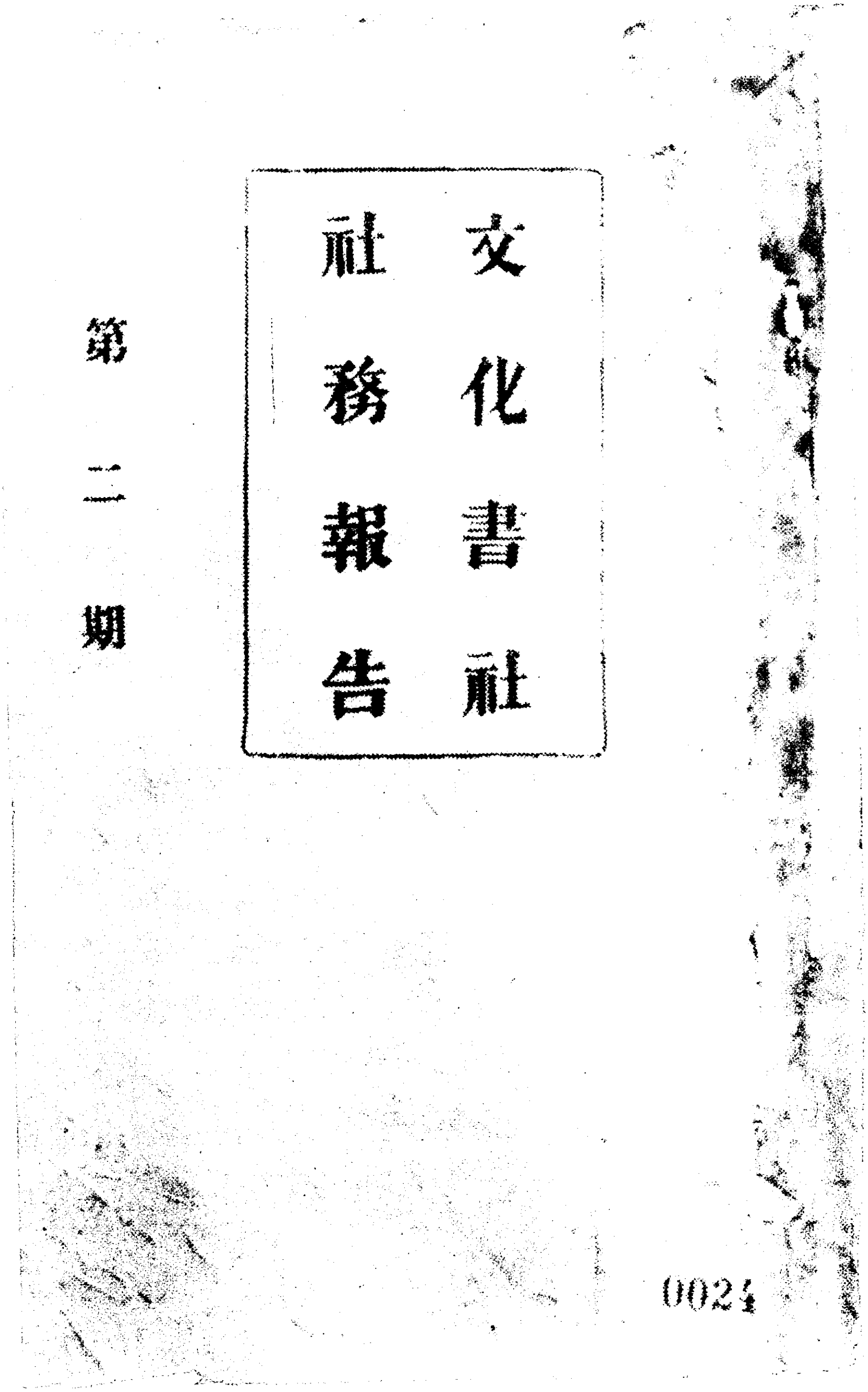
唐自光（营业员——管报兼管书）

王仙梅（营业员——管报）

黄德安（烧饭兼走杂）

以上是现在的职员。在这个时期内尚有陈君子博、任君培道在社各担任营业约二个月。

社设在长沙潮宗街五十六号。



文化書社

社務報告

第二期

0024

文化书社社务报告。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1921年夏）

这一本会务报告乃专记十年一月长沙会友三次会议情形。这三次会议，头一次是新年大会，在一月一、二、三号。第二次是本年一月常会，在一月十六号。第三次是本年二月常会，在二月二十号。这三次讨论，极为详尽，分记于次。

新民学会长沙会友因湖南政局影响，好久没有开会。九年年尽，长沙政局略定，会友在此者亦达二十余人，遂谋聚会一次。此时评议员任期（一年）已满，不能开会。遂由职员何叔衡、周惇元、毛润之、熊瑾玎、陶斯咏等，先期商定开会手续，发出一张通告：

一、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因种种原因没有开成，今定从十年一月一号起接连开会三天，为较长期的聚会，讨论下列各种问题：

1.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2.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3.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4.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自述）；
5.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自述）；
6.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7. 会友如何研究学术；

8. 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9.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及手续（附出会问题）；

10. 会友室家问题；

11. 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12. 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13. 学会成立纪念问题；

14. 临时提议。

上列各项问题，或为巴黎会友所提议，或为此间同人所急待解决，请各人先时研究准备，以便于开会时发表意见，而期得到一种适当的解决。开会地点：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会时间：第一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第二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二时（各带餐费二角）；第三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半。务希拨冗到会，风雨无阻，并请严守时刻。

十年一月一日，在文化书社开会，到会者十余人，是日大雪满城，寒光绚烂，景象簇新。十时开会，何君叔衡主席，主席请毛润之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毛君说：我们学会久应开会，去年以前，因种种变故，到未开成，现在算是不能再缓了，趁在新年，各处都放了假，特为较长期的集会，讨论同人认为最急切的各种问题。至于本学会经过情形，可大略报告，遂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国外各方面做事求学情形，大略报告一遍。毛君报告毕，主席将要讨论的各问题提出。陈启民以开始三问题内容重大，主张压下到明日讨论，圈出其余问题之几个，在今日讨论。毛润之谓因其重大，今日宜略加讨论，但不表决。众赞成，于是开始讨论下面三个问题：

“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

“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三问题有联带关系，故连带讨论。毛润之云：我可将巴黎会友对于上列问题讨论的结果，报告大众。巴黎会友讨论的结果，对于（一），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二），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急进方法，一部分则主张用缓进方法；对于（三），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均见巴黎来信。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谓第一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荫柏云：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谓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们不能为他们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们也应负责。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目的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用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

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讨论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问题（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讨论。

主席请众讨论下面的问题：

“学会本体及会友个人应取什么态度?”

毛润之报告会友在上海半淞园讨论的结果，主张学会取潜在进行态度。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巴黎来信言我们学会好处在稳健，不好处在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至于会友个人相互间的态度，主张“互助”“互勉”。众赞成上海的决议。（态度问题解决）主席提出“会友如何研究学术”的问题，毛润之报告巴黎会友对于共同或分别研究学术的进行（见萧子升来信）。并主张规定研究的对象，宜提出几种主义（如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定期逐一加以研究，较之随便泛泛看书，有益得多。陈启民云：我觉得环境每把人扯之向下，所以会友集合一处，同居共学，是必要的。集合多人力量去改造环境，要容易些。熊瑾玎谓：同居，开会，两个办法，都是必要的。何叔衡主张开办平民饭店。易礼容云：只要能住在一起，即职业不同，亦可以常相聚合。毛润之云：须组织一种公共职业才能同居，现在且讨论怎样研究学术的问题。李承德云：我们不但要研究社会主义，哲学、科学、文学、美学……都要研究。朱子有言：从大处着想，从小处着手，会友也要采这种态度，我们不妨用种种的手段，去达到目的。毛润之云：各种普通或专门学术，当让会友去自由研究。现会中所特要研究者，必为会友所共同注意且觉为现在急需的。主张单研究主义，如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陈启民主张规定一个计划，在本年内研究几个

主义，完期得到结果。毛润之主张暂作半年预算，研究五六个主义。何叔衡君主张每月聚会一次，研究有得的可来谈，其余的可来听。彭荫柏谓社会主义、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皆有研究的必要，不赞成专研究主义。毛润之申明云：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

以下又讨论如何看书：有主张单独看书以其心得来讲演者，有主张共同看一种书开会时各述所见者，尚未完全决定。惟每月开会一回专讨论学术，则已决定。未决定者，主张俟下次开会再决，新年大会不议。（研究学术问题大体解决）

于是进行讨论“会章之修正及会费之添筹”。

本来学会会章，久应修正了，前此多人主张把会章改简略些，巴黎来信亦主此说。但是日忙于讨论各种问题，要将会章即行修正，实做不到。毛润之主张推定起草员，草定后由长沙方面会友开会表决，再征求巴黎及各地会友的同意。众主张即委职员起草。至于会费的添筹，为刷制会务报告和通信集，主张每年加收一元。（会章及会费问题解决）

对于“新会友入会条件及手续并出会”的问题，是日讨论决定如下：

新会友入会的条件（即为会友的信条）：（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

新会友入会的手续：五人介绍；通告全体会员（省去由评议部通过，因是日主张不设评议部之故）。

会员出会问题，因有些名义上是会员实质上非会员的，决定：（一）在会务报告内登启事（见下）；（二）会友录里不列名；（三）

开会时不约。通过启事如下：

敬启者：本会会员结合，以互助互勉为鹄；自七年夏初成立，至今将及三年，虽形式未周，而精神一贯。惟会员对于会的精神，间或未能了解。有牵于他种事势不能分其注意之力于本会者；有在他种团体感情甚洽因而对于本会无感情者；有缺乏团体生活的兴味者；有毫无向上之要求者；有行为不为多数会友满意者。本会对于有上述情形之人，认为虽曾列名为会友，实无互助互勉之可能。为保全会的精神起见，惟有不再认其为会员。并希望以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求无上列情形者，本会前途幸甚！

新民学会启
十年一月二日

（以上会员入会出会问题解决）

一月二号为聚会的第二日，大雪越深，到会者十余人（昨日到会者今日均到），因有昨天未到今天到会的人，主席（何叔衡）将昨天讨论及议决过的问题大略报告一番。继续讨论昨天未完的第一个问题：“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

用循环发言法，从主席起，列席诸人自左至右依次发言：

何叔衡：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

毛润之：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任培道：同上

陶斯咏：同上

易阅灰：同上

易礼容：同上

邹泮清：我对于改造两字极为怀疑，一般人都以为我们要根本改造，要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其实是做不到的。世界无论什么事，不可一跃而几，是渐渐进化的。新民学会不宜取改造的态度，宜取研究的态度，将各种主义方法彻底研究，看哪一种主义方法适宜。东西民族不同，人类病痛极杂，决非一剂单方可以诊好。邹君发言极长。

陈章甫：言改造世界，范围较大。可以世界为家，心意愉快的多，故我赞成用“改造中国及世界”。

张泉山：我另有一个主张今可不提；单就方才所说讨论，不宜以中国与世界并举，宜用“改造中国并推及世界”。

陈子博：现社会为万恶的，改良两字和缓不能收效，宜取急进态度，所以我主张改造。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故我主张删去中国二字用“改造世界”。

钟楚生：我们目的不妨大点，主张用“改造世界”。

贺延祜：同钟

彭荫柏：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自愿抛弃昨日“改造东亚”的话。

熊瑾玎：主张用“改造世界”。

刘继庄：同熊

李承德：主张用“促使社会进化”。

周惇元：同李

都发言毕，相互略有批评。主席云：昨日曾言不取表决形式，但事实上无表决则不能明白分别某种主张的多数少数。众赞成表决。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中国及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陶斯咏、易礼容、毛润之、钟楚生、周惇元、任培道、陈

启民、易阅灰、陈章甫、彭荫柏（十人）。主席说：主张用“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的起立！起立的如下：熊瑾玎、刘继庄、陈子博、何叔衡、贺延祜（五人）。以上二种主张文字上虽稍异，实质实是一致。于是主席又说：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起立，起立的如下：李承德、周惇元（二人）。周惇元声明云：我于“改造中国与世界”与“促社会进化”都赞成。此外声明不作表决者邹泮清、张泉山二人。(目的问题解决)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 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

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原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的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泮清：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祜：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荫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天下不尽是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W.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贯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要做破坏工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设亦须预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实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用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彭荫柏谓：一点一滴的改造，亦

须趋向共同目的。任培道赞成陈启民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话，惟谓病后宜有补剂，教育其补剂也。邹泮清仍反对改造说，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谓人有人心道心，不能尽善，故须点滴改革。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玎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做工。毛润之谓：人人做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泛劳动主义。周惇元不赞成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做工。

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克穰、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二人：任培道、邹泮清。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方法问题大体解决)

以上第二日完。中午叙餐。

一月三号，为集会第三日。首先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问题。仍依次发表意见：

何叔衡：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如陈炯明之类，亦宜接洽。

陈启民：研究宜重比较，取精用宏。宣传宜兼重知识阶级，使无弃才。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周惇元：从下级入手，宜渐进，重普遍，立脚宜稳，点滴做

去。学校和饭店，皆吾人着手处。研究宜深。

熊瑾玎：先研究，而后从事下手之法。下手之法，宜重传播。学校以自办的为好。再则从事普遍之宣传，办报亦其一法。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发财不是为自己而发财，只要有目的，有组织。

彭荫柏：研究、传播、组织、联络四者都不可缺。研究宜方面多，科学、文学、哲学、经济、政治不偏废。各以所得互相交换。传播宜兼重知识阶级。组织劳动党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联络，则个人、团体，宜兼顾，如少年中国学会，其可联络者。

贺延祜：研究、传播，甚要；尤宜自己投身到劳动界去。

陈子博：自己到劳动界去多发小册子，语言无妨激烈一点。组党分都市、乡村两方面，洪会可利用。

易阅灰：社会主义青年团可资取法。

姜瑞瑜：发展个人特殊能力，利用机会。教育宜着重。

张泉山：主客观两方面宜兼重，客观方面分三种方法：(1) 宣传。分为三：(a) 学校；(b) 小册子；(c) 秘密演讲。(2) 组织。(3) 联络。分为三：(a) 个人；(b) 小团体；(c) 大团体，如俄国。主观方面宜增高个人能力。

陈章甫：研究宜即时着手。宣传如文化书社，最有效力。我县自浏西文化书社成立，教育人员发生极大之忏悔，即其例。须从市民运动入手，多讲演，多联络，联络可仿颜习斋医病教人办法。饭铺，茶店，最好着手。组织菜园，实行从劳动界入手。夜学要多办。联络要自己到劳动界去，并宜及于女界。

邹泮清：世界是积渐进化的，宜点滴改造，宜温和。从现时现

地做起。注重教育实业。办教育实业要资本，但借外资，仍宜反对。宣传着重劳动阶级，为长时之宣传。教育是基本事业，从学校制造同志最为坚强有力，一个真同志，抵得若干泛人。募捐办学校，由小学而中学大学，由长沙而各省各国，积渐前进，久而可靠。办报注重通俗。

蒋集虚：做事要钱，筹办要从事实业，望各人分工进行。

易礼容：过激主义本不可怕，不研究自然怕他，研究要深切。宣传以诚恳态度出之必有成效。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艺术家以暗示的方法行之。

陶斯咏：我所要说者，宜云：“我个人即刻如何着手?”我的答复是：“我个人要即刻读书。”

任培道：从自己读书做起。

毛润之：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络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体，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依次发言毕，相互讨论，对于所举各种着手方法，多谓宜以必要而且切实可行者为主。主席遂将上面各人所述着手方法，综合序列如下：

着手方法：

1. 研究及修养：

    A. 主义；

    B. 各项学术。

2. 组织：

   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3. 宣传：

    A. 教育；
    B. 报及小册；
    C. 演说。

4. 联络同志。

5. 基本金：

   组织储蓄会。

6. 基本事业：

    A. 学校（又夜学）；
    B. 推广文化书社；
    C. 印刷局；
    D. 编辑社；
    E. 通俗报；
    F. 讲演团；
    G. 菜园。

于是主席以赞成上面六项各节为会友进行着手方法付表决，全体起立。(着手方法问题解决)

次讨论“会友室家问题”：

陈章甫报告巴黎会友来信的内容。并谓会友多感室家的苦痛，急宜设法解决。毛润之谓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现在青年有室家痛苦的极多，会友中亦大多数有此痛苦，此时不求解决，将来更无办法。相继自述有室家痛苦者多人。有主张组织“夫人改造学校”

者，有主张组织“工厂”者，有主张组织“女子工读学校”者。结果照巴黎来信，先组织“妇女成美会”，推举陶斯咏、易礼容、陈章甫、任培道为筹备员；究用何种救济方法，请四人筹商后得有结果，再行商决。（以上室家问题解决）

次讨论“学会纪念日问题”：

一致主张以四月十七日为学会成立纪念日，各地会员是日分别集会叙餐。

次讨论“会友健康及娱乐问题”：

大家认此为重要问题。惟“增进健康”一项，如早起，运动，沐浴，节劳，戒烟酒等，不便表决规定，应由会友个人去斟酌力行；但表决“增进娱乐”的各种集会如下：

1. 游江会：阴历五、七、八三个月择期举行三次以上。
2. 游山会：春夏秋三季择期举行三次。
3. 踏青会：三月三日。
4. 聚餐会：每月一次，于每月例会日举行，每餐各备铜元二十枚。
5. 踏雪会：遇雪临时集会。
6. 球会：各会员自由组合。

（以上健康及娱乐问题解决）

此外尚有“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及“个性之介绍批评”三个问题，因时促不能讨论，等本年一月常会解决。

第三日自上午十时起讨论，至下午二时方散。是日全体至草潮门外河干拍照，大雪拥封，照后不现。

一月十六日，为长沙会友十年一月常会期，仍在文化书社开

会，到会者二十一人。何叔衡主席：报告今天系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之问题。问题凡三：（一）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二）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三）个性之介绍及批评。请大家先讨论第一问题：

“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

列席二十一人，依次发言：

何叔衡：我的计划狭小，将来仍当小学教员。想在我的本乡办一学校。在三年以内要往国内各地调查一次。同时不忘看书研究。从前想学外国文，但现觉年纪大了，不能学好。然还想学习日本文，以能看日本书为主。做事从最小范围起。

周惇元：目的在研究学术，想于文学及哲学上用一点功。将来事业则在教育。现在进行：想在两年学好英文。前想进学校，今觉中国学校无可进了。想在近筹一点钱赴日本，惟不易办。赴日虽不甚好，但一、可绝外缘，免去在国内时的纷扰；二、日本虽无独立文化，但感受最快，并非无学可求。筹款困难时，或要借助官费。

彭荫柏：从前本想终身站在实业界，所以进了商业学校。后知商业不适个性，便把他丢掉了。从前我有一种野心：学好数国文字；对于形而上学，也想懂得一点大概；又想于实业上有所贡献，于海外贸易有所进行。但是现在变更了：觉得要使社会改造，非于经济政治上有所改造不可。前想留美，因无钱打止；后又想到法国去；去年以来，又想赴俄；现仍想由法赴俄。在长沙，至多不过两年了。在长沙，除解决自己生活之外，还想帮助劳动组织。求学方面，还是初心，但文字只想学英俄两国了。

钟楚生：我自己觉得只能在教育界生活，并且愿意只在教育界生活。我从前本已进了中学，因故改入师范。师校毕业，因本省高等师范不好，不愿去，因此做了教员。因循至今，随便又是几年。

将来仍想在教育上用功，想筹钱到日本去一次。

陈子博：俟中学毕业后再定计划。在长沙时，一面对于社会上做点事，对兵与工，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将自己的功课预备一番。

谢南岭：我认为改造社会，应当从最下级——乡村——做起，所以乡村教育，极愿尽力。师校毕业后，决定升学，或西南大学，或高师，或高工，升学毕业后，决在乡村中做事。改变普通人做便宜事做高贵事的心理态度。

张泉山：我从前只有求学上的计划，去年以来，又有事业上的计划了。我对于学问，想从数学、物理学、化学下手。现在有闲就读英文。我于自身生活以外，担负一个老弟的学费，因此当在长沙再留一年半，仍从事教员生活。

蒋集虚：想做一个教育者，从事小学中学的教育事业。师校毕业后，教书，积钱，再入高等师范，然后往外国留学。从事教育时，拟集合同志，自办学校。

毛润之：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喜研究哲学。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上，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

苦的牺牲）。以后想办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罗耻迂：终身事业：教育。教育是为人类的，为社会的，所以对于社会学欲有所研究。研究的方法不能确定，或自修，或学校，或国内，或国外。至于目前，从阴历明年正月起，读英文。在五年以内，要使英文学到可以看书。

夏蔓伯：深信工学并行，与脑体共用之理，想一面研究教育，一面学习工艺，这是目的。方法：第一决定在师范毕业，毕业后任教员几年，教书时并兼从事研究与练习工艺。十年后，再出洋。

邹半耕：我的计划筹想了多年，几经修正，现在似乎有一点把握了。我意一个人的事业不外研究与发表两节。我个人想研究文学及哲学（广义的），拟以一年温习曾学过的各种自然科学，再以二年习文学，再以一年习英文。这四年中附带教课（不当主任），无课则事研究。四年后往日本，至少住一年。惟不愿进学校，因我从来反对他。此后再以五年求学，详细不能悬拟，或竟赴西洋亦难定。以上是我的十年研究计划，此后再从事发表。至我不赞成学校，因学校不足成学。

易阅灰：我近来认定我自己最后要做一个教育者。预备工夫，先学外国文；至少学好英文、法文、日文，注重英文。将教育学与学外国文合为一起，看英文教育学。我又认学校无进的必要，决定在年半以内从事教育的工作。每天做四小时工，读六小时书。

陈启民：发言很长，记其大要。

陈云：我个人计划，一是终身的，为终身读书计划。这是根据我自己的宇宙观和个性来决定的。我觉宇宙只是空间时间二者。时间是直线，空间是整块，都不是破碎的。我个性则是喜欢多方面。因此觉得宇宙间人之所欲学，皆吾之所欲学。宇宙间人之所曾论

思，皆吾之所欲论思。文学、哲学、科学，皆吾之所欲学。我愿做一个学术界的托拉斯。学问暂时不能定系统。升学不升学，出洋不出洋，觉得皆不成问题。因学校不足以范围我，我可以利用学校，所以或者再入学校。至于出洋，世界上学问分两大支，一支属亚，一支属欧；我从前有一种见解，对亚洲想集中研究中国的学问，推及印度、日本，对欧洲，则不能说集中哪一国，所以想先研究亚洲学，这是我从前的想法。后来又想用西方的方法，求东方的学问。现在则想东西并进。至将来到外国去，以一国为常驻，以各国为游行，作一个学术界的猎夫。我于升学，不定在哪一年和哪个学校。至读书的时间，原无穷尽，死而后已。以上说终身的计划。再说目前的计划。为经济压迫，不能外出，但这正是成全我，因为我想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学。中国学的下手注重周秦；周秦以下，无学可说。宋受佛学影响，当别论。清为复古时代，自当研究。我想以历史的方法治中国的学问而集中于哲学和文学二面。我以为冷静方面的学问当在后，人事方面如政治、经济等当在先。而西方的政治、经济，均大规模有组织，所以我对于西方学拟集中于政治、经济的方面。我从前有两年学好三国文字的计划，因事实阻碍，近又订了三年学好两国文字的计划。英文而外法文和日文都是要学的。

贺延祜：我的计划随时变易，前学师范，无甚计划，毕业后教了几年课，想进高师，未果。现拟学医，因此想学英文、化学、生理学等。因经济不能独立，拟做两年事，集一点钱，再进医校，医系一种职业，可以救人。做事时兼学英文、化学。

吴毓珍：想到法国勤工俭学，但因无钱恐不能去，现在还是筹钱。一面筹钱，一面读点英文。

陶斯咏：陈先生想做一个学问上的托拉斯，我只好做一个拣煤

炭的小孩子。我在师范毕业后，因经济，不能升学，就想教课数年，储金升学，不料至今还是原样。久想邀伴自读，几经设法无成。去年想入北高，未果。去夏至南高想入又未果。以后仍只在周南，一边做事，一边研究，从心理学、教育学和英文入手。同时想联络省城各处女友，我觉求友不一定要求胜己，诸凡有志，即当联络。

任培道：从前许多计划都失败了。先前本想升学，后因经费及地点的困难未能。因决计当小学教员，一求增进经验，一求储积费用。在溆浦数年，亦无成效。去年想到法国去，也因无钱未成。因力辞校事，想在长沙专门对于学问用一点功，即到长沙，也不能实现，现在仍只好一面解决生活，一面学习英文，再等机会升学。

吴家瑛：在学生时代计划和希望很大，及入社会经历数年，从前计划打消好多了！现亦无具体的计划可说，惟对于学问事业两面，总是抱一种向前进行的意思罢了。

唐文甫：陈君以为宇宙是整然的，因此作成他的宇宙观而立定其计划。我的计划，也立于我的宇宙观，我觉得宇宙只是“美”。我觉得世界没有不美的。凡能引起我的美感的，我就喜欢去研究。文学是能够表美的，诗歌尤是文学上表美的要品。因此我欲于诗歌有所研究和创作。不是求名，也不是求利，也不管人人说好说歹，只求满足自己的要求就是。此外哲学也想研究。凡求学一要有识，二要有胆，而胆第一，无胆则不能成学。吾愿戳破一切，做一个学问上的“冒失鬼”。年半内不出省，一面做一点事，解决生活，一面学英文及日文。年半后或入北大，或进南高，暂不定。自揣个性近于文学，将来想专力于此。

熊瑾玎：我觉要做事，就要有钱，因此我就早有发财的念头，

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货殖传”……看。常觉在中国这种社会下发财有两条路：一是做官，二是经商。做官要钻营，不愿干。经商我也试验了一下，因他种原因，停了。现在想从生产事业下手，从前与萧子升等商量到东三省垦荒，因各种困难未成，现在正筹度他种方法。我觉私利可以不要，团体资本是该要的；增进我们的资本，方能发展我们的事业。苟可发财，不必择术。

以上个人的进行计划发表完。从前的朋友们，多将自己的计划看作秘密，不肯把他公开出来，因此别人不晓得他的计划，他也不晓得别人的计划，各人都打入闷葫芦里，要互助也无从互助，要结合同目的的人共做一样事也无从结合。这种“各想各”“各做各”的现象之结果：一、自己的计划如果偏了或错了，因无从得到纠正，便一直偏错到老死，所志无成，徒增怨悔。这类情形，是我们时常看见的。二、自己的计划虽未偏错，而孤行无助，终归不能达到，这类也是常有的事。长沙同人鉴于此种弊失，乃有各述计划之举。各地会友均若能同样举行，各述自己计划，以其结果刊登会务报告，大家看了，当可得到种种益处。

上面个人计划述完，休息二十分钟，继续讨论第二个问题：

“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

这问题也是很重要的。大概从前的读书人，是照例不研究生活方法的；因此，竟弄成凡读书人社会就是无恶不作的坏人社会。吃饭问题，本来不容易解决。加以不研究，更不得不寻些糊涂方法去解决了。新民学会长沙会友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除开一二人因别种理由，不主张注重生活问题之外，其余对此问题都觉得很为重要。讨论情形特记如次：

何叔衡：自身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

教育费。自己拟做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至于别的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

彭荫柏：常有三个问题，即求学、做事与生活，都难解决。但我觉得人只要有勇气，不应计及生活问题上去。罗素说，“应当想生活问题以外的事”，我很相信。我们只要把求学做事的问题解决，生活不成问题。但我们生活，也要定一方向。许多方面的生活，如做官之类，我们不可去。只有教育界（除开别的新组织新生活）和做工，为我们所可采的方面。做工也有为难的地方，因为劳动界太无识了。所以我们做事，当有新组织才行。

唐文甫：在我们求学时，专心去解决生活问题，恐怕会要堕落，解决不了，便生烦闷。我现在在《民治日报》帮编新闻，一面不费多的时间，一面可以得到少许报酬，用以生活并买书报。将来拟从事这一类，一面可资生活，一面便于研究的事。

陈子博：虽略有遗产，但父亲专制，不能容我自主；要脱离此种痛苦，非独立生活不可。现学未成，仍然困难。寒暑假中拟在文化书社服务，以所得工钱，供给学费。毕业后生活方法，要俟将来决定。

周惇元：暂任报馆事，解决生活，将来很想一切事不做，专门读书。但款须另筹。

张泉山：以教员为职业。

钟楚生：以教员为职业。

谢南岭：家寒，但能耐苦，物质上的生活很易解决。然无钱买书，将来升学，也很为难。近来想组织一个小小的工场，或印刷所，来解决生活。

夏蔓伯：我自己现在是一个寄生虫；不惟自己，身上又有了两

个寄生虫——妻、女。将来个人的生活方法，想从事手工业。现在师校尚未毕业，拟于年内着手办一小印刷局，以所获供给用项。毕业后以教员维持生活。家里有一父，二妹，一妻，一女；除父外，通是不生产者，故家庭生活，甚是危艰。

易阅灰：我于消费，主张适当，不太奢，亦不太啬。饭取可口，衣取章身，房子求卫生通光气。至取得生活费的方法，暂为教员月薪，支出恐怕要以买书费为多。

贺延祜：生活暂时尚无方法，计划想学医，不能之时，仍在教育上做事，半工半读。消费不主太简，食住总以能卫生为好。衣以保暖为宜。

熊楚雄：单是一个人的生活不成问题，我们生活所以难解决者，就是除了自己，还有别人——子弟。生活的方法，要想法子开辟，例如："送灰面""添洋油"两件小事，从前没有人干，经人开辟了，就是很好的生活方法。我们如果没有一点事做，也可以自己开辟途径。我对于生活费的使用，不大喜欢俭啬。因为生活奢一点，欲望必定也大一点，做事必定也勇一点。

毛润之：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到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罗耻迂：生产方面：在教育上生活。消费方面：量入为出，不必俭。除自己解决生活外，还要解决家庭生活。

蒋集虚：物质生活，不外衣、食、住三项。现我决定家产一点不要，师校毕业后以教员为职业，与相知之数友同居生活，生活费互助，轮流升学。衣则十年内决定只穿布衣，食则每日一餐也可，

住屋更可随便。至精神生活，则急要读书。我从前觉得人生无味，盖进化无已，没有底境，使人迷茫，觉得无味。近受杜威、罗素的影响，将凡事之无希望的方面，黑暗的方面，坏的方面，不去着想，专想有希望的方面，光明的方面，故觉颇有生趣。

邹半耕：因要读书，生活问题也不得不计及一番。以我家论，本可自给。但能自己给书报费则更好。至于将来完全读书时期，便为难了。

陶斯咏：现在的生活：教书，学校办事。教书和办事的生活难靠，则烹饪、裁缝、编物。物质生活不困难；但自己不善理财，有钱不能储蓄。精神生活是一难事，因为要有学问才行。精神如鱼，学问是水，有学问精神才得愉快。

陈启民：精神生活，先前所说可以见大概，不重述。物质生活非个人所能解决，所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革生活的命。生活上太枯焦，太刻苦，必影响于心理。所以我们身体上所需，必不可故意刻减。饮食、衣服、住居，都要达到一个相当的程度，虽不要奢，总要“备”。生活的全体，非个人所能解决，个人只能尽力之所能去做。

任培道：现时生活，可以教书解决，衣食能安淡泊。

此时吴德庄因事先去。各人依次述生活方法毕。互有讨论，周惇元云：劝善规过，最是要紧，我常感觉到虽时常有朋友谈论，总多闲谈，少有用诚恳的态度来讨论修学立身的问题的。希望会友注意此点，会面不为闲谈，劝善规过，讨论问题。又觉得我们在此时应该注重“自己改造”，不应加入团体太多，致牵涉许多事务，妨碍自己的进修。蒋集虚极赞周君的话，说：“应该如此。”陶斯咏云：我总加入了七八个会，以后当辞去四五个。何叔衡云：朋友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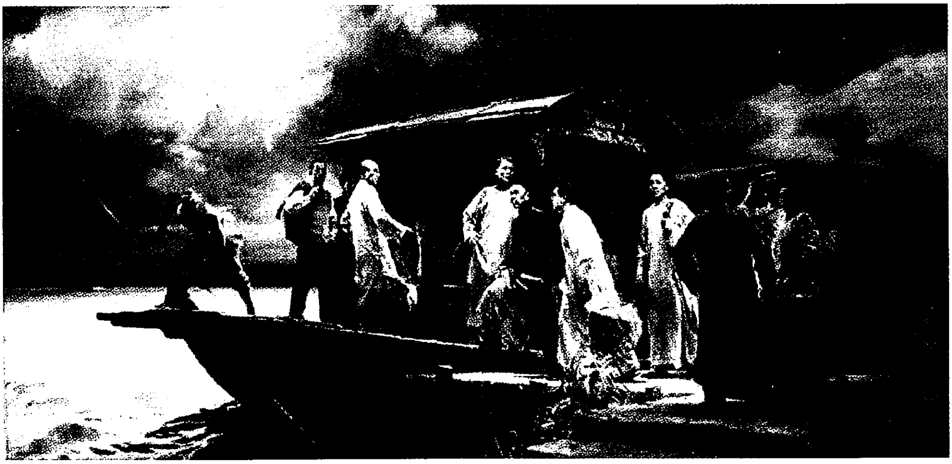
宜多批评。至生活的切实方法，还须大加研究。毛润之不赞成熊瑾玎之消费主张，谓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主张依科学的指导，以适合于体内应须的养料，身上应留的温度，和相当的房屋为主，这便是“备”，多的即出于“备”之外，害就因此侵来。此时何叔衡提议：想一个公众的生产方法，谓刚才有人提议办印刷局，我以为可以商议进行。毛润之云：文化书社有此计划，因“书社”只是发行一部，还要组织一个印刷局，及一个编译社。夏蔓伯谓：如有人帮助组织，愿任进行。大家认为此事甚属要紧，结果：决定另行筹议。“个性之介绍及批评”，因时间不早，未议散会。

各会友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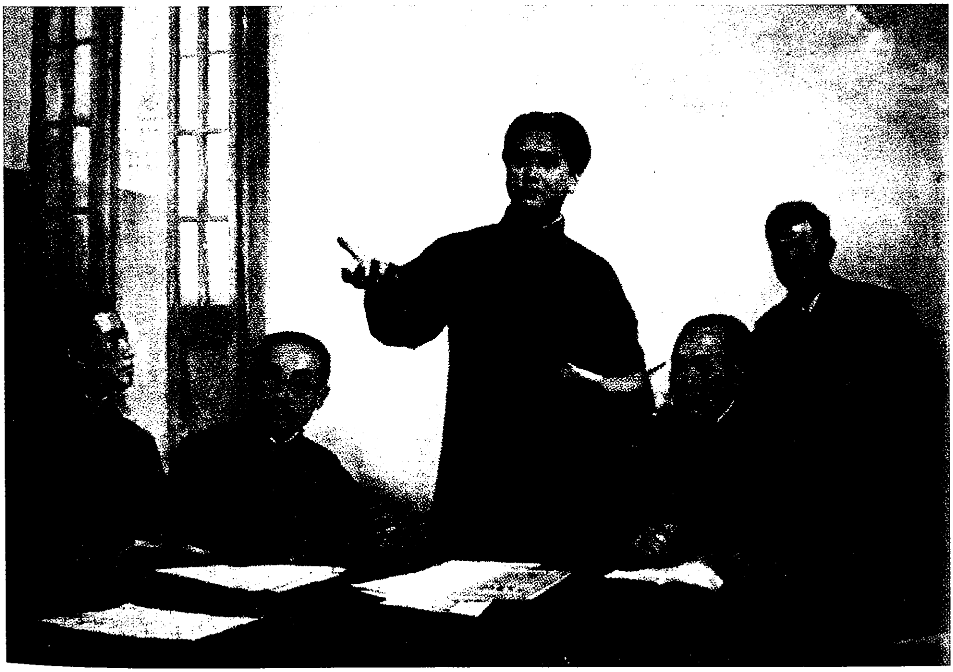
第三号会务报告，大略要本年年底才可编印。至通信集第四集稿已齐，本年八月可出。第五集的信稿，亟盼陆续寄到；极随便的信，极短的信（如明片）均请寄来。来件请寄长沙文化书社。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图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望志路10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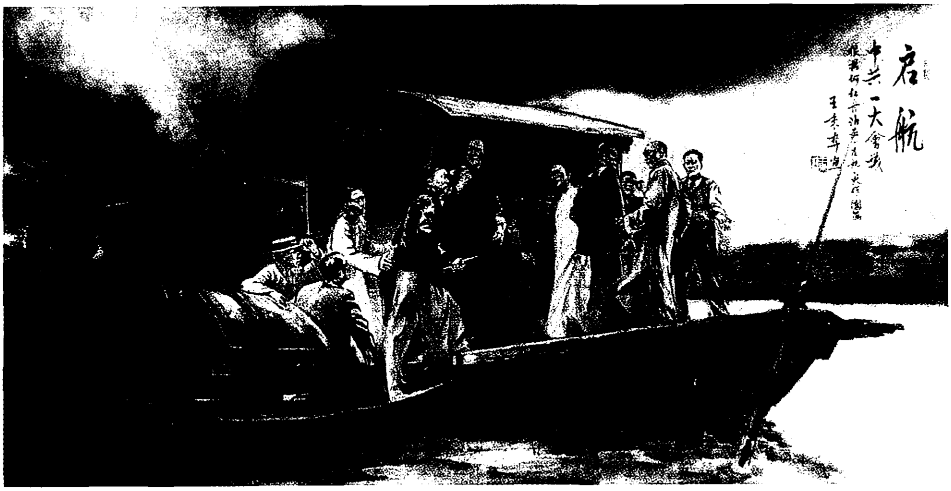
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中共一大最后一天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图为嘉兴南湖游船（仿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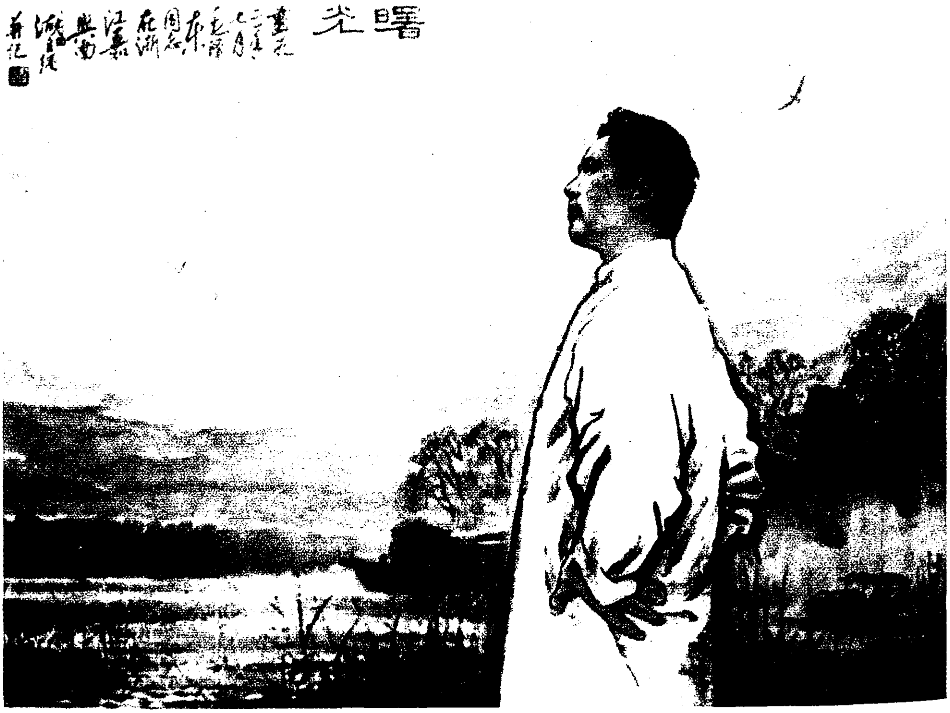
《启航》（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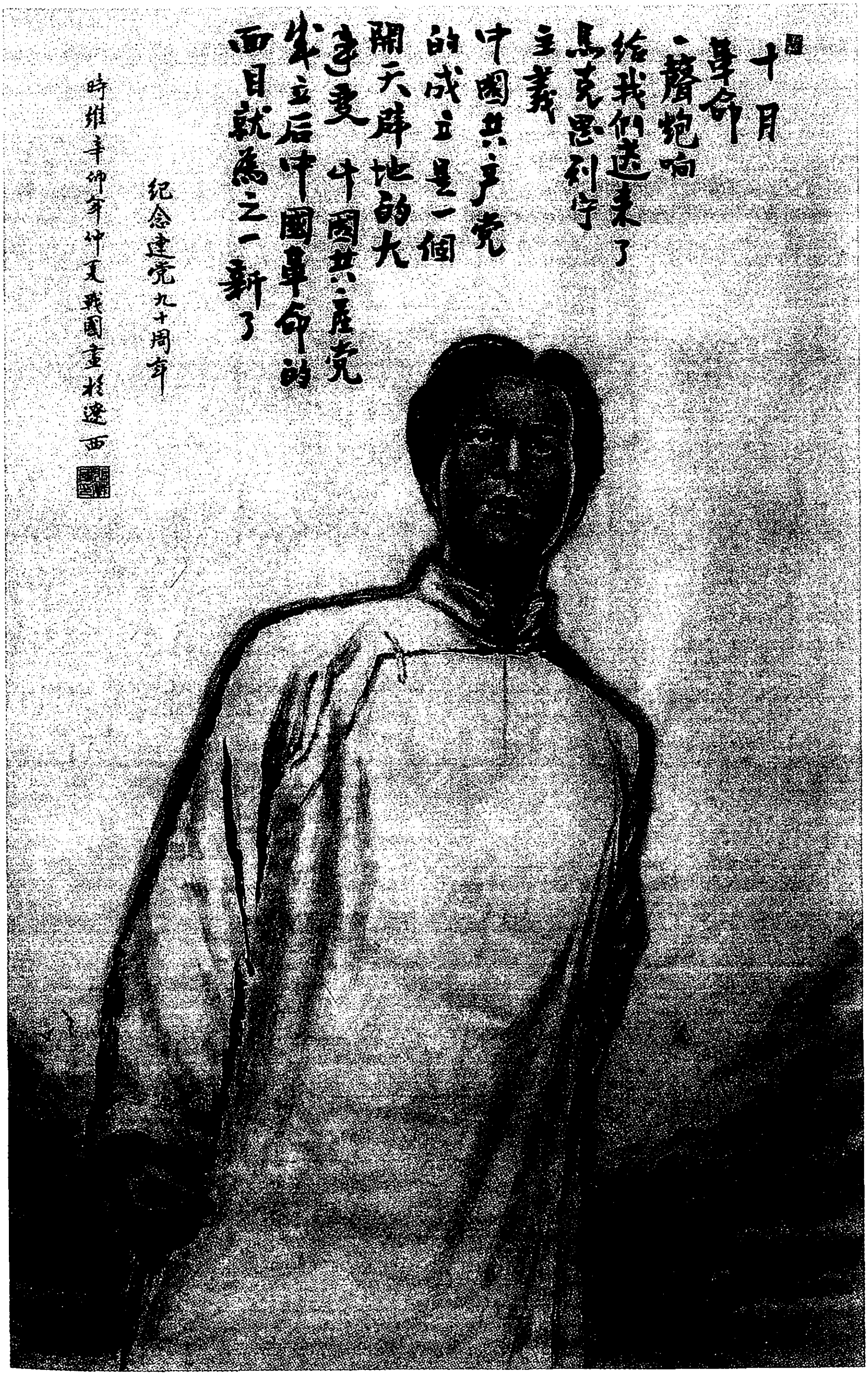
《共产党宣言》（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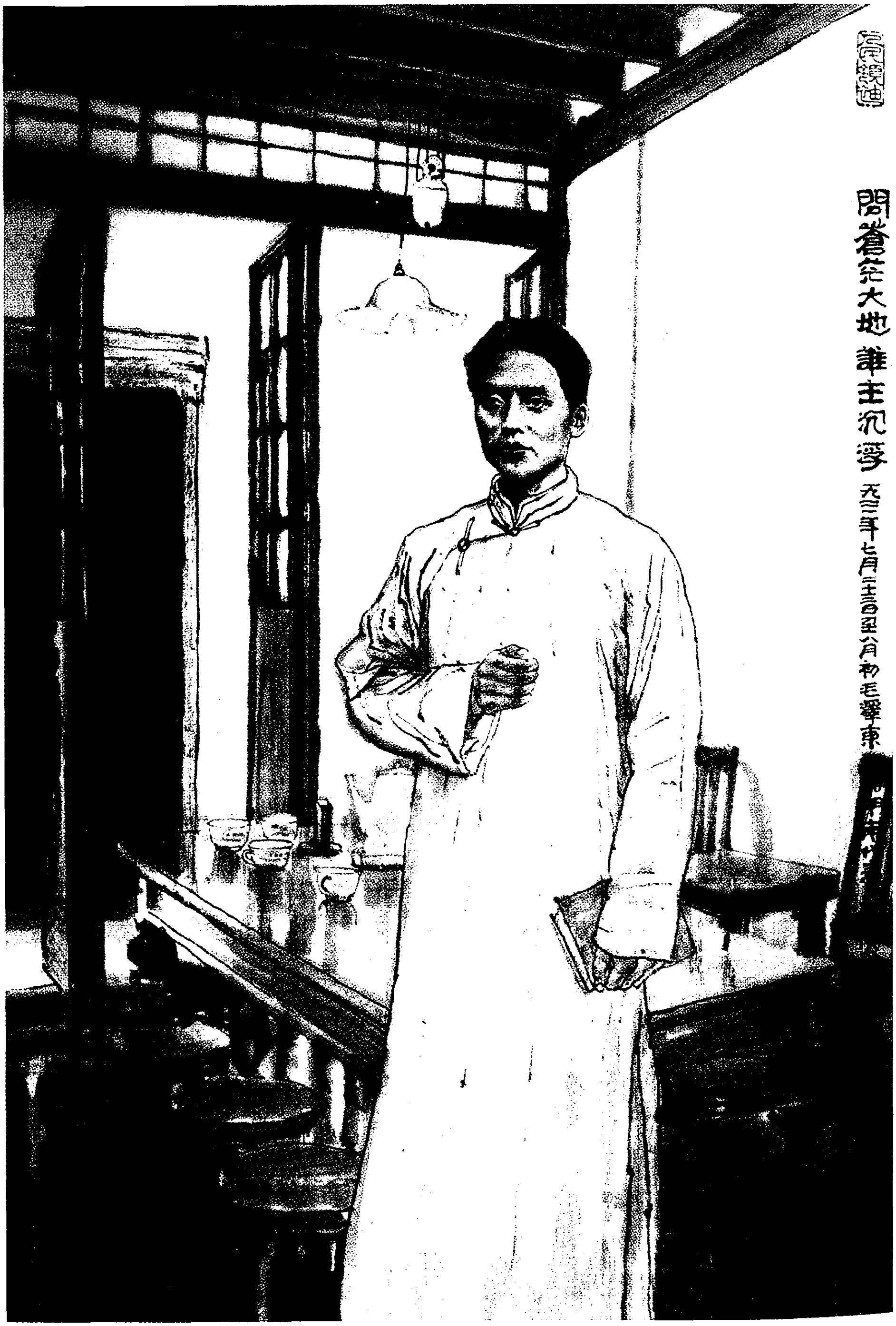
《启航》（中国画）



《曙光》（中国画）


十月
革命
一聲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
馬克思列宁
主義
中國共产党
的成立是一個
開天辟地的大
事变 中國共产党
成立后中國革命的
面目就爲之一新了
纪念建党九十周年
時維辛卯年仲夏 戰國畫於遼西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画）


問蒼茫大地 誰主沉浮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毛澤東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中国画）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1921 年 8 月 16 日）

第一章　宗旨及定名

第一条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材，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

第二章　校董会

第二条　本大学设“校董会”，以校董十五名组织之，负本大学经费上之责任，并总持本大学大纲；由学社社员推举。校董因必要，得扩充人数。

第三条　校董会得以校董在本大学所在地者经半数以上之列席开校董会。校董之不在本大学所在地者得随时陈述意见于校董会，并得托其他校董代表意见。

第四条　由校董会推举一人为“驻校校董”，掌握本大学事务之

大纲。

第五条　本大学校董会设名誉校董，额无定数；由校董会推举有下列资格之人充任：

一、助款于本大学五千元以上之人；

二、赞助本大学有甚大劳绩之人；

三、国内外大学及专门学校校长。

第三章　学长及办事员

第六条　本大学设学长一人，由校董会聘请；担任指导学友之自修，考察学友之成绩。但因必要得添聘专科指导员，辅助学长担任指导、考察之责。

第七条　本大学暂设办事员如下：

一、书记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办理本大学文书、交际及设备诸事物。

二、会计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掌管本大学经费之出纳及其使用诸事务。

三、图书馆主任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管理本大学图书馆。

四、实验室主任一人，受驻校校董之付托，管理本大学实验室。

第八条　本大学于前所举之办事员外，因必要，得加设相当的办事员。其职务及人数，临时酌定。

第四章　通信员

第九条　本大学于国内国外重要之各大学，各专门学校及各学

术团体设通信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校各团体之连络；并注意各校各团体学术研究之情形及其重要之结果，报告于本大学。

第十条　本大学于国内国外学术昌明之区域（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昌、巴黎、伦敦、柏林、纽约、莫斯科、东京等）设通信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文化区域之连络，并注意各区域内一切重要文化学术之情况，报告于本大学。

第十一条　本大学于湖南省内（省城及各县）各重要之中等以上学校，并各种学术团体，设通信员，担任本大学与各校各团体之间连络，并互相介绍其学术。

第十二条　通信员于上列职务之外，得临时托以其他特别职务。

第五章　学友

第十三条　凡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不分男女长少，具有自修能力，志愿用自修方法以研究高深学术者，经本大学证明认可，得报名入学。非中等以上学校毕业，而具有与之相等之学科根柢者，经本大学证明认可，亦得入学。但本大学各种特别班学友，不必具有上列资格。

第十四条　本大学学友，分为下列二种：

甲，住校者，为住校学友；

乙，不住校者，为校外学友。

凡住校学友入学，必须经过试验，并自付膳费及杂费。住校学友及校外学友，均享有本大学图书、函授、听讲、集会等研究上之便利。凡学友须于每学期始，交纳相当之保证金，于每学期末退还，学友应否交纳学费，及学费交纳多寡，临时依所研究之情形

规定。

第十五条　本大学学友名额，由本大学斟酌房屋及图书馆设备情形临时分别规定。

第十六条　本大学学友，有发现下列各项事情之一者，得随时令其退学。

一、无自修能力，对于所认定之学科不能尽心研究，无成绩之表示；

二、假名自修，分心校外不正当之事务；

三、不能自治，无向上之要求；

四、妨害公众秩序，破坏其他学友及本大学名誉。

第六章　研究

第十七条　本大学暂设文、法两科，其科目如下：

文科：中国文学、西洋文学、英文、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新闻学、哲学。

法科：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

以上各学科之详细类别，另以表规定之。

学友于以上各种学科中至少须选修一种。

第十八条　本大学研究之范围，分为下列三类：

甲：科学；

乙：哲学；

丙：文学。

甲、乙、丙三类之详细科目，另行规定。本大学学友，于甲、乙、丙三类各科目中，至少须选修一科目。

第十九条　本大学研究之方法，分为下列二种：

甲，单独研究，学友各自制定课程表，对于所选定之学科单独修习。

乙，团体研究，组织各种研究会：关于科学者，如“数学研究会”“心理学研究会”“经济学研究会”等；关于哲学者，如“周秦诸子学研究会”“印度哲学研究会”“罗素哲学研究会”等；关于文学者，如“中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诗歌、小说或戏剧研究会”等；由本大学学友因志愿相同，分别组织，定期研究完毕。在研究期间，随时开会辩论商榷，各研究会之组织另定。

第二十条　本大学为图研究之便利起见，特设补助方法三项如下：

甲，通函指导：由本大学聘请国立大学教授及其他国内外学者，担任定期通函指导，其指导之项目如下：

一、开示书目；二、指示研究方法；三、解释疑问。

乙，特别授课，如外国文一科，本大学得酌量情形，开设“英文”“法文”“俄文”等各专班。此外如“工人夜校”等各种平民教育，亦得附设，其组织另定。

丙，特别讲座：本大学设特别讲座，随时延请名人担任讲师到校讲学。

第二十一条　本大学为沟通文化，介绍新知，设各种“译书会”，如“法文译书会”“英文译书会”等。

第七章　劳动

第二十二条　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

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艺园、印刷、铁工等。

第八章　图书馆及实验室

第二十三条　本大学于校内建设图书馆，设置中外各种重要之图书、杂志及新闻纸，以为学友研究参考之用。

第二十四条　本大学于校内建设博物理化实验室，以为学友实地试验之用。

第九章　成绩表示

第二十五条　本大学学友成绩之表示，分为下列三种：

甲，平时所作之记录及论文；

乙，每一学期届满时所作之论文；

丙，每一科目修习完毕时所作之论文。

第二十六条　本大学学友每人修学年限无定，以修习一科目完毕为单位，成绩及格者，给与某科目修学证书（如数学修学完毕成绩及格，即给与数学之修学证书）。但不要证书者听。学友经认可得长期在本大学内研究。

第十章　经费

第二十七条　本大学经费之大部，系用为建设并充实图书馆及

实验室之用，其来源如下：

甲，学社津贴；

乙，公私捐助。

第十一章　校舍

第二十八条　本大学以湖南船山学社房屋为校舍（长沙小吴门正街）。将来因必要，得扩充房屋或另行建筑。

第十二章　分院及海外部

第二十九条　本大学因学友研究之方便，于湖南各重要地点设本大学分院。即以长沙本校为第一院，第二院以下俟经费充足时开办。

第三十条　本大学之学友，因必要，得设海外部。

第十三章　自治规约及本大纲修改

第三十一条　本大学内部生活，以“自治规约”规定之，此项“自治规约”由驻校校董、学长、办事员与学友共同订定。

第三十二条　本大纲之修改，须得校董会之同意。

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1921年8月）

湖南人近有“自修大学”的创设，他的宗旨在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希望入学的人都能自己读书而共同研究，在中国现在“大学狂”潮流中，可算最实际的教育制度了。该校近发表宣言，说明创立的宗旨：

人是不能不求学的，求学是要有一块地方并且要有一种组织的。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它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得很。但是书院也尽有好处。要晓得书院的好处，先要晓得学校的坏处。原来学校的好处很多，但坏处也就不少。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为罢了。学校的第二个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自有划

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的最大缺点，有心教育的人所万不能忽视的。学校的第三个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总括这些坏处，固然不能概括一切的学校说他们尽是这样，并且缺点所在，将来总还有改良的希望，但大体确是这样，欲想要替他隐讳，也无从隐讳。他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沉浮，高才的相与裹足。回看书院，形式上的坏处虽然也有，但上面所举学校的坏处，则都没有。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但是现代学校有一项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以上是说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现在再说自修大学独有的利，而书院和学校则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义与非平民主义。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是一。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是二。书院非赤贫的

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是三。自修大学力矫这些弊病。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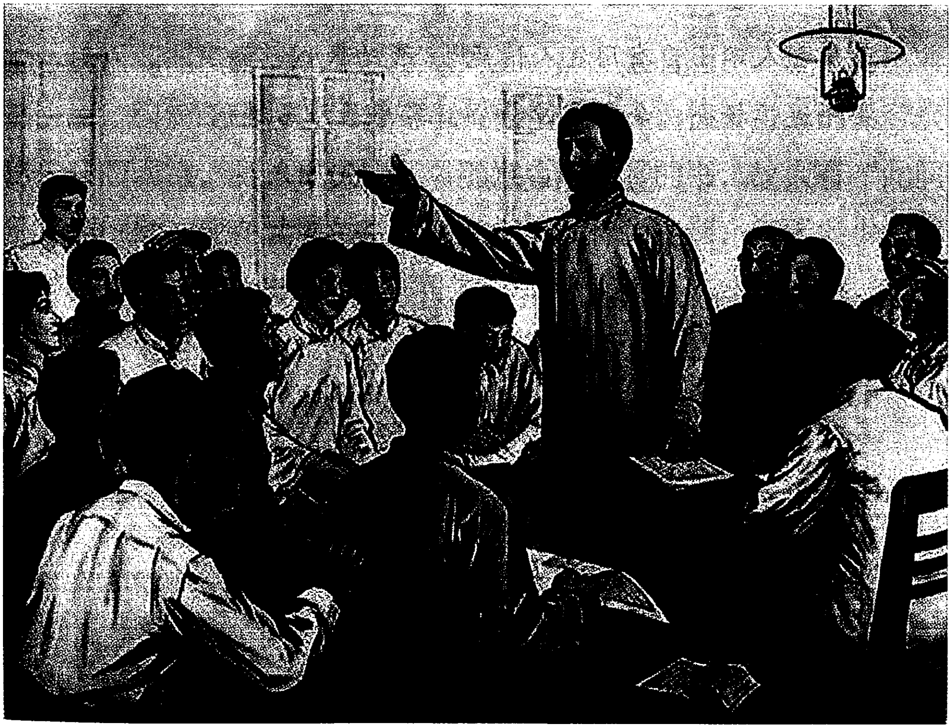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既如上说。那么自修大学的内容怎么样呢？现在说一点大略如下：第一，自修大学学生研究学问的主脑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自修大学里面的“图书馆”就是专为这一项用的。第二，自修大学学生，于自己看书，自己思索之外，又有“共同讨论，共同研究”。各种研究会的组织，就是专为这一项而设的。第三，自修大学虽然不要灌注食物式的教员，但也要有随时指导的人做学生自修的补助。第四，自修大学以学科为单位，学生研究一科也可，研究数科也可，每科研究的时间和范围，都听学生依自己的志愿和程度去定。第五，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正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最后要说自修大学在湖南的必要了。诸君，湖南不是至今没有一个最高的学术机关吗？省立大学在最近期内之必无成理，和即使成了也不过是一个官式大学，这是大家都明白的。而住在这湘江流

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澧江流域三千万湖南民族，他们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冲动，将如何去表现出来，发挥出来呢？湖南人尽管是峥嵘活泼如日方升的，尽管是极有希望的，但是没有可以满足其精神的欲求而发挥其文化的冲动，湖南人到底有甚么意义呢？说到这里，便觉得湖南人有一种很大的任务落在他们的肩膊上来了。甚么任务呢？就是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湖南自修大学之设，窃取此意。事实上虽不能和湖南人个个发生关系，精神上必要使他成为一个湖南全社会公共的学术机关；虽不能说一定有很好的成绩，但努力向前，积以年月，相信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的目标的。

1921年8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和何叔衡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图为湖南自修大学的旧址——船山学社。

1920年秋至1921年冬，毛泽东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1921年下学期还兼任一师的国文教员。毛泽东利用一师这个阵地，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图为毛泽东在一师附小的寝室。



《毛泽东同志在自修大学上辅导课》(中国画)

挽易白沙烈士联[1]

（1921年8月）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2]，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3]？

---

[1] 易白沙(1886—1921)，名坤，字越村，湖南长沙人，家居白沙井附近，反清烈士易培基之弟。1921年5月间，他只身赴北京，准备伺机刺杀北洋军阀政府首脑，但未成功。于是又乘海轮至广州谒见孙中山，请求组织军队北伐。由于广东形势未稳，亦未如愿。激愤之下，于农历五月初五晚来到明代大儒陈白沙（1428—1500）故里新会县陈村海边蹈海，以死报国，年仅35岁。毛泽东书此挽联。

[2] 愤死，悲愤而死。

[3] 长沙，这里指代湖南。后进，这里是黑暗落后之意。

给萧子升的信[1]

（1921年9月28日）

我回湘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现在读书虽甚少，然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己〈已〉晓得非读不可了。

此款事势[2]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

男女共学[3]，亦一新生面也。

---

[1] 这是毛泽东致萧子升信的主要内容。

[2] 指为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筹款医病问题。陈赞周，1920年5月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在巴黎病逝。

[3] 指许文煊、杨开慧、周毓明三女士进岳云中学一事。

给杨钟健[1]的信

（1921年9月29日）

钟健先生：

前几天接到通告，知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又接来示，嘱补填入会愿书，今已照填并粘附小照奉上。惟介绍人系王君光祈[2]为我邀集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余二人要问王君才能知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3]为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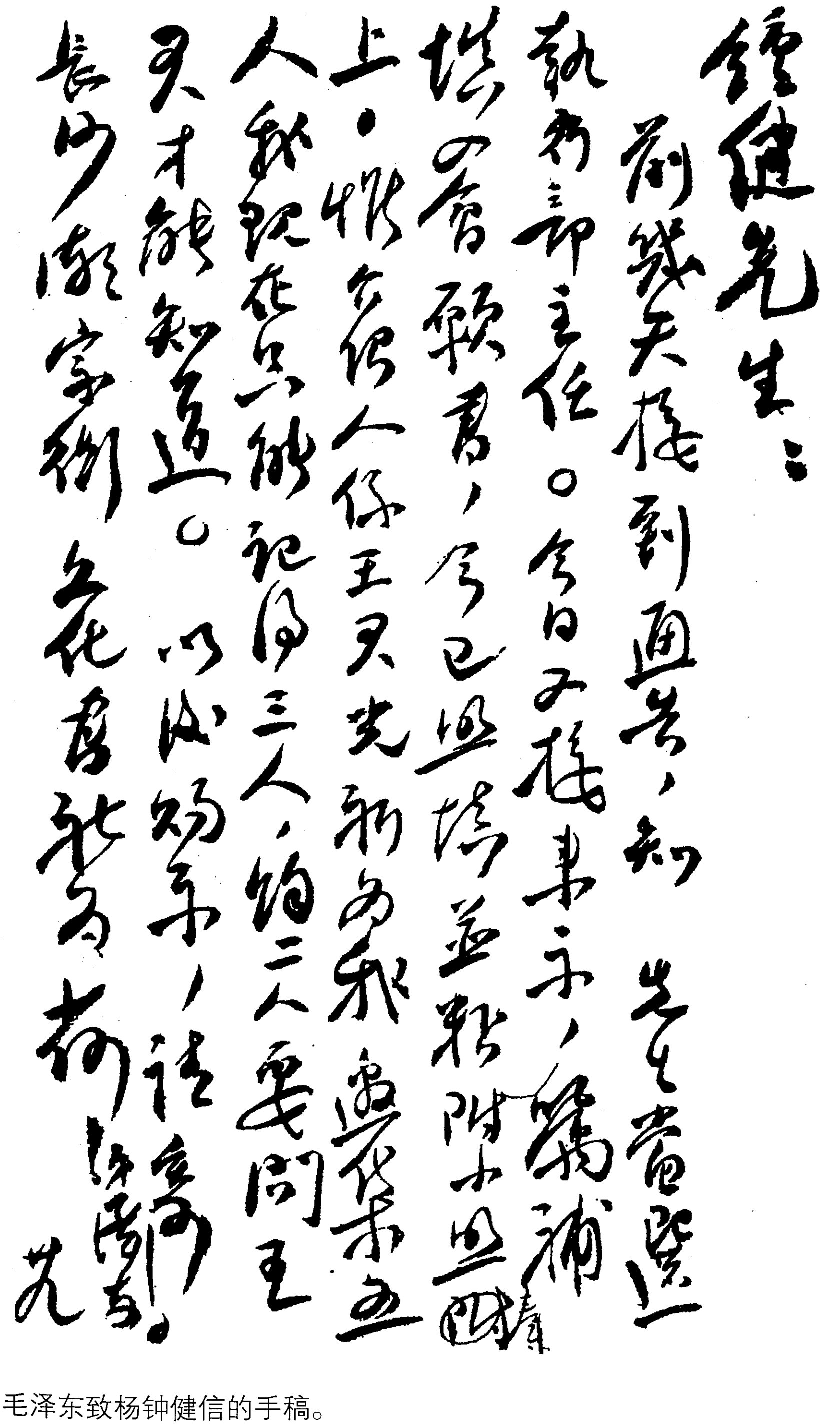
弟　泽东
二十九日

---

[1] 杨钟健（1897—1979），陕西华县人，古生物学家。当时是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

[2] 王光祈（1892—1936），四川温江人，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该会第一届执行部主任。

[3] 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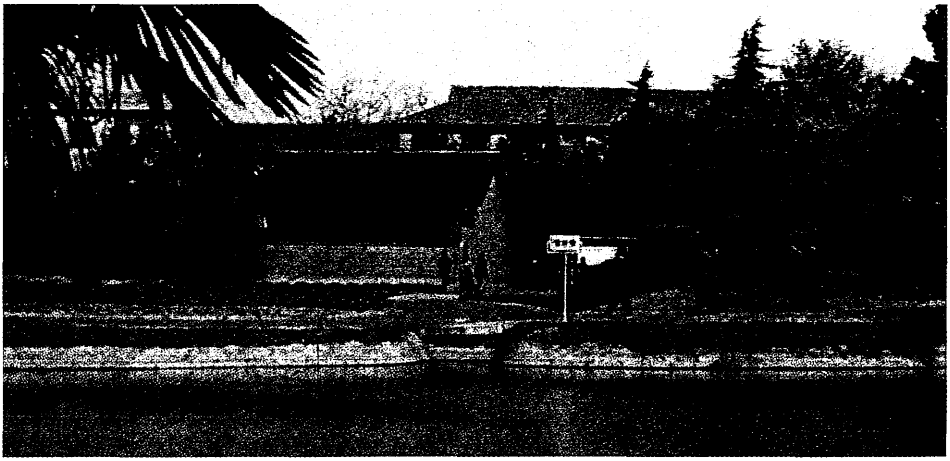


鍾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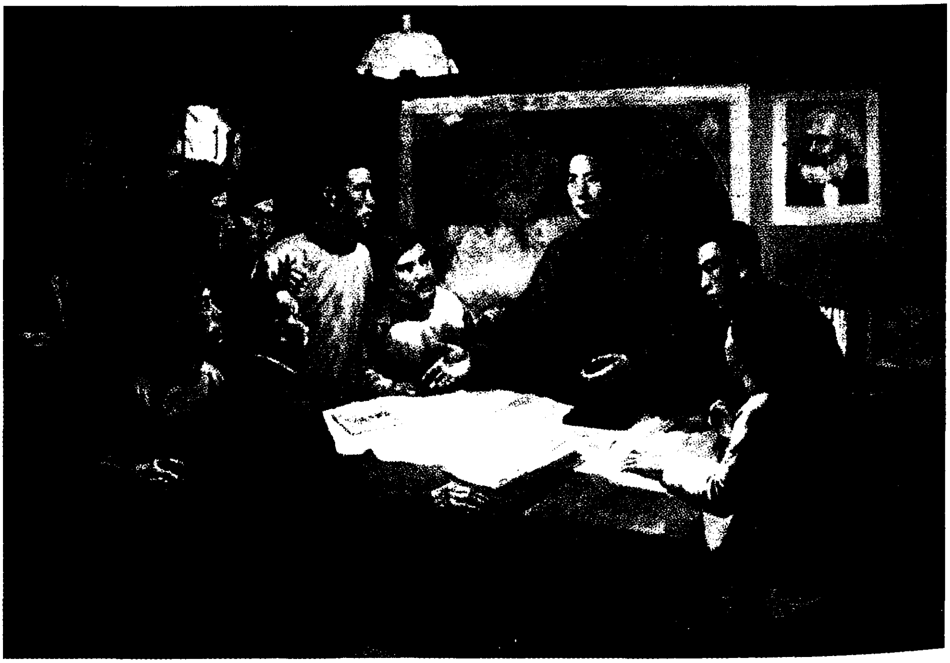
前幾天接到通告，知　先生當選執行部主任。今日又接來示，囑補填入會願書，今已照填，並將附小照上。惟介紹人係王君光祈為我逕代求，五人我現在只能記得三人，餘二人要問王君才能知道。以後通訊，請寄長沙潮宗街文化書社

毛澤東

毛泽东致杨钟健信的手稿。



1921年10月，毛泽东、何叔衡在长沙组建中共湖南支部。1922年5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图为区委机关旧址——长沙清水塘。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油画）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油画）

和李立三应对联[1]

（1921年11月）

洞庭有归客；（毛泽东）

潇湘逢故人。（李立三）

---

[1] 1921年11月中旬，李立三在法国勤工俭学，由于参加爱国进步活动，因而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回湖南从事工人运动。他拿着党中央的介绍信来到长沙清水塘23号毛泽东办公及居住的地方。当时，毛泽东正在伏案疾书，抬头一望，见是阔别已久的老友，喜出望外。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也高兴地说：“难怪方才喜鹊叫，原来是李兄大驾光临！”毛泽东接着说：“这叫做‘洞庭有归客’。”李立三立即回答说：“潇湘逢故人。”两人握手，相视大笑。李立三（1899—1967），原名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所希望于劳工会的[1]

（1921年11月21日）

劳工会现在已周年了，我同情于劳工会也一周年了。为什么独同情于劳工会？劳工神圣，一切东西都是劳工做出来的，劳工会是劳工的团结体，谁也应该同情的。劳工会这一年来的艰难缔造，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我愿这第二叶上写的要大不同于第一叶：材料更丰富，意义更新鲜，章法、组织更美备。因此我就要本我思虑所及，贡献几个希望条件：

（一）劳动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诸君特别注意的。

（二）组织上宜一依西洋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

（三）工会是工人组织的，所以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更进则

---

[1] 这是毛泽东在湖南劳工会刊物《劳工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湖南劳工会是黄爱、庞人铨等1920年11月21日在长沙成立的，初创时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影响，1921年11月下旬改组，接受了毛泽东在本文中提出的建议。

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现在不能遽言及此。我以为无论如何第一步要办到凡入会的工人每人必出至低限度的月捐，少至一个铜元都可；第二步办到自己养活工会。这一点很要紧，望劳工会诸君注意。

我所希望的就只这三项。最后我要向工友们简单地说几句话，当一杯酒，热一热诸君的肚子：

不劳动的不得食！

劳动者获得罢工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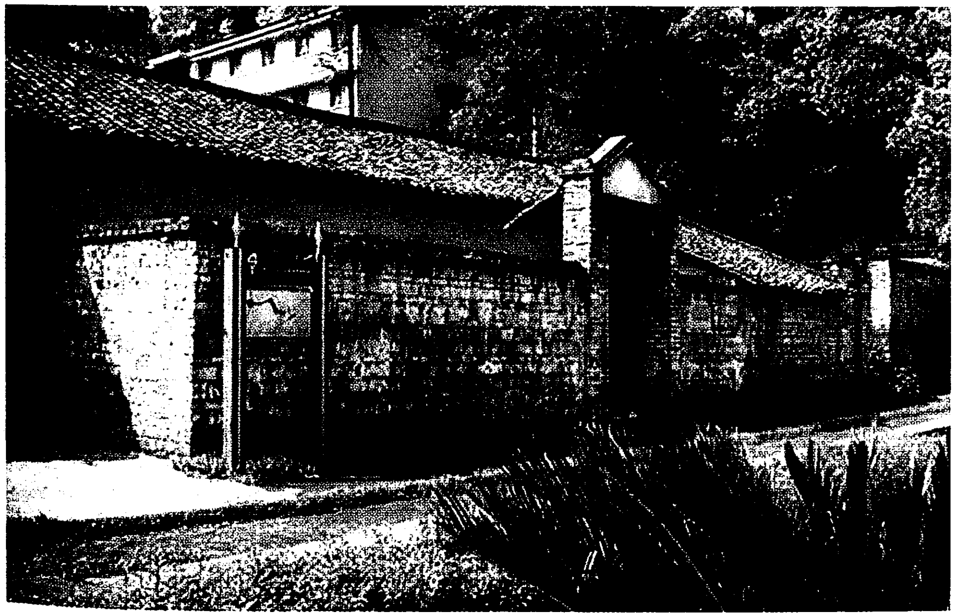
劳工神圣！

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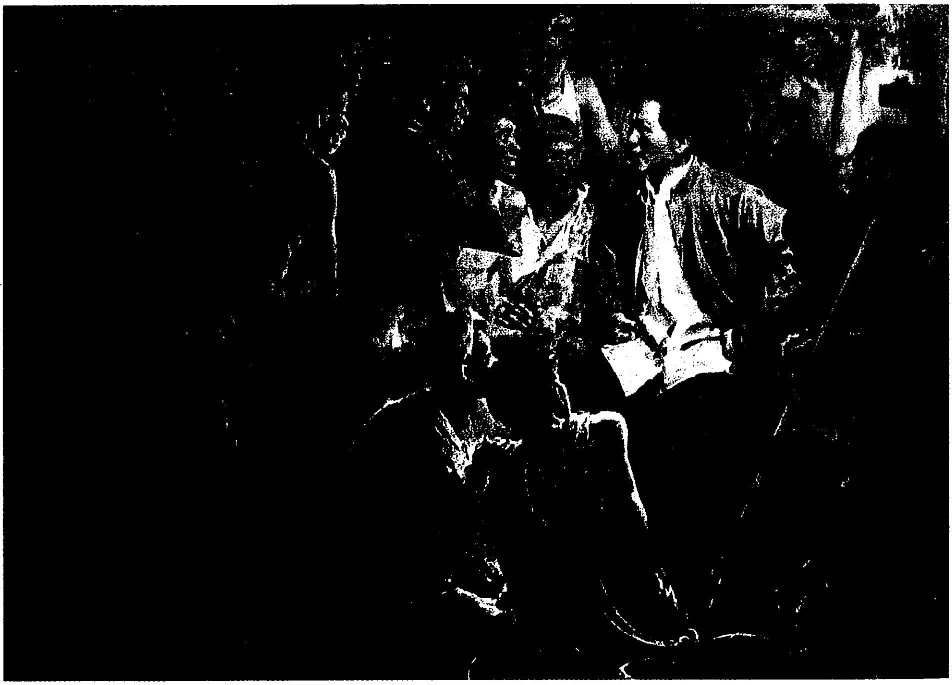
全世界都是劳动者的！

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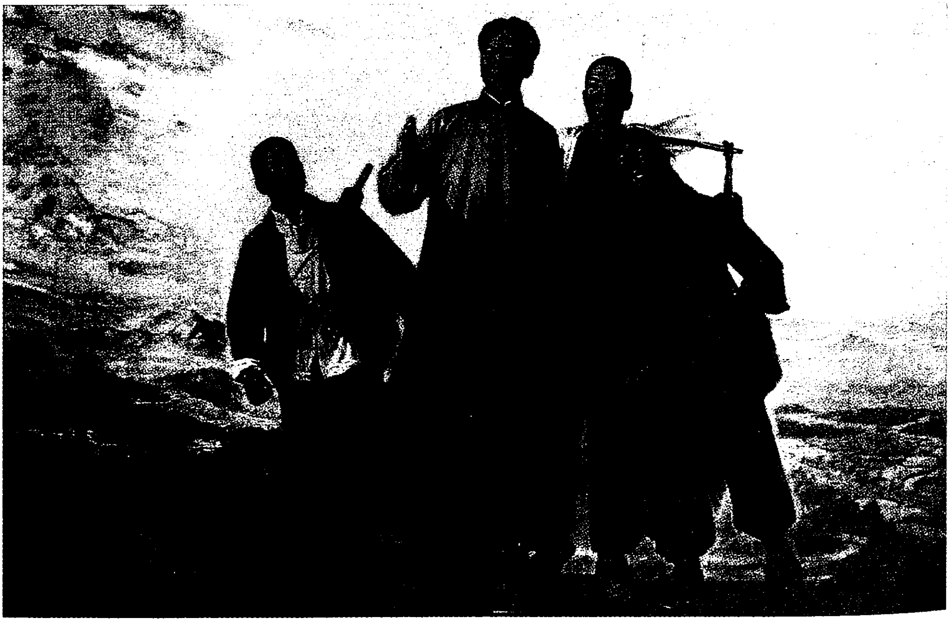
1921年秋，毛泽东到江西萍乡安源考察。图为毛泽东考察过的总巷平矿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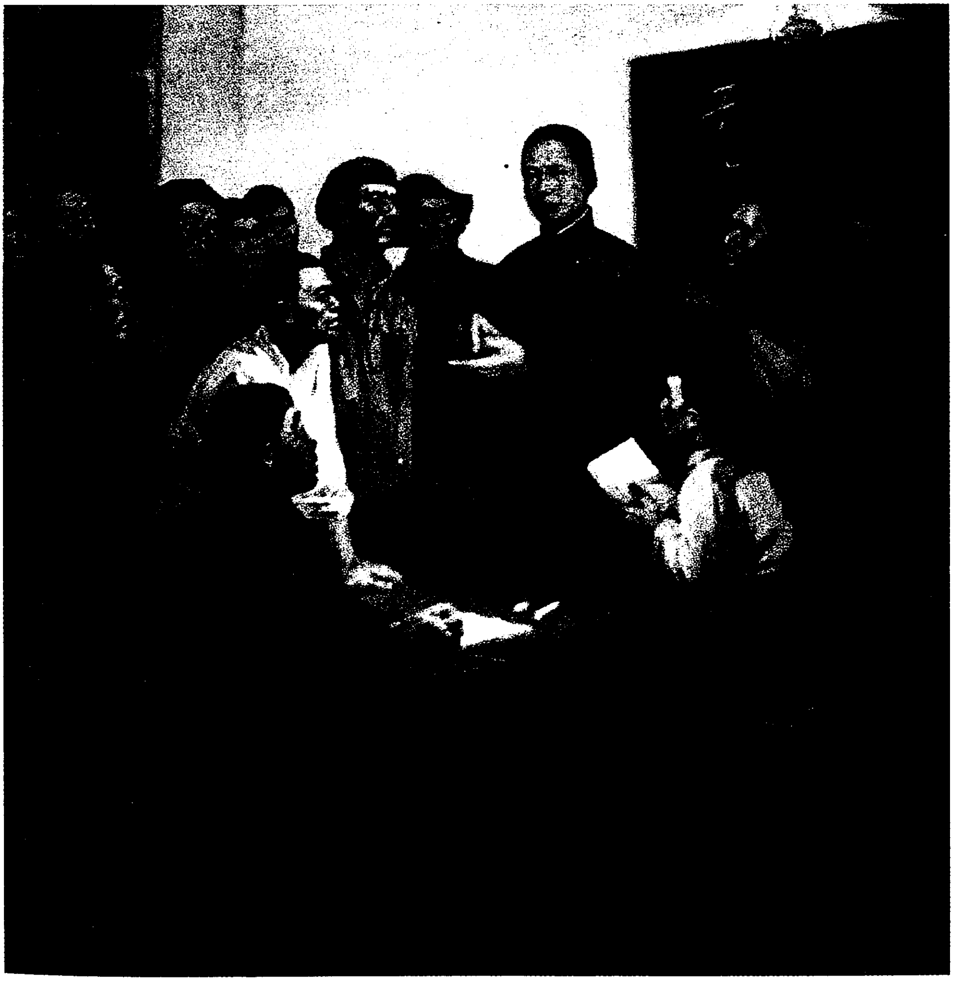
1921年，毛泽东在安源的住址——八方井4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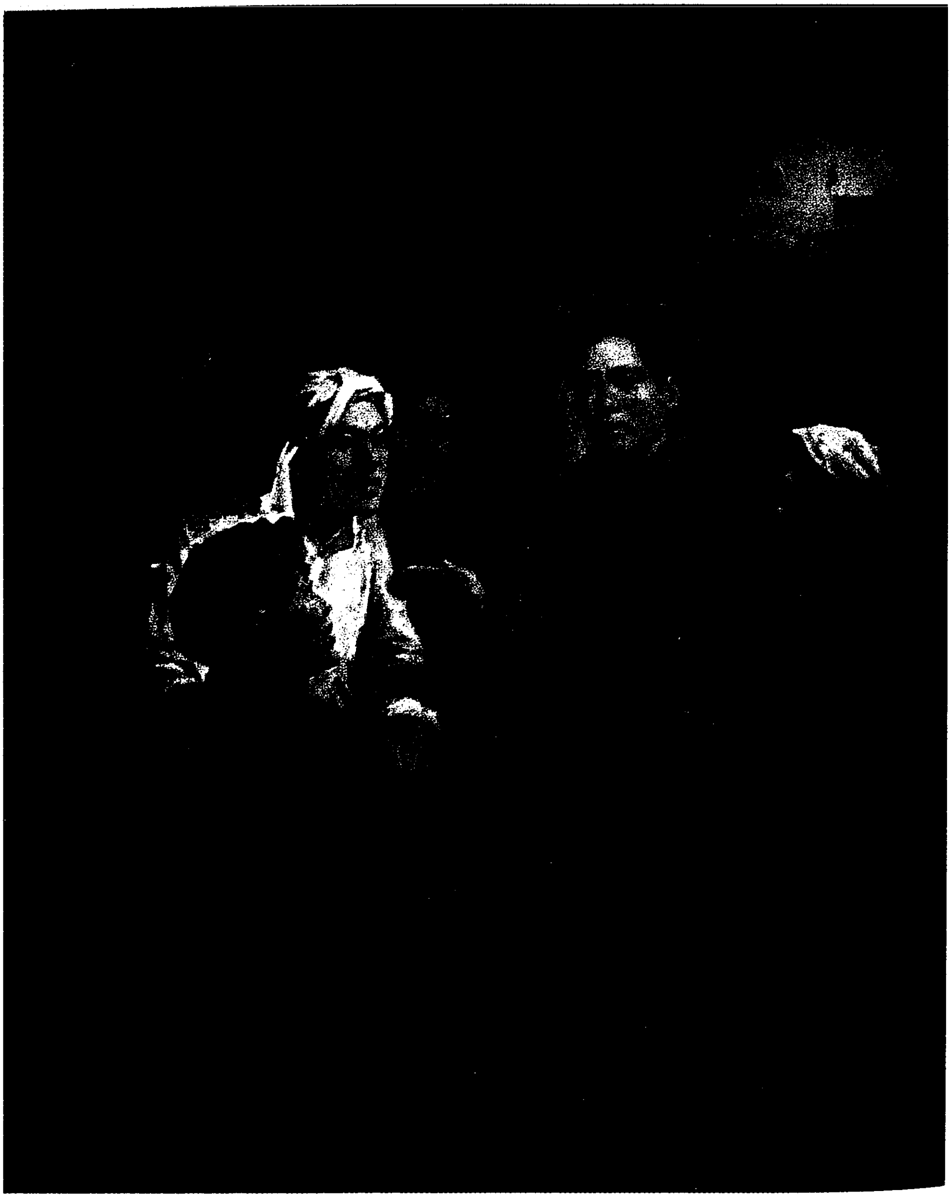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安源工人在一起》（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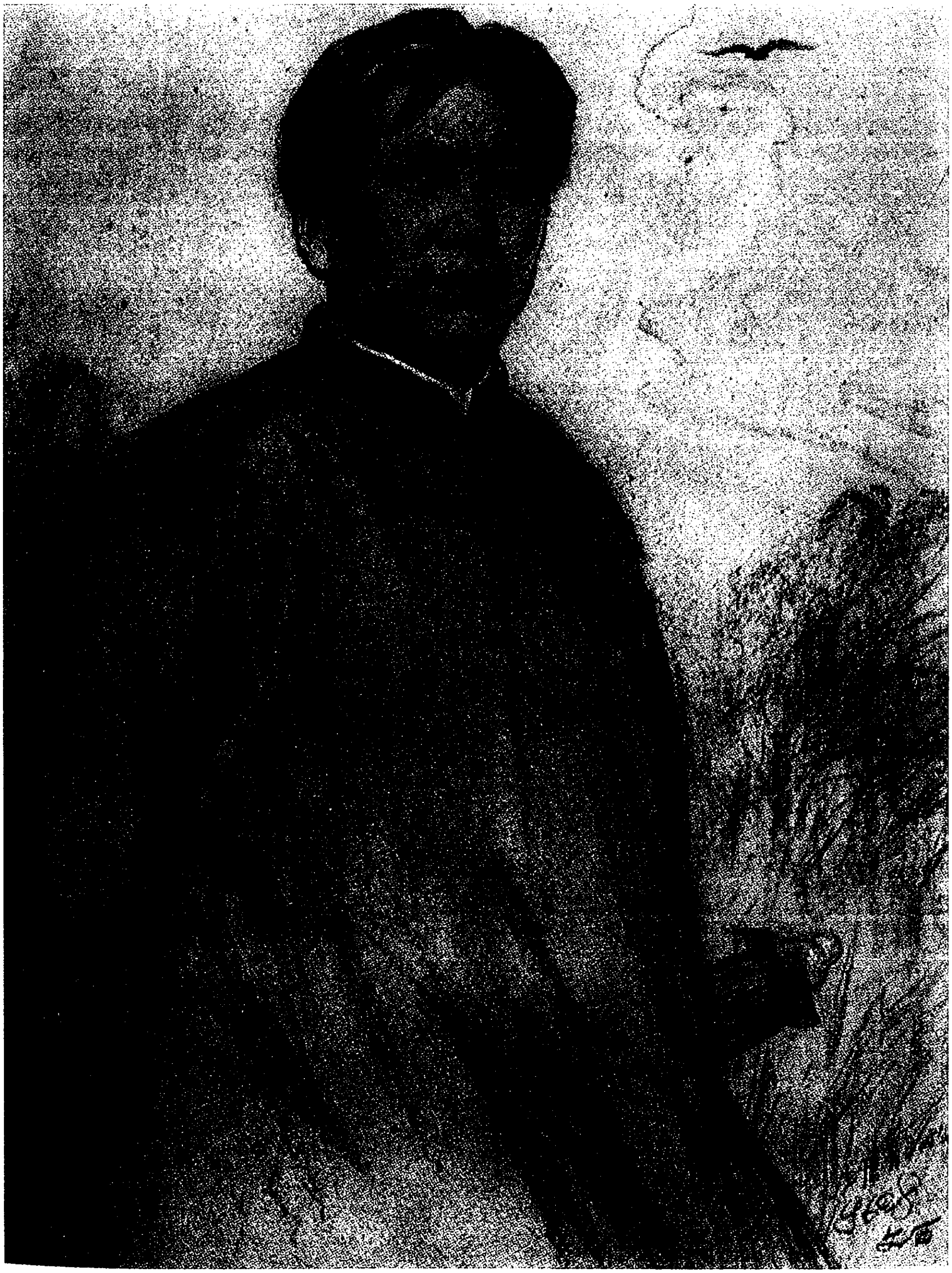
《同赴革命征程》（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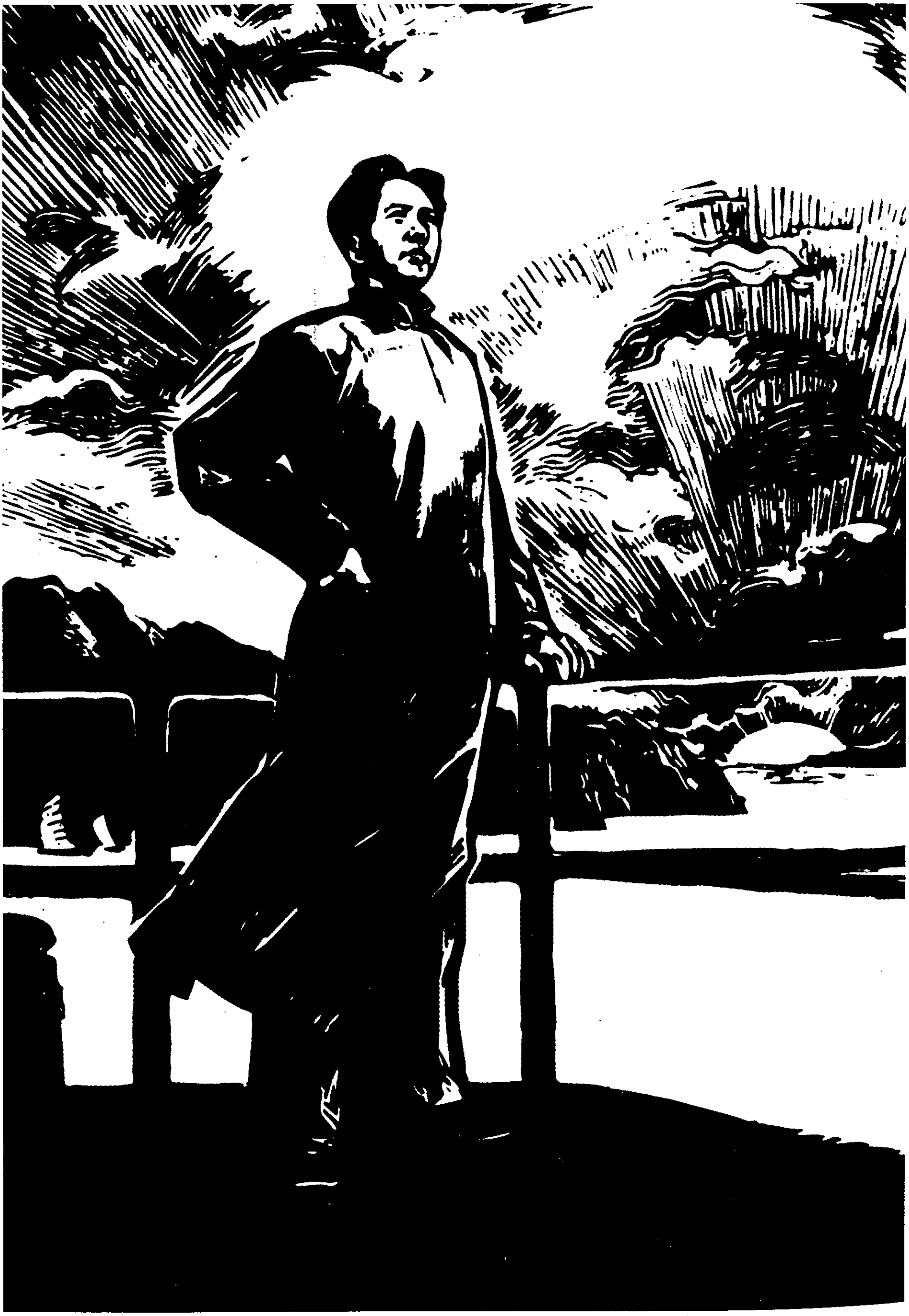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矿工在一起》(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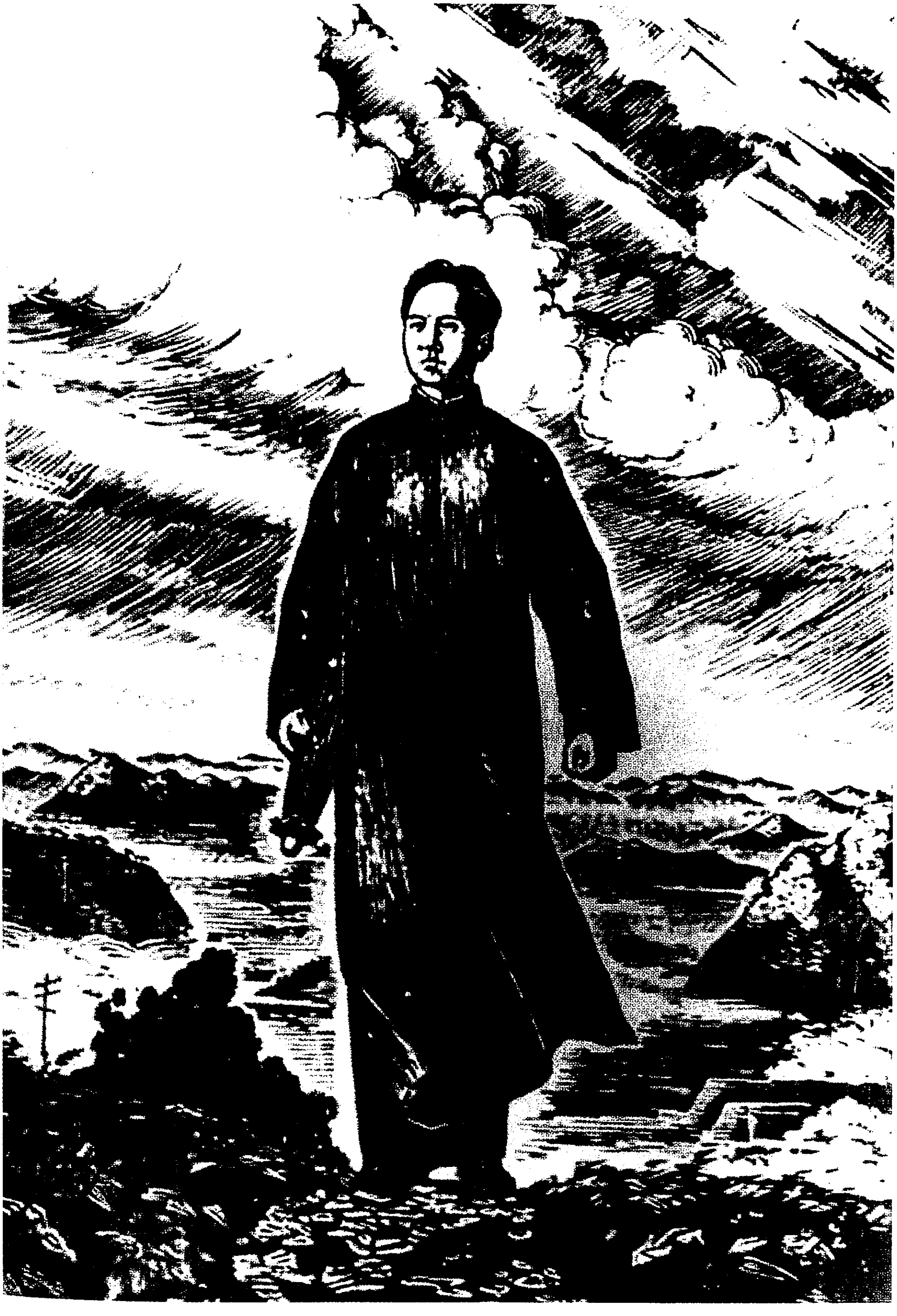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矿工在一起》（油画）



《毛主席青年时代》（素描）



《青年毛泽东》（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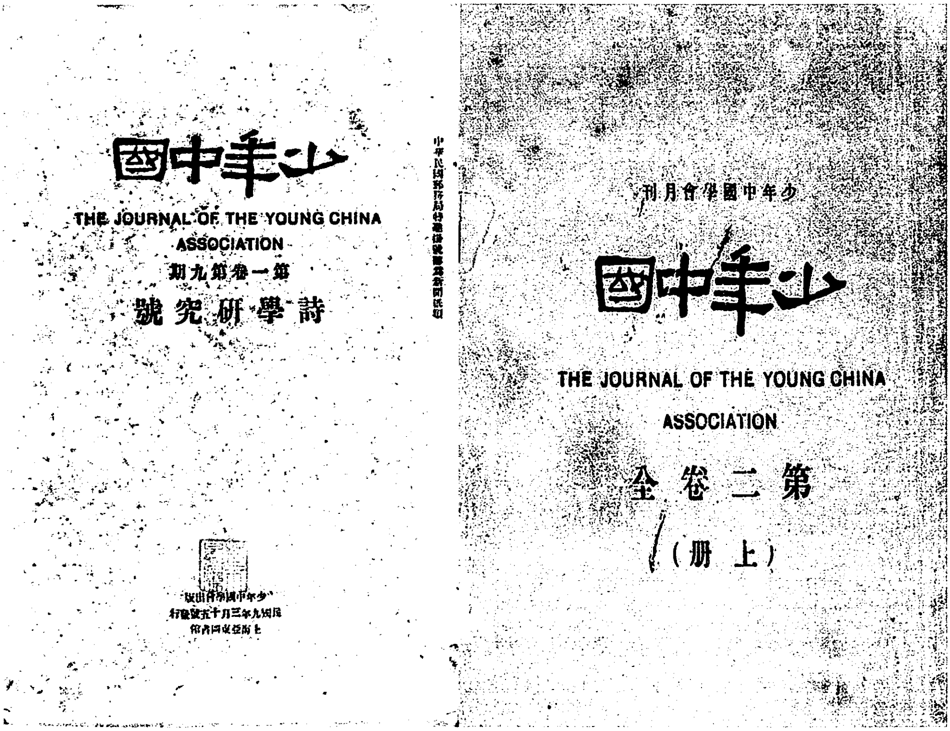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去安源》（版画）

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

（1921年12月）

姓名	终身欲研究之学术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	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	备考
毛泽东	教育学	教育事业	已从八年七月起湖南	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预备。预备三年或四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五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一卷第九期

詩學研究號

少年中國學會出版
民國九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

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少年中國學會月刊

少年中國

THE JOURNAL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第二卷全

（上冊）

少年中国学会的机关刊物《少年中国》，1919年7月在北京创刊，1924年5月停刊，共出4卷12期。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李达等曾在上面发表文章。

告中国农民书

（1921年）

有人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不是痛苦的，也不是受十分压制的，因为所谓农民，都是自己有着田地，自己耕种的，并不是单签耕人家的田而谋生的。就是耕人家的田，而所得生产物的分配乃是平分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分配不平均。既然这样，你就向他们去宣传，也断不能促进他们的自觉，这话都不然，我现在只要把农民的状况记述出来，就可证明这一说的理由不充足了，不过我现在记述的农民状况，是就我住的那一县和附近那各县状况而论的，我想就以此推向全国，也不过是大同小异罢了。

一、农民自身里面的阶级。有人说中国的农民，都是各有土地的，这句话是有一部分确实的，然而未免太笼统了。一家三人所有千亩田，算是有土地；一家十口人所有一亩田也不能不算是所有土地，然而你们这样的所有，就说农民之间，生活都是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痛苦吗？设若细细地考虑起来，就可知农民自身内面，也有几层阶级：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家收租，这种人并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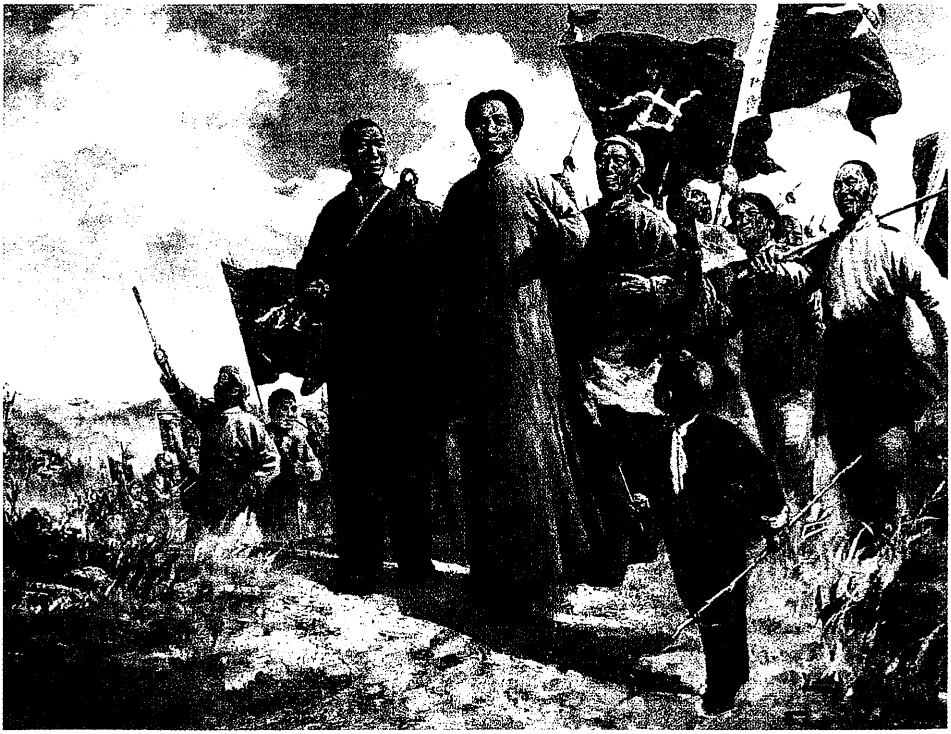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的出产可以养活

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的土地之外租人家的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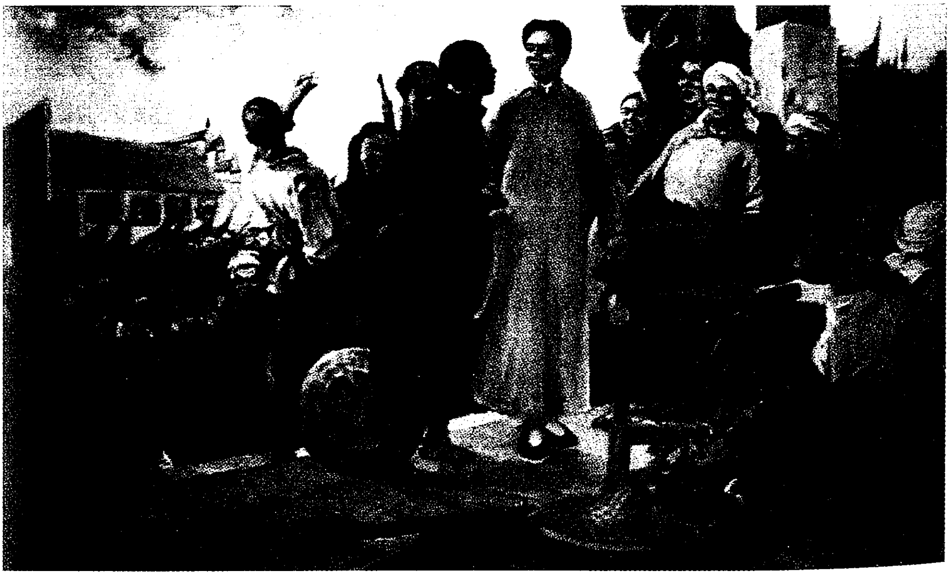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的出产，绝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的田，分得一种而自瞻〈赡〉。这一种人也可谓下级的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钉的地方也没有，专靠耕人家的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贫穷的农民了。上述四种里面以第三种和第四种的人数为最多。第一种人当然是少的，第二种也是很少的。第一、二种的生活是丰衣足食的，不是我们问题的目的物。我们的目的物，乃是占农民全数内面的大多数的第三、四种农民。第四种农民的苦况简直是非常厉害，每天到晚，终年到头地苦作，还不够穿衣吃饭，一过年岁不好，田主顽强（分配的方法里面详说）的时候，就差不多要饿死。所以这种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地痛苦的。第三种农民，虽然自己有一点土地，还耕一点人家的田，然而因为生活程度高，不是东拉西扯地来借贷，也是不能维持安家的生活。所以每到收谷的时候，谷总不能全进到自己家里来，直接运往债主家里去还账，或还利息了去。因为这种原因，自己所有的一点田，也不得不渐渐卖或当给“土财主”或中等农民（在后面地余中里面详说），而坠为第四种农民了，所以他们的生活也是极困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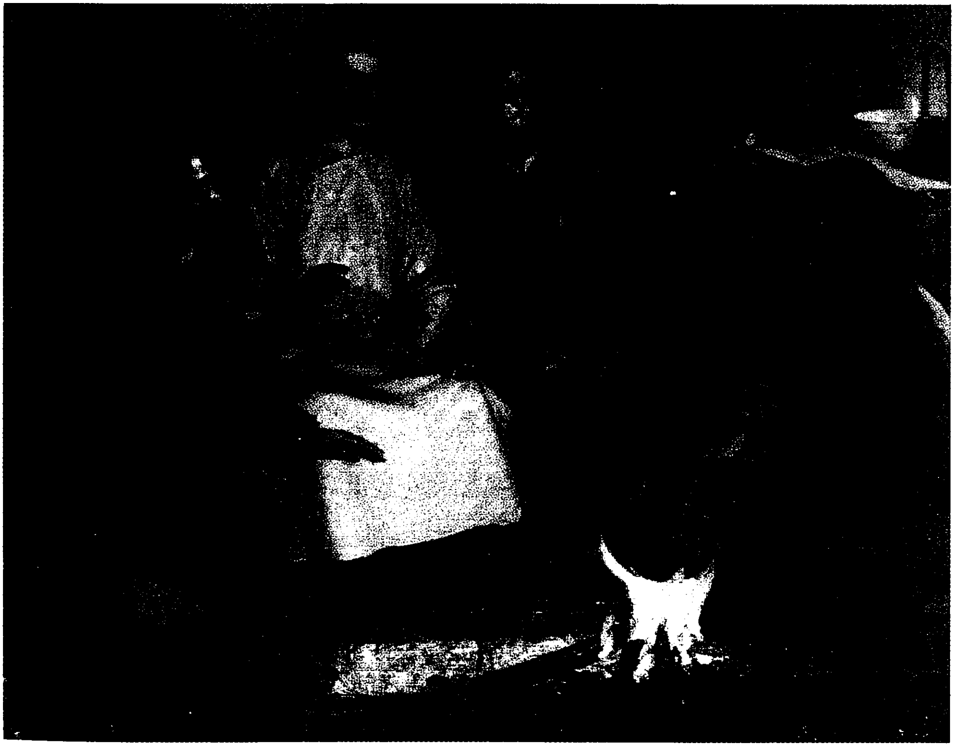
照这样看起来，可见得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只拿着农民都是自己有土地这句话，说农民的生活都没有什么困难的先生们，简直是瞎说。这种说劳动者是和资本家同样的有收入，他的生活……



《考察农民协会第一乡》（油画）



《进祠堂》（油画）



《教育全家干革命》（油画）

虞美人·枕上

（1921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1]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2]

晓来百念都灰尽，[3]
剩有离人[4]影。
一钩残月[5]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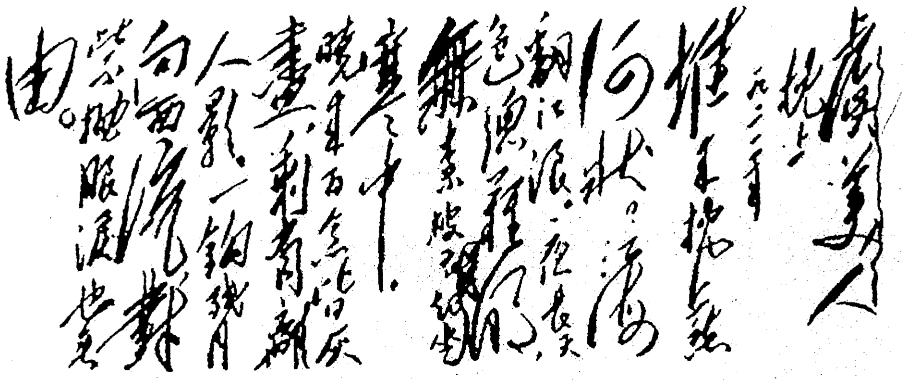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手书句末为问号。

[2] 毛泽东手书作“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3] 毛泽东手书作“晓来百念皆灰尽”。

[4] 离人，指作者的夫人杨开慧。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后随作者去上海、武汉等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隐蔽在长沙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牺牲。1920年冬，同毛泽东在长沙结婚。

[5] 残月，拂晓时形状如钩的月亮。宋代梅尧臣《梦后寄欧阳永叔》：“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



虞美人

枕上

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

何状。江海

翻波浪。夜长天

色总难明。寂寞

披衣起坐

薄寒中。

晓来百念都灰

尽，剩有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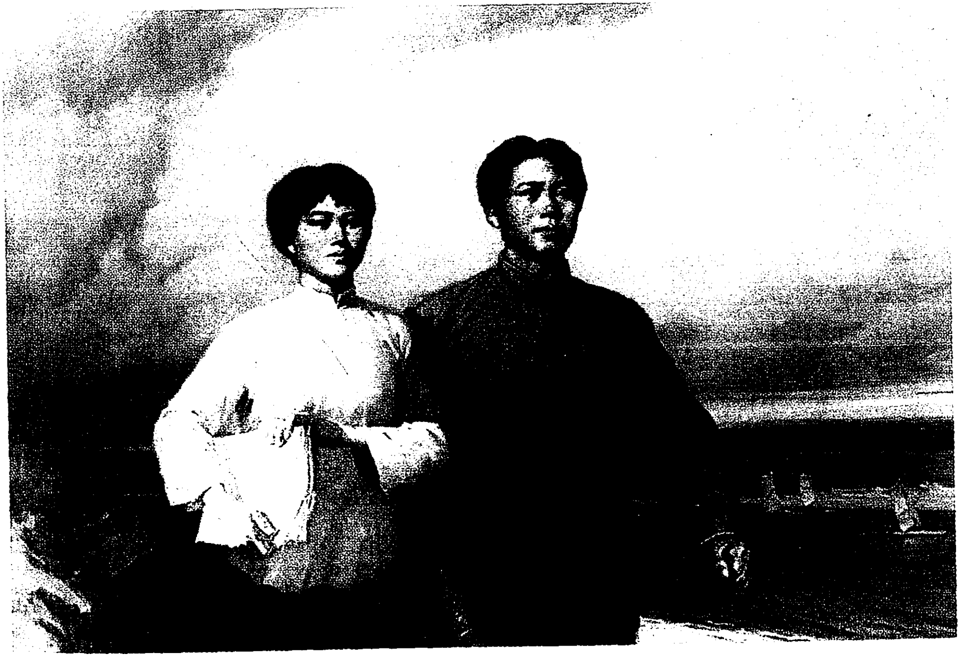
人影，一钩残月

向西流。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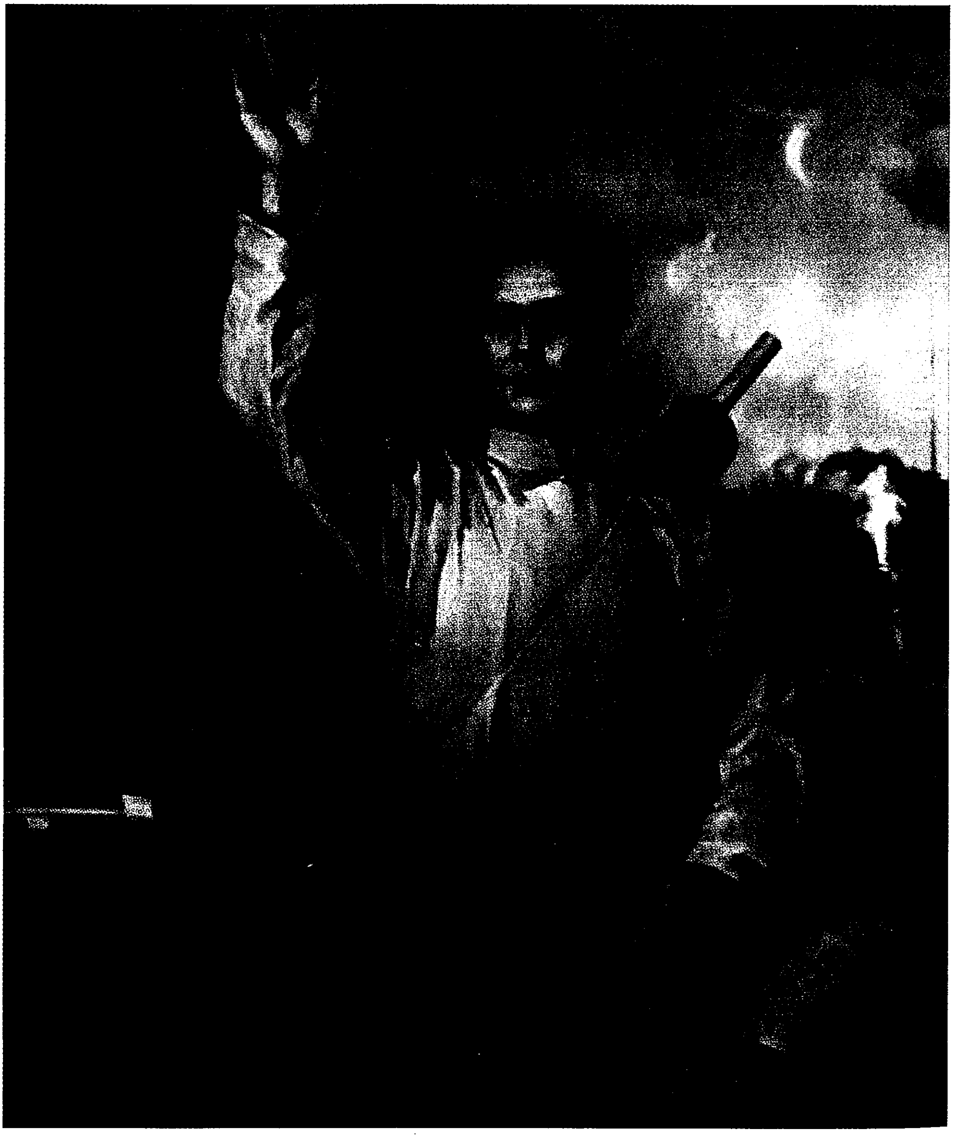
此不抛眼泪也

由。

毛泽东手书《虞美人·枕上》。



《战友》（油画）



《挥手从兹去》（油画）

题长沙劳工会联*

（1921年）

改造物质生活；
增进劳工知识。

题安源工人夜校[1]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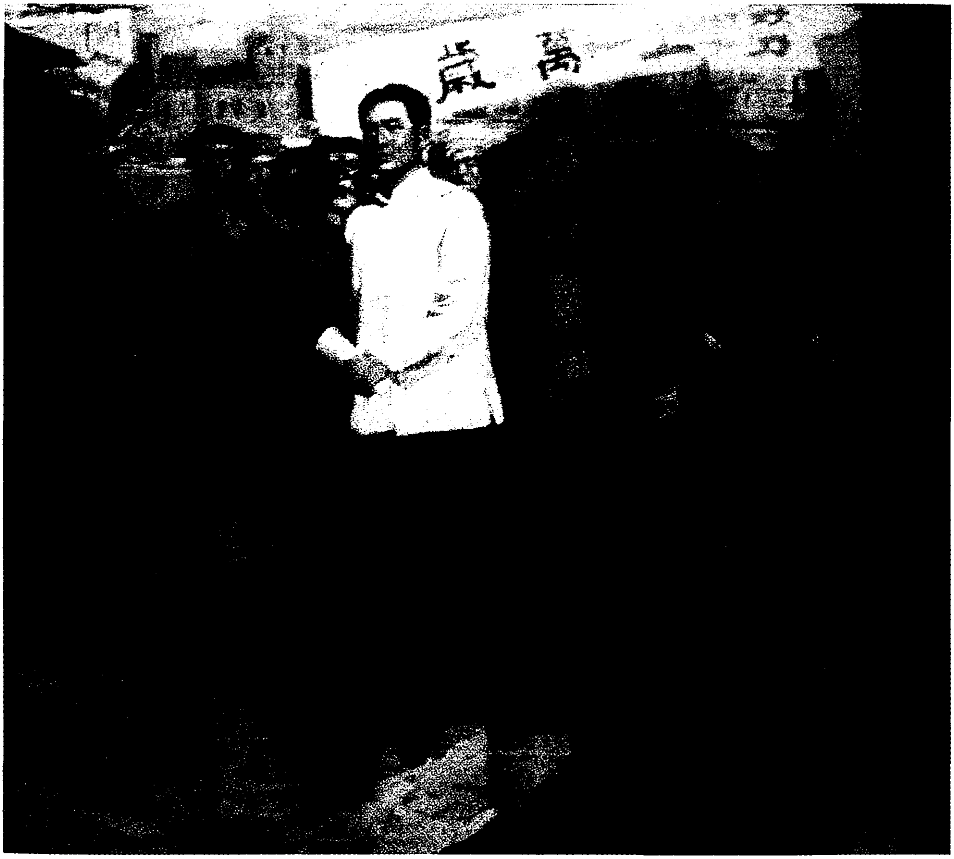
（1921年）

联络感情，交换知识；
互相帮助，共谋幸福。

---

[1] 安源工人夜校，1922年年初在安源五福巷成立。

1922



《领导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油画）

更宜注意的问题

（1922年5月1日）

自治省的湖南，以全民政治相号召的湖南，若全然撇开劳工，岂非笑话？如说劳工不应该撇开，那么，这个劳工仅有的“五一”纪念日，至少也值得大家一注意吧！

大家注意，就请注意到劳工的三件事：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除开那些重利盘剥的人，坐拥遗产的人和挟资经营产业的人以外，大概都是用手或用脑做事的劳工。这些劳工从他们身上所产生一面他们自己恃以得食一面资本家又恃以获利的唯一东西的“劳力”，一定靠着一件东西，就是工人本身的“生存”。不能“生存”，自然就不能有“劳力”。这样的结果，工人自然得一个“死”字，但资本家又岂能独得一个“生”字？依这个理由，所以准备做十八岁以上的大劳工的，哪些十八岁以下的小劳工，不可不予以相当的食物使保存生命，慢慢有力可卖，这实在是聪明的资本家应该注意的。在世上卖过力的劳工，当他到了六十岁以上力卖尽了再不能卖力的时候，依照秋天的草木也可以得点雨露尽其天年的例，也应该使这些劳工尽其天年。依这个理由，那些六十以上不能卖力的人，应该给与他一点救命的食物。一个人在“老”“少”两段不能做工的时候应该都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这就是生存权。

一个人在十八以上六十以下有气有力的时候，除开他自己发懒不做工可以让他饿死不算数外，在理都应该把工给他们做，工人就有种要求做工的权利。若是工人有力而社会无事可以买他的力，事实上工人不得不“赋闲”时，社会就应该本着罪不在工人的理由而给与他们平常的工资，这就是劳动权。

工人做的东西应该完全归工人自己，这就是劳动全收权。

劳动全收权自然是共产主义实行以后的事，这无论怎么样聪明的资本家也不会注意的。但也不要太忽略了，因为这实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一个大潮流。若生存权和劳动权，并不违背资本家的利益，实在值得大家注意。

大家注意生存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要饿死？大家注意劳动权，就请注意湖南现在有多少人失业？

“五一”这个纪念是八时间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了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八时间制。至于哪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时的湖南我愿大家特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自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悔之不及了！

给张秋人的信

（1922年6月7日）

秋人[1]兄：

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一号，请你快将第二号补来。细则[2]收到了。先报[3]第八期亦到。此间改组事[4]，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S.Y.[5]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6]，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枏[7]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8]，及其他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

---

[1] 秋人，即张秋人。1922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同年秋，应毛泽东邀请到湖南，被推荐到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英语教员，指导党团工作。

[2] 细则，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细则。

[3] 先报，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先驱》。该刊于1922年1月15日创办，次年8月15日停刊，共出25期。

[4] 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改组。

[5] 衡阳S.Y.即衡阳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2年5月1日。S.Y.是英文SocialistYouth League的缩写。

[6] 秦北平，黄和钧的化名，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语文教员。

[7] 赵枏，当时任衡阳地方团劳工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第三师范新书报刊贩卖部负责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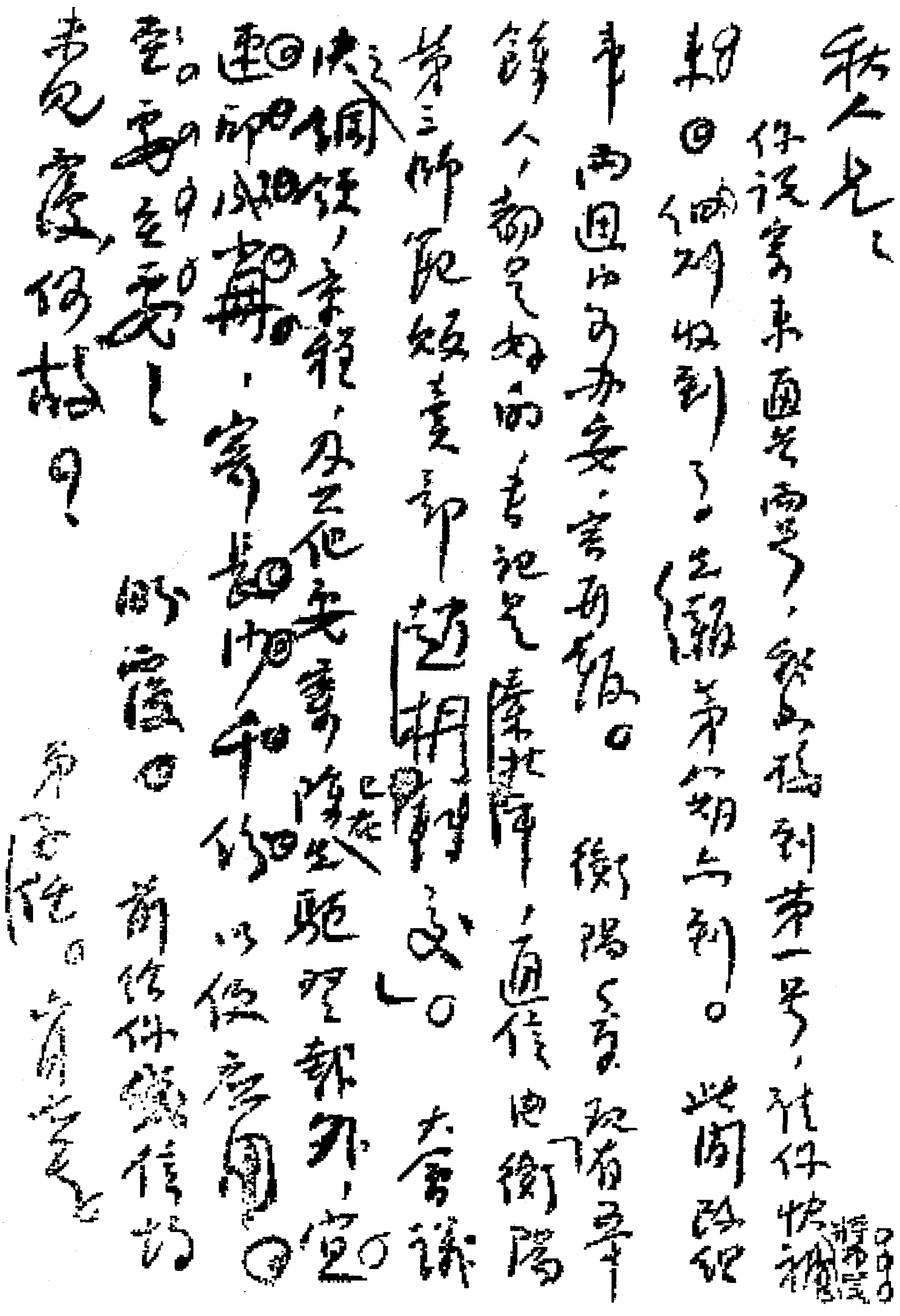
[8] 指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章程。

千份以便应用。至要至要！盼复。

前给你几信均未见复，何故?

弟　子任

六月七号



秋人先生：

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一号，请你快补寄[illegible]期。你们收到了，先驱第八期亦到。此间组织本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方面现有团员八人，都是好的，书记是[illegible]，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illegible]转[illegible]。大会议决之[illegible]，亲往，及至他处[illegible]已在[illegible]处理，都好，望运动[illegible]册，寄[illegible]和[illegible]以便应用。至要，至要！[illegible]覆。前信件[illegible]信均[illegible]。贵处何如？

弟 [illegible]

毛泽东致张秋人信的手稿。

给张秋人的信

（1922年6月15日）

秋人兄：

常德S.Y.[1]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2]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衡阳S.Y.负责人现为第三师范赵枏，请注意。

前信请即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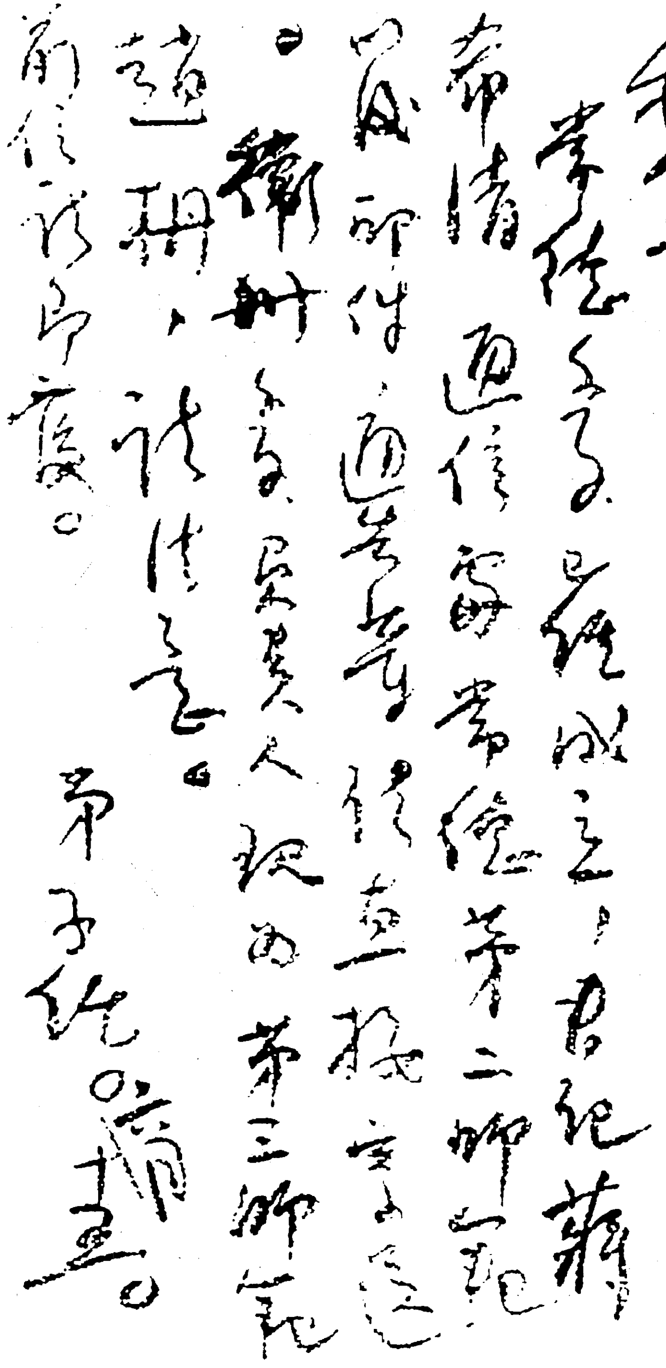
弟　子任

六月十五日

---

[1] 常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22年6月12日。

[2] 蒋希清，1922年6月至9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秋人兄：

来信收到，已经成立，书记[illegible]

[illegible]通信[illegible]第二师范

[illegible]通告各县[illegible]

衡州[illegible]第三师范

[illegible]请你[illegible]

前信[illegible]

弟子任。[illegible]

毛泽东致张秋人信的手稿。

给施复亮[1]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

（1922年6月20日）

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一）一、三、四、五号通告均到，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三人如下：

书记——毛泽东。

组织部主任——李隆郅[2]。

宣传部主任——罗君强。

（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3]二人年龄虽过二十八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

（三）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十二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十三条之规定呈请中局认可，乞示复。

（四）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六条三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十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三个月，认为过促难

---

[1] 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曾化名方国昌，浙江金华人。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2] 李隆郅，即李立三。当时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

[3] 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长沙教书。

于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三个月为六个月，可否，乞示复。

（五）此间执行委员会议决建议中局一件事如下：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区执行委员会至正式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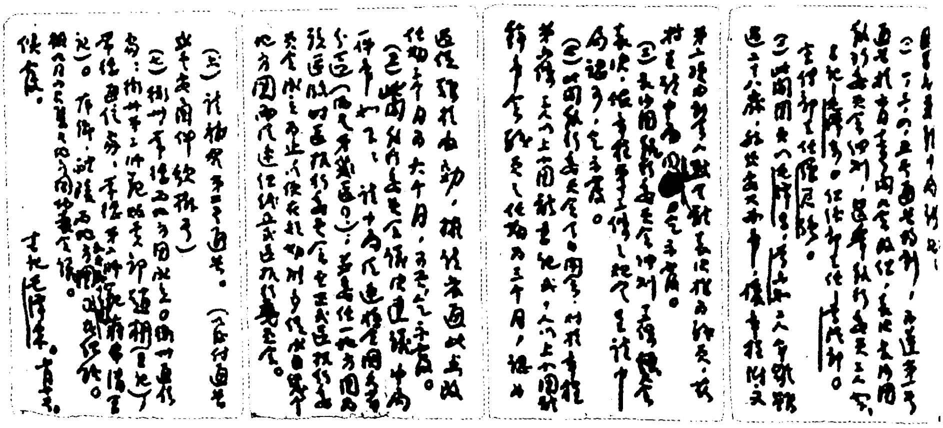
（六）请补发第二号通告。（以后付通告或重要函件须挂号）

（七）衡州〈阳〉、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阳〉通信处：衡州〈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书记）；常德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候复。

书记　毛泽东

六月二十号



1922年6月，毛泽东兼任改组后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委会书记。图为毛泽东就改组长沙团组织的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

给八舅父七舅母八舅母[1]等的信

（1922年7月5日）

八舅父、七舅母、八舅母及各位表兄嫂同鉴：

润莲[2]下乡带上一信，不知收到否？天气渐渐热了，各位舅父母、兄嫂都好么？甥今年住家读书，没有在外边做事，幸喜身体还好，每天也还快活。泽民、泽覃、淑兰、先桂、泽建、开慧[3]都好，不劳挂念。端人[4]下乡，托他带上此信。余候再陈。敬颂

大安！

甥　泽东

七月五号

---

[1] 八舅父，即文正莹。七舅母，指文赵氏（1854—1924），湖南湘乡人，农民。八舅母，指文赵氏（1855—1937），湖南湘乡人，农民。

[2] 润莲，即毛泽民。

[3] 泽覃，即毛泽覃（1905—1935），毛泽东的三弟。当时在长沙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红军独立师师长等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牺牲。淑兰，即王淑兰（1896—1964），湖南湘乡人，毛泽民的夫人。当时随毛泽民在长沙居住。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做中共地方组织的联络工作。新中国成立

后，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做接待工作。先桂，即赵先桂（1905—1932），湖南韶山市大坪乡湘韶村人，毛泽覃的原配。当时在长沙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1932年在济南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泽建，即毛泽建（1905—1929），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堂妹，从小由毛泽东的父母抚养。当时在长沙读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衡山县委妇女运动委员，耒阳县夏塘、敖山等地的农民游击队队长。1928年夏在耒阳被捕，1929年8月被国民党衡山县政府杀害。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县板仓人，毛泽东的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留在长沙县板仓一带坚持党的地下斗争。1930年11月被军阀何健杀害于长沙。

[4] 端人，即文端人（1901—1932），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坨（当时属湘乡）人，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小读书。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图为会议的会址。

给欧阳振垣[1]的信

（1922年8月7日）

有事奉商，望于本星期二七号[2]下午四时惠临清水塘一叙[3]。

---

[1] 欧阳振垣，原省立第三师范学生，当时在长沙任教。

[2] 据《一百年日历表》，1922年8月8日才是星期二。

[3] 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应中共湘区委书记毛泽东要求，派共产党员张秋人来湘工作。毛泽东决定派张秋人到衡阳三师，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写此信，就是要同欧阳振垣商量由他护送张秋人赴衡阳的问题。

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宣言

（1922年8月16日）

径启者我们泥木工人，为着生计问题，要求加一点儿工价。从六月初一日起算是实行甲工三角四分，乙工二角六分了。乃近日忽有少数人公团，开会反对，请求行政公署，张贴改订价码之布告。但是我们苦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瞻〈赡〉眷，并非坐食冤枉，和其他非正当工业的可比。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样摧残！

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苦力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是应当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决不受何方面的剥夺。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就是冒得三角四分和二角六分钱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特此，宣言。

湖南泥木工人全体同启

八月十六日

长沙土木工会章程

（1922年9月5日）

第一条　本会由长沙土木工人组织之定名为长沙土木工会。

第二条　本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

第三条　凡长沙土木工人经本会会员一人以上之介绍，委员会之通过，皆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本会会员入会时须纳入会费二角，以后每月纳常月费六十文。

第五条　本会拟举下列各事：

（一）补习学校。（二）消费合作社。（三）卫生保险。（四）失业互济。（五）其他必要事项。

第六条　本会基本组织为十人团，会员每十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任期一年，在一地域内因团结的便利，得由若干十代表选举一人或二人，负传达连络的责任。

第七条　十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三十七人组织委员会，任期一年。

第八条　委员会分为下列五股：（一）总务股，设正主任一人，副主任四人，总理本会各事务。（二）文牍股，设股主任一人，文牍员四人，掌理文书事项。（三）会计股，设股主任一人，会计员四人，掌管经费事项。（四）庶务股，设股主任一人，庶务员四人，掌理庶务事项。（五）交际股，设股主任一人，交际员十六人，掌管交

际事项。本工会事务重要者须经委员会各委员议决，普通者经各主任议决即可。执行委员会各职务由各委员互相推定。

第九条　本会得□请秘书，办理本会一切事务。经大会或委员会议决者。

第十条　十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在十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委员会为最高机关。

第十一条　每年开十代表大会一次，遇有必要时得由委员会临时召集之。

第十二条　会员全体大会无定期，遇有必要时得由委员会临时召集之。

第十三条　十分之一以上之十代表对于委员表示不信用时，得请委员会召集全体十代表会议，经多数之通过得撤退委员，另行选举继任。

第十四条　委员会有撤退十代表之权，但须得该团团员多数之同意。

第十五条　会员有犯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由委员会宣布退出：

（一）违反本会章程及大会委员会之议决案者；

（二）阻碍本会进行者；

（三）非失业、疾病三月以上不纳常月费者。

第十六条　退出会员不退所纳会费。

第十七条　惟十代表大会有修改本章程之权。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十代表会议通过日起为有效。

委员会委员姓名如下：黄志信、朱汉生、鲍海云、任澍德、董贤波、舒玉林、欧月轩、任澍皆、李贵生、陈子林、罗子佩、莫子林、骆有贵、彭应祺、王德桂、盛少元、朱树生、陈春和、陈澍

生、梁杏村、仇口生、刘季恒、刘春生、袁东生、张由生、蔡国卿、袁福青、黄青口、杨福涛、郭炳生、吴菊皆、罗先政、黄少梅、朱有富、王自福、廖春庭、黄松全、黄梅仙、任澍民、戴兰成。

劳动各团体致参众两院电*

（1922年9月6日）

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长沙大公报、民治日报，请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钧鉴：

敝部顷致北京国会一电文曰：中华民国国会参众议员钧鉴：世界经济之变迁日亟，劳动阶级之觉悟日深，苏俄创立劳农国家，是全世界各国楷模！我劳动者手创文明，本身未受其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经明文规定人民无阶级之区分，而全国最大多数之劳动者，未受法律之保障，且常遭其摧抑。人世不平，孰能于此？今幸劳动立法运动，声震全国！血气之伦，孰不庆幸！诸君为人民代表，须知共和国家，权在全民。舍最大多数之劳动阶级而言立法，即不啻抛弃全民！敝部等根据劳动者法（一）获得政治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产业管理（四）得受补习教育之四大原则，完全赞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提出之劳动之法案大纲十九条。务恳诸君：一秉正谊，举其天职，从速通过劳动法案，俾我劳动者不致沦为无法之人民，致酿法外之活动。幸甚幸甚！否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誓不认公等代表民意制定宪法也！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岳州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同叩等语。务恳贵

处力持公道，大加赞助，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
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岳州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同叩
九月六日

粤汉铁路工人致朱先生*

（1922年9月10日）

朱先生伟鉴：

工等此次罢工，出于万不得已，全因痛苦太深。劣员肆虐，待遇不良，详情工等向敝路王局长及洋总管所提出各条件。半月以来，甘心忍痛，无如王局长有意迁延，张苗未去，所请不允全路愤激，迫而出此。先生有意维持，曷胜感谢！惟敝路向重，有系统管理，负责任者，自有当局。幸先生迅向徐家棚王局长及洋总管交涉，朝允八条，夕即开车，决不违命。再工等颇有团体组织，此次罢工系由全路俱乐部联合会，负完全交涉责任。特并奉闻。即颂勋祺！诸维灵照不尽！

粤汉路全体工人
致全国各地工团快邮代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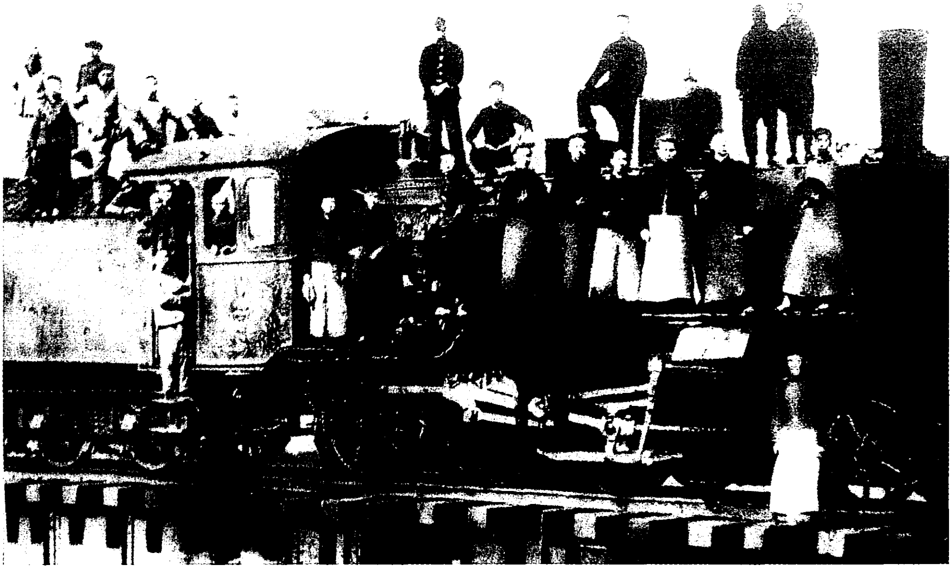
（1922年9月12日）

万急全国各地工团亲爱的工友们：

粤汉铁路全体罢工后，有一小部分为局长利用之天津工人，以同乡关系，甘做局长走狗，破坏团体之行动，仍旧行告局长调请军队保护，以致罢工工人无法对付，不得已而全体睡于铁轨道上，以示拦阻。乃军队受局长之指使，竟□无人道肆行杀伤工人。工人之家属往救，军队亦以□样之手段对付，儿啼妇哭，实不忍闻。受伤者无算，投水者数十人，将至毙命者七八人，就捕者十数人，而岳州工友已死者六人。凡有人心，谁不悲愤！工人等经此残酷杀伤之后，呼号辗转于淫威压迫之下，只有仍旧坚持罢工，誓死不屈。万分恳请各团工友以实力援助，誓必达到：（一）撤退弹压工人的军队；（二）革退并惩办王局长；（三）抚恤被伤工人及工人的家属；（四）完全允许工人提出之条件。各工团劳动同胞呀！这样黑暗□酷横暴的压迫完全加□于我劳动阶级之身，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怨愤？痛恨？奋起？报复呀！

全国的工友们呀！起来呀！向仇人奋斗呀！

粤汉铁路俱乐部联合会全体工人



1922年，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组建了长沙各个行业的工会，先后发动了一系列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运的高潮。图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筹委会合影。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图为安源路矿工人在庆祝胜利。

长沙泥木工人全体快邮代电*

（1922年9月24日）

长沙各报馆、各工会、各工团、各工友俱乐部转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工团、各工友俱乐部、各工友们及全国各界人士钧鉴：

敬□者，我泥木工人，因生活程度太高，洋价飞涨，钱价日落，又加之社会经济组织之不良，失业者日众。故我泥木工人身家所受痛苦，笔难罄述，几在社会上工人无立足之余地，迫不得已，集全体泥木工数千人。会议于落星田鲁班庙，举行加价。经多方之讨论，乃议决极公平之工价。甲工四角，乙工三角。呈由总工会备案后，由总工会评议议决减为甲工三角四分，乙工二角六分，转给长沙县公署备案，并非同人等自由加价，已于古历六月初一日宣布实行。□主□伙友。已照此次加价结算工账者不少。忽于阳历九月十七号，由长沙县传本会派代表与各公团会议工价。当即由本会派代表三人赴会，陈述我泥木工人痛苦，及加价之理由。不料到会之所谓少数资本家者，假公团名义，只主张照九年钱价折合，甲等只有二角七八分，意欲强制定议。当即由本会代表向众声明，不能由我少数代表私付表决，俟回会后再作答复。次日经本会会员开会。讨论结果，仍由本会呈文长沙县述明，再不能减少之理由。想现在社会上，凡我劳苦工人所住房屋及日用货物，莫不照九年时加价。何独我穷苦工人，加几分洋钱工价，即有所谓公团者出而制止。查

我建筑工人，在世界上，不独未受社会之优待，反受少数公团资本家之压抑。同人等数千余人，各有父母妻室儿女，当□社会经济不良之时，又加之生活费之微，实不能生活矣。倘或客厅只能依照少数公团资本家之一方决议，则同人等生活费太少。生存权已失。如此重压，迫于不得已之时，惟有最后之对待，全体工人歇业，坐以待毙罢了。如果歇业之举发生，则希望我全国各界父老主张公道，及全国各工会各工团各工友们，予我们数千苦工人以实力之援助。临电不胜迫切之至。

湖南建筑会泥木工人全体同叩

粤汉铁路罢工之宣言*

（1922年9月）

亲爱的同胞们！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兄弟姊妹们！

看呵！我们无产阶级，受社会怎样的待遇？资本主义者是怎样的压迫我们？偌大的社会，哪有我们发言的地位？但是，到了今天，黑暗势力紧紧的包围，使我们当这生死的关头，不能不发出激厉悲壮的呼声！同胞们呀！粤汉铁路的二贼，张恩荣（监工）苗凤鸣（员司），是怎样的专横险诈，虐待工人，我们前已宣布了。他们去年为图私利，唆使工人罢工，愚弄我们，陷我们于极深之痛苦。事后又阴谋强迫我们加入他们的团体，为他们争权利的武器。不遂，就恼羞成怒，用种种的手段，破坏我们的俱乐部。这是怎样教我们愤恨而且痛心的事呵！此外，苗又借罢工诈取我们的血汗工钱。工人因工受伤，苗竟不允其请假就医，而且扣除其工资。张则借火车贩烟土，因工人不与照顾遂挟嫌殴辱，并予开除。又没收工人所带食米，诬陷工人偷煤。种种虐待工人情形真是难以尽述呵！同胞们，这种工贼我们迭次要求局长革退。十几天来，毫无切实办法。面讯的结果，他不允我们的要求，教我们□法庭审判。显然是袒护私人，以拋延卸责。我们在三天前三电交通部限三日内圆满解决，否则全体罢工以待国人公决并以同意提出最后通告于局长。现在三天满了，已绝无圆满解决之望，是他们为袒护犯法害公之私

人，逼我们走最后的路，使国家受莫大之影响！同胞们！张苗是我们工人的蟊贼。我们当然誓不和他们两立。此外，生活程度的加高，我们生活一天一天的困苦。所以要求加薪以改良生活，亦是我们很紧迫很合理的行动。同胞们，工友们呀！我们为“解决压迫”“维持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不能不与工贼奋斗，不能不有这最后一举（罢工）呀！各界同胞呀！我们完全为我们切身利害而奋斗，与外界任何问题，毫无关系。请你们秉正义公理的精神，与我们以切实的援助呀！亲爱的工友们！无产阶级的兄弟姊妹呀！我们为生存而奋斗，为人格而奋斗，不达到目的，誓死不止！工友们！勇敢！坚决！“死中求活”，全在我们“团结”“奋斗”的力量呀！全国的工友们呀！“工人一体”，我们大家联合起来，一致向压迫我们的人奋斗呀！粤汉铁路工人宣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关于劳动立法的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

（1922年9月）

请愿书

为请愿事。窃劳动问题早已发生于欧洲工业革命以后，至今日百有余年，中经无数之政治家及政治学者苦心殚虑，旦夕钻研，而卒未获一根本解决方法。惟欧美先进国，积多次之经验，遂获莫大之教训。于是保工条例律有明文，而从前穷苦无告之劳工亦得渐与普通人民立于平等地位。而国运亦得转以苟且偷安。最近如苏维埃俄罗斯更完全由劳动者建设劳农政府，掌握政权，国内宪法悉由劳动者手定。即此可知一国劳动者实立于建国上重要地位。此乃世界自然进化公例。无容置疑者也。晚近我国工人亦颇有觉悟，国内工业稍发达之区。所有劳工纷纷结合团体，冀藉群策群力，以改良自身地位，减轻自身痛苦，于理甚属正当；更有因劳资问题不得已而出于同盟罢工，在正当防卫上立论。工人同盟罢工确是工人应有之权利，毫无可訾议。无如我国士人素有贱视劳工恶习，而工人设立团体及一切正当行为，又因未有相当法律保护，故国内一般操政权者，对于工人得任意摧残，且对于工人设立团体及一切正当行为，尤为嫉视。所以近年来往往有因劳资问题而竟闹成劳资于不平等之

举动者，比比皆是。在今日操政权者不知世界大势，昧于立国根本，遂以为工人易欺，其愚实甚。而曩昔立法者亦囿于成见，未尝观察及此。此我国之劳工界所以依然痛苦呻吟，莫可告诉，诚可哀也！殊不知国内工人亦是中华民国一分子，律以凡属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之旨，国内工人亦当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歧视；且以全国人民而论，工人实占绝对的多数，依据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原则，岂能舍弃工人而不顾；况立国基础全凭国内生产者为之柱石，而消费者不与焉。此稍知近代政治社会经济诸状者，莫不异口同声，共畅斯旨。而工人在社会完全为生产者，在国内各阶级中用力最多，境遇最苦，而对于国家社会功绩又最巨。曩昔立法者对于国内少数之特别阶级及社会之消费而不生产者，则加意保护，而于占全国人民绝对多数且用力最多、境遇最苦、功绩又最巨之工人，则竟忍心摈斥，不齿诸齐民之列。在国民应有权利义务上，岂得谓平？故依以上种种立论，无论从何方面说来，今日劳工法案，皆应有成立之必要，皆应规诸根本大法之内，俾一班操政权者，以后不敢巧立名目，轻于尝试，或借特别法治安条例焉，以受其压迫工人之伎俩，斯诚目前制宪最急之务也。但今是论者，动谓我国法律未尝歧视工人，何必无病而呻吟，不知罢工骚扰有罪，明文规于刑律（暂行新刑律第二百二十四条），袁氏治安条例迄今尚未取销（民国二年三月北京政府教令第二十八号之治安警察条例）。所谓我国法未尝歧视工人者，是直自欺欺人之语耳。然推求其故，由于国家根本大法尚未成立，而临时约法又无保护劳工明文，所以罢工骚扰恶及治安警察条例。两次虽经国会在广州非常会议时议决取消，但此关于变更法律案，权限上当时已发生问题，效力上尤未能发生于全国。此足以证明今日劳工法案应规诸根本大法之刻不容缓者也。方

今国会重开，国人希望急于制宪，而众议院常会议员李庆芳君已有保护劳工法案之提出，吴子玉氏亦有保工规条应附诸根本大法之主张，虽陈义各有不同，条文尤未易强合，但海内士夫，渐有易贱劳工为尊重劳工之趋向，不可谓非差强人意。同人等素从事于劳工运动，连年来亲睹国内劳工饱受暴力摧残之惨状，深知国内劳工无法律保护之痛苦，加以感受操正柄者之巧于舞文玩法，益觉得劳动法案规诸宪法之重要。用是为全国劳工请命计，为国家立法前途计，理合拟具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依法请愿贵院尽量采纳通过，规诸宪法。并将暂行新刑律之第二百二十四条罢工骚扰罪，及民国三年北京政府教令第二十八号之治安警察条例，正式提出议决取消，以苏工人之困。全国劳工幸甚！为此依法请愿贵议院，提出大会议决施行，此上众议院议长。

计开劳动法案大纲十九条统祈钧鉴。

劳动法案大纲

一、承认劳动者之集会结社权。

二、承认劳动者之同盟罢工权。

三、承认劳动者之团体的契约缔结权。

四、承认劳动者之国际的联合。

五、日工不得过八小时，夜工不得过六小时，每星期连续四十二小时休息。

六、十八岁以下青年男女工人及吃力的工作不得过六小时。

七、禁止超过法定的工作时间，如在特别情形，须得工会同意，才得增加工作时间。

八、农工的工作时间，虽可超过八小时，但所超过之工作时间的工值，须按照八小时制的基础计算。

九、须以法律担保一般不掠夺别人劳动之农人的农产品价格。此项价格由农人代表提出，以法律规定之。

十、吃力的工作，及有碍卫生的工作，对于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人，绝对禁止超过法定时间，绝对禁止女工及十八岁以下的男工做夜工。

十一、体力的女工，产前产后各八星期休工，其他工作之女工，产前产后各六星期休工，均照常领取工资。

十二、禁止雇用十六岁以下之男女童工。

十三、为保障工人适当以至低度的工钱，国家须制定这种保障法律。当立此项法律时，须准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无论公私企业及机关的工资，均不得低于此项法律保障的至低限制。

十四、各种工人，由他们产业组合或职业组合保障，可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企业机关，及选举代表参加政府企业机关及政府所管理的私人企业或机关之权。

十五、国家对于各国公私各企业，均须设立劳动检查局之权。

十六、国家保障工人有完全参加国家所设劳动检查局之权。

十七、一切保险事业，须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以保障所有在政府的、公共的、私人的企业和机关内的工人之损失或危险，保险费完全由雇主或国家出之，受保险者决不分担。

十八、各种工人和雇佣人，一年工作中有一月之休息，半年中有两星期之休息，并领薪之权。

十九、国家须以法律保障男女工人有受补习教育的机会。

请愿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　邓中夏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分部　阮达时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　林湘浦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　毛允滋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　谭平山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　王尽美

介绍人：

童启曾　杜凯元　张秉文　赵金堂
岳云韬　孙镜清　李肇甫　刘　纬
萧　湘　廖希贤　蒲伯英　吕　复
骆继汉　姚桐豫　周继潆　万　钧
彭学浚　孙　钟　邓毓怡　胡鄂公
汤松年　张国浚

给李立三等的信[1]

（1922年9月）

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要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

---

[1] 这是毛泽东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前夕从长沙致李立三等信的主要内容。

长沙泥木工会援助缝纫工人通告*

（1922年10月）

我们昨天接读褂衣缝纫工人的罢工宣言和他们的快邮代电。那上面所说的意思，以为成衣工人，已经加成二角八分。所以褂衣店的做检货和做长年的工友，也要求涨点工价。这是何等的正当，是何等的有理由。你看他们在铺里做工夫的缝纫工友，每天从早晨起来，吃了早饭后，就要伴着案板，一天三餐饭之外，你看哪里来的休息。况且他们的晚工，比什么还要苦。不论天冷天热，甚至于有做到三更过后的。你看这样晚散工，早晨又要按老板的早饭，到底有几点钟的睡眠呢。这样苦的工作，所得的工资，不能养活家中的父母妻室儿女，他们再也不能忍饥受饿了。他们这次的罢工，是出于不得已的。我想当店主的，也应该承认他们的要求。我想你们的良心，也不愿意让他们这些无产的工友们，受那样的摧残压迫的，又何必定要用控诉法庭的话来恐吓他们呢。各街的店主呵，你们要清白些。现在的时候，不比从前了。他们的团体坚固得很。听你们怎样的压迫，怎样的恐吓，我想他们非达到增加工资，是决不得屈服的。我们最后的一句忠告，就是奉劝你们用解放的手段，承认他们帮伙的请求。秉你们的良心，总不要同类相残，效那班顽固派的行动。你们要晓得，虽说他们帮伙，稍微涨了一点工价，你们也定会把卖价加高的，其实到底与你们有什么损失呢？各街的店主呵，请你们再四思虑吧。

长沙泥木工人六千四百余人快邮代电*

（1922年10月5日）

长沙各报馆、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工团、各工人俱乐部、各工友们暨各界人士钧鉴：

工等前次□发出一快邮代电，谅邀洞鉴。其一切苦衷，均在前电内详细说明，意欲有圆满解决之希望。不料昨阴历八月十四日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布告，偏袒少数街团一方面之言词，不洞悉工等苦衷，并称工等决无加价理由。试问今日各种货物及房租等何不一比从前昂贵数倍，又何非自由加价？我最穷苦之工人，迫于生活太艰，不能不稍加工资，以改良生活。此工等应有之生存权，何况不能自由加价而反以极酷烈之压迫手段，岂必致工等饿死而后快耶？工等万不能忍，迫不得已决于十六日全体罢工，并请愿省议会，图最后之解决。非达到圆满目的，誓不上工。务望各界诸君体念苦衷，予以谅解，并予以实力之援助。临电神驰，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长沙泥木工六千四百余人同叩

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为长沙泥木工人罢工支援信[*]

（1922年10月13日）

建筑业工友诸君大鉴：

诸君这次罢工□有多日了。诸君！那由我们认为十分正当。乃资本家方面至今未完全依允诸君的要求，实在令人气愤。现在各工团群起援助诸君。□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专此祝诸君努力。

长沙泥木工人致长沙县知事快邮代电*

（1922年10月21日）

万急长沙县周知事鉴：

工等罢工近二十日，损失近十万元，所争只在仅敷衣食之每日三角四分工价，贵知事故抑劳工，多方延宕。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迭函承认工价，恳求开工。而贵知事应允之布告，迟延不发，是以一人而抗社会逆民众。工等誓不承认各种出手情理之遁词，非达到三角四分之目的不止。罢工已久，衣食无出，饥寒交迫，众志成城。请与贵知事约，从今日下午十时起，至明日下午九时止，二十四小时内，请贵知事用书面明白承认工等能够衣食之每日三角四分工价之要求。否则工等定于二十三日，推举代表一千人，前来贵署与贵知事面质理由。若犹不决，则定于二十四日全体四千余人，齐到贵署请发衣食，以解饥寒。特此电陈，即祈决覆。再二十三日之代表到署，及二十四日之全体到署，均应文明举动。严守工人自治劳动神圣之本职，一切由纠察员负责。不烦贵知事援引袁皇帝颁布之治安警察法。孜孜为秩序吃虑，合先申明。

省城泥木两行全体工人等四千余人同叩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

长沙泥木工人代表与吴政务厅长的谈话记录及呈省长的文[1]

（1922年10月24日）

谈话记录

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价增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罢工争持一案。即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行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许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各工人。

上列文句在省长公署政务厅，当吴厅长景鸿记录。

呈省长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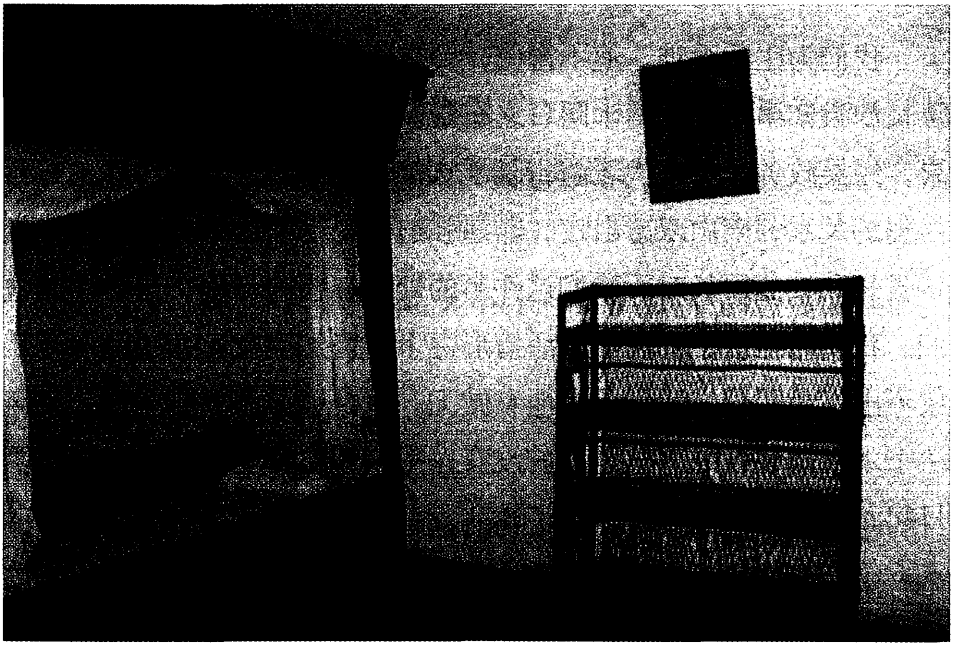
呈为营业自由恳请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事。窃工等要求将工价

---

[1] 1922年10月6日，长沙泥木工人6000余人为增加工资和争取营业自由而罢工。毛泽东领导泥木工人代表与长沙县知事周瀛干、湖南省政务厅长吴景鸿、省长赵恒惕进行谈判，并取得胜利。据当时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沙泥木工人谈判代表之一易礼容1987年6月7日回忆：毛泽东最清楚长沙泥木工人罢工全过程，呈文是他起草的。

增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迫而罢工已二十日。昨日工等全体齐赴长沙县署，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请其取消前发布告，以全生活。正争持间，适接省长电令，允在今日完满解决。窃思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等工价之争，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宜双方自行协定。非有强迫行为，官署不必过问。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隆情盛意，至为感激。现工等全体集合省教育会前坪，群情一致，恳求省长即赐解决，以安人心。所有工等工价增加，属于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官署不必过问缘由。理合呈请省长，即时明白批示，交由代表携回。并请令饬长沙县周知事，废弃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实为公便。谨呈湖南省长赵。

湖南省城泥木工人　任树德　仇寿松
杜仲坤　黄少梅
李海珊　毛润之
朱有富　罗子佩
等六千四百余人
全体谨呈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清水塘出生。图为毛岸英诞生的卧室。

长沙泥木工人布告*

（1922年10月25日）

我们为生活艰难，迫不得已，要求将工价增至三角四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八月十四日之布告。罢工争持一案，昨次请愿结果，经吴政务厅长，代表赵省长承认加价一事，为劳工与雇主的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定，非遇强迫行为，官厅不必过问。我们认省长和政务厅长对于我们这件事的处置，极为合理，当然感谢他们。我们的工价，在现在生活情形之下，当然要收三角四分。若某家不出三角四分，我们不到他家做工。就是这个营业自由权，省宪法上本已早经规定，只是从前没有保障，现在算是有了保障。从明日起，各人照常开工。特此宣布。

泥木两行请愿大会布告

十月二十五日

给文运昌[1]的信

（1922年11月11日）

运昌姻兄：

来示接读。刘君实在无法位置，今刘回乡，情形请面询之。弟在此无善足录，生活奇窘，不足为戚友道也。

舅父母一函请面呈。各位表兄嫂同此问候。有暇盼兄时赐教言。即颂

乡祺！

弟　泽东上

十一月十一号

---

[1] 文运昌，字咏昌，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坨（当时属湘乡）人，毛泽东的表兄。早年毕业于湘乡县立师范，在乡任小学教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农民运动，任湘乡县凤音乡农民协会秘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给八舅父母[1]的信

（1922年11月11日）

舅父舅母大人尊前：

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人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2]回乡之便，托带片言，借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祷！敬颂

德安！

甥　毛泽东上

十一月十一号

---

[1] 八舅父，即文正莹。八舅母，即文赵氏。

[2] 即同日给文运昌信中提到的“刘君”。不详。

铅印活版工人之要求条件*

（1922年11月21日）

一　致公司函

径启者，工等蒙贵公司雇请工作有年，每日工作时间太长，辛苦万分。排报工人纯系夜间工作，通宵达旦，不能安寝，此种痛苦更所难堪。每月所获工资，多则八元少至五元四元，以之维持个人生活而虞不足，实无余资以供事蓄。近来经济变化，生活程度日益增高，食物房租，日益□贵，是以原有之工资愈难维持生活。迫不得已，经全体议决，向贵公司提出维持生命之十项要求，请于三日内答复，完全承认。再工等此次之要求纯系出于生活压迫。平日东宾之间感情素洽，贵公司对于工等之痛苦，必不漠视而能完全承认也。

二　致报界函

径启者，敝会工友，为生活压迫，精神物质，痛苦万分。不得已向各印刷公司提出要求条件，请求增加工价，改良待遇。若各公司不念工人痛苦，坚持不允，是迫工等出于最后之一途，届时全体罢工之事，或不能免。报界主持公论，体念劳工，素所钦佩，敝会工友手印各报，对于报界，亦不无微劳，关系既深，情意自切。所

有敝会向各公司要求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各情，理合函达贵报，企予主持公论，使敝会合理之要求，早日达到，幸甚。要求条件，附上。

三　要求条件

甲、活版部条约。（一）排报工人每日工作，检还以六千字为限，每种须另加一人排版。各项新闻，一经排检不得抽□。排杂件工人，每人每日作，以小时为限。如有紧急工作，□加开晚工时，以三小时为半工，并须备晚点。（二）各报馆齐稿时间：（1）附张午前十时。（2）中外新闻午后二时。（3）本省新闻午后四时。（三）排报工人，每人每月除伙食外，工资光洋十二元，以月计算。排杂件工人每人每月除伙食外，工资光洋以十元为本位。须一节计算，主薪水加倍。（四）发货检还，每千字工资为一角八分，空白以字计算。边圈大夹小及边符号加半，书内表格加倍，英文零件繁杂表格面议。伙食归公司担任。（五）公司应在每年盈余项下，提二成作为工人红利。（六）排杂件工人，每年以正月初八日为开工期，腊月二十四日为收工期。每月朔望为休息日不得扣除工资。如值休息日，有特别工作，须加倍给薪。（七）学徒三年毕业，须具有普通知识。学习满六个月者，须由公司酌给津贴。一家只能一进一出。

乙、铅印部条约。（一）包印大报□种计两张，包价光洋二十五元。分数以百分起至一千分止。如超过千分以外，以原价八成计算。（二）包印小报，每种计一小张，包价光洋十二元。分数以百分起至千分止。如超过千分以外，以原价六成推算。如有兼印杂件，临时面议。（三）杂件工人，归店主聘请。（四）喂纸工人，每月工资光洋十元。如兼主任，每月须加工资光洋五元。（五）推车工人，

每月工资光洋五元。（六）无论包工聘请，伙食概归公司担任。学徒及晚工，均照活版部例。凡公司对于工人，不得借故开除。如因故开除工人时，须将理由通知本会，取得本会之同意，否则不能有效。

铅印活版工人条件*

（1922年12月9日）

活版工人条件

（一）排报工人每种大报二大张，以八版计算每版一人每栏以五十□行为标准，行数为五号字所占地位为标准，如加行数仍照推算另排。广告一人各项新闻一经排检不得抽□。但有必须抽□时，按每百字加洋六分。排杂件工人每人每日工作以八小时为限，但首尾休息时间不在此内。如加晚工照日工之价并伙食结算以三小时半为一工。

（二）各报均宜从早发稿时间推本省新闻每人以一百零四行为准行数以六□计算。

（三）排报工人每人每月除伙食外，工资光洋一十一元以月计算。但十日以内者以半月计算，十日以外者以一月计算。如遇报馆倒闭或被封时，不在此例。排杂件工人，每人每月除伙食外，工资光洋以九元为本位以月计算，主任薪水加倍。

（四）发货检还每千字光洋一角四分，空白以字计算，边圈大夹小及边符号加半，书内表格加倍，英文零件繁体表格面议。伙食概归公司担任。

（五）公司红利以十五分之二作为一切工人红利。但以工作满六

月者为限。

（六）排杂件工人每年以正月初六日为开工期，腊月二十六日为收工期。但遇特别情形必须工作时须加倍给薪，每月朔望为休息日，不得扣除工资。如值休息日，有特别工作须加倍给薪。

（七）自签字日起一年以内，各公司不得加收学徒。

铅印工人条件

（一）包印大报。每种计两张，每月包价光洋二十二元。分数以一百分起至一千分止，如超过千分以外，以原价七成计算。

（二）包印小报。每种计一小张，每月包价光洋一十元。分数以百分起至千分止，如超过千分以外，以原价五成推算。如有兼职条件临时面议。

（三）掌机工人。每人每月工资光洋一十元。

（四）摇□工人。每人每月工资光洋五元。

（五）无论包工聘请伙食概归公司担任，学徒及晚工均照活版部例。

两部共同条件

（一）公司开除工人，须将理由宣布，并不得以此次罢工为理由。

（二）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之工资伙食，须由各公司照常补发。但报馆从此不开工者，不在此例。

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

（1922年12月14日）

各工团代表，因各种重要问题，与政府交涉情形。各报均采访稿，略有登载，惟省略太多，且多与实际交涉情形不符。各工会会员全体，却不明白此次交涉结果，特将与警察厅、长沙县、政务厅及省长公署交涉的实在情形，披露于次。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泥木工会、理发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石印工会、笔业工会、缝纫工会、机械工会、人力车工会、靴鞋技师工会等，十一工团以近来劳资纠纷日益加多，工人团体日益发达，工人与政府的隔阂亦日益加甚，官厅对于劳资间之争执，处置常不得其平，最近忽发生西区警署取下人力车工会会牌，及长沙县意欲重封理发新店之事，又笔业罢工迄未了结，机械工会则学生派与实习派冲突，缝纫工会则旧总管值年与伙友冲突，如以近日谣言甚多，谓政府又将有不顾宪法压迫劳工之事，谣言日甚一日，工界之愤慨与恐慌亦日甚一日，总此诸因，实有与各级行政官厅直接交涉之必要。各工团代表二十余人，特于本月十一日上午十二时，晋见警察厅石厅长，交涉约两小时。下午三

时，晋见长沙县周县长，交涉约两小时半。十二日上午十二时，晋见政务厅吴厅长，交涉约三小时半。十三日上午十二时，晋见赵省长，交涉约一小时半。交涉之事项，约分十项：（一）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二）集会结社自由问题。（三）表明工界的态度。（四）工界与政府应时常接头免生误会。（五）建议组织劳资裁判所。（六）人力车工问题。（七）理发工问题。（八）笔业工问题。（九）机械工问题。（十）缝纫工问题。

关于第一项（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赵省长、吴厅长、石厅长、周县长，均谓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近来各处罢工时起，政府并未干涉，即是明证。赵省长、吴政务厅长并谓，政府虽听到许多传说，如总同盟罢工之类，亦以谣言置之，并未用何种压迫办法。赵省长又提及黄庞事件，谓杀黄庞实系因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运动造币厅罢工，而那时正值过年，靠造币厅铜元接济军饷，实不能罢工，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代表对于政府所采对劳工之态度，认为满意，惟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及运动造币厂罢工，谓实不是事实，并谓来告省长的一定均谓这些是事实，说这样不是事实的恐怕省长在今天才听到。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而政府方面受通国的责难，名誉上法律上的损失真不可数计。即此亦足证明工人与政府隔阂之不好。

关于第二项（集会结社问题），代表谓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不知省宪法第十二条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并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须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一条就根本取

消了。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扰，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能随意干涉。赵省长、吴厅长、石厅长、周县长，均谓宪法当然完全有效，只要人民是守法的，政府当然不干涉。在政务厅时，代表并谓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从前政府常有干涉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之理由，常有以某种集会结社或言论出版之意思，将会要侵犯刑事法典为词□与法律本意不合。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暂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代表并引英国容许共产党不加干涉（议会内有共产党议员），干涉只在共产党有侵犯法律行为（即革命）之时。吴厅长谓法律本有动机主义与行为主义二派。现在法律确是采行为主义，但如某种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亦不得不干涉。代表仍谓如无直接损犯法律之行为，实不应干涉，并举英法不禁人民携带手枪，必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为证。

关于第三项（表明工人态度），代表谓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工人并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因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至工人对于现政府之态度，只要政府待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工人为解决自身痛苦，常有种种运动，即所谓劳动运动但均不出增加工钱、减少时间及改良待遇三事。工人断不为目前政治上的党派所利用。工会为政派所利用的，必系招牌工会，真正产业的工会或职业的工会，断不为他们所利用。政府不察，看见工人罢工时起，就疑心有政派在那里利用。这种疑心，

实在是错误的。以后请政府分别为人利用的招牌工会及纯粹为解决劳动者自身痛苦的真正工会为二事，不混而为一，以免处置失当，引起工界对政府的恶感。赵省长、吴石两厅长、周县长，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很为得当。吴石两厅长，谓社会主义为进步之主义，将来一定可以达到，惟目前不能实现。周县长主张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大损失。赵省长亦谓社会主义将来或可达到，惟目前则难。目前应以开发实业为主，劝工人稍为忍点痛苦。代表对周县长之意见，则谓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至与之冲突了。

关于第四项（工人与政府接头），代表谓工人与政府不接头，实足酿成种种误会。政府高高在上，工人在下，中间的人容易捣鬼，造□出种种谣言，如近日所传之政府将大压迫罢工及去年之黄庞案，即是其例。并且工人与政府不接头，资本家店主则容易与政府接头。政府里下级人员或偏听失察，随便处断，及工人受害不过一个反动，政府又要变为原判，威信就损失不小。数月来此例甚多，近日又有人力车工之事。希望以□政府与工人随时接头。重要案件，先接头，再处置。赵吴石周均以此说为然。吴厅长并谓极愿多与工人接头，以便考知工人生活状况，惟工会代表须确实能代表大多数者。赵省长谓以后新政府，省务院负完全责任，省长不过虚衔，可多向省务院交涉。

关于第五项（劳资裁判所），代表谓近来劳资间纠纷日多，普通行政及司法机关处理劳资问题常感失当。因劳资问题非有专门知识不能使处断不失当，特建议政府，仿广东之例，设立劳资裁判所。石厅长周县长异常赞成。周县长并允在裁判所未设以前，凡工界争执愿任调人。吴厅长赵省长均谓可向省议会请愿制定法规，政府即

可设立。赵省长并允向议会方面去说。

关于第六项（人力车工会问题），系在警厅交涉代表谓长沙人力车工会依照省宪第十二条组织，人数一千八百余人，组织极其完善，乃西区警署忽将会牌取下，指令上有“擅自设会”之语。并且出言粗恶，气势汹汹，警厅周科员更拍桌打椅，出言辱骂，毫不尊重工人人格。外间传言，有谓业主与厅里职员串通舞弊，未知确否。各工会异常愤激，以为一个工会可以取牌，其他的工会都可以取牌，危险实甚，并且完全违反省宪法第十二条。石厅长听代表之言，为之惊愕，谓并未下此项命令。比即承认人力车工会备案，文到即可批准。并劝工人对吴鹤生的会可不必齿，谓假工会自然会销灭的。代表也答应了。

关于第七项（理发工问题），代表在长沙县及政务厅，指出此案各项情弊，并指出原判违反省宪法营业自由之规定，码头陋规事实上要打消，四六分账最为持平各点。周县长允停止执行原判候，省署将原判变更即可了结，并允保释工人骆美祥出狱。吴厅长竟否认有新指令要长沙县执行原判之事，谓我并不知道（可见此案弊病极大）。遂允依照省议会议决案办理。如议决案不到，则由工界来一呈请求变更不合理之原判，即可办理了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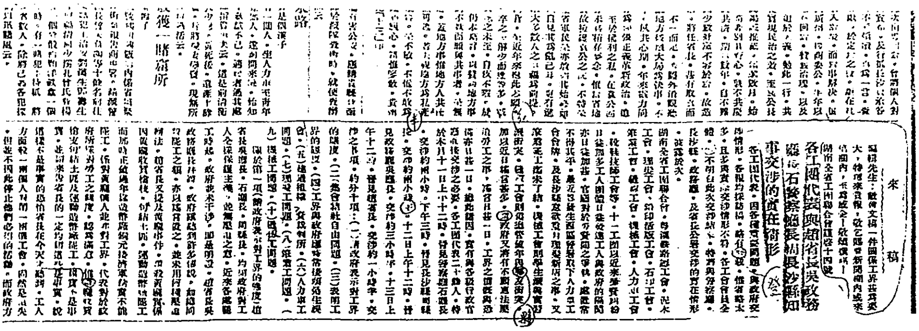
关于第八项（笔业罢工问题），在长沙县交涉。代表说明笔业工友生活之苦，及店主方面要迫工人于死地延不解决情形。周县长即允诺出任调停，定期十二日约集工雇两方代表在长沙县署调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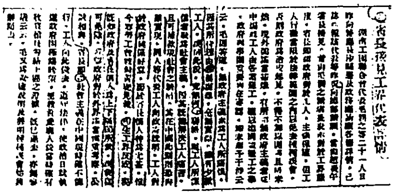
关于第九项（机械工会问题），在政务厅交涉。吴厅长先就听得学生派片面之词，询问是否属实。代表即将机械会成立以来各种为人利用，真正工友不能过问，及近来真正工友切实整顿，开会改选，议决改名机械工会各情，详细说明。吴厅长允照实在情形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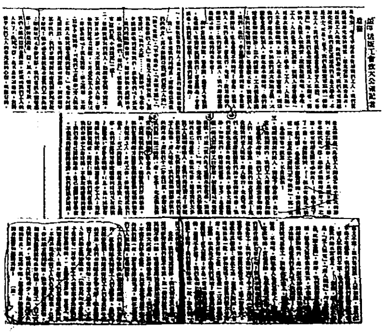
理，断不听彼方一面之词。

关于第十项（缝纫工会），在长沙县交涉。代表说明旧总管值年不交财产文卷完全是少数反对多数情形。周县长比允出任调停，定期十二日上午，约集双方代表在长沙县署调处。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代表		毛润芝	杨润玺
粤汉铁路总工会代表		郭亮	许仲允
泥木工会代表		任树德	仇寿松
理发工会代表	王子寿	阳秋生	马自强
缝纫工会代表	汤碧	张汉藩	郑福生
笔业工会代表		郑应魁	张炳生
铅印活版工会代表		萧如	柳茂南
石印工会代表		谭影竹	张海屏
人力车工会代表		黄杰	罗荣熙
机械工会代表		王麓生	萧开桢
靴鞋技师工会代表			李秉干







1922年12月，毛泽东率长沙各工会代表21人和赵恒惕等政府官员谈判，迫使赵恒惕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图为长沙《大公报》的连续报道。

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

（1922年12月14日）

盾先生：

先生穿起长衣告诫我们工人，我们当然很感谢先生的盛意；但先生如果脱去长衣，站在我工人地位向我们尽忠告，我们不更加感谢先生吗？我们自己承认我们不是大学生，不是博士，不是士君子。我们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个的工人。我们当然是应当是要受人家的“不吝教诲”的。但我们也承认世间上，不独有一部分的人是被人教训者，就现在而论呢，学生、工人、人民是被人教训者；教训人者自然是一班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学生、工人、人民无一人不是无知识的，无一人不是不读书的，所以他们穿起长衣来，拿出他们那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来教训人，这也是不错的呵！他们的阶级是知识阶级；他们的饭碗，工具便是学问；他们谋生活的方法便是能做文章，能教训人。我们，他们，各自要拥护自身利益，各自要显出神通，这也是很不错的呵！但是，教训人的人，我们也很希望他们先看：脱翁的忏悔录第二章；我们虽不配教训人，我们却愿意请出脱翁来，仿他们的忠告者！

我们自认无知识，无学问，应受人家教训，也但愿人家能够教训我们；苦言药也，甘言疾也，我们敢不敬领！但我们要申明的：

一、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训我；能够不

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再不要开口就“你们做工人的”“缺欠常识”“不守秩序”“品类日杂”“我忠告你们工人”“助长工人嚣张习气”，应当要说：“我们大家……”才好呵！先生你真个能诚恳地帮助我们，忠告我们吗？那末，我们很愿和你握手，请你赶快拿出你的手来，切莫再“你们，你们”，恍惚像我们是“官”，你们是“小的该死”一样！

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譬如我们说你贵报馆，每月受某私人多少金钱，你能承认吗？我且问你：你之所谓“不再（再字于检稿时，被我们工友删去）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先生果何所见而云然，果有何种证据而云然，请你赶早答复我们。我们更愿新闻记者说话要翔实些才好呵！但你必定要说是希望我们不如此的。你如果真是含沙射影，我们当然不能答应你；你如果说是希望，那末，情有可原，但我们不能承认你是善意。你蔑视我们工人的人格了，此种希望，也不是你诚恳的。表同情于我们工人的盾先生的心里，所应有的，并且你所谓“此后工人难免不狃于此次的胜利，遂嚣张起来，人数日多，品类日杂，虽有多数代表纠察，恐亦不能维持秩序了”之语，你更何所见断言必如此！——恐字写下了一些，有些难转弯，——你真有先见之明吗？这句话，也是你不应当说的，和前面的话一样；并且你之所谓“不守秩序”，那一条，也恐怕有些故意，不自然罢！

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先生说我们受人驱策，为人牺牲，先生可怜我们，先生便应该做我们的真实的指导

者。我们很愿先生能真个脱去长衣，辞去大编辑职务，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什么“我因此更进而忠告从事劳动运动者你们……”呵！先生，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你既然说我们不对，我们的指导者不对，我们是受人驱策，为人牺牲，我们便即刻辞去我们的指导者。用我们十二分的诚意，来欢迎和我们独一无二的同□者，先生！先生能惠然肯来罢？请快快脱去长衣！

四、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替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得〕读书和运动的机会？做报的工人，日夜工作，你却很赞成他们做夜工；夜工的问题，现在且不谈，我且问你，他们那进补习学校读书的时间又在哪里？难道他们有分身术吗？并且，长沙城里有几个补习学校？长沙城里有多少工人？请你仔细调查调查，再说话罢。我们现在承认，我们非减少工作时间，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我们非自己团结起来，自己创办补习学校，不能取得读书的场所。我们要减少时间，雇主不理；我们要团结，人家破坏，故我们不得不有运动。我们要拥护我们读书的利益，而人家说我们不该；我们要聘请指导者，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先生，而人家又说是，“受人驱策”“为人牺牲”，并且说他们是“试验主义”。好好，我们就请那说话的人罢，而他又要穿他的长衣，不能来，先生，请你再和我们，想一个更妙的能求得知识的方法罢！免使我们长久受人教训罢！

至于说夜里做工，照卫生原理上，你承认全无妨碍，不错呵，编报的人是夜里做工；做官的，当政客的，当议员的，也都是夜里做工，他们为什么肥肥胖胖呢？我们不但夜里做工，日里也做工；

我们不能睡到下午才起床。我们更没有肉吃，劳动者因营养不足，或工作过劳，往往碍其卫生。补救之法，在穷人方面，只有睡眠休息一途，你知道吗？你要我们体力劳动者，在劳力疲倦之后，还要做一二三四的体操！运动，你真是不舍我们死吗？你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夜工运动！不是一言两语能够答复你的。现在不多说了，我们也劝劝你，你真是读太多了书呵！我们要请你来试一试，和我们一同工作的滋味了。

先生，我们很感谢你，我们很爱戴你；因为你对于我们还不冷淡，比一些对于我们的问题不发一语、噤若寒蝉的长沙城里许多的大报馆的大记者，要好得多呵！但是，我们有话，不能不向你先生说，也如你先生有话不能不向我们说一说，所有得罪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工人无知识，有弱点罢！

工人们能以文字和我作正当的辩驳，我甚高兴。只是我认为对于工人们是忠告，他们却要认作教训；我认为对于工人们是表示希望的意思，他们却要认为含沙射影；我□没得说了！譬如文中有两句：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我交与检字房的稿子并没有一再字，排字工人并未删去此字，我是要附带声明的。）是因为世界常有借工潮试验主义的人，我希望工人们以后注意此层，不要诬陷并未说工人们已受人驱策，已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总不能算是恶意罢。到底我还要说句忠告的话：现在工人们工资比较的加多，时间比较的短少，如果要求久远的自立，真正的幸福，还是每日抽出点时间去读书和运动为好！（盾）

长沙铅印活版工人上工宣言*

（1922 年 12 月）

在我们铅印活版工人，固为拥护自身应得的利益，向雇主要求改良待遇，减少工作，增加工资。其始，但出乎□意的要求，后来，因为雇主方面，态度强硬，毫不觉悟。所以逼迫我们，使我们不得不出于罢工。我们的罢工，是因为我们向雇主所提出的条件，大部分被雇主拒绝，我们乃不得不罢工。我们是因为逼迫而至于罢工。而且，我们的罢工，完全是善意的，合法的。这一次罢工，对于文化事业上所生的损失是很大的。人家责备我们工人，我们不能承认。我们不能牺牲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妻室儿女的生活，不吃饭，不穿衣，专为士君子之流，谋文化之发展，□我们自身不发生任何□□□。我们决不向雇主提出要求，雇主不拒绝我们的要求，乃至有大部分被拒绝。我们也□不至于便出于最后之一举。不得已而罢工。所以这损失，第一步，是要强硬之雇主负责的。我们罢工有了十七日之久。政府和所谓知识阶级，都承认文化事业上所生的损失很大。他们自己也都很感受苦痛的，但他们不替我们想想，我们的苦痛怎样。我们觉得知识阶级，对于我们不得已之罢工，有出任调停之责。政府，也有出任仲裁之责。大家的苦痛固然不错。但是这苦痛，也要大家出来解决，不能够责成我们工人解决。且不能够要我们工人牺牲自己，解决□大家的苦痛，我们很不可解。为什

么在这十七日之中，大家只骂工人，但总不替我们帮同解决？知识阶级中人，且莫说，政府对于我们的问题不注意，不出为公正的裁判。我们更不可解。所以这损失，第二步的责任，是要知识阶级和政府中人负的，但我们也不能全不负此损失之责。我们承认，我们使社会上有此重大损失。我们是出于不得已的，我们不是这样，我们的生活上，是要发生问题的。我们已预先对雇主提出要求和警告。雇主态度强硬，他们情愿社会上生此损失。政府及知识阶级中人不替我们想解决的方法。他们情愿社会上生此损失。我们区区工人，能力太小。生命至重，对于这件事，是无法可设的。今幸各工团出为援助，又得张□□、毛泽东、张平子、陶孝忠等君出□调停。雇主方面，已允许我们要求条件之大部分，双方已签定了条约了。我们的工资增加了，我们的时间减少了，我们的红利及朔望休息的要求，也取得了。我们不得不感谢调〔停〕人及各工团之援助。我们胜利了呵。我们宣言上工。

挽黄爱和庞人铨联[1]

（1922年）

奋斗为众生，千古伤心是工运；
取义拼一死，九泉含笑亦冤魂。

---

[1] 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在天津读书时曾参加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是周恩来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庞人铨，湖南湘潭人，曾参加过驱逐张敬尧运动。二人均出生于1897年，是长沙“遍及百业，会员七千”的劳工会负责人。1922年1月16日，二人被湖南当局秘密杀害。这是毛泽东为他们写的挽联。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32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给张秋人的信……………………………………………………………3
（1923年1月24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吴子玉先生电*……………………………4
（1923年2月20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萧衡珊先生电*……………………………5
（1923年2月20日）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6
（1923年2月）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通电*………………7
（1923年2月）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8
（1923年3月7日）
《新时代》发刊词…………………………………………………10
（1923年4月10日）
外力、军阀与革命…………………………………………………11
（1923年4月10日）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15
（1923年4月10日）
给孙中山的信………………………………………………………17
（1923年6月25日）

农民问题议决案 ……………………………………………………………18
（1923年6月）
省宪下之湖南 ………………………………………………………………21
（1923年7月1日）
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 ……………………………………………32
（1923年7月2日）
北京政变与商人 ……………………………………………………………33
（1923年7月11日）
在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上的建议 ……………………………37
（1923年8月5日）
“省宪经”与赵恒惕……………………………………………………………38
（1923年8月15日）
纸烟税 ………………………………………………………………………40
（1923年8月29日）
英国人与梁如浩 ……………………………………………………………42
（1923年8月2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45
（1923年9月6日）
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 ……………………………………………………46
（1923年9月28日）
贺新郎·别友……………………………………………………………………49
（1923年）
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联 …………………………………………………55
（1923年）
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的讲话 …………59
（1924年1月29日）

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提出的四项议案 ……………………60
（1924年2月9日）
给民智书局的信 ………………………………………………………65
（1924年3月16日）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66
（1924年4月19日）
给平民教育委员会诸同志的信 ……………………………………68
（1924年5月26日）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69
（1924年7月21日）
中共中央给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 ………………71
（1924年8月31日）
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72
（1924年9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 ……………………76
（1924年9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 ……………77
（1924年9月25日）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 ……………………………………78
（1924年9月27日）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79
（1924年11月1日）
挽陈子博同志联 ……………………………………………………81
（1924年）
题安源工会联 ………………………………………………………82
（1924年）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85
（1925年10月20日）
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94
（1925年10月26日）
在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95
（1925年10月27日）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96
（1925年11月21日）
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99
（1925年11月27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105
（1925年11月27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07
（1925年12月1日）
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117
（1925年12月4日）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20
（1925年12月5日）
三三三一制……124
（1925年12月5日）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126
（1925年12月5日）
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127
（1925年12月5日）
颂声来于万国……128
（1925年12月5日）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129
（1925 年 12 月 5 日）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130
（1925 年 12 月 5 日）
邹鲁与革命……………………………………………………………131
（1925 年 12 月 5 日）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132
（1925 年 12 月 13 日）
向左还是向右？ ………………………………………………………133
（1925 年 12 月 13 日）
赤化原是如此…………………………………………………………135
（1925 年 12 月 13 日）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136
（1925 年 12 月 13 日）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137
（1925 年 12 月 13 日）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143
（1925 年 12 月 20 日）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145
（1925 年 12 月 20 日）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146
（1925 年 12 月 20 日）
右派的最大本领………………………………………………………148
（1925 年 12 月 20 日）
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150
（1925 年 12 月 26 日）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152
（1925年冬）
沁园春·长沙 ……………………………………………………………160
（1925年）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75
（1926年1月1日）
宣传报告…………………………………………………………………182
（1926年1月8日）
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191
（1926年1月10日）
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192
（1926年1月10日）
关于宣传决议案* ………………………………………………………198
（1926年1月16日）
关于党报决议案…………………………………………………………202
（1926年1月16日）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207
（1926年1月18日、19日）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217
（1926年1月19日）
宣传报告决议案* ………………………………………………………220
（1926年1月）
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致中央秘书处电…………………………222
(1926年2月14日)
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演说………………………………224
（1926年2月28日）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226
（1926年3月18日）
《国民运动丛书》书目 ………………………………………………230
（1926年5月19日）
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234
（1926年8月14日）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235
（1926年8月）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247
（1926年9月1日）
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252
(1926年9月16日)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259
（1926年10月25日）
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的发言……………………………264
（1926年10月27日至28日）
挽罗宗瀚烈士联………………………………………………………266
（1926年10月）
目前农运计划 ………………………………………………………267
（1926年11月15日）
湖南的农民* …………………………………………………………269
（1926年11月30日）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280
（1926年11月）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88
（1926年12月20日）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291
（1926年12月）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297
（1926年12月）
在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上的讲话………………………341
（1927年1月4日）
和农协干部的谈话………………………………………………344
（1927年1月）
在询问唐家圫农民运动情况后的谈话…………………………345
（1927年1月）
土地问题草案……………………………………………………346
(1927年)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349
（1927年2月12日）
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353
（1927年2月1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经过* ……………………………357
（1927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362
（1927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367
（1927年）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370
（1927年3月）
给省农民协会的信………………………………………………373
（1927年3月14日）

农民问题案……………………………………………………375

（1927年3月16日）

在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致辞…………………………381

（1927年3月18日）

对农民宣言………………………………………………………386

（1927年3月19日）

中央农运讲习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摘录）…391

（1927年3月26日）

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宣言* ……………………………393

（1927年3月26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96

（1927年3月）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434

（1927年3月）

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 …………………………………………441

（1927年4月9日）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443

（1927年4月12日）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444

（1927年4月19日）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447

（1927年4月19日）

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448

（1927年4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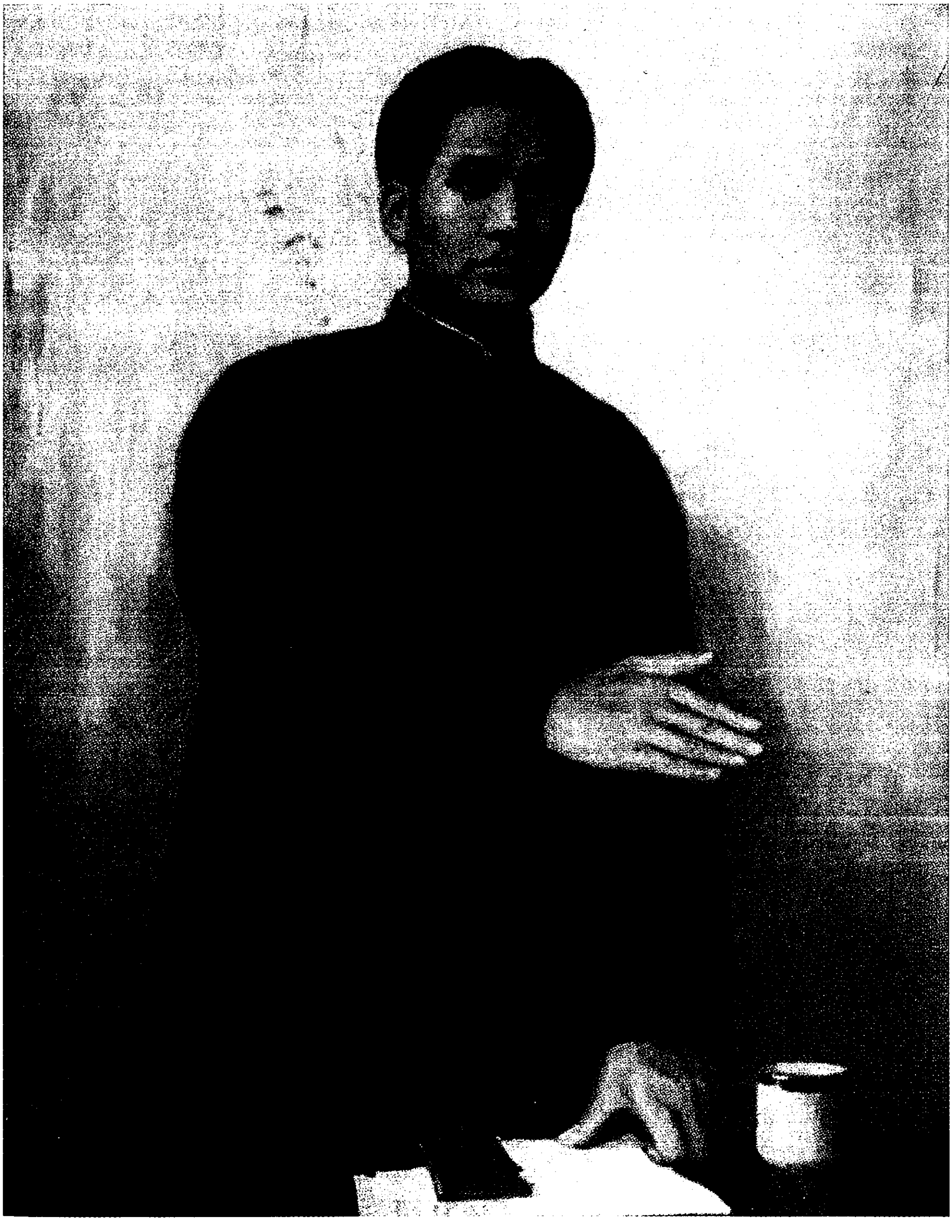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报告的补充说明………………450

（1927年4月22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关于讨蒋通电……………………………452
（1927年4月）
中国土地分配的调查……………………………………………455
（1927年4月）
土地问题决议草案………………………………………………457
（1927年4月）
土地委员会报告…………………………………………………459
（1927年5月9日）
全国总工会、农协电告湘工农团体* ……………………………463
（1927年5月26日）
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464
（1927年5月29日）
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欢宴会上的开会词………………………468
（1927年5月31日）
全国农协致陈嘉佑电……………………………………………470
（1927年5月）
全国农民协会要电六则* …………………………………………471
（1927年5月）
菩萨蛮·黄鹤楼 …………………………………………………474
（1927年春）
农运策略* ………………………………………………………478
（1927年6月1日）
全国农协电请解决长沙事件* ……………………………………484
（1927年6月3日）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487
（1927年6月6日）

全国农协请颁布乡村自治条例* ……………………………………491
（1927年6月7日）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496
（1927年6月7日）
全国农协最近训令……………………………………………499
（1927年6月13日）
农运策略的说明* ……………………………………………501
（1927年6月14日）

1923



《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会议上发言》（油画）

给张秋人的信[1]

（1923 年 1 月 24 日）

甫先生在京大考在即，有好消息望告[2]。

---

[1] 这是毛泽东致在衡阳三师工作的张秋人信的部分内容。

[2] 1923 年 1 月 25 日，张秋人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信中说：“近日空气很恶，此间教职员说：镇守使要来检查此校，因为省长有公事给他，说三师范某——指我——系上海来之……”“水口山罢工事，确有大影响，此间又组后援会，益使社会上注目，恶之。元旦日把 CY 的名义公开了——发传单，有些人亦大惊小怪了！湖南已挂着自治招牌，关于运动方面，理应自由些，我此去当与子任兄一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吴子玉先生电*

（1923年2月20日）

洛阳吴子玉先生鉴：

京汉路工以要求集会结社自由，惨遭死戮三百余众，近世文明国家所未闻也，国家养兵，所以卫民，今以残民，北起长辛店，南迄武汉，杀声遍地，冤呼震天，先生安坐洛阳，指挥若定，金口掘堤，重庆犯顺，方之是役，犹未为勇。吾闻古有民变，今则工变。俄罗斯工变矣，数百年盖世威棱之尼古拉斯，一旦如摧枯拉朽。如德如法如意大利，旦晚有事，其军阀政客资本家悉属尼古拉斯第二。先生力抗皖奉，国人尚存好感，然遽谓吾拥直鲁豫湘鄂正副巡阅使之尊，人莫予毒。则国人鸣鼓而攻，将随此念以俱至矣。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

二十日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致萧衡珊先生电*

（1923年2月20日）

武昌萧衡珊先生鉴：

先生指挥所部，杀路工三十二人，冤惨所中，江水为寒矣，先生狐也，假吴子玉虎威以临江汉，鱼肉人民，再接再厉，一战而胜京汉路工，何其勇耶。世曰劳工神圣，先生必曰军阀神圣，以武汉近事观之，军阀则诚神圣矣，然吾闻世有杀不绝之劳工，未闻有杀不绝之军阀，先生试思先生之左右，除百数十师旅团长镇守使警察长如万恶不赦之杜锡钧、何锡藩等辈而外，何一而非吾劳工阶级同志耶，今日兵士实弹以杀劳工者，明日吾劳工挥泪一为指点，便可反戈以杀军阀，先生则曰乱党，而岂知遍地皆乱党，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属乱党也。不务得民，而务残民，不惟自省，而惟多杀，怨愤所积，铤而走险，枯木朽株，尽起为难，天地虽宽，将无先生立足地矣。特进忠言，诸维善择。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同叩

二十日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通电*

（1923年2月）

全国各工团、各商会、各农会、教育会、学生联合会及各报馆、各团体均鉴：

京汉铁路为总工会开成立大会，被武力强迫解散而同盟罢工，复遭万恶不赦之军阀曹锟、吴佩孚、萧耀南、张福来等，以大队兵士强迫工人上工，致杀死工人三百余人，伤者无数，同时枪毙工界首领施洋、吴汝明、林祥谦并封闭京汉路各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该数工会成立有年，成绩昭著，总工会成立大会自属合法行为，乃工人应有之权利，曹吴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属破坏约法，蹂躏人权，如斯不足，复唆使军队，横加惨杀，强迫上工，似此拥兵作威，草菅人命，诚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也。我等同为工界中人，与京汉路工友有骨肉相联之关系，对此万恶军阀之无理摧残，怒发所指，万众皆然，应此广大群众之要求：“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乃告成立，自此当率潇湘数万劳动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誓必复此万世之仇雠，肃清此人类之公敌。爰特通电前来，望即同申公愤，鸣鼓而攻；不然，军阀为恶，日益嚣张，恐我四万万同胞同为噍类矣。临电神驰，不胜盼祷！

湖南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叩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通电*

（1923年2月）

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鉴：

自万恶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等势武淫威，解散京汉路各工会，同时指挥长辛店、郑州、江岸各站兵警惨杀工人三百余人并枪毙工界首领吴汝明、施洋，腰斩京汉工会长林祥谦，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之事横来，凡在同胞睹此违叛约法——集会结社自由——的民贼，莫不怒发直竖，恨不立食其肉而寝其皮，本联合会为此，除指挥全湘各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打倒军阀各项进行：拨发第一次通电，唤起各界同情：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委员会”予以种种实力救济，直电痛斥吴佩孚、萧耀南二贼魁外，再为此第二次通电，务望全国各团体尊重约法，伸张民权，打倒军阀，肃清中国计，众志成城，精神贯彻，必须达到民权集会结社自由，恢复被封各工会，惩办肇祸军警，重恤京汉路伤亡各工友为快！临电不胜盼切！

湖南全省工团会叩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

（1923年3月7日）

光亮[1]兄：

廿四号来信收到。全国大考[2]在湘举行，此间教务会议[3]议决照办。惟日期主张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会[4]之后，此点重要，请斟酌为盼！

文化要劳动史[5]四百本，请速照发。

弟　子任

三月七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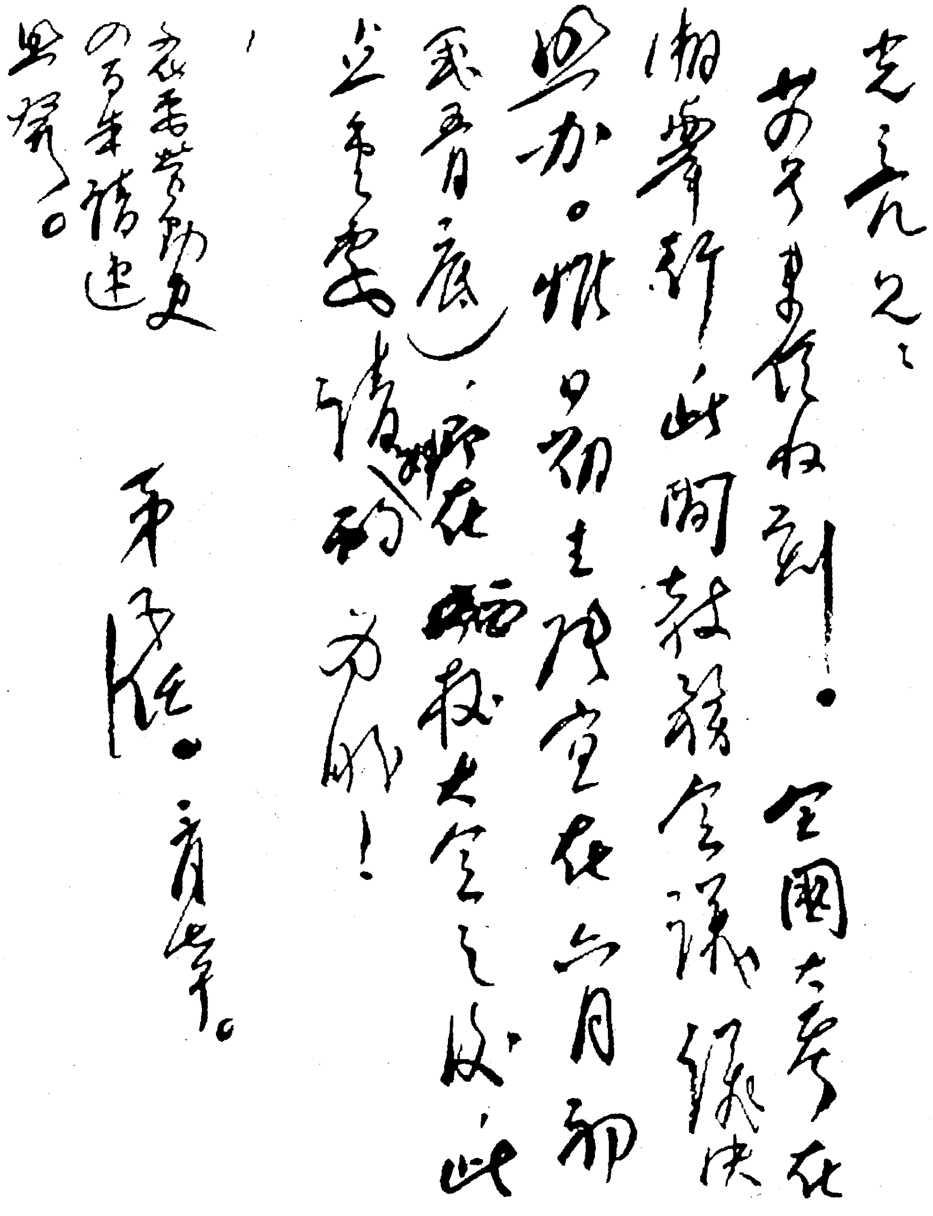
[1] 光亮，即施存统。1922年5月至1923年8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

[2] “全国大考”是代号，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该会原计划在湖南长沙召开，后因长沙发生“六·一”惨案，时局恶化，改于1923年8月在南京举行。

[3] “教务会议”是代号，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执行委员会会议。

[4] “西校大会”是代号，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5] 文化，指长沙文化书社。劳动史，指施存统编著的《劳动运动史》，该书于1922年4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印行。



克元兄：

来信收到！全国大会在湘举行，此间执委会议决照办。惟日期改定在六月初（或五月底），那在两校大考之后，此点务要请你们为难！

泽东。[illegible]

农民运动史的另本请速寄来。

毛泽东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信的手稿。

《新时代》发刊词

（1923年4月10日）

本刊是湖南自修大学同人创办的，也可说是同人发表研究所得的机关报。

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普通校刊兼收并列，是文字的杂货店，本刊却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艰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虽然自修大学创办伊始，同人的理想还在试验时期，将来成绩如何，不能预告，但是这出发的目标，自信非常正确，若凭着那种精神和志气做去，必有成功的希望的，本刊便是一个试验的标准了。

因此本刊出世的使命实在是非常重要。将来，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倘能借此引起许多志同道合的人们从事这种社会改造的事业和研究，那是同人所十二分盼望的。

外力、军阀与革命

（1923年4月10日）

中国的统一到底能实现吗？除开张绍曾[1]等一班妄人，谁都晓得在最近期间内是不能的。因为国内各派势力在现在是无法使他们统一。统一当然不是混和，所以现在什么“各省会议”“国事协议会”，下至什么派遣代表和各派首领磋商，无非是些空话空事。把国内各派势力分析起来，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2]，进步党散了，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3]。胡适、黄炎培[4]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和聂

---

[1] 张绍曾（1879—1928），河北大城人。当时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曾主张迎孙中山进北京协商南北统一。

[2] 进步党，1913年5月由民主党、共和党等合并组成，拥戴袁世凯，同国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国民党相对抗。1913年9月，该党熊希龄出任内阁总理。1913年和1914年，袁世凯先后宣布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后该党自行瓦解。

[3]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以研究宪法相标榜，被称为研究系。

[4]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1922年提出“好人政府”，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今属上海市）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办事部主任，主张“使无产者有业，使有产者乐业”，提倡手脑并用，注意实践。

云台、穆藕初[1]等新兴的商人派也属于这派。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2]（目前奉、皖虽和国民党合作，但这是不能久的，他们终久是最反动的东西）。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所以以后中国政治的形势将成为下式：一方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动的军阀派。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一个期内，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政治更发黑暗，财政更发紊乱，军队更发增多，实业教育更发停滞，压迫人民的办法更发厉害。质言之：民主的脸面更发抓破，完全实施封建的反动政治，这样的期会要有十年八年都说不定。

何以知道必然是这样呢？你看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

---

[1] 聂云台（1880—1953），湖南衡山人。清末继承其父聂缉椝的事业，任复泰公司经理、恒丰纺织新局总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建吴淞大中华纱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20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穆藕初（1876—1943），上海市人。先后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厚生纱厂、郑州豫丰纱厂、中华劝工银行，担任经理或总经理。1922年赴檀香山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任首席代表。后任国民党政府工商部次长。

[2] 直、奉、皖是北洋军阀的三大派系。直系先后以冯国璋、曹锟、吴佩孚为首领，得到英、美的支持。奉系是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天省（今辽宁省）军阀集团，1919年在日本支持下，控制整个东北。皖系是以段祺瑞、徐树铮为代表的安徽省籍军阀集团，投靠日本。

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1]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2]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中国的分裂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是不利的；但由民主派统一中国，较之民主、军阀两派混乱中国，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更不利；只有由反动政治完全霸占中国于他们就最利。这是目前及最近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反动军阀的天下的第一理由。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看，中国现在是最便利于军阀统治的。白狼、老洋人[3]可以在河南一带啸聚数万人扰乱数省；人民百分之九十几未受教育；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稍有点可怜的工商业外，全部都属于农

---

[1] 华盛顿会议，指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国代表1921年11月12日至次年2月6日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

[2]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在分别致送英、法、德、日、意、俄的照会中首次提出：美国承认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也要在一切“势力范围”内取得通商自由，享受低税率和一切特权利益。1900年7月3日海约翰再度照会六国政府，主张把门户开放政策应用到“中国一切地方去”，以分沾侵略利益，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共有的半殖民地。后来，美国利用“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作为它排挤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独霸中国的外交手段。

[3] 白狼，即白朗，人名。1912年在豫西聚众反对袁世凯的统治。1913年夏，响应孙中山的“二次革命”，进军豫鄂皖边境，于1914年改称“公民讨贼军”。老洋人，一说为李鸣盛，一说为张庆，又名张国信。1922年10月27日，老洋人率万余人联合一部分赵倜旧部在豫西起事，称建国军援豫军。

业经济生活；人民的组织，除开沿江沿海沿铁路应乎他们经济的情形有一点微弱的组织，像工商、教职员、学生等团体外，几乎全是家族的农村的手工业的自足组织；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陕西、甘肃、四川、贵州、广西各地至今无一寸铁路；全国无一个有三十万确实党员的政党；全国无一家销到二三十万份的报纸；全国无一种销到两三万份的杂志；而中国全体有人口四万万，有土地三千余万方里：试问在这种社会经济情形下军阀不来统治，还有谁可以来统治？这是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中国必仍然是军阀的天下的第二理由。

我们从内外政治经济的情势上，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及最近之将来，必然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这个期内是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是必然成功一种极反动极混乱的政治的。但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一面西南各省终不能为北方统一，虽然也不免是些小军阀，但终究还是革命分子存匿之地。这个期内，民主派分子是一天一天增加，组织一天一天强固。结果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中国的民主独立政治在这个时期才算完成。

我们只知道现在是混乱时代，断不是和平统一时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动更混乱的；但这是和平统一的来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独立的圣药，大家不可不知道。

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

（1923年4月10日）

（一）我们这个大学，不是由另外一些“办学”的人设的，是由一些有学问兴趣的学生感于现时教育制度不好，要合古时书院现时学校两样之长，变被动的求学为自动的求学——基于这个意义之上设的。我们这个学校方才创始，确实简陋得很，来学的人全要看他自己能不能，其实努力才能断定他有没有好成绩。但我们极愿得到许多有志青年和我们做同学。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现实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每一个同学入校，我们要明白他下列几项：

（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

（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

（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

（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

（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

（6）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六项用通信的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

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二）入校者每月须照交伙食费、杂费及学生费。

（三）入校后有投稿本校月刊的义务。

（四）入校后有服从本校公约的义务。

（五）本校为经济所限，目前采完全自修主义。凡自揣无自修能力者不必入校。

给孙中山的信[1]

（1923年6月25日）

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

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三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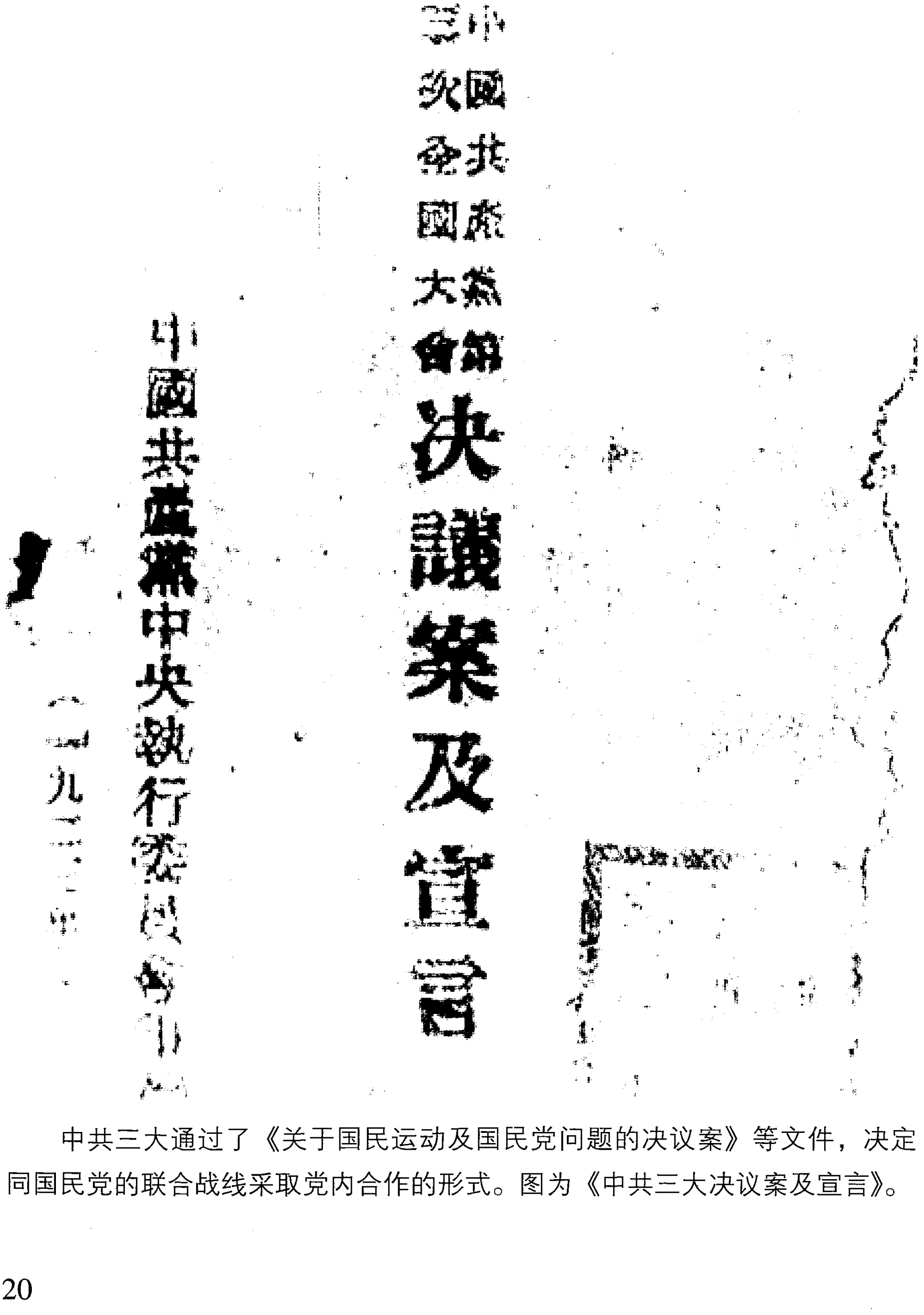
[1] 1923年6月25日，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农民问题议决案

（1923年6月）

自从各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强制输入外货以来，一般日用品的价格增高率远超过于农产价格增高率，从前的农民副业（如手工纺织等）也全被摧残。又自辛亥以后，军阀争地盘的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再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如预征钱粮、额外需索等），地痞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加困难。因此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开幕。图为会议旧址。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及宣言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印行

一九二三年

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等文件，决定同国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图为《中共三大决议案及宣言》。

省宪下之湖南

（1923年7月1日）

省宪下的湖南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湖南人恐怕知道的很少。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新近发生的劳动运动，若说详细，不是一篇短文可了，简括地叙述大略如下：

（甲）政治

（一）省宪　省宪之议自湖南始，至今也只有湖南有省宪，这原因是很寻常的。湖南介于南北之中，经汤乡铭、傅良佐、张敬尧三次北洋派武力的蹂躏，人民恨北派武力至深。及谭赵湘军驱逐张敬尧，适值北方直皖两派开始分裂之时，乃有省自治省宪法之议，这完全是北洋武力的反响。湖南若无省宪为护符，则容易遭兵，在人民不愿，在军阀更不愿，结果成为军阀利用民意借省宪以自保全，故省宪仅为在湖南这不利的地势上一个弱小的军阀（赵恒惕）用来保险的工具。兼有几省强大的军阀如吴佩孚固然不要省宪，张作霖也只要自治不要省宪，即力量弱小但因地形僻处不甚怕别人侵略有时还想就军饷于邻省的军阀如唐继尧也不要省宪。故省宪只在湖南这个地方有出现的可能。然也万难长命，因省宪虽以时机的关系得侥幸御外患于一时，但终究是束缚军阀的绳索，如湖南省宪规定军费缩小至岁出三分之一，现在预算不能照省宪规定已有不能不撕破省宪之势；加以谭派与赵派相争，事实上一定要迫令一派勾引外兵

争此位盘：省宪之寿命决无久理。联省自治更是万无实现之望的东西。

（二）政派　谭延闿、赵恒惕、林支宇分为三派。谭派的民康社、赵派的民新社、林派的湘社为他们的政党。林派在军事上无势力，仅有一组卑污政客为牟利的目的而结合，伺谭赵两派的盛衰以为趋避，三派中最为下品。赵派现在当权，其政治生命实际上建设在南北相持中吴佩孚的威劫和恩养上面（省宪也建设在这个上面），故虽军事势力不及谭派而能持久不倒。谭派失势已三年，然在军事上尚有大部分势力，近来投入国民党，欲仗孙中山援助恢复政权，和赵派争斗异常剧烈。此外政学系则依附赵派以谋禄利。

（三）政府　本年一月依省宪产生的新政府，分内务、交涉、财政、实业、教育、司法、军务七司。七司司长统于省务院长，俨然责任内阁，省长则一虚设的总统。省长赵恒惕、省务院长李剑农、内务司司长吴景鸿、交涉司司长杨宣诚、财政司司长袁华选、实业司司长唐承绪、教育司司长李剑农、司法司司长徐钟冲、军务司司长李石文，这就是政府的组织。

（四）议会　政府由议会选举，故议会颇有权力，议员的来源完全由金钱买卖。其类别官僚一部分，滥绅一部分，政客一部分。其党籍三分之二属赵派，三分之一属谭派及林派。这次湖南新省议会，充分表现了贪鄙、专横及愚蠢，舆论恨他们入骨。

（五）军队　现有军队二师五旅。其组织及分布大略如下：第一师师长宋鹤庚，第一旅旅长贺耀祖，团长郑鸿海、谢煜焘，驻常德及益阳。第二旅旅长唐生智，团长刘兴、李品何，驻常德。骑兵团何健，驻桃源。炮兵团黄耀祖，驻常德。又汪磊一团亦属第一师，驻郴州。第二师师长鲁涤平。第三旅旅长刘硎，团长叶琪、袁植，

驻南县及湘潭。第四旅旅长唐荣阳，团长唐生明、唐振铎，驻澧县及石门。骑兵团唐希忭，驻湘潭。炮兵团戴岳，驻长沙。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团长蒋锄欧、刘重威、邹鹏振、朱耀华，驻长沙、醴陵、湘阴一带。炮兵营尹甫龄，驻长沙。衡阳镇守使兼混成旅旅长谢国光，团长谭道源、成光耀、刘雪干，驻衡阳、桂阳、永州三县。宝庆镇守使兼混成旅旅长吴剑学，团长吴家铨、张湘砥，驻宝庆及武冈。沅陵镇守使兼第九旅第十旅旅长蔡钜猷。第九旅旅长刘叙彝，团长何隆干、谭润生，驻湘西之黔阳、洪江。第十旅旅长田镇藩，团长彭寿恒、杨毓棻，驻湘西之辰州及黔阳。此外尚有陈渠珍所部驻湘西，保靖、乾县、镇筸、绥静各处之巡防营十余营，夏斗寅所部驻浏阳之鄂军一团，王得庆所部驻永州之宪兵一营。总计湘军人数共约四万。内贺耀祖、唐生智、叶开鑫三派属赵恒惕派，叶开鑫之混成旅数近一师，号称赵派的主干。鄂军夏斗寅一团中立。其余均属谭延闿派。湖南因系瘠省，又无兵工厂，所以不能多养兵。兵不甚多，则军饷难不足，而尚可勉支一时，不至发生重大事变，与四川、云南等省养兵过多有时不得不向外就食者稍不同。故湖南只要别人不来侵略，自己亦无须侵略别人，所谓门罗主义的省自治，其内的经济的方面，乃建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得保有二三年生命，以至于今。

（六）财政　湖南岁入共千四百万元（国家地方均在内），截留应解中央之国家税羁为省用，此亦省自治之一个经济的动因。依省宪规定军费占三分之一，教育费占三分之一，行政费占三分之一，这是新预算，尚未实行，也万不能实行。财政系统紊乱已极，政府直接收入只有省城一点税捐，及榷运局、造币厂二三机关的收入以度日。外县从田赋以至，切正杂税捐，大部分均被军人就地截用。

故财政不能整理。军费，以至行政费、教育费，以前积欠甚多，无法清偿。旧债不清，更无整理办法。赵政府谋借外债，又被谭延闿派多方破坏，数次无成。湖南业已四年无事，这四年中以全省之财力，养尚非巨额之军队，济之以军队私抽之鸦片烟税，故能勉强相安无事。今则承平稍久，军队之欠饷暂多，搜括已穷。借债又无着，而军队一人不能裁，赵政府之财政基础现在已很薄弱，倘谭派乘虚进击，赵非变到投降吴佩孚，则必须倾倒无疑。

（乙）经济

（一）工业　湖南境内全部在手工业时代，除省有第一纱厂及官营水口山铅矿，商营锡矿山（新化）、铅矿外，无他较大的产业可指。商营小矿颇不少，小规模炼铅炼锑厂设立颇多，但资本极小，欧战后铅锑砂价又贱，故营业甚不振。第一纱厂系官有资本（二百万元），租商开办，营业活动资本不及二十万，但营业情形尚好，股票价每百元值百十五元。湖南、光华两电灯公司在省城营电灯业，两公司竞争颇烈，但营业均不振（湖南较光华为好），股票跌至六十元或四十元。造币厂官办以铸轻质当廿铜元采取其余利为目的，月铸二百一十万串，可获利十五六万元。铜元价在市面每二百一十枚当银一元，害民极大，除水口山有外人小规模炼砂厂外，湘省无外人经营之业。

（二）商业　全体为小资产商业以长沙、湘潭、常德为三个大埠。外商以英商营业较大，日商次之，美、德又次之。四国在长沙均设有领事。

（三）农业　湖南山地多平原少，除洞庭沿岸略有较大规模经营之农业外，余均小资产当自耕农及佃农。佃农生活比雇工还苦，因雇工必家累少生活简；佃农则必人口甚多之家，纳租于田东，普通

东佃各半，重者东七佃三，最重东八佃二。故佃农如单靠田里收获断不够生活，全靠喂猪、种杂粮等副业为之补足。湖南前数年连遭兵祸，荒歉不少。近二三年稍稍复业。全省米产除沿湖下游一带年有一部分输出省外外，余均仅足自给，故“湖南熟天下足”的话现在并非事实。每年冬初开岳州关，春初闭关，政府利有每石一元之米捐作财政之补助。

（丙）一般文化及教育

（一）一般文化　小农民思想略无变动，他们政治的要求但求有清官有好皇帝。女子尚有十分之三四是小脚，惟男子辫发即僻地亦没有了。教育上大致已采用新学制，惟办学人物依旧，根本上並未有大变。最好的代表是省议会议员，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新政治制度，而言论动作，充分表现宗法社会之一切旧式样，丝毫没有变动。耶苏教、天主教教堂布满全省，僻地小镇无不侵入。美国传教事业为尤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种浓厚的亲美空气。省城有日报九家，只有大公报销数有二千三四百份。其余自一百份至五百份，内容多不成样子。

（二）教育　所谓教育就是指学校，湖南办学的人派别最多，略纪于下：

大农派　前清高等学堂、求实书院、求忠书院三校出身之合体，因西洋留学归国者多，又名西洋派。以教育司司长李剑农为领袖，党徒之思想大半顽固，以大农学校为本营，散布教育界颇广。

优级派　优级师范出身。思想腐旧。在教育界颇得势。

高师派　本省高等师范出身。思想较新颖。

北高派　北京高等师范出身。思想在诸派中为最新颖。青年教育社为其集合体。

高工派　前清高等工校及现在工业专门出身。盘踞工校，议会政府均有其势力。最为顽劣。

城南派　清城南书院中路师范出身。思想腐旧与优级派等。盘踞教育会。

平大派　研究系及创造社人物易家钺、罗敦伟、张资平等组织平民大学，俨然一小派。思想在各派中算最杰出。

一师派　第一师范出身。其势力在小学教育。思想顽固新颖各半。

东洋派　日本留学生。以甲种工业学校为根据。顽劣与高工等。

君子派　此派以陈佩霖、朱剑凡、胡子靖、彭国钧等为代表。最早的日本短期师范出身。以楚怡、明德、修业、周南四校为根据。思想顽固而颇有正气，故素有君子之称。

诸派中优级为老前辈，大农人物虽老而结合则新，两派在教育界目前要称两霸。高师与优级本为弟兄行，却因地盘之分配，反脸特甚。高工、东洋近颇失势，然其潜力仍不弱。城南则鼠窃狗偷，依附赵恒惕以为活。君子一派从前清末年以迄民国八年，号称教育界之专卖，最为烜赫，民九以后各派崛起，其势稍衰了。北高、平大、一师三派号为新派，颇有结合联立战线以御旧派之势。湖南私校多于公校，各派亦多以私校为母国而以公校为殖民地。教育经费连留学经费在内数近二百万，私校例得受津贴，津贴多者至万余，少亦数千数百，是为私校发达的原因。

（丁）劳动运动

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

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今将各种工团及罢工统计。列表如下：

（一）新式组织的工团

名称	组织年月	人数	工会所在地	备考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去年五月	11000	萍乡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水口山铅矿工人俱乐部	去年十月	3000	水口山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粤汉铁路总工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以徐家棚、岳州、长沙、株萍四工会合组
粤汉路岳州工会	去年五月	300	岳州	
粤汉路长沙工会	去年八月	600	长沙	
造币厂工人俱乐部	今年一月	1500	长沙	组织完备颇有力量
第一纱厂职工俱乐部	今年三月	1500	长沙	因与职员合组组织不甚完备但颇有力量
泥木工会	去年九月	2000	长沙	力量较弱
缝纫工会	去年九月	15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力量亦弱与店主争执尚未解决

名　称	组织年月	人　数	工会所在地	备　考
铅印活版工会	去年十月	350	长沙	组织完备 颇有力量
石印工会	去年十月	3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 无多力量
电气工人俱乐部	今年二月	100	长沙	组织尚未完备
黑铅炼厂工人俱乐部	今年二月	300	长沙	组织完备 颇有力量
人力车工会	去年十月	1850	长沙	组织完备 颇有力量
机械工会	去年十一月		长沙	与湖南机械工会对抗而设
理发工会	去年十月	500	长沙	与店主抗争两年颇有精神
笔业工会	去年十月	300	长沙	力弱
靴鞋技师工会	去年十一月	2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 力弱
辗谷工会	今年四月	500	长沙	遭官厅解散
茶居工会	今年二月	300	长沙	组织不完备 无甚力量
砂船工会	今年一月	200	水口山	与水口山矿工俱乐部连结颇具力量

名　称	组织年月	人　数	工会所在地	备　考
铜官陶业工会	今年二月	3000	铜官	铜官为湘省瓦器窑业大埠工会颇具力量

以上二十三工团总计人数约三万人

（二）旧式组织的工团

劳工会	有两个，一为赵恒惕解散之劳工会现设办事处于上海，一为第一纱厂资本主组织之劳工会，目的欲取旧劳工会而代之
机械会	一班工业专门学生里挟少数工人艺徒所组织宾步程领袖
工业总会	省城手工业店主之团体政府所承认为法团者
中华工会	流氓陈家鼐所组织设总会于省城设分会于各县
工人同志会	造币厂宾步程派一部分工人为对抗造币厂工人俱乐部而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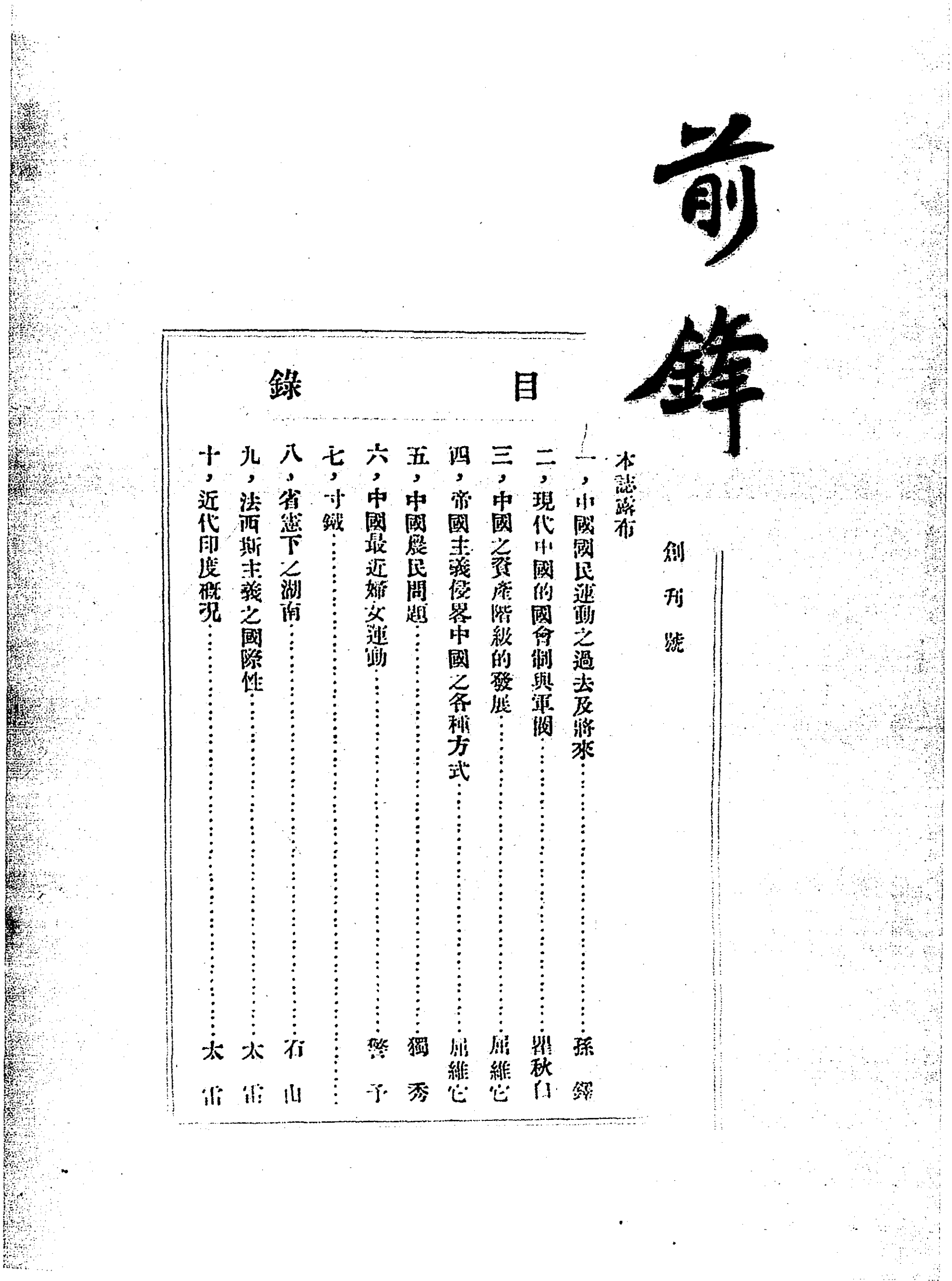
以上五个工团，除工人同志会确有四百余人机械会有二三百人外，劳工会、工业总会、中华工会完全是空体，并无工人。旧劳工会在未封前有二三千人，因系各业糅合的旧法组织，故一被封便都散去了。

（三）罢工统计

罢工者及次数	加入人数	罢工要求	罢工日期	胜败
安源矿山及株萍铁路一次	11000	集会结社自由加工资	五天	全胜利

罢工者及次数	加入人数	罢工要求	罢工日期	胜败
粤汉铁路二次	800	第一次加工资　驱张苗 第二次援助京汉	第一次十九天 第二次一天	第一次大部胜利 第二次失败
长沙泥木工一次	4000	加工资	廿四天	全胜利
水口山矿工一次	3000	加工资	廿三天	全胜利
长沙印刷工一次	350	加工资	十七天	全胜利
长沙纫绂工一次	800	加工资	十天	小胜利
长沙织造工一次	1500	加工资	廿天	半胜利
长沙理发工一次	500	集会结社自由加工资与店主平分公产	廿天	大部胜利
长沙笔业工一次	300	加工资	三十五天	半胜利

共计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罢工人数共计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人。罢工目的：大部分争工资，小部分争自由。罢工时期均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



前鋒

創刊號

目錄

本誌露布
一，中國國民運動之過去及將來……孫鐸
二，現代中國的國會制與軍閥……瞿秋白
三，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屈維它
四，帝國主義侵畧中國之各種方式……屈維它
五，中國農民問題……獨秀
六，中國最近婦女運動……警予
七，寸鐵……
八，省憲下之湖南……石山
九，法西斯主義之國際性……太雷
十，近代印度概況……太雷

1923年，广州平民书社出版的《前锋》杂志创刊号。毛泽东以石山的笔名发表了《省宪下之湖南》一文。

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1]

（1923年7月2日）

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

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

[1] 这是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致共产国际信的主要内容。

北京政变与商人

（1923年7月11日）

这次政变发生，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忽然抬起头来注意政治，这是何等可喜的一个消息：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于六月十四日发表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上海总商会复于六月二十三日经会员大会议决，发表对全国国民的宣言，这个宣言里说：“用敢掬诚宣告中外，自本月十四日起，所有曹锟高凌蔚等因僭窃政权对内对外种种行为，凡我国民概不承认其有代表国家资格。除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请各自维持其境内之治安以维现状外，其善后建设事宜，谨当与全国国民共谋解决。”

总商会同时议决否认“不能代表民意”的国会，并组织一个民治委员会以为积极解决国事的机关。上海各马路商联会和上海总商会这次举动，总算是商人出来干预政治的第一声，总算是商人们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表示！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

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大家知道厘金和关税是商人的两个生死关，商人之迫切要求裁厘加税，是他们利害切肤的表示；但裁厘加税并不是容易做得到的事，因为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假使把厘金通通裁掉了，结果是军阀一天一天瘦而商人一天一天肥，那时商人起来推翻军阀真是只要“一声喊”，搬了石头打自己的脚，聪明的军阀决不做这样蠢事；假使把外货的关税特别加增，或竟废掉协定关税由中国自己定出保护关税来，把中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撤去了，一转瞬间国内工商业加速度发展，外货在中国就立刻没有立足之地，狡猾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更决不做这样蠢事。所以裁厘加税，与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简直是有生死关系，断不是黎元洪一纸稽滑的起身炮命令所能做到的。我们再看最近上海纱商要求国家发纱业公债为曹锐靳云鹏破坏，要求国家禁棉出口又为外国公使团破坏，更足证明外力军阀和商人是势不两立的。这些都是上月二十三日到了上海总商会会员大会的那些体面商人穆藕斋先生们亲自尝到的苦味！

商人们历来“酷爱和平”，未想到政治的改造需要革命，不是几个“裁兵制宪理财”的电报所能收效；更未想到革命需要自己出马，号召组织全国国民，造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革命的实力；甚至以为改造政治不必需要一个政党，而怪国民党之努力革命为多事；商人们从前这些幼稚而且怯懦的心理，试将现在的情形比较起来，岂不要哑然失笑？从前还有一部分迷信美国的商人，他们迷信美国是扶助中国的好友，而不知美国竟是最会杀人的第一等刽子

手，试把近来美国怎样阴谋扶助那商人及全国国民所反对的曹锟去抢夺政权，以及怎样出死力妨碍商人所要求的禁棉出口政策等等实际的事例看来，就可以知道迷信美国的错误了。我们从这次上海商人对于政变的举动看来，知道他们业已改变从前的态度，丢掉和平主义，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得非常之快。至其对于美国阴谋侵略中国的愤恨，我们从上海总商会和银行公会反对美国商会及美侨协会“乘我国民于民治运动奋斗期中，高唱隐含共管中国的论调，而以中国商会及银行界已予同意之谬说，建议本国政府”的文电看来，“中国商人媚外”的恶名，至少也洗去了一部分。

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上海以外的商人都一齐起来一致行动。现在的时机是火烧眉毛尖一样的迫切，再不容我们躲懒睡觉；现在是要团结全国国民实行做革命运动，更不容于商人之中还分出派别。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至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不为曹锐和一班“官僚资本家”所迷惑，汉口的商人不为吴佩孚所劫持，一齐起来和上海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

末了，我们还有须警告全国商人的：第一，革命的大业不是容易的事，在向来外力军阀两重压迫革命的中国环境里更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要实践总商会“与全国国民解决”的宣言，不要再蹈从前商教

联合会拒绝工人加入的复辙。第二，现在商人们既已很勇敢地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就要赶快去踏上第二步，坚持以国民会议解决国事的办法，整严步法，努力向前，不达目的不正；切不可稍遇阻力就停止不进，或更走向和外力军阀妥协的错路上去。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史的工作，我们不可再懈怠！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上的建议[1]

（1923年8月5日）

（一）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二）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三）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

[1] 1923年8月5日，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参加会议的还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共5人。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密令金佛庄相机作反战宣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3点建议。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

“省宪经”与赵恒惕

（1923年8月15日）

“……自湘西问题发生，赵氏地位动摇，不能不假省宪以自卫，故前数日即令其党羽方克刚李济民等以金钱买公团通电，或作一群众运动……寓拥护赵氏于维持省宪之中……定五号午前八时举行游街，……彼辈发信以工人团体为多，以为工人头脑简单，必有千余人可来，讵是日候至十时，不特无一团体到会，即私人参与者亦只彼辈亲朋数人而已，彼等焦急万分，乃派人四出，至素为匪徒包办之中华工会及养济院佛化讲演院等处，每人大洋五角，并备点心一餐，雇请百数十人，于十二时出发游街，游街之先，在教育会幻灯场开会，一党和尚叫化等共一百二三十人。首由：

（1）和尚炽培主席，报告开会宗旨，略谓：

省宪法不如谓之省宪经，如佛家之有佛经……坐中和尚叫化即两手乱舞；

（2）散会后出发：

前有大旗二面———书省宪维持会———书省民请愿大会；

第一队——为长衫马褂队，俨然省民代表，约二三十人；

第二队——中华工会，约五六人；

第三队——佛化讲演团，光头博衣，约四五十人；

第四队——养济院，约四十人；

五光十色……演此丑剧，尽滑稽之能事……”

（见民国日报）

我们历来反对联省自治，因为他不是联省自治，乃是联督割据；我们历来反对军阀烂政客假窃名义的省宪，因为他不能做人民的保障，反做了军阀烂政客争权争利的保障，湖南最是个明证。赵恒惕现在堂哉皇哉兴“护宪之师”了，而他两年来——有省宪以来——惨杀劳工（黄庞等），勒封报馆（大公报，自治新报，新湘报），剥夺人民书信自由（邮电检查员未曾撤去一日），剥夺集会结社自由（封人力车工会，封碾谷工会，封外交后援会，多次禁止学生工人的集会），庇护其军队贩卖栽种鸦片烟，贿买选举（派遣属员私造省宪的总投票，用钱私造省议会，用钱买的省长），向商人勒捐（长沙总商会会长，屡被迫逃），向农人提征田赋（有些县提征到民国十七年），破坏法定的预算此例减教育实业费增加军费，勾结吴佩孚萧耀南，何一不是戴省宪假面具与人民为敌！他这次兴师动众，也是和蔡钜猷争鸦片税（所谓特税）起始。赵恒惕这样万恶不赦的东西，居然还在那里假借名义大吹大擂“护宪”，真不怕羞死湖南人！

纸烟税

（1923年8月29日）

我们时常说：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或者有人不相信；我们不时常说：外国人（尤其是英美）的假亲善只是想借“亲善”两字好多量压榨中国人的膏血，或者也有人不相信。自禁棉出口令遭洋大人反对而取消，可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现在又来了洋大人压迫政府取消浙江等省的纸烟税，可更不能不有些相信了。申报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电：“阁议，英美公使抗议加征地方纸烟捐，结果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征收纸烟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六月三十一日杭州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电：

“窃维奢侈征税为各国之通例。近年卷烟盛行，以吾浙论，每岁销场竟逾千万，消耗之巨，骇人听闻，流毒之烈不减鸦片。当局有鉴于此，特命设局征收，化无益之消耗，作修路之正用。乃闻外商借口条约权利迭与政府交涉，殊不知此种特税，完全取诸吸户，与烟商毫不相涉；纯粹浙人所输之捐，外商又劳干预！且系国内行政主权，断不容外人侵犯，自应据理力争，勿任有所借口，主权幸甚。”

原来美英据了协定关税条约，不许中国对外来奢侈品自由抽税，任凭是“纯粹浙人所输之捐”是“国内行政主权”，只因为是对外国货，所以到底不许抽税。

英美烟公司所出的纸烟，一小部分是英美日本国运来的，一大部分是英美烟商用中国的烟叶雇中国的劳力在上海汉口等处中国内地设厂制造的。制造出厂时照“条约”出了一点轻微的税，大批运到各省，以后就再不许中国“自由”抽税了。浙江一省销纸烟价“年逾千万”，全国每年销纸烟总额无确数，照浙江一省推算起来，至少在二万万元以上，真是“骇人听闻”！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外国人向我们“亲善”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的“阁议”，真是又敏捷又爽快，洋大人打一个屁都是好的“香气”，洋大人要拿棉花去，阁议就把禁棉出口令取消；洋大人要送纸烟来，阁议就“电令各该省停止征收纸烟税”再请四万万同胞想一想，中国政府是洋大人的账房这句话到底对不对？

英国人与梁如浩

（1923年8月29日）

威海卫交涉现在逼着要签字了。除了山东人，全国国民并没有何等表示，这到底是什么缘故！难道国民忙于收还旅大运动就忘记了收还威海卫运动？还是国民只知恨日本不知恨英国；只知日本帝国主义是侵略中国的，不知英国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要厉害的？

办理威海卫交涉的人：一个是督办梁如浩，一个是帮办陈绍唐。据陈绍唐在山东旅京同乡会宣布梁如浩罪状说："梁督办居心媚外，向英人献保留刘公岛之策。威海卫之交还关系军事上甚巨，梁氏甘心卖国，以无条件的交还，变而为继续的租借，且变而为永远的租借，无非另有交换，专谋利己。……梁氏恨余破坏其卖国阴谋，始则托人向余疏通，饵之以利，力言余个人一切开支将来均可代为报销，且结束后之种种利益，亦可分润。经余屡次拒绝，且仍要求其完全公开，梁氏知余不可以利动，乃继以威胁。至激烈不能相下时，梁氏往往拍案厉声向余曰，此事我有全权办理。往往指挥左右将余扶出门外。余愤不可遏，曾屡次拟以身殉。一日余随手取一砚即欲向头自击，某英人睹之大惊，向余劝阻，梁氏毫无所动也。……"

梁如浩与英人所订之威海卫草约计甲乙两部二十三条，八月二

十三日济南国民大会已经指出其丧权辱国重要的地方出来了：

（一）变接收为续租　草约允许英国续租十年，十年后有展期续租之权。且将历来未经租于英国之威海卫城，一并划为特别区域而续租之。

（二）断送领土领海　草约规定（1）中国地方长官应换给英国原租人（永租）凭照；（2）按照外人永租华地向来办法，不收任何手续费；（3）英国保留官地，中国不应收用；英国租出之地中国应予承认。其断送领土为如何。草约又规定：（1）刘公岛海面之抛锚所，须俟英国海军不使用时中国方得使用；（2）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派兵登岸操演打靶；（3）英国海军得在刘公岛抛锚所拖至外海操演。照此规定，英国占领刘公岛及其海面，其陆战水战各队得自由出没于我领土领海。

（三）断送国家主权　草约规定刘公岛威海卫间一并划为特别区域，既不统属于山东地方，又非真正统属于中央政府。我政府名义上虽得委派政官，然警察须由英国人统带，财政由海关税务司（英国人）管理，市政则由中英合组之中英委员会办理。我国委派之行政官不过徒拥虚名，担负英国债务之偿还及公费之筹备而已。威海卫竟做了香港第二，国家主权完全断送。

迷信华盛顿会议的同胞们：华盛顿会议给了我们的在哪里？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威海卫交还是要把威海卫变为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满仍要强迫续租；要求广九路与粤汉路接轨欲置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经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议则主张以研究厘金问题为限（八月二十六日伦敦电）；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铁路共管案来了。迷信华盛顿会议相信英国比日本好的同胞们：请问华盛顿会议给我们

的在哪里？英国比日本好的地方在哪里？

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

国人应速起反对汉奸梁如浩！

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3年9月6日）

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两函均收。

兹议决出席。贵会会议代表为委员长与秘书，请于开会时通知此二人中之一人。

出版物已嘱出版部每期赠送贵会《向导》二份，《前锋》《新青年》各一份。《工人周刊》等请以贵会出版物直接与之交换可也。

九月六日

给林伯渠、彭素民[1]的信

（1923年9月28日）

伯渠、素民二位同志：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2]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3]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4]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5]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

[1] 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彭素民（1885—1924），江西清江人。当时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

[2] 赵，指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

[3] 1923年夏，湘军内部谭延和赵恒惕为争夺对湖南的控制权爆发战争。当时支持赵恒惕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被称为北军。

[4] 谭，指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当时是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

[5] 1921年8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争夺湖北地盘进行战争。吴佩孚部前敌总指挥张福来率领军队击败湘军，攻下湖南岳州。吴佩孚与赵恒锡从各自利益出发停战议和。吴佩孚在取得驻防岳州便于控制赵恒惕的有利条件后，停止了南进。

关于本党[1]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2]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3]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在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4]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弟　泽东

九月廿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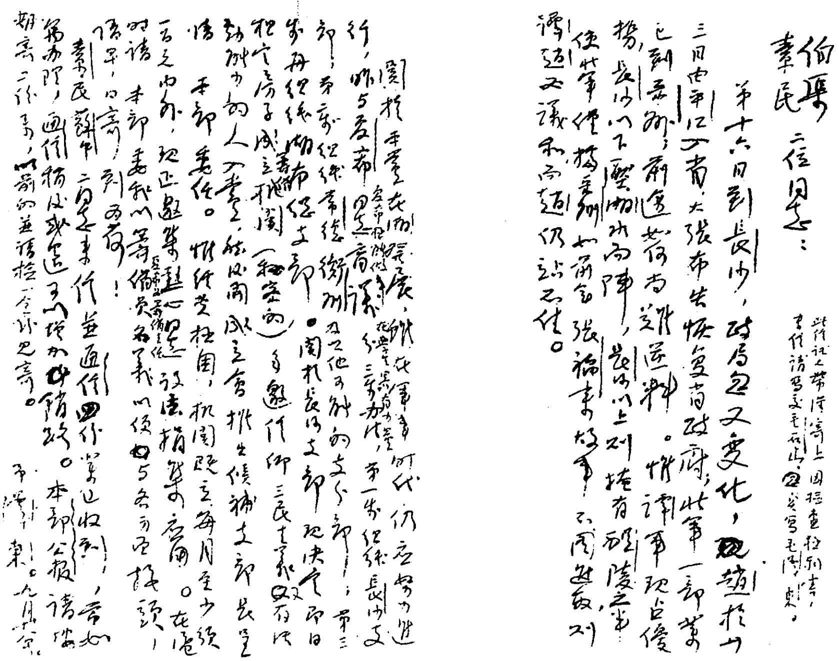
---

[1] 指中国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毛泽东当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湖南进行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2] 夏希，即夏曦（1901—1936），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省学联干事部主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湘区委员会书记。曾参加在湖南建立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3] 这里的本部，是中国国民党当时的最高领导机关。

[4] 苏中，即徐苏中。1923年曾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


伯渠
素民　二位同志：

此件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利害，来件请写交毛石山，勿写毛泽东。

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十三日由衡州返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甚为难料。惟谭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暂时不能为战阵，长沙以上则谭有醴陵之胜，使北军侵入湘省，如前此张敬尧事例！不问谁胜败，对谭赵之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在湘发展，然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惟与各方面[illegible]，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把它组织成立（兼筹备）机关（秘密的），由邀集赞同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运动每月至少须百元之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兼筹备主任），以便向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兄：二月来事件并通信四件业已收到，当如前办理，[illegible]。本部公报请每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份邮寄。

弟泽东。九月廿八。

毛泽东致林伯渠、彭素民信的手稿。

贺新郎·别友[1]

（1923年）

挥手从兹去[2]。
更那堪凄然相向，
苦情重诉。[3]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4]，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

[1]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9月至12月，毛泽东在湖南从事党的工作，年底奉中央通知由长沙去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据此，本词可能作于这年12月底离开长沙的时候。当时革命形势在上升，作者“割断愁丝恨缕”而为革命事业献出全副身心的豪情，以及作者所预想的未来革命风暴的猛烈壮阔，在词中“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的比喻中得到强烈的表现。

[2] 挥手从兹去，本于李白《送友人》：“挥手自兹去。”

[3] 《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惨然无绪”。

[4] 过眼滔滔云共雾，云雾比喻误会。本句意为误会再大也只是过眼即逝的云雾。

人有病，
天知否？[1]

今朝霜重东门[2]路，
照横塘[3]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4]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5]，
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
和云翥。[6]

---

[1] 《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曾不记，倚楼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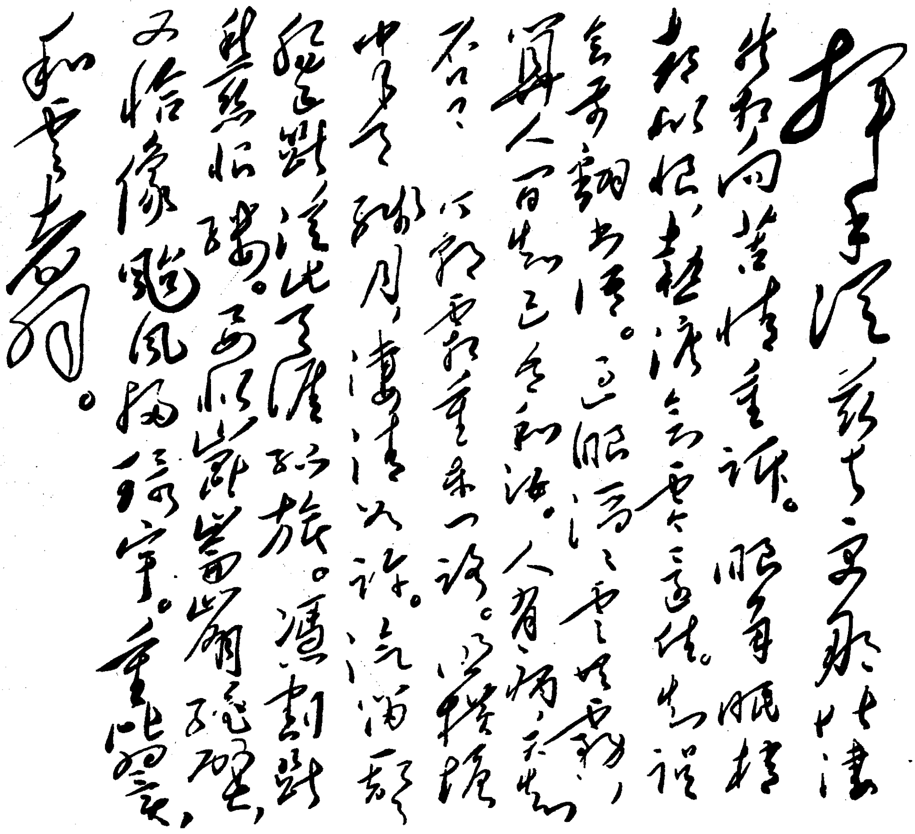
[2] 东门，指长沙城东的小吴门。古诗词中常用东门泛指送别之地。

[3] 横塘，指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因塘东西长，南北窄，作者特称横塘，并暗用横塘之典，借指妇女居住的地方。唐崔颢《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清水塘附近有火车站。

[4] 凭，意思是借以，包含两方，非单“请求”彼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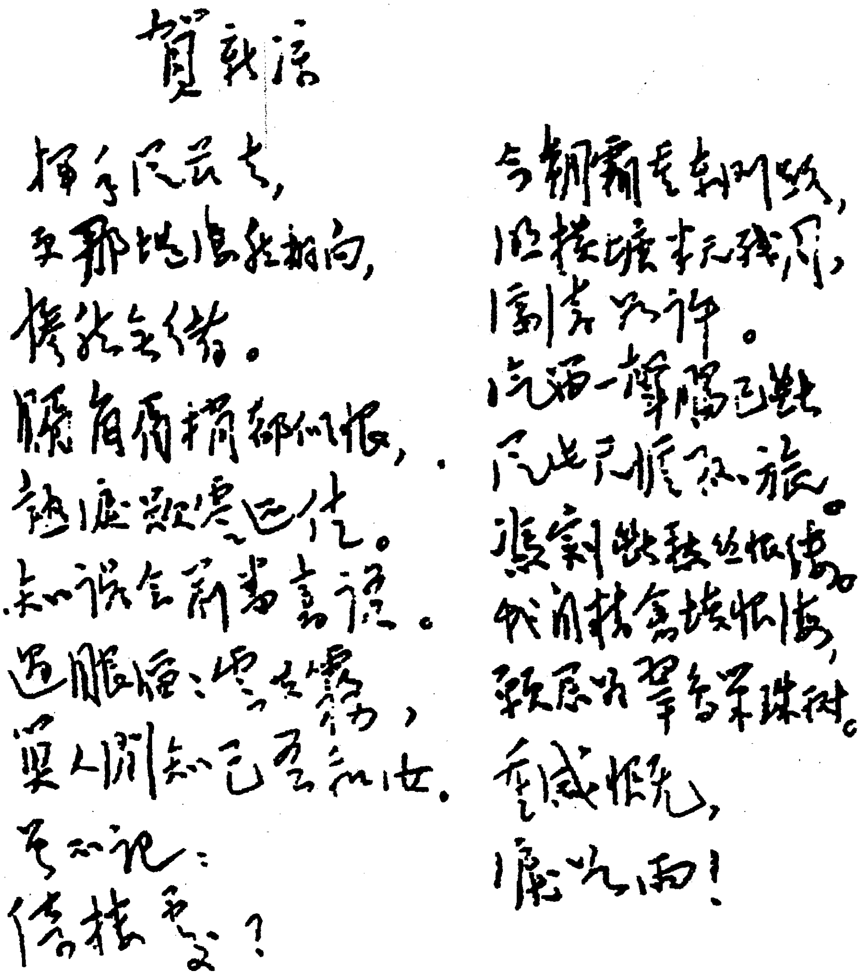
[5] 昆仑崩绝壁，昆仑山的峭壁倒塌。这和下面的“台风扫寰宇”，都用来表示“割断愁丝恨缕”，参加革命斗争的强大决心，同时也烘托了未来的大革命的声威。《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我自精卫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

[6] 重比翼，和云翥，指在将来的斗争中会晤时再在云霄中比翼双飞。翥，鸟飞。《中国风》1992年12月创刊号刊载的毛泽东手书作“重感慨、泪如雨。”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手书《贺新郎·别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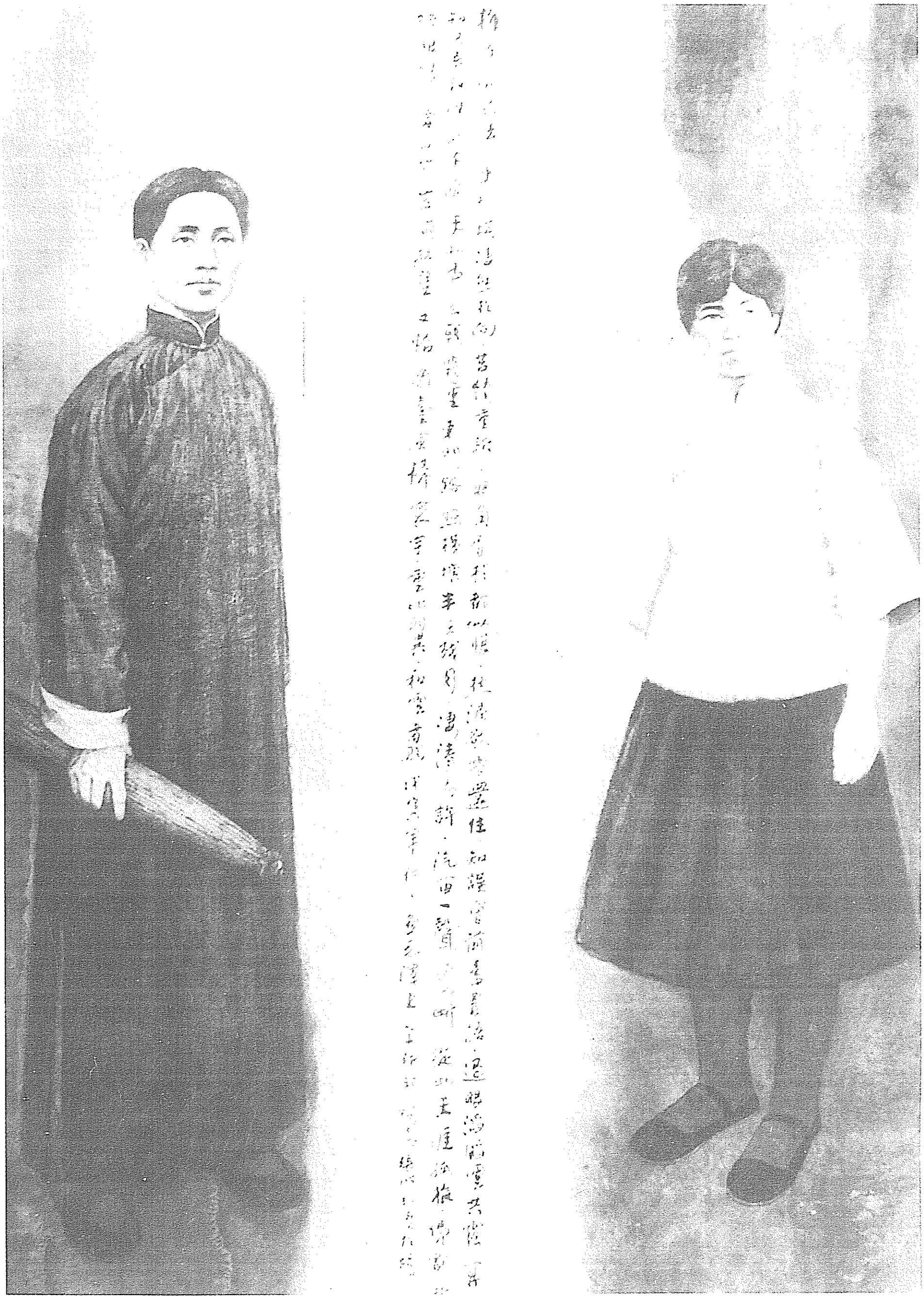


贺新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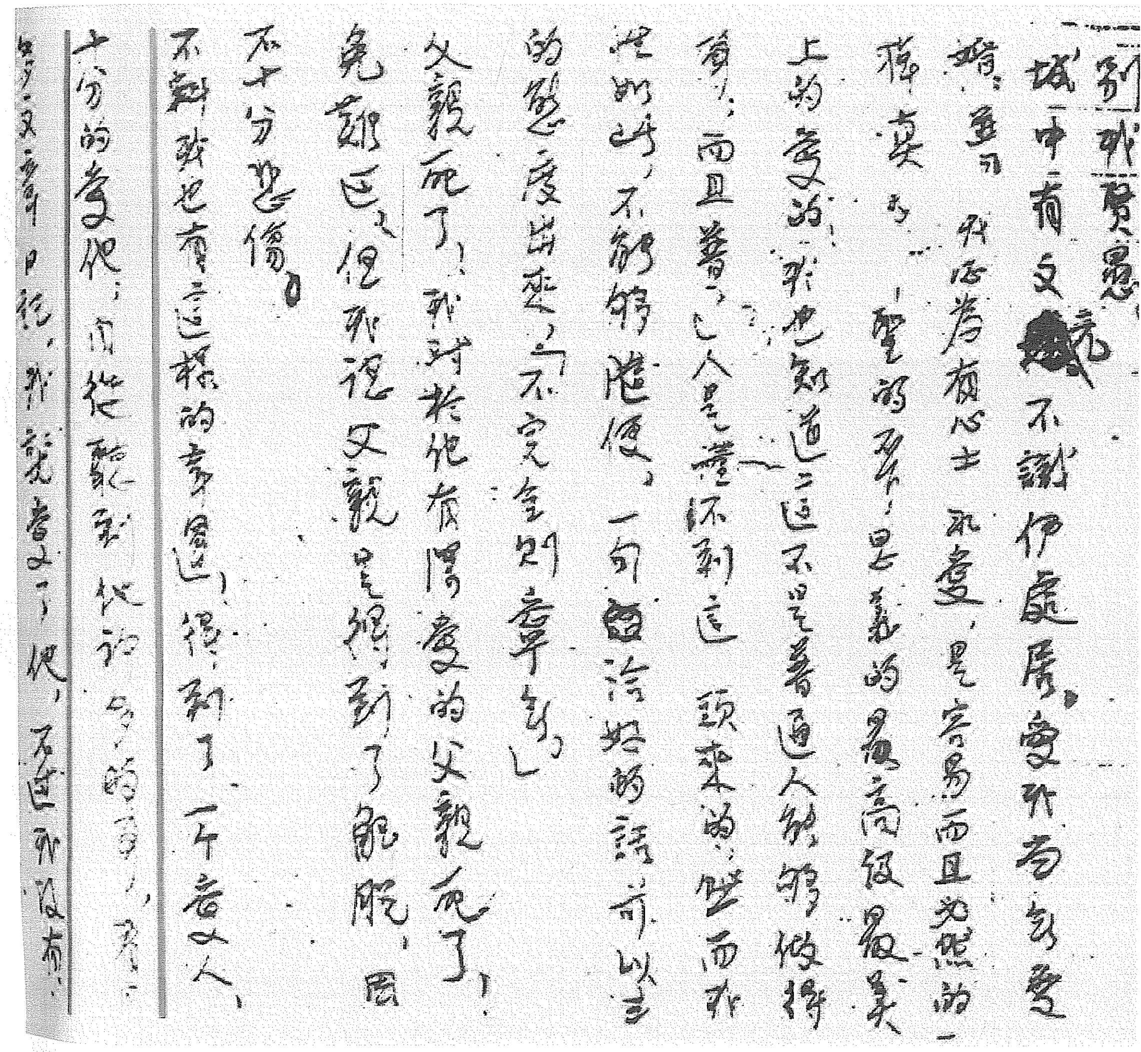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
惨然无绪。
眼角眉梢都似恨，
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
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曾不记：
倚楼处？
今朝霜重东门路，
照横塘半天残月，
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
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我自精禽填恨海，
愿君为翠鸟巢珠树。
重感慨，
泪如雨！

毛泽东手书《贺新郎·别友》。

《人间知己》（油画）



《贺新郎》（诗意画）



別，我覺得

城中有文[illegible]，不識伊底廬，愛我為我愛

婚，並且我認為有心去求愛，是容易而且必然的一

種真矣，聖的潔，是美的最高級最美

上的愛的，我也知道這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得

到，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這頭來的，然而我

想的時，不能夠隨便，一句[illegible]恰好的詩，可以

的感度出來，「不完全知章句」

父親死了，我對於他有深愛的父親死了，

免難過，但我想父親是得到了解脫，因

不十分悲傷。

不對，我也有這樣的愛過，得到了一個愛人，

十分的愛他，自從聽到他許多的事，看

多文章日記，我就愛上了他，不過我沒有

杨开慧作《偶感》一首，表达她对毛泽东的思念。

一九二〇年十月

偶感

六落起湖風，濃寒入肌骨。念茲遠行人，
波突起伏無定止，不知寒衣是否備。孤
護是否安達，書信不可通。欲問
恨無雙飛翮，飛去見茲人。茲人不
恨無已時。

二

頃一寄娘前茲為所親聽者自高寫
月晉偶去二王日。適有永人至。狂

務川節忽切如燒眉。遁從入福湖伊自
莽川住岳不教朋何復歸長以思切思
人之復得相親。今時各阻路遙。之在念
風雲蕃湖人情為復如追究傷我懷
內燕燉。顧將全在意。悉爾故人心。朋
至可貴。乡可相比倫。
危顧一老懷思尸長忙處。乡試忙長舊

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联

（1923年）

俱人盖世英雄汉，
乐以忘忧让三分。

---

[1] 1921年冬毛泽东在安源提出办夜校，组织工人团体，并将这个团体命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

1924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在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时的讲话[1]

（1924年1月29日）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

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

---

[1] 1924年1月29日，国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比例选举制为大会政纲之一”的议案。此决议未通过。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次会议提出的四项议案

（1924年2月9日）

（一）重要市县党部及区党部宜有经费补助案。（毛泽东提出）

（理由）经费断不宜只用于中央与省之两个高级党部（空洞的党部）。市县党部、区党部之二级（实在的党部）非补助经费，必无办法，必难发展。因党员所纳月捐，至多只能供给区分部之用费（区分委员会生活费及活动费），不能提供区党部，更不能提供市党部、县党部。而市县党部及区党部为本党指挥党员行动最扼要的机关，若这两级党部没有力量，必至全党失了力量。惟普遍补助需费太多，补助穷僻不重要地方党部实亦没有意义。宜择有工人、农民、学生、商人等群众运动实际工作之市县区党部补助经费。此等党部之须补助经费，较之省党部须补助经费更为紧要（省党部若不兼所在地市党部则专用巨额经费殊无充足的理由）。

决议　交预算委员会审查。

（二）本年内各省省党部宜兼理所在地之市党部，中央及各地执行部宜兼理所在地之特别区党部案。（毛泽东提出）

决议　应照章程组织此案不能成立。

（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地执行部实际组织时，应注意事实上之需要案。（毛泽东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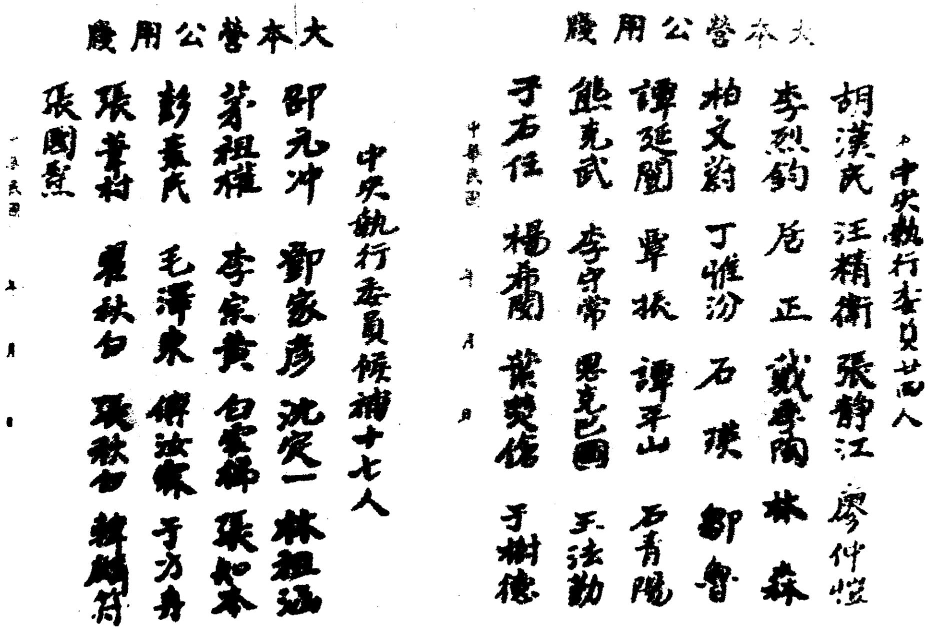
（理由）中央及京沪哈汉四执行部组织干事以上职员，共有六十余人，大会后半年内断不须设置职员如此之多。因为：（一）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二）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三）此刻决找不到如此多的有用之人，滥竽充数则全失本意，因此中央及各执行部到实际组织时宜看事实上的需要。事实上需要一部才开一部，需要一人才用一人。

议决　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考。

（四）本年内地方组织宜分别轻重缓急立定一计划案。（毛泽东提出）

（理由）地方组织不宜务广，选择重要地方若干处立定一计划，集中人才财力于此一年内，专心致志于此等地方。办出个头绪来，到第二次大会方有实际效果可看。本年内应该专力的地方应把列成两等：第一等：最重要而现时有发展之可能者，如上海、北京、广州、汉口、哈尔滨……等至多八九处宜用十分之七的力量（人力财力）去做。第二等：次重要而现在有机会着手者，如太原、安庆、杭州、南昌……等至多十一二处用十分之三的力量去办。此外各地如无可为机会，在本年内均可不注意，以免分散精力得不到好结果。

决议　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参考。



大本營公用牋

中央執行委員廿四人

胡漢民　汪精衛　張靜江　廖仲愷
李烈鈞　居正　戴季陶　林森
柏文蔚　丁惟汾　石瑛　鄒魯
譚延闓　覃振　譚平山　石青陽
熊克武　李守常　恩克巴圖　王法勤
于右任　楊希閔　葉楚傖　于樹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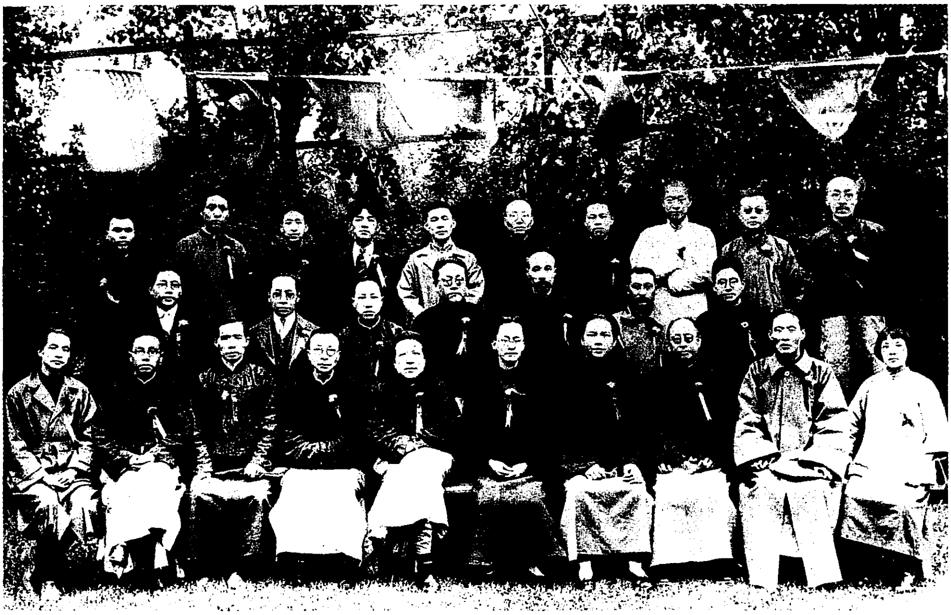
大本營公用牋

中央執行委員候補十七人

邵元冲　鄧家彥　沈定一　林祖涵
茅祖權　李宗黃　白雲梯　張知本
彭素民　毛澤東　傅汝霖　于方舟
張葦村　瞿秋白　張秋白　韓麟符
張國燾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名单。



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部分成员在孙中山寓所合影。后排左二为毛泽东。

1924年5月，国共两党在广州附近创办黄埔军校。毛泽东积极推荐青年到军校学习，并到黄埔军校讲演。图为黄埔军校旧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图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

给民智书局的信[1]

（1924年3月16日）

请将配好的书经汉口转交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

[1] 这是毛泽东为长沙文化书社进书的事致民智书局信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

（1924年4月19日）

同志们！

“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日都快到了，在此四日中，我们都须有相当的活动与宣传。

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严重的压迫之下，今年的“五一”，除广州外，当然没有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之可能，同志们应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召集工人（以工人为限）讲演会，讲演“五一”的历史及中国民[1]革命与集会结社之自由的关系。在广州的工人集会中，应解[2]工人组织集中与统一的必要，痛驳安那其派独立分权之谬误；应解释工人参加政治运动的必要，痛驳安那其派“只要面包不要政治”之谬误；但同时须说明政治运动非猎官运动。

“五四”纪念当然以学生为中心，同志们演说词中，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

---

[1] 此处原文如此，似缺一“族”字。

[2] 此处原文如此，似缺一“释”字。

“五五”纪念恐不能成为社会的运动，然亦应集合C.P.及S.Y.同志（如不便全体集合，C与S分别集合亦可），开一纪念会，由同志中在理论上素有研究者讲演。

“五七”纪念日，务努力联合工商学生做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口号是：不但否认二十一条及收回旅[1]，并要援照中俄协定，取消各国的租界、租借地、兵营、领事裁判权、庚子赔款，及废弃不平等的条约，改定平定[2]的条约与关税。

各地同志活动的结果，望总来一报告。

委员长　T.S.Chen[3]
秘　书　T.T.Mao[4]

---

[1] 此处原文如此，似缺一“大”字。

[2] “改定平定”似应为“改订平等”。

[3] 签名是陈独秀。

[4] 签名是毛泽东。

给平民教育委员会诸同志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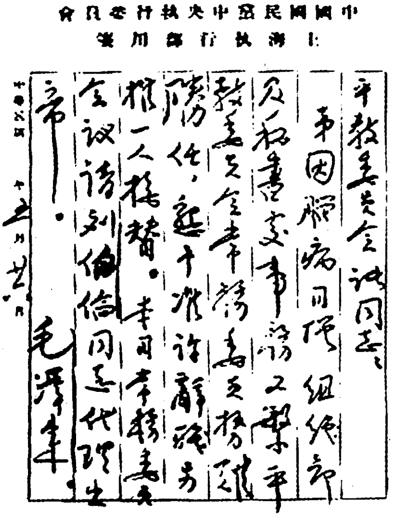
（1924年5月26日）

平教委员会诸同志：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会议请刘伯伦同志代理出席。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上海執行部用箋

平教委员会诸同志：
弟因脑病日增，组织部
及秘书处事务又繁，平
教委员会常务委员势难
胜任，恳予准许辞职，另
推一人接替。本月常务委员
会议请刘伯伦同志代理出
席。
毛泽东

中華民國 十 五月廿六日

[redacted]

毛泽东致平教委员会诸同志信的手稿。

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1924年7月21日）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诸同志：

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自吾党扩大执行会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此时国民党只极少数领袖如孙中山、廖仲恺等尚未有和我们分离之决心，然亦决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已拟定于秋间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解决对我们的关系。我们为图革命的势力联合计，决不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然为国民党革命的使命计，对于非革命的右倾政策，都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我们应做之事如下：

（一）应由我们所指导的各团体或国民党党部，对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不满于右派的意见。右派重要的错误是：（A）不愿反对帝国主义的列强；（B）反对中俄协定，并且根本反对苏俄，说是国民党之敌；（C）压迫兵工厂工人组织工会，阻止圣三一学生退学；（D）纵容江门、佛山商团摧残工人农人；（E）排斥共产派。

（二）我们同志应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开会时提出左右派政见不同之讨论。

（三）今后凡非表示左倾的分子，我们不应介绍他入国民党。

（四）须努力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

（五）各地急宜组织“国民对外协会”，一方面是建筑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中坚，一方面是形成国民党左翼或未来的新国民党之结合。此项组织，必须个人加入，加入时，必填写入会愿书，万不可团体加入；加入分子目前不必急求数量之增多，而应注意质量之明确，当以不满意国民党右派主张为重要标准。此会为社会运动一种独立团体，不可与国民党团体混合，尤不可受国民党支配；惟在国民党不能公开地方，完全由我们造成国民党党部，可用此协会名义，对外公开；但此协会内万不能容留右倾观念的分子在内。

各区委、各地委、各独立组组长接到此通告，应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此项通告对外严守秘密。

委员长　T.S.Chen
秘　书　T.T.Mao

中共中央给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1]

（1924年8月31日）

为准备召开第四次全国大会，要求各地同志对于本党一年来的各种政策、各种实际工作，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局。个人有特别意见的，可以写成书面意见，由委员会或组长汇寄中央局。中央拟将各地讨论的意见，在党报上发表，以为第四次大会各项决议讨论的材料。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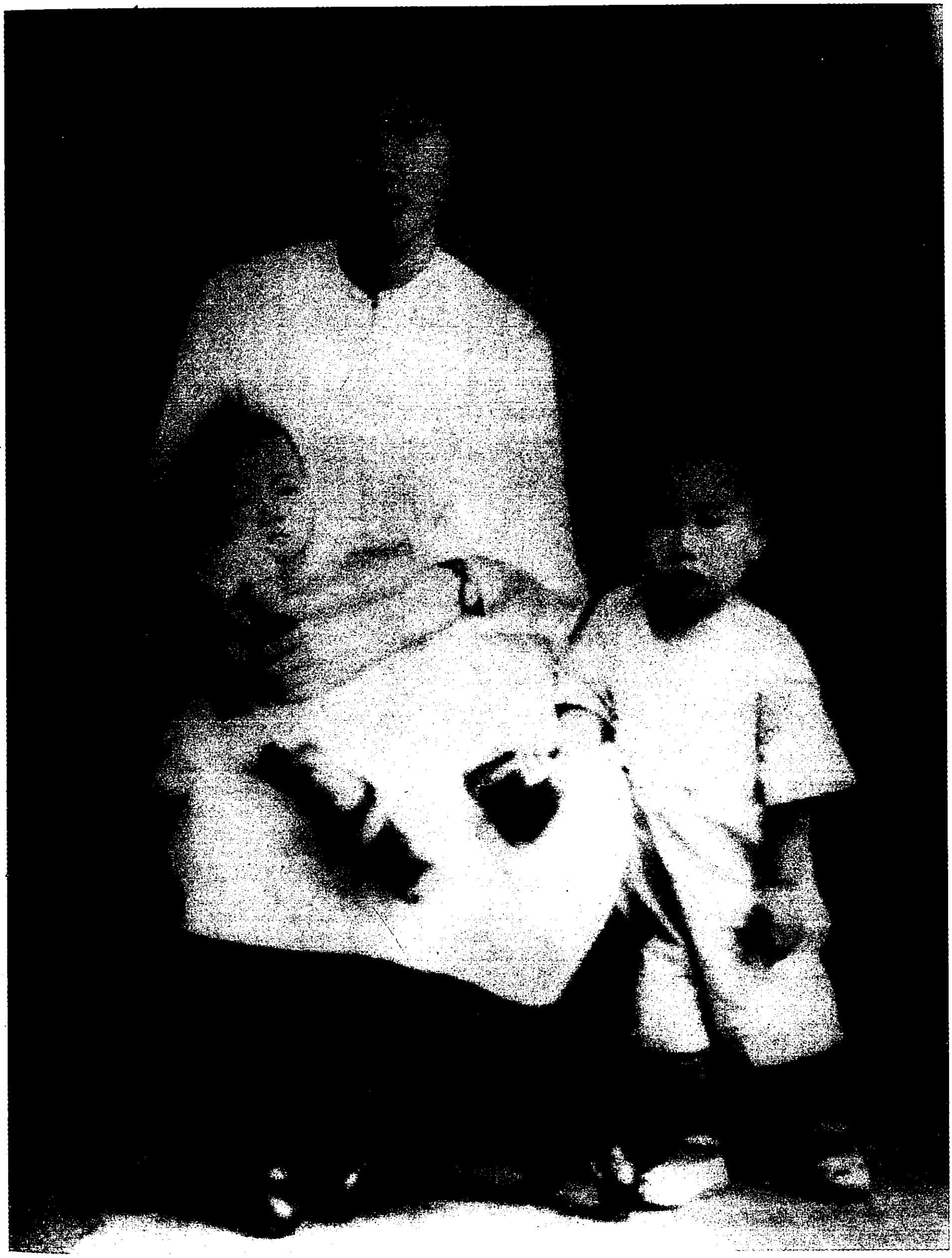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意见致各区各地方委员会各独立组组长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关于反对江浙军阀战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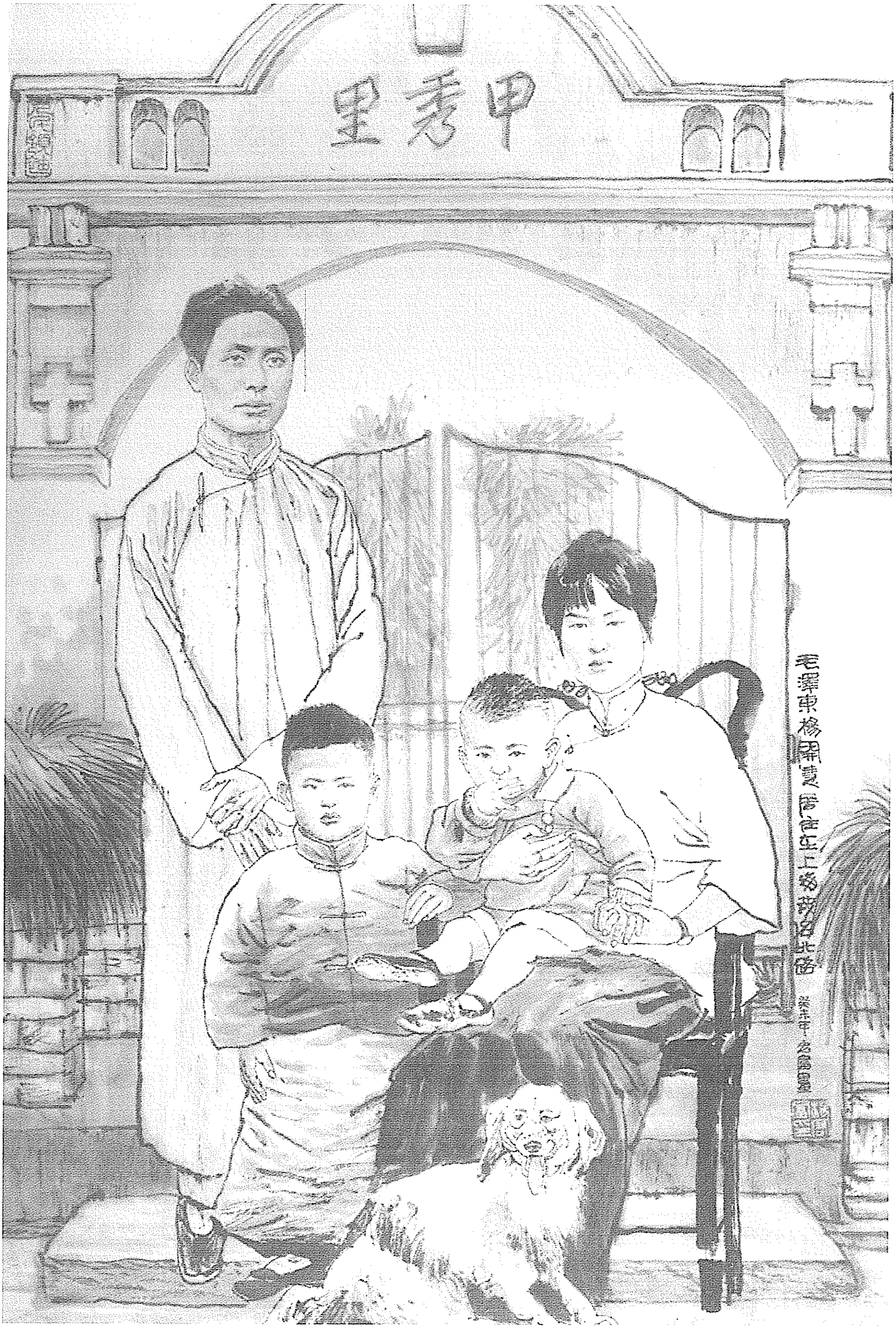
（1924年9月10日）

此次江浙战争，显然是军阀争夺地盘与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中国政治之一种表现；无论对于参加战争之任何方，若有人为偏袒之言动，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我们对于此次战争的适当努力，只有是暴露其实在性质及关系于国民之前，借之使人民了解在双重宰制之下中国和平之无望，每一次军阀的战乱的结果，只有加增人民的痛苦及奴服的地位；人民对任何军阀战争不能存丝毫希望，可希望解救中国的惟有是国民革命。我们要借此次战争为现实的材料，更努力地来宣传国民革命，号召民众组织国民革命的实力！为此中局已决定发布一对时局宣言，表示本党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此项文件，现已在印刷之中，不日即可寄发各地。本党各级组织在接到此通告之后，应立即下令所有党员开始活动，万勿因循放弃此次宣传绝好机会！至活动态度，应一律依本通告及宣言所指示；此外若任何级机关或个人有独立的言动者，一律以破坏本党纪律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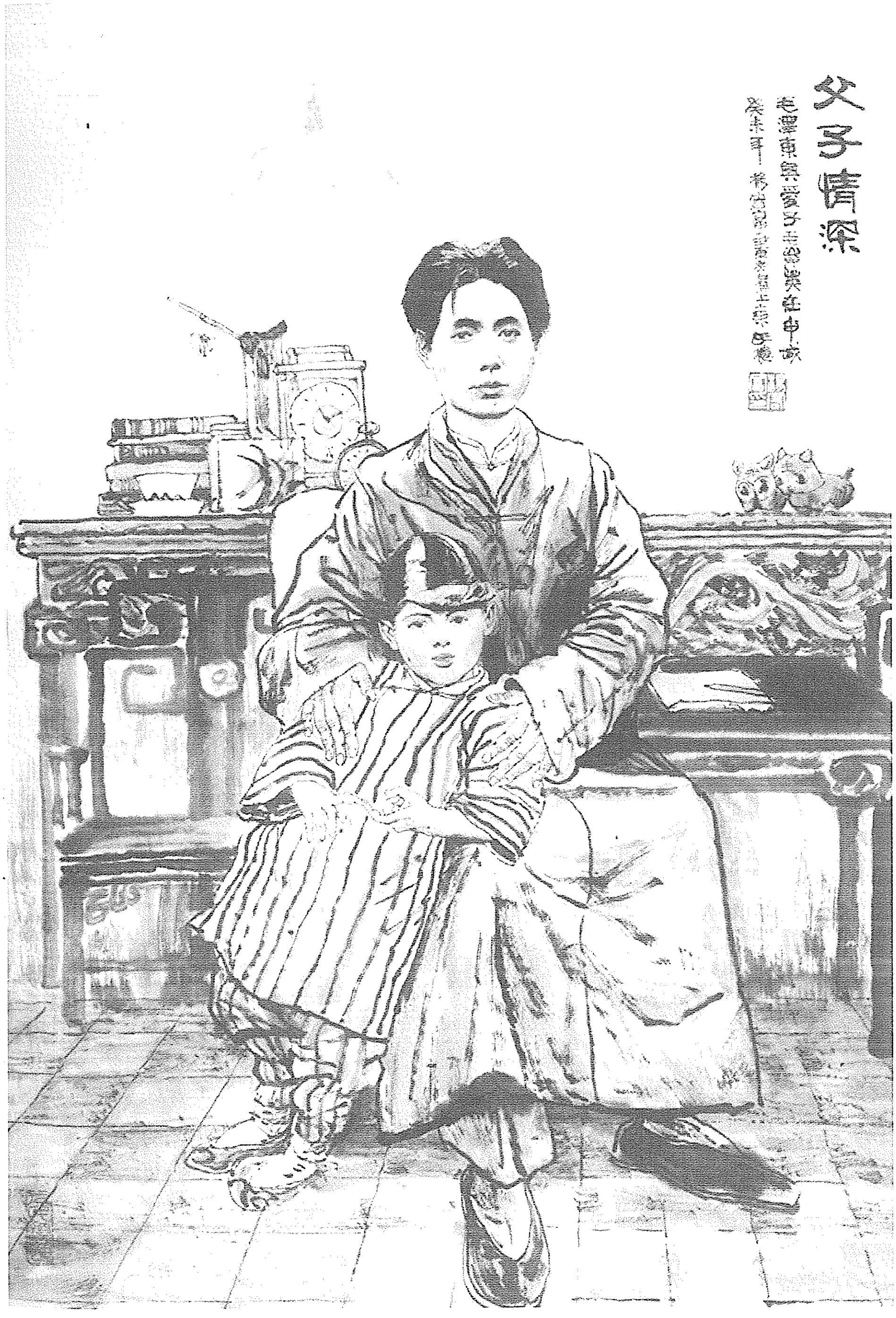
委员长　T.S.Chen
秘　书　T.T.Mao



1924年，杨开慧和幼年的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合影。


甲秀里
毛澤東楊開慧居住在上海茂名北路

《毛泽东、杨开慧和他们的孩子》（中国画）



《父子情深》（中国画）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1]

（1924 年 9 月 15 日）

各地同志对通知中所列议案和前次扩大委员会所作各议案，详加讨论，尽量发表意见，将讨论情况和意见于十一月一日以前汇交中央局，在党报上发表。

---

[1] 这是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1]

（1924年9月25日）

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

---

[1] 为加强党内教育和党外宣传工作，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各地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的通知。这是通知的主要内容。

给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1]

（1924年9月27日）

第一点，系因和森[2]同志患病，在病愈以前现推德隆[3]同志出席。第二点，C.P[4]中央自有自由调遣其党员之权；至张伯简[5]同志应否改在C.P中央长期做事，俟稍后决定了自当通知S.Y[6]中局变更前议，但现时并未正式决定。第三点，赵世炎[7]同志到京接办《政治生活》，仁静[8]即可返沪，并未变更前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信的主要内容。

[2] 和森，即蔡和森，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向导》主编。

[3] 德隆，即项德隆，又名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4] C.P是英文Communist Party的缩写，即共产党。

[5] 张伯简，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向导》出版发行工作，次年元月调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执委。

[6] S.Y是英文Social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即社会主义青年团。

[7] 赵世炎，当时刚从苏联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区委宣传部部长，接办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

[8] 仁静，即刘仁静，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秘书。

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

（1924年11月1日）

各地委、区委、小组负责同志们：

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前次扩大会议决议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说过。近来党的工作一天一天繁重，但是内部组织却未有显著的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样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兹特再行通告各负责同志，自后务于此点特别矫正，至少要做到下列各事：

（一）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

（二）开会时应常常提出具体的政治问题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

（三）负责党部或组长，应规划工作，分配各个同志担负，训练各同志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

（四）每次接到中局文告后，应即提出会议讨论，并尽力执行，执行时有无障碍及其结果，均应随时报告中央；

（五）委员会或组长，至少一星期应向中央作报告一次，报告一星期内所做工作；

（六）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地述明各项工作之全部。

委员长　T.S.Chen
秘　书　T.T.Mao

这个通告发出后，中局政策略有变更，现在我们对于孙中山参加于北方和会并不根本反对，然我们当警告中山在和会中本着国民党的党纲、政纲及北伐宣言说话，揭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在和会中勾结宰制中国的阴谋。

挽陈子博同志联[1]

（1924年）

出师未捷身先死，
长使英雄泪满襟。[2]

---

[1] 1922年1月16日，赵恒惕公然杀害了长沙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引起了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一天，赵恒惕坐车经过长沙市坡子街，突然一声巨响，一枚炸弹在他的车前爆炸，吓得赵恒惕仓皇逃命。他立即命令全城戒严，挨户搜捕，后来才知投弹的是青年陈子博。陈子博在粪池里待了3天，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但因大粪中毒遍身发烂。由于当时时局紧张，无法在长沙就医，只得坐轿回湘乡老家调养。回家后病情加重，不幸于1924年1月22日病故。噩耗传到长沙后，文化书社于3月15日举行3天追悼会，毛泽东送了这副挽联。陈子博（1892—1924），湖南湘乡人。早年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1920年参加筹办文化书社，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长沙执行委员会非宗教运动委员长。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陈子博任委员。1922年，毛泽东因反对赵恒惕离湘后，陈子博代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年8月曾组织长沙织造工人罢工。

[2]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语出唐代杜甫《蜀相》一诗。意思是说，诸葛亮壮志未酬，溘然长逝，这是使英雄志士最为遗憾、最悲痛的事。这里用来悼念陈子博不幸逝世。

题安源工会联

（1924年）

有团结精神，有阶级觉悟；
是劳工保障，是人类福星。

1925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1]会场日刊》发刊词

（1925年10月20日）

本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开会，发行日刊，应有发刊词。

本党自同盟会以至中国国民党历二十年，而有去年一月之改组；自辛亥革命垂成而败历十四年，而有现在之领导全国国民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革命；至于今日，于全国各地惨遭帝国主义屠杀声中，于反动军阀高压爱国运动声中，于东江炮火声中，而有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之召集。这些都不是个人主观的突现或一时事变的偶然，这些都是察观环境的必然，和历史事实的推进。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从去年到今年两年来全国高潮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中，由执行我们的正确的革命策略得到了宣传、组织和那遇敌攻守的经验。于这次广东全省代表大会中我们将得到什么?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怎样使革命的三民主义在广东实现，乃是广东同志的唯一工作。

---

[1] 指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25年10月20日至27日在广州召开。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广东的同志，在反抗帝国主义（沙面罢工、省港罢工），反抗军阀（打倒陈、林[1]，打倒杨、刘[2]），反抗大商买办阶级（镇压商团事件），反抗地主阶级（海丰、广宁、顺德、宝安……各县农民与地主阶级的苦斗）各次很大的运动中，都做了人民的领导。在这些反抗运动中间，得到了二十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十万有组织的农人，和数万有训练的军队，还有许多爱国的商人、学生都到了本党旗帜之下，为本党在南方定下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建设了指挥全国革命运动的国民政府。在各次运动中，虽然有许多外省同志之参加，然广东同志实做了最大的

---

[1] 陈，指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林，指林虎（1887—1960），广西陆川人。1912年3月任江西陆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1922年冬受陈炯明委托，到湖南联络赵恒惕，推行联省自治。1923年3月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广东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1924年5月被任命为广东督办。

[2] 杨，指杨希闵（1886—1967），云南宾川人。当时是盘踞在广东的滇系军阀。刘，指刘震寰（1890—1972），广西柳州人。当时是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

努力。

广东是与英国帝国主义紧临的地方，是陈、林、邓本殷[1]等落魄军阀狡然思逞的地方，是陈廉伯[2]等大商买办阶级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军阀严重剥削压迫农民的地方。怎样检查以前的工作，规定以后的方法，产生有力量的全省最高指挥机关，用以发展各界人民的组织，尤其是发展那占广东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即二千数百万的农民大群众的组织，以保障而且扩大我们的胜利，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于广东，乃是广东全省代表大会的责任。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

打倒陈炯明，肃清一切反革命！

打倒危害广东的买办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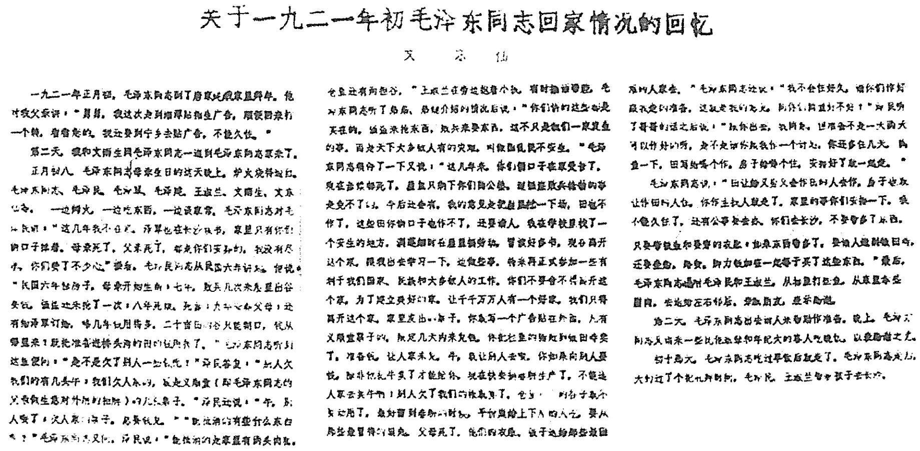
打倒勾结帝国主义、军阀惨杀农民的地主阶级！

革命的三民主义万岁！

---

[1] 邓本殷（1878—1926），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陈炯明的部属，曾盘踞广东廉州（今合浦）、雷州（今海康）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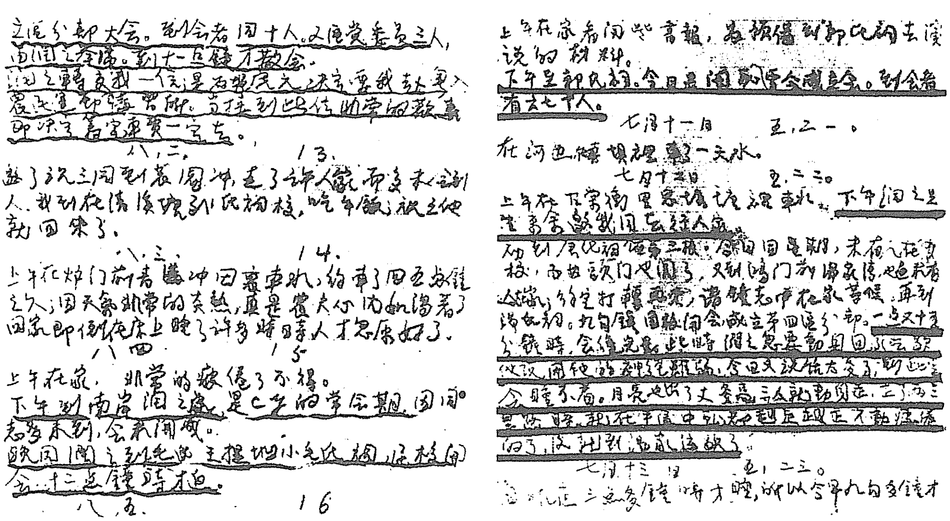
[2] 陈廉伯（1884—1945），广东南海人。英国汇丰银行广东分行买办。1919年任广东商团团长。1924年秋，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商团武装叛乱，遭革命力量镇压后逃往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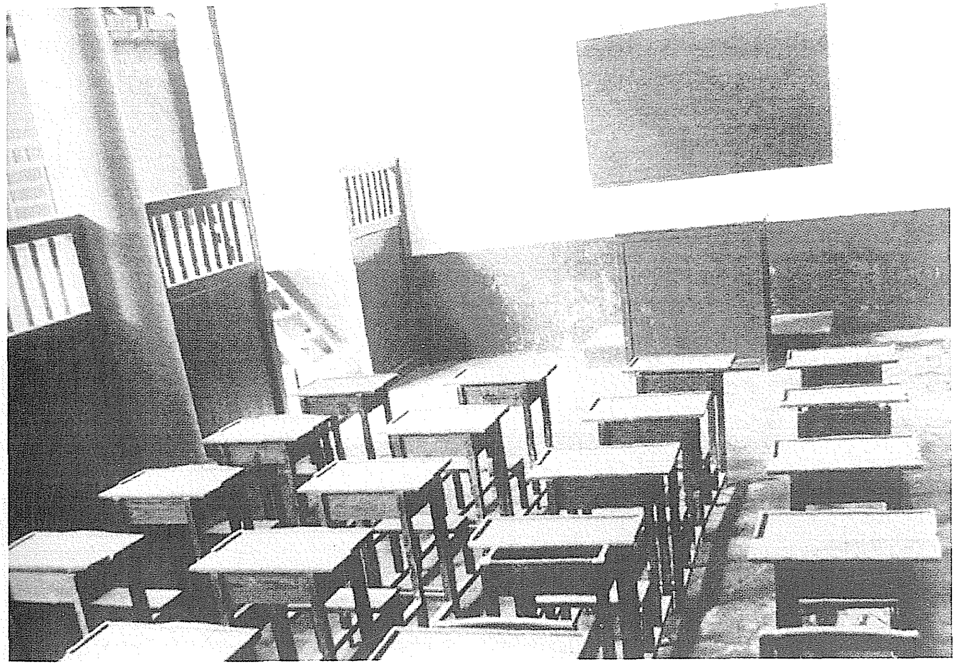
关于一九二一年初毛泽东同志回家情况的回忆

文东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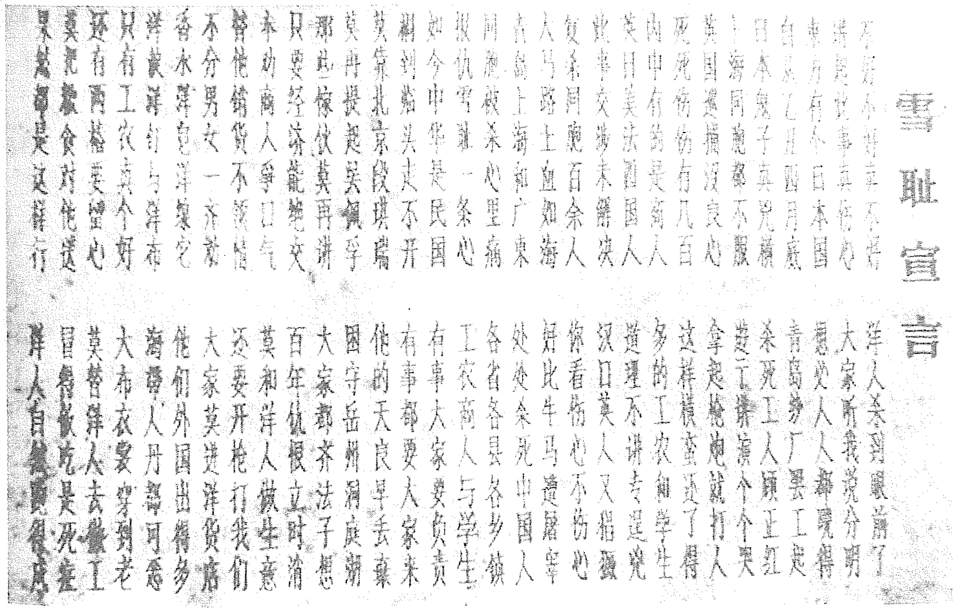
文东仙关于1921年毛泽东动员亲人干革命的回忆。



当年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的贺尔康，在日记中记载了毛泽东1925年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情况。



毛泽东在毛氏宗祠开办的韶山第一所农民夜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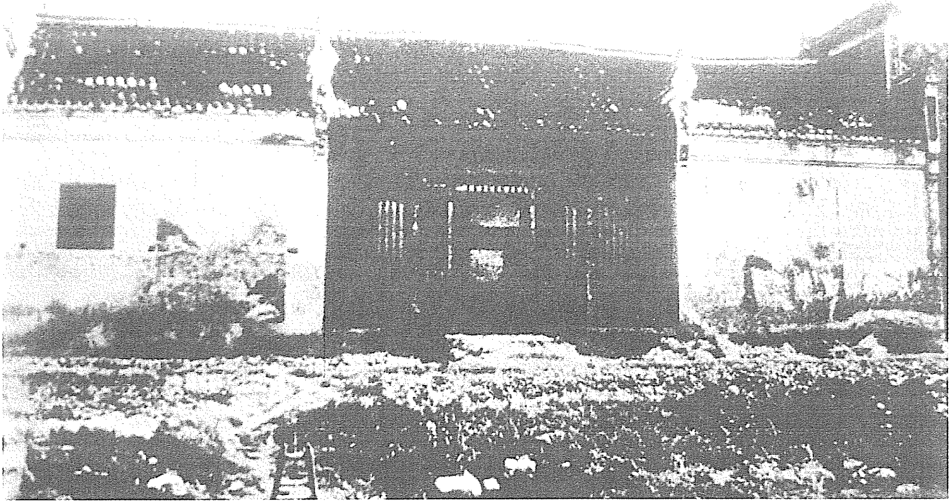


雪耻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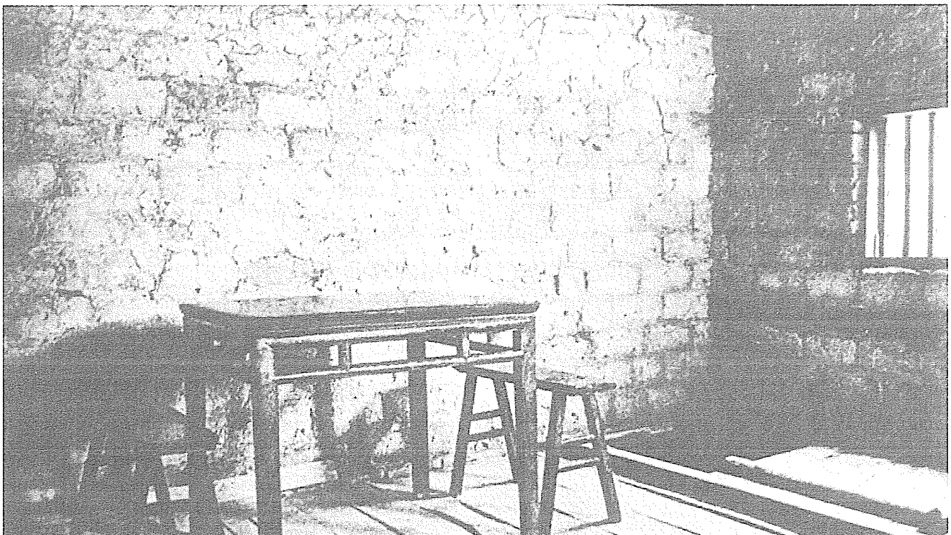
不厌不好主不将
讲起此事真伤心
东方有个日本国
自从乙丑四月底
日本鬼子真凶横
上海同胞都不服
英国还搞没良心
死死伤伤有几百
内中有的是商人
英日美法四国人
此事交涉未解决
复杀同胞百余人
大马路上血如海
青岛上海和广东
同胞被杀心里痛
报仇雪耻一条心
如今中华是民国
祸到临头丈不开
莫怪北京段祺瑞
莫再提起吴佩孚
那些傢伙莫再讲
只要经济能绝交
本地商人争口气
替他销货不留情
不分男女一齐救
香水洋皂洋袜它
洋缎洋针与洋布
只有工农真个好
还有两种要留心
莫把粮食资他送
果然都是这样行

洋人杀到眼前了
大家听我说分明
想必人人都晓得
青岛纱厂罢工起
杀死工人顾正红
进了操演个个哭
拿起枪炮就打人
这样横蛮还了得
多的工农和学生
道理不讲专逞凶
汉口英人又猖獗
你看伤心不伤心
好比牛马遭屠宰
处处杀死中国人
各省各县各乡镇
工农商人与学生
有事大家要负责
有事都要大家来
他的天良早丢弃
困守岳州洞庭湖
大家都齐法子想
百年仇恨立时消
莫和洋人做生意
还要开枪打我们
大家莫进洋货店
他们外国出得多
海番人丹都可恶
大布衣裳穿到老
莫替洋人去做工
冒得饭吃是死罪
洋人自然要得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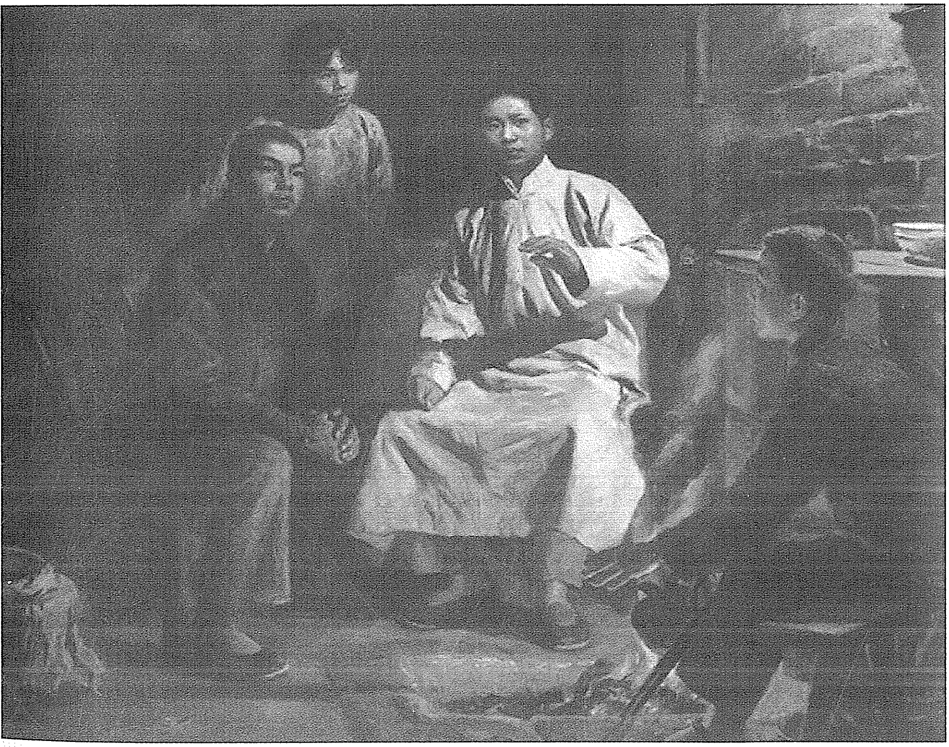
韶山雪耻会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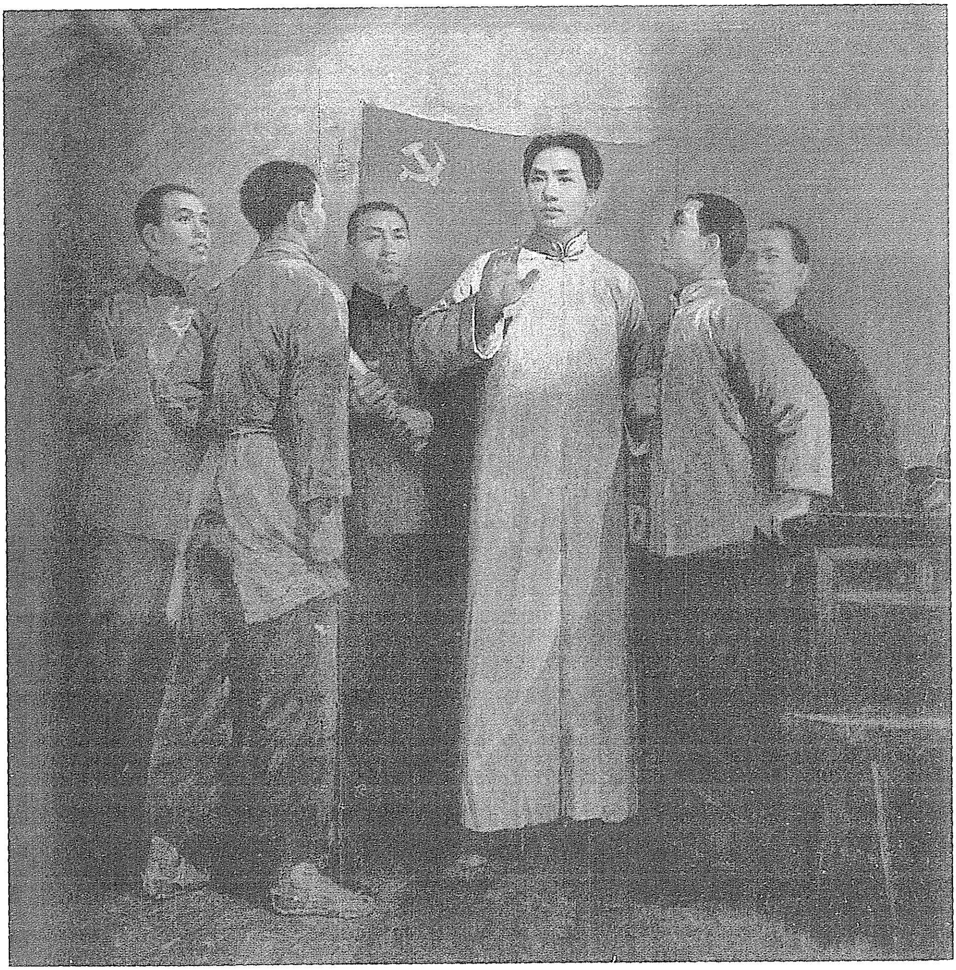
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旧址郭氏宗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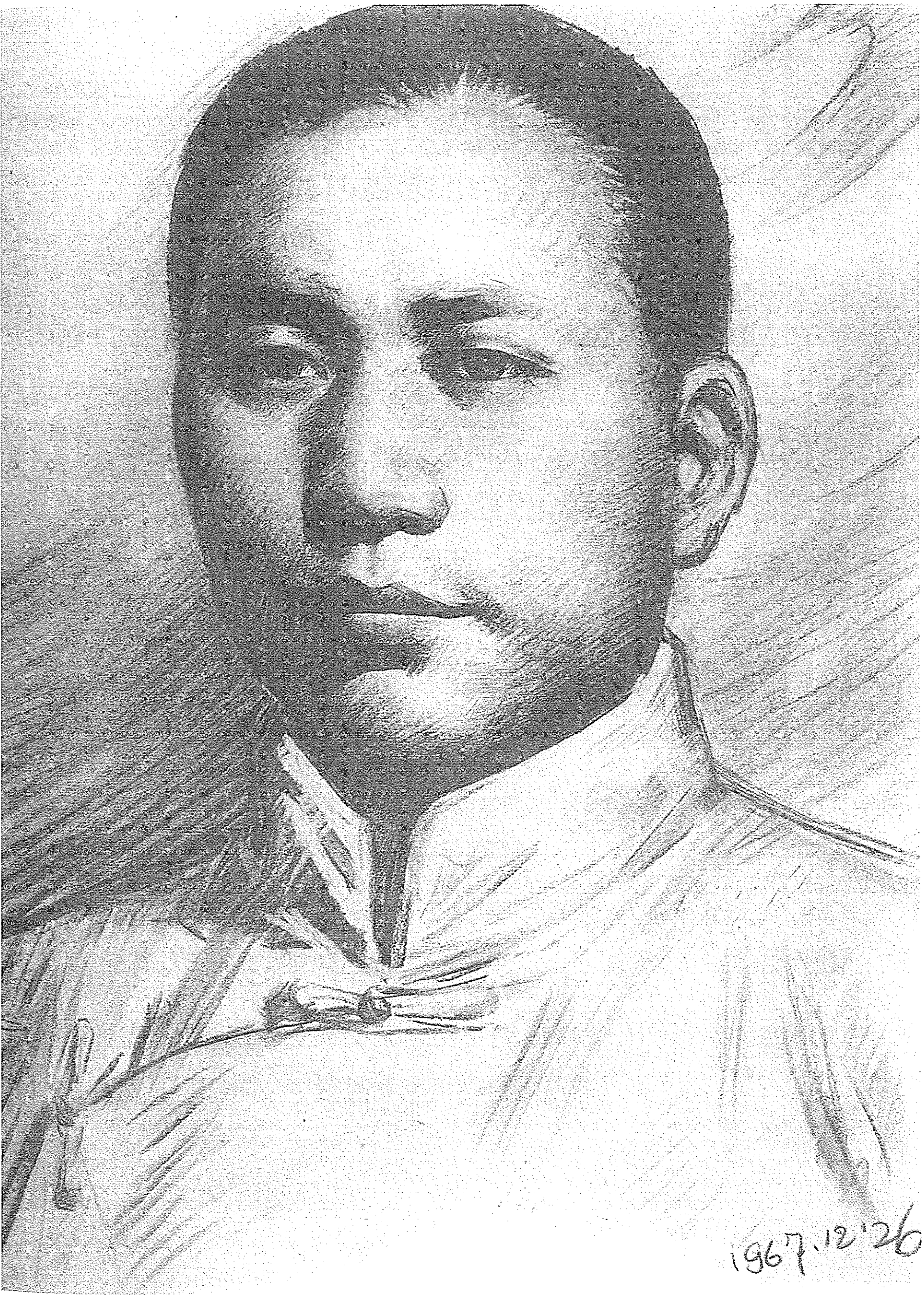
毛泽东故居的阁楼。1925年，毛泽东在这里为新党员举行入党仪式，组建中共韶山支部。



《毛泽东教育亲人干革命》（油画）



《韶山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油画）



《韶山时期的毛泽东同志》（素描）

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1]

（1925年10月26日）

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不能离开世界的革命。现在全世界的势力显然分成两种，即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益扩大，而西方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亦蓬蓬勃勃而起，此可为全世界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而在欧美日本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于严重剥削压迫其本国工农阶级之外，又勾结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军阀、政客、买办阶级及地主阶级，严重剥削压迫其中层及下层民众，此亦全世界反革命势力已有集合的一种表现。

---

[1] 这是由毛泽东等起草的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宣言的主要内容。宣言号召广东的人民、全国的人民起来，站在国民党领导下的革命战线上，团结革命战线上的一切势力，向反革命战线进攻。

在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1]

（1925年10月27日）

关于中间派问题非常重要，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快要召开的时候，更有指出讨论的必要。一部分国民党员以“地主阶级也是中国的同胞，不可提倡自己打自己”为借口，反对为农民解除痛苦，反对佃农减租，似乎要在党内造一个中间派的样子。这种想造成中间派的同志以为右也不好，左也不好，只有不左不右所谓中庸之道才是好的。但是，依我的观察，这中间派是不能存在的。在世界上，欧战以后，分成两个大本营，一个是大资产阶级领袖的反革命大本营，一个是无产阶级领袖的革命大本营，两派短兵相接起来，中派的基础就动摇了。在中国，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证明，一向自命为中间派的人，都成了帝国主义、军阀的走狗，完全成了反革命派。在广东，在分为革命和反革命两大派的情形下，是没有敢站在中间的。根据以上事实，证明中间派在中间是不能立足的，只有革命的理论策略，才是我们党的理论策略。

---

[1] 毛泽东出席国民党广东省代表大会闭幕式，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部长身份，向参加大会的千人发表演说。这是演说的一部分。

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1]

（1925年11月21日）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注意

（一）国内会员以本年九[2]月三十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期；国外会员以本年十月三十一日为填缴调查表截止期。逾期不缴者即照本届年会议决案第四条办理，取消其会员资格。

（二）答案务请缮写清楚措辞明确，否则发生误会，应由本人负责。

（三）调查表正副两张:一备付印；一备保存。均请按式填缴，由邮局双挂号寄交南京网巾市六号黄仲苏收转。

姓　毛　名　泽东　号　润之　省　湖南　县　湘潭

最近通信地址　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永久通信地址　长沙文化书社

---

[1] 本篇文内用楷体字排印的为调查表原有的，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1919年7月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于1920年1月参加该学会。学会出版有《少年中国》和《少年世界》等刊物。会员成分复杂，有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及国家主义者。1925年学会作出改组决议，并发调查表征求会员对学会宗旨和改进会务的意见，后因意见不统一，改组无法进行而停止活动。

[2] 原表此处为“九”，毛泽东将其改为“十一”。

问题请逐条答复

（一）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

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

（二）对于本会会务之改进究抱何种态度

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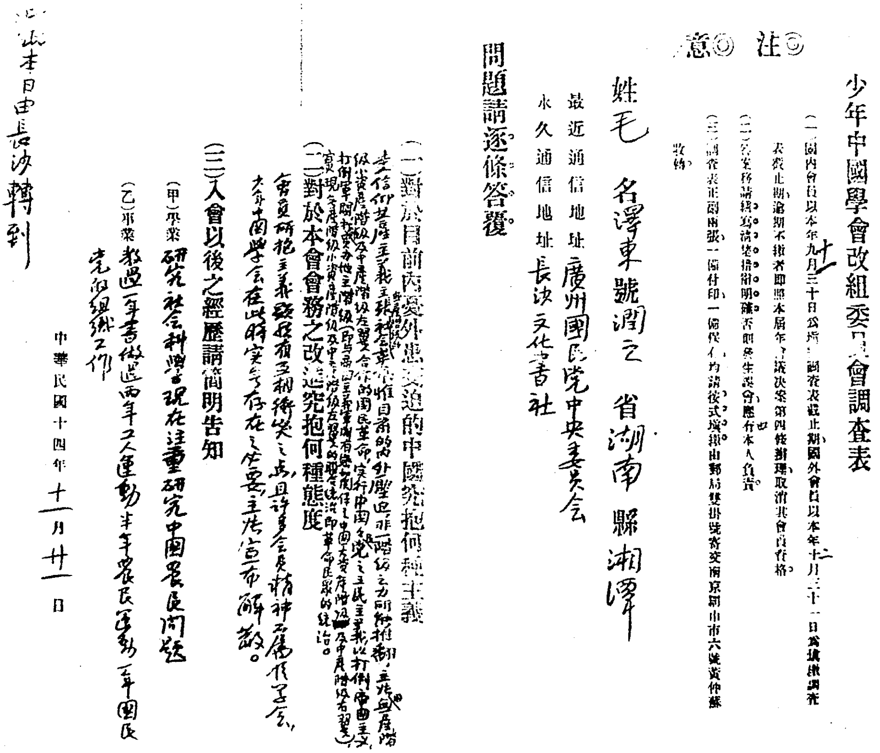
（三）入会以后之经历请简明告知

（甲）学业　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

（乙）事业　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此纸本日由长沙转到



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

注意

（一）國內會員以本年九月十一三十日爲填報調查表截止期、國外會員以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填報調查表截止期、逾期不報者即照本屆年會議決案第四條辦理、取消其會員資格。

（二）答案務請楷寫、清楚、詳細、明確、否則發生誤會、應由本人負責。

（三）調查表正副兩張、一備付印、一備保存、均請依式填報、由郵局雙掛號寄交南京[illegible]中市六號黃仲蘇收轉。

姓毛　名澤東　號潤之　省湖南　縣湘潭

最近通信地址　廣州國民党中央委员会

永久通信地址　長沙文化書社

問題請逐條答覆。

（一）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

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党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二）對於本會會務之改進究抱何種態度

會員所抱主義顯然有互相衝突之點，且許多會員精神不屬於學會，少年中國學会在此時實無存在之必要，主張宣布解散。

（三）入會以後之經歷請簡明告知

（甲）學業　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

（乙）事業　教過一年書，做過兩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一年國民党的組織工作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

此表本日由長沙轉到

毛泽东在广州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中国国民党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925年11月27日）

甲　反奉战争各方面的分析

（一）帝国主义方面　去年直奉战争，起于英美帝国主义欲挟直系统一中国排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企图。其爆发于江浙战争，乃美国帝国主义欲垄断江苏无线电报借款，排斥日本无线电报借款。故其时美国及亲美派竭力助齐燮元，而日本及亲日派乃竭力助卢永祥。此次反奉战争仍然一脉相承，日本帝国主义站在奉系背后，美国帝国主义站在直系背后，唯英国帝国主义在去年奉直战后鉴于直系之不中用，于五卅运动全国反英时，不得不极力与日本协调以重利勾引张作霖镇压上海的反英运动，后且相传英国以巨款助奉扩充奉天兵工厂，企图以奉系统一全国之说。此时直系以杨宇霆督苏上海增兵和在北京所开关税会议有利奉张之故，不得不早日发难。狡猾的英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役内究竟助奉助直，此时尚难完全断定。大概日本为对抗美国计，宁愿拉拢英国以共同役使张作霖。然英国如察张作霖有不利形势，而其旧仆吴佩孚有胜利的可能时，为巩固其长江流域势力范围计，他会舍新欢而联旧好，也是意中之事。故英国帝国主义的态度，将看何方胜利把握较多即助何方。

（二）军阀方面　在直奉对峙的局面中，直系方而有湖南、湖

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七省地盘。四川之袁祖铭支配下之贵州，名义上也属直系。但这几省内部各有特殊的派别，吴佩孚、孙传芳亦必相互分裂。在反奉战争剧烈时期，孙吴自须联合作战，现在战事停顿已现裂痕，将来战胜奉张，必然分裂无疑。奉系方面，自来即有老少两派。去年胜直以来，因权利的分配，内部暗斗日甚。财政竭蹶，奉票跌至五折以下。前之攫取直鲁苏皖，即为解决财政问题。此时苏皖已失，又因国民军之威胁，山东及直隶之京汉线亦将不守，关内财源尽矣，聚数十万饥军于山海关内外，其势力于速战而不利于持久。奉直两派军阀，无论哪一派胜，均于中国不利，因两派背后均有凶恶的帝国主义。唯在全国反奉运动中，直系之反奉自不能不认为一员以共同对付目前强敌，奉倒再以国民之力肃清直系，乃系作战策略的必要。

（三）政派方面　在此次反奉战争中，政派之态度可注意者为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之买办阶级。安福系在军事上的势力此时可说已经没有，其在政治上的势力，早已裂为亲直亲奉二派。唯因亲直派失势，亲奉派在北京当权，故北京政府变成完全代表张作霖的东西。研究系自曹吴当国即附曹吴。曹吴虽失败，仍为吴佩孚主幕。此次直系抬头，研究系蒋方震等及该系猪仔议员猬集汉口，借以攫取利益。联治派乃合政学系益友社及所谓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一派政客如章炳麟等许多小政派而成，现时亦均聚在吴佩孚旗帜之下以谋活动。顾维钧一派所谓新外交系，一向是直系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卖国经纪人，此派现与研究系及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级深相结纳，一同聚在直系旗帜之下，努力做其卖国运动。上海南通等地买办阶级，去年反直战争时因美国帝国主义之指引站在直系一边。此次直系再起，亦马上从其主人（美国帝

国主义）的意旨，做了直系响亮的应声，而且是直系有力的柱脚。以上各政派，除代表日本帝国主义与官僚利益的安福系属于奉系一边外，其余代表官僚及地主阶级利益的研究系联治派，代表英美尤其是美国利益的新外交系，与上海南通买办阶级，都站在直系一边。

（四）国民军方面　国民军与英美日本帝国主义都没有关系，因此同情于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国民军最大的特点。此时因策略上必须尚未与张作霖决裂，或且取暂时的妥协，但这是一时的事。本党欲图接近国民革命之成功在反奉战争后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则国民军在北方之胜利实为重要关键之一。

（五）国民政府方面　本党在广东的基础现已十分巩固，北江熊克武部早经解决。东江陈炯明部又已肃清，其小部窜入闽边者已派兵追剿，务绝根株。南路邓本殷部亦不日可以解决。全境统一可说业已告成。英国帝国主义勾结陈炯明等消灭本党革命势力之企图，业已完全失败。省港罢工问题，港商港政府知无别法可以对抗，现正力图转圜，不日可得到胜利的解决。目前本党在广东方面所致力者，为革命军军力之精练扩充，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之刷新整顿，工农商学民众运动之扩大。总之以最短之时间，积极准备实力，俟南北形势发展到相当时限，即发兵北进，领导全国国民为国事之彻底解决。本党业用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明反奉战争之目的，并用国民政府委员会名义致电直奉两方重要将领，勉其一致推倒奉张，并于奉张势力倒后建设合于民众目的之政府及政策，以验其对于本党拥护民众利益主张的迎拒。

（六）民众方面　此次反奉运动在民众意识方面，乃为反抗拥护英日帝国主义压迫爱国运动之奉系军阀的运动。故此次反奉运动的主体，应该是全国的革命民众，直系之发动，仅仅是一支先发队，

不能算作主体。此时民众之愤怒奉系军阀为历年所未有。全国民众之反奉即反英日帝国主义，反奉胜利即反英日胜利的观念，与广东民众之讨伐陈炯明即攻击英国帝国主义，东征胜利即罢工胜利的观念是一样的。故此次反奉战争在民众意识方面与在“直皖”“奉直”几次战争时都不相同。

乙　我们的宣传及准备

各地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觅得各种机会，于同志中尽力解释，于民众中尽力宣传以下各点：

（一）各国帝国主义在此次战争中的阴谋。

（二）为英日帝国主义走狗的奉系军阀如胜利，则民众将受到绝大的危险。

（三）直系反奉，民众可以利用于一时，但不可任其代替奉张执政，因直系代替奉张执政，人民亦将受到极大危险，直系当国前例，人民不应忘记。在长江各省商人阶级欢迎吴佩孚孙传芳空气极盛地方，尤宜注意宣传此点。

（四）各种反革命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新外交系、买办阶级都是与人民利益绝不相容，不可不揭其阴私一律排斥。

（五）在各派反奉势力中，冯玉祥一派与吴佩孚孙传芳一派不同之点，即冯与帝国主义无缘，赞助国民革命；吴孙则受帝国主义指使，反对国民革命。故人民于友敌之分辨，全看其与帝国主义有无关系。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

（六）真正人民的领袖，乃中国国民党。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广州国民政府。真正人民的军队，乃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因为国民

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乃反帝国主义的急先锋，人民利益的拥护者，人民痛苦的慰劳者（举广东反抗英国帝国主义及此次统一广东和积极建设的事实）。

（七）被压迫的中国全体民众，乃一切中国问题的主宰。此次反奉战争，人民应该是总指挥。人民应该赶快组织起来，主持这次反奉大运动。

（八）国民党对时局宣言主张之四条：（1）建设统一全国之国民政府。（2）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3）此国民政府必于最短时间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对于不平等条约为根本之解决。（4）此国民政府必保障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乃结束此次战争的唯一方法。不照此四条，则战争结局，仍然是帝国主义军阀合作支配的局面。人民仍然要受与从前同样的危险。

（九）为实施国民党的主张计，应该赶快准备真正的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在各种人民团体中，“国民会议解决国事之必要”应继去年的宣传重新奋起一个普遍的宣传。各省党部、各特别市党部于必要时，应该在所辖范围内全体动员，对于国民会议作猛力之宣传，以期唤起民众之注意。

丙　口号

（一）打倒张作霖、段祺瑞。

（二）打倒英美日本帝国主义。

（三）打倒一切阴谋政派。

（四）人民起来指挥反奉运动。

（五）以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结束反奉战争。

（六）建设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

（七）取消不平等条约。

（八）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

（九）一切革命分子速加入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严驳北京党员之违法会议[1]

（1925年11月27日）

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

近接北京中央执行委员林森等铣[2]电，主张在北京西山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覆电严驳。盖就法理而言，既经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议决，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就事势而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受军阀之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以从中作梗，今年四月间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未半，即中辍南下，继续开会于广州，即基于此原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岂可复蹈故辙，使军阀与反动分子得遂其破坏革命之阴谋。况第二次全国大会原定八月十五日在广州开会，嗣因省港罢工，交通梗塞，广州扫除反革命派，战事频仍，以致屡次展期。兹者广东全省统一，广州安如磐石，纵使交通颇感不便，亦无碍于开会。故已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十

---

[1] 这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等给国民党各级党部的通电。

[2] 铣，即11月16日。

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于十五年元旦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诸同志尊重决议，愿念事势，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除胡汉民同志现在莫斯科，李烈钧柏文蔚两同志于役京外，已电征同意外，弟等一致尊重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决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之主张，并竭其全力以拥护实行。谨此宣言，诸维鉴察。

中央执行委员　汪兆铭　谭延闿　谭平山
林祖涵　李大钊　于右任
于树德　王法勤　丁惟汾
恩克巴图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毛泽东　瞿秋白　韩麟符
于方舟　张国焘
感[1]

---

[1] 感，即11月27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

（1925年12月1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

---

[1] 毛泽东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1927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

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1]和国民党右派。

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为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2]“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3]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学说解释国民党的民生

---

[1] 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以其外围组织“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公开进行活动。组织这个政团的是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把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当作职业。

[2] 戴季陶（1891—1949），又名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从事过反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活动。后曾和蒋介石在上海共同经营交易所的投机事业。1925年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和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为后来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准备。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1949年2月，蒋介石的统治即将崩溃，戴季陶感到绝望而自杀。

[3] 北京《晨报》，初名《晨钟报》，1916年8月创刊于北京，1918年12月改名为《晨报》，1928年6月停刊。

主义，他们反对国民党联俄和容纳共产党[1]及左派分子。但是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为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2]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3]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

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4]，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

---

[1] 1922年和1923年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并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曾经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或候补委员，担任过国民党的许多领导工作，对于帮助国民党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2]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3]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20年1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60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布解散。

[4] 这里是指中农。

耕农和手工业主所经营的，都是小生产的经济。这个小资产阶级内的各阶层虽然同处在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但有三个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即用其体力或脑力劳动所得，除自给外，每年有余剩。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1]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这种人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中产阶级颇接近，故对于中产阶级的宣传颇相信，对于革命取怀疑的态度。这一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而且因为近年以来帝国主义、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军阀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是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仅仅可以保住，渐渐变得生活下降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

---

[1] 赵公元帅是中国民间传说的财神，叫赵公明。

粟”。这种人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很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和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众，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所说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们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1]和各地农民运动的经验看来，这个断定是不错的。

半无产阶级。此处所谓半无产阶级，包含：（一）绝大部分半自耕农[2]，（二）贫农，（三）小手工业者，（四）店员[3]，（五）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

---

[1] 指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5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5月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10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8人。5月30日，上海2000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100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2] 这里是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

[3] 店员有不同的阶层，他们一般不占有生产资料，生活来源的全部或者主要部分是依靠向店主出卖劳动力所取得的工资。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是店员中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下层店员过着无产阶级的生活。

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大约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经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籴粮，较之自耕农的无求于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优于贫农。因为贫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其经济地位又分两部分。一部分贫农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此种农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另一部分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更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手工业者所以称为半无产阶级，是因为他们虽然自有简单的生产手段，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他们也常常被迫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经济地位略与农村中的贫农相当。因其家庭负担之重，工资和生活费用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和失业的恐慌，和贫农亦大致相同。店员是商店的雇员，以微薄的薪资，供家庭的费用，物价年年增长，薪给往往须数年一增，偶与此辈倾谈，便见叫苦不迭。

其地位和贫农及小手工业者不相上下，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小贩不论肩挑叫卖，或街畔摊售，总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贫农不相上下，其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也和贫农相同。

无产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如海员罢工、铁路罢工[1]、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2]以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的大罢工[3]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

---

[1] 指1922年和192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主要铁路线的工人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要求改善生活的经济斗争迅速发展为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举行总罢工。其他许多铁路的工人也纷纷响应。2月7日，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等，残酷地屠杀京汉铁路的工人，造成了二七惨案。

[2] 沙面当时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广州的租界。1924年7月，统治沙面的帝国主义者颁布新警律，规定沙面的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携带贴有本人相片的执照，在租界内行动必须受各种苛刻的限制，但是外国人可以自由出入活动。沙面工人于7月15日宣告罢工，抗议这些无理措施。这次沙面罢工迫使英法帝国主义者取消了新警律。

[3] 指1925年6月1日开始的上海大罢工和6月19日开始的香港大罢工。这两处罢工是当时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支柱。前者有20多万工人参加，坚持了三四个月；后者有25万工人参加，坚持了1年零4个月，是截至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

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中国尚少新式的资本主义的农业。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在乡村中是最感困难者，在农民运动中和贫农处于同一紧要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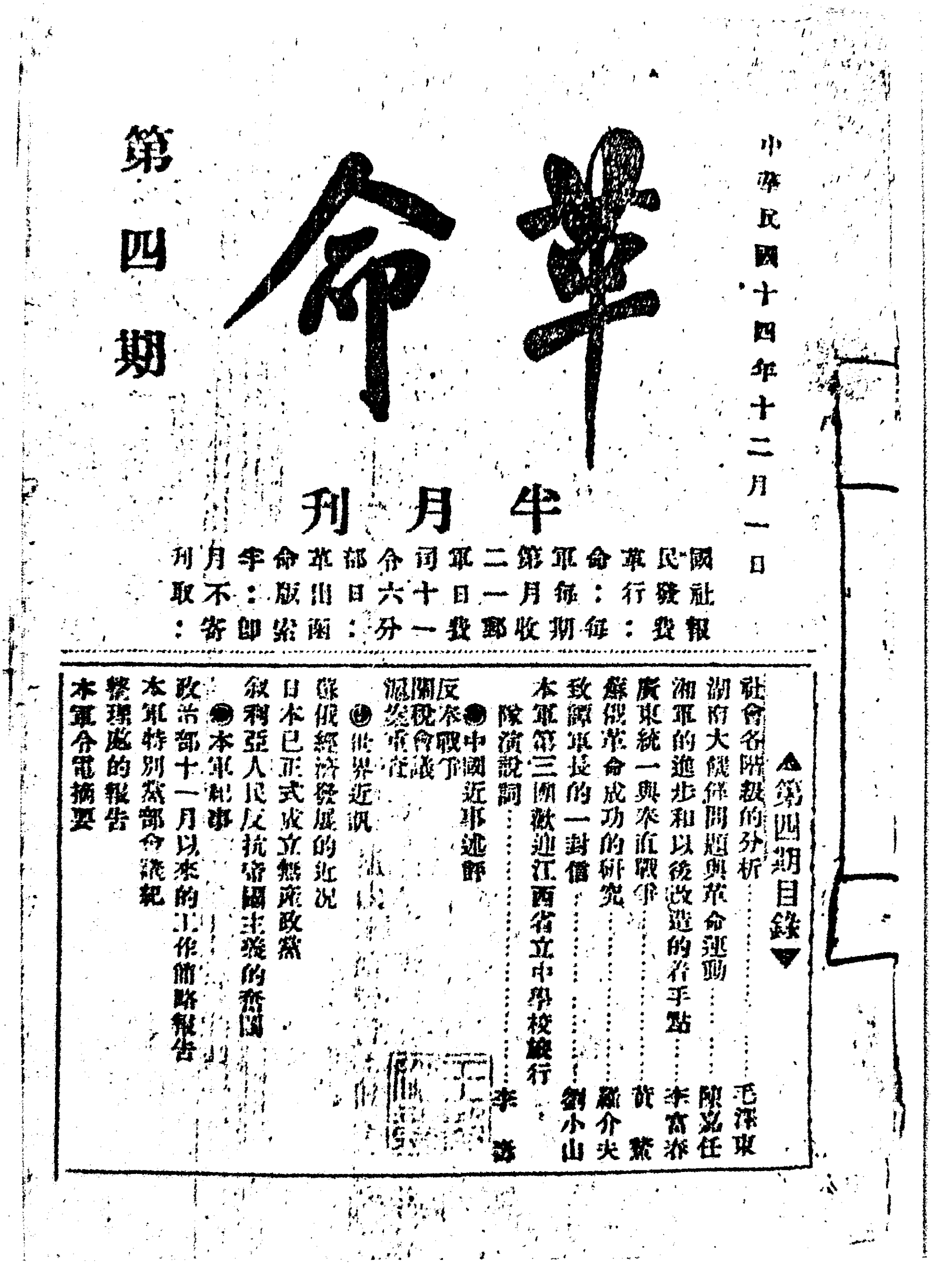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1]，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

---

[1] 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青帮是旧中国的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参加者主要的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流氓无产者。这类团体大都用宗教迷信为团聚成员的工具，采取家长制的组织形式，有的还拥有武装。参加这类团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互相援助的义务，有时还共同反抗压迫他们的地主、官僚和外国侵略者。但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不可能依靠这类团体得到出路。同时，由于这类团体带有严重的封建性和盲目的破坏性，它们又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所操纵和利用。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群众组织，这类落后的团体就失掉了它们的存在价值。

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综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革命

半月刊

第四期

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革命半月刊

社發行：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不取

報費：每期收郵費一分：函索即寄：

▲第四期目錄▼

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
湖南大饑荒問題與革命運動……陳兆任
湘軍的進步和以後改造的着手點……李富春
廣東統一與奉直戰爭……黃紫
蘇俄革命成功的研究……羅介夫
致譚軍長的一封信……劉小山
本軍第三師歡迎江西省立中學校旅行隊演說詞……李[illegible]
●中國近事述評
反奉戰爭
關稅會議
滬案重查
●世界近訊
蘇俄經濟發展的近況
日本已正式成立無產政黨
敘利亞人民反抗帝國主義的奮鬥
●本軍紀事
政治部十一月以來的工作簡略報告
本軍特別黨部會議紀
整理處的報告
本軍命電摘要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发表《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来成为《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

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5年12月4日）

全国及海外各级党部全体同志均鉴：

溯自先总理在日，鉴于革命之历久无成功，毅然决定改组本党，当时即有一班懒惰右倾党员，欲回避真正之革命，知改组刷新之不利于偷惰垄断升官发财，阻挠备至。及第一次全国大会决定革命策略以后，彼辈知阻挠之无济于事，乃公然叛变。冯自由、马素等勾结段祺瑞、张作霖另组团体倡之于先。杨希闵、刘震寰勾结英国帝国主义举兵发难于后，梁鸿楷、郑润琦、莫雄、朱卓文等更不惜出以最残酷之手段，置我最忠勇之廖仲恺同志于死地，欲一举推翻广州革命根据地。本当于此存亡绝续之交，为保持本党革命地位计，不得不出以严厉之手段以处置诸叛党党员。幸赖先总理革命精神之感召，诸同志强毅勇猛之努力，于本年六月扫平杨刘，于九月肃清廖案诸叛逆，使广州根本之地，危而复安，革命事业，挫而愈奋，团结淬厉，进展可期。不图彼辈毒心不已，又复勾结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与英国帝国主义指挥之陈炯明、邓本殷三方夹击，以期破灭我革命势力。复赖同志一致努力，于两月之内，使三方顽敌，以次肃清，革命权力，因以巩固。常此之时，北京少数同志忽又以开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闻，查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

议，迭经五月二十一日及五月二十三日第三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决定，只能在广州开会。因第二次全国大会，系决定在广州开会，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议系为议决在大会提案等事，十月三十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第四次全体委员会须在全国大会前三星期召集，即是此意。且广州为本党革命根据地，北京乃军阀及反革命派麇聚高压之区，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安能舍广州而至北京。显系一班叛党党员，假借机会，怂恿少数革命观念动摇之中央委员，谋不利于本党之行动，邹鲁即其中之一也。查本党自改组以迄于今，反动党员自冯自由以迄邹鲁，所同然一词以攻击本党及本党政府者，曰共产，曰联俄，曰容纳共产派分子，夫共产云云，乃帝国主义军阀用以离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联合战线之一种策略，吾同志苟与帝国主义军阀无缘，即不应助之宣传，以淆乱国民观听，且事实俱在，谣言之兴，必难持久。惟联俄与容纳共产派分子，则为本党求达到革命成功之重要政策，先总理决之于先，第一次全国大会采纳于后，乃有客观之根据及深切之理由。盖今日之革命，乃世界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决斗之一幕，与历史上一切革命异其性质，则革命之进行，亦当然异其策略。今帝国主义之对吾党，早已为国际联合的压迫，若吾党之革命策略不出于联合苏俄，不以占大多数之农工阶级为基础，不容纳主张农工利益的共产派分子，则革命势力陷于孤立，革命将不能成功。本党辛亥革命所以未能成功，即因当时反革命派势力已有国际的联合，而吾党革命势力尚无国际联合，在国内亦未唤起大多数民众为之基础，完全陷于孤立地位，故不得不妥协迁就以驯至于失败。时至今日，岂可复蹈故辙？彼帝国主义军阀正惟吾今日所探革命策略之可畏，乃多方离间破坏，务令吾党尽绝国内外之一切友助，回复从前孤立地位，使革命事业永

无成功，而后彼等始得遂其永久统治中国之愿望，其计之毒，宁有逾此。我少数同志观察不周，辄为此等离间政策所惑，年来党内纠纷，大抵肇原于此。须知今日之局面，不为革命，便为反革命，无丝毫中立回翔之余地。然欲革命，必须联合国际及国内各派革命势力，团为一体，始能与反革命派决战而不败。否则未有不失败者。不惟失败而已，其自身且有随时陷入反革命派之危险，冯自由以致邹鲁诸叛党党员，其明证也。此次北京开会之事，已由本会去电严驳，且已决定第二次全国大会会期为明年一月一日，于本年十二月十一日开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甚议于广州，业经电促京沪各委员刻日南下与会，多数委员意见一致，本已毫无问题。惟因近来党内外谣诼之兴，多由不明了本党政策而起，因将改组以来与反革命派奋斗之经过及先总理所采革命策略之根由，通告各地同志，望各同志坚持总理之主张，勿为异说所迷惑，革命前途，实利赖之。特此通告。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

（1925 年 12 月 5 日）

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2]、研究系、联治派[3]、国家主义派[4]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革命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有外国及本国的海军、陆军和警察，有国际的广大宣传机关（路

---

[1] 这是毛泽东为《政治周报》创刊写的发刊词。《政治周报》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刊物，1925 年 12 月 5 日创刊于广州。毛泽东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主编。

[2] 安福系，是北洋军阀皖系操纵的政客集团。1916 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北洋政府。1918 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进行政治活动，控制国会，被称为“安福系”。1926 年段祺瑞垮台，安福系瓦解。

[3] 联治派，即“联省自治派”。北洋军阀统治期间，部分军阀政客为保持地方割据，并反对民主革命，而提出联省自治的反动主张。

[4] 国家主义派，指中国青年党（当时的公开名称是“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一些反动政客。他们投靠帝国主义和当权的反动派，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

透社等），有全国的报纸和学校。他们之间虽因利害不同时起冲突，说到对于我们，却无一怀着好意。

我们在广东的工作，在扫平杨、刘[1]，肃清郑、莫[2]以后，划然开一新时代。广州市上实现了十四年来未有的太平；人民确实得到了集会、结社、言论、罢工自由；东征军不曾拉夫；废除了广州市场的赌博；全省军政统一；财政亦逐渐集中；病民苛税已有一部革除，其余部亦定下了革除的步骤；民政、司法、教育、交通机关均确立了改革政策；北江、东江、南路反革命余孽以次肃清；坚持罢工，大规模封锁香港，以拥护爱国工人运动。我们并不隐讳我们的缺陷，我们不是说广东业已改造——广东之改造确还刚在开始，还有许多扰乱治安的土匪，还有许多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内幕积弊还有许多未尽除去。我们不是说这些缺陷都没有了，我们是说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权力，已有了一个肃清土匪的机会，已有了一个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战的力量，民政、财政、司法、教育、交通诸端已可开始刷新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已有了一个革命的基础。凡所施为，一本孙中山先生革命策略，昭昭在人耳目，而香港英国帝国主义，陈炯明、邓本殷等一班反革命余孽，无数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免一齐向我们发抖。彼辈怨愤之余，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无所不用其极。京津沪汉各地反革命派宣传机关，惶然起哄，肆其恶嘴毒舌，凡所以咒诅诬蔑中伤我们者，亦无所不用其极。全国国民尤其是北方及长江各地各界人民，所在被其迷惑，对于广东真

---

[1] 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

[2] 郑、莫，指郑润琦、莫雄，是广东的小军阀。1925年他们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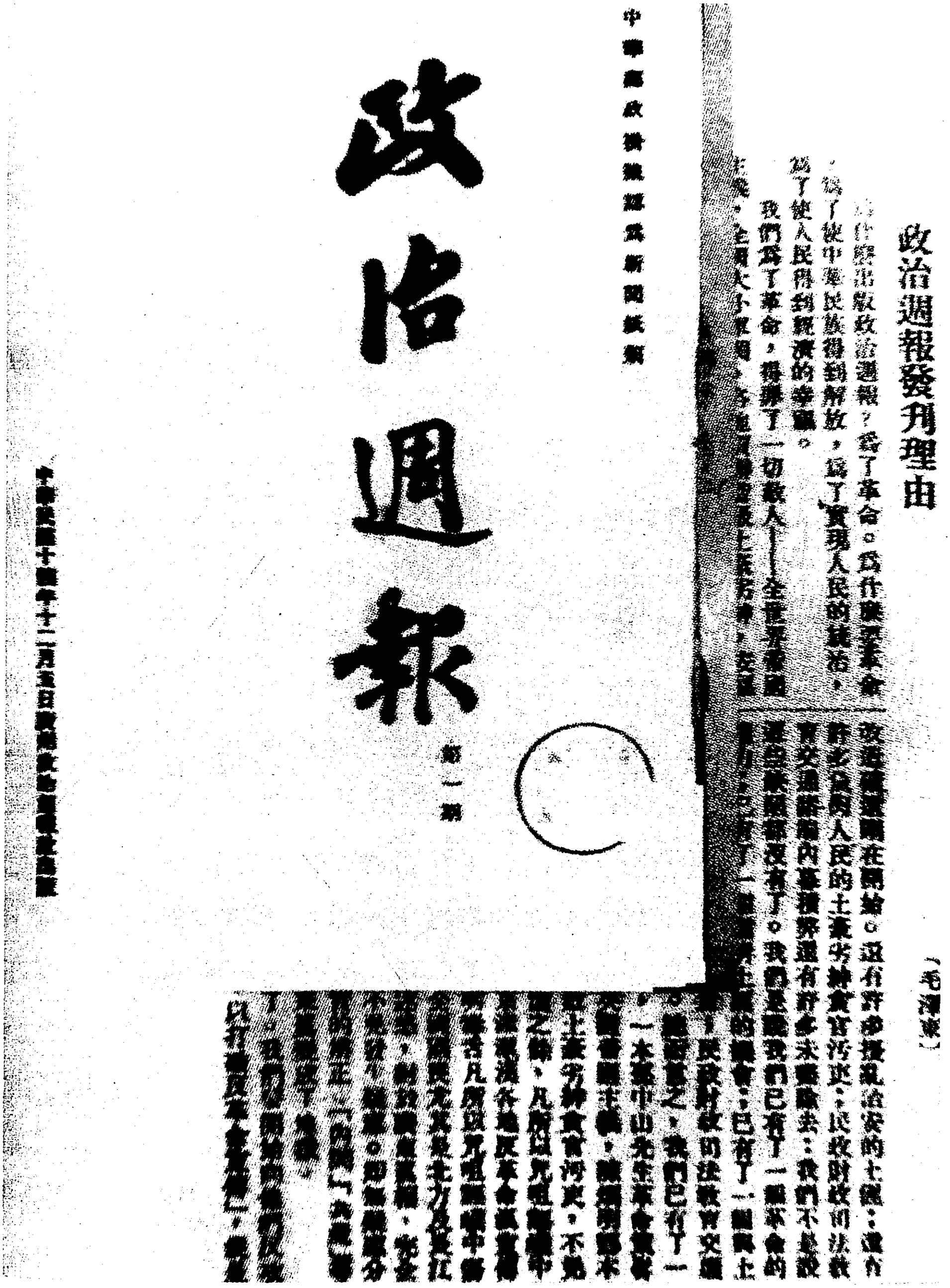
相，完全隔绝。乃至同志之间，亦不免发生疑虑。即无疑虑分子亦无由根据事实以为切实的辨正。“内哄”“共产”等等名词到处流传，好像广东真变成了地狱。

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

《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接受我们对于革命工作的忠实报告，全国革命的民众起来！



政治週報

第一期

政治週報發刊理由

（毛澤東）

為什麼出版政治週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

1925年9月，毛泽东从韶山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宣传部代部长。12月，创办了中央宣传部机关报《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图为第一期《政治周报》和毛泽东撰写的发刊词。

三三三一制

（1925年12月5日）

“何谓共产？财产充公。不准私蓄，贫富皆穷。造作好语，名曰重农。三三三一，其实不通。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己得三成，一成会用。”这是杨坤如贴在惠州城厢内外的“反共产”四言韵语告示。一个新从北京来而头脑颇算得清醒的朋友问我道：“三三三一制到底有这回事没有？”我听了纳罕。我尚未答他时，心里想：难道你也有点疑惑或者广东竟行了什么“三三三一制”吗？我便带着冷峭的神气答他道：“有是有，不过还在杨坤如的告示上。”他说：“《香港晨报》不是国民党的报？那上头也载着。”于是我才知道所谓《香港晨报》也有这种新鲜议论。原来《香港晨报》在杨刘叛变以前确与国民党有过关系。杨刘叛变香港罢工以后便为刘震寰买了去做了香港洋大人和所谓陈总司令也者的机关，利用省港断绝交通，就在香港那荒岛上《香港晨报》那篇幅上涌出了许多的“事实”，三三三一不过那许多“事实”中的一个，却不料远远地送到了北京饱了北京朋友的眼福。我因此想：现今世界上的东西，无论是那动物（如人之类）或静物（报纸之类），不必看得太拘板。因为现在“革命”“反革命”分了家，那些动静物件，可以今天在这家，也可以明天在那家。《香港晨报》在国民党时，做了国民党的机关报；他被香港洋大人刘震寰先生与夫所谓陈总司令也者买了去，便只能算作他们的

机关报。这正如冯自由马素一班人在国民党时，是国民党员，及被段祺瑞买了去，虽然嘴里还说国民党，招牌也是挂的“国民党俱乐部”，然而只算是段祺瑞的人了。我不是特别有恨于《香港晨报》和冯马几位先生，我是不得已要借光这一个例子点破给国内外许多朋友看，于观人察物时别要上当。至于杨坤如的告示做的词章俱佳，只有“其实不通”一句，算是败笔，所谓一粒老鼠屎点坏一锅汤者非耶？但那是秘书的过。

杨坤如的布告与刘志陆的电报

（1925年12月5日）

杨坤如的布告已经领教了，还有刘志陆等给“北京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奉天张督办，湖南赵省长，武昌萧督办，江西方督理，福建周督理，岑西林先生，吴子玉先生，康南海先生，梁任公先生”许多人的电报，那上面却稍不同。他那“其罪七”中说：“我国社会，素称重农，主佃利益，所得常均，互助精神，自然而合。今乃诱以均地之说，乱其互利之序。”不免与杨坤如冲突。照杨坤如说：“三成地主，三成充公，已得三成，一成会用。”各方面都得一点，倒可以说是“互利”。刘志陆说的却是“均地”，其意谓广州政府教农民从地主手里夺取土地都均分了，地主从此没有租收，所以是“乱其互利之序”。一个说地主还有三成，一个说地主一点没有，未知北京等处朋友，到底相信哪个的话。

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

（1925年12月5日）

刘志陆等的电报，于数了国民政府八罪之后，加上“呜呼”一段，接着说：“总之出师靖难，伐罪救民，如果讨赤志同，仇雠亦吾良友。师直为壮，胜负无待交绥。得天者昌，仁暴无难立判。”刘电列衔诸人如段执政各部总次长张萧赵方周各位督办督理，或省长以及岑吴康梁诸先生，固然是讨赤同志。但香港金总督伦敦包总理，何尝不是讨赤志同？却不将台衔列上去。而且金总督助了如许金钱军械，又保护了陈总司令在香港开设总司令部，讨赤之志，炳若日星，却偏将台衔漏列，真不知是何用意？电末师直为壮数句说的更属糊涂，他竟在替国民政府做功德颂。

颂声来于万国

（1925年12月5日）

有个潮梅绅学商联合会打了一个响应刘志陆的电报，里面说：“共产妖党，煽惑粤东，近之足以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远之足以酿世界以灭绝人类之忧。我刘公仗义发难，为天下先。行见旌旄所指，浆食争迎，拉朽摧枯，大勋立就（记者按立字有弊）。赤化赖以铲除，国基由兹奠定。岂特与云南起义马厂誓师先后鼎足，抑且全世界人类赖以保障，全球劫运赖以挽回，纪念垂于千秋，颂声来于万国。”处处不忘“全世界”“全球”，眼光何等远大！刘志陆如果真把“赤化”铲除，“颂声”之来，一定可靠。万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下面四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国。

反共产中国国民军大同盟万岁

（1925年12月5日）

这是陈炯明在东江所发反共产印刷品上面的一句口号。这句口号确实响亮，只可惜“反共产中国国民军”要去“大同盟”有点为难。像奉天张督办所部与汉口吴子玉先生所部，实在可算得“反共产中国国民军”了，但是何从“大同盟”呢？

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

（1925年12月5日）

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然此种制造，只能比较抽象，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便容易自己戳穿使人不信。然此次陈炯明在东江，为了孤注一掷以图幸胜，竟什么方法都用尽了，他竟捏造所谓“共产章程”以恐吓人民。他们的传单中有一张题目叫做“劝粤民协助粤军讨伐赤党”，那里面说：“呜呼！我父老兄弟知蒋中正拟订之共产章程乎？区区之愚，窃虑蚩氓无知，以为共产者共富人之产，于一般贫民无与也，或更大有造于贫民也。而抑知大谬不然。吾综厥章程，概括言之：有所谓三三三一制者，盖对于产田言之也。有所谓四四二制者，盖对于房屋言之也。而对于工厂商场资本稍厚者，则更完全没收之。”但近日香港《工商日报》却载道：“省商代表到港，港商代表假座华商俱乐部，请省商代表开第二次大会议磋商解决工潮恢复交通事宜，华人绅商与省商代表皆围坐于一长桌。省商代表简琴石起言，省城政府实非行共产。”假如有人拿了简石琴的话去问陈炯明，我料陈炯明必将答道：“简石琴自己扯谎，别人共了他的产他还说未共呢。”

邹鲁与革命

（1925年12月5日）

邹鲁说："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应该觉悟，切不可因人家说旧同志不革命便抹杀一切。若不是我们同志屡仆屡起，哪能有民国。若不是讨袁护法讨贼北伐诸役一向无前，哪能有今日的历史。就是共产得意的工作焚毁商团，乃需要靠杨刘。打杨刘仍需要靠许梁。即今日之制许梁，又何莫非老同志。"很好！邹先生！就请你革命罢！实在没有一个人有本领敢于抹杀革命的老同志！须知单是"有民国""有历史"是不能算数的，须得现在还是革命，须得将来还是革命。若那老同志杨刘，老同志许梁，我看还是少举例为好。

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

（1925年12月13日）

“革命派团结起来！”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体中央会议地点之争，实乃继续革命与放弃革命之争。故即舍违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议决与不由中央秘书处召集等法律及手续不计，单就事实说，不愿在革命高潮之广州开会，而愿在段祺瑞肘下之北京开会，请问这是什么意义？此事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京严驳，并由中央委员汪精卫、谭组安等十余人将驳斥要点通电全国各级党部，又由中央委员会发出详明通告历举两年来右派党员之反革命行为以警戒党员勿为所惑，均志上周本报。一周以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接到各地反对北京会议之文电已有二十起，继起反对者必遍全国。因在现在的中国，除了革命，决无路走，凡属革命性强固的党员，决不愿附和右派抛弃光荣的革命地位，以助帝国主义军阀张目。我们料到全国党员不但不附和，而且将因此引起一个更大的团结。“革命派团结起来”是廖仲恺同志倡导的口号，“要革命的向左边去”是汪精卫同志倡导的口号，在今日这两个口号必然要普及于全国各地革命同志及革命民众之间。我们从听到下列各处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的声浪，推知这两个口号之必然普及于全国。

向左还是向右?

（1925年12月13日）

半年以来一班人有一种议论，即是说左也不好，右也不好，另外提出一种中间意见，排斥右派也排斥左派，自己标明是站在中间地位。这种事情在广东不多见，而在江浙颇普遍。因为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站在广州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香港，站在香港旗帜之下他必定反对广州。陈炯明率领反革命派军人政客买办阶级土豪劣绅一齐站在香港旗帜之下，国民党左派率领工农兵学商各种革命民众一齐站在广州旗帜之下，所以两边是用大炮互轰。在这互轰中不能有中间派，他有也只能藏头掩面躲在一派旗帜之下用低声发言用轻步走路。假如有人要站在广州香港之间，则其宣言必定是“香港不好广州也不好”，那香港的大炮一定对准他轰，广州的大炮也一定对准他轰。江浙一带现在还没有大炮互轰之事，“两边不好”的议论于是乎大盛。本来今年五月三十日甲方的大炮已经在南京一带砰砰地响了，幸喜乙方没有大炮，只有些拳头做不成“互轰”，未酿成对抗的乱局（罢工一下子也算不了事），使“两边不好”的议论还可以公开地宣传，“留正气于两间，存自由于天地”。但我们若假设一个局面，假设那南京路上的群众，不但有拳头，而且有大将，又是汪精卫蒋介石带领着，把那巡捕房砰的一声打个粉碎，随即占领工部局，所有“红头阿三”之类一齐变了俘虏；马上

封锁吴淞口，在南北塘狮子林驾上大炮（像虎门一样），炮台上起扯“炮打帝国主义”旗帜。这时候上海一定不幸要闹成广州一样的“乱局”，也会设置了卫戍司令部，请着王懋功先生之流做了司令，每日坐了武装汽车在马路上飞巡。《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将怎么办呢？那自然还有北京。但是北京也难靠久，总以段执政坐得稳为条件。段执政坐得稳那是没有问题的，不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可以高挂起招牌，就是第四次全体中央委员会也可以在那里开会，比较张家口还要自由——话虽如此说，我至今还有点糊涂，何以张家口不准第四次中央委员会开会，那里不是段政府管辖的地方吗？如果段执政不在——且慢，即使段执政在也难免有照料不周之处，不是听说有两个人被人捉上汽车载入城内打了又给写悔过书吗？咳！段执政辇毂之下也出来这种乱子，世事真是难说！更可痛着：据北京执行部电称：十一月二十八日发生革命运动，市民围攻执政府，要驱逐段祺瑞。又称：国民大会议决三条，第一条组织国民政府（很不幸！自然是照广州的样）。又据路透电称：“二十八日北京示威，学生执广州旗帜，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游行者分散传单，上书推翻段祺瑞，诛朱深，枪毙国贼，解散关税会议，国人武装，群众革命，真正国会等字样。”《时事新报》在这段电报之前标题道：“可骇的示威”。怎么办？这里又有了“可骇的示威”，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屋顶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酿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站在中间的先生们！请问怎么办呢？向左？还是向右呢？

赤化原是如此

（1925年12月13日）

十一月二十三日申报北京电："使团是粤详报，识蒋介石主义虽标赤化，但对于人民颇爱护，反之反共产军陈林洪等部到地方时，反多共产行为。"原来赤化就是爱护人民。赤化我化，安得染遍着全中国！

杀尽知识阶级的是谁

（1925年12月13日）

陈炯明的反共产宣传文章里，有一篇是“敬告青年学生”，末尾几句说“共产党的政策，还要灭绝知识阶级，我青年学生，总算知识阶级，共产党成功时，就要把知识的青年学生，一个一个杀尽”。要知陈炯明的话对不对，起先把中国知识阶级的地位，作一个分析。我们觉得有知识的人们不能承认他们是一个阶级，只能承认他们是一些有知识的分子，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共通的利害，能够促成他们联合做一个阶级。他们有的做了张作霖、吴佩孚、陈炯明等的秘书或参谋；有的做了张□、穆藕初、陈□伯等的辩士或书记，说农民不应减租和工人不该罢工；但同时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投入农工阶级的战线里了。依此，我们很可明白每个有知识的人，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跟着近世产业进步必然的结果，早已失去了他们所谓自由职业的尊严和保证，由中间阶级暂沦为无产者，势非死心塌地参加农工运动不可。若他们竟忘却了自身在现存社会上的地位，而情愿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才算是有知识的青年被人杀尽。被谁杀尽呢？直接被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冤杀，间接被帝国主义毒杀。

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

（1925年12月13日）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不独中国人景仰，全世界被压迫民众无不景仰，厌恶他的只有各国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即帝国主义与军阀。苏俄当革命之际，各帝国主义国家勾结台尼金、蓝格尔、柯尔恰克等白党反革命派四面侵袭，其危急情形殆仿佛两个月前之广东。此时孙先生曾有一勉励的电报致列宁。据俄代表鲍罗庭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美洲同盟会欢宴席上所述，谓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首领列宁，接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故当孙先生遭陈炯明叛变避走上海之际，其时势力颇为薄弱，但苏俄派遣代表越飞到沪，致意孙先生，期以合作，共同推倒帝国主义，是为中俄两国大同盟之起点云云。确实现在全世界被压迫民众的大敌只有一个，就是帝国主义。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全世界革命势力联合一致，方能和他决战而不失败，中国所需于苏俄者在此，苏俄所需于中国者亦在此。京沪等处一班高等知识分子哗然以联俄为异，乃不识现今世界上革命、反革命双方争斗的形势，不识国民党革命策略的意义之故，莫斯科孙文大学之设，乃苏俄民众景仰孙先生革命精神，设此大学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据莫斯科来信，孙先生

之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两巨著已由彼邦学者翻为俄文，孙文大学现在积极筹备中，照目前预测，将来必有非常可喜之成绩。该校董事会主席为著名之越飞博士，曾任俄国驻华代表，董事会会员则为该校校长拉突、普拉夫打报主笔卜哈连、克鲁斯加耶夫人、职工联合会执行部主席汤斯基及其他名流。中俄两国各社团及个人捐助者甚多，经济方面，甚为充足。校长拉突曾对人言，该大学宗旨在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课程主要科为近代经济思潮、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而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更列成专科，各科教授大概取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独立之研究，及创造的著作。各种成绩，并于著名报章杂志发表。至孙文大学学生人数，闻第一次定额五百名，在广东方面招百五十名。现在业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考取一百四十七名，从一千零三十人中选出，其方法分笔试、口试两种，必两种成绩均优者方能及格。考取各生姓名列下：

梁福文　梁干乔　钟树棠　黄永伟　朱国贞
区就宪　邹仕恬　林耀寰　刘□珠　白瑜
郭明生　朱瑞　谢振华　龙其光　陈复
陈璧光　林爱民　邓公武　缪任衡　钟基本
汤学海　梁少强　刘马欧　黄甘棠　郑重民
林侠　林协文　叶恩溥　周学鎏　廖化机
邵页昌　吴仲良　黄发　李淋　方陶
聂甘雨　冯德恭　曾任良　陈正业　徐康
沈苑明　冯声南　陈造新　扬华波　张民权
翟荣基　林叔山　林道文　李文达　甄兆权
董良史　郑奇　董正兴　李文瑄　黄大钧

董煜　韩亮兼　郑介民　杨家腾　梁振阳
唐君粹　郅文仪　马维禹　刘慕强　徐莹
李惠芳　阮篪　张任权　黄仲理　岑延藻
张恕安　曾上　黄毅民　萧豪　叶君好
刘达元　李彦良　黄永洪　黄菊　黄文杰
张星　刘福鑫　方檀　罗英　王志鸿
吴鲁　张引岚　陆那杰　邓汉钟　郑仁波
鏖开　钟琨瑜　冯洁芬　韦碧辉　刘缦舒
黄鼎新　周爱　赵愚　陈道守　吕魁文
黄夷白　萧爱贤　康泽　骆德荣　吴肃
王光樾　万徐如　张元良　李冠英　郑国琛
彭文畅　王觉源　陈声孚　张远猷　邓敦厚
徐君虎　余鹳　余楚帆　李焜　彭涛高
杨振西　杨振藻　胡铭勋　周诚南　高云裳
蔡日秋　段世援　陈海洲　潘新卫　段平
王佐才　吴国谦　吴君实　陈志陆　黄昌光
温忠　赖芳赓　陈显尚　张思南　刘武琨

以上共百四十名，尚有七人姓名待查。至学生性别、籍贯、年龄等项，政治委员会已制有统计表，录之如下：

（一）姓别：男一百三十九人，女八人。

（二）省别：广东七十一人，湖南二十八人，江西十人，云南七人，四川七人，江西五人，湖北五人，浙江三人，贵州三人，福建二人，江苏一人，山东一人，山西一人，未详三人。

（三）年龄：二十岁以内者三十六人，二十五岁以内者八十六人，三十岁以内者二十人，未详五人。

（四）婚嫁：已婚嫁者四十五人，未婚嫁者九十六人，未详六人。

（五）职业：学界五十五人，教育界七人，报界二人，农界一人，其他七人，未详十人。

各生现正准备放洋，分为数批出发，第一批日内即可登船，直放海参威。每人须带路费二百五十元，由国民党津贴一百元，自备一百五十元。连日各方面开会欢送者有新学生社、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其他团体，国民政府亦邀集学生聚会一次。在此聚会中，汪精卫曾致勖勉之词，并与学生约定下列三事：（一）关于广州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两周报告留俄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时将其近况报告回来。（二）孙文大学之中国学生，须团结起来，始终誓为孙文主义奋斗。（三）关于赴俄各种预备，请各生举出干事数人，专向政府接洽，俾将所得消息，随时向各人报告。在此叙会中，俄代表鲍罗庭有一长篇演说，说明孙文大学之目的。谓科学在帝国主义手里，用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若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则可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美国及英德诸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学，乃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孙文大学的目的，则在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兹录其演说全文于下：

鄙人今天参加此盛会，殊为欣幸。诸君不久将往俄国，入孙文大学肄业，我和诸君，将来或者可以在莫斯科见面，或者诸君回国后，才得与诸君见面，均未可知。俄国革命以来，中国人往俄国去的，不只这一次。俄国革命的发生，在八年以前，当时许多中国人前往俄国，并有许多中国人都是为赞成俄国的革命，加入革命军，他们为革命军牺牲的也不少。诸君到俄国后，见中国人为俄国革命牺牲者的坟墓，便知道有许多中国同志曾为俄国革命尽力。他们的

力量在红军里是很有影响的。关于此事，报纸也曾记载，并说过苏俄政府有许多地方，是靠中国人才能成立的。当俄国革命成功，莫斯科东方大学成立的时候，是在东方民族想自求解放而为革命运动的时候。时欧洲战争未竟，他们表面上，说是为民族自决，但其结果，非常使人失望。许多民族见帝国主义的列强所说的都是骗人的话，不特失望，且渐觉悟。尤其东方各民族，都知道巴黎和会是不可靠的，遂□倾向威尔逊主义的路途，走至俄国多数派主义的营中。这般人厌弃巴黎，舍之而往莫斯科，但那时候，巴黎与莫斯科的情形，究意如何呢？我们可以比较比较。巴黎在那时候有煤，有面包，有牛肉；莫斯科在那时候，无煤，无面包，无牛肉。一方面于物质上有优良的享用；一方面天寒无所抵御，饥饿迫人，亦不遇得些乌黑的面包，饮些清淡的汤水。时适东方大学成立，埃及、中国、波斯、高丽各民族的国民前往求学的不知几多。他们尽可以到居住舒适、饮食丰足的欧美各国去读书，为什么一定要到饥饿交迫的莫斯科去求学呢？这也没有别的缘故，他们都是想去莫斯科研究革命的学说，求得革命的经验。有了这种学说与经验，他们便可回去救国救民。所以他们为要安慰他们精神的饥饿，就能够敌得过一切肉体的饥饿了。自此以后，俄国的状况，渐渐地变更了，反革命派也渐渐扫清了。阻碍既除，发展便易。生活问题亦因之而解决，煤也有了，面包也有了，牛肉饼干比巴黎还要充裕，起居饮食都很舒服了。但是这种物资的进步，并不使我们抱着丰衣美食的思想，而忘了革命党人的精神。在一个大团体中，自然难保没有一部分不肖的党人。惟此是例外，那般大多数党人，依然保存革命的精神，努力革命工作。现在于东方大学之外，又有孙文大学之设立，孙文大学的目的何在？他的组织究竟如何呢？我们今天不能以短少的时

间，向诸君作详细的报告，诸君抵莫斯科以后，自然可以明白。今日不过随便述其大概。欧美各国见人家去那里留学，多表示欢迎，并且说科学是无国界的，是无党派的，科学是大家所公共的。按之事实，究竟对不对呢？这不过帝国主义者的面皮话罢了。我们相信科学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以为善，亦可以用以为恶。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就用以压迫弱小民族了。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就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我们相信无论何种学校是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的宣传机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银行家摩根所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为反对银行资本利益的宣传。芝加哥大学，是美孚火油公司资助的，他们一定不容我们在那里反对托拉斯制度的提倡。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是与资本家有关系的。至于德国的学校，何曾不如是。英国的学校，也何曾不如是。帝国主义者以学校为他们帝国主义宣传的机关，我们便要有学校为我们国民革命宣传的机关，每个学校，都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工具。孙文大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去继续中山先生的工作，以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将来在此校卒业之学生，可以代替在帝国主义的学校受过教育的留学生，担任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在许多留学生均不知道改造中国的方法，他日诸君由俄国回来，可用革命的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中国的问题，只有革命的方法可以解决的。所以全靠诸君本着革命党人的精神，为革命学说与经验的研究。将来回国之后，便可用之以达我们解放中国的目的。这种大工作，一定遇着许多困难，但我们值得牺牲，以征服这种困难，因为我们所抱的目的，是最伟大的，是求中国民族的解决。诸君将来都是为中国国民革命努力的。中国的命运，是在诸君的手里。诸君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我祝诸君的成功！

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

（1925年12月20日）

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从十一月二十日起，即从登载北京右派会议的通电之日起，已经宣告做了反动派的机关，宣告脱离了革命的国民党，宣告与帝国主义军阀从此妥协，宣告做了帝国主义军阀宣传机关之一种。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是毫不足奇的，因为这个报从前是叶楚伧等的私人报，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才收归党办，但是自始即不能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该报常常不登或删节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文字之该报所认为“过火”者，替帝国主义军阀隐恶扬善无微不至；对国民党国民政府的革命策略丝毫不能宣传；去年江浙战争该报完全丢掉国民党地位做了安福系卢永祥的机关；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资本家大登其压迫工人有理的广告。工人的新闻则拒绝登载或删节而后登载；本年五卅运动中该报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远不及研究系的机关报；近数月来广东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军阀运动肃清反革命派等重要消息该报多不肯登载，而对于孙传芳的军事消息则占满了篇幅。凡此皆该报反动的预兆，个个革命派党员都早已十分不满意该报，该报此时不过借北京右派会议为“正式反动”的宣告而已。该报自从十一月二十日表明了“正式反动”以后，连日做了许多攻击

左派的宣传，这自然是该报的本分。因为该报如果不做攻击左派的宣传，便不能取得右派机关报的资格，便不能向上海工部局和北京段祺瑞邀功使他们承认该报的反革命地位，便不能达到该报反动的目的。上海《民国日报》的反动我们觉得十分有理由。这个证明了国民党左派之强固，证明了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军阀运动之发展，证明了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证明了中国国民革命之成功已是快要到来。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化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色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明白了这点，我们便可以明白上海《民国日报》何以要反动，《晨报》《醒狮周报》等何以近来攻击国民党、共产党比从前特别激烈，以及国民党右派领袖们何以必须于此时在北京开会以反对广州左派领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关于上海《民国日报》之处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业经议决派员查办并通电各地各级党部申明该报之反动荒谬行为。兹将电文录下：

分送北京翠花胡同八号，并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哈尔滨各党部。上海望志路永吉里江苏省党部，杭州浙江省党部，长沙湖南省党部，南昌江西省党部，武昌湖北省党部，重庆四川省党部，厦门福建省党部，南宁广西省党部，广州广东省党部，并转各级党部，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各报馆，海外各地党部，各同志均鉴：上海《民国日报》，近为反动分子所盘踞，议论荒谬，大悖党义，已派员查办。谨闻。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寒

北京右派会议与帝国主义

（1925年12月20日）

帝国主义痛恶左派国民党的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做了全国反帝国运动的总指挥，使一切帝国主义栗栗危惧，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能集中权力指挥省港罢工和扫除其种种有用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梁鸿楷，郑润琦，莫雄，魏邦平，陈炯明，林虎，洪兆麟，邓本殷，熊克武，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取消政治委员会；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能领导国民革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帝国主义痛恶苏俄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雇用俄顾问增加了攻击帝国主义的力量，北京右派会议议决辞退俄顾问鲍罗庭；帝国主义痛恶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增加一支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北京右派会议议决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的党籍。观此，我们可以知道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些什么工作。

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

（1925年12月20日）

北京右派会议替帝国主义做了适合其需要的种种工作，既如上述。然而这是帝国主义对付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最后之一方法。帝国主义的工具杨希闵、刘震寰企图推翻广州政府实现今日北京右派会议之目的，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梁鸿楷、郑润琦、魏邦平、莫雄、朱卓文等企图于刺杀廖仲恺后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熊克武图从北江袭取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段祺瑞派遣兵舰图从虎门袭击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的工具陈炯明、邓本殷欲从东南两方打到广州实现今日右派会议之目的，又无效。帝国主义这些工具所做的工作都没有效。国民党右派愤激起来了，于是有北京会议之召集，由“枪炮袭击”的方法，改用了“议决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效力怎么样呢？实在难说。自然，右派会议的种种议决，只算是儿戏的议决。但是这种“窠里反”的方法，确实比在“窠外反”要进步。帝国主义于一切工具用尽之后，找到了这个最后的工具，使他于失败之余忽然得到了一点小慰。即使右派中有几位口里还在说打倒帝国主义，即使右派中还有一部分并无诚心为帝国主义利用，即使他们怎样不承认自己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然而在事实上是大大帮了帝国主义的忙，事

实上是做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因为他们的工作适合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右派的最大本领

（1925年12月20日）

右派机关上海《民国日报》十二月三日社论说：“只有怕革命党的军阀，哪有怕军阀的革命党。”他拿这个理由去反对下面汪精卫等感电的话：“中央全体会议属于公开性质，若在北京开会，外则有军阀的压迫，内则有反动分子利用军阀而从中作梗。”因此《民国日报》以为中央全体会议在北京开会，可以表示勇敢，可以表示不怕军阀。《民国日报》的错误在哪里？他的错误就在于不懂得革命党的活动有公开与秘密之别。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他的党的组织与会议在敌人势力之下完全是秘密的，他的主张和宣言则是公开的。在敌人势力之下要将党的组织党的会议公开起来，那必须先得敌人的谅解，就是至少有某几点是于敌人有利才能得到他的默许或者还能得到他的保护。但这还成了什么党呢？这只能是敌人的朋友，不是要革敌人的命的革命党。段祺瑞容许了右派在北京公开地开会，他能容许汪精卫、谭延闿等到北京公开地开会吗？该报又谓孙总理去年曾到北京不怕段祺瑞。不知孙总理去年能到北京有两个原因：一是段祺瑞刚上台其政权尚未稳固，压迫国民党的政权尚未确定；一是当时北京的警察权尚握在同情于国民党的冯玉祥手里。没有这两个原因，孙先生是不能公开地到北京的。假如孙先生至今还在，段祺瑞一定不能容许他在北京公开地做革命运动，他一定须秘密起来，

或跑到别处去。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反动军阀盘踞的地方，都有国民党的组织，各级党部到处都有机关，党员及干部同志随时都有会议，都有各种企图消灭敌人势力的勇敢奋进的工作，但这都是秘密的。在这些组织和工作中，只有左派在那里不断地奋斗，右派党员都畏惧不敢近前。右派的长处就是一张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几个口号，他们也能不看党的决议案背得出；至于实际的做法，实际的行动，他们一听见就吓落了胆。右派只有一张嘴，他们并没有手与脚。他们只有胆子在段祺瑞面前开会，没有胆子到广州开会，因为广州的革命空气把他们吓傻了。他们议决了他们所谓的第二次全国大会明年三月在上海或北京开会。依我的观察，他们大会如真能召集得成（不管人数多少），未必敢在北京开，因为段执政的龙庭已是坐不大稳了。他们大概会在上海开会。在帝国主义的老巢里，向各国领事工部局洋大人巡捕房红头阿三面前公开着国民党的全国会议，这很可以表示“勇敢”。能在军阀帝国主义面前公开地开会，这是右派最大的本领，左派分子望尘莫及！

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1]

（1925年12月26日）

上海《民国日报》自去年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收归党办两年以来，自始既不能完全代表本党，编辑委员长叶楚伧始终不能认识本党政策，以致常有荒谬言论。该报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外来电常常加以压抑，或删削不肯尽量登载，以致有同一之文电或新闻，《民国日报》不肯登载，别家报纸反肯登载之事。去年江浙战争该报完全抛弃本党地位，极力拥护安福系卢永祥，有“义存卢存，义亡卢亡”之语。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压迫数千工人流离失业，时该报为之大登压迫工人有理之广告，工人之新闻则拒绝登载，或删节而后登载。五卅运动中该报反帝国主义之宣传尚不及研究系之机关报。近数月来本党在广东方面与帝国主义反动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革命的争斗，凡属重要消息，该报均不肯发表，以致各地党部及社会均不明白广东真相，而对于孙传芳之战事消息则占满了篇幅。自十一月十二日起该报竟公然拥护北京右派会议，攻击广州中央及国民政府，完全站到反动地位，其言论记载荒谬已极，以较上海申、商等报对于本党的态度该报还差得多。处置之法，该报现以租界为护符，本党势力之所不及，无从加以纠正或惩罚，惟有在

---

[1] 这是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的身份，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上海另办新报，以为本党言论机关之一法。至新报如何办理，当另案计划。奉函审查该报并拟具办法见复等因，兹将审查并办法结果报告如右。此复中央执行委员会。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1925年冬）

有些人说：国民党现在又分离出去一个右派，这是党里左派分子的操切，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国民革命的不幸。这个意见是不对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十八世纪末期至十九世纪中期欧、美、日本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阶级的民主革命，与十九世纪末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合作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官僚、军阀、买办、地主阶级的国民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不但如此，辛亥年的革命，与现在的革命，性质也不相同。前代英、法、德、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乃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乃当时资产阶级用以笼络欺骗小资产、半无产、无产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其结果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建设了国家主义的国家；其终极是发展了全世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了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现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乃小资产

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实际革命的乃小资产、半无产、无产这三个阶级成立的一个革命的联合。其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所号召的民权民生主义并不是某一阶级笼络欺骗某一阶级使为己用的一种策略，而是各革命阶级一种共同的政治经济要求，由他们的代表者（孙中山先生）列为他们政党的纲领；其结果是要达到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其终极是要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建设一个真正平等自由的世界联盟（即孙先生所主张的人类平等、世界大同）。再看辛亥年的革命与目前的革命不同之点。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1]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

---

[1] 黄兴（1874—1916），湖南善化（今属长沙县）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领袖。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任执行部庶务，曾直接领导多次反清的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1913年二次革命时任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去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黄兴未参加，转赴美国。章炳麟，即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1924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讲学。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中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理事、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现在的局面与辛亥年完全两样：革命的目标已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党的组织逐渐严密完备起来，因为加入了工农阶级的分子，同时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的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以此之故，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了少数革命意志强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者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因此，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本党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组织，一部分是海外华侨工人，一部分是内地的会党，另一部分则为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小地主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及自耕农子弟出身的内地学生，总之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这四个阶级的集合体。此时领袖中国大地主阶级的康有为派保皇党[1]，与领袖中国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孙中山派同盟会，成了对抗。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

---

[1]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9年在加拿大组织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自任会长。其宗旨是保救光绪，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

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孙先生因此大愤，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1]。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成形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2]

---

[1] 欧事研究会，是民国初年建立的政治团体。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另一部分党员同孙中山意见分歧，另组欧事研究会，参加者有李烈钧、熊克武、钮永建等百数十人。黄兴虽已赴美，仍列名其间，会员隐以他为首领。该会反对以急进的革命手段对待袁世凯，而主张缓进。后改名政学会。在袁世凯公开进行复辟帝制活动时，亦参加反袁联合战线。

[2] 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曾任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省长。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唐继尧（1883—1927），云南会泽人。曾任云南省督军、省长。熊克武（1885—1970），四川井研人。曾任四川讨贼军总司令。

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中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1]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真正跟我来革命的，如汪精卫先生一样的人不出二十个，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到了第一次全国大会的人，都听见孙先生的话。然而此举首先得罪了代表买办阶级的领袖们，冯自由、马素等首先与帝国主义、军阀勾结，脱离了国民党，另外组织同志俱乐部。国民党左派两年来在广东的工作，为了拥护工人的团结与罢工，得罪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为了拥护农民的团结与减租，得罪了地主阶级；为了保持革命根据地，用严厉手段对付反动派，得罪了帝国主义工具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魏邦平、陈炯明、熊克武一班人。于是又激动了一班新右派，他们已在北京开会，图谋脱离左派领袖的国民党，另外组织右派的国民党。惟闻在北京的会议[2]

---

[1] 茅祖权（1883—1952），江苏海门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2] 指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居正等10余人1925年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的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中，代表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一派与代表买办阶级的一派意见不合，前一派有会议未终即离京南下之说。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也是必然的。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织反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那些站其中间的中产阶级（小地主、小银行家及钱庄主、国货商、华资工厂主），其欲望本系欲达到大资产阶级的地位，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的压迫使他们不能发展，故需要革命。然因现在的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猛勇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他们对之不免发生恐惧，又怀疑各阶级合作的革命。中国的中产阶级（除开其左翼即中产阶级中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可与其余阶级合作革命，但人数不多），到现在还在梦想前代西洋的民主革命，还在梦想国家主义之实现，还在梦想由中产阶级一阶级领袖、不要外援、欺抑工农的“独立”的革命，还在梦想其自身能够于革命成功后发展成壮大的资产阶级，建设一个一阶级独裁的国家。他们革命的出发点，与其余阶级革命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发财，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救苦；他们的革命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其余阶级的革命是为了要得到自己的解放并且使将来永无压迫自己的人。这班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

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在人数上说，四万万人中，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至多每四百个人里头有一个（四百分之一），计一百万人。小地主、国货工商业家等中产阶级，大约每百个人里头有一个（百分之一），即四百万人。此外的数目都属其余的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等小资产阶级约占一万万五千万；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人数最多约占二万万；产业工人、都市苦力、雇农、游民等完全的无产阶级约占四千五百万。依此分析，则中国为了救苦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众有多少呢？有三万万九千五百万，占百分之九八点七五。其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占百分之零点二五。中间派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占百分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断定：代表中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之分裂，并不足以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并不足以阻挠中国的国民革命。他们的分裂，是基于他们的阶级性，是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使他们不得不分裂，并不是为了什么左派的操切。所谓左派（所谓左派，是指国民党的左派，并非指共产党，共产党党员在国民党内乃共产派，不是国民党左派）的操切，就是扫平杨、刘[1]，扫平郑、莫[2]，扫平东江、南路、北江给了陈炯明、邓本殷、熊克武以大打击，坚持省港罢工给

---

[1] 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

[2] 郑、莫，指郑润琦、莫雄。

了英国帝国主义以大打击这些革命的工作；然而这也是基于革命派的阶级性，基于现在特殊的时局，不得不奋斗，不得不革命，奋斗和革命乃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并不是什么操切不操切。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而在现在，他们留在国民党内，实在是汪精卫先生所说的“假革命派”，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为了他们的分出去，为了他们对于革命派（左派）的反动和攻击，革命派将因此成功一个更大的团结。所以我们现在到处可以听得见的口号，几乎都是这样的一句：“全国革命派团结起来！”

沁园春[1]·长沙

（1925年）

独立寒秋，
湘江北去，
橘子洲[2]头。
看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
百舸[3]争流。
鹰击[4]长空，
鱼翔[5]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6]寥廓[7]，

---

[1] 沁园春，词牌名，由东汉的沁水公主园得名。

[2] 橘子洲，又名水陆洲，在长沙西面的湘江中。

[3] 舸，大船。这里泛指船只。

[4] 击，搏击，这里形容飞得矫健有力。

[5] 翔，本指鸟盘旋飞翔，这里形容鱼游得轻快自由。

[6] 怅，原意是失意，这里用来表达由深思而引发激昂慷慨的心绪。

[7] 寥廓，指宇宙的广阔。

问苍茫[1]大地，
谁主沉浮[2]？

携来百侣[3]曾游，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4]。
恰同学少年[5]，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6]方遒[7]。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8]
粪土当年万户侯。[9]
曾记否，

---

[1] 苍茫，旷远迷茫。

[2] 沉浮，同“升沉”（上升和没落），比喻事物盛衰、消长。

[3] 百侣，很多的伴侣。侣，这里指同学。

[4] 峥嵘岁月稠，不平常的日子是很多的。峥嵘：山势高峻，比喻超越平常，不平凡，不寻常。稠：多。

[5] 同学少年，毛泽东于1913年至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毛泽东和萧瑜、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开始了他早期的政治活动。

[6] 挥斥，奔放。

[7] 遒，强劲有力。

[8]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评论国家大事，写出激浊扬清的文章。指点，评论。江山，指国家。激扬，激浊扬清，抨击恶浊的，褒扬清明的。

[9] 粪土当年万户侯，把当时的军阀官僚看得同粪土一样。粪土，作动词用，视……如粪土。万户侯，食邑万户的侯爵，借指大军阀，大官僚。万户，指侯爵封地内的户口，要向受封者缴纳租税，服劳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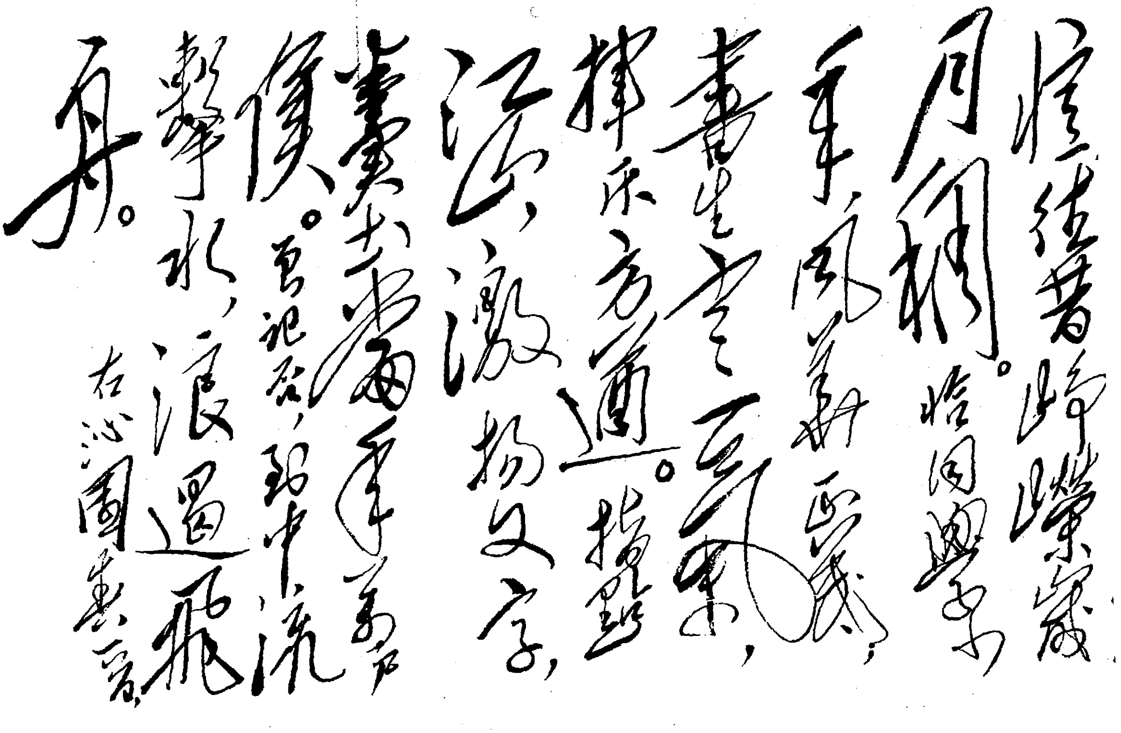
到中流[1]击水[2]，
浪遏[3]飞舟？

---

[1] 中流，江心水深流急的地方。

[2] 击水，这里指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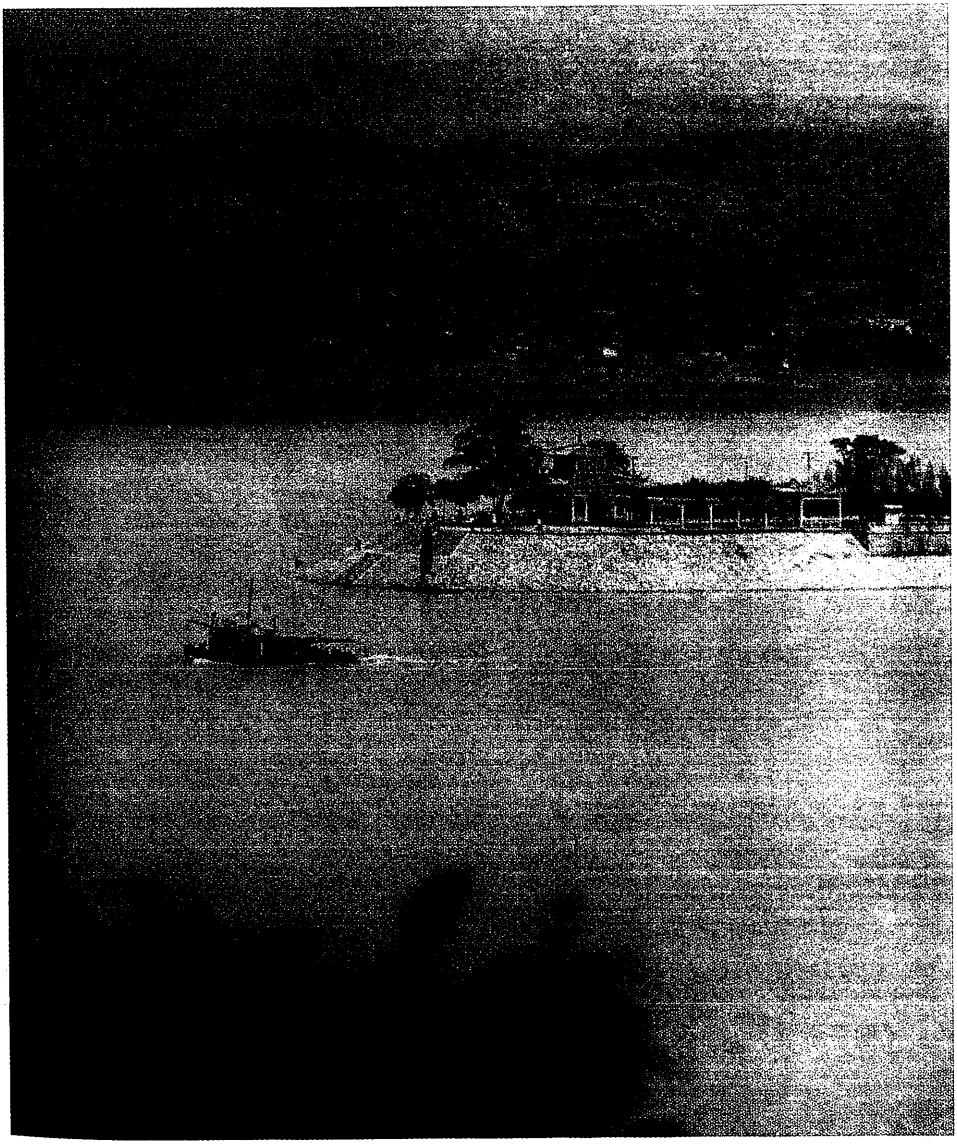
[3] 遏，阻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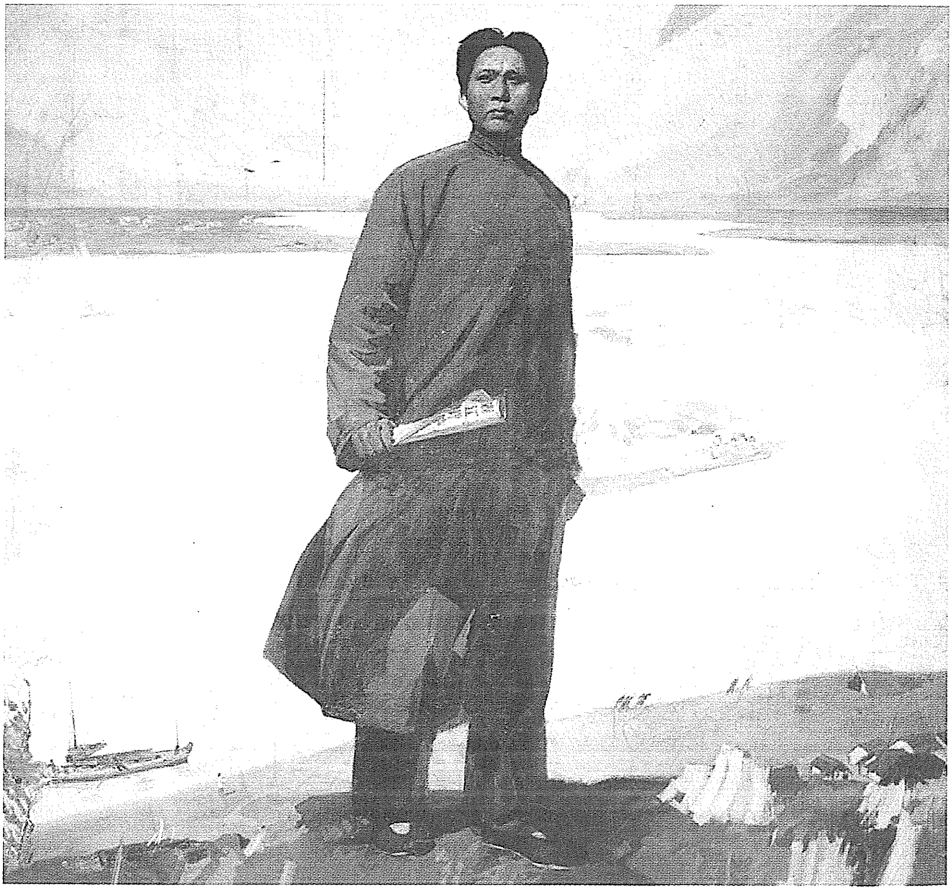
忆往昔峥嵘岁
月稠。恰同学少
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指点
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
侯。曾记否，到中流
击水，浪遏飞
舟。
右沁园春 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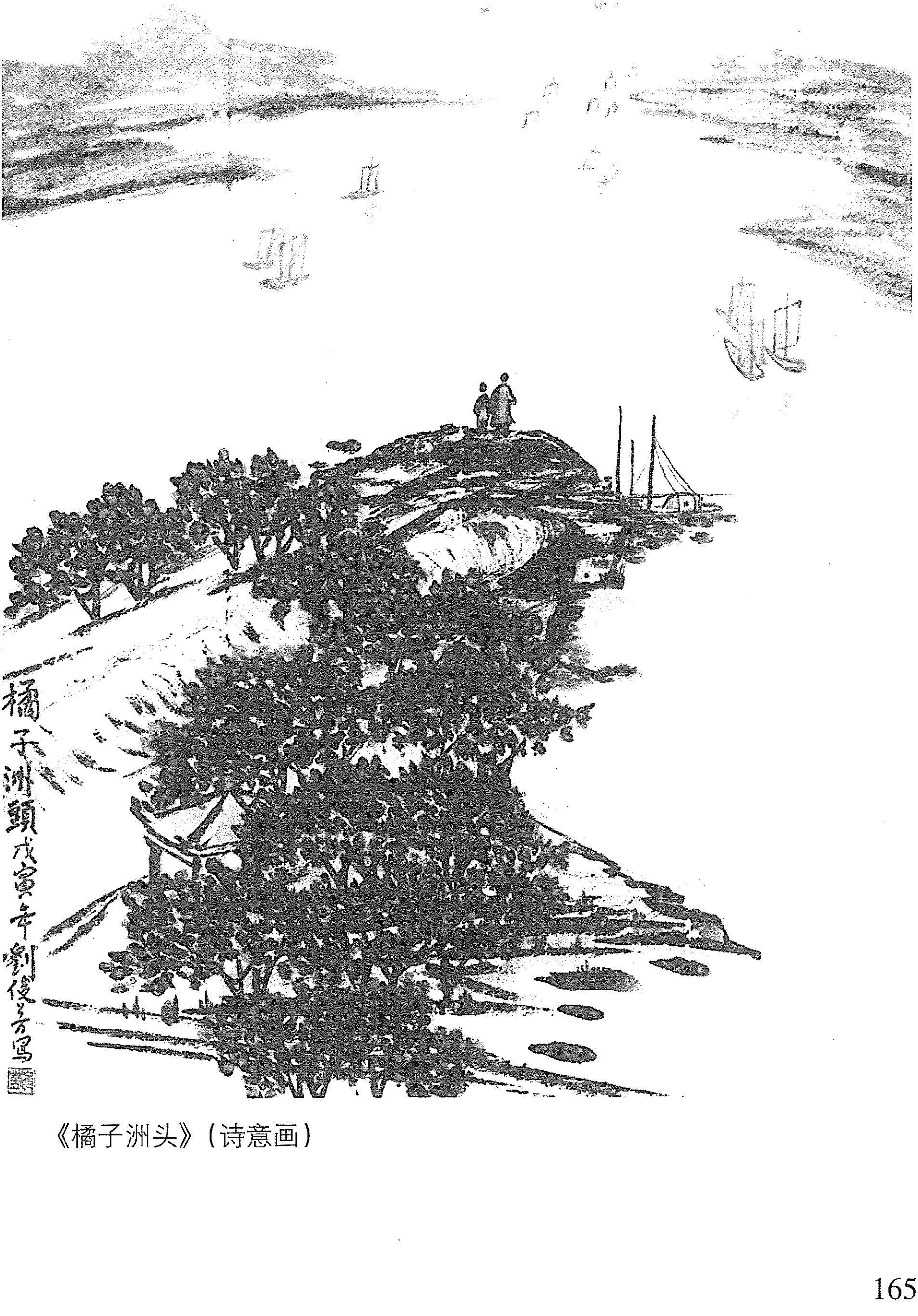
独立寒秋，湘江北
去，橘子洲头。看万
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
争流。鹰击长
空，鱼翔浅底，万
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
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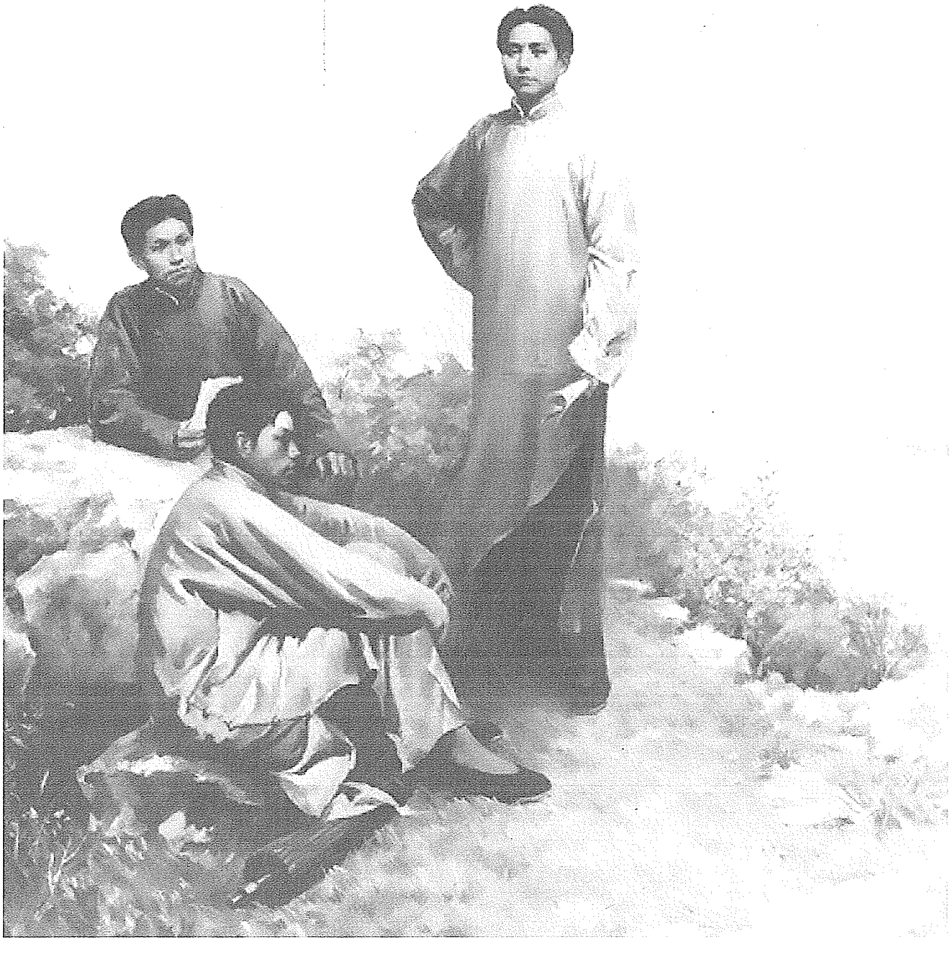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友人常到湘江橘子洲游泳，然后登上洲头，畅谈人生和未来。图为橘子洲望江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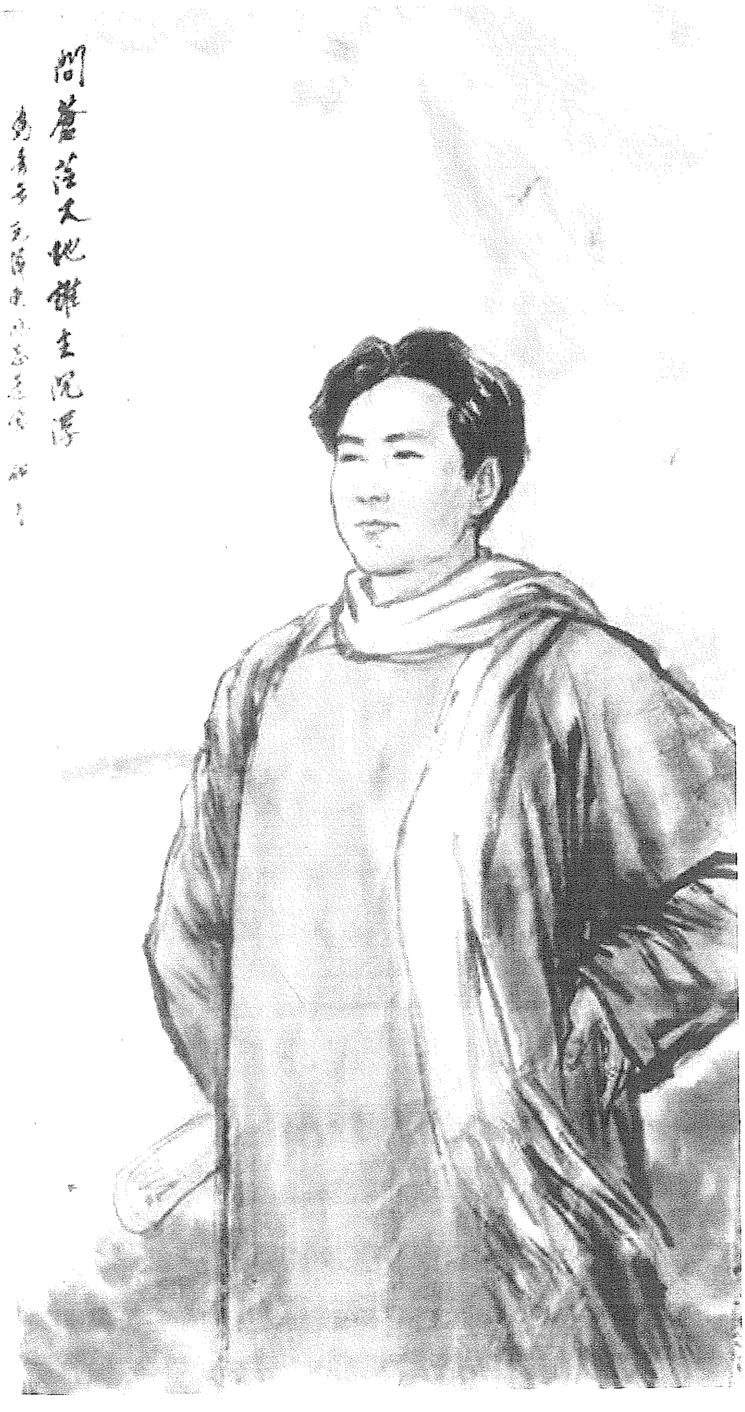
《橘子洲头》（油画）


橘子洲頭
戊寅年劉俊芳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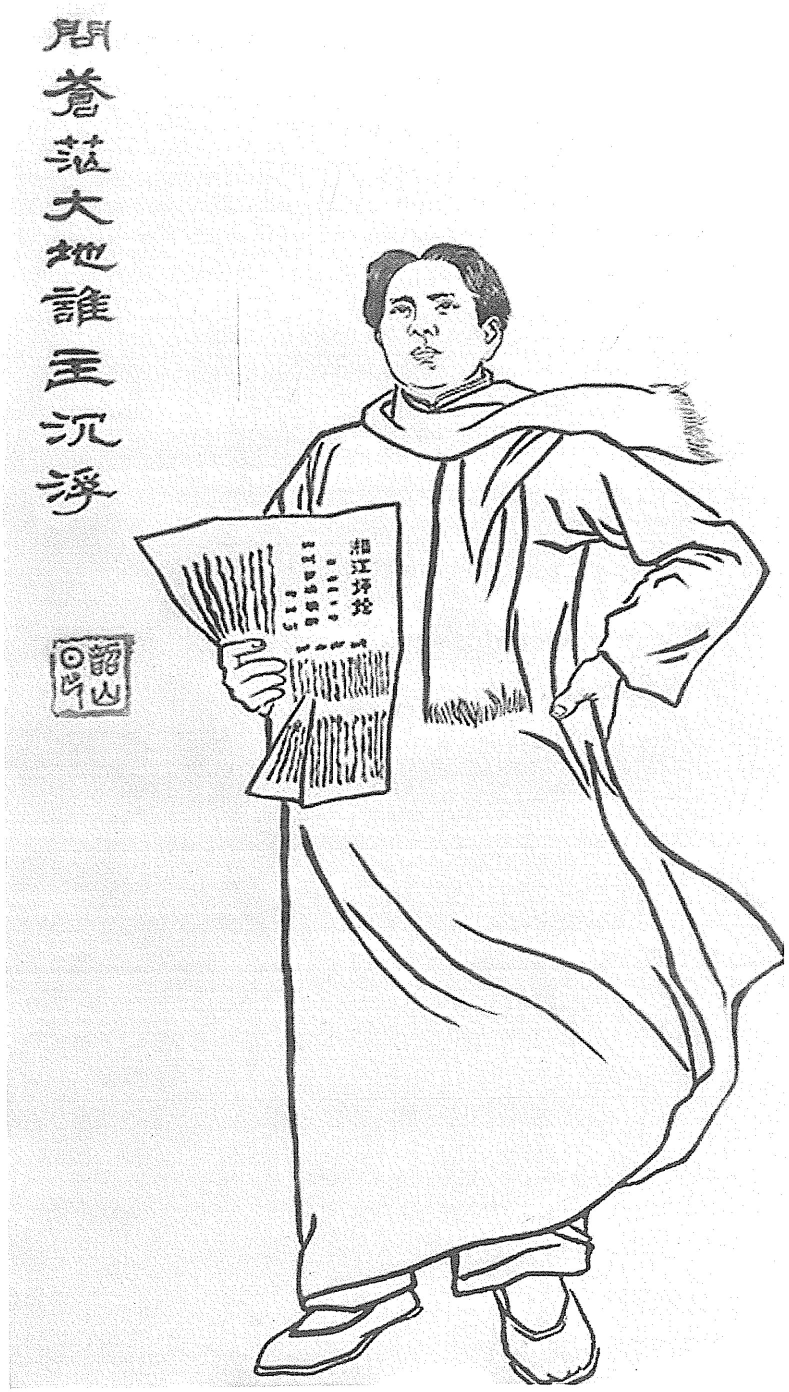
《橘子洲头》（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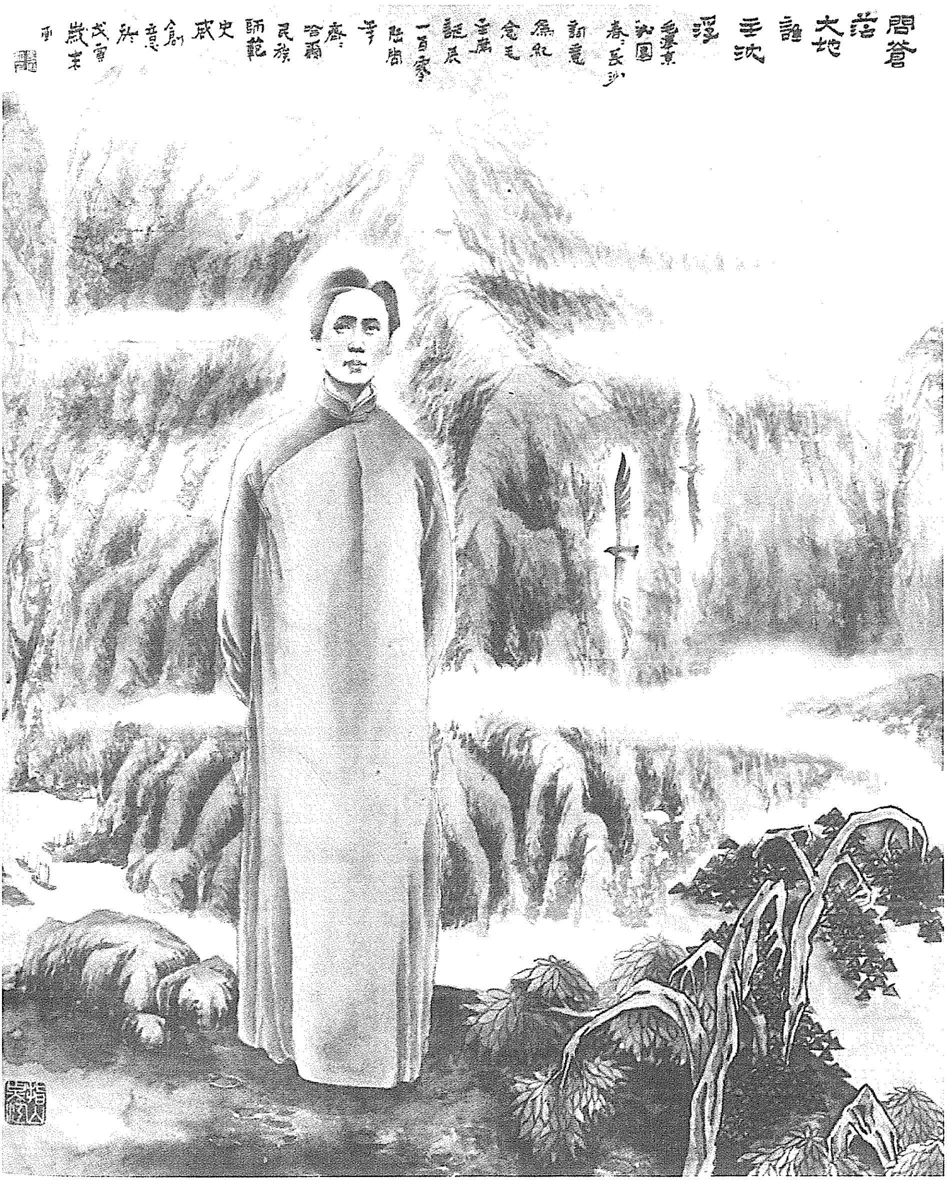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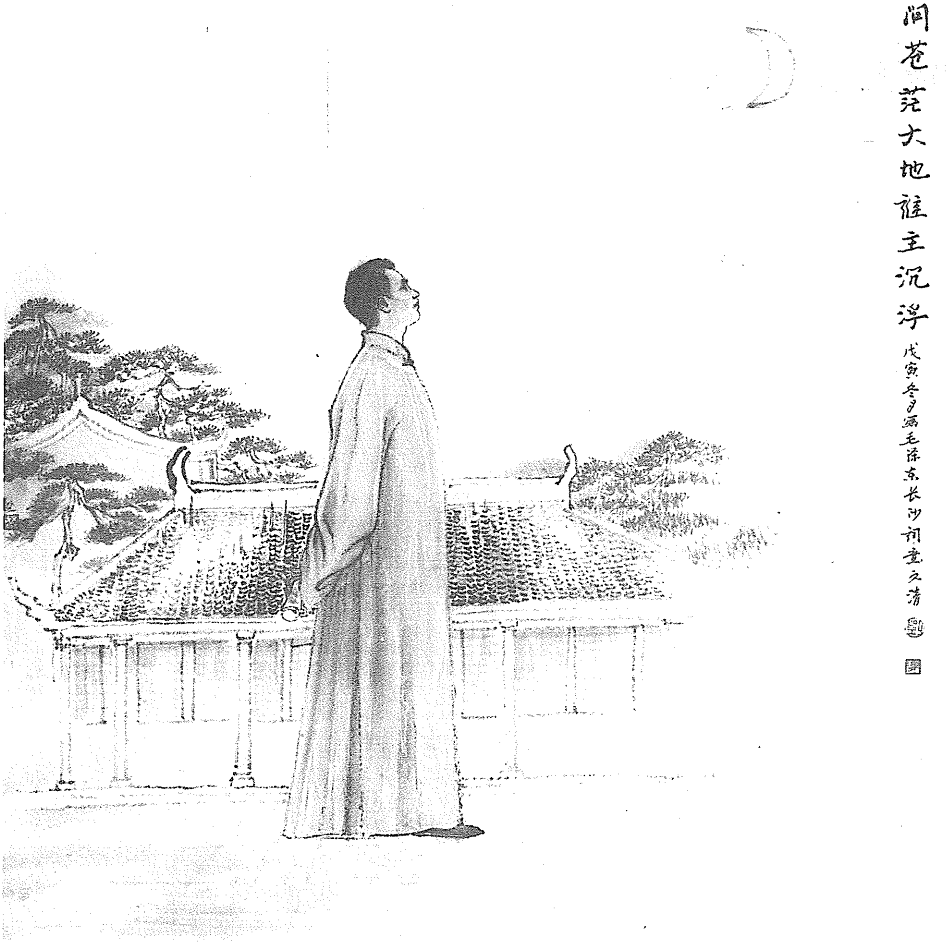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画）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湘江評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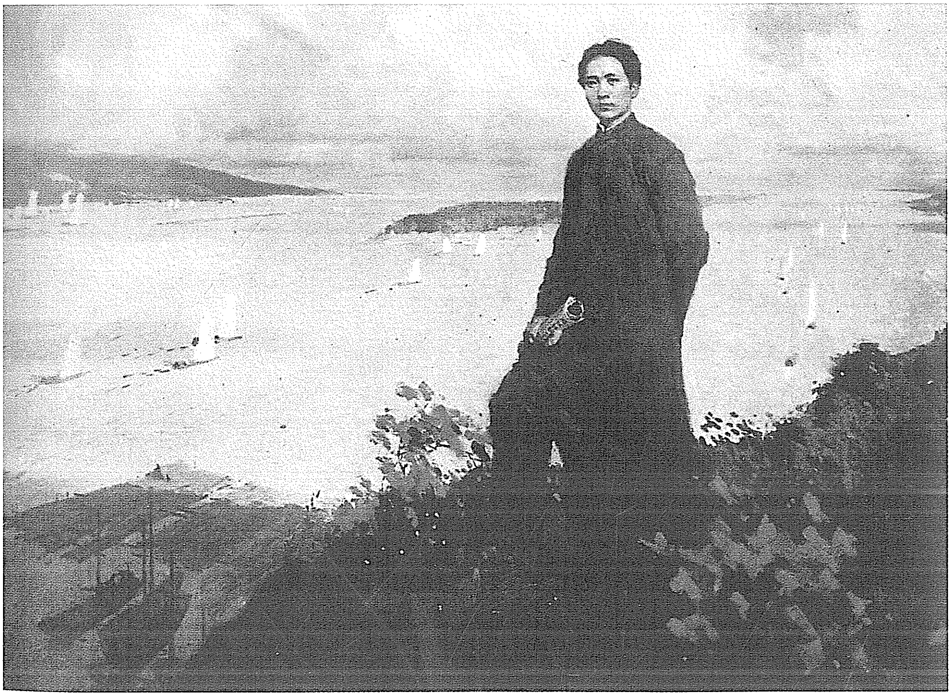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宣传画）


問蒼茫大地誰主沈浮
毛澤東沁園春長沙詞意
為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零五周年
民族師範
史成創意於戊寅歲末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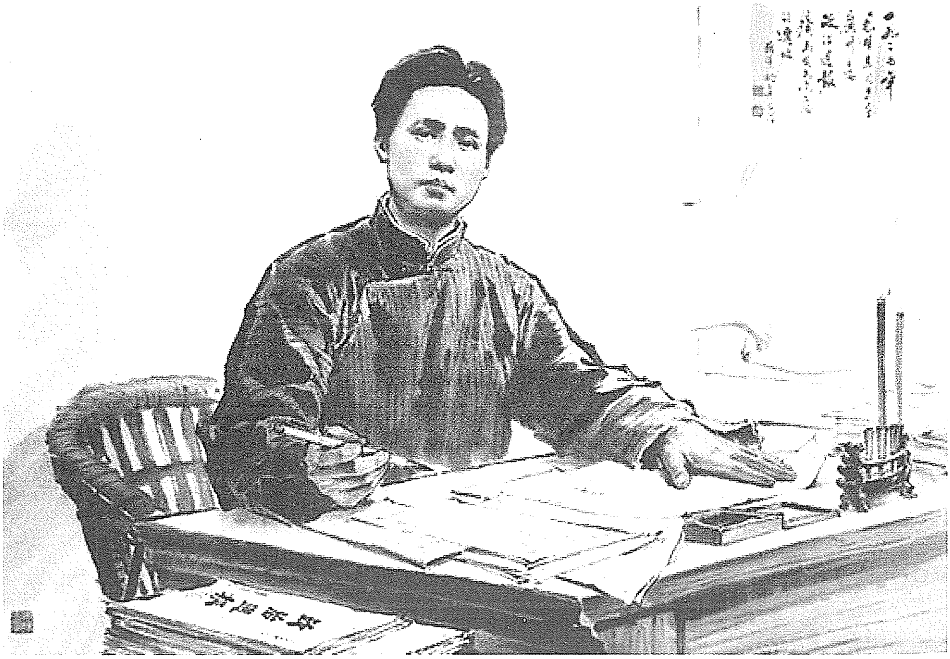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戊寅冬月画毛泽东长沙词意 之清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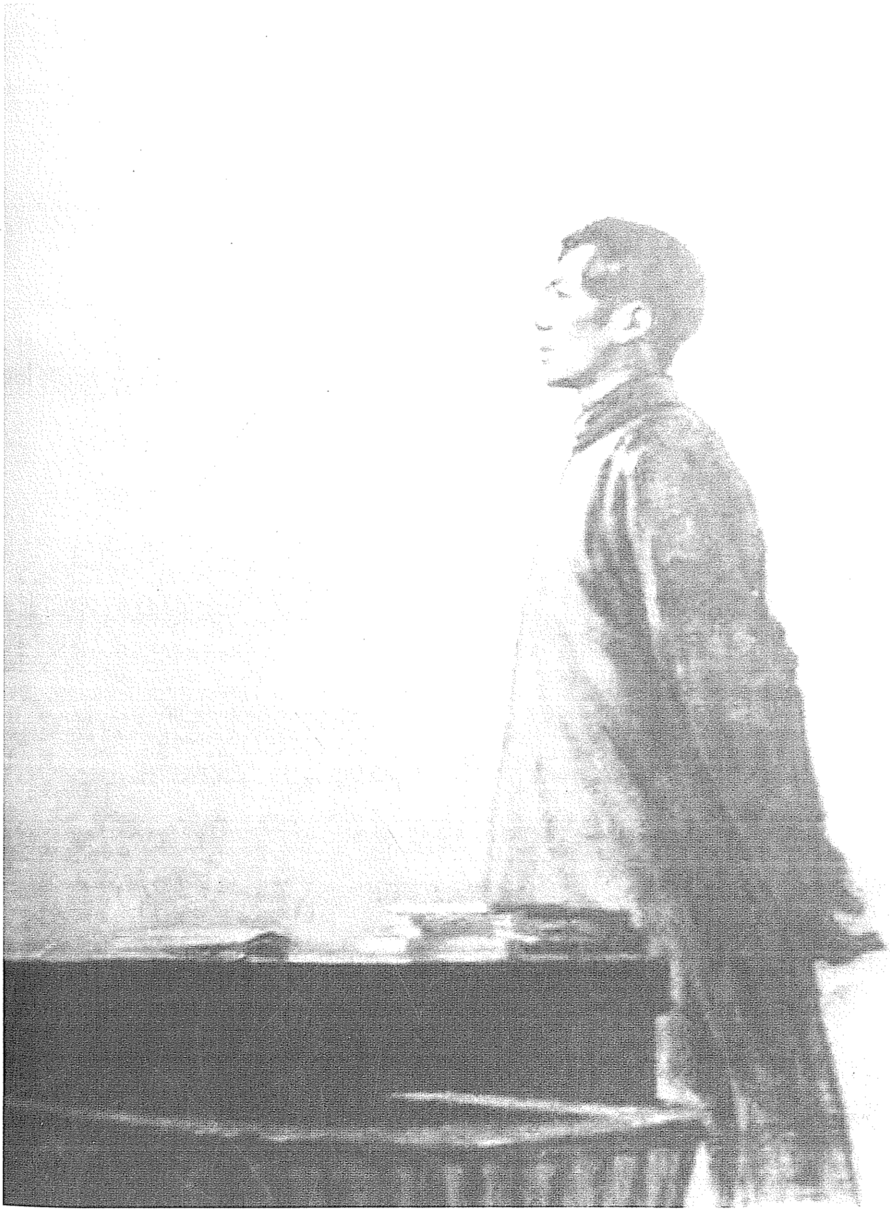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油画）

《鹰击长空》（诗意画）



《激扬文字》（中国画）

1926



《夜尽（毛主席在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油画）

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1926年1月1日）

你跑到农村中间去，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见有下列八种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农

半自耕农

半益农

贫农

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

游民

这八种人分成八个阶级，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于其心理即其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同。

中国大地主的来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贵族后裔及现在的官僚军阀，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买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极少，其利益建筑于对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五种农民的严重剥削之上。其剥削方法分为五种：第一种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此

种剥削极其普遍而惨酷。第二种高利贷，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对于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的剥削，这种剥削之惨，有的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债累息，数年即完全破产者。第三种重捐，乃用一种压力强迫自耕农、半自耕农按亩出捐，以充团防局经费。此团防局（或名民团）乃地主阶级的武装，为镇压农民暴动维持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必要的设备。第四种为对于雇农的剥削，即剥削其剩余劳动。但中国尚少资本主义的农业，大地主多不亲自经营土地，故此项剥削小地主较多，大地主较少。第五种为与军阀及贪官污吏合作在本年包缴预征田赋，而来年索取重息于完粮之农民。合这五种剥削加于农民的惨苦，真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国的大地主是中国农民的死敌，是乡村中真正统治者，是帝国主义军阀的真实基础，是封建宗法社会的唯一坚垒，是一切反革命势力发生的最后原因。大地主阶级人数，以收管业五百亩以上者计算，在农民中大概约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属在内），在全国三万万二千万农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计）约占三十二万人。

小地主数目比大地主多，全国至少在二百万以上。其来源大部分为力田起家即自耕农升上来者，亦有一部分为都市商人购买土地，又有一部分为官僚后裔之衰败者及现在之小官僚。其剥削方法为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此种人颇受军阀及大地主的压迫，故颇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现代的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国内高等知识分子如大学校专门学校教员学生以及东西洋留学生一大半都是小地主子弟，所谓国家主义乃自他们口中倡导出来。盖小地主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欲望为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一个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然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不能发

展，故需要革命。但因现代的中国革命运动，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建设国家主义国家的阶级的发展及存在，感觉着威胁，又怀疑革命。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说解释民生主义，反对国民党联俄及容纳共产派分子。这一班人乃中国中产阶级的右派，他们颇有跑向反革命地位的倾向。但中产阶级中有一个左派，在相当时候可以引向革命的路。如在农民协会运动气焰高涨时，小地主中间的左派分子可以引其帮农民协会的忙。但其性质极易妥协，其血统到底与小地主右派及大地主要亲，与农民协会要疏，断不能望其勇敢地跑上革命的路，跟着其余的阶级忠实地做革命事业，除开少数历史上和环境上都有特别情况的人。

自耕农属于小资产阶级，其中又分三种。第一种自耕农是有余钱剩米的。即每年劳动所得，除自给外，还有剩余，用以造成所谓资本的初步积累。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小地主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与中产阶级的小地主颇接近，故对于乡村小地主们中那些什么“老”什么“公”什么“胡子”的“谨防过激党”“谨防共产”的宣传颇相信，自然这些谨防的话又是从大地主中那些什么“大人”什么“老爷”的嘴里出来的。这班余钱剩米派，乃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对于现代的革命在他们没有明了真相以前取了怀疑的态度。但这部分人在自耕农中占

少数，大概不及全数百分之十。中国的自耕农人数，有人说超过佃农、雇农的总数。但把半自耕农除外，一定只占农民的少数，大概自一万万至一万二千万。自耕农中的富裕部分约占其中百分之十，计千二百万人。第二种自耕农是恰足自给的，每年收支恰足相抵，不多也不少。这种自耕农比较第一种自耕农大不相同，他们也想发财，但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随着近年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使他们感觉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感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从前相等的劳力，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即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才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他们骂洋人叫“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仅怀疑其未必能成功（理由是：洋人和司令的来头那么大），不肯贸然参加，取了中立的态度，但绝不反对革命。这一部人数甚多，大概占自耕农的一半，约六千万。第三种自耕农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自耕农好些是原先本是所谓殷实人家，渐渐变得只能保守，渐渐变得要亏本了。他们每逢年终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说：“咳！又亏了。”这种人因为他们从前过着好日子，后来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这种人在精神上感的痛苦比较一切人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从前与现在相反的比较。这种人在革命运动中颇要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其人数约占自耕农中百分之四十，即四千八百万——一个不小的群众，乃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以上说三种自耕农对于现代中国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一到战时，即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第三种左倾的自耕农马上参加革命，第二种中立的自耕农亦可参加革命，即第一种右倾的自耕农受了佃农及自耕农左翼的革

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所以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这三种农民的数目，在中国农民中大概自一万五千万至一万七千万。分开来说，半自耕农大概为五千万，半益农、贫农各占六千万，乃农村中一个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这三种农民虽同属半无产阶级，然经济状况大有分别。在半自耕农其生活苦于自耕农，因其食粮每年有一半不够，须租别人田地或者做工或营小商以资弥补。春夏之间，青黄不接，高利向别人借债，重价向别人粜粮，较之自耕农之不求于人，自然境遇要苦，然优于半益农。因半益农无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之一半；半自耕农则租于别人的部分虽只收获一半或且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获。故半自耕农之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半益农。

半益农与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同受地主的剥削，然经济地位颇有分别。半益农无土地，然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及相当数目之流动资本。此等农人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以得到一半。不足部分，种杂粮，捞鱼虾，饲鸡豕，勉强维持其生活。于艰难竭蹶之中，存聊以卒岁之想。故其生活苦于半自耕农，然较贫农为优。其革命性则优于半自耕农而不及贫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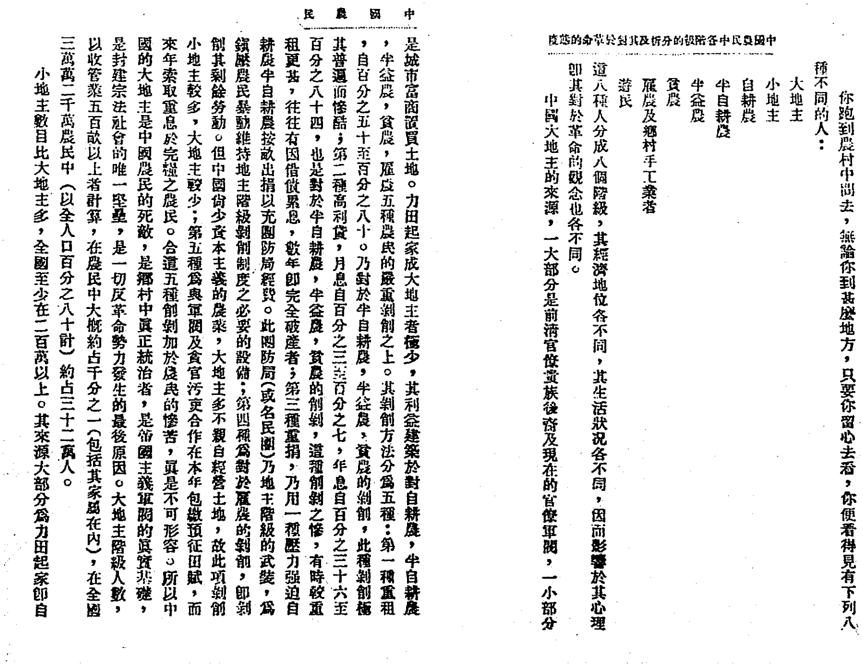
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亩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集，如牛负重。乃农民中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雇农乃农业的无产阶级，有长工、月工、零工三种。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流动资本，故只得营工度日。

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此种人乃乡村中甚感痛苦者，做农民运动极要注意。乡村手工业工人地位比雇农要高，因其自有工具，且系一种自由职业。但因家庭负担之重，工资与生活物价之不相称，时有贫困的压迫与失业的恐慌，亦与雇农差不甚远。

游民无产阶级为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之剥削压迫及水旱天灾因而失了土地的农人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分为兵、匪、盗、丐、娼妓。这五种人名目不同，社会看待他们也贵贱各别，然他们之为一个“人”，他们之有五官四肢则一。他们谋生的方法兵为“打”，匪为“扣”，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他们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的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做了他们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机关。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中国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贫乏，又一个是失业。故若解决了失业问题，就算解决了中国问题的一半。中国游民无产阶级人数说来吓人，大概在二千万以上。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我们组织农民，乃系组织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手工业工人五种农民于一个组织之下。对于地主阶级在原则上用斗争的方法，请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让步，在特别情形上，即使遇了如海丰、广宁等处最反动、最凶恶极端、鱼肉人民的土豪劣绅时，则须完全打倒他。对于游民无产阶级则劝他们帮助农民协会一边，加入革命的大运动，以求失业问题的解决，切不可逼其跑入敌人那一边，做了反革命派的力量。



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

毛　澤　東

你跑到農村中間去，無論你到甚麽地方，只要你留心去看，你便看得見有下列八種不同的人：

大地主
小地主
自耕農
半自耕農
半益農
貧農
雇農及鄉村手工業者
遊民

這八種人分成八個階級，其經濟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狀況各不同，因而影響於其心理即其對於革命的觀念也各不同。

中國大地主的來源，一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貴族後裔及現在的官僚軍閥，一小部分是城市富商置買土地。力田起家成大地主者極少，其利益建築於對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五種農民的嚴重剝削之上。其剝削方法分爲五種：第一種重租，自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乃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此種剝削極其普遍而慘酷；第二種高利貸，月息自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七，年息自百分之三十六至百分之八十四，也是對於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的剝削，這種剝削之慘，有時較重租更甚，往往有因借債累息，數年即完全破產者；第三種重捐，乃用一種壓力強迫自耕農半自耕農按畝出捐以充團防局經費。此團防局（或名民團）乃地主階級的武裝，爲鎮壓農民暴動維持地主階級剝削制度之必要的設備；第四種爲對於雇農的剝削，即剝削其剩餘勞動。但中國尚少資本主義的農業，大地主多不親自經營土地，故此項剝削小地主較多，大地主較少；第五種爲與軍閥及貪官污吏合作在本年包繳預征田賦，而來年索取重息於完糧之農民。合這五種剝削加於農民的慘苦，眞是不可形容。所以中國的大地主是中國農民的死敵，是鄉村中眞正統治者，是帝國主義軍閥的眞實基礎，是封建宗法社會的唯一堅壘，是一切反革命勢力發生的最後原因。大地主階級人數，以收管業五百畝以上者計算，在農民中大概約占千分之一（包括其家屬在內），在全國三萬萬二千萬農民中（以全人口百分之八十計）約占三十二萬人。

小地主數目比大地主多，全國至少在二百萬以上。其來源大部分爲力田起家即自

1926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民》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

宣传报告[1]

（1926年1月8日）

文字宣传

（一）日报

（甲）党办者：

（1）上海民国日报　以前系叶楚伧等的私人报，第一次全国大会后收归党办，支扩充费数万元，以后月支经费二千五百元至三千元。然自始即不能算作真正的党报，其言论记载荒谬之处甚多。西山会议后，变为反动派的机关报。

（2）广州民国日报　以前系广州市党部办，十三年十月始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发行数由千余份增至一万一千余份。

（3）广州国民新闻　以前系反动派机关报，廖案后收归中央宣传部管理改为党报，广东省党部成立归省党部管理。目前日出七千五百余份。

（4）香江晨报　曾有一个时期收归党办。后叛入敌党，现已停刊。

（5）香港新闻报　十三年七月起脱离陈炯明关系，属本党指

---

[1] 本篇是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当时，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挥。罢工事起被港政府封闭。被封前销数达八千余份，销路海外多，香港次之。

（6）北京民报　出版未久，被张作霖封闭。

（乙）同志个人办或用社团名义办的日报，调查未周，不计。

（丙）海外华侨党部所办大小日报颇多，调查未周，不计。

（二）周报

（甲）党办者：

（1）中国国民党周刊　第一次大会后中央所办，不久停刊。

（2）广州民国日报　曾附属有文学、科学、孙文主义研究、经济、平民、农业、妇女、影画等八种周刊，然不久即停。

（3）党声周刊　归中央宣传部主持，初附属于广州民国日报，后独立，然不久亦停。

（4）评论之评论　第一次大会后上海执行部宣传部主持，附属上海民国日报发行，不久停刊。

（5）上海民国日报　附属之科学、平民等几个周刊，不久均停。

（6）浙江周报　第一次大会后浙江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7）新民周报　第一次大会后湖南省党部所办，不久停刊。

（8）中国国民　西山会议后由上海各区党部联合会出版，主旨在对抗西山会议及右派之言论，现改为三月刊。

（9）武汉评论　湖北省党部主持，继续未断。

（10）政治周报　十四年十二月出版，由中央宣传部主持，每期四万份，目的在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

（乙）广东方面各军及各军校所办周报半月刊等，如黄埔军校的《黄埔潮》、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第四军的《军声》、攻鄂军的《人道》等。

（丙）同志主持用社团名义办的刊物，此类颇多。如

学生团体的刊物，各地都有，如《中国学生》等。

工人团体的刊物，如《工人之路》等。

农民团体的刊物，不多，广东方面稍有一点。

军人团体的刊物，如广东方面之《中国军人》《革命军》《青年军人联合会周刊》及烟台之《新海军》等。

妇女团体的刊物，全国约四五种。

其他团体所出刊物。

（三）月报

前年有《新建设》《新民国》二种，不久即停。现只有中央农民部主持之《中国农民》一种，初出版。

（四）通讯社

（1）中央通讯社　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颇有成绩，办理已两年了。

（2）其他有关系之通讯社数家。

（五）书本

（1）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出版的书约三十种（内关于孙先生的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十二种，关于其他同志的如汪先生讲演集等十一种，中央宣传部编纂的约五种），共发行三十九万三千九百五十九册。惟散发偏于广东方面。

（2）各地的　不明，无统计。

（六）传单

（1）中央的

中央宣传部共发传单八十三种。惟散发尽在广东方面。

（2）各地的　不明，无统计。

（七）标语

（1）中央的

广州市中央宣传部与广州公安局合作，做了两种标语：一种钉在电线柱上，一种写在墙壁上。均取材于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及孙先生之遗言。

（2）各军的

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海军，黄埔军官学校，及第二、第三两军附设之军官学校，由各政治部主持，发布各种标语，为数不少，收效极宏。

（3）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方面农会工会印发颇多。

图画宣传

（一）图画宣传的重要

中国人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全国民众只能有一小部分接受本党的文字宣传，图画宣传乃特别重要。

（二）经过之成绩

（1）中央的　去年四月起才实行，做得颇少，又偏在广东方面，分为下列三项：

（甲）每周供给四幅小讽刺画于广州民国日报（间有缺）；

（乙）每周出一种宣传画（间须两周或三周出一种）；

（丙）印刷孙中山先生、廖仲恺先生之小照片。

（2）各军的

各军政治部于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对于民众的影响很大。

（3）各民众团体的

广东工农两会做了不少的图画宣传，最能激动工农群众。北京、上海两处也有一点。

口头宣传

（一）口头宣传，于宣传中，在分量上，在效力上，均占重要地位。

（二）在农民、工人、兵士、学生中召集会议，在此会议中作各种内容的演说，是为经常的口头宣传。

（三）在各种政治变动或示威运动时，作各种的演说，是为临时的口头宣传。中央党部曾数次组织宣传队。各省各埠大规模有组织的宣传，五卅运动中及以后，做得很多。

（四）负责同志于开党员会时，作政治的党务的报告，是为对党内同志的教育。中央党部于总理纪念周常行之。

两年来十四重要事件之宣传

（一）本党改组　发布宣言政纲，明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

其结果：

（1）使民众认识了本党及本党之目的，一变从前怀疑本党的态度。于对外宣传有极大效果。

（2）统一党内目标及方法，使怀抱个人或少数人目标及方法者，逐渐淘汰出去。于党内教育收效极大。

（二）收回粤海关事件　反帝宣传，帝国主义明白与本党破脸，本党亦明白反帝；在宣传上有很大影响。

（三）沙面罢工之反帝。

（四）商团事件

使民众认识了买办阶级的罪恶。惟此事件本党的宣传做得不力，反革命派攻击本党的宣传却做得十分起劲。

（五）中俄协定　国人从此明白国际上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反帝国主义国家之别。北京以及各地反帝国同盟奋起。“反帝国主义”一口号开始为民众所接受，本党为此发布一宣言。

（六）反直战争　民众从此对强大军阀失信用。孙先生发布北伐宣言。

（七）总理北上　发布北上宣言。提出“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

（八）国民会议促成运动　与段祺瑞对抗，使段之善后会议民众全不信用。同时使民众更深切地认识本党政治主张，“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在此运动中，深入于民众。

（九）总理追悼运动　使民众认识孙先生，认识本党及本党目的。此追悼运动极普遍，达于穷乡僻壤，“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两个口号因此更深入民众。此时本党发布与段祺瑞绝交宣言。

（十）五卅运动　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此次在宣传上收效极大，乡村农民群众已普遍地知道了本党有拥护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

宣言。

（十一）廖案　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及其附属物之残暴。本党用追悼及文字图画等的宣传，做得很不少。

（十二）反奉战争　使民众明白认识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之关系，明白认识中国军阀崩坏之迅速。在此战争中，民众有了接近革命成功之感觉。在各地的反段运动中，提出与当地军阀直接冲突的口号，如北京民众之“驱逐段祺瑞”，武汉民众之“驱逐吴佩孚”，长沙民众之“打倒赵恒惕”，一变从前避免直接冲突之和平态度，革命空气，空前紧张。

（十三）反教运动　两年来反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遍于全国各地，使民众认识了帝国主义之宗教侵略。

（十四）军队中平时之政治教育与战时之政治宣传　本党在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中所作之政治教育，造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军事势力；在广东各次战役时所作之军民联合的宣传，使军队爱护人民，人民拥护军队。此一事仍可算得本党一大成功。

敌人的宣传

我们的宣传之一部分，不能不针对敌人的宣传去做，现在且一看两年来敌人的反革命宣传。

（一）帝国主义

两年来因本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特别猛进，帝国主义诬蔑攻击本党的宣传，亦特别厉害。乃提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的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向本党进攻。香港、上海、天津、北京、奉天、汉口各外报，及外国

通信社之造谣诬蔑挑拨中伤，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二）各派军阀

国内各派大小军阀一致拥护帝国主义发出的两个口号（反共产，赤色帝国主义）而扩大之。

（三）买办阶级

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然比任何反革命派之宣传为努力；香港工商日报、上海新闻报，可为代表。

（四）研究系

拥护官僚及大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向上，时事新报、晨报可为代表。

（五）安福系

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以新申报为机关。

（六）联治派

拥护官僚及地主的利益，反革命宣传工作同上，中华新报乃其机关。

（七）国家主义派

学了点西洋国家主义的样子，拥护小地主及华资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共产”“反苏俄”十分起劲，醒狮周报乃其代表。

（八）国民党右派

本党右派自西山会议后，也学会了“反共产”“反苏俄”两句口号，跟着以上各反革命派起斗，取了敌对本党的态度，上海民国日报乃其代表。

两年来在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相对抗之中，革命宣传确是取一种攻势；这种攻势，在五卅运动中特别地表现出来。反革命宣传却始终是一种守势，为了招架不住，才抬出“反共产”“赤色帝国主

义”这两块挡箭牌来。这种对抗攻守的现象，乃中国革命势力日益团结进取，而反革命势力日益动摇崩溃的结果。

缺点

从两年来的宣传中，发现了如下各缺点：

（一）党报不健全；

（二）对各重要事件的宣传指导不敏捷，而且多未能尽量地做；

（三）指挥系统完全缺乏，上级与下级党部的宣传部间，完全失去联络，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许多宣传部负责人因此放弃职务；

（四）检察纠正之职务，完全旷废；

（五）宣传材料之充分搜集，及供给于下级党部，完全未办；

（六）有计划的党内教育，几乎没有做；

（七）偏于市民，缺于通民；偏于文字，缺于图画。

以上均是以前本党宣传工作中最大的缺点，以后应一一改正之。

反对右派会议者遍于全国

（1926年1月10日）

国民党右派林森、邹鲁、谢持、张继、居正、覃振、石瑛、叶楚伧、沈定一、傅汝霖、茅祖权、邵元冲等，于全国反帝国主义高潮之际，左派同志苦战奋斗之时，在国民革命战线上，临阵退缩。酝酿渐久，由革命地位退入不革命地位，由不革命地位退入反革命地位，因而有所谓西山会议之召集。此西山会议，完全与帝国主义取一致态度，对于左派国民党及广州国民政府取了攻击的形势。消息传播，全国哗然。因为真能反抗帝国主义的左派国民党国民政府，乃全国人民所爱戴，岂有号称国民党党员而反图攻击破坏之理？于是左派党员与革命的民众团体，群起反对，函电纷驰，目不暇给，十二月初旬情形，已略记前期本报。兹将十二月中旬收到各地攻击右派文电，列之于次，以供众览。盖全国数十万党员中，真正之右派不过数千人，最大多数均属革命的左派。全国农工商学民众团体。则全在左派领导之下。以此一月之间，反右空气，弥漫城内。现在第二次全国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观于元旦日大会阅兵典礼场中，“打倒右派”之呼声震彻天地，可以知其趋势了。反右文件前回记至二十号，兹从第二十一号记起。

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

（1926年1月10日）

最近京沪民众起来反对段张，郭松龄倒戈相向，各重要省区民众均认此次政变为全国国民革命之表示，联叠向应，满于全国。因为此次战争，一方面可以看出全国反奉高潮已压得奉系军阀不得不分化而溃裂，使反奉倒段易于成功；一方面又可以看出民众未有武装的积极行动，使直奉战争变为民众与军阀不流血的成功，其结果将使人民仍然不能夺取政权恢复其国家主人地位。各地民众有鉴于此，乃奋起作暴动示威，自北京勃发而后，上海、郑州、武昌、长沙各地一致奋起，革命热潮，震荡域内。广东为中国革命之先驱，当此革命基础巩固全国反奉潮流高涨时候，自应急起直追，领导全国国民作统一全国的大革命运动。因此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省农民协会、青年军人联合会、革命青年联合会、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总社、香港学生联合会、广州市商会等各大人民团体，联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反段示威巡行，并督促国民政府准备出兵北伐，必打倒卖国殃民的段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国民革命在短时间内得告完成。各团体开过数次筹备会，决定十二月二十日为当示威巡行之期，发布宣传大纲如下：

援助京沪反段示威运动宣传大纲

（一）素以用兵出名的吴佩孚去年失败之容易；张作霖自打败吴佩孚后声势之大不可一世，然而与孙传芳一接触而溃退，与国民军未开战而瓦解；此可证明中国的军阀已在崩溃极速度之中。

（二）五卅后反帝国主义运动，因军阀张作霖之摧残，未能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因此民众对于张作霖欲加以铲除，使反帝国运动能得胜利。以日益增长之民众势力，以与日趋衰亡之军阀张作霖争斗，张作霖之倒败为当然之事。孙传芳所以能以少数军队在最短期间内未经一战，而将数十万奉军赶出苏皖，是因孙传芳适站民众势力的工具之地位故也。奉军因民众势力之压迫，内部必得发生破裂，此即郭松龄起兵反奉之事之所以发生。

（三）去年□□□□，虽有中山先生之提倡兴□□，奈民众势力未能团结崛起，致使人民抢夺政权之时机丧失，而使军阀势力重新凝固，遂复藉政柄而继续其服务帝国主义以剥削压迫人民。此次执政军阀奉张已倒，如人民不起而代之执政，则政权将仍落于军阀之手。此次奉张之倒，系靠人民之不自觉的工具直系的孙传芳与奉系的郭松龄，而非直接靠人民自己的势力或其自觉的工具之势力。如人民现时不急起直追，抢夺政权于自己手中，则军阀必将继续其统治于中国，而延长中国人民之压迫与痛苦。因不论其继续之军阀为谁，其趋媚帝国主义与压迫人民则一，盖军阀之本性然也。

（四）最近北京民众之暴动，即人民不愿再受此种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压迫，而企图夺取政权之表示也。各地的民众应响应北京的民众运动，要求政权归诸人民，打倒段政府，组织人民的政府，保障

人民的自由，召集国民会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五）人民此种要求能否达到，颇系于国民军之态度，因北京政局自奉张失势，其重心完全转移于国民军。然而国民军之态度，完全依民众势力之雄厚与否而定，人民如果能有大规模的运动，对国民军以严重之表示，则国民军必可早日决定其对人民执政之态度如何。

（六）广东为中国国民革命之基础，广东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占极端重要的地位，广东之强固与发展，影响及全国运动之发展。广东在短时间内，已能将全省反革命势力肃清，香港已屈服，愿派代表解决罢工。广东人民而能在商议中一致拥护罢工工人，则罢工工人之解决必能保障罢工工人将来第二次的大运动。□□□□省已先后与广东表示亲善与不敌视的态度。广东政府已得人民的拥护，现更实行财政统一，整顿吏治，除盗安民等事，广东政府必能得人民更大的拥护。广东革命基础既已巩固，则国民党能向全国发展其运动，即国民党组织之全国发展，北伐军力之扩大。广东人民与全国人民，应协助国民党巩固革命基础与发展全国革命运动之各种计划。

（七）人民夺取政权。国民革命之成功，有赖乎全国革命势力之团结与国民党之左倾。去年中山先生所号召的运动之所以失败，党内反动分子之破坏实为一大原因。此班反动分子今又在北京预备破坏国民党之组织，以摇动革命运动之领导，以阻碍北京民众之倒段运动。如国民党不能将此班反动分子肃清，则革命之领导不巩固，国民党革命之政策将受影响，全国的运动必受重大之损失。

（八）口号：(1) 武装中国革命民众。(2) 打倒卖国的段政府。(3) 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4) 建立统一全国的国民政府。(5) 拥

护革命的国民党。（6）召集国民会议。收回人民自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7）恢复各地爱国团体。（8）拥护省港罢工。（9）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准备出兵北伐，实行革命的统一。（10）革命民众夺取政权。（11）收回关税自主。（12）驱逐关税会议的各国代表。（13）释放反帝国主义被捕的战士。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十万群众集合于广州市之东较场，最多为工人，次为兵士，次为各界人民。会场旗帜纷飞，满场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青天白日党旗，及各工会的红旗。会场中分设三坛，中坛农工商界，主席为全国总工会李森，省农会何友逖；右坛军政界，主席周逸群；左坛学界，主席为革命青年联合会沈宝同，广州学生联合会黎兆葵。坛之四周高竖“打倒一切反革命势力”“收回关税自主”“恢复各地爱国团体”“打倒段政府”等等标语。正午十二时半开会，于簇拥高呼声中通过下列各项决议案：

（一）对北方倒段运动之议决案

广东根深蒂固的军阀，在最短时期中，已被广东革命与代表民众的政府所铲除。有精兵数十万，并有强大帝国主义为后援的张作霖，未经攻击，而一败涂地。这正证明军阀崩溃之速度日加，而不能再延残喘。五卅运动以来，民众反帝国主义运动日益高涨，虽有军阀之摧残，与反革命势力之破坏中伤，仍日涨不已。近日在北京、上海等处民众，又有大暴动之勃起。盖民众为发展其革命势力起见，及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起见，已急于夺取政权，使人民各种自由得保障，使革命的战线能一致，使指挥反帝国主义运动能统一。广东人民既已握得政权，以铲除广东省内的反革命势力，应与全国民众联合，一致以打倒段政府及一切反革命势力，并建立一保障人民自由、与帝国主义奋斗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

（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态度之议决案

际此统治军阀失势，人民正在努力争夺政权时，国民军态度有举足轻重之势，是以本大会议决通电冯玉祥，与国民军，请其表明态度。决定为人民之武力，以援助人民夺得政权；抑决定再蹈奉张之覆辙，仍扶持段政府而使军阀势力重新凝固。

（三）对郭松龄之议决案

郭松龄既因人民势力之压迫而对张倒戈，使民众势力之发展，得长足之进步，应更毅然决定自己愿为人民之自觉的工具，以促进人民要求之实现。否则如背弃民众而愿代张以领导奉系势力，则自己之覆灭，将较张作霖为尤速也。

（四）拥护罢工工人与香港交涉之议决案

省港二十万罢工工人，此次为中国民族的自由而奋斗，忍饥耐冻，坚持至六个月之久，为中国革命史上所未闻见之牺牲与毅力。此次罢工非特对香港帝国主义给以绝大打击，而争回中国八十五年前的尊荣，并已帮助革命政府，完成其扫灭反革命势力，与巩固广东革命基础之功业。现在香港方面与罢工工人解决罢工，是以我全省人民应一致拥护工人之要求，务求达到胜利为止。不可让我为革命为民族辛苦奋斗牺牲之二十万同胞，单独受损吃亏也。

（五）对林森、邹鲁之议决案

林森、邹鲁等前此上担任外交团领导之责，负广东人民之付托，北上与帝国主义奋斗及监督卖国政府段氏之卖国勾当。林森、邹鲁非特背弃广东人民之托付，自北上对帝国主义未加一次之攻击，对段政府之卖国勾当，不加以监督，并与国民党叛党分子结合，企为破坏的国民党作反对广东人民所拥护广东政府之宣传。近日更与段政府勾结谋破坏北京民众推倒段政府之运动。本大会议决

通电，申讨其卖国卖省卖党之蟊贼。议决案通过后，高呼口号，整队巡行，均手挥小旗，浩浩荡荡，由东较场出惠爱东路，过西□□，经太平南路，到西□□散队。沿途散发传单，共计四五十种，数十万份。

关于宣传决议案*

（1926年1月16日）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贯彻本党唤醒民众的政策，并于最短期间实现先总理的遗志起见，视宣传工作为现在最切要的企图。今特将宣传计划列下：

（一）统一中央及各省执行委员会的实际的宣传工作。

（二）欲实现宣传的统一，中央及各省的宣传部，须致力于目前政策的解释。本党所颁行的一切论文、杂志、日报、传单、布告、指导群众集合的训令和为示威运动所拟定的口号，都应集中于此目前的政策。

（三）本党目前急待实现的政策，先总理的遗嘱中，已有明白规定。第一次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实现此政策的方法，已有详细决议。中央和各省的宣传部，应使总理的遗嘱深入农工商学各群众，使他们明了遗嘱意义，和遗嘱实现后全国各族民众怎样能得到莫大的利益。中央和各省宣传部，应当根据“总理遗嘱的实现，就是中国解放的成功”的口号，进行宣传的工作。

（四）一个政党，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所以抽象的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虽说有时党所宣传的减租、免除苛税、扑灭军阀、增加

工资、确立教育基金、改良商业、发展实业等政策，不能即刻全部实现。总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

（五）如果将党对民众所应做的工作，继续列出作中国民族的解放途径，定为民众所认识。于是真正引导民众完成国民革命的群众的党，才能实现。

（六）因此中央和各省委员会的宣传工作，必定根据群众的实际利益去执行。无论对学校或乡村的群众，或对工厂的城市的商店的群众，应为这样做去。所以我们做宣传工作的口号是：“依据民众的需要，实现先总理所指示给我们的国民革命。”欲解放中国，除此之外，再无捷径。

（七）各个群众虽说因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异其需要，但是他们要求国民革命的实现，确是一致的。中国的解放和统一，是大多数人所要求的，所以大多数的民众，就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宣传部对于此点，应明白指出。国民党虽主张增加工资，但同时并不妨害本国产业的增进。不但不妨害本国产业的增进，反力促进其发展。这也正和十九世纪欧美的工人罢工运动，不但没妨害产业的发展，反来促起产业的进步，同一理由。国民党扶助农民减租，取消苛捐杂税，也是一个必要的政策。因为农民所受的压迫愈减轻，国民革命完成的时期愈迫近。现在剥削农民的，一部分是封建式的地主，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卵翼下的反革命派，我们如果想促成国民革命的成功，必须拥护农民的利益。宣传部应当正式指示，凡是赞同中国农民的解放运动的，就是忠实的革命党员，不然就是反革命派。如此，宣传部方能使负担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建立稳固的基础，并于最短期间，完成总理的遗志。

（八）一个党的成功，须赖有党的重心。中国国民党的重心，就

隐伏在大多数受剥削的农民群众。关于这一点，宣传部应时常指示各党员，并且命令他们趋重于这个重心。

（九）本党的宣传，应注意普遍于全国各处。举凡乡村、省县、商埠重镇的大小事件，均不应脱离本党的视线。本党中央和各省的宣传部，就是本党处决该事件的设计者。所以宣传部遇有事件发生，应首先贡献本党和全国民众以精确的报告，并且解释该事件的原委及其对于国民革命的影响，并且指出怎样利用这种事件，以实现本党的政策。

（十）军队的组织，有军需部供给全军的服装和军械。宣传部之在本党，正和军队里的军需部相类。宣传部供给党员及民众以政治学识，行动的方策，使能于国民革命的困苦过程中，努力奋斗，在各种互相衡突的意见和情绪中，坚持本党的主张。宣传部应指示各党员如何战胜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的恶势力。更应变换冲动的怨观的缺乏自信心的党员，使成为健全的革命势力。

（十一）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跃最敏捷的机关，故凡本党能纂述书籍小册子编辑论说拟就宣言和口号的党员，都应参与宣传部的工作。凡不能亲身参加宣传部工作的著作家，或新闻记者，应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来做宣传工作。所以宣传部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

（十二）宣传部和党员及民众的联络，极关重要，设使宣传部所发出的文告训令，不能为党员所应用，或纵能应用而不能适合民众的需要，宣传的目的便完全失去，宣传部完全无用。欲迅速地供给宣传材料，必须交通敏捷，宣传部的组织健全，才能办到。中央宣传部应和各省宣传部本党各机关，以及其他公共团体，依规定的时间，藉书信电报专差，保持密切的联络。

（十三）凡在本党统治区域以内的宣传部，致力于普通宣传工作，应唤起民众拥护本党政府的同情。

关于党报决议案

（1926年1月16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视为最重要之点，就是宣传本党的革命原理——整个的三民主义——以期三民主义随国民革命的成功，完全实现。三民主义之中，只实现其二一而不能全部实现时，国民革命依然不能谓之成功。不过本大会深知民权和民生两主义必待民族主义确实完成并且稳固地建立起来，才能实现。这是我总理的遗念，本大会所矢志接受的。

第二次大会闭幕以后，第三次大会开会以前的时期，本党应当鼓动并且集合所有的革命力量，在最短期间，促成民族主义的实现。这是本党最切要的工作，民党党报所应首先致力的。

民族主义的意义，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是在使中国脱离次殖民地的境域，进而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同立于平等的地位。总理谓次殖民地就是受多数帝国主义统治的民族。所以次殖民地的情况，较统治于一个帝国主义下的殖民地更为厉害。总理又说民族主义，是在使中国统一并且受统治于五权宪法的中央政府。

第二次代大会，要求本党党报时时指示民众民族主义之中有两种要点：第一，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第二，是依据五权宪法实现国内统一的政府，想实现国内统一的政府，必须先打倒帝国主义。

本党机关报，应指出在中国未脱离次殖民地的境域以前，想着依据本党的五权宪法或其他法律实现统一，都是带有危险性的梦想。过去本党之失败，都可引为鉴证。

本党党报，更应指出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欲求经济的进步以迎合中国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全国商港经济的发展，愈见显著，外国资本家统治全国财政的势力，也愈见坚固；结果中国内地愈趋于穷困，本国的产业及银行事业逐渐变为外国经济的附庸，这是本党党报时时要注意指示的。本党党员之服务于各级学校，从事于社会经济的调查，并且对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完全同意的；应当参加党报的编辑工作，竭尽他们的知识和发表能力，去证明本党对产业发展的主张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的。

党报更应依系统的计划，指示给学生、工人、农人、商人，不平等条约废除后，他们怎样可以满足自己的要求，农民群众得到福利后，本国货物的销场定要扩大；本国货物销场的扩大，引起劳力需要的增加，结果工资增加，生活状况改善；农工阶级的经济的改善，知识阶级（教师、工程师、经理）的服役范围也因之扩大。在这时期，商业自然有长足的进步。本党党报应指出种种的改善和进步，必须要不平等的条约废除、海关管理权收回、中国统一后，才能得到。所以全国的学生、工人、农人、商人，一定要参加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

救亡的方案，充满了中国。然而在这些方案里边，凡未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海关管理权的，本党党报应当指明这是危险的宣传，中国统一和解放上的障碍物。关于这一点，是党员特别要坚持的态度。党报的评论必须是建设的，不应一味是破坏的；容易为群众所了解的，而非专为少数人所阅览的。

第二次代表大会更训令党报宣传以下的口号及政策：

（一）广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根据地。

（二）广东因在忠于总理遗训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导的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在行政上、军事上、财政经济上，都得到了莫大的进步。广东人民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及行为渐有深刻的信仰。

（三）凡反对国民政府或设法倾覆国民政府的政权，破坏国民政府的名誉或另外结合小组织谋不利于国民政府的，通是反革命者，或有意无意的帮助反革命者。

（四）国民党在广东，正从事于统一全国政治的任务。国民党在广东的成功，将促成国民革命的实现。所有足以妨害广东的成功的障碍，一定要不顾情面，不怕危险地去扫除他。

（五）必须个个党员视国民革命的利益，不但重于自身的利益，党员的家族亲属或其他团体的利益，也不能和国民革命的利益相比拟。

（六）国民党不是一个互助的团体，乃是为中国的自由统一而奋斗的革命党。凡不能从事国民革命的工作，或忘记了这个伟大的责任，就是违反了总理和国民的希望。在国民党中，决不容这种事实存在的。

（七）本党的纪律，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统一中国的武器。凡违反本党纪律的就如同临阵脱逃的兵卒一样。

（八）口头革命，不服从上级机关的指挥，或既受命令而不能执行的，都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其发表革命的言论，多做些革命的工作，方能促成国民革命。

（九）本党党员因牺牲自身，惠爱同族，对少数分子施以严厉的手段，也是不能免的。四万万同胞，不能依和平的手段来统一，暴

力也是需要的。暴力的意义，就是组织和纪律。党员个人是本党所统制的分子，党员个人的利益是包括在党的利益中间的。所以党员的利益，应当为本党的利益而牺牲。

（十）唯有组织良好纪律森严的国民党，才能于扑灭国内外敌人后，建立国民政府。先总理为中国奋斗，为革命牺牲，四十年间如一日，我辈死后者应当引为榜样。

（十一）本党只要问党员：能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否？能努力作打倒军阀否？能努力建立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以统一全国否？如能，他就是一个国民党党员。

本党党报，对于国内事件多未披露解释，确是一个大错。党员的训练和党中领袖的养成，不能从抽象的原理中得来。必须利用现存的事实，向党员讲明，并分析其政治的意义，才能使党员增加革命的经验，鼓励革命的勇气。本党以时事为研究的对象，不断地为全国民众奋斗。本党党报就是全体党员的导师。党报解释时事，应当指出起因，和对于国民革命的影响。例如苦力为帝国主义者所殴辱一事，意义非常伟大，本党党报应即在党报重要栏内将它发表，并且就此阐明国民革命的必要。工厂矿穴里工人的苦况，应当予以详细的描写，工人的生活困苦，原因是在中国产业的落后，产业的所以落后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军阀常假借为国为民而战的口号，耸动群众的视听，本党党报应当指出事实攻击他们言行的矛盾。中国报纸书籍中遇有传播帝国主义的文明，宣扬他们对中国的口头亲善时，本党党报都得加以抨击，不可轻易放过机会。本党党报，不只要指出帝国主义者政治的、经济的侵略，更应指出文化的侵略，足以破坏国民革命的思想，分裂知识分子的队伍，麻醉一般革命民众的心理。本党党报，应特别防止这种危险，关于此点党报

应当宣传以下的口号：

（一）中国的自由统一，要靠中国环境内所产生的思想，尤其是群众在要求生存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知识，才能实现。帝国主义的学术是不能救中国的。

（二）学术思想、学术研究，若不是为民众要求社会经济的解放及为民众要求生存，都是毫无价值的糟粕。

（三）知识分子的口号，应当是："到群众里去。"中国的解放，唯独在群众中才能找到。

（四）凡是脱离群众的分子，在社会上就失掉了根据。他的一切活动统无效力。

（五）帝国主义者耗费千百万元来克服我们的思想，我们应当很奋勇地战胜他们的诡计。

（六）帝国主义者耗费千百万来传播耶稣教，这是他们破坏我们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很厉害的工具。

以上各点，本党党报应特别宣传并指示知识分子应努力介绍民族主义于全国民众。万勿甘作传播帝国主义文明的工具。

第二次代表大会，十分重视党报的工作，故训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各省执行委员会在日报上、周刊上，坚持本党的宣传政策，不容犹疑。日报和周刊的编辑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执行委员会任命，并且监督他们的言论。中央和各省委员会对于党的政策既负全责，故得斟酌情形撤换编辑员或取消该宣传机关。

中央党部设立调查员，供给报告及论说材料于本党各党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宣传部，应依本党对于某项时事问题的决议，按期通告于本党各机关报。

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26年1月18日、19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第十二日第二十三号

日期：中华民国十五年一月十八日

时间：上午十时至十二时三十分

出席人数：一百八十人

主席：汪精卫

秘书长：吴玉章

记录：速记科

（中略）

主席：现在把总章所应加修改者，每条来讨论。

主席：第十五条，有没有异议？（无异议通过）

主席：第二十四条有异议没有？

毛泽东同志动议：在“星期举行纪念周一次”下面加上但书，“如有特别情形时得由该省党部许可，每两星期举行一次”。

三二号于树德同志：一星期开纪念周一次，如果事实上有多少

困难，应该给他自由变更，加上但书是对的。

一四〇号刘诵芬同志：加上但书，是比较好一点。

一三九号方维夏同志：本席也以为加上但书是好的。

主席：各位对于加上但书，有异议没有？（通过）

（中略）

主席：第七十三条，有没有异议？

一四六号杨暗公同志：在第二个“其他”下面，应加一个省字。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此次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人数很多，本席以为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可以兼其他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事实上也是可以兼而且应该兼的。

…………（以下略）

第十二日第二十四号

日期：元月十八日

时间：下午二时三十分至五时三十分

出席代表：一百六十五人

主席：汪精卫

秘书长：吴玉章

纪录：速记科

…………（中略）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决议案

…………（中略）

四、**主席：**现在商民运动决议案已分派各位，请各位讨论。

九十八号侯绍裘同志：二章第六条本席以为不应该将党与商人组织混而为一。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本席以为商民协会章程不必列入决议案内，可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决定。

甘乃光同志：章程在这里讨论确是很难的。最好交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酌定。大会现在只把八条决议案讨论即可。

五十八号陈公博同志：大会只应决议原则，章程总不要说到，交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好了。

（附议者十人以上）

主席：以赞成商民运动决议案的八个原则，但商民协会章程交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查者举手付表决。（大多数通过）

五、中央党务报告决议案

…………（中略）

主席：请党务报告决议案审查委员报告审查经过。

二〇一号詹大悲同志报告。（草案文另附）

主席：对于决议案有无异议，请众讨论。

四十六号黄国伟同志：对于案内第（二）条（丙）项："增高各省党部及海外总支部之地位，及扩大各省党部及海外总支部之职权"，各特别市党部，应请一律增高及扩大，并明白规定。

主席：有无附议，附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成立。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六）款"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句应改为"关于发表变更本党决议及政治方针言论"，又创立研究的会社之上，应改加"凡有"二字，必须事前得党部之许可，改为"必须得

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把“或事后得党部之追认”句删去。

三十七号周守愚同志：党部之上应加“最高”二字。

十号范鸿劼同志：主张改为凡有发表政治主张的言论。

于树德同志：如此改法，未觉完满，因为党员发表政治的言论，实在天天都有，如果每件都要得党部许可，将不胜其烦，事实上实不可能。应于“凡有发表政治的言论”之下增加“不得与本党的政策及决议有所抵触”句。

五十九号高语罕同志：言论的范围极宽，一千几百字也是言论。本席以为应声明限于著作品，如戴季陶同志前几月所出小册子之类，须得本党之许可，如属细碎之言论，均须党部之许可，恐不胜其烦，事实亦难办到。故本席主张将“言论”二字改为“著作品”。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五十九号所说，本席也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辞，字数虽小，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不行的。

…………（中略）

主席：现在有三个修正案，先将于树德同志修正“凡有发表政治的及党务的言论，不得与本党之政策及决议有所抵触，凡有创立研究的会社，先须得该地最高党部之许可”修正文付表决，赞成者举手。(大多数举手通过)

主席：各位对于本决议案，尚有无讨论?

…………（中略）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第二条（己）项“各重要区域”应改作“应于适当地点”。(附议者十人以上)

主席：有无异议，无异议通过。

一六三号张文卿同志：（八）款“所以承认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共同努力”应改为“遵守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之主张”。

六十三号张廷灏同志：应改为“先总理有见及此，因容纳共产党加入本党，共同努力，以后如有党员不明白先总理容纳共产党员之遗旨，在党部内仍发生纠纷，应以公开的形式共同讨论”。

八十一号许卓然同志：此等修正文字，似有偏重一方面语气，认为不甚适合，仍请大家讨论。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仍请维持原案，不必删改。

五十五号袁同畴同志：我以为这个问题，应该从根本解决，决议案持此等态度，恐愈增误会和纠纷。此次西山会议，彼以反共产为号召，其实我们认他只是反革命，绝不是共与反共问题，这是绝无疑义的，但我们黄埔军官学校同学，亦有此种争执，他们也自己承认，讲堂上可以吵嘴，对帝国主义却共同攻打的，所以我们不能说他是反革命。本决议案八项条文规定，如有争执，可在党部指导之下公开讨论，亦不过治标方法。如望解决此等纠纷，其治本方法，不可不讲。就本席近年来办理黄埔军校经验所得，深知党内此种纠纷，实非主义之争，因为三民主义即包括共产主义，两方之目的实相一致，亦非党员努力者与不努力者之争。其实他们彼此之间，是有误会的。他们有些人总嫌共产派同志进行党务之不肯公开，而且没有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因为有此一疑，两方便有许多纠纷生出来了。所以本席以为欲从根本解决最是重要的，就是给两方互相认识。就本席考虑，以为几件事是要望共产党员同志做到的：（一）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时，声明自己是共产党。（二）共产党员，要将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公开。（三）中国国民党党员加入

共产党时，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以上三样办法，如果办到，其纠纷将不解自解。更有声明的本人固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也并没有加入其他反共产的任何团体。对于两方，绝无畸轻畸重之意，且对于共产党的同志，也绝对尊重。现在愿以至诚的态度，提出大会，请大家解决。因为这个问题，若无根本解决，使以后再生纠纷，便不是好现象。（附议者十人以上）

张国焘同志：袁同畴同志提出的三点，都是非常之好，但是实际恐不能这样。先说第一点，因为如果全国都系广东一样便没有困难的，因除广东以外，就实在办不到。如说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给国民党最高党部知道，是不成问题的。但党部非常之多，区分部也是党部，国民党员中也有许多不明这种意义的，若要下级党部也知道，恐马上发生危险，或者在广东没有危险，难保不在别处有危险。次说第二点，原本政党有公开的自由，但在现在中国军阀压迫之下，共产党除却秘密进行，却无办法。如果活动公开，则警察侦探，马上就把你拘捕，共产党同志在北方被害者已有数人，可为先例。所以活动公开是不可能的。所以总理在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只问共产党员加入本党，守不守本党的纪律，而不问其他，就是如此。如果规定条文要共产党员活动公开，便含有不相信的意思，有监察的意思，也不是总理的本意。（主席宣告现已时届，应延会至这个问题解决才散会，众赞成）至于第三点，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要得该地党部之许可，这也很正当的。但大家要知道世界政党的历史，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共产党员也有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同志没有觉得不高兴的。至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百分之三，也是很少很少的。我们现在只问他是革命不革命，不要问他共产不共产。除是共

产党员脱党以后，走入反革命的道路，我们就自然反对他。如果好的共产党，变了好的国民党，同样是好的革命党，和我们在革命战线上合作，那是非常之好的。我们并不反对他的。在政党原则上应该如此。但同时有人在共产党又在国民党，我们更没有什么不高兴的。记得前几年曾和贺惠寒同志谈话，他说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一定也是好的国民革命者。好的国民革命者，也一定不反对农工的利益。这句话确实很对。今天袁同志提出这个意见，本席也觉得高兴，故此也提出这种至诚的讨论。

毛泽东同志：袁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很可讨论。张同志所说的是事实也要注意的。而且这三种条件，我们也都是不怕的。先就第一点说：如果怕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也决不是真正共产党员了。但是共产党在中国还算是一个秘密组织，与俄国共产党执政可以公开活动，情形不同。在中国共产党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声明，便马上要受枪毙了。就第二点说，和第一点也相同，在共产党的友党中国民党势力之下公开是可以的，但在他处，也要公开，就马上要给人解散消灭，这便足以使国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个重大打击，也于国民革命前途是不利的。就第三点说，无论何党，党员出党入党应有绝对自由。实不必有若何的限制。

…………（以下略）

第十三日第二十五号

日期：十五年一月十九日

时间：上午十时三十分至下午一时十分

出席代表：一百八十八人

主席：谭平山

秘书长：吴玉章

纪录：速记科

…………（中略）

一、汪主席精卫报告主席团提出闭会后本党对于北方目下时局之宣传大纲

…………（中略）

二、财政决议案

…………（中略）

三、纪律提案

路友于同志报告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另附）

三十二号于树德同志：本席对于此案，大体上很赞成，但文字上或许要注意，因为恐怕有的已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而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报纸很多，我虽不能拿出反证来，但不能不虑到。

五十九号高语罕同志：本席以为凡是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的，一方面登报声明，一方面还须向中央党部报告。

二〇一号詹大悲同志：本席认此案应着力于党的观念上，不要于政治立点上看，才可得正确的解。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本席亦很赞成此案不牵涉到西山会议的问题，而只于西山会议以后的党务范围内的问题上取。

二十一号董用威同志：本席以为对于像居正一般人的处分，大家试设想各地党务之前途，有否困难，即可得相当的意见，所以本席主张居正石青阳应永远开除党籍，至于戴季陶则仍不必再加处分。

主席：现在可以改定讨论方式，将本问题分为几次讨论，先将

居正案解决。

二一五号朱剑凡同志：本席以为无讨论之必要，可直付表决，因在座中决无赞成这种勾结军阀破坏党务之反动分子也。

主席：赞成居正永远开除党籍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主席：关于第二项，石青阳陷害同志虽经四川代表吴玉章申明尚无事实，而勾结军阀，则有许多同志作证，应否开除请大众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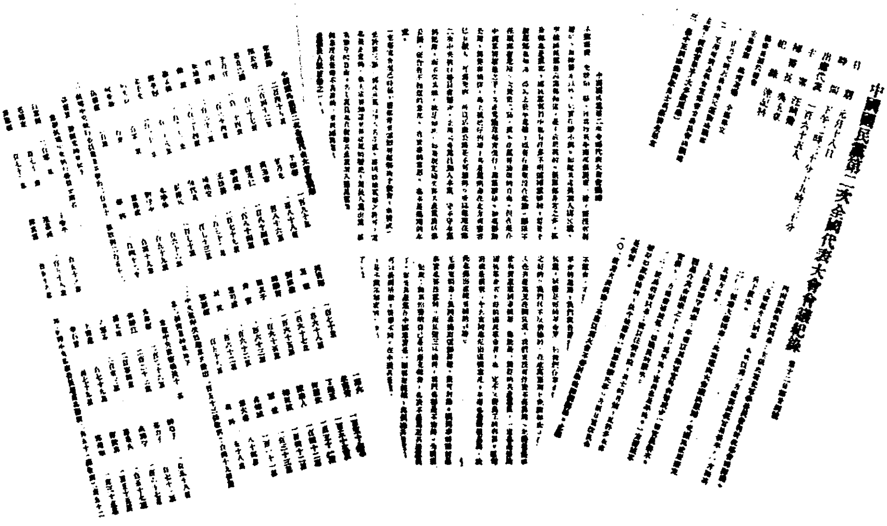
二一五号朱剑凡同志请以原案付表决可矣。

主席：赞成石青阳开除党籍者举手。（大多数可决）

主席：关于第三项覃振石瑛茅祖权三人，原案主张加以警告限于一月内声明脱离同志俱乐部，且须致函中央党部报告，否即除名。大家以为如何？

十六号毛泽东同志：本席主张改为两月。因一则交通不便一个月消息来往实不够。二则又使他们知道决议案慎重的真意。三则我们还且希望他们再走回革命之路的。（附议者十人以上）

（以下略）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作了宣传报告，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图为会议记录记载毛泽东发言的部分和大会的选举结果。

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

（1926年1月19日）

一、中国现在尚未脱农业经济农民生产，农民既占全生产百分之九十，为要实行总理之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农民。吾国人口既然农民实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审是则吾国四万万之人口，农民实占三万万有奇，所以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惟有首先解放农民，基于以上之论点，则中国国民党无论何时何地，皆当以农民运动为基础，无论政治的或经济的运动，亦应以农民运动为基础，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于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因农民解放即国民革命大部分之完成，而为吾党三民主义实现之根据。

二、吾党在广东自有农民运动以来，为期不过七月，已有农民协会者三十有七县，会员增至六十二万人，有组织之农军达三万人，吾党前次讨伐杨刘，此次统一广东，农民皆有实力之参加，此皆可证明吾党对于农民之进步，农民为谋本身解放之急切，农民参加国民革命之努力，现在广东以外，在珠江流域虽有广西，在长江流域虽有湖南、湖北、安徽，在黄河流域虽有山东、河南、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特别区，均有农民运动之兴起。惟组织尚少，效力不著，吾党为使全国农民参加于政治争斗，以后非极力注重于中国中北两部，断不能于最短期间，促成全国农民之组织，以

致力于国民革命，所以吾党尤须确定对于全国农民运动之统一计划，并确定经费，使此种计划得以完成。

基于上述之理由，大会对于农民运动，分为政治的、经济的、教育的三种决议：

（一）政治的：

1. 指导农民使为有组织之民众以参加国民革命。

2. 排除妨碍农民利益之军阀买办阶级贪官污吏劣绅土豪等。

3. 解散压迫农民之武装团体。

4. 明定农民自筹自卫之原则。

5. 无论何时本党政府应站于农民利益方面而奋斗。

6. 制定农民保护法。

7. 实行公用度量衡。

（二）经济的：

1. 严禁对于农民之高利贷。

2. 规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

3. 减少雇农做工时间，增加雇农工资。

4. 取消苛捐杂税及额外征收制止预征钱粮及取消无地钱粮。

5. 禁止包农制。

6. 从速设立农民银行，提倡农民合作事业。

7. 速行耕地整理并整顿水利改良农业。

8. 调查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农。

9. 取缔奸商垄断物价。

10. 改良青年雇农及女雇农待遇。

（三）教育的：

1. 厉行农村之义务教育及补习教育。

2. 利用地方公款兴办各种农民补习学校。

3. 尽力宣传使农民自动地筹办各种学校。

本党为求解决农民痛苦，而使其变为有组织之民众，以促革命之成功，故对于内部之组织，尤须有严紧慎密之筹划，大会对于年来农民运动之经过，认为有相当之进步，此后更当继续努力，并为内部工作之筹划，兹特规定如下：

（一）各省党部均应设立农民部，并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之关系，实行中央党部之统一运动计划。

（二）于中央党部指导之下，在本国中北两部，选择相当地点各设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扩大中国之农民运动。

（三）确定并扩大农民运动经费。

（四）各省区市党部宣传部与各该省市之农民部，发生密切关系，尤须与中央农民部发生密切关系，使此种运动，成为本党之整个的统一的运动。

宣传报告决议案*

（1926年1月）

（一）自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布本党宣言及政纲，明揭国民革命之目标及方法之后，党内外之观听为之一变。在党外，民众渐知本党领导国民革命之目标，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一切附属物，为民众之利益而奋斗。因此，民众一变从前怀疑本党之态度而为拥护本党之态度。在党内将全党党员范围于一个共同目标与共同方法之中，统一其趋向而整齐其工作。其怀挟个人之目标及方法者，以与此共同之目标及方法不相容之故，乃逐渐归于淘汰，具有一种极大的教育作用。惟在宣传方面，两年来尚未能将本党革命目标及方法，深入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之工农小商群众中。在教育方面，更未能建立一具体的教育党员计划，使全体党员革命化，是其缺点。大会以为今后本党的宣传工作，亟应改正此缺点。

（二）两年以来在全国各种重大事变中，本党之宣传，确能采取一种攻势，将各种事变的意义，解释给一般民众。如收回粤海关事件、沙面罢工事件、商团事件、中俄协定、反直战争、国民会议促成运动、总理追悼运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廖案、国民政府肃清反革命派及最近之反奉战争，均能不失机会，发起广大的宣传，暴露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官僚买办阶级之罪恶，而指示民众以出路。此外在国民革命军中之政治教育，及战时军民联合之宣

传，尤有重大之成绩。大会以为本党在今后继续发生的全国各种事变之中，应尽量利用时机，一面揭破一切反动势力之阴谋及罪恶，一面揭示本党之主义及政策，使全国被压迫民众日趋于革命化。盖欲使本党之主义政策深入民众，惟有在关系民众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国的大小事变之中，努力进行其宣传，始有实现之可能。至于军队中之政治宣传，极为紧要，以后更应尽量扩大。

（三）两年来由帝国主义发出“反共产”与“赤色帝国主义”两个口号，号召其在中国之工具——官僚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及各种无聊政派，如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努力作其破坏诬蔑之宣传。其目的为欲拆散本党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藉此等反革命的宣传，向民众揭破其诬蔑及错误，同时指示民众，使知欲求革命之成功，则国内国外之革命的联合战线，必须扩大而巩固之。

（四）至于宣传工作指挥系统之缺乏，党报之不健全，检察之旷废，宣传品分配之偏枯，农村宣传之不力，党内教育之无计划，均为两年来之缺失，以后应按照新的宣传计划，切实改正之。

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致中央秘书处电[1]

(1926年2月14日)

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诸同志：

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州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2]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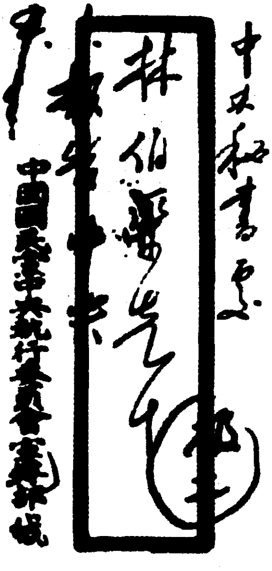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二月十四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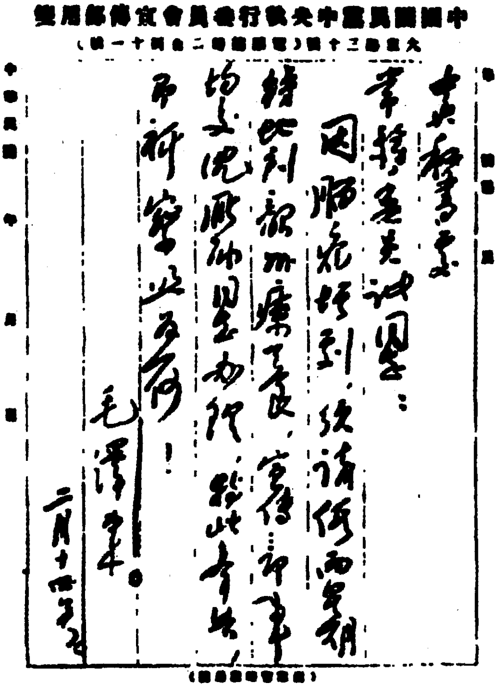
[1] 这封信的信封上署有“中央秘书处林伯渠先生报告中央”字样。毛泽东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理部长。

[2] 沈雁冰，当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秘书。据沈雁冰回忆，毛泽东当时请假是为了去韶关考察农民运动。


中央秘書處

林伯渠先生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緘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用箋

中央秘書處

常務委員諸同鑒：

因腦病頗劇，擬請假兩星期，往北江韶州療養，宣傳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代理，特此奉達，即祈察照為荷！

毛澤東

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关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致中央秘书处电的手稿。

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的演说[1]

（1926年2月28日）

开办政治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做革命工作，绝对不是抱升官发财的希望而来的。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

---

[1] 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为培训政治工作人员而举办的政治讲习班开学典礼上演说的主要内容。讲习班由理事会领导，理事为谭延闿（主席）、程潜、林伯渠、陈嘉祐、鲁涤平、毛泽东、李富春，担任本班教授的有汪精卫、萧楚女、沈雁冰、朱剑凡、邓中夏、陈公博、高语罕、熊君锐、毛泽东。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

1926

農民部農民運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錄

日期：三月十六日 時間：下午一時

1926年3月，毛泽东受聘担任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为中国革命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图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讨论续办第六届农讲所，并请毛泽东任所长的会议记录。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1]

（1926年3月18日）

今天是中国民众纪念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巴黎公社事件的发生，距今已五十五年了，为什么到今日我们才知道纪念，才举行纪念呢？因为中国从前的革命，是少数人包办的，及到革命潮流渐渐增涨，革命运动才跟着由少数人扩张到多数人，到现在已有多数的农工民众参加，并且有左派的国民党党员作指导，有工农阶级专政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作模范，所以中国民众才知道有今日的纪念，才能有今日的纪念。

关于巴黎公社的经过，近几日的报纸都有记载，即《新社会观》[2]一书内，也有简单的叙述，想各同志都已看过，可以不必多讲。现在只把纪念巴黎公社的几个重要意义说一说。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五十五年

---

[1]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的讲演，发表在《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旬刊》上，原题为《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

[2] 《新社会观》，郭范仑科著，王伊维译，瞿秋白校，平民书社1925年6月出版。

前的今日呢？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这是应该注意的第一点。

马克思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只有国内阶级战争，才能解放人类。民国三年的欧洲大战，丧失了许多的生命，耗费了无数的金钱，结果得到了什么？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现在一般资本家宣传说：“对外的战争是有益的，对内的战争是无益的。”我们却要进一步说：“资本家互争利益的国际战争，是无意义的，打倒资本主义的国际战争，才有意义的；军阀们争权夺利的国内战争，是无价值的，被压迫阶级起来推倒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才有价值。”一般国家主义派，盛倡其“为祖国而牺牲，乃无上光荣”的说法，这是资产阶级欺人之话，我们万不要受他们的愚弄！此应注意的第二点。

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

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此应注意的第三点。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1]国民政府打倒杨、刘[2]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

---

[1] 指民国14年，即公元1925年。

[2] 杨、刘，指杨希闵、刘震寰。

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这是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第四点。

现时帝国主义者为欲分散革命势力的联合，极力宣传“赤色的恐怖”，说什么俄国革命杀了整千整万的人，实则只有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才是真的恐怖！试看巴黎公社失败后，被法国资本家所残杀者统共不下十万人，而俄国革命所杀的，最多不过几千人。“赤色的恐怖”实在不及“白色的恐怖”多了！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更是“白色的恐怖”的实证。所以我们要大声疾呼：“反对白色的恐怖！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残杀！”

《国民运动丛书》书目

（1926年5月19日）

第一辑

（1）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　汪精卫著（已有）

（2）中国近百年史略（待编）　此书应注意外交之失败及民族思想之发展不宜纯记政治成为一姓家传

（3）十九世纪欧洲之政治问题（待编）

（4）产业革命（待编）

（5）从原始共产社会到封建社会

此有一书可以依据，原书为俄人某所著纯以唯物史观为根据解释过去历史，原为一本世界史略，今拟分为三册，分题三名，则分合皆便，或可加小题曰："世界史略之一"

（6）妇女解放运动小史（待编）

以德国Bebel（培培尔）所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一书为兰本

（7）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待编）

（8）革命（待编）　此为美国文学家Jack London（杰克·伦敦）所著之短篇小说极为有名

（9）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待编）

（10）德国大革命之意义（待编）

（11）世界之农民运动（一）（待译）　此种总名一个其中实为国别

（12）二七运动始末记（待编）

第二辑

（1）中国国民党之使命（待编）

（2）世界大战后之初十年（待编）

（3）社会主义与宗教及艺术（译）

（4）中国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待编）

（5）从中古自由市民至产业革命（世界史略之二）（待编）

（6）土耳其国民革命（待编）

（7）苏维埃制度（译）

（8）苏俄之外交（译）　俄外交总长契杰林原著

（9）世界之农民运动（二）（待编）

（10）鲁示尔占领与道威斯计划（待编）

（11）黑种人之革命运动（待编）

（12）五卅惨案之前后（待编）

第三辑

（1）孙文主义

（2）马克思的历史方法（译）

（3）劳动运动之开始至俄罗斯社会革命（世界史略之三）

（4）华盛顿会议后之国际形势（待编）

（5）革命的文学（待编）

（6）欧州保安公约之分析（待编）

（7）资本的集中与中产阶级之消灭（译）

（8）世界之农民运动（三）

（9）苏俄的教育（待编）

（10）红军（待编）

（11）犹太民族解放运动（待编）

（12）摩洛哥战争（待编）

第四辑

（1）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待编）

（2）洛迦诺会议（待编）

（3）巴黎公社（待编）

（4）五一劳动节（待编）

（5）马克思论东方民族革命（译）　比共荐论文三篇极关重要

（6）苏俄的艺术（待编）

（7）世界农民运动（四）（待编）

（8）埃及民族解放运动（待编）

（9）叙利亚战争（待编）

（10）将来之国际大战（待编）

此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与苏俄武力之比较及新式战备之研究，取材于俄国军事委员长伏尤芝之论文

（11）一九一七年匈牙利社会革命失败史（待编）

（12）反动势力下之巴尔干（待编）

第五辑

(1) 中国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待编）
(2) 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待编）
(3) 三八国际妇女日（待编）
(4) 资本主义下之战争与和平（待编）
(5) 法西斯蒂（待编）
(6) 墨西哥革命（待编）
(7) 波斯问题（待编）
(8) 莫索尔油矿（待编）
(9) 英美在国际之利益冲突（待编）
(10) 大战后之世界妇女运动（待编）
(11) 殖民地最近的革命运动（待编）
(12) 裁减军备会议（待编）

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1]

（1926年8月14日）

诸位在广东开会，请顶要紧不要忘记八十岁以上的农民，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诸位今天参观，最好就下乡去，到民间去，直接去指导农民，唤醒他们守旧的劣根性，根本救治农业。本地在农业学校毕业者很多，外国回来者亦不在少数，但都是受农民的梗阻——其实还是受先忘了自己没有去领导农民的梗阻——到今仍没有多好效果！

现在农村经济非常枯涩，农民生活非常困难，因此广东农民问题，当是诸位开会的一个问题，在大家更希望这问题得有完满的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以农民运动讲习所代表的身份在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

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1926年8月）

依五个月以来之经验，发现本省各地农民运动，多不免左稚之病。其所提口号，如打倒地主，以及关于干涉政治等，在目前都失之过高。本省农民运动，除尽力组织穷苦农民群众，并拥护其最低限度的经济条件之改善外，还应引导中小地主，及一切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就是大地主，除开最小部分之难同情革命者外，也要设法使之在革命运动中能守中立。我们正在开始这种工作的时期，如果我们的口号过高，行动太左，将使农村中一切地主、绅士、团防，都与我们的运动发生冲突。结果不仅阻碍工作的发展，亦且影响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

我们同志应引出许多事实向农村中宣传下述的意义，中国各阶级的人民，无不饱受了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的祸害，尤其是乡村的民众受害最烈且最普遍（都市的买办阶级与官僚，是与帝国主义暨军阀勾结分肥的）。虽然在表面上，乡村人民的经济地位贫富不等，然因洋货侵略的结果，农村经济完全破坏，失业者日渐增多，更遭军阀之蹂躏，贫者固已逃生无路，死不得所，即富有者亦何尝不受物价高涨之影响，经济地位日渐动摇。且战祸延绵，政治黑暗，使人救死不赡；故大富者日即衰落，中产更难维系，其仅小有者，固早陷于冻馁矣。故挽此共同之危局，惟有合力消灭此互结为

恶之两重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

本党之从事农民运动，乃深知帝国主义与军阀危害中国的根基完全建筑在剥削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利益上面，若此根基不予铲除，国民革命久不能实现，故欲唤醒农村各阶级的人民，认识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罪恶，一致团结，努力国民革命，以求解除自身的痛苦。

若非甘为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爪牙，如贪官污吏及恃富为恶的土豪，应该皆可接受本党的宣传。本党在农民运动中，对于各阶级的政策，应当以雇农佃农自耕农为主体，而与中小地主及士绅商人等建立联合战线，以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贪官污吏（军阀的爪牙）及土豪劣绅（土豪的爪牙）。我们固不可认贼作子，尤不可误反为敌，坐使敌人的联合战线扩大，而自己却退在孤立的地位，这是要深切注意的。

兹根据本省数月来工作之经验，规定对乡村各方面的态度与政策，各同志，尤其是专力于农运之同志，务须遵照各项之规定，从事宣传与组织，以期于最短期间扩大本省农民运动，成立县乡各地农民协会，建立坚固不拔的革命基础。切不可有渝斯旨，错误宣传，致发生破坏国民革命运动过程中联合战线的危险。

对各方面的策略

一、对湖南现政府所取的态度

只要现政府能确定与国民政府合作，及反对吴佩孚的政策，并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以及工农团体的发展，我们当竭诚与之合作。我们的活动须尽量纳入合法的形式，如农民协会，统向官厅立案，及有事依合法手续，向官厅起

诉，请求豫决等。总之，遇事要避免暴动和不必要的冲突。

二、对农村中各方面所取的态度

从前我们对于本问题所定的策略，因为没有实际的经验，有一些不能适用。而同志们在执行的时候，又超过原定策略的限度，发现许多左稚的地方。结果是我们还不曾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进攻，而一些可以与我们合作的（如开明的地主及正绅等），已因误会不予我们同情了，甚至他们也就开始向我们进攻了。我们现在规定我们的态度如下：

（一）团结雇农、佃农、自耕农；

（二）与中小地主取联合战线（收租谷百石至五百石者为小地主，收租谷五百石至一千石者为中地主，千石以上者为大地主）；

（三）使不积极作恶的大地主中立；

（四）联络正绅，反对劣绅；

（五）我们要打倒贪官污吏；

（六）我们要打倒土豪（土豪地主阶级中积极作恶，甚至利用团防局残杀平民的分子）。

三、民食问题

湖南近年连遭水旱及军阀之刮削，谷价高涨，荒民遍于各县；此问题，在此时的我们，实无单独负责解决之可能。从前之办人民救灾会，实为借此以揭破赵恒惕以赈灾名义，刮款捐款借款之黑幕，此时局势已与此前不同，故我们的策略亦当稍有变动。现在重新规定关于民食问题的策略如下：

（一）对救灾会采放弃消极态度；

（二）鼓动正绅从事赈灾发种，及向政府请求赈济等事项，我们努力参加赞助；

（三）关于查仓、阻禁、平价、派粜……事项，我们须与正绅合作办理；我们即有所主张，亦应以适当形式出之，不应离开正绅单独地行动（如强定谷价买卖等）。

四、农民运动与地方自治

农民对于地方自治，从前十分不负责任，实为错误。以后我们应指导农民合法地参与选举地方公职人员，或被选为地方公职人员等事，农民协会对于地方公益等事（如修路、筑堤、水利、森林、合作社等），应注意参加，但对于地方行政（如债权债务之争执、缉盗清匪等），不应积极地干与。

五、农民协会与旧农会

在现在的政治之下，旧农会还是所谓合法的团体，农民协会，还是新奇的组织。在这个过渡的时候，我们的同志，在农民运动中，在农民协会与旧农会的关系上，应依照下列的规定去工作：

（一）以在本省县乡一律公开地组织农民协会为原则，但遇特殊情形不能公开时，仍应保存其秘密组织；

（二）农民协会会员，一面须尽可能取得旧农会，以免劣绅土豪利用旧农会——所谓合法的机关压迫农民；

（三）在农民中宣传旧农会的组织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

（四）在旧农会内对贫苦农民暗示，使之同时加入农民协会；

（五）农民协会会员在旧农会内一切言动，均须站在农民协会的政策上；

（六）平静时，农民协会与旧农会取合作态度，地主与贫民有冲突时，应设法使旧农会居调停地位。

六、农民运动与农村小学校小学教师及塾师

小学教师、塾师及农民三者之经济地位，大概相同，塾师与小

学教师比较，仅只是思想上落伍。农村小学教师实际是天然地站在输送新思想于农村的地位，现在有许多小学教师，已经尽了这种职务，许多小学校也已经变成了各地方农民运动的机关。我们现在对于农村小学校小学教师、塾师，应照下列的规定，去进行我们的工作：

（一）对小学教师输送革命思想，并努力吸收小学教师加入本党；

（二）设法督促每个小学教师，均在省城农村补习教育社统一指导之下，办理成人补习教育；

（三）尽量利用小学校或其他学务机关，做农民运动的机关；

（四）农民协会努力援助小学教师，完成各种最低限度的经济要求（如加薪等）；

（五）对私塾不加反对，并向塾师宣传，使同情于农民运动；

（六）对小学教师与塾师的冲突（如塾师及小学校学生、小学教师倡议取缔私塾等），不卷入旋涡，更不左右袒，于可能时为之疏解。

七、对团防局所取的态度

团防局固然是土豪用以压榨平民拥护自身利益的一架机器，但我们不是绝对不能使之为被压迫民众而尽力，因为团丁多半就是农民，其办事人乃至局长多是地方的正绅、小学教师，或其他明白事理之知识分子。

故我们目前对团防局之工作，应（一）从其上层以至下层，努力向之宣传，介绍团员入党；（二）扶助小地主、正绅、小学教师，及其他不压迫农民的分子，取得团防局之职务。使团防局从少数专横的土豪手里，移到他们的手里。

八、对慈善团体及慈善堂同善社等所取的态度

我们对慈善事业团体（如慈善堂积善小补堂等），应取相当的联络；我们对于专门宣传迷信的团体（如同善社等），暂不加反对。

九、对教会所取的态度

我们对于教会，在口头宣传上，应该极力说明教会为帝国主义的先锋。我们要说明他是一方面替帝国主义做侦探，侦察中国内地情形——政治经济民情风俗究竟是个怎么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反用着“和平”“博爱”等说着好听的名词，甚至用一些金钱出来收买民众对于他们的信仰。他们想把所有被压榨的民众，一齐都欺骗下去。他们想引导着一般被压榨的民众，都忘掉他们自身生活的痛苦，以保证帝国主义压榨民众基础之巩固与恒久；但在目前，我们不要造出一个与他们发生实际的冲突的机会，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他们与军阀勾结，处处藉口条约保护），使我们只能取如此一个态度，如果遇着教会，他们明显地实际为恶（如霸占田庄、压买民房等）的时候，我们便须鼓动公愤，群起反对，我们在此时努力参加。

十、对土匪所取的态度

多数的土匪是由农民失业而产生的，换一句说话，有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榨而后有土匪。他们用抢劫做方法，去反抗现社会，我们自然不赞同。但他们因生活困苦，要求生计问题的解决，我们当然是与之同情。所以我们现在不提出整个的打倒土匪的口号，而只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口号，这就是我们要除去所有土匪的原因。但是如果遇到有某一部分或某一个土匪，为压迫阶级所利用，来压迫农民，我们便须分别地反对。

十一、对于与军事政治有关系的农民运动

本省农民运动，应特别注意与军事政治有关系的地方，如湘南

注重湘粤、湘桂交通要道，湘东、湘西注重铁路贯通、水运便利、省会邻近以及全省汽车道路、产业机关，并须注意凡有工运的地方，农运须与之密切联络。

十二、工农联合

本省的产业工人（如水口山、锡矿山、第一纱厂安源、“此处运动由中央划为省部管”及株萍粤汉两铁路等处的），我们的农民运动，应与之密切地联络，结成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在一切农民群众中，尤应宣传工农必能切实联合，革命的力量乃大。

十三、农民运动与本党组织之发展

本党为指导农民运动之中心，在农民运动中如果我们不努力去发展本党的组织，其结果一方面因为缺乏本党多数同志的领导，必将使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强健，农民运动的发展不迅速，甚至将要招致一些可以避免或是不应有的压迫。一方面因为农民协会以外缺乏本党的党员做应援的工作，必将使农民协会于行动时陷于孤立。所以我们于农民运动中，应照下述的规定去工作：

（一）努力在农村中发展本党的组织，及党员之数量。我们要在每一个最低级的农民协会的所在地，至少成立一个区分部。

（二）我们对于雇农、佃农、自耕农、小学教师及其他比较明白的知识分子，如手工业者、商人、团防局职员、团丁、正派的团绅、同情于国民革命之地主，均应使之加入本党。

十四、假借农民协会名义破坏农运问题

我们已发现有人假借农民协会的名义，作欺骗农民、破坏农民协会的勾当。他们有的利用失业游民作恶，破坏农民协会的名誉，有的利用家族观念，集合其一姓子弟，假名农民协会，饵以一时小利，破坏整一的革命的农民运动。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应照下列的

规定去工作：

（一）切实宣传我们的农民运动的意义，使一般被压迫的乡村民众，都能了解革命的需要，不受他们的愚弄，只要宣传得好（农民利害应该一致，对乡村各阶级的口号莫失之过高），组织严密（我们的力量日日强大），反对的人必然有所顾忌（小资产阶级的人，安土重迁，身家姓命，极其要紧），而不敢轻于反对我们；

（二）随时防止破坏的行动；

（三）使家族的首领分裂，而取得底下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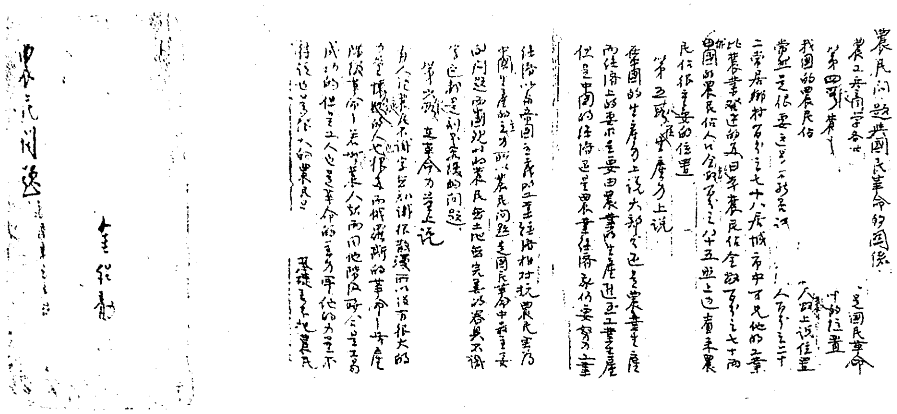
十五、整顿下层组织

我们为应付环境起见，定了上述种种策略。但这些策略绝对不是右倾的，乃因时制宜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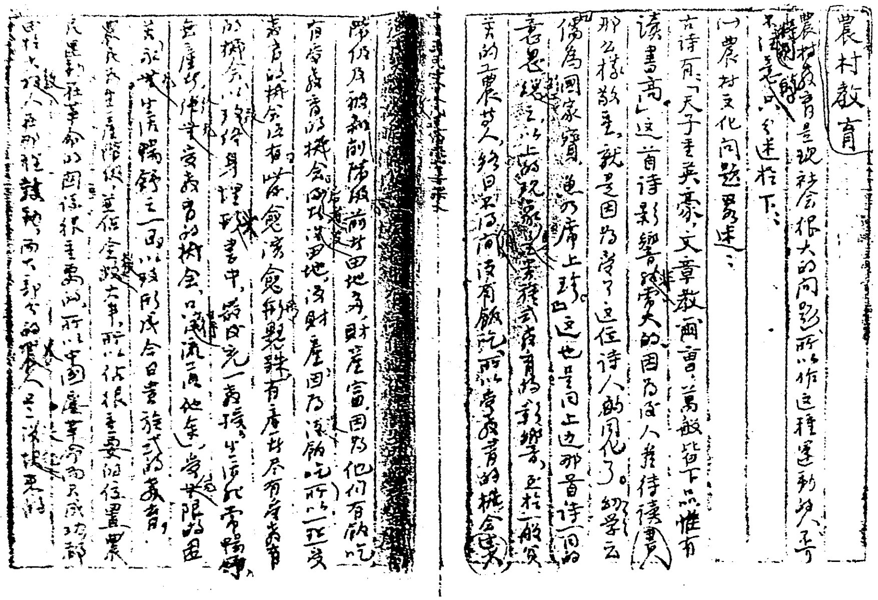
我们相信经济地位低落的穷苦农民，其需要革命，较之乡村各阶级必能格外勇敢，格外忠实。我们应多吸这类觉悟的分子加入本党，加入农民协会，作为农民运动的核心，我们的农民运动才算有了基础。决不容稍事游移。疏懈下层组织，反而失去工作的重心。

上述种种策略，都是为欲巩固下层组织而定的，若工作失了中心的意义，即是丧失了这些策略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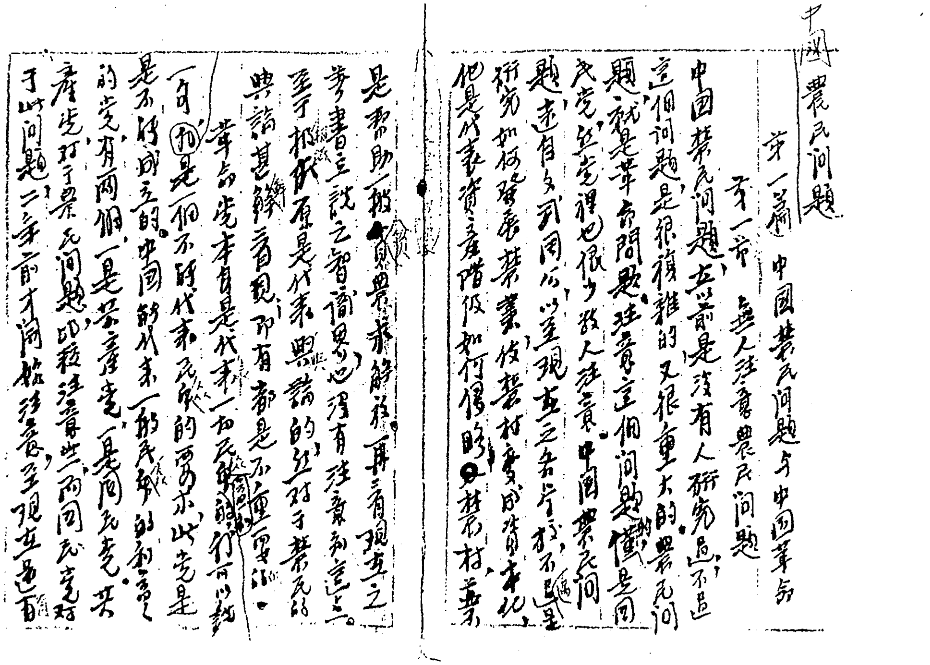
1926年5月，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毛泽东亲任所长。图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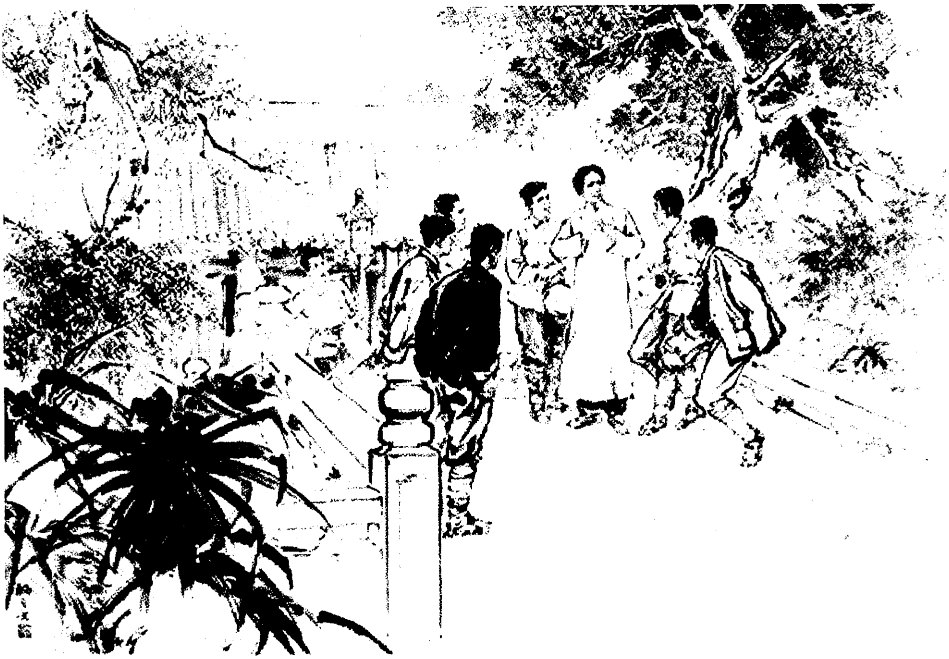
1926年，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图为农讲所学员听毛泽东讲课时的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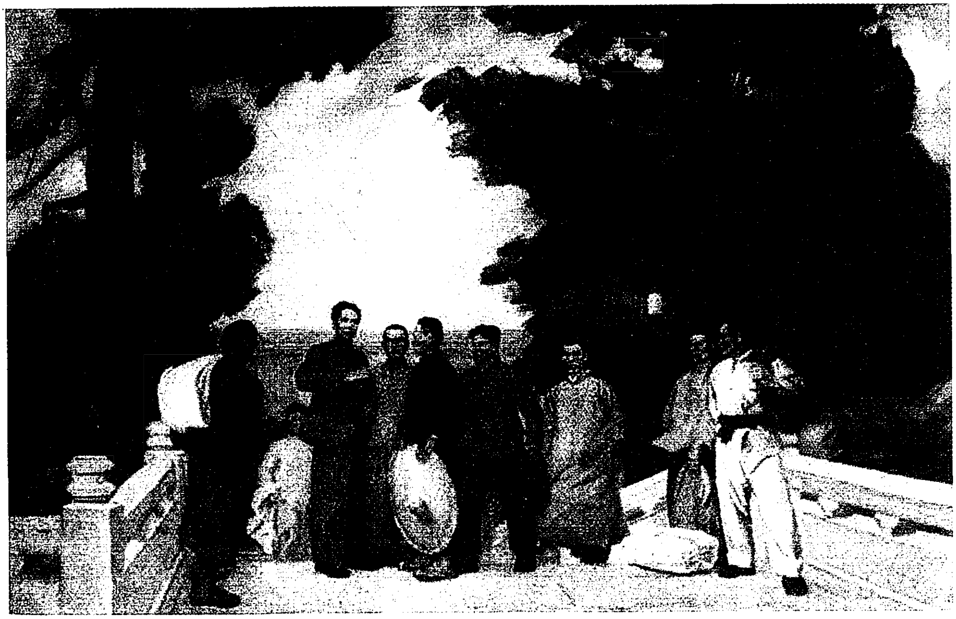
农讲所学员听毛泽东讲课时的笔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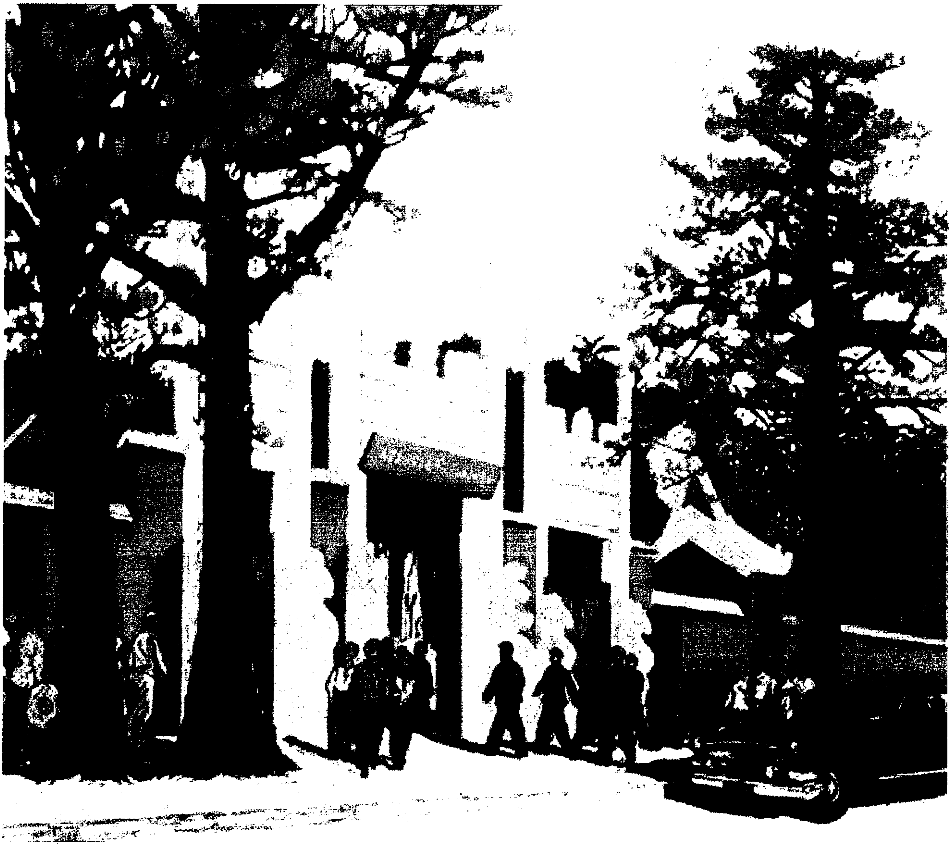
农讲所学员听毛泽东讲课时的笔记。



《毛泽东同志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画）



《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油画）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版画）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农民问题丛刊》[1]序

（1926年9月1日）

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这些道理，一直到现在，即使在革命党里面，还有许多人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国主义内而统治阶级，对于其地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求所以实现其压迫与榨取，则全靠那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所以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明显的例摆在广东：哪一个土豪劣绅、

---

[1] 《农民问题丛刊》，是毛泽东1926年5月至9月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主编的，旨在总结推广国内外特别是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以指导和促进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原计划出版52种，实际上出版了26种。

贪官污吏比较敛迹的县份，必定是农民运动已经做起来有了大的农民群众加入了农民协会的县份。换句话说，即是哪一个陈炯明势力削减的县份，必是农民起来的县份。我们无庸讳言：一年以前是陈炯明有广东，革命政府可以说并没有广东；一年以来到现在是革命政府与陈炯明平分广东天下，虽然陈炯明自己不在广东境内；往后须得农民从广东各县逐渐地起来，才可以确实证明陈炯明的势力从广东各县逐渐地减削下去。陈炯明的故乡，历来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猬集的海丰县，自从有了五万户二十五万人之县农民协会，便比广东任何县都要清明——县知事不敢为恶，征收官吏不敢额外括钱，全县没有土匪，土豪劣绅鱼肉人民的事几乎绝迹。因此，乃知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全中国各地都必须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胜利，不然任便怎么样都算不得。全中国各地必须都办到海丰这个样子，才可以算得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确实起了动摇，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因此，乃知凡属不重视甚至厌恶农民运动之人，他实际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际上即是不要打倒军阀，不要反对帝国主义。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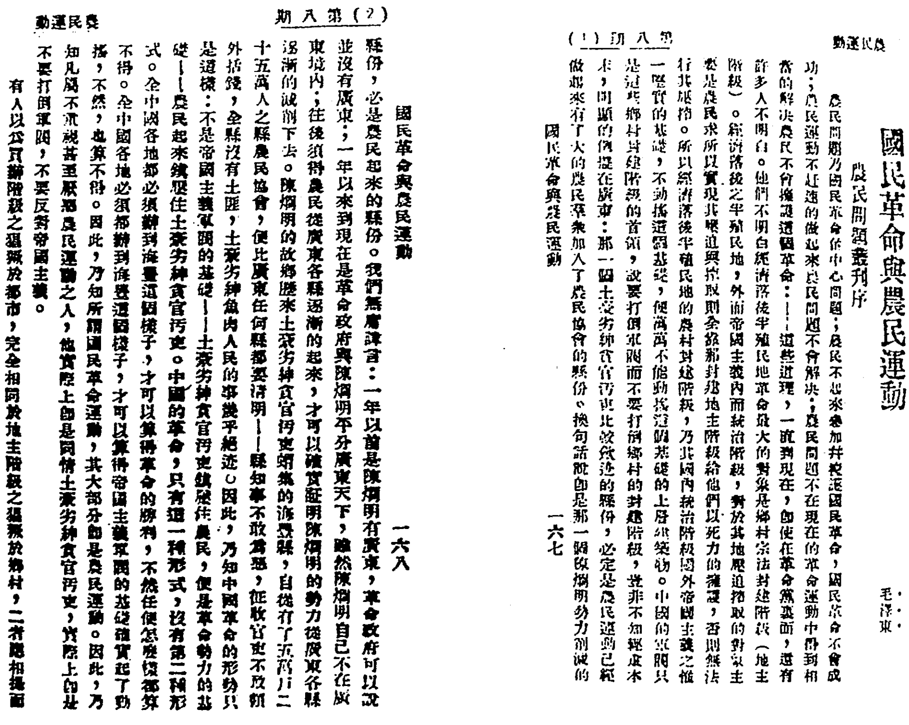
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括得来，买办阶级如银行公会等对北京政府有条件的借债，究竟比较甚少。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基此理由，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的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我们预计：全国三万万以上农民群众当中，以十分之一加入农民协会计算，可以得到三千万以上有组织的农民。尤其是南方的湘、粤、赣，北方的直、鲁、豫，中部的鄂、皖几个政治上特别重要的省份，应该下大力从事组织。有了这几个重要省份的农民起来，其余省份的农民便都容易跟着起来。必须到这时候，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能确实动摇，国民革命才能得着确实的胜利。

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种材料的搜集自然要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才能日即于丰富，目前除广东外各地农运都方

在开始，所以材料是异常贫乏。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内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的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从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我们应该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材料，本书只收得五种（第二十二种至第二十六种）。关于此问题的材料并不是很缺乏，为了出版仓卒搜集不及，他日尚当另外编印。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这部书内关于广东的材料，占了八种，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

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从五年来各地的农民运动的经过看来，我们读了这部书的广东农民大会议决案、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及广宁普宁两个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不由得不有此感觉。本书对于外国的材料也搜集了一点（第十五种至第十八种），但是太少。各国尤其是俄国的农民运动农业经济的材料很多，可惜没有人详细地翻过来。本书内惟俄国农民与革命一篇算得比较的详细，我们亦很可以拿来与中国的情形比较一番。



農民運動　第八期（1）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農民問題叢刊序

毛澤東

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這些道理，一直到現在，即使在革命黨裏面，還有許多人不明白。他們不明白經濟落後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經濟落後之半殖民地，外而帝國主義內而統治階級，對於其地壓迫榨取的對象主要是農民。所以實現其壓迫與搾取則全靠那封建地主階級給他們以死力的擁護，否則無法行其壓榨。所以經濟落後半殖民地的農村封建階級，乃其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之惟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便萬萬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築物。中國的軍閥只是這些鄉村封建階級的首領，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豈非不知輕重本末，問題的例證在廣東：那一個土豪劣紳貪官污吏比較斂迹的縣份，必定是農民運動已經做起來有了大的農民羣衆加入了農民協會的縣份。換句話說即是那一個陳烱明勢力削減的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一六七

第八期（2）　農民運動

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　一六八

縣份，必是農民起來的縣份。我們無庸諱言：一年以前是陳烱明有廣東，革命政府可以說並沒有廣東；一年以來到現在是革命政府與陳烱明平分廣東天下，雖然陳烱明自己不在廣東境內，往後須得農民從廣東各縣逐漸的起來，才可以確實證明陳烱明的勢力從廣東各縣逐漸的減削下去。陳烱明的故鄉歷來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蝟集的海豐縣，自從有了五萬戶二十五萬人之縣農民協會，便比廣東任何縣都要清明——縣知事不敢爲惡，征收官吏不敢額外搭錢，全縣沒有土匪，土豪劣紳魚肉人民的事幾乎絕迹。因此，乃知中國革命的形勢只是這樣：不是帝國主義軍閥的基礎——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鎮壓住農民，便是革命勢力的基礎——農民起來鎮壓住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中國的革命，只有這一種形式，沒有第二種形式。全中國各地都必須辦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得革命的勝利，不然任便怎麼樣都算不得。全中國各地必須都辦到海豐這個樣子，才可以算得帝國主義軍閥的基礎確實起了動搖，不然，也算不得。因此，乃知所謂國民革命運動，其大部分即是農民運動。因此，乃知凡屬不重視甚至厭惡農民運動之人，他實際上即是同情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實際上即是不要打倒軍閥，不要反對帝國主義。

有人以買辦階級之猖獗於都市，完全相同於地主階級之猖獗於鄉村，二者應相提而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农民运动》第八期上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

致中央农民部陈克文函[1]

(1926年9月16日)

一

克文兄：

陕西办事处特别委员会可以指定下列五人为委员：亢维恪、李维屏、李秀实、王述绩、杜松寿，以亢维恪为书记。

泽东
十六日

二

克文兄：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陈克文的两封信。陈克文，广西岑溪人。从信函的内容判断，陈克文当时的职务应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相当于农民部秘书长）。1927年7月，陈克文以农民部秘书职务代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氏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行政院参事；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秘书长等职。陈氏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云南办事处负责人，学生内可以指定周霄、陈能新二人[1]。周颇好，陈亦比较好。其余一人，据新滇社云南同志王懋庭君说：宜指定一现在昆明进行党务及民众运动的同志，方足以资联络，据他说有李鑫同志者，北京农大毕业，在滇从事工作，可胜此任，特此奉闻，请酌定。云南办事处简章，学员们已写好，请核准。各省经费不宜呆定，每人发薪三十元，恐怕他们援以为例，事情未做，一点钱都作薪水瓜分了。此点于他们领钱时，兄宜为之说明：要经济地用，可以不发薪水的便不发薪水，不需要发三十元的便不发三十元，三十元是至高度的数目，务宜节出一点钱作活动费。今天无船开，明天大约有一只船开，到明天，剩留的便在一百人以内了。路费竟超过小洋三千元，前交政委预算数目太低，除直、察两省外均不够。譬如四川，前只定大洋五十八元，现须加至七十四元，此数据学生说还是很紧仄的，因宜渝间上水船价特贵。每人增加十六元之多，四川学生二十五人共增四百元，其余各省均须增加，每人大洋月二元、四元、六元、八元、十元不等，故总数在小洋三千元以上。明日即可做好公文，连同路费增加理由表，请农部转政治会议议决。《农民问题丛刊》已印出十七种，先付上两份，我兄一份，甘先生[2]一份；其余有十种已付印，不久可出；有约二十种尚在编缮

---

[1] 原函旁注：书记可指定周霄。

[2] 甘先生，即甘乃光，当时任国民党农民部部长，《农民运动》发刊词即出自甘氏之手。他同毛泽东、林祖涵、阮啸仙、罗绮园等人同为国民党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还是第六届农讲所的教员。1926年5月28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任命甘乃光为农民部部长，参见《中国国民党职名录》第52页。甘乃光、陈克文在当时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农民运动》两个刊物上都发表过大量有关农民运动的文章。

中，印出尚需时日。一俟印出，当付若干与我兄、甘先生及农部。甘先生同此。

敬颂日安！

王君[1]今日来农部奉谒，已见否？

弟　泽东上

九月十七日

再，江西农运以前成绩太坏，宜由尊处指定学生五人组一农运委员会，在省农民部下做指挥农运的工作。江西不宜设办事处，因已有省党部，然农运委员会则十分必要。江西学生中颇有几个好的，可以任委员。陕西的亦宜设委员会，不宜用办事处，亦因已有省党部。愚见如此，祈酌定。

泽东　又白

---

[1] 王君，指王懋庭。

附一：

云南农运特派员规定符号[1]

原名	符号
周霄	邹孝
陈能新	熊新
郐光璧	武光国
施瑞林	方端
李敬民	吕兴
罗彩	林实
黄丽生	邝定锦
朱毓光	牛光

---

[1] 云南农运特派员八人中，周霄、郐光璧、施瑞林、李敬民、罗彩、黄丽生六人都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一书所确认的毕业生，但名单中没有陈能新、朱毓光二人。但据这封信可以肯定，陈能新、朱毓光二人都是第六届毕业学员。

附二：

云南农民运动特派员办事处简章

云南因省党部尚未正式成立，农民运动正在萌芽时期，中央农民部为发展云南农运起见，特派员前往组织。以后关于农民运动一切事项，完全受中央农民部之指挥，至省党部成立再行呈请中央农民部核办。其简章如下。

第一章　组　织

第一条　办事处由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组织之。

第二条　办事处之名称及所在地：

一、名称——云南全省农民运动特派员办事处。

二、所在地——暂设昆明，但可随工作需要移动。

第三条　全体会为办事处最高级机关，经干事会议决或全体三分之一以上特派员之请求，得随时召集，以审核干事会工作并解决一切重大事件。

第四条　办事处干事会由中央农民部指定书记一人、干事二人组织之。

第二章　职　权

第五条　办事处传达中央农民部命令于各特派员。

第六条　办事处转报所汇集之各特派员报告于中央农民部。

第七条　办事处秉承中央农民部之命令及全体会议决案，有指挥及监督各特派员之责。

第八条　办事处每月汇集各地工作活动经过详细情形，作有系统之报告，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九条　办事处如有特别事件发生，除一面切实调查设法应付外，并将应付方法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十条　办事处组织各级农民协会须先经干事会议决并呈报中央农民部核准。

第十一条　办事处应将特派员工作区域及运动计划于一定期间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十二条　办事处干事会至少每月开会一次。

第十三条　办事处根据工作情形有请领及支配经费之责权。

第三章　纪　律

第十四条　特派员有怠工及违背决议时，由书记召集干事会或全体会议决处分，但处分后须呈报中央农民部，并在下次全体会报告。

第十五条　干事会有旷职及违背决议时，经三分之一以上特派员之弹劾得召集全体会议决处，并呈请中央农民部改派。

第十六条　全体工作计划无论何人均须严守秘密。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办事处章程如有未尽妥善处，得在全体会议时修正之，但事后须呈报中央农民部。

第十八条　本章程于办事处宣布成立之日发生效力。

附三：

云南农民运动办事处开办费预算表

类　别	用　途	用　费	摘　要
住所	押佃金	二十五元	本省租屋须先交押金，即保证金之类
用器	桌二张	五元	
	椅八把	十五元	
	床板二付	五元	
文具	文房用具	五元	
	油印机	二十元	
杂费	一切零星	五元	
合计		八十元	
附记	一、以上各项费用均系从俭酌划，用于初成立时，至于办事期间一切开用，尚未列入预算。 二、以上预算数目均以小洋计算。 三、押佃金一项为租屋时必需之款，于退租时如租金不欠，则原数退还，仍可拨归他用。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

（1926年10月25日）

江浙两省在中国为工商业特别发达之区，因此工人商人的地位容易被人重视，至于这两省农民，便少有人重视其地位，而且多以为两省乃太平富庶之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其实这种见解完全是皮相，完全是不明白江浙农村实际状况之谈。我们试一考察江浙农村之实际状况，便知道实际情形与思想完全相反。以下所述各县具体事实，只算我们近来得到的一极小部分材料，然已足证明江浙农民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太平富庶无多痛苦的农民了。

崇明　长江口之一岛，岛之全域为崇明县，均长江泥沙沉淀冲积而成。岛之四周年涨新沙，因此沙田甚多，佃农甚多。今举上沙一地为例。此地地主剥削佃农非常利害，每千步田要纳保证金五十元。这种田完全是新涨的沙田，农民逐渐替地主们经营成熟。成熟后，地主管田底所有权，农民管田面的权。每年耕种所用人工、肥料、农具、种子等均归农民自备。秋收后每千步田要纳租谷五百斤甚者五百斤以上。地主到农民家里的时候，农民要请他吃好酒饭，不然便难免加租，收租的秤，大概都在二十两以上。农民如稍反抗，马上送县究办。农民若今年欠了五元租，明年就要你还十元二十元，又不得不还，于是农民破产者年年有之。此地农民曾在民国十一年起了一个暴动，并没有什么赤党过激党煽动他们，他们自己

成群地起来打毁警察局，割去地主陶某的耳朵，并大闹县署要求减租。后因团结不固，首领被捕，以致失败。今年江苏遭了普遍的旱灾，田亩减收，上沙地方每千步田农民只收谷三四百斤，而地主缴租却坚持要照旧例缴五百斤。地主且以“佃业维持会议决”以欺农民（佃业维持会系十一年地主组织以欺农民的），于是农民恨地主益深，暴动又将发生了。

江阴　从无锡乘轮船前往，到一处地方，叫顾山镇。这顾山镇介在江阴、常熟、无锡三县之间，三县大地主很多，压迫佃农很厉害。去年秋天，有一个日本留学生顾山人周水平（周原在无锡省立师范毕业）回到本乡，看不过眼，乃劝佃农组织团体，名曰“佃农合作自救社”。周往来各村，宣讲农民痛苦，声泪俱下，顾山农民从者极众，江、常、锡三县交界各地农民都为煽动，如云而起，反对为富不仁之劣绅大地主，一致要求减租。但农民尚未完全联合起来之时，劣绅地主早已联合起来，江阴、常熟、无锡三县绅士地主同时动作。文电如云片告到孙传芳，孙传芳哪有不听劣绅地主的话，于去年十一月便把佃农户合作自救社解散，把周水平捕获，今年一月便把他枪毙了，减租运动算是一时镇压下来。当周水平灵柩回到顾山安置在他家里时，农民们每日成群到他灵前磕头，他们说：“周先生是为我们死的，我们要给他报仇！”今年大旱，稻收成不好，农民又想起来要求减租。可见他们并不怕死，他们知道只有团结奋斗，以减少贪暴地主的剥削，才是他们的出路。又江阴东乡有一名叫沙洲的地方，亦有农民反对地主的事。此地主苛例为交上期租，江苏人所谓寅交卯种，是一件于农民经济上很痛苦的事。现在农民要求种田还租，正在那里奋斗。

丹阳　这里述丹阳县吕城镇的两件事（这吕城镇在丹阳县东

乡，靠近沪宁铁路）。一件是反抗当铺欺剥农民。事在今年夏间，吕城镇上有一家当铺，一天被马玉仁残部在县西茅山为匪者到境抢了一回，但所抢不多。当铺主人即鸣控报失，说典当的衣物都抢去了，同时密将衣物乘夜移藏他处。这些衣物的当户即近镇各村农民，闻讯，邀截于路，得原物之一部，但已被藏之部未得。典物的农民乃起而组织“当户联合会”，向吕城镇当铺算账。结果，当铺赔偿损失一部，即每人赔偿等于当价之数目，共赔了九百块钱。此事证明农民有团结便可得到胜利，设这回没有团结，便让奸狡的当商欺剥了全部的当物去了。又一件是反抗劣绅富农强迫农民缴钱戽水。事在今年夏秋一直到现在尚未了结。江苏各县农村的河里，现在很普遍地采用一种机器戽水，叫做“戽水机器”，以代替旧法的手车脚车车水。吕城镇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感觉得要戽水改用机器。但这个地方的劣绅及富农便乘机图利，抢头先做，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公司”，集合资本一千四百元，买来一架机器，安置在河里，用公司名义出布告，要农民每年按亩出钱，若不出钱不准戽水。农民们一打算：所有这几村的田一年按亩缴纳的钱，即够买一架机器，集资自买一架，一次出钱，年年可用，用公司的机器，则年年要缴这样多钱，于是大多反对劣绅富农的公司。本地有几位小学教员颇帮农民的忙，帮他们组织一个团体，叫做“农民促进会”，在这个团体内，组织一个“机器戽水合作社”，办法也是农民按亩出钱，自凑足一千四百元，买了一架戽水机器。于是河里有两个戽水机器，一架是公司的，一架是合作社的，公司的一架完全摆在那里没有人理会。劣绅气极了，用种种诬词告到孙传芳那里。结果派兵下乡，大索过激党，捕去四人，通缉三人，声言不用公司机器的人都要重办。当兵来时，村中壮年男女都躲在禾丛中，只留下老弱妇

女小孩见兵士的面。这些犯了重罪的农民，单是送兵太爷免捕礼就送了一千余元，其余被搜掠者不在内。此案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好在现在已是孙传芳不甚如意之时，吕城的劣绅们或者也稍稍感到难尽如意，亦未可知。

无锡　离无锡县城十五里之徐巷镇，不久之前也出了一件小小乱子。此地大商兼大地主的荣德生，他要在此地修一条马路经过农村，拆毁镇上房屋，廉价收买过路田亩，此事直接损害农民经济，故农民们组织农民俱乐部反抗荣德生。结果荣德生屈服，允许田二百元一亩，新植的桑苗一角钱一株，镇上房子不拆。

青浦　沪杭路侧之青浦县，上月内发生农民反对重价买荒之事。本县荒地，农民缴价买荒，历来定价每亩三元。此次劣绅串通县长林贞一，组织一公司，以每亩三元领得荒地，而以每亩十二元卖给农民。农民组织垦务联合会反抗，劣绅官厅则多方恐吓。现仍在争持中。

泰兴　东乡王家庄地方，今年因旱少收，农民要求减租，与地主起了激烈的斗争。地主不但不肯减租，反压迫农民，农民中之一人因恨极图杀一万恶之地主。地主报县，捕农民三十人入狱。

泰县　泰县森森庄地方之农民，今夏因旱请求减租，起了一个运动。地主压迫，捕去为首数人。

徐州　江苏农民中江北徐海一带算是最苦，红枪会连庄会到处皆是，农村各种争斗，比他处更多，缕述不尽。铜山县东乡北乡等处地势洼下，去年禾稼淹没殆尽。所幸二麦已种，农民尚有“转过荒年有熟年”之希望。今秋淫雨连绵，田间禾苗终日浸在水中，由萎黄而腐烂，农民辛勤半载，落得两手扑空。此时地中仍是积水片片，二麦播种无期，怨声载道，莫不表现一种凄惨愁苦的状态。天

灾之处，同时还有横征暴敛之军阀贪官与重租重利之劣绅地主，层层敲剥。因此农民流而为匪者极多，徐州一带，所以成了著名之匪区以此。

慈溪　慈溪属浙江，在宁波之西，近月本县山北地方曾发生一次大的暴动。这山北地方的农民本是很强悍的，时常有械斗的事发生，加以近年官僚警察无理的压迫，劣绅地主加倍的剥削，农里积愤已深。恰巧今年晴雨不均，稻和棉花都没有收成，那地主的铁租又一些儿都不肯减，农民的闹荒暴动就因此爆发了。农民的暴动一爆发，一般游民无产阶级都很勇敢地参加进来。九月十三日上午，聚积两千多人到警察局报荒，和警察冲突起来。他们把警察署焚毁了，把警察的枪械也缴了，又转至乡绅地主家“吃大户”。吃了以后，因愤乡绅地主的凶恶，把他们的屏画古董门窗壁络都捣毁净尽，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也不大听人劝导，只是这样发泄他们的忿气。

隔日乡绅逃至城内告发，军警陆续下乡大搜农民，农民领袖多已逃散，“犯法”“犯罪”已成了普遍的宣传，农民因此胆怯起来，这个暴动就镇压下去了。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在群众完全没有组织，又没有指导，所以成了原始的暴动而至于失败。

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

（1926年10月27日至28日）

一

本党最重要之政策为农民政策，预征钱粮足使农民对本党发生怀疑，不如用公债一法取之于少数有钱人较为可行。

二

昨据宋部长说，预征钱粮不过仅收得二三百万元，何苦以此区区之数使数千万农民或大多数人民怀疑我们的决议案是不能实行呢？本席仍旧主张发行三百万殷实公债，向殷实商人募集。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关于“不得预征钱粮”，于1926年10月27日、28日在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上的两次发言的一部分。本篇三是28日关于联席会议的地位和权能、联席会议决议是否有效的问题的发言的一部分。

三

联席会议的性质，于开会时谭主席已说得很清楚。[1]今天丁同志[2]忽然提出疑问，真是怪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

---

[1] 谭延闿在开会词中说：因为北伐已得到相当的胜利，“我们应该有新的应付方法，所以由中央常务会议及政治会议讨论，以为应该召集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来决定方针，但一时又不易召集，如果召集中央全体会议，人数又不很多，所以请各省派人加入，大家来开会讨论一下”“这次开会凡到会的都有议决权”。

[2] 丁同志，即丁淮汾，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挽罗宗瀚[1]烈士联[2]

（1926年10月）

羡哲嗣政教长才[3]，竟成千古；
叹吾党革命先锋，又弱一个。

---

[1] 罗宗瀚（1896—1926），字耻迂，湖南安化县伏口镇（今属涟源市）人。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4年。1926年北伐军入湘，湖南省政府改组，他一度出任湖南省建设厅秘书。当时，他是国民党左派，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坚持国共合作，支持工农运动。同年10月，因积劳成疾，入田秋明诊所治疗，被北洋军阀派人在药中暗下毒药，口鼻出血暴卒，年仅30岁。

[2] 这是毛泽东挽国民党左派、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和挚友罗宗瀚的对联。1926年10月，罗宗瀚被北洋军阀用毒药暗中毒死。同年冬，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大礼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800多人参加。各界人士赠送挽联500多副。毛泽东从广州将此联写给罗宗瀚之父。

[3] 哲，才能识见超越寻常的人。哲嗣，称别人之子的敬词，犹言令嗣。这里指罗宗瀚。长才，犹通才。《世说新语·赏誉》："太傅府有三才：刘庆孙长才，潘阳仲大才，裴景声清才。"谓刘舆、潘滔、裴邈三人。

目前农运计划[1]

（1926年11月15日）

（一）农运进行应以下列标准规定发展地方之次序：

1. 集会、结社自由较多的地方；
2. 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地方；
3. 沿铁路、沿江河交通便利的地方；
4. 农民经济上有特别之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之处。

（二）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

（三）在一省内亦应用集中的原则。如：

湖南——应注重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

湖北——应注重沿江沿铁路各县，尤其是武昌、汉阳、夏口三县。

江西——应注重从吉安经南昌至九江之一线。

河南——应注重京汉、陇海、道清三路沿线。

---

[1] 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自1925年扩大会议议决设立后，因种种原因，组织迄未完备。11月，毛泽东来任中央农委书记后，始正式决定以阮、彭、易、陆、萧、C.Y.七人合共组成中央农委，以委员一人常川驻局办事，另在汉口设办事处，就便指导湘、鄂、豫、赣、川农运工作，并拟出一目前农运计划。

陕西——注重关中道即渭水流域各县。

四川——以重庆、成都两处为中心，注重其附近各县。

广西——注重从百色经南宁至梧州之一线。目前特别注重范石生势力下之恩隆、奉议、恩阳、百色等县与已发展之东兰县联络。

云南——以昆明为中心注重滇粤路沿线。

福建——以永定为中心注重闽南各县。

浙江——注重宁波、绍兴二属。

江苏——注重崇明、江阴、丹阳、无锡、泰兴、铜山、睢宁等县。

山东——注重胶济、津浦两路沿线。

安徽——注重皖北，以寿县、合肥为中心。

直隶——注重京汉、京绥、京奉、津浦四路沿线。

直隶与京兆特别区应划分两个农运区域。在国民党系统下，直隶农运归直隶省党部管辖，以天津为中心，京兆农运归北京特别市党部管辖，以北京近郊为中心。

（四）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

（五）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并促成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设立办事处。

（六）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湖南的农民*

（1926年11月30日）

现时已有组织的农民

一、县农民协会的统计

正式成立县农民协会者：三十六县

已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者：一十八县

共计五十四县

二、人数的统计

（一）自本月统计的，三十县，五十三万六千一百三十七人

按上月统计算的，十一县，五万零五千人

无统计估算的，十三县，三万人

共计五十四县，计一百零七万一千一百三十七人

（二）有十万人以上的——四县

有五万人以上的——六县

有一万人以上的——十二县

有五千人以上的——十二县

有一千人以上的——十八县

不满一千人的——二县

（三）人数最多的县份有十四万人

人数最少的县份有二百七十四人

（四）各县人数统计表

说明：A. 为本月有详细报告的；B. 按上月报告推算的；C. 无统计估算的；D. 县协筹备处。

南县	A	七千	茶陵	A	一万一千二百六十六
衡阳	A	八万八千二百二十三	道县	A	一千四百三十五
资兴	A	五千	泸溪	C	五千
绥宁	A	一千一百	湘潭	B	十万
耒阳	A	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五	祁阳	B	五千
彬县	A	一万	湘乡	B	六万
浏阳	A	十三万九千一百九十	？	BC	一千
攸县	A	一万	长沙	A	七万一千四百五十
醴陵	A	五万	宝庆	A	三百七十七
华容	A	一万	临湘	OC	五千
汉寿	A	七千二百二十九	常宁	OC	五千
蓝山	A	三千五百五十	宁德	OC	一千
桂阳	A	六千二百四十三	安乡	OC	二千一百
新田	A	五千一百五十	新宁	C	一千
酃县	A	五千四百六十八	溆浦	C	一千

宜章	A	七万四千一百八十三	宁乡	B	五万
湘阴	A	一万七千六百	新化	OA	六千三百七十七
益阳	A	一万五千六百八十	临沣	OA	一千一百六十六
安化	A	六万二千三百	永明	OA	二千一百八十一
陵零	A	七百	汝城	OA	八千八百六十五
岳阳	OA	二千零七十	常德	OA	九千五百四十五
武冈	OC	五千	芷江	OA	二百七十四
沅江	OC	一千	城步	OA	八百八十九
?	OC	一千	嘉禾	OC	一千
江平	B	十万	桃源	OC	一千
来阳	B	十万	?	OC	一千
永兴	B	一万	沣县	OD	二千五百四十九

北伐中之农民参战

一、供给：北伐军所经地方，农民即均能供给饮料，或少数之食粮，代为煮饭等事。

二、向导、侦探：此种工作，沿株萍路、浏阳、平江、长沙湘潭、宁乡、衡山、南县、华容等处均有。

三、运输：农民自动受军队雇请运输者之外，有组织地替军队运输之事亦有。

四、扰乱敌军后方：湘潭、平江、南县、浏阳、沿株萍一带等处皆有。

五、参加战斗：死伤人数及夺得枪支尚无精确统计，大略如下：

1. 株洲：唐军二次攻入长沙时，农民与叶门，缴枪百余，及机关枪大炮等。

2. 醴陵：北伐军入长沙时，农民夺枪二百余及机关大炮等，十一月赣方败兵入醴时，农民缴枪甚多。

3. 平江：七月北伐军入平，农民参战死二十五人，夺枪数百支及机关枪等。十一月二师兵变，农民围缴变兵枪二百五十支，现政府要收此枪，农民反对，正在相持中。

4. 浏阳：农民救出被围北伐军一团，击退敌溃兵，有死伤，并夺得枪支。

5. 华容：一次蔡鉴军入华容，农民与驻军共同击退，二次蔡鉴入华容，农民三千余人单独击退蔡军。

6. 沅江：华容第一次击蔡军时，沅江农民参加。

7. 湘潭：农民设疑兵，助北伐军过河，攻击溃兵等。

8. 宁乡：救出被围北伐军一团，攻击溃兵，夺得枪支。

9. 株萍沿路：与敌军冲突毁铁道。

10. 长沙：围攻溃退军官，助政府围缴溃兵变兵。

六、农民参战之原因：

1. 党人宣传的效果，农民都知道北伐军是拥护工农利益的，要

援助北伐军胜利，农民然后才能得到利益。

2. 对北兵叶军之仇视，两方军纪比较，使农民仇视更深。

3. 受农民协会的指挥（有最少数是自动的）。

4. 在九、十月中农民之愿意参加战争，则为欲得到枪支，因此时农民武装的要求已经起来了。

七、农民参战之影响：

1. 农民政治观念之进步。

2. 农民自信力进步。

3. 使政府认识农民力量，影响政府左倾。

现在农民的倾向

一、农民已觉得他们参战有功，需要报酬了，就是没有参战的各县，也觉得党人的宣传应该兑现了。

二、经济的要求：这种要求已普遍有了农运的各县，下面的要求是最普遍：

（一）减租——还没有（耕地农有）不纳租的要求。

（二）减息——从八九分息减到四五分也就满足了。

（三）解决荒月食粮问题——形成了普遍的平粜阻禁运动。

（四）减捐税——少数地方有不纳捐税的要求。

（五）减押金，及不得无故退佃等——尚无明确的观念。

这些要求可说是很低，都是他们直接的，有些地方是各种要求都已起来，少数地方还只觉得一二种。在湖南近广东广西一带农民的要求，比湘中一带较高。

三、政治的要求：

（一）改造团防——他们对团防局人还非常注意。

（二）反抗都团——许多地方都团已经失了作用，毁打都团总的事甚多。

（三）希望一个好的政府。

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可说都还是非常幼稚。县长民选等口号农民固然没有感到，就是乡村的政治要求，也还只有消极的；至于反动派所造的“没收土地”“组织工农政府”这类谣言，更是连影子也没有。

四、武装要求：农民武装要求，现在日见急迫了。他们都愿从溃兵变兵手中夺得枪支，如此次平江农民的留枪运动（见前参战情形）非常激烈。

农民已起来的斗争

一、减租运动：

（一）衡阳的减租运动：衡阳的租额，表面是说东佃各半，实际上佃户得不到半数。自从民国五年因大水和增加教育经费的关系，全县渐次普遍增加了租，增加的数目虽然不是一律，却是没有不加的。这样一来，佃户所得，比从前原来不及五成的数目更少了。自唐离湖南以后，衡阳加入了农协的农民就有很迫切的减租要求。于是提出全县复租的口号，就是要恢复五年以前（民国五年以前）的租额。结果，全县都得恢复了民国五年以前的租额。农民在此运动中加入农协者，约七万人。同时反动分子也就在这次运动中团结起来了。这次运动可说是全县农民加入协会的和未加入协会的都参加了。

（二）各地的减租情形：除衡阳外，各地只有零碎的减租运动，某一个佃农民对某个田主减租。因为各地每当更换佃户或田地易主之时增加租额，有时加得太多的，佃户即请求减少。这种事实经农协替农民解决的甚多。这虽不是一个斗争，然农民因此对农协增加信仰。

（三）减租运动，本为各地农民急迫的要求，但收租期间已过，故未发生斗争。一般农民的观念，都以为明年减租的问题为有一番大斗争。

二、减息运动：

（一）安化已全县普遍减息成功，未发生特别反动。约由月息七八分减为四五分。农民亦认为满足。

（二）岳阳一部分农民的减息运动，尚未结果，大约可胜利。

（三）湘阴牛洲农民要求免欠息失败。

（四）各县都有减息运动皆无大冲突。

三、减押运动：

（一）浏阳全县减押金为每租谷一石，押金二元，已成功。但此后是否将有冲突，尚难断定。

（二）岳阳一部分湖田，地主拟租每石增加押金七元，农民已起而反抗，地主亦联络三县团对付，此事将有大冲突。

（三）各县尚有小的减押运动。

四、减税运动：

（一）攸县、醴陵、宜章，皆有减税运动。

（二）安乡已将全县亩捐取消，但增加田赋附加。

（三）岳阳一部分农运要求取消亩捐与团防冲突，尚未结果。

五、垦荒运动：

安化农民要求在冬月由农民自由种杂粮不纳租。一部分已成功，一部分尚在争持中。

六、平粜阻禁问题：

（一）起因：连年湖南均有灾荒，每到荒月，乡村中均缺乏食粮或食粮暴涨，于是形成了一种农民平粜阻禁运动。

（二）这个运动，可说是有农民组织的地方十之七八都有了，不过形式各有不同罢了。约有下列的各种形式：

1. 由农协或由乡民会议，议决谷价，不得高于此价卖谷。
2. 议定两种或三种谷价，并决定一种人吃某一种谷价。
3. 有限制地运谷米出境。
4. 谷米一概不准运出境。
5. 待荒月再议谷价，现时不议。
6. 只留租谷的几成。

（三）这个斗争引起来的冲突：

1. 闭粜：地主不粜谷，则强迫粜谷，甚至罚钱殴打。
2. 偷运：发觉偷运则将谷充公或罚钱。
3. 因议谷价而引起冲突。

（四）影响：地主商人都产生了大的恶感，即大自耕农，佃农亦不愿此办法，政府催还田赋，地主即推谷卖不出，政府对此举亦甚不满意。

（五）省农协的政策已决定只准留一部分租谷以备荒月之平粜，不准无限制地阻禁。但已成群众心理，一时甚难改变。

七、与团防的冲突：

（一）宁乡团防局长（在乡分局）已皆由乡民会议选举，及有农协组织之处，农民均极注意人选。

（二）岳阳

1. 团局禁止农民开会、冲突，农民请愿结果，团局解散。

2. 农民为抗亩捐与团防冲突，尚未结束。

3. 两团防冲突，击毙农民十余人。

（三）嘉禾团防枪毙农民。

（四）桂阳反动派勾结团防调兵入城解散农民协会。

（五）资兴团防强迫改组农民协会。

（六）湘潭农民反抗团防斗殴枪杀农民一人。

（七）牛洲（岳阳）团防禁止农民组织协会。

（八）各地均有农民与团防冲突之事，多为团防胜利。

八、与土豪劣绅的冲突：

农民与土豪劣绅的冲突，可以说是无时无地没有了。土豪劣绅对农民之进攻，也是一天一天地厉害起来。农民对他们殴打、控告、游乡、罚款、驱逐，无一不有。自然多数是由他们对农民进攻而引起民众的愤怒。

乡村政权情形

一、有些乡村已由农协取了政权。

二、乡民会议在许多县中都有了，可以为乡村最高立法组织。有少数县中的团防局长和乡董等，也可由乡民会议选举。

三、有少数地方有农协、教联、商协、工会等联合的组织取得了乡村政权。

四、有许多地方乡村政权已为国民党党部取得，同情或赞助农运。

五、多数地方仍由土豪劣绅把持以压迫农民。有农民协会的地方则时时发生冲突。

农民自卫的组织

一、湘南各县因唐生智的提倡，都有挨户团的组织。这种组织的指挥机关虽然是在绅士地主们手中，却团员及下层指挥人都是农民。在有农民协会的地方，自然不费力地成了农民的组织。挨户团没有枪械，多有梭镖（一种尖刀接以长柄的武器）、鸟枪、马刀等。多数有定期的操演，且有操演费（每次每人约五百文）。湘中各县如平江、浏阳、长沙……一带也有此种组织，但不普遍，且无操演费。他们此次参战及防匪，都能愿出很大的作用，组织人数无统。

二、湖南的农民，除挨户团以外，没有别种自卫组织。虽然以前有农民自卫军、自卫团等名称，皆因经费无法解决而停止了。

三、平江、安化、醴陵、湘潭……等处，农民夺有少数枪支（平江有二百五十支，尚有问题未解决），这都可拿出来作农民自卫之用。

土豪劣绅之破坏农运

各地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势力，都渐渐团结起来了。他们对农民进攻约有下列各形式：

（一）秘密组织保富会、保产会、白化党三等，公开组织区董联合会、乡镇联合会。

（二）宣传农协是将要抽丁、抽人头税，吴佩孚来了是会杀头以

恐吓农民，使之不能加入农协。

（三）他们宣传农协共产，行什么三三三一制。

（四）组织假农民协会，发表宣言主张什么三三三一制。

（五）混入农协包办，包办不成则捣乱。

（六）收买、煽动或提倡乡土观念、宗法思想、迷信，使农民起来反对农协。

（七）混入国民党压迫农民，包办农协。

（八）宣传北伐军失败。

（九）与民右派、赵、孙勾结。

（十）假装农民暴动捣乱毁税局，以便各方对农运失掉同情。

（十一）利用团防等直接压迫农民，屠杀农民，解散农协。

他们这些破坏手段，各处都似有联络地进行。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

（1926年11月）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尾各省学生开始来粤，四月举行入学试验。确定所址于番禺学宫，依照预算从事开办。五月三日开学，收录学生三百余人，训练四个多月，业于九月十一日举行毕业试，截至十月五日止，除病生三人未出所外，所有学生均已遣送回籍，从事工作。查本届农所，为国民党第一次大规模之农所，应全国农运之要求，集二十省区之学生于广州，而训练之，兹将经过情形分数项述之于下：

一　学生人数及籍别

原定学生名额三百人，后以来学者多，加收十六人。六月间又增收加十一人，共有学生三百二十七人。嗣以疾病或他故先后退学者九人。至毕业时共有学生三百一十八人，依省籍分别则如次：

直隶二十二人，山东二十三人，河南二十九人，热河四人，察哈尔五人，绥远八人，陕西十六人，四川二十五人，湖北二十七人，江西二十二人，湖南三十六人，安徽十五人，江苏十人，福建十六人，广东二人，广西四十人，云南十人，贵州一人，奉天二人。

二　授课情形

五月三日虽经开学，因课堂为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用为会场，至五月十五日，才开始上课。中有两星期为赴海丰实习时间，理论之讲授，实际授课十三星期，共授二百五十二小时。计：三民主义，六小时；中国国民党史，六小时；中国农民问题，二十三小时；农村教育，九小时；帝国主义，十四小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五小时；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九小时；中国政治状况，十二小时；中国财政经济状况，四小时；经济学常识，十八小时；苏俄状况，十八小时；中国史概要，十六小时；地理，四小时；中国职工运动，十七小时；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十五小时；广宁高要曲江农运状况，六小时；海丰及东江农运状况，四小时；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六小时；法律常识，九小时；统计学，九小时；农业常识，十六小时；农村合作概论，十小时；各国革命史，九小时；革命画，十四小时；革命歌，四小时。

这些课程，于革命之理论及方法，尤以农民运动之理论及方法，大体已备。上列各课，多数均有讲义或参考材料发给学生。

三　军事训练

将学生分为二队，每队分为六区队，设总队长一人，区队长六人统率之。于五、六、七三个月内，实行正规之军事训练，共计训练十星期，上操一百二十八小时。俾学成之后，能为农民武装自卫之领导。

四　实习

五十人赴韶州实习一星期，全体赴海丰实习二星期。赴海丰实习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

五　授理论以外之理论研究

本届设专任教员一人，除讲堂授课外，指导学生为上堂以外之理论研究。专任教员为萧楚女，毛泽东亦参与之，发给下列各种书籍每学生一全份：

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之政策的结果，帝国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社会进化简史，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中国农民月刊，农民运动周刊，犁头周报，中国民族运动及其策略，孙文主义讨论集，孙中山先生对于农民之训词，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湖南农民运动目前之策略，农民合作概论，列宁与农民，农民国际，俄国农民与革命，中国农民问题研究，土地与农民，苏俄之农业政策，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步兵操典。

凡重要书籍，在阅看之先，由专任教员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做答案，限期交

卷。由专任教员于答案中择出数份，加以改正，缮好张贴墙壁，名曰“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用此方法，助益学生之理论研究颇不小。

六　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

因学生来自各省，又即须回到各省从事工作，对于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亟须研究。乃组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云贵、两广、福建、江浙、山东、奉直、豫陕、三特别区等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一研究由各该省学生组织之。推干事一人、书记一人至八人主持其事，各研究会开会每星期自一次至二次。开会时由教务主任负指导之责，在各省研究会内，引导学生开始研究实际问题。引导学生作出了下列各种全国的调查：

（一）租率

（二）主佃的关系

（三）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

（四）利率

（五）拖欠逼账及烂账等情形

（六）田赋

（七）抗粮情形

（八）厘金、杂税、杂捐及临时捐

（九）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数目之比较

（十）地主的来源

（十一）货物价格与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十二）工价

（十三）失业情形
（十四）祠堂组织及族政情形
（十五）地方公会组织及财产状况
（十六）地方政治组织
（十七）地方政治情形
（十八）会党及土匪
（十九）团防情形
（二十）教育状况
（二十一）销售何种洋货，影响如何
（二十二）兵祸及其影响
（二十三）天灾及其影响
（二十四）贪官污吏及其影响
（二十五）烟、赌、偷、抢各种情形
（二十六）出产什么及其销售地
（二十七）妇女的地位
（二十八）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二十九）从前与现在地价之比较
（三十）从前与现在农产品价格之比较
（三十一）农村组织状况
（三十二）地质之肥饶
（三十三）宗教之信仰状况
（三十四）度量衡
（三十五）民歌
（三十六）成语

七　编印农民问题丛刊

为应全国农运同志研究上之要求起见，极力节省原预算内不必要之开支，省出一点钱来编印农民问题丛刊，计共五十二种，现在已出版者十七种：

（一）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
（二）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
（三）革命政府对于农民运动宣言
（四）广东省农民协会章程及农民自卫军组织法
（五）广东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六）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重要决议案
（七）广东省党部第一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运动之决议案
（八）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
（九）农民合作概论
（十）列宁与农民
（十一）农民国际
（十二）俄国农民与革命
（十三）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十四）土地与农民
（十五）苏俄之农业政策
（十六）社会革命与农民运动
（十七）日德意三国之农民运动

以下尚在印刷或编辑中：

（十八）广东农民运动概述

（十九）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二十）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二十一）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
（二十二）中国的重要农产物
（二十三）中国重要农产物之对外贸易概况
（二十四）全国农业行政机关试验机关及教育机关
（二十五）各国之农业进步及其原因
（二十六）中国农业生产问题
（二十七）全国农民运动概况
（二十八）中国地租问题
（二十九）各地主佃的关系
（三十）中国重利剥削问题
（三十一）中国田赋问题
（三十二）各省抗粮运动
（三十三）苛税问题
（三十四）各省农民之分析
（三十五）地主的来源
（三十六）祠堂
（三十七）地方公会
（三十八）各省地方政治组织
（三十九）中国地主阶级的武装问题
（四十）天灾问题
（四十一）兵祸问题
（四十二）贪官污吏问题
（四十三）土豪劣绅问题

（四十四）各地的工价

（四十五）各地的度量衡

（四十六）农村教育问题

（四十七）农村宗教问题

（四十八）中国农村中妇女的地位

（四十九）中国农民的观念及感想

（五十）农村文学

（五十一）农村成语

（五十二）中国农民问题概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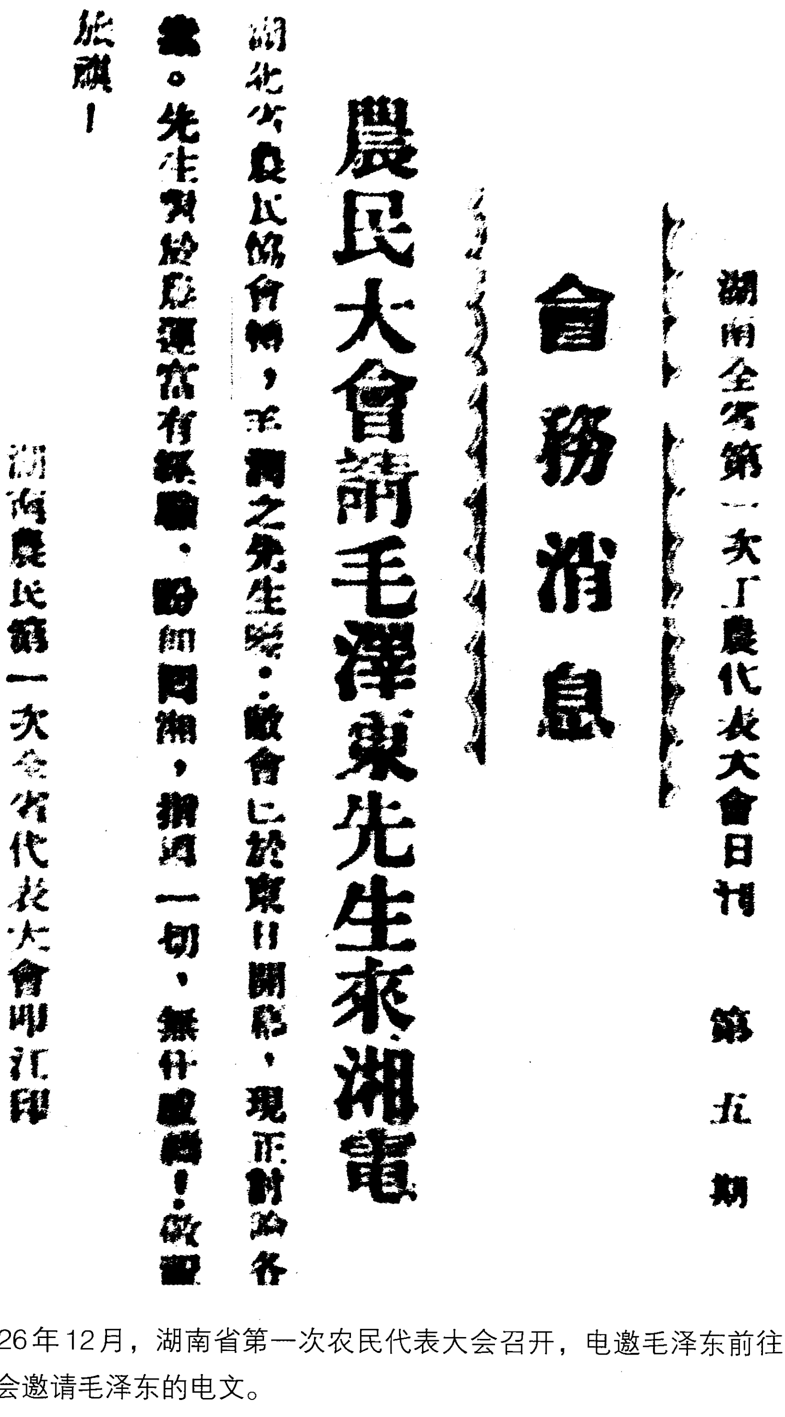
这部丛刊如能完全出版，在目前农民问题之迫切的研究、农民运动之急激的发展中，确实可尽相当的供给材料之责。

在湖南省第一次农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6年12月20日）

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在去年是不会有这种大会的。在去年是军阀赵恒惕的政府，今年是较能与人民合作的政府。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今日的题目是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国民革命中工人的要求，要原料充足，生产品丰富。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只有农民。国民革命的商人问题两种：一种是工业家，一种是商业家。工业品的市场，是在乡村，购买工业品的是农民。商人货物的原料，是从农村中运来的。商人货物的销场，也在农村中。商人若想货物畅销，就要农民问题解决，有余钱可以购用品。国民革命中的学生，现在学生有做农工运动的。他们有学工业的，有学商业的，为什么不去从事于手工业商业，就是农民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各国学生都反对革命，而中国学生尤多从事于革命运动。中国的学生多半是很苦的，并且毕了业出来无处可用，故不得不革命。中国的学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重要的，譬如一座三层洋楼，上层是帝国主义者军阀土豪劣绅，下层是工农阶级，中层是学生。有上去与军阀帝国主义接头的，有下去与工农接头的，还有些上不

得、下不得的。中国学生的现象，革命的是少数，反革命的也是少数，不革命的最多。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这都是属于农民问题的。将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余工人、商人、学生、教职员……的问题都解决了。



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　第五期

會務消息

農民大會請毛澤東先生來湘電

湖北省農民協會轉，毛潤之先生鑒：敝會已於東日開幕，現正討論各案。先生對於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導一切，無任盼禱！敬望旌旗！

湖南農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叩江印

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召开，电邀毛泽东前往指导。图为大会邀请毛泽东的电文。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

（1926年12月）

农民在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之下，生活一天一天地坏下去，许多人弄得“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真是无“居”可“安”，无“业”可“乐”了。

自从帝国主义的势力向东方侵略，打破了我们的“锁国政策”，冲开了我们的农业经济，我中国的农民便做了外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每天辛辛苦苦，做出许多粮食、棉、麻、丝、茶……等类的东西，他们只稍微拿几个钱出来买了去；他们用机器制造各种新奇的货物，运过来，不知买了我们好多的钱去了。什么洋油、洋布、洋钉、洋碱、洋瓷、洋铁……说不尽的洋货，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城市，渐渐地打入我们的乡村了。我们不用机器做的土货无人买，我们做田也挣不到几个钱，他们洋资本家就一天天发财了。

帝国主义者剥削我们的方法，是霸占海关，自由输入货物，廉价发卖，刮去我们的银钱，破坏我们的手工业；是霸占矿山、铁路、航路，开设工厂、银行，利用我们的贱价劳力，替他产生红利，利用我们的贱价原料，替他生产商品，夺取煤铁，操纵运输。而且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以厘金和盐税间接剥削农民，以亩捐附加等类之捐税直接剥削农民。帝国主义者更借了许多款项给军阀，军阀又加重剥削农民以还债。军阀更利用失业的农民，组织雇

用的军队，帝国主义供给了枪械，乃造成武力，为压迫农民之工具。

帝国主义既挟了他的金钱武力，又勾结国内军阀、买办，所以在中国横行一时，农民辛辛苦苦做工的结果，都转几个弯子跑到他们荷包里去了。

国内军阀和土豪劣绅之剥削农民，是一种封建的剥削制度。他们不像资本家之剥削雇佣劳力，却是将农民的生产结果，分割一大部分去，即是租税制度。地主是如此地直接或间接（如包佃制）取之于农民，军阀也是如此地直接（如对自耕农）或间接（如对佃农）取之于农民。他们每年从农民身上刮起去的，大约要占农民收获百分之六十至六十五。

他们互相结托，又与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联络一致，共同榨取农民的血汗，而且共同镇压农民的反抗。到了饥荒年岁，农民忍无可忍，自然地暴动起来，时常有推倒封建阶级及帝国主义的形势。太平天国之役，是中国南部农民的大暴动。义和团之役，是中国北部农民的大暴动，可是都给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反动势力压下去了。

然而潜伏在农村中的革命运动，绝不因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镇压而消沉。遍布南方各省的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哥老会，以及北方的捻子、白狼、红枪会等团体，先后发生，不谋而合地相继与封建的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因此各地的仇杀教士案、饥民骚动案（近年之大事如宣统年间饥民焚烧湘省巡抚衙门，如临城劫车案，都是这些人干的），时有发生。他们这些革命的团体，是没有广大的联合战线的，是不明白政治的策略的，所以决不能成其大事。

现在全世界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有策略的革命已给了我们农民一

个好榜样了。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二十年前，就已和农村中自然发生的革命团体联络，并且引导到真正的政党路上去，领导我们农民革命。在政治上定了“建设民主”，经济上定了“平均地权”作解放农民之标准；随时随地，给我们农民以适当之策略，向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作战，以求达到目的。

湖南农民在数年以前于衡山岳北已开始有组织地萌芽。前年上半年湘潭农民又有一部分起来，结果是被赵军阀摧残，不能顺利发展。去年二月株洲汪先宗先生为农民利益殉难，军阀土豪之凶横已极，而农民情绪之激昂也增进，物极必反，于是酿成驱逐赵恒惕之猛烈运动，驱赵一事，农民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吴、叶反攻的时候，农民替北伐军当间谍，运输、带路、破坏敌人后防，甚至拿着梭镖鸟枪担任游击或加入作战，如醴陵、株洲、平江、华容各地，不下十余战，都有农民加入，因此竟阵亡农民多人。试看湖南农民之参加北伐战事是何等的勇敢肯牺牲呢！

及至北伐军到了鄂赣以及浙豫前方去了，湖南农民则竭力巩固后防，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这种运动是非常广大的。差不多各处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都受了莫大的影响。他们平日作威作福，胡作乱为，不把农民当人，到了今日，真不敢再拿出从前的排调来了。因为我们农民是不晓得讲斯文讲面子的，我们硬干起来，听他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要受我们一打，不怕他们倚着残余的势力还要反攻，还要大规模地残杀农民，如嘉禾、临湘、攸县、益阳、安化、宜章等地，惨案迭出，我们直认他是回光返照，我们毫不恐惧退缩。这一点子革命工作，我们敢说也比得上打开武昌城。因为乡村中土豪劣绅的势力是军阀的真正基础，打破这种势力，非农民起来，实在难以办到。

当今的革命政府，其主要工作，我们觉得应当是继续铲尽军阀政治的基础，发展民众的组织；在这个工作进行之中，我们农民是要舍死忘生地拥护其成功。

但是，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各被压迫的民众，不只是解放农民，我们岂可以只顾到农民的解放吗？是的。不过农民解放是一个枢纽。农民的解放如果实现，其实也就是各阶级的利益。现在工商业的不发展，其中一大原因，即是三万万农民无购买力；而农业的不发展，即是农民无生产力。如果农民解放，农民在经济上能减少地主的剥削，必能使农业改进，而因为他们之购买肥料、农具、布草等类，工商业必同时发达。从前法国革命，也因为农民得着一部分解放，法国富力大进；近来俄国农民根本去了地主的剥削，生产力一年年增进，都是明白的证据。工商百业既因农民解放而繁荣，至于教育文化，种种建设，更何待言呢！

然而目前政府的财政困难，市面的金融停滞，社会上呈现异常的恐慌，许多的传言，都怪了我们农民，认为是农民革命产生的结果，冤哉枉也！目前的恐慌，是有实际的原因的。一层是战争封锁，米不能出长江，盐不能进岳州，这里就损失米捐盐税两宗大的收入。一层是湘西财政没有统一，黔军及各种新色部队截留税收，这样又损失了全湘三分之一的财源了。一层是反动派从中操纵，例如耒阳打杂税局事，虽然有一半是杂税局本身有弊病该打，还有一半却是反动派利用时机，想在党部、政府、民众团体当中挑拨恶感。反动派在各处造谣煽动，诸如此类，是很多的，有此数个原因，所以弄得社会不安。何能归罪于农民呢?!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土豪劣绅，虽所取手段出于法律以外，其实这是革命争斗中所必取的手段。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

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若是骇怕“纠纷”，采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免除纠纷之旧的政策已不适用了；我们只有大家建设新的政策，即是使农民在乡村中建立民主的自治，根本铲除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

本大会仅代表湖南二千七百万农民，精细考虑，决定今后革命争斗自求解放的策略。凡我湖南诸农友们！要集中于省农民协会旗帜之下，依照本大会的策略努力奋斗呀！

我们口号是：

全中国的农友们联合起来！

拥护革命政府！

铲除贪官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肃清农贼！

整理财政，剔除中饱！

打倒军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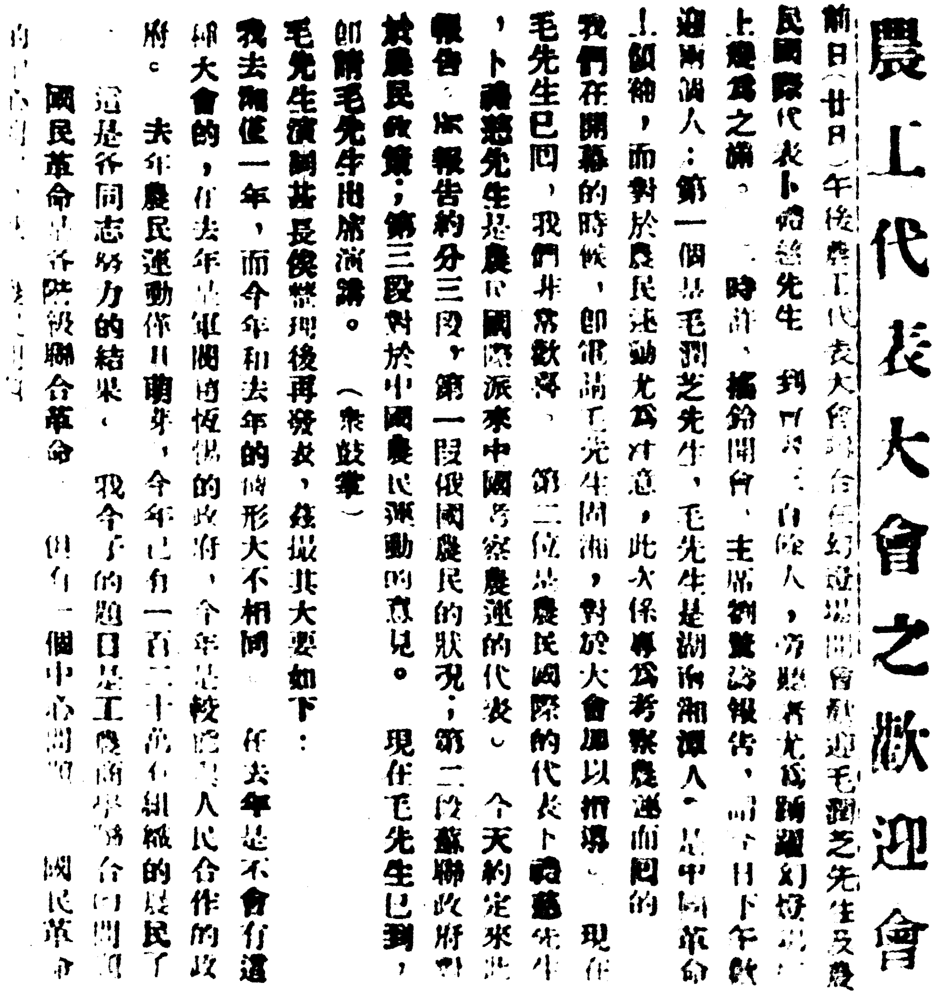
打倒帝国主义！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农民国际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農工代表大會之歡迎會

前日（廿日）午後農工代表大會特在幻燈場開會歡迎毛潤之先生及農民國際代表卜蘭斯先生 到會者三百餘人，旁聽者尤爲踴躍，幻燈場上幾爲之滿。 一時許，搖鈴開會，主席劉[illegible]報告，謂今日下午歡迎兩個人：第一個是毛潤之先生，毛先生是湖南湘潭人，是中國革命上領袖，而對於農民運動尤爲注意，此次係專爲考察農運而回的。我們在開幕的時候，即電請毛先生回湘，對於大會加以指導。 現在毛先生已回，我們非常歡迎。 第二位是農民國際的代表卜蘭斯先生，卜蘭斯先生是農民國際派來中國考察農運的代表。 今天約定來此報告。 卜報告約分三段，第一段俄國農民的狀况；第二段蘇聯政府對於農民政策；第三段對於中國農民運動的意見。 現在毛先生已到，即請毛先生出席演講。 （衆鼓掌）

毛先生演講甚長俟整理後再發表，茲撮其大要如下：

我去湘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 在去年是不會有這樣大會的，在去年是軍閥的政府，今年是較好的人民合作的政府。 去年農民運動僅只萌芽，今年已有一百二十萬有組織的農民了。 這是各同志努力的結果。 我今天的題目是工農商學聯合問題。 國民革命是各階級聯合革命 但有一個中心問題 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illegible]

1926年12月，毛泽东应邀赴长沙参加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图为大会欢迎毛泽东赴会的报道。

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6年12月）

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决议案

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就是军阀政治的基础。国民革命势力在湖南表面上虽已把军阀政治打倒了，然其社会基础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有很多存在，不过因民众势力之兴起，这个基础业已开始动摇罢了。在此动摇期中，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为要保持他们最后在政治上、社会上之地位，更出死力互相勾结，用种种挑拨离间、倾陷压迫手段，甚至混入国民党及农民协会，图谋消灭革命势力，恢复军阀的统治，反动现象显而易见。故国民解放运动，与此种反动势力是绝对不能并存的，必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根本铲除，然后国民革命胜利才有保障，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才算根本消灭。这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凡属革命民众所应当深切注意的。

自农民运动发展，各县土豪劣绅即群起压迫破坏。最显著之事实：如赵恒惕、廖运元、李鸣九、赵桂生等之岳北屠杀，焚毁农屋二十余所，枪杀三人，拘囚数十，被逐被逼者不可计数。湘潭晏容秋指挥十八罗汉，左右县政，把持三堂四所，吞蚀军饷、捐款以饱私囊。该县西二区团防局长成胥生，凭借赵逆势力，勾结驻防军

队，把持乡、村政权，残杀良民，破坏农协，诬陷协会会员，谋害农民领袖毛泽东等三十余人，更勾结西山会议派，谋反抗革命运动。该县株洲汪孝逵、汪绳武等，利用团防，勾结叶逆军队，诬杀农民领袖汪先宗。宁乡陶滨川、廖季梅、刘佑卿等暗助叶逆军饷，蚕食公款、联合团防，响应赵、叶，破坏北伐；杨致泽、刘昭等利用团防，残杀良民至数百人，枪伤农民领袖梅冶成。桂阳雷征、彭仁寿、李容巨、黎庚樛等统率团防，占据县城，解散党部，枪杀工人，图殴农民领袖何汉。耒阳伍易卿、李子如、刘友三、邓元勋等收买痞徒，假冒农协名义，焚烧政府机关，企图嫁祸；土豪邓演宾私印愿书，组织乡农民协会，以图破坏农运；北乡土豪李某，收买农贼，擅改乡农民协会为区农民协会，并擅刻钤记，更私发大批乡农民协会筹备员委任状。衡阳劣绅张杞生，勾结团防局长何镇楚，围捕农民及农民领袖；土豪杨竹轩，集合暴徒数百，捉去区执行委员，勾结驻防军捣毁各公法团；团防局长罗凤逸，恃强摧残农民，纠合打手，捆打农民领袖。华容傅道南、罗昌、张荫元、孙锐义、傅治焕等，勾通土匪，勒索人民，瓜分公款，八长联盟，把持县政，包揽词讼，诬害农民。湘阴之赵子成、赵荪堂、赵迪予、赵崇正等借赵逆势力把持团防，高租、高利，剥削农民，农民实已变为农奴；任炳奎，指使任觉桥，勾结痞徒，破坏农协，殴打特派员；劣绅酆孟秋，强迫解散农协，驱逐努力农运的人员。益阳黄剑农、龚海帆、龚金榜、刘中藩、陈毫卿，组织伪党部，指挥暗杀队，把持县政，破坏革命，鲸吞公款，鱼肉人民；团防局长刘梦龙、曹应春，倚团防势力，擅杀乡民，操纵地方行政，盘踞旧农会房屋，捣毁农舍，压迫农民。郴县著名之土豪劣绅曹游龙等借党敛财，惨杀党员；李冰如捣乱农协，毁坏党部，买活反动，派杀区农协委员长

李固。湘乡程希洛、彭世箴、朱太初、贺石渠等，私通赵、叶，破坏革命，捣乱后方；组织三K党、保产党、城镇乡联合会、暗杀队；勾结团防局，捣毁永丰党部；焚烧农舍，破坏农民运动，谋害农民协会执委曾策；把持县政，侵吞公款，包揽词讼。下里团防局长萧介藩，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运，包庇土豪熊祥元，强运谷米，逮捕农协会员，私行拷打，滥用刑罚，残杀良民达百数十人；把持团防局，侵吞地方公款，操纵乡权，武断乡曲。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等，统率团兵，惨杀农民，包庇赌博。道县之杨锐等，扶植党羽，把持国民党县党部，暗杀省党部特派员陈清河，压迫农运。汉寿梅石、赵勋华等，欺压良懦。常宁土豪欧阳玉琪，高租、高利，大秤、小斗；劣绅李溪成、谭封桐，破坏农民协会组织。沅江袁熙甫、袁致祥等，宣传“三爱主义”，利用团防，贿买镖手，悬赏八百元，谋杀农运专员。平江县议员、长寿商会会长李灌畦，为长寿土豪劣绅领袖，在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日，指挥流氓游街示威，高呼“打倒农、工阶级”“反对三民主义”等口号；北伐军与敌军在平江开仗时，受敌方委任，组织递步哨队及保卫团，运动地方，希图破坏北伐，并组织暗杀党，图杀国民党员及农运领袖。该县汪信哉乃仙坛坛主，惯性压迫民众，把持县有财产及政治，并于去年正月，组织讨赤委员会，禁止加入国民党；沈寅卿、姚叙哉是真正地痞劣绅，包揽词讼，武断乡曲，压迫民众，破坏农协。临武李镜先，利用团局，垄断乡政，毒毁杀农、工委员宁教仁，迫散区党部，勾结募债专员刘艺侯，浮收舞弊，纵兵苛索。新宁陈升安，侵吞公款，摧残学务；雷腾蛟、华维翰，勾结县府，私用刑讯，指良为匪，勒罚巨款。安乡徐德保等勾结县长，倚仗团防势力，压迫农民，出团卖谷，每亩至四斗八升，敛谷八百余担，农民请求减轻，

不独不准，反惨杀农民许正卿等二十余人。浏阳邹逆尧仁之参谋长及筹饷委员王益生、鲁觉丞等盘踞县团防局，要挟官厅，把持县政，压迫民众，破坏革命团体，又为邹尧仁规划一切，提取军饷；劣绅黄昭著、黄达五，把持乡政，勾结地痞；刘任生，组织假农民协会，利用农民，破坏农协；刘生实，勾结谢文炳，敲诈商人，侵吞军饷捐款。板西团防局长娄邵德，欺压民众，破坏农协，捕殴国民党员刘解人，当街痛笞三百，枪杀良民，拐逃团防枪支；土豪王远万，高利盘剥，压迫农民，逼死农妇。长沙清泰乡都总林巨卿，平日专横乡曲，近因募集公债，从中舞弊，更侵吞水灾赈款，扣留地方学款，自命为土豪劣绅，禁止当地农民加入农协，与彭逆祖植等串通一气，鱼肉贫民；郑澍人，勾结吴逆，宣传反革命，侮辱革命领袖孙总理及黄克强先生；罗倚陶，侵占田地，骗取佃户批价，压迫佃农；河西镇团防分局长丁琼芝，绰号丁四土匪，把持局务六年，借团敛款，迄今财政不曾公开，伊家致富业已逾万，平时擅捕良民，滥用刑法，诬农协会员为土匪，肆行压迫。永明王鹏，现充团保，武断乡政，破坏农运，借团捐为名，任意苛索；王筠，现充团总，破坏农运，垄断一乡，包庇赌博，近更混入国民党，当选非法的县党部执行委员。衡山唐经畬，把持县政，垄断乡曲，侵蚀公款，鱼肉良民，反对民族革命运动，印刷书籍，谋破坏革命，现更勾结西山会议派，潜来省城图谋扰乱北伐后方；劣绅罗如琴，于北伐开始时蓄谋破坏，我军退守衡州之时，更诬告农民夏观桃、彭黄枚等，谓为匪徒，且谓农民协会为匪党。

以上所举各县土豪劣绅，特其尤者，至于细小，一概未录。必须全部铲除，方收肃清封建余孽之实。至于贪官污吏，调查未周，姓名从略。必须农民运动与市民运动联合，方能打倒贪官污吏，建

设廉洁政府。

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

（一）现在乡村自治区域，普通有三级。如长沙之都、团、牌甲；衡阳之都、区、甲；宝庆之区、保、庙；常德之镇、保、甲；慈利之都、团、甲；郴县之区、团、小团；湘潭之都、甲、团皆是。亦有分为二级或四级的，旧有各级自治机关之组织，原是一种封建性质的东西，近则完全成为地主阶级结托军阀、统治乡民之工具。现在省、县政治，虽有改变，而他们把持乡政，鱼肉乡民如故。各级自治组织中，尤以高级组织（即接近县之一级）为此辈把持垄断之中心，利用团防武装，拥护其压迫良懦、刑杀无辜、侵蚀公款、勒派税捐之种种特权。其下各级组织，亦多为若辈之爪牙，使境内乡民，尤其是农民，全部受其钳制。农民视此种机关，谓为“头张衙门”，或谓之为“铁门坎”，此种封建阶级之组织，实帝国主义、军阀之真实的基础。现在的农民运动，就是民主革命势力向这种封建势力攻击之一种运动，必须将此种民主运动汇合起来，推翻城乡特殊阶级，然后中国之国民革命，才算有相当的成功。

（二）现在乡村中农民的民主运动，已经普遍地起来，封建的特殊阶级基础，因此开始动摇；然这种特殊阶级，犹据其封建的阵线，作最后之挣扎。在这种形势之下，发生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其实这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若不经过目前的争斗，则决不能破坏旧的封建秩序，而达到建设新的民主秩序之目的；同时农村经济，亦将长期陷于封建经济状态，而不能达到一个新的发展。

（三）为保障民主运动的胜利，必须发展革命的民权，建设民主的自治。此种民主自治，属于乡村一般民众，封建余孽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许其参与，而实现此种民主自治的方式，首在举行乡民会议，建立完备的乡村自治机关。

（四）乡民会议是乡村自治之最高权力机关，其使命在集合乡村各种民众势力，树立民主革命的真实基础，实现乡民之要求，发展乡村经济。乡民会议之组织，在最低级自治区域，当为乡民全体大会，在高级自治区域，当由低级自治区域之乡民全体大会选举之代表组织之。

（五）乡村自治机关，当由乡民会议产生，采委员制。高级机关应举办民食、财政、教育、农事、交通、水利、森林、自卫、救济、公断、调查等事业。以上各种事业，须按照地方情况，酌设专人主任。并在自治委员会下，设立各种事业之委员会，以为讨论之机关。低级机关，则斟酌地方情形，制定其组织。

（六）为实现新自治制，目前应由农民协会，邀集其他革命的民众团体，组织乡村自治筹备机关。

（七）旧有之各级自治机关人员，在新自治制实行以前，应由乡民开会改选，不得仍由劣绅包办。

乡村自卫问题决议案

（一）湖南各县的团防局或保卫团，在事实上，多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武力。在军阀时代，则直接勾结军阀，妨碍革命进行；即在现时革命高潮中，仍敢多方抗拒革命势力，破坏农民运动。此种扰民耗财的反动武力，竟是一种乡村军阀，完全失去了卫乡防匪

的意义。假使不急行改造，则动摇革命基础，酿成农村纠纷，危险实大。为实现真正人民之自卫组织起见，所有团防局或保卫团应一律取消，另外成立挨户团。

（二）乡挨户团受乡民自治委员会的指挥监督，执行保卫民主、地方秩序之职务。县城团防总局，改为挨户团总局，受县政府之指挥监督。

（三）挨户团之团丁，每家或数家出一人，团丁总数视地方需要而定。

（四）县挨户团总局，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乡挨户团，设主任一人，队长、班长若干人。县挨户团总局主任由县民会议推选，交县政府任命之，县民会议未召集以前，则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乡挨户团主任，由乡民自治委员会选举，队长、班长由主任提出，得乡民自治委员会同意委任之。

（五）挨户团须定期操练，并施行政治训练。

（六）挨户团依地方的需要得设常备团丁，但不得多设冗员、致靡费用。

（七）挨户团的经费，如操练器械、常备办公等项，就原有团防经费撙节开支。如以前无团防局而现在必须设立挨户团的地方，其经费由乡民自治委员会得乡民会议的同意筹措之。

（八）原有团防局或保卫团之枪支、服装及其他器物，应一律移交于挨户团。

（九）在团防局或保卫团未改组为挨户团以前，应执行下列过渡办法：

1．团防局长或保卫团长，由乡民会议改选；县团防局长或县保卫团长，由县农民协会邀同县之各种革命的民众团体选举，由县长

加委。

2. 团防局或保卫团的职员、团丁，均须施行政治训练。

3. 团防局或保卫团的唯一职务，在于防御盗匪，除与盗匪临阵交战外，不得对任何人杀戮或拷打。

4. 团防局或保卫团不能受理民刑诉讼。

5. 团防局或保卫团的经费，须有预算、决算并公开之。

6. 政府须解散并惩戒摧残农民的团防局或保卫团。

地租问题决议案

大会听到各地关于地租报告，列述于下：

长沙租额，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衡阳，每亩田可得谷三石五斗，纳租一石六斗至二石，每石租规银五元到七元。衡山，每亩可得谷一石五，纳租一石三斗零，每石租规银从三四元到八九元。岳阳，四六租，田主得六成，佃户得四成，每亩规银四元。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每亩押规银五两至八两。宁乡，每百担谷地位只能收干谷六十石至九十石，须纳租五十石至六十石，每百担谷地位至少要规银一百元至两百元。株萍路，每亩收谷三石多至四石，纳租一石八斗至二石二斗，现在每亩押规普通是五六元，一班田主见谷价日高，又变一办法，其佃规多少以每年该田所收谷价为准，如所收谷作抵一百元，则须佃规一百元。临湘，每石田分四亩，收得干谷十六七石，纳租十石至十一石（东六佃四），普通每石租押规五元至六元。邵阳，有一种铁租“请耕字”，里面载明“丰歉不得加减”（如“请耕字”载明是十石，秋收只有八石，佃户须赔租二石）。南县，每亩田押规少

则二三元，多则五六元，最多有达十元者。郴县，除缴押金外，还要批礼鸡、鸭肉，果饼等礼物。湘乡，荒年东七佃三，丰年东九佃一，每石租信银二元至三元、五元不等。此外还有如下规定：一、要和东主做义务工；二、每石租要送稻草一支；三、要送东主三节的礼物。对引进人也是一样，不然引进人就向田主声明不负责任，使之退佃。永明，每亩田收谷一石至二石不等，佃户只能得到十分之二；种豆的田，佃户所得更少；种姜的田，照十分之六缴租。溆浦，上、中两种田，均东六佃四，但遇天灾，田主占八九成，佃户只得一二成，所以有借谷还租的。宜章，未耕田以前，就要交钱或交银的。

从上面这些材料看来，农民一年到头的牛马生活所得，皆因重租、重押、陋规种种剥削，大部分被地主掠夺去了。必赖妻儿子女，不分晴雨昼夜，捡柴、拾粪，看牛、纺绩的辛苦，才能维持其受冻馁，仅免于死亡的艰难生活；因之农业生产不能进步，土地荒废一天天增多，农民一天天流于失业，他们的出路，只有当兵、当匪，因此更造成了军阀政治。同时因农村购买力之减少，又影响到国内工业难于发展。地主从剥削农民得来的大量地租，不用于农村生产事业，以致农村经济有逐渐衰落的趋势。

因上述情形，大会为救济农民的痛苦，增进农业的生产，增高农民的购买力，特拥护中国国民党减轻佃农地租的决议，并规定改善地租及东佃关系的详细办法如下：

（一）东、佃契约，本应由双方协定。乃因农民久在地主积威之下，不得不承认地主一方面的条约。农协是代表农民的机关，所以东、佃契约，应由各县农协斟酌当地情形拟定；经省协之批准，请政府备案。东、佃双方，均须遵守，如需另增附项，须得当地农协

的许可。

（二）租额应该减轻。减租的标准，应该根据田亩的性质、大小、肥瘠，副业的多寡，押金的轻重和佃金利息的有无、多少等情形，减少租额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

（三）农民多为当地土著，并无缴纳押金的必要，如桂阳、零陵、邵阳、溆浦、麻阳等县，都没有押金办法。而采押金办法的地方，贫农每因无押金，佃田不到，成为农村中无法救济的失业问题。故各地如非十分必要情形，自得废除押金制度。即在押金制未能废除以前，亦应一律按照当地利率计息，不得有无息押金。押金最高限制，可由各县协斟酌当地情形规定，经省协批准，请政府备案。

（四）农民除佃约上规定应纳的正额地租外，无论何种陋规，一律免除。

（五）地主不得无故或借故退佃，尤不得因农民团体的行动，而对个人提出退佃。农民设因退佃而受损失，所受的损失应由地主赔偿。

取缔高利贷决议案

在现在社会制度下，借了人家的钱、米，当然应付一种利息；可是乡下的土豪劣绅、奸商、不法地主等惯于乘贫农需钱急迫的时候，实行高利盘剥。贫民因高利贷的逼迫，有至于卖妻鬻子，或自杀的；即幸而能够还债，不久的工夫，就要弄到赤贫的地位。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在革命政府之下，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

据各地代表报告：月息百分之十，差不多是全省七十五县普遍的现象，谓之“大加一”，又有借银九元，月息一元，名为“九去十归一”。南县、安化、华容等县，有月息百分之二十的。慈利、永

明、城步等县，都是月息百分之三十。耒阳有“九去十归外加三”之利息，即借本九元，一月后还十元三角。常德乡间通行的利息，为借洋七角，一月还洋一元。桃源有“孤老钱”，每月一对本，如借洋一元，过月还洋二元，过两月还四元，以此类推。慈利谷息，每串钱年息一斗。岳阳之“押干租”，借洋四元，年还息谷一石。益阳等县，有五月间借出谷一担，八月间收谷两担的。郴县有水谷，即每借洋一元，年还息谷三斗。新宁有借钱十千，年出息谷一石的。衡阳有标谷利，即于上年四五月间借出谷一石，以最高价算为现钱，下年七八月间，以最低价算谷收入，除谷价之两次剥削外，仍算月息百分之六七。此种利息，可说是在三个月之间，即可加三倍以上。临湘有每元每日利息一角，每满十天即算复利，如此计算，借洋一元，满一个月须还本利共八元。城步有“八斗九年三十石”的俗语，即借谷八斗，九年还谷三十石。

至于最低利息，在沅江、南县、常德、岳阳、芷江、慈利、安化等县，每月利息百分之五。华容、桃源等县，为月息百分之四。湘乡、道县、新宁、临湘等县为月息百分之三。这些都是借贷利息的起码数。在以上各县中，要借比此更低的利息是决借不到手的。

大会认此种高利盘剥，极为不当，各县协得依据各地情形，规定适当利率，经省协批准，政府备案，通令执行。最厉害的高利贷应请政府一律明令禁止，并于最短期间，实现国民党新政纲之规定利率，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

田赋问题决议案

（一）田赋正供虽不很重，附加则重极了。据各地代表报告，茶

陵附加超过正供一倍以上。宁乡每两正供，附加学捐、团防、路股、农林保管共四元，又各都自治经费一元至二元不等。武冈附加超出正供二倍。湘阴每两正供仍一两连附加共完九元。新宁每两附加十二千余文。衡山附加虽由农协决议减轻，但每亩有二角八分七厘之多。长沙每两附加三元六角，常德每两附加四元八角。临湘每正额三元七角五分，附加团防、学捐、警捐等项共洋五元。零陵每粮一石，附加团防二元五角，永明每两附加六元余。新田每两附加八元。澧县每两附加六元至九元。衡阳每两附加十元内外。祁阳每两附加十八元。蓝山每两附加小洋二十六元。宁远每两附加一百余串。宜章每两附加：近城团十五六元，白沙团二十四元，黄沙团三十六元。

以上各县均属超过正供远甚，从超过正供一倍至每两三十六元，骇人听闻，至于此极。此外，新化每两附加团防费二元五角，桃源、永兴每两均附加二元四角。郴县每两附加二元。湘乡每两附加一元八角。郴县每两附加一元六角，犹为附加较轻的县份。补救之法，应由各县农民协会，邀同各县革命民众团体，清厘田赋附加数目及其用途，凡非地方公益正当开支，应一律免除，属于正当开支的也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至于以前附加甚轻，而在地方公益事业上有必要时，必须经县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民众团体的认可始得增征。

（二）贫苦农民欠征田赋，各地都有，有倒在粮柜上的，有倒在地方团保手中的，有倒在家族族长手中的。此种粮柜、团保、族长等借欠完钱粮之名，以重利盘剥欠户，苛索不遂，往往继以差役威逼。欠户常因此受重大的损失与侮辱。本大会决定，在国民政府统治湖南前，贫民历年欠缴田赋，无论多少，应请政府一律豁免。

（三）地亩经界不清，以致许多人田多粮少，或田少粮多，甚至有粮无田，或有田无粮，狡猾的得重利，驯良的被剥削。又有因田亩经界不确，于田地易主时，旧主随意将其田亩以少算多，无形中新主照亩计租，一转移间增加佃农几倍租额。亟应督促政府，清丈地亩，确定赋率，取消无地钱粮，禁止飞粮，为受害农民减轻痛苦。

（四）关于征收田赋的一切陋规，如钱水重利、抹尾数等，均属无理剥削，应该一律废止。

（五）近年水旱天灾，极为重大，受灾区域，农民困苦非常，无力缴纳田赋。此等区域，应斟酌灾情轻重，免征或减征田赋。

（六）用累进方法，征收田赋。

亩捐问题决议案

现在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之县政府、团防局或地方自治机关的抽收亩捐，都是一律按田亩计算。这种办法，使仅足自给的或尚不足自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极难担负，尤其是摊派到佃农身上，更属无理剥削。大会决定：

（一）非地方公益，经民众多数公认者，不得抽收亩捐。

（二）自耕农有田二十亩以上的，才纳亩捐；佃农不纳亩捐，但穷东富佃之重押轻租者，不在此限。

（三）亩捐征收，用累进税法。

厘金问题决议案

帝国主义强制中国成立关税协定，因这个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中国乃不能采取保护关税制，以图发展本国的产业。然有更使中国沦为殖民地地位者，则为中国自创之厘金制度。洋货入口，值百抽五，并缴纳子口税百分之二，此外，不纳任何厘金，洋商贩运土货出口，亦适用此例；而中国自己所经营之货物，现技术上既远不如洋货；复受层层厘卡之剥削，乃只有缩减或停歇之一途。尤其是对于一般小商，为害更大。因厘金征收太苛，物价乃太昂贵，十余年来，物价有贵至数十倍者。一般之消费群众，特别是占消费群众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因农产品之涨价赶不上工业品之涨价，遂感受无穷之痛苦。综计厘金的影响，农民受害最大。因物价昂贵影响，购买力减低，商业因之衰弱。购买力低，商业衰弱，工业自无从发展。工业无发展之望，工人遂陷于困苦地位。而政府对农、工、商业之税收亦不得不因厘金这种恶税之征收而全般缩小，全国交困，便成了今日的现况。

目前湖南的军事时期已告结束，省政府虽一时不能毅然将此种等于对国家经济自杀的制度完全废除，亦应规定一种较轻的统一的厘金，代替多种繁重的厘金，使商民缴纳一次厘金之后，不再有第二次缴纳。肥料与荒月食粮，关系农业与民食至大，均应免厘。至于过去厘金的积弊，如扦子团之苛索及各项陋规之病民，其应彻底扫除更无疑义。

废除牙帖取缔牙商决议案

牙商借缴牙帖费用，挟官厅威力，农民将其生产品如棉花、粮食、水果、枯饼、杂粮、猪只、牛皮、桐、茶油类，运往市场，不能向消费者直接发卖，必须交由牙商交易，牙商便居间操纵剥削，

实为自由贸易之障碍。政府应从速废除牙帖，取缔牙商克扣行用，废除农产品必须落行旧制，使农产品任农民在自由市场贩卖。

民食问题决议案

乡村中食粮的流通，及谷米的价格，向来是由地主、奸商、土豪劣绅所操纵。如囤谷居奇、故抑谷价，致使一般农民，在初收新谷时，不能不将收获廉价卖出；一至荒月，又不能不重价向那班囤谷居奇的人购买食谷。至于贫苦无收获，纯靠购买食谷的雇农、手工业者的生活，皆操之于地主、奸商、土豪劣绅之手。这样，农民除受地租及高利贷等剥削之外，更加上一层损失。尤其在最近，湖南连年荒歉，农民因这种操纵，所受痛苦更加厉害。以前政府与社会对此民食问题都不负责，故现在各地农民乃不得不以平价阻禁为消极的救济办法。这并不是农民的过错，完全是以前政府及社会不肯负责任酿成的结果。所以民食的调剂，成了目前重大问题。我们的决定是：

（一）我们在一个范围内（如一个乡农民协会的范围，或一个区农民协会的范围），须先有一个大概的调查。当地欠食谷若干，即于当地各地主的租谷中分别存留多少，名曰存仓，以备平民购食之用，余谷一概任其流通，不限价格。

（二）存留的谷，原为维持地方民食，须以平价给食谷欠缺的贫民，对于最贫苦的人民则更当减低价格。

（三）严格限制奸商操纵。

（四）煮酒熬糖，亦属社会需要，但是在非常时期及有特殊情形的可行禁止。

关于社仓积谷问题决议案

社仓积谷，为社会备荒的组织，这种组织历代相传，归地方公众管理，不受官厅干涉，因此受军阀政府的影响尚少；但在别一方面，则为土豪劣绅、地痞所把持，发生吞款肥私，对借贷之剥削敲诈，管理疏忽种种弊病，不仅平民得不到实惠，积谷数目也逐年减少。大之如省城的湘社、湘义、储备三仓，原有积谷三十余万石，近来因管理的不善，又被军阀提取，仅余四万余石，而省仓竟至颗粒不存。社会对于备荒既如此疏忽，自然一到青黄不接，发生饥荒的时候，无法救济。这事在现时经济制度之下，关系平民生死、社会安宁极为重大。大会因决定：

（一）农民协会应与地方民众团体及自治机关联合，清查原有的社仓积谷，若有经管人侵蚀，应勒令赔偿。

（二）农民协会应由新执行委员，约同各民众团体，并与政府协商议定，增加城、乡的社仓及仓谷。

（三）社仓谷息，不得超过借额十分之一，赤贫者应一律免息借给。

（四）此后，仓谷应由各民众团体组织委员会共同管理，每年于一定时期清算一次，数目公布。

（五）湘义、湘社、储备三仓，应设法灌足，省协会应邀同各民众团体切实清查，并组织委员会管理。

（六）各地社仓积谷，专为备荒而设，严禁提作别用。

金融问题决议案

中国币制紊乱已极，农民及一切贫苦人民所受影响极为深广，本大会为救济这种不良现象起见，特决定如下：

（一）禁止城、乡商店或个人发行市票。

（二）中央银行、省银行及其他经政府准许的银行发行票币，都应该无限制地兑现。

（三）取消元丝银。

（四）铜元的成色，须确定不变，制造数量，须适合社会的需要，不得过多或过少。

（五）禁止轻质的广东毫子及四川轻质铜元入境。

（六）钱水问题，解决办法分为三项：一、银两纹银以七钱二分算大洋一元，元丝银以一两算大洋一元三角；二、铜元制钱，按照当时市价计算大洋；三、票币按照政府颁布之钱水价格表计算大洋。

农民银行决议案

现在的农村经济枯竭到了极点，这个原因约有数项：

（一）因城市工、商业之发达，经营农业，不如经营工、商业之得利，不但城市资本不愿投入农村，即农村原有少数资本，也给城市吸收殆尽。

（二）农业品价格低廉，工业品价格高贵，二者交换，结果农村更大受城市的剥削。

（三）盗匪扰乱的结果，地主多由农村迁往城市，乡间金钱，随

着流入城市。

总上诸因，便造成农村金融枯竭的现象，在这种枯竭现象之下，高利借贷，便乘机榨取。在许多地方虽高利也没有钱可借。农村资本既如此缺乏，农民尤其是贫农的生产力，便因之大为减弱。肥料不足，人力不全，塘坝不修，农具不齐，因此秋收歉薄，影响农民经济极为重大。农业衰落，农民痛苦，遂成为全国普遍现象。

救济办法，只有请求政府设立农民银行，以最低利息，借款给农民。至于农民银行基金，则可依照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最近政纲中“以省公有之地，作为农民银行基金”的规定。查本省政府公地，如营产、官产、荒湖田等类，为数很多。除湖田中的一部分应用作疏河、浚湖费用外，其余部分都应该拨作农民银行基金，不得以他种名目，动用此种为农民谋利益的农民银行的款项。农民银行的管理及稽核，农民协会可以参加。

食盐问题决议案

准盐附加，每百斤征到五元七角，超过正税几及两倍。而垄断盐票的商票、租票、霸运的运商，以少数私人操纵全省民食，层层剥削，罪恶滔天。目前盐价每担涨到十三元以上，加害农民，最为普遍严重。亟应废止私人盐票，打破运商垄断，取消准盐引岸，使川、粤、芦、淮盐，自由流通。淮盐引岸既行取消，政府自可整顿盐税，应即减轻盐税附加，以免贫民长受淡食、贵食之害。又粤盐入口，应收统税，不应该设立分卡，为害农民、商人。

农村合作社问题决议案

“合作社”是互相扶助、互相救济，以排除互相的不利，而增进互相的利益的组织。贫苦的农民，为免除高利的盘剥，应组织“信用合作社”，用集合的资本，集合的信用，以谋储蓄及借贷的便利。为免除辛苦收获的农产品卖出时受奸商压抑价格过低之弊起见，应组织“贩卖合作社”，使农产品能直接输往较远之市场，获得较好之价币。农民日常消耗品，如油、盐、布匹、杂货等类，历受商人居间剥削，常时出了高价买了劣货，急应组织“消费合作社”，公共集资从较大市场或物品产地运来廉价货品，供给农民需用。目前农民以抵制高利贷、免除农产品价格过低、免除日用货物价格过高，这三件事最为急务。因此上述三种合作社之组织，最为迫切。此三种合作社，在初经管时，亦可在一个合作社中分为三部经营。此外，为谋农田水利之改进，农业生产力之增加，亦可组织“生产合作社”。为谋农具、种子、肥料之廉价并迅速购得，亦可组织“购买合作社”。为谋对农产品之加工（如将谷子加工做成米，将木头加工锯成木板），及其他使用之便利（如共同使用水车），亦可组织“利用合作社”。

各地农协，应注意宣传各种合作社之效用。各农协应注意合作社技术人才之养成，并编印关于如何经营合作社之小册子。在政府方面，应依据国民党新政纲“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之条文，在政治上、经济上予以有力之援助，如补助信用合作社之资本，免除或减轻消费合作社、购买合作社运入日用品及农具、种子等税捐，以谋合作事业之发展。各地开办合作社时，

对于经济之管理，须取严密方法，防止流弊之发生，以免丧失信用，阻碍进行。

农业生产问题决议案

（一）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经济，尚停止在封建宗法农业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地主阶级严重剥削的结果，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的境遇，农民痛苦达于极点；另一方面因科学还没有输入农村的缘故，农民所受自然的压迫，如水灾、旱灾、风灾、虫害、病害和生产工具的拙劣、农作的不进步等等，简直无法抵抗。

（二）农民欲求种种压迫的解放，惟有用革命手段方能达到。就是一方面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减轻特殊阶级重租、重利、重捐的剥削，以谋人为之压迫减轻；同时输入科学方法于农村之中，解决资本缺乏问题，以抵抗自然的压迫，而谋农业生产的进步。

（三）目前天然灾害，最厉害的无过于水、旱两灾。水、旱发生的原因，在于森林破坏，河道淤塞，堤垸不固，塘坝不修。因此农民应该努力去提高农业生产，以谋救济。但是大规模的建设，如疏河、浚湖、造广大的森林等，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堤垸、塘坝的修治，政府与地主应分别负责。

（四）至于选择种子，制造肥料，改良农作方法以及修筑道路以利运输，防止病害，驱除虫害，都必须采用科学方法，及得到政府之政治的、经济的帮助，才能解决。因此政府应站在农民利益、国家经济方面，极力去提高农业生产。

农村雇工问题决议案

（一）在现时的农村经济状况，虽不能规定雇农以一定的工作时间，但超过雇农能力的过分时间，因此害及雇农健康者，均须加以限制。

（二）工资与工作及生活物价过于不相称的地方，须酌量情形，增加工资。

（三）年终结账，改为三节（端午、中秋、过年）结账。

（四）禁止强迫童工做超过其能力之工作。

司法问题决议案

现时法律偏于保护特权阶级。负债的乡村农民，尤其是佃农与贫农，因法律偏于保护债权及地权，所受痛苦最大，如“父债子还”“随意易佃”等类，农民在此种法律之下，简直没有话说。在习惯上农民简直不能与地主立于平等诉讼地位。即有诉讼，亦绝少胜诉之事。司法衙门黑暗已极，从来即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俗话。至于诉讼手续的繁杂、讼费的苛重、差役的勒索、讼棍的卡骗，使农民畏官过于虎狼，视地主讼棍如恶煞。宁肯受屈，不肯与讼。此种恶劣情形，急应改变，大会特决定关于司法问题之要项如下：

（一）民、刑法律须全部改订，凡不利于农民的条文，须一律废除。

（二）农民协会有代表会员诉讼之权利。

（三）严禁法官收受地主、债主的贿赂。

（四）严禁讼棍挑拨是非。

（五）禁止差役违法苛索。

（六）取消歇家，农民诉讼，由农民协会保证（以会员为限）。

农村妇女问题决议案

中国农村妇女，在封建制度之下，一切权利都被剥夺。如不能参与乡村自治机关及各种公共集会，即祠堂祭祀酒食，亦无资格参与享受。家政除少数特别外，亦多不能过问，但是她们的家庭劳动，是极繁重的：烧茶、煮饭、挑水、打柴、浆洗、补缀、扶养哺育，终日为了些繁琐家务，劳苦不息，都得不到一点代价。甚至她们必须的几个零用钱，都要从纺绩、打草鞋，或者喂鸡生蛋，才能取得。至于农村妇女的地位，真是恶劣到了万分，其他不自由、受压迫的地方，一时数说不尽。这些现象，都是旧式农业经济社会的必然结果。农村妇女之完全解放，必在由旧式的农业经济，进到一个新式的农业经济以后。目前在可能范围之内，大会督促政府实行中央对于妇女的决议案外，宜用下列几种办法，以资救济：

（一）各级农民协会，设妇女部。

（二）反对恶姑残害媳妇，尤其是虐待童养媳，及严禁妇女包脚、穿耳。

（三）女工工作，与男工相等时，应得同样工资。

（四）须注意领导妇女，加入农民协会。

（五）须宣传妇女有参加乡村自治机关及各种集会之必要，并注意领导她们参加。

（六）农协所办学校，须注意收纳女生。

（七）严禁虐待女孩及买卖婚姻。

青年农民运动决议案

青年农民是勇敢活泼而有进取心和反抗性的，他们除受到一般农民所受的痛苦以外，更因处于家长制度之下，由习俗之束制，感受待遇的不平等，且以农民受剥削过甚，青年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年来水、旱为灾，战祸频仍，其痛苦影响及于青年农民，至深且巨！因之其需要革命，最为迫切。广东各地的青年农民已表示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有很大的力量：如为农民本身利益的斗争，肃清反革命势力等工作，他们无不很热烈地参加。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目前尚在萌芽，农民斗争亦在开始，青年农民的力量尚未能充分地表现出来，然而此次北伐，平江等地的农民参加战事而牺牲者，其中的青年农民不在少数。

青年农民包括青年雇农、牧童及农家子弟等，这些分子在农村中最多，而他们因为富于革命性，能促进整个的农民运动发展起来，农民协会得他们的努力而日趋巩固。他们是农民政治的及经济的斗争的先锋，这种革命的势力，应使其更加扩大而有力量，所以青年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于青年农民伟大的革命力量，应如何地珍视，发展湖南的青年农民运动，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目前湖南青年农民运动的工作，除领导并结合广大的青年农民群众参加一般的政治经济斗争外，应特别注意文化的宣传，训练青年农民革命能力，养成斗争中之主要战士。至于他们的经济生活，虽与成年农民有密切的利害关系，然以提高青年农民之革命

意识计，须尽可能地予以改善。

因为青年农民的地位和生活与一般农民相异，所以他们除一般的要求外，有他们特殊的需要，在目前须达到下列最低限度的要求：

（一）应规定青年农民最低限度的工资，与成年农民做同样工作者，应得同等工资。

（二）每日工作时间超过其能力所能担负的，每月应有例假，在假期内（纪念节日停工在内）应照给工资。

（三）青年农民不做危险及有害身体的工作，禁止雇主虐待打骂。

（四）青年农民因工作伤亡者，东家应给予医药费或抚恤费。

（五）以祠堂、庙宇的财产及他项财产开办青年农民的免费学校，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在此时间内，雇主或家长不得课以工作，农民子弟均应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六）农民协会组织儿童团，以训练农村儿童成为革命的后备军。

（七）青年农民一致加入农民协会。

欲求实现此青年农民本身利益的要求，各级农民协会实负有领导的责任，青年农民工作是农民协会工作中之一部分，青年农民问题得着相当解决，即整个的农运获到助力不浅，所以农民协会应有办理青年农民工作的专人及组织。在省农民协会和各县农民协会须于执行委员之下设置青年部，区及乡农民协会得设青年委员一职，他的责任是计划并指导青年农民方面之一切工作。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须注意不妨害全般农民运动，尤应注意联合会战线策略之应用。

农村教育决议案

中国城、乡教育经费，直接间接，都是农民负担。拿湖南来说吧：省教育经费，最大部分出自盐税附加，这种税很显明地是农民负担的；县教育经费，出自田赋附加，这种田赋附加，一部分由自耕农、半自耕农直接负担，一部分名由地主缴纳，实则纯是佃农担负的；至于乡村教育经费，出自河捐（即谷米捐）、猪捐、牛捐、窑捐、屠捐、竹木捐、蛋捐、鱼捐、石灰捐、祠庙捐等等，无不是直接间接，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

农民负担了一切的教育经费，而农民所受的教育怎么样呢？

专门学校、大学校，完全为城、乡的特殊阶级所专有的，当然找不出一个农民子弟的影子：中等学校至少要中、小地主的子弟才够得上有入学的资格；进得起高等小学的人，也多属于有余钱剩米的富农子弟；就是国民小学校的学生，也是少数比较有饭吃人家的子弟，多数贫苦农民是完全没有份的。总结一句：出教育经费的是贫苦的农民，受教育的则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以外的特殊阶级。据近来教育统计，全国受教育的不过百分之三，没有受教育的，竟至百分之九十七。这就是表明中国百分之九十七的贫苦人民，供给百分之三的特殊分子的教育经费。不但贫苦农民不能得到一点教育机会，反造成少数特殊阶级。这些特殊阶级，利用其优越的知识，来愚弄压迫贫苦人民，而且时常笑骂贫苦人民，指为“无知愚民”，这是何等不平等的事啊！

再看现在乡村教育的状况：私塾、学校同时存在。私塾是旧式农村经济的产物，到现在还拿着四书、五经做教本，宣传封建思

想，这是极大的缺点，但私塾能投合农民的要求，课余教些杂字杂文，私塾教师亦能为农民书写应用文字，这些都合农村的需要，故现在的私塾，尚能得农民拥护。学校的好处，在于向封建思想完全笼罩的农村中间灌输进步思想。因此学校往往与地主阶级冲突，彼此争斗，至为激烈。旧学校教材的内容，半是说些城市中间的东西，太不合农村的需要；同时学校教师态度亦多与农民隔绝，所以农民对于学校，大多是怀疑的。以前乡村教育之又一缺点，只有儿童教育，没有成人教育；只有男人教育，没有女人教育。其结果使目前实际生产社会中坚的大多数人物，陷于知识缺乏的状态，影响到革命之完成，国家之建设，实在大极了。

还有一点，是我们所不可不知道的，就是农民教育普及，全靠农民自己起来，有了自己的团结，从特殊阶级达到减租、减息及废除苛捐之目的，然后农民才能有余力自己举办教育。必须农民能够自己举办教育，然后农民才能开始接受文化；必须由农民自己举办教育，然后这种教育才是真正合于农民所需要的。否则如一般人天天所说普及教育，始终只是一句废话。而所谓义务教育、平民教育等等，实际都是些“打屁不挨腿”的东西。

大会根据上述理由，参照实际需要，特决定关于农村教育问题之要项于次：

（一）下级农协应竭力注意开办农民学校，分为日班、夜班，日班教农民子弟，夜班教成年农民。

（二）农民学校的课程、编制及教材，省农民协会应从速组织农民教育委员会，编制应用。

（三）农民学校，应尽可能地设置妇女班。

（四）农民协会所办之农民学校，其经费之来源于下：甲、从佃

租中减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乙、提拔地方迷信公款；丙、省、县政府特别补助，在省、县预算中列为专项。

（五）乡村原有之国民小学、高等小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其材料应力求适合农村需要，应由省农民协会教育委员会，邀同各界热心农村教育人员，组织湖南农村教育协会的大规模的农村教育运动，即由此会编制乡村小学教材。

（六）为适合农村儿童就学的经济能力起见，国民学校应改四年制为三年制。

（七）改良私塾，其方法注意向私塾教师灌输进步思想，并改良其教法。

（八）为谋农民教育发展的农民协会应与小学校教师及私塾教师密切联络，并容许他们入农民协会。

（九）省农民协会，应设法出版农村白话报、农村画报各一种。区、乡农协均应附设阅报处，并于乡村要道，张贴壁报。

（十）国民学校，应津贴贫苦农民学生的中餐。

（十一）县农民协会、县党部会同县政府应创办培养农村小学师资的学校。

宣传工作决议案

（一）农民协会是领导农民群众参加国民革命，同时为农民本身利益而奋斗的机关，所以我们的宣传，要有一定的计划、统一的方法，才能团结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农旗之下，实现我们的使命。湖南农民，在全省人口三千万的估计中，至少要占二千万的数量，一年来农民运动的成绩，虽已有一百二十万会员，但我们为革命前途着

想，仍旧是认为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对农民的宣传，取得全体农民群众的参加。

（二）根据上面的理由，今后的宣传工作，应注意下面的几个原则：

1. 一切鼓动和宣传，须避免流于空泛及机械式的训话，而应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

2. 农村中的迷信、宗教、伦理及道德观念，都是农业经济的反映，只有渐次地设法提高农村文化程度去清除它，不必与它发生冲突。

3. 观察中国现在政治情形及农民群众的斗争力量，确定我们的总口号是全体农民团结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高租重利，实际参加地方自治，要求民选委员制的县政府。

4. 过去农民的错误，是过于依赖政治势力及迷信领袖，今后的宣传工作，应注意从不断的斗争中，使农民认识自己团结的力量。

（三）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亟待进行，应采行下列几个具体办法：

1. 宣传机关问题

为使宣传工作做得完美而有系统起见，应使省农民协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宣传部，县、区农民协会亦应同样地设立县、区宣传部，严密地受省宣传部的指导和管理。

2. 省宣传部部务问题

（甲）设立农民通讯社。命令各级农民协会按时将重要农运消息向通讯社投稿，再由通讯社审查发表。各级农协会员不得自由报道农运上的通讯，致发生政策上的错误。

（乙）设立图书馆。尽量收买关于农民问题的书籍报纸，以作农

民运动的参考，到了稍有成绩的时候，将详细目录寄往各级农民协会，并制定借阅章程，以备各地借阅。

（丙）日常部务：

（1）随时拟定各种纪念节日及政局的宣传大纲；

（2）时常向各地宣传部发部务通告；

（3）与各地宣传部通信，答复他们的报告和信件；

（4）接受并批评各地宣传报告；

（5）实行农村的调查工作，如土豪劣绅问题，租率、利率、物价、地价、工资、农村社会组织与实际情形；

（6）搜集并调查各党派及社会各阶级对农民运动的言论及对省宣传部各种宣传的态度。

3. 出版物问题

（甲）办一种专供农民阅读的周刊，目的在给各地农民以政治及革命理论的常识，指示农民铲除封建势力，建设民主政治的道路。

（乙）供给农民运动者及社会一般人士明了农民运动的刊物，注重农民问题理论的论述及农民运动临时问题之分析，可出半月刊一种。

（丙）理论书籍的编辑。扩充农民运动丛书，以供农民运动者及社会一般人士之研究。各地有价值之书籍也可斟酌翻印。

（丁）农村补习教育的书籍：

（1）补习学校课本的编定；

（2）补习学校办学方法的编定；

（3）补习学校教育的方法（实际的课目表及参考材料汇录）的编定。

（戊）经常训练及鼓动的小册子、画报、标语：

（1）文字的宣传品应极浅显而带趣味性，易为农民接受者。与其用论文，无宁用小说及有韵的歌谣或问答体的短文。

（2）根据农民要求，选择简单有力而农民所能懂得的文字及意义，做成标语及画报。

（3）各种宣传品有时可改变乡里传说及神话，而把革命的宣传附属上去。

（4）农村中识字的占少数，所以我们还要注重口头的宣传。纪念节日及重要政治问题发生时，可印发谈话纲要，发交各级执行委员，以备与农民谈话。又可编制与农民有关系的戏剧，在各地排演。

（5）农民小丛书，应照上面原则，扩张省宣传部经常的宣传品。

农民协会经费问题决议案

（一）各级农民协会，因会务发展，工作增多，不能不确定相当数目的经常费用，如少数办事人生活费、办公费、宣传费、交通费等项皆是。但是，下级农协的经费数目，须根据各地工作情况及地域情形，由县协会决定经省协会批准，省协会之经费由省代表大会核定。

（二）农协经费的收入，分为下列各项：

1. 会员入会费每人一百文，月费每月每人二十文，不得增加。非特别情形经高级协会批准者，亦不得减少或不缴纳。

2. 从公、私地主所收租额中，按照各地租率大小、租额多寡，减租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八，指定为农民教育经费。各地减租数量须

由县协会决定经省协会批准。

3. 酌提地方无益公款，但须经省农民协会的批准。

4. 县政府及党部的津贴。

（三）各级农民协会经费收入支出，须造出预算、决算，向该级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公布之，县、区乡农协的预算、决算，均须经省农协批准，如省农协认为有情弊时，即令其停止支用。

对于农民运动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到易礼容同志湖南农民运动报告以后，全体一致决议如下：

（一）湖南的农民组织已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会员，在短时期中即有这种成绩，我们认为是满意的；但就全省局面来观察，为担负国民革命的工作，这点数量还是太少。今后当更以十二分的努力，从事发展，以贯彻“全省被压迫农民在湖南省农民协会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口号。

（二）在北伐军事行动中，浏阳、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处农民实行参战，因此使北伐军垂手而得武汉，湖南农民参战与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同足证明“工、农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的理论不为虚言。然此次参战农民牺牲很多，本大会敢代表全省农民深致敬意，并接受其革命精神。

（三）一年来从湖南农民的斗争中知道目前湖南农民急迫的要求为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民食问题，而其革命的最大对象则在打破封建制度，建设民主政治。这种要求表现于反团防，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要求武装的行动中更加明显。今后的工作应领导农民，一方面继续作上面的争斗，以根本扫清封建余孽；一方

面更努力民主制度的建设，即实现乡民会议、县民会议、省民会议以至于国民会议，而以多数贫苦农民为领导之乡民会议与乡村新自治制之建设为基础。

（四）土豪劣绅为农民的直接统治者，同时又是军阀政治的基础，因农民的奋起，各地土豪劣绅为继续保障其剥削计，乃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于是农民乃不得不加以反攻，目前乡村中纠纷事实乃因此形成。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最有力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行动是很好的，今后更当加倍努力。

（五）湖南农民运动中各地的工作同志，在微薄的薪资和过度的劳苦中，处处表现刻苦、努力、廉洁、一切为革命的美德，这是值得我们景仰的。但是有些同志行动不免流于幼稚及不注意外交的错误，这是应该努力改变的。

（六）从全部工作的成绩看来，我们认为满意，然而今后值得我们努力改变的亦有下列几点：

1. 组织不严密，不开会缴费，不免有土豪劣绅混入；
2. 缺乏训练，因此农民能力不能增加，政治观念不能进步，或不信自己力量，或陷于骄傲；
3. 宣传不切实、不普遍；
4. 口号过高或过低；
5. 不能领导农民从斗争中得到训练；
6. 调查工作没有注意。

农民协会组织问题决议案

（一）各级农民协会，统一于省农民协会之下。

（二）各级农民协会应向省农民协会立案，得其批准方为有效，但是区须由县转省，乡由区转县，再由县转省，县农民协会由省农民协会函请政府备案。

（三）各级农民协会及执委，不接受上级命令，自由行动，违反农民利益，或与上级发生关系而不诚实（如报告不确实之类）者，个人则由上级警告或撤职，或开除之；全会则由上级警告或改组之。但区农民协会除警告外，不能执行此项职权，县农民协会执行此项职权须报告省农民协会。

（四）县以下各级农民协会称呼不统一，有冠以地名叫作某区某乡的，有冠以级字叫作第几区第几乡的，为划一起见，应规定区、乡农民协会都用数目字区别。

（五）解释章程及划定各级协会的权力，属于省农民协会。

（六）省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举行洗会运动，以淘汰不良分子。

（七）为使会员与非会员不致混淆起见，由省农民协会特制农民协会会证颁发之。

（八）县农民协会旗帜、印信，须由省农民协会核准颁发，不得私自制造。区农民协会旗帜、印信，由省农民协会颁发式样，由县农民协会核准颁发，不得私自制造，但县农民协会颁发后，须将式样呈省农民协会备案。

（九）区农民协会于必要时得分设办事处。

禁止瓜分乡村公产决议案

乡村公产如祠堂、庙产等项，应该要拿来做乡村公益事业，如创办农村教育，整理道路、桥梁，救济贫病孤苦等。近来各地土豪

劣绅，接受帝国主义所造的“赤化共产”的谣言，向农村中宣传农民协会是没收地方财产的机关，以恐吓一般乡民，将祠产、庙产到处瓜分，借图中饱，如湘潭、湘乡、浏阳、平江、常德……等县最近都有这种事实发生，若不设法制止，不独影响农村公益，且开土豪劣绅及其爪牙乘机渔利之门。

制止的方法，应请政府严令禁止瓜分乡村公产及无益迷信款项，应由农民协会邀同地方革命民众团体公议保存及处置的方法，若有违反这项禁令，擅自瓜分公产，以图一己中饱，不顾乡村公益的，便是土豪劣绅，或属土豪劣绅的爪牙，得由地方自治机关公议处置，其情节重大者，应请政府按照惩办土豪劣绅条例而惩办之。

禁烟问题决议案

鸦片流毒深入农村，许多生产谷米的田地，变而生产鸦片，成为民食缺乏的原因之一。吸食鸦片的人，尤其是劳动者，废时失业，有害健康，在社会上更发生了许多恶影响。湖南已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赵、叶军阀勒种包销、饮鸩止渴的政策，应该根本铲除。尤以湘西各县受害最烈，政府应有彻底办法，以资救济。目前急务，应请省政府通令全省首先禁种禁吃，限期禁绝，再在全国规模之内，严禁邻省鸦片通过本省。

湘西问题决议案

湘西连年大旱，又加上几次的兵灾，人民不知死去多少，失业

的更是成群结队，更加土匪如毛，遍地抢劫。即使免于死亡失业，然而家居外出，假使不蒙土匪的庇护，也要遭不测之灾，吊羊勒赎，竟是寻常的事情。近更军队复杂，川军、黔军各达数万，此来彼去，勒索供给，动辄巨万，而且各自扩充势力，乱发委任，到处招安土匪。一到了冲突时，这里解散，那里聚集，这里剿灭，那里安抚。各据一方，放出许多如狼似虎的官吏，任意添设税关捐募，勒种烟苗，苛派军差，极尽了压迫剥削的能事。湘西人民，尤其是农民，在这种黑暗政治之下，担负重大的税捐，受着兵匪的骚扰，简直是有田不能耕，生机完全断绝。占全省三分之一的湘西，陷于这种紊乱状态，乃使整个的湖南政治经济，也不能统一。农民为解除自身痛苦，拥护湖南政治经济的巩固与统一起见，竭全力从事扩大革命民众的组织，增加民众自身力量，以反对军阀政治的工作。同时督促政府于最短时间，肃清不法军队，解决土匪问题，开辟交通，禁绝鸦片。

解放苗、瑶决议案

苗、瑶是一种古代民族，因汉族西来，避至湘、粤、川、滇、黔、桂深山间，人口有一天天减少的趋势，生活已到了极痛苦而绝无希望的地位。但是这些民族，可以说全体都是爱和平的农民，历朝外受汉族封建君主的大屠杀，内受土司、酋长的严重剥削，致使此等爱和平的农民，长处暗无天日的世界。而汉族人士习于传说，以为苗、瑶为极野蛮的民族，即灭亡亦不足惜。解放弱小民族为革命农民的志旨，农民协会尚有不问国别均得为会员的规定，我们对于同国异族的农民同胞，实有竭力提携的必要。湖南南部旧衡阳道

属土著多瑶民，西部旧辰源道属土著多苗民。本大会为解放苗、瑶起见，决议如下：

（一）设法使苗、瑶等民族加入当地农民协会，或助其组织单独的苗、瑶农民协会。

（二）严禁汉族侵占苗、瑶土地。

（三）开办苗、瑶简易学校。

（四）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

（五）请政府严厉剿灭苗、瑶土匪。

（六）请政府颁布解放苗、瑶的明令，使其与汉人政治经济一律平等。

（七）援助苗、瑶，解除土司、酋长的残酷压迫。

没收逆产问题决议案

过去的湖南军阀及其封建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无不剥削人民，侵蚀公款，以饱其私囊。现在革命势力虽已及于湖南，然而这些民贼，仍保存其由剥削侵蚀得来的丰富的财产，建筑雄厚的经济势力，以为他们图谋死灰复燃之基础。欲求反动势力之肃清，必首先没收其财产，毁坏其经济基础，使他们先其依附。他们的财产，既然是由剥削侵蚀而来，当然仍应还诸民众。所以我们对于没收逆产的主张是：

（一）督促清查逆产委员会，从速没收一切军阀及其党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

（二）各级农民协会负责调查当地逆产，报告清查逆产委员会。

（三）规定逆产为抚恤老、弱、残废、兵士及赈灾之用。

工、农、商、学大联合决议案

现在中国国民革命，是各阶级合作的革命。这个意义，很可以就政治、经济两方面来说明，尤其是经济问题，在各阶级连带关系中，更为重要。现在各阶级民众，在政治上共同的需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买办阶级，以求得真正的民权实现。在经济上是要发展生产，使原料丰富，出品增加，销场扩大。同时，知识分子，就能够拿着所学的进步的技术和知识，来应用于社会。

就湖南说，现在虽已归革命政府统治，然境内封建军阀余孽及一切反革命派还到处潜伏，阻挠革命工作，必得一律肃清。同时，对于建设方面，各阶级民众，应首先完成乡村自治，进而至于县民会议、省民会议、国民会议，使时局发展，合于民众需要，而不至右倾。基于上项理论，及应付湖南政治环境，因此本大会提出工、农、商、学大联合口号，议定具体方案，促成湖南各阶级民众，一致团结，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以期达到最后的成功。

拥护中国国民党新政纲决议案

在北伐军事势力进展九江、武汉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为应付新的政治局面起见，特召集中央及各省联席会议，以决定今后方针，经审慎的讨论，产生了新的政纲。此新政纲，我们认为确实能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全国民众若能依照此新政纲继续奋斗，一定能使目前的革命早日完成。尤其是关于农民的政纲，尚能适合目

前农民群众的需要，使封建势力在乡村根本无存在之余地，因此本大会一致决议，愿率湖南全省农民群众，拥护此农民政纲。同时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在最短期间，在行动上贯彻此革命之新政纲。

接受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对于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之主张决议案

共产党为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一方面领导中国工、农阶级，联合一切被压迫民众共同从事国民革命，反抗帝国主义，求中华民族之解放；一方面为实现工、农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最近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发表对农民目前最低限度要求的主张，本大会认为他们的主张确实是依照农民客观的环境及主观的要求决定的，因此本大会对共产党这种主张，完全接受，并训练各级农民协会，于最短期间，切实遵照执行。

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决议案

帝国主义八十年来宰制中国，因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军阀买办阶级的豢养，使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变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其中，英帝国主义者以历史久远的资格更穷凶极恶，去年因民众势力的奋起，乃实行“五卅”大屠杀，结果，酿成“省港罢工”及全国排货运动，给英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以绝大打击，然英帝国主义

宰制中国的野心，不因此而少懈。一年来，一方面实行勾结吴佩孚、孙传芳；一方面继续炮舰政策，如最近万县惨案，长江一带故意撞沉华船等事。本大会认为一切革命的民众，为求生存计，目前实有一致团结起来打倒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的必要。因此，特一致议决扩大对英经济绝交，并建议各县境域内，各种民众共同组织反英行动委员会。

各级农民协会全体加入济难会决议案

中国济难会的宗旨，是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中之被难者，并发展世界被压迫民族之团结精神。自“五卅”以后开始成立，一年以来确实博得一般革命民众的同情。本大会除极端赞助外，并议决全省农民一律加入济难会为会员，并在各级农民协会设立济难分会，共图救济事业之发展，以期革命之早日完成。

拥护省民会议决议案

省民会议是保障革命民权，巩固北伐后方，肃清封建余孽，促成国民会议的出路。全省民众已组织了省民会议筹备处，限期举行，我工、农阶级实负着极大的宣传和推进的责任。湖南的农民们、工人们，从过去痛苦经验中，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当然要在省民会议中，得到一个具体的方案，一以促进国民会议之早日完成，一以实现农、工阶级之逐渐解放。对于漏网的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或混入会议中来捣乱的，我们一定本着除恶务尽的态度，去铲除他们。本大会特郑重决议：以全力拥护省

民会议！

加入赤色农民国际决议案

为集中革命势力起见，一九二三年，乃有赤色农民国际的组织。此世界农民协会，有完全的革命政纲，他打着列宁主义的旗号，领导全世界农民为本身利益而奋斗。我们黄色人种的农民应赶快集中在他的旗帜之下，共同打倒我们的敌人。本大会议决湖南省农民协会单独加入农民国际，并应联络各省区已成立之省农民协会，一致加入农民国际。

抚恤北伐伤亡将士决议案

国民革命举行北伐以来，英帝国主义多年卵翼的吴佩孚、孙传芳势力，全部消灭，今且进而号召第二次北伐与奉、鲁军阀实行肉搏。因此在国民政府领域之下，一切民众能取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等绝对自由，而充分参加国民革命。这个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革命民众本身努力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北伐将士的碧血换来的。北伐的将士为国民革命而喋血疆场，留下他的父、母、妻、子，在孤苦无告中过着日子。尤其是最大多数的兵士，因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破坏农村经济，不得已离土地而集中军营，其全家衣食，即赖血肉换来的军饷，今一旦失此衣食来源，全家悲痛之余，复有转成乞丐饿殍之患。

本大会一致决议，请政府据下列两个具体的方法以抚恤北伐伤

亡将士的家属：

（一）属于逆产的田地发给伤兵及阵亡将士的家属耕种。

（二）加征盐税三角作为抚恤费。

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决议案

我们的战线要是不集中的时候，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总是要被敌人陷在无援的地位的。同时我们的工作，仅限于一个局部的地方的时候，因不能收集思广益之效，常常是要走上错误的道路。据农民协会的章程，有三个正式省农民协会，即可成立全国农民协会。本大会应即联合广东、湖北、江西、河南之省农民协会，在最短期间，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农民协会，以确定今后全国农民运动的方针，统一全国革命的农民之行动。

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决议案

中国国民党在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改组以来，确定援助工、农的政策，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最近中央联席会议，对于农民都能有很切实的政纲。

孙中山先生说：“我们解决农民痛苦，归结要耕者有其田。”这确是中国农民问题解决的唯一方法，因为中国农民目前艰苦奋斗，努力向前的目标即在“耕地农有”。

中国国民党的最大使命，真如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第三次宣言所说：“当遵先总理遗嘱，设法解决土地问题。”

谁能预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问国民党解决土地问题与否。

本大会敢代表湖南二千万农民誓以全力拥护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完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工作。同时并希望党与政府在最短期间，贯彻“耕地农有”的政纲。

1927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

在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上的讲话[1]

（1927年1月4日）

一

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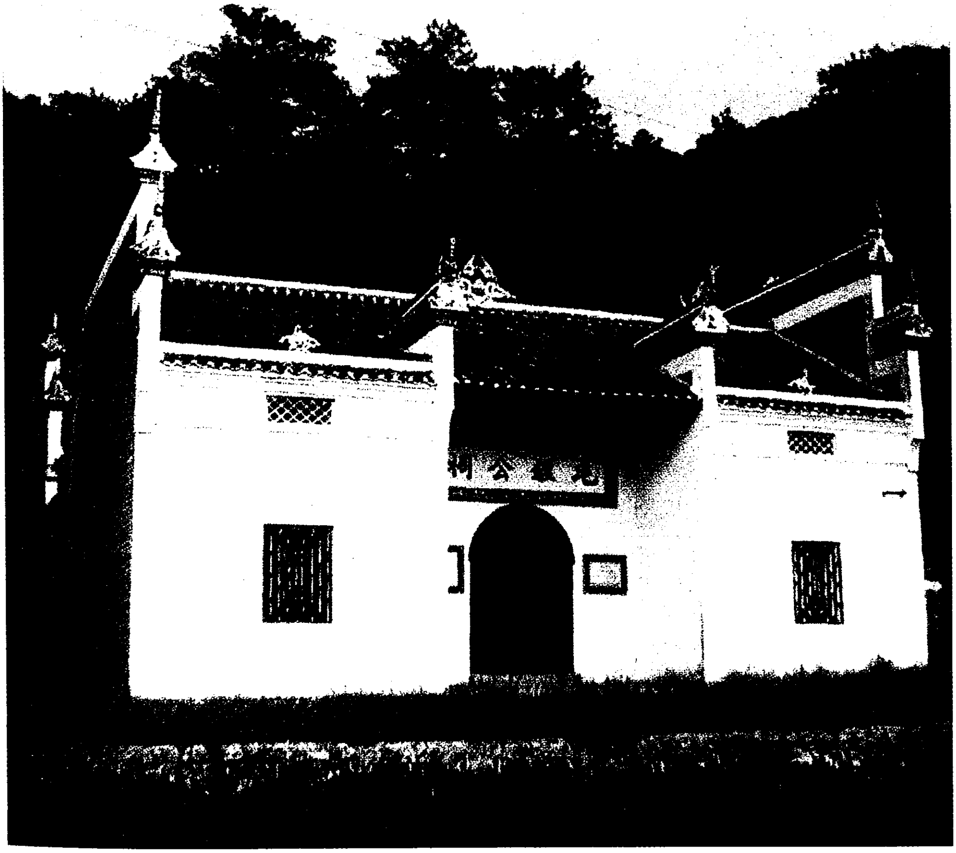
二

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看到很多妇女参加第一区农协干部会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关于农民的革命精神讲话的一部分，要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

湘潭县第一区农协会所在地银田寺白庙。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农协干部和群众大会，并作讲演。



毛鉴公祠。毛泽东曾在这里参加特别区第三、第四乡农协召开的大会。

和农协干部的谈话[1]

（1927年1月）

我从银田到韶山来，看到农民都起来了，已经掀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1] 在韶山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农协干部和群众座谈。这是毛泽东和毛福轩、王淑兰等农协干部谈话的一部分。

在询问唐家圫农民运动情况后的谈话[1]

（1927年1月）

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

[1] 1927年1月9日至14日，毛泽东到湘乡县考察，先在唐家圫外祖父家同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弟和一些老农20余人座谈。这是毛泽东在询问了唐家圫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后谈话的一部分。

土地问题草案[1]

(1927年)

本党总理在同盟会时代，即注意到非解决农民问题中之土地问题，革命不能彻底成功，当时所提出的口号为“平均地权”。但平均地权仅能限制大地主之垄断土地，仍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故后来更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总理在民生主义的演讲中，及对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训话中，均极力发挥耕者有其田的重要。以为必定为要耕者有其田，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痛苦，必须彻底解决农民的痛苦，革命才能得到农民的拥护，才能使革命彻底成功。所以，总理在民生主义演讲中说：“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了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但是，总理并不主张在革命开始的时候，毫无准备，即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且在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重重压迫底下的农民，他们第一步所急于需要解决的还不是土地问题，而在推翻那些解决土地问题的障碍物。所以本党在总理指导下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政纲与土地有关的只有

---

[1] 本篇是毛泽东与邓演达、陈克文拟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草案。具体时间不详，但从文件的卷宗来看，放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档案内，由此判断当在1927年1月至2月。

“应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及“整理耕地”的规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农民政纲关于土地问题之决议，亦只有“从速整理耕地”及“清理官荒分配于失业之贫农”的明文。去年联席会议决定之最近政纲，与土地问题有关者，为：（一）统一土地税则废除苛例；（二）省公有之地由省政府拨归农民银行做基金；（三）荒地属省政府应依定章分配于贫苦农民；（四）政府应帮助农民组织及发展垦殖事业。这些政纲都未能达到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现在客观事实的需要已经进了一步了。一年来农民解放运动，因农民自己的努力和本党的领导，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本党以前所定的农民政纲，虽然还是很普遍的为农民所要求实现而没有实现的，但是事实上有许多地方的农民，确有进一步的要求，本党以前所定的政纲已经不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了。这个进一步的要求是什么呢？便是“耕者有其田”。

我们试留心地看一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农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已经协助本党取得了一部分的政权，打倒了军阀和一部分土豪劣绅。但是他们的生活还不是和从前一样吗？痛苦还不是没有解除吗？农村中被驱逐于职业界外以致流为土匪、乞丐或卖身于国外资本家的无产者，不是一日一日地增〔加〕吗？半无产的部分即虽有若干土地或资本，但收入不够支出陷于负债地位的农民，这一部分半无产的农民比无产部分数目更多。这些全无土地资本之贫农，我们提出减租减息减税等口号，简直和他们不生关系，既半无产的贫农，这些口号所能给他们的利益亦属不多。这许多农民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后，他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样的贫苦农民，在农村中是一个极大的数目，占全农民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我们将怎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他们现在已经到了要求土

地的时候了，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已经到了要行动的时候了。并且在北方各省的红枪会、大刀会、连庄会和以前的白狼〈朗〉、老洋人等，更是很大的贫农群众，其形势之严重过于南方。我们的革命势力不久便要到北方各省，北方的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会要立刻发生，所以本党目前对于土地问题，应该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因此，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有下列各项的议决：

（一）组织土地问题委员会于最短期间内计划解决土地问题的解决。

（二）各省省政府须于短时间内将全省的土地情形调查完毕。

（三）省政府须从速设立农民银行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给农民。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1927年2月12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所由湘鄂赣三省党部联合创设，呈请中央党部核准备案，定名为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条　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

第三条　本所学生由湘鄂赣三省党部考送，湘、赣各一百五十名，鄂二百名者，外得斟酌农运发展需要添设他省学额若干名。

第四条　本所经费由湘鄂赣三省党部按照学生名额负担并请中央党部津贴。

第五条　本所设立于武昌。

第二章　学制

第六条　学级编制暂分三班，遇必要时得再行分合。

第七条　学科规定于下，遇必要时得行增减。一、三民主义；二、国民党史；三、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四、帝国主义与中国；五、社会进化史；六、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七、各国革命史略；

八、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九、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十、经济学常识；十一、政治常识；十二、法律常识；十三、中国职工运动；十四、农民问题；十五、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十六、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十七、各国农民运动状况；十八、乡村自治；十九、农村教育；二十、农村合作；二十一、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二、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三、农业常识；二十四、农民组织及宣传；二十五、农民自卫；二十六、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二十七、革命歌；二十八、革命画；二十九、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第八条　学习期间定为四月。

第三章　行政组织

第九条　本所设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委员会，管理全所事务。委员会由三省党部委任若干人，中央农民部委任一人，并请中央党部加委组织之。委员会推定主任委员一人，办理本会日常事务，对外代表本所。

第十条　本所设教务处、训练处、事务处，每处各设主任一人，分别主持各该处事项。主任由委员会聘请之，各处得酌量情形聘用干事若干人。

第十一条　各处设委员会协助主任进行各该处事项，其组织如下：

一、教务委员会，由教务处主任及教员若干人组织之。

二、训练委员会，由训练处主任及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三、事务委员会，由事务处主任及事务员若干人组织之。

第四章　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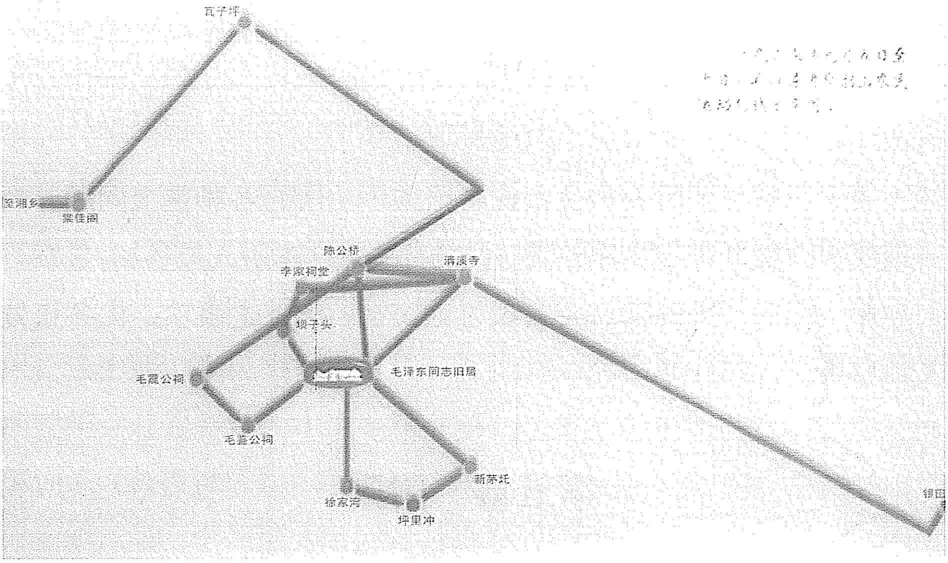
第十二条　全所委员会会议讨论关于全所之各种重大问题，由主任委员召集，遇必要时得请与议案有关系之本所人员参加。

第十三条　各处委员会会议讨论属于各该处之事项，由各该处主任召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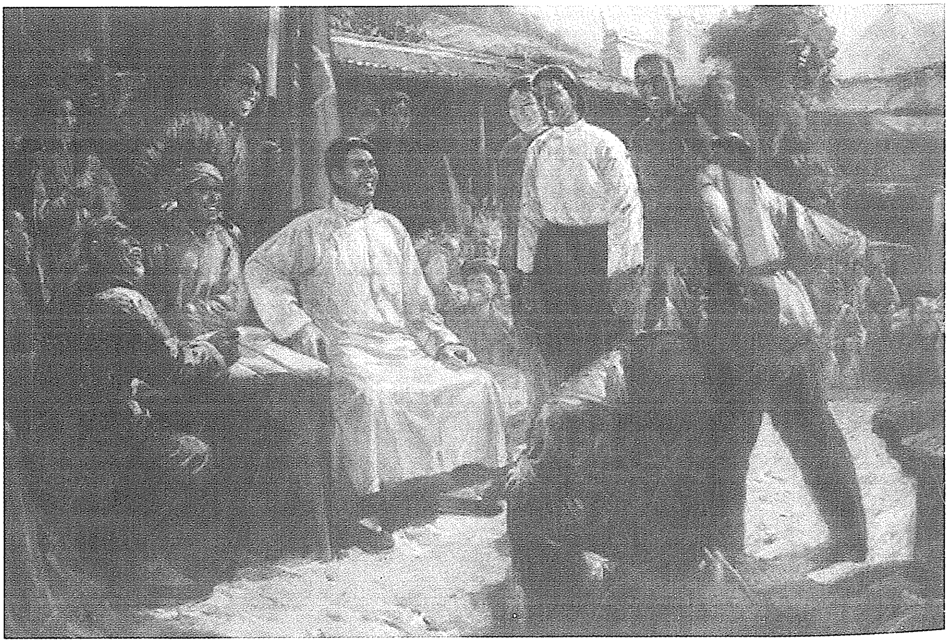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章程如有增删之处，由委员会提议修改之。

第十五条　本章程由三省党部呈请中央党部批准后施行之。


瓦子坪
至湘乡
棠佳阁
陈公桥
李家祠堂
清溪寺
坝子头
毛泽东同志旧居
毛震公祠
毛鉴公祠
新苏托
徐家湾
坪里冲
银田

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的路线示意图。



《毛泽东考察韶山农民运动》（油画）

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给中央的报告

（1927年2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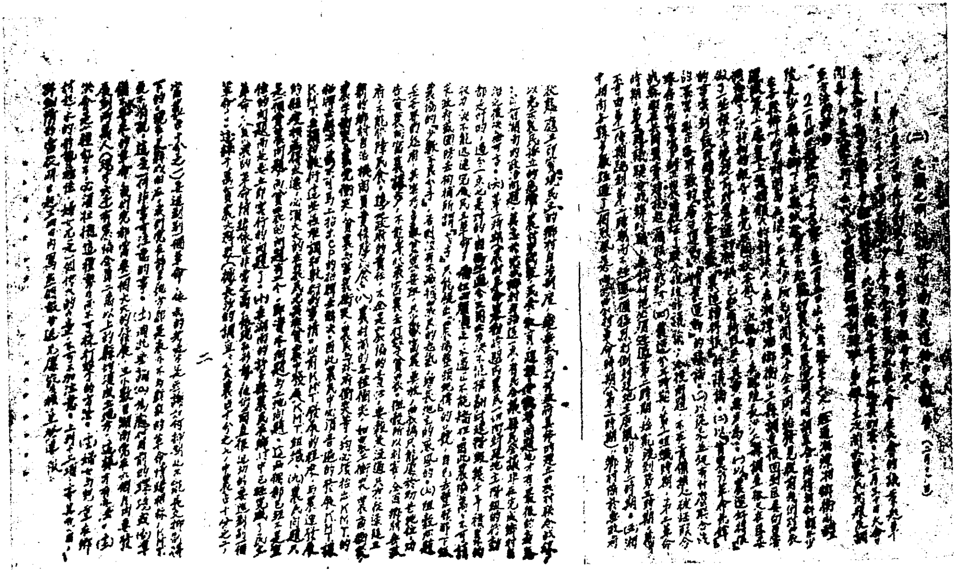
弟二月十一日由长沙到武昌，兹将各事报告于次。

一、弟十二月十七日由汉口到长沙参与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大会的议案起草委员会中商量各种决议案，此次决议各案大体还算切实。十二月三十日大会闭幕，与区委决定将大会代表各同志开一短期训练班，弟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二、一月四日起往乡下去考察，至二月五日止，共考察三十二天，经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乡，在乡下在县城邀集有经验的农民及农运同志开调查会，所得材料颇不少，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表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在湘潭、湘乡、衡山三县调查后回到区委向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的报告，在党校、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在醴陵、长沙二县调查后又在区委作了一些报告。党从前对农运的错误，已经有所改正，其重要点为：（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起一个联合战线。（四）农运分三时

期，第一组织时期，第二革命时期，第三建设联合战线时期，无论何地必须经过第二时期，始能渡到第三时期，万万不可由第一时期跳到第三时期而不经过一个猛烈打倒封建地主威风的第二时期。（五）湘中、湘南各县多数经过了一个烈风暴雨的农村革命时期（第二时期），乡村陷于无政府状态，应立即实现民主的乡村自治制度，变无政府为有政府具体地建立农村联合战线，以免去农村孤立的危险；农村□武装、民食、教育、建设、□□等问题也才有最后的着落；目前湖南的政治问题，莫急于完成乡村自治这一点，省民会议、县民会议非在完成乡村自治之后决无可言。（六）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因此农协万万不可请求政府或团防去拘捕所谓“痞子”，只能提出“农协整顿纪律”的口号，自己去整顿那下级农协的“少数不良分子”，否则没有不减损农民的志气，增长地主的威风的。（七）阻谷问题是各界的□□，其实乃多数贫农要阻，只少数富农要放，农协只能处于劝告地位，劝告贫农向富农让步，不能要代表富农去打击贫农，阻谷所以利害，全因乡村无政府，不能保障民食，这是政府的责任，不全是农协的责任，要谷米流通只有从速建立新的乡村自治机关负责保障民食。（八）农村间的各种冲突，如农工冲突、农商冲突、农学冲突、农党冲突、贫农与富农冲突、农民与政府冲突等，均必须抬出K.M.T.的招牌去解决，万不可马上抬出CP的招牌去解决。因此农民中必须普遍地发展K.M.T.，让K.M.T.去调和敷衍这些极难调和敷衍的事情。以前K.M.T.发展的程度，与农运发展的程度相差得太远，必须大大地在农民尤其在贫农中发展K.M.T.

组织。（九）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十）在湖南的许多县农民在乡村中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地要进到另一个革命！这样千万贫农大群众（据长沙的调查：贫农占十分之七，中农占十分之二，富农占十分之一）要进到另一个革命，依我的考察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K.M.T.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十一）因此要论（a）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b）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至小数目湖南党在六个月内要发展到两万人（现才六千）有农协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须成立地方，这样才有办法。（十二）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取打击的方法。（十三）妇女与儿童在乡村起来的形势极佳，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上列十三项，举其要目，详细情形当从明日起三四日内写出一个报告送兄□察核，并登导报。



1927年2月，毛泽东考察完毕回到武昌，16日给中央写了报告。图为报告的部分内容。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之经过*

（1927 年）

一　创办缘起

本所是由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而成的。要叙述本所成立之经过，当从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说起。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之创设，是有下列的要求：湘、鄂、赣三省为本党新开辟之省份，三省的反动军阀，虽云打倒，但是军阀的基础尚未铲除，革命的基础，亟待培植。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有组织的民众。在湘、鄂、赣三省要建设民主的政治，铲除封建势力，这种扩大民众的组织，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实为非常迫切、非常重要的工作了。为应付这种革命的需要，必须培养一批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以担负这个工作，这是创办农所第一个要求。其次大家都知道，农民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三万万二千万人的问题。如果三万万二千万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国民革命永远不会成功的。因此农民问题，实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了。可是如何去搜集这些问题的材料，如何去分析研究，如何去求谋解决，在本党统治之下，如何去具体实施本党农工政策，在军阀宰割之下，如何去领导农民起来，向敌人进攻，这些问题，都逼迫着我们解决，而且非集合各方面的聪明才力，以对付这个问题不可。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遂

在这些迫切要求之下，产生出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系湘鄂赣农所扩大而成，则其所负使命，当更重大，可以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大本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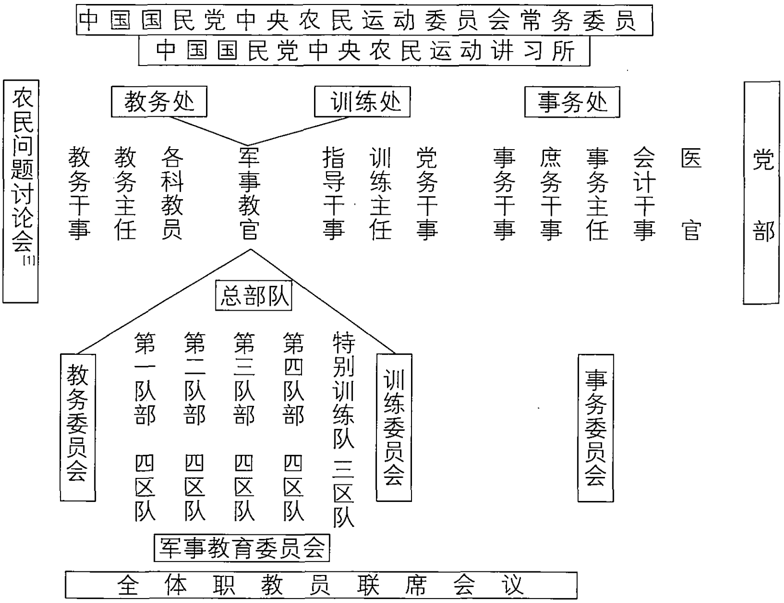
二　筹备经过

创办农所，各方已感需要。而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即决定学生选送数目，赣一百五十名，湘一百五十名，鄂二百名；及经费负担办法，每名费用八十元，湘赣各担负一万二千元，鄂一万六千元。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筹备员共有八人，均由三省党部先后推出，湖南省党部所推出者为毛泽东、陈克文、周以栗，鄂省为张眉宣、陈荫林、李汉俊，赣省为龚式农、王礼锡。筹备处于一月十六日成立，设于湖北省农民协会内。当时筹备处仅住一人办公，房屋校具，一切无着，经费仅湖南来了二千元，而距开学期又不过月余，筹备实感觉非常困难。共开了五次会议，所做的工作，第一，就是找定所址。武汉机关林立，学校多被占领，农所学生又多，几乎无法找得相当所址，经过若干转折，始找定现在房子，但是曾驻军队，毁坏不堪，许多的经过加工修造。第二，就是设备一切。讲桌床铺食桌以及其他一切用具均系从新设备。第三，就是招考学生，规定考试标准，湘、鄂、赣三省学生，完全由三省党部考送。此外为顾及全国农运之发展，添招皖、苏、川、豫、直、陕学生共一百名。亦由各该省党部选送。第四，就是拟定课程，聘定教员。附课程表于下：

科　目	时　间
三民主义	十六
国民党史	六
国民党宣言及议决案	八
帝国主义与中国	十八
社会进化史	十八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	十二
各国革命史略	十
中国政治经济状况	十六
世界政治经济状况	十六
经济学常识	十六
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八
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	八
农业常识	十六
农民组织及宣传	十六
农民自卫	四
政治常识	八
法律常识	十
中国职工运动	八
农民问题	二十五
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	十八
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	十二
各国农民运动状况	二十
乡村自治	二
农村教育	四
农村合作	十二
农民调查统计及报告	十六
革命歌	八
革命画	八
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操练每日二小时 教授共六小时

筹备将告完竣，忽闻南昌方面，取消农所，江西学生亦说不来。但是此间仍旧进行，不稍松懈。而中央党部此时已在武汉将开始办公。中央党部认举办农所为非常必要，遂于第七十六次决议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由此本党全国之农所，遂由湘鄂赣农所演变而成了，但是湘、鄂、赣三省选派之学生及负担之经费，均无变更，惟增加苏、皖、豫、鲁、直等省学额共三百余名，合计原定学额，共九百余名，经费预算，合计经常开办两种费用增至九万六千余元。

三　组织系统


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农民问题讨论会[1]
教务处
训练处
事务处
党部
教务干事
教务主任
各科教员
军事教官
指导干事
训练主任
党务干事
事务干事
庶务干事
事务主任
会计干事
医官
总部队
教务委员会
第一队部
四区队
第二队部
四区队
第三队部
四区队
第四队部
四区队
特别训练队
三区队
训练委员会
事务委员会
军事教育委员会
全体职教员联席会议

---

[1] 农民问题讨论会是由职教员与学生组成的，将农民问题如土地问题、武装问题、乡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均分组讨论，求于政治经济各理论教授之外，对于这些实际问题的内容与解决的方法有充分之研究。

四　编制概况

现在学生共有七百五十一人（过半月后即将增至九百五十名）：

湘	一百五十一	鄂	二百零六	赣	一百四十九
豫	三十六	皖	二十四	苏	十三
川	二十五	贵	一	陕	四
晋	七	奉	五	直	十
闽	五	浙	五	鲁	三十

现分四班，每班为一队，三班设本所，均系四月毕业；一班设花园山，为特别训练班，学生多是豫鲁北方等省武装农民，毕业时间定为一月。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1927 年）

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进来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进来这里的目的并不和他们进普通的中学大学一样，我们的责任自然也和他们不一致。因此我们进所之后一切的生活自然也和他们不能相同。

同志们！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不是受殖民地的被压的三万二千万的贫苦农民群众中的一个分子吗？我们现在惟一生路不是要唤起这广大的被压迫的农民群众，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起来反抗吗？我们除了革命，除了和我们的敌人拼命，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进来这里的惟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这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除农民群众的痛苦。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敌人的状况，他们几千年来占据了社会上优越的地位。这便是说，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个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他们的基础十分稳固，他们有他们的组织，他们有优裕的经济能力，有凶狠的武装（军士警察）、有拥护特殊阶级利益的法律习惯和一切封建制度，做他们的护符，所以他们是很不易的，这两年来，在广东、在湖南、在湖北、在北方各省，农村中都发生了

莫大的冲突、莫大的流血，结果我们农民群众，虽得到了许多进步，然而我们的牺牲，也真不小，这都足以证明我们的强敌，是很不容易打倒的。

并且在我们自己的战线上，同时出现了许多毛病，许多足以减剥我们斗争能力的毛病。农民的生活方式，是颇散漫的，几千年来老生活把他们弄成不问政治，只望真命天子出世救人的依赖思想，他们对于地方的观念、家族姓氏的观念很深，一切封建社会的坏毛病，都因封建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膨胀、发展使之笼罩在农民的身上，现在要农民起来，反抗他们根深蒂固的强敌，真是谈何容易？便是我们自己也何尝不是一个从封建社会里出来的人，也何曾能够免除了封建制度的影响？我们现在虽然决心要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要为农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然而我们的身上，已经从旧社会里带来了不少的毒菌，这些毒菌随时随地都有阻止我们前进的可能。

同志们！我们从旧社会带来的毒物是什么？我们不是过惯了个人主义的浪漫生活吗？我们不是不大喜欢受团体的干涉吗？我们不是不喜欢有秩序有规律的生活吗？我们的队伍中有许多人不免时常假借自由平等的名词来掩盖他一切的罪过，这些人喜欢崇拜英雄主义，喜欢个人的自由活动，这些人一切的行动一切的批评，常常从他自己个人做出发点，个人的利害关系，随时在他的后头做他的指挥者；他的眼睛只看见了人和人的关系，看不见群众和客观的事实，这样的最容易变成一个唯心论者；口中常常发出许多良心论、道德论。

同志们！我们许多都是从小有产者的阶级出来的，所以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毛病，都容易丛集在我们的身上。上述那些毛病，我们不是时常犯着吗？这些毛病，最能妨害我们的革命工作。我们虽然

是一个具有热烈革命性的青年，仍多少免不了这些毛病在身上作怪。现在许多反革命的势力，都是从这些封建的制度、封建的思想习惯产生出来的。我们的党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存在的原因。

同志们！我们的敌人这般地凶横顽固，我们的责任这般重大，我们非把我们从旧社会里带来的毛病痛切地扫除，我们更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

同志们！我们跑来这里，从消极方面，要把我们这些从封建社会里带来的毛病扫除；从积极方面，我们要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际，这样我们才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率的革命工具，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完成我们的责任。同志们！我们为着便利我们在所内从消极和积极两方面把我们训练成一个好的革命的工具，我们应依照下面规定的各条去努力，这些规定我们不要看作一种普通的学校规则，乃是使我们达到变成一个好的革命党员的一种必需的方法。这些条文我们大家都经过一番讨论发表过意见，都认为是我们必要的东西，并且经过最后的决定颁布，已经成为本所的纪律了，我们一定要一致服从，因为这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即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制定的纪律。这种纪律是自觉的纪律，是达到使我们学习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造成好的革命党员之唯一方法呵！

我们必须绝对服从的纪律：

（一）为了达到团体化、纪律化起见，除了服从党的纪律命令之外，要服从本所的规则和命令，除本规约规定者外一切临时发布之口头的文字的规则和命令，均应一律遵守。

（二）本所学生对于所内各事都可以充分发表个人的意见，但为

着避免意气用事，与无谓的纠纷和冲突起见，不应随意施行攻击，随意向外发表不满意的言论或文字。我们应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全所的利益上，用书面或口头向负责人陈述意见，请求答复或办理。在没有答复之前所有一切处置和命令不得违反。

（三）本所职员教员教官和学生应表示互相尊重的态度才可以得到有意义的训练。

（四）无论对本党的同志或非同志，都应有一种很诚恳的态度禁止讥笑、谩骂、斗殴及匿名攻击。

（五）为要改正散漫的个人活动，并且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便是并不想要造成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员，是一种极大的错误。

（六）要养成团体的活动，便要牺牲个人的成见，服从团体的议决，除在未议决之前，可以充分发表意见，一经议决之后，便不能故意违反。

（七）本所学生是预备到贫苦农民阶级去的，所以要有练习耐劳吃苦的生活。

（八）所内生活应注意谨守规定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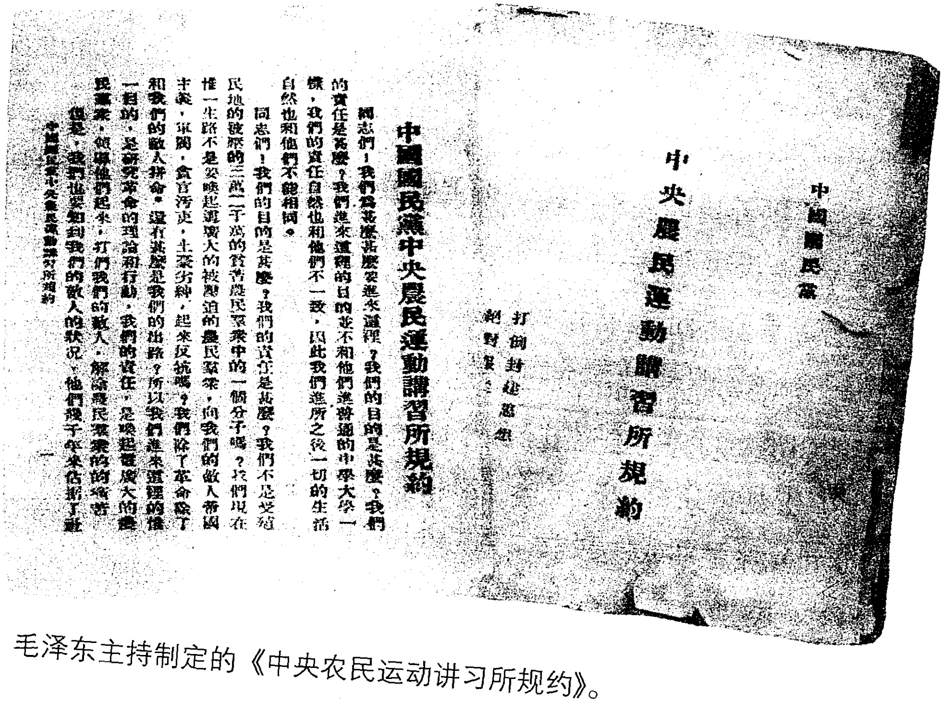
（九）除星期或例假外，有事外出均应请假，请假处所普通者在总队部，特别者在教务处，得其许可方能外出。除特别情形外，准假与否，以是否妨碍功课之学习为标准。

（十）教室、寝室、食堂、浴室各处均应保持清静及秩序。

（十一）对于所内器物，应谨慎使用，不得任意破坏。

（十二）违反本规约者依其情节的轻重分为下列七项处置：

（1）劝诫
（2）警告
（3）罚立正或举枪
（4）禁止星期外出
（5）令其服劳役
（6）罚守卫
（7）令其退学
（8）呈请党部开除党籍



中國國民黨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規約

打倒封建思想
絕對服從

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規約

同志們！我們爲甚麼甚麼要進來這裡？我們的目的是甚麼？我們的責任是甚麼？我們進來這裡的目的並不和他們進普通的中學大學一樣，我們的責任自然也和他們不一致，因此我們進所之後一切的生活自然也和他們不能相同。

同志們！我們的目的是甚麼？我們的責任是甚麼？我們不是受殖民地的被壓的三萬二千萬的貧苦農民羣衆中的一個分子嗎？我們現在惟一生路不是要喚起這廣大的被壓迫的農民羣衆，向我們的敵人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起來反抗嗎？我們除了革命除了和我們的敵人拼命，還有甚麼是我們的出路？所以我們進來這裡的惟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論和行動，我們的責任，是喚起這廣大的農民羣衆，領導他們起來，打倒我們的敵人，解除農民羣衆的痛苦

但是，我們也要知到我們的敵人的狀況，他們幾千年來佔據了社

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規約　一

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宣言[1]

（1927年）

同志们，同胞们：

我们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这继续二次北伐的革命的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意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二次北伐誓师。

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外国帝国主义，及铲除国内封建政治势力，所谓封建政治势力，即军阀及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我们晓得军阀及土豪劣绅就是帝国主义的两只手，帝国主义有了这两只手，就可尽量地销售洋货，贱价收买原料，以剥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那么广大的农民群众不能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斗争力量，则中国革命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不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基础，不能铲除。所以，农民问题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成了大家不能忽视的革命问题。农民问题之重大，到现在是没有哪一个有勇气敢来否认。谁反对农

---

[1] 1926年秋，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农民运动日益高涨，急需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因革命形势的发展而结束。学员派回原籍，领导农民运动，掀起了一个农村斗争新高潮。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革命中心已由广州移至武汉，这时毛泽东又到武汉筹办了这所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继续培养革命干部。

民运动，谁就是反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了农民问题，要肃清党内与帝国主义军队妥协的破坏农工政策的右倾分子。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要继续二次北伐，扩大农村革命。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是要训练一般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出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

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为农民奋斗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可是这种重大的工作，这种重大的运动，一切革命民众都负责任，都与之有关系。我们在这奋斗的途中，谨盼望各界革命的民众，予以诚恳的指导。我们应该呼：

扩大农村革命！

铲除封建势力！

继续北伐工作！

消灭奉鲁军阀！

拥护总理农工政策！

反抗破坏农工运动的一切反革命派！

农民解放万岁！

国民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筹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图为武昌抚院街农协遗址。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

（1927年3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所由中央党部创设，定名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条　本所以养成深明党义之农民运动实际工作人员为宗旨。

第三条　本所学生依全国各省农运发展需要，招收学额，至各省每期学额，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之。

第四条　本所经费，由选送学生之各省党部，按照学生名额负担，不足之数，由中央党部拨给。

第五条　本所设立于武昌。

第二章　学科

第六条　学科规定于下，遇必要时得酌量增减之。一、三民主义；二、国民党史；三、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四、帝国主义与中国；五、社会进化史；六、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七、各国革命史略；八、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九、世界政治经济状况；十、经济学常识；十一、政治常识；十二、法律常识；十三、中国职工运动；十四、农民问题；十五、农民运动理论及策略；十六、中国农民运动及其趋势；十七、各国农民运动状况；十八、乡村自治；十九、农村

教育；二十、农村合作；二十一、粤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二、湘省农民代表大会议决案及宣言；二十三、农业常识；二十四、农民组织及宣传；二十五、农民自卫；二十六、农村调查统计及报告；二十七、革命歌；二十八、革命画；二十九、军事训练（教授操练）。

第七条　每届学习期间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决定之。

第三章　行政组织

第八条　本所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并互推三人为常务委员。

第九条　所设教务处、训练处、事务处，每处设主任一人，分别主持各该处事务，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之。各处得视事务之繁简，聘用干事。关于党务事项，由训练处掌理之。

第十条　各处设委员会，协助主任，进行各该处事务。其组织如下：

一、教务委员会，由教务处主任及教员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二、训练委员会，由训练处主任及教员教官若干人组织之。

三、事务委员会，由事务处主任及事务员若干人组织之。

第十一条　各处及各委员会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如有增删之处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拟定呈请中央党务委员会批准施行。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武昌创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上课，毛泽东等亲自授课。图为农讲所旧址——武昌红巷13号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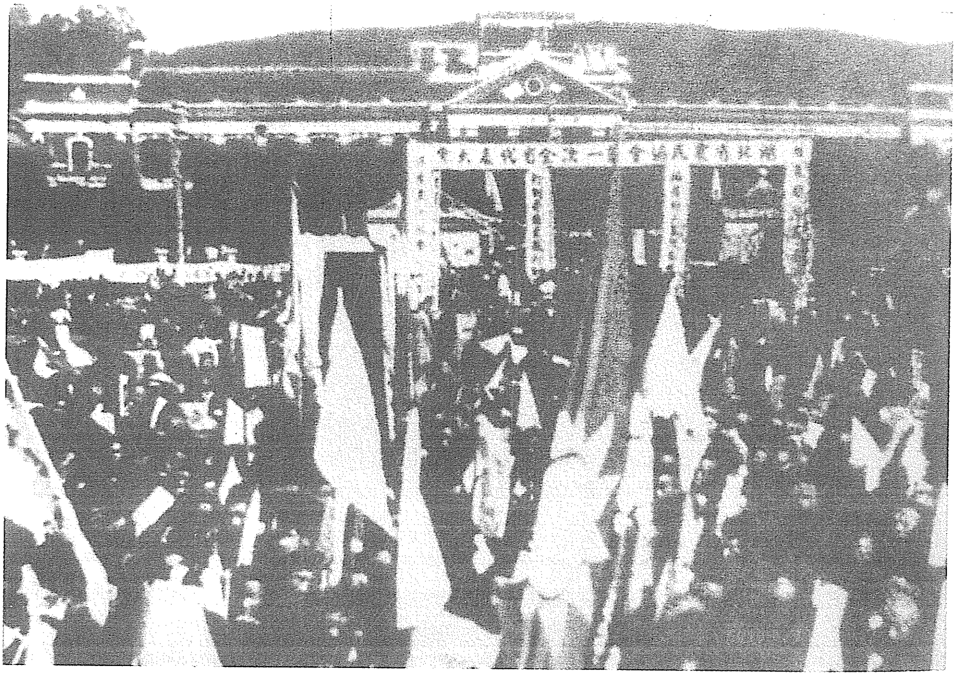
给省农民协会的信[1]

（1927 年 3 月 14 日）

径启者顷阅长沙报载，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一书，此书原系供本所学生及各省农运特派员参考之用，并非卖品。如需翻印，惟必具下列三个条件：一、由贵会审查，将已失时效之本，如《湖南农运目前之策略》等，抽出不印。二、价钱不能过高，只能取得印刷费及纸费。三、须经贵会审查，不许错误。否则不准翻印。即祈贵会代为办理为荷。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湖南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一事给湖南农民协会的信。



1927年3月4日，湖南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武昌阅马场举行，毛泽东被聘为名誉主席。图为农代会会场。

农民问题案

（1927年3月16日）

民国十五年十月，本党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曾通过多条关于改良农民现状的决议。自是以后在五个月中，乡村间被压迫的农民与压迫者（如地主、绅士土豪、污吏）间之斗争，更有广大之发展。但是联席会议议决在各地方多没有实现。农民协会，虽欲企图实现此等议决，而常遭乡村把持政权者之严厉拒绝，或打击。政府与党部方面，因忙于军事行动，对于农民不能保障其组织，更不能给与积极的援助，使建立农民自治的政府，使农民能以自治政府的权柄，战胜其敌人，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抑制农民运动之发展，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要国民革命能够成功，一定要铲除这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势力。这些封建的残余势力，就是农民痛苦之所在，也就是军阀，及帝国主义在经济落后的中国生存之基础。所以本党与国民政府必须竭力保障其发展农民的组织，并竭力使联席会议议决实现。此议决实现本党谋中国农民解放之第一步。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并一定会失去农民的拥护，即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之拥护。本党不但为要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反军

阀反帝国主义之争斗起见，须努力求农民运动之发展。本党代表大多数农民之利益，亦当随时扩大农民运动，务求被压迫农民，能以其自己之组织与斗争的力量，达到其要求本身解放之目的。本党无要保障农民之能获得解放，必须发展农民之组织，使其能在任何政治条件之下，皆能以自己力量，与一切压迫彼等之势力斗争，方足以使国民革命之胜利成为农民的胜利。故□为要建立统一的民主政治起见，为要使三民主义确实开始实现及使农民明白本党为其好友与保障起见，本党此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应有如下之决议：

立刻实现中央及各省党部联席会议所通过一切对农民问题之议决，在新从军阀铁蹄底下解放出来的地区，尤应根据考察农民的实际要求，妥定实现议决之方法。为达此目的起见，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国民政府主张设立农政部。其责任为实行土地改良及农民所要求经济的政治的改造与建设。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议下列十项，政府党部及革命的民众团体须立即：

一、政府应立即着手立区乡村自治机关，由乡村居民按照区乡自治法组织之，管理区乡间一切行政、经济、财政、文化等事宜。农民协会应在本党指导之下为组织与指导此自治机关的中心。区乡自治法另定之。

二、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土地委员会（必要时乡自治机关内亦可设立之），由农政主管机关派员及农民协会代表组织之，以筹备土地改良及实行政府所规定关于土地整理与土地使用之各种办法。

三、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或乡自治机关，如有不服从者，即应依照处置反革命条例处办之。区乡自治机关，应有改组此等武装团体之权力，使此等武装团体确能保卫乡村人民，而为乡村人民之武力，保卫乡村人民所必需之武力。

如感觉枪支不足时，政府须设法补助之。

四、本党关于联席会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之议决，应于本年内完全实行。田租契约应向乡自治机关注册。乡自治机关与农民协会并监视不得超过决定当地最高租额。乡自治机关与农民协会应废除一切租约内或租约外之任何苛例，应由政府下令，准许佃农有永久使用土地权。非地主亲自收回耕种，不得其田另佃。如佃农自愿退田，或田主收回亲自耕种时对土地所增善者，应得相当报酬。

五、区乡公地及庙产，政府应下令饬其交给区乡自治机关管理。各宗族公有之祠堂地产，须禁止族长或少数反动分子把持□违反宗族内贫困者之利益。

六、政府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并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此等土地财产之属于区乡者，应视为人民公有。

七、旧有田税法制实为不合理不公平之税则，急应改革，至于现在征收于农民之各种苛捐杂税，为害农民经济甚者，亦应逐次废除。政府应从速规定与当地需要相当的划一税率。其他对于土地及乡村生产品所征收之杂税，须一律废除。如此方可减轻农民负担，一切收税机关应移转于区乡自治机关及财政主管机关特派员之掌握。不准劣绅土豪盘踞，必须完全改组。

八、为减轻农民受高利债剥削起见，政府应颁布明令，禁高利剥削，规定利率，不得高过年利二分或月利二厘，并禁止利上加利对于农民旧有之债务。国民政府农政部应速决完办法，解除农民因债务之痛苦，并应设法立即组织农民银行，年利百分之五贷与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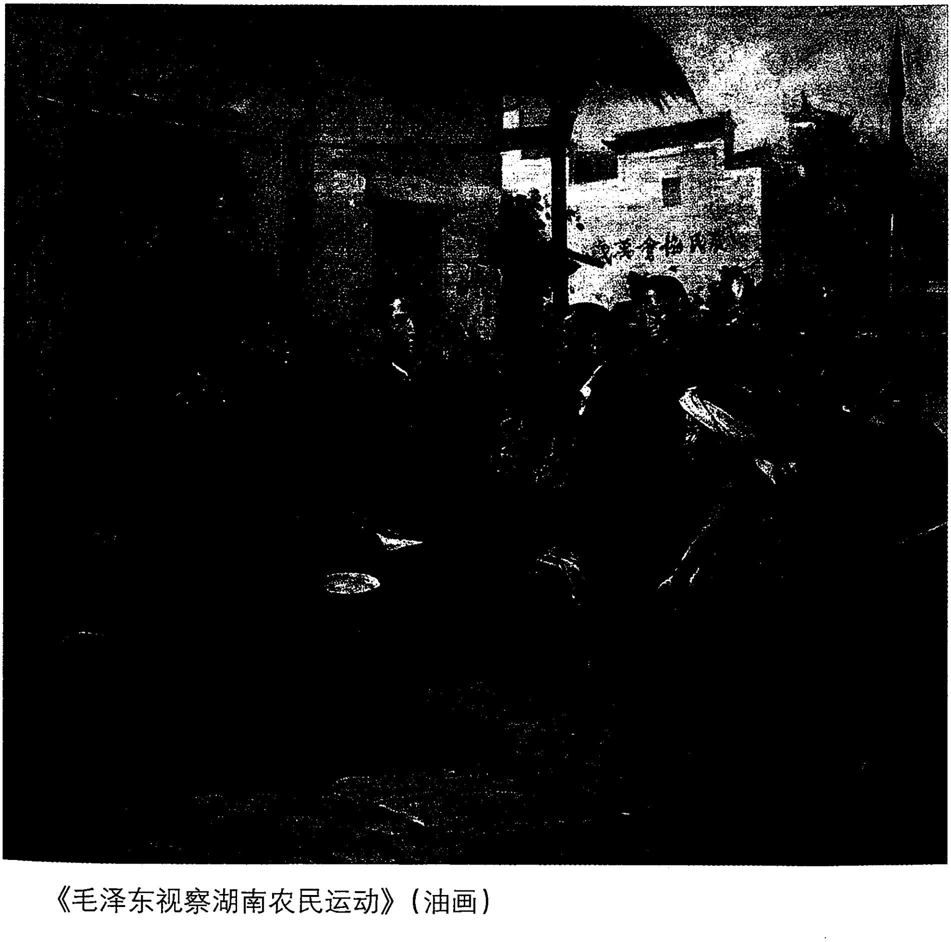
九、为防止地主及奸商抬高粮食价格及救济天灾时之贫农起见，政府应准区乡自治机关请求农政主管机关给以管理粮食出口及

保存一部分粮食之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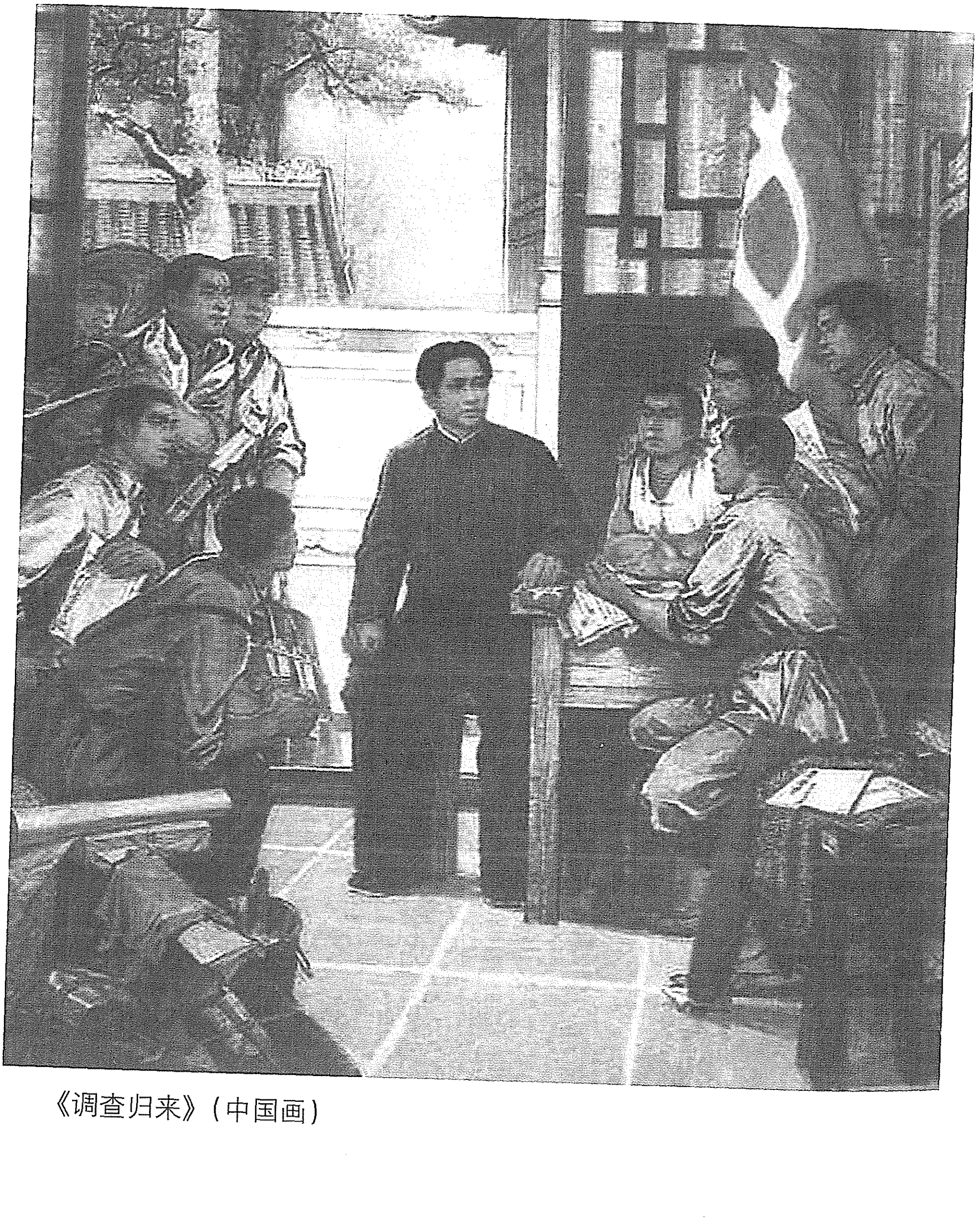
十、国民政府应加紧筹备以下各问题预备提出下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一）付租须经由乡村自治机关，如何政府可由租内扣除田税；（二）实现民主制度之县政府；（三）组织独立的民主的司法制度，以解决由土地而来的问题及他种问题；（四）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认为以上各项仅为中国农民解放斗争之第一步工作，□此等斗争扩大胜利则必须唤起农民自己起来活动，且获得政府全力之援助。

中央全体会议深信以上各项之实现，一定认为国民革命唯一强固的基础，中国千百万农民将赞助本党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之共同奋斗，全体会议深信此种联合战线一定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消灭一切军阀及排除农业发展之障碍，并可解决社会上一切衰败的现象，如失业土匪等等。因为如果不能使三万万农民得到解放及提高生活，那么中国工商业必定不能振兴，而且将继续依赖帝国主义。以上各种改良计划，是建立新社会制度之唯一方法，中央全体会议对于一切阻碍或破坏此种联合战线或妨碍农民运动之发展，或阻碍国民政府解放农民及解放全中国之革命政策之实行者，必毅然决然与之奋斗。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并应决定：（一）下次全体会议，政府应有对于以上各项实施成绩之报告；（二）号召本党全体党员一致起来，宣传此项议决，使中国农民全体了解，在各乡村各军队、各团体中或用印刷品或对不识字者用宣读方法，务使每一人都能了解此项的决议。



《毛泽东视察湖南农民运动》（油画）



《调查归来》（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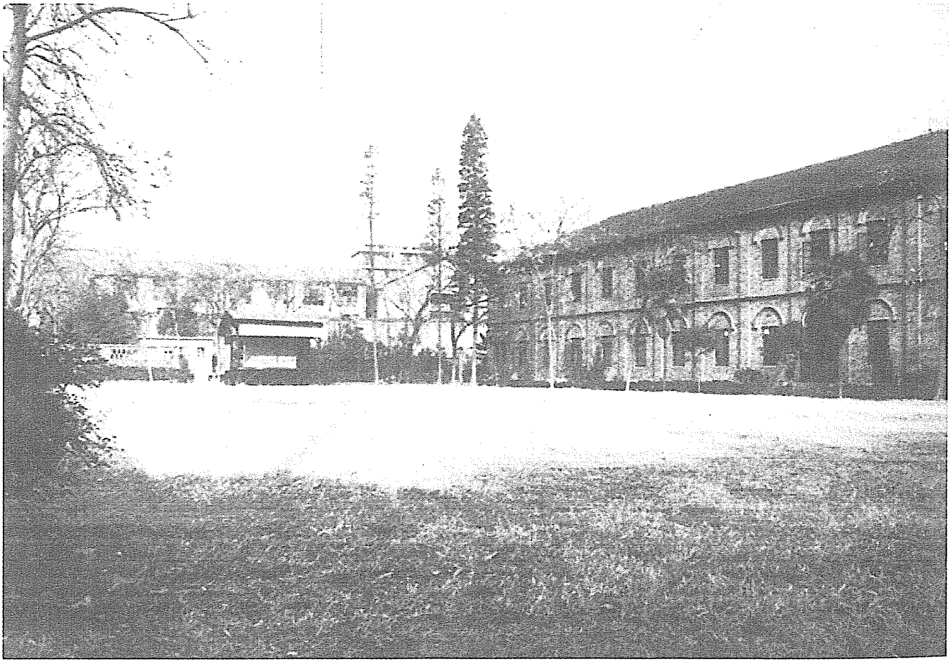
在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大会上致辞[1]

（1927年3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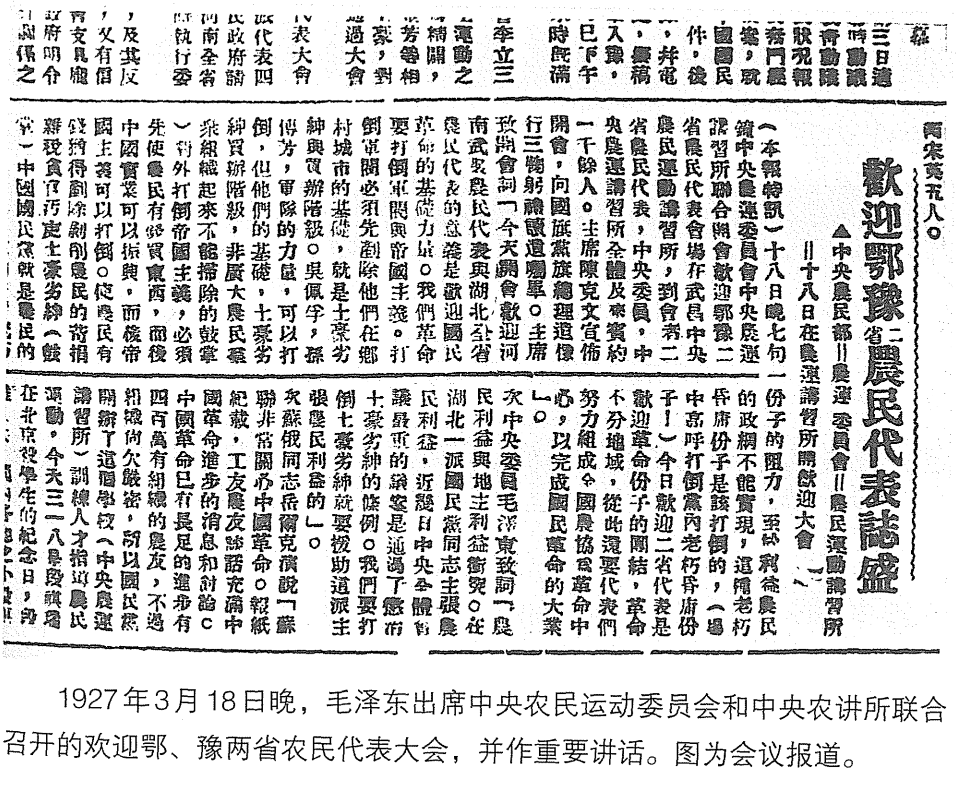
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

[1] 1927年3月18日晚7时，中央农运委员会、中央农运讲习所联合开会欢迎鄂豫二省农民代表。会场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到会鄂豫二省农民代表、中央委员、中央农运讲习所全体及来宾1000余人。主席陈克文宣布开会，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读遗嘱毕，主席致开会词后，中央委员毛泽东致辞。这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致辞。



1927年3月18日，毛泽东出席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并作了湖南农运状况的报告。图为大会会场武昌农讲所大操场。



三日道
時動議
青動議
狀況報
務門歷
案，就
國民
件，後
，并電
，屢禱
入鄂，
已下午
時既滿
舉立三
運動之
精闢，
芳等相
豪，對
過大會
表大會
代表四
政府請
南全省
執行委
，及其反
，又有僞
支具體
府明令
僞之

兩宋黃五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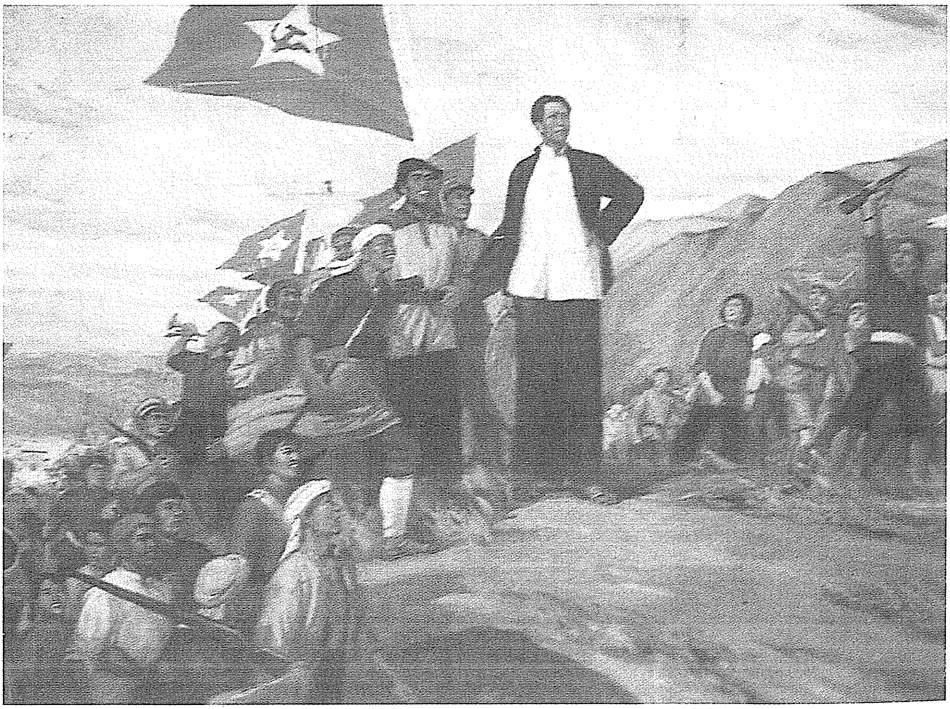
歡迎鄂豫二省農民代表誌盛

▲中央農民部‖農運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
‖十八日在農運講習所開歡迎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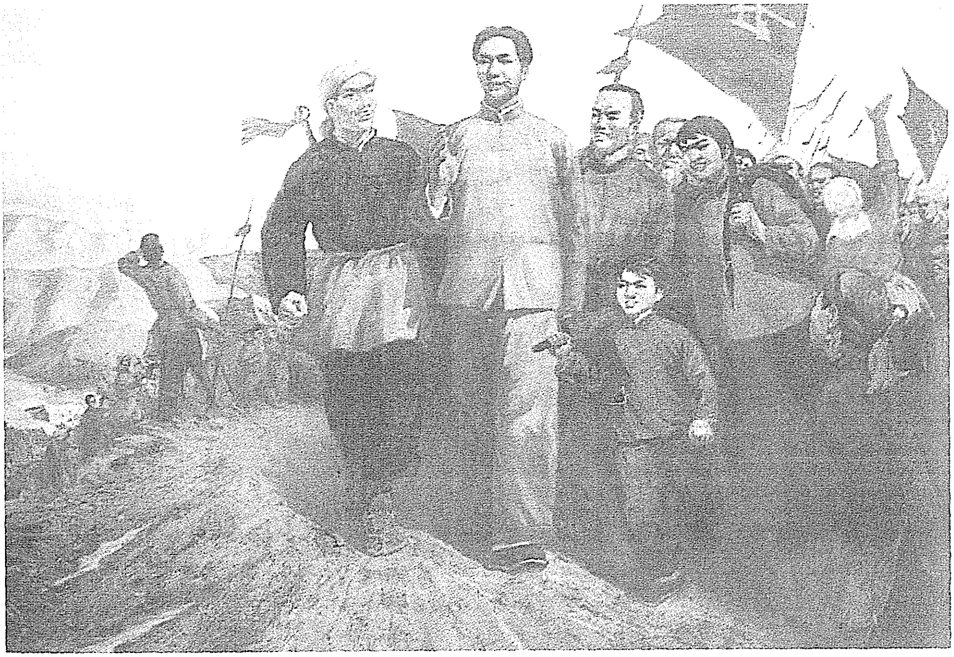
（本報特訊）十八日晚七句一鐘中央農運委員會中央農運講習所聯合開會歡迎鄂豫二省農民代表會場在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到會者二省農民代表，中央委員，中央農運講習所全體及來賓約一千餘人。主席陳克文宣佈開會，向國旗黨旗總理遺像行三鞠躬禮讀遺囑畢。主席致開會詞「今天開會歡迎河南武裝農民代表與湖北全省農民代表的意義是歡迎國民革命的基礎力量。我們革命要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必須先剷除他們在鄉村城市的基礎，就是土豪劣紳與買辦階級。吳佩孚，孫傳芳，軍隊的力量，可以打倒，但他們的基礎，土豪劣紳買辦階級，非廣大農民羣衆組織起來不能掃除的鼓掌）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先使農民有錢買東西，而後中國實業可以振興，而後帝國主義可以打倒。使農民有錢務得剷除剝削農民的苛捐雜稅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鼓掌）中國國民黨就是農民的

份子的阻力，至於剝奪農民的政綱不能實現，這種老朽昏庸份子是該打倒的，（場中高呼打倒黨內老朽昏庸份子！）今日歡迎二省代表是歡迎革命份子的團結，革命不分地域，從此還要代表們努力組成全國農協爲革命中心，以完成國民革命的大業」。次中央委員毛澤東致詞「農民利益與地主利益衝突。在湖北一派國民黨同志主張農民利益，近幾日中央全體會議最重的議案是通過了懲治土豪劣紳的條例。我們要打倒土豪劣紳就要援助這派主張農民利益的」。次蘇俄同志岳爾克演說「蘇聯非常關懷中國革命。報紙紀載，工友農友談話充滿中國革命進步的消息和討論。中國革命已有長足的進步有四百萬有組織的農友，不過組織尚欠嚴密，所以國民黨開辦了這個學校（中央農運講習所）訓練人才指導農民運動。今天三一八是段祺瑞在北京殺學生的紀念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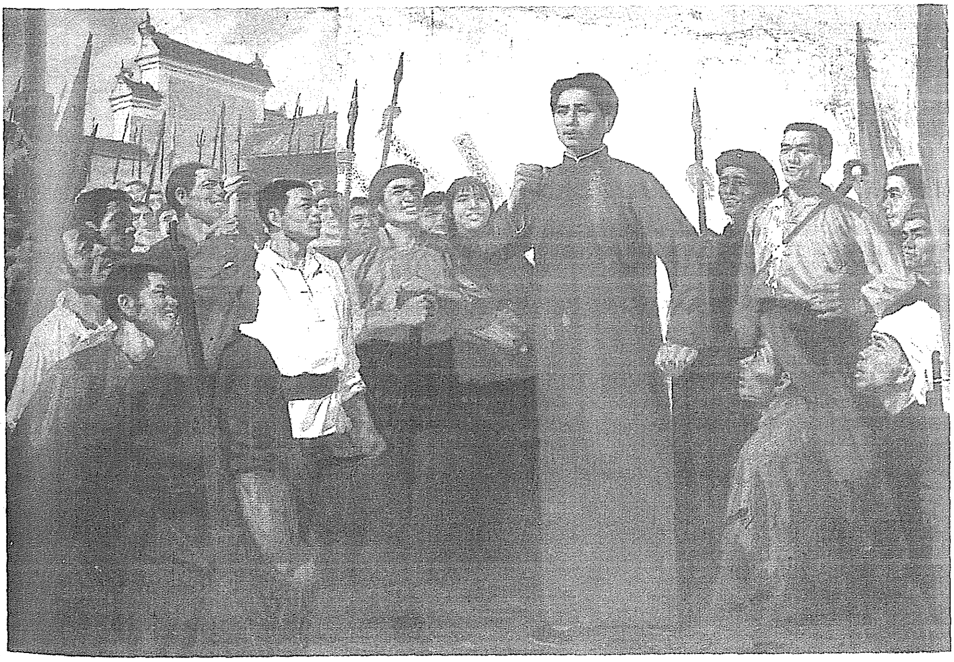
192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出席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农讲所联合召开的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图为会议报道。



《发展农民运动》（油画）



《发展农民运动》（油画）



《农民运动万岁》（油画）

对农民宣言[1]

（1927年3月19日）

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生活的大部分还是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中国农民受了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三重剥削，其困苦达于极点，自求解放之心，十分迫切，因此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底于完成。中国国民党为领导国民革命之最大政党，负有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民国十三年一月，本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发布宣言，对于农民问题，特加注意。民国十五年一月，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议决对于农民运动的纲要。同年十月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发布新政纲，关于拥护农民利益者二十二条。三年以来，本党党员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引导广大的农民群众为拥护自身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组织之广，几遍全国，使革命风潮特别扩大，革命进行特别顺利。这都是因为农民受痛苦最深，求解放最切，而本党适能拥护其利益，扩大其组织，领导其行动，才有这样的结果。

最近各地农民起来的形势，至为迅猛。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短期间内，有极大的发展。长江下游及北方各省，以北伐军的进展，

---

[1] 这是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由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身份提出的对农民宣言。

农民必定迅速地起来，成为拥护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除参入战争扶助革命军得到胜利外，就是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特权。这个封建地主阶级，乃直接剥削农民最厉害的一个特殊阶级，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对于农民的剥削，都凭附这个特殊阶级才能达到目的。故封建地主阶级，乃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之真实的基础。不推翻这个特殊阶级的权力，则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及一切反革命派虽有形式上之破败，其使之存在的实质并未消灭，时常有使革命改变性质的可能。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被统治于封建地主政权之下，不推翻封建地主在乡村的政权，则一切经济争斗如减租减息等等简直无从说起。因此，革命的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移转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本党具有最大之决心，将领导此种争斗，使得到最后的胜利。

本党为领导代表民主势力的农民，与代表封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争斗，并使这个争斗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此外本党尚当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装。总之须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的革命胜利即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胜利之确实的保障。

农民在政治争斗胜利之后，经济争斗便随着开始，农民经济奋斗意义，为反抗帝国主义军阀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个剥削的

总数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本党的任务，即在领导农民反抗这种剥削。本党联席会议议决政纲有如下数条：一、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二、禁止重利盘剥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三、禁止上期租；四、禁止预征钱粮；五、禁止包佃制。此次全体会议又决定佃农使用土地权，改良田税法则，并规定农民的自治机关，关于地方经济事务之各项主管权力，皆属农民初步的经济争斗之纲领，本党必须领导此争斗，使继政治争斗得到胜利，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域内，当用政治的力量帮助农民达到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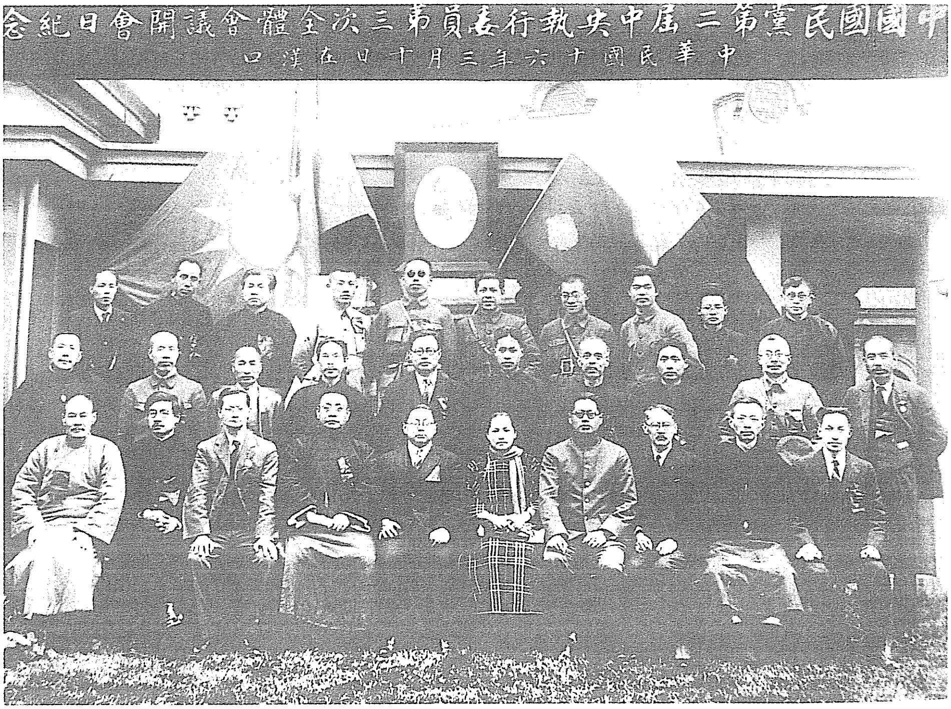
不但如此，因为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地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原来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的数目，到近年而愈扩大。完全无产的赤贫农民，与有产不多不够生活的次贫农民，占全体农民中之大部分。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乃一切纷扰变乱的根源，同时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国民政府管辖下的各省，特别是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北方贫农群众的土地问题，也是极其严重。本党总理孙先生深见于此，二十年前即已提出，平均地权为革命政纲。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到“农民之失去土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总理并于民生主义讲演中，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此皆深知农民的最后要求在于土地，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因此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

贫农不仅无土地，而且无资本。革命发展的结果，乡村富有阶

级极端闭借，许多地方几于断绝借贷关系，至使贫农社会惶惶不可终日，非有一具体政策，不能解决此资本缺乏问题，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有云，“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济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中央各省联席会议政纲亦以农民银行列为专条，并规定以年利百分之五贷款与农民。本党当于最短期内在革命势力所及之地，使本党政府努力设立农民银行等条件极低之贷款机关，以解决农民之资本缺乏问题。

总之国民革命的完成，有赖于全国农民之兴起。本党始终站在农民利益方面代表农民而奋斗，本党始终拥护农民一切合理的斗争，务使一切剥削农民的特殊阶级，失去其凭借，减轻其剥削，每个受压迫的农民都得到切实的解放，这是本党历史的使命，本党当毫不犹豫地执行之。

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邓演达　陈克文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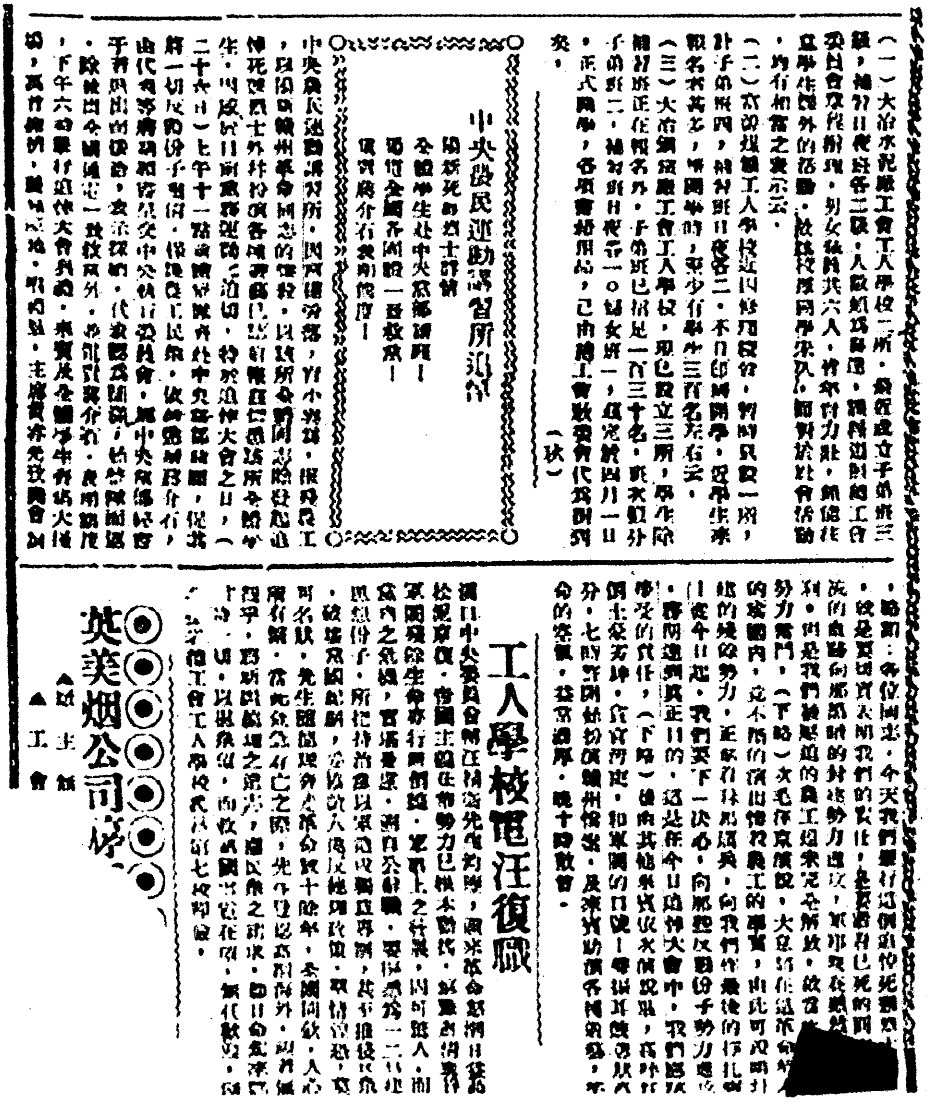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開會日紀念
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十日在漢口

1927年3月10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委员合影。中排右三为毛泽东。

中央农运讲习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1927 年 3 月 26 日）

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承受的责任。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通告

工人學校懲汪復職

英美烟公司

1927年3月26日，毛泽东在农讲所召开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图为汉口《民国日报》报道。

阳新、赣州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宣言*

（1927年3月26日）

同志们！被压迫的民众们，自从帝国主义勾结国内——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赐给我们的痛苦和摧残，尤其是——栉风沐雨——手胼足胝——食不得饱——衣不得暖的贫苦！农友——和——工友，简直是有如处在——深渊——火炕，生死那得自由啊。

咳！我们被压迫的农工民众们，难道我们生来就应该受特殊阶级——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资本家的摧残、剥削吗？难道我们是应该固定地做他们的奴隶、牛马吗？要杀我们就杀我们，要我们坐牢狱，我们就坐牢，我们若是稍有点反抗的表示，那就所谓“大逆不道”“废弃纲常”。咳！这真是人类的禽兽世界啊。

这种狠毒、残酷的压迫，使我们真是忍无可忍了，所以近来各地被压迫的农友——工友，皆奔腾呼号地起来组织——农民协会——工会，为解除自己的痛苦而奋斗，毒忍的封建阶级——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他们为拥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榨取，就大起恐慌了。不是说我们“过火”“胡闹”，就是说我们“流氓”“地痞”“土匪”。这种挑拨的手段，想着使我们成为众人之敌，继续他们的最后挣扎，更进一步地向我们贫苦农工民众进攻。于是演出阳新、沔阳、天门、汉川，与赣州、九江流血的惨剧。阳新、沔阳等地的

惨案，是乡村的反革命的封建势力——贪官恶吏、土豪劣绅、大地主向革命势力——农民协会进攻，甚至用洋油烧死农民领袖，共计在“六人”以上。这种惨不忍闻的消息，是何等的令人痛心呵。

赣州、九江流血的惨剧，是假革命、反革命派，向革命势力工人的群众进攻，枪毙工人的领袖，最可怜的是枪毙工人的领袖的凶首是蒋介石部下暂编第一师党代表与蒋介石的卫兵。这种流血的惨剧，蒋介石是不能不负责的。贫苦而且最受侮辱、最受压迫的农工兄弟们，反革命势力已经是联合起来很凶恶地向我们进攻了，并且他们进攻的手段非常的毒辣，现在我们是处在生死的关头了。若不拼命团结努力和他们奋斗，那么我们就没有活命的日子了。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地位，我们的环境，现在已经是短兵相接的时期了。我们要向那封建势力的黑暗屏障继续不断地进攻，早晚必能得到光明的途程的。

各界的革命民众们，我们为拥护总理的农工政策，就不得不实行援助最受压迫的最受痛苦的农人与工人，以期他们得着最后的解放，早促革命的成功。

我们追悼诸位烈士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是为农工利益而奋斗，竟至牺牲性命而死！并且我们要继续着他们的血迹争斗，领导着农工民众们向封建残余势力进攻。

我们痛苦我们“同病相怜”而牺牲的同志，我们是后死者，我们是向着民间去携手的候补者！“义难容辞”“责无旁贷”啊！

我们要高呼：

农友团结起家！工友团结起众！铲除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誓为阳新——赣州死难农友——工友复仇！保障农工利益！农工武装起来！拥护总理农工政策！不打倒土豪劣绅，革命不能成功！反对农

工运动即是反革命，实行农村大革命！阳新惨案是乡村反革命的封建势力向革命的进攻！赣州的惨案是假革命、反革命向革命势力进攻——提高党的威权！铲除封建势力！反对军事独裁！农工解放万岁！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国民革命成功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

（1927年3月）

农民问题的严重性

我这回到湖南[2]，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想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因为目前农民运动的

---

[1] 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而坚持自己的错误见解。他们的错误，主要是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年春夏国民党之所以敢于叛变，发动“清党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主要就是乘了共产党的这个弱点。

[2] 湖南是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

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组织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就湘中、湘南已发达的各县来说，大约分为两个时期。去年一月至九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此时期内，一月至六月为秘密活动时期，七月至九月革命军驱逐赵恒惕[1]，为公开活动时期。此时期内，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因为农会会员能作向导，作侦探，作挑夫，北伐军的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因为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写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便有约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

---

[1] 赵恒惕（1880—1971），湖南衡山人。1920年以后，他是统治湖南的军阀。1926年3月，在湖南人民掀起反赵高潮的形势下，被迫辞去湖南省长的职务。同年7月至9月，他的旧部被北伐军击溃。

半。如湘潭、湘乡、浏阳、长沙、醴陵、宁乡、平江、湘阴、衡山、衡阳、耒阳、郴县、安化等县，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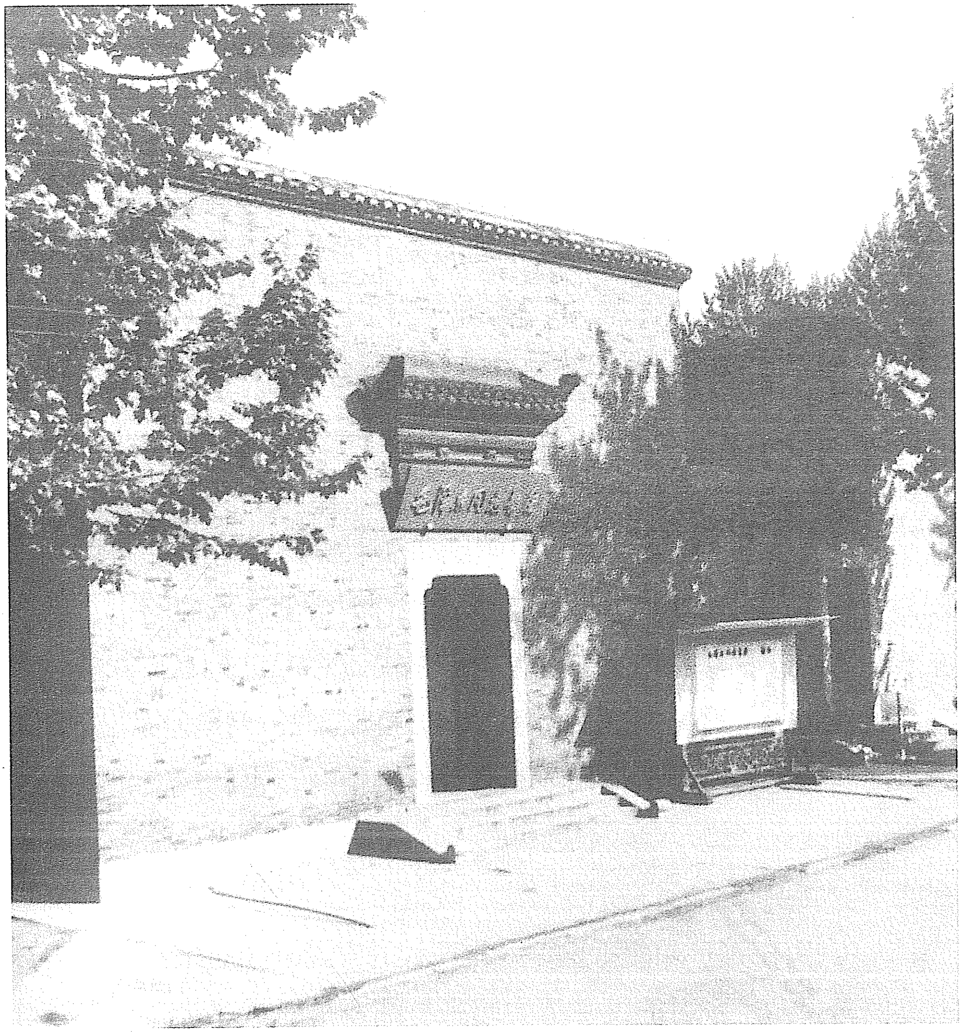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真是“说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则完全被剥夺了发言权，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会投降。

“我出十块钱，请你们准我进农民协会。”小劣绅说。

“嘻！谁要你的臭钱！”农民这样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农乃至中农，从前反对农会的，此刻求入农会不可得。我到各处，常常遇到这种人，这样向我求情：“请省里来的委员作保！”



为了答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的责难，毛泽东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湖南五县的农民运动，2月12日回到武昌。图为毛泽东写作报告的地方武昌都府堤41号。

前清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那些人怕入另册，便多方设法求入农会，一心要想把他们的名

字写上那农会的册子才放心。但他们往往遭农会严厉拒绝，所以他们总是悬心吊胆地过日子；摈在农会的门外，好像无家可归的样子，乡里话叫做“打零”。总之，四个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谓“农民会”，现在却变成顶荣耀的东西。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下面的人，现在却拜倒在农民权力之下。无论什么人，都承认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后是两个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

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1]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所谓“过分”的问题

又有一般人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这是中派的议论。实际怎样呢？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

---

[1]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

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这就是一些人的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第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是非常之需要的。在第二时期内，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

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这一派的议论，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实质则和前一派同站在一个观点上，依然是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这种理论，阻碍农民运动的兴起，其结果破坏了革命，我们不能不坚决地反对。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

---

[1] “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有人常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做“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队伍内机会主义者的理论。毛泽东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这里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1]，坐飞机回广东[2]了。吴佩孚[3]

---

[1]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军江西的时候，排斥共产党人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打了败仗。许多报刊刊登消息说蒋介石受了伤。当时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农民群众还认为他是革命的；地主富农则反对他，听到北伐军打败仗和蒋介石受伤的消息后很高兴。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的反革命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从这时起，地主富农就对他改取拥护态度了。

[2] 广东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

[3] 吴佩孚（1874—1939），山东蓬莱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之一。1920年7月，他打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开始左右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为英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24年10月，他在军阀混战中失败。一年后再起，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他据有直隶（今河北）南部和湖北、湖南、河南等省。北伐军从广东出发，首先打倒的敌人就是吴佩孚。

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1]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

---

[1]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1]，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

---

[1] 不应当容许富农加入农会。1927年时期，农民群众还不知道这一点。

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1]，占百分之二十。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2]，占百分之五十。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3]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

---

[1] 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赤贫”，是包括雇农（乡村无产者）和乡村游民无产者而言的。

[2] 指乡村半无产阶级。

[3] 指当时的国民党县党部。

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农会的人说农会做了许多坏事。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农民打土豪劣绅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为，并没有什么可指摘。但是农民所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人们的指摘，我们须得把农民所有的行动过细检查一遍，逐一来看他们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样。我把几个月来农民的行动分类总计起来，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做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记。

第一件　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乡、衡山这样的县，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哪一只“角暗里”的农民没有起来，这是第一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如益阳、华容等县，这是第二等。有些县，农民组织起来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组织起来，如城步、零陵等县，这是第三等。湘西一带，在袁祖铭[1]势力之下，农会宣传未到，许多县的农民还全未组织起来，这是第四等。大概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各县最发展，湘南各县次之，湘西还在开始组织中。据去年十一月省农民协会统计，全省七十五县中，三十七县有了组织，会员人数一百三十六万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数中，约有一百万是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内农会势力大盛时期组织的，九月以前还不过三四十万人。现又经过十二月、一月两个月，农民运动正大发展。截至一月底止，会员人数至少满了二百万。因入会一家多只登记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计，群众便约有一千万。这种惊人的加速度的发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孤立，使社会惊为前后两个世界，使农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这是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

[1] 袁祖铭，贵州军阀，1926年6月至1927年1月曾经盘踞湘西一带。

第二件　政治上打击地主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的中心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许多地方，像湘乡、衡山、湘潭等县，地主权力完全推翻，形成了农民的独一权力，自无问题。但是醴陵等县，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两区），表面上地主权力低于农民权力，实际上因为政治斗争不激烈，地主权力还隐隐和农民权力对抗。这些地方，还不能说农民已得了政治的胜利，还须加劲作政治斗争，至地主权力被农民完全打下去为止。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项：

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账目不清。这回农民拿了清算的题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绅。好多地方组织了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土豪劣绅看了这样的机关就打颤。这样的清算运动，在农民运动起来的各县做得很普遍，意义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土豪劣绅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打下去。

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或从前有鱼肉农民的劣迹，或现在有破坏农会的行为，或违禁牌赌，或不缴烟枪。在这些罪名之下，农民议决，某土豪罚款若干，某劣绅罚款若干，自数十元至数千元不等。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

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办农民贷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种惩罚，不过较罚款为轻。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

小质问。遇有破坏农会的言论行动而罪状较轻的，则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比较不甚严重的质问。结果，多要写个“休息字”，写明从此终止破坏农会名誉的言论行动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最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戴高帽子游乡。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故有钱的多愿罚款，不愿戴高帽子。但农民不依时，还是要戴。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关进县监狱。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绅捉了，送进知事公署的监狱，关起来，要知事办他的罪。现在监狱里关人和从前两样，从前是绅士送农民来关，现在是农民送绅士来关。

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绅，在农

民运动发达县份，几乎都跑光了，结果等于被驱逐。他们中间，头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这些逃跑的土豪劣绅，以逃到上海的为最安全。逃到汉口的，如华容的三个劣绅，终被捉回。逃到长沙的，更随时有被各县旅省学生捕获之虞，我在长沙就亲眼看见捕获两个。逃到县城的，资格已是第四等了，农民耳目甚多，发觉甚易。湖南政府财政困难，财政当局曾归咎于农民驱逐阔人，以致筹款不易，亦可见土豪劣绅不容于乡里之一斑。

枪毙。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例如宁乡的杨致泽，岳阳的周嘉淦，华容的傅道南、孙伯助，是农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枪毙的。湘潭的晏容秋，则是农民和各界人民强迫县长同意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则正待“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罪处决。这样的大劣绅、大土豪，枪毙一个，全县震动，于肃清封建余孽，极有效力。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多的有几十个，少的也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第三件　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近月湖南农民经济斗争上一件大事。从去年十月至现在，贫农把地主富农的谷米阻止出境，并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结果，贫农的目的完全达到，谷米阻得水泄不通，谷价大减，囤积居奇的绝迹。

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去年七八月间，农会还在势力弱小时期，地主依然按照剥削从重老例，纷纷通知佃农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农会势力大增，一致反对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后，农民势力压倒地主势力，农民乃进一步宣传减租减押。农民说：可惜去秋交租时农会尚无力量，不然去秋就减了租了。对于今秋减租，农民正大做宣传，地主们亦在问减租办法。至于减押，衡山等县目下已在进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间，地主还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后，无人敢退佃了。现在退佃另佃已完全不消说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点问题。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农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许退佃，但同时发生了佃农失业问题。此问题尚无一致的解决办法。

减息。安化已普遍地减了息，他县亦有减息的事。惟农会势盛地方，地主惧怕“共产”，完全“卡借”，农村几无放债的事。此时所谓减息，限于旧债。旧债不仅减息，连老本也不许债主有逼取之事。贫农说：“怪不得，年岁大了，明年再还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

——打倒都团[1]

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都”管辖的人口有一万至五六万之多，有独立的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2]等，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统、督军[3]、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这回农村造反的结果，地主阶级的威风普遍地打下来，土豪劣绅把持的乡政机关，自然跟了倒塌。都总团总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农民协会去办。他们应付的话是：

“不探（管）闲事！”

农民们相与议论，谈到都团总，则愤然说：

“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个字，的确描画了经过革命风潮地方的旧式乡政机关。

---

[1] 湖南的都和团相当于区和乡。旧式都团的乡政机关是地主统治农民的工具。都、团的负责人称“都总”“团总”。

[2] 亩捐是当时县、区、乡豪绅政权除抽收原有田赋之外，另行按田亩摊派的一种苛捐。这种捐税连租种地主土地的贫苦农民都要直接负担。

[3] 督军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管辖一省的军事首脑。督军大都总揽全省的军事政治大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地方性的封建军事割据，是一省范围内的独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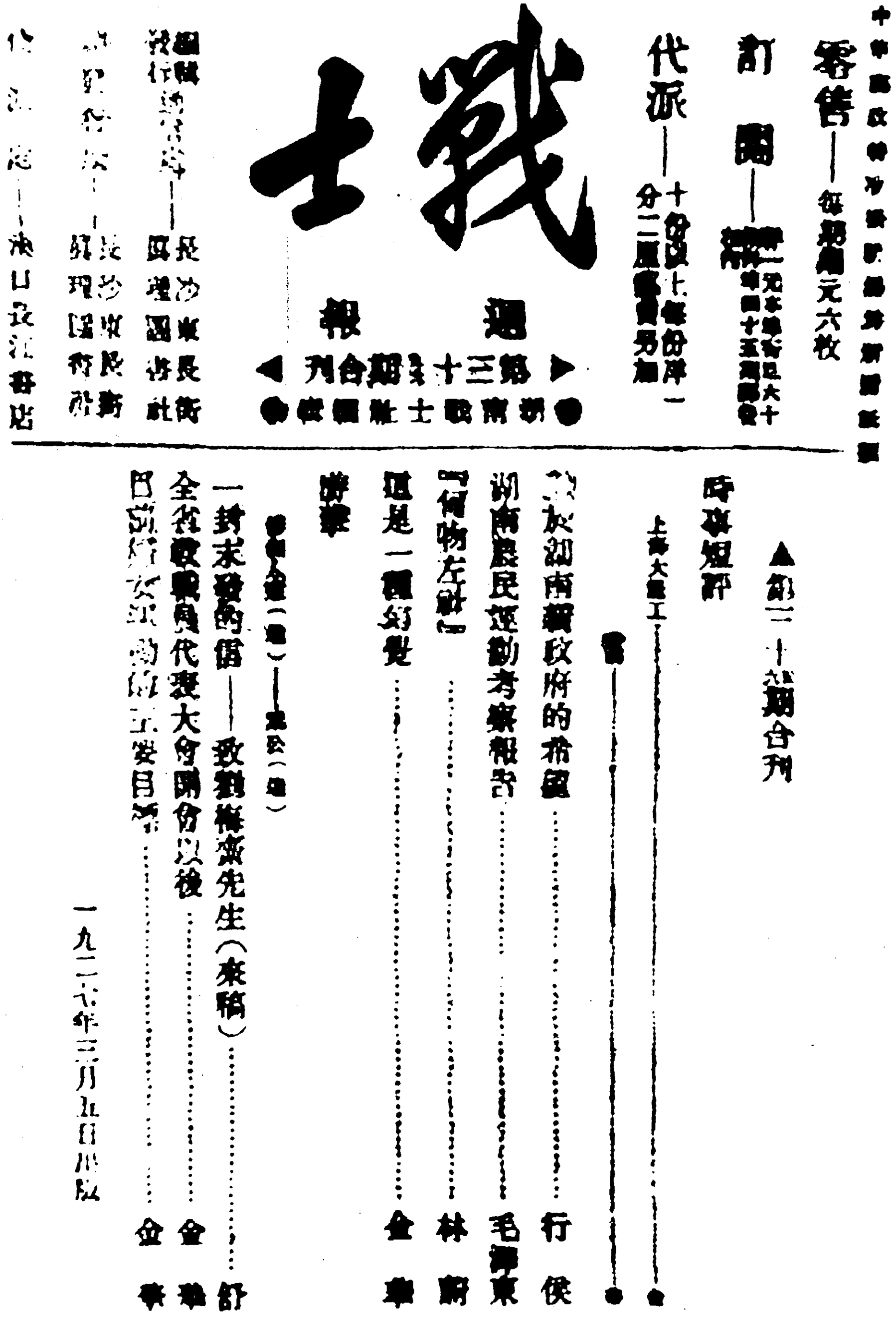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湖南地主阶级的武装，中路较少，西南两路较多。平均每县以六百枝步枪计，七十五县共有步枪四万五千枝，事实上或者还要多。农民运动发展区域之中南两路，因农民起来形势甚猛，地主阶级招架不住，其武装势力大部分投降农会，站在农民利益这边，例如宁乡、平江、浏阳、长沙、醴陵、湘潭、湘乡、安化、衡山、衡阳等县。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倾向于投降，例如宝庆等县。再一小部分则站在和农会敌对地位，例如宜章、临武、嘉禾等县，但现时农民正在加以打击，可能于不久时间消灭其势力。这样由反动的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将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1]，放在新的乡村自治机关——农民政权的乡村自治机关管理之下。这种旧武装拿过来，是建设农民武装的一方面。建设农民武装另有一个新的方面，即农会的梭镖队。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湘乡一县有十万枝。其他各县，如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七八万枝、五六万枝、三四万枝不等。凡有农民运动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这种有梭镖的农民，将成为“挨户团非常备队”。这个广大的梭镖势力，大于前述旧武装势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绅看了害怕，革命

---

[1] “挨户团”是当时湖南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党决不应该看了害怕。



中華郵政[illegible]認爲新聞紙類

零售——每期銅元六枚

訂閱——[illegible]

代派——十份以上每份洋一分二厘郵費另加

戰士

週報

◀第三十[illegible]期合刊▶

●湖南戰士社編發●

總發行處——長沙東長街[illegible]

[illegible]——長沙[illegible]

代售處——衡山[illegible]書店

▲第三十[illegible]期合刊

時事短評

上海大罷工……………………………………雷

對於湖南省政府的希望……………………行俠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

「何物左派」………………………………林蔚

這是一個幻覺………………………………金華

詩歌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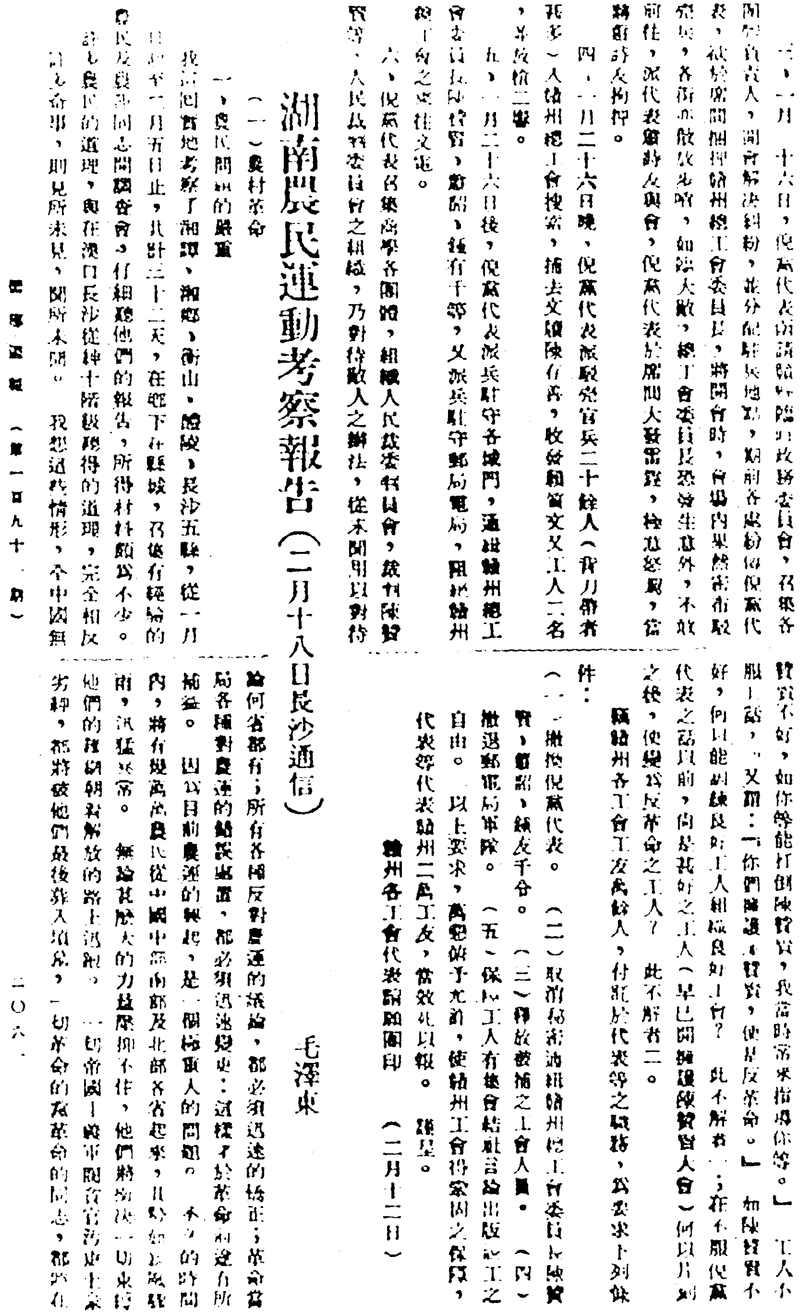
一封未發的信——致劉梅齋先生（來稿）……………舒

全省農民代表大會開會以後…………………金華

[illegible]……………………………………金華

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出版

1927年3月5日，湖南长沙的刊物《战士》刊登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三、一月十六日，倪弼代表商請縣黨部暨政務委員會，召集各團體負責人，調解糾紛，並分配駐兵地點，期前各團體與倪弼代表，被於席間捆押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將開會時，會場內果然密布駐兵，各街亦散佈步哨，如臨大敵，總工會委員長恐發生意外，不敢前往，派代表齎函與會，倪弼代表於席間大發雷霆，極端怒罵，信轉函詐為拘押。

四、一月二十六日晚，倪弼代表派駐贛官兵二十餘人（背刀帶者甚多）入贛州總工會搜索，搶去文牘陳存各，收發租當文又工人二名，並放槍二響。

五、一月二十六日後，倪弼代表派兵駐守各城門，通緝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鄒閣、鍾有千等，又派兵駐守郵局電局，阻止贛州與外面之來往文電。

六、倪弼代表召集商學各團體，組織人民裁判委員會，裁判陳贊賢等，人民裁判委員會之組織，乃對付敵人之辦法，從未聞用以對付贊賢不好，如你們能打倒陳贊賢，我當時常來指導你等。」工人不服上訴，"又罵：「你們擁護陳贊賢，便是反革命。」如陳贊賢不好，何以能組練良好工人組織良好工會？此不解者一；在不服倪弼代表之話以前，何以甚好之工人（早已開始擁護陳贊賢入會）何以片刻之後，便變為反革命之工人？此不解者二。

屬贛州各工會工友萬餘人，付託於代表等之職務，為要求下列條件：

（一）撤換倪弼代表。（二）取消秘密通緝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鄒閣、鍾友千令。（三）釋放被捕之工會人員。（四）撤退郵電局軍隊。（五）保障工人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以上要求，萬懇俯予允許，使贛州工會得安固之保障，代表等代表贛州二萬工友，當效死以報。謹呈。

贛州各工會代表劉鳳圖印　（二月十二日）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二月十八日長沙通信）

毛澤東

（一）農村革命

一、農民問題的嚴重

我這回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計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及農運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頗為不少。許多農民的道理，與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在中國無論何省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運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的矯正；革命當局各種對農運的錯誤處置，都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運的興起，是一個極重大的問題。不久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甚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最後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

嚮導週報（第一百九十一期）

二〇六

1927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前半部分。

第六件　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

县政治必须农民起来才能澄清，广东的海丰已经有了证明。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在土豪劣绅霸占权力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知事，几乎都是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都是廉洁政府。我走过的几县，知事遇事要先问农民协会。在农民势力极盛的县，农民协会说话是“飞灵的”。农民协会要早晨捉土豪劣绅，知事不敢挨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挨到下午。农民的权力在乡间初涨起来的时候，县知事和土豪劣绅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农民的。在农民的权力涨至和地主权力平行的时候，县知事取了向地主农民两边敷衍的态度，农民协会的话，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绝。上头所说农会说话飞灵，是在地主权力被农民权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时候。现在像湘乡、湘潭、醴陵、衡山等县的县政治状况是：

（一）凡事取决于县长和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这种会议，由县长召集，在县署开。有些县名之曰“公法团联席会议”，有些县名之曰“县务会议”。出席的人，县长以外，为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县商民协会、县女界联合会、县教职员联合会、县学生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县党部[1]的代表们。在这样的会议里，各民众团体的意见影响县长，县长总是唯命是听。所以，在湖南采用民主的委员制县政治组织，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了。现在的县政府，形式和实质，都已经是

---

[1] 当时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各地国民党县党部，很多是属于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是共产党人、左派国民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联盟。

颇民主的了。达到这种形势，是最近两三个月的事，即农民从四乡起来打倒了土豪劣绅权力以后的事。知事看见旧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这才开始巴结民众团体，变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承审员没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还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审员助知事审案。知事及其僚佐要发财，全靠经手钱粮捐派，办兵差和在民刑诉讼上颠倒敲诈这几件事，尤以后一件为经常可靠的财源。几个月来，土豪劣绅倒了，没有了讼棍。农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级农会里处理。所以，县公署的承审员，简直没有事做。湘乡的承审员告诉我：“没有农民协会以前，县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诉讼禀帖；有农会后，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于是知事及其僚佐们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警备队、警察、差役，一概敛迹，不敢下乡敲诈。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尤其是县政府豢养的警察、警备队、差役这班恶狗，他们怕下乡，下乡也不敢再敲诈。他们看见农民的梭镖就发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

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农民在乡下怎样推翻地主的政权，已如前头所述。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农会势盛地方，族长及祠款经管人不敢再压迫族下子孙，不敢再侵蚀祠款。坏的族长、经管，已被当作土豪劣绅打掉了。从前祠堂里“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残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爷们只好听她们的便。又有一处地方，因禁止贫农进祠堂吃酒，一批贫农拥进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绅长褂先生吓得都跑了。神权的动摇，也是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许多地方，农民协会占了神的庙宇做会所。一切地方的农民协会，都主张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做农会经费，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乡各区农民禁止家神老爷（傩神）游香。渌口伏波岭庙内有许多菩萨，因为办国民党区党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萨堆于一角，农民无异言。自此以后，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场、送大王灯的，就很少了。这事，因为是农会委员长孙小山倡首，当地的道士们颇恨孙小山。北三区龙凤庵农民和小学教员，砍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只有两个小菩萨名“包公老爷”者，被一个老年农民抢去了，他说：“莫造孽！”在农民势力占了统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农民和妇女，青年和壮年农民都不信了。农民协会是青年和壮年农民当权，所以对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

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但是现在时期，农民的精力集中于破坏地主的政治权力这一点。要是地主的政治权力破坏完了的地方，农民对家族神道男女关系这三点便开始进攻了。但是这种进攻，现在到底还在“开始”，要完全推翻这三项，还要待农民的经济斗争全部胜利之后。因此，目前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若用过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强地从事这些东西的破坏，那就必被土豪劣绅借为口实，提出“农民协会不孝祖宗”“农民协会欺神灭道”“农民协会主张共妻”等反革命宣传口号，来破坏农民运动。湖南的湘乡、湖北的阳新，最近都发生地主利用了农民反对打菩萨的事，就是明证。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1]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

[1] 这句话引自《孟子·尽心上》，大意是说善于教人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毛泽东在这里是借来比喻共产党人应当善于教育和启发农民，使农民自觉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良的风俗习惯，而不是不顾农民的觉悟程度，靠发号施令代替农民去破除。

我在乡里也曾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我的话是：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大家走好运，大家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大家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了吗？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是：‘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吗？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我这些话，说得农民都笑起来。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传

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比如有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吧，如果你看见一个小孩子对着另一个小孩子鼓眼蹬脚扬手动气时，你就立刻可以听到一种尖锐的声音，那便是：“打倒帝国主义！”

湘潭一带的小孩子看牛时打起架来，一个做唐生智，一个做叶

开鑫[1]，一会儿一个打败了，一个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叶开鑫。“打倒列强……”这个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几乎人人晓得唱了，就是乡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晓得唱了的。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据农村工作同志的报告，政治宣传在反英示威、十月革命纪念和北伐胜利总庆祝这三次大的群众集会时做得很普遍。在这些集会里，有农会的地方普遍地举行了政治宣传，引动了整个农村，效力很大。今后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种机会，把上述那些简单的口号，内容渐渐充实，意义渐渐明了起来。

---

[1] 唐生智是当时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的一个将军。叶开鑫是当时站在北洋军阀方面反对革命的一个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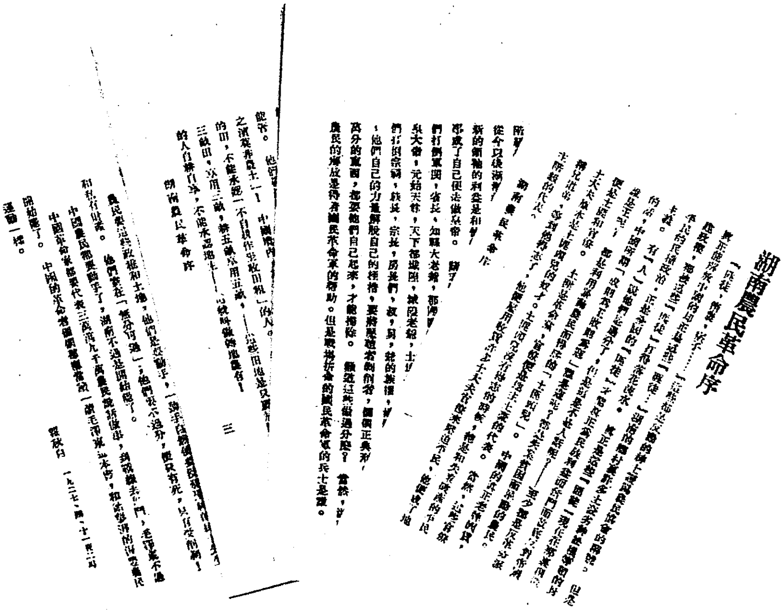
第九件　农民诸禁

共产党领导农会在乡下树立了威权，农民便把他们所不喜欢的事禁止或限制起来。最禁得严的便是牌、赌、鸦片这三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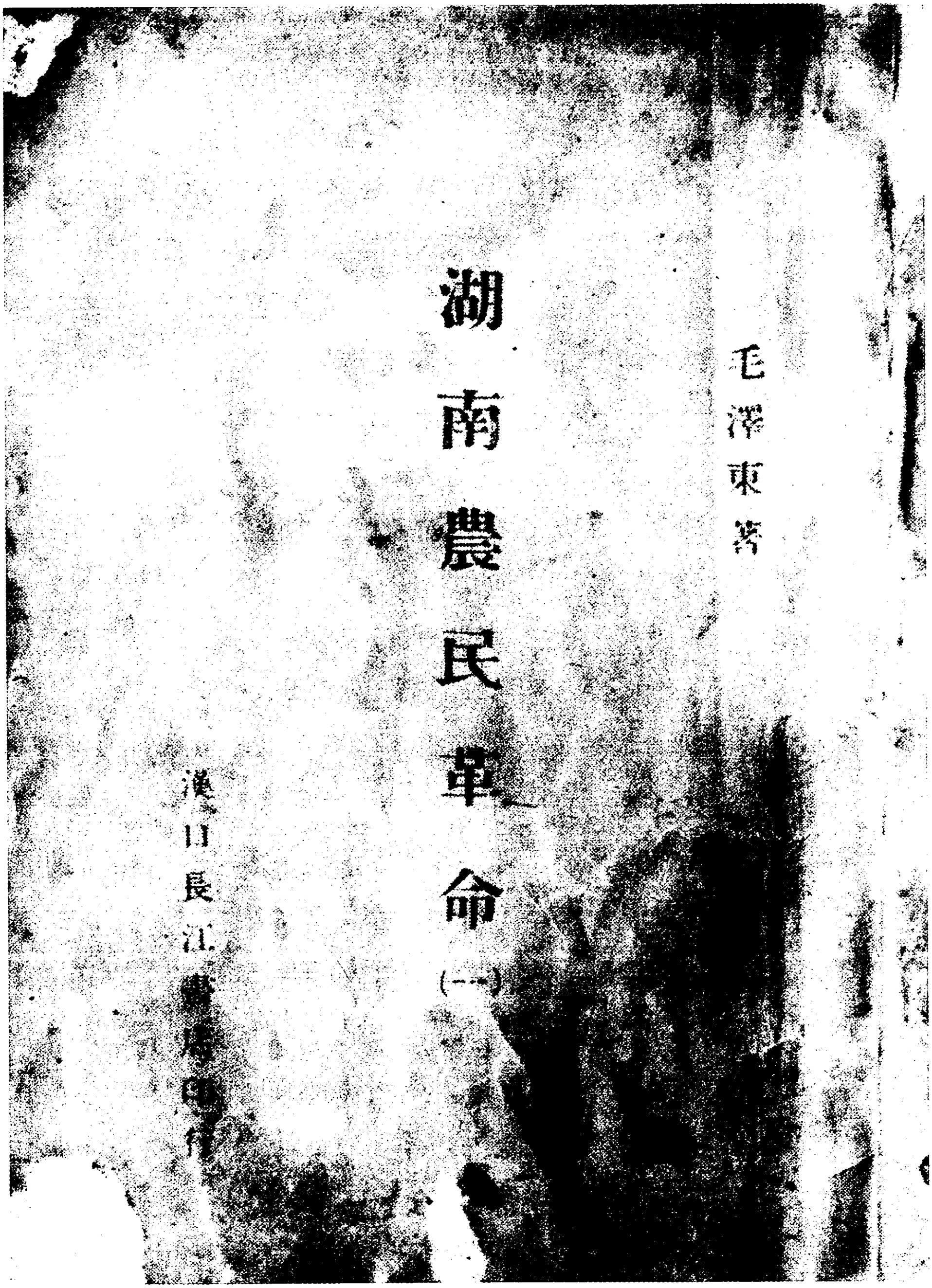
牌：农会势盛地方，麻雀、骨牌、纸叶子，一概禁绝。

湘乡十四都地方一个区农会，曾烧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乡间去，什么牌都没有打，犯禁的即刻处罚，一点客气也没有。



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作序。



毛澤東著

湖南農民革命(一)

漢口長江書店印行

1927 年，汉口长江书店出版的《湖南农民革命》。这是毛泽东著作的最早单行本。

赌：从前的“赌痞”，现在自己在那里禁赌了，农会势盛地方，和牌一样弊绝风清。

鸦片：禁得非常之严。农会下命令缴烟枪，不敢稍违抗不缴。醴陵一个劣绅不缴烟枪，被捉去游乡。

农民这个“缴枪运动”，其声势不弱于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1]军队的缴枪。好些革命军军官家里的年尊老太爷，烟瘾极重，靠一杆“枪”救命的，都被“万岁”（劣绅讥诮农民之称）们缴了去。“万岁”们不仅禁种禁吃，还要禁运。由贵州经宝庆、湘乡、攸县、醴陵到江西去的鸦片，被拦截焚烧不少。这一来，和政府的财政发生了冲突。结果，还是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命令下级农会“暂缓禁运”。但农民在那里愤愤不乐。

三者以外，农民禁止或限制的东西还有很多，略举之则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许多县有打轿子的事，湘乡特甚。农民最恨那些坐轿子的，总想打，但农会禁止他们。办农会的人对农民说：“你们打轿子，反倒替阔人省了钱，轿工要失业，岂非害了自己？”农民们想清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涨轿工价，以此惩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谷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铺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价于一极小数目，酒店无钱赚，只好不煮了。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

---

[1] 孙传芳（1885—1935），山东泰安人，北洋直系军阀。1925年11月以后，曾经统治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五省。他镇压过上海工人的起义。1926年9月至11月，他的军队主力在江西的南昌、九江一带，被北伐军击溃。

鸡鸭。湘乡禁喂鸡鸭，但妇女们反对。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湘乡的嘉谟镇实行不吃好饮食，用果品祭祖。

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民没有权力时，只能用宗教观念反对杀牛，没有实力去禁止。农会起来后，权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里杀牛。湘潭城内从前有六家牛肉店，现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杀病牛和废牛的。衡山全县禁绝了杀牛。一个农民他有一头牛跌脱了脚，问过农会，才敢杀。株洲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

游民生活。如打春、赞土地、打莲花落，醴陵议决禁止。各县有禁止的，有自然消灭没人干这些事的。有一种“强告化”又叫“流民”者，平素非常之凶，现在亦只得屈服于农会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个雨神庙，素聚流民，谁也不怕，农会起来，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乡农会，捉了三个流民挑土烧窑。拜年陋俗，议决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还很多，如醴陵禁傩神游香，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中元烧衣包，禁新春贴瑞签。湘乡的谷水地方水烟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铳，放鞭炮的罚洋一元二角，放铳的罚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场。十八都禁送奠仪。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统名之曰农民诸禁。

这些禁令中，包含两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对于社会恶习之反抗，如禁牌赌鸦片等。这些东西是跟了地主阶级恶劣政治环境来的，地主权力既倒，这些东西也跟着扫光。第二是对于城市商人剥削之自卫，如禁吃酒席，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等等。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极为贫困，受商人剥削厉害，不得不提倡节俭，借以自卫。至于前述之农民阻谷出境，是因为贫农自己粮食不够吃，还要向市上买，所以不许粮价高涨。这都是农民贫困和城乡矛盾的缘故，并非农民拒绝工业品和城乡贸易，实行所谓东方文化主义[1]。农民为了经济自卫，必须组织合作社，实行共同买货和消费。还须政府予以援助，使农民协会能组织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农民自然不必以阻谷为限制食粮价格的方法，也不会以拒绝某些工业品入乡为经济自卫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匪

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有些地方，还有小偷。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二是农民运动

---

[1] 东方文化主义，是排斥近代科学文明，标榜和宣扬东方落后的农业生产和封建文化的一种反动思想。

起后，谷子价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问题不如从前那样严重。三是会党加入了农会，在农会里公开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气，“山、堂、香、水”[1]的秘密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杀猪宰羊，重捐重罚，对压迫他们的土豪劣绅阶级出气也出够了。四是各军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许多。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也同情于农会。他们的议论是：“农民协会吗？讲良心话，也有一点点好处。”

对于禁牌、赌、鸦片和清匪，农民协会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废苛捐

全国未统一，帝国主义军阀势力未推翻，农民对政府税捐的繁重负担，质言之，即革命军的军费负担，还是没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绅把持乡政时加于农民的苛捐如亩捐等，却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减轻了。这也要算是农民协会的功绩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运动

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

---

[1] 山、堂、香、水，是旧中国民间秘密团体的一些宗派的称号。

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有些已经举办，有些正在筹备，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夜学经费，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闲公闲产。这些公款，县教育局要提了办国民学校即是那不合农民需要的“洋学堂”，农民要提了办农民学校，争议结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农民全得了。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第十三件　合作社运动

合作社，特别是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确是农民所需要的。他们买进货物要受商人的剥削，卖出农产要受商人的勒抑，钱米借贷要受重利盘剥者的剥削，他们很迫切地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去冬长江打仗，商旅路断，湖南盐贵，农民为盐的需要组织合作社的很多。地

主“卡借”，农民因借钱而企图组织“借贷所”的，亦所在多有。大问题，就是详细的正规的组织法没有。各地农民自动组织的，往往不合合作社的原则，因此做农民工作的同志，总是殷勤地问“章程”。假如有适当的指导，合作社运动可以随农会的发展而发展到各地。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各种版本。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坝

这也是农会的一件功绩。没有农会以前，乡村的道路非常之坏。无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只好让它坏。略有修理，也当作慈善事业，从那些“肯积阴功”的人家化募几个，修出些又狭又薄的路。农会起来了，把命令发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径所宜，分等定出宽狭，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

段。号令一出，谁敢不依？不久时间，许多好走的路都出来了。这却并非慈善事业，乃是出于强迫，但是这一点子强迫实在强迫得还可以。塘坝也是一样。无情的地主总是要从佃农身上取得东西，却不肯花几个大钱修理塘坝，让塘干旱，饿死佃农，他们却只知收租。有了农会，可以不客气地发命令强迫地主修塘坝了。地主不修时，农会却很和气地对主说道："好！你们不修，你们出谷吧，斗谷一工！"地主为斗谷一工划不来，赶快自己修。因此，许多不好的塘坝变成了好塘坝。

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们吧！很奇怪，南昌方面[1]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2]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3]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4]有什么两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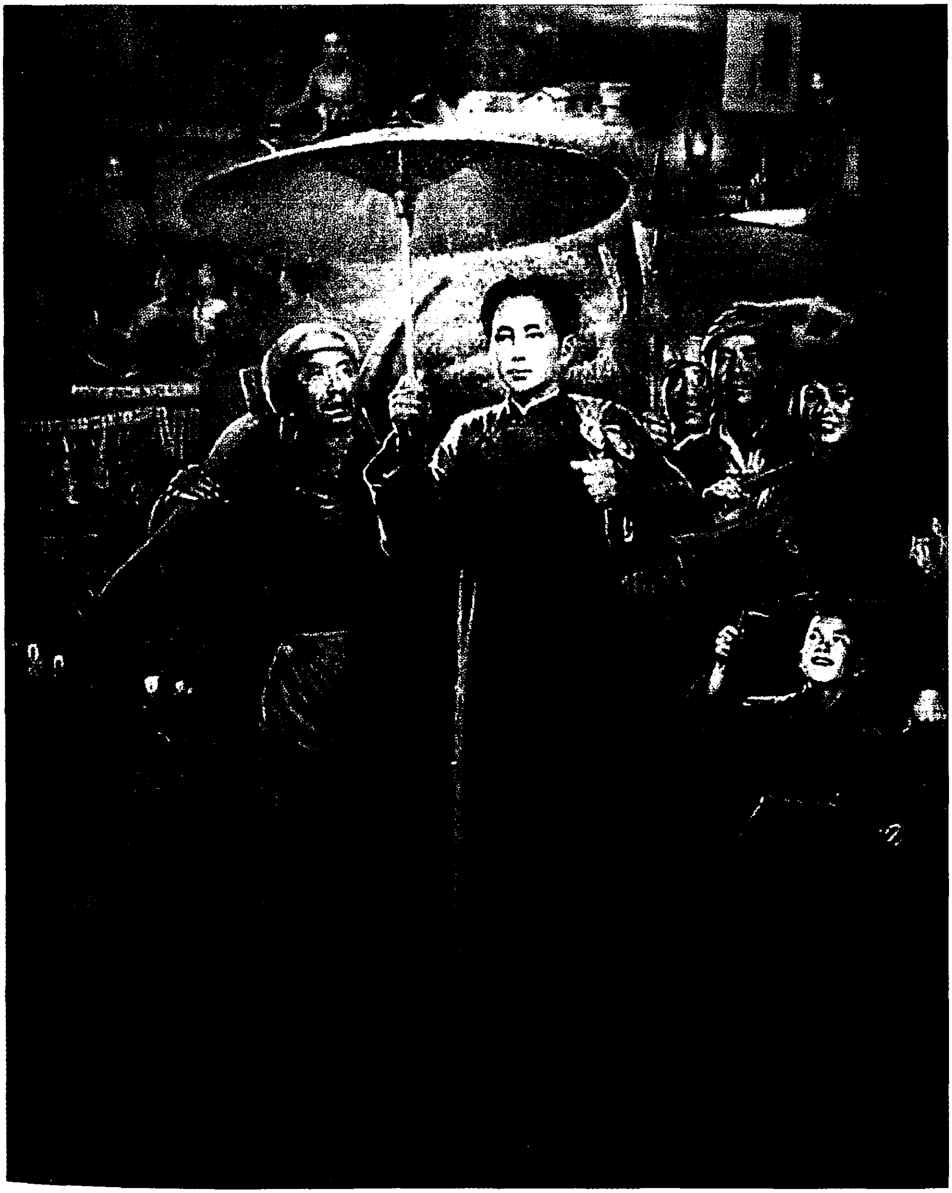
---

[1] 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南昌。蒋介石在南昌集合了国民党右派和一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勾结帝国主义，策划反革命的阴谋，形成了与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对抗的局面。

[2] 张静江（1877—1950），浙江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是国民党右派头子之一，为蒋介石设谋画策的人。

[3] 刘岳峙，湖南国民党右派组织"左社"的头子。1927年2月，他被当时还执行革命政策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清洗出党，成为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

[4] 叶公好龙，见汉朝刘向所作《新序·杂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毛泽东在这里用以比喻蒋介石辈口谈革命，实际上畏惧革命，反对革命。



《春雷交响·1927——好得很》（油画）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

（1927年3月）

地点：湖南湘潭西乡。

时间：民国十五年。

假定事实：一个壮年勤敏佃农，租人十五亩田（一佃农力能耕种之数），附以相当之园土柴山，并茅屋一所以为住宅。此佃农父母俱亡，仅一妻一子，妻替他煮饭喂猪，子年十二三岁，替他看牛。这个佃农于其租来之十五亩田，可以全由自己一人之力耕种，不需加雇人工。因穷，田系贩耕，没有押租银可交，所以田租照本处通例要交十分之七。

第一　支出之部

（一）食粮。佃农和他的妇人每人每年吃谷七石[1]二斗，小孩吃谷三石六斗，三人共吃谷十八石。每石时价四元，共七十二元（大洋[2]，下同）。

---

[1] 本篇中的“石”和“担”，有的是容量单位，有的是重量单位，它们所表示的量各地不完全相同。均照原文排印。

[2] “大洋”（光洋、杂洋）、“小洋”（毫洋、毛洋）、“铜元”，这三种货币之间的比值，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期不完全相同。

（二）猪油。三人至少每月吃猪油一斤，一年十二斤，每斤二角五分，共三元。

（三）盐。三人至少每月二斤，一年二十四斤，每斤一角三分（铜元四百三十文），共三元一角二分。

（四）灯油。每月煤油至少一斤，一年十二斤，每斤七分（二百三十文），共八角四分。

（五）茶叶。一年至少十斤，每斤二角，共二元。

（六）工资。三十六元（此农人如不租田耕种，可往人家做工，一年可得工资三十六元，今不做工，便损失此项工资了）。

（七）种子。每亩四升，十五亩六斗，值洋二元四角。

（八）肥料。买牛浆，洋一元买二千四百斤，放一亩，十五亩共支粪钱十五元（如买猪粪，一元买二千斤，可放一亩，共十五元。如买豆子，每一石价九元，每一石毛谷田打豆三升，每亩有六石毛谷，应打豆一斗八升，每升价九分，共洋一元六角二分，十五亩共二十四元三角。如买菜枯——油菜子粕，每四十斤价一元，每斤二分五厘，每亩要打枯五十斤，价一元二角五分，十五亩共十八元七角五分。但豆与枯饼，种十五亩田之佃农无资格放）。又十五亩须打石灰一千五百斤，每千斤价二元，共三元。二项共十八元。

（九）牛力。租牛，包秧下田（谓包犁好至秧可下田），每亩租价一元，内除人工二角四分（本来租牛人工在内，但前面假定事实不加雇外面人工，故此佃农应往他家做零工弥补此项犁田人工，而于牛力租价内将人工除去），计七角六分，十五亩共十一元四角。作十五亩田之佃农，总是自己喂了一头牛，且牛可踹粪，安得不喂？今以喂一头牛论，买一头中等牛，要费本钱四十元，依本处每元丝银百两息谷八石推算，四十元合元丝银三十两零七钱（大洋一元三

角合元丝银一两），计每年息谷二石四斗五升六合，每石价四元，值洋九元八角二分四厘。

（十）农具消耗。

（1）犁二架。十五亩田，每年要用二架犁。每架毛犁弯一角。毛犁底、犁把手、犁箭三样共一角。毛货做成犁要一个木匠工，工食三角四分三厘（木匠工价一元七工，每工一角四分三厘，伙食二角）。犁头、犁铡四角。上桐油半斤，一角五分（每斤三角）。一犁共一元零九分三厘。二犁共二元一角八分六厘。

（2）铁耙一架。六元，可用十年，每年六角。

（3）耙头二把。每把五斤，一元四斤，二角五分一斤，每把一元二角五分。二把二元五角。可用三年，每年八角三分三厘。

（4）锄头三把。

（a）挖锄一把。五斤，一元四斤，一斤二角五分，五斤一元二角五分。可用十年，每年须含钢一次，七分（二百三十文），十年七角。以上共一元九角五分。以十年均分，每年一角九分五厘。

（b）田锄一把。三斤半，八角七分五厘。可用五年，每年含钢一次七分（二百三十文），共含钢三角五分。五年共一元二角二分五厘。每年二角四分五厘。

（c）藁锄一把。一斤半，三角七分五厘，可用二年，每年一角八分七厘五。

锄头三把，每年消耗共六角二分七厘五。

（5）打禾桶一个。木料一元，钉子、钳子一元，木匠工八个一元一角四分（每元七工），木匠八工伙食一元六角，上桐油三斤一元，挡折一床（包做五串，每元三串三百计）一元五角。共七元二角四分。可用二十年，每年三角六分二厘。

（6）箩筐六担。包做每元三担，共二元。可用二十年，每年一角。

（7）络脚六担。每担百文，共六百文，合洋一角八分，只用一年。

（8）鸢箕四担。“长携”“钩索”各二担，每担一角，共四角。只用一年。

（9）撮箕三个。一个打禾用，一个晒谷用，一个盛米用，共值一元，可用十年，每年一角。

（10）风车一架。六元，可用六十年，每年一角。

（11）晒谷用具。谷筛子一，匀耙一，扯谷耙二，共一元五角，可用十年，每年一角五分。

（12）南盘一个。一元，用五年，每年二角。

（13）米筛二把。二元，用十年，每年二角。

（14）推子一张。二元，用四年，每年五角。

（15）碓一张。二元，用三十年，每年六分七厘。

以上十五种农具，每年消耗六元六角零五厘五。

按[1]：农具之消耗固为一大项，而开办的本钱之利息乃为一更大项。十五种农具之置备共费本钱三十九元五角五分六厘，以二分月息计，每年利息九元四角九分。单农具一项已如此之巨，若将所有支出费用计算利息，当为一惊人之数，本篇均未计入。

（十一）杂用。季节庆吊通情送礼，人客来往烟酒招呼，及此外一切零星用费，每月至少一元，全年共十二元。

以上十一项共计一百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五厘五。

---

[1] 这个“按”是毛泽东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加写的。

按：衣服一项，每年三个人至少要穿六丈布（即两匹布），布价每尺八分，共四元八角，染水、缝工在外。但普通贫农的衣服都是由女人做了穿，很少耗钱买布，故上面不列。

第二　收入之部

（一）田收。每亩年获谷（稻）四石，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十分之七），自得十八石，每石价四元，共七十二元。

（二）喂猪。每年四十元（每月三元三角，至少有此数）。

（三）冬季或砍柴，或挑脚。一冬可寻钱二十元。

（四）工食省余。九、十、十一三个月出外砍柴挑脚，不在家里吃饭做事，应从支付项下除去这三个月一个人的伙食和工资。每月伙食二元七角四分（谷六斗二元四角，油一斤二角五分，盐十一两九分），三个月共八元二角二分。工资每月二元五角，共七元五角。二项共十五元七角二分。

以上四项共计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

第三　结论

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

即每年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之收入，还须假定在下列六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一）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

（二）身体熬练，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

（三）精明会转计（本处会转计谓会计算）。

（四）所养猪牛不病不死。

（五）冬季整晴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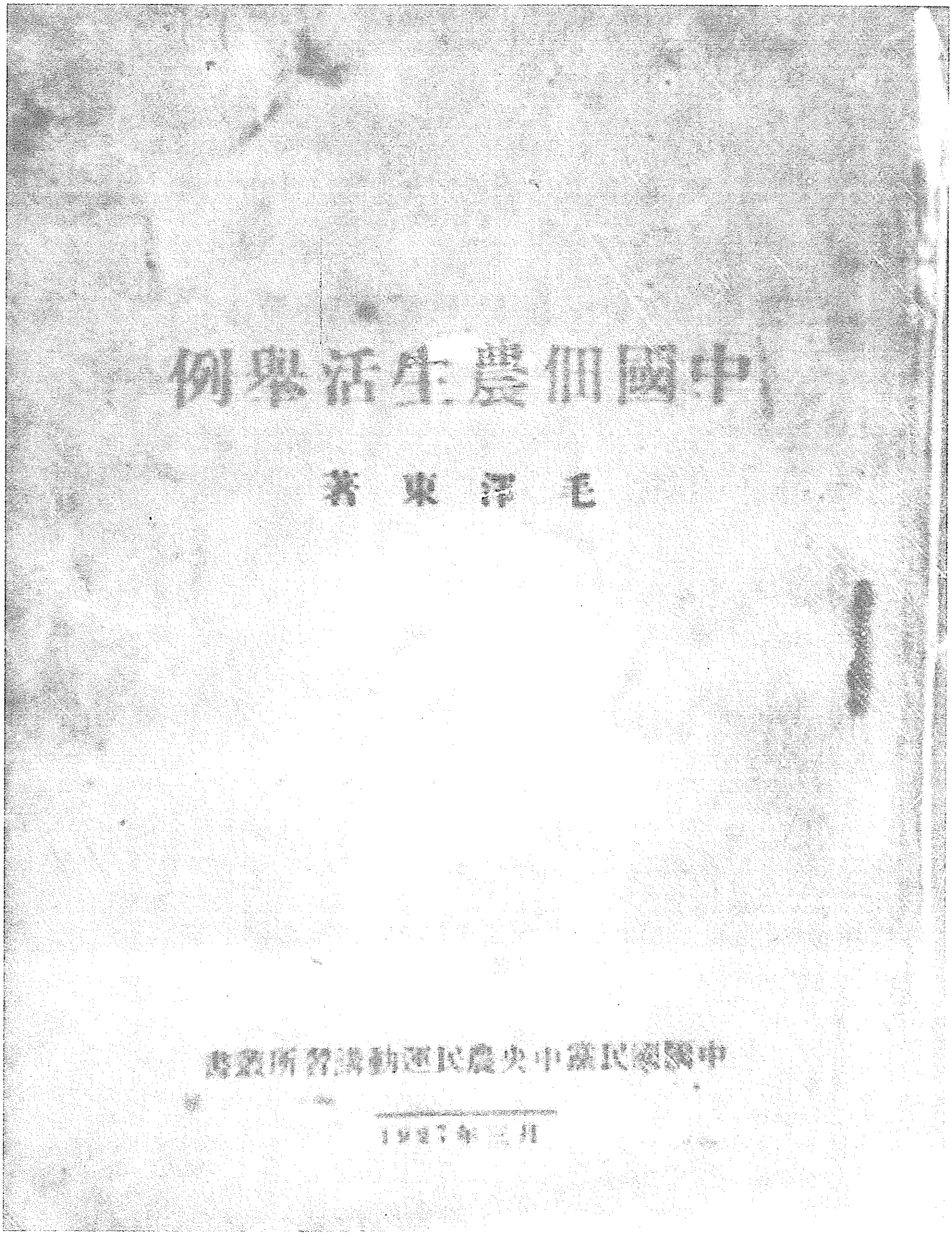
（六）终年勤劳，全无休息。

事实上呢，六个条件具备者乃很少的，尤其是第三和第五个条件。穷苦佃农总是老实者多精明者少，在生存竞争十分剧烈之今日农村，此点关系荣枯极大；而冬天往往风雨连绵，害得穷苦农民大大减少砍柴挑脚之收入。至第一条之天然灾害，第二条之疾病，第四条之牲畜病症，都是在所难免。第六条则表示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然事实上佃农不能个个这样终年无一天休息地做苦工，稍一躲懒，亏折跟来了。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这种小部分靠正业大部分靠副业，计算起来每年亏折一长项之佃农生活，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

许多佃农每年尽其勤力所获之副业以与生活相挣扎，还觉得可以勉强遮敷不甚感亏折之苦者，则以工资一项全不计算之故。

（本文乃与佃农张连初君会谈之结果。）



中國佃農生活舉例

毛澤東著

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叢書

1927年三月

毛泽东把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对佃农的调查情况写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作为农讲所学员的学习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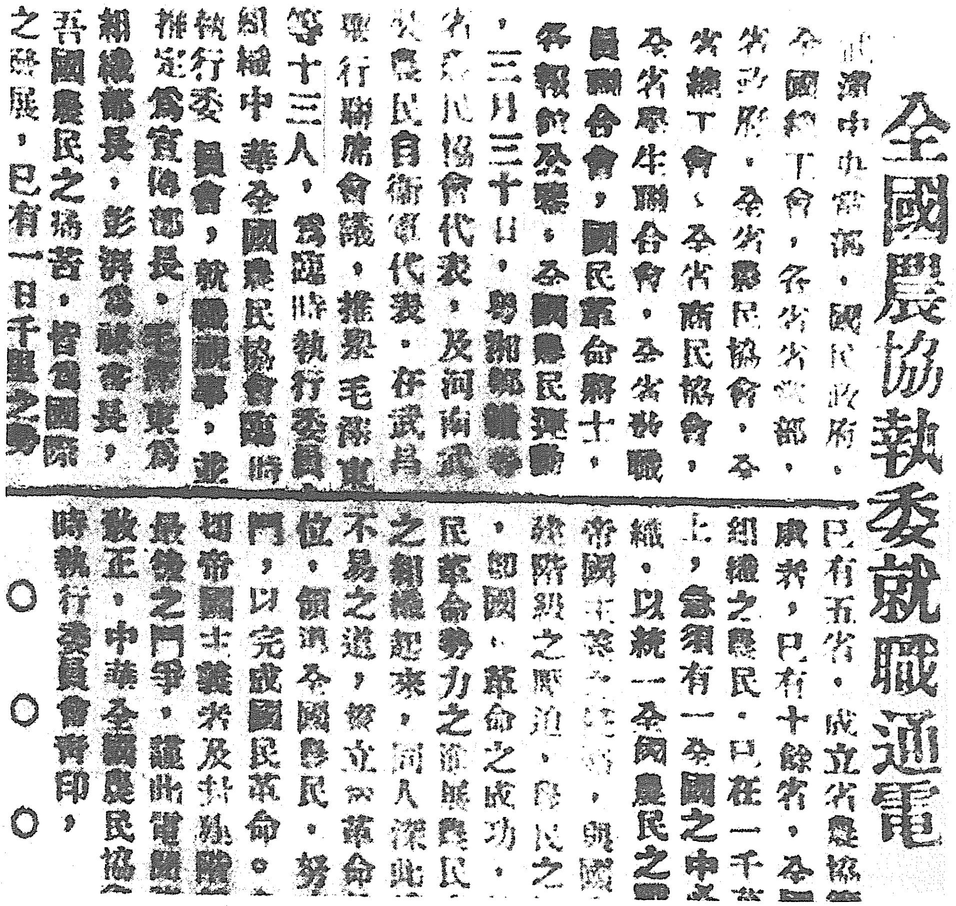
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

（1927年4月9日）

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各省省党部、省政府、全省农民协会、全省总工会、全省商民协会、全省学生联合会、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国民革命将士、各报馆公鉴：

全国农民运动之发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势。现在成立省农民协会者，已有五省，成立省农协筹备处者，已有十余省，全国有组织之农民，已在一千万以上，急须有一全国之中心组织，以统一全国农民之战线。三月三十日，粤湘鄂赣等省农民协会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自卫军代表，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举邓演达、毛泽东、潭延闿、谭平山、徐谦、孙科、唐生智、张发奎、彭湃、易礼容、陆沉、萧入鹄、方志敏等十三人，为临时执行委员，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视事，并推定邓演达为宣传部长，毛泽东为组织部长，彭湃为秘书长。吾国农民之痛苦，皆为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与国内封建阶级之压迫，农民之解放，即国民革命之成功，故国民革命势力之进展农民亦随之组织起来，同人深此为信不易之道，誓立于革命的地位，领导全国农民，努力奋斗，以完成国民革命。与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封建阶级作最后之斗争，谨此电闻诸希教正。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青印



全國農協執委就職通電

武漢中央黨部，國民政府，
全國總工會，各省省黨部，
各省政府，各省農民協會，各
省總工會、各省商民協會，各
各省學生聯合會，各省教職
員聯合會，國民革命軍將士，
各報館公鑒。全國農民運動
，三月三十日，由湘鄂贛粵
各省農民協會代表，及河南武
裝農民自衛軍代表，在武昌
舉行聯席會議，推舉毛澤東
等十三人，爲臨時執行委員
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
執行委員會，就職視事，並
推定爲宣傳部長，毛澤東爲
組織部長，彭湃爲秘書長，
吾國農民之痛苦，皆因國際
之發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勢

已有五省，成立省農協
廣者，已有十餘省，全
組織之農民，已在一千
上，急須有一全國之中
織，以統一全國農民之
帝國主義之[illegible]，與國
[illegible]附[illegible]之壓迫，農民之
，即國民革命之成功，
民革命勢力之[illegible]發民
之組織起來，同人深此
不易之道，[illegible]革命
位，領導全國農民，努
門，以完成國民革命。
切帝國主義者及封建階
最後之鬥爭，謹此通電
教正。中華全國農民協
臨時執行委員會齊印，

○
○
○

1927年3月底，中华全国农协会临时执委会成立，毛泽东被推举为常务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图为全国农协执委就职通电。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27年4月12日）

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地不纳租了，自动地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它就得了。

---

[1] 1927年4月12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记录。会议主要讨论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方法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1]

（1927年4月19日）

一

政权问题，不过是形式的问题。我们切实实现本党的决议已经够了，即是能够扩大农民协会的组织，则农民的政权是不成问题的。我关于土地问题有点意见，我以为这个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即：

（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我们确定这个意义之后，须加以大力的宣传。

（二）如何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土地有何标准，如何分配土地，此点实为问题的中心问题。

（三）农民的政权与土地问题，即用什么机关来没收和分配。

（四）土地没收了，耕者有其田了，是否禁止买卖？所以发生了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五）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此问题亦甚复杂。

---

[1] 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等问题时的5次发言。这个会议于1927年4月19日下午在汉口举行。

二

我很赞成主席的意思[1]。我以为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设乡村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乡村自治机关的事项。至于农民政权有两个阶段：（一）农民协会时代。在农村革命的时候，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革命过后，乡村政府应在国民政府一个系统之下。农民协会与政府本来不同一个系统的，并且此种农民政权的行使，各省需要几个中心的县份做榜样。湖南已经颁布过区乡村自治条例[2]，湖北亦可开始，广东则在例外。这些条例，最重要的须规定某种人不能加入自治机关之内。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

三

（一）农民政权问题可以另成一问题。

---

[1] 指会议主席邓演达在会上讲的以下意见：“农民政权问题，宜经下层着眼：（一）消极方面，应消灭封建势力。（二）积极方面，应建设农民自治机关。但乡村自治、区自治、县自治，均须顾到农民武力的保障，故解决农民武装问题极关重要。故第一步宜讨论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第二步要使农民得到武装，革命的党和政府应设法给武装与农民，我们应作一决议，请中央由兵工厂出品中交百分之五或十与农民；第三步由农政部根据决议案，制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令公布出来。”

[2] 指中共湖南区委1927年2月16日发布的《关于如何实现乡村民主政权的通告》及附件《湖南区乡自治条例》。

（二）增加土地分配之机关一项，加入上面解决土地问题纲要之内。

四

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有：（一）使农民得解放。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实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土地问题不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增加生产力，不能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不能改良土地。据俄同志[1]调查，我国土地生产力日见衰落，全国生产力已到了一个大危机，此危机不解决，必起绝大的饥荒。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无力改良土地，生产必至日减。故第二个意义为增加生产。（三）保护革命。革命势力目前虽见发展，但亦即到了一个危机，此后非有一支生力军必归失败。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其作用，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兵士问题。兵士能否永久参加革命，亦即在土地问题解决，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这三点是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意义。

五

现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可再加三项：（一）废除封建制；（二）发展中国工业；（三）提高文化。

---

[1] 指苏联土地问题专家岳尔克和达哈诺夫。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

（1927年4月19日）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应包含下列六点，并应根据此六点草成纲要。

1. 解放农民
2. 增加农业的生产力
3. 保护革命
4. 打破整个的封建制度及推翻帝国主义的基础
5. 促进中国工业化
6. 提高文化

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1927年4月22日）

一　原则

一、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土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

二、为使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必须使农民有充分的力量以取得政权及保障政权，因此国民政府应援助乡村农民对大地主及其他一切封建势力之斗争。

二　实行办法

三、国民政府应从速颁布乡区县自治机关组织条件，并选派农政人员前往各乡区县指导并扶助其组织。

四、国民政府应督促各省政府切实执行本党历次对农民问题的决议，尤其是中央各省联席会议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决议案。

五、各省省市党部应从速会同各省农民协会根据上述之原则，

斟酌各该省实际状况拟具解决土地问题之实施法则，呈请中央党部核准后交国民政府令各省政府执行之。

六、为肃清乡村封建势力，防止反动势力向农民进攻起见，对于土豪劣绅及一切妨害人民利益之反动分子，应由各省党部、省政府、农民协会及省党部所指定之各人民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以严厉方法处分之。

七、凡国民政府所管辖之兵器制造机关，应以出品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供给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其保管及分配军械事项，由中央党部组织“人民武装委员会”处理之。

八、国民政府应从速调查各处气候水土及收获数量，确定小地主之标准，大约沃壤每人不过五十亩，瘠壤不过一百亩，在此限度之内，得享有地权。

九、国民政府应即颁布保护佃农法规。

十、国民革命军将士现有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其无土地者，于革命战事终了后，应由国民政府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其详以法规定之。

十一、关于土地问题之宣传纲领应由土地委员会拟定，呈请中央党部批准。

三　附则

本案所指土地是耕作之地，至于牧场、森林、矿山、家屋、工场等所属土地，不属于本案所指之范围。

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报告的补充说明[1]

（1927年4月22日）

现在所决定为政治的没收，如土豪劣绅军阀等等的土地，此为第一步。进一步再论凡自己不耕种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没收，此为经济的。经济没收在湖南已不成问题，农民已自行分配。在财政上，土地问题不解决，亦是没有办法的，是无出路的。军阀在湖南，是剥削农民的。国民政府到湖南后，仍未能完全免除剥削，因战争关系，财政上不能不继续旧政策，此种情形，恰与现在革命发生矛盾。如没有出路，革命必遭失败。现在的财政如登记税是收不到，田税是有许多不缴纳的，苛捐杂税，更不能收。故土地问题必须解决。解决土地问题是对全般革命有利益的。如湖南照现在的财政政策，每年收入不过千余万（十四年由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左右）。若土地问题解决后，以田税百分之十计算，即可筹得五千六百万，并且可增至百分之十五，如此财政之困难立可解决。故为解决财政困难，土地问题如不决定，是无出路的。尚有自耕农中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富农是要没收的；如十家之内五家是富农，即须将

---

[1]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武汉召开。邓演达代表毛泽东、易礼容、陆沉和岳尔克五人专门委员会作关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报告。这是毛泽东对草案的补充说明。

富农土地分给其他五家。湖南的农民，现正在自己分配，自己开会分配。所以专就湖南的状况说，用政治没收的形式是不够的；但就一般论，只能用政治没收。故国民政府应明令定这样的法规（属于普通的），同时又须颁行单行的（如湖南）的法规。湖北不能与湖南比，河南又不能与湖北比，其解决当然不同。故一步做到经济没收，往往又与客观情形不称。……兹读中国土地调查，此表比较确实，可资参考。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关于讨蒋通电

（1927年4月）

各省区各特别市党部、海外各党支部，并转各级党部、各省政府，并转各级政府机关、国民革命军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方面军指挥、海军总司令、各军长，并转各军全体将士、总政治部，并转各级政治部、全国各报馆，并转各民众团体及全国民众均鉴：

顷阅蒋中正巧日通电，知其已由反抗中央而违于自立中央。蒋中正此种阴谋，警之已久，由其平日以中央为傀儡，及见中央所为不便于一己之私，于是始则纠集督军团式之会议以示反抗，继则纠集西山会议式之会议以谋分裂。同人对于蒋中正此种阴谋，虽早已觉察，惟调查已迟，及今横决，始谋堤障，实所疚心。蒋中正通电辞气之间，犹以劳苦功高自矜试闻北伐以来，牺牲无量数同志之血，虽否为蒋中正一人成就功名。□进吴佩孚、张作霖辈，以战事自矜，颐指政府，其结果遂使北京致陷于无政府之状态。蒋中正欲师其故智，其如革命的民众已非复可欺，徒见其不知景而已。同人民有欲为革命的民众告者，蒋中正所以反抗中央，自立中央，自其抵沪以来，首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惜拾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之唾余，以反共产口号，博其欢心，更不惜屠杀民众，为其相见之礼物。明知此种行为，必中央所不许，故不得不出于反抗中央之途。对于持正不附逆之军队，则以总司令名义，骗之出战，而

绝其援应，委之于敌。对于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则随意逮捕，拘囚杀害，对于各省市党部党员，则嗾使走狗横加摧毁，迨至异己渐去，狡窟已成，则悍然自立中央而无所顾忌。于是一切帝国主义之工具，皆麇集于其旗帜之下，以从事反革命。一切革命分子，皆彼以共产或勾结共产党之名，除之务□，今已开始进行。将来必变本加厉，东南革命基础，由之崩坏，革命民众，将无噍类。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加不认革命垂成之功，隳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各国民革命军□此厚辱，临电痛愤，不□欲□。

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国民政府委员
军事委员会委员　汪精卫　谭延闿　孙　科　徐　谦
顾孟余　谭平山　陈公博　吴玉章　唐生智　邓演达
宋子文　程　潜　朱培德　张发奎　宋庆龄　何香凝
林祖涵　王□□　陈友仁　经亨颐　于树德　杨匏安
恽代英　彭泽民　毛泽东　许苏魂　夏　曦　黄　实
董用威　詹大悲　王乐平　陈其瑗　朱霁青　高语罕
陈璧君　江　浩　潘云超　邓□修　谢　晋　孔　庚

1927年春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图为蒋介石军队关押的民众。

中国土地分配的调查

（1927年4月）

一、全国农户五千六百万（地主在内）平均每户以六人计，共三亿三千六百万人。上数以百分之八十为农民比例计算，则中国全人口为四亿二千万人，若此数是确实的，则上列农民数是确实的（此是根据俄同志及外国人的调查）。

二、中国全国面积内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已耕种的土地。东南沿海几省人口超过于能耕之地积，以山东论，每一acre（英亩当中国四十余公亩）住六百人，因此地价地租均甚高，因人多地少及租高农民有钱只能应付生活及付地价，无力发展农业技术。因此，技术很低，已经表现生产衰落的危险。

三、三亿三千六百万农民中：

（1）有土地的农民（有一亩起以至大地主）在一亿二千万至一千五百万；

（2）无地的雇农约三千万，游民、土匪、兵士、无固定职业之乡村小商人共约二千万；

（3）全体农民三亿三千六百万中，减去有地的农民一亿五千万及无地的雇农三千万，游民、兵匪等二千万，剩下一亿三千六百万则是无地而租人田地的佃农；

（4）依上统计有土地的一亿五千万占农民总数百分之四十五，

无土地的佃农、雇农、游民，共一亿八千六百万，占农民总数百分之五十五；

（5）以此知农民之多数是完全无土地而要求得到土地的。而且有地的农民中，又有许多是土地不够的，他们也是要求土地。

四、有地的农民（百分之四十五）中：

	亩数	人数	占地
贫农	一至十	百分之四十四	百分之六
中农	十至三十	百分之二十四	百分之十三
富农	三十至五十	百分之十六	百分之十七
小中地主	五十至一百	百分之九	百分之十九
大地主	一百以上	百分之五	百分之四十三

富农及小中地主及大地主三项人数共占有地农民中百分之三十，而其土地则占全数土地中百分之七十九。

五、以有地无地农民全数论：

（1）无地农民占百分之五十五

有地而地极少的贫农（一亩至十亩的）占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七十五均是要求土地的；

（2）有地十亩至三十亩的中农占百分之十二，他们不需要为土地而争斗，不反对贫农取得土地，反能帮助贫农；

（3）有地三十亩以上的富农、小中地主及大地主占百分之十三。

土地问题决议草案

（1927年4月）

一、凡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在乡村的土地，由区乡土地委员会没收，并分配于土地不足之农民。

二、农民分配土地以每户人口为标准，每人所得土地之数，又以年龄为差等。

三、土地之分配以乡为单位，但没收土地之数额甚大者，得以区为单位分配之。

四、区乡土地委员会由农民领导的区乡自治机关派员组织之，为区乡自治机关之一部分，负没收、分配、登记并管理第一条所述土地之责。

五、县省国三级政府均应组织土地委员会，县省国农民协会各得派代表参加。

六、没收并分配于农民之土地，其地租由区乡自治机关经收交于政府，租额由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商同全国农民协会定之。

七、没收并分配之土地禁止买卖。

八、国民政府农政部应即根据此决议制定一法规公布之。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图为大会举行开幕式的地方——武昌都府堤20号。

土地委员会报告

（1927年5月9日）

土地问题不独在革命理论上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且事实上现在亦已到了不能不解决的地步。湖南农民已有自动起来没收土地、分配土地的行动，广东、湖北、江西等省农民代表大会，无一不对于土地问题表示亟待解决的要求，甚而在奉鲁军阀压迫下的直隶农民，因为“旗地变民”的问题，也不知闹了多少次的冲突流血。再就政治上的观点看，革命运动，现时确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同时也伏着绝大的矛盾和危险，财政无法解决，军队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问题，这些矛盾和危险，亦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以求得一个出路。本党为着领导群众，为着保护革命，所以特别组织土地委员会，负责讨论这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土地委员会成立之后，已先后开过许多次会议，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也有了相当的结论，现在将讨论的经过，作一简括的报告如次：

土地委员会成立后，先后开了三次会议，觉得问题太重大太复杂了，非征集各省的材料和各方面的意见，不能遽尔得到解决的办法。所以开了三次会议后，即开扩大会议，扩大会议共开会五次，后来为便利讨论起见，更组织专门委员会，负审查各种决议草案的责任，共开了四次会。扩大会议出席人数，最多者有四十人，少亦十余人，自四月十九日起，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至五月六日，再开

最后之第五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之同志代表十五省区，报告共四件，决议草案共七件，对于解决土地问题，虽未能得到十分完满的办法，但在革命进程中，亦算得尽了相当的责任。兹更分述会议经过如下：

（一）开会的次数：

1. 委员会本身开会三次
2. 扩大会议五次
3. 专门审查委员会四次

（二）出席同志：

1. 本委员会委员
2. 中央各委员
3. 各省区党部负责同志
4. 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同志
5. 军事负责同志（军长师长政治部主任或秘书）

（三）出席人所代表之地：

1. 湖南　2. 湖北　3. 广东　4. 河南　5. 直隶　6. 山东
7. 安徽　8. 江苏　9. 浙江　10. 福建　11. 热河　12. 奉天
13. 察哈尔　14. 吉林　15. 山西

（四）报告：

1. 俄同志达哈诺夫报告俄国解决土地问题之经过
2. 全国土地分配之概况
3. 直隶省党部报告该省土地分配情形
4. 热河省党部报告该区土地分配情形
5. 其他各省党部同志报告各该省土地情形

（五）讨论之中心问题：

会议中根据各方面之报告调查及目前革命的需要，土地问题亟待解决，已为众所公认。但解决办法，是否立刻全部土地悉数没收为国有，抑为部分的没收，颇多讨论。结果认为理论上土地须全数收归国有，本毫无疑义，但目前客观事实，全国的政治环境及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做到全部土地收归国有的地步，在现在的客观事实中，只能做到政治的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尚未能完全消灭，根本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亦非中央会议所能详细规定，中央只能规定一种原则，详细办法，应斟酌各省实际状况，由各省自行拟定。故会议之结果，有下列各决议案：

（六）决议案：

1. 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决议案
2. 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决议案
3. 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
4. 佃农保护法决议案
5. 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案
6. 处分逆产条例决议案
7. 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

以上为土地委员会讨论解决土地问题之经过情形，所有各种决议案，尤其是4、5、6、7各决议案，土地委员会认为是适合本党目前的策略，与客观事实的需要，应由本党定为法规，分别颁布施行。是否有当，敬候

钧会详为核夺为荷此致

中央执行委员会

附：

（一）决议案七项

（二）会议纪录一本

土地委员会委员　邓演达　谭平山

毛泽东　徐　谦　顾孟余

十六年五月九日

全国总工会、农协电告湘工农团体*

（1927年5月26日）

限即刻到。湘潭、湘乡县农民协会探转省农民协会、全省总工会鉴：

政府已派五委员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长沙事变，本日晨起程，望转告全省工友农友静候政府解决，避免冲突为要。

中华全国总工会　全国农民协会叩
宥印

全国农协对湘鄂赣三省农协重要训令

（1927年5月29日）

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皆为农民，其所受政治经济的压迫与剥削，最为酷烈（田租苛捐之负担往往占其收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所以他们的革命要求，也最为迫切。过去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农民因求解除剥削而热烈参加革命，或为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协会的职任，即在领导此主力军以完成农民的解放，亦即国民革命的成功，因为国民革命的意义，在于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的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欲达到此目的，客观上最后必须实现耕者有其田，始能推翻帝国主义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政治基础，而解放全中国民众，使中国经济之生产力及工商业得有自由充分发展之可能。

自从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确定扶助农工之政策以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历次之训令、议决案及宣言，对于此种政策，屡经厘定，承认农民减租及乡村自治的主张，更日见其具体化。因此全国农民，尤其是粤湘赣等省的农民，尽力拥护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与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战，革命势力乃得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更将发展到黄河流域及中国全部。国民革命势力的发展，湘鄂诸省农民获得相当的自由，更认识打倒军阀，不仅在打倒拥兵自卫、勾结帝国主义、压迫民众之个人，而在根本消灭军阀之基础——农村

的土豪劣绅。农村之土豪劣绅在一乡之中不啻小军阀，其常为大军阀之爪牙，尤为人所共晓。故当国民革命军与吴赵军阀搏战于沙场之际，亦即农民与豪绅搏战于乡村之时。农民之向土豪劣绅猛烈攻击，实所以尽其国民革命主力军之主要任务。土豪劣绅深知此种争斗，为其生死关头，亦即用尽各种残忍手段，竭力反抗。于是各省农民之鲜血，乃满溅于土豪劣绅之手。农民欲求自存，欲求保障国民政府所付与之自由，乃迫不得已用革命的方法，回答土豪劣绅的反攻，此实为农民解放运动初步的必要手段，亦即国民政府实行初步民权之必要手段。此与国民革命军在革命战争时之军事紧急行动相同，实属无可非难。

革命势力愈发展，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愈激烈，帝国主义新旧军阀等，更尽力扶植土豪劣绅，以摧残农民运动。农民方面反因未能即时得到国民政府之强有力的帮助，而受残酷的袭击。加以蒋介石及土豪劣绅等，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遂愈益激起农民的愤怒，使其不能不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以谋反抗，而图自存。同时过去的斗争，只是限于一个地方，未与全中国的革命过程，发生密切的关系，所以革命战线，大形纷扰。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过去未及及时实行对于农民的宣言、决议，使每个农民，皆知政府和革命军实系代表农民利益而奋斗，因此，在国民政府保护军人财产之命令未颁布以前，少数农民的行动，有时不免侵犯革命军人之利益，蒋介石辈及土豪劣绅，更乘时造谣，挑拨离间，或且故为左倾之煽动，随又诋毁农民运动。原军事式之紧急战斗行动，至革命势力确有优势之时，理应开始新的建设时期，农民运动，亦是如此，否则长此以往，反将障碍农民运动的发展，而被反动派所利用，以危害革命的联合战线之巩固。

中国农民运动，到了现在，已有相当的发展，尤其是湖南湖北，必须采用新政策，始能适合新环境。此新政策首要的，即为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建立区乡县的民主自治政府。以乡而论，此种民主政府，虽以大多数农民为中心，其他中等阶级、小地主、中小商人、知识分子，及一切非土豪劣绅、非反革命派的群众，均得充分参加乡民会议及乡村政权，余则可以类推。

此种乡村民主自治机关建设之过程中，第一，必须严厉对付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拨离间政策。务使农民政权，可以完全由此种机关行使，举凡逮捕罚款等事，均由此种真正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自治机关，建设司法机关，按照国民政府的法令办理。第二，关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的家属——至多亦不过是小地主。在经济上应与农民一致获得解放，在政治上与农民同立于打倒反革命之战线；自然他们理应赞助农民之建设民主政权，所以农民协会，应当指导农民，力求与之合作，而乡村自治机关，对之更能切实保护。第三，乡村民主自治机关之成立，为唤起农民，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之有效方法。因为一方面可以由此种自治机关，在国民政府指挥之下，继续与土豪劣绅斗争，并辖治压迫剥削农民之土豪劣绅，使不得逞其凶残。他方面则此种乡村自治机关，既在国民政府行政机关系统之下，必可以使国民政府得到更深厚更广大的社会基础。第四，欲农民民主政权之确立，必须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群众，统一其指挥以保卫其利益，而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更可以使农民自卫军成为国民政府所承认所管理之保护村间治安的唯一武装势力，其他民团团防等组织，均不应任其存在。第五，改良贫农生计，亦为乡村自治机关成立后之主要任务。自乡村自治机关至国民政府，均须竭其全力，以求得此项问题之解决其具体方法，为设

立农民协作社及农民银行，无土地者及土地少者，设法使之得有生计与以田地，并使农民得到资本及工具，以冲破反革命派的经济封锁，振兴农村生产，关于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之土地的规定则须遵照国民政府政策执行。第六，食米问题，从前因为没有良好的办法，又有奸商土豪从中操纵，农民为保障自己不致饥饿起见，往往不得不阻谷出境。今后则须由乡村自治机关解决或由乡村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共同解决。因为此等机关，对于乡村的需要，容易精详计算，对于革命军之军米，尤须尽量供给。并可在不妨害民食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使谷米流通，以活动乡村之金融，购买必须的物品。第七，在乡村自治政府成立后，尤须切实施行佃农雇农保护法，以保障佃农雇农之生活。

要使这些工作，完全实现出来，在目前必须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革命过程，合而为一，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造成整个的打倒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之森严的革命壁垒，以保障已得的革命胜利，力求耕地农有之实现，而达到解放全中国民众的目的。不然，革命初期农民运动的原始现象，如果继续下去，则农民已得的革命胜利，不惟不能保障，而且有被反动派利用而摧毁之可能，或将因而大受挫折。

上述各事，关于农民运动的前途，至为重大，为此训令该省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并录令通告各县区乡各处，使农民群众彻底了解目前的新政策，以便努力工作。并将执行情形，具报本会，是为至要！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　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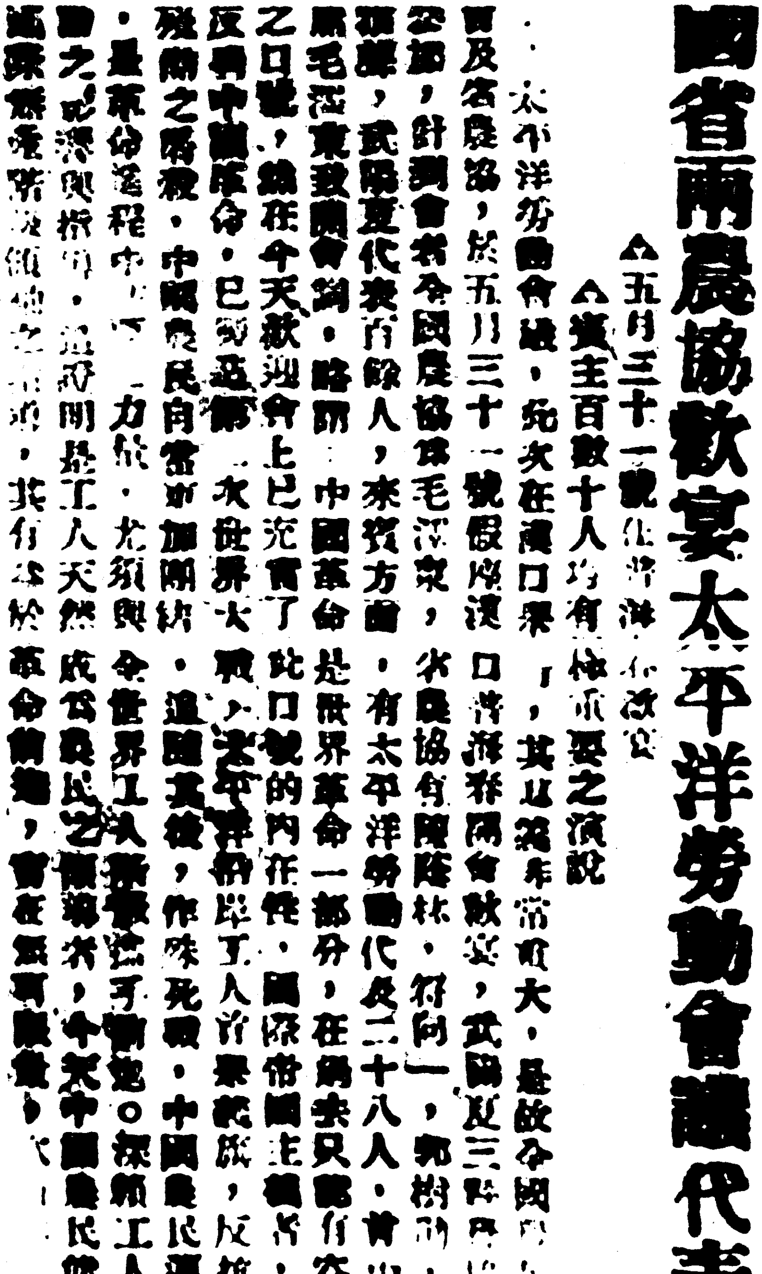
在太平洋劳动会议[1]代表欢宴会上的开会词

（1927年5月31日）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在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国际帝国主义者，为反对中国革命，已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沿岸工人首举义旗，反抗此残酷之屠杀。中国农民自当更加团结，追随其后，作殊死战。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过程中主要的力量，尤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今天中国农民能得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

[1] 太平洋劳动会议，此次在汉口举行，其意义非常重大，是故全国农民协会及省农协，于5月31日在汉口普海春饭店开会欢宴。武阳夏三县农协亦参加，计到会者全国农协为毛泽东，省农协有陈荫林、符向一、郭树勋、邓雅声、武阳夏代表百余人。来宾方面，有太平洋劳动代表28人。毛泽东在会议上致开会词。



國省兩農協歡宴太平洋勞動會議代表

△賓主百數十人均有極重要之演說

1927年5月31日，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在汉口普海春饭店欢宴参加太平洋劳动会议的代表，毛泽东出席并致开会词。

全国农协致陈嘉佑电

（1927年5月）

郴州陈军长勋鉴：

庚电奉悉，移镇湘南，誓师讨贼，革命前途，实□□赖，尚斯努力奋进，全国革命民众皆为公之后盾。

全国农民协会　叩

全国农民协会要电六则*

（1927年5月）

电一

长沙各报馆转长沙全体武装同志均鉴：

自从蒋逆叛变以来，即派大批走狗，造谣生事，以图离间革命势力，传闻长沙驻军，不幸误听反动派挑拨，竟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并将各机关负责同志屠杀十余人。此种举动，不惟根本破坏农工政策，亦且弁髦政府，扰乱北伐后防。敝会闻讯，非常惋惜！革命军队，既为人民武力，武装同志又均来自民间，为农民工友同为革命战线上之亲爱弟兄，其间决无若何仇怨。即有误会，亦当请示政府，从容解释。今竟然箕自煎，何殊助敌杀友！返躬自省，当为怃然。尚望惩前毖后，静候国民政府解决，万不可一误再误，有辱令名，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谨电布达，无任神驰。

电二

西平唐总指挥钧鉴：

同志切实遵守总理主义，坚决拥护总理政策，久为革命民众所共见。迩来报章所载同志拥护三大政策之通电，尤令全国民众钦仰

不置！不料长沙驻军，误听反动派挑拨，竟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及近郊农民协会武装，并屠杀各机关同志十余人。此种举动，不惟根本破坏农工政策，更属直接扰乱北伐后防。敝会闻讯，非常震悼！同志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应请迅电湖南省政府从速宣布事变真相，慎重善后，是为至盼！

电三

湖南省政府钧鉴：

蒋逆叛变以后，即派大批走狗，造作种种离间革命势力之谣言，传闻长沙驻军，不幸误受挑拨，竟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及近郊农民自卫军武装。遥听恶讯，不胜悲愤！此种举动，不惟根本破坏农工政策；抑且直接摇动北伐后防。敢请迅将事变真相示知，并盼慎重善后。

电四

西平、上蔡一带探送唐孟潇、邓泽生、张发奎诸委员钧鉴：

长沙驻军，轻信谣言，于马日捣毁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解除工人纠察队及近郊农民自卫军武装。本会对于此等重大事件，究应若何主张，即盼飞电示知。至为盼祷！

电五

驻马店四军十二师政治部李主任钧鉴：

皓电奉悉。敝会已与后方各革命团体组织慰劳伤兵委员会，专负慰劳救护负伤同志之责，请转知前方全体将士安心杀敌为盼！

电六

西平、上蔡一带探投唐总指挥、靳总司令、张军长并转前敌全体将士钧鉴：

迭奉捷音，欣悉奉逆精锐，已为我忠勇之将士歼灭殆尽。从兹肃清河南，直捣幽燕，指顾间事耳。谨电奉贺，并望继续努力，彻底肃清奉逆及一切剥削压迫农民之土豪劣绅，以荡涤北方之瑕秽，而解放幽燕之民众。敝会誓率全团农民一致为我全体将士之后盾。

菩萨蛮·黄鹤楼[1]

（1927年春）

茫茫九派[2]流中国[3]，
沉沉一线[4]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5]

黄鹤知何去？

---

[1] 黄鹤楼，旧址在湖北省武昌市区之西长江岸边的黄鹤矶（一作黄鹄矶）上，即今武汉长江大桥南端西侧。楼在历史上曾几经毁坏修复，1955年修建大桥时拆去遗留建筑物，1985年6月在重新扩建后开放。《南齐书·州郡志》说有个叫子安的仙人，曾骑黄鹄（即鹤，古“鹄”“鹤”二字通）经过黄鹄矶。《太平寰宇记》说骑鹤仙人叫费文祎，一作费祎，每乘黄鹤到此楼休息。楼因此得名。许多文人曾题诗抒慨，唐崔颢的名句“黄鹤一去不复返”，尤为历代传诵。作者借这个题目，抒发了革命家的截然不同的感慨。

[2] 九派，派，水的支流。相传在长江中游一带有九条支流同长江汇合，所以称“九派”。鲍照《登黄鹤矶》诗：“九派引沧流。”

[3] 中国，指中国的中部地区。

[4] 一线，指当时长江以南的粤汉铁路和以北的京汉铁路。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两条铁路已接通，改名京广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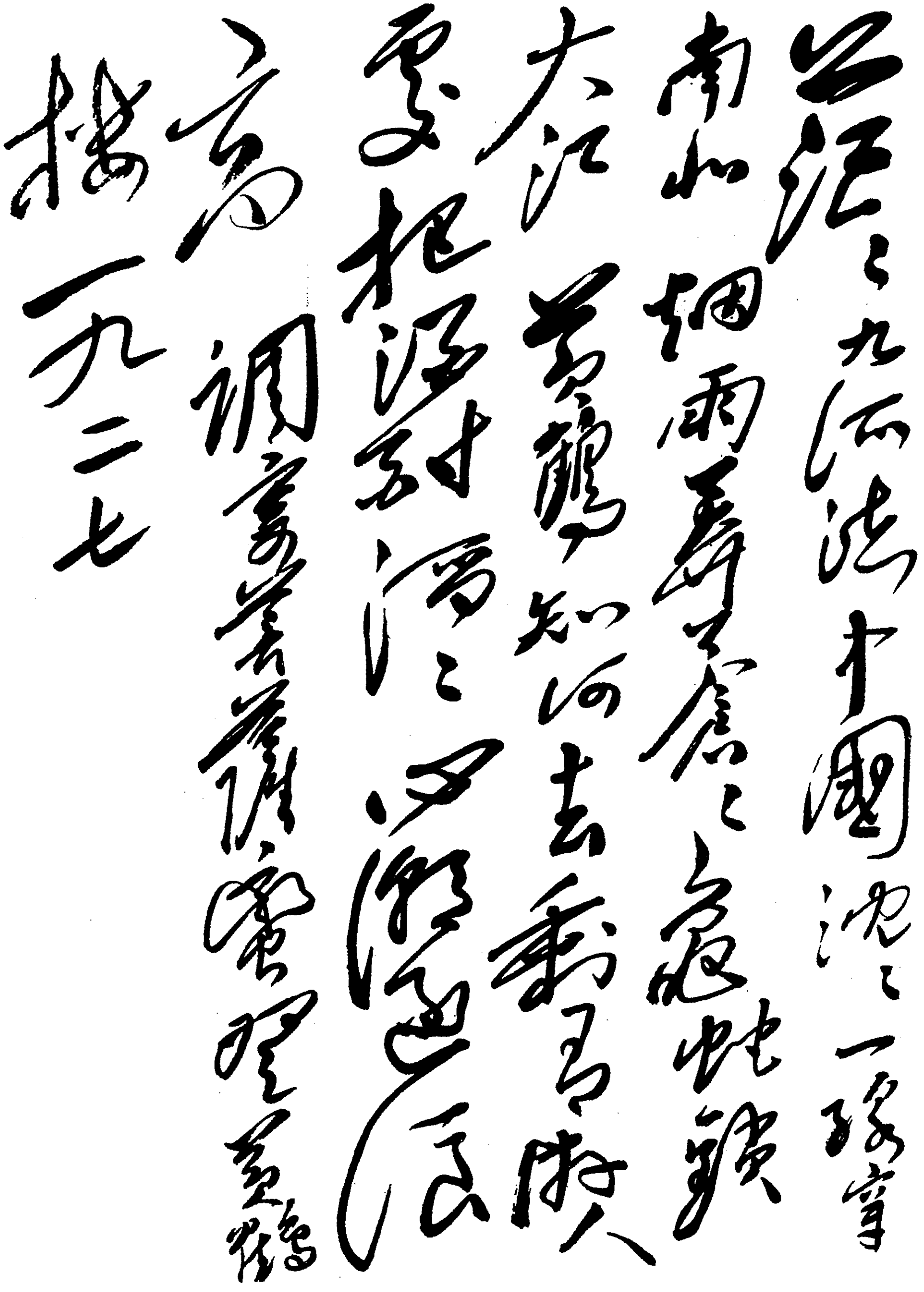
[5] 龟蛇锁大江，龟蛇指龟山和蛇山，蛇山在武昌城西长江边，龟山在它对岸的汉阳，隔江对峙，好像要把长江锁住一样。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1]
心潮[2]逐浪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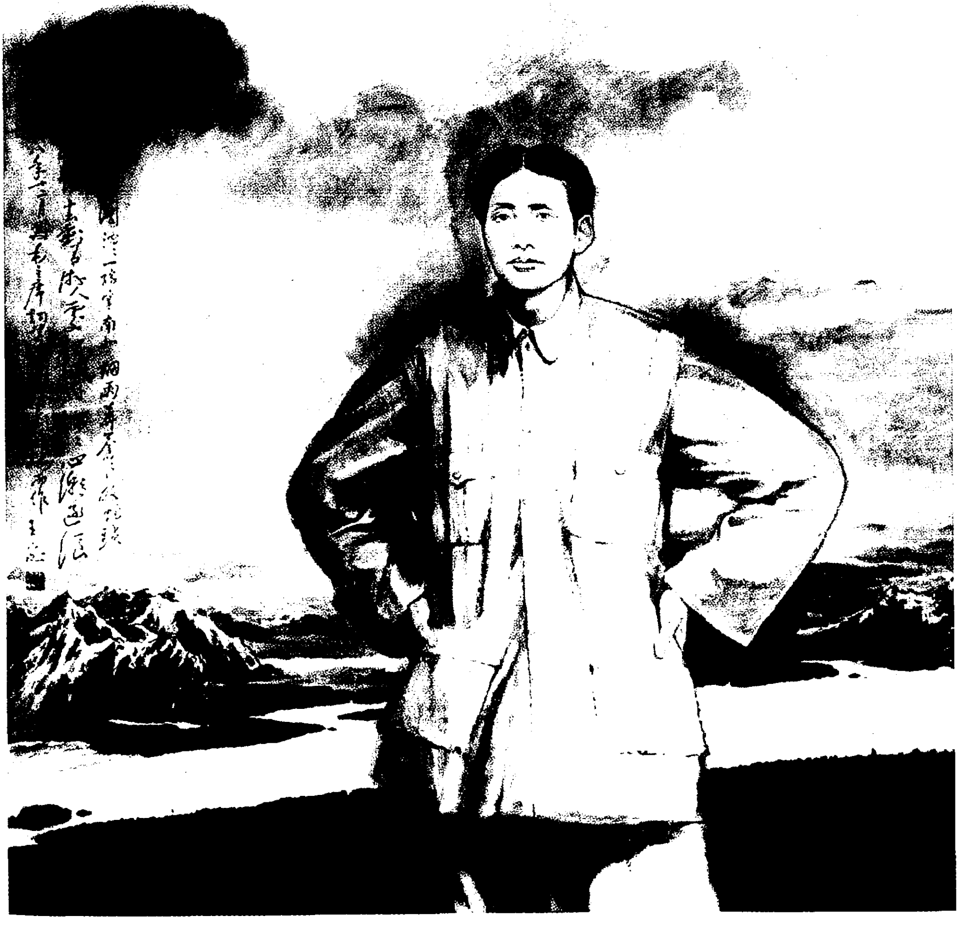
[1] 把酒酹滔滔，酹是古代用酒浇在地上祭奠鬼神或对自然界事物设誓的一种习俗。这里是对滔滔的长江表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2] 心潮，作者自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8月8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茫〻九派流中国沉〻一线穿
南北烟雨莽苍〻龟蛇锁
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
处把酒酹滔〻心潮逐浪
高　调寄菩萨蛮黄鹤
楼　一九二七

毛泽东手书《菩萨蛮·黄鹤楼》。



《心潮逐浪高》（诗意画）

农运策略*

（1927年6月1日）

各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

兹将政治局（六月一日）第□次会议通过之农民运动策略大纲通告如下：

务必迅速令农民部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国民政府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

一、最近的时期中，贫农与地主间发生空前的急剧的冲突，革命的农民运动突然地发展。因此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便爆发了，这是革命的当然的现象，并非所谓“过火”。但是，更加剧烈的冲突之继续发展，则对于全国革命的形势与暂时的联合战线的关系，实在含着很大的危险。本党应当预察这种危险而给农民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二、现时国民革命军的军官，还是革命军队中的重要核心。但是，同时他们皆是地主阶级出身，大多数自己是小地主。贫农力争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打击了军官的利益，因此，军官的政治态度便要改变。如今还没有靠得住的军官，也没有阶级觉悟的军队。如果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完全离开革命，那就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

三、各级党部应当迅速执行第五次大会的农民政纲——就是不

没收军官家属的土地同财产。这种策略现时非常得必要。但是并不是说：这种策略便可以完全在政治上取得地主同情的军官，使与工农结合永远的同盟。——一切私有地产者的阶级关系，是很确定的。这样的策略仅只是延宕与革命军官剧烈冲突的时间，求得整顿工农运动的组织力量之可能。我们运用这种策略，可以得到充足的时间，来组织革命的工农群众的武装，而且我们的影响，应该深入军队之中，一方面是逐渐改良军官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提高军队的阶级觉悟，使反革命者难于利用兵士来做反工农的工具。

四、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小地主之间甚至自耕农及半自耕农之间，虽可寻出界限，然而他们的经济，都建筑在私有制度之上。所以不正确的政策，真可以使自耕农的群众，都落于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之下（如平均田地甚至于平均佃权，以及均分财产，强迫捣毁祖宗牌，没收兵士邮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当的政策）。

均分田地的口号，现在尚不能提出（至于均分财产，则根本上不应当宣传）。均分田地，非先给土地国有不可。各级党部应当对于农民协会的指导者，详细解释均分田地口号之危险。这一口号可驱使小地主甚至于富裕的佃农，都站到地主方面去。

五、农民协会的基础，应当从无地的农民移转到大多数的佃农、自耕农。同时对于无地农民的迫切要求，应当有具体暂时解决的办法。至于根本政策如屯垦荒地，亦应当急速公布。“无田地者应当得到田地”这一口号，是应当提出的，同时，要对于无地的农民解释：以国家财力实行屯垦政策来解决无地贫农的问题，以及实行均分田地，都要革命完成之后，方能实现。无地的贫农，实在是革命的先锋，现时他们应当加入革命的武装势力以至于直接到革命军队之中去。

六、关于土地的斗争，应当有极明显的政纲，——就是没收大地主。不论国民政府的态度怎样，没收大地主的田地，是要实行的。这一要求的实现，不能单靠国民政府的命令，还要农民自己的力量。但是，为着策略上的原因，对于大地主田地之没收，应当等到本党对于中小地主的态度完全解释，乡村自治政权，已经开始建立，然后才能实行。没收大地主田地是农民运动现时的职任，要在最近□期间开始执行。

七、最近几月以来，革命的农民运动之发展过程里，发现许多无组织的行动。这些行动如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均分财物、普通的罚款、禁止米出境……往往殃及小地主。此等无组织的行动，自然要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对，使他们联合着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实行反对革命的行动。甚至于农民协会之内也发生纷扰，一部分私有田地的农民自己与农民协会相冲突。有些地方还实行禁烟、禁酒等“道德运动”，于是亦用强迫手段，如铲除烟叶等的办法。至于一般“平产”式的没收财物，罚款式的写捐，更使农民自己相斗，使小商人亦起反感，至于怠工罢业，因而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地主豪绅之金融经济的封锁政策反而容易领导小资产阶级，同向农民协会攻击，——因为农村之中的经济日益停滞，以至于牵及国民政府领域内之一般经济□商业生活。这种无组织的斗争方法，都带着中国原始的贫民暴动之性质，一概都要努力避免而□与以正确的指导。

八、然而那些无组织的行动，客观上是革命初起时之风暴时期的必然现象，这些现象表现土豪劣绅威权与政治力量堕落而动摇。实际上正需要直接建立农民政权，由风暴时期进于巩固革命胜利——农民政权的时期。国民政府对于乡村自治的政策，过于迟缓地实行，

而对于肃清土豪劣绅的封建政权至今没有决心。因此我们的党应当执行下列的职任：

须以农民群众为骨干，联合农村中一般被压迫的人民，彻底地推翻豪绅的封建政权之势力而建立乡村自治，进行没收反革命及大地主的田地，满足贫农目前的要求，并使农民在各地的斗争，与国民政府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总斗争相联结，替国民政府建筑更深的社会基础。总之现在主要的职任是以农民为领导建立乡村自治的革命的农民政权，用一切可能的适当的方法，以政府的形式继续反土豪乡绅大地主之斗争。

这种新的农民运动之策略，其意义是：注重农民政权的斗争，这是实行土地革命，所最必要的，并使国民革命军之军官与中小地主中立；亦就是要推动左派国民党，使他们和我们共同赞助农民自己进行没收大地主田地的初步土地革命。

这种策略，并非降低农民运动的，而是对于农民运动，更加加以觉悟的无产阶级正确指导，引导农民作更进一步巩固革命胜利之斗争。

九、所以目前农民运动的根本任务及我们党指导农民运动的任务如下：

（1）农民协会，不但要团结无地的农民，而且要凡是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都要团结，以建立革命的联盟。而且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学教师等，都应在联盟之内。

（2）按照农政部所颁布的条例，以及本党所决定的方针，进行乡村自治的运动，组织革命的农民政权。

（3）解除土豪乡绅的武装，使农民夺取其武装，组织并巩固农民的武装势力（农民自卫军）的队员，应以农民协会会员充当。当

乡村自治政权稳固后，农民自卫军当为唯一的乡村中政府军队（或将称为保安队），以□征兵的制度，使个个革命农民受着武装训练。

（4）进行改革土地制度的预备工作，调查大地主的限度，搜集必需的材料。引进国民党党部及其群众参加土地制度改革的运动。在农民群众及一般民众中解释宣传这个问题。

（5）指导改良贫农生活状况的斗争。更加注意减轻佃农剥削之斗争。实行减少捐税的运动，宣传并要求统一的累进农业税之实行。研究改良雇农生活的办法，实行建设消费借贷生产的合作社。

（6）引进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参加指导的工作。真正农民不但要多多参加乡区农民协会的机关，而且要参加县省农民协会的执行委员会。农民协会的机关中，应多量增加耕种田地的贫农，使他们成为协会之中心。

十、农民协会现时最危险的病象，便是本党在许多时机中，欠缺党的指导。

各级党部对于各地斗争的形势，农民协会组织的成分、农协机关的成分，都缺乏精确的考察；对于各阶级农民的趋向，亦没有明晰的观察；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的数目、武装农民的数目，亦不能够详细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正确的整理材料。

十一、农民协会内部的情形，亦是不大好，省县乡区的各级协会之间，尚未发生密切的关系。有些指导农民运动的负责人员，往往惯于虚报农民组织的数目，夸大农民斗争的事实，——这简直难于有正确的实际的指导，而且妨碍政治方针之确定。农民运动之指导机关里，缺少真正农民和非同志的参加，这是很大的缺点。省县农民协会指导员的成分里往往只有不知乡村情形之知识分子。

十二、因此我们党对于农民运动之组织上的责任是：（1）必须

检查农民协会机关之成分，而且要开设非党员的及真正农民的训练班，以求一般农民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工作，使党的指导深入乡村群众，各省农民协会应当积极注意实行这件事。

（2）引进革命的国民党员参加农民运动的工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如果国民党不参加农民协会运动，那么非但国民党脱离了农民协会，而且城市中小资产阶级也会跟着脱离农民运动的同盟。因此，同时必须发展国民党组织于农民之中。扩大并强固国民党左派在农村之基础。

（3）必须努力整顿共产党党团的工作，农民协会中之党团与团部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达到密切的关系。各级党部机关应时常注意讨论农民运动，尤其是省县党部之农民部与各级农民协会中的党团。如此，方能准备正确的指导。尤其主要的，是要努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于农民之中，并且必须强固党的支部工作。党对于群众的指导必须切实建立，——要争取向来在旧式秘密结社（如哥老会、青红帮等）指导之下的群众。

各级党部尤其是湘鄂赣，接到这一个大纲，必须加以详细的研究，迅速规定具体办法，来执行这一新的策略，并且将运用此策略于各该地的具体的情形的计划，即报告中央至要至要。

中央常务委员会　安中原
中央农民部　宗容民

全国农协电请解决长沙事件*

（1927年6月3日）

（衔略）均鉴：

许克祥借口湖南农工运动过火，于上月马日在长沙围攻工会农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之武装，屠杀革命同志，解散省党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搜查教育机关，封闭长沙师范，驱逐查抄湖南省政府建设厅长、教育厅长，劫夺汉口民食维持会米款七万元，并仿蒋逆介石举动，组织所谓救党临时特别委员会，以破坏各级党部农工运动。过火与否？与党部、学校究有何项连带关系？建设厅长与教育厅长，岂亦为所谓暴徒？而须遭其放逐、抄查。汉口民食维持会米款之劫夺，湘鄂交通之阻碍，尤为扰乱北伐后防。此等举动，即谓出于误会，而其破坏革命纪律，违抗军令及政府，则已昭然若揭！其结果不仅工农备受其摧残，中央威信亦为之扫地！省政府更在胁迫之下，形同解散，是完全反革命之行动也。初期民众运动，犹未经训练之新兵，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原为革命同志共晓；革命军人，决不能因此而离开工农，更无论借口而加以压迫。即有意见，亦当绝对尊重党纪军纪，呈请政府办理。农工为革命之主力军，国民革命之目的，即在解除农工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之痛苦。是以本党从前有禁止武装袭击农民之决议，最近更有保护工人纠察队之命。许克祥何得故违法令，举兵袭击工

农，解散工农纠察队，一如蒋介石在沪宁之所为乎？至工农运动中，发现幼稚行动，原为政治指导尚未完全强固之民众原始现象。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全国农民协会，对之早已拟定具体办法，明令执行。湘省农协，亦正在开始纠正。如代武汉前敌军民采购米粮，并助各军招募新兵等事实，均为万目所共睹。何图许克祥不守党部政府办法，擅用武力，横施摧残，解散党部，实行政变，显系目无政府，扰乱北伐后方，破坏总理农工政策；响应蒋夏诸逆，欲由湖南发动，推翻武汉革命根据地。事变以后，中央特派专员赴湘查办，复被许克祥拒绝。唐总指挥敬电指示解决方法，极为得当，亦抗不遵行。近更愈演愈烈，派兵袭击湘潭、常德等处□□□屠杀，是许克祥不仅为三湘工农之凶手，更已成全体武装同志之罪人，全国民众之公敌。曩者国民政府，尚未明令讨伐，原期其幡然悔悟，勒马悬崖。今彼竟公然拒绝调查，违抗唐总指挥命令，倘若再予姑容，则彼或将误认为政府默许其行动，而日益凶横，愈难制止。若然者，不惟湖南革命势力将被其消灭净尽，各地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亦将继之而起，使北伐之进展，及整个革命前途，均受极严重之打击。敝会为防止反动势焰之高涨，保护国民革命之胜利计，谨率全国一千万有组织之农民，恳请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予免职查办。倘许克祥犹复不知修改，则请明令讨伐，肃清乱源，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全国农民协会江（三日）叩。

长沙湖南省政府勋鉴：

奉读卅电，骇异万分！民众运动之初期，犹未经训练之新兵，幼稚行动，万难完全免去，原为革命同志所共晓，革命军人决不能因噎废食，抛弃民众，甚或借口压迫。即有意见，亦应尊重党纪军

纪，呈请政府处理。此贵省政府唐主席之正当主张，民众与军人均应恪遵。事实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以及敝会，对于匡救民众运动初期之原始现象，均已厘定具体办法，明令执行。湘省农协，亦正在开始纠正。如代武汉前敌军民采购米粮，并助各军招募新兵等事实，均为万目所共睹。许克祥借口以谋叛，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解散省党部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封闭长沙师范，蹂躏教育机关，驱逐查抄省政府建设厅长、教育厅长，擅自组织所谓救党临时特别委员会等反革命事迹，昭昭在人耳目，万难以巧辞掩饰。然长沙一隅，既为许克祥所盘踞，中央特别委员会，犹被阻止；唐总指挥电令，犹被窜改；省政府委员家属，犹被抄查。此等暴行，试问于农运何涉？卅电当系许克祥滥用政府名义所发，出言背谬，无怪其然！惟许克祥已为党部政府民众之公敌，敝会业已电请政府免职查办，贵省政府诸委员，虽不幸被其劫持，并宜设法自拔，除此元凶，以救党国。谨贡忠言，幸采纳焉。全国农民协会江印。

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

（1927年6月6日）

各省委鉴：

六月一日政治局通过的国民政府对农民运动之策略大纲，已由农字第五号通告，通告各省委员会及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此种策略关系农民运动前途，亦即整个革命运动之前途异常重大，尤其对于湘鄂赣各省农民部必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切实执行。毋得息忽！此策略大纲所指出之最主要者为农民政策建立之运动，然分析要点有三：（一）土地革命之开始，如没收大地主及土豪劣绅之田产等，并非过火，仅为现时革命阶段之策略起见，指明不没抄小地主及革命军官之重大意义。（二）指明均分田地甚至财产，则确为对于现在之不正当的政策。（三）指明其他政策，虽有本系正当的，然因本党指导力之弱及农协执委成分之缺少农民，致会永久以无组织的行动出之。此等无组织行动，固为革命初期所难免或且必需，然长此以往未能及时加以组织指导，使已得之革命胜利得以巩固，而进展于新的时期，则其流弊甚大，此等无组织之行动，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

（一）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使他们联合农村中较为富裕的分子，都在大地主政治影响之下，实行反对革命运动。现

时，农协本身必须使此种行动不殃及小地主及革命军官。至于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现时不但不能停止，而且正在他们反攻时期，必须更加坚决地进行。但是，在现在政局之下，必须在每次斗争中，设法尽量地搜集此等土豪劣绅之罪状及证据，不得再用原始的方法，此等真凭实据，即可交给政府机关办理的工具，宜切实注意。

（二）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运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以后亦当绝对停止。关于阻谷问题，农协需精密计算乡村之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或多量供给军用。农协捐款，除巨绅土豪之罚款外，其他均须指定用途。例如协作社之建设，本应与捐主以某种权利，似此方能收充裕经费，联合小商之实效。否则农协在本乡的写捐，往往使小商人恐惧怨恨而实际并未收得此款。此等行动宜立即纠正。反正收不着的，宜立即公布取消。至于农协向外来采办货物之商人捐款，则亦非办法，——农协应有组织地规定适当的物价，勿使奸商垄断而剥削农民，却决不可过于恐吓外来商人，使农村经济与城市商业断绝关系。关于不必禁止谷米出境，亦是同样的情形和理由。

（三）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农协并非共产党，实际上是农民政权之雏形，对于宗教尚且必须以信仰自由为原则，而由国共两党党部去耐心解释宣传。可以没收庙产，而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至于宗法迷信尚深的农村中，甚至于反对这些陈腐东西，都必须以谨慎出之。

关于组织问题，各级农民协会，均须尽可能地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尽可能地实行改选，一方面必须使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尽量参加各级农协之执行委员会。整个农民协会必须以耕田的佃、雇、自耕农等贫苦农民为中心，而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各级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学教师等，建立革命联盟。此种改选运动（代表大会）应以巩固农协、实行新政策为号召，一方面可以略举无组织行动之各该地的具体事实加以匡正（通过相当的议决案），别方面关于乡村自治运动之要求，应极热烈地宣传，由各区、各乡农协向政府请愿。再则对于没收大地主反革命派亦须对一般人宣传，各级农协应标明不没收小地主，使农民群众及其他阶级皆能了然。最后，此种改选运动中，尤须注意揭露豪绅反攻之凶恶于全社会，议定抵御、镇压之具体实行方法。此种各级区、乡、县以至省的农协代表大会，如因剧烈之武装斗争而难于开会时，则现有农协委员会，必须举行上书数事。组织确不健全者，必须改组。

各级农民协会，对全国农民协会必须发生亲密的关系。全国农民协会已发布之临字第一号训令，及将发布的第二号训令，各级农民协会，尤其是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必须通电拥护，一方面表示各级农民协会已有实行新策略之决心，他方面亦可以提高全国农民协会之政治地位。

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所以，各级农民部务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严

厉执行，至要！至要！

安中原
宗容明
一九二七年六月六日

全国农协请颁布乡村自治条例*

（1927年6月7日）

一　致国民政府农政部函

敬启者：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故须依赖大多数农工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曩者粤湘赣鄂诸省农民，接受本党之政策决议，纷纷起而响应国民革命军，以促吴孙诸逆之崩溃。其目的即在推翻数千年来乡村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解除本身之痛苦，亦即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乡村之经济基础。与军阀统治之政治基础，赖农民之努力，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虽未完全推翻，然其基础，则已大形摇动。土豪劣绅为维持其统治起见，乃不惜滥用暴力，屠杀农民，造谣挑拨，以谋反噬，于是农村争斗，愈演愈烈！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而无确定之政府设施与保障，任其孤军奋斗，幼稚行动遂难全免，乃间有妨害商人营业，殃及军官家属，均分田地，禁阻米谷之事实发生。加以土豪劣绅，借名滋事，捏词诬陷，益使乡村呈出无政府状态，农民虽欲建立乡村政权，但因未得党及政府及时之扶助，未克如愿以偿。即有少数地域已能建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革命秩序，亦不能使其长久保存，更无论于日益发展。夫以农民群众初得自动地管理地方事务而绝无政府方面之实力保护，豪

绅奸蠹日夜反攻，大则屠杀，小则破坏秩序，今已遍于各乡各县，则无政府状态之持续，实为莫大之危象。中央有见及此，曾一再发出训令，以图救正。钧部第一号布告，更指出具体办法，谓将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以建立一般革命人民之政权，而保护农民利益。全国农民均延颈举踵，盼其实现，如大旱之望云霓。盖县、区、乡自治政府不建立，即无以镇压反动封建势力，无以扶助农民之斗争，而予以有组织、有系统之指挥。至于农民之幼稚行动及乡村之无政府状态，亦无以匡正，纵有良好决议，终无实现之可能也。本会为消灭乡村政府状态，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之新形式，确定民权主义之基础起见，除请中央及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外，理合备文函达。钧部职司农政，务盼迅予根据本党扶助农民之政策及民权主义，拟具乡村自治条例，提出国民政府颁布施行，实为公便。此致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谭。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二　致中央党部函

敬启者：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故须依赖大多数农工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曩者粤湘赣鄂诸省农民，接受本党之政策决议，纷纷起而响应国民革命军，以促吴孙诸逆之崩溃，其目的在推翻数千年来乡村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解除本身之痛苦，亦即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乡村之经济基础，军阀统治之政治基础，赖农民之努力，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虽未完全推翻，然其基础，则已大形摇动，土豪劣绅为维持其统治起见，乃不惜滥用暴力，屠杀农民，造

谣挑拨，以谋反噬，于是农村争斗，愈演愈烈！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而无确定之政府设施与保障，任其孤军奋斗，幼稚行动，遂难全免，乃间有妨害商人营业，殃及军官家属，均分田地，禁阻米谷之事实发生，加以土豪劣绅借名滋事，捏辞诬陷，益使乡村呈出无政府状态，农民虽欲建立乡村政权，但因未得党及政府及时之扶助，未克如愿以偿，即有少数地域已能建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革命秩序，亦不能使其长久保存，更无论于日益发展，夫以农民群众初得自动地管理地方事务，而绝无政府方面之实力保护，豪绅奸蠹日夜反攻，大则屠杀，小则破坏秩序，今已遍于各乡各县，则无政府状态之持续，实为莫大之危象。中央有见及此，曾一再发出训令，以图救正，农政部第一号布告，更指出具体办法，谓将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以建立一般革命人民之政权，而保护农民利益，全国农民，均延颈举踵，盼其实现，如大旱之望云霓，盖县区乡自治政府不建立，即无以镇压反动封建势力，无以扶助农民之斗争，而予以有组织有系统之指挥，至于农民之幼稚行动及乡村无政府之状态，亦无以匡正，纵有良好决议，终无实现之可能也，本会为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之新形式，确定民权主义之基础起见，谨恳钧会，令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以慰全国人民喁喁之声，此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三　呈国民政府文

为呈请事。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之统治，以建立民主政权，故须依赖大多数农工之参加，然后可以决

胜。曩者粤湘赣鄂诸省农民，接受本党之政策决议，纷纷起而响应国民革命军，以促吴孙诸逆之崩溃，其目的即在推翻数千年来乡村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解除本身之痛苦，亦即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乡村之经济基础。与军阀统治之政治基础，赖农民之努力，土豪劣绅反动封建势力之政权，虽未完全推翻，然其基础，则已大形摇动，土豪劣绅为维持其统治起见，乃不惜滥用暴力，屠杀农民造谣挑拨，以谋反噬，于是农村争斗，愈演愈烈！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而无确定之政府设施与保障，任其孤军奋斗，幼稚行动，遂难全免，乃间有妨害商人营业，殃及军官家属，均分田地，禁阻米谷之事实发生。加以土豪劣绅，借名滋事，捏辞诬陷，益使乡村呈出无政府状态，农民虽欲建立乡村政权，但因未得党及政府及时之扶助，未免如愿以偿，即有少数地域已能建立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之革命秩序，亦不能使其长久保存，更无论于日益发展，夫以农民群众初得自动地管理地方事务而绝无政府方面之实力保护，豪绅奸蠹日夜反攻，大则屠杀，小则破坏秩序，今已遍于各乡各县，则无政府状态之持续，实为莫大之危象，中央有见及此，曾一再发出训令，以图救正，农政部第一号布告，更指出具体办法。谓将督促所属，于最短期间建立县区乡自治政府。以建立一般革命人民之政权，而保护农民利益，全国农民，均延颈举踵，盼其实现，如大旱之望云霓，盖县区乡自治政府不建立，即无以镇压反动封建势力，无以扶助农民之斗争，而予以有组织有系统之指挥，至于农民之幼稚行动及乡村之无政府状态，亦无以匡正，纵有良好决议，终无实现之可能也，本会为消灭乡村政府状态，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之新形势确定民权主义之基础起见，谨恳钧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俾农民有所遵循，努力建立县区乡自政权，以慰全国人民喁

喁之望，是否有当，仍请训示指导，谨呈国民政府。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全国农民协会之重要训令*

（1927年6月7日）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最近许克祥在长沙谋乱，亦以农工运动过火为号召。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火与否之问题；但一方面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亦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是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始能适应新环境，已由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中明白指出。现为使此新时期之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立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做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地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

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为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业品，虽为商人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亦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济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地扶助商业之发展，以妨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期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亦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

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加紧宣传工作，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反动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农民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及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须真实将农运详细情形，尽量发表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彻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本会所示途径，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绳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亦须报告上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全国农协最近训令

（1927年6月13日）

为令遵事。农运过去因发展过速，组织上未所健全，加以土劣猛力反攻，遂使农村斗争日趋急剧，上级机关之指导偶有不周即不免发生无组织之行动。已经本会明令各级农协极力纠正，务使各地农民俱在农协指挥之下，有组织有计划地继续与一切土劣反封势力斗争，以尽我农民在革命过程中推翻帝剥削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及军阀统治的政治基础之职责，并指出各地农民目前的斗争目标应为建立乡村自治而奋斗。现据各方报告，在湘赣鄂三省中土劣进攻非常猛烈，党员农民工人牺牲者不下一万数千人，其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感情之毒计，亦正积极进行，往往捏造事实，指鹿为马，故甚其辞，希冀军人向民众团体发生剧烈之冲突，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于以推翻党国，虽人民痛苦亡国灭种亦所不惜，同时贪污起而与土劣互相响应，共同捏词诬蔑农民，以图离间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如贡冈农协本无铲挖烟苗事项，而贪污竟蒙呈中央予以解散即其著例，现在国府军事委员会因已明悉帝阀贪污土劣买办洋奴以及一切反动派乘我军北伐与奉军战斗剧烈之际向国府联合进攻之毒计，而训令全体武装同志，对于指鹿为马，过甚其词之传言，谨为审查勿堕反动派之阴谋。然日来各城土劣勾结土匪溃军屠杀农民事实仍有愈演愈烈之势。贪污离间政府与人民之阴

谋亦后层出不穷。各机关近来接及诬控农民之状纸每日不下数起，在此种情形下，各级农会极应一改请求国府（一）明令保护工人组织及工纠队农民自卫军并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方之反动派，使工会农会CP等革命组织享有完全自由团结革命势力，实行讨伐蒋。（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劣，严惩造谣离间的蒋介石奸细及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仇鳌、彭国钧、萧羽昆，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湘省政府省党部省工会省农协及一切被摧残之革命团体，接收湖南请愿团之请愿，并令湘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从速镇压湖南之反革命派。（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CP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农协之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以反抗土劣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之挑拨离间。因为土劣之气焰不灭，则创设乡村自治建立民主政权终属不可能之事，经济上之建设更无从可以实现，而国民政府之基础亦未由巩固也。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委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　沉
六月十三日

农运策略的说明*

（1927年6月14日）

各省委特委临委鉴：

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了以农村革命为中心的新阶段。我们同志尤其是农运负责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各方面必须有深切的了解与明确的认识，并须根据第五次大会之土地问题决议案，而具体地运用，然后可以使党切实领导农民运动，以推进革命势力的进展。因此，各同志对于这个通告务须特别注意，并且切实执行。上次农字第五号通告，是关于国民政府治下农运之新策略的政治局议决案，然而各地都应注意参考，这是湘鄂农运的经验。本次通告则为一般全国农运策略之说明，仍是根据部议决案的原则。

一　政权问题

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自然是土地革命。但是，土地革命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现在阶段主要特点是农民政权之争斗。（一）自耕贫农众多而尚受新旧军阀压迫的地方，非有建立农民之革命民权的目标，不能使此等贫农形成斗争中的领导者，而联合一般人民去开始反对军阀豪绅的运动，亦不能使他们真正明了革命战争（北伐、东伐或西伐）的目的和意义。此种政权的斗争方能促起土地问

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二）新旧军阀之下佃农及失业民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广东）亦须立此目标以指挥暴动，虽然此处的主要特点仿佛已经是没收大地主，其实没有争政权的目标，单纯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够的，此等地方的主要口号是为土地而争政权。（三）国民政府之下，农民事实上取得政权的县及区乡，曾经有许多地方（至今还保存着几县呢）。可是，以前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任令农会孤军独战，现在的新政策是事实上帮助农军反抗。如今豪绅的反攻在湖南、湖北、江西都演成剧烈的危机，农民已得之胜利（事实上的民权）几乎全被摧残。此时农民政权之斗争，所以更加要加紧，要对于豪绅的进攻，组织极坚决猛烈的反攻，在这斗争过程中，便要开始没收大地主，就是要以行动去领导小资产阶级左派。面对他们让步（见上两次通告）；别方面就挟持他们去共同反对劣绅土豪，自然必须以建立民权为目标，第一，农民群众有势力的地方，立即成立自治筹备处，吸引小资产阶级参加，标明劣绅、大地主、反革命（已被没收者）外，一切小地主享有公民权、选举权；第二，农民群众势力尚小的地方，亦宜以此政权斗争为目标。而实行武装斗争时，便是为乡村自治而战，为镇压乡村反自治者而没收其土地。各级农协，应群起要求政府颁布自治条件。第三，农政部与农协发生亲密关系，双方互相响应农政部从上而下的帮助农协之政权斗争，农协自下而上的拥护农政部之政策通电，控诉豪绅、请愿、派代表等运动，都可以增加这农政部的威信。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政权问题之决议案

我们知道，农民运动中，贫农是最革命的，中农也来参加革命了，其结果引起其他一般被压迫的民众，都积极起来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政权。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应当是这个政权中的领导者，否则农民政权不能巩固。贫农领导的政权，应当指导、吸引一般反抗土豪劣绅之地主封建势力的分子，代表农民及其他乡村一般被压迫的民众的利益，特别是贫农利益的，向土豪、劣绅、地主、封建势力给以严厉的镇压。同时乡村农民运动及农民政权，必须在城市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赞助并巩固革命的国民政府。

封建地主阶级乃几千年来压迫剥削农民最利害的一个阶级。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政权，则农民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从做起。所以，农民运动的初期，必须领导农民用种种革命手段，实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权利。标明为民权的政治而斗争的目标，必造成很紧张的革命空气。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是十分必要的。一般人对于农民运动认为过火的批评，实际就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上面，企图消灭农村的斗争。我们必须严厉地加以纠正了，非如此不能根本摇动乡村封建政治，使一切斗争得到胜利，农民政权确实地建立起来。

农民在乡村中打击封建地主的时候，农民协会应成为乡村中唯一的权力机关，完全指挥这斗争，使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一切政治组织（如民团、保卫团、团防局等），完全消灭。在这个过程中，应即建设民主的区、乡自治制度，以保障农民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胜利。

农民不仅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参加县政治的方法是：一面使县政问题皆由县长与农民协会

及其他革命的民众的团体开会议解决；一面促县政府改为民选委员制。

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他们要求国民政府、省政府赞助农民争政权之争斗。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农民协会的政治、地位应当尽量地提高。

二　经济斗争

经济斗争之进行，在阶级分化没有明显的地方，减税运动可与富农、小地主等共同作战。在阶级已有明显分化的地方，减税运动以及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之要求，仍是各种农民作战的共同目标，就是反对高利贷，也不特为佃农之问题，应即竭力领导他们努力斗争。至于减租运动，则尤为重要，这实是没收大地主运动之第一步。在经济斗争中，更当注意青年农民的利益，但不能与巩固经济斗争脱离。对于雇农手工业者，在目前情况之下，不宜另有独立的组织，惟农协对于他们的利益，应该切实拥护。如雇农人数太多，农民经济斗争扩大，则农协内可以组织雇农部（手工业部亦是如此），但对于农村的联合战线，亦须注意巩固。因此一方面要使雇农要求得到满足；他方面为防止会内的冲突，应使雇主及一般群众了解雇农改良生活的必要。有必要时，农民协会应为小农、雇主及雇农冲突时之仲裁机关（青年雇农、牧童亦在此例）。经济斗争之进行，各地的宣传亦有不同，张作霖治下则提减租减税、没收大地主三种斗争，宜看各省农民经济状况而定。注意之点，主要是引导这种经济斗争取得到最广大的群众，而且能立刻转变到政治斗争以至军事行动。蒋介石治下亦是一样的，但是广东应当特别注意，必须

明确地以农民政权及没收大地主为暴动之标志；在湘鄂赣三省则除根据情形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尤须注意的有两件事：（一）是经济斗争在程度剧烈的地方，必须转入农民协会自己开始经营的建设事业，如借钱的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等。（二）至于减除苛捐杂税的运动，必须各地方调查实情，向政府提出具体的要求。田税的问题与土地问题应联合在一块进行，并须指出非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之趋势，至没收后之土地则须征收农业累进税。

土地问题确为不能不解决之重要问题，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不但是佃农、贫农，即失地之农民及短期之雇农亦有迫切的要求，就是苛捐杂税等等压迫之下的自耕农，也大多数感觉土地之缺乏。并且农民运动的根本目的，即为改变现在的土地制度，使耕地农有实现而进于国有，我们即使在阶级分化未明的地方，亦须宣传第五次大会之政纲，使农民及一般人民了解解决土地问题之必要与策略。土地问题应与经济斗争之发展合而为一，应使农民了解，减税、减租并不能彻底求得解决，必须进到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土地革命阶段。

对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必须使之中立。使农民得和国民党左派及一般被压迫民众结合，进攻土豪劣绅大地主。我们的党在目前必须用很大的力量进行这个工作。实际上，小地主与富农不一定是土豪劣绅，不可使他们落于土豪劣绅、大地主领导之下，因而巩固反动的政权。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地主及中等阶级一方面虽然可以反对土豪劣绅，他方面客观上也是农民的剥削者，所以，对于他们要求减租，是不没收其土地财产之交换条件。全国的减租运动都须注意这一点；并须宣传国民政府之佃农保护法，国民政府治下，则须要求此法之严格地实行。

分地运动是贫农要求解决生计问题的迫切表现，其起源则在减租减税的运动，但我们党不能放任他们自由做去。分地虽然是必不可免的阶段，但在将来革命已有新的发展，已与小资产阶级建立了巩固的联合战线时，可由没收而均分，然后再走上土地国有的道路，然后国家开办屯垦，方能解决失地农民及兵士之土地问题。至于现时的联合战线，还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真正联合战线。国民政府及其军官之中，还包含有中等地主，甚而至于大地主的少数分子也在内。现在，减租减税的运动和解决一部分贫农的生计问题（利用合作社、加入军队、兴办工程等方法）都是将来解决土地问题之准备而已。所以，客观上如果有紧迫的必要，一方面固然可以由农民协会，最好是乡村自治政府设土地委员会，设法分配若干土地与此等贫农，但只是将没收之公产、庙产、大地主荒地、官地来分配，而不是均分，别方面必不可过早地提出均分土地的口号，尤其是均分财产的口号。

阻卖问题，是乡村中荒歉成为剧烈斗争而经济破坏的时候，所必然发生的。农民协会以及将来自治机关，必须注意这种斗争，不使过于延长，随时筹算本地所需米粮，如已有多余，即需竭力流通，这不但对于保持与国民党左派及城市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如供给军米问题），而且为农村经济本身的利益亦是必要的。

三　武装问题

农民政权的斗争与土地的斗争，直接要求本党十二分注意农民武装的问题。农民协会应当集中乡村武装，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应在每个反军阀的战争中，利用各种时机，号召农民参加战斗，

夺取敌军的武装，使农民自卫军成为乡村中革命的武装。而此种夺取武装的进行，更应与本党军事策略相适应。农民运动往往开始便急转直下进于武装的冲突的，各省军部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在北方各省，则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劣绅的影响而置于我们的指导之下。成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并使有一批复一批的武装训练与补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各省军部及农民部，均须积极切实准备，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对于武装问题之决议案

（1）各省应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

（2）武器种类除枪外，应使每一个农会会员都置备鸟枪、梭镖、大刀、木棍等武器一件。

（3）对付旧有地主阶级的武装如团防、民团、保卫团等，分为三种办法：（一）使政府下令各省均限于组织农民自卫军，旧有之地主阶级武装团体须一律解散，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二）只要为政治环境所许可，能以农民力量强夺其武装的即行强夺。（三）不能实行以上两种办法的地方，则用改选其办事人方法，使在土豪劣绅手中的武器，移转与农民协会接近的绅士及其他进步分子手中。我们必须在此种移转的过程中，参加活动，在团丁中，设法施行政治宣传，使之减少为地主阶级利用敌对农民的思想并来同情于农民协会，渐次归到农民协会手中。

（4）全国农协会提出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请国民政府颁布。

（5）应使国民政府照各省农民自卫军状况，领取或廉价购买枪弹。

（6）各级农民协会应一律设置健全的农民自卫军部。

（7）中央及各省的军委（未组织军部的应即组织），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军委讨论农民自卫军问题时，应与农委开联席会。

（8）应有计划地、经常地宣传□□□□□□□□□□□装之残暴无理，农民应即建设自己的武装以保障农村革命的胜利。

四　组织问题

农民协会之组织，一开始便含有与乡村中旧政权对抗之第二政权的性质——这一层意思，应当十二分地注意。农民协会在运动始起的时候，不论是减租减税或减息，不论是武装的争斗，总之都是反对豪绅大地主的斗争——亦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固然阶级分化不甚清楚的地方，有的豪绅会联合在协会或红枪会之内，共同反抗军阀及当地巨绅。但斗争稍稍发生，小的豪绅便要反动，我们便要转到一般农民联合乡村中小商人、小学教师等而反抗豪绅大地主的阵势，一般农民之中自然是贫农和地少的自耕农，无地的佃农、雇农以及游民群众占中坚的地位。所以农协的组织，应当以贫农为中心。但是又不可以游民为唯一的基础。而应以佃农等耕种田地的贫农为其基础。经济落后的地方，小手工业及小商业并非与农业有明显的分化，那就同时要吸收这种分子到农协之中。至于中农、富农也不用排拒——斗争的过程，往往使他们自愿加入农协——只须农协机关（执委会）里巩固贫农的领导地位。应竭力引导本地真正农民参加农协机关，愈多愈好。农协会在自治政府未成立之前，他是

乡村中的第二政权，亦就是乡村中革命分子的团结，乡村政府建立之过程中，他居于领导地位。乡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后，他是政府的中坚。事实上等于指导政府的组织。共产党因国民党之党团，经过农民协会而指导乡村政府，——农民协会便成了更扩大的国民党，他在中国之政治的民权化的过程中，占着非常之重要的地位。

五　联合战线问题

乡村中之联合战线，当以贫农为中心，领导□□□□富农并吸收小商人、手工业者、小学教师、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对小地主、革命军官让步。农民协会对这些同盟者的利益亦须尽量拥护，领导他们向大地主、土豪、劣绅斗争。在北方的工作须特别注意于领导富农及知识分子（小学教师等）一同努力作反军阀的运动。在蒋介石统治之下，小商人及知识分子均有暂时被蒋介石诱惑的可能，宜尽量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斗争以暴露蒋介石欺骗民众的罪恶，以强固农民斗争的联合战线。在湘、鄂、赣三省亦须联合小商人及知识分子，使其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再须宣传土地问题之解决，不但对贫农有利，而且有利于乡村中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也只有他们和贫农联合攻击豪绅大地主，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保障他们的利益。

当富农、小地主对农村革命尚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时候，农村革命之中心势力的贫农，固不可不去推动他们，以实际的行动去领导他们，使他们一同尽力于农村革命，但要注意他们的利益，决不可以使他们站在反革命的方面去。北方各省的初期运动尤宜注意于此。

农民必须与城市工人结合密切的联合战线，具体地发生密切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互相帮助。如经常地互派代表，遇事互相报告，互相以实相助，指明工人的敌人与农民的敌人是互相勾结的。他们双方常常各造谣言离间工农，实则他们是共同剥削压迫农工的。

六　会党问题

会党（哥老会等类组织），原来是被压迫阶级起来反抗压迫的组织。他们有很严格的组织，勇敢的精神，很有对于共同奋斗的义气，但是他们的工作方法（机械的纪律）及其游民的性质，使他们往往为豪绅所利用。他们的组织，在农民之中，往往很有发展。他们久受压迫，他们因农协起来，在政治上也得到了自由，故他们对农民协会的组织的感情很好，农协应取得他们的群众，这是非常必要的。假如农协排拒他们，则他们在旧式的首领指导之下，是有被地主利用成为法西斯蒂的可能，我们对他们应该有积极的、很好的宣传与训练。同时须有具体的部分解决乡村里游民目前迫切要求的方法，以及国民革命对于他们的政纲，使他们能明了本党能代表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凡会党的行动与农协冲突时，应设法调和，纵使证实其为受人利用而反动，也应惩处其首领，不要傍及群众，以防御此被压迫之贫穷群众都无路可走更形反动。就是攻击其首领也不宜操之过急，只宜以具体事实去暴露其首领，不能彻底为农民而谋利益的罪恶。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此。不能放任他们使永久留在封建式的领袖之下，而不能放任

他们游民式的思想和政策，反而来指导农协的运动。对红枪会问题亦是如此。

七　国民党问题

从前农民对于国民党往往不愿意加入，土豪劣绅又往往利用国民党党部的组织，以打击农民。以后对于国民党由乡村到城市的党部，都应领导农民群众加入，我们党经过国民党乡村党部之党团作用去指挥农协及自治机关的工作，乡村农民的国民党党部应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基础，在政治主张及策略上，都应当从下而上地给上级党部的左派以建议而督促其实行。至于国民党部的农民部，第一，应站在党的地位给予农民运动物质经济的帮助。第二，在形式上予农民运动以指导。在农村中，宣传国民党之革命的农民政纲。国民党农民部对于农协并非统属的关系，须使农民协会的整个系统，俱将统一于全国农协之下。但如国民党欲以上级机关的态度命令农民协会则亦不宜加以直接反对，而应辨别其政策之革命与否，加以纠正或敦促农民加入国民党后应注意向其宣传国民党政策及左右派之分别，使农民的政治观念进步，这样，才不致如现在有部分地方农民反对国民党，又有许多地方农民以为国民党的名字都是革命的。

八　共产党的发展问题

第一，应在贫农中间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第二，要用党团指挥各种农民团体，对于农运工作尤须有精密的计划，例如每级农民部对于该县农运工作至少应有每半月的计划，而省委农民

部则至少应有每一月的计划，——应根据第五次大会决议案及中央之政策，加紧努力地为土地革命、农民政权而奋斗，自然应当有系统有组织地逐步筹划。

九　青年工作

CY中央最近已有具体的决定，曾经CP中央农委的审核，兹从略。

十　协作社

协作社对于中国农民运动，现时已是非常之重要。所谓协作社，不必一定照着“西洋学院”的组织，而要实现其主要的意义帮助贫农脱离重利盘剥、奸商之垄断居奇等种剥削。所以各地可以就原有的组织或农民自己的习惯而改良之，形式不必尽同，必须造成协作社的人才，研究各地农民自己的经济，从速创办协作社，以辅助农民的经济斗争。——尤其是信用合作社。

（附录）第五次大会前中央农委关于协作社之决议草案

1.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利均在工人阶级手中时，那合作社的组织可容易达到社会主义的社会。

2. 在一国城市中任何生产权力，均在资产阶级手中时，那末合

作社在经济方面可以说完全为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了，在政治方面，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它来作改良派的宣传，以愚弄小资产阶级。他们用合作社的机关为借口，说凡此便可消灭资本主义，以取消工人阶级的奋斗政策及其阶级斗争。

3. 国民革命的发展，使目前中国的近状到了介乎一、二之间的一种情形了。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末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中得以减少压迫。

在目前，中国民主革命尚未完全得着胜利保障之时，合作社之工作应该采取如下之方式：（一）利用合作社为强有力的经济武器以反抗奸商重利盘剥者的压迫。此种经济的武器可以成为改良贫农一部分生活的工具。（二）合作社应当形成一种引导农民加入农协、使其参加乡村斗争的组织形式。（三）合作社应用全力以帮助农协的发展，合作社成为一组织各种农民的形式，乡村有许多手工业者，他们本身的利益农协尚不能把他代表出来，但利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则可引导之参加农协。

4. 在组织许多大规模合作社之前，应向农民宣传合作社的意义与其重要，同时并须作提高农村文化的宣传。所以，协作社自起首组织的地方必须在那有强有力的农协组织的地方，因该地之群众有合作社之要求。换句话说，合作社是要跟着农协的发展而发展，同时须受农协之领导。

5. 在阶级的地位上，我们收集合作社的会员，应采取与农协收集会员的相同标准，如此才能抵制和操纵合作社乡村的资产阶级及

压迫者之影响。同时，合作社社员，虽然采用农协收集会员的标准，但并非只有农协会员方可入合作社，反而言之，合作社必需成为引导中农、贫农加入农协之一工具。

6．当北伐军继续向北方军阀进攻，帝国主义者向华侵掠（如英国集中实力于上海等）时，合作社只能得着政府很少的帮助。因此，合作社的经济，需自己独立，只有向乡村募集的方法。所以，在乡村各公款内，农协应当拨一部分作为合作社的基金。在目前情形之下，我们所要组织的合作社，尚一方面要费少许的经费，另一方面，是要成效很快。这种合作社，即为消费合作社。在那个有农产品输出的乡区（棉花、茶等），我们可以组织交易合作社。在目前最困难组织的为农民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合作社，需要多数的金钱、机器与较高的文化。在乡村所有的修地筑堤的农民社会事业，农协应当使之根据合作社的意义改良。在乡村手工业区，应当组织为他们购买原料，分卖出品的合作社。此最后的两种合作社的形式，可说为达到生产合作社一种最近的组织。

7．组织合作社的方法，应当在城市或省会之地建立中心的合作社，以便在较便宜的市场，购买生产品，以帮助农民。所以，工业在有二三十小合作社组织的乡区，组织一中心成为较大的合作社，省会亦然。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6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沧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 ……………………………………1
（1927年6月22日）
中央农运讲习所给各省党部函*……………………………12
（1927年6月）
考送学生章程*…………………………………………………13
（1927年6月）
中央农运讲习所招生计划 ……………………………………18
（1927年6月）
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 …………………………………21
（1927年6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25
（1927年7月4日）
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27
（1927年7月20日）
中央委员宣言 …………………………………………………33
（1927年8月1日）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40
（1927年8月7日）
湘南运动大纲 …………………………………………………45
（1927年8月）

湖南民众组织更需要武装 ……47
（1927年8月9日）
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 ……48
（1927年8月18日）
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帮助 ……49
（1927年8月18日）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50
（1927年8月19日）
湖南致中央函*……51
（1927年8月20日）
湖南常委来信*……53
（1927年8月30日）
不打长沙转兵向南 ……54
（1927年9月20日）
给杨开慧的信 ……55
（1927年9月）
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 ……56
（1927年12月18日）
西江月·秋收起义……57
（1927年）
题军旗联 ……71
（1927年）
到安源时之报告*……73
（1927年）
题遂川公审土豪劣绅大会联 ……79
（1928年1月）

为井冈山群众题春联 ……………………………………………83
（1928 年）
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84
（1928 年 5 月 2 日）
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 ……………………………………94
（1928 年 6 月 16 日）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99
（1928 年 7 月 4 日）
湘赣边界特委致湖南省委信* …………………………………102
（1928 年 8 月）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04
（1928 年 10 月 5 日）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18
（1928 年 10 月 5 日）
挽王尔琢联………………………………………………………128
（1928 年 10 月）
西江月·井冈山 …………………………………………………131
（1928 年秋）
井冈山的斗争……………………………………………………133
（1928 年 11 月 25 日）
(井冈山) 土地法 ………………………………………………172
（1928 年 12 月）
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76
（1928 年 12 月 16 日）
和何长工应对联…………………………………………………184
（1928 年）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87
（1929年1月）
共产党宣言*……191
（1929年1月）
筹款公函……194
（1929年2月13日）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196
（1929年3月16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9
（1929年3月20日）
敬告士兵群众书……204
（1929年3月27日）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205
（1929年4月5日）
四军军部命令……216
（1929年4月10日）
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218
（1929年4月13日）
（兴国县）土地法……219
（1929年4月）
农民协会章程*……222
（1929年5月）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227
（1929年6月1日）
给林彪的信……234
（1929年6月14日）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249
（1929年6月）
清平乐·蒋桂战争……252
（1929年秋）
采桑子·重阳……254
（1929年10月）
从蛟洋到达汀州后给中央的信……263
（1929年11月28日）
给李立三的信……266
（1929年11月28日）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269
（1929年12月）
告全国士兵弟兄书*……314
（1929年）
告绿林弟兄书*……319
（1929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325
（1930年1月5日）
中国红军第四军告国民党军队士兵书*……344
（1930年1月）
如梦令·元旦……351
（1930年1月）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354
（1930年2月）
土地法*……358
（1930年2月7日）

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364
（1930年2月14日）
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370
（1930年2月16日）
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373
（1930年3月18日）
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379
（1930年3月19日）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381
（1930年3月21日）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382
（1930年3月29日）
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386
（1930年3月29日）
宣传员工作纲要*……388
（1930年4月26日）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390
（1930年4月）
反对本本主义……392
（1930年5月）
寻乌调查……403
（1930年5月）

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形*

（1927年6月22日）

（一）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甲）发展的情形：湖南农运为时不久，然据本年四月份报告全省有组织的有六十三县，会员达五百余万人，农民起来者近千万人。其分布区域，以湘江流域为中心，滨湖各县及资江流域次之，因此等地带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占重要〔地位〕，湖南农民运动为准备北伐工作计，也不能不首先着眼此处，至于湘西一带，因交通不便，又长时间在军阀——袁祖铭等统治之下，所以至今还在开始的时期。（乙）发展的原因：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完全是封建军阀统治的结果，军阀政治建筑在剥削农民上面，其赖以维持政权的最大饷项，即出于田赋、盐税、杂税、厘金，这四项完全直接或间接是农民负担的。湖南农民在张敬尧、傅良佐、赵恒惕、叶开鑫等军阀统治下之惨受提征田赋、加设厘金、增加杂税等，一切层出无穷的剥削，差不多八家九家弄到家空业尽。军阀为贯彻其剥削起见，复勾结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为爪牙。厘金局、榷运局为官吏竞取之美差，六个月知事可得数万元，如此等类的事实归结为加倍农民的痛苦。至于土豪劣绅，为军阀政治的下层基础，政治上垄断乡村政权，利用团防武装实行屠杀，经济上重租重批高利借贷，农民生活乃更堕于万劫不复的地位。整个的封建势力——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层层剥削，

决定了农民只有两条出路：革命与死亡（饿死、冻死、为匪而死等）。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于农民的利益——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重租重利等曾有广大的宣传，于是湖南农民在饥饿困顿中便蹶然兴起了。（丙）农民革命中的主要力量：贫农是农民中最受痛苦、数量最大的群众，他们没有土地，生活毫无保障，简直早上不知道晚间。在封建政治下面，他们的地位又属于最卑贱，饿与死是他们不可逃的两个命运，因此他们天然富于革命性。富农中人对于革命起始是不生兴趣的，只有贫农才一开始便十分相信国民党、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对农民的宣传，毫不犹豫地赞成革命，毫不犹豫地加入农民协会。因此贫农实在是农民协会的发起人，是参加北伐的战士。换言之，贫农是湖南农民的领导者，这也就是湖南农运中的主要力量！

（二）湖南农民运动的功迹。（甲）参加北伐：湖南农民运动在革命中第一个贡献，即是领导了农民北伐，湖南农民参加北伐与省港罢工有同样的意义。省港罢工封锁香港，革命政府才有“闭门捉贼”，将陈炯明、邓本殷、杨希闵、刘镇寰等根本肃清，进而举行北伐的机会。湖南农民参加北伐，即使北伐军在极短时间通过湖南，能养精蓄锐而克复武汉。要是说省港罢工创造了北伐，那末农民运动即促成了北伐，当北伐军从衡阳下来的时候，醴陵、浏阳、平江、临湘、华容等地的农民曾以锄头、梭镖实际参加战争。组织侦探队、慰劳队、冲锋队援助北伐，因之农民阵亡者极多，至于送茶、送粥慰劳兵士更普遍全省。（乙）反抗土豪劣绅：军阀政治的下层势力建筑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及团防武装以从事封建式剥削的上面。因此不求打倒封建军阀政治则已，否则除努力为打倒军阀本身外，必须进一步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专就农

民解放而言，也必须先从其直接统治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下解放。

湖南农民对于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比任何口号都容易接受，因土豪劣绅为农民直接的统治者！湖南农民指土豪劣绅为“长牙齿”“坐长板凳的”，这都是形容土豪劣绅剥削农民血汗，垄断乡村政权的事实。尤其是农民对于此等“长牙齿”“坐长板凳的”所把持的乡村自治机关，比贪官污吏所盘踞的县政府及一切征收机关更属畏惧，更属痛恨，所以就有“打头张衙门”“铁门坎”的称呼。

湖南农民革命目前的对象仅有土豪劣绅，因主观的力量还不能与整个的封建势力作战，因此贪官污吏在湖南有些地方可以存在，他们队伍中间也没有打倒几个。至于土豪劣绅被农民打倒的，在数量上，可就比其他封建势力多了。但是实际说来，湖南农民打倒土豪劣绅也没有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闹得太凶”，统计全省为农民打倒的土豪劣绅也不过几十，倒是土豪劣绅两年未满的时间，惨杀农民实有可惊的数目矣。所以湖南农民目前只在反抗土豪劣绅，还不能算是打倒土豪劣绅。可是这种反土豪劣绅运动，也就已给湖南封建势力以不少的打击，如宁乡之刘昭、杨致泽，湘潭之晏容秋，华容之梅实，长沙之俞敕华等，均为土豪劣绅队伍中坐头一把交椅的。从这几个巨子明正典刑后，湖南的封建势力可算是挫折了锐气，这一点湖南农民在国民革命中实在建了伟大的功迹。（丙）建设了太平盛世的乡村：任你把湖南农村的骚扰现象说得如何动人，但即算是一个土豪劣绅的巨魁，在心里头或者竟致于口头上，也不能不承认目前的湖南农村，比他们这些“老爷”（湖南农民对地主的称呼）当权的时候，倒有太平气象。

满清末年起，政府即三令五申地禁鸦片，但事实上，在军阀统

治之下，禁烟局本来即是卖烟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哪怕你拿着烟枪躺在十字街头，也没有人问，被查处罚的却尽是一些小烟鬼和没有势力的，请看武汉市上的特别雅室、广州的谈话处之多，便可想见禁烟的滑稽。然而禁之二十年不但不曾禁绝，反而有长足发展的鸦片，湖南农民已起来的地方，以最短的时间，却一点一滴都禁绝了。

土豪劣绅的烟枪给农民劈尽了，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发现秘密吸食的罚款游乡，果然有许多颇有面子的绅士先生唱了几出戴高帽子的把戏，从此湖南农村谁也不敢在虎头上捉虱，再干那吞云吐雾的勾当了。

至于赌博，农村童子团挨家搜索麻雀牌及其他赌具，当场付之一炬。旧习新年，乡村照例大开赌局，喝雉呼卢闹个不休，可是现在的新年娱乐，旧有的却留下的龙灯狮子着换，新增的却有演讲会、提灯会、群众大巡行等类，著名赌痞们，也只好跟着大家丢手。

三寸金莲，在北方以至于九省通衢的武汉还不算稀奇的事，湖南的穷乡僻壤，过去本也不少，可是现在农民协会的女会员，已经穿起草鞋，跟着大众背起梭镖进城游街了。还不止此，湖南农村女子公然有些自办小工场，下田耕种的了。

乡间还有几件事，连最凶的土豪劣绅也背着在啧啧称赞的，即是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土，任何人（包括地主）的塘坝要是壅塞，农民协会即下令开挖，工程完后，即与地主交涉，照实数给工钱。乡村道路素来不注意的，可是现在差不多每一处都给修好了。羊肠小径已变成丈多宽的通衢，真算是行旅称便，地主们惯于把持荒山荒土任其荒芜，农民协会便出名租借交会员开垦。

从事这三件工程，修塘坝、筑道路、垦荒地的，尽属贫农，这

是区乡农民协会议决安插贫农的方法。乡间因没有过分失业的危险，偷盗案件也就绝迹了，人们所梦想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湖南农村是一步紧一步地向这个现象走的。

此外办教育（捐钱设夜学）、破除迷信（观音殿、财神庙变了会场，神像抬开换了孙先生遗像），已成为农村极踊跃的工作，高贵的士大夫，一味空提倡，却不如平凡的农民马上见诸实行。

总而言之，农民运动已给湖南农村一个新的气象，民主主义的新气象，振兴工业生产、改良风俗习惯、救济失业，这都是湖南农民已有成绩尚不曾稍懈的工作呵！

（三）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土地问题的解决，一切农民们急迫的要求是四个大字："土地国有"，根本推翻封建势力的经济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中的经济革命。农民是竭诚参加革命的，可是他在革命中不会忘记他的目标，倒是因革命更使他对这个目标增加了渴望。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跨过了先进的广东，因此他比其他各省更早、更明地告诉我们，他前列的战旗，即是"土地国有"，根本铲除封建势力。过去几个月农村中即流行一种口号"平均佃权"，这纯粹是贫农阶级喊出来的，这个农民式的口号的意义，即是反对垄断土地。农民协会会员中占多数的贫农分子，多主张按当地农民人数平均佃种，这个办法当然是行不通的，于是发生了"禁佃"的纠纷，这个现象完全是贫农丧失土地所致。还有个流行更为普遍的口号，在一般知识分子看来，简直是笑话，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平等"。农民口中所说的不平等条约，不是什么南京条约、辛亥条约，而是关于苛刻征取地租的"佃约"，如最流行所谓"东七佃三"及"无息押金""田鸭""田蛋""田草"，逢时逢节送"人情"（即礼物）给地主，遇地主婚丧，有做工不受工资的义务等苛例陋规。这

些在农民尤其是贫农，以为便是国民党、国民政府所宣传要废除的不平等条约，看来真是好笑！可是这其中却含有贫农要求土地的意义，因所谓不平等条约的“佃约”、苛例、陋规，贫农固受害不浅，尤其是使贫农永不能有佃田的机会，贫农丧失土地，生活陷于极困苦的地位，是其能踊跃参加革命，胜过其他农民的唯一原因。农民自定之“平均佃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即万一能够见诸实行，也完全是治标的办法，而不能将土地问题根本解决，因土地仍归为大地主所垄断，农村经济仍停滞于封建状态中，因此农民乃进一步发出所谓“平等”的呼声，即孙总理所谓“耕者有其田”，孙总理可说是预先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趋势了！

湖南农民对于土地已经有二十分的急迫，在“平粜”“阻禁”两件事上更表现得显明。西欧农民的希望是产物价格增高，然而在市场上时常是产物还不及工业品的高贵，而发生所谓“剪刀”问题。在湖南却是相反的现象，农民协会普遍地抑平谷价，阻止谷米出境，实在说来这不算稀奇，不过是一个土地关系。西欧之农民都是有土地之小农（在机械生产的农场耕种的，只能算是工人，自当别论），所以他总希望谷价增涨，湖南农民也可以说中国农民，可就不然了，农民中贫农占百分之九十，这种贫农都是丧失土地，或者有土地而不足的，他们的食谷是要从地主富农手里用重价购买的，因此对于农产物价格的态度恰与西欧农民取一种相反的形势，就是希望谷价更贱更好，根本原因是高租重利的关系。“平粜”“阻禁”的确能给其他有土地的农民以不利，对于农产流通、政府财政的妨碍也毋庸讳言。

然而这完全是一个土地问题，要解决也只有土地问题解决以后才有可能。只要每一个农民都能够有够耕种的土地，那时农民站在

小农的利益只会希望谷价增涨，决不会发生“平粜”“阻禁”，否则任你如何救济总是徒然。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对于“平粜”“阻禁”，曾有“按照当地所需食谷存仓外”“一概放行”的议决，省农民协会更三令五申实行禁止，但结果依然。因贫农嗷嗷待哺，饿肚皮使他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而存仓又事实上做不通的时候，便以群众的力量，继续维持“平粜”“阻禁”的老法子，不能给与土地，要禁止这种农民式的方法，谁也不能够的呵！中国农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所以总理说“国民革命成功在农夫工人之参加”，但是怎样使农民参加革命？给农民以所需要。农民的向背，是国民革命成功与否的标准，湖南农民运动已显示给我们，土地问题实在是国民革命议事日程中最先待解决的项目。

（四）湖南农民运动的障碍。土豪劣绅之进攻——我始终相信湖南农民目前还够不上说打倒土豪劣绅，而只能说是反抗土豪劣绅，许多人尤其是不明湖南真相的外省人，惯于一口咬定湖南农民闹得太凶，杀土豪劣绅太多了，事实告诉我们却是相反的。上面说过湖南被杀之土豪劣绅不过几十人，而农民被土豪劣绅残杀的却有可惊之数目，赵恒惕时代，以土匪为名，共杀了一万以上。除开我们有意抹杀事实，人人知道湖南农民的革命，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湖南土豪劣绅的残酷狡猾，比任何省区都厉害。湖南农民运动当前的最大障碍，即是整千整万的土豪劣绅，湖南农民与此等土豪劣绅的中间，只有一个你死我活的关系，整个的土豪劣绅的阵线，是拼命地在向湖南农民进攻呵！

他们进攻的方法，最阴狠、最残酷的，分析起来一共有六个：

（1）利用团防实行屠杀：团防局、保卫团、民团、警察所，在湖南本来露骨的是地主的镇压农民武装，在赵恒惕时代更为军阀政

治的真实基础，如宁乡大地主童氏为赵氏岳家，童氏在宁乡可以任意调遣全县团防。这种地主的武装，在军阀时代是实际的乡村政府，是统治农民的直接机关，逮捕屠杀农民简直变成这些“局长老爷”的家常便饭。只要土豪劣绅鼻子里哼一声，农民便有“进局”的危险，宁乡杨致泽办团防时，并杀四百余人，并没有罪状。刘昭办团防的时候，有一次两个乡村竞玩龙灯，刘昭唆使所住乡村的乡人与其他乡人争斗，一铁匠骂刘昭的娘，过了许久，刘昭带团兵去外查案，路遇铁匠上山进香，刘昭即喝令团兵捆缚，挖眼截舌，又割断阳物插铁匠口中，大骂：“你还骂娘吗？”牵走五里，始行枪毙。各县团防私用非刑更属普遍，农民稍不如命，即以土匪之名，实行“挂半边猪”“踩杠子”“坐快活凳”“断脚筋”“鼻熏辣椒”“倒挂”等使人战栗的刑法，因此农民不“进局”则已，否则不死也成残废。

北伐军经过湖南时，而宁乡、湘乡、安化团防预备齐集雪峰山为赵氏作最后挣扎，湖南团防在土豪劣绅指挥之下，纯为反农民运动的工具。益阳泉交镇团防局不参加区党部成立典礼，大队巡行之农民，经过团防局时，质问局长不参加理由。团防局毫不答话，即开排枪，当地立毙农民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嘉禾团防局长王泽民在团局大开赌局，被农民禁止，即枪毙农民王老四，并抄掠农民财产多家。茶陵团防局秘密将假期回乡宣传农运学生一人，以洋油、柴薪活捉烧死，尸首粉碎，丢弃灭迹。此外团防局勾结土豪劣绅以武力企图消灭农协的事实，差不多月有数起。

（2）勾结土匪：农民运动兴起，土豪劣绅所把持之乡村政权已大半倾颓，因之其所有之武装——团防局渐次失其统治的效力。许多团防局已自行解散，存者又为正绅所管理，土豪劣绅为继续进攻

农协计，便不得不舍弃团防而寻找新的武器——土匪了。安化土豪劣绅勾结土匪杀农民二百余，差不多在省农协的卷宗十件中有九件报告着，土豪劣绅聚合匪类，饮雄鸡血酒，指天发誓，打倒农协，杀尽特派员的举动，湖南农民在土豪劣绅勾结土匪这一个方法之下，的确牺牲了不少。

（3）组织反动团体：利用团防，勾结土匪，还是一时的行动，土豪劣绅进一步企图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便组织反动团体以团结势力，并以为指挥反革命的中枢。湘乡有镇乡维持会，衡阳有白化党，醴陵、浏阳有三爱党，醴陵有打狗会，所谓狗者即指农民。保产党更为湘中普遍组织，这些团体专在对付农民，凡各县惨杀农民、捣毁农协等举动，都是出自这些反革命、反农民运动的参谋部的计划。有些地方这种计划虽为民众破获，但其组织，并不曾解散，千方百计进攻农民正在一天天猛进呵！

（4）混入农协：这是一个更阴毒的进攻，在许多力量薄弱、指导者没有力量的地方，狡猾的土豪劣绅便戴着一副假面具混进了农协，从中捣乱，侦探虚实，尤其是故意提出过高的口号，做出越轨行动，以破坏省农协一贯的政策，或转害革命的农民。农民运动失却革命民众的同情，十分之九是出于这班土豪劣绅的奸细所赐。

（5）组织御用农民协会：土豪劣绅知道农民运动万难用武力阻止，继续以团防、土匪、反动团体明目张胆地进攻，只是以卵击石，惹火上身。聪明的土豪劣绅决不做这样“猪头式”的勾当，于是转而满口赞成农民运动。有一个时期，差不多每天都有几批肠肥脑满、尖口利嘴的人物到农民协会来索取简章，要求组织农民协会。他们是打着两树大旗——家族主义、地方主义，以号召家族，农民协会在各县曾不断地发现，团结一姓、反抗外人是他们的口

号。此外土豪劣绅多声称入其所号召之农协，可吃便宜食谷，或可得金钱以号召同姓或佃户，并千方百计愚哄上级机关承认其为特别区乡农协，以遂其利用窃取的阴谋，而从容置农民运动于死地。

（6）造谣中伤：湖南土豪劣绅，第一等逃往上海，第二等逃往汉口，第三等逃往长沙，这是湖南土豪劣绅在农民反抗以后的普遍行迹。他们是犯了滔天大祸，幸逃法网的罪犯，可是在逃亡中，他们还是不曾放弃他们反农民运动、反革命的工作，最大的最厉害的方法即是到处拼命造谣。这个阴谋实在比上面这些方法更来得严重，什么农运是共产公妻，兵士六个月不回家，妻子便由农协公去，某军长、师长的家财被充公，父亲被杀等无稽之谈，以挑拨革命军人与农民的感情，并使农民在革命民众面前失却深厚的同情，而陷于孤立的地位。目前在汉口，这种反宣传即极其发达。

（五）湖南农民运动的缺点及今后的方针。革命者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他只有从不断的进行中，了解他的错误，以求补救。湖南农民运动决不会有像土豪劣绅在各地反宣传那些奇怪的事实，如公妻共产之类，错误就是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就是从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中间，稍忽略了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但是这个错误的原因，革命政党，尤不能辞其咎。几千年压迫下面的农民一旦起来，他的行动自不免带种种幼稚的行动，要是革命的政党能够取得农民的领导，农民在革命的政策之下作战，定不会有这样的错误的。可是现在农民运动如飞的发展，党在事实上落了后，以湖南言，几百个农民中不能找一个农民党员，所以革命的政策决不能深入农村而为农民作战的目标。今后的我们，唯一的方法只有在农村极力发展国民党的农民，努力地取得对农民的领导，继续实行下面的六个政策：

一、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的财产。

二、保护革命军人的土地及财产。

三、保护中小地主、小商人的利益。

四、从速实现中央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

五、建设革命民主的乡村政权。

六、武装农民。

中央农运讲习所给各省党部函*

（1927年6月）

迳启者案奉中央党部决定续招第二届学生，贵省党部□□□□生□名，兹将考送学生章程奉上，即希查照办理。惟须有特别声明□□□□一招生经验届各省考送，学生有未能按照考送学生章程办理，致□□□□窒碍，及不经□之事实：如学生身体之未详细检验，入所旧病即发□□□□能上课，这回则白费川赀；学生并无农运决心，不能接受严格军事□□□□途他去，服装被帐之不带整齐，入所即感缺乏。供给为难。此皆由□□□□慎，通知未周，致办理者与考送者，皆蒙不和。此届考送学生，务□□□□个，即能训练成材，有一个作用。特此函达，即希察照见复□荷。

考送学生章程*

（1927年6月）

一、名额　（各省名额见招生计划）不能超出规定数目，学生分配，以注重交通为要，政治中心，农运需要的地域，将该省总名额分配于各县。由县党部按照本章程，考送省党部。

二、资格　学生以由各县考送，来自乡间者为最好，其资格如与下列不合者，到所时绝不收录，并不负责遣回。

甲、思想　革命观点确定，无反动思想。

乙、学历　中等学校毕业或肄业者，高小毕业常识较优者，小学教师。

丙、决心　向党部填具志愿书，决心入所后服从本所纪律，接受严格训练，毕业回到本省乡村做农民运动，无他臆想者。

丁、身体　强健耐劳，确无肺病、痔病、神经衰弱、花柳等病，及其他痼疾，在所能服严厉军操，到乡能走远路（省县党部须负责行个别严格检验）。

戊、年龄　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

己、性别　一概男生。核

三、考试　由县党部考送省党部，省党部加以复试，以定去取。考试分笔试、口试。笔试科目：国文、□□、历史常识测验（本所□□复核如认为不合格即行遣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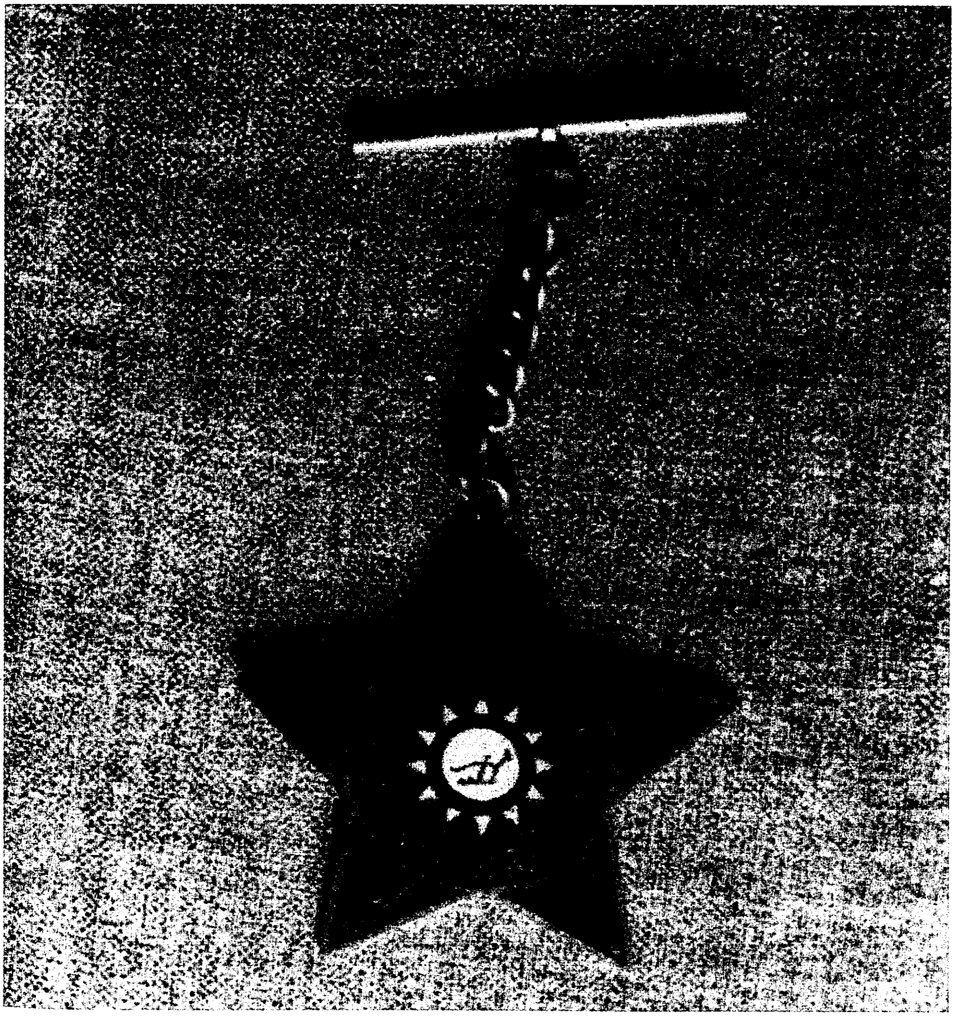
四、待遇　来往川资，由所供给，每人□□元，不收学费。制服由所供给，单制服两套。毕业后派赴乡村，担负农民运动工作。

五、学习期间　九月一日开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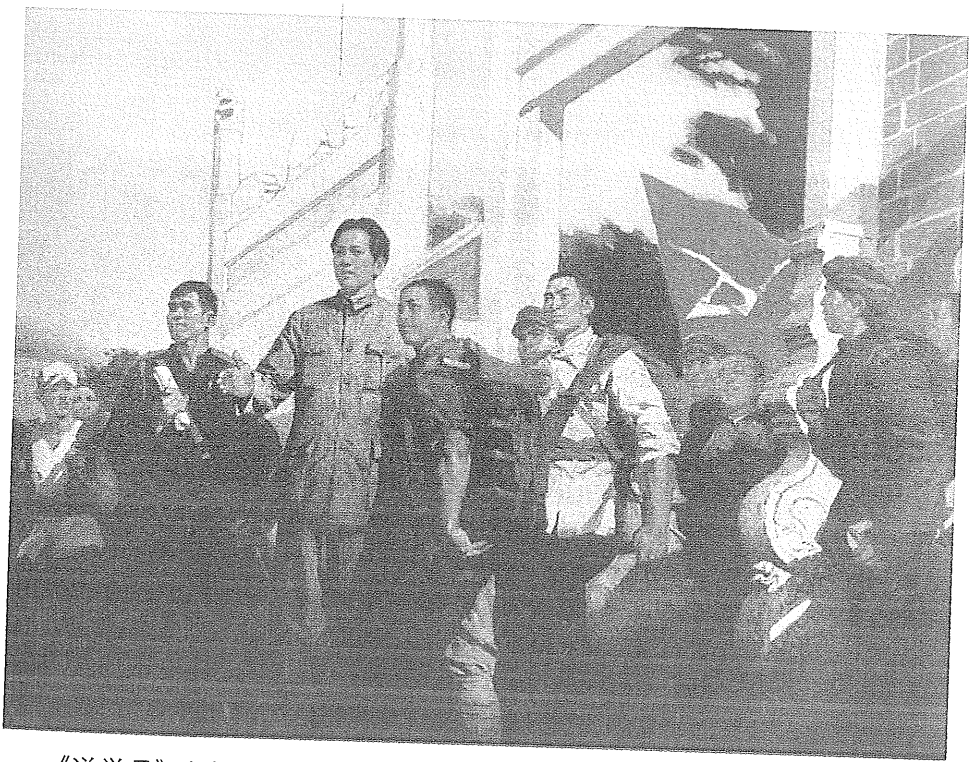
六、到所日期　限八月二十七日起到三十一日止，为到所时间，迟到早来，均不收纳。

附学生须自行携带之物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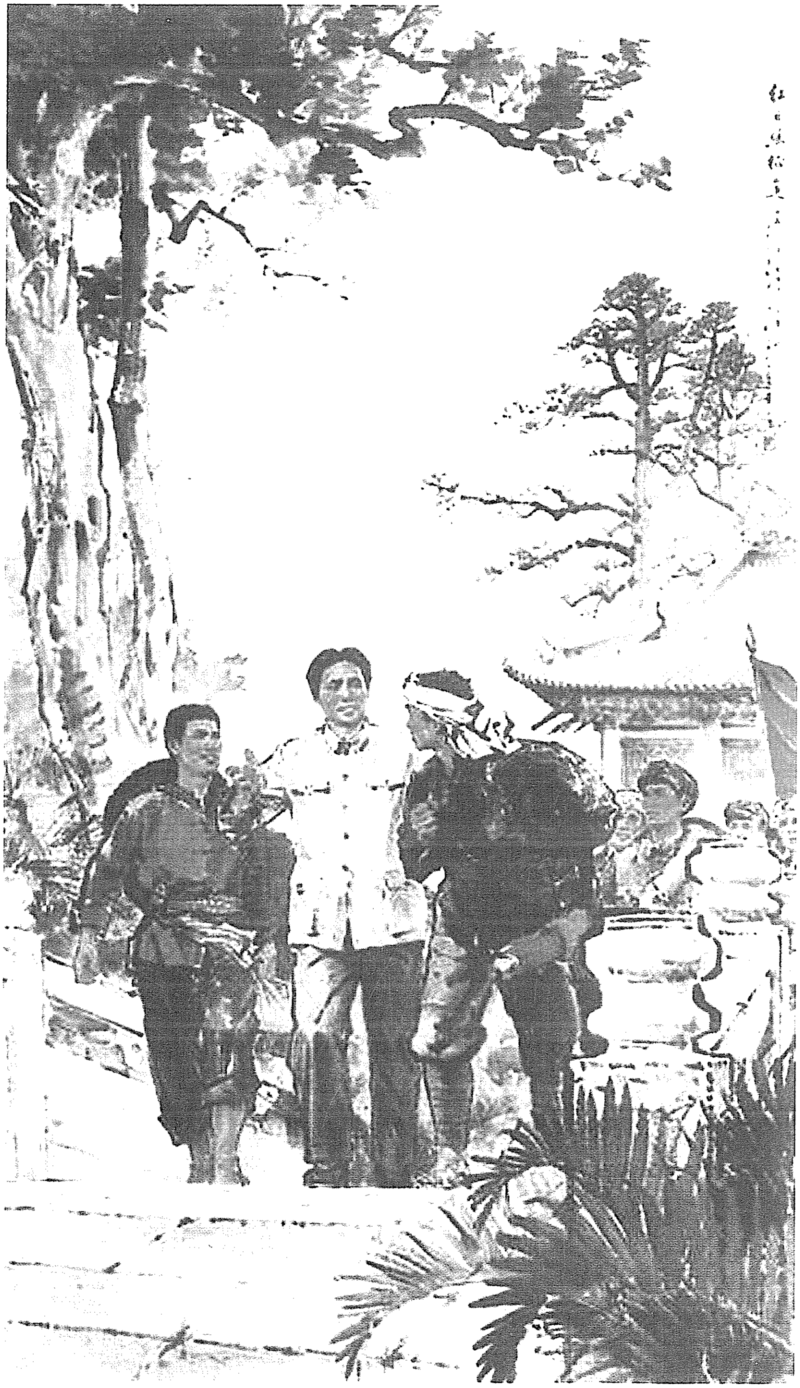
一、面盆、手巾、漱口盂、牙刷。二、短夹裤、短棉衣、棉裤、换洗里衣。三、鞋袜、皮鞋。四、棉被褥全副。五、小箱□□。六、笔墨。七、洗衣剃头零用。上列各物必须自行携带齐全，如有缺乏本所概不供给。



1927年6月18日，农讲所学员毕业，大部被委任为农民特派员，或回乡从事农民运动。图为农讲所发给学员的毕业证章。



《送学员》（油画）



《红日照征程》（中国画）

中央农运讲习所招生计划

（1927年6月）

一、学额　一共六百名，第二期学额分配，应注重北方各省尤应多招直鲁豫三省学生，湘鄂赣农运人员已有相当准备，暂不招生，其他各省，则酌量支配。

省别	学额
鲁	八十
直	八十
豫	八十
陕	五十
晋	五十
川	五十
皖	三十
苏	五十
奉	三十
热	十五
察	十
绥	十
闽	二十
浙	二十
其他	二十五

二、开学日期　定于九月一日。因第一届须六月底始能结束，结束后，须稍有休歇时间，整理一切，且北方各省招生，亦须相当时间，故须九月一日，始能开学。

三、招生办法　学生仍由各省党部依据第一期招生章程，负责考送。

四、课程训练　根据第一届所定办法办理。

五、学习期间　仍定为四月，即今年十二月底毕业。

六、班数　仍为四班，依第一届之经验，每班学生人数过多，管理训练，极形不便。故二届学生，应酌量减少，第一届每班二百人以上至二百五十人，第二届应减至一百五十人，故六百人仍为四班。

七、经费　第二届经费支出及收入，均与第一届有不相同处，即第一届经费有四万元，系湘鄂赣三省党部负担，第二届经费，须完全由中央负担，因北方各省，尚无能力分任也，又第一届学生来所，并无路费，支出回籍路费，□比较不多，第二届学生则来所回籍，均须发给路费，故路费支出，为数甚巨，来往路费共三万元，预算如下表：

省　别	每名数（元）	共计（元）
鲁	五十	四千
直	五十	四千
豫	三十	二千四百
陕	七十	三千五百
晋	六十	三千
川	八十	四千
皖	二十	六百

省　别	每名数（元）	共计（元）
苏	十四	一千二百
奉	八十	二千四百
热	七十	一千零五十
闽	四十	八百
浙	三十	六百
察	七十	七百
绥	七十	七百
其他		一百零五

经常费共六万六千元。

（说明）依第一届经验每学生一人四个月需用费一百一十元，六百人六万六千元。

以上两项，共需九万六千元，拟由七月份起，仍按第一届，向中央支领一万四千元之数，则中央每月支出之预算，仍然不变。

全国农协对于农运之新规划

（1927 年 6 月）

为令遵事：前此蒋、夏诸逆，相继叛变，均以反对农工运动为旗帜。此虽反革命派一贯之口号，而非农工运动本身真有所谓过失与否之问题。但一方因革命潮流飞涨，初期农民运动之原始现象，未能完全免除，他方面上级机关之指导能力，不能与需要相适应，确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中国农民运动，已进到一个新时期，必须采取新政策，更能顺利执行起见，再指出下列五事，务望各省农民协会，并转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照办理：

一　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

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因为发展甚速，难免有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乘机混入，以遂其破坏农民运动之企图。他们每每假借农民协会名义，做出种种妨害大多数农民利益及农民协会名誉之事实。现欲改正此种不良事件，必须多数农民积极参加各级农民协会，各乡区农民协会更当尽可能地随时召集代表大会，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发现不良分子，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并为执行新政策起见，各级农民协会，应即日召集代表大会，增选新职员，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同时使耕田的贫农、佃农、

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之坚固的社会基础。

二　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

农村中的小商人为流通金融之主要分子，并与农民同立于被压迫的地位，农民协会应即领导农民，与之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煮酒熬糖，以及其他商品，虽为商会之利益，同时亦与农村经济有关，农民协会必须予以保护。农村谷米，在乡村自治机关未成立时，应由农协计算农村需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而军米亦得充分的供给，农村中之其他重要出产品，未宜与城市商业发生良好的经济关系，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以前有些地方，因为抽捐派款及其他原因，遂使城市商业与农村之关系日益恶化。今后对于此种情形，亟宜纠正，并当有组织地扶助商业之发展，以防奸商过度之剥削。对于革命军人之家属及财产，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已明令各级农民协会指导农民，予以切实保护，此项工作，目前尤须与慰劳救护革命军人之运动，一致加紧进行。

三　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

乡间禁酒席、禁斋果香烛，反对一切迷信及宗法社会之旧习，改良乡间妇女之地位等运动，因为打破封建社会恶习之必要的行为，但必经过长时间的宣传，使一般民众俱能了解，社会文化上已提高，方可行之而无碍。倘必操切从事，则不惟得不到良好效果，及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

以破坏乡村的革命联盟。

四　开始乡村建设事业

乡村自治机关之建立，为镇压反动封建势力，巩固农民已得胜利，消灭乡村无政府状态而使农民运动适应于革命新环境之重要工作。已由本会呈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乡村自治条例，各级农民协会，应即联络乡村革命平民，努力进行，务于最短时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农民银行、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及其他建设事业，各级农民协会，亦应与其他革命平民，共事建设。

五　加紧宣传工作

农民运动一有相当发展，土豪劣绅等及封建势力，除一面集中力量，残杀农民外，一面复收买走狗，捏词诬陷，造谣煽惑，贫苦农民，初得相当自由，对于组织协会，既无经验，幼稚行动，万难全免。土豪劣绅更复小题大做，以耸听闻，夏逆叛变以后，其行动尤为猖獗。各级农民协会，过去对于宣传工作，非常懈怠，土豪劣绅颠倒是非、淆乱黑白之宣传，遂得以充满于乡村城市，甚至革命同志，亦受其影响而怀疑农民运动，以后各级农民协会，不但要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呈露于革命同志、革命民众之前，用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并真实地将农民运动详细情形，尽量发展出来，使上级农协得以随时指导其工作，纠正其错误。对于本会临字第一号训令，更须作一度很普遍的宣传，使一般农民俱能彻底明了农民运动的新方向，而积极按照

本会所示径途，努力工作。

凡此五端，均为巩固革命联盟，促进国民革命之要务，各省农民协会必须领导各级农民协会，切实遵行，倘有奉行不力，或阳奉阴违者，本会必当伸以革命纪律，立予改组，其有反动派假借农协名义，滋生事端，或捏词诬陷者，各级农民协会，转请政府立予扑灭，毋使滋蔓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
谭延闿　谭平山　邓演达　毛泽东　陆沉

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一家在武汉的住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27年7月4日）

一

长沙事件为何键夺唐生智政权。唐生智本欲拉我们反何，但见我们没有力量，遂拉拢何键部下打何，故唐不能打许克祥。

二

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个师和军反蒋，应促成唐生智和何键分化，拉唐反蒋。

三

有两策略：（一）改成安抚军合法存在，此条实难办到。（二）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讨论湖南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讨论联合唐生智反对蒋介石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关于省农协策略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此外尚有两条路：（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

（1927年7月20日）

（一）近年农民运动的进展，已表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进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和工农武装。这一革命在中国目前已经受了一个挫折，其原因：（1）无产阶级的领导尚不强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主观上的组织力尚不能领导工农小资产阶级这一革命联盟；（2）工农武装没有建设；（3）我们党动摇不定政策的错误；（4）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所谓革命军的阶级性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不能担任新的历史使命——土地革命，他们由限制工农运动而进到反对、屠杀工农的整个的反革命，这种叛变是历史的必然，证明了革命的深入丝毫不足惊奇，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地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这是目前革命的客观情势，要求我们一个新的策略上的答复。

（二）现在全国农民，整个的在新旧军阀之下喘嘘地活着，十几年新旧军阀战争的负担和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最大部分架在穷苦农民身上，在北方，苛捐苛税的繁重已经迫使大多数的农民抛弃土地，得不着生活，南方各省，农民的痛苦与北方无异，屡经奋斗所得的些许自由，又重新完全被剥削。无论南北大多数遭受过度的压

迫的穷苦农民（佃农、半自耕农、雇农、失业农民以及大部分自耕农）他们已经觉悟起来，到处和他们的敌人奋斗，尤其在南方自李济琛、唐生智之屠杀以来，农民之反抗奋斗，更加英勇而坚决，同时新旧军阀因为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内部矛盾，不仅不能建设一个统一的反动政权，反而一个一个很迅速地正在继续崩溃下去。因此全国的革命潮流，表面上虽似一时的低落，实际却是继续往上涨。目前的反动局面只是革命转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阶段时阶级冲突的反应。我们的党只有坚决地站在这个土地革命的立场，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怎样开发土地革命的潮流呢？只有敏捷地认清客观情势，抓住每一个机会，提出适当的口号，领导广大的群众继续不断地争斗才能达到此目的，此时，“不缴苛捐苛税”“不缴预征钱粮”“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取消高利贷”“没收大地主、土豪劣绅及反革命的土地”“没收祠堂、庙宇等及一切公共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新旧军阀”“实现革命民权”“实现乡村农会政权”“民选县政府”“解除反革命的武装”“恢复农民协会”“实行农民武装”“农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抗租、抗税之自由”等口号，应当是开发土地革命的总的动力。

（三）在北方各省如直鲁晋豫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多数，他们苦于繁重的税捐日益破产，流为土匪或逃亡他省。在这里我们要以自耕农、贫农、佃农、雇农为中心联合一切农村穷苦民众及小地主结成斗争的联盟，反抗一切苛捐苛税及预征钱粮，反抗一切战时的征发，实行减租二五，同时从这种斗争的发展中夺取乡村政权、夺取武装以至于没取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等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及地户。

在南方湘鄂赣粤等省则佃农占多数，次之为自耕农半自耕农，

佃农受地主重租的剥削，同时自耕农、小地主则受军阀税捐的剥削极为繁重，我们应立即于实行二五减租，反抗苛捐苛税预征钱粮的口号之下实行罢租罢税，一面借以揭破武汉南京政府减租减税的伪善面具，一面以佃农自耕农贫农为中心团结一切农村穷苦民众以至于小地主，进行严重的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夺取农村政权武装于农民协会之下，以至于没收豪绅大地主反革命及一切祠堂庙宇的土地以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我们现在应用全力宣传聚集农民群众力量而实现之的口号。

无论在什么地方，反对超过年利百分之二十的高利贷的争斗应彻底进行，因为这是一般被压迫民众的共同要求。

（四）土地革命只是一个过程，政权争斗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必有夺取政权的争斗，才能推翻封建地主的乡村统治，才能促进土地问题的爆发而且给他以解决的权力机关。在南方各省如广东湖南，虽则农民运动的主要特点已经进到没收大地主，其实农民如果没有取得政权，单纯地解决土地问题是不可能的。依湘粤的经验，这个分析是丝毫没有错的。

所谓政权的争斗，就是要建设农民的革命政权，换言之即农会政权之建设。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农民协会已经不是一种职业组织，而是以穷苦农民为主干的乡村政治联盟，因为农民协会，事实上不仅团结了一般农民（耕地的或失业的），包括了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和小商人，就是一部分脱离大地主影响而对农会表同情之小地主也经联合在农民协会之内。所以农民协会在现时就是乡村中穷苦农民联合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联盟——农会政权。这是乡村政权的一个正确的形式，要开始在各地实现起来。

（五）根据两湖农民运动的经验，应当指出在农民协会组织上要

特别注意的几点：

（1）每一省农民运动要把我们的人力财力集中在政治军事或交通占重要的区域，以树立领导全省运动的中心基础，宁可为求这些区域的深入而暂缓扩大，万不可只求扩大而忘记了中心基础工作。

（2）农民协会既团结了一般农民群众、手工业者、小学教师、小商人，并且在一定条件之下，小地主也包括在内，则农协各级领导机关的成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大概小地主一般的不吸取在领导机关内，此外在区执委内，佃农、自耕农、贫农、失业农民至少各占五分之一，在区执委内小学教师的当选是有必要的。

（3）各级农协设立妇女部及青年部，乡村儿童运动及儿童团体完全受农协青年部之指挥，农妇概加入农协不另组织女界团体。

（六）农会政权的斗争和土地革命必需革命的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但是现在所谓革命军实际是在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军官领导之下，到处屠杀农民，武装冲突已成为农民运动中极普通的现象，因此在现时阶段中农民运动确是最严重而紧迫的问题，每一个农民运动者如果没有十二分注意这个问题而谋给予正确的答复，便等于没有准备农民革命得到胜利。各地党部应当用种种方法使农民接受军事训练，获得武装，今指出几项大要的办法如下：

（1）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阶级和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武装农民。

（2）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地投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

（3）对团防局、保卫团等地主阶级的武装在不能即刻夺取其武装时亦采用上项的办法。

（4）农民武装现时没有以“农民自卫军”“农军”这类名义公开

存在的可能，只能在下面三种形式之下存在：A. 以合法的名义存在如“挨户团”“保卫团”“联庄会”之类；B. 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C. 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

（5）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万不可一开始便去攻击其反动领袖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破除迷信，这种机械的性急的手段是不能取得群众拥护的。同时如过去只知联络其领袖或借军事领袖的招牌去号召也是不能收效的。

在南方一般以“劫富济贫”为标语的会匪，在农民革命的高潮中又输入了“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同时他们的行动也能与农民协会接近甚至团结在农协之下。本来他们多半是失业农民或将近破产的农民，他们的经济口号如“劫富济贫”就和“没收大地主土地”接近，他们自然是地主阶级的仇人，是城市反动军队的敌对者（在没有被他们的反动领袖拍卖以前），假使能领导他们上正确的革命的轨道，一定可以成为土地革命之有力的帮助者，但是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是异常之恶劣的，他们的领袖多半是带有候补军阀的性质，因此他们得不到正确的政治的领导走上革命正轨为一定的目标而奋斗，而以“打家劫舍”为惯常生活，其行动与思想完全随其领袖为转移，因此我们要懂得会匪在农民革命中的积极作用，一面又要明白他们走向反动的可能性，我们的目的便是要增进他们的革命性和革命训练，使之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之下而成为土地革命的有力的帮助者，其方法与上项大体相同。

（七）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地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方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

几个同志在那里活动，而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责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或者便是农运负责同视党和集体的领导而习于个人的活动，因此，我们党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感觉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之概。党在平时既不能尽其组织上积极的责任，□时，自然更不能希望其成为唯一的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如果本党的领导能正确地在农民中建立起来。那末，第一，要使党的支部能够深入到乡农协，并□□正成为群众争斗的核心。第二，党对农民的指导必须经过党团（改正过去□□领袖的错误），党团要绝对服从党的指导。第三，各省党部的农民都要□地建立起来，对一省的农民运动每次定出一月或两月的计划，督促并□各级党部切实执行。

中央委员宣言

（1927年8月1日）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唯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党自重之私意。当其时也，同人等顾念革命全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发展广大民众势力，则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阴谋于一日，故一年之间不惜降志辱身以与蒋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离弃全国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顾，一走了事自命清高。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如是全国同志为党国存亡计，始发动恢复党权之运动，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亦于是举行，通过各项巩固革命势力之决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危而复安者，间不容发。唯此恢复党权运动，全赖全国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与蒋逆中正以重大之打击，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机，借口拥护此种运动，以遂其倒蒋而自增势力之私，同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对于

革命毫无诚意，将来难免危害党国。然亦只有根据总理遗训，使本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故对于两湖广大农民运动之发展，以及农民群众进入为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乡村自治之革命行动，认为不但不应加以压抑，而且认为系本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渐得广大农民之认识。广大农民有此认识与运动，方能摧毁封建之残余势力，以为本党革命势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取得切实之保障。不图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键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拥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同时，江西朱培德因谋于蒋氏妥协，有驱除革命分子停止工农运动之事。此少数领袖，亦曲予优容，视为当然。冯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与蒋逆会议，致电威胁中央罢免军队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员。此少数领袖亦无制裁能力，且不能不虚与委蛇决定，以自乱其步趋。中央党部在此少数软弱领袖指导之下，威信完全坠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决议，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气焰大涨，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一则曰此多共产分子，再则曰彼辈不服从中央命令，自由行动，三则曰“耕者有其田”“应以政治与法律来解决”。今则事实显然，无可掩饰。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本党党员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万数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武汉中央

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致于此！总理遗训谓不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武汉中央则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亦即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屠杀农民问题。此是总理之本意?！唐生智、何键等复在武汉首都横行无忌，包围中央党部，占据民众团体，劫掠中央银行，逮捕中央委员，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中央党部复在此种反动武人威胁之下提出分共之议，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实党员，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图，卖党无耻，如斯其极！分共之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未能通过。彼等仍欲号召八月十五日之中央全体会议。同时在武汉及一切在彼等权力以下之各机关已开始捏造曲解种种事实，大为反共之宣传，企图强迫中央委员通过彼等所提出之议案，以掩饰其非法谋叛之逆迹。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卖身。若犹隐忍不与奋斗，助成其叛逆之计划，将何以对全国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对总理与本党先烈？是以决意先后离汉，为革命与本党前途，将尽力所能及，以领导全国同志为保持本党革命的正统而奋斗。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辞矛盾，举止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迥若两人。总理临逝世时，虑党中领袖或不免受敌人软化。总理逝世不及三年，党中旧的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极！同人等顾念总理四十年造党之艰难，与全国百万革命同志期望之远大，不能坐视本党荣誉之历史为此等少数旧领袖所断送，兹特郑重申明，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

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北伐之牺牲，必须能达本党总理之遗志，拯救民众疾苦，解放工农，以发展革命势力，倘如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地以此种革命主张口号天下，唤起民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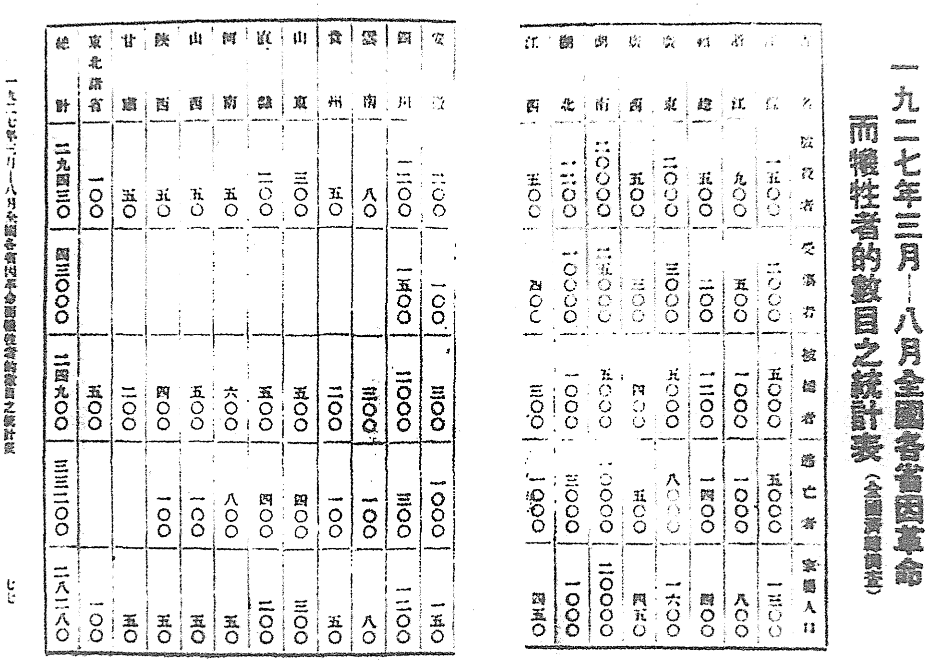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一切帝国主

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以为当前急务，唯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鉴察之！

孙宋庆龄　邓演达　谭平山　彭泽民　林祖涵
恩克巴图　吴玉章　于树德　恽代英　柳亚子
杨匏安　高语罕　谢　晋　白云梯　毛泽东
董用威　江　浩　韩麟符　夏　曦　许苏魂
邓颖超　屈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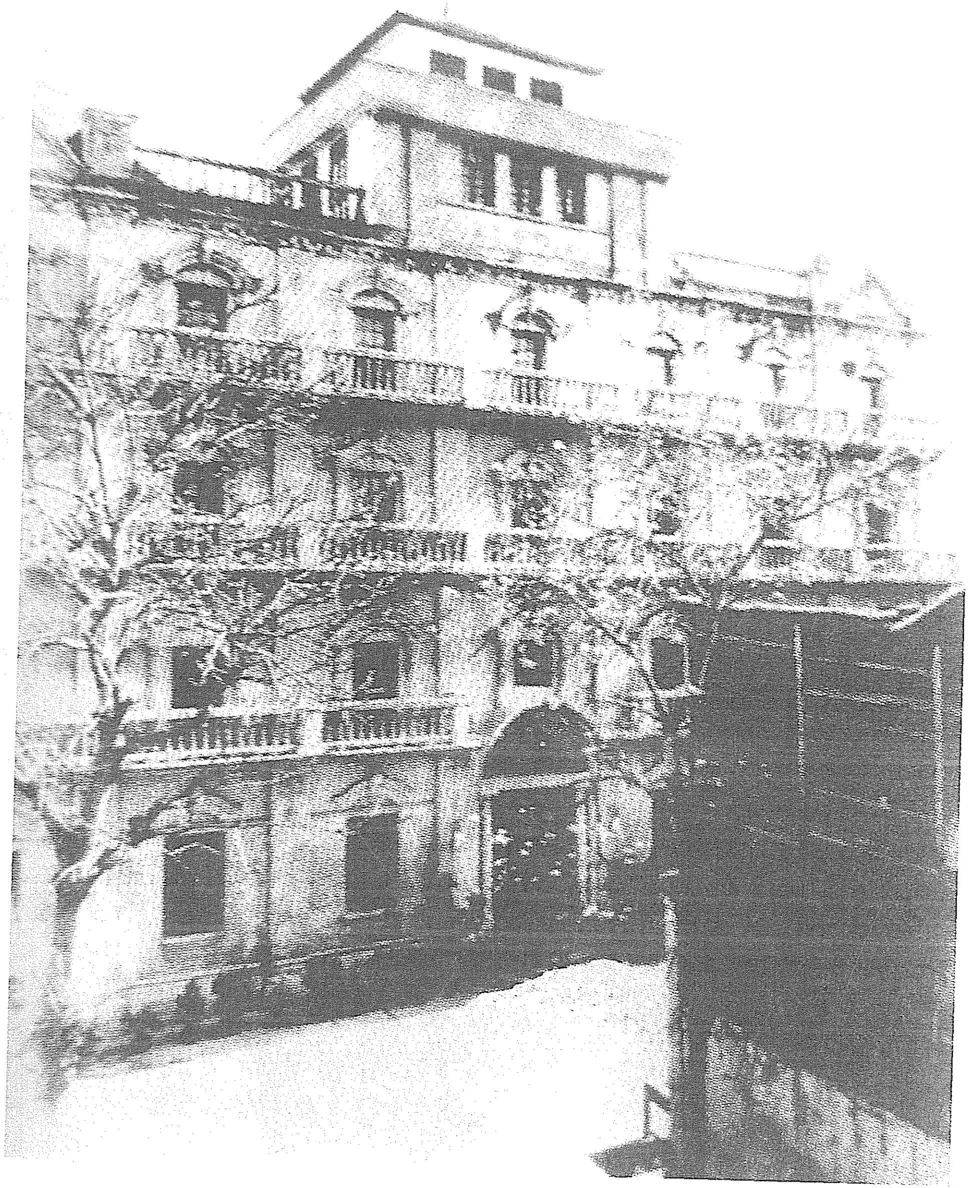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全國[illegible]調查）

省名	被殺者	受傷者	被捕者	逃亡者	家屬人口
江蘇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
浙江	九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八〇〇
福建	五〇〇	二〇〇	一二〇〇	一四〇〇	四〇〇
廣東	二〇〇〇	三〇〇〇	五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一六〇〇
廣西	五〇〇	三〇〇	四〇〇	五〇〇	四五〇
湖南	二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	五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
湖北	一二〇〇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三〇〇〇	一〇〇〇
江西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四五〇
安徽	二〇〇	一〇〇	三〇〇	一〇〇〇	一五〇
四川	一二〇〇	一五〇〇	二〇〇〇	三〇〇	一二〇〇
雲南	八〇		三〇〇	一〇〇	八〇
貴州	五〇		二〇〇	一〇〇	五〇
山東	三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三〇〇
直隸	二〇〇		五〇〇	四〇〇	二〇〇
河南	五〇		六〇〇	八〇〇	五〇
山西	五〇		五〇〇	一〇〇	五〇
陝西	五〇		四〇〇	一〇〇	五〇
甘肅	五〇		二〇〇		五〇
東北諸省	一〇〇		五〇〇		一〇〇
總計	二九四三〇	四三〇〇〇	二四九〇〇	三三二〇〇	二八二八〇

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月全國各省因革命而犧牲者的數目之統計表　七七

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中国共产党成为非法党派，大革命失败。图为当时被杀的各省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统计表。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发起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图为江西大旅社，起义前周恩来等曾在这里开会讨论起义问题。

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

（1927年8月7日）

国际代表[2]报告的全部是很重要的。第一，国民党问题在吾党是很长久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首先是加入的问题，继又发生什么人加入，即产业工人不应加入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产业工人，即农民都无决心令其加入。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其后有一部分人主张产业工人也加入，闻湖北亦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执行。过去群众中有偶然不听中央命令的抓住了国民党的下级党部，当了此房子的主人翁，但这是违反中央意思的。直到现在，才改变了策略，使工农群众进国民党去

---

[1] 这是毛泽东1927年8月7日在汉口举行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孙中山所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归于失败。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这个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2] 国际代表，指罗米那兹（1898—1934），苏联人。1927年7月下旬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

当主人。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曾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1]走了。甚可怪的，唐[2]军还仅承认只有八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3]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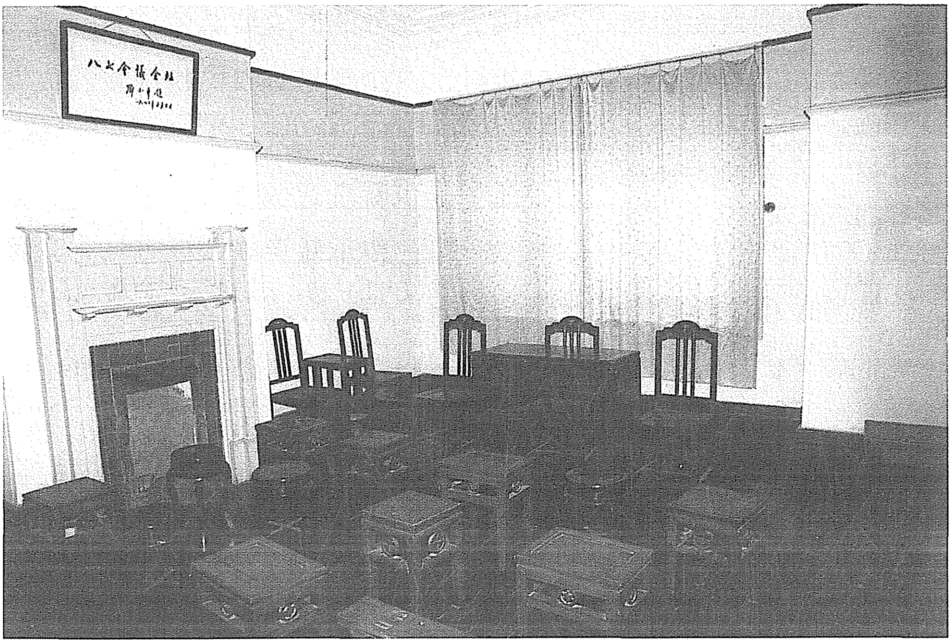
---

[1] 许克祥（1891—1967），湖南湘乡人，1927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同年5月21日（马日），他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捣毁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史称马日事变。

[2] 唐，指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3] 蒋，指蒋介石。唐，指唐生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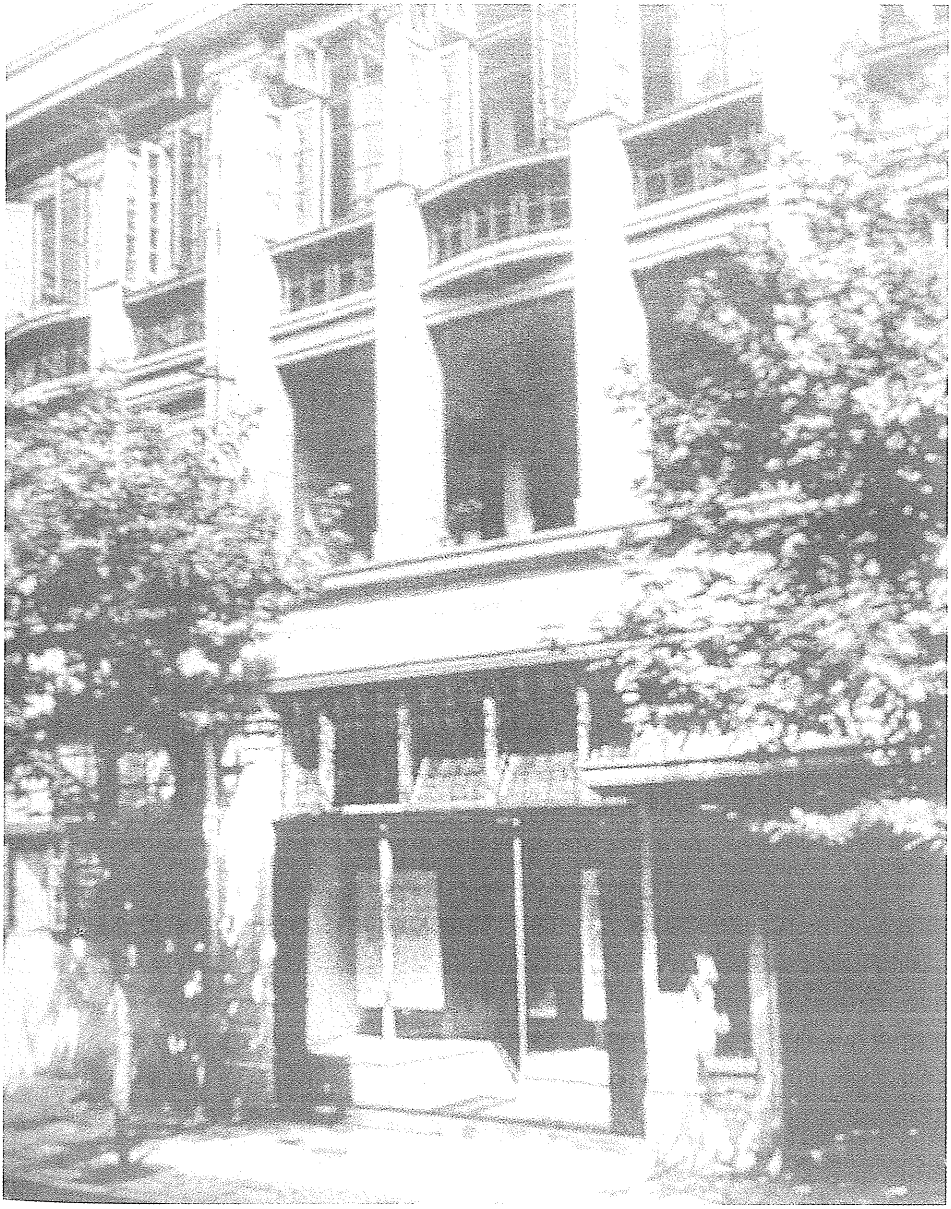
中取得的。[1]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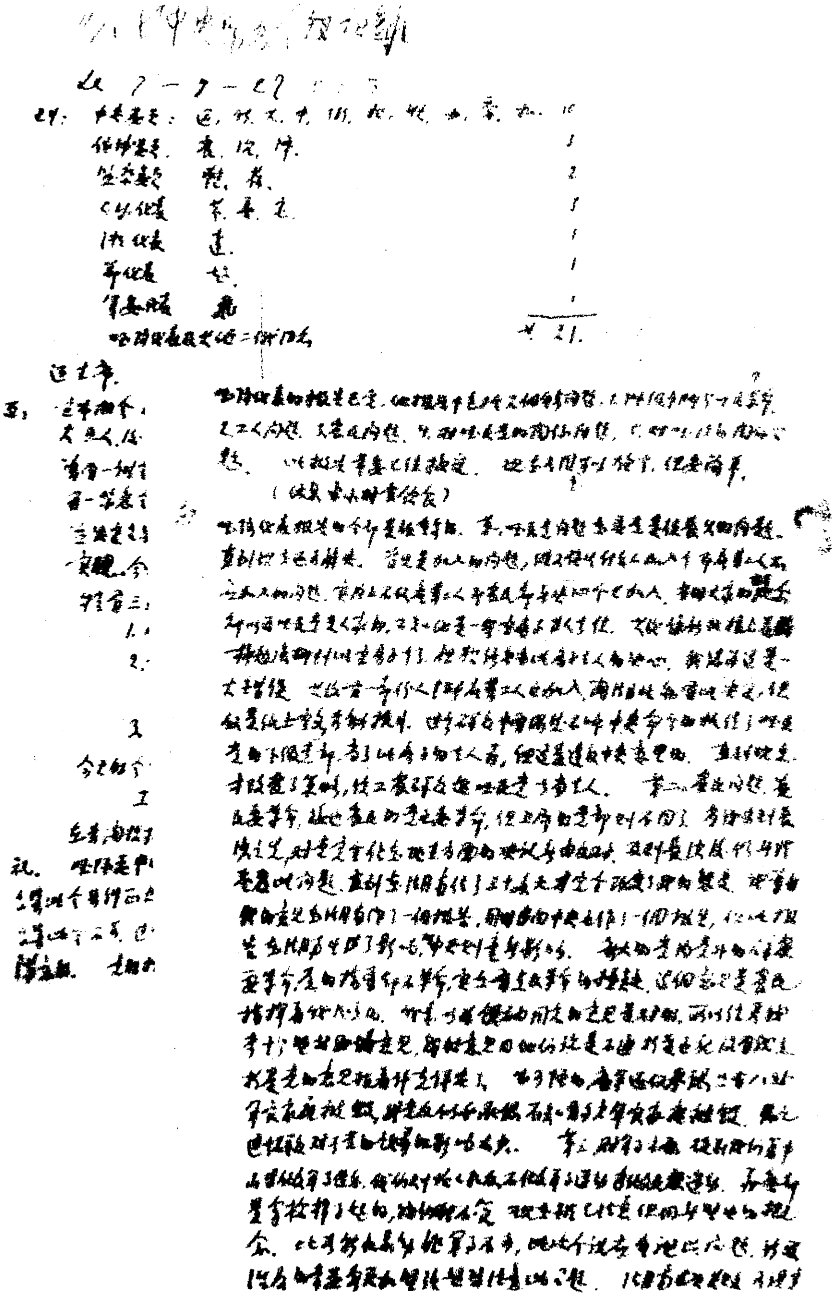
八七会议会址（内景）。

---

[1] 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对这个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图为八七会议旧址。



八七会议的会议记录。

湘南运动大纲[1]

（1927年8月）

一、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2]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

（一）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

（二）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

（三）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

二、军力方面：

（一）请中央命令彭湃[3]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湘南开展武装斗争的计划。这之前，毛泽东在1927年3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提出“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这是使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应大力普及。7月4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农民武装如何发展和保存的问题时，毛泽东又提出有两条路线：“(1)上山，(2)投入军队中去。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2] 唐政府，指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省政府主席唐生智。

[3] 彭湃，中共中央委员，曾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副委员长，当时是南昌起义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

（二）浏平军[1]千人立即由郭亮[2]率领赴汝城。

（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赴汝城。

右三部分共兵力约一师，以革命军一团作中坚，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三、湘南须受江西革命领导机关的指挥，革命的粤政府成立，则受粤政府指挥，并供给其需要。中央应命令江西方面执行此计划。

四、党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湖南省委的指挥，在交通阻隔时候得独立行使职权。

---

[1] 指湖南浏阳和平江的农民武装。

[2] 郭亮，1927年马日事变后曾代理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柳直荀等部署发动长沙附近各县农军进攻长沙。

湖南民众组织更需要武装[1]

（1927年8月9日）

组织一师往广东是很错误的。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已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2]，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现在的省委是在事变[3]后收拾残局的，成立不到两月，他在恢复湖南组织上是建了一点功劳的。以后省委应增加工农同志的指导是很对的，以前党内群众对党的负责人是不满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问题时的发言。

[2] 即《湘南运动大纲》。

[3] 指马日事变。

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1]

（1927年8月18日）

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即少，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二、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

---

[1] 这是毛泽东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时发表意见的一部分。

湖南秋收暴动要有军队帮助[1]

（1927 年 8 月 18 日）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

[1] 这是毛泽东和易礼容在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湖南暴动问题时发表意见的一部分。易礼容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7年8月19日）

世荣兄：

湖南的秋收暴动在现在客观环境上看，确是到了一个很好的时机，现在此间决定办法于下：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的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

四、湖南现在因许克祥对唐生智的叛变，唐的军队均开往前线抵许，现在湘南与长沙事实已经隔绝，因此，另组织了一个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目的在夺取湘南，至万不可能时，决夺取桂东、汝城、资兴三县，建立工农兵的政权，湘南等革命委员会坚决实行土地革命政策。

以上是此□，对湖南暴动的原则，具体详细情形由资深同学面告，接到此信后请即批准赐复，并帮助一切为盼。

湖南致中央函*

（1927年8月20日）

（上略）……（三）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跳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〇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此政权既建立，必须迅速地取得全国之胜利。望中央无疑地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

因国际这个新训令，影响到我们对国民党的意见，即在农工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地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这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

（四）土地问题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

处乡村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的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

（一）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由农协按照“工作能力”与“消费量”（即依每家人口长幼多寡定每家实际消费量之多寡）两个标准公平分配于愿得地之一切乡村人民。

（二）土地分配时由区协命令乡协按户造册，造好交于区协由区协按册分配土地。

（三）土地分配以区为单位不以乡为单位，人口多于土地之乡，可以移于人口少于土地之乡。必如此而后分配略得其平，至于甲区移住乙区暂不可能。

（四）土地没收之后对于地主（无论大地主）家属之安置必须有一办法，方能安定人心，办法分为……（中略）四等：一等收百分之四，二等收百分之三，三等收百分之二，四等收百分之一。

此草案昨日虽在省委会讨论一次，尚待多征询农民同志意见然后再请兄处作最后之决定，兹先将草案录上借供讨论资料……（下略）

八月二十日

湖南常委来信*

（1927年8月30日）

某某兄：

湘字五号信收到，关于指出此间两点错误，事实及理论均非兄所说，兹将答复于下：

（一）夺取长沙与秋收暴动在革命的整个意义上说，是发展土地革命，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长沙暴动是秋收暴动的起点，秋收暴动的发展是土地革命夺取政权，我们计划夺取长沙的主要战斗者是工农，要调某某两团进攻长沙意义是辅助工农力量之不足，不是主力，是掩护暴动的发展，不是唯一的重要的暴动成分。兄处谓此间是军事冒险，令将长沙暴动计划取消，实在是不明了此间情形，是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的一个矛盾政策。

（二）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此间没有将各地已有相当准备之事实，向兄陈述这是一个错误。（请看湘中暴动计划）关于湘南工作问题，也该说明一句，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所以我们决定不以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但是湘南各县的暴动计划及暴动准备均已令有组织的各县切实执行，长沙暴动开始，各县随之同时发动。

八月三十日

不打长沙转兵向南[1]

（1927年9月20日）

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

[1] 1927年9月20日早晨，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这是讲话的一部分。

给杨开慧的信

（1927年9月）

我亲爱的霞[1]：

我去了，不管去的有多远，有多久，我总是要回来的，我们不久就会团聚的。要坚信两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大家团结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

润之留笔

---

[1] 霞，即杨开慧。

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信[1]

（1927年12月18日）

部队行动，由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毛泽东七人组成前委，请批准。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七人外加江西的刘真，请呈报中央批准。又朱云卿应加入前委和特委。

---

[1] 1927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敌委员会，表示朱、毛两部建立联合领导的意向。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西江月·秋收起义[1]

（1927年）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2]。
匡庐[3]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4]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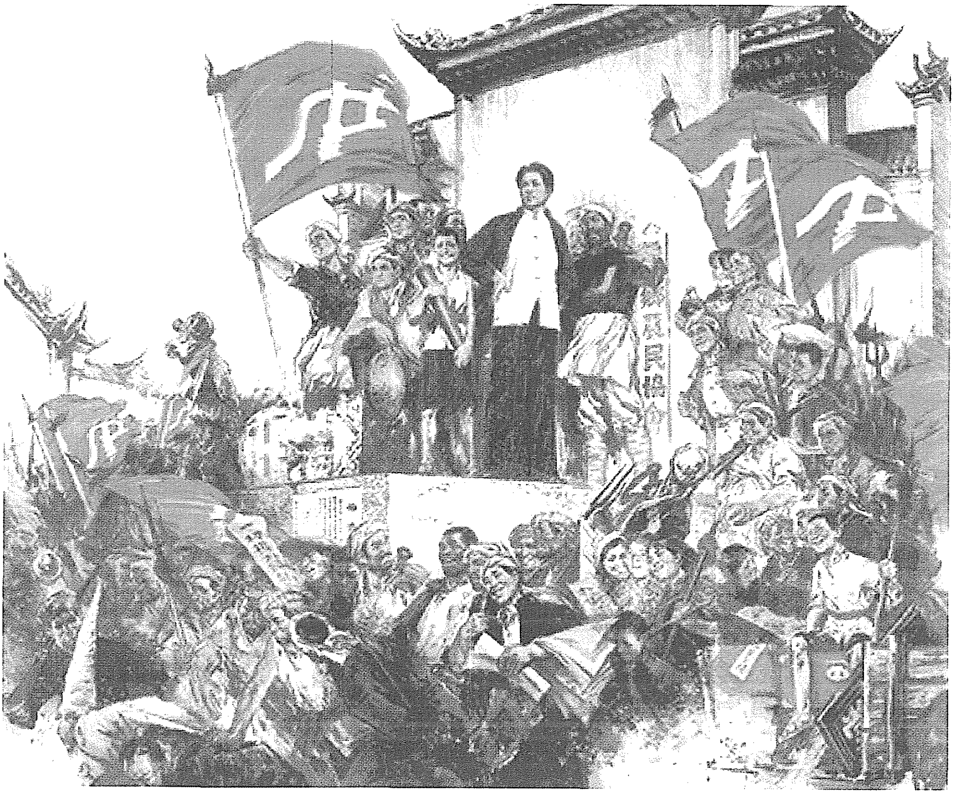
[1] 秋收起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决定发动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武装起义。毛泽东在湖南省东北部和江西省西北部领导农民、工人和一部分北伐军，成立一支工农革命军，9月9日起在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武装起义，遭到敌人围击。10月，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成功地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2] 斧头，中国共产党党旗上的锤子当时常被误认为斧头。

[3] 匡庐，首次发表时原作“修铜”，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改为“匡庐”。传说商、周间有匡俗（一作匡续）在今江西庐山结庐，因称匡庐或庐山。参见东晋慧远《庐山记》（一作《庐山记略》）。

[4] 潇湘，首次发表时原作“平浏”，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根据作者修改的抄件改为“潇湘”，借潇水和湘江指湖南省。

农民个个同仇[1]。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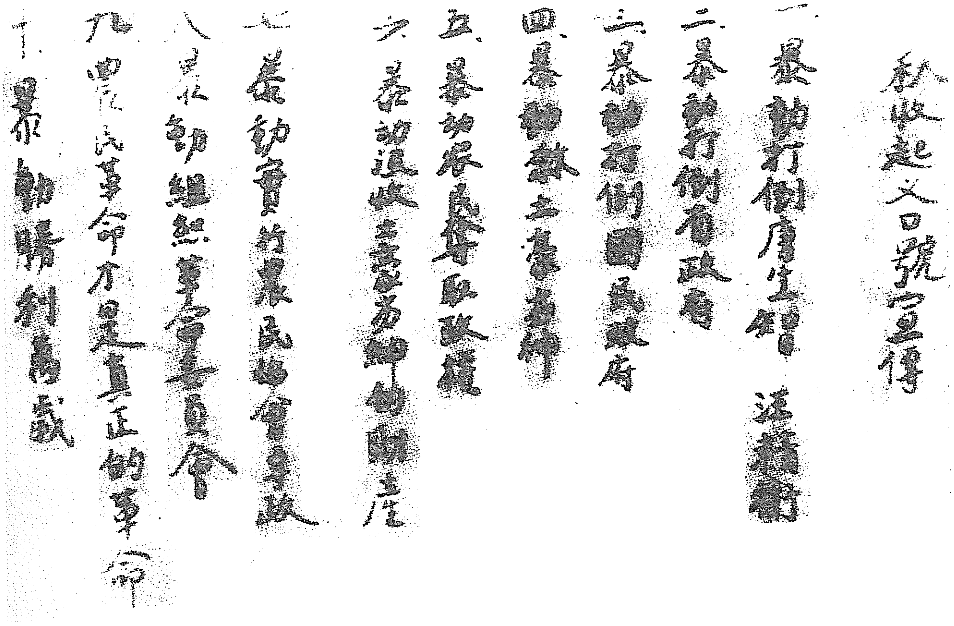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中国画）

---

[1] 同仇，同心合力打击敌人。《诗·秦风·无衣》：“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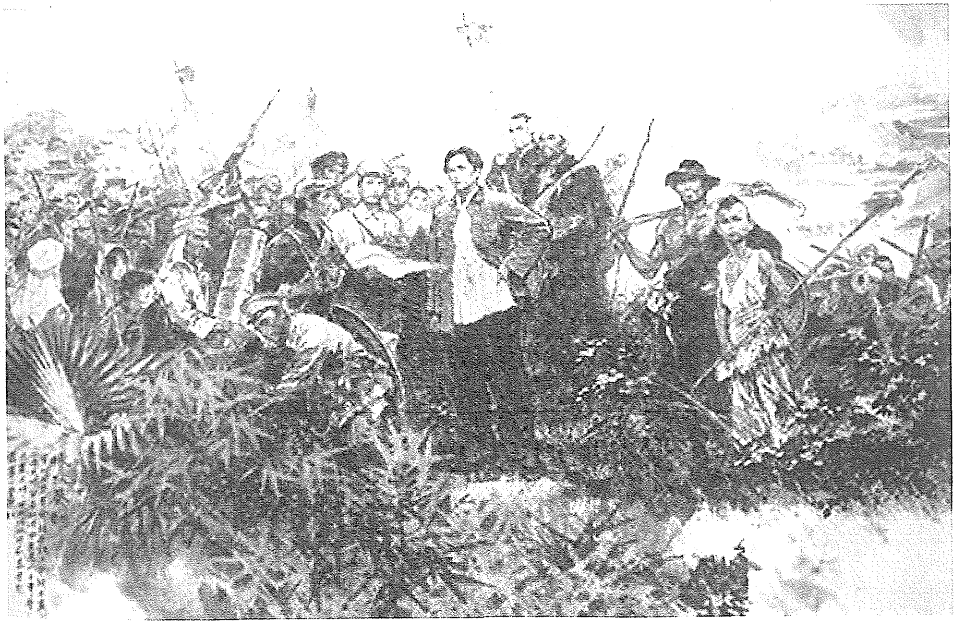
[2] 进、动，按《西江月》词律，上下阕末句末字当与二、三句末字同韵异调，即第二、第三句押平声韵，第四句押原韵的仄声韵。这里没有按律押韵，而依湖南方音用进、动两字隔阕押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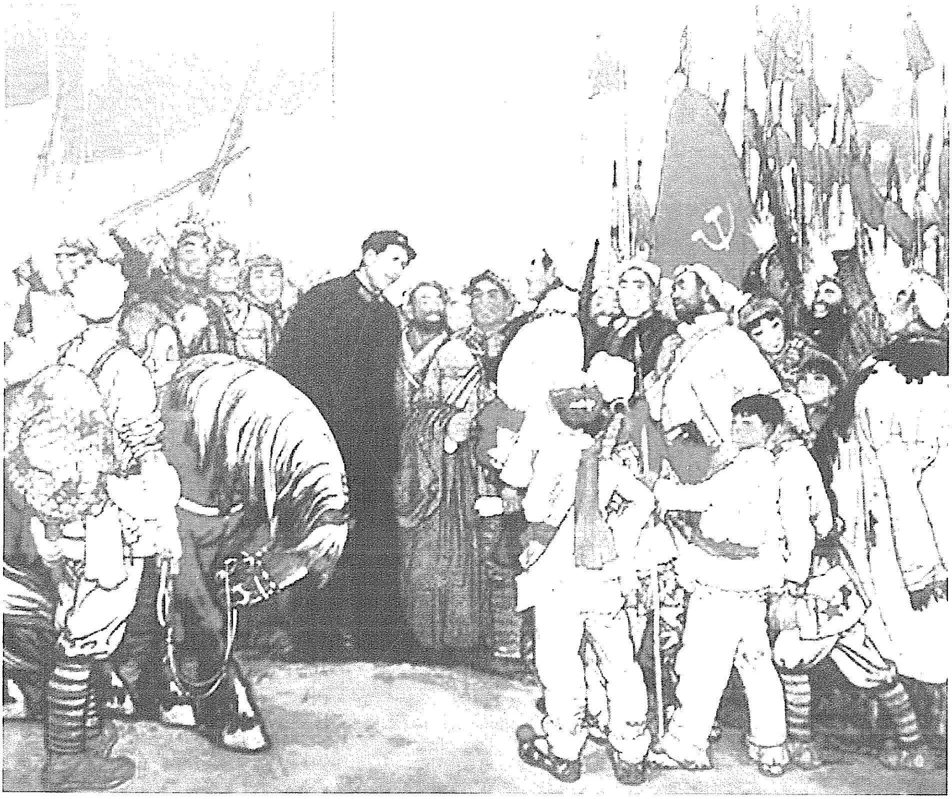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口號宣傳

一、暴動打倒唐生智 汪精衛
二、暴動打倒省政府
三、暴動打倒國民政府
四、暴動殺土豪劣紳
五、暴動農民奪取政權
六、暴動沒收土豪劣紳的田產
七、暴動實行農民協會專政
八、暴動組織革命委員會
九、農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十、暴動勝利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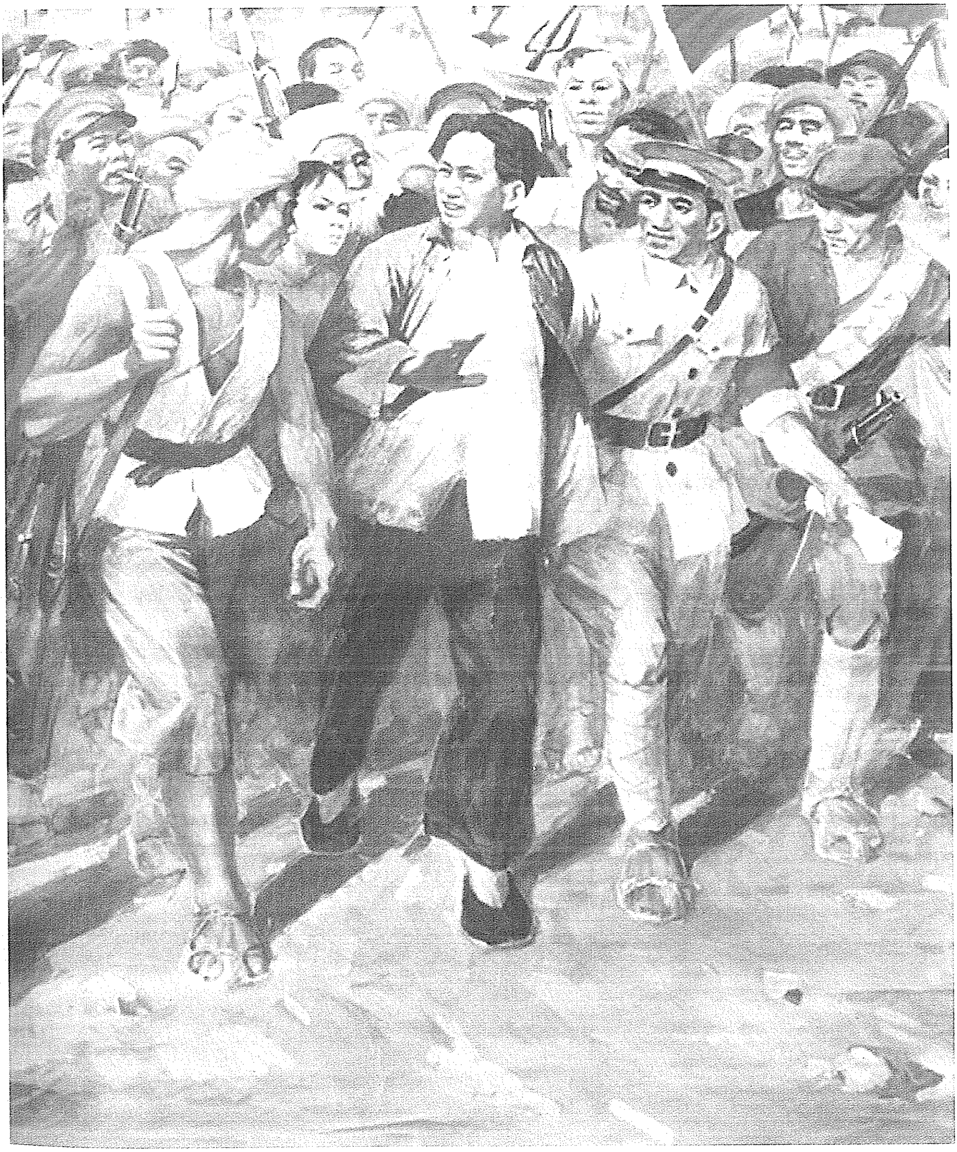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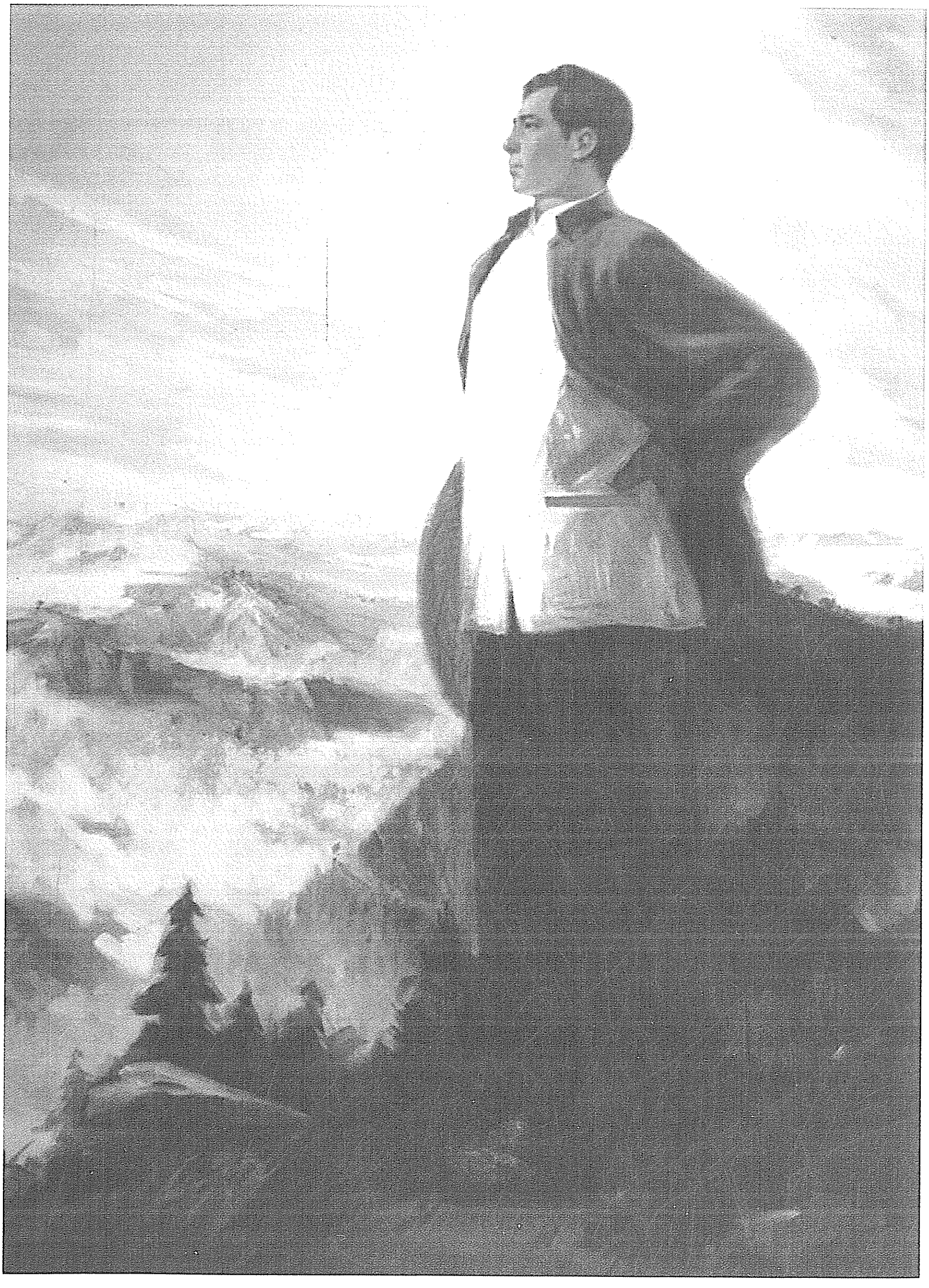
《秋收暴动》（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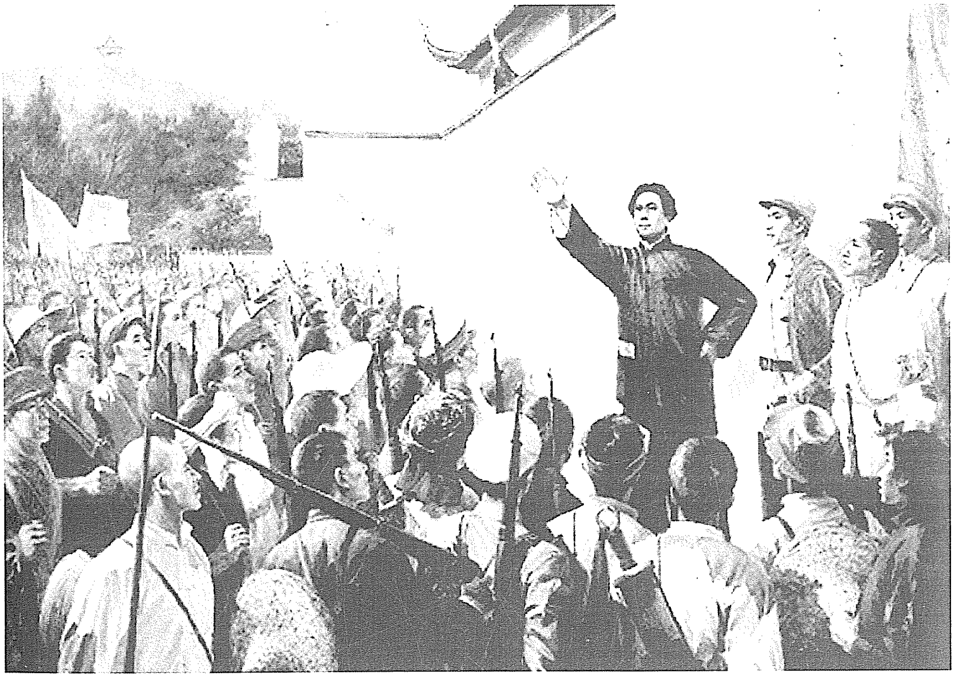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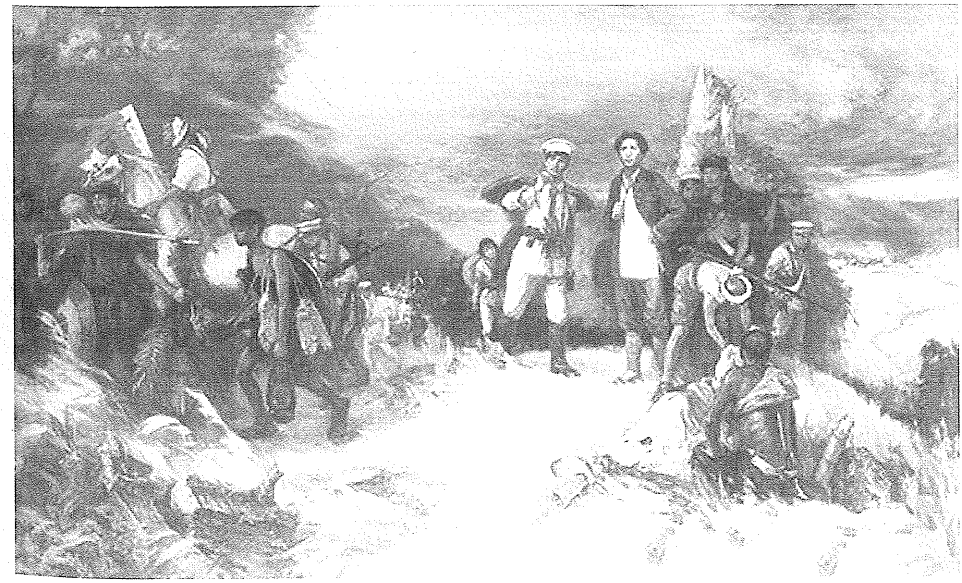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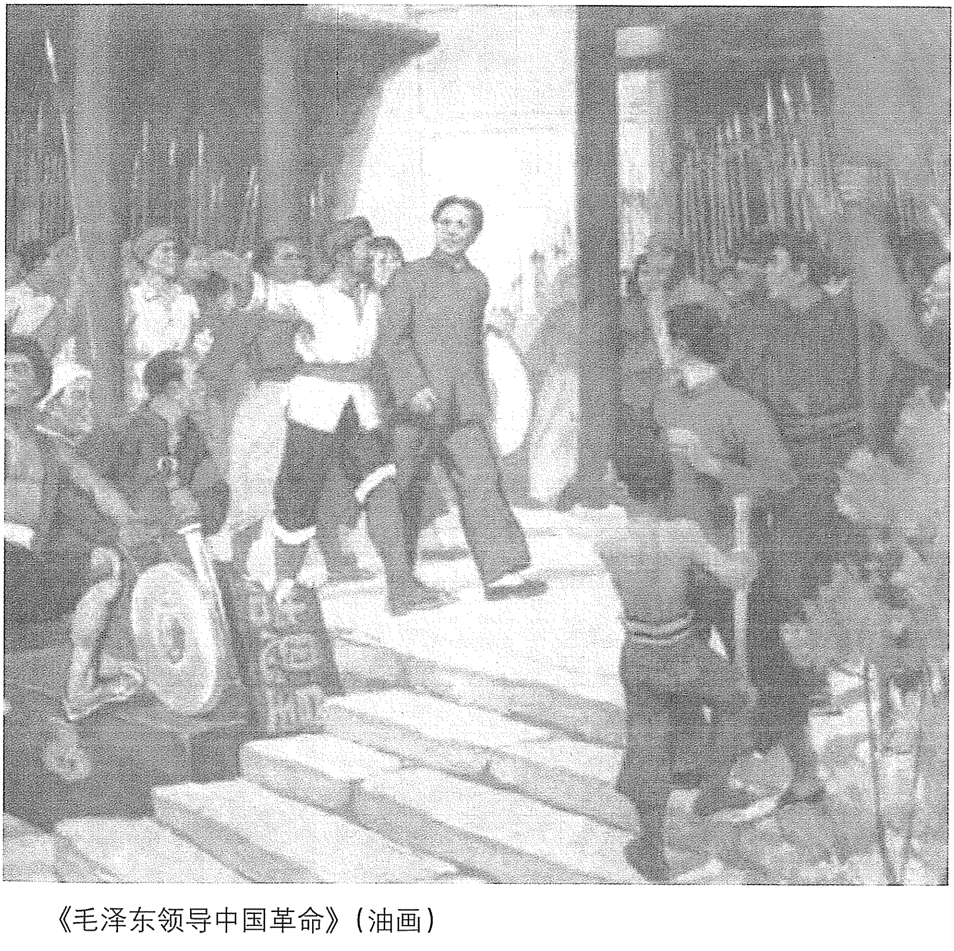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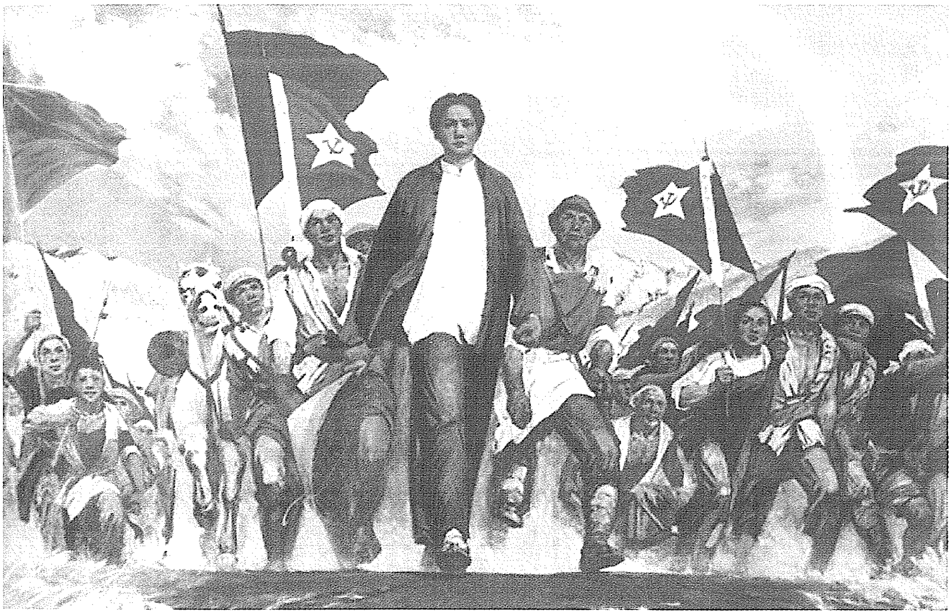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誓师大会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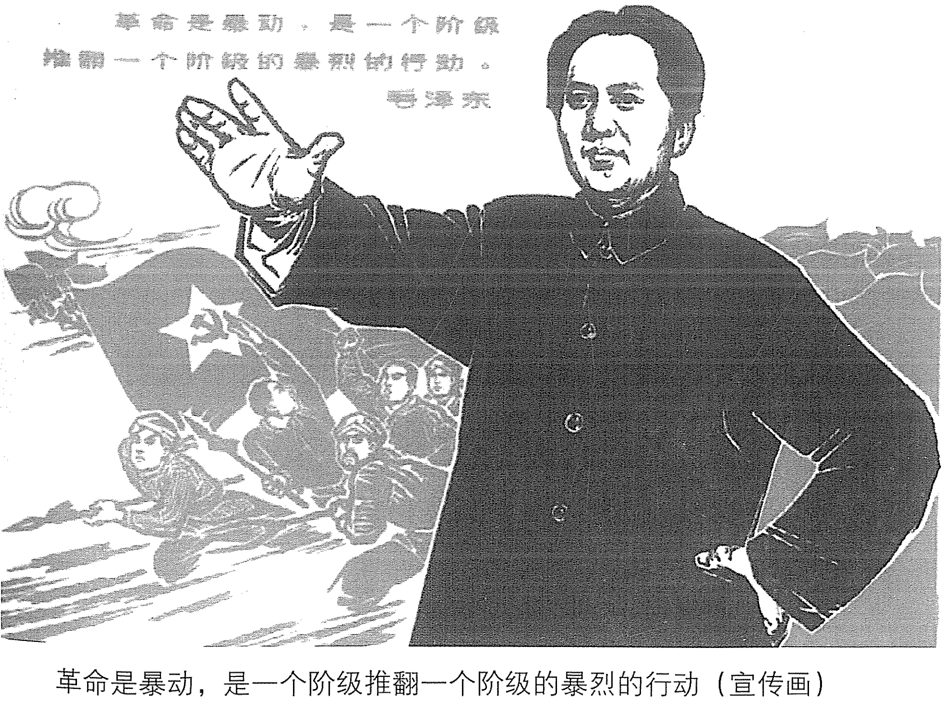
《秋收暴动》（油画）



《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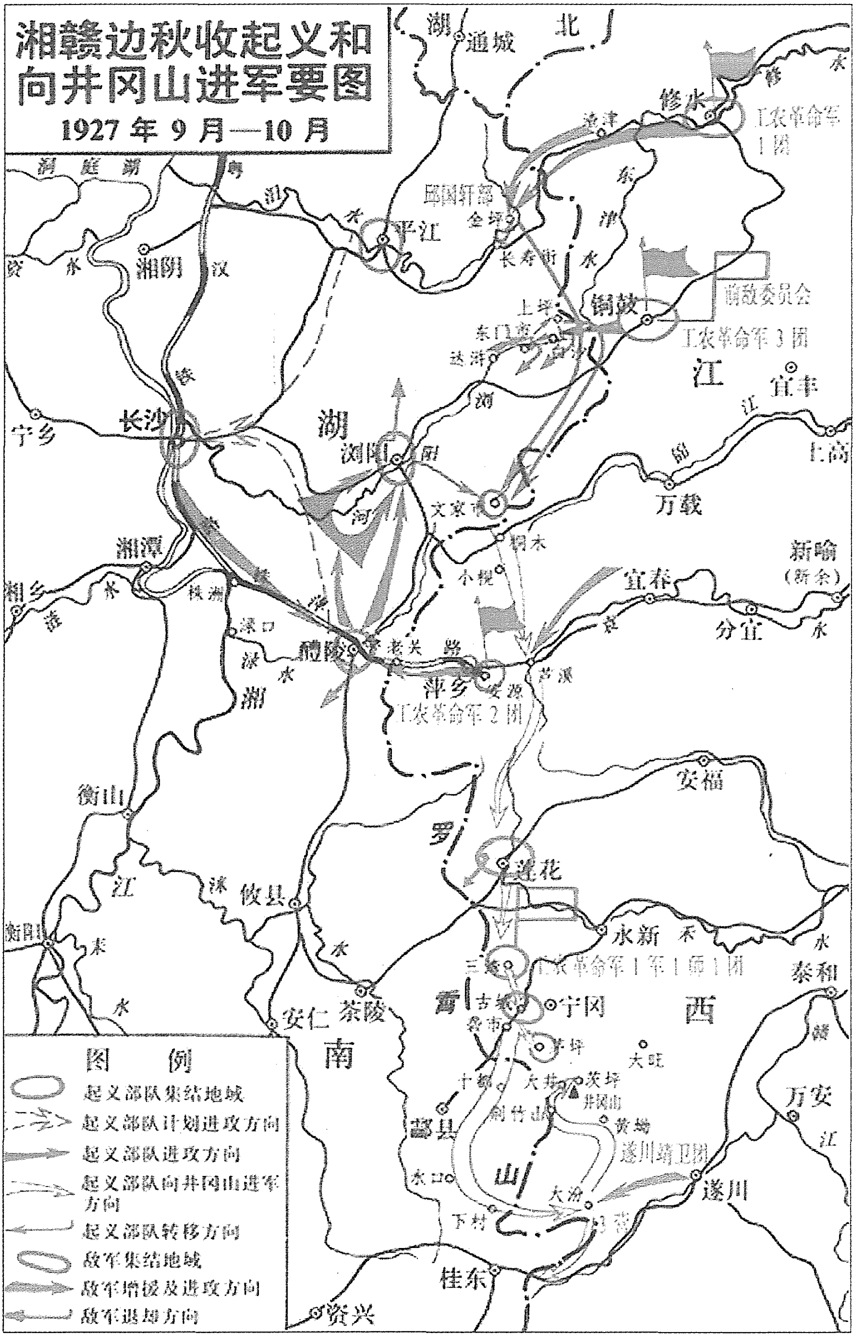


《秋收起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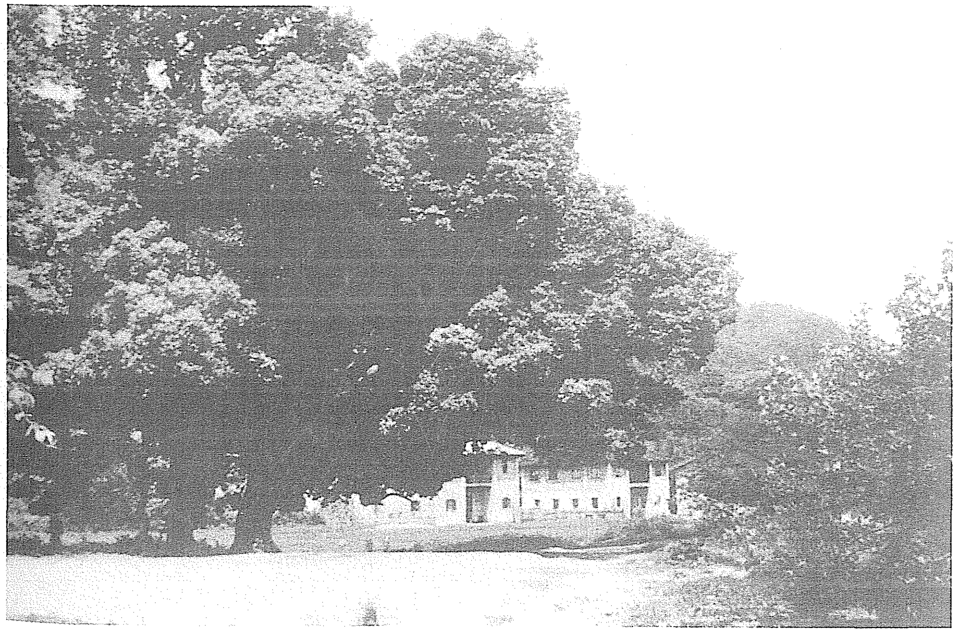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
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宣传画）


湘赣边秋收起义和
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1927 年 9 月—10 月
湖 北
通城
修水
渣津
工农革命军 1 团
修 水
洞 庭 湖
汨 水
平江
邱国轩部
全坪
长寿街
东 津 水
前敌委员会
上坪
铜鼓
东门市
白沙
达浒
工农革命军 3 团
湘阴
资 水
汉
铁
粤
长沙
宁乡
湖
浏阳
浏 阳 河
文家市
江
宜丰
锦 江
上高
万载
桐木
小枧
湘潭
湘乡
涟 水
株洲
渌口
渌 水
醴陵
老关
路
萍乡
安源
芦溪
工农革命军 2 团
宜春
袁 水
新喻
（新余）
分宜
湘
安福
衡山
罗
莲花
江
攸县
永新
禾 水
衡阳
耒 水
洣 水
三湾
工农革命军 1 军 1 师 1 团
泰和
茶陵
安仁
南
霄
古城
砻市
宁冈
茅坪
大陇
十都
大井
茨坪
井冈山
酃县
荆竹山
黄坳
遂川靖卫团
万安
赣 江
山
水口
大汾
遂川
下村
桂东
资兴
图　例
起义部队集结地域
起义部队计划进攻方向
起义部队进攻方向
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方向
起义部队转移方向
敌军集结地域
敌军增援及进攻方向
敌军退却方向

1927 年 9 月 9 日，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图为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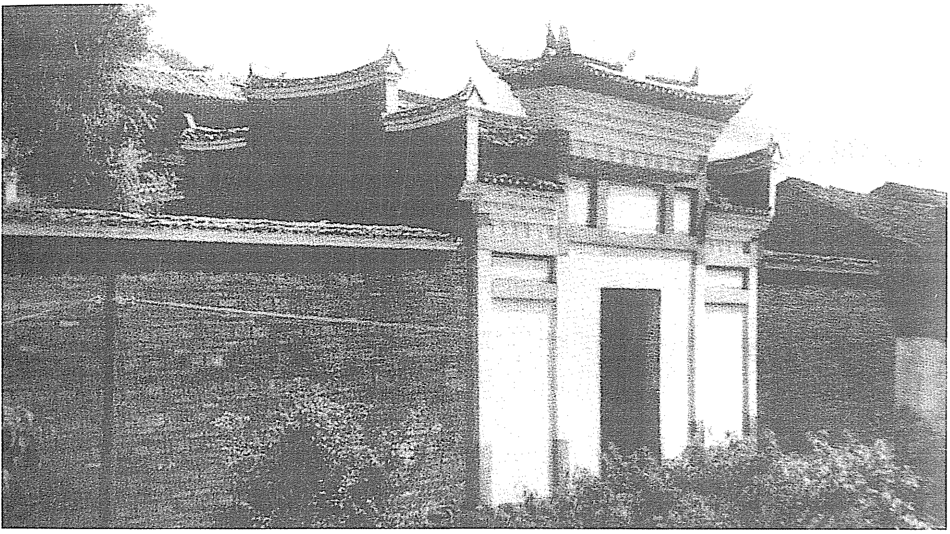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里仁学校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向井冈山进军。图为文家市里仁学校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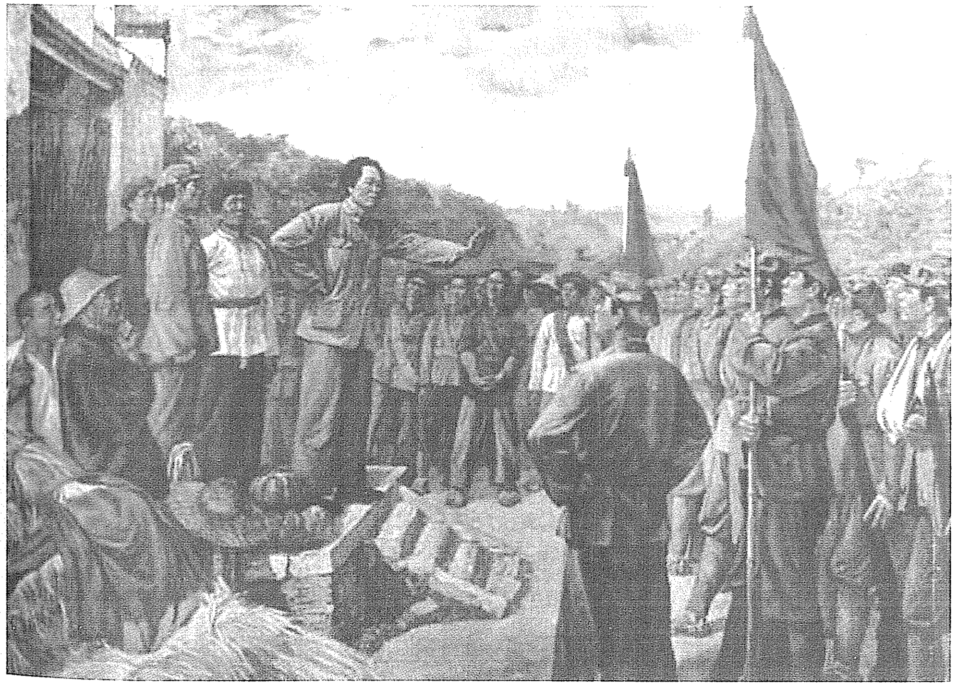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底，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图为三湾枫树坪。

工农革命军士兵委员会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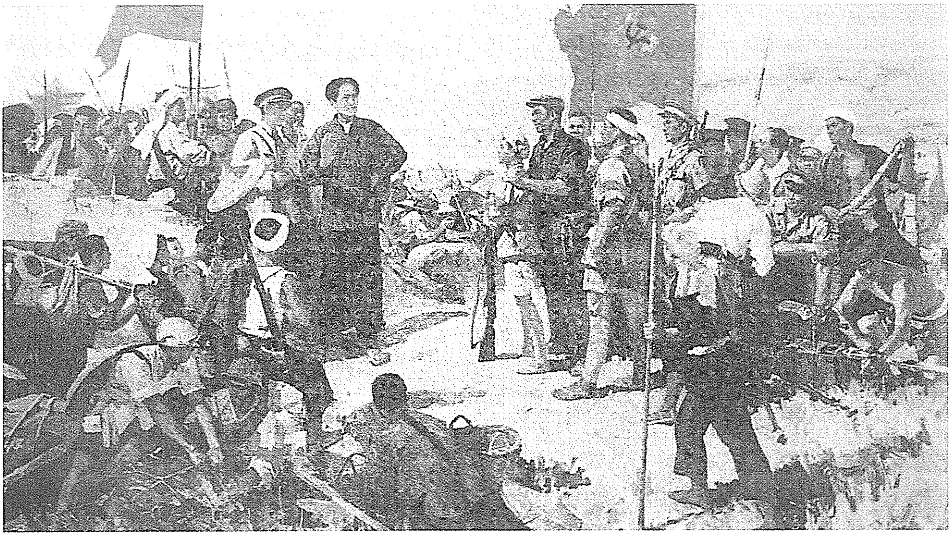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各级党组织和民主制度，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图为三湾士兵委员会的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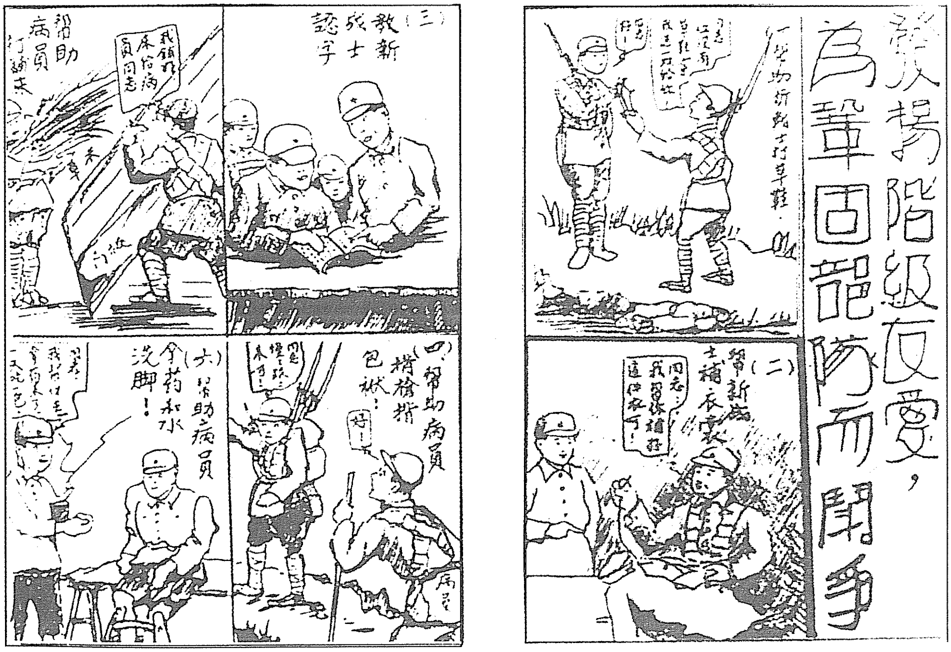
1927年10月3日，秋收起义部队到达江西省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图为会议旧址——联奎书院。



《三湾改编》（油画）



《毛主席在文家市》（油画）


幫助病員打飯來
我領來給病員同志
（三）教新戰士認字
（四）幫助病員揹槍揹包袱：
好！
（六）幫助病員拿藥和水洗脚！
發揚階級友愛，為鞏固部隊而鬪爭
一、幫助新戰士打草鞋。
（二）幫新戰士補衣裳

三湾改编提出了在军队中实行民主制度，改变军官欺压士兵的旧风气，为建立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图为红军当年的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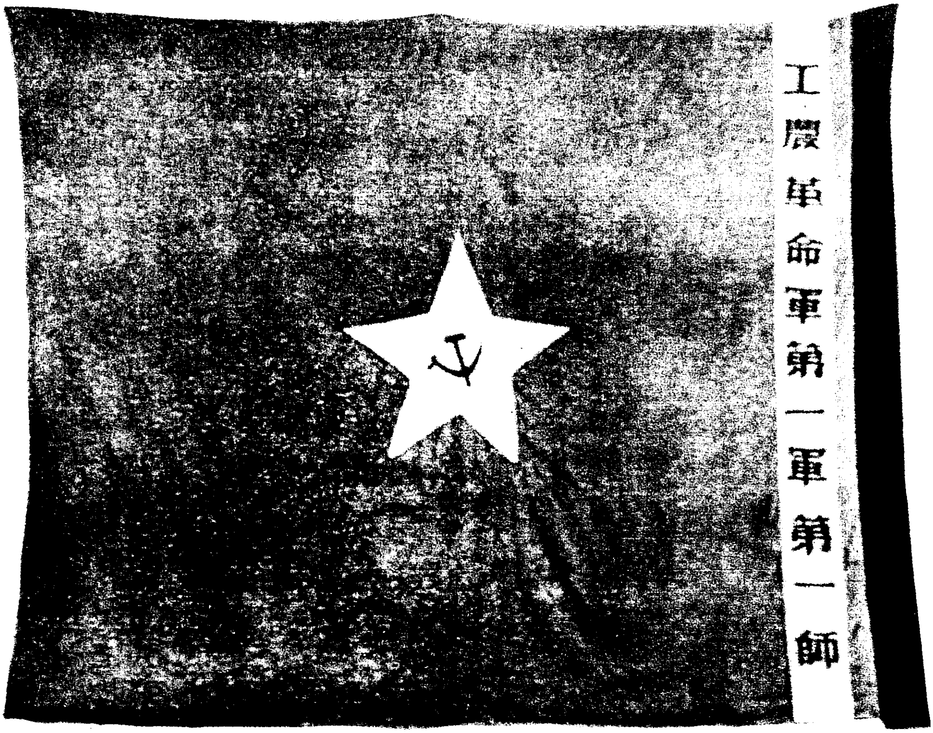
题军旗联[1]

（1927年）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

[1] 1927年9月9日，在湘赣边界的浏阳起义。为了加强对起义军的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独出心裁，亲自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上书写了这副对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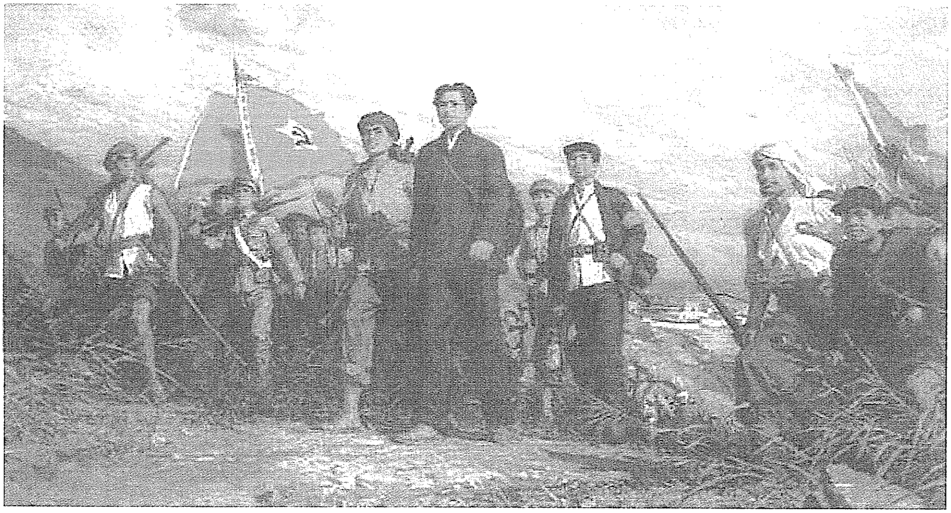


1927年9月，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和湖南省委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奔赴安源，部署秋收起义，并决定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图为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由何长工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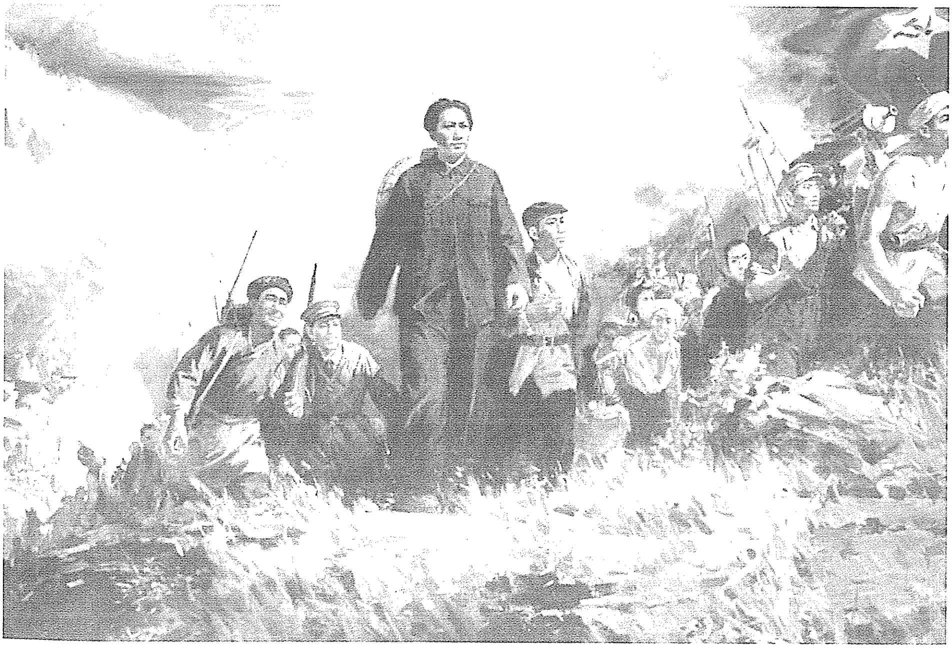
到安源时之报告*

（192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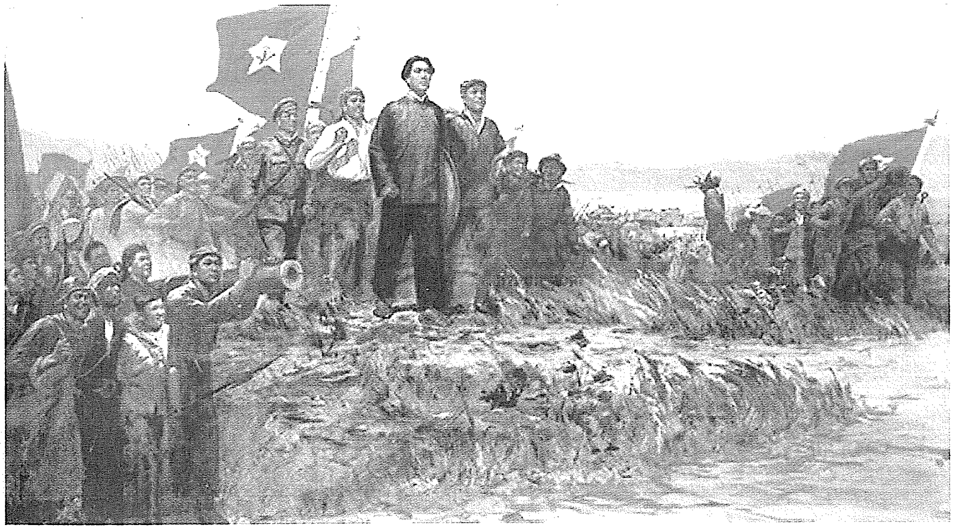
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准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绕道闽边，他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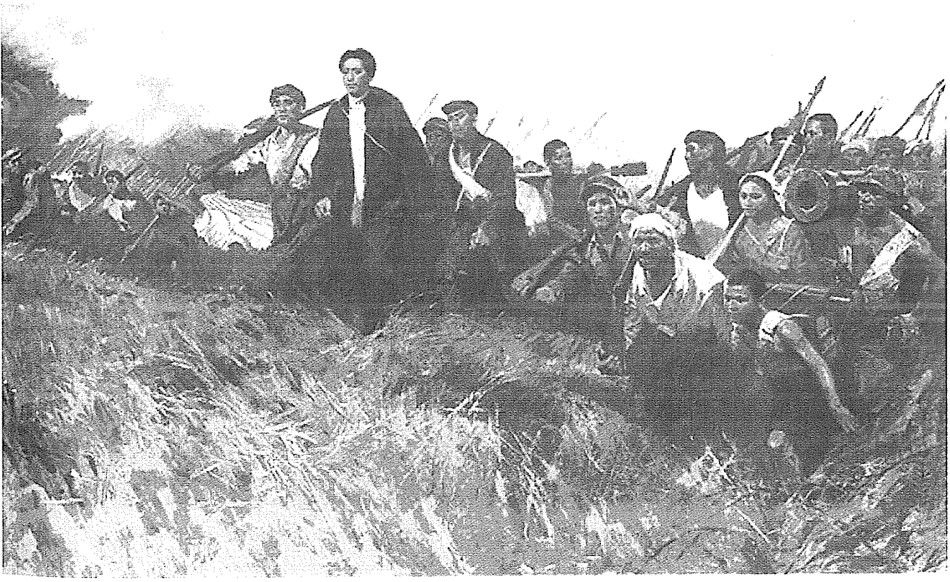
《伟大的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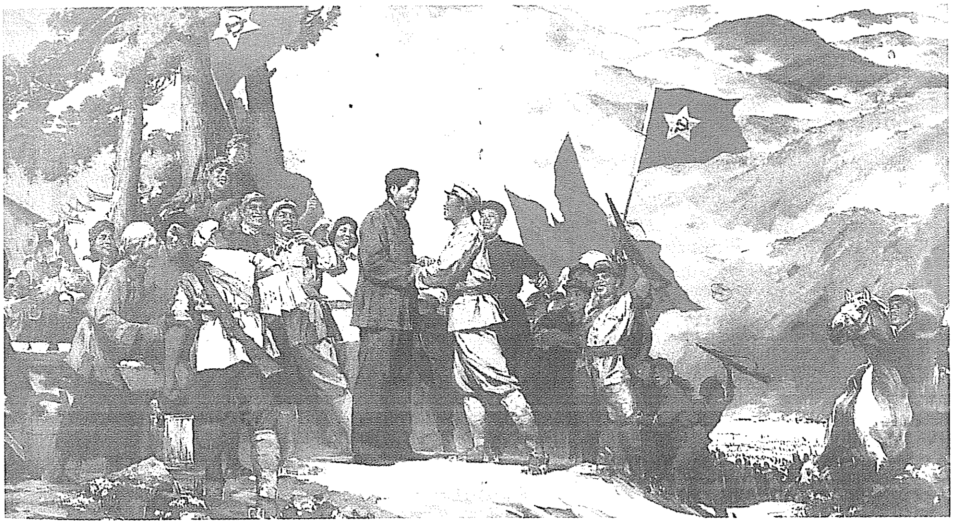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向井冈山进军》（油画）

荆竹山雷打石。1927年10月毛泽东在这里宣布了“三大纪律”。

1928



《井冈山会师》（油画）

题遂川公审土豪劣绅大会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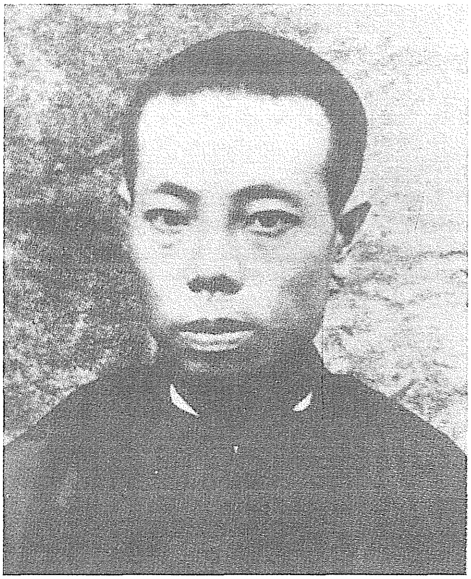
（1928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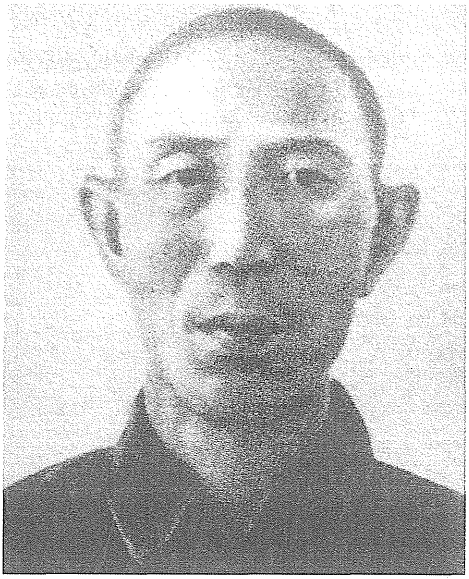
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我今日宰杀土劣[2]，怕不怕，刀上加刀。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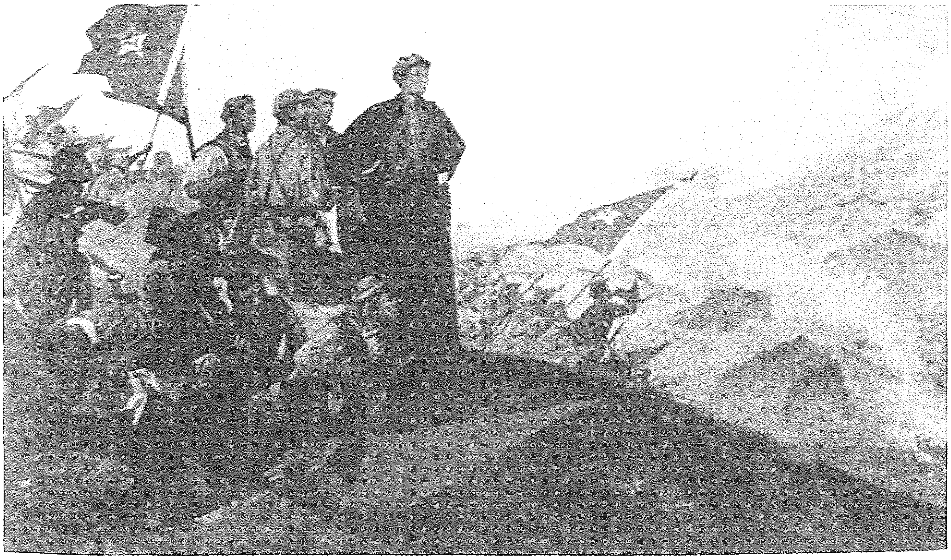
[1] 1928年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队攻克江西遂川县城，1月24日召开成立县工农兵政府的群众大会，公审土豪劣绅郭渭坚，并处以极刑。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并为大会亲笔书写了这副对联。遂川，县名，在江西省西南部，赣江支流遂川江上游，邻接湖南省。

[2] 土劣，土豪劣绅的缩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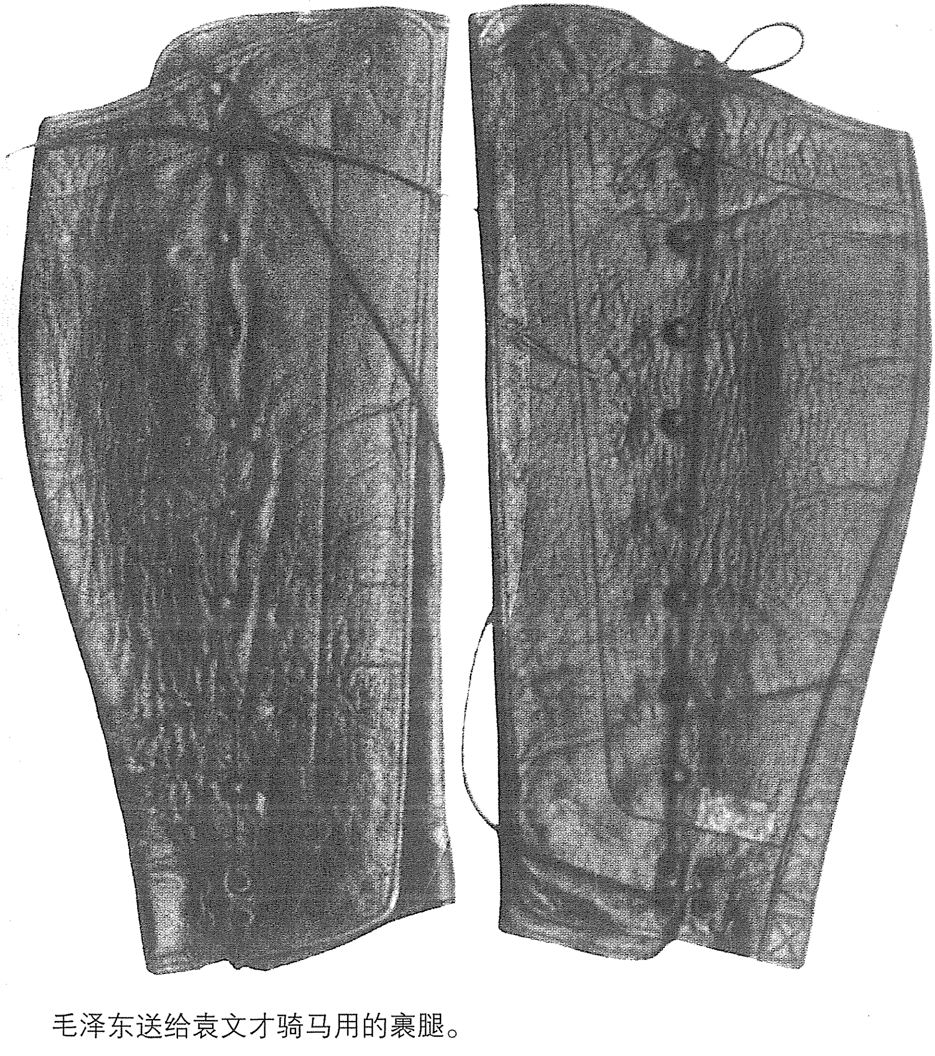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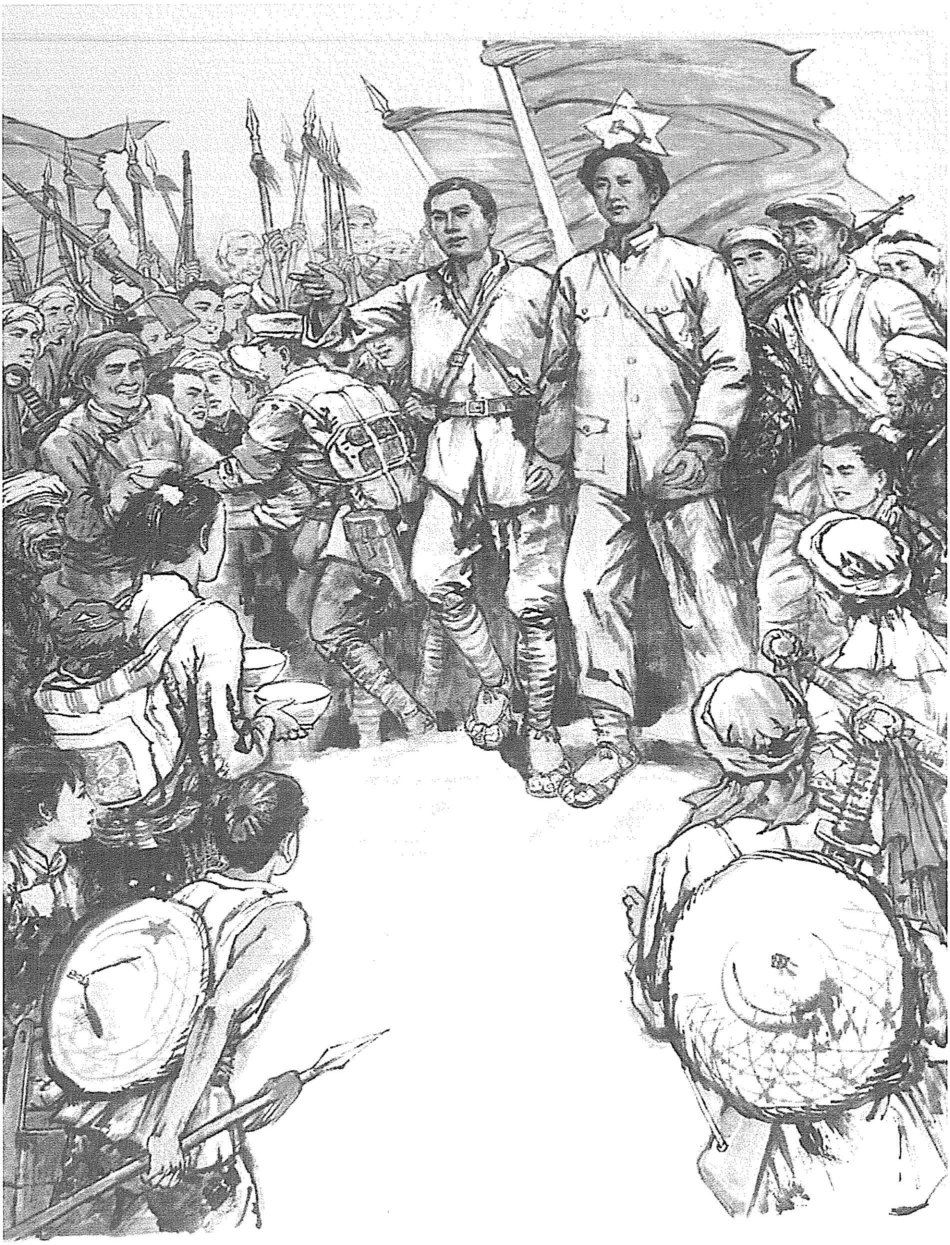
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极力争取、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图为袁文才（左）、王佐。



1928年2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取得井冈山斗争的第一个胜仗，攻克宁冈县城新城，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图为油画《新城大捷》。



毛泽东送给袁文才骑马用的裹腿。



《王佐迎接工农革命军》（中国画）

为井冈山群众题春联[1]

（1928年）

大刀梭镖铲除旧世道；
斧头镰刀开创新乾坤。

---

[1] 这是1928年春节，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给井冈山群众题写的春联。

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1928年5月2日）

中央：

（一）我们失败后——由湘南（军队无甚损失，不过是湘南政权和茶陵政权被破坏了）退至赣边。岂有此理的湖南各县委和县政府带了一大批农军，一起跑来，现在有一万八在这里。

（二）占领的地方是永新、宁冈、遂川三县，不久将会扩充地盘。

（三）追击毛部之杨如轩师，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被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部缴械之营，现在也被朱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兵已溃退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支。

（四）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对内对外都使深入的策略。以永新为中心而附近各县发起暴动，对内建立党军队筹款子，做衣服；对外帮助地方发起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与分配土地。因此决定把打吉安的功夫来做这些事，比较有意义的多。

（五）前湘南特委决定朱、毛两部合编为第四军，指定朱德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朱部编为第十师，毛部编为第十一师，湘南各县农军编入两师中，朱兼十师师长，宛希先党代表；毛兼十一师师长（本任张子清，因他受伤，毛兼代），何挺颖党代表。另一教导大

队，陈毅任大队长。机关炮略备。以朱部二十八团，毛部三十一团为较有战斗力，马马虎虎的军队来很可一打。

（六）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太糟（一部分除外），刻正大加整顿，日益良好。

（七）军委、师委、团党、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日益良好。

（八）吃饭大难。一个月来大多数每天除米三分洋外，别的不消说。不过现在永新这几天筹了些款子。

（九）两省边界距离仅十余县，两省省委历次管不到手。因同志们努力，党的组织活动都在天天发展中。但从三月间周鲁同志（湘南特委代表）来宁冈取消前委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起了不良之现象。去年十二月前委会即有建议组织边界特委，湘省委及中央最好请另派得力同志来此做书记，毛同志任军中工作很难兼职。

（十）我们的永久通信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十一）政治分析、党的重要文件，请时时寄来。

（十二）请将别区不能立足的暴动分子大批送来，不论军事、政治、技术的，愈多愈好。前委之搅事做无骂词又骂受不办呢？睡不觉，现未免是罪恶，现于吉安来信之后，大略意思即把特委组织起来。你以为如何？听兄处明示，组织一是，组织，这以宁冈为中心罗霄山脉政权之建立，党之强有力，军力去造就实在湘赣两省之革命根据地之一，此理毛同志等累次呈明在案。由湘南特委转湖南省委转中央多次，未见奉准驳明文，间以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并非省委明示，前两日接吉安县委的信，又有江西省委亦核定的话，并毛同志任书记的话，仍非省委明示，这怎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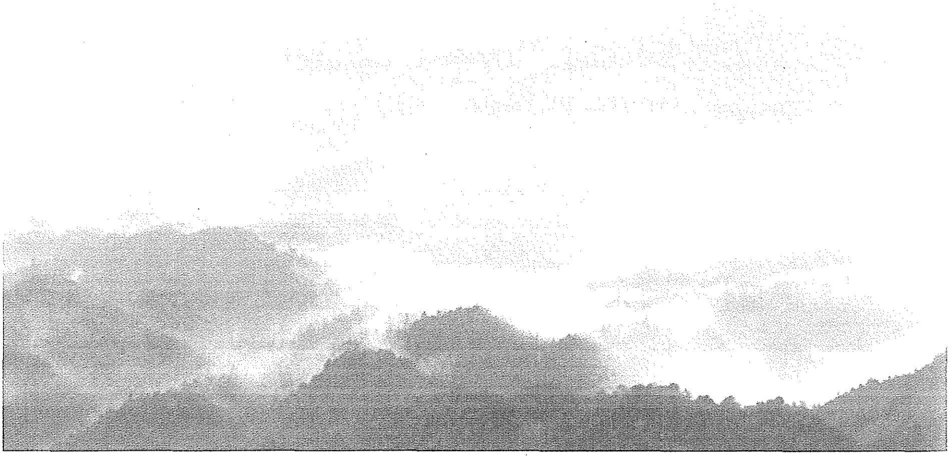
来呢？又怕挨无味的骂。完了。

此致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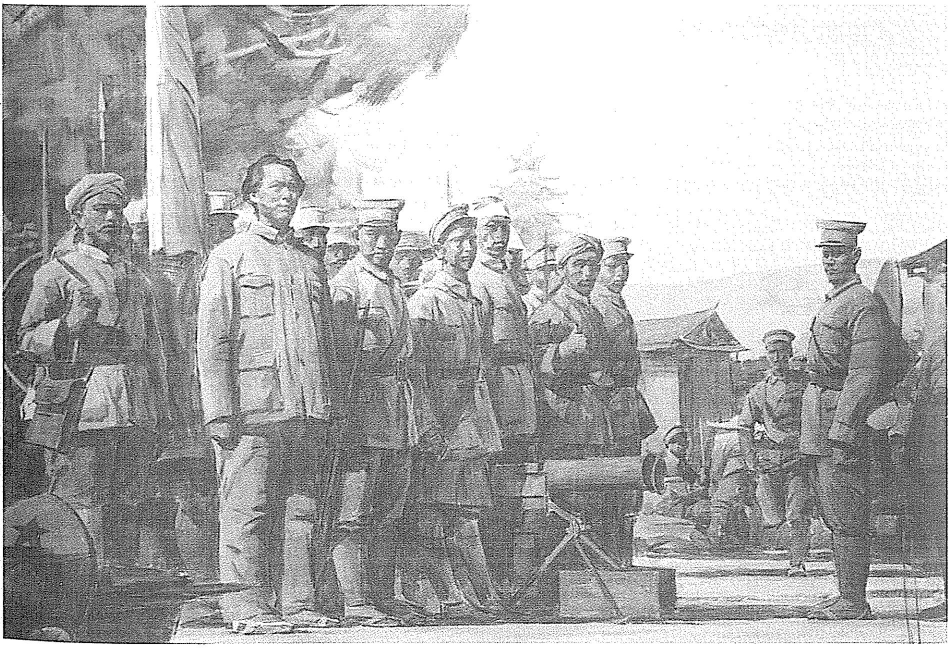
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　毛泽东

五月二日于永新城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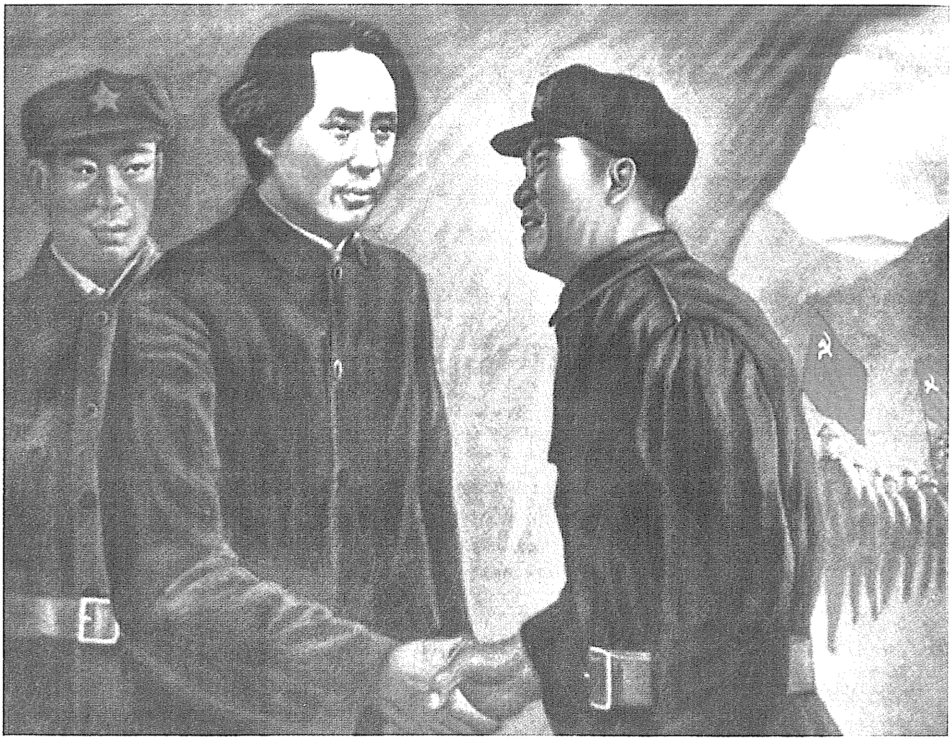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图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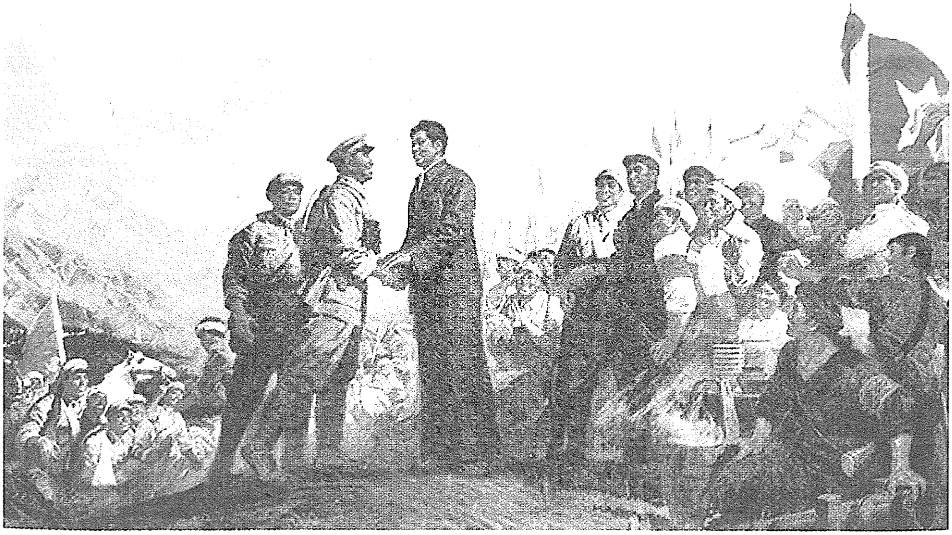
1928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农军和毛泽东部在宁冈砻市会师。图为砻市龙江书院，毛泽东、朱德曾在这里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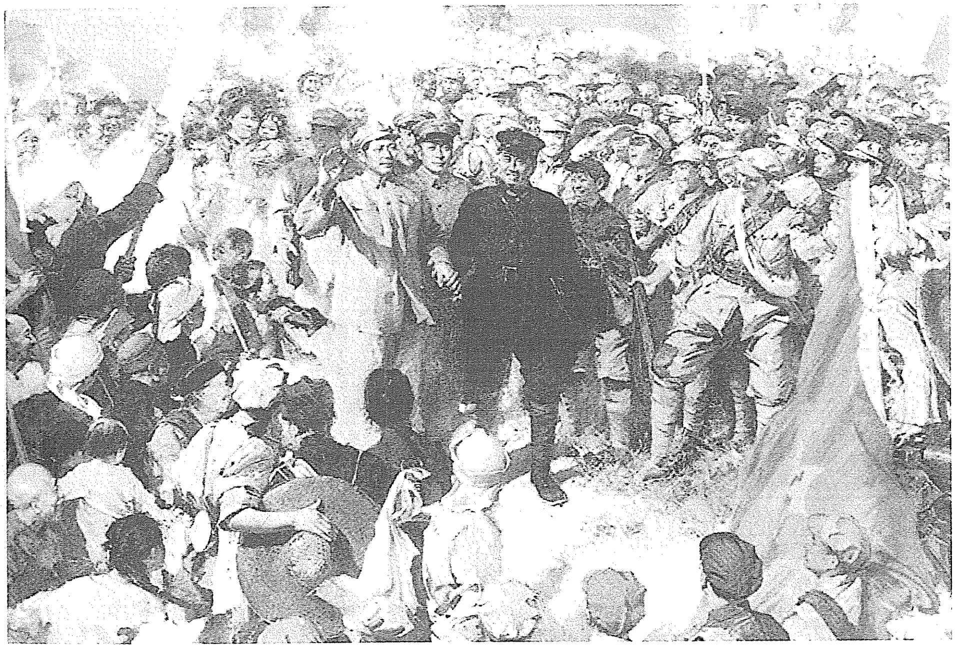
《排头兵的故事》（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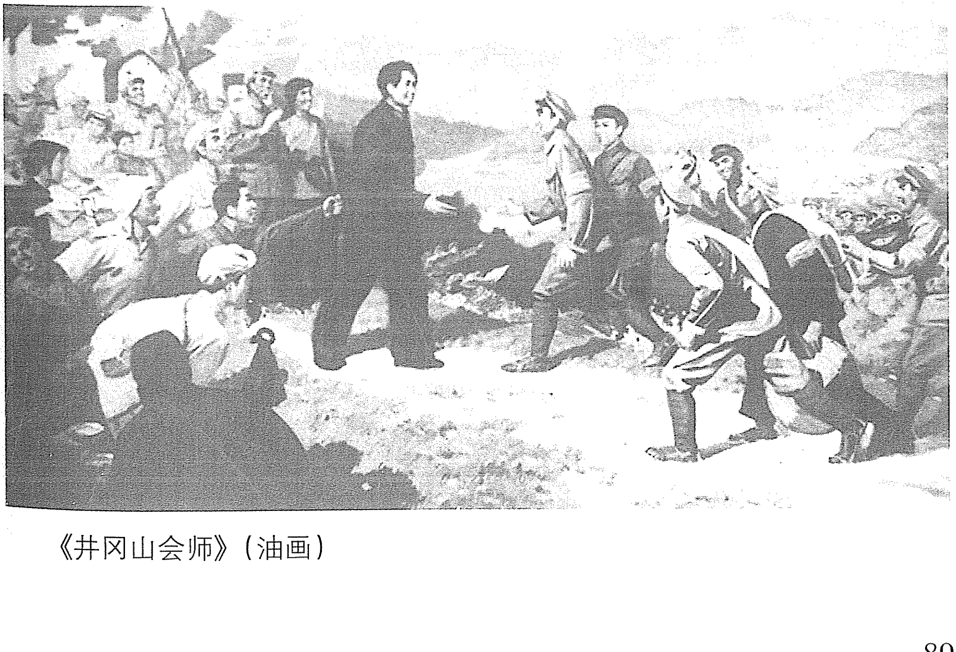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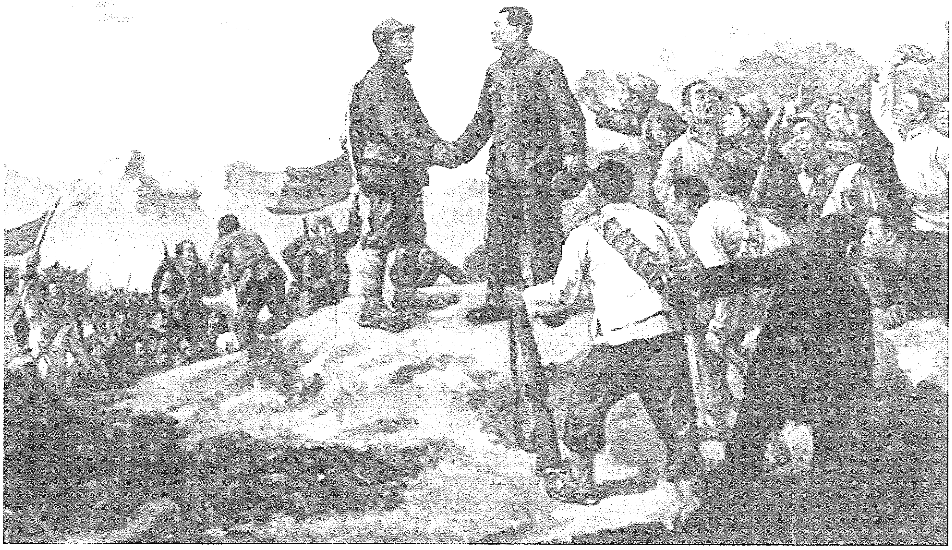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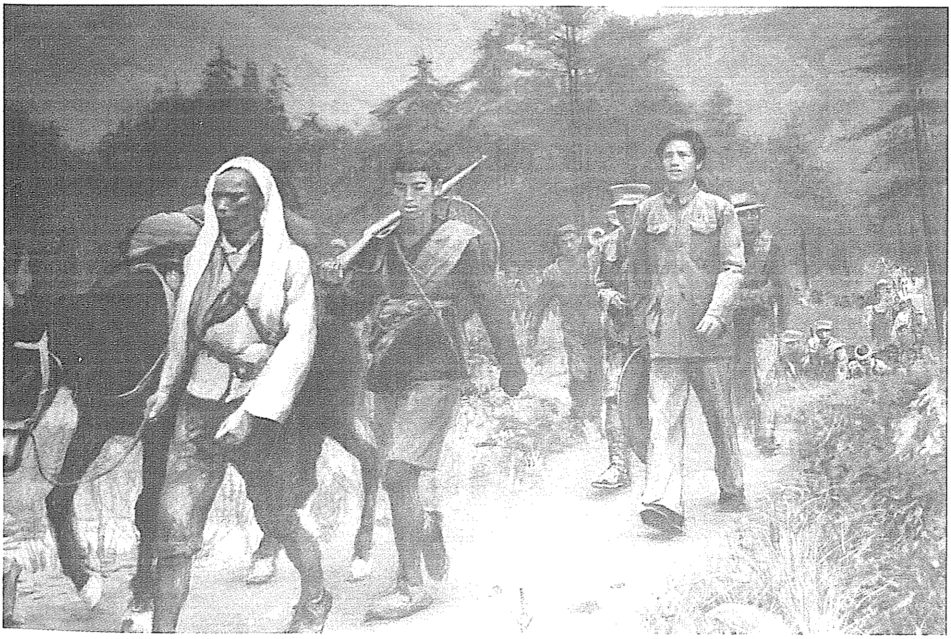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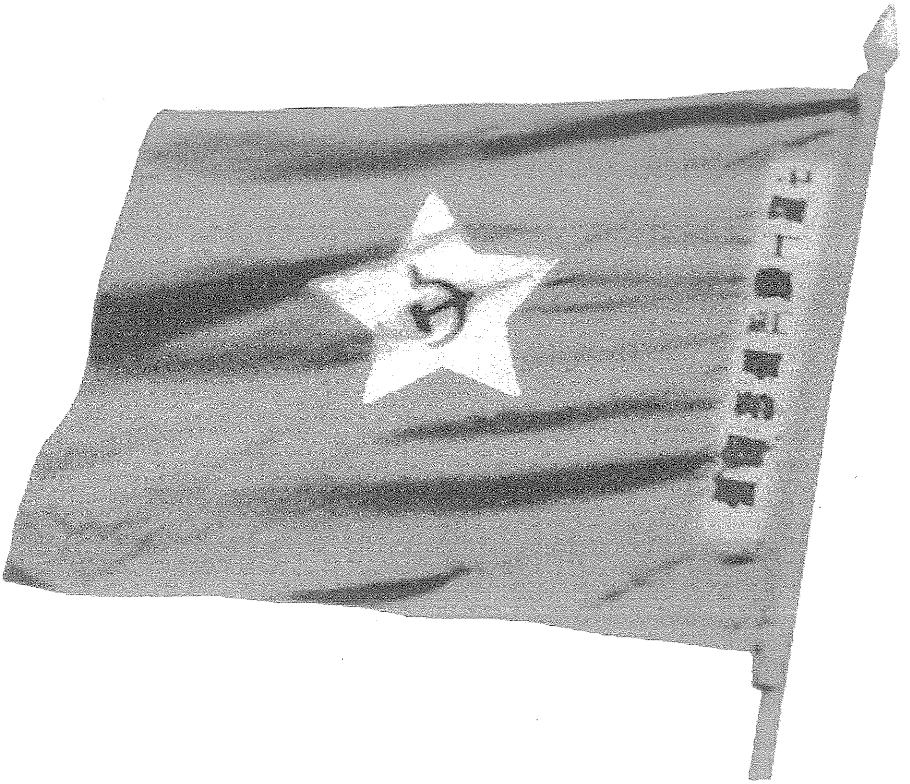
《井冈山会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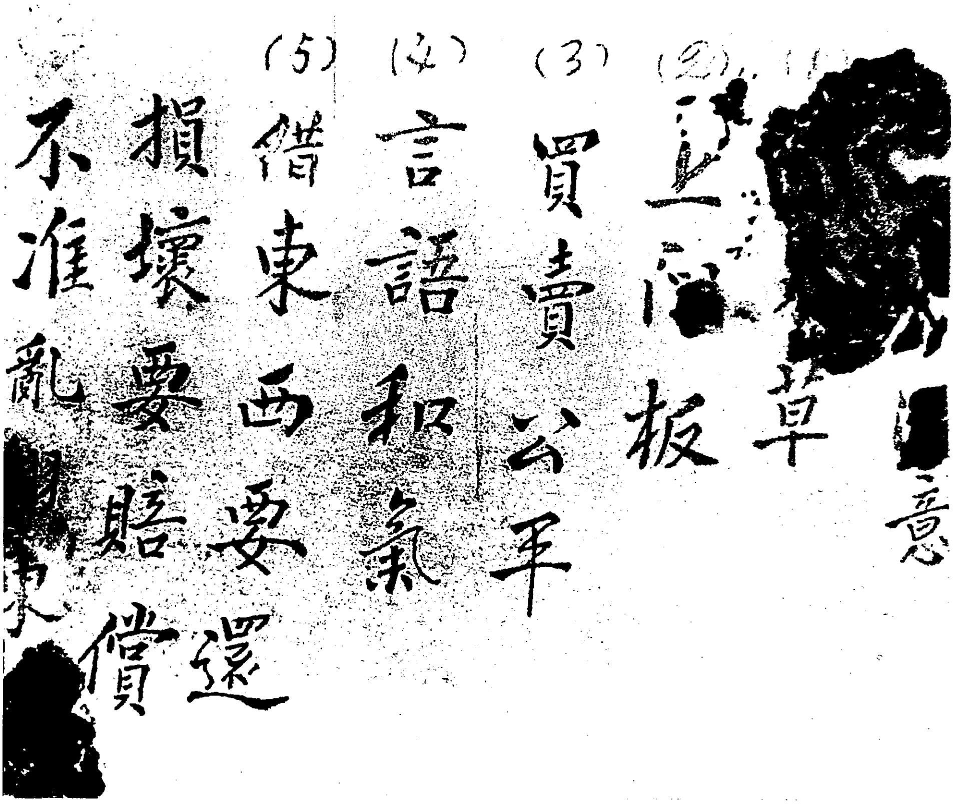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会师》（油画）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油画）



1928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旗。



[illegible]意

(1) [illegible]草

(2) 上門板

(3) 買賣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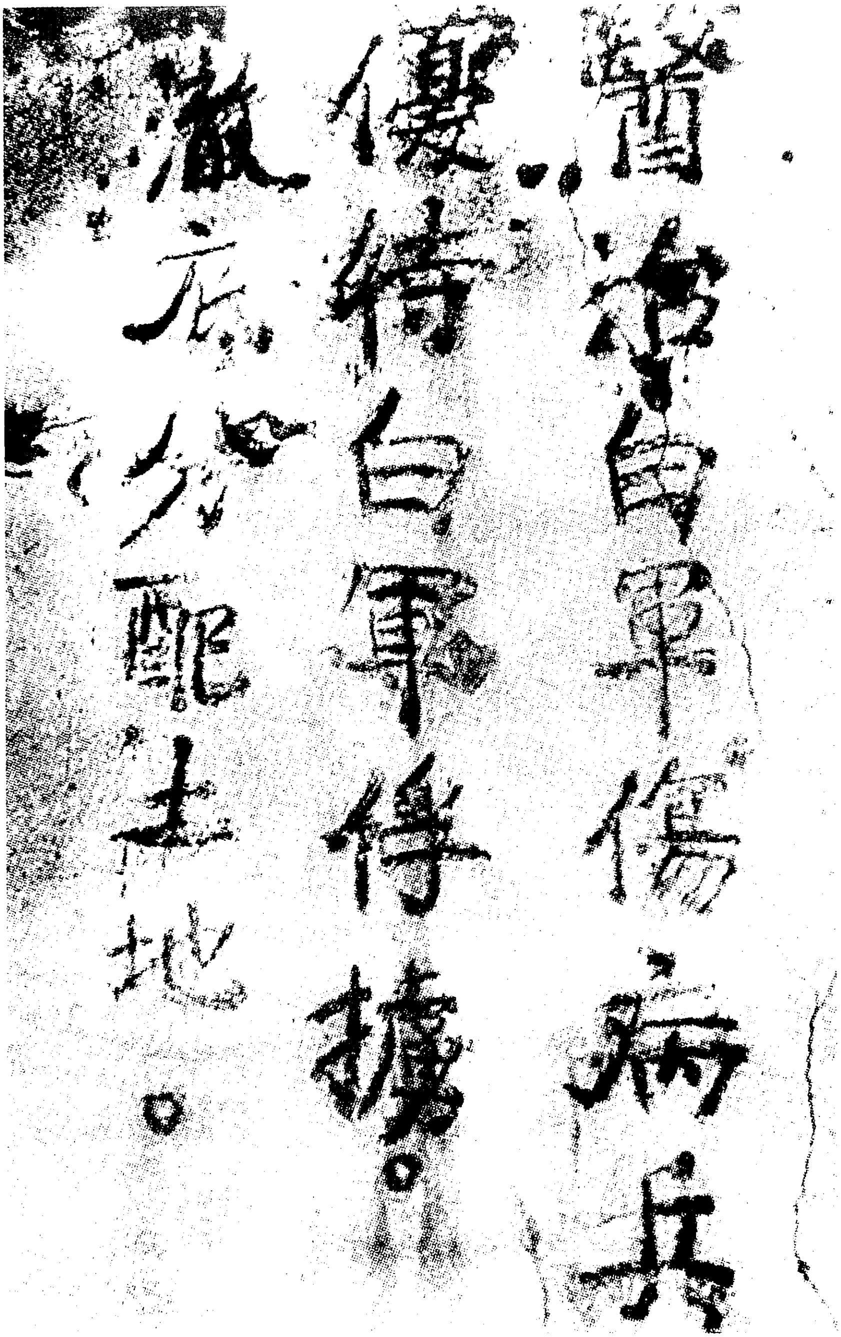
(4) 言語和氣

(5) 借東西要還

損壞要賠償

不准亂[illegible]

1928年，毛泽东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图为红军战士写在包袱皮上的“六项注意”。


醫治傷病兵
優待白軍俘虜。
徹底分配土地。

井冈山斗争期间，毛泽东为部队制定了正确对待俘虏的政策。图为红军战士写的优待俘虏的标语。

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1]

（1928年6月16日）

一、此间争斗已到很剧烈很阔大的时候了。敌人以十团之众（杨如轩[2]四团、吴尚[3]六团）向我们进攻，地主的挨户团[4]当然在外。茶酃两县的广大的农民群众业已被压下。白色清乡把我们党的组织压得粉碎，茶陵的好些勇敢做事的同志被杀，酃县县委负责人被害。第八军最近与我作战四次，一败三胜，但敌人顽强抵抗，已占领之茶、攸只得完全退出，湘南已无寸土。最近有一次军事胜利[5]，五月杨如轩七十九团及二十七团一营，工兵，大炮队，机关枪连，师部，卫生队，输送队，被打得落花流水，虏获颇多，杨已逃吉安（一说负伤），刘团长（二十七团）死，夺获迫击炮七尊，山炮二尊，光洋二十余担，但敌精锐两团仍是在附近永新县城一带，不

---

[1] 这是红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连续“进剿”期间，毛泽东在江西宁冈茅坪写给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的一部分。

[2] 杨如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3] 吴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第八军军长。

[4] 挨户团，是当时农村武装的一种，它分常备队和非常备队两部分。“挨户”是形容几乎每一户人家都要参加的意思。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地方的“挨户团”被地主所夺取，变成了反革命的武装组织。

[5] 指1928年5月中旬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反对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次“进剿”期间的草市坳战斗和重新攻占永新县城的战斗。

敢穷追。此间军事布置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但目前数日按兵未动，俟查明敌情再行决定。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及特委成立，用特委命令才把他们勉强的制止。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A. 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B. 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C. 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

二、吉安来信，始知江西省委已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陵、攸县、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1]，议决政治问题，政治纪律，暴动口号，政纲，选举负责人（工农分子占多数）。宛希先、毛泽东为常委，朱德、陈毅、刘辉霄为候补常委，暂推毛为书记。泽东此刻在学习时期，实在不能担任。以后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1. 普遍发展六县之党。2. 发动当地农民的暴动。3. 改造军队变成真正的红军。4. 在军队中建立健强的党。5. 办军校及党校。盼望政治消息，请湘东特委担任政治消息传达，三日一次。取报纸在高陇牺牲营长一、连长二、兵士五十人以上，最后因朱德会攻才获着胜利。6. 四军军委书记今日开始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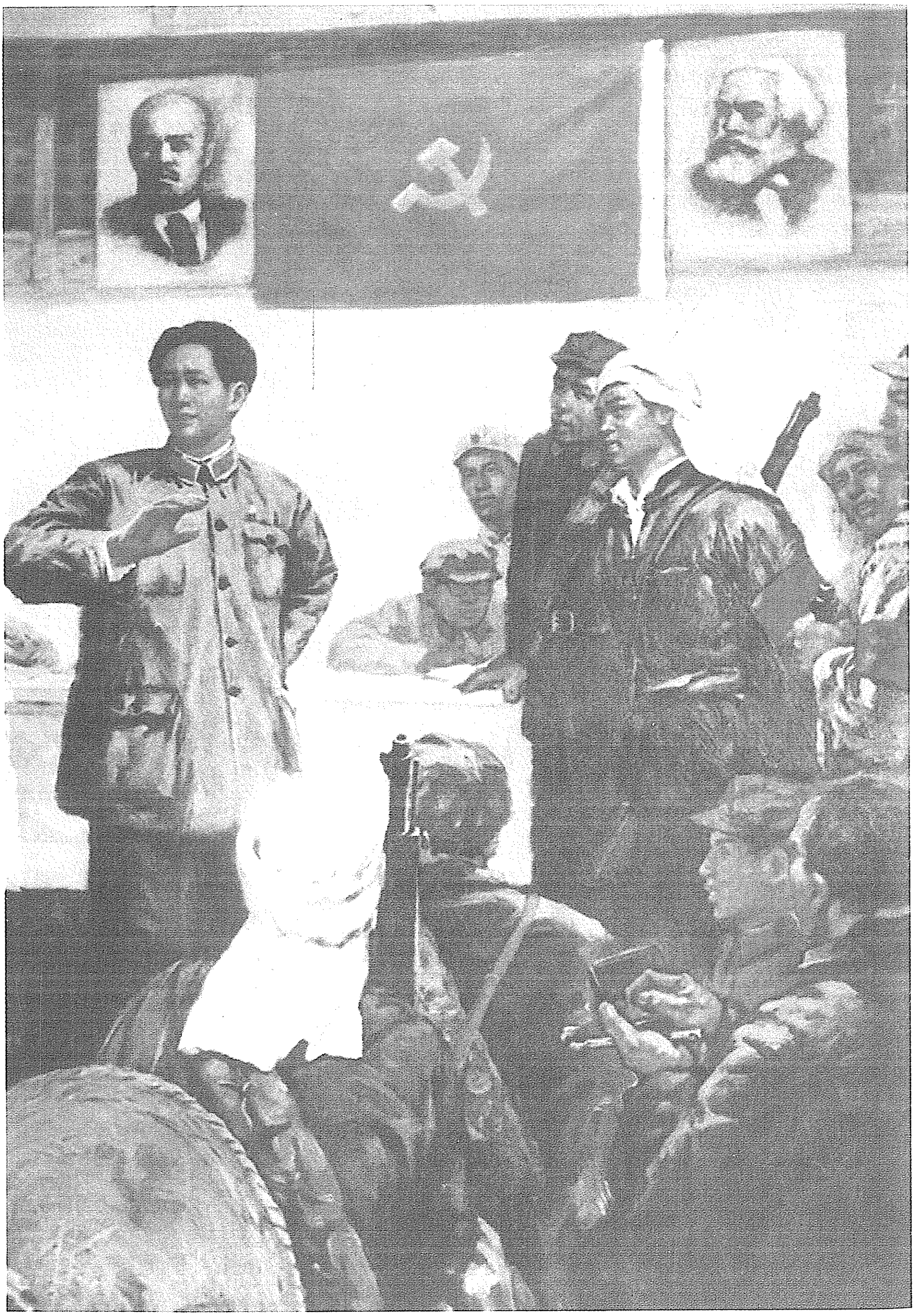
---

[1] 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中是1928年5月20日。

1928年4月至6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打破了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二、三、四次“围剿”。图为红四军第四次反“围剿”龙源口大捷旧址。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图为湘赣边界党的“一大”会址——茅坪谢氏慎公祠。

1928年5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最高政权机关——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宁冈茅坪成立。图为苏维埃政府旧址。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油画）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28年7月4日）

湖南省委：

袁、杜二位同志于六月三十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收到，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六月二十三日击溃杨池生后，四军已大部来永新向莲花、安福及吉安之西南端游击，筹款并发动暴动，即于六月三十日晚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愿住定一处艰苦地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行走徒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

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钧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后且补可用适当战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分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所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尚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乃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尚、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尚、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

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若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之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为之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　军委

七月四日于永新城

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钧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后且补可用适当战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分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所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尚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乃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尚、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尚、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月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

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困难，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若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之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为之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委　军委

七月四日于永新城

湘赣边界特委致湖南省委信*

（1928年8月）

湖南省委：

（1）杜同志来及来信均悉。五月卅日此间军委召集扩大会，由杜同志报告政治情形，并宣读省委来信，扩大会完全接受，对杜同志综合各地实际斗争的教训之报告，亦极重视。关于省委信中应解释者有下列几点：A. 实力……但以游击战争汇合湘南湘东赣西赤色努力，唯力是视，不过行动应侦察敌情，才能决定。B. 以少数武装编成独立团营的错误，亦极接受，不过此间并未曾做过。C. 此间系朱毛部及湘南农军而成，现在湘南农军已回去活动，原系□师编制，后改为□团，取消师部，组织军部，直接指挥。

（2）省委指出焚烧城市的错误，此间决不再犯。

（3）军中的党在形式上已普遍组织，组织形式上照国民党革命军的党之组织。

（4）军中CY组织，在过去湘南特委指示要成立，数月的经验，在工作方面感觉许多不便，在四军CY第二次大会决定合并。此次扩大会亦认为有合并的必要，不过非局部所能解决，须有省委作最后之决定，但此主张与取消派不同，CY有干事会，可以尽量参加工作。

（5）改造军队，洗刷流氓无产阶级当尽力去做。

（6）废除饷银制度，此间早有计划，但事实上兵士生活困难，兵士之耐劳艰苦，颇属难得。

（7）请派大批安源矿工来此当兵。

（8）军委成立，省委指定泽东为主席，此节似无必要，因此间地方工作，需人尤其迫切，军委组织亦无完善，书记为陈毅同志，此节未执行。

（9）湘南特委随军到资兴，取道安仁回衡阳，宜郴负责人已回去。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

（1928年10月5日）

一　国内的政治状况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2]，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

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3]，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题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2] 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在1935年12月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1939年12月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曾作了详细的说明。

[3] 蒋派指蒋介石派。桂派指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派。冯派指冯玉祥派。阎派指山西军阀阎锡山派。他们曾经联合对张作霖作战，于1928年6月占领了北京和天津。

一个对张作霖[1]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此次失败中，受到很大的打击，中国资产阶级（非买办豪绅阶级）也受了打击。但最近数个月来，工农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的城市罢工和农村暴动，在南北各地发展起来。军阀军队中的士兵因饥寒而酝酿着很大的不安。同时资产阶级在汪精卫、陈公博一派鼓动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发展着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2]。这种运动的发展是新的事实。

---

[1] 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1924年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打败后，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一个军阀。1926年他联合吴佩孚入据北京。1928年6月，他从北京退回东北，在路上被向来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炸死。

[2] 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及蒋介石公开对日妥协之后，曾经追随蒋介石参加1927年反革命政变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的在野反对派，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当时，同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政客，曾在这个运动中进行投机活动，形成了国民党中的所谓“改组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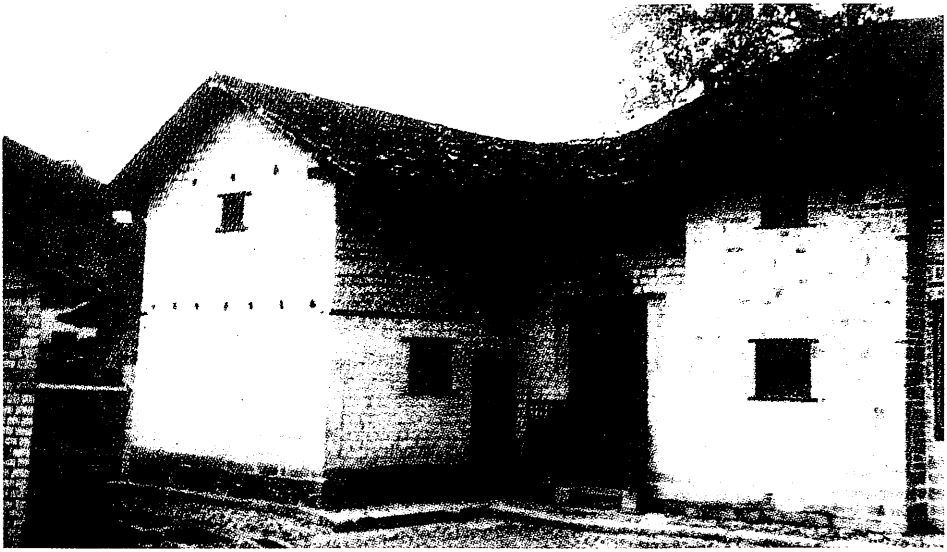
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内容，依国际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这种革命的实际运动，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发展的。

二　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1]，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

---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来属于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方许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占领，那里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及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组织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广泛统一战线，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已开始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政治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国主义企图继续原来的殖民地统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种相当有力的武装力量，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而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除美国以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阵线在中国被突破，因而使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已在世界上发生很大的动摇。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根据这种新的情况，毛泽东于1928年对于在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条件下这一个问题上所作的观察，已有了改变。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图为毛泽东撰写这两部名著的地方——茅坪八角楼。

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仅仅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小块。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

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所以广州产生过三天的城市民众政权，而海陆丰、湘东、湘南、湘赣边界、湖北的黄安等地都有过农民的割据[1]。至于此刻的红军，也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分化出来的。那些毫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毫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

---

[1] 这是指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各地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最初爆发起来的对反革命势力的反击行动。在广州，1927年12月11日，工人和革命士兵在一部分市郊农民的配合下联合起义，建立过为时3天的人民政权。广东省东部沿海的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在1927年5月和9月举行起义，都曾经建立过革命政权；在这年10月举行的起义中建立的革命政权，一直坚持到1928年3月。在湖南省东部，1927年9月，起义的农民曾经占据过浏阳、平江、醴陵、株洲一带，醴陵农民并于1928年2、3月间建立过农村革命政权。湖北省东北部的黄安（今红安）、麻城等地的起义农民，曾经在1927年11月占领黄安县城，建立革命政权20多天。在湖南省南部，1928年1月，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等县的起义农民，建立过革命政权达3月之久。

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继续地向前发展，而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停顿，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1]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三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

军阀间的分裂和战争，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势力。因此，小地方红色政权得以乘时产生出来。但军阀之间的战争不是每天不停的。每当一省或几省之间的白色政权有一个暂时稳定的时候，那一省的统治阶级或几省的统治阶级必然联合起来用尽力量来消灭这个

---

[1]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红色政权。在为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所必须的各种条件尚不完备的地方，便有被敌人推倒的危险。本年四月以前乘时而起的许多红色政权，如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就是这个道理。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军队，随时都有八九个团以上的兵力，多的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党的特委和军委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1]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上地形之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之不尽一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中的各次胜利。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并且不能阻止此割据的日益扩大，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加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候，反而采取统治阶级政治破裂时候的战略，分兵冒进，致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同志不察当时环境，不顾特委、军委及永新县委联席会议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意见，其错误实在

---

[1] 罗霄山脉是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大山脉，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

非常之大。这种失败的形势，因为九月以后特委和军委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步骤，而挽救过来了。

四　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

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使边界土地革命和民众政权的影响远及于湘赣两省的下游乃至于湖北；使红军从斗争中日益增加其数量和提高其质量，能在将来三省总的暴动中执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县地方武装即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提高起来，此时能够与挨户团和小量军队作战，将来能够保全边界政权；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渐减少依靠红军中工作人材的帮助，能完全自立，以边界的人材任边界的工作，进一步能够供给红军的工作人材和扩大割据区域的工作人材——这些都是边界党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任务。

五　经济问题

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1]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

---

[1]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是指农民以外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各种自由职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中国的这类社会成分主要在城镇，但在乡村中也占有相当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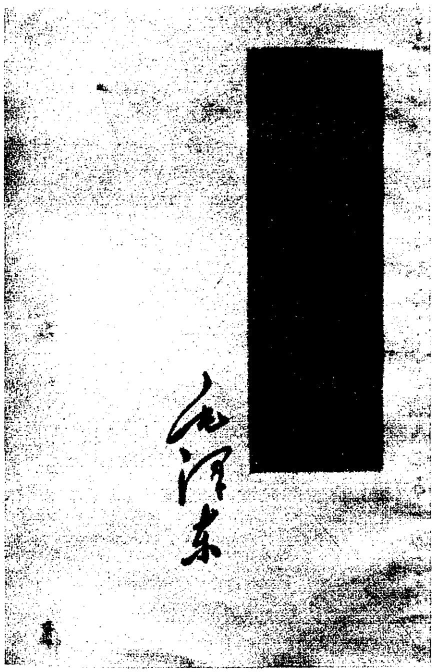
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这种困难，在全国总政权没有取得以前当然是不能免的，但是这种困难的比较地获得解决，使生活比较地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地充足一点，则是迫切地需要的。边界党如不能对经济问题有一个适当的办法，在敌人势力的稳定还有一个比较长的期间的条件下，割据将要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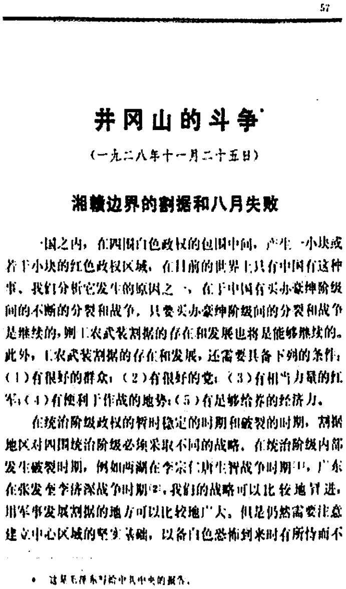
六　军事根据地问题

边界党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大小五井[1]和九陇两个军事根据地的巩固。永新、酃县、宁冈、遂川四县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区，和永新、宁冈、茶陵、莲花四县交界的九陇山区，这两个地形优越的地方，特别是既有民众拥护、地形又极险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边界此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就是在湘鄂赣三省暴动发展的将来，亦将仍然是重要的军事根据地。巩固此根据地的方法：第一，修筑完备的工事；第二，储备充足的粮食；第三，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把这三件事切实做好，是边界党应该努力的。

---

[1] 大小五井山区，指介于江西西部的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东部的酃县4县之间的井冈山，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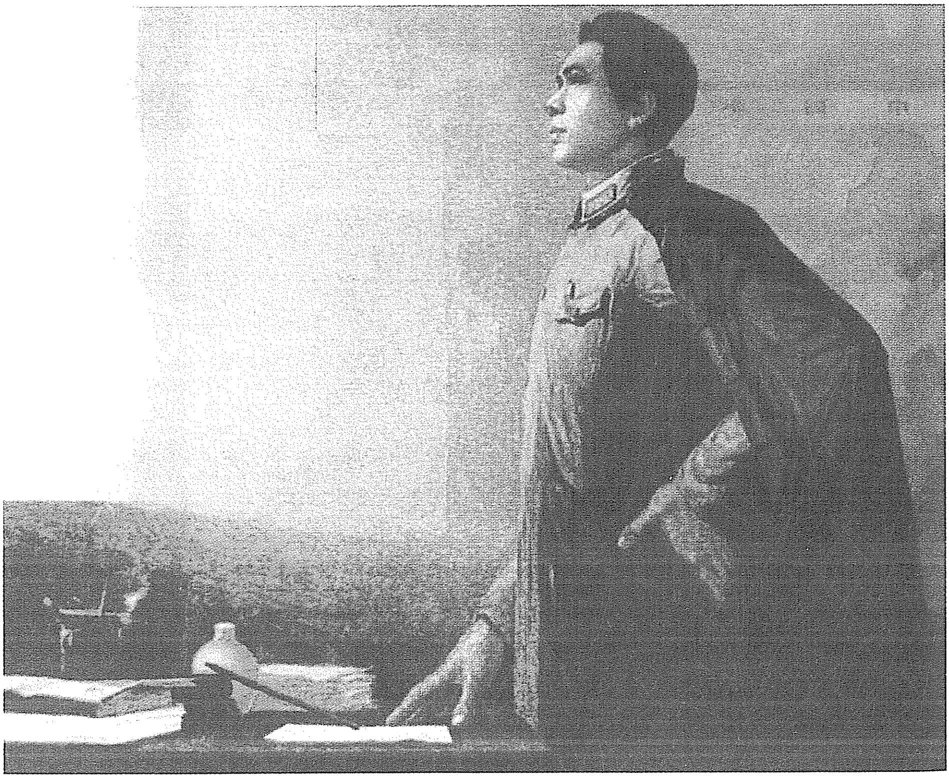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1]，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2]，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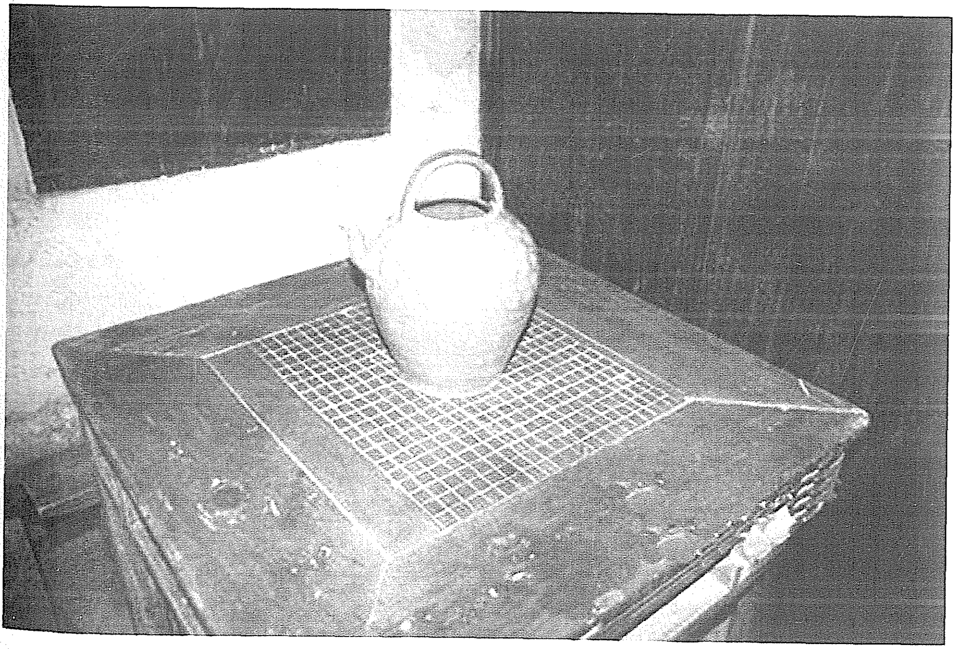
*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部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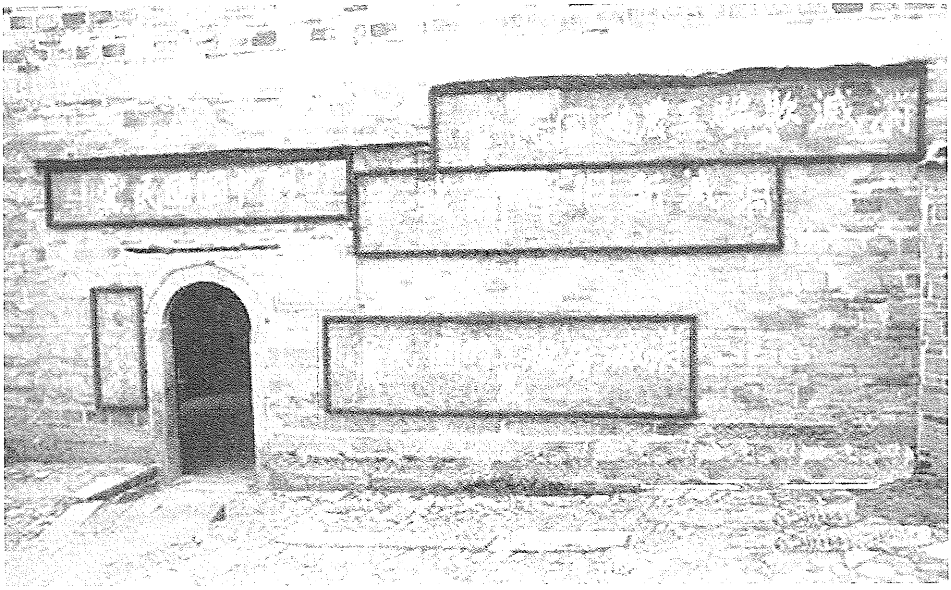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八角楼》(油画)

毛泽东在八角楼办公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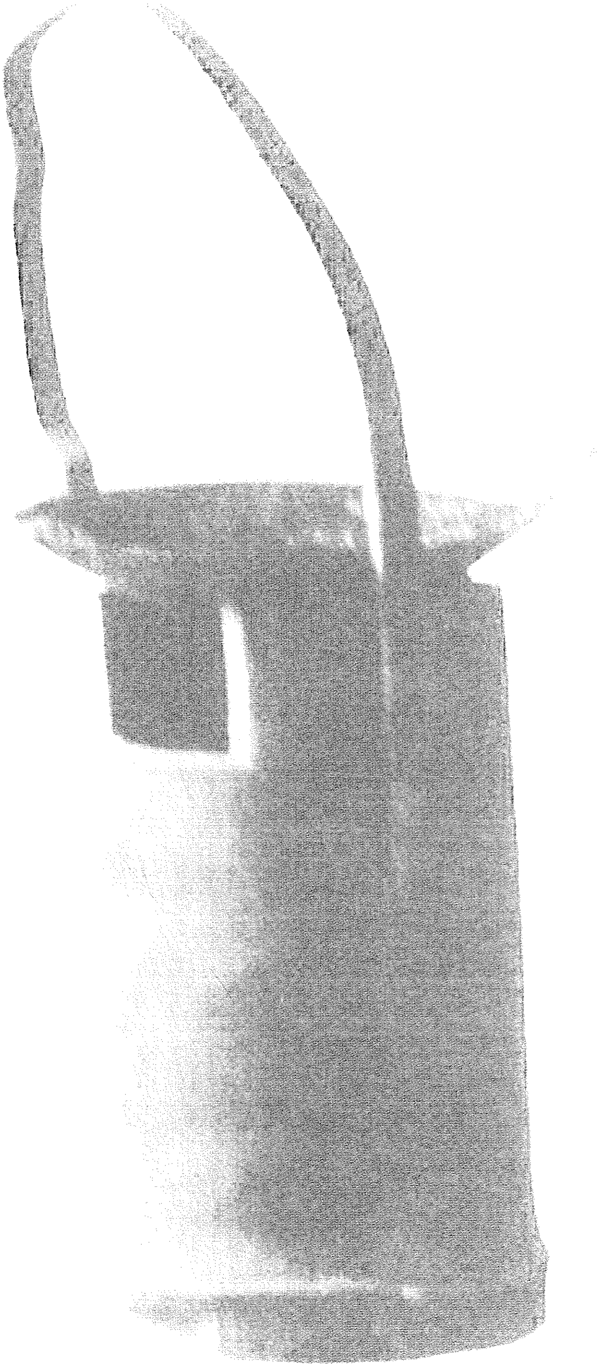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朱德在八角楼空闲时下棋用的四方桌。



八角楼的墙上还有当年红军战士写的几条标语。据老同志回忆，这些标语是当年贺子珍带着红军宣传队书写的。

八角楼内的大院里，至今仍保留着毛泽东、朱德当年使用过的拴马桩。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使用过的油灯。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8年10月5日）

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

（内容参见《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

边界各县党的改选与建议

边界特委是最近四个月才产生的，在此短短的期间内，虽然曾领导工农红军做过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及给旧社会以伟大的破坏等工作，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攸县的党到现在还未建立。其他各县党的影响亦只及各该县之大部或一部，并未建立坚实的中心区域及普遍发展到四处的广大群众中去。故建立攸县的党和各县的坚实中心区域及普遍建立各县党

的基础，同样是边界党部今后的重要责任。

一　过去党的错误

1. 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遗毒太深，依靠军队而不领导群众作独立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2. 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上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其他各县，如宁、酃、莲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作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组织上很严重的错误。

3. 过去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领导及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珍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误解。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紧急会议中虽然很严重地指出了这种错误，特委经常有三个常委驻会指示工作，但各科及秘书等机关，因人才缺乏之故，仍然无法建立，加之特委工作人员病者极多，政治时生变化，各县委与特委的关系不能密切，故特委本身反对各级总部的指示，仍然没有尽量执行紧急会议之决定。

4. 指导机关，多数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对于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缺乏注意。

5. 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底，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6. 过去党没有注意基本组织——支部。

7. 过去党的工作方式不对。党的一切问题应该集权于常委会，

组织科、宣传科等不过是常委会的技术机关。但是边界的党，不但没有集权到常委会，甚至连组织科都没有，而仅是书记一人的独裁，紧急会议后，特委本身及永新县委比较好点（由常委会决定各项工作），但特委以下之各级党部，仍然犯同样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正。

8.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员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在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

9. 过去工作，上级与下级隔开，下级对上级也没有很好地巡视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

10. 过去党太少注意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

11. 过去特委只注意军事范围的布置，如宁岗、永新两县工作，没有顾及全部，以致成为军队附属品。如军队打到某县，就注意某县的工作，军队没有到某县，某县的工作就不注意了。

12. 过去党太不注意团的工作，甚至有取消团的倾向。

二　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

1. 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领导。

2. 特委县委都须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

3. 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提拔工农分子，特别要注意教育的意义。

4. 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各科都是技术机关。

5. 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1]，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6. 党应该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办法产生。

7. 党员成分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

8. 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一个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夫式的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基础。

9. 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同时要特别注意城市支部工作，并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在乡村中的党员，须选出先进分子，加以特别训练，以培养成党的中坚。

10. 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应当极力注意秘密工作，反对依靠军事政治势力去组织党，应在敌人范围内秘密组织党，反对逃跑和“打埋伏”。

11. 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攸县县委应马上建设，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

---

[1] 原文如此，疑缺内容。

12. “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仰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地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

三　各县工作问题

各县工作详细计划由特委负责讨论。

四　农村斗争问题

1. 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的错误。

2. 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并没有施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上花茶陵比较好点）。

3. 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水，中农动摇。

4. 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地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5. 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即组织：（1）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

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主干。（2）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的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变为赤卫队。（3）在工农群众中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五　工人运动问题

1. 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

2.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工人，我们党须用大的力量去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由零碎经济斗争进而武装暴动，纠正过去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

3. 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

六　兵士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在执行中必须将工农兵三种力量很好配合起来，然后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尚未实现，故军阀豪绅买办阶级得以运用封建关系愚弄工农而雇用之，以为保护他们的工具，故现在的士兵有大多数尚安心在敌对阶级指挥之下过饥寒交迫（敌军有几年未发过饷的）的生活。但在国民党未叛变之前，国民革命军相当地

都受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宣传。至于事变以后，投入军营的（农灾协或工会的办事人）当然更有觉悟。这些觉悟分子在反动军官高压严密的防范下，而又苦于找不着领导者，故不敢轻易在反动军营中做宣传组织工作，实则他们的革命情绪，反水志愿是很丰富的，这可以证明在客观上的士兵运动的可能性，实在已经具备了。而且此运动的成功，在湖南、广东等省，已有事实可据。现在反动统治的屏障，完全是靠几百万尚未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我们士兵运动做得好，则反动统治很迅速地便要倒台，反之，我们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门做农民工作，则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

边界各级党部向来少注意士兵工作而只顾工农运动（有些党部还仅只有农民工作）。须知我们过去许多失败的经验，主要原因是没有士兵运动参加暴动（如去年广东的年关暴动、湖南屡次的暴动失败……），现在如再不注意，则将来的失败便可预言。很明显的，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方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级党部必须努力进行士兵运动。莫忘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要将工农兵三种势力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

1. 士兵运动此时与工农运动同样重要，各县应有计划有组织地选派大批工农同志去反动军队内当兵、当夫、当伙头……在敌兵内部起作用。尤其是永新、茶陵、辽川等大部敌兵汇集的县分，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2. 加紧对敌兵的宣传工作。

3. 派人到敌人内部去组织党，不要组织士兵委员会，以免组织复杂而易于惹起敌军军官之发觉。

4. 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做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

5. 造谣、恐怖煽动，以动摇敌军人心，由动摇而瓦解。

七　宣传问题

1.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

2. 特委县委宣传科，应设法使之健全，每周标语宣传大纲，都须按期发出，每日壁报亦应发给各级党部缮写张贴。各游击队出发游击，都须有很好的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宣传队、个别宣传）。

3. 以后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工作报告，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阅。特委县委每周应有宣传大纲发给各下级党部。

4.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应极力分析军阀内部的冲突，注意反对军阀混战的宣传工作。同时，应极力宣传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说明军阀混战其结果必被工农暴动所消灭。

5. 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

6. 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

7. 此时我们应对同志和群众，详细分析统治阶级与政治上经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动的势力，

打破灰心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门依靠军队的等待观点（自然我们不否认军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

八　训练问题

1. 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2. 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材料，计划每周训练工作。

3. 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才。

4. 各级党部的会议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训练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材。

5. 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6. 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作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

九　苏维埃问题

1. 过去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协会的变形，所以它的工作，是秘书长和主席包办，甚至有些政府还是富农当权，或为知事衙门。这些所谓苏维埃政府，应一律改组。

2. 由特委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应一律照组织法组织之。

3. 苏维埃必须以工人贫农革命兵士为主要力量。反对富农秘书

长把持，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4. 湘赣边界政府重新彻底改造。

5. 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普遍宣传。

十　土地问题

接受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通告，交特委讨论，作最后决定。

十一　CY问题

1. 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组织，过去边界各级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级党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取消团。

2. 目前边界各县应当是建设团的工作，但是团的本身力量薄弱，很难单独担负起这个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划出一部分力量，经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地建设团的支部，扩大团的组织，健全团的指导机关。

3. 团的经费应该独立，以便团在工作上能够措置如意，避免团在经费上依赖党的观念。

4. 注意团的工作，是各级党部应有的责任。今后各级党部向上级报告中，必须有“团工作”的一项。上级巡视员在检查各级工作中，亦须留心团的工作。

5. 各级党部、团部多不明了党与团的关系，以致发生各干各的倾向。

挽王尔琢联[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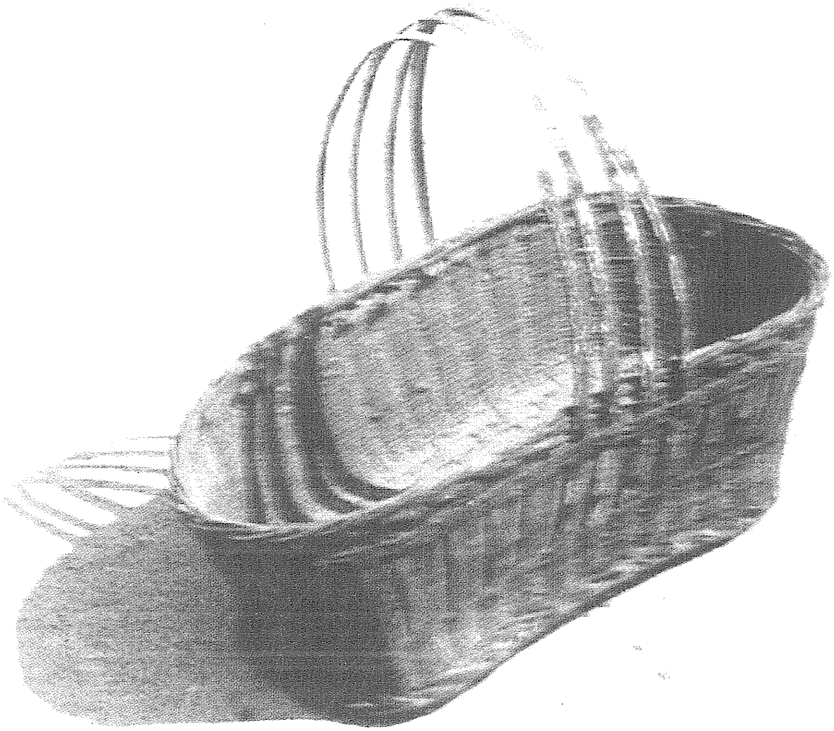
（1928年10月）

一哭尔琢，再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

[1] 王尔琢（1901—1928），字蕴琰，湖南省石门县商溪乡王官桥村人，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又参加湘南暴动。1928年4月上井冈山和毛泽东会师，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参谋长兼红军第二十八团团长。1928年8月25日，追赶叛徒时，在江西省崇义县思顺墟被叛徒袁崇全枪杀。王尔琢牺牲后，朱德赶到思顺墟现场，痛哭和悼念战友。10月上旬，在宁冈砻市举行追悼会。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八角楼起草，由陈毅书写了这副挽联，挂在会场两边。

为了改善根据地医疗条件，根据湘赣边特委决定于1928年10月，在井冈山西北的小井兴建一座红军医院。图为小井红军医院旧址。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给伤员送饭用过的篮子。

西江月·井冈山[1]

（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2]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3]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4]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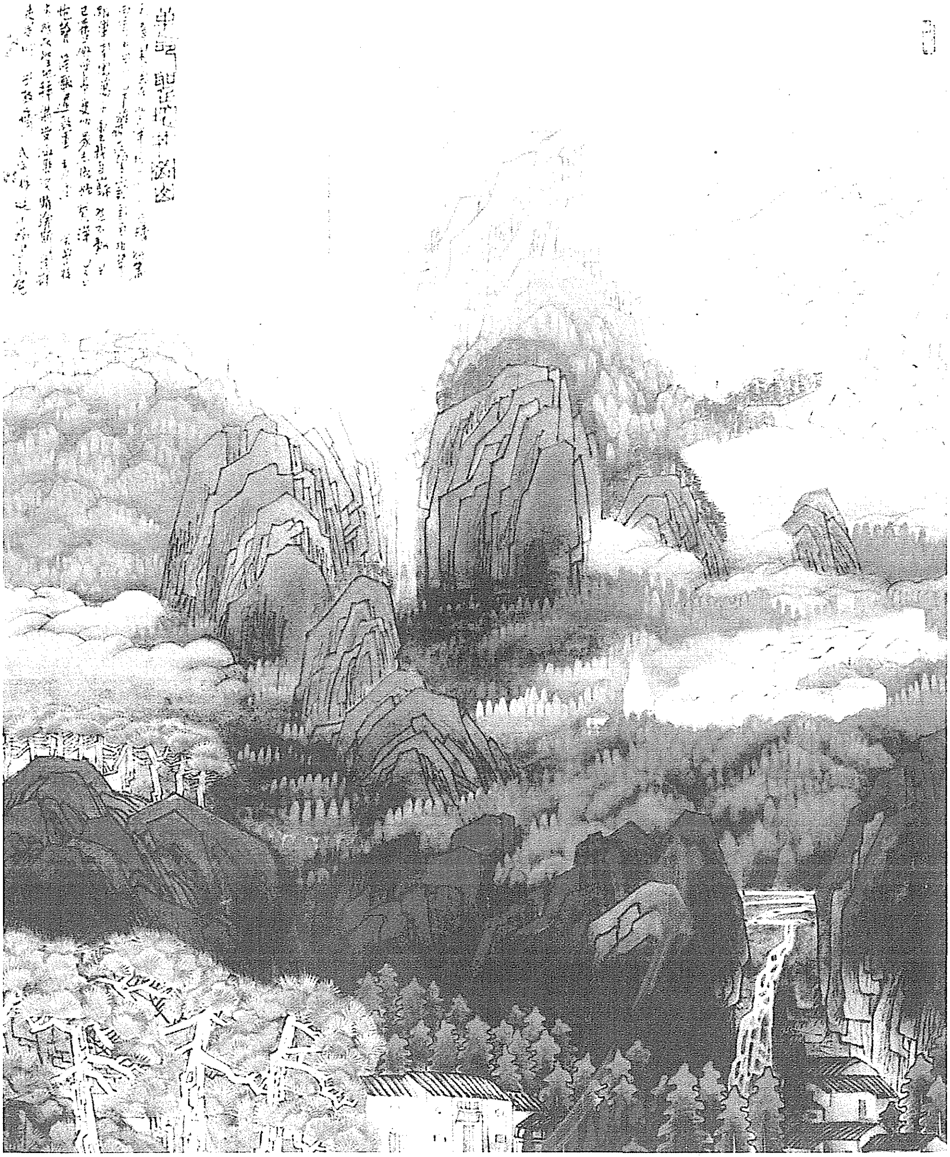
---

[1] 井冈山，在江西西部及湖南东部，方圆500里。

[2] 鼓角，本指古代军中所用的战鼓和号角，此处借指军号。

[3] 岿然，高峻独立。

[4] 黄洋界，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另4个是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



《革命圣地井冈山》（诗意画）

井冈山的斗争[1]

（1928年11月25日）

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失败

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在统治阶级政权的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割据地区对四围统治阶级必须采取不同的战略。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2]，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3]，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2] 这个战争发生于1927年10月，到第二年3月结束。

[3] 这个战争发生于1927年11月，到第二年2月结束。

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至于策略之所以错误，全在未曾把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和破裂的时期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分别清楚。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则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的基础，不顾主观力量的可能，只图无限量的推广。如果遇到什么人在军事方面主张采取逐步推广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张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求自立于不败之地，则谥之曰“保守主义”。他们的这种错误意见，就是今年八月湘赣边界失败以及同时红军第四军在湘南失败的根本原因。

湘赣边界的工作，从去年十月做起。开头，各县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地方武装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坏枪在井冈山附近，永新、莲花、茶陵、酃县四县农民自卫军枪枝全数缴给了豪绅阶级，群众革命情绪已经被压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党的县委，酃县有了特别区委，莲花亦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和万安县委发生了关系。地方武装，除酃县外，各县都有了少数。在宁冈、茶陵、遂川、永新，特别是遂川、永新二县，进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绅、发动群众的游击暴动，成绩都还好。这个时期，土地革命还没有深入。政权机关称为工农兵政府。军中组织了

士兵委员会[1]。部队分开行动时，则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之。这时党的高级指导机关，是秋收起义时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组为师委（何挺颖为书记），变成单管军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同时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调往湘南，遂使边界被敌占领者一个多月。三月底湘南失败，四月朱、毛两部及湘南农军退到宁冈，再开始边界的割据。

四月以后，湘赣边界的割据，正值南方统治势力暂时稳定的时候，湘赣两省派来“进剿”的反动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到过十八个团。然而我们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了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和军委（陈毅为书记）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因为这些策略的适当，加以边界地形的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军队的不尽一

---

[1]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1947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中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

致，于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个月的各次军事胜利和群众割据的发展。虽以数倍于我之敌，不但不能破坏此割据，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据的发展。此割据对湘赣两省的影响，则有日益扩大之势。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原来七月中旬，湖南敌人第八军吴尚侵入宁冈，再进永新，求战不得（我军从间道出击不值），畏我群众，仓卒经莲花退回茶陵。这时红军大队正由宁冈进攻酃县、茶陵，并在酃县变计折赴湘南，而江西敌人第三军王均、金汉鼎部五个团，第六军胡文斗部六个团，又协力进攻永新。此时我军只有一个团在永新，在广大群众的掩护之下，用四面游击的方式，将此十一团敌军困在永新县城附近三十里内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后因敌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随后又失去莲花、宁冈。这时江西敌人忽然发生内讧，胡文斗的第六军仓皇退去，随即和王均的第三军战于樟树。留下的赣军五个团，亦仓皇退至永新城内。设我大队不往湘南，击溃此敌，使割据地区推广至吉安、安福、萍乡，和平江、浏阳衔接起来，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队已不在，我一团兵复疲惫不堪，乃决留一部分会同袁、王两部守井冈山，而由我率兵一部往桂东方向迎还大队。此时大队已由湘南退向桂东，八月二十三日我们在桂东得到会合。

红军大队七月中刚到酃县时，第二十九团官兵即因政治动摇，欲回湘南家乡，不受约束；第二十八团反对往湘南，欲往赣南，但也不愿回永新。杜修经导扬第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军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队遂于七月十七日由酃县出发，向郴州前进。七月二十四日与敌范石生战于郴州，先胜后败，撤出战斗。第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跑向宜章家乡，结果一部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章消灭，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终，当日收集的不过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于八月十八日占领桂东。二十三日，会合从井冈山来的部队，议决经崇义、上犹重回井冈山。当到崇义时，营长袁崇全率一步兵连一炮兵连叛变，虽然追回了这两个连，但牺牲了团长王尔琢。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部乘我军欲归未归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这个根据地。

此次失败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动摇思家，失掉战斗力；一部官兵不愿往湘南，缺乏积极性。（2）盛暑远征，兵力疲惫。（3）从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起来，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战的意义。

割据地区的现势

今年四月以来，红色区域逐渐推广。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在红色区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区乡政权普遍建立。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都有县政府，

并成立了边界政府。乡村普遍组织了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则有赤卫队。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布满城乡。党的组织和政权的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1]。八月三十日井冈山一战，湘敌始退往酃县，赣敌仍盘踞各县城及大部乡村。然而山区是敌人始终无法夺取的，这在宁冈有西北两区，在永新有北乡的天龙区、西乡的小江区、南乡的万年山区，在莲花有上西区，在遂川有井冈山区，在酃县有青石冈和大院区。七、八两月，红军一个团配合各县赤卫队、暴动队大小数十战，仅失枪三十枝，最后退入山区。

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冈山。十月一日，与敌熊式辉部周浑元旅战于宁冈获胜，收复宁冈全县。此时湘敌驻桂东的阎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军，编为特务营，毕占云为营长。十一月九日，我军又击破周旅一个团于宁冈城和龙源口。翌日进占永新，随即退回宁冈。目前我区南自遂川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一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的上西区，永新的天龙区、万年山区，则和整块不甚连属。敌人企图以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消灭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正在准备打破敌人的进攻。

军事问题

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

---

[1] “反水”，意为叛变。

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这种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问题也就非常地繁复和严重。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1]；（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2]；（三）平浏的农民[3]；（四）湘南的农民[4]和水口山的工

---

[1] 即1927年8月1日在南昌起义的叶挺、贺龙的旧部。这些部队在潮州、汕头一带失败后，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在广东坚持斗争，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等率领退出广东，经福建、江西，转入湖南南部，会合当地农军举行湘南起义，开展苏维埃运动。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2] 指1927年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它的干部有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等叛变革命以后，这个警卫团在8月初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起义军。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就转到修水，同平江、浏阳的农军会合。

[3] 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在1927年春已经形成相当有力的农民武装。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即“马日事变”），屠杀革命群众。为了向反革命还击，浏阳的农军，同长沙附近其他各县的工农武装一起，曾经向长沙前进。在进军途中，由于中共湖南省委传达了中共中央撤退农军的命令，其他各县工农武装都向后撤退，只有浏阳农军未接到命令，一直攻到长沙城下，遭到失败后撤退。7月中旬，这支农军同平江的农民武装会合。9月又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等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毛泽东领导下，于修水、铜鼓、平江、浏阳一带举行秋收起义。10月，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4] 1928年初，朱德、陈毅率部在湘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原来农民运动有基础的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5县，这时都组织了农军。后来这部分农军由朱德、陈毅率领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

人[1]；（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虽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枪的增加仍不相称，枪不容易损失，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湖南省委答应送安源工人[2]来此，亟盼实行。

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此种情形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红军官兵中的边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远籍人分配土地颇为困难。

---

[1] 湖南省常宁县水口山是重要的铅锌矿产地。1922年，水口山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了工会，历年与反革命斗争。1927年冬，以水口山的工人为主，组成了湘南游击总队，进行游击战争。1928年初，湘南游击总队编入朱德率领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参加了湘南起义，后随起义军一起，到达井冈山。

[2] 指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工人。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派人到安源工作，第二年，建立了共产党和工会的组织，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的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当时，安源一带有1.2万多名工人参加了工会。1927年9月，安源工人武装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连、营、团都有了士兵会，代表士兵利益，并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

党代表制度[1]，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因为下级干部死伤太多，敌军俘虏兵往往过来不久，就要当连排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从表面看，似乎既称红军，就可以不要党代表了，实在大谬不然。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党代表伤亡太多，除自办训练班训练补充外，希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来。

普通的兵要训练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们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简直无所谓训练。军事技术太差，作战只靠勇敢。长时间的休息训练是不可能的，只有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看可能否。为着训练下级军官，现在办了一个百五十人的教导队，准备经常办下去。希望中央和两省委多派连排长以上的军官来。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

---

[1] 红军中的党代表1929年起改称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1930年起改称政治指导员。

上，全靠打土豪供给[1]。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2]。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医生药品均缺。现在医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应办药，至今不见送到。仍祈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西医和一些碘片来。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

[1] 用“打土豪”罚款的方法筹措军费，只能是临时的和部分的。军队大了，地域宽了，就必须而且可能用收税等方法筹措军费。

[2] 此种办法在红军中施行了一个很长时期，在当时曾是必要的，后来改变为按等级略有一些区别。

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1]。

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2]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3]。现在连支部缺乏好的书记，请中央从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动分子中派遣多人来此充当。湘南来的工作人员，几乎尽数在军中做党的工作。可是八月间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现在不能调出人去。

地方武装有赤卫队和工农暴动队。暴动队以梭镖、鸟枪为武

---

[1] 在军队内部实行一定的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在这里毛泽东特别着重地指出革命军队内部民主生活的必要，是因为当时红军初建，非强调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农民和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士兵的革命积极性，不足以肃清干部中由反动军队传来的军阀主义的习气。当然，部队中的民主生活必须是在军事纪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必须是为着加强纪律而不是为着减弱纪律，所以在部队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要求极端民主的无纪律现象。而这种现象在初期的红军中，曾经一度严重地存在过。关于毛泽东反对军队中极端民主化的斗争，参见《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1926年北伐时，叶挺领导的部队为一个独立团。这个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是北伐中有名的战斗部队。革命军占领武昌以后，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同时，抽调该团部分骨干组建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和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抽调该团的大批骨干组建第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参加南昌起义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等部合编为第十一军，叶挺兼任军长。

[3] 事实上红军中的党员人数占全军1/3左右即好，后来在红军和人民解放军中大体上都是如此。

器，乡为单位，每乡一队，人数以乡的大小为比例。职务是镇压反革命，保卫乡政权，敌人来了帮助红军或赤卫队作战。暴动队始于永新，原是秘密的，夺取全县以后，公开了。这个制度现已推行于边界各县，名称未改。赤卫队的武器主要是五响枪，也有九响和单响枪。各县枪数：宁冈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莲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县九十，遂川百三十，万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红军发给的，小部是自己从敌人夺取的。各县赤卫队大都经常地和豪绅的保安队、挨户团作战，战斗力日益增强。马日事变[1]以前，各县有农民自卫军。枪数：攸县三百，茶陵三百，酃县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莲花六十，宁冈（袁文才部）六十，井冈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马日事变后，除袁、王两部无损失外，仅遂川保存六枝，莲花保存一枝，其余概被豪绅缴去。农民自卫军如此没有把握枪枝的能力，这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结果。现在各县赤卫队的枪枝还是很不够，不如豪绅的枪多，红军必须继续在武器上给赤卫队以帮助。在不降低红军战斗力的条件之下，必须尽量帮助人民武装起来。我们业经规定红军每营用四连制，每连步枪七十五枝，加上特务连，机关枪连，迫击炮连，团部和三个营部，每团有步枪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战缴获的枪，则尽量武装地方。赤卫队的指挥官，由各县派人进红军所办的教导队受训后充当。由红军派远

---

[1]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5月21日（马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反革命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开合流的信号。

地人到地方去当队长，必须逐渐减少。朱培德、吴尚亦在武装保安队和挨户团，边界各县豪绅武装的数量和战斗力，颇为可观。我们红色地方武装的扩大，更是刻不容缓。

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当此反动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敌人能集中大量军力来打红军，红军分散是不利的。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赤卫队则以分散为有利，现在各县赤卫队都采取分散作战办法。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聪明的敌人例如李文彬，近来也仿效我们的办法，不杀俘虏，医治被俘伤兵。不过，在再作战时，我们的人还是有拖枪回来的，这样的事已有过两回。此外，文字宣传，如写标语等，也尽力在做。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惟缺绘图的技术人材，请中央和两省委送几个来。

军事根据地：第一个根据地是井冈山，介在宁冈、酃县、遂川、永新四县之交。北麓是宁冈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黄坳，两地相距九十里。东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县的水口，两地相距百八十里。四周从拿山起经龙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陇（以上宁冈）、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县）、营盘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黄坳、五斗江、车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计五百

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庄、行洲、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窟宅之所，现在作了我们的根据地。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军粮全靠宁冈、永新、遂川三县输送。山上要隘，都筑了工事。医院、被服厂、军械处、各团留守处，均在这里。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第二个根据地是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县交界的九陇山，重要性不及井冈山，为四县地方武装的最后根据地，也筑了工事。在四围白色政权中间的红色割据，利用山险是必要的。

土地问题

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农民手里。江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约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约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万安、宁冈、莲花自耕农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占比较的多数，约百分之六十，农民只占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县两县均有约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间阶级问题：在上述土地状况之下，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1]，是能得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但农村中略分为三种阶级，即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农阶级。富农往往与小地主利害联在一起。富农土地在土地总额中占少数，但

---

[1] 1928年湘赣边界土地法中曾经有这样的规定。毛泽东后来指出，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是由于当时缺乏土地斗争的经验而来的。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与小地主土地合计，则数量颇大。这种情形，恐全国亦差不多。边界对于土地是采取全部没收、彻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红色区域，豪绅阶级和中间阶级，同被打击。政策是如此，实际执行时却大受中间阶级的阻碍。当革命初期，中间阶级表面上投降贫农阶级，实际则利用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及家族主义，恐吓贫农，延宕分田的时间。到无可延宕时，即隐瞒土地实数，或自据肥田，把瘠田让人。此时期内，贫农因长期地被摧残及感觉革命胜利无保障，往往接受中间阶级的意见，不敢积极行动。必待进至革命高涨，如得了全县甚至几县政权，反动军队几次战败，红军的威力几次表现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如永新南乡，是中间阶级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隐瞒土地也最厉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红军大胜之后，区政府又处理了几个延宕分田的人，才实际地分下去。但是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

白色恐怖下中间阶级的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经过我们“不杀反水农民”、“欢迎反水农民回来割禾”的宣传之后，才有一些农民慢慢地跑回来。

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然若全国在革命高涨中，贫农阶级有所恃而增加勇气，中间阶级亦有所惧而

不敢乱为。当李宗仁唐生智战争向湖南发展时，茶陵的小地主向农民求和，有送猪肉给农民过年的（这时红军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战争结束，就不见有这等事了。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1]。

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红区白区对抗，成为两个敌国。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处理失当这两个原因，两区几乎完全断绝贸易，食盐、布匹、药材等项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贵，木材、茶油等农产品不能输出，农民断绝进款，影响及于一般人民。贫农阶级比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阶级到忍不住时，就投降豪绅阶级。中国豪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若不是继续进行的，全国革命形势若不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地区的红色割据，在经济上将受到极大的压迫，割据的长期存在将成问题。因为这种经济压迫，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永新、宁冈两县没有盐吃，布匹、药材完全断绝，其他更不必说。现在盐已有卖，但极贵。布匹、药材仍然没有。宁冈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据地）出产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运不出去[2]。

---

[1] 鉴于争取农村中间阶级的重要，毛泽东随即纠正了打击中间阶级过重的错误政策。毛泽东对中间阶级的政策主张，除见于本文外，又见于1928年11月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提案（内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等项）、1929年1月红军第四军布告（内有“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等语）和1929年4月兴国县土地法等。

[2] 此种情况，依靠革命战争的发展、根据地的扩大和革命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是可以改变的，后来也已经改变了。这里的关键是坚决地保护民族工商业，反对过左的政策。

土地分配的标准：以乡为分配土地的单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区，以三四乡为一个单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极少。所有乡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现依中央办法，改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1]。

向自耕农让步问题：尚未详细讨论。自耕农中之富农，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产力为标准，即人工和资本（农具等）多的多分田。富农觉得平均分和按劳动力分两种方法都于他们不利。他们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们愿意多努力，加上资本的力量，他们可以多得收获。若照普通人一样分了，蔑视了（闲置了）他们的特别努力和多余的资本，他们是不愿意的。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但此问题，仍当讨论，候得结论再作报告。

土地税：宁冈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办法多收半成，已在征收中，不好变更，明年再减。此外，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在割据区域内，都是山地，农民太苦，不好收税。政府和赤卫队用费，靠向白色区域打土豪。至于红军给养，米暂可从宁冈土地税取得，钱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击，筹得万余元，可用一时，用完再讲。

政权问题

县、区、乡各级民众政权是普遍地组织了，但是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乡、区两级乃至县一级，政府的执行

---

[1] 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当的。事实上，在革命根据地，长时期都是实行按人口平分土地的原则。

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名副其实的工农兵代表会组织，不是没有，只是少极了。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代表会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争中显出了它的效力，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方能普遍地真实地应用于群众组织。我们正在制订详细的各级代表会组织法（依据中央的大纲），把以前的错误逐渐纠正。红军中的各级士兵代表会议，现亦正在使之经常建立起来，纠正从前只有士兵委员会而无士兵代表会的错误。

现在民众普遍知道的“工农兵政府”，是指委员会，因为他们尚不认识代表会的权力，以为委员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关。没有代表大会作依靠的执行委员会，其处理事情，往往脱离群众的意见，对没收及分配土地的犹豫妥协，对经费的滥用和贪污，对白色势力的畏避或斗争不坚决，到处发现。委员会也很少开全体会，遇事由常委处决。区乡两级政府则常委会也少开，遇事由主席、秘书、财务或赤卫队长（暴动队长）各自处理决定，这四个人是经常驻会的。所以，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

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只有在斗争中揭破了他们的假面，贫农阶级起来之后，方能去掉他们。这种现象虽不普遍，但在很多

地方都发现了。

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置一边。这种情形是很多的。政权机关里的党团组织有些地方没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满。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

党的组织问题

与机会主义斗争的经过：马日事变前后，边界各县的党，可以说是被机会主义操纵的。当反革命到来时，很少坚决的斗争。去年十月，红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到达边界各县时，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为重新建党时期，五月以后为大发展时期。一年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这种情形，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党内教育，逐渐减少了。同时，在红军中，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敌人来了，主张拼一下，否则就要逃跑。这两种思想，往往在讨论作战时由一个人说出来。经过了长时间党内的斗争和客观事实的教训，例如拼一下遭了损伤，逃跑遭了失败，才逐渐地改变过来。

地方主义：边界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许多石碓）。社会组织是普遍

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经过了许多这样的教训，地方主义是减少了。

土客籍问题：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八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

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我们的办法是一面宣传“不杀反水农民”，“反水农民回来一样得田地”，使他们脱离豪绅的影响，安心回家；一面由县政府责令客籍农民将没收的财物退还原主，并出布告保护土籍农民。在党内，加紧教育，务使两部分党员团结一致。

投机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永新、宁冈两县的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过去党的组织全部公开，九月以后，建设秘密的组织，准备在反动派来了也能活动。同时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二因我军在占领这些城市时太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现在纠正错误，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

党的领导机关：支部干事会改称委员会。支部上为区委，区委上为县委。区委县委之间因特别情况有组织特别区委的，如永新的北乡特区及东南特区。边区共有宁冈、永新、莲花、遂川、酃县五个县委。茶陵原有县委，因工作做不进去，去冬今春建设的许多组织大部被白色势力打塌了，半年以来只能在靠近宁冈永新一带的山地工作，因此将县委改为特别区委。攸县、安仁均须越过茶陵，派人去过，无功而返。万安县委一月间曾和我们在遂川开过一次联席会议，大半年被白色势力隔断，九月红军游击到万安，才又接一次

头。有八十个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山，组织万安赤卫队。安福没有党的组织。吉安邻接永新，吉安县委仅和我们接过两次头，一点帮助不给，奇怪得很。桂东的沙田一带，三月八月两度分配土地，建设了党的组织，属于以龙溪十二洞为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辖。各县县委之上为湘赣边界特委。五月二十日，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开会，选举第一届特委会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七月湖南省委派杨开明来，杨代理书记。九月杨病，谭震林代理书记。八月红军大队往湘南，白色势力高压边界，我们曾在永新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十月红军返至宁冈，乃在茅坪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十月四日起开会三天，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盘圆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的委员。五人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十一月十四日红军第六次全军大会，选举二十三人组织军委，五人为常委，朱德为书记。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前委暂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前委管理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随军行动。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

革命性质问题

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

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们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较地执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宁冈，批评我们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改变原来前委的领导人，政策一变。四月全军到边界后，烧杀虽仍不多，但对城市中等商人的没收和乡村小地主富农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厉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厂归工人”的口号，也宣传得很普遍。这种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

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为市，三天一次），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这件事，证明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了。豪绅对人民的税捐很重，遂川靖卫团[1]在黄坳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税，无论什么农产都不能免。我们打掉靖卫团，取消这些税，获得了农民和中小商人全体的拥护。

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割据地区问题

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北段地势不如中段可进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会，如果没有迅速夺取长沙或武汉的计划，则以大部兵力放在浏阳、醴陵、萍乡、铜鼓一带是很危险的。南段地势较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政治上及于湘赣两省的影响也小些，不如中段一举一动可以影响两省的下游。中段的长处：（1）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2）党的组织有相当的

---

[1]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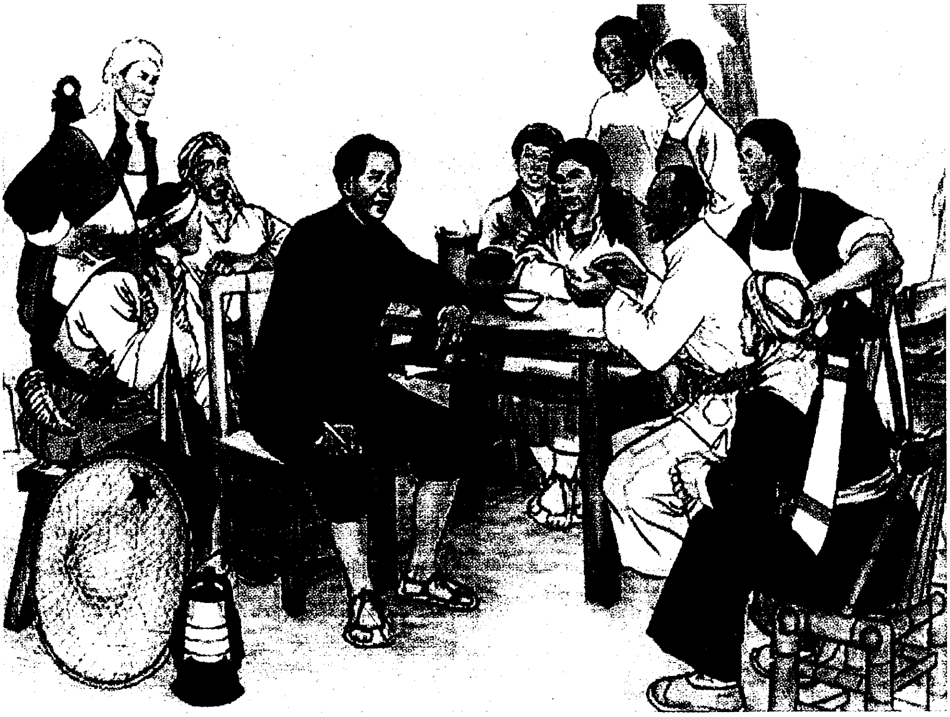
基础。（3）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4）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5）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中段的缺点，是因割据已久，“围剿”军多，经济问题，特别是现金问题，十分困难。

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举行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把红军拉去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数量上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至于往湘东，在湘鄂赣三省豪绅政权尚未分裂之前，亦决不宜用红军的主力去。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即在这种时候，也应以宁冈为大本营，去湘东的只能是游击部队。因豪绅间战争未起，湘边酃县、茶陵、攸县尚有大敌，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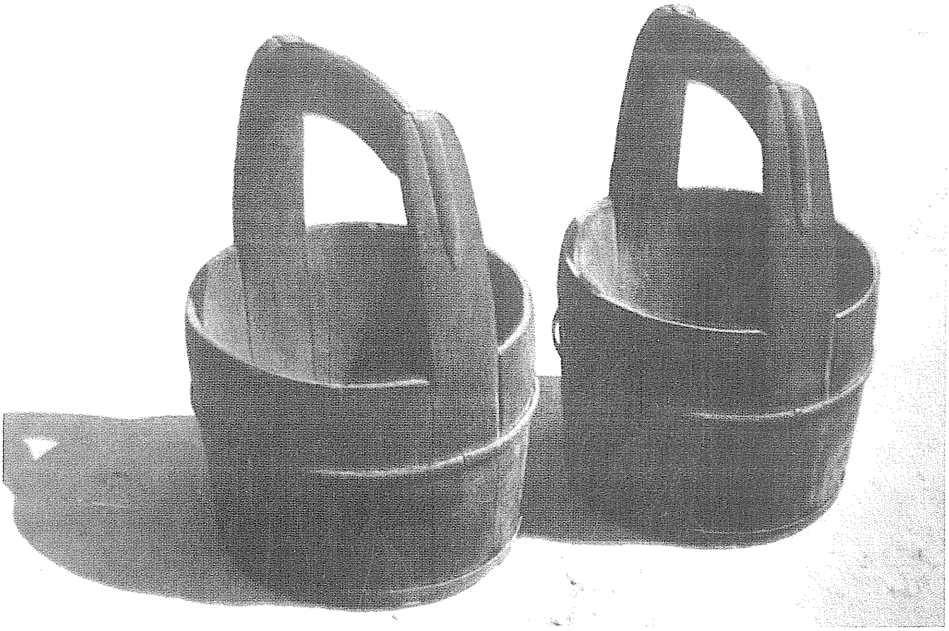
北向，必为所乘。中央要我们考虑往湘东或往湘南，实行起来都很危险，湘东之议虽未实现，湘南则已有证验。这种痛苦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时时记着的。

现在是豪绅阶级统治还没有破裂的时期，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借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的敌人，均有办法。为边界计，红军若走，则像八月那样的蹂躏，立可重来。赤卫队虽不至完全消灭，党和群众的基础将受到极大的摧残，除山头割据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将转入秘密状态，如八九月间一样。红军不走，以现在的基础可以逐渐向四周发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为红军计，欲求扩大，只有在有群众基础的井冈山四周即宁冈、永新、酃县、遂川四县，利用湘赣两敌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无法集中的情况，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利用正确的战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必有俘获，如此可以逐渐扩大红军。以四月至七月那时边界群众的准备，红军大队若无湘南之行，则八月间红军的扩大是没有疑义的。虽然犯了一次错误，红军已卷土重来此地利人和之边界，前途希望还是不恶。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以士兵论，因军阀们把向边界“剿匪”当做一件大事，“剿匪经年，耗费百万”（鲁涤平），“人称二万，枪号五千”（王均），如此等类的话，逐渐引起敌军士兵和无出路的下级官长对我们注意，自拔来归的将日益增多，红军扩充，又是一条来路。并且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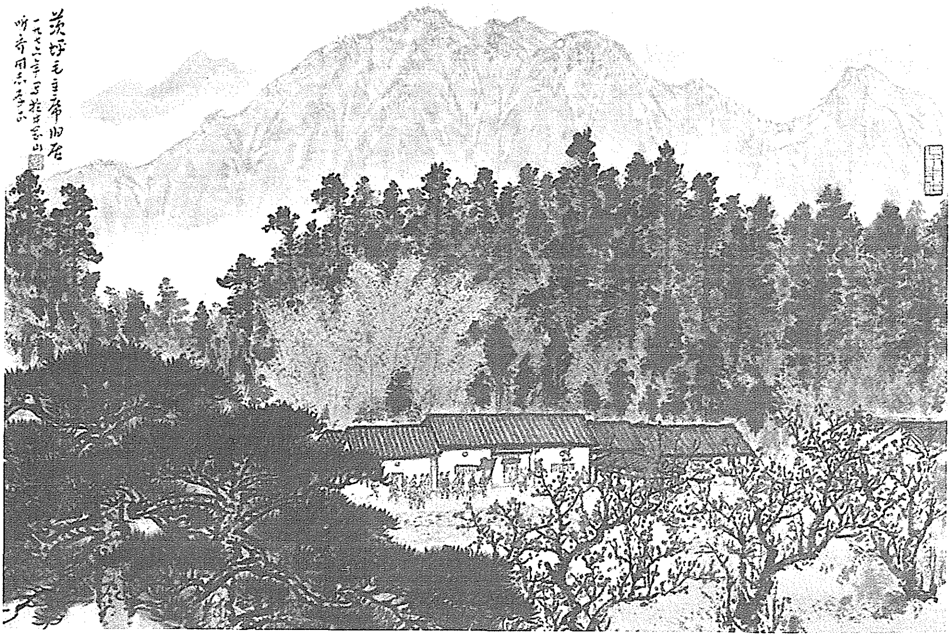
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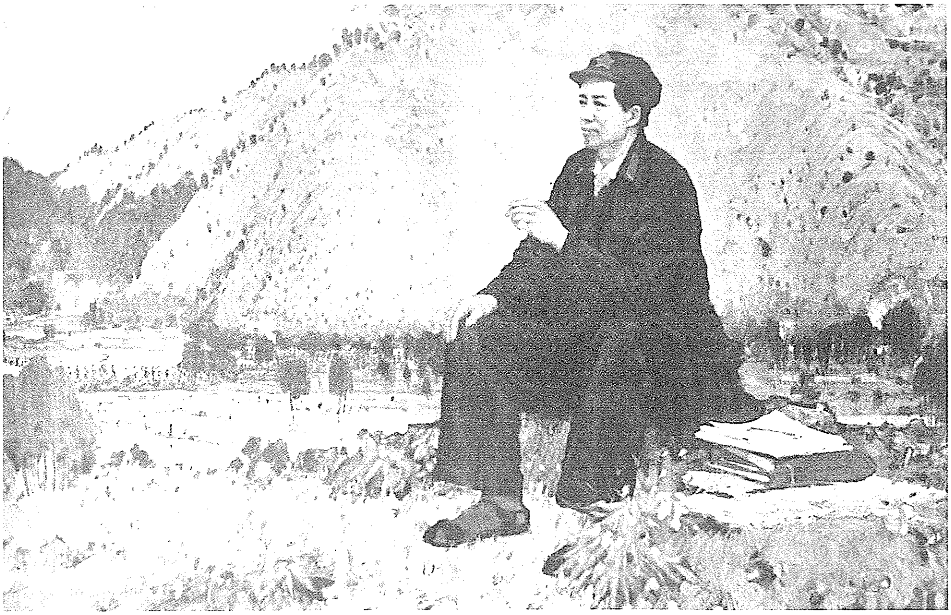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井冈山农村调查》（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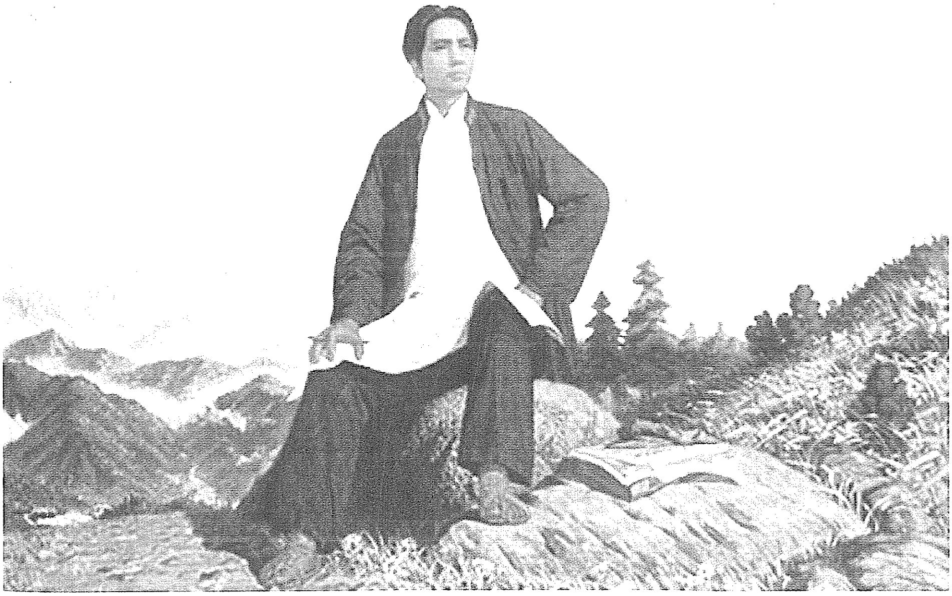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永新调查时为乡亲们挑水用过的水桶。


茨坪毛主席旧居
一九七六年写于井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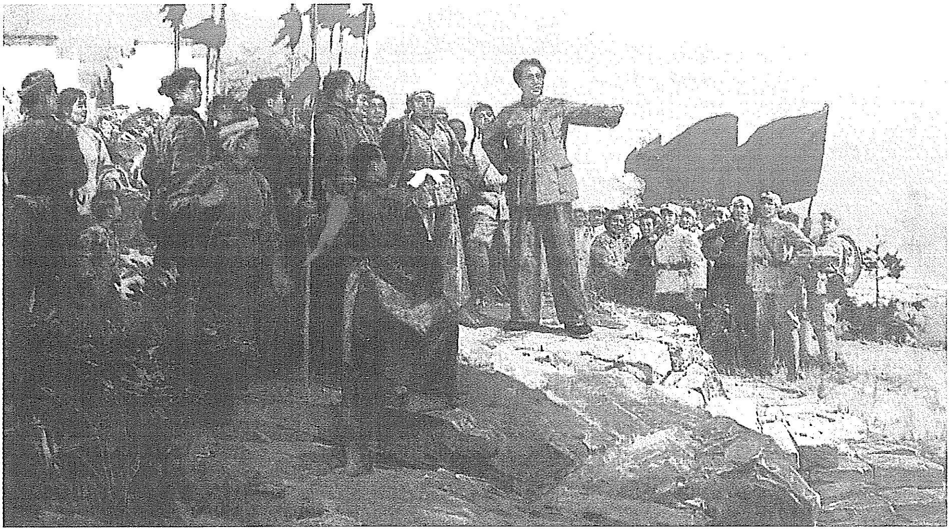
《茨坪毛主席旧居》（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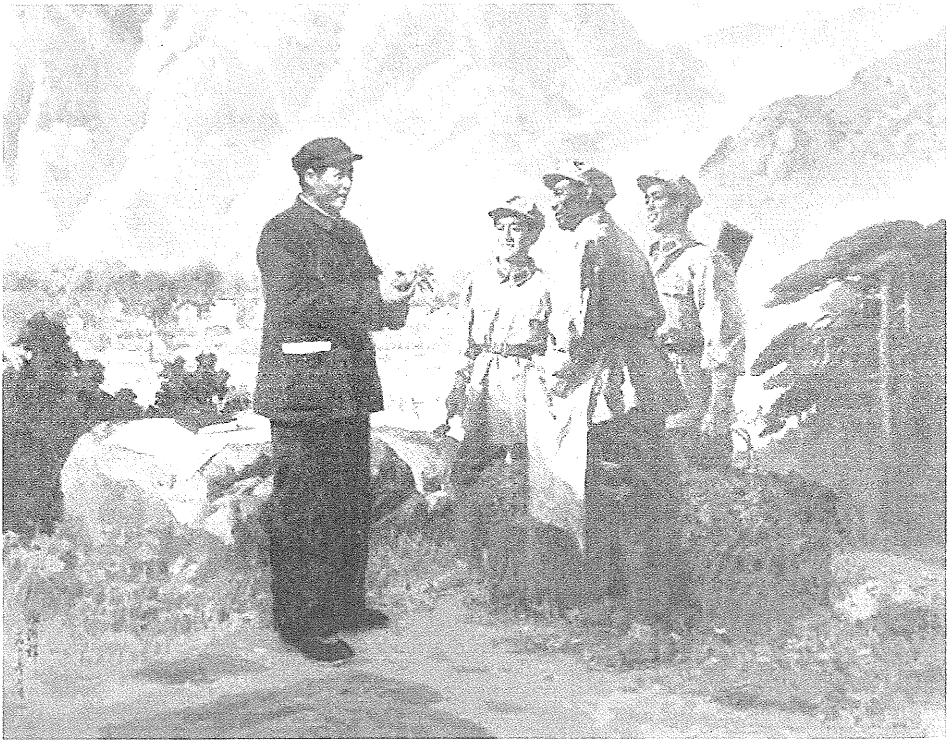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井冈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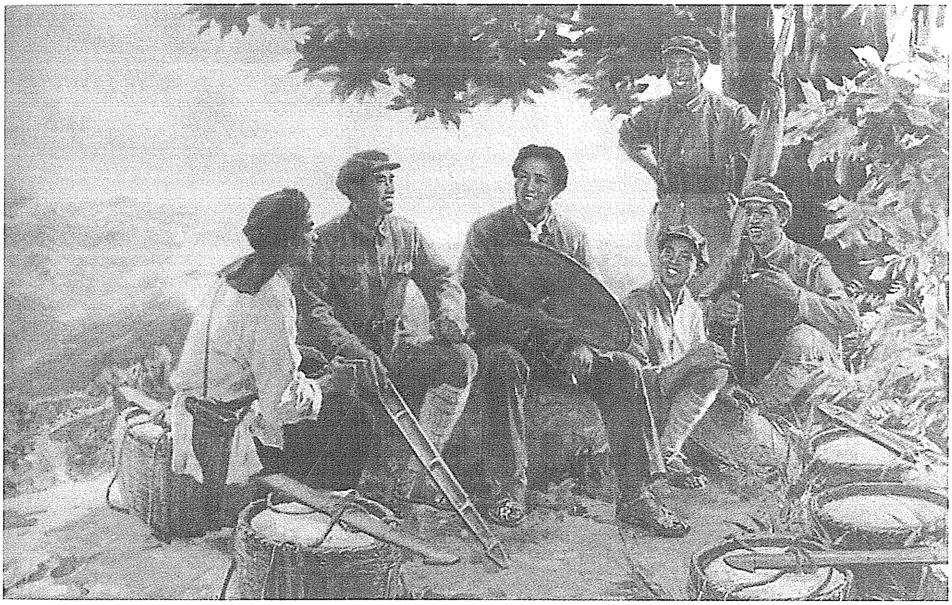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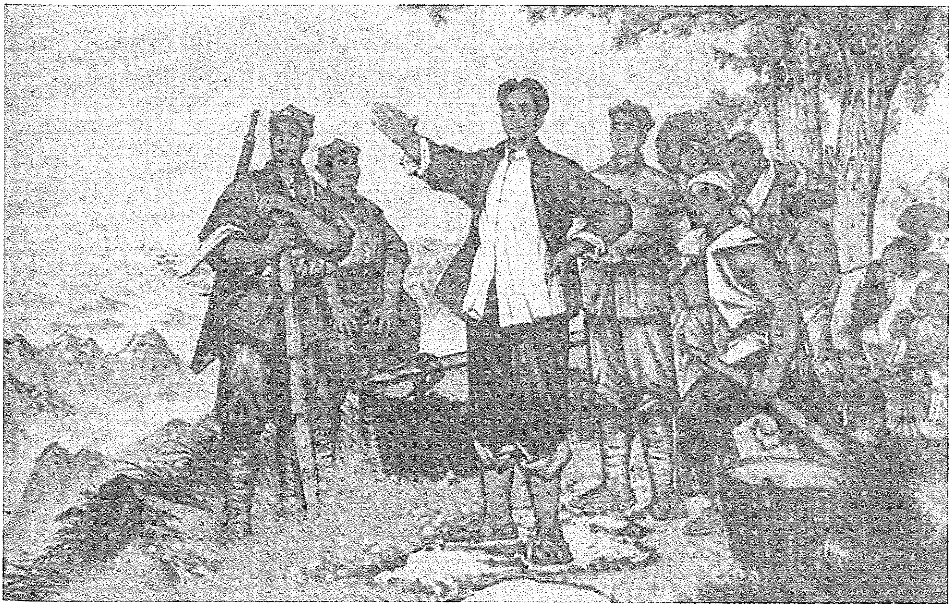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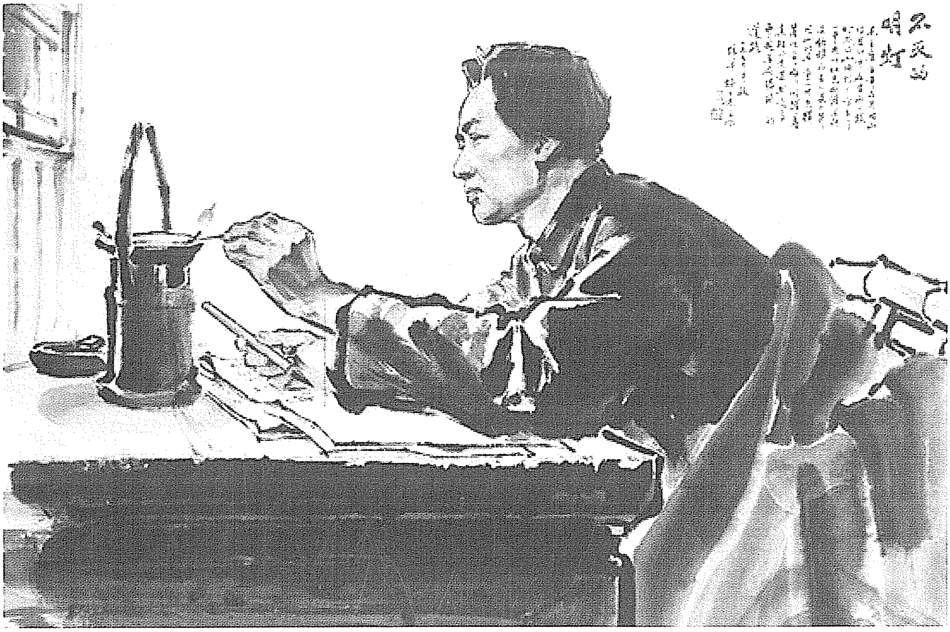
《艰苦岁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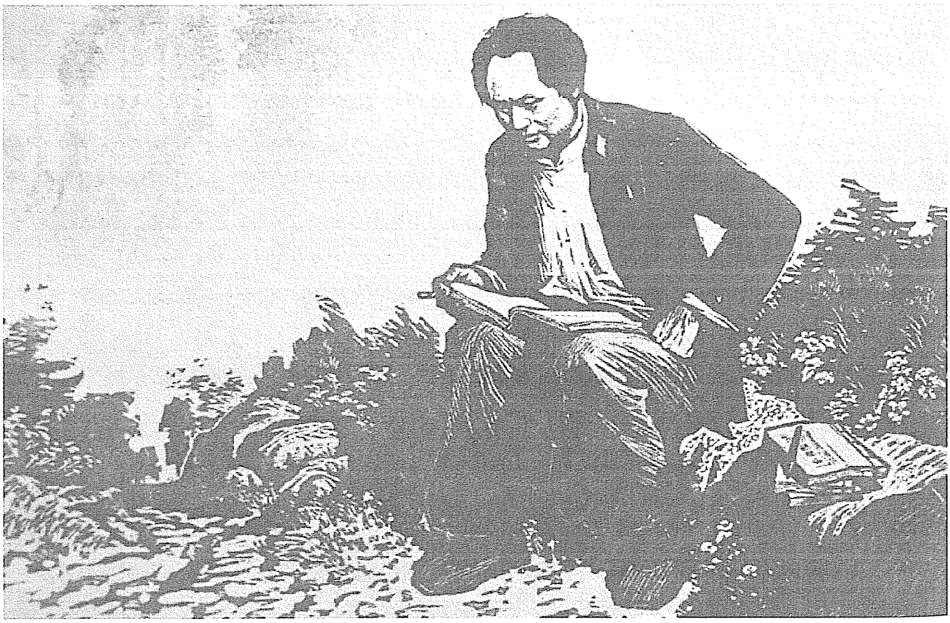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挑粮路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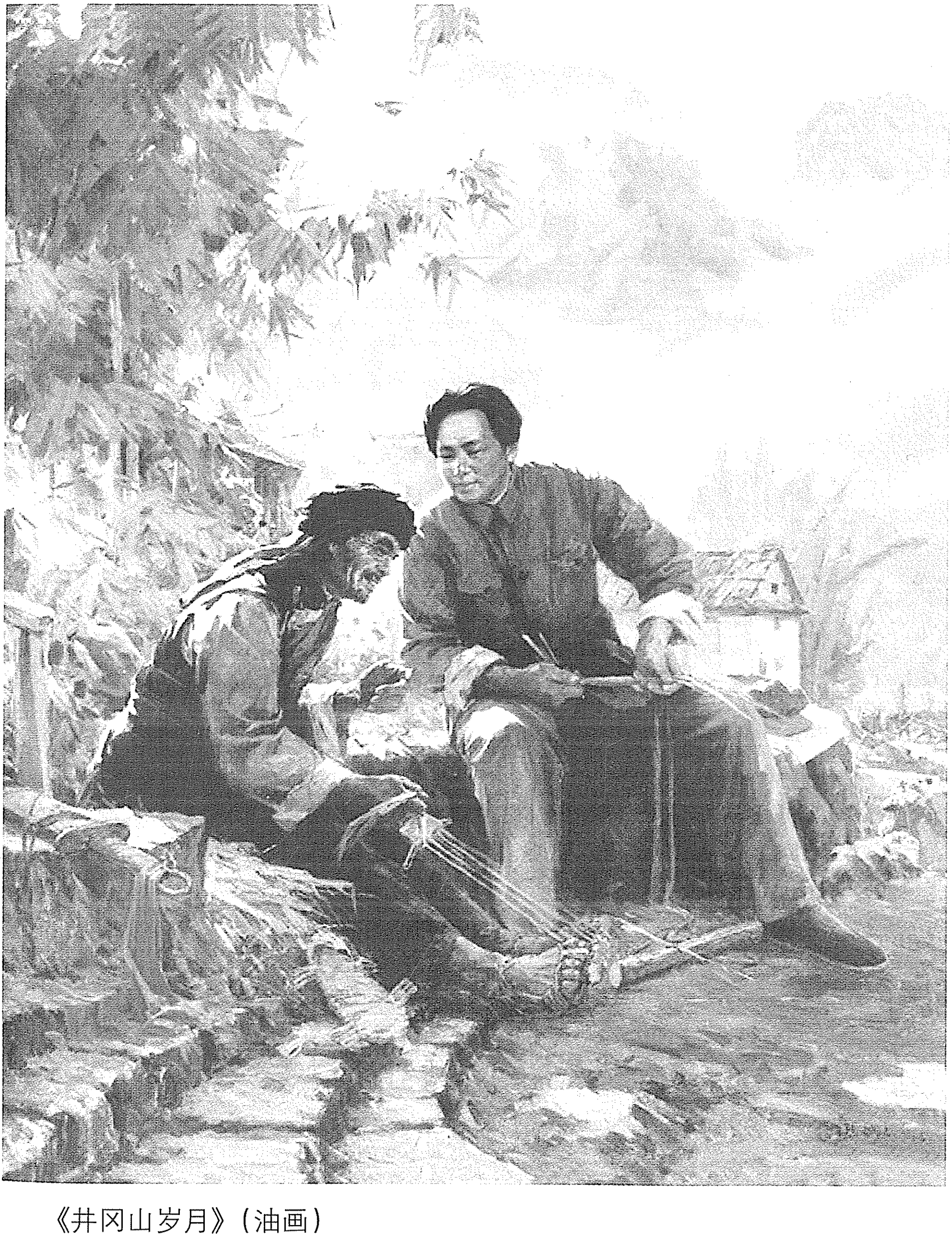
《光辉的榜样》（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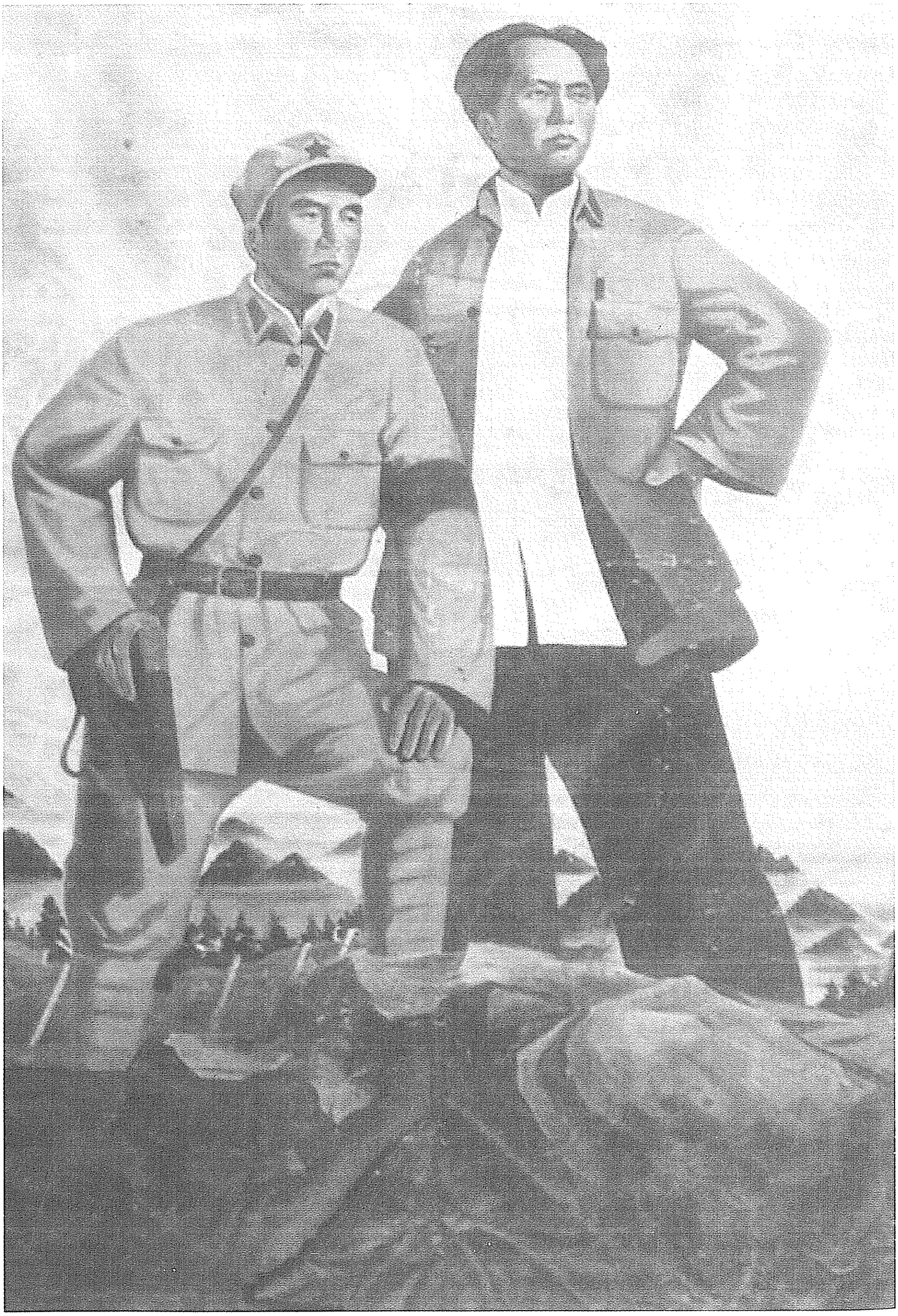
《不灭的明灯》（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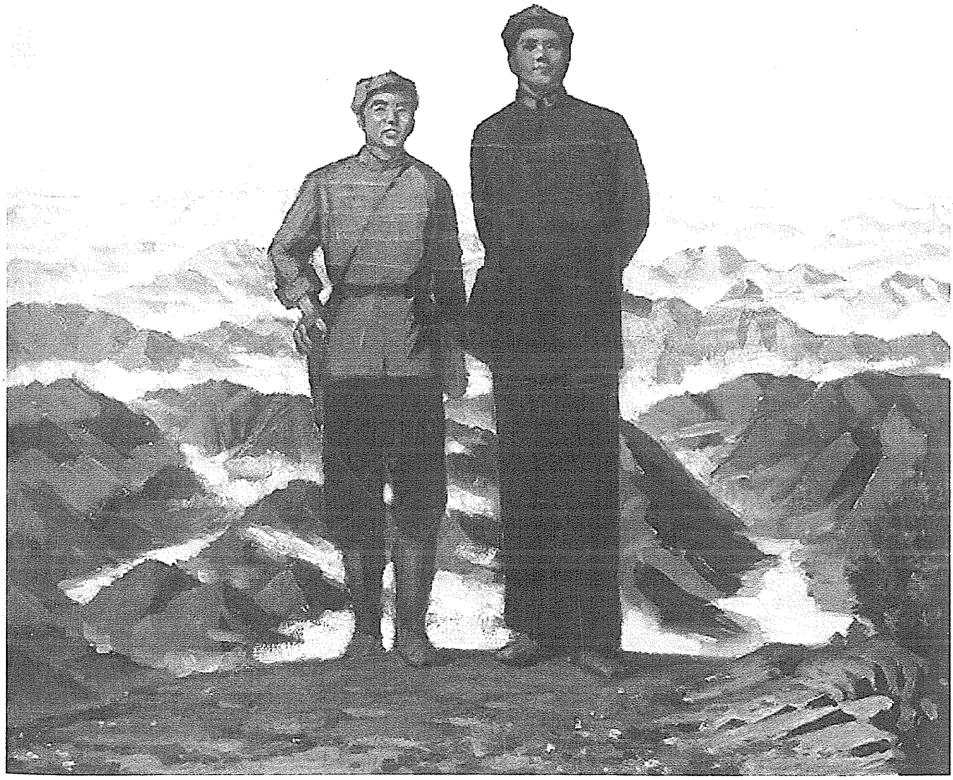
《井冈山之晨》（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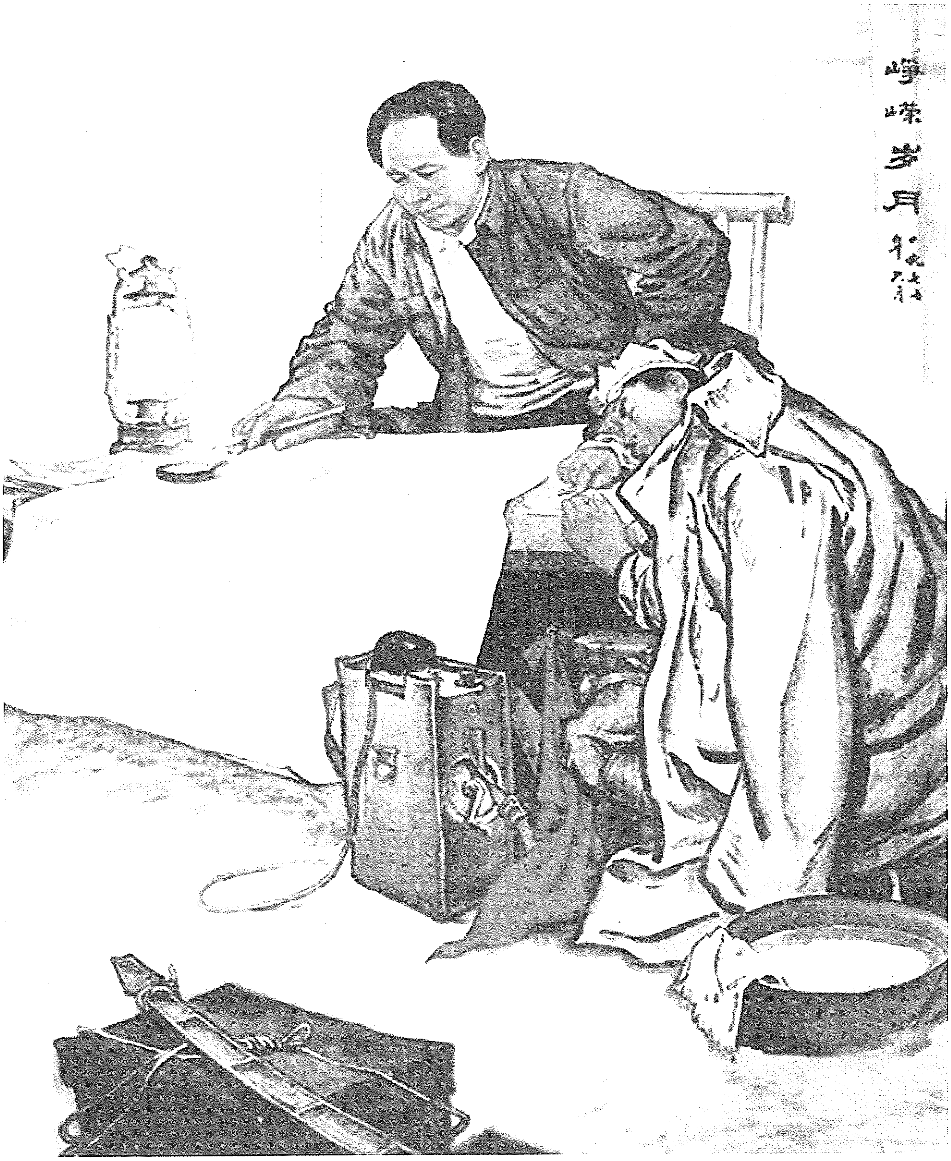
《井冈山岁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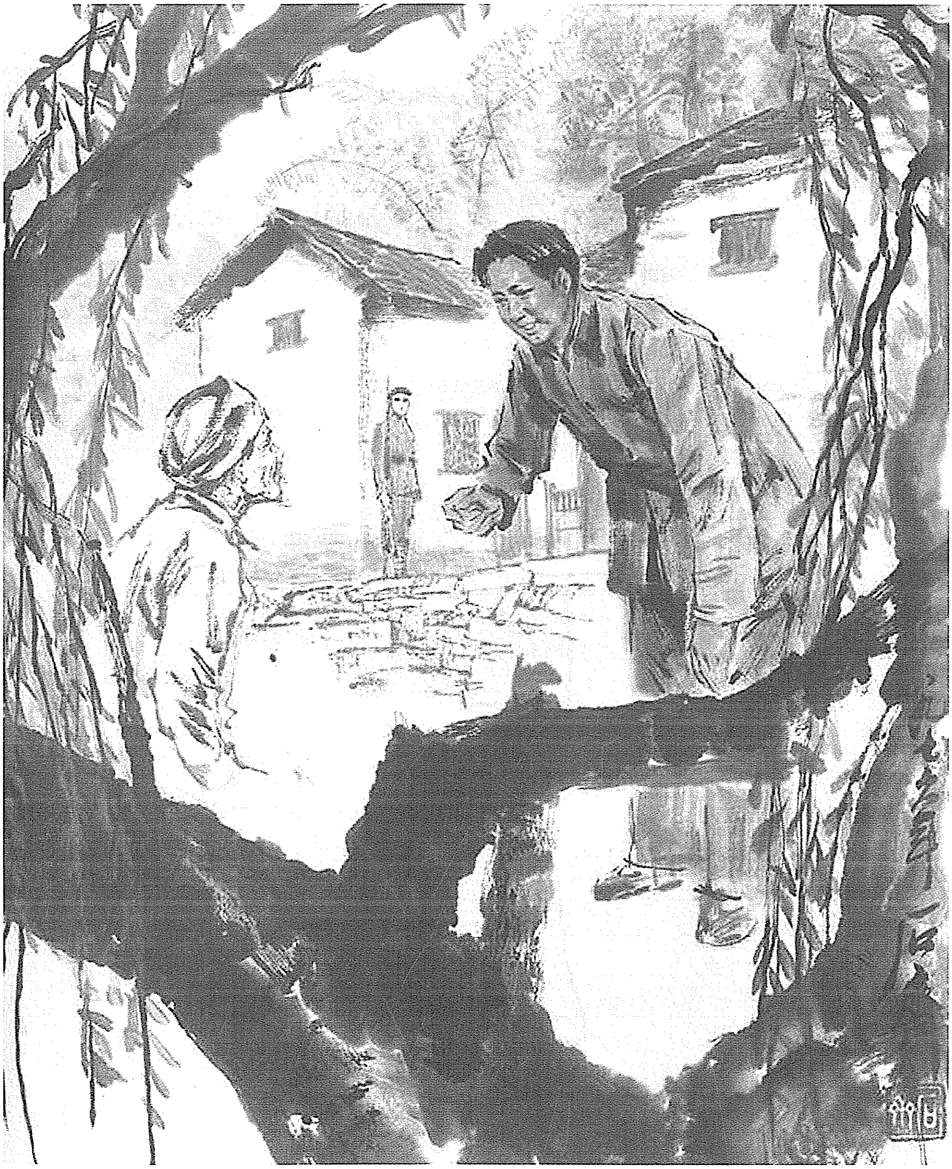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井冈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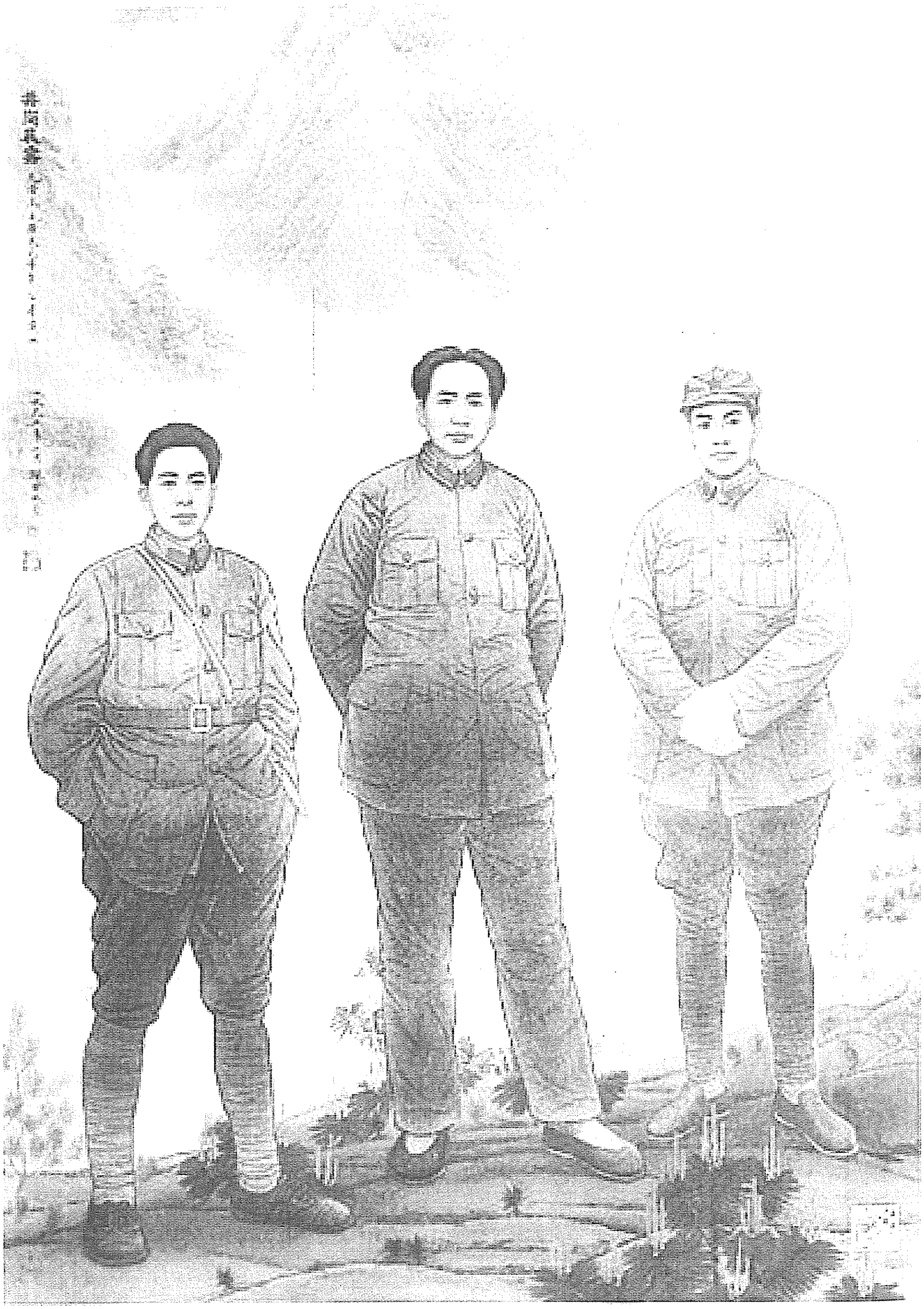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井冈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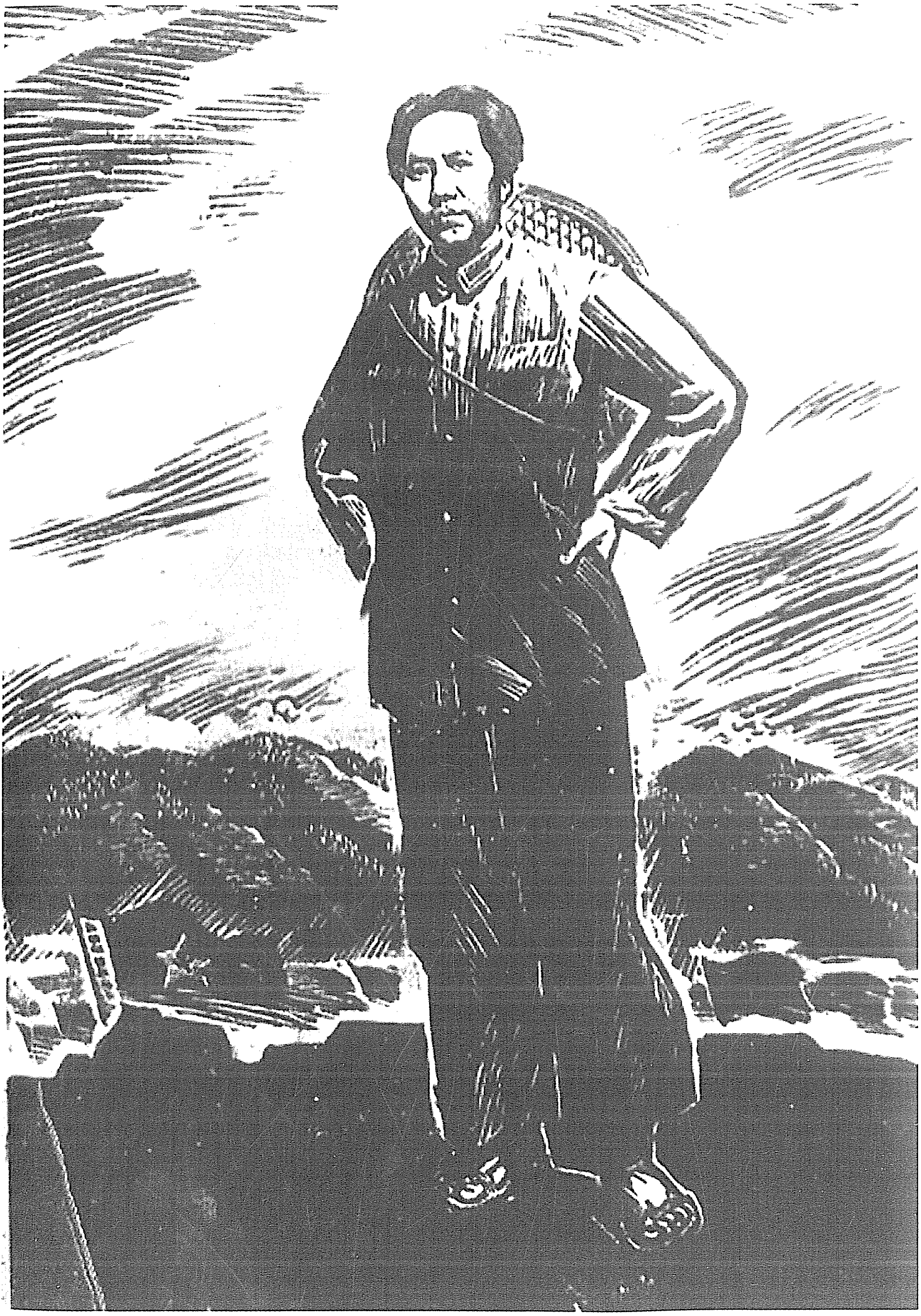
《峥嵘岁月》（中国画）



《毛主席到我家》（中国画）



《井冈晨雾》（中国画）



《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版画）

（井冈山）土地法

（1928年12月）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一）以乡为单位分配。（二）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三）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一）茶山[1]、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二）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三）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一）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1. 百分之十五；2. 百分之十；3. 百分之五。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二）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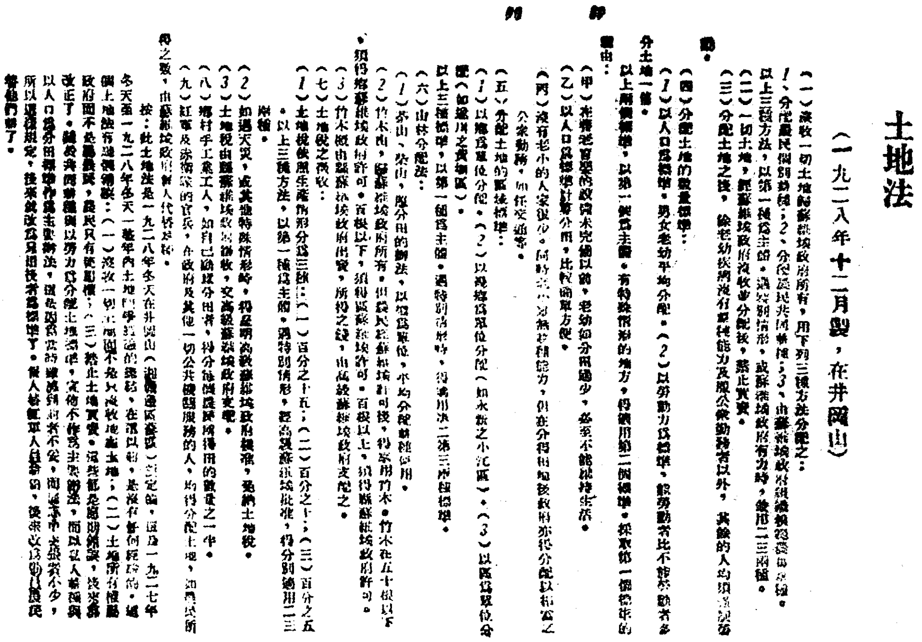
（三）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

---

[1] 茶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田的数量之一半。



土地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製，在井岡山）

（一）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種方法分配之：1、分配農民個別耕種；2、分配農民共同耕種；3、由蘇維埃政府組織模範農場耕種。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或蘇維埃政府有力時，兼用二三兩種。

（二）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並分配後，禁止買賣。

（三）分配土地之後，除老幼疾病沒有耕種能力及服公眾勤務者以外，其餘的人均須強制勞動。

（四）分配土地的數量標準：

（1）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者比不能勞動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適用第二個標準。採取第一個標準的理由：

（甲）在養老育嬰的設備未完備以前，老幼如分田過少，必至不能維持生活。

（乙）以人口為標準計算分田，比較簡單方便。

（丙）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時老小人等雖無耕種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後蘇維埃政府亦得分配以相當之公眾勤務，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1）以鄉為單位分配。（2）以幾鄉為單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區）。（3）以區為單位分配（如遂川之黃坳區）。

以上三種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遇特別情形時，得適用第二第三兩種標準。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辦法，以鄉為單位，平均分配耕種使用。

（2）竹木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但農民經蘇維埃許可後，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須得鄉蘇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下，須得區蘇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上，須得縣蘇維埃政府許可。

（3）竹木概由縣蘇維埃政府出賣，所得之錢，由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稅之徵收：

（1）土地稅依照生產情形分為三種：（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經高級蘇維埃政府批准，得分別適用二三兩種。

（2）如遇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得呈明高級蘇維埃政府核准，免納土地稅。

（3）土地稅由縣蘇維埃政府徵收，交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

（八）鄉村手工業工人，如自己願意分田者，得分每個農民所得田的數量之一半。

（九）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種。

按：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岡山（湘贛邊區邊界）制定的，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土地鬥爭經驗的總結，在這以前，是沒有任何經驗的。這個土地法有幾個錯誤：（一）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權屬政府而不是屬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三）禁止土地買賣。這些都是原則錯誤，後來都改正了。關於共同耕種與以勞力為分配土地標準，規定不以此為主體，而以私人耕種與以人口為分田標準作為主要辦法。這是因為當時雖然覺得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張者不少，所以這樣規定，後來就改為只用後者為標準了。僱人替紅軍人員耕田，後來改為動員農民替他們耕了。

1928年冬，毛泽东总结一年来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图为《土地法》的部分内容。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1]：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界）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

---

[1] 这个“按”是毛泽东在延安编辑《农村调查》一书时加写的。

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红军第四军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28年12月16日）

一　大会纪事

四军五次大会是本年五月在宁冈新城开的，到现在经过了六个月的艰苦斗争。六次大会于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开正式会，十五日闭会。到会代表七十九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卅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三十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十七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期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后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四十九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二十三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十五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巨，复志其概略于此。

二　政治问题决议案

（1）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根据国际二月间对中国革命问题决

议，认定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对外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若果否认这个民权的革命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误解于中国革命极有害。我们从过去的斗争中，证明国际意见的真实。从广州暴动以来，各地烧杀主义便是根本误解了中国革命性质，红军四军于……苦的经验，我们今后的行动是领导工农兵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土地革命，推翻目前最反动的局面，红军必须宣布具体城市政纲，力改前次无限制没收军需品的政策。

（2）国际形势：从德奥资本主义复兴，英法海军协定，美国战争条约，意大利争地中海的权，日本对华出兵，美国对华单独条约，诸事件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日趋激烈，这是国际革命涌进的时机！

（3）国内情势：近来国民党各派军阀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表面上鼓吹永庆升平，实际上蒋介石派专政拉拢勉图一时的相安，从军政、财政、党务三方面国民党内包含了极繁复的裂痕，尤其是北方匪祸方面与南方工农兵暴动证明这个“统一政府”的力量薄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统治中国的主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既是不一致，则其卵翼下的军阀政府更是分崩离析的了。所以中国现时政局的暂时相安，只是在酝酿着军阀们的大混战。

（4）苏维埃政府的产生与存在问题：在白色势力统治下的中国能生长出苏维埃政权而有继续存在的情势，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半殖民地，在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根本是割据不能统一的，苏维埃政权即从其分裂中成长，如果统治阶级的

分裂是继续不断的，则苏维埃政权也同样的能继续存在下去，我们从一年来各地苏维埃之发生证明，上面理之真实，又从边界一年来的割据证明，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需要下列四个条件：（甲）能坚决斗争的共产党；（乙）广大有组织的工农群众；（丙）有相当力量的武装红军和赤卫队；（丁）有利于斗争以少胜多的地势。

（5）目前政治任务：湘赣二省在中国地域上过去经过极汹涌的革命潮流，群众有较深入的基础，边界各割据便负有影响二省革命运动的使命，这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任务。

三　党务决议案

（1）红军中各级党部，不宜公开处置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兵委员会内，党的负责同志须兼为士委职员，对外须提高士委权力，成立党团指挥之，军事机关也需健全，使具有执行党的革命指挥军事的权力。纠正党部过去直接处理日常事务，视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的毛病。

（2）五届军委决定健全各团委，军委只负责政治指导责任，因此对于下级情况毫不明了，各团委也独自为政，遂有不能集中之弊，今后应建全军委，军委须经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

（3）红军迭经巨战，党委干部人才已伤亡殆尽，此后军委须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才。

（4）须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其比例至少须二分之一。

（5）连上支部干事会应改变称连支部委员会，扩大委员数量，

使多数同志参加干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为红军核心，支委人数定五至七人。

（6）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四　军事问题决议案

（1）建立军事根据地：（甲）在大小五井建筑巩固的工事；（乙）在根据地尽量屯积粮食；（丙）在根据地建筑医院、营舍及红军纪念堂。

（2）部队编制：每连长枪定七十五支，每营四连，每团一个特务连，其枪数与步兵连等，每团可有机关枪连、追击炮连，每连长枪四十支，团部传令排八支，营部四支，军部可设立特务营，其组织与兵营等。

（3）一切枪弹归军部，各团、营、连不得自由分配。

（4）短枪每连至多不过六支，营部至多不得过三支，团部至多不得过五支，军部至多不得过六支。

（5）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

（6）军事技术得加强训练，对于下级干部的军事指挥更应注意方法，健壮红军战斗力。

（7）在军队组织中要特别健全侦探队、卫生队、担架队，在每营可设担架排，关于经济经理及报告应采用新式簿记。

（8）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作纪

念品。

（9）红军政治训练要注意下列诸种：（甲）健全士委会，使其权能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维护军队纪律，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对外作群众运动；（乙）分期举行士兵识字运动；（丙）启发士兵阶级觉悟，使士兵了解革命中各种主要问题，并具备政治常识；（丁）筹备各种娱乐，影响士兵自动参加，使其得到艺术的享乐；（戊）连上须组织三人以上宣传队，战时平常不断地做宣传工作；（己）标语口号须由军委规定发出，以求统一，免致杂乱。

（10）各级党部须随时计划做破坏敌人工作。

（11）为使红军扩大须应募工农及革命分子来红军入伍。

（12）军委须着手健全三十二团第一营。

五　经济问题决议案

军部军需处及各团辎重队，每月需要作一详尽经济报告，交由士兵代表会审定后向群众公布，务使红军经济问题彻底公开。

六　纪律问题决议案

十一月十日红军新城、永新之役，宁冈四区赤卫队及一部农友不来前线作战、夺取敌人枪支及担任运输、救护、搜山等工作，仍在新城附近收搜耕牛及其他杂物。此种行动实属违反革命纪律，侵犯农民利益，本代表大会应向宁冈县委及县政府提出质问，希望以后不宜再有此项行动，关于索去耕牛须尽数发还，并公开发表宣言，解释此项错误，使群众明了。

七　大会代表提案

（1）健全担架队；

（2）健全侦察队；

（3）健全军事政治学校；

（4）优待敌军；

（5）招新兵；

（6）收买枪弹西药；

（7）派员联络五军；

（8）整饬军纪党纪；

（9）囤积粮食于后方；

（10）颁布民权革命政纲；

（11）禁止盲目的焚杀；

（12）保护中小商人利益；

（13）恢复罗霄山脉政权向北发展；

（14）红军需依照太平天国军队的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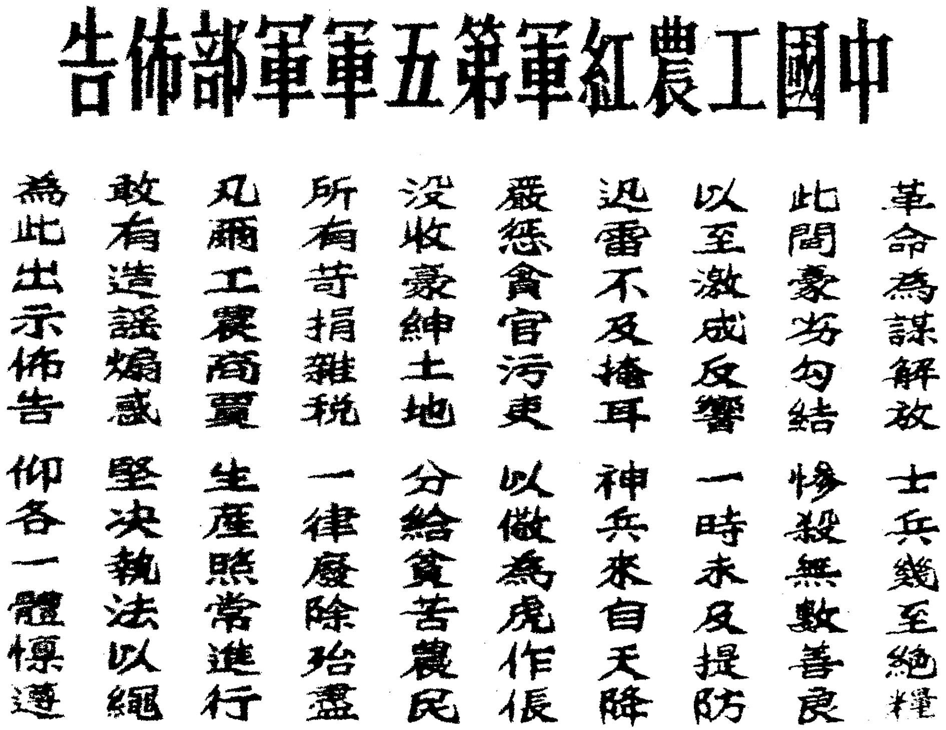
（15）速定红军人员武器的编制表；

（16）军队中不准私自买卖；

（17）健全士委会；

以上十七种提案，大会因提前闭幕，未及详细讨论，均交新军委讨论执行。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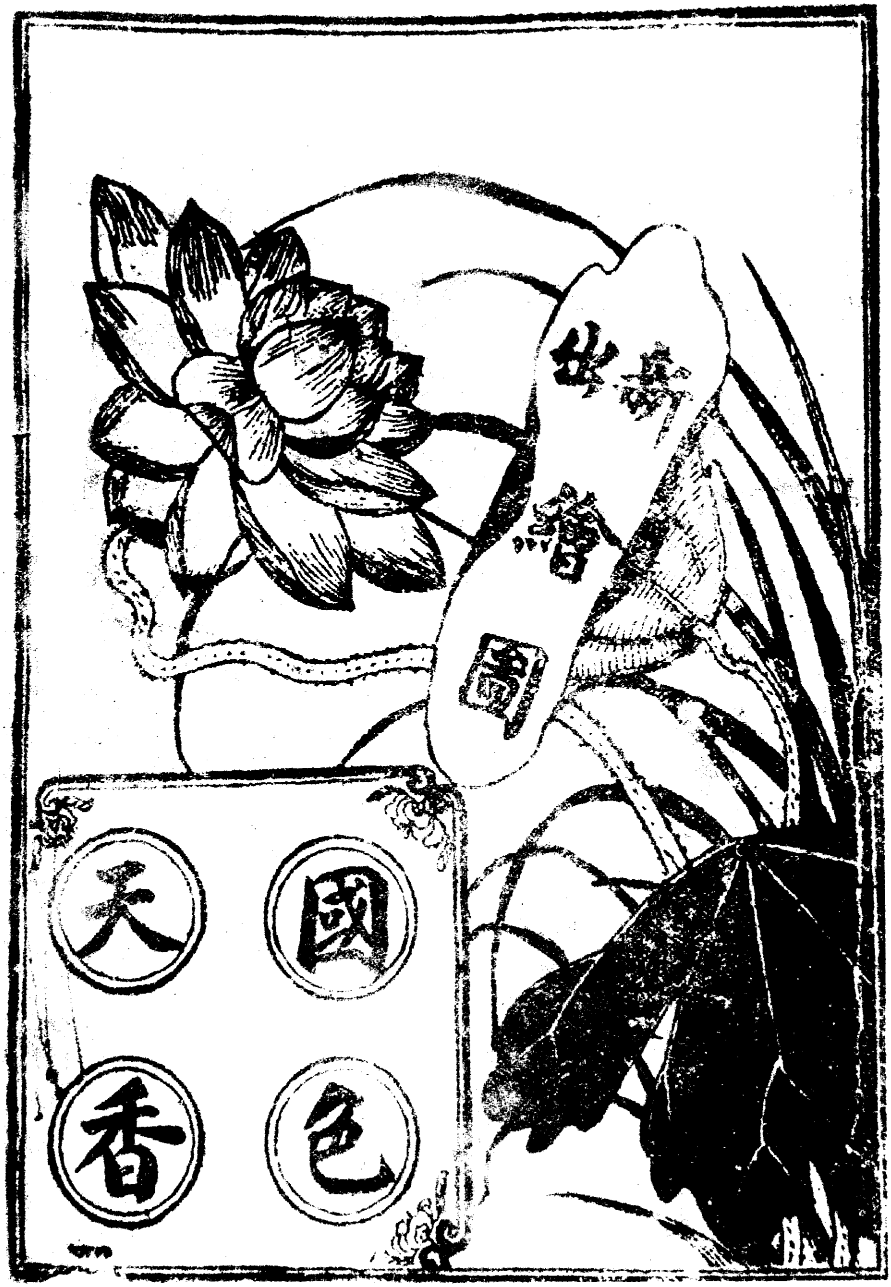


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軍部佈告

革命為謀解放
此間豪劣勾結
以至激成反響
迅雷不及掩耳
嚴懲貪官污吏
沒收豪紳土地
所有苛捐雜稅
凡爾工農商賈
敢有造謠煽惑
為此出示佈告

士兵幾至絕糧
慘殺無數善良
一時未及提防
神兵來自天降
以儆為虎作倀
分給貧苦農民
一律廢除殆盡
生產照常進行
堅決執法以繩
仰各一體懍遵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和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会师。图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部布告。



伪装题名《新出绘图国色天香》的《中共六大决议案》。

和何长工应对联[1]

（1928年）

谷磨磨谷，谷随磨转，磨转谷裂出白米；（何长工）
门锁锁门，门由锁开，锁开门敞迎故人。（毛泽东）

---

[1]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将王佐的武装力量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并将何长工派去任党代表。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见一位老农正在磨房磨谷，便进房帮助。何长工有事来找，见磨谷的磨盘，略加思索出了上联。毛泽东听后，说：“妙对！妙对！下联可难配啊！待我仔细想想。”回到驻地后，毛泽东见警卫员用锁开门，当即触景生情，对何长工说：“我看刚才的上联可以这样对。”接着说出了下联。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1918年毕业于湖南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4年参加长征。建国后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29

古田會議決議
膠東聯合社印

1944年3月，胶东联合社以《古田会议决议》为书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1]

（1929年1月）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夫，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国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2]，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
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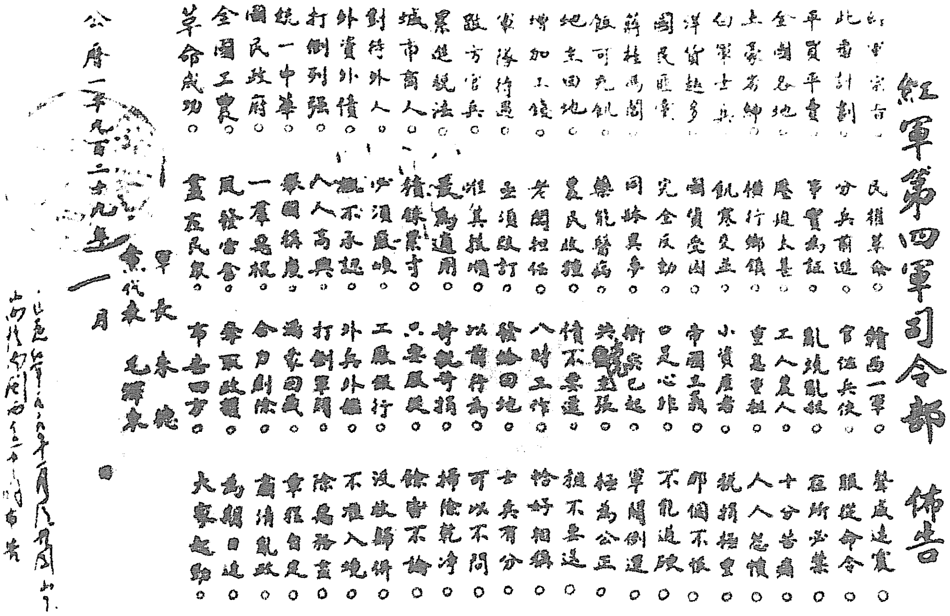
---

[1] 这是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

[2] 蒋桂冯阎，指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冯玉祥、阎锡山四派。

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
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公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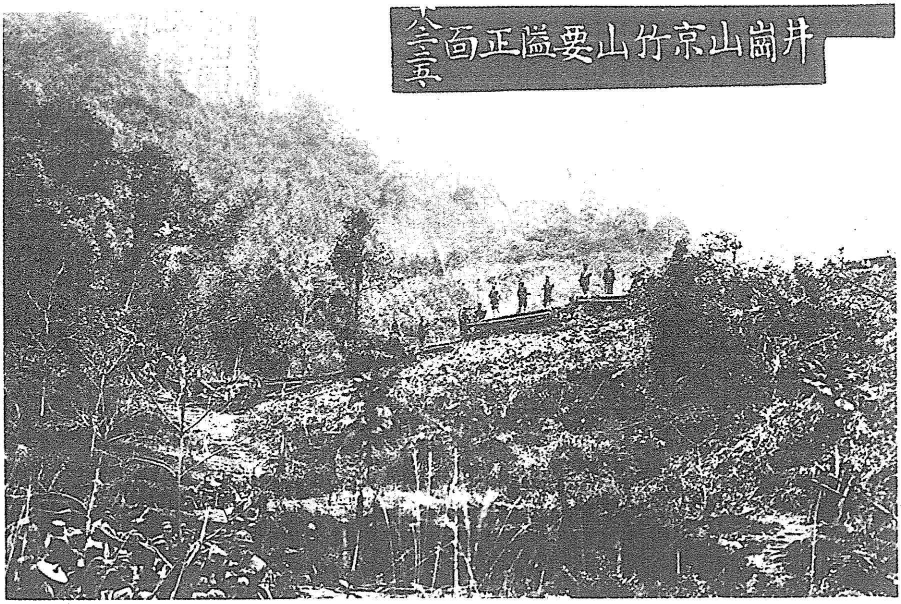
紅軍第四軍司令部　佈告

紅軍宗旨。民權革命。贛西一軍。聲威遠震。
此番計劃。分兵前進。官佐兵伕。服從命令。
平買平賣。事實為證。亂燒亂殺。在所必禁。
全國各地。壓迫太甚。工人農人。十分苦痛。
土豪劣紳。橫行鄉鎮。重息重租。人人怨憤。
白軍士兵。飢寒交迸。小資產者。稅捐極重。
洋貨越多。國貨受困。帝國主義。那個不恨。
國民匪黨。完全反動。口是心非。不能[illegible]。
蔣桂馮閻。同[illegible]具爭。新[illegible]已起。軍閥倒運。
飯可充飢。藥能醫病。共黨主張。極為公正。
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
增加工錢。老闆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
軍隊待遇。必須改訂。發給田地。士兵有分。
地方官兵。惟其投順。從前行為。可以不問。
累進稅法。最為適用。苛稅什捐。掃除乾淨。
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
對待外人。必須嚴峻。工廠銀行。沒收歸併。
外資外債。概不承認。外兵外艦。不准入境。
打倒列強。人人高興。打倒軍閥。除惡務盡。
統一中華。舉國稱慶。滿蒙回藏。章程自定。
國民政府。一羣惡棍。合力剷除。肅清亂政。
全國工農。風發雷奮。奪取政權。為期日近。
革命成功。盡在民衆。布告四方。大家起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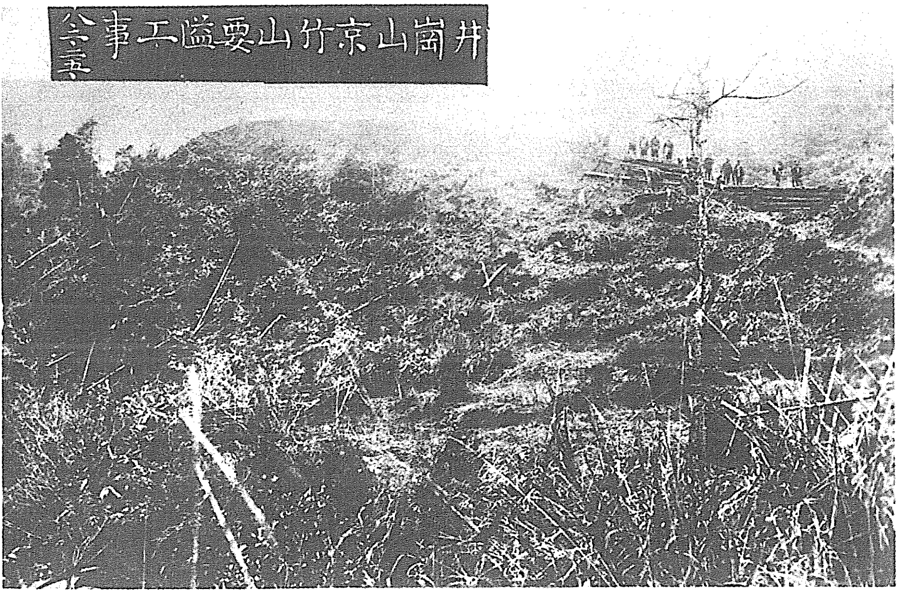
軍長　朱德
黨代表　毛澤東
公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一月

[illegible]

红四军司令部在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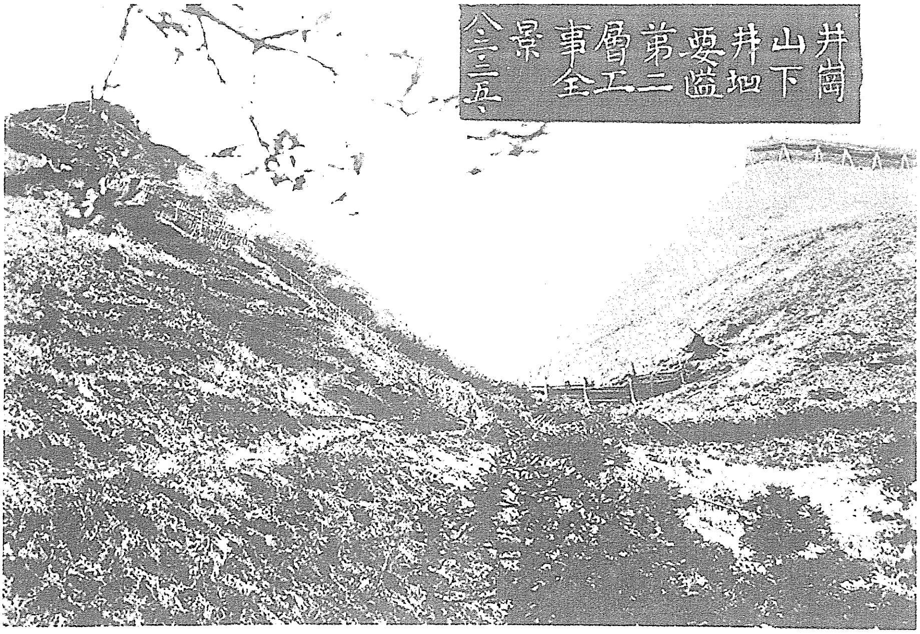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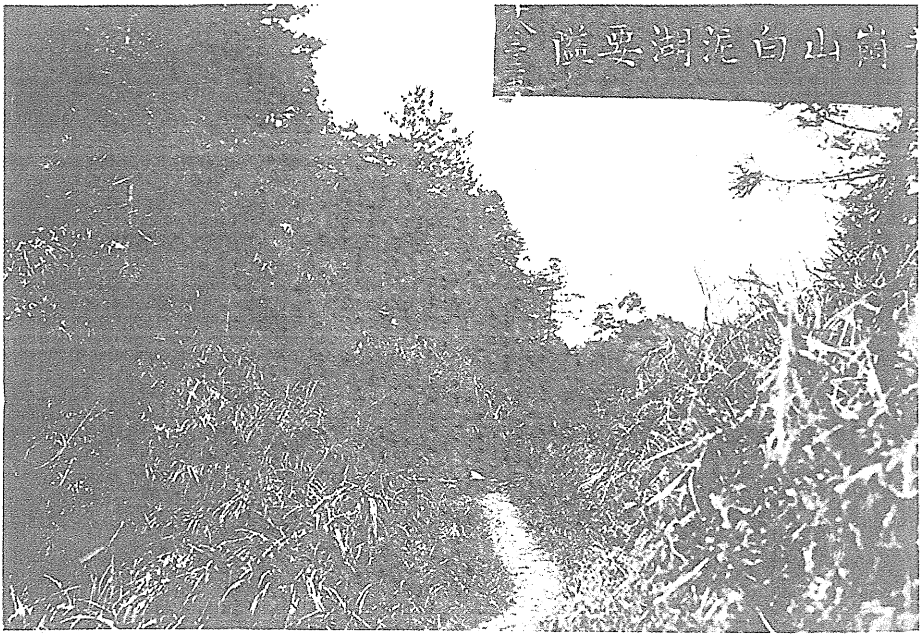
井崗山京竹山要隘正面



井崗山京竹山要隘工事

1929年1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井冈山。图为国民党军队拍摄的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军事设施图。


井岡山下井坳要隘第二層工事全景
八三三五


岡山白泥湖要隘
八三三

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的军事设施图。

共产党宣言*

（1929 年 1 月）

中国的革命现在还是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是要推倒两个最大的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阶级。中国受英、美、法、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有几十年了，他们把洋货运进中国来，把中国的农产品运到外国去，使中国的农民吃亏很大；又开工厂剥削中国的工人，开银行吸收中国的资本，管理海关扼制中国的命脉，设立教堂养成他们的走狗，把租界做根据，兵船开在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各沿海沿江重要口岸，陆军亦驻在北京、天津、上海各处，简直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这样压迫中国，中国数万万工人、农民、兵士及小资产阶级便不得不起而反抗，共产党更不得不站在民众的前头勇敢奋斗。乃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半路反叛，不但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并且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卖国媚外，和吴佩孚、孙传芳一个样子，资产阶级国民党既已反革命了，工人、农民、兵士和小资产阶级，乃不得不担负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帝国主义打倒之后，全国才可以统一，工业才可以发展，中国整个的民族才可以得到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责任。中国现在的土地制度，是一种半封建制度，农民受重租、重息、重税的剥削，田地集中在地主手里。中国境内，差不多不论哪一县，田地十分之七在地主手里，农民只有很少的田地。

乡村里一百户人家之中，少穿少吃的贫农要占七十家，够穿够吃的中农不过二十家，余钱剩米的富农不过十家，乡村中大多数人受苦受难，只有少数收租谷收利息的土豪享福。城里的官僚军阀乃是土豪的代表。一面重捐重税剥削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帮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土地革命是中国民权革命主要的内容，地主官僚军阀不除，中国农民得不到土地，民权革命就不算成功。所以推翻封建剥削，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个责任。如上所述，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剥削，是民权革命的两大目标，但国民党已经背叛民权革命，蒋、桂、冯、阎、奉各派新军阀都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表、帝国主义的走狗。故要达到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剥削的目的就非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不可，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个责任。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今来至此地，所执行的任务，就是上面所说的三件。同时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工农、兵士、群众所执行的任务，也就是上边所说的三件。要执行上述三大任务，特依照共产党第六次全国大会的指示，发布下列十大政纲：

（一）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资本开设的工厂、商店、船只、矿山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满、蒙、回、藏、苗、瑶各民族的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六）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田地，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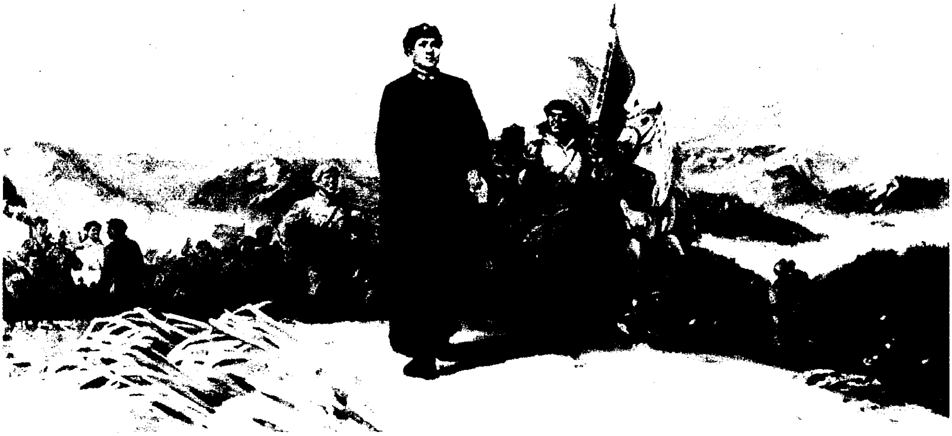
（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田地和工作；

（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苏维埃俄罗斯。

以上十条政纲是达到三大任务的具体方案。工人们、农民们、兵士们、一切贫苦群众、一切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快快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团结起来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新军阀奋斗啊！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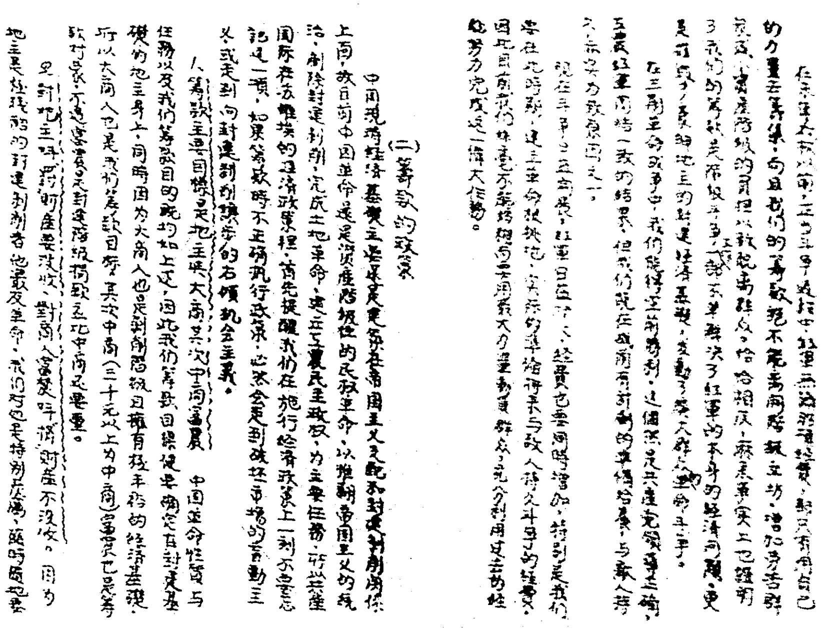
《向赣南闽西进军》（油画）

筹款公函

（1929年2月13日）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对于商人极力保护，纪律森严，毫无侵犯。现因军粮拮据，特函前来，请代筹军饷大洋五千元，草鞋、袜子各七千双，白布三百匹，夫子二百名。务于本日下午八时以前送来本部。即希查照办理，切勿玩延。如坐视不理，即证明宁都商人显系与宁都反动派勾结一气，故意与红军为难，本军唯有将宁都反动商店进行焚毁，以警奸顽，勿谓言之不早也。

晚上八时前，招待处执事们按时将所筹款和雇用的民工带到红四军军部军需处。此次筹款任务顺利完成。



筹款须知

一、筹款的重要

在苏区未扩大以前，在目前斗争过程中，红军无法取得经费，就只有用自己的力量去筹集。而且我们的筹款绝不需要向[illegible]阶级[illegible]动，增加劳苦群众负担，[illegible]资产阶级的负担以救济劳苦群众，恰恰相反，苏区事实上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筹款是帮助工农斗争，就不只是解决了红军的本身的经济问题，更是打击了反动地主的封建经济基础，发动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三湘革命战争中，我们能得到空前的胜利，这个固然是共产党领导之正确，工农红军团结一致的结果，但我们现在与前有计划的筹措给养与敌人持久斗争实为致胜原因之一。

现在斗争已在开展，红军日益扩大，经费也要同时增加，特别是我们要在此时期，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准备与敌人持久斗争的经费，因此目前我们要毫不犹豫的向广大群众动员群众，充分利用过去的经验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

（二）筹款的政策

中国现在经济基础主要是受着帝国主义之统治和封建剥削关系上面，故目前中国革命是反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剷除封建剥削，完成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主要任务，所以在国际资本进攻的经济政策里，首先提醒我们在施行经济政策上一刻不要忘记这一项，如果筹款时不正确执行政策，必然会走到破坏市场的盲动主义，或走到向封建剥削投降的右倾机会主义。

1、筹款主要目标是地主、大商，其次才是富农　中国革命性质与任务以及我们筹款目的既均如上述，因此我们筹款目标要确定在封建基础的地主身上，同时因为大商人也是剥削阶级且拥有极丰富的经济基础，所以大商人也是我们筹款目标，其次中商（三十元以上为中商）富农也是筹款对象，不过富农是半封建阶级，捐款之比中商还要重。

2、对地主、豪绅的财产要没收，对商人、富农只要捐款，财产不没收。因为地主是压迫我们的封建剥削者，也最反革命，我们不但是特别注意，随时随地要

[illegible]

二

图为湘赣军区政治部翻印的《筹款须知》，对筹款的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

（1929年3月16日）

做生意的同胞们，读书的同胞们：

（一）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到你们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

（二）共产党在现时领导的革命，叫作民权革命，是要打倒三个反动的东西。第一个，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管，不许洋人支配中国；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给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现时领导奋斗的三个大任务。

（三）提出这三种任务，你们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该十分欢迎。做到这三件事，是工农阶级的盼望，也是于你们大有益的。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吗？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洋货不断地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的益处有多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凋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到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的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达吗？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去

了走狗，地主阶级失去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于你们是有益处的吗？

（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大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示服从，心怀敌意。须知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一定要成功的，而且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

（五）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配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须招收大批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做政治工作。

（六）蒋桂战争已在两湖爆发，全国新军阀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骗民众的国民党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全国统一完全是臭话。美国走狗的蒋派冯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阎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新军阀之倒台溃败就在眼前，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商人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速

起来帮助工农阶级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争啊！

商人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赞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断绝洋货的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的商业自由！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革命的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

（1929年3月20日）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

1. 我们（红军第四军）三月十四日攻克汀州[2]城。郭凤鸣（福建第二旅旅长）打死，陈尸汀市三日。缴获步枪约五百支（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支，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郭旅残部向上杭溃退。

2. 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建立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分秘密公开两种），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目下是政治部代替政权机关。

3. 时局开展（我们看到三月三日的上海报，三月十三日的……及漳潮两报），闽西及赣南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

4. 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

[2]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1]，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5. 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6. 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部）约四百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独立第四团（段月泉部）约三百余枪，战斗力尚弱，现在兴国、于都之交。红军彭德怀[2]部约三百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三月七日彭部袭击刘士毅[3]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枪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7. 福建省委须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4]工

---

[1] 直隶，旧省名，辖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小部地区，1928年改为河北省。

[2] 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3] 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

[4] 汀属八邑，指旧汀州府下辖的归化、长汀、上杭、永定、宁化、清流、连城和武平8个县。

作，汀属党部太弱，担负不起建设政权的责任。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现在枪无人抬），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

8.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9. 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1]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2]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宁都、兴国、吉安之交，地属吉安）。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关枪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3]），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

---

[1] 李文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2] 罗福嶂，村名，位于江西寻乌东部。

[3] 打圈子政策，是毛泽东对井冈山初期红军游击战术的一种形象说法。

都、瑞金之壬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壬田市向汀州之原因。张旅[1]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蒋系须集中部队，故将张旅调回，因此我们得安心对付郭凤鸣旅。十三、四日两次击溃郭部二、四团，而红军亦在兴国、于都一带发展。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兵士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2]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10. 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第四军除留在湘赣边界的一部分外，出来的部队现编为三个纵队，共三千人，枪一千五百，子弹极少。因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战斗力不及从前。但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因两次损伤的结果，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于极点，亟盼中央派人来补充，至少须派军事的政治的教官各数人，来此开办训练学校。

11. 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一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一月间在井冈山接到的；一是六次大会[3]决议案

---

[1] 张旅，指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张与仁。

[2] 袁文才，1929年随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途中，脱离队伍回井冈山，仍坚持革命，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

[3] 六次大会，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

(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结[1]六件)，今年一月在永新接到的。我们寄给中央的信：去年八月毛泽东之一长信，由湖南省委转；去年十一月前委之详细报告[2]，由湖南江西两省委转，此报告历述两年来湘赣边界斗争之经过，红军之现在计划等，不知均曾收到否？

12.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惟少组织、宣传、职工三决议案，乞即补寄！

13. 闽西特委须速建立。赣南特委与江西省委非常隔绝，但与前委已发生密切关系。湘赣边界特委自去年五月成立以后，与湖南省委关系较密，与江西省委关系较少。赣南党部，于都及东固最好，兴国、信丰、宁都、安远、寻乌次之，瑞金、会昌、石城尚无组织。长汀在开始发展中，最好之永定，离我们三百余里。为应付江西事变，红军此刻不能去永定。阮山[3]同志的红军有开来汀州之必要，必须如此，我们去江西后，汀州的政权才可以继续，才可以与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络。郭凤鸣死，汀州再无人管，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省委熟计。

14. 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

前委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

[1] 原文如此。

[2] 即《井冈山的斗争》。

[3] 阮山，当时是闽西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

敬告士兵群众书[1]

（1929年3月27日）

本军是共产党的军队，是贫苦工农的化身，我们誓为工农利益奋斗，以求得到彻底的解放！

你们与工农同是被压迫的贫苦群众，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是你们共同的敌人，为解放工农，为解放你们自己，我们特地号召你们起来：实行兵变！回枪打张贞[2]！回枪杀压迫你们的长官！参加土地革命、分取土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向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发布的《敬告士兵群众书》的主要内容。

[2]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

（1929年4月5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2]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3]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4]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2]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

[3] 指1929年初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4] 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能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

民革命军、浏平[1]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2]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

---

[1] 浏平，指湖南浏阳和平江。

[2] 指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1929年2月10日至11日，红军第四军在江西宁都大柏地（后改属瑞金），伏击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歼灭该旅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800多人，缴枪800余支。1929年3月13日至14日，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于福建长汀的渔溪、长岭寨一带，全歼敌军2000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

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1]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2]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3]同

---

[1] 叶，指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戍司令，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贺，指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北伐战争中曾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8月率部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

[2]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当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3] 恽代英（1895—1931），江苏武进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1]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2]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3]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4]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5]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6]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

---

[1] 贺昌（1906—1935），山西柳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2] 蒋伯诚（1889—1952），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3] 陈国辉（1898—1932），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卢兴邦（1880—1945），福建尤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4] 张贞（1884—1963），福建诏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6] 李文彬，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十一旅旅长。

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1]的红军独立第三团[2]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3]，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

---

[1]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

[2] 独立第三团，似应为独立第一团。

[3] 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大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

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1]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2]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3]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4]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

[1] 金汉鼎（1891—1967），云南黎县（今华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师长。

[2] 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当时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3] 宁永莲遂酃茶，指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

[4] 攸、醴，指湖南攸县和醴陵。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1]，历史地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

---

[1] 即《井冈山的斗争》。

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1]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

[1] 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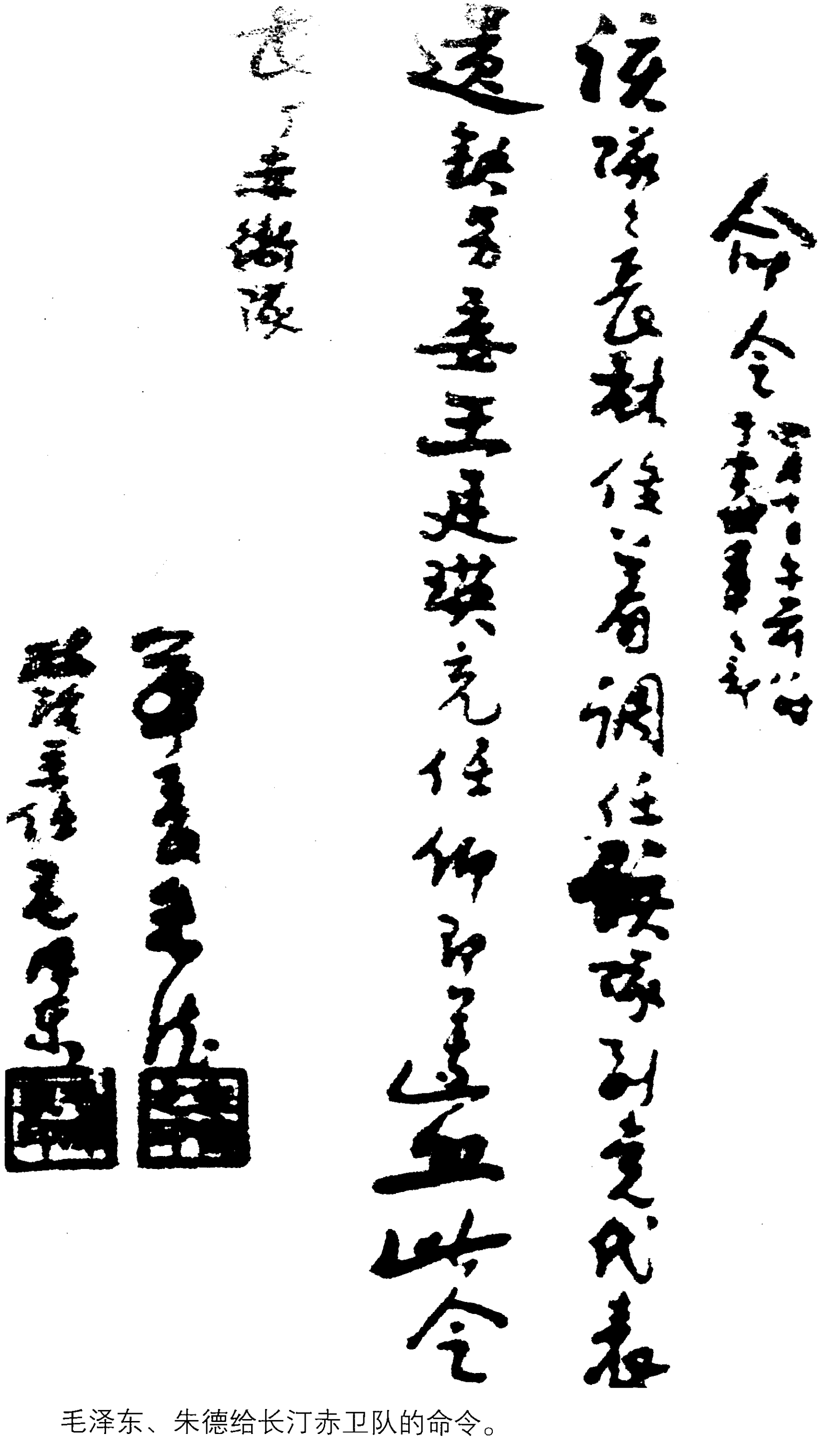
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其中最早以文字记载了毛泽东、朱德在1928年5月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术的“十六字诀”。图为该信的部分内容。

四军军部命令

（1929年4月10日）

该队队长林俊着任该队副党代表遗缺另委王廷瑛充任，仰即遵照。此令长汀赤卫队

军　　长　朱　德
政治主任　毛泽东



命令 [illegible]

该队队长材佳着调任该队副党代表遗缺着委王廷瑛充任仰即遵照

此令

长汀赤衛队

军长朱德

政治主任毛泽东

毛泽东、朱德给长汀赤卫队的命令。

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

（1929年4月13日）

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

[1] 这是毛泽东在于都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致湘赣边界特委信的部分内容。

（兴国县）土地法

（1929年4月）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

（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毕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致不能维持生活。

（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

（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3）以区为单位分配。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

第三两种标准。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所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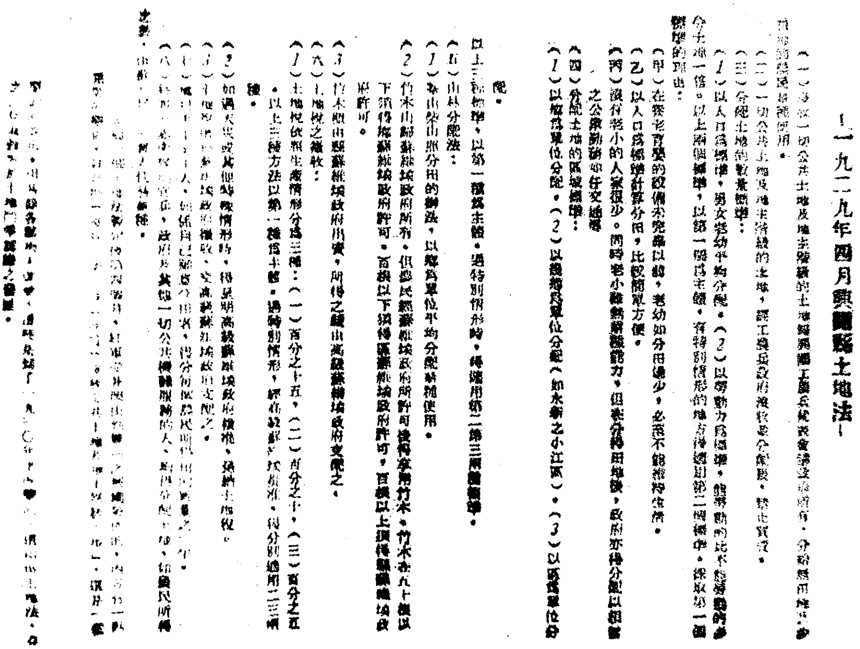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岗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土地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

（一）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興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所有，分給無田地及少田地的農民耕種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經工農兵政府沒收並分配後，禁止買賣。

（三）分配土地的數量標準：

（1）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2）以勞動力為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土地一倍。以上兩個標準，以第一個為主體。有特別情形的地方得適用第二個標準。採取第一個標準的理由：

（甲）在養老育嬰的設備未完備以前，老幼如分田過少，必至不能維持生活。

（乙）以人口為標準計算分田，比較簡單方便。

（丙）沒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時老小雖無耕種能力，但當分得田地後，政府亦得分配以相當之公眾勤務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區域標準：

（1）以鄉為單位分配。（2）以幾鄉為單位分配（如永豐之小江區）。（3）以區為單位分配。

以上三種標準，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時，得適用第二第三兩種標準。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辦法，以鄉為單位平均分配耕種使用。

（2）竹木山歸蘇維埃政府所有，但農民經蘇維埃政府許可後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須得鄉蘇維埃政府許可，百根以上須得區蘇維埃政府許可。

（3）竹木概由縣蘇維埃政府出賣，所得之錢由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稅之徵收：

（1）土地稅依照生產情形分為三種：（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種方法以第一種為主體。遇特別情形，經高級蘇維埃政府批准，得分別適用二三兩種。

（2）如遇天災或其他特殊情形時，得呈明高級蘇維埃政府核准，免納土地稅。

（3）土地稅由縣蘇維埃政府徵收，交高級蘇維埃政府支配之。

（七）[illegible]工人，如係自己願意分田者，得分每個農民所得田的數量之一半。

（八）紅軍及赤衛隊的官兵，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機關服務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農民所得之數，由蘇維埃政府[illegible]人代替耕種。

[illegible]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于都。图为毛泽东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等情况制定的《兴国县土地法》。

农民协会章程*

（1929年5月）

第一条　目的

农民协会之作用，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领导农民，对地主阶级斗争以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没收地主阶级田地分与农民，扫除农村中一切封建势力为目的。

第二条　会员

（1）农民协会之会员，为雇农、佃农及其他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

（2）农村手工人，尚无工会组织之时，亦得加入农民协会。

（3）革命的农村妇女，必须引导加入农民协会。

（4）会员年龄规定十四岁以上。

（5）一切收租的人、放重利的人及反动分子，不准入会。

（6）非农民之革命分子（赞成土地革命主张不还租、不还债的人）经全乡会员大会五分之三通过亦可入会。

（7）会员入会手续。

（甲）有会员二人介绍。

（乙）执行委员会通过。

（丙）填写入会表。

第三条　乡农民协会

（1）三人至十人成一小组，选举组长一人。每七天开会一次。

（2）三个以上小组，成一乡农民协会。

（3）全乡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每小组派代表一人至三人）选举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4）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组织科长一人（内设雇农、青年、妇女三股）、宣传科长一人、土地科长一人、财务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聘秘书一人。

（5）执行委员三分之二，及委员长、粮食科长、土地科长、军事科长必须雇农或佃农方能充当。

（6）执行委员任期三月。

（7）乡代表大会每十五天开会一次。执行委员会每三天开会一次。临时会随时召集。

（8）地方过大、人口很多、不便指挥之乡得设立村农民协会，受乡农民协会之指挥。委员会人数及分科，得比照乡农民协会酌量减少，会期与同。

（9）执行委员任期三个月。

第四条　区农民协会

（1）三个以上乡农民协会成一区农民协会。

（2）全区代表会，每乡三人至九人须全部或至少三分之二是雇农、佃农议决。

（3）在有工会的区域内，须组织区革命委员会，不要区农民协会，区内各事，选举委员七人至十三人组织执行委员会。

（4）执行委员会，互选委员长一人、宣传科长一人、组织科长一人（内设雇农、青年、妇女三股）、土地科长一人、财务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秘书一人。以委员长、组织科

长、土地科长、财务科长、军事科长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5）执行委员任期三个月。

（6）执行委员会三分之二及委员长、土地科长、粮食科长、军事科长，均须雇农或佃农方能充当。

（7）区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委员会，每七天开会一次。常委会三天开会一次。临时会随时召集。

（8）区农民协会，受县革命委员会管辖（县不设农民协会）。

第五条　农民协会的工作

（1）把革命农民组织于各乡农民协会之内。

（2）对一般农民作普遍的宣传（特别是肃清反动势力、解决土地问题二项）。

（3）对组织了的农民，加以政治斗争的训练。

（4）打击地主阶级。

（甲）对于平素欺压工农、阻碍工农革命运动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和他们的走狗，一概捉拿起来，依其情节轻重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赔偿、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乙）没收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的谷子、衣服、器具、房屋，以大部分分与贫农，小部分归农民协会应用。勒令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减轻谷价。

（丙）废除农民对地主的一切债务（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丁）举行群众大会焚毁田契借约（关于地主的）。

（5）组织赤卫队举行游击。

（6）发动没收一切收租田地（大、小地主的，祠堂的，公会的）的斗争，到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时实行没收，分配贫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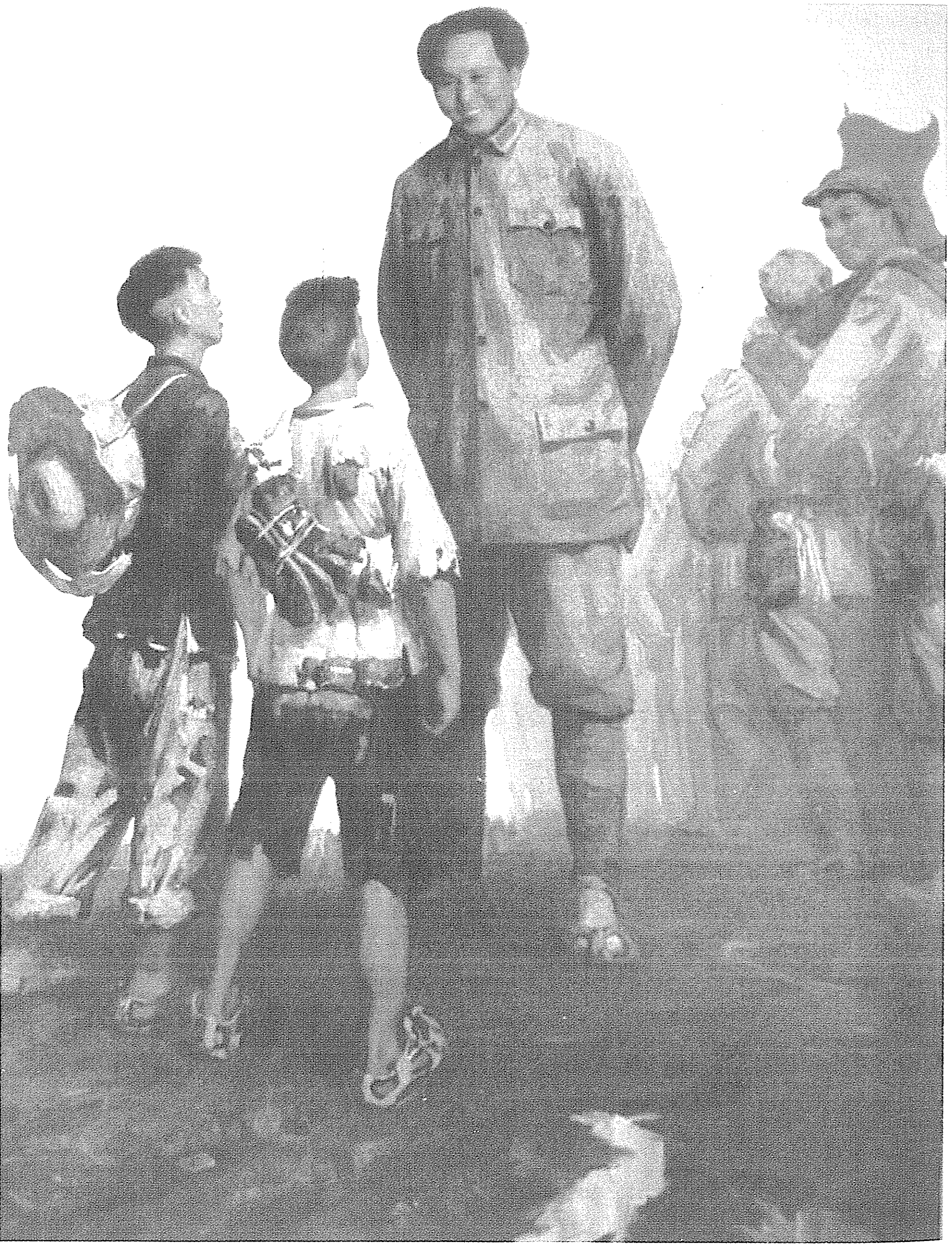
（7）筹备建立区乡两级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

第六条　农民协会与工农兵政府

农民协会是组织群众发动斗争的机关，到了群众的斗争大大发动了，群众大多数有了组织了，此时就要组织区乡两级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以代替农民协会，而于工农兵政府下，设立贫农委员会，为代表贫农利益的机关。

第七条　经费

农民协会经费以会费（会员每人每月出铜元五枚）及打土豪充当。



《贫农的儿子》（油画）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

（1929年6月1日）

中央：

1. 我军（第四军一、二纵队）由瑞金不攻汀州取道直趋龙岩，五月二十四日到达龙岩城及其附近，坎市之陈国辉部两营，一特务连，一机关枪连，骤不及备，大部缴械，得机关枪两挺，步枪二百余支，子弹三万发，俘营长一，士兵二百余。

2. 因永定有郭凤鸣部黄月波团，有迅速击破之必要，五月二十六日进攻永定，黄团不战而退上杭。

3. 我军现在永定分兵各县城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帮助革命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并去发动群众斗争的新区域，消灭民团势力，刻在工作中。

五日后即移往他县（龙岩、上杭等），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张贞、陈国辉、卢新铭大部入粤，闽西、闽南空虚，张贞、陈国辉、卢新铭（代郭旅长）三个残部合计五千人，故此时在闽西一带游击，是最好的机会，望省委对这方面工作多加指导。

---

[1] 本文序号不连贯，编者未加改动，均按原文刊印。

4. 我们四月一日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于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做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共为四十五天，路线是从瑞金到于都到赣州东乡到兴国到宁都，五月十五日再到瑞金，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发展亦不至偏于一隅，与中央指示的“分开游击，统一指挥”相合，现在闽西是这样的。

5. 在赣南游击四十五天内朱培德又闹剿匪，一旅由赣州进于都，一旅由泰和进兴国。一路由抚州进宁都，瑞金由抚州来的是王均师李文彬部，我们在瑞金但未游击，我们向龙岩来，他亦进汀州。在此刻军阀发动全国大混战的时候，此一部敌军或无再追我之可能，唯尚不能完全断定刻在探查中。我们对于这等战争强的军队，决采打圈子政策，不到条件具备（如地势与群众）有胜算可操时，决不和他碰头，所以敌也终无奈何我们。

6. 赣南党与群众的基础，以背都兴国及赣州东乡比较好，安远……宁都次之，瑞金刚在开始，石城、广昌、南丰等县无组织，新改组的赣南特委在赣南于都工作人员很缺乏，一部分地方有盲动主义，多部分还有机会主义（不动主义），省委对他们的指挥很稀少，于都、兴国、宁都三县都有了政权机关（工农兵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之下是农会工会。赣南各县地主势力很弱，前有刘士毅、赖世琮（赖世璜弟）两部土著军队，十分为害，刘旅被红军之二次击溃，残部调往沪浙，赖部于四月三十日红军攻克宁都时，又完全消灭（俘赖世琮，缴好坏枪一百余）。此两部既不存在，朱培德军队又决不敢长驱偏僻之赣南，故赣南的前途，亦是很有希望的，因赣南的发展又可与赣西之井冈山（宁冈等六县）、赣东之方志敏部取得联

络，请中央通告江西省委注意这二处工作。

7. 一月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井冈山彭德怀同志两连兵抵抗很大的会剿军至四日四夜，终于被敌军攻破之。各县赤卫队及王佐营仍在边界，未受大的损失。彭同志即退来赣南缴得刘士毅部枪百余，四月一日与四军在瑞金会合。前委决定彭同志部及王部改编为第四军第五纵队（第四纵队缺），王佐同志为纵队长，湘赣边界赤卫队为四军第六纵队，贺国中同志为纵队长，共有枪一千四百支，此两纵队战斗力颇强。此两纵队属于彭同志以四军副军长名义（对内彭为书记）指挥，湘赣边界军委隶属于前委，前委不能直接指挥时则受湘赣边特委指挥，游击的区域是以宁冈为中心，边界各县有势力广大的提为斗争区域，注意与赣闽路联系。四月十四日彭同志部从于都出发，往信丰、南康……遂川四边界以后从……抵……积他们的活动……江西省委指挥之下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共有枪约一千支（四军补充五百支，好坏各半），两面战斗力颇好，四团成立不久较差，内部组织也颇健全，党在军事上很能发生作用，他们游击的区域是吉安……泰和、万安、兴国……各县他们工作的方法比前较差，四军的影响须有进步。四军在赣南游击时他们受前委的指挥（与前委的关系不变），与四军一同做发展组织、发动群众斗争的工作，担任的区域是兴国及宁都之一部。四军来闽西后他们仍在那里以兴国为中心向四周各县游击。

9. 我们在宁都时东江特委曾到一信给我们，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彼帮助。前委复了他们一信，说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实不能分兵去助，因彼反动势力很大，且不能很远路线发兵。来到闽西时又去了一信，要他们做群众工作，红军在闽西工作一时期后有向东江游击一时期的可能。东

江特委与闽西特委有联络，与赣南特委尚没有联络，依工作的进展，各特委有密切联系的必要，且有在省交界一带设指导机关之必要，或以前委固定设置于此，望中央讨论指示。

10. 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余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六日大柏地对刘旅一战幸已补充（但因没有兵提，将所有之枪给江西红军第二团去）。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八百支，三百多等坏些的发给地方赤卫队去了），连原有共计二千。子弹三个月前，平均每枪不到四十发，现亦增加一倍，这是我军的实力。外间所宣传均超过此数甚多，如各地党部甚至有朱、毛，有人两万，有枪一万，这样实情不明，势必在估量上发生错误。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四百枪。这三部分大体都可说是有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

11. 红军党的详细概况，已详四月一日在瑞金补抄去年十一月的报告，由福建省委转上谅已达览。去年十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

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

兹将五月份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及军部直属部队党的各项重要统计于下：

（1）党员数量：1329。

（2）职务总计：长官330，战斗力兵734，非战斗力兵188，夫子68。

（3）发展同志统计：官长9，战斗力兵99，非战斗力兵9，夫子10。

（4）年龄统计：十八岁以下95，十九岁至二十三岁644，三十一岁至四十岁179，四十八岁以[1]

（5）成分统计：工人311，农民626，小商人106，学生192，其他95。

（6）处罚同志统计：劝告29，警告96，留察10，开除31，共计166。

（7）活动分子统计：支委委员65，组长123，组员200，共计500余。

（8）伤亡同志统计：官长伤6亡3，战斗兵伤9亡5，

再附上一信后，四月一日在瑞金寄上一信并付上彭同志一信补抄去年十一月份的详细报告，不知均收到中央否？到于都探闻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中央通告十五号二十号，当在兴国石印数千份，散发红军及各地党部。刘安恭同志还未办公，听到详细的口头报告。五月二十日在瑞金收到中央军委致前委一信，到龙岩又接到中央通告三十四

---

[1] 原文如此，疑缺内容。

号，国际职工运动小册子、中央为蒋桂战争告民众书等均收到。

此外尚接到福建省委闽西政治经济状况与党今后方针小册子《烈火》等刊物，我们久处深山穷谷之中，与外界隔绝，最近得到中央及福建省委各种指示，真是意外的欣喜，唯江西省委三年来不曾有一个字给我们。最近二次到赣南，罗受男同志从中央来带往我们的文件，又只见罗空手来，文件被江西省委留住了，这种情形太不好了，请中央通知江西省委千万改正这种状态。

（13）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如前在汀州十七天，仅向大商人筹款二万，豪绅地主筹款三万，彼就宣传几十万；仅杀五人，都是最反动的（郭凤鸣营的）；长汀革命委员会烧四个，红军烧一个，彼则宣传为五百多间房子；仅杀郭凤鸣死党三四人，彼则宣称为杀千多人，总之全是胡说，不足为信。杀人烧屋，要有群众的基础，已经成了信条之一，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

（14）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现请中央在最近期内派遣中、下级军官，中、下级政治工作人各一百人，医生及造炸弹师各数名，高级军官、高级政治工作人员各五人，在□个月内赶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来人从福建省委转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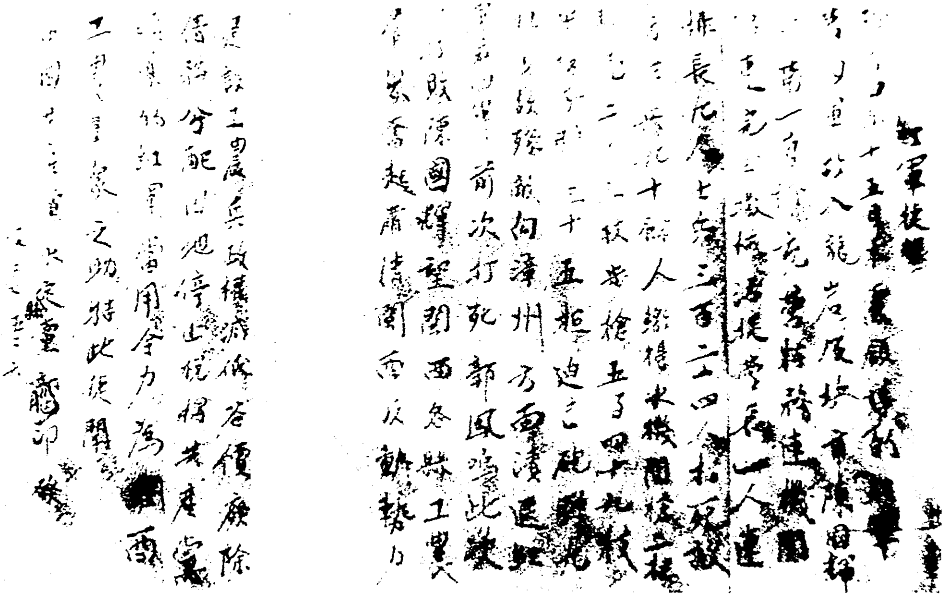
（15）请福建省委负责在厦门设交通机关，专任前委与中央的传达。设立机关经费付上价值一万元的烟土，托龙岩县委转交，如何运送，祈指示龙委。

（16）红军因长期斗争，现有军官及政治工作人不唯知识感特异的饥荒，精神亦表现疲倦，为救济红军的疲计，为造就将来工作人

计，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二十二人业经前委选定，另用专函连同履历付上盼速复！

宣传情况容后报告！

前委书记　毛泽东



1929年5月至6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攻占永安、龙岩县城，建立了县级革命政权。图为龙岩战斗胜利的捷报。

给林彪[1]的信

（1929年6月14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3]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

---

[1] 林彪（1907—1971），当时任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

[2] 指林彪1929年6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

[3] 白砂会议，指1929年6月8日在福建上杭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的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1]，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

---

[1] 原件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1]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2]。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3]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枝长枪一连的制度[4]，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5]，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

---

[1] 原件如此。

[2] 1928年7月上旬，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湘南）的思想，于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受严重损失，称八月失败。

[3] “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4] 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5] 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30个字。

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1]与二、四团[2]。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3]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4]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5]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

---

[1] 指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军第五军，该军1928年12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军会合。

[2] 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1929年2月，红军第四军与第二、第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合。

[3] 柏路会议，指1929年1月4日在江西宁冈柏路村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四军军委、第五军军委等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了如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彭德怀率红军第五军和第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4] 彭德怀（1898—1974），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5] 原件如此，可能是就花名册说的。

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1]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2]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枝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

---

[1] 原件在“纵队委员会”前，有3个字不清。

[2] 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们在湖雷前委会议[1]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

---

[1] 湖雷前委会议，指1929年5月底或6月初在福建永定湖雷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

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1]，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

---

[1] 原件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1]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

---

[1] 朱云卿（1903—1931），当时任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

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1]，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

---

[1] 行委，全称为行动委员会。

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1]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

---

[1] 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1]，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

[1] 原件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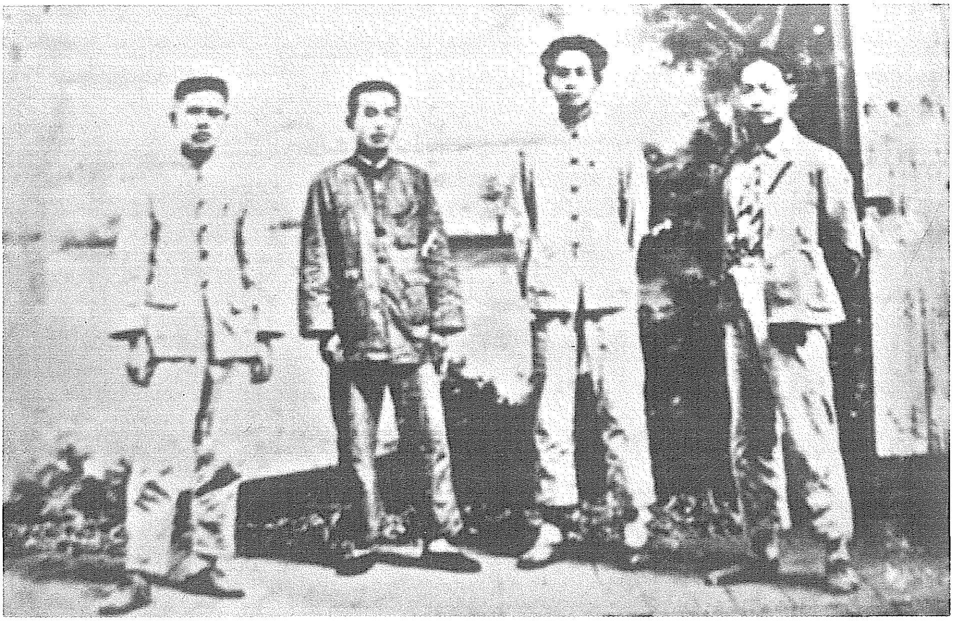
C的敬礼！[1]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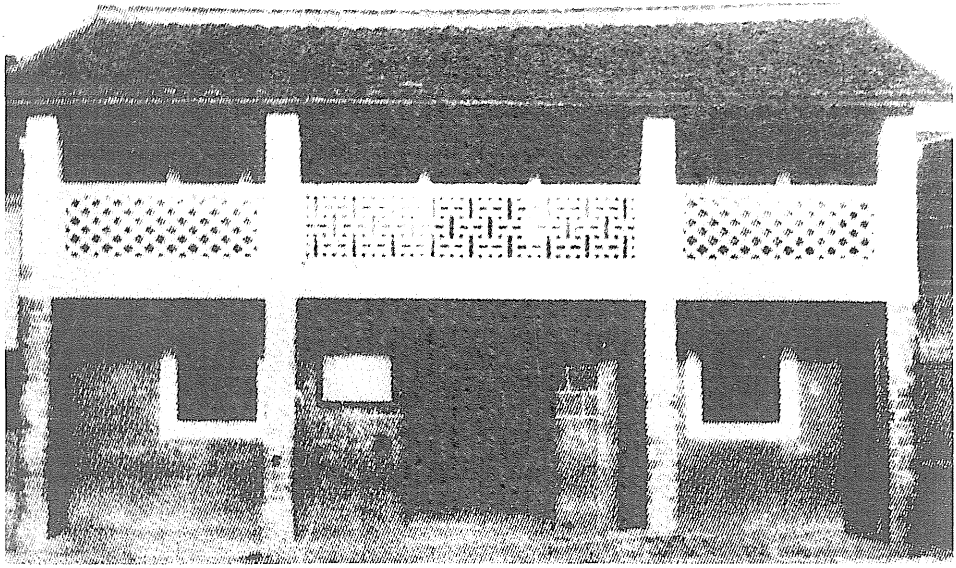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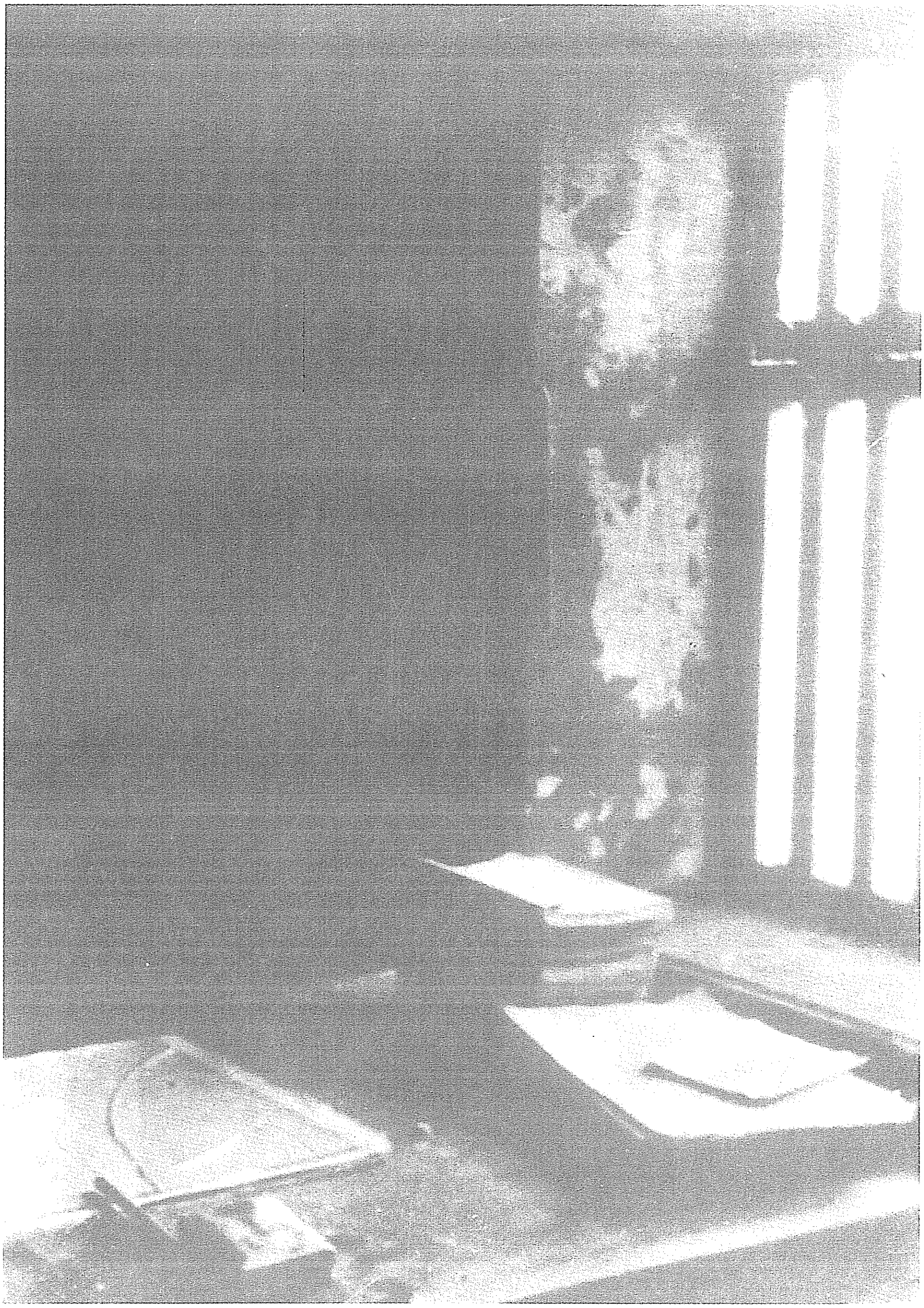
[1] 即共产主义的敬礼。C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1929年6月19日，毛泽东等在福建龙岩。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大会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在会后到上杭地区指导地方工作。图为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地——上杭古田协成店。



1929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蛟洋举行。图为毛泽东在蛟洋文昌阁的旧居内景。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

（1929年6月）

为布告事。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现在国民党四分五裂，蒋桂冯阎全国混战。反动政府根本动摇。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人数越多，势力越大。兵士组织红军，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各省各县各乡各镇都大大地干起来了。本军来到此地，知道民众痛苦甚深，谷价很贵，利息很高，租谷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绅操纵一切，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这种土豪劣绅，百人之中，不过几人。大多数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少数的豪绅，求得多数人的利益。现将急于要做的事开列于下：

（一）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

（二）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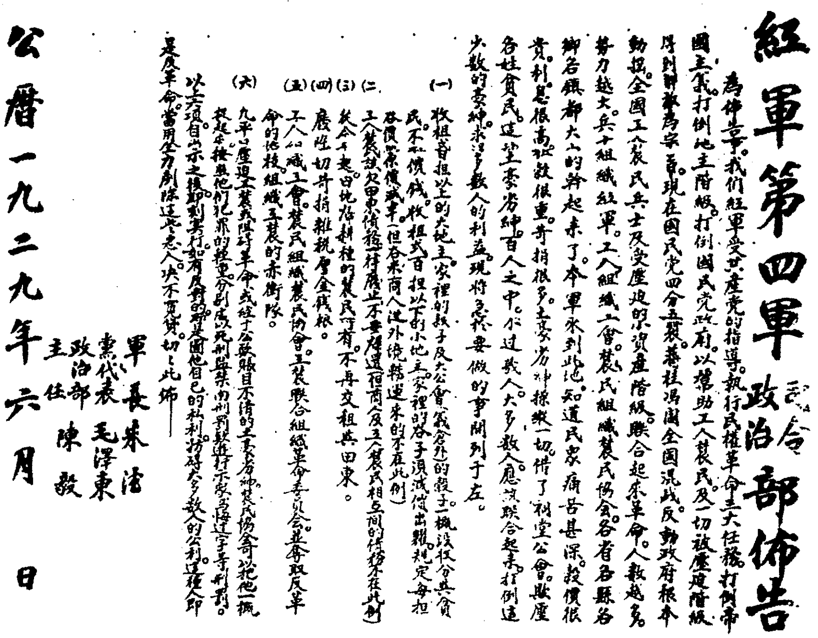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并夺取反革命的枪支，组织工农的赤卫队。

（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以上六项，自出示之后，即刻实行。如果反对的，即是图他自己的私利，妨碍大多数人的公利，这种人即是反革命，当用全力铲除这些恶人，决不宽贷。切切此布。

军　　长　朱　德
党 代 表　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　陈　毅
公历一九二九年六月　日



紅軍第四軍司令政治部佈告

為佈告事。我們紅軍受共產党的指導。執行民權革命三大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階級。打倒國民党政府。以幫助工人農民及一切被壓迫階級得到解放為宗旨。現在國民党四分五裂。蔣桂馮閻全國混戰。反動政府根本動搖。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及受壓迫的小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革命。人數越多。勢力越大。兵士組織紅軍。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各省各縣各鄉各鎮都大大的幹起來了。本軍來到此地。知道民衆痛苦甚深。穀價很貴。利息很高。租穀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紳操縱一切。借了祠堂公會。欺壓各姓貧民。這些土豪劣紳百人之中。不過數人。大多數人應該聯合起來。打倒這少數的豪紳。求得多數人的利益。現將急於要做的事開列於左。

（一）收租谷担以上的大地主。家裡的穀子及大公會（義倉在外）的穀子。一概沒收分與貧民。不收價錢。收租谷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裡的穀子須減價出糶。規定每担谷價若干（但各米商人從外境轉運來的不在此例）

（二）工（農民欠田東債務。一律廢止不要償還（但商人及工人農民相互間的債務不在此例）

（三）沒收的田地歸耕種的農民所有。不再交租與田東。

（四）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厘金稅捐。

（五）工人組織工會。農民組織農民協會。工農聯合組織革命委員會。並奪取反革命的槍枝。組織工農的赤衛隊。

（六）凡平日壓迫工農或阻礙革命或經手公款賬目不清的土豪劣紳。農民協會可以把他一概捉起來。按照他們犯罪的輕重。分別處以死刑監禁的刑罰或進行示衆遊街等刑罰。

以上六項自出示之後即刻實行。如有反對的。都是圖他自己的私利。妨礙大多數人的公利。這種人即是反革命。當用全力剷除這些惡人。決不寬貸。切切此佈——

軍長 朱德
黨代表 毛澤東
政治部主任 陳毅

公曆一九二九年六月 日

毛泽东、朱德、陈毅署名的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清平乐·蒋桂战争[1]

（1929年秋）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2]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3]，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4]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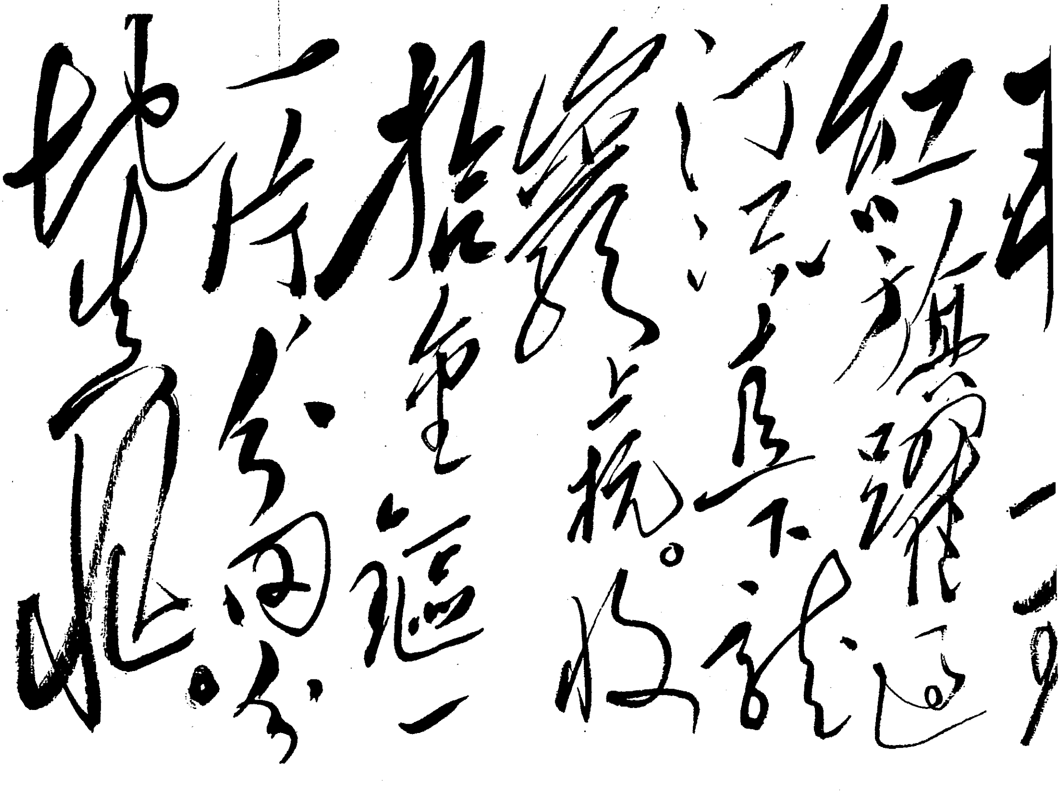
---

[1] 蒋桂战争，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1929年春为控制两湖而进行的战争。

[2] 一枕黄粱，典出唐沈既济的《枕中记》，讲一个叫卢生的，在旅店向一个道士叹述穷困不得志。道士就拿出一个枕头，说枕在上面就能使他“荣适如志”。卢生在梦中从婚到死，享尽荣华富贵，转了一圈人生，醒来一看，困顿依旧，旅店主人也仍然在蒸黄粱（小米饭）。

[3] 汀江，韩江上游，源出福建省西部长汀，向南流入广东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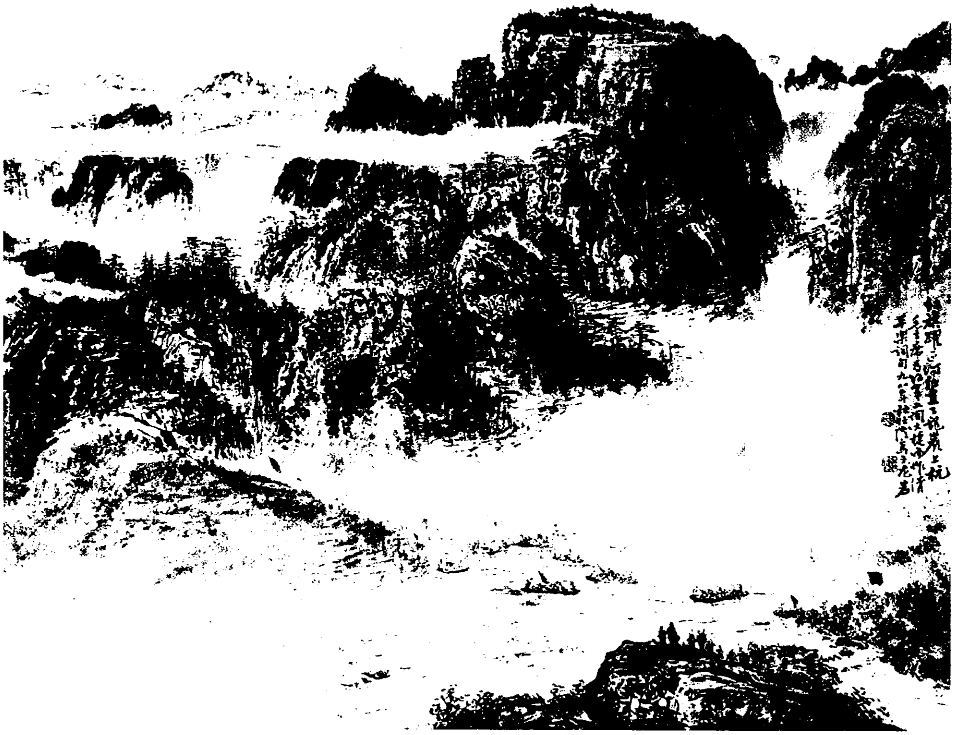
[4] 金瓯，指国土。语出《南史·朱异传》，梁武帝曰：“我国家犹若金瓯，无一伤缺。”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诗意画）

采桑子[1]·重阳[2]

（1929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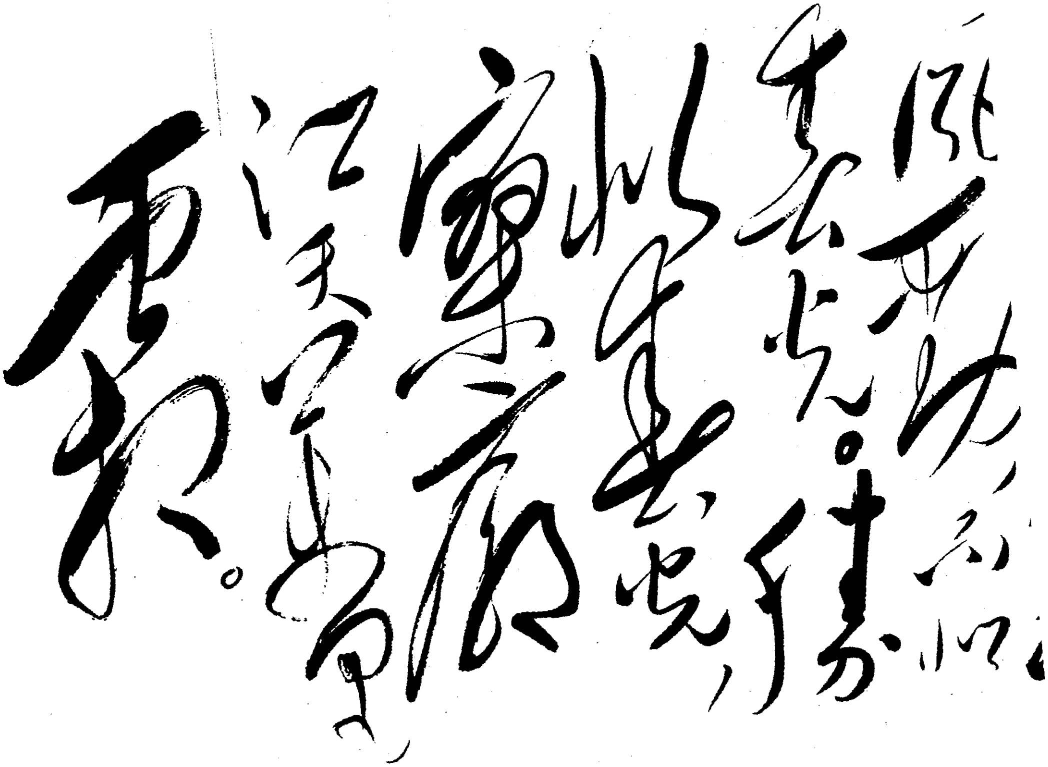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
寥廓江天万里霜。

---

[1] 采桑子，词牌名，本为古乐采桑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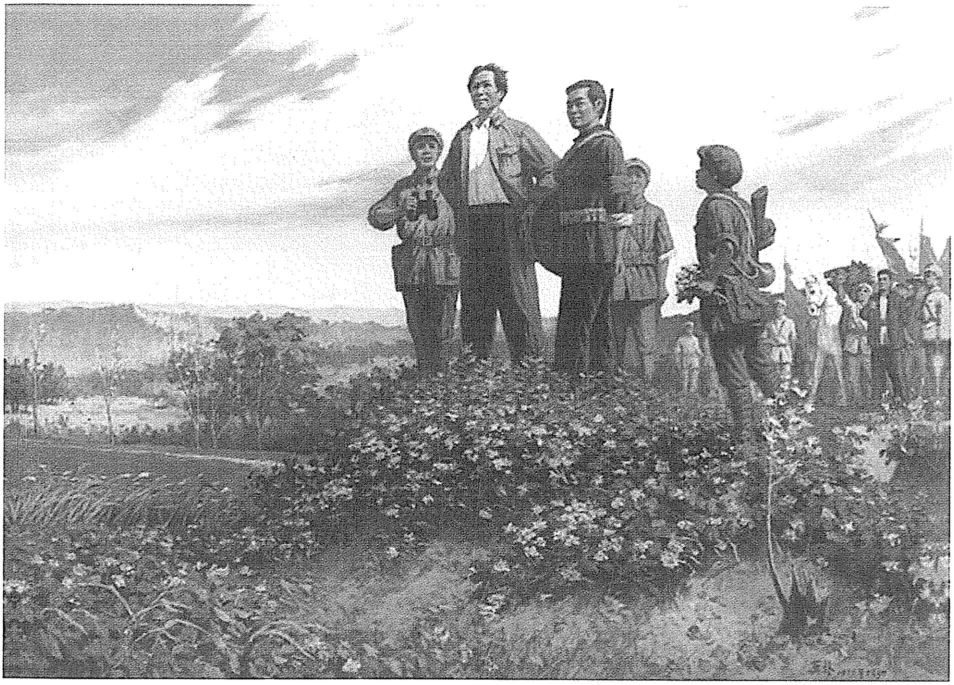
[2] 重阳，农历九月初九，传统上文人登高赋诗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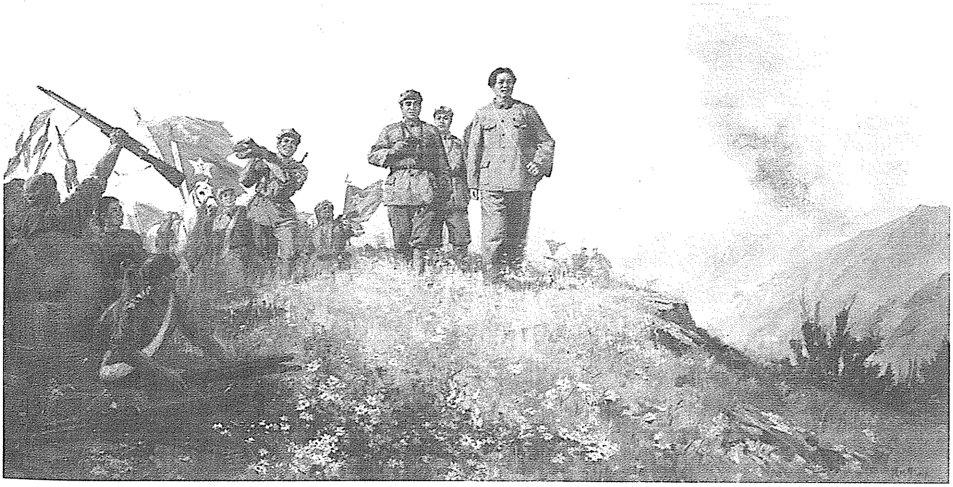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手书《采桑子·重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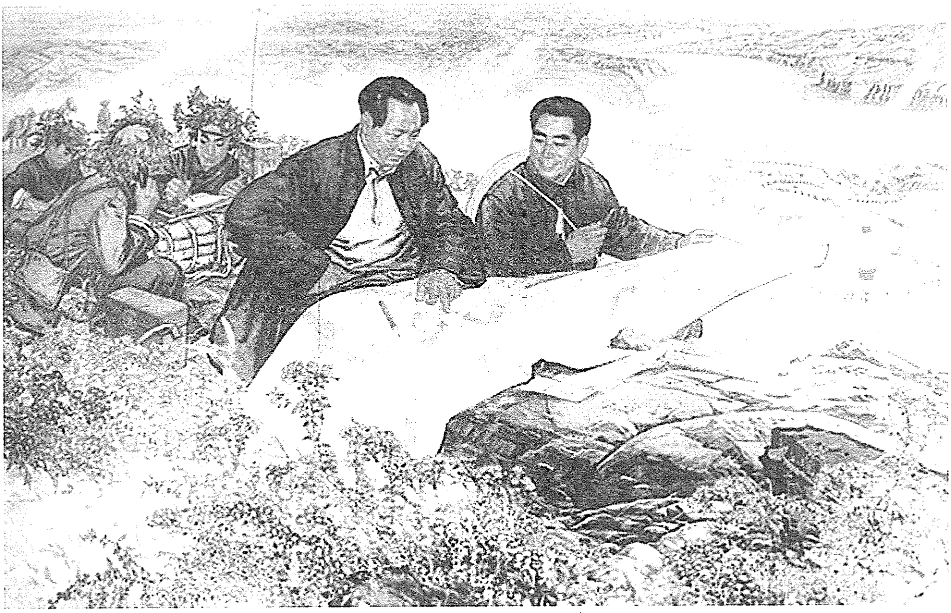
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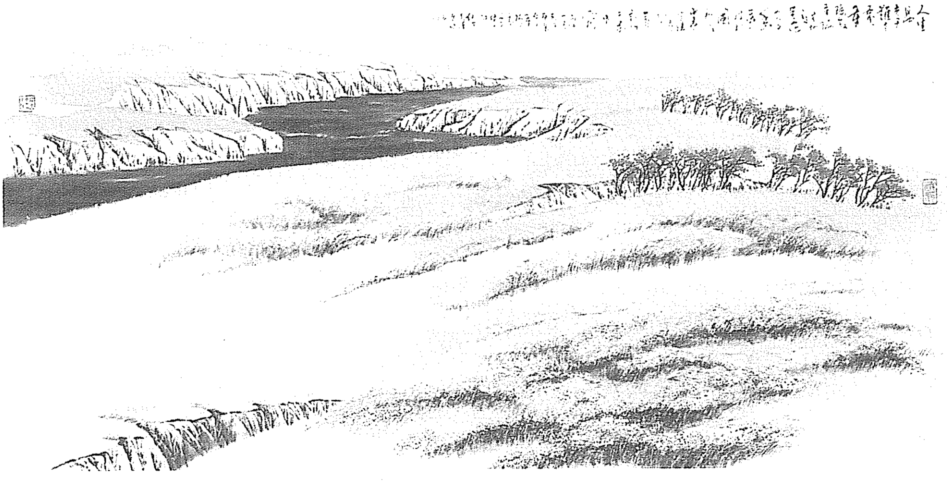
《战地黄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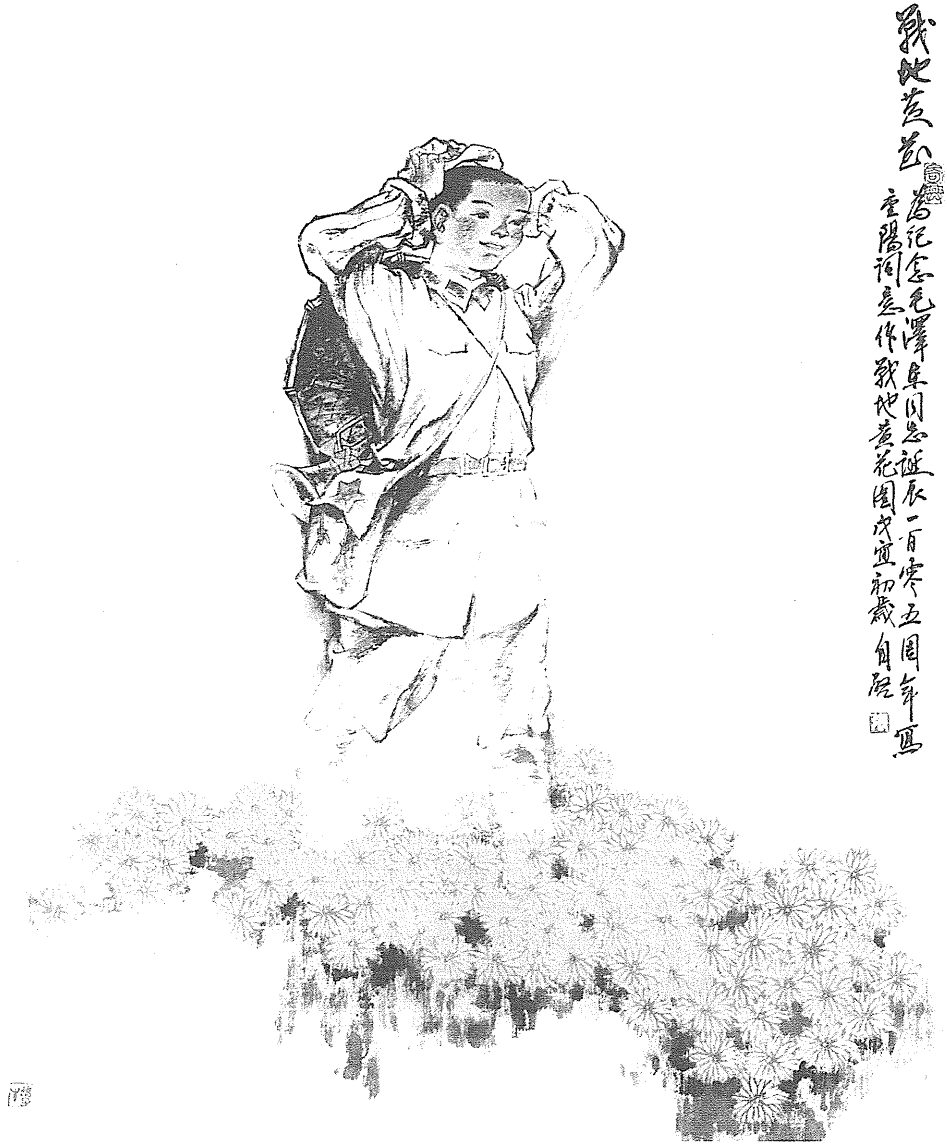
《战地黄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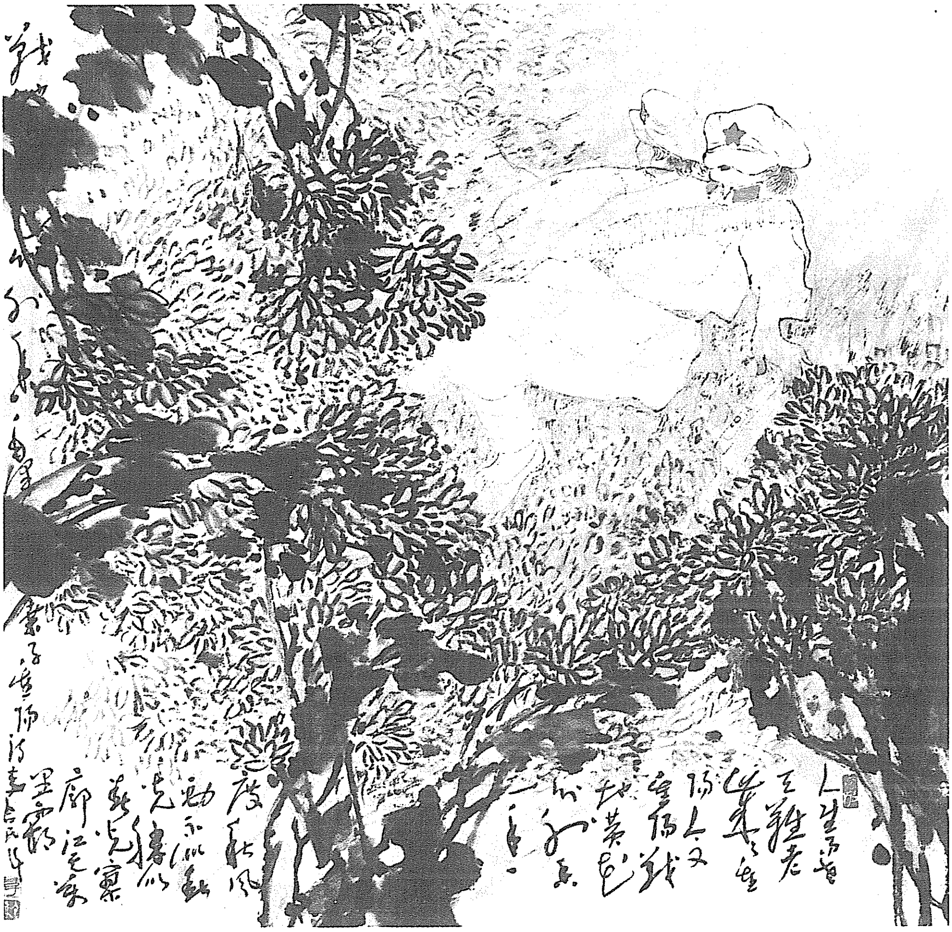
《历尽艰辛为人民》（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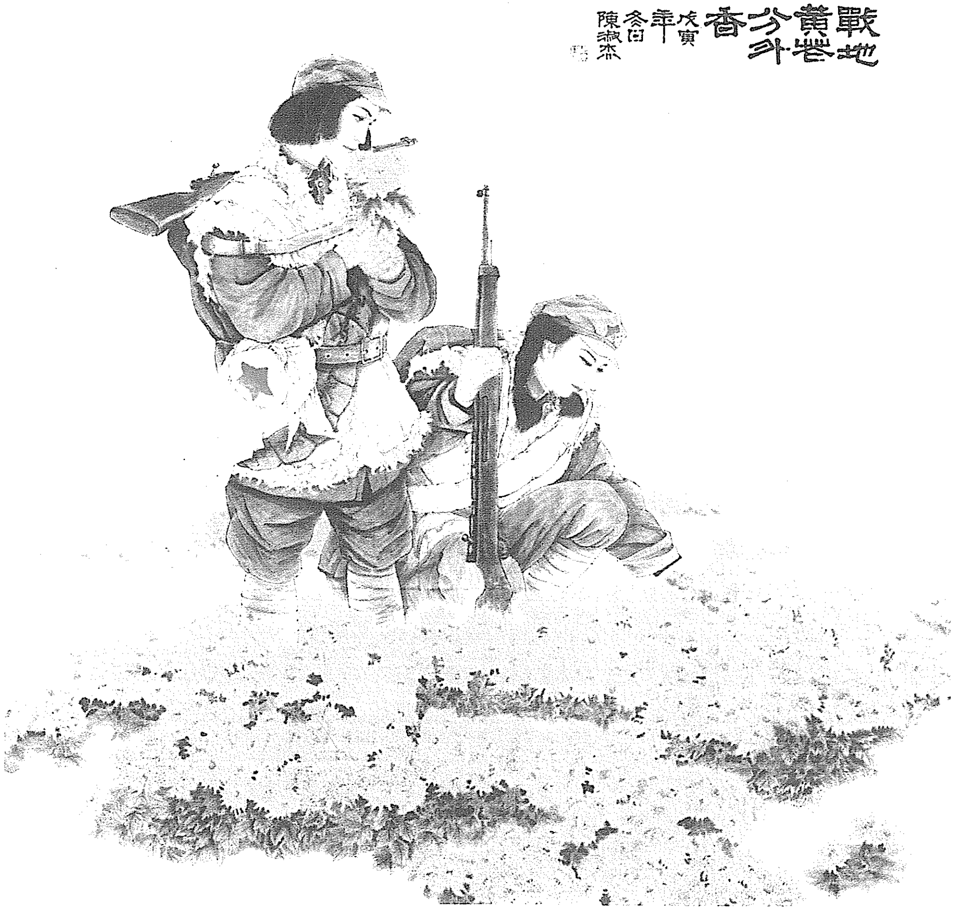
《重阳》（诗意画）


戰地黃花
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零五周年寫
重陽詞意作戰地黃花圖戊寅初歲自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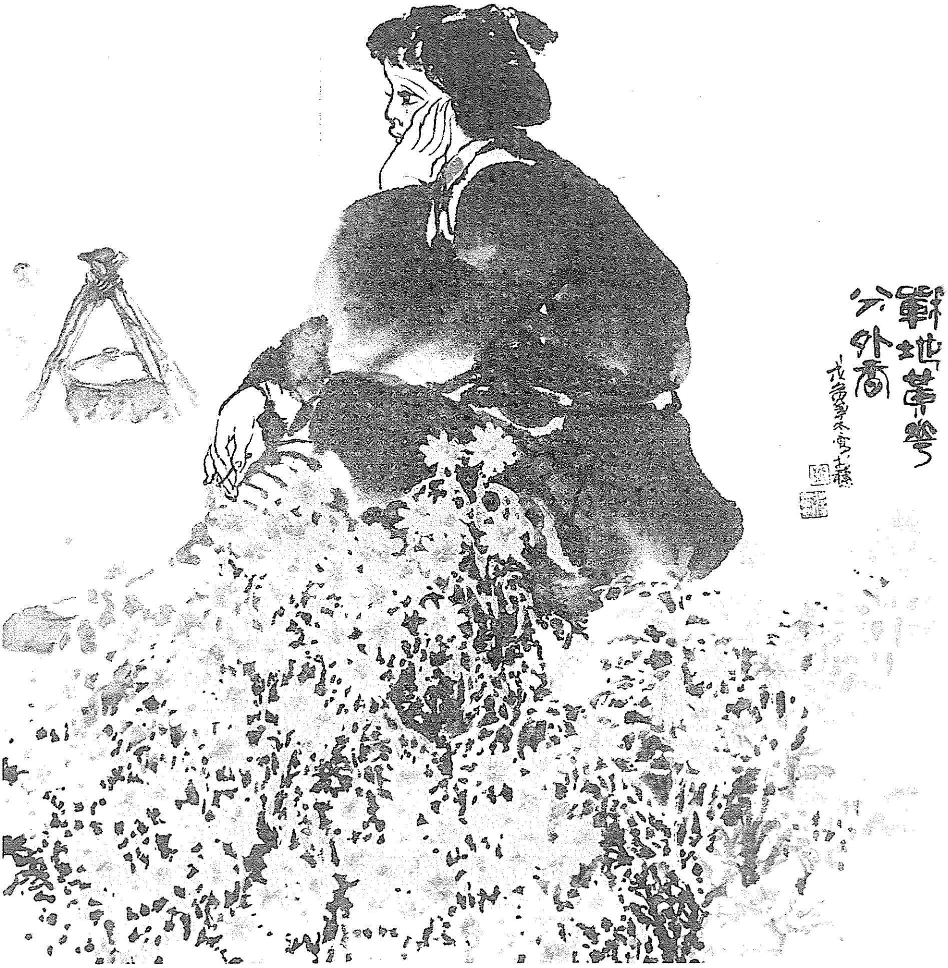
《战地黄花》（诗意画）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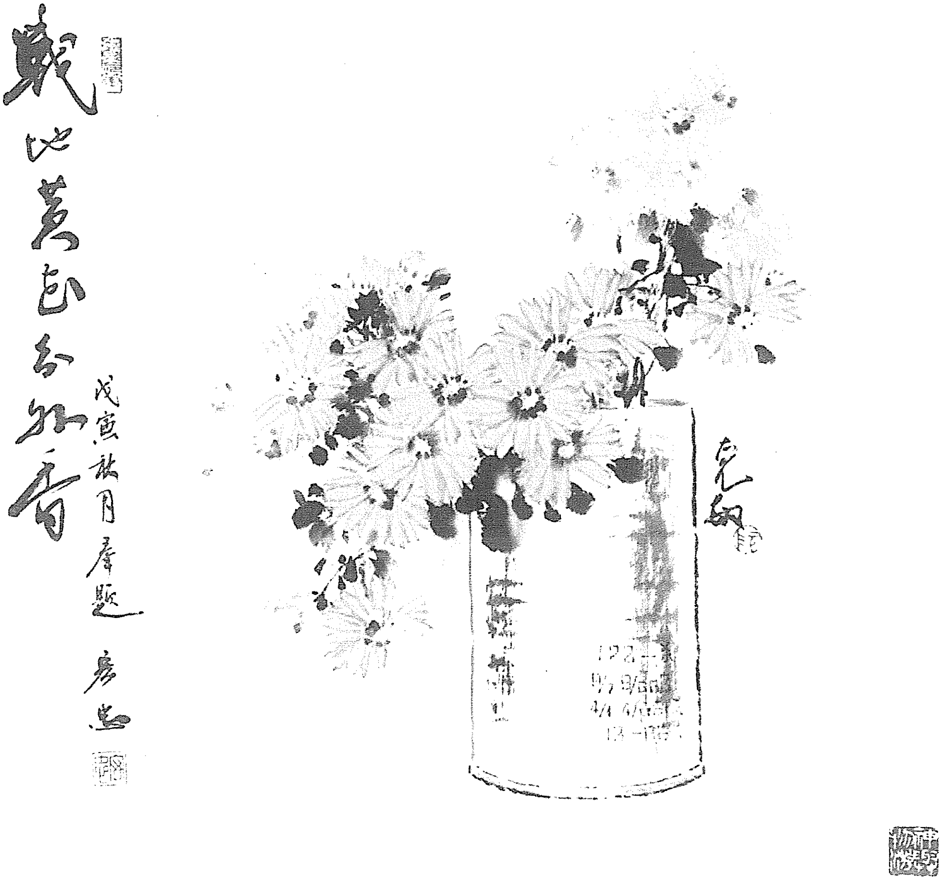
《战地黄花》（诗意画）


戰地黃花分外香
戊寅年冬日
陳淑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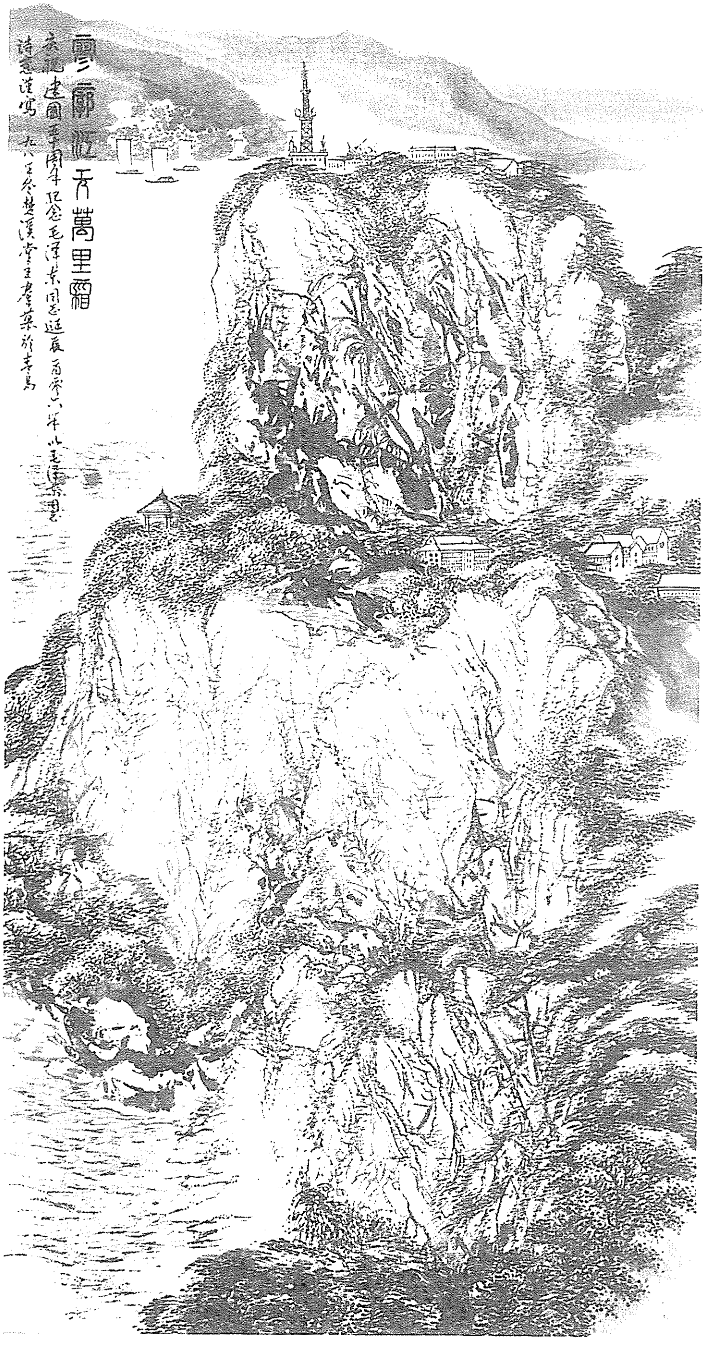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戰地黃花分外香
戊辰年冬寫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战地黄花分外香
戊寅秋月

《战地黄花分外香》（诗意画）



《寥廓江天万里霜》（诗意画）

从蛟洋到达汀州后给中央的信[1]

（1929年11月28日）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2]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3]，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八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4]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5]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

---

[1] 1929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离开了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福建省上杭县蛟洋等处指导闽西工作并养病。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前委。这是毛泽东回前委工作后写给中共中央的信。

[2] 谢，指谢汉秋，1929年10月他被中共福建省委派往闽西巡视工作。

[3]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4]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5] 陈毅，当时任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9年8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带回部队。

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1]，《红旗》[2]，《列宁主义概论》[3]，《俄国革命运动史》[4]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　　”[5]。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汀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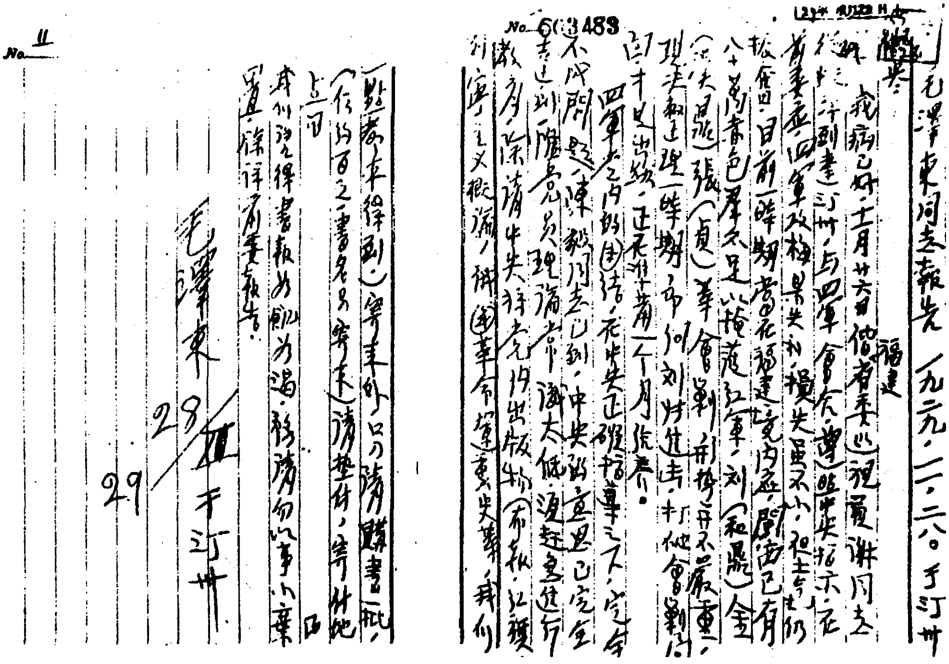
[1] 布报，即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10月24日创刊。

[2] 《红旗》，是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创刊。

[3] 《列宁主义概论》，是斯大林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最早汉译本的书名。

[4] 《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1927年7月由新青年社出版。

[5] 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No. 6(3)483

毛澤東同志報告　一九二九、一一、二八。于汀州

中央：

我病已好，十一月廿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從蛟洋到達汀州，与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攻梅縣失利，損失雖不小，但士氣仍好。目前一時期當在福建境內，閩西已有八十萬赤色群衆，不足以掩護紅軍。劉（和鼎）金（漢鼎）張（貞）等會剿，形勢并不嚴重，現決整理一時期，而向劉、林進擊，打破會剿局面。十天後出發，正在準備一個月給養。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除請中央將黨內出版物（布報、紅旗、列寧主義概論、俄國革命運動史等，我們一本也未得到）寄來外，另請購書一批（價約百元，書名另寄來），請墊付，寄付地點。我們望得書報如饑如渴，務請勿以事小棄置。餘詳前委報告。

No. 11

毛澤東

28

29

于汀州

1929年9月，中共中央致信红四军前委，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军行动的策略与建设的正确主张。图为1929年1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给李立三[1]的信

（1929年11月28日）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2]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3]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4]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邮政通信处“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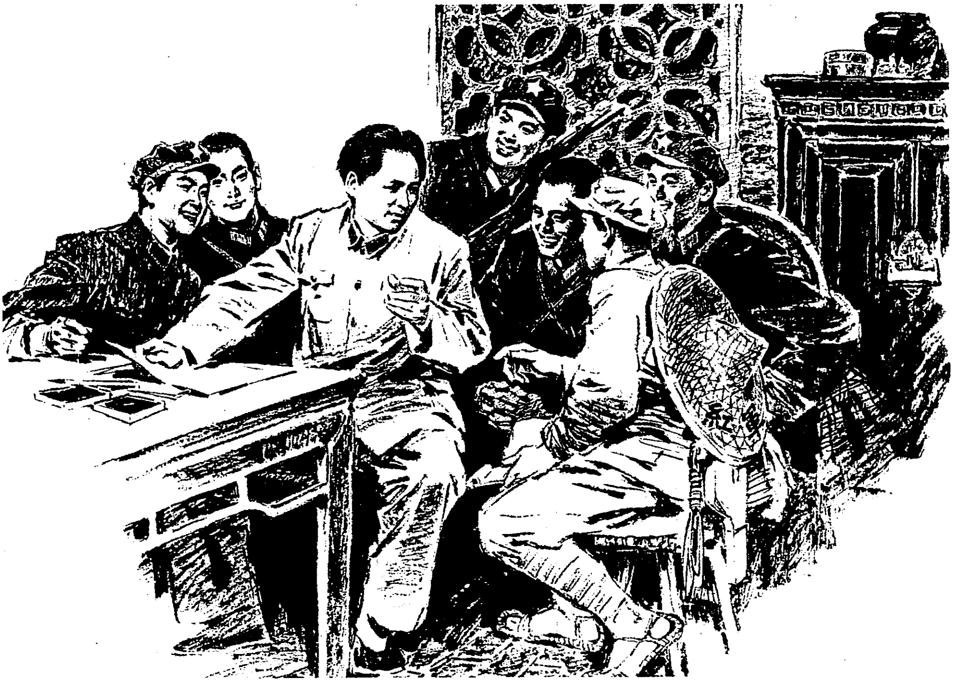
[1]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3] 泽民，即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4] 指陈独秀当时在党内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

[5] 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古田会议前夕，毛泽东亲自领导红军在福建连城县新泉村进行整顿。毛泽东亲自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召开古田会议作好准备。

毛泽东在新泉村的住地“望云草室”。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

（1929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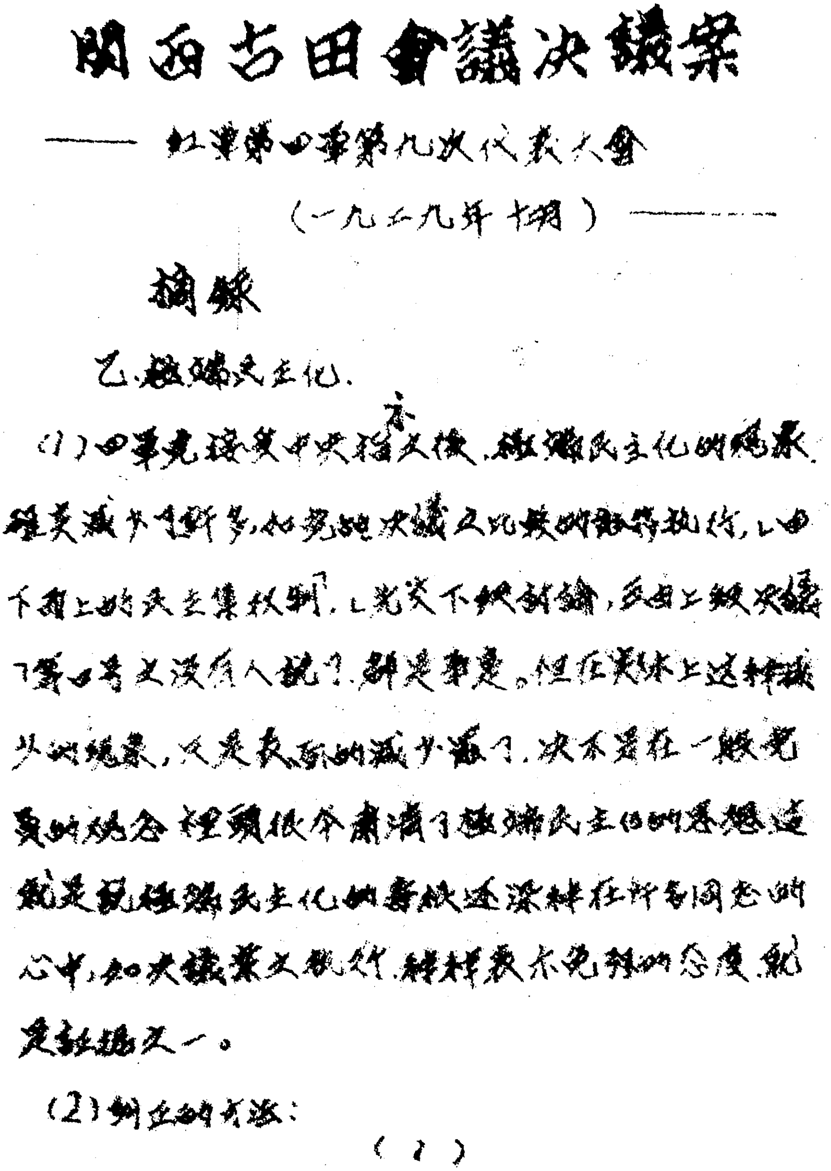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2]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8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2] 九月来信，指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



閩西古田會議決議案

——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摘錄

乙、極端民主化。

（1）四軍黨接受中央指示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雖是減少了許多，如黨的決議及比較的能夠執行，以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以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了等口號又沒有人說了，都是事實。但在實際上這種減少的現象，只是表面的減少罷了，決不是在一般黨員的腦子裡頭依然肅清了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毒根還深種在許多同志的心中，如決議案之執行，種種表示勉強的態度，就是鐵證之一。

（2）糾正的方法：

（1）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古田村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并作报告。会上，毛泽东被选为新的红四军前委书记。图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一　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1]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

---

[1] 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

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1]。

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

---

[1] 1927年革命失败后的短期间，在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曾经在1927年年底流行过，到了1928年年初渐渐地停止了下来。但有些党员也还存在着这种情绪。盲动主义就是冒险主义。

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

二　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

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 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 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

三　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　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

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　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

四　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

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五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

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六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七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1]、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2]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

[1]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2] 李闯，即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1628年，即明思宗崇祯元年，陕西北部形成农民起义的潮流。李自成参加高迎祥的起义队伍，曾经由陕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陕西。1636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为闯王。李自成在群众中的主要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同时他不准部下扰害群众，曾经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妇如淫我母”的口号，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因此，拥护他的人很多，成为当时农民起义的主流之一。但他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他在被推为闯王后，率部入川，折回陕南，经湖北又入川，又经湖北入河南，旋占湖北襄阳、安陆等地，再经河南攻陕占西安，于1644年经山西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结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八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作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地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

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

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　党的组织路线

（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

（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二　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1. 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2. 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1]党员大会等，开得非

---

[1] 纵队，当时相当于团；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常少。

3. 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下，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地放松了。

4. 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5. 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机关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地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6. 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纠正的路线：

1. 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2. 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

（四）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

三　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 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

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因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 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3. 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地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4. 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5. 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

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煞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　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1]为单位经常有计划地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2]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

---

[1] 大队，当时相当于连。

[2] 即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和各纵队委员会。

之下从事工作。

五　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部的工作的任务。

六　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　士兵会党团[1]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2]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

[1] 党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将“党团”改称“党组”。

[2] 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

党内教育问题

一　意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　材料

（一）政治分析；
（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
（三）组织常识；
（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1]的纠正；
（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
（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

[1] 指本篇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的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等8种错误思想。

（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于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三　方法

（一）党报；

（二）政治简报；

（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四）训练班；

（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

（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七）个别谈话；

（八）批评；

（九）小组会；

（十）支部大会；

（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

（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

（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七）政治讨论会；

（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一　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二　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宣传内容的缺点：

1. 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 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3. 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4. 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 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 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7. 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1]等）的宣传；

---

[1] 民团、靖卫团，都是反动的地方武装。

8．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宣传技术的缺点：

1．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1]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的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2．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5．画报只出了几张。

---

[1] 司书，即连队中担任文字书写的人员。

6. 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7. 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8. 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 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以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 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11. 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 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　纠正的路线

（一）宣传的内容方面：

1. 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2. 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 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4. 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

5. 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 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7. 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 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1]时期与汪蒋战争[2]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宣传的技术方面：

1. 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

[1] 蒋桂战争，指1929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2] 指1927年10月宁（南京）汉（武汉）对立期间，国民党新军阀何应钦、李宗仁同唐生智之间的战争。

（2）组织

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丙、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丁、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做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2. 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 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作《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4. 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5. 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6. 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7. 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8. 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9. 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1]。

10. 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11. 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12. 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

[1] 当时红军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　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做对士兵的训练材料：

（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早晚点名口号；
（六）识字运动；
（七）怎样做群众工作；
（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苏俄红军；

（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革命故事；

（十五）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卫生；

（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革命歌；

（十九）图报。

二　方法

（一）上政治课：

1. 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2. 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3. 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

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1]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4. 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5. 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6. 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早晚点名说话：

1. 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2. 材料：

---

[1] 军佐，是旧军队中对辅助指挥员管理行政事务的人员的统称，如军需、军医等。这里毛泽东是沿用旧军队中的这种称呼。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集合讲话：

1. 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2. 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地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3. 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4. 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个别谈话：

1. 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作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2. 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3. 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4. 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游艺：

1. 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踢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2. 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3. 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改良待遇：

1. 坚决废止肉刑；

2. 废止辱骂；

3. 优待伤病兵；

4. 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1. 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2. 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3. 红军的宗旨：

（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

（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

（3）红军三大任务。

4. 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5. 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

1. 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2. 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3. 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废止肉刑问题

一　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作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

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

二　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

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　纠正的方法

（一）坚决地废止肉刑。

（二）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三）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他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 修改红军惩罚条例；

2. 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

惩罚条例；

3. 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

优待伤病兵问题

一　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

1. 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

2. 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3. 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三）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蛟洋医院的缺点：

1. 无组织状态；

2. 医官和药太少；

3. 医官卖私药；

4. 不清洁；

5. 御寒衣服、被窝不够；

6. 看护兵太少；

7. 饮食恶劣；

8. 房子窄；

9. 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

1. 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

2. 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

3. 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

4. 逃兵多；

5. 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　解决的办法

（一）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

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

1. 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

2. 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

3. 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

4. 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五）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六）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款，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1]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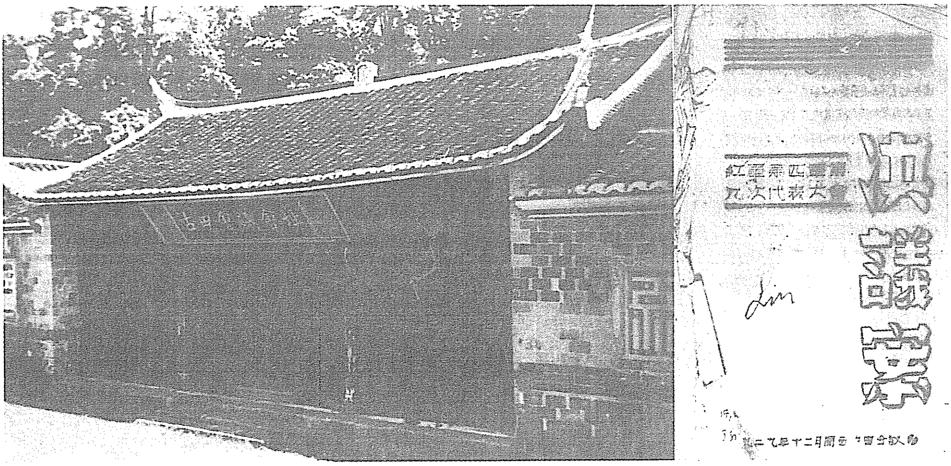
[1] 这里的“阶级”，指军队中官阶的等级。

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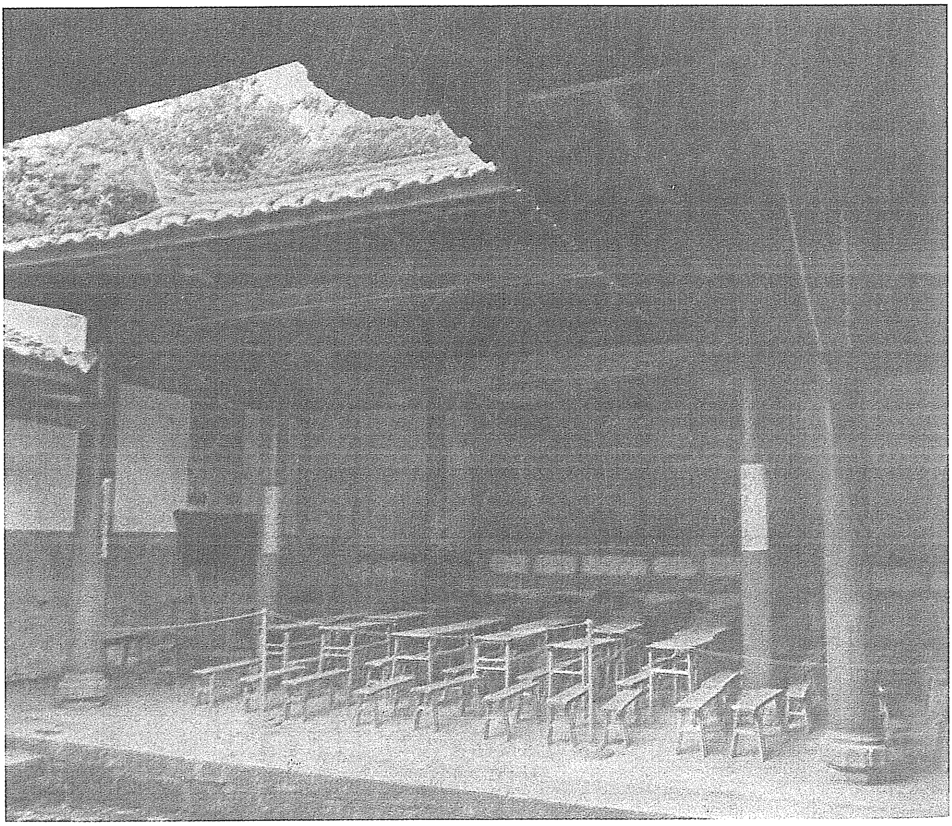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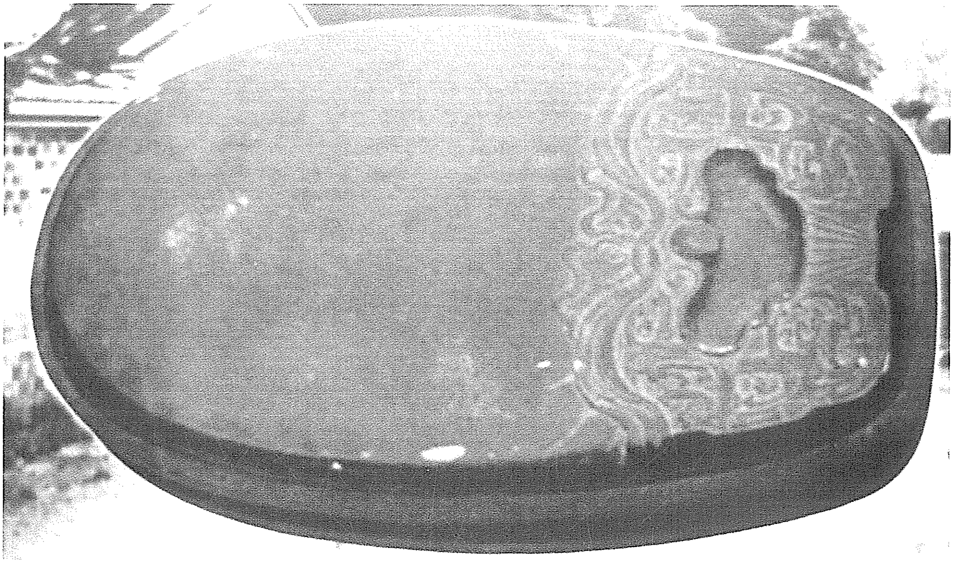
红四军前委、政治部旧址——松荫堂，前委书记毛泽东在此起草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为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決議案
L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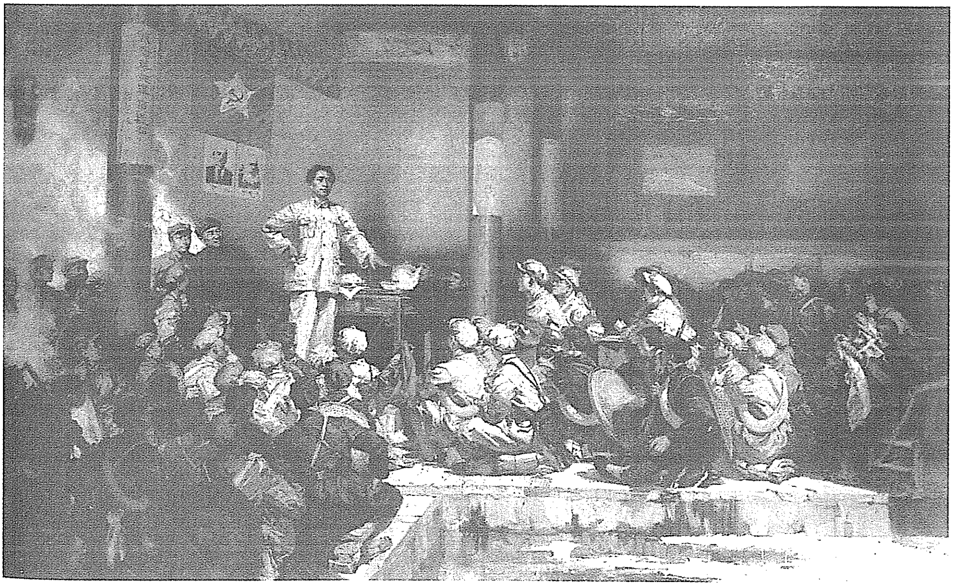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旧址和红军时期印行的古田会议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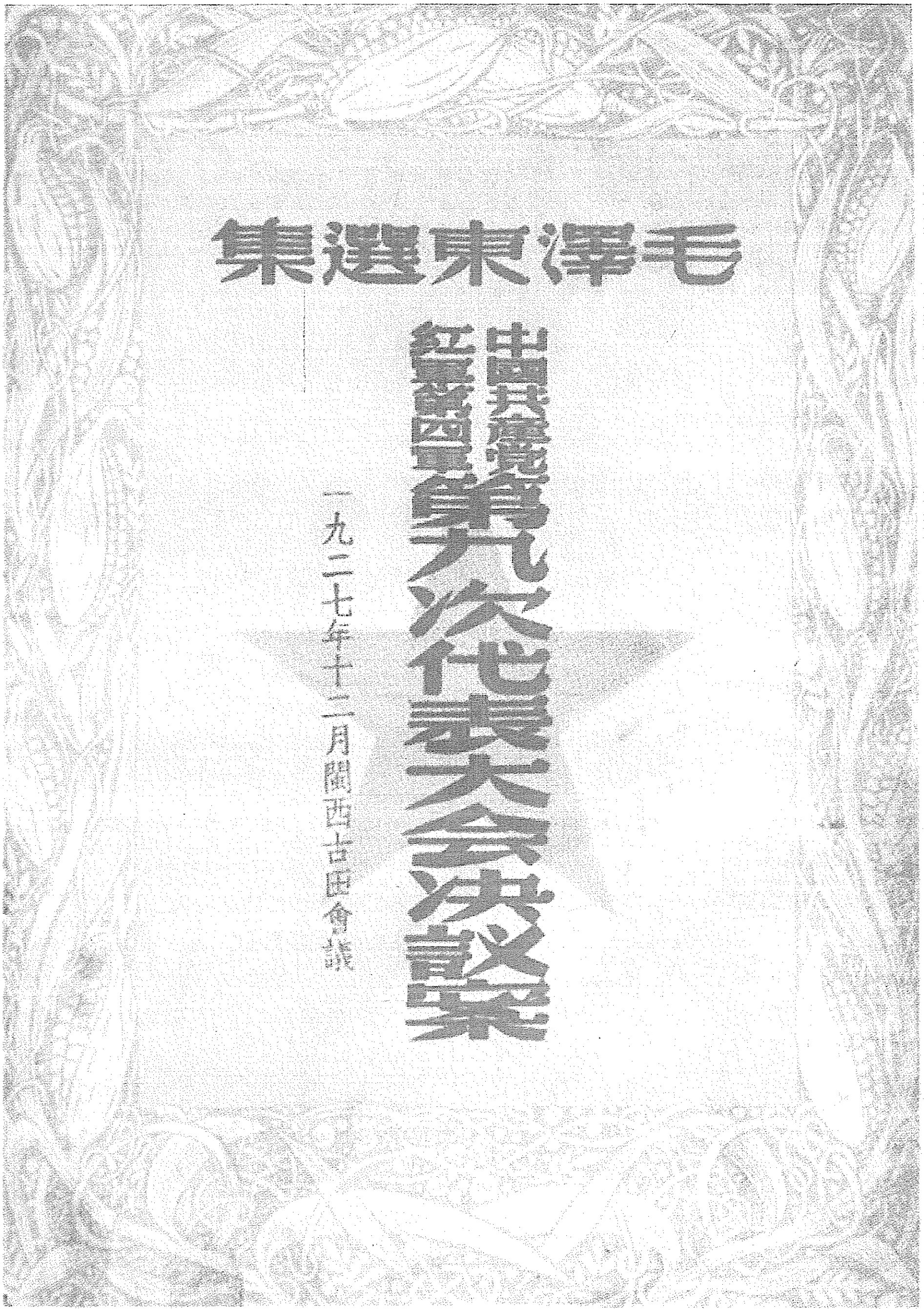
古田会议会场内景。



毛泽东在古田时使用的砚台。



《古田会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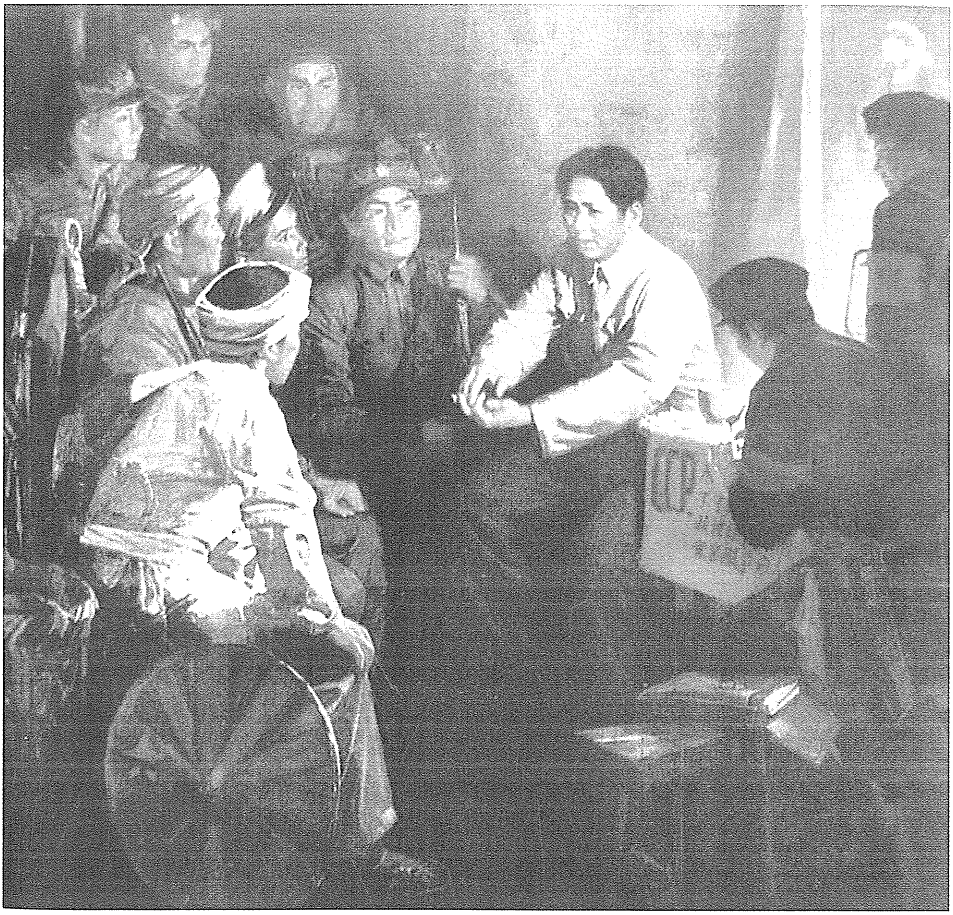


毛澤東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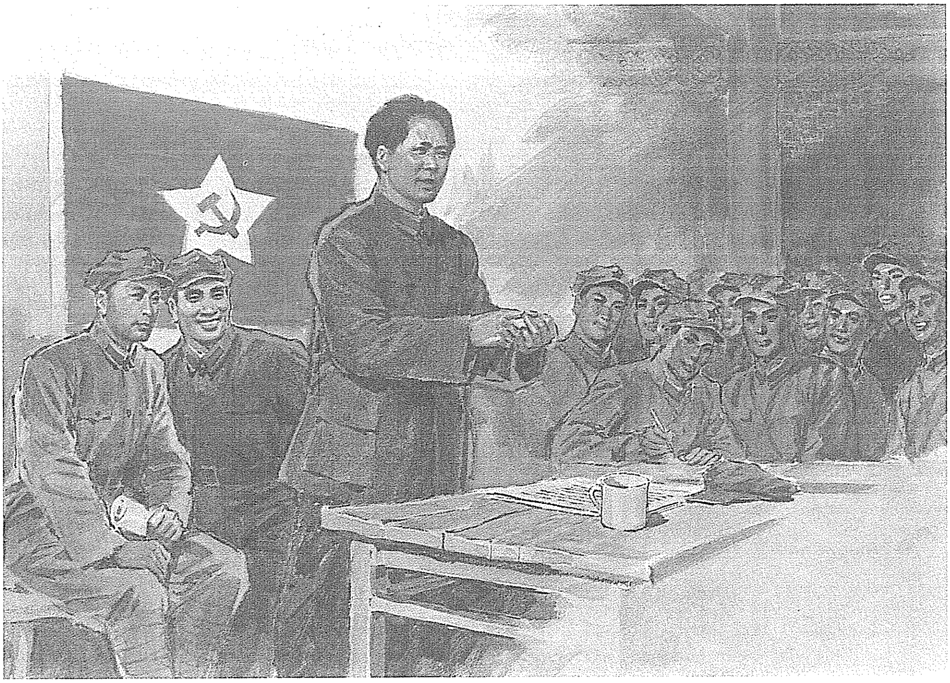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
紅軍第四軍
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議案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閩西古田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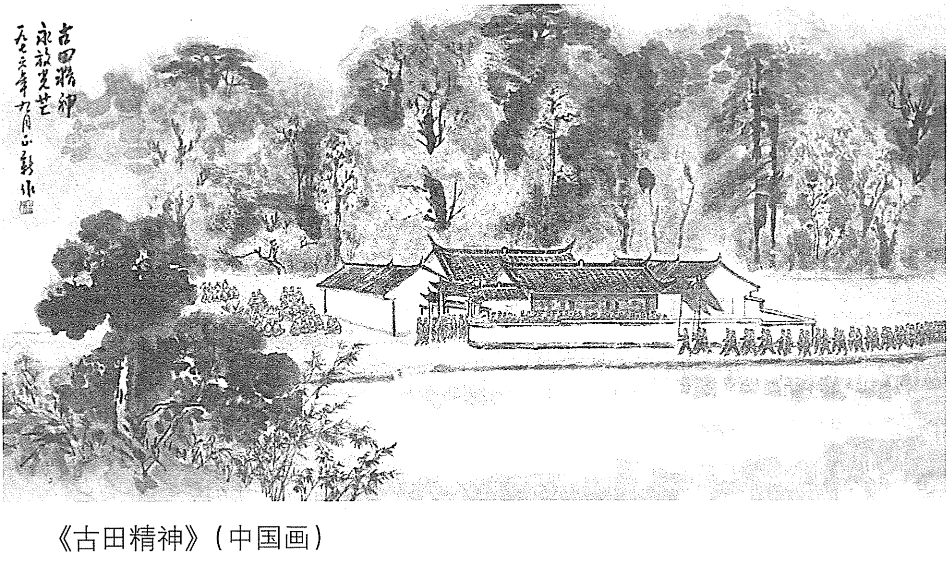
1948年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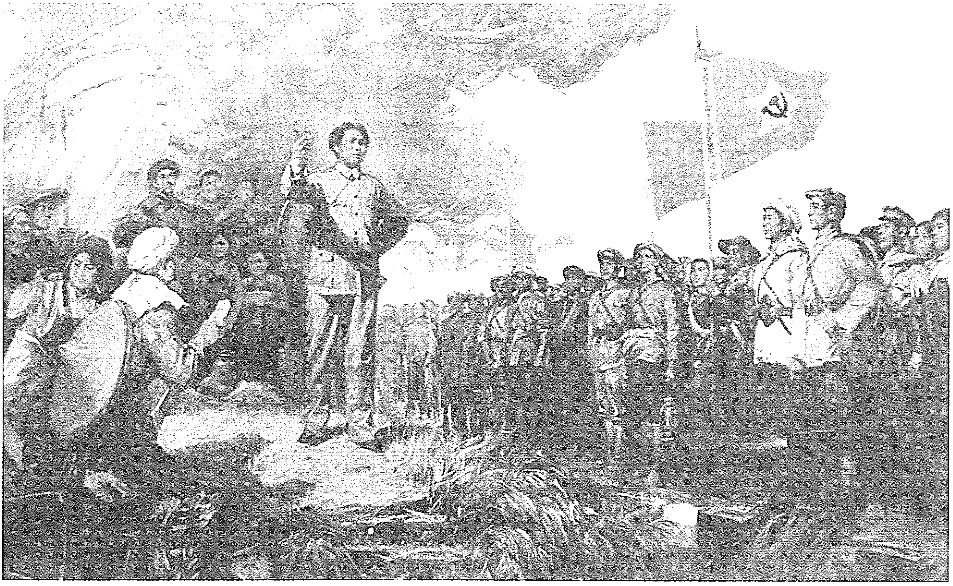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连队中建党》（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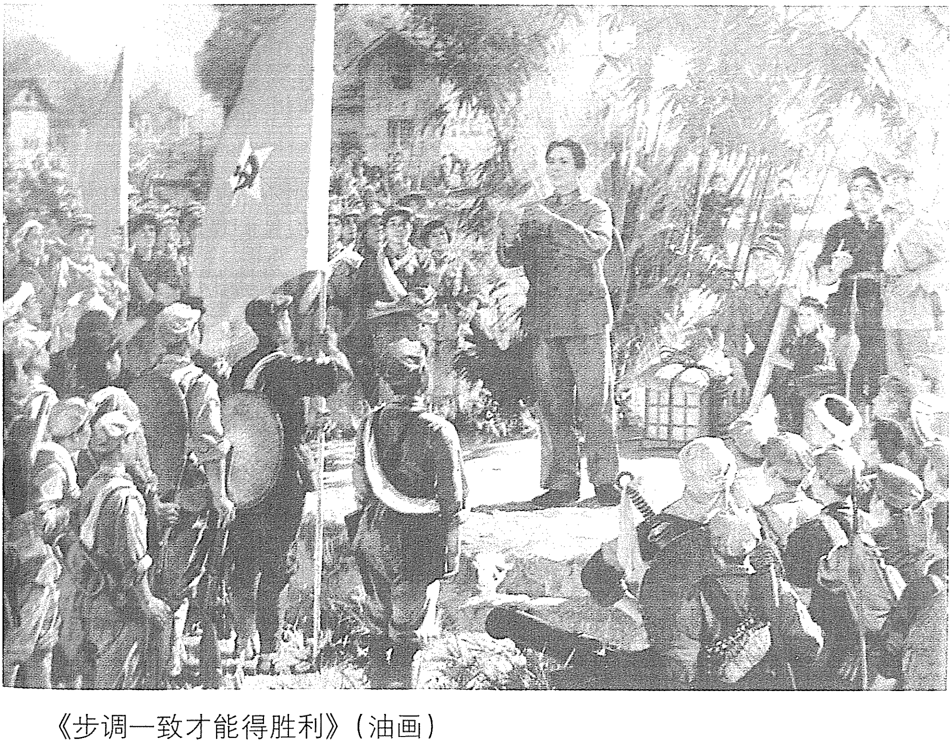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油画）



《古田精神》（中国画）



《人民军队党指挥》（油画）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油画）

告全国士兵弟兄书*

（1929年）

全中国的士兵弟兄们：

我们有七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看了，请细细地想一想。

第一，士兵是穷苦工农出身。我们士兵谁个不是由工人、农民出身的？哪里找得出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来当士兵呢？我们家中，因为耕田没有田可耕，做工没有工可做，或者耕出的田，还不够还地主的租和官厅的捐税，借了些债，又是利上加利，迫得无力偿还，家里住不下去，只得出来当兵。有些做工的，被厂主、店东开除失业了，再无法度日，无路可走，只得把性命出卖，每月换得几块钱。

第二，替白军当士兵，是非常受痛苦、受压迫的。初时我们不知道军队里的生活是怎样，我们只是跟着有钱有势的人，只想到军队去当兵，拿起枪来可以杀个痛快，报仇雪恨，哪知道我们走错了路，走在什么号称国民革命军的营盘里。他们首先就是革我们士兵的命，他们对我们施行苛待、恶骂、毒打，甚至于枪毙，不是吗？我们稍为不检点，就要得到军棍、藤条的“恩赐”，或两个耳光、一脚皮鞋，这是见惯的。至于军饷，他们只说没有钱，一欠就七八个月，有时开恩发一点，还要搭些公债券。而他们那些团长、师长们呢？你们试查查看，起码总有几千几万十几万洋钱，放在银行里。

至于新军阀蒋介石呢？那就多了，只是汇到美国去的，就有几千万元，他的洋房子建在租界上，他的老婆宋美龄做一件外衣，在上海大公司定的，报载用了三万元。然而我们住的、穿的怎样呢？就是那些师长、军长们，他们哪个没有洋房子住？你们不是住草棚就是住破屋。官长们穿的衣服，又比你们的烂军衣如何？他们吃西餐、大餐，吃馆子，你们的伙食呢？不是只有六块钱一月吗？不是只有一盘菜吗？打了好几年仗，他们做官的，个个升了官，个个发了财。你们呢？许多士兵弟兄，都打死在离家几千里的异乡，可怜有的老母、妻子还不知道，有的连老婆还没有讨呢！

第三，我们士兵要明白，谁是朋友、兄弟，谁是仇人、敌人？不要帮助仇人、敌人来杀自己的朋友、兄弟。让我们大家看看，到底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是不是我们的“朋友”呢？绝对不是的，他们是我们的死仇大敌。替我们做器具、盖房子的工人和供给我们吃的、穿的农民呢？他们是我们的仇敌吗？绝对不是的。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兄弟，工农里面还有许多就是我们士兵的父亲叔伯兄弟亲戚呢。我们可以替我们的仇敌去杀自己的亲人、朋友吗？不可以的，不应该的。可是许多士兵兄弟，还没有觉悟，受了新军阀国民党的欺骗，到处去替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来杀自己的朋友、兄弟，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呀！你们不信吗？蒋介石自称顶“革命”的，第一次北伐时，他到了江西，就杀死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到了上海，他又把替他打开上海、杀退孙传芳的工人纠察队缴了枪，还枪杀了许多工人；许克祥在湖南，何健在湖北，李济深在广东都杀了工农，计算起来，总有几十万人。他们不是都说“革命”吗？他们革谁的命呢？是革工农的命，但是受他们欺骗利用去杀工人农民的，不都是我们士兵自己吗？两次东征，两次北伐，蒋

桂战争死了好多士兵！结果换得蒋介石做新皇帝，我们士兵的血，不知流了多少，只养肥了这些吃人的野兽；我们士兵的尸骨不知抛弃了多少，只垒成新军阀的宝座！够了啊！我们已受他们骗够了！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弟兄们！快觉悟过来吧！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不要再受他们欺骗了。他们骗你们“不怕死，不要钱”，他们可是躲在后方，大扒特扒地扒钱，死的都是你们。他们就“爱国家，爱人民”，却把济南惨案出卖给日本，航空权出卖给美国；几十万被杀死的工农，已经这样蒙他们的“爱”了；国家一切权利，已经蒙他们的爱出卖完了，谁说不是呢？士兵弟兄们，快醒来啊！

第四，我们试问一问自己，打了几年仗，得了些什么？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都是军阀争地盘、争权利，互相打起来的，他们无论谁胜谁败，都可以升官发财。我们只有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送到战场上去死；一些些的抚恤费也都进了官长的腰包；没有死的也成了残废，不能为军阀跑腿了，就一批一批地裁掉去修马路，修不了马路的就只好讨米，千山万水，没有盘缠，哪有一个回得到家中！另一方面，又因为军阀战争不息、加捐加税，更有土豪加紧加租加息，家中的父母、妻子、兄弟都快要饿死冻死哩。总之，士兵们替军阀打仗，军阀升官发财，士兵们不被打死的也只落得个被裁！

第五，红军士兵打仗，是替自己谋解放。士兵弟兄们，你们大家要找出路，要谋生活，要不受痛苦，要不做奴隶，要家中得着利益，只有觉悟起来，联合起来，杀死反革命的军阀长官，自己举出士兵弟兄当官长，成立士兵委员会，来参加管理军队，与工农联合起来，打倒压迫我们的土豪劣绅，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来分给农民，我们才有好日子过。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我们自己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然后才能得着真正永久的幸福。我们的红军，才

是我们士兵自己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受官长压迫与剥削，官兵薪饷一律平等，穿吃一样，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队管理，可以枪毙反革命的官长，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消灭军阀，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

第六，红军第四军与反革命奋斗了几年，消灭了许多豪绅军阀。我们红军第四军在两年前的八月一号，因蒋介石反水投降了帝国主义，保护土豪劣绅、资本家，屠杀工农的时候，要我们来保护仇人，来杀我们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那时我们还没有忘记革命，不愿意受他的欺骗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就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南昌暴动起来，与反革命军阀作战。两年来，我们转战湘赣闽粤各省，打倒许多土豪劣绅，消灭了许多新军阀，建立许多工农兵政府。

第七，红军士兵欢迎白军士兵到红军里来参加革命，士兵弟兄们，让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向我们的阶级敌人进攻吧！你们觉悟起来吧！我们欢迎你们。弟兄们！起来吧，让我们共同高举起鲜红的旗帜，高唱：“同志们，快来努力建设我们的劳动共和国，劳动阶级要做世界主人翁，人类才能进入大同，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革命先锋队。”最后我们高呼：

1. 全国士兵弟兄们，倒过枪来，杀死压迫你们的反革命官长！
2. 全国士兵暴动起来，消灭新老军阀！
3. 全国士兵起来，组织自己的红军！
4. 工农兵联合起来！
5. 打土豪分田地！
6. 推翻国民党政府！
7. 打倒帝国主义！

8. 建立工农兵政府！
9.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10.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红军第四军士兵委员会

告绿林弟兄书*

（1929年）

绿林弟兄们！山上的弟兄们！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一个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极恶劣最下贱而凶恶的东西，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可以每年抢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当土匪的少许弄一点东西来饱肚子就犯了大罪，见着就抓，抓着就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何等不平，何等可恶！真是岂有此理！

共产党与红军并不以为你们可恶，土匪这个名字不过是土豪劣绅给你们起的罪名，但这有什么要紧，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屋住的穷朋友，我们痛苦的来源就是受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的压迫，我们打土豪劣绅、反抗军阀实在是名正言顺，用不着客气，不要管什么土匪不土匪！大家务要硬干下去！不过你们的生活不是怎样快乐，我们深知你们的痛苦。

第一是你们的力量太小了，枪少又不好，人少又不懂得军事随时受军阀民团的压迫，使你们白日不敢露面，躲在深山中，夜晚要忙着打土豪不得片刻休息，风吹雨打，吸霜吹露，是你们日常的生活，虽说吃喝要比在家好一点，但是走路就不敢随便了，说话也不敢随便了。这是非常痛苦的呀！

第二是你们不敢回家，因为你们上了山，得了土匪的大名，家

里面不敢住，你们打土豪分的东西没有法送回家，送回家土豪知道就要祸事临头，因此你们上山，除你受苦而外你家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也得不着幸福。

第三你们在山上因为力量小受军阀的压迫、受民团联合的压迫，以前土豪没有枪，军阀住在城里不下乡，你们还可以随意活动，可以多打土豪多分东西。现在可不同了，民团有枪，修起了巩固高大的围子，军阀随时下去向你们进攻，使你们三天四天要搬一次，恐慌不了，土豪渐渐打完东西分不着，你们力量小又不敢到远处去打，一旦不幸被土豪军阀捉着，他们毫不讲理，不给你家送一封信就把你一命呜呼！呀！这又是何等悲痛而令人愤恨的事呀！

第四纵令你们力量大一点，使你们在山上多快活几日，但是你们的将来，这一生一世的出路结果，实在渺渺茫茫，一个人做一件做得久了会要厌，所谓（糖吃多了都不甜）何况弟兄们在山上受苦呢！

绿林弟兄们！在你们这个痛苦环境中你们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替你们想，不外以下几种：

第一是你们打土豪得了钱就跑到远方去。这个办法不对，你们跑到远方去，沿途有民团军警巡查，你们插翅也难过，何况你带的有金银，这一条路是条死路。

第二是你们打土豪得了金银，积财回家。你们以为在远方当土匪没有得罪本地人可以回家，其实你依靠枪杆子回得家来，土豪劣绅为敲诈你的钱，哪里容得下，假口你的案发了就把你送去县里坐牢杀头。

第三是你们力量大一点弄得土豪们没办法，他硬打你不过，想一个软法，就是编你们为民团欢迎你们下山，这个方法非常巧妙，

真所谓软索能够套猛虎！土豪不欢迎你们下山，你们就会把他们消灭，所以想一条妙计来欢迎你们当民团，外表说得好听免你们的罪，实际上每月用几块钱买你们为看家狗！你们是一个活活泼泼的草泽英雄，千万不要上当，受他们狗套的拘束。

第四你们力量大了被军队改编。国民党政府和军阀可以用一个官来软化你们，这个当你们千万不要上，因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他们与我们工农贫苦人们是不两立的，他们改编你们不是为你们好，实在是一个软办法，先笼络你们，使你们入了他们的圈套，然后才来解决你们，试看有几个绿林出身的人被改编得到发达？还有一层，你们今日被改编，明日土豪就要你们去打土匪唉！土豪改编你们就是用的以土匪打土匪（就是弟兄打弟兄）的毒计呀，你们千万不要上当。

弟兄们！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第一红军与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但是为一国的穷人努力谋幸福，有力量为全世界人谋幸福。共产党与红军每到一处要想尽方法来与你们见面，你们与红军联合接成一气又能长进学得政治、军事的本领，又能够有帮助不致单独孤立受压迫，又能与全国的革命势力工友与农友们团结一致不会永远都躲藏山上，共产党与红军既是穷人的好朋友，有钱的死对头，是绝对不害你们的！

第二共产党与红军是为工农及贫苦人努力奋斗的，现在农友没有田耕，因为田地被土豪霸占了，工友没有饭吃，因为工钱太少或被老板赚去了，士兵没有饷，因为被军阀克扣去了，我们中国人受苦受寒，是因为受了国民党与外国洋人（帝国主义）的压迫。共产党红军就是要把土豪的田地夺来交给农民，使得田地公有，要工人的工资增加，不准老板一个独赚，要帮助士兵发军饷，要把克扣军

饷的军官打倒，要联合全国人民起来打倒国民党，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实现全世界的自由平等，弟兄们！你们是有力量的，是极勇敢的，不要老占在山上辜负你们的勇敢善战的本领，应与红军联合一致，参加当前的大革命，弟兄们！你们能这样做，不但你们本身的痛苦样样的可以解决，你们家里也可以分得田地，所有的穷人都会得到幸福，这样的为穷人做事，立下了革命功业就是死也值得啊！弟兄们快来啊，我们红军欢迎你。

（一）欢迎绿林弟兄加入红军
（二）欢迎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
（三）绿林弟兄不要扰害工农及贫苦人民
（四）绿林弟兄不帮助土豪，红军不打绿林弟兄
（五）绿林弟兄不帮助军阀，红军不打绿林弟兄
（六）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
（七）绿林弟兄加入土地革命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1930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中国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

（1930年1月5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

---

[1]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1]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

---

[1] 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28年1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至1933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1934年11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8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1]，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

---

[1] 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1]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2]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3]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

---

[1] 鲁涤平（1887—1935），湖南宁乡人。1928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2] 指1929年3、4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3] 1928年7月至11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1929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6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1]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

---

[1] 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

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1]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2]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

---

[1] 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2]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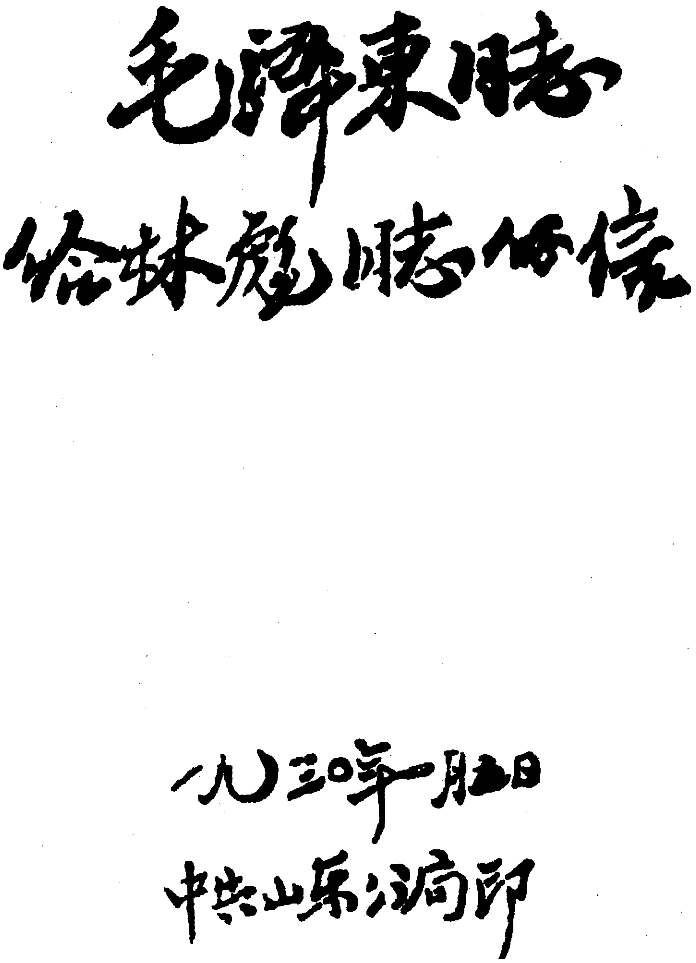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1]，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

---

[1] 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1929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毛泽东同志

给林彪同志的信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中共山东分局印

1930年1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提出了中国革命和武装道路的基本思想，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1]，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

---

[1] “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1]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2]旅已被击破；陈卢[3]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4]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5]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

---

[1] 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2] 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3] 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1926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4]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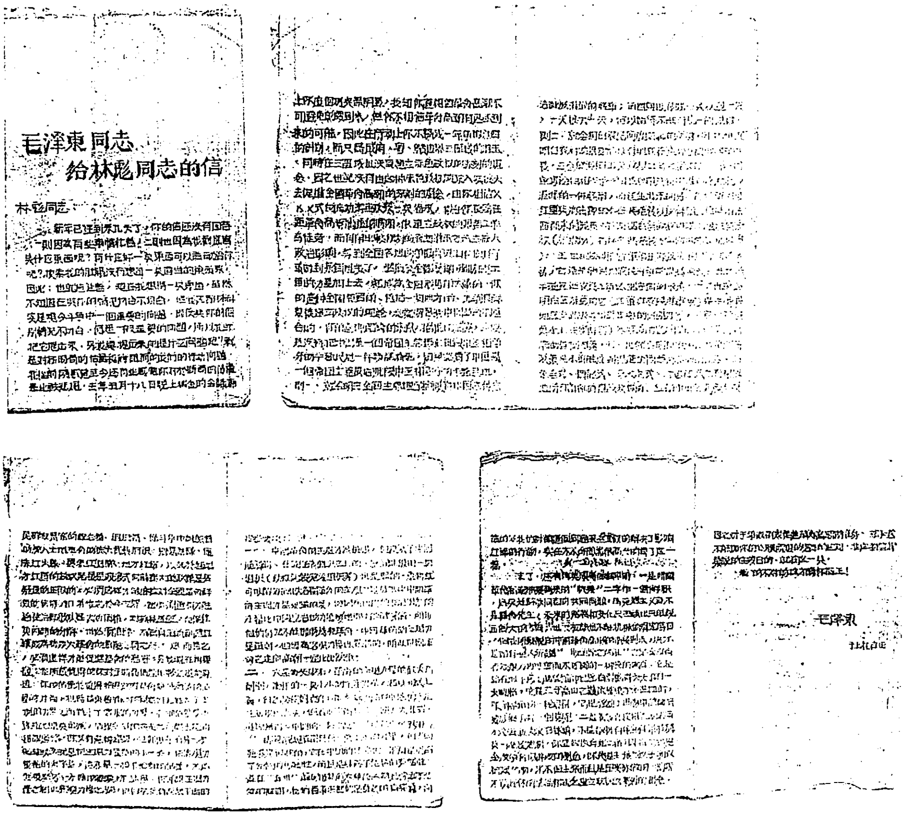
[5] 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

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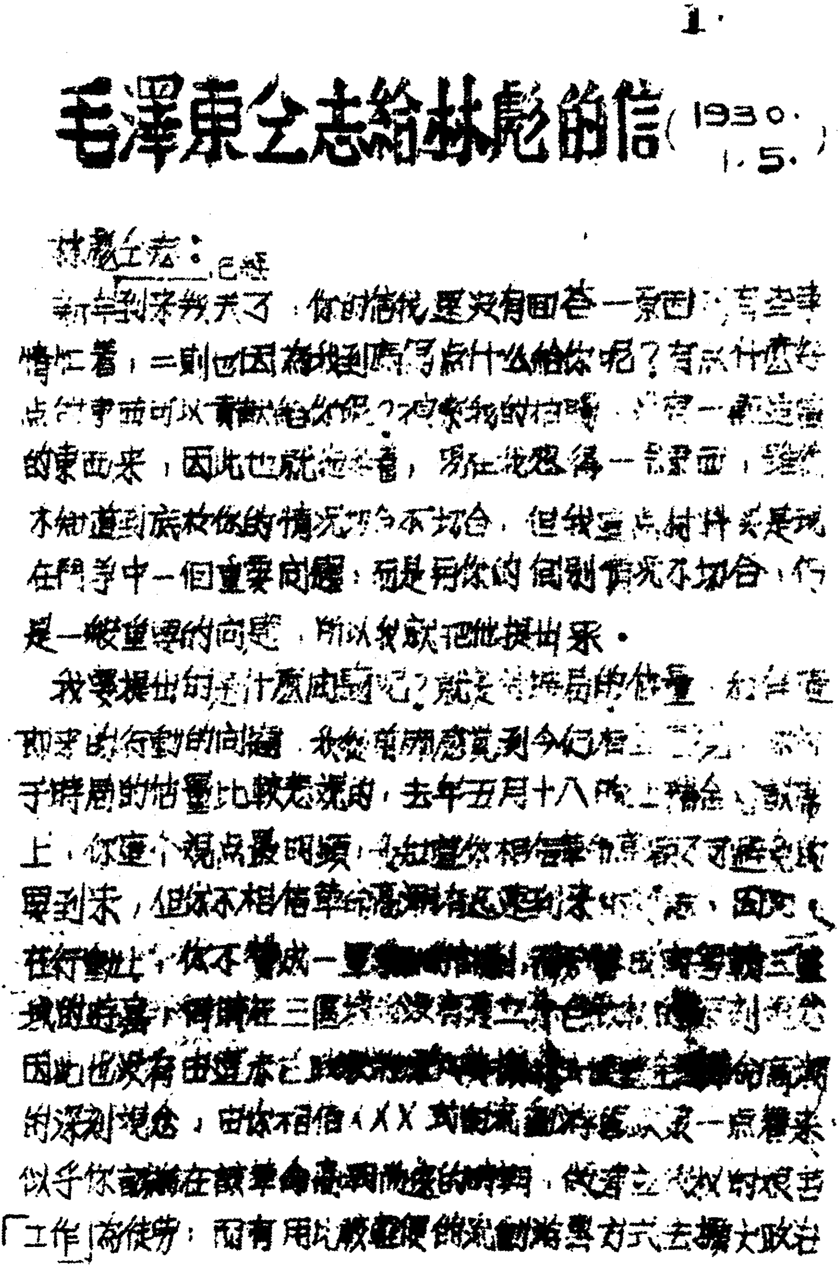
毛澤東同志給林彪同志的信

林彪同志：

毛澤東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油印件）。

资料图片



1.

毛澤東仝志給林彪的信（193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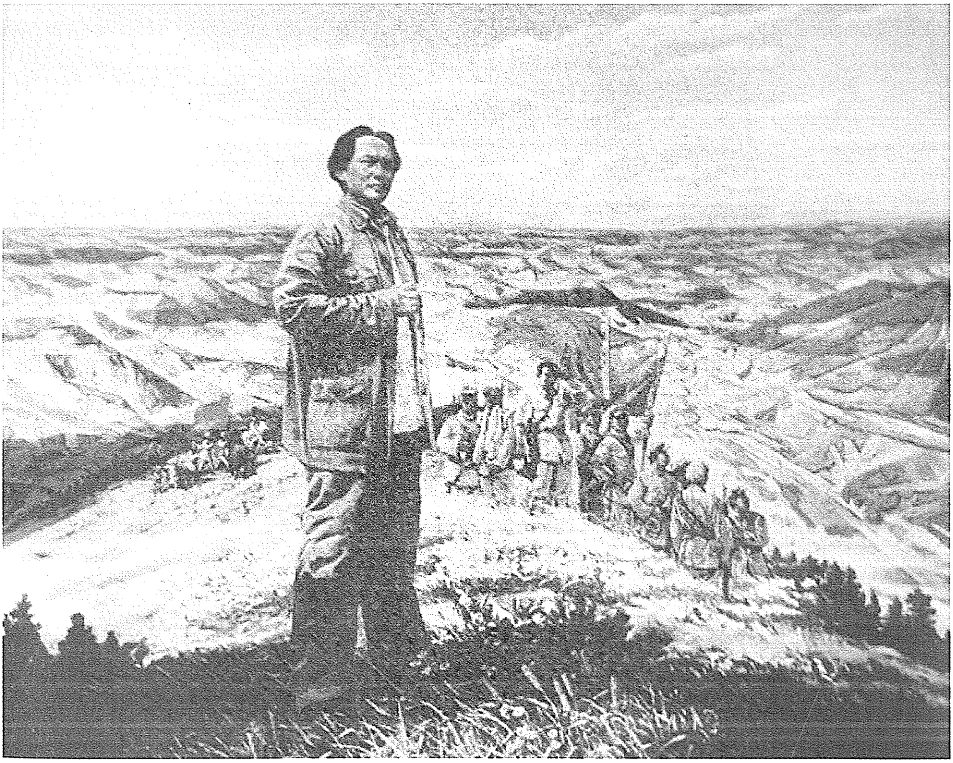
林彪仝志：

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因為有些事情忙着，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点什么給你呢？有点什麼好点的東西可以貢獻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一點適當的東西來，因此也就拖延着，現在我想得一点東西了，雖然不知道到底於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点材料実是現在鬥爭中一個重要問題，即是於你的個別情況不切合，仍是一般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他提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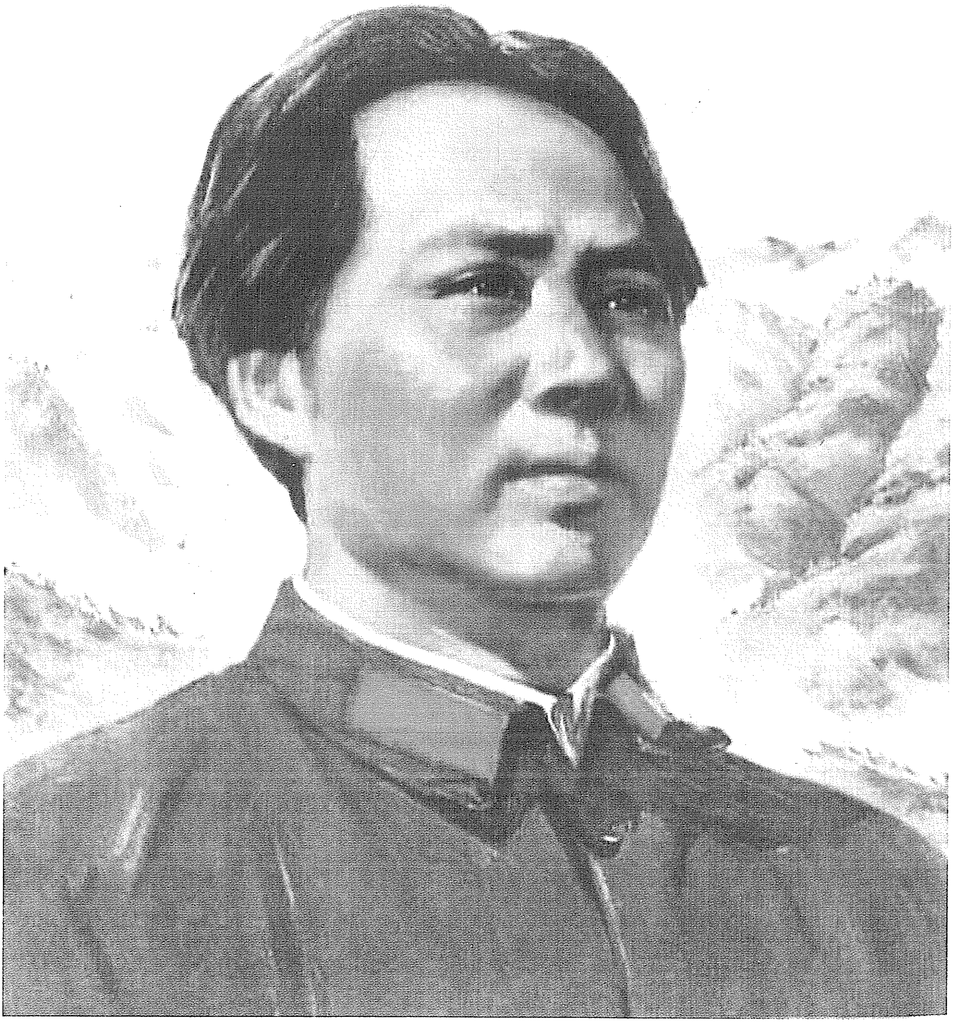
我要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呢？就是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行動的問題。我從前頗感覺到今仍有些感覺，你對于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觀，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會議席上，你這个觀点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閩粵贛三邊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因此也沒有由這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觀念，由你相信ＸＸ式的流動游擊政策一点看來，似乎你認為在距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

毛泽东致林彪信的油印件（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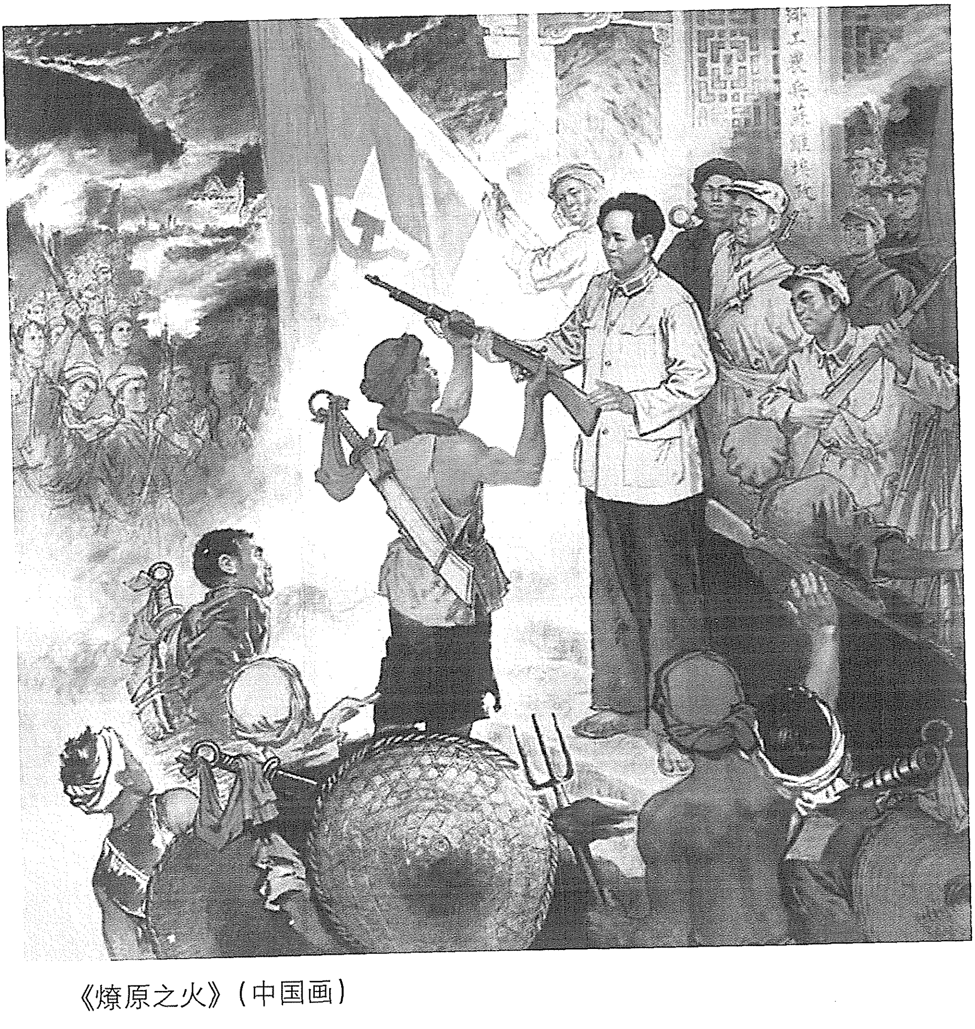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写作地旧址——协成店。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油画）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油画）



《燎原之火》（中国画）

中国红军第四军告国民党军队士兵书*

（1930年1月）

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弟兄们！

一、现在军阀又在开火了！

现在军阀又在打仗了，一面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俄国），中国军阀蒋介石便为其忠实走狗；一面是蒋介石独霸中央政权，引起了全国大小军阀的反抗。前一种进攻苏联的战争是全世界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种是中国军阀代表帝国主义利益抢夺中央政府平分地盘的互斗。两种战争的开火都是加重工农兵的痛苦，尤其是当兵的弟兄们更要直接为军阀帝国主义受惨痛的牺牲。局势有这样的严重，弟兄们千万想一想什么是我们当兵的出路！

二、你们听一听红军的意见：

我们是中国的红军。我们中一部分同志在两年前曾为国民革命打过死仗，卖过苦力，眼见老弟兄们新弟兄们一批一批为国民党的总司令军长师长们当了炮灰。国民党对于工农兵提出的口号一点也不实行，而且保护土豪劣绅加重对人民的压迫，尤其可恨的是惨杀工农会的领袖及共产党员。等到假革命的黑幕揭穿，我们才根本明白国民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东西，我们才联合同志带枪投到农村中与工人农民联合一起实行干起土地革命来。反革命的国民政府两年来以三省的兵力几次进攻我们，终不能损伤红军的丝毫，倒多谢他们

的输送补充，红军转而强大起来。如今全国各地都有红军出现，完全证明工农群众的力量一天一天在发展。我们是受国民党欺骗的人，当此战争来到的时候，念及弟兄们的痛苦，特别很诚恳地为弟兄们贡献一个意见！

三、我们为什么要拥护苏联?

弟兄们！第一，我们要知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对于我们当兵的危险。现在全世界分成两个战线，一面是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战线，如英美日法等国，他们是专门压迫无产阶级弱小民族的。蒋介石坐了南京，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因为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兼军阀，所以做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一面是无产阶级的战线，如苏联及各国工人农民兵士等穷苦的人。苏联在十余年前打倒了俄皇，成立了工农兵政府，把资本家地主等扫除干净。工农兵自己管理自己国家，求得了真正的自由平等。全世界无产阶级看见苏联为此办得好，都起来革命，联合苏联。比如中国从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曾有一次大革命，就是得了苏联的帮助。如果国民党不反叛革命，如果革命不失败，工农兵早得了政权，早成立了苏联第二。国民党反叛以后到现在两年光景，革命并未消灭，而且又渐渐抬头起来，中国是如此，其他各国也是如此。苏联成了我们工农兵的大哥，领导千百万穷苦人民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这样引起了帝国主义的绝大恐慌，不得不联合起来进攻苏联，以压迫一切革命势力。蒋介石便是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忠实奋勇去进攻苏联，造成几个月以来的中东路风潮，这明明白白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开始。战争如一旦开火，眼看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要运几万几十万兵士去打仗，就是要用我们工农劳苦群众去打工农劳苦群众，这是何等狠毒！弟兄们！千万不要上当，要拥护苏联，拥护无产阶级的国家，掉转枪头对着中国军

阀打去！

四、我们要起来打倒军阀

弟兄们！第二，你们要知道中国军阀混战是加重我们当兵的及工农的痛苦。中国军阀蒋介石、朱培德、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张发奎、张学良等这般东西，时而和气，时而反面，打起仗来，今天南京打武汉，明天又武汉打南京；时而广东打广西，时而广西打广东，一年要干几次，弄得我们当兵的打得莫明其妙。每一次打仗，我们当兵的要死几十万，军阀们无论胜败都要刮地皮，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至于人民老百姓呢，起码几省或者全国遭殃！唉！这样打仗究竟为什么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不同是国民党吗？不同是三民主义的忠实同志吗？不同是口头在讲革命吗？原来完全是假的。国民党是军阀的刮民党，民族主义投降英法美日，民权主义不准人民开会，民生主义加租加捐加税。国民党军阀只知道争地盘、刮地皮、发洋财，投降帝国主义以他为靠山而保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接济军阀的金钱和枪弹，所以军阀们打仗是永远不能停止的，也永远不会打倒帝国主义的。弟兄们！现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发奎等为了打倒桂系以后地盘分配不均，又在打仗了！这个战争必然加重当兵的痛苦，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士兵同志应该起来反对，大家不要替军阀打仗。两方面的兵士一齐反转来打倒军阀，谋自己的出路！

五、什么是我们士兵的痛苦？

弟兄们！第三，要知道自己的痛苦来源以及自己的出路。弟兄们！我们不是生来当兵的，也不是命苦应该来当兵的，我们只是在家里没衣穿、没饭吃不得已才跑来当兵的。为什么我们会没衣穿、没饭吃呢？第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用洋货赚了中国的钱。洋货销

场宽广，土货逼得不能出卖，只有停止不造。因此几千万几百万的工人农民便不得不失业了。加以军阀连年打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苛捐杂税的剥削，弄得我们老百姓求生无路、入地无门，大家没法不当土匪只有当兵。在我们当兵以后，初步进军营，每日三操两讲，七打八骂，从打手心、打屁股、关禁闭、开除以至于打靶，这些就是军阀们对我们的家常便饭！主要的意思就是养成我们的奴隶性格不敢反抗。至于士兵的衣服呢？每年顶多只有两套，穿来长长短短毫不合身，出外就惹人家发笑。被服呢？只有一两床坏毯子，夏天太厚了，冬天太薄了，破几个大洞简直是臭蚤的大本营。住房呢？军官们要揩油，不肯花钱修补，风吹日晒，把士兵当着牢狱囚犯还不如。军饷几月几年不发，上了他们的腰包。伙食尾钱照例不分，军阀们为了揩油，把伙食弄得非常坏，每日糙米青菜，无油无盐，这就是士兵的衣食住。一旦在战场带花，送入伤兵医院，那更是千百怪状，眼瞎的、足跛的、断背的，睡在床上不能动弹，那一面在哭，这一面在嚎，没有零用钱，没有医药，伤口流黄水臭得难闻，当兵带了花只有痛死。所以大家都希望痛快补一枪，不愿活受罪。唉！这些景况比比军阀们住洋房、摸麻牌、吃西餐、睡几房姨太太、存几百千万在银行里，究竟谁值得呢？还有军阀故意克扣军饷，使当兵的受尽穷苦，他们还向弟兄们说：大家不要愁，快打仗了。打仗到了大地方，弟兄们多少可得东西。唉！这就是军阀的毒计！他们克扣了军饷，指使我们到战场去抢劫，实在是要我们为他们拼命。许多弟兄听说打仗，就很高兴，以为发洋财机会到了，每次都拼命上前乱抢一阵，这正中了军阀们的毒计。大家想想，每次打仗到一个城市，大的商店、银行早有军阀们告示保护，谁敢去动一动？发洋财只有光顾小商人及痛苦的老百姓，他们

与我们是一样的苦人！大家再想一想，当兵的为军阀打了几百仗了，从广东打到北京，结果得了一个裁兵，强壮的留下，残废的滚蛋，请问哪个当兵的曾带了钱回家？军阀说打仗发财，完全是利用我们为他们拼命的一条毒计！弟兄们千万不要上当！唉！弟兄们！我们在家里受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压迫，不得已跑出来当兵。当兵以后，又仍然受帝国主义压迫，并且成了保护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压迫人民的器具。帝国主义军阀豪绅没有我们当兵的，他们不会那样凶恶；工人农民穷苦老百姓没有我们当兵的，他们不会那样受痛苦、受压迫。我们当兵的自己受压迫，又替别人做走狗去压迫自己的穷苦同胞，而自己一点好处没有，只有帮助军阀享福，唉！这是怎么样的蠢笨！这是怎么样的不值得啊！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

六、什么是我们的出路？

弟兄们！我们红军弟兄中有一部分以前也与你们一样是很服从军阀长官的，不懂得军阀的可恶，后来从事实上看穿军阀压迫兵士的黑幕，才彻底懂得工农兵是亲骨肉，应该联合起来，所以才坚决脱离军阀到红军里面来。弟兄们！要知道红军的好处是什么？

七、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军队

第一，红军是工农革命的军队。红军弟兄与工农是不能分开的，工农同志背着枪编成队伍就是红军，红军同志放下枪到田里工厂里就是工人农民。因此我们红军到一处，工农群众起来欢迎，煮饭烧茶、杀猪宰羊来欢迎我们。土豪劣绅跑的跑了，捉着的就罚款或者由工农兵开会来审判他，一切田地财物由工农兵大会决定处罚。因此红军与工农团结一气，分了田地，自己管自己政府，造成了真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如今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各地都有红军。就是由工人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呀！

八、红军是士兵自己的军队

第二，红军是士兵自己的军队。国民党挂着国民革命军的名称，骨子里是军阀的军队。军官有权，兵士无权。红军官兵好像师生的关系，弟兄般的亲爱。衣食住都由士兵选举代表共同管理，由工农兵政府供给。所以红军中官兵伙穿吃薪饷都是一样，红军中只有做工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敬爱官长，财政公开，兵士代表有权过问，全军有多少用多少，明明白白，绝没有扣军饷吃伙食尾子上腰包的怪事，一有不平等即可开会提出来问，马上就有公平的处置。所以红军才是真正的军队，是以士兵的利益为主，完全没有压迫。

九、红军是拥护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

第三，红军是拥护共产党联合世界革命势力的。帝国主义军阀的势力非常之大，而且他们是有全世界的联合，我们工农兵的革命也一定要有全世界的联合才能打倒他。共产党是全世界革命的指导机关，各国都有很好的组织。红军必然要拥护共产党才能与世界革命取得联络。共产党的政治意见与军事计划都非常正确高明，红军及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指导之下，一定能步步成功。同时共产党并不是一个特别的组织，他只是在工农兵中一部分最勇敢明白的同志所组织成功，纪律特别严，工作特别苦。凡是工农兵，只要努力革命，有工作表现，都有入共产党的资格。所以共产党是工农兵自己的党，绝不像国民党只是几个军阀资本家豪绅的机关，把工农兵压在脚底。

弟兄们！朱毛红军就是因为有了上面三个原因，所以能转战四省，反革命派把他奈何不得。这可以证明，我们当兵的要到红军去才能得着工农的拥护欢迎，要接受共产党的指导才不会走错路，才

不会为军阀做牛马。弟兄们！现在战争已经爆发了，一面是我们工农兵又更加受帝国主义军阀的压迫，一面当着帝国主义军阀打架的时候，确是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好机会。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在最近有到来的希望，只看我们工农兵的团结和努力。

十、你们到红军方面来吧！弟兄们！起来吧！不再替军阀做牛马奴隶，快带枪投到红军去。广大的工农群众及全国红军正热烈地欢迎你们。认清你们的出身是工农无产阶级。认清压迫你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军阀。认清工人农民是你们的好朋友。认清红军是你们解放自己的一条生路。离地狱，登天堂。快来呀！

十一、我们大家革命的口号！

（一）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

（二）反对中国军阀战争！

（三）全国兵士群众联合起来！

（四）不上前线去，不替军阀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

（五）向军阀算欠饷，要二十元一月兵饷！

（六）工农弟兄不打工农弟兄，士兵不打士兵！

（七）拥护红军，带枪到红军中去！

（八）实行土地革命，分配士兵土地工作！

（九）工农兵联合起来！

（十）拥护工农兵政府，打倒国民党政府！

（十一）拥护共产党，打倒国民党！

（十二）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十三）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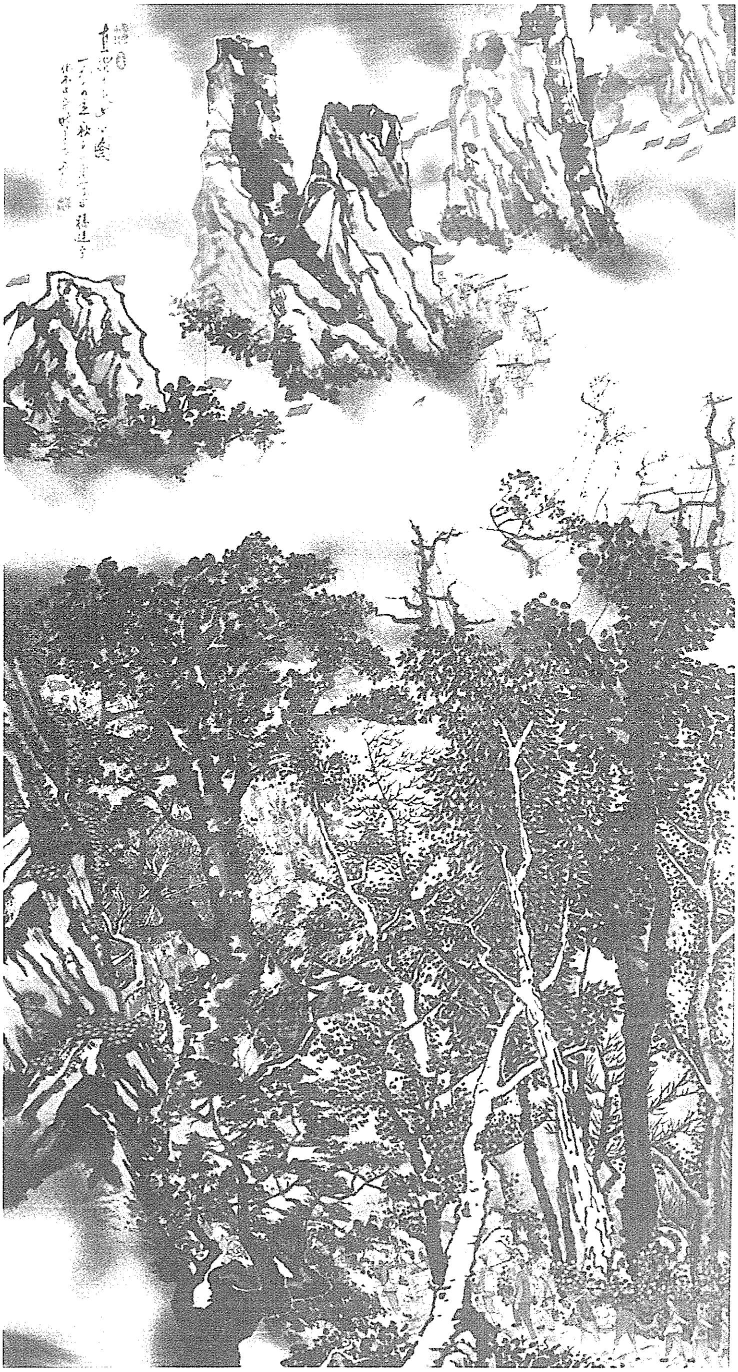
如梦令·元旦[1]

（1930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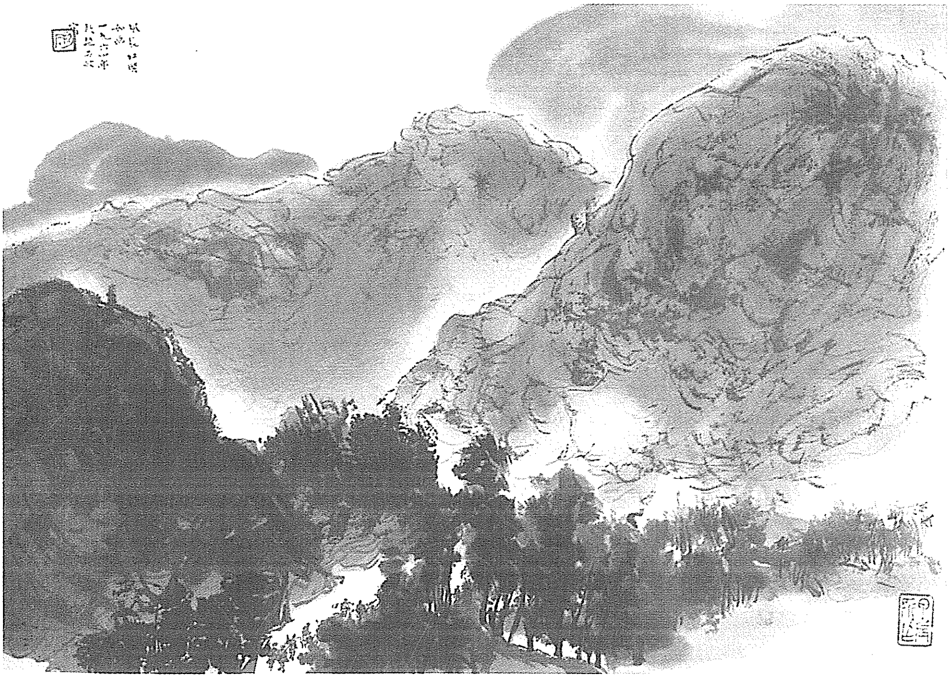
宁化、清流、归化，
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
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
风展红旗如画。

---

[1] 1929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在福建省建立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12月底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对红军发展史有重大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同时，蒋介石组织了江西、福建、广东的反动武装实行“三省会剿”，向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进逼。当福建敌军先头部队进抵离古田村仅30里的小池时，红四军在1930年1月上旬向敌后转移。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先出发，挺进江西。毛泽东率领第二纵队掩护主力转移后，向北经福建连城、清流、归化（今明溪）、宁化等县，西越武夷山，去江西和红四军主力会合，使敌人的“三省会剿”宣告破产。元旦，这里指农历正月初一（1930年1月30日）。



《直指武夷山下》（诗意画）



《风展红旗如画》（中国画）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

（1930年2月）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情更迫[2]。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3]。

此行何去？
赣江[4]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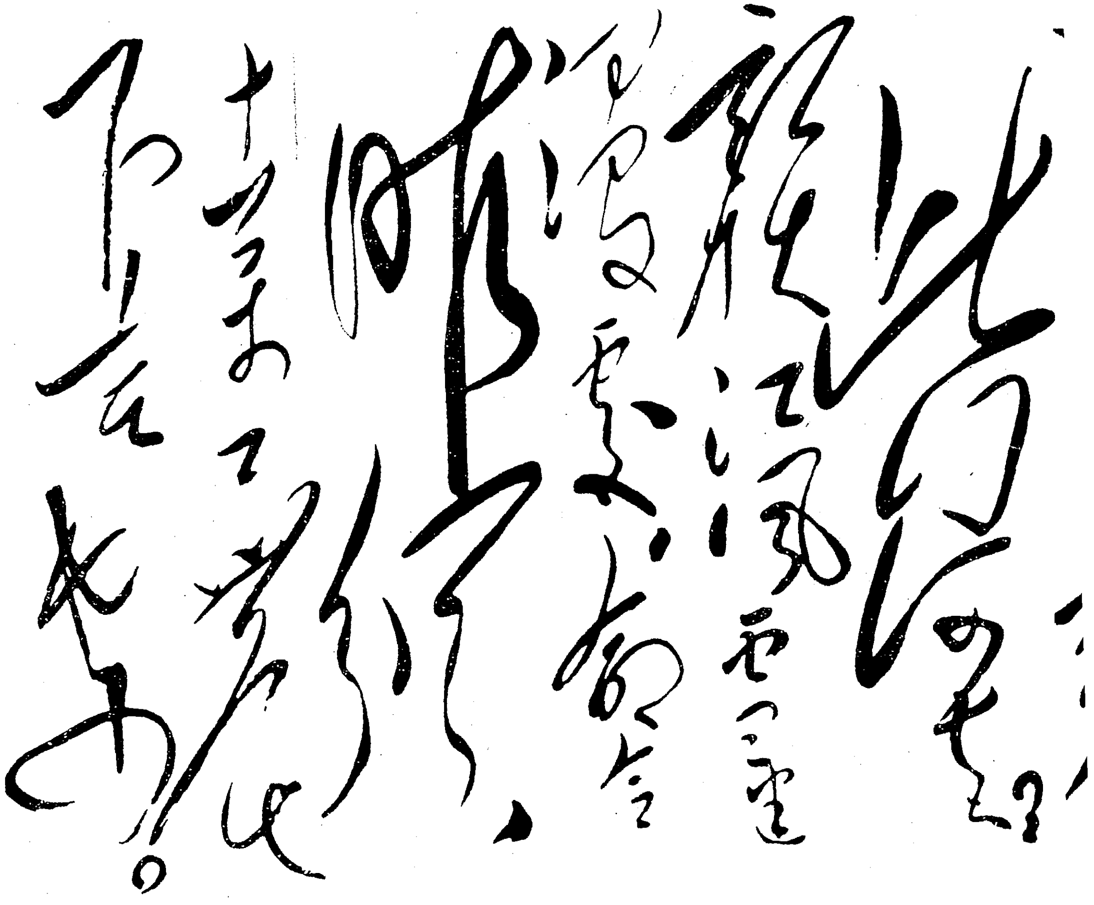
[1] 广昌路上，广昌，县名，在江西省东部。1930年2月中旬，毛泽东率红军准备攻打赣江西岸江西省中部重镇吉安时经过这里。因当时国民党军调集7个旅12个团，开始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毛泽东、朱德等遂决定不攻吉安，改在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一带，打孤军进犯的国民党军唐云山旅。

[2] 情更迫，首次发表时原作“无翠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改为“情更迫”。

[3] 大关，指险要关隘。

[4] 赣江，江西省主要河流，由章水、贡水流到赣州市汇合而成，北流经吉安、南昌注入鄱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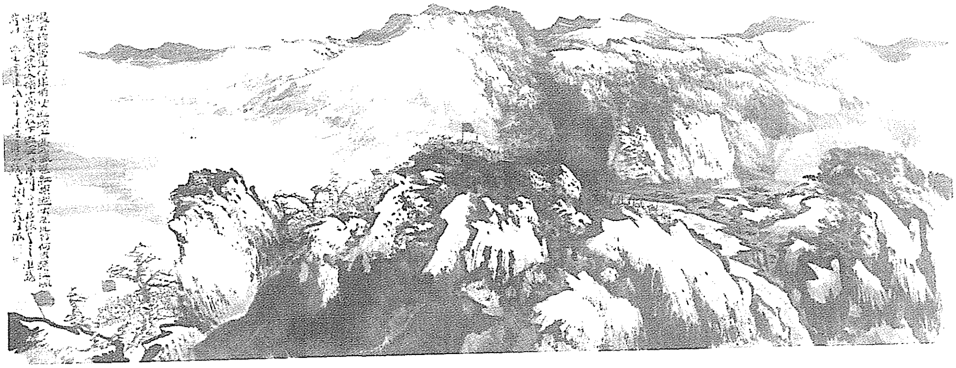
[5] 吉安，现为市，在江西中部，赣江西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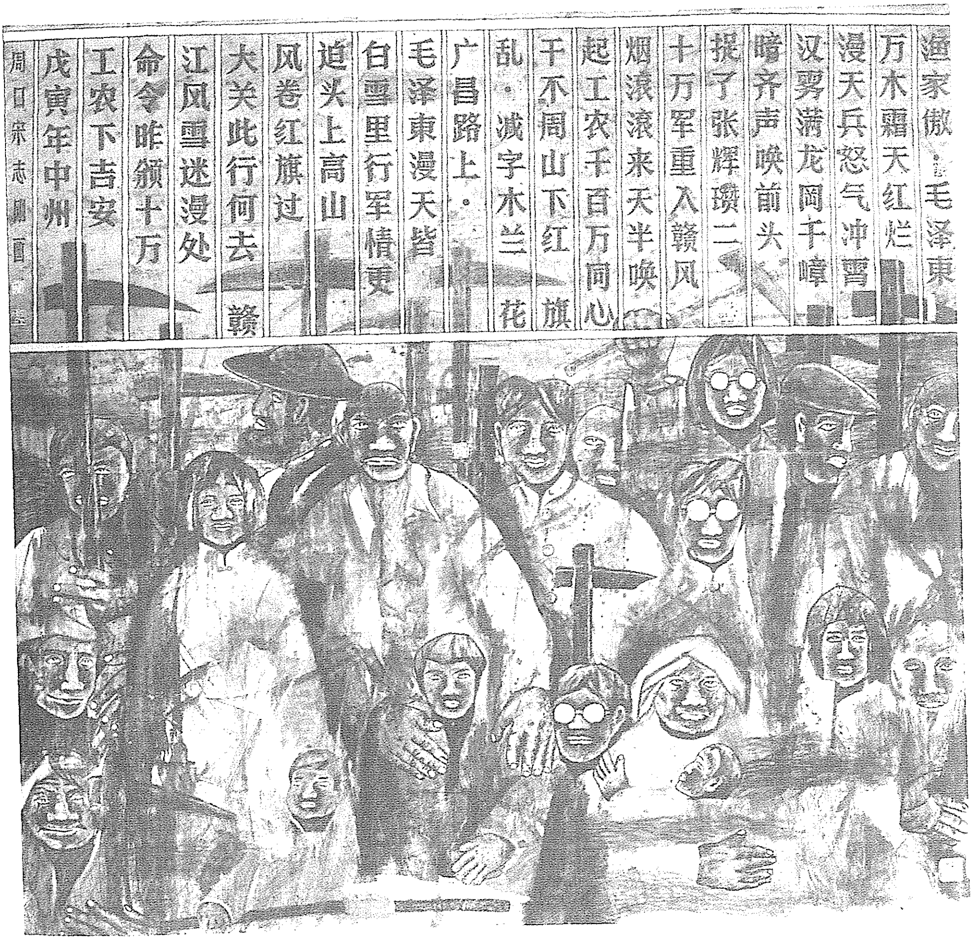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毛泽东手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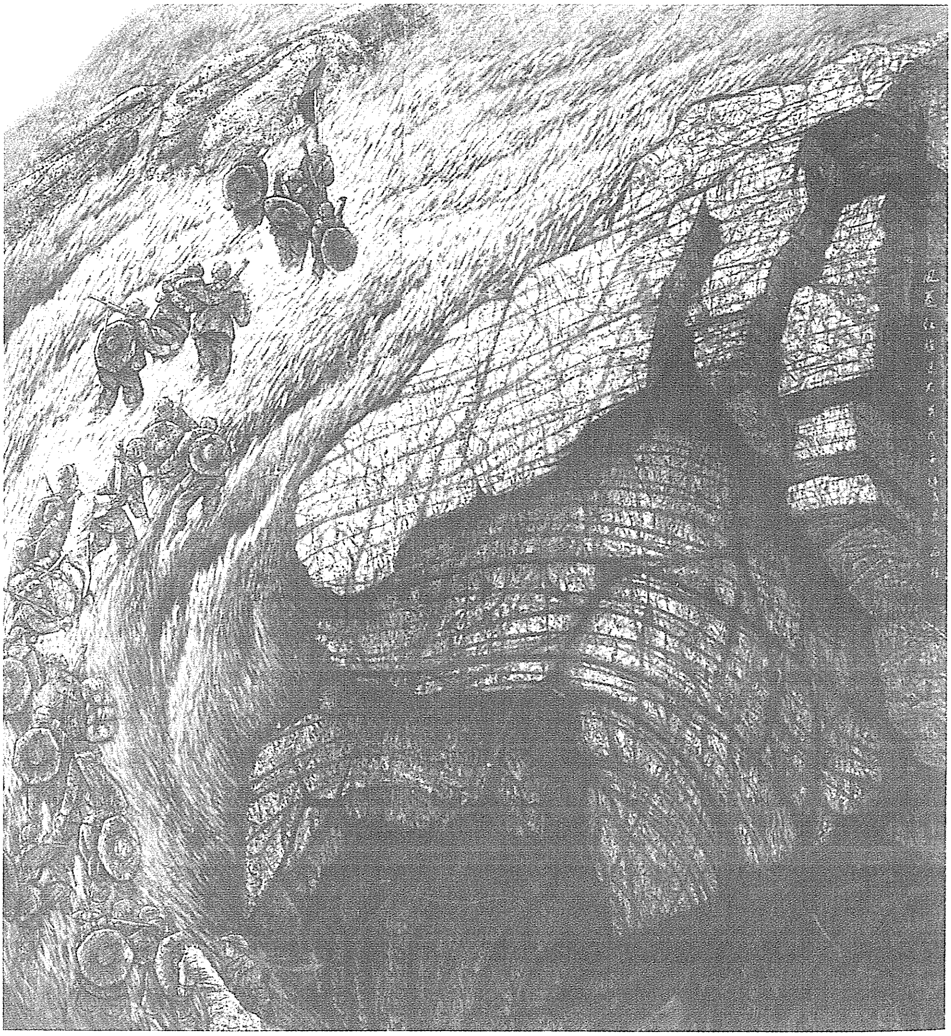
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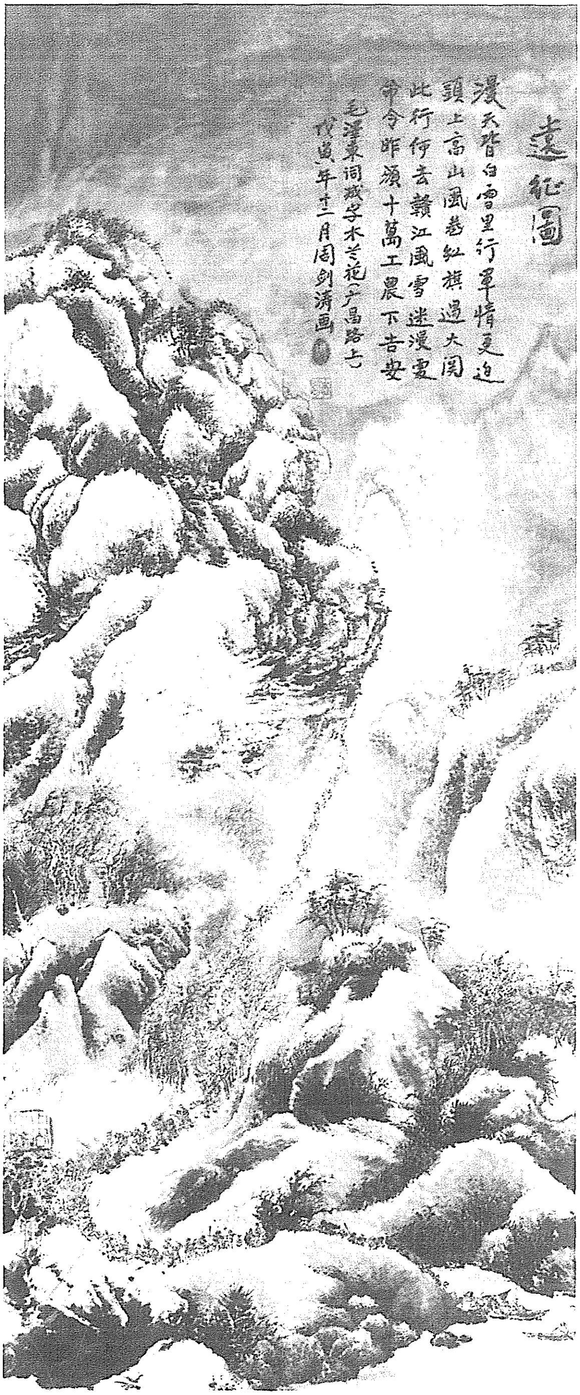
《雪里行军》（诗意画）


渔家傲·毛泽東
万木霜天红烂
漫天兵怒气冲霄
汉雾满龙冈千嶂
暗齐声唤前头
捉了张辉瓒二
十万军重入赣风
烟滚滚来天半唤
起工农千百万同心
干不周山下红旗
乱·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上·
毛泽東漫天皆
白雪里行军情更
迫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
大关此行何去赣
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
工农下吉安
戊寅年中州
周口宋志刚画

《岁月》（诗意画）



《风卷红旗过大关》（诗意画）


遠征圖
漫天皆白雪里行軍情更迫
頭上高山風卷紅旗過大関
此行何去贛江風雪迷漫處
命令昨頒十萬工農下吉安
毛澤東詞減字木蘭花廣昌路上
戊寅年十二月周劍清畫

《远征图》（诗意画）

土地法*

（1930年2月7日）

第一章　土地之没收及分配

第一条　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所有，由苏维埃分配与贫苦农民及其他需要土地等项的人民。只有农民协会，尚未成立苏维埃时，农民协会亦得执行没收及分配。

第二条　自耕农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除自食自用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没收的，苏维埃应批准农民的要求，没收其多余的部分并分配之。

第三条　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与田地。

第四条　现役红军官兵夫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

第五条　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得酌量分与田地，以补足其生活为限。

第六条　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第七条　旅外不在家乡的，不分田。

第八条　分田的区域标准有二：

（1）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

（2）以数乡为单位，如有三四乡互相毗连的，内中几乡田多几乡田少，若以一乡为单位分配，那田少之乡不能维持生活，又无他种生产可以维持生活的，则以三四乡合为一个单位去分配。以上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普遍适用的，如有特别情形经乡苏维埃要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可用第二种办法。

第九条　分田的数量标准：

（1）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有特别情形的地方，经乡苏维埃请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得以劳动的标准分配。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十四岁以上至六十岁能耕种的为一劳动单位）。

第十条　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起见，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重新瓜分。分田后，由苏维埃制定木牌插于田中，载明此田生产数量，现归某人耕种。

第十一条　所有豪绅地主及祠庙公田的契据，限期缴交乡苏维埃，或乡区农民协会，当众焚毁。自耕的田契，如有多数农民要求焚毁的，亦得焚毁。

第十二条　田地分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种证。

第十三条　凡乡中死亡、改业和外出的，将他所分得的田地收归苏维埃再行分配。或来或新生的，苏维埃应设法分与田地，但须在收获之后。

第十四条　暴动分田时，如农民已下种，则本季生产归原耕种

农民收获，他人不得刈取。

第十五条　河坝及大规模池塘，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供给人民公共使用并督促人民修浚整理。

第十六条　大规模山林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人民需要采用竹木时，按照下列数目，得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下的由乡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上五十根以下的，由区苏维埃批准。五十根以上的由县苏维埃批准。

第十七条　大规模山林的出产，除供给人民需要外，其余归苏维埃出卖，所得之价，作苏维埃用费。各级苏维埃应得之成数，由高级苏维埃规定。

第十八条　木樟山杉山竹之不便个别分配的，得由人民数家合为一组，向苏维埃领取栽耕，以其生产分配组员使用。

第十九条　为满足贫苦农民要求起见，应将所有没收田地，尽数分与他们，苏维埃不必保留。但得保留没收房屋之一部分为公共事业之用。

第二章　废除债券

第二十条　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借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或农会焚毁。

第二十一条　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不论新旧，都要清还。

第二十二条　工农贫民欠商家交易之账，而非商业高利贷的，仍旧要还。但非本身之账不还，年限太久之账也不还。

第二十三条　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账，革命以前借的，应全

还、减还或免还，由乡区苏维埃按照情形，适当规定。革命以后借的，全然要还。

第二十四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豪绅地主及典业奸商的，无条件收回抵押品。

第二十五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小资产阶级的，其抵押品，应收回若干或不收回，由乡区苏维埃照双方经济情形决定之。

第二十六条　钱会、谷会、豪绅地主奸商接取工农穷人在先的，接会人应将钱谷交还于纳会人，会取消。工农穷人接取豪绅地主奸商在先的，接会人无须交还钱谷于纳会人，会也取消。

第二十七条　苏维埃政权之下，禁止高利借贷。由县苏维埃按照当地金融情形规定适当利率。但不得超过普通资本在当地一般经济情况中所得利率之数。

第三章　土地税

第二十八条　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维持并扩大红军及赤卫队，维持政权机关等）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路河坝等），苏维埃得向农民征收土地税。

第二十九条　土地税须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并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亦可征收。

第三十条　土地税按照农民分田数量分等征收：

1. 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
2. 每人分田收谷六担的，收税百分之一。
3. 每人分田收谷七担的，收税百分之一点五。

4. 每人分田收谷八担的，收税百分之二点五。

5. 每人分田收谷九担的，收税百分之四。

6. 每人分田收谷十担的，收税百分之五点五。

7. 每人分田收谷十一担的，收税百分之七。

8. 每人分田收谷十二担的，收税百分之八点五。

以后每加收谷一担，加收土地税百分之一点五。

第三十一条　土地税按照以下比例分配于各级苏维埃：

百分之五十归乡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区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县苏维埃，百分之十归省苏维埃。

第三十二条　山林出产，只供人民自己食用，没有多余的，不收税。自己食用之外尚有多余的，其多余部分，由苏维埃按照出卖价值，用适当比例收税。

第四章　工资

第三十三条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以前工资过低的要适当提高。以后工资数目，由苏维埃依照生活物价涨跌及农民收入丰歉两个标准决定之。乡区苏维埃规定工资，须得县或省苏维埃批准。

1930年2月，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红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图为“二七”会议旧址。

“二七”会议期间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1]

（1930年2月14日）

江西斗争第一步行动计划联席会议决议：

（一）根据联席会议对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作根本计划。

（二）目前行动的总目标及中心口号，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下列六个口号则是目前的中心口号。

1. 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2. 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
3. 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
4. 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
5. 打到吉安消灭军阀混战；
6. 打到吉安武装拥护苏联。

以上六个口号各部队各政权机关各群众组织都要立即对工农士兵及其他被压迫群众（中小商人及学生）公开提出做广大宣传（对工农及城市贫民要在一切墙壁上写满，对士兵要作为早晚点名呼唤的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发动广大群众达到政治任务，反对隐蔽政治目标及对宣传怠工。

（三）敌方形势估量及攻取吉安的意义：

---

[1] 这是“二七”会议主席团毛泽东、曾山、刘士奇署名发布的通告。

1. 敌方形势：两广战争相持未决，福建政变爆发，湖南有对周烂吴尚的军事行动，湖北有鄂系（夏斗寅徐源泉）与蒋系的斗争，老桂系（李石樵李宜煊）与蒋系的相持，蒋阎正积极酝酿南北大战，工农士兵贫民游民的斗争普遍发展。在上述形势之下，蒋系在短期内无增兵江西的可能，在江西赣东赣北至少可牵制张辉瓒部三团（赣东二团赣北一团），张部只能用三团兵力对付赣西，谭道源一师不能回来，金汉鼎受闽西工农牵制，同时又有参加争福建地盘的必要一时不容易到赣西。

赣西成旅两团朱旅一团及靖卫队的部署如下：吉安二营靖卫队枪一百五十支守城，分宜、袁州、新余三县共有一营另一连流动游击，加以分宜有靖卫队枪三十支，袁州有商团及靖卫队枪三百支，新余有靖卫队六十支，峡江有易团团部及兵七连又靖卫队八十五支有工事，三曲滩有一营人游击于吉安三曲滩间，吉水有二连（新开去）及靖卫队六十八支，新淦只靖卫队三十五支，兴国万安均靖卫队守城，在以上各县敌军及统治阶级都非常恐慌。

2. 我方形势：赣西及兴国、于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百十五万，宁冈、水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六县县城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县城在敌人手，四乡都在我们手，安福、新余、分宜、峡江，南丰、于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兴国有大部分是赤色区域，加以红军四、五、六军都到赣西各地，尚有许多地方武装，斗争情绪很高。

3. 在上述敌我两方形势之下，“打吉安”确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过去业已发动了广大群众动摇了敌基础，故这一行动口号是十分对的。但我们第一步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实行围吉安城，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

然后进行第二步计划（后附）。

（四）部队的调动及布置：

1. 赣河以东：A. 四军三纵队及军直属队全部于二月十三号集中乌江市，十四号进攻吉水城，要有决心地打下来（四军三纵队在十二日以前要把永丰城拆完）；B. 六军第二纵队部第四支队二月十三号开往中鹄，十四号配合中鹄群众及武装消灭水东之敌，（二连）监视吉安城，响应四军进攻吉水；C. 中鹄苏维埃除分一部分群众与四支队配合进攻水东外，另要分配一部分群众于十四号清早开往吉水城，与四军配合进攻吉水城内之敌，消灭敌人，担任拆城及搭浮桥；D. 六军第二纵队第五支队于九日到达荇田东固，赤卫队由袁振亚率领于十日到达荇田与五支队取齐，组织一行委指挥荇田一带工作，袁振亚为书记（行委名单及任务另附）；E. 四军第四纵队及二十五纵队宁南游击队的任务仍如前委布置在宁都、广昌、南丰三县扩大红色区域牵制金汉鼎及筹款；F. 四军全部放弃永丰攻取吉水的意义是：揭出四军的目标，于吉安对面威胁吉安城，影响赣河下游群众起来，并使南昌反动政府的目标集中赣西；G. 吉水攻下后前委及吉水县委的工作①迅速拆城，②建立县政府，③建立县城工人组织，④发展城内党与团的工作建立区委。

2. 赣河以西：A. 五军及边界赤卫团的行动和任务：五军及边界赤卫团（至少要四百枪）限二月十三日集中永阳，以永阳为指挥中心，配合西区群众武装，向吉安城附近威迫，同时注意泰和之敌向吉安退却时相机截击之，所有西区一带群众武装都归五军指挥。B. 六军第一纵队（原二、三团）限二月十三日到达阜田集中（三团如赶不及可迟一天到达，二团必须同时到达），以阜田为指挥中心，配合相水金滩群众武装及吉水游击队向三曲滩吉安峡江三方面

威迫。甲、从第一纵队派出小部队配合群众武装向三曲滩扰敌，与吉水四军取得联络；乙、峡江边游击队向峡江城扰敌；丙、内外延赤卫队及儒行游击队集中桐树坪向吉安城扰敌（扰敌即每天拂晓及深夜向敌打枪），断绝吉安三曲滩敌人与下游的交通亦是六军一纵队的任务，所有北路的群众武装都归一纵队指挥。

（五）行动纪律及财政政策：

1. 各部队及工农群众到达的地方尤其是城市未得命令不得自由到民间及商店去搜索。

2. 各部队到达地方特别是城市应有计划地分配部队及负责人员去搜索应该搜索的处所，捕捉应该捕捉的人犯。

3. 关于没收反动财产及捉拿人犯均归政治部指挥并处理关于搜索残余敌人及没收反动派军用品均归司令部指挥并处理。

4. 凡罚款筹款没收及处理人犯均须由政治部或群众政权机关明白布告或宣布罪状。

5. 不得破坏学校及邮政。

6. 没有政治的必须时不得破坏公共机关及民众一切器物用具。

7. 禁止没有政治意义及群众基础的烧杀。

8. 财政政策：A. 红军军饷及政权机关的用费主要应向豪绅地主取得，而不应加增中小商人的负担。B. 商店资本在二千元以下的不筹款，两千元以上的按照下列比例要求他们捐助军饷：比例资本有两千五百元捐款三十元，三千元者捐款四十元。此外，资本增加一千元加捐于全部资本数百分之一。如资本四千元，除捐四十元外则加捐四千元之百分之一，共捐八十元；资本五千元者，除捐八十元外则加捐五十元，共捐一百三十元；资本六千元者，除捐一百三十元之外则加捐六千元百分之一即捐六十元，共一百九十元；资

本增加者以此类推。C. 向豪绅地主筹款用罚款名义，向商人筹款用捐款名义。D. 对于豪绅地主所开的商店于其商店资本部分仍按照比例向其捐款，于其豪绅地主部分则加以罚款。E. 反动分子所开的商店经过宣传取得中小商人的同情之后，可以没收，否则仍不要没收。对于反动店主在群众意义的必要时应该捉拿并罚款。F. 河流交通在军事的必要上得施以检查，或有时期有范围地断绝船只来往，或扣留船只，不得没收船只上货物及其他财产。

（六）党内外群众的动员：

1. 伟大的政治任务：只有动员党内外一切群众才能达到，过去许多地方对于行动目标只有少数负责人知道不让群众知道的错误应该坚决的废除。

2. 此通告到达各地方后要迅速召集党及群众的各种会议或大会，详细报告政治形势国际国内江西赣西反革命势力崩溃及革命势力高潮的形势斗争前途（工农夺取江西爆发革命）和目前行动的目标（六个中心口号），并宣布纪律（行动纪律各条），红军及政权机关并要发传单出布告，使群众完全明了我们要做什么。

3. 党内动员：A. 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开会讨论这一通告及续发的各通告。B. 开活动分子大会，由党的指导机关派人作报告，军队以军或纵队或支队为单位开，地方以区为单位开。C. 开支部大会报告通告内容发动党员全部。

4. 军队动员：A. 召集军政工作人员会议报告政治形势斗争前途行动目标及纪律各项，讨论执行方法，领导士兵积极行动。B. 举行士兵集合讲话亦是报告政治形势等各项，鼓舞他们的斗争勇气。

5. 工农群众动员：A. 召集各级群众机关及工农干部会议（即开各级委员会，以区为单位召集群众大会。B. 群众大会名为某区

攻取吉安示威大会，此通告到后三日内必须举行，事先要有好的准备，事后要将结果报告上级机关。C. 群众大会的中心口号除开前述六个中心口号外再加以下列六个口号（共十二个口号）。

①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消灭反动势力；

②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分配土地；

③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建立苏维埃；

④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帮助扩大工农武装；

⑤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消灭军阀混战；

⑥欢迎红军第四、五、六军武装拥护苏联。

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

（1930年2月16日）

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之陂头举行，二月六日至九日开会四天，联席会议开会时节的政治形势是帝国主义积极布置反苏联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共起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混战日益扩大，财政经济危机遍布全国，工农兵士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特别是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各省红色武装斗争有大规模的开展，打红旗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在三百万以上。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别省要成熟。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而且是世界意义上实行着武装拥护苏维埃促进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

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着党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由于这三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

革命的一大动力。联席会议又告诉同志及一切正在斗争的群众，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从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因为和我们作对的不但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且是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但艰苦斗争的前途则必然是全国革命高潮援助南方革命势力，南方革命势力则要汇合全国的革命势力把统治阶级完全埋葬。

联席会议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

联席会议决定革命的土地法，反对迟迟分配土地，指出不论何地，凡暴动驱逐了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分配与农民。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只要真实的群众要求，自耕农的土地亦得没收。对于分配土地，指出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与一切需要这些东西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苏维埃管理，仍归人民公共使用。联席会议指出，表面上站在左边在现时阶段主张所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理论，实际是帮助豪绅保持封建势力，违反彻底破坏封建基础的任务。同时，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与男女老幼平分，应该采取后者，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联席会议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

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指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四军则组织军委指导之。前委名单如下：毛泽东、郭贞、曾珊、王怀、方志敏、朱德、潘星元、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指定毛、曾、刘、朱、潘五人为常委，黄、彭为候补常委，毛为书记。联席会议为了赣西南的统一指导，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指定新的名单，成立赣西南特委，同时指定四军军委名单。又决定召集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及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

前委在联席会议指出的任务之下，业已开展工作。特为通告红军及地方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

前委

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

（1930年3月18日）

一　环境分析和行动计划

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三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

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进占福州。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闽西只张贞部队，稍远的将来我们可取得漳州，使红色区域直通海口。同时两广战争益趋激烈，东江驻军只有一旅内外，东江西北七县的红色区域有扩大之可能。赣州虽未攻下，然给赣州群众的影响仍然是不小的，对全国也有相当的影响。新的军队到赣州接防短时期没有可能。新的军队未到赣州以前，金部七十团是无法离赣州的。

在上述环境之下，红军第四军的行动应该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其游击区域是：赣南之赣县、于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之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岭、大埔各县；闽西之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各县。六军二纵队的游击区域三个月内应该是万安、赣县东乡、于都北乡、兴国东乡、宁都南乡和广昌石城各县。六军一纵队的游击区域是吉

安、安福、分宜、宜春、新余、峡江、吉水、永丰、乐安、新干各县。六军三纵队则是泰和西乡、遂川、万安各县。赤卫队的二十二纵队应与六军二纵队的行动配合，担任兴国全县、于都北乡、宁都全县的红色区域的完成，宁南游击队则担任广昌、南丰、宜黄的红色区域完成。红军第五军，第一步应与六军二、三纵队的行动配合，完成赣河上游的工作（泰和、遂川、上犹、万安等县），第二步应开返五军的根据地湘鄂赣边一带，推广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并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下，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分兵游击一时期后，因为别一种环境的需要和夺取闽南、发展赣东等地，便应该集中行动。所以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

二　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只求扩大不求深入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赣西南与东江等处，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设苏维埃和忽视赤卫队组织是十分错误的。红军游击时亦易犯这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来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这样的组织算不得组织。这种只做宣传不做组织的地方不是没有的，如南康、大余、会昌、瑞金、石城等县，有些原来没有一点组织的，有些原来有点组织的但只是很小的一点，我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做深入的组织

工作是白费力的，在这样的地方自然只能做些宣传及分配豪绅谷物的工作，给群众以相当的影响，就可以开起来走。但在别的地方，如宁都、于都、安远、寻乌、长汀、武平等县就完全不同，不但原有党和群众的组织，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应该扩大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四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往武平县、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寻乌的红色区域与东江的红色区域原来是通的，这样三省的接连都成功了。若不使这五六县工作深入，单是走马观花地游击一番，如去年赣南四十五天工作，则闽粤赣接连的任务，就不知何日才得实现。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一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红军各部队分开工作时，应该指定时间，支配于指定区域。应该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多，不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少。在一定地区内（如四军三纵队之于于都）哪块是要支配时间多的，哪块支配时间少的，又要有计划，才能工作更有效。

三　伴着发展

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从我们的经验中是显示工作的效力的。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它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设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过去的经

验，非如此则工作白费力，湘赣边界大块红色区域的创造，是因为大革命时，茶陵、酃县、莲花、永新、宁冈各县的群众斗争有一些党的组织的残渣，伴着这些固有的基础，才发展起来的。遂川原来没有基础，勉强制造的结果，仍然弄不出一个局面。四军闽西七月的分兵游击，一纵队在坎市兰家渡沿汀河而上，复折返上杭、永定交界一带，都是伴着原有的一些基础发展的，是“打通”“连贯”的工作，所以一纵队那次的工作效力特别大。三纵队在龙岩龙门一带是伴着原来斗争的区域，帮助农民去工作，所以也收了效力，可惜工作时间不久，仓卒开入闽中，所以效力不及一纵队远甚。二纵队去的雁石、姑田一带，原来一点基础没有，所以是完全白跑一趟，简直无效力可言。这回四军到江西来宁都、乐安、永丰、藤田四地的分兵，只有宁都四纵队一路收了大的效果（四纵队在宁都二十天不但推广了红色区域，主要还要在它纠正了宁都党的机会主义，执行了分配田地、组织苏维埃、建设赤卫队的重要任务）以外，其余三路都没有达到推广赤色区域的效果，因为三地都不是原来有组织的，只有三纵队曾派了一个小部队到吉水，可惜三纵队的党发展这个区域太迟，未能派很多的工作人员下大力去工作。虽然我们并不放过它，上面这些例子很够我们认识：“伴着发展”的口号是无疑的正确。虽然我们并不限制红军的脚板，不准跑入纯全白色区域去一步，有时为了全国的意义或其他不可避免的原因，如“影响时局，解决经济问题”和“退却”等等，是要跑入原无基础的区域去的，但这不是工作路线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无疑是“伴着发展”，也即是历来所说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应付地方党部及群众“请兵”的问题，有些同志对于地方党及群众向红军请兵去打土豪、打民团一件事，随

便的看过了，不知地方群众请兵是好工作机会，因为群众做了主体，一切布置设计都是群众自己的，红军趁此机会帮他一手，斗争之发展是异常迅速的，不顾群众的请求只是主观地布置工作，失掉极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个人主义的工作路线，也是错误的。

四　武装农民

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支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子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地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作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们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五　训练地方干部

红军党的斗争经验，是比许多农业区域的地方党部要丰富些、进步些的。同时地方斗争的发展，工作人员缺乏，工作路线不正确，也就越发表露。因此红军党的指挥机关，无疑的要负担新发展

区域地方干部人材训练的责任，短时期党内训练班和群众领袖训练班之说，依然要按照从前的经验去进行。

六　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

去年四军在赣南东河一带游击时候，赣南特委却去注意西河的日常斗争，把东河方面红军发动起来了的热烘的群众，一点不去指挥，让他冷下去，机械地执行赣粤大道为中心区域的口号，忽视红军在东河一带的政治作用，忽视赣南、东江、闽西三区域联系的伟大意义，表现了十足的机会主义，赣南等处如有过许多许多乌龟干部，红军到了许久不出来接头，要他发动武装斗争就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比较积极一点，也不能利用红军游击的时机，加紧发展斗争的工作，这些地方党的行动与红军的动作不合拍的现象，是使工作失去效力的最大原因，此现象赣南最利害，赣西南特委要努力地纠正。

七　红军党部地方党部的关系

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的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它的工作，但在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它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行使指导的职权。

关于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1]

（1930年3月19日）

为令知事。照得攻城之法，不外奇袭强袭两种，本军此次攻打赣城，即以强攻之决心，施行奇袭之手段，乃以下述缺点之影响，致未克奏效，殊为憾事。兹将是役之缺点及战后之教训，大略列下，以资他山之鉴。

一、敌情之判断不确

屡据各方来报，有谓城中无敌，仅靖卫团[2]百人，有谓城中敌人仅一营者，致使指挥官之判断敌方兵力误为一营，实则城内之敌为七十团全部（三营，每营步三连、机枪一连）。因此攻城之配备及计划多轻忽不周。

二、地形未预先观察

先日一、二纵队既抵城门附近，敌即闭城顽抗。当时我方尚未决心攻城，故高级指挥官未经率领各部指挥官观察城郊一带地形，致翌日四纵队到达南门附近时，未能即时占领有利阵地，以为尔后扒城之预备。对于炮兵、机枪之阵地，亦未预先选定射击区域，射击距离等更无测定。

三、事先无充分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二号训令。

[2] 靖卫团，是一种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当我军到达茅店、冬田一带时，尚未准备扒城器具（如竹梯等），以致临时匆促。

四、上下决心不一致

在战斗间，各部官长以至士兵偶见城中之敌实有一团兵力，遂有一部动摇其攻城之决心，未照攻击命令实施。

五、战场报告不确实

战场之报告实为上级指挥官判断敌情相机处置之资，不宜轻敌妄大，亦不应[1]此次战役，有一时报告欲即再举攻击，而旋又报告不能攻击，反复无常，毫无正确[2]指挥官处置不易。

六、不按时施行总攻

攻城命令原定十六日晨三时三十分施行总攻击，乃第四纵队于四时三十分尚未到达原定之东南两门间之预备阵地，以至施行总攻击时间错过，及南门外发火时瞬已天亮，遂使扒城不能奏效。

七、指挥不适当

一部指挥官陷于急进务胜之感情，而地形之顾虑不周，攻击点之选择不适宜，当不应攻击之地区（如正对城楼之大路）及时间（如不在夜间而在日间）而施行攻击，而应施行攻击之地区及时间反而错过。

以上诸项系略举其大者，至各部在战场上部分之缺点，应由各部自行召集军官会议讨论批评之，并具报本部为要。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

---

[1] 原件在“不应”之后空缺六七个字。

[2] 原件在“正确”之后空缺四五个字。

整顿军风纪的训令[1]

（1930年3月21日）

为令遵事。照得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2]，使红军精神及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荡检闲游，以免一染恶疾，则百般困难，既自戕其身体，复贻误于要公。况值此春初，百病丛发，各官兵人等，正宜多加谨慎调摄，以冀健康，方克肩兹革命之重任，安可自寻疾病，以误工作。为此，除另行令饬特务支队派出巡查外，特此恺切训诫，勿得故违，致于拿办。切切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1930年3月21日17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省南康县唐江镇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三号训令。

[2] 三条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大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这是红军在1928年提出的。

关于官兵考绩的训令[1]

（1930年3月29日）

为令遵事。照得军官、军佐之任免升调的适当与否，直接影响于战事的胜败和工作的利钝，所以要有考绩调查，使上级指挥机关明了各级官佐工作状况，而施以指导、纠正和教育。况且红军在游击时期，其重要任务在打倒阶级敌人，武装工农，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扩大赤色区域。为达到此种任务，所以在战时，要能使官兵一致，奋勇猛进，歼灭敌人，解除其武装而武装工农。在平时，则一面官兵须一致做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一面各级主管官须负责训练本部士兵。因此，在这种重大责任之下，红军官长的本身训练和训练士兵是很重要的工作。查现在我们军中官佐提升调动都只在经过战争牺牲之后，迫不及待地将将就就把一个人补上一个缺，或者在下层去提升，这样都是无计划的用人行政。至于教育方面，我们的红军不是行军作战，就是分兵工作——这自然是我们环境和任务所必需的。但因此却使军部没有方法去有系统地计划各纵队的士兵教育，这样士兵教育只有归各级（纵队、支队）主管官负责计划，而军部仅能给以方针的指示。所以官佐任用得适当不适当，就是说他们在战时指挥能力、平时管理方法、教育训练等等，尤其是游击时的群众工作，是不是适宜的，这都关系于红色战事和群众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五号训令。

作。至于士兵中，自然不少勇敢老成、素有作战经验的工农的革命分子，其能力可以充当官佐的，然而我们从没有考绩调查。对于官佐则无从有计划而适宜地调用，对于士兵也无从提升。教育计划，更付诸阙如。现在为了（1）使官佐之调用适宜，（2）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的提升任用，（3）使全军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决定如下的办法：

一、规定教育系统。以后士兵教育归纵队，军部只能给以教育方针的指示（但各纵队之教育计划及实施状况仍须随时报部核查），军官教育则归军部。

二、实行测验制。以后教育经常采用道尔顿测验制[1]，以促其进度之迅速。测验之办法如下：

测验之机关

（一）兵卒之测验归大队（由支队派员参加）。

（二）军士（班长、副班长）归支队（由纵队派员参加）。

（三）下级干部（中队副以上，大队长以下）归纵队（由军部酌派人员参加）。

（四）中级官佐（支队长、支队副、直属队队长、股长）归军部。

三、调制官兵考绩表（表式另列）。

（一）考绩表分三项

1. 调查。

2. 测验。

---

[1] 道尔顿测验制，是美国人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这种制度废除课堂讲授，强调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

3. 考绩。

（二）兵卒之考绩

1. 调查：姓名，年龄，入伍时间，战役及负伤次数（政治方面政治部规定）。

2. 测验：（1）学科——典、范、令、游击战术。（2）术科——操场、野外动作。

3. 考绩：个性，嗜好，能力（由各排长考查填报）。

（三）军士之考绩

1. 调查（同上）。

2. 测验（同上）。

3. 考绩：个性，嗜好，班之管理方法及战时统率平时助教之能力（由各大队长、大队副、政治委员考绩详定之）。

（四）干部之考绩

1. 调查：姓名，年龄，籍贯，奉任现职日期，未入红军前之经历，入红军后之经历，参加战役及负伤次数，曾受赏罚及有何特长。

2. 测验（政治另由政治部定之）：战术原则，射击学理，阵中要务。

3. 考绩：主张（是否合乎红军政策及遇临时事变有无主张），管理法，训练法，游击工作，指挥能力及果断，个性（对同事之关系情感），命令之执行，在士兵中之信仰。

（五）中级官佐之考绩

1. 调查：同干部。

2. 测验（政治由政治部另定之）：战术学，射击学，地形学，阵中要务。

3. 考绩：同干部。

四、各部处之教育。

（一）军需处：军需处对于各纵队经理人才，应每月出试题，举行道尔顿式之测验，并尽可能地与以工作之指示，并用开会方式教育他们。

（二）军医处：军医处则对于医官、看护士、看护兵、担架兵等，亦须有计划地施以普通医学、药物学与救护教育，并行测验。

（三）副官处：副官处对于各级副官之管理（对于马夫、火夫、公差等），须时常予以指示并开会讨论心得，纵队或支队副官应时常召集马夫、火夫、挑夫、公差等训话。

以上关于教育之方法，各部队务须切实执行，并且用军官会议或部务会议的形式去讨论执行的方法，把这种方法及意旨转达到下级去，这样才能使红军中军事技术进步。军事技术进步自然也更容易达到我们的政治任务。为了革命的工作，希望各部一律执行为要。此令。

附表如下[1]。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

[1] 本文收入本书时，将表略去。

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1]

（1930年3月29日）

为令遵事。照得红军为工农革命之斗争工具，在此反动政局日益崩溃，革命潮流日形高涨之际，自应多征忠实勇敢之工农分子扩大红军，以资扑灭反动势力，获取最后胜利。惟近查各部队对征募新兵一项，只图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更有收募五官不全、驼背、跛足及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等症者，此殊不知五官不全、驼背、跛足者不特有关红军观瞻，实亦不合军人之资格。原因患目疾者不能瞄准射击，耳聋者不能分辨号令，鼻塌者多为梅毒遗传且易受传染病，口吃者不能担负军人之传达任务，至于身患肺痨、花柳病、盲肠炎、痔疮诸症，不但身体孱弱不能随军斗争，抑且有传染他人之危险。本长鉴于上述各项之非是用，特规定征募新兵及新兵入伍时应注意之事项如下：（一）征募新兵之资格：年龄须在十六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身长四尺二寸（裁尺）以上，体格强健，无恶疾及非五官不全者。（二）征募职权及检查手续：各大队皆可随时征募新兵，但必须经军医处或卫生队检查合格后始得补名。如分兵（指一支队分出）游击时，得由支队长、政治委员或支队副亲自检验，确与第一项资格相符合者始行补名。（三）新兵教育：教育以集中为原则，新兵多则在纵队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六号训令。

设新兵大队，少则在支队设新兵排。教育训练至相当时期及有相当程度时，始行补充入连。自训令后务仰转知所属，一体遵行。倘再玩忽乱收不符上述规定者，除否准其补名之伙食外，并处罚其主管长官，决不宽贷。切切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宣传员工作纲要*

（1930 年 4 月 26 日）

第一条　每一宣传员须备一副写标语的用具，用白（或黑）的颜料，根据本部规定各种标语，随时随地写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的墙壁上。

第二条　根据本部规定的标语本子，除每个都要在墙壁上书写外，字数较多的标语得用有色纸写好，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三条　每到一城市，要用红布写上本部规定之主要标语，悬挂于街道中间。

第四条　在宣传队中，要经常指定专人背带所有宣传品及浆糊筒，将宣传品张贴于通衢大道行人易见之处。

第五条　每一宣传员无论在行军、驻军，均须携带宣传品，碰见群众即行有计划的散发。

第六条　在白色区域，群众受反动宣传恐慌逃避时，各宣传员要注意将宣传品适当地配置，让群众回来可以看见。例如将各种宣传品贴于通衢大道之中及学校、工厂、商店、兵房之内。

第七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善于词令的宣传员若干人，担任口头宣传，随时随地打着宣传旗及引动群众之工具，召集群众对之宣传，并在群众中找出比较接受宣传的分子，作个别谈话。如群众很

少时，即和他们作个别谈话。

第八条　在宣传队中，择定性近艺术、善于词令的宣传员，担任化装宣传，在有一天以上休息、群众较多的地方去工作，并设法召集群众大会。

第九条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做成总的统计。

第十条　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

第十一条　在打土豪时，须分派宣传员随保卫科出发作宣传，并帮助保卫科工作（如没收谷物分给贫农等）。

第十二条　在开群众大会时，须负责布置会场，召集群众维持会场秩序。在开会前后，深入群众中去宣传。

第十三条　在作战失利时，或敌军向我进攻因战略关系退却时，各宣传员须多写对敌方士兵宣传的口号及多散发对敌方士兵的宣传品。

第十四条　在作战时，每一宣传员须帮助抬扶负伤官兵，并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扛抬负伤官兵，引送至卫生队上药。

第十五条　在每一战斗结束时，每一宣传员须注意招待敌方官兵与之谈话，作个别的宣传。

第十六条　战事结束以后，应帮助雇请战地附近群众收埋死亡官兵。

第十七条　每个宣传员，于随时随地须注意维持军风纪。

第十八条　每个宣传员，每日工作结束后，须将本日工作情形报告队长，由队长汇报成书面报告交科长察阅。

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

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1]

（1930年4月）

为令遵事。我们红军作战既没有强盛的火力压倒敌人，又没有军用化学可以制胜，全凭着已腾沸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去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奋勇猛进，以我们的勇敢骇倒敌人。然而，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作几场恶战。这样还是不够，我们还没有制弹厂，还没有固定的后方。子弹无多，就应该特别爱惜，射击精确才能杀伤更多的敌人。如果跑步前进而落伍了一大半，就失了团结而强固的冲力；快放齐放，打不到一个敌人，就不能摧毁敌人的战斗力而动摇他们的阵地，对于掩护冲锋更不发生威力。所以没有健强的体力，就有万分的革命精神和志愿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在战场上杀伤得多数敌人，而自己也就多受损失。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习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现在规定各部早操时间废除跑步，或多操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在每星期的操课表中须另有体操时间。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久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单杠架、吊绳、吊棍、秋千、吊环、爬城索……（此等器械都可以带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第八号训令。

的）施行器械体操和设备些障碍物，施行应用体操——就是做超越竞走。这些事情只要有一个星期以上休息的地方，有相当的地点时就可以举行，派兵士去做并没有困难，而且他们必定也很欢喜来干。另一方面，在学术科施行中都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加多射击教育的时间，举行射击比赛。以后军部拟在每一个月至两个月之间，召集一次各纵队及军直属队的体力比赛和射击比赛，由各部挑选选手参加，分别给奖，以资鼓励（比赛办法临时再行拟定颁布）。现在各纵队和军直属队就要开始准备，要知道这是增进红军战斗力的唯一要件。望各部长官负责转达各兵佐一体知照，并督促执行为要。此令。

军　　长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反对本本主义[1]

（1930年5月）

一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

[1]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

[2] 1931年4月2日毛泽东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二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

许多做领导工作的人，遇到困难问题，只是叹气，不能解决。他恼火，请求调动工作，理由是“才力小，干不下”。这是懦夫讲的话。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1]，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一定要出门吗？也不一定，可以召集那些明了情况的人来开个调查会，把你所谓困难问题的“来源”找到手，“现状”弄明白，你的这个困难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

[1] 参见《论语·八佾》。原文是：“子入太庙，每事问。”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三　反对本本主义

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我们说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是正确的，决不单是因为它出于“上级领导机关”，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的，是斗争所需要的。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

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四　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你不相信这个结论吗？事实要强迫你信。你试试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是不是空洞的唯心的呢？这种空洞的唯心的政治估量和工作指导，是不是要产生机会主义错误，或者盲动主义错误呢？一定要弄出错误。这并不是他在行动之前不留心计划，而是他于计划之前不留心了解社会实际情况，这是红军游击队里时常遇见的。那些李逵[1]式的官长，看见弟兄们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乱处置一顿。结果，犯事人不服，闹出许多纠纷，领导者的威信也丧失干净，这不是红军里常见的吗？

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

五　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

---

[1] 李逵是《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但是处事鲁莽。

为什么要作社会经济调查？我们就是这样回答。因此，作为我们社会经济调查的对象的是社会的各阶级，而不是各种片断的社会现象。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1]，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举例来说，我们调查农民成分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2]、半自耕农、佃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调查商人成分，不但要知道粮食业、衣服业、药材业等行业的人数各有多少，尤其要调查小商人、中等商人、大商人各有多少。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的情况，尤其要调查各业内部的阶级情况。我们不仅要调查各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要调查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

---

[1]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工作，把进行社会调查作为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定政策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军第四军的调查工作逐渐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还把进行社会调查规定为工作制度，红军政治部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表，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经济生活情况和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的情况等项目。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再提出切合群众需要的口号。

[2] 这里是指中农。

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

什么是调查时要注意的社会阶级？下面那些就是：

工业无产阶级

手工业工人

雇农

贫农

城市贫民

游民

手工业者

小商人

中农

富农

地主阶级

商业资产阶级

工业资产阶级

这些阶级（有的是阶层）的状况，都是我们调查时要注意的。在我们暂时的工作区域中所没有的，只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其余都是经常碰见的。我们的斗争策略就是对这许多阶级阶层的策略。

我们从前的调查还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就是偏于农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许多同志对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这二者的策略始终

模糊。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1]，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六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发动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政权，完成民权主义革命。由这种斗争的发展，跟着就要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在这样日益走向尖锐的短兵相接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之下，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

---

[1] 这里所说的山头指江西、湖南边界的井冈山地区，平地指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的主力，自井冈山出发，向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进军，开辟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

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1]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红军中显然有一部分同志是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提倡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饱食终日，坐在机关里面打瞌睡，从不肯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对人讲话一向是那几句老生常谈，使人厌听。我们要大声疾呼，唤醒这些同志：

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七　调查的技术

（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

---

[1] 指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1929年初，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曾经把这些决议案汇集印成单行本，发给红军和地方的党组织。

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3）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

看调查人的指挥能力。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人多有人多的好处，就是在做统计时（如征询贫农占农民总数的百分之几），在做结论时（如征询土地分配平均分好还是差别分好），能得到比较正确的回答。自然人多也有人多的坏处，指挥能力欠缺的人会无法使会场得到安静。究竟人多人少，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但是至少需要三人，不然会囿于见闻，不符合真实情况。

（4）要定调查纲目

纲目要事先准备，调查人按照纲目发问，会众口说。不明了的，有疑义的，提起辩论。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

（5）要亲身出马

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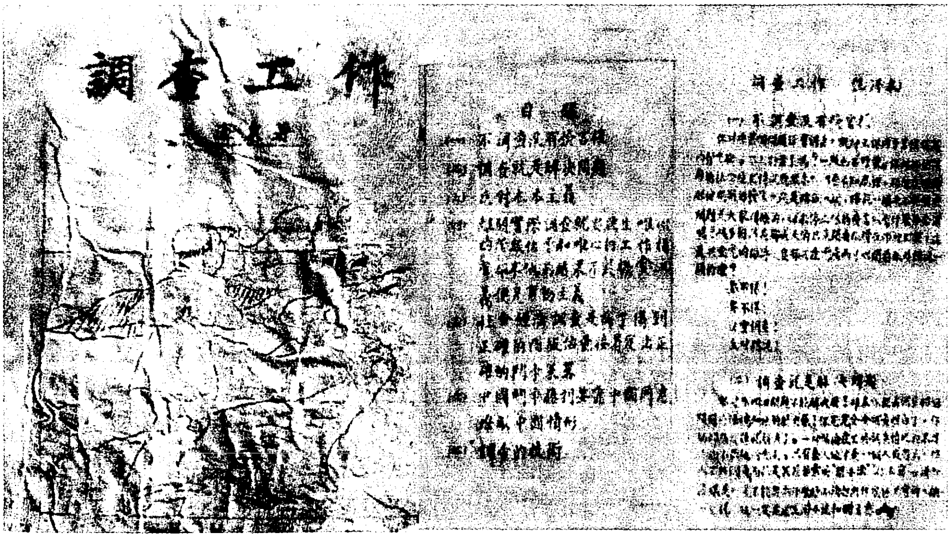
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6）要深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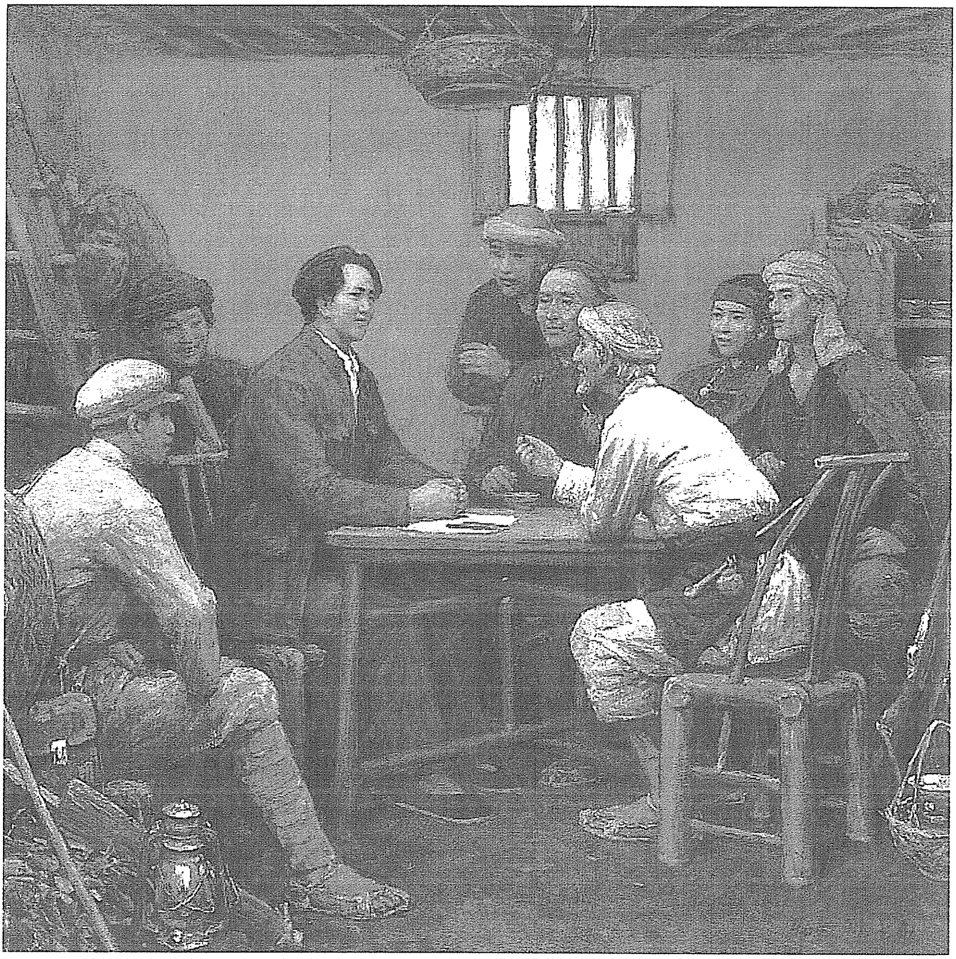
初次从事调查工作的人，要作一两回深入的调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处地方（例如一个农村、一个城市），或者一个问题（例如粮食问题、货币问题）的底里。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者一个问题了，往后调查别处地方、别个问题，便容易找到门路了。

（7）要自己做记录

调查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做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



1930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一文。图为《调查工作》的封面、目录和内容（部分）。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油画）

寻乌调查

（1930年5月）

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1]。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2]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寻乌调查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正是陂头会议[3]（二月

---

[1] 宁冈调查，是毛泽东在1927年11月做的。永新调查，是毛泽东在1928年春做的。

[2] 蒋，指蒋介石。桂，指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1929年初，蒋介石派遣其驻江西的第一集团军，李宗仁、白崇禧派遣其驻湖南的第四集团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

[3] 陂头会议，又称二七会议，指1930年二月上旬，毛泽东在江西省吉安县陂头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扩大工农武装；在土地问题上，否定了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主张，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

七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1]（六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中学生，破产小地主，曾任小学教师、县革命委员会及县苏维埃主席，篁乡区人）。在材料上与我以大量供给的，是郭友梅（五十九岁，杂货店主，曾任县商会长，本城人）、范大明（五十一岁，贫农，县苏[2]职员，城区人）、赵镜清（三十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陈炯明[3]部下当过兵做到排长，现任县苏委员，双桥区人）、刘亮凡（二十七岁，县署钱粮兼征柜办事员，现任城郊乡苏维埃主席，城区人）四人，他们都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此外李大顺（二十八岁，贫农，曾任区苏委员）、刘茂哉（五十岁，老童生，开过赌场，做过小生意，原是小地主，降为贫民，曾任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现任区苏委员）两人，也供给了一部分材料，间或到我们的调查会。还有刘星五（四十六岁，农民，做过小

---

[1] 汀州会议，又称南阳会议，指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会址先在福建长汀的南阳（现属上杭县），后移至汀州城。会议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会议除肯定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又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

[2] 县苏，县苏维埃政府的简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通称苏维埃政府。本书中的“区苏”“乡苏”“市苏”，分别为区、乡、市镇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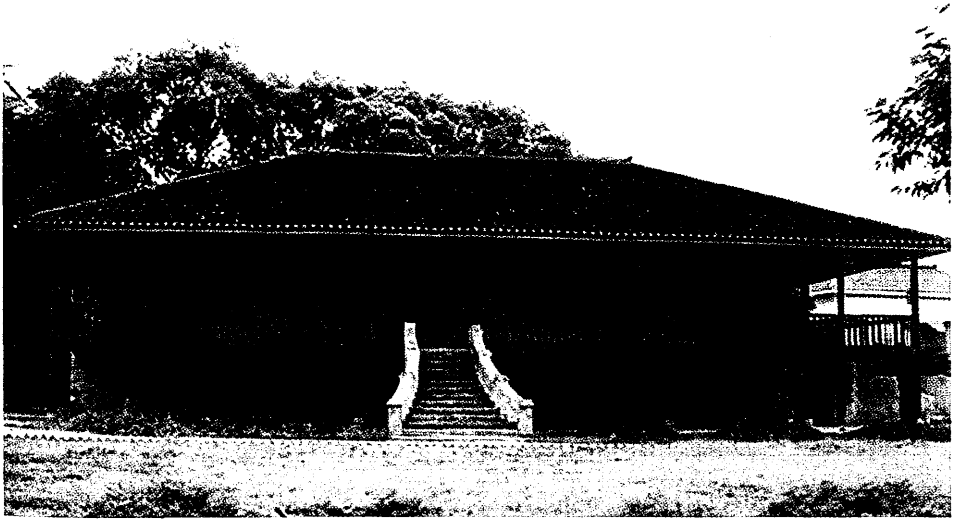
[3] 陈炯明，（1878—1933），广东海丰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推为广东副都督，后任都督。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勾结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背叛孙中山。1925年所部被广东革命军消灭。

生意，乡苏委员，城区人）、钟步赢（二十三岁，梅县师范生，区政府主席，石排下人）、陈倬云（三十九岁，自治研究所毕业，做过缝工，做过小生意，当过小学教师）、郭清如（六十二岁，秀才，赴过乡试，做过小学教师，城区人）四人，到过一二次调查会，稍微供给了一点材料。我们的调查会，就是我和以上十一个人开的，我做主席和记录。我们的会开了十多天，因为红军部队分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的工作，故有时间给我们开调查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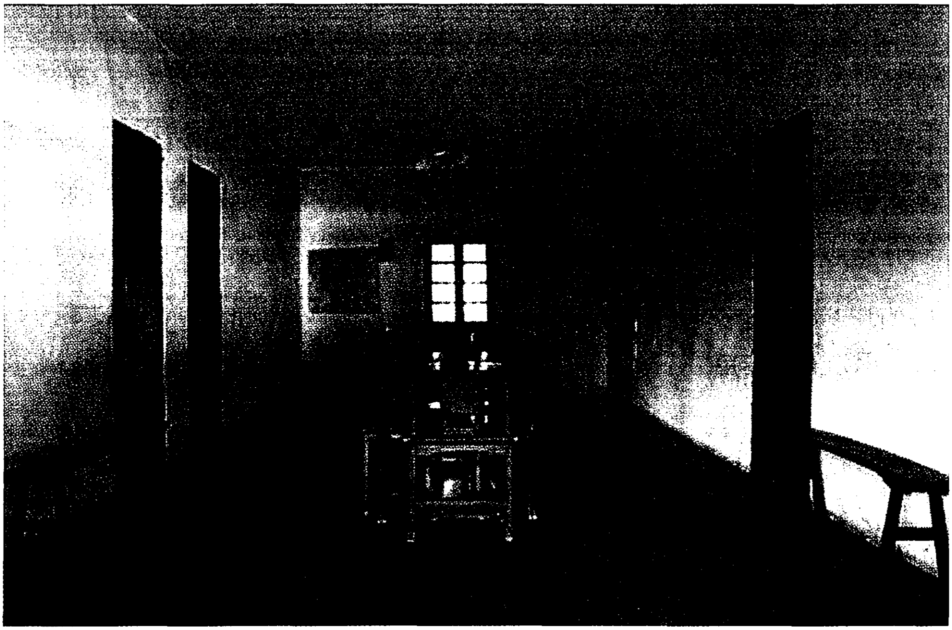
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

这个调查有个大缺点，就是没有分析中农、雇农与流氓。还有在“旧有土地分配”上面，没有把富农、中农、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于宁都小布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城马蹄岗进行了寻乌调查。图为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开调查会的旧址。



毛泽东作“寻乌调查”时在寻乌县城马蹄岗开调查会的会场。

第一章　寻乌的政治区划

全县分为七区，七区之中包括四厢十二堡。

七区是：

城区：分东西南北四厢，为全县政治中心。

仁丰区[1]：即篁乡堡。公平圩、菖蒲圩（即篁乡圩）为本区两个政治中心，各设一个局。

双桥区：即双桥堡。内分十三段，以留车为政治中心。

南八区：分南桥、八富两堡，以牛斗光为政治中心。

兼三区：分项山、腰古、滋溪三堡，以吉潭为政治中心。

---

[1] 仁丰区，在1930年5月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曾改称篁乡区。

澄江区：分寻乌、大墩、桂岭三堡，以澄江圩为政治中心。

三水区：分三标、水源两堡，以三标圩为政治中心。

明万历前寻乌还未设县，万历以后才设县。没有设县的时候，一部分属江西的安远县管辖，设置石溪堡，其地域是现在的澄江、三水、仁丰、县城等区；一部分属广东平远县管辖，其地域是现在的双桥、南八、兼三等区。

第二章　寻乌的交通

一　水路

寻乌水从桂岭山盘古隘一带山地发源，经澄江、吉潭、石排下、车头、留车，流入龙川，下惠州，故寻乌水乃是东江的上游。船可通到澄江。沿河以澄江、吉潭、留车三个圩场为最大，吉潭在三个圩中更首屈一指。

另由石排下可以通船到城区之河岭（城南十里）。

二　陆路

以石排下为中心，分为四条大路：一条经过吉潭（三十里）、澄江（六十里）、盘古隘，通筠门岭（一百一十里），为兴国、于都、会昌通广东的大路。一条经过县城（三十里）、三标（六十里）、太阳关，通安远城（一百四十里），为信丰、安远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珠村、牛斗光（二十里）到平远之八尺（四十五里），为会昌、安远两方通梅县的大路，即会昌、安远两条路均到石排下集中，共同通梅县的大路。一条经过车头（二十里）、留车（三十五里）、荒塘肚（六十里）到兴宁之罗浮（九十五里）、罗冈（一百二十五里），往兴宁、五华，为寻乌下惠州的大路。

另有几条小些的路：一条从澄江通安远挖补界之罗塘（三十里），再由罗塘南往下坝，北往门岭。一条从吉潭经小田、船肚、书园往平远（六十里）。一条从县城经大炉下、滋溪、剑溪、礼崒、赖地往武平（一百八十里）。一条从县城经上坪通安远南乡之胡山（六十里），再由胡山北往安远城（六十里），西往太平（三十六里）、鹅公圩（六十里）。一条由县城到新圩（六十里），再由新圩经公平圩（三里）、两广亭（四十五里），往定南之鹅公圩（八十里），再南经鹅公圩，西往定南城，西经鹤子圩往信丰。由新圩经菖蒲（二十里）、隘排口往龙川城（二百四十里）。由菖蒲、隘排口通兴宁城（一百八十里）。以上各路比较小一点。

从寻乌城出发，往门岭九十里，往武平一百八十里，往梅县二百四十里，往兴宁二百四十里，往安远一百一十里，往龙川三百一十里，往定南（经上坪、胡山、太平、鹅公圩）一百六十里。

三　电报

过去电报局设在吉潭，民国十一年移到县城。电线由吉潭通寻乌城，通筠门岭，通平远。

四　邮政

县城是三等邮局。一路走吉潭、澄江通门岭。一路走牛斗光通八尺，再由八尺通梅县；另由八尺分一路通平远。一路走三标通安远。澄江、吉潭、牛斗光三处有“代办所”，三标、石排下二处有“代收所”。旧历二、五、八走门岭，一、三、五、七、九走八尺，二、四、六、八、十走安远。赣州的信走安远，送于都、兴国的信走门岭。县城邮局通常可以汇款二百元以内，五百元以内须先期交

涉，否则不能。前年三二五暴动[1]，抓了邮政局长，罚过五百元。此次新局长怕抓，先期跑了。三二五暴动还杀了一个电报局长。

五　陆路交通器具

和广东一样，不论什么道路一概没有车子。陆路运输工具大多数是活人的肩胛，其次是骡马。县城通梅县大路上骡马很多，县城通门岭、县城通吉潭两条路也有，此外没有。运输的骡马是骡多马少，但普通一概叫做“马子”。用马子驮的货物以盐豆两门为大宗。

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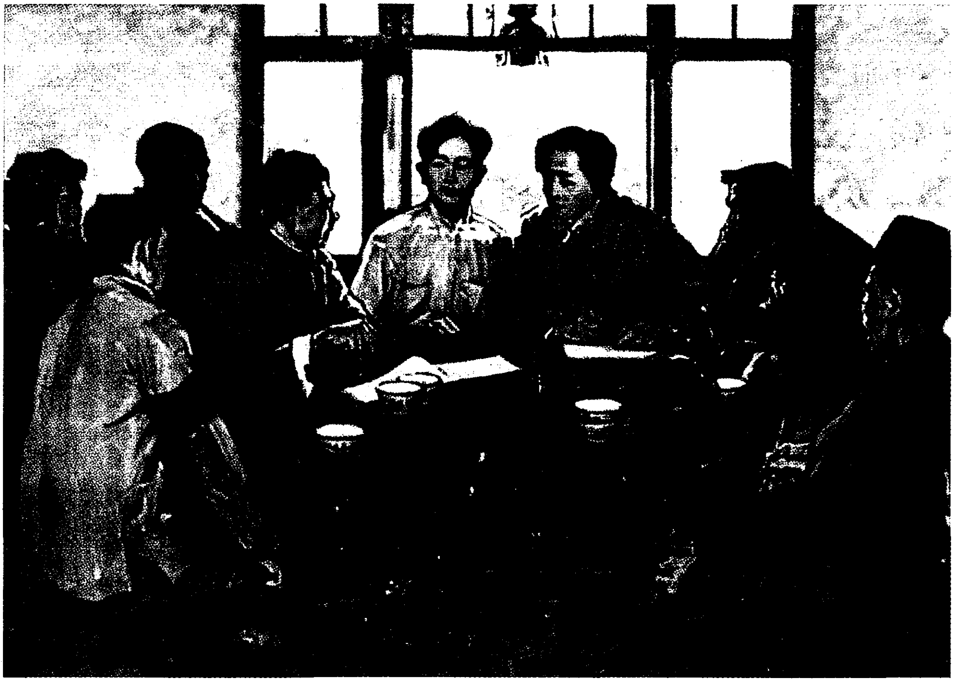
本章目录

一　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二　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三　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四　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五　惠州来货
六　寻乌的出口货
七　寻乌的重要市场
八　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2）盐
（3）杂货

---

[1] 三二五暴动，指1928年3月25日寻乌党组织领导农民和青年学生举行的全县性革命暴动。

（4）油
（5）豆
（6）屠坊
（7）酒
（8）水货
（9）药材
（10）黄烟
（11）裁缝
（12）伞
（13）木器
（14）火店
（15）豆腐
（16）理发
（17）打铁
（18）爆竹
（19）打首饰
（20）打洋铁
（21）修钟表
（22）圩场生意
（23）娼妓
（24）同善社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调查》（油画）

一　门岭到梅县的生意

从石城、瑞金来的，米和豆子为大宗，值几十万元。从兴国来的，茶油[1]为大宗，米也有（少）。于都、会昌没有什么货来。

澄江圩每圩从门岭来的油约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担约值小洋三十元，每年以百圩计算，约值十五万元。

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分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

---

[1] 茶油，也称木油，指用油茶树的果仁榨的油，可供食用。

过。米走寻乌通过往梅县的，很少。由寻乌通过的是油豆两大宗。豆子担数比油多一倍，每担有五斗的，有三斗的，不等。价值每斗小洋一元五毛。每圩（三天一圩）用船载的有五船，每船十四担，每担（以四斗计）值六元，每圩共值四百二十元，每年一百圩共值四万二千元。另还有肩挑，每圩有二十担，每年有二千八百担，共值一万六千八百元。两项共值五万八千八百元。

二　安远到梅县的生意

鸡

这一条路上的生意，大宗是鸡，次是牛，又次是猪。鸡的大部分是唐江、南康、信丰来的，安远也有一点，甚至有从遂川来的。走王母渡、金鸡圩、新田、版石，不入安远城，由安远城北五里地方通过，入寻乌下梅县。由梅县的鸡行装往松口，向汕头输出。鸡每天走寻乌通过的，安远来的是大宗，也还有小部分走门岭来。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每担六十斤，以每天百担计，六千斤。鸡贩子由唐江一带一直挑到梅县城或新铺圩（由寻乌走大柘去新铺下船，直往松口，不经梅县）发卖，每斤价五毛（寻乌鸡价每斤四毛）。每天六千斤，共值三千元。每年三百六十天，共值一百零八万元。梅县鸡行卖与松口，每斤价七毛以上，可谓大赚其钱。

牛

每月逢一是“牛岗”。十一月最旺，每岗七八百头牛。正、二月次之，每岗一二百头。三、四、五、六、七月最淡，每岗少的三五头，多的也不过十余头。八月初一这天为牛市“开岗”的日子，从这日起生意逐渐旺盛，每岗从四五十头到六七十头。九、十两月每

岗就有百把头了。

每年共有多少牛呢?

正、二月每月平均一百头，共二百头;

三月六十头;

四、五、六、七月没有市;

八月三岗，二百五十头;

九月同八月;

十月三百头;

十一月三岗，二千一百头;

十二月只有二岗，一百六十头;

全年三千三百二十头。

牛价平均每头值四十元，全年共值一十三万二千八百元。

牛也是如鸡一样，从唐江、信丰来的为大宗，安远也有一点点，寻乌本县没有。和鸡不同的是，鸡于寻乌只是经过，牛则在寻乌出卖。牛市在县城东门外河墈上，卖主是唐江、信丰、安远人，买主是梅县、武平、蕉岭、平远人，经纪（牙人）是寻乌人。不是经松口向汕头输出，大概是牛贩子们买了去转卖给人家耕田，或转卖给城市宰杀。牙人钱每只牛买卖双方各出半毛。牛税有承商包办，每年缴政府一千七百四十元。牛税从前每年“标”（即投标）一次，出钱多的得标，近改为三年一标。税到牛身上，黄牛每头四毛，水牛每头五毛，名之曰“饷”。抽过了税，在那只牛身上拍上个“饷”字的石灰印，买主就起牛跑。饷以外，还有捐，是近来附加的，每牛一毛。承商向政府出的税，连同他自己的赚项，年在二千元以上。以平均每牛抽税四毛半计，每年在寻乌城出卖的牛，当在四千五百头以上。上面说每年三千三百二十头，乃是最少量的估计。

猪

信丰来的最多，安远次之。走两条路来，一条从安远城，经寻乌城，走牛斗光、八尺去梅县，这一路最多；一条由安远南乡，走公平、新圩、留车、平远之中坑圩，往梅县，这一路较少。两条路全年有五千只猪通过。平均每只一百斤，每斤价四毛半（每只四十五元），五千只猪共值二十二万五千元。寻乌政府每只抽税二毛。

三　梅县到门岭的生意

大宗是洋货（牙粉、牙刷、电筒、胶底鞋、肥皂、洋伞、马灯、洋铁均大宗。其中如牙粉、牙刷等，本属中国制的多，但普通也叫洋货），海味（海带、海参、鱼肚、鱿鱼、淡菜、咸鱼等为大宗），盐（十年前惠盐多，三四年前潮盐多，这是因为商人包办路线不同的缘故。现在又是惠盐多，则因八尺、中坑等处反动派对红色区域封锁，阻塞了潮盐的路的缘故。盐到门岭后，一直通往兴国），洋油（亚细亚牌的多），布匹（梅县去的少，兴宁去的多，均买了洋纱自己造的。兴宁织造很发达。兴宁一般生意也比梅县大）洋纱（外国货）这五类。糖与面粉亦有好些。

梅县与门岭不通车，货大部分是肩挑，盐通通用马子驮，只有用船载至澄江起岸。面粉之一部也用马子驮。

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

四　梅县到安远、信丰的生意

货物种类与往门岭的同，但数量少于门岭，大概比例是门岭六

成，安、信四成，因门岭货物销到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广大地方，安远、信丰地域较狭之故。

五　惠州来货

只有盐一门是大宗。咸鱼、黄糖二样略有一点来寻乌卖。此外没有。

六　寻乌的出口货

上面说的都是进口货或通过货，这里要说寻乌县对外出口货。

第一是米。梅县一带很缺乏米，价比寻乌贵一倍，寻乌每年要供给它很多。澄江、三标、吉潭（项山的）、城区四个区域的米，从牛斗光经八尺、大柘，向梅县输出；龙图、腴田、留车、芳田、篁乡上半区一带的米，走中坑向梅县输出；大同、篁乡下半区、大田、蓝田、斗晏及龙川来的一部分，走岑峰经石正向梅县输出。三条路输出数量大略相等，每天共计输出米一百担，全年三万六千担，平均每担价八元，共二十八万八千元。

第二是茶。出于城区西厢之上、下坪，南厢之图合、冈上、鹅子湖一带。三、四、五、七、八月为采茶期。每圩约输出二十担（每担七十斤），每年百圩输出二千担，共一十四万斤，每斤价五毛，共值七万元。十分之八以上向兴宁输出，十分之二以下向梅县输出。采茶时兴宁客子到乡下，收买生叶自己制造。生叶中，“雨前茶”（谷雨以前的，又叫“头春茶”），一块钱八斤，每五斤生叶可以制出一斤茶。这种雨前茶价颇贵，要一块钱一斤。“二春”（三四

月的）和“秋子”（七八月的），每块钱能买生茶叶十五斤，制造出来每斤卖五毛。做茶生意的靠着二春和秋子赚钱，头春茶是赚不到什么钱的。十二月还能产出些茶，名叫“雪子”，和雨前茶一样的贵，同属上等人家吃的。出不多，客子们于它也赚不到什么钱。城区之外，双桥区之雁洋坪也出茶，虽很少（每年只值百多元），但很好，因为不是岭头种的，而是菜园子里种的。

第三是纸。出于篁乡，向兴宁（走罗浮、罗冈）、梅县（走中坑，也有走岑峰的）、龙川（走贝岭）三地输出。平均每圩六十担，全年一百圩，六千担，每担价八元，共四万八千元。

第四是木。产地是城区的西厢（上、下坪）、南厢（鹅子湖），南八区的河角圩一带，篁乡区的香山、高头一带，三水区的肖木坑、寨塘坑，兼三区的罗福嶂。除罗福嶂的向潮汕输出外，其余均向东江输出。但罗福嶂木头输出潮汕价钱很贵，输出东江的则价钱很贱，每年约值万余元。二十年前出产较大。

木头出口是龙川客子出本钱，本地木商作辅助。都上山去看完了，把山价（那山里许多木头中，讲定可以“倒”的那些木头的价钱）交与山主，由客子自己雇工倒下来，本地商人则为之照顾，使木头不被别人偷去。四五月是倒树最多的季节，六月以后，倒的渐少，九月以后便不再倒了。木一倒下就剥皮。剥了皮之后至少有两个月摆在地上，使它干起来。两个月后如果市价好，出卖有利，就扎排子下河，往往有搭架搭到三四年的。本地商人对于树贩（外地客子）是处在一种工人的地位，他们称树贩叫“老板”，而树贩称他们叫“排头”，利益的分配是老板九成，排头一成。

第五是香菇。主要产地是三标和安远交界之大湖崃、小湖崃、寨塘坑、上下坝，城区和安远交界之上、下坪一带山地，其次是双

桥区与平远交界之叶子崒。香菇每斤二元，每年约出一万元。安远出香菇比寻乌多，销往南雄，寻乌的销往兴宁。没有客子来收，是寻乌人贩了去卖。

第六是茶油。出在双桥的大同、斗晏、荒塘肚、蓝田、大田一带。年约一万五千斤，每百斤二十五元，共计三千七百五十元。从罗浮、岑峰两条路对兴宁、梅县两地输出。

总计寻乌六种出产（单说出口部分）价值如下：

1.米	二八八，〇〇〇元	四二九，七五〇元
2.茶	七〇，〇〇〇	
3.纸	四八，〇〇〇	
4.木	一〇，〇〇〇	
5.香菇	一〇，〇〇〇	
6.茶油	三，七五〇	

七　寻乌的重要市场

吉潭第一，盐、米、油、豆是大宗。牛斗光第二，盐、米略小于吉潭，油、豆与吉潭等。留车第三，布匹是最大宗，由兴宁进口；油、豆次之。县城第四，牛行要算第一门生意；第二是油、盐、米行；第三算是布匹（从前赣州有布子来，民国十七年起没有了，因为它是土纱织的，“一股大，一股细”，被兴宁、梅县的洋纱布抢了生意去。兴宁、梅县的布很好，“一掌平”）。鸡生意虽大，但它只通过不归“行”，故不算。澄江第五，油、豆、盐在这里过驳，是大宗；米次之；鸦片亦是大宗，从兴宁、于都来。石排下第六，油、盐、米、豆的总口岸，但多属通过，只盐、米有些买卖。

鸡、猪、牛亦是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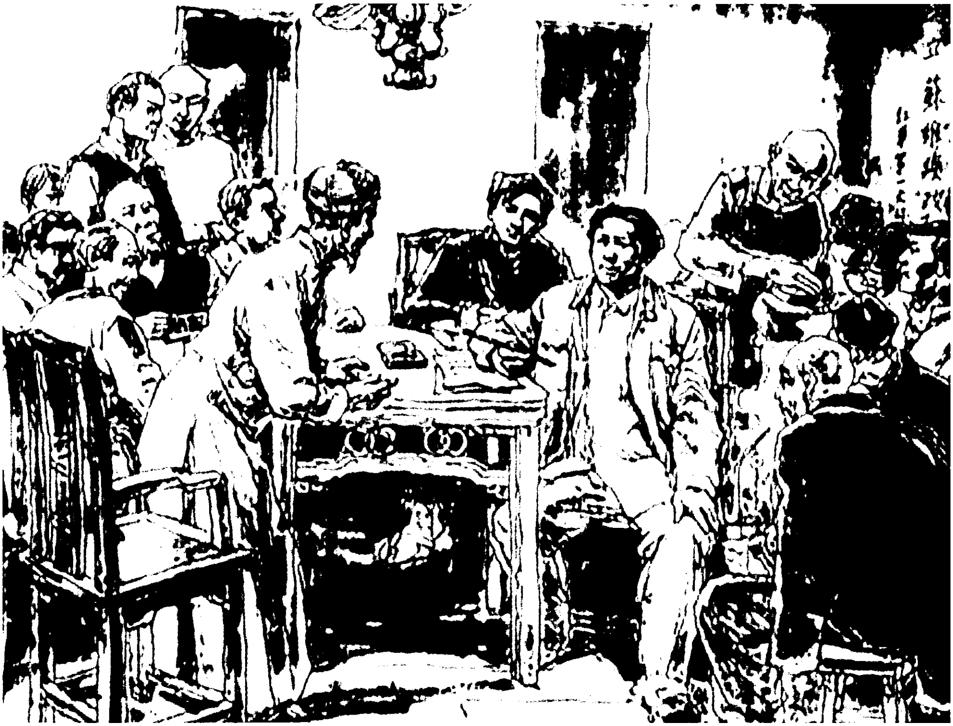
此外，如岑峰（米）、公平（纸）、篁乡、三标等处，都属普通小圩场。

八　寻乌城

（1）寻乌城是什么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非常明显，争取贫民一件事，一般同志不感觉它的重要，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寻乌的许多市场中，由于机会的便利，特为把寻乌城这个市场拿了来观察一番。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县城马蹄岗进行了“寻乌调查”。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

说到寻乌城这个市场，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从前时候寻乌城的生意，比现在寻乌城的要大一倍。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到寻乌城来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的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城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行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

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怎么不值得我们注意呢？还有，寻乌城至今还是一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圩场交易并行着的地方，它约有二千七百人口，一道坚城的内外，表现它那寂寞的情调，除非到一、四、七的圩期，才临时地热闹几小时，这不又是一件很好的资料吗？

下面是从各种货物去剖解这个城的生活情况和组织内容。

（2）盐

本城的一切货物，大都是销向城区的东西南北四厢和三水区的三标、水源两堡这个区域里的，别的地方很少到本城买东西。惟独盐是例外。盐的大部是销往安远、信丰，小部才销在城区、三标。又因为它是日用品，所以它是城里生意的第一大宗。城内有五家盐店，每家每年多的做得两万元生意，少的也做得六七千元生意，五家共合一年可做十万元生意。

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每元（小洋）买十斤到十一斤。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惠盐色白，但质差味淡，因之价也较贱，每元能买十六七斤。要是贪便宜的人才吃惠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

开潮盐行的，本地籍二家（汇通、新发昌），平远籍一家（韩祥盛），万安籍一家（周裕昌），泰和与本地合开一家（万丰兴）。汇通有本三千元，算最大。周裕昌先前有本二千元，去年因做纸生意被匪劫失本九百多元，现只存千元左右了。以上两家都开了二十多年了。第三家要算韩祥盛，本约七百元，开了十几年。第四家万丰兴，两百块钱进店，开了四年，现有本四五百元了。第五是新发

昌，开了十多年，拉拉扯扯不上一百元本。

汇通店主钟周瑞是个地主（开盐行的只有他是地主）。店子开在东门城内，家住在南门城外。有二百二十石谷田，每年收获两季，每季出谷二百二十担，一季完全交租，一季农民得着。他家里有个老婆，三个奶子（儿子），三个新妇（媳妇），一个等郎嫂（买来的，五岁了，因为她现在并没有郎，还要等着她老板娘把郎生下来，故叫等郎嫂，别处叫做童养媳），连他自己，共九个人吃饭。没有雇店员。他自己指挥他的奶子、新妇做事。这是城里第一个“资本家”。

韩祥盛，平远八尺人，自己两公婆，一个奶子，三个人吃饭。没有请店工。每年能赚些钱。

新发昌，主人叫邝明奎，车头人，是个前清的文秀才。他开了十多年店，几十块钱做生意，两公婆又一儿子吃饭。因他办事公平，做了两次商会长，前清一届做两年，去年到现在又是他，六十几岁的白头老人家。

（3）杂货

大的上十家，连同小的共十六七家杂货店。志成（兴宁人）、纶泰兴（吉安人）、义泰兴（吉安人一、本地人一合股）、义成、潘月利、王润祥、潘登记、祥兴、永源金（以上六家均兴宁人）、均益（挑担子出身，本地人）、骆晋丰（本地人，杂货商人中只有他是个地主，收租三百担）、范顺昌（福建人）、黄裕丰（福建人）这十三家，就是大一点的杂货店。其中黄裕丰以黄烟、纸张为主要生意。其他都是以布匹为主要生意。次于布匹就是洋货生意。这个小小市场竟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

牙粉　牙刷　胶底鞋

皮鞋　套鞋　运动鞋

拖鞋　铅笔　钢笔（自来水笔）

粉笔　天然墨　毛笔

墨盘（砚池）　墨湖（墨盒）　笔套

笔架　浆糊　练习本

印色　原纸　油墨

教科书（没有单独的书店，附在杂货店卖）

字画　小手巾　肥皂

香碱　花露水　花露精

毛面巾　洋袜子　洋瓷面盆

洋瓷碗　洋瓷水角（把碗）　生发油

生发膏　手袜子（手套）　胭脂

围巾　大小梳子　水粉

雪花膏　电筒　电土（电油[1]）

洋火　香烟（有金字、中国、三炮台、哈德门、扇美各种，以金字、中国两种销得较多）

麻姑烟　烟嘴　洋遮（洋伞）

草帽　礼帽　洋瓷茶杯

文明帽　洋毡　棉毯

球被（毛毯子）　绒线帽（小儿用）　夜帽

木棉枕　皮枕　中山扣

白骨扣　乌骨扣　海螺扣

阴阳扣　宽紧带　吊带

---

[1] 当地称电池为电油。

丝裤带　洋裤带　爽身粉

汗衫　扇子（乌纸扇、白纸扇）

钟　表　叫人钟

信纸　信封　日记册

镜子　眼镜　洋刀子

儿童玩具（小洋枪、火车、不倒翁、人公子、小皮球、哨子，此外还有很多）

德国响刀　安全刀　挥剪　毛剪（以上四种均剃头用）　皮夹子（皮箱子）　藤夹子（藤箱子）　洋靛（蓝的）　染布用颜料（洋红、乌粉、灰粉、品洋）

铜锁　铜番锁　铁锁

铁番锁　铜帐勾　骨帐勾

洋油　马灯　不灯（即草灯）

宝盖灯　洋瓷桌灯　莲花宝盖灯

三练洋灯　四方带灯　六角带灯

圆火带　扁火带（以上两种均点灯用）

骨筷　漆筷　算盘

水烟筒　杆子烟筒　洋钉

铜煲（烧茶用）　轻铁锅子　轻铁盘子

轻铁调羹　明瓦　各种瓷器

骨牌　麻雀牌　枣子

泡圆　各种罐头（牛肉、杂菜、鸭肉、冬笋、批把、沙梨、荔枝、龙眼、菠萝、牛奶）

对联　洋蜡烛　白洋蜡

葡萄干　洋线　铅线

铁线　墨水

以上一百三十一种，商人都叫作“洋货”，在杂货店里出卖。其中打横画的二十三种是销数较多的，没有打横画的各种销数都少。一百三十一种中有一百十八种是从梅县及兴宁来的，梅县来的占最大多数，只有洋袜子、围巾等织造品大部分是从兴宁来的。明瓦、对联二种完全从赣州来。皮枕、信纸、信封、铜煲、洋油、扇子、水烟筒、毛笔八种，梅县、赣州两处都有来。皮枕、信纸、信封、瓷器、扇子、水烟筒，赣州货不但占多数，而且比较好。信纸、信封，赣州的是本国纸制的，梅县的是用洋纸制的。洋油、纸烟则广东来多，赣州来少。纸烟是梅县、兴宁、赣州三处来。毛笔亦赣州来多，梅县的只有很少一点。

为杂货店里的次要生意的洋货已如上面所述，下面再说杂货店里的主要生意——布匹。

布匹有土布（青、白、花、灰、红、绿、柳条各种），竹布（蓝、白、灰、乌、红、光、青、印花各种），竹纱（白、灰、乌、蓝、柳条、靛各种），绸缎（各种华丝葛、各种纺绸、薯莨绸、香云纱），呢绒（厚呢、粗呢、镜面呢），夏布（白、蓝、乌、机白、波心各种）。土布是中国人用洋纱制造，从兴宁来。竹布、竹纱都叫洋布，从香港走梅县来。绸缎中华丝葛、纺绸从杭州走赣州、梅县两路来，寻乌女人买来织头帕，这种头帕每个女人都有。全城布匹生意每年约值十万元，销地是城区和三标。

杂货店里除布匹、洋货二个大宗外，还附带出卖黄烟、糕饼和香纸蜡烛，也有搭卖零油零盐的。

城内杂货生意，前清时候每年总计十五万元上下，现今十二万元上下。十二万元的分配是：布匹八万余元（土布七万元，洋布一

万元，呢绒二千元，夏布千余元），洋货二万元（每家多的千一二百元，少的二三百元），此外黄烟一万元上下，糕饼四百元上下（只有两家附带卖糕饼），香纸爆竹五百元上下（附带卖香纸的二家，卖爆竹的十三家）。

还待举出几家杂货店，好更具体地了解他们的情况。

最大的杂货店，店主陈志成，兴宁人，在县城、吉潭、澄江各开一间店。县城这一间本钱三千元，自己只有千把元，余是借来的。三千元每年利息要九百元，除了工钱、伙食等项开销，每年以赚得利息为止。陈本人又嫖又赌。

第二家要算纶泰兴，三个份子合成，本钱二千元。除了开销，每年赚得三四百元。

第三家算义泰兴，三个份子，吊多钱本（即千多元本），每年赚得一二百元。

第四家，罗义成，一人开，千多元本，每年能赚四五百元。很节俭，吃饭就是点子青菜，穿的是土布衣。带两个徒弟，家眷在兴宁没有来。他是兴宁人，早年来寻乌挑糖箩子，在县城及四厢敲糖子卖，一个明钱[1]敲一块小糖（现在敲一块糖子起码要一块铜片[2]了），或者拿糖子换各种荒货（头发、烂铜、烂铁、猪牛骨头、烂棉被）。他就是这样子起家的。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

郭怡和是本钱最小的杂货店，百多块钱本，卖些黄烟、纸媚、蛋、自来火、带子、红索子（红绳子）、丝线、综条（镶鞋口用）、笔墨、毛巾、洋纱巾、骨扣等等东西。店主郭友梅（他是参加我们

---

[1] 明钱，即铜钱。

[2] 铜片和本文中的“铜板”“铜壳子”，都指铜元。

这个调查会的）和他一个老婆，每年穿衣吃饭缴费百多元，生意赚项仅敷了它。他是万安人，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虽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现在是往留车、八尺、牛斗光、车头等处去买货，那时候那些地方的商店却都要到寻乌城中他的店里来买货。因为那时货物来源主要是赣州（布匹、绸缎、纸张、笔墨、草帽、苏席），吉安亦有来往（紫花布与丝线）。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钱，货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起，“世界不好”。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租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账，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账，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光复派率领农民千多入城，抢了许多别的店子。随即官军克复，又大抢郭怡和，抢去六千九百多元东西）。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郭做过两任商会长——民国十四年到十六年。

这里还要说到杂货店的店员制度，看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杂货店的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

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而且地位也不同了。帮工一年将要过去的时候，能干的，老板继续留他做；不能干的，老板便辞歇他，老板对他说："我的店里不需要这么多人做了，明年你要另找生意。"他斢到了一个新的店家，他的地位越发高了一些，衣服也穿得越发好了一些，薪俸（不叫工钱）也逐年加多起来。他的社会名称再也不是"徒弟"了，而是令人尊敬的"先生"。他在帮做的那一年中，老板给他的薪俸不是取讲定数目的形式，也没有"薪俸"的名目，只是老板要给他做各色冬夏衣服。再则他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做得好，店里长钱，他的薪俸便逐年增加。光绪年间生意好时，先生的薪俸最高有到一百二十元的，但现在因为生意零落，最高薪俸不过八十元了。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自己回到家里去住也是有的；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像郭怡和的老板郭友梅回到万安去住家，把生意交给一位可靠的姓高的先生做，就是一例。靠不住的先生，是不能把生意交给他做的，因为他讲嫖赌、"打斧头""打雷公"（"打斧头""打雷公"，都谓"吃油饼"[1]）。

---

[1] "吃油饼"，这里指明吃暗拿占便宜的行为。

（4）油

油是本城第三门生意，从门岭、安远两方面来，销在城区及篁乡，三标也有点把子（点把子即一点子）。只一家油行，刘福兴，一百大洋领了一张“帖”，就算本钱。代客买卖，经过一担油收行佣两毛子。十一二月是顶大门生意，每个大圩（逢一为大圩）有一百担，两个月六百担；小圩（逢四、七）三几十担，两个月四百担。一月到十月很淡，每圩不过三几担，通共不过三百担。全年约一千三百担，抽行佣约二百六十元。因为他领了帖，由他卖独家，什么人都只能从他那里买油。帖从南昌省政府领来，要县政府用公事去，付足领帖钱，才有帖子发下来。一百块领帖费之外，还要五块钱手续费。一张帖八年有效，过了八年成为废纸，又要领过新帖。要领帖的不止油行，还有盐行、豆行和牛行。

（5）豆

也只一个行，没有店，城隍庙公地上买卖。何子贞是个公安局长，近来做警察队长，寻乌的反动首领。他在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生意也是十一二月顶大门，两个月有八百担。全年约共一千担，一担（一担五斗，一斗十升）豆子抽行佣两升，每担豆价七元五毛（每升一毛半），约计抽去百分之四，每年可抽行佣三百元。何子贞是本城人，住在东门外，小时很苦，平远中学毕业，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回来当小学教师，当了八九年，古柏、潘丽都是他的学生。民国十六年清党前后，古、潘等领导的“合作社派”，和何子贞领导的“新寻派”发生冲突。民国十六年四月打一仗。民国十七年，三二五暴动把何子贞赶跑。四月，何子贞恢复势力，大出头，大罚革命派的款子，后来又做公安局长、警察队长，渐渐发了些财，在近郊买了田地。他在民国十四年以前，即没有与

合作社派冲突以前，是代表商业资本势力的，起始组织“留粤学友会”，开办平民义学，时在民国十年。民国十四年六月，合作社派在县城开大会，革命派势力长起来，何便与封建豪绅妥协，并且取得了对封建派的领导地位，成为寻乌最恶劣的反动首领。这次红军到寻乌，他才率领警察队（靖卫团[1]）逃往项山。

（6）屠坊

只有三个案，摆在街边，没有屠店。三个案是刘奀二、陈老二、刘世渭。刘奀二从前有百把元本，现在了了（了了即没有了）。陈老二、刘世渭也完全没有本钱，因为买猪不必要现钱，猪杀了后收了钱再付猪价，有信用便行。平均每天杀两个猪，每猪一百斤，每年杀猪七万二千斤。拿现时说，买猪进来每斤二毛半，卖肉出去每斤二毛八，每斤赚三分，全年可赚二千一百六十元，是个不恶的生意。但要出很多的屠宰税，从前三家每月出税百元，每年一千二百元。近因生意较淡，只出一千元，每家也要出三百多元。因为三家包缴屠宰税，所以三家人以外什么人也不能杀猪卖，除非自己吃便罢。红军入城后，由三案增加到七八案，销路大增。税又不要，赚了一个就是一个，屠户人人欢喜。肉价，红军未来前每斤三毛二，现在每斤二毛八。

（7）酒

陈贵和、高元利、元利栈、周裕昌、刘双盛、凌文盛、彭同孚这七家是较大的酒店，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是小酒店。周裕昌（吉安人）、高元利（吉安人）、刘双盛（本地人）、陈贵和四家是最大的，本钱都不出百元。凌文盛（本地人）、元利栈（吉安人）、彭

---

[1] 靖卫团，又称靖卫队，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同孚每家不过四五十元。以上七家都是卖糯米做的甜酒，叫做水酒，因为色黄，也叫黄酒。这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一般喜欢喝的，因它味醇，也吃不坏人，又较便宜的原故。分为“双酒”“单酒”（只城里这样称呼，乡下不说“双”“单”而说“好”“淡”），双酒酒娘多。卖酒以壶算不以斤算。双酒十八个铜板一壶，是黄酒中最好的，普通人家请客才吃；但也有自己一日三餐吃的，那些酒鬼们每餐喝一点，他就不吃饭也做得。单酒十个铜板一壶，口渴了，贫民买了当茶吃。双酒生意比单酒大。范广昌、邝洪盛、骆得利三家均本城人，本钱都不过十把块钱，卖的都是白酒。还有周裕昌卖的也有白酒。这种酒用黏米做，味较黄酒烈，出卖不讲壶，零卖两个铜板一杯，趸卖一毛六分一斤。白酒生意比黄酒少，黄酒约九成，白酒约一成。不论黄白，凡属做酒生意，他的目的并不全在酒，拿了酒糟供猪（喂猪），是他更重要的目的。自己的猪吃不完，拿了发卖，两个铜板一小碗。黄酒店最好的时节（三月至八月口渴时节）每店每天能卖五块钱，平常时节（九月至二月）每天能卖两块钱。黄酒店每家每年可做一千零二十元生意，七家共计七千多块钱生意。白酒店热季半年，每天每家收一块钱，凉季半年，每天只得五毛子，每家全年二百七十元，四家共只有一千元上下。

酒税是非出不可的。看生意大小，大酒店每月约四毛，小酒店每月二毛，一毛五的也有。

（8）水货

水货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呀，“山珍海错”就是它们的标语。水货商人的荣枯得失，亦是颇饶兴味的。下面先举出各样的品类，次观察他们的得失。

咸鱼　第一大门。桂花鱼、青鳞子、海乌头、海鲈、剥皮鱼、

石头鱼、金瓜子、黄鱼、金线鱼、圆鲫子、大眼鲢、拿尾子（身大尾小）、鞋底鱼（即“并背罗食使”，只有一侧有眼睛，要两鱼并走才能觅食，故普通指人互相倚靠做事谓之“并背罗食使”，就是拿了这种鱼做比喻的）、角鱼子（头上有两个角），都是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

海带　第二大门。有青带、海带两种。青带亦名赣带，最好，赣州来。海带少于青带，货较次，价钱较贱，梅县来。年销千多斤，两毛子一斤。

糖　也是水货店里出卖，第三大门。分为白糖、黄糖、冰糖、橘饼各种。白糖中有雪粉，看是好看，不甜，梅县来；有粗白，很甜，惠州来；有縻白，中庄货，惠州来。三种都是洋糖，一毛七八一斤。黄糖中有芋头糖，一团一团的，梅县来；有片糖，一片一片的，最好，惠州来；有散沙糖，掺有沙子，最差，惠州来。过去是黄糖便宜白糖贵，现在是黄糖贵白糖便宜。黄糖过去不过一毛六子一斤，现在涨到二毛四五了。过去白糖二毛六七子一斤，现在跌到一毛七八了。黄糖都是土糖，白糖都是洋糖。本城白糖每年销千多斤，黄糖销六七千斤（只冬季有来）。因为黄糖更甜，所以比白糖销得多。冰糖从梅县来，年仅销几十斤，两毛多子一斤，属洋糖。橘饼，梅县来，年销二三十斤，三毛子一斤。

以上各种糖中，以片糖销数为最大门，因为做米果要用它，过年时候不论城、乡、贫、富，家家都要做米果。

豆粉　第四大门。筠门岭来的多，他县来的也有。番薯做的，还是粉，没有成条子，做肉丸等用。年销几千斤，一毛五六子一斤。

猪皮　第五大门。普通席面用碗猪皮做假鱼肚。梅县来。年销千把斤，一毛子三两，每斤五毛半。

闽笋　从梅县、安远两条路来，“闽笋”是个名而已。第六大门。不但酒席用它，普通亦作粗菜吃，特别是割禾莳田时候。寻乌自己本有些笋子，三四月间农民挑了卖到梅县去，七八月后寻乌人要用，又零零碎碎从梅县买了来。年销五六百斤，二毛三四一斤。

鱿鱼　办酒席就要用，普通也要。第七大门。梅县来。年用三五百斤，每斤七八毛。

豆豉　年销三千斤内外，一毛四子一斤。寻乌人也会做，做了熬酱油，没出卖的。差不多家家要吃，放点油到里面蒸一碗吃得几餐，人家省吃省用，往往这样做。

面灰　即面粉，梅县来，洋面粉多。做包子，做饺子，做面条，做糕饼，都要用它。尤其是糕饼用面最多：蛋饼、提糖饼、冇饼（“冇”，当地读胖，意曰里面是空的）、五仁饼、猪油饼都是面做的。两毛子一斤，年用百包上下。

洋蜡　一块一块的白东西。二毛五六一斤，每年销四五百斤。

玉粉　又名西粉，番薯做成的，和豆粉不同就是它已造成了条子。梅县方面来。普通人都吃它。一毛子半斤左右，年销六七百斤。

以上十一门是比较用得多的，以下各门都用得少。

盖市　鱿鱼里的一种，即是最好的鱿鱼，请上客才用它。梅县来。用得不多，每年三两百块钱生意。普通的鱿鱼叫“洋鱿鱼”。

菜莆　就是芜菁，和萝卜相像，腌了的。走信丰来。每年销得三两百斤，端午过了才有卖，八月一过就没有来了。两毛子一斤，比西粉贵一点。

鱼翅　四毛子一两，用得很少，每年只要一二十斤。

海参　每年用三两百斤，比鱼翅生意大得多，每斤二元八九毛。

鱼肚　用三两百斤，价和海参差不多。普通席面用了海参必定

要用鱼肚，便不用假鱼肚的猪皮了。

墨鱼　只用四五十斤，每斤价七八毛，同鱿鱼差不多。

珧柱　销二十斤上下，十二三毛一斤。

贡鱼干　仅销十斤八斤，每斤价二毛。过去可销七八十斤。

大虾　销七八十斤，每斤六毛。大虾并不是很大的虾，它的名字又叫“虾米”，不比“潮虾”有四两一个的。

虾壳　极小的虾子压扁起来好像虾皮一样，叫做虾壳。销得百多斤。过年过节家家要镶豆腐——把豆腐挖一个口，把猪肉、鱼子、香菇连同虾壳，或更加入些蒜子和韭菜，剁成碎酱塞了进去，叫做镶豆腐。虾壳价每斤一毛多。

蜇皮　三毛子一斤，销不大，每年二三十斤。

淡菜　大的叫做“蚝鼓”，又叫“西利”。淡菜年销四五十斤，三毛多子一斤。西利本城没有卖。

天青鯆　一种海鱼，大的有扇子大一个。本城少卖。

以上盖市到天青鯆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

金针菜　即黄花，两毛子一斤，年销四五十斤。

云耳　销四五十斤，十毛子一斤，光绪年间每斤不过五毛子，涨了一个对倍。梅县来。

香菇　销百把斤。冬菇较好，两块零钱一斤。春菇较坏，一块二三毛一斤。本地出产。

冬菜　白菜制成罐头，过去走天津来，近来梅县也可以造了。销得百多罐，每罐四毛。

腐竹　豆腐皮卷成条子，两毛多钱一斤，销四五十斤。兴宁来。

豆腐霉　即腐乳，梅县来。豆腐浆、芋子、面粉三样东西做成，与普通人家用豆腐干做的不同。

胡椒　白胡椒，销十把斤，十二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四毛钱一斤，贵了两倍。乌胡椒，销二三十斤，五六毛子一斤，光绪年间不过两毛多子一斤。都是外国来的。

榄豉　把生橄榄煮熟，去核发霉，即成榄豉，寻乌叫榄角，梅县叫榄豉。每年只销得十多斤，每斤价二毛多。

酱油　本地做的也有，门岭来的也有。小黄豆子蒸熟，晒得半干，摊开使它上霉，再拿了去煮。煮出来的水加进香料和盐，就成酱油；煮后的豆子就成豆鼓，但这种豆豉是不好的。好豆豉是煮好没有滤去酱油的豆子。豆豉和酱油均以三、六、九月生意较大。豆豉每月销得二三百斤，年销三千多斤，每斤价一毛四。酱油每年销三几百斤，每斤价一毛半。

柿花　年销百把块钱，小的三个铜板一个，大的一毛子两个。

红枣黑枣　两样年销百零斤，黑枣四毛子一斤，红枣两毛子一斤。

龙眼　一年只销十把二十斤。有壳的三毛多子一斤。无壳的叫“元肉”，十毛一斤，药店里才有。

荔枝　很少有卖。价和龙眼略同。

杨桃干　销得几十斤，四毛子一斤。

从柿花到杨桃干各种均从梅县来。

瓜仁　就是瓜子，信丰、门岭都有来，三毛零子一斤，销得二三百斤。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水货店的生意。此外，水货店还附带卖洋油和茶油。

水货店中的盛衰兴替，不可不一述其概要：

顺昌老店、顺昌兴记、卢权利、汤尧阶、荣春祥、骆接赐、张

均益七家，是水货生意中大一点的。此外，还有卖水货的小摊子若干家。其中，顺昌老店和张均益是杂货店兼做水货。

顺昌兴记是顺昌老店的分支，水货生意中算最好的，有千把块本钱，每年向梅县缴得动两三百元。店主范祖先，本城人，家中二十多人吃饭，生意赚项仅敷缴用。

卢权利，算第二家水货店，梅县人，资本千多两千元。除水货外，还做桐油、茶叶、香菇、茶油各样，运往兴、梅做“行岗生意”，他做的水货生意不如兴记，这一宗却是兴记所没有的。他也能在梅县缴得些些动，因为他是梅县人，生意颇红，缴千把八百都是没有问题的。他自己两公婆，请了两个先生（年薪各六十元），除缴用外，每年至少赚两三百元，财气好的年头，千把八百也要赚。

汤尧阶，蕉岭人，资本二千元，没有请先生，缴用以外，无钱赚。早几年开油盐行很赚钱，前年起蚀本，改做水货。

荣春祥，本地人，资本七八百元。家里有几十担谷田，七八人吃饭。不请先生。用度呢，生意赚了钱来开支，城外家中的谷子就储蓄起来，算水货店第一家好的。苏维埃成立，把他的田没收了一部分，不待说心里是呕气的。他小时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

顺昌老店主人范兴甫，本城人，三四百元本，家里十多个人，请了个先生（薪水五六十元），水货生意仅能敷口。他的祖父范渊甫是个大地主，三个儿子，全家百四十多人，年收八百担谷。后来败下来，土地分散，范兴甫一家只有三四十担谷子的田了。现在苏维埃分田，他家还能分一点进去。但他的兄弟范老八却能收百多担谷，今年分田大部分要分出去。老八没有做生意。顺昌兴记是他共祖公的兄弟开的，有四五十担谷田，二十多个人吃，苏维埃分田有

点分进去。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七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同样的。其次是因为子弟很多，生长在那些封建经济的家庭里（大地主和初期商业资本的家庭里），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练腔调”（闹阔气），把个家门了了。那时候（民国十年以前），寻乌的城东小学（一些地主凑股子办的，五块钱一股）是个有名的“毕业公司”。全县地主子弟练腔调无出息的，拿了钱去这个公司里坐三年，得张文凭，就大摆其架子，用他们的名片上“城东小学毕业生”几个字，回到家里骗祖宗。什么叫做骗祖宗呢？第一是刚毕业的时候，祠堂里头照例赏给毕业生一些钱，叫做“抢花红”；第二是每年和那些秀才举人有功名的平分学谷；第三是每年祭祖完毕和有功名的分胙肉。范家的少爷们竟有六七十个进了这个毕业公司。他们毕业后，在他们的大小公堂中，除开抢花红得谷子外，单分胙肉一门，每年得一百斤。

骆接赐，本城人，二三百元本，四个人吃饭，没有请先生，蒸烧酒，卖水货，除开销外，能赚一头二百块钱（即一二百元），算是一家好的。他从前好嫖，讨了个老婆不嫖了（用去五百多块钱讨来的），老实勤快，酒糟又可供猪，所以年好一年，家里有十多担谷田。

张均益，做水货又做杂货，一头二百元本，其余是借来的。没有请先生，指挥他的儿子做生意，每年颇有些赚头。他是本地人，

五六年前是个挑夫，帮寻乌城的商人挑了米子或者香菇去梅县，从梅县挑了布子及咸鱼回到寻乌。他自己挑东西，同时又当夫头。这种夫头的职务是能够赚钱的。寻乌商人拿了钱给他去办货，寻乌城的老板和梅县的老板两头都给酒钱与他，因此他就慢慢地发起财来。

摆摊子的水货生意，每家不过几十元本，多的不过一百元，他们的货是从本城大水货店和过往小贩那里买来。这种摆摊子的，往往能因勤苦精干发起财来。本城由摆摊子起家开店的有许多家，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都是。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来。

（9）药材

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

百和堂是第一家，主人池某，潮州人。他本来是篁乡人，姓刘。小时因家穷，父母把他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后来他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广东商人有句俗话：“不怕扯，只怕绝。”那些没有儿子的人，一定要买个儿子传代，就是为了“怕绝”呢。也有为了劳动力需要的理由而买儿子的。普通买了来，聪明能干的把他做儿；蠢笨的呢，就把他做“奴古”[1]。百和堂主人自己是买来的，他因生子不育，又买来一个儿子，随后他自己也生了两个儿子、两个女娃子，连他的老婆共七个人吃饭。又带三个徒弟。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

---

[1] “奴古”，客家话，指男奴仆。

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七家药店中，只百和堂、杨庆仁、王普泰三家有嫩料。

杨庆仁，樟树人，过去有本五六百元，去年被他儿子赌掉几百块，现只二三百元了。

王普泰，也是樟树人，百元左右本钱，和寻乌劣绅何子贞及天主堂陈神父（梅县人）勾结。陈神父借给他四百元，此外还向土娼来凤子借了两百元，除药店外再开了一间洋货店。来凤子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她跟了赖世璜[1]部下一个连长，去年回到寻乌，带来了三百块造孽钱。王普泰想方法巴结来凤子借了这笔钱。钱借到了，王普泰送了许多礼物给来凤子，花露水呀，汗巾呀，等等。

新德生，主人姓杜，也是樟树人，四五百元本。田仁和、黄裕兴、福春堂都是樟树老表，都是一百元本。

每年药材生意，百和堂值三千元，庆仁堂八百元，新德生、田仁和各六百元，王普泰四百元，黄裕兴、福春堂各三百元，共六千元。

王普泰是参加反动组织的，反动派会议他必到场，虽然他表面上没有做什么官。杂货店的陈志成，水货店的宝华祥，火店的同来安，都是以商人干与政治。苏维埃势力进城，四家都被没收。

（10）黄烟

城里有两家制造黄烟的店子。一家叫黄裕丰，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先前有本三千元，兼卖纸张杂货，赚了万多块钱，拿回上杭买了田，现在本城店里还有本钱千多元。另一家叫做涌泉号，也是自己制黄烟，安远人，三五百元本，前年才开张。

---

[1] 赖世璜（1889—1927），江西石城人，曾任粤军第七军第一师师长、赣军第四师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等职。

黄裕丰请了两个工人，一个刨烟，一个打包。涌泉号请了一个工人。工人年薪六十元。吃老板的饭，这一点与杂货药材店的“先生”差不多。不同的是工人平日无肉吃、无酒喝，只初一、十五才打牙祭，先生则平日有吃，因此没有特别的打牙祭。吃饭也有些不同，先生经常地同老板共桌吃，工人则人少时和老板共桌，假如多了几个工人呢，老板便同先生做一桌，工人另外做一桌。这些都表示先生的身份比工人高。工人普通不唤工人，唤做“师父”。

杂货店、水货店的黄烟，多是从这种制黄烟的店子里买去的。

（11）裁缝

共有用机器的十三家，手工三家。刘芹英、黄嫂子、廖接芳、刘森河、刘师父、谢神保、范癞子、谢其龙、何祥古、谢师父、黄老五、黄上先都是用机器的，每家一架“车子”（即缝纫机）。每家的老板都同时是工人。每人带个徒弟，缝下子边，打下子扣绊。这种裁缝店的资本，就是买一架机器的本钱。机器第一等百二十多元，第二等七八十元，第三等三四十元（是别人用旧了的）。民国九年以前，寻乌没有缝纫机，一概手工做。民国九年有个兴宁人何师父，第一次弄来一架机器开店。他原先是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因他“剪刀很利”（寻乌人说裁缝偷布，不说他偷布，而说他剪刀很利），又好嫖，站不住，带着车子回兴宁去了。前年（一九二八）还只四架，去年增至十三架，内有几架是买了别人的旧车子。其中黄老五手艺顶好，生意顶大，勾结官厅及豪绅，包了好衣服做，因此赚钱买了田地。三二五暴动，他即表现反动，这次革命势力进城，他就跟反动派一路跑了。衣服式样，民国九年何师父创用机器，兴“上海装”（破胸、圆角、打边）。民国十二年，上海装不要了，行一种破胸、方角、大边装。去年起行“广州装”（七扣四

袋而身很长），一小部分人喜欢穿这一种，但多数人还是大边装。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青年学生，不待说老早是新装，青年农民、青年工人，大多数也是新装了，除非是很穷无钱做衣服的才仍然是旧装。在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鞋子起了个显著的变化。去年夏季，南半县抗租得了胜利，冬季又分了田，农村中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人，十分之七以上都穿起胶底鞋和运动鞋来（这种鞋的底是从广州运到兴宁，兴宁做成鞋子，每双十毛左右）。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袪子裤。

城里手工缝衣店至今还剩三家。

手工与车子的比较是：手工做一件的时间，车子差不多可以做三件。工价的比较：每套短衣裤手工做七毛，机器做六毛。货色的比较：车子做的好于手工做的。机器哪得不驱逐手工？

全县重要圩场吉潭、澄江、石排下、车头、牛斗光、留车、篁乡（采用机器比任何一处早）、公平、荒塘肚、岑峰等十处，都有缝纫机，因此全县人口中已有百分之三十废除手工、采用机器做衣了，特别寻乌的南半县机器化的速度更发快！

（12）伞

彭万合、李祥仁两家造纸伞。彭万合是武平人，在寻乌城开伞店，开了三代一百多年了。初来寻乌时只有一二百元做本，做伞逐渐赚了钱，到前年（一九二八）三二五暴动前，连田产共有千多两千块钱资本了。店主彭老五子，他的父亲彭盛祥十多年前在寻乌南

门外田背地方买了六十担谷田，起了一栋新屋。他家兄弟老三、老七在田背住家。他自己在城内做伞生意。田背的田租给农民耕种，每年收租十分之五。他家本有七个兄弟，死了四个，还有三个兄弟，六个儿子、侄子，一个母亲，三个妇人，五个媳妇，共十八个人吃饭。儿子在初等学堂读书。他们三兄弟中，他是做伞的，三十岁了。请了两个工人。他的兄弟老七子，二十多岁，曾在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读过二十几天书，就碰着三二五暴动，反动派加上他“暴徒”的罪名，没收他田背的家产，烧掉他田背的房屋。老三、老七都在城东学校毕业，不过老三读的是在“毕业公司”时代的城东学校，老七时城东学校却已经是改造过的，即革命的中山学校派办理的时候了。因此老七于城东学校毕业后，也就进了中山学校，加入“暴徒”队伍里。老三自城东毕业后，就在武平当小学教员，现在老七也跑到武平去了。老五的店子现在只有四五十元资本了。他父亲彭盛祥时代（光绪年间）纸伞还很盛行，那时候社会用的伞有了三成洋伞，还有七成是用纸伞。民国到今，恰好斠了一个方向：洋伞占去七成，纸伞只有三成。不论城乡，不论工农商学，凡属“后生家”和“嫩妇女子”，差不多一概打着洋伞了。洋伞是从梅县和兴宁来，因此彭盛祥时代南半县的留车、牛斗光要到县城彭店来买纸伞，现在却通通往梅县、兴宁买洋伞去了。从前彭万合每年要造出三千把纸伞发卖，现在每年不过只造得千二三百把了。从前（光绪年间）彭店雇工六七人，于今只雇两个人了。伞价从前每把二毛五，于今四毛五。

李祥仁是个南康老表，四十多岁，伞工出身，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四五十元本，每年出伞二千左右，请了两个工，一个削骨子，一个褙纸，他自己上油。

洋伞有羽绸伞、洋布伞两种。羽绸伞通是日本货，中国不能做。洋布伞的洋布和铁骨也是外国来的，中国人把它绷起来，加上一个伞把子。羽绸伞每把价一块大几（谓一块五毛以上），洋布伞每把一块二三。纸伞、洋布伞、羽绸伞的销行比例是：纸伞、洋布伞各百分之三十，羽绸伞百分之四十。

伞业现在没有人学徒弟了。拿寻乌城来说，不但现在，近十年来就没有人喜欢学做伞了。它的原因不外：一、伞业的前途是没有希望的；二、伞店的学徒比杂货店的学徒要辛苦，学做伞十三四岁才去学得，要煮一店人的饭，又要买菜，又要扫地，又要捡拾作坊里一切拉拉杂杂的东西。

（13）木器

从前只有一家，胡东林，赣州人，四五百元做生意，开了二十多年，制造各种木器出售，如台、凳、椅、桌、床铺、脚盆、衣架、水桶、柜子、面盆、尿桶、托盘、招牌、匾额（酬神、祝寿、颂德等用）、对联、书箱、衣箱、壁橱，学校用的黑板及其他用具，送礼用的扛盒和撑格，等等。

木器店算这一家大，他的木器不但销在城区，而且销往各区各县。但他店里的那些木器主要不是供给工农贫民，而是供给地主阶级、中等商人和富农的，因为他的那些东西工农贫民要不了，除非为了嫁女才向他买些小衣箱、小柜子之类。他家很苦，在赣州。二十年前他从赣州来寻乌帮人家做木工，积了点子钱开个小木店，慢慢发展，盛时请过四五个工，赚了千把块钱，付了一半去赣州，剩下四五百元做生意。一九二八年起始没有好多生意了，只留了一个工人，他自己做，儿子帮一点，仅仅敷口。衰败下来的原因，完全在于土地革命。北半县没有革命，也受了革命的影响。地主阶级和

其他有钱人也不做寿了，也不做热闹喜事了，酬神和歌颂功德也停止了，学校也大半关门了，他的生意哪能不衰败下来呢?

他的木器的样式，凡供给封建地主的一概是旧式，但也有一部分是采取进步样范的，那就是学校和教堂的用具。他和福音堂的包牧师有来往。南门外福音堂和教会医院的建筑，木材部分和木器，是由他承包做的。

他的亲戚薛某，去年邀了十个人打了一个“月月标”的会，每人五块钱，共五十元起本，开个小小木货店在城隍庙侧边，不请工，两父子做，一年蚀了本，奄奄无生气了。

工农贫民要用的木器乃是圩场上供给的。每逢一、四、七圩期，便板子呀，提桶呀，水桶呀，脚盆呀，饭甑呀，饭盆呀，饭勺呀，水勺呀，锅盖呀，倾盆呀（覆菜碗、覆锅头的盆子），砧头呀，菜板呀（切菜用，圆的叫砧头，方的叫菜板），洗碗盆呀，禾篮呀（盛了割下来的禾挑往禾坪里去打的），谷斗呀（打禾用），砻盘呀（推子），楼梯呀，等等东西，都由那些住在山肚里“做圆木的”匠人们挑了来卖。并不是每次圩期都有那一切东西，是依了时节和需要而向圩场上供给的。砻盘一种要定做。风车要上杭师父才能造。全县有十来个上杭师父，每年由上杭来一二次。水车一门，本县农民百家中只有一具，因本县陂圳多，很少遇到干旱，用不着水车这种东西。

南门外还有两家棺材店，每家都只有四十元本，造的都是贫民用的“火料子”（又叫“火板子”）。地主、资本家乃至稍微有几个钱的佃农和工人，普通都是自己请木匠做棺材。只有极穷人家，或是“抖紧”时候（急用时候），才会买这种火料子。失了东西或被人损坏了东西的人，常常是这样破口大骂：“爱割爱绝的！爱绝人毛

的！火板子夹的！火料子装的！”（“爱割”的“割”，消灭的意思。）这就是形容火料子这种棺材是不名誉的人才用它的。有钱人家自己请木匠做棺材，这种木匠除本地人外，一部分是上杭人，就是那些造风车的师父们，他们兼着造棺材。

（14）火店

有刘万利、合昌隆、刘鸿兴、温得利、潘发利、潘金利、汤日恒、同来安、曾记涛、九嫂子、大只四嫂子、古流芳、刘奀二（兼卖白酒）、古裕昌等十多家。火店里的客人以挑担子的为最多，占去百分之八十。卖牛的，背包袱子的（背着包袱子向着别地找生活去），四乡到城里来打官司的，往赣州读书的，变把戏的，卖膏药的，算八字的，和尚化缘的，行医的，看风水的，唱叫化歌的（即唱莲花落的），共占百分之二十。那百分之八十的挑担子客人中，大多数是鸡鸭客子，少数是挑烟皮客子（烟皮即烟叶）。

开火店不要多的资本，只须几条旧被窝，几床粗席子，买点米买点柴火，就可开张。店屋租钱要在几个月后才交付。

开火店赚钱，靠赚那些撑伞子的和穿长衫子的。他们来了，把点好东西给他们吃，把点好床铺给他们睡，要走了给他们重重地敲一下子。挑担子的及其他穷人来了，火钱（即歇钱）饭钱都要轻些。吃饭照碗数算，比长衫客子照餐数算，便宜得多，每碗半毛（会吃的一碗又一个零碗就够，不会吃的半碗也够）。吃酒的一壶水酒等于一碗饭价。火钱每夜三个铜壳子（即铜板），因为要点一盏灯火，还要烧水洗身，故要火钱。冷天盖被窝，另拿被窝钱，每人两个铜壳子。火店卖酒饭的利润，每十毛本赚四毛。真的讲起来，开火店的赚钱，还是靠畜猪子，因为火店的糠、饭汤和零饭，是经常有的。

火店的对头是警察和衙门口的差人，因为警察、差人要盘查，常常借了盘查为难客子，弄客子的东西，如像借了查烟土，一转眼把客子的银钱偷去了。若当戒严时候，还要因对答不妥当受那无妄的飞灾。以此客子怕上城里的火店，天还没黑，就在黄坳、河岭、长举、新寨等离城三里到十里的地方歇下来，火店的生意大受影响。

火店中，同来安店是反动的。店主陈登祺，出身却是贫农，家在留车，穷得没饭吃，因为他会两手打，便在留车一带乡下教打。民国七八年他到县城当法警，民国十四年就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他因与官厅勾结，又跟留车劣绅陈吐凤要好，三二五暴动时保护县长谢寅出险，为谢所赏识，政权恢复，被提拔为靖卫队长。他率领队兵到双桥一带掳人勒款，焚烧革命群众房屋。谢县长走了，他回到火店里。这回苏维埃没收了他的房屋。

（15）豆腐

以不满三千人的寻乌城，却有豆腐店三十多家。寻乌城里吃饭十餐有九餐要吃豆腐。吃豆腐原因，一是价廉，二是方便。寻乌的农村中也是很喜欢吃豆腐的，不如寻乌城这样厉害，却也占了食品的一半。

两升半豆子做一桌豆腐，豆子两升半的价钱是五毛，豆腐一桌的价钱是六毛半，赚一毛半。所谓“一桌豆腐”，就是大豆腐干四十六块，零卖每毛子七块，三个铜壳一块。若是小豆腐干，则每桌九十二块，每毛十四块，三个铜壳两块。豆腐有水豆腐、煎豆腐、豆腐干、薄干子四种。水豆腐销最多，次煎豆腐，次豆腐干；薄干子最少，因为只有人家做好事才用它。开豆腐店赚钱，主要还是拿豆腐渣畜猪子。因为每天普通只能销一桌豆腐，特别情况才能销两桌，每天只能赚毛半子到三毛子。畜猪子每年可畜两道“猪妈带

子”，每道可出三四十元。若畜肉猪，每店每年可畜四个，约四百斤，出得一百元。但畜肉猪供米要多，还不如畜猪子划得来。

豆腐生意都是“居家生意”，就是一边磨豆腐，一边又耕田。

磨豆腐不是容易事。常言一句：“快学难精。”又云：“蒸酒磨豆腐，唔敢称师父。”

（16）理发

全城理发店八家。民国元年以前器具都是旧式的，装式则一律是辫子。民国元年起，开始用洋剪（挥剪和毛剪），样式一概和尚头，没有别的。民国二年开始兴“东洋装”，器具还没有大镜子，也没有化学梳和轻铁梳子。民国六七年，兴“平头装”“陆军装”，还是没有大镜子等。民国十年加上赣州来的“博士装”，寻乌学生到赣州读书传来这种新样。民国十二年开始有了宽八九寸、长尺二三的大镜子，又将一尺长四个脚的“单凳子”换了有靠背的藤椅子，并且开始输入了轻铁梳。这些新式器具都是从梅县来的。民国十五六年大革命时，开始输入化学梳。东洋装的名目消灭了，博士装也差不多没有了，但原来在学生和商人中盛行的平头装和陆军装，却在青年工农贫民群众中普遍地盛行起来。“文装”“花旗装”“圆头装”（梅县人讥笑这种装叫“暹罗柚”）这三种，却是新添的花样，盛行于小资产学生群众（这个群众是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反对地主文化的）之中。文装亦名“西装”，花旗装就是美国装，它的来源是从南洋传到梅县，由梅县传到寻乌的。现在县城及别的大市镇中，剃光头的可以说完全没有了。乡村农民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剃光头。在整个人口中，那种剃平头、陆军头等等新样子的，还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一个小部分又全数属于青年群众。

理发价，剃光头、挥光头都一毛，挥各种新装一毛半，修面只

半毛。

开理发店要四五十元本，师父普通请两个，少的一个，至多三个。工价以半年计至少三四十元，普通五六十元，最多八十元。生意好的理发店，每天每人可以做一块钱生意，普通是一个老板两个工人，平均每天能进三元，每年能进千元内外。开销工钱百多元，其余都归老板，再开销伙食（以四个人计每人七十五元）、店租（三十元左右）和器具的消耗（百元以内），可赚四百元内外（老板自己的工钱在内）。这一笔钱的消耗呢？就是老板的嫖和赌。

剃头和裁缝，不论工人、老板，很少有把赚项储蓄起来发财的，原因是这两种人多半聪明伶俐、好嫖好赌、好吃好着。为什么这两种人是这样的呢？大概由于他们社会地位的卑下。前清时候，社会上看剃头工是属于“下九流”的。别的地方，缝工的社会地位也很卑下。缝工虽有老婆，但他们仍是好嫖。剃头工则十个有八个没老婆。这种没老婆的人并不觉得苦楚，他们倒在嫖的上面表现十分快活。

“下九流”是对“上九流”而言。下九流是：一削（削脚趾），二拍（拍背），三吹（吹鼓手），四打（打烟铳），五采茶（男女合唱采茶戏），六唱戏，七差人，八剃头，九娼妓。上九流是：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问卜四堪舆[1]，五流丹青[2]六流匠，七僧八道九琴棋。

（17）打铁

三家打铁店，叶师父、杨师父、李师父。杨师父安远人，叶、李均于都人，每家资本五十元内外。打的是篾刀，柴刀，斧头，锄

---

[1] 堪舆，和本文中的“地理先生”“看地的”，均指看住宅基地和坟地的迷信职业者，通常称为“风水先生”“阴阳先生”。

[2] 丹青，通常借指绘画。这里指画工。

头，铁铔（即耙头），耘田耙，耙（大耙，牛拖的），鲢鲤刨，梭镖（寻乌土话“尥子”，梅县叫“挑笔子”，东江叫“尖串”），刀麻（菜刀），锅铲（炒菜用），铲子（刨锅头用），火钳，火铲，钩环（挑水用），铁勺（舀米舀油用），木匠用各种铁器（各种刨铁、各种凿子、斜铲、铁锤、凳头钳、角罗钻、割刀），铁尺（做衫压布用），绵刀子（裁缝用），马刀，关刀，双刀（卡子刀），小拐子（小把），铁钉，门铬（上门用），铁箍。除马刀、关刀、双刀外，余均家常用具，销向城厢附近。打铁器和打铁方法，一概旧式。

铁是城区南厢的黄沙水，双桥区的铁铔水、石塅坑，南八区的车头、横径、大陂角六处地方所产，每处都有炉，铸铁，又铸锅头、犁头、犁壁（犁锄）。铸出的铁不但销在本县，大部分还是销往惠州、石龙，也有销往门岭的。锅头除销本地外，约有半数销往会昌及赣州，还有一小部销往潮汕。犁头、犁壁销在本县。每个炉子要挑响炭的（响炭即木炭，铸铁、铸锅都用它，挑的约二十人），烧炭的（用木烧响炭，每窑三人，五窑炭供一铁炉，共十五人），运砂的（铁砂从山崩下，农民挑运卖与打炉子的，这种工人不便统计），以及炉厂内的工人（高炉铸生铁十人，炒炉铸熟铁十二人，铸锅头十二人，火夫一人，坐柜和行走三人），共计一炉铸铁需二百人上下。每个炉子单铸铁要资本千元，单铸锅头也是千元，铸铁兼铸锅头则需二千元，大宗开支是砂子和响炭，其次是工人的伙食、工钱。炉厂有独家开的，也有合股开的。工人的工钱，师父（工头）每天十二毛，工人三毛，伙食吃老板的。坐柜每年七十元。师父和工人以日计，做一天算一天，坐柜以年计。还有神福、红包和来往盘缠，都是老板对工人的缴费。师父地位很高，待遇不好他就弄鬼，生意就要蚀本。师父会做的每年可得工资五百元。每间炉厂每

年能生产四千元，六个厂二万四千元。民国以前没有洋铁来或来得少，工价又便宜，寻乌的铸铁生意比现在大，会做的炉厂每年能生产二万元以上。前清时虽只有两间炉厂，却共能生产四万余元。现在炉数加了，每间炉厂的产量却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工钱贵（工钱贵是因外来工业品贵）和洋铁侵入。

铁价现在比三十年前（光绪二十五六年）贵两倍，那时生铁每担（四十斤左右）最贵不过十一毛，现在却是三十二毛了，即需八分钱买一斤生铁。三斤生铁打成一斤熟铁，价五毛。

本城三个打铁店，两个于都人，一个安远人。乡下打行炉的通通是于都人。于都铁工很多，三千七八百座炉子出门，高炉每座四个人打，矮炉三个人打，共有铁工一万三千左右。他们打铁在江西，而且打到福建、广东，打到南洋去的也有。

（18）爆竹

一间爆竹店，钟老板，会昌人，几十块钱本，开了六七年。自己及请的一个师父共两个人做，每年做得四五百元生意。老习惯大年初一那天大放其爆竹，寻乌的小小商店每家也要放两块钱。今年初一反动政府宣布戒严，不准放爆竹，不但年初一，平日也不准放，爆竹生意因此大减。南半县农民暴动区域彻底破除迷信，也不要爆竹了。因此不但本城钟老板的爆竹生意减少了，从前梅县和门岭两方输入寻乌的爆竹，近来也停止了。

（19）打首饰

寻乌的妇女们也和别的封建经济没有彻底破坏的地方一样，不论工农商贾，不论贫富，一律戴起头上和手上的装饰品，除大地主妇女有金首饰外，一概是银子的。每个女人都有插头发银簪子和银耳环子，这两样无论怎么穷的女子都是要的。手钏和戒指也是稍微

有碗饭吃的女人就有。银也是个名，实际是洋铁皮上面涂一点银，有些是铜上面涂一点银。打这种首饰的店子本城有七家之多，每家只要几十元做本。他们的首饰，一部分是人家来定做的，一部分是用个小匣子装着背往四乡去卖的。七家首饰店中，有四家是一个老板、一个工人、一个徒弟三个人做事，一家是四个人做，一家是两个人做，另一家只一个人做。学徒制度与理发业差不多，不过工作更苦些，穿的衣服也更烂一些。

（20）打洋铁

一家，刘俊记，兴宁人。前年来本城开店，以前无所谓洋铁。三几十块钱本，一个老婆、一个徒弟和他自己三个人。材料是洋油瓶，做的是小洋铁灯呀（不[1]灯），盛洋油的壶子呀，盛茶油的壶子呀，舀油的勺子呀，烧茶吃的壶呀，洋油透子呀（滤子），酒透子呀，盛茶叶的瓶子呀，各种小盒子呀等等日用必需品。所以，这样一个洋铁店乃社会需要的。生意也很赚钱，三个毛子一只洋油瓶，从本城、吉潭、三标、澄江、牛斗光等处杂货店里收了来，做成洋铁器以六个毛子卖出去。此次红军进城，刘俊记不知何故跟着反动派跑了。

（21）修钟表

也是一家，叶公昌，梅县人，除工具外，十把块本钱，专门修理钟表。全县除本城一家外，牛斗光还有一家。两家都是前年（一九二八）开的。寻乌全县有十二万人，百分之二的有了钟表，共有钟或表二千四百个，所以需要一两家修理钟表的店子。

---

[1] 不（dùn），方言，指形状短粗、矮胖。

（22）圩场生意

寻乌城还是个店铺生意和圩场生意并行着的城子。以寻乌情形说，圩场生意代表半自然经济，店铺生意代表商品经济。店铺生意与圩场生意的比例是：店铺占百分之七十，圩场占百分之三十，可见商品经济势力超过自然经济很远了。

圩场生意的要项如下：

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圩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本城人口中农民部分自己有米），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米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一百七十二斤）四元，民国元年五元，民国十六年旱灾有过十六元，本年红军未到八元五毛，既到七元。

第二是柴火。木炭、水炭子、片柴、把子柴、蕗萁，从四乡挑来“赴圩”。木炭（响炭）价，光绪二十六年每百斤五毛，民国元年到十七年每百斤八毛到十二毛，去年因雨多每百斤涨到二十二毛，现每百斤十六毛。片柴价，光绪二十六年每担（七十斤）一毛七八，民国元年二毛二三，民国十年到十六年四毛，民国十六年到现在五毛到六毛。

第三猪肉。前头店铺生意中已讲了的三个案子，其实应该讲在圩场生意里面，因为是圩场上的生意。

第四猪子。细猪子（两个月的）和猪条子（三四个月的）都没有行，都在圩场上买卖，每圩约三十个，每月九圩共二百七十个上下。现细猪子每斤三毛，猪条子二毛，大肉猪二毛五。为什么猪条

最便宜呢？因为猪条子是四五十斤一个，不是很没有钱用的人不肯拿了出卖的，但迫得拿了出卖时，人家就卡他的价钱了，他也只得忍痛丢手。

第五鸡鸭。本地四乡来圩上零卖的，为数不多，平常每圩鸡鸭两门十把二十只，也有时一只都没人要的，这证明了寻乌城之苦。过年过节每圩可销百多只。价钱，鸡每斤四毛半，鸭三毛。

第六竹木器。木器在圩场出卖的部分已在前面店铺生意中木器项下附带讲过了。现在讲竹器，谷箩、谷笪（笪读达，即晒簟）、畚箕（挑灰粪下田的）、鸡鸭笼、猪笼、篮子、橐子（盛米果等零碎东西的）、磨栏（即栏盘）、糠筛、簸箕、睡床（睡椅）、撮箕、竹椅、灶捞（捞箕）、筷子、扫把、洗锅把、掇耳子（即鸢箕，比畚箕小）、角箩（小孩子装米果吃的小箩子）、篓（即鱼篮，摘茶子[1]也可用）、河子（即“得鱼忘筌”[2]之筌，别处曰篆）、茶篮、笠麻（斗篷）、菜篮、晒篮等等竹器，通通在圩场上卖。

第七小菜。芥菜、芹菜、苋菜、蕌头、脉子、芥蓝菜、蒜子、苦瓜、冬瓜、南瓜（丝瓜）、节瓜、甜瓜、黄瓜、西瓜、番莆（南瓜）、茄子（广东人叫吊菜）、凤菜（又叫空心菜，别地叫蕹菜）、芋子、莆子、萝卜、韭菜、葱子、茼蒿菜、白菜、菜头（芥菜头）、当机（即刀豆）、辣椒、雪豆、彭皮豆（扁豆）、豆角、八月角（八月豆）、老虎豆、树豆子、青豆芽、黄豆芽、马齿、黄芽白，以上各种小菜都由附近乡村供给本城居民。

第八鱼。有鲩、鲢、鳙、虾子、鲤、鲫、黄鳝、泥鳅、虾蟆、

---

[1] 茶子和本文中的“木梓”，都指油茶树的果实。

[2] 出自《庄子·外物》。原文是“得鱼而忘荃。”荃亦作筌，捕鱼用的竹器。

虾公、元鱼（脚鱼）、河鱼子、“抢”等等。普通市上卖的只有鲩、鲢、鲤、鲫、黄鳝、泥鳅、虾蟆数种，其余各种不经见。鲩每斤二毛半，黄鳝每毛十两，泥鳅每毛一斤，虾蟆每毛七两。“抢”是少有的大鱼，寻乌城去年曾卖过一个四十斤的，别的地方有七八十斤的，由惠州一带循河上来，个把人淹死在水里，正好做了它的食品。

第九糖。粉、糍粑、那子（粉皮）、板子（软板子、铁练板、铁勺板、豆子板、油果、糖板子、鱼子板、苎叶板、番薯板、印子板各种）。圩期到了，他们就来了，特别是“会景”的时候（迎故事或打醮的时候）来的更多。一两块钱本钱。

第十水果。李子最多，荸荠次之。此外，枇杷、柚子、杨梅、柿子、桃子、桔子、柑子各有一些。水果不是很小的生意。

（23）娼妓

二千七百人的小城市里，“老货”“嫩货”有三四十家，什么昌娇呀，月娥呀，钟四妹呀，谢三妹呀，黄昭坤呀，戊秀呀，润凤呀，大观兰呀，小观兰呀，昭娥呀，来昭呀，玉淑呀，五凤呀，亦娥呀，都是这个苦群众里的著名人物。除大观兰、亦娥两个外，都是人们所谓“嫩货”，润凤、戊秀、月娥、五凤、昭坤五个更加著名。

科举未废、文武两考盛行的时候，也有现时这样多的娼妓。科举既废，逐渐减少，光绪三十年左右只有十几名了。往后又渐加多，到现在又恢复科举时代的盛况。南半县革命向北发展，同时红军开抵澄江，娼妓们许多跑下乡去了。她们中间传说，“红军见草不留，扫把都要过斩”，所以她们吓得跑了。

本城娼妓三标人多。寻乌人有句俗话，“三标的货，项山的糯”，就是说的三标女子美丽的意思。

十年之前商业兴盛的时代，商人嫖娼的多，豪绅次之，豪绅子弟（所谓少爷）很少插足。十年以来换了一个地位：豪绅嫖娼的最多，少爷次之，商人嫖的最少了。商人为什么嫖的少了？因为他们的生意不行时了。豪绅为什么嫖的多？他们包了官司打，就以妓家为歇店，长年长月住在妓家，过年过节才回家一转。他们的嫖钱哪里来的？打官司，乡下人拿出一百元，他给乡下人使用二十元，八十元揣在自己的荷包里，这样子得到供给娼妓的费用。少爷们为什么从前没有到城里嫖的，近来有很多嫖的了？“毕业公司”等类的学校兴起来了，少爷们脱离那温暖的家庭走到城里来读书，觉得好生寂寞，娼妓家中少爷们的足迹就多起来了。

（24）同善社[1]

约当光绪二十七八年时，赣州一个绸缎店恒孚号的熊老板（南昌人）到寻乌来开办同善社，他就是所谓天恩先生。那时的善长古鹤甫是个秀才，住在城里，家务也不很好。后来善长改了潘明典，是个拔贡，有千元上下家资，现做九江地方法院书记。郭友梅是光绪二十七八年进的同善社，那时候有社员百把八九十个，以后还进了好多，最盛时本城同善社大概有二百多人。同善社的发源在四川，由那个四川的同善社发出公事到各省开办同善社，各省的政府准许后再向各县开同善社。赣州府的天恩先生是得了南昌省的公事的。他来到寻乌，首先拜会县知事，知事赞成了，出了保护告示，同善社就可以大大地开起来。入社是要经过神明的批准的，一个筒子放些纸坨子，有的写个“准”字，有的就是白纸。同善社的神明叫做达摩祖师，介绍人引导要进同善社的，走到神明面前磕头祈祷

---

[1] 同善社，从先天道分化出来的一种会道门组织，清朝末年发源于四川省永川县，后在反动政府扶持下逐渐蔓延到许多省。

之后，伸只手到筒子里拈那纸坨，拈个“准”，便进同善社，拈个白，不能进去。有个屠夫三次都是拈个白的，有个土豪四次都拈个白的，“莫说无神也有神哪”。林虎到过寻乌城，好大一个头，二十八九岁，威武得很。许崇智[1]也曾到过这里。林虎部下营连长有七八个进了同善社，在这里扎了一个多月。进同善社要入社费一元，以后随时捐钱，也不勉强。南昌同善社、四川同善社都有公事来要捐钱，公事上说：“捐了钱，二天到那里去了，簿子上有名字，就可吃得饭哪。”郭友梅捐过南昌三元，四川五元。寻乌社二百多人中有三四十个是女子。他们的成分商人百分之五十，地主百分之二十，农民百分之三十。但所谓农民没有贫农，都是“有碗饭吃的”“不求人的”。民国七八年省政府来公事要停办同善社，停了一两年。随后唐生智[2]有公事来，说“善菩萨，可以信得，不要取消它”，又办起来。民国十二三年政府又来公事要停，才停止到今。

每天早中晚三次静坐，叫作“做工夫”。做工夫的，两天内不能和女人睡觉，睡了就不灵验。同善社有秘密，做到五层工夫，天恩先生才有秘密讲，郭友梅还只两层工夫，未曾听得什么秘密。四川有个九层工夫的天恩先生到过赣州府，那里同善社每人出两块钱接天恩先生的风。方本仁[3]也到了。同善社每年做两次“龙华会”，社员都到，见人出两毛钱，向祖师磕头，奏鼓乐，吃斋菜。

进了同善社，得些朋友，可以做官。

---

[1] 许崇智（1887—1965），广东番禺人，曾任粤军第二军军长、粤军总司令等职。

[2]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1927年4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3] 方本仁（1880—1953），湖北黄冈人，曾任北洋军阀赣南镇守使、赣粤边防督办和江西军务督办等职。

寻乌县长曾有三个进了同善社，他们和社员们一样到同善社磕头。

（25）人口成分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寻乌这个城，把它的人口成分剖解起来，才知它还完全是一个农业手工业城市。全城近二千七百人的各业比例如下：

职业	人口数	百分比
农民	一，六二〇	六〇
手工业者	二九七	一一
游民	二七〇	一〇
娼妓	一六二	六
商人	一三五	五
政府机关	一〇〇	四
地主	七八	三
宗教徒	二二	一弱
共计	二，六八四	一〇〇

看这个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共占百分之七十一，便知这个城市还是以农业手工业为主体，向附城一带耕田的和开小作坊做手工的占着住民的最大多数。所谓手工业者，包括各业手工工人和手工业主，商店的店员也算在内。所谓手工业，就是缝纫店、黄烟店、酒店、伞店、爆竹店、理发店、木器店、豆腐店、首饰店、洋铁店、修钟表店、屠坊店这一些。所谓宗教徒是耶稣教十人，天主教三人，斋公六人，和尚三人，共二十二人。本城纯粹地主十二家，共约七十八人。商人兼地主五家，算在商人里面。商人是指盐行、杂货布匹店、油行、豆行、水货店、药材店、火店等，共计一百三十五人。娼妓是三十余家，三十几个妓女，却养活一百六十二人。

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和手工业者几乎同等。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这表示失业群众之多是怎样的可惊。所谓政府机关一百人，是指新的县苏维埃、城区苏维埃两个机关（四十人），加上县苏赤卫队（六十人），不是指的旧政府。但是旧政府机关人数也是与新政府人数差不多的。说到这个群众中的领袖部分，即那旧社会的指导阶级，自然不是那总数占百分之八十七的农民、工人、游民和娼妓，他们是被统治者，统治者是那仅仅占人口百分之十三的地主、商人和耶稣教天主教传教士等。商人的商会虽没有多大权力，商人群众中却有几个人参加那统治全县的县政府。不过那几个人也不是完全代表商业资产阶级说话，他们是接受地主的领导，帮着做些事。这也是因为寻乌城商业不但是很小而且是逐年衰落的原故。

商人而能向政界话事的：第一个算何子贞，豆行老板，用个假名出张帖子拿给别人去开。他自己一面教书，一面当公安局长，又当警察队长，又当国民党委员。他父亲承包牛岗税，剥削牛商。他初回寻乌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意识，颇有新派之称，后来便与地主妥协了。现逃。第二个是黄光甫，水货店宝华祥的老板，商会的文牍，能到衙门话事。现逃，店没收。第三是火店老板陈登祺，初当法警，升靖卫队长，跑衙门。现逃。第四是杂货店主陈志成，虽没做官，却事事与反动派同谋，有会必与。现逃，店没收。

十二家收租的地主，列举如下：

何德新　从前收租五六百石，现收百石，七八个人，仅够开销。乡人和衙门有交涉时要请他话事。他儿子何挺拔，平远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

何成治　收三百多石，人少，有三百石出卖，是城内第一个大地主。何成治死，寡妇当家，买个儿子不能话事。

刘佛荣　收二百多石，人少，有谷出卖，寻乌城第二个大地主。“水浸牛皮——很吝”，不与外事。

刘段轩　只收几石谷。中山派，与何子贞打官司打穷了。他的儿子还在赣州班房里。他的儿子是赣州第四中学毕业，新的城东小学校长。

范老八　百多石，有多余。他哥哥开顺昌老店，他在家收租，不走衙门。此次派款三百元。农民没收了他。

范家声　百多石，有多，十五六岁，中山学生，被何子贞罚款。此次又被苏维埃派款一千元。

张三玉　百多石，有多，寡妇管家，不出面。

邝四嫂　几十石，有多，一个儿子，一个孙子，不反动。

吴老四　已死，留个寡妇，一个儿子，一个孙子，百多石租，有多，不话事。吴老四光绪年间坐县署征收柜，全县钱粮由他过手。死了四年。

范明才　先前开杂货店，歇了十多年了，收八十石，稍有多。民国初年当保卫团总，是劣绅，好嫖，好赌，现跑了。

何祥盛　摆摊子出身，做水货生意发财，三二五暴动被罚款，生意关门。他儿子何家常，买来的，梅县东山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领袖之一，共产党员，过番去了（往南洋叫“过番”），现到福建。

何学才　何子贞之父，县衙刑房科写口供，后做堪舆，承包牛岗税，买了几十石谷田，是个大劣绅。

以上十二家是纯粹地主（两家中地主，十家小地主）。其中何德

新、范明才、何学才三人是积极反动分子，刘段轩、范家声两人是同情革命的，何祥盛的儿子何家常是共产党员，其余六家是所谓“只顾发财不管闲事”的。

下面五家是商人而兼地主：

钟汇通　寻城第一家盐行，二百二十石租，有百石余剩，跑衙门，话事情。

骆晋丰　分成四家，共六七千元。老二最富，有二百五六十石租，老实，不话事。老大死了，十多石租，糊口不够。老三有三四十石，糊口而已。老四（前商会会长，同善社主任教员）也只几十石，仅糊口。

荣春祥　几十石租，全部储蓄着，做生意吃饭，不话事。

温荣记　八十石，全存着，做生意吃饭。第三个儿子温锡纯与新寻派勾结。

林笔利　水货生意，百多石，稍有多，不管闲事。

以上五家均商人而兼地主。其中钟汇通与温荣记是反动派，余都是所谓“不话事”的。五家中钟汇通、骆晋丰两家是中地主，余三家是小地主。

第四章　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本章目录

一　农村人口成分
二　旧有田地分配
三　公共地主
　A.　祖宗地主

- B.　神道地主
- C.　政治地主

四　个人地主

- A.　大地主
- B.　中地主
- C.　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 D.　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 E.　小地主

五　富农

六　贫农

七　山林制度

八　剥削状况

- A.　地租剥削
  1. 见面分割制
  2. 量租制
  3. “禾头根下毛饭吃”
  4. 批田
  5. 批头、田信、田东饭
  6. 谷纳、钱纳
  7. 铁租、非铁租
  8. “要衫裤着去捞”
  9. 劳役
  10. 土地买卖
- B.　高利剥削
  1. 钱利

2. 谷利
3. 油利
4. 卖奶子
5. 打会

C. 税捐剥削

1. 钱粮
2. 烟酒印花税
3. 屠宰税
4. 护商捐
5. 牛捐
6. 赌博捐
7. 财政局总收入
8. 派款借款

九　寻乌的文化

一　农村人口成分

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零四五
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	百分之零点四
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	百分之三
破落户	百分之一
新发户	百分之二
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	百分之四
中农（够食不欠债的）	百分之一十八点二五五
贫农（不够食欠债的）	百分之七十

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　百分之三

游民（无业的）　百分之一

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　百分之零点三

二　旧有田地分配

公田　百分之四十

地主　百分之三十

农民　百分之三十

三　公共地主

A. 祖宗地主

寻乌公田多，成了各区普遍现象。各种公会多得很，祠堂里的公会如什么“公”什么“公”，差不多凡属死人，只要是有“后”的，而他的后又是有钱的，他的所谓后者必定从他们的家产中各家抽出一份替他立个公。这种凑份子立公的办法是什么姓都普遍采用的。凑成的份子一概是田地，不用现钱。再则那什么公还在时，他自己就留出田产立起公来，这一种比前一种更多。公田一经成立，就年年收租。租除祭祖用费外，大概总是有多余的，便把它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拿谷积蓄，而是拿钱积蓄，就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粜给贫民，把钱积起来。积得若干年成一笔大款，便购买田地。如此下去，这一公的田地就渐渐地增多起来。但这积蓄增多的在全部款子中只占去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由他的子孙均分了去。多半是子孙穷苦的多才主张分的，子孙富足的多呢，那便不主张分

了。分是在什么时候呢？又是怎样一种分法呢？就是当那过年过节时候从祠堂里分谷分肉。男子都有分，女子没有分（有些族上寡妇有分），每人分得几斗谷、几斤肉。这种谷叫“红丁谷”。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从前是秀才、举人有功名的人分的，后头加上“毕业生”。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七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个男子一份。分的次序：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因为这两种人是可贵重的，每人大概分一斤。次房股肉，每股十斤八斤的有，十多二十斤的也有，整的分出去，再零分与房众。为什么要分房股肉呢？这是一种斗争，房下人少的要分房股肉，房下人多的反对分房股肉，主张分丁肉。但结果各地多半是照了人数少的房份的意见分了房股肉。为什么少数对多数胜利呢？因为这种公的产业，原是各房都有平均的权利的。次分丁肉，不是每个公都有分，多数公是没有丁肉分的，这是因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有少数公堂谷肉不是平分而是轮分，名义叫做“轮收”，又叫“管头”，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这并不算“吃油饼”，因为这样做正是公堂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为什么呢？当他那个祖宗还没有死，把家产分拆给儿子们的时候，为了怕他的子孙日后把分得的一点田产变卖了弄得没有饭吃，就从田产中挖出一部分不分，作为公田，永不变卖。一面有了他死后的祭费，一面呢，他的穷困的子孙便得了周济了，这叫做“留出后路”。他的子孙也很赞成这种办法，因为这就是为自己留出后路。凡那祖宗生前没有立起会的，祖宗死后，子孙们只要稍为富裕也必定为他立会，出名叫做祀祖，其实是为了自己。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在这个意义之下，那些贫苦子

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那些穷苦人闹着要分公田也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他们是要分了田去变卖，得钱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在这种情形上面，看得出贫农群众因为他们苦得没有米煮，便把什么“祭扫”呀、“慎终追远”呀等等封建思想逐渐地不要了，他们的生活迫着他们要不了这些宝贝了。

总计祖宗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二十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六十。

B. 神道地主

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的各种各色的神，许多都有会，如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大神会、真君会、婆太会、赖爷会、公王会、伯公会、文昌会等等，都是没有庙的。还有一种醮会，祈神之用，也属这一类。在上述的各种神内有一部分是立了“坛”的。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那里面藏着好灵验的神呀，因此叫做坛。不论神、坛，凡有会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通通是富农地主。神会的产业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钱。这种田、谷、钱，叫做“会底”。目的：一是为神，因为神能保佑他们人畜清泰，财丁兴旺；二是吃东西，神诞那一天吃一顿，过年过节还有肉分，但要斗了份子的才有吃有分。斗过份子后来穷了的，有顶退份子的办法，譬如每份是五块钱会底，人家就出五块钱给他“顶”了去，他就算是“退”出了会。“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有一个，即使那个村子只有三家人，也有个社坛。为什么要社坛？保佑禾苗没有虫子食、牛猪六畜不至于遭瘟，保佑人们得到康健。每个社都有会，二月起，十月止，每月都开会，会期普通是初

二，有些地方是十六。开会那天，同社的人每家来一个，不分贫富，一概有份，杀猪买酒，大吃一顿。吃过之后，开堂议事，作陂开圳呀，禁六畜伤害禾苗呀，禁胡乱砍伐山林竹木呀，条规不一，议论纷纷，也没有什么主席，也不要什么记录。虽然乱讲一顿，却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就是当那所谓“老前辈”或所谓“更懂事的”讲得“更公道”的时候，大家都说他的话“讲得好”，就是这样子成了决议。这种社是群众的，虽然也信神，却与地主富农的神坛完全两样。这种社的会议是农民作主，不是豪绅作主，也不完全是富农作主，是大家来而“更公道”的人的话为大家所信仰，这个人就作了无形的主席。社坛有公堂的最少，大多数是每月初二开会（要敬神）时候大家斗钱，每人每次二毛、三毛至四毛，不来吃的不出。再讲到“庙”。庙是有屋子，而屋子里面有菩萨的。庙有个庙祝，土名叫做“庙老”，是个老头子，服侍菩萨，招扶香灯。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有庙田的，庙老吃庙田的租，无庙田的，庙老伙食从群众中捐钱谷。庙有城隍庙、关帝庙、三官庙、三圣宫、赖老庙、龙王庙、关岳庙、杨公庙、东岳庙、江东庙等等。庙的性质，是所谓“有功德于民则祀之”的意思。神坛是地主需要的，社坛是农民需要的，庙是地主、农民共同需要的。庙的田产很少，租入不够香纸费及庙老用，所以不是严重剥削所在。“寺”则完全不同，它是和尚的巢穴，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施了田的大地主，叫做“施主”。大地主为什么施田地给和尚呢？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大地主为了“修子修孙修自己”，所以施田给和尚。五福庵、回龙寺、正觉寺、观音阁、东笔山、大悲阁、鹅湖庵、西竹山、天台山、狮子岩、三角崃、角公岩、法华庵、西华山、南阳山、梵慧寺、甘露寺、九龙山，都是城

区附近的和尚寺。道士斋公的叫做“观”，则有云盖嵊、大山里、川塘坑等等。观的田产的来源和剥削的状况，与寺无二样。

总计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八，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二十。

C. 政治地主

又分二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一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

县城的考棚田收得六百五十石租，经手的豪绅“吃油饼”吃去一百八十石，交出四百七十石与考棚。考棚田的来历是前清时候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置买田地，作为考棚年修经费。起个“尚义祠”，把那捐款大地主的姓名写在木主上，捐多的主高，捐少的主矮。

宾兴田的来历也是地主捐起的，田散在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之五成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有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是作为乡试、会试的路费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主要还是作为乡试路费和乡试奖赏），奖赏的别名叫做“花红”。县宾兴祠年可收千五六百石谷租。乡试（省考）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举行。每届寻乌试考的一百多人，每人路费二十四元，中了举的有花红百多元。宾兴祠内有百几十块木主，写的都是出捐的豪绅们的名字。科举废后，凡在赣州第二师范毕业的，每人发参观费三十元，使他们好往江浙一带参观。此外，往外国留学的也曾津贴过一回，一个留学日本的给了三百六十元。县城办简易师范及高等小学，即是用的宾兴祠的经费。

建筑学宫也是地主捐钱，因此也如尚义祠、宾兴祠一样，起了一个“好义祠”，纪念那般捐主。后头祀孔经费又捐了千多元，是款

子不是田地。

学租是各姓地主捐集，为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的，姓姓都有。如篁乡古姓有学租一百石，车头邝姓有二百多石，至少的也有几十石。此外城区有“薪水会”，各区也有。各区普遍地有“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系一种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的。还有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一百石租起个“尊育堂”，却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算是一个特别形式。

总计教育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至于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的土地，数亦不少。不但大桥、长桥有会，村落小桥也往往有会。有会就有田，都是地主、商人捐起的，目的是修理桥梁。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桥会大的有八千元，田产每年收租五百石，那就是留车的浮桥。小的有二三石租的，乃是很小的小桥。

路会不多，会田也少，全县不过十大几个（十五个以上叫十大几个）路会，每个路会不过收七八石谷。为什么桥会发达路会零落呢？因为路烂了修补易，不修补也不至于完全不能走人，桥则不然。

粮会也少，全县不过几个，如篁乡的严姓，大田的梅姓，车头的邝姓，吉潭圳下的刘姓，各有一个，各有些田地。多的如车头邝姓粮会有五百石租的田，原是“军田”，现充粮会。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追粮。各方敲榨，各人不利，故斗钱成立粮会，或由各小公出钱斗成。有了粮会，法警只找粮会一处，免得各家受害。没有粮会呢？法警来了，脚钱多过粮钱，逾

限不完要算利息，利又非常之重，因此起个粮会。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总计公益方面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占全部公田的百分之十。

四　个人地主

A. 大地主

以上说了公共地主部分的土地，再说个人地主部分的土地。个人地主土地在全部土地中占百分之三十，比公共地主土地要少。个人地主土地中又以小地主（收租不满二百石的）土地占大多数，中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上但不满五百石的）土地次之，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土地最少。

全县共有八个头等大地主，如城区的刘土垣，篁乡区的罗含章，南八区的谢杰、邝文荣，双桥区的梅洪馨，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澄江区的林朝官、王菊圆，收租都在千石以上。其中最大的算“屎缸伯公”，他是兼三区的项山堡人，连田地、房屋、山林、牲畜及他在吉潭圩上开的药店、杂货店，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他是全县豪绅的领袖。民国初年他的第三个儿子潘梦春（是个文理不通的脚色，没有考过科举，也没有进过学堂）做过县财政课长（国家财政）。民国六七年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粗通文理）做过三年县财政局长（地方财政，管理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款）。民国十三四年潘梦春又做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

里。他在总保卫团任内为了要钱用，同时北洋军阀邓如琢[1]部队到县要军饷，发了许多纸票，使用了几个月，被一个中地主叫赖翱虚的在省城一状告了他，才停止了。民国十五年国民党势力来，他就失势，但他立即和原来带资产阶级色彩的、这时已经和地主妥协了的新寻派结合，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委员。今年三月豪绅们把县长胡泽凡推倒，他就上台做县长，红军到来他才跑往武平。他有七十多支枪，被武平钟少奎收编去了。刘土垣算第二个大土豪，但不活动，是个中学毕业生，在县里没有权。谢杰，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做过赖世璜的师长。现在上海组织什么赣南钨矿会，争钨矿自办，加入改组派[2]，组织"江西自救会"，出版《自救日报》，反对蒋介石。对于"剿共"，呼号甚力。王菊圆，赣州第四中学毕业生，澄江方面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去吃不要钱，因此取得一班流氓对他的拥护。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个人以厉害的打击，有受这种打击弄得倾家荡产的。

寻乌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有十二个。曹善成（西厢田背），收租五百石，祖父发的财，是个"老税户"[3]。丘树烈（西厢图合），收五百石，无大用。他的儿子是个工程师，南洋大学毕业，

---

[1] 邓如琢，安徽阜阳人，曾任北洋军阀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第一师师长等职。

[2] 改组派，是国民党的一个派别。1928年底，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因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被称为改组派。

[3] "老税户"，指祖辈父辈已经是地主的人家。

到英国打过一转，现在天津什么锅炉公司当工程师。曹愿森（东厢），收五百石，本城高小毕业，四十岁了，在东厢有权。黄甲宾（北厢长举），收七百石租，国民党员。何子贞想利用他，他不出来。现在投机，向农民表示好意，要枪交枪，要钱出钱。他说：“国民党没有用，出了钱不能保命，出到苏维埃还可保命。”谢善德（三标鸭子墓），五百石，读老书的，是个“山老鼠”[1]。王佛盛（水源坳背），五百石。儿子王维藩，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国民党员，在外未归。蓝绍宗（澄江），五百石，蓝死了，寡妇当家。曹国栋（吉潭），六百石，从前称万户，造房子用掉一些，高小毕业，“屎缸伯公”之戚，与潘梦春合作。易展良（双桥区桂石下），五百石以上，开头反动，田快被分掉，又罚去千多元，穷了，不反动了。赖鹏池（双桥区丹溪），称万户，五百石以上，前清附生，老实得很，辫子还留着，但不反动。邝明经（南八区鸡子叫），六百石，他的第四个老弟当白军营长，反动，全家走尽。陈万保（廷岭），六百石，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他自己不反动，他的老弟是新寻派，和他共家，很反动。以上头等大地主八个，二等大地主十二个，共二十个，江西人所谓“万户”就是指的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逐一列出来？为的要研究这个阶级的政治作用，不列出来便没有充实的例证。为的这个理由，我们还要把中地主列出来，只是小地主为数太多不便列举。地主阶级中为什么要分出中地主，因为中地主的政治作用不但和小地主大有分别，和大地主亦显然有分别。

B. 中地主

首先举城区。丘伟伍（西厢图合），收四百石，日本帝国大学皮

---

[1] “山老鼠”，指住在山区，很少外出，不问世事的地主。

革科毕业，在赣州贫民工厂做工程师半年，民国十一年回寻乌做教育局长，进国民党，新寻派领袖之一，为新寻派计划，是个厉害的东西，红军到寻乌，同谢嘉猷一路跑了。黄甲奎（北厢长举），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寻乌国民党指导委员，新寻派分子（新寻学校教员），积极反动。骆松盛（北厢长举），收三百石，城内开骆晋丰杂货店，不积极反动。有个侄子是国民党员，高小毕业，说共产党的坏话。何挺拔（北门城外），收三百多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干事，新寻派主要人物，努力于反革命。刘佛荣（小东门外），收三百石，不反动，做医生。

三水区：雷昌响（三标长排），三百石，是个“山老鼠”，无用。胡恩荣（三标圩），三百石，是个斋公，不问世事，专门要两个铜钱，在家里困觉。胡镜如（三标圩），二百石，赣州第四中学毕业，二十多岁，三标有名的土霸，参加县政权。凌鲁石（三标径石），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又做什么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起了新房子，五十多岁。袁德和（水源袁屋，最反动地方），二百石左右，中学毕业，国民党员，反革命。此外，三水区还有中地主多人，记不清楚。

澄江区：蓝子乾，四百石，省立中学毕业，在澄江圩开蓝协泰杂货布匹店，反革命。谢嘉猷，三百石，高小毕业，四十多岁，做过十四军谢杰部下团长，寻乌团防总队长，改组派，把红军五十团第一营消灭的就是他，江西陆军学校毕业。凌希贤，三百石，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澄江新圩开个店。

兼三区：陈玉横（吉潭），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吉潭的土霸，新寻派主要人物，“屎缸伯公”的孙婿，很活动。刘太宗（吉潭圳下），四百石，赌博头子，流氓出身，赌博发财，民国五年还是

“当乌”（做贼挖壁，夜间出门，叫做“当乌”）。潘金棣（项山），二百多石，梅县师范毕业，新寻派，国民党积极分子，吉潭靖卫团总。潘明瑞（项山），四百石，“屎缸伯公”亲属，吉潭圩上开了两间杂货水货店，项山反动首领。潘观澜，虽是个百多石租的小地主，却是反动首领，潘丽死于他手。赣州高小毕业，做小学教员五六年，那时并不反动，三二五暴动前后就腐化反革命了。他的父亲是个赌博头子，以此发财。潘明典（项山坪地），百多石，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本县教育局长数年，还担任许多别的事，有“身兼九长”之称。本是个中等地主，运动省议员用掉四千多元，还是落选。去年做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今年在九江做高等法院书记官，是个官僚主义者。说话很漂亮，字也写得好，样子也好看，又很规矩，像个孔夫子。潘景文（项山大坜），三百多石，前清秀才，老先生。潘国才（项山村），三百石，也是个老秀才。潘国卿（项山村），只有五六十石租，高小毕业，叶子峯土匪的秘书，反革命。刘翰元（剑溪），二百多石，不中用。

篁乡区：李其琅（篁乡圩），三百石，赌博出身，儿子李含辉高小毕业，反动派重要分子。刘玉接（篁乡圩），二百多石。儿子刘金燕，南昌心远中学读书，又进了沪江大学、上海大学各读过一下，过去接近合作社派。刘玉麟，刘玉接的弟，四百石，是个哑巴，四五个儿子均小学毕业；小儿子读过中学，参加三二五暴动，现反革命。赖寿成（红头岭），四百石，儿子赖世芳梅县东山中学读过书，反革命。赖翱虚（红头岭），四百石，秀才，上海理化专修科毕业，做过县立高小校长一年、教员五六年，运动省议员失败。两个儿子中学读书，其中一个又在北京师范毕业，接近合作社派，三二五暴

动时新寻派向他进攻，现在两个均反革命。汪子渊（山子下），二百石，篁乡的反动首领，是个大劣绅，做过保卫团总，宾兴分局长。刘经曦（司城村），三百多石，梅县中学毕业，父亲在胡谦那里干事，被土匪打死了，不反动。刘荃兰（司城），二百石左右，高利贷起家，现在也不反动，儿子加入农协，因误会被农民乱枪打死。罗成添（溪尾），四百石，买半毫子黄烟都要同人讲价钱，是个守财奴，要钱不要命，他那村子整个的反革命。罗福寿（溪尾），前有三百石，分开了，反革命。罗佩慈（溪尾），二百石，做过于都县长，是个诡计多端的人。三二五暴动前大家还在秘密准备，他看出来了，在农村中散布改良欺骗主张说：“家里的谷子要赶快平价，不要钱，发与本姓的贫民，不然不得了。”是个反动首领，豪绅中很厉害的。罗禄寿（溪尾），二百石，儿子是新寻派，喜出风头。古乐三（塘背），两兄弟合计三百石。他哥子是个秀才，做过两任省议员。他自己在胡谦那里做过军需，陈炯明时代做过五华县的一个区长，全县反动首领之一，带三四十支枪，跟谢嘉猷跑了。古光瑞（塘背），二百多石，高小毕业，反动。古化南（塘背），二百石，是个老实人。古光禄（塘背），四百石，守财奴，顶好便宜，买小菜都要讲价。他儿子在梅县东山中学毕业，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以上塘背各古，均古柏同屋人。）古有余（塘背），五百石，开纸行，又卖烟土，又开花会，纵赌。他是个守财奴，不问世事，专门要钱。因他是强房中的弱股，他的亲支大家欺负他，向他要五十就五十，要一百就一百。严锦绣（高头），过去唤万户，做屋做穷了，剩三四百石谷，开了间铺子在公平圩，子孙十几个，不问世事，发财为主，算得个“山老鼠”。严国兴（高头），百多石租的小地主，以做生意为主，公平圩开杂货店，同时贩纸，商家来往扯得通。贝岭、岩下

的商人借钱给他，连同他自己的钱，共用掉六七千元，运动省议员，失败，现负债。篁乡区的反动首领之一。严锡柏（高头），二百多石，开了间杂货店在公平圩，不甚反动。（以上兼说了几个小地主，因为他们是著名脚色。）

双桥区：黄庆云（黄田），二百石，不反动。罗守汉（黄沙），二百石，不反动。赵尚钦（腴田），三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反动。谢友丰（腴田），二百石，不反动。陈德全（留车），二百石，在留车开盐行，反动，二十一纵队把他枪毙了。陈镜日（留车），二百石，不反动。儿子陈继光参加三二五暴动，梅县中学毕业，三二五暴动失败，跑往南洋。陈山牛（留车），赌博鬼，二百石谷，不反动。陈标记（留车族坑），过去是万户，分开三四家。陈标记死了，他的儿子“不子六”有三百石，在留车开水货店，反动首领。陈国才（留车族坑），二百石，梅县中学毕业，反动派。陈吐凤（留车族坑），二百多石，大劣绅，寻乌五虎将之一。“潘（明典）谢（虚左）陈（吐凤）彭（子经）邝（太澜），寻乌五虎将。”“新寻”“合作”两个新派起来后，老的五虎将就倒台了。陈及潘、彭、邝都是秀才，只谢是毕业生（寻乌简易师范）。廖洪贵（石碣），二百石，开个水货杂货糕饼店在枫山圩，不反动。刘俊福（垢坊），过去称万户，分开了，现有四百石。儿子刘鸿翔，赣南中学毕业，又在北京文化大学读过书，狗屁不通，却十分反动，双桥区反革命首领之一，现还在死守炮楼。刘石福，刘俊福的兄弟，二百多石，过去拿钱办过小学，现亦在炮楼中。刘元瑛（垢坊），二百多石，在炮楼中。刘作瑞（垢坊），四百石，三二十个人的大家庭，参加革命，把田分掉了。原因是早前和刘俊福争田买，又为了一个奸情案起衅，三二五暴动他家有人参加，失败，刘俊福诬告他，并勾结叶子峯土

匪把他家烧掉了。现在他侄子刘国香做区苏维埃委员，刘日升做乡苏维埃委员，他自己在家不问事。他是梅县第五中学毕业生，老实得很，二十三四岁，比他侄子还年小，官司是他侄子的父亲即他的哥子主持着打的。刘宝华（石贝），三百石，儿子在县中山中学毕业，参加革命，做共产党区委书记。刘开香（石贝），二百石，高小毕业，不反动。汤思贤（下磜），三百石，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中坚分子，十分反动。汤立贤（下磜），二百石，黄埔生，做过靖卫队长，新寻派。汤佛淑（下磜），二百石，是个劣绅，人称土霸，小学教员讲习所毕业，新寻派走狗。曾超群（上磜），百多石[1]，梅县中学毕业，不反动。曾锡麟（芳田），三百石，读老书的，放高利贷放得很厉害，他和他的侄子曾光华（小学毕业）反动到十二分，均在坵坊炮楼里被农民围困着。曾菊香（芳田），二百石，侄子曾产丰，高小毕业，是个共产党员，房子被叶子峯土匪烧掉了。曾海澜（伯公坳），过去是万户，最近分拆，他得二百石。参加三二五暴动，被曾锡麟告状用去千余元，叶匪又罚他，老弟被叶匪捉去罚款六百多元。现不反动。易颂周（桂石下），二百石，前清秀才，是个劣绅，与叶匪有勾结，现跑走了。何子文（丹溪），过去是万户，分开了，现在二百多石，反动不厉害。钟寡妇（丹溪），二百多石，反动派，跑了。赖荣俊（岑峰），二百多石，过去是小劣绅，现不反动。梅仁华（岑峰），二百石，不反动。梅调先（大田），秀才，三百石，反动派，逃走。赖文莲（大同），三百石，红军二十一纵队捉着罚了二千元，田分掉，现不反动。邝春龙（雁洋坪），二百石，高利贷起家，没收了，现不反动。邝世仰（雁洋坪），二百石，梅县师范毕

---

[1] 这里指分家后曾超群所有的田亩数。分家前曾家兄弟二人共有谷田200多石。

业，国民党员，死反动。邝应绍（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邝兰春（黄羌坪），二百石，不反动。陈陶香古（族坑），三百石，寡妇管事，赌博起家，反革命。

南八区：刘篁先（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枪决了。刘添运（龙图），三百石，反革命，杀了他一个儿子，屈服了。刘焕通（龙图），三百石，被红军罚款千余串，现不反动。刘世滴（龙图），二百石，前清秀才，反动派，全家逃走。刘振广（河角圩），二百石，第三个儿子反动，跑了，其他不反动。刘梅荣（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曾月辉（河角圩），二百石，不反动，寡妇管事。曾路福星（河角圩），二百石，有余钱，勾结叶匪，全家反动，跑了。陈二赖禾（鸡子叫），二百石，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侄子被红军枪决，很反动。赵芷香（车头），二百石，老先生，过去有点子“劣”，不反动。赵赞杨二（车头），二百石，全家反动，跑到坵坊炮楼里去了。他是赌博鬼，祖父发的财。赵奀二（车头），二百石，老实，兼做生意，在车头开华兴店，今年第三次四县会攻时店被烧了，他的父亲被杀，不反动。赵应华（车头），二百石，过去是万户，分了一半给他四个儿子，余一半归他两公婆，“坐灶子”（把家分拆，自己留一份，叫“坐灶子”），不反动。他的余积是临时分给他子女比较多的儿子。温赞标（青龙），二百多石，高小毕业，不反动。钟文发（珠村），四百石，兼做盐米生意，祖父遗财，不反动。钟斑三（珠村），三百石，祖父遗业，他过去曾赌博，有时会做和事佬，不反动。钟继善（珠村），二百石，梅县中学读书，参加革命，在红军十一军五纵队工作。钟大面六（珠村圩），三百石，老税户，赌博，反动，全家走尽。钟咏柳（珠村圩），二百石，东洋留学生，做过武穴警察局长，在本县做过一等课员、承审员、实业局长，在谢杰部下

亦干过事，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逃到平远去了。彭子经（古坑岗），三百石，前清秀才，本县五虎将之一，清末做过湖南凤凰厅巡检，民国时代又在本县做过财政局事务员，收过赌款，最近在团防队做军需股，每次清乡都参加。一个儿子彭秉彝，梅县中学毕业，新寻派，国民党员，做过知耻小学校长。全家反动极了。黎祖德（古坑岗），过去是万户，做生意，做蚀了本，剩下三百石，全家反动，走了。彭宏云（下廖），二百石，不大反动，开个杂货店在下廖村。彭宏权，彭宏云老弟，二百石，反动，跑往平远。彭锦汉（下廖），二百石，兼做生意，开药材和杂货铺，死爱钱，不反动。韩佛仙（满坑），二百石，兼做生意，又耕田，老实人，但亦逃到平远去了。钟奕材（林田坝），三百石，高小毕业，祖父手里是万户，两家人分，过去不赞成革命，逃走，现自愿罚款，要求回家。钟丁四（林田坝），二百石，祖父遗业，子弟也有耕田的，不反动，“怕共产”。钟树芬（林田坝），二百石，他自己死了，老婆当家，罚款二百元，不反动。谢瑞琳（牛斗光），三百石，医生，不承认罚款，逃走。谢肇凡（牛斗光），二百石，新寻派，赣南中学毕业，做过保卫团总，最近做过靖卫团总，南八区革命胜利后，在反动县政府当秘书，是南八区反动首领之一。陈春荣（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儿子高小毕业，当白军连长，反动，全家走平远。陈六记（牛斗光），三百石，在留车和牛斗光各开一个油盐米豆行，勾结叶匪，很反动，全家走了。陈忠俊（廷岭），二百石，本人老实，他的儿子过去做过保卫团总，不反动。谢佩钦（牛斗光之枫树岗），四百石，是个高利盘剥者，很多赌贩向他借钱，他的儿子在新寻学校读书，反动，逃走了。陈安如（廷岭），三百石，兼做猪牛贩，开火铺，罚了他的款，现在不见得反动。曾人升（莲坪），三百多石，自己会耕

田，赌博发财，不交罚款，逃走。钟星奎（珠村龙虎坑），二百石，平远中学毕业，国民党做干事，南昌训政人员养成所毕业，新寻派的中坚分子，反动之极。

以上全县七区，共有中地主一百一十三个。

C．大中地主对于生产的态度

收租二百石以上的中等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大地主，他们对于生产的态度是完全坐视不理。他们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组织生产，完全以收租坐视为目的。固然每个大中地主家里都多少耕了一点田，但他们的目的不在生产方法的改良和生产力的增进，不是靠此发财，而是为了人畜粪草堆积起来了弃之可惜，再则使雇工不致闲起，便择了自己土地中的最肥沃者耕上十多二十石谷，耕四五十石谷的可以说没有。这种地主家中普通都是请一个工人，只有“万户”以上的大地主而又人丁单薄的方才请两个工人。为使工人不致“闲嬲”（“嬲”，当地读廖，“东走西走”或“玩下子”的意思），除开做杂事外，便要他耕点田。

D．大中地主的政治思想

大中地主的生活，依寻乌状况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新的，即接受资本主义影响多的。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他们看钱看得松，他们什么洋货也要买，衣服穿的是破胸装，头也要挥一个洋装。派遣子弟进学校也颇热心，或者自己就是中学等类学校毕业的。这种人在地主阶级中比较少，而且是在接近河流、接近市场的地点才有的，多半他本身就兼商人，澄江的王菊圆就是好例。第二种是半新不旧的。他们赞成一点“新”，但随即就批评“新”的坏处。他们也办学校，也做教育局长，但他们办的学校是专制腐败的。做教育局长是为了拿到一种权，可得到一些钱，而不是为了什

么“开通民智，振兴教育”。但历来的教育局长多半是他们做，第一种人太新了是做不到手的。他们的生活介在节俭与奢华之间。他们人数在大中地主中占着大多数。守旧是地主的本性，这第二种人为什么也要半新不旧地随和时势一下子呢？完全为了争领导权。因为不如此则领导权就会完全被民权主义派即所谓“新学派”的人争取了去，所以他们有摇身一变的必要。却因他们的经济关系还是在一种封建剥削的状况中，所以他们仍充分表现地主性，那种革新只是表面的。城区的丘伟伍，兼三区的潘奕仁，澄江区的谢嘉猷，就是这个阶层的适例。第三种是完全封建思想封建生活的，他们的住地是在与河流及市场隔穹的山僻地方。他们始终希望恢复科举。他们完全是帝制派，他们欲以帝制主义来打倒民权主义，恢复他们的政治领导，挽回那江河日下的封建经济的崩溃形势。他们的生活很节制。他们至多挥个光头，有些仍是薙去额发一二寸。这种人在大中地主中依寻乌说是占着少数，双桥区（大田）的梅洪馨就是适例。大中地主阶级中新的占百分之十，半新的占百分之七十，全旧的占百分之二十。但所谓新的，是说他们走向资本主义化，不是说他们革命。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的，就是大中地主阶级的新旧，不仅是以地域的原因（河流与山地，近市与远市）而形成，还有以年龄的原因而形成的。一家之中，老年人多半守旧，少年人多半维新，中年人就多半半新不旧。这种年龄的原因即是时代的原因。老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最深，同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无能力讲新，所以只得守旧。少年人受旧制度熏染浅，同时不维新没有出路，所以他们比较不顽固些。中年人则介在二者之间。举一个例，大地主“屎缸伯公”是很顽固的。他的儿子便主张办学堂，但办出来的学堂却是半新不旧。他的孙子则往广州，往上

海，往北京，往英国，有六七个出外读书，研究所谓“新学”的。不过无论怎样研究新学，依然是彻底的反革命。“屎缸伯公”的孙子潘作琴在英国医科毕业回来，现在汕头行医，称汕头西医第二个好手，每天收入四五十元，每月能收千多元。他初回国时，寻乌教会医院出千二百元一年请他，不肯就，因为他在汕头的收入更要大。

E. 小地主

小地主（二百石租不满的）数目更多，以地主全数为一百，则大地主（租五百石以上）占百分之一，中地主（租二百石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九，小地主占百分之八十。大地主人数很少，在全县不显特别作用。中地主是全县权力的中心，他们的子弟许多是进中学校的，县政权如财政局、教育局、保卫团等也是他们抓到的多，特别是祠堂蒸尝费用[1]几乎全部在他们掌握之中，小地主及富农是很难过问的。但是小地主在地主阶级中是占着绝对大多数，而且显出下面的特点，即：（一）做小生意的多。他们开小杂货店，收买廉价农产物候价贵时卖出去，大概百个小地主中有十个是兼做这种小买卖的。中地主虽也有做生意的，而且他们一做生意就比小地主做得大，但他们做生意的成分比较很少，即中地主多半还在一种封建经济的领域中过生活，不如小地主商业化得厉害。（二）特别表现小地主商业化的，还有他们派遣子弟进学堂一事。小地主子弟进初等小学是全部，进高等小学也几乎是全部，至少十家有八家，进中学的亦十家有三家。这个阶级接受新文化的形势是比哪一个阶级要快要普及。他们在全般政治生活中是受中地主阶级统治的，即是说他们是没有权的。他们革命的要求在初期革命运动中却表现很迫切，革

---

[1] 蒸尝费用，即祭祀费用。

命的活动亦很猛进，寻乌的合作社派（即中山中学派）的运动，就是代表这个阶级的运动，而和他们对抗的新寻派（即青年革命同志会派）的运动，却是代表中地主阶级的反革命运动。为什么小地主阶级接受资本主义文化即民权主义的革命文化如此之迅速普遍，他们的革命要求与活动如此迫切与猛进呢？则完全是因为他们这阶级的大多数在经济上受资本主义侵蚀和政府机关（大中地主的）压榨（派款），破产得非常厉害的原故。由这两个阶层（小地主与大中地主）的斗争，引导到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即代表中等地主而多少带了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寻派，日益与大地主妥协结成反革命战线，而代表小地主带着革命民权主义倾向的合作社派，日益接受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与贫民阶级结合起来，形成近来的土地革命斗争。

上面所说的小地主，不是说小地主的全部，只是说他们的一部分。普通所讲的小地主包含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从所谓老税户传下来的，这一部分的来源多半是由大中地主的家产分拆，所谓“大份分小份”，即由大中地主分成许多小地主。这部分的人数在整个地主阶级中占百分之三十二。依他们的经济地位又有三种分别：一是年有多余的，人数占地主阶级总数百分之零点九六，他们在斗争中是反革命的。平民合作社派中的刘鸿翔、赖世芳、刘瑞标就属于这个阶层。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三二五暴动中以及失败后，就陆续表现反革命了。二是一年差过一年，须陆续变卖田地才能维持生活，时常显示着悲惨的前途的。这一部分人数很多，占地主阶级全数百分之二十二点四。他们很有革命的热情，寻乌平民合作社派人物的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阶层。如死去了的斗争领导者潘丽（共产党县委书记）、刘维炉（三二五暴动时革委会主席）、刘维锷（共产

党区委委员）等，现在的斗争领导者古柏（共产党县委书记）、钟锡璆（红军营长）、黄余贵（共产党区委书记）等等，以及没有参加合作社后头参加革命的，如梅汝黄（红军大队政治委员）等，都是这个阶层里头的人。三是破产更厉害靠借债维持生活的。这一部分占地主全部百分之八点六四，他们也是革命的，有很多人参加现在寻乌的实际斗争。以上说所谓老税户破落下来的小地主，它的第二、第三部分一般说都是参加革命的。以合作社社员来说，有三十个中学生，一百个高小学生或小学教员，都是过去或现在参加革命的，都属于这两部分破落的小地主阶层，尤以第二部分为特别多。

普通所讲小地主，除上述老税户部分外，另有一个占地主全数百分之四十八的不小的阶层，那就是所谓“新发户子”。这一个阶层的来历，与从老税户破落下来的阶层恰好相反，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这个阶层是在一种“方新之气”的活动中。他们的经济情形是一面自己耕种（雇长工帮助的很少，雇零工帮助的很多），一面又把那窎远的瘦瘠的土地租与别人种而自己收取租谷。他们看钱看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粮食年有剩余，并且有许多不是把谷子出卖，而是把谷子加工做成米子，自己挑了去大圩市，甚至去平远的八尺等处发卖，以期多赚几个铜钱。他们又放很恶的高利贷，很多是“加五”（即百分之五十）的利息。放谷子出去，压迫贫民“上档量本，下档量利”（上档下档即夏收冬收）。他们又放“捡谷钱”和“捡油钱”。什么叫做捡谷钱？趁着青黄不接时候，以钱捡与农民，到了收获时候以谷还与债主，大概捡给两块钱，就要在收获时还一担谷，而那时谷价常常值得四块钱一担了，这是一种对倍利。捡油钱也是一样，多属对倍利。所有放高利贷，

差不多全属这班新发户子。大地主、中地主放债也是放的加三利，加五利非常之少，捡谷钱、捡油钱可说没有。还有更凶的“月月加一”利，即见月还利百分之十，一年便对倍有过。这种借贷都要抵押品，并且要借一种“会”做面子，如“订同会”。还有“印子会”，是月月加一，利上起利，比订同会更厉害。这些都是大中地主所少做的。前清时候放恶利的比较少，民国以来放恶利的渐渐加多。“现在人心更贪了”，就是贫民对于高利贷者含有历史意义的评语。“今个人，人心较贪了咧”这个话，在寻乌贫民群众中到处都听见。这班新发户子看钱既看得大，更不肯花费钱米抛弃劳动送他们子弟去进学堂。所以他们中间很少有中学生，高小学生虽有一些，但比破落户阶层却少很多。至于破落户阶层为什么进学堂的多，就是因为他们看钱看得破些（因不是他经手赚来的），而且除了靠读书操本事一条路外，更没有别的路子可以振起家业，所以毕业生就多从这个阶层中涌了出来。上面所说那种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在有些人的说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它作富农，即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打倒的。

五　富农

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前边所谓“半地主性的富农”，则不叫作富农而叫他们作小地主。贫农群众便是作这样看法的。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

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因此，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只有富农路线的机会主义者，才会站在这个策略的反对方面。

六　贫农

——贫农中的四个阶层——

什么叫做贫农？我们简单回答道：不够食的叫做贫农（不够食的原因是受剥削，那不待说）。但这是一个普通的说法。若从贫农里头再加剖解，便知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他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阶层。第一个是半自耕农。他们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在贫农全数中则占百分之十五。第二个是佃农

中之较好的。他们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他们比半自耕农穷，即比半自耕农更不够食，但比别部分贫农却要好些。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第三个是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他们同样无土地，他们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寻乌所谓“只能定得一爪子”的就是指这种牛。这一个阶层之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他们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十点五，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五，是一个与半自耕农相等数量的群众。第四个是佃农中之最穷的。他们除没有土地之外，还没有一点本钱，借米借盐是常事。他们又没有一点牛力，农忙时节，候别人把田耕过了，然后同别人（那些亲戚家族们）借了牛来，或租了牛来，耕那数亩用重租租来的瘦田。他们虽然有犁，但没有耙，因为打一架铁耙要好些钱，他们力量不足办此。这一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七，占贫农全人口百分之十，是一个并不很小的群众。他们衫很烂，要讨来着。三餐饭两餐食杂粮（粟板呀，番薯片呀）。做米果卖，砍柴火卖，挑脚，就是他们添补生活的办法。

七　山林制度

寻乌的山地，多落在首先落脚的氏族手里，后到的氏族便没有山或少有山。因为先到的占领，所以也有小姓先占了山，大姓后到仍没有山。田与山的情形不同，田地转移很快，小地主和农民的田

地，用典当的方法一年转移两次的都有，一年转移一次的就更多了。至于卖绝，也是常有的。山地则因其生产力小，通常一姓的山（一姓住在一村），都管在公堂之手，周围五六里以内，用的公禁公采制度。所谓“公禁”者，不但禁止买卖，而且绝对地禁止自由采伐。除非死了人，“倒条把子树，搭墓棚”，才得许可。为公共利益使用，如作陂，开圳，修桥梁，那是可以的。除此以外，只有定期开山，蕗萁三年两开，树木两年一开。由“禁长”召集本村同姓人等到场议定开山日期。到期，每家出一工，到山采伐，所得蕗萁或树卡（开树木山又叫落卡，即砍树枝）共同分配。也有按山林生产情况分成若干小块，召集公众到场拈阄，然后按所分地段各自去采的。以上是家族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还有地方主义的山林“共产”制度。多半以村为单位，由村内各姓人等公举禁长。严禁私采，定期开山等等，都与家族“共产”的山林一样。禁长三个起码，多的到十多个，依村落大小山林广狭而定，以五六个为最普通。禁长均由选举，任期不定，有一年换两回的，有四五年不换的，全看他尽职不尽职。凡做禁长的都要铁面无私，公公道道。“不管你天皇老爷的奶子，捉到了你偷树子，偷蕗萁，均要罚的。”南八区龙图乡有个禁长，捉到了一个偷树子的女子，那个女子对他说：“我倒条子树子搭下子亭子，不要罚我，我同你龙图人都是亲亲戚戚，为什么你就这样没有情呢？”那个禁长回答她道：“不要说你这个卖板子（米果）的昭凤妈，今天就是我的舅婆也要罚，要晓得我刘世烈狂是铁面无私的。”若是禁长不能维持，大家又乱砍乱伐不顾公益的时候，就要“暖禁”（唤起大家注意，恢复从前规矩，叫做“暖禁”。疏忽神明，重新致敬，叫做“暖神”或曰“暖福”）。禁长们每年召开禁山会议一次，一切关于禁山的规矩都是由这种会定出

来的。禁山会临时召集的多，也有“有底子”的。开禁山会的那天，不但禁长们到，而且那个范围内每家都到一人，每人自带酒饭，另外出一毛子或半毛子买菜，并买敬“伯公”（“伯公”就是杨大伯公，什么地方都有，每个树头下，田塅下，山圳上，什么地方都有他）的香纸。以上两种这是说的“共产主义”的公山。还有“资本主义”的私山，乃是香菇山、茶子山、茶叶山、竹山、杉山等，生产品能变卖，出息较大的。这些山原来也都是公山，渐次落在有钱人手里，大概是大地主占一半，小地主（新发户子）及富农占一半。因为开这种山不是有资本的不能开，特别是开香菇山、茶叶山，要大地主，其余则多是资本主义化的小地主及富农。寻乌的山地约作如下的分配：一姓公山占百分之十五，一乡公山占百分之五，私山占百分之十，离人家远开发不到任其荒废的所谓“荒山”，则占了百分之七十。成为荒山的原因，有些是人少山多用不着它，有些则是姓界限制，虽有他姓欲利用的，亦被山主拒绝，只好让其荒废。这种被姓界限制欲开发而无从的情形，到处都有。土地革命之后，这种姓界便消灭了。

八　剥削状况

A. 地租剥削

1. 见面分割制

见面分割与量租，两种同是寻乌县的收租制度。见面分割是禾熟时地主与农民同往禾田，农民把谷子打下和地主对分，双方各半，地主部分要农民送到他家里。有些地方分割之先，由地主先取一担，这一担不在对分数内，这种多半是肥田。地主的理由是：此

田我买来时多费了田价，你佃户耕了省了粪草，若不先取一担，你占便宜太多。但这种办法是很少的，百家之中不过一家。另有一种，是农民先取出些谷子，叫做“撮谷种”，数量是在全数租谷中撮出一撮箕。理由是：秧子打在别人田内，不在你这个地主的田内，打了秧子的那块田，早子[1]没有收，别家地主要受损失，为了补偿佃户亦即补偿别家地主的损失，所以要先撮出一撮箕。当地主自己或派人到场监视分割时，要吃有猪肉有鱼（有些还有鸭子）的午餐。午餐过了，禾分割好了，农民挑了租谷伴同地主或其雇工送去地主家中时，还要加上两个鸡蛋，放在谷子上面一同挑了去，每天都是如此。农民和地主感情好的，送上七八个蛋的也有。

2. 量租制

量租制是“早六番四”。平远是对分。为什么要“早六番四”呢？因为早子价较贵，收获量也更多，交租六成才不便宜了佃农；番子[2]价较贱，收获也较少，故交四成。表面上看，早六番四两档扯平，还是五成，实则不然。地主常得五成六，农民只得四成四。因为早子收获量虽多，每十担中地主现已得去六担，农民只剩了四担了。番子则收获量每十担中往往要比早子少二担，只有八担，交去四担租，自己只得四担，合起早子的四担共得八担。地主却共得十担。成为四点四成与五点六成之比。

大暑（旧历六月）割禾，立秋（旧历七月）量租，地主通知农民把租送来。不见送来时，地主自己打个洋遮子，亲自跑到农民家里去催。再不送来，就派工去取。取又取不着，就调了他的田。有些恶地主呢，就告农民的状，捉了农民去坐班房，不过这种恶地主

---

[1] 早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早稻。

[2] 番子，指一年两季稻的晚稻。

不多就是。原来见面分割占全县百分之四十，量租占百分之六十。近来见面分割的加多，量租的减少，各占百分之五十左右。为什么见面分割的加多起来呢？因为佃户穷的日多，常常一割下禾就没有谷子，地主怕农民收后不量，所以见面分割加多起来。同时农民为怕调田与吃官司，也宁愿见面分割。

3. “禾头根下毛饭吃”

“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说的是刚打下禾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这种情形寻乌简直占百分之四十。为什么禾头根下毛饭吃呢？譬如耕了二十担谷田的，量去了十一担多租，剩下八担多。去年过年和今年青黄不接毛饭吃时借过地主谷子两三担，加上加五利，又要还去三担多至四担多。打禾了，要买好东西招扶地主。禾打过了，买上一点油盐，舂上一点米子，立秋刚到，一切都完。这就叫做“禾头根下毛饭吃”，又叫做“一年耕到又阿啲”。南半县土地斗争中，农民、小孩子普遍地唱了一只歌，那歌唱道：

月光光，
光灼灼。
埃跌苦，
你快乐。
食也毛好食，
着也毛好着。
年年项起做，
总住烂屋壳。
暗婧女子毛钱讨，
害埃穷人样得老。
暗好学堂埃毛份，

有眼当个瞎眼棍。
天呀天，
越思越想越可怜。
事业毛钱做，
年年总耕田。
六月割也就，
田东做贼头。
袋子一大捆，
擎把过街溜。
吗个都唔问，
问谷曾晒就？
穷人一话毛，
放出下马头。
句句讲恶话，
俨然税户头。
唔奈何，
量了一箩又一箩，
量了田租量利谷，
一年耕到又阿嗬！
又阿嗬，
会伤心，
穷兄穷弟爱同心，
穷姊穷妹爱团结，
团结起来当红军，
当到红军杀敌人！

注[1]："埃"，我。"毛"，没有。"项起做"，继续做。"暗婧女子"，再漂亮女子。"样得老"，怎样得老。"暗好学堂"，再好学堂。"割也就"，刚割完。"做贼头"，很恶之意，如贼头一样恶。"袋子一大捆"，用去收租的。"过街溜"，洋伞。"吗个都唔问"，什么都不问。"放出下马头"，打官腔。"税户头"，大地主。"阿嗬"，没有了之意。"爱同心"，要同心。

4. 批田

寻乌地主把田批与农民通通要写"赁字"，没有不写的。五年一小批，七年一大批，是全县普通的赁期。这是东佃间的"规矩"，也就是不成文的法律。只有那种恶地主才敢借故破坏这种法律，三四年或七八年调换佃户。赁字上面写明的是：（一）田眼，写明田的所在及界址。（二）租额，写明见面分割制还是量租制。（三）租的质量，写明要"过风精燥"，不得少欠升斗，如违转批别人。（四）田信，写明每年或每两年交一只鸡公。这种赁字，哪怕少到三担谷田都要写一张。因为若不写赁字，一则怕农民不照额交租，打起官司来无凭据，二则怕年深日久农民吞没地主的田地。赁字只农民写交地主，地主不写交农民。

下面是赁字的一个例：

"立赁耕字人邝世明，今来赁到凌贱贵兄手内禾田一处，土名铁寮坝，禾田一大丘，计租六桶。当日三面言定，每年合纳租谷六桶，限至秋冬二次，早六番四，送至家中，过风精燥，交量明白，不得缺少。如有缺少，任田主另批别佃，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赁字为照。

---

[1] 这个注是毛泽东加的。

每年信鸡一只。

见人　罗长盛
代笔　谢雨霖

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立赁耕字人　邝世明”

5. 批头、田信、田东饭

批头分“批头钱”“批头鸡公”二者。批头钱，每石租普通单批（五年一批叫单批）一毛，双批（十年一批叫双批）二毛，也有三毛的如篁乡等处，均批田时交清。批头鸡公不论批田多少总是一只，也是批田时交。单批转到双批，即五年转到十年，批头钱、批头鸡公一样照交。南半县双批多，如篁乡、双桥两区完全没有单批，就是一份田耕几十年的现在也还有，只很少。地主将田批出去后不久卖了与别人时，退还批头钱一部分与农民。北半县单批多，地主卖田时不退批头钱。

田信鸡每年一只，赁字上写明是“鸡公”，因为鸡公（阉鸡）比鸡婆较大，但农民还是送鸡婆的多。赁字上虽说了每年一只，但农民往往两年才送一只。送的时候在冬收后或过年时节。不见送来时，地主常常自己去催。“田信鸡公送了来啊！”“唔曾畜到。先生！等我后圩买到来。”或者说：“毛啊，先生！今年子总要免下子。”

双桥区有田东饭，每年请地主吃一次。别区很少。

6. 谷纳、钱纳

送租，全县说来百分之八十送谷子，百分之二十折钱。公堂、神会、庙宇、桥会的租，约有一半是交钱的，因为公堂、神会等佃农亦多半有份，因此佃农常常要照当时市价折钱送去，而把谷子留下备自己食用。这种人多半是兼做小生意的或有猪鸡出卖的，才能得到钱。那些豪绅把持的公堂、神会，为了有利他们的侵蚀（候谷

价高时钱卖得多)，便强迫农民交谷上仓，农民亦无可奈何。同一理由，地主田租总是交谷而不准农民交钱，只有离田庄很远的地主才有准许折钱的。

7. 铁租、非铁租

非铁租占全县百分之八十，水旱天灾，面议减少，但每石租只减少一斗到二斗。遇大灾害收成大减时，请了地主来看过了，冇谷（“冇”，当地音胖，冇谷，无米之谷）也要分一点去。铁租是在赁字上载明“半荒无减”，在全县占百分之二十。但实际上农民实行得少，仍然是请了地主看过，精冇照分（精谷就是好谷）。

8. “要衫裤着去捞”

许多的农民把租交过，把债还清，就没有饭吃了。地主们收了那些租不肯出卖。过年了，农民急于得点谷子，地主把谷放出一部分，但不是卖而是借。因为借谷的利息是半年加五（早前的利率是“钱加三谷加四”，近来谷息加四的少了，大多数都是加五），比卖的味道更多。地主卖谷是要到四五月间青黄不接时候，那时价钱抬得更高，但他还要三歪四摆。

农民走到地主家里向地主道：“先生，食了朝?”

地主：“唔，系哟!”

农民然后慢慢地话到籴谷：“您的谷，埃来籴两斗子。”

地主：“毛……啊！自己都唔够食。”

农民：“好哩哪！您都毛谷，河坝里水都毛流！搭帮下子，让斗子给埃，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1]!”

地主：“好，你十分话紧了，埃的口食谷都让点子把你，你肯不

---

[1] “等稳就要做到来食啊”，意思是等米下锅。

肯出这多价钱呢?”

农民:“先生,莫这样贵,算减点子给埃!”

价钱如了地主的意了,然后把谷子粜与农民。

有个传遍全县的故事:篁乡地主刘福郎,是个著名刻薄的人,青黄不接时候,他把冇谷掺进精谷里发粜。有一天,有个农民到他家里籴谷子,他叫他的媳妇和女儿道:“要衫裤子着就要去捞!”农民们把他这句话传了出去,就成了全县闻名的大笑话。为什么这句话会成笑话呢?因为寻乌习惯,女子偷人叫“捞”,把冇谷掺进精谷去也叫做“捞”。他当着农民不好明说把冇谷掺进精谷,一个不留心,对他的媳妇和女儿说出那句好笑的话来,就成了流传至今的典故。

9. 劳役

劳役制度全县都没有了。地主有紧急事如婚丧等类,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事。地主带耕一点田地,农忙时候,也常常求佃户替他做工。但通通是出工钱的。

10. 土地买卖

据知事公署粮柜上当雇员的刘亮凡说,民国十四年全县把田出卖的有六百家(买田的不足六百家,因为有一家买几契田的),以全县三万家计(十二万人,每四人为一家),每五十家中有一家破产。至于典当,更多于卖绝,每百家有五家把田典出(典进的每百家有二家,因一家有典进几契田的)。即是寻乌近年每年有百分之二的人家破产,有百分之五的人家半破产。

田价:坑田每石租十七元到二十元,塅田每石租三十元到四十元。普通坑田二十元,塅田三十元。典当坑田每石租典价普通十五元,塅田普通二十元到二十五元。

典当分为“过手”“不过手”。过手，是田主收了典主的典价之后，把田交了给典主，典主收了田或自己耕或佃给别人耕，都由他作主，田主不能过问。过手之后，典主也没有租送给田主了，田主除了保留收回权之外，简直和卖绝一样，因为主权的大半已在典主手里了。不过手，由典主将典价交与田主，而田仍由田主耕种，每年量租给典主，租率是照普通田租一样，每一石谷田交一石谷租(两档共)。譬如塅田典价每石租二十元，田主得了二十元，交出一石租，每石谷价普通四元，利率是年二分。为什么典田利率低于社会借钱利率呢（普通借钱年利三分起码)？因为一般富农（新发户子们）的心理，高利放债不如低利典田靠得住，“把钱放到泥里头”是很稳当的。富农们为什么不买田而去典田呢？因为农民和地主的破产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先典后买”，成了普遍现象。但“田就姓大，一典就卖”，也是普遍现象，故买田与典田仅仅相差一间。过手不过手二者，过手的占百分之九十，不过手的占百分之十。不过手的多半是包租（铁租)，但也有法律上过手，而由原主向典主书立赁字成为东佃关系仍耕着这份田地的。这是于债主（典主）债户（田主）关系之外，再加一层东佃关系。

不过手典当的田，有些是偷典的。就是那些“嫖赌食着”的少爷们，当他们赌输了或者没有嫖钱了，欠了暗帐，不得开交的时候，便瞒了他的父亲把田秘密典给那些强房大姓的富农或地主之手，等到他的父亲死了，然后把田过手。为什么要典给强房大姓呢？因为只有强房大姓才不怕事，秘密发觉了，他就公开起来，也不怕他的父亲不依。

典田不过手，也是典主对田主的一种重利盘剥的机会。因为田主每年交租交不清时，典主就对那未清部分行起息来，年年加多，

最后非把这份田完全卖给典主不可。这种欠租利息是三分以上的高利贷，而不是二分的典价利息。

B. 高利剥削

1. 钱利

钱利三分起码，也是普通利，占百分之七十，加四利占百分之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二十。通通要抵押，有田地的拿田地抵押，无田地的拿房屋、拿牛猪、拿木梓抵押，都要在“借字”上写明。大地主、中地主、公堂、新发户子（发财的小地主及富农）都有钱借。其中以借额论，中地主占百分之五十，新发户子占百分之三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二十。以起数论，新发户子最多，占百分之七十五，中地主占百分之二十，大地主及公堂占百分之五。以借债人论，加五利（年利五分，每百元利五十元）、加一利（月利一分，每百元年利百二十元）差不多通通是贫农借的。加三利（月利三厘，每百元年利三十六元）也有，但极少。以贫农借额作一百，加三利占百分之二十，加五利占百分之七十，加一利占百分之十。贫农的借主多半是新发户子，三元五元，十元八元，零零碎碎，利上起利。抵押品贫农无田可指，多半指房子，指牛猪。借主时时想吞并贫农的房屋牛猪，或他很小的一块田，或一个园子，察到贫农要钱用，就借给他，还不起，就没收抵押品。也有中等地主借这种吞蚀贫农的小份子债的，古柏的祖父古有尧就是一个例。他曾经用这种借贷法吞并贫农三个菜园子、两个房子。今天借一元，明天借两元，逐渐成一大注，便有资格吞并一个菜园子了。他常常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为这些事颇妨碍于他个人的发财。他算得个典型的重利盘剥者。

加三利，多半是富农向富农借的，借债的用途是做米贩、做猪贩或者往市上开家小商店。为什么富农向富农借得到加三利，贫农只借得到加五、加一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趸”。普通总是二百元、三百元一借，还了来，作得用，不像贫农之三元五元一借，零碎得很，还了来，也不能作个什么用。二是靠得住。富农有田契作抵押，他的经营又是生利的、有希望的，不像贫农之财产很少，借钱多半是为消费或转还别人债务，很不可靠。

中等地主的钱多半是借给那些小地主中之破落户及正在走向破产路上的农民，他的目的也是在于吞并土地。

大地主及公堂的钱很少借给人家的，因为大地主的目的在享乐而不在增殖资本，做八十酒呀，起大房子呀，留了钱做这些用，送子弟读书也要用钱（这不是他的重要目的）。一小部分商业化的大地主，拿了钱去做生意。因此，也就无钱借与别人。那些有多钱余剩的，没有工商业可以大注地投资，零零碎碎借给小地主及农民，既借不得几多，又不甚可靠，他就宁可挖窖埋藏，不贪这点利息。加以军阀捐派频繁，看见多钱出借之家，就这也要捐，那也要派，闹得不得下地。陈炯明部下林虎、刘志陆[1]，在篁乡向大中地主、公堂、神会派了万多元，派过两三次，因此更发使他们把钱藏起来。

2. 谷利

谷利比钱利重得多，乃富农及殷实中小地主剥削贫农的一种最毒辣的方法。十二月、三月两个期间借的最多。贫农为了过年，故十二月要借谷；为了莳田，故三月要借谷。不论十二月借，三月借，均六月早子收割时候要还他，利息均是加五，即借一石还一石

---

[1] 刘志陆（1890—1941），广东人，曾任广东潮梅镇守使、粤军第二军军长等职。

半（三箩）。这种六个月乃至三个月算去百分之五十的利息的制度，乃是高利贷中很厉害的。

贫农六月收下早子，还去租谷和借谷，吃到八月就没有谷子了，又要跟地主富农借谷。八月借谷一石，十月打番子时候还他，加二利，要还一石二斗。若贫农十月还不起，只得同债主说："埃今年毛有还了，明年早子收了再还。"债主就说："也可以的，本利加算起来才行。借给你的那一石本，算加五利是五斗，那利息二斗利上起利也要加五，就是一斗，你明年六月总共还我一石八斗。"（本一石，加利二斗，又加利五斗，又加利一斗，共一石八斗。）那末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一个对年，共是加八利。假若他明年六月又还不起，那末从一石八斗再行加五起算。假如那个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3. 油利

油利是所有借贷关系中的最恶劣者。所谓"对加油"，寻乌南半县有茶子山的地方都有的，北半县没有茶子山，所以没有对加油。什么叫做对加油呢？借一斤，还两斤，借两斤，还四斤，借四斤，还八斤，这样叫做对加油。什么期限呢？九月打油时候为标准，九月以前一年之内不论什么时候借的，一概对加利。

油山[1]是地主或富农的，租给贫农耕种，地主富农收油租，二十斤油收十斤，六十斤油收三十斤，计收百分之五十。地主富农收了这些油租，大概百分之九十是挑赴市场发卖，百分之十是用对加利借给贫农。但他借时，往往说这油是他儿子或他媳妇的私家油。有些呢，也确是他儿子、媳妇的私家油，富农家里的媳妇们和他还

---

[1] 油山，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没有当家的儿子们常常有私油。它的来历是，当摘茶子的时候将过了，茶子树下的零茶子遗落没有拾的，他们就拾起，打出油来作为他们的私财，他们就有资格放高利贷。

“先生，借点钱给挨！”

“毛！”

“借点谷给挨！”

“毛！”

“毛有吃了，总要借点子！”

“油就有，挨奶子的。”

贫农目的不是借油，因为油利太贵了，但因为地主富农钱谷都不肯借，迫着只得借油，借了油去变卖成钱，再籴谷子吃饭。

也有借油吃的。贫农们打禾子，没有油吃，提个壶子跑到地主富农家里借一壶油，六月借油九月还，一壶还了两壶去。贫农家里没有秤，有些贫农的老婆、媳妇也不识秤，借一壶还两壶，她们是容易记得的。

4. 卖奶子

上面第二节里所说十年拖欠的话是假设的，事实上债主很少准许农民一笔账拖到十年之久。他总是压迫农民很快还清，还清一次，再借二次，因为他怕农民欠久了靠不住。通常情形是准许农民还本欠息，息上加息，推算下去，也只三年五年打止，不准太欠久了。债主怎样强迫农民还债呢？打禾了，债主挑了箩子走到农民的稻田里去，对农民说：“你的谷子还了我来！”农民无法，望着债主挑了谷去。既交了租，又还了债，“禾头根下毛饭吃”，就是指的这种情形。许多的农民在这种情况之下扯着袖子揩眼泪呢！

“嫁姑娘卖奶子，都要还挨。”这是寻乌的习惯话。债主们对那

种“可恶的顽皮农民”逼债，逼到九曲三河气愤不过的时候，往往是这样说的。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刘亮凡是城区富福山人，富福山离城十八里，那村子里共有三十七家人，分为刘、曹、陈、林、黄五姓，共有五家卖奶子（客籍叫儿子曰奶子）的，内三家都姓刘，是刘亮凡（城郊乡苏维埃主席）的亲房，名字叫做刘昌育、刘昌伦、刘昌纯，其他两家，一家叫林芳廷，一家叫陈良有。刘昌育（刘亮凡的胞叔）是小木工人，余四个都是佃农。刘昌育有四个奶子卖去三个，刘昌伦三个奶子卖去一个，刘昌纯两个奶子卖去一个，林芳廷三个奶子卖去两个，陈良有一个奶子卖去一半。五家都是因为破产到完全没有了，没法子，把奶子变卖得些钱，一面还清债主的账，一面自己吃饭。买主都是附近村庄里的本姓绅士和富农，绅士更多，富农次之。卖价每个百元（起码）到两百元（最多）。卖时两家在名义上不说“卖”而说“过继”，但社会上一般都说“卖奶子”。要写张“过继帖”，普通也叫作“身契”。过继帖上面写道：

“立过继帖人某某，今因家贫无奈，告借无门，人口嗷嗷，无力养育，情愿商请房族戚友将所生第几男过继于某宗兄为男，当得身价洋若干元。自过继之后，任凭养父教读婚配，倘有打骂等情，生父不得干涉。两方甘愿，并无勒迫，不敢生端异说。恐口无凭，立此过继帖一纸为据。

媒人某押
某押
某押
房族某押
某押
某押
戚友某押
某押
某押
父某押
母某押
兄某押
弟某押
某某代笔
某年某月某日立”

这种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房族戚友临场有多到十几个的，都要“画押钱”，归买主出。亲房及强梁的（多半是绅士）画押钱要多，有十多元到二十元的，普通房族戚友画押钱每人一元以内。奶子的年龄有三四岁的，有七八岁的，有十三四岁的。买卖奶子，由媒人背了送到买主家。这时候奶子的父母总是痛哭流泪，甚至两夫妻打起架来，妻骂夫没有用，寻不到饭吃要卖奶子，旁人也多有替他们流泪的。刘昌育卖奶子，他的侄儿刘亮凡就是一个看不过意流了泪的。现在讲到调查会的第二个农友李大顺，看他供给的材料又是怎样？他是双桥区的黄沙村

人，他那个村是个有人家四百户左右的大村，内中卖奶子而被他亲眼看见的有五家，每家卖出一个奶子。有一家是卖往广东平远县的八尺地方，李大顺在路上撞到这个背着小奶子的父亲往平远方向一路哭了去，这人撞到熟人脸上不好意思到十分。他为什么要把奶子卖往广东八尺呢？因为卖的价钱更高，一个奶子卖得二百多到三百元。不论卖到什么地方，四五岁的幼年奶子卖的价钱更高，因为容易“养得疼”（带得亲）。年龄大了，像八九岁的、十多岁的，反倒卖不起价钱，因为不容易带得亲，并且容易跑掉。至于到调查会的第三个农友梅治平，他是双桥区蓝田村的农民，他村里也有卖奶子的事。他的叔父梅宏波穷得不得了，三个奶子一个过番（往南洋）去了，一个在家，一个卖往平远。附近暗径村，贫农梅传华七个奶子，卖出五个。那天调查会到的就是刘、李、梅三位，他们自己村子里出卖儿子的事，就有上述那么多起。三人中一个是北半县人（刘），两个是南半县人，那末全县的情形也不难推知了。据他们说，在他们所知道的地方，每百家人家有十家是卖过儿子的。刘亮凡说，他曾见过和听过卖儿子的事，在他家乡的附近共有上百的数目。

普通总是卖儿子，卖妻卖女的不经见。

听见人家卖了儿子了，债主就急急地到他家里去讨账。“卖了奶子还不还埃（我）吗！”债主很恶声地叫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这时候是他这笔债的生死关头，卖了奶子犹不还他，钱一用掉，永久没有还债的机会了，所以他就顾不得一切了。

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

5.　打会

打会的目的是互相扶助，不是剥削。如为了娶媳妇，做生意，

死了人要埋葬，还账等等，就邀集亲戚朋友打个会。但月子会、隔年会、四季会，因为标利很重，结果变成剥削农民。

打会的人（会头）不是全无资产的人，多半是中农阶级及小商人中间打会的多。富农不消打会，极贫的贫农想邀个会也邀不到，只有半自耕农，佃农中之有牛力、农具者，自耕农，市镇上较活动没有破产危险的小商人，他们邀会才有人来。

会有长年会、半年会、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五种。

长年会是六个人，六年完满。除头会外，每人出洋十元，共五十元，交与头会。头会“没本盖利”，三年加三（每年盖利十五元，共四十五元），两年加二半（每年盖利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计六年头会要盖利八十元，本则“没收”去了。二会以后没本盖利制度与头会同，惟利息逐年减轻。如二会是二年加三（每年十五元，共三十元），二年加二半（每年十二元五毛，共二十五元），一年加二（十元），共盖利息六十五元。三会以后盖利更少。“头会卖脸皮，二会捡便宜”，说的是头会虽得经济利益，但须低头求人才打成会，二会既不求人又得利益。

半年会采取标息制度，每半年标一次，人数八个起码，九个、十个、十一个以至二十多个都有。半年会不是没本盖利，而是每半年一了。（月子会、四季会、隔年会缺。）

C. 税捐剥削

1. 钱粮

（1）地丁　全县一千四百二十四两，每两还正税大洋三元，附税二角四分。它原本不是钱而是米，每石谷田完地丁米八勺（每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每升地丁米折成忙银六分四厘二，再照每两忙银折成大洋三元二角四分，约计每石谷田完大洋二分。相传从

前安远典史杨霄远跑到北京皇帝老子那里，头上顶个盘子，盘子里面覆着许多酒杯子，表示安远、寻乌两县山多田少，手里拿着一篇奏文，上面写着“万顷山冈一线田”等等话头，请求减轻田赋，弄得那个皇帝大发脾气，说你那么个小官敢到我的面前上奏，我可不依，喝声推出斩首。然后拿了奏文一看，看到“万顷山冈一线田”的地方，却说“话还说得有理”，就批准他的奏文。因此安、寻两县田赋较之他处为轻。至今两县地主富农当每年完粮时候，还要拿些香烛到杨霄远庙里祭他一番。两个县城都有杨公庙。

（2）官租　篁乡全区，三标区一部分，城区也有一点，名曰“官田”。政府收官租不收地丁，共计九百四十多两，较之地丁贵得八九倍，大概每石谷田要完小洋二毛。为什么有这种官田呢？明朝篁乡出了个“霸王”，名叫叶楷，盘据篁乡多年，与明朝皇帝作对，皇帝用计把他剿平，把所有篁乡全区叶楷管辖地方的田地充公，名曰官田，禁止买卖，只能用佃户与佃户之间转移田地的名义，叫做“顶退”。三标官田的来历与篁乡相同，那里曾为叶楷部属占据过。城区的一点小的官田，则因那里的人曾经犯了皇帝老子的法，因此没收了他的田来。

（3）合计　地丁、官租二项，合计银二千三百六十余两，每两折三元二角四分大洋，也不过七千六百四十余元。由于沙冲水破，逃亡孤绝，贫苦拖欠几种原因，每年有两成收不到手，实际只能收六千一百十二元左右。

（4）苦甚　上述田赋数量，每年不过六千一百余元，而县署用款如行政经费、司法经费、监所经费、人犯囚粮、慈善经费各项，每年须用一万余元，以之抵充，不足远甚。故到寻乌做官的人，莫不觉得苦甚，便一意勾结豪绅，借种种事故压榨贫民。至于烟、

酒、屠宰等税，直接归省政府，不与县署相干，县署能指挥的只有田赋一项。

（5）陋规　县署钱粮经征柜上有几种陋规：第一是银水，每块钱至少吃去半毛至多一毛。譬如市价每小洋十二毛折大洋一元，粮柜上却要收十二毛半，全年六千一百余元，每年可吃银水三百多元，这是粮柜上的第一个大剥削。经征主任没有薪水，专靠银水及其他陋规养他。第二是过割礼，又名割粮礼，民间买卖田地要交割粮礼，粮柜上每户要收过割礼二毛，全年约有六百户割粮，可得一百二十元。第三是填写礼，田地买卖不但要交割粮礼，而且要税契，就是要拿土契到粮柜上斢张官契（财政厅发下来的），将土契文字填写到官契之上，每张收填写礼二毛，全年所得总数与过割礼同。第四是券票礼，即粮票钱，每张小洋三分，全年约二千张，共六十元。以上四种陋规，除银水外，都是公共的。每个知事新到任，粮柜主任要孝敬二十元至三十元与他，名曰“点规”，即是希望新任知事再点他做粮柜主任的意思。此外，还有过节礼（端午）、过年礼，不但要送知事，而且要送财政科长，知事送物，科长送钱（十元到二十元）。这些耗费都是出之于陋规。

（6）管钱粮的　寻乌县有三个管钱粮的，刘士辉、刘梅芳、黄少堂。民国以来就是他们管钱粮，他们挟着几本粮册做宝贝，勾结历任县知事把这个职务当做世袭。由三人中互推一人为主任，其余两人为户书。红军到城，三个都挟着粮册跑掉了。

2. 烟酒印花税

寻乌的烟酒印花税，每月小洋各六十元，共百二十元，一个商人承包，在北门内设个税局。除县城外，每月往澄江、吉潭、三标、石排下、留车、车头、牛斗光、珠村圩、荒塘肚、公平圩、篁

乡圩、中和圩、岑峰圩、茅坪圩、龙岗圩、上坪圩等十六个圩场收税一次。每个小酒摊子卖酒，每个小杂货店卖黄烟，都要抽税。老实的，多敲他一点，调皮的，照章程收。每月一百二十元包税，实收可得二百元，赚八十元。税局要用局丁二名、火夫一名。包商多半是赣州人。

3. 屠宰税

也是包，每月八十元税额，实收百五十余元，赚七十余元。也设一个局，局丁一名，火夫一名。局丁不但招扶局长，还要帮他出外收税。百五十余元，城中即占四十八元八毛（三个肉案）。包商也是赣州人。只能收到圩场有定案的屠户，章程虽然说的乡下人家杀一个猪也要完税，实际收不到。

4. 护商捐

是一种地方捐，普通叫做“百货捐”。国民党经费、靖卫团经费都从此出，公安局没钱用也要拨一份给它。县百货捐总局归地方财政局管辖，县城北门外、吉潭圩、盘古隘，各设分局。油、盐、米、豆、鸡、鸭、牛、猪、羊、狗、水货、杂货、布匹，凡属路途过往货物，无论什么都要抽税，每件半毛起码，五毛为止。米果、水果、柴火、竹木器等附近乡下挑到圩场零碎发卖而非远途过往的东西，不收税。反过来说，一切远途过往的东西都要收税。南半县留车、牛斗光等处群众斗争发展，便无法设局收税。三个分局每月数额二千元以上，吉潭过去有一个月收过二千多元，北门外过去有一个月收过八百多元，盘古隘过去无局，谢嘉猷最近才设立。名字叫做“护商捐”，实则商民恨得要死。

5. 牛捐

县城一处，每年一千七百多元，无局，由三四个股东承包，一

人出面办理。四年来都是新寻派何子贞的老子何学才出面包办。一千七百多元捐额，实际则收二千三四百元，也是一笔地方捐，归财政局管理支配。

6. 赌博捐

名字叫做“公益捐”，包括赌摊与花会，亦属地方经费，由财政局派征收员（何子韶做过两年）管理征收。县城一处每月收一千一百元，盛时每月收过一千八百余元。全县各圩同样要抽。前年每月全县收过三千多元，那时有刘士毅[1]派了一排人来县经办，名曰“防务捐”，每月提去二千元。赣南各县都是如此。后赣南旅省同乡会向省政府告了刘士毅，他不得不撤销，但地方豪绅继续征收如故。这是地方豪绅与刘士毅斗争的一幕小史，许多县都有这种斗争。

7. 财政局总收入

财政局的收入是牛捐（年一千七百多元）、护商捐（年二万四千元）、考棚租（二千元左右）、宾兴租（以谷折钱计三千元左右）、孔庙租（三百元左右）等，共计年收三万元左右。其用途是，国民党县党部、靖卫队、财政局、建设局、教育局、清乡局、公安局、新寻学校（何子贞、何挺拔办的）、普化学校（在澄江，谢嘉献、蓝玉卿办的）的开销，总而言之是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所从出。

8. 派款借款

省政府的赣省公债派过三千元，二五库券派过二千元，中央公债派过一千元左右，金融善后借款派过四千元，军阀过往，如林

---

[1] 刘士毅（1886—1982），江西南昌人，曾任国民党军江西独立第七师师长、第五师第十五旅旅长。

虎、刘志陆、李易标、黄任寰[1]、许崇智、赖世璜过了多回，前后派过四万多元。以上这些派借款项，由县署分摊到各区、各村、各圩，凡有一石谷田以上的，小商一百元资本以上的，均要派到。凡操到政权的豪绅地主大商，从县到乡各级机关的办事人，均不出钱，对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为之设法酌减。于是款子都派在那些老实的弱小的地主、富农、商人身上。还要加派手续费、夫马费、茶水费，如上头要派一千元，财政局就要派一千二百元，接下去区乡两级又各要加派，借此渔利。上面借了款去如公债等，间有还下来的，军队借款亦间有还来的，县城及各区保卫团豪绅们一把吞了下去，从不发还与借户。汪子渊当保卫团总时，吞没军队还来借款一千余元，惹起篁乡一带借户和他打官司，始终没有打得出一个铜板。

九　寻乌的文化

女子可以说全部不识字，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百人。男子文化程度并不很低，南半县文化因交通与广东的影响比北半县更加发达。依全县人口说，约计如下：

不识字	百分之六十
识字	百分之四十
识字二百	百分之二十
能记账	百分之十五
能看三国	百分之五

---

[1] 李易标，曾任北洋军阀广惠护军使、粤军第四军军长等职。黄任寰，曾任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能写信	百分之三点五
能做文章	百分之一
初小学生	百分之五（五千人）
高小学生	百分之八（八千人）
中学生	五百人
大学生	三十人
出洋学生	六人
秀才	四百人
举人	一人

（上列的百分数是每一项对于人口总数的比例。）

高小学生多于初小，是因为进高小的多由读蒙馆后直接进去的。全县初小每区不出十个，七区共七十个，每个以五十人计共三千五百人。此外半新不旧的初小，有其名无其实或者连招牌也没有挂的有八十个，学生约一千五百人。两项共五千人上下。

高小每区至少一个。双桥区经常有两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四个。南八区有二个，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过三个。城区有二个（城内之城东学校及田背之曹仓学校）。篁乡有一时期（三二五暴动前）有三个。县城有三个（除城东）。全县经常有高小十三个，最盛时期（三二五暴动前中国大革命前后文化运动高潮时期）有十八个。普通每校有一百学生。前清光绪末年办起到最近，最老的有二十多年历史，共有学生一万左右，一万人中已经死掉了二千左右。高小学生大部分是小地主子弟，大地主与富农子弟各占小部分。

本县有四个中学，但都短命。项山大地主“屎缸伯公”办的知耻中学（项山小杭）办了一年，双桥地主们联合办的尚志中学（在

坵坊）办了半年，澄江公立的普化中学（在澄江圩）办了两年，革命派办的中山中学（在县城）办了两个月，总共出了一百多个没有毕业的学生。中学生的大多数是在梅县、平远、赣州三处中学读书的（每处各一百名左右）。全部都是地主子弟，其中亦是小地主占大多数。

大学生中大多数出于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只占着五个。刘维炉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了一学期，刘维锷在北大读了二年，邝才诚在北京师大读了一年多，三个都是共产党员。二刘三二五暴动时被杀，邝任红军五十团参谋长，在澄江被谢嘉猷捉着割死。邝世芳在北京朝阳大学读四年，病死，思想是革命的。凌得路在北京文化大学读一年，到俄国留学，以不能供给饭费，在芬兰使馆教大使家塾，思想是革命的。五人都是由祠堂供给学费才进大学的。大地主出身的二十五个大学生（及专门学校学生）全部反动，主要如何子贞（河南矿务学校读了两年，寻乌靖卫队长）、赖世源（北京师大预科二年，在篁乡参加反革命）、刘鸿翔（北京文化大学读两年，在南八区领导反革命），三人均在寻乌，其余多在外头，属于蒋介石派。共大学生三十人，十分之八是读法科。

出洋学生六人中，潘作琴（英国医科毕业，在汕头行医）、丘凌云（到英国走过一回，其实不算留学，天津锅炉公司工程师）、丘伟伍（日本帝大毕业，新寻派中坚，随何子贞跑了）、古子平（从日本买了一张文凭回来，大嫖大赌，篁乡人，做过教育会长，此次在篁乡炮楼中被红军攻走）四人均大中地主出身。曾有澜（最先出外留学的，光绪年间去日本，法科毕业，在奉天、北京、湖北做法官，中山中学派曾捧他为假首领，三二五暴动失败房子被烧，现加入改组派）、邝摩汉（日本留学，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北京文化大学教务

主任，与寻乌大地主谢杰在南京办汽车公司）二人出身不属大中地主。曾是小地主，官费留学日本。邝是贫农，高小毕业，进南昌宪兵学校，有个什么人赏识他，供给他钱去日本。

秀才生存者全县还有四百个，其中篁乡区塘背古姓一村六百人中占去十一个，是秀才最集中的地方。古柏的高祖七十岁，死时起个“圣旨”牌坊，中间写着“亲见七代”，两边写着“眼见五廪贡”“膝绕十二衿”，说的就是那时候他的孙子同时有十二个秀才。塘背古姓的旧文化在全县是最盛的，他们在政治上也历来占着支配的地位。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近数年来，秀才们大多数无所事事，在乡村中当“老太”（本姓农民呼尊长叫“老太”，地方上人称他则曰“先生”）。这班人多半是收租的小地主，一小部分教书（旧书，也有新书），又一小部分行医以为生。秀才都是地主阶级的产物，但也有极少数是从贫农阶级出身，受地主的栽培而读书进学的。寻乌唯一的现存举人古鹿苹，他的父亲是个雇农，苦得没有饭吃。他小时提个小篮子卖小口（糖子、荸荠、咸萝卜等等），后来读书，先生见他聪明，不收他的学费，以此读出头来。他做过两任县知事、两任省议员。他在乡间是个极顽滑的，什么人都同他好，他亦表面上赞成新派，同时又禁止他的女儿剪头发，限制她的婚姻自由。南半县土地斗争起来，他采取反对态度，这次红军进攻古姓炮楼，他又主张投降。

南半县土地斗争胜利，每个乡苏维埃至少办了一个列宁小学校，普通是每乡两个，特别地方（龙图、牛斗光）办了四个，每校学生四五十人。学校及学生数比旧时国民学校增多一倍。小孩子们说：“若不是土地革命我们没有书读。”高小因无经费也没有教员

（革命知识分子忙于参加斗争去了），还没有办起来。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本章目录

一　分配土地的方法
二　山林分配问题
三　池塘分配问题
四　房屋分配问题
五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六　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七　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八　留公田问题
九　分配快慢
十　一个“平”字
十一　抵抗平田的人
十二　原耕总合分配
十三　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十四　非农民是否分田
十五　废债问题
十六　土地税
十七　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一　分配土地的方法

有几种分配土地的方法。主要的是照人口平分。全县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地方没有分配土地。就已经分配了的说，照男女老少平分法去分配的占百分之八十。当土地斗争初起时没有成法可援，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县政府）提出了四个办法，要区乡苏维埃召集群众代表开会讨论，任凭选择一种。那四个办法是：一、照人口平分；二、照劳动力状况分配，劳动力多的多分，劳动力少的少分，即四岁以上、五十五岁以下为一劳动单位分全田，四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分半田；三、照生活财源多寡分配，如做手艺的少分，无他职业的多分；四、照土地肥瘦分配，肥的少分，瘦的多分。施行结果，多数地方采取第一个办法。后头斗争发展，寻乌党就采取第一种办法作为主要办法，推行各区，得到了多数贫农群众的拥护。现在照这个办法来分配的土地，占全分配区域百分之八十。这百分之八十的地方，通通按照人口数目，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劳动能力有无大小，以人口除田地的总数去分配。

有些地方是四岁以下的不分；四岁以上直到老年，不会劳动的分五成或七成，其余分十成。行这种办法的有留车、枫山、上磜、大同四个乡，约有一万人口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照人口平分之后，不会劳动的因为无力耕种退回田之一部分（退的数目多少不等，由本人自定）于苏维埃，由苏维埃补给有劳动力的人耕种。结果成为有劳动力的多分，无劳动力的少分，与县政府提出的第二种办法差不多。不同的是由农民自动地在分田之后退回一部分田地，而不是一开始就按劳动力标准分配。这

样做的有龙图一个乡。还有黄沙乡也是退田，不过不是农民自动退田，而是政府于平分之后见着一些人得了田无力耕种，就命令他们退回一部分。要农民退田，他们也没有什么怨言；不过若硬要退肥田，而不准他们退瘦田，他们就不喜欢。龙图、黄沙两乡共有二千五百人。

此外，还有大田乡的自由耕种，愿耕多少就耕多少。这是因为大田乡经过白色大屠杀，杀死壮丁近百、老小数十，有几家全家被杀，又有二三十人当赤卫队，或往外县做革命工作去了，全乡原有八百人，现只六百人，有许多田无人耕种，同时全乡的牛一条不剩地都被反动派牵去了，所以只得任人取耕，全不限制，牛则从别乡土豪家牵来使用。

二　山林分配问题

全县对于山林，除牛斗光一个乡外，均没有分配，仍由原耕作人经营，名义上全归苏维埃公有，耕种人向苏维埃纳地税。为什么牛斗光的山林分了呢？因为那乡人多田少，农民要求分山迫切。此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仍然迫切要求分山，如附城南门外、北门外一带的农民，因为山权在各大姓公堂手里，小姓农民没山种，他们就迫切要求分山。

三　池塘分配问题

所有权归苏维埃，使用权归农民，由池塘的邻近人家轮流管

理，每年更换一家。全县都是这个办法。

四　房屋分配问题

没有分，但准许屋少的或被反动派烧了屋的，搬进屋多的人家去住。双桥、南八两区被敌人烧屋很多，那些烧了屋的人都搬进附近地主富农家里去住，搬进中农贫农家里去住的也有。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屋主不欢喜新来的人在他家里生儿子。寻乌习惯，若别人在自己家里生了儿子，就认为他那一家的“精灵”会被那新来的人夺去，他家就要衰败了。从前双桥区的芳田乡有个进士叫曾行崧，他是在他的外祖家出生的，后来他中了进士，做了官，人们就说是夺了他外祖家的风水。这件事全县闻名。三二五暴动失败，留车暴动总指挥钟锡璆的老婆避难避到她的外祖家，她外祖恐怕她会生育，就赶快要她走。后头跑到龙川县的一个村子，在那里山上搭了个寮子才把儿子生下来。现在一般被工农占住的人家，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别人在他家里生儿子，但心里是不满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由现在这种“临时借住”改变到“据为己有”，就是把地主的房屋也完全照地主的田地一样加以分配。这亦是动摇封建基础争取贫农的一个策略。

五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

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所以寻乌现在土地分配状况虽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用乡为单位分的，但多数农民对于这一办法并不热烈拥护，而只是不积极反对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积极反对呢？则因一乡之中，村与村的土地数量虽有参差，并不怎样悬殊，照乡为单位分了，他们在经济上所受的损失为数甚为微小。至于那些村与村的土地数量相差很厉害的地方，或者是村的区域很大差不多等于别处一个乡的地方，他们就坚决反对以乡为单位，如城区的城郊乡（分为四村）、新寨乡（分为二村），南八区的珠村乡（分为六村）等处地方，均以村为单位分配。但这种地区不多，只占全县百分之十五。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这区移到那区农民自己不赞成，就是这乡移到那乡也不赞成。“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还有迷信风水，以为祖宗坟墓所在，抛去不利。农民相信风水是于他们的生产有利的。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车头地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那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小龙去（同一个区，相隔十多里），也同样是经济理由。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

六　城郊游民要求分田

城内农民分田最少，每人一石八斗，为全县分田最少的地区。原因是过去耕田的少，过去不耕田而现在要求分田的游民和娼妓很多，因此把田分得少了。娼妓有爱人的跟爱人跑了。没有爱人的无

论如何要求分田，她们说：“没有生意了，不分田会饿死。”人们说她们不会耕，她们说：“我来学呀！”实在她们业已在耕田了。游民同娼妓大多数都是分了田的。那些分了田的游民都是比较有耕种能力的，如有儿子，有少数本钱的；娼妓则是有丈夫或儿子的，她们每家有三五口人，迫切要求分田，若不分给，她们就闹。在这种情形下，政府也就分了田给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不分的，就是纯粹的流氓或娼妓而完全没有耕种能力的。以城郊说，游民分了田的占百分之六十，毫无耕种能力不分田的占百分之四十。

七　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添

城郊最少，每人每档（一年收两季，每季为一档）一石八斗。城区四厢又多一点，每人每档三石多。双桥区最多，每人每档七石以上。龙图、河角圩每人每档七石。但大多数地方都是每人每档分五石。每人每天要食米一斤，一年三百六十斤，一百八十斤合一石，共米二石，即谷四石。分田石数都是水谷（即毛谷），每档分五石的，一年两档共十石。十石水谷能晒八石燥谷，食去四石，尚余四石。这四石谷年节做米果呀，蒸酒呀，去了二三石，剩下一二石，不敷衣服、油盐、社会交际（婚丧年节）的日常用度。那末他怎样补足呢？便靠畜猪子、养鸡鸭、种小菜（指城市附近）、种甘蔗、栽竹木、种杂粮（番薯、芋子、包粟、豆子）以及兼做手工（做各种圆木和各种竹器，如锅盖、桶子、饭甑、脚盆、尿桶、水勺、竹椅子、斗篷、簸箕、米筛、畚箕、火笼、竹篮子等等东西。以上那些竹木器，农民兼做的多，专门竹木工做的少，农民甚至有兼做台、凳、椅、桌的），兼挑脚（挑米脚、挑盐脚、挑豆脚、挑油脚、

挑杂货脚，都是帮助人家挑，挑米盐两脚的最多，余较少），兼做小买卖（贩油、盐、米、豆、猪、鸡以至米果等等），兼为资本家做工（采香菇、做纸工、采茶等）。上举各项，每人兼做一门或两门，用这种方法补足生活。全家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

八　留公田问题

没有留公田。开会分田的时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府留出公田呢？

九　分配快慢

后起的北半县分配得很快，如城区从暴动占领县城到田地分配完毕，只有二十天时间。还有南八区的车头、龙图及三水区的上坪分配得更快，只要一天调查完结，两天算清，又一天宣布，此外的时间是照每人应得的数目实行抽多补少，确定每家田地的区划。这样，至快也需要一星期，**因为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的不愿接瘦，要调配妥当，故需要相当时间。南半县的大部分（除车头、龙图）却分配得慢。去年二月起，双桥一带就有了武装斗争，但到十一月底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才开始发表册下去，做土地调查。调查费了一个月还没有调查清楚。原因是调查方法不对，调查表内容很复杂（人口、成分、文化程度、民族、年龄、土地所有权属谁、土地界址、面积数目、每年收成等等），不必调查的项目也列了进去，

调查手续又很麻烦（县革委将调查表发往各乡，调查好了再送县革委审查），以致延长时日不能分田。今年一月才变更方法，调查表只列简单几项（家长姓名、一家人口总数、能耕种的若干、不能耕种的若干、专做工商业的若干、耕田若干、应分田若干）。调查手续，由乡政府召集“分田大会”，每家出一代表，讨论分田办法之后，当场调查（会场上摆设许多桌子，每个小村的代表们围绕一张桌子，众人口报，一人手录），送交乡政府核清，将人口总数除田的总数，得出每人应分数目，在通衢公布。从调查到公布，只需四天（调查一天，算清两天，公布一天）。剩下就是实际分配，即从第五天起每个乡政府同时派出指导员十多人，分往各村，踏看田地肥瘦，并验第一天调查场中是否实报无误。踏验明白，执行分配，抽多补少，确定界域。这种踏验、抽补工作较为麻烦，斗争亦多在其中，所以须费一星期内外的工夫。用这种方法从调查到分配完毕，至迟不过两星期即可办完。北半县后起地方，就是用的这种方法。

十　一个“平”字

各乡分田会议中，讨论的问题是，乡为单位还是村为单位呢？人口标准分配还是劳动力标准分配呢？鱼塘、园、坝怎样分配（山林、房屋二者，寻乌没有提出讨论）呢？不准虚报，虚报的怎样处罚呢？至于没收标准问题简直不消讨论，因为红旗子一打起，那就是没收土地的宣告，用不着再有什么文字形式的宣告了。简单的问题就是这一大片土地怎样分配。很明显的，以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是最直捷了当，最得多数群众拥护的，少数不愿意的（地主与富农）在群众威胁之下，简直不敢放半句屁。所以一个“平”字就包括了没收、分配两个意义。

十一　抵抗平田的人

双桥区枫山乡有个姓刘的小地主，霸耕自己的肥田不肯拿出去，拿出的只是些坏田。当群众强迫他拿出的时候，他愤然说：“遭人命也不拿！”乡政府不能解决。县政府派人到枫山，才把他压下去，肥田拿了出来。南八区牛斗光也有富农小地主不肯拿出好田。乡政府怕他们，不敢作主，县政府的人去召集群众大会，才强迫富农小地主照办。双桥区大田乡小地主梅元坤是被反动派烧了房子的，自以为有功于革命。当群众要分他的田的时候，他恶声说：“分田呀！头脑壳生硬下子来！”群众告知县政府，县政府要区政府去捉他。区政府负责人梅立三是个共产党员，因与梅元坤同族，把这件事弥缝下去。梅元坤否认说过那句话，田仍分出来，就此了事。还有双桥区荒塘肚乡政府负责人林某及徐溪乡政府负责人林某（他也是共产党员），分田时独得好田。群众说“办事人得好田，我们补来的是坏田”，大为不满，斗争情绪因此低落。县政府把两人的好田撤回补给群众，群众才高兴了。以上几个例子，除梅元坤一家是反对没收他的田地外，其余都不是没收问题，而是肥瘦分配问题。所以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也即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

十二　原耕总合分配

“以乡为单位”，说的是人口单位，不是土地单位。土地是不能

以区域限制的。甲乡的人在乙乡耕了田，乙乡的人也在甲乡耕了田，一乡的人在他的邻近各乡都有土地耕种关系。区与区的交界，县与县的交界，省与省的交界，农民都是互相交错地耕种土地。所以一乡的人拿了他们原在本乡及邻乡耕种着的土地，总合起来，平均分配，被认为是毫无疑义的。寻乌的土地分配也是这样。

十三　暴动在莳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

有三种处理法。第一种是寻乌北半县现在行的（南半县分田在莳田之先，无此问题），上档（又叫“早子”）归原耕，下档（又叫“番子”）归新户。这种办法，富农不吃亏，但一切耕田少的贫农及不耕田的地主与流氓都不满意。特别是地主与流氓觉得没有办法。不能收租了，地主无法得谷。赌博废止，又没有钱借了，流氓失了吃饭的财源。第二种是新户帮钱给原耕，上档亦归新户得谷。这种办法又分帮多与帮少。帮钱多，原耕自然满意；帮钱少，原耕当然不满意。但贫农及流氓群众就纷纷议论，甚至有的说：“几多子家门都了了，你这几根子狗骨气力都唔攒?”意思是说几多大财东都破产了，你这一点点多余东西也舍不得吗?寻乌法律上没有承认这种办法，农民却有自由行之者。像城区有那食不够的贫农帮一点钱给富农，要求富农让了上档的分出部分给他收割，颇有些人家是这样做。第三种是不论上下档谁分了谁就去收获，广东平远县有行之者。

十四　非农民是否分田

流氓在县城方面，略有耕种能力的准许分田，毫无耕种能力的

不分；在县城以外各区，因流氓人数少，一概分田。工、商、学无可靠收入的准许分田，县城及大市镇有可靠收入的不分，不足的酌量补足一部分。红军士兵和革命职业者，不但分田，而且苏维埃动员农民替他们耕种。地主在乡居住的准许分田。僧尼、道士、传教士要改变职业，即不做僧尼、道士、传教士了，方许分田，否则不分。算命及地理先生无规定，因为很少，大概都是分田的。南半县完全没有僧尼、道士、传教士、算命及地理先生等人了，他们一概改了职业。黄沙乡政府主席的父亲死了，请和尚做佛事，农民反对。寻乌本县很少“看地的”，看地的多属于兴国人。和尚很少，全县不过百把人。耶稣、天主两教，县城一个耶稣堂二百多人，一个天主堂一百多人，篁乡一个耶稣堂一百多人，牛斗光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吉潭一个耶稣堂一百人左右，澄江一个耶稣堂七八十人左右，计耶稣堂五个七百人左右，天主堂一个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耶稣堂属美国，过去县城有一个美国牧师，其余四处均中国人传教。天主堂属德国，有一个中国神甫。教徒成分，寡妇（内有贫农）及老年妇人（地主婆）占百分之三十，刁钻古怪的绅士及其家属占百分之三十，弱房小姓的农民占百分之二十（强房大姓的农民不入教），地主出身没有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其他百分之十。大概进教的不外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很坏的，一部分是很弱的。很坏的也不是流氓，而是那乡村中奸滑阴险想当霸王的，他们进教为了利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种是受人压迫贪图保护的贫弱的人，他们的目的在于避祸。

十五　废债问题

分为债与账两项。债是废除二分利以上的高利贷。该欠商人的

叫作账，民国十七年元旦以前的不还，以后的要还。因为寻乌所有的债，没有在二分以下的，所以二分以上的不还，实际上即是整个的不还。亲戚朋友之间讲人情借来不要利息的债务，群众仍归还，但这是非常之少的。欠商人的账多属富农阶级，中农稍有一点。贫农雇农是没有商人赊帐的。

十六　土地税

去年收了抗租所得税，每抗租一石，收税二斗，在双桥、南八两区实行了。今年二月县革委扩大会规定不分等第普遍收土地税百分之十，税率与抗租所得税相等。这是一种不分等第（不是累进的）的税法。五月县苏维埃大会采用赣西苏维埃颁布的累进税法。

十七　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寻乌的女子与男子同为劳动的主力。严格说来，她们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犁田、耙田、挑粪草、挑谷米等项，虽因体力关系，多属男子担任，但帮挑粪草，帮担谷米、莳田、耘田、捡草、铲田塍田壁、倒田、割禾等项工作，均是男子作主，女子帮助；砻谷、踏碓、淋园、莳菜、砍柴割草、烧茶煮饭、挑水供猪、经管头牲（六畜叫头牲）、洗裙荡衫、补衫做鞋、扫地洗碗等项工作，则是女子作主，男子帮助。加以养育儿女是女子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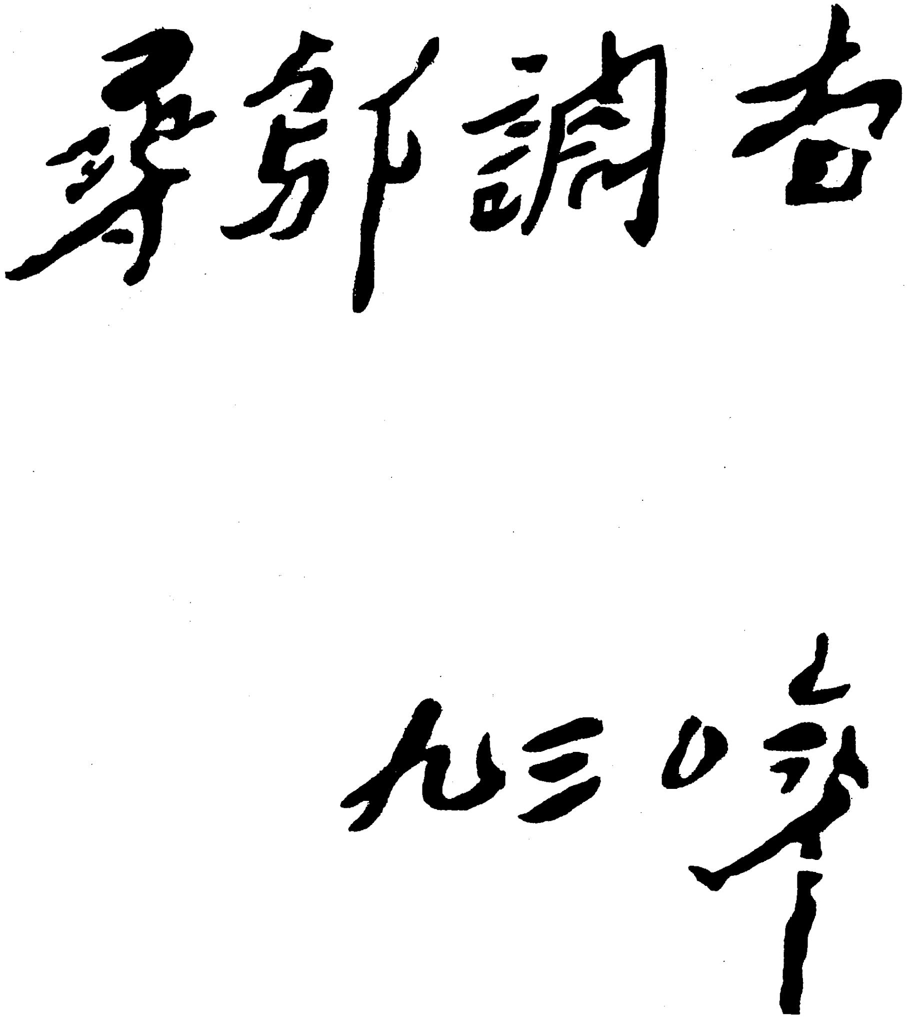
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土地斗争发展，许多地方女子勇敢地参加斗争，这回四军二纵队打篁乡反动炮楼，篁乡的女子成群地挑柴去烧炮楼，又从反动地主家里抢了谷子出来。斗争胜利的地方她们立即有了个人的自觉。各处乡政府设立之初，所接离婚案子日必数起，多是女子提出来的。男子虽也有提出来的，却是很少。十个离婚案子，女子提出来的占九个，男子提出来的不过一个。男子在这个问题上却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其中一小部分男子就消极起来了。“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这就是他们无力禁阻离婚表示叹息的话。这一部分多是属于贫农。一大部分男子是非常强硬的。芳田赤卫队队长曾家勋原有一个老婆，后来又勾到人家一个女子。原有老婆要求离婚，他不肯，对她说：“我家是有进没出的，你要离婚就一驳壳打死你！”龙图的富农刘学盛，反对他的老婆离婚，对革委的主席说：“她要离婚，我就捂了渠。捂掉了渠，我死都愿！”（“捂”，当地读无，消灭的意思；“渠”，当地读已，他的意思。）这一部分男子多半属于富农。政权机关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有过四次变更。第一次是去年十一月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明显地反对一夫多妻，承认原有老婆后有爱人而老婆不反对者无罪；主张有条件的离婚，而其条件并不甚苛，承认一方有疾病的，女子受压迫的，夫妻反目半年不同居的，男子出外一年无消息的，均准离婚；地主阶级毫无条件可离婚。同时在法律外，申明禁止捉奸。这个申明传播后，南半县各地发生很多的男女间纷扰，最显著的是龙图与河角圩两乡（属南八区）的青年男女群众，几乎发生械斗。原因是两乡的青年男子，一群一群地时常调戏对乡成群的青年妇女。两乡的青年妇女都组织了妇女协会，她们有了团结，对于她们自身艰苦的劳动便自由地放松

了一些（她们成群上山去砍柴火，比平素归家时间要晏）。同时和她们的男性青年朋友（对乡的）恋爱的行为逐渐有了许多，在山上公然成群地“自由”起来。他们两乡是同姓别房。到今年一月，因为发生捉奸的事，反对捉奸的群众就去干涉，结果几乎弄成械斗。上述事情之外，有老婆又新找一爱人的差不多每个乡村都有，老婆们就群起反对。政府在这种情形之下，来了一条相反的法律。今年二月县革委会扩大会，对“贞操问题”决议：“已结婚之男女，不准与另一男女发生性交，私奸者严办。”同时对所谓“爱人”问题亦定了一条法律：“反对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制度，原有夫或妇未经离婚，不得另找爱人，过去有些错误的应即马上离去，只同一个结为夫妇。”对离婚问题没有变更。这个决议发表后，纠纷停止了，一致对付当时严重的时局，打破了敌人的“进剿”。五月二日占领县城，同时红军第四军占领了反动的北半县，发动会昌、安远、平远的群众。在这种形势之下，五月六日全县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取消了二月会议的贞操决议，虽然没有明白地规定禁止捉奸，但再不说什么“私奸者严办”了。此次对“爱人”问题采取了二月会议的意见，对离婚问题与前二次会议无异。但大会闭幕不到一个月，第三区苏维埃大会却大大变更了对“爱人”问题、离婚问题的决议，他们的口号是“离婚结婚绝对自由”，当然的结果，不但禁止捉奸，而且什么爱人也可以带了。这个案子通过的地区是寻乌全县斗争最久（一九二八年到今），又是资本主义最先侵入的地区，时候则又在四军到来，会、安、寻、平四县斗争大大发展的时候。当这个案子提出的时候，提案人的演说是：“四军的人说了，有条件的离婚包含了封建思想。”这篇演说过后，案子就马上通过了。城区是新起来的，建设政权不上一月，男女问题已经闹得不亦乐乎。有一乡拒绝县政府派

去的宣传员，他们说：“同志！你唔要来讲了，再讲埃村子里的女人会跑光了！”其实宣传员宣传的是“推翻封建势力”“打土豪分田地”，离婚结婚问题也是照着法律讲的，但一经发动，就如水之就下不可制止。城郊一乡跑了十几个妇人，她们的老公跑到乡苏维埃去哭诉。乡苏维埃在老公们的迫切要求之下出了一张告示，上面说道：“一般青年男女，误解自由，黑夜逃跑，纷纷找爱。原配未弃，新爱复来。似此养成，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偷偷摸摸，不伦不类……。”这篇告示，明显地描画了成年老公们的呼声。不过这种“不伦不类”的潮流——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无法制止的了。

妇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未结婚的青年群众中，差不多不论哪个阶级都拥护婚姻自由的口号。贫农阶级已结婚的成年男子，一般说来是反对离婚自由的，但他们反对的态度不是那种反革命性的顽强态度，他们只觉得老婆跑了不得下地。他们的叹声是：“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他们跑到乡政府请求设个法子，他们也不敢打他们的老婆了，即使是十分呕气的事。富农小地主阶级的成年男子们就完全不同，那种“捂了渠”“一驳壳打死你”，都是他们反革命性的横蛮无理的表示。至于成年农民男子们为什么要反对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没有问题）呢？非常明显，他们是为了劳动力。

那末，农民男子是反对女子解放到底的吗？不是的，特别是贫农雇农阶级他们很快就会给予女子以完全的解放，在他们整个阶级解放完成了之后。他们之所以惧怕跑掉老婆，乃是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充分看见推翻封建剥削以后的成果的时候所发生出来的一种思想。只要土地斗争一深入，他们对于婚姻问题的态度就要大大改变了。



尋鄔調查

九三〇年

1930年5月，红四军在江西寻乌停留一个多月。图为毛泽东撰写的调查报告《寻乌调查》封面。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58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 ……………………………………1

（1930年6月5日）

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8

（1930年6月22日）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9

（1930年6月25日）

富农问题 ……………………………………………………………11

（1930年6月）

流氓问题 ……………………………………………………………28

（1930年6月）

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 ………………………………………………33

（1930年7月29日）

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36

（1930年7月）

撤向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 …………………………………………38

（1930年8月1日）

进攻长沙先取浏阳 …………………………………………………40

（1930年8月3日）

进攻文家市的命令 …………………………………………………41

（1930年8月18日）

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 ……………………………44
（1930年8月19日）
向长沙推进的命令 ………………………………………………………45
（1930年8月24日）
给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 …………………………48
（1930年8月24日）
诱敌出工事外消灭并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 ………………………49
（1930年8月31日）
收缴敌人枪械办法的训令 ……………………………………………51
（1930年9月12日）
进攻吉安的命令 …………………………………………………………53
（1930年9月13日）
攻长沙不克的原因 ………………………………………………………55
（1930年9月17日）
由萍乡出发向吉安的命令 ……………………………………………57
（1930年9月23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 ………………………………………58
（1930年9月29日）
红军士兵会章程*…………………………………………………………60
（1930年9月25日）
第一军团待命攻击吉安的命令 ………………………………………66
（1930年10月2日）
总攻吉安的命令 …………………………………………………………68
（1930年10月3日）
给中共南方局转中央的信 ……………………………………………71
（1930年10月14日）

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72
（1930年10月17日）
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议*………………73
（1930年10月19日）
给湘东特委的信 ……………………………………………………84
（1930年10月19日）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86
（1930年10月26日）
兴国调查……………………………………………………………101
（1930年10月）
分田后的富农问题…………………………………………………164
（1930年10月）
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68
（1930年11月1日）
红一方面军给红三军的训令………………………………………171
（1930年11月16日）
东塘等处调查………………………………………………………172
（1930年11月）
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80
（1930年11月）
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187
（1930年11月14日）
分青和出租问题……………………………………………………191
（1930年11月15日）
给江西省行委的信…………………………………………………198
（1930年11月20日）

木口村调查……………………………………………………201
（1930年11月21日）
八个大胜利的条件* ………………………………………204
（1930年12月22日）
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211
（1930年12月25日）
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214
（1930年12月28日）
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216
（1930年12月29日）
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218
（1930年12月）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219
（1930年12月）
题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联…………………………227
（1930年12月）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229
（1930年12月）
土地政纲……………………………………………………231
（1930年）
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235
（1931年1月1日）
追击谭道源部的命令………………………………………237
（1931年1月2日）
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分散筹款的命令…………………239
（1931年1月16日）

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242
（1931年1月28日）

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244
（1931年2月17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继续东移加紧筹款的命令*……246
（1931年2月21日）

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249
（1931年2月28日）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252
（1931年3月）

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259
（1931年3月17日）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第四号……265
（1931年3月20日）

移动队伍整顿训练并筹款的命令……272
（1931年3月23日）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275
（1931年4月2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九号……277
（1931年4月1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号……279
（1931年4月17日）

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280
（1931年4月19日）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283
（1931年4月）

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292
（1931年5月5日）
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294
（1931年5月13日）
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297
（1931年5月14日）
攻击中村南团之敌的命令………………………………………299
（1931年5月21日）
先敌占领南丰的命令……………………………………………301
（1931年5月24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一至八次会议记录……………………306
（1931年5月、6月）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320
（1931年春）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四号………………328
（1931年6月20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329
（1931年6月22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九次会议记录………………………332
（1931年6月22日）
给周以栗、谭震林等的信………………………………………334
（1931年6月28日）
给十二军军委的信………………………………………………338
（1931年6月30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布告：处决黄梅庄…………340
（1931年6月）

给十二军军委的信……341
（1931年7月1日）
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的命令……342
（1931年7月24日）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345
（1931年7月31日）
题城岗乡苏维埃政府党支部联……347
（1931年7月）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348
（1931年夏）
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命令……350
（1931年8月3日）
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352
（1931年8月8日）
裁减行李马匹的通令……355
（1931年8月17日）
节省经费的通令……357
（1931年8月22日）
题黄陂联……360
（1931年8月）
转移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361
（1931年9月11日）
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364
（1931年9月23日）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369
（1931年9月25日）

挽黄公略联……372
（1931年9月）
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373
（1931年10月14日）
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375
（1931年11月20日）
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380
（1931年11月27日）
戏题兴国“四星望月”菜联……382
（1931年秋）
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384
（1931年11月28日）
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385
（1931年11月28日）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386
（1931年11月）
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389
（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402
（1931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410
（1931年11月）
暂行税则……423
（1931年12月1日）
婚姻条例……428
（1931年12月1日）

关于一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与人民委员……431
（1931年1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434
（1931年1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439
（1931年12月1日）
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444
（1931年12月10日）
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447
（1931年12月11日）
苏维埃建设重要训令……451
（1931年12月15日）
六言诗·苏维埃政府布告……453
（1931年12月19日）
关于实施劳动法的决议案……454
（1931年12月20日）
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455
（1931年12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459
（1931年12月）
和萧劲光的谈话……462
（1931年12月）
反富农问题……463
（1931年）
夺取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宣传大纲*……467
（1931年）

更加积极准备争取第二次大战更伟大的胜利* ……………………468
（1931年）
关于加入过反革命组织的工农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477
（1932年1月1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479
（1932年1月27日）
关于变更和补充居民与苏维埃代表的比例标准………………483
（1932年1月28日）
和何长工的谈话………………………………………………486
（1932年1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三号……………………………………487
（1932年2月1日）
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488
（1932年2月1日）
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实施办法…………………………………493
（1932年2月1日）

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

（1930年6月5日）

从前军及纵队政治部做了一些横的助手的工作，忽略了他的主要工作，是指挥全军或全纵队的政治工作。

军及纵队两级政治部，同时又是群众的临时政权机关。从前对于这一任务的工作，也做得不好，如对于群众请求，缺乏好的答复，对于群众组织及地方政权机关，缺乏帮助他们作成全般的计划，使于红军走后，还能很好的做下去。

一　军政治部的工作纲领

1. 抓住每一个时期红军的政治任务计划，从政治工作上实施起来。例如打倒闽西军阀，扩大闽西赤色政权一个任务，计划着鼓动全军官兵使他们明了这一个任务的意义，提高他们的斗争情绪。

2. 计划督促并检阅全军官兵的政治训练。如（1）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训练；（2）青年士兵的特别训练（青年士兵学校）；（3）一般士兵的训练（普通班）；（4）下级干部的训练（特别班）；（5）供给政治训练材料；（6）规定早晚点名口号；（7）各种集合讲话等。

3. 指导并检阅全军士兵会的组织及工作。

4. 计划督促并检阅全军的宣传工作如（1）供给主要的宣传材

料；（2）检阅并指导各部队的宣传材料与方法；（3）督促各部队宣传队之组织与训练；（4）化装宣传之组织与检阅等。

5. 督促各部队政治机关，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三条纪律及一般军风纪。

6. 督促各部队政治机关，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优待伤兵事项。

7. 督促各部队政治机关，协同军事机关，执行红军各种治军政策，如废止肉刑、废止枪毙逃兵等。

8. 制发社会经济调查表，指导各部队的实际调查方法，并督促各部队做成统计，交由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

9. 计划并督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体。

10. 计划并督促帮助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机关。如革委会、苏维埃。

11. 计划并督促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建立地方武装。如暴动队、赤卫队及地方红军。

12. 计划并督促各部队，或帮助地方政权机关，肃清反动势力。

13. 计划并指导帮助群众机关没收分配田地。

14. 计划并指导各部队，办理群众领袖训练班。

15. 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做深入群众的各种建设工作。如学校、合作社、看病所等。

16. 处理并答复群众的请求。

17. 计划并指挥各部队及最高群众机关，筹措红军给养及群众工作用费。

18. 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及群众机关，良好地执行城市政策。

二　纵队政治部工作纲领

1. 抓住一个时期上级所付于的政治任务计划，从政治工作上实施起来。例如打倒闽西军阀，扩大闽西赤色政权一个任务，计划着鼓动全纵队官兵使他们明了这一任务的意义，提高他们的斗争情绪。

2. 计划督促并检阅全纵队官兵的政治训练。如（1）新兵俘虏兵的特别训练；（2）青年士兵的特别训练（青年士兵学校）；（3）一般士兵的训练（普通班）；（4）下级干部训练（特别班）；（5）供给政治训练材料；（6）规定每周早晚点名口号（在分开游击，离开军政治部工作时）；（7）各种集合讲话等。

3. 指导并检阅全纵队士兵会的组织及工作。

4. 计划、督促并检阅全纵队宣传工作。如（1）供给主要的宣传材料；（2）检阅并指导各部队的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3）督促各部队宣传队之组织与检阅等。

5. 督促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三条纪律及一般军风纪。

6. 督促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优待伤兵事项。

7. 督促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同军事机关，执行红军各种治军政策，如废止肉刑、废止枪毙逃兵等。

8. 督促指导各级工作人员，做实际社会调查工作，并督促其做统计，汇交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

9. 计划并督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体。

10. 计划并督促帮助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机关，如革委会及苏

维埃。

11. 计划并督促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建立地方武装，如暴动队、赤卫队及地方红军。

12. 计划并督促各部队，帮助地方政权机关，肃清反动势力。

13. 计划并指导帮助群众机关，没收分配田地。

14. 计划并指导各部队，办理群众领袖训练班。

15. 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做深入群众的各种建设工作，如学校、合作社、看病所等。

16. 处理并答复群众的请求（如军政治部在一块工作时，须转呈军政治部办理）。

17. 计划并指挥各部队及军需机关，筹措红军给养及群众工作用费。

18. 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及群众机关良好地执行城市政策。

上列各项，和军政治部在一块时，须秉承军政治部的指导办理，离开军政治部时，得自行计划决定，但事后须报告军政治部。

三　支队政治委员工作纲领

一、计划全支队官兵政治训练，并督促和帮助各大队实施。

1. 加紧官兵的政治教育。

2. 指导全支队士兵会工作。

3. 努力使本支队官兵了解上级政策的指示。

4. 随时考查并纠正官兵的错误倾向。

5. 训练并指挥宣传队工作。

6. 计划开办青年士兵学校（督促各部选送学生、指定教授时间地点、教授人员、编定教材等）。

7. 计划并实施士兵特别班的政治训练。

二、监督全支队行政事宜。

1. 督促官兵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

2. 监督经济的管理。

3. 督促维持军风纪。

三、改良士兵待遇。

1. 注意改善管理士兵的方法。

2. 注意改善士兵的日常生活（饮食、娱乐、卫生等）。

3. 注意改善伤病兵的调治。

四、扩大政治宣传，组织群众团体。

1. 计划并指挥召集群众大会。

2. 指挥官兵及宣传队，随时随地对群众作口头及文字和化装宣传。

3. 指挥官兵作社会调查报告上级机关。

4. 指挥官兵组织群众团体，并指导其斗争方法。

5. 指挥官兵战时对俘虏兵之招待与宣传。

五、指挥肃反与筹款工作。

1. 指挥官兵调查并设法逮捕豪绅及一切反动分子，报告上级机关处理（单独行动离开上级较远时，得先处理后报告）。

2. 指挥官兵调查土豪及帮助做筹款工作。

四　大队政治委员工作纲领

一、计划并实施官兵的政治训练，以巩固政治领导，团结官兵力量，增强战斗能力。

1. 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上政治课、集合讲话、宣读报纸、个别谈话等）。

2. 指导士兵会工作（指导开会，在会议中讨论工作各项，并指导执行各项决议案）。

3. 努力使本部队官兵了解上级政策的指示。

4. 注意纠正本部队官兵的错误倾向。

5. 注意对新兵、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二、监督本部队行政事宜。

1. 督促官兵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

2. 监督经济管理。

3. 督促维持军风纪。

三、改良士兵待遇。

1. 注意改善管理士兵的方法。

2. 注意改善士兵日常生活（饮食、娱乐、卫生等）。

3. 注意改善伤病兵的调治。

四、扩大政治宣传组织群众团体。

1. 计划并指导召集群众大会。

2. 指挥官兵或宣传分队随时随地对群众作口头及文学和化装宣传。

3. 指挥官兵作社会调查报告上级机关。

4. 指挥官兵组织群众团体，并指导其斗争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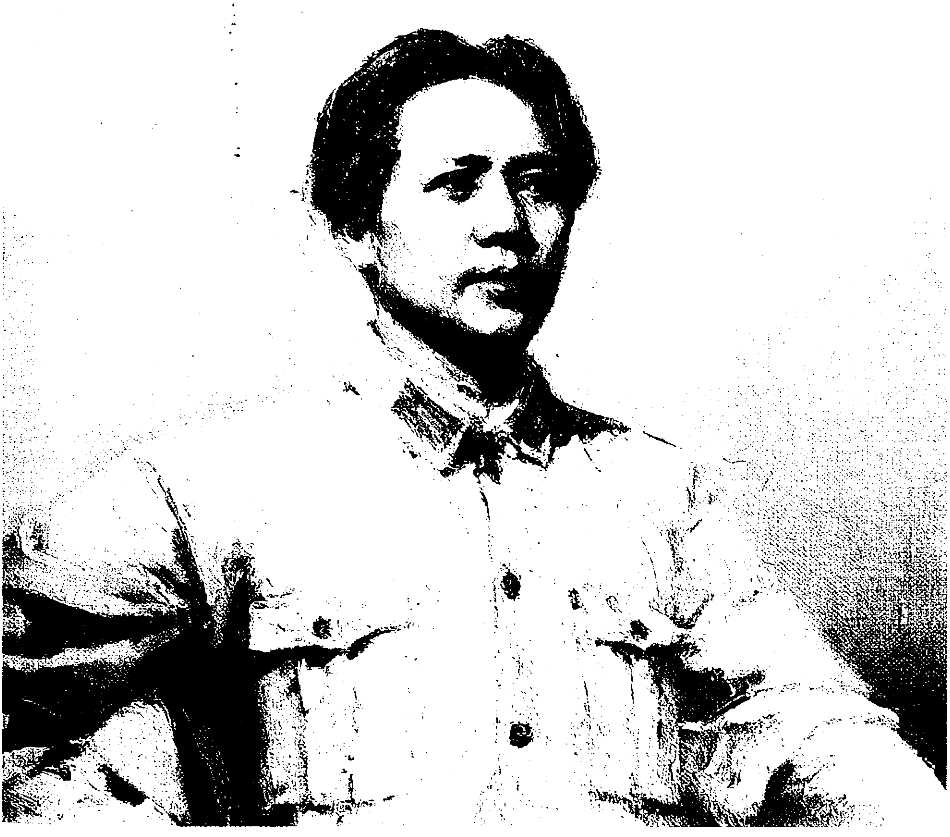
5. 指挥官兵战时对俘虏兵之招待与宣传。

五、指挥肃反与筹款工作。

1. 调查并设法逮捕豪绅及反动分子，报告上级处理（单独行动离开上级较远时，得先处理后报告）。

2. 调查土豪帮助筹款工作。

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



1930年6月，毛泽东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图为油画《毛泽东》。

红一路军由闽西出发向江西集中的命令[1]

（1930年6月22日）

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

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设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

---

[1] 这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联名签发的作战命令的主要内容。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

（1930年6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各地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转各地赤色工会，各省革命互济会、革命学生会，各地苏维埃政府，各军区红军。上海日报，香港日报，上海红旗报，闽西红报，各地红报转全国工农兵劳苦群众鉴：

自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各派都成为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以致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日益增长，资本进攻极其厉害，使中国日趋于殖民地化的厄运，工业衰落，市场凋敝，农村破产，造成中国经济极大的恐慌，特别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造成残酷的军阀混战，延长扩大，这些都证明反动统治已走向崩溃。但另一方面革命势力走向平衡的发展，工人斗争激进农民土地革命深入，红军苏维埃区域飞速地扩大，兵士日趋革命化，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日益左倾，全国革命胜利客观条件均十分成熟，革命高潮已来到我们面前。在这一政治形势之下，革命群众当前任务是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根本把反动政治推翻，夺取全国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本委员会为接受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率红军第一军团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二、第三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

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并号召工农兵贫民群众一致起来，工人实行政治罢工，农民实行地方暴动，白军兵士实行兵士暴动，变军阀战争为革命的阶级战争。我们相信只有广大的革命群众力量才能把一切反动的军阀力量根本推翻，我们相信只有根本把反动的国民党统治推翻才能统一中国，工农兵贫苦群众才能得到解放。劳苦工农兵群众为自身解放，为求全国革命胜利，必须坚决地很勇敢地与红军站在一条战线上。与一切反动势力，国民党军阀、帝国主义作最后的决战。我们更要相信中国革命的胜利，定可掀起全世界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中国反动统治国民党军阀的死灭，而且是帝国主义崩溃的前夜。我们这一决战，即是我们中国从帝国主义军阀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死灭，而且是帝国主义崩溃的前夜。我们这一决战，即是我们中国从帝国主义军阀铁蹄之下解放出来的决战。革命的火药已经爆发，革命的曙光快要到来，我们的红旗将要在全世界飘扬。工农兵贫苦群众们一致起来，将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所加于我们的锁镣打一个粉碎。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委员　朱德　曾山
李元林　刘士奇
邓子恢　黄公略
彭德怀　王怀
林彪　彭清泉
伍中豪　谭震林
陈毅　段月泉
方志敏　邵式平

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富农问题

（1930年6月）

一　什么是富农

富农有三种：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就是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一种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即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佣工人耕种的一种人；第三种是初期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

各种富农对于贫苦群众的剥削有两种共同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高利贷（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和商业性的出卖粮食；第二种富农各有一种特殊方式的剥削，即半地主性富农的剥削地租，和资本主义性富农的剥削雇佣劳动。此外各种富农中有许多是兼营商业的——开小商店及贩卖产品，则是用商业资本方式剥削贫苦群众。

二　富农的反革命性

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但中国富农的剥削则一般带着半封建的残酷性。无论在地租方面，在高利贷方面，在雇佣劳动方面，在商业资本方面，都表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因此这个阶级

的利益和贫农雇农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

在革命初起时，富农阶级虽然有反军阀苛捐杂税的需要，但为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土地和资本），只要革命是从贫农雇农方面而起来的，他们一定站在地主方面和贫农雇农作对。

在革命潮流高潮，富农慷慨焚契分田挂红带子称同志甚至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行为，是为了取得社会地位，争取对贫农雇农的领导权，企图挽救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由目前的保护家产进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是农村斗争中最严重应该唤起同志们充分注意的问题。

在农村斗争深入时，就是在那贫农雇农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权，打落了富农的政治地位，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山林、耕牛，废除了富农的债务时，富农的表现就是造谣惑众和消极怠工。

在革命由危急走向失败时，富农就由动摇、妥协以至完全叛变，站在地反战线，向贫农雇农进攻。

三　对于初期性的富农的争论

过去各方面（特别是东江）只承认半地主性的、资本主义性的两种农民的富农，初期性的则不叫做富农而叫做“中农”，反对把他们多余的土地没收，甚至反对废除他们的债务，这是忘记了这种初期性富农仍是一个剥削阶级。他们虽不收租，也不剥削雇佣劳动，但他们放高利贷，并且高价乘危出卖剩余粮食，这两种剥削是和半地主性、资本主义性两种富农完全相同的。这种富农靠了上述两种剥削，逐渐积累资本，跑向资本主义性和半地主性的两种富农队伍

里去。贫农雇农不但对于半地主性和资本主义性两种富农的土地要没收，债务要废除，就连那初期性富农的土地、债务也要没收，也要废除。凡属斗争深入的地方，贫农雇农都照这样的做了。但在共产党里都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联席会议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坚决地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要和没收其他两种富农的土地，废除其他两种富农的债务一样地坚决。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呢？因为只有没收他们的土地才能回答他们高价乘危出卖剩余粮食的残酷剥削，只有废除他们的债务才能回答他们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这两种剥削都是半封建性的，只有把这两种剥削彻底废除了，农民才算彻底从半封建关系下得到完全的解放，单单废除地主和第一、二种富农的剥削还是不够。

四　广大贫农群众的力量足以克服富农也只有党建立了反富农的策略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彻底完成民权革命任务走向社会革命阶段

在长江、珠江两流域，一般说来，是贫农雇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富农不满百分之十。在农村斗争中斗争的主力是贫农雇农广大群众，加上中农是可以结成同盟的，富农是个极孤立的小群众。富农虽有必然的反革命性，但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是要被广大贫农群众打倒的。那些说南方各省中也有富农或自耕农占多数或占一个颇大的数目（如“江西是自耕农占多数”“梅县大埔自耕农多，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福建长汀建宁富农占百分之四十”等等说法），显然是夸大富农的阶级力量，以为第一步只

应反对地主，反对富农尚非其时。这不只是与社会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客观上的错误，有些并且是主观上企图建立富农的领导权于党内和群众内，模糊党和群众内的阶级认识，减轻以至取消党的反富农任务的一种反革命阴谋。

那些夸大富农的阶级力量以为当进攻地主时应该向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是很危险的。同时仅仅认识富农是“一个极孤立的小群众”而不认识富农的“极残酷的半封建”，也必然要减轻以至取消党的反富农任务，也同样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固然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但若我们的答复不从剥削的本质上看，单从剥削的方式上看，也势必承认“富农不是主要敌人，地主才是主要敌人”，不承认反富农斗争的性质也和反地主斗争一样是反对残酷的半封建剥削，因而我们的结论也必然要走到减轻以至取消反富农斗争的重大任务。放弃了这个任务，就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彻底完成民权革命，走向社会革命阶段。反之，只有认识反富农斗争和反地主斗争同样是反对残酷的半封建剥削，才能坚决地建立党的反富农策略，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才能彻底完成民权革命，走向社会革命阶段，也才能全部推翻陈独秀们的理论根据，不许他们还据有“富农”一个区域在那上面胡说八道。

五　海陆丰斗争失败在盲动主义和海陆丰地方主义，不是失败在反富农

东江的同志以过去海陆丰失败，富农（初期性富农他们所谓“中农”）反水为鉴戒，叫各地不要打击初期性富农，同时别地也时

有这种论调，这和大革命时两湖的同志跟着唐生智、许克祥的尾巴大叫农民运动过火差不到许多。现在大家已经明了大革命失败不是失败在“过火”而是失败在“没有过火”（机会主义）；海陆丰及他处的失败，是失败在盲动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这时革命的全国形势适当低潮，而不是失败在反富农。在盲动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领导之下不论何时都要失败的，决不因不反富农而可避免失败；同时决不能以反富农斗争，和大烧大杀大抢同样列入盲动主义，可以引为以后的鉴戒。适得其反，坚决地和富农斗争树立贫农雇农的绝对领导权于农村之中，乃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六　为了流通金融而保存富农的债不废是最蠢不过的

为了“流通金融”即为了使富农再借钱给贫农，而阻碍贫农群众对富农彻底废债的斗争，这是很不对的。这种口号由富农以欺骗的性质提出来原不足怪，若站在贫农观点上作这种主张则是最蠢不过的。因为农村秩序一骚动，一切借贷赊欠立即停止，哪有斗争到了没收土地时候而有富农出来流通金融之理。一切红色区域的事实早已教训了我们，要流通金融只有靠贫农自己组织信用合作社和苏维埃向富农强借办理低息借贷，靠富农在贫农不打他的条件之下发慈悲心救济贫农，那完全是空想。

七　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

“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南方各省土地斗争中不可

移易的两个中心口号。到处的群众普遍地在执行这两个口号，党却到处做群众的尾巴，要到群众自己执行了才去“追认”；有些更是始终“否认”，则不但是群众的尾巴，且变了群众的对头。这种严重现象如不纠正，党是不能领导南方各省的土地斗争的。毫无疑义“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废除高利贷”两个口号是不适当了，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利用了去作为阻碍贫农斗争的工具。毫无疑义，“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要在南方各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公开地正面地提了出来，“否认”固然是极端错误，“追认”亦是尾巴主义。要拿了这两个口号去发动群众，而不要待群众有了斗争党才加上去领导他，这种“待群众起来了再去领导他”的策略仍是不深切南方各省土地情况，由此而得到机会主义的动摇性的策略，这种动摇性的策略，是于飞快要到来的上万万数目的贫苦农民大斗争之领导，不适合的。

八　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叫出两个口号

有一种意见主张党对富农的策略在白色区域和在红色区域要有不同，红色区域可以打击富农，执行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白色区域仍是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地主债务的口号，这是为了使富农暂时中立使贫农对地主的斗争先胜利。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我们只要承认富农（包括实际是富农而普通看做“中农”的那些农民）数目在农民比例上是占少数（比起地主数目来却是多数），而这少数的富农乃是用最残酷的半封建剥削对待贫农雇农，是必然要反革命的，我们的策略便应一起始就宣布富农的罪恶，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绝不应该模糊富农与其他农民的阶级界限，让富

农得一投机取巧的机会，应该让他一起始就现出本来面目，使群众认识他的反革命。并且富农决不会“中立”，他看见贫农雇农一起来，马上就站在地主战线去，哪有什么中立的事！这种使富农中立的幻想，必然要妨碍无产阶级发动贫农雇农的猛烈斗争，并争取中农与之结成同盟的任务。因为我们若不一起始就提出反富农的口号，贫农便要表示失望，这在闽西和各地斗争中业已证明，因为贫农雇农的敌人绝不止地主一个，还有富农一个，地主的剥削固然是厉害，富农的剥削却是更厉害。

九　不论什么地方都要叫出两个口号

又有一种意见，是承认在某些地方要向富农让步，如一省之内某些县，一县之内某些乡，凡是所谓“富农多数”的地方，在分田、废债两件事上可以不照贫农数多地方一样，由当地苏维埃决定和一般办法不相同的一种办法，如土地依劳动力分配，小资产债务不废除等，上级苏维埃要批评他。这种意见的危险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所谓“特殊地方”为了取得富农的欢心，便完全牺牲了贫农雇农的利益，他们不知道富农多的地方贫农雇农一定更多，把贫农雇农的利益，去迁就富农的利益，这是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党不应如此；第二是准许特殊地方的苏维埃有保障富农利益（即不平分土地，不废除小资产债务）的权利，那么不必真是所谓“富农多”或所谓“自耕农多”（其实这都是南方各省没有的事，只是富农共产党员造的一种谣言）的地方，即在富农自耕农很少的地方，只要那个地方的苏维埃是富农管事，他就可以蒙蔽群众提出这种要求。所以这种意见的危险不啻保障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剥削与压迫，在南方各

省中应该不分地域叫出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方才免去这种危险。

十　分配土地不按人口平分而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只于富农有利

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劳力多的多分，劳力少的少分，这只于富农有利。因为中国的富农主要还是半地主性的和初期性的两种，纯粹资本主义的农场或农业公司是很少的，南方各省中简直看不见几个。中国的富农既是以自己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那末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这于富农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不但有劳力还伴随着充足的牛力、农具与资本，不比贫农虽有劳力，但伴随的牛力、农具、资本很不充足甚至没有，所以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即在贫农中说，那些劳力多的贫农家庭（如一家八人中四人有劳力）因为多得了田，便比较劳力少的家庭（如一家八人中两人有劳力）具备迅速发展为富农的条件。

十一　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当着红白交战胜败未分时候亦即现在这种时候，当前的唯一问题是怎样争取广大群众克服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时候决定一切策略的标准是争取群众，而不是什么发展生产。因为这时候生产的工具（土地等）还在敌人之手，或虽落在群众之手，但仍有被敌人

夺回去的可能，这时候完全谈不到发展生产的问题。那些在这种时候提出发展生产一类不适时宜的问题的，显然是代表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客观上不是什么发展生产而是阻碍斗争发展，帮助地主延长寿命，使革命走向失败的。

十二　按人口平分不但不会减少生产反而是增加生产的条件

上面说了当着斗争激烈时候，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即就发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较按劳力差别分为有利，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未分配时多收百分之二十，以前闽西有些同志所忧虑的“田地分割太小了”“原先未耕田的人分了田不会耕田会荒废”种种可以招致生产减少的危险，现在事实证明不足忧虑，并且适得其反，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什么原故呢？因为贫农及失业群众得了田，就把一切人力用在田内，从前农村中一切不生产的寄生虫和地主及游民现在不耕田就没饭吃，都迫得耕起田来了；从前贫农中之因土地不足而闲置起来的劳力，亦因得了田而使用出来，因此生产就增加了。又因中国的农业生产还在人工耕种人工灌溉人工肥料（绿肥厩肥等）阶段，地主剥削时代贫农以为田不是自己的，不肯努力耕耘，所谓“深耕易耨”他们完全不愿，他们亦不愿整水利，肥料也不愿多放，简直懒得去弄肥料，以此田地日就荒芜，生产大大减少，造成普遍全国的农业危机。闽西农民既得了田，且是平均分配，每人都得一分，便把从前那种怠工现象完全除去，他们愿意深耕了，他们把大规模人力用在修陂圳，与在地

主富农剥削时代陂圳不开大不相同，若不平分则不能把大规模人力利用修复陂圳上；谷草放在猪栏牛栏里造厩肥，把草皮挖起来沤汤作粪，再加上人粪尿，肥料问题也解决了。以上这些都是平分土地发动大规模人力的效果，有了这些效果生产就增加了。

如说他们缺乏牛力，分了田不能耕，那些原先租用富农的牛的，没收了富农的牛就完事（不出牛租就完事），那些原先连租来的牛也没有了，他可以同他的亲戚朋友临时借牛或租牛。

如说农具不够用，他们可以向富农借用多余的农具（富农的多余土地没收了，有农具多余），甚至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

如说田地分割太小于生产不利，这只在大规模的公司农业才有此现象，公司农业在中国简直看不见几个，普遍现象是小农生产，即使是大地主的土地，他亦是分租给许多农家耕种，并不是整租给一个农家耕种，并没有分割太小生产不利的事。并且我们对于农业是要鼓励贫农用集合生产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去，而不是要鼓励富农走向资本主义生产。贫农们集合许多小块土地用合作社方式组成合同生产制度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这样才是我们的目的。

革命时代农产物价格特别低落，剪刀现象发展，富农田多因为耕了没有利益不热心耕，结果反破坏了生产。

一家之中能劳动的少不能劳动的多平分了田亦不会减少生产。因为那一家中少数有劳力的，他们的劳力亦常常能够担负供给全家粮食的任务。并且所谓没有劳力的人，亦不是完全没有劳力，他们仍可帮助一些工作。至于那种大家庭，不能劳动的比能劳动的特别多（如九人对一人），这种情形很少，他可以把田地交还苏维埃，转给别人耕，亦不至使田地荒废。

十三　富农要求留公田并利用共同生产口号

苏维埃的模范农场和合作社式的集合生产，是以农业走向社会化的好方法。但在现在这种斗争时期，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因此现时不能经营模范农场。为了争取群众扩大斗争，应把田地尽数分与需要的人，苏维埃没有留公田的必要；山林及多余房屋，凡属群众需要的亦以分配为原则。那些为了苏维埃要钱用，或为了明年生儿子，主张田地不要全部分配要留出公田，山林和多余房屋完全不分配；还有表面上站在左边主张所谓“社会主义底共同生产”（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由苏维埃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如江西的袁文才、福建的傅柏翠等，都完全是富农路线底主张，这是聪明的富农当革命高潮时延缓贫农分配土地的巧妙欺骗政策。因为贫农忙的不是明年生儿子的问题，而是明天自己吃饭问题，因此贫农的要求是赶快分配一切土地。为明年生儿子留出公田，在贫农眼中完全没有什么必要。至于社会主义生产是要在分配土地彻底肃清封建关系之后由贫农组织合作社集合耕种，在革命的全国胜利之后由苏维埃择地经营农场，由此走向社会主义。若不经过分配过程、合作社过程，就执行苏维埃经营政策，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前途。

十四　何时分田何时得禾

过去的办法是土地分配在下种之后，本届的生产归原耕人收获，这种政策只富农是满意的，贫农大不满意。依这种政策在每年

收一次的地方，贫农及失业群众名曰分了田，实际要等到明年秋禾才第一次收得谷子，每年收两次的地方也要下一次才收得谷子，以此贫农及失业群众不满意。应该何时分田即由分了的人得到田里的收获，富农虽不满意，却取得了贫农及失业群众的拥护。向富农偿价然后得禾，亦是站在富农利益方面的办法，依据贫农的需要连价也无须偿他，因为贫农无钱付价。

十五　谷子亦可以平

农村斗争发展到暴动形势，贫农雇农及失业群众在打豪绅烧契约的斗争中，一定有一种平谷斗争，接着就是平田斗争，所以平谷是农村斗争中一个重要项目。平谷斗争做到彻底的不但要平地主的谷，而且要平富农的谷，拿一乡人口的总数除一乡存谷的总数，无代价地把一切人家的多余谷子平了下来。在这种斗争中我们若站在富农观点上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口号，一定要失掉贫农群众，显然是不对的，无疑要站在贫农雇农及贫苦群众的观点上发动平谷斗争。在游击战争时政权连短时期稳固可能都没有的地方，则要用“抢谷”的方式。虽然，要是抢地主的谷，但群众要抢富农的谷时，我们应完全地拥护群众这种行动。

十六　向富农筹款不是盲动主义

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向富农征调费用是应该的。过去阻止群众向富农筹款把这种行动算做盲动，这是从拉拢富农一个观点出发，根本是不对的。

十七　抽肥补瘦

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末富农得了护符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大不满意，不但闽西，各地亦大都发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妄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

十八　反对富农的调查研究口号，土地要很快的分配

许多富农共产党员阻碍土地斗争，延宕分配土地时间，他们的口号是调查未清研究未好，以致有暴动之后调查研究了三年还没有分配土地的，有调查研究了一年还没有分配土地的。我们应该根本反对这种清谈主义的调查研究。在土地实际分配一个问题上简直不要上级机关的调查研究，只要经过乡政府的调查，马上即可分配。为了迅速地彻底发动群众迅速地传播革命影响，应该很快地分配土地，凡属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

十九　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

土地工农业累进税的目标是供给斗争的财政需要，在这个目标下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为了斗争的财政需要，贫农自不能不出相当的土地税，但必须收得很轻，极贫的（每年食不够的）应该免税。中农出税较贫农可以多一点，但须不违背联络中农的原则，就是说中农出税亦不能太重。对于富农可以抽收高至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为了斗争的紧急需要，得向富农无代价征发剩余粮食。

二十　平分之后仍有富农

现在的打富农，主要目的不在消灭富农而在争取贫农群众，扩大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实则富农打过之后，富农并不会绝灭，因为富农具备种种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即使把他的田地平了之后他仍比贫农要占优势，富农的发展比贫农的发展一定要快，贫农雇农仍然要受富农的剥削（剥削方式是商业性的囤买囤卖和开小商店）。要真正消灭富农，要真正使贫农雇农不再受富农的剥削，一定要在有了民权革命的全国胜利再转变到社会革命的全国胜利把农业社会化了之后，必须依靠城市工人的帮助与指导和贫农雇农自己的努力使农业社会化了，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才被社会化的生产所消灭，那时候一切农民都无产阶级化，农村中才真正没有了剥削，这

就是工业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所要领导农民共同走向的目标。

二十一　批评是鼓励贫农前进而不是对他们泼冷水

当群众热烈地起来做平田斗争时，“妄想平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批评语句，常常为富农以至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利用了去，把意义改变，抵抗贫农的平田斗争，这种例子到处发现，这在正当起劲的贫农斗争不啻泼下一瓢冷水，必然要使贫农失望。原来我们所要提出的批评，不是说平田不好，乃是就农村范围说，平田之后，私产制度没有废除，共产制度没有实现，富农对贫农的剥削依然会继续发现，所以贫农在平田之后，要更进一步用集合耕种方法向社会主义走去，才是最后的胜利。就全国范围说，平田之后，工人还没有汇合农民的力量，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不但依然剥削农民，而且比前更加厉害，造成农村中残酷的剪刀现象，农民虽有饭吃，但无衣穿无货用，一切农产品贱得要命，一切布匹货物贵得要命，农民的生活依然痛苦不堪。农民要解决这种剪刀痛苦，只有扩大红军，扩大斗争，帮助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的大城市取得胜利，打倒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苏维埃管理全国，同时促进了全世界的革命高潮，推翻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农民才能取得全国以至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帮助，把剪刀痛苦消灭。我们的同志应该在每一红色农村中把农村及全国两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如上所指）借各种机会用各种方法告诉农民，鼓励他们向前一步，而决不是站在富农的观点把他们拉后一步。

批评的开始应在平田斗争胜利之后。若正在平田斗争激烈拼命之中提出这种批评，不但容易被富农曲解利用，而且使群众面前涌现两个目标（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容易混淆群众的观念，因为群众在当前目标未实现前只了解当前的目标，不了解进一步的目标，我们若不在当前目标未实现前鼓励着群众猛力实现当前目标，却放松了当前目标去鼓励进一步的目标，群众就会有“既说这样好，又说那样好，究竟怎样好?”的怀疑发生出来。若在群众平田斗争胜利之后（两星期即可完毕平田斗争）开始批评，就没有这种弊病了。

二十二　组织上肃清富农

（1）要保障土地革命胜利首先要肃清党内富农成分

为了争取广大的贫农雇农群众坚决地进攻富农，建立贫农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权，保障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首先就要肃清党内的富农成分，特别是农村中的党，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过去一直到现在地方党的组织，尤其是指导机关里面，不论什么地方，都充满着富农分子。这是因为各地农村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上级机关派去农村工作的人农村中首先出来接洽的多属富农、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由这些知识分子继续引进来的当然只是他们气味相投的同类。到了农村斗争发展的时候，这班富农、小地主党员多半成了支部以上各级指导机关的干部，各地斗争发展之迟缓和不深入都是这班人在那里作怪。高级指导机关的指示被他阻隔着，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一直要待群众斗争发展到冲破了他们机会主义领导，高级指导机关的反富农策略又对着他们压迫，这样高级指导机关的反富农策略才与群众斗争合拍起来，肃清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

富农路线，这种过程，差不多每个地方都经过的。

很显然的，富农（特别是领导机关中）若不洗刷出去，群众斗争是不能起来的。无条件的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是争取群众保障农村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怎样洗刷富农？从各种斗争过程中去观察那些表现富农路线的，就马上给他洗刷出去。

（2）富农不参加苏维埃

要建立农村中雇农贫农的领导，防止富农领导作用，除了党内肃清富农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办法就是剥夺富农的选举权。一切从前的现在的富农不得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当然更不得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及其他一切政权机关职务。这是保障革命由民权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关节，忽视这个重要关节就必定要演出严重的错误。

二十三　发展反富农的理论斗争

不但组织上开除富农，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发展反富农的理论斗争。不论党内及群众内，这种反富农的理论斗争都是大大使之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克服富农路线。不但实际上推翻现在的富农领导，并且要使它在任何时候不能抬头。

流氓问题

（1930年6月）

一　流氓问题成了斗争中一个严重问题

在地方尤其在红军中，随着斗争发展，流氓问题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不正确的观点，如说“流氓会打仗，我们不应该排除他”“三教九流的人都可收容，犯法的办他就是”“只要官长领导得好，士兵的组织成分是不要紧的”“现在不要打击流氓，总暴动时打击流氓不迟”，以上这些错误言论，在红军中时常发现，基于红军中的流氓成分，产生出许多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如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政策、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非常之不利于革命。特别在革命高潮飞快到来加紧布置全国总暴动争取全国胜利的时候，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流氓意识如不克服，流氓成分如不洗刷，斗争的前途是要发生许多危险的。

二　流氓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

同志中许多对于流氓的观念十分模糊，对流氓认识不清楚，以

致不能确定对流氓的正确策略，因此对于流氓有一详细分析，是决定对流氓策略的先决条件。

（1）流氓的来源

半殖民地中国因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大为破产，造成巨大的失业群众，又不能有大规模民族工业吸收他们，这个失业群众没有出路，因此造成大批的流氓。

（2）流氓的社会职业及其特点

流氓约有三十种不正当的职业：1. 土匪，2. 盗贼，3. 娼妓，4. 兵痞，5. 戏子，6. 差人，7. 赌棍，8. 乞丐，（以上八种都是大群众，以下人数较少）9. 讼棍，10. 地保，11. 中人（一部除外），12. 开烟馆的，13. 装水烟的，14. 卜卦的，15. 算命的，16. 看相的，17. 地理先生（一部除外），18. 要把戏的，19. 卖假膏药的，20. 卖武的（一小部除外），21. 游学的，22. 包打听，23. 拐子，24. 拆白党，25. 做烂媒的，26. 人贩子，27. 和尚（一部除外），28. 道士（一部除外），29. 师娘（巫），30. 教徒（一部除外）。

现在争论中所谓流氓，应限于上列各种，他们的人数，平均约占社会总人口百分之五，全国约有二千万。他们的特点是：（一）脱离生产；（二）职业不正当不安定，藉“诈骗”“掠夺”“乞索”为生活；（三）生活不规律。

（3）流氓的党派组织

流氓群众为了争取他们的社会生存地位，有各种秘密结社，如长江沿岸的青帮与红帮，闽粤赣桂南洋的三点会，云贵川湘鄂陕甘的哥老会，闽粤南洋的致公堂，福建的符子会，苏皖鲁豫的大刀会，顺直一带的在理会，东三省的胡匪，北方各省的红枪会及其同类团体，南方各省的三合会及天地会，洞庭湖沿岸的汉留会，上海

的三K党，南昌的兰花会，湘南的青龙会，长沙的蝴蝶采花团等，名目不一，到处都有，但组织很散漫不统一，又多带封建性。

（4）流氓的特性

第一是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第二是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第三是雇佣性重；第四是破坏性重；第五是阶级意识模糊；第六是反群众的；第七是反社会主义的；第八是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第九是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上列九点流氓的特性，不是各个独立，而是互相关联的，都依据于流氓的阶级地位社会职业而产生。

（5）流氓对于革命

依据上列的分析，可以断定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说来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的，随时有叛变做反革命走狗的可能。

三　党对流氓的策略

我们明了了流氓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对于革命的作用，就可以决定对付他们的策略了。党对流氓的总策略应该是：把流氓从统治阶级底下夺取过来，给以土地和工作，强迫其劳动，改变其社会条件，使之由流氓变为非流氓。

在特殊环境之下可以临时利用他们，使之脱离统治阶级的地位，然后再对他们加以适当处置，或临时利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统治阶级。但无论怎么样，政治上不能对流氓有丝毫让步。

在流氓其有反革命阴谋时，或有反革命可能时，或妨碍群众斗

争，非除掉他们群众斗争就不能起来时，或假借革命旗帜压迫群众时，或坚决的反革命帮助统治阶级和革命群众作对到底时，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消灭他们，不但消灭他们的首领，必要时还须消灭他们群众的一部以至全部。

红军及赤卫队是革命群众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重要工具，这个重要工具的组成分子，必须完全是工农革命分子而不能有流氓参杂其中。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他们的利益与整个斗争群众的利益是违反的。他们在作战上亦表现畏缩不前，虽有时表现勇敢，但他们是为了个人出发而勇敢，不是为了阶级任务而勇敢。游击战争中的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都是他们的表现。每次拖枪逃跑的也都是他们。这些分子如不洗刷出去，把工农革命分子参加红军、赤卫队以代替他们，改变红军赤卫队的组织，则这样的红军、赤卫队是很危险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也只有排除这些反纪律反组织的成分，才能更大规模地争取群众，使之乐意加入红军，达到扩大红军扩大斗争的任务。虽然不是说要把现在红军中的流氓成分在二十四小时内扫数开除出去，但必须有计划地以工农斗争分子代替流氓，坚决地反对党内庇护流氓。对于流氓存着“还有革命希望”的幻想，主张“三教九流的人都可进红军”“游击战争时不要打流氓，总暴动时方可打流氓”“只要官长领导得好，士兵的组织成分是不要紧的”，以及什么“现在不要流氓，将来也不要农民了，将来也不要工人了，剩下一个共产党”等等错误的怪异的观念加以批评。

对于由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惩办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

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同时对于那些流氓习惯还少的人应该加以适当的教育。

在党内在群众一般都要提高反流氓的教育与宣传，造成反流氓的浓厚空气。特别在党内要洗刷流氓成分，克服流氓意识，要认清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务。必须如此才能保障红军这个工具为工农阶级所用，而不致被流氓领导了去走入歧路，使革命走向失败。

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1]

（1930年7月29日）

（1）戴岳部[2]之一团于二十五日由新余开到新干，朱耀华部[3]之一〇七团于二十六日由崇仁开至樟树，一〇八团亦奉有张辉瓒[4]命调省，似有急赴南昌防御我军之势。本日据樟树来人云，朱耀华率一〇三、一〇七两团及十三师（邓英[5]）之一团由樟树乘船下南昌。

（2）本军团以原任务期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6]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7]，以扩大政治影响，决定北上第二步之第二期推进计划，拟于三十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石子崚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高安发布的红军第一军团命令。1930年6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南昌、九江的命令，红军第一军团由闽西长汀入赣。7月24日，攻克樟树，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一部。随即由毛泽东、朱德召开红一军团干部会议决定不打南昌，只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隔江向南昌鸣枪，举行“八一”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

[2] 戴岳部，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戴岳。

[3] 朱耀华部，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旅长朱耀华。

[4] 张辉瓒，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

[5] 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

[6]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决定8月1日为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日。

[7] 南浔路，指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即今向九线一段。

（3）第十二军应即于本（二十九）日午后向南昌方向移进，至离城三十里附近择地宿营。明（三十）日派出一纵队进占生米街，并相机进占牛行车站，其余则进驻万寿宫（万寿宫之宿营地及警戒由十二军罗代军长[1]分配）。

第三军应于明（三十）日由此地出发，经杨家坊、李村、赤土街到达石子埈一带，三十一日即在原地休息待命。

总部直属队随革军委与第四军于明（三十）日由此地出发，经祥符观街、梁村到达万寿宫宿营，三十一日就地休息待命。

（4）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即发动群众并努力筹款。

（5）第十二军派出占领生米街之部队，一占领牛行车站后，须即破坏南浔铁路（注意破坏铁桥）及附近电线。

（6）出动时予随总部行止。

右令

附记：

（1）明（三十）日总部及四军之出发时间及行军序列如左：

A．出发时间总部及直属队暨革军委特务大队，应于一时半起床二时半出发。

第四军于三时出发。

B．行军序列按总部特务队、总部、革军委与其特务大队、交通队及第四军之次序行进，直属队行李在交通队后行进。

C．行军警戒，第四军应配派出后卫。

（2）到万寿宫之路线如左：

由本城经冷村——王村——五口桥——左家山、祥符观街——

---

[1] 罗代军长，指罗炳辉。

熊陂桥——彭楼铺——昭山——梁村——万寿宫。

（3）到石子埁之路线如左：

由本城——连城桥——谢家埁（宋家）——杨家坊——小港（北异）——胡村——李村——赤土街——落瓦——石子埁。

（4）第三军须注意问明行进路线，以免与第四军交叉。

蝶恋花·从汀洲向长沙[1]

（1930年7月）

六月天兵征腐恶[2]，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3]
赣水那边红一角，[4]

---

[1] 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6月，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由福建省汀州（长汀）进军江西省。8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东北同彭德怀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会合，并决定共同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9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克。守敌强而有备，红军不宜攻坚。同年夏由于蒋、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河南等地混战，数月之内江西、湖南一带，除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外，都无强敌。因此，毛泽东说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改变当时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指示的夺取湘鄂赣三省省会的冒险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余等地，占领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准备了条件。这首词写的是红军6月、7月进军中的豪迈心情。

[2] 天兵征腐恶，指红军征讨腐朽凶恶的国民党军阀。

[3]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缨，绳索。汉武帝时终军出使南越，请授长缨，说要把那里的国王缚住带回来。鲲鹏是《庄子·逍遥游》中所说的一种极大的鱼和由它变成的极大的鸟。通常是褒义词，这里作贬义用，等于说巨大的恶魔。

[4] 赣水那边红一角，指赣西南的赣江流域黄公略率领的红六军（1930年7月改称红三军）所建立的根据地。红六军是赣西南的主力红军，1930年6月同红四军、红十二军组建为红一军团。当红一军团的主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由福建省汀州向江西省进军时，红六军尚在赣西南的赣江流域，所以下文称为偏师。

偏师借重黄公略[1]。

百万工农齐踊跃，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
狂飙[2]为我从天落。

---

[1] 黄公略（1898—1931），湖南湘乡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任红三军军长。1931年9月，在江西省吉安的东固地区行军中遭敌机扫射牺牲。

[2] 狂飙，疾风。这里形容正在兴起的革命风暴。

撤向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1]

（1930年8月1日）

（1）一〇三团及一〇五团均已到南昌车站，似有固守待援之势。

我派出队本日（八、一）已由南昌车站附近向南昌攻击，以为纪念八一节之武装示威运动。

（2）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灭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3）第十二军开赴安义向九江方面警戒，须于明（二）晨三时（派出万家埠、滩溪方向之游击）由此地出发（缺第一纵队），经乌山铺、落瓦、两路口（分路）、石鼻街到安义县城。其派出于郭坊垓之第一纵队，应于明晨五时后始撤回，便道开赴安义归还建制（该军第一天以到达石鼻街宿营为宜）。

第三军应于明晨二时由原驻地（石子垓）出发，经落瓦、两路口（须注意按时迅速通过两路口以免与十二军交叉）、刘家、广福桥到奉新县城（六十里）。其派出郭坊垓之第一纵队，明日可进至万福桥前数里处择地宿营，后（三）日到奉新归还建制。

第四军（缺第二纵队）应于明（二）晨三时由原驻地（藻山）经梁村、唐家、唐家坊、广福桥到奉新县城。其第二纵队应于明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新建县万寿宫发布的红军第一军团命令。

四时三十分随总部直属队后行进，经乌山铺、落瓦、两路口到达广福桥附近宿营，就地工作，发动群众并努力筹款，一面向南昌方向警戒。

总部特务队、总指挥部、革军委及其特务大队、交通队应于明晨三时起床，四时按序在本路口集合出发，接十二军后行进，经乌山铺、落瓦、两路口（在此分路）刘家、广福桥到奉新县城（六十里）宿营（直属队行李在交通队后行进）。

（4）安义部队（十二军）与奉新之总部之联络，着由总部交通队派出通讯兵一班随往架设电话。

（5）行进时予在总部位置。

附记：

（1）奉新县城之设营事宜由第三军长黄公略负责。

（2）落瓦附近之两路口分路处应由第三军派人妥竖分路路标。

（3）各部官长须告诉所部全体兵伕以出发方向及到达地点，以免落伍兵走错路。

（4）各部队所经过地点或所驻地点之电线、电杆等，无命令不得任意破坏，以免我军欲架设电话时发生困难。

进攻长沙先取浏阳[1]

（1930年8月3日）

南昌之敌自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七月十九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根据敌情之变化，决定先取浏阳，进攻长沙，以威胁武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以军团总部的名义在奉新发布的《进攻长沙先取浏阳》的命令的主要内容。

进攻文家市的命令[1]

（1930年8月18日）

（1）何键[2]残部约有兵力三团盘据文家市（约两团）、孙家塅（约一团）之线，文家市与孙家塅之间之清江亦有敌之联络部队。

（2）军团以肃清该敌残部然后攻取长岳[3]之目的，拟先歼灭该线之敌。

（3）第四军应于明（十九）日由此地经慈化、清水塘开到桐木宿营，后晨（二十号）一时由桐木出发，其主力经下湾、梨树坳、石罩上、年塘、均田、杀爷坑、上下金家湾、萧家湾，扫荡其大路下之警戒敌军，转向文家市包围攻击前进。文家市西北地区三峰尖、严家滩之线归该军负责，应酌派部队攻击占领之。

（4）第三军（缺第三纵队）应于明（十九）日经慈化进至清水

---

[1] 这是1930年8月18日20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万载县黄茅发布的红军第一军团命令。1930年8月18日，第一军团进抵黄茅后，获悉向红军第三军团进攻的国民党军何键部第三纵队4个团已抵湖南浏阳东南文家市、孙家塅一线，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奔袭该敌。20日，第一军团进攻文家市，全歼国民党军第三纵队3个团另1个营，击毙纵队司令兼第十六师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

[2] 何键，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

[3] 长岳，指湖南长沙和岳阳。

塘宿营，后（二十日）晨二时由清水塘出发经斗谷菴、白竹坳、上中下花园、大岭上、龙头湾，向高升岭、棺材岭敌阵地攻击前进。

（5）第三军第三纵队应于明（十九）日午后由此地出发，经佛子口、铁岩开进至岩前附近宿营（须秘匿兵力），后（二十号）晨三时由岩前经槐花塅、白马洲、避水岭、石牛潭、五神岭、黑石嘴、荷莲塘，向文家市攻击前进。

（6）总指挥部后（二十号）晨始进至岩前、文家市大道上。

（7）第十二军（攻击孙家塅之敌）应于明（十九号）日由原驻地出发，经王家厂、桥下、枫树坳、万阳桥进至大土里、松树坳之线宿营，准备完毕，后（二十号）日向孙家塅攻击前进，消灭该地之敌后，即向清江压迫，并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络，且应注意蒋埠江方向。

（8）全线总攻时间定于二十号晨拂晓（五时前后）。

（9）各部行李随各部行进。

（10）攻击文家市部队消灭该地之敌后，其先到达之部队应即猛烈追击残敌，务使悉数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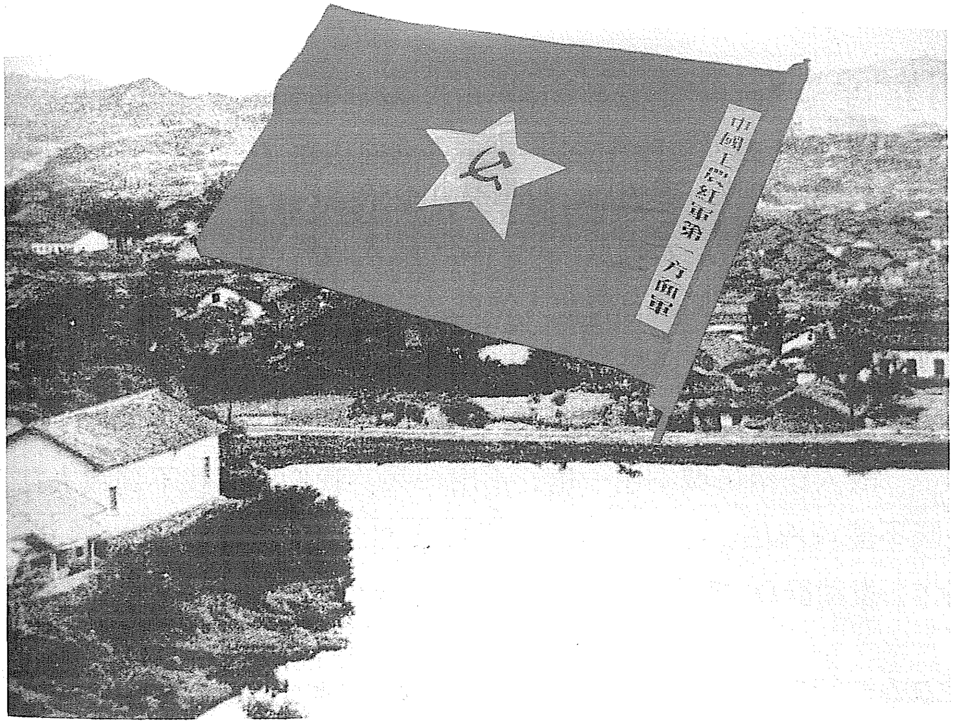
（11）各部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即桐木、清水塘、岩前、松树坳等地）时，须即与各当地赤卫队配合行动。

附记：

（1）各部在各攻击阵地须与邻接部队切实联络。

（2）各部须节省兵力，于必要时须与邻接部队互相策应。

（3）第三军第三纵队行李，攻击时须在岩前停止，待总部行李到达后随同行进。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

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红一方面军。图为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湖南浏阳永和市及红一方面军军旗。

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

（1930年8月19日）

红一军团攻占樟树后，此时抚州有敌二团，戴岳部则有由新干渡河来樟树之势。若去攻抚州，抚州敌人必然跑走，打不到手。若敌人前进，又不知何日将敌人结束。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

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

[1] 1930年8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认为打南昌没有把握，派罗炳辉率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罗炳辉侦察回来，说南昌形势对我十分不利，敌人力量很强，固守很严，不好去打。因此，一军团部分主张执行中央攻占南昌计划的干部，接受了不打南昌的正确主张。同日，毛泽东和朱德签发红一军团撤围南昌进至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随后，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转向奉新、安义。19日，毛泽东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对不打南昌作了说明。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向长沙推进的命令[1]

（1930年8月24日）

（1）据报敌军何键[2]部主力由浏阳沿普迹市[3]向长沙退却，平江罗霖[4]部（约四团）亦退向永安市[5]，该敌有缩短防线于永安市、螽斯港、龙头铺、株洲之线抵抗我军之模样。

（2）本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之目的，决定三路向长沙推进。第一军团任左路，第三军团（缺十六军）任中路，拟于明日（二十五号）由现在地出动，第一天进至古港、净溪桥、荆坪之线，第二天进至浏阳、观音阁、周家坪之线，第三天进至普迹市、

---

[1] 这是1930年8月24日23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湖南浏阳县永和市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8月23日，红军第一军团与第三军团在永和市会师。在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上决定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向长沙推进。从8月底至9月11日，第一方面军两次攻击长沙。由于长沙敌军主力坚守不出，除歼灭由猴子石出击之敌两个多团外，攻击均未奏效。经毛泽东提议，总前委决定第一方面军撤长沙之围，转向江西寻机歼敌。

[2] 何键，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讨逆”军第四路军总指挥。

[3] 普迹市，村名，位于湖南浏阳县南部。

[4] 罗霖，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七十七师师长。

[5] 永安市，镇名，位于湖南浏阳县西部。

官庄之线，第四天进至百仙桥、杨家桥之线，第五天攻击鲞斯港、株洲之线。

（3）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率领所部第三军团（缺第十六军）及浏东群众，以主力由现在地沿浏阳、普迹市、百仙桥之线向龙头铺攻击前进，须于二十五日到达古港附近，二十六日进占浏阳城，二十七日占领普迹市，二十八日进至百仙桥，二十九日攻击龙头铺、鲞斯港之线之敌。

（4）第一军团及浏南群众由本长兼领，由现在地沿枫林铺、官庄、杨家桥之线向株洲攻击前进，须于二十五日到达净溪桥、荆坪之线，二十六日到达观音阁、周家坪之线，二十七日进占官庄，二十八日其主力应进至杨家桥附近，二十九日攻击株洲。

（5）第十六军军长孔荷宠率领所部，配合平江群众，尾追罗霖，相机进攻永安市，支配该敌，使浏水以南部队易于进展。

（6）在出动后沿高坪、罗家冲、观音阁、瓦子坪、萧家坡、石围里、石回嘴、梅子园、新寺、荷塘铺之线以南（线在内）为第一军团作战地区，线以北（线不在内）为第三军团作战地区。

（7）如敌军占守永安市、普迹市、官庄之线时，右路之十六军仍照第五项制令之任务执行，左路之第一军团应迅即消灭官庄之敌，以主力出镇头市，协同担任正面之第三军团攻击普迹市之敌，务使歼灭敌之全部。

如敌军以主力守鲞斯港、株洲之线之南端（龙头铺、株洲一带），则第三军团应以主力由茭冲铺、游马冲、易家湾迅速沿铁道南下攻敌之侧背。

如敌之主力在该线之北端（白鹤桥、鲞斯港一带），则第一军团应以主力迅占易家湾，沿跳马涧攻敌之侧背。

如敌军主力退守长沙城，则右路之十六军应沿东屯渡迅占长沙北段铁道一带地区，中路之第三军团应沿白鹤桥、跳马涧、圭塘向长沙之小吴门、浏阳门攻击，第一军团则应沿铁道向长沙南关攻击。

如敌军放弃湘江东岸之铁道线退守湘潭，则右路之十六军应配合群众占领长沙城，第三军团则以主力迅速进占易家湾，即于该处渡河进攻湘潭，并酌派一部兵力于柳铺塘附近隔河向湘潭佯渡，以掩护其主力在易家湾渡河，第一军团则于株洲附近迅速渡河，沿湘江左岸向湘潭攻击，务使歼灭敌军。

（8）湘赣边境赤卫军在浏部队应分为两部分，附于第一、三两军团，受各该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之指挥，担任后方联络输送交通等事。

（9）予随第一军团行止。

注意：

1. 纪律——凡各部所经过地方须特别严守纪律，尤以不得擅取工农东西，没收东西及焚烧房屋须得有命令方得执行，特别应领导随军群众做到。

2. 联络——各部每日均应有报告到总部（暂在第一军团总部内），相互间亦应有密切联络。

3. 交通破坏——各部队于沿途所遇之交通工具（如铁道、桥梁、火车、汽车、汽船、电线、无线电台等），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违者严究。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给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

（1930年8月24日）

浏阳之敌被我军消灭了四分之一，尚有四分之三在进攻中，这是何键部队的主力，把这些东西消灭了，湖南政权就到手了。

---

[1] 1930年8月24日，毛泽东致信中共赣西南特委、闽西特委并转中央，报告红一军团在浏阳文家市作战的胜利，以及在永和市同第三军团的会合。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诱敌出工事外消灭
并乘胜攻入长沙的命令[1]

（1930年8月31日）

（一）长沙敌军仍依据工事向我顽抗中，板石港之敌收集多数船只，有准备在大托铺、易家湾之间偷渡模样。

长沙于二十四日由岳州[2]开来公秉藩部[3]之两团。

衡宝[4]之敌军（约三团）有开到湘潭之说。

（二）方面军仍拟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攻入长沙。

（三）第三军团（缺第五军之第一师）仍位于林家但、杨家冲、龙山塘、西塘冲、黄虎冲一带，俟板石港之敌渡河后出击歼灭之，得手后仍照原任务沿铁道、汽车道向长沙南关攻击前进。

（四）第五军之第一师仍位于莫家垅附近，于本晚应派出队伍向猴子石敌阵地佯攻，拂晓前应占领石牌岭略后之阵地，对由猴子石出击之敌须能迅速歼灭之，并策应第一军团之左翼（第十二军）及第三军团之右翼（主要策应十二军）。

---

[1] 这是1930年8月31日午后毛泽东和朱德在湖南长沙南郊白田铺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岳州，旧府名，即湖南岳阳。

[3] 公秉藩部，即国民党军第九路军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

[4] 衡宝，指衡州、宝庆，均为旧府名，即今湖南衡阳和邵阳。

（五）第十二军仍位于现在地（老庙、洞井铺一带），本晚应派出队伍向石坝、石马铺等处之敌阵地佯攻，于燕子岭、井湾子、老庙之线须留阵地哨，于敌军出击时则任圭塘、石坝、石马铺等地带之攻击（圭塘大道在内）。

（六）第四军应即撤至廖家冲、周家坝之北端，明晨拂晓前应占领天际岭以南之阵地，须能对于从我右翼出击之敌猛攻而歼灭之。本晚应派出前进哨于许家冲附近，以与东山之我浏阳赤卫军第七团及燕子岭之十二军确取联络，于敌军出击时，该军应接第十二军右翼，任圭塘大道以右地带之攻击（大道不在内）。

（七）第三军之第三纵队应于本晚撤回段家垄附近归还建制。

（八）第三军全部位于段家垄、白田铺一带为总预备队。

（九）第一军团之大行李及伤兵收容所仍在原位置。

（十）余在白田铺总预备队位置。

注意：

1. 夜晚须注意敌之骚扰。
2. 各部须互派人员确取联络，有情报则应互相通报。

总 司 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收缴敌人枪械办法的训令[1]

（1930年9月12日）

我们红军过去在游击时期，没有和大的敌人打仗，也没有缴得大批的敌械，因此我们的官兵同志往往跑上前一把手抓住就向他要枪，拿到枪就自己背上，这种习惯到现在还保存着。这回我们打长沙，第四军的一个支队，已经将陈光中[2]的一团人追到自愿缴枪了，但我们的官兵还是像以前一样，想自己把这些枪统同背上，这如何能够，我们的人少，敌人的枪多，自然是背不完，结果在无法处置的时候，被敌人一反攻，这一团的枪又落到敌人手中去了，真是可惜！以后我们大家要懂得打大仗缴大批枪的办法。敌人的队伍凡是用旗或手举起摇动，或奏敬礼号，或将枪举起表示自愿缴枪投诚的，我们一方面要用威力防备，命令他将枪一律架起（架枪），或一律放在地下退后若干步，然后派官长把这些俘虏集合好带离战场，派必需的兵力把他押解到后方。所有的枪枝（或放在地上或架在枪架上），另派人（顶好有副官差遣）带极少数的兵力，送到后面的最近的地方，交给徒手的人员转送到后方（于必要时卸下机柄）。但决不要把缴到敌方大批的枪械自己都背起来，反使我们自己减少了战斗力，这一点应特别注意。派去的人员应马上跑回原队伍，再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第二号训令。

[2] 陈光中，当时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七旅旅长。

应付别方面的敌人。在收缴敌人枪械的时间，应用极迅速的动作，很周密的防范，以免给敌乘机反攻。在敌人枪还拿在手上的时候，为了要减少敌人的战斗力，促成我们的战斗任务起见，应毫无留情地杀伤他。反之敌人已经将枪放下表示投诚了，就不要因愤恨而伤害他，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望我们官兵同志应切实注意遵行为要。此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进攻吉安的命令

（1930年9月13日）

（一）我方面军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有在争取革命暴动的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前提之前，汇合江西千百万工农贫民在集中进攻策略之下，猛烈的最火速的最勇敢的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封锁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障争取武汉之任务。决定了夺取南昌的第一期方案，以第一军团攻取，第三军团略取峡江、新干、吉安。

（二）本军团决以明（十四）日由此地（株洲）出动，沿途分散工作，任务是发动群众、筹款和缝制被服，行军工作的日期一共十七天，限于本月三十日全军团到达吉安之延福乡集中。

（三）第十二军应于明日由此地出动，向黄土岭、攸县一带工作前进，以后则沿莲花、安福限于本月三十日到达延福乡集中，并担任鱼州方面的警戒。

（四）第四军自明日起即分布由此地（株洲）以至白关浦、姚家龙、碌口、渔潭湾、神福湾、泗分铺、沈潭等处，工作日期十一天，限二十四日沿铁道萍乡取齐（以后三、四两军及总部直属队行军计划再有明令），并担任长沙方向的警戒。

（五）第三军应于明晨由此地出动进到东冲浦，就在板于铺、醴陵、黄沙浦、楚东桥等处工作十一天，限二十四日沿铁道到萍乡取

齐待命。

（六）总部及直属队随工农军委会明日由此出动，在三军后面行进，十五日至二十四日在醴陵萍乡中间。

附注：

1. 第四军明日即应破坏粤汉路之株长段内的主要铁桥，并毁其铁道枕木十余里以外。

2. 十二军到攸县后和留此地的四军与到醴陵的总部皆用电话联络，攸、醴交通可用汽车。

3. 如长沙敌军大部迫近，则第四军应向醴萍方向靠近本队。

4. 我三军团已沿醴陵向萍乡前进。

5. 明晨三军与十二军出发时在铁路上有十几里路的同路，三军应走铁路左边，十二军走右边。

6. 在分兵期内可发零用钱大洋一元，补九月份草鞋费大洋四角。

7. 做军服要做夹衣，每人补齐被单。

总指挥　　朱德
兼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攻长沙不克的原因[1]

（1930年9月17日）

此次攻长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灭敌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敌共有三十一团之众，我在文家市、猴子石两役[2]虽已消灭敌兵在五团以上，但大部队尚未消灭即退入城壕，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粤汉路、株萍路[3]及对河群众没有起来，不能断绝敌人之水陆交通，不能封锁敌人之经济及军事运输。（三）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敌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致两个军团联络不好，因而失机。以上三点是没有打进长沙去的原因，而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但文家市一役消灭敌人三团，猴子石一役消灭敌人两团以上，缴敌步枪两千枝、机关枪二十五挺，毙敌旅长戴斗垣，伤敌旅长陈渥，俘敌团长二，伤敌团长二，死伤及俘

---

[1] 这是毛泽东以红军第一军团前委书记的名义在湖南醴陵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一部分。

[2] 指文家市战斗和猴子石战斗。猴子石战斗，在第二次攻占长沙时，红军第一方面军用诱歼敌人的战法，于9月3日在长沙城郊猴子石附近歼敌两个多团。

[3] 粤汉路，指广州至武汉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株萍路，指株洲至萍乡的铁路，即今浙赣线一段。

虏敌之中下级干部甚多，未能统计，俘敌士兵两千以上，死伤敌士兵四千以上。围困长沙十六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三十余里。九月三日将敌之出击部队完全击溃，从此缩入战沟，不敢出来一步。到九月十日我军第二次总攻不得手，九月十二日始决议向萍醴[1]撤退。把敌军三十团以上的威风完全打落，使之不敢正眼看我红军，同时给全国以颇大影响，则是这一次战争的胜利。

这次战役是自有红军以来第一次大战，因此我军死伤亦不小。单以一军团说，高级干部有柯武东刘作述[2]两同志阵亡，死伤中级干部数十，下级干部一百以上，士兵一千六百左右。三军团损失亦不小。我军虽有这些损失，但士气一般仍是很壮，继续到江西去作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

[1] 萍醴，指江西萍乡和湖南醴陵。

[2] 柯武东，原任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第一纵队纵队长，1930年8月在文家市战斗中牺牲。刘作述，原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1930年9月在猴子石战斗中牺牲。

由萍乡出发向吉安的命令

（1930年9月23日）

本军团奉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夺取南昌、九江，消灭鲁涤平，为夺取长沙、武汉，进攻南京起见，……决定先攻下吉安城，使赣西南工农群众势力向下游发展与我们配合并补充大量新兵，扩大红军队伍……

（一）三军团于明二十四日由萍乡动身，进驻樟树，占领临江一带，截断赣江，并堵住敌人援军。

（二）一军团分两路：左路十二军攸县出发，右路三、四军从萍乡出发，经袁州（二十军）汇合，共在安源、萍乡集结工作，限于二十七日出动，部队准时在阜田集中，攻击吉安城。

（三）总部直属队随同中军委于明二十四日移至安源工作三天，限于二十七日全军团（缺十二军）由安源、萍乡出动，向宜春进发，经宜春到吉安城北九十里之阜田附近集中，出动后全随总部行止。

（四）十二军由攸县向吉安城北集中。

（五）……

总指挥　朱　德
兼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

（1930年9月29日）

一、湘敌仍在老关、礼陵、黄土岭一带，赣敌代旅已从万载向南昌退出，据报，邓英部由吉安调回南昌，吉安城由赣州调来之马昆旅接防，南昌还有警卫团一团到吉安。确否，正续探中。

二、本军团（缺十二、二十两军）你原计划拟于明（三十）日由此地（宜春城）经分宜向吉安前进，拟三十日到达分宜（八十里）城附近，十月一日到达路口（六十里）附近。二号到达阜田（五十五里）附近集中。

三、第四军应于明晨五时以前由现在地（下浦）出发完毕。经彬江向分宜城前宿营，总部总政治部直属队随中革委应于明晨三时起床，四时半即在大街上集合，按原次序出发，接第四军后行进。第三军（缺一个纵队）应于明晨五时接总直属队后出发到达分宜附近宿营。

四、第三军应派出一个纵队兵力到慈化接中央长江区来员及三军路前派往浏阳护送伤兵之一个大队回队，接到后应从速赶来阜田附近，均回建制。

五、出动后，予随总部行止。

附记：

（1）各部沿途须探听各方敌情。

（2）沿途宿营地皆由第四军林军长负责分配。

（3）先头部队到达阜田后，应相继袭取吉安城。

红军士兵会章程*

（1930年9月25日）

第一章　宗旨

第一条　提高士兵政治水平，加强阶级认识，确定革命观点，增进斗争力量。

第二条　团结士兵革命精神，联合工农革命势力，达到革命的政治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

第三条　代表士兵利益，改良士兵生活（给养卫生待遇娱乐等），提高士兵革命情绪。

第四条　帮助军政机关，维持革命纪律，扩大红军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第二章　职权

第五条　士兵会在政治部及政治委员指导之下进行工作。

第六条　对军事政治各种问题，士兵会得向军政机关提出意见。

第七条　对军队管理认为不适当时，士兵会有向上级提出抗议或申诉之权。

第八条　士兵会有审查军中经济、监督军队给养之权（如审查收支、清算伙食数目等）。

第九条　士兵会对会员之处罚，只能直接执行警告及开除会籍之权，至关禁闭、罚款、枪决等项，须建议主管官处理。

第十条　士兵会有选派代表参加苏维埃组织之权。

第三章　组织

第十一条　士兵会是士兵群众的团体，所以他的组织应以群众条件为标准。红军政治部是军中的政权机关，师或纵队以上均设有政治部，因此师及纵队以上不设士兵会委员会，团以下均得有士兵会的组织。各级直属部队亦得组织士兵会。各团士兵会隶属各该军师政治部，各级直属队士兵会直属于各该政治部之指导。

第十二条　红军官佐士兵伕，均得为士兵会会员。

第十三条　士兵会执委无论官佐士兵伕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但官长被选者不得超过委员人数三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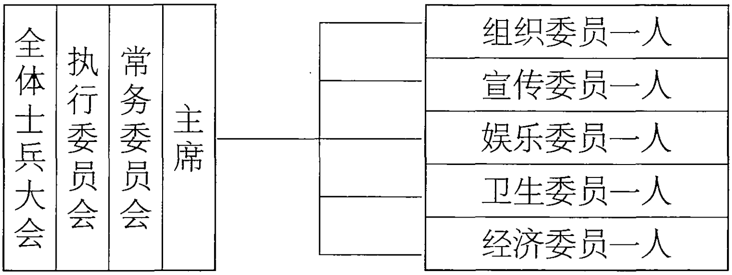
第十四条　各级士兵会执行委员会产生方法：

（一）连士兵会执行委员会由本连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七人至九人组织之，由执委会中选举三人组织常委会，互推一人为主席，各军政机关酌量增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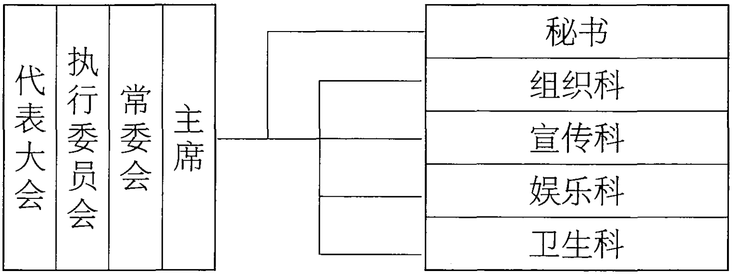
（二）团营士兵会执行委员会，召集全团或全营代表大会选举九人至十一人组织之，由执委中选举三人至五人组织常委会，互推一人为主席（直属队同）。代表的产生以各连人数为标准，每五人或十人选派代表一人。

第十五条　各级士兵会组织系统表如下：

（一）连士兵会


全体士兵大会
执行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主席
组织委员一人
宣传委员一人
娱乐委员一人
卫生委员一人
经济委员一人

（二）团营士兵会（直属队士兵会同）


代表大会
执行委员会
常委会
主席
秘书
组织科
宣传科
娱乐科
卫生科

第十六条　连士兵会之下，以排或班为单位分编小组，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人，组长由执委会指定之（军政机关士兵会得依各该机关情形以十人或二十人分编小组）。

第十七条　连士兵委员会得设组织委员一人、宣传委员一人、娱乐委员一人、卫生委员一人、经济委员三人，组织、宣传、娱乐、卫生四委员皆由士兵会委员充当之，经济委员会主任，亦由士兵委员会委员充当之，余二人可由执委会指定或由士兵大会选举之。

第十八条　团营及直属队士兵会，得设组织科、宣传科、娱乐科、卫生科，四科科长均由团营士兵会委员充当之，科员由执委会指定一人至三人充任。

第十九条　团营及直属队士兵会得设秘书一人（委员兼充或另聘）。

第二十条　执委任期：

（一）连士兵会执委，每两个月改选一次；

（二）团营直属队士兵会执委，每三个月改选一次，均得连选连任。

第二十一条　各种会期：

（一）连士兵会会员大会，每半个月开会一次，执委会每周开会一次，常委会五天一次（以上各科会议如有特别事故均得随时召集之），小组会每七天开会一次。

（二）团营直属队士兵会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执委会每十天开会一次，常委会五天开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均得随时召集之）。

第二十二条　纪律

（一）会员均须遵守红军的三条纪障（1. 不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2. 打土豪要归公；3. 一切行动听指挥）、八项注意（1. 上门板；2. 捆禾草；3. 讲话和气；4. 买卖公平；5. 借东西要还；6. 损坏东西要赔并须爱惜公物；7. 不得胡乱屙屎；8. 不搜敌兵腰包），如违犯上项纪律之一者，即报告主管官分别处罚之。

（二）凡经多数议决之事件，会员无论何人均须服从。

（三）如有不按时召集会议，及不按时到会，不遵守士兵会决议，各级士委会酌量处罚警告或开除会籍。

（四）会员无故一连三个月不缴会费者开除会籍。

第四章　工作

第二十三条　在政治部及政治委员指导之下，努力进行土地革命工作（1. 建设政权；2. 分配土地；3. 武装工农）。

第二十四条　努力革命的宣传，使红军政治影响扩大，如召集

群众大会，开会欢迎新兵及俘虏兵，欢送准假士兵等，且用士兵会名义散发宣言，派遣代表出席群众会议等。……

第二十五条　随时与地方群众团体发生亲密关系，在无群众组织地方努力建设地方群众团体。

第二十六条　提高士兵本身文化程度，办理识字运动、青年学校，出版士兵小报，讨论政治问题，练习讲演等。

第二十七条　调查社会经济情形。

第二十八条　办理士兵正当娱乐，如组织俱乐部、同乐会、赛跑、唱歌、游戏、跳舞、化装、讲演、拳术、足球等。

第二十九条　监督给养，清算伙食。

第三十条　办理卫生事宜，如注意茶水、菜饭、衣服、宿营地之清洁，身体之保养，驻军大小便要定所，早晚加衣盖被洗衣洗足等。

第三十一条　慰劳伤病官兵（派人抬扶伤病官兵，打水给伤病官兵洗脸，烧茶水给伤病官兵喝，清扫房屋，发起募捐，捐衣服银钱，帮助伤病官兵），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优待伤病官兵办法，建议军政机关办理。

第三十二条　死难同志的调查及登记，并设法抚恤死难同志家属。

第五章　经费

第三十三条　1. 连队士兵会经费规定每月五元，营及直属队每月十元，统由政治部发给。2. 会员中有犯赌之纪律者，士兵会得没收该赌博之会员财物充公，以十分之八归连或士兵会，十分之二归

营团士兵会。

士兵会会员每名每月交会费铜板一枚。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士兵会章程如有不满意，得三分之一以上的会员提议，士兵会提出意见，请政治部修改之，得总政治部批准执行。

第三十五条　本会章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第一军团待命攻击吉安的命令[1]

（1930年10月2日）

（1）吉安仍为邓英部[2]盘据中。马崐旅[3]尚在赣州，并未到吉。

（2）本军团决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拟于明（三号）日进至百子塘、三角塘、华家之线准备完毕，待命向吉安城攻击（攻击命令及附图明日另发）。

（3）第四军应于明晨六时由此地（阜田）出发完毕，经吉湖、节孝祠、祈山庙、黄螺坪、苍坑、新安、沈塘、舟家山、三合坪到百子塘一带布置宿营。到达宿营地后，应即派出军官，到吉安城北门外螺子山附近侦察地形，准备四号晨拂晓攻击。

（4）第二十军应于明晨由现在地（南源又名林源）进至胡家、

---

[1] 1930年9月撤围长沙后，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讨论决定，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以第三军团占领清江，截断赣江，保障第一军团侧翼安全。2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到达袁州（宜春）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并带来8月29日《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经毛泽东等多方说服，周以栗放弃再打长沙的意见，同意总前委攻取吉安的决策。10月4日，第一军团攻占吉安。这是1930年10月2日20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吉水县阜田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

[2] 邓英部，指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

[3] 马崐旅，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崐。

三角塘、华家一带布置宿营。须派军官侦察吉安城西真君山、天华山之线之地形，准备四号晨之攻击。

（5）第三军之第三纵队及总直属队，应于明晨（四时半起床）五时半由此地（阜田）出发，经君子亭、湖源、盘塘、江弦上、枫冈桥、桐树坪到山前附近布置宿营（宿营地由本部副官分配）。三军三纵队亦应派员侦察天华山、神冈山中间及城西南附近之地形，准备四号晨之攻击。

（6）第三军军部及一纵队应于明（三号）日赶至桐树坪前之马伏冈之附近宿营，准备四号晨之攻击。

（7）第十二军应于明日向神冈山前进，相机宿营，准备四号晨向神冈山攻击，得手后即沿河攻南门。

（8）行进时余在总部先头。

附记：

（1）各部明日到达宿营地后须即准备攻城器具。

（2）各部侦察地形后须绘略图呈部。

（3）各部须切实断绝交通。

（4）明日各部自找向导。

右令

总指挥　朱德
兼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总攻吉安的命令[1]

（1930年10月3日）

（一）敌军邓英部[2]（兵力不及三团）仍在吉安城郊依托工事固守中，其阵地布置于螺子山、真君山、天华山、神冈岭之线。

（二）本军团有攻取吉安消灭邓英部队，汇合赣西南群众力量，直下南昌、九江，以建江西政权，封锁长江进攻南京，保障武汉暴动胜利之任务，决于四号拂晓总攻吉安城，限于五号拂晓前夺取吉安城[3]。

（三）第四军任左翼，向螺子山、真君山间之敌阵地攻击，以大校场至潘塘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四军（道路在内），以右归二十军。

（四）第二十军任正面，向真君山、天华山之线之敌佯攻，左与第四军右与第三军确取联络，归第四军军长林彪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命令。

[2] 邓英部指邓英任师长的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

[3] 1930年6月至9月，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推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据此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城市暴动计划，并强令红军各部攻打长沙、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以配合武装暴动。当年9月，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缓攻南昌、九江，南下转攻吉安，以就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准备条件，然后再攻南昌等地。10月4日，红军攻占吉安。

（五）第三军（缺一个纵队）与十二军共任右翼，向神冈岭、天华山之线之敌攻击，以太平桥江边之道路为界线，线以左归三军（线在内），以右归十二军（线不在内），三军右与十二军左与二十军确取联络，十二军左与三军取联络。

（六）各军攻击敌阵地得手后，应以少数兵力监视炮楼内之敌，以主力攻城，并尽力截断城内与阵地上之敌之联系。

（七）军团不留总预备队，各军须自留预备队。

（八）余现在山前总部，四号拂晓时在大塘附近之路口（真君山之北），四号午后则移至江边（天华山之南）。

注意：

1. 各部冲入敌阵地后，即向城攻击。如城沿尚有敌工事，则应利用一切地物，并构筑简单掩体为支撑点，待机再向城攻击。

2. 夜间，各攻城官兵一律以白毛巾或白手帕围绕颈上，其余哨音、号音、口令皆用参谋处原定之信号。

3. 夜间攻击应用白刃战，故各兵士在敌阵地前不必打枪，更要注意不要自己互相误会。

4. 夺得敌阵地即举火为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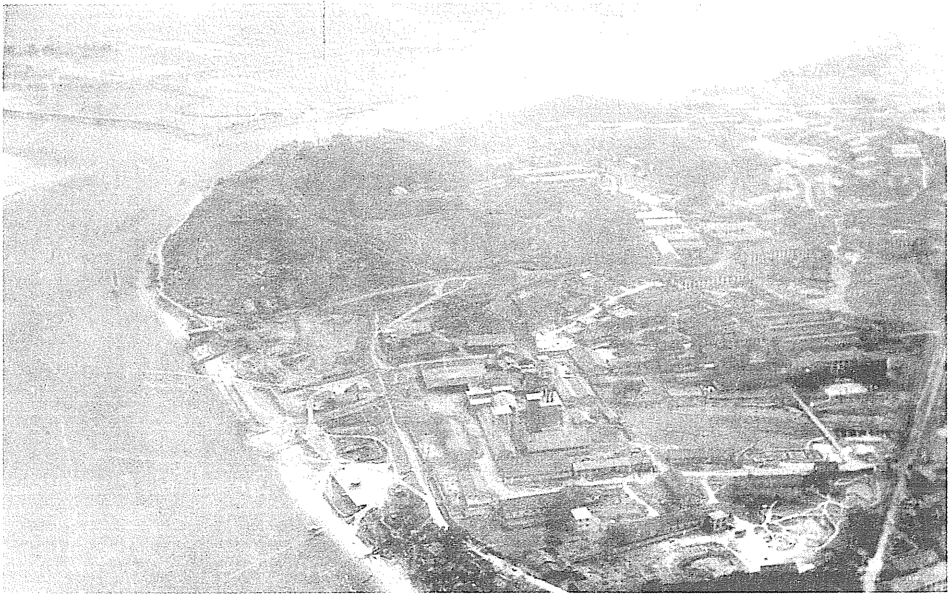
5. 夜间尽量利用水沟前进。

6. 各攻城部队尽力向前，不必顾及敌之包围。

7. 各部须每时皆要取得进步。

8. 进城后，各官长、士兵须严守纪律，不得乱拿东西。

9. 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之无线电机、电话、电灯、汽车等交通器具概不准毁坏。



1930年10月，为避免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要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到的损失，毛泽东等灵活处理了所属红军的作战行动，率部攻克江西吉安，扩大了赣西南苏区。图为吉安战斗旧址。

给中共南方局转中央的信[1]

（1930年10月14日）

此次吉安暴动胜利，虽在军事上没有消灭敌人主力、缴获大批枪械，但政治上的收获却是不小的。吉安暴动胜利，无疑是赣西南豪绅、军阀、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赣西南地方暴动的完成，是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开始，猛烈扩大红军的好时机。

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红一军团于十月十八日可抵清江与红五、红八军汇合，即行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一带将有大规模的决战。

---

[1] 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吉安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致信中共南方局转中央，报告攻克吉安的胜利和赣西南党组织状况等问题。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

（1930年10月17日）

一

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

二

不要继续攻打大城市，而要东渡赣江到革命根据地内部关门打狗。在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情况下，要避实就虚，以弱胜强。赣江西岸夹在湘江、赣江之间，机动范围小；赣江东岸则地跨闽、浙、赣边界，有大山，回旋余地大，在根据地内发动群众参加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

[1] 1930年10月17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军团进抵峡江。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全体会议。会议讨论了时局问题、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并均有决议。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讨论时局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讨论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对于土地问题决议*

（1930年10月19日）

土地问题为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

现时民权革命阶段，主要是反对封建势力。土地革命是彻底摧毁封建经济基础的，必须深入土地革命，才能消灭地主军阀制度与帝国主义的统治，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才能征收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群众建立巩固的同盟，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红军是从土地革命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他固然要担负无产阶级整个革命的任务，但现时如离开土地革命，以及忽视土地革命的正确执行，将不成为红军，更难达到扩大红军与创造红军铁军，这只有取消派根本不懂得反封建势力，才会放弃土地革命。

革命工作中的危机

现时苏维埃区域中许多地方暴动尚未完成，或只能游击地一时占领。鄂东南直到现在尚无一个县城，赤白对立的现象，到处严重的形成。不仅如此，甚至许多赤色区域群众，今日革命，明日反

水。在鄂东苏维埃区域，改组派大发展，布置暴动。在赣西南AB团到处充满党和团两特委以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最高指导机关及技术工作人员，有三分之二为AB团分子，各级党团苏维埃以及红军学校、赤卫队、红色邮局，都布满了AB团的组织，实行暗杀，准备与邓英军队联合，企图暴动一举消灭苏维埃及各革命组织——凡此是如何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同志如何深刻地去注意，必须分析这些危机的来源，予以坚决克服。这些危机的主要原因，便是土地革命中富农路线与机会主义。

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与机会主义

A　分田与不分田

事实教训我们，凡是彻底平分了田地的，便能发动广泛群众，坚定革命基础，多数就能完成地方暴动，如闽西、永新、兴国（第二次比较彻底）等县。凡是犯了富农路线不分田地的，就不仅没有完成地方暴动，甚至无法消灭赤白对立。鄂东广济不分田地，共产党与土豪可以和平共住于革命区域，结果白色恐怖一来，反水最凶。安福被富农分子把持不分，结果大部反水，对革命带来严重的叛变，仅一、三两区接近永新分田影响，分了田，农民便坚决抵抗反革命的进攻。永新峡江分田彻底的地方，便很少AB团，泰和、兴国、吉水，以及鄂东的大冶，阳新的龙县区，凡分田不彻底地方，不是发生严重的AB团，便是改组派；凡是分田是彻底的地方，便能出大批红军，如永新，否则，发动不起。不彻底平分田地，为什么这样严重呢？因为反对封建势力主要的策略是土地革

命。土地革命，在目前就是要分，分要分得平，分要分得快。只要有从彻底平分田地的斗争中才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树立革命基础，但是我们土地革命，怎样办的呢？扯起红旗子，三年不分的，一年不分的，半年不分的，这在赣西南、东江、鄂东、鄂西、湘西，以及江浙的红色区域，差不多是普遍现象。红军和游击队许多是不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不只是机会主义，简直是地主路线，不是站在贫苦农民的阶级上代表要分田，这种不分，实际就是保存地主制度，至于借口要详细调查，精密统计，种了青苗不能分，分则原耕农民得三分之二的谷子，得田贫农得三分之一的二一开（大冶），或仅只随便拿出一点的拨田法（阳新一部分），或只实行抽多补少，不实行抽肥补瘦，有了这些富农路线，到处在阻碍土地革命的发展。因此不仅不能发动广泛的贫苦农民群众起来完成地方暴动，而且土地革命把豪绅地主赶跑了，高租重利取消了，苛捐杂税没有了，但土地不来一个彻底分配，实际得利最多的，只是富农；因此不能发动广泛贫苦农民群众对富农的阶级对抗，不能树立贫苦农民群众的革命威力，认识富农凶残阴谋的真面目，镇压富农的反动，反而一场土地革命被富农取得领导权。在苏维埃、赤卫队、党部一切革命机关内，都是富农当权，而为着富农阶级利益，压迫贫苦农民，进一步组织AB团、改组派、第三党，布置暴动，叛变革命——这就是不平分土地和坚决反对富农，留下反革命派活动基础，苏维埃区域发生严重危机的主要根源。

B　机会主义的路线

上面所说的富农路线“拨田法”“二一开”等，本来是显而易见

的富农阻碍土地革命的主张，可予以排斥的。可是因为党内陷于一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机会主义路线——很精微的富农路线，便不仅不会排斥这种富农的主张，反而助长富农主张的发达。那种机会主义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以分田是农民意识，反对平分。分田，是违反社会主义的前途资产阶级的幻想，要分田是助长农民私有观念，分田是不合共产党的目的，便不要提出分田主张，听农民自决。以发展生产为理由，反对按人口平分，主张以劳力为标准去分配。以民权革命阶段的原则，反对一切没收，一切没收是动摇了中农，这些不是有意地站在右边来一个反对（农村中富农分子，借口共产党六次大会批评平分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反对平分），便是不看事实的理论空谈。这种不合事实的空谈，表面上似乎极左地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为富农提出辩护的理论，乃是极右倾的富农路线。

C　这一路线的错误根源

在于不了解，在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经济的中国，土地革命必须经过分配的过程，中国农业经济主要的形式是小农经济，无论佃田耕种或耕种自己的田的，都是分割成极小的经济单位，由几百万户农民群众，用中国犁耙耕种。（欧洲式的）地主经济可说是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场，是很少很少。因此土地革命不是马上把这些分割极小的经济单位，集合起来，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农场的生产，这是经济条件所不许可的，因而不得不承认土地革命开始时小农经济的生产仍占主要形式，不得不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而且这种分配，因为无地及地少的农民群众，到处占农村最大多数，在南方占百分

之七十以上，土地革命运动一起来，必然要来一个一切没收，平均分配，才能满足群众需要。所以，上次大会早已指出，在有很多的失业和贫苦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多数农民群众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援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在理论上早已解答了。中国土地革命，已经两三年了，更应依据两三年的事实教训，来了解这一问题。

事实是农民不起来分土地则已，一起来，到处是要求平分。

事实是仅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够，必须连富农的一切土地没收，因为所占的土地，在南方各省，其数目仅次于地主，而且多数是肥沃的土地。设若不一概没收，必不能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的需要，所以峡江与吉安北路分了三次五次，直分到最后把富农土地一概没收，来一个平分，才算办得好。事实是中国富农的特质是实行半封建的残酷剥削，与地主阶级分离不开，从狡猾的投机直到动摇叛变，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不来一个平分，便不能一开始就扯开农村中贫苦农民群众对抗富农的阶级火线，无法树立雇农的领导，镇压富农的反动。所谓坚决反对富农，又不没收他的土地，便是空话。事实是群众已走向前了，要一切没收，党还在拘泥于民权阶段的原则，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不敢提出一切没收，但群众已经在一切没收了，于是又说如果群众要求一切没收时，党不应反对，这是多么连尾巴都不去抓的取消主义，不去争取百分之七十以上贫苦农民群众，让富农领导去。事实是一切没收，不但不会动摇了中农，多数中农反因而分入土地，像兴国第十区就如是。有些地方少数中农虽不免有点分出，但在一切没收广大贫苦农民群众革命声威之下，中农感觉一切压迫的剥削均已取消，富农做不成了，地主更

不用说，大家都平等，分出一点也是应该（阳新近江的中农）。这就是说，要拿住中农，只有贫苦农民群众具有广大的威权，在猛攻地主条件之下，才有可能，也就是只有平分土地才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贫苦农民群众还在富农之下讨生活，富农还可以发扬他的权威，那就不要想与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

事实是所谓农民意识，至少有富农意识与贫农意识两种，富农意识是主张不分，贫农就要求平分。说平分田地是农民意识，要反对农民意识，就只有不分田，这就恰恰反对了贫农意识，代表了富农意识。平分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可是在目前确有他伟大的革命作用，粉碎封建制度，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从前，俄国孟什维克批评列宁主张平分土地，是违反社会主义，列宁的答复“平分土地是具有历史的革命作用，孟什维克派所不了解的”。六次大会指出平分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党必须加以批评，但决不是否认平分、反对平分，六次大会明明写着：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应加以批评……使农民完全了解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绝没有真正和平的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能走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是说要做平分的工作，同时还要做批评的工作。机会主义的先生们，只在那里说批评的废话，还没有平分，不知道批评什么？至于反对扩大红军，反对向外发展，不集中武装，这都是富农意识，贫农倒是彻底摧毁封建势力，积极向外发展的。目前要打破保守观念，只有集中“反对富农意识”，却不可笼统反对农民意识，使贫农在目前一部极革命的意识（平分土地，反对富农）被压倒。当然共产党要树立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如批评平分），不能停滞在贫农意识上。

事实是所谓发展生产与劳动力为分配标准，在今日恰恰是富农

的要求。富农把耕具、肥料、种子、牛力都算作劳动力，只有富农最有劳动力，最有发展生产的条件。富农说贫农样样没有，分多了田要荒，于是富农以发展生产最好的革命招牌取得了很多的田地，而最迫切要求土地的贫农，仍不能解决土地缺乏问题。而且以劳力为标准纵令不把资本算在里面，但老幼妇女是缺乏或没有劳力的，分田就分得少，但他消耗并不会少，有时且要雇农耕种，既不够食又要开消工钱，如何维持生活呢？在现在斗争时候，发展生产不是主要，争取群众才是迫切要求，只有掀起了广泛贫苦农民群众，彻底把封建势力推翻了，争取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才能谈到发展生产。实际呢，贫农分了田为着要饭吃，一家男女老幼的劳力，都使用在田土上，不仅不会荒，已经就使生产发展，在闽西今年收获较革命前增加百分之二十就是明证。

事实是对于没收与分配不提出具体的主张，所谓取决于群众，结果常是被富农操纵利用，不仅不平分，甚至不分，安福即如是。所谓取决于群众，是接受群众正确的要求，群众已到处要求一切没收，平均分配，党便应坚决提出一切没收，平均分配，使广大群众得到坚决的领导，富农无所施其阴谋欺骗。共产党再也没有理由说分田不是共产党的最终目的，随便听农民去分好了，对目前这一场伟大斗争，还不积极出来领导仍旧等闲看待。

依据上述事实的教训，便应该认识土地问题了，中央指示没收按民权阶段的原则，对富农即是政治的没收，如多数贫农群众要求一切没收时，当然一切没收。分配也提出按人口平分与按劳力两个办法，这是听各地根据实际事实去活泼工作。现在事实到处教训我们，要求一切没收，平均分配，就应在中央所指示的两个方法之中，选择一个实际工作，这才是活泼地正确地执行中央路线。那些

说一切没收、平均分配是农民意识违反了中央的，不是不了解中央的指示，就是故意在曲解，替富农张目。

土地问题的机会主义一贯的历史的发展

共产党对于土地问题犯了一贯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大革命以前，党内就不曾提起土地问题，大革命时代，湘鄂粤的农民运动进入平分土地高潮，党对土地革命，不能提出正确主张，只骂农民运动过火。南昌暴动知道土地革命严重了，还陷在机会主义坑中，说五十亩以下的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这是大革命失败一个严重的原因。盲动主义时候做的农民暴动，但不曾注意到土地问题的解决，六次大会指出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要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赞助平分，可是许多苏维埃区域，一到执行又来了严重的富农路线，不是不分，就是分不彻底。到今日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已经要求一切没收了，我们还在说，这违背民权阶段的原则，还在说服群众，把群众往后拉，这样不能斩尽机会主义最后的尾巴。不坚决提出一切没收，平均分配，则将不能领导农民土地革命的高潮与无产阶级建立巩固的同盟，以致现在红色区域发展的迟慢，苏区边境红白群众的严重对立，红色区域的缩小与群众的叛变，红军不能猛烈扩大的现象。看来，再有使中国革命走向流产的危险。所以目前反对土地革命中富农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在革命高潮之前，发动千千万万的贫苦农民群众完成地方暴动与无产阶级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最重任务。

从组织上来一个富农分子与机会主义分子的肃清

现时共产党特别是农村中的党部充满着富农、中农分子，无产阶级基础非常薄弱，这是富农路线机会主义严重发生组织上的根源。因此要坚决反对土地革命中的富农路线机会主义，必须在坚决的发动平分土地的斗争中从组织上驱逐富农分子，与肃清一切机会主义的分子，因为这些分子离开阶级观点，完全脱离群众，不接受群众要求，甚至是占据党部和苏维埃革命机关，压迫群众阻碍土地革命深入，必须如此，才能保障正确的土地革命策略的执行。

一切没收，平均分配

凡属地主阶级、公共祠堂、庙宇以及富农的土地，一概没收，平均分配，房屋、山林，如竹山、茶山，凡可分而为贫农群众要分的，一概平均分配。分田必须按照人口平分，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多七天分完，这三个原则，抽肥补瘦，首先第一就要做到，免得以后再平分，或者牵及贫农的麻烦。

各种人口分配问题

雇农原则上不分田，实行劳动保护法，保障其生活，但雇农要求分配时，仍然照分。瓷业工人及半失业工人、失业的独立劳动者，在不能鼓动当红军，政府不能组织生产，解决其生活时，为争

取群众一样分田。流氓同样分田，应从统治阶级利用政策之下，把流氓夺取过来强迫劳动。红军兵士本人为优待起见，应予分田，苏维埃政府并须派人或强迫富农用耕种互助等组织代为耕种。富农地主家属在服从苏维埃法令无反动图谋之下同样分配田地，强迫他们劳动。

合作社组织问题

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收反革命的及富农多余的牛力、耕具帮助贫雇农耕种，没收地主阶级反革命的财产，征借富农银钱组织借贷合作社，低利借给贫农，组织贩卖合作社。政府举办集体农场在目前应为宣传的口号，如果可能时，苏维埃政府可以举办集体农场，是要以社会主义生产的手段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竞争，领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集体生产，但目前苏维埃政权是政治斗争的性质，经济和管理的能力都不容易举办集体农场，如果经营不好，又丧失农民对集体生产的信仰，目前一般说来，仍组织生产合作社为主。

土地国有

这在目前是一个宣传的口号，实际禁止土地买卖、土地出租，土地归苏维埃分配，已经就是国有。只有积极地作社会主义的宣传，批评平分还是不够（但在批评时，首先必须承认平分土地是推翻了几千年封建地主制度，农民得到解放是伟大的胜利），土地、耕具不能改良，肥料、种子不能办好，虫灾、水旱不能防止，只有与

无产阶级合作，推翻整个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统治，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行集体农场，农村电气化，使用新式机器耕种、收获，使用科学肥料与科学的改良田地，防止灾害，才是土地革命的彻底胜利，人类最大的和平幸福。这才是领导贫农争取中农，走向社会主义的实际教育工作。如果机械地宣布国有，则违反了农民现时要分土地的私有要求，是没有好影响的。

废除一切债务

从土地革命之日起，一切债务，不论借债、铺债，以及各种谷物借项利息，一概废除。这是因为农村债务，除掉贫农与贫农之间少数的友谊的借债以外，都带有封建剥削性质，一概废除，实是广大贫苦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但是富农地主阶级因特种原因借用贫雇农的账项，便一定要还；富农地主之间的债务，还交苏维埃作借贷合作社资本。

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必须坚决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的杀戮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只有给反动派无情消灭，才能使群众起来收缴地主武装，建立由坚决的雇农贫农为领袖的苏维埃政权与赤卫队。

给湘东特委的信

（1930 年 10 月 19 日）

湘东特委：

九月来信，今日在峡江收到了，我们收到你们九月以前的信共三封，于十五日做了一个总答复，此信谅可收阅。

九月来信说中央、省委、长江局均有信给我们，并概已转送前来，但此间并未收到，不知兄处从何处寄来致误，念甚！如兄处抄留有底，望速复抄一份前来是盼。

新兵问题，你们本月底，能送五千，最好不过，望加紧努力，用宣传鼓动办法去征集达到以至超过此数，至于运送方法，你们应还与工农革命委员会驻吉办事处通信。我们在吉安，设了一个办事处，以毛泽谭为主任，以万副之，内部组织后方委员会，毛泽谭为书记。后委的任务，是征调新兵，做衣服，对兄处关于送新兵事，应与后委通信。

总前委本月十七日抵峡江，在此开了全体会议，对时局估量，行动问题，土地问题，资本问题均有决议。对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决不能调和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之下，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派都觉得需要来一个改良主义的政纲，但这改良主义的政权的领导问题，决不能用和平的方法能够解决。最近的将来，军

阀战争，必有一场惨酷的爆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的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全军团拟明后两日向峡江出发，向南浔路前进。对于土地问题，我们认为一定要彻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对的，只有执行没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争取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彻底推翻封建剥削，才能保障社会主义胜利的前进。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应该没收反革命的商店与军阀官僚资本的工厂商店，对于不是违反苏维埃劳动法的资本，应用工人监督资本的方法来限制他，克服他的阴谋（移开资本，怠工不办货）。这是几句简单的说明，详细解释，请阅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信便知。

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夜于峡江县

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

（1930年10月26日）

一　吉安胜利与新的革命高潮

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一、三军团的汇合与吉安主要城市的夺取，这一红军势力的猛力发展，配合全国各主要城市无产阶级尖锐斗争，农村中苏维埃的发展，已使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形成总的爆发，特别是吉安的夺取是完成赣西南数百万有组织的群众，二十余县苏维埃政权最有群众最有基础的夺取。它不仅是更有基础地帮助红军向前发展，它不仅要号召全江西革命群众最近期间完成江西总暴动，这对于全国革命势力的推进，对于争取全国革命胜利，同时是有伟大意义的。无疑地应继续吉安胜利的发展，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二　国际事变与世界革命的发展

最近国际事变的发展，如意法备战，意法海军谈判决裂，法国对海军的积极扩充，捷克斯拉夫的排德暴动，英国痛诋美国关税提

高政策，南美洲十七个共和国组织南美联盟，对抗美国的运动，都表现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紧张。美帝国主义指使欧洲美洲对苏联经济封锁。特别因苏联最近正在美贱价抛麦，引起美国麦价惨跌更无法挽救其农村生产过剩的恐慌，更对苏联的仇视；各国之抑制共产党运动与拘捕领袖，更表示进攻苏联的加紧。但在帝国主义垂死时期所发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上面，已促进了世界革命怒潮，法国最近选举中共产党大获胜利，柏林五金工人反抗政府百分之八减薪，十四万工人大罢工，西班牙之马拉加船坞工人罢工，蔓延到维多利发生总同盟罢工，造成叛乱形势，政府虽采取严厉手段，不能镇压。匈牙利五万工人游行示威，捷克共产党之排德大示威，波兰京城总罢工，抗议政府拘捕反对党领袖，智利南部之突起革命，日本丝纶工潮走到与警官队武装冲突中，印度揭竿而起的居民暴动，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之巩固与发展，就农产品一项，已压倒美国农产品，凡此说明世界革命正在怒潮澎湃地开展起来，这一形势是非常便利于中国革命，这将要转变进攻苏联的战争为争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战争。

三　军阀混战中几个事变

A．蒋介石攻下济南后，张学良发出巧电主张和平统一，听候南京政府处理。

B．张学良开三军入关，进驻北平天津，近且通电主张在北平召集善后会议，要讨论什么“努力救国”问题。

C．蒋介石发表两个重要电报：一、请国民党政府大赦政治犯，除陈炯明、阎锡山及共产党外一律赦免。二、召集国民党四次

代表大会，确定召集国民会议，颁布约法宪法。一个告国民书中述剿共（限期三月到六月，一面分区负责，一面整个会剿），整理财政，澄清吏治，发展经济，厉行自治等五项。

D. 报载南京中央宣传部长刘芦隐对时局报告有“日文报对东北当局张汉卿造作种种谣言……日本政府在华外交官吏，竟使日报在我国境内肆行离间，致使吾人不禁怀疑其有意操纵”又说“英人辛博森助阎强占海关，当犯有参加外国内乱之罪，经我国数次之抗议迄无表示，我们认为英国驻华外交当局不负责任，就是英国政府亦不成个东西了”。

E. 蒋介石占领郑州，冯玉祥部队据报载一部被蒋缴械，一部投降蒋，一部退豫北，有进攻山西说。

F. 蒋介石调徐源泉、王金钰、陈诚、夏斗寅、蔡廷锴、蒋光鼐、岳维竣、肖芝楚等都回鄂，谭道源、金汉鼎、许克祥、彭启彪、毛炳文、李云杰、唐云山等部入赣，镇压革命。

四　对于这些事变的估量

A. 蒋阎冯的战争，即是英日美的战争，日本利用英美冲突的紧张，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乘机取巧于美蒋妥协，使其走狗奉张取得河北地盘。果然英美两方都不能不向他让步，跟着蒋阎两方对奉张的进兵，都不能不加以承认，特别在蒋要利用这一着以对阎。

B. 长沙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以及吉安的夺取，这不但使中国革命形势有广大的转变，同样转变了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说革命势力的发展，阶级的根本矛盾，已使帝国主义、中国统治阶级极力想缓和自身的冲突，联合对付革命，美帝国主义固然感觉所统

治的南京政府下面，革命势力日益威逼，需要如此；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也觉得中国革命之胜利，首先是于日本不利，所以日美有暂时妥协的可能，蒋亦不得不拉张，以迅速结束战争。在英帝国主义方面，镇压中国革命，也是急需。加以在日美联合，在阎冯惨败之下，也不得不暂时屈服，在帝国主义军阀这一暂时联合对革命之下，所以蒋介石有从前线大调兵力进攻革命的需要与可能。同时镇压中国革命需用新的改良主义，欺骗政策，所以蒋介石于开封郑州占领前后，乘军事上的胜利，连篇通电提出改良欺骗政策，企图树立反革命的领导，所谓赦免政治犯与召集国民会议，实际是接受改组派的纲领，企图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同时拉拢冯的部下以抗阎，组织一个由蒋系领导，即美国领导的反共联盟，镇压中国革命，这不仅是争取反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同时也就是争取进攻苏联反世界革命的领导权。

C. 这一反革命联合，必然要在革命高潮面前瓦解。这是统治阶级之矛盾与动摇崩溃，革命势力之猛进可预先肯定的。帝国主义军阀，虽然竭力在拉合，可是内部的矛盾跟着紧张，张学良善后会议的主张，显然与蒋介石的国民会议对立，蒋冯阎混战，实际得了北京山东地盘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学良，因此凑紧了日美张蒋的冲突，刘芦隐的报告，已露其端倪。蒋介石匆匆调兵南下，限期三月至六月肃清共匪，就表现蒋张战争的紧张，特别是因为统治阶级政治经济根本破产，全国规模的金融紊乱，农村经济的严重破产，南方各省经年持续的农民反抗地主的暴动，国民党各派都无法解决，就看出这一问题的更加严重，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生产恐慌的影响之下，大批停顿倒闭，增加失业危机。冯阎虽然失败，但是一切破产了的山西陕西无法生存，必然出于争地盘一战，

英帝国主义为挽救其产业的危机，对于已丧失的中国势力及其政治上的领导权，必然要极力以求挽回，这就证明了帝国主义及中国统治阶级因为经济政治的根本破产，所以不能稳定的前途，亦即不能有巩固的联合，新的军阀混战必在不久的将来更促其崩溃。蒋介石的所谓和平统一，只是欺骗无耻的妄谈，就连吴稚晖走狗也在说："要思想永久和平，恐怕不能有十二分的把握。"基于上述这一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及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走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坚决斗争中，群众所要求的不是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而是工人农民士兵广大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苏维埃大会，且已定期十一月七日召集；民众所要求的不是维持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什么宪法约法，而是保障无产阶级专政，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利益的苏维埃法令纲领；民众所要求的不是豪绅地主政权的地方自治，而是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政治。国民党改组派蒋介石派为什么要在这个时节提出这一套把戏呢？正因为革命已走到高潮，要根本推翻统治阶级，看见民众为上述各种要求坚决斗争，便不得不提出什么国民会议、宪法约法，拉拢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镇压工农的要求与革命。这种阴谋欺骗，只暴露统治阶级愈加崩溃，在革命高潮面前，恐慌无措的丑态。帝国主义军阀这一反革命的联合是在今日全世界革命怒潮澎湃，中国革命猛烈开展之下进行的。因此这种进攻的性质是统治阶级挽救危亡的进攻，绝不像过去革命潮流低落时期统治阶级消灭革命势力而举行的会剿井冈山一样的进攻。我们对于蒋系军阀的大举进攻，必定要来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暴动去答复他。在帝国主义军阀，一面不得不妥协，一面又无法调和矛盾，就在这一动摇崩溃的形势中，我们肯定指出这一阶级决战的胜利。不但是争取一省，就是争取全国革命的

胜利。

D. 关于军阀混战有两种不正确的估量：第一是非阶级的空洞乐观估量。以为军阀混战总是愈打愈大直到自取灭亡，无论如何不会联合对付革命。这一估量完全是非阶级的错误估量。这是因为不了解阶级的矛盾超过统治阶级自相矛盾时，统治阶级必然要作最后的挣扎，暂时抛弃自身的矛盾联合起来，对付革命。这种估量的结果，将松懈革命工作的布置，实际行动上容易走到脱离群众，单纯的军事观点，因而一遇着反革命的联合，就觉手忙足乱，这种空洞的乐观估量，就必然走到极端悲观。另一种就是以为敌人的联合对付我们，革命就遇着很大的困难，因而发生悲观。这仍然是一种非阶级的分析，并不了解革命高潮。因为统治阶级之最后的联合挣扎，是对付革命势力的进攻，这就证明革命已到高潮。革命到了要消灭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为挽救自己的危亡，岂有不联合之理？革命势力还在一省内发展的时候，统治阶级每每用一省的力量对付革命，游击战争的时候，即是如此。相反的，如果遇着统治阶级全国规模联合的时候，无疑地就证明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谁不认识这一点谁便不真正认识革命高潮，谁就要走到悲观、逃避、可耻的取消主义。正确的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但要遇到国内军阀，而且遇到国际帝国主义残酷的战争。在革命开始胜利时，帝国主义军阀是有抛弃本身矛盾，一致联合对付革命的需要与可能。这只有加紧全国工作的布置，注意四大革命势力的平衡发展，准备残酷的决战。中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根本破产无法挽救，革命势力猛烈开展，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工作的配合与世界革命顺利的条件中，争取中国的胜利。在目前的统治阶级联合对付革命，右倾分子容易发生悲观，一向持乐观的也要走到悲观。因此正确地指出统治阶级的动

摇崩溃，新的战争的酝酿与革命势力之猛进，与悲观观念斗争，是实行阶级决战争取一省胜利的前提工作。

五　反对争取一省政权的游击路线

争取一省政权的工作，今日已实际地摆在我们面前，要能达到这一任务，必须转变过去红军游击时代所留下的游击路线——就是由单纯军事观点发生的轻装袭击路线。这一路线由于对军阀混战估量不正确，不了解争取一省胜利是阶级决战的工作，因而走到离开群众，不注意争取群众，建立群众工作，不注意扩大红军与加强红军力量。在军事技术上仍专门使用游击方式，不懂得阶级决战时所必须准备的条件。单纯的轻装袭击（这里所讲的袭击，是指争取一省的战略路线，不是反对军事战术上的袭击），结果表面上似为坚决进攻的左倾路线，但实际延缓了革命首先胜利的到来，成了极端的右倾路线。长沙和吉安事件，足够教训我们，第一次的不能坚决持续占领长沙，主要的是群众条件不具备，红军在力量上亦尚不是红军中坚。第二次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红军的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至于长沙第一次之能攻取，是因为敌人无援兵可增，无工事可守，仅只有在这样条件之下，轻兵袭取才有可能。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地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

以严重的纠正。中央最近指出，红军需加紧训练，提选好的农民成分工人干部创造红军中坚、红军铁军。指出必须有三万至五万红军中坚，方能把握住大城市的胜利，树立群众对红军的信心。作战必须有计划地有布置地使用战略，这更深刻了我们争取一省实际工作的布置，我们认为这一指示非常明确。但如借口群众尚未配合，红军不采取坚决进攻，无目标的分散工作，或因为没有群众配合，就在有胜利把握时也不攻坚，不了解给养补充训练，都只有在有计划的斗争中才能解决，当然也是放弃一省胜利的任务，也是严重的右倾观点，应该注意防止的。另外还得指出一点，就是不了解战略与战术活泼的运用，战略是依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地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规定于当时主客两方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这在红军下级干部及士兵群众尤要使之明了，否则群众只知道总目标，亦有因战略与战术上的变化，便怀疑动摇起来，甚至要使上级指导机关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妨碍战略战术的活泼运用，这是值得注意的。

六　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是一方面军与江西党部的当前任务

在争取武汉的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前提之下，目前应争取江西胜利继续实现武汉的胜利，江西胜利，自然绝不能离开全国革

命高潮，不过在江西本身说来，这种条件有更多的可能，江西有六十余县的苏维埃区域，农民暴动已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一、三军团的汇合，与红军第十军的鄱阳湖口的继续进攻，特别最近吉安的夺取是汇合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江西地主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大都破坏干净，而且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威迫之下，更促进其动摇崩溃，红军在清江与敌军十八师隔江宣传，士兵即是一排人拖枪叛变，投入红军，敌军士兵相约我们打南昌不打枪，敌方官长大起恐慌，深夜集合训话，最近又有拖枪来到第三军团的，若说五月不发一文，士兵都不愿干，官长常被暗杀，军队中常发现到红军中去的呼声，他们感觉当红军不受压迫，这一形势就证明统治阶级所持以挣扎的工具都靠不住。加以历次作战敌军士兵动摇不愿硬打的经验，更使我们知道敌军虽多并不足畏。目前蒋系军阀，虽然派遣许多部队来到江西，但在统治阶级反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并未解决，新的冲突正在酝酿，蒋介石不过利用暂时妥协抽空对付革命，而且在长期混战之余，士兵极端疲惫动摇，只要我们加紧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无疑地可以消灭敌人进攻的主力。所以江西党与一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的有布置的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七　在上述这一任务之下一方面军与江西党工作路线

1．加紧反对军阀压迫革命与武装暴动夺取江西政权的宣传鼓动，扩大吉安胜利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及所颁布的一切法令文告的宣传，提出“反对军阀压迫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江西政

权”，鼓动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坚决地以阶级决战答复敌人的进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在革命高潮之前加紧反对一切改良主义，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取消派及最近蒋介石之国民会议欺骗政策，尽情地暴露他们一切罪恶，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这成为阶级决战时打破敌人缓和革命的阴谋严重的政治任务。

2. 建立南昌、九江、南浔路的工作：无产阶级的暴动在今日成为争取主要城市，不可缺少的主要力量。敌人最后的挣扎是凭坚固的工事死守城市，长沙事件教训我们争取一省胜利，缺乏主要城市工作是不可能的，现在应纠正对城市工作的悲观与忽视，克服一切困难，建立城市工作。职工运动的主要路线，是直接组织武装暴动，加紧政治同盟罢工的布置。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与纠察队及暴动时中坚队伍的赤色先锋队，至于日常的经济斗争当然不会放弃而是要联系到武装暴动。

3. 完成地方暴动：首先应将赣西安福、泰和、新余、分宜、袁州，赣东吉水、永丰、乐安、新干，赣南的赣州等县地方暴动完成，在白色区域，须坚决发动游击战争，布置暴动，坚决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把所有的赤色区域连合起来。要进而与闽湘鄂连成一片，准备以群众暴动的烈焰，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完成地方暴动，必须学习过去的教训迅速没收一切土地，彻底平分才有可能。在这一斗争中要树立雇农的领导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建立贫农委员会，苏维埃赤卫队中须严防富农分子参加，坚决提选雇农贫农之为领袖，农村斗争一开始不仅猛烈地进攻地主阶级同时即须从平分土地不完租债，反抗富农对贫苦农民一切剥削压迫，发动贫苦农民群众对富民的阶级对抗，如此才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坚定革命基础。

4. 动员广泛群众参战扩大苏维埃，指示全国革命形势的开展，

政治上的必然胜利，号召群众这次军阀压迫革命，我们必须男女老幼一齐动员配合红军，实行阶级大决战，消灭敌人主力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凡属敌军进攻的区域，如峡江、新余、分宜、袁州、安福、莲花以及吉安、吉水、水丰、乐安等县须集中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统一指挥，侦察敌人出进要道，扰害敌人后方，破坏敌人交通，收缴敌人枪支，断绝敌人供给，漫山遍野地埋伏，作各种骚动与恐慌工作，使敌人陷在红色区域进退不能，根本消灭。赤卫队帮助红军放哨侦察、运输、救护，各县须有组织的准备起来，各县武装梭镖土大柱炮，火药须尽各种可能分区乡充实准备，上述这些工作，必须用鼓动方式群众路线，各区乡召集苏维埃群众大会，由群众自己决议参战的实际行动与准备，必须发动自觉的热烈的参加，才是政治上的胜利。因此须坚决反对命令主义（不经过说服鼓动，群众不了解，强迫地执行）狭隘路线（党和苏维埃不在群众中起煽动领导作用重大问题不由群众会议解决形成少数上级人的颐指气使群众感觉只为个人命运而行动），另一方面须暴露军阀压迫革命屠村烧山的残酷，自首反水阴谋，提高阶级的仇恨，提出“为阶级奋斗到底决不投降”以鼓动斗争决心。在非战的苏区须同样动员，猛烈向外发展，消灭赤白对立的现象，以争取群众，一致向豪绅地主进攻，说服赤色群众，制止报复主义，以坚决平分土地，在白色区域相当时期的占领，帮助群众分田建立赤卫队等来消灭赤白对立的严重障碍。

5. 加紧白军士兵运动，白军士兵因为混乱的残酷牺牲与生活上不堪的压迫和恶劣以及受了工农革命高潮的影响非常动摇，最近自动拖枪投红军的事不断发生，士兵暴动的条件，是完全成熟还没有成批地发动，就仅在缺共产党的组织与领导，地方党部和军队党

部，须纠正过去这一工作的忽视，用最大力量来注意。必须了解没有敌人部队的瓦解，决没有革命的胜利，这一工作的路线，是要树立广泛的政治基础与建立严密的组织领导。要以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变屠杀工农为帮助工农解放的战争发动士兵的阶级觉悟，组织士兵暴动，纠正过去的狭隘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与单纯的兵变主义（少数人的拖枪逃跑），地方党和红军政治部须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调遣大批人利用各种机会插入敌方军队进行此一工作，特别在目前对来赣的白军士兵下级官长须加紧宣传鼓动，主要是抓住他们在山东河南长期苦战，所得的只是白白的大批死伤，现在又要调回打工农，认识军阀的罪恶，指明现在革命形势的开展与他们的出路，只有参加工农革命，鼓动他暴动哗变。在敌人进兵的区域，必须来一个群众的士兵运动，利用士兵宿营，动员妇女小孩老头子以洗衣小卖（但主要粮食必须断绝）与之接近鼓动。赤卫队一面须勇敢地收缴敌人枪支，一面对俘虏白兵必竭力优待，争取白军士兵群众，打破敌方说赤卫队惨杀白军，使士兵不敢哗变的谣言欺骗。

八　赣西、赣南及其他苏维埃区域的严重任务

1. 团结贫农雇农对抗富农，在那富农把持肥田的区域，要迅速地再来一个质量上的平分土地，实行抽肥补瘦，这是扯开农村阶级的必须，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根本镇压富农阶级反革命阴谋的最实际的政策，至于那些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都已经彻底平分了的地方，应该保障分田胜利。不得动摇原有分配。我们的口号是：“分得公平的不动，分得不公平的再分。”

2. 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因为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这一改造，只有彻底平分田地，发动雇农贫农对富农的阶级斗争，以及动员对付反革命进攻的阶级决战中，洗刷富农及一切怠工动摇分子等，提选积极的雇农贫农分子才有可能。同时在地方城市内（各县城特别是吉安城）要彻底执行穷苦工人的意志，以工人监督资本实行劳动保护法的口号对抗资本家的剥削，对于工人中与资方接近的及非直接受剥削的阶层要从组织上加以防止，从这些斗争中洗刷城市乡村支部的一切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提选坚决的无产分子。

3. 提出“撤换违反贫苦工农利益的委员”“撤换违反苏维埃会议的委员”的口号，改选原有全部苏维埃政府，重新提选雇农贫农真正群众领袖为苏维埃委员，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这是因为赣西南各级的苏维埃政府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的原故。苏维埃政府同时须肃清新式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是脱离群众断送苏维埃的自杀政策。巩固苏维埃的主要策略只有引进广泛群众参加苏维埃的管理，一切重大问题均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与解决，政府工作向代表会议报告，接受代表会议批评，这就要定期召集村乡苏维埃群众大会，及乡以上的代表大会，反对固定的代表制，提出“选举贫苦工农领袖为代表”由村乡群众大会选举。乡政府下面人口过多、地面过广者，须设立村苏维埃，政府人员，不脱离生产，不支给养。如此方能防止新式官僚主义的发生，才能使苏维埃一切行政合乎群众要求，取得群众拥护，使苏维埃巩固。

4. 从政治上指出AB团各种欺骗阴谋，肃清在群众中的影响，

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5. 城市中建立真正的阶级工会，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加强纠察队的组织与训练。

6. 建立独立的雇农工会，这是树立乡村中无产阶级的领导非常重要的组织，须建立雇农工会支部生活，加强阶级的教育，领导对富农的斗争。为着争取贫农基本群众，发动对富农的阶级斗争，要建立贫农委员会，成分过去受重租重息剥削的贫农，现在分了田仍贫困的贫农，注意提选积极分子为领袖。

7. 用鼓动说服方式猛烈扩大红军后备军，坚决反对命令主义，欺骗方法，因为这不是扩大红军，而是在阻碍扩大红军，后备军须注意军事政治训练领导参加群众工作。

九　一方面军目前工作

1. 军事战略：一、三两军团在敌人多数增援向我们前进的情况之下，认为是补充红军枪械，扩大红军创造红军铁军，最好的时机到来。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2. 加强军队中政治训练，目前应集中实行阶级决战，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政治鼓动，指出反革命的联合的必然崩溃，大举进攻是创造红军铁军的绝好机会，以提高官兵斗争的决心。同时军队中应注意反AB团改组派，对新兵尤要注意一般的政治教育，建立士兵委员会与党的组织。特别注意党的领导力量加强与组织扩大，各军

党员数量一个月内应较原数扩大一倍，并应注意有计划地宣传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各种革命策略的问题，以及识字教育，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经常领导士兵做群众工作。从群众斗争中吸引坚决的工农分子，扩大红军，达到创造红军铁军的任务。

3. 加强实用的军事训练，成为创造红军铁军的严重工作之一，这尤其是对以多的新兵成分，实行阶级决战，所不可忽视的。这须取消不适用的形式上的操练（如姿式教练）除下操外，更要利用一切行动休息时间来达到这一任务，各军长官须有计划有督促有检阅地执行这一工作。

红军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兴国调查[1]

（1930年10月）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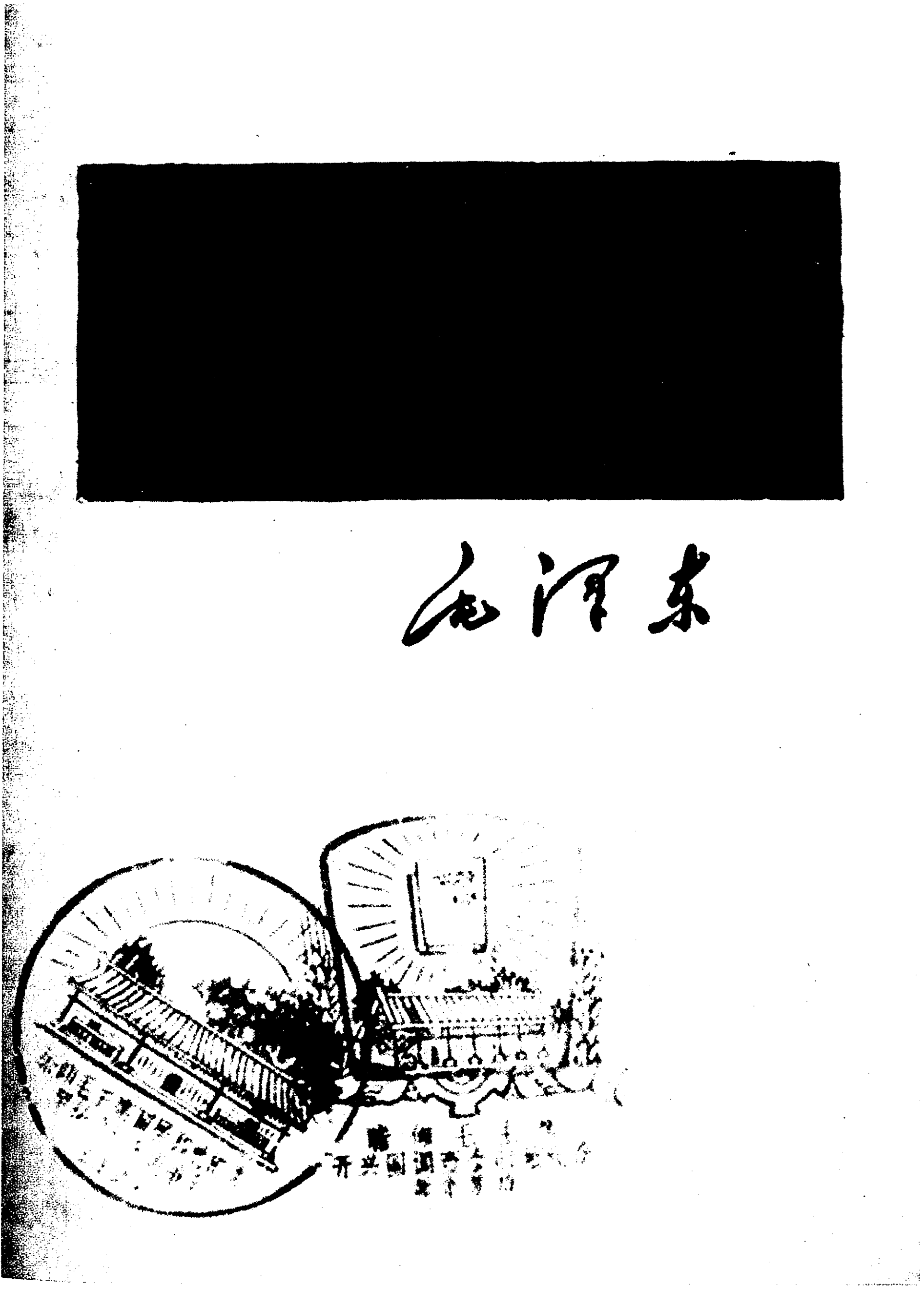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凌源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三坑区为第三乡，江团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

---

[1] 1930年10月初，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江西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许多农民当红军。10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县罗坊找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区的8位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随后整理写出《兴国调查》一文。

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1930年，毛泽东依据对8个农民家庭的调查，整理出《兴国调查》一文。图为《兴国调查》的单行本。

一　八个家庭的观察

傅济庭

第十区第一乡人，开小屠坊，没有本钱。五个人吃饭。有二十三石谷田，要交出三石租，留二十石。五人每人要吃七石，共要三十五石，不足十五石，靠屠坊生意补足。每杀一个猪，能赚一元三角左右（现在没有大猪杀了，每个猪只能赚五角左右）。五个人是：父亲（八十岁）、妻子（煮饭，养猪，弄柴火，洗补衣裳，不能耕田）、儿子（五岁）、女儿（一岁）和自己（三十九岁，耕田兼杀猪）。除自己的田以外，又同人家租入五石谷田，每年要请一个月的零工帮忙作田。母亲五年前死了，死的时候用了小洋一百多元，除兄弟出的以外，自己借了小洋五十元债，利上加利，今年已是百五十元了。二十三石谷田中有十七石是自己的，六石是“退脚田”，乃白鹭（赣县属，离十区一乡十里）钟姓的公田。六石每石押去小洋六元，共三十六元，另外每年交租三石（十分之五）。

去年三月革命失败，跑往均村山里，帮人修山。九月红军到兴国，回家，靖卫狗[1]钻山走了，没有分田。今年二月（阳历三月），红军打赣州，二月分田，没有分进来，但三石租不要出了，百五十元债不要还了。同时押金三十六元也没有收回。二月起在村政府当了三个月土地科长，帮人家分田。四月起当赤卫队中队长，有梭镖无枪，当了三个月，六月十五日带队打兴国县的靖卫狗一次。六月

---

[1] 靖卫狗，即靖卫团，反革命的地方武装。

起，赤卫队改编为红军预备队，当排长，一个多月，当连长。这时第一乡编了二个连。八月打七坊，带队去打，打胜了。这次（阳历十月）出发新余当营长。脱离生产不得，肉帐又没有收好还与别人，要回家去，不愿当红军。

读过六年书，勉强看得清报。

李昌英

十区一乡彭屋洞人。

六个人。自己四十八岁，耕田。妻也四十八岁，心气痛，只能煮饭，洗衫衣，供猪子。儿子二十岁，耕田，很笨，不会算计。媳妇二十岁，每天弄柴烧，不能耕田。女儿十二岁，今年六月嫁出去了，嫁到四十里的吴姓。第二个儿子三岁，今年四月死了。现在只有四个人吃饭。

自己有三十石谷田，借老弟李昌芬二十石谷田。李昌芬因田不好不够开销，往泰和罗坑作田去了。李昌芬的二十石谷田水打得到，只能收十三石谷，要量九石租。李昌芬欠了千二百毛债，九石租，就代昌芬还了利。自己的三十石谷田，因是山田墈，易崩坏，实际只能收十七石，连昌芬田的实收数四石，共二十一石，均水谷（毛谷），七折成燥谷十五石，年好也只十七石罢了。六个人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帮助，年收番薯三十担左右。喂一只猪，喂到十二月，卖给人家，买油盐回来吃。平时不能吃肉，只有清明（四毛）、莳田（十五毛）、端午（三毛）、吃新（十毛）、七月半（二三毛）、中秋（二三毛）、割禾（二十毛）、重阳（二三毛）、过年（三十毛）才买肉吃。吃新要买十毛钱肉，因为要

请工种番薯。莳田、割禾都要请工。一年要请二十个工。父子二人除做自己的事外，还要帮兄弟老二耕二十石谷田，每年要花费八十个工（每一石谷，好田要费三个人工，坏田要费四个人工）。因为老二死了，剩下老二嫂，昌英的第二个儿子过继与她，八十个工没有工钱。除做自己的事并做老二嫂的事外，再无余力帮别人做工了。

欠债一千二百毛，欠的义仓上的，每年还利谷七石半（借百六十毛量利谷一石，每石价二十四毛）。每年年终卖猪卖得二十多元，除拿六七元买盐油外，均拿了折了利谷还与义仓。本村新义仓、老义仓各有三十余石谷，共有七十石谷。

今年三月分田，六个人每人分得七石谷，共四十二石谷，即把昌芬那份田完全归了昌英，昌芬欠的那笔帐由昌英还利的，也废除了，义仓上一千二百毛债也废除了。四十二石谷是瘦田，只能收六成，二十五石谷左右，加上番薯，勉强够吃。

今年八月赣西南来公事，重新分过，抽肥补瘦。他家死了一子，嫁去一女，只有四个人了，每人分得六石一桶（四桶为一石），共得谷二十五石。他的坏田拨出一点给人家，人家的好田拨来一点与他，这回分田分得匀净。为什么三月每人分得七石，八月只分得六石一桶呢？因为革命胜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农民这时候回来了十二个人，因为泰和那边还没有革命，听到兴国革了命，有田分，都回来，所以本村每个人的田分少了些。

彭屋洞只有易、李、丘、郑四姓，共一百三十多人，没有村政府。

他在乡政府没有办什么事，他的儿子李全坡在乡政府经管彭屋洞方面的军器（梭镖、鸟枪、刀等）。

打兴国，打良口，均他儿子出发；打七坊，打南昌，轮到他出

发。他愿当红军，只是要请一个月假，归去买回一牛子，才好耕田。因为他的一条牛，今年六月二十七日跌死了，前年二十三元买进来的，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十元，六月费去十二元买进来一条牛，七月又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八块钱（还不曾收拢），须得再买一个牛子才好耕田，所以要告一个月假回去一转，再来当红军。

“叨红军的恩典”，过去七十块钱一头的牛，如今只要二十元买得到了。“叨红军的恩典”，百物都便宜了。油过去二十三元一担（一百斤），现在只要十元一担了。谷过去四元一石，现在一元一石（三个铜片一升米）。柴过去二十文一斤，现在八文一斤。肉过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现在三百二十文一斤。只有盐、布等项大贵特贵。盐过去三百二十文一斤，现在八百文一斤。布，过去白棉布一百四十文一尺，现在三百二十文一尺。

温奉章

十区四乡（猴迳）人。猴迳有三百多人，有一个乡政府。

四个人吃饭。

父亲五十六岁，脚痛，一点事也不能做了。母亲四十六岁，眼睛看不到了，供猪而外，不能做别事。自己二十岁，耕田，今年三月起当少队大队长，七月起在乡政府当财政委员，十月出发打南昌，代理红军后备队连长。妻十六岁，煮饭，弄柴烧，看牛，不帮耕田。

自己有八石谷退脚田，父亲押去多少钱不知道，每年还租二石半（燥谷）。本是八石水谷田，因系好田，能收八石燥谷，四个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少二十石。从地主租来一百二十石谷田，不押

钱，要量租。一百二十石均水灾田，实只能收九十石水谷（每年收一次），八折成为七十二石燥谷，要量去五十五石租（租率百分之七十五），余剩十七石，吃食不够。六月至七月收禾，虽然收了禾，还了租去，还了去年的生谷去，随即没有食了，八月九月又要生谷。向富农生，生一年，一石还三箩。每年要生十多石谷。去年生的十二石谷，今年“叨红军的恩典”，不要还了。欠了六十元债，欠大地主刘花让的，每十块毫洋量一石谷利息，现在不还了。幸得能收四十担番薯，三担番薯抵一石谷，共可抵十三石谷。

今年三月，四个人共分了三十二石谷田，除自己的八石退脚田外，分进来了二十四石。分法，即就原耕的一百二十八石（佃人百二十石，自己八石），铲出九十六石与别人，剩下三十二石。铲出去的尽量拿歹田，剩下的都是好田。八月重分，发现他分多了，又太好了，铲出去二石，剩下三十石，又把好田铲出一些，歹田铲些进来。“乡政府分田很公道。”

过去耕百二十石谷田的时候，自己忙得要死，莳田、割禾、种番薯三个时节还要请工。莳田请六七工，割禾请三十多工，种番薯（早迟两次）请三十多工，共要请七十多工，莳田种番薯交伴（我帮你做，你帮我做）十多工还不在内。现在只耕三十石谷田，不但不要请工了，也不要交伴了，自己也不如过去那样苦做了。比方过去苦三分，现在只苦一分，闲空时间很多，在乡政府管财政，办些公事。打兴国，打良口，这回打南昌，他都出发。

读过四年书，标语能认一半，能写帐。

陈侦山

十区二乡指阁寺人。

第二乡共有八百人，乡政府设在永丰圩上。

七个人吃饭。三个兄弟，各人一个老婆，老大一个女。老大二十九岁，陈侦山老二，二十四岁，老三十八岁。老大摆油盐摊子，摊子摆在人家店门口，专卖零油零盐，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蚀掉了，“搭便革命”，不要还债，摊子不能再摆，现在二十军当兵。老二读过八年书，十九岁以前在自己家看牛，十九岁起学“看地”，看了五年地，在乡政府当宣传员，这次出发，当连政治委员。老三做篾匠学徒，学了三年，现在二十军当兵。老大的妇娘煮饭，弄柴火，种菜。老二的妇娘同做上项各事，现在乡府当妇女赤卫队队长。老三的妇娘才九岁。老大的女二岁。

自有二十石谷田，又租来十石（还租谷五石），老大主持。永丰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圩毕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请八十个工帮做。

欠债一千三百毛，要利谷十石。每年耕田有谷三十石，还去租谷五石，利谷十石，只剩十五石。七个人除老三帮人做篾不在家外，六个人要吃四十二石，不足二十七石，靠了老大做油盐生意、老二看地赚点钱来添补。老三还在学徒期中，不能赚钱。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老三是个老实人，人家说怎样他就怎样，这时他没有参加革命。四月，革命失败，靖卫狗来，老大跑往均村帮人修山，老二跑到泰和的冠朝，在那里看地，赚了七八十块钱。去年十二月，红军又占兴国，老大老二回家，又干革命。革命失败时，

被靖卫狗烧去六间房子。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石谷外，还分进来二十九石，共计四十九石，每人得七石。妇娘子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三月分田尽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匀，扯去一半好田，扯来一半歹田，还是每人七石，妇人仍是喜欢的。因为妇娘子自己在政府办事，经常说别人应该好歹扯匀，所以在扯匀自己的田时，她也是赞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离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满嫂三个女子，都没有耕种能力，所以乡政府派人为他家耕田。派乡中劳力多的去耕，先耕陈家的，后耕自己的，耕得很好。派去耕田的人吃陈家的饭。七个人有四个人吃外边的饭，这四个人的每人七石谷便余了下来，拿了发卖，得了钱买油、买盐、买布。

钟得五

十区三乡（三坑）人。

家里有十一个人。自己二十八岁，读过七年书，在白鹭（离三坑三十里）王姓杂货店里当先生（管账），年薪小洋六十元。连当学徒到当先生共计做了十三年。去年三月红军到白鹭，跟着回家，在家居住。母亲五十七岁，老了，带小孩子。哥哥老八，三十一岁，耕田。老八嫂三十二岁，煮饭、弄柴火、洗衣服，不耕田。两个侄儿，一个九岁，读书，一个三岁。妻二十八岁，煮饭、弄柴火、供

猪子。两个儿子，一个七岁，读书，一个两岁。大侄讨了一个老婆，九岁，带小孩子。一个侄女，两岁。以上共十一个人，只有老八能耕田，他自己能做生意，其余均缺乏生产能力。

自己只有三十石谷田，租别人三十六石，共六十六石。租的田还六成租，还去二十一石六斗，折钱与他，留下谷子。每年能收四十多担番薯。十一个人要吃七十七石，养鸡、供猪、煮酒、请工、待人客等项，每年要吃二十石左右，共需一百石左右，收支相抵，不足二十多石。全家每年盐钱、布钱、工钱、粜谷钱及一切应酬用项共要百五六十元，内中盐钱要二十多元至三十元，布钱要三十多元，粜谷二十五六石每石三元左右共七十多元，此外要应酬费二十多元。这一百五六十元的来源，从白鹭商店付回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种杂粮如豆子等项出十多元，供猪除自己吃肉之外能余十多元，卖松树柴火每年出十多元，共约百二十元，每年须欠债三四十元。他家前共欠债二百多元。

从前有四十六石谷田，十年前卖去七石（价每石十元），前年又卖去九石（每石十二元），故只剩三十石了。老八耕田，劳力还不够，每年要请零工一百二十多个，每工二百四十文，每年要出工钱二十八串多。

今年二月（阳历三月）革命成功，每人分得五石半谷田，十一个人共得六十石零一箩（内自己的三十石）。因为本乡这次分田好歹没有扯匀，现在又要重新分过，目前还未分好。本乡人多田少，每人分五石半，不够食。他家过去每年需食谷百石左右，杂用百五六十元，分田结果得谷六十石零一箩，比革命前之六十六石少五石半。但二十一石租谷不要还了（折钱六十多元），二百多元债的利息四十元（二分息）也不要还了，则是好处。不好处是白鹭王姓的店

倒，他无事做，每年少了八十元（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的收入。两样相比，革命前同革命后差不多。但革命后，杂用减少了许多。蒸酒，为了请工，虽然还要，但可减少一些。布因省穿，也减少了。吃谷不够，虽还要籴入，但谷价大减，七毛钱可以买一石。应酬亦相当减少了。所以从前要百五六十元杂费，现在大概减少一半，八十元一年就够了。（兴国的钱均以毫洋计。）

三月分田，“以原耕为标准抽多补少”。以村为单位，本村人多田少，故只做到原耕不动，并没有抽多补少。目前再分，从别村抽些过来，大概每人能得七石谷，若能这样，食谷就差不多了。

五月，他在乡政府土地科负分配山林的责任（四个分山委员之一），把第三乡的山林都分配了，办法由乡代表会议决，他便去各村分别开群众大会，实行在各村分山。分山多的分田少，分田多的分山少。分田不分山的有，分山不分田的没有，分山的总是分了一点田。五月当赤卫队后备队中队长。六月当独立团的宣传员。此次出发新余，又是当宣传员。第七第八次攻吉安，他都去了。

愿到红军当宣传员。

黄大春

十区一乡茶干村人。

本村有三百九十多人。

四个人吃饭。自己三十六岁，同人家做爆竹。母亲五十四岁，病了九年，做不得事。妻三十一岁，砍柴火挑到白鹭市上去卖（茶干去白鹭十里），卖了钱来买米煮，又要煮饭，又要种菜，又要洗衣服，非常之苦。老弟三十二岁，做篾匠，去年三月去二团当红军，

一去无音信。

家有五石谷田，自己耕了，没有租别人的田。

他帮人家做爆竹，由人家请做零工，一毛四分钱一工，如天天做每月能得四元。老二做篾，一毛子一工，食黄烟，做衣服，没有什么钱多余。

革命之后，爆竹没有做了，老二也不做篾，当兵去了。

从前靠做爆竹，靠老婆砍柴卖，年头做到年尾，弄不得饱饭吃。分了田，吃便够了。欠了陈姓富农的债四十元，把五石谷田作抵押。这个富农非常之恶，革命中被群众打死了。去年三月组织秘密农会，茶干村农会有五六十人，他在农会当交通。去年十一月当赤卫队队长，今年四月当土地干事，六月当红军预备队排长，八月当预备队连长，这回带队下新余。

三月分田，每人只有六石半，都是歹的。又因为原耕下了种，原耕得去六成，新户只得四成。七月（阳历八月）重新分配，每人分得七石，又分来了一半好田。

他是爆竹工人，失了业，老二是篾工，改当红军，故都分了田。别的在业工人，也都分了田，且与农民同数量。这是因为工人虽在业，但业不安定，常怕失业，故要求分田。又因为工人分田自己不能耕，要请人耕，故须与他人同数量。农民开头只答应工人分半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加工价，农民才说“我们准许分全田，你们不要加工价”。

工人分了田，没有牛，要从亲房朋友借牛，没有犁耙，也要借，所以感觉困难。

未曾读过书，只会写帐。

陈北平

十区三乡（三坑）人。

十一个人。三兄弟，每人一个老婆，两个侄子，一父一母，一个祖母。老大，三十八岁，做泥水匠。老二，三十一岁，耕田。老三即陈北平，二十四岁，读过六年半书，在高小读过一年半，在乡教小学五年。父亲六十五岁。母亲六十二岁。三兄弟的老婆在家煮饭、砍柴、种菜、洗衣服，不耕田。侄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祖母九十一岁。

自有三十二石谷田，租人家二十石，还十石租。十一个人有两个吃别人的，小的老的吃得少一些，因此每年六十石谷就够食，收入只有四十二石，不足约二十石。此外还有杂用，蒸酒啊，请匠工啊，买油盐布匹杂货啊，婚丧季节送礼啊，等等，每年要用百二十元左右。靠了老大能入工资五十元左右，老三教书薪水五十元左右，山里棕、柴、竹、木等项出得二十元左右，每年牛婆生一牛子，能出二十元左右，共约百四十元左右，以供杂用及补食谷之不够。

欠债八十元毫洋。

去年祖母、母亲、大嫂、两个侄儿都死了。剩下三兄弟，老二、老三各一老婆，加上老大的岳母，现在六个人吃饭。

三月分田照九个人分（那时有新生儿子一人，新生侄子一人，新讨大嫂一人，但今年下半年便都死了），每人五石半，共四十九石零五斗，自己有三十二石，分进来十七石五斗，都是歹田。目前重分，业已调查清楚，还不曾实行分配。

地主富农倒，不造房子了，老大失业，改了耕田。新办乡村人

民学校，老三还有书教，照政府工作人员一样，每天一毛子伙食费，没有薪水。老三（陈北平）三月在常备队当政治委员，四月在乡政府当宣传员，五月在乡政府当文化科长，六月在乡政府当秘书，闰六月回家教书，九月下新余当预备队第二连政治委员。

打黄塘，打浪川，老大老二都去了。

雷汉香

十区第三乡（三坑）人。

五个人吃饭。三兄弟，一个母亲，一个大嫂。老大四十三岁，一分帮人做雇农，二分自己耕田。老二三十九岁，二分做雇农，一分自耕。雷汉香是老三，二十五岁，泥水匠学徒二年，回家做雇农。母亲七十岁。大嫂三十四岁，煮饭，弄柴火，种菜。

自有七石半谷田，租公堂四十四石谷田。公堂田还租六成。

欠债千二百毛，二分息，借了同乡富农雷祖荣的。

老大老二替别人做零工，在家做事的时间，老大三分之二，老二不过三分之一。老三差不多全部时间替别人做零工。老大当家。

自己的七石半谷田，年成不好，只能收六石。公堂的四十四石只能收七成，计三十石。收成虽减，租不能减，仍要交四十四石的六成租，计二十六石。作一场田，只剩四石谷吃。连同自业的六石，共不过十石，食谷差得很多，又要还二百四十毛利钱，使得一家困苦不堪。

补足生活之法，第一是靠老大、老二尤其是老三帮人做工赚点钱回家。老三每年帮人做二百二十工左右，老大每年帮人做三四十工，老二帮人做百七八十工，合计帮人做四百二三十工。这些工

中，平时每工二百文，割禾、摘木梓每工五百文，共计每年工钱约四十元左右。第二靠种番薯，每年出得四十多担，抵得十多石谷。第三靠种番稻（即晚禾），每年出得十多石谷，这是不要还租的。种番稻就不能种杂粮。第四靠供猪子，每年供得两个，每个可出二十多元，共四十多元，除掉自己吃一半，可剩二十多元。

照上面的计算，共可收入三十多石谷子，六十多块现钱；支出方面，只有三个人的吃食（三兄弟约有两个吃人家的饭，只有一个吃自家的饭，加上两个女子，共三人），和二十四元的利息，相抵有余，用作油盐杂费，应该不至很苦。为什么他家还是很苦（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长日吃番薯丝拌饭，穿也没有好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三兄弟都好赌，特别是老二总是赌输。第二个原因，是老大嫂好吃懒做，在家闹得天翻地覆，弄得三兄弟都懒得做工，猪子也被她打死了。第三，一连死了两头牛，一个吃硝水吃死，一个跌死，家运不济，大背其时。有这三个原因，所以他家总是苦。

三月分田，每人分得六石半谷，共三十二石半。即从原耕五十一石半中（自有七石半，租人四十四石），抽出十九石给别人，其余归自己。不过抽出去的十九石，都是山边瘠瘦每年只能出一道的歹田，留下来的都是每年可出两道的好田。

要重新分配，调查好了，尚未实行。

三月分田抽出去的十九石，因为这田彼时即归新户耕种，故十九石谷，都归新户得。别家分田抽出部分的收获，原耕六成，新户四成，乃因本届田禾新户完全不理，施肥下力仍托原耕，所以收获时新户愿以六成归之原耕，原耕愿以四成归之新户，好象原耕对新户完租四成一样。

老大在本乡赤卫队当兵，打七坊打黄塘都出发过。老二当赤卫

队班长。老三开头在赤卫队当兵，后当排长，这回出发新余当连长。

二　本区旧有土地关系

一　田地分配

照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情形来说，旧有田地的分配如下：

地主	百分之四十
公堂	百分之十（为地主富农所共有）
富农	百分之三十
中农	百分之十五
贫农	百分之五

二　人口成份

兴国第十区人口成份大略如下：

地主	百分之一
富农	百分之五
中农	百分之二十
贫农	百分之六十
雇农	百分之一
手工工人	百分之七
小商人	百分之三
游民	百分之二

依上所述，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占百分之十五。平分土地，中农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对于他们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土地。那些平分要损及中农的说法是不对的。

此处人口成份的分析，是以家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雇农百分之一是指完全的雇农，那些贫农兼雇农的虽为数不少，不在此例。小商人百分之三是指完全的小商，那些半农半商的不在此例。游民百分之二是指完全失业靠赌钱做土匪等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业的不在此例。

为什么地主人口只占百分之一？因为本区占有土地的地主，多住在邻县之白鹭区、田村区及本县之县城的原故。若把他们算进来，大概地主阶级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或三。

三　剥削状况

第一种　地租剥削

一乡（凌源里）、二乡（永丰圩）、四乡（猴迳）地租均是百分之五十，三乡（三坑）大部分百分之六十，小部分百分之五十。因为一、二、四乡有水灾，又有旱灾，收成常不好，故租较低。第三乡没有水旱灾，故租较高。

为什么一、二、四乡有水旱灾，第三乡没有水旱灾呢？因为一、二、四乡是塅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

久不下雨又成旱灾。第三乡多是山田，田高于河，虽田亩很小，却雨不怕水，晴不怕旱。

走沙山是没有法子种树的。

本区的田年种一次，种番稻的不足百分之五。少数番稻及杂粮不收租。

第二种　高利剥削

一、钱利。分为两个阶段。民国十六年以前要三分利（百元年利三十元），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借到的，有田有山有屋作抵才可借到。民国十六年后“世界起变化”，把钱出借的就很少了。

在本区居住的纯粹地主极少，地主多住在赣县的白鹭、田村一带，不过土地在本区。富农是多的。因此本区贫农向地主借钱的完全没有，向富农借钱的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则向公堂借。中农不要借钱，雇农不能借钱，要借钱而又有抵押品能借钱的，只有贫农。另一方面，把钱出借的主要是富农。因此，土地革命中贫农与富农的决斗，无疑要剧烈的。富农也有时向地主借钱，几百元千把元一借，利较轻，一分五到一分八。富农这样成趸地借了来，再几十元一注地借与农民，收得抵押品，榨取高利息。这样，富农就做了地主剥削贫农的中间人，因此富农和地主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公堂，本区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这种劣绅，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他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而是劣绅。因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从中剥削。一乡、二乡及四乡的公堂，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第三乡，民国以前，劣绅管的最多，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国以后，富农管的最多，与一、二、四乡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农管，十分之四是劣

绅管。贫农向公堂借钱时，利比向富农借稍轻，富农利二分四，公堂利二分。公堂借钱一样要抵押。公堂索债比富农还要厉害，期满利钱不清，牵牛赶猪，下田割禾，都做得出。借富农的，到期利钱不清，同他讲明，利上加利，下年一同还他，或由他将抵押的田山租与别人耕种，收得租子抵偿利息。富农目的只在图利，所以期限有时还能通融。

钱利中有一种最挖苦的，就是月子利。这是流氓借了去做赌博用的，一月为期，一元还二元。但不常有。

二、谷利。借谷叫做“生谷”，富农的，利很重，公堂义仓的，利较轻。富农借谷与贫农，不论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借的，或是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借的，七月割禾还与他时，都要百分之五十的利，就是一担谷还三箩。十一月借，七月还，没有一年；一二月借，七月还，只有半年，三月借，七月还，仅四个月。为什么要这样重的利息（比钱利重得百分之二十）呢？因为冬春两季，谷价大贵，较之秋天贵一倍，秋天每石一元半的，冬春常是三元。因此，富农要将谷价所失，加在利息上面。他还只愿卖谷，不愿借谷。因为利息即使高到百分之五十，还不如冬春把谷出卖来得有利。贫农向富农借谷，要有好大的人情，才办得到。富农一百石谷，卖的九十多石，借的不上十石。茶干（第一乡）的富农陈凤鸣，贫农黄大春同他借谷（民国九年四月），他不肯借，同他借钱转而同他买谷，他就肯借。

贫农借钱，由富农借出的占百分之八十，公堂义仓借出的占百分之二十，地主直接借出的没有。贫农借谷，由公堂义仓借出的占百分之九十，由富农借出的占百分十。由此看来，富农是完全的剥削主义，公堂义仓确实还些周济之意。

公堂亦大部是剥削主义。公堂谷子，第一乡出卖的百分之八十，出借的百分之二十。第二、三、四乡都是出卖，几乎没有出借的。惟独义仓的谷子，是全部出借，没有出卖的。本区义仓，各乡都有。第一乡（人口三千）有四个义仓，八百石谷。第二乡（人口八百）有五个义仓，五百石谷。第三乡（人口三千）有六个义仓，四百石谷。这三个乡共有十五个义仓，一千七百石谷，几乎每村有一个仓。只有第四乡（人口二千）仅一个义仓，一百石谷。本区贫农度荒月，全靠义仓借点谷食，靠富农借谷是无望的。义仓借谷利息百分之三十，虽较富农借谷为轻，但要抵押是很严格的，铁器(犁耙)、锡器、银器、棉被、帐子、衣服等，均可作抵，总要一样。只有第一乡之洋坊村义仓借谷，不要抵押品，只要找邻户写张“顶票”，担保本利照还。义仓的谷是由地主、富农、中农捐集的。他们捐集谷子起个义仓，荒时寒月接济贫民，是和缓贫民暴动的一个改良欺骗政策，不明白的却在那里颂他们的恩德。义仓的谷，除地主、富农、中农不能借也不要借外，贫农、雇农、工人、游民都可以借，只要有抵押，或能写“顶票”。

生谷厉害，“捡新谷钱”更厉害。二、三，四、五等月，贫农没饭吃了，向富农捡新谷钱。当时谷价三元一石的，一元五毛一石捡了新谷钱，七八月间交谷，这时谷价总是二元左右。拿这时候市价说，并不算怎样厉害，问题就在贫农把谷子廉价交出去了，明年春夏之间，望着富农拿了卖贵价，三元一石。富农一元五买进来，三元卖出去，利息百分之百，比之利息百分之五十的生谷，不更厉害么?

三、猪利。本区没有。

四、牛利。各乡都有，但不多。富农把牛婆借给贫农，贫农喂

养此牛拿了耕田，每年出利谷一担半（三箩）给富农。生了牛子，贫农富农各占一半。一、二、四乡富农十家中有三家把牛出借，叫做“税牛”，第三乡十家富农中只有一家有牛出税。牛也会病死、跌死，所以这种牛利是不见得很稳当的，富农不很努力放这种利。又怕贫农喂养不好把牛弄瘦，又怕贫农把牛劳动过度，又怕盗贼偷去。所以贫农向富农税牛，要很有人情的才能税到手。

五、油利。贫农有油山的，五六月间，无米煮了，向富农借钱买谷吃饭，把新油出卖。五六月间油价每担（百斤）二十五元的，作十二元出卖，少的只作十元，九月交油，不得短少。即是六月同富农借十二元钱，九月要还一担油与他。九月油价普通总是十七八元一担，高的要卖二十元，低的也有十五元。假如六月借十二元，九月油价是十八元，其中六元即算四个月的利钱，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利率。假如九月油价是二十元，利息就是八元，百分之六十七的利率。富农九月收了油，藏起来，等到明年四月至八月油缺时候，运下江口，运下赣州府，起码卖得二十五六元一担，价顶高时卖四十元一担的也有。前年六月，第一乡农民到白鹭买油，一元钱（十毛）只买得一斤十二两。这虽是买零油，但若集合起来，要五十七元才能买一担油。去年六月一元钱买二斤半，也是四十元一担。若照此例计算，贫农今年六月卖给富农一担新油得十二元，到第二年六月就要损失二十八元之多，简直是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利。这种油利不但重，而且很稳当。九月起到十二月都是贫农打油时候，富农不怕贫农“走空”的，就放心让贫农把油送到家里来；怕贫农“走空”的，自己到贫农家里守着打油，亲自取回。

油利就是这一种形式，从贫农方面说来，叫做“捡新油钱”，从富农方面说来，叫做“放新油钱”。富农把油出借的事（不是放新油

钱）非常之少，但也间或有。今年十二月贫农向富农借一担油，卖得二十元，明年油价贵时，还油一担，或照市价折成钱还去，不要利息。这等于贫农为富农收藏这一担油，所以不算恶利，要与富农有人情的，明年靠得住有还，才能借到手。贫农借这种油，或因死了父母，或为讨妻子，或为其他紧急用途，向有知交的富农借钱，富农说我没有钱，只有油（或者说只有谷），就这样借了油来，发卖得钱，以济急用。明年油贵时节，债主要油，借主就从市上买了油去还他。债主要钱，就照当时市价折了钱去还他。这种借油法，叫做“扯油”。

不论前一种捡新油钱，或后一种扯油，都是不多有的，只在有油山的地方才有。在有油山的地方，如兴国第十一区（均村一带），那一带的贫农耕油山的多（贫农自有油山很少，多是向地主富农租的）。百家耕油山的贫农，捡新油钱的占二十家。均村一带的富农，油利剥削很厉害。在那一带地方，贫农向富农扯油的，百家之中，不过一二家。

六、当利。分大当小押两种。大当，本区没有，田村、白鹭才有，月利五分。当一百文，月利五文，当一千文，月利五十文，当一元，月利五分，都拿小洋计算。十个月为期，到期不赎，延一个月死当。月利百分之五，即年利百分之六十，这种剥削非常厉害。贫农、雇农、工人、游民四种人中，进当铺的很多。这四种人，一百家中有六十家进当铺。抵押品，铁器、锡器、银器、蚊帐、被窝、衣服，都要。本区跑到白鹭去当东西的，非常之多，占贫苦群众百分之六十。白鹭开当铺的是兴国县城人，十一个月死当，当铺老板把抵押品运到兴国城去拍卖。抵押品值三元，当一元五。但当铺老板的目的是利息，不在拍卖抵押品。

小押，本区各乡都有，富农干的，不开门面，也不经常做，只是贫苦工农苦得很时，拿了东西跑到富农家里，求押点钱，间或有之。贫苦工农一百家中，有十家当小押的。为什么当大当的多，当小押的少呢？因为这种干法名誉太坏，并且本乡本地人太熟了，抵押品虽拿了来，贫民总想求情多当几文，富农也不便苦争。因此，富农多不十分肯干这件事。小押的利息与大当同，但日子很短，由富农讲，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期不赎，作为死当。

这次到调查会的八个人中，陈北平、钟得五、傅济庭、陈侦山四家不曾当过东西，温奉章、雷汉香、黄大春、李昌英四家都当过。温奉章每年要当一次，四五月间当了籴米煮，去年还当过一次。去年四月，把铁耙一架、酒壶两把，当到白鹭恒兴当铺，当了小洋二元四角，拿了回来籴谷子一石，十二月赎了回来。雷汉香家也是年年要当。老大老二当的不说，单说老三雷汉香，去年正月当过一回，单长褂一件当一元，锄头两把当六毛，未曾赎回。六月又当过一回，一把泥刀当三毛，一个“洋头子”当五毛（都是老三做泥水匠的用器），也不曾赎回。李昌英去年以前没有当过。去年二月起革命，去游击大队工作，白匪来，跑往白鹭，妇娘子在家没有饭吃，当了棉袄一件，得钱一元二毛。革命再起，未曾赎回。黄大春去年以前未曾当过。去年五月，爆竹不销了，无人请作爆竹，没有饭吃，当了棉被一床，得钱一元五毛，当给本村富农钟块子。今年七月全县革命，白鹭红色游击队到本村，贫民起暴动，捉了钟块子到白鹭杀死，棉被取回。这个钟块子的父亲好，肯周济贫民，故群众不曾杀他。钟块子在唐江开爆竹店，学会一手打，打得几十个人开。把他杀掉，人人称快。他的田平了，又罚了他家三回款，罚了好几百元。

七、盐利。很厉害。因为兴国的盐，都是从广东来的，贫农兼做盐生意的颇多。本区百家贫农，有十家兼去挑盐。没有本钱，向富农借，收买鸡挑往嘉应州（广东梅县），一担鸡去，一担盐回，借洋一元，还盐一斤做利。时间不过二十天或一个月，一斤盐价一毛二三，即一个月间，借本一元，要还一毛二三的利。民国十六年以后，革命的一天多一天，一般利息减下来，减到二分四，盐利也没有了。

第三种　税捐剥削

本区除钱粮以外，对于农民没有什么直接的税捐。

三石谷田为一石“秧租”，完粮四分四厘（银子）。完粮，每银一两，折大洋三元六角。四分四厘折大洋一角五分八厘四毫，这是一石秧租田的粮价。一石秧租田，就是现时三石普通田，所以现时普通一石谷田要完粮大洋五分二厘八毫。本区去年谷价每石小洋三元，折铜元六串。每大洋一元，折铜元二串八百。大洋五分二厘八毫，折铜元一百四十八文，能买谷二升半弱。这即是说，兴国现时一石谷田，每年要完粮二升半。但本区一石谷田，实际只能打七斗谷（收七成），这样就是七斗谷中要完粮二升半，约完去百分之三点五。

本区除钱粮外虽无别的直接税捐剥削，但本区去广东做盐生意的却要受沿途各种税捐剥削。中农或贫农做盐生意的，从本乡收买鸡七十斤，三毛二分钱一斤。一担挑到嘉应州，讲银子，从前每斤价银三钱零，有时高到四钱一斤，今年价高，每斤高到四钱八。每银七钱四分折大洋一元，银四钱八，折大洋六角五，折小洋九毛一，除去本钱三毛二，每斤鸡能赚小洋五毛九。七十斤鸡能赚小洋

四十一元三。为什么今年嘉应州的鸡价特别高呢？因为革命，赣南各县的鸡去的少了，所以价钱大贵起来。

四十一元三毛赚项中，要除去沿途的开支。第一是工钱，往年十天可到嘉应州，如今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相间，许多地方要绕路，至少要十五天，每天工钱二毛五，十五天共三元七毛五。第二是吃伙食、吃黄烟、吃茶水、穿草鞋，每天至少要四毛五，十五天共要六元七毛五。第三是鸡食谷，七十斤鸡每天吃谷子三毛，十五天共要四元五。第四是厘金，从兴国到门岭不抽捐，到门岭要过厘金，每担鸡大洋一元（折小洋一元四），门岭过去不抽。第五，还要加上在本区收鸡的用费，每一担鸡要费三天，工钱、伙食、买鸡笼，共费二元。以上五项开支，共要十八元四毛。四十一元三毛，除去十八元四毛，每担鸡实赚二十二元九毛。

一担鸡去，一担盐回。今年嘉应州买盐，大洋一元买十八斤。过去嘉应州盐每大洋一元只能买十四斤，去年还是这样。今年因革命发展，盐销停滞，所以便宜了。挑一担，八十斤，价钱大洋四元五，折小洋六元三。盐挑回兴国，今年五六月间盐缺万分，因此价涨，小洋一元，只买得二斤半。照这时市价，八十斤盐，卖得小洋三十二元，除去本钱六元三，赚得小洋二十五元七。

但二十五元七赚项中，要除去沿途开支。第一是工钱，十五天，三元七角五分。第二是吃伙食、吃黄烟、吃茶水、穿草鞋，六元七毛五。第三是厘金，吉潭、门岭、白埠、钓鱼潭、会昌、花桥六处，门岭要过厘，其余五处要验票。过厘，从前每担盐六七毛，如今要大洋一元，五处验票，每处大洋二毛，合共要大洋二元（折小洋二元八毛）。以上三项开支，共计十三元三毛。二十五元七，除去十三元三，实余十二元四。

一担鸡去，赚二十二元九，一担盐回，赚十二元四，共赚三十五元三。时间一个月。过去鸡盐两项生意，赚钱赚不到现在这样多，但比较靠得住，不要绕路，时间只要二十天可往返。现在赚钱较多，但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卖掉鸡的钱只以一小部分买盐，大部分带在身上）。虽不要盐，但时时要捉鸡吃，仅不至于杀人。虽然如此，去做生意的人并不减少。

五六月盐贵，每元二斤半。现在（十月）盐便宜些了，每元三斤十二两，这是因为江口、大湖江两处打开，赣州可以来盐了。比之未革命时，依然是很贵的。未革命时每元六斤四两，比现在（十月）差不多便宜一倍，比今年五六月差不多便宜两倍。

三　斗争中的各阶级

一　地主

第一乡地主均在兴国城及白鹭，不在本乡，租要送到兴国城、白鹭去。在本乡有田、在白鹭住家的大地主有四至五家，每家收租千多石，有在白鹭开店的，有在南昌、赣州干事的。在兴国城的有一家，收租千石，在城内开恒春号洋货店，在赣州也有店。

第二乡有三家地主，每家收三百多租，均在本乡住。刘月林，三百租，自己不耕。革命中杀了他家两个人，月林之子老大老三，都是靖卫团分团总。革命后还有十人吃饭，分了田，服从政府。杜喜猷，自耕二百谷，收三百租，二十多人。杜喜猷，四十岁，去年二月参加革命，今年二月红军来，首先自动拿出契来烧，田都平了。杜在政府办事，当宣传。谢文林，三十个人，自耕五百谷，收

一百租，与杜喜猷是亲戚，自愿烧契分田，现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他家六兄弟，五人耕田，还请四个长工，在本乡第一发财。他家无一人识字，很老实。（谢文林其实是个大富农。）

第三乡有两家地主。曾锡群，分为五家，共收一千多租，自己不耕。五家共二十多人。著名大地主，反革命。男子都跑了，留下女人小孩五六个，每人也分了田。屋烧了。他家的人未曾杀到，他同姓替他当走狗的杀了两个。谢远香，四百多租，自己不耕，二十多人，反革命，跑了，不曾杀到人。

第四乡，王润兰，大地主，四百租，又自耕二百谷。油山很多，均自耕。反革命，靖卫团总，杀了许多工农，烧了许多工农的屋，跑了。刘家洪，三百谷，自耕一百，出租二百，五个人，反革命，与王润兰、曾梅喜共起靖卫团。刘家洪和他的儿子均被杀。曾梅喜，收一百租，自耕百多谷，是个富农，五个人，靖卫团副团总，杀死工农多人。贫农高老狗被他杀死，“魂魄在他家吵闹，曾梅喜和他的父亲均被鬼缠死了”。谢传珍，六百租，自己不耕，五六个人。谢传珍被第三区捉去交区政府看押，尚未杀，家财抄了。

二　富农

第一乡共十二家，其中七家反革命。七家中有两家杀掉了家长，其余五家壮丁都跑掉了。跑的家中均被抄，锅子都有被抄的，杀了家长的两家没有抄。七家女人、老人、小孩均未跑，分了田，女人有些与别人结婚了。被杀的一家刘能昌，他的儿子刘述尧，二十多岁，参加革命，出发新余当班长。一家叫陈凤鸣，屋烧了。十二家中有五家不反革命，捐了款子，平了田，进了赤卫队，做革命

工作也努力。其中徐昌函，四百谷田，大部自己耕，小部出租，十多个人，还有很多钱放利，被游击队罚了七百元，家里未被抄，谷子未分掉，田分掉了。徐昌函二十六岁，去年二三月即参加革命，今年三月起做少年先锋队指导员，后到赣西南政府做工作（不知做什么工作），八月回乡在区政府又做少先队指导员，被人咬为AB团，押起来了。凌月波，四百谷田，均自己耕，十二个人，儿子凌霄汉，是个“毕业生”，在村政府当秘书，罚了他百多元，依然当秘书，有人咬他是AB团，押到区政府两个多月，许他自首，放了。谢忠节，二百多谷，大部自耕，一部出租，八个人，最近乡政府把他捉了，要罚他钱，还未放。以上十二家富农中，七家是积极反革命，五家虽表面参加革命，却有两家是图谋反动的AB团，剩下三家，一家也被捉了。

第二乡有富农九家，陈先为、梅嘉生、杨祖莲、谢钟玉、谢文林、陈衮伟、王正科、邹相春、谢良慈。陈先为，二百谷，自耕百二十石，出租八十石，有钱放债，十多个人，剥削很厉害，反革命。陈先为跑了，三个儿子都杀死了，抄了家。梅嘉生，其实是小地主，百多谷，均出租，有钱放债，做布生意，反革命，当靖卫团的指挥。梅嘉生和他的母亲，又一个长工，均被游击队杀死，家抄了。杨祖莲，百多谷，自耕出租各一半，反革命，AB团的暗杀队长，七月区政府把他杀了。谢钟玉，也是小地主，均出租，有钱放债，反革命，AB团团总，平素是个劣绅，八月十七日区政府把他杀了。谢文林，六百谷，自耕五百，出租一百，三十个人，六兄弟，五个耕田，还请长工，本乡第一财主，是个大富农。与杜喜猷是亲戚。自愿焚契分田。全家三十多人，均不识字，颇老实，现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陈衮伟，二百谷，自耕出租各半，有钱出借，二十

个人，参加革命，八月被人咬为AB团，区政府把他捉起了。王正科，二百谷，自耕多，出租少，反革命，当靖卫团，今年五月被杀。邹相春，百六十石谷，出租一百，自耕六十，七个人，参加革命。他的儿子邹丽东，当区政府文化部长，还忠实。谢良慈，四十石谷，均出租，在永丰圩开杂货店。起头参加革命，在第二乡乡政府管财政，侵吞八十多元，撤了他的职，罚他出百五十元。有一天开民众大会，他就着人家的现成笔墨，连写两个反动标语："巩固苏维埃政权定要AB团改组派""拿下赣州吉安定要AB团改组派"。捉了他拷问，供出当AB团秘书，八月十七日把他杀了。以上九家富农（中有三家小地主，一家小商人），七家反革命，只有两家是革命的。

第三乡，九家富农，谢九璋、毛世楫、雷永霞、陈凤鸣、姜滔书、邱福田、邱世礼、邱质魁、谢益星。谢九璋，四百多谷，自耕二百多，租人二百，八个人，放高利，反革命，乡下称霸王，当土棍。革命起来，全家跑了。毛世楫，二百多谷，均自耕，放债，早前二十三个人，现在分为四家。孙子毛章平，二十二岁，中学生，AB团团总，捉起了。雷永霞，二百多谷，自耕五十石，租人百多石，有钱放债。早前走了，乡政府捐了他二百多元。他回了家，乡政府叫他去红军学校，没有考进，乡政府又叫他进了兴国县的教导队。年二十一岁，高小毕业。陈凤鸣，百多谷，均自耕，七个人，无钱放债，因为他的儿子在赣州读书要用钱，反革命，AB团的秘书，杀了，抄了家。姜滔书，百多谷，均自耕，有钱放债，十个人，参加革命，捐了他百二十元。邱福田，百多谷，自己耕，稍有一点钱放债，五个人，反革命，自己跑了，妻子跟了别人。邱世礼，百三十石谷，自耕四十石，租人九十石，吃大烟，无钱放债，

反革命，本人跑了。他的妻乡政府叫她嫁别人，房子做了乡政府办公地。邱质魁，百五十石谷，自己耕，有钱放债，六个人，参加革命，儿子编入赤卫队，捐了他六十元。谢益星，二百谷，自耕出租各半，有钱放债，十二个人，AB团，捉起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跑了，还有三个儿子在家。以上第三乡九家富农，六家反单命，只有三家尚未反革命。

第四乡，刘家洪、曾梅喜两家富农，均是反革命（见前地主节）。

本区四个乡，第一乡十二家富农，九家反革命；第二乡九家富农，七家反革命；第三乡九家富农，六家反革命；第四乡两家富农，均反革命。四乡共计三十二家富农，二十四家反革命，余八家现虽尚未反革命，也不知将来怎么样。

富农的田是很好的，和地主的田、公堂的田一样的好。他们买贫农的田总是要买好的，贫农也不得不把好田卖给他们，因为若卖歹田，要几亩才抵得一亩的价。他们放债与贫农要抵押，也要好田不要歹田。因此，好田一天一天集中到了富农的手中。

革命初起，如今年二三月间，富农投机加入革命的颇多，乡区苏维埃中富农及其走狗占去百分之三十的位置。四五月间，举行反富农宣传周，把他们打下去。到现在，本区只有两个富农办事了（一个是谢文林，在第二乡苏当财政科长；一个是邹丽东，在区政府当文化部长）。

三　中农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第一，中农在土地上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于平田时是平进了的。本区中农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

二十，土地只占百分之十五，故本区中农平田时平进的多。虽然也有平出去的，却是极小部分。

第二，过去讨一个老婆要费二百元内外，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家产，所以中农讨亲很不容易，为了讨亲而欠债的很多。假若一个妻子死了，再讨一个就非常之困难。现在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这是很大一个利益。

第三，过去中农人家，老人死了，起码要用五十元、一百元，百多元的也要用。过去中农因为死爷死娘，负债破产是常有的。现在迷信习惯破除，死了人埋了就是，一点钱不费。

第四，过去牛贵，跌死一条牛，卖得十元八元牛肉钱，要加上十多元钱，才能买回一条牛。现在跌死一条牛，卖牛肉虽仍只卖回十元八元，却只要加上三四块钱就可买回一条牛。

第五，地主富农权力被打倒，礼节废弃，迷信破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都不要了，也可节省一点用项。

第六，除上述五项经济利益外，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重大的利益项。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中农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之四十。内中完全不欠债的占百分之十，稍许欠一点债但家计仍然敷得下去的占百分之三十。

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

本区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占百分之十五。中农的土地虽然要比贫农的好些，比富农的却差得多。大概中农的土地，好的歹的各占半数。

四 贫农

革命后，贫农取得利益如下：

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

第二，分了山。过去贫农是少有山的。第一、第二两乡贫农百家中，三十家有山，七十家无山。第三乡（三坑）靠近均村，那块山多，故贫农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三十家无山，那块的山多是油山。第四乡贫农百家中，五十家有山，五十家无山。各乡贫农有山的，每家山数量亦很小。本区的山，一、二两乡因走沙山多，故地主只要田，不要山，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山之一部。第一乡山的分配是：富农百分之四十，中农百分之四十，贫农百分之二十。第二乡山的分配是：富农百分之五十，中农百分之三十，贫农百分之二十。第三乡因油山多，山里有出息，故地主要山，但仍以富农占的山为最多。其分配是：地主百分之十五，富农百分之五十，中农百分之二十，贫农百分之十五。前面说第三乡贫农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但这七十家所占山的数量不过百分之十五，每家只有一点点。第四乡山的分配是：地主百分之二十，富农百分之二十，中农百分之五十，贫农百分之十。没有山或山太少是贫农一大困苦。（一）没有柴火，或柴火不足，要向人家山上采芦茅。（二）不能伐了松柴挑到市上去换油盐，只能挑芦茅去换油盐，三担芦茅才抵得一担松柴。（三）没有木头起房子，做用器。（四）没有油山或油山不足，就没有油吃，或油不足吃。现在分了山，且和分田一样照人口分，每家每人都有山了。虽然各乡山有多的有少的，各乡人民分山，有分多的有分少的，但即使那个少山的乡，每个都分了一点山，因此解决了贫农的困难问题。贫农为了需要，是坚决主张分山的。为了

生产，亦非分山不可。过去山多人家，因为人力不足，有些荒了，有些修理不好。人力足的贫农大群众，因为无山，便把人力闲置起来。现分了山，贫农大力用到自己的山上，生产便会大大地增多。

第三，革命初起时，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贫农不出钱挑了谷子吃。白鹭（大地主集中的地方）并按人口平分了，贫农吃到割禾时还吃不完。

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三月革命初起时，上头的公事说，商家的帐要还，会帐要还，贫苦工农相互的帐要还。六月十几（阳历七月）赣西南（即指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又来公事，说一切不要还了。本来从三月起，便是一切都不还了，不过不还虽然是事实，而上述三种债要还，却尚是一种道理（尚成一种理论）。六月以后，连这道理都推翻了。贫农十分拥护这种办法。为什么贫农主张连那三种都不还呢？（一）商家的帐。大商家多半跑了（白鹭三十五家商店，十家大的都跑了）。小商家（如白鹭之二十五家小商店）虽多少也有些货帐在工农手中，但小商家多半欠大商家的帐，欠地主的帐，欠富农的帐。贫苦工农不还小商家的帐，同时小商家也不还大商家和地主富农的帐，两者比较，小商家还较得利。因为小商家欠大商家和地主富农的帐，比他放给贫苦工农的帐为数要多些。（二）会帐。为了讨亲，为了还帐，邀定亲戚朋友打一个会，这些亲戚朋友不是中农就是富农，取消会帐是无伤的。虽然打会是出于友谊扶助，但起会是贫农，还不起，取消是应该的。即使二会三会是富农接了，取消不还也有理由，因为富农接了会，把钱放利放到别的贫农手中去，贫农现在不还他了。并且他的全部家产，充公的充公，捐款的捐款，已经闹空，所以不还也是应该的。至于地主富农为剥削贫苦工农而打的会，本区没有。（三）贫苦工农相互的帐。革

命了，“你是贫苦的，我也是贫苦的，我拿什么还你呢？”这样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所以一概废债是最正确的。

第五，吃便宜米。今年正二月，谷价每石四十六毛，三月开始革命，每石二十毛，六月至今（阴历九月）每石七毛，以七毛与四十六毛比，便宜五倍半。谷贱，在贫农分了田已经耕种收割以后，自然有相当的不利，但在革命开始尚未收割的数个月间，谷贱于贫农是有利的。

第六，是“由”了老婆（江西农民把婚姻自由的“由”字变成动词，使之区别于旧时强迫的买卖的婚姻，通用于全苏区农民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埋了就是。

第八，牛价便宜。没有牛容易买到，死了牛容易买回。贫农的牛力是很缺乏的，以贫农百家论，本区每家一条牛的只有十五家，两家共一牛的四十家，三家共一牛的十家，四家共一牛的五家，无牛的三十家。在这种情形之下，牛价便宜是贫农的利益。

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

第十，没有烟赌，同时也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也不会失掉东西。

第十一，分了田，家家能供猪，不专为卖钱供别人吃，自己也可以吃肉了。过去，屠坊中，贫农买肉吃的很少，现在买肉吃的多起来了。

第十二，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

贫农可以依照牛力多少，分为五个阶层，如上边第八项所述。

五　雇农

雇农和贫农一样分了田，因为地主富农倒，虽有人请零工，没有人请长工了，所以他们坚决要分田。分了田，牛力、农具没有，又很难耕种，此问题现在尚未解决。区乡政府不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发与雇农，把它们出卖了。

傅济庭的外甥朱大喜是个雇农。家中七个人：四兄弟，父，母，同他的老婆（童养媳带大的）。他是老大，二十二岁。老二，十九岁。老大在富农钟姓家中做长工，每年工钱小洋三十九元。老二在人家看牛，每年工钱十元。共收入四十九元，买得十六石多谷，只能供两个半人的吃食。靠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砍茅草卖，弄点钱吃饭，冬天吃两餐。欠三十多元债。自己无屋，住地主的山棚，为地主招呼山。父亲原也是雇农，现六十多岁了。

本区雇农每年可抽十五个工，正月过了元宵上工。初一、十五没有牙祭打。老板供给被窝，衣服没有。有病吃药，吃自己的。病在三天以内，不扣工钱，三天以外，要扣工钱。工钱零碎支给。天光做到黑，除吃饭、休息时间外，工作至少十点钟。冬天，晚上剥木梓、刨番薯。

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不但人人有老婆，一人几个老婆的也有。中农百分之九十有老婆，百分之十没有。贫农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手工工人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游民百分之十有老婆，百分之九十没有，也比雇农中有老婆的多些，只有雇农才是百分之九十九无老婆。七月（阳历八月）政府下令，男子无老婆的赶快“由”到老婆，女人无老公的赶快“由”到老公，于是

“由”老婆、“由”老公的事情，就突然增多起来。七月以来，两个多月时间，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雇农比较难于“由”到。女子嫌雇农家中没有器具用品，又嫌他不常在家中，所以雇农不容易解决老婆问题。第一乡傅济庭住的洋坊村，四个雇农（两家的两兄弟），只有一个“由”了老婆。本来另一个也可以“由”到，乡政府的社会保险科长说：他们两人过去有勾搭，不准登记。因此那个女人“由”别的男子去了，这个雇农依然没有老婆。第二乡永丰圩附近，六个雇农，四个“由”了老婆。第四乡，温奉章住的猴迳村，只有一个雇农，至今没有老婆。

分田后，没有长工了，零工亦十分减少七分，只剩三分。工钱没有涨，雇农也没有要求涨。“工都没有做，还话涨的事!”

雇农分田后牛力、农具问题。洋坊村的两家雇农，一家姓陈的，老大老二都是雇农。老大帮富农陈姓做长工，每年工钱三十三元。老二帮钟姓富农做长工，工钱四十二元。他们的父亲是个佃农，死了，母亲带了他们两兄弟讨米。他们长大了，就做雇农。母亲死了，剩下两兄弟。老大二十九岁，老二二十三岁。有一个屋，有煮饭器具，无桌凳，过去有的耕田器具也卖掉了。二月分了田，两兄弟都回家来，老二“由”了一个老婆。他们没有本钱。老二本有百多元钱，借给钟姓贫农，废债一行，也不能收回了，因为那个贫农没有法子还。幸得有个叔子是中农，借给他们牛力与农具。三个人共分十六石二斗谷田。二月分田后，即拿来自己耕种，收获全归自得。头禾割了，又耕二道，禾长得很好。如有牛，一个人能耕一百石谷田。他们两兄弟共只耕得十多石谷，所以有许多工夫空出来，为人家做零工、挑脚，赚些钱用。

洋坊村又有一家雇农钟姓，也是两兄弟，父母死了，叔父（钟

恩江），叔母，叔父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两个孙女，全家共九个人。叔父及两个儿子都耕田，租别人的，自己没有田，欠了债，每年不够生活。他们两兄弟帮人家做雇农。老大钟声坡，四十多岁，在钟姓富农家做长工。老二钟声槐，三十六岁，在钟姓中农家做长工。二月分了田，即由自己耕种。原有一条母牛，租得中农钟龙潭的，养了两个牛子。革命后，钟龙潭要这个牛回去。乡政府对钟龙潭说："税的牛，看各乡办法，各乡都交还，你才能要回，现在不能要回。"因此这头牛仍在钟恩江家。两兄弟分田之后，牛力、农具不成问题，因为他们的叔父有。

在这里要说一说那个中农钟龙潭的事。钟龙潭，三十多岁，母亲六十岁，老婆二十多岁，三个人吃饭。自有十多石谷田，租人三四十石谷田。还租之外，自食有多，拿了出卖。有三条牛出税，税在三家贫农家中，每牛每年收租谷一石半，生了牛子各得一半。很有钱放帐。二月平田，三人共分二十四石谷（每人八石），比自有的多了一点。但不能租人田，因此没有余谷出卖了，税出的牛和放出的债都平掉了。他是个很老实的，不反革命，也没有担负什么重要工作，在本村红军预备队当火夫。

革命后雇农在政治上没有当权。中农贫农总以为雇农"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不熟公事"，办不得事。本区区、乡政府委员没有一个雇农，只有一个雇农当乡赤卫队队长。

六　手工工人

本区手工工人的种类：木匠、泥水匠、缝匠、铁匠、剃头匠、篾匠、砻匠、棕匠、石匠、画匠、锡匠、机匠、银匠、染匠、槽

匠、漆匠、窑匠、纸匠，十八种。以木匠、泥水匠、缝匠、篾匠四种人数较多，剃头匠、铁匠、槽匠（打油的）次之，其余又次之。铜匠、弹匠、鞋匠、皮匠四种，本区没有。油槽一乡一个，二乡两个，三乡十一个，四乡十二个。每个油槽有槽匠一人。

工钱：过去每工木匠二毛，泥水匠二毛，缝匠一毛五，篾匠二毛五。剃头一、二、四乡每人每年谷子一斗，三乡每人每年一毛五，均吃老板的饭。铁匠二毛五。槽匠二乡十个钱打一斤油，三乡三个钱打一斤油，四乡打一担油（百斤）抽二斤，一乡产油少，情形不明。三乡特贱，乃因油多。砻匠，每座砻六毛，三工打一座。棕匠二毛二，石匠四毛半。画匠以画计，画豪绅地主的像，画神像。锡匠以锡器计。机匠夏布每丈一毛，春布每丈也是一毛（夏布即麻布，春布八成麻二成棉），本区无织棉布的。银匠以银器计，“吃冤枉很大”。染匠不明。漆匠以件数计，窑匠也以件数计。纸匠一毛五（做皮纸，只第三乡有）。

过去木、泥、缝、篾四匠，每年多的做二百工，少的百把工。革命后，泥匠、缝匠做工日子大减，大概一年只能做几十工了。木、篾二匠仅比过去稍为少做一点，差不很多。剃头比过去发达，因为女子都剪发了。革命后，锡匠、画匠、漆匠、纸匠都不见，因为用不着他们了（纸匠是做喜爆引线的，喜爆不用，纸匠不要了。）

“上头的命令”，是手工工人分半田，但手工工人要求分全田。理由是失业的失业，工作减少的工作减少，并且靠不稳，只有分田才靠得稳。农民说：“上头命令，你们分半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涨工价。”贫农雇农不愿工价涨，因为他们分了田要做农具，需请工。富农中农原来已有农具，无需请工，只有贫农特别需要请工。因此，贫农雇农不愿涨工价。贫农说：“好，你们就分全田，不要涨

工价。”工人并且说，分田之后，若每年还做得一百工，他们愿每年交还两石谷子于公家都可以。剃头工不分田，因为剃头工长日在人家，吃人家的饭。赣县工人分了田减了工资，木匠、泥匠原二毛，减到一毛五，篾匠原一毛五，减到一毛二。

手工工人有老婆的百分之七十，没有的百分之三十。革命后，原先没有的，现在多数“由”到了。因为手工工人熟人多，又有一门手艺，又较聪明，又会说话，又有许多识字的，在这些点上均比雇农强些。

手工工人，区有总工会，乡有分工会，村有支部，譬如第一乡之凌源有各业工人共二十多人，合共组织一个支部。

乡村手工工人，总是兼耕田。以工为专业，完全不耕田的，百人中找不出十个。

手工工人百分之八十是欠债的。

七　商人

本区商人的种类：开油盐杂货店的，卖米果的（又分几十种），开茶店的，开酒饭店的，开屠坊的，作豆腐的，开鸦片烟馆的。本区不兼耕田专门开小商店的占全人口百分之三（百家中有三家）。

本区四个乡中，过去只有三家五百元本钱的小商人，均在永丰圩，别乡没有。全区小商店：第一乡五家，第二乡三十五家（均在永丰圩），第三乡六家，第四乡没有，共计四十六家。四十六家小商店中，本钱五百元的四家（三家在永丰圩，其中一家是药店，樟树人开的，两家是洋货店，兴国城分来的，均不是本区的地主。革命起，均跑了，店没收，货给贫民。一家在三坑，是本乡的地主，全

家跑了，店封）；四百元的一家（在三坑。杂货店，两股合伙，一股韩礼陶，耕田二十石谷，一股韩礼东，耕田六十石谷。革命后，韩礼陶跑了，韩礼东混入革命，做政府土地科长，现被人咬为AB团，押在区政府）；三百元的三家（均在永丰圩。两家杂货布匹店，兴国城人开的，均反革命，跑了，店改开茶馆。一家屠坊，兼有六十石谷田，参加革命，继续开店，当村政府主席，老实人）；一百元的两家（三坑一家，杂货兼客栈，没有田，反革命，人杀了，店倒。西江一家，杂货店兼打银器，耕田数十石谷，不反革命，店在开）；五十元的两家（在第三乡。竹坑一家药店，有田二十石，不反革命，现仍开。上颈垇一家药店，也有田，反革命，跑了，店倒）；二十元的二十四家（第一乡四家，两家在五娘庙，两家在蕉田江。第二乡二十家，均在永丰圩）；十元的十家（第二乡九家，均在永丰圩。第三乡一家，在骑岭隘）。以上是以小商店为专业，不兼营别业的。

乡村中以农为主、商为辅的（八成靠农，二成靠商）很多，约占全部人家的百分之四十（百家中四十家）。这种人多数是贫农，少数是中农，因为生活不够，做点肩挑生意补足生活。如到江口，到赣州，到湖江面，挑盐回，去时多少带点油，做本钱，挑鸡到嘉应州（即梅县）去卖，带点盐回的也有许多。

本区商人本钱五十元以上的共十二家，其中九家反革命，三家不反革命。

资本五十元以上的十二家商店中，只有五百元资本的四家雇了店员，其中三家各雇店员一名，一家雇两名，其他八家均未雇店员。

二十元以下的三十四家，名叫商店，实是贫民小店，因此他们中间没有反革命的，店均在开。

本钱二十元及十元的三十四家所谓商店中，类别如下：

客栈九家（第一乡四家，第二乡五家，均在永丰圩）
烟馆四家
糖果两家
屠坊四家
米铺四家
木器一家
铁匠一家
杂货四家（以上均在永丰圩）
茶馆五家（四家永丰圩，一家第三乡）

这回分田，商人本钱五十元以上的，除杀了跑了的不算，未杀未跑但店封闭或倒歇的，均分了田。不反革命，店仍在开的，只有三家。一家是永丰圩三百元本钱的屠坊。因为向他写了二百二十元的捐款，只剩八十元本了。他家十五个人吃饭，不反革命。他原有六十石谷，此次分田，店主陈少林分一半田，家里十四个人分全田，因此除原有外，还分进了一些。陈少林的老弟陈少英在三军（原二团）当连长，所以他家也革命，少林当村政府主席。一家是竹坑五十元本钱的药店，也是店主分半田，家人分全田。一家是西江一百元本钱的杂货银器店，不反革命，乡政府写了他的捐（数目不明），也是店主分半田，家人分全田。此外那三十四家贫民小店中，第一乡四家客栈，第三乡一家茶馆，因为历来没有好多生意，过去生活大部分靠耕田维持，故此次分田，不论店主家人，一概分全份。永丰圩的二十九家，过去专做小生意营生，没有田地，革命后除烟馆四家倒闭外，其余糖果、屠坊、米铺、木器、铁匠、杂货、茶馆、客栈等二十五家，不但依然存在，生意亦较过去没有减少。

虽然如此，他们仍照章分了田，店主分半份，家人分全份。没有牛力、农具，向亲戚借用。

总括上述情况看来，本钱五十元以上的商店（其实多数均是小商店），在革命中受了严重打击，是当地过左政策的结果。二十元十元的贫民小贩，则在革命中得到了很大利益，除了分得田之外，应酬消耗减少，老婆容易讨，死了人不费钱财，政治上出了头，都是与贫农相同的。这种贫民小贩是与贫农同阶级的，因此他们所得的利益，也与贫农所得利益差不多。

八　游民

本区游民有下列各种：

（1）赌钱的：全区约五十余人。第一乡约十人，第二乡约二十人，均在永丰圩，第三乡六人，第四乡约二十人。过去赌钱的十个有九个吃大烟，现在不吃了。本区五十多个赌钱的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心里十分喜欢。过去寒天没有衣穿，一身稀烂，现在穿得好了。过去有钱时吃鱼吃肉，无钱时饭都没有吃，现在虽没有好东西吃，饭却天天有吃。赌钱的十分之八没有家室。现在分了田，从亲房借牛力、农具用。赌钱的平日颇慷慨，因此现在容易借得东西。第一乡十人中有一个原先在第四乡政府当财政委员，他平素赌钱赌硬，有信用，革命后当财政委员当得很好。第二乡二十人中有下述四人在乡政府办事。“天上人”王振永，在区政府当宣传部长，有房子，无家室，前年参加革命，被靖卫狗把房

子烧了。陈衮同，前年即参加革命，在区政府当裁判[1]，后当预备队第三连连长。杨大湖，前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革命当乡政府主席，当得好，后在区政府办事。陈绍渠，前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当本乡土地科长。第三乡六人中之雷永黄，有家室，赌钱卖烟，今年二月加入革命，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很忠实。

（2）讨饭的：即叫化子。第一乡四个，第二乡五个，第三乡四个，第四乡四个，共十七个。这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多半是无家室的孤单人。十七人中，只有四人有家室，这四人都是全家讨饭。现在分了田，从亲房借牛力、农具用。革命后没有办事的。

（3）卖水烟的：第二乡两个，第四乡一个，共三个。第二乡的两个均有老婆有儿子，家里租了田耕，但本人不务正业，在赌博场中卖水烟。第四乡的一个没有家室，也没有耕田。现均分了田。革命后无办事的。

（4）打卦的：只第四乡一个，无家室，不耕田，专门打卦。分了田。

（5）挑观音的：第一乡一个。分了田。

（6）道士：第一乡三个，均有家室，不耕田，做法事为业。第二乡二个，均无家室，不耕田。第三乡一个，有家室，耕了一些田。共计道士六个，均分了田。第二乡之曾云章，是个道士，前年即参加革命，无家室，无田地。今年二月当兴赣万游击总指挥，“顶有计划，会办事，用兵不曾败过”，现编入二十二军。

（7）和尚：第四乡二个，各住一个庵子，收租吃饭，高兴圩人，革命后回高兴圩去了，在高兴圩分了田。

---

[1] 本文中提到的区、乡苏维埃政府中的裁判，指负责办理民事、刑事案件的工作人员。

（8）戏客子：唱木脑壳戏的。第三乡一个，有家室，耕了田，现在二十军当兵。第四乡二个，有家室，耕了田，在村政府办事。以上三个均分了田。

（9）算命的：第一乡一个，本人无妻子，但有兄弟，去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起在乡政府当宣传科长。第二乡二个，一个是瞎子，均有家室，耕了田，本人算命，这回分了田。瞎子陈信波，“有名的算命先生，有个知事请他算命算灵了，给了他十块钱”。因为他是瞎子，分田多分一倍，分十四石谷。第三乡四个，均有家室，三个耕了田，一个没有，本人算命。其中三个都在政府办事。一个叫曾庆龙，去年二月参加革命，“顶会说话”，今年六月当区政府土地部长，当得好。他原有几石谷田租给他的叔父，没有妻子。一个叫丘大阳，今年二月参加革命，没有田也没有家室，现在第三乡政府当裁判，很忠实。一个叫丘伯成，有几石谷田，有妻子，今年二月参加革命，现在乡政府当宣传员。算命的共七个。

以上九种游民，共九十余人，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这是很可以注意的。

游民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

九种以外，本区没有别的游民。

四　现在土地分配状况

一　分田地

第一，分田单位：四乡均以村为单位分配。因乡境大，山岭

多，乡为单位去分，隔远了，不好耕。农民宁愿在本村分田少一点，不愿离了本村迁往别村。田少山多的村，每人少分点田，多分点山，田多山少的村，每人多分点田，少分点山，“也差不多”。

第二，分田方法：“上头的命令”，是三天分完。实际上，一乡、三乡均七天分完，二乡、四乡均八天分完。（这样的时间太短促了。）

一乡十五个村，二乡、四乡均七个村，三乡八个村。分田的开头，区政府派宣传员到各村开民众大会，先半日通信来，召集民众。男人都到，女人不到，十岁以下小孩子不到。宣传员当众讲说焚契分田的好处和办法。一个宣传员每天可以召集两个村的民众会。那时各村开的民众会，到会群众的感觉是，讲是讲得好，不晓得章程稳得不稳得。有的说：“字章（即契约）烧了，债不要还了。分田搭便（托福之意）红军好是好，恐怕靠不住。现在分田，恐怕还要还租。”在民众大会中，举出村政府主席一人，秘书一人，财政科长一人，土地科长一人、干事二人，组织科长一人，宣传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交通一人。第一乡洋坊村政府，是今年阴历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开民众大会选举的。宣传员往别村去了，民众（全村男女老少百八十多人，本日到会六七十人）散去吃午饭。下午又来，村政府召集他们开会。村政府主席钟恩明（是个独立劳动者，无田，做厨子，做豆腐卖，别处做戏他做米果去卖），这天当大会的主席。议决事项如下：

1. 向富裕之家写款子，作村政府用费，财政科负责。
2. 全村谷子阻止出境，粮食科负责。
3. 集中全村武器，军事科负责。
4. 调查土地，举行分配，土地科负责。

二十六日起至二十九日，共四天，为调查土地时间。土地科长傅济庭（即这次到调查会的一人），率领土地干事钟恩生、钟恩仁(均贫农)，会同四个组长（全村分为四组，每十家为一组)，实行按家看田，某家某处有若干谷田，记上册子。四天调查完毕，知道共有若干谷田。把全村人口一除，得出每人应得田数。三月初一日再召集民众大会，当众逐一报告，某家有田若干，有人若干，全村共有田数和每人应得田数。当有傅化龙（有二百三十石谷田，均自耕，十个人吃饭，欠债三百多元，请一个看牛工，有一个大水牛。他的田都是歹田，实只能收百四十多石，十个人吃，有一半多余，还债利并量一部分退脚田的租，要去四十多石，剩得三十石左右，是个略有多余的中农)、钟先惠（七十多石谷田，均自耕，三个人吃饭，过去有钱放债，去年起房子用掉了，每年请半年长工，每年吃谷之外有三十多石剩余，也是个中农。他有五兄弟，分了家，除他外，一个够食，三个很苦）二人，说调查不公平，报多了他们的田。在场数十个贫农、雇农、工人齐说傅、钟二人话讲得不对，土地科的调查并没有错。在场尚有三家富农，都听众处置，不作一声。大家承认调查结果，当即决定某家要“铲出”若干给某家，某家要“铲进”若干从某家取得。要铲出的人家，铲出什么部分由他自己作主，因此他就把坏的部分交出去。这时因斗争尚不深入，得田的人得了坏田，已经是意外欢喜，并不要求好田。这一天的会，就是做的“抽多补少”的工作。分完了，村政府秘书把册子造出来，也不要张贴。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初一日，七天工夫，把田分完。

分完了，“即刻过耕”或“秋天过耕”，又成了贫农与富农的斗争。本区各乡二月底分田时，已经下种，尚未插秧，正在犁田时

候，大多数都即刻过耕了。但亦有一些富农想要再看风色，希望靖卫团回来田分不成，他们就对贫农说：我已下肥了，犁田了，今年不要过耕，让我耕到收获时再过耕，收获了分四成给你。贫农有些接受富农的主张，以为坐得四成也是好事。有些雇农及工人亦实在无法马上接田来耕，因此全区共有约百分之十，用“分四成”办法，没有即刻过耕。

二　分山林

二月底三月初分了田，五月底才分山。

洋坊村是五月二十七日起始分山，上头的命令是这时候才到的。（注意：上头命令的作用是怎样的大。）五月二十七日，乡政府派了一个宣传员刘大伦（知识分子，工作热情，但八月十七日发觉他是AB团的秘书，区政府把他杀了，这一天杀了AB团十一人，象刘大伦这种人恐怕是杀错了）来本村，又开民众大会，宣传分山办法，新举出七个土地干事，决定分山。这天宣传员又报告了贫民借贷所一件事，议决照办。

分山比分田更困难，有大山，有小山，有柴火多，有柴火少，有大树的，有小树的，有无树的，因此难分。土地科长和七个土地干事，一道出发，踏看全村各山，定出个办法，不照山的面积分，照山的茶子树分。以一担“桃”[1]（一担茶子，值钱二串，叫做一担桃）为标准，大树三十根为一担桃，中树六十根为一担桃，小树百二十根为一担桃。把全村山地算成桃数，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

---

[1]　本文中的桃，是指油茶树的果实。

插牌子为界。本村分四天才分清楚。土地科八个人有权决定分配，“不能由各人讲，倘由各人随便讲，那就扯不清”。

第三乡长窖村，土地科五个人（一个科长四个干事），村政府发下二元一毛伙食钱，分了三十多天才分清楚，“可见难分”。

山虽分了，树木只准砍树枝，不准砍树身，要砍树身须经政府批准。

三　分池塘

以村为单位，按照池塘大小，分组放鱼，大塘五家为一组放，小塘三家为一组放。一组对于一塘，各家同时同数放鱼，打鱼时候照数平分。本区池塘的水，多是不靠它润禾的，因此只有鱼的问题，没有水的问题。鱼塘之外，亦有少数山塘靠了塘水润禾的。山塘放得鱼的，照上法分配。放不得鱼的，跟着田走，田归哪个，塘归哪个。

革命前放的鱼，归原放鱼人得，不分。今年冬天干塘，原主捉了鱼去，新主才好放鱼。

四　分房屋

依理，房屋以分为好。贫农十多个人一家只有两三间房子的，不少。一般说来，贫农百分之六十房子不够住，好房子都是富农占了。贫农纷纷说要分房子，政府就说“上头无公事”，贫农因此也不敢去住富农的房子。洋坊村开会时，贫农要求分房子，土地科长说“房子多的应拿出一些给房子少的住”，但未作决议，富农不肯让，

贫农也不敢住。（可见“上头公事”之重要。）

分房子应该以村为单位，毗连的人家，房多的分与房少的。

本区只有地主、富农、奸商之因反动被杀或被驱逐的，他们的房子如未烧掉（烧掉是不对的），就有了贫农去住，但亦不曾正式地分与谁。未杀未跑的，即使有很多剩余房子，也不曾分。

被烧的反革命地主富农的房子（游击队烧的），一乡一个，二乡两个，三乡五个，四乡四个，共有十二个。内中三个地主，九个富农。被烧的革命工农的房子（反革命烧的），一乡没有，二乡七个，三乡八个，四乡八个，共二十三人。内中农一个，贫农二十个，小商人一个，流氓一个。

五　公田

二月分田，留了公田，各乡各村都留了。一乡洋坊村留了十多石谷，茶干村留了三十多石谷。二乡指阁村留了十一石谷。三乡长窖村因田少还有十六个人没有分到田，故不曾留，别的村都留了。四乡猴迳村留了百多石谷田，都是遭水患的。为什么要留公田？一是分余尾数不便分配，所以留了。譬如每人分七石，余十多石，拿来分，每人分一桶不够，不好分，就留下作公田。二是作政府用费。三是为了明年生儿子要田分。八月重分，因上头有公事要彻底分配，把公田也分了。

其实公田还是不留的好。第一，有生的也有死的，生儿子不怕无田。第二，收土地税，政府有了钱用，不必靠公田作用费。并且照二月的例，留下来的都是坏田，无大用处。所以不如一概分了，农民多得利益的好。

六　分田数量

各村不同。如第一乡洋坊村，每人分五石六斗（二月分八石，实只能收五石六斗），茶干村每人分八石。第二乡指阁村每人分七石。第三乡长窖村，二月八月不同。二月间，本村分田数量有四种，有分七石的，有分六石半的，有分五石半的，有分四石一桶的。以姓为单位分，因为田多的姓不肯分出田来与田少的姓。到了八月，才以村为单位分，每人分六石。第四乡猴迳村，二月每人分八石半。八月重分，把坏田名出二石实出一石的只作一石算，外边又有人回来，每人只分七石半。

兴国每年只耕一道，照上述分田数量，老幼扯匀，勉强够食。添上种杂粮、供猪子，油盐布匹杂用也有了。

本区杂粮的大宗，就是番薯，平均占全部人口食粮的四成。分别来说，第一乡较少，因为土不起番薯，十成中只吃二成。第二乡和第三乡就大不相同，平均十成中要吃五成，多的吃到七成，一年到头都是饭里夹着番薯丝吃。第四乡平均吃番薯四成。

五　土地税

名曰“公益费”，八月初间（阴历）已经收了。分六石谷田的收百分之一（每人六升），分七石的收百分之一点五（一斗半升），分八石的收百分之二点五（二斗），分九石的收百分之三点五（三斗一升半）。本区没有分九石的，故本区公益费的最高额是百分之二点五。第一乡洋坊村一百八十二人，每人分田八石（照二月分田的数

目），照百分之二点五抽收，共收去三十六石四斗。茶干村三百九十七人，每人分田八石，共收去七十九石四斗。第三乡长窖村每人分田五石半，不收税（上了六石的才收税）。全区本年大概能收税一千石左右。

八月收的税，多数还存在各村，一部分送到乡政府去了，没有送到区政府去的。八月收税时，县政府的公事说，愿出谷子的出谷子，愿折钱的折钱，折钱以三十文折一斤谷子。当时市价只有二十文，故农民没有愿出钱的。

初收公益费时，约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办事人到他们家里，他们说："前头说抗租抗税，现又收起税来了。"收公益费时，上头的命令来得很紧，限三天将谷子交到乡政府去。乡政府召集了各村土地科长开了一个会。第一乡分为九个赤卫大队，每大队去了一个人，都是土地科长，议决要各村负责人开会，会完即收公益费，未曾开民众大会。收费时以大队为单位，如第八大队是洋坊、凌源、梨坩三村合共组织的，由大队长、土地科长、三个中队长、九个分队长，分往三个村，挨户征收（每个中队为一村）。到哪一家量完了，称一称，九十斤为一石，由哪一家派人送往乡政府。本大队共收公益费差不多四百石谷。第一乡茶干村先两天发信与各家，要他们送公益费到公仓去。到期各家纷纷挑了谷子送到公仓（即过去的义仓），由本乡的负责人（五个）领收，不到一天工夫就收齐了，一共收了七十多石谷子。事先说，哪一家当天不把公益费送来时，五个负责人当天的伙食费就要哪一家出，大家怕出这笔钱，所以很快地送去了。

六　苏维埃

一　区政府

区政府委员（二月至六月的）：

主席刘绍彪（二乡人，过去不耕田，学打，略识字，做裁缝，后不做裁缝了，赌钱为业。前年参加革命，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换了主席，他当裁判）；

军事萧志春（二乡人，不耕田，贩鸡走广东，赌钱，守祠堂，自己没房子，不大识字。前年参加革命，七月后当区政府主席）；

财政侯礼章（二乡人，裁缝，识字。七月后当区工会委员长）；

组织刘绍明（二乡人，医生，不做别的职业，过去家境好，后来四兄弟分家，他做医生，欠了债。前年参加革命，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当财政）；

宣传邹利三（赣县人，富农，六兄弟，中学毕业。当宣传部长，七月后去赣县）；

王振永（二乡人，绰号“天上人”，无业，赌钱吃饭。前年参加革命，房子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仍当宣传）；

方功署（十一区人，是个读书人，职业不明。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回十一区去了）；

萧志城（二乡人，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参加革命，受过靖卫团的打击，七月后仍在区府，不知做何事）；

陈昉宝（二乡人，裁缝，兼赌钱，不识字。前年参加革命，八月以AB团嫌疑被押）；

裁判曾云章（二乡人，是个道士，无他业，家境苦。前年参加革命，后做兴赣万游击总指挥，现编入第二十二军）；

文化邹丽东（二乡人，过去有六百谷，读书读掉了，剩百多谷，欠三百多元债，是个破产的大地主，大学毕业。去年参加革命，七月改组仍当文化）；

秘书长谢应山（县城人，读书人，五十岁了。七月改组仍当秘书长）；

少队政治委员萧少文（二乡人，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参加革命，七月改组去赣西南）；

少队指导员徐昌函（一乡人，富农，本身是个“毕业生”。去年游击队写了他的款子，他就参加革命，八月以AB团嫌疑被押）；

黄贯（读书人，历史不明。七月改组后行动亦不明）；

陈衮同（二乡人，父亲当土棍，死了，本人是个中农，兼赌钱，不识字。前年参加革命，靖卫团把他的田充公，七月改组仍在区府）；

杨达成（二乡人，过去做裁缝，后来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加入革命，七月改组后在二乡政府当宣传）；

妇女刘超英（一乡人，劳动妇女，不识字。七月改组后去赣西南）。

以上十八个人，赌钱为业六人（其中两个原先是裁缝），裁缝兼赌钱一人，纯粹裁缝一人，医生一人，道士一人，破产大地主一人，富农二人，中农一人，不明家世的读书人三人，不明家世的劳动妇女一人。

以上十八个人中，以刘绍彪、萧志春、刘绍明、王振永、谢应山、陈衮同、邹丽东、曾云章八个人最能话事，最有权。

区政府设在永丰圩。

二月到九月开过二十多次全区民众大会，全区代表大会开过两次（各村开民众大会选举代表）。全区民众大会六月前开得少，六月后斗争深入，开得很多。四月以后，女子及小孩都参加民众大会了。

二　乡政府

举第一乡乡政府为例：

主席谢金明（贫农兼挑脚，自己有极少的田）；

财政钟国春（中农）；

军事杨廷荣（贫农，自己有极少的田）；

宣传谢忠楷（贫农，自己有田，但欠债）；

谢忠梅（自己有田，本人耕田，兼上广东，是个中农）；

谢华焕（富农，本人兴国县立学校毕业）；

陈方波（贫农，耕别人田，本人算命）；

秘书易永洪（父亲剃头，贫农，本人读书）；

裁判陈玉书（莲塘人，是个读了书的）；

土地傅济庭（贫农）。

以上十个人中，六个贫农，两个中农，一个富农，一个外边来的读书人。

乡开的民众大会比区开的少得多，不上十次。四月以前妇女小孩都不参加，四月以后便参加了。

乡的代表大会开过六七次，每乡每次三四十人，每村一个至两个代表，接近乡政府之村有些非代表的人来参加。每回开三四点钟，到会代表讲话的尚多，主席临时推举。

三　村政府

二月到五月有村政府，分田时候实在需要村政府。田分完了，村政府可以不要了，并且立起来又没钱用——即使不要伙食，办公费多少要一点。革命深入之后，分了田，十家一组编了组，又有了赤卫大队，不要村政府也可以了。

四　政府人员的弊病

第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

第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向政府里头讲不起话的买不到手，有情面讲得起几句话的才买得到。并且既然出卖，就要比较有钱的人才能买到，雇农及极穷贫农当然无份。

第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乡政府总有一个二个女子，区政府总有三个四个女子。女子办事是好的，但政府的取舍不对。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她。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时，也是一样，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

第四，这是最大的一项，就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就是，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有一次主席说赞成某人的举手，有些人不举手，主席就指不举手的说他是AB团。有一次主席对不

举手的怒目诘问为什么不举手。再有，就是一定要共产党员才能在政府办事，不是共产党员，即使是群众领袖，也不能到政府办事。

（我向到会人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份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这些坏事是不对的。）

七　农村军事化

一　赤卫队

第一乡九个大队，第二乡三个大队，第三乡四个大队，第四乡四个大队。编制法：八人至十五人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本区各乡通常是八九十个人一个大队。例如第一乡的第八大队，是由洋坊的第一中队、凌源的第二中队、梨圳的第三中队编成的，共有九十多人。

赤卫队年龄，二十三岁以上，五十岁以下。

赤卫队不都是男子。

初来，分为常备赤卫队，预备赤卫队两种；后来，合而为一，不分常备预备。

任务：日日夜夜放哨，村村有哨，每村的总路口必定有个哨棚。普通时候，白天童团和少队放哨。章程上规定五个人一天，两个女童团，两个男童团，一个查哨的是少队。少队要是识字的，要看得清通行证。不论什么人通过，甲村过乙村都要通行证。夜间放哨则归赤卫队，普通四人一夜，二人一班，一班上半夜，一班下半夜。若环境紧张时（如七月七坊靖卫狗打到均村附近时），白天夜晚都归赤卫队放哨，并且人数特别加多，白天虽仍只四五人，晚上便

要十多人，甚至二十多人。

赤卫队每大队设大队长，要是本乡最努力而且多少懂得一点军事的人。政治委员一人，要是本乡最努力而且看得通公文的。

赤卫队早先要下操，七月编了红军预备队，便不下操了。

赤卫队分男赤卫队、女赤卫队。例如第一乡洋坊、凌源、梨埘三村合组的第八大队，有男赤卫第八大队与女赤卫第八大队两种。女赤队年龄与男赤队相同，但人数较少，因为女子比男子少，又除去孕妇，除去乳母，普通每队便只有四十人（第二乡第三大队）、五十人（第一乡第八大队，第三乡第三大队），也有少于四十人的，也有多于五十人的。女赤队平时不担负放哨。紧急时男赤队出发去了，女赤队便也担任放哨。女赤队也要下操，每月一次，每次两三点钟，队长、政治委员都是女子。操时男赤队派人去教操。男赤队自六月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剩下都是老弱的，每队有只留十多个人的，二十人的，三十人的不等，以后便不下操了。男赤队每乡有一个乡队长，一个乡政治委员。两人不常住乡政府，住在他们自己家里头，有事调他们去，他们就去。全乡下操时，他们也要到。各乡赤队共下过两次全乡操。

二　少年先锋队

凡有一个赤卫大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少队，不分男女，年龄十六至二十三岁。有大队长，政治委员。每大队分三个中队，每中队分三个分队。惟人数较赤队少，每队有二十人的（二乡指阁），三十人的（三乡长窖），五六十人的（一乡洋坊等三村）。二十人、三十人的都叫做中队，五六十人的便叫做大队了。六月起，挑选勇敢分

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剩下的少队仍然要下操，一个月下两次。只有男赤队，自从把勇敢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便不下操了。

少队自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之后，剩下的没有几多人了，有的简直没有少队了（如一乡洋坊等三村，二乡指阁）。

三　童子团

不分男女，年龄八岁至十五岁。

有一个赤队及少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劳动童子团。每村有个团长，乡无团长，区有团长。

童团的工作：第一是放哨，第二是检查烟赌，第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萨。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开民众大会，他们也要去。他们的武器主要是木枪，也有几支梭镖杂在其中。

童团的团员都在人民学校读书。人民学校是七月办起来的，第一乡五个，第二乡三个，第三乡七个，第四乡一个，共十六个。区政府规定每乡三个，出三个教员的伙食费，每天大洋一角，每月零用钱大洋二元，共计每月大洋五元。因第一乡地宽，准办五个。第三乡山多，三个不够，自己加办四个，共七个，但用费仍只十五元，平均每校分得两元多一点。人民学校学生少的二十多人，多的到百二十人，普通四十多人。如第一乡洋坊、凌源、梨�branch三村合立的人民学校，八岁至十五岁的儿童有百二十多人，房子住不下，一个教员教不了，因此有许多人尚未读书，百二十人中只有六十人左右在读。本来三村想办三个人民学校的，因本村无教员，请外村的又无

给养，故不能办三个。三乡竹兆安村的学校，学生只有二十一个人。

平民夜学校村村都有。每校有一教员，村中稍认识文字者充之，不要给养，教员白天在家做自己的事情，夜间去平民夜学上课。洋坊的傅济庭，长窖的钟得五，都是教员。学生多少不一，洋坊的有四十人。年龄不定，老的壮的少的都有。多数夜学有女子参加，占全额三分之一。也有无女子的，如一乡的茶干村，四乡的猴迳村，都无女子参加平民夜学。童团每个星期下三次操，都在人民学校指导之下，“操得很好”。

四　纠察队

工人组织纠察队，每乡一连，一个连长，一个政治委员。第二乡的纠察队有百零五个人。第一乡洋坊、凌源、梨垇、茶石（即茶干）四村共有一排，二十六个人。

五　红军预备队

从赤队、少队两个组织中挑选精壮勇敢分子组成的。每乡二连，全区八连。每连人数几十个到百多个。第一乡的二连，每连有百零几人。此次到新余，第十区的八连人都到了。七月编成预备队后，打七坊，打浪川，打赣州，及此次出发新余，都归预备队担负。预备队出外，乡村放哨由赤队、少队、童团担负。预备队回来，又帮同放哨。全区八连人组织一团，有团长、团政治委员，平时没有营之设置。一乡是第一、二连，二乡是第三、四连，三乡是第五、六连，四乡是第七、八连。此次出发新余编成三营，一、

二、三连为第一营，四、五、六连为第二营，七、八连为第三营，有营长、营政治委员。连上有挑夫四人，火夫八人，传令兵一人到两人，勤务兵一人，号兵一人（不会吹号），没有马。每连有两个宣传员，口讲，手写标语。营部无宣传员，无副官，无传令兵。团部有宣传员三人，副官一人，传令兵二人。三个营部跟团部住一起，共吃伙食。武器是梭镖、鸟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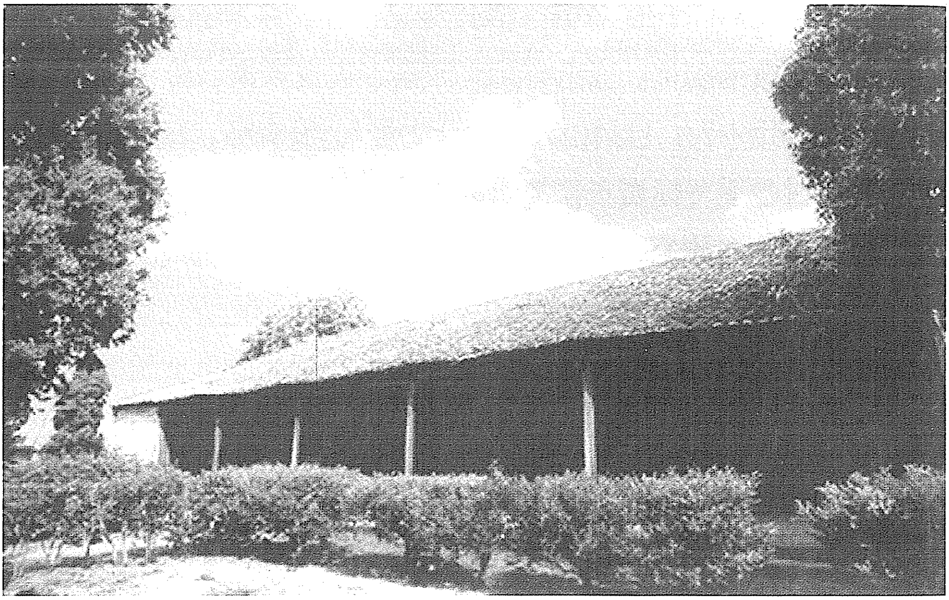
六　区特务营

三个连，七月起编的，也是由赤队、少队挑选编成。选择赤队、少队中更年青勇敢的分子编入，比预备队好。有编制，有训练，但不经常集中，平时仍在家中做自己的工。每月集中下大操三次，时间是初二、十二、二十二。有事调集出发打仗。现在一、三两连出发打浪川去了，二连在家未动。器械主要是鸟枪、土造来福枪、土造大炮，没有快枪，略有一点梭镖。营部和区政府在一起，有营长、营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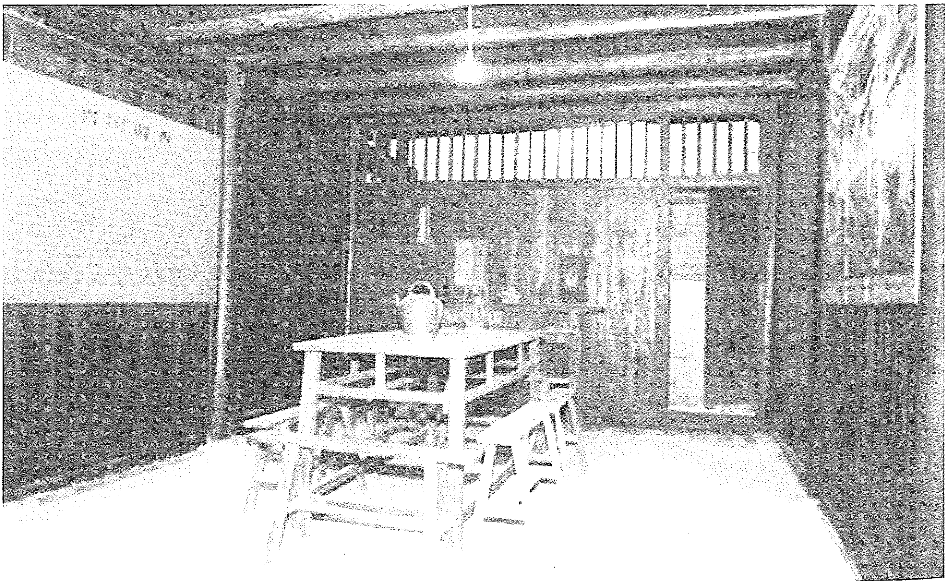
七　红军独立团

兴国全县一共编过三个独立团，都送给红军了。也是由赤队、少队挑选出，成份与特务营一样好，都是青年，并且是志愿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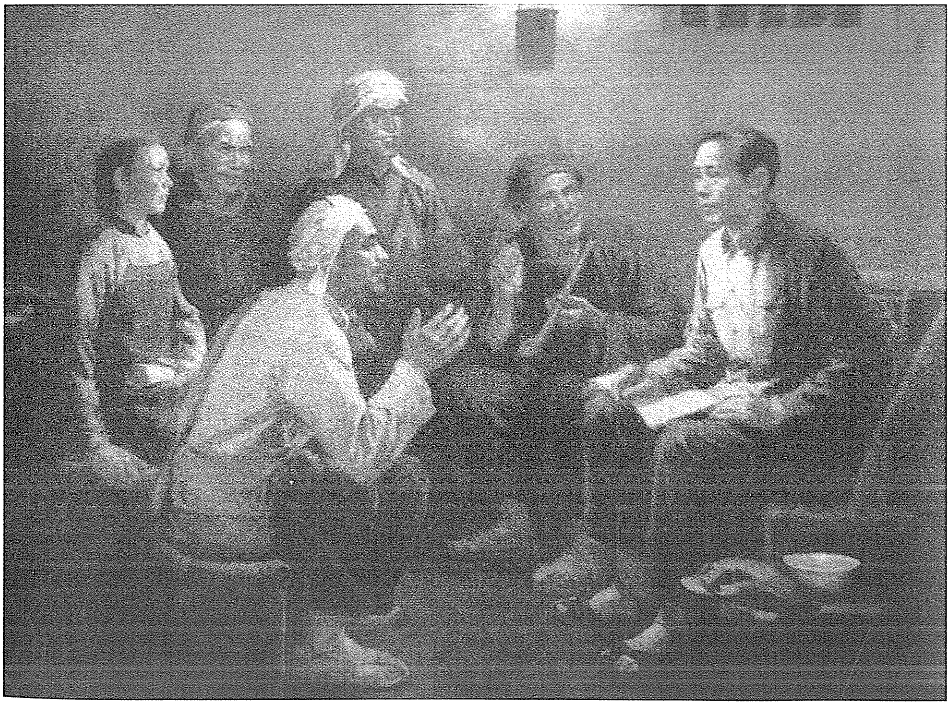
每团人数一千多。团营连都有长，有政治委员，在县城集中训练，听候调遣编入红军。一概徒手无武器。



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利用休息时间在兴国县彭家洲召开了为期一周的调查会。图为毛泽东在罗坊镇彭家洲召开调查会的旧址。



兴国调查旧址复原内景。



1930年10月，毛泽东进行了兴国调查。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

分田后的富农问题[1]

——永新及北路[2]的情形

（1930年10月）

永新红色区域富农的剥削：一是粮食居奇，二是贩卖工业品。粮食居奇又有二法：一是自己的剩余粮食，二是贱价收买贫农的粮食，以此造成今年的严重春荒。富农因要居奇，又被政府规定最高谷价，便把粮食完全藏起来，以致城里贫民工人有一个星期吃粥，办米不到手，农村里雇农贫农也闹饥荒。后头，县苏领导一个春荒斗争，对富农坚决奋斗不让步，一定要抑平谷价。党在各区乡起作用，领导少年先锋队平仓，从酒缸中，从夹壁中，从茅屋中，从土砖园子中，从床底下，搜出富农埋藏的许多谷子来。结果，不但够吃，而且有多。新谷出世时，富农纷纷把陈谷挑到城里卖。富农在贩卖工业品做小生意的事情中赚到非常之大的利钱，主要是盐、洋袜子、手巾、糖、肥皂等项。他们有本钱，有各种旧的社会关系，

---

[1] 这是毛泽东听取中共赣西南特委王怀和赣西南北路行委书记陈正人关于当地富农与贫雇农在土地革命中斗争情况的报告后写的调查材料。本篇副标题下毛泽东原来注有“王怀，陈正人报告，毛泽东记录”。

[2] 北路，这里指当时赣西南特委所属北路行委管辖的地区。1930年3月赣西南特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为了便于领导和指挥，在特委下设立了东、西、南、北等路行委。

贫农雇农所不能办到的东西，富农都能办来。

（以上王怀[1]报告，以下陈正人[2]报告。）

不但永新如此，北路也如此，今年也做过春荒斗争。富农做生意赚钱，和永新一样。阜田有个九如堂，老板是个小资本家。北路盐荒时候，他到南昌去办盐。没有油墨纸张，他也能到南昌办。因为他同国民党守望队[3]的队长能接头，他有旧的社会关系。他的盐及别的货物都卖得很贵，六七月间，他的盐卖到一串六百钱一斤。他有两架缝衣机，使得阜田裁缝师父没有工做，都反对他。又因他的物价太高，阜田市苏[4]在群众的要求之下，把他捉起，罚了他一千元。罚了之后，他依然在阜田做生意。打开吉安后，他的生意越发做大了。北路春荒时，富农把谷卖到白色区域去。春荒斗争就是阻止谷米流到白色区域去，只准在赤色区域互相流通。

按：这是一九三〇年十月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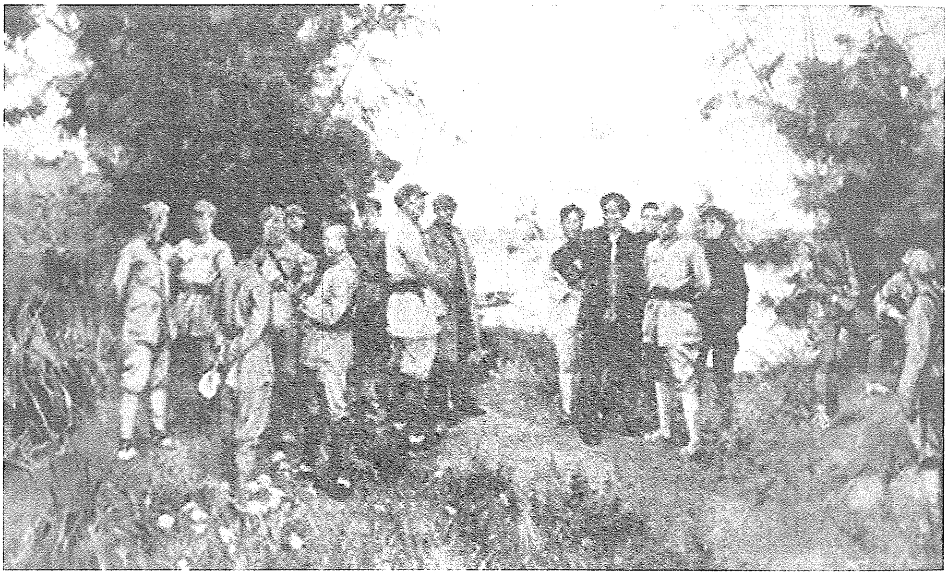
---

[1] 王怀，1930年3月至10月任赣西南特委常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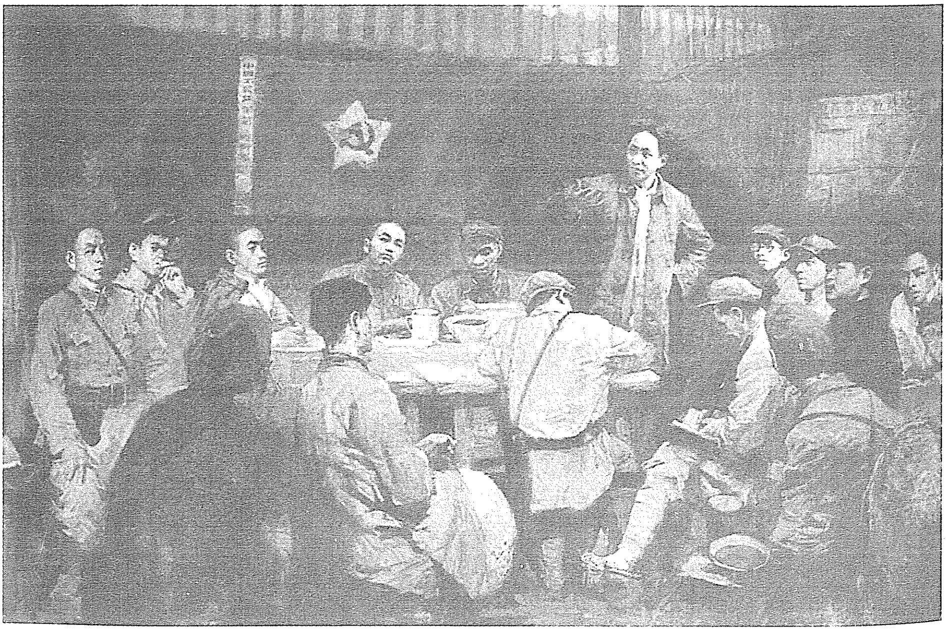
[2] 陈正人，1930年5月任赣西南北路行委书记，同年10月改任江西省行委宣传部长。

[3] 守望队，是反动豪绅地主强迫农民参加的、用以破坏红色区域的一种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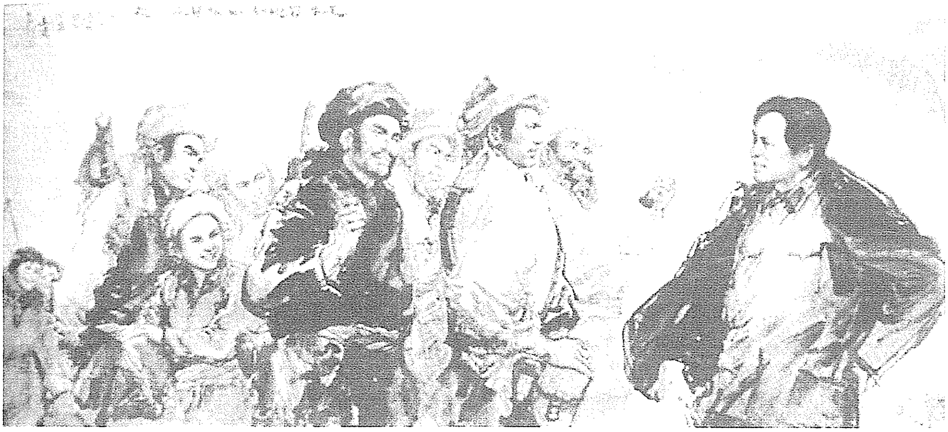
[4] 市苏，市镇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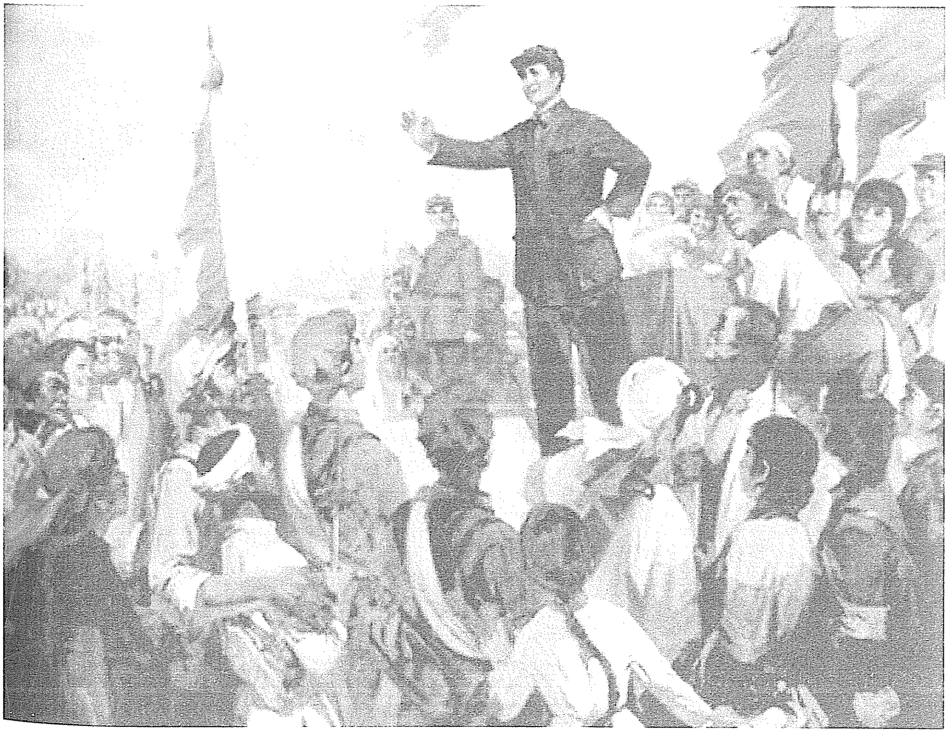
《罗坊会议的同志》（油画）



《罗坊会议》（油画）



《毛委员和赤卫队员在一起》（中国画）



《万人大会》（油画）

诱敌深入赤色区域
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

（1930年11月1日）

（一）高安、上高一带有敌公罗两师[2]，樟树有张辉瓒师[3]之两团，丰城有邓英师[4]，万寿宫有敌一师（番号不详），彭启彪旅[5]在南昌附近，许克祥[6]开往湖口附近，谭道源师[7]、胡祖玉旅[8]在南浔路[9]，蔡廷锴蒋光鼐两师已开到鄂南，湘敌李觉师[10]进到袁州[11]。

---

[1] 这是1930年11月1日14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新余县罗坊园前村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1930年10月下旬，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查明国民党军准备发动大规模“围剿”的情况后，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就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30日，在罗坊召开的总前委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战略方针。

[2] 公罗两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三纵队新编第五师和第七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公秉藩和罗霖。

[3] 张辉瓒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一纵队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4] 邓英师，指国民党军第一纵队新编第十三师，师长邓英。

[5] 彭启彪旅，指国民党军独立第十四旅，旅长彭启彪。

[6] 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一纵队第二十四师师长。

[7] 谭道源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二纵队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

[8] 胡祖玉旅，指国民党军第五师第十三旅，副师长兼旅长胡祖玉。

[9] 南浔路，指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即今向九线一段。

[10] 李觉师，指国民党军第十九师，师长李觉。

[11] 袁州，旧府名，即江西宜春。

（二）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

（三）第三军团为中路军（由彭总指挥滕政治委员[1]指挥），应即迅速渡过袁水南岸，集中队伍，准于本月五号在新干对河附近渡江，向樟树前进，相机略取樟树，并在樟树通丰城、新干两大道附近筹款二十万，发动群众。以后之集中地在永丰之藤田附近。

（四）第四军、第十二军为右路军，应于三号集中部队，四号检查工作，五号开到峡江城，六号渡江（归林彪杨岳彬[2]指挥），经崇仁向抚州前进，相机略取抚州。在南丰、南城、崇仁、宜黄各处工作，筹款四十万，发动群众。以后集中地在乐安之招携市附近。如中路军受优势之敌威逼时，则应提早集中时间，向中路移靠，以便应敌。

（五）第三军（由黄公略蔡会文[3]指挥）为左路军，担任赣江西岸一带地区（包括安福）扰敌工作，与二十军及中路军取联系，牵制敌人进攻吉安。

（六）第二十军应在吉水、永丰、新干一带工作，须经常与总部确取联络。

（七）工作时间以一个月为期，各部须按期完成该县区之工作。

---

[1] 彭总指挥，即彭德怀。滕政治委员，即滕代远。

[2] 林彪，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军长。杨岳彬，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

[3] 黄公略、蔡会文，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八）后方联络期[1]经峡江到吉安。驻吉留守处仍旧。

（九）总司令部拟于三号在峡江城渡河，位置于峡江县城对岸通新干之大道旁，以后则随中路军（三军团）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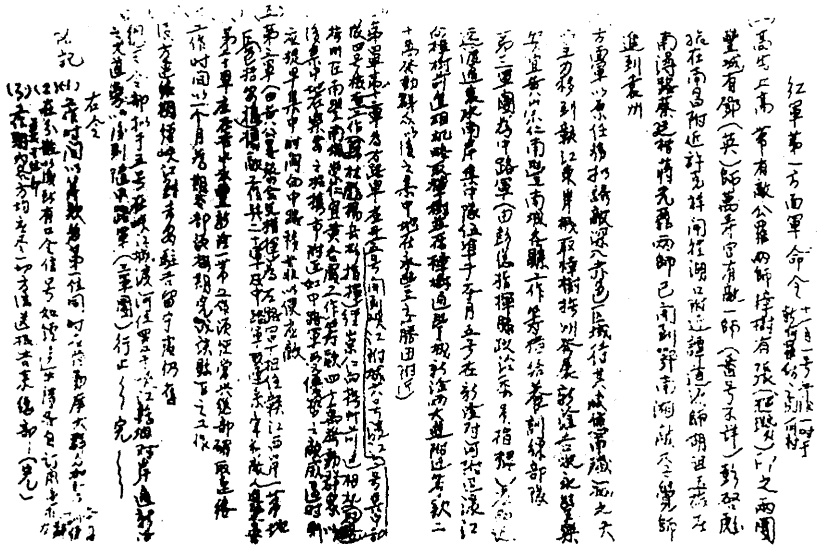
右令

附记：

1. 工作时间以筹款为第一位，同时应发动广大群众加紧本身训练。

2. 在分散以后，所有口令信号如经遗失，得各自订用，通报邻友并报告总部。

3. 工作期内各方均应尽一切方法送报告来总部。



1930年10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委在江西罗坊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战略方针。图为毛泽东、朱德发布的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

---

[1] 原文如此。

红一方面军给红三军的训令[1]

（1930年11月16日）

等敌军到吉安并分散后才攻击，实为错误之处置，虽全方面军出击之时机尚未成熟，而各路军一有机会则应尽各种方法各个击破敌之前进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签署的训令的主要内容。

东塘等处调查

（1930年11月）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红军前敌委员会在罗坊决定了诱敌深入方针。十一月六日红军从峡江渡赣江往永丰、南城，我从峡江到吉安布置撤退。十一月七日宿东塘，第二天到吉安，沿途做了一点简略调查。在李家坊调查中，使我明白了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在这次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赣西南分配了土地的有几十县。高级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是以乡为单位去分配，一般高级机关的工作人员大家也以为是照着乡为单位去分配的，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的很少。以村为单位，这种利于富农不利贫农的分配法，是应该改变的。

一　东塘调查

吉水县同水区第十五乡之东塘村。

本乡一千户，三千人。

村为单位分田。

本村二百九十人。

村政府有主席、秘书，都吃自己的饭。

分田每人分一斗三升[1]，约二石半谷（每田一斗出谷二石）。

别村有分一斗半的，有分二斗的，二斗为止，本乡无分二斗以上的。

村政府秘书胡德顺，兼平民学校教员，四十八岁。家中八个人吃饭，自己外，五个儿子，一个老婆，一个大儿媳妇。大儿子做裁缝兼耕田，二十五岁。二儿子十九岁，学木匠，去永丰县做徒弟，没有钱回。三儿子十四岁，学篾匠，还是徒弟，没有钱回。四儿子七岁，读书。五儿子三岁。过去有田一石三斗八升，能收二十七石谷，不够吃，靠番薯、供猪、大儿子赚钱。欠债三百串，此次分田，八个人共分得一石零四升，分出去了三斗四升。

吉安出城到金滩、同水、阜田，七八十里远，几乎家家女子都是织布的。这是很大的出产。由商人及富农地主供给农家纱（洋纱）。资本主义破坏家庭副业的过程还没有完结。

二　大桥调查

吉水金滩区第九乡所属，距吉安五十里。

本区分为十三乡。

本乡分为五村。

本村叫大桥村。

乡政府主席孙修恩。

茭坑刘家五百七十人，每人分田九箩，即四石半。茭坑汤家百

---

[1] 这里的一斗三升，指的是播种量，用以计算分得的田亩数。

一十人，每人亦分九箩。茭坑伍家五十人，每人也是分九箩。刘、汤、伍三村，共一个村政府，都是每人分田九箩。

大桥村郭姓，一千零二十七人，每人分田八箩，即两斗田，打谷四石。神江圩罗姓，两个村子，二百一十人，共一个村政府，每人分田八箩。

郭、罗二村，每人分田八箩，因为田好些。刘、汤、伍三村，每人分田九箩，因为田差些。老幼平均，每人每年要吃十箩谷（五石）。

每村有三分之一的田可种晚禾，三分之二的田因无水不能种晚禾。能种晚禾的与不能种晚禾的交搭分配，每人都分了一点。分八箩、分九箩均指早晚两禾合共的收成。每人每年要吃十箩谷，分八箩的不够二箩，分九箩的不够一箩。补足的方法：一是做工，如染布、做米、做木匠、做铁匠、做裁缝等。出外乡做工的有三百多，其中往赣州的一百七八十人，做米工、做裁缝、做小生意的多；往吉安的约一百人，做米、染布的多。这些人家里都分了田。本乡不出杂粮。二是织布，家家妇女织布，每“件”布十二丈多，一百二十多尺，工钱四百文，手脚快要十天，一人每月共可收入一千二百文。手脚不快，有小孩子耽搁，十天不能织一件布。富农及小商人从吉安贩了洋纱来，分发各村各家。织得不好的，三百钱一件也有，二百钱一件也有，要赔布的也有。一件布，另外落得（赚得）二两纱，这二两纱织得二尺布，一尺布价一百文至一百一十文，农民穿衣就靠落这项纱。织工价每月千二百文做油盐钱。以上做工和织布，是两个用以补足食用不够之大宗来源。现在布没有多少织了，工也没有多少做了。去赣州的工人尚未回来，去吉安的一百人回来了五六十个。

本乡还没有学校。

近日本区命令，每乡募红军志愿兵二十人。本乡去了十八人，都是自愿的，今天在午冈区政府开欢送大会。

三　李家坊调查

吉安儒坊区第十九乡，叫作李家坊（离吉安四十里）。

本乡有九村，六个村政府。

九村是六个大村，三个小村。

六个大村是李家坊、上赵塘、仓下、徐源、金壁、周源。三个小村是叶家坊、小李家坊、洋坪洲。三个小村同李家坊共一个村政府，余五个大村各一个村政府。

村政府办事人四个，一个主席，一个秘书，一个土地兼粮食，一个交通兼火夫。主席、秘书、交通兼火夫三人住政府办公，吃公家的饭。土地兼粮食一人住在本人家里，吃自己的饭，有事到村政府办事才吃公家的饭。

村政府的用费是：（一）三个人经常的伙食及平均每日两个人的客饭，每人每日大洋一角，月共十五元。（二）灯、油、纸、笔等项办公费大洋三元。（三）赤卫队、少先队每次出发要草鞋费、剃头费、吃烟费，五百钱的也有，一串钱的也有（实报实销，多退少补）。打了九次吉安，时间久的出发一个月才回来的也有。过去这项零用钱，平均每月要三元。过去出发，村政府还要发伙食费的，后头改归乡政府发伙食费，村政府只发零用钱。以上三项，每月共用二十一元。

过去村政府有九个人办事：主席、秘书、财务、采办、土地、粮食、裁判、交通、火夫。九个人都在村政府办事，吃公家饭。今

年正月初起革命，到三月十九日止，又从六月初四日起，到九月初四日止，都是这样。三月二十日起，到六月初三日止，反动守望队占领，村政府取消，负责人跑往阜田去了。九月初五日起到现在止，改为四个人常驻办事。九个人办事时，用钱更多。

乡政府正月初十日起，到三月十九日止，六月初四起，到九月初五止，办事人有主席、秘书、采办、财务、文化、土地、粮食、裁判、交通、火夫各一人，妇女三人，少先队三人（队长、副队长、指导兼秘书），儿童团长一人，共十七个人，都吃政府的饭。九月初六起到现在，办事人减少了，只有七个：主席、秘书、土地兼粮食、文化、妇女委员会主席、赤卫队长兼火夫，又一个秘书。秘书的工作是“没收委员”兼“下乡宣传扩大红军”二件。以上七个人经常住政府办事，吃饭。妇女委员会有四个委员，有事到政府吃饭，无事在家。四个妇女委员的工作，是下乡组织劳动妇女当赤卫队，当慰劳队，当洗衣队，宣传男子去当红军。

今年二月，本乡去了八个人当红军。六月十八日，第二次攻吉，每村去两个人当红军，共去十八个人。七月第七次攻吉，又去七人。八月十三日九次攻吉之后，又去四十六人，编入独立团，在大塘第二独立团团部受训。本乡先后共去了七十九个人当红军，都是鼓动去的。但最后一批四十六人中，有四五个人哭着不愿去，是勉强去的。

本乡九村：李家坊，胡姓，二百二十八人。小李家坊，李姓，三十人。叶家坊，叶姓，四十五人。洋坪洲，肖姓，二十四人。四个村，共三百二十七人（男百五十五，女百七十二）。上赵塘，刘姓，二百人。仓下，晏姓，三百一十五人（男百五十人，女百六十五人）。徐源，周姓，三百人。金壁，一百九十人。周源，三百七十

二人（男一百七十六，女一百九十六）。九村共一千七百零四人。

李家坊等四村，共有田九百二十一亩一分。李家坊，每人分田二亩七分，收谷七石。叶家坊，每人分田三亩，收谷六石。小李家坊，每人分田二亩，收谷五石半。洋坪洲，每人分田二亩五分，收谷五石半。李家坊余田十七亩九分，移过小李家坊六亩，移过叶家坊六亩，实余五亩九分“在众”。洋坪洲，除分配外，余二亩三分“在众”。余田是因尾数不好分的，作为村政府公田，以其租谷作公费，租率百分之六十。

上赵塘村，共有田八百二十亩，每人分田二亩四分，收谷二石半，分配外余田二十九亩二分“在众”。

仓下村，共有田六百九十亩零三分，每人分田收谷七石八斗。

徐源村，共有田八百二十多亩。分田法：在家的每人分三亩五分，本村田好，每亩可打五箩（两箩为一担），共可打十七箩；工人分一亩七分五厘，占农民的一半；出外的分一亩四分。

金壁村，共有田四百八十九亩，每人分二亩七分，可打谷子六箩，出外的不分田。

周源村，共有田五百一十亩八分，每人分田二亩二分，每人得谷六箩，出外的不分。

本乡反动守望队，自红军攻下吉安后，正队长、副队长、秘书及一个排长，共四人，均在吉安捉到，解送桐树坪区政府，杀了。队兵均在本乡参加革命，无去吉安的。在家未去吉安的排长三人，班长十人，均未杀，准他们参加革命。

乡政府主席晏春文，有八亩田，每亩只能打三箩谷，共二十四箩，四个人吃饭。七月头次分田，在乡在外都分，他家分出一亩二分，余六亩八分，能打二十箩谷子，每人得谷五箩。八月打下吉安

后再分一次，在外有生活的不分，在乡的以及在外无生活的才有分，每人得田二亩二分，他家自有八亩，还分进八分田。他过去欠五百串钱债，卖一个女儿（七岁）与吉安（买主赣州人，在吉安开和茂钱店），得价一百元，还与债主，尚欠二百串。又送过一个女儿（刚生下的）与吉安天主堂，没有得它的钱。

四　西逸亭调查

吉安儒坊区第二十三乡所属之一村，离吉安十五里。

儒坊区共三十几个乡。

本乡有村政府九个。人口约六百。

本村西逸亭，村政府办事人五个：主席，秘书、粮食委员、土地委员、妇女委员。均吃自己的饭，村政府不起伙，有事集合（如开会），便吃村政府的饭。

祠堂里的公款及各种神会的公款，集合起来归村政府用。

村政府的开支就是赤卫队、少先队的出发用费（打吉安或开大会），以及独立团士兵出发发给伙食费（每人每天大洋一角）。出发只发伙食费，不发草鞋、剃头，吃烟等费。

本乡乡政府有十九个人办事：一个主席、两个秘书（一个乡政府的，一个赤卫队的）、一个文化、一个采办、一个粮食、一个土地、一个赤卫、一个社会保险、两个妇女（一个妇女委员会的主席，一个组织）、一个火夫、一个交通、一个赤卫队大队长、三个中队长、一个赤卫队指导员、一个少先队队长。本乡乡政府是今年六月初九日起的，因吉安反动派时常到本乡捉人，所以立不稳，敌人来了就往后走。打开吉安，本乡工作才发展。反动派在本乡捉去十

个人，杀了两个，打开吉安放出了八个。打开吉安之后，在吉安捉获本乡反动派二十几个，杀了六个厉害的，其余罚钱放了一批，解到桐树坪区政府去了一批。现在工作很忙，分田呀，分谷呀，抗债呀，办学校呀。

本乡目前正在分田，以村为单位分，分了五村。上头来了命令，要以乡为单位分，又要分过。各村的意见，田多的村要以村为单位，田少的村要以乡为单位。本乡九村，有八村要以村为单位，只有一村要以乡为单位。

分了田的为汀塘、班溪坑、塔水、新塘、塅上等五村。汀塘每人分田二亩（打四箩到五箩），班溪坑每人分田二亩半，塔水、塅上两村每人均分田二亩，新塘每人只分得八分田。新塘田少，要求以乡为单位分。新塘村有二百人左右，黄姓，田虽少，但都是好田（没有水患），并且有山有土。

攻取吉安一个多月了，本乡的田还没有分好，还要五六天才能分完。

抗债斗争就是要债主缴字据来烧，九村至今还只有官田一村缴了字据到乡政府来，也还未烧。

乡政府主席被区政府换了，新主席王玉堂才来五天。

老主席刘全生有一亩八分田，木匠，三个人吃饭，六月起当主席。

过去儒行、坊廓分为二区，现在合为儒坊区。本乡新主席是儒行区人，本乡原属坊廓区。王玉堂，木匠，有五亩田，打十八箩谷，四个人吃，本人木匠兼耕田。本区到红军当兵的七十多人，少先队去的占四十多人，皆十几岁的青年，勇敢得很。

区政府设桐树坪，主席陈俊彬，一个米业工人。

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

（1930年11月）

这是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赣西行动委员会[1]扩大会及十五日省行委扩大会两次会议中到会代表的报告，我在会上略记的，虽很简略，也可见赣西南土地斗争之一斑。

一　分田情形

纯化：

远的十里一乡，一乡好歹搭匀分。去年（一九二九）十二月分第一次。本年三月分第二次，以原耕为单位，抽多补少。现在分第三次，抽肥补瘦，已开始分，还要十多天才能分完。

儒延：

去年（一九二九）十二月，分了豪绅地主的，未分公田及富农的田。今年三月，没收一切，按生产力分[2]。五月第三次，没收一

---

[1] 行动委员会，这里指1930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犯“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为了推行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各地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成的各级统一领导机构。

[2] 按生产力分，是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在土地分配问题上的一种错误做法。这种做法不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而是以劳动力、牛力、农具、资金等作为分配土地的标准。

切，按劳力平分，但不是彻底平，由肥田多的拿些肥的出去，瘦田多的拿些瘦的出去，未分甲乙丙三等扯平。以村为单位的多。

水东：

三次都以乡为单位。第一次本年正月，抽多补少。第二次六月，抽肥补瘦，仍不彻底，许多人不满意。现在分第三次。各乡土地委员集中于区，组织土地委员会，互相帮助去分，实行抽肥补瘦。打开吉安，城内千多人回去，同样分田。将次分完，十七乡分了十三乡。

西区：

分了两回。今年八月第二次，虽分上中下三等，好歹平分，实际没有彻底。乡为单位。乡太大了，田远的隔六七里，农民不要。

最近区委下通告，第三次彻底分，抽肥补瘦，烧粮册田契。区派五个巡视员去帮助分。

儒坊：

第一次本年正月，好歹平分，不彻底，留了公田。有些乡为单位，有些村为单位。第二次五月，群众拿了反水首领的田分与贫民(这些人第一次是分田的)。第三次（即现时），分上中下三等平分，南岳庙一带三四乡新争取的区域，尚未分好。西逸亭分好了（?）。村为单位。

安福：

没有反水的地方这次尚未分，先分反过水的地方，限十天分完，彻底平分。七区分了一半，五区分了三分之二，其余反水地方不曾分。全县九个区中，第一区全未反水，第二区三分之一未反水，第三区半数未反水，第四区三分之一未反水，第五、第六、第七区五分之三未反水，第八区一半未反水，第九区即城区全反水。

沿城区三十里地方完全反水，未反水地方是沿永新、莲花、袁州[1]赤色区域的原故。这些未反水地方都是“弱小民族”，受大村压迫的。这些地方都分过田，抽多补少，只未抽肥补瘦。

东固：

乡为单位。去年（一九二九）七月分田，抽肥补瘦，分甲乙丙三等扯平，未分二次。后因当红军的将田交归政府，现在把这些田在各村的交与各村的人耕。民众吵，所以去年七月即把田平分了，口号是“搭匀来”。

峡江：

本年正二月，第一次分土豪劣绅的田。第二次三月，分公田。第三次四五月，分富农的田，才彻底分好，抽肥补瘦。以村为单位，因为田多人少，有田无人要。新发展区域分了二次。第一次两星期之前，分得马马虎虎。第二次，目前，限五天分好，好歹扯匀。

水南：

第一次本年三月间，抽多补少。第二次八月，沿白色区域边界抽多补少，不抽肥补瘦，其余抽肥补瘦。不过党部负责人特别分好田，勒令农民帮同作田。

儒林：

今年三月分第一次，抽多补少。五月全区反水。六月打倒守望队，第二次分田，有几个乡抽肥补瘦分好了，大多数乡名分实未分，因为尽是AB团在那里主持。乡为单位，特别情形才有村为单位的。

永新：

西北特区，老幼残废无耕作能力的，比普通人多分一半。全县

---

[1] 袁州，今江西宜春。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也是如此，还加上家属无耕作能力的那些“工作人员”，也是多分一半。此办法，西北特区有一部分实行了，但经特委西路工作会议批驳了，因为这是从慈善观点出发，有人笑为“孤寡路线”。永新普遍全县分田，分过两次，第一次是打开龙源口后，第二次是今年六月西路工作会议决定后到九月实行的。现在还有一区（城区）全区，四区（南乡）之一半，五区（东乡）全区，占全县五分之一的地方，没有分配得好。永新农民愿以生产量为标准分田，全县代表大会接受了。

吉水：

阜田、同水田分好了，金滩没有分好。

“见人分”。“好的搭丑的”。“分初坏”。

“河南佬”是个困难问题。谷村一个乡，每人只分二担田。

万安：

村为单位。第二次分，已经抽肥补瘦了（?）。

分宜：

村为单位分田。论谷分，不论田分。被反革命烧了二千多栋房子，三十多里无老房子。

二　荒田现象

东固：

最低每人分得十六担谷田（每担八十斤上下），许多田无人耕。山荒了大部分，因为采桃子[1]工钱太贵只好不采，也不挖山。

---

[1] 本文中的桃子，是指油茶树的果实。

纯化：

荒了四五百箩谷田。因为：（一）三月分田正值农忙，没有家私，分的田又歹，又离得远，所以荒了好多。（二）当红军及出外办事的二千大几（即谓二千七八百人），人力不够。

水东：

荒了几里。因为红白交界——临河地方，吉安城反动派时往骚扰，一天要几百人放哨，放三层哨，还在夜间时常被敌杀死。

水南：

荒了几百担谷田。因为留公田，农民不愿租了去耕，所以荒了。“我分了几担谷田，够得吃了，不愿耕公田。”

儒林：

荒了千多担谷田，禾熟了无人割。因为田是反动的地主富农守望队的，这些人走了之后，政府不把它分与农民，农民便没有责任去耕去割。（儒林是吉安近城的区。）

安福：

道浦区、崇文区荒了六千担谷田。因为报复屠杀主义，反水农民不敢回家；又因为分田不彻底，只数量上分。这两个原因，都是由于富农领导作鬼。安福田多人少，湖南人、永新人、河南人，多在安福作田，只要你替他对政府完粮，他就把田给你作。为什么人少？因为不讲卫生，死亡的多。

新余：

三个红色区内荒了几百担谷田。因为一部分人当红军去了。红白交界又荒一些。

分宜：

荒了几十担谷田。

永新：

一般说来没有荒田，总共荒了百担谷以内。

赣南：

凡红白交界地方都荒了许多田。

三　工人分田问题

永新农民反对工人平分土地，永新代表大会没有接受这个意见。

泰和有一区，工人分了田，减少了工资，后头又恢复了。

吉安工人做工不满半年的照分田，做工过了半年的分半田。

四　分山问题

永新代表大会决定，茶子山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

吉安代表大会（一九三〇年十月）决定竹木山不分，乡苏管理，农民使用。需用竹木的，得政府许可，可去采伐。茅草山随便采伐。

油茶山[1]，永新、峡江、延福、儒行、东固、泰和、西区各处均分了。儒坊、纯化，没有油茶山。万安没有分山。

分宜，本年（一九三〇）十一月五日，省行委派刘林栋参加县行委，决定一个分山的办法，并提交第二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办法是："三百元以上一块的山归苏维埃，三百元以下一块的山

---

[1] 本文中的油茶山，是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归原主管。”但在今年五六月时（“二全会议”[1]以前），因为接了上级（北路行委第四次扩大会）命令，已经以乡为单位平分了山岭，虽然本县没有开什么会议。十一月翻案，农民很不满意。

山有七种：（一）木梓山[2]，（二）杂粮山，（三）原料山，（四）竹木山（小竹木山、大竹木山），（五）柴火山（茅草山、柴火山），（六）矿山，（七）荒山。

---

[1] 二全会议，即1930年8月召开的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接受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方针。

[2] 本文中的木梓山，是指种植油茶树的山地。

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

（1930年11月14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江西省委[1]在吉安开会，我代表总前委出席，在陈毅[2]、陈正人、马铭诸同志的报告后，指出了赣西南党内自“二全会议”后的一贯的取消土地革命的路线。经过会议讨论，一致承认对于这一错误路线要作坚决的斗争。下面是陈毅、陈正人、马铭诸同志作报告时，我记录下来的一些要点，有许多只有我自己看得懂。

儒林区，洗去忠实同志，留下清一色的AB团。

红色区域，富农操纵经济。

永新，富农操纵粮食。政府采取抑制富农政策是对的。

区委书记不下乡巡视。

中央及上级的意见不能传达到下级。

“杀尽富农地主。”

“要分定。”

富农欺骗贫农的政策，拿白色恐怖去说，“白符号”。

路线不经指明，即被富农包围蒙蔽，如永新四区委（马铭为书记）。

---

[1] 这里的“省委”应是省行委。

[2] 陈毅，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二军军长。

东路[1]的田完全没有分好。

南路[2]除兴国、赣县外，余均没有分好。

曾人超。

瑞金党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

上犹党员八十多人，地主富农占三十多人，内有靖卫团总。两个月不分田。封存的土豪谷子拿了出粜。

东路青年群众勇敢，青年团怕死。

妇女没有斗争。

“一切皆分，是农民意识。”

茶山，富农多，贫农少，不分茶山是富农的利益。

乡村平民学校也是富农的利益，贫农子弟读书的少，因要做工。

富农命令群众打仗，保全富农利益；信丰赤卫队官长都是富农。“点名”“调田”“打屁股”“罚钱”。

信丰西北乡富农，鼓动红军开小差回去，口号是保全红色区域。富农是扩大红军的障碍。

优待红军家属问题。永新自动当红军的不优待，不帮助耕田，要是政府派出去的才优待他的家属。

信丰：本地当赤卫队打仗死伤的，优待；去二十二军打仗死伤的，不理。富农作怪。

反对婚姻自由的只是富农，说“农民反对”，是没有分别的说法。

“二全会议”，取消农民，取消土地革命。

---

[1] 东路，这里指当时赣西南特委所属东路行委管辖的地区。

[2] 南路，这里指当时赣西南特委所属南路行委管辖的地区。

李文林[1]八月二十四日到南路，对土地革命问题没有专门报告，没有专门讨论。

七月十五日南路扩大会，陈毅提出八条纲领，如马上分田割禾，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无条件分房屋，分山林，分池塘等。赣南革命委员会出了布告。瑞金、于都富农，提出“赣西南土地法”第十四条，原耕为主，口口声声不能违反土地法，违反的是反革命，以至于“打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出这张告示。

扩大会两个火夫起作用。

“他是世袭，又是他当主席?”

怕共产党，“不要说，要杀头。”

“你往年还完租哪，这点田作不得!”

红军老婆与婚姻自由。

“你当红军不当红军？当红军不能同你结婚。”“人家报告你当红军打死了，我还替你守节吗?”“八块钱八十斤肉。”“昨日讨他，今日讨主席，是自由。”“陈致中在西河联席大会上报告，冲散了陈毅的空气。(陈毅开了九天会，决定了详细的土地法，陈致中第十天到，取消了。）”

“没收地主土地，平分是临时策略不是目的，又提不出无产阶级意识的土地法。”

谢汉昌[2]在北路传达：“以劳动力为标准是贫农意识。”

贫农的体力不及富农（贫农没有吃)，贫农的儿子也无力。

---

[1] 李文林，当时任赣西南特委常委，1930年10月改任江西省行委书记。

[2] 谢汉昌，1930年下半年曾任红军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

李对丛[1]说："'二全会议'大家都没有把握，所以不好讨论土地问题。""赣西南的党建立在中农以上。"

在西路传达（周高潮）[2]："一切皆分是农民意识。"

十月二十八日在信丰开南路行委扩大会，郭[3]传达了"抽肥补瘦，彻底平分"，但开了一天半，没有讨论，没有决议。

赣南的两条路线（陈毅说）。

"永新不是富农路线，我反对。"马[4]说。

"不同意土地革命深入。"段良弼[5]对陈正人说。

"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特委对中央的报告。

---

[1] 李，即李文林。丛，即丛允中，1930年曾任赣南行委书记、江西省行委常委。

[2] 西路，这里指当时赣西南特委所属的西路行委。周高潮，1930年曾任西路行委书记。

[3] 郭，即郭承禄，1930年下半年曾任赣南行委书记。

[4] 马，即马铭。

[5] 段良弼，1930年曾任共青团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行委常委。

分青和出租问题

（1930年11月15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在吉安开了一次扩大会。到会的人除省委[1]常委外，有永新、吉安、泰和、万安、吉水、安福、分宜、峡江各县苏维埃的主席及二十二军陈毅[2]同志。我代表总前委参加这次会。这次会的特点，就是讨论了分青和租田两个问题。对于分青问题，我提出了拥护分青的群众基础。对于租田问题，推翻了向来“苏维埃区域不应收租”的“左”倾的但实际是富农的理论。此外，反对江汉波式的劳力分配法[3]，指出了他的错误仍在于帮助富农妨碍贫农的利益。这个会没有开完就散了，因为敌军已到峡江，各县负责人须回去布置应敌，所以打算要讨论的山林、池塘、房屋、荒田、失业、债务等问题便都没有讨论了。会议过后，发生了严重的敌人进攻和富田事变[4]，因此省委至今没有发表这次会议的决议案。下面那一些，是我在那天会议中自己做的一点简略的记录。因为有些要紧的材料，所以把它留下来。

---

[1] 这里的“省委”，应为省行委。

[2]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二军军长。

[3] 指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1929年冬至1930年春在赣西工作中推行的反对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而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土地的办法。

[4] 富田事变，指1930年12月12日在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发生的由肃反扩大化引发的一起有严重错误的事件。

一　纯化以区为单位分田

纯化区第三次分田（一九三〇年十月），进到以区为单位统计人口与生产量，看每人得田若干，然后以乡为范围去分配，“移得田动的移田，移田不动的移民”。现在纯化全区三万多人，每人所得田数相等（每人得十一石谷田，每石四十四斤）。

二　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

以村为单位分田的弊病：（一）大村不肯拨田于小村。（二）单位太多，区乡政府不易督促，暗中生出许多弊病。（三）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主义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个意见可以注意。

三　土地斗争不是一下子能深入的

分田无论如何要分几次。头一次总是富农瞒好田，不能将田分别上中下三等调查好。头一次总是富农中农领导，贫农没有权。“暴动久得一点，无产阶级便起来了。”这个意见是对的。

四　杨成芙的“农业社会化”计划

吉安县政府主席杨成芙（原纯化区委书记，又是主席），主张将

纯化区的田共耕共费[1]，作三步达到：第一步区为单位分田，第二步组织合作社，第三步共耕共费。这是完全错误的。

五　江汉波式的劳力分配法

分田以劳力为单位的弊病，就是凡孤、寡、老、幼、小脚妇女及一切不能耕田的人，均不够食。贫农劳力多的也抵不住富农，因为贫农不及富农的牛力、农具、资本，并且富农可以租耕孤、寡、老、幼、小脚妇女等人的田。因此，以劳力为单位只于富农有利。

安福与吉安、分宜交界的“边界区”及吉安之延福乡，都实行了以劳力为单位分田的“江汉波办法”，并且是绝对的，有劳力的有分，无劳力的无分，不论年龄。流氓有分。无劳力的，由有劳力的耕了给他们食。三军团一个政治委员来吉安，对王怀[2]说：湘鄂赣边界的分田法，是以劳力为单位，无劳力的分一半，不是由政府供给。

以劳力为单位分配，富农田多，牛力、犁耙需自己用，贫农要借不可能。只有平分，贫农才能借富农的剩余农具，所以贫农要求平分。

六　分青问题

瑞金、于都两处农民，一部分拥护汀州会议“无条件分青”的

---

[1] 共耕共费，即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当时革命根据地内有这样一种错误主张，即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下耕种，生产品由苏维埃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部分归苏维埃所有。

[2] 王怀（1906—1932），江西永新人。1930年3月至10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

口号，一部分则拥护陂头会议“青苗不分”的口号，他们的口实是：“不得破坏土地法。”

北路各县，今年五月分田，补偿本钱与原耕，每石谷补六百文。阜田，富农的田不补，贫农的田每石谷补一串文。

纯化三月分田，当时还未莳田，只犁了一道，有些下了少数肥料，分田后不补还本钱。

北路，每石谷补偿本钱六百或一串，五月以前县议定谷价每石四串，补偿率为六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时尚未分田，又值荒时，规定谷价四串，有帮助贫农抑平谷价的意义。但收获后还是规定每石四串，“这就不对”。

永新去年旧历五月，西北特区的第五区政府规定，早禾田谷快要熟了那时候分田的，进田人每两石谷（二百斤，即一石田）补回大洋一元与出田人；大禾田每年收一道的，五月时正当插秧之后禾还没有长成，每石田（谷二石）补回一串钱与出田人。县委的决定是无偿得田，但第五区因交通阻塞，没有得到县委指示，便照自己的决定做了。

于都东乡与赣县西北部的富农，要求每石谷田（实只八斗）补还小洋二元（值四串），党不准，进田人无偿得了田。

正当的政策应该是“无偿得田，分亩分青”。地主家属照分，以归一律。地主钱多，另行派款。流氓照分，因为他们是劳苦的。富农反对流氓分青，是不对的。中农没有多的田分出去，不受影响。“上层贫农”耕田多的，虽受影响，但有他种利益满足他们。广大的下层贫农、手工工人、雇农，是十分拥护这个办法的。分青之后无力耕种的，准许照出租办法办理。

七　原耕总合平分

过去以村以家为单位照原耕为标准去平分，结果有利富农不利贫农。正当的办法应该是：以乡为单位，按全乡人口总数，除全乡人口原来所耕田地的总数（全乡人口原来在本乡耕的和原来在外乡耕的合计起来），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移得田动的移田（田多的村，把田推一部分给田少的村），移田不动的移民（隔远了，无法移田，只好移民）。这个办法，叫做“原耕总合分配”。

八　非劳动人口与新租田制

无劳力的人把田租与有劳力的人耕，佃户交租谷与田主。纯化、万安、新余交十分之四，分宜、宁都交十分之五，永新交三分之一。富田（吉安之一个区）分上中下三等田，上田交十分之四，中田交十分之三，下田交十分之二，似较合理。

无劳力要把田出租的人，纯化、安福、泰和、新余、分宜、峡江，均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宁都占百分之二十多，因为这些地方的女子小脚多。永新只有百分之五，因为女子都是大脚。出租的人多是孤寡残废老小，及做革命工作的人。以上所说，都是说的一家全无劳力而要把田出租的人口。至于无劳力而自己家中有人耕种不需出租的那种人口，就更多。全般说来，无劳力的占人口全数百分之七十五，即四个人中只有一个壮丁有充分力量耕田，这是中国的大问题。不过，这所谓无劳力，是指不能正式耕田，他们中间的半数有部分的劳力，如做看牛、砍柴、煮饭、洗衣服、作菜等事。统计

起来：

百分之二十五——全有劳力；

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半有劳力或稍有劳力；

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全无劳力。

前面所述各地“租田交谷”，都是所谓“分谷制”，只有纯化是“收租制”。分谷制的坏处是：租户耕田，以己田为主，对于田户的田，不下力施肥，随随便便，禾熟时候，按收获谷数，对分，四六分，或他种比例分，这个制度于田户不利。收租制，是讲定租额，不论收成多少，因此租户注意下力施肥，于生产量及田户均有利。

收租制的坏处是：（一）铁租，遇灾患年成，于租户不利。（二）赤卫队出发次数多，耕田日子减少，亦于租户不利。

总括起来，分谷制利于富农，收租制利于贫农。

正当的政策应该如下：

（一）贫农、雇农及失业者分了田，缺乏牛力、农具、本钱的，由政府没收富农地主的多余牛力、农具等项，分给雇农、贫农、失业人等私人使用。同时，奖励集体使用这些工具，把没收富农地主的东西交些给合作社。再有一种办法，就是私人向富农临时借用牛力、农具，以资补助。政府裁制那些故意不借东西的富农，以赞助贫农、雇农及失业者。

（二）至于那些完全不能耕田的人，应准许他们在下列条件之下，把田租与富农中农耕种：

（甲）废除分谷制，规定固定租额，凶荒无减。

（乙）规定最低租额（百分之五十），务使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剥削”不得过多。

（丙）不准富农借口只耕己田，不耕人田。如富农不愿租田时，

乡政府应将本乡必须出租的田，分配租与本乡富农中农，强制他们耕种。

九　城市失业工人要求分田问题

泰和城内泥水木匠二百多人失业，要求分田，没有分。他们是外县人，城区农民不准他们分田。又南门城外作甘蔗的，也要求分田。

兴国也闹这个问题。

此问题值得从长考虑。

给江西省行委的信[1]

（1930年11月20日）

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

（一）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对于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坊区之一点没有做，吉安洋油大部未搬，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以儒坊区及吉安的情况推之，西区儒林区、纯化区、泰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于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恐怕亦相差不远。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要指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覆灭，新余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损失，峡江紧急会议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并以洋油和万多斤盐资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训。

（二）报载六十师三团从鄂南开动，五日完毕，六十一师继续开拔，从莲花方面进攻赣西。除永新安福两县委县苏[2]要飞速准备应

---

[1] 这是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水南写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信。

[2] 县苏，县苏维埃的简称。

敌外，湘东特委尤要飞速准备应敌。对于牵制蒋蔡两部[1]（这是敌军主力），湘东群众和独立师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一进到永新、安福、泰和、吉安等地，赣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该敌，同时已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方法去牵制他，务使蒋蔡罗李[2]四师不能渡过河东。在这个任务下，红军第三军负了很大的责任。上述许多工作，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都要指导。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截至现在，好像没有行使他的职务，既没有发一个通告给各地指示工作，又没有发一个通报到各地报告敌情，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湘东方面左委左部都要指挥，就是省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西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东行委、赣南行委属境，亦不能在这紧张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如近日开的赣西行委扩大会，赣西各县委员等联席会，雇农代表大会，均不邀莲花、萍乡、兴国、宁都、永丰的代表到会（至少应该邀他们列席旁听），真是非常之不应该。

（三）水南区还不知道只发柴、菜钱，不发油、盐、米钱的事，别处也是相同，对于供给红军油、盐、米一事，当没有接得通告。我要财政部派两人，一往永丰、宁都，一往纯化、水南、陂头、白沙、东固办理红军给养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员多答应了，实际并没有做，等两天红军到了这些地方，油、盐、米问题仍然不能解决。特别是盐，须预从省政府的盐中挑一部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给红军，不用钱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二十三万元到手

---

[1] 蒋蔡两部，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师长分别为蔡廷锴和蒋光鼐。

[2] 蒋蔡，指蒋光鼐、蔡廷锴。罗李，指罗霖、李觉，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三纵队第七十七师师长和第十九师师长。

（此二十三万元无论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支用分文，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筹款不可。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能疏忽，是为重要。省委应该每天开一次会，召集省苏[1]负责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

（四）我们今日可到白沙，明日可到藤田，望省委、左委、赣东行委、赣西行委、二十二军军委，每天各有一信送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湘东行委最近报告（内述独立师缴枪五百余等事的）在安[2]收到。

---

[1] 省苏，省苏维埃的简称。

[2] 安，指江西吉安。

木口村调查

（1930年11月21日）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八日，红军放弃吉安。十九日我和古柏、谢唯俊[1]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藤田，会合红军主力。二十一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政府委员的成份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份。在这个调查中证明，中农在平分土地中不但无所失而且有所得，富农小地主则在农民的激烈斗争中便要走到反革命阵营中去的。

吉水县水南区第八乡所属之木口村。

全村二百人。

全有劳动力的壮丁四十六人，都编入了赤卫队。

村政府设在祠堂里。

村政府九个办事人：主席、秘书、土地委员、社会保险委员、赤卫委员、粮食委员、裁判委员、妇女委员、青年委员。

主席刘兴南（小地主），两个人，有五十六石田（每石田出谷三箩，每箩四十斤），耕十多石，出租四十石。因好赌，没有钱放账。此次分田大部分出去了。秘书彭家发（中农），八个人吃，有四十八

---

[1] 古柏，1930年曾任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军政最高指导机关）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谢唯俊，1930年曾在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

石谷田，还租入二十几石，够食，不欠债。此次分田每人分得七石八斗，共计六十二石四斗，分进来了十四石四斗，这是中农分田进来的证据。土地委员刘兴文（贫农），三个人，十石谷田，不够食，这回分进来了十三石四斗，过去欠债六十元。社会保险委员伍开连（贫农），四个人吃，十六石谷田，不够食，租入二十多石，此次分进十五石二斗，过去欠了账。赤卫委员彭家兄（中农），过去一个人吃，十二石谷田，因还高利债，卖掉六石，只剩六石，够食，还帮人做零工，没老婆，不能供猪子，好赌，欠债三十元。革命后“由”了一个老婆，老婆带来了一个十三岁的儿子及一个十三岁的媳妇，现在四个人分田，每人分得七石八斗，共得三十一石二斗。以本人说，原只六石，今分七石八斗，增加了一石八斗，又是中农分田进来的一个证据。粮食委员徐传章（贫农），一个人吃，只有二石谷田，不够，帮人做零工，现分进了五石八斗，还没有老婆。裁判委员由主席刘兴南兼。妇女委员杨九英（中农），五个人，五十石谷田，她丈夫和她的家翁耕种，够食，没有多余，不欠债。这次分田分进来了六石谷，又是中农进田的一个证据。以上七个村政府办事人，小地主一个，中农三个，贫农三个，其中中农都是分进土地的。

本村前年起就革命，今年正月分田（从东固区分过来的，本村从前属于东固）。本村政府委员均吃自己的饭，政府一路来不起伙。

本村共杀了七个反动派：彭家光、彭家善、彭家俊、彭培均、彭昌隆、彭昌禧、温志贵。彭家光（小地主），三个人吃，有三十多石谷田，在水南开布店，田租给人耕，收租，店内生意不好，每年蚀本，经手收第三十八都的捐税从中图利，吃鸦片，读书人，是个大劣绅。彭家善（富农），彭家光之弟，五个人吃，有四十多石谷田，有钱放债。因废债伤了心，勾结河南土匪，去年七月和他的老

兄一起被捉，杀了。彭家俊（流氓），三个人吃，无田，欠人债。参加革命，在东固游击队当副官，又当过司务长，又当过军需。后头开小差，弄了三支枪，私打土豪当土匪，去年被捉，杀了。平素好打牌。彭培均（富农），四个人吃，有百二十石田，请两个长年耕，还把一半租与人耕，有钱放债。群众平田烧契，他不肯，杀了。彭昌隆（小地主），四个人吃，六十石田，均租与人耕，放薄荷油钱、黄麻钱，读书人，在吉水县教书，跟河南土匪一起，火线上捉到杀了。彭昌禧（小地主），三个人吃，彭昌隆之弟，六十石田，放薄荷油钱、黄麻钱，借一元还谷三箩，前年三月杀了。温志贵（富农），七个人吃，三十石谷田，租入百多石，自己劳力外，还请一个长年及许多零工，不放债，兼做小生意，担鸭子及油果子卖。勾通河南土匪走漏革命消息，被杀。（所谓河南土匪，就是一部分河南人移居江西吉水县，其中有些人当土匪。）

以上杀掉的七个反动分子，小地主富农各三人，流氓一人，证明小地主富农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这七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

八个大胜利的条件*

（1930年12月22日）

一　国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帝国主义

一、帝国主义的冲突与恐慌

1. 意大利为中心七国的联合，意国同法国冲突得利害，意国就把那些同法国有仇恨的国家德国、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结成七国团体，对付法国。法国就恐慌。怕意国德国站到苏联方面去。德国说你们（英法美）不取消要我赔款，我就要和苏联做朋友。意国说你们不准我大造海军，我也要与苏联做朋友。那些大帝国主义（英法美）答应得来不得了，不答应也不得了，这些表现他们冲突得不可开交。

2. 英国要五人专政，英国罢工问题失业问题闹得很凶，对外做生意又不发财。国内工商业都喊不得了，快要闹大乱子一样。英帝国主义就恐慌起来，就要组织五个人政权，好集权对付乱子，这就表现国里的问题真不小啊！美国货物堆起发烂，工人七百万就没有饭吃。

美国的麦子出得太多，卖不出去。资本家只喊要作田的农民不要种麦子了；可是，有七百万工人没有钱买麦子吃，在那里挨饿失

业。一面麦子堆着发烂，一面工人挨饿，你看帝国主义里怪不怪。美国银子也产得多，堆了没人借，银子大跌价，简直不得了。钢铁橡胶也卖不出去，所以七天工夫倒了一百三十多家银行。这就叫做生产过剩的产业恐慌，现在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日本发生大地震，日本的产业早已恐慌，他们老早就喊要行紧缩政策（少用钱少办事），现在又发生大地震，房屋、工厂、桥梁不知毁坏好多，人也死得不少。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这次大铁锤，叫苦不得了。

二、国际革命潮流的开展

1. 德国共产党到处暴动，德国共产党与国社党（资本家的死党）到处发生冲突，共产党与警察也到处发生冲突，街头巷尾，拿手枪打人成了常事，连戏院里演一出戏（反对帝国打仗的）也发生冲突，国社党不要演，共产党示威要演。街上简直做起游击战争，德国无产阶级恐怕就快要暴动起来。

2. 英国煤矿大罢工。英国九万煤矿工人已实行大罢工，有扩大到全国罢工的形势。共产党在罢工工人中发展，全国煤矿工人大会有二十多万代表，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这一势力，就不可轻看呀！

3. 美国共产党干得起劲，美国共产党以前是不厉害的，现在美帝国主义内失业的人多，共产党大发展，美帝国主义害怕，组织一个调查共产党的会。照调查会的报告，说是有五十多万共产党员，共产党已经在组织大示威，干得起劲。

4. 苏联宣布帝国主义罪恶。苏联五年实业计划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帝国主义恐慌，就勾结白俄，从中破坏，想把工厂里铁路上的机器都毁坏，使苏联实业破产，再去出兵干涉。这个大阴谋被苏联

发现了，那些犯人口供出英国都是同谋的。苏联把这些供词用无线电告诉全世界，宣布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个个脸红失色。现在苏联无产阶级更加团结，共产党员组织骑巡队，骑着马到工厂里到铁路上去巡查，工作非常紧张。

二　国内形势有利于阶级决战，不利于蒋介石、鲁涤平

一、统治阶级的冲突（从下面几件事看得出来）

1. 蒋和张、阎、冯的对抗。张学良要改编二十个师，阎锡山改编十军，名义上交徐永昌商震管理军政，骨子里还是暗中主持。阎、张在天津互派代表相会，冯玉祥名义上要把孙良诚宋哲元等调回甘肃，集中在晋西南骨子里是想打陕西。张学良又极力拉石友三，石友三在天津与张派各要人相会，这是捣的什么鬼，就是张学良猛力拉拢阎冯部下，扩张自己实力。又要干起军阀混战来。蒋介石在陇海线上仍大布重兵，洛阳放个行营，顾祝同做行营主任，这是与冯玉祥对抗。郑州设个行营，何应钦做行营主任，显然与石友三阎部下对抗。又把孙连仲调到兖州，王钧摆在徐州，金汉鼎摆在海州，这就是与张学良对抗。陇海路上摆一路的兵，这是捣什么鬼，这是准备新的大混战。以前蒋、冯、阎，这回还要加进一个张学良。我们要以阶级决战反对这种屠杀工农的大混战啊！

2. 广西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派了第八路军许多军马打广西，混战一场的结果，因为张桂军打败了云南军，张桂军就得了声势，蒋介石无可奈何，他们表面上讲和，但广西还归广西黄绍雄霸占，这个问题，还是不得解决。

3. 四川省同云南省内的小军阀，又准备混战。

二、革命势力的发展：

1. 郭汝栋一旅士兵大暴动。

郭汝栋开兵去打湖北省曾被□□谁知兵一到，整个一旅士兵暴动过来了，一旅人的大暴动，这表示敌人的部队是如何动摇崩溃，蒋介石慌了，只好撤郭汝栋的职。

2. 鄂东北的革命势力攻打不下。

鄂东北原为红军第一军，蒋介石以前派徐泉源打过，现在又要加派肖之楚去，还要派飞机，可见无法对付这一革命势力。

3. 湘北革命势力的坚强。

湖北是红军二、六两军，何键派了许多部队去打，可是二、六两军威逼过常德，到过澧州，现在在石门。何键忙了，又调李觉去打，又把陈诚师也开一部分到华容，反动派的报纸当然不说红军胜利的消息，但是从反动派加调军队去打，就可见得它打红军不过，恐怕还送了许多枪吧。

上面说的统治阶级的冲突，国内革命势力到处在努力反抗军阀，这是非常帮助我们打胜仗的。

三　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的战略是着着失败

1. 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敌人要我们到白色区域同他打仗，我们偏不去，我们要敌人到红色区域，敌人不得不来。我们不去，使他们的轮船、火车、工事都无用了。他们要来赤色区域，我们的梭镖也就更厉害了。敌人来到赤色区域，就好象虾子落到滩头，这一

看就是敌败我胜。

2. 采用持久战略，这次敌人要快打，我们偏不同他快打。敌人内部有冲突，只想打败我们，又好混战。限三个月“剿匪”，我们就看清了他的弱点，偏同他熬。现在熬了他差不多两个零月，使他们步步打个空，要熬得他内部发作，给他一个猛打。敌人在我们军队里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长，总共打了四千多AB团。我们不同他快打，抽出时间来打死了许多小蒋介石，把红军内奸肃清，团结得更紧，敌人又是失败，我们已经打了大胜仗。

3. 给敌人久困重围。

敌人妄想给我们重围久困，河东、河西开起几路军队包围我们，就来一个坚壁清野，号召群众参战，给他一个久困重围，乐安之敌我们晚上四周一打枪，他们黑夜里就象老鼠，□跑到山上不敢下来。施家边的敌人，因为我们扰他，敌人机关枪步枪就打到天亮，结果自己打自己，打死几百。我们扰敌，敌人即吹集合号，惊心吊胆，一晚不敢睡觉，打又看不见我们，不打又怕我们真打他，你看这个是谁给谁个围困。敌人来到赤色区域，柴米油盐样样无，要派兵到乡里去搜，好费力还弄不到一餐饱饭，你看这又是谁个给谁个围困。我们又大贴标语，又做白军士兵宣传，敌人又很动摇，还没有开始打仗，敌人就步步失败了，我们就步步胜利了。敌人又恐慌又动摇，给他一个猛打，哪有不胜之理。

四　我们有群众配合，敌人没有

我们得到群众帮助，担架队、运输队、救护，报告敌情，带路

做交通，到处都有革命群众出力帮助。敌人没有，敌人没有人带路，没有人送信，没有人报告消息，只有破坏他的交通，捉他的探子，扰乱他的后方。而且我们一打仗，群众到处登山助战，使敌人不晓得我们有多少兵力，发起慌来。打败了敌人，群众到处起来缴枪捉拿，就叫他一个也跑不出红色区域，这就是敌人无群众，我们有群众。敌人一定要败，我们一定要胜。

五　我们兵力是集中的，敌人的兵力是分散的

这次我们一、三两军团大汇合，集中在一块。我们的实力和战斗力是够打的。二十团敌人，军队虽多，但河西扯到河东，相离几百里，是个分散的，每路的枪支，至多不过四五千杆。我们最大的火力，给他一路击破，叫他其余的路虽来也无用。这就叫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断无不胜之理。

六　我们的军队是团结的，敌人的军队是动摇的

敌人的兵士老早动摇，加上跑到赤色区域，看了我们的标语“白军弟兄杀尽压迫你们的官长”“欢迎白军弟兄来当红军”。眼睛一看，心里一想，就更要动摇起来。乐安敌人卖枪给老百姓逃走的，跑出来找红军的，发生了好几回。我们红军哩，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是自觉的打仗，万众一心的。以这种阶级的红军，团结打那动动摇摇的白军，哪有不胜之理。

七　我们准备充足，敌人财政恐慌

红军打仗从来不带好多粮饷的，三军团只有一餐早饭米，还打开了长沙。这是我们红军的特色，现在我们倒准备了三个月粮饷，我们就可同敌人大打特打。这回我们官兵夫还捐钱打仗，这也只有我们红军才能做得到。因为这是自己拿出钱来替自己打仗的原故。红军有了这种精神，又有大的准备。敌人哩，财政恐慌，抽了房捐，又要抽店捐，还要加盐税，发公债，总是钱上军阀腰包，兵士军饷无着，一定教敌人多来给他一个大大的消灭。

八　我们得地利，敌人不得地利

宁都、永丰、兴国一带，既是赤色区域，又是山多岭峻，路又窄，地又险，敌人大的步伐摆不开，开大炮也失了作用。红军行动又快，地势又熟，山前一个正面攻击，山后一个包抄打来，要叫那陷在那里的白军走投无路，打个片甲不留。

上面几个条件，是我们阶级决战一定要胜利的条件。可是一定要我们勇敢去打仗，不勇敢去打，决没有坐在家里打胜仗的道理。只讲一件事，比如白军士兵动摇，我们打得胜利，但是白军官长是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死走狗，他们一定要打我们，才能救死。所以还是要我们坚决的勇敢的去打他才能胜利。不过我们有八个大胜利的条件，敌人有八个大不利的条件。所以我们更有把握胜利的，同志们，勇敢向前尽你阶级责任吧！

总前委印于黄陂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伏击进犯小布之敌的命令[1]

（1930年12月25日）

（一）石马之敌本（二十四）日进至上溪（距小布五十里），中村之敌（按：此两处皆系张辉瓒部）本日午前十一时到达源头、上潮、芦峰岭之线（约两团），显有于明（二十五）晨侵入小布之势。我三军之一连仍在小布。肖田之敌（毛师[2]）本午进至吴村，引水之敌（谭师[3]）本午进至东韶。我政卫团已撤回麻田。东固之敌本日到达南龙，尚未至龙冈。君埠仍有我派出之部队。

---

[1] 1930年12月，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蒋介石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调集十万兵力，从吉安至建宁一线，由北向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第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25日先在江西宁都县小布伏击未果，28日方面军改换目标，向东固次第攻击前进，30日在龙冈地区伏击成功，歼第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万人，活捉张辉瓒。接着红军乘胜追击，1931年1月3日在东韶地区再歼谭道源第五十师一个多旅，其他敌军闻风溃退，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黄陂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九号命令。原件所标时间为“十二月二十四号下半夜一时”，实际是1930年12月25日1时，因此命令中凡写“明”和“明晨”者，均应为“今”或“今晨”，“本日”应为“昨日”。

[2] 毛师，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师长毛炳文。

[3] 谭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二纵队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

（二）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五）日先歼灭来犯小布之敌。

（三）第三军团任右翼攻击小布之东北两方（即弩峰南方高地，沿树陂北方高地，及油脑上、乌山至何屋附近之线），应于明晨（须在六七时左右出发）十时到达小布街附近十里左右停止（注意将目标隐蔽起来），须让源头前进之敌进入小布后，截断其源头来路，然后举行猛攻而歼灭之。

第三军任左翼攻击小布之西方（即富江坪及树坑南方高地一带），应于明晨八时出发，十时须到达小布街附近十里左右停止，注意隐蔽目标，让上溪前进之敌进入小布街以后，截断敌之上溪来路，然后猛攻而歼灭之。

第十二军任中路攻击小布之南方（即何屋南方高地及水西北方高地之线），应于明晨七时半由现在地出发，向小布攻击前进，如小布未到敌，则在小布前（即小布南端）十里附近停止。

第四军为总预备队，应于明晨十时到达田东市（钓峰至小布途中）停止待命（总预备队即位置于此）。

中革委政卫团仍位于麻田，应向东韶及洛口、南团三方向严密配备警戒，牵制东韶、吴村之敌，使我主力出击得收全胜。

（四）各军大行李皆位置于黄陂附近，归本部副官处长指挥。

（五）各部队应带午餐一顿。

（六）总司令部随中革委于明晨八时由此地移到田东市总预备队位置。

附记：

1. 地位即用本部颁发第三军参谋处测绘之小布附近略图，及本部参谋处印发之宁都路线图。

2. 各军应自行指定绷带所位置。临时野战病院在赖家坪。

3. 电话暂不撤收。如麻田发现敌人，政卫团于必需撤退时可撤收之，但必须即刻通报各部。

4. 三军团应注意向南团方向警戒。

右令

总 司 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横扫左翼之敌张辉瓒等部的命令[1]

（1930年12月28日）

（一）敌谭道源部[2]仍在源头、上下潮、树陂一带，熬延不进。

毛炳文部[3]进入东韶之两团，确移到洛口，先头昨到达平田，其后续部队行动不明，大概有向宁都前进模样。

张辉瓒部[4]经善和、藤田到达潭头，现向上固、龙冈推进中。许师[5]之行动不明，公罗[6]两部分在东固、南龙、枫边、富田、陂头各地。

（二）方面军决改换目标，横扫在我左翼当前之敌（张辉瓒部以至许、公、罗各师），次第歼灭之。拟分兵两路，左沿君埠、龙冈，右沿上固、潭头，向东固次第攻击前进。

（三）第三军团、第四军为右路军（归彭总指挥德怀、滕政治委员代远指挥），沿汉下攻击上固、下固，得手后即继续向潭头攻击前

---

[1] 这是1930年12月28日21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黄陂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一号命令。

[2] 谭道源部，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

[3] 毛炳文部，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师长毛炳文。

[4] 张辉瓒部，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5] 许师，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

[6] 公，指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二十八师（原新编第五师）师长。罗，指罗霖，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七十七师师长。

进，务须消灭各该当地之敌，然后向东固略进。应于明（二十九）日由现在地出动（行军计划自定）。

第三、十二两军为左路军（归本长指挥），沿君埠攻击龙冈，次及南龙，歼灭各该地之敌后，则向东固略进。应于明（二十九）日由现在地出动（行军计划另详）。中革委政卫团留黄陂，归战地委员会指挥，牵制东区敌人。

（四）全方面军之大行李及非战部队，统归第三军团总指挥部副官处长陈宗实指挥，随左路军后行进（各部只准带伙食担四担及必需之小行李）。政卫团第四连掩护大行李行进，归陈副官长指挥。

（六）[1]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进。

注意[2]：

1. 如上下固无敌，则右路军应与左路军协同歼灭龙冈之敌，并向沙溪方向警戒。

2. 右路军之后卫，应注意源头、树陂方向之敌。

3. 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

4. 各军政治部，须有半部随军至战地工作，以半部随大行李走。

---

[1] 原件第五项字迹脱落，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42年编印的《军事文献》中为：“（五）各路卫生队随各部行进。”

[2]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42年编印的《军事文献》在此件注意中还有“5.三十五师（现在约溪）应于三十日午前由约溪便道插至南龙、龙冈间，配合左路军攻击龙冈并向南龙警戒”一项。

攻击龙冈敌张辉瓒部的命令[1]

（1930年12月29日）

（一）敌张辉瓒师[2]由南龙向我前进，本（二十九）日午前十时，其先头部队到达此三十里之龙冈圩（戴岳旅[3]一〇三团），后续部队不明。潭头有到敌说。

谭道源师[4]仍在源头、上下潮。

毛炳文师[5]移到洛口、平田、东山坝一带。

（二）方面军决以左路军于明（三十）日攻击龙冈之敌，右路军则应派部协助歼灭该敌。

（三）第十二军（缺三十五师，包括六十四师在内）任左翼，应于明晨四时前出动，向表湖前进。应以一部分占领龙冈南端水西西端之万工山，以主力截断通南龙之大道（经兰石、茅坪），须于午前十时占领所要之阵地。

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五时出动，占领木坑以右地区及亭子岭之主要阵地，向龙冈攻击前进（须于午前九时半开始攻击）。右与

---

[1] 这是1930年12月29日20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永丰县君埠街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二号命令。

[2] 张辉瓒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3] 戴岳旅，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旅长戴岳。

[4] 谭道源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五十二师，师长谭道源。

[5] 毛炳文师，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师长毛炳文。

右路军派出队确取联络，如右路军未派出部队，则应向右延伸特别注意右翼。

（四）总攻击龙冈时间为三十日午前十时。

（五）右路军应于明晨派出一部，经回龙到樊埠附近，左接第三军，右接第十二军，向龙冈之西北端（张家车附近）攻击前进，到达时须即向三军及总司令部取联络。如上固无敌，则以主力向樊埠、张家车之线攻击前进，而以小部警戒下固、潭头。

（六）各军小行李及伤兵收容所、绷带所等均自择地点位置，敌方俘虏招待所设小别。

（七）大行李仍位置于阳[1]停止待命，如小布发现敌情则径向约溪移动。

（八）总司令部明日移到小别附近指挥。

附记：

1. 明日出发前各部应集合官兵讲话，作政治鼓动，预备队亦应随时作政治鼓动。

2. 十二军应注意竭力截断敌南龙之增援队。

3. 各军俘虏兵可向小别招待所转送。

4. 各军应注意相互间之联络及搜集情报。

5. 各部须注意搜集西药，无线电亦不准破坏。

右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此处“阳”后缺一字，似为“阳矶”。

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1]

（1930年12月）

第一，我们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这是最重要条件。第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有利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我们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我们可以察明敌军行动，摸清敌人行动规律，从而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第六，我们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

---

[1] 1930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小布主持召开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并作动员讲话。这是讲话中列举的克敌制胜的六个有利条件。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

（1930年12月）

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富田事变，我们老早指出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无论那班叛逆怎样还在那里扯红旗，怎样还在那里讲革命，可是富田事变一发生，事实是勾引白军，很快地进攻富田，很快进攻东固，使富田东固一带群众受烧杀压迫的痛苦，事实是拖起军队往河西，分裂革命势力，事实是前方准备决战，后方来个暴动，破坏阶级决战，事实是到处寄信派人造谣挑拨，企图使群众脱离红军，事实是破坏了省苏维埃政府，事实是攻打城市还是农村的一般的事实。取消派有法子（内中缺少一百零八字）人做红校代表来黄陂的，从允中就千万嘱他一个人，要他秘密把这一封信交给朱德同志彭德怀同志，朱德同志即将此信交出来。不料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我们要问：

（一）到底是哪一个陷害同志？AB团取消派，现在反对毛泽东唯一的罪状，是陷害同志，造成什么“要把赣西南干部一网打尽”的谣言，企图恐吓动摇一班革命同志来反对毛同志个人，达到AB团取消派破坏革命的阴谋，事实是现在的赣东行委，赣东苏维埃办事处，赣南、东南行委，兴国县委、县苏，万安县委、县苏，泰和县委、县苏，吉安市苏，水南区委，永丰县委、县苏，沙溪荇田区委、区苏，凡了解富田事变的同志，一天一天都站在总前委正确路

线之下，一致反对富田叛变。毛同志又不做孤家寡人，为什么要把革命同志“一网打尽”呢？一网打尽的欺骗恐吓，事实已告失败，此次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AB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AB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事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作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可是AB团取消派血口喷人，说“屠杀了大批干部”。不错，在你们AB团取消派看来，真是干部，红军中AB要犯刘天岳、曾昭汉以及龙超清、梁鼎元、江克宽、周章等的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等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李同志到富田时，正值段良弼、李伯芳、刘万青、谢汉昌、金万邦等开联席会议，独陈正人、曾山同志不在，遂能一举捕获李伯芳、段良弼、金万邦、谢汉昌等亲笔供称是AB团，并说他们的AB团比起段锡朋所办的，要进步，没有那封建。AB团取消派好阴险呀。攒〈钻〉在革命机关，做反革命，打倒了他，还要说，陷害了忠实同志。关于肃清省行委的AB团要犯是总前委决定的，并非毛同志一人。而且当时总前委所指出的，只限于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等三个，金万邦、丛允中、曾兴、王怀、周冕、刘经化、任心时等何以捉到他们头上？那时根据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亲笔口供，谢汉昌说，“打倒朱毛、消灭李段”。这个阴谋早在去年六月谢汉昌做兴永边界区委的时候，借着金汉鼎部队压迫兴永革命，表面上为消极抵抗敌人，骨子里即是开始叛变的一个鬼胎。逆说这个阴谋是经过丛允中、萧认的批准，才敢于执行，可见蓄谋已久，富田事变不过公开暴露呀。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谢

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重责的，为什么可以呢？至于说丛允中、王怀、李天柱写封信给左委即诬为AB团，在今天看来不幸而言中，丛允中原是秘密造假信的呀。李天柱是破坏红校的呀。事实是三军的AB团特别布置得多，设若照了左委的意见，不过河来，予以整顿，现在的三军就必得遭遇AB团取消派的破坏呀。为此说来还要诬人家，为陷害，企图再躲在红旗下延长反革命的寿命，有谁相信！现在呢？再看AB团取消派，为着要打倒毛泽东达到破坏革命势力，竟走到无耻的捏造假信，造出毛同志给信古柏同志，要拿出朱、彭、黄、滕几个同志的罪状以便捕杀，一面秘密地，一再把这样的信送交朱、彭、黄，再三无耻地哀求朱、彭、黄、滕，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周（中央代表周以栗同志）及其走狗一齐扣留，为此捏造假信，为此挑拨离间，为此毒辣想一齐扣留，这是哪个在陷害同志一网打尽？

（二）到底哪个是阴谋大家？取消派AB团现在说毛泽东同志第二句最起劲的是毛同志是阴谋家，说毛同志喜欢用政治手段“拉一个打一个”。这句话以资产阶级的眼光看来，都有些陷谋意味，但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唯物论的人们，他就要从事实上去看，拉得对不对，打得对不对。如果拉的是为革命，打的也是为革命，又有什么要不得呢？我们以前不是拉过国民党，打倒过吴佩孚、张作霖吗？不也曾拉过汪精卫反对蒋介石吗？无产阶级不是要拉住农民的同盟军，实行夺取政权吗？我们现在在农村不是正要拉住中农反对富农吗？这有什么要不得呢？而且必然要如此的，不过字面上有点不同，或叫连络，或叫争取罢了。他们不从事实上结果上以此分析，只一味唯心造谣反对，足见其无诚。事实上AB团取消派现在叫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朱、彭、黄早已宣言，

没有什么私人拥护与否之分，只有革命反革命之别，AB团取消派于是有说，“我们的头颅愿供献在你们（暗指朱、彭同志）面前”，大敌当前不把头颅去同军阀拼生死，却在苦哀乞怜地要死在朱、彭同志之前面，不去努力阶级决战打敌人，却努力要朱、彭同志用非常手段扣留毛、周，正是何等无耻的阴谋，何等无耻的拉一个打一个的AB团取消派的阴谋毒计。

事实上他们假造出毛同志给古柏同志一封假信，说什么毛同志要古柏同志替AB受附，故意勒招朱、彭、黄、滕，也是红军AB要犯，并与其方白军勾引好实行捕获，以此证明毛同志反水企图使群众不相信红军，红军脱离群众，使革命归于失败，可是这封信原稿呢？照他们自己说，费了一夜的推敲，原稿尚未得到，他们找不着原信的底稿里说可以拿脑壳来保障是真的不是捏造，这是不打自招，这见其作□心劳口拙罢了。这样的捏造，自然不值读者一笑，即就他们造假的技术，看来也大不相信后面的“……完……及、10-12”这样地写日子，从来毛同志不是这样写信的□□□□□□□□□□□□□□这一点□□□□□实行挑拨离间，竟不惜一切，说出毛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打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挑拨朱、彭等来杀毛、周，竟如此毒辣陷害同志，“书伪造之信”不够，还秘密地派人，秘密地交信，这到底哪一个是阴谋大家，现在AB团取消派到处还在那里造谣蒙蔽，陷害同志。AB团取消派胡家驹跑到泰和，煽惑县苏委员长李森林同志、县委郭德香负责同志，说总前委要捕杀他们，恐吓他们，要他们反总前委，但李同志参加过拘捕段、李、谢AB要犯的会议，听过韶九同志的报告，他们一点不疑，而且曾全雅同志说得最好，如果总前委两捉李、郭两个人，为什么要告诉你胡家驹呢，胡才哑口无言。AB团取

消派假造总前委要把赣西南革命同志一网打尽的谣言，都是同造假信一样的阴谋企图，使整个赣西南革命同志个个怀疑恐吓，他就能从中捣鬼，不知真正革命的，决不会上他的鬼计。AB团取消派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只希望这一封信能达到你们（按指朱、彭等同志)，又说，如果此信不能达到，又不幸落到奸人的手上，我们只有流血以报党。真不幸得很，这封信又到我们手里，AB团取消派，你们拿不出毛同志给古柏同志信的原稿，我们都找着你们的原稿了，你们大施阴谋的原稿了（现在正用照片将原稿照起付印)，可怜你们日暮途穷唯一的希望，又希望失败了，你们“流血”呢？还是“吸血”阴谋家的取消派AB团呵？你们不要以取消派AB团之心，度布尔什维克朱、彭等之腹了！

（三）刘敌的行动不是AB团阴谋吗？这在开头的一页已简单把富田事变的真相说明了，可是AB团取消派，他们要说刘敌的行动是为了救同志，是听了李韶九同志一句“是政治问题哪”的话，仿佛是富田举义，绝非叛变阴谋。AB团取消派呀，你们又不聪明了，果真总前委捉错了段、李、谢，为什么不要求开会详细调查解决呢？即使说，当时为着救同志急不暇择，那末，把同志救出了，也就完了，为什么还要拖部队往河西？为什么还要捉起刘军长？为什么还要陷害李韶九同志？为什么还要苏维埃赶走曾山同志？为什么还要进攻红军学校？为什么还要到处派出特派员欺骗群众脱离红军，公开地说“我们要反对毛泽东，反对第一方面军，如果第一方面军来了，我们要告诉群众，通统走开，政权机关也要走开，只有二十军才是我们可靠的军队”，又说，我们有了群众不愁红军不落在江西，（一个AB团取消派的特派员叫做汪安国在水南区说的）更为什么要捏造假信挑拨离间呢？有人说，这是误会，为什么一误再误

三误还不止呢？我们要反对这种误会的调和论调，而且果真为着救国吗，那末为什么又扯出一大套不速战呀，分田不以劳动为标准呀（邓浩春致永丰县的信）的策略上的话呢？就说策略吧，为什么不开会争论，而必要开枪放炮呢？李韶九同志说“是政治问题哪”，我们现不知道说了没有，如果说了，那就千对万对，的确AB团取消派阴谋叛变革命，千方百计破坏红军，取消土地革命，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哪，值得每个同志注意努力起来，肃清叛逆呀。AB团取消派，还在装腔作势地说“我们极力遏止叛变”的情绪，恐蒙敲人所弃，而是剩白军打到东固，走狗的功高，不要过于谦虚了吧。

（四）二全会议不是AB团取消派的操纵吗？我们老早指出，二全会议恐有AB团取消派的阴谋，因为从事实上，拿二七联席会议（毛同志领导的）与二全会议对照一看，就不能不使每个革命的同志对二全会议怀疑。二七联席会议坚决提出分田的主张（以前赣西南对土地革命，是只共产党先生们调查研究的题目，要分田也是不分共产党员的田的）二全会议对土地问题——中国革命主要问题，竟一字不谈，谈的恰恰是反土地革命的□□□□□□□□□□□□□□□□□□农民意识，反对二七会议之平田主张，取消土地革命，二七会议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开除机会主义代表江汉波。二全会议坚决发展取消派的理论，开除代表赣西南平田斗争的刘士奇，二七会议后发动赣西南分田革命斗争，建立了革命基础，二全会议后发展了AB团取消派，造成反革命的阴谋。现在呢？谢汉昌亲口供出了，二全会议主要反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因为刘士奇是实行七次战赣坚决实行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二七会议的决议的。开除刘士奇，是领先经过谢汉昌、李伯芳等几个人的秘密会议，然后在大会中提出的。谢自己供说，在大会中

他是担任做说客的，无怪当时谢、李反刘之笃力呵。谢又说，反对分田是没有理由可说的，只好借“转变农民意识”高唱平分是私有观念，不合社会主义之主张，这最早的社会主义的道理中找出反对分田的理由来，破坏土地革命。谢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争取雇农贫农群众，巩固中农同盟，我们的政策就是拿富农地主流氓，二全会议的主角就是AB团取消派首领李文林、段良弼、谢汉昌、李伯芳所唱的，又是上面这些把戏。二全会议是AB团取消派的操纵呢？还是正式的AB团取消派的会议？恐怕操纵两字还不够代表内容吧。自然我们不能说，所有参加二全会议的人，都是AB团取消派，的确里面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同志，如杨成英同志，甚至为反对开除刘士奇，感觉有话不能说，愤慨至于哭泣，这就证明二全会议完全被他们所谓党的领袖、实际AB团取消派的领袖包办了。这在今日看来，当然不是偶然的事。在二七会议后，猛攻富农地主，富农地主于是不仅从行动上积极反对分田，不仅从组织上积极发展AB团取消派，而且要建设一贯的反革命的理论，二全会议就完成了这一任务。二七会议是无产阶级、贫农猛攻地主富农，二全会议，便是地主富农的反攻。

（五）谁破坏中农呢？我们一向主张在农村中，是团结雇农贫农，巩固中农同盟，向地主富农斗争，AB团取消派以前反对平田，要以劳动力为标准去分田（实际代表富农利益，因为富农才有资本，算得上劳动力多，于是富农就多分田。贫农呢，既无耕牛农器，复少肥料种子，不消说劳动是很少很少的。于是就缺少分田。可是贫农家里，一样有老少，一样有肚子嘴巴要饭吃呀。取消派AB团同志，你们也革命，也知道这些人要吃饭的怪事吧！）AB团取消派知道反对贫农利益是说不过去，于是一下跑到极左边，说要贫农

雇农都是分好田，中农分不好的田，表示特别拥护贫农雇农利益。表面上看来，不能说不革命。但是骨子里又是一个阴谋。请问目前故意给中农坏田，这是不是故意破坏中农同盟，故意逼着中农走到富农一方面帮助反动，故意使贫农孤立？果然破坏了中农同盟，土地革命就要破坏主张，贫农分好田，不是国民党一样拥护民众利益，口惠而实不至吗？总之，他们站在右边不能取消土地革命，便要跑在左边来取消土地革命。如今右也给他一个打击，左也给他一个揭穿。他只好要造谣说，我们喊出中农反对的口号了。

末了，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呢？是不是泽东同志个人问题？不是不是决不是。如果是毛同志个人问题，为什么还要提起周以栗同志呢？纵令退一万步，以栗同志刚到江西，使了什么政治手腕？捉了哪一个，打了哪一个？AB团取消派还得赶造谣言吧？那末，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同志呢？正因为毛同志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目前实际在领导斗争，推动中国革命，A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所以就要打倒毛泽东。正因为以栗同志代表中央正确路线，所以同样要捉起。AB团取消派为什么拥护朱、彭、黄呢？并不是拥护革命，因为革命就没有私人拥护与否的问题，他们也不是忠实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了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各个打倒。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战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呵。

题第一次反“围剿”[1]誓师大会联

（1930年12月）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

[1] 1930年12月25日，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在江西省宁都县小布河滩的麻糍石下召开了近万人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写了这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旁柱子上。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一次军事“围剿”。图为进攻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

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布告[1]

（1930年12月）

段谢刘李[2]等逆，叛变起于富田。
带了红军反水，不顾大敌当前。
分裂革命势力，真正罪恶滔天。
破坏阶级决战，还要乱造谣言。
进攻省苏政府，推翻工农政权。
赶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员。
实行拥蒋反共，反对彻底分田。
妄想阴谋暴动，破坏红军万千。
要把红色区域，变成黑暗牢监。
AB[3]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联。

---

[1] 这是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起草的讨伐富田事变的布告。

[2] 段谢刘李，指当时被指控为AB团的首要人物：段良弼（江西省行委负责人）、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刘敌（红二十军一四七团政委）、李伯芳（江西省委秘书）。

[3] 即AB团，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建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成立三个月后，就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的“四二”大暴动所摧垮。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个内奸。
扯起红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这是蒋逆毒计，大家要做宣传。
这是斗争紧迫，阶级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团结更坚。
打倒反革命派，胜利就在明天。

土地政纲

（1930年）

一、推翻豪绅地主官僚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工农，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政权。

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分配农民使用。

四、全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和分配工农军的士兵，供有经济上的使用。

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

六、焚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

七、取消一切军阀及地方衙门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经济累进税。

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

（1）办理土地工程。

（2）改良扩充水利。

（3）防御天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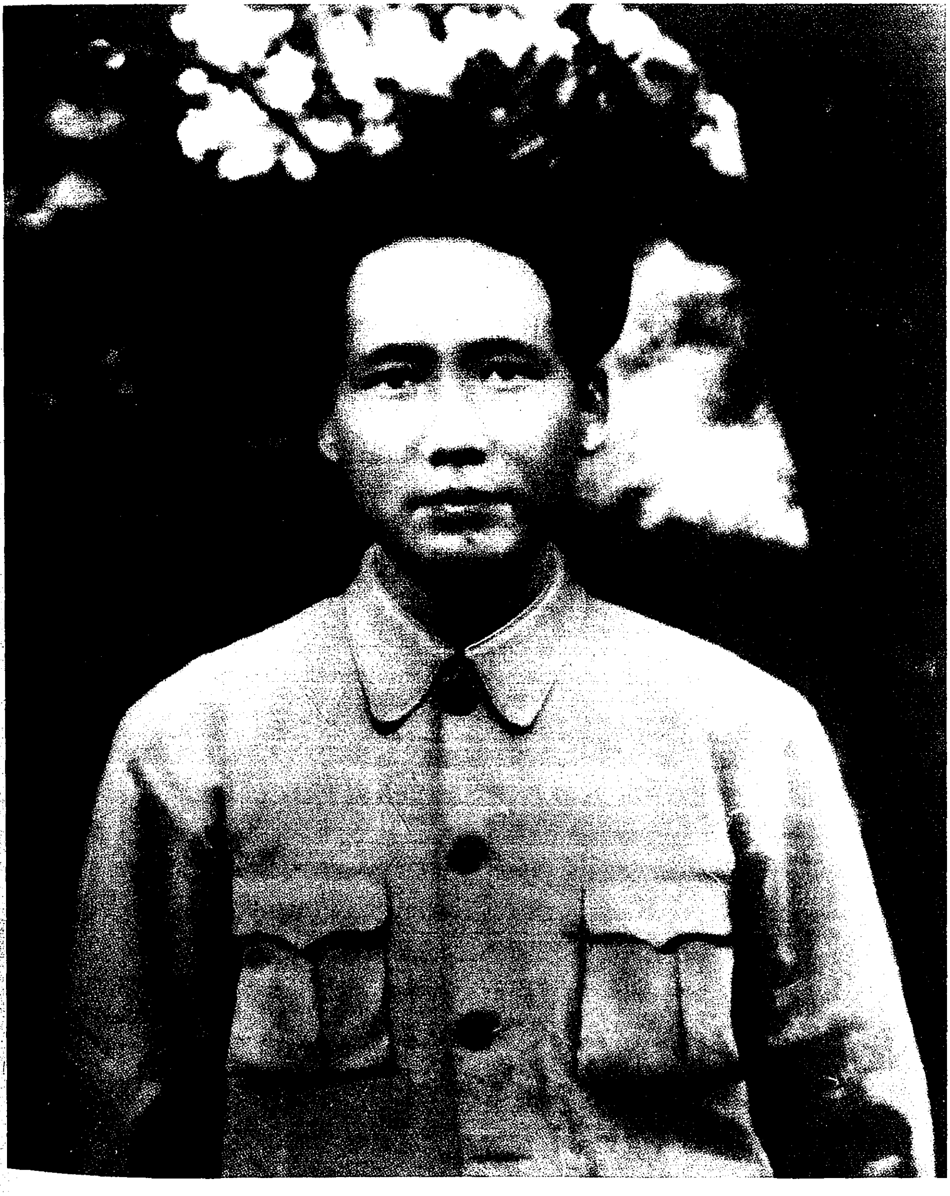
（4）国家办理移民事业。

（5）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等，经手办理低利借贷。

（6）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

（7）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管理。

1931



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

进攻谭道源部的命令[1]

（1931年1月1日）

（一）敌谭道源师[2]（全师六团）主力在源头、上下潮一带，其先头（约两团）进至树陂。许逆克祥部[3]（两团）现仍在洛口，毛逆炳文部[4]（四团）先头已于三十日到宁都县城。（其余敌情详谍字第十三号通报）

（二）方面军决以全力扑灭谭师。

（三）二路军[5]任官岭下、芦峰岭以北地区之攻击，应以主力抄过油榨陂占领廖坊以北高地一带，向源头、上潮之敌猛攻前进，须于明（二）日正午十二时到达目的地开始攻击。

第三军任树陂以西地区之攻击，应占领布头西端四百米标高高地（用第三军第二次及三军团第一次测绘之小布附近略图）亘于洋参窝之线，向树陂之敌攻击，须于明（二）日午前十时到达目的地，开始攻击，诱敌注意树陂正面。

第十二军任大元里以西地区之攻击，应由现在地经拨云亭、上

---

[1] 这是1931年1月1日22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南林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一号命令。

[2] 谭道源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

[3] 许克祥部，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

[4] 毛炳文部，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师长毛炳文。

[5] 二路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的部队。

茶元、油麻江迂回至大元里，向下潮攻击前进（须以一部沿大元里西端羊石寨高地攻击），须于明日正午十二时到达目的地开始攻击。

（四）总司令部明日进至西山指挥。

注意[1]：

（1）此次战争关系全局，各官兵须不惜任何牺牲，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2）第三军须特别努力构筑工事，以支持正面之阵地。

（3）胜利后须注意收缴敌之军旗及无线电机，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并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缴获敌之经理处款项不准分散，纸票不准焚毁，须一律缴部。

（4）战后俘虏兵与伤兵之处置，均由各军负责办理。

右令

反“围剿”中的红军一部在行军途中。

---

[1]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42年编印的《军事文献》在此件注意中还有“（5）各军小行李及卫生队自己处理”一项。

追击谭道源部的命令[1]

（1931年1月2日）

（一）敌谭师[2]因闻张师[3]惨败，已于本晨五时逃退，一部经源头、中村向南北坑败走，其后头部队被我二路军[4]截缴枪械甚多，另一部（主力）则经南团向东韶[5]逃去。视此情形，敌军似有全线退走之模样。（其余敌情同前）

（二）方面军决于明晨追击东韶之敌，然后次第扑灭朱逆绍良[6]部之许（两团）毛（两旅）两师[7]，以收政治上之声威。

（三）第十二军任正面之攻击，应于明晨十时前经南团、琳池到达东韶街附近，向东韶之敌攻击前进。应占领琳池以北、杀尾嘴以南之阵地。

第三军团任左翼，应于明晨十时前到达陂头附近，向东韶之敌

---

[1] 这是1931年1月2日22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二号命令。

[2] 谭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

[3] 张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4] 二路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专门派出迷惑敌人的部队。

[5] 东韶，镇名，位于江西宁都县北部。

[6] 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

[7] 许毛两师，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二十四师和第八师，师长分别为许克祥和毛炳文。

攻击前进。

第三军任右翼，应于明晨十时进至田营，以主力牵制洛口之敌（许师）之增援，另以一部迂回到东韶街东端、山下坪北端之高地，向东韶攻击。

第四军为总预备队，位置东韶西之龙坛（第四军应于明晨十二军出发后随十二军后行进）。

政卫团仍位置于麻田，应于明晨派出游击队分向洛口及东山坝、平田游击。

（四）三军团之小行李随三军团后行进，三军之小行李亦随三军后行进，四军、十二军之小行李（由十二军派出小行李指挥官指挥）则随四军后行进。（行李不准乱插队伍）

（五）总司令部随工农革委会接四军后，进到龙坛总预备队位置指挥。

附记[1]：

1. 三军团行军路线由源头经增坊、石圳下、崠毛圳、张家前、杨坛、庐园、枫山下、新坛、白水、陈家到陂头。

十二军行军路线，由下潮经南团、焦边、坳背、王家坑、龙坛到东韶。

2. 各军绷带所位置自择，医院位置在阳矶，各师雇人送去。

右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42年编印的《军事文献》在此件附记中还有“3.总直属队明晨六时起床，六时半早餐，七时准备完毕待命出发”一项。

粉碎第一次“围剿”后分散筹款的命令[1]

（1931年1月16日）

（一）敌第六路军毛许两师[2]退集南丰城附近，原驻抚州之谭道源路孝忱两师[3]残部有即日移动之准备（大概向乐安），第十九路军蔡戴两师[4]近移驻兴国殷富、江口之线，第九路军之公师[5]现退至吉安、泰和之线，罗霖师[6]则向永丰移动，朱耀华旅退驻吉水。以上各敌军有以南丰、乐安、永丰、吉水、吉安、泰和、兴国一带成弧形线目前对我防御之势。

胡祖玉旅大部仍在弋阳未动，赵团正由南浔[7]移防抚州，韩师[8]

---

[1] 这是1931年1月16日8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四号命令。

[2] 毛许两师，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分别为毛炳文和许克祥。

[3] 谭道源路孝忱两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五十师和新编第十三师，师长分别为谭道源和路孝忱。

[4] 蔡戴两师，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师长分别为蔡廷锴和戴戟。

[5] 公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

[6] 罗霖师，指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七十七师，师长罗霖。

[7] 南浔，指南浔路，即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

[8] 韩师，指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

孙旅在峡江，刘旅在南浔、高安一带，王金钰[1]之一旅已于十一日到萍乡。

刘逆和鼎[2]部之刘旅十号到将乐、泰宁，后续一旅十一日到顺昌。张逆子敏部已到建宁。

（二）方面军决于本月内继续积极筹款，备足给养，以便照原计划歼灭敌人。

（三）第三军团除留一师于东韶帮助该地群众工作外，大部应即向南丰城之敌威逼前进，以掩护我四、十二两军之筹款，如敌退则派队进驻南丰，以扩大筹款区域，与广昌、头陂一带之我第四军应确取联络，于本月三十一日前须筹足大洋三万元。

（四）第四、十二两军仍在原地区尽量分散筹款，截至三十一日止应筹足十万大洋（除原定六万元外加筹四万元），在筹款期内应互取联络。

（五）第三军之良村原派出队应仍在良村工作，有事径呈本部。

第三军并应出第八师进至石马附近，任南北坑、中村、藤田工作（右与乐安独立营联络），并向乐安、永丰警戒（详探乐永两方之敌情），应于三十一日前筹足一万大洋。有事径向本部报告。

第三军之其余部队仍在现在地加紧训练。

（六）第三十五师应努力配合兴国群众，向兴国之敌骚扰威吓。

（七）各地赤卫队应尽量向白色区域进攻，造成整个前进之情势。

（八）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仍在小布。

---

[1] 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

[2]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五十六师师长。

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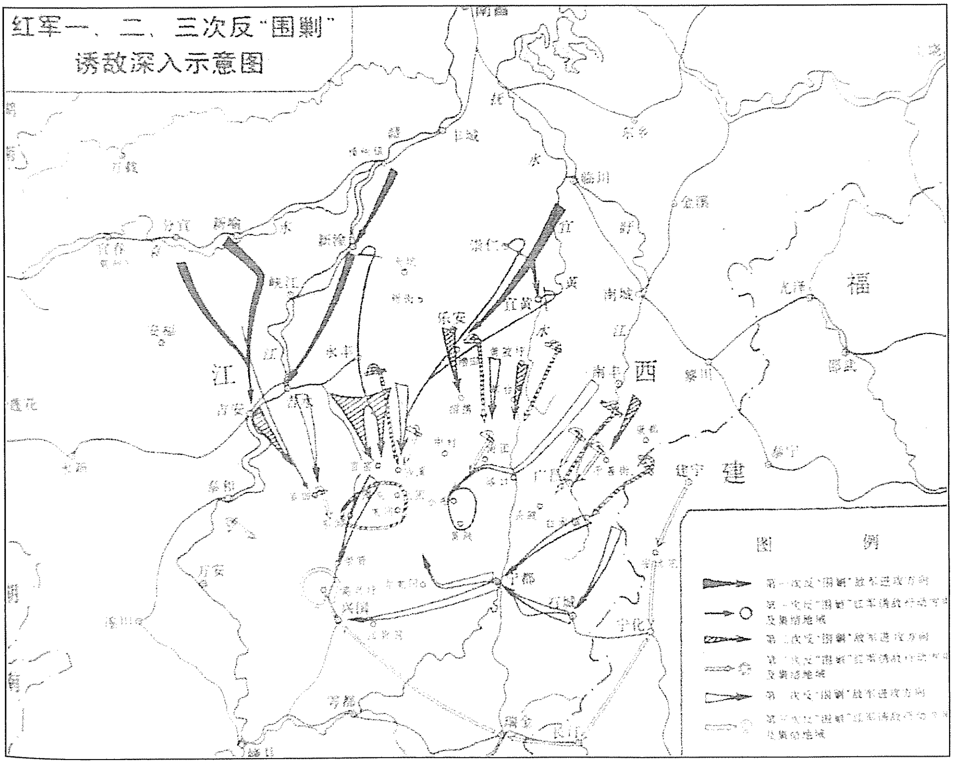
1. 各部移动后应将移动时间及各部队到达位置详细具报来部。

2. 各部每天最少须有一次报告来部。

3. 在筹款期内以筹款为第一目的，但仍须注意本身训练。

右命令八项附记三项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红军一、二、三次反“围剿”
诱敌深入示意图
南昌
丰城
东乡
临川
金溪
赣
水
宜
黄
江
西
福
建
新喻
分宜
宜春
新淦
峡江
崇仁
宜黄
乐安
永丰
吉安
安福
莲花
泰和
万安
遂川
兴国
宁都
广昌
南丰
南城
黎川
光泽
邵武
泰宁
建宁
宁化
石城
雩都
瑞金
长汀
图　例
第一次反“围剿”敌军进攻方向
第一次反“围剿”红军诱敌行动方向及集结地域
第二次反“围剿”敌军进攻方向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诱敌行动方向及集结地域
第三次反“围剿”敌军进攻方向
第三次反“围剿”红军诱敌行动方向及集结地域

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诱敌深入示意图。

选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1]

（1931年1月28日）

我们成立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对于我们侦探到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确有不少帮助，我们现在正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这对各军团各军有以下必要：

（一）使我们中央区与其他各特区，一、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各军团的通讯灵便。

（二）使我们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

（三）使我们各军间的通讯更加密切。

（四）使我们更能封锁敌军电台，侦察其行动。

因此，我们要求各部照下列人数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

（一）总司令部二人。

（二）中革军委[2]秘书处三人。

---

[1] 这是以毛泽东和朱德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命令。

[2] 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1月成立，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同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三）第三军团三人。

（四）三、四、十二军各二人。

以上共十四人（各部能多送者更好）。

学习无线电的学生的条件如下：

（一）年龄：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

（二）出身：家庭经济地位是工人、雇农、贫农或参加过斗争的。

（三）性别：不分男女都收。

（四）学历：须有高等小学毕业或相当程度者，最低限度须粗识文字及有些常识者。

（五）性格：聪明、活泼、忠实、好学、无流氓习气者。

（六）学习期限：暂定四个月。

（七）学习课程：机务、报务兼学。

各部接到此命令后，须即按照上列条件和人数，选送可造就的青年来学习。要认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重要。选调人员要在二月一日前送来本部考察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仍旧驳回。望各部体念这种工作的重要，在现工作干部或技术人员当中，抽调出来以应急需，是为至要。

此令

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

（1931年2月17日）

组织革命战争，消灭军阀战争，是目前革命的中心任务。执行这个任务，就要创造铁的红军，要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加强红军中的政治教育，使红军的指挥员战斗员明了他们的任务并且坚决地去执行；同时加紧对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发动战区之内的广大群众起来斗争，就成了我们的迫切任务。执行这些任务的，是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政治部。统辖各地红军的这些任务就要有个总政治部。现在全国各地红军有大的发展，统一和加强他们的政治指导，成了迫切的需要。为了这个需要，在本会内面设立总政治部以毛泽东为主任。为了事实需要，本会总政治部，暂时兼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职务。

总政治部指挥红军中的政治部并指导政治委员的政治工作，总政治部的命令，红军之中政治部要绝对地服从。而关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则政治委员同样要接受并服从，各红军中的政治部要经常地接级向总政治部作报告，政治委员能向上级的政治委员会报告外，同时并向上一级的政治部作政治工作报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在组织上是各有单独的组织系统，但在工作上则下级政治部服从上级政治部的指挥，同时要服从同级政治委员的指导，下级政治委员

服从上级政治委员的指导，同时在政治工作方面同样受上级政治部的指导。

此通令到达后，望切实执行为要。

主　席　项　英
副主席　朱　德　毛泽东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
继续东移加紧筹款的命令*

（1931年2月21日）

（一）据最近报载：何应钦到赣后，部队仍未移动，所谓剿匪会议，尚须待孙连仲来赣后才开。

现蒋、蔡两师仍在兴国附近。据密报：戴载师部在田村（兴国通赣前小道，距兴国约六十里），区寿年旅移于都城附近。

公、罗两师仍在吉安城附近，其一旅在水东。

毛、许两师仍在南丰附近，胡祖玉在宜黄，路孝忱在崇仁，乐安有其一营，谭道源师退樟树，韩德勤大部在南昌，郝梦龄师在修水、武宁，郭华宗师在万载。

徐廷瑶之一部在弋阳、上饶一带，阮肇昌仍在乐平。

（二）以目前形势判断，敌军周志群在宁化，其警戒部队在隘口，有待孙连仲部到后，始能缓缓向我们前进之模样。我们为要一面诱敌轻进，努力加紧筹足两个月的给养，一面乘此期中以便迅速歼灭进犯之敌，转移形势，决将主力部队向东移动，由明（二十二）日移动起，以十五天为期。

（三）第三军团应于明（二十二）日移动，以一师进占黄陂，向宜黄威逼并筹款，以一师位于甘竹圩北之白舍附近，监视南丰，掩护筹款，并须利用白舍至头陂原有电线，与头陂之四军部队通讯；

其余位于洛口、苦竹一带，以洛口为指挥中心。工作到三月六日止，须筹足现洋两万元以上。

第四军以广昌为指挥中心，派一师进至闽边之康都圩附近，沿大道一带在道路左右各三十里以内（距广昌一百二十里以内）分散筹款；另派一师沿大道往水南圩、船尖隘向建宁工作，在距广昌一百二十里以内择一适当地点为指挥中心，在路旁各三十里处筹款；其余可位于广昌、头陂附近。限于二十四日移动，工作至三月六日止，须筹现洋十二万元以上。

十二军仍以宁都城为指挥中心，以三十四师进驻石城县城；以六十四师进驻固村，向打油坪、黄陂、坪山、黄村工作。限于二十四日移动，工作至三月六日止，须筹款二万元。石城工作队并派人注意警戒宁化。

第三军（缺七、八两师）应于二十三日向大金竹移动，限于二十四日与第八师集中于招携，向乐安进攻，相机消灭乐安之敌，进占乐安城。得手后，须以一部向牛田方向工作筹款，限于三月六日内筹足现洋四万元以上。

（四）西路军（七师、三十五师）仍照原任务连续工作，并配合赤卫军努力消灭附近之反动地主武装，打击敌人守望队政策。

（五）红色警卫团应于二十三日开动，进驻石马，向荇田游击，帮助该地地方工作，并努力消灭附近地主武装。

（六）各部工作期满后，各就原地集结兵力待命集中。

（七）各部到达目的地后，应即作七天工作计划并具报，工作以筹款为第一位，次则消灭反动武装，建立红色游击队，发谷物，宣传。

（八）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于二十二日移至黄陂。

附记：

1. 各部集中时，应带食盐一个月，米七天，留待后用。

2. 小布至东韶之电线即撤收，另设由黄陂至洛口之线，以黄陂至麻田之线归总队交通队架设，洛口至麻田线归三军团交通队架设，由头陂四军部队至白舍圩（三军团之一师）之电线，仍利用原之电报线架设。

3. 各工作部队到达目的地后，皆应调查附近之路线（路途、房子、交通、河流、桥梁等），绘成路线图，并抄送本部。

4. 在工作期中，如有某部敌人前进时，正对该敌之部队须节节抵抗，阻缓其行进，以掩护大军集中，并须立即通知邻接部队。

5. 到石城之部队，须注意尽量多买西药（特别是海碘磺、碘片、酒精、纱布等）及电话线，到乐安部队须注意搜寻敌之文件及秘密图书、电码等。

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1931年2月28日）

现在春天到了，各地农民动手耕田的还很少，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农民动手耕的很少呢？有些固然是习惯上的原因，耕田时季素来推迟，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据我们调查还有（一）田没有分定，（二）耕牛缺乏，（三）红白交界靖匪[1]威胁不好耕田几种原因。

关于田没有分定一层，在现在红色区域是个大问题。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空气十分浓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没有权来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这种情形是很不好的。省苏[2]应该通令各地各级政府，要各地政府录令布告，推促农民耕种，在令上要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了钱来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词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那些说农民余钱剩米归

---

[1] 靖匪，指靖卫团，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2] 省苏，即省苏维埃政府的简称。

苏维埃公用的话完全是谣言。农民一家缺少劳力耕田不完，或全无劳力一点不能自耕的，准许出租。租完多少，以两不吃亏为原则，由各处议定。还有红色区域准许自由做生意，赚得钱来，均归本人。以上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也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希望各级苏维埃及民众团体负责同志大家明了的。实行上述办法，AB团[1]等反动派别或者要乘机造谣，说共产主义不成功了又要恢复地主制度。各级政府负责同志，便应根据民权革命的意义加以驳斥，说明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决不是什么恢复地主制度，那些反动派别的话，完全是错误的。

缺牛一层。第一，要提倡耕种互助，邻近乡村牛多的帮助牛少的耕田。但这种帮助，不是完全白送，除牛多人家自愿送耕不要租钱之外，应该准许租牛，只有正式准许租牛，才能相当解决缺牛问题。第二，全乡或全区缺牛太多简直不能下耕的，县区乡等级政府，应为设法调剂，鼓动牛多区乡把牛出借或出卖。在这里县区两级政府，应有全县全区牛数的调查，有了这个调查，才能实行调剂。第三，禁止杀牛。现在一边缺牛，一边各圩市尚有杀牛的，违反贫农利益，应加禁止。第四，红白两区域一般农产品与工业品流通交易，应许完全自由，没有特殊情形（如米荒时）不加禁止并不限价（红色区域内部更不限价）。但目前贩牛出口，因为红色区域缺牛太甚，影响很大，应暂时禁止。

---

[1] AB团是1926年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至于红白交界，农民受靖匪威吓不敢耕田，以致荒了许多田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领导工农武装向地主武装猛力进攻，使红色区域向前发展，过去不能耕种的地方，便可以耕种了。

以上意见望讨论施行并复信给我们为要。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八日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1]

（1931 年 3 月）

一　总政治部的通令

红军各级政治部、政治委员，地方各级苏维埃、各界民众团体：

《时事简报》是苏维埃区域中提高群众斗争情绪、打破群众保守观念的重要武器，在新争取的区域对于推动群众斗争更有伟大的作用。因此，本部决定要红军和当地政府普遍地举办起来。为了这个需要，把举办《时事简报》的意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它的编写方法，写成一个小册子附在下面，发往各地。红军各级政治部、地方各级苏维埃的文化部接到这个通令和小册子之后，应即速计划举办起来。本部出的《红军报》可以供给《时事简报》的一部分材料，除发给红军之外，从近日起每期（三天一期）发二百二十份给江西省苏维埃文化部，再由省苏文化部转发各县苏、区苏。大约每一个区苏有一份，各县苏、区苏如未接到，望向省苏函索为要。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四日于黄陂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写的关于在红色区域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的通令和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标题为编者所加。

二　怎样办《时事简报》

（一）红色区域举办《时事简报》，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打破群众的保守观念。

农村里头，小市镇里头，小城市里头，都是没有报纸看的。斗争的群众，革命以前和革命以后，在消息不灵通、见闻狭隘这一点上讲，是差不得很远的。井里虾蟆井里跳的现象，依然在群众中保持着。同志们，这种现象是不好的。这种现象引导群众把斗争的热情降低下去，引导群众走向保守局面上去。这是和扩大斗争、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相冲突的。努力地扫除这种现象，是苏维埃和民众团体的责任。扫除的方法，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巡行演说、团体参观等项固然都是好的，举办《时事简报》更是一种好的方法。

（二）新争取的区域用《时事简报》去推动群众斗争。

那些新争取的地方，《时事简报》更有伟大的作用。当着红军占领新的地方，引导群众起来斗争，打土豪呀，分田地呀，分谷物呀，废债务呀，起游击队呀，立苏维埃呀，当着这个地方的群众起来做这些斗争的时候，他们一面在那里斗争，一面却时时有一种疑虑：我们不是孤立的吗？我们的斗争不会失败吗？当着革命群众有这种疑虑的时候，正是潜藏的反动分子造谣恐吓的时候。这时革命群众所热望的，是近地及远地革命红军的援助。这时候，《时事简报》跑了出来答复他们这问题。记得去年（一九三〇年）三月红军占领大余时，出了一张《时事简报》，贴在一座大木桥的亭子上，引起成群的人川流不息地去看。好些人眼睛望着报，口里照着念，一座桥上充满了欢跃的空气。大余是一个例子。过去红军用这个方法

作为发动群众的工具，收了很大效果的还做了一些，可惜没有普遍地做，更没有经常地做，是一个大的缺点。

（三）《时事简报》的内容和编写方法。

1. 《时事简报》不是印的是写的，不是小字是大字，不是小张是大张。

2. 《时事简报》不做文章，只登消息。登的消息是：（1）群众斗争消息（打土豪，分田地，捉AB团[1]，起贫农会，消灭地主武装，发展红色区域，甲乡瘟死十头牛，乙乡无盐吃、没菜等等）；（2）苏维埃的活动（开了代表大会，出了重要布告等等）；（3）红军的活动（作战胜利、帮助群众分田等等，但军事秘密如红军的人数、枪支、编制、行动、番号等不可登载，以防泄漏）；（4）统治阶级情形（军阀混战等等）。

3. 也不是完全不发议论，要在消息中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使看的人明白这件事的意义。但不可发得太多，一条新闻中插上三句议论就觉得太多了。插议论要插得有劲，疲沓疲沓的不插还好些。不要条条都插议论。许多新闻意义已明显，一看就明白，如插议论，就像画蛇添足。只有那些意义不明显的新闻，要插句把两句议论进去。

4. 登消息的次序，本乡的，本区的，本县的，本省的，本国的，外国的，由近及远，看得很有味道。

5. 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

---

[1] AB团，是1926年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6.《时事简报》的材料，关于本地的和近地的，那就很容易采取；关于远地和全国的、国际的，从总政治部所出《红军报》采取或从别的报上采取。

7. 文字和材料都要是有鼓动性的。

8. 但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说只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

9.《时事简报》三天出一张，一个月出十张，斗争紧张的地方可以一天出一张。

10. 编辑办法。地方县苏文化部设一专人，每三天编一张稿。稿子上的消息是本县的、邻县的、全国的、国际的，但不是每期要有各种新闻，几期本县新闻多些，几期邻县新闻多些，要紧的是本县、邻县这两部分新闻，因为它是群众欢迎的。全省的、全国的每期条把就够，国际新闻几期之内登他条把，这些新闻不可没有，没有就不能引导群众参加大范围的斗争，因此一定要有，但决不可多。多了，一来占去篇幅，把本地近地的重要消息篇幅缩小；二来这些消息缺乏兴味，群众不易了解。县苏文化部的《时事简报》编辑员把这一期稿子编好了，按照区苏的数目，每个区苏抄发一张，寄与区苏文化委员。区苏文化委员接到县苏文化部的稿子，在上面加上本区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在《时事简报》里头占着第一等重要地位，因为没有这部分新闻，便缺乏《时事简报》的中心内容，因而也决不能引起群众注意，决不能达到《时事简报》所要取得的效果了。区苏文化委员把本区新闻加上去了之后，把这整篇稿子，按照全区乡苏的数目，每个乡苏抄寄一份。乡苏文化委员接到区苏

的稿子，再在上面加上本乡的新闻。这一部分新闻也是要紧的，它的主要意义是引动看报的兴趣。要到这个时候，全篇稿子才算编成。按照本乡村的数目，每村一张，用大字写在大纸上面，加上红色圈点记号，写上出报日子，派人张贴到各个村子的显扬地方，给群众看。要到这个时候，才叫做报。县、区两级文化部写的都不是报，只是报的稿子。这种做法，功效是很大的，假如全县有一百乡一千村，每隔三天全县百乡千村的群众就都看到了《时事简报》。这种报同时又可做识字运动的材料，村中识字小组的组长给那些不识字人指点一番，既看了报又识了字，真是好得很的办法。

11. 新闻条数的大概分配。比如一期《时事简报》有八条新闻，那末县苏的稿子四条（其中本县两条、邻县一条、国内国际一条），区苏加上三条，乡苏加上一条，共八条。字数每条不得超过四十字，每期不得超过四百字。

12. 红军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群众看。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决不可像过去一样，有些完全忽视这个方法，全不注意编《时事简报》；有些编一张不编一张，断断续续地在那里做一点。这些都是不对的。红军散开在做群众工作时，一定要有计划地编《时事简报》给群众看，但把编好的《时事简报》同时多挂几张在各个伙食单位的宿营地内给士兵看，也是要紧的。红军在集团驻扎时，编《时事简报》的目的主要是给士兵看，但同时多挂几张给当地群众看，也是必要的。

13. 红军编《时事简报》，在散开做群众工作时，由军政治部编成初稿，发往各师；各师政治部或政治委员加上当地新闻及本部活动消息，发往各团；各团政治委员又加上当地新闻及本团活动消息，发往各连。（以上者都是稿子。）由连政治委员指定文书、上士

及其他能写字的，按照当地村庄数目，用大字大纸写好，加红色圈点记号、出报日子，每个村庄一张，派宣传员前去张贴，贴到显要之处给群众看。同时留一张贴在宿营地，由连上识字运动委员会指挥识字小组，引导各组士兵去看。红军在集团驻扎训练时，《时事简报》的作用既主要是给士兵看，那末军政治部宣传科编稿时，除了编上地方斗争消息、国内国际政治消息（一条至二条）、友军消息（一条至二条）外，最要紧的是要编上本军消息（一条至三条）。编好了，发往各师。各师又加上本师消息（一条至二条），发往各团。各团又加上本团消息（一条至二条），由团政治委员指挥宣传队及团部司书按照连的数目，用大纸大字写好，每连一张，发往各连，引导士兵去看。每期《时事简报》条数至多十条，字数至多四百字。

14. 红军编的《时事简报》，它的内容国内国际消息要少，只占十分之三，本军、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占十分之七。只有这样，才能引动士兵和群众看报的兴趣，取得我们所要取得的效果。

15. 《时事简报》的新闻，特别是本地的和近地的新闻，一定要是与群众生活紧密地关联着的。如牛瘟、禾死、米荒、盐缺、靖卫团[1]、赤卫队[2]、AB团造谣、共产党开会等等，都是与群众生活密切关联的，群众一定喜欢看。凡属不关紧急的事不登载。

16. 《时事简报》一定是要大张纸、大个字写的，油印的要不得。现在总政治部出的《红军报》，省苏、县苏以至区苏出的报纸，各军各师出的报纸，凡属印刷成功的小字出品，不论它的用意是怎样安顿给群众看、给士兵看的，实际都是只有干事才能看得懂（有许多下层工农干事依然看不懂）。所以，决不能拿了这些报去代替

---

[1] 靖卫团，是一种反动的地方武装。

[2] 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时事简报》。《时事简报》是极大黑墨字，稀松七八条，看上去明明朗朗，看完了爽爽快快，是真正群众的读物。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黄陂

为争取第二期作战胜利军事上应准备的工作[1]

（1931年3月17日）

我们在第一期龙冈东韶两役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已经把进攻革命势力的白军打退了。现在敌人为了争取反革命的领导权，为了避免统治阶级的崩溃作最后的挣扎，为了要维持他们将死亡的生命，而更要向革命作更残酷的进攻。最近加调上来的王金钰[2]部两师（一师已到吉安、吉水一带，郭华宗师[3]尚在高安），郝梦龄[4]（向吉水运动中）、胡祖玉[5]（宜黄）、韩德勤[6]（新干）、刘和鼎[7]（建宁）、罗卓英[8]（萍乡）等五师及在吉安原有的公罗[9]两师，都有

---

[1] 这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

[2] 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

[3] 郭华宗师，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四十三师，师长郭华宗。

[4] 郝梦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五十四师师长。

[5] 胡祖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五师师长。

[6]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

[7]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五十六师师长。

[8] 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师长。

[9] 公罗，指公秉藩、罗霖，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和第七十七师师长。

积极准备向我们前进之势。第二期的战争就快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这回比前次作战胜利的条件更具备了。蒋张冲突[1]的日益紧张，全国经济恐慌的不能维持，都促成新军阀混战的必然爆发，这是使他们非常不利的。而在我们这一方面则已有全国规模的胜利，答复了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特别是龙冈战后敌人不特损失了两师的兵力，同时部队也更动摇了，士兵也更趋向革命了。我们不特得到许多枪械子弹的充实，而且地方武装也增多了四千杆枪。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以至三都、七堡各地新争取到数十万的群众，都有相当的武装组织，并且已经组织了五路赤卫军，划分了十个游击区，决定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具体方法（在赤区军事会上的讨论）。富田事变的完全解决，使河西[2]的革命势力又要更集中起来。另外我们新增加了一支生力军——第七军[3]（据报该军已到酃县遂川两处），又出乎敌人意料之外，使敌人进攻我们的计划不能不略受牵制。这种种条件都保证我们这回必然要得到更大的胜利。

为了要更确实取得这个更大的胜利起见，我们应将过去作战的缺点检阅一下，而对于这次作战做个更好的准备。除关于政治宣传鼓动方面已有总政治部通同指示外，特将军事方面应准备的工作分列如下：

---

[1] 蒋张冲突，指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在中原大战后为拉拢各军阀旧部而产生的矛盾。

[2] 河西，指赣江以西地区。

[3] 第七军，指1930年11月由广西左右江地区奉命北上的红军第七军。第七军在转战桂粤赣湘边境后于1931年7月22日在江西于都县银坑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

一、前次作战前后的总缺点

（一）战前

1. 预期作战地区没有事先部署，以致攻击龙冈的略图只是就近调查的，路线也是临时问的，而群众也是临时才去调。

2. 许多部处（参谋处、副官经理处、军医处）没有开会专门讨论准备作战的工作，以致作战时抓不着头绪，或忙做一堆，或不晓得应做些什么，或工作人员一起都派出去了再无人可派，或做起事来器具又没有带（如参谋不带复写纸、铅笔，医官没有带应用的药品）。

3. 给养没有充分准备，以致作战时有些部队两天没有吃饭。

（二）战中

1. 变更上级作战方案时而传达得含糊，接受上级作战命令时又不能领会上级的意图。

2. 指挥上有些掌握不到队伍，有些少机动性，有些不注意战场上全般的状况。

3. 上下级及友军间相互联络很不密切（报告、通报极少）。

4. 部队战时的给养多接济得不好。

5. 各部队的人员组织多是无计划的，不科学的，在战场上或后方，忙东忙西达不到任务。

（三）战后

1. 追击队没有组织。已往追击敌人的部队，上级指挥官也没有给以任务。追击部队没有得到最高级机关的命令，有自行撤回宿营的（如东韶之役）。

2. 打扫战场不是有计划的指定专员，分派部队去负责。

3. 各部多没有派人去搜寻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密码、特种器具和特种人材等。

4. 战斗结束后，很迟甚至没有将敌人退却的方向、途径、情形报告。缴获、损失数目和部队补充整顿情形报告得更慢到不得了。

5. 战后胜利品、俘虏、伤兵的处置太慢，这是很妨碍追击的。同时也太不注意招待伤兵，饭汤都很久得不到食。

6. 不能立即的饱餐士兵，恢复部队的精神，以致喂马、擦枪等……[1]

7. 俘虏兵没有派专人去负责管理，以致俘虏兵整天没有饭吃（龙冈之役），对我们不满意。

二、现在应准备的工作

（一）鼓动

1. 除政治鼓动参照总政治部所指示的外，并应各部分别举行誓师。

2. 在出发作战前，应集合部队讲话作鼓动。

（二）会议

运用各种会议，去做战前的准备工作和讨论战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战后的处置，这是达到任务的最好方式。因此各部应即召集下列各种会议。

1. 军或师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1）召集参谋会议，讨论战时的部队注意事项，参谋工作，各方联络法，后方勤务，以及战后搜寻机密图书方法，并目前各部的训练方针。

（2）召集副官会议，讨论关于战时杂务人员的分工，大行李的指挥法，给养的接济法，前方临时事件及俘虏之处置及遣送法，胜

---

[1] 省略号是原有的。

利品的处置法，伤兵的招扶给养茶水和转送问题。

（3）召集军医会议，讨论关于伤兵的救护及转送事项，绷带所的设立问题，战后药品、西医、看护等的搜集方法……[1]

（4）召集团长、团副以上的军官会议，检阅过去训练上及战时指挥的缺点，并讨论此次作战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并目前的训练。

2. 团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1）以团为单位召集排长、副排长以上的军官会议一次，检阅过去作战的缺点，和此次应准备及注意的事项。

（2）以团为单位召集副官、特务长、军需上士等给养人员的会议一次，讨论战时的给养接济及战后伤兵俘虏兵的给养问题。

3. 连一级应召集的会议：

（1）以连为单位召集副班长以上的连务会议一次，检查过去战斗的缺点和讨论战前的准备及战时战后的注意事项。

（2）开连的士兵会一次，报告此次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意义，及我们应有的努力。

（三）训练

1. 依照新操法加紧训练，并分别举行射击演习（军长、师长都要去看操课）。

2. 实行测量野外战斗教练，举行团及师对抗演习各一次。

3. 每天早操一律作抢山头、追击、射击、速集的动作。游戏时间一律操刺枪术、测量、游戏、跳远等。晚间点名时做军事讲评。

4. 杂务兵（特别是挑夫）要派员教他们站队、走路、休息、停止（靠路的一边）等动作，以免阻碍行军及战时队伍的增加。

---

[1] 省略号是原有的。

5. 担架兵、看护兵须联合演习救护法、转送法。

6. 所有各部队人员，一律须知行军、驻军或战时对空的荫蔽，遇敌机时即能迅速隐藏身体（详见长沙时所发之方面军第一号训令）。

7. 对火夫应尽量减少其疲劳，并训练增进其炊爨能力。

8. 讲解武器拭擦法、保护法，并督促士兵实行。

（四）给养

各部一律须准备米十天，钱一个月。

以上各项，各军于接到此令后，要立即开会，自定详细计划，使所属各部去切实执行，并且一面呈报本部考核为要。

此令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七日

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通令第四号

（1931年3月20日）

红军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地方各级政府：

（一）争取二次胜利的中心意义在于转变敌我形势

自从军阀战争暂时停顿敌人向革命进攻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龙冈战争，虽然取得大的胜利，但仍未能转变这种攻守形势。因此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我们要转变敌我攻守的形势，就要给第二次进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取得比龙冈战争更大的胜利。必须这样，才能使敌人溃败下去，退守中心城市，把敌人的形势强迫着他变成一种守势。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维埃区域的巩固问题。必须使敌人退守到中心城市去了，我们才能使现有苏维埃区域广大地发展一步，必须在敌人溃退下去，苏维埃区域有了切实的巩固，尤其在有了广大的发展了，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与精练。必须在苏维埃区域切实巩固与广大发展，红军进一步扩大与进一步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一方面促进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争夺领导权冲突的迅速爆发，使各派的力量更加削弱，使各派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更加发展，运用革命的客观形势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促进反动统治区域工

农兵士贫民斗争情绪的高潮，斗争实质的加深，斗争范围的推广，扩大旧有的红色区域与红军，创造新的红色区域与红军，使革命发展在全国内更加扩大起来，由此去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直至发展到全国的胜利。假如我们不能争取这次战争的更大胜利，便不能转变敌我攻守形势。那与我们上述的任务是违背的。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去争取第二次战争的伟大的胜利，哪一个对于争取这一次胜利不努力，哪一个就是革命的罪人。

（二）目前敌我形势和我们二次战争的胜利条件

龙冈东韶战争以后的政治形势，在反动统治方面军阀战争的危机一天一天继续发展。如最近山西编制问题的就绪，张学良对于军阀旧部的拉拢，北方七省财政会议的召集，蒋介石极力拉拢黄绍雄解决两广问题，召集军官讲话团结干部，派人到各省拉拢小军阀，四川云南等省小军阀的冲突不得解决等等，都是蒋张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到来的证据，另一方面蒋介石对苏区和红军第一次的进攻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失败。第一军在鄂豫皖边界有胜无败，最近打下黄梅等处，蒋介石派七师兵力去打，无可奈何。贺龙等领导的第二军团在湘西鄂边活动，蒋介石也曾派四师兵力打过，也奈何他不得，赣东北的第十军、湘鄂边的第十六军等活动，十六军曾在通城解决敌人整个一团，缴枪千支。闽西龙岩虽失，红军现又向汀州发展，打了胜仗。广西第七军驰骋于桂湘鄂三省之交，最近到上犹崇义，不日即可和我们汇合。至于我第一方面军第一次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是影响全国，给反动派级一大的威吓，给各地工农一大兴奋，据近日上海来人说上海工人曾起来热烈庆祝这次胜利，至于江西红色区域，除一些城池被敌人占领，接近这些城池的地方有一部分群众反水之外，有些地方还有发展，特别是广昌、石城、宁都三都七堡以

至永丰、乐安、南丰等地，新争取了几十万群众，在红旗之下斗争起来，至于宁岗、赣县、吉安都在不怕疲劳地与敌人不断斗争，所以上面这些一方面证明军阀的冲突策略，一方面又证明革命势力的顽强，这样使得蒋介石对于南方各省革命势力的镇压，尤其对于第一方面军二次进攻的企图不得不更为积极些。

蒋介石在江西的兵力，除原有的公、罗、蒋、蔡、毛、许等部外，虽然增加了王金钰、孙连仲两部，数目较前增多，但后方交通需要很多兵维持，红军第七军来赣，又要抽兵对付，因此实际用上来的兵力将不能超过九师，仍较上次兵力差不很多，加以张谭惨败，兵心较前更加动摇，赤区进兵较前更加困难，敌人方面的弱点，原来是很多的，我们方面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敌军，但我们有一个最大的优胜条件，就是军心团结，大家摩拳擦掌只想打仗。第二，龙岗战争之后，我军加强了实力（枪弹、政治、军事训练等）。第三，增加了地方武装，武装了群众，统一了地方武装的指挥。第四，富田事变的解决，争回了被欺骗的群众。第五，争取了三都七堡这个最反动的区域，扩大了宁都、石城、广昌、南丰、永丰等地的群众斗争，肃清了部分的地主武装，巩固了战争的后方。第六，红军第七军来到江西，给群众一个兴奋，给二次战争一个帮助，所以第二次战争的胜利，是必然归于我们的，只要我们大家下决心，努力去争取。

（三）逼在目前的第二次战争与我们的准备工作

目前敌人，已开始移动，南丰增加一团敌人，王金钰已到南昌设督办署，王部有到南城说，郝梦龄部到达吉水，吉安有部队增加，并极力拉伕，二次战争的爆发，已一天一天逼近了。加强准备二次战争的一切工作，是争取二次胜利的必要条件，除关于军事训

练工作已有参谋部指示外，本部特将政治方面的准备工作分为红军与地方两个方面指示如下：

第一，红军的准备工作：

（1）以军为单位召集政治工作人员会议，除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科长以上的人员到会外，宣传部长、士兵会主席均应到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报告政治形势，二次战争的意义和军中宣传鼓动，计划报告之后，须深入讨论注意纠正各种不正确的见解，与实际宣传鼓动执行方法。

（2）以师为单位，召集士兵大会，主要是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对争取二次胜利作一大鼓动，讲话的人除师长及师政治委员之外，军长、军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要分别出席。

（3）指导士兵开士兵会，主要是提出争取二次胜利的各种问题来讨论，使士兵对于政治方面的问题，能进一步地了解，对于准备的实际工作能使士兵自觉地做起来。

（4）以军为单位，在大部队集中后开誓师大会，部队之外要发动当地群众参加，主要意义是鼓动士兵群众，提高士兵群众的作战勇气。在大会中讲话的内容和技术，要简短有鼓动性，讲话中要插入少数口号，鼓起全场的热气，并要有准备地推动士兵提出一些关于作战方面的问题在大会上通过。

（5）在群众会、士兵会、誓师会中都要讲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如作战注意、作战经验报告、各部队的特殊优点与缺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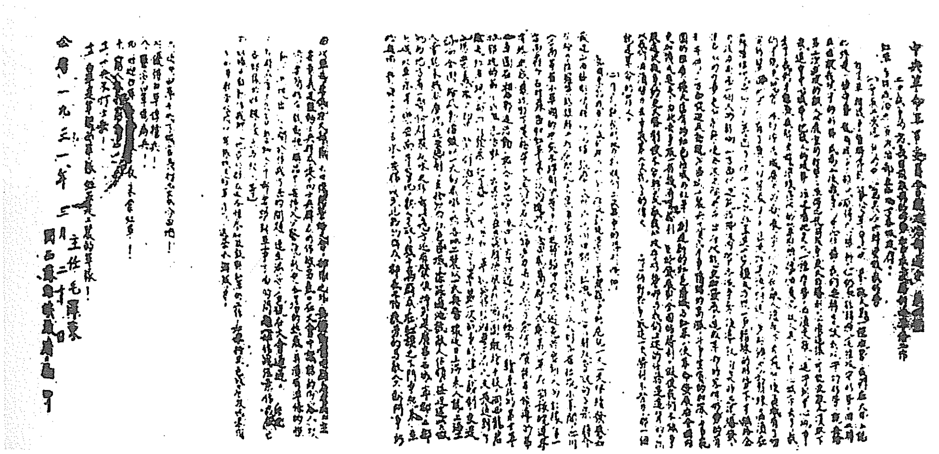
（6）组织并鼓励作战地区的群众作各种参战及鼓动红军的工作，如举行赤色戒严，派代表团对红军慰劳，组织担架队，欢送红军作战，送茶水粥饭等。

（7）政治部应即进行对俘虏的宣传工作及宣传品的准备。办到

每个俘虏有一种好的宣传品。

第二，地方政府与工农群众的准备工作：

（1）以县为单位召集各级政府主席、游击队长、民众团体负责人的联席会，报告政治形势与二次战争的意义，计划白军前进时坚壁清野备战的工作。



毛泽东以红军政治部主任名义签署的通令。

（2）以区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主要是鼓动群众热烈参战。

（3）选举有说话技能、观念比较正确的同志组织慰劳红军代表团，到红军中鼓励红军作战，来时至少有布置红旗上面用大字写鼓励红军的口号，写明送给某军、某某地方工农群众或某团体赠送，同时有宣传传单告红军战士，能带些慰劳品来更好。

（4）准备敌人经过地方的宣传工作，各村各乡应该写着宣传敌人士兵的标语，散布许多简单明了（如几句口号凑拢来）的传单。但口号条数不要多，到处多写相同的几个主要口号。

（5）各乡村组织士兵运动委员会，做白军士兵运动。

（6）动员群众准备欢送白军俘虏的欢送工作，如俘虏经过的地

方政府应招待饭餐，杀猪给他们吃，沿途送茶水饭粥，高呼欢送新同志的口号，由群众送食物给俘虏，同时对他们宣传鼓动。

（7）地方武装部队参加红军政治鼓动工作的准备。

二次作战中红军及地方游击队早晚点名口号：

一、勇敢冲锋！

二、拼命杀敌！

三、拥护共产党！

四、拥护苏维埃！

五、活捉何应钦！

六、打倒蒋介石！

七、二次战争胜利万岁！

八、工农解放万岁！

对白军宣传鼓动口号：

一、白军弟兄是工农出身不要拿枪打工农！

二、白军士兵要发清欠饷只有暴动起来！

三、白军弟兄杀死反革命的官长自己举出官长成立红军！

四、白军士兵不上前线打仗不替军阀当炮灰！

五、白军士兵是工农出身不替军阀屠杀工农！

六、欢迎白军士兵下级官长打土豪分田地！

七、优待白军俘虏兵！

八、医治白军伤病兵！

九、欢迎白军弟兄下级官长来当红军！

十、穷人不打穷人！

十一、士兵不打士兵！

十二、白军是军阀的军队，红军是工农的军队！

主任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日

移动队伍整顿训练并筹款的命令[1]

（1931年3月23日）

（一）据各方报告：王金钰[2]所属四十七师、四十三师（郭华宗[3]）及郝梦龄师[4]在永丰、吉水、水东之线，韩德勤[5]在新干，公秉藩[6]移到泰和，罗霖[7]有留守吉安模样，孙连仲[8]部二十五（孙）二十七（高树勋[9]）两师闻已到乐安、龚坊、戴坊一带（并有骑兵师），胡祖玉[10]全师移南丰附近，毛许两师[11]仍在南丰，路孝忱师[12]

---

[1] 这是1931年3月23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山塘村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胜字第八号命令。

[2] 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

[3] 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四十三师师长。

[4] 郝梦龄师，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

[5]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师长。

[6] 公秉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师长。

[7] 罗霖，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七十七师师长。

[8]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9]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10] 胡祖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五师师长。

[11] 毛许两师，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分别为毛炳文和许克祥。

[12] 路孝忱师，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路孝忱。

在乐安、东陂之北，蔡戴两师[1]仍在兴国附近，刘和鼎[2]仍在建宁，周志群[3]在宁化。（其余敌情详参谋部通报）

（二）方面军决移动队伍整顿训练并筹款，部署如下：

（三）第三军团除留一师于肖田向南丰、乐安之敌监视并警戒外，其余应即移到宁都河以北赖村、葛坳、澄江、梅窖、三寮、古龙冈一带地区工作训练。指挥中心应设在赖村。

（四）第三军应位置于藤田附近工作并向永丰、吉水之敌警戒，如敌进则向沙溪方向撤退，其主要工作在本身之整顿训练。

（五）第四军应即移到广昌、驿前、石城、湛田一带工作整顿训练，其指挥中心应在头陂、宁都之间，并向宁化、南丰警戒。

（六）十二军全部应于二十五日开始移动，以大柏地为指挥中心，布置于大柏地、瑞金、九堡、壬田市、黄石贯一带筹款，其赖村工作即移交三军团接收。

（七）三十五军应于二十六日移到青塘附近训练整顿。

（八）红色警卫团应即移到宁都城附近（向青塘方向离城数里）整顿训练。

（九）西路军任务及位置仍旧。

（十）南路军着即撤销，除六十四师即归还建制移往十二军新工作区整顿训练外，其余各部队可各仍在原地工作。

（十一）总部随中革军委率总直属队于二十五日移青塘。

附记：

---

[1] 蔡戴两师，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师长分别为蔡廷锴和戴戟。

[2] 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五十六师师长。

[3] 周志群，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四旅旅长。

1. 青塘附近交通线特定如下图[1]，其余仍旧。
2. 青塘到赖村由总部交通队与三军团交通队协同架设电话。
3. 各军于各驻地附近应派得力参谋测绘。
4. 各军于四月一号自行发零用钱一元。

右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本文收入本书时，将图略去。

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1931年4月2日）

红军各政治部、地方各级政府：

我们现规定了人口和土地两种调查表格。这两种表格主要的是要统计各阶级土地和人口比例，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

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

现在这两种表格，我们如能照深刻注意实际的正确的统计填写起来，是能解决我们许多问题的，特别是现在分配土地中的许多实际问题。深望红军政治部每到一处注意填写，地方政权机关逐乡去填写，尤望红军中和政府中每个负责人随时随地做此种调查和统计。

到底如何才能使调查所得的材料真实正确呢？

第一，必须建立对这一工作的深刻认识，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才会以大力注意。

第二，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调查这一乡，必须找到他们的分田的人口和土地调查本子，找到这一乡的经手分田的土地委员和熟悉这一乡情形的人，先把每一家人的阶级成分和每一亩田为哪个阶级占有（属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分别清楚，再用硬算

的办法统计清楚，按照实际数目填写上去。

第三，上级政府派出去指导的同志和政治部负责任的同志，须将两张表格的内容及调查时要注意之点，详细向执行这一工作的同志说清楚。特别是要说清楚：富农标准要是以剥削为他收入的相当部分。那些少量放账或借账的人还是列在中农。那些原是雇农，中间（未革命前）已经租得土地耕种的人还是列入贫农。那些全家不耕田，专靠独立劳动（做裁缝、木匠等）谋生活的才叫独立劳动者。半耕半做手艺的还是按照他的经济地位列入贫农、中农或富农里面去。自由职业者与流氓的分别，是在自由职业者谋相当正业（如医生、教员等），流氓无一定职业，生活行为亦不一定，而且都是做坏的事多。

以上各项，如果调查时不弄清楚，则自己茫无把握，必致把阶级成分弄错了，失了统计的正确价值。

这两张表格——土地表格和人口表格有密切联系，填写时必须同时进行。无论个人或团体，填写好了可封好直接邮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收。

我们的口号是：

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

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九号[1]

（1931年4月17日）

中革军委决定在本会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并指定叶剑英、朱云卿、郭化玉[2]、左权、杨立三、范树德、林彪、林野、黄公略、陈奇涵、耿凯、邓萍、曾士峨等十三人为编辑委员会委员，以叶剑英为总编辑，朱云卿为战史部主任，左权为编译部主任，郭化若为杂志部主任，（暂缺）为军事地理部主任。其工作内容：第一，搜集数年来中国工农红军在战争中的斗争的历史的资料，并妥为整理使具备中国红军战史的雏形，以便将来的编辑。第二，搜集中国红军战士在战争中的经验与创见，及介绍国际尤其是苏联军事作家的著述，以提高红军军事指挥员的技能。第三，发行不定期出版的杂志，使红军全部生活能在文字上发挥其忠实的见解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以及各种介绍等，以为创造铁的红军的有力的帮助。第四，详细调查红军连年转战各地区的地理、经济、居民状况及与军事有关的各种材料。这些工作应当是中国红军各级机关经常的而且要有计划的工作，应当有专门负责机关——编辑委员会，尤要红军全部一致地参加这种工作，尽量供给材料，以充实编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九号通令。

[2] 郭化玉，即郭化若。

辑委员会各部门工作的内容，希望各级机关迅速传达，以后投篇文稿可迅送中央军委参谋部为要。

此令

主　席　项　英
副主席　朱　德　毛泽东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七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号[1]

（1931年4月17日）

在即将进行的第二次反围剿中，地方武装要主动积极向敌人袭击扰乱，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应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战”的秘诀，采取化众为零、化零为众的方法，以完成其应有的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十号通令的主要内容。

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1]

（1931年4月19日）

一、中国革命浪潮日益高涨，必然引起反革命一致的进攻，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可是反革命营垒中的矛盾，已随着全国经济政治的危机与革命进展而益加尖锐，势将爆发为战争。目前中国红军应以最高限度的坚决集中力量，配合群众武装打破敌军围攻，争取第二次进攻的胜利，建立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并向外发展。

二、目前敌军的行动似以宁都为目标，步步为营地向我军前进。今天以前所得的情报汇述如下：

第十九路蔡[2]部于四月八日抵龙冈头、江背洞之线，至今未得

---

[1] 1931年2月，国民党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任命其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20万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于4月1日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第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于4月20日向龙冈周围地区集中，下旬再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红一方面军从5月16日起至31日止，自江西的东固、富田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横扫七百余里，连打五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这是1931年4月19日17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青塘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蔡，指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代总指挥兼第六十师师长。

移动消息。

第五路王金钰部[1]一师已抵新安、陂头，郭华宗[2]于四月十五日抵水南，郝梦龄部[3]于四月十四日抵白沙，公秉藩部[4]在固陂、富田一带。

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5]之高树勋师[6]抵乐安望仙圩，其大部在宜黄。

第六路朱绍良部[7]先头抵广昌城，余在广昌、南丰间。

敌军所至，革命群众大受摧残，水南逃出万余人，兴国逃出两万余人。这些群众对我军进攻都抱有热烈希望，各地武装群众已与我三十五师相配合，以游击战术阻止各路敌军前进。

我河西[8]方面的第七、第二十两军及湘东独立师在泰和方面与敌激战中。

三、本方面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方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

四、本方面军集中地点如下：

第三军团应于明（二十）晨出发，经过古龙冈、良村于四月二

---

[1] 王金钰部，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王金钰。

[2] 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四十三师师长。

[3] 郝梦龄部，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

[4] 公秉藩部，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

[5] 孙连仲部，指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孙连仲。

[6] 高树勋师，指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

[7] 朱绍良部，指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

[8] 河西，指赣江以西地区。

十二日集中龙冈圩。

第四军应于同日出发，经安福圩、黄陂、汉下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上固。

第三军于同日出发，经江口、南坑、龙冈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于石头坑（在龙冈北端）。

第十二军于同日出发，经江口、南坑在总部直属队后方跟进，务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上固之回龙。

本方面军总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随同中央军委在第三军后方前进，于四月二十三日集中龙冈。

第三十五军暂归第三军指挥随同进止。

第三十五师、第七师另有任务。

五、第三军团、第四军、第三军应各派出先遣队一连在各军行进路先头，负有整理桥梁修补道路以利行军的任务。

六、当第三军团到达龙冈（四月二十二日）时，第十二军和同路各部队应抵君埠，第四军应抵汉下。此日各军应互相派出联络员，取得密切联系。

注意：

1. 各部沿途须就地购米吃，不准吃携带之米粮。

2. 此命令只发到师部止。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

（1931年4月）

中央局扩大会议，听了关于立三路线，及四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立三路线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盲动主义的路线。自从六月十一号政治局决议案起，他就完全统治了中央，统治了全党。但在苏区中，从苏大会起，立三路线就已经起了领导作用。在国际七月决议给与中国党以正确路线时，为要接受国际路线而召集的三中全会，不但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把党从立三路线之下解放出来，转变到国际路线上去，反而向立三路线调和，使国际路线不能在党内得着实行。

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四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他深刻地批评了上述时期中央局的错误路线，痛斥了当时中央对国际指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他完全接受了国际路线，给党的政治路线一个彻底的转变，正确地指出党的目前任务。同时四中全会又改造了中央及中央政治局，把立三路线负责最重的同志，开除出政治局及中央，吸引了新的积极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及政治局来。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又给与罗章龙等所领导的反国际反党的右派以严重的打击，并且能够克服右派。四中全会以及全会后的中央的这一切决议与工作，扩大会议表示完全的同意。

扩大会议一致认为在汀州会议以前，四军前委的路线是一般正确的，是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正确路线的。四军前委是坚决为工农政权而斗争，曾经坚决地反对过不要政权的流氓路线。前委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来争取群众，关于土地革命的一切机会主义，曾作残酷的斗争，从这些斗争中，贡献了土地问题许多宝贵的经验。前委对于红军有了正确的了解，建立了红军的整个制度，如建立党的领导，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建立军需制度和筹款路线，特别是建立做群众工作的路线等。此外前委又认清武装地方群众，正确地执行城市政策。前委为了坚决执行这些任务，曾向盲动主义、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流氓路线，作了长久的坚决的斗争。流氓路线曾经在四军七次代表大会正式进攻，起了领导作用，统治了前委，党的正确路线，一时失败。经过八次大会，特别是九次大会严重奋斗，流氓路线的领导，又从事实上宣告破产，正确路线对于流氓路线坚决的斗争，才在这个时候，作了一个总结。前委之所以能正确地坚决地为执行中国党六次大会的路线而斗争，是因为前委能正确地分析各个时期的政治形势，特别认清半殖民地的中国斗争的实质，农民战争的作用，才确定苏维埃之能够存在与发展，又从苏维埃运动实际斗争中获得经验，才能正确地运用策略，反对左倾右倾的机会主义。但从汀州会议起（这时四军与三军汇合，成立一军团前委），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放弃了巩固苏区的工作，采取了冒险路线，去向大城市冒进。虽然在个别问题上，如土地问题，地方武装问题，红军的群众工作等，前委并未因为立三路线而动摇自己的正确路线。但攻打长沙后（这时一军团与三军团汇合，成立总前委），事实证明，立三路线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所以总前委即由开始怀疑立三路线，进而反对立三路线，转变到正确

的路线上去。这个转变的正式形成，是在新余的罗坊会议。这就已经在党的文件上，明显地确定了这个转变。这是经过袁州会议，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许多严重斗争，才有这个结果。最后在宁都的黄陂会议，更具体地指出党内有两条路线，必须推翻那条错误路线（立三路线），执行这条正确路线，革命才能走向胜利的道路。

三军团的前委在立三路线时代，是完全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三军团在过去的军委及后来的三军团前委领导之下，作了许多英勇战争，如长沙、岳州、平、浏、大冶等战争，确在红军战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三军团过去关于夺取群众，执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问题是忽视的，红军的战略是流动式的游击。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在整个政治路线上是执行立三路线，但三军团所以能够占领长沙，在政治意义上获得这样大的胜利，是因为三军团前委正确地估量了长沙本地的敌我力量的对比（关于全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的分析前委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估量）是因为三军团的英勇斗争。至于第二次进攻长沙，则更是冒险主义了。但长沙战争明显地证明了立三路线是行不通的，宣布了立三路线的彻底破产，使总前委的路线得着转变，使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之下，迅速地走上正确路线，虽然全国党部并未能立即了解长沙的战争的教训，来反立三路线，总前委在转变路线之后，正确地决定了击破敌人进攻的战略——引敌深入，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结果，得着龙岗、东韶的伟大胜利。

江西党的路线大体可分为三时期说明：

第一，是一九三〇年二七会议前的时期，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赤色区域已经开辟了二、三年了，还不分配土地，地主、富农充满了党和革命团

体，土地革命已经发动了，却不能正确地领导农民斗争，建立革命基础。

第二，是二七会议（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委的联席会议）到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这一时期是转变机会主义，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这才发动了赣西南的广大群众几次攻吉的英勇斗争，创造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二七会议是提出了“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地布尔什维克化”。但这一时期的缺点，没有从组织上坚决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且在后半期，在政治上就接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使苏区忽视巩固工作。

第三，是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完全集中到二十军、三十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地攻打中心城市，攻赣。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是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中央局在整个工作的布置，并没有坚决地去执行国际关于苏区工作的指示，更没有给党过去工作中的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虽然在许多单个问题上（如地方武装问题，工会与苏维埃的关系，红军中的CY问题等），有了正确的解决。中央局对目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反革命进攻革命，尤其是进攻红军与苏区，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问

题，而指出军阀只是为了准备军阀混战而来进攻红军（见八号通告）。这种错误的估量，有放松我们的主要任务——打破敌人进攻——的执行，产生等待军阀战争的情绪的可能，仅只因为过去总前委已经有了正确的估量，才没有发生这种不良结果。

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

中央局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内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夹杂不清的。中央局没有认清革命的目前民主阶段，没有认清在中国现有土地关系之下，党是应该坚决地领导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中央局决议对平均分配是动摇的，如说："平均分配是小资产阶级幻想。"这是不认识平均分配土地是消灭封建关系最彻底的办法。只有在平分之后农民认为平分是已经平均了贫富，已经是社会主义了，这是幻想。党对这种幻想，应当谨慎地加以批评。一般地说平均分配是幻想，这是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决议，这是可以被利用来反对土地革命。再中央局决定以劳动力为主，以人口为辅的分配方法，而预先没有经过详细审查与研究，没有采用过去斗争的经验，这是不审慎的。再中央局没有了解中国土地革命是带了残酷的农民战争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地争取群众。此外，关于反富农问题，

中央局没有分清暴动前与暴动后反富农策略的不同。在暴动前，主要的不但从政治上反对富农的领导，还要在经济上废除富农的债务，没收富农的土地；在暴动后（如现在时候），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肃清富农的影响，驱逐富农出苏维埃，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使富农在政治上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不是照中央局通告所说的："从经济上解除富农的武装，消灭富农的半封建剥削。"（分田后，半封建的剥削已经消灭了）中央局的错误指示，不但不能纠正过去对富农问题的一切左倾错误，反而要助长这些错误。最后中央局没有深刻地采用过去执行土地革命的丰富经验，没有重视过去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斗争的经过。这都是中央局犯了上述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中央局对于改造苏维埃，创造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根据地，以及召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与宣传等等问题的注意力，还是不够。这一切都是调和路线的结果。

立三路线在苏区执行的恶果是很明显的；苏维埃区域相当地缩小了；地方武装集中到红军中去了。党与苏维埃在某种行动上说，是脱离了群众；党与苏维埃在组织上涣散了；AB团及其他反革命派得着机会发展，并且能得钻进党内与苏维埃内；红军因为过去执行猛烈的扩大，也受了相当的损害。

扩大会议在估量目前形势时，完全同意中央关于"反对军阀进攻红军与苏区的决议"以及中央给红军的几次训令。扩大会一致认为最近革命的发展，引起了反动统治的团结，来进攻革命，特别是进攻红军与苏区。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实行欺骗政策。如"国民会议""大赦""裁厘"等等来欺骗群众，组织苏区内的反革命团体，如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北极会等等，企图从内部破坏苏维埃与红军。但同时必须指出统治阶级虽一致进攻革命，但他

们内部矛盾，不但存在，并且继续发展。中国革命势力发展的不平衡，使革命势力对于各系军阀的威吓的程度不相同，所以他进攻红军时，军阀战争仍旧是有爆发的可能。并且最近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北方军阀备战的形势非常紧张。这是证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大规模军阀战争的积极准备。

南京政府虽派遣重大兵力向红军及苏区进攻，但红军是有击破这种进攻的充分可能，因为白军是不健全的，官长和士兵是不一致的，士兵的生活是痛苦的，进攻红军的各派小军阀间也是不一致的，有冲突的。在红军方面，上下完全一致，“万人一心”，又有广大工农的拥护，完全不是孤军作战，所以在红军与白军的残酷斗争中，红军与广大工农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是能够取得第二次伟大胜利，击破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龙岗东韶第一次伟大胜利，就是证明。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一、动员一切力量，把工农群众与地方武装正确地去与红军主力配合，应用一切于我们有利的战略与战术，去击破敌人的包围与进攻，在击破敌人进攻的过程中，要达到把江西苏区创造成全国苏维埃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与号召，应当立即开始。

二、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尽量提拔工人来担任领导工作。改进士兵的军事训练，建立铁的纪律，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杜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三、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

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应当立即消灭党包办政府工作的现象，“党是立法机关，政府是行政机关”的恶现象，应当建立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一贯的工作系统。政府应当立即颁布选举法以及经济政策条例。

四、关于土地问题，确定以人口平分，在没有平均分配好的地方要立刻执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已经分配好了的地方，就要肯定土地私有，不得动摇再分。地主的家属和封建制度的附属品，如道士、和尚、地理家等人中间的剥削分子，没有分得土地的权利，但允许他们租用土地（详细办法，当另有决议案），商人（乡村小市镇的贫民分子，多以农为主，以商为次的人，不在此例）不能分得土地。至于地主及其家属的房屋，亦应一概没收，转分给贫农群众，但可以允许这些分子，移到已经空出来的坏房子去。

五、加紧无产阶级的领导，建立健全的阶级工会与工会工作，正确地去领导阶级斗争，去实现政府劳动法。在目前的苏区内，雇农工会的工作，是工会运动中的重要部分。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工会，但独立劳动者分得田后，如仍是贫农地位，得照其他贫农一样加入贫农团。

六、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七、加紧苏区内反帝国主义的工作与宣传，特别是反帝国主义进攻苏区与红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特别是反对正在准备着的进攻苏联的战争，建立反帝大同盟的组织。

八、坚决地执行改造党的工作。洗刷异己阶级的成分，彻底改造干部，创造新的真正的工农干部来担任领导工作。

九、加强在白色区域的工作，特别是白军军队里的革命工作，以求领导白色区域革命运动，捣乱敌人的后防，瓦解敌人的军队。

扩大会议指出，只有正确地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党才能正确地完成这些任务；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旧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步等等的右倾情绪。这些情绪特别是因为敌人的进攻，以及苏区内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更得着机会生长，所以党应当用大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反立三路线的斗争，要坚决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特别是实际工作中的立三路线。正确地执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决地执行国际路线，以及四中全会的决议，这样一定能够引向新的伟大的胜利。

动员部队帮助群众插秧耕田的训令[1]

（1931年5月5日）

（一）敌人长期进攻苏区及红军，大施抢粮食拔去秧苗使农友马上缺食不能耕种及将来无秋收希望这种卑劣残毒手段，我们应立即动员打破他这一政策，使苏区所有田土按时耕种完毕，求得第二次大战[2]胜利前的工作必要条件。

（二）苏区群众多数动员在作战中做放哨、侦探、运输等工作，所有田地不能按时下种，必然会影响作战及秋收食粮。我们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时，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住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

（三）红军帮助栽秧耕田全是一种应尽义务。不要吃农友的饭及任何酬报，并且要十分和气，不得有不好态度对待农友。

（四）若遇有白匪骚扰不能栽秧的地方，应派兵游击掩护栽种完毕。

（五）预防青黄不接时，理应早为筹备种各种蔬菜瓜类及豆麦等类，以应急需。

（六）各级战斗员指挥员应将此种工作视为作战中之一种重要任

---

[1] 这是1931年5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训令。

[2] 第二次大战，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作战。

务，如能按期做到耕种完毕，是二次战争首先胜利之一。务祈全体动员努力此一工作，但决不能妨害作战。

（七）帮助工作时应与乡苏及村苏[1]商同办理，此种工作才不致帮助在富农家里。

此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乡苏及村苏，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的简称。

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1]

（1931年5月13日）

一、各方面敌情，除前已由总部印发情报，通知各部队外，本日复得如下的情况：

（一）王金钰[2]部直辖之第四十七师，分三路向东固[3]前进。其左路先头到达大源坑并派出游击队到源头游击。其中路已通过九寸岭到达箐龙坑[4]至万寿宫之线。其右路已通过观音岩到达山坑，与我第三军团之一部对峙中。

（二）郭华宗[5]水南之一旅，早已进至下马石，本日复进至上坊附近，有进东固的模样。郭华宗部之又一旅（二团）早由白沙到达南坪（距东固五十里），本日行动不明。其又一部（二团）昨日由白沙进到白富，似将进沙潭头。

（三）中洞与桥头江闻亦到敌军，似属公逆部[6]，兵力不详。

---

[1] 这是1931年5月13日22时15分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王金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

[3] 东固，镇名，位于江西吉安县东南。

[4] 箐龙坑，疑是福龙坑。

[5] 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四十三师师长。

[6] 公逆部，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

（四）蒋蔡[1]主力在龙冈头至兴国城之线，其进至方太之三团仍在原位置。

二、本方面军为各个破敌，巩固苏区，向外发展起见，决心先行消灭进攻东固之敌，乘胜掩击王金钰属全部，努力歼灭之，以转变彼我攻守形势，完成本军目前的任务。

三、根据本方面军的行动应给各部队如下的任务：

第一，想定敌军将王金钰之第四十七师为基干，配合郭华宗一部及公秉藩部，于明（十四）日拂晓分五路同时向我军进攻时，本方面军应先消灭我军右翼之敌（在地理上以东固通富田之河为界，此方面之敌为郭华宗一旅或两旅及王金钰部到达大源坑之一旅），然后用全力解决由神坛前、三彩、桥头江来犯之敌（王金钰四团、公秉藩四团）。因此，我第十二军应以两师占领大山脑、高岭、乌甲石和风坑之线为正面，我第四军、第十二军之一师，应由大山脑经珠坑径出击包围敌军侧后，我第三军全部（三十五军在内）应由东固经江口抄击大源坑前进之敌，为我军之左翼，第三军团应以一部占领阵地，牵制富田崇贤两方之敌，主力位置于东固附近为总预备队。总司令部指挥阵地在锅都岭。

第二，想定敌军单向我们左翼阵地前进，富田方向，水南、白沙方向不进时，第三军团除以一部向崇贤方面之敌警戒外，全力从左翼抄击洞口方向前进之敌，四军及十二军从右翼抄击九寸岭观音岩两路前进之敌，三军任正方攻击。以上两种作战计划，究采何一种应依照敌情变化决定，当另有命令。

---

[1] 蒋蔡，指蒋光鼐、蔡廷锴，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和十九路军代总指挥兼第六十师师长。当时蒋光鼐在上海养病，第十九路军由蔡廷锴统率。

四、第七师应位置于枫边、城冈、方太（附近）三点，第三十五师之百〇三团位于崇贤附近，尽量设法阻止蒋、蔡前进。我三十五师百〇四团应位置于潭头附近牵制白沙、自富方向之敌。

五、各军依照上述的布置，对于敌军飞机的隐蔽，交通设置，粮食采买，侦探派遣，后方联络等，应有绵密的布置。

附记：

1. 明天敌如不进东固，但进至三彩、神坛前、上坊之线，则战争当在后天。

2. 明晨各部应于五时用餐并准备午餐（明天吃三餐，伙食钱恢复一角大洋）。暂停种田、采柴、找笋等工作。

3. 各部明天应准备敌飞机来袭。

4. 各部应即准备向导。

5. 第四军应派出游击队向罗坊附近游击，主要任务是打听南坪敌情。

6. 一军团各军长、政委，及三军团之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应于明六时以前到中革军委面受机宜。

7. 十二军明晨须即派队在大山脑、高岭一带阵地上赶筑工事，但须预防敌机发现。

8. 此命令限于师长、师政治委员以上负责人阅看，不任他人阅看。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1]

（1931年5月14日）

（一）敌情见参谋处本日通报。

（二）方面军决先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2]之敌，拟于后日（十六）从左向富田[3]方向出击。

（三）第三军团为左路军（三十五军在内），应于明日（十五号）进至江树头附近宿营，严密断绝交通。后（十六号）日经固陂向富田前进，须于后日午后一时以前攻击富田。

（四）第三军（缺三十五军）为中路（正面），应于明（十五）日拂晓进到螺坑、张家背、淘金坑一带，并占领白云山[4]、更鼓、石唐、窑子、大垄一带阵地。十六日午前八时开始向桥头江一线攻击前进，得手后以一部追击败走之敌，以一部协助正面之第四军侧击观音岩之敌。

（五）第四军（并六十四师）亦为中路（正面军），明日以全军

---

[1] 这是1931年5月14日20时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王金钰、公秉藩两师，指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师长分别为王金钰、公秉藩。

[3] 富田，村名，位于江西吉安县东南。

[4] 白云山，位于江西吉安县东南。

进驻东固一带，以一师占领三彩、神湾前[1]一线阵地，六十四师则应位置于锅都山之北端。十六日分两路，一攻观音岩，一攻九寸岭，向富田之敌进歼。十六号午后二时猛攻。

（六）十二军（缺六十四师）为右路军，明（十五）日以一部占领大山脑一带主要阵地，牵制由上坊、罗坊、潭头三方向之敌。后（十六）日待我左路与中路得手后敌全线败退时，则相机向水南追击。如后天右路之敌（上坊、潭头等）不来，则为方面军之总预备队。

（七）一〇四团[2]亦归第四军指挥。明（十五号）日应即集结兵力，后日（十六号）午前八时相机向大源坑之敌攻击，策应中路军。待敌败走时，配合正面军夹河向富田追击，攻取富田河北端阵地，截击由富田溃走过河之敌。

（八）野战医院应于十五日移到东固开设（各军伤兵即送此转后方医院）。

（九）总司令部随中革军委明（十五）日仍在此地（鳌上），后天则在正面军后沿三彩、观音岩向富田前进。

附记：

1. 各部应各带米粮五天。
2. 战后俘虏兵送东固。

右令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神湾前，疑为神坛前。

[2] 一〇四团，属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建制。

攻击中村南团之敌的命令[1]

（1931年5月21日）

（一）据三军团报告，中村[2]有敌高树勋[3]部之一旅，其先头部队于本日午后与我六师之前哨接触，该敌似系掩护后面主力之运动。

（二）方面军决于明（二十二）日攻击该敌，乘势下南团[4]消灭高师之主力。

（三）三军团任左翼（第二天攻击南团时亦任左翼），攻中村之东北端，沿地盘源、丁家岭、西源垅三路攻击中村之北。应于明晨（二十二日）三时由石马出发，六时半到达预备攻击阵地。

第四军任右翼，沿四十九脑向焦坑、罗荜山、牛坑、冈上之线，向中村南端攻击前进。须于明晨三时由龙坊一带出发，六时半到达准备攻击阵地（第二天攻击南团时担任正面）。

第三军为总预备队，应明晨三时由现在地出发，沿童坊、狭江口、下纸棚、木梓脑、伞子坑、中坑、普化庵、濠源、桥下坑，策应第四军相机进入元头宿营，准备第二天（二十三日）攻击南团，

---

[1] 这是1931年5月21日19时50分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永丰县尧坊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中村，村名，位于江西永丰县东南。

[3]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4] 南团，村名，位于江西宁都县北部。

担任右翼（须向南团严密警戒，并侦察敌情）。

第十二军为总预备队，应于明晨三时三十分在三军后行进，位置于第四军阵地后濠源、桥下坑附近，第二天攻击南团时跟三军之后担任右翼。以韩婆崃、赖珠亭、中村至松树岩之线为战斗区分线，线以北归三军团担任，线以南（线在内）归四军担任。

（四）如中村之敌退走南团或源头时，则三军团尽量进入通南团方向宿营，三军、十二军、四军都进入元头一带宿营，准备后日向南团攻击。

（五）总司令部及直属队随革军委进至东坑附近指挥，明晚则在中村街上接收报告，后日打南团指挥阵地在上下潮。

右令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先敌占领南丰的命令[1]

（1931年5月24日）

（一）据报，孙连仲[2]残部已于二十三日退出东韶，向宜黄逃跑，朱绍良[3]部三师亦经广昌向南丰逃走。

（二）方面军决取捷道先敌占领南丰城，如敌（毛许胡[4]）尚在我右后方时则截击之。

（三）第三军团为左路军，应于明（二十五号）日由现在地出动，分三天半行程，经吴村、洽村、三坑向南丰前进，相机占领南丰城。到达南丰后，主力应控置于市山街[5]附近待命行止。并应派出一师兵力为先遣队，分三天行程，先期赶往南丰，限二十七日到达南丰城附近，攻击该城，相机占领之，掩护我军主力之开进。

（四）第一军团为右路军，按三、四军、总直及十二军之次序，于明晨四时由现在地（麻田、南团、上潮）出动，分三天半行程，经洛口、严坊、苦竹、甘竹、枫林、磨刀渡向南丰前进。到南丰城

---

[1] 这是1931年5月24日23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南团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3] 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指挥。

[4] 毛许胡，指毛炳文、许克祥、胡祖玉，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六路军第八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五师师长。

[5] 市山街，村名，位于江西南丰县西部。

附近时即在瑶浦一带布置宿营，待命行止。第三军亦应派兵一师为先遣队，分三天行程，限于二十七号到达南丰城附近，掩护我军主力开进。

（五）三十五军应于二十六号到达东韶待命，各部大行李归该军掩护。各部大行李限于二十八日一起开来东韶待命。

（六）随营学校及红色警卫团（缺第四连）归回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开往河西。

（七）各路军每日到达宿营地时应相互取得联络，先遣队须特别注意侦察敌情，随时飞报来部（每日行进预定表另发）。

（八）总司令部随右路军在第四军后第十二军先头行进。

右令

注意：各路先遣队务须先敌赶到南丰城而占领该城，布置警戒，互取联络，待主力之到达，不得放弃该城。两先遣队以先到南丰城之师长、政委指挥之，如毛许胡三逆已先占该城，先遣队亦应向之攻击。

红军第一方面军由南团附近开进行程预定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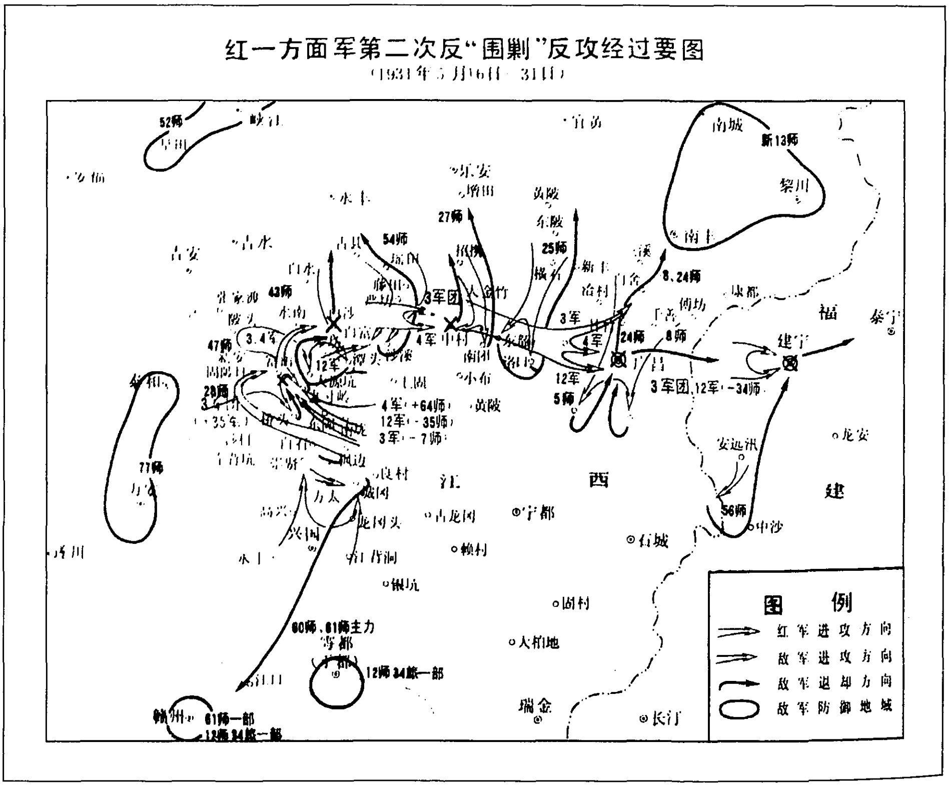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五月于南团

部队区分	左路军		右路军				
	先遣队(三军团之一师)	本队(三军团缺一师)	先遣队(三军之一师)	第三军(缺一师)	第四军	总直属队	第十二军

二十五日	由东韶到洽村(70里)	由南团到吴村乌溪一带(40~50里)	由麻田经洛口严坊到苦竹(70里)	由麻田经洛口严坊到脑源附近(55里)	由南团经洛口到严坊(50里)	由布元经南团洛口到严坊(55里)	由上下潮经南团洛口到严坊(65里)
二十六日	京溪山(65)	洽村(40)	由苦竹经甘竹罗坊白舍到枫林(90)	由脑源经苦竹到甘竹(65)	由严坊经苦竹到甘竹(70)	同左	同左
二十七日	占领南丰城(30)或攻击该城	三坑(45)	经下洋占领南丰城如已到敌攻击之(40)	经罗坊白舍枫林到磨刀渡附近(70)	同左(70)	经罗坊白舍到枫林附近(50)	到枫林(50)
二十八日	占领南丰城	市山街(40)	占领南丰城	经下洋到瑶浦附近(20)	同左	经磨刀渡下洋到瑶浦(40)	同左

注意：各部非万不得已，不得随意变更计划。如万不得已不能赶到预定地点时，须迅速报部并通知各友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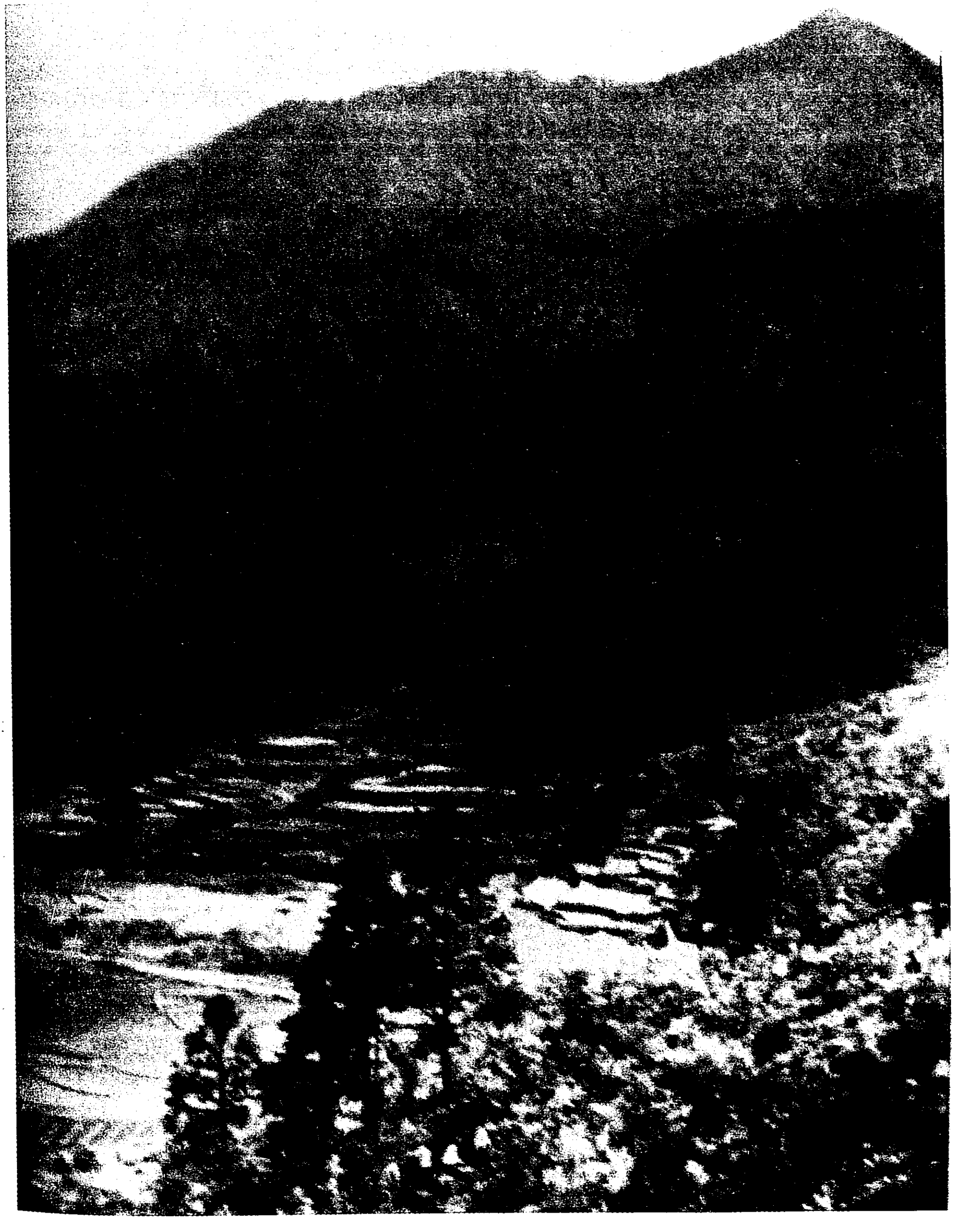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反攻经过要图
（1931年5月16日—31日）

52师
峡江
宜黄
南城
新13师
黎川
南丰
乐安
增田
黄陂
东陂
永丰
27师
54师
吉安
吉水
25师
新丰
8、24师
康都
3军团
中村
4军
3军
4军
24师
8师
建宁
泰宁
福
43师
47师
28师
12军
4军（+64师）
12军（-35师）
3军（-7师）
12军
5师
3军团、12军（-34师）
安远讯
龙安
77师
江
西
建
56师
中沙
宁都
石城
兴国
赣州
61师一部
12师34旅一部
60师、61师主力
雩都
12师34旅一部
瑞金
长汀
图　例
红军进攻方向
敌军进攻方向
敌军退却方向
敌军防御地域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红一方面军反攻经过要图。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地点白云山。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一至八次会议记录

（1931年5月、6月）

总前委第一次会议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夜八时于洛口严坊总部位置

出席者：泽东（毛泽东）、朱德、林彪

列席者：荣桓（罗荣桓）、化玉（郭化若）

（一）敌情所得：据无线电台报告，毛炳文电台今晚在头陂发报，但不知道移动不移动，胡许位置不明，严坊农民报告头陂确有敌哨放到前山，毛许部二十三日早由洛口退，到二十四日午后才退光。估计敌人今日可在广昌头陂一线集中，头陂之敌明天或许可集中广昌城。

（二）行动问题：头陂敌人（毛部一师）有退却形势，我们以第一军团去打他，是可以击退他的，但三军团还在吴村，如果我们打下头陂，追到广昌，则三军团相隔百里，赶不上增援，不易消灭敌人。因此我们有集中两个军团全力去打毛、许、胡的必要，决定明天（二十六）全方面军开到苦竹集中。

总前委第二次会议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晚八时于苦竹街上总部

出席者：东（毛泽东）、德（朱德）、林（林彪）、怀（彭德怀）、略（黄公略）

列席者：文（蔡会文）、桓（罗荣桓）、辉（罗炳辉）、化（郭化若）

（一）敌情所得：据农民报告，头陂之敌已退，广昌有敌三师。无线电台无消息。我们估计今天敌人确可全部集中广昌城，并有经千善向南丰退却之势。

（二）行动问题：在敌人还在广昌城的形势之下，如果我照原计划到南丰城，则敌人在我们侧背，使我们行动不便。因此我们应先夺取广昌城，击退毛、许、胡，取得二次战争更好的胜利形势，然后猛追诸敌，逼他放弃南丰城，使我们以后筹款工作更加容易。明天第三军经甘竹向南丰急进，在路孝忱没有集中全师（三团）和准备坚守的条件之下，很可能夺取南丰城，使毛许胡败走时不能不退回抚州，则我们可增加几个县城筹款。其余明天分两路攻广昌，四军担任左翼，十二军担任右翼，三军团为总预备队。四、十二两军今夜各应派兵一团于一时出发，先头行进，使敌人不得逃脱。

（三）后方问题：后方医院设小布，洛口设伤兵转送站，由东分委负责。苦竹由各军自留军医院处理伤兵，大行李及工作人员调到苦竹待命。

总前委第三次会议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时于广昌城休息中

出席者：东（毛泽东）、德（朱德）、怀（彭德怀）、彪（林彪）、林（谭震林）

列席者：化（郭化若）、平（袁国平）、桓（罗荣桓）、辉（罗炳辉）

（一）攻城结果：二十七日开始攻城，到二十七日夜九时才打进工事，敌胡、许两部已全部退南丰。我们一起死伤四百人左右，枪支所得极少，但打伤敌师长胡祖玉，夺取广昌城（胡伤重会死），给整个战事更好的影响。

（二）敌情所得：毛炳文已于前（二十六）日过河向南丰退却，胡、许昨晨开始退却，昨夜九时退完，胡祖玉被我方打伤，我们估量敌人必定退守南丰。

（三）行动问题：此时去追胡、许攻南丰是赶不上的（桥梁已被敌人破坏，现正架设中）。在战略上和形势上我们都应追刘和鼎，先他夺取建宁城，以便以后的筹款。因此第四军今天暂留广昌处理伤兵并整顿部队，只派出第十师追击胡、许，以不接触为原则，追到千善附近。其余去打建宁，三军团应即刻过河向建宁前进，第一天要到水南附近（距广昌五十里），第二天（二十九日）应进至里心前十五至二十里宿营，准备第三天攻击建宁城。十二军随总部后，在三军团后跟进。占领建宁后，四、十二军和三军团分散在建宁、太宁、黎川筹款。如果毛、许、胡退出南丰城，则我更可占领南丰、宜黄、黎川、建宁四县筹款。

（四）线后处置：伤兵由四军派人负责，由此地政府派担架帮助，经苦竹送洛口转送小布医院。

（五）伙食费及另用钱问题：在筹款时有土豪打的部队伙食费仍发一角一天，没有土豪打的部队（为在兴国扰敌部队和后方医院……）在一有款可发时，应每人每天发一角五。

六月份另用钱各部筹到款时即可发给两次，每次一元。

总前委谈话会决定明天（五卅）在里心休息一天，第三军团派兵一师向建宁方向游击。

总前委第四次会议

一九三一年五月卅日夜八时于里心总司令部

出席者：东（毛泽东）、德（朱德）、怀（彭德怀）、谭（谭震林）

列席者：化（郭化若）、平（袁国平）、权（左权）、辉（罗炳辉）

（一）行动问题：

刘和鼎部在建宁城的大概有四团，他们想不到我们主力能够这样神速地运动到这里，但是敌人今天还没有前进，在敌方整个战线失败的条件下，估计刘和鼎不退就只有守。在我们要筹划第三期战费和整个作战形势之下，是很需要夺取建宁城，才能推展到黎川、太宁三县筹款。因此决定如敌不退出建宁城时，决以三军团为攻城部队向该城攻击，准备攻七天，要挖地洞，用火药轰炸（火药由十二军里心之部队收集，限三天内收集三百斤，第四天拿到前线备用）。第十二军（缺三十四师）为攻城预备队，随总部于明天早晨八

时，在三军团后向建宁城前进，卅四师留在里心以师部和一个团布置在里心附近，一个团位置于桂羊，并派兵一连进到水南和广昌取联络，另一个团位置在里心与康都之间以与第四军联系，其任务是：1. 建立工作，2. 筹款（每团每天要筹足一千元），3. 维持后方交通，4. 收买三百斤硝药，限三天内办完，第四天解送前线。

（二）参谋处建立问题：

参谋长朱云卿在后方医院身故，遗缺由郭化若同志代理，左权同志代理参谋处长，发通令使各处知道。

（三）总直委增补委员问题：总直委委员刘伯坚、柳南奎、何金荣、李卓等四个人离开这里，直委委员应补充三个。决定左权、杨立三、林德清三同志补充直委委员，仍以王国中代理书记。

总前委第五次会议

一九三一年五月卅一日夜九时于建宁城西门外三军团总部

出席者：东（毛泽东）、德（朱德）、怀（彭德怀）、林（林彪）

列席者：平（袁国平）、化（郭化若）

（一）敌情估量：

这回刘和鼎之所以和我们迎战，因为不晓得我们主力到这里，同样的在廿七日我们派第三军直趋南丰时，何应钦、朱绍良他们以为我们主力打南丰而一部打广昌，因此变更他们以毛、许、胡三师守广昌，而调刘和鼎主力和周志群黑夜赶到广昌策应的计划，转要毛、许、胡退南丰，刘、周仍在原处布防。因此我们得到了第二期作战的最后一次胜利，这次击溃刘和鼎部四团，大约消灭三团以上，缴枪约二千支以上，缴到西药可供全军半年之用，无线电一

部，这个大出乎敌人意料之外。在这个情况下，加上广东问题的严重，我们应以大部兵力进占黎川，向南城激击，威逼敌人放弃南丰以至宜黄、南城，如此我们就可得建宁、黎川、南丰、南城、宜黄以及乐安、水丰、吉水等县城，河西的西路军直向峡江前进，夺取峡江，在刘被我十六军击溃，韩德勤被我七军俘虏的情况下（见敌方无线电报），罗霖孤军不易独守吉安，在我们第一期工作时间中，吉安就有夺取的可能。

（二）行动决定：

为整顿部队，开会处理战后事情和休养兵力起见，明天（六月一日）起在此地休息两天，六月三号第三军团以第六师推进到太宁工作筹款，其余进黎川，十二军仍位置于建宁桂羊之线筹款工作并处理在建宁之后方事情（如伤兵、战利品等等）。在三十五师到达建宁后，十二军应派部队进建宁接第六师工作，如敌人退出南丰后，我们拟以第三军团布置于黎川资溪硝石等处，即黎川到南城河以东地区。第四军则在南城到黎川河和南城到南丰河之间（南丰城在内）。三军在南城至南丰河以西地区筹款。十二军在建宁太宁之线。

三军团明天要将部队整顿，补充干部，后天开活动分子会，十二军明天就要开活动分子会，作报告。

工作的任务对地方的是：1. 分田；2. 组织赤卫队游击队；3. 建立政权；4. 建立党。对本身的是：1. 筹款；2. 加紧政治军事和党的训练；3. 扩大红军。

（三）西药收集问题：

这回最大的战利品就是得到大批的西药，总司令部收集两个团的卫生队就有十五、六担药，还有两个卫生队的师军医院药库，已由三军团派队看守，明天要一起收集拢来（大概可供半年之用）。除

留此地伤兵应用的以外，一起清查登记清楚，交总司令部汇集，派专人送东分委保存，以后分配各医院。

（四）伤兵问题：

此次作战三军团的伤兵大概在三百人以内，十二军在三十人左右，暂时由十二军军医处负责就在此地设军医院收容医治（在这环境下，起码可以有一个月的医治），等三军团的军医院到时，交三军团医院负责，全伤的一个月不能好的得到后方，交通便利时送后方。

（五）俘虏兵问题：

目前为了扩大红军的迫切需要，这回的俘虏兵一个也不放走，留红军中补充，大约人数有三千左右，除三军团留一千五百人外，以一千五百人补充四、十二两军。这些俘虏就即时编到各师去训练，在训练中再去挑出坏的送走。

（六）枪械及战利品问题：

这回取得的枪支大概有二千以上以及其他战利品，统通由十二军负责运送后方，但部队必须留足本身所必需的，每连九十支枪不管他人数多少，必须负责挑起。

（七）炮兵组织问题：

这回得到两门山炮，三军团留一门，连原有一门编成山炮连，其余一门送后方，和九原岭、白沙所得的，再配两门编成第一军团山炮连。

（八）无线电队问题：

方面军的无线电队为了要使人员器具的便于调剂，训练方面能够一致，应有他的独立系统，决定成立方面军总司令部无线电队，下分四个分队，人员电报机等一律照分。但第一重要的是总部电台，其次三军团的，再次后方，再次分一个给河西七军。人员器具

的分配和筹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的计划，由参谋处再拟定提出。

（九）后方医院问题：

后方医院因为没有专人负责督促整顿，以致很不健全，特别是AB团有大的发展，使伤兵同志怕到后方留医，以后为了便于指挥和整顿起见，应由各军办后方医院，由各军自己负责。总医院专收重伤病人（一个月以内不能好的）和疑难症候等病人，但药品要总医院分配或调剂。现在各分院过两月后，伤病兵多半出院时，其医院和工作人员除各军归各军外，应由总院详细考察，没有AB团嫌疑的分配各军。

（十）战场纪律问题：

这一期作战中三军团发现一个连长、一个政委，有改组嫌疑，擅自退离阵地，让败敌逃脱，自行开会，选举团长、政委。又有一个参谋在战场上造谣，摇动军心，拟审后枪决。十二军有特务团长没有命令带队伍去搜山，以后有命令去调，又过期才到，以致不能完成任务。又一个团长在沙溪作战中不遵命令，徘徊不进，拟予以撤职。另有个排长在阵地上造谣，亦拟一并撤职。我们认为要维持红军铁的纪律，使战斗更能达到其政治任务起见，这些违犯战时纪律的要严办，由三军团前委和十二军军委提出办法批准。此外打报告给总部发通令给各军知道，三军团和十二军执行纪律时要集中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宣布。

总前委第六次会议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日夜九时于建宁城外总部

到会者：东（毛泽东）、德（朱德）、怀（彭德怀）、林（林

彪）、平（袁国平）、萍（邓萍）、化（郭化若）、权（左权）、杨（杨立三）

（一）行动问题：

现在郝、郭两师退永丰、吉水，孙连仲退宜黄，蒋、蔡三十号退出兴国，向赣州去，朱、毛、胡、许路等师仍在南丰，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之必要，对我们有取守势之可能。因此我们的行动，第一期还是照以前的意见，向北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使这任务更完满的完成，是这一期工作的目标。因此，敌如退出南丰，则第三军团全部应进黎川，威逼南城，四军进占南丰城，三军进占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十二军仍在太宁、建宁，如敌守南丰、南城、抚州以至宜黄，则三军团应留一师于太宁，余在黎川，留太宁之一师应以一团位于太黎间，一团位于太建间，余在城内。第一步，三军团不要横村，只要太黎路，以一师进黎川硝石间架桥向硝石游击，一师位于黎城，一师在湖坊，一师仍在太宁，总指挥部应在黎城，如敌守南丰、南城不进，则三军团应向右靠向光泽、邵武、太宁，十二军直属队位于建宁城西北，卅四师在建宁西乡，卅六师位于建宁东乡，四军在南丰、黎川、建宁间。如敌进，以不打为原则，向右靠（集中后再打），三军在敌未退时布置于南丰白舍、南丰东陂之直角内，牵制朱、孙两路，并且在此地区内工作筹款，总部和四军在一起，卅五军决调到瑞金，接闽西重要物资来，并维持闽赣交通消灭靖匪吴文荪，卅五师之一〇三、一〇五两团调回建宁归还十二军建制。

第二期　各军工作区域如下：

三军团——大余、遂川、上犹、崇义、泰和（河西）、万安

（河西）。

四军团——会昌、寻乌、安远、信丰。

三军——于都、泰和（河东）、南康、赣县。

十二军——建宁、宁化、汀州、瑞金、石城、广昌。

十二军现刻即可派一团到新区域去布置工作，三军团在敌退出南丰后，可派一个师到新区域布置，三军四军同样地在相当时期即派一部队伍到新区域布置。

三个期间的工作仍照前议第一期向北，第二期向东，第三期向西。

第一期工作最多不过两个月，对外四项工作：1. 迅速建立游击队。2. 迅速分田。3. 建立苏维埃。4. 建立党和团。对内工作三项：1. 筹款除本身食用外，要筹足一百万元作第三期作战费用。2. 加强军事技术训练、政治训练、党和团的训练。3. 扩大红军数量三万。

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期作战，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

（二）中央局来电中的问题：

1. 毛同志因此地工作开展需要，暂不去龙岗。

2. 左权同志为参谋处长，以总部特派员名义派到后方，其任务①处置伤兵、西药、后方医院、俘虏、枪械等。②指导地方武装的组织训练与行动。

（三）对于群众工作路线错误问题：

1. 四军前次在水南烧土豪房子时烧了一条街，要由十二军代赔，由四军政治部出布告。

2. 第四师乱没收建城“绥安中西医院”，要追究处罚警告，以

后对于西药房医院等不要没收，买西药时，可出钱向他买。

（四）西药问题：

此次得到的西药除三团留一部应用外，交到总部的有二十五担，其中重要治伤药如碘片、四碘仿、酒精，应各留三分之二在总部医务所，送三分之一到后方交中央局，十天或半个月以内分必要的药品给各分院，由左权同志负责带去。

（五）枪械问题：

每连至少要带九十支枪，人数不够也要背走。

总前委第七次会议

六月四日于康都圩

出席者：毛（毛泽东）、朱（朱德）、林（林彪）

列席者：罗（罗荣桓）、郭（郭化若）

各部队布置问题：

第四军——无论敌人退出南丰与否，皆照如下布置，但须三军团到黎川后三天（即九号移动）。

上杭、西坪、下刘、东坪、照洒一个师。

下桥、东圹、钟贤、龙安一个师。

大洋坑、石沟村、双田、荷田一个师。

横村、樟村、西城桥、桂上、桂下、朮城、周坪一个师。

军部应在大洋坑。

第三军以一师布置于市山街党口东陂之线，以一师布置于沿河玉白舍及尧石三坑之线。

军直属队及一个团位于大排上杨梅寨、三溪圩之线。

四军移动后总部移到西城桥。

总前委第八次会议

六月十日夜于总政治部

出席者：毛（毛泽东）、朱（朱德）、周（周以栗）

列席者：杨（杨立三）、郭（郭化若）

（一）目前政治形势与估量：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恐慌，各省财政仍旧不能统一，两广成立军政府，汪、李、白到广州，派桂军到桂林，显然要打湖南，何键很匆忙地回长沙布置队伍，张口拿不到钱，回北平又召集西北军首领开会，王金钰、阮肇昌等都托故到北平去。同时第一军在现在的形势来看并没有失败，追我们第二军团的白军也必定要因两广问题而停止追击，特别是在江西的军阀军队完全失败。蒋介石隐瞒着红军胜利的消息，这些都证明南北军阀军队的混战不会因红军胜利而停止，并且必定很快在湖南长衡一带爆发。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必定普遍地很快有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蒋介石有放弃陕西、河南、山东，缩短防线的可能，将来或退守徐州、武胜关、长沙、南昌（在江西或则退南昌、抚州、吉安三处）各点，即使失败蒋也必不肯退让，但即使蒋对北方妥协，抽兵南下也不能解决张桂或革命势力。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应该向北才能促成两广出兵，两个月后，我们的主力才调到赣南。在现在红色警卫团和八师是应该必要向赣南工作，其余各军在一个月后也都应该派出少数兵力到新区域工作。

（二）前委分工：

组织——周以栗。

宣传——由后方调古柏同志来。

秘书长——郭化若。

（三）经理处建立问题：

为了统一和巡视前方军需起见，在方面军内设经理处，以杨立三同志兼处长，李锦文同志为军需官。

（四）六月份公费照五月份下半月数加倍：

红军伙食费，后方六月十五号起一角五，前方一角钱，另用钱六月十五号发一元，七月一号发一元，送信和少数人公出每人发两角伙食。

（五）款项运输问题：

各军直接派队一直护送到君埠中革军委经理部。

以上三事下通令。

（六）东路工作问题：

乐安应以招携、望仙为中心工作区域。

宜黄应以东陂、党口、新丰市为中心工作区域。

南丰应以三溪、三坑、枫林、渡店前、康都为中心工作区域。

广昌以白水、水南、头陂、甘竹、夫峰、千善为中心区。

一〇五团应在广昌工作。

（七）宣传问题：

1. 办红军报。

2. 审查过去标语发出新标语。

3. 定出早晚点名口号。

4. 起草宣传纲要（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

（八）召集前委扩大会问题：

在廿号召集三军团前委书记、四军林彪同志、三军会文同志、

十二军正林同志、东分委唯俊同志、龙普林同志到会。

（下略）

（九）政治通讯问题：

把前委重要文件的要点和可发表的一部分决议案及一些重要政治消息照印几十份，不定期。

（十）福建工作问题：

闽西红军发展主要方向不要向漳州、东江，要向汀州、连城、归化、宁化、清流等县，才能与赣东南联系起来，而扩大十一军由总前委去信闽西。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

（1931年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2]。
雾满龙冈[3]千嶂[4]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瓒。

---

[1] 反第一次大“围剿”，蒋介石在他所策动的反革命内战中，曾经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过五次“围剿”。从1930年10月起，他布置反革命的第一次大“围剿”，纠集了10万兵力。12月，他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即“围剿”军总司令，开始进犯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12月30日乘雾对进入龙冈包围圈内的敌军主力张辉瓒第十八师发起总攻，激战至晚，把敌军全部歼灭，俘获张辉瓒以下官兵9000余人。接着乘胜追击逃至东韶的敌军另一主力谭道源第五十师，又歼灭其一半。两仗共歼敌1.5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余敌纷纷逃窜。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这首词作于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以后，第二次反“围剿”交战以前。

[2] 霄汉，霄指云天，汉指星河。

[3] 龙冈，在江西省永丰县的南端，南与兴国县相连，西与吉安县相接，是险要的山区。

[4] 嶂，高山。

二十万军重入赣，[1]
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
不周山下红旗乱。[2]

作者原注

关于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

《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3]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4]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国语·周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5]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6]，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韦昭注：“贾侍中〈按指后汉贾逵〉，云：‘共工，

---

[1] 二十万军重入赣，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调集二十万兵力至江西，以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1931年4月发动第二次“围剿”。

[2] 不周山下红旗乱，这里用触倒不周山的共工，来比喻决心打倒反革命统治的工农红军和革命群众。红旗乱，红旗缭乱拥挤，描写革命队伍士气之盛。

[3] 共工、颛顼、炎帝、高辛、女娲、祝融，他们都是传说中古代部族的首领。

[4] 天柱、地维，维，大绳。古人设想天圆地方，天有九根柱子支撑，地有四根大绳系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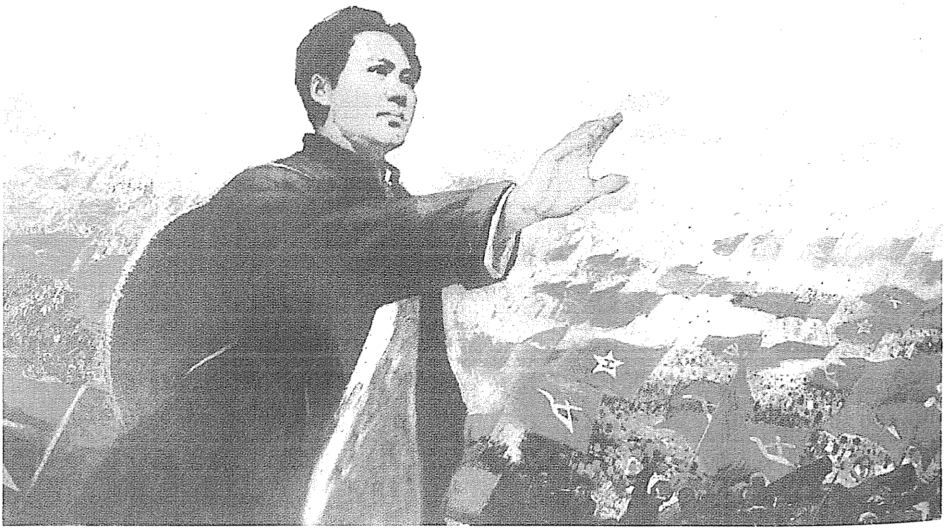
[5] 虞（同娱）于湛乐，淫失（同佚、逸）其身，贪图享乐，纵欲放荡。

[6] 堕（同隳）高堙庳，平毁山丘，填塞沼泽。

诸侯，炎帝之后，姜姓也。颛顼氏衰，共工氏侵凌诸侯，与高辛氏争而王也。’”）

《史记》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当其（按指女娲）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1]，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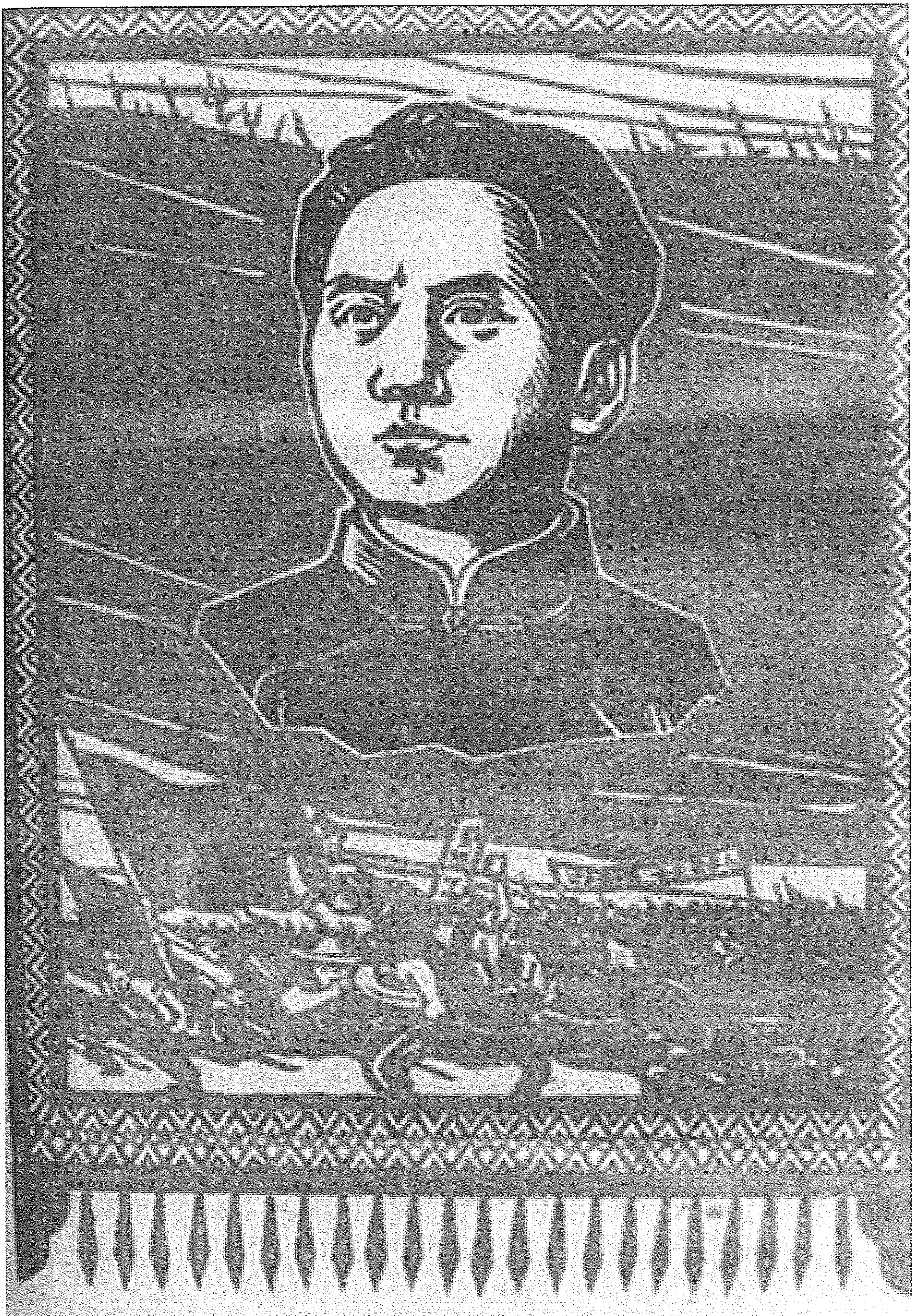
毛按：诸说不同。我取《淮南子·天文训》，共工是胜利的英雄。你看，“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他死了没有呢？没有说。看来是没有死，共工是确实胜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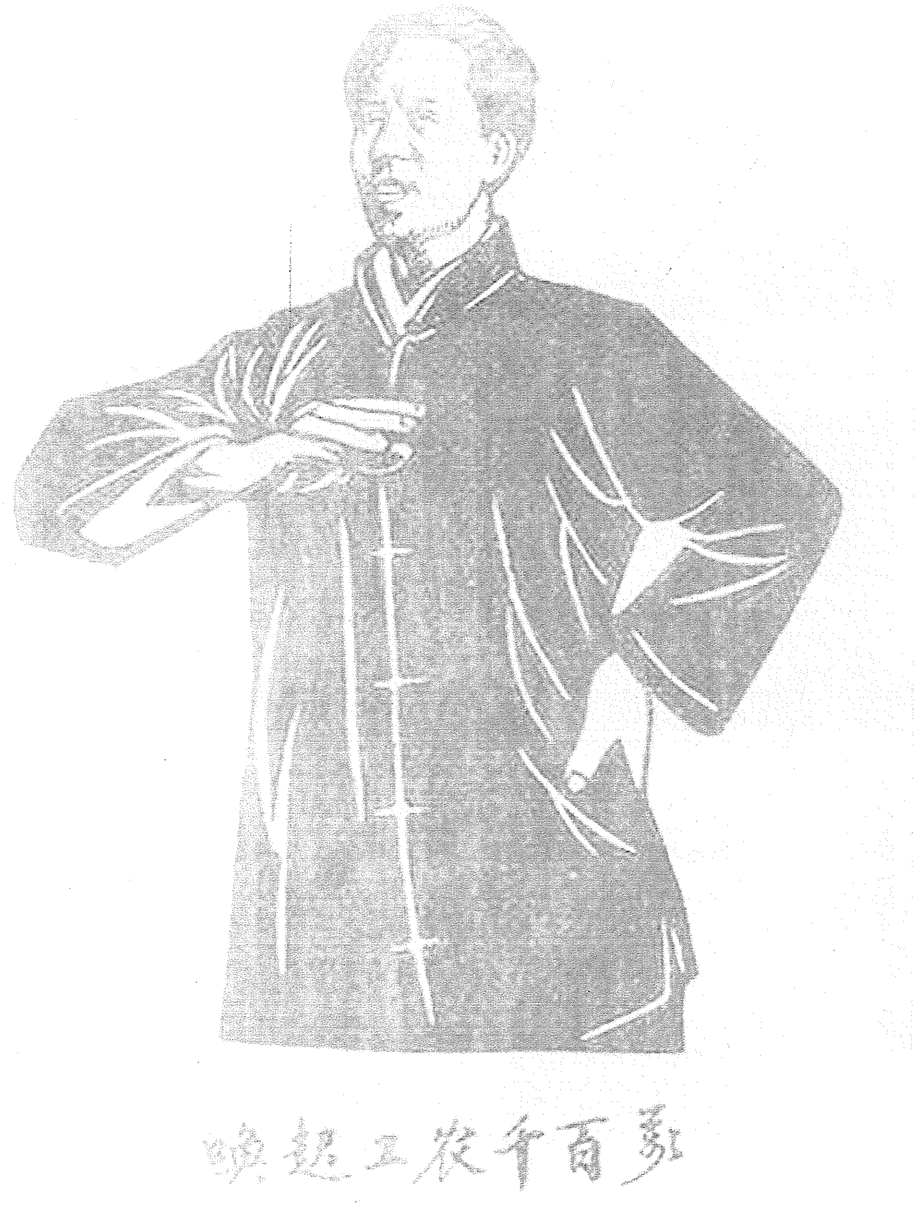
唤起工农千百万（宣传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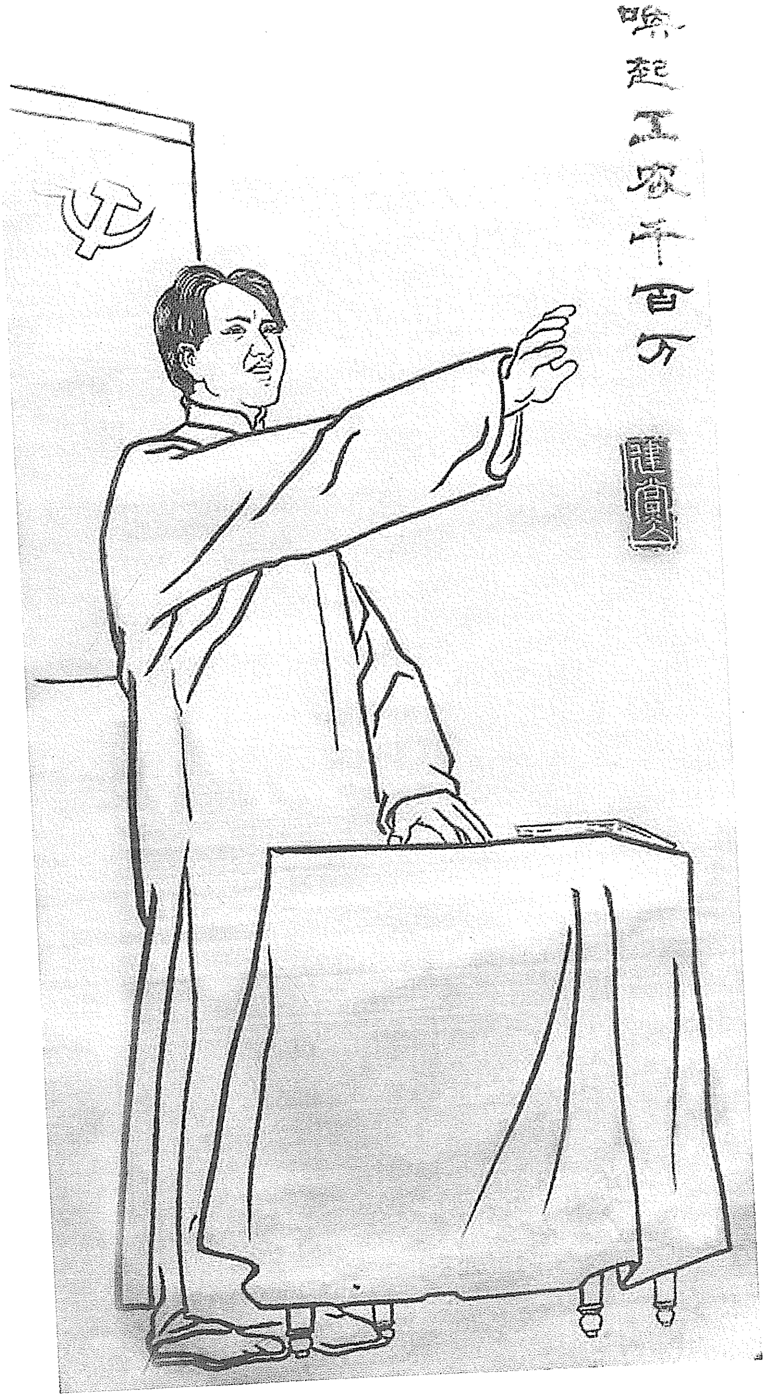
[1] 以水乘木，乘，接替。古代有用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以解释朝代更替的说法。《三皇本纪》称女娲“亦木德王”，共工想用水德来代替木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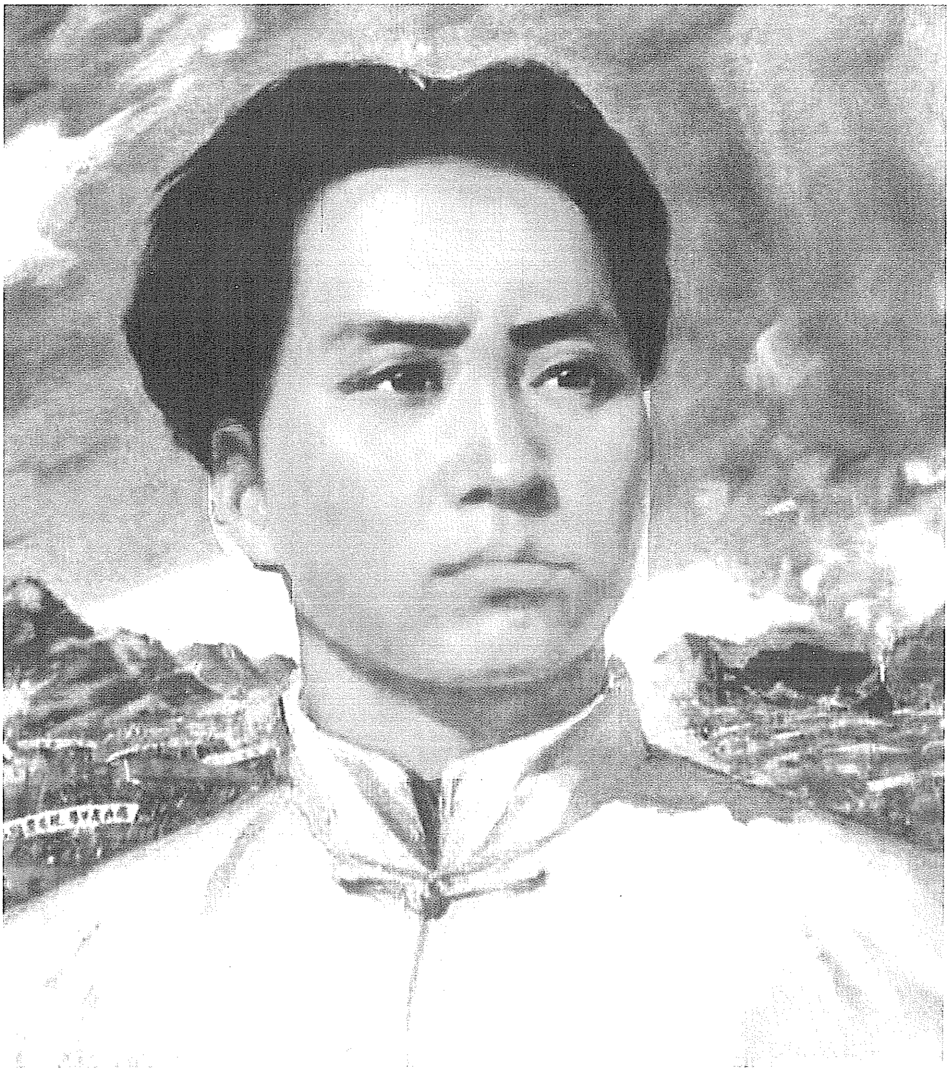
唤起工农千百万（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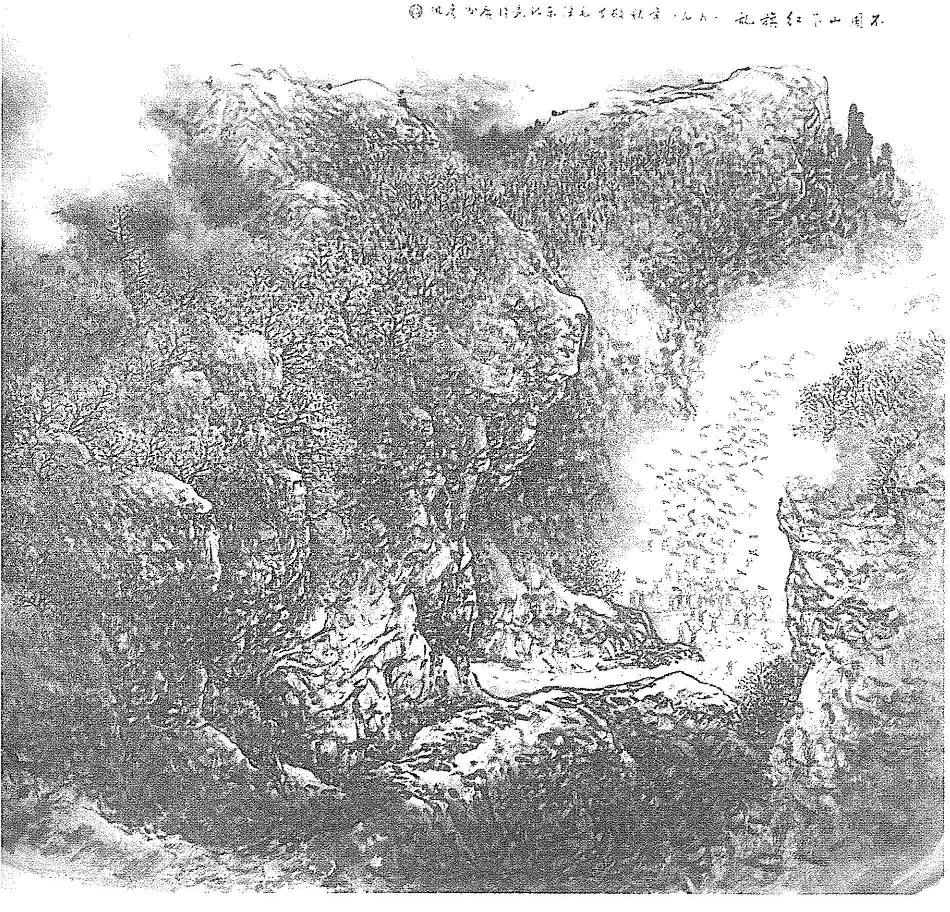
唤起工农千百万（宣传画）



唤起工农千百万（宣传画）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油画）


不周山下红旗乱
一九八一

《不周山下红旗乱》（诗意画）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第十四号

（1931年6月20日）

本会前曾决定八月一日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央政府，现因各地选举代表需要长时间才能竣事，加以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因此特决定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节（公历十一月七日）举行，各地代表应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选举完毕，听候通知出席。特此通令，希各政府，各红军部队，各革命团体，一体知照，并转知全体革命群众为要。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项　英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1]

（1931年6月22日）

（上略）

二十二日午后二时

到会人数同前

主席——王稼祥

宣布继续开会

（一）予期第三期战争地区的选定问题

毛：头一次已经说过了，第三期作战大概会在由南丰来打我们，那么我们就好办，可以引敌深入宁都、黄陂、小布甚至石城才打。如果敌人由兴国、白沙、水南、南丰四处来时，甚至乐安也来一路，富田、东固来一路，那就不好，等他到东固、龙岗，敌人只集合一路的，是很少的。如果估量敌人两路来时，我们应该努力多做赣南一带深入工作，如果蒋蔡也来打我们时，这回我们是可以不等他做好工事就要打他们，这回是可以打他的。那么，就应布置于都的战场，并且一定要打开七坊，三军要全部去打垮蒋、蔡，是可以使南京政府与广东政府的力量平衡起来了，所以蒋、蔡的行动直

---

[1] 本会议的参加者为毛泽东、王稼祥、周以栗、朱德、彭德怀、林彪、谢维俊、谭震林、蔡会文、郭化若、欧阳健。

接关系于我们的战区选择，这是要讨论的。

彭：白军在两次失败中深知不能围攻，所以这回是会更集中力量夹道并进。如果敌人加强力量更会合拢来，那就不好。放弃东固、龙岗，如蒋、蔡仍由兴国侧进，以兴国宁都为目标，我们就在于都布置战场，蒋介石要树立他的声威的企图之下，应是能求达到击破我们的目的，而不再梦想“消灭”红军了。因此，敌人一路合拢前进时，可由他深入，分几路合围时，就不等他逼近时就打。

毛：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的苏区做战场。

林：以上所说大部同意。敌人下次分三路前进，仍不过以前路线。中路会增多加强兵力，敌人利在速战，我们要延迟。蒋、蔡为了对付蒋方，和部队去接防，因此不好离开赣州由吉安来。我们现在就应加紧布置这一带工作，自然将来作战，只要有利条件时就可打。

欧阳：蒋、蔡在二期作战中进得非常之慢，而赣州报纸满布反蒋空气（二十九号以前），蒋、蔡有点不听蒋介石命令的样子。

朱：将来打还是打朱绍良为有利，战场应以□□、龙岗为中心，广大群众配合，在目前他不能来快。

蔡：大致我是同意的，并且敌人也必然把主力放在南丰至广昌这一路，蒋、蔡反蒋的成分会多些，作战地区无论在哪里，争取于北是必要的，是为了巩固赤区与打通兴、于、宁联系。前回许多部队去打□□，赖村还有些打不下，现在三军只以两师去攻打，布置不开。

周：敌人三次进攻至少有三路；战场应在兴、于、宁、瑞一带布置。

欧阳：第三次进攻蒋，决不围攻，最多一两路，南丰一路，吉或永一路，蒋、蔡反蒋成分多些，是不易来的。不反蒋就有后方，这回如不反蒋，就不应退赣州，他只有两师敢向广东移动，必是打广东，战场应在宁都、瑞金间。

主席我们只能大略分析，以便准备工作，现在永丰工作须即刻整顿，赣南于北一带，土围要即消灭，争取到我们手上。在赤区中要防AB团及敌探侵入，医院原则要搬，暂时不动。

毛：南丰之敌现有退走模样。如敌退出南丰，三军之一师，应进到南丰以北里塔一带工作。十二师应移到新丰市工作，三军对赣南工作不但不要增加部队，并且要减少，因为战期必会比较延长。

（二）红军学校问题。（略）

（三）二期战争教训待汀州会议讨论。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九次会议记录

（1931年6月22日）

六月二十二日午后八时于康都总部

出席者：毛（毛泽东）、朱（朱德）、彭（彭德怀）、林（林彪）、谭（谭震林）、周（周以栗）

列席者：王稼祥、会文（蔡会文）、耿凯、化玉（郭化若）

（一）部队布置：

第四军（缺一师）集中后即速以全力取便道进攻沙县，迅速分散筹款，然后分到归化、永安两县，筹款数目四十万，由沙县转移到归永的时间，看南丰敌情而定，敌退就慢移些。

第三军团先以全部向将乐逼进，驱逐周志群，占领将乐、顺昌两县，筹款数目六十万。

十二军分散于宁化、清流、汀州，筹款十五万，并派人到汀州缝被服、买西药，打通闽西交通。如南丰敌退，三军两个师进占南丰，只前进到里塔圩；如敌不退，只留一师□到兴于边。如蒋、蔡反蒋不要逼赣州。

（二）时局估量与行动方针：

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蒋对北方妥协，自然张学良是暂时要利用这时机取得山东全线，而冯阎还是成问题。蒋

对广东自然必处守势，先打红军。但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我们目前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边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

（三）打七坊纪律问题：

如敌不退出南丰，三军仍然照原计划打七坊，但必开干部会召集队伍讲话，说明纪律，群众赤卫队绝不要去，到七坊后要开和平会，立和平公约，第一条要两方不要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第二是兴国赤卫军有帮助七坊农民打反动派的义务，牛不要还，因还不清，双方捉的人要还，已杀的作罢。

（四）四军十二师布置：

一团在荷田康都之线，一团在西城桥、石沟圩之线，一团随总部在建宁，十二军派一连到里心维持交通（与广昌），一团于安源司。

（五）闽赣边特区：

以周以栗同志为书记，指挥汀、连、自、瑞，以周、李井泉为汀、瑞两县委书记，（略）。

（六）南丰问题：

南丰问题，捉胡竹生是对的，但技术做得不好，没有先找一个群众领袖，或是AB团中争取一个领袖，然后再打那个AB团领袖。南丰没有领袖，胡竹生必须要捉时，必须先解决南丰的武装，极秘密扣留，星夜奔走，审问时不应使个个都知道。某些是AB团，也不准随便讲。现在应先设法找回武装，第三军政治部三军的一师应在南丰地方，马上去宣布胡竹生罪状，分田，建立贫农团，找好□□，武装用各种方法找来集中。

给周以栗、谭震林等的信[1]

（1931年6月28日）

以栗同志转边界工作委员会
震林同志转十二军军委：

此次十二军工作区域分得不妥当，清流、连城应让第十二军作第二步工作区。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的工作。十二军担任这三县，三十五军担任瑞金一县，三军担任于都会昌二县，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十二军两个月要做三县工作不是容易的。一次战争[2]后，四个月中十二军做了石城一县宁南[3]半县工作，现在宁南是半色区域，石城是

---

[1] 这是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就红军分散工作区域问题写给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栗和红军第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的信。6月3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红十二军军委并转周以栗及闽赣边工委、红三十五军军委，指出：“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定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下，决不能容我们此时期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信中还说，在目前形势下，红十二军在宁化、石城、长汀三县工作只能计划做一个月，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

[2] 一次战争，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3] 宁南，指江西宁都县南部。

全色区域。过去成绩如此，现要两个月做三县工作是必然难做好的，必定要增加工作时期才行。若推广到清连二县，并且把十二军主力三十四师摆到二县去，那末十二军工作将又是毫无效果。因此须变更康都决议[1]，把三十四师迅速调返来，使他担任宁化全县，三十五师担任石城全县，三十六师担任长汀全县，军直属队在三县之间。望坚决照此布置。

依大局看来，过去所拟三军团去二崇[2]、四军去宁安[3]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4]，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较之我们出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军以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

---

[1] 1931年6月21日至22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丰县康都圩召开第九次会议，讨论时局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行动方针以及战场布置等问题。会议决定第三军团向将乐逼近，占领将乐、顺昌两县，筹款60万；第十二军分兵在宁化、清流、汀州工作，筹款15万；第四军（缺一个师）迫进沙县、归化、永安，筹款40万；第三军两个师进占南丰，限前进到里塔圩，如敌不退，只留一师在兴国、于都边。

[2] 二崇，原件如此，疑为江西上犹、崇义。

[3] 宁安，原件如此，疑为江西定南、安远。

[4] 1931年5月，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联络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

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三军团应以建宁、泰宁、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四军应以归化[1]、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尤溪为筹款区域，即在三县筹款自给。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赣东独立师的中心工作区是广昌，使之联系建宁与石城。所谓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做宣传，而不分田地，不建立政权。工作时期暂定两个月，延长下去可到六个月。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十二军在宁化、长汀、石城工作，要力戒二期在石城、最近在建宁工作之失败（石城游击队尽是流氓、富农，通通反了水），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坚决反对群众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若三县工作再如过去建宁、石城一样，那末军委和三个师委须负严重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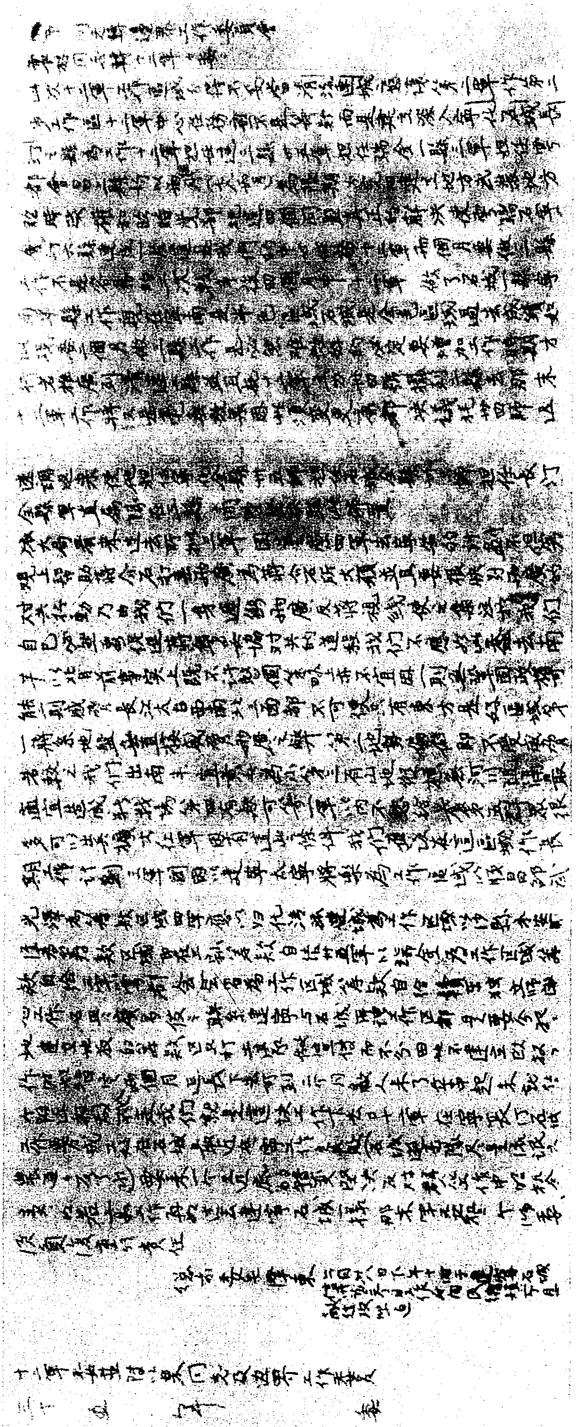
总前委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时于建宁

石城信所说三个月工作时间须缩短一个月，因敌进攻紧迫。

---

[1] 归化，旧县名，即今福建明溪县。



毛泽东给周以栗、谭震林的信，信中重申了1927年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三大任务。

给十二军军委的信

（1931年6月30日）

十二军军委，并转以栗同志及边界工作委员会、卅五军军委：

二十一日，由石城、瑞金两方面付上一信未知收到否？今日无线电消息，何应钦由南昌进到抚州督战。（下略）

又据郝梦龄电台通报称，本军奉命仍随卅四师（廿八）由永丰向上行，由沙溪推进等语。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敌军很迅速地向我们进攻，已毫无疑义，在此形势下决不能容许我们此时做准备工作，大概下月内准备作战。已电令四军及三军去顺昌、沙县，立即摆在将乐、归化筹款，以十天为筹款时期，自然要以敌情为转移，敌不进不集中。五天为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在宁化、石城。昨信说十二军筹款不是主要任务，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群众工作才是主要任务，现在看来，筹款和群众工作同样是主要任务，并且做群众工作若布置得多，只对筹款有帮助，决不会妨碍筹款的。大约此信到宁化时，卅四师已在清流筹款，开自宁化，布置宁化为主要地点，一面筹款，一面把群众大大发动，做到分配田地。卅五师之一团，应在安远，其另一团及师部应去石城。白水工作暂时放弃，因为石城是很要紧的。军直属队在宁化境内，卅六师在长汀（注意做石、瑞、汀、宁交界工作）。这样以主力在宁化、石城两县各有一部分，筹款与群众工作，两俱顾及。要达此目的，卅四师必须从清

流、连城撤宁化，并迅速撤回，才不会妨碍宁化工作。即使清流筹款很有希望，亦不宜超过一个星期至十天，就要撤回。因一星期至十天之久，已经把款子筹得相当多了。宁、石、长汀三县工作，在目前形势之下，只能计划做一个月（一个月后敌允许再延长就是），即是在七月内把三县工作做个又好又多，中心点是要把田地分配。如因地域太宽，部分分配不来，即择重要地点分配，如宁化之安远、牛沙、县城、手口、石牛五点；石城之松山、县城、坪山、沿岗、大犹圩六点；长汀之县城、馆前、古城及四县交界点。每处需有一个阶级认识明确，领导力量强的人去指导，如震林、炳辉、谭政三同志应不在一块，每人专任指导一处，同时兼任巡视一处或两处。每隔十天集合军委机关要开会一次，震林同志一人普遍的出去巡视，专住一处亦可。须知团、连二级负责人很少，能独立指挥群众工作而不错误的，即使一级师长、师政委，亦很难说每一个都有明确的阶级认识而有坚强领导能力。过去各师所做工作之失败，就是证明。你们接到此信，须根据上述原则，重新来一个布置。卅五军在瑞金工作，应注意九堡、沿坝、武阳围、西岗四处，使在一个月内，真正的分配土地，而不要去占会昌。西岗市虽属会昌境内，但界瑞西、于东之间，为于、瑞交界之要地，这处群众工作起来了，影响三县交界很大。所以卅五军应把西岗市的工作，放在自己范围内，并使工作迅速收效。井泉同志，昭良同志应亲往各地巡视，因为卅五军下级干部更不会做群众工作。

红军通讯第二期附上，可作士兵政治课教材。

总前委书记　毛泽东于建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布告：处决黄梅庄

（1931年6月）

查军阀国民党两次调遣共四十万的兵力，并用尽社会一切反革命力量（如组织AB团社会民主党等反动组织），企图破坏苏区和红军，但均被红军第一方面军打得他落花流水，击溃白军在二十万以上。张辉瓒、胡祖玉先后被红军斩首击毙。这伟大的革命胜利已经吓破了全国军阀及帝国主义的心胆。蒋介石为企图挽救国民党的危亡，最近派遣一批走狗来赤色区域，采用军阀的惯技，企图向红军主要负责官长疏通破坏红军团结。蒋介石派来的走狗已经逐一捕获斩决。日前又派了黄梅庄前来，想利用封建关系，拆散红军战线。现该黄逆已经捕获，公开审判议决处□□□□□□□□□□□□□□□□□□□□□□死。查该黄逆梅庄甘心反动，竟受蒋介石使命前来破坏红军，实属罪大恶极者。将该犯黄梅庄验明正身，捆赴刑场执行斩决，以肃反动而寒匪胆。此状。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毛泽东
公历一九三一年六月□日贴

给十二军军委的信

（1931年7月1日）

震林同志及十二军军委：

廿九日宁化的信，今日（一日）收到。没有说到卅六师及以栗同志行动，不知他们已去长汀否？照你们现在的布置是以筹款为中心，因此石城方面完全未派任何人去。你们现在这种布置，可以做一个月，短时期做，一星期至十天。一星期至十天满，卅四师在清流、连城的部队，即行撤回宁化，布置在中沙到长汀界上的线上，及宁化与石城两县交界的线上，多处的工作起来后，百〇四团仍在都上，安远到中沙的一线上，但工作需要向江西边界推进，使与江西赤区接连百〇三团及卅五师师部。十天后，应去石城布置，在三个重要地点工作起来。白水如顾不及，应暂时放弃，第二步再去工作。工作区重新划分，你们只管宁、石、长三县。真正要做好三县工作，非长期用大力不可。瑞金为卅五军专管；广昌归赣东独立师专管（赣东特委直接指导），不归你们。建宁已经做起工作来的地方，暂时归你们指导，这块扩大的红军，亦归你们补充，但未做起来的地方，应归三军团，将来在大局上，建宁应归三军团。

总前委　毛泽东于建宁

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的命令[1]

（1931年7月24日）

一、截至本日止敌情如左：

（一）陈铭枢[2]部（蒋蔡韩罗[3]）在富田、水南、白沙之线与我独五师对抗中。

（二）孙连仲[4]部（郝唐郭李[5]）在沙溪、大金竹之线与我九师

---

[1] 1931年7月，国民党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30万兵力，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由北向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自8月上旬到9月中旬，先后在莲塘、良村和黄陂连续打了三次大胜仗，当敌总退却时，又乘胜追击，分别在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歼灭大量敌军。全役共歼敌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这是1931年7月24日23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于都县银坑牛角塘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陈铭枢，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右翼集团军总司令。

[3] 蒋，指蒋光鼐，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在上海养病。蔡，指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代总指挥兼第六十师师长。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第五十二师师长。罗，指罗霖，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七十七师师长。

[4]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5] 郝，指郝梦龄，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路进击军第五十四师师长。唐，疑指唐奉珍，第二次“围剿”时曾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代师长。郭，指郭华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李，指李韫珩，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五十三师师长。

对抗中。

（三）朱绍良许克祥[1]在南丰，周浑元[2]在甘竹、广昌，毛炳文[3]在白水、头陂，维持陈罗赵卫[4]之交通。

（四）赵观涛师进到砍柴冈、宁都城、田头等处，卫立煌进到瑞金。

（五）陈诚罗卓英两师于十九日进宁都，二十二日分两路，一路进至青塘，一路进至邮村坪。二十三日青塘之敌进至古龙冈，邮村坪之敌进至赖村[5]。此两路每路均为一师。明（二十五）日古龙冈之敌将向桥头前进，赖村之敌必将向平安寨前进。

二、本方面军在敌人深入恐慌疲惫之下，决心首先消灭由赖村进攻之敌，然后转向桥头方向消灭敌军的第二部。

三、我军对赖村进攻之敌军攻击部署如下：

（一）右翼军（第三军团及第四军）归彭德怀[6]指挥，应于明（二十五）日出动，俟赖村敌军进至葛坳附近时，以三军团由老屋场之线抄出敌后，以四军由鲤婆坳、大田之线攻击敌之左侧。为防三寮

---

[1] 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团总指挥。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团第二十四师师长。

[2] 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团第五师代师长。

[3]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团第八师师长。

[4] 陈，指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师师长。罗，指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师师长。赵，指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六师师长。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总预备军总指挥兼第十师师长。

[5] 赖村，村名，位于江西宁都县西南。

[6] 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

方向有敌向葛坳增援，三军团一团兵力扼守龙山使敌军不能通过，又须派出小部队位置于流民坝一带，如有敌企图渡河则努力阻之。

（二）中央军（十二军）于二十五日出动，与第四军左翼取得联系后，经桥背到达葛坳占领阵地，攻击敌之正面。

（三）左翼军（第七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军七八两师）归李明瑞[1]指挥，以七军位置于梅屋，第八师应位置于琵琶垅牵制古龙冈方向之敌，使不能增援。三十五军位置于平安寨策应各方。第七师位置于忠洲附近，牵制古龙冈之敌。

四、总司令部在平安寨、桥背附近。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1931年7月，蒋介石调动3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并亲自督战。

---

[1] 李明瑞，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七军军长。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1]

（1931年7月31日）

（一）顷据十二军报告，东固侵入白石之敌，本日已入崇贤。又据纯化区委报告，富田、陂头、新安[2]一带之敌共约三团，东固蒋蔡部[3]是否全向崇贤及龙冈，敌人现时行动尚不明了。

（二）本方面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先夺取富田、新安。

（三）七月三十一日（本日）一军团各部须乘夜移动到下列地点：四军到石陂圩，十二军到小遥岭附近，总部到田塅，三军到老营盘。三十五军在兴国城，三军团、七军到茶园冈与沙村之间（行三十里左右）择地休息。

（四）八月一日夜间，四军进到古坪圩（在戴家坊、石陂圩之间，是红色区域），十二军及总部进到石陂圩，三军进到小遥岭与石陂圩之间，三军团、七军须进至湾溪、灌溪、铜山、东芫、高陇、马田一带。

---

[1] 这是1931年7月31日19时30分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2] 富田、陂头、新安，村名，均位于江西吉安县东南。

[3] 蒋蔡部，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蒋光鼐当时在上海养病，由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

（五）八月二日夜间，一三两军团各部各从原驻地出发，一军团担任攻击富田，三军团及七军担任攻击新安圩，均须于夜二点（即三号晨）开始攻击。

（六）各军每日行军时间规定为下午六时半至上午五时，上午五时十分至下午六时为休息睡眠时间。不得违误。

（七）攻击富田、新安时总部在三军的先头。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题城岗乡苏维埃政府党支部联[1]

（1931年7月）

主义遵马列；
政权归工农。

---

[1] 1931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率领红军来到江西省兴国县城岗乡。第二天，由乡苏维埃政府党支部书记老胡作向导，观察地形，准备在这一带打好第三次反“围剿”的第二仗。中午登上城岗乡制高点白华山。观察好地形，老胡引着毛泽东来到山顶的书院里。毛泽东用过饭，私塾老师邀请毛泽东为他们题一副对联。毛泽东写下了这副对联。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

（1931年夏）

白云山[2]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3]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4]

---

[1] 反第二次大“围剿”，红军在这次作战中仍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术。1931年5月16日先对由富田（在吉安县城东南90里）向东固（在吉安县城东南120里）地区前进之敌一个师和一个旅突然猛攻，经一昼夜激战大部歼灭之。然后向东横扫，一直打到江西、福建两省的边境。5月31日，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前后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

[2] 白云山，在江西省吉安县东南，吉安、泰和、兴国三县交界处，距东固西南17里，是第二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朱德指挥打第一仗的地方。

[3] 枯木朽株齐努力，西汉司马相如《谏猎疏》：“枯木朽株尽为害矣。”（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说在红军包围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时候，连枯木朽株也发挥了帮助红军反对敌军的作用。

[4]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这是倒装笔法。飞将军，指矫捷勇猛的将军。《史记·李将军列传》：“（李）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这里用来称赞行动隐蔽神速的红军。当时红军隐蔽集结在山上，敌军由富田向东固地区进犯，红军突然从山上打到山下，好像飞将军从天而降。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1]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2]

---

[1]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当时红军从赣江流域的富田地区打起，打到同江西省毗邻的福建省建宁地区（闽山，指那一带的武夷山），东西约700里。战役从5月16日开始至31日结束。

[2]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蒋介石鉴于第一次“围剿”冒进失败，这次“围剿”改用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办法，但仍遭惨败，嗟叹莫及。

消灭由崇贤进高兴圩之敌的命令[1]

（1931年8月3日）

（一）进崇贤之蒋蔡部[2]约三团，其前进哨位置于通高兴[3]方向之大圳（大圳之哨已进到锅都尖山上，在敦丘可以望见），今日上午八时我三十五军与之接触，据报敌有向高兴前进之势。其目的在占兴国。

蒋鼎文、赵观涛[4]到半迳曲洋两处，有进迫于都之势。古龙冈、三寮、青塘、江口、南坑、君埠、良村均无敌，黄陂有赵师之独立旅。龙冈一带之陈诚、罗卓英、韩德勤[5]三师于八月一日到富田，龙冈到沙溪一线只有郝师[6]一旅（三团）、唐郭两师残部（约六团）。

---

[1] 这是1931年8月3日20时30分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泰和县老营盘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作战命令。

[2] 蒋蔡部，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蒋光鼐当时在上海养病，由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

[3] 高兴，即高兴圩，村名，位于江西兴国县西北。

[4]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四军团总指挥兼第九师师长。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六师师长。

[5]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师师长。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师师长。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第五十二师师长。

[6] 郝师，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三路进击军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

东固至崇贤一线有蒋蔡两师（共十团，余在富田、新安、吉安）、李云杰师[1]（六团）、郝师之一旅（三团），共十九团左右，其目的在到兴国。其一部占领东固协助富田之敌对付已到富田附近之红军。

（二）我方面军决心于明（四）日消灭由崇贤进高兴之敌。

（三）明（四）日攻击部署如左：

敌进高兴圩之后，三军由现驻地（新圩）从右翼打去，十二军由现驻地（枫林、库村——在崇贤到长迳口之间）从左翼打去，四军由现驻地（长迳口）打敌之正面。三军团、七军由现驻地分为两路，一路由小遥岭进至长迳口附近，一路由石陂圩走大小遥岭左边之小路（本日十二军走的路很好走，由石陂圩木桥边分路）到枫林、库村附近。三军团、七军的任务是总预备队，相机增加击敌。

（四）今明两日总部在黄土垇。

附记：

1. 敌不进高兴，我军明日不动。
2. 三军团、七军须于本日夜十时开动，拂晓到达目的地。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李云杰师，指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

消灭龙冈之敌的命令[1]

（1931年8月8日）

（一）敌之整个布置见蒋介石八月二号命令，已另录。龙冈[2]有敌第五师四团、五十四师两团（昨日未与我军作战的），加上昨天与我军作战的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败兵约两团，共尚有敌八团。崇贤、方太之蒋蔡部[3]，兴国江背洞之赵观涛[4]部，青塘、古龙冈之孙连仲[5]部，均在向我军前进，但明日（九号）不能达到龙冈。

（二）我军决心以全力消灭龙冈之敌。

（三）攻击龙冈部署如左：

三军团及七军任左翼，今夜宿营于兰石，担任攻击龙冈之西北

---

[1] 这是1931年8月8日14时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约溪起草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第一方面军继1931年8月6日至7日在江西兴国县莲塘、良村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第五十四师各一部后，决心再歼龙冈之敌。在开赴龙冈途中，获悉龙冈国民党军第五师已有准备，即改变计划，以第三军向龙冈佯动，主力则连夜东向黄陂。

[2] 龙冈，村名，位于江西永丰县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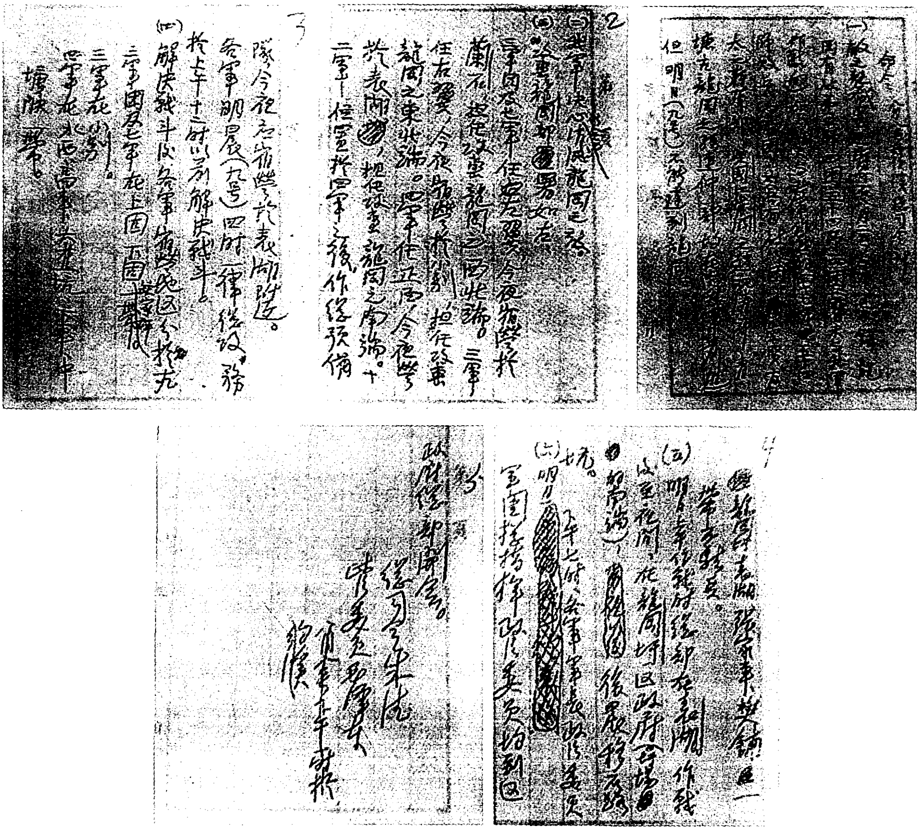
[3] 蒋蔡部，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总指挥蒋光鼐当时在上海养病，由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代总指挥。

[4] 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六师师长。

[5]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端。三军任右翼，今夜宿营于小别，担任攻击龙冈之东北端。四军任正面，今夜宿营于表湖，担任攻击龙冈之南端。十二军位置于四军之后作总预备队，今夜应宿营于表湖附近。

各军明晨（九号）四时一律总攻，务于上午十二时以前解决战斗。



毛泽东起草并签署的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作战命令。

（四）解决战斗后各军宿营地区分于左：

三军团及七军在上固、下固、缺家坪一带。

三军在小别。

四军在水西、高车、大蕉坑、下车、中塘陂一带。

龙冈圩、表湖、张家车、樊埠一带不驻兵。

（五）明日上午作战时总部在表湖。作战后至夜间，在龙冈圩区政府（圩场的南端），后晨移石头坑。

（六）[1]明日下午七时，各军军长、政治委员，军团总指挥、政治委员均到区政府总部开会。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这一条内容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42年编印的《军事文献》中为（七），（六）的内容为“伤兵、俘虏、枪械均由各军自行处理。伤兵医院设君埠西端之空坑（离君埠十五里）一带。枪械收集于陂头（君埠与汉下之间）。”这是毛泽东手稿中所没有的。

裁减行李马匹的通令[1]

（1931年8月17日）

三次战争[2]中，敌以很大机动的力量运动部队进攻红军。我们现在已取得第一步第二步的胜利。现在我们要准备长期和敌人作战，要准备经常的夜行军，这就须要加强红军的机动力量，比敌人不只强十倍百倍，以取得三次战争全部胜利。因此，各部队须努力执行下列两件事：

（一）裁减笨重行李。凡笨重行李与不经常使用之大行李，限明日裁减完毕，集中于各军军部，另择偏僻安全地方安置（地点另行通知），其余担子重量，必须每担不过四十斤。

（二）此次行动，各部队马匹妨害行军非常之大。妨害行军，即是妨害战略执行。而且各部队常于战后擅自补用马匹，则不独妨害行军，更易养成战斗人员懦弱腐化，殊属不对。前十二军三十四师，曾实行连上不要一匹马，结果很好。现在为了加强红军的机动力量，对于马匹要下最大决心裁减下来。兹规定裁减马匹，连上不要一匹马，团留两匹、师两匹、军七匹（军长、军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军需处长、副官长、军医处长）。某几个特别情

---

[1] 这是1931年8月17日10时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令。

[2] 三次战争，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况的部队，如无线电队、交通队、机关枪连得由军长、军政委按照需要，批准使用马匹数目。又，留下马匹，必须不要坏马。其规定以外，多余马匹一律限于明天（十八号）由各军集合（马夫在内），派员带到官田，交赣南特委，作为后方运输伤兵、枪械、粮食等之用。

上列两事望各部切实执行为要。此令！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节省经费的通令[1]

（1931年8月22日）

一、三次战争[2]已为我工农红军取得第一步胜利，但目前仍须准备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艰苦奋斗，以持久战略来消灭敌人，争取三次战争的全部胜利，才能完成创造苏维埃根据地、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任务。在这种精神之下，本方面军经理处曾召集第五次经理会议，具体规定目前节省经费办法，经本总司令、总政委批准应即遵照执行。

二、目前各种用费规定如下：

（一）伙食费照原发一角，后方医院同。

（二）马干照原发一角，但必须照新规定的马匹发钱。

（三）办公费

连每月四元。

经理处、卫生队、交通队、无线电队、军士连、教导队、军医处、特务队、军需处、保卫队等与连同。团、营与连同。

师六元（办公应在内）。

师政治部六元。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通令。

[2] 三次战争指1931年7月开始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军部十元（办公应在内）。

军政治部十元。

总指挥部十五元（办公应在内）。

总政治部十五元。

总司令部二十元（办公应在内）。

总政治部二十元。

（四）夫费

1. 工作每天发大洋一角五分。

2. 休息每天发大洋一角。

3. 回家按路程计算，发给伙食钱，每天一角，并每天发给工资一角。

（五）病兵休养费

1. 病兵一概由军及师军医处负责送，伙食、休养费均归军医处发。

2. 随军队休养的不发休养费。

3. 送政府休养的发大洋一元带伙食一元。

4. 送后方医院的休养、伙食费一概不发。

（六）伤兵费

轻四元

重八元

（七）俘虏费

每名发三元

（八）客饭费

每餐三分，无公事者不得领钱。

（九）向导工资与临时夫子同，有特别情况者不在此例。

三、节省经费是争取三次战争胜利的重要问题之一，要保障以上规定各项用费能遵照执行，各级主管官长须有切实之监督，尤须保持经理机关之独立系统。查近来各军对于经费支付有由师部批发，军需处不批发的；有下级政委在军需处噪闹的；有军需处只受师长、政治委员指挥，不能在经理系统之下工作的（三十五师），调换军需人员不告诉经理处的（第三师）；有力批发手续问题，经理人员与军长、政委冲突的（三十五军）；有调监护兵、长夫不经经理机关同意强蛮调用的……这些事实都是不认清经理独立的意义，间接就妨害争取三次战争全部胜利的任务，应严格改正，概遵工农革命委员会[1]与革命军事委员会[2]前后两次通令，切实执行，特此通令。

---

[1] 工农革命委员会即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1930年8月与红军第一方面军同时成立，负责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政权，毛泽东任主席。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取消工农革命委员会。

[2] 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1年1月成立，受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负责指挥全国红军，项英任委员会主席。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题黄陂联[1]

（1931年8月）

黄虎山洞吠白犬[2]；
陂水长流锁蛟龙[3]。

---

[1] 1931年8月11日，在反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率部包围驻黄陂的国民党军毛炳文师，歼灭其四个团。毛泽东对黄陂人民和黄陂的山山水水怀有深厚的感情，因而创作了这副嵌名联。黄陂，江西省宁都县的一个小镇。

[2] 黄虎，喻指英勇的红军。白犬，喻指国民党军队。

[3] 陂水，象征革命人民的力量。蛟，古代传说中的动物，民间相传以为能发洪水。一说母龙，无角。《楚辞·九思·宋志》：“乘六蛟兮蜿蝉。”王逸注：“龙无角曰蛟。”蛟龙，喻指为害人民的国民党军队。

转移阵地截击敌军的命令[1]

（1931年9月11日）

（一）据报，敌韩德勤部[2]于九号晚复退回兴城[3]，蒋蔡两师[4]主力仍在高兴圩附近，蒋鼎文[5]残部在长迳口，敌之游击队十号到绮冈、隆坪当晚即撤走，本日游击到六寨之敌午后亦撤走。老营盘[6]附近有我独立四师，老营盘有我省苏[7]及四军收集子弹之一连，三军第九师在六寨附近占领阵地，至明日（十二）下午二时即撤至成功圳占领阵地。

（二）方面军决转换阵地截击敌军，拟于明（十二号）日移动，派第三军为掩护队，在老营盘附近掩护。第三军团、第七军着于明（十二号）晨四时由现在地（均村一带）出发，经高湾、下坪锡、上坪锡、东坑、十八排、黄龙坪到浪川[8]（四十里），在浪川之茶芫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兴国县茶芫冈发布的命令。

[2] 韩德勤部，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第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

[3] 兴城，指江西兴国县城。

[4] 蒋蔡两师，指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第六十一师和第六十师，师长分别为戴戟（原为蒋光鼐）和蔡廷锴。

[5]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四军团总指挥兼第九师师长。

[6] 老营盘，村名，位于江西泰和县和兴国县交界处。

[7] 省苏，省苏维埃的简称。

[8] 浪川，村名，位于江西泰和县南部。

（住房屋一半，须适当分配）、下元一带布置宿营。

第四军及三十五军着于明晨四时由现在地（小章贡、长窖、里溪等处）出发，经小章贡到富足，可分为两路，一路走天子壋，一路走钓鱼台，均到浪川之石灰尾[1]及茶芫（住房屋之一半，须适当分配）一带布置宿营。如石灰窑总直属队宿营地有多时，应划分一部为第四军宿营地。

总直属队由杨副官处长[2]指挥，着于明晨五时由现在地（富足）出发，经龙上、钓鱼台到浪川之石灰窑宿营（石灰窑之房子由总部杨副官处长分配，总直属队住完后剩余归四军）。

第三军之新兵团明日移到浪川之白果树下。

（三）三军团到宿营地后，须派员往小庄侦察渡河点并架桥，准备后天通过小庄往田塅。

（四）总部明夜在石灰窑，各部到宿营地后须立即派传令兵到总部接受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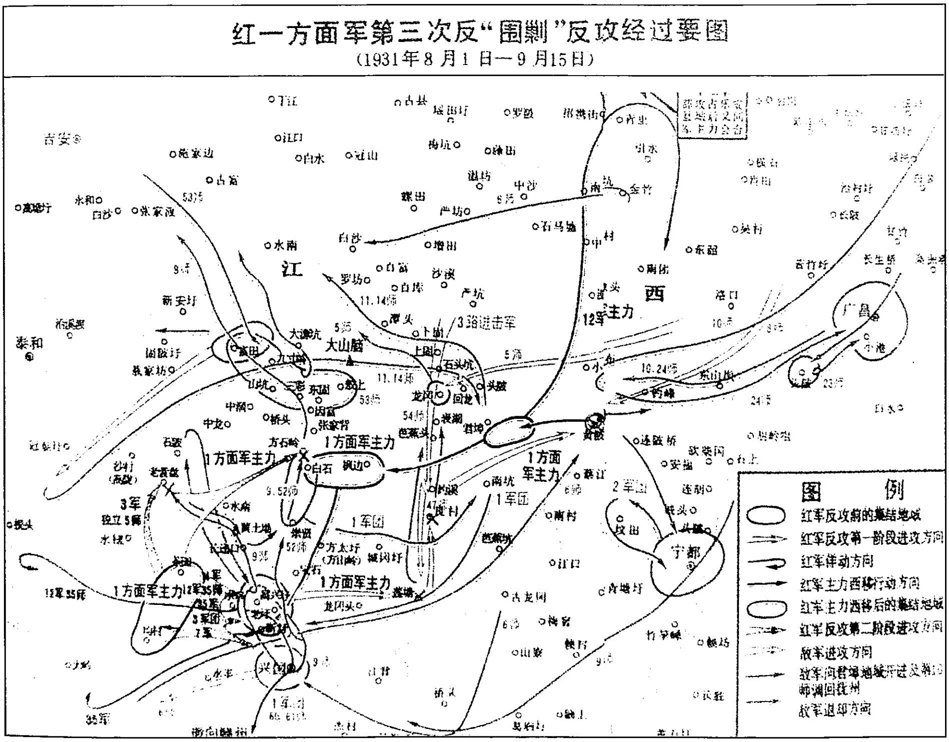
（五）各军应把政治部暂时留下照顾伤兵，候交通恢复，即向龙冈头一带归队。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九月十一号夜九时二十分于茶芫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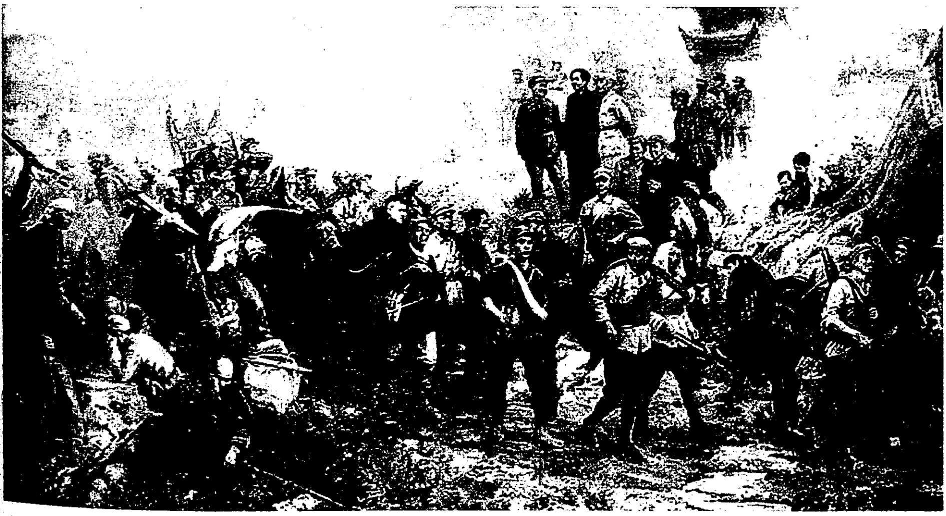
---

[1] 石灰尾，似应为石凤尾。

[2] 杨副官处长，指杨立三，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官处长。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反攻经过要图
(1931年8月1日—9月15日)
吉安
泰和
江
西
广昌
宁都
兴国
黄陂
大山脑
1方面军主力
1方面军主力
1方面军主力
1方面军主力
1方面军主力
1军团
1军团
3军团
7军
3军
12军主力
3路进击军
2军团
图例
红军反攻前的集结地域
红军反攻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红军佯动方向
红军主力西移行动方向
红军主力西移后的集结地域
红军反攻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敌军进攻方向
敌军向苔塘地域开进及第10师调回赣州
敌军退却方向

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反攻经过要图。



《反"围剿"的胜利》(油画)

开往福建工作筹款的命令[1]

（1931年9月23日）

（一）自我军三期战争[2]完全胜利后，白军已全线撤退，蔡廷锴[3]部之六十、六十一两师已于十九日退出兴国城向赣州开走；陈诚[4]之十四师、罗卓英[5]之十一师、卫立煌[6]之第十师、区寿年[7]之七十八师皆在吉安；七十七师罗霖[8]部拟即开往长沙；第九师蒋鼎文残部已逃到吉安对河；第五师周浑元[9]、第六师赵观涛[10]、五十三师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兴国县水头庄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入闽的第一号命令。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以后，鉴于红军连续作战，急需休整补充，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第一方面军总部决定以少数部队监视敌人，主力转移到赣东南和闽西北地区，休整部队，筹措给养，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

[2] 三期战争，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3] 蔡廷锴，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军团代总指挥兼第六十师师长。

[4]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十四师师长。

[5] 罗卓英，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师师长。

[6]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总预备军总指挥兼第十师师长。

[7] 区寿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师长。

[8] 罗霖，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七十七师师长。

[9] 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第五师代师长。

[10] 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一路进击军总指挥兼第六师师长。

李韫珩[1]部都正向吉安退却中；孙连仲[2]部之二十五、二十七两师在宁都一带；李云杰[3]之二十三师在头陂；朱绍良[4]率二十四师许克祥[5]、第八师毛炳文[6]残部在广昌；福建之张贞[7]部四十九师在南阳、白沙一带。

（二）方面军决开到福建去工作筹款，并定于二十五日由现在地（莲塘、龙冈头、长信、水头庄之线）分七天行程（第五天休息一天）开到汀州[8]城集中。

（三）各军之行进路线如下：

一、第三军团及第七军为右路，应于二十五号由现在地（长信）出动，经过江背洞、桥头、银坑在曲洋过河，再走下坝、三载、稳村、冈面圩、羊角圩、河坑口到瑞金城，分四天行程。第五天（二十九号）在瑞金城休息一天。三十号再由瑞金城经古城，分两天行程开到长汀集中。

二、第四军为中路，应于同日（二十五号）由龙冈头出发，在总直属队后行进。经过水头庄、水背、坝子上、新圩子、琵琶垅、平安寨、大田圩、黄屋乾到长沙过河，务于第三天（二十七号）上午渡河完毕，再走流民坝、上田、渡头圩、官仓下到黄柏圩，分四

---

[1] 李韫珩，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五十三师师长。

[2]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3] 李云杰，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二十三师师长。

[4] 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团总指挥。

[5] 许克祥，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团第二十四师师长。

[6]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三军团第八师师长。

[7]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围剿”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8]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天行程。第五天（二十九日）在黄柏圩休息一天。三十号再由黄柏圩经云集圩、合龙市、柳东脑，分两天行程开到长汀城集中。

三、第三军为左路，应于二十五号由现在地（莲塘）出发，经过官田、忠洲、古龙冈、三寮、澄江圩、杨梅头、黄屋乾到长沙，在四军后过河，再走瑞林寨、羊坑、山河圩、院溪村，分四天行程到壬田市。第五天（二十九号）在壬田市休息一天。三十号再由壬田市走九工排、湖陂、白虾、沿冈、篁[1]、罗白坪，分两天行程到长汀城集中。

四、总部及直属队应于二十五日晨四时由现在地（水头庄）出发，在中路第四军前头，沿第四军之行军线前进，务于第二天（二十六号）在长沙渡河完毕，在河之南岸择地宿营。第三天到官仓下附近，第四天到瑞金城宿营，以后则沿右路第三军团之行军线到长汀。

（四）各军在曲洋、流民坝两点渡河时应各派出渡河指挥员指挥渡河事宜，特别注意对空警戒（派对空瞭望哨，布置多数机关枪对空防御）。总直属队务于二十六号在长沙（即流民坝对河）渡河完毕。第四军务于二十七号拂晓开始迅速渡河，限于二十七日午前渡河完毕。第三军接第四军后在同地（长沙）过河。

（五）各军留下之临时病院，统归红军后方总医院（院长戴济民、政委贺诚）指挥，各军寄在后方和地方上的大行李，由各军自行处置。

（六）总部第一天到平安寨，第二天到流民坝附近，第三天到官仓下，第四天在瑞金城，以后位置另定，各军每天到达宿营地后须

---

[1] 原件“篁”后缺一字。

有一报告送部。

附记：

1. 各军行进路线详见附图，但须绝对秘密，只转发到师为止。

2. 各军自行规定到瑞金城、黄柏圩、壬田市之行军计划，只发到团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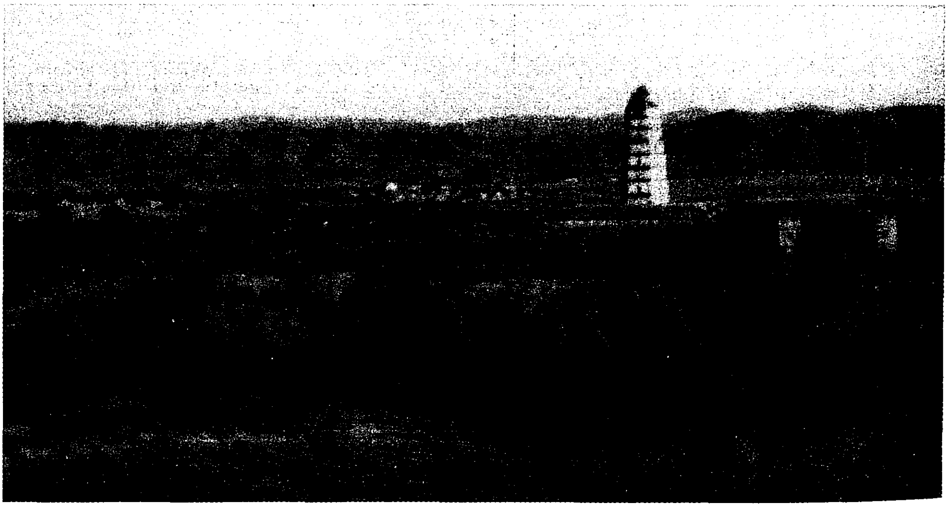
3. 右路行军线以右地区，任由三军团及七军自行另找平行路分途行进。左路行军线以左地区，任由第三军自找平行路分途行进。

4. 各军在渡河点附近应选择对空阵地，配备八架以上之机关枪，如敌飞机飞至低空（八百米以下）扰乱我军渡河时，由各渡河指挥员或各军军长（总指挥）指挥射击之。

5. 各军于行军中应指定得力参谋，沿途调查行进之路程、行进路附近之房屋、山水、地形等。每到一宿营地须调查宿营地之社会情形，与四通八达路线。到集中地时要把调查结果汇报总部参谋处。

右命令六项附记五项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1931年8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

（1931年9月25日）

士兵兄弟们！

国民党的军阀们不是常常对你们说：你们的责任是在“保国卫民”吗？但是，你们看：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请问：国民党的军阀们怎样实行着他们“保国卫民”的责任呢？现在他们对你们讲些什么话呢？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暴行，国民党的军阀们叫你们“不要抵抗”；叫你们“逆来顺受”；叫你们伸着脖子让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来屠杀；叫你们安安静静地做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军阀只能向帝国主义献媚投降，只能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是既不能“保国”，也不能“卫民”的！

但是，国民党军阀们，为了他们自己争地盘，为了扩大他们剥削与屠杀中国民众的范围，他们内部却年年岁岁举行着军阀的混战；为了军阀的战争，他们很勇敢地驱逐使你们到战场上去残杀你们自己的兄弟，去破坏民众的生命财产；他们征收苛捐杂税，他们拉夫拉马，他们吸吮着劳苦民众的最后一滴血；他们屠杀革命工

农；他们强迫人民种鸦片烟来害毒民众；他们造成全中国空前的灾荒（水灾、旱灾、饥荒）；在剥削民众与屠杀民众方面，他们都表示了很大的坚决与勇气！

尤其当我们苏维埃区域的工农群众自动起来——驱逐了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了国民党的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创造了工农自己的武装工农红军、建立了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底时候，国民党的一切军阀就死命地挣扎，表示他们的决心与勇敢，一次二次三次地依靠帝国主义者帮助向我们进攻；用飞机、炸弹、毒气、大炮、机关枪等，屠杀苏维埃区域的民众。虽是他们的进攻都被我们和民众奋勇打败了，然而如若我们不根本消灭他们，他们决不会放松我们的。在进攻人民的苏维埃政权与人民的红军方面，他们又是非常勇敢的！

士兵弟兄们！你们受这些军阀的欺骗与压迫已经够了吧！你们想想看：你们到底为了什么替这些军阀们拼命？如若说你们是为了养家活命吧？事实上，就是你们自己也常常领不到一个钱的薪水。你们自己都食不饱，衣不暖，还何能养家？你们的长官把你们当作牛马、当做炮灰，要你们为他们升官发财去拼着性命来残杀自己的工农弟兄们！

士兵弟兄们！你们必须要另想出路呵！你们的出路是有的——这出路就是革命！你们现在手里有的是枪炮，你们首先把你们的反动长官杀掉；然后你们同当地的工人农民与一切劳苦群众联合起来，把国民党的鸟政府打倒，把地主阶级的土地没收过来，分配给贫苦的农民、把有钱人的粮食、住房拿来充公，分配给穷人住、穷人吃；使工人只作八小时的劳动；并且你们大家组织起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样，你们就创造出了工农兵的政府，即苏维埃政府。

你们就变成了工农的武装——工农红军。如若你们驻防地的旁边已有了苏维埃政府与红军，那你们就活捉或杀掉你们的反动长官，然后你们就投到那里去加入红军。只有苏维埃政府，只有红军，才能保护工农兵士的利益，才能打倒国民党，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才能真正保国卫民！

士兵兄弟们！团结起来！倒转你们的枪头，为打倒剥削压迫与屠杀中国劳苦群众的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建立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而战吧！我们这里数十万红军士兵弟兄们正欢迎着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呵！

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团长　朱德
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长　贺龙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长　彭德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　黄公略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挽黄公略联[1]

（1931年9月）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

[1] 1931年9月15日，部队在转移中，黄公略率红三军开赴瑞金，途经江西吉安东固六渡凹山峡，突遇敌机扫射。他一面组织队伍隐蔽疏散，一面指挥对空射击，不幸中弹牺牲，牺牲时年仅三十三岁。9月16日下午，红军在兴国莲塘村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大会，并亲笔写下这副挽联挂于会场主席台两旁。

收集攻打土围炮楼经验的训令[1]

（1931年10月14日）

（一）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

（二）以前打土围子攻炮楼都是用步兵的冲锋，用炮兵威吓，实在不够得很，死伤很多，土围子炮楼还是没有打开，总不晓得用工兵的效力去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他的围墙，再冲进去，或是用多量火药完全给他炸个干净。

（三）红军最近攻打土围炮楼的斗争经验中得着很多教训，学习得很多本领，有把握地打开了许多有名炮楼，消灭了敌人最后的堡垒。

（四）土豪的土围炮楼在乡村中正在修筑，军阀在城市里已筑了坚固堡垒，防御红军的进攻。红军的攻城攻坚的战术，应该在打土围攻炮楼的斗争中学习成功。

（五）各军接到此训令后，务将各军、师、团直接打土围子攻炮楼的指挥员的实际经验，兵力布置，工作的方法，如挖地洞的方法，用的工具，爆炸的药种药量，爆炸的效力，收效的成绩，详细的开会讨论后汇集起来报告总部，再由总部参谋处加以讨论，汇集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苏字第一号训令。

有效的有经验的方法编为筑垒攻城教范，训练红军。这是目前万分需要的，限训令到十日内汇集转报，勿延为要。此令。

总 司 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

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1931年11月20日）

同志们！大会此刻举行闭幕了，大会已经得到伟大的胜利！我代表临时中央政府说几句话：

临时中央政府在目前时局之下，在大会所付托的使命之下有三个大的任务：

组织革命战争。革命的发展威胁了国民党军阀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统治。反革命的统治势力是要和我们革命的统治势力作残酷的斗争的，所以革命的临时中央政府，第一个任务就是团结〈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指挥这个战争使它逐步胜利，用战争的方法把国内的敌人推倒，使反动统治区域一天一天缩小，使苏维埃区域的版图一天一天扩大。同志们要知道，推翻反动统治，战争是惟一的方法，此外没有第二个方法。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不是和平建设的机关，而是指〔挥〕战斗的机关，我们要反对那种柔弱怕战争的心理，要组织广大群众用在大规模的战争上面，首先摧毁敌人的武力，推翻敌人的政权，才有我们呼吸说话的余地。

第二是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在一省几省地区内首先胜利。我们要巩固的根据地，还要大范围的根据地，就是为了对付战争，为了在扩大规模的更残酷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我们要在大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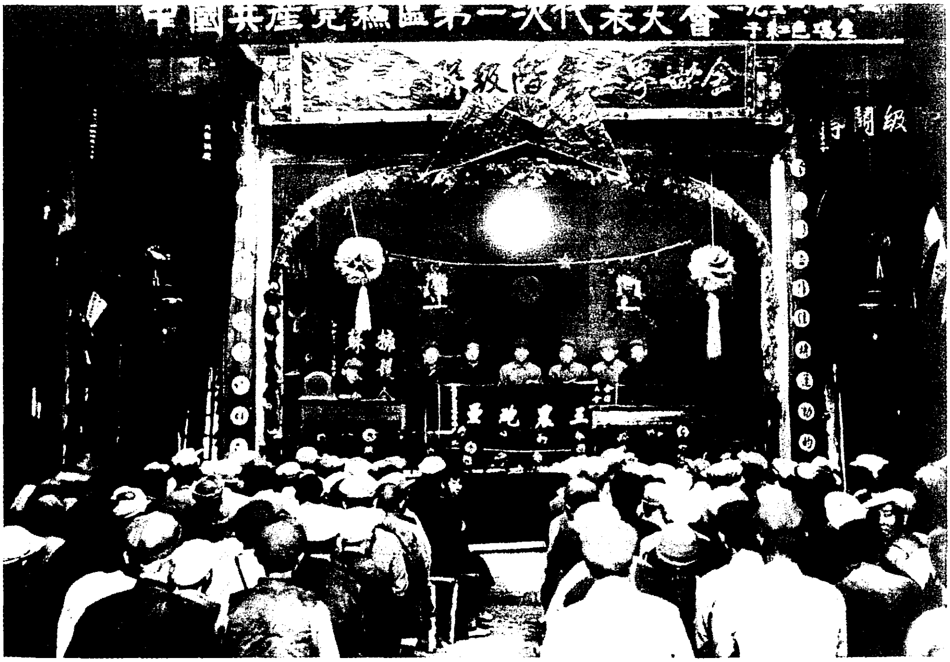
地方实行大会决定的那许多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政纲和法令，发布我们的宪法，使广大工农群众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国家权力机关去对抗敌人阶级的国家权力机关，去统治敌人阶级。要用劳动法去争取广大的人民群众，要用土地法去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要用这些法令和它在苏维埃共和国内实行的实际效力，去影响白色区域的工农劳苦群众，去瓦解白军士兵，去动摇敌人的统治。临时中央政府应该要在这样的努力上而去建立巩固而扩大的根据地，应该随着战争的开展去扩大我们的根据地，随着根据地的巩固，愈扩大去执行更大规模的战争，使这种战争能够取得完全的胜利。

第三是创造一支大而有力的红军。临时中央政府组织革命战争的〔军事〕组织红军队伍，〔是〕首先的任务。现在的红军还不大，我们要造〔就〕一支大红军才能抵抗白色统治阶级，用来战〔胜敌人〕的军队。我们并要使这支红军强有力，使大数量的红军之内有主力军才能胜敌人强有力的部队，夺取中心城市。

临时中央政府的三个任务（组织战争，创造根据地，创造红军）不是少数人的努力而能够实现的，要在各级苏维埃的努力下面，在广大群众的努力下面才能实现。并要知道战争是我们生活的中心，不是战争，不能使根据地扩大；不是战争，也不能使根据地巩固；不是战争，不能扩大红军；不是战争，不能使红军建成铁军。工农劳苦群众完全要知道：用战争武装自己，用战争打倒敌人，战争是使我们得到解放的惟一有效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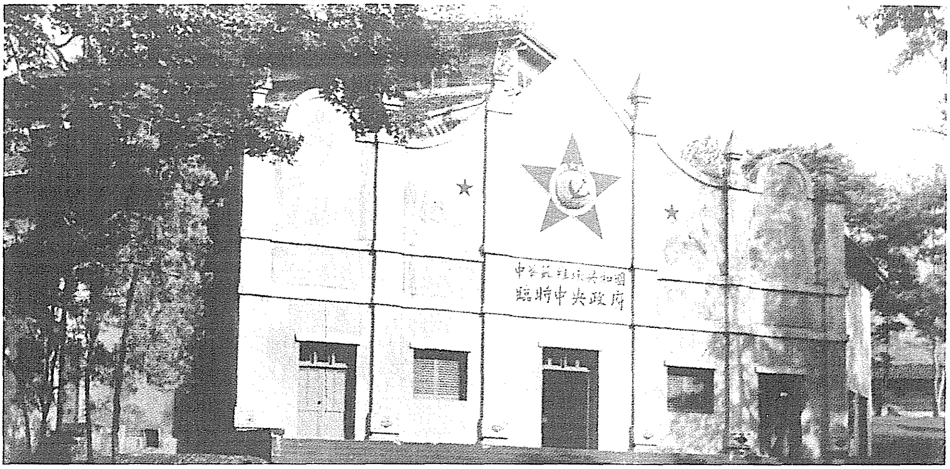
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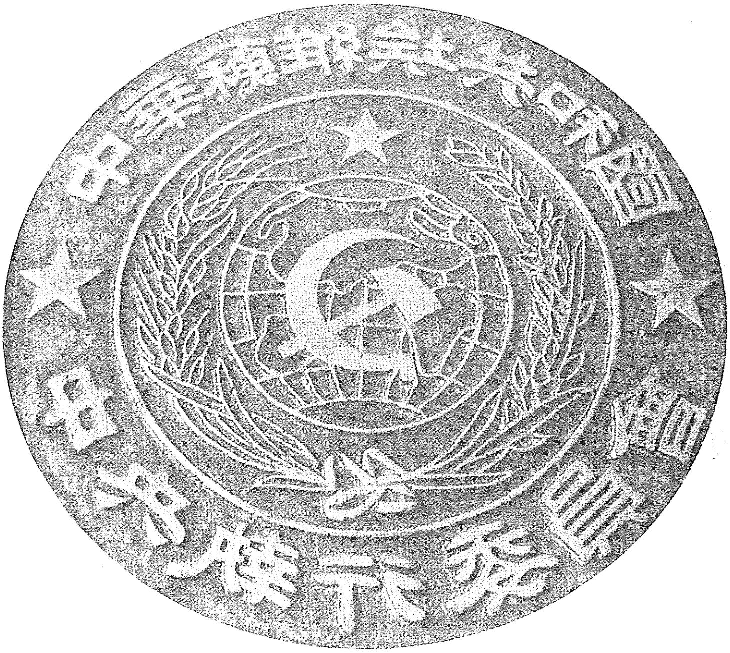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
工農兵

1931年11月1日至5日，由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图为大会主席台会场。右四为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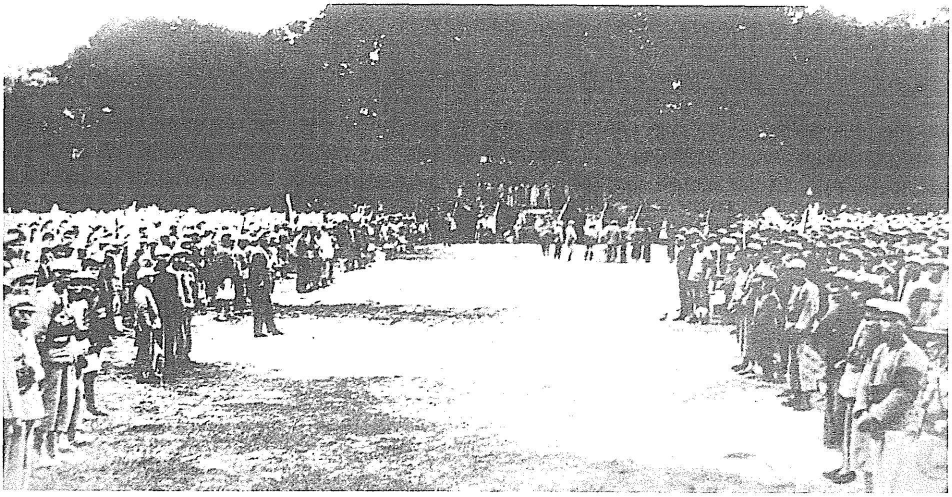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委员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合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臨時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图为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钢印。



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给红军授旗。

毛泽东在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的故居。

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31年11月27日）

同志们！今天，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了中央各人民委员部委员，也就是各部的部长。会后，大家就要走马上任，代表人民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用枪杆子打出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尽管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还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个部委该有都有。同志们，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过去我们只会种田，会做工，后来学会了打仗，现在我们面前又摆着一个新课题，还要学会治国安民的艺术，要学会建设国家的本领。我们现在的中央政府还是临时的，我们甚至连国歌、国旗、国徽都来不及制定出来。这没有什么关系，孩子都生出来了，还怕取不出名字？没有国歌，就唱《国际歌》，没有国旗，就暂时打红军的军旗嘛。

同志们，从来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共产党人。国民党现在天天喊“围剿”，要消灭我们。等将来我们强大了，我们就从农村根据地出发去包围城市，去打倒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到时，我们的中央政府就成为一个正式的政府，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完全的统一的国家，再不是一只小鸟，而是一只大鹏，展翅翱翔，鹏程万里，将是一个雄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国！

同志们，大会选举我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我没有别的本事，但有一条：我保证将与同志们一道，认认真真地工作，真心实意地为工农兵大众谋利益，也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将我们的苏维埃事业推向前进！

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图中站立者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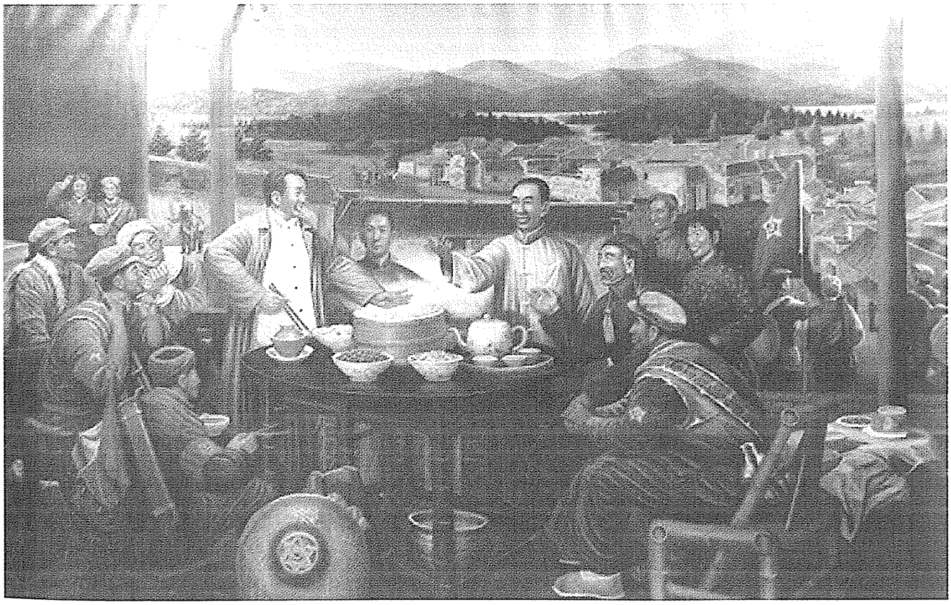
戏题兴国“四星望月”菜联[1]

（1931年秋）

上盘下盘，盘叠盘，猪肉、米粉、芋头片，盘盘装好菜；
主料配料，料拌料，酱油、辣椒、蒜头瓣，料料出佳肴。

---

[1] 1931年秋的一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来到兴国县长冈乡作农村调查。吃午饭的时候，村中刘大娘要用当地人爱吃的拿手菜招待他，她用猪肉片蘸上米粉，下垫芋头片，拌之酱油、辣椒粉、蒜头瓣等调料分别盛在四个盘子里，三个小盘放在下层，上面叠放一个大盘，一起放在蒸笼里蒸。没多久，就蒸好端在饭桌上。毛泽东看到这大盘叠小盘就感到新鲜，举起筷子一尝，真是鲜美极了，忙问在座的人，这菜叫什么。孙大爷回答道：“我们这里的人，只知道这么做，却叫不出名字。”这时，陪同来的乡长说：“请您起个名吧。”毛泽东说：“好说，好说，那我就为这菜撰副对联吧，‘上盘下盘，盘叠盘，猪肉、米粉、芋头片，盘盘装好菜；主料配料，料拌料，酱油、辣椒、蒜头瓣，料料出佳肴。’横批是‘四星望月’。”在场的群众齐声赞好。



《四星望月》（油画）

关于暂行婚姻条例的决议

（1931年11月28日）

在封建统治之下，男女婚姻，野蛮到无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只有工农革命胜利，男女从经济上得到第一步解放，男女婚姻关系才随着变更而得到自由。目前在苏区男女婚姻，已取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姻制度。

但是女子刚从封建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她们的身体许多受了很大的损害（如缠足）尚未恢复，她们的经济尚未能完全独立，所以关于离婚问题，应偏于保护女子，而把因离婚而引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负担。

小孩是新社会的主人，尤其在过去社会习惯上，不注意看护小孩，因此关于小孩的看护有特别的规定。

此条例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公布实行。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

（1931 年 11 月 28 日）

（一）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税收是主要的来源，中央政府根据宪法的规定，废除国民党军阀的一切田赋丁粮，苛捐杂税厘金等，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二）统一累进税对于任何方面都只是征收一种税，征收的原则，除去将纳税的重担放在剥削阶级身上外，依阶级的原则来解决，对于被剥削的阶级与最苦的阶层的群众，免除纳税的义务。

（三）在目前因革命战争关系，全国苏区不能连成一片，以及许多特殊情形之下，对于农业税只能以主要出产为收税的标准，对于一切副产品暂不征收，农业税率的规定，也只能以能维持必需生活费外，为开始征收标准，按数逐渐起累，不足标准者概免税，富农则征税较重；起征的标准要低于贫农中农一半。规定这一原则，由各省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形，定出农业税的税率。

（四）在目前为发展苏维埃区域的经济起见，对于商业出入口税和工业的出厂税暂行免税。

（五）本税则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起实行生效。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1]

（1931年11月）

中国工农红军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到现在的四年艰苦斗争中，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配合广大工农坚决地执行土地革命，反对国民党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从豪绅地主阶级手上夺回土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自己锻炼成强有力的红军，打破了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军阀三次大规模的进攻[2]。这种为工农阶级为苏维埃政权英勇斗争的精神与胜利，是值得钦佩与称扬的。苏维埃阶段中革命运动向前开展，更需要红军的扩大与巩固，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去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达到建设苏维埃的新中国，而完成红军在历史上的阶级任务。因此，红军战士及其家属应得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优待，大会特颁布下列优待条件：

第一条　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其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地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

第二条　凡红军战士家在白色区域的，以及新由白军中过来

---

[1]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会议还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决议和条例等文件，本条例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通过的。

[2] 指国民党军在1930年11月到1931年9月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三次大规模“围剿”。

的，则在苏区内分得公田，由当地政府派人代耕。

第三条　红军中退伍士兵不能服务准给长假的，准由红军公田内分配土地给他耕种。如有在苏区安家的，其家属仍分得土地。

第四条　红军战士在服务期间，无劳动力耕种家中土地或分得之公田，应由苏维埃政府（区政府计划，乡政府执行）派人帮助全部耕种、灌溉、收获工作，所派人工，每年不得少于五十工，红军战士家中缺少劳动力的，应按其需要予以补助。

第五条　为要执行上述条例起见，特规定凡未在红军中服务者，应实行无代价的“优待红军工作日”。每人每月帮助红军家属工作两天，时间与工作种类依红军家属之要求而定。

第六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苏维埃共和国之一切捐税。

第七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家属所居住之国家房屋免纳租金。

第八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本人及其家属得享受国家商店百分之五减价的优待。当必需品缺乏时，有优先购买之权。

第九条　凡红军战士乘坐轮船、火车，其费用概由公家发给。

第十条　一切戏场每月须有一次免费欢迎红军看戏，平时票价减半。

第十一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子弟读书免纳一切费用。

第十二条　红军在服务期间，因伤病须休养时，应送到最适宜之休养所休养。在休养期间，一切用费由国家供给。

第十三条　在红军中服务五年以上，年龄满四十五岁者，可退职休养，国家补助其终身生活。本人不愿退伍愿继续服务者，应得特别优待。

第十四条　国家设立残废院，凡因战争或在红军服务中而残废

者入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不愿居残废院者，按年给终身优恤费，由各县苏维埃政府按当地生活情形而定，但现时每年至少五十元大洋。

第十五条　红军与家属通信，由直属机关盖章，不贴邮票可寄回家。红军家属寄信到红军中，则由当地政府盖章，亦不贴邮票，可寄到红军机关中转发。各级政府及红军机关应切实负责。

第十六条　凡红军战士在战争中牺牲，或在服务中因劳病故者，须照下列条例抚恤之：

1. 凡死亡战士应将其死亡时间、地点、战役、功绩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汇集公布。

2. 死亡战士的遗物应由红军机关或政府收集，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陈列以表纪念。

3. 死亡战士应由当地政府帮助红军机关收殓，并立纪念碑。

第十七条　凡红军死亡或残废者，其家属优待办法如下：

1. 子女弟妹幼小的由国家设立革命纪念学校，专门教育他们，并由国家维持其生活，直到年满十八岁由国家介绍职业为止。

2. 父母妻子由国家维持以相当津贴。

3. 本条例之三、四、五、六、七、八等条照旧有效。

第十八条　凡红军在服务期间，其妻离婚，必先得本人同意，如未得同意，政府得禁止之。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

（1931 年 11 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统一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内部组织起见，根据宪法特颁布本暂行条例。

第二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应严格地遵守本条例，建立健全的组织和工作。

第三条　本条例的停止或修改之权，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四条　本条例在实际应用上发生疑问或争执时，解释之权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章　乡苏维埃

第五条　乡苏维埃是由全乡的选民，根据宪法的规定而选举出来的全乡政权机关，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

第六条　乡苏维埃不设立执行委员会，也不设立主席团，只设主席一人，大的乡苏维埃可设副主席一人，主席缺席时，须选举代理主席行使主席之职权。

第七条　乡苏维埃不分科，一切事件由整个苏维埃负责。有临

时事件时，可临时组织委员会进行之，如在没收和分配土地时，组织土地委员会进行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工作等。各种临时设立的委员会的委员，除乡苏维埃的代表外，可吸收乡里的活动分子来参加，这些临时来参加委员会工作的人，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第八条　乡苏维埃的每个代表须担负苏维埃的一部分工作。

第九条　乡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

第十条　乡苏维埃有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规定如下：一、主席一人，二、交通一人，三、其余的工作人员一人。但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至多不得超过三人。在狭小或偏僻的乡，又或在经济困难时候，只维持主席一人生活费。别的工作人员不给生活费，或津贴一部分生活费。

第十一条　乡苏维埃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如超过了所规定的名额，必须得区执行委员会的核准。

第十二条　乡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每十天由主席召集一次，有特别事件得召集非常会议。

第十三条　乡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不限定在每一地方开。可以移到各村去开，最好是与讨论的问题有关系的村去开。

第十四条　乡苏维埃每月须向该乡选民作乡苏维埃的工作报告一次。几个村的乡可以到各村去召集选民大会报告自己的工作。

第十五条　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决议及命令，用布告的形式通知全乡人民，召集群众大会作报告，某种不重要的问题由代表口头传达。

第十六条　乡苏维埃主席的权限是召集会议，督促决议案之执行，处理日常的事务。

第十七条　乡苏维埃有权解决未涉及犯法行为的各种争执问题。

第三章　城市苏维埃（中央和省的直属市除外）

第十八条　城市苏维埃是由该城市的选民根据宪法的规定而选举出的全城市的政权机关，他和乡苏维埃一样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

第十九条　由城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选出主席团，再由主席团选出正副主席各一人。

第二十条　城市苏维埃为进行各部门的工作得分设：内务、劳动、文化、军事、卫生、粮食、工农检查、土地等科。

第二十一条　每个城市苏维埃的代表，至少必须参加一科的工作，并且在代表外还可以吸收该城市的活动分子参加各科的工作，不是城市苏维埃的代表而来参加各科工作的人，均有发言权但无表决权。

第二十二条　城市苏维埃的各科得组织干事会，以整理和计划各该科的工作。其干事须由城市苏维埃主席团委任之。

第二十三条　城市苏维埃得任用指导员以指导和巡视城市苏维埃所管辖的机关的工作。

第二十四条　劳动科之下可设立失业劳动介绍所和劳动检查所。在工农检查科之下得设立控告局。

第二十五条　废止秘书制，设立总务处以管理城市苏维埃内部一般的杂务，总务处设主任一人。

第二十六条　总务处之下得分设：文书、印刷、会计、事务、收发等股。

第二十七条　为办理城市苏维埃主席团文字上的工作，得用技

术书记一人。

第二十八条　城市苏维埃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规定如下：

一、主席一人，二、副主席一人，三、军事科员二人，四、劳动科员一人，五、土地科员一人，六、财政科员一人，七、内务科员一人，八、工农检查科员一人，九、文化科员一人，十、卫生科员一人，十一、总务处主任一人，十二、文书、印刷、会计、事务、收发、交通各一人，十三、其他工作人员二人。

但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十九人，在经济困难时及小的城市，城市苏维埃有生活费的工作人员不得超过九人，各科的工作可以兼任，有一部分的工作人员可不脱离生产。

第二十九条　城市苏维埃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的名额，若超过所规定之名额时，必须得县执行委员会批准。

第三十条　城市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每星期召集一次；城市苏维埃全体代表会议，每两星期召集一次。有特别事故时，可召集非常会议。

第三十一条　城市苏维埃各科干事会的会议，每星期须召集一次；各科的全体人员会议，每星期也须召集一次，其记录应送到主席团去批准。

第三十二条　城市苏维埃各科的全体人员会议和城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不限定在什么地方开，可移到群众所在的企业和机关去开，最好到与所讨论的问题有关的企业和机关去开，为的是吸收群众参加所讨论的问题。

第三十三条　城市苏维埃每月须向该城市的选民作自己的工作报告一次。

第四章　区、县、省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四条　区、县、省这三级的组织差不多相同。区执行委员会由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县执行委员会由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省执行委员会由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再由各级的执行委员会选举出主席团。区县执行委员会选出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只有省执行委员会选出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

第三十五条　区、县、省执行委员会之下得设立土地、财政、劳动、军事、文化、卫生、工农检查、粮食、内务等部。

第三十六条　区、县、省执行委员会可任用指导员，以指导和巡视下级苏维埃的工作。

第三十七条　省执行委员会得聘请专门人才，以帮助某几部的工作。

第三十八条　劳动部之下可设立劳动检查所及失业劳动介绍所，工农检查所之下可设立控告局，省所属内务部之下可设立民警所、市政所、刑事侦探局。

第三十九条　区县省执行委员会须设立总务处，以办理一般的杂务。总务处之下分为文书、印刷、会计、事务、收发、交通等股。

第四十条　为办理主席团文字上的工作，可用技术书记一人。

第四十一条　区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规定如下：

一、主席一人，二、军事部长一人，三、财政部长一人，四、土地部长一人，五、文化部长一人，六、工农检查部长一人，七、劳动部长一人，八、总务处长一人，九、文书兼收发一人，十、印刷、事务、交通各一人。

但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的名额不得超过十五人。若在经费困难

的时候，各部的工作可以兼任，有生活费的工作人员不得超过七人。

第四十二条　区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若超过所规定的名额，必须得县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第四十三条　县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规定如下：

一、主席一人，二、副主席一人，三、军事部长一人，四、财政部长一人，五、粮食部长一人，六、土地部长一人，七、文化部长一人，八、卫生部长一人，九、劳动部长一人，十、工农检查部长一人，十一、内务部长一人，十二、总务部长一人，十三、文书、印刷、事务、收发各一人，交通二至五人，十四、其他工作人员五人。

但工作人员的总额不得超过二十五人，若在经费困难时，各部的工作可以兼任，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不得超过十五人。

第四十四条　县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若超过了所规定的名额，必须得省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第四十五条　省执行委员会领生活费的工作人员规定如下：

一、主席一人，二、副主席二人，三、内务部正副部长各一人，四、军事部正副部长各一人，五、财政部正副部长各一人，六、土地部正副部长各一人，七、文化部正副部长各一人，八、工农检查部正副部长各一人，九、粮食部长一人，十、卫生部长一人，十一、劳动部正副部长各一人，十二、政府机关报办事人员五人，十三、总务处主任一人，十四、技术书记一人，十五、文书二人、印刷二人、事务一人、会计一人、交通四人，十六、其他工作人员十五人至五十三人。但工作人员的总额，不得超过九十人。

第四十六条　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若超过了所规定的名额，必须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第四十七条　区、县、省执行委员会的各部的组织委员会，以

各部部长为主席，其委员由各该级的执行委员会委任之，委员人数可由三人至九人。

第四十八条　各部是立于平等的地位，这一部不能指挥那一部。若这一部与那一部有关系的问题可共同商议进行之，比较重要的问题，应经过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第四十九条　各部委员会的会议，各级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都是每星期召集一次，有特别事情时得召集非常会议。

第五十条　区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每月由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集一次；县执行委员的全体委员会议，由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每两月召集一次；省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由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每四月召集一次。有特别事故时，得召集非常会议。

第五十一条　为审查各级苏维埃的财政起见，得组织审查委员会担任这个工作。财政审查委员会的委员，由上级或本级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之。

第五十二条　区执行委员会每两个月须向该区的选民作工作报告一次，县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须向该县内的选民作工作报告一次，省执行委员会每六个月须向该省内的选民作工作报告一次，选民群众可在该工作报告大会上批评政府的工作。

第五十三条　这些工作报告可写成书面委托某一个执行委员或下级苏维埃政府向选民群众代作报告，选民所提出的意见，须转到作工作报告的政府去，以便参考。

第五章　工作的方法

第五十四条　各级苏维埃的工作方式，大体相同，今规定总的

工作方式如下：

甲、会议。

乙、定期检查各科各部及下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丙、在会议上定期听各科各部及下级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并审查之。

丁、定期向选民报告自己的工作。

戊、组织革命竞赛，并进行定期的竞赛成绩的检阅。

己、布告、通告等。

庚、用各种方式将苏维埃政府的各种决议案，广播到群众中去。

第五十五条　会议分为：城市苏维埃的各科干事会议，各科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县、省执行委员会各部的委员会议，主席团会议，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城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区、县、省苏维埃的代表大会。

第五十六条　各科和各部对于他所管辖和有关系的机关，最少两个月须检查一次，检查的结果，在各科的干事会议或全体人民会议上或各部的委员会议上作报告。

第五十七条　主席团对于各科和各部的工作，最少每两月须检查一次；主席团对于他所管辖的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最少每三个月须检查一次。检查的结果，在主席团或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上作报告。

第五十八条　各科或各部须定期的在各科或各部会议上，听各该管辖机关的工作报告，主席团须定期的听各科或各部及下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报告，执行委员会定期听主席团或下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报告。

第五十九条　组织各种竞赛；团体与团体竞赛，乡村与乡村竞

赛，城市与城市竞赛，区与区竞赛，省与省竞赛，订立竞赛条约，到条约期满后，举行竞赛的成绩检阅。由上级苏维埃政府派代表去检阅和评判竞赛的结果，并给竞赛胜利者以某种奖励。

第六十条　经过布告、通告、命令、壁报、小册子等等，使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决议案等深入群众中去。

第六十一条　工农检查部有他的特别任务，得设立控告局以接收工农的控告事件。同时，可委托忠实可靠的工农干部，代收工农群众的控告事宜，并且在各地方须挂控告箱，使工农群众投提意见书。此处，还可以组织工农群众的突击队，突然地去检查某机关的工作，以揭破官僚主义者与腐化分子的假面具，还可以组织群众法庭以审判犯法行为的官僚腐化分子。

第六章　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具体工作

第六十二条　地方苏维埃政府（由乡苏维埃、城市苏维埃到省执行委员会止）具体的工作规定如下：

（一）执行上级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指令、训令、法令、决议等等。

（二）制定该政府一个月至六个月的工作计划及实现这种计划的工作日程。

（三）在召集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会议、主席团会议、各科各部的会议以前，准备议事日程、报告、提案及其他材料。

（四）解决该区域的争执问题。

（五）指示下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并对上级苏维埃政府作

报告。

（六）进行人口、土地、婚姻、死生、契约、文书及工商业等等的登记。

（七）办理关于土地问题的事宜，如没收、分配、整理耕田及水利等。

（八）代收国家捐税。

（九）制定并审查预算决算。

（十）办理义务劳动，如帮助红军、救灾、修路等等。

（十一）组织地方武装、办理守卫、放哨、通报消息、帮助红军作战事宜等等。

（十二）计划并执行该地方的建设事宜。

（十三）进行该苏维埃境域内文化教育事业。

（十四）市政的建设。

（十五）民警和刑事侦探的管理。

（十六）进行卫生事宜。

（十七）与官僚腐化分子斗争。

（十八）劳动保险之实现。

（十九）进行社会保险事业。

第七章　地方苏维埃政府的财政

第六十三条　各级地方苏维埃政府机关的一切收入，须完全缴到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各级机关去，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库收入项。

第六十四条　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支出须做成预算案，送上级苏

维埃政府批准，按照所批准的预算案支出。

第六十五条　第一项的支出，不准移作别项用途，倘若移作别项用途，须得上级苏维埃批准，才能移用。

第六十六条　不准超出预算案所规定的数额，倘若必须超出预算案时，须得上级苏维埃的核准。

第六十七条　预算案期满后须同一形式地制成决算案两份，一份交上级苏维埃政府去批准，另一份保存在该苏维埃政府内，以便检查时作参考。

第六十八条　若违反本条例的财政支出手续，依照浪费公款论罪。

第八章　文件的署名

第六十九条　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文件，须由主席、副主席署名，要是主席缺席时，由副主席代理主席名义署名；没有副主席的苏维埃政府，由主席署名，主席缺席时，得由代理主席署名。

第七十条　与某科某部有关系的文件须由主席同某科或某部长同时署名。

第九章　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检查

第七十一条　地方苏维埃政府雇用工作人员时，须填写两份履历书；一份保存在该工作人员做工作的苏维埃政府内，另一份送交比它高一级的苏维埃政府，以便检查。

第七十二条　上级苏维埃政府对下级苏维埃政府的雇用工作人员，有随时检查和撤换之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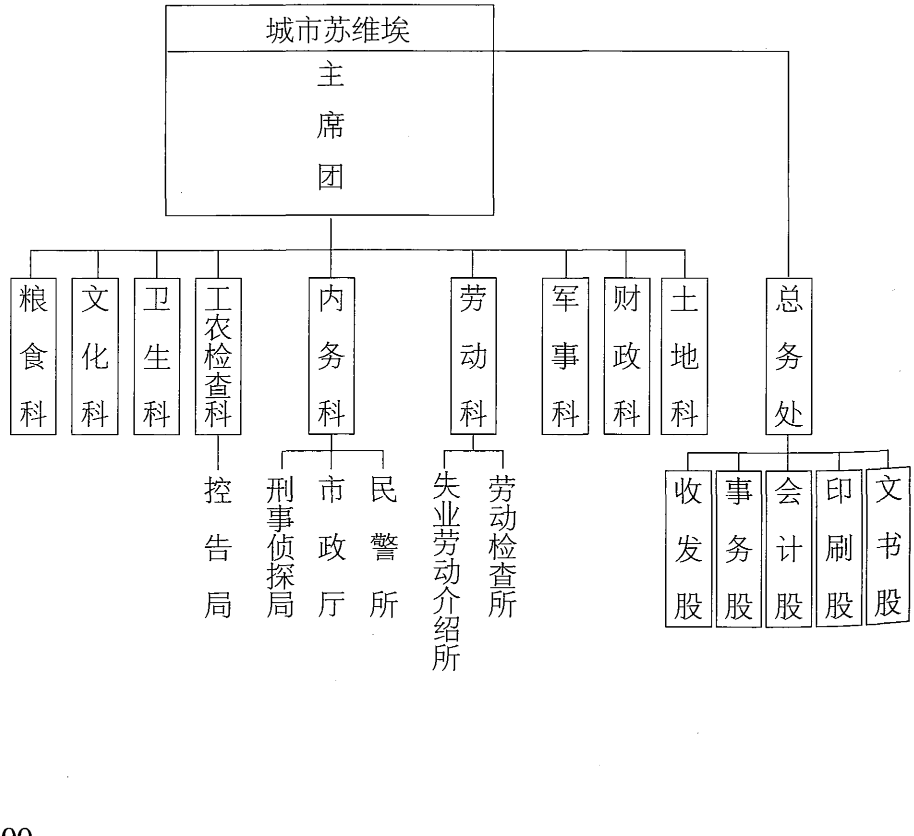
第十章　附则

第七十三条　本暂行组织条例自颁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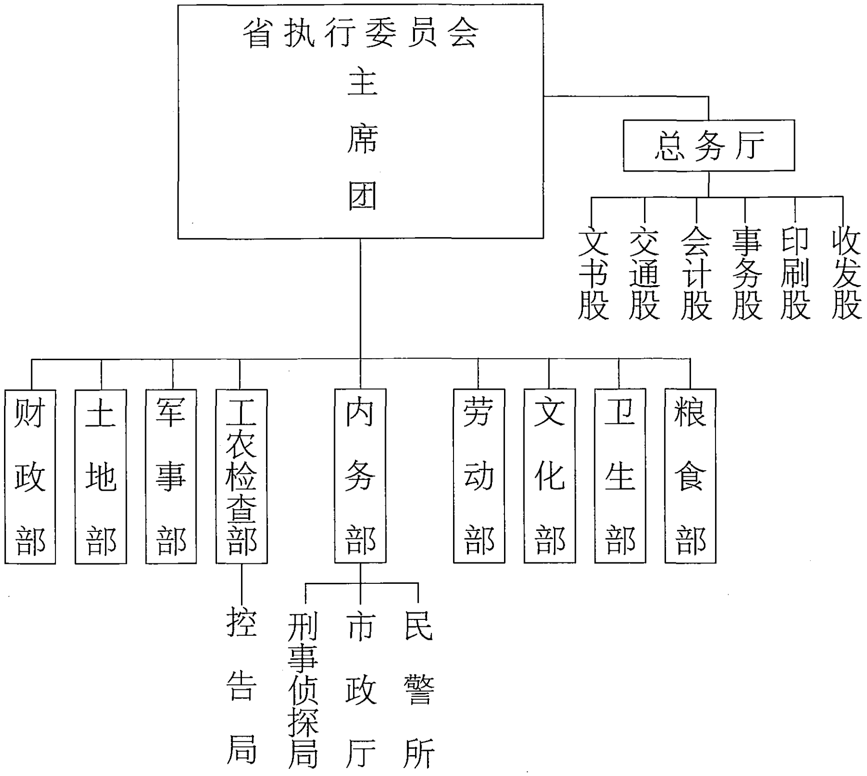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附：组织系统图

城市苏维埃组织系统图表


城市苏维埃
主席团
粮食科
文化科
卫生科
工农检查科
控告局
内务科
刑事侦探局
市政厅
民警所
劳动科
失业劳动介绍所
劳动检查所
军事科
财政科
土地科
总务处
收发股
事务股
会计股
印刷股
文书股

区、县、省执行委员会的组织系统图表


省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
总务厅
文书股
交通股
会计股
事务股
印刷股
收发股
财政部
土地部
军事部
工农检查部
内务部
劳动部
文化部
卫生部
粮食部
控告局
刑事侦探局
市政厅
民警所

附注：区、县执行委员会的组织系统与省相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

（1931 年 11 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域内选举手续上的统一起见，根据宪法第六十八条至第七十九条关于选举的规定，特颁布本选举细则。

第二条　本选举细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域内都发生效力。

第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停止和修改本细则之权。

第四条　本细则若发生疑问或在执行上发生争执时，解释之权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二章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根据宪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人民，凡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的区别，对苏维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以下列的几种人民为限：

一、一切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民，如：雇佣劳动者、农民、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及他们的家属；

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海陆空军中服军役的人；

三、以上二种人民中，在现时不能工作或失业的人。”

第六条　根据宪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犯有下列各条之一的人民，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剥削他人劳动的（富农包括在内）；

二、靠土地、资本的盈利为生而自己不劳动的；

三、商人、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中间人和买办；

四、各宗教的传教士、牧师、僧侣、道士、地理、阴阳先生及一切以传教为职业的人；

五、国民党及其他反动政府的警察、侦探、宪兵、官僚、军阀及参加反对工农利益的反动派；

六、有神经病的人；

七、经法庭判决有罪，而在犯罪期间的人；

八、一、二、三、四、五各项人的家属。”

宪法第七十条又规定如下：“本宪法第六十八条所列举的三种人民之一，而只犯有第六十九条各项之一的，也同样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章　办理选举的机关

第七条　根据宪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办理选举的机关列举如下：

一、在城市地方，由城市苏维埃组织选举委员会进行之。委员人数不得超过九人。

二、在乡村地方，由区执行委员会组织全区的选举委员会进行之。委员人数不得超过十一人。

第八条　在大的城市和大的区，在城市选举委员会和区选举委员会之下得设立选举委员会分会，在选举委员会总会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

第九条　选举委员会的委员，须由城市苏维埃及区执行委员会报告县执行委员会审查，再由县执行委员会报告省执行委员会或它的主席团批准并委任之，但以该地方的居民为合格。在特别情形中，可由上级政府派该地居民以外的人去。

第十条　城市苏维埃和乡苏维埃的主席，不得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

第四章　选举的手续

第十一条　在未开始选举的两星期前，须实行选民登记。

第十二条　选民登记员可由选举委员会指定专人进行之。有组织的人民，可经过该组织而进行之。无组织的人民，可雇用专人进行之。

第十三条　登记时，须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规定的选民登记表而填写之。

第十四条　登记完了后，须将选民的登记表汇送选举委员会。

第十五条　登记结束后，须由选举委员会宣布该区域内的选民总数，并应选举的代表人数。

第十六条　在未开始选举前，选举委员会经过城市苏维埃或执行委员会，须将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的名单公布。

第十七条　选举委员会须预先向各地区、各团体、各企业公布开选举大会的地点和日期。

第十八条　在城市里，须以生产为单位，进行选举。那些不能以生产为单位进行选举的人，则按区域指定地点，开选举大会。工人和劳动者的家属，则与其本人在同一处地方参加选举。在乡村里，以村为单位，开选举大会。小的村，可合几个村为一起而开选举大会。

第十九条　登记后有选举权的选民，选举委员会须给他一张选举通知书，通知他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开选举大会。选民取得这张通知书之后，才能进选举的会场。

第二十条　选举委员会有权借用任何公共场所或私人房子作选举的会场。

第二十一条　开选举大会的会场，先由选举委员会布置好，进选举会场的门口，须指定专人登记，执有选举通知书的人，才许他进场。

第二十二条　选举大会的主席团由三人组成之，两人由选举大会推选，其余一人则为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全权代表，并另选书记一人，以担任选举时的记录。

第二十三条　选举大会主席团的主席，一定由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全权代表担任之。

第二十四条　选举大会宣布开会后，主席须宣布到会人数，是否合法。

第二十五条　选举大会的议事日程，规定如下：

（一）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全权代表，根据宪法第六十八条、六十九条和七十条的规定，宣布什么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什么人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选举正式代表。

（三）选举候补代表。

（四）通过选民委托代表带去的提案。

第二十六条　选举大会的记录，到会登记表，及一切与选举有关系的文件，都汇送选举委员会，以备选举结果后的审查。

第二十七条　选举大会的记录，必须主席团的全体及书记签字。

第二十八条　以该选民大会参加选举的选民半数以上到会，就可开会。

第二十九条　倘若到会选民的人数不足法定人数时，须宣布延会，由选举委员会再定期重新召集。在重新召集选举大会的情形中，选举通知书，须重新发给。

第三十条　倘若第二次选举大会再不足法定人数而延会，则第三次所召集的选举大会，无论足法定人数与否，一样可开始选举，选举出应产生的代表人数。

第三十一条　选举不用书面投票，而以举手来付表决，以举手的多数者当选。

第三十二条　提候选人的姓名，用个别的，或用整个的名单来提，可随大会多数选民的主张。

第三十三条　正式代表与候补代表，不得同时提出付表决，必须先选举完了正式代表，再选举候补代表。

第五章　各级工农兵苏维埃代表产生的手续及代表与居民的人数的比例

第三十四条　工农兵乡苏维埃的代表，由全乡的选民大会选举出来，每居民五十人得选举工农兵乡苏维埃的代表一人。

第三十五条　工农兵城市苏维埃，由全城市的选民大会选举出来，每居民两百人，得选举城市苏维埃的代表一人。

（附注）工农兵乡和城市苏维埃，除正式代表之外，得选举候补代表，其人数以正式代表的五分之一为比例。

第三十六条　由各乡工农兵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全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数，以每居民四百人得选举代表一人为比例。

第三十七条　由各区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各城市工农兵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全县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数，以城市居民，每五百人选举代表一人，乡村居民，每一千五百人选举代表一人为比例。

第三十八条　由各县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省直属市工农兵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全省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以城市居民，每五千人选举代表一人，乡村居民，每二万五千人选举代表一人为比例。

第三十九条　由各省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直属市工农兵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人数，以乡村居民每五万人选举代表一人，城市居民，每一万人选举代表一人为比例。

第四十条　区、县、省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须由各该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之。

第四十一条　凡不足法定选民人数的区域，也得选举代表一人，但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第四十二条　属于区苏管辖的工农武装和红军，参加区的苏维埃选举，属于县苏管辖的工农武装和红军，参加县的苏维埃选举，

属于省苏管辖及不属于省苏管辖而在省区域内的工农武装和红军，参加省的苏维埃选举，红军的选举条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另行颁布之。

第六章　基本（城乡）选举之承认、取消及代表之召回

第四十三条　按照宪法和本细则所规定的手续而进行的选举，才算合法，须与以承认。

第四十四条　对于选举有不按照宪法和本细则所规定的手续而进行时，选民可向城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去控告，该苏维埃政府，接到这种控告之后，须即组织委员会审查之。

第四十五条　选举完结后，选举委员会，须将选举中的一切文件，汇交城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以备检查。

第四十六条　城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接到关于选举的文件后，须组织专门委员会审查之。

第四十七条　发现某部分的选举有不合选举手续时，取消某部分选举之权，属于城市苏维埃和区执行委员会。

第四十八条　若发现全部选举有违反选举手续时，取消选举之权，属于上级苏维埃政府。

第四十九条　在选举效力上发生争执时，由城市苏维埃和区执行委员会解决之。

第五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为选举上诉的终审机关。

第五十一条　城市和乡苏维埃的某一代表，若不执行自己的职务，有违背人民的付托，或做犯法行为的时候，城市或乡苏维埃得

开除之。选民也有召回该代表之权，并得另行选举。但在这种情形中，须报告上级苏维埃政府审核之。

第七章　选举的经费

第五十二条　办理选举的经费，由国库担负之。

第五十三条　各选举委员会，须制定办理选举的预算案，由城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报告县执行委员会批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拨给的选举经费中支付之。

第五十四条　选举结束后，选举委员会，须向城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作财政报告，并制定决算案，由城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报告县执行委员会批准。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本选举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1931年11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凡在企业、工厂、作坊及一切生产事业和各种机关（国家的、协作社的、私人的都包括在内）的雇佣劳动者，都应享受本劳动法的规定。

第二条　对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海陆空军服军役的战斗员和指挥员，不受本劳动法的拘束。

第三条　无论何种已生效力或未生效力，由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及其他劳动契约，倘他的劳动条件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条件恶劣者，皆不发生效力。

第四条　雇农、森林工人、季候工人、交通工人、苦力、家庭的女工厨役及其他有特殊劳动条件的工人，除享受本劳动法的一般规定之外，并得享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中央劳动部对于这些工人所颁布的个别劳动条件的规定。

第五条　对于苦力（搬运工人、拉车夫、拉船夫、轿夫、挑夫等都包括在内）的荷重量，由中央劳动部另行规定之，以及独立劳动者在被人雇佣时所应享受本劳动法之规定权利，另由中央劳动部颁布详细条例。

第二章　雇佣的手续

第六条　雇佣工人，须经过工会和失业劳动介绍所，并得根据集体合同，严格禁止所谓工头包工员、买办或任何私人的代理处的各种契约劳动、包工制包工头等。

第七条　所有失业劳动介绍所，须由各级劳动部组织并管理之，严格地禁止私人设立工作介绍所，或雇佣代理处。

第八条　严格禁止并严厉处罚要工人出钱买工做或从工资中扣钱作介绍报酬。

第九条　凡欲寻找工作的人，须往中央劳动部在各地所设立的失业劳动介绍所登记，列入失业劳动者的名册内。

第三章　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

第十条　集体合同，是一方面由职工会代表工人和职员与另一方面的雇主所订立的集体条约，在该集体合同上，规定出企业、机关、家庭及私人雇主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并规定了将来雇佣劳动者个人与雇主间订立劳动合同的内容。

第十一条　集体合同的条件，对于该企业或机关内的全体工作人员，无论他加入了职工会与否，都发生效力。

第十二条　业经劳动部注册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合同上所规定的日期起发生效力。

第十三条　劳动合同，是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与雇主订立的协定劳动合同的条件，倘与劳动法现行的劳动法令及集体合同的条件较恶劣者，皆不发生效力。有期限的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的有效期

间，不得超过一年，工会在合同未满期以前，有权要求取消合同。

第四章　工作时间

第十四条　所有雇佣劳动者，通常每日的工作时间，依本劳动法的规定，不得超过八点钟。

第十五条　十六至十八岁的青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点钟，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点钟。

第十六条　所有工人在危害身体健康之工业部门中工作（如地下矿工、铅锌以及其他带毒性的工作），每日的工作时间，须减压六点钟以下，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种类及某种工业，每日之工作时间，减至若干点钟，由中央劳动部制定公布之。

第十七条　所有在夜间做工之工人，每日工作时间，较通常工作时间少一点钟（通常八点钟者，减至七点钟，七点钟者，减至六点钟，其余类推）。

（附注）下午九点钟起，到第二天上午六点钟之时间，称为夜工。

第十八条　除非经过劳动检查机关或工会对于某项工业部门的特别允许，任何工业和季候工作，不得做比本劳动法所规定的时间以上的额外工作。

第五章　休息时间

第十九条　每工人每周经常须有继续不断的四十二小时的连续休息。

第二十条　在任何企业内的工人，继续工作到六个月以上者，至少须有二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在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每年至少须有四个星期的例假，工资照发。

第二十一条　下列的纪念日和节日，须一律停止工作：

（甲）一月一日新年。（乙）一月二十一日世界革命的领袖列宁逝世纪念日。（丙）二月七日军阀屠杀京汉路工人纪念日。（丁）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纪念日。（戊）五月一日国际劳动纪念日。（己）五月三十日五卅惨案反帝纪念日。（庚）十一月七日无产阶级革命纪念日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纪念日。（辛）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

（附注）各级劳动部得商同当地的总工会，得按当地情形，规定地方的纪念日作为特别休息日，休息日和纪念日的工资照发。

第二十二条　休息和纪念节日的前一日的工作时间，至多不得超过六点钟。

第二十三条　在本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内，包括半点钟至一点钟的吃饭时间，不得扣工资。

第二十四条　工人和职员若因生病或生育小孩所得的休假，不得算入第二十条的例假之内。

第六章　工资

第二十五条　任何工人之工资，不得少于由劳动部所规定的真实的最低工资额。各种工业部门的最低工资额，至少每三个月由劳动部审定一次。

第二十六条　各种企业内（国家的或私人的）实际的工资额，

由工人（由工会代表工人）和企业主或企业管理人用集体合同规定之。

第二十七条　所有劳动检查机关和工会所特许的额外工作，工人须得双薪。

第二十八条　由劳动检查机关的许可，工人在休息日或纪念日做工作，应发双薪。

第二十九条　女工、青工与成年男工做同样的工作，领同等的工资，童工、青工虽按缩短时间做工作，但工资仍须按照该职业工资的等级，以全日计算。

第三十条　夜间的工资，须高于通常的工资。工作八点钟者，增加七分之一。工作六点钟（危险工作）者增加五分之一的工资。按件计的工作，如为夜工，除应得的工资外，作八期钟者，应照其平均工资增加五分之一。

第三十一条　所有工资，须用现金支付（不得用货品），经常每周或半月支付一次（不得迟过半月并禁止任何方式积欠），且直接交给工人之手。

第三十二条　工人和职员如每年的例假时在例假期间的工资，应在例假前提前发给。

第三十三条　按件的工作，可由工人（由工会代表工人）与雇主双方面订定集体合同，所有按件工作，须规定每日的平均生产率与每日的中等工资（按照每一工业按件所作之工作时间计算）。

第七章　女工、青工及童工

第三十四条　女工、青工及童工除享受本劳动法各章的普通权

利之外，规定下列的特别保护女工、青工、童工之条文。

第三十五条　凡某些特别繁重或危险的工业部门，禁止女工、青工及童工在里面工作，禁止女工、青工及童工工作之工业部门，由中央劳动部审定公布之（如地下矿工橡皮铅铜胶水银锡铸造及其他同样矿场过高或过低的地方的木工等等）。

第三十六条　禁止女工在任何举重过四十斤之企业内工作，若在某种特殊工业或工作过程中，必须包括一部分女工，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通常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二。

第三十七条　十八岁以下的男女工及怀孕和哺小孩的女工，严格禁止做夜工。

第三十八条　所有用体力的劳动女工，产前产后休息八星期，工资照发。使用脑力的机关女职员（如女办事员与女书记），产前产后休息六星期，工资照发。如小产（堕胎），休息两星期，工资照发。

（附注）女工产前产后的休息期内及小产时的工资，由厂主担负。如若社会保险处已经成立，则经过社会保险处发给。

第三十九条　生产前五个月内及生产后九个月内，不许开除女工。若不得她的同意，并不得令其出外办事或迁移到别处去。

第四十条　哺乳的女工，除享受本劳动法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外，并规定每隔三点钟休息半点钟，来哺小孩，不得克扣工资，并在工厂内设立哺乳室及托儿所，由工厂负责请人看护。

第四十一条　十四岁以下的男女，严格禁止雇用。十四岁至十六岁的童工，经过劳动检查机关许可后才能雇用。

第四十二条　每企业必须完备地详细地登记青工、童工的年龄、工作时间和工资等等。

第四十三条　设立工厂或商埠学校，以提高青年工人的熟练程度，并给他们以补充教育，经费由厂方供给。严格禁止旧式的学徒制和养成工资各种形式的学徒制。凡与本劳动法条文所规定的条件恶劣者（工资、工作时间、待遇等），宣告无效。

第八章　劳动保护

第四十四条　任何机关或企业，不经劳动检查机关检查和许可，不得进行工作，开设或迁徙地方。

第四十五条　所有机器，须设置防护器，未经劳动检查机关检查与适当防护器的设置，不得增设新机器。

第四十六条　无论何种企业，必须发给工人工作，专门衣服的种类及穿着前期间，由中央劳动部特别规定之。

第四十七条　工作条件及工作过程特别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企业（如温度无常、毒气等），企业管理处须供给工人特别的保护衣服及其他保护物（加护眼器、面具、呼吸器、肥皂、特殊食品、肉类与牛乳）。在有毒企业内，供给消毒药品或器具。这些设备，不得由工人担负，并须按期检查工人体格，借谋保护。

第四十八条　各种罚款与克扣工资，须严格禁止，赔偿损失，亦被禁止。同时对雇用工人后，任何时间内征收工人保证金或储金制度，一律严格禁止。

第四十九条　因厂方过失，中间之停止工作，不得克扣工资（如机器损坏，或缺少原料，厂方不能实行苏维埃法律的规定等）。

第五十条　工人去参加苏维埃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参加职工大会或会议，担任工厂委员会的工作，被法庭叫去当见证人、鉴

定人或陪审员等，在执行工作期间，无论时间之久暂，都不得克扣工资。

第五十一条　工人或职员被征到红军中去服军务，因此而失去他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中，须预先发给他三个月的平均工资。

第五十二条　雇主必须供给工人以工作的工具，并不得因用工具而克扣工资。倘若工人用自己的工具，雇主必须偿还工人以原价，其详细的办法，由集体合同规定之。

第五十三条　由工厂出资建筑工人寄宿舍，无代价地分给工人及其家庭住，未建筑寄宿舍的，每月由工厂津贴相当的房金。

第五十四条　工人和职员若自愿地解除劳动合同，雇主须发给他半个月的中等工资，作为卸工津贴费。若雇主开除工人和职员，雇主须发给他三个月的中等工资，作为卸工津贴费。

第五十五条　工人和职员若暂时丧失劳动能力，雇主须保留他原有的工作地位和原有的中等工资。

第五十六条　由劳动检查员监督劳动法之实行。凡劳动检查员认为某企业将有立即危害工人身体健康及生命者，劳动检查员有封闭该企业之权，劳动检查员的工作任务，由劳动部另行颁布之。

第五十七条　所有受雇后在工作过程中所得的职业病，本劳动法认为与职业遇险同，并应全部抚恤之。

第九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地方的组织

第五十八条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联合全国各企业与机关的工人和职员所组成。各项职工会及其他方组织，须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而组织之。不根据该章程所组织的各

种联合会，不得称为职工会，也不得享受职工会在法律上应享的权利。

第五十九条　苏维埃保证职工会的行动自由，有宣布并领导罢工之权，代表工人交涉，并签定合同等权，各省和各县的产业职工总会，得代表工人签订该商业、工业或地方工人的集体合同。

第六十条　一切集体合同及劳动合同，由工厂或店铺委员会监督执行。因为这是职工会在企业中的基本组织，并得监视劳动法及各种关于劳动问题的法令之执行。

第六十一条　职工会主要的任务，是代表个别的或集体的工人保护一切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并努力设法改善工人一切经济及文化的条件，用各种方法积极地帮助和加强发展，并保护苏维埃运动及苏维埃政府。

第六十二条　在一切国有及协作社的企业中，职工会是直接参加和佐理这些企业的经济与管理。在私人的企业中，职工会成立特别机关，以监督生产。

第六十三条　苏维埃政府给职工会的组织以物质上的帮助，并与职工会以享受邮政、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等市政公用品及铁道、轮船等优待条件。

第六十四条　由雇主出工资总数以外的百分之二的数目，作为工会的办公费；又百分之一，作为工人的文化费。

第六十五条　雇主开除工人，须得职工会的同意。职工会的工厂委员会、店铺委员会代表工人加入评判委员会，以解决劳资间的一切纠纷。

第六十六条　每个工厂及店铺委员会为直接保护自己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每个企业中的工厂委员会，须组织劳动保护特别委

员会，从活动工人中选出三个至七个组织之。这个委员会的作用是：

（甲）视察劳动法中关于保护劳动及集体合同的一切条文是否执行，（乙）劳动检查机关的检查记录之提议是否执行等等。

第六十七条　职工会有向苏维埃政府提议颁布各种劳动法令，提出并提荐劳动检查员之权。工厂委员会之委员，根据工厂委员会的证书，有自由进出工厂和参观全部工厂之权。

第十章　社会保险

第六十八条　社会保险对于一切雇佣劳动者，不论他在国家企业、协作社或私人的企业，不论工作时间之久暂及付给工资的形式如何，都得施及之。

第六十九条　由雇主于应付的工资之外，支付全部工资额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的数目，作为社会保险之基金。该项百分比例表，另由中央劳动部以特别命令颁布之，绝对不得向被保险人征收保险费，也不得从劳资中克扣。

（附注）保险基金，绝对不许移作与保证工人无关系的用途。

第七十条　社会保险的优恤的种类如下：

（甲）免费的医药帮助　不论是普通病或因工作致病、遇险、受伤，职业病等，都支付医药费。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

（乙）暂时失却工作能力者的津贴　如：疾病、受伤、受隔离、怀孕生小孩以及服侍家中的病人等的空缺时间内的工资。

（丙）失业津贴费　（一）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一年以上，就可得失业津贴费。非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二年以上，才可得失业津贴

费。（二）失业工人必须在失业劳动介绍所或在当地工会注册，或由机关证明曾被雇用过，或有职工会会员证，才能得到优恤金。（三）支付失业津贴费，时间之长短，可按照当地情形和社会保险基金的状况，加以限制，但于失业工人仍可继续领相当的优恤金。

（丁）残废及老弱的优恤金　凡工人因一般的原因，或遇险或职业病而遭受部分的或全部的残废或年老不能工作经过特别专门委员会的检查而确定此种残废的程度与性质及其家庭的状况后，须得现金优恤。

（戊）婴儿的补助金　如工人生了小孩，须取补助金来买小孩十个月所必需的物品和牛奶。但此项补助金的总数，不得超过二个月的工资。

（己）丧葬津贴费　工人及其家属之死亡，都由社会保险处领取丧葬费。

（庚）工人家属贫困补助金　凡工人的家庭专依靠工人赚工钱生活者，若工人死亡或失踪，应得优恤金。此项优恤金的数目之大小、支付时间之长短，要看工人的家庭大小等条件，由专门委员会审查决定之。但于受雇任何企业六个月以上的工人，都得领取之。

（附注）疾病优恤金，从得病第一天算起，可达工资同样的数目，但不能超过相当规定的最高限度。由职业病而残废的人，同样可领疾病优恤金，到规定领残废优恤金为止。

（附注）未成年人的失业津贴，不问他的工作时间之长短，做何种工作，都得领取之。

第七十一条　社会保险处之管理与社会保险基金之用途，雇主不得过问，雇主只尽纳保险费的义务。由职工会的代表大会，选举社会保险机关的管理委员会，并由政府批准，而在职工会和劳动部

的监督之下，管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集与用途。

（附注）在社会保险处未成立以前，本章所列举的各项津贴费，由雇主担负之。

第十一章　解决劳资冲突及违犯劳动法的机关

第七十二条　凡违犯劳动法的案件以及劳资的纠纷，或由人民法院的劳动法庭判决强制执行之，或由劳资双方代表所组成的评判委员会及设在劳动部的仲裁委员会以和平解决之。评判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的工作细则，由中央劳动部另行颁布之。

第七十三条　凡违犯劳动法及一切关于劳动问题的法令集体合同等，无论他对于刑法受何种惩罚，都归人民法院的劳动法庭审理之。

第十二章　附则

第七十四条　本劳动法有疑问或在执行上发生争执的时候，由中央劳动部解释之。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由该苏维埃省政府的劳动部解释之。

第七十五条　凡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维埃区域，凡中央劳动部有权颁布之各种细则和表册，该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有颁布之权。

中华工农兵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常务主席　项　英　周以栗　曾　山
邓　发　张鼎丞　陈正人　朱　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暂行税则

（1931 年 12 月 1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确定统一的累进税，废除国民党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等。

第二条　税则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

第二章　商业税

第三条　税率：暂将商业资本税从二百元至十万元分为十三个等第，按照等第规定税率，征收其资本营利的所得税（即全部营利收入非征收资本）资本在十万以上税率另定。列表如下：

等第	资本	税率
第一等	200~300 元	百分之二
第二等	301~500 元	百分之二点五
第三等	501~700 元	百分之三
第四等	701~1000 元	百分之三点五
第五等	1001~1500 元	百分之四点五
第六等	1501~3000 元	百分之五点五

等第	资本	税率
第七等	3001~5000元	百分之六点五
第八等	5001~10000元	百分之八
第九等	10001~20000元	百分之九点五
第十等	20001~30000元	百分之十一点五
第十一等	30001~50000元	百分之十三点五
第十二等	50001~80000元	百分之十六
第十三等	80001~100000元	百分之十八点五

第四条　征收方法：依据商店向政府财政机关所领取的营业证，按其资本多少，来规定税率，然后按税率征收所得营利。

第五条　征收时期：每年分为二期，但季节生意，得于其生意结束后征收之。

第六条　免税办法：

（甲）凡遵照政府所颁布之合作社的条例组织之消费合作社，复经县政府登记的，得由县政府报告各该省政府，许可免税。

（乙）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出卖其剩余生产品者，一律免收商业税。

（丙）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

（丁）商人遇险或遭意外损害，报告政府经查验证实者，得许免税。

（戊）对于某种必需的日用商品和军用品，得随时由政府命令公布免税。

第三章　农业税

（注）现时农村生产与物品价值，极为复杂，不能规定一个统一

的税收办法。只能规定农业税征收的原则，各省可依据此原则，按照当地情况，定出适当的农业税。

第七条　农民分得土地后，按照全家每年主要生产的收获，以全家人口平均，规定出每人每年的收获数与生活必需的支出，根据此标准，再定出向每人开始征收的最低数额及累进税。

第八条　只征收主要生产（谷麦）的税，副产暂不征税。

第九条　茶山、棉麻、果园，当作稻田麦地分配，成为主要生产的，亦应征税。

第十条　红军家属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

第十一条　雇农及分得田地的工人一律免税。

第十二条　贫农收入已达开始征收的税额，但仍不能维持其一家生活的，得由乡苏维埃决定个别减税，或免税。

第十三条　对于过去富农的征税，要较重些。

第十四条　遇有水旱等灾，或遭受白匪摧残的区域，按照灾情轻重，免税或减税。

第十五条　因改良种子、改良耕种，所增加的农产收入免税。

第十六条　开垦荒地，所收获之农产品，免税三年，富农则依照收获情形，减税或免税一年。

第十七条　农业税征收的办法和时期，在农产品收获后一月至二月开始征收，收税时依照税率规定向各家征收每人应纳之税额。

第十八条　农业税征收现款或农产品，依据农民的意愿而定。

附江西省农业税征收办法，以作各省的参考：

农业税

农产品	税率
四担	百分之一
五	百分之二
六	百分之三
七	百分之四
八	百分之五
九	百分之六点五
十	百分之八
十一	百分之九点五
十二	百分之十一
十三	百分之十二点五
十四	百分之十四点五
十五	百分之十六点五

注：平均每家每人收获量以干谷四石以上计算开始征税。

对于富农从二担起，即抽百分之一，三担即抽百分之二，以上类推。

第四章　工业税

第十九条　生产合作社，经县政府批准备案的，得由县政府报告省政府，许可免税。

第二十条　在目前为促进苏区的工业发展，暂时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

第二十一条　工业所得税，按资本大小，规定税率，征收其利润，其税率另行规定，但须较商业税为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税则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婚姻条例

（1931 年 12 月 1 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第二条　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

第二章　结婚

第三条　结婚的年龄，男子须满二十岁，女子须满十八岁。

第四条　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

第五条　禁止男女在五代以内，亲族血统的结婚。

第六条　禁止花柳病、麻疯、肺病等危险性的传染病症的结婚，如上述病症经医生验明许可者，可以结婚。

第七条　禁止神经病及疯瘫的结婚。

第八条　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第三章　离婚

第九条　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

第十条　男女离婚，须向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登记。

第四章　离婚后小孩的抚养

第十一条　离婚前所生子女，归男子负责抚养，如男女均愿抚养，则归女子抚养。

第十二条　哺乳期内小儿，归女子抚养。

第十三条　小孩分得田地的，田地随小孩同走。

第十四条　所有归女子抚养的小孩，由男子担负小孩必需的生活费的三分之二，直至十六岁为止。其支付的办法，或支付现金，或代小孩耕种分得的田地。

第十五条　女子再行结婚，其新夫愿养小孩的，小孩的父亲才不负小孩生活费之责。

第十六条　愿养小孩的新夫，必须向乡苏维埃或城市苏维埃登记。一经登记后，须负责抚养成年，不得中途停止和虐待。

第五章　离婚后男女财产的处理

第十七条　男女各自得田地、财产、债务，各自处理。在结婚

满一年，男女共同经营所增加的财产，男女平分，如有小孩，则按人口平分。

第十八条　男女同居所负的公共债务，归男子负责清偿。

第十九条　离婚后男女均不愿离开其房屋时，男子须将他的一部分房子，卖给女子居住。

第二十条　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男子须维持其生活，或代耕种田地，直至再行结婚为止。

第六章　未经结婚登记所生小孩的抚养

第二十一条　未经结婚登记所生的小孩，经证明后，由男子负担小孩生活费的三分之二。第四章之第十一至第十五各条均通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的，按照刑法处以应得之罪。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关于一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与人民委员

（1931年12月1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千九百三十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十月革命节在江西苏区开会。议决了政纲、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重要法令。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

毛泽东　项英　张国焘　周恩来　卢福坦
朱德　瞿秋白　张鼎丞　邓发　王稼穑
徐锡根　范乐春　陈绍禹　彭德怀　关向应
孔荷宠　方志敏　任弼时　贺龙　沈泽民
谭震林　黄平　曾山　林彪　陈郁
罗登贤　夏曦　邓子恢　刘少奇　刘大朝
陈正人　袁德生　崔棋　屈登高　段德昌
葛耀山　彭轨　陈福元　古大存　韦拔群
张华先　何叔衡　黄苏　胡海　滕代远
肖恒太　罗炳辉　陈毅　张云逸　周以栗
卢德光　胡均鹤　徐特立　邵式平　洪紫清
刘光万　余汉朝　吴致民　刘建中　李宗伯
刘生元　王永盛　阮啸仙等，为中央执行委员，组织中央

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后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开第一次会议。选举：

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

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穑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为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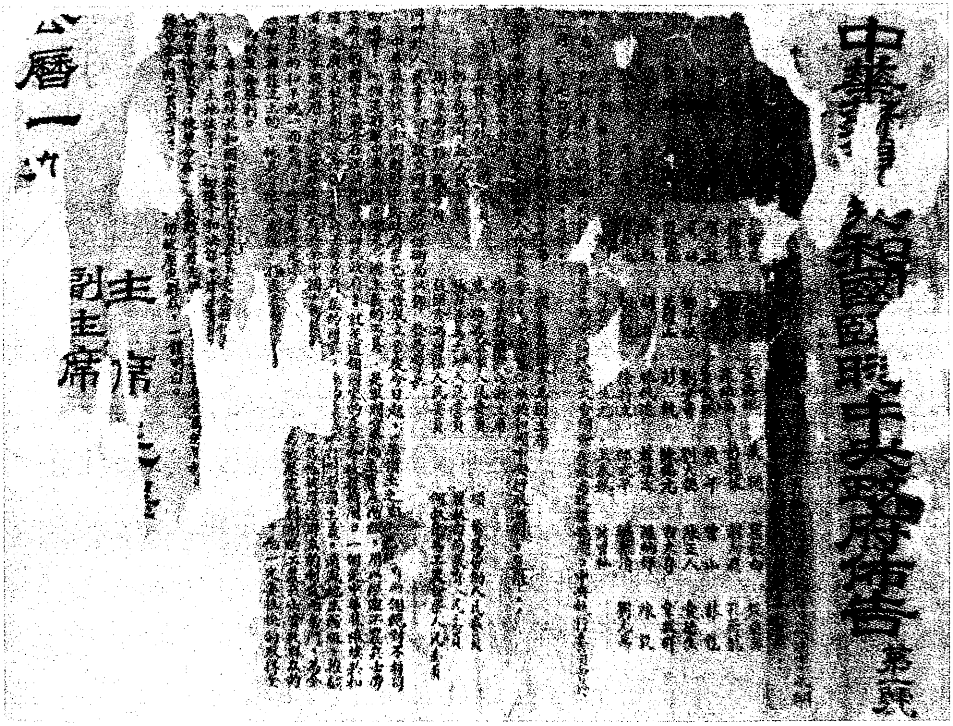
同时于人民委员会下设立国家政治保卫局以邓发为局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业已宣告成立。从今日起，中华领土之内，已经有两个绝对不相同的国家，一个是所谓中华民国，他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是军阀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用以压迫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国家的反革命政权机关。一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广大被剥削、被压迫的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国家。他的旗帜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地主阶级，推翻国民党军阀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于全中国，为数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为全国真正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他的基础是建筑在苏区和非苏区几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的愿望和拥护之上的。他具有绝大威权，打击着国民党军阀政府由崩溃走到死灭，他一定要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受全国代表大会的付托，当竭全力执行大会制定的政纲、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一切法

令和决议。建立巩固而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至于取得全国的胜利，现当政府开始工作之时，特为布告全中国工农兵士贫民和一切被压迫群众，一体明白。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一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

（1931年12月1日）

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农民斗争，继续发展，日益高涨，帝国主义军阀虽然疯狂似的要来抵抗，可是苏维埃运动还是向上增长并且扩大，日益使中国的农民，武装了自己，组织了红军，一县又一县的农民，从数千年来在封建地主豪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没收并分配这些压迫者的土地，打倒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国民党的政权，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是能够完成中国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的政权。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没收地主的土地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为使没收和分配土地有一个统一的制度起见，第一次大会站在基本的农民群众与革命发展前途的利益之基础上，采取下面的土地法令，作解决土地问题的最好的保障。

第一条　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地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乡村失业的独立劳动者，在农民群众赞成之下，可以同样分得土地，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且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

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

第二条　红军是拥护苏维埃政权推翻帝国主义的先进战士，无论其本地是否建立苏维埃，或尚为反动统治，均须分得土地，由苏维埃政府设法替他耕种。

第三条　中国富农的特性是兼半地主或高利贷者，对于他们的土地也应该没收。中等农民阶级的土地不没收。富农在被没收土地后，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分地”，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用自己的劳动去耕种这些土地。

第四条　没收一切反革命的组织者及白军武装队伍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反革命者的财产与土地。但贫农、中农非自觉地被勾引而反对苏维埃，经该地苏维埃认可免究者，可作例外，对其首领，则须无条件地按照本法令执行。

第五条　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消灭土地上一切奴役的封建的关系及脱离地主私有权的最彻底的方法。不过苏维埃地方政府，无论如何不能以威力实行，不能由上命令，必须向农民各方面来解释这个办法，仅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如大多数中农不愿意时，他们可不参加平分。

第六条　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苏维埃政府，必须力求无条件地交给农民。但在执行和处理这些土地时，须取得农民自愿的赞助，以不妨碍他们宗教感情为原则。

第七条　凡较富裕的农民，企图按照生产工具，分配被没收的土地，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这是富农，有意阻碍土地革命的发展，为自己谋利益的反动企图，须给以严厉的制止。地方苏维埃政府，应根据各个乡村当地情形，选择最有利于贫农、中农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土地，或按照每家有劳动力者之多寡，同时按人口之多寡

即混合为原则，进行分配，或以中农、贫农、雇农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富农以劳动力（即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地方，富农每个有劳动力者，所得分田数量，等于人口平均分配每一人所得的分田数量）为单位，人口为辅助去分配。分配土地，不仅应计算土地的面积，而且应估计土地的质量（特别是收获量）。在土地分配时，还应尽可能地适合地进行土地改革，预备消灭窄狭、片段、大阡陌的各种封建遗迹。

第八条　没收一切封建主、军阀、地主、豪绅的动产与不动产、房屋、仓库、牲畜、农具等。富农在分得土地后，多余的房屋、农具、牲畜及水碓油窄等亦须没收。经过当地苏维埃，根据中农、贫农的利益，将没收的房屋，分配给没有住所的贫农、中农居住，一部分作学校俱乐部、地方苏维埃、党及青年团委员会、赤色职工会、贫农团和各机关使用。牲畜和农具，可由贫农、中农，按组或按户分配，或根据农民意见，自愿地将各种没收农具，办初步合作社，或在农民主张，苏维埃同意下，设立牲畜农具经理处，供给贫农、中农耕种土地的使用。经理处应由地方苏维埃管理，农民得按照一定规例，支付相当的使用金，所有农具的修理，经理处工人的供养以及新农具新牲畜的购备，由农民加纳使用金的百分之几，以资弥补。

第九条　没收地主豪绅的财产及土地，同时必须消灭口头的及书面的一切佃租契约，取消农民对这些财产与土地的义务或债务，并宣布一切高利贷、债务无效，所有旧地主与农民约定自愿偿还的企图，应以革命的法律，加以严禁，并不准农民部分地退还地主豪绅的土地，或偿还一部分的债务。

第十条　一切水利、江河、湖、溪、森林、牧场、大山林，由苏维埃管理，建设便利于贫农、中农的公共使用。桑田、竹林、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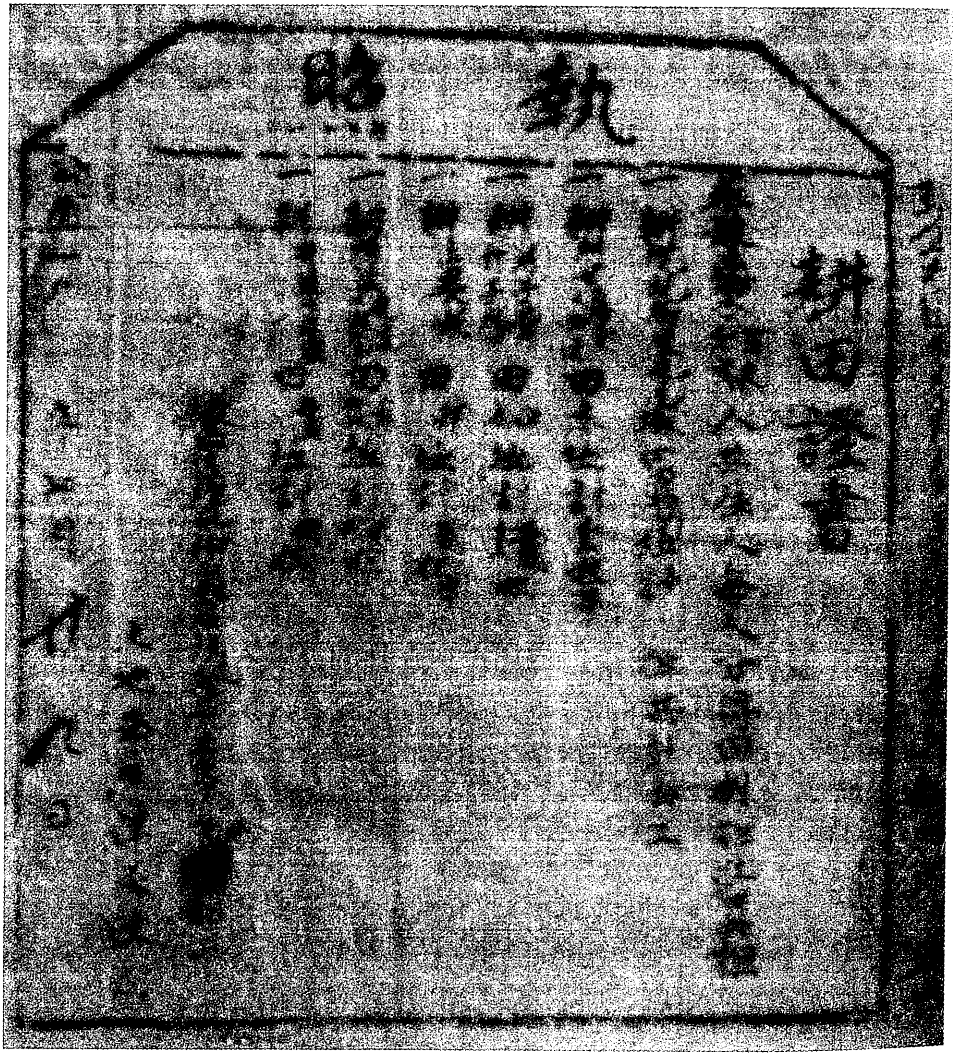
山、鱼塘等，得如稻田、麦田的一样，依照当地农民群众的自愿，分配给他们使用。

第十二条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是彻底消灭农村中的一切封建关系，而事实上就是使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迅速的发展的必经步骤。不过实际实行这个办法，必须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国有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在目前革命阶段上，苏维埃政府应将土地与水利国有的利益，向农民解释。但现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与土地的买卖，苏维埃政府同时应严禁富农投机与地主买回原有土地。

第十三条　地方苏维埃如在该地环境允许条件之下，创办下列事业：一、开垦荒地；二、办理移民事业；三、改良现有的与建立新的灌溉；四、培植森林；五、加紧建设道路，创办企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十四条　本法令不但适用于现存在的苏维埃区域，而且应用于非苏维埃区域及新夺取苏维埃政权的区域。各苏区内已经分配的土地，适合本法令的原则的不要再分，如不合本法令原则者，则须重新分配。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团常务主席　项　英　周以栗　曾　山
邓　发　张鼎丞　陈正人　朱　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执照

耕田证书

瑞金时期，工农政府发给农民的耕田证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

（1931 年 12 月 1 日）

为着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发展，工农革命联盟的巩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下列条例，做为目前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根据。

一　工业方面

一、为保障完全独立的苏维埃政府，将操在帝国主义手中的一切经济命脉——实行国有（租界—海关—银行—铁路—航业—矿山—工厂等）在目前允许外国某些企业，重新另订租借条约，继续生产。但必须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及其他各种条例，如这些企业主，违反这些条件，实行怠工，关闭企业或干涉苏维埃政府的内政，拥护反革命，则必须立即没收作为国有。

二、苏维埃对于中国资本家的企业及手工业，尚保留于旧业主手中，尚不实行国有，但由工厂委员会职工委员会由工人监督生产，若这些企业主怠工，破坏苏维埃法律或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如故意破坏或停止生产，则必须立即没收他的企业，按照具体条件，交给工人劳动协作社或苏维埃政府管理。

三、竭力促进工业发展，苏维埃特别注意保障供给红军的一切

企业的发展（工厂—作坊—手工业—家庭企业……）。

二　商业方面

一、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但苏维埃必须严禁商人投机以抬高价格，应解散商会，禁止大小商人以商会名义垄断价格。如遇商人怠工，或经济封锁，危及基本群众主要生活商品的供给，或因红军需要，苏维埃政府应规定必须物品之最高限度之价格，但这种方法须在必要时施行，有可能即须恢复商业自由。

二、与非苏维埃区域的贸易，还绝不能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同时苏维埃政府，应实行监督这些贸易，以保障苏维埃区域必须商品的供给，银币输出，必须得该地苏维埃允许。

三、为着整个苏维埃贸易与保障劳苦人民的利益，改良劳动群众必须品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和发展。苏维埃对于合作社，应给以财政的帮助，与税的豁免，苏维埃应以一部分被没收的房屋与商店交给合作社使用。并且为要保障劳苦群众的供给，苏维埃政府必须提倡公共仓库，积蓄粮食，以便实行廉价供给与接济。

三　财政与税则

一、消灭一切的国民党军阀政府捐税制度和其一切横征暴敛，苏维埃另定统一的累进税则，使之转由资产阶级负担。苏维埃政府应该豁免红军、工人，乡村与城市贫苦群众家庭的纳税。如遇意外

灾害，亦应豁免或酌量减轻。

二、取消过去一切口头的书面的奴役及高利贷的契约，取消农民与城市贫民对高利贷的各种债务，严禁预征或债的奴役。应以革命的法律严防并制止一切恢复奴役与高利贷关系的企图。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退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

三、苏维埃区域内的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用，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

四、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货币的特权。工农银行对于各农民家庭工业者，合作社，小商人，实行借货，以发展其经济。这个银行应实行其兑换货币，其分行并带征税收。

五、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禁止这些银行发行任何货币。苏维埃应严禁止银行家利用本地银行，实行反革命活动的一切企图。

四　市政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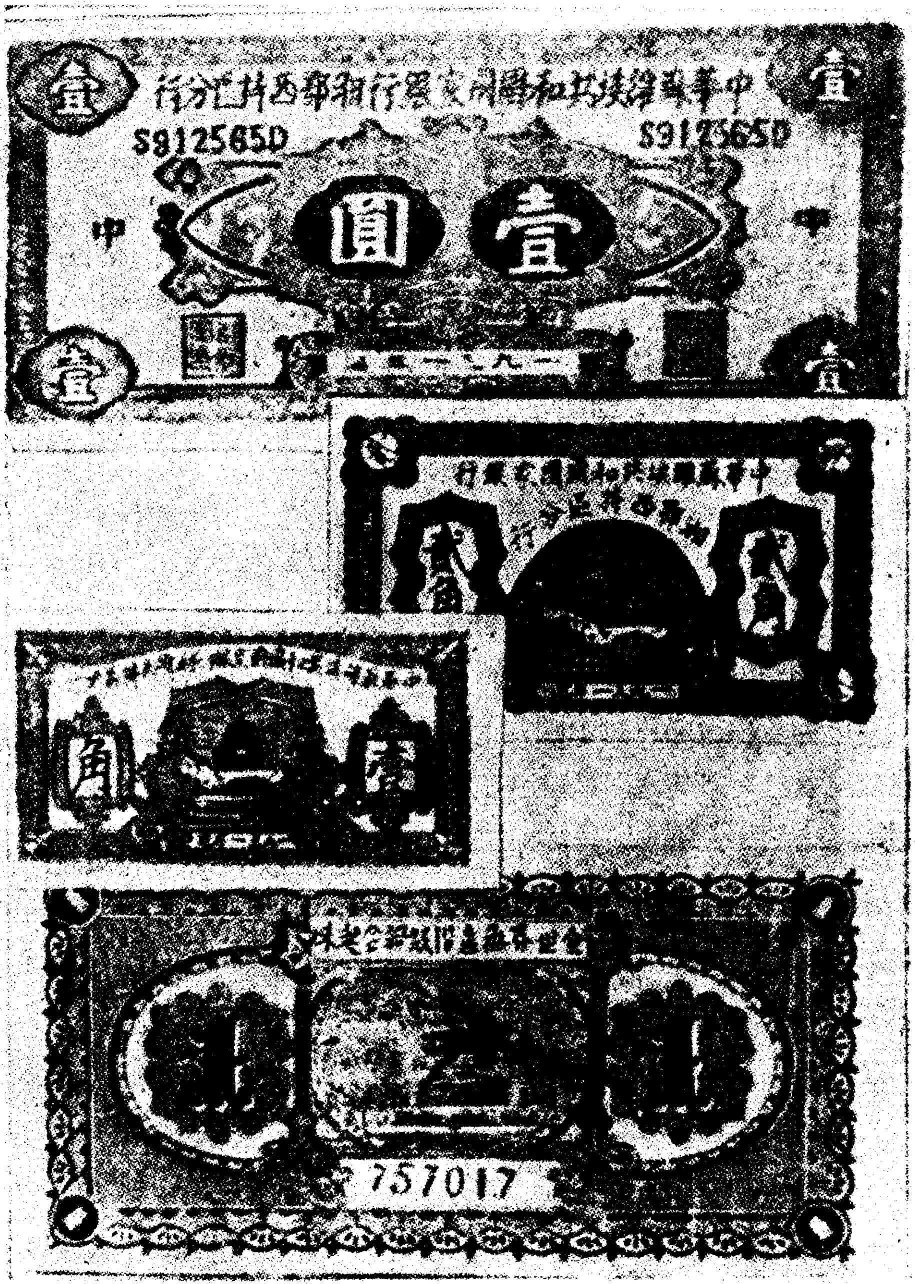
一、苏维埃应实行相当调剂，以减轻与城市贫民的房租，没收地主豪绅军阀官僚政客的房屋和财产，这些房屋应交给工人，苦力，学徒，居住。财产由城市贫民分配，或由苏维埃用作公共事

业。城市苏维埃应采取一切办法，改良贫苦人们的居住条件。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团常务主席　项　英　周以栗　曾　山
张鼎丞　陈正人　朱　德　邓　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

江西工農銀行
壹圓
發展社會經濟
增加工農生產
1
1
1
1

苏维埃时期发行的货币。


S912565D
S912565D
壹圓
壹
757017

苏维埃时期发行的货币。

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

（1931年12月10日）

各苏维埃区域，省、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红军、赤卫队及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人及一切被压迫群众：

工农革命的叛徒顾顺章（又名黎明，原名顾凤鸣，曾化名为化广奇魔术师，年约二十七八，上海吴淞人，身材极矮，眼暴鼻兀）自从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在汉口被国民党反革命的侦缉队捕获后，立即向反动统治投降。将中国共产党驻武汉的交通机关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及红军二集团军的驻武汉办事处告诉敌人以致全部破获。并捕去革命战士十余人，后统被武汉反动政府杀害。甚至在一只江轮上有一位同情于革命的工友，这一机关只有顾顺章知道，他亦将他供出，送入反革命的牢狱。因为有了这些血的代价和保证，于是顾顺章连电南京要求亲见蒋介石，到南京后他除掉将中共及苏维埃政府红军与一切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团体的组织情形、活动状况告密于国民党反革命外，他更将已经为南京政府定了徒刑的中共中央委员全国革命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等从狱中指证出来，给反革命立即枪杀。同时，更将他在上海时所晓得的中共中央委员及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汉等同志五个住址告诉反革命。立即电令上海公安局会同帝国主义捕房按名破获。幸而这几个同志在这时已离开上

海，故未遇难。接着顾顺章就依着他所知道的线索，继续派他的亲戚家人在上海侦查中共及各革命团体的机关与负责人。不幸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同志即在他这一布置中被捕遇难，成为顾顺章叛变革命投降反革命之最大的贡献。从此，顾顺章遂进而为蒋介石秘密杀人机关的KK组织中一个要员。与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扬虎等反革命凶犯同为蒋介石杀人的助手了。

最近，因为红军在各苏区的胜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白色统治区域工农劳苦群众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高涨，中国共党及革命群众团体虽在极端困难的白色恐怖之下，但因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他们的组织反更加巩固与严密起来，更坚决地领导工农劳苦群众围绕着苏维埃旗帜而斗争。于是叛徒顾顺章消灭革命组织和革命领袖肉身的毒计不能得逞。乃改变方略硬以杀人凶犯污我革命负责同志与中共中央，企图用这一阴谋诡计破坏中共及其负责者在群众中的信仰。更无耻的顾顺章自己还登报通缉中共负责同志周恩来等说他自己自从叛变后并未陷害过共党任何个人，而只闭户读书。这种无耻的抵赖，绝对掩不住他凶恶残酷的毒手所给予革命的血的损害。这是每一个革命群众都能认识的，至于悬赏通缉，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当他们置身革命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即已经登记在反革命的通缉簿上，又何待叛徒顾顺章来登报通缉。

阶级的仇恨已走到决死的斗争。国民党反革命所要通缉的正是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所要拥护的。反之顾顺章这类凶恶残酷的叛徒是国民党反革命所庇护的，正是广大工农劳苦群众所要扑灭的。反革命所依赖的只是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官僚这一类人，他们正是走向自己的穷途末路。革命的参加者和拥护者，却是极广大的工

人、农人、城市贫民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而胜利的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他们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革命高潮的继续增高，蒋介石二三十万的军队，都被工农红军如拉枯摧朽地一次二次三次地打败下来，一个顾顺章叛徒及蒋介石杀人的KK组织何能消灭革命。相反的，他们终将在革命大浪中淹没！

为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及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严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统治区域，如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都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的责任。地主资本家反革命走狗的悬赏收买的地方是不能用来污辱我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

广大的工农劳苦民众！

巩固自己的阵线，一体严拿叛徒顾顺章！

发展革命斗争，根本消灭蒋介石杀人的KK组织！

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

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

（1931 年 12 月 11 日）

亲爱的工人、农民、兵士及革命的学生们：

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又在进行新的出卖中国、出卖民族利益、出卖民众的无耻勾当了。报纸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已经承认在锦州设立中立区，提议组织在天津的国际共管，承认一切以前的卖国丧权的密约！兄弟们，姊妹们！大家懂得这些是什么意思？这是说，将满洲几万里的土地，数千万的民众断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践踏；这就是说，把锦州、天津供献给国际帝国主义蹂躏，这就是给全中国四万万人民加上沉重的铁链与手铐脚镣，使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地屈服在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之下而做亡国奴！兄弟们！姊妹们！这是空前的骇人听闻的卖国勾当！但是，反动统治阶级还在大言不惭地空喊“革命外交”“最后准备”与“北上收回失地”，真是天地间头一等不要脸的无耻勾当！

兄弟们！姊妹们！我们能够像绵羊一样任凭反动统治勾结帝国主义来宰割我们吗？我们能够眼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夺吗？我们能够忍受殖民地奴隶所受的最惨酷的压迫、屠杀与侮辱吗？我们能够看着自己的兄弟被帝国主义者鞭打、惨杀、屠戮而默不作声吗？我们能够眼看自己的姊妹们被人调戏、侮辱、强奸而

无动于衷吗？不能，不能，一万个不能。那么，我们就应该大家一致地起来反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中国！罢工、罢课、罢操起来！夺取反动武装来武装自己，大家努力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

兄弟们！姊妹们！我们对于国民党统治，还能有任何的幻想和希望吗？国民党的统治造成连年不断的饥荒，使千千万万劳苦民众饥寒流离，生死不得；造成了几百万的失业工人，辗转街头，糊口无由；造成了连年的军阀战争，使几千几万的兵士暴骨荒野，孤儿寡妇流离失所；造成了无数辱国丧权的密约和惨案，使中国永远陷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不能翻身！对于这样罪恶滔天的反动统治，能够再有一分钟的忍耐吗？不能，不能，一万个不能！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推翻这个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准备我们的力量，准备我们的武装，举行武装暴动，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来建立人民自己的政府！在自己的政权领导之下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

兄弟们！姊妹们！我们若果推翻了反动统治，组织了自己的政权来进行革命战争，能够战得胜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吗？能够打破军精粮足的帝国主义军队吗？能够，能够，一万个能够！经过四年大战疲乏不堪的俄国工农群众，靠自己的力量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打破了十四国帝国主义的联军，难道我们不能够吗？千百万群众的团结，其力量可以胜过一切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何况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殖民地的被压迫的奴隶和占有六分之一世界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站在我们一边呢！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与帝国主义作决死的血战！

兄弟们！姊妹们！苏维埃中央临时革命政府向你们宣告：苏维埃政府是唯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到底的革命政府，我们以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的独立与解放为目的，我们反对一切中国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之间公开与秘密的不平等条约；我们反对秘密外交；我们主张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出中国去；我们主张没收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我们否认一切外债；我们认为南京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卖国政府，他们没有任何权力代表中国的劳苦民众。他们与帝国主义间一切交涉与协约，苏维埃政府一概认为无效。对于满洲事变，我们主张立即无条件地撤退日本在华军队；废除一切中日旧约，没收一切日本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矿山、铁路、企业，收回一切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在尊重苏维埃中国独立与自由的条件下，重订新的平等条约。不然，则与日本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民族解放的战争。但是为了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为了求得民族解放战争的实行与胜利，必须首先打倒反革命的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在苏维埃形式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的统治！

兄弟们！姊妹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天天凶残了，国民党的卖国一天天更加无耻了，劳苦群众的痛苦一天天地水深火热了！起来！全国的劳苦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作决战！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来，以工农苏维埃革命来消灭国民党反革命的统治，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半殖民地的统治制度，获得中华民族及中国民众的自由和解放！

罢工、罢课、罢操来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国民党压迫屠杀反帝运动！

民众自己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否认一切国民党与帝国主义谈判与密约！

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

打倒帝国主义！

拥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

拥护红军——中国民众自己的、唯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到底的武力！

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万岁！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广暴第四周年纪念日

苏维埃建设重要训令

（1931年12月15日）

过去各级苏维埃的组织，很不完善：第一，行政区域太宽，使行政的实施不便。第二，政府级数太多，使指挥迟钝，联系不灵。第三，尤其重要的，是选举手续不完备。不是用简单的群众大会，就是不按选举程序地去召集代表会议或主席联席会议以选举各级政府。特别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乡与城苏维埃，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第四，各级政府内部的分工和工作方法，多不适当。以上这些，都是□苏维埃宪法和中央政府的各种条例细则不相符合的。

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宣布：各地、各县政府须依照宪法及中央颁布的暂行条例细则，重新划分行政区域，重新改组各级政府。首先主要的，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细则，重新划分的区、乡（行政区域、废除村与小组），再行依照选举细则，选举乡苏维埃和城苏维埃（这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然后依照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从城、乡苏维埃直到省苏维埃，一律重新建设起来。这是一件极重大的工作，各级地方政府必须下极大的决心，用极大的精力，很周密很审慎地去做，才不致使重新划分的行政区域又和过去的行政区域一样发生缺陷，才不致使重新改组的各级政府又和过去的政府差不多，为了免除这些弊病，各省省政府须以极大的努力去指挥这一次地方苏维埃建立运动。除发出各种详细的文告指示之外，还要在省

及所在地召集县、区两级政府负主要责任的人开会；再择定适当时机召集各乡、村政府负主要责任的人开会，由省、县派人去指导，在这些会议中详细明了地讨论地方苏维埃建设运动的意义和实际去做的方法。此外，当实际划分区域改选政府时，指导还要派人到各县去巡视，随时解释疑难，指正错误，县对于区，区对于乡的指导，也要仿此办理，务必要使这次苏维埃建设运动，得到很好成绩。

江西、福建两省和瑞金直属县，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起，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为依照新法令实行苏维埃建设运动的期间，两省省苏和瑞金县苏，须立即按照此时间做出适当的工作计划，使行政区域的划分和各级苏维埃的选举（乡一级的划分和选举应用去大部分的时间和力量），能于一百天时间内，有步骤的很好的完成起来，并随时将经过情形报告中央政府，以便中央政府能及时加以指导，其他各省自令到之日起实行。此令。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六言诗·苏维埃政府布告

（1931年12月19日）

军阀豪绅地主，到处压迫穷人。
利用国民政府，要捐要税不停。
地主白占土地，厂主垄断资本。
大家要免痛苦，只有参加革命。
穷人一致奋起，组织工农红军。
豪绅地主土地，一律分给农民。
免除苛捐杂税，都是有吃有剩。
工人每日工作，只做八个时辰。
商人服从法令，生意由你经营。
各地工农群众，赶快参加革命。
建立工农政府，快把地主田分。
工人组织工会，快同厂主斗争。
大家一致努力，完成中国革命。

关于实施劳动法的决议案

（1931年12月20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劳动法的实施议决如下：

（一）根据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劳动法条文而实施之。

（二）本劳动法从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力。

（三）自本劳动法实施之后，以前各级政府颁布的一切劳动法令及关于劳动问题的决议，都不发生效力。

（四）人民委员会和中央劳动部根据劳动法规定并发展劳动法的应用，得颁布各种专门的法令细则和表册。

（五）如遇有劳动法的修改和增补，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颁布之。

（六）本劳动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内，都发生效力。

（七）凡违犯劳动法各条之规定以及将来颁布的关于劳动问题的各种法令，须按照刑法以应得之罪惩罚之。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

（1931 年 12 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宪法第七十六至七十九条及选举细则各条之规定，为便于选举委员会的工作起见，特另行颁布本工作细则。

第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停止或修改本细则之权，并有解释关于本工作细则的疑问或争执之权。

第三条　本工作细则，施行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内，一切选举委员会，都应遵照本工作细则进行工作。

第二章　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第四条　选举委员会，按照选举细则产生之后，委员之间，须即速进行分工，每个委员应担任选举委员会的一部分工作。

第五条　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不脱离生产，在办理选举期间，可暂时解放他所担负的工作，专门来进行选举工作。

第六条　可酌量任用技术人员，如文书、印刷、登记员之类，但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可利用区执行委员会和城市苏维埃的技术工作人员。

第七条　选举委员会，可在区执行委员会和城市苏维埃的地方办事，不必另设办事处。

第三章　选举前的工作

第八条　在未开始的两星期前，须将该选举区域内，实行选民登记。对于登记的工作，如没有组织的选民，选举委员会可任用专门登记员进行之，有组织的选民，可委托该组织的负责人进行之。

第九条　登记须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的选民登记表填写之。

第十条　登记完了之后，须由选举委员会指定委员，组织委员会，审查登记表。

第十一条　审查完了之后，须将有选举权的选民名单公布，在选民所在地或圩场张贴。

（附注）按照选举细则，应发选举通知书，为便于选举工作起见，故暂改用选民名单的布告。

第十二条　选民名单，须在选举大会的三天前发表。

第十三条　在未选举前，须将选民交给代表带去的提案的草案预备出来，且先在选民所在地公布，使选民预先认识应提出的提案。

第十四条　选举委员会，在未开始选举前，应将该区域内各个选举大会的选民总数，应选举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人数公布，（候补代表，以正式代表的五分之一为比例，如不及此数，也可以选举候补代表一人）并将被剥夺选举权者的名单，经过区执行委员会和城市苏维埃公布。

第十五条　在开选举大会的前三天，须布告选举大会的地点和

时间。

第十六条　须先将会场布置好，看守会场门的人和进会场的登记人预备好，选民进会场时，须按照选民的名单放他进去。

第四章　选举时的工作

第十七条　无论哪个选举大会，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派全权代表去出席。

第十八条　由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全权代表，宣布开会，在宣布开会后，须宣布到会的人数，是否已足法定人数。

第十九条　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全权代表，一定为选举大会的主席。

第二十条　选举大会议事日程的第一项，应由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或全权代表，根据宪法第七十三、七十四及七十五条之规定，宣布什么人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什么人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章　选举后的工作

第二十一条　选举委员会，须将关于选举的文件（如选民登记表、选举大会的记录、进选举会场的登记表等）汇集起来，交给区执行委员会或城市苏维埃，以备检查。

第二十二条　选举结束后，选举委员会，须向区执行委员会，或城市苏维埃，作选举总结的报告，对于选举委员会所用去的经费，同样须对区执行委员会或城市苏维埃，作详细的财政报告。

第二十三条　选举结束之后，选举委员会，须将工作结束，所

有选举委员会所购置的东西，全部交给区执行委员会，或城市苏维埃，选举委员会就宣布停止工作。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

（1931年12月）

第一条　为实行财政统一，一切国家税收，概由国家财政机关（中央及各省、县区财政部及城市财政科），按照临时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税则征收，地方政府不得自行规定税则或征收，但每年或每季开始征收税款，必须接到中央财政部关于收税的时间与手续等的规定的通令，才能征收，中央财政部得指定银行，代理收税。

第二条　各级财政机关，所收入之税款及政府经营事业的入款，或罚金或没收的财产以及其他收入等款项，概应随时转送或直送中央财政部或中央财政部所指定之银行，各级财政机关在未得到上级财政机关的支付命令以前，不得自行支配、扣用或抵补，亦不得延期不缴。

第三条　各级行政经费，各军火食杂用等经费，统由各该部分的财政机关造具预算，交他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审查，并报告中央财政部批准，统由中央财政部依据批准之预算付款。

第四条　凡中央财政部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各省政府财政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之总经理部），应于每月二十五日以前，造报其下月预算，送交中央财政部审查批准。其各级财政机关，应于每月二十日以前造报其下月预算，送交其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以便审查总合造报。

第五条　中央财政部在批准他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之预算后，依据预算，发给该财政机关的发款通知书，该财政机关，依次批准他的直接下一级财政机关的预算，并依次发给通知书。

第六条　各级财政机关接得此发款通知书后，填具领款证，由财政机关负责人及其政府机关或党军机关负责人共同署名（如省政府的领款证须有财政部长及省政府主席之署名），才能向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领款。

第七条　凡中央财政部直接下一级的财政机关，须于每月十号以前将他的上月决算表，送交中央财政部审查批准，各级财政机关，须于每月五号以前，将他的上月决算表，送交他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审查批准。

第八条　各级财政机关送决算表时，应将他的一切单据贴在单据簿上，随同送交他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此等决算单据，即保存于各上一级财政机关，不要再行转上了（如师部之决算单据等保存在军部经理处；区财政部之决算单据等，保存在县之财政部），但上级财政机关认为有必要时，随时调取各下级财政机关的单据、表册及所要的材料等。

第九条　不能取得单据之用款，由经手人代填单据，并须声明，不能取得单据的理由。

第十条　各级财政机关之预算表、决算表，应备同样的两份，一份自己保存，一份送交他的直接上一级财政机关备案。

第十一条　所有各级财政机关，凡关系财政事项所使用的账簿、表册、单据等，须一律遵用中央财政部所规定的统一的格式，不得沿用旧式账簿，或另立新奇。

第十二条　所有各种账簿单据，他的银钱记账单位，应一律折

合大洋计算，并须将折合的时价附记清楚（多少小洋或铜元值一元大洋）。但如收入是金条、银锭及不能十足通用的纸币，应将原件缴送中央财政部，不得自行折价。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机关的账簿、表册、单据等保存期间为五年，过期得由该机关负责人监视销毁之。

第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之。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和萧劲光的谈话[1]

（1931年12月）

对这支部队，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起义的军官，愿留下的欢迎，组织他们学习，进学校，搞干部教育。对要求走的欢送，发给路费，来去自愿。

---

[1] 193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和即将上任的红五军团政治委员萧劲光谈话，提出团结、建设红五军团的基本方针。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反富农问题

（1931 年）

一　反富农的道理

第一，富农是农村里的半地主和资本家，是个剥削阶级。他是拥护封建势力又想做资本家的，和工人雇农贫农以及中农群众的利益完全相反的。我们要保障工人雇农贫农以及中农的利益就要反对富农。

第二，富农是个剥削阶级。他是常常同反动势力勾结一气来破坏革命，我们要巩固苏维埃政权保障分田胜利就一定要反富农。

第三，富农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与我们完全相反，为使革命向前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加紧反富农的斗争。

二　反富农的错误

考查过去反富农，发生了四个大的错误。

第一，不以反剥削作标准，反富农看做专门的筹款。不提出剥削作标准，反提出金钱作标准。什么百元以内的不打，百元以外的就打，这种金钱标准被流氓头利用，少数地方弄到了上了二十块钱

的和养得起老母猪的也要打起来，使群众发起生恐慌，觉得革命是要使大家贫穷不是使大家富裕、生活改善的。

第二，侵犯了中农。因为有了第一个错误就发生第二个侵犯了中农利益的错误。中农是作田够食够用不受人家剥削，也不去剥削人家的。这些人不但不能侵犯他们，反要紧紧联合他们，大家来反富农。因为中农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一起革命才是出路，我们也只有联合中农，革命势力才雄厚起来，革命才会很快地发展。

第三，没有彻底平富农的田。许多地方分田实行了抽多补少，没有实行抽肥补瘦。富农把持了好田、山林、房屋、池塘等项，也没有彻底分配。于是富农在经济上占着优势，在政治上也取得了领导权。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团体被富农把持，富农更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势力来剥削压迫贫苦农民群众。

第四，没有发动群众。因为反富农只是政府筹款，也没有彻底平田，就不能使群众认识富农的反革命。大家起来用各种方法反对富农，政府也就脱离群众孤立起来。

三　反富农的正确方法

甲、政治方面。一、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苏维埃政府红军赤卫队及一切革命团体不许富农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和苏维埃会议的代表，要选举工人雇农贫农的领袖及中农最积极分子议事办事，还要组织贫农会，团结广大贫农群众与中农结成好的同盟，来反对富农。凡以前侵犯了中农利益或罚了他们的款子或捐了贫农的款子的要一律发还，要反对流氓头非阶级的脱离群众的乱罚政策。如再有这些事情发生，准其上抗。二、镇压富农的反动。富农是一个剥

削阶级，必然用各种方法来反对革命、破坏革命。因此在苏维埃区域防止富农的反动是应往常严格注意；发现富农的反革命行动的组织鸭比团或别的反革命团体勾结白匪阴谋反动破坏革命等等，政府必严格地照反革命办他的罪。富农只有在遵守苏维埃一切法令，不做反革命阴谋和活动，才一律准其生存营业。

乙、经济方面。一、反对富农的剥削。现时反富农并不是消灭富农，主要的是在经济上坚决地反对富农一切剥削，因为富农的剥削是增加了我们工人贫农等的痛苦。富农可以准许他请雇农工，只要按照劳动保护法来待遇雇工，不许苛待压迫。做生意也可以，只不准卡买卡卖，不准放高利贷。这些更实际的法子要有县政府最好经过县代表会议，按照当地情形规定出来。这种策略不是根本消灭资本家而是反对资本家残酷的剥削，要使社会上的经济得到活泼的发展。至于有时不得不向富农捐款，那是为得革命的需要。富农可以出得起应该担负的。但不是现时根本要消灭富农的经济。说到富农的田地，那就要一律平分。二、实行经济政策。上面讲的限制富农的剥削，还是一个消极的法子。单从消极方面来反富农是不够的，还要按照社会情形实行经济政策，积极地来反对富农。如由政府领导民众办理借贷合作社，低利借贷款给贫苦群众，办理生产合作社发达生产品，办理商业合作社，减少商人富农中间的剥削等。这些组织是积极地抵抗富农的剥削，使广大贫苦群众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准备着社会上的经济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四　防止流弊

在上面指出反富农的错误以及现时不是消灭富农的说法，再不

是叫大家放轻反富农。相反的是要大家认清反对富农的策略，更加紧地来反富农。我们在纠正策略的时候，要防止暗藏在革命中的富农分子和帮助富农的人来缓和反富农的工作，更不许富农借口来反对政府。此布。

主　席　项　英
副主席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三一年□月□日

夺取第二次大战胜利的宣传大纲*

（1931年）

各级政府、各政治部、各革命团体：

这一宣传大纲是在第二次大战前鼓动群众最切要的材料，各机关都应根据这一大纲，在文字上、群众大会上、口头上以及组织宣传队去扩大这一宣传、鼓动，以争取第二次大战的胜利，各机关绝不能忽视这工作，并且各机关应将这一宣传尽快翻印，分发到工农群众中去。

更加积极准备争取第二次大战更伟大的胜利*

（1931年）

一　军阀混战快要爆发

1. 蒋、阎、冯的战争刚才结束，张学良就跑到南京来看一看虚实，回到天津后把阎锡山残部，改编为五军，冯玉祥军队也改编了几个师，向南京的国民政府硬要了五十六万分给这一大批军队，这是很明显地要这一批军队同他合伙来打蒋介石。张学良又收买了石友三、孙建仲，并要孙而来勾结韩复榘、马鸿逵，想把山东造成整个的反蒋大联合。蒋介石当然也不示弱，也在那里软硬手段兼用去拉拢收买，并威吓孙连仲、韩复榘等，并挑拨晋军及冯部孙良臣等的内部分裂，又把山东、河南的一些杂色军队解决了，怕的是这些靠不住的军队将来被张学良勾引过去。蒋介石的嫡系军队都布置在江苏、安徽的北部及河南、陕西等地方。所以蒋介石、张学良现在双方都在摩拳擦掌积极准备再来一次杀人更多的军阀大战。

2. 因为蒋张战争必然要爆发，所以蒋介石想向美国、加拿大借一批大债作战费，但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吃醋出来干涉说要借款大家借，不能哪一国单独借钱给中国。这里可以看出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冲突更加厉害，必然他们走狗各个军阀的混战也随之更加紧张

起来。

3. 蒋介石要和张学良大战，他怕我们的革命运动在他的后方发展起来了，他不得了，革命运动发展起来就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死亡日子到来了，所以抽调军队来进攻各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他想把我们革命力量威吓缩小一点，他可以向他的老板帝国主义及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面前夸口认他蒋介石能镇压革命势力，可以巩固他的反革命的领导地方，并且也可以安心去同张学良大战。不料张辉瓒全部被我们俘虏了，谭道源师被我们消灭了一半，蒋介石的第一步计划完全失败了。他又勉强从山东抽了韩德勤的两旅来，又从湖北抽了郭华宗的一师来，因为鲁胖子太没有用了，又把何应钦派到江西来指挥，又把他的所谓限四月底结束“剿匪”的问题，缩短一个多月，这都可以看出来蒋介石想很快地把我们威吓一下，好便将军队调回去对付张学良。但是现在蒋张的战争一天一天地紧张了，而所谓剿匪的军队人人都怕做张辉瓒第二，又不敢前进。我们则在这里稳坐泰山，乘机会一个一个消灭他（所谓以逸待劳），加之我们又有武装群众的帮助消息很灵通，地理又熟悉，敌人则一件都没有。这样的便利仗当然我们是有打一仗胜一仗把握的。

二　全国各地红军的发展

1. 蒋介石在这一次是下了相当的决心要来同全国的革命力量拼一拼，不仅派军队到赣西南来，鄂东北、鄂南、湘东、湘西、赣东北、闽西都派了军队去。但是打的结果怎样呢？我们且拿反动派报纸上的消息（当然这些消息都是打了折扣的）来看一看，鄂东北自从蒋介石派去打红军的郭汝栋的两派暴动投入红军后，红军第一军

更在安徽、湖北、河南的边界大大地行动起来。湘西的红军二、六军则把徐源泉及何键的军队打败了许多次，在革命势力更由公安、潜江一带扩大到施鹤去了，鄂南、湘东的红军十六军则抽了一部分队伍，攻下离南昌一百二十里的高安（一月二十四日）。赣东北的红军第十军攻下上饶后（一月七日）又围攻余江。红军第七军又到了湘南的江华及粤北连山县。闽西的红军又夺回了永定（一月一日），并且又进攻平和，西路的独立师又打了遂川。国民党不调军队来打红军还好一点，调军队来打红军简直是帮助红军发展，因他们送了许多枪支子弹给红军。

2. 我们活捉了张辉瓒，各地的红军又在不断地发展。因此反动统治阶级更加惊惶发抖，而中国的工农群众则更加兴奋努力，就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殖民地的革命群众也在那里拍手欢呼，庆祝中国革命的新发展，所以反动统治阶级是一天一天地恐慌增加，我们是一天一天地革命发展增加，我们的心气是屈服敌人，因此我们打胜仗也更有把握。

三　富田事变解决了，我们的力量更团结更巩固

1. 当我们打第一次大仗的时候，离富田事变的期间还不远，许多同志受了AB团取消派的利用，还不能明白过去。现在则不同了，富田事变后发生的许多不好现象，现在都逐渐消灭下去了，永阳省行委业已取消，过去被欺骗的群众都觉悟过来了，这样我们能够用全副力量去对付进攻的敌人，当然我们的力量更强大了。

2. 我们打第一次大仗时内部的AB团虽然打了一大部分，但还

有许多埋伏在我们的队伍里作白军的侦探，造谣破坏分散革命力量。现在我们把上次未打完的鸭比团又打出一些，那些被欺骗的AB团分子都明白过来了，出来自首，这样我们内部的坏东西反革命的AB团，可以说肃清完了，于是我们的革命力量更巩固了，所以现在和第一次大胜仗时比较，我们的力量是更加团结巩固，因此我们杀敌的力量也更大，第二次的大胜利更有把握。

四　我们的武装增加了

我们消灭了张辉瓒，打败了谭道源，缴得步枪八千支，机关枪、追击炮、手机关合起来也有上千的数目，子弹百余万发。敌人送给我们这么多的武器，我们又可以多包围敌人几团兵。

五　地方的武装增加了

1. 因为我们打第一次大胜仗后，发了三四千条枪给地方的群众，得了这么多的枪，力量更加雄厚，天天扰敌打靖匪又缴得一些枪，并且他们打得多了胆子也壮了，经验也多了，军事技术也进步了，所以他们对红军帮助的力量也更大。

2. 地方的武装增加了，可以多消灭靖匪，多做扰敌工作，敌人要维持他们的交通必然要步步为营地沿途多布置兵力，这样更可把敌人兵力分散，增加敌人的顾虑。于是，我们更容易去消灭敌人，所以敌人虽想每路多加兵力，实际上到火线上来的还加不了许多，因为要多留兵力维持后方交通是很安全的，这样我们又占了许多便宜，当然这也是我们有把握打胜仗的一个条件。

六　敌人的恐慌增加了

1. 敌人到赤色区域来找不着带路的，买不着东西吃，又加上地方武装到处骚扰，他们已经恐慌得不得了。又听得张辉瓒全师消灭了，谭道源虽然跑得快也遭受个大惨败，于是他的恐慌更加厉害。

2. 白军士兵进剿赤区来见到我们的口号传单；要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告诉他们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是平等自由的，他们一方面又看见白军在赤色乡村里烧杀抢掠，所以他们都渐渐地认识了革命，认识了红军。蒋蔡两师到了兴国就有二十三个士兵带枪开小差到红军里来，这就可以知道白军的士兵是有很多不愿意来同红军打仗的。加以张辉瓒师的俘虏兵回去后大发宣传，我们怎样优待他们，又不搜腰包，并且每人还发了三块钱，于是白军的军心更加动摇，没有勇气来打红军，甚至于想送枪来给红军，来领三块钱的也有。这样可见我们的力量是更大更巩固了，打仗的勇气是一天一天提高了，而敌人则恐慌即一天一天增加，军心一天天涣散，这也是我们有把握打胜仗的条件。

七　群众的积极性更增加又有地理上的便利

1. 在白军初来进攻时，群众虽然很积极地帮助红军，并作了许多扰敌的工作，但因为地方武装不多，各方面的经验也不多，加以还有许多AB团及富农在内做鬼，所以他的力量表现还不十分大。自经第一次大战胜利后，他们的胆子也壮多了，武装也增加了，各方面的经验也增多了，所以打靖匪的工作和扰敌的工作来得更积极

更勇敢，而且战略也更巧妙。现在各地的群众成天成夜的在那里积极打靖匪、扰敌，使敌人心惊胆吊到处做工事，时时刻刻都不敢放松警备，因此使敌人的兵力非常疲劳。这样当然要影响敌军作战的精神。

2. 我们赤色群众拥护苏维埃的斗争精神，本来是非常勇敢的，加以白匪这次到赤色区来抢粮食、烧房屋，见人就杀等等的残酷行为，所以群众因此更加愤激、更加勇敢，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敌人全都消灭。我们是有广大群众的，敌人是没有的，我们的群众一天一天地更加积极、更加勇敢，敌人的士兵是一天一天的动摇，愈到赤色区域来愈困难愈恐慌，这一切都使得敌人不得不打败仗。

3. 赤色区域里面都是我们的熟路，我们又有群众替我们送消息带路。敌人动动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很容易去打包围。敌人地理不熟，又没人带路，他们的侦探又放不进来，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力在什么地方，只好没头没脑地向赤色区域里面瞎撞，我们可以在很险要的地方等他们来，给他们冷不防，就可以包围缴械，活捉张辉瓒，就是用这个方法，将来我们还要用这个方法去活捉两个师长来。

所谓地利、人和已经是打胜仗的条件，况且我们还有许多便利和优点，我们还有不打胜仗的道理吗？

八　我们的经济更充足

1. 我们早已料到了这次是个长期战争，所以老早就把地方的粮食油盐等都送到秘密地方藏起来，使敌人进来没有饭吃，而我们可以食用自由，什么都不会感到缺乏。红军本身本来已经准备了几个月的费用，勇敢的红军官兵们又大家起来把个人的私钱都捐给公家

又情愿减伙食费，并且在团组中□□中又准备了几个月中的月费，所以同敌作持久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敌人就不行了，他们进到赤色区域来一切食的用的东西都找不着，他们必须从很远的后方送来，从后方送来真是困难极了，山路又不容易走，护送的队伍派少了，我们可以截击他，派多呢？又没有那么多的兵，所以蒋蔡的队伍一到兴国每天只能吃一餐饭一餐粥，假若他们再向赤色区域里边进一点，他们将一定没有饭吃，这一点也使得敌人不得不打败仗，我们不得不打胜仗。

但是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打胜仗的条件，我们断不能这样就满足了，就去轻敌，我们更要去加紧准备用最大的力量去消灭更多的敌人，更多捉几个师长来，要活捉蒋光鼐、蔡廷锴、许克祥、毛炳文、罗霖、公秉藩，要把敌人进攻的企图完全消灭，我们要去进攻敌人，追击敌人，把敌人赶到南昌去、九江去，使苏维埃巩固的发展与扩大，展开新的革命局面，发动更大的规模的革命战争，去消灭军阀混战，争取一省或数省的以至全国的苏维埃革命胜利。

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1932

1932年10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受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错误批判，会后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专做政府工作，但他仍以大局为重，发动苏区人民支援革命战争。图为毛泽东在宁都的旧居——胡氏家祠。

关于加入过反革命组织的工农分子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问题

（1932年1月13日）

过去有些工农分子，因为政治认识薄弱而被欺骗加入过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洛茨基派及其他的反革命组织，被压迫和受欺骗而反过水的，后来自觉地向苏维埃政府自首，有的被政府逮捕后能忠实地供出反革命的组织而经政府许其自新者，有的被反革命分子所欺骗而加入了反革命的变相组织者，有的被白军压迫而反水出去后来回来的，以上这些加入过反革命组织和反水的工农分子，各级苏维埃政府对于他们剥夺公民权与否，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以致当着选举时对他们不好处置，有些地方则把他们排除在选举之外，这于保护工农利益和彻底肃清反革命的组织都是有妨碍的。因此，本政府特颁发本训令明白规定：

凡与下列各条相符合者，应宣布他们仍然有公民权，当选举时仍然与普通工农分子一样可以参加选举，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贫苦工农分子加入过反革命组织（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洛茨基派等），觉悟后能向苏维埃政府自首，并将反革命的组织尽所知地报告出来者。

（二）贫苦工农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所欺骗而加入各种反革命的变相组织（如恋爱团、两性合作社、好吃委员会、苗子委员会、一心

团、神精团等等），经AB团、社党等招供而被苏维埃政府逮捕后，经过自新期间考察，确实他不是明知这种组织是反革命的，因而不自觉地去加入，乃是为朋友感情关系或一时满足嗜好被欺骗去加入，并且现在已经知道自己被欺骗，因而脱离这种反革命的变相组织者。

（三）加入反革命组织（AB区、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洛茨基派等）的附和的贫苦的工农分子，被捕后能忠实地供出反革命的组织，经苏维埃政府给他自新，自新期间已满，业已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在行动上有觉悟表现者。

（四）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工农分子，被肃反机关逮捕，经审问释放，而判决公民权的期限已满，并已恢复公民权者。

（五）赤白交界的区域，贫苦工农分子被白匪、团匪等反动派所欺骗和压迫而反水，现在确已觉悟，自知过去的错误，仍努力参加革命工作者。

但是，凡属反革命组织（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洛茨基派等）的反水的主要分子、首领及行动上无诚意悔悟表示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即使是贫苦工农，均应剥夺他们的公民权，绝对不能参加选举。

以上规定，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贫苦工农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为了用各种方法易于彻底肃清暗藏苏区内的各种反革命组织和阴谋，望各级苏维埃政府遵照执行，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为要。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932年1月27日）

一、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苏维埃境内依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之规定，在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管辖之下执行侦查、压制和消灭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反革命的组织活动及侦探盗匪等任务。

二、国家政治保卫局与方才暴动的或红军新占领的区域的肃反委员会的任务、组织和工作范围均不相同。肃反委员会的任务，在以革命的工农群众的威力，于暴动时和方暴动后将一切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与其活动逮捕和检举到肃反委员会中来处理。肃反委员会是暴动群众选出的，在暴动的指挥机关——工农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工作。肃反委员会可有自己的武装队伍，担任受命拘捕、看管和处决一切反革命罪犯的任务。肃反委员会存在期间，依当地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时间与巩固的限度而定。

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任务，在以其集权的系统的组织与革命群众的信赖和帮助，经常地系统地执行抵抗、检举和消灭一切公开的尤其是秘密的暗藏的反革命的组织和行动，以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目前苏维埃运动正在向前发展的新的苏区，一般地都要经过肃反委员会的工作阶段，在肃反委员会存在的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应与其发生系统上的管辖关系，且要逐渐转变其成为政治保卫局

的下级组织。

四、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其本身在委员会的管辖之下工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即为委员会的主席，并得列席人民委员会，有发言权。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任免处分权，属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委员中应有参加最高法院的检查员一人。

五、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各省苏维埃政府与中央军委会中有它的代表机关，指挥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地方机关与红军中的工作。省、县两级设分局，亦由委员会管理。分局长即为委员会主席。在红军中，中央军委会或其他苏区军委会及军团或师以下则设特派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及上级分局亦得在某种机关中直接派定特派员。分局长、委员及特派员的任免处分权，统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最下级特派员的任免处分，省及军委会分局有权处理，但最后的批准权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

六、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特别障碍以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须绝对服从。各分局、各特派员在政治上是受当地各该级政府或红军中军事政治负责者指导的，各分局长并得列席于省苏、县苏的主席团会议，但工作的关系上绝对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地方政府及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如有抗议只能提到人民委员会解决。

七、国家政治保卫局给权予地方及红军中分局，侦查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但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特许的范围内者，各分局才能自己解决。特派员则只有在上级给予的任务范围内执行一切工作，除非临时紧急处置，如反革命分子或其组织已定有暴动，特派员可取得当地政府或红军的帮

助，实行拘捕人犯，破获组织，然后再报告上级核准。

八、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各分局和特派员是代表政权侦查、接受与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的。当地群众及政府机关、共产党部及共产青年团部、各革命团体、红军均负有向其供给和报告各种消息的责任，在需要时，地方政府及红军应给以武装力量的帮助，且须临时听其指挥。地方政府、红军指挥机关与政治保卫局分局及特派员在工作上只能发生横的关系，只有在必要时，分局和特派员得以其一部分材料通知其同级政府和红军指挥机关，且须在国家政治保卫局规定的范围以内。对红军指挥机关则关系较密切，以便红军能时时注意到将不良分子淘汰出去，使反革命的活动无以生根。

九、一般地对于反革命犯人及其嫌疑犯的拘捕审问权属于政治保卫局。政府其他机关、共产党部、共产青年团部及一切革命团体均不得自行拘捕审讯，尤其不得自行处决。除非紧急情形，如发现反革命分子或其组织已定有暴动或逃跑时，得由其他机关乃至群众自动地将其拘送保卫局，但也只限于拘捕为止。当保卫局得有反革命充分证据，须拘捕暗藏在政府机关、红军与各革命团体中的负责人的时候，保卫局只能于执行拘捕前通知该机关之最负责者，预备替代人员。该机关最高负责者即使不同意也不得阻挠其行动，只能向上级抗议。假使保卫局依据证据认为该机关已无可接受预告的人，则须于执行前通知其上级机关的负责人。

十、一般地对于惩罚反革命犯的判决和执行权属于司法机关，政治保卫局则处于检察的原告地位，唯在国内战争及苏维埃运动向外发展时期，在人民委员会许可的范围内，国家政治保卫局有权依据法律判决和执行对于某种反革命犯人的惩罚。

十一、工农民主政权对于反革命犯的惩罚原则是依据阶级路线

来规定的。凡属剥削阶级的地主、豪绅、旧官吏、资本家、老板、富农犯了积极反革命的罪状，须给以严厉的惩罚；一般的工人、红军战斗员、雇农、贫农、中农与独立劳动者只要不是坚决投降于反革命的领袖分子，而为反革命胁迫欺骗去加入或附和反革命行动或组织的，在原则上应一律给以自新的出路，其办法从公开劝告、警告、禁闭、开除军籍一直到拘捕与剥夺一时期的公民权。惩罚异己阶级的反革命分子最严厉的是死刑，次要的应监禁、罚做苦工或驱逐出苏区境外。工农中被反革命胁迫欺骗而自首的一律免罪，被发觉或检举后的自新分子亦应从轻处分，拘捕者应释放。异己阶级中的自首分子应分别首从，且须规定审查时期。在审查期内不得自由移动，自新分子仍应给以较其应得的为轻的处罚。

十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原则应分侦查与执行（审查检查所得的材料与复查均在内）两个工作系统。彼此分开，不相隶属。在侦查部下应有极精密极复杂的工作网，执行部下应有自己的武装组织。

十三、国家政治保卫局一切行动依法律的裁制，在临时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未成立前由人民委员会直接处理。

十四、在其他苏区未与中央苏区打通以前，国家政治保卫局得将其管辖该苏区政治保卫局的全权委托该苏区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直接代理。在中央苏区内，有时因客观故障，地方分局与国家政治保卫局暂时隔断时，亦运用此规定的原则。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关于变更和补充居民与苏维埃代表的比例标准

（1932年1月28日）

目前中国革命，还正在残酷的斗争中，苏维埃政府若颁布各种条例，首先应当顾到适合目前的斗争的条件与否，应根据这个原则，以颁布各种条例。因此，对于选举细则上所规定的居民与苏维埃代表的人数比例，也要根据这个原则，不应把居民与代表的人数比例规定得太呆板了。为适合目前革命斗争的环境，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机关内的领导地位，本届的选举居民与代表人数的比例，对于过去所颁布的选举细则，必须略有变更和补充。兹将居民与代表比例的新标准规定如下：

一、乡苏维埃：贫农、中农、独立劳动者等，每五十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工人、苦力、雇农，每十三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不足所规定的人数者，也可以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二、直属于县的城市苏维埃：城市贫民和周围所管辖范围内之贫农、中农及独立劳动者，每八十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工人、苦力、雇农，每二十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不足所规定的人数者，也可以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三、直属于省的市苏维埃：城市贫民及附近之贫农、中农等，每四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工人、苦力、雇农，每一百人选举

正式代表一人；不足所规定人数者，也可以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四、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各乡苏的代表及地方武装的代表所组成，每居民两百人得选举参加区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一人，不足所规定人数者也可以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五、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区代表大会和城市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及地方武装和红军的代表所组成，每乡村居民一千二百人得选举参加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一人。代表的成分，工人、苦力、雇农应共占百分之二十五，士兵占百分之三十，每城市居民四百人得选举参加县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一人，代表的成分，工人、雇农、苦力应共占百分之五十。

六、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县代表大会和省直属市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代表所组成，乡村居民每五千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代表的成分，工人、苦力、雇农应共占百分之二十五，士兵占百分之十。每城市居民二千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代表的成分，雇农、工人、苦力共应占百分之五十。

各级苏维埃的候补代表以正式代表五分之一为比例，就是每选举五个正式代表，可以增选一个候补代表，正式代表不足五人者，也得选举候补代表一人。候补代表参加苏维埃的会议或者代表大会，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正式代表缺席时，由候补代表升补。

（附注一）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工人、苦力、雇农、红军的代表标准，应在选举代表之前确定，城苏、乡苏及区县二级代表大会都须注意到工人、苦力、雇农及红军成分。

（附注二）地方武装和红军选举手续，另有地方武装和红军细则规定之。

以上的规定是补充选举细则的缺点，除居民与代表的比例变更

外，其余的程序，都应依照选举细则的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接到本训令之后，对于本届的选举应即遵照本训令的指示去进行。此令。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1932年1月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和《政治委员工作须知》。

和何长工的谈话[1]

（1932年1月）

你的工作需要变动一下。宁都起义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

你到红五军团十三军当政委。你有改造起义部队的经验，首先要把十三军搞好，这一炮打响了，就会影响十四军，鼓励十五军。

---

[1] 这是毛泽东在瑞金叶坪和何长工谈话的一部分。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三号

（1932年2月1日）

为保障红军中战斗员、指挥员及工作人员的权利，维持红军铁的纪律，本执行委员会特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兹公布该条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起开始发生效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到本命令之后，即转各级红军部队及地方武装指挥部，按照该项条例的规定组织军事裁判所，以管理红军中一切刑事裁判。此令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

（1932年2月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凡在红军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赤色警卫连等武装队伍服军役的，无论是军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倘犯了刑法、军事刑法及其他法律，都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但犯普通纪律而未涉及犯法行为者不在此限。

第二条　在作战地带居民的违法行为，无论其犯军事刑法或其他法律，都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敌军的侦探、内奸等如在作战地带，也由军事裁判所审理之。

第三条　红军各级裁判所，都须遵照本条例的规定组织之。

第二章　军事裁判所的组织系统

第四条　军事裁判所分为以下四种：一、初级军事裁判所；二、阵地初级军事裁判所；三、高级军事裁判所；四、最高军事裁判会议。

第五条　初级军事裁判所设在红军的军部、师部及军区指挥部和独立师部内，阵地初级军事裁判所则设在作战阵地的最高级的指

挥部内。

第六条　高级军事裁判所设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内。

第七条　高级军事裁判会议，设在最高法院内。

第八条　初级军事裁判所及阵地军事裁判所都隶属于高级军事裁判所，高级裁判所则隶属于最高法院。

（附注一）最高法院未成立以前，对于最高军事裁判会议所应解决的案件，由临时中央政府临时组织法庭解决之。

（附注二）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得在该苏区的最高军事委员会内设立高级军事裁判所，并有最后决定案件之权。

第三章　军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

第九条　初级军事裁判所是由裁判所长一人、裁判员二人组织裁判委员会。高级军事裁判所是由裁判所长一人、副裁判所长一人、裁判员三人组成裁判委员会，以指导一切裁判事宜。最高军事裁判会议由最高法院指定若干人组织之，但必须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参加。

第十条　初级军事裁判所的所长和裁判员，由士兵代表大会推举出来，经高级军事裁判所核准；高级军事裁判所的所长和裁判员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名单，经最高法院核准。

第十一条　各级军队的指挥员，不得委任军事裁判所的所长和裁判员。

第十二条　初级军事裁判所审判时的法庭由三人组织之，以裁判员为主席，其余二人为陪审员。高级军事裁判所所审理的初审案件须用陪审员，但终审的案件则不用陪审员，而是由裁判所所长和

裁判员所组织。

第十三条　陪审员由士兵选举出来，每星期改换一次，陪审员在陪审期间可解放士兵的职务，陪审期间终了，仍归原队工作。

第十四条　各级军事裁判所得任用书记及其他工作人员。

（附注一）倘案件不多，军事裁判所的人员可以减少，初级军事裁判所可以仅设所长一人，高级军事裁判所可以仅设所长一人、裁判员一人。

（附注二）审判不关重要的简单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审理之。

第四章　各级军事裁判所的裁判及其裁判手续

第十五条　初级军事裁判所审理军长以下的犯罪的指挥员、战斗员及在军队里服务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案件，但为初审机关。

第十六条　地方武装的军事裁判所审理全省地方武装的军事案件。

第十七条　阵地初级军事裁判所则审理在作战地带的一切案件，但仍为初审机关。

第十八条　高级军事裁判所是审判经过初级军事裁判所判决而上诉的案件后之终审机关，同时是审理军长以上的指挥员、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属部队及其他工作人员的案件之初审机关。

第十九条　最高军事裁判会议是审理经过高级军事裁判所判决而上诉的案件之终审机关，同时是审判军团指挥员以上的重要军事工作人员的审判机关。

第二十条　除最高军事裁判会议外，其余各级军事裁判所判决

的案件被告人在判决书上所规定的上诉期内，都有上诉权，上诉的期限规定为七十二小时至一个月，其上诉期由当时审判该案件的法庭决定之。

第二十一条　凡判决死刑的案件，虽被告人不提起上诉，审理该案件的裁判所须将案卷送给上级裁判所去批准。

（附注一）在紧急作战的情形中，可先执行而后抄录全部案件送给上级军事裁判所去追认。

第二十二条　审判案件须用公开的形式，准许士兵及军队的工作人员旁听，但是有军事秘密的案件，可采用秘密审判的形式，但宣布判决时仍须公开。

第二十三条　审判的时候，不一定在军事裁判所的所在地审判，可到军队所在地及犯法者的工作地点去审判。

第五章　军事检查所的组织及任务

第二十四条　在初、高两级的军事裁判所的所在地，设立初级军事检查所及高级军事检查所。

第二十五条　初级军事检查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一人、检查员若干人。高级军事检查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二人、检查员若干人，以外可用书记、文书等技术工作人员。

（附注一）军事检查所的工作人员看军队情形可随时增减。

第二十六条　各级指挥员、政治委员若发现军队中有犯法行为的证据，可以将犯人实行逮捕，送给相当军事检查所去检查。

第二十七条　军事检查所是检查和预审军犯的机关，一切案件，除已明白无须再检查的简单案件外，都先交该级军事检查所去

检查过；军事检查所的案件检查完了，做出结论之后，再将案件送交军事裁判所去审判。

第二十八条　军事检查所是代表国家对于军事犯的原告机关，它可以检查军队中及与军事有关系的一切犯法案件，并可以向法庭提出公诉，开庭审判时可以代表国家出庭告发。

第二十九条　当检查案件的时候，凡与该案件有关系的任何人，检查员有传来审问之权。

第三十条　传审的时候，可用传票、拘票、检查票三种。

（附注一）军事裁判所只能用传票、拘票二种。

（附注二）军事裁判所所在地的军部或师部及其他军事机关，须指定部队为军事检查所调用。

第六章　经费

第三十一条　军事裁判所及军事检查所的经费，按照预算由各该级的军事机关发给。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命令公布之。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有随时修改或停止之权。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执行优待红军条例的实施办法

（1932年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红军的优待条例，这个优待条例，对于红军规定了许多优越的权利。为什么对于红军要定出这许多的优待条件呢？因为红军在几年来的斗争中，是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军阀的主要力量，是苏维埃政府的有力保卫者。他在过去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上，做了英勇斗争的光荣事业。目前中国革命是一种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是积极进行革命战争的时候，是要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作更残酷的大规模的战争，必须要有广大的红军，才能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以及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红军是为解放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而作战、为苏维埃政权而作战的战士，是以最大牺牲精神来为工农及一切劳苦民众利益和解放而奋斗。因此，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群众，就应当对于红军加以特别的优待，使这些红军战士心中得着安慰，对于家庭没有什么挂念，可以一心一意地去勇敢作战。因此，第一次全苏大会特别定出这个优待红军条例。

过去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对于红军及其家属的优待，确已有些规定，但在实际上的执行是缺乏注意的，有的地方简直是忽视不执行，有的地方对待红军家属，简直是破坏红军，这与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是有很大的妨碍的，这是很大的错误。以后各级苏维埃

政府应严格地纠正过去的这些错误，绝对执行全苏大会通过的优待红军条例，以后若再有忽视优待红军或对执行优待红军条例怠工，须当作反革命一样来处罚。兹特规定下列优待红军条例实施的具体办法，以便去执行。

一、以区为单位，立即调查本区内充当红军的人，这些红军中家庭的人数、土地多少、能劳动的人多少、缺乏劳动和不足劳动的人有多少，统计起来，抄成二份，一份自存，一份交县苏维埃保管，这一工作三月一日前办理完毕。

二、红军各军和独立师及脱离生产之地方武装，由政治部及政治委员负责，将所有队伍中指挥员、战斗员及一切工作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家庭状况，详细登记，汇报于革命军事委员会或当地苏维埃政府，这一工作也限于三月一日以前办理完毕。

三、红军中以前牺牲了的战士，由地方政府与红军政治部及政治委员尽可能调查清楚汇报军委或地方政府，以便交付各县政府办理。

四、从前红军和地方武装中，还留有参加反革命组织者，无论是已经处决了的分子，或在队伍中自首自新分子，均须区别阶级成分和首要及附和，由各军地方武装负责人调查，汇报上级机关，以便决定对于他们的土地应否没收，决定后交给各地方政府执行。

五、各军登记的名册，除外籍的红军战士外，由中央政府分别转交各区政府，然后各区政府依照各军名册与当地政府调查登记名册对照后，报告该上级政府备案；如有不符合者，仍须详细考察和转报上级政府备查，以免遗漏或错误。

六、对于实行优待条例之主要问题，在**目前是动员群众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和耕种红军公田**，这应由区、乡政府依照调查的名册，

将该区内各个红军战士家属之无劳动力或缺乏劳动力的数量加以总计，计算共需要义务劳动多少，然后统计全区内各乡的劳动力多少，适当分配某地工农群众帮助某地之红军家属耕田和耕种红军公田，交各乡苏维埃负责，具体分配实行耕种。

七、各乡苏维埃接到区苏维埃的通知后，应立即召集乡苏维埃的会议，决定执行办法，然后召集红军家属及召集该乡全体居民开大会，讨论和公布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及耕种红军公田的意义和本乡所担任义务劳动多少，经过群众赞成，具体地分配义务劳动的天数和时期。同时乡苏维埃还须尽一切可能召集贫农团、雇工工会的负责人开会，请其帮助政府动员群众实行帮助红军及红军家属耕田。当耕种和收获时，乡苏维埃要负督促的责任，同时要防止强迫命令的行为（但对富农不在此例）。

八、当耕种和收获的时候，乡苏维埃要在事前用宣传鼓动方法去动员广大群众，按照规定的义务劳动去帮助红军及红军家属耕种和收获，使红军的田地耕种和收获时间，较一般的耕种和收获要早一些。

九、对于外籍之红军战士留公田的办法，应按照地方每人分田多少，规定留出公田的数额，分田少的少留，分田多的多留，如江西规定的办法，每乡每人分五担者留三人到五人的公田，五担以上者则多留公田，分五担以下者亦须留出公田，最少是二人的公田。其他苏区可按照江西办法规定，除旧有苏区须设法留出公田外，凡新发展区域，当分配土地时，须特别注意留出公田。

十、公田以区为单位，统计起来报告县政府，然后统计起来报告省政府，再将全省公田统计起来报告中央政府，再由红军总政治部根据红军外籍人数与各县公田数目给以分配。一方报告中央政府

交地方政府向各地群众公布，同时向各军战士公布新分公田多少、在何地点，由各军战士推举代表到所分公田地点查看。

十一、各地之公田，由区政府规定特别标志，上写分与某军战士公田，其种子、肥料等项，以动员群众供给为主体，在可能时，将由政府补助。

十二、每年收获后，由区苏维埃负责将收获品出卖变成货币，依次解送县政府，省政府转送红军分配享受公田之人。

十三、对于牺牲了的外籍红军战士，应将其姓名、籍贯、家庭登记，将来革命发展到该地，由中央政府令行当地政府按址查明，以优待条例实行对于其家属之优待。

十四、红军战士牺牲后，其家属不够维持生活或完全不能维持生活者，政府应照当地必需生活费给以相当津贴，使其子女达到能维持生活为止，无子女者维持其父母妻子至死为止。

十五、凡设立学校的地方，红军子女有免费入学的权利，由乡、区苏维埃负责执行。

十六、红军战士和其家属享有通信上的特别优待，照人民委员会第一号通令办理。

十七、对于残废了的红军战士，由军事委员会之红军抚恤委员会和残废院照优待条例办理。

十八、为了执行以上办法及优待条例中之一切规定，在各县政府军事部之下，设立优待红军委员会，负责管理优待红军事宜。省政府之下设立省优待红军委员会，来负责指导、督促各县优待红军委员会之责。

十九、为督促各级政府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起见，由各级政府工农检查部负责，随时派遣人来考察，如发现各级政府不执行优

待条例或经红军战士及其家属控告者，由工农检查部查出来迅速纠正，并得由法庭提出控告按罪处罚。

现在春天到了，春耕就要到来，各级政府与红军政治机关必须依照优待红军条例和本令所述办法，立即讨论具体执行事项并切实执行，随时将执行的情形按级报告上级机关以至中央政府审查，不得疏忽怠工，是为至要。此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5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2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1

（1932年2月8日）

对于临时最高法庭审理AB团改组派军事犯等要犯的判决书的决议案…4

（1932年2月）

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的布告……………………………………………………………………6

（1932年2月）

给袁国平的信………………………………………………………7

（1932年3月6日）

为杭武工作给闽西的一封信…………………………………………10

（1932年3月9日）

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17

（1932年3月16日）

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19

（1932年3月30日）

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21

（1932年3月）

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27

（1932年4月2日）

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 ……………………………30
（1932年4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32
（1932年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 ………35
（1932年4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
被压迫民族宣言 …………………………………………………40
（1932年4月15日）
今后中心任务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 ………………………42
（1932年4月22日）
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 ………………44
（1932年5月3日）
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46
（1932年5月9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江西省苏第一次代表大会各种决议案的决议…48
（1932年6月3日）
致朱德、王稼祥电 ………………………………………………50
（1932年6月5日）
中央政府给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电 …………………………51
（1932年6月9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执字第四号 ………………………………54
（1932年6月9日）
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 …………………………………55
（1932年6月9日）

内务部的暂行组织纲要 ……62
（1932年6月20日）
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 ……65
（1932年6月20日）
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 ……71
（1932年6月25日）
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 ……73
（1932年7月7日）
修正暂行税则 ……84
（1932年7月15日）
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 ……88
（1932年7月25日）
当前作战方向问题 ……89
（1932年7月25日）
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 ……91
（1932年8月10日）
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 ……93
（1932年8月15日）
宜黄乐安等地敌情和我军作战部署 ……95
（1932年8月15日）
打击陈诚部队的训令 ……98
（1932年8月29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命令 ……102
（1932年8月31日）
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电 ……103
（1932年9月2日）

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电……104
（1932年9月3日）
部队必须轻装的命令……105
（1932年9月5日）
关于打破敌军围攻鄂西苏区的意见……106
（1932年9月上旬）
对红四方面军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建议……107
（1932年9月中旬）
对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的意见……109
（1932年9月中旬）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二十五号……111
（1932年9月17日）
关于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113
（1932年9月20日）
关于目前军事行动的报告……116
（1932年9月23日）
关于中央政府周年纪念……119
（1932年9月24日）
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121
（1932年9月25日）
关于方面军行动与中央局全会地点问题的意见……124
（1932年9月26日）
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126
（1932年9月26日）
应紧急动员并布置中央苏区与各苏区行动……132
（1932年9月30日）

关于鄂豫皖应选敌弱点歼其一部的意见……133
（1932年9月30日）
复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电……135
（1932年9月30日）
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136
（1932年10月6日）
关于战争紧急动员……139
（1932年10月13日）
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九号命令……145
（1932年10月13日）
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号命令……146
（1932年10月13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147
（1932年10月14日）
为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53
（1932年10月21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157
（1932年10月31日）
临时中央政府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159
（1932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171
（1932年11月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175
（1932年11月12日）
征发富农组织劳役队……177
（1932年11月25日）

为多种杂粮禁种毒品事……178

（1932年11月25日）

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180

（1932年11月29日）

关于各级选举运动的检查……186

（1932年12月1日）

为纪念广州暴动同时纪念宁都暴动周年纪念……189

（1932年12月2日）

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190

（1932年12月20日）

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八号……194

（1932年12月27日）

为严紧出境行人事……196

（1932年12月27日）

为提前春耕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事……198

（1932年12月28日）

七言诗·观梅小吟……200

(1932年冬)

为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举行追悼大会以纪念赵博生同志事……203

（1933年1月1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204

（1933年1月17日）

关于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208

（1933年2月24日）

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209

（1933年2月25日）

和傅连暲的谈话……210
（1933年2月）
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211
（1933年3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问题的决议……215
（1933年3月1日）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平津……216
（1933年3月3日）
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219
（1933年3月4日）
汀州不能轻易放弃……221
（1933年3月5日）
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223
（1933年3月15日）
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226
（1933年3月23日）
听取王观澜关于查田试点工作汇报时的指示……227
（1933年3月）
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第十八号……228
（1933年4月14日）
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230
（1933年4月15日）
为检查和取缔私人枪支禁止冒穿军服事……234
（1933年4月15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肃反委员会决议……237
（1933年4月15日）

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239
（1933年4月22日）
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训令……241
（1933年4月28日）
为限制特别快信……243
（1933年5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闽粤白军士兵书……245
（1933年5月28日）
为“五卅”运动会题词……247
（1933年5月）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248
（1933年6月1日）
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251
（1933年6月1日）
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255
（1933年6月1日）
为节省五万担谷子卖给红军告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群众……259
（1933年6月）
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262
（1933年6月10日）
关于解决群众粮食问题……265
（1933年6月16日）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267
（1933年6月）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271
（1933年6月）

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274
（1933年6月）
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281
（1933年6月18日）
菩萨蛮·大柏地 ……………………………………………………283
（1933年夏）
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286
（1933年6月21日）
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300
（1933年7月4日）
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302
（1933年7月11日）
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封信……………………………305
（1933年7月13日）
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310
（1933年7月15日）
反对最近国民党卖国的大连会议通电……………………………317
（1933年7月18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319
（1933年7月21日）
关于执行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321
（1933年7月22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323
（1933年7月22日）
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325
（1933年7月22日）

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327
（1933年7月29日）
临时中央政府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330
（1933年8月1日）
中央政府电贺东方红军的伟大胜利……………………………334
（1933年8月8日）
苏维埃暂行选举法……………………………………………335
（1933年8月9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决议……346
（1933年8月9日）
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347
（1933年8月9日）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356
（1933年8月12日）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361
（1933年8月12日）
吉安的占领……………………………………………………369
（1933年8月13日）
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373
（1933年8月25日）
为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375
（1933年8月28日）
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377
（1933年8月28日）
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380
（1933年8月28日）

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381
（1933 年 8 月 29 日）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396
（1933 年 8 月 30 日）
为开展查田运动……399
（1933 年 9 月 1 日）
中央政府庆祝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开幕电……403
（1933 年 9 月 3 日）
今年的选举……405
（1933 年 9 月 6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415
（1933 年 9 月 6 日）
关于教育工作……420
（1933 年 9 月 15 日）
农业税暂行税则……423
（1933 年 9 月 18 日）
纠正推销公债的命令主义……426
（1933 年 9 月 23 日）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428
（1933 年 10 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四十九号……433
（1933 年 10 月 10 日）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435
（1933 年 10 月 10 日）

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455
（1933年10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457
（1933年10月15日）
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480
（1933年10月15日）
中央政府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482
（1933年10月1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486
（1933年10月24日）
农业税暂行税则补充条例……493
（1933年10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498
（1933年11月11日）

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

（1932年2月8日）

春天到了，春耕在即，这一问题是苏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不但关系苏区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改善，同时关系经济的发展与巩固，因为生产增加，是巩固与加强苏区和红军向外发展的力量。目前正当着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的时候，而国民党反革命政府正无耻地出卖中国，使中国无数万的群众牺牲于帝国主义宰割之下；同时全国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工人大罢工猛烈地发展着，各地群众自动组织义勇军，有些白军士兵已自动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各地苏区与红军得到新的伟大的胜利和发展，这些事实完全证明目前中国的形势又到了革命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要大大地向外发展，配合和领导全国工农及一切革命群众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运动，以组织广大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因此发展和提高苏区生产，强固苏区向外发展的经济力量，在目前便有极伟大的意义。

在发动和加强春耕运动中，特别要注意对于去年被白匪摧残区域，应当用多种方法去帮助群众解决春耕中各种问题——耕牛、种子、肥料、工具等，以及在春秋之间的粮食问题，这是苏维埃政府一个实际任务。对于广大工农群众，苏维埃政府要努力领导他们来解决春耕中各种困难问题，使今年粮食收获大大地增加，来改善群

众生活，来加强向外发展的力量，来充分供给红军的给养，以开展和帮助目前积极进行的革命战争。临时中央政府委员会现在决定如下办法，希各级政府切实地更具体立即执行。

一、要把春耕运动作一大大宣传鼓动，动员广大群众彻底了解发展生产与加强革命力量的意义，去努力发展生产，增加生产，并用革命竞赛的方法来鼓励群众。

二、要发动群众特别要由贫农团来领导，在春耕中实行耕种互助运动，无论人工、耕牛、农具、种子，一概彼此帮助，以便相当地解决目前春耕中各种困难问题，来促成耕种的顺利进行。

三、去年有些地方（如东固龙岗一带），因为白军摧残，耕牛、农具、种子等物多受烧杀毁坏的损害，在今年春耕中必然发生许多困难和障碍。因此，各地政府应立即详查现有耕牛、农具、种子多少及缺乏多少，有计划地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灾区应当在可能范围内代其设法购牛，设立耕牛站，无代价或极廉价租与无牛的农民使用；另一方面农民须尽可能地集股去买耕牛共用，并可向信用合作社借贷（各地须创办信用合作社），富农多余的耕牛、耕具等均要没收分给无牛或缺牛的雇农，或是富农的牛除他耕种自己的田地以外，一定还要租给别人耕种，也可付最低的租金；中农、贫农的牛须宣传鼓动他们在耕种互助之运动之下除自己使用外，还须以相当的租金出租给无牛的农民。农具一项，应极力提倡生产合作尽量制造，同时要把富农多余的农具设法分配给没有农具的贫苦农民，非灾区的多余农具，除首先分给当地缺少的农民外，应鼓动群众捐助送给灾区。种子一项，各地政府和群众都要善为筹划，有种子的地方，运往没有的地方去卖，没有的地方，要向有的地方购买或募储。

四、过去因土地分配不定，以致妨碍耕种，现在凡是土地没有

分配好的地方，尽最大力量在春耕以前一律分好。

五、今年春耕应向群众宣传鼓动提前耕种，以改正过去旧习的展期耕种。在未到春耕时以前，应多种杂粮以资补助。

六、各地要鼓动广大群众踊跃帮助红军家属耕种并耕种红军公田，地方武装在可能范围内来帮助当地群众耕种，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工农自新分子，在未满期时可编成劳动队，分配到劳动力缺少的地方去帮助耕种。

七、对于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时候缺乏粮食的地方，现在各级政府立即调查清楚，县、省政府应当根据各地余粮或缺粮实际情形详确统计，实行各地粮食的调剂，以解决粮食缺乏的困难。

以上各点，务望各地政府按照当地情形切实执行，并由县区政府负责人详细讨论执行办法和经常派人到各乡去指导，并将随时执行情形向上级政府报告为要。

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

对于临时最高法庭审理AB团改组派军事犯等要犯的判决书的决议案

（1932年2月）

三个判决书的全部原文应通过之，但须修正以下各点。

一、曹舒翔，原判应监禁二年，但本执行委员会认为太轻，因为她是红军医院第四分院的政治委员，又公然地加入AB团来破坏苏维埃政权和红军，违背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委托，并且曹舒翔曾在苏联学习过三年，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在政治上是站在一切不良分子方面。回国后来苏区工作，又加入了AB团，可见她之加入反革命组织不是偶然的，因此须增加监禁一年三个月，共需监禁三年三个月。剥夺选举权的期限仍照原判。

二、孔繁树，依判决本应监禁三年，因他在革命战争中做过相当的工作，并因带花而残废，因此法庭减少了他一年六个月的监禁。但是他在AB团里是担任总指挥的责任，虽然做过相当的革命工作，对他的处罚，还是很轻，须增加三个月的监禁，共监禁一年九个月。剥夺选举权的期限仍照原判。

三、黎心诚，依原判是监禁二年，因他历次作战勇敢，且受伤数次，应减轻六个月，则监禁一年六个月。剥夺选举权的期限仍照原判。

四、魏柏刚，依原判应监禁五年，但依他的罪状，处罚未免过

重一点，因此应减轻六个月，则监禁四年六个月。剥夺选举权的期限仍照原判。

本决议案对于上列反革命犯的监禁期限之减轻和加重，应通知上列各犯人知悉。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为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的布告[1]

（1932年2月）

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登载伍豪等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2]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出布告的主要内容。

[2] 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上海的《时事新报》《时报》《申报》自1932年2月中旬起，连日登载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2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新把戏”。

给袁国平[1]的信

（1932年3月6日）

袁国平同志：

一、你们在江口第一次来信，此间已经收到。三都群众既如来信所云，古龙岗等处，当比三都更好，我们要更加地努力去争取，勿反因群众觉悟而松懈自己的工作及约束。

二、此次工作的一切策略和工作方法都随时要注意，不要使他离开“争取群众创造苏维埃区域”的总任务。不好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过去迁就落后群众的意识，固然有时候为了争取群众，可以把我们的工作，分作若干步骤，但这根本就要不离开我们的根本任务，而更实际地去达到我们“争取群众创造苏维埃区域”的总任务。总□通讯第三期所指示的策略及工作方法，大体上是对的，但是你们要很灵活去运用，不要呆照着本子上的法子。因为前次我们对三都七堡的群众的估量与你们此次来信所说就有点不同，所以工作策略和方法的运用也不能机械地执行。比如先打大地主，后打小地主这个方法——并不是什么策略路线——在今日三都情况看来，如果过于机械去执行，就会走到机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还有由农民协会转变到苏维埃和贫农会中间的过程，不能屡时之久，首先就要

---

[1] 袁国平（1906—1941），湖南宝庆（今邵东）人，原名袁幻成，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牺牲。

十分用力去发动贫农、雇农、中农群众迅速地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由对大地主的斗争迅速进到对小地主对富农的斗争（分物分田和废债），一到有比较多数的贫苦群众起来了，就应立即把那班投机活动而残留在农民协会中的小地主和富农完全驱逐出去，并且立即建立群众的政权机关——苏维埃，和群众的阶级团体——贫农会。总而言之，策略和工作方法是看实际环境来决定的，你们要很实际地去了解当地情况，与当地群众斗争的情绪与要求，决定更实际的策略和方法，才能得到更大的实际的效果。

红色群众初进白色乡村，报复、盲动，势必发生。你们还要注意其他地方发生同样的事。对于部队的纪律也不可以丝毫松懈。群众主要组织小游击队去分发豪绅的财物给群众，为了要组织小游击队去组织初步的群众团体——农民协会，甚至为了组织小游击队去组织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为了要组织小游击队去攻击群众所害怕的土围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三都七堡这种环境当中（那些比三都七堡条件更差的环境，如现时三军工作的永丰城，五八军工作的南丰城附近，四军工作的安远司，十二军工作的石城宁化交界一带，更不消说）民众团体和政权机关种种组织，分田和废债种种利益，都是没有保障的，红军一退出，地主武装回来，一切组织坍台，一切利益落空，这时候只有有组织的经过我们训练了的打过土豪分过东西和豪绅地主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的小游击队，可以跟着红军退到红色边界等待时机作第二次的进攻，这才是□得住的东西，才是使这次工作不成为白费的办法。再早的不说，单说长沙战争以后，萍、醴、攸一期工作，袁水流域一期工作，乌江流域一期工作，不都在教训我们没有拿到工作的中心——组织脱离生产的小游击队吗？同志们千辛万苦所做的分田废债立苏维埃办赤卫

队（不脱离生产的）等项工作，不都是等于白做了吗？因为你们四次来信都未提及组织游击队的事，所以在这封信上详细地说了一番。但这不是说你们不应有在三都七堡建立巩固政权的计划，现时三都七堡的环境条件与现时的永丰城、南丰城、安远司等处的环境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毫无疑义你们应该做建立巩固政权的计划，你们要计划彻底发动全部群众，彻底消灭地主武装，组织阶级的群众团体和政权机关，实行分配土地。但你们要计算到敌人前进得快红军须要集中地主武装尚未消灭那种时候的情况，你们若计算了那种时候的情况，便知道组织脱离生产的打土豪的当地小游击队，实在是你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工作了。把组织游击队作为中心工作，不但不会松懈其他的工作，适得其反，把其他的工作都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过去各军政治部和最大多数做政治工作的同志都不了解在特殊环境中组织游击队这一中心任务，做的多是些不适合环境条件的工作，所以总是白费气力的多，实有成效的少。因此，这一封信所说的不仅是对于你们部队在三都七堡工作的指示，并且是全方面军以及各个独立师各个地方游击队所应同样注意而完全照着去做的。

总政治部主任　毛泽东

三月六日于黄陂

为杭武工作给闽西的一封信

（1932年3月9日）

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上杭武平已被我红军十二军配合广大工农群众，在几天内全部占领，团匪钟绍葵，全部击溃而逃窜广东。这是当目前发展民主革命战争开始时就取得这一极大胜利，在全国苏维埃的发展和胜利上，都有伟大的意义。尤其是当目前红军正在围攻赣州的时候，上杭武平两县的夺取，不仅威胁广东军阀，而且对于夺取赣州有极大的帮助。

上杭武平两县的夺取，不仅开展并巩固了闽西苏维埃区域，而且使闽赣的联系愈更巩固了，特别是上杭城的夺取，它是闽西的一个最大的中心城市，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是占重要的地位，因此杭武的占领不是暂时的性质，而是使它巩固起来成为闽西巩固的赤色区域，上杭城要使它成为赤色的中心城市，这是你们很重大的任务，必须以全力去完成这一任务。

人民委员会对于上杭武平的工作有以下的指示：

（一）正确地执行全苏大会的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这是巩固杭武两县赤色政权的主要条件和基础，在这一条件之下，将广大的城市工人苦力，农村的雇农、贫农、中农以及劳动群众掀动

起来，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斗争和苏维埃政权，在他们实际利益的获得上，才能使他们积极地拥护苏维埃的政权，有了极广大工农劳动群众的基础才能巩固两县的赤色政权。

（二）为了发动城市的工人群众，就要实际地去实现劳动法上的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改良待遇，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订立等等最低的实行，政府要站在保护工人利益上，必须使这些最低的利益立即实现，同时对于工人组织工会，应在物质上及工作进行上积极予以帮助，但在这里有几点必须指出而要防止发生的，同时也是过去在工作上时常发生的错误。（1）对于劳动法的实现与工人利益的保护，只见空泛的文告，没有在实际上来执行，没有用许多具体办法去做，事实上工人得到了没有，政府也不过问和检查，只要出一纸布告和一纸命令就完事了，这是对于拥护工人利益的消极。（2）对于工人利益的保护，政府多半是不审查事实和群众斗争情形，简单地用政府的命令强迫资本家实行，而不着重发动群众起来斗争，这样反而使群众不了解，而对于斗争一时消极。（3）在实现劳动法上，每每不考察当地的经济情形与工人生活的实际状况与需要，很适当地规定实际的实行办法，而是超过当地的实际经济情形强迫去做，结果使许多资本家无力负担而且停业，破坏了苏维埃现时的经济政策，而使苏区的经济受大大的影响，反使许多工人失业增加，以及许多工人怀疑，对于斗争消极甚至与资本家暗地妥协与让步，结果削弱了工人对于斗争的积极性和阶级意识，这是极有害的。同时借口维持苏区经济和实行经济政策，而抑制工人的斗争或对工人利益保护的消极，那更应坚决地反对。总之对于劳动法的实行，要站在坚决地保护工人利益与不违反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来执行，特别是加强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性与对于苏维埃

政权的拥护。

（三）在农村中对于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必须彻底执行土地法，最主要的是站在明确的阶级路线上，再不使土地革命的果实被富农窃取一时。这种必须纠正过去对于分配土地有一种错误观念，以为在开始发展土地革命时，必不可免地被富农窃取一次必须要分第二次或第三次才能解决，因此在开始分配土地时就马马虎虎来分，这是非常不对的。我们只能说在土地革命时，富农必然企图来窃取土地革命的利益，而我们正因如此，更要坚决地去发动群众来打击富农的企图，更要以明确的阶级路线使土地革命的利益不至被富农窃取去。这个错误在江西新发展的区域屡见不鲜，主要的原因，在于分配土地时，不着重发动群众，简单地用命令去实行，去代替群众来分配，这样自然使富农得以乘机窃取。固然在新发展的区域，迅速分配土地，是为很快地发动和争取农村基本群众，来巩固这一区域，可是在分配土地上，使富农将利益窃去，这是不能很有力地来巩固新的区域，至于迅速分配，只有将农村基本群众发动起来，积极参加分配土地斗争，才能迅速分配，才能打击富农的企图，使土地革命的利益，不至被富农窃取去。有了广大雇农贫农中农积极斗争的基础，新的区域才能很坚强地巩固起来。所以在分配土地时，必须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中央政府的土地法，来动员群众，分配土地委员会要多吸收雇农、贫农以及中农来参加，必须经过群众选举，必须将土地委员会的委员成分，向群众大会报告和考察，每一次分配土地之决定，要召集群众报告，必须经群众大会的同意和赞成然后再实际分配。最紧要的是在宣布土地法和选举分配土地委员时，特别宣布富农只能分坏田，富农不能参加土地委员会，以引起群众的注意和斗争，来打击富农的企图，驱逐与防止富

农混入，夺取分配土地权。在过去新区域分配土地时，完全是红军代做的，苏维埃政府多未派人去领导，甚至不理，让红军独负其责，这样一方面妨碍红军其他任务执行，同时就在这种情形下，红军为执行其他任务不能专力去做自然发生随便分配。因而过去红军中对于分配土地的形式主义极重，可是地方政府要负主要责任，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而不去领导，此次杭武两县的没收与分配土地，闽西政府必须要积极去领导，根据以上的指示与你们过去分配土地的许多经验很正确地去执行。

（四）中农问题你们要严重注意，过去在许多地方发生排斥中农，借打富农来打中农的事情，这完全是破坏与中农联合，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革命胜利前途，却有莫大的危害。你们这次在杭武工作，绝对不要循环以前那种错误，第一在土地问题上，对于执行平均分配，绝对遵守土地法第五条对于中农实行的原则（……仅在基本农民愿意和直接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如大多数中农不愿意时，他们可不参加平分）正确执行；第二在筹款中绝对不应侵及中农这一条件下，在新发展的区域，最容易因为筹款而发生事情，我们的筹款不应出之于中农；第三在分配土地特别是参加政权中要积极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来参加，严防排斥中农参加选举和政权的现象发生，总之巩固中农联合是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胜利主要的一个基础，绝对反对侵犯中农，甚至在许多问题上（如平均土地等）对于中农采取相当让步。

（五）上杭城及武平城的工作除了对于工人问题及参照总政治部为赣州工作一封信中之许多原则和办法执行外，第一，要依照全苏大会的经济政策，临时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税则、投资条例、借债条例，并运用汀州的经验来正确执行并将这些文件翻成布告发布出来。

第二，对于商业要极力维持，不要因为筹款的缘故而破坏商业，至于筹款应分等级，对于小资本以及中等的一部分不应筹款。对于反动领袖所开商店应该没收并将他的反动罪状及没收理由，详细公布，这种公布主要的是没收反动派的财产，而不是没收商店，以揭破反动派造谣的企图。

第三，一切反动机关的房屋应正式宣布没收归苏维埃政府，然后再由政府分给各机关和各群众团体，不得发生各机关各团体随便占领房屋的无政府状态，对于反动派的房屋财产均应由政府宣布没收，房屋可以一部分分给工人作宿舍，一部分廉租的租给一般贫民住，没收的财产除现金归政府外，一部帮助红军和灾区群众，其余尽量分给城市贫民，反对将一切没收的东西都迁到老苏区而不发给当地群众的行动。更要反对各机关和群众团体，自由没收自由处置的无政府现象。

第四，对于学校及文化一类的东西要绝对保存，甚至派人监督保管，严禁损坏。

第五，如上杭各店发有小票和纸票，政府要强迫立即兑换现金收回销毁，必要时政府要派人去监督，并禁止以后出纸票，对于现金要注意以防止反动派和商人大批偷运出境以影响苏区经济。

（六）筹款要统一集中在一个机关，由闽西政府与十二军政治部共派人组织之。严禁各团体各机关自己打土豪，树立财政统一的基础，对于所筹一切现金，应以绝大多数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严禁一切因为经济来源宽而随意浪费的情形，如发生这种现象要严厉地惩戒。

（七）肃反问题必须依照中央政府第六号训令组织肃反委员会及一切肃反的原则，正确地来执行肃反工作，并准备建立裁判部与设

立政治保卫局来维持革命秩序，与执行经济的司法工作。

（八）临时政权的建立是很重要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就要立即去执行〔全〕苏大会中央政府之一切法令，来实行土地革命和政纲，来镇压反动派的活动，与发动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建立正式政权，这是它的主要任务，每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必须是经过群众大会来选举。闽西政府应以全力去领导和指导各地革命委员会工作，上杭应由闽西政府决定为直属的市苏维埃，在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以及肃清反动派工作，进行相当程度的，就要积极去进行建立正式政权工作，首先是城乡苏维埃要达到代表会议制真正建立，以树立杭武两县苏维埃组织的巩固基础，一切正式政权的建立，须完全依中央政府所颁的条例和训令去执行，革命委员会必须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机关，严防形式主义的发展，以及富农反动派的混入。

（九）地方武装的建立，必须有计划地去进行。你们要同军区指挥部共同讨论实际进行工作办法以建立群众武装力量来捍卫杭武苏区。

（十）闽西对于红军新发展的区域，向来依赖红军去工作，而自己反不去积极领导，又不用大的力量去建立工作和巩固这一区域，为〈如〉连城、宁化，十二军占领了很久，闽西政府又不注意去领导，以致新发展的区域而不能巩固起来，甚至红军一离开后却被反动派又占据而失掉，这是极严重的错误，对于上杭武平的工作绝不允许再继续过去的错误。你们应立即征调和动员老苏区的一大批工作人员到这两县去工作，闽西政府的负责同志要亲到上杭去指导一切工作，现在必须以全力去巩固杭武，这是当前一个最实际最主要的工作，任何工作都没有这一工作重要，因此，我们决定为巩固杭武，福建农民代表大会决定展期，望你们立即通令各级政府，并借

此加紧下级选举与改造工作。

现为加强杭武工作，前次闽西派来中央政府受到训练之工作同志，可以立即派回你处分配到杭武去帮助工作。

同志们！巩固杭武是你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你们要以全力去完成这一任务，要将杭武两县变成最巩固的苏维埃的疆土，要使上杭城成为赤色的中心城市。

最后望你们将这一封信翻印转给十二军政治部及杭武工作同志。

最近杭武的情形及以后的工作，望随时向中央政府报告。

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

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1]

（1932年3月16日）

为了保障田地生产，不受水旱灾祸之摧残，以减低农村生产，影响群众生活起见，最便利而有力的方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旱灾之发生，并且这一办法还能保护道路，有益卫生，至于解决日常需用燃料（如木柴木炭）之困难，增加果物生产，那更是与农民群众有很大的利益，况中央苏区内空山荒地到处都有，若任其荒废则不甚好。因此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之利益。现值初春之时，最宜植树，特决定以下办法，各级政府必须切实执行。

一、由各级政府向群众作植树运动广大宣传，说明植树的利益，并发动群众来种各种树木。

二、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对于适宜种树之荒山，尽可能的来种树以发展森林，必须使旷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

三、在栽树时，由各乡区政府考察某地某山适合栽种某种树木，通告群众选择种子。

四、为保护森林和树木发育起见，在春夏之时，禁止随意采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等发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对植树运动的决议。

伐，免伤树木之发育。

五、这一运动最好用竞赛来鼓动群众，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

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1]

（1932年3月30日）

恩来同志：

（1）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2]，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

（2）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3]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4]与否，均拟直下漳州。

（3）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5]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1932年2月至3月，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失利。3月中旬主力分为西路军（第三军团）和中路军（第一军团和第五军团）在赣江流域活动，后中路军改为东路军，向闽西发展。中共苏区中央局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东路军发起漳州战役。4月10日，东路军首先在考塘消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两个团，随即攻克龙岩城。19日东路军对漳州外围守敌发起攻击，占领天宝、南靖（今南靖县靖城镇），次日攻占漳州。此役歼灭漳州守敌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

[2] 漳泉，指福建漳州和泉州。

[3] 七师，指红军闽西军区独立第七师，1932年5月编入红军第十二军。

[4]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5]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的17000名官兵，经军中中共特别支部组织，在该部参谋长赵博生和旅长季振同、董振堂率领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后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4）一军团已开至汀[1]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

（5）我明日去旧县[2]晤谭张[3]。

泽东

三十日

---

[1] 汀，指福建长汀。

[2] 旧县，村名，在福建上杭县北部。

[3] 谭张，指谭震林、张鼎丞，当时分别任红军闽西军区政治委员和福建省苏维埃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

（1932年3月）

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代表诸同志，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最光荣的纪念日——巴黎公社纪念日——举行开幕了。这个时候，正当世界的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到了很紧张的时期，尤其是在目前发展革命战争中，红军十二军接连夺取上杭武平大胜利的时候，你们大会的举行，是有伟大意义的，同时也就是表示你们这次大会所负有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任务。中央执行委员会除派有代表出席大会帮助和指导大会的工作外，特再给你们一个书面上的指示。

一、当着目前革命形势，无论在世界和中国，都是进到了最紧张的新的时期。这种紧张的新的形势，表现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兴盛，世界资本主义急剧的衰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制度的矛盾达到极尖锐的程度，以及帝国主义企图进攻苏联的加紧，表现在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紧张，更加深了帝国主义战争爆发的危机，同时世界革命的危机日渐成熟。由这种危机的尖锐发展，到去年九月就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继而强占上海，这不仅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以挽救他自己的危机，而且是帝国主义争夺瓜分中国，重分世界的尖锐矛

盾的爆发，所以从这一事变发生以来，特别是日美的冲突紧张到了万分，各帝国主义对于战争的准备和动员，真是拔剑张弓、一触即发的最紧张形势，然而帝国主义是时时不忘对苏联的进攻，并且随时企图把这一战争转变为进攻苏联的战争。

在中国表现在反动的国民党和其政府，自三次进攻革命失败后，内部的分崩离析，反动的统治日益崩溃。到了东三省的事变爆发后，愈加无耻地出卖中国，代替帝国主义压迫反帝运动，反动的国民党的统治在全国更加破产，反动统治的威权，在群众革命斗争中已打落殆尽了。现在国民党和其政府在出卖东三省之后，继续出卖上海，最近更在企图挑起帝国主义大战，促进帝国主义迅速地来解决瓜分中国的问题，来出卖整个的中国，来牺牲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于帝国主义大战的飞机炮弹之下。东三省和上海的人民已在日本帝国主义飞机大炮之下不知牺牲多少了，而国民党和其政府向洛阳逃窜，这是准备将长江沿海一带给帝国主义作战场，国民党军阀更是依附于各帝国主义之下，在大战爆发时，是毫无疑义的为各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屠杀群众的工具，同时国民党和其政府在这样情形之下也就使他最后破产，必然被工农革命将他葬送到坟墓中去。

全国革命运动，自三次革命战争伟大胜利，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各地苏维埃和红军，都是继续获得很大的胜利和发展，全国反帝高潮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及国民党无耻地出卖中国之下，是澎湃地汹涌起来。这一反帝运动，现在已发展到许多地方群众自动武装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发展到捣毁国民党党部和其政府机关，公开喊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特别是最近在上海的白军士兵自动起来，违抗国民党的命令，在前方与日军直接抵抗。全国工人斗争的发展，现在更是逐渐

取得反帝运动的领导，白军士兵急剧地革命化，不仅在反帝中自动地与日本作战，而且不断地哗变和暴动，投入红军，这些都是表明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正在汹涌地向前发展。这一发展的前途，必然要汇合在苏维埃旗帜之下，以民族革命战争来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而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二、这个时候，是历史上新的时期，是革命与战争的时候。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发展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来领导全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以民族革命战争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屠杀中国民众，以革命战争去摧毁反动国民党的统治，以民族革命战争去消灭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个时候是革命发展最紧张的时候，最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发展，现在大大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开始获得很大的新的胜利和发展。当前的具体任务，是继续这些胜利，更努力地动员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战争，来进行大大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去夺取邻近的中心城市，争取苏维埃首先在一省和几省的胜利，这个任务，也是你们这次大会所负的最主要的中心任务。

三、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你们大会一切工作都要以发展革命战争为主要的中心，首先就要讨论实际动员群众的各种具体的方针，这一动员工作主要的是发展斗争深入斗争，要提高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就要切实地实行劳动法、土地法等等，大会必须很具体定出实行劳动法、土地法的实施方案，只有同斗争的实际联系上才能将福建的百十万广大工农群众发动起来热烈地参加革命战争。

四、为了发展革命战争，就要扩大与加强红军，这是发展革命战争的主要力量，大会必须很具体地讨论扩大红军和执行优待红军

条件的实际执行办法，必须排斥过去闽西只扩大地方武装不注意扩大红军的地方观念，因为这是极有害于加强革命战争的力量与发展革命战争的实际任务。

五、为了发展革命战争，争取苏维埃首先在江西的胜利，就要采取积极向外发展的进攻策略，这个进攻策略，绝不是冒进和放弃巩固根据地的盲动主义，恰恰相反，而是巩固胜利的向前发展。大会必须确定发展的方向，主要的是向北发展，这是配合中央整个的发展计划来实际争取江西和邻近的几省首先胜利，但是在其他方向，同样地要向外发展扩大苏区。为了要完成向北发展的任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巩固杭武。大会必须讨论动员大批干部，和执行中央政府给闽西政府一封信所指示应做的工作的具体办法。杭武的巩固，不仅是巩固粤赣的联系，而且主要的是加强和巩固向外发展，进行革命战争的力量和基础。不求巩固根据地的冒进主义要坚决反对，同样的对于不积极向外发展，只求巩固的保守主义，那更是在执行目前大大向外发展进行革命战争的任务上是极端有害的，大会更应坚决同这种倾向作斗争。

六、为了加强革命战争的发展力量，就要巩固发展革命战争的经济力量，大会必须详细讨论发展苏区经济，提高生产的实施方案，以及执行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对于财政问题，大会要坚决地依照中央所颁布的财政条例，定出很具体的统一财政办法。对于节减经费，帮助发展革命战争更要切实讨论，大会应该坚决地反对过去各级政府随意浪费经费的严重现象，并规定惩戒以后浪费经济的办法。

七、为了加强革命战争的发展力量，就要加强地方武装的组织与训练，提高地方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实际作用。过去闽西地方武

装不健全，绝不是如一般人所说“闽西地方武装无用”或是“闽西人不能打仗”，这种错误观念，大会必须坚决地反对。闽西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不仅与敌人作了长期斗争，而且创造了广大的苏区，是具有伟大的革命斗争力量的。过去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不强，主要原因是路线的错误。闽西在盲动主义时代，遭受了很大的失败，后来在一二三次战争中，在军事上又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不会运用游击战术，有时没有正确估量敌人力量的对比，而采取硬攻的方式（如几次攻坎市湖雷等）使得在军事上受着部分失败，而降低了士兵的勇气，削弱了战斗力，同时对于地方武装的领导和军事政治训练的不注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大会必须详细讨论整顿地方武装与加强政治军事工作以及运用游击战术的办法，以提高地方武装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

八、为了加强发展革命战争的领导，就要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大会对于苏维埃的建设，应根据中央政府所颁布的条例决议，切实讨论实行办法。在这里要特别引起你们注意的是城乡苏维埃代表制度的建立，这是苏维埃组织的基础，是苏维埃领导群众动员群众最有力的基本组织。大会必须反对过去苏维埃的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这都是要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的任务，有莫大妨害的，大会要定出各级苏维埃工作检查的具体实行办法。

九、闽西苏维埃几年来与敌人伟大的斗争，坚决执行了土地革命的任务，创造广大的苏区，实行土地政纲，是有伟大的成功与胜利的，同时在过去工作中也犯了不少的错误与缺点。大会对于过去的工作，必须来一个工作检查，这样才能集合过去宝贵的斗争经验与纠正一切错误与缺点。

十、过去闽西经过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遭受许多的失败，后从盲动路线转变过来，又是接着敌人一、二、三次的进攻，又因军事策略上犯了错误，以致许多区域受着摧残，有部分苏区给敌人占据而没有恢复，加以对于地方武装领导的错误，有些边区受团匪的摧残，可是在许多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不正确地去认识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由于过去工作路线的错误，结果更忽视了目前革命发展有利的形势，反而发生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是一种极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革命形势是极端有利于革命发展，但是我们积极领导群众大大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对于这种情绪是极端有害的，而不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大会必须同这种情绪作无情的斗争，这里更需要大会彻底依照全苏大会和中央政府所指示的工作路线，实行工作的转变，福建全省工作，必然有很迅速的开展，必然使福建苏区有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以上的指示，是供给你们在大会中对于一切问题的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很坚信的，这次代表大会一定很完满得到全部的成功，与完成目前革命的紧急任务，最后高呼：

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成功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1]

（1932年4月2日）

恩来同志：

1. 我昨日到上杭，商应敌布置。拟阳（七日）去白沙和林聂[2]会合。

2. 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3]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赴会昌筠门岭，间经武北湘坑、官庄、白沙，于十四日到龙岩。

3. 中央局、军委[4]宜移长汀。

4. 三军团行动如何，统盼电示。

泽东

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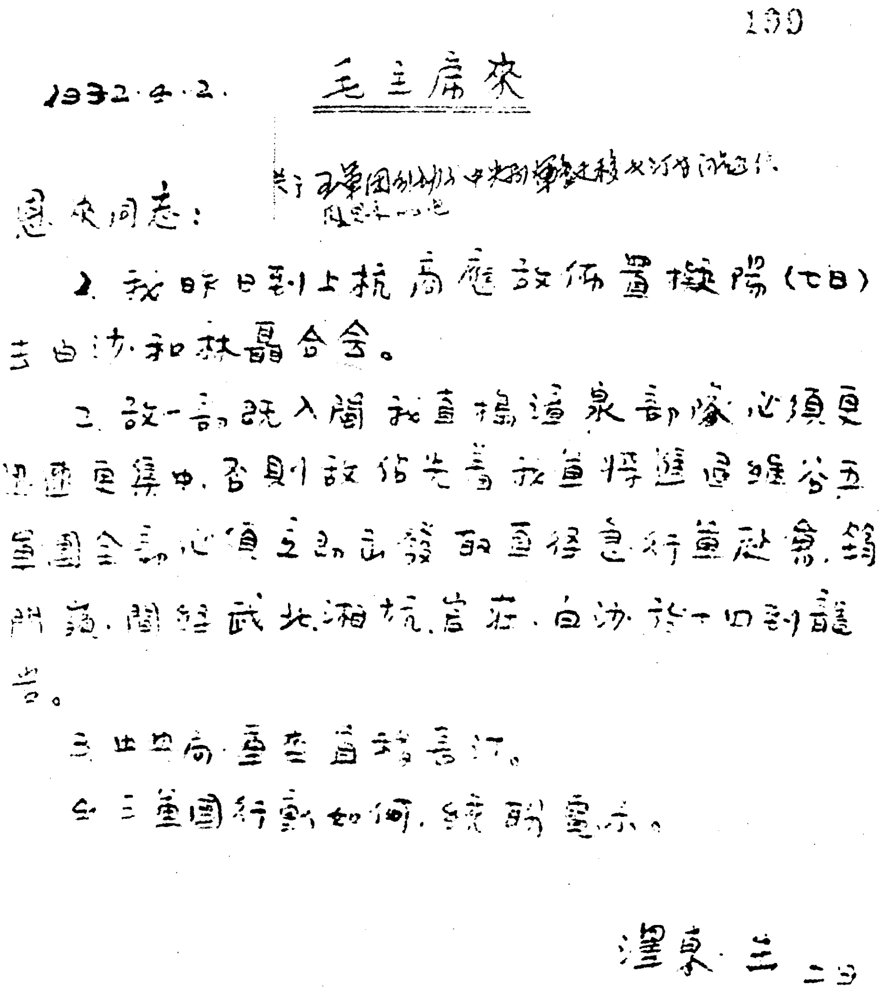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东路军（由第一、第五军团组成）攻漳州途中给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

[2] 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漳泉，指福建漳州和泉州。

[4] 军委，指1931年11月25日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此后红军第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奉命撤销，所属部队统称中央红军，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和指挥。



139

1932.4.2.　毛主席來

关于五军团到漳州后中央局暂驻长汀等问题给
周恩来的电

恩來同志：

一、我昨日到上杭，商應敵佈置，擬陽（七日）去白沙和林聶會合。

二、敵一部既入閩，我直接漳泉部隊必須更迅速更集中，否則敵佔先着，我直將進退維谷，五軍團全部必須立即出發，取直徑急行軍赴急，筠門嶺，閩經武北，湘坑，岩前，白沙，於十四到龍岩。

三、出發向，要在直趕長汀。

四、三軍團行動如何，請即電示。

澤東 三 二日

1932年4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指挥中央红军东路军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图为毛泽东关于漳州战役给周恩来的电报。

1932年4月，毛泽东指挥东路军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图为红一方面军东路军攻占漳州后部队的合影。

龙岩战斗胜利原因和岩永今后工作[1]

（1932年4月11日）

恩来同志：

1. 龙岩胜利，差员答复。赣州撤退[2]，入漳应有一战，若能消灭张贞[3]大部，便是剪除粤敌一翼。

2. 昨日胜利原因是：

甲、白沙休息一天，团结兵力。

乙、不顾坎市，直取龙岩。

丙、大池宿营，不去小池，击敌不备。

然未置全胜，则四十五师解决敌之前哨过缓，否则敌[4]八团及其旅部可望全获。

3. 在此地驻两天，会合九师即直下漳州。

4. 岩永[5]工作，应站在迅速造成战场的观点上去做，因此要加强领导，加以红军主力在前方，总政治部似宜移到龙岩，总经理部应迅速移龙岩管理运输，并做衣服。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

[2] 此处原件脱落两字，这两字似为“之后”。

[3]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4] 原件“敌”后缺一字。

[5] 岩永，指福建龙岩和永定。

5. 十二军除任争取杭武[1]外，还须侦察大埔、平和敌情，此点关系甚大，已要谭震林[2]亲率电台并一团人去永定，向埔、和游击，时通消息。

6. 黄任寰[3]有入赣南说，到寻乌的似即该部。粤闽边界似由黄质文[4]守备。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

泽东

十一日

---

[1] 杭武，指福建上杭和武平。

[2] 谭震林，当时任红军闽西军区政治委员兼红军第十二军政治委员。

[3] 黄任寰，当时任国民党军粤桂第三军独立第一师师长。

[4] 黄质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粤桂第三军第八师师长。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

（1932年4月15日）

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与其各派军阀，本其投降帝国主义的惯技，接连地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任其随意屠杀中国人民，现更以和平谈判，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解散反日团体，压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群众，强迫自动对日作战之淞沪兵士和民众的义勇军撤退，用机枪扫射抗拒撤退命令之十九路军之英勇兵士，以表示其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只能依靠某一派帝国主义反对另一派帝国主义，企图挑起世界大战，以便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来解决瓜分中国问题。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国民党军阀则宁肯将东三省上海及整个中国送给帝国主义，对于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之中国工农红军，则不断地以其最大的军力来进攻，企图消灭苏维埃政权和工农

红军，这明显表示国民党政府和其各派军阀的一切欺骗，无非想掩饰其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行为，实际都是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工具，是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进行的障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才能直接地毫无障碍地与日帝国主义作战，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在全国大大地发展起来。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所以不推翻国民党统治，就不能实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在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这正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的前提。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装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要认识到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地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是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民众武装；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苏联，才是真正能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力量。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

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地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区各地自动武装起来，推翻反动的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工农红军，联合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与苏联，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

（1932年4月15日）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上海事变将成为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具体表演，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只有更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镇压全国民众的反日反帝运动，绝对不会有任何真正求得中国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抗日行动。现在事变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估量的正确。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上海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由于英勇士兵自动对日作战的压迫不得不以抗日相欺骗的某些国民党军阀，现在也都原形毕露：马占山做了满洲政府的军事部长，蒋蔡等军阀参加了帝国主义瓜分上海的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更是随时准备接受国际联盟宰割中国民族的指令，他所谓“长期抵抗”的宣传，一方是以此来欺骗全国反日的民众，另一方是企图以此来取得别一派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而挑发世界大战，好让帝国主义强盗在大战中来解决瓜分中国问题。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几月来最努力的，还是秉承帝国主义意旨，在各地解散反日团体，压

迫反日罢工，屠杀反日反帝群众，用机关枪扫射自动抗日的英勇士兵并严禁民众义勇军的活动，特别是对于苏区与红军的进攻，更是用最大的兵力来对付。这一切，都表示国民党政府及其各派军阀完全是帝国主义直接压迫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工具，他们不但永远不会进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并且是民族革命战争进行的根本障碍！

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现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已不甘受国民党的污辱，愤起为反日反国民党的革命斗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实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革命任务起见，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向全中国被压迫民众指出：苏维埃区域久已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国民党军阀却在帝国主义的领导和指使之下，绝不放松地向苏区与红军进攻；要不是国民党军阀的进攻，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所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现在领导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统治，正是实际去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是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直接对日作战，并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白军的士兵要暴动起来，打倒反动的军官，自动对日作战，成立工农红军推翻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成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这样，来实现以民族革

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因此，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除以通电宣言发表这一对日宣战的主张和行动方针外，更对全国工农红军全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给以下列指示：

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对日宣战的动员，要使每一个红色战士都能了解：积极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进攻苏区的部队，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正是进行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必要前提。国内革命战争愈发展，国民党军阀愈崩溃，直接对日作战的时机将愈迫近，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动员对日宣战，绝不是要等到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开火时才做，并且现在白色统治沿海各地的英勇士兵与民众义勇军久已不受国民党军阀的指挥，自动地对日作战了，他们迫切地需要苏维埃和红军的指导与援助，所以动员对日宣战与积极向外发展革命战争绝不能割裂开来，而应认为动员去发展革命战争，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是给白区反日群众和英勇士兵以有力的援助。军事的动员要做到每个红色战士非因伤病不能离开队伍，开小差的要受到惩罚与群众的耻笑，地方武装要执行红军中一样的纪律，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要加紧军事训练，军事委员会要宣布和检查全苏区的赤色戒严，要加增兵工厂的生产，要在交通要道设立粮站与运输站，要屯集一部分谷子准备米荒，要节省经费准备战役的持久，要在发展区域的边境设立向外推进的警戒工事，要准备筹款的武装队伍（政府的税收自然主要部分也是供给红军），使主力红军得以继续其作战的任务，要组织大批

游击队从苏区各边境向外发展，在接近中心城市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统治的地方，可由游击队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实行游击行动。

二、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与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作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要在《红星报》及其他红军刊物上经常不断地揭露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瓜分中国、屠杀和榨压中国民族与国民党出卖中国、污辱中国民族的事实，激励起全体红色战士对日宣战的热忱与勇气，鼓动起他们向外发展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军阀及其统治的决心，并要编印各种小册子和画报，要提出联系到目前实际行动的宣传鼓动口号，特别要注意于红军新发展区域尤其是接近中心城市的地方的政治工作。

三、当着工农红军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红军的作战任务，首先是要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放着当前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不去消灭，这是给国民党军队配合帝国主义武装以消灭红军的极便利的机会，这是紊乱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步骤，而不是真实地去进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当着红色游击军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自动地武装起来，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吸引白军士兵，自动对日作战，共同组织指挥这一行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脱离和推翻国民党军阀的统治。

四、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首先要加紧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向外发展革命战争，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要动员全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地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首先是加入不脱离生产的赤卫队

和少先队，要使全苏区劳动群众不论男女，都有接受军事训练准备对日作战的热烈要求，要努力动员执行巩固苏区根据地的工作，要加紧实行赤色戒严与地方自卫，要节省经费、粮食帮助红军，要屯集公谷供给红军，要动员群众努力耕种充裕今年收成，要整理赤色邮政，厉行修桥补路以巩固苏区交通，要立即征收累进的商业税准备收土地税，以开辟政府的收入，要动员工农劳苦群众，提高红军用品的生产（如制造被服鞋帽与兵工厂的生产等），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劳队帮助红军作战，实行红军优待条例，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耕种红军公田。

五、这一训令一直发到工农红军地方武装的下级组织与城乡苏维埃，要根据这一训令定出自己的动员计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应发布自己的动员计划。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对日宣战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宣言

（1932年4月15日）

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民族！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施用其横暴的侵略政策，以武力占据东三省，进攻上海及中国沿海沿江各口岸后，现在东三省已为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殖民地化，并且以此为武装进攻苏联与准备太平洋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根据地。强盗组合的国际联盟及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正在计划瓜分中国，镇压中国苏维埃旗帜下的一切革命运动，上海的和平谈判与国联调查团的主要作用，便在于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本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精神，正式决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战争，领导全国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用民族革命战争来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一切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的尝试与企图，争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

中国国民党军阀及其政府早已成为中国民族革命的敌人，他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他不独绝对不会以民族的战争去反抗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本其一贯的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惯

技，帮助帝国主义实施其瓜分中国的政策，顺从帝国主义，努力于压迫中国革命屠杀反帝群众，特别是积极进攻已经脱离并且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因此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就成为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

现在所有苏区红军和工农群众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领导之下，正在努力发展革命战争，首先推翻国民党统治来会合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和革命兵士的力量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及其统治中国的一切势力。我们相信这是为着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和整个中华民族解放和独立而战，也就是与你们站在一条战线上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而战。我们希望你们一致起来援助我们这一艰苦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弟兄们，和我们一致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

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

今后中心任务
和新区、白区工作的意见[1]

（1932年4月22日）

恩来：

1．南靖一战，张贞[2]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因此争取对粤敌的胜利，成为今后中心任务。

2．粤敌有从永定、平和或诏安入闽之可能。我东路军当于最短时期向北杭、武、岩、永[3]四个全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筹足百万以上经费，准备消灭入闽之敌，以期迅速入赣北上。

3．闽南剥削奇重，工农小商深恨地主军阀到绝，红军入漳，市民拥看若狂。

4．已与邓子民[4]见面，据云：南靖、平和、云霄、漳浦、龙溪五县相交之龙溪圩，距漳州八十里，有一红色游击区，群众约四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电报。

[2]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3] 杭、武、岩、永，指福建上杭、武平、龙岩和永定。

[4] 邓子民，查无此人，疑是邓子恢、蔡协民之误。邓子恢，当时任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特派员。蔡协民，当时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书记。

万，漳州南乡有一个六十人的红色游击队。现决以龙溪圩为中心，向南、平、云、浦、龙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其他白区的工作纲领是：（1）公开宣传。（2）秘密组织。（3）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漳州是否建立临时政权机关，以资号召，待数日后看群众斗争情形及环境需要而定。反日宣言[1]速颁示。

泽东

二十二日

---

[1] 反日宣言，指1932年4月15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对政治估量、军事战略和东西路军任务的意见

（1932年5月3日）

中央局：

电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第一，三次战争[1]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国统治势力，特别是蒋系，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对于我们只能取守势防御的攻击，至于粤军亦是防御攻击性质。决不应夸大敌人力量，以为敌人还有像去年三次进攻给中央苏区以大摧残的可能，而且在战略上，把自己错误起来，走入错误道路。

第二，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我们的任务是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胜利，似要以消灭敌人作前提。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去年的战略，要用到现在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了。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入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

---

[1] 三次战争，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作战。

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移转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行动。我西路军今后应采取完全主动的动作，用各种方法调动敌人，集中兵力打他弱点，各个消灭敌人，达到全局胜利。东路军今后的任务，是要坚决的打击粤敌，要马上集中十四军、三军的第八师、十二军的三十六师于猷岩，白区作战与赤区有很大不同，和粤军作战又与打张贞[1]有很大不同。南靖之敌因在白区，兵力不够分配，以致左翼包抄不能派出，张贞残部不能消灭。十四军、第八师、三十六师的集中，是完全的必要，江西方面有大量地方武装是足够分配的。

毛泽东

三日

---

[1] 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1932年5月9日）

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是更加无耻与露骨的在进行。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签订所谓停战协定，这个协定是完完全全地出卖中国无产阶级的中心的上海，在协定中允许日本长期屯集上海无数的海陆空军，而上海的周围永远不驻中国军队，实际上，这是无限的扩大了上海的租界区域，这是实现将上海变为国际共管的自由市的具体的步骤。

这种无耻的投降与公开的卖国，更明白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而同时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集中一切力量来进攻早已得到了解放与脱离帝国主义羁绊的苏区与企图妨碍阻止工农红军的反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的进行，在上海谈判与协定签订中间更明白地揭露了国际联盟是瓜分中国的组织者，而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与瓜分中国的发起人。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全中国劳动群众面前宣言：他代表全国的劳苦群众否认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谈判与密约，否认五月五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停战协定；号召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坚决地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与清道夫——国民党政府，

来保卫中国的领土的完整，来求得中国完全的独立与解放。

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号召全中国劳动群众斗争起来，武装起来，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进攻；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坚决地彻底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为着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斗争！为着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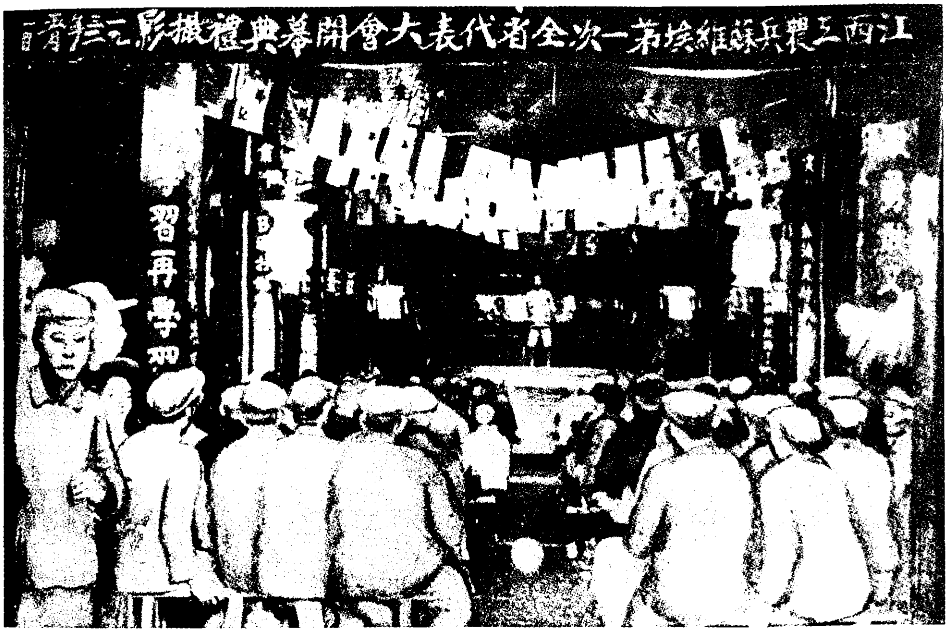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五月九日于江西瑞金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批准江西省苏第一次代表大会各种决议案的决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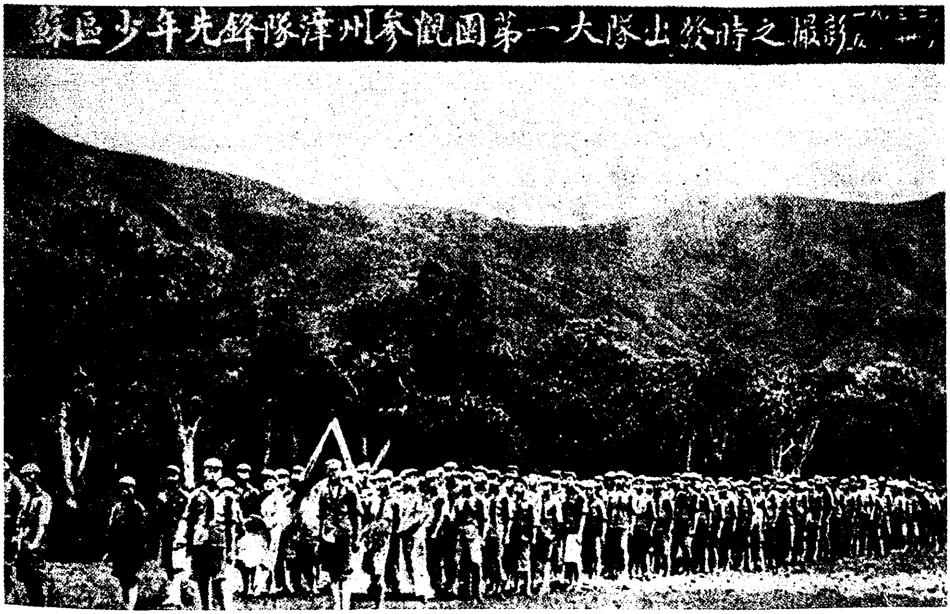
（1932年6月3日）

江西省苏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苏维埃工作报告决议案，实行劳动法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地方武装问题决议案，江西财政与经济问题决议案，扩大红军决议案，文化教育工作决议案，拥护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动员的决议案，认为对全苏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的各种法令和决议没有什么冲突，可以批准。但是江西省苏的新执行委员会，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把这些决议案切实去执行，使之全部实现，要极力地避免过去各级政府把大会的决议看做一回事，而日常的工作又是一回事，结果，决议成为历史上的观瞻和研究的材料之弊病，因此本政府特别引起江西省苏新执行委员会注意。江西省苏新执行委员会最好是把江西省苏大会的决议，立即做成工作计划，切实地去执行，这样才不使省苏大会的决议成为具文。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江西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開幕典禮撮影 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
習再學習

1932年5月1日，江西工农兵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图为开幕典礼。


蘇區少年先鋒隊漳州參觀團第一大隊出發時之攝影 一九三二，五，卅

1932年5月30日，苏区少年先锋队漳州参观团第一大队出发时的情形。

致朱德、王稼祥电[1]

（1932年6月5日）

东路军各军须于六至八号三天内整理完毕，准备九号出动。八号下午二时在官庄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军长、军政委、军团总指挥、军团总政、军团参谋长均到会。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关于各军整顿期限召开军事会议问题致朱德、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政府给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电

（1932年6月9日）

湘赣省苏转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同志们：

苏维埃中央因交通关系不能派代表出席你们的大会，只能以无线电给大会一个简单指示。

（一）目前正当帝国主义疯狂般进行反苏联战争瓜分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特别是苏维埃红军的几次空前胜利，帝国主义由秘密干涉进到公开地直接武装镇压中国革命。

（二）国民党统治崩溃与其继续出卖中国替帝国主义当清道夫和挽救他的死亡，正在疯狂地进攻全国苏区和红军，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进到拼死斗的时期，是国内战争进到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全部战争的阶段。

（三）目前全国阶级力量对比转变了，更有利于苏维埃革命发展，苏维埃在目前是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以革命的进攻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是最高限度地来动员群众武装群众，百分之百地来执行中央对日战争的动员训令，夺取江西和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

（四）你们大会要在这一任务下来进行一切工作，来确定更具体的行动方针，来动员准备群众与红色战斗员去为反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而斗争，更具体来计划赤化赣江西岸与红军及江西省区的

配合去夺取赣州吉安南昌的实际行动。

（五）大会对于努力扩大红军执行红军优待条例，应该有很具体的决定，对于地方武装的加强，发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加强白区一切工作和斗争的领导都要充分地讨论。

（六）加强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必须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要全部地实施劳动法，实行土地检查看是否完全实现土地法令，有计划地进行土地建设，提高生产。

（七）巩固城乡代表会议，实现真正的民主制度，吸引大多数工农群众来参加政权与工作。

（八）肃反问题除正确执行六号训令外，同时防止另一放弃肃反错误发生，可是对于变相引诱和欺骗的各种组织（如吃烟会、恋爱社等）而非自觉加入之工农分子的处置，不能同自觉或已知而加入AB团之分子，相提并论，应有区别，不能作正式加入反革命组织论罪，这样才能将受欺骗而不自觉地加入变相组织之群众争取过来，不使反革命从中威胁而堕其阴谋。

（九）必须严厉纠正过去鼓动群众到白区抢米搬米的错误，这损害苏维埃信仰，增加白区群众反感，使反革命利用，对白区地主谷米主要发当地工农群众，以一部分帮助红军，一部分帮助受摧残缺米的苏区群众，但是还要向白区群众作宣传。

（十）省苏过去对反富农分为革命前后两种，这是极端错误的，大会必须排斥这种理论，过去群众不积极生产，主要是不分阶级的乱罚款、乱捐款的恶果，而不是反富农剥削所致。

（十一）正确执行经济政策开发财源，建立发展革命战争的经济基础，一方面发展经济整顿税收，组织游击队，在白区筹款，同时要提出“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严惩贪污浪费，实行真正财

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

（十二）要使这一切工作彻底执行，就要实行工作检查制度，来消灭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过去省苏不建立工农检查部是错误的，各级政府必须按照省苏大会颁布条例建立起来，要选最有斗争历史和工作积极的老共产党员来充任，并须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和群众团体来参加这一工作。

（十三）大会必须彻底来检查过去省苏及各级政府的工作，无情地揭发工作中一切错误，才能正确地执行苏大会和中央一切决议和命令，来完成大会应有的任务，最后祝你们大会成功。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执字第四号

（1932年6月9日）

《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是法院未成立前，组织临时司法机关和处理诉讼事宜的暂行条例，该条例在江西、福建两省及瑞金直属县，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起发生效力，其他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从文到之日起发生效力，各省及直属县的裁判部，接到本命令及该条例之后，应即遵照执行。此令

各省及直属县裁判部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1]

（1932年6月9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裁判部为法院未设立前的临时司法机构，暂时执行司法机构的一切职权，审理刑事、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

第二条　除现役军人及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外，一切民事、刑事案件的诉讼事宜，都归裁判部审理。

第三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各级裁判部的组织及审理案件的程序，须完全遵照本暂行条例的规定。

第二章　裁判部的组织系统

第四条　城市、区、县、省各级政府内部须设立裁判部和裁判科，唯乡苏维埃内则不设立。

附注：小的城市苏维埃可不设立裁判科，由县裁判部直接审理该城市的一切案件。

第五条　下级裁判部直接隶属于上级裁判部，上级裁判部有委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的《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

任和撤销下级裁判部长及工作人员之权，同时裁判部应受同级政府主席团的指导。

第六条　裁判部在审判方面受临时最高法庭的节制，在司法行政上则受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的指导，司法人民委员部有委任和撤销裁判部长及工作人员之权。

附注：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省执行委员会得行使临时最高法庭和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的职权，以解决司法上的一切问题。

第七条　区裁判部设部长一人、书记一人，县裁判部设部长一人、裁判员一人、书记一人；省裁判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兼裁判员二人（其中一人专管刑事案件，另一人专管民事案件）及书记一人，由部长和副部长组织裁判委员会。

附注一：县裁判部也可以组织裁判委员会，可由裁判部长裁判员，及市民警所长等而组成。

附注二：有必要时得上级政府的许可，可以用别的技术工作人员。

第八条　裁判部有随时调用赤卫队、警卫排、民警担任司法范围内各种工作之权。

第九条　没有选举权的人（未满十六岁的人也包括在内），不得担任裁判部的工作，即书记也要有选举权者，才能担任。

第十条　在各级裁判部下可设立看守所，以监禁未审判的犯人，或判决短期监禁的犯人。县、省两级裁判部，除设立看守所外，还须设立劳动感化院，以备监闭判决长期监禁的犯人。

第三章　法庭之组织及其审判之手续

第十一条　各级裁判部得组织刑事法庭和民事法庭以审理刑事和民事的案件。

第十二条　各级裁判部可以组织巡回法庭，到出事地点去审判比较有重要意义的案件，以吸收广大的群众来参加旁听。

第十三条　法庭须由工人组织而成，裁判部长或裁判员为主审，其余二人为陪审员。

附注：简单而不重要的案件，可由裁判部长或裁判员一人审理之。

第十四条　陪审员由职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选举出来，每审判一次得掉换二人。

附注一：无选举权者（未满十六岁的人也包括在内）不得当选为陪审员。

附注二：陪审员在陪审期间，得暂时解放他的本身工作，并须保留他原有的中等工资，陪审完了之后，仍回去做他的原有工作。

第十五条　主审与陪审员在决定判决书时，以多数的意见为标准，倘若争执不决时，应当以主审的意见来决定判决书的内容。如陪审员之某一人有特别意见，而坚决保留自己的意见时，可以用信封封起，报到上级裁判部去，作为上级裁判部对于该案件的参考。

第十六条　审判案件必须公开，倘有秘密关系时，可用秘密审判的方式，但宣布判决之时，仍须作公开。

第十七条　审判案件时，必须有书记一人或二人担任记录。

第十八条　每次开庭，审问完了一个案件之后，法庭须退庭商议判决书，待判决书宣布之后，才能审判第二个案件，绝对不许审问完了之后，经过几天才宣布判决书。

第十九条　与被告人有家属和亲戚关系或私人关系的人，不得参加审判该被告人的案件（陪审主审都一样）。

第二十条　判决书的前面须写明审判的时间，主审、陪审及参加审判人的姓名，次写被告人的履历及罪状，再次则写所定之罪，最后须写明被告人的上诉期间。如判决监禁，须从逮捕那天算起。每个判决书须由主审和陪审盖印或签名负责。

第二十一条　每个判决书的原文，须抄写一份给被告人。

第二十二条　每个案件的材料和证据，须编成一起，归为一个案卷，编成号码次序，保存在裁判部内，不准遗失。

第二十三条　开庭审判时，除检察员出庭做原告人外，与群众团体有关系的案件，该群众团体也可派代表出庭做原告人。

第二十四条　被告人为本身的利益，可派代表出庭辩护，但须得法庭的许可。

第二十五条　各级裁判部所判决的案件，在裁判书上所规定的上诉期间内，被告人有上诉权。上诉的期限规定为二星期，由审理该案件的法庭看该案件的内容而决定上诉的日期。

附注：上诉的日期，是被告人把上诉书送到审理该案件的裁判部的日子而计算起，并不是上诉书送到上级裁判部的日子而计算起。

第二十六条　凡判决死刑的案件，虽被告人不提起上诉，审理该案件的裁判部，也应把判决书及该案件的全部案卷送给上级裁判部去批准。

第二十七条　在判决书上所规定的上诉期已满或上级裁判部已经批准，该案件的判决书才能执行。

第二十八条　裁判部可用传票、拘票、搜查票三种。

第四章　各级裁判部的权限

第二十九条　裁判部有宣布被告人警告、罚款、没收财产、强迫劳动、监禁、枪决之权。

第三十条　区裁判部审理一般不重要的案件，其判决处罚强迫劳动或监禁的期限，不得超过半年。

第三十一条　县裁判部是区裁判部所解决的案件的终审机构，同时又是审判有全县意义的案件之初审机关，有判决死刑之权，但没有执行死刑之权，县裁判部判决死刑的判决书，得省裁判部的批准之后才能执行。

附注：与省政府隔断的县苏裁判部，不得省裁判部的批准，可以执行。

第三十二条　省裁判部为县裁判部所判决的案件之终审机关，同时又是审判有全省意义的案件之初审机关，有判决死刑之权，但须送临时最高法庭去批准而后执行。

附注：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省，省裁判部有最后处决案件之权。

第五章　检察员的工作和任务

第三十三条　省裁判部得设正、副检察员各一人，县裁判部则

设检察员一人，区裁判部则不设立检察员。

第三十四条　检察员是管理案件的预审事宜。凡送到裁判部的案件，除简单明了，无须经过预审的案件之外，一切案件，必须经过检察员去预审过，并且凡是一切犯罪行为，检察员有检查之权。

第三十五条　经过预审手续之后，检察员认为有犯罪的事实和证据，做出结论后，再转交法庭去审判。

第三十六条　发觉有犯罪的行为，如必须预先逮捕，然后才能进行检查的案件，检察员有先逮捕犯罪的人之权。

第三十七条　当检查案件时，凡与该案件有关系的人，检察员有随时传来审问之权。

第三十八条　检察员当检查案件时，无论问被告人和见证人，必须写成预审记录，由被审问者（被告人和见证人）及检察员签字盖章，作为该案件的证据。

第三十九条　检察员是代表国家的原告人，开庭审案时，可以代表国家出庭告发。

附注：检察员制度未建立以前，可由裁判员中抽出一人，担任预审的工作，代执行检察员的职务，但进行预审的裁判员，法庭审判该案件时，他不得为法庭的主审和陪审。但关于反革命的案件，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以派代表，代表国家为原告人。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有随时修改和停止本条例之权，本条例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命令公布之。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在江西、福建两省及瑞金直属县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但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自文到之日起发生效力。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

内务部的暂行组织纲要

（1932年6月20日）

（一）内务部在中央政府则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称内务人民委员部，县、省受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指导则称内务部，唯区则不设立内务部。

（二）各级内务部，在行政上直接属于上级内务部，建立直接的系统关系，绝对执行上级内务部的命令，但同时受同级政府的主席团的指导，发生横的关系，内务部可以组织内务委员会，由三人至九人组织之。

（三）下级内务部的部长，经该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出来之后，必须送上级内务部去批准。

（四）内务部暂时管理市政、民警、刑事、侦探、卫生、交通、邮电、粮食、社会保证、户口调查、生死和婚姻登记等事项，内务人民委员部下暂时设立：

（甲）市政管理局；

（乙）行政局；

（丙）卫生管理局；

（丁）交通管理局；

（戊）社会保证管理局；

（己）邮电管理局。

（附注一）卫生、交通、邮电、社会保证、粮食等管理局是卫生、交通、邮电、社会保证等部未成立前的临时组织，暂时由内务部兼理这几部的工作。

（附注二）城市苏维埃，区、县、省的卫生部（或科）目前暂不在内务部之下设立卫生科，但区由主席团负责，城市苏维埃，区、县、省的粮食部，须另设部（或科），受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指导。

（五）县、省两级内务部内，只设行政科、市政科、交通科、卫生科、社会保证科，城市苏维埃设行政科，管理民警厅，兼理刑事侦探的工作，大的城市则设立市政科、行政科以管理市政民警及刑事侦探事项。

（六）内务部除部长和副部长外，中央则设各管理局的局长六人。省设立行政、市政、交通、卫生及社会保证等科长五人。县则只设科长二人，城市则设行政科长一人。

（附注）小的县可由部长兼科长，只增加科长一人。

（七）除第六项上所列举的负责工作人员外，可酌量用技术工作人员，以担任技术上的工作，由部长以命令委任之。

（八）各管理局（或科）所掌管的事务如下：

（甲）市政管理局（或科）管理市政的建设事宜，如：马路、街道、电车、电灯、自来水及其他公用的市政企业的建设和管理。

（乙）行政局和行政科：（1）管理民警，训练和教育民警，调查户口，登记生死和婚姻，街灯之设立，监视和指导民警维持市面的治安、街道的清洁以及禁止烟赌等等。（2）管理刑事侦探，训练刑事侦探人员，侦查和逮捕各种刑事犯（如贼盗杀人犯等等）。

（丙）卫生管理局（或科）管理医院，预防和制止瘟疫与传染

病，注意公共卫生，检查车船、公共食堂及人民住宅之清洁，考验并监督医生和药剂师，检查药品及药材之营业等。

（丁）交通管理局（或科），计划和建筑并检查道路、桥梁之修理与改善，船只的管理，航路的疏通和航路标志的建立，陆上运输的管理与改善（如铁路、汽车道、航空等）以及管理其他关于交通的事宜。

（戊）社会保证管理局（或科）□□□管理救济社会的贫困，如水灾、旱灾，以及受各种灾害的区域的救济。

（己）邮电管理局，发展和管理全国的邮政、有线电报、无线电报、长途电话等事业。

（附注）邮电是集中管理的，所以只有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之下设立，邮电管理局，省以下则不设立。

（九）如在工作上有必要时，各管理局或各科可设立委员会，聘请专门人才为委员，以管理局长或科长为主任，其委员有三人至五人。

（十）地方政府之粮食部、卫生部之组织和工作细则，另行规定公布之。

（十一）为督促部务之进行，指导下级之工作，得任用指导员若干人。

（十二）内务部的办公细则另定之。

（十三）本暂行纲要，人民委员会得随时修改和废止之。

（十四）本暂行纲要，在福建、江西两省及瑞金直属县，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未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自文到之日起施行。

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

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

（1932年6月20日）

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劳动妇女积极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对于革命有很大的作用，如妇女参加游击队，女子参加义勇军、赤卫队、少先队等，这都表现妇女参加各种斗争的革命积极性。如果不注意妇女问题，不实行保护妇女应得的利益，是会削弱妇女对革命斗争的积极性，这是对革命有损失的。尤其是在日益扩大向外发展的革命战争中，多数劳动男子均要到红军里去及参加前线的工作，则后方的工作与巩固保卫的责任，更要由妇女来担当。坚决实现保护与解放妇女的法令，领导与兴奋劳动妇女群众来积极参加革命战争，使与妇女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并很好地配合起来，以增加革命胜利的速度。

各级苏维埃政府应承认妇女在革命战争中有力的作用，过去苏维埃政府对妇女的权利，很少注意，且表现出轻视妇女的倾向，举出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知道：

一、在这次选举当中，有些地方剥夺了劳动妇女的选举权，使劳动妇女不能来参加苏维埃工作，这是违反了苏维埃的选举原则，是侵犯劳动妇女在宪法上所享的权利，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

二、苏维埃政府下农民妇女同男子一样分得了田，在经济上妇

女是可以独立的，但是有许多地方妇女与丈夫离了婚，土地房屋仍然没有随着女子带去。而政府的工作人员，不但不注意这些问题，不去保护妇女应享受的权利，反而干涉妇女财产享受的自由权，如禁止离婚女子带衣服走等等。特别是男女工资不平等，如兴国合作社女工工资比较学徒还少，福建南阳区，冲米工人男女做同样的工作，但是工资女工比男工少一半。这是蔑视无产阶级妇女最不可容许的错误！

三、在婚姻问题上，未按照婚姻条例去执行，还有许多买卖婚姻及强迫婚姻、童养媳等现象存在，至于打骂妇女在各地还很普遍，甚至许多政府在婚姻问题上是采取压迫干涉的手段，以至在兴国、龙沙、上社等地，因为女子不能得到婚姻自由及遭政府禁闭毒打，无法抵抗，导致从前封建时代女子为得婚姻自由毒死丈夫的事件发生，这不仅是苏维埃政权下的耻辱，而且证明这些政府反抗中央的法令，继续过去压迫女子的封建行为！

四、劳动法对于女工权利的保障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并未实行，尤其是对于女工产前产后的保护。

五、关于优待红军家属的条例，各级政府尚未能积极地领导群众坚决彻底地执行，特别对于加入红军的妇女（如义勇队）也未提出她们应和男子当红军享受同样的优待条例，这证明了对妇女利益的忽视。

六、过去女子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比男子要低些，苏维埃政府对于妇女的保护，有的只单注意于婚姻问题的解决，大多数反站在压迫和讪笑的观点来解决，或置之不理，对妇女的政治文化的工作，也多怠工甚至放弃。

根据以上的情形，应彻底纠正过去对于保护妇女的工作错误与

缺点，各级政府现在应根据这一训令建立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应进行以下几种工作：

一、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关系与工作方式。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政府组织中一个关于改善妇女生活的专门委员会，与土地、劳动、文化等都是不同的，它不是政府的一个行政部分，它的一切计划和意见须提交同级的政府主席团讨论和批准，决定后，由该级政府用命令来实行。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不能自己命令下级政府执行，仅限于上、下级委员会对于工作上之指导。各级政府主席团为指导和督促该委员会工作起见，要常派人出席他们的会议，如主席团讨论关于妇女问题可叫该主任出席会议，或因报告改善妇女生活计划和意见，该委员会可请求主席团参加会议作报告和解释，如政府各部中对于讨论有关妇女问题，该委员会也可派人出席各部会议，参加讨论和提出意见。

二、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任务和工作，根据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组织纲要是：关于妇女生活的调查统计研究和拟定改善妇女生活的办法，并考查下级政府对于执行妇女方面的各种法令情形，来向同级政府报告和提出具体的建议。

三、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劳动妇女代表会议的关系。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可以召集劳动妇女代表会议，在妇女代表会议中来了解她们的家庭状况与她们的需要及对政府的意见，吸收关于妇女本身利益的意见与要求，收集妇女的材料，此外还可经过各种群众团体来收集妇女材料。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必要时可以叫群众团体派人来参加会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应出席女工大会及劳动妇女大会，报告苏维埃政府关于保护妇女方面的法令，及她们应享受的权利。

四、苏维埃政府之下男女是一律平等的，不但劳动妇女在政治上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并且应吸收妇女参加政权机关的一切工作，使广大妇女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的周围积极来为实现她们自己全部权利而努力。现在首先纠正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轻视妇女，忽视妇女权利保护的不正确倾向，以及对于不执行关于妇女方面的各种法令作坚决的斗争。如选举妇女当乡代表，选派劳动妇女中干部参加乡政府下所组织的各种委员会（如分田调查田等等这所有的各部工作）并在工作中特别注意对于教育和训练的实施。

五、提高劳动妇女的觉悟和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的认识：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因此，应使妇女知道为实现本身利益及保障既得利益而斗争，就应当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号召她们来拥护红军，鼓动她们的丈夫、兄弟、儿子到红军里去，反对逃兵，组织洗衣队、救护队、做放哨检查工作，以及参加地方武装，积极努力地学习与参加苏维埃政府的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这样来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及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而斗争。

六、为要提高妇女政治文化的水平，各级的文化部应设立妇女半日学校，组织妇女识字班，可办家庭临时训练班、田间流动识字班，教员由政府及各地学校教员及群众团体的干部来担任。要督促下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与同级文化部计划实施妇女的文化工作，以及计划培养妇女干部，吸收妇女到各机关工作。在劳动妇女代表会议或妇女学校及俱乐部中，要实行政治教育等号召妇女积极参加苏维埃运动，参加革命战争。

七、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应同各级劳动部，讨论在最近时

间内实现劳动法保护女工利益的全部条文的实施方法，尤其是对于产前产后的保护女工应与男工一样，实现社会保险。男女做同样的工作应领同等的工资。

八、对坚决勇敢当红军的劳动妇女应享受优待红军条例的一切权利。

九、各级政府应坚决地实行婚姻条例全部，尤其是女子与她丈夫离了婚，田地房屋随着女子自己来处理，要禁止买卖婚姻、强迫婚姻、童养媳、打骂妇女这些压迫女子的行为，对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如再发生压制妇女和放弃保护妇女权利的错误，应给以无情地打击。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更要注意发动妇女起来为拥护和实现苏维埃保护妇女法令而斗争，要在改善妇女生活中更加强妇女斗争积极性和积极参加苏维埃一切斗争。

十、为要妇女生活彻底地改善，各级政府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就非常重要。

甲、各级政府应速建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并督促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工作，并决定具体工作计划，中央人民委员会过去曾训令各级政府在五月内成立是项组织，但至今多未执行，轻忽上级训令，兹再定于七月十五号以前，各级政府把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完全要建立起来。

乙、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发下来的两种调查表，在福建、江西两省，七月十五号以前完全要填好，统计交来中央。

丙、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按月向上级作工作报告与妇女生活的状况及关于妇女生活问题的提议和具体的办法。

丁、江西、福建两省苏维埃政府已成立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应即决定一定时间内的具体而切实的工作大纲，迅速督促下级

政府成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尤其要注意对重要县的督促指导与工作的建立，在七月十五号以前要向中央政府作一工作报告。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

发行“革命战争”短期公债条例

（1932年6月25日）

第一条　临时中央政府为发展革命战争起见，特募集公债以充裕战争经费，故定名为“革命战争”公债券。

第二条　本项公债定额为国币陆拾万元。

第三条　本项公债利率定为周年一分。

第四条　本项公债票分为如下三种：

1. 五角
2. 一元
3. 五元

第五条　本项公债规定半年还本还息，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为还本息时期，届时本利同时兑还。

第六条　本项公债完全得以十足作用的完纳商业税、土地税等等国家租税，但缴纳今年税款则无利息。

第七条　本项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及代其他种现款的担保品之用。

第八条　如有人故意破坏信用、破坏价格，以破坏苏维埃与革命战争论罪。

第九条　本项公债负经售债票及还本付息，由各级政府财政机关、红军经理部、国家银行及政府所委托之各地工农银行、合作社

等分别办理。

第十条　本条例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公布施行。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

（1932年7月7日）

目前国内战争正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帝国主义除了指挥和组织国民党军阀，调动了八十师以上的兵力，来进行对于全国七八省苏区与红军的大“围剿”以外，更随时都在准备直接地公开地进攻中国苏维埃与红军。日本帝国主义之以武力侵占东三省与进攻上海，已经是武力瓜分中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之最具体的表演，各帝国主义强盗在一致的同意和赞助之下，缔结了所谓上海和会的《休战协定》，为的是越快越好地共同瓜分上海瓜分中国，以便集其全力来对付中国革命，对付苏联。国民党军阀政府在这一协定面前，更加暴露了它出卖中国替帝国主义当清道夫的作用，所以它一面签字于出卖上海出卖中国的条约，一面便从沪宁铁路线上，调走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与第五军的士兵，开到福建武汉，来进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苏区与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苏维埃中央政府早就宣布了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鼓励和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与工农红军，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线上，否认国民党反革命出卖中国给帝国主义的一切协定与密约，广大地发展抗日的民众武装力量，积极地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

现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在领导苏区广大群众与全国工农红军，

实行全线出击，以革命的进攻，来回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来击溃和消灭国民党的进攻部队，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来争取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这样，来给帝国主义以直接打击，来造成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条件。鄂豫皖、湘鄂西两苏区新的不断的胜利，已经造成了威胁和包围武汉又更有利的形势。中央区红军从漳州回师西向，红十军十六军的积极行动，与三军团在河西的胜利，都使消灭粤赣敌人，夺取赣河流域的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的战斗任务，更加迫切地放在面前。赣江流域的决战已经在这几天内开始，全苏区的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也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要，都更急迫。战争动员的宽广与深入，后方工作的巩固与得力，对于前线上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有决定的意义。因此中央政府特训令各级苏维埃政府与一切工农武装组织，迅速地执行下列各项工作，使苏维埃政权之下每一个工农分子，不但从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了解这一战争关于本身前途的意义，而且要在整个阶级战争过程中，有本身实际动作的表现以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开展和继续——这样才可转变以前“前线打仗后方无关”的得过且过的苟安现象：

一、为着红军在战争的开展中，能得到充分的军役的补充，并且还能继续地有组织地输送到前方，在目前自愿军役的时期，中央政府认为有立即成立红军补充团的必要。现特规定成立红军补充团的具体办法如下：

①在现有苏区内，各县或几县成立一个红军补充团，凡是扩大到主力红军中去的工农战士，统要经过这一补充团的集中训练，以便整队地送往前方。只有在前线段上或新发展区域中的补充，与补充到独立师独立团去的新战士，可以不必经过补充团。

②每个补充团，每月多则成立五连，至少亦须二连，其每月不能扩大红军到两连的地方，则应与邻近县份联合成立一个补充团。每个军区应成立多少补充团，各个补充团每月可扩大红军几连，中央区由各军区指挥部依照中央革命军委会每月所分配给军区的总数，自己规定。其他苏区则由军委分会规定，每个补充团每月或每半月须向前方输送它已经训练了的新战士一次，并继续训练新扩大来的工农战士。

③红军补充团的直接指挥者，是当地县苏及其军事部，但对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如军区指挥部、军分区指挥部、卫戍司令部、军委会后方办事处等），亦得就近与之接洽，该军事机关，亦必须予补充团以帮助和指导。

④补充团的干部，由红军学校、各军随营学校、各军区指挥部设法供给。各军派在各地做招待红军新战士的工作人员须全数参加到补充团工作，原有之招待处一律取消。政治委员及政治干部由地方苏维埃政府负责供给。

⑤补充团在当地训练时所需用的枪械弹药，由军委会后方办事处兵站及地方政府分开筹集，并由各军区指挥部计划支配。这些枪弹在已经训练过了的战士送到前方去时，一般的不必带去，以便得以继续训练新来的战士。

⑥补充团的被服供给，在江西由中央政府责令军委会后方办事处及兵站赶制，由军区指挥部划定县份按期领取。福建、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则由其军区指挥部，鄂豫皖则由军委分会自己筹划。关于伙食杂用费，统由各县苏维埃政府负责筹措，中央区之预算由各军区指挥部决定，并须得中央政府之批准。其他各苏区则由军委分会和军区指挥部决定和批准。

⑦训练日期，一般地规定为半个月。训练内容，由各军委分会、各军区指挥部规定颁布。

⑧各地红军补充团，须与当地的拥护红军委员会发生极密切的联系，并求得它的帮助，以协同动作。

⑨各地补充团，须一律于七月内成立。

二、在目前革命武装力量需要极迅速发展的时候，在各地游击运动正在积极广大的基础上开展的过程中，红军主力的补充来源，要不仅依靠于补充团正在前线上的发展，并且要尽力使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等等武装组织，不断地集中到和改编为主力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军委分会与各军区指挥部，必须在扩大红军计划中，定出扩大独立师成军或改编某些独立师独立团到主力红军中去的计划和日期，并规定成立新的独立师独立团。

三、为使每一苏区有选举权的公民，都能执行武装起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的权利，都能到红军中去参加前线作战的义务，各苏区应立即普遍地发展和成立城乡赤卫军。关于组织赤卫军的原则，中央政府特再规定如下：

①要宣传苏维埃区域有选举权的公民，在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都有加入赤卫军的义务。但地方苏维埃政府不应将十八岁以上的劳动男女，统都编入赤卫军，而是要经过广大宣传，使其自愿地加入，这是目前成立赤卫军的主要原则。

②赤卫军一般的原则是不脱离生产，乡村要使十八岁以上的劳动男女，都能自愿地加入，在城市，要以工人为骨干，包括广大贫民群众，在大城市，要单独地成立工人赤卫军。四十岁以上的劳动男女，如亦自愿加入赤卫军，可编入赤卫军的预备队，使之服后方的和警卫的勤务。

③赤卫军在军区直接系统之下，以乡为基本组织单位，隶属于区军事部，由县军事部统一指挥。各区军事部除于各乡一般地成立赤卫军外，并得成立各区的赤卫军模范营，大区可成立三连至四连，小区一连到二连。模范营及模范少先队要能集中本区内相当力量的较好枪支。

④凡已经加入少先队的十八岁到二十三岁的劳动青年男女，因为他们已经在受军事训练与担任军事役务，可不必同时加入赤卫队，但少先队应经常地输送最积极的分子到赤卫军中去，并且在参加前线与在后方有军事动作时，少先队须受红军与赤卫军的指挥。

四、为着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各县地方武装应实行全线出击，要积极到白色统治区域与敌人后方去发展游击运动与新的苏维埃区域，这除掉扩大和成立新的独立团以外，更应最大限度地发展与成立游击队的组织。游击队的主要任务，应是到白区中和敌军后方去积极行动，侵蚀和破坏敌人的根基和武力，组织农民暴动，号召并组织白军兵暴，普遍地繁殖新的游击队，发展新苏区，破坏敌人交通，劫夺敌人辎重，袭击敌人部队，筹措红军给养——这些，都是巩固和扩大苏区，实行全线出击，协助主力红军胜利的必要条件。关于游击队的组织，应注意下列几点：

①各县应依据当地的斗争环境，决定自己应成立的游击队的数目，即在赤色中心的各县，至少亦必须成立四五个游击队，到外县边区去行动。

②各个游击队的人数，不必机械规定，要依照其所要活动的区域之客观环境，与本身所能集合的力量来决定，有时可大到一连两连的人数，有时可小到十数个人。

③游击队的成分，必须是最勇敢积极的工农分子，尤其是领导

者，必须是群众中坚决斗争的先锋分子，才能使游击队在政治上的巩固，与其到白色区域统治的单独行动，得到有力的保障。

④游击队在其出到白区行动时，必须脱离生产，当其回到苏区整顿训练时，最好仍使之回到生产中去，待其再度出外游击，要能调换或增加一部分新的分子参加，使整个苏区工农群众，都能练习游击队的动作。

⑤地方警卫连、赤卫军的模范营、模范少先队，要都能采取游击队的动作，组织脱离生产的游击队，轮流到白区与敌人后方积极行动。

⑥关于游击队的游击计划与动作纲要，各军区指挥部，尤其是地方苏维埃军事部，应按照当地当时实际状况，给派出的游击队，以具体规定。

五、地方苏维埃政府与一切地方武装组织，应广大地发动群众加入参战的各种组织，如担架队、输送队、向导队、侦察队、破坏队、洗衣队、慰劳队、救护队等，要给这些组织以必须的物质上的帮助，要领导这些组织到前线上去参加实际工作。各县区军事部应计划每区或每乡应成立这些组织的队数和人数，各军区与分区指挥部应规定它到前线上以及到各方面火线上需要数目，并责成各地方政府负责送往前方。

六、为了迅速从后方输运粮食和一切军用品补充和供给前方，以及使红军行军便利，不受道路与河川之阻碍，各级苏维埃政府要有计划地领导群众，迅速将交通干路上之桥梁道路修理好，帮助兵站进行一切工作，特别靠河道的苏区和边区，更要有计划地收集船只，准备随时来供给军事运输。对于军事交通线上之邮政局应经常有准备地依据军事交通线的变更，去加强该线一带之邮局工作，加

调递信员和班次，使军事信件能最迅速而不遗失地送到，同时各级政府对于邮局工作人员增调，要予以最大帮助。

七、中央政府为充分筹措战争经费，使得红军用其全力于决战方面，特决定一方面提高营业所得税的累进税率，重新确定土地税率，征收城镇的房租，并责成地方苏维埃政府去在发展新苏区中筹款，使一切税的重担放在最有财产的阶级身上；另一方面在全苏区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使广大工农群众在经济上来动员帮助红军，保障革命战争的经费，不受任何困难和阻碍。同时中央政府为使苏区境内金融流通，便于商业汇兑与国家税收，特于本月起开始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国家纸票。各级苏维埃政府应广大地动员群众，使他们了解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并应在经济上担负起保障红军给养与战争经费的充裕，使战争胜利地继续，能迅速地取得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因此，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应该一方面严格监督商人老板富农，一点不能放松他们对于国家税收的担负，防止他们从中取巧，隐瞒资本，以多报少，造谣捣乱，与破坏生产，破坏苏维埃金融一切阴谋，反抗和操纵。发现有这种事实，苏维埃政府应采取坚决的手段来严厉制裁。对于一切尚能在苏区内的商人组织如“牙行”与其他旧式行会的残余，各级苏维埃政府必须严厉查禁，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召集商人集合一起，宣布政府对他们的法令、命令与决定。另一方面，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在缴纳极少数的土地税上（雇农、失业工人免税，贫农、生活困难的免税或减税），尤其是在推销公债与使用纸票上，应该以极大的热诚与积极性来尽先缴税，尽先购买债券，尽先使用纸票，并且以革命竞赛的方法来实现，来互相鼓励。关于这一切群众动员，各级苏维埃政府须依靠于工会、雇农工会、贫农

团、互济会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的帮助，务须六十万公债票推销，能定期以内超过规定的票额。纸票的发行，在群众的极度信任中流畅通用。一切税收也都能在群众的监督、督促与鼓励之下无迟疑地缴纳。对于发展新苏区去筹款，各级苏维埃政府与军区指挥部，更要依着阶级路线，精密地计划并指派专人去负责进行。

八、为使充足苏区群众与红军的粮食，为使农村经济发展，增加政府税收并充裕战争经费，为使红军公田与红军家属土地的收入增加，各级苏维埃政府须负责进行广大的保护秋收与加种杂粮的运动。这运动的具体工作，有如下几点：

①各级苏维埃政府，尤其是区乡苏维埃，应领导群众计划保护秋收的各种办法，首先是要严格地执行赤色戒严，普遍地成立赤卫军，担任保卫的任务，务使土匪民团不能在秋禾快熟或收获后，侵入苏区各乡来割禾抢谷。特别是苏区边境，更要严防国民党白军到苏区来蹂躏谷田，破坏秋收。这种保卫工作的成功，必须依靠于全乡全区群众的发动，一方面要组织最得力的游击队去到白区与敌军后方行动，去到土匪民团驻在的地点游击，要认识红军的积极向外发展，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土匪群众与团丁，消灭土匪民团，是保护苏区秋收的根本办法；另一方面，各区各乡的赤卫军、少先队，必须在县区苏维埃军事的统一指挥之下，密切地联络起来，遇到匪警或白军侵入，整个区整个乡的赤卫军，甚至整个县的得力的模范营，都要能相互配合行动，实现各方面的出击，以到联防以保护秋收的任务。

②为使在秋禾肥熟的时候，农民群众能得到收获及时之利，地方苏维埃政府应发动与鼓励广大群众组织收获队、割禾队，于他们做完了自己的收获之外，去帮助其他人工较少的农家去收或者采用

互助的办法去实行。对于红军家属尤其是对于红军公田，更要发动群众组织“突击队”“冲锋队”，以革命竞赛的方法，首先去替他们和帮助他们收割。这一发动，政府要依靠于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并要以雇农工会贫农团为发动的主要骨干。

③在游击队到白区出动时，更要发动白区群众的秋收运动，这种最实际的办法是在秋禾肥熟的时候，预先将白区豪绅的谷田认明，然后以游击队配合群众出去收割这些谷田，以大部分交给当地群众发动其阶级斗争，这不但保护了苏区秋收，并且还消灭了赤白对立的界限，扩大了苏维埃的影响和区域。

④地方苏维埃政府在秋收过程中，更要作加种杂粮以充足苏区粮食的发动，要调查和准备各乡各区土地上便于种植的杂粮，提倡和奖励农民去种，在今年秋收后，全苏区要严禁再有任何一地种植鸦片的事实发生，这首先需要向群众做广大的宣传解释工作。

⑤在秋收中地方苏维埃政府即须注意到集中公谷举办公仓，与在群众中做节省粮食和准备新谷贱价卖给红军的运动，并要提倡少做米酒、米粉，多储干谷以准备来年粮食。

九、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虽在各部分为数甚少，但积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的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以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同时注意到经费节省，绝不是工作减少，相反地，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

十、为使苏区经济发展，各级苏维埃政府要注意于生产事业的提倡恢复和帮助，现时苏区中许多旧的生产事业如闽西的造纸、木材，江西的茶油，宁都的夏布，瑞金的樟脑，会昌、安远的煤矿，散在许多地方的煤炭等，都应由地方政府来计划恢复，并在得到中央政府的审查批准之后，或租给商人投资经营，或交给工人劳动合作社办理，或借款给农民自己经营，或归苏维埃政府自己管理。这一切生产事业的提倡和计划，各级苏维埃要看做是巩固与发展苏区的中心任务之一，这对于战争在经济方面的动员是有极重要的关系和作用。为防止和抵制商人的投机和垄断，尤其为抵抗敌人的经济封锁与反革命在苏区内部的捣乱，各级苏维埃政府更应特别帮助劳动群众的合作社，尤其是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和发展。在现在各苏区的几个中心地方（如中央区之瑞金、汀州、白沙、兴国、�londitions门岭、宁都、于都等），地方政府要帮助劳动群众组织起较大规模的消费合作社，并给以相当的财政的帮助，使能在战争的环境中，以廉价货品来抵制商人的操纵，供给群众的需要。

十一、地方苏维埃政府与一切地方武装组织，要严格地实行赤色戒严与保护交通运输，要严密地注意与检查苏区内一切阶级异己分子与形迹可疑的人的活动，以防止反革命派的抬头，以巩固战争的后方。哪一乡哪一县，要对于赤色戒严怠工，对于商人工作消极，即是哪一乡哪一县没尽了它对执行后方工作的责任，哪一乡哪一县，将给予反革命派与反革命分子以活动的便利机会。中央政府严格地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凡对于这种工作消极怠工的，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制裁。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使上述的一切动员与后方工作，能在更有组织、更集中领导的条件之下进行，特决定于人民委员会之下成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劳动与战争委员会有计划和管理

经济上、军事上、劳动上的全部动员，及对于政府各部委、军区、地方政府关于战争动员问题的指挥之权。各级苏维埃政府及一切武装组织，应经常地将其动员与后方工作的计划和执行程度，报告给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以便于经常地检查与给以及时的指导，同时各该政府的武装组织，仍须向其主管指挥机关报告，以保持其原有的行政与指挥系统。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七月七日

修正暂行税则

（1932年7月15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确定统一的累进税，废除国民党军阀政府的一切田赋，丁粮厘金苛捐杂税等。

第二条　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

第二章　商业税

第三条　税率：暂将商业资本税从一百零一元至五十万元分为十四个等第。按照等第规定税率，征收其资本营利的所得税（即全部营利收入非征收资本），资本在五十万元以上税率另定。兹列表如下：

商业税

等第	资本	税率
第一等	一百零一至二百元	百分之六
第二等	二百零一至四百元	百分之七
第三等	四百零一至七百元	百分之八
第四等	七百零一至一千元	百分之九

等第	资本	税率
第五等	一千零一至一千五百元	百分之十
第六等	一千五百零一至三千元	百分之十一
第七等	三千零一至五千元	百分之十二
第八等	五千零一至一万元	百分之十三
第九等	一万零一至二万元	百分之十五
第十等	二万零一至三万元	百分之十七
第十一等	三万零一至五万元	百分之十九
第十二等	五万零一至八万元	百分之二十一
第十三等	八万零一至十万元	百分之二十三
第十四等	十万零一至五十万元	百分之二十五

第四条　征收方法：依据商店向政府财政机关所领取的营业证，按其资本多少，来规定税率，然后按税率征收所得营业税。

第五条　征收时期：每月征收一次，季节生意也须按次征收之。

第六条　免税办法：

（甲）凡遵照政府所颁布之合作社的条例组织之消费合作社，复经县政府批准登记的，得由县政府报告各该省政府，许可免税。

（乙）肩挑小贩资本在一百元以下及农民直接出卖其剩余生产品者，一律免收商业税。

（丙）商业资本一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

（丁）商人遇险或遭意外损害，报告政府经查验证实者，得许免税。

（戊）对于某种必需品的日用商品和军用品，得随时由政府命令

公布免税。

第三章　农业税

（注）现时农村生产与物品价值，极为复杂，不能规定一个统一的税收办法。只能规定农业税征收的原则，各省可依据此原则，按照当地情况，定出适当的农业税报告中央政府批准施行。

第七条　农民分得土地后，按照全家每年主要生产的收获，以全家人口平均规定出每人每年的收获数与生活必需的支出，根据此标准，再定出向每人开始征收的最低数量及累进税，但富农则按劳动力来平均（而不以人口平均），计算收获与纳税标准。

第八条　只征收主要生产（谷麦）的税，副产暂不征税，但每年收获谷麦二次者，应征税二次。

第九条　茶山、棉麻、果园，当作稻山麦地分配，成为主要生产的，亦应征税。

第十条　红军家属（限本身父母妻子及无劳动力的弟妹）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

第十一条　雇农及分得田地的雇佣工人苦力本身和妻子一律免税。

第十二条　贫农收入已达开始征收的税额，但仍不能维持其一家生活的，得由乡苏维埃决定个别减税，或免税。

第十三条　对于过去富农的征税，要特别加重些。

第十四条　遇有水旱等灾，或遭受白匪摧残的区域，按照灾情轻重免税或减税。

第十五条　因改良种子、改良耕种所增加的农业收入免税。

第十六条　开垦荒地，所收获之农产品，免税三年，富农则依照收获情形，减税或免税一年。

第十七条　农业税征收的办法和时期，由中央财政部公布。但其他阻隔之各苏区可依据当地情形由当地最高政府决定公布。收税时依照税率规定向各家征收每人应纳之税额。

第十八条　农业税征收现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币为限，其余的杂币不收。

第四章　工业税

第十九条　生产合作社，经县政府批准备案的，得由县政府报告省政府许可免税。

第二十条　在目前为促进苏区的工业发展，暂时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

第二十一条　工业所得税，按资本大小，规定税率，征收其利润，其税率另行规定，但须较商业税为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本税则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

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1]

（1932年7月25日）

中央局：

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2]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会议只限于军委会议。此种办法如何，飞电复。

周　毛　朱　王

二十五日

---

[1]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赣南会议）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得到全面贯彻，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逐步受到排斥。根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撤销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央红军。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随之取消。次年3月，中央红军在赣州战役失利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赴前线指导工作。6月中旬，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总司令、副主席王稼祥兼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仍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当时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建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周恩来、朱德等不同意这个建议。本篇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8月8日，中革军委任命毛泽东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至同年10月再次被解除此职。

[2] 毛，指毛泽东。

当前作战方向问题[1]

（1932年7月25日）

中央局：

（一）赣江敌情：粤敌除张枚新师[2]回韶关整顿，叶肇[3]两团留赣州外，十七师八团仍集结雄余[4]两处，并有部分开向新城[5]、南康说。五十二师在新城，十四师在南康上犹两地，二十八师一部在赣州、一部在万安，四十三师在遂川，陈光中[6]一旅在曾前，泰和以下为五十九、九十各师。

（二）我们再四考虑，认为赣州上游[7]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

---

[1] 1932年7月南雄、水口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红军第一方面军（6月恢复番号）的一部分兵力佯攻赣州，主力则从赣州以南的赣江上游渡河，沿赣江西岸北进，向国民党军主力发动进攻。就此，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于1932年7月25日23时发出这份电报，阐述了他们对作战方向的意见。

[2] 张枚新师，指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四师，师长张枚新。

[3] 叶肇，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二师师长。

[4] 雄余，指广东南雄和江西大余。

[5] 新城，镇名，位于江西大余县东北。

[6] 陈光中，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师长。

[7] 赣州上游，指赣州以南的赣江上游。

河出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

（三）因此，决往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1]等四个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如敌人渡河东决战更好。但此行动须极迅速秘密，我们决后方开始集中行动。望秘电中央。

（四）过去行动中错误与缺点望即告。

周　毛　朱　王

---

[1] 陈罗，指陈诚、罗卓英，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司令官和第二路第十一师师长。

关于批准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判决书的决议案

（1932年8月10日）

临时最高法庭请求批准一九三二年八月三日至四日判决反革命的季振同、黄仲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蔡佩玉一名监禁五年，监禁期满后，并剥夺公民权五年一案，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临时最高法庭，站在保障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巩固红军纪律，严肃革命的阵线的立场上，判决反叛革命的季黄等八名以死刑是必要的。当此阶级斗争更加尖锐，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全国红军继续不断地得到伟大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为维持它垂死的运命，竭尽全力地向革命尤其是苏维埃和红军进攻的时候，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除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全国最大数量的反动统治军队向苏维埃红军作四次的围剿以外，更进行在苏区内的一切反动势力的组织，从内部破坏苏维埃和红军，以作内应，同时正因目前阶级斗争到了决死斗的时期，革命队伍中之阶级异己分子，因阶级的利害，由动摇而直接公开叛变革命。按季黄等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虽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可是一到阶级斗争到了拼死命的时候，实行叛变革命，本无足怪，根据季黄等的反革命事实，应处以死刑。但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独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认季黄二人虽是此案的

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指导者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故对于该案特作以下的决议：

一、季振同由死刑减刑为监禁十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计算起

二、黄仲岳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计算起

三、朱冠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计算起

四、张少宜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计算起

五、高达夫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七日计算起

监禁期满后并剥夺公民权五年。

其余刘佐华、李聘卿、萧世俊、蔡佩玉等，仍照原判执行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日

消灭乐安之敌的训令[1]

（1932年8月15日）

一、据守乐安城之敌系二十七师之一旅，共有两团兵力，城附近高地筑有工事。

二、我军有迅速消灭该敌，占领乐安城之目的。拟于明（十六）日向守城之敌攻击。

三、令林彪[2]同志为攻城总指挥，聂荣臻[3]同志为政委，所有第一军团、独立第五师、特务营及以后参加攻城军统归其指挥。

四、第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十六）日位置于南村附近。

五、第三军团十六日到达徐庄、荫水坪之线，十七日到达水口，十八日到达牌路港，监视宜黄、崇仁之敌，并策应我攻城军。

六、兵站医院在招携开设。

七、各军要择适当地点开设野战医院。

---

[1] 这是1932年8月15日11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乐安县招携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8月8日，毛泽东重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同日，中革军委下达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第一方面军从兴国、于都等地北上，于17日攻克乐安，20日攻占宜黄。乐安、宜黄战役取得了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俘敌五千余人的胜利。

[2] 林彪，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3] 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八、总经理部及各军后方统归范部长[1]指挥，明（十六）日进至望仙附近候令。

九、总司令部明（十六）日在望仙。

右令

总司令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

[1] 范部长，指范树德，当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经理部部长。

宜黄乐安等地敌情和我军作战部署[1]

（1932年8月15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一）北向行动方针乃见前电[2]。红一方面军已于十五日到达招携、东韶[3]一带。

（二）敌情：孙连仲[4]部一师分驻宜黄、乐安，一师驻崇仁、抚州；朱绍良[5]部毛师[6]在南丰，李师[7]在南城，许师[8]在其中；吴奇伟师[9]一旅在永丰，一旅在吉水、吉安，一旅在樟树、新干；陈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央的电报。

[2] 即《当前作战方向问题》。

[3] 招携，位于江西乐安县南部。东韶，位于江西宁都县北部。

[4]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九路司令官。

[5] 朱绍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六路司令官。

[6] 毛师，指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六路第八师，师长毛炳文。

[7] 李师，指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六路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

[8] 许师，指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六路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

[9] 吴奇伟师，指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九十师，师长吴奇伟。

诚[1]部十一师在吉安，十四师回泰和。五十九师在峡江、安福，四十三师在遂川、泰和，二十八师在万安及赣河西岸，五十二师亦有回吉安讯。赣东北赵观涛[2]部五师，西北谭道源[3]部及湘军五师，赣南粤湘军八师，尚未见移动。

（三）我军决以迅速坚决秘密的行动，先攻乐安、宜黄，消灭孙连仲大部，乘胜攻南丰、南城消灭朱部，开展赣东一面，求得巩固的向西迎击陈、吴等师增援部队，以更有利的取得赣江下游中心城市，造成夺取南昌的形势。

（四）现部署已毕，战斗明晨开始，期以连续胜利达到目的，并配合全国红军行动。

周　毛　朱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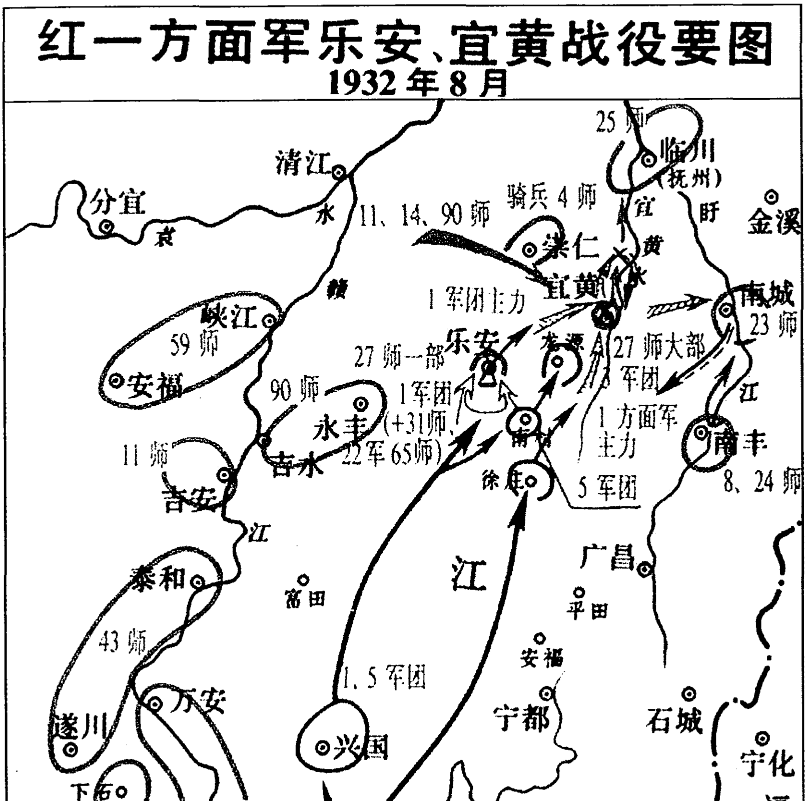
十五日

---

[1]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司令官。

[2] 赵观涛，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八路司令官。

[3] 谭道源，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七路司令官。


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要图
1932年8月
25师
临川
（抚州）
清江
分宜
袁
水
11、14、90师
骑兵4师
崇仁
宜
黄
水
盱
金溪
赣
宜黄
南城
23师
峡江
59师
安福
1军团主力
乐安
龙源
27师大部
27师一部
3军团
90师
永丰
1军团
（+31师、22军65师）
1方面军主力
江
南丰
11师
吉水
吉安
徐庄
5军团
8、24师
江
泰和
富田
江
广昌
平田
43师
安福
1、5军团
万安
宁都
石城
遂川
兴国
宁化
下石
28师
福
14、52师
雩都
3军团
瑞金
赣县
贡
小溪
长汀
西
1、2师，1军教导2团
南康
水
建
新城
52师
14师
大庾
信丰
古陂
1、3、5军团
12军，独3、6师
乌迳
坪田圩
铁石圩
南雄
东
4、5师，独3师，独2旅
图例
战前敌我态势
乐安战斗行动
宜黄战斗行动
敌增援行动
战后我军行动

1932年，毛泽东再次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并率部取得了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图为红一方面军乐安、宜黄战役要图。

打击陈诚部队的训令[1]

（1932年8月29日）

一、综合各方情报：敌陈诚[2]指挥十四、九十及五十二师之一旅（或十一师全部）向乐安前进，其前锋十四师、九十师于昨（二十八）日均距乐城约一日行程。刘绍先师[3]二十八日到八都，周浑元[4]第五师抵抚州、崇仁两点。另据我一军团在南城附近捉获新自抚州来的敌人司书供称：敌第一师胡宗南[5]师由豫调赣，已抵南昌，有开往抚州说。现在抚州驻军仍有孙连仲[6]残部，南城之敌仍为李毛许三师[7]困守着。

---

[1] 这是1932年8月29日10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南城县里塔圩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训令。1932年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放弃攻打南城的计划，部队在南城至南丰、南城至宜黄两线进行休整，保持战略主动。28日奉中共苏区中央局指示，向乐安、宜黄方面移动。

[2]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军司令官。

[3] 刘绍先师，指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刘绍先。

[4] 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师师长。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

[6]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九路司令官。

[7] 李毛许三师，指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六路第二十三师、第八师和第二十四师，师长分别为李云杰、毛炳文和许克祥。

判断敌军对我作战企图，因我东攻南城及在南城附近工作，故首先要恢复已失的据点乐安、宜黄，以抑制我军北上企图，跟着集合各方兵力与我主力作战，因此陈诚部有即日进袭与占领乐安的可能。敌得乐安后，将采取预期与我主力在宜黄境内决战的姿势，配合崇仁周师甚至胡师及南城李毛许三师实行分进合击（此时力量对比是二十个师与三十六个团甚至四十二个团之比）。假使我军放弃乐安、宜黄而集中主力于南丰方面，无疑的该敌要继续向南丰前进，达到与我主力决战目的。

二、我军为要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赣东苏区巩固地向前发展，决心首先打击敌之一翼，即远道东来的敌军陈诚部，乘胜掩击崇仁会合之敌，再行相机进取，以求得革命战争的继续胜利。

这次作战的开端，在宜黄城附近，而决战方面预期在凤冈圩、源头一带，但有可能的以一部引诱敌之主力于宜黄方面，我军集结主力由黄陂山道袭击乐安之敌陈诚的后尾。

三、根据上述目的，我方面军应于八月三十日起，开始集中到适当位置，须于三天之内（九月一日）全部集中完毕。其集中计划如下：

部队	经过路线	集中地点
第一军团	一、由新丰街、上游、子规、永兴桥、二都之线。 二、由里塔、永兴桥、二都之线前进集中。	二都、杏坊一带
第三军团	由宜黄城过桥至鹿塘。	鹿塘、宜黄城一带
第五军团	由神冈、党口、五都、河口之线前进。	河口及其附近地区

部队	经过路线	集中地点
总司令部	经永兴桥、二都之线前进。	杏坊附近之南候
附记：一军团在二都，五军团在河口。渡河地点要预先派人选择，并尽可能架设桥梁。		

四、在集中期间各部应执行任务如左：

（一）第三军团驻宜黄城部队，应派队到通抚州方向之龙骨渡及通崇仁方向之官仓前以北地区游击。

（二）第十二军应跟着三军渡河，其任务是在监视南城李毛许三师行动，因此该军兵力配备要能对南城通南丰道路（新丰街、里塔圩大道）、南城通宜黄道路（一由茅排、潭坊通宜黄，一由李三陂、君山通宜黄）给予严密的监视，因此十二军军部及直属队并三十六师之一团，应位置于李三陂向麻源及茅排、里溪两方游击，以牵制南城之敌，三十六师（缺一团）位置于罗家坊（上游通李三陂道上）负责向株良、新丰街方向游击，以妨碍南城敌军向南丰的活动。

（三）第六十四师（缺一团）即日开到凤冈圩，主力向乐安迫进，努力刺探乐安方向敌情，以一部向崇仁方向游击，监视崇仁之敌。

该师留驻南丰之团，暂归十二军政治部谭主任[1]指挥，应立即渡过南丰河西岸位置于里塔、新丰街之线，监视南城之敌。

（四）第六十五师须在乐安方面，监视陈诚部队的行动，如该敌占领乐安时，应在乐安南部以游击牵制该敌行动，如敌由乐安向宜黄前进，应袭击与扰乱敌人后方。

---

[1] 谭主任，指谭政，当时任红军闽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军政治部主任。

五、关于各军团行进道路之侦察及桥梁的架设，要有计划地进行，以克服行军中的困难。

六、沿途要派专人负责收容落伍的，重病号可送黄陂兵站医院休养。

七、各军团到达集中地区后，应立即建设电话，以利联络。分段担任如次：

一军团担任鹿塘、杏坊线。

三军团担任宜黄、鹿塘线。

五军团担任河口、杏坊线。

八、总部三十日到永兴桥宿营。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毛泽东

红军第一方面军总部命令

（1932年8月31日）

一、敌吴奇伟部约四团，今日上午到达店前，有与敌人主力配合向永兴桥作包抄模样。

二、我方面军以一、五军为主攻部队，担任消灭店前之敌，对宜黄、崇仁方面之敌，由三军团负责监视。

三、以一军团林、聂同志任前敌总指挥，第五军团明日行动归其指挥。

四、五军团总部率十三军，由坪上下南村子。今日下午随四军之后跟进（四军刻由固沅村向下南村之线前进），经滨口、滨沅到达徐家、乐园一带宿营，并派员到崇五都一军团总部，接受明日攻击命令。

五、十五军即由永兴桥经鹿沅到杨坊宿营，即刻派出一团兵力到曾家山接三军防务，其余部队须在杨坊前面高地，构筑阵地，以便明日实行积极进攻，并须将敌情及战斗各期情况，以无线电报告一军团总部，并直接接受其命令。

六、总司令部本晚在下南村（土语仅称南村）。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毛泽东

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电[1]

（1932年9月2日）

敌主力似在黄陂五、六都之线，分两路夹河南进，有到东陂、朱坊之线可能，我方面军明日应集结新丰市、带源、恰村一带，准备坚决打击此敌。

---

[1] 1932年9月2日，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向南开进，致电率领后续部队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报告敌情并对部队行动提出建议。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电[1]

（1932年9月3日）

敌军现到东陂、东港、神冈三点，似有南进可能。提议红一方面军应集结东韶、吴村、洛口之线，坚决打击南进之敌，但我军现在颇疲劳，应有两天以上休息，并作大的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部队必须轻装的命令[1]

（1932年9月5日）

查军队作战首贵迅速，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行装轻便，各战斗员的负担量尽量减少。因此规定各战斗员携带子弹数目至多不得超过一百五十发，多余弹药均由各军团经理处收集一处，储藏在适当地点，并派妥人保管，以备补充。各人携带物品亦应按照以前的规定，由各级指挥员切实负责检查，多余及不需要的一并送往后方。务期行动敏捷，节储战斗力，以便应付继续的残酷斗争为要。

右令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宁都县永乐村向各军团和第十二军发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命令。

关于打破敌军围攻鄂西苏区的意见[1]

（1932年9月上旬）

中央局，急转湘鄂西分局并中央：

我们认为，敌以重兵围紧鄂西苏区，红三军应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消灭他这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他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如因顾虑苏区被敌侵入而分一部兵力去堵，不仅兵少堵不住，对于决战方面又减少兵力，损失更大。上次将三军分为两部行动是不利的，尤其在目前国内战争条件下，红军与敌人作不能消灭他们的几天持久战更不利。现在中心区只四五十里，七师与八、九师应迅速设法利用黑夜小道避免战斗，偷出敌人重围圈外，集结一起，选择适当地点，准备相机打击敌人，一面并发展新苏区。中心区内外线应广大发展游击运动战，阻扰敌人，而不应照分局计划，八、九师回来，七师到另一县。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和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同意否？电复。

周　毛　朱　王　于前方

---

[1] 1932年8月下旬，在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的重兵围攻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决定红军第三军分两路行动，并于8月下旬和9月上旬两次致电苏区中央局。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苏区中央局转湘鄂西中央分局并临时中央的电报。

对红四方面军
粉碎第四次“围剿”的建议[1]

（1932年9月中旬）

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

寒电悉。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打稳扎。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

---

[1] 1932年8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第四方面军经月余奋战，终因敌强我弱，相峙不利，决定撤离豫东南，向皖西北转移。9月中旬，张国焘等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报告红四方面军转战情况，并要求中央紧急动员各临近苏区军民急起策应。临时中央将该电转给当时在中央苏区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等。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京汉路西行动。

中央局在前方的　周　毛　朱　王

对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问题的意见[1]

（1932年9月中旬）

中央局，转中央及鄂豫皖：

（一）鄂豫皖红军在敌人密集的分路合击与深入苏区的情况下，一月余激战三次[2]，仅击败敌人，未能消灭敌人一路，而我受损失大，补充不易，结果仍须自动放弃新集、七里坪。这在战略上仍未抓紧目前国内战争的环境，红军尚须力求避免过大的牺牲，争取便利于消灭敌人一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在一次激战后，须力争相当时间的休息与补充，以免过度的疲劳而影响和减弱红军战斗力。敌急追亦宜以游击战术去疲劳与扰乱他，以争取便于消灭他的有利条件。若机械地固守一地求战太急，反足以招致自己损失大敌人不能消灭的不利条件，敌人再进，所固守的地区仍要失去。

（二）目前移师皖西是对的，我们唤起你们注意这一战略的运用，要努力争取消灭一面敌人的胜利，以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围剿”的目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转临时中央及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电报。

[2] 指红军第四方面军1932年8月10日至13日在湖北黄安县冯寿二、冯秀驿进行的阻击战斗，8月15日在黄安县七里坪进行的反击战斗，9月1日至5日在河南光山县胡山寨进行的阻击战斗。

（三）伤病兵近万，反动派捣乱医院，须请中央用大力送自己的医生去。作战行军顾及战士疲劳，可以减少疾病。烂脚病都由拂晓行军，在战场不洗脚以及蚊虫传染而生，勤洗擦干可以减少传染。

周　毛　朱　王　于前线

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
第二十五号

（1932年9月17日）

目前革命战争正在胜利地向前大发展，每一个工农群众都应积极到前方参加战争工作，以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担任军事运输是参加战争工作之一，是实际去帮助和便利红军在前方作战，各级政府对于动员群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到前方的工作不充分，没有很好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使每个工农同志热烈去参加，以至发生开小差，影响军事运输和战利品之损失，另一种不好的现象，过去各地去担任运输就要工资，形成一种雇用形势，这不仅影响军事费用增加，而且失掉了工农群众参加战争的意义，必须立即纠正，并要向工农群众作广大宣传，使其热烈的自愿的加入担架队运输队到前方工作，现规定运输员担架员的指导调动待遇等办法如下：

一、长期运输员担架员一月到三月的，一概随军工作，每天每人发草鞋费大洋一角五分，五天发一次，并得分火食尾子，但其他零用费不发。

二、短期运输员担架员。由当地地方发动来的短夫，就近担运伤病兵和战利品，在二十天以下的，不发按日的草鞋费，但酌量发给运输时间中的所需草鞋钱，临时由自己雇用的，根据当地情形的

实际需要原则，酌量发给相当的草鞋费。

三、苦工队服务时间，以原判决来定，行军时每天可发草鞋费大洋五分，驻军不发可分得火食尾子，其他费用一概不发。

四、长期运输队员和苦工队由各县苏负责组织好，由兵站转送军委分配到各军随军工作，后方及兵站医院，均不得留用此种长期运输员担架员。

五、为了迅速搬运前方胜利品和物件起见，各军区各政府后以□除临时动员群众外，应调各地赤卫军来担任这一工作，不仅减少临时动员的困难，迅速将一切胜利品运回不受损失，而且是领导赤卫军实际去参加战争工作。

六、省苏县苏应经常督促和指挥各地对于此种工作之进行，至于集中时间地点和人数多少，须照总政治部的通知来执行。

以上决定各项办法，望各级政府，各兵站后方机关切实遵照执行。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七日

关于继续改造地方苏维埃政府问题

（1932年9月20日）

当目前革命战争急剧的发展中，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与发展革命战争，一切工作应以战争为中心。一切牺牲在为争取战争全部的胜利，健全与巩固苏维埃的领导，是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地方苏维埃虽经过一次全部改造，在工作上虽有部分进步，但在领导与发展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中，发现地方苏维埃的领导薄弱和许多错误，首先是没有以战争为中心，因此扩大红军许多地方没有积极去进行，不积极动员群众到前线参加战争。有些对于地方武装领导没有坚决实行进攻敌人，如龙岩革命委员会、长汀县苏等，不但不坚决地领导群众去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反而畏缩逃跑，使苏区受到相当损失，对于游击队的政治领导不注意，造成严重的赤白对立现象，更没有坚决地去扩大苏区巩固新的苏区。诸如此类事实，充分表现，有些地方苏维埃政府之不健全和不坚决执行自己的任务。这对于革命战争的发展与胜利有莫大的危害！

我们更在苏维埃政府本身来看：有的政府还有阶级异己分子隐藏在内，在工作上有些还充分表现非阶级的路线。这种非阶级路线，常在土地问题、劳动保护问题上表现出来。官僚腐化的现象，在一部分地方苏维埃政府内生长着。贪污的现象还很严重，政府的工作方式，往往脱离群众，大都用命令方式，强迫群众去执行，对

于红军优待条例没有全部去执行，以妨害扩大红军的工作。忽视妇女权利，不切实执行婚姻条例，以阻碍妇女来参加革命工作。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命令的玩忽和敷衍，城乡苏维埃的经常代表会议未建立起来，甚至有的乡苏关着门不做事，全部工作大半挂着空名而没有工作，这些严重现象和错误，表示地方苏维埃之不健全，还不能有力地担任领导革命战争的任务。

为了要加强苏维埃政府对革命战争的领导，消除在苏维埃工作一切错误和缺点，因此，决定地方苏维埃政府实行继续改选和改造，从改选中洗刷出去非阶级的异己分子及一切对革命战争工作消极怠工的分子，驱逐贪污腐化官僚等分子出苏维埃，吸引积极的新的干部，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政府，去实际执行领导革命战争的任务和工作。

这次选举的程序，不是闽赣两省苏区各级政府同时来进行改选，而是以县为单位来个别进行改选。因为现值发展革命战争的时期，若各地同时进行选举，各地政府都注全力于改选的工作，必使领导发展革命战争的工作停顿起来，而不利于革命战争。但主要改选的标准，以该级政府对于领导革命战争的工作如何以决定全部或部分改选。现将全部或部分改选的县名列举如下：

一、全部改选的：江西的：南广、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于都、永丰等县。福建的：长汀、宁化、新泉、武平等县。龙岩则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

二、部分改选的：江西的：兴国、胜利、宁都、公略、赣县、乐安、万泰等县。福建的：永定、上杭等县及瑞金中央直属县。

这次改选中应当以发展革命战争来动员群众参加改选运动，检查和批评苏维埃工作，以这次改选运动作为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参加

前线工作的实际动员，纠正过去和平改选以及脱离战争的选举运动。

在此次改选中，各级政府，应当特别注意吸引工人中积极分子参加县代表会区县执行委员会，以加强各级苏维埃中的工人成分。

各级苏维埃政府接到本训令之后，应立即准备改选的工作，改选的期限，由江西、福建两省苏及瑞金直属县苏主席团自己去规定，改选的手续，仍然按照选举细则的规定。此令

各级苏维埃政府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

关于目前军事行动的报告[1]

（1932年9月23日）

中央局，并转中央：

（一）目前敌情：在十八军解决张英五十九师[2]后，十一师回吉安，十四师在吉水、新干，四十三师在永丰，九十五师[3]在乐安。宜黄有二十五师及第五师之一旅，抚州有孙连仲[4]残部及五师另一旅，南丰、南城仍为毛许李[5]三师，有一旅在里塔、新丰。五十二师驻地不明，大约在吉安、吉水、安福一带。赣江泰和以上为粤军。分散驻扎闽北之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仍为周志群[6]部。一般的是缓进，赣南、闽西敌人则较急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关于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中共临时中央的报告。

[2] 1932年9月，以师长张英率领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军第五十九师，因“剿共”作战损失惨重，缩编为三个团，加以别部补充，改任陈时骥为师长，张英去职。

[3] 似应为九十师。

[4]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九路司令官。

[5] 毛许李，指毛炳文、许克祥、李云杰，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八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三师师长。

[6] 周志群，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四旅旅长。

（二）目前红军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更严重错误。

（三）现在因敌人固守白区城市据点，在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南丰、黎川一线城市周围，还有广大区域未曾赤化，加以过去我们战略错误所造成的困难条件，致攻城打增援部队必须时时顾及敌人分进得以合击，又红军因疾病离队之多，补充不及，在白区还不易打击与消灭敌人三个较强的师的靠拢行动。故如再打乐安宜黄两城，两三天内东西北三面敌人可集中至少五个师兵力来增援合击。同时吴奇伟周浑元[1]也决不如高树勋[2]之易攻。如攻里塔圩，敌力较弱将退入南丰城，南丰工事甚坚，可据守以待更大的援兵，届时援兵过多，将使我不能击敌一面。攻永丰城则更逼近敌之大量增援部队。

（四）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具体的布置，以大部兵力放在南丰之西直到乐安附近，以一部兵力放在南丰东南做扩大苏区工作，经过一期工作，即以小部队经常向南丰游击，引起敌军增援南丰而准备打击增援部队，并相机与闽北苏区求得联络。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因为这片地区之赤化与逼近这几个城市，必能变换敌情，并给红军以有利的群众条件，消灭敌人与取得中心城市。

---

[1] 吴奇伟、周浑元，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九十师和第五师师长。

[2]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五）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地集中兵力去作战，同时在工作中也决不丝毫忽视敌人进攻的布置与小部队的随时袭击。

（六）我们决定后日出动，如中央局有新意见，望火速电告。

周　毛　朱　王

二十三日

关于中央政府周年纪念

（1932年9月24日）

本年十一月七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同时是苏联革命成功的十五周年纪念，在这一年中，国际的中国的革命形势，有了最大的开展，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成功，更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和世界革命的发展，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和瓜分中国，在这一年中，达到了空前的紧张形势，中国苏维埃运动，自成立全国统一的领导机关——临时中央政府，在全国得到空前的胜利与开展，全国工农红军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继续获得革命战争空前的胜利，消灭国民党军一二十师之众，扩大了最广大的苏区，开展了全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新局面，苏维埃已成为全国工农劳动群众解放的旗帜。

当这一伟大的纪念节中，是帝国主义国民党为挽救其垂死的统治，集全力向苏维埃和工农红军四次大“围攻”中，已被我英勇红军在各个战线上□其崩溃和消灭，遭到最严重的惨败，苏维埃中央号召全国工农劳动群众和红军，以英勇的战斗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攻，争取江西首先的胜利，以实行直接对日作战来纪念这一伟大的纪念节。同时要加强与领导革命战争，在今年纪念节举行各级政府工作检查。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周年纪念节举行下列各项：

一、宣布一月六、七、八三日，各机关，各部队，各工厂、商店，一律休假。

二、十一月七日举行阅兵。前方各部队除因战争关系不能举行外，余均由□最高指挥员举行阅兵，各县赤卫军模范营集中县苏所在地举行大检阅，瑞金直属县由中央检阅全县模范营。

三、十一月六日，各县召集选民大会，由各区乡政府代表中央向选民作一年的工作报告。（报告书届时由中央印发。）八日是各区乡政府向选民报告工作，使苏维埃的选民在这天来检查苏维埃的工作和接收选民对于苏维埃的一切意见。

四、在十月底各省县向中央作工作报告，实行检查各级苏维埃在这一年中的工作，特别是领导与组织战争的工作。

各级政府和各军区，务须遵照执行，要在积极发展革命战争中□实际的准备以上各项工作。此令

军委会

各级政府

各军区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1]

（1932年9月25日）

中央局：

电[2]悉。

（一）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2] 指1932年9月2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给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电报。电报说："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进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群众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将于鄂豫皖、湘鄂西与更直接的河西十六军、八军积极而艰苦的行动，不是呼应配合的。而且更给敌军以时间来布置。分散亦有被敌袭击危险，于我们不利，可以演成严重错误。"电报还说，我们认为红军主力应积极出击敌军，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并求得消灭此敌，如不易得手，则引出南丰之敌而消灭之。

（二）如攻乐安，以过去经验，急切不易得手，必引起西路强大增援，内外夹击，将陷于不利。由黎川佯攻南城，有大河相隔，佯攻无作用，无法打增援部队。现在只有一个机会，即宜黄仅驻孙连仲部[1]，五师有开贵溪说，如属实当可以牵制东西两面敌人。强攻宜黄，消灭孙连仲部为第一步计划，但必须俟敌证实才能开动，如此将延长在苏区待机日期，不确则必虚耗时日。

（三）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2]，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体布置，我们更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的准备，随时打击东西进攻，或宜、乐、丰的袭击部队。这样才能胜利地配合全国红军的进攻，这自然是积极进攻的。

（四）中局如同意这一布置，请即刻电复，以便明晨开动。如必要我们待机攻宜黄，则只能在此等候不动，因开近宜黄而不能打，将更加错误。

（五）无论中局同意哪一行动，我们提议即刻在前方开一中局全体会，并且要全体都到，这不仅可以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与发展方向，地方群众动员与白区工作，特别是扩大红军苏区与争取中心城市之具体进行等。日期以三十日开为好，三天赶到宁北的小塘。

---

[1]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九路司令官。

[2] 中区，指中央苏区。

（六）如何，待电复。

周　毛　朱　王
二十五日

关于方面军行动与中央局全会地点问题的意见[1]

（1932年9月26日）

中央局：

昨电悉。

（一）乐安敌吴奇伟师[2]，非高树勋[3]一旅可比，前次攻乐[4]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击转增不利。十六军现退出上高，转向萍乡方向发展，八军电报不通，配合行动不能使之牵制赣河主力，因此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二）现方面军向边区开动，待宜黄敌情弄清后，如只孙连仲[5]部，抚州五师大部又到贵溪，我坚攻宜黄以开展局势；如宜黄有重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

[2] 吴奇伟师，指国民党军第九十师，师长吴奇伟。

[3]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师长。

[4] 指红军第一方面军1932年8月16、17日攻击乐安的战斗。

[5]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第九路司令官。

兵不便攻，则只有执行原定计划，布置宜、乐中间一带战场，争取群众以调动敌人。

（三）中央局全体会以项邓[1]两同志回后，仍以到前方开为妥，因有许多问题如前电[2]所指，必须讨论解决，日期以在十月十号以前为妥。

周　毛　朱　王

---

[1] 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邓，指邓发，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2] 即《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会讨论作战行动问题》。

敌大举进攻前
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1]

（1932年9月26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对全苏维埃与红军第四次“围剿”的策略，在他行动中表现是：以优势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急攻，而对我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扰，镇压群众，同时非常积极地准备着全国反动力量，以求很快地向中区[2]实行大举进攻。在此时期，对于赣东北与湘鄂赣进行积极的摧残，以便利其大举进攻中区时无侧后的顾虑。

二、在目前敌人坚守据点，向中央苏区游击进扰，与迅速布置大举进攻的情况下，我们中区工农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这一行动的任务，是要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力量，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为积极作好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围剿”的准备发布的训令。由于中共苏区中央局不同意，训令中的部署未能实行。

[2] 中区，指中央苏区。

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来夺取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

三、执行和实现这一任务，须有具体准备工作，特别是布置战场的工作，对于军事上的要求，更须积极准备。现详细规定是：

（一）预定战场的地区

预定我军目前的战场是要适合两个要求：

1. 为要坚决执行胜利的北上任务，必要迅速地肃清宜、乐[1]、南丰一带拦阻着我军北上的白区地主武装，使我军可以巩固地迫近宜、乐、南丰各城市，有把握地夺取据点，消灭援敌，胜利地北上。

2. 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地在宜、乐、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即以猛烈追击乘胜夺取抚州、吉安，开展江西局面。因此决心在宜、乐、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目前的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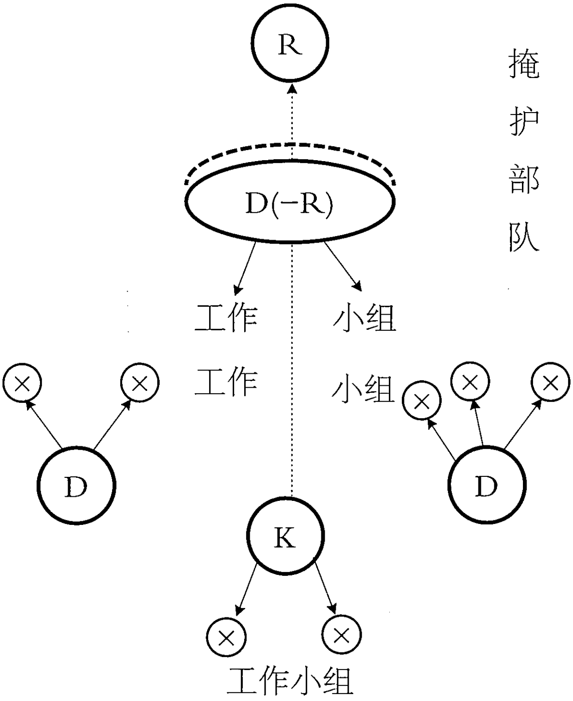
（二）战场布置的组织

1. 我军的工作部署，每个军要以师为单位分开，要派一师为掩护队，各师分在适当地区工作及训练，其分散要领如下图：

---

[1] 宜、乐，指江西宜黄和乐安。

第某军布置图



2．掩护部队必须派出有力部队担任（要有战斗指挥比较强的率领），要进出工作部队的前方约一天或半天行程，先要占领巩固阵地（施行必要的工事）。其主要任务是掩护后方工作部队的安全。其部队除派警戒部队并须以一小部向前游击外，主力须适当集结在一地从事训练，在情况许可下可以派出工作小组在驻扎地邻近做群众工作。在派小游击队向敌人方向游击时，不能削弱其掩护作用。各军掩护队得到紧急敌情，不但须迅速通报本军各部队，还须直接通报邻军各部队。

3．工作小组。由各师（或军部）直接派出该师工作人员，有时可附属必要的警戒队，直接保护工作小组之安全工作。

各师（除工作小组）须尽量的集结训练，如以各种原因不能全

师集中而要以团为单位分驻时，各团驻地最好能向敌方前后重叠起来（前后距离各团不能超过十里以上）。如地形不许可，必须摆成一横线或梯形时，各团距离不能超过五里以上。

4. 各军团要根据过去作战经验，针对着本身弱点加紧各种训练，各军团要自订军事训练计划。

师以上各级指挥机关应经常派出巡视人员到下级去巡视，严厉地督促执行任务，并将巡视结果报告上级。

5. 参谋旅行团。参谋旅行团以军团为单位组织之，任务是：任军事地理的调查及作战的各种侦察，所到地方必须将工作结果制成书面及图表，准备报告直属指挥员及上级参谋部（详细工作计划另定）。该团应该调查和登记事件规定如下：

（1）社会调查

人口数目及乡村中革命领袖姓名。

房屋多少。

给养状况。

特别出产。

当地阶级关系。

有无各种斗争历史。

有无反动政治组织。

（2）地理调查

四至道路状况。

附近河川状况。

桥梁船只数目。

森林。

地势。

（3）军事调查

附近地主武装。

地方武装。

前面敌军及团匪情况。

6. 各军团如遇敌人集中向我进攻（敌人小游击队的进扰不在内），须有掩护有计划地向着指定地点（东陂、新丰市、甘竹）迅速集中准备作战。

（三）工作期间内主力的行动

我为要布置战场计，在工作期间，我军主力应集结在工作地区适当位置，施行训练为有利。

（四）部队分散和集中

1. 作战区域的划分（如附图[1]）。

在工作开始，应择取在我军军事交通的需要上，沿着路线附近先行工作，然后再向其周围推广。其主要道路（如图所示）各军团及军可按规定地区妥为分配后报告总司令部。

（1）第一军团以东陂为中心，其工作区域包含水口、登仙桥以东，苦竹坪、东陂、朱坊以北，五六七都、水南以西（附图）。

（2）第三军团以新丰市为中心，在水南、朱坊、五六七都以东（不包含朱坊、水南）新丰市之东北工作，包含有朱坊、甘坊、三溪、杨坊、党口、神冈等（附图）。

（3）第五军团以甘竹为中心，东至罗坊、白舍、瑶陂，西至洽村、沙坪（附图）。

（4）第二十二军以南村为中心，东至水口、苦竹坪，北至登仙

---

[1] 此处及以下几处“附图”，原书中未附。

桥、罗山街，西至增田以西直至水南，南与苏区打成一片（附图）。

2. 方面军的集中计划另行规定。

四、各部队在工作期间，应设递步哨以便取得互相密切联系，特别是在最前线的掩护部队，当其派出的游击队得到敌情时，须马上用电话互相通报（横的电话线须迅速架设）。

五、工作期间总军医处应在水口设立临时医院，收容工作部队伤病兵。

各军团应在军队未分散以前，对于军队卫生如传染病的隔离及对饮水注意放毒等加以详细的说明。

六、各部队进入工作地区后，应将该处给养状况详细调查电告总部。如给养不够，须从工作区以外设法筹办，以免工作区顿起粮食恐慌。

七、工作期间总司令部在吴村。

总司令　朱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应紧急动员并布置中央苏区与各苏区行动[1]

（1932年9月30日）

中央局，急转中央：

来电悉。

（一）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在湘鄂西苏区受着挫折、鄂豫皖苏区红军处于不利、中区[2]红军北上又未能展开更大局面的时候，我们估计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并已首先向赣东北、湘鄂赣摧残进攻。

（二）目前进攻中区的敌人，采取坚守据点，向苏区游击进扰，并以三个师以上之集团军力阻我出击，正是敌人在积极布置对中区大举进攻。

（三）全苏区的紧急动员与布置中区、湘鄂赣、湘赣、赣东北苏区的配合行动，我们已感到急要。已提议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议上决定。

周　毛　朱　王　于前方

---

[1] 这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敌情分析和应敌建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的电报。

[2] 中区，指中央苏区。

关于鄂豫皖应选敌弱点歼其一部的意见[1]

（1932年9月30日）

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并转中央：

一、据几日来侦察，敌十四军进袁家坳、长山冲，已伸入燕子河、西界岭之间，第一军二师到罗田之固家河，逼近西界岭，张印相[2]所部到闵家河，但三十一师在宋埠，郝梦龄[3]到肖家坳与其靠拢，王均[4]到霍山，其先头部队在麻埠，梁冠英[5]亦在霍山，上官云相在英山，十三师在黄安[6]之河口，陈耀汉[7]在胡头坳，戴民权[8]在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转鄂豫皖中央分局并转临时中央的电报。1932年9月24日，张国焘等致电苏区中央局，请求经常告知敌情和各苏区红军配合其行动的情况。

[2] 张印相，当时任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第三十师师长。

[3] 郝梦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师长。

[4]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剿匪”军右路军副司令官兼第二纵队指挥官、第七师师长。

[5] 梁冠英，当时任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剿匪”军右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第三十二师师长。

[6] 黄安，旧县名，即今湖北红安。

[7] 陈耀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师师长。

[8] 戴民权，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师师长。

张老埠，四师在金家寨，八十九师在新集，张钫[1]在商城。

二、第一师仍在武汉，四十八师在鄂西之宝塔湾，此间尚未侦得有何敌人开向黄广潜[2]。

三、据此，敌似以十四军、一军两纵队为挺进队，以三十军、三军、二十路军为堵击队，四师、八十九师为工作队，并组织上官云相为五纵队，有逼我四方面军于长江边决战的形势。

四、我们认为与敌决战，必须具备消灭与击破敌之一方的把握，以转变目前不利局势，并准备继续作战的力量。因我们必须估计红军补充的速度，在现时苏区条件下尚赶不上敌人继续求战之快，若仅击败敌人，而不能消灭敌人，不能缴获枪弹、俘虏，不能继续作战，这将不易变更现有局势，他苏区援助亦难消灭敌人，不易调动进攻鄂豫皖敌军。中区现正处于敌坚守据点，积极布置大举进攻，攻则集三师以上兵力来援，颇难取得在运动战中消灭他的环境。

五、因此，鄂豫皖在现时必须选择敌之弱点，首先消灭敌之一部，如无此把握而苏区尚能活动，应勿急求战，多疲劳敌军，俟造成更有把握的决战。

六、我们意见如此，望考虑电复。

周　毛　朱　王

三十日

---

[1] 张钫，当时任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第七十六师师长。

[2] 黄广潜，指湖北黄梅、广济和安徽潜山。

复中共苏区中央局等电[1]

（1932年9月30日）

我们估计到敌人即将倾全力大举进攻中区，全苏区的紧急动员与布置，中区、湘鄂赣、湘鄂、赣东北的配合行动，我们已感到急要，已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四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

---

[1] 这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中共苏区中央局急转临时中央电的主要内容。

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1932年10月6日）

全中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群众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早已向全国的民众宣告：国际联盟是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联盟，它派遣李顿调查团来华的主要任务，便是计划瓜分中国与镇压中国苏维埃旗帜之下的一切革命运动。

现在帝国主义强盗联盟的调查团——李顿调查团，瓜分中国的报告书已经发表了，这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民众提出的瓜分中国的哀的美敦书，而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却是完全同意接受它的！

李顿报告书公开地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据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明白地宣布了日本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华北、上海是正当的不得已的行动。号召各帝国主义都来瓜分中国，消灭中国的革命运动，首先就是要更残酷地进攻中国苏维埃政府所领导的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后来消灭满洲义勇军的反日战争，全国的反日反帝运动与抵货运动。无耻地主张满洲应作为“自治国”，设立国际宪兵，成为国际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去积极向苏维进攻。同时用一些“宗主权属于中国”等名词来企图解除中国民众反帝的武装和欺骗中国民众。最后，再三命令国民党更要积极地去进攻红军，更

忠实地去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更努力地镇压反帝运动、抵货运动，凶残地去屠杀民众！

李顿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苏维埃政府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进攻苏区、进攻苏联的新企图！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以求得中华民族完全的解放和独立！武装保护苏联，建立中国劳苦群众与苏联亲密的联盟。

苏维埃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宣言，要真正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压迫民族战争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完全忠实地拥护接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告书，承认作为谈判根据，国民党各派政府一切的讨论研究及口头上对报告书某几点之不满意，无非是掩饰它出卖中国的面具，欺骗中国民众的把戏。国民党宁肯将东三省、上海及整个中国送给帝国主义，而对于领导全国革命民众实行革命民族战争的工农红军，却在帝国主义的指挥和协助之下，动员百万的兵力来进攻，企图消灭真正反帝民众的苏维埃政府，阻止红军及反帝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同时帮助帝国主义屠杀满洲的义勇军，压迫全国反帝运动，制止抵货运动和工人的罢工，屠杀中国工农劳苦群众以效忠帝国主义。只有推翻出卖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统治，我们才能顺利地进行民族革命战争。

苏维埃政府正在领导全国的工农红军和苏区的广大劳苦群众，艰苦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胜利地去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以革命战争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全国的民众们武装起来，反对国民

党进攻苏区，推翻帝国主义走狗的国民党统治，拥护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只有苏维埃政府才能真正地领导全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直接对日作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工农红军才是真正地实行民族战争的民众武装！

全国的工农红军战士、苏区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们，积极地进行革命战争，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坚决进攻来粉碎第五次“围攻”！白区各地的工人农民士兵及劳苦群众，自动武装起来组织义勇军，举行罢工，进行抵货运动，积极向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一切的革命民众们，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实行革命民族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建立全中国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月六日于江西瑞金

关于战争紧急动员

（1932年10月13日）

全国革命日益剧烈的发展，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在全国获取了空前的伟大的胜利与发展，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攻在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鄂赣等地遭受不断的惨败，尤其是中央区红军向北胜利地开展。因此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严厉督促之下，正倾全力来布置对中央区的大举进攻，加紧进攻赣东北、湘鄂赣与河西，这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反动统治阶级企图倾全力以作最后挣扎，是革命与反革命决斗的紧要关节。

这一阶级战争比以前任何次的战争都要剧烈和严重，这必须动员我们一切工农劳动群众，武装起来迅速强大红军力量，以一切的力量一切的经济和一切牺牲去准备战争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我们要在这一战争的胜利中，取得吉、赣、抚、南等中心城市，实现江西和邻近几省首先胜利。

中央政府为了领导全国工农群众和武装组织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中央区的大举进攻，以及对于全国的四次围攻，特对于全国各苏区各工农红军和全体工农劳动群众，实行战争的紧急总动员，以最积极的最迅速的行动，和最宽广的最充分的战争动员，实行坚决的进攻，来保障这一战争的完全胜利。因此各级政府、各红军、各军区要坚决地、迅速地执行以下各项紧急动员工作：

一、紧急动员全体工农劳动群众，以最积极的革命热情和实际行动来为争取战争胜利而努力而斗争，因此各级政府，即实行对于全苏区工农群众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工农分子，都了解这次战争关于本身前途的意义，关于苏维埃在全国胜利的重要关节，认识到全国革命力量增大和反革命的挣扎，来鼓动工农群众的战争热情和阶级的决心，积极地准备和参加前线和后方的战争中一切实际工作，去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而战斗，这是我们阶级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

甲、省苏区政府全体人员立即到下面分别召集会议，特别是城乡代表会议、选民大会，来举行政治动员，使每个工作人员、每个工农同志，都了解这一战争的意义，全部动员起来，去参加战争一切动员工作。

乙、各红军部队由各该最高指挥机关根据本身情形分别召集军人大会，举行全体战士的总动员。

丙、各地方武装由军区及各级军事部，分别举行赤卫军游击队以及少先队等队员大会。

丁、各群众团体在这一总动员令下去分别召集全体会员大会，作鼓动的报告。

二、各红军部队，根据确定之方针，以最积极的敏捷的进攻行动，首先击破敌人的进攻，用胜利的进攻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特别是全国红军，更要有配合的联系的行动。

三、猛烈扩大红军是加强革命战争的主要力量，这是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一个主要条件。各级政府在十月内以最大力量和速度，来动员最广大的工农积极分子去加强红军的数量和质量，要坚决执

行中央十五号训令，同时必须使所规定的数目要超过一倍，以后要经常进行扩大红军工作，不断地大量补充前方，建立经常的红军补充队。并责令各级政府动员和督促离队回家之士兵，于十月内全部归队，在群众中发动最广泛的归队运动。

四、坚决执行十五号训令，迅速动员全苏区凡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壮年，全体自动地加入赤卫军，每人须自备一种武器，加造土枪土炮梭镖，准备充分的弹药（同样少先队要广泛地建立起来），按照规定的编制建立起来，必须于十月革命节前完成这一工作。尤其是加紧政治教育和军事上的战斗训练，各级政府、各军区、各军事部要切实负责执行，使赤卫军真能担负保卫地方配合红军行动，消灭和打击进攻的敌人，模范营、模范少先队要能随时调动集中作战。

五、建立强有力的游击队，各地现有的游击队，要加以严厉检查，对于队员中不好的成分，应马上洗刷出去，强健和改换游击队的领导分子。每个游击队在十月内须轮流训练一星期，加强政治军事教育，使每个游击队员知道他所负的任务与工作。每县最少有一个或二个最精干的游击队，到附近白区和敌人的后方去发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扩大苏区，成为苏维埃的武装组织者、宣传者，成为钳制和打击敌人配合红军作战的革命战争中一个最重要的力量，坚决消灭过去游击队的一切严重现象，各县必须于十月内组织和整顿完毕，按照劳战委员会所计划的方向和任务全体出动。

六、为着便利消灭敌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积极发展四周苏区，特别是北和东，以及东北三面，是争取战争胜利，完成江西首先胜利的一个重要前提。各级政府各地方武装应立即动员到这些方面去发展苏区，争取广大工农群众，造成更广大的一片苏区，围绕

各中心城市及敌人作为据点的城市周围，取得与赣东北及河西的密切联系，更有计划地去进行围绕苏区周围的白军士兵工作，去瓦解敌人的军队，争取革命的士兵群众，建立附近中心城市的工作。各省县政府要在十月内征调大批的干部到这些新区域去建立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去进行白区和白军士兵工作，同时对于各边区要深入阶级斗争，巩固这些区域向外发展。

七、必须立即征收土地税、商业税、房租等开发财源，充分筹划战争的经济和粮食，及一切军用必需品，要准备能与敌人长期作战，使红军及一切工农群众在战争中不受敌人的封锁和给养的困难，更要继续节省一切费用和粮食，来充裕战争的准备，这是有决定战争胜负的意义。

八、动员全体工农群众实行储蓄粮食、食盐，节省粮食的耗费，努力耕种杂粮、菜蔬，准备在战争中来供给红军，应当从政治上鼓起全苏区工农群众对于革命战争的热情和对于红军的拥护，在经济上粮食上充分地去准备和储蓄，来为争取战争胜利，准备随时借给和捐助红军。

九、我们必须坚决消灭进攻的敌人，使我们的苏区不受敌人的蹂躏，假如敌人要进扰到苏区内，我们应该坚决地领导工农群众和武装来打击和消灭敌人，并且要断绝敌人的粮食和交通，日夜骚扰，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不能一刻存留于苏区内，各地方政府应领导地方武装和工农群众积极做各种准备工作，运用过去三次战争的经验，使得到更充分的有效的成绩与胜利。

十、全苏区实行最严密的赤色戒严，一切步哨由赤卫军负责，须在十天内建立起来，严防敌人侦探混入，严查行人和携带物品，凡有可疑者，须带至政府严密察究，各级政府发给路票须先有详细

考察和登记，不能随便发路票，取消从前手上盖印的办法，各群众团体须到政府领取路条，非政府军事机关，不能发路条，出白区的路条，必须由县区政府发给。立即举行全苏区户口清查，特别对于城市之一切可疑分子要加紧考察和监视，这一工作各级政府要取得工会少先队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参加和帮助。

十一、加紧肃反工作，责令国家保卫局训令各级分局，严密计划来进行这一工作，同时，各级政府对于一切反革命活动，要采取严厉处置，特别是石城、宁都、广昌、宜黄、宁化、会昌、寻乌、于都、安远、信丰、龙岩等县，对于豪绅地主的势力，迅速彻底肃清，凡是地主富农及有反革命嫌疑分子，我们应当领导工农群众，实行监视行动，在战争区域，对于这些分子要监押起来，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派别，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建立更巩固的后方。

十二、积极整顿交通干线，便利于军事运输和军队行动，建立强有力的兵站工作，以后兵站运输，凡是靠兵站两边各三十里内之政府负运输和保护责任，该线一带之赤卫军，成为保护和护送的武装。运输办法，改正过去各种组织的名义，统一于赤卫军，规定每一个赤卫军队员，有支武器，一条扁担，五个人共一副担架，这样遇战争时，全体拿着武器去进攻敌人，至前方和兵站需要担架队、运输队时，全部赤卫军就变为运输队、担架队，这样动员迅速，才能适应战争中的紧急需要。

十三、三次战争时，敌人在苏区内所构筑的工事，还未毁灭者，及各城的城墙，由各该政府动员广大群众于十月内全部拆毁。

十四、各级政府在战争时，必须坚决领导群众和武装与敌人坚决作战，如有畏缩逃跑和不坚决领导群众作战的，应以革命纪律制裁，同时为加紧各政府对于战争领导力量起见，各级政府工作人

员，均要受武装训练，区乡政府人员，直接参加赤卫军负领导之责，省县两级应联合同级的各机关各团体的工作人员，建立一个赤卫军的组织，经常实施军事训练，使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要军事化，这样是更实际地加强各级政府对于地方武装作战的领导。

战争的形势日益紧迫了，我们要以全力来动员全苏区工农群众，要以最大的速度，来充分准备一切战争工作，要准备一切牺牲去为争取战争的胜利，要使一切工作服从于战争。这一次，胜利当然属于我们的。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再次受到“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的错误批判，会后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图为宁都会议旧址。

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二十九号命令

（1932年10月13日）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的发展，□□各级地方政府军事部的工作，以领导各地地方武装积极参战，军事部长一职，必须富有军事技能与指挥能力的才能担负这一重要工作。人民委员会特决定各级地方政府军事部长一职，改变从前的选任办法，由各军区指挥部瑞金卫戍司令部直接委任，现在各县区军事部长由军区卫戍司令部分别鉴定加以委任或改派，特此令知，希各遵照。此令

各级苏维埃政府
各军区指挥部
瑞金卫戍司令部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

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号命令

（1932年10月13日）

前瑞金卫戍司令员刘伯承已调赴□□工作，遗职委由选任红军学校校长叶剑英兼任。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

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役计划

（1932年10月14日）

第一　情况判断

照一般说来，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反动统治阶级，在进行对全国苏区的四次“围剿”，是利用各苏区联系不易，配合差欠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我们看敌人逐次对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等转移攻势，虽未能如其所愿，然而他上述的计划，实已显明。敌人对鄂豫皖进攻的部署，是于某些方面扼守支点，某些方面使用并列的几个强大的挺进纵队，深入苏区，寻找我主力求战，再以其政治工作的兵团，逐步推移。这一部署是敌人在每个苏区屡遭红军各个击破和消灭的结果。在目前敌人迅速布置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时转用到中央区是极有可能的，并且现在已开始要调动部队增援江西。可是，对中央区的这一部署未完成之前，各方大半都是扼守支点，以小部进扰苏区，阻我主力出击，企图以包围的阵势配合经济封锁，遂行其合围并进的“围剿”计划。

第二　战役纲领

本方面军为要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策应地作战，乘敌上述部

署未完成的时候，击破敌人一方和联系东北红军起见，拟出敌不意迅速而同时地消灭建宁、泰宁、黎川的敌人而占领其地域。占领泰宁的兵团，并于占领泰宁时即刻拨出一个相当的兵团，直趋口武，沟通崇安红军。诸兵团任务完毕即归还建制，其余各兵团在达到以上这些任务后，应赤化所在地域及征集红军所需的资材以利于以后的战役，但须集结主力，常作战斗准备，和集中姿势。

遂行上述任务时，敌人如从南城南丰方面（甚或伸到广昌）并列向黎川进攻，则我军向建宁集中而攻击其右侧翼：敌人如从北向南并列进攻苏区时，则我军也向建宁集中与之决战于广石宁中间的地域。

其他沿苏区边境之作战的军队，都应向敌人后方，特别是沿其交通干路的后方，普遍发展游击动作，动员广大的工农群众，瓦解敌人军队，来减弱和消灭敌人进攻苏区的能力，这些军队的干队，须集结游击于敌人的交通干路。

第三　诸兵团前进开始的地位

1. 第一军团——头陂
2. 第三军团——广昌
3. 第五军团——甘竹
4. 第二十二军——巴口桥
5. 总司令部——广昌

第四　纵队区分及其应取的道路

1. 第二十二军为右纵队，应具有消灭梅口铺、泰宁敌人，并出

一部兵力直趋□武，沟通崇安红军之目的，取道尖锋、贵坊、均口、梅口铺向泰宁前进。

2. 第一军团为中央纵队，应具有消灭建宁、里心敌人并派一部兵力到康口向南丰掩护建宁之目的，应一经广昌、水南、里心向建宁，一经白水、尖锋、贵坊、黄泥铺、双溪口向建宁前进。

3. 第三军团为左纵队，应具有消灭黎川敌人之目的，取道千善、康都、西城桥、横村向黎川前进。

4. 第五军团为战役总预备队，应具有帮助一军团第二十二军消灭建宁、泰宁敌人之目的，取道千善、傅坊□、建宁、□挂下，须于十九日到达梅口铺以西地区，策应二十二军的行动。

5. 总司令部随第一军团取道水南里心道路进占建宁后，拟在建宁北之安仁。

第五 诸纵队前进的实施

诸兵纵队于十月十六日各从所在地开始前进，其并列前进之日，各地区如诸纵队向作战地域前进计划表：

本方面军诸纵队向作战地域并列前进计划表

日程 地点 部队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左纵队 中央纵队	下广昌 白水之线	西城桁洋客坊之线	黎川 建宁	黎川 建宁	就工作地区	同上
右纵队 中央纵队	客坊 广昌	均口 长桥	梅口铺 马鞍桥	泰宁 梅口	安仁	安仁

日程 地点 部队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千善市 宁家源	建宁				
附　记	中央纵队一路在广昌及其以东地区之线，一路在白水营前之线	中央纵队如发洋房子不够一部应进至洋以东				

第六　预定兵站线

兵站线暂时仍旧。不过由广昌延伸到建宁一段，应取道总司令部所经过的路线，以后应筹备下述的两条兵站线。

1. 安远市、石城、固厚、曲阳到后方办事处。
2. 安远市、宁化、沿岗圩、壬田到瑞金。

第七　赤化所在地域和征集资材应注意事项

1. 这一战役达到主要任务外，应以一部实行赤化所在地域和征集红军所需要之资材的工作，而主力应集结备战。

2. 各军团主力集结地域及其分布地域如标示要图第二。说明：一、一军团向康都、傅坊、发洋、贵坊、安远市地域派工作部

队，而以其主力集结于建宁附近。

二、三军团向黎川及黎川东北和西北地域派工作部队，而其主力集结于横村附近。

三、五军团向官仓、均口、猪树下地域派工作部队，其主力集结于梅口铺附近。

四、二十二军向泰宁东北及东南地域派工作部队，其主力集结于泰宁附近。

1. 各兵团除一般侦察外，应有计划地派出侦察，接触敌人以利适时集中。

2. 应有计划地繁殖游击队，并使健全起来，成为巩固当地苏区的主要条件。

3. 征集资材以不妨碍发展阶级斗争为主旨。

附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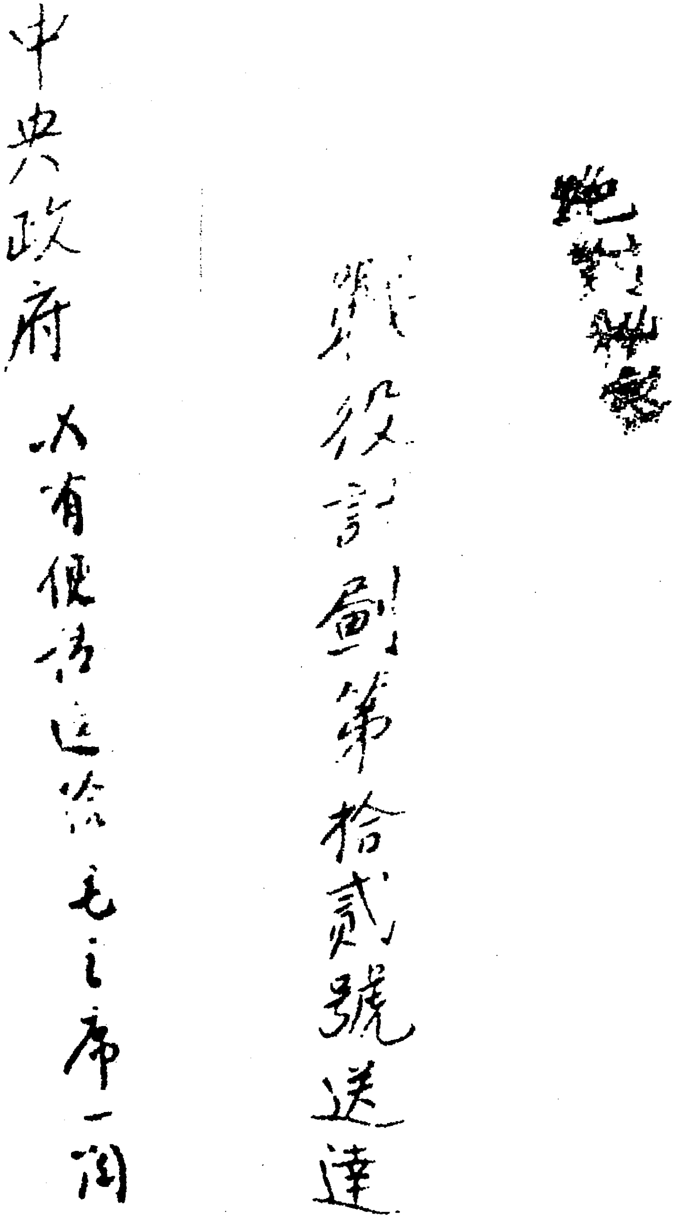
1. 各兵团须各就行动地带，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并应便道消灭路上的白军团匪。

2. 各兵团须注意对空防御，尤其是要隐秘我军企图。右战役计划第壹号送达。

一军团　林总指挥

聂总政委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毛泽东
代总政委　周恩来



絕對秘密

戰役計劃第拾貳號送達

中央政府　以有便請送給毛主席一閱

1932年10月，周恩来关于红军的战役计划送毛泽东阅的批示。

为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

（1932年10月21日）

因为革命发展，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胜利的开展，敌人正倾全力加紧布置对于中央区的大举进攻。中央政府除已下战争紧急动员令来领导全苏区工农群众去彻底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外，为更充分地保障这一次战争的完全胜利，充分准备战争的经济，特别是动员一切工农群众，更迅速完成这一准备，中央政府特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用费。各级政府接此训令，必须根据过去经验，马上讨论推销计划，限期执行。兹将发行具体办法列下：

一、债款分配数目：

（一）商家共十五万。

汀州市——七万。宁化——五千。瑞金——二万。会昌——八千。筠门岭——一万八千。广昌——六千。宁都——五千。兴国——八千。于都——三千。石城——三千。安远——二千。寻乌——二千。

（二）各县共九十八万六千。

福建：长汀——六万。上杭——六万。龙岩——二万。永定——一万五千。新泉——一万五千。宁化——一万。汀州市——四千。武平——一千。

江西：瑞金——十二万。兴国——十二万。宁都——八万。会昌——六万四千。赣县——六万。胜利——六万。公略——五万。于都——五万。广昌——四万。石城——四万。永丰——三万。安远——一万五千。寻乌——一万五千。乐安——一万。宜黄——五千。信丰——二千。万泰——四万。

（三）红军共六万。

前方——四万。后方办事处——一万。红军学校——二千。赣军区——五千。闽军区——三千。

（四）党政团体共四千。

全总执行局——二千七百。少先队总队部——五百。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四百。列宁师范——三百。中央局——一百。

二、发行和收款日期：

第一期共三十万六千。

十月二十六日由中央送出。

十一月一日各地发行。

十一月十五日收清。

龙岩二万。永定一万五千。武平一千。乐安一万。宜黄五千。广昌四万六千。宁都八万五千。安远一万七千。寻乌一万七千。会昌、筠门岭共九万。

第二期共三十六万。

十月三十日送出。

十一月一日发行。

十一月十五日收清。

瑞金十四万。于都五万三千。汀州市七万四千。宁化一万五千。上杭六万。新泉一万五千。闽军区三千。

第三期共三十一万。

十一月五日送出。

十一月十二日发行。

十一月底收清。

兴国十二万八千。赣县六万。公略五万。万泰四万。永丰三万。信丰二千。

第四期共十八万四〈五〉千。

十一月八日送出。

十一月十二日发行。

十一月底收清。

长汀六万。石城四万一千。胜利六万。后方办事处一万。赣军区五千。红军学校五千。党政团体四千。

第五期四万。

十一月十二日送出。

十一月二十日发行。

十二月一日收清。

前方红军四万。

三、集中款项地点：

（一）福建各市县及军区集中国家银行福建分行。

（二）江西瑞金、石城、会昌、寻乌、安远、于都、胜利、宁都、广昌、江西军区、党政团体，直接解交中央国家银行。

（三）江西之兴国、赣县、公略、永丰、宜黄、万泰、乐安、信丰集中江西省苏。

（四）前方红军集中总经理部。

四、动员群众办法：

（一）用宣传鼓动的方法，鼓动工农群众自动购买，切不能用命令强迫，但对于富农大中商人可以事前派定，责令购买。

（二）由区市乡召集乡代表会议作报告讨论。推销和鼓励群众的办法，由城乡政府和代表召集选民大会，报告政府发行公债券的意义与公民的义务，特别要从政治上参加革命战争上来鼓动，使群众自动地购买。

（三）用革命竞赛方法，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村与村，团体与团体比赛，谁购买得多，缴款得快，谁就胜利，由上一级政府给奖旗和名誉奖。

（四）各村各市由代表及城乡政府负责将款转解上级。

（五）各级政府根据以上各项来决定本身执行的具体办法（即分配方法、鼓动方法、收款方法等）。总之，决定公债的发行，能按以上规定实际做到，最主要的是靠我们动员与鼓动群众工作如何来决定，谁能积极去动员群众，谁就能够达到任务，必须严厉纠正过去不发动群众，专靠命令的错误工作方式。

第二期公债之发行，完全是为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战争需要，现值秋收之后，工农劳动群众以及居民在经济上都更活动，尤其在第一期公债发行之后，公债票之信用，更容易取得群众之拥护，各级政府必须根据过去经验，尽量去鼓动群众，坚决纠正过去不经过宣传鼓动而命令指派的错误行为，无论如何各处必须按期销售，如限缴款，以完成战争任务，如再发现如过去之敷衍怠工者就给以革命纪律的处罚。切切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
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

（1932年10月31日）

福建省苏主席团：

中央听了邓发同志关于出席你省主席团会议的经过的报告以后，认为你们自扩大会以来，在领导方式与实际工作的转变上，仍然存留着过去形式主义的错误。仍然没有抓紧目前的政治形势，以战争动员为中心，来布置一切工作，来具体指示和推动下级政府的工作。因此在执行扩大会的决议案上，在实际工作的转变上，仅仅只有很小的成绩，（只有上虞一县在工作上有转变）而且是非□微动的。这一现象实在是目前省苏最严重的问题。希望你们以最大的努力与决心，立即彻底改变这一方式，决不要只在口头上高喊转变，在决议案上大写转变，而在实际工作的执行上仍然继续原来的方式。假如不能在实际工作上有彻底的转变，对于苏维埃本身任务的执行和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积极动员的工作，实有极大的危害，你们务须以领导战争动员为一切工作中心。依照中央紧急动员令的指示，依照劳战委员会在各个战争紧急动员计划中所规定的一切工作百分之百地执行，抓紧每一项实际工作，规定具体办法，来指示和督促下级政府执行。这样来把各级政府的工作应引到实际上去，使各级政府能够更有力地担负目前的伟大的战斗任务，以保障

革命战争的全部胜利。

此次长汀各区军事部联席会议的决议上，决议在客坊刘源各成立一个警卫连以专任抗御团区和保卫该地政权的任务。这种办法只能增长保守观念的发展，而不能积极动员群众，以进攻的路线来发展和巩固苏区。这一工作应当是以模范营模范少先队来担任。

你们应当立即纠正他们这种办法，同时议决议案上谓于十月革命节前编好三个赤卫军，这一决定在充分动员群众工作上是可能的，但这一决定必须依据实践的可能为前提。否则决议成为空文，□□全省最严重现象是决议上写的漂亮事实做不到，成为决议是决议工作是工作。因此我们的意见，为了使工作切于实际，还是依照十五号训令首先成立一个模范师，一师□是必须很实际地去动员群众，于十月革命节前，实际编足，加紧训练，拟后随时调动，这是巩固汀东南向外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丝毫不容忽视。

你们在眼下更应以最大的力量去争取和建立连城的工作，须挑派大批干部至连城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把该地工农群众争取到苏维埃的旗帜下面，以巩固该地的政权。特别是汀东南的巩固，这是你们首先要以大力去进行的，这是实际粉碎敌人四次围攻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

关于你省执委扩大会的决议案，中央现尚没有接到各个决议的全文，故不能立即答复。俟将来接到全文后，当提交会议讨论审查，予以详细的指示。望你们□即将扩大会决议案全部寄来。

此致

战争动员的敬礼！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临时中央政府一周年纪念向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

（1932年11月7日）

全体选民同志们!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成立到今天已有一周年了。临时中央政府在一周年的时候，根据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之规定，将自己在这一年的工作和行政实施情形，向全体选民作简要的报告，并愿听受全体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过去的工作与以后行政方针之意见与提议。

我们在报告工作之前，首先讲一讲这一年来的政治情形与其发展，以后再报告中央政府在这情形之下采取的行政方针与实际的情形。

同志们，这一年来政治的事变和发展，无论在哪方面都是比去年更加锐利地向前发展。最主要的特点：

一、在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愈加兴盛巩固，资本主义世界愈加衰败，两个不同制度的对立，达到更加尖锐的地步。

二、世界革命日益高涨，各国无产阶级日益走到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有些帝国主义国家内建立了法西斯蒂专政，更增加了国家与国家间和阶级与阶级间的矛盾和冲突。

三、帝国主义战争，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性极端紧张。

中国因为世界形势的急剧发展，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积极，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事变的发展愈加剧烈，因此这一年当中：

一、苏维埃政权是继续胜利的开展，国民党政权是更加腐烂和崩溃，这两个政权对立的形势，确到了更尖锐的程度；

二、全国国民经济达到总崩溃的地步，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发生巨大的水灾、旱灾、瘟疫及日本帝国主义武装的屠杀，使无数的民众遭受空前的灾祸与牺牲；

三、全国革命危机日益增长和尖锐，反帝运动的高涨发展到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东三省义勇军已有五十万人，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之下，于一年中得着空前的新的开展，已成为全中国人民解放的旗帜；

四、各国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由秘密地帮助国民党军阀，进到公开地直接地武装镇压，日本占领东三省进攻上海，最近更积极地进攻热河，各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组织和指导国民党军阀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而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危险性日益加强起来；

五、国民党和军阀是更公开地投降帝国主义，除出卖东三省、签订出卖民族利益的上海协定外，正在继续出卖热河和整个中国，完全接受帝国主义的指示，集其全力对于苏维埃和红军作大规模的四次“围攻”，现要倾全力积极来对中央区大举进攻。

这一年来的政治形势，因为革命胜利的开展，阶级力量的对比大大转变了。就是说，革命力量日益增长和加强，反革命的势力日益削弱和崩溃。现在的形势，也是反革命与革命日渐走近决死斗的时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阶段。

中央政府在这些政治事变和发展中，用全力来开展和领导全国

民众去发展革命战争，开展苏维埃革命新的胜利与争取全国工农的解放。

在今年初，即确定冲破敌军“围剿”，来领导全国反日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方针。二月中，红军积极攻赣，占领上杭、武平、宁化，并于四月五日正式宣布对日作战，领导与组织全国民众以民族的革命战争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保障中国领土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真正独立与解放，同时，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就要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工具——国民党政权，并积极向外发展，以求能早日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前提，于是领导红军占领漳州、南靖，消灭张贞军阀军队。当国民党签订出卖上海的协定时，苏维埃中央政府公开代表民众宣言否认这一协定，并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

在这个时候，鄂豫皖红军占领黄安县城后，在豫东南占领璜川；在皖西占领六安、霍山；湘鄂西红军占领鄂中各地，苏区大大扩大，在陕甘成立了新的苏区。帝国主义国民党因为苏维埃红军的胜利和发展，于是迅速签订所谓上海协定，以便集中全国反动势力，动员全国军阀军队八十师以上，来进攻全国苏维埃和红军，首先是对于湘鄂西和鄂豫皖的进攻。这时，中央政府是领导全国民众和红军积极进攻，实行全线出击，来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攻”。全国苏区和红军，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在鄂豫皖边境获得十次空前胜利，湘鄂西击退了川军，赣东北、湘鄂赣、鄂赣等红军都得到胜利。中央区的红军由漳州回师击溃素称顽强的广东军阀军队十七八团之众，给进攻苏区的广东敌人严重的创伤，使国民党在全线都遭受严重的打击，全国红军共消灭白军十余师，击溃的约二十个师，得枪支约五万余，其他军用品无数，真是空前的大胜

利。后中央区红军北上占领宜乐，三次进攻抚州，震动南昌。因为红军在北面大的胜利开展，国民党为挽救其死亡，拼命挣扎，目前倾其全力正在积极布置对于中央区大举进攻，以及进攻中央区的两翼——赣东北和湘鄂赣。

同志们！由于革命胜利发展的结果，反革命为挽救自己垂死的统治，也是一次大一次地集其力量来进攻革命。

同志们！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重要关头。

临时中央政府，目前是坚决地领导全国民众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对于全国苏区和红军已下了紧急动员令，动员全苏区民众全体红军战士更以坚决的进攻方针，首先击溃敌人一方面，积极发展四周的苏区，争取四周广大工农群众，猛烈扩大红军，扩大和加强工农群众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现存的苏区准备充分的经济和粮食，动员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经济和饷粮，以胜利的进攻来消灭更多的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这是我们当前紧急任务，是我们全体民众为了自身解放而应当努力奋斗的！

现在再报告这一年来中央政府对一切法令的实施。这些法令的实施与颁布，都是为实际保障人民的利益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甲）彻底执行土地法，并检查各地已分配土地，并严格督促和指导各级政府执行，直接地由中央派人几次到各地去实际检查，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属于贫农中农雇农等来享受，不致为富农所夺取。的确，在大多数的地方，没收了豪绅地主土地，没收了富农的土地而给了他们一份坏田，使贫农中农雇农得到实际利益；还有些地方，因为政府组织不健全，还没有迅速地彻底地将土地法令全部

实现，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乙）劳动法的实施，首先要讲的，有些地方政府对于这一法令的执行是表现出许多怠工的地方。中央政府曾经坚决地与这些倾向作了不少的斗争。检查制度虽然建立，但工作不大实际和深入。现在在城市中相当地实现劳动法一部分——八小时工作制、劳动合同等——但还有许多未能实现，特别是在乡村中对于劳动法未具体地来实施。这些对于保障工人利益上是有损失的，我们应当公开承认，这是一个错误，必须立即纠正的。

（丙）经济政策的实施，在这一年是有相当成绩的。首先是商业恢复广使民众日用品的供给，在敌人封锁之下，还能够继续发展生产，颁布了工业商业投资条件，但苏维埃生产品输出方面，比较输入上还是差些，主要是因敌人封锁与有些资本家逃跑。不过各级政府，在执行经济政策中，又发生了另一种错误，即是有些地方对资本家过于退让而妨害工人群众的利益。

另外是成立国家银行发行纸票与辅币，建立统一货币，调剂金融的基础，同时颁布了临时借贷条例，以便利人民的临时周转。

颁布税则，彻底废除国民党军阀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将税的重担加在富农资本家和富裕者的身上；对于红军、工人、雇农、苦力实行免税，贫苦民众免税或减税。

（丁）优待红军条例的实行。中央政府并规定实行优待条例的具体办法，在绝大多数地方已经留外籍红军的公田，并领导群众组织了耕田队，帮助红军家属耕田，邮局已实行对于红军家信免费，并颁布了红军抚恤条例，组织抚恤委员会。同时为了鼓励并优待工农群众及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与领导战争，又颁布了赤卫军与政府工作人员为战争死伤的抚恤条例，但在检查中发现了有些地方政府没有

彻底执行，尤其是不能够很好地领导群众来实行对红军家属的帮助，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甚至有些地方（如福建长汀）政府人员不执行红军优待条例，反擅自要群众来优待自己，这完全是反法令的行为。中央政府除严办怠工和违反法令的分子外，并号召全体民众来反对自私自利的分子，并严防和监督各地方政府坚决执行。

（戊）建立肃反的正确路线与司法秩序。这一年来是有大的成绩，纠正了过去不分阶级和首要次要的错误，绝对废止了肉刑，建立国家保卫局各级组织与肃反工作，中央设立了临时最高法庭与各级裁判部以及处决和办理反革命案的各种原则。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又发现放弃和宽恕反革命的事情。后来中央虽严厉纠正，可是这种错误，在各级政府中或多或少还有。现当敌人大举围攻时，反革命的活动得以乘机起来，尤其是国民党团结一切反动分子来进攻，肃反问题更成为我们保障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全体选民同志要一致来帮助政府彻底消灭反革命一切派别——AB团、社会民主党、托陈取消派、第三党、改组派等和其活动，消灭一切反革命利用封建的迷信的组织与活动——如大刀会、一心会、红枪会等。

（己）中央政府为了保障妇女的权利，首先颁布婚姻条例，彻底消灭过去封建的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并保障妇女在离婚结婚中的一切权利。在这法令执行中，有个别工作人员完全违反这一法令，同时，还有许多工农同志，因不了解实行婚姻自由是彻底消灭封建残余，保护妇女权利，而发生许多纠纷。中央政府为了保护妇女权利，严厉打击一般违反婚姻条例的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个别负责人员，但希望全体民众必须了解过去老公打老婆、买卖婚姻、虐待童养媳都是封建制度的表现。我们的革命为要彻底消灭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成功，所以大家要努力来拥护这一法令的

执行。中央为实际进行保护妇女权利，已颁布和组织了各级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专负责做这一工作。

（庚）为了巩固和加强革命战斗的主力——工农红军，树立政治委员制度，颁布政治工作条例，设立大规模的红军学校，已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提高了红军军事政治技术。进行扩大红军工作，过去各级政府没有将这一工作作为自己主要工作之一，没有运用政治的广义动员方法来动员工农群众踊跃地自动加入，反而采取了强迫命令方法，特别有些地方政府机械地执行动员条例，这些实际上阻碍了扩大红军工作。中央政府最近正在严厉纠正这些错误，目前扩大红军是保证战争全部胜利的最主要的一个基本条件，尤其是为了更多地消灭进攻的敌人，就更要努力扩大红军。

同志们！为了争取战争全部胜利，大家就要踊跃地加入红军。

中央政府为要吸引全体工农群众参加武装组织，特颁布赤卫军组织原则与训练方法及其任务，已成立了几十万有武装的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只有全体民众武装起来，造成了最伟大的武装力量，才能彻底消灭任何敌人。

（辛）根据经济政策，规定了财政制度与方针，正式颁布财政条例；实行财政统一，严厉消灭过去财政上各自为政的现象，确定会计年度，实行预算决算制度。这一工作，在中央区有些县已得到成绩，有些县还未实行，特别是对贪污浪费的惩戒，有些政府机关还不能坚决地执行。最大的成绩，是纠正了过去专靠打土豪的财政政策，现在已整理税收，树立财政基础，这特别是改善和加强了对于红军的供给，因此，大大地减少了红军筹款的负担，使红军更能以全力来发展与进行革命战争。

财政上最主要的用途，在敌人不断进攻的时期，当然不能不用

在发展战斗方面，并为充实革命战斗的经费，曾发行第一次革命战争公债六十万，在广大民众拥护之下，很迅速地发完，这的确对于发展战争给了莫大的帮助。最近又为彻底地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又发行了第二次公债，同志们！踊跃继续买公债，就是积极参加战争的工作。

（壬）对于教育制度的建立，规定小学校制度，开办各乡小学校，并积极进行小学校教员的培养，设立列宁师范，这一切都有相当的成绩，但对于成年教育和识字运动，还未能集中大的力量来进行，还未普遍地发展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癸）关于交通建立与整理：颁布修理桥梁道路之规定，并督促各级政府执行，获有相当的成绩，特别是利于军事运输。同时统一苏区的邮政，建立统一邮政制度，这是于军事上和民众使用上有很大的便利。

此外，为发展苏区经济，拥护民众利益，颁布了合作社条例，帮助和领导各地合作社运动。同时领导了今年春耕运动，增加农村生产，领导各级政府来帮助秋收春耕中耕牛种子农具等问题。规定每年春季举行大规模的植树运动。为了保障民众的健康，颁发了防疫条例，并发动各地防疫运动。对于去年三次战争中被敌人摧残的地方，中央曾拨了一部款项来救济当地群众，同时领导了红军和各级政府募捐经费和收集物品等救济运动。

同志们！这是中央政府在这一年中行政设施的大概情形。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有些工作不能全部实施，许多工作不深入。我们希望全体选民同志，对于过去行政上的缺点，多加以批评和提议；对以后要踊跃参加一切政府行政工作，监督和帮助各级政府全部实施一切政纲和法令。

中央政府在这一年中对于苏维埃建设是用了很大的努力和注意。

（子）颁布行政区域划分的条例，以便利于目前斗争的领导。

（丑）建立城乡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树立了工农苏维埃的下层基础。

（寅）根据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则，规定苏维埃选举原则和其办法，纠正了过去不分阶级的错误的选举办法。

（卯）规定了地方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

（辰）为了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规定苏维埃组织与任务的基本原则，当中央政府成立不久，即宣布地方各级苏维埃重新自下而上进行选举和改选。在这一选举运动中，更加动员了工农群众参加苏维埃选举，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城乡代表会议和各级政府工作，驱逐在苏维埃政府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怠工腐化分子出去，但因各级政府动员不充分，还未能达到满意的成功，最近更宣布继续改造地方政府，特别是以领导战争与设施政纲来进行改选。

（巳）建立巡视制度与检查工作制度，来实行检查地方苏维埃工作，但在实际上，到现在尚未很好地建立起来。

（午）为了监督和防止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官僚化，加强工农检查工作，设立各级控告局，规定定期检查工作，但因为经济不够，因此，还不能有满意的实际效力。

（未）建立城市民警局，进行户口调查，不过只有几个城市工作进行得较好一点，大多数城市还没有建立工作。

（申）颁布和进行劳动感化院的组织。

（酉）颁布各部组织与工作纲要，建立各部行政系统与工作。

（戌）开办苏维埃工作人员训练班，培养苏维埃的干部。

（亥）中央政府各部工作，因为组织还未十分健全，还不能更充

分去进行各部工作及各级的行政系统与工作实施。

现在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虽然有许多进步，但是缺点和不健全的地方还很多，当目前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中，必须建立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来领导民众来扩展斗争，去粉碎敌人的进攻，这就要全体选民同志们，积极参加苏维埃改造，健全苏维埃组织与工作。

最后讲到中央政府对于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指导与关系。

因为目前全国各苏区还未打成一片，交通的困难和白区的阻隔，这是增加中央政府对于全国苏区指导工作的困难条件，因此中央政府直属地只有江西、福建两省和瑞金直属县，其他如湘赣、湘鄂赣，虽然接近，常因交通阻碍，有时不能通信，鄂皖豫，湘鄂西，赣东北，广东琼崖、东江，广西左右江，距离很远，往往不能直接交通，除了在政治上的领导外，对于工作的指导是困难的。中央正在努力领导全国苏区积极向外发展，以便最终能造成统一的自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全国苏区打成一片。

中央政府对于江西福建和瑞金，是经常地来指导和督促他们的工作，但还感觉不充分，还需要大的努力，以便更加改善他们的工作。

选民同志们！苏维埃中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这一年中行政方针与实施，主要的是扩展革命战争，开展苏维埃更大的胜利来保障已得的胜利，以求最后能取得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因此一切工作是以革命战争为主体，同时在工作上的缺点与弱点，也就表现在还不能适应革命的发展和需要。这些缺点与弱点都希望全体选民加以详细地检查，充分地帮助苏维埃政府，迅速地将他们克服，这即是使苏维埃政府来有力地完成自己在历史上的伟大任务。

同志们！这一年来革命有了大大的发展，革命的力量大大地增长了，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在全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红军得到了空前的胜利，因此反革命对革命的进攻亦就大大地增加，阶级斗争达到了更加剧烈的阶段。

全体选民同志们！反革命眼见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扩展而倾其全力来镇压革命和抵抗革命。军阀豪绅地主每天在企图夺回土地，继续收租，资本家天天想减低工资，加长工作时间，来恢复他们对于广大民众的剥削。国民党军阀用全力来进攻苏维埃与红军，是因为苏维埃是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权，红军是真正中国人民的武装。国民党军阀却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走狗，是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寄生虫。

同志们！帝国主义国民党，是我们民族的和阶级的死敌，不打倒帝国主义，不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就不能保障已得的自由，就不能保障已得的土地革命胜利，就不能取得全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同志们！用革命战争的手段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将国民党葬送到坟墓中去，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取得中国完全独立自主的权利。

全体选民同志们！中央政府已下战争的紧急动员令了。红军已在前方进攻敌人，击破敌人一方，并占领了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个城了，大家一致动员起来！

踊跃当红军去，加强红军的力量来消灭敌人！

全体男女工农同志加入赤卫队、少先队，武装起来去进攻敌人！

积极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加强革命战斗力量！

积极进攻敌人，不让敌人扰乱到苏区里来！

踊跃买公债，快完土地税，蓄藏粮食，充实战争的经济。

迅速毁灭一切城墙和以前敌人修的工事！

积极进行肃反工作，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活动。

加紧赤色戒严，不让敌人一个侦探混到苏区里来。

同志们！当我们纪念中央政府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正是战争紧张的时候，我们用战争的胜利来纪念我们光荣的十月革命节，拥护苏维埃政府。

选民同志们！现在革命形势，是有利于我们革命的发展，我们苏区扩大了！工农红军加强了！工农群众人数加多了！敌人力量削弱了！我们有争取更大胜利的条件，我们“一切帮助给与战争，抛弃一切的动摇，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当然这次我们是胜利的”。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

（1932年11月7日）

当本政府去年十一月七日诞生的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各帝国主义赞助之下，以武力强占东三省，屠杀东北民众，来实际进行瓜分中国，直接以武力干涉中国革命。这一年来，帝国主义更是积极地在其进攻苏联，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的共同政策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之后，制造傀儡“满洲国”，造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企图截断世界上两大苏维埃共和国——苏联与中华苏维埃的联系，炮击上海南京，近更积极进攻热河，英之指示藏兵侵扰川康，法之侵略云桂，美之在华积极活动，帝国主义强盗联盟的国际调查团最近发表的报告书，更加一层地保障日本在东三省的统治，公开提出国际共管东三省与全中国，特别是组织与指挥国民党军阀进攻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达到完全实现奴役几万万中华民族的工农劳苦民众的政策。担任实施帝国主义政策的清道夫——中国国民党军阀政府，除顺从帝国主义的指令，将东三省及上海捧手奉送与帝国主义，现在更继续出卖整个中国，竭力镇压全国反日运动，阻碍和压迫义勇军的发展和行动，更在帝国主义的指令与直接帮助之下，对全中国已经脱离帝国主义统治，并正在领导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苏维埃区域与工农红军，举行大规模的四次围攻。本

政府于四月正式宣布对日战争，并指出要真正实行民族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和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本政府曾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直接武装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号召东北义勇军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同时实行土地革命，这样才能使反日的民族战争，有力地有保障地向前胜利开展。一年来，本政府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艰苦奋斗，为执行这一任务而战斗。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一年来的对立形势，达到极尖锐的地步，苏维埃疆土日益扩大和巩固，并在北方建立了新的苏区。苏维埃疆土内，工农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法令保障下，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农民获得土地，废除了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一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水平，均有了极大的改进与提高，与国民党统治下被沉没于灾祸重生、备受剥削与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之生活，不啻有天壤之别。这更显示着工农政权的伟大创造力量，粉碎了国民党各派、托陈取消派、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及第三党等所有一切反革命派别，诬蔑苏维埃和红军的谰言，和“国民会议”一类的反革命的理论和欺骗行为。苏维埃政权日益胜利与开展，这不仅是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且是直接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因此帝国主义实行直接以武力来干涉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同时组织和指挥国民党军阀来进攻苏维埃和红军。而国民党军阀更集中一切反动社会力量，调动全国军阀军队八十师以上，向全国各苏区进攻。全国苏区工农群众和红军，在本政府领导之下，各个战线上都继续消灭了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使国民党军阀在各个战线上遭受严重惨败。尤其是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之

后，国民党为取得帝国主义国际联盟更大的宠爱和尽其清道夫的最后责任，正倾其全力，积极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帝国主义国民党集中全力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正因为苏维埃革命运动是中国几万万工农劳苦群众的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革命运动。本政府正动员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实行坚决进攻，以胜利的进攻来完全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攻，根本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扩大与发展民族革命战争，驱逐和推翻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用以镇压中国革命，奴役中国的军队和统治。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郑重宣言：否认国民党政府出卖上海东三省与日帝国主义所订立的一切密约，根本否认日帝国主义御用以奴役东三省工农劳苦群众的傀儡政府之存在，同时，根本反对国联调查团及其奴役东三省和全中国的报告书及实现这一政策的国际联盟。更在此特为郑重声明：以后一切国联的决定和国民党与日帝国主义所订定的一切条约，均不发生任何效用，本政府特在此号召全国苏维埃区域每个红色战士和工农劳苦群众，用民族革命战争来粉碎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一切条约；准备和组织着自己的力量，随时同帝国主义军队直接作战；并领导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和红军武装保卫中国革命的朋友——苏联；并建立中国劳苦群众与苏联的社会联盟。我们特号召和鼓励东三省的义勇军，完全站在苏维埃旗帜之下，进入土地革命；动员更宽广的工农劳苦群众，扩大与发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战争；建立起满洲苏维埃政权。我们更号召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旗帜之下，更猛烈地斗争起来，配合工农红军和东三省的义勇军，驱逐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武装；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中国革命的四次大“围攻”；直接推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统治，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

（1932年11月12日）

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正在胜利地进展着，医院与兵站工作的整理与健全，对于革命战争有极密切的联系，人民委员会特决定：

一、每个医院所在地的少先队，男队员应担任招护兵的工作，女队员应担任医院洗衣的工作，各医院附近的少队部应准备随时调遣队员在医院工作。

二、凡距离医院较远之各地少队部，亦应准备随时调遣队员在各处医院担任招护与洗衣的工作。

三、各处医院所需之伙夫，经由当地赤卫军负责供给。

四、各兵站之运输与担架，均由兵站沿线之赤卫军负全部责任，轮流输送。

五、凡担任医院与兵站工作之赤卫军少先队由各该上级机关酌量减少或免除其他各种勤务。

以上各项，希各遵照执行，勿误。此令！

各级苏维埃政府
各红军部队
各军区指挥部
瑞汀卫戍司令部

少先队总队部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征发富农组织劳役队

（1932年11月25日）

现值革命战争紧张时期，勤务繁多。为了减轻工农群众对于战争勤务的担负，特决定征发富农组织劳役队，在赤卫军的监视之下，来担任苏区内的各项劳役——如拆毁城工事修路及内地的运输等，这种劳役队是带强迫性质征发富农来充当的，一切待遇也与普通的运输队不同，其办法：

一、各地方政府须将富农能劳动的，一律编入劳役队，工作时派赤卫军监督他们（每五个劳役者要派一个赤卫军去监督），现在立即派他们去拆毁城墙土围子，把过去敌人在苏区内所筑的工事毁去，把道路桥梁修好。在苏区内地各兵站沿线的运输，一部分笨重东西的挑运，也要派他们担任。

二、劳役队的给养，均须自带伙食，但如担任运输工作，路程超出两日以上者，政府可供给饭食，要他们自带菜钱。

望各地政府即日依照上项决定，切实执行为要。此令

各级苏维埃政府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为多种杂粮禁种毒品事[1]

（1932年11月25日）

目前我们为了革命战争继续胜利的进攻与长期的战斗，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有充分的准备，粮食一项，尤为重要，不独关系红军的给养，且直接影响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临时中央政府为充实粮食的来源，使苏区广大工农群众与红军，不致感受任何粮食的困难起见，特决定如下：

一、多种杂粮菜蔬。现在正是种杂粮的时候，各地工农群众，应当尽量地种杂粮菜蔬，以补充谷米的不足。

二、禁种鸦片。鸦片是最有害的毒物，是豪绅地主用来麻醉工农的工具，我们苏区内，应当绝对禁止，同时，种了鸦片，既妨碍种杂粮，且妨碍明年的春耕，即是减少了粮食的来源，妨害了革命战争，所以我们全苏区内，今年绝对不准再种鸦片，要改种杂粮。

以上的决定，完全是为了革命战争的利益，为了工农群众的利益，不论何人，均应严格遵行。最近闻有富农，从中破坏，故意煽动群众种烟，以减少苏区粮食的生产，造成工农群众的毒害，实系有意破坏革命，为苏区所绝不容许。各地政府各革命团体以及各工农群众，对于这种煽动群众种鸦片，有意破坏革命的富农，应当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十三号）。

密侦查，予以严厉之处罚，特此凯切晓告，望各级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各工农群众，一体周知，切实遵行，是要。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战争动员和工作方式

（1932年11月29日）

最近检查各地执行紧急动员令的成绩，非常令人不满，除劳战会给各地的一封信中，已一一指出外，人民委员会更严重指出，形成这一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政治上认识的错误：

（一）一般的是忽视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和反映群众中最落后的太平苟安的意识，以为敌人还未来，依然照旧工作，当然就不能去执行紧急的任务。

（二）在边区的地方，受敌人的侵扰，又走到惊慌失措，这是没有认识目前有利于革命的形势，缺乏对于革命的自信心，失败的情绪，阻碍了动员工作的执行。

（三）对于进攻策略的认识错误，以为这单是红军的任务，而自己坐望红军胜利，在边区更表现依赖红军，而自己不积极向外进攻敌人，这种等待观念，就不能从各方面积极去进行进攻策略，必然放弃了一切紧急动员工作。

人民委员会，号召各级政府和地方的军事领导机关，坚决地同这些政治的错误作无情斗争，反对对于敌人大举进攻的忽视，尤其是太平苟安以为敌人还未来的落后意识；坚决反对那种对敌人进攻的惊慌失措和等待保守的观念，这些是最危害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紧急动员工作的进行。

人民委员会，严重唤起各级政府和地方军事领导机关，深刻地来认识目前敌人之积极筑建汽车路，组织兵站运输，组织与扩充地主武装，在苏区四周发展反共团，铲共义勇军，搜刮大批军费，增调大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加紧进攻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苏区。这是表现敌人更周密在布置对于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和准备长期挣扎，必须深刻地认识这次粉碎敌人大举进攻，是长期的最艰苦的残酷斗争，是阶级决斗的重要关节，我们必须以一切的力量去为争取这次战争胜利而奋斗。

同时要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虽在帝国主义直接帮助之下，武装力量是加大了，但在政治上和敌人的内部是比三次战争大大削弱了，在敌人进攻苏区的军队中充满了不满与动摇，尤其是全国革命的发展，同时苏维埃红军的扩大与加强，这都是有利于我们的条件，我们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去为战争的利益而牺牲，是能获得这次战争的全部胜利，实现江西首先胜利。

在检查动员工作中，发现另一种严重现象，即是不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上发动群众，完全采用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的脱离群众的工作方式，同时这种方式发展，是与上面的政治错误有密切关系的：

一、因为不认识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性，自然不能认识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重要，没有站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

二、各级领导机关，对于下级的官僚领导方式，只下一个命令，做一决议和计划发下去，对于一切执行的具体方法和动员群众各种方式，也不加以指示和检查，甚或简单地命令去做，或以处罚和威吓，这样更促成了下级强迫群众、命令群众的现象普遍发生；

三、表现散漫无组织的工作方式，不去运用选民大会、代表会议，及一切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加强动员群众的力量，必然走到强迫群众、命令群众；

四、由于官僚式的工作方式，必然不能很刻苦去进行群众动员，为图便利的，就以强迫、命令来代替。

这些现象，表现在紧急动员中，是很浓厚的。最显著的，对于中央的紧急动员令，没有召集选民大会，代表会议，赤卫军、少先队大会，各群众团体大会，作详细的报告和解释，充分进行政治鼓动工作，直到现在群众中，还有大多数不了解敌人的大举进攻，这自然使一切动员工作，都不能在群众积极性的基础上，充分地实现起来。如扩大红军，就不能完成规定计划，就不能使壮年的男女工农群众，踊跃地自愿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反而用处罚来强迫下操。特别是完纳土地税、发行公债，事前没有作充分的政治宣传，使每个工农分子，了解为什么缴纳土地税，购买公债。当征收和发行的时候，又不召集各种会议和运用城乡代表去鼓动群众，自愿缴土地税多买公债，群众发生疑问时，不去作详细的解释，反而用强迫富农资本家的方式，施之于工农群众，于是造成脱离群众的严重现象，事实上是增加征收土地税和发行公债的困难，更影响其他一切动员工作，这是何等的严重问题！

这种强迫命令的方式，不仅表现于紧急动员中，而且充满了苏维埃的各种工作中，助长这种工作作风的发展，由于各领导机关，在领导上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对于上级命令的接受和执行，不是照例地转发，就是原封保存，没有开会，按当地的情形详细讨论执行具体方法，来指导下级的工作。对于执行结果，从未加以检查，不问成绩如何，只求敷衍了事，执行的基础，完全建筑在简单的命

令上，任何时期，任何工作，都是照旧的工作，照例开会，这是十足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脱离群众，破坏苏维埃与群众的关系，对于苏维埃胜利和发展，有莫大危害，照例敷衍，强迫命令，是官僚主义的重要表现，这是苏维埃政府中绝对不允许存在的。这种官僚主义侵入苏维埃政府：

（一）由于中国半封建社会和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之传染。

（二）由于农民散漫性的笼罩，缺乏无产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

（三）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只图一时便宜，使官僚主义侵入到苏维埃机关，日益生长起来。

人民委员会，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和广大工农群众，一致地与官僚主义作最坚决斗争，来肃清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驱逐不可挽救的官僚腐化分子，以巩固工农苏维埃的政权，同时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这就必须要：

一、一切工作要建筑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谁抛弃动员群众工作，必然是脱离了群众。

二、法令与决议的实施，不单靠命令，主要还是依靠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与热情，来拥护法令的实施。

三、动员群众，要靠政治上充分地宣传鼓动工作。

四、动员群众的方式，要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以及一切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城乡代表会选民大会，是直接动员群众的工具，工会是动员群众的柱石。

五、每一个决定，要合于实际能够实行，反对一切空泛不具体的决定，及毫无准备和结果的照例开会。

六、执行命令要注意发动群众的方法，同时要注意群众中的意见，以作决定实行办法的参考。

七、接到上级的命令和决议，马上应该开会，作详细讨论，规定自己执行的具体方法。

八、在执行工作中，应该随时检查自己的工作，看做到了没有，有些什么错误和不妥的地方。

九、对于一切工作，要根据工作的关系来适当地分工，这不仅是每一部每一个工作同志应该如此，就对于下级指导，都要根据情形来分配工作。

十、对于下级的指导，要切实，要具体，多有办法的指示。

十一、不要随便发文件，多用巡视指导，巡视员不是走马看花，不是站在旁边批评，而是负责地检查工作，帮助下级来解决工作的困难。

十二、组织工作团，去直接帮助下级工作，工作团的责任，是将该处工作做好，不是空口批评人家，而自己不做，工作团的工作方式，是集中力量，先做好一个地方，然后再到第二个地方，应当要分工，每人担一种工作，到一处就要将一处工作做好。

十三、不要随便开会，开会要有准备，有结果，要实际去做。

十四、开群众会，事前要有充分准备，每一个政治鼓动，必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说话要简单明了，多带鼓动的作用。

苏维埃的工作作风，是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是具有艰苦斗争的坚忍性，一切脱离群众的办法，都是官僚主义的作风。

人民委员会，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紧急动员起来，反对一切

对于敌人大举进攻的错误认识和懈怠行为，肃清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去为创造苏维埃的工作作风，迅速地去完成紧急动员令的一切工作而奋斗。

各苏维埃机关——由省直到乡——接着这一决议，就马上开会，来检阅自己的工作，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来暴露一切工作中的错误，具体规定执行办法，并将讨论的结果向中央报告。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各级选举运动的检查

（1932年12月1日）

自中央于九月二十日宣布各级政府依照选举规定，分别实行改选各级政府以来，将近二个月，检查改选的结果：

一、没有一个县，依照十六号训令选举完毕的。

二、各级选举运动都是和平的，没有以斗争来发动群众参加选举。

三、将选举运动与目前战争的紧急任务分割起来，不是为了选举放弃一切战争动员工作，就是忙于战争动员工作，将改选运动停搁。（如万泰要发了公债再改选等。）

四、不按选举规定，没有经过选民选举，指派代表敷衍了事，甚至异己和自新分子，也举他充当代表。（如会昌县代表大会。）

五、省县两级，对于选举运动是表现敷衍和消极。

根据以上情形，这次选举运动太无成绩，充分表现各级政府，没有从政治上认识改选，和坚强地方苏维埃政府，是领导工农群众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一个重要基础，而且更露骨地暴露了各级苏维埃执行训令的官僚主义。

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坚强地方苏维埃政府，是造成这次领导工农群众，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有力杠杆。同时鉴于过去一二三期战争时，苏维埃机关暗藏有异己分子，而发生反水等严重事

件，因此，对于这次选举运动，决定举行严格的检查，凡是不合以下条例的，宣布无效，应重新改选。

一、没有发动广大选民起来开选民大会所选举的。

二、所选举的人，不是经过大多数选民同意和拥护的。（如最近许多地方，先将名单提出，甚至先由上级批准，然后再向选民大会提出，这是违反选民意识的包办形式。）

三、被选的人，不是工农群众中对革命最坚决而工作最积极的。（如开小差，和平日参加各种工作不积极的。）

对于重新选举和十六号训令所规定，应改选而未改选的要马上去进行，特别是将这次改选运动，成为动员群众，为了执行战争紧急动员，为了坚强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领导机关的广大运动，这就要在选举中执行以下工作。

一、城乡选举，应当进行群众中广大的政治动员工作，其内容：

甲、号召群众，为了彻底获得劳动法土地法的实现，大家就要积极来参加选举运动，建立真正能执行一切法令的有力量的政府。

乙、使工农群众了解苏维埃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如若选举不好的人去做工作，就不能替大家谋利益。

丙、选举权是工农的权利，有选举权的，能得到很多的权利，富农地主资本家是被剥夺了选举权，所以地主无田分富农分坏田，资本家无地位，大家不要放弃权利。

二、要从政治动员上，首先向各村各街的群众宣布，劳动工会、贫农团等，一切团体来开会讨论选举问题，使每个群众都知道本城本乡要改选，都了解选举的重要，到了期，大家都自动来选举。

三、要拿着检查选举权，发动群众对于隐瞒的富农和一切异己分子作斗争积级〈极〉参加选举。

四、在选举时，不仅依照选举细则所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应当以检查工作，特别是对于一切法令与工农群众利益保障的检查来发动群众批评过去代表和政府的工作，反对官僚主义，认真推选自己要举的代表。

五、要利用选举运动和选举大会来报告或讨论中央紧急动员令，去发动群众积极进行战争动员。

六、□□□□□□□□□□□□□□□□□□□□□□方面，引导群众认识敌人大举进攻，是为反对苏维埃和恢复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工农势力，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与敌人斗争决心，坚决为保障土地革命利益和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到底。

七、区县两级代表大会的进行，必须建立在城乡选举运动的成功基础上来进行，区县代表大会要消灭一切形式主义，应以检查过去工作，讨论执行战争紧急动员和一切法令为大会的内容，决议案不要长，要实际具体。

八、选举委员，不要随便推选，应当注意多选举工人、雇农、苦力，以及妇女、贫中农干部，同时，要纠正只形式上讲成分，并不注意在成分上再加考察工作能力和群众信仰。

九、区县选举后，对于其他一切工作人员，关于他的成分和平日工作，加以严格检查，异己和怠工分子，应当马上将他撤换。

中央责成省县政府，严格执行以上决议，并由各巡视员和工作团，应负责检查各地选举运动，应当将选举运动和坚强地方苏维埃，看成为执行紧急动员令之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

为纪念广州暴动
同时纪念宁都暴动周年纪念

（1932年12月2日）

在十二月十一日，是广州暴动的五周年纪念日，广州暴动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新阶段，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十四日是宁都暴动周年纪念，这一暴动是中国第一个伟大的士兵暴动。震撼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促进国民党军阀的崩溃，开展苏维埃新的胜利。因其与广暴日期相近，人民委员会特决定于十二月十一日，放假一天，于纪念广州暴动中，同时纪念宁都暴动周年纪念，举行盛大的纪念示威大会，加紧执行战争的动员，特别要在这一纪念中，以最大的力量，去建立白区与白军的工作，争取苏区四周的白军革命士兵，瓦解敌人大举进攻的军队，以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争取苏维埃在江西及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此令

各苏维埃政府

各红军部队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

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1]

（1932年12月20日）

甲、为了在这次战争[2]中，更多地消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起见，必须以最大努力去坚强地方武装的力量，充分发挥地方武装在战争中的作用，这是我们争取战争全部胜利的必要条件。

乙、为了击破敌人进攻的集团战略与所采取的十个战术，就需要地方武装强有力地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敌人的企图全部归于失败。同时，要使地方武装的组织和力量特别加强起来，能有力地便于执行任务。

丙、根据现有的地方武装组织完全是依照正式红军来编制的，这不仅因为地方武装的武器以白刃居多，而且军事干部缺乏，赤卫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张国焘发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密令。

[2] 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2月至3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采取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分别在黄陂、东陂地区两次伏击敌人，共歼敌近三个师，取得了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创造了红军历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军、少队[1]更是群众的武装，没有建立起正式军队生活，训练、给养都比红军感觉困难，并且在行动上是协助主力红军作战，所采用的战术主要的是游击战术，这就决定地方武装的组织要适合于这些条件来编制，主要的原则是短小精悍，便于行动的敏捷、突击有力。因此旧的编制太过庞大，不便于执行任务。

丁、在游击战术中主要的是袭击敌人，在战斗上是以白刃战为主。就我们地方武装的武器来说，那是最有利于我们采用这种战术和战斗的，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一种优越条件。但是最近脱离生产的武装，普遍的只要步枪，鄙视梭镖，这是不对的。固然加强火力是重要，但所有地方武装的步枪，绝大多数没有刺刀，因此在袭击敌人与实行白刃战斗时不仅减少解决战斗力量，有时反受敌人的白刃威胁而退，以至影响任务的执行。

戊、赤卫军、少队之武器，梭镖作主干，但各地编制时往往将少数步枪集中编到模范营、模范少队中之一部，不能够使火力与白刃配合，削弱赤卫军、少队特别是模范赤卫营和模范少队整个武装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

已、根据地方武装的特殊条件和任务，现决定地方武装新的编制原则如下：

一、独立团能照红军编制，但武器配置上以三分之二为火力，三分之一为白刃（梭镖），混合在排内。

二、游击队基本编制，采五班制，内分火力三班，白刃（梭镖）二班，不设排，直属于队部，加队副二人。挺进游击队仍照红军编制。

---

[1] 赤卫军，即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少队，指少年先锋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亦不脱离生产。

三、模范赤卫军和模范少队的编制以每连采三排六班制，以十一人为一班。三连模范赤卫连、一连模范少队为一营，每区一营，三营为一团（三区合编为团），每县三团到五团，编一师。

四、赤卫军采用三班一排，四排一连的编制，以三排为战斗排，一排系救护排（以壮年妇女来编制）。在作战时，战斗排在前面作战，救护排担任战时救护和后方勤务。四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三团为一师，三师到五师为一军。乡最少编一连，二乡或三乡编一营，一区成立一团，每三团成立一师，每县成立一军。

五、少先队因系青年群众半军事组织，仍照原定编制。

六、在游击队和模范营的班之下分为两组，每组设组长一人，在作战时可成为一个战斗群，便于进攻和退却。

七、模范赤卫军和模范少队的武器配置每班步枪三支，班长、组长各一支，队员系梭镖八支，连长、政委、排长步枪各一支，每连共步枪二十三支，梭镖共四十八支。

八、赤卫军、少先队武器配备如模范营同，但以鸟枪、土炮来代替步枪。但土炮可合编一排，直属于营部。

九、梭镖长度一律定为五尺二寸。每一赤卫军、少队都应备一种武器。

十、除一般编制外，如步枪仍多的时候，模范营每班可增加二支到四支，每连增加到三十五支至四十七支步枪。

十一、政治委员制度在这次改编时一律建立起来，赤卫军及模范少队，连设政委、指导员，营团师均设政委。如连单独担任任务，临时委任政委。一切指挥员、政委由军区、军分区、军事部和其政治部委任。

庚、限定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日内改编完毕。

辛、在改编时如游击队独立团在出击的时候，须等到回苏区后再改编，未出发的立即改编。

壬、模范营之改编，可按旧有的编制人数为基础来增减，不应采用混合改编，以免延迟时日。

癸、各种武器（如梭镖火药）须动员群众从速集齐，同时，改编好后一切训练要注意实际的战斗教育和演习，彻底废除过去一切形式的非战斗的教育和训练，完全实施劳战会[1]所规定的教育计划。

以上各项望各级政府、军区、军分区、军事部严格遵照执行。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

[1] 劳战会，指劳动与战争委员会。

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八号

（1932年12月27日）

现为统一财政，并随时明了全苏区财政现象，便利于整个财政计划和支配起见，财政人民委员部已决定于明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国库，实行□计划□，将一切财政收入一律交到国库分支库，由中央支配；这是建立统一财政的重要基础。各级机关各红军部队，及一切地方武装，必须深切了解统一财政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作用，自一月一日起要照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布的国库条例及会计规则办理。并规定以下几项：

一、各机关各部队一切开支一定要按照各个系统作预算向自己上级报告，未取得财政人民委员部支票，绝对不能向支库支款，或临时扯借，违者以破坏财政统一论处。

二、各地方游击队独立团及一切地方武装经费要办到自给，但地方武装所筹之款亦归还军事机关有计划分配。

三、如有些地方武装，因一时困难经费不能自给者，须作预算向军区报告支取，无论如何不能自由向支库支用。

四、各级财政部要更有计划地指示和督促下级机关，加紧一切财政收入，开发财政来源，不能因为开支可向上级领取，便放松对财政款项之收入，违者以怠工论处。

五、各级预算须按规定日期造报，一切开支须按上级批准各项

内的数目按数支用，非有特别理由另表报告经上级批准，未经批准自由超过预算者，则由其自认。

上述各项各机关各部队，必须切实遵照执行。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为严紧出境行人事

（1932年12月27日）

现值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紧张时期，对于从苏区出境的人，自应特别慎重，非经过严密审查，决不可随便放出苏区，以免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分子，得以自由出境，从事反革命活动。临时中央政府为了巩固苏区以保障工农群众的利益起见，特规定对于从苏区出境行人的办法如下：

（一）凡从苏区出境者，须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出境护照及政府的路条，方可放行；如只有护照而无路条，尤其是只有路条而无护照者，均不得放行。

（二）国家政治保卫局及省、县分局（区特派员无发护照之权）对于要求出境者，须经过严格之审查，认为确有出境之必要者，方可发给护照，并须于护照载明出境之路径。

（三）省县区政府（乡政府没有发给出境路条之权）对于特有政治保卫局之出境护照而要求出境路条者，可依照护照上规定之途径发给出境路条，否则不能发给，尤其是区政府打出境路条时，须详细考查，确系本区店〈居〉民或出境者的路程必须由本区经过，而不是故意从别区跑到本区来打路条的，才可发给。

以上各点务望各地政府，各级保卫局，各军事机关，各检查机关，切实照办，以加紧赤色戒严，是为致要。此令

各级苏维埃政府
各级国家政治保卫局
各军事机关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为提前春耕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事

（1932年12月28日）

革命战争已到了万分紧张的关头，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最大力量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挽救其垂死的统治，这一残酷的阶级战斗，正在剧烈地开展着。这次战争是敌人拼死的挣扎，较之一二三次战争，更为激烈与持久，我们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进攻，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用一切力量来与敌人作坚决持久的艰苦斗争。但现隔春耕之期不远，在春耕期内，当是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中央政府为了使广大工农群众，得以安全耕种，迅速完成春耕工作，毫无顾虑地集中全力去消灭进攻的敌人起见，决定全苏区境内，一律提前春耕，并设法尽量增加生产与工作速度，期于最短期内，使苏区粮食的收获，大大增加，以巩固红军的给养及改善工农群众的日常生活，造成革命战争彻底胜利的保障。所以这一决定，关系非常重大，各级政府，务须协同各群众团体——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以最大努力，动员全体群众，依照下列各项办法，切实施行：

一、在公历正月内，要把所有的土地，一概犁好，一切河坝修好。

二、播种栽秧，至少要比往年成例，提前一个月举行。

三、要每家立即充分准备肥料，选择最好的种子，这不仅可以大量增加生产，而且是便利于迅速地播种下秧。

四、各地群众要实行耕种互助，一切人工、种子、耕牛、用具都要彼此协助，以便迅速进行春耕工作。

五、红军公田及红军家属的田地，务须发动群众尽先耕种，不可荒芜寸土。

以上各项办法，各级政府，务须依据情形，拟定更具体办法，召集雇农工会、贫农团及选民大会作广大的宣传鼓动，并定出革命竞赛和奖励办法，谁乡谁人的土地先犁完，河坝先修好，肥料种子先准备好，先播种，先下秧，即由县区政府给以奖励，尤其是土地尚未彻底解决的地方，须立即分好，以免阻碍春耕。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七言诗·观梅小吟[1]

(1932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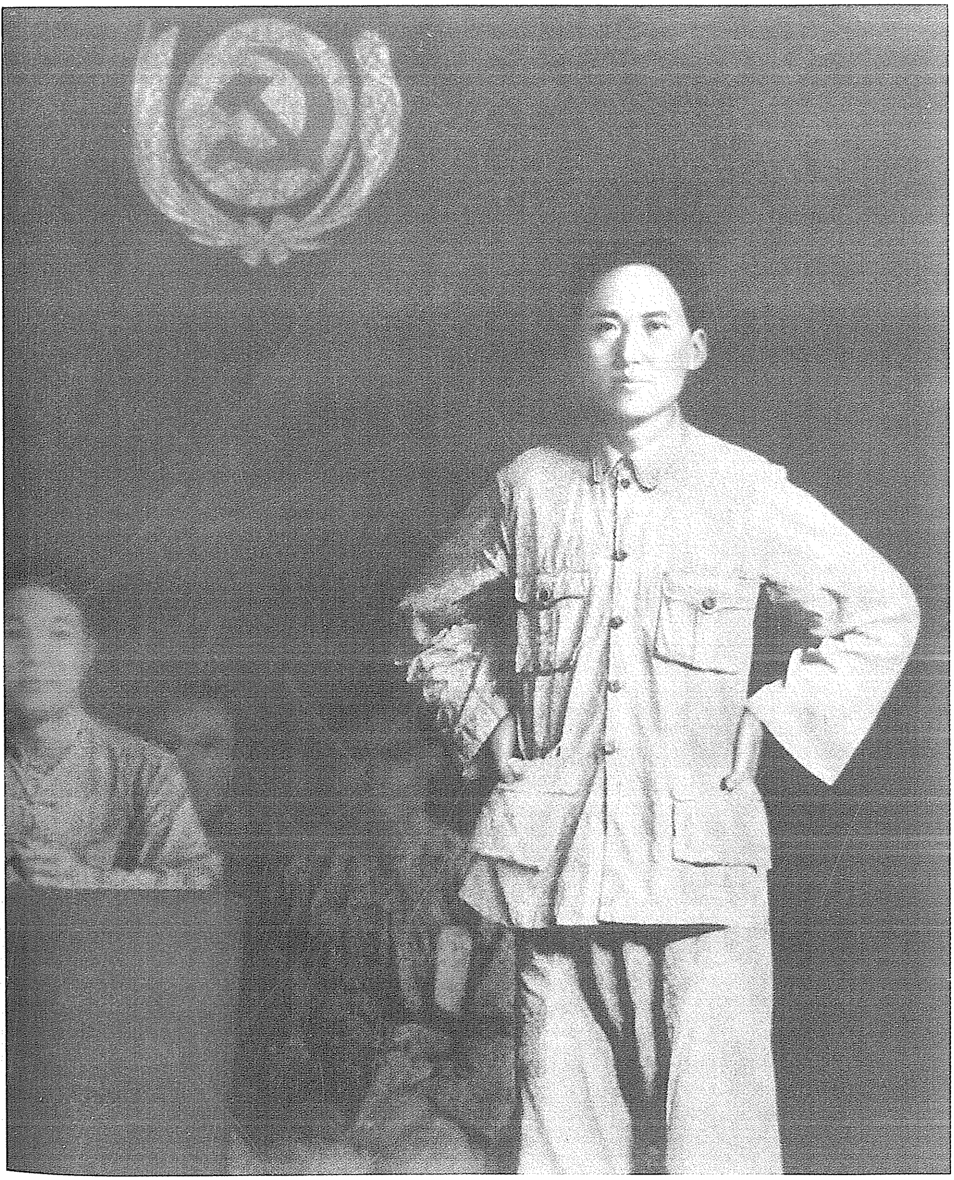
春心乐共花争发[2]，
与君一赏一陶然。

---

[1] 1932年12月，毛泽东来到福建汀州养病。这是他和贺子珍在北山赏梅时，即兴吟诵的两句诗。

[2] 此句借用了李商隐《无题》中“春心莫共花争发”诗句。

1933



1933年6月，毛泽东在江西革命根据地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上。

为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 并举行追悼大会以纪念赵博生同志事

（1933年1月13日）

五军团副总指挥十三军军长赵博生同志，是宁都兵暴领导者，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创造者，此次我红军在南抚金溪，连获伟大胜利，消灭并击溃敌人向中央区大举进攻的主力部队——改组派军阀之第九十师蒋系军阀之十四师和二十七师，逼近抚南城下，开始今年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伟大胜利；不幸赵博生同志于此次南城战役，指挥全体战士英勇坚决与敌搏战，卒以少数兵力，击溃军阀蒋介石的基本部队第十四师全师之众，完成我主力红军在抚州附近的全部胜利中而牺牲，临时中央政府特为纪念赵博生同志领导宁都暴动及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的光荣事绩起见，决定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于今年列李卢纪念中，（二十一日）全苏区举行追悼大会和宣布博生县成立。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三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1]

（1933年1月17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在法英帝国主义及国际联盟的公开援助之下，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更进一步地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强盗帝国主义的更进一步的侵略，造成了和平居民的整批惨杀，城市与乡村的毁灭，痛苦与饥荒的增加。上海与满洲的惨状，在大部分的中国土地上要更残酷地重复着。

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中国士兵整千整万的被惨杀，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国民党的军阀们步步撤退，这样帮助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国民党用一切力量镇压反帝国主义斗争、抵货运动与反对组织反日义勇军。

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阀政客们解释他们的罪恶行为与卖国勾当的理由之一，就是说中华苏维埃的存在，使他们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率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联名发布的宣言。此文在收入《苏维埃中国》第一集，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莫斯科）1933年版，1957年，中国现代史科编辑委员会出版该书的翻印本时，刊载的落款时间为1933年1月10日。

进行国防。蒋介石不愿意与日本军阀作战，而用八十万大军去进攻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的中国工农。

但是中国民众愿意自己保卫自己。许多部队与几十万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反对屠杀自己的兄弟姊妹，赞成武装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他们开始了解：只有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能够胜利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唾骂国民党的解释是蠢笨的谎话，他们想用这种蠢笨的谎话，在全国民众的面前掩盖自己的卖国行为，中华苏维埃政府再一次提醒中国民众，在去年四月我们已经号召全中国民众与我们一起共同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而蒋介石对于这个号召的回答，却是动员一切军队进攻中国工农而不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

在下列几个最简单的，但是为真正组织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所必要的条件之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战斗的协定，以便共同用武装斗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出版、言论之自由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我们要求中国民众及士兵拥护这个号召，进行联合一致的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将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卖国与投降的斗争联结起来！

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兼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　德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

蘇維埃中國
埃共和國
行委員會

1933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苏维埃中国》，记载了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的重要政策文件。

关于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1]

（1933年2月24日）

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是战时的紧急办法。富农有捐助战费之义务，不得拒绝政府命令。征募方法是要一方面劝导，同时要带强迫性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向富农募捐以充战费的训令的主要内容。

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1]

（1933年2月25日）

凡属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均须在不妨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近旁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各级政府更须迅即采定旁近政府的空地或荒田，辟为菜园自己种菜。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帮助春耕并自己种菜的训令的主要内容。

和傅连暲的谈话[1]

（1933年2月）

这个医院，是我们的第一个医院，由你当院长。医院的任务很重，你要当好这个院长，首先得有一个观点，为伤病员服务。这个医院除了给红军看病外，也要给老百姓看病。

对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要结合进行；要教育大家讲卫生。

---

[1] 毛泽东曾向同情革命、追求进步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提议，将医院改编为中央红色医院，并把它搬到瑞金。傅连暲欣然同意。毛泽东结束休养，回瑞金不久，即派人到长汀将医院及傅连暲全家迁移到瑞金。这是毛泽东在看望傅连暲时和他谈话的一部分。

为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

（1933年3月1日）

中央政府根据江西福建两省许多地方政府报告，各处革命团体纷纷请求，认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现在实行大举进攻，对苏区群众是大烧、大杀、大抢，福建的龙岩已全县被摧残，群众损失不可数计，永定的溪南区被白军抢去谷子二万余担，江西方面，过去三次战争被白军杀人数千，烧屋数万，抢去谷米数十万担，猪牛各数万头。目前蒋介石、陈济棠的几十万白军，又已开苏区狂进，烧杀抢劫，业已开始。我英勇红军，正在各地和白军作残酷的战斗，但缺乏粮食，各地革命群众愿意自己节省食用，借出谷米，供给红军，好把万恶白军完全消灭，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才保得苏区群众不受摧残。

中央政府根据上述群众的意见，决定接受群众这个请求，特规定革命群众自愿借谷办法如下：

一、谷子是每家农民都有的，借出谷来比借出钱来容易很多，尤其在群众反抗白军残暴，革命热情提得极高的时候，更加容易实现，各地政府应协同各群众团体来进行这一运动，限三月份内各县要一律将群众借谷一事办完，因为战争在这个时候，将更加激烈了。

二、这一借谷运动的完成，一定要靠着很好的宣传鼓动工作，宣传言词要非常通俗，并要用各种方法，如演新剧、化装讲演、贴

标语、出画报等，使那些尚未请求借谷的群众一体明白，成为全体农民群众自愿借谷的一个大运动。对那些未曾自动请求的群众，一定要禁止不作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命令主义方法。若用强借摊派的方法，不单会使苏维埃脱离群众，而且谷子一定要比用宣传方法借得少些。

三、关于借谷数目的分配，必须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形及群众出谷的可能性来决定，决不可普遍一律，在老苏区，要照产米的程度来分配，产米素丰的地方应多借，产米较少的地方应少借。在新苏区，要看群众对革命认识的程度与斗争的是否深入来决定，在斗争深入的地方应多借，否则应少借。如边区则应看曾否受反革命的摧残抢劫来决定，被摧残得厉害的地方应不借，受害较轻的边区，亦须斟酌情形，决定适当的数量。这样才能使群众了解借谷给政府是真正为了保护他们本身的利益，很踊跃地拿出来，不致发生进行这一工作的困难与不好的影响。

四、各级政府接此训令后，要依照借谷办法，马上召集各乡主席联席会议，计划分配，并派人分头出发到各区乡开代表会、贫农团会、雇农工会、选民大会等，将别处群众自动借谷的热烈与办法向本地群众宣传解释，并组织竞赛，使大家踊跃借谷。

五、借到的谷子，应按照下列地区分别处理：

甲、在江西的：

（一）博生、石城、于都、会昌、瑞金、胜利、兴国等县及永丰南部，均集中于区政府，除发一部分给当地医院、政府、部队和其他国家机关作为经费外，其余应妥为保存，听候中央命令处理。

（二）公略、万泰、永丰之北部，赣县、宜黄、乐安、南广、安远、寻乌，除由各县政府斟酌当地红军（由政府发钱的）政府医院

各机关之需要和群众团体有津贴者，应拿出他们所要的部分作为经费发给他们外，剩下的可照市价出卖。

乙、在福建的：

（一）长汀、宁化，集中于区政府保存，听候中央命令处理，惟上杭、新泉、武平，除供给当地红军政府机关以及有津贴之群众团体（照价发给）外，其余照价出卖。

（二）凡估价出卖的谷，一定要将谷款送交支库，以取得支库五联收据为凭，各级政府不得动用分毫，如有乱用谷款，或谷价以多报少，贪污舞弊者，要受严厉的处分。

六、各地政府、医院、部队及各群众团体吃米，须尽先买此谷子，但须作价交钱，不得赊借。

七、各级财政部收到中央财政部的借谷票后，要另立借谷账簿，将所收群众的谷子数，发出给群众的谷子票数，支出给各机关的谷子数，出卖的谷子与价数，逐项记账，以便清算，其出卖得款缴交支部的部分，支库对于此款，要另立一款，名为“群众借谷款”，不得混在特别收入或红军公谷款内。

八、凡群众借谷均以取得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发的借谷票为凭。

九、拿了借谷票的人，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准他抵纳土地税。那些晚税的和抵税有余的，到时得向区政府领还现款。

十、借谷票应有乡苏主席盖印，并限在本区抵税。没有乡苏主席盖印的票和不是本区的票，作为废票无效。

十一、借谷票由县财政部按照各区群众和粮食情形适当分配，区再酌量各乡情形分配。各级政府领去谷票多少，要照票结账，领票而未交谷，将票缴还，不得短少。

十二、群众借谷，一面交谷，一面交票，交了谷而未得到票的，可向上级政府控告，请求严办。今年一月以来各处发动三升米运动之谷，可并入此项借谷，一并给票。

十三、富农向他捐款，不再借谷。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问题的决议[1]

（1933年3月1日）

乡村中各业工人，要求分配土地时，不论失业与未失业，应按照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那样，分配同等数量质量的土地。各新区域和土地尚未彻底分配的区域，经过群众同意，酌留公田，用于公共事业，如修理桥梁、修理渡船等。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等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乡村工人分配土地及保留公田问题的决议的部分内容。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进攻平津

（1933年3月3日）

全中国民众们：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七十五生的大炮，巨大的战斗飞机和炸弹，在热河境内施行非人道的轰炸屠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八个师团，在几百架飞机掩护之下，正在三路进攻承德。国民党的将军们，依然采取无耻的不抵抗主义，步步撤退，放弃了开鲁、朝阳等，将千百万的和平居民与积极抵抗日帝的士兵，让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摧残和屠杀。全中国的民众们！热河全省已经落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整个华北，是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殖民地民众悲惨的命运，是直接威胁着全中国的劳苦民众！

全中国民众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奴役中国的强盗战争，正在猖狂地进行着。在我们的面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武装起来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只有广大的千百万民众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及其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与瓜分中国的强盗战争，能够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经屡次号召中国民众起来，与工农红军及苏区劳苦群众们一起，进行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并且在最近一次宣言中，在全国民众面前，明白地宣告中国工农红军愿意在最简单和最必要的条件之下，与一切真正抗日军队订立作战的战斗

协定。

而国民党军阀政客们最无耻地屈膝在帝国主义面前，出卖中国，实行不抵抗主义与投降，断送东三省，出卖淞沪，屠杀抗日反帝的工农群众与革命士兵，禁止一切抵货运动与抗日义勇军的组织，现在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用一切力量进攻热河的时候，他们更公开地主张放弃热河平津，在口头上无耻地声称这是战略的必要，同时却把几十师的兵力向着中国工农群众、工农政府与红军进攻！苏维埃政府宣言，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的军队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国民党回答这个宣言，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面前，步步撤退，不送一兵一卒到热河去抗日，而把最大部分的兵力调来江西，并且在反革命头目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之下，疯狂般地进攻苏区！正因为苏维埃政府号召与组织全国反帝抗日运动，所以卖国的国民党政府更加凶残，更加用尽一切烧杀掳掠，军事冒险与经济封锁，企图来阻碍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来扑灭反帝抗日的主力！

国民党军阀政客们，企图把苏维埃政府愿意与抗日部队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的宣言，当做是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的懦弱的表示，可是这正表示了他们的蠢笨与无智，最近两月的战争，已经给了这些卖国军阀以严重的教训，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部缴械，两师长及师部人员全被俘虏，第五军溃不成军。苏维埃运动是得到了千百万群众拥护的，国民党军阀的军事冒险及经济封锁只有更加激起全国劳苦群众的反抗，并且，给苏维埃运动向前开展以顺利的条件！

中国苏维埃政府准备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直接作战，并驱逐他们出中国，因此必须扫清一切阻碍我们与日本作战的反动军队与武装！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再一次宣言愿意与一切真正抗日

的军队订立战斗协定，但是对于一切侵犯苏区的军队与武装，将给以最严厉的打击，直至把他们完全消灭！我们号召白军的士兵兄弟们起来反对你们的卖国长官，掉转枪头来，和红军联合一起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驱逐他们滚出中国去！

全中国的民众们！白军士兵兄弟们！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你们起来进行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的国民党统治！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与苏区，拥护我们的战斗号召，反对你们的卖国长官，自动地起来联合工农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反对以一兵一卒一枪一弹进攻苏区！要求以全国兵力开赴华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

为调节民食接济军粮

（1933年3月4日）

近据各地报告，苏区各县，许多地方禁运谷米，甲县乙县，划成界限，许多地方发生粮荒，米价飞涨，有钱无市。这是十分严重的现象，查苏区之内，粮食情形不同，有些地方多余，有些地方缺少，边区地方，敌人抢劫，发生米荒。红军驻地、医院近旁，粮食更缺。各区各县的互相调剂，不但关系一般民众的日食，是十分重大的事情，关系红军及后方医院的给养，乃是打破敌人四次进攻不可一天缺少的条件，尤其重大得很。

阻碍粮食流通的原因，不外以下三种：（一）粮食不足的民众，恐本地流出多，五六月间要吃贵米。（二）粮食有余的民众，想留到后头，可得高价。（三）富农奸商操纵谋利，甚至故意捣乱，破坏革命战争，各地政府不加考察，就实行禁阻起来。哪知道怕本地五六月间要吃贵米，别地老早就吃贵米了，永定每元三升半，上杭每元四升，汀州七升，瑞金也到了八升，其他缺米地方，都是一天贵似一天。城里工人，没有田耕，卖工度日，一家老少，以少少的工钱，吃昂昂的贵米。全部红军正在前线同敌人拼命，靠着后方输送军粮。各地政府，要把这些理由，告诉当地群众，一定要全苏区都有饭吃，尤其要红军有饭吃，同心合力，打破敌人，才是出路。要告诉那些粮食有余的人家，不要只想高价，别地在挨饿，前方缺军

粮，大家不能坐视不理。须知全体不好，红军不胜，你们自己的利益也是得不到的。至于富农奸商，恨了政府采办军粮，恨了合作社调剂民食，或故意积藏，或暗中操纵，甚至大造谣言，煽动群众，这是反革命的举动，各地政府要领导革命群众给他们以严厉的制裁。须知全体的利益和战争的利益，是一切利益的第一位。各地政府和民众应有深刻的认识。

中央政府已决定了粮食调剂的计划，设立了粮食调剂局，各地政府应领导群众，快快组织粮食合作社，在粮食调剂局领导帮助之下，努力进行。办米之外，还要办盐，以抵制富农奸商的积藏操纵，以防备国民党的严厉封锁，以调节各地的民食，以接济前方的军粮。各地政府须知去年中央苏区的收成不丰，今年的春荒问题必然要来得严重，领导群众解决这个严重问题，是苏维埃政府的一件大工作。从省苏维埃起，到城乡代表会止，都要有详细的讨论，精密的计划，广大的宣传，努力的行动，方能完成这个工作。这是群众的切身大问题，这是打破敌人四次围攻的大关键，要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真正代表群众利益的政府，要使苏维埃政府，成为有力地领导战争的政府，对于这个问题是不能丝毫忽略的。

除由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出布告外，特此通令各地各级政府切实遵照执行。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

汀州不能轻易放弃[1]

（1933年3月5日）

朱、周：

昨晚与中央局及剑英[2]商决：

（一）敌七十八师及张炎旅[3]之右纵队将到连城，有进攻汀州[4]威胁首都[5]配合赣敌行动，同时配合其左纵队从岩永杭[6]三县向我苏区大举进攻，实行摧残之企图。

（二）汀州为我东南根本重地，不能轻易放弃，现任命李韶九为汀、瑞卫戍司令，负防御之责。敌如前进，当号召汀、瑞广大群众及武装以困阻之，决不任该敌钳制我方面军之行动。

（三）将宁石[7]独立团等武装编为独十一师，从东北方面胁制该

---

[1] 1933年3月，当红军第一方面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北部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时，位于根据地东南的国民党军乘机进犯长汀等地。这是毛泽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给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红军东南战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3] 张炎旅，指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师第九旅，旅长张炎。

[4]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5] 首都，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

[6] 岩永杭，指福建龙岩、永定和上杭。

[7] 宁石，指福建宁化和江西石城。

敌，迅即编成十九军，至少两千枪集中使用，以有力地打击岩、永、杭前进之敌。不论汀、连何种情况，我十九军必须在茶地、太拔、白沙、旧县、新泉一带坚决作战，争取大的胜利。

毛　项

五日

关于镇压内部反革命问题

（1933年3月15日）

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对全国苏区举行四次围攻及现在正向着中央苏区大举进攻，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已进到生死决战的时候，敌人除开军事力量以外，更有计划地在苏区内部组织反革命活动，利用苏区的地主富农及商人，组织各种反革命团体（AB团、社会民主党、托洛斯基派及封建迷信团体如一心会、懒子会等），欺骗少数落后群众，乘机捣乱，同时派遣侦探混入苏区，探听军情。根据最近发现的事实，如汀州的群众大会上有人叫唤反革命口号，在汀州破获了国民党县党部机关，在瑞金、汀州、河田三处发现彼此相同的反动标语，在石城的宣传部长家里搜出四支长枪，在南广县敌人组织的反革命活动，妨碍了一切群众工作和战争动员工作，会昌一带的奸商进行着破坏苏维埃国币的计划，瑞金、汀州的奸商有计划地向银行兑换，各地奸商操纵物价，同时大量地运送现金出口，在一部分地方武装中，亦发现了反革命的破坏行动，由以上这些最近得来的事实，已经明白证明敌人在苏区内是有计划地在组织反革命，从政治上、经济上各方面进行破坏苏维埃破坏革命战争的毒计。

但是我们各地的苏维埃政府，十分地缺乏警觉性，对于这样严重的反革命活动情形，居然忽视，甚且简直是容忍了。中央政府现

在严重唤起各级政府及其肃反机关的注意，对于过去这种忽视容忍反革命活动的态度，是一刻也不能允许的了，各地政府及其肃反机关，要立即纠正这种错误，要按照各地实际情况，立即动手对付反革命，各区乡特别各城市之内，一遇有反革命分子潜藏及活动的事实，要采用坚决敏捷的办法，给他们以严厉的镇压，在环境紧张时候，要宣布临时的戒严，苏维埃政府及一切革命机关，要施行武装的及群众的保卫。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对于重要反革命分子，要不犹豫地迅速地给以逮捕和处决，把他们的罪状在当地群众中普遍宣布出来，各地各级政府尤其市政府及区乡政府，要把反革命在苏区内部活动与外部白军配合进攻的阴谋事实，向广大群众宣布，动员全体革命群众对于商人富农及地主分子进行严厉的监督和注视，从各方面进行搜索反革命组织和活动的线索。苏维埃政府的肃反机关应与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等革命群众团体，发生密切的联系，只有广大的群众都在政府的领导之下热烈地行动起来，才能将反革命的组织和活动给以彻底的消灭。

边区各县的裁判部，对于已捕犯人，应迅速清理，凡属罪恶昭著证据确实的分子，首先是这些人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应立即判处死刑，不必按照裁判部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第二十六条须经上级批准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可以先执行死刑后报告上级备案。至于中心区域，同样要将积案迅速解决，不准仍然堆积起来，稽延肃反的速度。即在中心区域，若遇特别紧急时候，亦得先执行死刑，后报告上级，这是敌人大举进攻时，我们应取的必要手段，不能与平时一概而论的。

对于敌人进攻区域及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应该分别处置。其有反动事实的，应立即逮捕，严厉惩办，不让他们有丝毫活动的

余地。其他未发觉反革命事实的一般地主富农分子，应由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严格监视他们的行动，而不应一律逮捕，致发生不良影响，并增加以后处置上的困难。

中央政府坚决相信，对于此次内外反革命向着革命的进攻，我们是有完全粉碎他们而得到全部胜利的条件的。我们有着广大的群众和坚强的红军，我们有着巩固有力的政权机关，我们要拿了我们这个有力的政权机关（中央的及地方的）领导着千百万工农群众和红军，给与进攻我们的内外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有着过去肃反的宝贵经验，我们要运用这些经验给与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以严厉的镇压与彻底的消灭。各级政府接到本训令后，应立即按照当地具体情况，决定实际执行方法，并将执行情形按级报告前来。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1]

（1933年3月23日）

在激烈开展着的国内战争环境内，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战争实力的极重要条件。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迅速转变。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设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级国民经济部的命令的主要内容。

听取王观澜关于查田试点工作汇报时的指示[1]

（1933年3月）

广泛深入地发动当地群众，认真地宣传、贯彻党的土地政策，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组织起来解决问题。查田运动决不是一件寻常小事，是一个群众性的伟大革命斗争，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把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分清敌我，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把斗争推向前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注意掌握政策，注意不要把有轻微和短暂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也当做剥削阶级对待，以致侵犯他们的利益，扩大打击面。

---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的王观澜在瑞金县云集区叶坪乡进行查田试点工作的多次汇报时的指示。

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
命令第十八号

（1933年4月14日）

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在目前国内战争艰苦奋斗的时候，未能按照各人的劳动支给工资，对于各人的家庭，并无经济上的帮助，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这种艰苦牺牲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但是各地的情况，告诉我们：有许多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贫苦工农分子，因自己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劳动者，被家庭劳动所束缚，不能到政府来工作，以致有些地方的政府，缺乏这种好的工作人员，而把一些不甚积极又缺乏能力的人，选在政府工作，理由仅仅只在这种人他不是家庭生产的主要劳动者，不受家庭劳动所束缚，因此就把他选在政府工作，这样，选人的标准，离开了对革命的积极，和对工作上的能力，而只是因他在家得闲，这种现象，是不容许的。还有一种更加不能容许的现象，有些地方，当着选举的时候，好的分子，因为家庭生活牵累，不愿当选，于是那些坏分子，就出来了，富农和流氓，为了这样的原因，而攒〈钻〉进苏维埃机关中，在有些地方是存在的。至于那些成分好、对革命积极、对工作又有能力的人，他们担任了政府的工作，但因为家庭劳动问题，无法解决，使他不能好好地安心做工作，这种情形，是更普遍的（特别是区乡两级）。

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上述的情形，为了使苏维埃政府，成为积极而有工作能力的政府，能够在艰苦斗争的环境内，领导广大的群众，争取革命的胜利，特为议决：凡属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望务期内，如果他们的家里，确是没有劳动力，或是劳动力不足的，应于查明之后，由当地政府发动群众，代替他家耕种，或帮助他家耕种（那些家庭劳动力足够的，不在此例），以使他家生活上，比较他本人在家劳动时，不感缺陷为限度。在这里实际的办法，可适用红军优待条例第四条（无劳动力的，派人帮助全部耕种灌溉收获工作，缺乏劳动力的，按其需要，予以补助）。可使这些人员，解除家庭的顾虑，安心在政府工作。用这种办法作帮助，好把那些成分好、对革命积极，而又有工作能力的分子，大批地吸收到各级苏维埃政府来，加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能力，特此令知，望各级政府遵照执行。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

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

（1933年4月15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在五一我们谨向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呻吟于帝国主义国民党血腥统治之下的工农与城市贫民，被压迫反对中国工农的士兵，参加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学生与青年，成千成百的被监禁和虐待在国民党牢狱中的革命犯人们致革命的敬礼！

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进攻，完全瓜分中国的危机之空前增长与整个民族危机之深入，使我们不能不向一切为中国利益而斗争的人们及劳苦群众再作一次宣言。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平汉的区域，同时英帝国主义正在新疆进攻，并经过他的西藏以及其他的傀儡准备占据中国的西部。在日本政府与国民党，所进行的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又与帝国主义强盗们做了一笔生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秘书唐有任代表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在上海秘密与日本代表芳泽谈判。蒋介石——中国工农的刽子手，一九二九年要求日本占据山东与一九三二年在背后屠杀上海防卫者的罪魁，现在抛弃了北方战线，重新升用替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热河开路的卖国贼汤玉麟。蒋介石到北方并没有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而是承认他的朋友——卖

国贼张学良的产业。

西南政府与福建的军阀一样不是反对日本及其他任何帝国主义的，最近他们的“北上抗日”的宣传，完全是欺骗民众的鬼话，实际上是为着扩张自己的地盘和进攻苏区与红军。

为什么蒋介石要回到江西呢？为什么他抛弃了北方军队，使他们没有武装徒手对着日本的大炮飞机呢？为什么国民党及其政府集中了大批的军队，所有的飞机与军事技术来反对江西的工人和农民呢？因为他们正在与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商量要把中国当作他们的私产出卖干净。因为他们希望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也如对“满洲国”一样允许他们做几省的傀儡统治者。因为他们要屠杀中国的民众来维持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国民党为着掩饰自己的投降与出卖，造谣说日本帝国主义帮助红军金钱与军火，污蔑中国苏维埃政府与日本军阀进行谈判。这种无耻的下流的造谣，早已被许多铁的事实粉碎了。

中国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的唯一的民众政权与武装力量，在历次英勇的战争中，证明中国苏维埃红军与任何帝国主义势不两立，我们与日本的工人和农民是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因为他们同样是在进行英勇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样是受统治阶级的掠夺、压迫、虐待和屠杀。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正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正在为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利益而斗争，为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而斗争。目前正需要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作战，谁反对这个战争，我们就要打倒他。

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工人农民与士兵的斗争，以及红军的英勇防卫能够阻止帝国主义、蒋介石与破产的国民党实现他们的瓜分中

国的计划。

在最近三个月中，江西的工农及其红军击破了敌人九师以上的兵力，在几次的战斗中俘虏了人、枪各在三万以上，以及大批军需及其他武器无算，一万左右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已经自愿地加入江西红军。在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的红军也在迅速地增长着。从最近在江西被俘的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两师长及其师部人员的宣言中完全可以看出国民党军队的瓦解是怎样的深刻，他们责骂国民党与蒋介石，懊悔自己过去反对中国工农的罪过，要求白军的兵士与官长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调转枪头去打击出卖祖国的国民党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等卖国贼鉴于最近红军的伟大胜利与前线兵士的动摇以及全国民众的愤怒，又想以“剿共即抗日”“在共未肃清前，不许言抗日”的武断宣传来阻止广大兵士群众的革命化，来掩饰自己的出卖和投降。但是这种欺骗和威吓是不会成功的，恰恰相反只会更加暴露他们的罪恶。

根据目前的情形与我们的胜利必得重述今年一月间我们的提议来粉碎国民党关于红军及苏区工农阻碍有效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污蔑。我们认为只要能依照我们过去的提议积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刻是可能的，因此再将我们的提议向全国宣言：

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战争的作战的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

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示威之自由与释放政治犯等等）；

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队伍，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每一个工人、农民、兵士都会了解没有以上的条件，想与帝国主义作胜利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国民党的政策是破产了，他引导瓜分中国与更加奴役中国的民众，继续增加民众的痛苦、饥饿与屠杀。

我们号召一切劳动者与士兵在广大的群众中、军队中以及义勇军中加紧工作，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民族的革命的政策。我们号召一切劳苦群众拥护我们防卫中国及民族的权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为检查和取缔私人枪支禁止冒穿军服事

（1933年4月15日）

枪支是战争的重要武器，应当集中到红军部队及地方工农武装组织里面，去进攻敌人，发展战争，私人不能随便携带。对于工农阶级的敌人——地主、富农、资本家及一切反革命分子——更是绝对禁止他们手中存有武器，并严格防止反革命分子潜入我们武装队伍——红军独立师团、赤少队中来窃取武装，这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一个必要前提。

军服是红军穿的，不是红军的人员就不能随便穿红军的制服，以免混淆不清。

我们考查在一、二、三次战争胜利中有很多枪支散失在农村中，没有完全收清。同时过去各地的地主武装虽被我们完全消灭，但不免有少数枪支被反革命分子所埋藏。这些枪支的散布，难免不落于反革命手中。据最近事实，在汀、会、石等县检查地主富农的时候搜出有不少枪支。更就肃反中所发现的反革命派组织暗杀队（会昌）、扑杀队（于都）、秘密守望队（寻乌、万泰）等等武装阴谋，都足以表示这一问题的严重。当目前阶级斗争到了最剧烈的时候，我们不仅要彻底消灭外面进攻的敌人，而且要彻底解除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的武装，镇压反革命一切企图来保卫苏区，加强苏区的

发展和胜利。枪支是武器中最主要的武器，应当保证在工农武装队伍手里，举行检查和取缔私人的枪支，实行枪支登记，这是保障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工作。

近日红军制服遗散于群众中者甚多，特别是开小差的随身穿回家去，这样使红军与非红军分别不清，使政府损失大批经济，更直接影响于革命战争经费，非立即加以检查和取缔不可。

因此决定以下办法：

一、举行枪支检查，除正式武装部队——红军独立师团、游击队、警卫部队、赤少队以外，私人不得携带和隐藏枪支。

二、凡县一级以上之各机关和国家保卫局特派员，因工作关系必须携备枪支者，只限于短枪、步枪，由该机关负责人签名，向同级国家保卫局登记领取枪证，边区之区乡两级工作人员如因环境及工作关系须要携带枪支者，由直接隶属的县机关证明登记，领取证书。

三、以后凡无证书之私人枪支，一经查出，即以私藏军火论罪。

四、除脱离生产之武装部队在职战士、政府在职之工作人员、红军残废战士回家者得穿红军制服外，赤少队、群众团体及私人，均不得穿红军制服。至战士和政府工作人员退职时应将军服缴还。

五、中央区规定以五月为检查枪支、制服的时期，其他苏区自文到之日起二十天内检查完毕。

六、在检查期内自动缴报者不加处置，否则一经查出，即以私藏军火制服论罪，但过期后能自动缴报者可减轻处罚。

七、检查机关以县区军事部协同保卫局来进行。

八、在检查中必须动员赤少队和各群众团体来参加，并且发动和鼓动群众经常向政府和保卫局举发私藏枪械者。

以上各项由各级政府及各级国家保卫局机关协同拟定实行具体办法，并将检查登记情形按级报告为要。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肃反委员会决议

（1933年4月15日）

近来，考查许多正式政权已经建立了一年以上的乡区，甚至在很老的区，既有裁判部与国家政治保卫局，同时又有肃反委员会。这样机关重复，事权分割，殊属违犯组织原则，影响工作进行，加以肃反委员会过去没有明文规定属何机关指挥，以致许多地方肃反各自行政，无所统属，发生许多严重现象。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建立肃反机关，使在国内战争环境内能够有力地执行肃反任务，特为决议如下：

一、凡属新发展苏区与当地临时政权，县区常务委员会之下组织肃反委员会，为临时肃反机关，它的任务是镇压和裁判当地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及一切反动派的反革命活动与企图，肃清当地反革命势力，以巩固临时政权。它的职权是兼有司法机关和政治保卫局的责任。

二、县区肃反委员会在组织上隶属于当地革命委员会，而受它的指导与监督，在肃反工作上，应受上级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导，但如该地临时政权还未与省、县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时，其肃反工作应受附近红军部队军级以上的保卫局之指导，该地尚无红军或红军已离开该地时，则完全受县、区革命委员会之指挥。

三、县肃反委员会在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有直接逮捕、审

讯、判决反革命及一般罪犯并对于这些罪犯执行其判决（从处决到释放）之权。区、市肃委须经县肃委之批准，才能执行处决，但对于当地豪绅、地主、富农、资本家之罪恶彰著，经工农群众要求处决者，以及在紧急环境不容许远呈报者，区、市肃委可以先执行处决，后报告县肃委备案。

四、凡属已经建立正式政权的县、区，不论腹地、边地，必须成立裁判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肃反工作，并处理一般民刑案件，肃反委员会即取消。

根据以上决议，现有各老苏区中的县、区肃反委员会应即取消，将其工作分配归并于裁判部和保卫局。现有各新区域的肃反委员会，亦均须照此决议执行其职权上、组织上、工作上的应有的改变。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为夏耕运动给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

（1933年4月22日）

省苏县苏区苏的主席团及土地部长、乡苏的主席及全体代表同志们：

春耕已过去了。有些地方虽然得到了好的成绩，但许多地方的成绩是非常之差的。严重的情形是政府主席团忽视春耕，土地部对春耕怠工，尤其是动员的方式脱离了群众。现在夏耕已到，转眼就是秋收，如果你们再不努力，不立即改变春耕中所犯错误，不大家拿出战斗精神来对付夏耕，那么，为了群众利益为了革命战争去增加二成收获的计划，就要受到极严重的影响了。因此中央土地部特为编了一个夏耕运动大纲（即《红色中华》发表的《怎样领导夏耕运动》）发给你们，在这个大纲中指出了夏耕的严重意义，夏耕的目的，夏耕的中心工作，与夏耕中动员群众的方式，其中特别指出瑞金武阳区的实例——在这里真正做到了“有组织的动员”，激发了农民群众空前高度的劳动热忱，得到了春耕的伟大成绩。你们接到这个大纲之后，要立即召集各种必要的会议（县苏主席土地部长召集各区主席土地部长开会，区苏及其土地部召集乡苏主席及贫农团主任开会，乡苏分别召集代表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赤卫军、少先队、儿童团及乡村群众开会），解释大纲的要点，讨论本地的进行办法，立即将革命的夏耕战斗开展到所有红色农村中去。省苏不必召集县苏开会，但要根据此大纲而有具体活泼的指导。省对县县

对区均要每月检查他们的工作一次。区对乡则每半月检查一次。中央土地部当于五月内派人分往各县对你们的夏耕成绩作第一次检查。夏耕任务的完成首先靠了你们正确而有力量的领导。同志们大家为了夏耕的全部胜利而奋斗呵！

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代土地人民委员　胡　海[1]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

[1] 胡海（1901—1935），江西吉安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关于设立国民经济部的训令

（1933年4月28日）

提高苏区的各业生产，扩大对内对外贸易，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这在目前激烈发展的国内战争环境下，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曾发布第十九号命令，在中央增设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在省县两级增设国民经济部，要各级政府转变过去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迅速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进攻。自从帝国主义国民党向苏区与红军举行第四次“围攻”，同时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以来，由于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正确领导，红军与群众的积极进攻，我们已经得到了极大的胜利，但各级政府必须明白：我们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战争是长期艰苦的战争，即拿完全粉碎四次“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来说，亦尚须给与极大的努力。拿经济建设上的胜利，去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激发群众更高的革命热忱，同时保障红军的需要以配合整个的战争动员，这对于胜利的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

在上述原则之下，各级政府必须抓住目前经济建设上几个中心工作，如农业与工业生产的发展、粮食的调剂、合作社的扩大、对外贸易处的建立、国有企业的发展等，实际地进行起来。为了进行这些工作，人民委员会特制定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在此纲要内，规定设立国民经济部最主要的机关——设计局与调查统计

局，并规定在各专门行政机关——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国内外贸易部等未设立以前，这些机关的行政工作，全部或一部交由国民经济部管理。各级政府接此训令及纲要后，应立即按照规定建立各种机关，过去由财政部管辖的一些工作，如粮食调剂局、合作社、对外贸易处等，应划归国民经济部管辖。过去归教育部管辖的国家印刷厂，亦暂时划归国民经济部。过去归司法部及省县裁判部管辖的劳动感化院，应将制造与营业的部分划归国民经济部管辖。但内务部管辖的交通行政，只将运输部分划归国民经济部，其邮电路政等项仍归内务部管辖不变更。过去省县两级的粮食部，应归并于国民经济部的粮食科。各级国民经济部内，均应设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以为规划及建议的机关。省县两级国民经济部机关的建立、人员的委任，均应迅速报告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备案。至于该管区域国民经济的计划，及具体指导的方案，亦限早日拟妥，呈候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核准施行。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

为限制特别快信

（1933年5月11日）

为了限制特别快信，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曾经发布命令规定“凡公私信函非带有严格的时间性，不得发特别快信”。近查部分党机关及红色部队中，又继续发现许多乱发特别快信事，如第五分区有同志，因丢了一支水笔，用特别快信去调查，并要那边用特别快信答复。宜黄县苏军事部的同志，向福建军区的同志讨私债，也用特别快信。大西坝区委寄黄柏区委代人查问寄款事，也用特别快信等。这些这样乱发快信，妨害了邮政工作，妨害了真正急需的特快邮递，尤其妨害了军事情报的邮递，浪费了公款，这种情形再不能容许继续下去。人民委员会特再严格通令着各机关各部队速对所属人员禁止此种情事，并规定限制办法如下：

（一）军事机关的特快信限制在报告紧急敌情及送达紧急的命令与通报，其他均不得发特快信，并须经过主管指挥员在信面盖章。

（二）党部政府及群众团体，限制在：

（甲）县一级机关才准发特快信，区乡两级不得发特快信。

（乙）特快信内容，必须确带着严格的时间性，即信的性质，如非在极短促时间送到则对全盘工作有重大不良影响者。

（丙）党部由书记，政府由主席（中央政府得由各部长，群众团体由主任或委员长）在特别快信封面盖章。

（三）责成保卫局负检查之责，如发现违反上述规定者，除直接改为平信发递外，并报告该发信人之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该发信人以应得的处罚。

望各级机关各部队严格执行以上规定，不得再有违背。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闽粤白军士兵书

（1933年5月28日）

广东福建的白军士兵们：

出卖中国的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同日本订立了密约，不但放弃了满洲热河与察哈尔，而且以撤退北平天津的一切武装队伍为条件，来开始和平的谈判。整个的华北，现在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全中国民众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愤恨，已经达到了顶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再向进攻全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武装部队，提议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3）立即武装民众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一号召，虽是得到了全中国民众的拥护，但是国民党军阀不但不放弃进攻苏维埃区域的计划，来共同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更进一步地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整个华北，来加紧对于苏维埃区域的进攻。对于这个进攻，我百战百胜的英勇红军与工农民众，曾经给了卖国罪魁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以最有力的打击，完全消灭了蒋介石的第一个纵队，击溃了所有的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为

要使英勇的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消灭占领华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必须消灭同日本订立密约，出卖整个华北的国民党罪魁蒋介石的主力，来肃清北上抗日的道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向广东福建的一切武装队伍再一次地提议在他们承认上列三个条件之下，同他们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出卖华北的国民党罪魁祸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全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的政府与反帝国主义的武装。在我们的苏区，已经完全消灭了帝国主义的势力，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都是我们的同盟者，一切想拿抗日剿共的欺骗宣传来进攻中国革命根据地，给帝国主义做瓜分中国的清道夫的任何福建广东的国民党军阀，我们只有以武装力量与之决战，一直到完全消灭他们，使苏维埃政权在全中国得到统治。广东福建的白军士兵弟兄们，起来，同中国工农红军一起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去打倒出卖中国的一切国民党军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全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　德

为“五卅”运动会题词[1]

（1933年5月）

锻炼工农阶级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

---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央苏区体育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反“围剿”的硝烟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五卅”运动会筹备会，决定于193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举办全苏区境内第一次体育运动会。这是时任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为“五卅”运动会顺利召开题词。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

（1933年6月1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南京政府，自从断送了满洲和出卖了上海抗日防卫战之后，现在平津与察哈尔又被这些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了。以撤退平津一切武装队伍，让出平津给日本帝国主义为“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已经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完全实现了。

所谓“和平谈判”的内容是：

（一）华军撤退至平津以南，划长城以南为缓冲地带（即所谓中立区域）；（二）华方承认“满洲国”；（三）制止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一切活动及反满洲国力量的发展，解除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武装；（四）华方保证停止一切反日运动。“华北停战协定”由国民党卖国贼的庐山会议最后决定了，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和中国的卖国能手军阀刽子手们共同签字。在他们的欢宴中，庆祝他们的胜利。在北京城外，在满洲、热河，在察哈尔、平津一带，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继续着用他们的大炮飞机轰炸与屠杀抗日的义勇军，革命的士兵与千千万万和平的居民，来造成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殖民地奴隶们的“和平与秩序”！

全中国的民众们！平津华北已为反动的国民党最后出卖了！这

就是国民党的“长期抵抗”的内幕，这就是国民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实质，这就是国民党中央的“已定方针”！万恶的国民党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国民党，这样无耻的，这样大胆的把数千万方里及数千万人的整个满洲、热河与平津奉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正在想把西藏、新疆、川边、四川等广大的区域送给英国帝国主义。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是中国民族的主人翁，我们绝对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寸土地，不容许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这样无耻的大胆的出卖中国！必须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发展民族革命战争，以四万万民众的力量来打倒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军阀，首先是以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政府，只有全中国民众的血的战斗，才能收回我们已失的土地，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和领土的完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再向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的武装部队提议，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成立民众的义勇军，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但是国民党对于苏维埃的这种号召的回答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投降与出卖，尽力量向我们苏维埃区域进攻，并且增派大批的飞机来轰炸苏维埃区域内的劳苦民众与和平居民。同时，无耻地造谣说国民党不能出兵抗日，是由于苏维埃政权的存在，是由于中国工农红军“障碍抗日战争”。又说“中国没有力量抗日”，故“不得不忍痛停战”。现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兵士，每一个学生以及每一个革命者，都会亲眼看到：到底谁障碍抗日战争？谁是卖国贼？谁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现在谁都懂得和相信：不

打倒国民党，中国只有灭亡，中国民众永远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中国的民众，东北抗日的士兵，全中国的革命的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家以及一切革命者，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进行革命民族战争。不顾帝国主义的逮捕与国民党军警的一切压迫与屠杀，违反国民党的停战退却的命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斗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在完全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四次“围剿”的血战中，建立广大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创造一百万铁的工农红军，准备会师长江与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它的工农红军，在长期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中，已经证明给全中国的民众看：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众自己的政权，只有苏维埃政府能够领导全中国民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出卖中国的蒋介石的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以及一切国民党卖国军阀。

全中国的民众们！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一起，扩大民族战争与恢复东北失地，为保卫中国，为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1]

（1933年6月1日）

现在各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尚有广大区域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区域在中央区差不多占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为瑞金（除武阳区）、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除新陂区）、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五个全县。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泰、上杭、永定、新泉的一部分，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没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泛的发动起来。封建残余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阶级异己分子在暗藏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在各地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个原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文化经济建设都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泰、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陂区、安福区，瑞金的武阳区，永定的溪南区等）之后。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群众中发展最高度的阶级斗争，向着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进攻而把他们完全消灭，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关于查田运动的具体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布的训令。

进行事项，人民委员会特决定如下：

（一）责成各级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领导整个查田运动。

（二）责成各级土地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特派员用他们的全力去指导查田运动，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地方苏维埃，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司法人民委员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应用全力指导各下级机关，切实完成这些任务。

（三）责成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财政部，从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半封建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责成中央军事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军事部在查田运动中，整顿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责成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国民经济部，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费品的调剂，责成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指导各级教育部，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给各种简明通俗的课本与小册子给一切查田干部与群众，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

（四）省县两级政府应该从查田区域及一切先进的较先进的区域征调干部，开办短期的查田运动训练班。县苏应每月召集区苏负责人开会，区苏应每十天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检阅查田的经过。

（五）应首先召集瑞金、会昌、博生、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主要负责人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在中央政府开会，发动八县的查田运动。

（六）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靠贫农，坚决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

攻，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

（七）查田运动中要充分注意发动群众的大多数起来向着封建残余作斗争。首先要经过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一切调查地主富农成分，通过这些成分，没收这些成分的土地财产，均要经过尽可能多数群众的同意与参加。没收来的财物，除现款外应全部发给极贫苦的群众，特别注意发给贫苦的红军家属，并要多发给于财物所从出的村庄的群众。

（八）贫农团是查田运动中极重要的群众团体。区乡苏维埃要极力指导贫农团，洗刷其中的坏分子，吸收多数积极分子加入，贫农团中的工人小组应是贫农团的积极领导者。

（九）查田运动中要集中大力注意于一切落后的尤其是最落后的区乡及村子。要注意在落后的区乡，尤其在大村中开展查田运动，必须发动本村贫苦群众自己起来与本村地主富农斗争，要极力避免可能引起氏族地方斗争的一切错误行为。

（十）要在查田运动中肃清一切反革命的组织与活动，要防止、揭破地主富农的造谣与破坏。

（十一）要在查田运动中改造地方苏维埃，洗刷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出去，引进大批革命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

（十二）各级苏维埃中一切直接间接阻碍查田运动的人，都应受到严厉的或最严厉的惩罚。

只有坚决执行上述的决定，才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农村中的阶

级斗争，激发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彻底消灭农村中一切封建半封建势力，完成查田运动的任务。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召集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

（1933年6月1日）

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县苏区苏的主席团乡苏的主席同志们：

土地问题在许多斗争落后区域还是极严重的问题，为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前，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肃清反革命，改造苏维埃及群众团体，中央政府决定首先召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

（一）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

（1）开会地点：瑞金，云集区，叶坪。

（2）会期：六月十六号到齐，十七号开会，二十号闭会。

（3）到会人：

区一级：主席，土地部长，工农检察部长，保卫局特派员。

县一级：主席，土地部长，工农检察部长，保卫局长。

省一级：副主席，土地部长，工农检察部长，保卫局长。

（4）到会人现任职务，找人暂代。

（5）上列指定到会人不得托故不到。

（6）到会人须准备下列各项报告带来（节目略）。

为了要得到报告的材料，区苏须于此通告到时，即刻召集全区各乡主席及贫农团主任开会，把材料收集起来。县苏不要召集区苏开会，只要向县一级各部及群众团体收集材料。省苏则向省一级各部及群众团体收集材料。各到会人必须带着上开各项报告来，无报告的以怠工论，报告必须忠实，不准假造，假造报告求顾面子的，查出处罚。

（7）到会人往返路费，由各级财政部发给。开会期间伙食由中央政府发给。

（8）到会人带碗、筷、单被。

（二）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

（1）开会地点：瑞金，云集区，叶坪。

（2）会期：六月二十四号到齐，二十五号开会，七月一号闭会。

（3）到会人：每乡贫农团选举代表一人。贫农团会员超过三百人的应选举代表二人。

（4）代表的选举及出发：

1. 此通告到各区时，区苏即刻召集全区各乡苏主席及贫农团主任开会，报告中央政府这次召集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伟大革命意义及选举代表宣传群众的方法。

2. 各乡主席贫农团主任迅速回转各乡，召集贫农团会员大会，报告中央政府此次召集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意义，即行选举代表。

3. 代表的资格，必须是平素同地主富农坚决斗争的并且是积极活动的贫农、雇农。如果贫农团主任或干事有合得这种资格的，可以把他当选，如果主任干事没有一个合得这种资格的，那就必须在会员中选出人来。代表一定要开会员大会选举，不得指人充当，尤

其不得选举消极分子甚至异己分子充当代表。

4. 各乡代表选出之后，都到区苏集合，由区苏代理主席召集代表开会，组织一个代表团，从代表中指定一个最好的充当代表团主任，并报告此去中央开会的意义，发给路费，由主任率领出发，六月二十四号赶到瑞金。

5. 代表要带一个简明报告来：报告内载明（一）该乡人口多少。（二）贫农团的人数、成分。（三）什么时候成立的。（四）有无村贫农团。（五）分了几多组。

6. 代表的路费：由区苏发给，到中央开会期间的伙食由中央发给。

7. 代表带碗、筷、单被。

8. 代表出发后的宣传，乡苏须从乡代表会中或贫农团中挑选对于革命积极活动的分子五人组织一个“查田运动宣传队”，在贫农团代表出发后，分往各村各屋召集村屋群众大会，宣传此次中央政府为了开展一个查田查阶级的大运动，所以要开这次八县的贫农团代表大会，本乡已选举某人开会去了，本县各区各乡都有代表开会去了，要群众准备起来，注意那些冒称中农贫农分得土地的地主富农分子，只候代表回来，就要大大的查起来，一定要完全消灭封建势力，才能使贫苦群众得到最大的利益。但查田不是再分田，是由群众自己起来查那些假冒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分子，只有把他们查了出来，打倒了，才能使贫苦群众得到解放。并且我们雇农贫农是一定要同一切真正的中农联合起来的，中农的利益，苏维埃完全保护他。这种宣传的作用，就是要使群众大家知道本乡及各区各乡选举代表去中央开会，为的是要在八县九百个乡中间来一个查阶级的大运动，在代表回来之前各乡已造起了查阶级的浓厚空气。村屋会可

以在日落后开，乡主席要负领导责任。

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的县苏区苏乡苏负责同志们，为了要使这两次大会得到完满的成功，首先要使（一）到会人都带着忠实的报告来，（二）贫农团代表都是积极革命分子，而不是消极妥协分子，（三）要到的人都能到会并且都能按着规定日子到会，（四）各乡都有普遍的查田运动宣传，对这四点你们要用很大的努力。如果这四点没有做好，就会使大会不能得到完满的成功，那你们是要受责备的。特此通告。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

为节省五万担谷子卖给红军告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群众

（1933年6月）

（一）四次革命战争中，北面战斗蒋介石的白军几次遭到惨败，红军□次得到大胜之后，国民党军阀又正在调集他的残部，准备新的进攻，同时广东军阀陈济棠、福建军阀蔡廷锴、湖南军阀何键，都一齐出马，调动军队进攻苏区，红军正在同敌人血战，要把敌人的围攻打他一个粉碎。另一方面，国民党又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北京、天津，红军要准备同帝国主义直接打仗，要把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起打倒。但在这时候，红军发生了严重的粮食问题，有些红军在吃稀饭，中央政府各机关每天也要吃一半稀饭，米价很贵，又买不到，真正成了困难问题。此外还有一部分极贫苦的群众，特别是红军家属，没有饭吃，情形也是很严重的。

（二）但是苏区果然没有粮食吗？不是的，苏区有不少的粮食。不说公略、万泰那些粮食很多的地方，即拿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来说，都是每年粮食有多，去年收成虽差，仍有许多余剩。为什么红军在这些地方现在买不到粮食呢？这第一是富农奸商作怪，他们把粮食隐藏起来，或高抬时价，故意与红军为难。第二，粮食多的群众，还不明白红军的困难，他们想等后头更卖高价，还有许多粮食不多不少的群众，他们也不明白红军的困难，所以他们

不曾节省一部分粮食卖给红军。有这两个原因，所以近来市场上买不到粮食了。同志们，你们不明白红军的困难，这是各地苏维埃未曾向你们说明的缘故。现在中央政府要在瑞金、会昌、博生、石城四县采办五万担谷子去接济前线上的红军，要把这个责任放在四县县区乡苏维埃及四县一百万群众的身上。四县的分配是瑞金一万六千担，会昌一万五千担，博生一万二千担，石城一万担。但这次不是借谷，是买谷。我们根据过去借谷的经验，群众自动的借了许多谷子给红军，许多群众连借谷票也退了，这表示群众最高度的革命热情，这表示群众把红军看得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听得红军借谷，大家就借出来。但是同志们，过去借的谷子红军已吃完了，中央政府现在还要向大家买一批谷子，数目是五万担，价钱照市。时间是六月一个月内分批交齐。办法是有多余的人家把多余的拿出来，并且还要节省一部分拿出来。没有多余的人家，都节省一部分拿出来。只有那些自己十分不够食还要请亲戚朋友帮助的，才真正无法拿出谷子。同志们，大家都是盼望红军打胜仗的，现在红军在前方作战缺乏粮食，我们能安心吗？我们大家多吃点杂粮蔬菜，节省一部分粮食卖给红军，聚少成多，相信四县一百万群众，节省出四五万担谷子，应该不是难事。同志们，只要前线红军吃了饱饭，打了胜仗，我们后方群众就少吃一点也是光荣快乐的事呵！

（三）还有一个方面的粮食问题，也是我们广大群众必须注意的，就是一部分极贫苦群众缺乏粮食的问题，我们多数人决不能让这些人饿肚子，特别是红军家属，他们的困难问题，大家必须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群众互相帮助，第一是减价粜谷，第二是夏借秋还。为了阶级的利益，大家决不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谷米多的乡，一定要帮助谷米少的乡。谷米多的村，一定要帮助谷米少

的村。一村之中，谷米多的人家，一定要帮助谷米少的人家。大家除了卖谷五万担给红军之外，一定还要帮助极贫苦群众的粮食。这样才是真正的阶级友爱阶级互助的办法呵！

四县一百万群众一齐起来！

拿出五万担谷子卖给红军！

“减粜”“借谷”帮助贫苦群众！

不让红军吃稀饭！

不让贫苦群众饿肚子！

用粮食帮助红军打破敌人四次围攻！

红军胜利万岁！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否认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通电[1]

（1933年6月10日）

全国革命民众们！

国民党政府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帝国主义订了华北停战协定，这个协定将华北广大地域与几千万民众完全出卖给帝国主义，但这还是国民党公布了卖国密约的一部分。虽然汪精卫等卖国罪魁无耻地说协定只限于军事不及政治，而实际上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秘不宣布的大规模的卖国密约。据本政府所得关于此项密约的内容大要如下：（一）华军撤退至平津以南，划长城以南为缓冲地带。（二）华方承认“满洲国”“蒙古国”。（三）制止义勇军一切活动，相机解决义勇军及一切抗日军队的武装。（四）华方保证停止一切反日运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民众绝对不承认此项密约及华北停战协定，因为此种密约与协定已将满洲、蒙古、华北等广大土地及全国的民族利益完全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无疑义的国民党政府又将应允英美等帝国主义的要求，而将西藏西康，以至长江珠江流域的土地及权利出卖，实践其“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卖国路线。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号召全中国民众一致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在国民党政府和日本关东军代表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后，联名发表的通电。

反对国民党的卖国密约与卖国协定，以坚决的革命斗争：罢工、罢课、罢市、群众示威、组织民众自己的武装队伍来反对与阻止此项密约与协定任何一条的实行。全国民众必须明白，如果不反对此项密约及协定，四万万民众均将成为帝国主义永远践踏的牛马奴隶。全国民众必须明白，只有自己武装起来，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才能解放自己，免除牛马奴隶的命运。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言：他准备尽他一切力量，精神的物质的与武装力量来帮助全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对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并且重复向全国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武装部队宣布：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保障民众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之下，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任何国民党的武装部队订定作战的战斗协定，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同时，苏维埃中央政府还要指出，一切国民党的卖国军阀如冯玉祥、蔡廷锴、陈济棠等现在大呼抗日，反对停战协定，完全是欺骗民众的把戏，实际上他们中间一部分已经与蒋介石团结一起来积极绝望地进攻红军与苏维埃，另一部分则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高叫的抗日与反对停战协定，只是一种欺骗民众以便他们进行卖国的方法，他们除了勾结帝国主义镇压革命民众与革命士兵努力进攻苏区与红军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企图。全国革命民众与革命士兵，只有民众自己的武装及抗日士兵与民众的联合，才能执行真正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而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是这一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的士兵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与红军联合起来，共同去推翻出卖中国的罪魁祸首的国民党统治，去保障中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争取中国民

族的彻底解放！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日

关于解决群众粮食问题

（1933 年 6 月 16 日）

近来粮食缺乏，谷米的价钱一天天的贵起来了，还有少数地方，有钱都买不到米，因此有部分的群众没有米吃，每天只吃些蔬菜杂粮，甚至有吃树叶草根的，这真是成了一种严重的现象。原因是因为富农的隐藏，商人的操纵，故意与劳苦工农群众为难。有些粮食多余的群众，他们还是各顾各的旧有观念，总是想等待高价方出粜他的米谷，别个劳苦工农群众饿着肚皮，他们是毫不关心的，这完全是由于他们不明白阶级互助的重大意义。还有一些没有多余粮食的群众，也没能够节省部分的粮食卖给那些缺乏粮食的劳苦群众，特别是红军家属或用夏借秋还的方法借给他们。

现在离新谷上市还要一个多月，在这样长久的时间中，还需要大量的谷子来接济那缺少粮食的群众和红军家属，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级政府是要用百分之百的力量来进行以下的工作：

1. 省一级政府要迅速的召集各种会议，作热烈的详细讨论，并根据各县实际情形，决定个别的有系统的具体计划，交下级政府讨论执行。

2. 县政府要根据省苏决议和过去借谷和节省谷子卖给红军运动的经验，召集区乡代表会议，（如因路远人太多可分两处召集）乡一级要有主席贫农团工会妇女代表参加，向这些代表和活动分子说明

阶级互助的关系，使他们回到各自的区乡作广泛的热烈的宣传鼓动，把群众发动起来，提高群众的阶级友爱和互助的精神，来解决目前的粮食难题，如在粮食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可以采取黄金（野山姜）、黄秋菜、茼蒿、苎麻叶、葛、蕨等植物当作补助食品。

3. 区乡政府务要彻底执行省县两级对这一问题的一切决议，要领导谷米多的乡去帮助谷米少的乡，谷米多的村一定要帮助谷米少的村和谷米多的人家帮助谷米少的人家，使苏维埃群众，在阶级互助的意义之下，打破富农米商的操纵，解决青黄不接的困难。

各级政府接到这令文后，希即努力执行这一工作，幸勿忽视为要。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国民经济部长　林伯渠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

查田运动是广大区域内的中心重大任务

（1933年6月）

一切过去的经验都证明：只有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只有在坚决的阶级口号之下，把农村中阶级斗争的火焰掀起到最高的程度，才能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苏维埃各方面的建设，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使苏维埃运动得着更大的力量，争取更大的发展与胜利。

依着土地革命发展的经验，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阶段的，就是（一）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二）检查土地的阶段，（三）土地建设的阶段。依照土地斗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在任何苏区之内，大致都有三种区域的存在，就是（一）斗争深入区域，（二）斗争比较落后区域，（三）新发展区域。

在新发展区域，土地斗争的发展，还在没收与分配土地的阶段，这里的中心问题，是以武力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革命的临时政权（革命委员会），建立地方的工农武装及群众团体，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分配土地给雇农、贫农、中农，分给富农以坏田，废除债务，焚田契与借约。这个阶段中的斗争，是包括革命与反革命开始接战以至革命打败反革命而实行处理他们的土地财产的这一整个时期。

在斗争深入区域，这里已建立了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地方武装与革命群众团体是广大的发展了，地主富农的封建半封建的势力已经完全克服下去，土地已经彻底分配好了，农民群众在土地问题上的斗争，已经进到了改良土地发展土地生产的阶段。所以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土地建设问题。

在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其发展阶段介在上说两种阶段之间，即是从临时政权时期进到了正式政权的时期，但还没有到政权的完全巩固时期。这里地主富农公开的反革命斗争，已经在第一时期被革命群众打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分子，就从那时候起，摇身一变，把自己的反革命面具取下来，戴上革命的面具，也赞成革命，也赞成分田，自称贫苦的农民，照例应分土地。他们积极地活动，凭借他们历史的优点，“说也是他们会说，写也是他们会写”，所以他们就在第一时期中乘机偷取土地革命的果实。无数地方的事实证明他们在把持临时政权，钻进地方武装，操纵革命团体，有时候比贫苦农民分得更多更好的土地。及至进到第二时期，因为上级政府的督促与群众斗争的发展，改造了革命委员会为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也经过了第一步的改造与发展，那些假装革命的分子，部分的被洗刷出去。许多地方的土地实行了第二次分配，甚至第三次第四次的分配，地主富农偷取的土地也清除一部分来。但是苏维埃群众团体与地方武装中间，还依然躲藏着许多阶级异己分子，在那里“挂红带子称同志”，在那里造谣言，开私会，在那里骂群众为“左倾机会主义”“乱打土豪”“公报私仇”，或者他们“开会说得有劲，闭会一事不行”，当着斗争激烈的时候，他们组织反革命的秘密团体，如国民党、社会民主党、AB团、新共产党以及各种各色的东西来破坏革命，谋害革命的积极分子。总之，地主富农阶级用各种

方法来压制群众的斗争，企图保持他们政权上的与土地财产上的权利，保持他们残余的封建势力。在这些区域里，革命群众与地主富农之间是严重的斗争着，但这里的斗争，不是像第一时期里红旗子同白旗子的公开的斗争了，而是革命的农民群众同戴假面具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斗争。这种斗争有它的一种特别的困难，就是暗藏的反革命不比公开的反革命，农民群众能够一眼看清楚。加上农村中各种根深蒂固的封建关系如民族关系等。要使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程度，一般都认识到应该最后消灭封建残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定要耐心地去向农民解释，一定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要有正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方法。这里的中心问题，就是查田查阶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就不能最大限度的发展起来，封建残余势力不能完全打倒下去，苏维埃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巩固，扩大红军，筹备经费供给红军，扩大地方武装，进行土地建设与经济建设，发展文化教育等等重大任务，都没有法子得到最大的成功。所以查田运动是这些区域里的最中心最重大的任务。

拿中央苏区来说，这种斗争比较落后的区域，占了全苏区的大部分，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乐安、宜黄、广昌、石城、建宁、黎川、宁化、长汀、武平十三个全县，瑞金、于都、博生、胜利、永丰的大部分，公略、万泰、赣县、上杭、永定、新泉的一部分，就是兴国也还有均村、黄塘两区，所有这些都是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的地方。

这些地方的农民群众，还没有最广大地发动起来，封建势力还没有最后的克服下去，苏维埃政权中、群众团体中、地方武装中，还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在暗藏着在活动着，还有不少的反革命秘

密组织，在各地暗中活动破坏革命。为了这些原故，这些地方的战争动员与经济文化建设都远落在先进区域（兴国差不多全县，胜利、赣县、万泰、公略、永丰、上杭的一部分，博生的黄陂区，瑞金的武阳区，于都的新陂区，永定的溪南区等）之后，这种地方竟占了中央区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面积，群众在二百万以上。在这个广大区域内进行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在二百万以上的群众中燃烧起最高度的阶级斗争的火焰，向封建势力作最后一次的战争，而把他们完全打倒下去，是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

查田运动的第一步
——组织上的大规模动员

（1933年6月）

怎样进行查田运动呢？首先是组织上的动员。

苏区内一切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共产党苏维埃与革命群众团体三者在党的领导之下，协同一致的行动起来，才能达到每个斗争任务的完满完成。查田运动是一个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个群众的伟大革命运动，是党和苏维埃群众团体工作改善的根本，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环，只有整个党整个苏维埃工会都动员他们的全力，加入这个运动中去，才能发动开展与完成这个运动。关于党的动员，中央局已有正确的指示，关于苏维埃的动员首先要反对过去把查田运动看做只是土地部的工作，不但财政部、军事部、国民经济部与教育部认为是与查田运动毫无关系的，就是工农检察部、裁判部、政治保卫局也认为没有多大关系，甚至主席团也不去管理查田运动，这是完全不对的，须知整个苏维埃，没有哪一部分可以脱离查田运动不管的。第一，是各级政府主席团要用最大的注意去领导整个的查田运动。第二，各级土地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特派员，是各级政府在查田运动中主要领导与工作的部门，要在查田运动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乡区县三级苏维埃，肃清农村中的反革命，这些政府部门，必须

拿出他们最大的力量，财政部要注意从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去进攻封建残余势力，同时增加国家的收入，军事部要注意在查田运动中整顿与扩大地方武装，动员群众积极分子参加红军，国民经济部要注意从查田运动的发展中，去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合作社的发展，与生产品消费品的调剂。教育部不是没有工作的，他应为着开展查田运动供给一些简明通俗的课本与小册子，给予一切查田的干部与群众，他应跟着查田运动的发展，去发展群众的文化教育，因为现在苏区工会会员，最大多数是在农村中，并与土地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查田运动这个伟大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是最坚决的领导者，所以不论农业工会、手艺工会及其他工会，必须在全总执行局的领导之下，动员他们的最好干部与一切农村中的会员加入查田运动，最主要的是在贫农团中起推动鼓励的作用，与对于查田查阶级改造政府提出积极坚决的主张。总之，查田运动不是一件寻常小工作，不是一月甚至不是半年所能彻底完成的，所以必须有党、团、政府、工会各方面配合的大规模的动员。

这里要说到教育干部的问题：第一，须召集下级负责人开会，给他们以关于查田运动中几个主要问题的充分的说明，过去各级苏维埃人员，多不了解查田运动是一个紧急任务，不懂得实际去区分阶级成分，不懂得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的路线与方法，所以没有法子去开展这个运动。第二，这样的教育还应施之于从当地的下级调来从一切先进的区域调来的干部，要为他们开办短期查田运动训练班，省县两级政府要为了查田运动多次的开办这种训练班，一星期至两星期毕业，专门讲授查田运动几个主要的问题。省县区三级政府的土地部、工农检察部、政治保卫局，每部应有他们一组工作员（区一级的不脱离生产），每部对于自己的这一组人，应给予充分的

关于查田工作的教育。第三，一种教育是应该施之于行动中的，这就是省县两级的派人出去巡视，与区一级的每五天至七天召集自己派出的工作员及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检阅他们的工作经过。有前两种方法，而没有后一种方法，是不能争取工作的最大成效的。

查田运动[1]的群众工作

（1933年6月）

查田运动是一个剧烈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动最广大群众热烈起来参加斗争，形成群众运动，才能保障阶级路线的正确执行，才能达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的目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工作方式，是查田运动最大的敌人。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主要是讲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及对工会、贫农团的正确领导等。

一　讲阶级（作宣传）

（一）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宣传的内容，就是要向群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策略。

（二）为了说明这个策略起见，要将什么是地主，什么是富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贫农，什么是工人说清楚。在这个说明中证明地主是封建剥削者，富农是半封建剥削者，因此只有采取消灭地

---

[1] 查田运动，是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在分配土地后进行的一种群众运动，目的是清查漏划的地主、富农，按照当时的土地法没收和分配他们的土地、财产。

主、削弱富农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农、贫农、工人身上。

（三）但是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

（四）对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所以要反复向群众说明这个策略，说明侵犯中农利益的绝对不许可的。为了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起见，要提出“富裕中农”来说明它，要着重说明富农与中农交界地方，使富裕中农稳定起来。要揭破地主富农对于中农的欺骗，使中农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

（五）要揭破地主富农的每一欺骗口号，向群众作广泛的解释。要注意地主富农利用氏族的地方的落后观念，来对中农贫农进行欺骗破坏。

（六）要说明查田运动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武器。因为把封建残余势力肃清了，去掉了敌人藏在苏区的捣乱者，广大群众革命热忱提高了，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等项工作就更加好做。

（七）要按照当地环境提出具体口号。如在落后的村子，要找出落后的原因，提出发动群众的具体口号。比如该地有反动地主威胁群众，因此群众不敢积极起来斗争，必须提出捉起这个地主的口号。又如当地政府人员犯了脱离群众的严重错误，使得群众不满意，就要从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着手宣传，以发动群众斗争。

（八）以上均是宣传的内容，以下再说宣传的方式。查田宣传的对象，第一要向乡一级干部分子（乡苏代表、各群众团体负责人）

讲话，使他们首先明了，经过他们去宣传群众。第二要在工会与贫农团会议上讲话，使会员群众明了。第三要在村子群众大会上讲话，使每一个群众都明了。

（九）宣传员。主要由乡一级积极干部分子担当，有布置地出席群众会议去讲话。其次是组织宣传队，经过训练后派往群众中去讲话。

（十）宣传的方法，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等等。

二　查阶级

（一）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按亩查田，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二）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藏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人，查这些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因此不得挨家挨户去查，挨家挨户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三）查阶级之前，一定要经过宣传的阶段，即讲阶级的阶段，不经过公开地普遍地讲阶级就动手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四）查阶级要发动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及其他群众多数人去查，要群众查了随时报告贫农团与查田委员会。不应该只是少数人去查，少数人去查要引起群众恐慌，是绝对错误的。

（五）查阶级要查得明白。不论是一个地主，一个富农，要把他们过去的剥削情形和生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

群众满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断语，那就容易弄错，本人不服，群众不满意，就阻碍了查田运动。对那些中农的成分，更要仔细查清了，不使中农弄成富农，富农弄成地主。

（六）一家阶级查出来的材料，要填在一张“阶级成分调查表”上，使大家好评论，日后好根究。如只讲在口里记在心上，或只是在簿上写两三行，易得遗失，是不好的。

三　通过阶级

（一）通过阶级就是决定阶级成分，是对这个人决定“生死”的时候，故要十分谨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过。

（二）通过的次序：首先是贫农团，要开贫农团大会。经过大家讨论，大多数人举手赞成，才算在贫农团通过了。如有疑问的，移到下次讨论，此次不要通过。

（三）第二是乡查田委员会。对于贫农团的意见加以审查，对的通过，不对的改正，怀疑的再调查。

（四）第三是区土地部。区土地部决定不下的，提出于区查田委员会。区查田委员会决定不下的，提出交县土地部。

（五）第四是村子群众会。一定要在本人村子里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报告本人的剥削情形与生活情形，看群众赞成不赞成，赞成的通过，不赞成的再去调查，决不可硬要通过。如果硬要通过，就会引起群众不满，这就是命令主义，要坚决反对的。

（六）以上通过阶级的四个步骤必不可少。特别是群众会通过，更加重要。许多地方，不经过群众通过就去没收，是错误的。

（七）如果过去有通过错了的，如把中农当富农，富农当地主，

地主当富农，应该推翻原案。要在群众大会上说明过去错误了，现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众的满意。

（八）过去弄错了现在翻过来的，如是中农一定要赔他的土地财产，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赔他。如是富农，现在有赔则赔，如果实在没有赔，只好将来替他想别种方法。这种赔还，最能争取群众。如果将错就错，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对的。

四　没收分配

（一）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没收富农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只有经过村子群众大会得到群众的同意后，才能实行。决不可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决不可黑夜去没收。

（二）没收了地主的财产，除开现款及宝贵物件交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东西，都应分发群众，这是提高群众斗争热情的好方法。

（三）趁着开村子群众会通过阶级的时候，举出临时的没收分配委员会，即刻没收，当场分配，不得迟延没收，不得迟延分配，不得把东西挑到政府里去再讲分配。

（四）要分配给本村子，不可全乡平摊（大地主不在此例）。

（五）首先要分配给红军家属、雇农、工人，及其他群众的贫苦者，不可不分阶层同等分配。

（六）猪鸡等物，煮起来在群众大会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员少数人吃。

（七）政府工作人员最好不要求分东西，以作模范。如果十分缺少用物，要取得群众的同意，在群众大会上通过。要防止工作人员

自由拿东西。

（八）没收的耕牛及重要农具，在群众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九）没收来的土地，迟延不分是不对的，除开留出红军公田及公共事业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给过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时，以村为单位大家平分。山林、鱼塘、房屋、茅厕，同样要迅速分配给群众。

（十）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发展合作社等口号，领导群众热烈参加革命战争，热烈参加苏维埃建设。

五　工会、贫农团

（一）所有讲阶级，查阶级，通过阶级，没收分配等许多工作，都只有动员工会动员贫农团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会应成为农村阶级斗争的领导者，贫农团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柱石。

（二）正确地开展查田运动，依靠于工会指导自己的会员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内部起积极的作用。

（三）要发展贫农团，使贫农团成为广大贫农群众自由加入的团体。

（四）要洗刷贫农团中暗藏的坏分子。

（五）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要勤快开会，要抓紧查田运动为自己的中心工作。

（六）要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贫农团的会议，应该吸引中农来旁听。

（七）工会、贫农团领导查田斗争工作，不能违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

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与方法，来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作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因此，反对查田运动中的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反对包庇地主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

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

（1933年6月18日）

我们在第一章里说过，苏区有三种区域存在：

（一）斗争深入区域。

（二）斗争落后区域。

（三）新发展区域。

不但一省如此，有些边区的县也是如此，例如永丰，就有三种区域同时存在。多数的边区，一县之内，都有比较落后的与新发展的两种区域存在。至于腹地，固然有些县一般说来，它还是整个落后的，但在这些县中仍可找到它的比较进步的区，如会昌固然多数区都是落后的，但西江区就比较进步。瑞金又是一种情形，武阳区可以说是深入区域，桃黄、黄柏、砂心、瑞林、九堡、云集、渡头，城市八区是比较进步区域，其他六区是落后区域。但无论哪一县中的哪一区，只要是建立了苏维埃，经过了没收分配土地的阶段的，大概都有它比较进步乡与比较落后的乡，一乡之中，又有它比较进步的村与比较落后的村。一村之中，有没有这种不平衡发展情形呢？许多地方都是有的，许多地方都是小村子（小屋子）进步，大村子（大屋子）落后。有些地方因为历史条件不同，个别的大村子进步，个别的小村子反而落后，这也是有的。这种情形规定了我

们的工作方向，使我们在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乃至一个村中去发动查田运动，不能不集中最大的注意于落后的部分，向着这些部分用我们最大的力量，一体看待平均用力是不对的。因为落后部分争取群众发动斗争的困难，就说这是“打不进去”的，把工作方向改到容易发展部分，把困难部分置之不谈，这更是不对的。自然工作的步骤，如果拿一乡来说，可以而且应该先从容易发动的村及容易发动的屋着手，但我们工作计划的重心仍然是在那些落后的村屋。为了要消灭某个村屋的特别落后（一时“打不进去”），先从好做的村屋下手，由此去影响落后的村屋，跟着去发动落后村屋的斗争，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拿一县一区来说，就不应是这样，在一县一区之内计划查田运动，应该一下手就用大力去突击那些落后的区乡，而对比较进步区乡只用次要的力量。

不平衡发展状态，又告诉我们一种方法，即是要从先进区域动员干部到落后区域去领导查田运动。从兴国等最先进区域动员干部去落后区域固然是要紧的，从一切地方的一切比较进步区域动员干部到落后区域同样是迫切的需要。一切先进的及比较先进的区域，都应该负责领导落后区域的责任，一切落后区域都应该学习先进区域。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开展查田运动。

菩萨蛮·大柏地[1]

（1933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2]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3]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4]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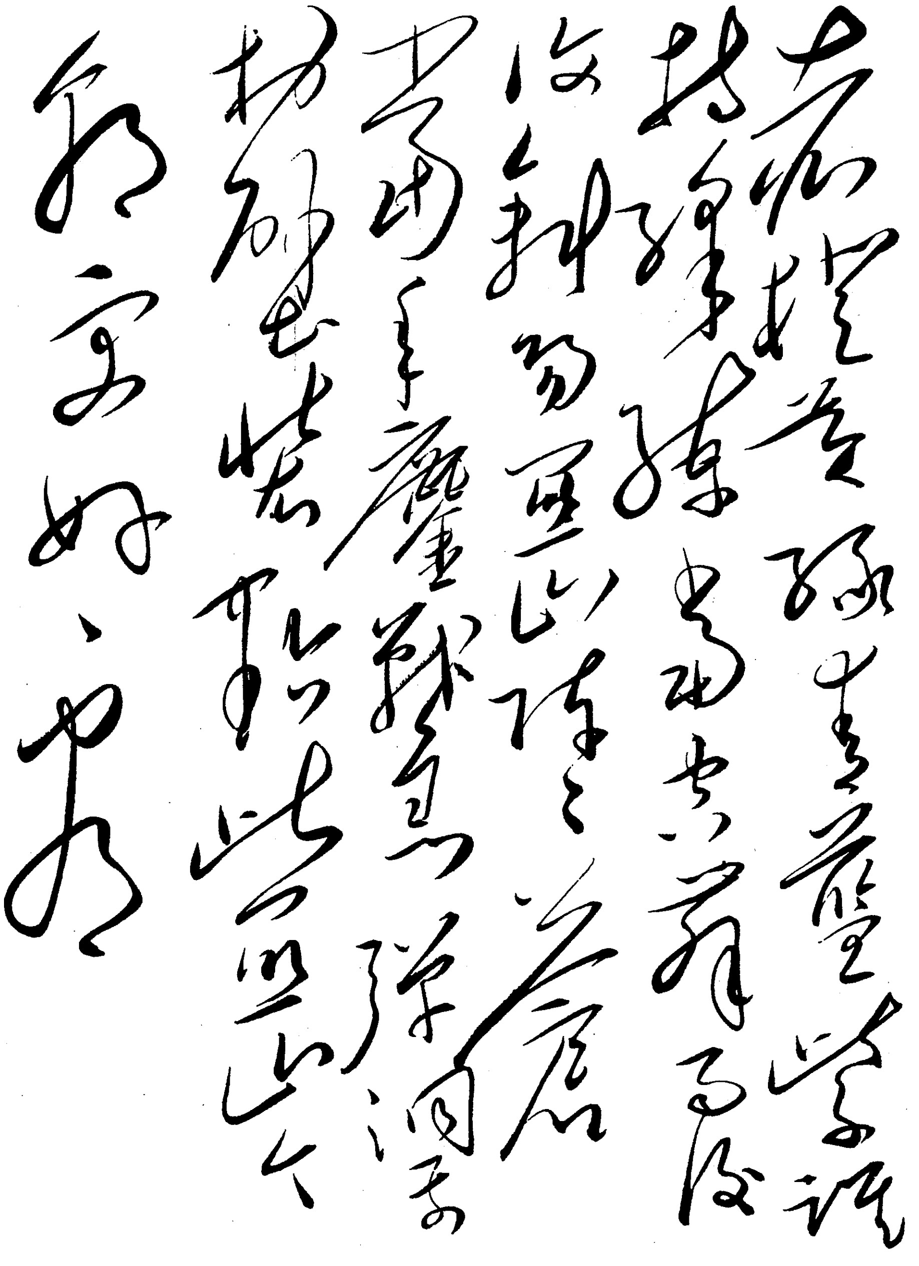
---

[1] 大柏地，在江西省瑞金县城北六十里。1929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由井冈山向赣南进军。2月10日（正值春节）至11日，在大柏地击败尾追的国民党赣军刘士毅部，歼敌近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并缴获了大批武器。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红军部队离开井冈山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这首词是作者1933年重过大柏地时所作，当时他已被调离军事领导职务，专任政府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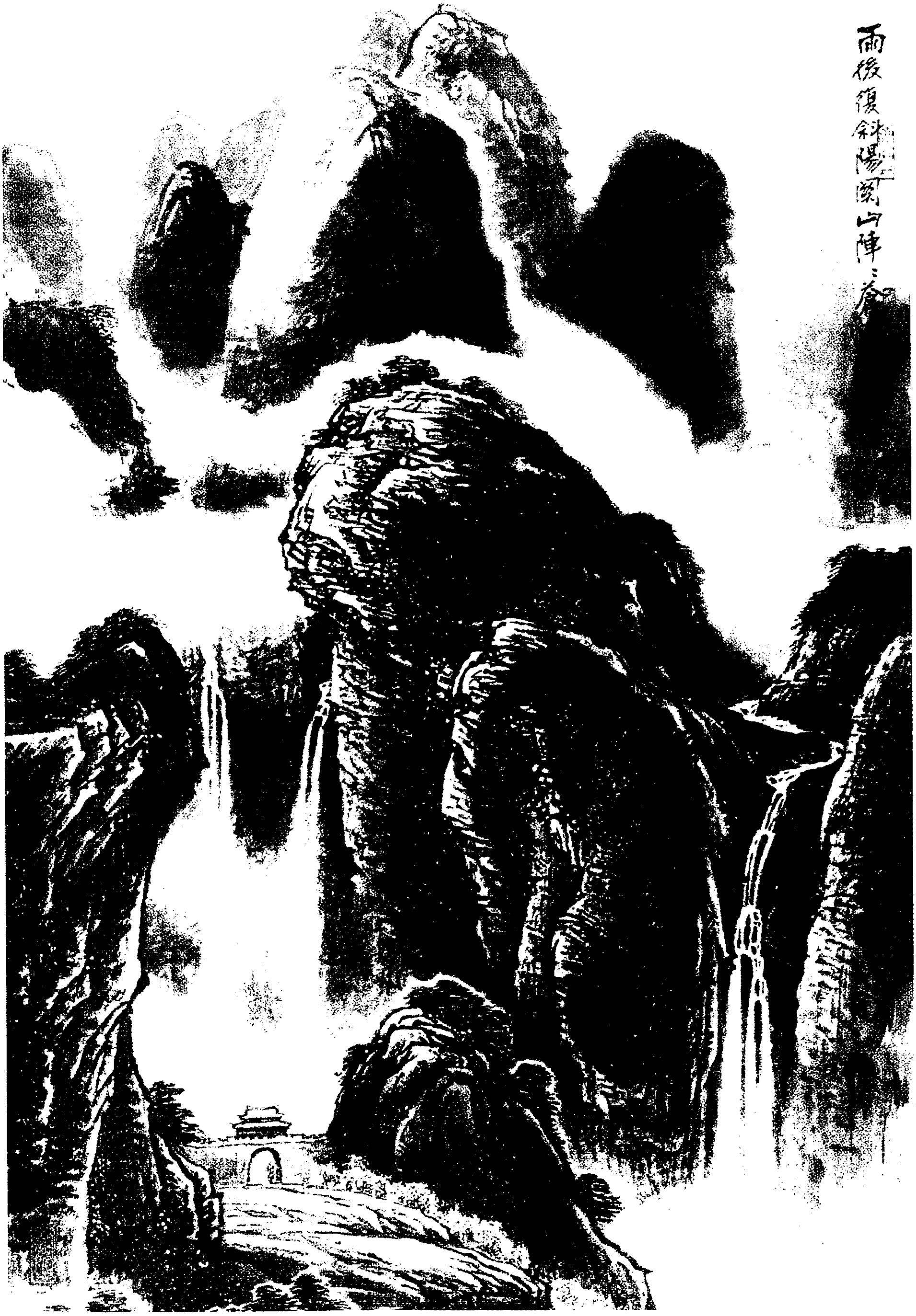
[2] 彩练，彩色的丝绸，比喻虹。

[3] 雨后复斜阳，唐温庭筠词《菩萨蛮》：“雨后却斜阳”。

[4] 洞，射穿。



毛泽东手书《菩萨蛮·大柏地》。



《关山阵阵苍》（诗意画）

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查田运动大会所通过的结论

（1933年6月21日）

一　关于组织上的动员

（一）政府的各部门必须一致行动起来，不但土地部、工农检察部、裁判部、政治保卫局须负查田运动的主要领导责任，财政部、军事部、国民经济部、教育部，亦须在查田运动中进行各项必要的工作。而政府主席与主席团，则须负起整个查田运动的领导责任。过去把查田运动看成只是土地部的工作，是错误的。

（二）县区乡三级均应组织查田委员会，隶属于各级政府之下，担负查田运动的总的领导责任。其委员除政府负责人外，还应包括群众团体等的人员在内。

（三）县苏应立即定出七月份全县查田运动计划，以后每月末尾定出下月的查田运动计划。

（四）区苏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开会，计划全区第一个七天工作，以后每七天计划并检阅工作一次。但距离太远的乡可以每十四天到区苏开会一次。距离不远的乡，则必须七天开会一次，推动查田运动的迅速发展。

（五）乡一级的动员方式应注意：（1）乡代表会，（2）工会，

（3）贫农团，（4）妇女代表会，（5）赤卫军与少先队，（6）其他革命团体，（7）村屋群众大会，必须经过这些机关、团体与群众大会，才能动员最大力量加入查田运动，一切缩小范围只图简便不顾到大多数群众的办法是不对的。

（六）县苏开办查田运动训练班，每乡一人，十天毕业。开办第二班，也是每乡一人，从乡苏代表会贫农团、工会中挑选最积极分子来受训练，派回本乡领导查田运动，但从先进区乡来的，须派赴落后区乡工作。七、八、九三个月每月须开办两班。

省苏应从先进县区挑选积极分子开办查田运动训练班，派赴落后县区领导查田运动。

（七）为了有力地进行查田运动，政府各部的组织，应立即健全起来，主要是解除兼职，废除轻易调动的习惯，和增加必须的工作员。

（八）乡一级组织没收分配委员会，由贫农团选举而隶属在乡苏之下，担负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财物之责。

二　关于在查田运动中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

（一）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并使雇农起领导作用，这样去完全消灭地主阶级，打击富农偷取土地革命利益并削弱富农的经济势力。这是查田运动中应该坚决执行的正确的阶级路线与斗争策略。关于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中农（富裕中农在内）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应平分。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维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进行中，应审慎决定那些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在分配没收来的

土地财产时，应注意到中农中的个别贫苦分子不使向隅。关于使雇农起领导作用，主要是使雇农都加入贫农团，而成立雇农小组，经过他们去团结贫农积极分子，发展贫农团，推动查田运动前进。在分发没收来的土地财产时，雇农应是首先分得者。

（二）从实际社会关系中正确地分析阶级成分，是执行阶级路线的重要部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面所犯的一切错误，必须迅速改正。要根据此次规定的标准（“怎样分析阶级”）去解决一切实际的阶级成分问题。要在群众中普遍解释这个标准，首先是教育干部使之完全懂得这一个标准。

（三）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那种说到查田就以为应“插牌子”的意见，是不对的。只有在“查阶级”的残酷斗争完结之后，大多数群众要求再分的那些个别的地方，才可以准许再分田。这种严格的分别，不但为了稳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集中全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队伍中发生任何的纷扰。

（四）要避免一切可能发生的民族地方斗争，团结一切力量去开展对地主富农的斗争。因此发动本村本姓的贫苦群众，清查本村本姓的地主富农，是查田运动中的重要策略。同样破除迷信的斗争（虽然是应该的），亦应放在“查阶级”的斗争之后。

三　关于群众工作

首先要纠正过去许多地方对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视，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必须明白只有耐心地艰苦地去做发动群

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发动他们最大的积极性，达到完全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惟一保障，应该在下列各项查田运动的实际行动中完全表现出来。

（一）查田运动的开始必须在一切村屋中作广大的宣传，向群众说明查田运动的必要，查田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查阶级是不侵犯中农的，特别重要的是把什么叫做地主富农中农向群众分析明白。村屋群众大会应不止开一次，特别那些最落后村屋须多开几次，应该不让一个革命群众不听到我们的查田运动宣传。要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首先在乡代表会、工会、贫农团、劳动妇女代表会及其他群众团体中，向一切积极分子解释明白，经过他们去向广大群众作普遍深入的宣传。

（二）搜集了关于地主富农成分的报告，进行实际调查的时候，应该不止查田委员会少数人去查，而要发动乡代表会贫农团工会的积极分子从各方面去查，将地主富农各种复杂的剥削作恶情形一概查出来证明给群众看，同时将牵涉到中农的误报给它证明不成立。

（三）在贫农团通过那些被查的地主富农成分之后，还应该提向乡苏通过，提向区苏批准。在这些过程中，要注意暗藏在贫农团与苏维埃中的地主富农分子的一切阻碍与反抗，对于这些分子应予以严厉的打击，同时要注意真正中农成分的误被通过。在进行没收处理之前，还要在被没收人的村屋中召集群众大会，经过详细说明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进行没收处理。过去许多地方只图省便，忽略这种群众会上的通过，常常酿成群众的不满，甚至造成严重的氏族地方斗争，这种错误以后不应重复。

（四）没收的财物除现款及与现款相同的东西（如金银首饰）应

交给政府财政部外，其他一切应完全发给贫苦群众，过去许多地方没收财物归政府的错误办法，以后须彻底改正。分发财物时应注意多发给财物所从出的村子，取得这些村子中群众的满意。秋收时及秋收后不久没收的谷米，在群众的同意下可以暂时贮存起来，待来年春夏发给贫苦群众。但群众要求发给时，便须立即发与群众。没收的土地除留出公共事业田及红军公田之外，应一概分与过去没有分得田的及田分得不够的人。财物与土地的分配应该迅速，不应没收了好久还拖延不分配。分配土地财物时应开群众大会，开单出榜，使众周知。

（五）争取落后村屋，尤其是大村子，是许多地方的重要任务，因此要特别注意下列各点：（1）发动本村的贫苦群众，清查本村的地主富农。（2）多次的“讲阶级”大会。（3）找得积极分子好好教育他们，即使一个也好，经过他们去取得与当地群众的联系，去发展贫农团，开展当地的阶级斗争。（4）特别严重地方，须首先捉拿那里阻碍斗争的反动分子，在公审大会上审判他，在群众的同意下枪毙他，跟着去发展群众斗争。（5）过去有两姓斗争的地方，须在两姓群众的代表会议上订立“团结公约”，互相承认过去错误，相约以阶级斗争代替过去的两姓斗争。以上这些都是争取落后村屋尤其大村子的必要方法。这里要反对对落后大村子的畏缩投降，要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方法，要反对对于反动分子的机会主义放任，要反对姓界斗争与地方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一切落后村子的革命群众，消灭这些村子的封建残余。

（六）查田运动中贫农团是有极伟大作用的团体。过去有些地方贫农团有名无实的，须立即真正组织起来。已组织了的，须立即团结其中的积极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坚决洗刷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

子及其他最坏的分子。要极力避免把整个贫农团解散重组，那些借口一二次召集不成会就解散贫农团的命令主义办法，是完全不对的。应该以很好的宣传鼓动去号召积极分子到会，即使到会的是少数也应同他们开会，由此去争取会员的发展。贫农团应该包括农村中一切自愿加入的工人群众，在里面成立工人小组，起推动领导的作用。中农不应加入贫农团为会员，但开会时可以邀请中农来旁听，特别在通过阶级成分时应该邀请他们旁听。过去贫农团三个人的干事会应改为五个人的委员会，互选主任一人，下分小组，按照住所接近每五人至十五人为一组。贫农团开会在查田运动最紧张时，可以几天开一次会，在查田的运动完结后，则按照常态开会。但频繁的会议仍须顾到会员群众的情绪去开，任何命令强迫都是有害的。每一次会之前，乡苏主席应指导贫农团委员会将议程内容作充分准备，无准备的开会是最坏的习惯。查田运动期中区苏应每七天或十四天召集贫农团主任开会一次，讨论健全贫农团的组织及领导斗争的方法等问题，必要时还可召集临时的全区贫农团代表大会。

四　关于改造苏维埃

（一）在查田运动中改造那些不健全的苏维埃机关，使之成为完全能够代表工农利益的，并且有充分工作能力的苏维埃，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二）改造地方苏维埃机关，分为洗刷坏分子出苏维埃去与吸引积极革命分子进苏维埃来两方面。关于洗刷坏分子，县与区的工农检察部应负主要责任，其方法是跟着“查阶级”的斗争的发展，在乡一级组织检举委员会，进行检举。乡检举委员会应由工会二人，

贫农团五人，妇女代表会二人，青年团轻骑队一人，少先队一人组织之，互推二人为主任，直接在区工农检察部领导之下。检举的目标主要是乡代表会中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完全离开工农利益向地主富农投降妥协的那些分子。检举的方法，第一，应将这些分子列出名单，搜集罪状，通知全乡群众发表意见。第二，收集了群众的意见，检举委员会做成结论。第三，提到乡苏代表会经过讨论，通过开除。第四，报告区苏工农检察部，经过区苏主席团的同意，用工农检察部名义向全乡群众布告开除。在检举运动中，工农检察部的突击队、通讯员，与控告箱，都应使之起充分的作用。那些罪恶最严重的分子，还应经过群众审判会的审判，交与裁判部依法裁制他们。检举与公审的意义，一方面在清除现有苏维埃中的坏分子，一方面还在教育广大群众使群众明白苏维埃中的坏分子是应该清除的，大家起来督促与拥护苏维埃，使以后不致还有这样的坏分子继续产生。检举与公审，不应该扩大到过去不甚积极的分子及犯有轻微错误的分子，对于这些分子，主要应用批评鼓动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公审之前，对群众要有充分的宣传，说明被审人的各项罪恶，以防被审人欺骗一部分落后分子，当公审时在会场捣乱。在有族界、房界、村界斗争的地方，不应轻率举行公审，必须在这些非阶级的斗争没有了，群众认为有公审的必要时，才能举行公审。

区苏与县苏中坏分子的检举，应在同级工农检察部领导之下，由群众团体与同级政府中下层工作同志（科长以至火夫）推举代表组织检举委员会，进行检举。区一级的检举委员会，还应吸引乡一级的积极分子，每乡加入一人。检举的程序与内容，与前述乡的检举大略相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苏维埃检举运动，上级政府主席团及工农检察部，应有计划地去领导下级，随时检阅下级检举工作做

得是否有错误，及时纠正他们的错误，同时应收集检举工作的具体经验，教育下级政府主席团、工农检察部及其检举委员会。

（三）关于吸引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乡一级的，第一是召集选民大会，选举查田斗争中最勇敢坚决分子进乡代表会中，补充那些被洗刷出去的坏分子的缺额。这种选举，事前要有好的准备。在这次补选中，可以选举几名至十几名的候补代表，在新的积极分子涌出得多的地方，尤其有此必要，以便逐渐代替那些十分不称职的落后的代表分子。第二是吸引大批新的积极分子进乡苏管辖下的各种委员会来，如土地建设委员会、山林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使这些委员会真正建立并工作起来。第三，在今年秋天全苏区的总选举中，务必要使查田斗争中多数积极分子都能当选到乡苏中来。

区一级的，在过去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只有小部分坏分子的区苏，就拿其余的好分子来代替被洗刷的坏分子的职务，同时还应引进乡苏中积极分子来区苏参加工作。个别地方在过去区执行委员会坏分子占多数时，应该在查田运动开展中间，由县苏派人领导开全区临时代表大会，改选区苏。

县一级的补充人员，可用县执行委员会中以好代坏，及从区苏乡苏中挑选好分子上来参加工作二种办法。

五　关于肃清反革命

（一）各级政府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整个系统，都要用大的注意向着各地暗藏的地主富农分子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及个别分子的一切活动，在查田运动中根本肃清他们，特别是省县区三级政治保卫

局及其特派员要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去进行肃反工作，要纠正过去许多地方忽视反革命活动的错误观点。

（二）查田运动中的肃反，主要是跟着群众“查阶级”的斗争，指导群众报告消息，追寻反革命线索，以至逮捕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查田运动期中，准许保卫局区特派员有逮捕犯人之权。逮捕要经过特派员的预审，提交区裁判部审判。重要犯人要在犯人住居的乡村组织巡回法庭，当着群众面前公开审判，在群众同意下就地枪决。这样去激发群众对于反革命的仇恨与警觉，而不应如过去有些地方一样，捉了犯人向县苏一送完事，忽视广大群众对反革命的愤恨，也不知借此教育群众对于反革命的继续警戒。为了达到肃清反革命的目的，对于侦察，逮捕，审讯，监禁，都要大大改良过去所用的技术。

六　关于用罚款捐款向地主富农进攻

为了根本消灭地主阶级一切经济上的根据，为了削弱富农的经济势力，用地主罚款富农捐款的方法去进攻他们，是完全必要的。从八县许多地方地主富农的多数或大多数尚未清出的事实看来，八县在七、八、九三个月内筹款八十万元，应该是有把握。县及区的财政部，应为此事用最大的努力，主要方法，是指导乡苏，动员雇农工会、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对于地主富农家产的调查，适当地规定每人罚款或捐款的数目，严厉地催促等等。这里要注意不得牵涉到中农身上去。而对于富农与对于地主，也要有轻重上的分别，即是说地主是消灭他们，富农则是削弱他们。

七　查田运动与战争动员经济文化建设的关系

（一）在查田运动的胜利中，八县创造红军八万，是完全可能的，并且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只要在七、八、九三个月中，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八县的最广大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六个月至十个月内，八县动员八万个新战士向前线去，完全有实现的可能。因此这一任务，就主要依靠于查田运动的开展与深入，不从查田运动方面努力，而单纯在扩大红军方面努力，这是八县过去扩大红军成绩不够的根本原因，这点须有深刻的认识。

（二）在查田运动的胜利中，八县普遍发展合作社，主要是消费品的、调剂粮食的、生产必要用具的（主要是农具）、与贷款给贫苦群众的，几种合作社，以抵制投机商人对于广大群众的残酷剥削，发展整个苏区经济以抵抗敌人的经济封锁，是当前重大任务之一。为了迅速而且大规模地进行这一经济战线上的战争，需要有苏维埃与群众的伟大组织力量，与大数目的资本。因此建议到中央政府，请求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用粮食交付，好迅速进行这一工作。这一工作的完成，同样依靠于查田运动的胜利，不从查田运动上用大力，发动大多数群众都积极起来参加经济建设，要十足完成这一任务是不可能的。

（三）秋收与秋耕两种大事，摆在很近的目前，这是群众生活与革命战争的根本关键。因此要在查田运动中，争取今年秋收秋耕的完满胜利。

（四）文化教育运动，广大的发展，也只有在查田运动的胜利中才能实现，如像千人中建立一个俱乐部，五百人中一个小学，百人中一个夜学，十六岁以上大多数都进识字班，在群众的大多数都积

极起来的时候，完成这样的文化教育建设，是并不困难的。兴国现在即已差不多一般地达到了这样的成绩，就是个很好的榜样。

八　在敌人的进攻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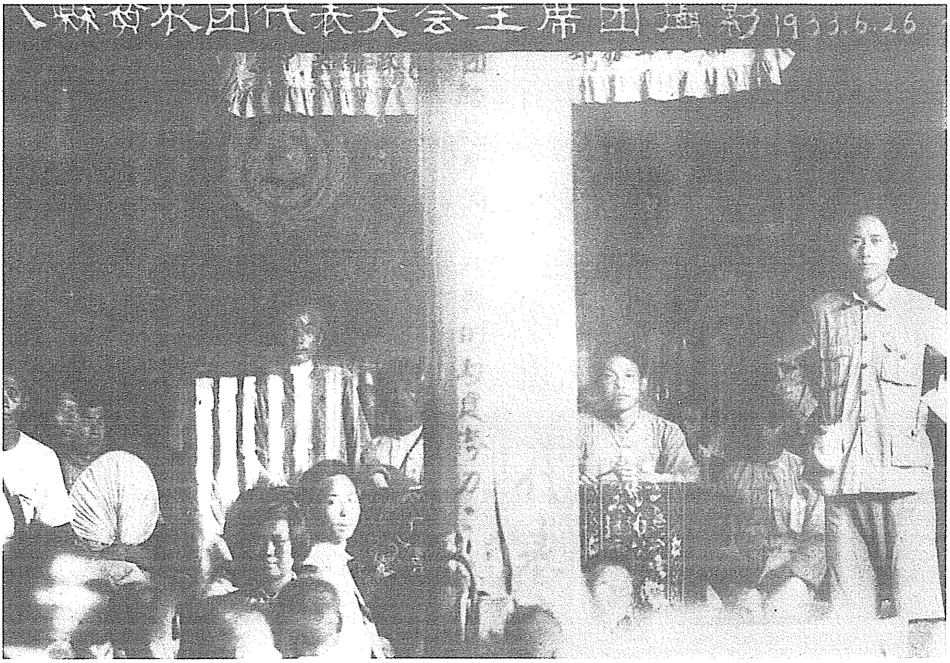
敌人对于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虽在北面战线上我英勇的红军已经将蒋介石的主力基本上打破了，但敌人还是在向我们进攻中。虽然敌人瓦解崩溃程度与日俱增，敌人有他的无数的困难，但仍不忘记对我们的进攻。现在广东的敌人已进至寻乌、安远，福建的敌人仍盘踞上杭、连城、清流一带，这对于八县及其邻近是一个大的威胁。为了根本消灭这些敌人的主力，把他们的残部驱逐出去，除了红军的英勇作战外，主要是依靠着广大的群众战，这更加上了查田运动一个紧急战斗任务。在逼近着的敌人面前，不但不能放松查田运动，而且要加倍努力去开展查田运动。必须在查田运动中迅速地争取几百万群众都积极起来武装起来，消灭敌人的内应分子地主富农的残余势力，建设了铁一样巩固的苏维埃，战胜敌人就有了充分的保障了。

九　拿查田运动的胜利拥护第二次全苏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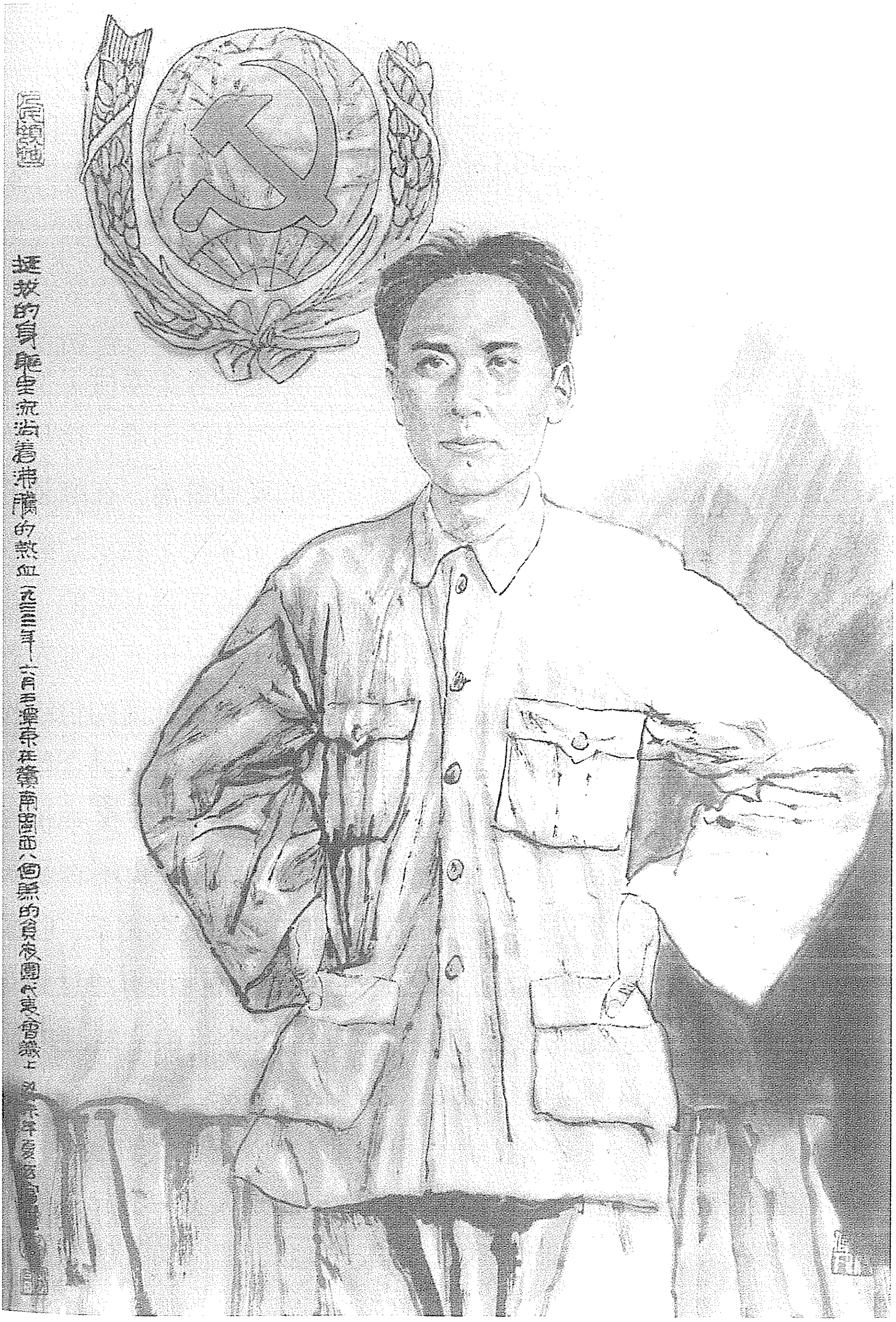
要在十二月十一日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彻底完成查田运动，因此特别要加紧七、八、九三个月的工作。要在十月开一次八县查田运动的检阅大会，在八月中央派人巡视各县时，即要有具体的成绩表现出来。为了加快查田运动的速度，八县自动地订立了查田运动竞赛条约，为了完全实现这些条约而斗争。

十　严厉处罚破坏与反对查田运动的分子

在查田运动的残酷斗争中，混进苏维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最坏的分子，必然会出来破坏或反对查田运动。这样的分子，应该遵照中央的查田运动训令给以严厉的处罚。即如此次大会在中央政府直接领导之下，到会人员都一致拥护中央的查田运动方针，热烈讨论工作进行的时候，乃有宁化禾口区土地部长黄衍泮发出根本反对查田运动的言论，经过分组会与大会对他的严厉批评与打击，但他始终不承认错误。大会认为黄衍泮是完全站在帮助阶级敌人抵抗广大群众查田斗争的立场上，完全污辱苏维埃的职务，建议中央政府撤销他的禾口区土地部长职，并交付宁化县苏监视他的行动。只有把这样最坏的分子清洗出去了，才能更加整齐革命的队伍，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与反抗，完成查田运动的伟大革命任务。


八縣貧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团摄影 1933.6.26.

1933年6月26日，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


挺拔的身躯里流淌着沸腾的热血

《挺拔的身躯里流淌着沸腾的热血》（中国画）

关于倡办粮食合作社问题

（1933年7月4日）

中央苏区本来是一个产米很多的地方，但是在今年弄成了部分夏荒的现象，有些工农群众米不够吃，感受了很大的困难，这是值得严重注意的事。原因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绝望的挣扎之中，不但采用一切政治军事力量，而且还采用了经济封锁政策，以致工业品的供给减少，价格昂贵。群众为要买得必需的工业品，不得不把新谷用绝顶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于是一班奸商富农就乘机操纵市价，把新谷价格压低到惊人的程度，以最低廉的价钱收买大量的粮食，或囤积居奇，或偷运出境，弄得有些群众到今年青黄不接时米不够吃，又要出钱去买贵米，这班奸商富农又乘机操纵，把谷价抬到很高的程度，甚至有些地方就是高价也不容易买得，这就是造成今年夏荒的主要原因。其他如去年天灾关系，收成不好，及白军团匪在边区的抢掠焚毁，并且政府方面没有注意到有计划的存储，无限制的粮食出口，也都是造成今年粮食缺乏的原因。政府对于消灭这种不好的现象，已想很多办法，如设立各地粮食调剂局、贸易局，并准备存储大量的粮食，以备群众的急需。但是最主要的解决工农群众粮食供给的办法，还是大家一齐起来组织粮食合作社，办法是：劳苦工农群众自己集股，股金可用钱缴也可用谷缴（扣成钱数），秋收后社员需要钱时，就可将粮食以比较市价

高些的价钱，卖给合作社。合作社收买的谷子，可以存储一小部分，供给来年青黄不接时社员的急需，其余大部分可陆续运到粮价高的地方出卖或出口，这样继续不断地粜进粜出，不但可以扩大资本，而且可以使社员得到很多的赢余。我们用这方法可以调剂市价，使苏区粮食价格在常年内不至过高或过低，同时可以保障农民不受粮食缺乏的困扰，免去奸商富农的残酷剥削，工农生活得到最大的改善。工农劳苦群众要马上动员起来，你邀我、我邀他地一齐加入粮食合作社。各种群众革命团体，应该用最大的力量，帮助这一工作的进行，各级政府的负责同志更应该负责把粮食合作社的意义和作用，作最普遍的深入的宣传，领导群众，帮助群众，使每一乡至少要建立一个粮食合作社。现在就要着手报名造册，照中央政府所发的粮食合作社章程选举负责人员，另方面建立好谷仓，在秋收前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使在新谷上市时立刻可以进行工作，这是保证群众粮食、巩固苏维埃政权，使革命战争迅速顺利发展的重要工作，绝不准有丝毫的忽视。特此布告。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四日

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

（1933年7月11日）

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1]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今年的“八一”，正是帝国主义新的强盗战争及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极度紧张的时候，正是日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公开出卖东三省、热河[2]与华北的时候，同时是全国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极大的高涨，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得到空前伟大胜利的时候，因此今年的“八一”有着非常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为决议如下：

（一）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

---

[1] 南昌暴动，指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新时期的开始。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二）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三）在区苏[1]土地部与乡苏[2]之下，组织红军公田管理委员会，管理红军公田的生产收获及收获品保管等事宜。在区苏土地部与内务部的共同管辖下及在乡苏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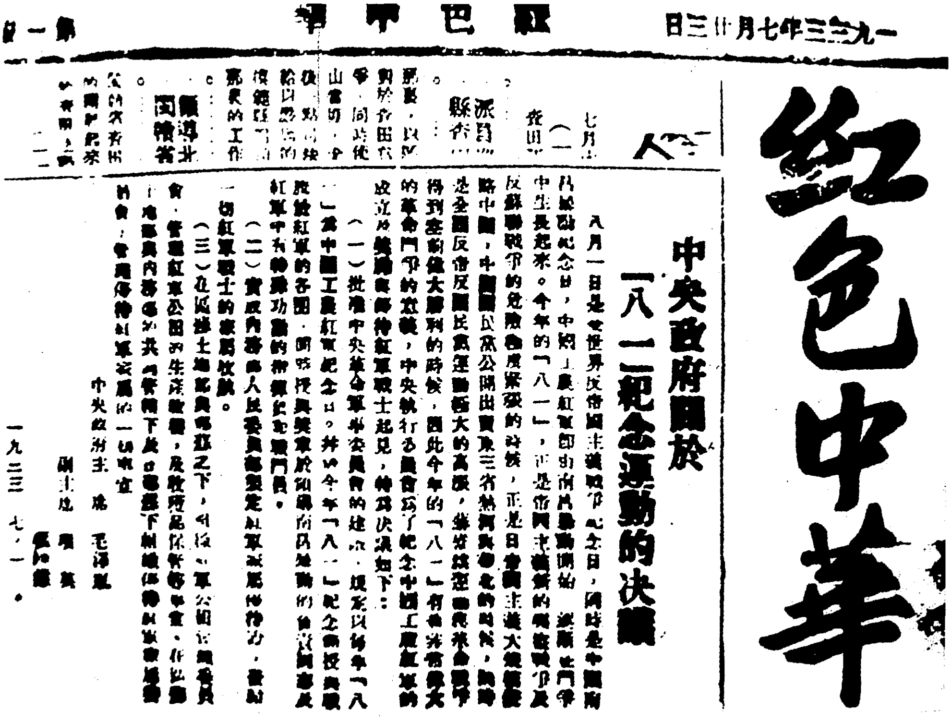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3]

---

[1] 区苏，区苏维埃的简称。

[2] 乡苏，乡苏维埃的简称。

[3] 一日，应为十一日。



紅色中華

一九三三年七月廿三日

中央政府關於「八一」紀念運動的決議

中央政府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項英　張國燾

一九三三　七、一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每年8月1日为红军纪念日（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图为《红色中华》发表的毛泽东等签署的关于“八一”纪念日的决议。

为查田运动给瑞金黄柏区苏的一封信

（1933年7月13日）

黄柏区苏各同志：

你们在中央土地部工作团的帮助之下，发动了黄柏区十二个乡的广大工农群众，热烈地起来查田查阶级，在这一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查出了二百七十家以上的地主富农，这些都是过去当作中农贫农，有些地主当作富农的分得了土地，并且分得了好田的，这个数目同区苏过去三年来所处置的一百二十二家地主富农比较，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一查田查阶级的斗争中，没收了许多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镇压了反动派的活动，提高了全苏区广大群众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清洗了混入苏维埃中的一部分阶级异己分子及其他最坏的分子出去，吸引了大批工农积极分子进苏维埃来，改选了乡苏与区苏，大大地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这是黄柏区此次查田运动的伟大的胜利。但黄柏区的查田运动是还没有完毕的，还有些残余的封建势力与一些反动派的活动，尤其是上塅乡新庄乡蓝田乡各一部分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仍在欺骗煽动一部分群众或明或暗地活动着，有些正在企图翻案。这种情形你们还须给予极大的注意，还须最广泛地发动这些乡里的群众起来，揭破反动分子的阴谋，继续清查残余的地主富农成分，镇压上塅等乡的反动分子，防止他们的反攻与翻案的企图，绝不疲倦绝不动摇地坚决领导群众的

斗争，争取查田运动的最后胜利。

详细地检查了你们所决定的阶级成分调查表，里面所决定的成分，极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也有一些是决定错误的，如有几家应该决定地主，你们却决定富农，甚至决定中农。有一家应该决定富农，你们却决定高利贷者。还有一家，对劳动力方面，表上填得不清楚，希望你们再行调查决定。今为引起你们对于阶级成分的决定应有慎重的与明确的注意起见，特将你们决定错误的成分共计十家列举并加以分析如下：

（一）周宗仁（上塅乡人）全家三人，不劳动（在二十年前本人请过长工十二年）。自己有田五十担，完全出租，每年收租谷二十五担，收了七年。有山二块，每年出息数百毛。放典租四担，扣洋一百元。（你们决定中农）

（二）谢明泗（上塅乡人）全家只有他一个人，他是不劳动的。自己有田三十九担，完全出租，每年收租谷十六担，收了二十年。有房子一间出租，每年收租谷一担，收了二十多年。放债一千零四十毛。过去在农村中曾压迫人，并曾强迫群众打过红军。（你们决定富农）

（三）朱德蒙（新庄乡人）全家二人，不劳动。自己有田四十一担，完全出租。放典租六担，又放债三十元，放了八九年。（你们决定富农）

（四）钟同其（山河乡人）全家二人，不劳动。自己有田八十五担半，经常请长工并零工耕种四十六担半。出租三十九担。放生谷一担。管公堂二个。（你们决定富农）

（五）刘芳洛（富溪乡人）全家三人，不劳动。自己有田五十四担，借进田十担，交租二担九十斤。出租田三十五担，每年收租谷

十四担，收了八年。请长工短工耕二十九担。欠债一千五百九十毛。管公堂一个，管了八年。过去在乡村有势力，压迫人。（你们决定富农）

以上五家，依照调查表上所填的情形，从他们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上看来，不是中农富农，而都是地主（小地主）。周宗仁、谢明泗、朱德蒙，均全家不劳动，土地完全出租，专靠收租过活，是标本式的地主，你们决定周宗仁是中农，谢明泗、朱德蒙是富农，都错误了。钟同其、刘芳洛，均全家不劳动，全靠剥削为主。他们和前三家的不同，就是他们是拿一部分土地出租，另一部分土地却请长工来家里耕种，但这同样是小地主，不是富农。因为中国农村中劳动力价格极廉，地主阶级中有许多都利用自已的一部分土地及旧式的农具，请工到家里耕种，极残酷地带着很多封建奴役性的方式去剥削工人，而同时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去剥削农民。这里与富农的不同，就是他们并不参加劳动，而富农则是亲身参加劳动的，你们把这一点忽略了，所以作了错误的决定。

（六）萧序皎（院坑乡人）全家四人，本人附带劳动（本人革命时〔被〕杀了）。自已有田六十二担，请长工耕三十八担（请了长工二代，到革命时止）。出租田二十四担（三十六年）。木梓山三块，每年出木梓四十担。放债二百一十毛。管公堂二个，这二个公堂每年收谷二十担，收了三十五年。过去曾压迫人。（你们决定富农）

（七）刘积何（胡岭乡人）全家三人，本人附带劳动。自已有田六十五担，请长工零工耕种三十二担。出租三十三担，收租谷十五担。有山三块，每年出息三十余元。有塘一口，每年出息二十余元。出租房子六间，每年收实谷六担。出租厕所一只，每年收租谷三十斤。欠债十元。管公堂四个，这四个公堂每年可收租谷八十九

担二十斤。在农村中很有势力。（你们决定富农）

以上二家各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同时又各请长工耕种一部分土地，几乎全部依靠剥削为生，这些都是与前面钟同其、刘芳洛两家相同，不同的是本人有附带劳动。但只是附带劳动，仍然应该决定是地主，你们决定富农是不对的。因为富农是实际参加土地生产者，只是附带有点轻微劳动的仍然不能说是富农。这种自己有点附带的轻微的劳动，最大部分依靠剥削为生的小地主，在中国是不少的。

（八）陈择洪（院坑乡人）全家五人，劳动一人。自己有田六十一担。借入田十担，交租谷三担，田地由自己及长工耕种。有木梓山二块，每年收木梓四十担。每年请长工一人，请了十年。放典租三担半，放了三年。放债五百毛，放了二十余年。出租房子一间，每年收税四毛，收了三十四年。管公堂一个，这个公堂，每年收租谷十八担，收了三十五年。过去在农村中曾压迫人。（你们决定中农）

陈择洪经常请长工，兼放高利贷，又管公堂，他的生活来源，大部分倚靠剥削。但他本人是实际参加土地生产者，这是中国标本式的富农，你们决定中农是错误的。

（九）钟国芳（柏地乡人）全家九人，三人劳动。自己有田一百一十二担。有木梓竹山三块。放债共毛洋三千二百毛，放了十余年，出租房子二间，每年租价二元，因未交钱，利上加利，一直到七千多毛。（你们决定高利贷者）

专靠或大部分靠高利贷剥削为生的人，叫做高利贷者，苏维埃对高利贷者的政策，是全部没收，消灭他们。钟国芳自己有田一百一十二担，完全自己耕种，为其生活的主要来源，我们决不能因他兼放高利贷，就把他决定为高利贷者而取消灭他的政策，这种抹杀

他自己的劳动的过左的意见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决定应该是富农，没收他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而仍应分给他比较坏的劳动分地。为什么不说他是富裕中农？因为他的高利剥削到了一万毛之多，并且是经常的。富裕中农有些虽也有一点剥削，但不是经常的，并且数量必是不多的。

（十）刘启昌（柏地乡人）全家四人，本人附带作田，兼做猪子牙人。自己有田三十六担。借进田四十四担，交租十五担。有山二块，每年收木梓桃二十担。请长工共十八年。放典租二担，放生谷一箩。管公堂一个，此公堂每年收谷十五担。（你们决定地主）

决定此人是地主，我们有些怀疑。依据表上看来，他家作了八十担谷田，耕了二块山，如果只一个长工耕种，是不够的，恐怕本人劳动有相当得多。如果本人劳动有相当得多，那就应该决定为富农，不应该取消灭他的政策，而应该照着富农成分待遇，并且地主虽也有借进田来请人耕种的，但只是少数地主如此，地主的多数是不借进人家的田的。此人借进田的占了大部分这却是富农常有的事。所以你们还要查清他本人劳动的情形，再作正确的决定——到底是地主还是富农，假如查明本人的劳动确实只是附带的一小部分，那你们决定是没有错的。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

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

（1933年7月15日）

贫农团在土地革命中一般说来是起了伟大的作用的。他不但团结了广大雇农贫农群众，联合着中农在其周围，在共产党与苏维埃领导之下，以绝大的革命力量，推翻了农村中的封建半封建势力，从地主阶级手中夺取了土地，积极地推进了土地上面的生产。即对于战争动员、经济动员和文化建设等项重大的工作，也起了极大的作用。贫农团的这种伟大的革命成绩，是十分值得称赞的。但是依据现状看来，贫农团不是在一切地方都有这样的成绩的，也不是有了这些成绩就可以不注意其组织上和工作的进行上还有缺点与错误。却正相反，只有看到了贫农团过去的成绩，同时还看到了贫农团的缺点与错误，还看到了有些地方的成绩不够，因此努力去改正贫农团组织与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与错误，才能争取以后更加伟大的成绩，完成贫农团在苏维埃运动中应有的责任。

根据许多地方的材料，贫农团在组织上与工作上，还有许多不健全的地方，有些地方甚至还只有一个空名，没有实际的工作，总括这些材料看来，可以分成两种情形：（一）有些地方没有乡贫农团，只有村贫农团，村贫农团之下设小组。有些地方没有村贫农团，只有乡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设小组。有些地方有乡贫农团，也有村贫农团，村贫农团之下设小组。在乡贫农团和村贫农团内部

都设有干事会，内分主任、组织、宣传三个工作部门，由干事会指挥各小组，定期开会，有的十天一次全体会，五天一次小组会，有的一星期一次全体会，五天一次小组会。加入贫农团的，不论雇农苦力贫农，要有三人介绍，否则不能加入，把许多雇农苦力贫农关在贫农团的门外，以致会员数量不甚发展，减少了贫农团的作用。（二）另外一种更加不好的情形，就是有些地方只简单地宣布除掉地主富农中农以外，其余一切都是贫农团会员，由中共支部或乡苏指定一个贫农团主任，这样该乡就算有了贫农团的组织了。贫农团主任不晓得有几多会员，也不晓得要做些什么工作，三四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不开会，只挂一个空名，这实际上等于没有贫农团。这样贫农团的任务和它在农村中应起的作用，是更加不能够完成了。第一种情形的贫农团，其中有些代替了政府的职务，如瑞金武阳区的龙冈乡，黄柏区的新庄、柏村两乡，就有这种情形。而第二种情形的贫农团，则没有经常工作，散漫不起作用。这两种现象都是不好的。但是苏区之中有不少地方的贫农团，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是很健全地发展的，大数量的会员，紧张的斗争情绪，能够积极地讨论各种革命斗争问题，又并不侵犯乡苏的职权，他们不但和上述第二种情形的贫农团（挂空名的）大不相同，比起第一种情形的贫农团（还有错误的）来也更加进步，他们真算得苏区中贫农团的模范，值得各地贫农团学习。为了总结过去贫农团斗争的经验，统一贫农团的组织，普遍建立贫农团的经常工作，完成贫农团在目前革命阶段中的重大任务，中央政府特根据土地斗争发展的经验，及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印发这一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希望全国农村中广大的贫农群众都在这一大纲之下，一致地团结与行动起来。

（一）贫农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而是在乡苏维埃管辖区域内的广大贫农群众的组织，同时农村工人必须参加贫农团，组成工人小组，在里面起积极领导作用，同时团结广大贫农群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成为苏维埃政权最可依靠的柱石。

（二）贫农团的作用是赞助政府实现政府的一切法令，而不是代替政府的工作。关系于工人贫农的利益与权利的各种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向政府建议。

（三）贫农团要特别注意中农的利益和权利，使中农环绕在贫农团的周围，建立贫农团与中农的坚固联盟，成为无产阶级联合中农的坚固的一环，以便利于进行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对富农的斗争。

（四）贫农团只有在共产党与苏维埃的领导之下，才能正确地实现他的一切任务，不致受富农的影响，不致受一切落后的农民意识，如绝对平均观念和地方观念等所支配。在还没有组织贫农团的地方，可由农业工会或贫农中的积极分子来发起，农业工人及手艺工人工会要能够做到在自己的全体大会上通过整个加入贫农团，以实现无产阶级在贫农团内的经常的领导作用。

（五）贫农团在初成立的时候，是吸收贫农中积极分子参加，以后便逐渐成为全体贫农群众的组织，为了吸引全体贫农群众加入贫农团（当然破坏土地斗争包庇地主富农的那种坏分子，即使贫农也不能加入），贫农团的老会员应该经常负责去作扩大贫农团的宣传，积极地去找贫农及农村工人加入贫农团。但不须用介绍形式，而是向工人贫农开大门，告诉并指引他们加入贫农团。加入贫农团是以自愿为原则，一切男女老少的工人贫农，均可报名加入，那种按户派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为了严厉地防止地主富农的混入，须从老会员找来的及自动报名的一切新会员中，按照分析阶级的标准加以考

查，遇到有成分不对的，立即开除出去，以保障贫农团不被地主富农混入。

（六）当着开展土地斗争，或当着进行查田运动的时候，如果因为过去贫农团散漫无作用，或者贫农团操纵在少数地主分子与富农分子手里，起了相反的作用，因此就用命令主义的办法，解散贫农团重新组织，这是脱离了群众，十分不对的。这种时候的正当办法，应该团结贫农团中的积极分子加紧教育他们，在贫农团内发动激烈的斗争，揭破地主富农的欺骗，争取会员群众脱离地主富农分子的影响，而坚决把地主富农分子及个别无法再教育的极坏的分子洗刷出贫农团去，这样来坚强贫农团的战斗力量，争取土地斗争与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如果贫农团中有中农加入，那便不能像对付地主富农分子一样，把他们一下洗刷就完事，一定要经过一番清楚的解释，对他们说明不必加入贫农团的理由，在他们出贫农团之后，贫农团开会时他们仍可来旁听，并且欢迎一切中农都来旁听。

（七）贫农团既不是纯粹一个阶级的组织，因此他并不需要如工会一样的严密的组织形式，不需要一定的章程，也不需要缴纳会费（需要用费时，在全体大会的同意下，可向会员举行临时的募捐），更不需要省县区的系统的组织，只是以乡为单位来组织贫农团。乡贫农团之下分小组，小组可以一个屋子（即小村子）为单位，每个屋子的会员为一小组，如果一个屋子里只有极少数人家，因之会员人数不多，可以两三个接近的屋子成立一个小组。如果一个屋子有几十家甚至更多的人家，因之会员人数甚多，可以在一个村子内成立几个小组。

（八）为着贫农团工作进行的便利，应由大会推举三个人（最积极的分子）组织委员会，较大的乡或会员很多的贫农团，可推举五

个人组织委员会，由委员会推定主任一人，主持全盘工作，此外不分设别的工作部门。贫农团应当实行很宽泛的革命民主制度，凡遇到重要问题，必须召集全体会员开会讨论。只有平常的问题，才单由委员会讨论，或由委员会召集小组组长参加讨论。

（九）贫农团大会、委员会及小组开会，不必机械固定时间，以防止形式主义的开会，减少会员群众的兴趣。凡遇重要问题，即行召集会议。在农村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时候，如像分田与查田的时候，就是三四天、五六天开一次会员大会，两三天开一次委员会及小组长会，都是应该的。

（十）贫农团的工作，在于随时能注意到工人贫农以及中农的利益，为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而斗争，今将贫农团的重要工作列举如下：

（甲）讨论豪绅地主的土地房屋、农具财产和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等的没收与分配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心是如何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如何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工人贫农中农的身上。这里要特别注意不妨碍中农利益，并且要亲密地联合中农，要注意彻底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势力，并不使地主富农冒称中农贫农偷取土地利益，要做到不使一个地主留下一寸土地，不使一个富农偷取一丘好田。

（乙）讨论农业生产上的问题，如怎样去进行春耕、夏耕、秋收、秋耕的运动。在各季的生产运动中，怎样增加人工，增加肥料，改良种子，开发水利，调剂耕牛，添置农具，消灭害虫，开垦荒田，种植树木与保护山林等问题。

（丙）讨论经济动员上的问题，除上述发展农业生产外，主要的是讨论合作社的发展，如发展粮食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

社、生产合作社、犁牛合作社，使国民经济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以抵制商人残酷剥削，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改良，革命战争得到极充实的力量。

（丁）讨论救济灾荒的问题，如灾荒时粮食、种子、耕牛、农具等的互相帮助，被敌人骚扰区域被难群众的设法救济等。

（戊）讨论群众卫生的问题，如发起普遍的卫生运动，讲究清洁扫除，以抵制疾病疠疫，保障群众生活的健康。

（己）讨论优待红军的问题，如红军公田的耕种、收获与保存，及帮助红军家属耕田，实行优待红军条例。

（庚）讨论战争动员上的问题，这里第一是扩大红军，第二是筹借经费接济红军，第三是慰劳红军，第四是扩大赤卫队与少先队，这些都是关于战争动员上极重要的问题。

（辛）讨论参加苏维埃选举运动与检举运动的问题，如当着选举时保障工人贫农中的积极分子使他当选进去，并吸引最好的中农分子参加苏维埃工作。当着苏维埃中混入有阶级异己分子及发生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等分子时，参加工农检察部所号召的检举运动，发动对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自我批评，使苏维埃的工作绝对健全起来。

（壬）讨论苏维埃一切法令决议命令使之在本乡完全实现的问题。

（癸）讨论一切临时发生的重大问题。

贫农团必须经常注意上列种种问题的讨论，并且积极地向政府建议，在政府领导下坚决地参加各种革命战线上的斗争，使各种革命任务完全实现，它才能不断地有自己的经常工作，而真正替工人贫农中农谋得利益，不致成为有名无实的团体。

（十一）为着更能巩固农村无产阶级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领导，

贫农团委员会（并可加选几个积极的贫农分子同去）可以建议与农业工会手艺工会的领导机关开联席会议，这种会议由工会召集，如组织拥护红军委员会，组织反帝拥苏同盟，组织革命互济会及某种庆祝纪念与示威大会等，都可举行联席会议来讨论，在一致的同意下共同努力使之实现。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

反对最近国民党卖国的大连会议通电

（1933年7月18日）

全国革命民众们！

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帝国主义的千忠万顺的走狗，于最近一星期以前，比先前更阴险更无耻地进行着大连会议，在七月五日的午后，于大连日本宪兵司令部签订了一个新的大连协定，这一协定比之五月三十日所签订的华北停战协定更其具体更其无耻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关东军副司令的热烈祝贺声中，在杯盘狼藉的庆祝卖国成功的欢宴会中，国民党政府的卖国代表雷寿云之流竟举着香槟酒杯和国民党似乎曾经称为“傀儡”的满洲国代表们互相握手了，一面庆祝他们新同盟国的成立，一面在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杜绝契约上，最后地签了字。这一新的卖国协定的主要内容就是：（一）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并且在名义上收编满洲国驻在滦榆一带的军队；（二）日本在华北各县如密云滦州等地设立监视兵；（三）把北宁到芦榆段作为共管。

在这一协定中，国民党不但于事实上已经正式承认了满洲国，并且是更无耻地与满洲国订立了傀儡同盟，誓死效忠于他们的共同主人日本帝国主义。最近的事实告诉我们，国民党政府已经允许满洲国的要求，在最近期内恢复满洲国的邮汇，改变赴欧邮件由海参威转道西伯利亚的办法。这些铁的事实指明国民党在民众面前所谓

满洲国是“傀儡”的假话，完全是无耻的欺骗宣传，事实上国民党自身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傀儡，与满洲国完全是走狗弟兄呵！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国民众坚决反对国民党在大连会议中所订的无耻的卖国协定，绝对否认卖国协定中的半句条文！并且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士兵和一切革命者一致起来反对最近国民党卖国的大连会议，以坚决的革命斗争：罢工、罢市、罢课、罢岗、组织群众示威与武装队伍起来反对与阻止大连协定的实行。全国民众必须认清在国民党与满洲国的傀儡同盟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将必然地更大规模地扩大他在华的侵略行为，从积极进攻察绥以至掠取东南沿海各省，与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同时日本强盗——国际帝国主义的东方宪兵继续着他最近反苏联的疯狂的挑衅行为，将必然地公开向中国民众的兄弟联盟——苏联进行武装干涉的军事冒险！

全国革命民众们，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正在加速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抗日红军，才是全国革命民众的自己武装！为着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领土的完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和白军中的革命士兵一致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把他们葬送到历史的坟墓里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

（1933年7月21日）

苏维埃行政区域的划分，与旧的反动政府的行政区域有绝大原则上的不同。在旧的反动政府的行政区域，范围都是很大，这因为他们是隔离群众的官僚机关，他们的目的只是削弱和压迫群众，苏维埃划分行政区域的原则与此完全相反，他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中央苏区行政区域的划分，虽经过了不少变更，但一般说来，多半还是沿用旧的区划，没有彻底改变。这对于战争动员对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感觉极大不便。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重新划分中央苏区的行政区域，并规定各级行政区域划分的标准如下：

一、市

除市场范围外，可管辖市场周围附近的一部分乡村，但不得超五里以外。

二、乡

（一）一等乡，即在平地而人口特别稠密的地方，每乡所管辖的人口以二千人为标准。如果一个村子或近距离内的几个村子超过了二千人时，乡苏管辖的人口可以较多些，但至多的不能超过二千五百人。同样，因地形的关系（如河流等）宜于分为两个乡，因而一

乡的人口不足二千五百人时，乡苏管辖的人口数亦可较少些。

（二）二等乡，即平地与山地参杂的地方，这种地方人口不如一等乡稠密，地域因之较宽，每乡所管辖的人口以一千五百人为标准。如因地形关系，乡苏管辖的范围以较大些为便利，或以较小些为便利时，一乡的人口可以多于一千五百人或少于一千五百人。

（三）三等乡，即山地多而人口稀少的地方，每乡所管辖的人口以一千为标准，如因地形关系，某些村落以划入一个乡管辖便利时，可以多于一千人，但不能使区域过宽，违背苏维埃接近群众的原则。同样，如因地形关系，乡苏管辖不便利时，亦可以少于一千人。在大山多地域特别辽阔人口特别稀少的地方，每乡人口可以少至四百人左右，但最低不能少于二百五十人。

三、区

以每区管辖七个乡为标准，在平地多人口特别稠密的地方，可以管辖到九个乡。在山地多，地区辽阔，而人口特别稀少的地方，可以减少到只管辖五个乡。

四、县与省

县与省的划分责成人民委员会按照接近群众的原则以命令规定之。

中央苏区以外的各苏区，均须按照本决议所述原则重新审查该地的行政区域，其有区域过大不合此原则的，必须实行重新划分。

本决议公布之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划分行政区域暂行条例》应宣告无效。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执行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

（1933年7月22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规定了划分行政区域的原则及市区乡划分的标准，关于省县行政区域的划分，责成人民委员会以命令规定。现因距第二次全苏大会会期只有四个多月，在这四个多月中间，须完成乡区县省四级苏维埃及全苏大会代表的选举，而在选举进行之前，乡区行政区域不合中央决议原则的均须重新划分，县行政区域亦有一部分须重新划分。为了正确的依照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原则，重新审查现有行政区域并实行划分，以便迅速进行选举起见，人民委员会有下列各项的规定：

（一）批准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江西福建两省增划八个县行政区的方案，增设洛口、龙岗、杨殷、赤水、长胜、西江、门岭、彭湃八县。江西福建两省苏应迅即派员前往各新县召集区乡政府负责人开会，推举临时县苏，执行当地政务，并立即着手重新划分区与乡的行政区域，以便进行选举。为了加强新县的领导，省苏可以委派一人至数人为临时县苏主席或其他工作人员。原来管辖新县区域之县苏，须派出一部分人员加强新县临时县苏的领导。

（二）为了保证此次区乡两级行政区域的实际划分完全适合中央决议的原则起见，乡的划分，应由区苏负责，报告县苏审查批准。区的划分，由县苏负责，报告省苏批准。报告时均须附以简明地

图。省苏须将各县新划区乡，附以地图，报告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

（三）新划区乡应以当地市场或大的地名作为区或乡的名称。旧有名称除带着封建迷信的含义者不能采用之外，其他都可沿用，没有适当旧名可用时，可用当地过去革命斗争中的著名事件的名称，或曾经牺牲而为当地群众所景仰的革命领袖的姓名，或其他革命名词，作为行政区域的名称。但一律不采用数字名称。

（四）划分行政区域这一工作，由各级政府主席团指导内务部负责进行，并须派人分往各地指导这个工作的进行，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担负总的指导责任。

（五）行政区域划分完毕，立即开始进行选举。关于选举的指导中央政府另有规定。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
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

（1933年7月22日）

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动员一切力量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从经济建设这一方面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普遍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与一切生产品的产销，发展对外贸易，这样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奸商的残酷剥削，使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更加充实的物质上的力量，这是当前的重大战斗任务。为了有力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批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并准购买者以粮食或金钱自由交付，除以一部分供给目前军事用费外，以最主要的部分用于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及扩大对外贸易等方面。为了确定公债用途及还本付息等项手续起见，特制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责成人民委员会督促财政人民委员部与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指导地方政府，根据本决议及公债条例，正确迅速地发行并支配此项公债，同时对工农群众及一切遵守苏维埃法令的居民，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使经济建设运动迅速地在苏区全境开展起来。其有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公债信用及任何经济设施者，责成国家政治保卫局采取必要办法，严厉镇压这些

分子，以保障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1933年7月22日）

（一）中央政府为发展苏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

（二）本公债定额为□币三百万元。

（三）本公债利率定为周年五厘。

（四）本公债利息，从一九三四年十月起，分七年支付，每元每年利息大洋五分。

（五）本公债还本，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分五年偿还，第一年即一九三六年还全额百分之十，第二年即一九三七年还百分之十五，第三年即一九三八年还百分之二十，第四年即一九三九年还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年即一九四〇年还百分之三十。偿还办法，届时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另行制定公布之。

（六）本公债以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及其他国营企业所得利润为付还本息之基金。

（七）本公债准作买卖抵押并作其他担保品之用。

（八）购买本公债者，交谷交银，听其自便，交谷者谷价照当地县政府公布之价格计算。

（九）本公债票面价额分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五元五种。

（十）如有故意破坏本公债信用者，以破坏苏维埃经济论罪。

（十一）本公债发行事宜，由各级政府公债发行委员会负责，所收款项，送交分支库，所收谷子，则交与仓库保管委员会。

（十二）本条例自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起施行。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

（1933年7月29日）

依靠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和苏维埃的积极领导，依靠工农红军和群众的英勇战斗与热烈拥护，依靠白区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和反帝反国民党群众运动的空前猛烈开展，经过东黄陂的战役，我们已经基本地击破了敌人的四次“围剿”。英勇红军在东黄陂战役的空前光荣伟大胜利中，给予国民党军阀魁首的蒋介石——地主资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支柱，以最致命的打击！在他的痛哭流涕的“手谕”与函件中，他自己悲情地承认：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的隐痛”（蒋介石致陈诚书），这是他们的军队的空前惨败与崩溃。所以当他们遭到这一严重的惨败之后，他们虽几次企图反攻，但终于无能为力了。

国民党军阀此次惨败和他们无力反攻的原因：第一，是由于工农红军的坚强壮大和英勇善战，在东黄陂大胜利中，又得到了极大补充更加增强了自己，苏维埃区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与发展，国民党的大部士兵根本动摇，不愿进攻红军，即国民党反革命军官亦大都丧胆落魄，讲到红军，就“谈虎色变”，所以虽则蒋介石几次企图反攻，但终于无能为力。第二，是由于中国民族危机的更深刻的继续增长，在日本帝国主义进占热河泺东，着着进逼平津，而国民党继续无耻投降的时候，全中国劳苦民众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浪潮高涨到了极点，这使国民党不得不一方面向日本帝国主义签订降约，

最后地出卖华北平津，一方面则厉行空前的白色恐怖，以镇压怒吼着的反帝反国民党的革命群众。第三，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总的崩溃，使全国数万万工农陷于空前的浩劫，从牛马奴隶的生活水准一直降到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的苦海中，结果全国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暴动极大地爆发起来，由日常生活的斗争而发展为反帝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这些革命的斗争极大地牵制了我们的敌人，使他们陷于惊慌失措，同时，国民党政府由于关税收入的减少和全国广大苏区的工农群众脱离了它的剥削范围，使国民党的财政更陷于破产！

国民党军阀在这种严重惨败，而没有出路的环境之下，他们唯一的“计策”，就是更加卑鄙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从国际帝国主义的手上，求得大批借款与军火，来组织对于苏区与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华北停战协定的签订与宋子文的出游欧美，正是在那里实行他们的诡计。现在国民党与帝国主义的新的买卖已经做好了。国民党送去了中国四百余万方里的领土和许多秘不宣布的礼物，而从帝国主义得到了几万万元借款和大数量的军火。国民党利用这些借款与军火的供给，在各帝国主义的直接指挥与组织之下，正从华北等地调遣着他们的军队，并且还在训练着许多新兵赶制毒瓦斯弹，集中一切力量来组织第五次“围剿”，疯狂地向苏区红军作绝望的必败的进攻！

因之，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革命形势的前面，在这一新的革命形势前面，我们的任务是要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力量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关键，两个政权——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将在即要到来的更大规模的战争中，实现这样一个前途——我们苏维埃政权的更加的胜利发展，他们国民党政权的更加死亡崩溃！

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我们首先应该增加我们自己的力量，集中我们的一切力量，提高我们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这里首先应该保障红军数量的继续增加，在今年八、九、十三个月中要达到扩大五万红军。同时要极大地提高红色战士的政治教育与军事技术，扩大和强健赤卫军少先队的组织。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地供给，在这里广泛地开展查田运动，深入农村中与城市中的阶级斗争，绝对地巩固苏维埃政权，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普遍地建立群众的合作社，发行经济建设公债，调剂粮食，扩大对外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是我们当前的重大战斗任务！

最后为着顺利地进行战争紧急动员，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我们要反对一切对于目前新的革命形势估计的不足，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是战争动员中的最凶恶的敌人，是实际地帮助了阶级敌人！

全苏区工农群众们、红色战士们！目前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革命形势面前，我们必须牺牲一切，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同志们！更残酷剧烈的五次战争就在前面了，我们彻底地粉碎了五次“围剿”，江西与邻近数省的革命首先胜利也就在前面了！

临时中央政府召集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

（1933年8月1日）

全国各苏维埃区域的工人、农民与红色战士们：

全国白色区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的士兵们：

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有了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是帝国主义疯狂地加紧进攻苏联，加紧进攻中国革命的两年，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向全国苏维埃区域进行最残酷的屠杀与围攻的两年，是国民党无耻地投降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卖中国的两年，也正是中国工农和红军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正确领导之下，以艰苦的斗争获得了光荣伟大胜利的两年。这两年间的斗争，我们扩大与巩固了苏维埃政权，我们得到无限丰富的宝贵的经验。为了集中我们对于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为了更进一步地发展与巩固苏维埃政权，为了总结两年来苏维埃的经验，苏维埃中央政府特决定于广暴的六周纪念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在赤都瑞金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两年来，中国民族的危机是愈益加深了。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与国民党的加紧卖国，使东三省热河平津一带数百方里的领土与数千万的人民，完全沦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之下。如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由于国民党的一贯的投降出卖，而更加急进了。把中

国完全殖民地化的悲惨命运正笼罩在全中国民众的身上。

两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是更加深刻化了。民族工业大批地破产，农村经济最后地崩溃，水旱灾荒普遍到全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已被迫至失业饥饿与死亡的道上。而国民党军阀的剥削，则有加无已，在四川国民党军阀已预征粮赋到一九七一年，种种苛捐杂税竟多至一千七百余种。全国地主豪绅向农民作更残酷的剥削，资本家也更加紧向工人进攻，国民党军阀的冲突与混战，更促进中国经济的崩溃。全国工农的痛苦，真是达到无可言喻的地步！

亲爱的同志们！中国工农是不能而且不会这样忍受下去的。现在全国到处都燃烧着革命的烈火，开展着英勇的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从示威罢工暴动以至游击战争与大规模的革命战争。而二年来中国工农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胜利，苏区的极大发展，英勇红军从数万到数十万的猛烈扩大，更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中的最有力的杠杆。

在全中国民众前面，现在放着两条道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殖民地的道路，与苏维埃的道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只有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在苏维埃政权下，帝国主义势力已被完全推翻。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革命群众已正式对日宣战，并且一方面领导着英勇红军猛烈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打倒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的国民党军阀，另一方面曾经几次号召全国白色武装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工农群众和士兵受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以至破产失业，沦于饥饿与死亡。但在苏维埃政权下，豪绅地主的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已被完全消灭。劳动农民和红色战士都分到了土地，工人阶级得到了劳动法的保护，苏维埃的经济建设正在

猛烈发展中，工农群众的生活是大大的改善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工农群众遭逮捕监禁与屠杀，任何言论、集会、信仰，尤其是抗日的反帝的自由均被剥夺，政权机关完全操在少数地主资本家的手中。但是在苏维埃政权下面，工农获得了自己的完全的政治自由，剥夺了剥削阶级（资本家、地主与富农等）的政治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工农第一次管理着自己的国家，工农成了统治的阶级，而工人阶级就是领导的力量。所有这些都再明白没有地指示出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是能够拯救中国的道路，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即是全国民众对于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胜利。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指挥与组织之下，国民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政治派别，都动员了全部力量向苏维埃区域与红军作绝望的进攻。虽然在英勇红军的铁拳下，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都已被我们完全击破了，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为着作最后的挣扎，正积极准备着更残酷的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企图根本消灭苏维埃与红军。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一“围剿”，即是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中国殖民地道路的必要的与主要的步骤。而全中国民众，应该集中一切力量粉碎这一“围剿”，为苏维埃的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劳苦群众与革命士兵，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的卖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粉碎这一“围剿”，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统治，拥护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派代表来参加全苏大会，为中国的苏维埃的出路而斗争。依靠在全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的积极性上，依靠于我们百战百胜的英勇的工农红军与坚强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全中国民众们，踊跃起来为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呵！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中央政府电贺东方红军的伟大胜利

（1933年8月8日）

东方作战军总指挥政委，并转全体指战员的同志：

英勇的你们，在东方战线上把顽强的敌十九路军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胜利，表现出工农红军已更加壮健，更加无敌，给正在布置第五次“围剿”的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极大威胁，也就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开始胜利，我们听到非常欣慰。在现时这个革命和反革命决胜负的历史转变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已在组织和领导全国红军及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为冲破敌人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相信英勇的你们，必然在这一次的任务下，奋发更大的勇气，向前消灭更多的敌人，取得更大更光荣的胜利。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八日

苏维埃暂行选举法

（1933年8月9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的各级苏维埃的选举，一律遵照本法的规定。

第二条　在战争期间，对于红军的选举，在本法上以专章规定之。

第三条　无产阶级是苏维埃的先锋队，领导农民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为要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机关的领导，对于居民与代表人数的比例，工人比别的居民，要享受优越的权利。

第二章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四条　凡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人民，在选举的日子，年满十六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的区别，具下列资格之一者，都得享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一切被雇佣的劳动者及其家属，与一切自食其力的人及其家属（如：工人、雇员、贫农、中农、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等）；

（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海陆空军服军役者及其家属；

（三）以上二种人民中，在选举时失却劳动能力，或失业者。

附注：本条各种人民的家属，如他们的出身，是被剥夺选举权的则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五条　犯下列各条之一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一）雇佣他人的劳动以谋利者（如：富农、资本家）；

（二）不以劳动，而靠资本、土地及别的产业的盈利为生活者（如：豪绅、地主、高利贷者、资本家）；

（三）地主、资本家的代理人、中间人（中介人、牙人之类）及买办；

（四）一切靠传教迷信为职业的人，如各宗教的传教师、牧师、僧侣、道士及地理和阴阳先生等；

（五）国民党政府及其他反动政府的警察、侦探、宪兵、官僚、军阀及一切参加反对工农利益的反动分子；

（六）犯神经病者；

（七）经法庭判决有罪，而在执行判决期间及被剥夺选举权的期限未满期者；

（八）一至五各项人的家属。

附注：本条第四项，靠传教迷信为职业者的家属，如靠自己的劳动为生活者，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六条　本法第四条的各种人民，犯本法第五条一至七各项之一者，同样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章　选举的手续

第七条　选举由当地苏维埃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定期

举行之。

第八条　选举须有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出席，才能举行。

第九条　在未开始选举前，须实行选民登记，将选民和被剥夺选举权者的名单及该选举区域的居民总数，由当地苏维埃在选举的五天前公布之。

第十条　选民登记完毕后，必须将开选举大会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各个选民，在选举大会的会场门口必须实行登记。

第十一条　工人须以生产或以其职业与产业的组织为单位，开选举大会。那些不能以生产为单位进行选举的人民，则须划区或划街道，指定地点，开选举大会。农民以屋子（小村子）为单位，开选举大会，人数过少的小屋子，可合并附近一个至几个屋子为一起，而开选举大会。

第十二条　工人的家属，则与其本人在同一处地方，参加选举，且与其本人取得同等的选民资格，如工人的家属，不与其本人同住，则仍依照他家属的工作地点，或居住地点，参加选举。

附注：工人的家属，倘为被剥夺选举权者，则仍不能参加选举。

第十三条　选举大会，须有该地选民总数的半数以上到会，才能开会。倘若到会的选民不足法定人数时，须宣告延会，由选举委员会再定期重新召集。在重新召集选举大会的情形中，开会时间和地点，须重新通知。

第十四条　倘第二次召集选举大会，无论足法定人数与否，可以开会，选举出应产生的代表人数。

第十五条　选举不用书面投票，以举手来付表决，举手多数者当选。

第十六条　选举大会的主席团，由三人组成之，两人由大会推

选，一人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选举委员会的代表，为选举大会主席团的当然主席。并推选书记一人，担任选举大会的记录。

第十七条　选举大会宣布开会后，主席须根据进会场时的登记册，宣布到会人数，是否足法定人数。

第十八条　选举大会的议事日程，规定如下：

（一）选举委员会的代表，根据本法第四第五及第六条的规定，宣布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谁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选举正式代表。

（三）选举候补代表。

（四）通过提案。

附注一：提出候选人付表决时，须用逐个表决的方法，不得拿整个名单一次付表决。

附注二：正式代表与候补代表，不得同时提出付表决，必须选举完了正式代表，然后再选举候补代表。

第十九条　选举大会的记录，必须全体主席团及书记签字或盖章。

第二十条　选举大会的记录，到会登记表，及一切与选举有关系的文件，都汇送选举委员会，转送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以备选举结束后的审查。

第四章　各级苏维埃的选举程序及代表的标准

第二十一条　乡苏维埃，由全乡选民各个选举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工人居民每十三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其他居民，每五十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附注：人口不满五百人的乡，代表与居民的人数比例可以减低到：工人居民每八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其他居民每三十二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第二十二条　隶属于区的市苏维埃，由全市各个选民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工人居民每十三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第二十三条　直属于县的市苏维埃，由全市选民各个选举大会所选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工人居民每二十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其他居民每八十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第二十四条　直属于省的市苏维埃，由全市选民各个选举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工人居民每一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其他居民每四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第二十五条　中央直属市苏维埃，由全市选民各个选民大会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工人居民每五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其他居民每两千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第二十六条　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乡苏维埃及区属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出席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乡村居民每二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代表的成分，工人应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附注：如区苏的管辖下有市苏维埃，应加上市苏的代表。市场居民，每五十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第二十七条　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县直属市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及县属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出席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市场居民每四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乡村居民每一千六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代表的成分，工人须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第二十八条　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省直属市苏维埃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及省属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出席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市场居民每一千五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乡村居民每六千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代表成分，工人须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五。

第二十九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直属市苏维埃代表所选举出来的代表及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所组成。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城市居民每一千五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乡村居民每六千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代表成分，工人须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第三十条　居民不满法定人数的地方，倘其人数在法定人数的半数以上，亦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倘其人数在法定人数的半数以下，得选举候补代表一人。

第三十一条　每正式代表五人，得增选候补人。候补代表参加会议，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如正式代表因故离职或撤职，候补代表即依次补充。

第三十二条　区、县、省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除选举出席县省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苏维埃之外，并须选举各该级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则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十三条　区、县、省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由各该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之。乡苏维埃和市苏维埃的代表资格，则由乡苏维埃和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之。

第三十四条　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人数规定于下：

区执行委员会，不得超过三十五人；

县执行委员会，不得超过五十五人；

省执行委员会，不得超过九十五人；

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一人。

附注一：红军参加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其标准和手续由本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之。

附注二：中央直属县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标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专门命令规定之。

第五章　红军的选举手续及代表的标准

第三十五条　在战争时期，红军不能有固定的驻扎地点，无法参加市苏维埃或乡苏维埃的选举，因此应有临时的变通办法，由本章各条特别规定之。

第三十六条　属于区苏维埃政府的工农红军（如：游击队等），直接选举代表去出席全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属于县苏维埃政府的工农红军（如：独立团等），直接选举代表去出席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属于省苏维埃政府或不属于省苏维埃政府管辖，而在该省内负有长期工作的工农红军（如：独立师及湘鄂赣、湘赣、闽浙赣及其他苏区的各军团），则直接选举代表去出席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红军的方面军，则直接选举代表去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附注：警卫部队，如警卫连、警卫团、政治保卫队等，则仍参加所在地的市苏维埃和乡苏维埃的选举，代表的标准与工人相同。

第三十七条　红军代表的标准规定如下：选举去出席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二十五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选举去出席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选举

去出席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四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选举去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六百人得选举正式代表一人。

附注：候补代表的标准，按照本法第三十及三十一条之规定。

第三十八条　红军的选举工作，由团政治处或独立营政治委员或连政治指导员，指定三人至五人组织选举委员会进行之。

第三十九条　选举到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连或营为单位，开选举大会来选举。选举到县及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营或团为单位，开选举大会来选举，选举到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团为单位，开选举大会来选举。

附注：选举的手续及选举委员会的工作，均依照本法第三章及第七章各条之规定。

第六章　基本（市乡）选举的承认取消及代表之召回

第四十条　按照本法所规定的手续进行的选举，才算合法，须与之承认。

第四十一条　市苏维埃和区执行委员会接到关于选举的各种文件后，须组织专门委员会审查之，如发现某部分的选举，有违反本法的规定时，取消某部分选举之权，属于市苏维埃和区执行委员会，若发现全部选举有违反本法的规定时，取消选举之权，属于上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第四十二条　在选举效力上发生争执时，由市苏维埃和区执行委员会解决之。倘市苏维埃和区执行委员会不能解决时，须移交上

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去解决。

第四十三条　对于选举有违反本法规定的时候，每个选民，可向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控告，市苏维埃或由执行委员会接到这种控告时，须即予审查之。如不能解决时，可按级地上诉，中央执行委员会为选举上诉的终审机关。

第四十四条　市苏维埃或乡苏维埃的代表，如有执行自己的职务，违背选民的付托，或有犯法的行为时，市苏维埃或乡苏维埃，经过全体代表会议，得开除之，选举该代表的选民，也有随时召回该代表之权，并得另行选举之，在这种情形中，须报告上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去审查。

第七章　选举委员会及其工作

第四十五条　选举委员会为办理选举的专门机关，其组织有下列两种：

（一）市选举委员会，管理全市的选举工作，其委员由七人至十一人。

（二）区选举委员会，管理全区各乡的选举工作，其委员由九人至十三人。

第四十六条　选举委员会，是由政府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所组成，其委员须由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在主席团会议上通过，送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查批准。

第四十七条　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以在该地方工作或居住的人民为合格，特别情形时，可由上级政府从别处调去。

第四十八条　市苏维埃、乡苏维埃及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不

得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第四十九条　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可不脱离原有职务，在办理选举期间，可暂时解放他所担负的工作，专门来进行选举。

第五十条　选举委员会，不设立单独的办事机关，可在区执行委员会和市苏维埃内办公，并可使用区执行委员会和市苏维埃的一切技术工作人员，有必要时，可添雇技术工作人员。

第五十一条　选举委员会在选举前应进行的工作：

（甲）实行选民登记。有组织的选民，可经过该组织（如：工会、贫农团等）去进行登记。无组织的选民，由选举委员会的登记员进行登记，登记须按照选民登记来填写。

（乙）登记结束后，即由选举委员会指定专人审查登记表，并须在选举大会前五天，经过当地苏维埃政府，将选民的名单，在当地及圩场上公布。在该区域内应选举的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的人数，亦须同时公布。

（丙）在选举大会的前三天，须将开选举大会的地点和时间公布，并通知该区域内的选民。

（丁）准备在选举大会要通过的提案。

（戊）规定各组织、各机关、各屋子（小村子）开选举大会的先后次序，并布置会场，指定进会场时的登记员。

（己）选举委员会，须经过当地苏维埃政府，将被剥夺选举权者的名单，在选举的前五天公布。

第五十二条　在每个选举大会开会时，选举委员会必须派人去出席。选举大会，须由选举委员会派去的代表宣布开会，并且该代表为该选举大会主席团的当然主席。

第五十三条　选举大会议事日程的第一项，须由选举委员会派去

的代表根据本法第四、五、六条，报告对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之规定。

第五十四条　在选举后，选举委员会须将关于选举的全部文件，汇集起来，送交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保存，以备审查，并向他们作选举的总结报告。

第五十五条　选举结束后，选举委员会就宣告解散。

第八章　选举的经费

第五十六条　选举的经费，由各选举委员会制定预算，经过市苏维埃或区执行委员会审查，报告上级苏维埃政府，从国库所拨出的选举经费中支付之。

第五十七条　在红军中的选举经费由选举委员会作预算，送各该级政治部审核发给。

第五十八条　在选举中所用的一切经费，由选举委员会负责向领款机关作决算报告。

第九章　附则

第五十九条　本选举法，在中央苏区，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未经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苏区自文到之日起发生效力。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决议

（1933年8月9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实施《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决议：

一、《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条文通过之后，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起发生效力。

二、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五日以后，过去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细则》《红军及地方武装的暂行选举细则》《选举委员会的工作细则》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号训令都宣告无效。

三、各级苏维埃的选举及红军出席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手续，都须依照《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规定进行之。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

关于此次选举运动的指示

（1933年8月9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于今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召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定中央苏区在九月至十一月，完成乡苏市苏的选举，及区、县、省三级的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次选举是从乡苏、市苏，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选。这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参加政权巩固政权的伟大的运动。这次选举运动，正当着一方面，革命战争对于敌人的四次“围剿”得到了全部胜利，中央苏区及全国各苏区的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的正确领导之下，消灭敌人部队，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深入查田运动，实施劳动法，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扩大苏维埃领土，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白色区域，在日本占领满洲热河华北，扩大其强盗战争，国民党签订卖国协定完全投降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全国工农兵士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潮流，进到了更高的阶段。但是另一方面，国民党自四次“围剿”惨败后，更加露骨地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向美、英、法、意、德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密约，实行大借款大买军火，进行其第五次的向苏区围攻，中央政府正在以充分的决心，领导广大群众与红军，争取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我们的各个苏区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这次普遍的选举，因此，这次

选举，是负有伟大历史任务的。要使这次选举密切地与当前中心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要从选举中来健全各级苏维埃的组织与工作，要在二苏大会上总结两年来的斗争经验，讨论新的策略，加强苏维埃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粉碎敌人的新进攻，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的胜利。为了这个目的，必须经过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广大群众中造成选举运动的热潮，使每个工人与农民都懂得这次选举的重大意义。争取大多数选民来参加选举，同时要使这次选举得到完满成功，必须仔细检阅过去选举的经验，收集过去选举的成绩，而避免过去选举中的缺点与错误，才能使这次选举成为最完满的一次选举。

一　过去选举经验的总结

首先应该指出，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前的苏维埃选举，与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后的苏维埃选举，有很大的不同。一苏大会前的选举，最显著的是没有明确的选举法，居民中有选举权的与没有选举权的没有明白地划清。在方法上，多是用一种群众大会方式进行选举。群众的多数还不充分认识选举是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重要关节，因此没有争取选民的多数来参加选举。在一苏大会后，由于中央政府的领导与阶级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两次选举的表现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了。选举细则制定了，选民与非选民开始严格地分开，开始用选民大会方式在选举委员会领导之下进行选举。选民对于选举意义的认识提高，因此参加选举的人数增加了。一苏大会后两次选举中第二次比第一次参加选举的人数更见增多，部分地方竟达到了选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兴国与赣东北）。许多地方的选举大会上（尤其是

第二次选举）发动了选民对候选名单的热烈的批评，收集了许多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问题的提案。在这个基础上，苏维埃的成分比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过去有不少的阶级异己分子与投机分子混入苏维埃中来，经过一苏大会后的两次改选，这些成分大批地被淘汰了。相反的方面，大批工农先进分子被选举到了苏维埃，建筑了苏维埃大厦的强固的基础。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工人成分的加多与加强，形成了苏维埃中无产阶级的骨干，建立了乡苏与市苏的经常代表会议制度。所有这些不可否认的成绩，都证明与一苏大会前的选举有很大的进步。

但是一苏大会后的两次选举不是没有缺点与错误的。只有我们正确地估计了成绩，又清楚地认识了错误，才能更顺利地开展目前这一次选举，使这一次选举与前两次选举更加表现它的不同与进步。前两次选举中最主要的缺点错误是：（一）发动群众不充分。这里主要是许多地方政府的主席与主席团还不深刻认识选举的重要意义，因此没有着重去讨论领导选举的问题，没有着重去做关于选举的宣传鼓动工作，因此参加选举的人数，除一部分地方之外，许多的地方还没有达到大多数的程度。（二）在选举中许多地方不能如兴国第二次选举时一样，发动热烈的批评与斗争，发动群众讨论提案。个别地方则完全是和平改选，形式上改换了一些代表和负责人，实质上与过去状况没有多大变更。（三）多数地方没有把查田运动与检查劳动法的斗争同选举运动密切联系起来，不知道在选举之前开展查田运动，工农检查部进行检举运动，劳动部检查劳动法的实施，因此一方面，不能高度开展农村中与城市中的阶级斗争，激发工人与农民的积极性，来参加选举，监督选举，涌出无数积极坚决分子贡献给选举。另一方面，就使得一些消极怠工分子、贪污腐

化分子，甚至阶级异己分子，事先未被查出，还能够借着选举混入苏维埃政权中来。（四）对于吸引工人积极分子使之当选，许多地方还做得不够，工人当选的数量质量虽有增加，但仍未达到应有的程度。（五）对于使女工农妇当选到苏维埃工作，许多地方注意得非常不够，因此，除兴国等处有好的成绩外，许多地方乡苏中劳动妇女当选的依然不多，一部分乡苏甚至一个女代表都还没有。区以上政府女子当选为委员的一般就都更少了。（六）选举方法上的错误：第一，是选举会单位太大，多数地方都是以乡为单位开会，使选民到会不容易。工人与农民混合开会，使工人不容易选举他们所要选举的人。第二，是将候选名单整个地报告讨论表决，而不是按名逐一报告，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真意不能充分发表，不良分子容易蒙混当选。这个错误发现在许多地方。第三，是许多地方选举委员会不起作用，仍然只是政府主席等几个人在领导选举。第四，有少数地方简直违反选举法令，不开选民大会，而由区乡政府负责人指派乡苏代表，这是绝对错误的办法。所有过去的经验——不论是成功方面与缺点错误方面，都是我们目前选举的教训，学习过去成功的地方，而坚决不容许过去的缺点错误再存在于这次选举，就是我们总结过去经验的目的。

二　此次选举的方针

苏维埃政府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这是目前阶段上革命政权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首先表现在苏维埃的选举上：一方面剥夺一切剥削分子的选举权，另一方面吸引尽可能多数的工人农民及贫民分子积极地参加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这个原则下，除了重新颁

布选举法之外，特再依据过去的经验，对于目前进行的选举有如下各项的指示：

（一）责成人民委员会及土地人民委员部，着力指导各级政府抓紧这一时期的查田运动工作。要使各地冒称中农贫农偷取了选举权的地主富农成分彻底清查出来，使这次选举的权利完全落在工农身上。要在查田斗争中去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去锻炼大批群众干部贡献到选举中来。劳动人民委员部要抓紧这一时机指导各级劳动部着力于劳动法实施情形的检查。开展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保护工人的日常利益，发动工人积极地参加选举，并在选举运动中起领导的作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应抓紧这一时机开展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检举运动，有系统地迅速地发动思想斗争，用自我批评的火力反对贪污腐化现象，反对对于查田运动对于检查劳动法实施的消极怠工现象，反对对于选举工作的官僚主义方式。尤其要驱逐暗藏在苏维埃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成分不好，又加工作不好的），使他们不能在选举工作中起坏的领导作用。

（二）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教育人民委员部应着力指导各级内务部与教育部，立即进行此次选举的宣传鼓动工作，不但要组织选举宣传队，而且要使一切农村中与城市中的俱乐部、识字班、夜学校、小学校、列宁室与墙报，都为此次选举活动起来。关于宣传的材料与方法，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与省县教育部去作充分的供给。同时责成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社对于此次选举运动作有系统的记载，要使《红色中华》成为此次选举运动的一个有力宣传者与组织者。

（三）关于选举工作的实际进行，下面指出的各点必须特别注意，必须使之完全见诸事实。

（甲）关于乡苏与市苏的选举：

乡苏与市苏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乡苏与市苏的选举是基本的选举。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一）须根据《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规定，由区苏市苏及区一级与市一级的各个群众团体的代表，组织“选举委员会”，担负领导选举的一切工作，选举委员会必须切实工作起来，不能容许仍如过去许多地方的一样成为有名无实的机关。（二）选举运动的动员方式，主要是在区乡两级召集各群众团体的联席会议，个别群众团体的会议，以讨论选举法的内容与选举工作的布置，这里最主要的是动员工会、贫农团与女工农妇代表会。（三）对于候选名单，选举委员会应作充分的事先准备。候选名单，应该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的意见，由选举委员会公布，使选民对于各候选人能够加以充分的考虑，当实行选举时，须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讨论，逐一表决，使选民尽量发表意见，使革命的民主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绝对禁止用强迫命令方式去通过代表名单。当选民中有不赞成某人的表示时，须立即注意群众的意见，如果为多数人所反对，应即撤销原提议，而另提适当的候选人，或由群众提出候选人。（四）乡苏市苏代表工农成分的比例，在选举法中已有规定，这里应指出劳动妇女的成分，至少要使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如果过去乡苏市苏全无妇女代表的地方，这点尤须注意。（五）乡苏市苏的选举名单，不但应注意不使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成分与工作均坏的）混了进来，还应注意各人的政治表现与工作能力。凡属工作不积极的分子，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表现过贪污腐化的分子，工作方式上表现浓厚官僚主义的分子，凡有这些错误表现的，都不能使之当选（以最近时期为准，过去虽犯过这些错误，但最近已经改变了的，仍然可以当选）。除了政治表现是选举最主要的标准外，工作能力方面，亦应予以相当的注意。过去有

些地方只看成分，不看能力，把能力过于薄弱分子引进政府，仍然是不妥当的。（六）在选举大会开会之前，须将选民提案的草案准备好，并普遍公布出去，使选民看了草案好去充分准备意见，在选举大会上将草案经过选民群众的修改通过，作为正式的提案。提案的内容，要能够充分表现当地群众对于自己生活，对于政府的法令政策，对于革命战争的意见。（七）乡苏与市苏的代表完全产生出来之后，由旧的乡苏和市苏召集新的乡苏和市苏的第一次全体代表会议，推选市苏的主席团、各科科长，推选乡苏的主席副主席。同时在乡苏的会议上选举，出席区苏代表大会的代表，市苏则选举出席县苏代表大会的代表。（隶属于区的市苏，则仍选举到区苏代表大会。）

（乙）关于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选举及其工作：（一）区县省三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区县省三级的执行委员会召集之。在大会前，各级应将自己的工作报告准备好，提到各该级主席团会议上通过，以便提向代表大会。大会前半个月须公布大会的议事日程，使到会代表可以很早准备意见。大会议事日程上应列入的问题，如（1）上级政府的工作报告；（2）本级政府的工作报告；（3）战争动员工作；（4）经济建设工作；（5）查田运动的总结；（6）当地重要建设事业；（7）选举执行委员会；（8）选举出席上级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等。这些议题，可以酌量当地情形以增减之。（二）大会的决议，应在大会前一星期起草好，抄写或印刷出来，使代表们可以看草案原文，然后经过大会的讨论通过，作为决议。（三）对执行委员会的候选名单，旧的执行委员会及大会主席团要有很好的考察，必须将查田运动中及各种斗争中表现最积极最坚决的分子，选举到执行委员会去，而不使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及表现贪污腐

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工作方式的分子，当选为执行委员。在选举执行委员会时，要特别注意工人积极分子，要将这样的分子大量地选举到执行委员会去，加强无产阶级在苏维埃中的领导力量。同时对于贫农中农的积极分子，要有很好的注意与吸收。并且不要忘记了选举劳动妇女到苏维埃工作，执行委员之中，劳动妇女至少要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数当选。准备候选名单的，除注意成分之外，同时须注意工作能力，决不能只看成分，不看工作能力如何，随便列入名单。执行委员选出之后，须报告上级执行委员会审查批准。

（四）关于政府向选民及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必须在这次选举运动中真正地实行起来。过去除一部分地方外，多数地方没有实行，是不对的。这一办法的实行，能使政府的政策与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的机会，能使选民对于选举的热忱提到更高的程度。实行的办法是：乡苏市苏在选举之前一星期，以屋子或村子为单位召集选民大会，作总结乡苏市苏过去的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经过的报告，发动选民群众的批评与讨论，欢迎他们提出新的具体的意见，以为政府以后工作的方针。区政府须在各乡苏和市苏的全体代表会议上作工作报告，并吸收广大群众来参加旁听，乡苏市苏的代表会议，对于区苏的工作报告，须作详细的讨论，将讨论结果提到区政府去。县政府则派代表到区苏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省政府则派代表到县苏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中央政府则到省苏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同时在各级代表大会上，本级的执行委员会须向之作同样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之后，都须经过详细讨论，将讨论结果，按级报告上级政府。要将群众对于政府工作的意见，一直达到中央政府来，使苏维埃的最高机关了解群众的情绪与要求。各级政府对于自己的工作报告，须事先指定专人起草。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拟出

报告大纲，发往各级政府，要各级政府按照这个大纲起草报告书，向同级的下级的代表大会及选民大会作报告。（五）省对于县，县对于区，区对于乡，必须按级派人去巡视，检查当地选举工作及苏维埃大会的情形。对于特别好的和特别坏的例子，须迅速收集起来，拿去指导别地的选举工作。（六）司法人民委员部应通令各级裁判部，将过去自新自首而没有明确规定剥夺选举权期限的工农分子，重新审查规定，免得这些工农分子排除在选举范围之外。

苏维埃选举是工农民主专政实施的重要关节，这次选举更负着伟大的历史任务，各级政府必须依照本训令的全部指示及《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的规定，切实进行这次选举，务使这次选举，得到完全的胜利。要拿了这次选举的完全胜利，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开展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的领土。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九日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933年8月12日）

同志们：我们这次开两个经济建设大会——南部十七个县的与北部十一个县的。这种为着经济建设而开的大会以前是没有开过的，今天是第一次。目前的形势是：敌人的四次“围剿”已经被我们完全粉碎，而五次“围剿”接着就要到来，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大风暴是逼近着我们了。帝国主义大战与反苏联的战争是在疯狂般地准备着：帝国主义是在疯狂地压迫中国，日本占领了中国四个半省，正在向内蒙古一带发展他们的强盗战争，国民党四次“围剿”惨败后，正在布置新的第五次“围剿”。全中国的革命斗争与革命战争是面临一种新的形势而大踏步地开展着。这时候我们在这里开经济建设大会，这就指明了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我们的经济建设是为着什么，我今天的报告就在解释这一点，我的报告分作下面两部分来说：

一　四次“围剿”的粉碎与新的五次“围剿”

（一）我首先来说粉碎四次“围剿”中我们所得到的胜利。

我们要说：

第一，是敌人部队的大数量的消灭。

四次“围剿”是彻底粉碎了。总括一年来中央区、鄂豫皖、四川、湘鄂西以及湘赣、湘鄂赣、闽浙赣各苏区红军，消灭敌人部队总数在十五师以上，比过去粉碎敌人三次“围剿”时的胜利更大了。敌人的武装力量，受了一个最严重的打击，敌军全部中下级军官，都十分畏惧红军，怕与红军作战，而白军士兵的动摇及对革命的同情，则在日益增长。

第二，是红军的坚强与扩大。

红军已经成为无敌的铁军了，红军编制的改变，军事技术的提高，政治上的坚定，都比过去有了极大的进步，红军的扩大，比较过去是增加了一倍，我们已经建立了大规模的作战军。

第三，苏区是更加巩固了。

在四次“围剿”中，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与拥护革命战争的热忱是更加提高了。查田运动的深入，工人斗争的发展，使得苏区内部封建残余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群众的文化教育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建设运动开始了发展的新形势，苏维埃的工作更加改善了，他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苏维埃的旗帜映入了全国劳苦群众的心目中。

第四，是扩大了苏维埃的领土。

中央区闽赣省的建立，四川几百里新苏区的开辟，湘鄂川贺龙同志那方面又发展了一个大苏区。

第五，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革命运动也是极大地发展了。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去中国四个半省，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订立中国与日本的卖国协定，使得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

党的运动大规模地开展了，因为国民党的压迫屠杀，农工商业的破产，资本家与地主更加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使得工人的罢工斗争，农民灾民的反捐税斗争，农村暴动与游击战争大大地发展了。

（二）同志们：我们已得到了极大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是依靠着什么得来的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是依靠于：（1）红军的英勇善战；（2）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积极性；（3）共产党正确路线的领导。这三个重要条件，才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取得了上边所说这些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给予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以极大的打击，一方面使革命力量更加增大了，取着铁的强流的形势向前猛进着，另一方面使得反革命力量更加削弱，更加感觉他们的危亡迫在眼前，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布置一个更大规模的进攻，企图挽救他们将死的统治。

（三）因此敌人疯狂地在布置他们的第五次“围剿”。

为了布置这一次“围剿”，使国民党不得不更加投降于帝国主义，蒋介石在出卖了东三省热河华北之后，更以许多卖国条件同美、英、法、意、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订立了密约，借得大批金钱和军火，重新调动部队，训练新兵，拉拢各级军阀（但军阀间的冲突与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正在积极地布置对于苏维埃和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二　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一）争取一切有利条件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中国革命现在是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即是说，帝国主义把中国灭亡呢？还是革命战争消灭国民党，驱逐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苏维埃中国呢？帝国主义国民党决定了灭亡中国的道路，他们已经采取了五次“围剿”，这种办法，要在五次“围剿”中把中国完全瓜分或者共管，使中国几万万民众，变成帝国主义的牛马奴隶，变成印度人和高丽人，使中国变成完全的帝国主义殖民地，这是一个绝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在我们的头上威胁着。同志们，我们能听任他们这样做吗？不能，我们要争取革命的出路，我们的出路是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成为新的自由独立的工农兵苏维埃共和国，这里重要的关头，是彻底粉碎他们的五次“围剿”。争取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仍然是依靠于红军，依靠于群众，依靠于坚决执行共产党的进攻路线，但我们必定要用我们的一切努力去争取一切比较过去更加充足的条件，方能粉碎五次“围剿”，方能取得比较过去更加伟大的胜利。

为了争取这次胜利，我们要做许多的工作。我们要猛烈扩大红军，要在中央区及临近几个苏区六个月至十个月内办到扩大二十万个新战士上前线去，使各个战线上的红军集团更加壮大起来，能够担负着打击蒋介石几十万白军的任务。要开展广泛深入的查田运动，激烈发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去最后地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加热烈地欢喜地参加革命战争。要普遍实行劳动法，启发工人斗争，更加提高工人群众的对于

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要经过今年的选举运动，改选各级苏维埃，从乡苏直到中央一律实行新的改选，使整个苏维埃政权铁一样地强固起来，更能担负组织与指挥革命战争的伟大事业。要注意边区和新发展区域的工作，使革命战争得到便利条件迅速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要发展群众的文化运动，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政治水平，使革命战争得到一个精神上的有力的工具。除此以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而为我们此次所要着力讨论的，这就是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我们要猛力开展经济建设运动，要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看成为粉碎五次“围剿”的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供给革命战争一个必不可缺少的物质上的条件，这次经济建设大会的召集就是为着这个目的。

（二）伟大的经济建设任务是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内容参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第一段至第五段。

（三）经济建设中的领导方式问题

内容参见《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第六段至第十一段。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

（1933年8月12日）

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2]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

---

[1] 这是毛泽东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召开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

[2] 从1930年至1934年，国民党军队对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叫做五次“围剿”。第五次“围剿”的正式开始是在1933年9月间，但从1933年夏季，蒋介石就在积极部署这次进攻。

行经济建设。同志们，这些意见是不对的。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你们看，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我们如果不把这些困难克服，革命战争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吗？盐很贵，有时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个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的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虑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必须这样干才叫做服从战争。现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员中，还有许多人不明了经济建设工作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地方政府没有着重讨论经济建设的问题。各地政府的国民经济部的组织还不健全，有些连部长还没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较差的人去凑数。合作社的发展还只在开始的阶段，调剂粮食的工作也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做起来。各地

还没有把经济建设这个任务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这是十分紧要的），还没有在群众中造成为着经济建设而斗争的热烈的空气。这些情形，都是由于忽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来的。我们一定要经过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讨论和会后回去的传达，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1]，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大家要努力去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多造农具，多产石灰，使明年的收获增多，恢复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香菇、薄荷油等特产过去的产量，并把它们大批地输出到白区去。

从出入口贸易的数量来看，我们第一个大宗出口是粮食。每年大约有三百万担谷子出口，三百万群众中每人平均输出一担谷交换必需品进来，不会是更少的吧。这笔生意是什么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这中间进行了残酷的剥削。去年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五角钱一担谷卖给商人，而商人运到赣州卖四块钱一担，赚去了七倍。又看三百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万块钱的盐，要穿差不多六百万块钱的布。这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的进口，过去不消说都

---

[1] 圩场，江西、福建等省农村中定期进行交易的市场。

是商人在那里做的，我们没有去管过。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一块钱七斤，运到我区，一块钱卖十二两。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像这样的事情，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以后是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

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的发行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发展生产，大部分用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我们的目的不但要发展生产，并且要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得盐布进来，分配给人民群众，这样去打破敌人的封锁，抵制商人的剥削。我们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但是我们问一问，这个任务在激烈的战争环境内，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们并不是说要修一条铁路通龙岩，暂时也不是说要修一条汽车道通赣州。我们不是说粮食完全专卖，也不是说一千五百万元盐布生意都由政府经管不准商人插手。我们不是这样说，也不是这样做的。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食盐和布匹，暂时从两百万资金再加上群众的股本做起。这些是不应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吗？这些工作我们已经开始做了，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过了增加两成秋收的预计。手工业方面，农具和石灰的生产在恢复过程中，钨砂的生产开始恢复。烟、纸和木头的生产也开始有了点生气。粮食调剂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绩。食盐入口也开始有部分的工作了。这些成绩，就是我们坚信将来能够发展的基

础。人们说要到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而在现在则是不可能的，这不是明显的错误观点吗？

因此也就明白，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如果同志们中间有离开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想法，那就应立刻改正。

没有正确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要在这次会议得到解决。因为同志们回去，不但要立即动手去做许多工作，并且要指导许多工作人员一道去做。尤其是乡和市这一级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粮食局、贸易局、采办处这些机关里的同志，他们是亲手动员群众组织合作社、调剂和运输粮食、管理出入口贸易的实际工作人员，如果他们的领导方式不对，不能采取各种正确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会立刻影响到工作的成效，使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整个计划。因此，我要向同志们指出下面的几点：

第一，从组织上动员群众。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

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末，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

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第三，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人们常常叹气没有干部。同志们，真的没有干部吗？从土地斗争、经济斗争、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涌出来了无数的干部，怎么好说没有干部呢？丢掉错误的观点，干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只有深入查田运动[1]，才能彻底地消灭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发展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使广大农民迅速地走入经济建设的战线上来。只有坚决地实行劳动法，才能改善工人群众的生活，使工人群众积极地迅速地参加经济建设事业，而加强他们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只有正确地领导选举运动和跟着查田运动的开展而开展的检举运动[2]，才能健全我们的政府机关，使

---

[1]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于1933年至1934年开展了一次查田运动。查田是为了查漏划的地主富农，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巩固和纯洁苏维埃政权。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同时按照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的规定，《训令》还提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在这次查田运动中，存在着“左”的错误。

[2] 检举运动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在1932年底至1934年间开展的一次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检举工农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某些不良行为，并且通过检举，清洗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

我们的政府更有力地领导革命战争，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领导经济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至于一天也不要忽略扩大红军的工作，那更不待说了。大家都明白，没有红军的胜利，经济封锁就要更加厉害。另一方面，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上去。总起来说，假如我们争取了上述的一切条件，包括经济建设这个新的极重要的条件，并且使这一切的条件都服务于革命战争，那末，革命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我们的。

吉安的占领[1]

（1933年8月13日）

事情是打吉安。打了八次了，现在是第九次。

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

这一天月亮儿还没有落尽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经开进了。真君山方面打响了，这是城的西北角上，接着城的北部螺子山打响了，我们的四军就开展在这两个方面。神冈山方面也接触了，这是城的南部与西南部，部队是我们的第三军。我们包围了吉安。晚上看不见的红旗一到东方的红日涌出来的时候，一齐都看见了。剧烈的步枪声、机关枪声、迫击炮声比过年打鞭炮还要热闹。很多的红旗发现在第二线，这就是无数万的赤卫军[2]与少先队[3]，人都伏在地上，因为敌人炮子的射击超过了我们赤少队的头上。天上有什么东西响动了，没有一分钟，就发现了敌人的红尾巴飞机，我们总司令部的阵地附近落下了几个大炸弹，人却没有伤一个。为了争夺真君山的阵地，剧烈的战斗在那里开展了。螺子山的队伍的一部分，从

---

[1] 这是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写的红军第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四版上。

[2] 赤卫军，即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3] 少先队，即少年先锋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亦不脱离生产。

敌人的薄弱点打进城去了，可惜又退了回来，这是因为敌人在西南部阵地调动了一部力量，向我们举行反攻。打了整个的一天。我们的十二军赶到了，加强了城西的阵地。天黑了，战斗有一时间的休息，我们准备着夜战解决敌人，打进城去。

敌人的头子，叫做邓英[1]，当我们红三军第八次攻吉不成的时候，南京狗政府曾下了一道褒奖他的命令，说他得到了“剿匪”的第一功，他也就趾高气扬起来，以为我邓大哥不但是高超过杨池生杨如轩李文彬[2]以至朱培德[3]那些头子，并且比起当今“剿匪”总指挥张辉瓒[4]，坐镇南昌的鲁[5]胖子也要威风得一二倍，喝酒呀！调堂呀！在土豪劣绅资本家以及牧师神父面前拍胸膛，称好汉呀！这些土豪劣绅资本家牧师神父们，居然信以为真，以为一面有了邓军阀的壮胆的演说，一面又确实看到了吉安城防的巩固——堡垒、壕沟、铁丝网，这些限制红军铁拳的宝贝，大概一定可以多活几天了。不料红军忽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规模的包围与猛攻，四号这一天，确实把一切军阀资本家土豪劣绅牧师神父们的狗胆都骇破了，街上乱钻的都是人，一时说南门来了，往北门奔，一时说北门来了，又往南门奔，当着螺子山一部分红军真的打进来了的时候，全城更加作起反来。城内的工人群众在这一天却另有一种特别的兴

---

[1] 邓英，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

[2] 杨池生，曾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杨如轩，曾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十一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李文彬，曾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3] 朱培德，曾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4] 张辉瓒，曾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师长。

[5] 鲁，指鲁涤平，曾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

奋，许多都抓紧了拳头，只等一个时候，就好打反动派。邓军阀的命令下来了，说的是不准一个人到河边去，连资本家土豪劣绅牧师神父都在内。河边上站立了拿枪的军队，河内一切的船只集拢在码头旁边的一块，任何一个土豪跪向邓军阀面前，要求坐个船逃命也不能，真的小军阀邓英大有与吉安城共存亡的样子。

乌黑的晚上红军举行新的攻击了，从真君山打了进去，那邓军阀自己带领他的队伍的一部分，都从河里溜掉了，一部跑不脱缴了枪。一个土豪劣绅资本家牧师神父都没有跑掉。吉安城就从这一刻起，落到了红军与苏维埃的手里了。底下就是第二天红旗子的群众大队伍进城，共产党机关与地方苏维埃机关也进城了，城内的工人及无数的贫苦群众都跑到街上热烈地来欢迎红军。这时候大捉土豪劣绅牧师神父与反动的资本家，就像捉猪捉羊一样，这里牵了一路，那里锁了一串，接着就是以后许多日子不断的群众大会呀！扩大红军呀！工人的代表大会呀！苏维埃大会呀！共产党大会呀！各县群众来看红色的吉安呀！轰轰烈烈，把个吉安城成了新世界。

根据红军负责同志的意见，此次占领吉安的教训是在：（一）反对了立三路线[1]的主张（反对打吉安，主张打九江，他们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才把吉安占领的，这次的占

---

[1] 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领吉安，是有极大的政治上意义，他不但在全国有极大的影响，并且与后来克服AB团[1]暴动的富田事变，与争取第一次革命战争胜利有直接意义。因为吉安的占领，给了AB团首先一个政治上的打击，同时吉安四十天的占领，给予进攻的敌人以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极大损失。（二）此次攻吉战役军事上是有缺点的，如兵力没有完全集中就进行攻击，那时集中了的只有四军与二十军，三军还没有完全赶上，十二军还差一天路，都是陆续地进入吉安城的阵地。如果迟一天攻击，整个一军团的部队都集中，就可以举行同时包围，同时攻击，不至于当着四军的一部打进城去了，敌人还能从城西调动队伍举行反攻，把我们入城的部队打了出来，使我们不能在四号的白天把邓英全部俘虏，这是一。再则，三号晚的夜间攻击计划，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是阵地战，敌人有坚固的工事，红军地形不熟识，应该经过开进与侦察的阶段，才能适当地布置兵力，选择攻击点，不至于把部队开上了阵地，发觉不适当，也无法改变，要到四号晚才能重新来一个配备，这也是白天未打进去，不能把邓英全部消灭的一个原因。还有三军团的使用不放在吉水、峡江，而放在离吉安很远的清江，以致邓英能够坐船逃跑。这些军事上的缺点与错误，都是从轻视敌人这个观点来的，以为敌人只有四团，费不了我们许多力量，由于这个错误观点，所以给敌人大都跑掉了，这是一个好的教训。

---

[1] 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

（1933年8月25日）

当着红军胜利、苏区扩大、革命运动猛烈向前开展的时候，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这里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当国家的财政，这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根本原则。

在这个原则下，苏维埃财政机关应以革命的手段，健全的组织，严密的计划，扩大财政收入，使与革命战争的发展相适应，一切离开政治任务的保守观念与无计划的凌乱状态都是非常有害的。

过去苏维埃财政机关的工作，在人民委员会的监督下面，对于供给战争需要、建立会计制度等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财政政策的原则方面，没有坚持正确的方针，主要表现在没有用最大努力去从剥削者方面筹款，去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而用其全力于租税改入及纸币公债一方面。同时对革命发展估计不足，使财政缺乏计划性，这对于大规模的财务行政，是有妨碍的。在领导方式上，如筹款不依靠于城市乡苏维埃与工农群众团体，经过他们去动员广大群众，而只依靠区以上工作人员少数人去干，以

致不能充分达到任务，这种官僚主义领导方式在苏维埃财政机关内，甚浓厚地存在着的。在干部问题上，不注意训练提拔大批的财政工作人员，部分的贪污腐化分子，不注意去批评洗刷。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不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对革命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的结果，而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同志是应负最大责任的。

人民委员会认为这一现象不能容许继续存在，责令新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同志，加以根本的整理，应从开展整个财政系统的自我批评，去纠正财政政策上的错误认识，去建立适应战争发展的财政计划，去转变领导方式，去提拔与训练大批财政工作人员，去肃清财政系统内部的贪污腐化现象，使整个苏维埃财政系统迅速健全起来，使苏维埃财政能够适合革命的发展，给予革命战争一个充分的财政条件，以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为发行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1]

（1933年8月28日）

中央政府为了发展生产，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扩大出口入口贸易，以打破敌人的封锁，节制商人的剥削，使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更大的改良，使革命战争得到充足的物质条件，特决定接受贫农团代表大会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请求，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并通过经济建设公债条例，以为此项公债的法律保证。

但是此项公债的发行，完全依靠于工农群众的革命热忱，必须是群众自动自愿地购买，绝对不能强迫摊派。各级政府，尤其是市苏、区苏、乡苏，必须召集当地群众团体的会议，解释明白。乡苏须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向各个代表解释清楚。经过各群众团体与乡代表，去召集各村各屋的群众大会，向每个工农同志，说明发行此项公债的意义。群众购买公债的时候，买多买少，听其自愿，平均摊派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除了尽量由工农群众购买之外，苏区其他居民均可购买，不加限制。凡我苏区民众，都应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一致起来购买公债，拥护公债，帮助政府推销公债，使此项公债短期间内推销完毕，迅速达到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如有反革命分子造谣捣乱，破坏公债信用，阻碍公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布告（第二十六号）。

债发行，工农群众应在政府领导之下，采取革命办法，去镇压这些反革命分子，以保障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特此布告。

附：经济建设公债条例

（内容参见《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一文）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推销公债的方法

（1933年8月28日）

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已在瑞金各处开始发行。根据瑞金最近的经验，虽有云集区等处采用了正确方法，收得极大成绩，但在其他几个区中却犯了极大错误。主要表现在区苏主席团没有将抓紧推销公债这一工作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去讨论去检阅，把推销公债看做只是财政部的事；没有推动区一级的群众团体作一致的动员，以致在许多乡中发生了平均摊派的极严重现象。不经过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的讨论与承认，不在乡苏的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更不开群众大会将公债意义解释清楚，而只把公债票发交乡苏，乡苏平均分配于各个乡代表，乡代表又平均分配于群众，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一律平均分摊。个别地方则强迫中农买，不买就说他是富农，以致许多地方引起了群众不满意，妨碍了公债的推销。但在云集区就完全不同，因为云集区苏对各乡的动员方法很正确，对乡一级的干部有详细的说明，再由这些干部向群众作了很好的宣传，所以得了极大的成绩。全区共认销四万零七百元，不到三个星期，已推销了二万五千五百元，其中以洋溪乡的工作做得最好，该乡担任的四千六百余元，业已全数销完。云集区及洋溪乡的光荣例子，值得全苏区来学习。中央政府为使此次公债发行得到完满的成绩，特为推销公债的动员方法这一问题指出下面几点：各级

政府必须完全依照执行。

（一）省苏要抓紧全省发行公债这一工作去讨论，去推动，去检查。要在省苏所在地的一个县中，搜集推销公债的经验，将动员方法好的例子与坏的例子写成文件，迅速指导全省各县。

（二）县苏要抓紧全县发行公债的工作去讨论，去推动，去检查。同样要在县苏附近几个区中，搜集经验，将好的坏的例子写成文件指导各区。

县苏主席团要为了推销公债，召集全县各区主席与财政部长开会。公债未到之县，也要先行召集此会，使各区先做动员工作，不要等公债到了，才匆忙开会讨论。公债发行以后，还要召集各区主席开会检阅，纠正他们的错误。

（三）区苏是发行公债动员群众的枢纽，要召集乡苏主席贫农团主任及其他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开会，详细告诉他们发行公债的意义与动员群众的方法，同时要派人分往各乡帮助乡苏去召集乡代表会、贫农团会、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的会，对他们作详细的解释。要经过乡一级的干部到各村各屋子去召集群众大会向群众详细地说明经济建设公债的意义。如果一次会之后群众还不明了，必须再到各村各屋子去开第二次会。如果还有不明了的地方必须再到那个地方去开第三次会。总要使群众完全明了，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战争的胜利，踊跃购买公债票。

（四）各级政府主席团及乡苏主席，必须严格防止平均摊派的错误，要晓得平均摊派是十足的官僚主义，是阻碍公债推销的极端错误办法，一方面使反革命分子容易造谣欺骗，另一方面不能使工农群众发扬其革命热忱，以后如再发现平均摊派的事，上级政府须立即纠正，纠正不改必须给以处罚。

（五）反对平均摊派，就是要鼓动群众自愿地买公债。买得多的要把他的名字并所买公债的数目在乡苏门前，出榜示众，以作模范。不肯买的，绝对不能强迫他买，要由乡苏代表、妇女代表会的代表及工会贫农团的会员，去劝他买，去鼓励他买，可以要那些买了公债的，去劝那些没有买公债的，可以把买得多的人每村组织一个宣传队，去进行推销公债的宣传。

（六）关于宣传工作，中央政府已经出了布告，乡政府收到布告应立即派人张贴到各村各屋子去。又发了经济建设公债的宣传大纲，区苏乡苏工作人员及宣传队，应按照这个大纲上面的各条，向群众做宣传鼓动工作。

（七）公债交谷交钱，听群众自便，谷价由区苏按照当地市价规定，通知各乡。

（八）各区苏应该领导各乡订立推销公债的竞赛条约，竞赛条约上不单规定数目字，还要规定不得用强迫摊派等官僚主义办法。完成竞赛条约的期间，不能定得太短（当然也不能拖延太长），因为太短了就不能采用充分的动员方法。

以上八项都是此次发行公债所必须注意的。省苏与县苏须派人到各县各区去巡视，看各地是不是完全执行了中央政府这一指示。县苏还须注意将本县发行公债最有成绩的区，作成简单的总结，寄到《红色中华》发表，以鼓励全苏区推销公债。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1]

（1933年8月28日）

国币是发展国民经济、便利群众交易的工具。政府对于国币流通数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计划与充分保证的。近来有一部分地方，发生不信用国家纸票、银毫或者降低纸票价格的现象。中央政府已命令各地政府，立即实行下列方法：（一）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解释，鼓励群众普遍使用国币，严办故意破坏纸票的分子。（二）召集商人小贩开会，说明苏维埃纸票是有全部国家收入作抵押的。（三）各机关各部队必须一律使用纸票、银毫。

---

[1] 这是毛泽东以“东”署名在《红色中华》上发表关于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的文章。

关于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1933 年 8 月 29 日）

一　伟大的胜利

查田运动在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之下，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如果说，查田运动过去还仅仅在开始的阶段上，那么在六月的八县查田大会后，七月一个月的工作，便已超过了去冬以来大半年中所做的成绩。一般说，在开会的八个县中，查田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形势，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瑞金与博生成绩最大，两县共查出了二千几百家地主、富农；胜利、于都、会昌、汀东、长汀、五城、宁化各县，亦都有了初步成绩，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广大的群众斗争发动了，苏维埃工作中、党的工作中许多过去停滞着的状态现在都活跃起来了。苏维埃中的坏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遭到严厉的镇压。一句话，封建残余势力，在广大群众面前遭受了惨败。在这个基础上，各种工作更加开展了。在查田有成绩的区域，扩大红军与扩大地方武装，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与发展合作社，秋收秋耕与发展劳动互助社，以及俱乐部夜学小学文化建设事业，都得到了极大的成绩，一切工作进行更加顺利了。在群众活跃的基础上，大批积极分子自己创造成为各种工作干部，许多工农积极分子加入了党，被

吸收到苏维埃工作中来。最好的例子是瑞金的壬田区，壬田区的查田运动在中央政府工作团帮助之下，五十五天中发动了全区的群众，彻底消灭了封建残余，查出了地主富农三百余家，枪决了群众所谓“大老虎”的十二个反革命分子，镇压了反革命活动，在群众面前检举了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一些分子，清洗了一些混进苏维埃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出去。全区查出了土地二万七千担，全区二万余劳苦群众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担二斗谷土地，分配了豪绅地主的无数财物给予群众。依靠于群众积极性的空前提高，五十五天中扩大红军七百余人进瑞金模范师去，没有一个开小差，节省谷子卖给红军，达到了一千九百余担，全县没有任何区比得上它。在各乡的要求下，全区担任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四万元，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已收得七千五百元，承认继续去筹备一万元。合作社迅速地发展了，文化教育建设如俱乐部、识字班、夜学也增加了，党员数量扩大，党的领导加强了，工会工作也进步了。全区另换了一种新气象，由瑞金的一个落后区，在五十五天中换了地位，成了与武阳区相等的一等区了。我们现在要问：壬田区为什么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呢？那我们应该指出，由于他们认识了查田任务的重要，由于他们的动员方式，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都是坚决执行了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正确指示，他们做了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工作，在任务的认识上，他们懂得查田运动与革命战争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认真地做这个工作，抓紧了查田运动的领导，有计划地去布置当地的工作，在动员方式上，他们在全区十一个乡中，抓紧了最落后和比较落后的七个乡的工作，在这七个乡中动员了党，动员了团，动员了乡苏，动员了工会与贫农团及其他群众团体，经过他们去动员广大的群众。在阶级路线上，坚决执行了依靠雇农贫

农与联合中农的策略，广大地发展了贫农团。他们说明了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阶级，他们“讲阶级”的工作做得很充分。当着鹅凤乡的地主富农，恐吓中农，使部分的中农发生恐慌的时候，我们的同志找了几个中农来作个别的谈话，经过他们去传达其他中农，鹅凤乡的中农立即稳定起来，接着积极拥护苏维埃的查田政策，从受地主、富农的欺骗转到与贫农工人一致联合进攻地主富农，壬田区的同志亦曾错误地处置了几家成分，但他们迅速地改正了错误。关于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首先他们作了广泛的宣传，不是开全区全乡会，他们开的是村子屋子会，这样去接近更广大群众，向他们作了多少次的宣传鼓动，所以全区群众都明了查田查阶级是自己的责任，自己的利益。其次调查阶级的成分，发动了多数人去查，详细搜集了各个成分的材料证明给群众看，所以没有发生群众不满意的事。其次通过阶级成分，是首先经过了查田委员会的分析决定，提交贫农团讨论通过，送达苏区批准，再到被没收人的村子里召集本村群众大会，解释明白，举手赞成，然后举行没收，在分配财物与土地上，工作人员都能了解自己应做模范，不拿东西，而把东西完全分给群众，没收的村子多分，其他的村子少分，得到了群众的完全满意，土地也迅速地分配了。别地拖延很久才分的现象，壬田区是没有的，所以迅速地发动了群众。他们打进落后大村子的办法也是正确的，他们不是畏惧这些大村子，他们也不用蛮干的办法去对付，他们对大村子是集中了火力，作了更多的宣传，从争取当地的积极分子着手，团结他们，教育他们。经过他们去动员其他的群众，他们很耐心地去做这种村子里的工作，表面上看是迟慢的，但实际上是迅速的，他们在五十五天中把壬田区所有的落后大村子一概发动了，很短时间消灭了这些村里的落后，柏

坑乡的一个村子打不进去，原来那里有两个著名的“大老虎”一向在作怪，他们就采取不同的办法，首先捉到这两个坏东西在当地开巡回法庭审判他们，经过群众的热烈拥护枪决他们，那里的群众斗争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了。他们开了十次群众审判大会、三次巡回法庭，都是经过了极广泛的群众路线，本乡的人多到，别乡的人每村派代表，小乡十几人，大乡四五十人，所以每一次公审与裁判的结果，都立即传播到了全区各乡各村去，不但使各个乡村的群众都觉得今天审判的这个人该罚该杀，而且使他们立即想到自己地方的那个同样作恶分子也该处治他。壬田区的查田运动真算得全苏区的模范！瑞金九堡区的工作也有极大成绩，他们首先是抓紧三个乡去做，召集各乡的查田委员会委员，到区苏开了三天训练班，讲明了动员方式、阶级路线与争取群众的方法。他们在没收分配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好办法。他们的办法是：要没收一家地主了，就号召本村本屋的群众一同去，在群众大会上选举了没收分配委员会，在群众的监视下进行没收，没收的东西堆在一个大坪上，再经过群众同意立即分配给应得东西的群众，吃得的东西又是一个处置，就是杀猪煮饭让群众大家吃一顿。这个办法在九堡区收了极大的成效，他们的没收分配委员会不是经常组织的，而是临时组织的，更加密切联系了群众（关于土地的没收分配，仍由经常的土地委员会负责）。一切东西不挑到乡苏去，不待集中了若干家然后分配，免去了拖延时日与被别人偷去了的毛病，九堡区在其他的路线上方法上，一般也是正确的，所以能够发动广大群众自己动手查阶级。他们办到了没有一个地主富农到乡苏来闹成分，与过去查田时的情况完全相反，过去总有许多被查的地主、富农到苏维埃来横闹，说把他们查错了。不但本人，甚至有时有个别乡代表贫农团负责人也有

来替他们求请讨保的，这次当然不是地主富农不闹了，而是闹也闹不起来了，他们的同宗，他们的亲戚，没有一个人赞助他们，地主富农软了劲，没有闹的可能了，这件事证明了九堡区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极充分，不然是办不到这个地步的。

所有这些光荣模范的例子（这种例子别的地方还有不少），给了党与中央政府的号召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证明中央局与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绝对正确性，哪一处完全执行了这些指示，哪里就立即取得伟大胜利。但是谁违背了这些指示，忽视了这些指示，哪里的工作就犯了错误，没有成绩或者成绩很微弱。让我再拿事实来证明。

二　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

查田运动的斗争任务，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之后，在中央政府查田训令及召集八县查田大会之后，查田运动在各县的开展，并没有普及到一切地方。这如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绩，还只当得博生一县的成绩；胜利、于都、会昌、石城每县的成绩，还只当得瑞金最好的一个区至两个区的成绩；各地有许多区的查田委员会没有开过一次会，甚至县查田委员会，亦还有几个县没有去抓紧全县的查田工作（会昌、于都、石城、宁化）；许多区与乡的查田委员会，区乡主席不做主任，借口别的事忙，放弃查田不管。党对查田的领导，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地方都明显地表现出党的坚强领导作用，党员群众的大多数，在支部与区委的领导下做了很多布尔什维克的勇敢战斗的工作。但在一切查田没有成绩及成绩微弱的地方，就表现出党部忽视查田运动，这如会昌县委在中央局查田决议发出后，差不

多两个月没有讨论过一次查田工作，直到七月底才开了一次会讨论查田；瑞金的下属区委一个时期中，对查田运动完全不管；瑞金市委虽为查田开过一次会，却没有推动四郊支部去注意查田的领导，各个支部没有为了查田运动开过会的，在别的地方，如于都、胜利、石城、宁化县委与许多区委，同样没有用大力去注意查田工作。党与中央政府说：“查田运动成为发动群众深入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与肃清封建半封建的有力方法（中央局决议）。查田运动是各地苏维埃一刻不容再缓的任务（中央政府训令）。查田运动是目前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八县大会总结）。”我们的许多同志却在说：“忙得很，没有工夫照顾查田运动。”党的决议说：“一切以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付查田运动，是最有害的。”这些同志却还是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来对待查田运动。

三　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

在查田运动开展了的地方，也还表现许多个别的仍是严重的错误，那就是这些地方党部中苏维埃中还常常有个别的同志，在查田运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他们机会主义动摇，这主要在当着查田运动激烈发展的时候，他们丢弃不了姓族与地方的关系，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农成分，或者错误地分析阶级成分，把地主当富农，把富农当中农，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们的极端疏忽中接受了地主富农假冒群众名义对于查田积极分子的诬告。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保卫与裁判部的同志，又没能跟着群众查阶级斗争的开展，去积极镇压反革命，甚至当着群众请求捉拿与枪决抵抗查田运动的地主富农分子时，还有不接受群众请求的。瑞金的裁

判部就是做了许多这样错误的例子。

四　侵犯中农的倾向是最严重的危险

“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七月查田运动中，又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农的倾向，虽然在中央局的决议上早已明白地写着：“必须特别注意与中农群众的联盟，中农是革命后苏维埃农村中最广大的基本群众，一切我们的处置与策略，必须获得他们的赞助与拥护。每一个贫农团与苏维埃的决定，必须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群众会议上得到中农群众的拥护，一切中农群众的呼声，必须注意听，并须严厉地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在八县大会的决议上指出：“查田的目标是查阶级，而不是再分田。”“联合中农应从不侵犯中农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开始，应普遍宣传苏维埃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的政策。在查田过程中，应审慎决定介在中农与富农之间的疑似成分，不使弄错。”但是这样的指示，并没有为许多地方的同志所注意。瑞金城区的查田，一起始即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成分，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咧，隔富农就远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蹈迳区的同志，插起牌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县的某些乡中，同样是插牌子遍查，同样发生了中农恐慌的事。八县大会的结论早已说了：“那种说到查田就认为应插牌子的意见是不对的。”但全未为这些同志所注意。这种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县都有发生，这是异常严重的情形。他们把查田与

分田混同了。不错，分田是应该插牌子的，是要一丘一丘查清数目，然后拿去分了的，但若把这个办法应用到查田运动上来，那就混乱了农村中的斗争目标。过去我们曾经指出："查田与分田必须严格分别，这种分别，不但为了巩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为了查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集中全力，特别是联合中农，去对付地主富农的反抗，这种时候，决不应在农民自己的队伍内发生任何的纷扰。"（八县大会结论）这样的策略，是我们领导查田斗争中整个策略最重要的一部分，可是还为许多同志忽视了。这种忽视，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那些经过指导还故意在做这些错误的，当地的上级苏维埃须给他以严厉的处罚，要在党内团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任何党员团员侵犯中农利益，违反联合中农策略的思想与行为。已经做了错事，如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去年兴国曾赔还许多中农的土地，取得了中农群众的满意，是一个宝贵的教训。

五　贫农团的关门主义与忽视雇农的领导作用是错误的

"贫农群众是党和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彻底地进行土地革命的坚决拥护者。""依靠贫农"是我们查田运动及一切土地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而贫农团则是查田运动中有极大作用的团体。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已经指出过去贫农团的关门主义倾向是错误的，应该废除介绍制，向贫农工人打开大门，一切男女老少的贫农工人均可报名加入。但是许多地方仍然沿着旧办法不改，仍然非有介绍不能

进贫农团，甚至在瑞金蹈迳区当着尚未入会的贫农群众跑来参加贫农团会议的时候，贫农团的负责人居然拒绝他们参加。博生的竹嵊岌区，七月一个月中，贫农团没有发展一个人。在一切查田有成绩的区乡，贫农团是广大发展了，而在没有成绩或成绩微弱的区乡，那里的一个表征，就是贫农团的关门主义状态。雇农在查田运动中的伟大领导作用，同样为许多同志所不认识。党的决议说："雇农群众是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中的兄弟，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锋队。因此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必须与工会取得密切联系，经过工会发展与组织工人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成为查田运动先锋队。"我们的同志，依照这个指示去做的，仍然不是多数。这里主要方法，是使农村工人加入贫农团，而在其中成立单独的工人小组；经过这些工人小组，去团结贫农积极分子，发展贫农团，推动查田运动前进。黄柏区山河乡的经验是宝贵的，当我们的同志两次召集贫农团开会不成的时候，就去开了一个农业工会与手艺工会的会员群众联合会，发动了几十个工人积极起来，每人带领一个贫农分子加入贫农团，第二天贫农团再开会，果然一齐到了，开展了山河乡的查田运动。山河乡的这个经验应该把它运用到一切农村中去。这里工会的上级领导机关，应该给下级工会以积极的指导，要把查田运动看成为工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六　关于富农问题的不正确观点

农村斗争中整个我们的策略，是依靠贫农，坚决地联合中农，并使雇农起先锋队作用，团结所有一切革命力量，去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对富农。关于富农问题，党已经正确说了："必须把地主和富

农分别清楚，在无情地消灭封建残余斗争中，决不容许任何消灭富农的企图。”七月查田中，虽然还没有公开主张消灭富农的理论，但是把富农分子当做地主全部没收了他的家产的，就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现了。这一错误的来源，是由于抹煞富农的劳动力，当着我们说“没有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有地租等等剥削的是地主”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把在生产中用了相当多的劳动分子，认为是“附带劳动”一类，把他当地主看待。有些地方则把富农兼有高利贷剥削的认为是“高利贷者”而照着“消灭高利贷者”的办法去对付这种富农。有些算陈账，算到革命前若干年上去，一人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几年前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做富农，或者仅仅只请过一年两年长工而前后没有请过的富裕中农分子，也放在富农一类。更严重的是过去兴国某地方的例子，那里的办法，拿剥削的种数去分别地主与富农的成分，三种剥削的叫地主，两种剥削的叫富农，比如请了长工，收了租，又放了债，则不管他家里有几个人劳动，总之他家里就是地主了。还有“反动富农”这个问题，在许多地方弄得颇糊涂。武阳区一家富农兼商人，十七个人吃饭，因过去他家有一人参加AB团，在两年前被杀了，两年之后那里的同志一定要全家没收他。在别的许多地方，同样发生许多这样的事情，把富农在暴动前参加过不十分严重的反革命行为，如参加“收三成租谷”之类（瑞金），暴动后几年他也没有做过反革命的活动，群众的多数对他不要求惩办，而我们有些同志则一定要没收他。正确地说，我们对待这类分子的办法，在巩固了的区域与尚未巩固的边区，应该有策略上的不同。在边区，无疑要采用严厉办法，镇压一切包括富农在内的反革命分子；在中心区，则要分别情形决定，暴动前有过严重的反革命行为，或暴动后还在做反革命活动的，自然应该坚决地没

收他，否则不应该没收。有些一家中只没收他本人以及同他反革命行为有直接关系的分子，其他的人则不没收。这样处置才是正确处置。

七　工农检察部没有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有些并且做出了错误

我们的工农检察部的同志，许多不认识查田运动开展中正是开展思想斗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与消极怠工，驱逐阶级异己分子出苏维埃去的最好时机，对于这些工作做得异常不够。许多我们工农检察部的同志，在这个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表现了自己的消极动摇，自己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甚至如瑞金市苏工农检察科长，包庇市苏裁判科长的极大贪污行为（私用公款千余元）。渡头区的工农检察科长对于区苏主席放弃查田运动不管，也不去批评他与检举他。工农检察部的检举运动，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别的错误方向，把恋爱问题当做腐化，把拿了地主的东西当做贪污，对于这样的分子进行检举甚至公审。有些地方把犯了轻微错误的开除职务，不去有系统地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把这种艰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简单的惩办主义。不消说，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那些犯了长期与严重错误的分子是应该坚决洗刷出去的，但是错误不到这种程度的也给予撤职处分，则是过分了。关于阶级异己分子的问题，普遍地只讲成分，不讲工作，只要是出身坏，不管他有怎样长久的斗争历史，过去与现在怎样正确执行党与苏维埃的路线政策，一律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出去了事。完全不错，我们要坚决洗刷那些阶级异己分子，那些成分坏又加工作坏的（包括地主富

农，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等），无疑应该洗刷干净，但如果不是这样也把他洗刷出去，那就过分的了。

八　关于查田斗争的领导艺术

了解了任务与路线，但没有领导群众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艺术，查田运动是仍然不能开展的。本文的开头已经说了壬田区等处许多很好的领导斗争的例子，但在另外许多地方却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少的错误。有些地方对于地主富农集中的落后大村子，不知道用各种方法去发动斗争，即如有大村子只有首先捉拿著名为恶即群众所谓“大老虎”的那些豪绅地主分子，才能开展当地的斗争，我们的同志却没有这样去做。关于用分配没收来的财物去发动群众斗争这个最好的方法，还有许多地方不知道采用。在瑞金蹈迳区的瓦子乡，甚至把东西只发给查田干部与贫农团会员，其他不发，理由是自己不积极的不应分东西。有些地方没收的东西分配得很慢，甚至没收了一个多月还未发给群众。没收的土地分配得更慢，不少地方的同志不知道去动员苏维埃的各部，动员各个群众团体，不知道动员所有的党员团员，在各个群众团体中，各个村屋中，去起核心领导作用，工作推不动，就说这里本来是没有办法的。有些地方当着群众查阶级的斗争已经发动起来了，许多群众都来报告地主富农，请求去查去没收时，我们的同志不能立即抓紧群众这个热潮去领导群众开展斗争，把查阶级的工作开展到各个村子里去。有些地方，则在查了一番之后，群众的斗争热情不能继续向上高涨，表现了停顿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不能用各种方法鼓励群众，使斗争继续高涨，一直领导到消灭一切封建残余的地步。许多地方当着经

过了查田运动，群众斗争热情蓬勃发展起来了的时候，不知道把这种热情组织到别的战线上去，比如当着群众得了东西，得了土地的时候，即不在那时的群众大会上，或不在其他一切有利的时机，鼓动群众去当红军，去买公债票，去进合作社；不鼓动群众去加紧秋收秋耕的工作，不去建立俱乐部、识字班，发展夜学与小学。把这种好的时机放过去，另等上级对于这些工作的督促来了，才又重新开头去作宣传鼓动。这种落在群众斗争热情之后的尾巴主义的领导，乃是最有害于革命工作的。

另一方面，在许多别的地方，又发生了少数人蛮干的恶劣现象。我们曾经着重地指示：要反对对于争取大多数群众的忽视，与命令主义的工作方式。只有耐心地艰苦地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达到消灭封建残余的目的。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查田运动的开始，必须在一切村屋中作广大的宣传，向群众说明查田运动的必要，说明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的阶级，特别重要的是把什么叫做地主富农中农，向群众分析清楚。村屋的群众大会应该不止开一次，特别是那些落后的村屋应该多去开几次，应该不让一个革命群众不听到我们的宣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首先在乡苏代表会、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及其他群众团体中，向一切积极分子解释明白，通过他们去向广大群众作宣传。查阶级应该不是少数人去查，要发动多数人去查。通过阶级成分不但在贫农团、乡苏、区苏通过，而且要在被没收人的村屋中，开群众大会，取得群众的同意，才能进行没收。分配财物，要发给本村本屋群众，取得本村本屋群众的满意。所以要这样，都是为了争取群众的大多数。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

群众的大多数。我们要面向群众，是在要面向群众的大多数。我们的工作要深入群众，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庄，一切大的小的市镇里的群众，要严厉反对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办法。可是我们的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去做的，在瑞金，许多区乡中没有向群众讲过一次阶级（没有分析过什么是地主富农中农）。在瑞金及别的县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不经过宣传就动手去查，以致地主富农跑出来造谣欺骗中农，说什么本乡地主富农多得很，或者说本乡有几百家地主富农要查（瑞金），而我们的同志，还不知用明白的“讲阶级”办法，去识破这种造谣。广昌的地主说：“查田运动是中央政府要过去欠债的人把债还与中央。”我们的同志没有立即去揭穿这种鬼话。在蹈迳区的几个乡中，除了不作宣传之外，查阶级只是查田委员会的几个人去查，通过阶级不但不经过群众大会，连贫农团也不经过，他们说：“群众靠不住，群众不会分析阶级，阶级成分提到群众大会去通过是要发生纠纷的，还是只由查田委员会通过是靠得住的。”这个蹈迳区同志的理论，真算得是天下奇闻！好几个地方没收地主时不在白天而在晚上，唯一的理由是怕地主跑掉了。有一处地方开群众大会，用了“全区大会”的办法，可是到的不上两百人，三个人轮流从上午演说到下午，不让群众休息，也不让群众喝水吃饭，说是怕群众跑掉了。这样蛮干的办法，又算奇闻的一种。

九　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克服自己错误争取查田运动的彻底胜利

无疑地，查田运动是在广大地区内开展了。但当这个运动前进的时候，当我们正确估计了已得成绩并奠定了运动发展的基础的时

候，我们还要警觉地注视运动途中的障碍物。只有发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去清除这些障碍，才能推动查田运动更加迅速地前进。开展反右倾的思想斗争，反对对查田运动严重意义的估计不足，及对地主富农的妥协投降，反对对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领导，是每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同时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对富农的不正确观念，也无疑要影响到中农上去。一切命令主义的蛮干，对于联合中农是最大的危害。用两条战线斗争的火力，扫荡了查田运动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查田运动就可以大踏步前进，他的彻底胜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933年8月30日）

国际反帝非战大会的代表们并转全世界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与一切革命者：

世界资本主义恐慌的深入，战后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终结，使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更其疯狂般地向着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与劳苦群众进攻，把经济危机的一切负担放在他们的身上，并且用最残酷的法西斯蒂的血腥的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组织与一切革命行动。在德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以及在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法西斯蒂的狂潮，正与全世界工人阶级与劳苦民众的革命运动死命地斗争着。

在对外方面，帝国主义各国正在准备以残酷的帝国主义战争，找求经济危机中的出路。它们对于苏联的进攻，对于殖民地的侵掠，是更其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中国以强盗的战争，占领了中国东三省、热河、察哈尔与泺东的广大区域，把那里的五千余万劳苦民众放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之下。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西部正利用西藏的军队，攻占我们西康四川等省，预备把中国西部完全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其他法国、美国帝国主义也同样地竞争着瓜分中国的领土，拼命地与帝国主义战争，来重新分割它们在中国

的市场！

万恶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民众共同的敌人，它们在中国与万恶的白色恐怖的国民党政府联合，以数万万金元枪炮、飞机、毒瓦斯弹，武装国民党的百万以上的军队，来进攻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中国的苏维埃区域，企图以血的屠杀来消灭中国革命运动，把中国完全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这样来维持它们的统治，来继续它们对于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奴役。国民党政府这种在帝国主义尽力帮助之下向中国苏维埃区域大规模的进攻，到现在已经是第五次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向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民众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代表者。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过去是在反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它现在对于帝国主义经过国民党所进行的对于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围剿”将给以致命的打击。它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密约，而且它正在号召、动员与武装全中国的民众，以民族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保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苦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中有力的同伴！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与一切革命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号召你们同我们在一起，来打倒全世界工人劳苦民众与一切革命者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我们更要求你们用一切方法阻止各国帝国主义者以枪炮、飞机、毒瓦斯弹运来中国，屠杀中国的民众，并且去号召

你们本国的士兵弟兄们，反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拒绝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屠杀中国的劳苦群众！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打倒世界帝国主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八月三十日

为开展查田运动

（1933年9月1日）

中央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特发布查田运动训令，并在今年六月间召集查田运动大会，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在所有农村中进行坚决的查田运动，几个月来，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展这个运动，有些地方或包庇地主富农，或侵犯中农利益，或不开群众大会作宣传，或不得群众同意就去没收，或不把没收的东西发给群众，或镇压反革命不坚决，这些都是极大的错误。中央政府为了赶快消灭封建残余，使中农贫农工人群众得到全部土地革命利益，特为布告各地政府及广大工农群众一体明白，大家起来拥护中央政府的命令，在下列各条办法之下，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争取查田运动的完全胜利。

（一）各地政府及查田委员会，必须抓紧查田的领导，推动工会贫农团及一切群众团体切实进行查田运动。首先要向群众作普遍的宣传，使群众人人明白查田运动的意义，大家起来自己动手查田查阶级。

（二）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阶级，因此不应该按家按亩插起牌子遍查，而是要发动一切革命群众，专门清查地主富农阶级。

（三）贫农团是查田运动的中心力量，应该大大发展贫农团，每

个贫农都可不要介绍自己报名加入。农村工人都应加入贫农团，去领导查田斗争的发展。中农可以参加贫农团的会议旁听。

（四）中农的利益绝对不能侵犯，不能随便把中农当做富农，有些富裕中农分子，过去虽然有点小小剥削，同样不能当富农看待。所有中农群众都应该团结在贫农团的周围，向地主富农一致进攻。

（五）富农是自己劳动兼靠剥削为生，因此只能分坏田，不应该把富农当中农看待。但同时也不能把富农当地主看待，完全没收富农家产的办法是错误的。

（六）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极小一点附带劳动，他们是封建剥削阶级，应该完全没收其土地财产。地主阶级的壮丁，应该编成劳役队，加以训练，使之参加国家的或当地的劳动工作。

（七）地主阶级的财物没收之后，除现款外，应该一概赶快发给本村的贫苦群众。没收的土地，除留出公共事业田之外，应赶快分给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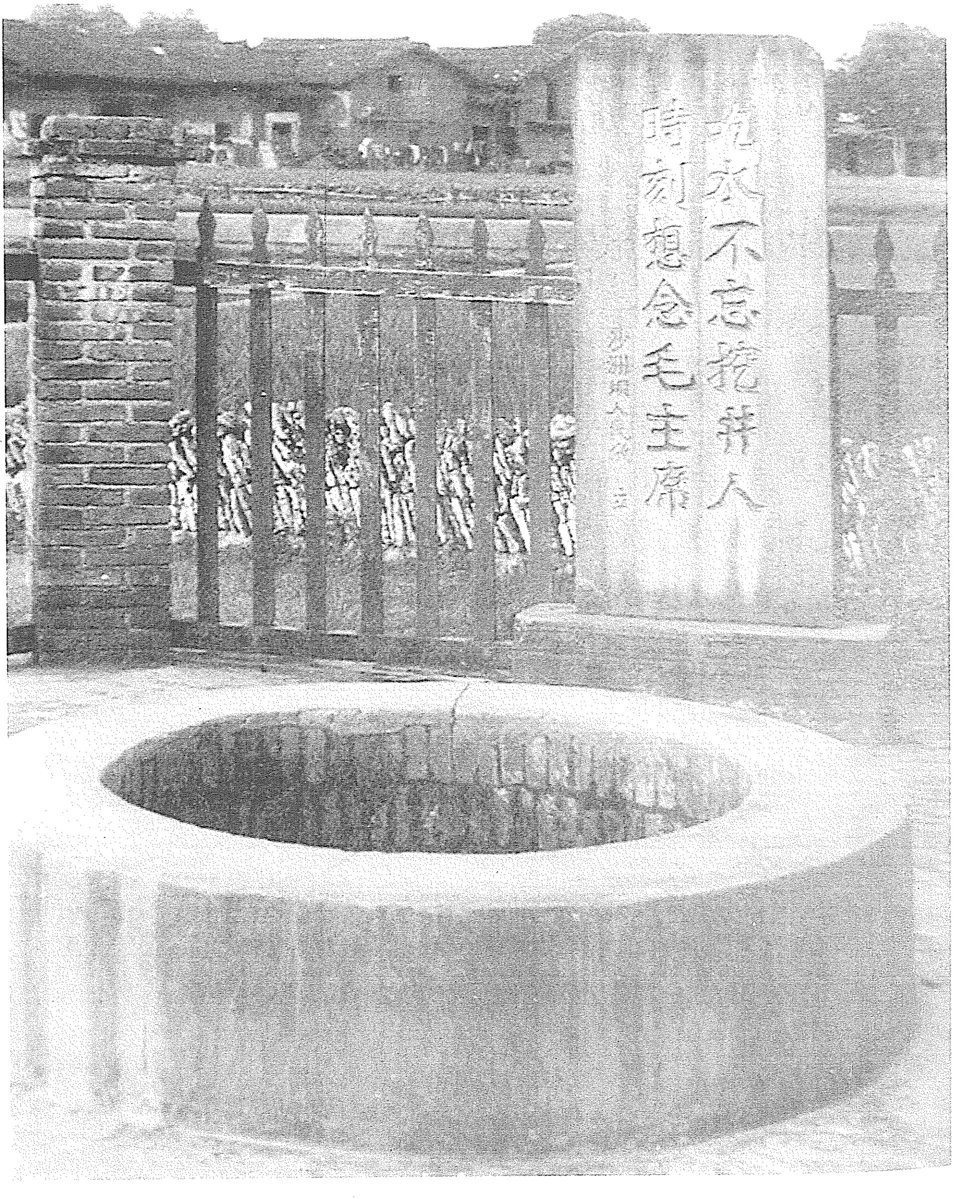
（八）混进苏维埃中的地主富农分子，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命令强迫，以及包庇地主富农的分子，工农群众应该在工农检察部领导之下，向着这些坏分子作斗争，错误轻的纠正错误，错误重的清洗出去，巩固苏维埃政权。

（九）一切参加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应该受到严厉的镇压，罪大的实行枪决。工农群众应该与苏维埃的保卫局及裁判部好好配合起来，彻底肃清反革命。

（十）查田运动的工作，应该与扩大红军，扩大赤卫军少先队，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发展农业工业生产，发展出口入口贸易，全部实行劳动法，发展列宁学校及识字运动，修理桥梁道路，进行苏维埃选举运动等项工作，切实配合起来，广大工农群众

都应在当地苏维埃领导之下，齐心合力，进行各项必要的工作，以便迅速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


吃水不忘挖井人
時刻想念毛主席

1933年9月，毛泽东带人为瑞金沙洲坝人民挖的水井。

中央政府庆祝
国际反帝非战大会开幕电

（1933年9月3日）

国际反帝非战大会代表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代表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向大会全体代表谨致无产阶级的革命敬礼，英勇的反帝战线的前卫们，你们不顾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不顾法西斯蒂与巡警探子的恐吓阻止，毅然在国际帝国主义共管下的被日本强盗所炮毁过的上海，来召开全世界反帝非战大会，我们表示无限的钦佩与热望！

大会的开幕是国际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在反帝的国际下层统一战线上获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功。我们坚信大会一定能够领导全世界反帝战士采取具体的步骤来反对不宣而战的企图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远东战争，反对正如火烧眉毛一般危急的国际帝国主义的反苏联的战争。

全中国劳苦民众完全深刻的理解李顿调查团与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团这两个组织的尖锐的对立，政治的经验告诉我们：前者是国际帝国主义强盗瓜分中国的计划者与组织者，而后者，就是你们呵，你们是全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和解放的最有力的帮助者。我们希望你们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所造下的兽行、罪恶和阴谋的实情，揭露在全世界工农兄弟的面前，

同时热烈地欢迎你们来参观苏维埃区域，把苏区内工农的革命热情和他们生活的改善，以及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建设，和你们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所见到饥饿、死亡、失业和灾荒做成一个显著的对照表，传播到全世界工人农人与兵士中间去，激起他们的兴奋与同情！

现在中国是在两条道路——殖民地的道路与苏维埃的道路——的剧烈战争中。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地进行对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正是要使中国走上完全的殖民地的道路，而我们也正集中一切力量来粉碎敌人的死命的大举进攻，竭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为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的道路而斗争。我们相信大会是完全同情于我们，因此，大会的成功即是我们的成功，大会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领导全国工农和红军，一致拥护大会的顺利进行，为大会的伟大的前进，表示热诚的祝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今年的选举

（1933年9月6日）

同志们，北部十八县的选举会议已开过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南部十八县的选举会议。同志们，我们每年都有选举，今年的选举同去年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没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选举，将建立更加巩固的苏维埃——这个最重要的阶级武器，我们要拿了这个武器去更大地增进群众福利，去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扩大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同志们，这就是今年选举的意义，我的报告就是在说明这个意义。我分做几段来说明它：

一　今年的选举是正当着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又在继续争取粉碎五次“围剿”胜利的年头

去年以来到东黄陂战争胜利，把敌人的四次“围剿”完全粉碎了。我们扩大了红军，巩固了苏区，发展了苏区，领导了帮助了全国反帝反国民党反地主资本家的伟大革命斗争。革命的胜利，比过去哪一个年头的胜利更大。反革命那方面呢？他们是更加衰弱了。但是反革命还在拼命地挣扎，特别是帝国主义因为全世界革命与战争逼在面前，他们拼命地向中国侵略。日本已在他们的炮火下建立

了一个满洲国，还想要建立一个蒙古国，英国要在中国的西边建立西藏国，法国侵略云南贵州，美国想瓜分长江各省，这些帝国主义，都在指挥他们的走狗国民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进行对我们的大规模五次“围剿”。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要百倍地努力去打破五次“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更大规模的革命与战争是摆在我们面前。受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它是革命与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今年的苏维埃的选举，正当着粉碎五次“围剿”的关头，我们要选举出强有力的苏维埃来，组织战争，领导战争，这是今年选举的十分重大意义。今年又是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年头，今年的全苏大会将选举新的中央政府——这是全国范围内革命与战争的组织者领导者。要使二次全苏大会能够担负它的伟大历史责任，今年的选举就不能当平常一样看待。

二　要明白选举的重要，我们还要来说明苏维埃的作用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它有两方面的作用，这两方面都是与旧的统治阶级政府完全相反的。第一方面，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它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它用战争消灭外部的反革命，这就是过去及现在我们反对敌人“围剿”，开展胜利进攻，向着全国反革命势力进行革命战争的任务。同时它又用法庭镇压内部的反革命，这就是过去及现在我们对付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托洛斯基派及一切存在苏区的地主资本家，他们一有反革命行为，我们就立即镇压他。革命的阶级——工农劳苦群众，用苏维埃这个武器去对付内外一切反革命，这就是苏维埃第一个作用。因为必须战胜了这

些反革命，阶级才能成为统治的阶级，政权才能成为统治的政权。同志们大家看得到，我们现在是统治者，因为我们战胜了敌人无数次的进攻，我们镇压了历来的反革命活动。再说到第二个作用，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我们工农群众的生活，过去完全是受地主资产阶级管理的，因为他们有政权，他们就有自由，而不给我们以自由，农民没有土地，工人没有劳动法保护，现在呢？农民有了土地，工人有了劳动法保护，我们自己的政权给了我们以自由，我们在自己政权下进行各种必要的建设，我们自己的生活完全由自己管理着，我们都是真正自由平等的，不受哪一个地主资本家的干涉。而我们对于地主资本家，却是独裁，却是专政，不让他们有一个参加我们的政权，我们设置各种法律管理他们，半点政治的自由都不给他们，这就是苏维埃第二方面的作用。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这种政权与选举的严重意义，现在许多人还没有最清楚地认识，不认识这种作用，就不会最积极地来参加选举。苏维埃人员不认识这种作用，就不会很好地去领导选举。同志们，我们马上就要进行选举了，要把苏维埃与选举的作用即刻宣传到群众中去，首先所有苏维埃人员自己要完全认识清楚，才能使今年的选举成为最完满的选举，才能一致动员起来为着建立强有力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而斗争！

三　今年选举中的顺利条件

目前既当着革命与战争的最紧急关头，苏维埃及其选举的作用又这样重大，那么今年的选举能不能完成它的任务呢？我们的回答是能够的，因为今年选举中我们有着许多顺利的条件。第一，敌人的五次“围剿”虽然规模很大，但我们已取得了第一步胜利，我们在最近两个月内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第一仗占领连城打败十九路军，第二仗占领乌江打败第八十师，第三仗围困延平打败了敌人的增援队，共缴枪六千多支，我们是在红军大胜利中进行选举。第二，今年的选举我们是在更大版图上进行着的，因为我们在打破四次“围剿”中极大地扩大了苏维埃领土。我们今年是在十个苏维埃省内——江西省、福建省、粤赣省、闽赣省、闽浙赣省、湘赣省、湘鄂赣省、鄂豫皖省、湘鄂黔省、四川省，进行选举，我们选举的规模是更大了。第三，在这许多苏维埃省中，农村里城市里的阶级斗争今年比去年更深入了，查田运动的发展，劳动法的实行，文化教育的进步，经济建设的开始，都得到了许多成绩，特别是查田运动把许多隐藏的地主富农查出来，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暗藏在苏维埃机关中的坏分子，也大批被洗刷出去了，使今年的选举得到更加顺利的基础。第四，我们还有着过去选举的经验，特别是去年的经验，使今年选举得到了许多宝贵教训。过去选举中好的成绩我们今年一定要继续采取，并且要更加发挥。过去选举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就要完全避免它，丢掉它，不让今年的选举再犯一点错误。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已经正确地做出了总结，哪些是过去选举中的成绩，哪些是过去选举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去仔细看清楚，并且

要每个苏维埃工作同志都去看清楚，还要对一切选民群众解释清楚。只有正确地认识了过去的教训，才能使此次选举运动更顺利地开展起来。

四　怎样指导今年的选举

同志们，我们明白了今年的选举是正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瓜分中国进行五次“围剿”的时候，极大地增加了今年选举的政治任务，我们又明白了苏维埃的伟大革命作用；而今年的选举又是在许多顺利条件下进行着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很好地来指导这次选举，百倍努力争取这次选举的完全胜利。关于选举的原则与方法，中央政府颁布的选举法及选举训令上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不须一一重述，今天我只把几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唤起同志们注意，这就是关于选举的宣传鼓动、基本选举、选民登记、工作报告、选举单位、候选名单、选民大会、选举委员会的任务等这几个问题，让我把这些问题向同志们作一个简略的解释，因为这些都是选举中极重要的问题，每个同志都要注意的：

第一，关于选举的宣传。今年的选举，必须在选举前三个星期内作最广泛的宣传，必须把粉碎五次“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今年选举的关系，说得最清楚；必须把苏维埃的革命作用讲得最明白；还要说明今年的选举是在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着的，使群众把选举看得极重要，同时又有着充分的自信心来参加选举，来推选许多先进分子进苏维埃，而一切当选人都有百倍的勇气来担当国家大事，这种宣传鼓动是选举胜利的先决条件。没有这样的宣传鼓动，即是说群众还不了解目前的政治形势，不了解苏维埃的作用，

不了解选举胜利的基础，那么群众就不会很热心地参加选举，也不会使当选的分子百倍增加他们的勇气。去年的第一次选举宣传较好，成绩也就较好。第二次选举宣传差，成绩也就要差。今年则必须比去年第一次选举的宣传还要做得更好些，才能鼓动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

第二，城乡代表会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城乡选举是苏维埃的基本选举。城乡苏维埃是最接近群众的一级，上级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一切扩大红军、查田运动、实行劳动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工作，均须经过城乡苏维埃才能实际去执行，所以城乡苏维埃的选举，是最基本重要的选举，并且要全苏大会开得好，就必须要省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省苏大会开得好，必须要县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县苏大会开得好，就要区苏市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要区苏大会开得好呢，就要乡苏代表会选举出很好的代表。这样看来，市苏乡苏的选举，岂不是关系全区全县全省全国的整个苏维埃选举吗？所以说市苏乡苏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同志们，我们会场的侧边正在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个塔是打下了一丈五尺深的石脚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脚，这就是城乡代表苏维埃了。

第三，我们要建立坚固的城乡苏维埃，不但要用最广泛的宣传使得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而且要使到会的选民都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应得选举权的人，而没有一个已经剥夺选举权的被蒙混了进来，没有一个应该剥夺选举权的被他假冒工人农民偷取了选举权去，这个工作叫做选民登记。这种有选举权人民与无选举权人民的严格划分，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出发点，是苏维埃宪法与选举法

最重要的一条。你们看，那个塔脚不都是石头筑的吗？所以这个塔是坚固的，如果掺杂一些污泥粪土进去，这个塔就不会有这样坚固了。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就要从不使一个地主富农资本家偷取选举权做起。

第四，去年的选举单位太大，今年把它改小了。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定工人单独开会选举，农民以小村子为单位选举，城市中贫民群众则划分街道选举，这一个改变，与争取选举完满胜利有很大关系，因为选举单位小不但可使选民的多数甚至全体都到选举会，并且可使选民对于被选举人的选择更加容易，选民的提案必定更好更多，日后的撤回权也更容易行使。因此同志们要注意今年的选举单位不可再弄大了。

第五，关于市苏乡苏向选民作工作报告，中央内务部已拟了一个大纲，区苏要指导乡苏照着大纲到各村去召集群众大会作报告。去年的选举，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种报告制度，今年一定要实行起来。因为实行向群众作报告，能使政府的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的机会，能使选民的选举热忱到更高程度。区以上各级政府凡过下级政府开代表大会的这一天，都应去作工作报告。

第六，关于候选名单。好好地准备候选名单，是争取选举胜利的重要关节。中央训令中说了：应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对候选名单的意见，并且公布出去，使选民对于各个选举人能加以充分的考虑。候选名单中首先要注意成分，不但要照着选举法使适当数目的工人及农民当选，而且要依照选举训令至少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其次，应注意政治表现，凡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都不要使他当选，当选的应该全数是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分子。其次，工作能力方面也要相当注意，

不了解选举胜利的基础，那么群众就不会很热心地参加选举，也不会使当选的分子百倍增加他们的勇气。去年的第一次选举宣传较好，成绩也就较好。第二次选举宣传差，成绩也就要差。今年则必须比去年第一次选举的宣传还要做得更好些，才能鼓动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

第二，城乡代表会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城乡选举是苏维埃的基本选举。城乡苏维埃是最接近群众的一级，上级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一切扩大红军、查田运动、实行劳动法、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等工作，均须经过城乡苏维埃才能实际去执行，所以城乡苏维埃的选举，是最基本重要的选举，并且要全苏大会开得好，就必须要省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省苏大会开得好，必须要县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来；要县苏大会开得好，就要区苏市苏大会选出很好的代表；要区苏大会开得好呢，就要乡苏代表会选举出很好的代表。这样看来，市苏乡苏的选举，岂不是关系全区全县全省全国的整个苏维埃选举吗？所以说市苏乡苏的选举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选举。同志们，我们会场的侧边正在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这个塔是打下了一丈五尺深的石脚的。我们要建立一个坚固的塔，就要从打下坚固的塔脚做起，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也要打下坚固的苏维埃脚，这就是城乡代表苏维埃了。

第三，我们要建立坚固的城乡苏维埃，不但要用最广泛的宣传使得大多数群众参加选举会，而且要使到会的选民都是真正的工人农民及其他应得选举权的人，而没有一个已经剥夺选举权的被蒙混了进来，没有一个应该剥夺选举权的被他假冒工人农民偷取了选举权去，这个工作叫做选民登记。这种有选举权人民与无选举权人民的严格划分，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出发点，是苏维埃宪法与选举法

最重要的一条。你们看，那个塔脚不都是石头筑的吗？所以这个塔是坚固的，如果掺杂一些污泥粪土进去，这个塔就不会有这样坚固了。我们要建立坚固的苏维埃，就要从不使一个地主富农资本家偷取选举权做起。

第四，去年的选举单位太大，今年把它改小了。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定工人单独开会选举，农民以小村子为单位选举，城市中贫民群众则划分街道选举，这一个改变，与争取选举完满胜利有很大关系，因为选举单位小不但可使选民的多数甚至全体都到选举会，并且可使选民对于被选举人的选择更加容易，选民的提案必定更好更多，日后的撤回权也更容易行使。因此同志们要注意今年的选举单位不可再弄大了。

第五，关于市苏乡苏向选民作工作报告，中央内务部已拟了一个大纲，区苏要指导乡苏照着大纲到各村去召集群众大会作报告。去年的选举，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种报告制度，今年一定要实行起来。因为实行向群众作报告，能使政府的工作在群众中得到检验的机会，能使选民的选举热忱到更高程度。区以上各级政府凡过下级政府开代表大会的这一天，都应去作工作报告。

第六，关于候选名单。好好地准备候选名单，是争取选举胜利的重要关节。中央训令中说了：应在选举前收集各群众团体对候选名单的意见，并且公布出去，使选民对于各个选举人能加以充分的考虑。候选名单中首先要注意成分，不但要照着选举法使适当数目的工人及农民当选，而且要依照选举训令至少有占百分之二十五的劳动妇女当选。其次，应注意政治表现，凡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及同地主富农资本家妥协的分子都不要使他当选，当选的应该全数是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分子。其次，工作能力方面也要相当注意，

能力过于薄弱的亦不宜引进到政府来。其次，现任苏维埃工作人员，如代表、委员、主席等，凡属犯有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官僚主义、包庇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重大错误没有改变的，一概不能使他当选。但过去工作积极观念正确的同志，则毫无问题可以当选。有人以为选举就不是一律推选新人，旧人一概不要，这完全错误的。

第七，关于选举大会。选举只须要一天工夫，却要用几个星期去筹备它。因为前面所述许多重要工作，必须有几个星期的筹备才能弄好。绝不可不早些筹备，一天捱一天，捱到选举逼近两三天，才手忙脚乱潦潦草草地搅一顿。现在北部十八县定期九月一号至十月五号为城乡选举期间。各区应该把选举的日子定在最后十天内，而把九月二十五号以前这几个星期极紧张地去做选举宣传、选民登记、工作报告、候选名单几项工作，才能够在选举的那天得到完满的成功。南部十八县可以迟一个月选举，城县选举日子可以定在十月底，而把九十两个月充分做准备工作。其次，选举的日子到了，必须尽量动员选民到会，今年必须办到最大多数选民都来参加选举会，并且须使选举在一次会上成功，不要弄到不足法定人数开会不成又要召集第二次会。其次，选举会上提出候选名单来讨论表决的时候，要发动群众发表意见，要与去年兴国一样选举会上有热烈的批评，群众不赞成的要另提候选人，绝对不能强迫群众去通过候选名单。如有坏分子捣乱，备着候选名单强迫群众通过，查出定要严办。其次，选举完后，还要讨论群众的提案，收集群众的意见提到苏维埃来，作为新政府的行政方针。

第八，以上一切工作，须要组织一个专门机关来负责任，这就是市苏与区苏的选举委员。选举法第四十六条规定，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是由政府及各个群众团体的代表组织而成的，还要经过县苏的

批准。选举委员会是负担着关于选举的全部工作。去年的选举委员会多半没有起作用，仍然是单独由政府人员指导选举，因此许多地方没有很慎重地去领导选举，政府中坏分子操纵选举的毛病也是有的。为了要免掉这些毛病，今年一定要组织选举委员会，由政府与群众团体共同组织之。

同志们，我的话说得很多了，选举的意义和选举工作的要点，我也都说到了。没有说到的，如县苏要有计划地去指导全县各个区苏代表大会，省苏要用有计划地去指导全省各个县苏代表大会，中央也是要有计划地去指导各个省苏代表大会，以及还有关于选举的别项事情，选举法与选举训令都有了详细的指明，这里我不多说。我说的那些要点，还望同志们回去告诉县苏区苏的许多同志，要提到主席团会议上去作详细的讨论。同志们，今年的选举是一个非平常的选举，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选举，是一个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这次选举。除了前面所说选举本身许多工作以外，我们要抓紧这个选举时机，开展查田查阶级的斗争，开展苏维埃的检举运动，只有查阶级与检举运动，才能把偷取了选举权的分子查出来，把混进苏维埃中的坏分子清出去，使这一次选举得到更大的成功。这在南部十八县是更应该这样去做的，因为还有两个月时间给我们进行查田运动。还有，行政区域没有划好的，应该赶快划好起来。这样做去，我们坚决相信，今年的选举是能够取得完满胜利的。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盼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全中国的劳苦群众都睁起眼睛望着苏维埃的旗子，他们明白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这几天上海正在开全世界各国代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他们同样热烈盼望中国苏维埃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应该回答这一切的热望。我们拿什么去回答他

们？拿我们全苏区的选举胜利去回答他们，拿我们的第二次全苏大会去回答他们。我们的口号是：

争取选举的完全胜利！

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

（1933年9月6日）

亲爱的兄弟们，姊妹们，朋友们：

我们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城市里的、乡里的穷人以及革命的士兵和知识分子，我们不愿永远做帝国主义和本国地主资本家的牛马奴隶，我们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新的自由生活了。我们正在领导我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作解放的斗争，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在六分之一的领土内（在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河南、陕西等省的许多地方）开始创建唯一的真正的民众政权——苏维埃政权，唯一的真正民众军队——工农红军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为根本改善中国工农劳苦民众的政治经济状况而奋斗。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开始就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使工人、农民、穷人、革命的兵士和知识分子们能够自己自由地干自己要干的事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要使他们从受饿、受冻、没房子住、没有工做、一字不识的牛马生活一样的人，变成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有工做，能读书识字的真正人一样生活的人。为要做到这一点，苏维埃政府就给了他们土地、房屋和工作，就为大人和小孩们开办了许多不要钱的学校、识字班、图书馆、俱乐部等，并且为病人和老年人办了许多不要钱的医院和疗养院。

然而统治中国的一群寄生虫——就是外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和放高利贷的人，始终总是不愿意我们能够过一点像人的生活。

而正因为我们开始创造了自己新的自由生活，因为我们一天只做八点钟的工，并且增加了工钱，因为我们原来完全没有土地或者有很少一点土地的人得到了土地，因为我们这里的妇女得到了解放，于是蒋介石、汪精卫和一切国民党野兽们，便骂我们是“赤匪”，是“共匪”，便不止一次两次地，而是简直不断地大举“围剿”我们。

当日本帝国主义大杀特杀我国同胞，并且把我国东北和北方领土一省又一省地占去了的时候，当美、英、法各国帝国主义者积极实行瓜分中国的时候，我们再三地向全国人民和军队宣言说：各帝国主义要完全瓜分我们中国了，我们一切中国民众应该像一个人一样起来保卫我们的祖国！

我们再三公开地向一切军队提议说：不论什么军队，只要他赞助我们的最简单的三个条件（为真正组织和进行武装人民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的必要条件：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给人民以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就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罢工等自由权利；三、允许人民有广大组织和发展反日义勇军的自由。）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去武装反对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蒋介石、汪精卫和国民党一切卖国贼们对我们这些提议的回答，始终都是一样：加紧与扩大对苏区的残酷进攻！

国民党现在又开始了对我们的自由的苏维埃中国实行第六次

“围剿”！在这次“围剿”中，仅仅在我们中央苏区周围（江西、福建、湖南、广东等）便集中了四十四万二千人以上的南京军队和广东军队，同时，这些军队还有大炮、坦克、飞机、毒气等很新式的很好的武装。

国民党军阀政客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许多新式武器和大批养兵款项呢？他们是从美、英、日、法、德等各帝国主义者方面得到的。

这些帝国主义者利用你们制造的武器和从你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钱，**去消灭我们这些为自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中国民众**！

我们和你们大家都还清楚地记得：在不久以前，美、英、日各国军队曾炮轰我们的广州公社和长沙苏维埃，法国飞机曾轰炸我们的广西龙州苏维埃。

在国民党这个六次“围剿”中，帝国主义者起这个“围剿”的组织者的作用，再明显没有地暴露出来了。美国帝国主义除借五千万美金所谓“棉麦借款”及四千万美金所谓“航空借款”给南京政府外，并且送给南京军队一百五十架军用飞机，几十条轮船装来的大炮、坦克、机关枪、化学毒品和子弹，外加几百个飞机师和各种军事技术专门家。英国驻华公使蓝浦生曾亲到四川视察，并给刘湘两千万英镑和大批军火，使其进攻我们那里的红军第四军。虽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者为瓜分中国互相间明争暗斗得极厉害，但是他们反对苏维埃中国是一致行动的，他们指使各自的走狗——南京派、广东派、北方派等军阀，共同“围剿”我们苏区已经得到解放的人民。德国法西斯蒂政府派送了七十个军事专家（连前国防总长赛克特在内）到南京去，蒋介石把这一批人在南昌总司令部内组织一个特别部，以便指挥对红军作战行动。国际联盟恰在这时派送

所谓“技术委员会”到南京去，实际上就是去帮助蒋介石计划和实行进攻中国苏维埃和红军。

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看呵！所谓“民主”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飞机师、各种军事技术专门家，正在德国法西斯将军和中国国民党军阀的指挥之下，用美、英、法、德各国的飞机、毒气、坦克、大炮等，在苏维埃中国领土内实行最残酷的航空战和化学战，屠杀大批的工、农、兵、贫民、知识分子等，以便消灭自由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

兄弟们，姊妹们，同志们，朋友们！

为保卫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成千上万男女老少劳动者，不惜用自己的血肉、头颅、生命等，英勇地打退了那人数比他们多、武器比他们好的国民党的一连五次的“围剿”。现在这个**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危险关头了**。

在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向你们请求：

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呵！

为要使我们再去过以前那样黑暗的牛马奴隶生活，国际帝国主义者决心要把中国苏维埃革命淹死在血海里。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强盗们，现在把军舰、飞机、陆战队等等，集中在苏维埃中国周围和一切中国的通都大邑和江海口岸上，他们决定先屠杀我们一场，然后再来进行互相火并的新的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使全世界人类都要遭受绝大的牺牲和痛苦！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特郑重号召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同进行英勇的群众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者干涉苏维埃中国！

反对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者在屠杀中国人民中准备新的帝国主义大战！

反对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用毒气、飞机、坦克、大炮等屠杀苏维埃中国的劳苦民众！反对运输一切军火来华，要求立刻召回美国飞机师、军事技术专门家和德国将军及参谋！要求立刻撤退美、英、日、法、意各国驻华海陆空军！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的国际同情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兼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　德

关于教育工作[1]

（1933 年 9 月 15 日）

文化教育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在目前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战争动员中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加紧教育工作来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启发群众的阶级意识与培养革命新后代，应成为目前我们最主要的战斗任务之一。

目前的教育工作显然地表现出还是落在其他苏维埃工作的后面，还是不能真正适应着革命战争胜利地向前发展的需要。这是由于过去教育部的工作中存在着不少的错误与缺点，由于一部分苏维埃机关与负责同志对教育工作的忽视，对教育在目前国内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不认识，甚至有以为战争环境中没有办法进行教育工作的机会主义观点，这一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继续存在的了。

过去教育工作中最大的缺点，首先应该指出，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把目前教育方针明确地规定，在中央教育部第一号训令中虽然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非常不够而且是不完全确当的，在过去教育部工作与文件中表现出，对于建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忽视。没有把普及教育与社会教育很好地联系着发展起来，没有把广大的施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十七号）。

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任务提到面前来而把教育束缚在仅仅反封建反迷信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范畴里面。同时，应该指出，对于扫除文盲这一极端重要的文化教育工作还没有有计划地去进行以及在利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犯了“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等，都是过去教育部工作中极大的弱点。

在适应着目前革命战争的需要这一条件之下，确立普及义务教育制度，在共产主义的精神上来创造革命的新后代，广泛地进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立刻开始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进行扫除文盲运动，要尽量地在最短时期内把从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所留下来的最毒恶的遗产——文盲——完全消灭，设立列宁师范与各种教育干部训练学校，来造就一支发展普及教育与扫除文盲的战线上必需的强大的教育者军队，对于发展工农剧社、蓝衫团、俱乐部、图书馆阅书室等等社会教育工作应给以充分的注意与组织。这更是目前教育的方针与中心的任务。

除了加紧地培养大批的工农分子的教育工作干部以外，必须利用一部分愿意积极地为苏维埃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专家来参加教育工作。

在可能范围内必须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免费与小学教员的优待，至少须做到由政府供给小学学生的书籍与文具费用和小学教员的伙食。

人民委员会完全同意中央教育部的提议，于十月间与团中央局联合召开文化教育大会，毫无疑义的，这一大会对于苏区文化教育的前途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使这一大会得到完满的成功，责成中央教育部充分地进行大会准备工作。

最近团中央局所发起的对教育工作的协助运动，人民委员会相

信，将成为苏区文化教育战线上有力的突击，使能迅速地消除教育工作的落后现象而得到极大的开展。

为了教育工作迅速地彻底地转变，为了顺利地完成目前教育的中心任务，必须无情地与忽视教育以及教育工作中一切不正确的观点与倾向斗争。只有在这一思想斗争的开展下，才能真正为着战争的需要来一刻也不容缓地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建设。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

农业税暂行税则

（1933年9月18日）

第一条　农业累进税的标准，按照农民分得土地后，全家每年主要的生产的收获量，以每人分田实收多少及全家分田人口多少来规定税率，富农的税率比贫农中农要加重些。

第二条　农业税税率表，由人民委员会规定公布之。

第三条　只征收主要生产品（谷麦）的税，副产品不征税，但每年收获谷麦二次者应征税二次。

第四条　茶山、木梓山、菜园，当作稻田麦地分配成为主要生产品的，亦应征税。

第五条　红军家属（限本身父母妻子及无劳动力的兄弟姊妹）按照红军优待条例免税，但以在收获前入伍的为限。

第六条　工人免税者分别规定如下：

一、雇农及陆上苦力工人本身及其妻（或夫）与子女免税。

二、水上苦力工人本身及其妻（或夫）免税。

三、店员手艺工人船工及其他产业工人分田者本身免税。

四、上述各项工人，以继续做工两年以上者为限，做工未满两年者不免税。

第七条　遇有天灾或遭敌人摧残，或孤寡残废失去劳动力之家庭，按照情形轻重得减税或免税。

第八条　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本身及其父母妻子减半征税，其系工人出身者照第六条规定免税的人外，其家属未免者，再减半税，但以收获前到政府工作者为限。

第九条　因改良种子改良耕种所增加的农业收入免税。

第十条　开垦荒地，所收获的农产品，照荒废年限及阶级成分分别免税如下表：

土地荒废年限	免税年度		
	中农贫农开垦者	富农开垦者	地主开垦者
荒废一年以上者	二年	一年	不免税
荒废二年以上者	三年	二年	一年
荒废三年以上者	五年	三年	二年

第十一条　本税则自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起发生效力，自本税则颁布后，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五日颁布之修正暂行税则内关于农业税的条文废止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元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

附：贫农中农的土地税率表

		每家分田的人数															
		一人	二人	三人	四人	五人	六人	七人	八人	九人	十人	十一人	十二人	十三人	十四人	十五人	
每人实得干谷担数	一担以上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免	以下类推
	二担以上	免	免	一·五	一·七	一·九	二·一	二·三	二·五	二·七	二·九	三·一	三·三	三·五	三·七	三·九	
	三担以上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六	四·八	五·〇	五·二	五·四	五·六	五·八	六·〇	
	四担以上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八	六·〇	六·二	六·四	六·六	六·八	七·〇	七·二	
	五担以上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八	七·〇	七·二	七·四	七·六	七·八	八·〇	八·二	
	六担以上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八	八·〇	八·二	八·四	八·六	八·八	九·〇	九·二	
	七担以上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八	九·〇	九·二	九·四	九·六	九·八	十·〇	十·二	
	八担以上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八	十·〇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十一·〇	十一·二	
	九担以上	十·〇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十一·〇	十一·二	十一·四	十一·六	十一·八	十二·〇	十二·二	
	十担以上	十一·〇	十一·一	十一·二	十一·三	十一·四	十一·五	十一·六	十一·八	十二·〇	十二·二	十二·四	十二·六	十二·八	十三·〇	十三·二	
	十一担以上	十二·〇	十二·一	十二·二	十二·三	十二·四	十二·五	十二·六	十二·八	十三·〇	十三·二	十三·四	十三·六	十三·八	十四·〇	十四·二	
	十二担以上	十三·〇	十三·一	十三·二	十三·三	十三·四	十三·五	十三·六	十三·八	十四·〇	十四·二	十四·四	十四·六	十四·八	十五·〇	十五·二	
	十三担以上	十四·〇	十四·一	十四·二	十四·三	十四·四	十四·五	十四·六	十四·八	十五·〇	十五·二	十五·四	十五·六	十五·八	十六·〇	十六·二	
	十四担以上	十五·〇	十五·一	十五·二	十五·三	十五·四	十五·五	十五·六	十五·八	十六·〇	十六·二	十六·四	十六·六	十六·八	十七·〇	十七·二	
	十五担以上	十六·〇	十六·一	十六·二	十六·三	十六·四	十六·五	十六·六	十六·八	十七·〇	十七·二	十七·四	十七·六	十七·八	十八·〇	十八·二	

纠正推销公债的命令主义

（1933年9月23日）

江西、福建、闽赣、粤赣各省苏，瑞金县苏并转各级苏维埃政府：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以来，在短时期内已得到了很大成绩，凡是动员方法好的地方，广大群众热烈起来拥护公债，如瑞金的云集区，福建的才溪区、红坊区等都是好的榜样。但在另外许多地方，却发生了严重的命令摊派错误，人民委员会业已发出第十六号训令，发出布告与宣传大纲，指出充分的动员工作，是推销公债的保证，严厉反对推销公债中的命令主义。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给各级公债委员会的指示信，把公债最后销完日期段缓至十二月。推销数目依照当地实际情形决定，也完全是为了避免强迫摊派，使有充分时间达到动员购买的目的。自从这些指示文件发出后，各地推销方法已经开始有了转变。

但这一转变还是非常不够的。不少地方仍旧在那里强迫摊派。特别严重的例子于都罗坊区竟因强派公债，一个中农及区苏主席自杀，粤赣小溪区有群众四百余人向外逃跑，也有与强派公债有关，这种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可耻的事件，竟在于都县苏领导之下发生了。中央得信后已立即派人前往查办，将给于都县苏以严厉的处罚。各省苏接此信后，须立即指示各县苏，检阅各区乡推销公债的动员方法，须拿着于都例子来警告一切苏维埃工作人员，立即开展

猛烈的自我批评，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主义，不论在扩大红军、在查田运动、在选举运动、在推销公债、在发展合作社，都不能采用丝毫强迫命令方法。于都的命令主义错误，是在各方面工作中都严重发生了，而代推销公债则更加露骨，罗坊区小溪区的教训各级苏维埃应该得到最大的警觉。

为了完满地推销公债，时间与数量必须注意到。各地竞赛条约上所定的时期，许多定在十月半销完，太短促了，应该遵照财政人民委员部九月十五日的指示，相当地展缓时间，收获迟及公债发行迟的，可以延长至十二月中，最后推销完毕，便有相当时间拖着充分的动员工作。但绝对不能如会昌等处把公债搁起不去推销，随着延长时间，把这一工作懒懈起来，延到十二月才又用强迫摊派去达到目的，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关于数量，完全得看当地实际可能情形及群众积极性发动的程度，有的应该增加，有的应该减少，不能机械地照数派发。各县苏区苏须按照全县各区，全区各乡各别不同的情形，随时加减公债的数量，去适合当地的情形，不能将公债一起发出，认为自己的事已完，致逼得下级走向强迫摊派道路，这种官僚主义的方式，应该立刻纠正过来。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

（1933年10月）

一　地主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剥削的方式，主要的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债，或兼雇工，或兼营工商业。但对农民剥削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学租[2]也是地租剥削的一类。

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

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

---

[1] 这个文件，是毛泽东1933年10月为纠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2] 旧中国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寺、观、教堂、清真寺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会救济或者社会公益性的，例如义仓的土地和为修桥补路而设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学田。所有这些土地，大部分都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有一小部分，农民有权干预。

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

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贷剥削为主要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人，称为高利贷者，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农

富农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农一般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剥削地租，或兼放债，或兼营工商业。富农多半还管公堂。有的占有相当多的优良土地，除自己劳动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债利等方式剥削农民，此种情况也应以富农看待。富农的剥削是经常的，许多富农的剥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三　中农

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中农一般不剥削别人，许多中农还要受别人小部分地租债利等剥削。但中农一般不出卖劳动力。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

别人有轻微的剥削，但非经常的和主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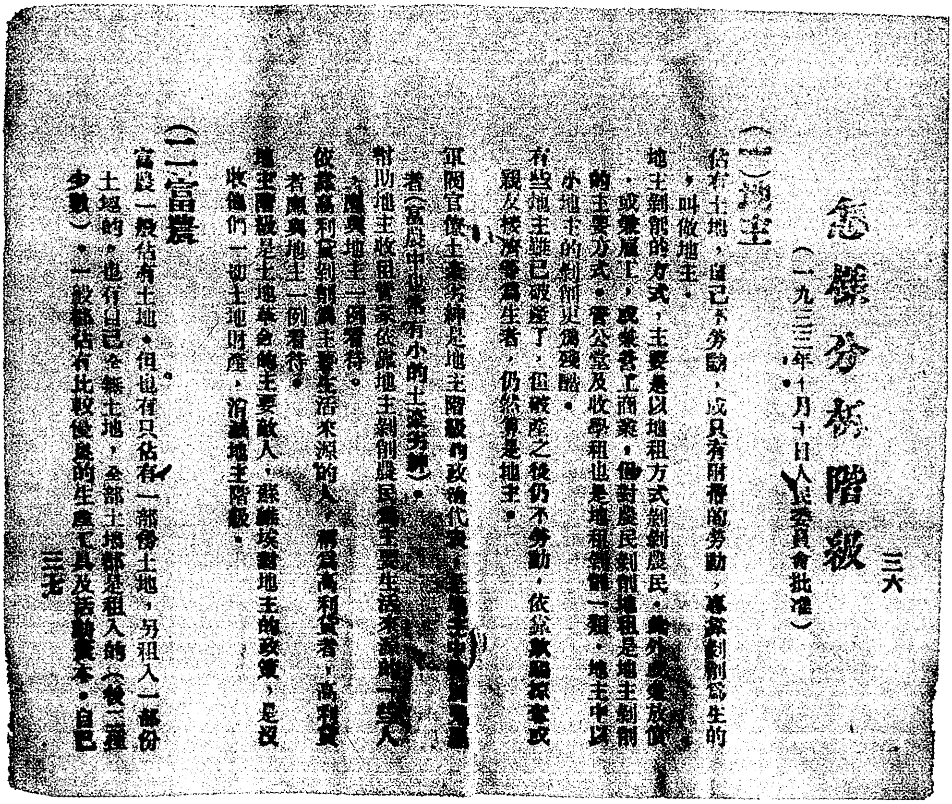
四　贫农

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的劳动力，这是区别中农和贫农的主要标准。

五　工人

工人（雇农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三六

怎樣分析階級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人民委員會批准）

（一）地主

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專靠剝削爲生的，叫做地主。

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是以地租方式剝削農民，此外或兼放債，或兼雇工，或兼營工商業，但對農民剝削地租是地主剝削的主要方式。管公堂及收學租也是地租剝削一類。地主中以小地主的剝削更為殘酷。

有些地主雖已破產了，但破產之後仍不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為生者，仍然算是地主。

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別兇惡者（富農中亦有小的土豪劣紳）。

幫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剝削農民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一些人，應與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貸剝削為主要生活來源的人，稱為高利貸者，高利貸者應與地主一例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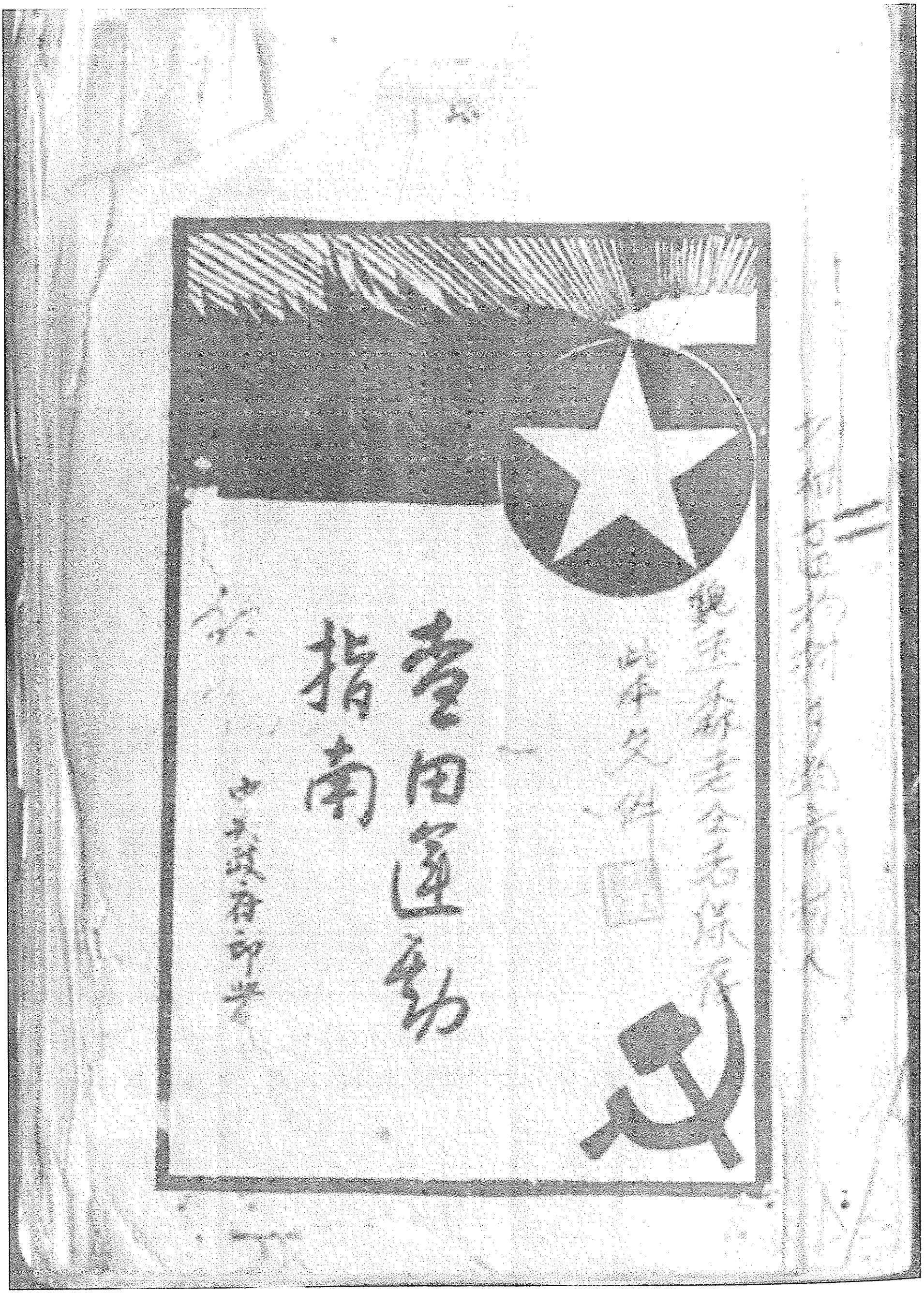
地主階級是土地革命的主要敵人，蘇維埃對地主的政策，是沒收他們一切土地財產，消滅地主階級。

（二）富農

富農一般佔有土地。但也有只佔有一部份土地，另租入一部份土地的。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後一種少數）。一般都佔有比較優良的生產工具及活動資本，自己

三七

1933年10月，毛泽东撰写了《怎样分析阶级》一文，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图为《怎样分析阶级》(部分)。



查田运动指南

中央政府印发

中央苏区时期印行的《查田运动指南》，其中刊载了毛泽东撰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四十九号[1]

（1933年10月10日）

（一）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本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特公布之。

（二）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有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据本决定予以变更。其因变更阶级成分而应变更土地财产之处置者：凡中农贫农贫民工人等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等，过去已经分配者，均应设法归还其本人，但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以外之财产，只在可能限度内设法归还本人（如当地尚有地主财产可没收等）。凡富农应得之田地、房屋、山林、池塘、园土、耕牛、农具等及资本家之财产，均只在可能限度内设法发还本人。

（三）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司法机关判决之案件有不合本决定者：其已执行者，应维持原判不变更。其未执行或在执行中者，应即依据本决定变更其判决。

（四）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及以后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签署的命令，公布《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

及因阶级成分而处置之土地财产适合本决定并无错误者，任何人不得要求变更其处置。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

（1933年10月10日）

在分田与查田的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或是以前的文件没有规定，或是规定不明悉，或是苏维埃工作人员解释不正确，以致执行上发生错误。人民委员会为了纠正及防止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起见，除了批准《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分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的各项原则外，特作下面的决定：

一　劳动与附带劳动

在普通情形下，一家中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叫做有劳动。一家中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的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劳动但非主要的劳动，均叫做有附带劳动。

（注）这里应注意：

（一）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富农地主的主要标准。

（二）规定一家中劳动的标准人数为一人，如一家有数人，其中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布的由他本人主持制定的文件。

有一人劳动，这家即算有劳动。有些人以为要有二人甚至全家参加劳动，才算这家有劳动，这是不对的。

（三）规定劳动的标准时间为一年的三分之一即四个月。以从事主要劳动满四个月与不满四个月，作为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分界（即富农与地主的分界）。有些人把有半年时间从事主要劳动的还算做附带劳动，这是不对的。

（四）所谓从事主要劳动，是指从事生产上主要工作部门的劳动，如犁田、莳田、割禾及其他生产上之重要劳动事项。但不限在农业生产方面，如砍柴、挑担及做其他重要劳动工作，都是主要劳动。

（五）所谓非主要劳动，是指各种辅助劳动，在生产中仅占次要地位者，如帮助芸草、帮助种菜、照顾耕牛等。

（六）劳动即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因此对于那种只雇长工耕种，没有其他地租、债利等剥削，自己负指挥生产之责，但不亲身从事主要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不得分配土地。

（七）构成地主成分的时间标准，以暴动时为起点，向上推算，连续过地主生活满三年者，即构成地主成分。

查田运动中对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问题，发生许多错误。或以有劳动当做只有附带劳动，把他判为地主，或以只有附带劳动当做有劳动，把他判为富农，都是因为过去对于地主富农的分界没有明确标准的缘故。依照上面规定，可以免去这种错误。

但上面的规定，是指“普通情形”而言。在特别情形下，须有不同的处置。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形。第一方面，是大地主而家中有人参加生产者。例如有人剥削地租债利的数量很大，如收租百担以上，或放债大洋千元以上，而家中人口不多，消费不大，则虽这家

有人每年从事四个月以上的主要劳动，仍是地主，不是富农。例如人口甚多，消费甚大，则虽有百担租或千元债，如果其家有人从事主要劳动，仍不是地主而是富农。第二方面，是拿剥削情形说是地主，但拿生活情形说则不能照地主待遇者。例如有人过去是富农或中农，但到暴动前数年，因死亡或疾病原因，忽然丧失劳动力，不得不把土地全部出租，或雇人耕种，因此全家过地主生活。如果把这种人当地主待遇是不妥当的，应照本人原来成分待遇。又如有人名义上还是地主，但其土地权实际已属别人，剥削收入极少，本人已有附带劳动，甚至生活比农民不如者，此种人应照富农分给坏田。其特甚者，在群众同意下，可照农民分田。再如有人过去是农民，暴动前二年遇特别机会突然致富，成了地主，土地固应没收，但因其二年前是农民，在群众同意下，亦可照富农分给坏田。

上述这些特别情形，查田运动中有些地方把它忽视了，这也是不对的。

二　富裕中农

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其剥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过其一家中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剥削收入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在苏维埃政权下，富裕中农的利益应与一般中农得到同等保护。

（注）这里应注意：

（一）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富裕中农与其他的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对别人有轻微剥削，其他中农则一般无剥削。

（二）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一家中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这种界限的设置是实际区分阶级成分时所需要的。

（三）所谓富裕中农的轻微剥削，是指雇牧童，或请零工，或请月工，或有少数钱放债，或放少数典租，或收少数学租，或有少数土地出租等。但所有这些剥削，在其一家生活的来源上不占着重要的成分，即不超过百分之十五。而其一家重要部分的生活来源，是依靠自己的劳动。

（四）在接近暴动的时期内虽曾经有过与富农在同等时间内的剥削分量相同的剥削，但不超过二年者，仍以富裕中农论。

（五）所谓某些情形下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为富裕中农，这里所谓某些情形是指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生活并不丰富。更有遭遇水旱灾荒，或逢疾病死丧，反而转向困难者。然而在这些情形下，在剥削分量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者，不能认为富农，而应认为中农。若没有这些情形，则剥削收入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者即为富农，不应认为富裕中农。这些情形的正确判断，依靠于当地群众的公意。富裕中农在农村中占着相当的数量，查田运动中许多地方把他们当做富农处置，这是不正确的。各地发生的侵犯中农事件，多半是侵犯了这种富裕中农，应该即刻改正。

举例：

（一）有人全家六人吃饭，二人劳动。有田五十担，收实谷三十五担（时价每担四元共值百四十元），完全自耕。有房五间，牛一只。有塘一口，出息大洋十二元。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约一百元。放生谷三担，利加五，年收一担半（值六元），收了四年。放债大洋

一百元（合小洋一千八百毛）利加二五，年收二十五元，放了五年。判断：此家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自己生产占二百五十元以上。对别人有债利剥削，但年收利息只二十九元，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全家开销后有剩余，生活颇好，但因剥削分量不大，故只算富裕中农，不是富农。

（二）全家五人吃饭，一个半人劳动。有田二十五担，收实谷十七担。借来田七十五担，收实谷四十二担，交租二十五担，交了十年。杂粮生产及养猪年收五十元。雇牧童一个，雇了三年。放债大洋六十元，利加三，年收十八元，放了四年。有屋五间，牛一只。有木梓山一块，年摘木桃三十担。判断：此家生活主要靠自己劳动，每年剥削人家极少，不过二十余元（雇牧童与放债合计），而受人剥削地租二十五担之多，全家开销所余无几，只能算普通中农，还不是富裕中农。

三　富农的剥削时间与剥削分量

从暴动时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一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在某些情形之下，剥削分量虽超过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

（注）这里该注意的是：

（一）以暴动时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而不能把其他任何时间作为计算剥削时间的起点。有些人算陈账，拿了中间空隔了的很早年代的剥削，作为决定阶级成分的根据，这是不对的。

（二）以连续三年的剥削作为构成富农成分的标准时间，如果剥削时间不超过三年，或虽有三年而是中间空隔了的（不相连续的），虽其剥削分量与富农在同等时间的剥削分量相同，仍以富裕中农论。

（三）剥削的分量必须是超过了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才能构成富农成分。如果剥削分量在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以下，虽有三年或三年以上的连续性，也不能构成富农成分，而仍是富裕中农成分。

（四）所谓全家一年总收入，是指自己生产部分与剥削他人的部分的合计，例如某家全家一年自己生产部分四百元，剥削他人部分一百元，合计五百元，即是总收入。其剥削部分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故是富农。

（五）某些情形，是指家庭人口多，劳力少，因此生活并不丰富，或因天灾人祸反而转向困难者。在这种情形下，剥削分量虽超过百分之十五，但不超过百分之三十，群众不加反对者，仍以富裕中农论。这里群众的意见是十分重要的，这种情形的考量也是要十分仔细的，不应该把富裕中农弄做富农，引起中农的不满意，但同时也不应把富农弄做富裕中农，引起贫农的不满意，所以应有仔细的考量，要取得群众的同意。

查田运动中对于这个时间与分量的问题，闹出许多纠纷，这是因为过去对于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分界没有明确的标准，或把富裕中农当做富农处置，或把富农当做富裕中农处置，中间的争论时常发生。现在规定的两者办法分界，可以免除这种弊病。

举例：

（一）全家十一人吃饭，二人劳动。自己有田百六十担，收实谷百二十担（值四百八十元）。有茶山二块，每年出息大洋三十元。有

塘一口，每年出息大洋十五元。杂粮生产及养猪等每年约值一百五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个，雇了七年，到革命时止，每年剥削剩余劳动约值七十元。放债大洋二百五十元，利加三，年收七十五元，放了五年，到革命时止。有一儿子是秀才，会做呈子打官司，借势欺人。判断：此家自己有劳动二人，但雇长工，又放债不少，剥削收入超过了全家总收入百分之十五，人口虽多，但开销后余钱不少，故是富农，应分坏田。他家有个劣绅，本人应不分田。

（二）全家三人吃饭，一人从事主要劳动四个月。有田六十担，自耕三十担，收实谷十八担。出租田三十担，收租谷十二担，收了五年。经常每年请短工二十天。有牛一只，每年可收牛税谷二担。放债大洋百二十元，利加三，年收三十六元，放了三年。判断：此家剥削收入超过自己生产，但因有一人从事四个月主要劳动，故是富农，应分坏田。

四　反动富农

在暴动前，尤其在暴动后，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叫做反动富农。反动富农应该没收他本人及其家属中参加了这种反革命行为的人的土地财产。

对于反动资本家，适用上述的原则。

（注）这里应该注意：

（一）必须是“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才叫做反动富农。如当暴动时领导民团屠杀工农，对革命政府顽强抵抗，特别是暴动后还在领导别人组织反革命团体机关，或个别进行重大反革命活动，如暗杀，当敌人侦探，自动替白军带路，逃往白区帮助国民

党，积极破坏查田运动与经济建设等。这种富农出身而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经证明确实者，没收其土地财产。其他富农中虽有反革命行为，但不是有领导的或重要的行为者，均不得没收其土地财产。

（二）反动富农家属之中，只没收参加了这种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分子的土地财产，其他分子的土地财产，则不没收。

（三）以找生活为目的而暂时跑去白区的，不是反动富农，不应没收家产。但不愿在苏区居住而跑去白区居住满一年不回来者，虽不是反动富农，仍应没收家产。

（四）对于反动资本家之定义与处置，完全适用以上之规定。

过去许多地方，把没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没收了，并且一家中把没有参加反革命行为的富农分子的土地财产也没收了，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一个来源，是在江西没收分配土地条例的第三条，“凡加入反革命组织（如AB团、社会民主党等）的富农，全家没收”不分首领与附从，不分参加者与未参加者。关于家属问题，虽在这一条的后半指出了“其家属未加入反革命组织，又无反革命行为，并与其家中反革命分子脱离关系，当地群众不反对者，得发还其土地”，但前既全家没收，后才发还一部，仍非正当办法，因此这一条应照现在规定修正。又过去有些地方扩大反动资本家的范围，没收了一些不应没收的商店，这也是不对的。

举例：

全家九人吃饭，一人劳动，又一人附带劳动。有田百六十担，自耕八十担，收实谷四十五担。出租田八十担，收租四十担，收了十年。有山五块，出息每年大洋七十元。经常雇长工一人。欠债大洋四百二十五元，利加二五，欠了三年。放债大洋三百八十元，利

加三，放了五年，有一人当靖卫团连长，当了两年，与赤卫军作战五回，又有一人加入AB团半年，不是重要分子，已向政府自首。家里其他各人无明显反动行为。判断：此家成分是富农。有一人做了重大反革命工作，此人是反动富农，应没收家产。其他各人不应没收。另一人虽加入AB团，不是重要分子又自首了，也不应没收。

五 富农捐款

在削弱富农的政策下，在国内战争时期中，除了实行分给坏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这些基本办法外，再向富农要求临时捐款，是应该的。但捐款数量至多不得超过富农现有活动款项全数百分之四十。捐款的次数也应有限制。

（注）

（一）近来进行富农捐款，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包庇富农不去捐款，一种是把富农现款捐尽与地主罚款无别，两者都是不对的，而后者则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并有影响到中农的危险。现规定至多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各地可按富农过去是否交过捐款及现在家况如何，在上述最高限度的规定内，分别要求富农捐出适当的部分。

（二）捐款是临时性质，与经常的土地税不同，故捐款数次应有限制，不能捐至多次，毫无止境。

（三）向富农捐款之权限于国家财政机关，任何其他机关，不得向富农捐款。

六　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

凡确定为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等，在遵守苏维埃法令下，富农自己有处置之权，他人不得妨碍。仅在便利生产又得富农同意的条件下，工农贫民才可与富农互相斢换房屋。

（注）

（一）近来有些地方发生工农贫民拿自己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斢换富农应有的土地房屋耕牛农具，甚至有斢换衣服肥料事情，这是不对的。因为“削弱富农”应有限制，分给较坏的劳动分地，没收多余的房屋耕牛农具，征收较高的累进税，并要求捐出一部分现款，这样“削弱”的政策已经实现了。超过这种限制，就是消灭富农的倾向，在目前革命阶段上是不应该的。只有在便利生产，并得富农同意的条件下，才可将房屋互相斢换。

（二）土地问题正确解决以后，如富农分得之坏田已经改良变成好田，他人不得再去斢换。

（三）暴动后富农添置的耕牛农具房屋，虽有多余，不得再行没收或斢换。

七　富农的义务劳动

富农应该比工农贫民担负国家及地方较多的义务劳动，但以不妨碍富农的生产为限度。

（注）

责成富农担负义务劳动，与责成地主担负义务劳动，应有分

别。地主的壮丁，应该完全编入劳役队，加以训练，使之参加国家与当地的劳动工作，在劳动过程中改造其阶级性，消灭地主阶级。富农应该比较工农贫民担负更多的义务劳动，但不能同地主一样使之担负无限制的义务劳动，致妨碍生产。因此，把富农与地主编在一个劳役队，在农事的紧张时期内，在富农劳动力没有多余及没有补偿办法的情况下，使之担负长期脱离生产的义务劳动，是不正当的。但不妨碍生产，或富农劳动力有多余，或有其他补偿办法，则不在此例。

八　破产地主

在暴动前，地主已经全部或最大部分失掉了他在土地财产上的剥削，但仍不从事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破产地主。破产地主仍然是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分配土地。

但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有分配土地之权。

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生活来源之一部，其分量达到其一年生活费用三分之一者，得照富农成分待遇。

（注）

有些人把部分破产的地主叫做破产地主，这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地主还有部分产业依以剥削，只不过剥削收入的分量有改变罢了。

有些人把破产后已经从事主要劳动满一年的，叫做破产地主，这更是不对的，因为地主破产后从事主要劳动已满一年（指暴动前），他已经由地主变为工人或贫民或农民了。

有些人把地主破产后已经从事一部分劳动者，仍照地主待遇，这也是不对的。因为若其劳动已达到维持一年生活三分之一者，这种人应该给予富农待遇了。

九　贫民

工人农民独立生产者自由职业者外，一切依靠自己劳动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者，或大部分依靠自己劳动力为生活者，或依靠极小资本自己经营以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者，均叫做贫民。乡村及小市镇贫民分子失业者应分配土地。城市贫民分子无房屋者应分配城市中地主的房屋。

（注）

贫民在城市中占着相当大数量，在乡村及小市镇上亦有一部分。贫民的职业是很复杂的，有些贫民一人的职业常依季候更换而不能固定。贫民的生活是很困难的，他们的收入常不够支出。

所谓依靠极小资本自己经营的贫民分子是指小贩。

不剥削他人的医生、教员、律师、新闻记者、著作家、艺术家等，叫做自由职业者。

十　知识分子

（一）知识分子不能看做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

（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

（三）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著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

（注）

（一）近来许多地方无条件排除知识分子这是不对的，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是有利于苏维埃革命的政策。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的时间，应设法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

（二）所谓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把知识分子看做一种单独的成分是不对的，把农民子弟在学校读过书的分子（所谓“毕业生”）当做一种坏的成分，这更是不对的。

（三）把当教员等工作看做不是劳动，这也是不对的。

十一　游民无产者

在紧靠暴动前，工人农民及其他民众，被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因而失去职业和土地，连续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叫做游民无产者（习惯上叫做流氓）。

苏维埃对于游民无产者的政策，是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及其他依附剥削阶级积极参加反革命的分子。关于争取一般游民无产者群众的主要办法，是使他们回到生产上来，照一般革命民众的例，分配土地和工作，并给予选举权，但分配土地，须在乡村居住，并须自己能耕种者。

（注）这里应该注意：

（一）所谓依靠不正当方法为主要生活来源，是指从事偷盗、抢劫、欺骗、乞食、赌博或卖淫等项不正当职业。有些人对于在业或半失业而兼从事一部分不正当职业（非主要生活来源）的分子，概叫做流氓，这是不对的。甚至把工农贫民中过去染有不良习惯（如嫖赌吸鸦片）的人，都叫做流氓，这更是不对的。

（二）有些地方，对于积极参加反革命的游民无产者领袖分子（所谓流氓头），不加惩办，反而分田给他，这是不对的。有些地方对于一般游民无产者分子，又拒绝其分田的要求，这也是不对的。

十二　宗教职业者

凡以牧师、神父、和尚、道士、斋公、看地、算命、卜卦等宗教迷信的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满三年者（紧靠暴动前），叫做宗教职业者。宗教职业者无选举权，并不得分配土地。

（注）

凡有这些宗教迷信职业而不是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及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而不满三年者，均不得称为宗教职业者，应各依其成分分别待遇，不得一律取消选举权，或一律不分土地。即是说凡以这些宗教迷信为副业的，或依为主要职业不满三年的，如果是工农贫民，均应有选举权，而在乡村者均应分配土地。本人如此家属更不待说。有些人把和尚、道士、看地、算命等人叫做流氓，这是不对的。

十三　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与土地

红军战士中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在他们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

的条件下，不论指挥员战斗员，本人及家属都有分配土地之权。

（注）

（一）优待红军条例第一条：“凡红军战士家在苏维埃区域内的，本人及家属均须与当地贫苦农民一般地平分土地房屋山林水池。”这里本已包括一切红军战士在内。但近来有些地方，只问社会出身，不问政治表现，把地主富农出身而坚决为工农利益作战的红军战士已经分得的土地，重新没收，这是错误的。

（二）“所谓红军战士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其他的人不得享此权利。

（三）地主富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如被开除军籍，得收回其土地。

十四　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

工人的家庭是富农或地主者，工人的本身及其妻子，依工人成分不变更。其应分土地与否，依其在乡村或在城市，分别处理，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成分处理。

（注）

（一）地主或富农家中，在紧靠暴动前，有人出卖劳动力已满一年者，应承认其为工人成分。本人及妻子照工人成分待遇，其应有的一部分财产不没收。工人本身及妻子如在乡村，应分配土地。本人及妻子如在城市，不应分配土地。本人在城市，妻子在乡村，本人不分配土地，妻子分配土地。家中其他的人，照地主富农成分处理，不得享受工人权利。家中如尚有其他成分，依其成分处理（例如一家有人在乡村靠收租放债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三年，此人是地

主。有人出卖劳动力已满一年，此人是工人。又有人在市镇上开自做自卖的小手工业店已满一年，此人是独立生产者。各依其在一定时间内生活来源的性质而决定其成分，又各依其成分而决定其在苏维埃法律下的待遇。）

（二）农村中工人独立生产者小学教员医生等人中，有兼有小块土地，因乡村不够维持生活出外谋生而将其小块土地出租，并非依为主要生活来源者，应照一般农民分配土地，不能当地主看待。

十五　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分

（一）结婚的行为，不能改变阶级成分。

（二）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工人农民贫民相互结婚后的阶级成分，依照结婚在暴动前后的分别，依照原来阶级成分的分别，并依照结婚生活情形的分别，而决定其成分。

（三）凡在暴动前结婚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从事劳动满一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成分。不从事劳动，及从事劳动不满一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则须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才能承认其为地主或富农或资本家成分。如生活不与地主富农资本家同等而与工农贫民同等（即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或过同等生活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四）凡在暴动后结婚的：工农贫民女子嫁与地主富农资本家，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须从事劳动满五年者，承认其为工人或农民或贫民成分，如不从事劳动，及

从事劳动不满五年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五）不论何时与何种成分结婚，所生子女的成分与父同。

（六）土地与公权的应否享有，依其成分。

（七）地主富农资本家女子嫁与工农贫民者，不得编入劳役队。随嫁的现款在五十元以下者，不得向她罚款或捐款。

（八）暴动前，工农贫民以子女卖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及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女招郎者，其出卖子女招来郎婿的成分与待遇，适用上述一至七条之规定。

（九）暴动前，工农贫民与地主富农资本家相互以子过继者，不问过继时之年龄如何，在十岁以下者，成分不变更。从满十岁起，工农贫民之子过继于地主富农资本家，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五年者，其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者，依原来成分不变更。地主富农资本家之子过继于工农贫民，与其过继父母过同等生活满三年者，其成分同于过继父母，如生活不与过继父母同等而与生身父母同等，依原来成分不变更。

（注）

这里所谓劳动，包括家务劳动在内。

十六　地主富农兼商人

（一）地主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没收。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不没收。

（二）富农兼商人的：其土地及与土地相连的房屋财产，照富农成分处理。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均不没收。

（三）对于地主富农兼商人的罚款或捐款，应限制在地主富农部

分，不能侵及商业部分。

（四）商人不编入劳役队。

十七　管公堂

管公堂是一种剥削。但应分别地主富农资本家管公堂，与工农贫民管公堂的不同。

（注）

管理各种祠庙会社的土地财产，叫做管公堂。管公堂无疑是剥削的一种，特别是地主阶级及富农备着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财产，成为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凡属这种为少数人把持操纵有大量剥削收入的公堂，管理公堂的行为，当然是构成管理者阶级成分的一个因素。但有些小的公堂，为工农贫民群众轮流管理，剥削数量极小，则不能作为构成管理者阶级成分的一个因素。有些人以为只要管过公堂的都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这是不对的。

十八　一部分工作人员的生活问题

在苏维埃机关及其他革命组织的工作人员，未分配土地而生活特别困难者，本人及家属可分给相当土地，或以其他方法解决其困难。

（注）

已分配土地的一般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生活，中央政府已有命令解决（即发动群众耕种其土地），这里只说未分土地的人员。所谓家属是指父、母、妻、子、女及十六岁以下的弟、妹。

十九　公共事业田

新区分配土地，及老区检查出来的土地重新分配时，应酌量留出为了桥梁、渡船、茶亭及农事试验场等公共事业而使用的土地。

（注）

桥梁的修理，渡船的修理与船工的工资，茶亭的修理与茶亭的设置，这些公共事业的费用均须按照需要，酌量留出一部分土地，发动群众耕种。此外，县苏、区苏、乡苏，还须在政府机关附近适当地方，留出一部分土地（县苏可留五十担至一百五十担，区苏可留十五担至二十五担，乡苏可留五担至十担）以为开办农事试验场之用。在农事试验场未开办以前，可租给农民耕种，只收最低的地租。

二十　债务问题

（一）在暴动前，凡地主富农资本家以金钱或物品贷付于工农贫民者，除店铺货账外，本利一概取消。凡工农贫民，以金钱或物品存放于地主富农资本家者，其本利应照数归还。

（二）专靠或大部分靠高利贷剥削为一家主要生活来源者，叫做高利贷者。高利贷者照地主成分处理。

（三）在暴动后的债务，凡不违背中央政府颁布之暂行借贷条例者，均应归还。

（注）

有高利贷剥削的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不论城市乡村，债务中

最大多数，都是高利贷剥削，但不是专靠或大部分靠高利贷为其一家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能叫做高利贷者，而采取完全没收的政策，应各依其成分处理。以为凡有高利贷剥削的，都是“高利贷者”，这是不对的。一面放债，一面欠债的，应将其“欠人”“人欠”互相抵销，看其剩余部分的性质与程度，再与本人其他剥削关系总合起来，决定其成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

关于重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

（1933年10月15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劳动法，经过一年半实施的经验，认为该劳动法的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办法的规定，在执行上发生困难，而且有许多实际事项没有规定进去，而这些实际事项又迫切需要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增进工人的利益，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组织了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劳动法，五个月来这一新的劳动法草案经过各地工农群众的讨论，集合了许多意见。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劳动法草案与各地的意见加以审查修改。特决议如下：

（一）劳动法条文通过并公布之，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起发生效力。

（二）新劳动法公布以后，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公布的劳动法即宣告无效。其他关于劳动问题的一切法令，如与新劳动法的规定相冲突者，亦失其效力。

（三）实施新劳动法各条文的详细手续，由人民委员会及中央劳动人民委员部以命令公布之。

（四）本劳动法的修改和增减，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行之。

（五）本劳动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内均发生效力。

（六）凡违反本劳动法各条之规定，均照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公布之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各条之规定处罚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

（1933年10月15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劳动法，对于凡受雇佣的劳动者均适用之。对于各种企业、各项机关、各种商店（不论为国有，为团体所共有，为私有，以及雇请工人在家庭工作者，都包括在内）和以物品或货币作报酬而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各个人，均须受本法的拘束。

（注一）对于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小船主、小手工业者及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得到工人与职工会的同意，得免除受本法某些条文的拘束，另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制订特别的法令颁布施行之。

（注二）还有特别事件发生（如防饥防灾及战争事件等缺乏劳动力时）中央人民委员会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意，得在一定限期内颁布特别法令实施之，免除适用本法。

上列两项的例外与限期，工人与职工会随时有权要求取消和缩短。

第二条　本法不适用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海陆空军的现役军人。

第三条　对于农业工人、季候工人、乡村手艺工人、苦力、家庭仆役及其他有特殊劳动条件的工人，除开适用本法一般规定外，

另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这些工人的劳动条件制订特别保护这些工人的补充法令公布施行之。

第四条　各项正式或非正式的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其条件如比本法所规定的条件较为恶劣者，均不发生效力。

第二章　雇用及取得劳动力的手续

第五条　凡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各个人及各种企业机关和商店欲以雇佣的方式取得别人的劳动力从事工作者，除本法第十条所规定的例外，均须向政府劳动部所属的机关（劳动介绍所）请求介绍。在当地政府劳动部没有成立该项机关时，须向职工会请求介绍。

第六条　凡欲寻觅工作的人须到当地政府劳动部所属的劳动介绍所登记，列入失业劳动者的名册内，如果当地政府劳动部没有成立劳动介绍所时，即到当地职工会登记。

第七条　私人设立的工作介绍所或雇佣代理处及委托工头招工员，买办或任何个人私自雇用工人，一律禁止之，要被介绍人付出金钱或物品作为介绍工作的报酬，或从工资中克扣介绍工作的报酬均禁止之。

第八条　所有各种企业、各项机关各商店以及私人雇主等，凡欲雇用劳动者工作时，均须照下列手续，请求劳动介绍所介绍。

（一）应开列所需用之劳动力的各种条件，以该企业或机关管理部的名义，或私人雇主自己或代表人的名义向该管政府劳动介绍所请求介绍。

（二）在劳动介绍所注册的人，有和前项所需要的条件符合者，

即照劳动介绍所的章程，介绍前往工作。

（三）雇主对于劳动介绍所派来工作的人，不论拒绝或收用，均须照劳动部所订章程通知该管政府的劳动介绍所。

第九条　如有下列情事发生，雇主须负完全责任：

（一）雇主在劳动介绍所开列所需用之劳动力的条件，与实际上不符合时；

（二）不履行因雇用工人所必须执行的手续时；

（三）非法拒绝劳动介绍所派去的工作人员时。

第十条　遇有下列情形，雇主可不经过劳动介绍所自行招雇劳动者工作，但必须在该管劳动介绍所登记。

（一）需用负政治上的责任或其他与被雇人身份有关的专门家和经理人管理人时；

（二）劳动介绍所从雇主请求之日起，在劳动介绍所章程所规定的日期内不能代为招到该项工作人时。

第十一条　所有企业机关及一切雇主应照劳动部所定期限将所有雇用的劳动者依式向当地劳动部呈报。

第十二条　在乡村中的雇主雇用劳动力及登记寻觅工作的人，由中央劳动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制订特别章程办理之。

第三章　工作时间

第十三条　所有被雇佣的劳动者，从事各项工作，通常每日的实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

第十四条　下列几种人，他们每日的实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

（一）十六岁到十八岁的未成年人；

（二）除开办理直接与制造有关系的人员外，所有使用脑力劳动的人员；

（三）在危害工人身体健康的工业部门，乃在平地下层工作的人。

（注）所有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部门，由中央劳动部规定公布之。

第十五条　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每日实际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

第十六条　对于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工作时间，中央劳动部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同意，得指定数种有特殊情形的劳动人员（如担负政治工作、参加会议、负责任的劳动人员，生产合作社及其他有特殊情形的劳动者）另行规定办法，不受上列规定工作时间的限制。

第十七条　所有在夜间工作的人，其工作时间应较白日的通常工作时间缩短，但在连续生产或轮流换班工作的情形下，夜间工作时间，仍与白日同，但须增加夜间工作的工资（如属于第十三条所规定者，应照白日工作时间内的工资，增加七分之一；属于第十四条所规定者，应增加五分之一）按件计算工资的人，如遇前项情形，除按件所得之工资外，如为夜间工作，亦须增加工资七分之一或五分之一。

（注）本条所称夜间，系指由下午十时起至第二天上午六时的时间。

第十八条　在每日的工作时间内，应有半小时至一小时的停工以为工人吃饭和休息的需要，但此项停工时间不算入工作时间内。

（注）凡在不能停工之工业中工作的劳动者，此项休息时间，由中央劳动部另行规定特别办法施行之。

第十九条　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以外的工作（即额外工作），按照一般原则禁止之。但在工作上有必要时，经过工人与职工会的同意及当地劳动部的批准得做额外工作。

（注）如有特别紧急的情事发生（如预防公众灾难、消灭工程上的障碍等）必须进行的额外工作，不及得到职工会与劳动部的同意时，应在第二天通知劳动检查员备案。

第二十条　进行额外工作时间，连续两日共不得超过四小时。

（注）在农业中，及其他季候工作中必须进行本条所规定以外的额外工作时，得到工人与职工会的同意及劳动部的批准，得酌量增加之。

第二十一条　凡因厂方的过失以致上工迟误，所消费的时间不得令工人作额外工作补偿。

第四章　休假时间

第二十二条　所有被雇佣的劳动者，每一星期内至少应有连续四十二小时的休息。

（注）若在工作上有特殊的情形，不能按照普通办法每星期依次休息者，则于相当时期内一次补给若干日的休息。

第二十三条　下列各纪念节日须一律停止工作：

（一）一月一日　新年节

（二）二月七日　军阀屠杀京汉路工人纪念日

（三）三月十八日　巴黎公社纪念日

（四）五月一日　国际劳动纪念日

（五）五月三十日　反帝纪念日

（六）八月一日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七）十一月七日　苏联十月革命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纪念日

（八）十二月十一日　广州暴动纪念日

（九）各级劳动部得商同地方的工会联合会按地方情形规定各该地方的纪念节日所作为休息日，但此项地方纪念节日每年不得超过二天。

第二十四条　每星期的休息日和前条各纪念节日停止工作，工资照给，若在工作上有必要继续工作者须加倍发给工资。

第二十五条　休息日和二十三条所列各纪念节日的前一日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工资与完全的工作日同。若系按月计算工资者不扣除工资。

第二十六条　所有被雇佣的劳动者连续工作在五个半月以上在一年内至少须有两星期的休假，照给工资，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及在危害工人身体健康之工业中工作的人，每一年至少须有四星期的休假，照给工资。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休假，工人可以自由选择时期利用，但以不妨碍各该事业及机关与家务的进行为限。

第二十八条　被雇人若因生病与生育所得的休假不得算入第二十六条所规定的假期之内。

第五章　工资（劳动力的报酬）

第二十九条　被雇人因出卖劳动力所得的报酬（工资）之额数应在集体合同及劳动合同内规定之。

（注）本条所称工资系包括货币部分与物品部分（如雇主供给伙食衣服及自然品等）之总称。

第三十条　所有被雇佣的劳动者，其工资不得少于当地政府在各该时期依照当地生活程度与各项劳动者职业的等级所规定的工资之最低限度。

第三十一条　所有各项被雇佣的劳动者所得工资等级的最低限度每三个月至六个月由当地政府劳动部规定一次。

第三十二条　超过法定工作时间以外的额外工作，应给额外工资，额外工资的数量，应在集体合同及劳动合同内规定。但起首两小时以内的额外工作，其工资应比通常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超过两小时以外的额外工作即应加倍付给工资。

第三十三条　所有被雇用的妇女与未成年人，如与成年男工做同样工作者，应得同样工资。未成年人按第十四条或第十五条规定的工作时间工作，但他们的工资，仍应按照该职业工资的等级，给予全日工资。计算未成年人工资的办法及工资的数额，由中央劳动部按照各企业的情形与工作性质规定之。

第三十四条　倘转移被雇人，换作比原定工资较低的工作时间，则应由转移之日起在两星期内仍照原定工资额数付给。

第三十五条　凡系长期工作，应分期付给工资，但至多每半个月应支付一次，临时或不满两星期以上的工作，应于工作完毕时付

给工资。

（注）如系按月按季按年计算工资者，在得到被雇人与职工会的同意不受本条的限制。

第三十六条　工资应以当地通常货币支付，但在得到被雇人的同意时可以物品代替一部分。以物品代替工资的额数及物品计算的办法均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内规定之。

第三十七条　付给工资，应在工作时间及工作地点行之，且须直接交给被雇人之手或被雇人所委托的代表。

第三十八条　例定支付工资日期如为例假，在例假期间的工资应在例假前付给。

第三十九条　按件计算工资的工作，应在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内规定按件工作的工价，并须根据每日的通常生产，规定每日的标准工资。规定包工工资的办法，及包工工资的支付办法，亦应在合同内规定。但禁止利用包工的办法，来克扣和剥削工人应得之工资。

第四十条　关于生产率的标准，由各企业各机关的管理部或雇主与职工会协议规定之。倘被雇人因为自己的过失，在正当的工作条件下不能完成生产率的标准时，可照他们已完成的工作付给工资，但不得少于原定工资额数的三分之二。如果被雇人屡次不能完成生产率的标准时，可照本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三项的规定解除合同。

（注）本条所指的正当工作条件如下：

（一）机械及其运用上均完整无阻；

（二）在工作中所需要用的一切材料与器具均能按时供给并足敷使用；

（三）工作地方，对于卫生及身体的运动各事有适宜的设备（如光线温度等）。

第六章　妇女及未成年人的劳动

第四十一条　凡工作特别劳苦笨重，或有害工人身体健康以及需要在平地下层工作的地方，均不得雇用妇女及未满十八岁的人从事工作。禁止妇女及未成年人工作的场所，由中央及各省劳动部规定公布之。

第四十二条　受孕和哺乳的妇女及未满十八岁的人不得雇用为夜间工作。

第四十三条　使用体力工作的妇女于生产前及生产后各休息八星期。使用脑力工作的妇女，于生产前及生产后，各休息六星期。

（注一）本条休息期间的工资，如被雇人已在社会保险局保险，由社会保险局付给，否则，由雇主付给。

（注二）小产经医生证明照疾病例给予休假。

第四十四条　被雇佣的妇女受孕在五个月以上者，不得□自己的同意，不得派往别地方工作，离开她原来的居住地点，在生产前五个月雇主不得辞退，在生产后九个月除开第一百零二条第七项所规定的情形外亦不得辞退。

第四十五条　哺乳的妇女在工作时间内，除享受本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普通停工停息时间外，每隔三小时应有半小时休息来哺乳小孩。此项休息时间计入工作时间内。工厂并须设立哺乳室及托儿所，请人负责看护。

第四十六条　未满十四岁的男女禁止雇用，雇用十四岁至十六岁的未成年人须经劳动检查机关的许可。

第七章　学徒

第四十七条　凡在工厂、作坊、商店以及在专门技艺工人指导下面和附属在工厂中的工艺学校分别学习各种技艺者，均称为学徒。

第四十八条　学徒学习的限期由中央劳动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及教育部按照各该职业的性质分别规定之。但最长的学习期限不得超过三年。

（注）关于保护各项学徒的补充法令，由中央劳动部另行颁布之。

第四十九条　无论何种学徒，均不得强令他们负担与本人所学特别技艺无关的他项工作或杂务，并不得强令学徒举行各种宗教的仪节。

第五十条　学徒每天至少须有一小时以上专门学习技艺的时间。

第五十一条　学徒在学习技艺三个月以后，须得相当工资，以后须按学徒学习期限与生产率的标准，提高工资。学徒应得工资的比例，由中央劳动部会同全国总工会规定之。

第五十二条　各机关各企业各商店以及学徒的专门指导人，须遵照劳动部教育部及国民经济部所颁行的法令，对于未成年的学徒学习业务之正当进行与否，负有设法维持保护并督促的责任。但严格禁止打骂与虐待学徒。

（注）考核与监督学徒学业正当与否的责任，属于该管劳动部的机关。

第八章　保证与津贴

第五十三条　凡工人及职员，被选为苏维埃或职工会所召集之代表会议的代表，在参加代表会议的期间，仍有支领工资的权利。

第五十四条　凡工人及职员，被法庭传唤充当见证人或监定人或陪审员执行司法机关委托事件的日期，如果不超过一个星期，仍有支领工资的权利。

第五十五条　凡工人及职员，因被征到红军中服军役及被派到苏维埃职工会及其他社会团体服务因而取消他的工作地位时，须预先发给他一个月工资的津贴。

第五十六条　因第一百零二条（一）、（二）、（三）三项原因，而解除劳动合同，及因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所指的原因，而解除劳动合同与被雇人因第一百零三条所指各项原因而解除劳动合同者，须给被雇人二星期工资的退工津贴。

第五十七条　各企业内在工作中所必须的器具及使用物件，保证被雇人随时有权使用，不得索资。如果因为工作的需要，而使用被雇人私有器械者，倘有损坏，雇主应负责赔偿。

各企业内如因工作而致损坏工人衣服者须由雇主负责照实价赔偿。

（注）本条对于做零工的手艺工人，免除适用。

第五十八条　凡工人及职员暂时丧失劳动能力，须保留他原来的工作地位。但病者以三个月为限，怀孕及生产者除开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休假外，以再经过三个月为限（第一百零二条第七项）。

第五十九条　各机关各企业中间停止工作，而未声明解除合同

者，须照给工资。

第六十条　如因被雇人的疏忽，或不遵守工厂机关的内部管理规则，致将器械使用物件制造品和物料损坏，经过职工会工厂委员会的同意，在被雇人工资内扣除赔偿损失的价值时，其额数不得超过该工人一个月所得工资的三分之一。

第六十一条　雇主若因财力缺乏，对于因集体合同及劳动合同所欠工人及职员的工资，须比其他的债务有优先权，尽先付给。

第九章　劳动保护

第六十二条　无论何项企业，不经过劳动检查机关的许可不得开设，或复业或移徙建筑物。

第六十三条　各企业各机关必须采用适当的设备，以消灭及减轻工作人的危险，预防事件的发生，及保持工作场内的卫生。

第六十四条　凡担负各种特别有害卫生的工作（如发生不规则的温度或潮湿或沾污身体等），及在有毒企业内工作，须由企业主发给工作人的工作衣服及各种防护器具（如眼镜、面具、呼吸器、肥皂等），并须给予工人以消毒药水，及特别食品（如肉类牛乳、鸡蛋等）。

在上述情形下之工作人，应按期检查他们的身体。

第六十五条　各项保护劳动的现行法令，由政府劳动部所属的劳动检查机关监督执行。劳动检查员于一定期间内，由职工会的会议选举，呈请当地劳动部批准。劳动检查机关的职权范围，由中央劳动部制订特别条例颁布之。

第十章　社会保险

第六十六条　社会保险，对于凡受雇佣的劳动者，不论他在国家企业，或合作社企业、私人企业以及在商店家庭内服务，不问他工作的性质及工作时间的久暂，与付给工资的形式如何均得施及之。

第六十七条　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以及私人雇主，于付给工人职员工资之外，支付全部工资总数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的数目，交纳给社会保险局，作为社会保险基金。该项百分比例表，由中央劳动部以命令规定之。保险金不得向被保险人征收，亦不得从被保险人的工资内扣除。

（注）社会保险基金不得使用于其他与社会保险无关的用途。

第六十八条　社会保险的实施如下：

（一）免费的医药帮助；

（二）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者付给津贴（如疾病、受伤、受隔离、怀孕及生产，以及服侍家中病人等）；

（三）失业时付给失业津贴；

（四）残废及衰老时，付给优恤金；

（五）生产、死亡、失踪时，付给其家属的补助金。

第六十九条　凡被保险人，如暂时丧失劳动能力，如第六十八条第二项所载不论为何项原因，须从丧失劳动能力之日起，至恢复原状或确定残废时止，照该被保险人在企业机关内所得工资额数付给津贴。

第七十条　因受孕及生产而丧失劳动能力，须照本法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的休假时间付给工资。

第七十一条　社会保险机关，如因基金缺乏，得相当减少付给

暂时丧失劳动能力者之津贴的额数。

第七十二条　被保险人及被保险人的妻，如生产小孩缺乏抚育能力者，须付给一次补助津贴，并小孩在十个月内必需的物品与养育费。但此项补助津贴的总数不得超过被保险人二个月的工资。

第七十三条　被保险人及被保险人担负生活费的家属，如有死亡，须付给必需的丧葬费，其数目由当地保险机关决定，但不得超过被保险人一个月的工资。

第七十四条　被保险人失业，须付给失业津贴。被保险人如系职工会会员做工在半年以上并由雇主交纳他的保险金，可得失业津贴，非职工会会员，做工在一年以上，并由雇主交纳他的保险金者，可领失业津贴。领取失业津贴，须先到劳动介绍所登记领失业证书，如系职工会会员，须有职工会会员证为凭。

支付失业津贴期间之长短，可按照当地情形和社会保险基金的状况加以限制。

（注）关于苦力零工等领取失业津贴，由劳动部规定特别办法办理之。

第七十五条　凡被保险人，因疾病或遇险，而致部分或全部残废，或因年老而丧失劳动能力，经过专门委员会的审查确定后，须付给优恤金。优恤金付给的额数，以残废的程度及性质与被保险人的家庭状况决定之。

第七十六条　凡被保险人死亡或失踪，或被保险人家属，因而无从取得生活费者，经过专门委员会的审查确实，须付给补助金，付给补助金的额数及方式，由当地社会保险机关视受津贴人的年龄及财产状况决定之。但只有被保险人家属的下列各人，才能领取本条所规定的补助金：

（一）未满十六岁的子女兄弟及姊妹；

（二）无劳动能力的父母及妻；

（三）上述家属各人虽有劳动能力而被保险人有未满八岁的子女者。

第七十七条　关于农业工人、苦力、家庭工人与零工的社会保险，中央劳动部得制定特别章程实施之。

第七十八条　雇主交纳社会保险金，但社会保险机关之管理与社会保险基金之用途，雇主不得过问。

第十一章　集体合同

第七十九条　集体合同，即一方面以职工联合会为工人及职员的代表与他方面雇主所缔结的契约，用以规定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中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与雇佣条件，并确定将来各个人订立劳动合同的内容。

第八十条　集体合同内各条款对于在各该企业或机关商店内的全体工作人员，不论他是否为缔结合同之职工会的会员均适用之。

（注）集体合同的效力，不及于享有开除与录用工人权力的管理人。

第八十一条　缔结集体合同的期限，由中央劳动部会同中华总工会规定之。

第八十二条　集体合同上所规定的条件，如比本法及其他关于劳动的现行法令所规定的条件较为恶劣者，皆不发生效力。

第八十三条　集体合同以书面为之，并须在劳动部所属的机关登记，该项机关对于合同内的某部分条文，如认为与现行的各劳动

法令，有不利于工人或职员时，有权取消之。集体合同登记的手续，由中央劳动部规定之。

（注）劳动部所属机关，取消集体合同内的某部分条款，其余各部分条款如双方声明愿意登记时，应予以登记。

第八十四条　业经登记的集体合同，自双方签字之日起，或依合同内所规定的日期起发生效力。

第八十五条　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转移于新业主时，已注册的集体合同在该合同的有效期间仍旧有效。

（注）如有前项情形，订立合同的双方，均有权声明重新审议该项合同，但须于两星期前通知对方。在新合同未成立前，该项合同仍旧有效。

第八十六条　集体合同，不论因为何种原因而未在劳动部所属机关登记，将来工人与雇主如发生与合同有关的争议时，其解决办法，不以该合同为根据，而以现行各项劳动法令为根据解决之。

第十二章　劳动合同

第八十七条　劳动合同即两人或两人以上所缔结的契约，一方面（被雇人）因受他方面（雇主）的报酬供给他的劳动力。劳动合同无论有无集体合同均可缔结之。

第八十八条　劳动合同上的条件，以双方协商同意而定。但劳动合同上的条件，如果比现行的劳动法令、集体合同及各工厂机关内部管理规则上所规定的条件较为恶劣者，或有限制劳动者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事情时，均不发生效力。

第八十九条　劳动合同订立之后，应即给予被雇人工折一本，

此工折的内容由中央劳动部以特别命令规定之。

（注）劳动合同的有效期限，在一星期以内者，不发给上项工折。

第九十条　未成年人在劳动合同上与已成年人享有同等的权利。但他的父母与负有监督执行劳动法令责任的机关及人员倘因继续该项合同于该未成年人身体健康有损时，应该项合同尚未满期，可以要求解除。

第九十一条　劳动合同的有效期限，分为下列三种：

（一）不满一年的有定期限；

（二）无定期限；

（三）完成某项工程的全时期。

第九十二条　被雇人不得雇主同意，不得将自己所担负的工作自行让给他人担负，但有下列的情形不受此条的限制：

（一）劳动合同为多数工人共同承揽工作者；

（二）被雇人自己丧失劳动能力，而当时的环境确实无法通知雇主者。

第九十三条　雇主不得要求被雇人，做在合同内所规定之工作无关系的其他工作，及做与被雇人生命有危险，或违犯劳动法令的工作。

雇主因某项工作雇用工人，倘临时在该处并无该项工作，或暂时无法进行该项工作时，雇主得要求被雇人转行担负与其性质相同的他项工作，如被雇人拒绝担负，得解除合同，但须给予两星期工资的退工津贴，如系零工，则给予当日的工资；如系月工，则给予五天的工资。如因预防危险及公众灾难有特别必要的情形时，虽与被雇人职业性质毫不相同的工作，雇主亦得要求被雇人担负。

如有上项情形不得减少被雇人原有的工资。但该项临时工作应给的工资，如高于该被雇人的原有工资时，则应照该项较高额的工资付给。

第九十四条　迁移被雇人由甲机关至乙机关或由甲地至乙地，虽有时该机关或金融随同迁移，须先得被雇人的同意。若被雇人不同意时，则此项劳动合同，可由一方面解除之。但须给予被雇人二星期工资的退工津贴。

第九十五条　凡系长期性质的工作，在订立劳动合同以前，对于被雇人得有一相当试验时期。但该项试验期限普通工人不得超过六天；办事员及技术人员不得超过半个月；负责人不得超过一个月，前项试验的结果，应即确定雇用或不雇用，但不雇用时，应按照该项工作的等级付给被雇人试验期间的酬金。

前项试验的结果（雇用或不雇用）应即呈报当地劳动介绍所。各劳动者在试验期间，仍以失业工人论，保留他轮流介绍工作的次序。

第九十六条　雇主与雇主间，秘密往来，通达消息，意图规定雇用劳动力的条件等行为一律禁止之。

第九十七条　除依照特别法令及工厂机关的内部管理规则外，禁止雇主或企业机关的管理人征收被雇人的罚金。

第九十八条　劳动合同有下列各情事之一者得废止之：

（一）双方同意废止者；

（二）合同期满者；

（三）合同所规定的工作完毕者；

（四）根据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的规定经某一方声明者。

第九十九条　各企业各机关如有迁移及变更业主时，不得废止劳动合同。

第一百条　如劳动合同所订期限已满，而劳动关系仍继续进行，订立合同的双方均未声明要求废止时，则该项劳动合同仍以原有条件继续有效，其期间无一定限制。

第一百零一条　无限期的劳动合同，被雇人随时可以要求解除，但普通劳动者，必须于一星期前预告雇主；负责人及技术人员必须于二星期前预告雇主。

第一百零二条　无限期的劳动合同与有限期而未满期的劳动合同，除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形外，如有下例各情事之一，得依雇主的要求而解除之：

（一）各企业各机关或商店之全部或一部歇业或缩减工作者；

（二）因有不可克服的经济原因，停止工作在一个月以上者；

（三）发觉被雇人对于工作无能力担负者；

（四）被雇人无充分原因不履行合同及工厂机关内部管理规则所负的责任者；

（五）被雇人犯刑事罪，其犯罪行为与被雇人担负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并经法庭判决确定者，或该被雇人受监禁处分满三个月以上者；

（六）被雇人无故旷工不到连续满五日以上，或一月总计无故旷工七日以上者；

（七）被雇人因暂时丧失劳动力，自丧失之日起经三个月以后仍不到工者，或妇女因受孕及生产，丧失劳动力，除本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休息时间外，再经过三个月，仍不到工者。

（注一）解除劳动合同，如该被雇人为工厂支部委员会委员或其他相当机关的委员时，须经职工会同意后才能执行。

（注二）如有本条（三）（四）二项情形时，解除劳动合同须经职工会同意后方得执行。

（注三）因本条（一）（二）（三）三项原因解除劳动合同时，须给予被雇人二星期工资的退工津贴。

第一百零三条　有限期的劳动合同如有下列情形，虽未满期，被雇人亦得自行解除之。

（一）被雇人不能按期间得所应得的酬金者；

（二）雇主违犯合同上所负的责任及劳动法令者；

（三）雇主或管理人或他们的家属对于被雇人有无理待遇情事者；

（四）变更劳动条件较为恶劣者；

（五）因其他在法律上所规定的情形者。

第一百零四条　无论何种劳动合同经职工会的要求，均得解除之。

第一百零五条　各机关各企业各商店，如雇用新的工人职员须于三日内通知职工会的支部委员会。如欲辞退工人职员，须于三日前通知职工会的支部委员会。

第十三章　职工会联合会及其在企业机关商店中的组织

第一百零六条　职工联合会（简称为职工会或工会），系联合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以及家庭中的雇佣劳动者而成立的机关。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各种职工联合会的总机关，各项职工联合会的组织须按照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在各该产业

职工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登记。

第一百零七条　所有各种其他的联合组织，未根据前条规定，在各产业职工联合会的中央机关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登记者，均不得称为职工联合会及享有职工会在法律上的权利。

第一百零八条　职工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分会均有下列各种权利：

（一）宣布并领导罢工；

（二）代表工人和职员与各企业各机关的管理部以及各私人雇主签订合同；

（三）出版报纸刊物，设立学校、图书馆、俱乐部，购置产业并管理之；

（四）对于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帮助劳动检查机关监督劳动法及其他一切劳动法令的执行；

（五）在私人企业中成立特别机关监督生产；

（六）在国有企业中参加企业的管理；

（七）向苏维埃政府提议颁布各种劳动法令，提出并推选劳动部所属各机关的职员。

第一百零九条　职工会得享受苏维埃政府各种物质上的协助，并享受邮政、电报、电话、电灯、自来水、电车及市政公用物品与铁道、轮船等优待条例。

第一百一十条　在军事机关内职工会的支部委员会，照中央劳动部会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制订颁布的特别条例组织之。

第一百一十一条　各机关各企业各商店的管理部或雇主，对于职工会一切机关的行动不得有任何阻碍，但召集该机关企业或商店的工人和职员大会或代表大会，在普通情形下，须于工作时间外行

之。但派遣代表参加苏维埃会议，或参加上级职工会的代表会议，仍得于工作时间内行之。

第一百一十二条　各机关各企业各商店除付给工人职员工资外，须付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为职工会的办事经费，又百分之一为职工会的文化教育经费。

第一百一十三条　各职工会的各级委员会的委员，持有该项委员的证书，均有权自由视察各机关各企业各商店内一切工作场所。

第十四章　管理规则

第一百一十四条　各企业各机关或商店内之劳动人员满五人以上者，为整理其内部工作秩序起见，得制定内部管理规则。此项规则遵照法定手续（第一百一十六条及第一百一十八条）确定之后，宣示于各劳动人员，方生效力。

第一百一十五条　在前条所述之内部管理规则内，对于劳动者及管理员之普通与特别的责任，以及因违犯规则所负责任的范围，及负责的办法，应有明确详细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六条　内部管理规则，对于各项现行的劳动法令和命令，以及该企业机关或商店内现行有效的集体合同不得有所抵触。

第一百一十七条　标准的内部管理规则，由中央劳动部会同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国民经济部制定之。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于未制定内部管理规则或该项管理规则，未经批准（第一百一十八条）以前，本条所述标准管理规则，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应行遵守。

第一百一十八条　所有各企业各机关各商店之内部管理规则，

应由各该管理部，会同当地职工会协定后，呈由劳动部所属的机关批准。

第十五章　解决争执及处理违犯劳动法案件的机关

第一百一十九条　凡违犯劳动法及其他关于劳动问题的法令，和集体合同的一切案件均归劳动法庭审理之。

第一百二十条　各机关各企业或商店与被雇人间，因为各种劳动条件的问题发生争执和冲突时，各级劳动部在得到当事人双方同意时，得进行调解及仲裁。但在发生重大争议时，即无当事人双方同意，各级劳动部亦得进行仲裁。

第一百二十一条　在国有企业、国家机关以及合作社企业中，得由管理部及职工会工厂作坊的支部委员会，各派同等数目的代表，组织工资争议委员会，工资争议委员会的职务如下：

（一）评定该企业或机关中工人职员应得工资的额数；

（二）解决管理部与工人职员间因执行劳动法令及集体合同所发生的争执；

（三）工资争议委员会的决定，须得双方同意，如工资争议委员会不能解决的案件，即提交劳动部所属的机关或劳动法庭办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

（1933年10月15日）

第一条　本条例是专为惩罚违反劳动法令的雇主（私人的国有的及合作社的）而颁布，凡违反劳动法令的一切犯法行为都根据本条例惩罚之。

第二条　凡雇主违反劳动法令各章的规定依照以下各项分别惩罚之：

（甲）在三个雇佣劳动者以下的企业或机关内，雇主违反劳动法者，处以三元大洋以上的罚款或三天以上的强迫劳动或监禁。

（乙）在三个以上七个以下的雇佣劳动者的企业或机关内，倘雇主的犯法行为仅及于小部分的雇佣劳动者，处以十元大洋以上的罚款，或十天以上的强迫劳动或监禁。倘雇主的犯法行为系及于多数或全体雇佣劳动者，处以二十元大洋以上的罚款，或两个星期以上的强迫劳动或监禁。

（丙）在七个以上的多数雇佣劳动者的企业或机关内，雇主的犯法行为仅及于少数雇佣劳动者，处以一个月以上的强迫劳动或监禁，或三十元大洋以上的罚款。

倘雇主的犯法行为，系及于大多数或全体的雇佣劳动者，处以三个月以上的监禁，或一百元大洋以上的罚款。

第三条　凡雇主违反关于劳动问题的现行法令，看雇主犯法行为的程度及影响于被雇佣者的多少，根据本条例第二条各项的规定处

罚之。

第四条　凡私人雇主及国有或合作社企业之管理人违反与职工会订立的集体合同，而该项合同又在当地劳动部登记者，以违反劳动法论罪，按本条例第二条各项的规定处罚之。

第五条　凡阻碍职工会及各级机关的负责人员及代表的合法行动，或妨害其使用自己的职权者，依其犯罪之程度，处以三天以上的强迫劳动或监禁，或处以三元大洋以上的罚款。

第六条　凡用强力恐吓或收买等方法以阻止工人或职员加入工会，以企图达到违反劳动法令和集体合同之目的者，依其犯罪之程度，处以五天以上的强迫劳动或监禁，或五元大洋以上的罚款。

第七条　凡违反劳动法或其他关于劳动问题的现行法令集体合同等案件，都归劳动法庭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审理之。

第八条　国有及合作社企业如发生有违反劳动法令及集体合同的事情，可由劳动部国民经济部及职工会组织特别委员会解决之。如不能解决时，则交劳动法庭根据本条例第二、三、四各条的原则判决强迫执行之。

第九条　凡中农贫农及手工业者小船主，因自己的劳动力不够而使用他人劳动力以辅助自己劳动力之不足者，倘得工人及职工会之同意而没有按照劳动法令的规定者，不应机械地依照本条例第二、三、四各条处罚之。

第十条　本条例，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随时修改和废止之。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中央政府为粉碎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

（1933年10月18日）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大规模的决战，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争取更伟大胜利的最重要的关键！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在清流、连城、洋口、乌江、黎川等地遭受了初步的严重打击之后，正在更疯狂地进行绝望的进攻，这一战斗是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决战的紧急的关头！

动员我们一切的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以我们的热血，争取这一决战中我们的全部胜利，这是整个苏维埃政权当前最中心的最尖锐的任务。可是中央政府检阅各级苏维埃工作的结果，许多地方政府对于战争的动员，还是表现极不紧张的状态，最近一时期内许多地方对于扩大红军，扩大与训练地方武装，动员运输队去前方的积极性表现非常不够。许多地方还不能充分地在一切工作中，在查田运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以及苏维埃的各种工作中，与革命战争的动员密切地联系起来，来实际地动员群众，领导群众为争取粉碎五次“围剿”全部胜利而斗争。因为许多地方政府对于战争动员采取不紧张甚至忽视的态度，所以在最近竟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实：北线敌人的小部队竟敢深入永丰北坑苏区袭击区政府，南线敌人的侦探竟敢深入筠门岭附近侦察军情，而我们的区乡政府，事前

完全不知道。在福建省，今年七月间对于配合红军争取连城胜利，准备异常不够，胜利后对于争取连清归新区极为缓慢。在闽赣省最近竟有三百余枪被敌人截夺了去。前方大批胜利品，缺乏伕子挑运，最近在黎川缴获的大批枪支，竟完全要红军战士搬运。这些地方对敌人警戒，对战争动员，采取了这样不紧张与忽视的态度，这对革命，简直是一种犯罪！这是一刻也不能再继续下去的现象！应该立即纠正过来。

自令到之日起，各级政府必须立刻执行下列工作：

第一，省、县、区、乡各级政府，及红军各部队，必须立刻召集各种会议，特别要在苏维埃的选举会议上，详细说明目前革命战争的紧张情形，用尽全部力量来进行战争的动员。各种群众团体应该同样召集会议，报告战争形势与自己的任务，务使苏区每一个工农，都要了解粉碎五次“围剿”的最战斗的意义，来热烈地踊跃地进行参战工作。

第二，深刻地记着我们粉碎四次“围剿”的经验与教训的各级政府，必须在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面前，完成中革军委扩大红军的计划，热烈地动员赤少队整营整连地加入红军，同时个别地动员勇敢积极分子大批加入红军，应该继续红五月的经验，继续红五月的光荣速度来猛烈扩大红军。同时应该运用兴国归队运动的经验，做到开小差的全体归队。

第三，必须动员十八岁至四十岁的公民，自愿地大批地加入赤卫军，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加入少年先锋队。应该特别迅速地恢复与扩大赤卫军模范营与模范少队的组织，经常下操，加紧他们的军事政治训练。未建立模范营与模范少队的，应该在最短时间内完全建立起来。应该在统一的作战计划之下（由军事机关的决定）动员赤

少队配合红军作战。各游击队必须根据军委命令敏捷地深入挺进敌人的后方以钳制并击敌人的部队。

第四，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质供给，每一件的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在十二月底完成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工作，在十一月开始征收土地税，在两月内加以完成。各级政府必须加紧筹款工作，特别是加紧新区边区的筹款。各级政府调剂局贸易局必须用大力量，来保证红军的给养，使红军粮食不至发生像今年春夏时的困难，而影响于红军的行动。必须动员工农群众准备随时随刻从经济上帮助红军。

第五，应该根据中央政府的义务劳动法，发动广大群众来担任运输工作，每一个赤卫军的队员，应该各有一根扁担，一条被单，五个人共一副担架，一听政府号令，立即可以集中，担任运输和帮助进攻敌人的工作。交通道路损坏时，必须立刻修理起来，以便利红军行动。

第六，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对于反革命案应在数星期内，迅速解决，绝对消灭犯人逃跑的现象。一切步哨必须完全建立起来，加紧查路条。在边区更应时刻防备敌便衣队的袭击，应按军委命令，设立必要的警号。

第七，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注意边区新区工作，调最得力的干部到新区边区去。在红军占领的新区域，应立刻设法建立临时政权，分配土地，建立地方武装，成立各种群众革命组织。

第八，各级工农检察部必须加紧检举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的分子。各级劳动部教育部在执行劳动法及进行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最密切地时刻联系到战争动员的工作。

一切苏维埃工作，应该服从战争！

在目前这样伟大剧烈的决战中，应该最严厉地打击一切惊慌失措退却逃跑的观点，同时应该坚决反对轻视敌人进攻放松动员工作的意见。必须以最大的努力紧张全部的工作，以深入的宣传鼓动来动员广大工农群众，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为粉碎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而战！为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战！

各级政府必须立即把这命令与军委十月五日的命令在各种会议上进行最详细的报告和讨论，定出最具体的执行办法。对于执行命令不积极及怠工者，必须立刻给以严厉的行政的制裁。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八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

（1933年10月24日）

全体选民同志们!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自成立到今天，已经两周年了。去年的今天我们曾向同志们作过简单的工作报告，现值两周年纪念的时候，应该把最近一年来的工作过程向同志们作个扼要的报告，并愿接受全体选民同志对于过去工作的意见和以后行政方针的建议。

同志们，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依靠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工农红军的英勇斗争，无论哪方面都是胜利地向前开展着，比一年前的形势大不相同。现在分开来说罢：

第一是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红军的扩大与加强

一年来，革命战争的中心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这一战争是在全国各苏区都完全胜利了。依据不完备的统计，一年来消灭白军缴获枪支在十万以上。单只今年一月到六月的统计，消灭白军共四十一团六营十连，击溃白军八师三十三团十九营九连，缴获步枪三万一千七百多支，机关枪自动步枪一千多支，活捉师旅团长二十多个，打死师长两个，旅长以下死伤不计其数。正因为我们这

种光荣伟大的胜利，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大大动摇起来，他们不得不组织五次“围剿”来向我们作死命的进攻。但是我们依靠着党的进攻路线，依靠着红军英勇与苏区白区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一开始就给敌人的五次“围剿”一个迎头痛击，连城、洋口、乌江，及最近的黎川战役，我们都得了胜利，缴枪八千支以上。一年来，由于工农群众勇敢向前加入红军，使红军比较去年扩大了一倍，并且在英勇的血战中锻炼成为强大无敌的革命铁军，各地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也加强了。苏维埃政府领导工农群众与红军，用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围剿”，是一切革命任务的中心，因此我们的一切工作，一切生活，都要服从于革命战争。争取战争的胜利，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同志的第一等责任。

第二是苏维埃区域猛烈的扩大与进一步的巩固

从去年到今年，中央苏区的东北方，赤化了建宁、泰宁、黎川、光泽、资溪、金溪等六七县，与闽浙赣苏区打成一片，在这里建立了新的闽赣省。最近东方军的胜利，又从福建的龙岩、新泉交界，经过连城、清流、归化，一直到闽北的延平附近，这一大块区域，都变为苏维埃版图了。江西在粉碎四次“围剿”中扩大南丰、宜黄、崇仁、乐安、永丰、新干等县的各一部分，面积占数百里之广，至于中央区以外的各苏区，如闽浙赣、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虽然有小部分地方暂时被敌人占据了，但有的不久即恢复，有的更有了新发展。发展得特别迅速广大的，是四川北部新创造的那个苏区。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不上一年已赤化了十多县，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苦群众和白军士兵，都倾向着苏

维埃革命。其他在陕西、河南、河北、江苏、广东、广西等处，都有我们的苏区或者游击区域存在着。甚至被国民党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东三省境内，也已经有了我们的红色游击区域。东三省广大的抗日义勇军部队，是在继续地顽强地同日本帝国主义战斗着。

苏维埃区域不但扩大了，而且进一步巩固了。比如过去执行阶级路线不明确的现象，现在一般已经纠正。劳动法的切实执行与新的劳动法的颁布，工人群众的经济生活更加改善了，工人参加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的积极性更加提高了，工人的阶级工会普遍地组织起来并发展起来了。查田运动的广泛开展，给了苏区残余的封建势力以最大的打击，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劳苦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广泛地发展了贫农团。依靠于工农群众积极性的发展，吸引了许多新的工农干部参加苏维埃工作，隐藏在苏维埃中的一些不良分子，许多被洗刷出去了。苏维埃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式更加改善，苏维埃更加与广大群众联系起来了。苏维埃行政区域今年已经划小，这样在制度上使苏维埃更加接近于群众，根据于过去苏维埃选举运动及苏维埃工作的经验，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选举法与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使今年的选举运动更加正确地开展起来，使地方苏维埃组织更加完善起来。所有这些，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政权，并且使这个政权适应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而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由于红军的伟大胜利，苏区的发展与巩固，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强占东三省热河与华北，国民党政府的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浩劫，影响了激起了国民党区域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革命士兵与革命学生，一致地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对地主资本家，革命的斗争在全中

国广大区域发展起来。全中国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热烈地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因为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真正为民族自由独立而战的政府与军队，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救中国。

第三是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

残酷的持久的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极大地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关于这一方面的工作，苏维埃已在用极大的力量去进行，这里发展农业生产是第一个任务，由于今年春耕夏耕中苏维埃领导的正确与广大劳苦群众热忱的提高，使今年的秋收平均比去年增加了一成半，杂粮生产更大大增加，犁牛合作社与劳动互助社亦在许多地方建立了。只有依靠农业生产的发展，才保证了红军与群众的给养，保证了与外部工业品的交换。发展工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任务。这里农具与石灰的生产，是与发展农业生产密切相连的，许多日用手工业品的供给，是依靠苏区自己的生产。烟、纸、木头、夏布、钨砂、樟脑等项的生产，过去都是出口大宗，但是后来衰落了。今年以来苏维埃对于这些工业已在计划恢复，有些已得到了初步的成绩。发展出口入口贸易是经济建设的第三个任务，今年以来，政府设立了对外贸易局，已经开始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为了实现上述各项经济建设的任务，合作社的发展是刻不容缓的，自从中央政府着力提倡合作社运动以来，各地消费合作社与粮食合作社已在风起云涌的发展中。各种生产合作社亦在计划发展，信用合作社则在开始计划。为了进行经济建设事业，中央政府发行的经济建设公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各地发行超过了三百万，大概五百万的数目是可以实现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得使革命战争得

到确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同志们一齐努力呵！

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地提高，亦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工农群众才有享受教育的权利与可能。一年来苏维埃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已在着力地进行。小学、夜学、识字运动与俱乐部运动，已在各地广泛发展起来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苏维埃大学与红军大学的建立，工农剧社与蓝衫团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表明苏维埃文化建设事业已进入了发展的阶段中。中央政府最近已宣布以马克斯共产主义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中央政府正在制定小学教育制度与颁布社会教育的具体办法。要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部分。

全体选民同志们，上面我们已经简单地报告了一年以来革命发展的形势与苏维埃工作的进步与成绩，现在我们还要向同志们指出过去苏维埃工作的不足与今后工作的任务。全体选民同志必须在苏维埃正确领导之下，用全力来充实这些不足，实现这些任务，才能争取五次“围剿”的彻底粉碎与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我们的任务是些什么呢？我们的不足在何处呢？

第一是扩大红军。同志们，我们的红军虽比从前扩大了，但是还不够，要打胜五次“围剿”中很多的白军，还要大大地扩大红军，每个勇敢的工农都应该自动地上前线去，为了配合红军作战，同时为了保卫地方，必须大大地扩大赤卫军与少先队，扩大赤卫军模范营与模范少队，放哨查路条的工作要特别严密起来，不让一个敌人的侦探混进苏区来。运输队要时常准备着，以便上前线抬伤兵运胜利品。

第二是新苏区工作要更快地开展。一年来发展的新苏区虽多，但是还觉得慢一点，这里一个原因就是中心区还没有选派更多的工农积极同志到新苏区去做工作。为了在粉碎“围剿”战争中更加猛烈地扩大新苏区，中心区的同志要大家欢喜到新苏区做工作去，新苏区的同志更要百倍努力于自己的工作。

第三是一年来苏维埃建设工作有极大的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工作须待于今后的努力，首先是保护工人的日常利益，要把劳动法更加普遍正确地实行起来。其次是查田运动，要在那些还没有肃清封建残余势力的地方尽力地发动查田查阶级运动，不得侵犯中农，不得把富农同地主一样看待。其次是经济建设，要努力今年的冬耕，准备明年春耕。要发展合作社达到一百万社员入社，成立消费合作社的各级总社，实行做起生意来。要实行发展出入口贸易，打破敌人的封锁，解决食盐的困难。要修理桥梁、道路，使经济发展得着便利。要切实推销三百万至五百万的经济建设公债，为各项经济建设事业的资本。其次是文化建设，要建立完备的小学教育制度，要发展消灭文盲运动。其次是加紧肃反，不使苏区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乘着敌人的进攻在我们内部捣乱。其次是加紧筹款，使战争经费得着保障。

为了迅速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彻底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全体选民同志都应该起来注意，监督苏维埃人员不使有官僚主义分子存在。必须使今年的选举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要使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经过选举到苏维埃来工作，而把旧有人员中的官僚主义分子洗刷出去，这样才保证了苏维埃各个战斗任务的实现。

全体选民同志们，所有这些工作每件都是我们的战斗任务，都是粉碎五次“围剿”不可缺少的条件，而当着我们向你们作报告的

今日，正是敌人用其全力大举进攻，我们集中力量向这些敌人进行决战的时候，战争是极度的紧张着，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必须极度的紧张起来。中央政府已颁布了战争的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用突击的精神去开展自己的工作，要使整个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前线的要求，凡我选民群众，都要在中央政府这一号召之下，立即动员起来。同志们，我们用这样的工作去换取最后的胜利罢！首先要换取一个伟大胜利使之出现于第二次全苏大会之前，同志们，我们拿了这样的一个胜利去献给第二次全苏大会罢！

猛烈扩大红军！

猛烈扩大苏区！

战斗地发展苏维埃建设工作！

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第二次全苏大会万岁！

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十月二十四日

农业税暂行税则补充条例

（1933年10月26日）

为更明显规定农业税免税减税起见，特颁布补充农业税暂行税则免税减税的补充条例如下，凡农业税暂行税则与本条例抵触者，悉依本条例办理之。

一　关于工人的

1. 雇农及陆上苦力工人与长担码头工人，本身及其妻（或夫）与十六岁以下的子女免税。

2. 水上苦力工人（木船竹筏木排及竹排工人）本身及其妻（或夫）免税。

3. 店员手艺工人（如泥水木匠理发纺织……）纸业工人及其他产业工人（造币厂印刷厂）分田者，本身免税（自做自卖的独立生产者不免）。

注一：上述各项工人雇农，以继续做工二年（紧靠革命前或革命后）以上者为限，做工未满二年者不免税。

注二：上述各项工人雇农免税者，不问其何时加入工会或加入何种工会，均照一、二、三项办理，雇农苦力加入店员手艺工人工会者，仍照第一项免税，手艺工人加入农业工人工会者，仍照第三

项免税。

4. 邮局工人，印刷厂工人，兵工厂工人，被服厂工人，各种国有（是国家所有的）与非国有工厂、矿山、商店中的工人雇员分田者，只要做工有二年以上，本身免税，其在银行、粮食调剂局、贸易局、电报局、电话局等做工服务满二年以上，支领正式工资者，本人免税。

5. 在各种国有工厂、矿山、银行、税关及商店机关未领正式工资者，则照农业税则第八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减半税（指本人及父母妻子）。

6. 雇农苦力工人、手艺工人、店员参加各种国有与非国有工厂、矿山、商店、银行、合作社等工作，支领正式工资未满二年者，仍照雇农苦力与店员手艺工人一样免税。

7. 凡各项工人免税者，须有工会会员证或各国有工厂机关正式证明书为凭。

8. 凡在银行、调剂局等处工作领有津贴的（与领工资者有别）照苏维埃工作人员一样待遇本人及其家属减半税。

二　关于红军的

1. 红军家属（父母子女及其妻不满十六岁之弟妹）在本年死的，本年免税，在去年死的，今年不免税。

2. 红军中伕子工作在五个月以上者，本身免税，三个月的不免税，如果收税不满五个月，收税后满五个月的，今年未免，明年补免。

3. 红军老婆离婚的不免税。

4. 红军医院的洗衣队看护兵，工作在半年以上者，照红军家属一样免税。

5. 红军开小差回来的不免税，归队的免税。

6. 意图免税而去前方一月或二月回来的，补税。

7. 在红军中因工作致病，失掉劳动力，准假回家者，在没有恢复劳动力以前，照红军免税。

8. 在前方参加红军行动被牺牲者，照红军免税三年，在劳役队中之富农在前方牺牲者免税一年。

9. 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为革命牺牲的，照红军免税三年。

10. 红军战士是地主富农出身，分有田地者，同样免税。

11. 当红军被反革命捉去的，有人证实者，照红军家属免税。

12. 残废兵讨的老婆，如是贫苦妇女，除本身免税外，其带来的子女同样免税，如是富农的妇女，夫妻两人免税，带来的子女十岁以内者免税，以外者不免。

13. 红军战士年满四十五岁又负〈服〉兵役满五年者，经批准退伍回家，领有凭证可验者，本人及其家属免税。

14. 红军战士免税以开始收税前入伍者为限。

三　关于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

1. 在政府工作半年以上者减半税。

2. 在政府工作被牺牲者本人及其家属减半税三年，病死的，本身及其家属减半税二年。

3. 政府工作人员与富农妇女结婚的，本人减半税，其妻不减。

4. 凡群众团体如工会少队儿童团党团反帝拥苏互济会等工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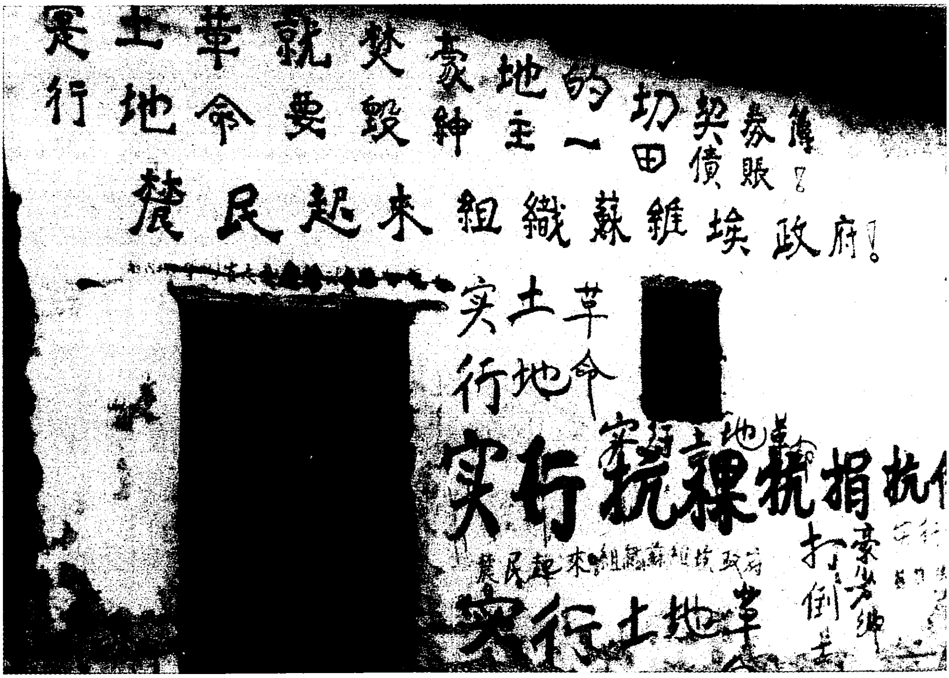
员，都不减税。

四　其他

1. 分田后荒了的田，故意荒的不免税，确实无法耕种，经乡苏批准的则免税。

2. 工人在罚苦工及被刑事处分期间内，其家属系免税的，照例免税。

3. 个别农民受各种天灾要减免的，须经乡代表讨论决定，全村要减免的，须经区苏主席团议决，县政府批准，全区要减免的，要省苏批准。


寔行土地革命就要焚毁豪紳地主的一切田契債券賬簿！
農民起來組織蘇維埃政府！
实行土地革命
实行土地革命
实行抗稞抗捐抗
農民起來組織蘇維埃政府
实行土地革
打倒
豪劣紳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标语。

4. 苦力工人本身死了，其家属照苦力工人免税一年，其他工人死了，本身免税一年。

5. 贫苦工农与富农妇女结婚，不满一年的，照各人原来成分收税，满一年的照贫苦工农收税。

6. 富农的女儿和老婆与贫苦工农结婚者，因年幼时及无劳动分得半个人的田，税率照富农，人口照新老公的家庭计算。

7. 贫苦工农无论男女招赘到富农家里，还是照原来阶级成分收税。

8. 种棉花之田免税。

9. 中农贫农残废孤寡，无人维持者免税，有人维持者不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

（1933年11月11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自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出卖满蒙的停战协定之后，更经过了大连会议上中、日、“满”三国的“联欢”，国民党南京政府不但出卖满蒙与泺东的所谓“中立区域”，而且直接动员它的武装力量，协同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国”的军队，压迫东北抗日的士兵退出于蒙古，并在“剿匪”名义之下，成千成万地屠杀东北抗日义勇军与革命的士兵群众。中国国民党罪魁蒋介石公开发表“侈言抗日者，立斩无赦”“为了剿共必须停止抗日”的最无耻的宣言，以最残酷的白色恐怖镇压一切反日的革命运动，有计划地撤退他的华北驻军，而集中他所有武装力量向反日反帝的主力军——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新的五次“围剿”以表示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来表现他的“中日直接交涉”的预定计划。

“中日直接交涉”，自九月间国民党要人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已经加强速度地进行了。这一次会议的内容，显然不限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满蒙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且必然是南京政府

进一步地投降卖国，以中国承认华北为日本势力范围，日本帮助南京政府，以金钱武器，伸长它的反动势力，进行它的五次“围剿”，为直接的交换条件。什么日本愿意放弃“在华北的治外法权”，当然不过是一种欺骗民众的把戏。

全中国的民众们，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各派国民党政府，同时将西藏与西康的大部分，出卖给帝国主义，将南海九岛与云贵等省，出卖给法帝国主义，将许许多多政治经济的特权出卖给美帝国主义，最近它从欧美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数万万元的大借款与杀人的武器，都是国民党政府出卖中国土地与人民的代价。

出卖整个的中国，投降帝国主义，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充当清道夫，这就是国民党政府的一贯外交方针！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反对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所以它对于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民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它疯狂的与绝望的五次“围剿”，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帮助帝国主义来加紧对于中国民众的剥削，造成全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使水旱灾荒普遍全中国，使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学生失学，使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生活在悲惨的地狱中而冻死饿死！

全中国的民众们！国民党所要我们走的就是使中国变为殖民地的道路，使中华民族完全灭亡的道路！

一致地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倒卖国辱国的国民党军阀，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民众的最后解放而血战，这是全国革命民众前面的唯一出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再一次向全中国民众宣言，

为了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为了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军阀，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时刻准备着流尽它的最后一滴血，为了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苏维埃中央政府正在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粉碎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粉碎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阻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即是争取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斗争中最重要的一环。

为了集中全国一切民众的力量，同全中国最凶恶的敌人决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这里再一次向全国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议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订立目前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

（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坚信我们这一提议，定能得到全中国劳苦民众及一切稍有爱国热血的人民的同情与积极的拥护。这种同情与拥护，将保证殖民地道路与苏维埃道路的决战中，苏维埃道路的完全胜利，将使中国的民族与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得到最后的解放！

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出卖中国的国民党南京政府！

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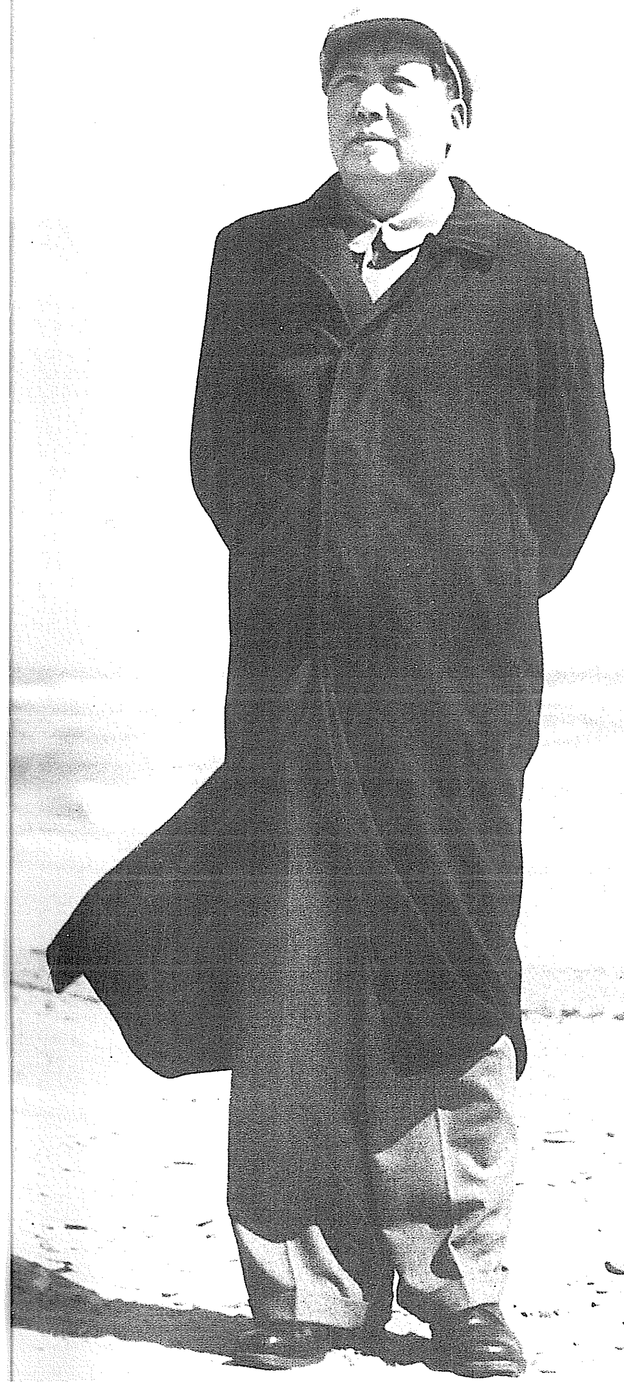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2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淦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长冈乡调查……………………………………………………1
（1933年11月）
赠彭德怀 ………………………………………………47
（1933年11月）
才溪乡调查 ……………………………………………48
（1933年1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 ……………71
（1933年12月12日）
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120
（1933年12月15日）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122
（1933年12月15日）
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123
（1933年12月20日）
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第二电…………127
（1934年1月13日）
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写的碑文………………………………129
（1934年1月15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131
（1934年1月22日）

给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的信……134
（1934年1月22日）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上的讲话……136
（1934年1月22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37
（1934年1月24日、25日）
我们的经济政策……198
（1934年1月23日）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203
（1934年1月27日）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206
（1934年1月27日）
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212
（1934年1月29日）
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兴国代表题词……215
（1934年1月）
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题词……216
（1934年1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218
（1934年2月1日）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词……219
（1934年2月1日）
关于二全大会选举与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委员……221
（1934年2月3日）
为福建事变宣言……225
（1934年2月11日）

组织法……229
（1934年2月17日）
雇用辅助劳动暂行条例……238
（1934年2月20日）
和乌石垅老者应对联……242
（1934年2月）
和某私塾先生应对联……243
（1934年2月）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244
（1934年3月20日）
司法程序……245
（1934年4月8日）
惩治反革命条例……248
（1934年4月8日）
婚姻法……254
（1934年4月8日）
乡苏怎样工作？……258
（1934年4月1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273
（1934年4月16日）
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275
（1934年4月）
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277
（1934年4月）
和刘晓、何长工的谈话……280
（1934年4月）

对红二十二师的指示……………………………………………281
（1934年5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282
（1934年6月19日）
告白军官兵书……………………………………………………287
（1934年6月）
和刘晓、何长工的谈话…………………………………………290
（1934年6月）
给中共会昌县委和县苏维埃的信………………………………291
（1934年6月）
视察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时的谈话……………………………292
（1934年7月1日）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293
（1934年7月15日）
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297
（1934年7月31日）
为《红星》报题词………………………………………………303
（1934年8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304
（1934年8月15日）
在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06
（1934年10月15日）
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307
（1934年10月）
和吴吉清的谈话…………………………………………………348
（1934年11月）

出路在哪里？……349
（1934年11月7日）
清平乐·会昌……352
（1934年夏）
向白军士兵抗日六条纲领的建议……356
（1934年）
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359
（1934年）
十六字令三首……361
（1934年至1935年）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367
（1935年1月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给张国焘的电报*……394
（1935年1月22日）
杂言诗·改李白《赠汪伦》……396
（1935年1月）
忆秦娥·娄山关……397
（1935年2月）
中央军委命令……409
（1935年3月5日）
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414
（1935年4月28日）
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415
（1935年6月15日）
为同四方面军会合复四方面军电……420
（1935年6月16日）

应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421
（1935年6月16日）
四方面军须力攻平武松潘……………………………………424
（1935年6月18日）
力争实行川陕甘方针…………………………………………426
（1935年6月20日）
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五点意见…………428
（1935年6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429
（1935年6月29日）
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431
（1935年7月10日）
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432
（1935年7月21日）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434
（1935年7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35
（1935年8月4日至6日）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议* ………437
（1935年8月5日）
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450
（1935年8月20日）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451
（1935年8月20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454
（1935年9月1日）

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455
（1935年9月2日）
左路军应改道北上……456
（1935年9月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462
（1935年9月12日）
消灭腊子口之敌的部署……465
（1935年9月16日）
部队的行动部署和严整纪律问题……466
（1935年9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467
（1935年9月20日）
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468
（1935年9月20日）
部队宿营位置及三日行动部署……469
（1935年10月2日）
近日各纵队的工作……470
（1935年10月3日）
日内无急于求战之必要……471
（1935年10月6日）
陕甘支队近期行动部署……472
（1935年10月6日）
通过洪德城环县时须做战斗准备……473
（1935年10月13日）
致彭德怀电……474
（1935年10月14日）

部队争取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475
（1935年10月16日）
拟在铁边城以东地区消灭追敌……………………………………479
（1935年10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480
（1935年10月18日）
陕甘支队的行动部署…………………………………………………481
（1935年10月19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483
（1935年10月2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84
（1935年10月22日）
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486
（1935年10月25日）
致朱德等电……………………………………………………………487
（1935年10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488
（1935年10月27日）
七律·长征 ……………………………………………………………489
（1935年10月）
念奴娇·昆仑 …………………………………………………………506
（1935年10月）
清平乐·六盘山 ………………………………………………………511
（1935年10月）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 ………………………………………………515
（1935年10月）

长冈乡调查[1]

（1933年11月）

一切苏维埃工作的实际执行都在乡苏与市苏，这是人人了解的，但乡苏、市苏应该怎么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却有很多人不了解。而不了解乡苏与市苏的工作，简直就不能真正领导苏维埃工作，就不能真正去解决“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个问题。现在上级苏维埃工作人员中我们遇得到这样的情形：发得出很多的命令与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同志们！这是不行的，这是官僚主义，这是苏维埃工作的障碍！

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

---

[1]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长冈乡　　（1933年11月18日）

谢昌宝　主席（塘背村）

李求应　代表（长冈村）

王先怀　贫农团主任（新溪村）

下面的材料是从这三个同志收集的。”

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现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发生了敷衍塞责或者强迫命令的严重错误，这些苏维埃同群众的关系十分不好，大大障碍了苏维埃任务与计划的执行。另一方面，无数的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又在许多地方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的很好的方法，他们与群众打成一片，他们的工作收到了很大的成效。上级苏维埃人员的一种责任，就在把这些好的经验收集整理起来，传播到广大区域中去。这样的工作，现在应该立即在各省各县实行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

这里收集的长冈乡的经验，限于时间与报告人的材料，仅是他们若干项主要工作的概略的总结。但这种总结已足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已足使我们郑重称赞他们的工作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因为他们与群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工作收得了很大的成效。发扬这些经验，收集更多的经验，供给一切落后的乡苏、市苏以具体的榜样，使他们的工作提高到先进乡苏、市苏的地位，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政治区划及户口

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之上社区，是从本区榔木乡划出来的。

上社区工作的等第：长冈、榔木第一，杨澄第二，合富、秀水、塘石第三，仁田、上社第四。

长冈乡分为长冈、塘背、新溪、泗网四村。

户口：

一、全乡四百三十七家，一千七百八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短夫及区乡工作人员在内）。在乡人口中，中农、贫农一千二百八十六，工人、雇农、苦力一百零二，地主、富农七十七。

二、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当红军，八十；

一九三三年当红军，一百三十九；

在游击营，七；

调县以上工作，三十四；

调后方医院工作，二十四；

调当长期夫子，三十六；

共三百二十。

三、地主、富农：

原有地主二家，五人；

原有富农十一家，七十二人；

八月查田查出地主之妻女与工农结婚的，六人。

从这六人收回土地三十六担六斗，没有查出别的富农、地主。

代表会议

一　会议情形

议事日程经常是：（1）开会，（2）报告，（3）讨论，（4）其他，（5）散会。拿纸写好贴起来。每次讨论的具体问题，则只主席自己开在纸上，不贴起。“报告”，首先主席报告开会理由，讲二三十句。接着区苏的“参加同志”报告（差不多每次都有区苏的人参加：部员来得多，十次有五六次；部长来得少，十次有二三次；主席、副主席不常来，十次只有一次），内容是政治形势与工作情形。“参加同志”没有说到的，主席与支书补充。“讨论”，均是具体问题，例如十一月八日开的一次会议，讨论了下列各项：

（一）军事动员。又分为：1. 扩大红军。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2. 优待红属。决定要模范耕田队与劳动互助社一齐动员。3. 归队运动。本乡有七个开小差的，决定要宣传队（乡的、村的）、突击队（红军老婆组织的）进行工作。4. 慰劳红军。每村答应毛巾四条；黄麻草鞋与布草鞋，长冈答应一百一十双，塘背一百双，新溪九十双，泗网一百双。

（二）经济动员。又分为：1. 经济公债。本乡承认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收到了谷子八百二十二担，值四千一百一十元，又收到现洋一百二十七元，共收了四千二百三十七元，尚差一千二百一十九元没有收齐，决定要各代表“拿出精神来”作宣传，限十一月二十五日收齐。2. 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过去只区有，现在乡组织支

社，还只集股一百零几元，但群众已承认了三百五十元，决定要各代表进行收集的宣传，宣传队也要出发。3. 节省运动。决定多种蔬菜以备春荒，把谷米节省起来。

（三）修整河堤道路。决定限十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十天内，修好通江背洞之六里长的大路，修六尺宽。修好后再修他路，四尺宽。选举筹备员五人，于路修好后修那个一丈宽被水冲坏了的河堤。至于那座大木桥，则与榔木乡合修。

（四）“拥护区苏”。为了对第三次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十一月十二日的开会表示全乡群众的拥护，决定赠送红匾一幅，一尺四寸红布，写四个字。十二日复动员全乡群众十分之九整队去区苏，要打爆竹。（结果群众去了十分之八，打了五六千爆竹，都是群众自己买了去打的。）

后二项是放在“其他”一项议程内讨论的。此次讨论的各问题，都是选举大会中选民的提案交乡苏讨论者。

二　检查制度

两次代表会议之中，一次是讨论问题的，另一次是检查工作的。

每次检查工作的会议之前，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所属代表开检查会，由值日代表以其结果在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报告后，讨论未曾做到的及做得不好的如何做到及改正。

此办法开始于榔木乡，长冈从榔木划出之后采用这个办法，后来杨澄乡也采用了。最近区苏召集了一个全区工作检查会议，要各乡都采用。

三　值日代表

各村代表数：

长冈村，五百多人（分田时人数），十四个代表。

塘背村，四百九十多人，十四个代表。

新溪村，三百多人，十三个代表。

泗网村，四百多人，十四个代表。

各村工作等第：长冈第一，塘背第二，新溪第三，泗网第四。

每村一个“值日代表”，轮流充当，每人每次值十天，九月起实行的。九月前是“代表主任”制，指定一人专任。行了两年后，以主任制有缺点，责归一人，余人不便练习工作，轮流则免此弊。但值日制（实是值旬）也有缺点，代表弱的不能领导一村。

四　常委会

苏维埃成立以来即有常委会。

主席、副主席、文书、中共支书、少共支书，共五人。必要时，值日代表参加。

五　代表领导居民

每个代表管居民二十几人至五十几人不等，如长冈村的代表李求应，他就是管五十多人的。

每个代表手中有一个居民册，册上分为男成年、女成年，男少队（可当长夫）、女少队（可当短夫），男儿童、女儿童。男成年中

又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长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女成年中也分为在赤卫军的（可当短夫）与不在赤卫军的（可优待红属）。

六　代表的变动

没有新划行政区时的榔木乡（七村，三千人），去年十一月选举代表七十多人，候补代表十一人，共八十多人。其中女代表十六个，男代表六十多个。到今年十一月一日改选时，原选男代表只剩下五个，多数当红军去了，少数调动了工作，红五月一次就去了二十九个。每一代表去时，先天召集所管群众选举一人，名曰“代理代表”。

七　代表的政治表现

最好的百分之六十。

中等的百分之三十五。

最差的百分之五（四个）。

这四个最差的是两男两女，很笨，又不积极，十次会只到四次，到了也不听事，更不发言。对群众态度“粗”，群众不喜欢这四人。七月把他们改选了。

八　女代表

十六个中：

最好的八个，寻工作做，又做得好。

中等的六个，不知寻工作做，交给工作就做，做不很好，要人帮助。

最差的两个，交给工作也不做。

长冈乡代表会议有许多好的创造，如常委会、值日代表、代表领导居民、检查制度等，都是别地可学习的。但常委会应改为主席团（大乡七人，小乡五人）；值日代表应改为代表主任，择最好的代表一个月或两个月一任，十天一换太频繁了。会议讨论的问题也很实际，但那个空洞的五条议事日程应取消，为什么不把那张开列了具体问题的单子贴出来呢？长冈乡的检查制度是很好的，工作的完全执行与争取速度，依靠这种办法。最坏的代表应早些撤换，八个月后才改选，太迟了。代表调动了工作，即刻补选是对的，但不应称为“代理代表”。

此次选举

一　选举委员会

九人：中共支书、中共妇女干事、雇农支部长[1]、手工支部长、贫农团主任及另一人、大队长、乡代表二人。支书为主任。九月组织的。

县苏原定九月底选举，两次改期，第二次决定十一月初。

---

[1] 雇农支部，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内赤色工会的一种基层组织，其负责人称支部长。

二　选举宣传

讲过去阶级未分清楚，现分清了，故要选举。还讲了为打破“围剿”，为检阅工作使之更进步，故要选举。

三　选民登记

四村各造册，由代表负责登记所管居民，交于选举委员会发榜公布：有选举权的一张，十六岁以下无选举权的一张，地主富农等无选举权的一张，前二张红，后一张白。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这样的三张。选民册九月本已造好，但把工人家属不算作工人成分，上月改正过来，重新公布。对于工、农选举代表标准的分别，群众中有生疑问者。正确了解“工人领导”这个问题[1]的，全乡不足十分之一。

---

[1] 1965年毛泽东对这里的“工人领导”问题写了一个批注，注文是：“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工人，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父等，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他们因为不能不为农业服务，出外当红军、脱产做政府工作的也较少。除造纸业有几人至十几人的工场手工业外，其余都是个体工人，自有工具，有些还是半农半工的人；土地改革中，工人怕失业，分了一些土地，他们大体相当于贫农，所以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反而觉得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自己有失业、半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只是因为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要在乡村中及在落后的小城镇中（那里只有手工业，没有机器工业），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工农双方都不理解这个大道理，因而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这件事闹了多少年，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以后，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了，因为那时的领导路线改变了。”

四　选举单位

四村每村一选举单位，另一工人单位。

五　工作报告

分两天开选民会（十月十九、二十两天），第一天两个村，第二天两个村。

主席到长冈、塘背两村报告，分两天出席。副主席（支书兼）到新溪、泗网两村报告，也分两天。报告分军事动员、经济建设、其他工作，共三项。

报告后，选举候选名单，也曾提出要到会群众批评乡苏工作，但无批评者。

六　候选名单

十月十九日支部干事会开会，各村都有人到（共到十一人）。按照各村工农人数比例，拟定一张五十五人的名单，恰如应选代表之数。然后提交各村党的小组会、工会、贫农团去讨论，由各小组党员在作工作报告的选民大会上起来提议，经大会通过，省去了选委准备名单的手续。

名单公布，四村及乡苏门外各贴一张。

公布后三天即选举。

七　选举大会

时间：十一月四日。

工人在乡苏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余是病的，未到。农民分四村开会，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上午开会，选民进门签一“到”字于写好了自己名字的一张表上（表二十四格，县苏印发，写二十四个选民的名字）。一人守门，门外有小孩子看，也有进来的。地主富农知道没有份，无来者。

程序：选举委员报告，乡苏主席报告，区苏参加同志报告，问选民有意见没有（没有），依候选名单逐名介绍、表决（无否决者），讨论提案（有人提议全乡十六岁到四十五岁无疾病者全体上前线，多数通过。此外，如十一月八日代表会议所讨论的“军事”“经济”“堤路”各案，都是此次选举大会提议的）。

上午十时到齐开会，下午四时散会，“精神很好”。

八　代表的政治表现

五十五个代表中，最积极的三十六个，中等的十九个，最差的尚未发现。

各代表中，老代表连选连任占十分之六（三十多个），新当选的十分之四。

九　选举后的代表会议

选举后第二天（十一月五日）上午，开第一次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副主席、文书，选举出席区大会的代表（十人）。区苏有三个同志参加这次会。第四天（十一月八日），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选举大会的提案（见前）。

长冈乡此次选举的缺点：（1）宣传没有指出，苏维埃是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权，选举苏维埃代表是群众最重要的权利。（2）候选名单人数恰如应选人数，没有比应选人数增加一倍，因此群众对于候选名单没有批评。选举委员会在组织候选名单问题上没有起什么作用，只有党的活动。（3）工作报告会议上没有尽力发动群众对乡苏工作的批评。除了这些缺点之外，其余都是成功的。

乡苏下的委员会

以下是群众团体。

分村、乡两级。村五人，主任即为乡之委员。乡五人的多，因村有委员会，但七人、九人、十一人的也有。

一　扩大红军委员会

七人，内三人是代表。讨论“扩大”“优待”“慰劳”“欢迎”。

慰劳队（七人，有队长，内四人是代表，一男三女，其他三人

一男二女）挑着花生、豆子、蔬菜、草鞋去医院，去县城，有一次去黄陂小布，慰劳红军。

二　土地委员会

七人。九月查田运动时还开了几次会，对前月查出的三十六担田加以处理。后来没有开会了。

应改为农事试验场管理委员会，场内附设农产品展览所。

三　土地登记委员会

五人，每村一人，主任常驻。七月组织的，做了两个月，登记完毕，取消主任的伙食。

办法：到各村问各代表，登记起来。代表不晓得的，便到那家去问。八月不明表格内容，登记不完备，延长一个月，登记好了。

四　山林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管种植、保护。

种了些树，山坏，不发达，应种在河旁、路近、屋边。

私山如砍树多，要问过山林委员，少则不问，没有规定尺寸。

五　建设委员会

五人。指挥“水利”“桥梁”两委员会。

六　水利委员会

五人，主任外，每村一人。

七　桥梁委员会

五人。管桥路之修理。应称桥路委员会。

八　国有财产委员会

五人。虽有，不了解做什么工作。

九　仓库保管委员会

三人。管公债谷及红军公田谷之保存。

备荒仓亦归它管，将没收的三十六担田的谷拿来备荒，共十多担。

十　没收委员会

三人。管罚款、捐款。

九月起罚地主九元，捐富农二百二十五元（十一家，多的捐四十余元，少的十元）。

过去把富农田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一概没收了，只分了些坏田、破屋给他们，没有分山。现富农耕牛、农具需向人租。富农的现款过去“罚”的也有，现在“罚”的也有，无所谓捐。现在富农家况比雇农差。

（应该指出：长冈乡对富农的政策是错误的。）

十一　查田委员会

九人。现没有了。

十二　教育委员会

九人。

十三　卫生委员会

五人。四月组织的。

十四　防空防毒委员会

五人。十月组织的。开了四五次会。

十五　筹备委员会

为开纪念会而设。

长冈乡的村委员会（许多的委员会在村都有），使苏维埃联结了更广大的群众，这是苏维埃工作发展到高度时的很好的创造。因为村有了五人的委员会，乡的委员会许多也只要五个人就行了，而乡的每个委员会的五个人，其中四个就是四个村委员会的主任，这样把工作组成了网，对于乡代表会议的工作的帮助是极大的。但长冈乡同志把这些委员会看作如同工会、贫农团等一样的群众团体，而不知其是苏维埃组织的一部分，这是不妥当的。其中建设委员会可取消。土地委员会在兴国这种土地斗争深入了的地方，应改为农事试验场委员会。此外应增加“粮食”“户口”“工农检察”“赤色戒严”等几个委员会。这些，在中央政府颁布的地方苏维埃组织法上面，已经规定了。

地方部队

一　编制

（一）男赤卫军[1]一排

二十四岁至四十五岁。此年龄内的男子，全乡共六十六人，除主席、文书两人及重病残废等未编入的二十人外，全部编入，计四十六人。

排长、副排长各一，班长、副班长各六。旗一面。

（二）女赤卫军一连

年龄同前。此年龄内女子，全乡共二百四十六人（超过男子二倍多），除病残的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共二百二十人。

连长、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各一，排长、副排长各三，班长、副班长各九，均女子。旗一面。

（三）少队[2]一大队

男女合编。十六至二十三岁的，全乡男二十一名，女八十名（四倍于男），共一百零一名，除病残（风脚等）十五名未编入外，一律编入，共八十六名。

大队长、副大队长各一。下分男的一排，女的两排，各有排长、副排长。

---

[1] 赤卫军，即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中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

[2] 少队，指少年先锋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不脱离生产。

二　训练

（一）排操

村为单位，每月两次，赤、少分开，男女合操。

教练人：长冈女副连长，塘背女连长，少队的是一个女子、三个男子。操目：立正，稍息，左右转，插当子，正步，跑步（女子少），散兵，野外（三四里远）。

武器：多数梭镖，少数木枪。

政治课：先操后讲，讲者政治指导员。讲革命形势、帝国主义、赤军任务等，无一定教材，“随便讲一下子”。

时间：下午，大约二时至六时，操二点半，讲一点半。

到操：平均能到十分之七。

（二）连操

乡为单位，每月十五日一次。

操目：各排操法，看哪排好，检阅排操的成绩。

政治课：操完，指导员讲政治形势。

时间：下午四个钟头。现冬天天冷，又较闲，改上午。

三　勤务

（一）运输工作

男子当长夫（四十五岁以上未编入赤卫军的则当短夫）。

女子当短夫（挑出一部分去城内、高兴、茶岭等处），还有救护（挑出一部分组织救护排，准备着，无工作）及洗衣（组织洗衣队，

每村挑出十多名，无小孩累赘的，去筲箕窝的补充师及教导队洗了好几次，去茶岭洗了两三次）的勤务。

（二）晚上放哨

长冈、塘背、泗网共三个哨所，每夜一班，五人或六人一班，赤、少各派几人，轮流担任，班长或副班长负责。一人站哨，余人睡觉。问口令（答“老百姓”，讲出自己的名字，去何地，做何事，其实群众并不知口令），查路条（别乡过路的），未曾捉到什么坏人。

（三）白天检查

三个人负一天责任，一个赤军，一个少队，一个童团。有人过，一个看路条（童团），一个盘问他（赤军或少队）。必要时送信。塘背哨所曾捉到四五个逃兵，送区。“老百姓”捉到一个无路条的（当他走山上小路过时），别县人，凶得很，疑是侦探，送县。

（四）防空

本乡防空防毒委员会指导群众防空，注意下列各事：

飞机来了不要乱跑。

挖防空洞，可以几家合挖一个，在做，尚未做好。

遇毒瓦斯用手巾封鼻。演习野营的回来说，用木炭屑装巾封鼻。

每村一个号炮所，都设好了。每所两个专人负责，一人外出必一人在家，司放号炮。

一切青年壮年的劳动群众都应组织到赤卫军或少先队中去，并且加以好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一方面保卫地方，一方面准备上前线，这是苏维埃在国内战争中的重要任务。长冈乡在这一个方面也是成功的。

群众生活

一　今年碰着饥荒

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　明年则不怕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得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　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又有些木油。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　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七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群众生活

一　今年碰着饥荒

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　明年则不怕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得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　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又有些木油。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　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七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群众生活

一　今年碰着饥荒

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　明年则不怕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得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　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又有些木油。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　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七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群众生活

一　今年碰着饥荒

今春莳田前，竟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要向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地方办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平均整差一个月粮，每人每年需谷五担，月计四斗。全乡一千五百人的百分之八十为一千二百人，一个月粮计四百八十担，都从远地办来解决了，无饿饭的。

二　明年则不怕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害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番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三）去年秋收后群众曾把谷子大批卖给商人，每担价仅二千八百文，不足一元，固然需要钱用，抓紧些少粜出点是可以的，但没有注意到，今年开了全县的会，议定非四元不卖给商人，并应少卖；（四）去年秋收后供猪供鸡鸭浪费许多，今年供得少了；（五）去年一、二两期公债，买两元需费去二担半谷，今年经济建设公债，买十元还只需交谷二担——因此可保证明春不荒。

三　油有多余

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梓岭，又有些木油。油不少，还有多余。

四　豆子可以换盐，但食盐量大减

今年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几全受水害），豆价也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其余百分之四十的盐，可以多余的油（油多百分之三十）去交换。

老少平均每人每天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盐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

五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二倍

供猪的人家约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余八元。但在暴动前平均每年每家只能买进猪肉约十元。以阶级分：暴动前中农买进猪肉约十二元，贫农约六元，工人约四元，现在差不多都有十二元（其中一部分人无此数）。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多少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六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七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

柴火本地不缺。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八　衣增一倍

衣服一切算在内，平均每人每年需新制一套单衣裤。中农过去、现在无甚改变。贫农、工人则现在较过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现在制二元衣服，过去则只能制一元。

九　雇农的生活改良了

雇农全乡约二十二家，十分之六比最贫的贫农要好些了，因为分了东西。本乡地主只二家，没收了富农的（十二家）不少，从城市又分了好些来。十分之四则同于贫农。

十　中农尚留在原地位

一般说来，中农生活与过去差不多。（苏维埃应该注意中农生活的改良。）

十一　市价

（甲）农产：

谷——暴动前秋收后每担（九十斤）三元，暴动后一元，去年秋后一元，今春九元，今秋后三元，十一月四元七角。

花生——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三元，暴动后三元，去秋

后三元，今秋后三元五角。

番薯——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一千文，去秋后一千三百文，今秋后一千二百文。

豆子——暴动前秋后每担（一百斤）七元，去秋后十元五角，今秋后十二元。

猪——暴动前每斤六百五十文，去秋后九百文，今春七百五十文，今秋后八百六十文。

鸡——暴动前每斤七百五十文，去年九百文，今年一千二百文。

鸭——暴动前每斤五百文，去年七百文，今年七百五十文。

鸡蛋——暴动前每个二十五文，去年及今年均四十文。

鸭蛋——暴动前每个三十文，去年及今年均五十文。

柴——暴动前片柴每斤八文，去年十文，今年十二文。

木油——暴动前每斤六百文（每元五斤半），去年九百二十文（每元三斤半），今春至秋每三斤一元，十一月二斤十二两一元，因能出口。

花生油——暴动前每七斤一元，去年三斤半一元，今年十一月三斤一元。

小柑子——暴动前每二十八斤一元，去年十九斤一元，今年十五斤一元。

（乙）外货：

盐——暴动前每七斤一元，一九三一年三月每一斤一元，去年每三斤半一元，今夏每一斤大洋一元，纸洋二元，十一月每一斤十二两大洋一元，每一斤四两纸洋一元。

布——暴动前中等蓝布每尺一百五十文，去年二百五十文，今春三百文，十一月三百八十文。

洋火——暴动前每盒四十文，去年七十文，今夏一百八十文，十一月九十文。

洋油——暴动前每斤五百三十文，去年一千一百二十文，今年一千六百文。

十二　群众的休息与劳动

每人每月平均约有五个整天（许多次会合计起来）的开会生活，即是他们很好的休息时间。因出外的多，乡间劳动力减少，群众的劳动强度还是同于暴动前，但劳动的意义不同了。

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

劳动力的调剂与耕牛问题

一　模范耕田队

四村各一队，共约七十人，红军家属有劳动力者组织之，每队一个队长。队下分小队，比如长冈村模范队二十多人，分三小队，按住所接近，有三人的，有七人的。每小队管其附近几家或十几家，经常注意使这些人家的生产弄好。今年八月割禾时组织的，作

用是调剂劳动力。

办法：劳动互助社帮红军家属耕田（不要工钱），模范队则帮群众耕田（要工钱）。比如某个互助社社员正要帮红属耕田，而他自己家里的田又正待耕，模范队便派人帮他耕，或者代替他帮红属耕田，由他出工钱与模范队员，这样来调剂劳动力。因此模范队须与互助社取得密切的联系。

二　劳动互助社

四村每村一个，除红属外，凡有劳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全乡社员三百多。

全乡人口中：

全劳动的百分之十（在全乡总人口中约占一百五十人）。

半劳动的百分之二十（约三百人）。

附带劳动的百分之三十五（约五百二十五人）。

无劳动的百分之三十（约四百五十人）。

前二项共约四百五十人，大部分加入互助社。

全乡出外的三百二十人（内二百二十六人当红军，九十四人做工作）中，除十几个人属于半劳动外，全部都是全劳动的，此数对于现留的全劳动一百五十人，为百分之六十八对三十二之比。劳动力的有组织的调剂，成为生产上的中心问题，因此群众热烈地欢迎劳动互助社。

互助社的工作是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均完全达到目的，红属的田一般耕得好。其办法如下：

优待红属：本乡红军家属，紧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二十五

个工，平时平均每家每月须帮助约十个工。群众劳力多的多帮助，少的少帮助，无的不帮，女人带了小孩子的也少帮。大概紧时全家有两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十三四个工，一个劳动力的须帮出六七个工，半个劳动力的帮一工两工做轻便工作。应该帮多而少帮了，则须算给工钱于多帮了的。比如紧时甲家每月本应帮红属七工但只帮了五工，乙家应帮七工而帮了九工，则甲家应算两个工的工钱给乙家。

社员互助：工数对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钱于多做了的。

帮助孤老：只要吃饭，不要工钱。

以村为单位全盘计划生产，调剂人工。

每个月底清算一次，找出工钱（拿钱的多，物品抵的少，都能找清）。

工价：今年割禾分三等，最高八百文（如打禾），其次六百四十文（如割禾、挑秆），最低三百二十文（如拿禾、点豆），七月间全乡社员大会议定的（此次到了上百人）。去年割禾工价，开头八百文，紧张时一千四百文为最高工价。

减低工资：雇农工会是赞成的，他们因为分了田更欠人工。劳动力多的也不反对，他们因为优待红属须帮工多。

互助社，委员五人，内主任、组织、宣传各一，受乡的秋收秋耕委员会指导。

劳动互助社在农业生产上伟大的作用，长冈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根据群众的意愿，以村为单位统筹生产，一切地方都可实行，特别在扩大红军数多的地方。必要时还可以乡为单位，甚至以区为单位统筹，上杭才溪区就是这样做的。耕田队可以合并到劳动互助

社，使组织上统一起来。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动员女子参加生产。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去了三百二十人，在乡四百一十三人，其中男子只八十七人，女子竟占三百二十六人（一与四之比），因此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地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三　犁牛合作社

九月间开始组织的，每村一个，刚在进行，尚未弄好，入社的不多。五个人的委员会。

平均百家中有牛二十五头，全乡共有牛百一十头。

一家二牛的无。

在有牛人家中，一家一牛的占百分之五十（小牛多，十几元一头的）。

二家一牛的，百分之十五。

三家一牛及四家一牛的，百分之三十。

五家以上共一牛的，百分之五（有七家共一牛的，大水牛）。

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全乡四百三十七家，无牛的约一百零九家。犁牛合作社尚未讨论如何解决。

办到了禁止杀牛，牛老牛病应杀的，报告乡苏派人去看，准杀才杀，无敢故意弄死者。

在现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耕牛的作用仅仅次于人工。根据瑞金石水乡（无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乡（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买牛。办法是在自愿原则下（经过社员大会同意），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例如，长冈乡每人分田六担二斗，无牛的一百零九家，平均每家四人，共四百三十六人，分田共二千七百零三担，每担三升得谷八十一担，每担五元得钱四百零五元，以二十元买一牛计，得二十头。每牛耕田八十担，共可耕田一千六百担，对于二千七百零三担，已解决了一大半，明年再出两升，即可完全解决。而租牛每年每担谷田即须出牛租五升。这一办法是石水乡群众提出来的，他们已在实行。我们希望各地都能实行。这不但解决贫苦农民一大困难，对于增加农业生产更有大的意义。

公债的推销

公债发行委员会五人，每村另有一个主任。

乡主席到县到区开会认销五千元，后又加认四百五十六元，共五千四百五十六元。

乡主席回来召集代表会议，由各村代表承认本村的销数。

各村值日代表召集本村群众开大会。事先各代表及宣传队向群众作个别的宣传，届时领导群众来开会，讲明购买公债的意义。当场各代表及各团体的负责人首先认购，群众跟着认购，席上登记起来。

没有销完。

各代表及宣传队，对那些未买的及买得太少的，按家按户作宣传。“今年这样多”，有些群众不了解，便把去年谷价（买两元公债要拿出谷子两担半）、今年公债（买十元公债还只要拿出两担）比给他们听，把合作社利益（集了股的分两次红就过了股金的头，不曾集股的无份）讲给他们听，把敌人封锁与经济建设的意义讲给他们听。

再开全村大会，加销一部，尚未销完。

再作宣传。

开第三次全村大会，又加销一部，仍未销完，但所余不多了。

再作宣传。

开第四次全村大会，全部销完。

共销五千四百五十六元，全乡一千四百六十五人，平均每人买了三元七角多。最多的买了四十五元（一家）。买三十元的五十六家，二十元的很多。一二元的极少，只十家左右。五角的无。孤老等不买的也有十几家。“群众完全满意。”从开始至销完为时十五天。

长冈乡工作的特点，在于能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推销公债不过一例。长冈乡五千余元公债的推销，全是在会场认购，全不按家去销，全是宣传鼓动，全不强迫摊派，经过四次个别宣传，四次全村大会，从开始至销完共只有十五天。别乡则有销数比长冈乡少至五倍六倍，反而在强迫摊派，销了两三个月还不能结束者，拿了同长冈乡对照，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合作社运动

起始于一九三一年三次战争[1]结束后榔木乡（长冈乡那时属于榔木）的顾岭村。本村群众以每股五角为单位，集了八十多元，开始做生意，有成绩。一九三二年一月，改为榔木乡合作社，没有增股，货比市上便宜，得到群众欢迎。到九月，做了三百块钱生意，赚了钱。去年九月，区社成立，全区集了八百股（每股五角），把榔木乡社归并于区。

职员：村社时代，社长（李奎应，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社长）、采办（李其尚，后历任乡社、区社、县社的采办）、会计兼营业（王仁森，后任乡社、区社的会计）各一人，吃社内饭，无工钱。改乡社时，决定每人月给工钱三元，但三人不受。

货从茅店、直下办来。

村社、乡社时，社员及红属买货，每千文减五十，即百分之五。非社员不减，但照市价实际上便宜些，一串钱货便宜二十文上下，即百分之二。区社今年十一月改为盐布每串钱减二十（因盐布贵，赚钱少），他货仍减五十，非社员照市价，此时一百元生意约赚二元。

区社去年九月至今年三月（半年），四百多元本钱赚了六百多元，以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文化教育费（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笔），百分之三十分红。为了增发红利，鼓励社员，临时将教育费取消（以后应该恢复），共分红百分之四十，每人分了一串钱。分红

---

[1] 指红军第一方面军于1931年7月至9月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时，清算账目，悬榜公告。分红后，增加了许多股本，今年七月时，共有二千股一千元了。十一月，第二次分红，每股分五角，实发三角，二角作为增股。决定改股金单位为一元，每人不得超过十股。

管理委员会十一人，审查委员会七人。

现定乡设支社。长冈支社集了二百六十多股（每股一元），在开始营业中。

县总社八月成立，也在开始营业中。

顾岭村合作社为全县合作社首创，又办得最好，有模范合作社之称。

本乡粮食合作社集了二百二十多股（每股一元），谷子抵交的多（每担五元），集中在长冈村一个仓里，还未开始营业，组织了管理委员会。

每个乡每个区都要学习长冈乡与上社区的消费合作社！

文化运动

一　小学

列宁小学，四个，每村一个，各有校长、教员。

学生：长冈五十五，塘背五十三，新溪三十三，泗网四十六，共一百八十七，占全乡学龄儿童总数百分之六十五。余百分之三十五，不是父母不要他们去，他们自己好玩不肯去，学生去“捉”，“捉”来有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罚饿饭的也有个把——那是“又大又蛮”的。学生之间自己发动斗争，“精神很好”。那些顽皮小孩

来读的时间少，不来读的时间多，父母送他们出门，“他们溜到山上打仗去了”。（惩罚的方法有些是不适当的。）

均分甲乙丙三班。

学生年龄，七岁至十三岁，也有十四岁十五岁的，则因生产忙，只读半天。

远的带中饭，近的回家吃。

书纸笔墨，学生自备。

教员尽义务，但劳动互助社帮他耕田，等于一个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教员自己不肯说，代表会议决定优待。（乡苏常驻人有优待，代表及群众团体负责人不脱离生产的无优待）合富、秀水两乡，则由学生斗米（斗，集合之意）给老师吃，月斗两斗米。杨澄乡又是一个办法：比如某村有一小学，乡苏准许群众中推出两个人（要是五十岁以上不能当长夫的），去开长担（开担即挑担，开长担即经常挑担）做小生意，赚了钱供给老师伙食，其数照乡苏办事人例（乡苏每日九分，老师也九分）。乡苏则对此两人不派一切勤务，由这两人自愿承认。

教员多是“文墨不深”的。

二　夜学

全乡九个：长冈三，塘背二，新溪一，泗网三。

学生平均每校约三十二人，九校共约三百。男约百分之三十，女约百分之七十。全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壮年共四百一十三人，大多数进了夜学，四十五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群众非常欢迎，说“夜学顶好”。

各校均分甲乙丙三班。

灯火，少数是自己带去，四人五人共一盏灯。多数就夜学设备的一盏木油灯，十多二十人共在这盏灯下读，每月每人出二个或三个铜片。

书纸笔墨自备。

教材：

甲班，读报，算术。

乙班，成年读本。

丙班，儿童读本。

每校一校长，一教员。校长可不识字，只要热心，学生没有来时，“请校长来指示”。校长也来读书。校长“老同志”多。九个夜学校长，女的占五个。教员无女子。九个夜学教员，七个是乡苏代表，都是尽义务的。

三　识字班

小孩子累赘的，“更多年纪的”，家里人太少离夜学又远的，这些人编入识字班。

编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为一组，举一组长——稍识几个字的。组长多属夜学学生。

教法：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桌椅板凳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口头夸奖。字，组长有不晓得写的，问夜学老师，夜学老师有不晓得的，问日学

老师。

用此办法，过去不识字的，现在都识得四五十个字了，少数能识七八十个。

此办法今夏开始实行，识字班的组织则去年就有了。

识字牌：每村一块，钉在路旁屋壁。牌上绘图写字，两天三天一换，一天一换或四天五天一换间或也有的。每次，少的两个字，多的三个字，没有不绘图的。日学老师负责。此法效大。

四　俱乐部

全乡俱乐部四个，每村一个。

每个俱乐部下，有“体育”“墙报”“晚会”等很多的委员会。

每村一个墙报，放在列宁小学。十篇文章中列小学生约占八篇，群众占两篇。

俱乐部都有新戏。

每个乡苏维埃都要学习长冈乡的文化教育工作！

卫生运动

一　办法

将居民编为卫生班，按住所接近，四五家，七八家，十一二家为一班，七八家一班的多，有班长。

虽规定五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有。要

督促，“不督促记不到，工夫又多”。

二　工作

（一）扫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三）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生运动。

三　成绩

四月起，头一次“蛮好”。随即松懈下去，五六两月全没做。乡苏发现了，批评了卫生委员会主任，重新召集卫生委员会（乡卫生委员会外，还有各村的卫生委员会，乡、村均五人）开会，号召各村竞赛，“看哪村做得较好”。七月督促实行，四个月来大有成绩，比前清洁多了。

四　舆论

“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员真正顾乐（爱惜的意思）我们！”但也有少数人说：“开窗户，没有病死要吹死！”还需要作深入的宣传。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

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社会救济

互济会乡委员会五人（内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会员六百一十一。全乡只有约二十家没有加入互济会，这些多属孤老。

月费一铜片，无不交的。

工作：

（一）慰劳红军。

（二）募捐救济难民，援助反帝。今年有过二次。一次是七十多个信丰难民到兴国城（榔木乡时），共捐了二十多串。一次是援助东北义勇军（也是榔木乡时，那时人口二千九百，会员约八百），捐了四十多串。捐数五个铜片起，一百的、二百的、一串的都有。一百的多数，约占会员百分之六十。五个铜片的，一串的，各只几人。

（三）乡里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募捐救济。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

（四）救济饥荒。今夏榔木乡有三四个人饿饭（过去乞丐，现还很穷），请求区互济会发钱发米救济，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

（五）救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无饿饭的），今夏一次募了十一串多钱。又四月间，由合作社借出本钱，给群众中

自愿的几个人，拿去办米，挑往桥头、江背洞发卖，赚了百多串钱，接济红属中病困者。经手的群众，除赚食外，一点多的不要。

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工作，是值得赞扬的。长冈乡是在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妇女

女工农妇代表会每村一个主任。由各个村的主任及一个妇女指导员组成乡的女工农妇代表会的主席团。全乡代表四十三人，长冈十二，塘背十一，新溪九，泗网十一。去年十一月开始组织的，今年三月改选一次，九月第三次选举。各村七天一次会，都按期开，每次仅个把人缺席（小孩累赘等原因）。代表分开负责，每个管五家至十家，管六七家的最多。

第一次成立时的选举，是由乡苏代表负责，村为单位，召集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劳动妇女开会。此次到会者各村平均十分之六。按住所接近，几家（不等）选一代表。这次各村选的代表数，较现时略少。这时，妇女们还不了解妇女代表会的作用，不十分踊跃，代表选出后，少数亦不大积极。代表会无主席团，只一主任，村则主任亦无。

今年三月，第二次选举。办法同前，但由妇女主任主持，各村的乡苏代表只参加帮助。规定了各妇女代表负责管辖的家数。规定

乡组织主席团，村设主任。

九月，第三次选举。改变办法，不开全村妇女大会，由各妇女代表召集所属各家妇女开会选举，全村的乡苏代表仍然参加帮助。

第一第二两次选举会，仅选举代表，未讨论问题。第三次讨论了“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属”“妇女学习犁耙”“妇女拿银器买公债”等问题。七天一次的代表会上讨论的问题，曾讨论到婚姻问题，说“要正确的自由，不要流氓的自由，不要一讲口就离婚”。在今年选举运动时，讨论了妇女的候选名单，但其他妇女切身问题，如“妇女病问题”“小孩子问题”“妇女教育问题”等，没有讨论。

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

丈夫骂老婆的少，老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应该彼此都不骂。）

完全不打小孩子的，现在还没有，但打的时候少了。（应该完全不打。）

小孩子现在也聪明得多了，如父母打骂，过去反口的少，现在多起来了。（父母不打骂，小孩子也不会反口。）

约百分之一的妇女，暴动后四年半中结过三次婚。秘密恋爱的，暴动前约占百分之五十，暴动后减少至百分之十，今年更减少了。这是因为，一分了田，二离婚结婚自由，三则革命工作忙。

衣服改短了，去掉了“花边”。发，除老婆太外，一律剪掉了，老婆太也有剪发的。老妇未剪的约占女子百分之二十。

群众中，过去（暴动前）互相打骂的事，时有发生，讲口的更不少。现在，相打绝迹，讲口也减少了。过去，讲口无人解释，即使有人劝解，“心里总不易散”。现在一讲口，便有代表出来解释，

“心里即刻散了”。现在讲口，多是那些年纪较老的同志们，他们开会较少，对革命工作不大明了，要他们去优待红军家属，间或讲起口来，但明了的积极的占多数（百分之七十），少数不明了的，老婆太为多，“她们总是不肯去开会”。

去年以来，老婆太敬神（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应该拿说服代替干涉）但有些老婆太，虽不敢公开敬神，心里还是信神，这些人多属没有儿子的。

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这里女工农妇代表会的领导与推动，是紧要的关节。女工农妇代表会，首先应该抓紧妇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跟着这些问题的动员，联系到一切政治的动员。在这一点上，许多地方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就是长冈乡也还缺乏充分注意。每个乡苏维埃，都应该把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的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上。

儿童

童团委员会，乡五人，一个书记。村的，一个主任。

七岁至十五岁的入儿童团，百分之八十加入了，未加入的多是七岁（因小）及十五岁的（因入了少队，本应十六岁才入少队，但有些“肯长”的加入得早），未加入的，女孩较多。

工作：（一）做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的宣传（宣传三四次不去才笑他，本乡历来无耻笑队）。（二）竞赛捡狗粪入“肥料所”，铲草皮入“肥料屋”。（三）交月费一铜片，慰劳红军。（四）节省运动——少吃果子，多买公债，五角、一元、二元、三元的都有，买五角的多，百分之六十的儿童买了公债。（五）做游戏，下操，到操场上练习打仗，逢星期日一次，订立了课目。（六）最大多数入了列宁学校。儿童团的纪律严得很，有些顽皮孩子不服父母，也不服老师，只服儿童团的纪律，罚扫地，罚禁闭，总是“服理服输”。（应该多用说服，少用惩罚。）

过去九岁十岁的小孩，为地主富农看牛，现在没有了。过去，儿童不论在家、帮人，每天劳动时间总在十小时以上，同于一个大人，可说全无休息与受教育的时间。现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戏，只早晨约一点半钟看牛或做别事。农忙时，则劳动时间较多些——向老师请假，助父母作工。过去受父母打骂，现在受打骂的很少了。

反帝

反帝拥苏同盟，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

村无委员会，有一主任。

下分小组。

全乡盟员五百五十八人。

月费一铜片，完全收齐，无不交的。

经常地作宣传，晓得“反帝”“拥苏”大意的百分之三十（七岁以上）。

有些慰劳品送给红军。

许多地方的群众甚至工作人员以为，反帝即是反国民党、反土豪，拥苏即是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反帝拥苏同盟的领导机关并没有去做深入的切实的宣传解释工作。长冈乡在这方面有了成绩，但也还要更进一步。

工人

木匠：失业的十分之三。十工只有七工做。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裁缝：大部失业，工资每日四百。

泥匠：失业十分之三，工资每日五百五十。

篾匠：失业十分之一，工资每日四百。

理发：增加十分之一。剃头的，每人一年出谷八升。

零工：工资平时每天四百（二毛），紧时八百（四毛）。

贫农团

乡的委员会，三人（主任、宣传、组织）。村的委员会，五人。今年七月，会员二百七十一，十一月，增至三百八十六。

过去，“有事就唤贫农团”，但没有注意健全其组织。

今年查田运动中（七月），把组织整理了，村设了委员会，发展

了会员。

七月前，甚至两个月不开一次会，七月后，村贫农团五天、十天或半月开一次会，看工作需要。乡的每月一次。讨论的问题：“查阶级”“会员每人节省一毛二”“发展会员”“健全组织”“发展生产”“罚款捐款”。关于扩大红军、优待红属、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则只向会员作报告，乡代表会对这些工作有决议时，提到贫农团会上来“发表”，没有什么特别讨论。(应该讨论。)

不收月费。

村下分小组。

在一切查田运动没有深入的地方，贫农团特别重要，乡苏维埃要负领导之责。贫农团，村应有委员会，应以村为单位开会，乡为单位的会可减少。长冈乡的办法是对的。

宣传队

乡一宣传中队，七人，一个队长。每村一宣传小队，大村（长冈、塘背）五人，小村（新溪、泗网）三人，有小队长。为扩大红军、经济建设、纪念节等作宣传。

宣传的方式：（一）个别宣传，此项最多。（二）值日代表召集全村群众讨论工作时去作宣传。（三）区县开纪念节大会时向群众宣传，也向别乡别区的“队伍”作宣传。

乡苏七天召集队长、小队长共五人开“宣传会”一次。区苏召集全区宣传队长开会，每月至少两次，有三次的。每次时间至少四点钟，会毕回家吃饭。

全乡队长、队员二十三人，女的占十分之六，均“较会讲的”，不一定要识字。

不更换，调动工作时才补人。专门研究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乌吗（怎样）能使群众更了解”。

今年二月起组织的。

突击队

乡苏下五人，一队长。村则长冈、塘背、新溪有突击队，泗网没有。红军老婆组织的。

哪一村工作做不动，别一村的突击队就去检查帮助，把别村如何做动的方法告诉他们。乡的也一样，看哪一村做不动，就去检查帮助。

比宣传队工作少，不显大作用。

乡苏召集他们开了三四次会。

八月起组织的。

宣传队与突击队的办法是好的，各乡都可以组织。

革命竞赛

竞赛的办法，从今年春耕运动做起的，比赛“较早”“较好”“无荒田”三项。这次是全区各乡竞赛，各乡主席在区苏开会决定的。本乡则各村竞赛，召集各村值日代表开会订定。每村由各个代表竞赛，值日代表召集各代表开会订定。没有要各家订立竞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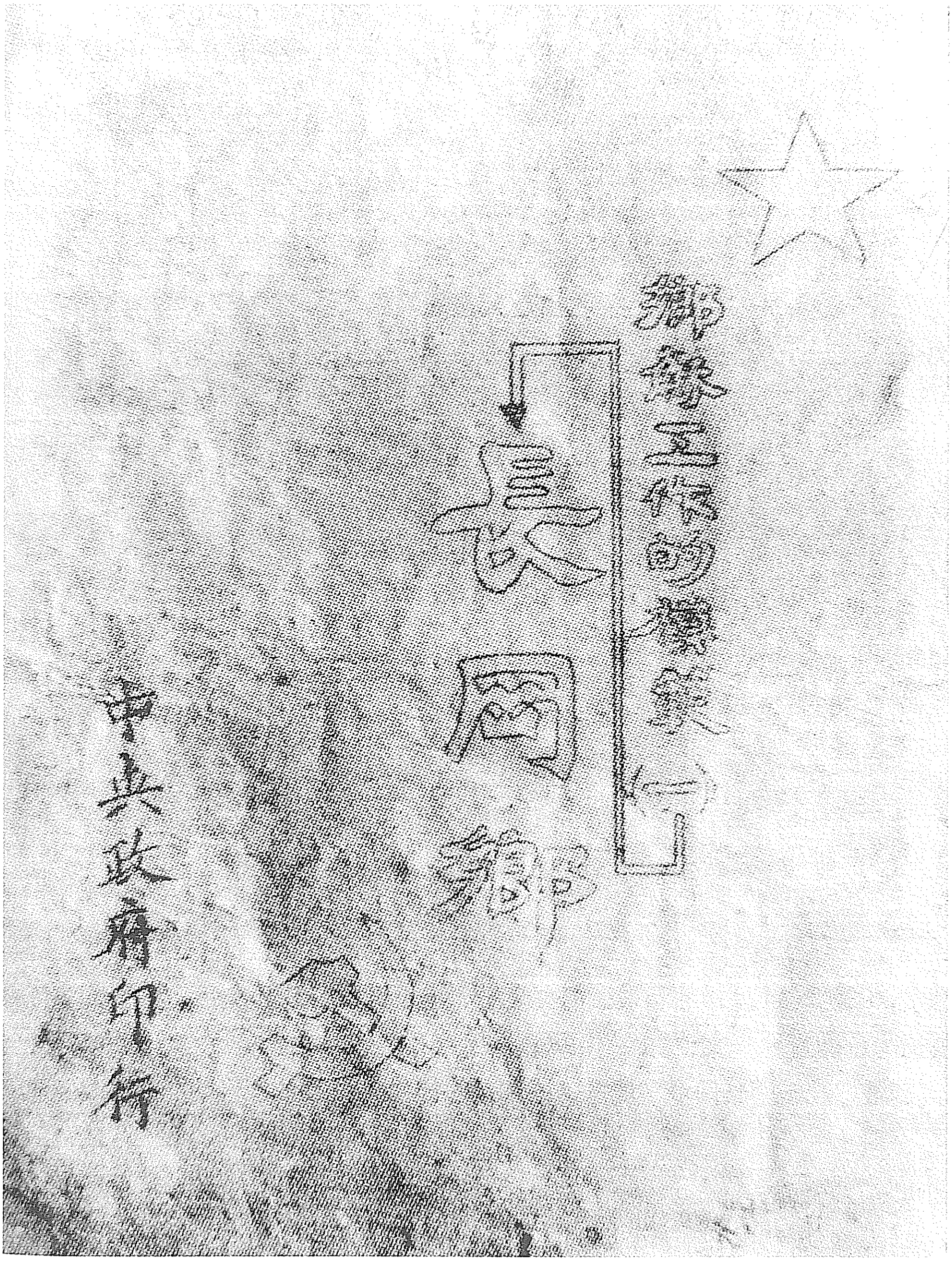
可订立）。条约上写明如下各项：竞赛项目的最高标准，某村与某村竞赛，奖品的种类及数目（分为第一等，红旗；第二等，信纸百张；第三等，信纸五十张），竞赛的时间，负责人与公证人。竞赛期内，乡代表会开了检阅会议，由值日代表报告情形，知道各村做到了什么程度。会后主席等（即公证人）到各村去巡视，看值日代表的报告是否“打花”（扯谎）。

四月间，另外还有一次竞赛，目标是“军事动员”，分“扩大红军”“慰劳工作”“优待红属”三项。（无“归队运动”，因其时无开小差的，五月间加入此项。）

五月二十日，乡代表会开“春耕”“军事”两项竞赛的总结会，新溪夺得红旗，长冈得信纸百张，塘背得五十，泗网无所得。

七月订立“军事”“经济”两项竞赛，现还未作总结，但已知长冈村最好。

为了争取工作的速度，革命竞赛的办法应该在每个乡里实行起来。乡苏是竞赛的领导者，但乡苏也只是“领导者”，因为每一竞赛，主要是群众的竞赛，不只是各村代表之间的竞赛。因此每一竞赛条约的订立，应召集村为单位的群众大会作报告，得到群众的承认，并把竞赛条约张贴出来。在生产问题等项的竞赛上，还应召集每个代表领导下的几十个居民开会作报告，得到他们的承认。一时期内检查成绩的结果，也应该召集这样的会作报告，来推动工作的前进。一切竞赛没有成绩的，都是由于只把竞赛条约放在少数人的袋子里，没有推动广大的群众。每一次竞赛，都要作出总结，并且给奖。长冈乡的两次竞赛，对于这些都大体上做到了，所以他们得到了实际的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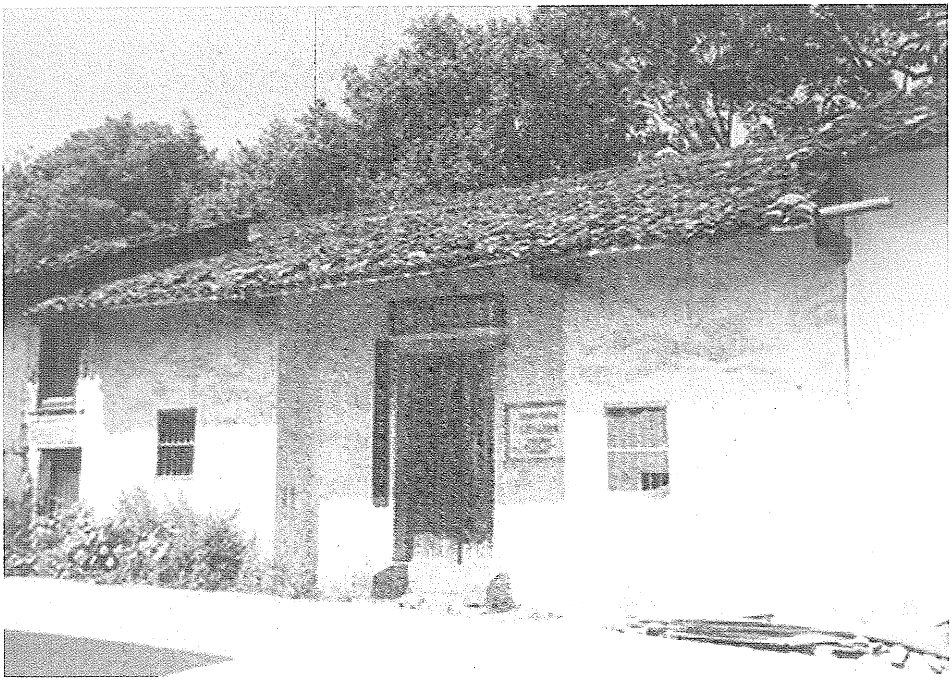


鄉蘇工作的模範（一）

長岡鄉

中央政府印行

1933年11月，毛泽东为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整理出《长冈乡调查》一文。图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印制的单行本。



1933年11月，毛泽东率中央政府调查团到长冈乡调查后，整理出著名的《长冈乡调查》一文，并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苏大会上发出了在全国创造“几千个长冈乡”的号召。图为长冈乡调查旧址。

赠彭德怀

（1933年11月）

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1]

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2]

---

[1] 这段话用铅笔写在寄给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的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上。

[2] 这段话写在毛泽东寄给彭德怀的列宁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上。

才溪乡调查[1]

（1933年11月）

行政区划

中央苏区有名的上下才溪，属于福建上杭县的才溪区。才溪区自新划行政区后分为下列八个乡：上才溪、下才溪、岭保、同康、曾坑、文才、大地、下王。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

分为四村：雷屋（人口约六百）、洋下（五百）、中兴（五百）、上屋（六百）。

乡苏常驻人：主席、文书。

因是大乡，文书常驻，帮助乡苏工作。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

---

[1]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曾将这个调查报告的油印单行本发给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在正文前面毛泽东注有：

“才溪乡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卓兴华　上才溪主席，任职半年。

阙绍光　上才溪文书，任职半年。

王得清　下才溪代表，任职半年。

下面的材料是从三个同志的口头报告收集的。”

分为四村：樟坑（人口约六百）、下坑（五百）、发坑（八百）、孙屋（七百）。

代表会议

一　代表数

上才溪：前五十三个代表。此次选举，工人家属算入工人成分，增至七十五个代表（新增二十二，本乡泥水工人多）。原五十三个代表中，工人十三人，加新增二十二人，共有工人代表三十五人，余四十人是农民代表。全乡工人一百八十三人，属于一百六十三家，连家属平均每家以三人计，共四百八十九人，每十三人举一代表，故举代表如上数。

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为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了。

二　代表团

代表在各村，每村有十多个的，有二十多个的，四村每村代表各自开会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的“代表团”，故代表团是四人。比较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团开会解决。每次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团开会，预先准备（或在上午，或在先天），代表会约五天开会一次。此办法，一九三一年开始的。（代表团应改称代表主任。）

三　代表与居民的关系

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五十多人的为最多。工人代表管辖少些，农民代表管辖多些。此办法，一九三二年开始的。

四　代表的政治表现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

最积极的，二十多个。

中等的，二十多个。

最差的，一个。

这个最差的代表，十次会只到三次，忙于找自己的生活，分配工作不上紧做，批评了多回，被代表会开除。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没有最差的。

五　代表的调动与补选

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去年十一月选举的。到今年十月十四日再选举时，当红军的二十七人（去年十一月一回去的），调动工作的十一人，共去了三十八人，剩下十五人。以村开选民大会补选，去的是工人补选工人，农民补选农民。有候补代表，则以候补代表充任。此补选会是去年十一月开的，后未开过。至今年十月再选举时，剩下四十二人，因陆续又调动了十一人。

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今年红五月，当红军的十一人，村为单

位开了一次补选大会。七月又有当红军的十五人，又开了一次补选大会。前后调动工作的十八人，以候补代表充任。

六　女代表

去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十六个，占百分之三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二十一个，也是百分之三十。补选以后，至今年十月选举时，上才溪五十三个代表中，女的三十三个，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七十三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也是百分之六十。此次选举，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女的四十三个，仍然是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女的五十九个，则占了百分之六十五。

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乡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组织与领导成为极应注意的问题。将乡的全境划分为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

此次选举

一、选举委员会领导选举。

二、居民选民登记，发榜三张。

三、候选名单，下才溪一百六十多人（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儿童们也在注。注“好”“不好”等字的多，注“同意”或“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着“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业问题解决得不好。

四、乡为单位开选民大会，乡苏报告工作。

五、工人全乡为一单位，农民村为单位（四个）。

六、选举大会，选民到百分之八十。病的，放哨的，在合作社工作出外办货的，女子坐月的，共约百分之二十没有到。老人撑着棍子到会。

七、为着选举开的会很多：工会、贫农团、妇女会、互济会与反帝同盟合开会员大会，儿童团、少队都开了会，党团员会先开。有标语，有小册子。所以今年的选举宣传，比去年普及得多，大多数人都了解选举的意义。

去年，十六岁以下的吵选举权，以为他们当红军的不少，工作也做得多，为什么没有选举权？今年，他们了解是年龄的理由，不吵了。

宣传队到各村宣传，白天讲演，夜间演戏。

八、选举大会上鼓动买公债，下才溪在会场中一天买了一千五百多元，上才溪六百三十元。

大地乡选民大会中，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全乡赤卫军模范营两班中去了一班。

九、新干部的当选：上才溪七十五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五十三个，有二十一个再当选了，落选的三十二个，新当选的占五十四个。下才溪九十一个代表中，前任代表七十三个，有五十个再当选，落选的二十三个，新当选的占四十一个。

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在选举大会上发动选民提案交新选代表讨论，这一方面则没有什么表现。这一方面的模范，应该让给兴国的长冈乡。

乡苏下的委员会

乡苏下有许多的委员会。举数例于下：

“拥护红军”。委员上下才溪均五人。四村各一个委员会，委员也是各五人。

“优待红军家属”。上下才溪均五人，村亦五人。

“查田”。两乡均十一人，村无。

“选举”。两乡均七人，村无。

“土地”。上才溪十一人，下才溪七人，村无。

“劳动”。即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两乡均五人。村无委员会，有小组。

“山林”。上才溪七人，下才溪十一人。

“逃兵归队”。两乡均十二人。

没有“春耕”“夏耕”等委员会。只组织耕田队，五人为一小组，十人为一班，三十人为一中队，百人为一大队，上下才溪各有一个大队。耕田队主要为了优待红军家属。

乡苏维埃下许多委员会的组织及其领导，成为乡苏工作的重要一部分，在才溪乡再一次证明了。中央政府已经采纳各地的经验，规定到地方苏维埃组织法里面。那里规定乡的委员会可以组织经常的与临时的共二十余个，依照各地工作情况，可以适当地给以增减。市区苏维埃，则须适应城市的特点，组织若干不同于乡的委员会。这一制度的明确的统一的建立，将使苏维埃与民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将使一切苏维埃工作的执行得着雄厚的力量。一个问题，就是村亦应建立某些重要工作的委员会（各种有广大会员的民众团体，同样应建立他们的村的领导机关）。因为如果只有乡的委员会，在有一千人上下的广大居民的乡，是无法周密地进行工作的。许多村的委员会的建立，即可保证这一点。

扩大红军

八、九、十三个月。

上才溪：六十人，动员了两排模范营。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两三个因病没有归队。

下才溪：六十五人，模范营一次动员了五十二个人，另一次个别动员，去了十三人。

另归队的十一人，还有十四人未归队。

全区十二个乡（未划分前），八月十五日那一次，动员模范营二

百七十三人。新划区八个乡，共尚有未归队的五十多人。

全区以上下才溪两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红五月以前，八乡平均每乡每月可集中布草鞋五百双，近因封锁无布，稍减少了。但上下才溪还有如下成绩：上才溪，八月五百多双，九月一百多双，十月九十多双。下才溪，八月三百多双，九月二百八十双，十月三百双，十一月六百三十双。

这些成绩，主要是由于党团支部动员党团员领导女工农妇代表会得来的：（一）党团员先开会，（二）妇女代表会开会，（三）妇女群众大会。

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乡有主席团五人，内推一指导员，另四人分在四村，每村一人，即为村主任。

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解释婚姻条例给妇女听。

大数量地动员群众去当红军，依靠于：（一）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二）充分地优待红军家属；（三）健全的编制与训练地方武装。而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长冈乡、才溪乡的经验，给我们完全证明了。长冈乡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四十五岁）四百零七人，其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占百分之七十九。上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五百五十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占百分之八十八。下才溪全部青年壮年男子七百六十五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五百三十三人，也占了百分之七十。这样大数量地扩大红军，如果不从经

济上、生产上去彻底解决问题，是决然办不到的。只有拿经济上的动员配合着政治上的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热潮，达到如像长冈乡、才溪乡一样的成绩。

经济生活

一　劳动力问题

上才溪：全人口二千三百一十八人（暴动时）中，男劳力五百五十四（十六岁至五十五岁，下同），女劳力五百八十一，内当红军的四百一十九，调外工作的八十八（男六十六，女二十二）。五百五十四个十六岁至五十五岁有劳动力的男子中，共去了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四百一十九加六十六），留在乡村的只六十九人，与女劳力五百五十九人（五百八十一减二十二）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全乡有红军家属三百五十八家。

下才溪：全人口二千六百一十人中，男女合计有劳动力的一千二百零七人（男七百六十五，女四百四十二），当红军的四百四十二，调外工作的九十八（男九十一，女七）。男子有劳动力的七百六十五人中，共去了五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及做工作，留在乡村的只二百三十二人，与女劳力四百三十五（四百四十二减七）比较，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全乡红军家属三百五十五家。

因此，耕种主要依靠于女子。上才溪今年女子能用牛的约三百人，能莳田的六十多人。暴动前这三百人中，只有十分之一即约三十个人能用牛。数年来的努力，得此成绩。

同时，“老同志”精神很好，开山开岭多是他们，一部分还可莳田割禾。儿童又参加生产。因此，生产是在发展中。除了女子、老人、儿童参加生产之外，生产的发展还依靠于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这样，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力，做劳动工。党团员又做“礼拜六”[1]。因此，生产得着更大的发展。

调剂劳动力的主要方法，是劳动合作社与耕田队，其任务是帮助红属与群众互助。

帮助红属：带饭包（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

群众互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样，一九三〇年起就这样做。工钱，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

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

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

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登记有劳动力的，无劳动力的，或缺劳动力的。有人请工，即刻可以分配。间有不知者，问耕田队的中队长（每村一个中队，五人为一小组，两组十人为一班，三班或四班

---

[1] “礼拜六”，指当时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帮助红军家属、贫农、雇农耕种土地和帮助耕种红军公田的义务劳动，来源于苏联十月革命后开展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为一中队），中队长手里也有个簿子。“赞成将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统一起来。”

生产情形：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今年大开，开了一千三百多担。开山比开田更多，山占四分之三，田占四分之一，因田开尽，故进到开山。没有一片田塍没有种杂粮，能种番薯的田一概种下番薯了。开山开得女同志“争”起来，我要开，你也要开。竞赛的效力很大。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现在全区没有做粉干及“板子”的，没有蒸酒的。

二　消费合作社

全区八乡有十四个消费合作社。

上才溪两个：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七十四元，后增至一百八十五元，每股五角。一九三〇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七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一人，圩日有两人帮助。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四十四元，后增至二百五十五元，每股一元。与前者同时起的。一九三三年九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圩日帮助者一人。

下才溪三个：

一个布匹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元，后增至二百四十元，每

股一元。一九三〇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二年二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一元。常驻二人。

一个油盐肉合作社。原股本三十五元，后增至一百五十七元，每股五角。一九二九年十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三月分红一次，每股分五角。常驻两人，圩日帮助一人。

一个豆腐、糖果、猪子合作社。原股本一百二十五元，后增至一百八十元，每股五角。一九三一年一月起的。一九三三年二月分红，每股分五角。办事常驻三人。

合作社每月查账两次（查毕回家吃饭），开社员大会一次（不吃饭）。办事人，每三个月于开社员大会时改选一次。调动到县社、区社去工作的，年壮当红军去了的（以较老的代），不胜任的，均即改换，但实际连任的多，换动的少。只红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赊一圩的，两圩的，最多三圩（五日一圩），还时，米、豆等等均可。圩期未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两期收清。

加入消费合作社的人家，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才溪百分之九十。

货缺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

货价，红属（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旧县、南阳、官庄等区的红属，均有来买货的。

“合作社第一好。”——舆论。

卖“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逐渐削弱至此），只圩日有个把子私人卖盐的，但土产如豆腐等，私人卖的还有。

三　粮食合作社

原名粮食调剂局，一九三〇年开始创设，由群众募集股金。此种募集不是普遍募集，而是向生活较好的人家募集，每股大洋一元。每乡组织一个调剂局，全区八个局，共有股金一千八百一十元。

调剂办法：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调剂局只收一斗五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卖给困难群众，但群众是否困难，要经过乡代表会调查通过。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进价格略除耗失。例如买进每元一斗五升，卖出则为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红军家属无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账，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莳田时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

今年二月，改名粮食合作社，但组织如旧。自今年经济建设运动发起以来，各乡粮社都扩大了。例如上才溪粮社，原股二百一十五元，现增加二百零三元，共四百一十八元。下才溪，原股一百三十七元，现增加二百元，共三百三十七元。调剂局委员五人，主任一人常驻，支领伙食。

今年五月，上村、障云两乡（现划入通贤区）发生饥荒（两乡尽是竹山，每人仅分田一担，纸业又失败了），全区各乡粮食调剂局合力救济。当时谷价每元八升，而调剂局借给此两乡的仍照去秋谷价每元一斗八升，秋后照数归还，全区共借给三十六担。另又募集杂粮（番薯干等）及钱去救济。结果无饿饭的。才溪区其余各乡，

今年均未患荒，是调剂局调剂之力。

下才溪另有一个“贩米合作社”，股本一百三十元，每股五角，专为红军路过、行人来往、机关人员及被难群众买米而设。委员五人均不常驻，圩日有一人办事半天，平时托付消费合作社办理。除开支办米工人的工资、伙食外，不分红利。普通群众来此买米的极少，百人中仅一二人。米价照市。自从群众集股办了这个合作社，红军、难民等就不要向群众挨家办米了。

四　犁牛合作社

全区只上下才溪两乡组织了，各有三头牛。

两乡约百分之二十的人家无牛，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来。

五　日常生活

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1]，更有吃糠的。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本地产米本来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现在杂粮的生产也比以前多了。以每餐说，暴动前不能吃饱，现在能吃饱了，并且自己吃外，还可卖给红军，完土地税，买公债票与兑换油盐。总之，吃饭改善了百分之一百（三个月米饭与六个月米饭之比）。

---

[1] “羊蹄子”，山野里一种草的根茎，形状似羊蹄，可以用来充饥度荒。

肉：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人每年吃肉约一元（大洋），现在为二元，增加百分之一百。暴动前百家只有六十家养猪，现在百家有九十五家养猪。

衣：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

盐：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

油：暴动前平均每人每月吃油（从江西来的木油，本地的猪油）六两，现在未减少也未加多，但因江西的木油来得少了，群众吃的多是猪油。

六　物价

谷——暴动前每担（一百斤）十元，一九二九年二元五角，一九三〇年五元，一九三二年六元二角，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元，十月五元。

猪肉——暴动前有骨每元两斤半，现在无骨每元亦两斤半。

鱼——暴动后因封锁，九江（从武平县转）没有鱼苗来，塘是空的，无市。

鸡——前后价同，每斤八毛。

鸭——前后略同，每斤四毛。

鸡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鸭蛋——前后略同，每毛买三个。

猪油——与猪肉价同。

石灰——田里不用，用了做纸，前后略同，每元买一担（八十斤）。

豆子——暴动前每担（八斗）十元，一九三二年二十元，今年八元。

烟——暴动前每毛买二两，现在每毛一两六钱。

茶叶——前后略同，每元买三斤半。

菜油——暴动前每元三斤半，今春两斤半，今冬一斤十三两。

纸——暴动前每球（四十斤）草纸四元五角，一九三一年六元，一九三二年五元，一九三三年一元五角，因此无人造纸了。

木——不能出口，无市。纸、木是本地最大出口，今均失败。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

木油——暴动前木油每元买三斤半，现在无甚货来，只得吃猪油了。

铁——比暴动前贵一倍。

布——棉布暴动前一元买一匹（二丈三尺），一九三二年一元又四毛买一匹，今年二元又两毛买一匹。

盐——暴动前每元十斤，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春仍是十斤，此年夏贵至七斤。一九三三年每元买一斤，十一月每元仅买十四两。极大的问题是要打破封锁。

洋油——暴动前百分之五十人家点洋油，每元买七斤十四两，一九三三年每元仅买一斤五两，因此除机关办公外，无人点它了，

均点“松光”[1]。

柴火——暴动前每斤两个铜片，去年三个铜片，今年五个铜片到九个铜片。

毛洋——前后同，每毛十六个铜片。

现洋——杂洋十三毛半；光洋十四毛，苏纸[2]同。现只有苏纸，现洋完全看不见了。又是国民党捣乱！

七　经济公债

新划的才溪区，八个乡，二千一百八十八家，八千七百八十二人，共承销公债一万三千六百元，现尚余约一千元没有销完。

上才溪五百二十三家，二千三百一十八人，销四千元。

下才溪五百零三家，二千六百一十人，销四千一百四十六元。

方法：

（一）党团员大会动员。

（二）各团体各自开会动员。

（三）乡苏代表会议动员。

（四）村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专门宣传，不销。

（五）乡为单位开群众大会一次，销债，两乡各销了一千五百多元，未完。

（六）乡代表、推销委员会（每村三人）、宣传队（乡组织的，每村五人），挨户宣传。

---

[1] “松光”，即松明，点燃用来照明的油脂多的松木条。

[2] 苏纸，这里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

（七）选民大会上，上才溪销六百多元，下才溪销一千六百多元。至此，上才溪销了二千多元，尚余一千多元，下才溪销了三千多元，尚余约九百元。

（八）嗣后由代表、推销委员、宣传队按户鼓动，概销完了，承认了数目，但公债还没有完全领到。

完全自动买，没有强迫。没有一次会不讲经济建设。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

我们重复地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才溪乡在青年壮年男子成群地出去当红军、做工作之后，生产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荒田开尽，进到开山，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有很大的改良。

劳动合作社（别地称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组织了全乡群众的经济生活，经济上的组织性进到了很高的程度，成为全苏区第一个光荣的模范。这种经济战线上的成绩，兴奋了整个群众，使广大群众为了保卫苏区发展苏区而手执武器上前线去，全无家庭后顾之忧。在两乡全人口四千九百二十八人中，男子出去当红军、做工作的一千零一十八人（上才溪四百八十五，下才溪五百三十三），女子出去做工作的有二十九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我们郑重介绍长冈乡、才溪乡、石水乡的光荣成绩于全体工农群众之前，我们号召全苏区几千个乡一齐学习这几个乡，使几千个乡都如同长冈、

才溪、石水一样，成为争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

文化教育

上才溪：

日学。四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群众募集款子，每人一角三分计算。学生共一百四十一人，多是六岁至十岁的。十一至十四岁的多进区苏义务教育性的劳动学校（由儿童工作干部训练所改）。全乡一至十五岁儿童六百多人，内六岁至十五岁的三百二十三人，此数内入日校的一百四十一人，入区苏劳动学校的三十七人，尚有一百四十五人失学。

夜学。四个，无校长，教员由日学教员兼。学生共一百二十多人，多是女子。每月每校办公费五角，群众募集的。

识字班。二十四组，每组十人，共二百四十人，每五天由夜学教员发五个新字去认。每组一个组长，男女均有。因老，因工作，因小孩牵累，不能入夜学的，便入识字班。

读报团。设于俱乐部内，有一主任，逢圩日（五日一圩）读《斗争》《红中》及“通知”“阶级分析”[1]等。每次最少五六十人听，多的八九十人。

识字牌。六块，设置于通路处。

俱乐部。一个，任俱乐部工作的五十多人，内新剧团占三十

---

[1] 《斗争》，即《斗争》报，当时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红中》，即《红色中华》，当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通知”，指当时上级机关发的关于各项工作的文件。“阶级分析”，指查田运动中印发的关于怎样分析农村阶级问题的文件和材料。

多人。

墙报。四处，每村一处，在日校门外。文章，学生教员做得多，群众做的不过十分之一。

下才溪：

日学。五个，共一校长，各一教员。教员伙食办法同上才溪。学生共一百五十多人，入区校的六十多人，共二百一十多人。

夜学。八个，无校长，教员五个由日校教员兼，三个是另找来的。平均每校学生约三十人，共二百四十人。办公费每月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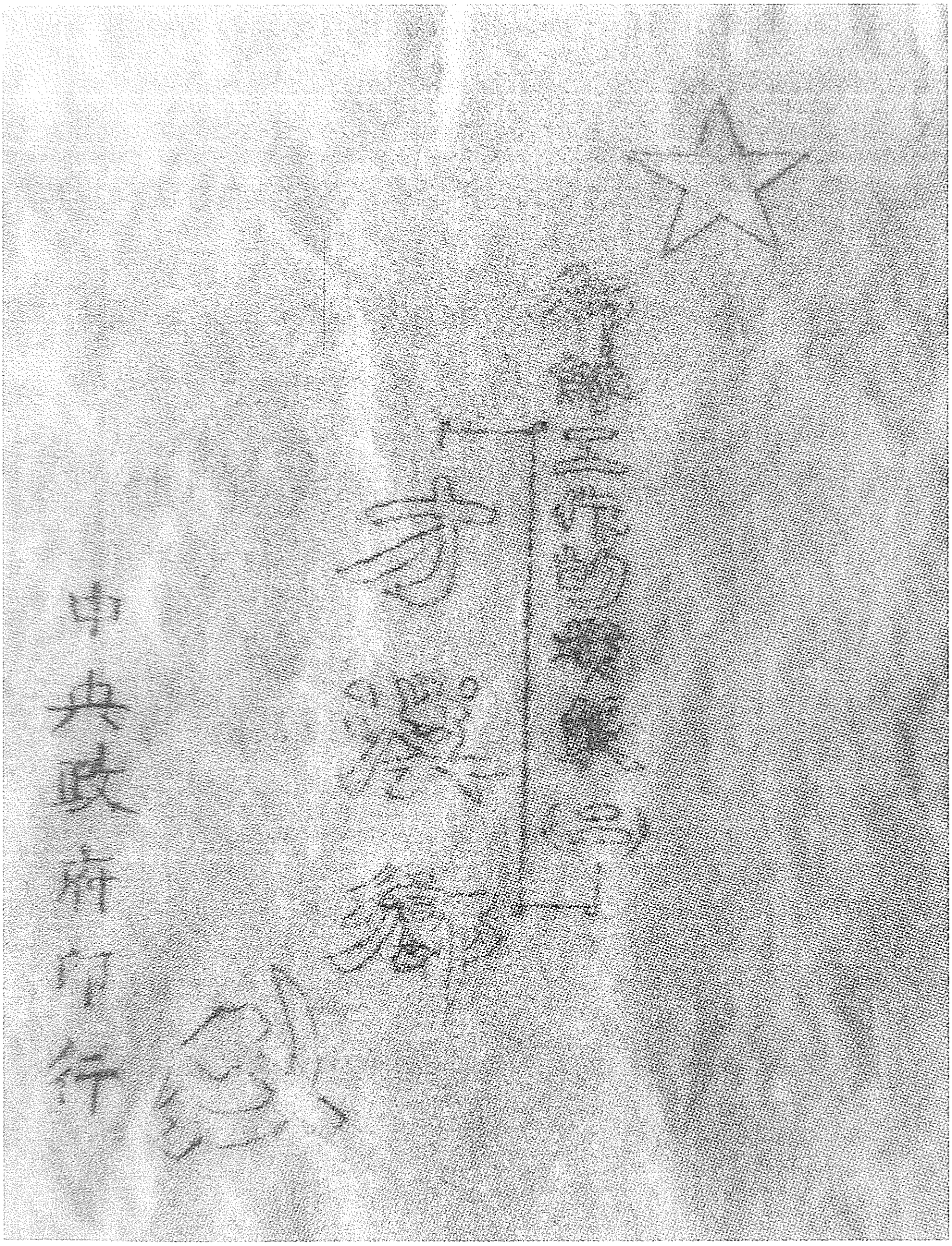
俱乐部。一个，工作人员五十多人。

识字班。二十六组，共二百六十人，识字办法同上才溪。

识字牌。五块。

墙报。五处。

读报团。一处，也是每五天逢圩日一次。



乡苏工作的模范（二）

才溪乡

中央政府印行

1933年11月，毛泽东到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后，整理出《才溪乡调查》一文。图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印制的单行本。

才溪乡调查会址。

《才溪乡调查》写作地点。

毛泽东题名的才溪乡光荣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

（1933年12月12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省、县、区、市、乡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为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组织，称地方苏维埃。

第二条　省、县、区、市、乡各级苏维埃，必须根据本法组织之。

第二章　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

（注）市苏维埃、乡苏维埃，是苏维埃政权的基本组织，其主要的特点是经常的代表会议制度，代表不脱离生产，散布在群众中。

甲　市苏维埃

第三条　市苏维埃为全市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全市选民选举代表组织之。

第四条　市苏维埃之下，应划分为若干“市区”，设立市区苏维埃，但四千人以下的市及隶属于区苏维埃的市，不划分市区。城外市区（即乡村划入市苏管辖者）之内，应按距离远近与居民多少，划分若干村，但每一市区之内，至多不得超过五个村。

（注）市区的名称，小市可以“城中市区”“东郊市区”“西郊市区”等等称之，大市可以著名街道及其他适当地名称之。城外市区内村的名称，可用各村中著名的地方称之，均不得用数字为名称。

第五条　市区苏维埃为全市区的最高政权机关，由全市区选举代表组织之。市区苏维埃隶属于市苏维埃。

（注）市区苏维埃代表人数的标准，暂适用乡苏维埃代表人数的标准。

第六条　除“区属市”之外，市苏维埃的代表，由市区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选举之。

（注）市苏维埃代表人数的标准，依照苏维埃暂行选举法第二十二条至二十五条之规定。

第七条　由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选举市区苏维埃主席团，为市区代表会议闭会期间全市区的最高政权机关。

第八条　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由市苏维埃全体代表会议选举主席团，为市苏维埃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全市最高政权机关。

第九条　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由市苏维埃全体代表会议选举市执行委员会，为市苏维埃全体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全市最高政权机关，再由市执行委员会选举主席团，为市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市最高政权机关。

（注）组织了市执行委员会的市苏维埃，其经常代表会议制度仍然存在，与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市苏维埃之经常代表会议制度同。

第十条　市执行委员会，在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由委员二十一人至二十五人、候补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在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由委员三十五人至七十五人、候补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组织之。

第十一条　市区苏维埃主席团，在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以五人至七人组织之，在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以九人至十一人组织之。

区属市苏维埃主席团，以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县属市苏维埃主席团，以七人至十一人组织之。

省属市苏维埃主席团，以十一人至十九人组织之。

中央直属市苏维埃主席团，以十九人至二十五人组织之。

第十二条　市区苏维埃，或市苏维埃，均推选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至二人。

第十三条　市区苏维埃与市苏维埃代表的任务：一方面是代表选举他们的选民到苏维埃去工作，传达选举意见及选民所要进行的工作，提到市区苏维埃或市苏维埃去讨论；另一方面是将上级苏维埃所要进行的工作，经过市区苏维埃或市苏维埃讨论之后，传达到群众中去，领导各代表所在范围内居民，坚决执行上级苏维埃的命令和指示，执行市区苏维埃和市苏维埃的决议。

第十四条　市区苏维埃的代表，须按其住所接近，在五个至九个代表之中，由市区苏维埃主席团指定一人为代表主任，在主席团许可的范围内，分配和指导其领导下代表的工作，传达市区苏维埃主席团的通知，在其领导下各代表召集其领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其领导下居民的较小的问题，必要时得参加主席团会议。城外市区内的各村，如一村中有代表主任在二人以上者，可于各代表主任之中，指定一人，负接受主席团的通知转达于各代表主任，召集以村为单位的居民会议之责，讨论村的问题，并得召集本村各代表开会。

第十五条　在市区苏维埃与区属苏维埃管辖的全境之内，为着代表与居民的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意见及领导工作起见，应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的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以居民三十人至七十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

第十六条　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之下，组织下列各种经常的或临时的委员会，其人数与任务规定于下：

1. 扩大红军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

2. 优待红军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在城内市区协同工会及贫民代表收集工人、贫民群众的优待月费及市财政部交来的百分之五商业税与店房租，适当分配于没有分到田、生活困难的红军家属及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的家属，领导全市区的能劳动的居民为劳动力不足的红军家属及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砍柴挑水或做其他必要的工作，为红军家属找工作及领导他们开办生产合作社；在城外市区指导耕田队，为劳动力不足的红军家属及其他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的家属耕种土地，解决红军家属及其他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的家属的一般生活困难问题，管理红军公田的耕种、收获与保管。

3. 慰劳红军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织之。其任务为领导居民群众举行慰劳红军运动，收集居民群众慰劳红军的物品等。

4. 赤色戒严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赤卫

军少先队的干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加紧赤色戒严与肃反斗争，如指导并巡查放哨、眺高、查路条、盘问可疑居民与来人，领导群众注意剥削分子的行动，追究反动派的造谣，并帮助政治保卫局与裁判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等。

5. 防空防毒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其任务为指导居民群众防御敌人飞机轰击的各种必要事项，如设立号炮所、构筑飞机洞、准备防毒用具等。

6. 义务劳动委员会及运输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调查登记、编制调剂并动员运输队、耕田队、修路队、劳役队（地主及反动富农的）及其他义务劳动事项。为了迅速的动员夫子到前方抬伤病员、搬胜利品及服后方的运输勤务，得单独组织运输委员会，委员五人至七人。

7. 失业救济委员会

在城内市区，在城外失业工人稍多之市区及区属市，均组织失业救济委员会（失业工人没有或极少的城外市区可不组织）。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失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帮助市劳动部的失业劳动科调查登记全市内的失业工人，讨论并实行为失业工人找工作、找住所及筹集经费或物品作临时的救济等。

8. 贫民委员会

于城内各市区组织之（城外市区不须组织），委员九人至十五人，委员必须是市区苏维埃中贫民出身的代表及各业贫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其任务为调查登记全市区贫民的人数，职业与失业状况，讨论与解决各业贫民群众一切生活困难问题。

9. 房屋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全市区内公私房屋之调查与登记，豪绅地主及反动资本家房屋之没收与分配，工人贫民缺乏房屋问题之讨论与解决，被烧被毁的房屋之设法重建等。此委员会只在城内市区组织之，城外市区不须组织。

10.　户口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其任务为按照成分调查登记全市区居民的家户人口，按月登记全市区居民中之出生、死亡、迁移、结婚及离婚之人数。

11.　工业委员会及农业委员会

在各市区特别在城内市区组织工业生产委员会，委员九人至十五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国营工业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及其他独立生产者中的积极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指导工人贫民群众发展国有的、合作社的、独立生产者的各种工业，监督工业资本家增加资本扩张营业，而反对其运去资本、停歇企业等。

在城外市区，则按照农业生产季候，组织春耕委员会、夏耕委员会、秋收秋耕委员会与冬耕委员会，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及农民中积极而老于农事的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指导农民群众调剂人工、增加肥料、解决耕牛困难、修理添置农具、选择种子、改良栽培方法、消灭害虫及不失时机收获农产品等。

12.　工业研究委员会及农业研究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在城内市区组织工业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为指导本市区内国有的、合作社的、私人小企业的各种工业生产中的各种重要问题之研究，如怎样提高生产技术等。在城外市区，则组

织农业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为指导本市区内农业生产方面各种重要问题之研究，如什么种子种什么地方适宜，宜于施放什么肥料，用何种栽培方法较好等，同时管理本市区的农业试验场。

13. 没收征发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在城内市区其任务为帮助政治保卫局与裁判部没收反革命犯的财产，没收住居在城市的地主及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总工的资本家的罚款或捐款等，这是经常的组织。

在城外市区，则其任务为没收地主的现款及其他财产，依照国家财政机关的命令，适当地进行富农捐款，这是临时的组织，任务完毕即撤销。

14. 国有财产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其任务为管理国有财产，在有国有财产之市区或市属直属市组织之，无国有财产者则不须组织。

15. 商业税或农业税征收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在城内市区组织商业税征收委员会，帮助市财政部调查商店营业情形，并帮助征收商业税，这是经常的组织。

在城外市区，则组织农业税征收委员会，帮助市财政部征收农业税，于征收农业税时临时组织之，任务完毕即撤销。

16. 公债发行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公债之推销，债款债谷之收集与暂时的保存，于发行公债时临时组织之，任务完毕即行撤销。

17. 教育委员会

委员九人至十一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列宁小学校长、补习夜学校长、俱乐部主任、共产青年团、工会、贫民团、少先队、儿童团、女工农妇代表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之，管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全市区内公私房屋之调查与登记，豪绅地主及反动资本家房屋之没收与分配，工人贫民缺乏房屋问题之讨论与解决，被烧被毁的房屋之设法重建等。此委员会只在城内市区组织之，城外市区不须组织。

10. 户口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其任务为按照成分调查登记全市区居民的家户人口，按月登记全市区居民中之出生、死亡、迁移、结婚及离婚之人数。

11. 工业委员会及农业委员会

在各市区特别在城内市区组织工业生产委员会，委员九人至十五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国营工业职工中的积极分子、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代表及其他独立生产者中的积极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指导工人贫民群众发展国有的、合作社的、独立生产者的各种工业，监督工业资本家增加资本扩张营业，而反对其运去资本、停歇企业等。

在城外市区，则按照农业生产季候，组织春耕委员会、夏耕委员会、秋收秋耕委员会与冬耕委员会，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及农民中积极而老于农事的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指导农民群众调剂人工、增加肥料、解决耕牛困难、修理添置农具、选择种子、改良栽培方法、消灭害虫及不失时机收获农产品等。

12. 工业研究委员会及农业研究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在城内市区组织工业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为指导本市区内国有的、合作社的、私人小企业的各种工业生产中的各种重要问题之研究，如怎样提高生产技术等。在城外市区，则组

织农业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为指导本市区内农业生产方面各种重要问题之研究，如什么种子种什么地方适宜，宜于施放什么肥料，用何种栽培方法较好等，同时管理本市区的农业试验场。

13. 没收征发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在城内市区其任务为帮助政治保卫局与裁判部没收反革命犯的财产，没收住居在城市的地主及其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总工的资本家的罚款或捐款等，这是经常的组织。

在城外市区，则其任务为没收地主的现款及其他财产，依照国家财政机关的命令，适当地进行富农捐款，这是临时的组织，任务完毕即撤销。

14. 国有财产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其任务为管理国有财产，在有国有财产之市区或市属直属市组织之，无国有财产者则不须组织。

15. 商业税或农业税征收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在城内市区组织商业税征收委员会，帮助市财政部调查商店营业情形，并帮助征收商业税，这是经常的组织。

在城外市区，则组织农业税征收委员会，帮助市财政部征收农业税，于征收农业税时临时组织之，任务完毕即撤销。

16. 公债发行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公债之推销，债款债谷之收集与暂时的保存，于发行公债时临时组织之，任务完毕即行撤销。

17. 教育委员会

委员九人至十一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列宁小学校长、补习夜学校长、俱乐部主任、共产青年团、工会、贫民团、少先队、儿童团、女工农妇代表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之，管

理全市与区属市内的一切文化教育事业之发展、整理与调查统计。

18. 卫生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各街道或各村落群众中积极分子组织之。管理全市区与区属市内通光、通气、通水、扫除灰尘垃圾、清洁沟渠便所、灭蝇、捕鼠、防疫、医药等事项。

19. 桥路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街道、普通道路、桥梁、船渡、茶亭等之修理与建设。

20. 粮食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关于全市区与区属市内每季粮食（杂粮在内）的调查登记与统计，调查统计全市区与区属市内居民群众每季共需粮食若干，有余或不足若干。

21. 备荒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其任务为筹集粮食于备荒仓而保管之，调查统计全市区与区属市内居民群众中粮食不足及正患饥荒者若干，需要接济粮食若干，并实施救济办法。

22. 森林或山林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在城内市区及城外市区之无山者，组织森林委员会，其任务为领导居民群众在一切可能植树的地方如园地、庭院、河旁、路边种植树木并培养保护之。在城外市区之有山者，则组织山林委员会，管理山林之种植、培养与保护。

23. 水利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九人，在城内市区管理街道及房屋下阴沟之修理，附城河堤之修筑，城内外池塘、水井之疏浚。在城外市区管理坡

地、河堤、池塘之修理与开筑，水车之修理与设备。

24. 土地登记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在城内市区管理地坡、池塘、水井、园土、果木、树林等的调查登记与统计。在城外市区则管理田地、山林、池塘、园土、沙坝、果木等之调查登记与统计，土地证之发给与补领等。

25. 开荒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于城外市区之有荒田、荒土、荒山者组织之。管理领导群众开发荒田、荒土、荒山。

26. 查田委员会

只在城外市区组织之，委员七人至十一人，以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主席、副主席、文书、贫农团主任、工会支部长、其他群众团体负责人为委员，为查田运动的领导机关，查田运动彻底完成后即取消。在查田运动时，为了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及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并分配于群众，得组织没收分配财产的委员会，委员七人至十一人，在查田委员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

同样，为着对于地主的土地及富农多余的与好的土地之没收与分配，在查田委员会之下得另组织没收分配土地的委员会，委员七人至十一人。

27. 选举委员会

委员九人至十三人，于举行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的选举时，由市区苏维埃或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各群众团体的代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在市苏维埃选举委员会直接指导之下，管理关于选举的宣传、选民的登记、选举单位的划分、候选名单的准备、选举大会的召集及其他一切与选举有关系的事项。选举完毕即撤销。

28. 工农检察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工会、贫民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共产青年团的代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直接隶属于市苏维埃的（区属市则隶属于区苏维埃的）工农检察委员会。其任务为经常检查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主席团、代表会议各委员会、赤卫军、少先队及国家企业是不是完全遵照上级苏维埃的法令、指示进行工作。在这些机关与企业中，如果发生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压制强迫或其他违反选民群众公意，违反苏维埃法令的行为的分子，即帮助市苏维埃工农检察委员会进行对于这些不良分子的检举。

第十七条　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下各种委员会之组织，得按当地工作需要情形增加之或减少之，但须得上级苏维埃的同意。

第十八条　在城外市区，如地域较宽或工作高度发展时，可以村为单位组织某些必要的委员会，每一委员会的人数三人至五人，为乡的委员会的分会，其主任即以乡的委员之一充之。

第十九条　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主持各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十条　市区苏维埃或区苏维埃的每个代表必须参加一个至二个委员会为委员，代表应参加何种委员会，先由代表自己选择，再由主席团适当分配之。

第二十一条　应充分吸收代表以外的工农贫民积极分子参加各委员会为委员。

第二十二条　各委员会进行工作时不得违背代表会议及主席团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市苏维埃与区苏维埃的各部对于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下的各种委员会，须按其任务的分别，经过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会议及其主席团发生密切的关系，必要时市

苏维埃的各部得召集全市各个市区与自己有关系之委员会的主任到市苏开会，或派人去市区召集有关之委员会开会，指示工作。

第二十四条　市苏维埃、市区苏维埃及区属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各委员会的会议，必要时应移到有关系的企业中、机关中、群众团体中或村落中去开会，以便吸收当地工农贫民群众及当事人参加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五条　市苏维埃、市区苏维埃及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除规定的常驻人员外，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

第二十六条　市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在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每月由主席团召集一次；在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每两月由主席团召集一次。市区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在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每十天由主席团召集一次；在居民五万以上的市，每二十天由主席团召集一次。

市执行委员会，每月由主席团召集一次。

市区苏维埃主席团会议，每三天由主席团召集一次。

市苏维埃主席团会议，在居民五万人以下的市，每三天由主席团召集一次；在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每七天由主席团召集一次。各委员会的会议，每十天由主任召集一次。

有临时问题，不论何种机关都得开临时会议。

市区苏维埃与区苏维埃的常驻人员，在城内市区为五人。在城外市区，人口在一千以下的二人，人口在一千以上的三人，人口在两千以上的四人，区属市苏维埃四人。

第二十七条　市苏维埃的常驻人员，由人民委员会按照各地居民多少及工作繁简，以命令规定之。

第二十八条　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须每两个月向选民作

工作报告一次。市苏维埃每三月向选民作工作报告一次。

选民对于工作报告有批评和建议之权。

第二十九条　市区苏维埃对于市苏维埃、区属市苏维埃对于区苏维埃，至少每月作工作报告一次。市苏维埃对于上级苏维埃至少每月作报告一次。

第三十条　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均可用文书一人，助理主席团的工作。

第三十一条　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均每半年改选一次。市苏维埃的代表，在选民五万人以下的市，每半年改选一次。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每年改选一次。代表连选者得连任。

第三十二条　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违背选民公意者，或无故连续两个月不出席代表会议者，或违抗代表会议决议经过警告不改变者，或犯其他重大错误者，得由选民十人以上的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开除之。撤回或开除之代表，以候补代表补充其职务。

乙　乡苏维埃

第三十三条　乡苏维埃为全乡最高政权机关，由全乡选民选举代表组织之。

第三十四条　由全体代表会议选举五人至七人组织主席团，为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

第三十五条　由主席团推选主席、副主席各一人。

第三十六条　代表的任务一方面是代表选举他们的选民到苏维埃去工作，传达选民意见，将选民所要进行的工作提到乡苏维埃去

讨论。另一方面是将上级苏维埃所要进行的工作，经过代表会议或主席团讨论之后，传达到群众中去，领导各代表所在范围内的居民，坚决执行上级苏维埃的命令和指示，执行乡苏维埃的决议。

第三十七条　乡苏维埃的代表，须按其住所接近，在三个至七个代表中，由乡苏维埃主席团指定一人为代表主任，在主席团许可的范围内分配和指导其领导下各代表的工作，传达乡苏维埃主席团的通知于其领导下各代表，召集其领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其领导下居民的较小的问题，必要时得参加主席团会议。

第三十八条　乡的全境之内，应按距离远近与居民多少划分若干村，但每乡至多不得超过五个村（村的名称可用村内著名的地名称之，不得采用数字）。如一村中有代表主任二人以上时，可于各代表主任之中指定一人，负接收主席团的通知、转达与各代表主任及召集以村为单位的居民会议之责，讨论村的工作，并得召集村各代表开会。

第三十九条　在乡苏维埃管辖的全境之内，为着代表与居民的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的意见，并领导工作起见，应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的远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以居民三十人至七十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领导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

第四十条　在乡苏维埃之下，组织下列各种经常的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其人数与任务规定如下：

1. 扩大红军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九人，管理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

2. 优待红军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十一人，指导耕田队为劳动力不足的红军家属及其

工作报告一次。市苏维埃每三月向选民作工作报告一次。

选民对于工作报告有批评和建议之权。

第二十九条　市区苏维埃对于市苏维埃、区属市苏维埃对于区苏维埃，至少每月作工作报告一次。市苏维埃对于上级苏维埃至少每月作报告一次。

第三十条　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均可用文书一人，助理主席团的工作。

第三十一条　市区苏维埃与区属市苏维埃的代表，均每半年改选一次。市苏维埃的代表，在选民五万人以下的市，每半年改选一次。居民五万人以上的市，每年改选一次。代表连选者得连任。

第三十二条　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违背选民公意者，或无故连续两个月不出席代表会议者，或违抗代表会议决议经过警告不改变者，或犯其他重大错误者，得由选民十人以上的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开除之。撤回或开除之代表，以候补代表补充其职务。

乙　乡苏维埃

第三十三条　乡苏维埃为全乡最高政权机关，由全乡选民选举代表组织之。

第三十四条　由全体代表会议选举五人至七人组织主席团，为代表会议闭会期间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

第三十五条　由主席团推选主席、副主席各一人。

第三十六条　代表的任务一方面是代表选举他们的选民到苏维埃去工作，传达选民意见，将选民所要进行的工作提到乡苏维埃去

讨论。另一方面是将上级苏维埃所要进行的工作，经过代表会议或主席团讨论之后，传达到群众中去，领导各代表所在范围内的居民，坚决执行上级苏维埃的命令和指示，执行乡苏维埃的决议。

第三十七条　乡苏维埃的代表，须按其住所接近，在三个至七个代表中，由乡苏维埃主席团指定一人为代表主任，在主席团许可的范围内分配和指导其领导下各代表的工作，传达乡苏维埃主席团的通知于其领导下各代表，召集其领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其领导下居民的较小的问题，必要时得参加主席团会议。

第三十八条　乡的全境之内，应按距离远近与居民多少划分若干村，但每乡至多不得超过五个村（村的名称可用村内著名的地名称之，不得采用数字）。如一村中有代表主任二人以上时，可于各代表主任之中指定一人，负接收主席团的通知、转达与各代表主任及召集以村为单位的居民会议之责，讨论村的工作，并得召集村各代表开会。

第三十九条　在乡苏维埃管辖的全境之内，为着代表与居民的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的意见，并领导工作起见，应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的远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以居民三十人至七十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领导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

第四十条　在乡苏维埃之下，组织下列各种经常的或临时的专门委员会，其人数与任务规定如下：

1. 扩大红军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九人，管理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

2. 优待红军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十一人，指导耕田队为劳动力不足的红军家属及其

他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的家属耕种土地，解决红军家属及其他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的家属的一般生活困难问题，管理红军公田的耕种、收获和保藏。

3. 慰劳红军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乡苏维埃的代表及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织之，其任务为领导居民群众举行慰劳红军运动，收集居民群众慰劳红军的物品。

4. 赤色戒严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由乡苏维埃的代表、赤卫军、少先队的干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加紧赤色戒严与肃反斗争，如指导并巡查放哨、眺高、查路条、盘问可疑居民与来人，领导群众注意剥削分子的行动，追究反动派的造谣，并帮助政治保卫局与裁判部实行镇压反革命活动等。

5. 防空防毒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其任务为指导居民群众防御敌人飞机的轰击的各种必要事项，如设立号炮所、构筑飞机洞、准备防毒用具等。

6. 没收征发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其任务为管理没收地主现款及其他财产，依照国家财政机关的命令，适当地进行富农捐款。这是临时的组织，任务完毕即撤销。

7. 国有财产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其任务为管理国有财产，只在有国有财产之乡组织之。

8. 农业税征收委员会

委员九人至十五人，管理征收农业税，于征收农业税时临时组

织之，任务完毕即撤销。

9. 公债发行委员会

委员九人至十五人，管理公债之推销、债款债谷之收集与暂时的保存，于发行公债时临时组织之，任务完毕即行撤销。

10. 各季的农业生产委员会

按照农业生产季候，组织春耕委员会、夏耕委员会、秋收秋耕委员会与冬耕委员会，委员九人至十五人，由乡苏维埃的代表及农民群众中积极而老于农事的分子组织之，其任务为指导农民群众调剂人工、增加肥料、解决耕牛困难、修理添置农具、选择种子、改良栽培方法、消灭害虫及不失时机收获农产品等。

11. 开荒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管理开发荒田、荒土、荒山。这是临时组织，任务完毕即撤销。

12. 山林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管理山林之种植、培养与保护。

13. 水利委员会

委员五人至七人，管理坡地、河堤、池塘之修理与开筑，水车之修理与设备。

14. 土地登记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其任务为对于农业生产方面各种问题之研究，如什么种子种什么地方适宜，宜于施放什么肥料，用何种栽培方法较好等，同时管理乡之农业试验场。

15. （此条残缺）

16. 查田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十一人，以乡苏维埃主席、副主席、文书、贫农团

主任、工会支部长、其他群众团体负责人组织之，为全乡查田运动的领导机关，查田运动彻底完成之后即撤销。

在查田运动时，为了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及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并分配于群众，得组织没收、分配财产的委员会，委员七人至十一人，在查田委员会指导之下进行工作。

同样，为着对于地主阶级及富农多余的与好的土地之没收与分配，在查田委员会之下，得另组织没收分配土地的委员会，委员七人至十一人。

17. 教育委员会

委员九人至十五人，由乡苏维埃代表、列宁小学校长、补习夜学校长、俱乐部主任、共产青年团、工会、贫农团、少先队、儿童团、女工农妇代表会等团体的代表组织之，管理全乡文化教育事业之发展、整理与调剂统计。

18. 卫生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由乡苏维埃代表及各村群众中积极分子组织之，管理全乡通光、通气、通水、扫除灰尘垃圾、清理沟渠便所、灭蝇、捕鼠、防疫、医药等事项。

19. 桥路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全乡桥梁道路、船渡、茶亭等之修理与建设。

20. 粮食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管理关于全乡每季粮食的调查登记与统计，调查统计全乡居民每季共需粮食若干，有余或不足若干。

21. 备荒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其任务为筹集粮食于备荒仓而保管之，调查

统计全乡的粮食不足或正患饥荒者若干，需要接济粮食若干，并实行救荒的办法。

22. 户口委员会

委员三人至五人，其任务为按照成分调查登记全乡居民的家户与人口，按月登记全乡居民中之出生、死亡、迁移、结婚及离婚之人数。

23. 义务劳动委员会及运输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调查登记、编制调剂并动员运输队、耕田队、修路队、劳役队（地主与反动富农的）及其他义务等事项。

为了迅速动员夫子到前方抬伤病员、搬胜利品及后方的运输勤务，得单独组织运输委员会，委员五人至七人。

24. 选举委员会

委员九人至十三人，于举行乡苏维埃选举时，由乡苏维埃代表、各群众团代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管理关于选举的宣传、选民的登记、选举单位的划分、候选名单的准备、选举大会的召集及其他一切与选举有关系的事项。

25. 工农检察委员会

委员七人至九人，由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共产青年团的代表及其他积极分子组织之。直接隶属于区苏维埃工农检察委员会，其任务为经常检查乡苏维埃主席团代表会议、各委员会、赤卫军、少先队是不是完全遵照上级苏维埃的法令指示进行工作。在这些机关及地方武装中，如果发生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压制强迫及其他违反选民群众公意、违反苏维埃法令的行为的分子，即帮助区苏维埃工农检察委员会进行对于这些不良分子的检举。

第四十一条　乡苏维埃下各种委员会之组织，得按照当地工作

需要情况增加之或减少之，但需得上级苏维埃的同意。

（注）在乡之区域较宽或工作高度发展时，可以村为单位组织某些必要的委员会，每一委员会的人数三人至五人，为乡的委员会的分会，其主任即以乡的委员之一充之。

第四十二条　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第四十三条　每个乡苏维埃代表必须参加一个至两个委员会为委员，代表应参加何种委员会，先由各代表自己选举，再由主席团适当分配之。

第四十四条　应充分吸收代表以外的工农贫民积极分子参加各委员会为委员。

第四十五条　各委员会进行工作时，不得违背代表会议或主席团的意见。

第四十六条　区苏维埃的各部，对于乡苏维埃下的各种委员会，须按其任务的分别，经过乡代表会议及其主席团发生密切的关系，必要时区苏维埃的各部得召集全区各乡或某几乡与自己有关系之委员会的主任到区苏开会，指示工作。

第四十七条　乡苏维埃全体代表会议，每十天由主席召集一次。

主席团会议，每三天由主席召集一次。各委员会的会议，每十天由主任召集一次。

有临时重要问题，不论何种机关均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四十八条　全体代表会议、各委员会的会议，必要时应移到与所讨论的事件有关系的村子内或群众团体内去开会，以便吸收当地群众及当事人来参加会议。

第四十九条　乡苏维埃的代表，除规定的常驻人员外，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

第五十条　乡苏维埃可用文书一人，助理主席团的工作。

第五十一条　乡苏维埃的常驻人员，居民一千人以下的乡为主席、文书二人，居民一千人以上的乡为主席、副主席、文书三人，在重要交通大道而为一天行程的终点、工作特别繁多之乡，得驻四人。

第五十二条　乡苏维埃须每两个月召集选民开会，作工作报告一次。

选民对于乡苏维埃的报告，有批评和建议之权。

第五十三条　乡苏维埃至少每月向区苏维埃作工作报告一次。

第五十四条　乡苏维埃的代表每半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

第五十五条　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违背选民公意者或无故连续两个月不出席代表会议者，或违抗代表会议决议经过警告不改变者，或犯其他重大错误者，得由选民十人以上之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经选民半数以上同意开除之。撤回或开除之代表，以候补代表补充其职务。

第三章　区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

甲　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

第五十六条　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全区最高政权机关。

第五十七条　由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区执行委员会，为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区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二十一人至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第五十八条　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每三个月由区执行委员会

需要情况增加之或减少之，但需得上级苏维埃的同意。

（注）在乡之区域较宽或工作高度发展时，可以村为单位组织某些必要的委员会，每一委员会的人数三人至五人，为乡的委员会的分会，其主任即以乡的委员之一充之。

第四十二条　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主持委员会的工作。

第四十三条　每个乡苏维埃代表必须参加一个至两个委员会为委员，代表应参加何种委员会，先由各代表自己选举，再由主席团适当分配之。

第四十四条　应充分吸收代表以外的工农贫民积极分子参加各委员会为委员。

第四十五条　各委员会进行工作时，不得违背代表会议或主席团的意见。

第四十六条　区苏维埃的各部，对于乡苏维埃下的各种委员会，须按其任务的分别，经过乡代表会议及其主席团发生密切的关系，必要时区苏维埃的各部得召集全区各乡或某几乡与自己有关系之委员会的主任到区苏开会，指示工作。

第四十七条　乡苏维埃全体代表会议，每十天由主席召集一次。

主席团会议，每三天由主席召集一次。各委员会的会议，每十天由主任召集一次。

有临时重要问题，不论何种机关均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四十八条　全体代表会议、各委员会的会议，必要时应移到与所讨论的事件有关系的村子内或群众团体内去开会，以便吸收当地群众及当事人来参加会议。

第四十九条　乡苏维埃的代表，除规定的常驻人员外，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

第五十条　乡苏维埃可用文书一人，助理主席团的工作。

第五十一条　乡苏维埃的常驻人员，居民一千人以下的乡为主席、文书二人，居民一千人以上的乡为主席、副主席、文书三人，在重要交通大道而为一天行程的终点、工作特别繁多之乡，得驻四人。

第五十二条　乡苏维埃须每两个月召集选民开会，作工作报告一次。

选民对于乡苏维埃的报告，有批评和建议之权。

第五十三条　乡苏维埃至少每月向区苏维埃作工作报告一次。

第五十四条　乡苏维埃的代表每半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

第五十五条　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违背选民公意者或无故连续两个月不出席代表会议者，或违抗代表会议决议经过警告不改变者，或犯其他重大错误者，得由选民十人以上之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经选民半数以上同意开除之。撤回或开除之代表，以候补代表补充其职务。

第三章　区县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

甲　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

第五十六条　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全区最高政权机关。

第五十七条　由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区执行委员会，为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区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二十一人至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第五十八条　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每三个月由区执行委员会

召集一次。

第五十九条　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听区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讨论之，讨论全区内苏维埃工作的方针与实行办法，选举区执行委员会，但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每两次全区代表大会中只举行一次（即六个月一次）。

第六十条　区执行委员会推选七人至十一人组织主席团，为区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区最高政权机关。

第六十一条　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互推主席、副主席各一人。

第六十二条　区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得用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二人，以助理文字等工作。

第六十三条　区执行委员会的常驻人员，由人民委员会按照居民多少及工作繁简以命令规定之。

第六十四条　区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月由主席团召集一次。

主席团会议每三天由主席召集一次。

有临时重要问题均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六十五条　区执行委员会至少每月须向县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一次。

第六十六条　区执行委员会至少每两个月须向区内各个乡苏维埃的全体代表会议作工作报告一次。

第六十七条　区执行委员会须向全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

乙　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

第六十八条　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全县最高政权机关。

第六十九条　由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县执行委员会，为全

县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全县最高政权机关。县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三十五人至五十五人、候补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组织之。

第七十条　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六个月由县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

第七十一条　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听县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讨论之，讨论和决定全县苏维埃工作的方针，选举县执行委员会，但县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每两次全县代表大会中只举行一次（即一年一次）。

第七十二条　县执行委员会互推九人至十五人组织主席团，为县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县最高政权机关。

第七十三条　县执行委员会的主席团互推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至二人。

第七十四条　县执行委员会可任用巡视员二人至五人，出发巡视和指导主席团指定的某一项或某几项工作。

第七十五条　县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得用秘书一人至二人、文书一人至二人，以助理文字等工作。

第七十六条　县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常驻人员，由人民委员会按照各县居民多少及工作繁简以命令规定之。

第七十七条　县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两个月由主席团召集一次。

主席团会议每五天由主席召集一次。

有临时重要问题均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七十八条　县执行委员会至少须每月向省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一次。

第七十九条　县执行委员会须向各区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

报告。

第八十条　县执行委员会须向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

丙　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

第八十一条　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为全省最高政权机关。

第八十二条　由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省执行委员会，为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全省最高政权机关。

省执行委员会由委员五十五人至九十五人、候补委员十一人至十九人组织之。

第八十三条　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每年由省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

第八十四条　全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听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并讨论之，讨论和决定全省范围内苏维埃工作的方针，改选省执行委员会。

第八十五条　省执行委员会互推十三人至十九人组织主席团，为省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的全省最高政权机关。

第八十六条　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互推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省执行委员会可任用巡视员五人至九人，出发巡视和指导主席团或各部指定范围内的、关于下级的某一项或某几项工作。

第八十七条　省执行委员会得聘用专门人才，助理主席团或各部的工作。

第八十八条　主席团任用秘书一人至三人、文书一人至三人，以助理文书等工作。

第八十九条　省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常驻人员，由人民委员会按

照各省居民多少及工作繁简以命令规定之。

第九十条　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四个月由主席团召集一次。

主席团会议每七天由主席召集一次。

有临时重要问题，均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九十一条　省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一次。

主席团至少每月须向中央人民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一次。

第九十二条　省执行委员会须向全省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

第九十三条　省执行委员会须向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

第四章　各部

第九十四条　省、县、区、市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裁判等部，工农检察委员会及国家政治保卫分局。

但省军事部的工作，得归并于军区指挥部，不另设立机关。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区只设特派员。省设审计委员会。

第九十五条　区及县属市的各部、直隶于县的各部、县及省属市的各部、直隶于省的各部、省及中央直属市的各部、直属于中央的各部，成为直的组织系统，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第九十六条　区、市、县、省各级苏维埃的各部，除隶属于各该部自己的上级各部之外，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指导和节制。

劳动的介绍、指导工人组织生产合作社等。

（四）社会保险局，管理社会保险的工作。

第一百零七条　劳动检查所长、检查员及社会保险局各级局长，由同级职工联合会推荐，经劳动部审查委任之。

第二　土地部

第一百零八条　省、县、区、市各级土地部之下，均设土地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土地斗争、土地生产各种问题的机关。土地委员会省由十五人至二十五人，县由十三人至十九人，区由十一人至十七人组织之，市按市辖近郊农村的多少，由十一人至十九人组织之。

第一百零九条　土地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没收分配科长、山林水利科长、调查登记科长、农事试验场主任、农产品展览所主任，劳动部、国民经济部、农业工会的代表，所在地附近的下级土地部部长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此职者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的主任，土地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团检查通过后，须送上级土地部批准。省、县两级委员要有附近的下级土地部长二人至三人参加。区及市土地委员要有附近乡苏维埃关于土地问题的委员之三人至五人参加。

第一百一十条　省、县、区、市各级土地部之下，均设没收分配科、土地建设科、山林水利科、调查登记科、农事试验场及农产品展览所。在土地没收分配问题彻底解决了的县、区、市，没收分配科的工作，应归并于土地建设科。

区级市土地部之下，还可组织临时的委员会：没收分配委员

会、查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等。

第一百一十一条　省土地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

县、区、市各级土地部，均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没收分配科、土地建设科、山林水利科、调查登记科，各设科长一人。农事试验场、农产品展览所，各设主任一人。

省土地部及中央直属市土地部，均设秘书一人。

县土地部及省属市土地部，均设文书一人。

第一百一十二条　土地部部长、副部长及各科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的职权。

（二）没收分配科，管理依照土地法令对于土地财产之没收、分配及对于土地之检查（查田运动）。

（三）土地建设科，管理发展农业生产事项，如各季的耕种与收获，调剂人工，开发荒地，调剂耕牛，改良农具，选择种子，增加肥料，改良栽培方法，消灭害虫，组织和指导农事试验场、农产品展览所、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

（四）山林水利科，管理坡地、河堤、池塘的修筑与开发，水车的修理和添置，山林的种植培养、保护与开垦等。

（五）调查登记科，管理土地的调查、登记、统计及发给土地证等。

第三　军事部

第一百一十三条　县、区、市均设军事部。

省设军区司令部，为县军事部的上级机关。

省军区司令部及县、区、市军事部之下，均不设委员会。

（注）省军区司令部及中央直属市的军事行政机关之组织，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

第一百一十四条　县及省属市军事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之职权。

第一百一十五条　县及省属市军事部，设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各设科长一人。其职权如下：

（一）第一科长，管理地方部队的编制与训练，并兼赤卫军司令部第一参谋。

（二）第二科长，管理扩大红军及一切战争动员工作，并兼赤卫军司令部第一参谋。

（三）第三科长，保管和分配武器弹药，并管理军事部其他杂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　区及县属市军事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之职权。

第一百一十七条　区军事部设第一科、第二科，各设科长一人。

其职权如下：

（一）第一科长，管理地方部队的编制训练事项，并兼区或市赤卫军参谋长。

（二）第二科长，管理扩大红军及一切战争动员工作。

第一百一十八条　县及省直属市军事部设秘书一人，区及县直属市军事部设文书一人。

第四　财政部

第一百一十九条　省、县、区、市各级财政部之下，均设财政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财政各种问题的机关。财政委员会省由十一人至十五人，县由九人至十一人，区由七人至九人组织之。市按市之大小，由七人至十五人组织之。

第一百二十条　各级财政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会计科长、税务科长、国有财产管理科长、国民经济部的代表、分库或支库的主任、银行行长、所在地附近的下级财政部长、与财政部工作有联系的机关的代表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此职者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的主任。

财政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团审查通过之后，须送上级财政部批准。

第一百二十一条　省、县、区、市各级财政部之下设会计科、税务科、国有财产科。此外，在应该进行对于剥削者没收和征发的地方，组织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农业税征收时，区及市的财政部之下，组织农业税征收委员会。

在发行公债时，组织公债发行委员会。

在山林多的地方，组织国有山林管理委员会。

各委员会的委员，由部长以命令委任之。

第一百二十二条　省财政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

县、区、市各级财政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会计科、税务科、国有财产科，各设科长一人。

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省及中央直属市财政部均设总务科、会

省军区司令部及县、区、市军事部之下，均不设委员会。

（注）省军区司令部及中央直属市的军事行政机关之组织，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

第一百一十四条　县及省属市军事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之职权。

第一百一十五条　县及省属市军事部，设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各设科长一人。其职权如下：

（一）第一科长，管理地方部队的编制与训练，并兼赤卫军司令部第一参谋。

（二）第二科长，管理扩大红军及一切战争动员工作，并兼赤卫军司令部第一参谋。

（三）第三科长，保管和分配武器弹药，并管理军事部其他杂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　区及县属市军事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之职权。

第一百一十七条　区军事部设第一科、第二科，各设科长一人。

其职权如下：

（一）第一科长，管理地方部队的编制训练事项，并兼区或市赤卫军参谋长。

（二）第二科长，管理扩大红军及一切战争动员工作。

第一百一十八条　县及省直属市军事部设秘书一人，区及县直属市军事部设文书一人。

第四　财政部

第一百一十九条　省、县、区、市各级财政部之下，均设财政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财政各种问题的机关。财政委员会省由十一人至十五人，县由九人至十一人，区由七人至九人组织之。市按市之大小，由七人至十五人组织之。

第一百二十条　各级财政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会计科长、税务科长、国有财产管理科长、国民经济部的代表、分库或支库的主任、银行行长、所在地附近的下级财政部长、与财政部工作有联系的机关的代表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此职者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的主任。

财政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团审查通过之后，须送上级财政部批准。

第一百二十一条　省、县、区、市各级财政部之下设会计科、税务科、国有财产科。此外，在应该进行对于剥削者没收和征发的地方，组织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农业税征收时，区及市的财政部之下，组织农业税征收委员会。

在发行公债时，组织公债发行委员会。

在山林多的地方，组织国有山林管理委员会。

各委员会的委员，由部长以命令委任之。

第一百二十二条　省财政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

县、区、市各级财政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会计科、税务科、国有财产科，各设科长一人。

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省及中央直属市财政部均设总务科、会

计科长一人。

省及中央直属市财政部，均设秘书一人。

县及省直属市财政部，均设文书一人。

第一百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部长、副部长及各科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的职权。

（二）会计科，管理钱币的出纳、账目的登记、预算书计算书的编制等。会计科之下，设记账、出纳、审核等股。

（三）税务科，管理商业税、农业税、山林税之征收、检查及监督。税务科之下，设农业税股、商业税股及记账员，必要时设山林税股。

（四）国有财产科，管理本部管辖的国有山林、矿山、店铺、房屋、工厂、作坊等国有财产之登记、整理，出租、借入公款的清查及登记，各种租金的征收。国有财产科之下，可以组织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

（五）总务科，管理伙食、印刷、收发及一切不属于各科的事项。

第五　国民经济部

第一百二十四条　省、县、区、市各级国民经济部下均设国民经济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国民经济各种问题的机关。

国民经济委员会，省由十五人至十九人，县由十三人至十五人，区由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之。市按市之大小，由十三人至十九人组织之。

第一百二十五条　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设计科长、工业科长、调查统计科长、运输管理局长、贸易局长、各社指导委员会主任、劳动部、土地部、财政部、职工会及其同级合作社的代表、所在地的下级国民经济部长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此职务者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的主任。

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团审查通过后须送上级国民经济部批准。

第一百二十六条　各级国民经济部之下，设设计科、工业科、商业科、调查统计科、合作社指导委员会、运输管理局（或支局）、贸易局（或支局），必要时设国有企业科，但区一级必要时不设工业、商业两科。

第一百二十七条　省国民经济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

县、区、市各级国民经济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设计科、调查统计科、国有企业科，各科设科长一人。

运输管理局、贸易局，各设局长一人。

省及中央直属市国民经济部均设秘书一人，县及省辖市国民经济部均设文书一人。

第一百二十八条　各级国民经济部长、副部长、各科及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之职权。

（二）设计科，拟具所属范围内农林、工、商、矿、交通等业发展与调剂的计划。

（三）工业科，管理工业之发展及调剂。

（四）商业科，管理商业之发展及调剂。

（五）调查统计科，管理所属范围内农林、工、商、矿、交通等业及其他必要事项的调查与统计。

（六）国有企业科，管理各种国有企业经营。

（七）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管理指导合作社的发展，并监督其工作。

（八）贸易局，管理国营贸易。

（九）运输管理局，管理国有企业的运输。

第一百二十九条　各级国民经济部，得聘请专门人才，设立专门机关，以进行某些必要的工作。

第六　粮食部

第一百三十条　省、县、区、市各级粮食部之下均设粮食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粮食问题的机关。粮食委员会，省由十五人至十九人，县由十三人至十五人，区由九人至十五人组织之。市按市之大小，由十一人至十七人组织之。

第一百三十一条　各级粮食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调剂科长，备荒科长，仓库保管科长，粮食合作社指导员，红军公谷管理委员会主任，土地税谷保管委员会主任，粮食调剂局长，国民经济部、财政部、土地部、职工会的代表，所在地下级粮食部长及其他工作人员能任此职务者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主任。

粮食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团审查通过后，须送上级粮食部批准。

第一百三十二条　省、县、区、市各级粮食部之下，设调剂

科、备荒科、仓库保管科、红军公谷管理委员会、土地税谷保管委员会、粮食调剂局或支局等。

第一百三十三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粮食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秘书一人。

县、市、区各级粮食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县及省直属市设文书一人，调剂科、备荒科、仓库保管科，各科设科长一人。

粮食调剂局（或支局）设局长一人，红军公谷保管委员会、土地税谷保管委员会各设主任一人。

第一百三十四条　各级粮食部部长、副部长、各科及委员会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的职权。

（二）调剂科、调查统计所属范围内粮食产销状况，拟具并执行调剂计划。

（三）备荒科，筹划并管理关于备荒一切事宜。

（四）仓库保管科，管理仓库粮食的出纳事宜。

（五）红军公谷保管委员会，收集所属范围内红军公谷并保管之。

（六）土地税谷保管委员会，集中所属范围内的土地税谷并保管之。

（七）粮食调剂局，调剂粮食的产销，保证红军与民众粮食供给。

第七　教育部

第一百三十五条　省、县、区、市各级教育部之下均设教育委

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文化教育各种问题的机关。

教育委员会，省由十三人至十七人，县由十一人至十五人，区由九人至十三人组织之。市按市之大小，由九人至十七人组织之。

第一百三十六条　各级教育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普通教育科长，社会教育科长，编审出版科长，共产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工会等群众团体的代表，政府机关报主笔，当地学校的校长（一至二人），各种文化团体的代表及所在地的下级教育部长等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的主任。教育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主席团审查通过后，须送上级教育部批准之。

第一百三十七条　省教育部下，设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编审出版科。

县、区、市教育部下，设普通教育科与社会教育科。

第一百三十八条　省教育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

县、区、市各级教育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普通教育科、社会教育科、编审出版科，各设科长一人。

省及中央直属市教育部，设秘书一人。

县及省属市教育部，设文书一人。

第一百三十九条　各级教育部部长、副部长及各科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的职权。

（二）普通教育科，管理成年青年的补习教育、儿童教育及中等教育。

（三）社会教育科，管理俱乐部、电影、戏园、地方报纸、书报阅览所、图书馆、革命博物馆、巡视讲演等。

（四）编审出版科，管理普通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各种材料之编辑

审查、下级教育部及私人编辑的材料，并管理出版事业。

第八　内务部

第一百四十条　省、县、市、区各级内务部之下，均设内务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内务部工作各种问题的机关。

内务委员会，省由十五人至二十一人，县由十一人至十五人，区由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之。市按市之大小，由十三人至十九人组织之。

第一百四十一条　各级内务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选举指导科长、交通科长、优待红军科长、卫生科长、社会保证科长、民事行政科长、义务劳动科长、民警分局局长或民警厅厅长、苦力运输工会的代表、革命互济会的代表、所在地的下级内务部部长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此职者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主任。

内务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团审查通过后，须送上级内务部批准。

第一百四十二条　省、县、区、市内务部之下，设选举指导科、交通科、优待红军科、卫生科、社会保证科、民事行政科、义务劳动科。

第一百四十三条　省内务部所在地，设省民警分局，直属于中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民警管理局。民警分局之下，在大城市设民警厅，小城市设民警所，成为直的组织系统，但同时受所在地各级内务部的指导和节制。

第一百四十四条　省内务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

县、区、市各级内务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选举指导科、交通科、优待红军科、卫生科、社会保证科、民事行政科、义务劳动科，各设科长一人。

省及中央直属市内务部，设秘书一人。

县及省属市内务部设文书一人。

第一百四十五条　省民警分局设局长、副局长各一人。

民警厅设厅长、副厅长各一人。

民警所设所长、副所长各一人。

（注）民警的详细组织，另以专门条律规定。

第一百四十六条　各级内务部长、副部长及各科、局、所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本部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之职权。

（二）选举指导科，管理苏维埃的选举工作，监督选举法正确执行，收集和统计关于选举工作的材料，解决选举中发生的问题等。

（三）交通科，管理道路、桥梁、船渡、河堤、茶亭等之建筑和修理，船只车辆之登记等。

（四）优待红军科，管理红军之登记和统计监督，红军优待条例之执行，发动群众并分配劳动力帮助红军耕种土地，解决红军家属的其他困难问题等。

（五）卫生科，管理关于群众卫生运动之指导，医院、诊断所、疗养所之指导，医生之登记和考试，药店之检查，药材合作社之组织，医生教育等。

（六）社会保证科，管理因战争因灾荒而发生之被难群众的救济、地方武装及苏维埃工作人员参加革命战争牺牲或残废者之抚恤、荒年粮食之救济、备荒仓之指导等。

（注）红军抚恤属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设之抚恤委员会及分会。

（七）民事行政科，管理户口、婚姻、生死之登记和统计，监督婚姻条例正确执行，市政之指导，居民众之须发等。

（八）义务劳动科，管理国家一切义务劳动之登记、统计和分配。

（九）民警分局、民警厅及民警所，管理各市民警事务。

第一百四十七条　为讨论某些专门问题，各科之下得组织临时的专门委员会。

第九　裁判部及军事裁判所

（注）各级地方苏维埃设立裁判部，红军部队则设立军事裁判所。

第一百四十八条　省、县、区、市各级裁判部之下均设裁判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关于司法行政、关于检察与审判各种问题的机关。

裁判委员会，省由九人至十三人，县由九人至十一人，区由七人至九人，市由七人至十三人组织之。

第一百四十九条　各级裁判委员会由部长，副部长，裁判员，检察员，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或特派员，民警分局或民警厅长或民警所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劳动部及职工会的代表，所在地下级裁判部长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其职者组织之，以部长为委员会主任。

裁判委员会的委员，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团审查通过之后，须送

上级审裁判部批准。

第一百五十条　省裁判部在司法行政上隶属于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

在检察与审判方面则受临时最高法庭的节制。

第一百五十一条　各级裁判部之下，组织刑事法庭、民事法庭，有必要时可组织巡回法庭。市裁判部之下，并须组织劳动法庭。

刑事法庭，审判刑事案件。

民事法庭，审判民事案件。

至于巡回法庭，则到出事地点去审判比较重要的刑事与民事案件，以便吸收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广大群众来观审。

劳动法庭，审判关于违犯劳动法令的案件。

第一百五十二条　省裁判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裁判员一人至三人、巡视员二人至五人、检察员一人至五人、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三人。

县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裁判员一人至二人，巡视员二人至三人，检察员二人至三人，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二人。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文书一人。

市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裁判员一人至三人，检察员一人至三人，文书一人至二人。

第一百五十三条　部长、副部长、检察员、裁判员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的职权。

（二）检察员，管理调查案件、预审案件及助理法庭告发事宜。

（三）裁判员，管理审问及判决案件。

第一百五十四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裁判部之下，设看守所及劳

动感化院；县及省直属审裁判部之下，设看守所，必要时亦得设立劳动感化院，为监禁及教育犯人的机关；区设看守所。

第一百五十五条　在司法范围内，各级裁判部有随时调动赤卫军、民警所、政治保卫队之权。

第一百五十六条　军事裁判所分为初级军事裁判所、阵地军事裁判所及高级军事裁判所。

第一百五十七条　高级军事裁判所在司法行政上隶属于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检察及审判方面则受临时最高法庭的节制。

何处应设军事裁判所及其管辖范围如何，由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命令规定之。

第一百五十八条　初级和高级军事裁判所之下，均设裁判委员会。

初级军事裁判所的裁判委员会，由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高级军事裁判所的裁判委员会，由七人至九人组织之。

第一百五十九条　初级及高级裁判所的委员会，由所长、副所长、裁判员、检察员、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或特派员、军队的政治机关的代表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此职者组织之，以所长为主任。

第一百六十条　初级和高级裁判所均须组织民事、刑事法庭，有必要时，得组织巡回法庭，以审判案件，与裁判部同。

第一百六十一条　高级军事裁判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一人至二人、检察员二人至三人、裁判员一人至三人、巡视员二人至五人、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三人。

初级军事裁判所设所长、副所长各一人，检察员一人至二人，裁判员一人至二人，文书一人至二人。

各级军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高级军事裁判所得按照工作情

上级审裁判部批准。

第一百五十条　省裁判部在司法行政上隶属于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

在检察与审判方面则受临时最高法庭的节制。

第一百五十一条　各级裁判部之下，组织刑事法庭、民事法庭，有必要时可组织巡回法庭。市裁判部之下，并须组织劳动法庭。

刑事法庭，审判刑事案件。

民事法庭，审判民事案件。

至于巡回法庭，则到出事地点去审判比较重要的刑事与民事案件，以便吸收出事地点及其附近的广大群众来观审。

劳动法庭，审判关于违犯劳动法令的案件。

第一百五十二条　省裁判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一人至二人、裁判员一人至三人、巡视员二人至五人、检察员一人至五人、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三人。

县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裁判员一人至二人，巡视员二人至三人，检察员二人至三人，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二人。区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文书一人。

市裁判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裁判员一人至三人，检察员一人至三人，文书一人至二人。

第一百五十三条　部长、副部长、检察员、裁判员的职权如下：

（一）部长管理全部工作；副部长、助理部长进行工作，部长因故离职时，代理部长的职权。

（二）检察员，管理调查案件、预审案件及助理法庭告发事宜。

（三）裁判员，管理审问及判决案件。

第一百五十四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裁判部之下，设看守所及劳

动感化院；县及省直属审裁判部之下，设看守所，必要时亦得设立劳动感化院，为监禁及教育犯人的机关；区设看守所。

第一百五十五条　在司法范围内，各级裁判部有随时调动赤卫军、民警所、政治保卫队之权。

第一百五十六条　军事裁判所分为初级军事裁判所、阵地军事裁判所及高级军事裁判所。

第一百五十七条　高级军事裁判所在司法行政上隶属于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检察及审判方面则受临时最高法庭的节制。

何处应设军事裁判所及其管辖范围如何，由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命令规定之。

第一百五十八条　初级和高级军事裁判所之下，均设裁判委员会。

初级军事裁判所的裁判委员会，由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高级军事裁判所的裁判委员会，由七人至九人组织之。

第一百五十九条　初级及高级裁判所的委员会，由所长、副所长、裁判员、检察员、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局长或特派员、军队的政治机关的代表及其他工作人员中能任此职者组织之，以所长为主任。

第一百六十条　初级和高级裁判所均须组织民事、刑事法庭，有必要时，得组织巡回法庭，以审判案件，与裁判部同。

第一百六十一条　高级军事裁判所设所长一人、副所长一人至二人、检察员二人至三人、裁判员一人至三人、巡视员二人至五人、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三人。

初级军事裁判所设所长、副所长各一人，检察员一人至二人，裁判员一人至二人，文书一人至二人。

各级军事裁判所的工作人员，高级军事裁判所得按照工作情

形，拟具意见报告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经人民委员会同意之后，以命令增减之。

第一百六十二条　军事裁判所所长管理本所全所工作；副所长、助理所长进行工作，所长因故离职时代理所长之职权。检察员、裁判员的职权，与裁判部的检察员、裁判员同。

第一百六十三条　各级裁判部初级及高级军事裁判所均设置法警，其人数由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以命令规定之。

第一百六十四条　没有选举权的人（十六岁以下的人包括在内），不得担任裁判部及军事裁判所的工作。

第十　工农检察委员会

（注）工农检察委员会的任务规定于苏维埃中央政权组织法内，这里规定的限于省、县、区、市各级的组织。

第一百六十五条　省、县、区、市各级工农检察委员，由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依照应到名额选出的委员组织之。

省由十三人至二十一人，中央直属市同。

县由九人至十一人（省直属区市同）。

区由五人至七人（县直属区市同）。

第一百六十六条　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的委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者方为合格：

（一）有阶级觉悟、最忠实于苏维埃政权的工人、农民、贫民及其他有革命历史的分子，但工人至少占百分之四十。

（二）没有受过苏维埃法庭的刑事处分者。

第一百六十七条　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为各级苏维埃行政机关

的一部分，其直隶属关系与其他行政机关相同。

第一百六十八条　省、县、区、市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应与中国共产党省、县、区、市各级检察委员会合在一个机关内办公，取得密切的联系。

第一百六十九条　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均推选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主席负处理日常工作及督率工作人员进行工作之责；副主席、助理主席进行工作，主席因故离职时代理主席的职权。

第一百七十条　省、县、区、市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之下设控告局，管理人民的控告、工农通讯员的通讯等，控告局设局长一人。

省及中央直属市设秘书一人，县及省直属市设文书一人，助理文字及事务工作。

省及中央直属市设巡视员五人至九人，县及省直属市设巡视员二人至五人，负巡视和指导某些指定工作之责。

第一百七十一条　省、县、区、市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须在一切国家机关中、企业中、工厂中、作坊中、学校中、社会团体中、街道中、村落中，建立通信员，形成通信网，通信员不脱离生产。

第一百七十二条　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有向同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建议处罚或撤换某些国家机关中和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之权。这些人员中如查出有犯罪实据者，须移送司法机关办理。

第一百七十三条　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对于其管辖范围内某些国家机关有工作设施的意见时，得直接向该机关或企业提出建议。

第一百七十四条　各级工农检察委员会对于某些国家机关中或企业中的工作人员进行检举时，得组织临时的检举委员会，当着检查某国家机关、某企业的工作时，得组织临时的检察委员会。

第十一　国家政治保卫局

（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任务，规定于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内，这里仅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省、县、区、市各级的组织和权限。

第一百七十五条　国家政治保卫局各级的机关，完全为集权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采取委任制度。

第一百七十六条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省及中央直属市、县及省直属市，均设分局，区及县直属市设特派员。方面军、军团均设分局，师团及独立营设特派员及干事。国家政治保卫局于必要时，得在某些机关中直接设特派员。

第一百七十七条　各级政治保卫局之下，有一委员会组织，负责审察和讨论保卫局工作及其所得材料。各局局长是该委员会主席，参加的委员应有同级共产党代表及法院（现为裁判部）之检察员。最高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委员，由中央人民委员会批准委任之，以下各分局委员会委员，则由国家政治保卫局委任。

第一百七十八条　省、中央直属市及方面军、军团的各分局，设执行部、侦察部、总务处。

执行部之下，设执行科、预审科。

侦察部之下，设侦察科、检查科。

县、省直属市各分局设执行科、侦察科、总务科。

第一百七十九条　省、中央直属市及方面军军团各分局，设局长一人、副局长一人。

执行部、侦察部，各设部长一人。

执行科、预审科、侦察科、检查科，各设科长一人。

总务处，设处长一人。

县及省直属市分局，设局长、副局长各一人。

执行科、侦察科，各设科长一人。

总务科，设科长一人。

其他工作人员，由省、中央直属市及方面军分局酌量情形，拟定人数，报告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命令规定增减之。

第一百八十条　局长及各科的职权如下：

（一）局长管理全局工作，指导下级分局或特派员。副局长、助理局长进行工作，局长因故离职时，代理其职权。

（二）执行部（或科），管理、拘捕、审问及处理犯人，并领导保卫队，监督护照、通行证、路条之发给。

（三）侦察部（或科），组织工作网，指导侦察工作，检查邮件与白区书报。

（四）总务处（或科），管理局内的事务工作。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国家政治保卫分局，对于一切反革命案件，有侦察、逮捕和预审之权。至于依据法律判决和执行之权，则一般地属于司法机关。特派员只有在上级给与他的任务的范围内进行工作之权，非经上级许可不得擅自捕人，但遇特殊情形时（如反革命分子逃跑或反革命已决定暴动等）不在此例。

第一百八十二条　国家政治保卫局各级机关的行动，须受法律的限制。在法律范围内，法院的检察员，有检察国家政治保卫局各级机关的案件之权。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各级机关对于某机关或某团体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执行逮捕以前，必须通知该机关或该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如认为该机关或该团体的主要负责人无可以接受预

告的资格，则须于执行前通知其上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

第一百八十四条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各分局，有组织为自己使用的武装队伍之权。

第一百八十五条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分局及特派员，与地方苏维埃机关及红军的指挥机关和政治机关，须发生横的密切的联系，局长及特派员，得出席这些机关的会议。

第十二　审计委员会

第一百八十六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审计委员会，隶属于中央审计委员会，同时受省及中央直属市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指导与节制。

第一百八十七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审计委员会以委员七人至九人组织之，工农检察部委员会主席、国民经济部长、裁判部长及省一级军事行政机关的首长，为当然的委员，审计委员会设主任一人。

审计委员会之下得设秘书、文书各一人，审核员二人至五人。

第一百八十八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审计委员会的任务为审核省苏维埃及全省一级苏维埃、市苏维埃及全市各市区苏维埃财政收支的预算与决算，审核财政机关的临时收支账目，并得向中央审计委员会提出该省或该市预算的原则。

第一百八十九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审计委员会如查出各级苏维埃及地方部队对于财政收支事项有违背法令或不正当的事情时，得提出解决的办法于主席团，并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

第一百九十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审计委员会，除随时将审计情形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及省市主席团外，于每会计年度之终，将一

年审计经过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及省市主席团。

第一百九十一条　县不设审计委员会，对于各区及县直属市的预算决议，由财政委员会作初步审核，送省审计委员会审核之。

第一百九十二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审计委员会对于下级苏维埃财政收支事项认为有调查之必要时，得派遣审核员实地调查之。

第十三　总务处

第一百九十三条　省、县、区、市各执行委员会之下，设总务处管理各级执行委员会内部的事务，各级总务处设处长、副处长各一人，由各级主席团委任之。

第一百九十四条　省及中央直属市县及省属市总务处之下，设文书科、会计科、收发科、管理科，各设科长一人，区及县直属市总务处之下，设秘书一人，文书一人至三人，收发员、管理员各一人。

第一百九十五条　各级总务处仅受同级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的节制，不发生上下级的隶属关系。

但为了某些事务工作的必要，如纠正收发工作的错误、改良文书与印刷的技术、调派技术工作人员等，上级执行委员会的总务处得给下级执行委员会总务处以指示，并得要它对于这些事项作报告。

第五章　地方苏维埃的权力

第一百九十六条　省、县、区、市各级苏维埃的权力如下：

（一）执行中央政权机关的一切法律、命令、决议与指示，执行

各该上级机关的命令、决议与指示。

（二）决定并执行本区域内关于各种苏维埃建设工作的计划。

（三）解决一切地方性质的问题。

（四）统一本区域内各级苏维埃机关的行政工作。

第一百九十七条　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对于全省各级苏维埃有监督之权。

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对于全县各级苏维埃有监督之权。

下级苏维埃机关绝对服从上级苏维埃机关。

下级苏维埃的决议、命令及指示，有违背中央政权机关的法律、命令、决议、指示及该管上级机关的命令、决议、指示者，上级苏维埃得取消之。

下级苏维埃机关如有违抗上级苏维埃机关的命令、决议、指示者，各该上级苏维埃机关得将其一部改造或全部解散之。

第六章　临时地方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

第一百九十八条　一切在暴动时期的地方和红军新占领的地方组织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先有革命群众团体的组织与工作而暴动起来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方式如下：

（一）市或乡的革命委员会，由市或乡的革命群众团体选派代表组织之。

（二）区革命委员会，由市或乡的革命委员会选派代表与区一级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共同组织之。

（三）县革命委员会，由区革命委员会选派的代表与县一级革命群众团体的代表共同组织之。

（四）省革命委员会，由县革命委员会选派的代表与省一级革命群众团体选派的代表共同组织之。

但每个革命委员会的名单，除中间被白区隔离、交通断绝的地方外，均须报告上级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得其审查与批准。

第二百条　在红军或游击队新占领而过去没有相当革命群众团体的组织与工作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方式如下：

（一）市或乡的革命委员会，由该市或该乡工作的红军或游击部队的政治机关指定委员名单，由该政治机关委任之。但委任后仍须召集该市或该乡工农贫民群众开会，报告此委任的名单，如当地附近不远有上级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须报告该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加以委任。

（二）区的及县的革命委员会，由在该县工作的红军或游击部队的政治机关指定委员名单，加以委任，但须召集全区或全县尽可能到会的工农贫民群众开会提出报告。

第二百零一条　革命委员会，乡由七人至十一人，区或市由十一人至十九人，县由十五人至二十五人到三十五人组织之。

第二百零二条　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九人至十一人，由省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推举，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之，或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委任之。

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五人至九人，由县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推举，报告省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委任之，或由省苏维埃或省革命委员会直接委任之。

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三人至五人，由区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推举，报告县苏维埃或县革命委员会委任之，或由县苏维埃或县革命委员会直接委任之。

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五人至十一人，由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推举，报告其所隶属的上级政府委任之，或直接由上级政府委任之。

乡革命委员会不设主席团。

第二百零三条　省革命委员会、县革命委员会均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至二人。

区革命委员会、乡革命委员会均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

市革命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至二人。

主席及副主席均由主席团会议推举，报告上级政府委任之，或直接由上级政府委任之。

第二百零四条　省、县、区、市革命委员会之下均设劳动部、土地部、军事部、肃反委员会、财政部、粮食部，依其工作发展的程序可以增设其他的部。

各部设部长、副部长各一人。

肃反委员会，乡由七人至九人，区及市由七人至十一人，县及省由五人至七人组织之。

其他工作人员，按工作情形，由省苏维埃或省革命委员会拟定人数，报告中央各部，经人民委员会同意之后，以命令规定并增减之。

各部之下设各部委员会，其人数与职务同于各级苏维埃的各部（粮食部同于国民经济部）。

第二百零五条　各部直接隶属于各该部的上级，绝对服从各该部上级的命令，但同时受同级革命委员会的指导和节制。

第二百零六条　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是：发展工农贫民群众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斗争，从当地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队伍中夺取其武装，组织革命委员会自己指挥而成分完全是被剥削的工农贫民（无任何剥削分子参加）的红色武装队伍，极力发展革命的战争，消灭并镇压当地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领导群众极力镇压已被推翻而仍然暗中活动的一切反革命分子，领导群众没收并分配土地，实行劳动法，组织工会及贫农团，使之成为革命委员会的柱石，在城市中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监督资本家的企业与商店，最后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正式政权机关（苏维埃）。

第二百零七条　由革命委员会改变为苏维埃须看当地工农贫民群众革命斗争发展的程度，由当地的最高政权机关决定之。

第七章　附则

第二百零八条　本组织法自颁布之日起发生效力。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组织法的各条得随时修改或废止之。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公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关于红军中逃跑分子问题

（1933年12月15日）

逃跑是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凶恶敌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过去对于逃跑分子没有统一的处置方法，因此特以命令宣布：

（一）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

（二）组织逃跑（如造假、印假路条等）率领一班一排一连逃跑者，对这样的领导分子，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

（三）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律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到枪决。

（四）因政治觉悟不够而个人逃回者，各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组织优待他们家属的工作，使他们自愿归队。对他们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如逮捕禁闭，则以违反苏维埃法律论罪。

（五）逃跑分子经宣传解释而顽固不归队者，政府得以群众赞助的条件下，要他赔偿国家（军衣、军毡）及群众的损失（优待他们家属的劳动力）并剥夺其选举权。

（六）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许收容在后方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中工作和服务，如收容逃跑分子则该机关负责人应受降职撤职以至禁闭的处分。

（七）凡不执行本命令者以帮助逃跑、破坏红军论罪。

（八）本命令自公布日起发生效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1933年12月15日）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

（一）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

（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

（丙）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

（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

（二）凡犯第一条各项之一者，除第一条各项规定的处罚外，得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并追回其贪污之公款。

（三）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罪，照第一、第二两条处治之。

（四）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务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

（1933年12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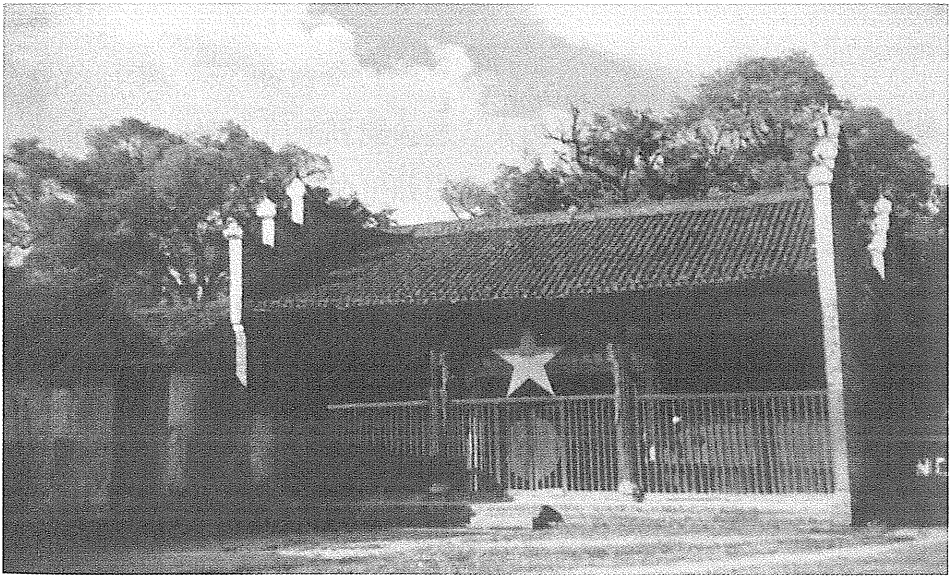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人民革命军的将士们：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代表同你们的代表订立反日反蒋的协定草约以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但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的反日反蒋的行动，亦没有看到你们在发动群众斗争与武装民众进行反日反蒋的方面有任何具体的实际工作。而蒋介石却已经派了三个纵队向福州与延平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也已经准备好以占领福州厦门来响应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你们与福建广大民众是在极端危险的中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郑重地告诉你们，在这一危险前面的任何消极与迟疑不决，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大的罪恶，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你们立刻依照我们反日反蒋草约上所决定的基本原则，采取断然的行动，集中你们所有的武装力量，立刻开始反蒋的决战，同时必须最坚决地发动与武装广大的民众，组织真正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真正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民主权利来开展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我们相信只有依靠于千百万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

党政府，我们盼望你们迅速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

毛泽东　朱德
十二月二十日

1934



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政府大院。

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第二电

（1934年1月13日）

人民政府李、陈、蒋诸委员：

依据目前情势福州既濒危急，人民政府已在危险之中，苏维埃中央政府根据过去双方协定敌以反日反蒋联合战线的精神向贵政府作下列紧急提议：

一、人民政府应立即实践其宣言中及协定上所允诺的人民民主权利。

二、人民政府应立刻武装福州及其附近与泉漳各地的群众，赞助和拥护广大群众参加反日反蒋战线以保卫福州及泉漳各地。

三、赞助群众，立即组织反日反蒋的斗争团体，不应借口战局紧张妨碍或禁止这种组织的发展。

四、应实际地赞助蒋敌后方（如闽浙沿海各地）的民众武装组织，和反日反蒋活动。

五、应有决心地肃清自己队伍中准备向蒋介石投降，或请托帝国主义保护的分子。

六、向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宣传为反日反蒋只有与苏维埃和红军合作到底，并采取一切有效方法与联合一致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与日帝国主义显已协同动作，并以扑灭十九路军为共同

目的，贵政府果欲真正贯彻反日反蒋主张，则我们上述提议是挽救目前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濒于危险的唯一出路，亦即贵政府对于自己负责的宣言与协定中所许诺者究有决心实现与否之最后试验。要知反日反蒋的民众的与武装的战线果能真实建立，即使福州失陷蒋介石与日帝国主义者必不能长治久安，而这一联合战线在全国亦必日益开展无疑。且贵政府果肯武装民众赞助福建首先是福州人民自卫，则时局将有新的开展，福州未必不保也。时机危急，希即考虑赐复为盼。

毛泽东　朱德

一月十三日

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写的碑文[1]

（1934年1月15日）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

[1] 1933年8月1日，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我党历史上第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在红色国都瑞金的叶坪村动工。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建立的。1934年1月15日，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挥笔为即将竣工的纪念塔题写碑文。

目的，贵政府果欲真正贯彻反日反蒋主张，则我们上述提议是挽救目前人民政府及十九路军濒于危险的唯一出路，亦即贵政府对于自己负责的宣言与协定中所许诺者究有决心实现与否之最后试验。要知反日反蒋的民众的与武装的战线果能真实建立，即使福州失陷蒋介石与日帝国主义者必不能长治久安，而这一联合战线在全国亦必日益开展无疑。且贵政府果肯武装民众赞助福建首先是福州人民自卫，则时局将有新的开展，福州未必不保也。时机危急，希即考虑赐复为盼。

毛泽东　朱德
一月十三日

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写的碑文[1]

（1934年1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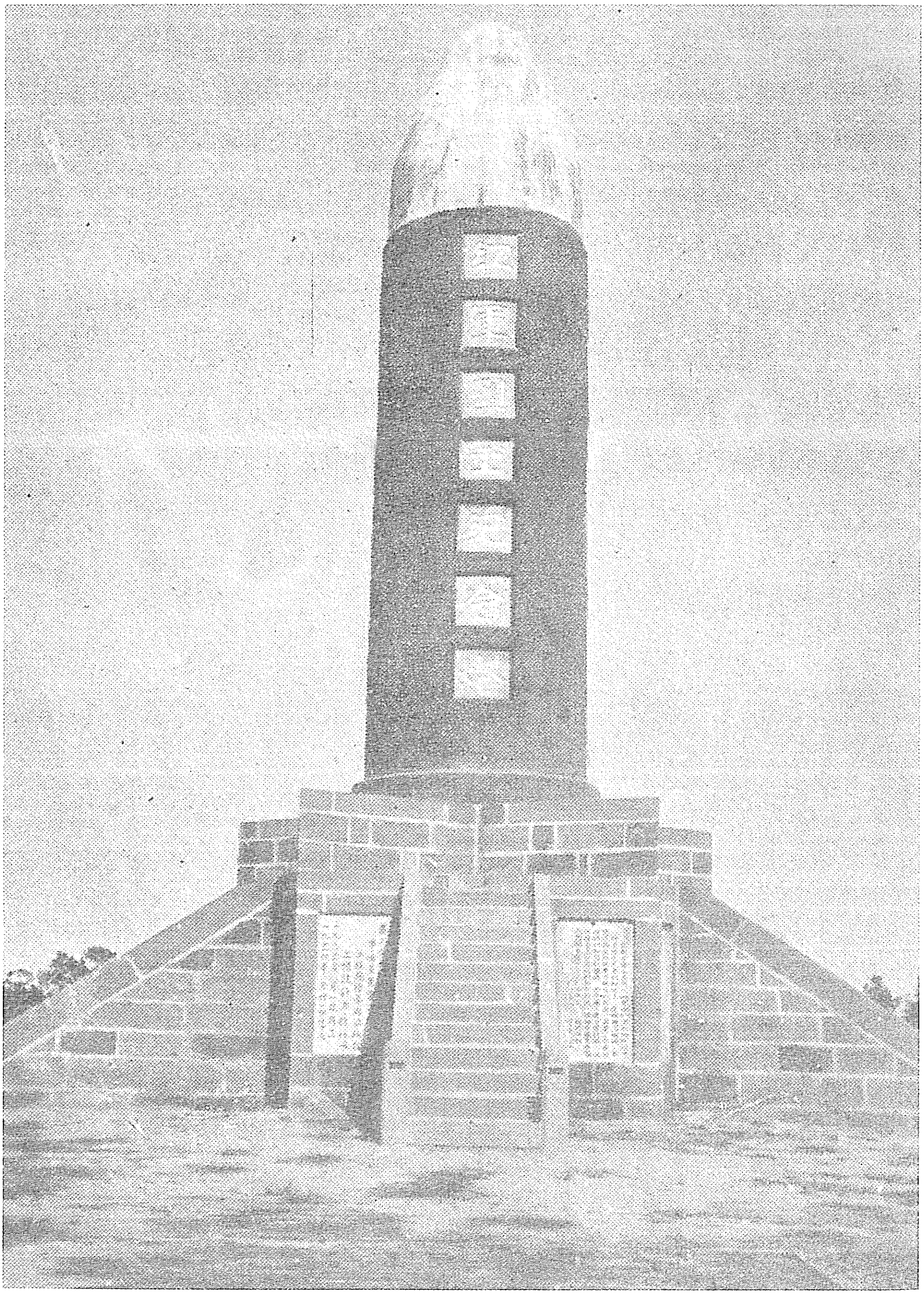
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这些同志牺牲，表现了无产阶级不可战胜的英勇，奠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

---

[1] 1933年8月1日，为了纪念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我党历史上第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塔在红色国都瑞金的叶坪村动工。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迎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而建立的。1934年1月15日，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挥笔为即将竣工的纪念塔题写碑文。



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词

（1934年1月22日）

同志们！现在我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鼓掌，奏乐）

同志们！今天是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代表们致革命的敬礼！（全体鼓掌，起立欢呼！）

同志们！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有两年又两个月了。两年来，全国事变的发展，完全显示了反革命统治阶级是更进一步动摇崩溃，而苏维埃运动与全国革命斗争则是大大的发展了。

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侵略的国家，是一个受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屠杀、压迫、奴役的国家，全国广大的领土很多被国民党送给帝国主义者了，使全中国受着帝国主义瓜分共管的威胁，使中国快到了完全灭亡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自己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创立了自己的政府与军队。我们在第一次全苏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此全国就是两个政权的极端尖锐的对立了。

两年来革命的发展，使全国革命形势更加发展了。广大民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两年来我们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帝国主义国民党在我们胜利的面前发抖起

来了，他们继续四次“围剿”之后，组织了五次以至六次的“围剿”。但是我们打破了敌人五次的“围剿”，在粉碎第六次“围剿”中间，我们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现在我们是处在对六次“围剿”的决战中，是处在最紧急的关头。

两年来，全国红军在浴血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中间，我们许多同志为着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光荣地牺牲了。许多同志在国民党区域、在白色区域领导革命斗争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屠杀了。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这些同志中间如黄公略、赵博生、韦拔群、恽代英、蔡和森、罗登贤、邓中夏、陈原道、何子述、鲁易、王良、关阿林、张锡龙、吴高群、彭鳌、孙小宝、傅作玉、童长荣、伯阳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我建议我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同志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全体代表起立静默三分钟）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任务是要彻底粉碎敌人的六次“围剿”，是要把苏维埃运动推到全国去，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灭亡中国的阴谋毒计。我们的大会是担负着很大的责任，我们的大会应该号召全苏区全中国民众为着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号召全苏区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集中一切力量，粉碎六次“围剿”，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大的彻底的胜利，实行抗日讨蒋，争取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我们的大会是全国最高的政治机关，他有着极大的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相信一定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完全的把握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大会将使六次“围剿”得到彻底粉碎。把革命发展到全中国去，把苏维埃版图扩大到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

的地方去，把红旗插到全国去，让我们高呼：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压倒一切的鼓掌声，全体起立欢呼！）

给东北人民革命军及义勇军的信

（1934年1月22日）

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义勇军亲爱的同志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本月在瑞金开幕，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以来，即已发布了对日宣战的宣言，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并于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发布宣言，只要停止向苏区与红军进攻，允许人民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三个条件之下，苏维埃与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对日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华北及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向中国进攻，完全采取一贯的不抵抗政策，投降帝国主义，压迫民众的反帝运动，屠杀逮捕反帝民众，解除抗日义勇军的武装，集中全中国的军队与资源向苏区与红军进行第五次的“围剿”，阻止苏维埃与红军和你们共同一致去向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作战，甘心为帝国主义完全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大会认为要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使民族革命战争得到彻底的胜利，必须推翻出卖民族利益污辱中国民族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

作战的协定，大会并向一切抗日义勇军提议，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宣言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作战协定，大会希望你们继续坚持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更广大的民众，肃清与驱逐投降帝国主义的动摇的领袖，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来充作战费，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将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大会相信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必将迅速地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发展到中心城市去，和你们的行动，取得更高度的配合，完全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创立自由独立的苏维埃新中国，中国民族解放万岁，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上的讲话[1]

（1934年1月22日）

我们经过了许多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反革命“围剿”，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武装了自己，扩大了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敌人又集中百万兵力进攻苏区。我们要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苏维埃人民，坚决消灭敢于进攻苏维埃的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

---

[1] 1934年1月22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阅兵典礼在瑞金沙洲坝中央运动场举行。这是毛泽东在典礼上讲话的一部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

（1934年1月24日、25日）

一　目前形势与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同志们！自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来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的事变的发展完全显示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更进一步的动摇与崩溃，苏维埃运动的剧烈的开展与胜利！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尖锐化的时期，也正是全世界紧紧地逼近到革命与战争的第二个新周期的时期。

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对立，现在是极端尖锐化了。一方面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取得了最后的巩固，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只在四年内就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去年的第一年内，又已经取得伟大的成绩。苏联早就消失失业现象，而且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是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国防是极大地巩固了。苏联的和平政策在全世界革命民众的拥护之下，到处得到了成功，最顽强的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和苏联订立国交了。

资本主义世界则是另外一个样子，资本主义的暂时的稳定已经

终结。资本主义总的危机已经走进了一个新阶段。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疯狂地准备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结果，使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尤其是日美间的矛盾，在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重新分配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是正在极端地威胁着全世界民众，然而帝国主义却又在企图暂时缓和它们内部的矛盾，而从牺牲苏联、牺牲中国去找寻出路。反苏联战争的准备并没有一刻停止，而瓜分中国进攻中国的战争则已经在明目张胆地进行中。

但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亦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影响之下，在帝国主义经济恐慌与战争威胁之下，生长、扩大起来。猛烈的阶级斗争和民主革命，是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面开展斗争，全世界战争与革命的火焰，是逼近着我们。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危机的加深、国民党经济的总崩溃、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使中国革命形势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使中国革命推进到了世界革命中特别显著的地位。

目前中国局势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内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尖锐化的对立，是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和中国民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太平洋大战和进攻苏联战争，与中国和东方劳苦群众为阻止及消灭帝国主义大战为保护苏联的斗争。

一方面，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广大的领土，垄断中国政治上、经济上一切主要权利，引导国民经济全部崩溃，使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遭受着空前所未有的痛苦，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压迫一切革命活动，实行

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组织一切反革命力量向苏区和红军作拼命的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融成一片，将中国引入完全殖民化的道路。

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号召、组织、领导全国革命民众进行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组织领导红军与民众为着保护苏维埃领土发展苏维埃领土而斗争，以坚决的进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屡次进攻“围剿”，严厉镇压苏维埃领土内的一切剥削分子的反革命企图。一切土地给予农民红军士兵，工人实行八小时制，增加工资，救济失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给一切革命民众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完全自由。引进广大工农群众管理自己国家机关，只不准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剥削分子的参加。组织民众的经济生活，使民众生活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受尽饥寒的地位，进到不但完全免除饥寒并且日益向上改良的地位。组织民众的文化生活，将过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完全没有享受教育可能的广大民众，进到日益提高文化程度的地位。所有一切，也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将几万万中国民众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阻止灭亡中国的殖民地道路，建立自由独立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两个政权对立的日益尖锐化，不能不促进两个政权之间日益激烈的决死的斗争。目前正是在两方面斗争将近决定胜负的历史的时期。反革命的六次“围剿”正在继续五次“围剿”粉碎之后大规模地向着我们前进。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任务，就在号召、组织、领导全苏区全中国一切革命民众进入这一伟大的战斗中。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加入红军，提高红军的政治教育与军事技术，扩大地方武装与

游击队，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加强苏维埃对于各个苏区红军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提高苏维埃各方面工作的速度与质量，加强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工作，以保证革命战争中的物质需要；开展工人阶级斗争，组织工人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到粉碎敌人的斗争上面来；开展农民的土地斗争，动员广大农民群众为夺取土地与保卫土地而斗争；号召全苏区全中国一切工农劳动群众以一切牺牲、一切努力给予革命战争，这样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六次“围剿”，这样努力去阻止殖民地化中国的道路，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范围的胜利。

二　帝国主义的进攻与苏维埃政府对于反帝运动的领导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来两个年头中间，国内最大的事变就是帝国主义的进攻及反革命对于革命的第四次、第五次与第六次的“围剿”。

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从残酷的飞机大炮的屠杀中占领了东三省与热河，控制了平津，还正在向着内蒙及整个华北准备其更大规模的杀人战争。英帝国主义从西藏向四川进攻。法帝国主义准备侵入云贵，美帝国主义则欲将长江流域及福建置于其直接统治之下。所有这些帝国主义，都在以奴役中国民族为目的，以消灭中国苏维埃政权为目的，以准备进攻苏联为目的，同时还以准备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目的，向着广大的中国领土伸张其毒手与阴谋。而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却在一切奉送帝国主义的方针之下，断送了几百万方里的

土地，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进攻，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以一切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代价，换得帝国主义的政治上、经济上与军事上的帮助，以便利其集中力量对于中国民族生存唯一可靠的力量苏维埃与红军的进攻。

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地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

这时候在全中国革命民众面前，摆着两个政权的相反的行动：国民党完全投降帝国主义，尽量压迫反帝的民众；苏维埃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尽量援助与领导反帝运动。

两年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曾经屡次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与国民党的投降卖国。一九三二年四月十四日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公布对日宣战，同时颁布对日作战的动员令，号召全国民众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奴役中国的帝国主义与卖国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发布宣言，号召一切进攻苏维埃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三）武装民众创立抗日义勇军，这三个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愿意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战斗的作战协定。国民党与日本订立塘沽协定及最近进行中日直接交涉的时候，临时中央政府曾一再向全国全世界宣言，表示代表全国民众严厉反对这种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与行动。各地民众的反日斗争，苏维埃政府是实行援助的，单是上海沪西纱厂工人的反日罢工运动，苏维埃曾以一万六千元援助他们。此外，苏区群众还有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援助，对于其他反帝斗争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许多援助。

至于苏维埃领土之内，则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驱逐了，教会侵占了人民的财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在中国境内只有苏区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争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与全体民众的最大的责任。而要实行这一责任，只有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首先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维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它横亘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维埃领土之间，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领土进攻，使红军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维埃与红军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肃清道路——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苏维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维埃十分地加强其对于一切反帝斗争的领导——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了创造革命的新时代，□□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

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在加速度地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苏区缺乏完备的专门的教育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应该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教育发展起来，无疑也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三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权反对“围剿”的斗争

因为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

至于苏维埃领土之内，则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驱逐了，教会侵占了人民的财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在中国境内只有苏区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争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与全体民众的最大的责任。而要实行这一责任，只有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首先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维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它横亘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维埃领土之间，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领土进攻，使红军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维埃与红军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肃清道路——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苏维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维埃十分地加强其对于一切反帝斗争的领导——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了创造革命的新时代，□□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

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在加速度地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苏区缺乏完备的专门的教育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应该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教育发展起来，无疑也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三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权反对“围剿”的斗争

因为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

至于苏维埃领土之内，则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驱逐了，教会侵占了人民的财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在中国境内只有苏区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争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与全体民众的最大的责任。而要实行这一责任，只有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首先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维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它横亘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维埃领土之间，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领土进攻，使红军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维埃与红军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肃清道路——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苏维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维埃十分地加强其对于一切反帝斗争的领导——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了创造革命的新时代，□□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

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在加速度地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苏区缺乏完备的专门的教育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应该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教育发展起来，无疑也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三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权反对“围剿”的斗争

因为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

至于苏维埃领土之内，则早已取消了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影响。牧师神父是被民众驱逐了，教会侵占了人民的财产是被收回了，教会学校是取消了，在中国境内只有苏区是脱离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

所有这些事实都在指明：只有苏维埃政府才是唯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苏维埃政府应向全国民众指出：用直接的民族防卫战争战胜帝国主义，是苏维埃与全体民众的最大的责任。而要实行这一责任，只有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首先是团结一切力量战胜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因为它是苏维埃与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的障碍物。要使民众明白：只是因为国民党的作梗——它横亘于帝国主义进攻地带与苏维埃领土之间，并且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领土进攻，使红军无法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使苏维埃与红军不得不以坚决的进攻来肃清道路——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为实行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步骤。

但是苏维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的广大的冲突，是一天一天地逼近了。这就要求苏维埃十分地加强其对于一切反帝斗争的领导——苏维埃应当成为全国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苏维埃政府只有用尽一切力量使民众明白当前的危机与国民党的罪恶，依靠于广大民众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的提高，才能顺利地执行自己的神圣的任务——以民族革命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血腥统治。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了创造革命的新时代，□□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

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中，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在加速度地进行着革命文化建设了。

苏区缺乏完备的专门的教育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应该跟着普遍教育的发展而使之教育发展起来，无疑也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三　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与苏维埃政权反对“围剿”的斗争

因为中国苏维埃区域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中国

工农红军是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因为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的猛烈向前发展，所以国民党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以至六次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助之下集中一切力量，向着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绝望的进攻，企图消灭中国革命势力，为帝国主义们瓜分中国担负肃清道路的责任。

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每一次进攻，都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华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在全中国万众的拥护之下，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同时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更加兴奋了全中国的劳苦大众，使他们认识到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真正为了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能救中国。

当敌人四次“围剿”开始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出卖了东三省。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之后，卖国的国民党不但不以一兵一卒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不管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的屡次宣言愿意与真正抗日军队订立抗日的战斗协定的提议；相反的，国民党卖国罪魁蒋介石，在四次“围剿”失败后，立刻接着举行五次“围剿”，集中了数十万军队进攻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压迫红军离开围绕武汉的区域。在我们方面，虽然因为要避免与过于强大的敌人力量作战，因为我们主观上某些策略的错误，红四方面军不能不退出鄂豫皖苏区，作了有名的远征，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南江、宣汉、绥定一带创造了新的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廿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兵士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

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的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前发抖起来。同时，从洪湖根据地退出的红军第二军团，不但主力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而且在川鄂湘边，配合着红四方面军积极行动，取得了新的胜利。即洪湖一带，亦尚有游击队的存在。在鄂豫皖苏区方面，我们的根据地虽然受了部分的损失，但留守的红军部队和游击队，英勇地向四周发展了游击战争。

至于中央苏区，这里是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因此，当然也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主要进攻的目标，国民党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兵力和我们作了顽抗的战斗，他调动了所谓“中央军”、蒋蔡军阀、两广军阀与湖南军阀，从四面包围中央苏区及其临近各苏区，然而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我们获得了空前的胜利。最大的胜利是在一九三三年的上半年，单只这半个年头，中央苏区红军消灭了白军二十四个团、六个营、二个连，击溃白军三个师、十二个团、五个营、二个连，缴获步枪二万枝左右，机关枪、短枪一千枝左右，尤其是在东黄坡战役，消灭了敌人最顽强的基本纵队，使敌人的五次“围剿”遭受了最后的惨败。

在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中，红军不但数量上扩大了，而且质量上增强了，红军指挥员、战斗员政治上的坚定，军事技术上的提高，比五次战役以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苏维埃领土扩大了，除四川广大苏区外，在福建的西北部，江西的东部，扩大了广大的苏区，增加了近百万的人口，建立了新的闽赣省，旧的苏区更

加巩固了，这表现在苏维埃工作的改善，工农群众革命积极性的提高，农村中、城市中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苏区中残余的反革命势力遭受到严厉的镇压。同时，这一胜利影响国民党区域非常之大，广大白区工农群众，在这一胜利影响之下，更加提高了他们的斗争的勇气。一切参加“围剿”的国民党军队，不但兵士中发生了普遍的动摇，甚至干部中亦发生了绝大的恐怖情绪，甚至使蒋介石不得不公开宣布“不剿匪请抗日者杀勿赦”的绝望命令。

然而这些胜利的取得，决不是偶然的。他依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正确，依靠了苏维埃政府领导集中，与他的政策设施的适当，依靠了红军的英勇善战，依靠了苏区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的拥护，并且还依靠了白区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和反帝反国民党运动的开展，依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被压迫民众的同情与援助。这些都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是决不能够取得胜利的。

国民党军阀在五次“围剿”惨败之后，唯一的出路是更加无耻地投降帝国主义，从帝国主义取得大批的借款与军械；聘请大批的外国顾问，收集一切旧有力量，组织新的力量（训练新兵、训练新的航空队、训练蓝衣社军官团等），总之，集中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对于苏维埃与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

苏维埃对于六次“围剿”的斗争，是决定中国或者被帝国主义瓜分而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或者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这个伟大斗争的主要环节之一。

苏维埃应该号召一切苏区中、白区中参加斗争的群众，明白认识这一斗争的严重性，只有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用百倍积极、百倍坚毅的精神统一于苏维埃指挥之下，才能争取这一斗争的完全胜利。

苏维埃应该指示给一切参加斗争的群众：在粉碎五次“围剿”之后我们有着战胜敌人六次“围剿”的一切基本的条件。党与苏维埃的正确的领导，红军的坚强与扩大，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这一切都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基础。

由于我们的努力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已经使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新的大举进攻受到了我们的严重打击，敌人的原定计划已经失败了，不得不在新的阵地与新的计划之下，向着我们作绝望的进攻，我们是处在六次“围剿”的最后决战的面前。国民党军阀的堡垒政策与经济封锁政策虽然极其残酷，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加强我们的群众工作和士兵工作，改进我们的军事策略，集中我们一切力量去克服这些困难，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应该指出：敌人的困难是大大超过了我们，白军士兵的动摇，敌人统治下工人、农民以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愤恨与不满，统治阶级各派军阀之间的斗争与分裂，援助国民党的各个帝国主义者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国民党财政经济的破产，所有这些，都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客观方面的条件。

这里应该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进行六次“围剿”之际，福建出现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这个“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表现国民党系统的进一步的破裂。苏维埃运动的伟大胜利与国民党在全国民众面前的破产，使得中国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不得不采取新的方式，企图于国民党道路与苏维埃道路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以保持反动统治阶级垂死的命运。然而这一企图只是徒劳，因为如果“人民革命政府”这一类的组织不从真正中国人民利益出发，不坚决承认苏维埃政府还在去年四月间即已宣布了的三个条

件，而与苏维埃政府订立并真正执行反帝反国民党的协定，而是止于欺骗与讲空话，那么，广大的革命民众不会于“人民革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采取任何不同的态度，它必然要遭受悲惨的失败也是可以预言的。而苏维埃在全国民众对它的信仰日益增加中，在国民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欺骗日益破产中，将坚决的粉碎六次“围剿”，以便努力阻止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的道路，努力争取在全国范围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在事实上证实这一句名言：“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

四　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

当着我们来说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时候，首先要问什么是这些政策的出发点呢？答复这个问题，应该明白苏维埃过去与现在所处的环境和从这种环境所产生的任务。

苏维埃的过去时期，他是生长于游击战争中，他是从许多极小的地方生长起来的。这些地方各自独立没有联合，每一个苏区的四周都是敌人的世界，敌人对于苏区是每时每刻的摧残与压迫。然而，他能够战胜这些敌人，他是从战胜敌人无数次压迫中间生长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苏维埃产生的环境。

苏维埃现在所处的环境，同过去有许多的不同；他有广大的领土，有了广大的群众，有了坚强的红军，他已将许多散漫的力量集中起来（虽然还没完全集中起来），他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已经有了他的地方与中央的组织，已经建立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是一个集中的权利机关，他依靠着广大的民众，依靠民众武装的力量——红军。这个政府是

工农的政府，他实行了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对于工农和广大民众是广大的民主。同时他是一个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而且是一个已经具有极大权力的专政，这个专政已经向着全国范围扩大他的影响，他在广大民众中间有了很大的信仰，他与过去游击战争时代情形大不相同了。然而战争仍旧是经常的生活，并且更加广大与激烈，原因是这个专政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对立一天一天尖锐起来，现在已经进到两方面快要决定胜负的时期，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大规模的“围剿”是摆在他的面前。这就是苏维埃现在的环境。

这种环境决定了他的任务，就是他必须用全部力量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必须一时不停地去进攻他的敌人，去粉碎敌人对于他的“围剿”。他的任务是革命战争，是集中一切力量去开展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去打倒敌人，并且还要打倒强大的帝国主义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敌人那一个专政的拥护者与指挥者。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为的是要解放中国人民，为的是要把中国四万万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奴役和蹂躏之下解放出来，为的是要使几万万中国劳苦同胞从军阀、官僚、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翻过身来，为的是使中国民众能够学习苏联工农一样将来胜利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建立光明的、幸福的人类新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苏维埃的根本任务。

从此，我们明白苏维埃在这种环境与任务之下，施行各种基本政策，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巩固已经胜利了的工农民主专政，为了发展这种专政到全国范围内去，为了动员组织武装全苏区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以坚决的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来巩固与发展这个专政，并且为了从现时工农民主专政，准备将来变

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去，这就是苏维埃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秉承第一次全苏大会的指示，两年来坚持这种政策的总方向，收到了伟大的成绩。已经从经验上证明给中国全体民众看：只有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才是为了民众政权与民众利益的政策，才是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坚决对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挽救全体民众出于危亡，解放全体民众出于水火的唯一的政策。

不待说，在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中国，苏维埃每一具体的施政，要立即取得广大民众的拥护。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革命政策之下，受尽压迫剥削的民众，对于苏维埃每一具体政策的施政，简直如同铁屑之追随于磁石。这种情形，造成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反动统治阶级因此不惜以一切最无耻的造谣，来污蔑苏维埃的施政。然而铁的事实，是给无耻造谣的有力回答，每一个有眼睛的中国人，只要不是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地主资本家，便不能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有何等天渊之别。

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我们首先来说苏维埃的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

为着反对敌人的“围剿”，为着进行革命战争，为着保卫中国民族和国家，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与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两年来在与敌人四次、五次以及六次“围剿”坚决斗争中，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大大取得了成功。

首先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漫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主要关键。两年来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着全中国红军，首先是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光荣的胜利战争，粉碎了敌人的五次“围剿”，并且取得反对六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而四川红军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取得了光荣伟大的新胜利。

红军在两年中是迅速扩大了，是比两年前扩大了几倍。这一方面之所以得到了成功，是依靠于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并且还依靠于动员方法的进步与对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的执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一个月中间，中央苏区的若干个县中扩大了近两万的新战士。很多的地方，工农群众潮水一般地涌进红军中去。一切以为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以为在新苏区边区等处不能扩大红军的机会主义的说法，事实已经证明是错误的。然而动员方法之正确，苏维埃优待红军法令之彻底执行，是迅速完成动员计划的关键。废弃一切强迫命令，实行充分的宣传说服，制裁破坏扩大红军以及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动员方法的重要节目。提高红军战士的社会地位到最光荣的标准，给予红军战士一切可能与必需的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待遇，分配外籍红军战士以土地，而发动群众代替他们耕种。为每一红军战士的家属很好的耕种土地，实行消费合作社对于红军家属百分之五的廉价，实行为红军家属开办供给日用必需品的专门的商店，实行在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盈利中抽出百分之十供给红军家属，号召群众为红军家属的疾病困难募捐接济，号召群众对于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的慰劳，

所有一切关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法令与办法，实际与彻底地执行，是保障红军踊跃地上前线去及巩固其在前线上的战斗决心的必要与重要的步骤。这些工作，在苏区各地存在着很多的模范，在这些地方的广大工农群众，以手执武器保卫苏区与发展苏区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而大批地不断地涌向前线去。其中如江西的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全部青年成年男子四百零七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去了三百二十人，留在乡间的八十七人，去的与留的成为百分之八十与二十之比。福建的上才溪乡，全部青年成年男子五百五十四人中，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四百八十五人，留在乡间的只有六十七人，去与留的比例为百分之八十八与十二。这些乡中的壮丁这样大数量地英勇地上前线去，然而乡村的生产，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呢？不但不发生不好的影响，而且更加扩大了、改良了。什么原因？因为劳动互助社、耕田队及其他一切的办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了乡村的劳动力，解决了红军家属每一个困难的问题。我想这种光荣的教训是值得全苏区学习的。

红军铁的一样的巩固，应使与红军的扩大密切地连接起来，两年来这一方面的工作，同样地得到了好的成绩。现在的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现在于：（一）成分提高了，实现了工农劳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现在的红军虽然还缺乏最新式武器的采用及其使用方法的练习，然而一般的军事技术，是比过去时期大大进步了。（五）编制改变了，

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使其成为不可战胜的苏维埃武装力量。

广泛地扩大赤少队与游击队，是苏维埃武装民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极端重要的事业。赤卫军、少先队是前线红军的现成后备军，是保卫苏区的地方部队，并且是从现在的自愿兵役制转变到将来实行义务兵役的桥梁。而游击队则是新苏区的创造者，是主力红军不可缺少的支队。两年来每个苏区中是发展了这些部队。他们的军事政治训练也相当地加强了。他们加入红军，他们之保卫地方，他们之袭敌扰敌，在历次粉碎“围剿”的战斗中，显示了他们极其伟大的成绩，致使敌人惊为奇迹，成为敌人侵入苏区的绝大困难。这在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是特别表现了他的作用。把这个制度广布到一切新开辟的苏区去，极大地扩大他们的组织，加强他们的训练，使这些部队成为红军在革命战争中最可靠的兄弟，这是苏维埃的重要责任。

充实红军的给养与供给，组织联络前线与后方的军事运输，组织军事的卫生治疗，同是对于革命战争有决定意义的事业。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若干中心城市与敌人经济封锁的情况之下，这一任务的进行是极其艰难的，然而两年来，凭借了苏区与白区广大工农的积极性，我们对这事业亦已建立了相当的基础。我们已经在这一方面保证了红军在过去长期中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成绩。但是当前粉碎的六次“围剿”的决战，及以后更加扩大的战争，需要我们用更大努力增加这一方面的力量，保证这一方面更加充分的供给。

更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是在我们的面前，苏维埃武装民众政策更加显示了他的绝顶重要性。一刻不放松去武装民众，去从切实的工

作中，以最快速度，实现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创造，是苏维埃基本的战斗的任务。

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革命战争，是动员一切民众力量去进行战争。环绕着这个基本任务，苏维埃就有着许多迫切的任务。他应该对广大民众施行广泛的民主。他应该坚决镇压内部的反革命。他应该启发工人的阶级斗争，发展农民的土地革命，在工农联合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原则下，提高工农的积极性。他应该执行正确的财政经济政策，保证革命战争的物质需要。他应该实行文化革命，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以及其他的许多基本政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以革命战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巩固与发展工农民主专政，并准备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去。

苏维埃的民主制度

现在我们来说苏维埃的民主制度。

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他是民众自己的政权，他直接依靠于民众。他与民众的关系必须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发挥他的作用。苏维埃具有绝大的力量，他已经成为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且也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他的力量的伟大，是历史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所不能比拟的。但他的力量完全依靠于民众，他不能够一刻离开民众。苏维埃政权需要使强力去对付一切阶级敌人，但对于自己的阶级——工农、贫民、职员、革命知识分子等大多数民众，则不能使用强力，而他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

苏维埃最宽泛的民主，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

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使女子的权利与男子同等。工农劳动群众对这种权利的取得，乃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结两年来各地苏维埃的选举经验，一般来说是有很大的成绩。第一，关于选民登记。用红榜白榜的办法，将有选举权的居民与无选举权的居民实行严格的划分。以不准任何剥削分子参加的选民大会的选举，代替了过去开群众大会选举的办法。第二，关于成分比例。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干部，采用了工人及其家属十三名选举代表一人、农民及贫民五十人选举代表一人的办法，拿了这样的成分去组织市乡代表会议。从区到中央，各级的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工人与农民的代表都有适当的比例。这样便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上保证了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并使工人站在领导的地位。第三，关于选举单位。为了保证多数的选民参加选举，并使工人能够选举他们的适当的代表进苏维埃，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新的选举法，规定每个乡苏和市苏，分成几个选举单位进行选举，即是农民以村为单位进行选举，工人则单独为一单位进行选举。这样就使民众参加选举十分便利了。第四，关于参加选举的人数。苏维埃选举运动的发展，使选民群众极大地认识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过去不积极参加选举的民众，现在许多都积极起来了。一九三二年两次选举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的选举，许多地方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选民，有些地方仅只害病的、生育的以及担任警戒的人不会参加选举会。第五，关于选举名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实行了候选名单制度，使选民在选举之先就有应否选举其人的准备。第六，关于妇女的当选。现在多数的城乡苏维埃，妇女当选为代表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以上。部分地方如上杭的上才溪乡，七十五个代表中妇女四

十三个，占了百分之六十。下才溪乡九十一个代表中妇女五十九个，占百分之六十五。广大的劳动妇女是参加国家的管理了。第七，关于工作报告，即是由乡苏、市苏在选举以前，召集选民开会，报告苏维埃的工作，并引导选民批评这种报告。这一办法，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进行的选举，也比较上一年实行得更加普遍了。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其次，苏维埃的民主，见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市乡代表会议制度是苏维埃组成的基础，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广大民众的机关，两年来的进步，使我们的这一制度更加完满了。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一）为着使乡苏、市苏的代表与当地居民密切联系，便于吸收居民的意见，并便于领导工作起见，依照代表与居民住所接近，将全体居民适当分配于各个代表的领导之下（通常以居民三十人至七十人置于一个代表的领导之下），使各个代表对于其领导下的居民发生固定的关系。这样便使民众与苏维埃在组织上连成一片了。（二）乡苏市苏的代表，按其住所接近，在三个至七个代表之中选举一人为代表主任，其任务是在乡苏及市苏主席团领导之下，分配和指导其领导下各代表的工作，传达主席团的通知于各个代表，召集其领导下的居民开会，解决其领导下居民中的较小的问题。一村之内，并须有一个总的代表主任，负领导全村工作之责。这样便使市乡主席团与代表之间密切地联系起来，并使村的工作得到了有力的领导。（三）在乡苏维埃与市苏维埃之下，组织各种经常的及临时的委员会，如优待红军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粮食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其数可以多至数十，吸收群众中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不但乡有委员会，村亦应该有某些

必要的委员会。这样便把苏维埃工作组成了网，使广大民众直接参加了苏维埃的工作。（四）乡苏及市苏的选举，规定每半年举行一次（区苏亦半年一次，县苏、省苏则每年一次），这样便使民众的新的意见容易涌现到苏维埃来。（五）在两次选举之间，代表有犯重大错误的，得由选民十人以上的提议，经选民半数以上之同意撤回之，或由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之。这样便使不良分子不能长期驻足于苏维埃机关了。所有这些，都是苏区中许多地方正在实行着的市乡苏维埃的特点。大家都可以看见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而苏维埃依靠这一制度，同广大民众结合起来，就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发扬民众创造力的机关，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这也是历史上除苏联外无论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区以上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完全建筑于市乡苏维埃的基础之上，由各级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与执行委员会而组成，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所以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

再次，苏维埃的民主，还见之于给予一切革命民众以完全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与罢工的自由。当着国民党统治区域剥夺一切革命民众的自由权利，执行疯狂的法西斯蒂恐怖的时候，苏维埃政府下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苏维埃并且给予一切可能的物质条件上的便利（会场、纸张、印刷机关等），一切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集会结社与言论出版，苏维埃总是极力的领导者，苏维埃所不允许的，只是那些压迫剥削分子的反革命自由。

不但如此，为了巩固工农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

的错误和缺点之权。当着国民党贪官污吏布满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时候，苏维埃制度之下则绝对不容许此种现象。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种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这种充分民主的精神，也只有苏维埃制度之下方能存在。

最后，苏维埃的民主精神，还见之于其行政区域的划分。苏维埃取消了旧的官僚主义的大而无当的行政区域，把从省至乡各级苏维埃的管辖境界都改小了。这是什么意义？这是使苏维埃密切接近于民众，使苏维埃因管辖地方不大，得以周知民众的要求：使民众的意见迅速反映到苏维埃来，迅速得到讨论与解决，使动员民众为了战争、为了苏维埃建设成为十分的便利。国民党军阀利用封建时代的大省大县大庄乡制度，这仅仅便利于隔绝民众，苏维埃政府是用不着的。这里应该指出：关于村的划分是重要的一节，因为乡苏维埃之下，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最便利的方法，是以村为单位去动员民众，依靠了村的适当的划分，村的民众组织的建立，村的代表与代表主任对于全村的有力的领导，乡村的工作才能收到最大的成效。

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

其次说到苏维埃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

苏维埃实现了最完满的民主制度，他是为广大民众直接参加的，他给予广大民众一切民主的权利，他对于民众绝对不使用也绝不需要使用任何的强力。

但是，地主资产阶级，即一切被革命民众所推翻的剥削分子，苏维埃对之则是另外一种态度。

地主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剥削者，因为他们是过去的统治者，所以他们对于苏维埃是怀着极端的仇恨的。因为他们虽被推翻但并未消灭，他们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他们还有优越的知识与技术，所以他们虽被推翻，却时时企图复辟，企图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原来的剥削制度。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代，敌人对于苏区不断举行军事的进攻，更使这些被推翻的剥削者时刻企图以反革命行动响应进攻的敌人。因此苏维埃政权不能不从各方面对于这些分子施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

苏维埃制裁剥削分子的政策，第一件是拒绝他们于政权之外。苏维埃的宪法规定，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完全取消他们的选举权，取消他们在红军中、在地方部队中服兵役的权利。但这些分子总是千方百计企图混进苏维埃机关中、红军中与地方部队中来，特别在新开辟的苏区，群众斗争的发展还不充分，这些分子更容易利用机会混进来。过去的经验完全证明：同这些阶级异己分子混入革命政权的活动作残酷无情的斗争，是苏维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第二件，是剥夺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种自由苏维埃仅只给予革命的民众，而不给予任何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必然地要利用这种自由作为他们反革命的工具，剥夺这些分子的自由是绝对必要的。苏维埃之所以日臻于巩固，剥夺了这些阶级敌人的自由，减少了他们借以活动的机会，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三件，利用革命武力与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苏维埃基于武装民众的任务，建立了坚强的红军与广泛的地方部队，这是苏维埃直接依靠的铁的力量，苏维埃依靠了他，才能战胜帝国主

义国民党的武力，才能镇压苏区内部的反革命活动。但是，苏维埃还有一个与此相连的镇压反革命的重要的武器，这就是苏维埃法庭。苏维埃法庭直接依靠于武装力量，依靠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依靠于人民的阶级斗争，使苏区中一切反革命企图受到严厉的镇压。数年来各个苏区中都发生了反革命的严重的活动，如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等处的AB团，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闽浙与闽赣等地的改组派，湘鄂赣的托陈取消派等，都曾经企图甚至已经实行他们的反革命暴动。但结果都受到苏维埃法庭的严厉的镇压，克服了他们的暴动阴谋，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这一方面政治保卫局与苏维埃法庭已经聚集了丰富的经验，纠正了过去许多地方没有执行明确阶级路线的错误。苏维埃法庭的群众化，即苏维埃法庭的制裁反革命应该同广大群众的肃反斗争联系起来，现在也更加进步了，巡回法庭的普遍使用就是证明。

总结起来看，苏维埃具备着对于广大民众的十分宽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但同时就在这种民主主义中间构成了他绝大的权力——建筑于千百万工农民众坚固的信仰与自觉的需要之上的权力。苏维埃运用这种权力，形成了自己的专政，组织了革命战争，组织了苏维埃法庭，向着阶级敌人开展各方面的激烈的进攻，而苏维埃法庭则在苏维埃领土之内起了他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伟大的作用。

如果拿工农专政的苏维埃法庭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法庭相比较，那又是一幅绝妙的图画。

苏维埃法庭以镇压地主资产阶级为目的，对于工农分子的犯罪则一般处置从轻，国民党法庭以镇压工农阶级为目的，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犯罪则一般处置从轻，法庭的作用完全给政权的阶级性决定了。

苏维埃法庭一方面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苏维埃对于这

些分子绝不应该有丝毫的姑息。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就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明令宣布废止肉刑，这亦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而国民党法庭则至今充满着中世纪惨无人道的酷刑。

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是采取感化主义，即是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与劳动纪律去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犯罪的本质。而国民党监狱则是纯粹的封建野蛮的虐杀，法西斯蒂的酷刑，劳苦群众与革命者的人间地狱。

消灭敌对阶级的反革命阴谋，建立苏维埃领土内的革命秩序，而废除司法范围内一切野蛮封建的遗迹，这是苏维埃法庭的目的，苏维埃这一方面的所有的改革，同样是有他的历史意义的。

苏维埃的劳动政策

其次说到苏维埃的劳动政策。

苏维埃基于他的政权的阶级性，基于武装劳动民众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伟大任务，必须坚决地发展工人的阶级斗争，保证工人的日常利益，发展工人的革命积极性，组织工人的这种积极性到伟大的革命战争中来，并且使工人成为革命战争的积极领导者，成为巩固与发展苏维埃政权的柱石，这就是苏维埃劳动政策的出发点。

在苏维埃劳动政策之下，工人的利益得到了完全的保护，他与过去的国民党统治时代及现在的国民党区域比较起来，真有天堂地狱之别。

当着苏区还是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工人是在做雇主的奴隶，工

作时间之长，工钱之少，待遇之残酷，工人地位之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这是每个工人所永远不能忘记的。所有这些，在现在的国民党区域，不但是一样地存在着，而且变本加厉了。最近的情形，白区工人的实际工资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减工、裁工、关厂，则成为资本家进攻工人的普通方法。因此造成了广大的失业，单以产业工人说，失业人数达百分之六十以上。一切国民党统治区域，罢工是犯罪的行为，一九三三年三月国民党在汉口公开宣布罢工者处死刑。一切工人与资本家的争议，国民党无不是站在资本家方面向着工人压迫的。

但是，这些罪恶，在苏区中便一扫而空了。

苏维埃政权之下，工人是主人翁，工人领导着广大的农民担负了巩固苏维埃的伟大的责任。因此苏维埃的劳动政策的原则是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巩固与发展苏维埃的政权。根据这种原则，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颁布了劳动法，一九三三年加以修改，重新颁布。此次修改的劳动法，对于城市与乡村，对于大企业与小企业，都能使之应用适当。

现在苏区是一般地实行了八小时工作制，订立了劳动合同与集体合同。城市内与许多的乡村内已经普遍建立了劳动检查所与检查员，目的是检查雇主是否有违背苏维埃劳动法的行为。对于雇主犯法行为的制裁，则属于专门设立的法庭。为了防止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操纵，为了保护在帝国主义国民党长期“围剿”所造成的一部分失业工人，苏维埃垄断了劳动介绍权，一切资本家请工，必须到苏维埃设立的劳动介绍所去。失业救济机关的设立，现在也日益推广了，失业工人一般得到了具体的救济。农村工人又都分配了土地。社会保险制度是确立了，社会保险局已建立在苏区各个城市中。所有这些都是工人们在国民党政权下所丝毫不能得到的。然而

苏维埃政权则以为这些政策的实行乃是自己最大的责任。

由于苏维埃坚决执行自己的政策，苏区工人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首先是关于工资。苏区各地的实际工资，比较革命前，是一般地增加了。下面是汀州的一个例子：

职业	期间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中等工资	
		革命前	现在	比较	革命前	现在	比较	革命前	革命后
京果工人	每月	十元	三十二元	加二十二元	二元	二十二元	加二十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三十元
纸业工人	每月	十元	三十五元	加二十五元	三元	三十二元	加二十九元		三十三元
油业工人	每月	六元	十八元	加十二元	三元	十二元	加九元		十五元
药业工人	每月	六元	三十元	加二十四元	二元	二十六元	加二十四元		二十八元
刨烟工人	每月	七元	三十六元	加二十九元	三元五毛	三十元	加二十六元		二十八元
印刷工人	每月	十五元	三十六元	加二十一元	五元	二十八元	加二十三元		三十四元
五金工人	每月	六元	十八元	加十二元		十四元			十六元
木匠工人	每月	六毛	八毛	加二毛					

职业	期间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中等工资	
		革命前	现在	比较	革命前	现在	比较	革命前	革命后
木船工人	有汀州之上杭	十四元	四十六元	加三十二元					
染业工人	每月	五元五毛	二十元	加十四元	二元	十八元	加十六元	革命前的没有统计	十九元
油纸工人	每月	五元	二十一元	加十六元	二元	十七元	加十五元		十九元
酒业工人	每月	六元	二十元	加十四元	三元	十八元	加十五元		
布业工人	每月	十元	三十五元	加二十五元	二元	三十一元	加二十九元		三十二元

从这个表看来，汀州市工人的工资比战前最少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三（木匠），最多的竟增加了百分之一千四百五十，即增加十四倍半（布业工人），这种惊人的增加，完全是反映了国民党时代的惊人的低落。当然汀州工人的工资是比较其他苏区城市的工资要特别高一些（并且工人吃的伙食是算在内的），但是其他城市的工资也是增加了的，如瑞金城市的泥水木匠工人，在最近一时期，从革命前每日两角五分，增加至每日四角五分，增加了百分之八十。

不但城市、农村中工资也增加了，下面是赣县田村区各时期零工工资的比较：

	最高工资（每日）				中等工资（每日）				最低工资（每日）			
	革命前	一九三一年五一前	现在	比革命前增加	革命前	一九三一年五一前	现在	比革命前增加	革命前	一九三一年五一前	现在	比革命前增加
手艺工人	三毛	三毛	三毛五分	五分	二毛二分	二毛五分	三毛	八分	一毛	一毛五分	二毛	一毛
纸业工人	四毛	四毛	四毛五分	五分	二毛二分	二毛四分	三毛	八分	一毛四分	一毛一分	二毛五分	一毛一分
农业工人	二毛八分	三毛	三毛二分	四分	一毛	一毛五分	二毛	一毛	三分	六分	一毛	七分
苦力运输工人	四毛五分	六毛七分五	九毛六分	五毛一分	二毛六分	三毛九分	五毛	二毛四分	一毛		二毛	一毛

这个表表示了一个农村，但其他农村中工资是一般增加了的。至于国家企业中的工资，拿最近两年来中央直辖的若干种企业来说，是一般增加了百分之二十，最高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工资的交付，一般都办到了按期付清，因为苏维埃的监督，雇主拖欠工资的事情是很少了。少数顽强的资本家，经过劳动法庭的

裁判，也不敢与工人为难了。

关于法定工作时间——八小时制的实施，两年来在苏区的一切城市是普遍实现了。农村中的雇佣劳动者，每日的实在工作时间也少有超过八小时，十六岁至十八岁的雇佣劳动者的时间，是一般比较成年为少。

关于妇女及未成年人的保护，如同工同酬，产前产后休息，十四岁以下童工的禁止，也是一般地实行了。

关于学徒的保护，则一般地缩短了学徒的年限，改良了学徒的待遇，扫除了对学徒的封建压迫。学徒的生活是相当的改善，学徒的工资是增加了（如江西方面，学徒每年至少有十五元的津贴，多的则有每月三元的）。

关于一般待遇，在城市中，特别在国家企业里，工人的卫生与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各个城市工人的伙食普通是每月六元以上。农村工人的伙食，与雇主同等。

苏区工人组织了坚强的阶级工会。这种工会是苏维埃政权的柱石，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同时它又成为广大工人群众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苏维埃对于工会，在法律上保障了它的权利，因此工会会员极大地发展起来。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统计，现在苏区工会会员数，仅以中央苏区及其附近几个苏区计算，共有二十二万九千人，其分布：中央苏区十一万人，湘赣二万三千人，湘鄂赣四万人，闽浙赣二万五千人，闽赣六千人，闽北五千人，根据中央苏区的材料，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仅有三千六百七十六人，不足全体工人的百分之五，即是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人是加入工会了。一部分地方如兴国，加入工会的竟达百分之九十八。请问这是国民党区域能够梦见的事情吗？不但中国，全世界除苏联外，哪一个帝国主

义国家是有这种情形的?

总之，两年来苏维埃的劳动法，已在苏区所有城市中实行了，乡村中也实现了他的主要条文。在两年当中，虽然遇到了不少的资本家富农对于劳动法的抵抗，但因工人群众的积极斗争与苏维埃的严厉监督，使这种抵抗归于无效。同时对于独立生产者与中农贫农雇佣工人，有时发生违反劳动法的事情，则应该经过恳切的劝告使之明了而自动地拥护劳动法。因此工人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工人的革命积极性大大发扬起来，工人在革命战争中在苏维埃建设中，是起了他的伟大的作用。

毛主席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年來工作時攝影
一月二十五日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图为大会主席台，站立者为毛泽东。

根据中央苏区公略、万泰、龙冈、兴国、胜利、西江、于都、寻乌、上杭、宁化、长汀、新泉十二县的统计，工会会员七万零五百八十人中，现在红军及游击队服务的一万九千九百六十人，等于会员的百分之二十八。参加苏维埃等革命机关工作的六千七百五十二人，等于会员的百分之十，他们大部分是在苏维埃机关负责。以上两项共计二万六千七百一十二人，占会员总数百分之三十八。现在还在家的会员则为四万三千八百六十八人。这十二县在家的工会会员，退还第二期公债四万三千八百五十五元，最近购买经济建设公债十九万七千八百零三元，在家会员平均每人买了四元五角。在家会员现在是党团员的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五人，占在家会员总数百分之二十八。这些统计，证明了工人群众积极地加入红军，参加与拥护革命战争，拥护中国共产党。然而这些都是苏维埃保护了工人的利益，发扬了工人的积极性得来的，那些说工人在革命后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说工人的积极性没有发扬起来，只可算作完全的胡说。

苏维埃的土地革命

现在我们来说苏区的土地革命。

中国的苏维埃与红军，是从土地革命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只有土地革命才能解放他们。苏维埃的土地政策的原则，就在于完全推翻地主阶级与国民党军阀一切封建与半封建的剥削与压迫。

一切过去及现在的国民党区域，农村中是吓人的地租（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八十）、吓人的高利贷（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与吓人的苛捐杂税（全国计一千七百余种之多），结果土地集中于地主阶

级与富农的手里，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境。因为土地上面的无情掠夺，农民失掉防御灾荒的能力，结果使水旱灾荒遍于全国，一九三一年被灾区域达八百零九县，被灾人口达四千四百余万人。因为层层地被掠夺，农民缺乏再生产能力，许多耕地变得很瘠，许多简直变成荒地，同时农民仅有的一点出产，又被帝国主义的农产物品倾销所压倒，因此中国农村经济陷于完全的破产状态。农村中土地革命的火焰，就在这种基础上强有力地爆发起来了。

苏区土地革命的威力，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农民群众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收了富农的好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打倒了一切与革命为敌的人，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农民第一次从地狱中出来，取得了主人翁资格，这就是苏维埃政权下与国民党政权下农村状态的根本区别。

第一次全苏大会颁布了土地法，使得全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有了正确的依据。因为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在分析阶级问题上发生了许多的争论，人民委员会根据过去土地斗争的经验，作出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将地主、富农、中农、游民等许多问题给予了正确的解决，农村斗争将更有力地发展起来。关于分配土地方法上面的许多问题，如距离、肥瘠、青苗、山林、池塘等等，还亟待收集各地经验作成必要的决定，这在新区分配土地的领导上是非常必要的。

为着彻底消灭封建残余势力，使土地革命的果实完全落在雇农、贫农、中农的手里，中央政府发动了广泛而深入的查田运动。根据一九三三年七、八、九三个月的统计，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

三省共计查出地主六千九百八十八家，查出富农六千六百三十八家，从这些被查出的地主富农等手中收回土地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九担，没收地主现款与富农捐款，共计六万零六千九百十六元。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扬起来了，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三个月中间得到了如此伟大的成绩，证明农村阶级斗争还需要苏维埃予以充分的注意，而查田运动是继续发展农村斗争彻底消灭封建残余的有力的方法，也是完全证明了。

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这一路线的正确应用，是保证土地斗争胜利发展的关键，是苏维埃每一对于农村的具体政策的基础。因此苏维埃政府对于那些侵犯中农（主要是侵犯富裕中农）及消灭富农的错误倾向，是应该严厉地给予制裁，同时决不应该放松对于那些同地主富农图谋妥协的错误，土地斗争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

土地革命斗争的群众工作，两年来得到了不少的经验。总结其要点则为：（一）分配土地的运动与查田运动，均必须以全力去动员广大贫农中农以及农村工人群众，自己动手向着地主富农作斗争。分田与查田的工作，都必须经过群众的同意。每一阶级成分的处理，必须通过于群众的会议中。苏维埃人员单独地少数人地进行分配土地与清查阶级，那便是有降低群众斗争热情的危险。（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以外的财产与富农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必须以大部分分配于贫苦的群众，如果不是这样做而归之于少数人员使用，那么也就要降低群众的情绪，而有利于剥削分子的反抗。（三）土地的分配不宜在长期不定的状态之中，应当在相当短促的期间内分配妥当，使之固定在农民的手中。以后非有当地多数群众的要求，不应轻易再行分配。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违反农民的意见，不但影响农

民于土地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同样将为剥削分子利用了去阻碍土地斗争的发展。（四）查田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查剥削成分，而不是为了清查被剥削成分，因此不应该按家按亩去查，而应该动员最广大群众清查那些暗藏着的地主富农分子。（五）必须打击那些阻碍分田与查田的反革命分子，在群众的同意之下用最严厉的办法处治他们，从逮捕监禁，群众公审，直至枪决，这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是这样做，那么土地斗争就要受到极大的障碍。（六）应该极力发展阶级斗争，而避免地方斗争与姓族斗争，地主阶级与富农，却是极力想拿地方斗争与姓族斗争来代替阶级斗争以便阻碍土地革命的前进，苏维埃人员不应该去上地主富农的当。（七）土地革命的发展，依靠于农村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与组织程度的提高，因此，苏维埃人员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必须健全贫农团与雇农工会的组织。

土地革命不但使农民得到土地，而且要使农民发展土地上面的生产力。由于苏维埃的领导与农民劳动热忱的提高，苏区的农业生产在广大的地方是恢复了，有些并且更加发展了。

在这个基础之上，农民的生活是有了很大的改良。农民推翻了地主与国民党的剥削，生产结果落在自己的手里，因此现在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着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哪一种生活、哪一种政权是农民群众愿意的呢？让一切国民党

区域的农民群众自己答复这个问题吧！

苏维埃的财政政策

再说苏维埃的财政政策。

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但是有着广大的革命战费与革命工作费用的支出的苏维埃共和国，当他还是处在全国范围内的较小部分，又是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并且实行着便利于广大民众的税收政策，许多外边人们竟不知道苏维埃财政的出路在什么地方。而国民党占据着广大的区域，大数量地搜刮民脂民膏，为什么反弄到财政破产？

没有什么奇怪，苏维埃的财政政策与财政的使用，同国民党是根本的不同。

苏维埃的财政政策，建筑于阶级的与革命的原则之上。因此苏维埃的财政来源乃是：（一）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二）税收；（三）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

所谓向封建剥削者没收征发，即是向苏区与白区地主富农筹款，根据过去的经验，这一方面的收入常常占了主要的位置，这和国民党的财政政策恰好相反：苏维埃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剥削者身上，国民党则把主要财政负担放在工农劳苦群众身上。

苏维埃的税收，是统一的累进税，现在简单地两方面实行，这就是商业税与农业税，税收的基本原则，同样是重担归于剥削者。

商业税的征收，分为关税与营业税。关税是以按照苏区的需要程度统制货物的进出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

分之百的。在中国境内，只有苏维埃实行了完全自主的关税制，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的干涉，一切货物在边境税关纳税之后通行全苏区，无第二次之征税，一扫国民党厘金关卡层层抽剥的虐政。

营业税即是商业所得税（工业税现在没有收），按照商店资本大小、盈余多少，征收统一的累进税，资本小、盈余少的税轻，资本大、盈余多的税重。资本在百元以下，群众的合作社以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品，这些都实行免税。

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忱，使之自愿的纳税，同样是累进原则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的税轻，家中人口多、分田多的税重；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红军家属免税，被灾区域按灾情轻重减税或免税。

苏维埃采取统一的累进税法，乃是世界上最优良的税法，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不敢采用或者不敢彻底采用的。至于国民党的税收，则是一篇绝大的糊涂账。其税收原则是主要取之农民及其他小有产阶级。正税之外，有无数的附加税。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统计，国民党区域内捐税名目共有一千七百五十六种之多，而四川的田赋预征到了一九八七年，陕西的田赋比国民党未到时增加了二十五倍，这是国民党对于劳苦民众的“恩德”！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是苏维埃财政政策的重要部分，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苏区表现出来，在中央苏区也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面的着重地进行，是苏维埃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应该指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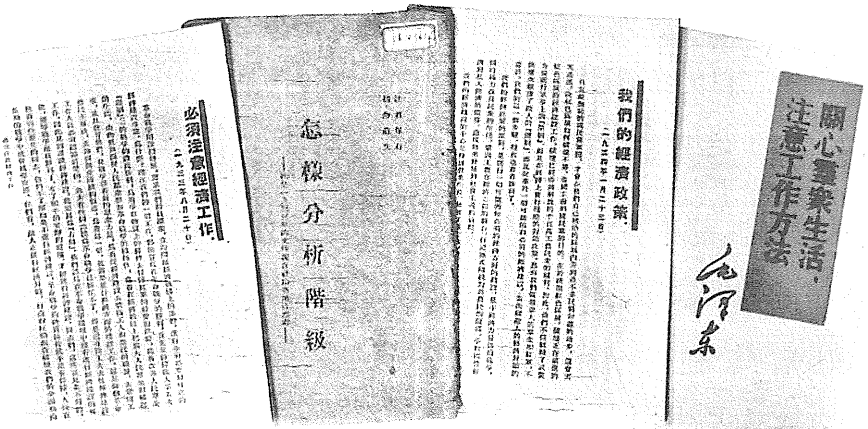
至于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法，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的斗争，过

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地用力。节省每个铜板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苏维埃对于财政的使用，应该与国民党的使用有绝对的差别。

苏维埃的财政不是没有困难的，红军的扩大、战争的发展，使苏维埃面前有着财政上面的困难。但是困难的克服，即包含于困难本身之中，开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改善我们的苏维埃工作，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分子的肩上安放着苏维埃财政的担子，向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去增加苏维埃的收入，这就是克服困难的方法。

苏维埃的经济政策

（参见《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怎樣分析階級
我們的經濟政策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關心羣衆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毛泽东

1933年8月和1934年1月，毛泽东分别在赣南十七县和苏区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上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强调经济建设和关心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

苏维埃的文化教育

现在要说到苏维埃的文化教育了。

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谁都知道，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

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为了这个目的，给予群众政治上与物质条件上的一切可能的帮助。因为现在的苏维埃区域，虽然是处在残酷的国内战争环境，并且大都是过去文化很落后的地方，但是已经在加速地进行着

革命文化建设了。

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二千九百三十二个乡中，有列宁小学三千零五十二所，学生八万九千七百一十人，有补习夜校六千四百六十二所，学生九万四千五百一十七人，有识字组（此项只算到江西粤赣两省，福建未计）三万二千三百八十八组，组员十五万五千三百七十一人，有俱乐部一千六百五十六个，工作员四万九千六百六十八人。这是中央苏区一部分的统计。

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二万零九百六十九人（内男一万二千零七十六人，女八千八百九十三人），进入列宁小学的一万二千八百零六人（内男八千八百二十五人，女生三千九百八十一人），失学的八千一百六十三人（内男生三千二百五十一人，女生四千九百一十二人），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苏区很多地方的儿童，现在是用了大部分时间受教育，做游艺，只小部分时间参加家庭的劳动，这同国民党时代恰好相反了。儿童们同时又组织在红色儿童团之内，这种儿童团，同样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

妇女群众要求教育的热烈，实为从来所未见。兴国夜校学生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人中，男子四千九百八十八人，占百分之三十一，女子一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九。兴国识字组组员二万二千五百一十九人中，男子九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女子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九人，占百分之六十。在兴国等地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在主持教育，许多妇女在做小学与夜校的校长，做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组

织，它注意于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个利益，妇女教育当然是他们注意的一部分。

群众识字的人数是迅速增加的。识字的办法有夜校，识字运动与识字牌，夜校有一定的地点，识字组在群众的家里，识字牌在道路的旁边。领导识字运动的机关则为乡村的识字运动委员会。拿兴国来说，全县有一百三十个乡的识字运动总会，五百六十一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三千三百八十七个分会下面的识字小组，二万二千五百二十九个加入识字小组的组员。这是扫除文盲的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应该使之向着全苏区一切城市与乡村中间开展去。

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加到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二万七千一百份，《红星》一万七千三百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了。

苏区中群众的革命的艺术，亦在开始创造中，工农剧社与工农歌舞团的运动，农村中俱乐部运动，是在广泛地发展着。

群众的红色体育运动，也是迅速发展的，现虽偏僻乡村中也有了田径赛，而运动场则在许多地方都设备了。

苏区还缺乏完备的专门教育的建设。但为了革命斗争领导干部的创造，我们已设立了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及教育部领导下的许多教育干部学校。中等教育与专门教育之应该跟着普通教育的发展而使之发展起来，无疑地应该成为教育计划中的一部分。

为了造就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了发展文化教育，利用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为苏维埃服务，这是苏维埃文化政策中不能忽

视的一点。

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什么？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

每个人都明白，所有这些方针与任务，只有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表征，这是人类精神解放绝大的胜利。

苏维埃的婚姻制度

现在说苏维埃的婚姻制度。

为了解放妇女于野蛮封建的婚姻制度之下，为了实行真正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还在一九三一年的十一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即颁布了苏维埃的婚姻条例，在这里，确定了结婚与离婚的完全自由，废除了包办强迫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蓄带童养媳。两年来在一切苏维埃管理区域是一般地实行了这一法令，凡非亲族血统在五代以内，非神经病与危险性的传染病，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经双方同意，并在乡苏与市苏举行登记，即可以实行结婚，离婚则只要男女一方提出要求，经过乡苏或市苏登记就行了。

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中国四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

伟大的胜利之一。

但是，这一胜利，是附属于工农民主专政的胜利之后的，因为工农劳苦群众婚姻制度的解放，必须首先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实行土地革命，男女劳动群众尤其是妇女第一有政治上的自由，第二也有了经济上的相当的自由，然后婚姻自由才有最后的保障。苏区中劳动妇女同男子一样有了选举权，并且分配了土地和工作，所以新制度是能够完全地实行了。

因为数千年来婚姻关系野蛮得无人性，女人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所以现时苏维埃的婚姻法令着重于保护女子，把因离婚而起的义务更多地给了男子负担。

因为小孩子是革命的新后代，过去社会习惯上不甚注意小孩子的保护，所以关于保护小孩，婚姻法令上有了单独的规定。其中关于私生子地位的承认与私生子的保护，是给了特别的注意的。

这婚姻制度的实行，使苏维埃取得了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广大群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而且在男女关系上也得到解放。

就拿婚姻制度一件事来说，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也是两个绝对相反的世界。

苏维埃的民族政策

最后，关于民族政策。

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使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自由与解放，是苏维埃民族政策的出发点。

国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如蒙古人、西藏人、新疆维回、甘肃回民、高丽人、安南人、苗人、黎人等等都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的剥削和统治，国民党所谓“五族共和”只是欺骗人的鬼话，而且冯玉祥的屠杀甘肃回民、白崇禧的屠杀广西苗族，乃是国民党最近的“赏赐”。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自己内部的统治阶级，如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与英日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相结合，使这些民族的广大劳苦民众遭受更加厉害的压迫与剥削，或者他们（王公活佛喇嘛土司等）直接投降于帝国主义，引导帝国主义迅速地殖民地化这些区域（如西藏、内蒙），更进一步地掠夺民众，这是少数民族过去与现在生活的实质。

苏维埃政府坚决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对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掠夺，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颁布的宪法大纲的第十四条宣言：

“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自决权，直到各民族脱离中国建立自己的独立自由国家。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属住在中国境内者，他们加入中国苏维埃联邦，或者脱离苏维埃联邦，或者建立自己的区域，均由各民族照自己的意志去决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现在必须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使他们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土司等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苏维埃政权应在这些民族中间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语。”

这是对于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实行民族压迫的响亮的回答，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及其苏维埃政府，不但自己正在用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而且号召国内一切弱小民族同时脱离中国统治阶级以及帝国主义的羁绊，直到这些民族完全独立。不但如此，苏维埃宪法大纲第十五条又说：

“中国苏维埃政权对于凡因革命行动受到反动统治迫害的中国各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革命战士，给以托庇苏维埃区域的权利，并且帮助他们重新恢复斗争的力量，直到这些民族与国家的革命运动得到完全胜利为止。”

苏区的许多高丽、台湾与安南革命同志的寄居，第一次全苏大会高丽代表的出席，这次大会的几位高丽、台湾、安南与爪哇的代表出席，都证明了苏维埃这一宣言的真实。

共同的革命利益，使中国劳动民众与一切少数民族的劳动民众真诚地结合起来了。

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代替民族的压迫。

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在全国范围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

从苏维埃政府所决定的这些政策和实施的这些成绩来看，很明显的苏维埃中国内的民众已经得到了许多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政治上、经济上、社会生活上的解放和胜利。然而谁晓得，我们苏区目前所做的一切，还只不过是苏维埃革命伟大解放政纲的部分实现的开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自始即有一贯的明显的施政纲领和前途，苏维埃中央政府早已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明白宣言过，他要完全消灭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他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新式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使中国人民过着真正的幸福的新生活。在将来向前发展过程中，他将实行国家工业化政策，他将实现国家农业集体化，他将逐步实行完全有计划的国民经济，他将根本消灭失业痛苦，他将根本消除贫穷的现象，他将使人民享受优裕丰富的生活，他将有不可战胜的国防力，他将有豁然独立的国际地位，他将

使中国变成永远没有人压迫人和人剥削人的幸福光荣的社会主义社会，换句话说，今日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苏联，就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前发展的活榜样！

五　苏维埃在彻底粉碎六次“围剿”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面前的具体战斗任务

当着我们说到了目前新的形势，说到了两年来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斗争，说到了苏维埃实施的基本政策的时候，就使我们得到一种确定的结论，即是说，苏维埃运动是大踏步前进了。两年来，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明显地变动了敌我两方的力量，敌人加强了他们的动摇与崩溃，而苏维埃运动则在猛烈的发展中，革命的力量是更加壮大了，革命的阵地是更加巩固了。民族战争与革命的国内战争已在中国广大范围内开展着，红军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工农民主专政的基础已经确立了，苏维埃工作已经在各方面得到伟大的成绩，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集中领导不但在苏区树立了坚固的基础，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为广大民众的革命旗帜了，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现时生活实际，成为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了。

然而革命的前进，要求我们估计到另外一些情形，要求我们以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检查革命的战线中存在着的弱点，这是我们不能放弃的责任。

估计我们的弱点，首先必须明白，现在苏维埃已经胜利的区域虽然是很广大了，但在全国来说，则还是处在较为狭小的范围内，还是处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反革命还保存着他们的广大的

区域，还占据着各个重要的城市。因此，苏维埃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是最严重地放在我们的肩上。日益加紧两个政权之间决死的斗争，要求我们以极大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容许丝毫的自满自足观念留存在我们革命队伍中间，也不容许表现任何微小的疲倦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两年中间，虽然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是广大地开展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对于运动的领导也有不少的成绩，然而若拿了与当前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比较，与阻止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投降卖国的严重任务相比较，则现时发展着的反帝斗争力量，显然还是异常不够的。苏维埃还没有采用更多的办法去发展广大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觉悟，去组织民众的反帝斗争，而且就在民众自发的反帝斗争中，苏维埃政府直接的帮助与领导还是非常不充分。广大白色区域的工人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苏维埃还没有充分地尽其组织与领导的责任。即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区域，也还未用最大力量去组织群众的斗争，使这些区域造成迅速变为苏区的条件，使红军在这些区域作战得到群众更多的配合，特别是在白军士兵中造成暴动响应红军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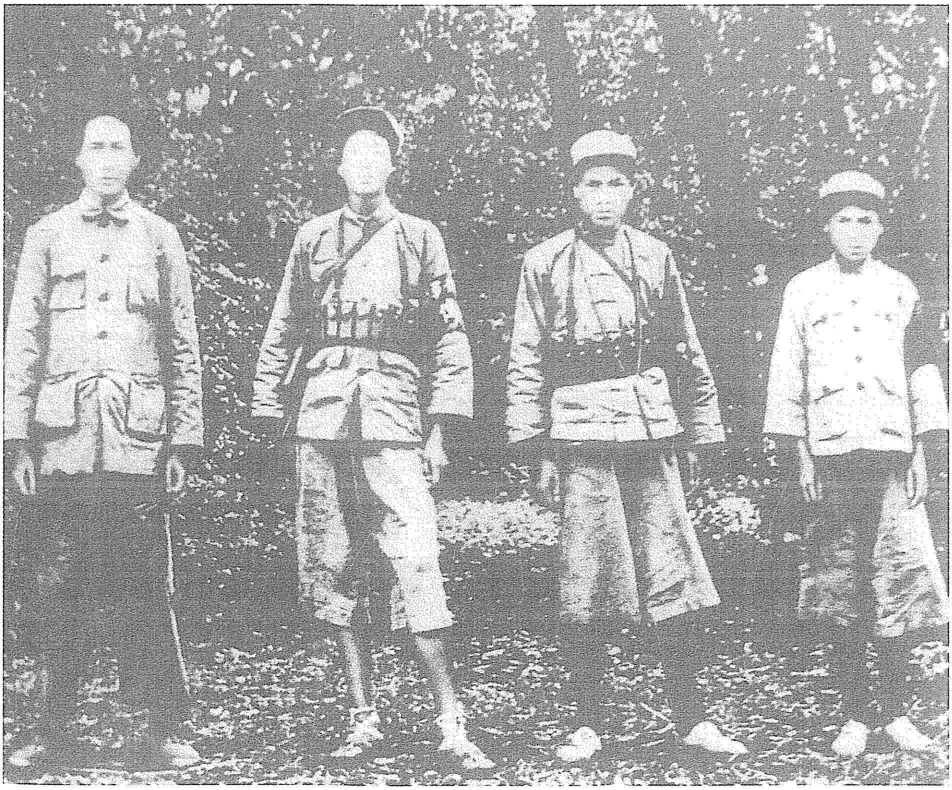
第三，红军的数量与质量，虽然是迅速扩大和增强了，但对于执行战胜帝国主义国民党整个军事力量，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伟大任务上，倒还是相差很远。后方扩大红军的工作，还不能适应前线的要求。赤卫军、少先队的编制与训练，在许多地方还是差得很。游击队的组织与行动，一般还是很不够的，优待红军家属的工作，在有些地方做得非常之不好。所有这些使得革命战争的发展，还只限于过去的成绩，使得我们每一次冲破敌人“围剿”之后，还不能乘胜直进，争取更加伟大的胜利。

第四，在一切为了战争的任务下，我们还不能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不论在土地斗争方面，在经济建设方面、在财政方面、在肃反方面以及在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他的弱点的存在，指出其一般的弱点，即是说，革命战争要求这些工作以很快的速度，争取大的成绩；然而在各地执行起来，都是参差不齐的。很多地方真正达到了所谓很快速度和最大成绩的标准，依靠了这些地方的工作，使革命战争得到了很大的帮助，但在另一些地方，则不但工作进行非常之慢，甚至经过很长的时期，还不能得到应有的成绩，特别在有些新区与边区中间，那里的工作更加差些。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的苏维埃机关中存在着一些不了解甚至不愿意执行苏维埃法令政策的分子。这些分子当中，有些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有些简直是地主资产阶级派遣进来的暗探。他们不是推进苏维埃的工作，而是妨碍了苏维埃的工作。他们不使苏维埃工作服从战争，而是使苏维埃工作离开战争，他们不愿意去开展群众的斗争，而使群众斗争停顿起来。他们不曾对于广大群众的动员，不曾对于群众的说服教育，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是用空谈空喊，甚至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去执行苏维埃工作。他们不去了解下层的情形，不去教育新进的干部，不去听取群众的意见，而只是机会主义地诬蔑下级干部不好，那里的群众没有革命积极性。在这些地方苏维埃的民主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没有吸收最广大群众来参加苏维埃的选举，没有吸收群众中大批积极分子来参加苏维埃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市乡代表会议制度，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还没有使苏维埃成为真正广大群众自己的政权机关。在这些原因之下，就使得许多苏维埃工作，在这些地方缺乏应有的成绩，使他不能适应革命战争的迫切要求。应该明白指出，这是苏维埃工作中间一个很严重的弱点。

所有这些弱点的存在，给了我们一种深刻的警觉，就是必须克服这些弱点，苏维埃运动才能适应一切客观的有利条件，而采取更大规模向着更大范围内发展去。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成为我们发展的基础。但是革命形势的需要，超过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还不够，我们必须增加力量。

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必须号召全苏区全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众，坚决执行下列各个具体战斗任务。



1934年，毛泽东和警卫员在瑞金合影。

在红军建设方面

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全国红军的领导，更进一步地强健起来，使全国红军的行动比较过去更加能够在统一战略意志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使各地方军事机关更加能够在中央领导之下充分地执行他们自己的职务。

把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普遍地深入地传播到全苏区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中去，号召群众在最短促的时间之内，为着实现这个最低限度的口号而斗争。要使群众明白，摆在面前的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决定胜负的战斗，苏维埃政权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直接广大的冲突，依靠我们数百万大红军的创立，因此一百万红军的首先创立，是苏维埃与每个工农群众神圣的责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各级地方苏维埃应该负责，收集两年尤其是去年红五月以来，各地扩大红军的丰富经验。着重地指出以充分的政治鼓动，去代替强迫方法。以残酷的阶级斗争与苏维埃在这一方面的法令，去对付破坏扩大红军与领导开小差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良分子，以充分执行苏维埃优待红军战士及某家属的一切法令与办法，去提高红军战士们的社会地位，去增加红军战士及其家属的精神上的安慰，去解决红军战士及其家属一切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方法。还要指出，为红军家属耕种土地以及日用必需品的供给，是优待工作的重要部分。一切对于优待红军战士及其家属怠工消极与阳奉阴违的分子，应该受到苏维埃法律的裁判。

应该把巩固红军放在红军建设的重要地位，使红军不但能够很快扩大，而且能够很快强健起来。应该更进一步提高红军战士的政

治教育，使每个红军战士都自觉地为了苏维埃新中国而奋斗到底，使红军成为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成为创造新苏区的执行者，使红军战士与广大苏区白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之间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要从政治教育去提高红军的自觉的纪律，使他们明白这是保证战争胜利的重要武器。政治委员制度，应该建立到一切红军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里面去。应该提拔更多的工人成分充当各级军事的与政治的指挥员。红军学校应当使之成为比较过去更能训练大批高级的与初级的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注意红军中成分的考察，对于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混进红军中来破坏红军的企图，应该给予严重的打击。巩固红军使红军成为铁军的工作，与政治工作同等重要而为现时红军所迫切需要的，就是军事技术的提高。这一任务的解决，在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日益采用新的军事技术的前面，对于我们是绝顶重要的。“学会与提高新的军事技术”的口号，应该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中去，红军学校应该为了这一目的去尽他最大的努力。

应该把赤卫军、少先队的新的编制方法推广到苏区的一切地方去，把一切劳动的青年成年男女，全部武装起来。红军后备军与地方守卫部队的作用与责任，应当使每个赤少队员清楚的认识。义务兵役制在将来更大规模的国内战争中的需要与作用，现在就应该向一切劳苦群众与赤少队员适当地宣传起来。应当用大力进行一切可能的与必要的军事训练与政治训练，野营演习方法应当尽可能推广到一切地方的赤少队中间去。在敌人进攻与苏区剥削分子企图捣乱的情形之下，赤少队保卫地方的责任应该特别地加重，许多地方赤色戒严的松懈现象，应该给予迅速的纠正。动员模范赤少队整连整队地加入红军中去，与动员之后立即重新编制起这些队伍来，是扩

大红军最好的方法之一。与红军作战不可分离而起其伟大支队作用的，是新区、边区以及白区中间的红色游击队。加强和扩大现有的游击队，最广泛地繁殖新的游击队，收集过去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极大地加强游击战争的教育与指导，把千百支游击队伸出白区去，伸出到敌人的侧方与后方去，在这些地方袭击敌人，发展群众斗争，创造游击区域，以至发展到创造新苏区，特别在尚未连成一片的各个苏区之间去做这些工作，与主力红军的行动互相配合起来，是苏维埃十分迫切的任务。

应该用一切办法去保障红军的给养、供给与运输，苏维埃的财政机关与经济机关，军事系统中的供给运输与卫生机关，应该为着这个共同目标而努力。运输队的动员，应该克服过去的弱点，使红军不致因缺乏运输员而妨碍了运动与作战。一切牺牲、一切努力给予战争，是每个苏维埃人员、每个革命分子的责任。

在经济建设方面

为着冲破敌人封锁，抵制奸商操纵，保证革命战争的需要，改良苏区民众的生活，苏维埃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各种必要的与可能的经济建设。

首先是发展苏区广大的农业生产。苏维埃应该用一切方法去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热忱。应该乘着春耕夏耕秋收各个重要的农事季节，进行提高生产的普遍而广大的运动，动员整个农村民众一齐进入生产的战线中。普遍组织劳动互助社与耕田队，有计划地调剂乡村劳动力，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是扩大生产的重要方法。应该领导并帮助农民去解决耕牛、农具、肥料、种子、水利以及防

止害虫等及农业上面的具体重要的问题。耕牛合作社应当普遍组织。根据去年春耕夏耕运动的经验，“完全消灭荒田”“增加今年二成收获”，应当成为战斗的口号。应当收集种棉经验，发展棉区的棉花生产。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牲畜的增殖，苏维埃应给予注意。某些重要农业部门如粮食、棉花等，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及各省国民经济部，应当作出具体的实施计划。苏维埃粮食部、粮食调剂局与群众粮食合作社，应当在工作上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完全保证红军与民众的粮食供给而努力。

苏区广大手工业的恢复，军事必需工业的建立，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苏维埃恢复与发展工业的计划，应当放在战争需要、苏区民众需要以及白区出口的可能基础之上。钨砂、煤、铁、石灰、农具、黄烟、纸、布匹、糖、药材、硝盐、樟脑、木材等项，应当是主要部门。应该用极大的努力去发展对于这些工业的群众的生产合作社，将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与农民，尽量组织到生产合作社来。同时应该容许并奖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扩大苏区的这些生产。苏维埃在目前不应当企图垄断所有的生产事业，但创办并发展一些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则是可以而且应当的。提高劳动热忱、发展生产竞赛、奖励生产战线上的成绩显著者，是提高生产的重要方法。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苏维埃对外贸易局与各种商业机关，必须更加健全起来。同时奖励私人商业，使他们为输出与输入各种必要商品而努力。而普遍地发展消费合作社，把广大工农群众组织在这种合作社内，使群众能够廉价地买进白区

的必需品，高价地卖出苏区的生产品，则在苏维埃贸易与整个经济建设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苏维埃对于消费合作社、中央总社与各省总社的领导，应当极大地加强起来。还没有建立省县总社的地方，应当迅速地建立。

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同样是要紧的办法。应该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以内，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这些都是银行的任务。

在苏维埃建设方面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维埃运动得着总的领导机关，对于中国革命有绝大的意义。两年来，在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间，得到了光荣的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指出中央政府在自己的组织上与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与不充分的地方。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必须健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组织与工作，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部即如粮食委员部

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的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总的发动机作用。

省苏维埃是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政府与各县区苏维埃之间的连锁，必须极大地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个省苏的领导，密切中央政府与各个省苏之间的联系（中央区各省与中央区以外各省），严密检查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极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极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方法，实行集体讨论，精确分工与个人负责的制度。加紧对于各县苏区工作的检查。极力纠正过去有些省苏工作上松懈与不集中的现象。

乡苏、市苏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用极大努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必须在一切尚未建立代表会议制度的地方，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地代表会议的工作，应该设立他的主席团。应该设立他的许多的委员会，并把委员会制度建立到村里去，吸收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建立每个代表与一定数目的居民发生关系的制度。应该建立主任制，每个村里要有一个主持全村工作的代表主任，应该准许他能够召集一村的代表与居民去开讨论村中工作的会议。乡苏与市苏是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工作的直接负责机关，他的工作中心是如何最健全地最充分地动员全市、全乡的民众，为着苏维埃的每一任务、每一工作的完满实现而斗争。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到各村各街道的实际工作上去。必须对于各村与各街道的工作，实行定期检查制度。各村或各街道之间的革命工作竞赛，是争取工作速度的有效方法。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切实而迅速地改善，依靠于区苏与市苏正确具体的领导。区苏、市苏的注意力应该全部放在各个乡苏、各个市区苏维埃的工作改善上面。充分的解释、频繁的巡视、切实的检

的必需品，高价地卖出苏区的生产品，则在苏维埃贸易与整个经济建设上都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苏维埃对于消费合作社、中央总社与各省总社的领导，应当极大地加强起来。还没有建立省县总社的地方，应当迅速地建立。

经济建设中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同样是要紧的办法。应该在苏维埃法律范围以内，尽量鼓励私人资本家的投资，使苏区资本更加活泼。应该尽量发挥苏维埃银行的作用，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目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这些都是银行的任务。

在苏维埃建设方面

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建立，使全国苏维埃运动得着总的领导机关，对于中国革命有绝大的意义。两年来，在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中间，得到了光荣的伟大的胜利。我们应该指出中央政府在自己的组织上与工作上还存在着许多不健全与不充分的地方。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使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在工作上划分开来，必须健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组织与工作，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部即如粮食委员部

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的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他总的发动机作用。

省苏维埃是地方政府最高领导机关，是中央政府与各县区苏维埃之间的连锁，必须极大地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个省苏的领导，密切中央政府与各个省苏之间的联系（中央区各省与中央区以外各省），严密检查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极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必须极力改善各个省苏的工作方法，实行集体讨论，精确分工与个人负责的制度。加紧对于各县苏区工作的检查。极力纠正过去有些省苏工作上松懈与不集中的现象。

乡苏、市苏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因此用极大努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必须在一切尚未建立代表会议制度的地方，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必须进一步加强各地代表会议的工作，应该设立他的主席团。应该设立他的许多的委员会，并把委员会制度建立到村里去，吸收大批工农积极分子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应该建立每个代表与一定数目的居民发生关系的制度。应该建立主任制，每个村里要有一个主持全村工作的代表主任，应该准许他能够召集一村的代表与居民去开讨论村中工作的会议。乡苏与市苏是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工作的直接负责机关，他的工作中心是如何最健全地最充分地动员全市、全乡的民众，为着苏维埃的每一任务、每一工作的完满实现而斗争。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必须把极大的注意力，放到各村各街道的实际工作上去。必须对于各村与各街道的工作，实行定期检查制度。各村或各街道之间的革命工作竞赛，是争取工作速度的有效方法。乡苏与市区苏维埃切实而迅速地改善，依靠于区苏与市苏正确具体的领导。区苏、市苏的注意力应该全部放在各个乡苏、各个市区苏维埃的工作改善上面。充分的解释、频繁的巡视、切实的检

查与民众中间的考验，是区苏、市苏领导方法的要点。县苏对于区苏工作的考查，也应该以这些为标准。

各省苏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极力地投到新开辟的苏区去，把在新区建立并加强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看成自己重要的职务。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内容，都与市、乡苏维埃有许多不同，一切白色区域变为苏维埃区域，经过革命委员会的过程。因此，健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使革命委员会能够负担起来武装民众，发动民众斗争，肃清反动势力，迅速转变到建立苏维埃政权，是各省苏区各新区、边区县苏应该极大地注意的。

苏维埃的民主虽然发展了，但应该指出许多地方还是异常不够的。必须严厉地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苏维埃人员应该从对于民众的动员与对于民众的说服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而不应该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苏维族人员应该注意民众的每一要求与每一提议，而不应该忽视这些要求与提议。苏维埃人员特别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应吸收广大民众对于存在在苏维埃机关中的不良分子，开展广大的批评斗争，直至用苏维埃法律严厉制裁他们。保证苏维埃与民众中间良好的关系。为了健全苏维埃的成分，必须实行苏维埃选举的群众化。必须向群众解释选举的意义，吸引最广大选民来参加选举。在选举中绝对的屏除那些阶级异己分子、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分子。选举大批的工农积极分子，来管理国家工作。在这里，依照选举法的规定，引进大批工人干部，加强工人在苏维埃政权中的领导地位，是健全苏维埃工作的重要关节。为了苏维埃工作的群众化，苏维埃必须与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合作社及其他一切民众团体发生密切的联

系，经过这些团体去动员广大民众，执行苏维埃的工作。

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必须用极大的力量除掉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间的松懈不紧张的现象，绝大地提高苏维埃人员的工作热忱，使每个工作人员都自觉地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国家工作而努力。同时必须森严工作纪律，一切对于工作不积极、疏忽与废弛职务、把苏维埃工作放在不要紧的位置等等的分子，应该向之作严厉的斗争，直至开除他们的工作。必须反对贪污浪费现象，因为这种现象，不但是苏维埃财政经济的损失，并且足以腐化苏维埃工作人员，使他们对于工作失去热忱与振奋精神的元素。必须把“一切工作服从战争”“争取工作的速度与质量”的口号，提到全部苏维埃人员的前面去，在这一方面，各级苏维埃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工农检查委员会，应该对于苏维埃工作人员，进行充分说服教育工作。

应该把苏维埃法令政策的彻底与忠实的执行，移在全部苏维埃人员的肩上去，应把违反苏维埃法令政策的行为，首先是苏维埃人员自己的违反放在严厉责罚的地位。

必须充分执行劳动法，把劳动法的每一条文解释给广大工人群众听。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最低工资的规定，是保证工人利益的中心与起码的部分。劳动检查所与劳动法庭，必须使之起完全的作用。必须向着那些忽视工人利益而企图与资本家妥协的人员作坚决的斗争。必须对于失业工人实行具体的与及时的救济，失业救济委员会必须在一切有失业工人的地方组织起来，社会保险制度，必须在一切可能实行的地方真实的实行。必须给予社会保险局的工作以应有的注意，必须避免过去有些地方对于保险金支配上的错误。为了这些工作的充分执行，应该把苏维埃劳动部健全起来，劳动部与

工会之间应该发生密切的关系。

充分地实行土地法，实行关于土地斗争的一切法令，向着全国范围开展广大的土地革命，这是苏维埃中心任务之一。没收地主阶级和大私有者土地的斗争，应该着重地猛烈地使之在一切新收入的苏维埃版图中开展起来。应该收集过去土地分配方法的许多经验，普遍应用到一切新区去。应该把查田运动开展到一切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的地方去，把那些地方封建残余势力给以迅速的肃清。土地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是保证土地革命彻底胜利的先决条件。

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

苏维埃制裁剥削分子及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策，必须坚决执行，国家政治保卫局与苏维埃法庭，必须提高自己的警觉性，对于反苏维埃法令的剥削阶级分子及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实行严厉的制裁与镇压。在这里政治保卫局工作与苏维埃法庭群众化，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肃反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争取苏维埃工作的速度与质量，使一切苏维埃工作，完全适合于革命战争的要求，这是苏维埃工作的总方向。

关于领导反帝斗争与白区工作

为了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猛烈地发展全国工农斗争，为了使苏维埃区域扩大到全国去，苏维埃政府必须加强对于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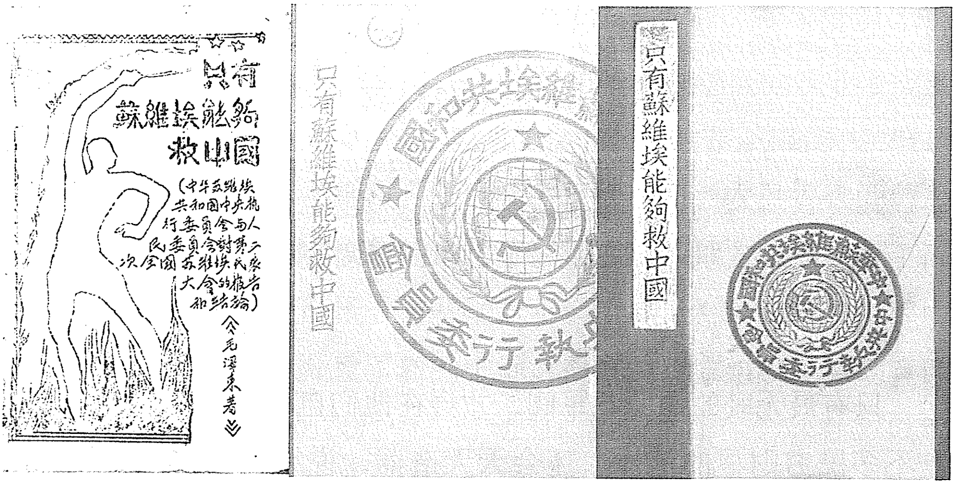
国反帝斗争与国民党区域工农革命斗争的领导。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放纵了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就是延长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寿命，就是限制了苏区发展的速度与范围。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各省苏维埃，必须把自己的眼光放大到广大的国民党区域去，不但要领导每一个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而且要在广大工农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利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投降卖国的每一具体事实，启发群众的民族觉悟与阶级觉悟，号召他们组织与武装起来，为驱逐帝国主义保卫中国领土而斗争，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地带，组织人民革命军义勇军，领导旧有的义勇军，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反动影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坚决地作战。苏维埃政府对于工人的每一反帝罢工，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每一反帝斗争，必须尽可能地给予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帮助。

对于国民党区域工人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反地主的斗争，一切革命民众反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群众斗争，苏维埃政府必须用一切办法去组织、去援助、去领导。一切苏维埃人员应该明白，要想把苏维埃运动发展到全国去，要想把比较苏区庞大若干倍的国民党区域造成转变为苏区的条件，要想创造新苏区，要想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大规模的“围剿”中间能够得到白区群众的援助，必须把极大的注意放到白区去。必须从苏区派遣人员，准备一切必须的物质帮助，去组织与领导白区群众斗争。对于这一方面的消极，就是对于扩大苏区与发展革命战争的消极。特别是苏区附近的国民党区域，这些地方的群众受苏维埃的影响最大，受国民党军事奴役食盐公卖等等的压迫最甚。苏维埃尤其是各个省苏及边县苏区政府，必须利用各种时机取得与这些群众的联系，组织他们的日常斗争，发展到游击战争，到群众暴动，到建立苏区与老苏区联结一片。在

这里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地发给当地群众。此外关于赤白对立问题、逃跑群众问题、食盐封锁问题、被难群众问题等，必须根据阶级的与群众路线，很好地给予解决。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交界地带工作的改善，是争取白区变为苏区的重要关节。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和红军，正在担负着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重大责任，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就必须完成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和规定的任务。同时，同志们都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四万万中国民众的解放，而且是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脱离帝国主义锁链的先导，是给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计划一个致命的打击，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从东方战线上进攻苏联的计划受到摧毁，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期大大地缩短逼近，我们的任务是何等的光荣和伟大！

同志们！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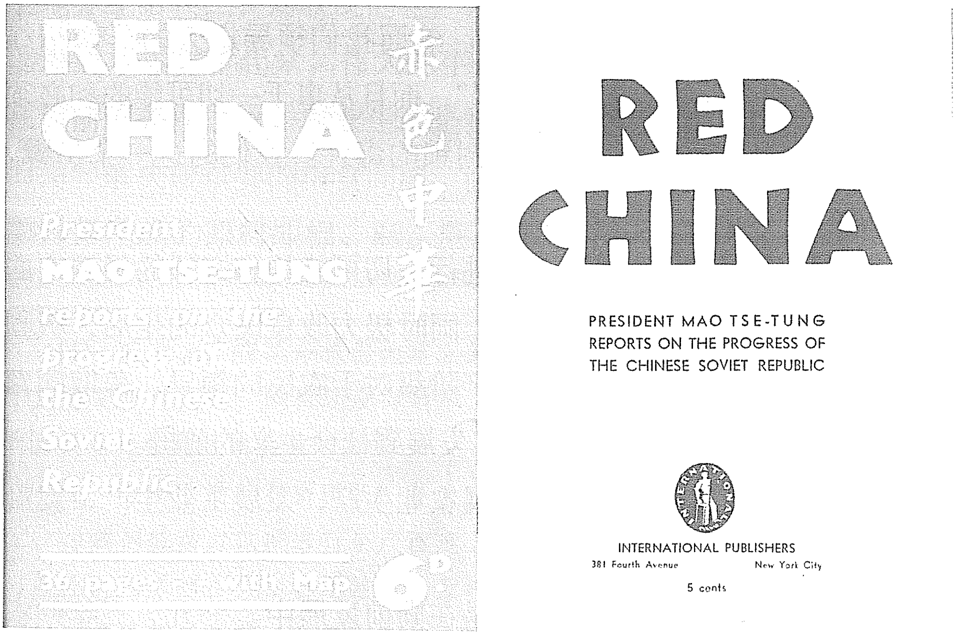
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和结论）

《毛泽东著》

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

1934年出版的《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即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RED CHINA

赤色中華

President MAO TSE-TUNG report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36 pages — with map

6d

RED CHINA

PRESIDENT MAO TSE-TUNG
REPORT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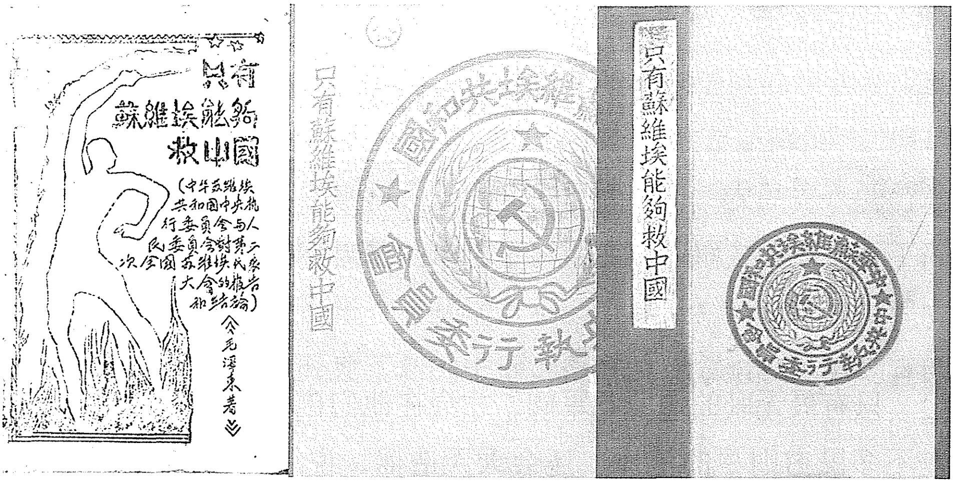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381 Fourth Avenue New York City
5 cents

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出版的《赤色中华》，即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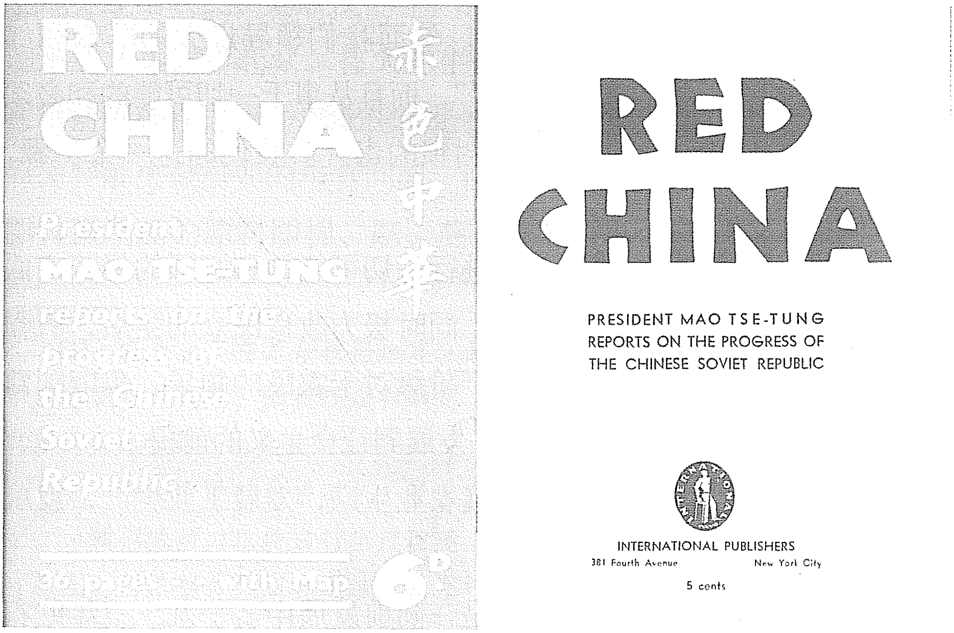
这里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带的工作，应该看得非常之重要。在这些地带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与游击队，必须完全遵守苏维埃的基本政策，禁止一切不分阶级乱打土豪的行为。没收地主阶级及反动派的财物，必须大量地发给当地群众。此外关于赤白对立问题、逃跑群众问题、食盐封锁问题、被难群众问题等，必须根据阶级的与群众路线，很好地给予解决。必须把造成赤白对立与群众逃跑的原因除掉了去。交界地带工作的改善，是争取白区变为苏区的重要关节。

同志们！我们苏维埃和红军，正在担负着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重大责任，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就必须完成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指出和规定的任务。同时，同志们都知道，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胜利，不仅是四万万中国民众的解放，而且是整个东方被压迫民族脱离帝国主义锁链的先导，是给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在太平洋上爆发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计划一个致命的打击，使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从东方战线上进攻苏联的计划受到摧毁，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期大大地缩短逼近，我们的任务是何等的光荣和伟大！

同志们！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和結論）
毛澤東著
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
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

1934年出版的《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即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RED CHINA
赤色中華
President MAO TSE-TUNG report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36 pages with map
6d
RED CHINA
PRESIDENT MAO TSE-TUNG REPORTS ON THE PROGRES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381 Fourth Avenue
New York City
5 cents

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出版的《赤色中华》，即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的经济政策[1]

（1934年1月23日）

只有最无耻的国民党军阀，才会在他们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弄到差不多民穷财尽的地步，还会天天造谣，说红色区域如何破坏不堪。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目的，在于破坏红色区域，破坏正在前进的红色区域的经济建设工作，破坏已经得到解放的千百万工农民众的福利。因此，他们不但组织了武装力量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而且在经济上实行残酷的封锁政策。然而我们领导广大的群众和红军，不但屡次击溃了敌人的“围剿”，而且从事于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建设，去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的毒计。我们的这一个步骤，现在也着着胜利了。

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

红色区域的农业，现在显然是在向前发展中。一九三三年的农

---

[1] 这是毛泽东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一部分。

产，在赣南闽西区域，比较一九三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则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陕边区的农业收成良好。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1]。但是经过分配土地后确定了地权，加以我们提倡生产，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增长了，生产便有恢复的形势了。现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而且超过了革命前的生产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复了在革命起义过程中荒废了的土地，而且开发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组织了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2]，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组织了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同时，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了生产工作。这种情形，在国民党时代是决然做不到的。在国民党时代，土地是地主的，农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们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对农民的生产加以提倡奖励以后，农民群众的劳动热情才爆发了起来，伟大的生产胜利才能得到。这里应当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

---

[1] 农业生产在革命根据地建立的头一二年，往往有些下降，主要是由于在分配土地期间，地权还没有确定，新的经济秩序还没有走上轨道，以致农民的生产情绪还有些波动。

[2] 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是当时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为调剂劳动力以便进行生产而建立起来的劳动互助组织。这种组织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大家自愿结合，互相帮助做工；结算时，工数对除，少做的按工算钱给多做的。此外，劳动互助社还优待红军家属，帮助孤老。帮红军家属做工是尽义务，帮孤老做工只吃饭不要工钱。因为这种劳动互助组织对于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采取的办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对此都有记载。

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面，对于某些重要农产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这是容许的，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进一步的注意和努力。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这里，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而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的组织，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节我们对于整个农村民众的动员和督促，则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农民（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组织犁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地合股买牛共同使用，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也应予以极大的注意。目前自然还不能提出国家农业和集体农业的问题，但是为着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各地组织小范围的农事试验场，并设立农业研究学校和农产品展览所，却是迫切需要的。

因为敌人的封锁，使得我们的货物出口发生困难。红色区域的许多手工业生产是衰落了，烟、纸等项是其最著者。但是这种出口困难，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为广大群众的需要，我们自己即有广泛的市场。应该首先为着自给，其次也为着出口，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两年来，特别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因为群众生产合作社的逐渐发展，许多手工业和个别的工业现在是在开始走向恢复。这里重要的是烟、纸、钨砂、樟脑、农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织布，自己制药和自己制糖，也是目前环境中不可忽视的。在闽浙赣边区方面，有些当地从来就缺乏的工业，例如造纸、织布、制糖等，现在居然发展起

来，并且收得了成效。他们为了解决食盐的缺乏，进行了硝盐的制造。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却是完全必需的。确切地计算原料的生产，计算到敌区和我区的销场，是我们每一种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从开始进行的时候就必须注意的。

我们有计划地组织人民的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食粮和钨砂的输出以及粮食在内部的调剂等，现在是异常需要的了。这一工作，闽浙赣边区方面实行得较早，中央区则开始于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

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

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国营的工业或商业，都已经开始发展，它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目前私人经济在红色区域是取着小规模经营的形式。

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个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动刚刚开始。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

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

为着发展国营经济和帮助合作社经济，我们在群众拥护之下，发行了三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这样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建设的资金问题，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财政的收入，是我们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明显的效验已在闽浙赣边区表现出来，在中央区也已开始表现出来了。这一方针的着重的执行，是我们财政机关和经济机关的责任。这里必须充分注意：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我们对于国家收入的使用方法，应该和国民党的方法有严格的区别。

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

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

（1934年1月27日）

同志们！关于我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同志们已经讨论了两天了。昨天的分组会，今天的大会，在这两天中间，同志们发表了很多的意见，从各方面发挥了我们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总结起来对于我的报告可以说是一致承认的。对于目前的形势，对于从这一形势产生的任务，对于两年来苏维埃政策的各方面的实施以及对于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在昨天今天同志们的讨论中间一般是同意了我的报告，同志们的发言，一般都是非常正确的，这是应该首先指出的。

但在昨天、今天两天的讨论中间，主要是在昨天的分组会中间，有个别同志的发言包含着不正确的观点，我也应该在结论中指出。这里主要是关于六次“围剿”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同志都承认我在报告中说的：我们是取得了对于六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但是六次“围剿”的最后决战却还是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号召广大群众，团结一切力量，争取对于六次“围剿”最后决战的胜利，是我们当前的最严重任务。因此在讨论中间有同志说：“六次‘围剿’已经完全粉碎了。”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对的。又有同志说：“六次‘围剿’我们仅在准备粉碎中。”这种意见也是不对

的。照前一说法，是过分估计了自己的胜利，把苏维埃最后粉碎“围剿”的严重任务轻轻取消了，而实际上，蒋介石正在集中一切力量最后向我们大举进攻，所以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危险的。照后一说，是看不到几个月来红军从艰苦战争中已经给了敌人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已经取得了第一步胜利，这种胜利，同粉碎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合起来，就成为我们彻底粉碎六次“围剿”的坚固的基础。对于自己成绩估计不足，同样是很危险的。

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仇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又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

另有一个同志，在分组会上说了些不对的话，他说苏维埃并没有扩大红军，也没有游击队，农民仍要交租与地主，这些话当然是糊涂极了，我想是不待说明的。又有一个同志，他说福建的工作人员都是机会主义者，我想也不待说明，大家知道是错误的。我们承认某些苏维埃工作人员中间是存在着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作怪，我们应向这种分子作坚决的斗争，但像这个同志的说法，则是对于苏维埃的诬蔑了。

关于婚姻问题，我在报告中曾经说到男女两方有一方坚决要求离婚，苏维埃政府应该准许离婚。但应该指出，红军家属是例外。为了巩固红军战士的战斗决心，中央政府曾经规定，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必须取得其夫同意，只有在两年内还得不到丈夫音信，

才可以由妻子一方提出离婚。关于结婚的年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降低，这种意见，我觉得是不妥当的。为了种族的与阶级的利益，结婚年龄不应该低于男二十，女十八以下。应该明白早婚是有极大害处的。同志们！要耐烦一下子啊！（全场轰笑）从前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之下，贫苦工农有到四五十岁还不能结婚的，为什么现在一两年都等不及呢？（全场又大笑）

以上是我的结论的一部分，但是结论主要部分[1]还在下面。

---

[1] 主要部分，即《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

（1934年1月27日）

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我觉得应该提出来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群众生活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谁要是看轻了这个中心任务，谁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员。我们的同志如果把这个中心任务真正看清楚了，懂得无论如何要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曾经看见这样的情形：他们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个时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汀州市群众的问题是没有柴烧，资本家把盐藏起来没有盐买，有些群众没有房子住，那里缺米，米价又贵。这些是汀州市人民群众的实际问题，十分盼望我们帮助他们去解决。但是汀州市政府一点也不讨论。所以，那时，汀州市工农代表会议改选了以后，一百多个代表，因为几次会都只讨论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完全不理群众生活，后来就不高兴到会了，会议也召集不成了。扩大红军、动员运输队呢，因此也就极少成绩。这是一种情形。

同志们，送给你们的两个模范乡的小册子，你们大概看到了吧。那里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长冈乡[1]、福建的才溪乡[2]，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长冈乡全乡一千五百人，销了五千四百块钱公债。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

---

[1] 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

[2] 才溪乡指福建省上杭县的上才溪、下才溪两个乡。

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1]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他们和汀州市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绝对的不相同。我们要学习长冈乡、才溪乡，反对汀州市那样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者！

我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模范的长冈乡工作人员，可尊敬的长冈乡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真心实意的爱戴，他们的战争动员的号召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这样做了，

---

[1] 公略县是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个县，以吉安县东南的东固镇为中心。1931年9月，红军第三军军长黄公略在这里牺牲。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这个县以纪念他。

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这是无疑的，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不是实实在在地被我们粉碎了吗？

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1]，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作方法的问题。

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

---

[1] 1933年6月，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周围普遍建筑碉堡，作为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策略。据统计，至1934年1月底，江西共筑碉堡4000多座。后来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同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也采用蒋介石的这种堡垒政策。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这种反革命的堡垒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战胜的，这已为历史的事实所充分证明。

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区边区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同样，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的工作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进行工作，他们是仔细地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负起了责任，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长汀、永定等县的一些地方，赣南的西江等处地方，湘赣边区的茶陵、永新、吉安等县的一些地方，湘鄂赣边区阳新县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还有许多县里的区乡，加上瑞金直属县，那里的同志们都有进步的工作，同样值得我们大家称赞。

一切我们领导的地方，无疑有不少的积极干部，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很好的工作同志。这些同志负担着一种责任，就是应该帮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帮助那些还不善于工作的同志们作好工作。我们是在伟大的革命的战争面前，我们要冲破敌人的大规模的“围剿”，我们要把革命推广到全国去。全体革命工作人员负担着绝大的责任。大会以后，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前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

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的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

（1934年1月29日）

这两天得到前方消息，反革命蒋介石，已经把福建的十九路军打败了，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那班先生们，也已经逃走了。现在蒋介石正积极向苏区大举进攻，根据这两天的消息，蒋介石是计划分三路向苏区大举进攻，即是东路、中路、西路，东路由福建沙县，进攻我们的归化清流泉上，企图占领石城瑞金，由蒋鼎文充当总指挥。中路由黎川向我们建宁苏区前进，前昨两天战事极为激烈，他们的目的要占领我们的建宁广昌与博生，由陈诚充当总指挥。西路由永丰经过荇田沙溪，企图进攻我们的兴国，由薛岳充当总指挥。

关于敌人对于我们的五次“围剿”，在这几天报告与讨论中，已经有了正确的估计，我们已经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但是五次“围剿”的最后决战还是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这一种估计，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了。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五次“围剿”的最后粉碎，把敌人的三路进攻打他一个落花流水。我们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坚强的红军，有着第二次全苏大会决定的正确的方针，粉碎敌人进攻的把握是在我们的手里的。但是我们应用极大的努力去实现许多紧急任务。第一是扩大红军，要继续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一月上半月突击运

动的经验，学习瑞金兴国西江等县扩大红军的光荣模范，要打败敌人的三路进攻，就要十分努力扩大红军。第二要实行赤色戒严，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赤色戒严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切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都要动员起来。第三要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地主富农资本家一定会在这次敌人三路进攻中乘机活动，企图做国民党的内应，我们应当提高阶级警觉性，随时随地注意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第四要在敌人进攻的那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一粒米吃，找不到一个带路的。第五要动员运输队上前线挑胜利品，抬伤兵，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就有人出发。第六要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要发动群众，把公债销完，把公债谷子收齐，把土地税谷子赶快送到苏维埃来，要节省经济帮助战争。第七要粉碎敌人的三路进攻，就要发动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战斗的动员起来，加紧自己的工作，就要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一致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用全力帮助战争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用全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回答他，我们要一致团结起来对付敌人，要向群众作普遍的宣传鼓动，告诉每一个男同志，每一个女同志，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小同志，使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一致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我们已经粉碎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在五次“围剿”中又已取得第一步胜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已经经过了许多的大风浪，我们不是毫无经验不禁风浪的小孩子，我们要收集过去胜利的经验，为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而奋斗！

我们要严厉反对一切在敌人进攻前面惊惶失措，悲观动摇，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关于紧急动员的报告

（1934年1月29日）

这两天得到前方消息，反革命蒋介石，已经把福建的十九路军打败了，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那班先生们，也已经逃走了。现在蒋介石正积极向苏区大举进攻，根据这两天的消息，蒋介石是计划分三路向苏区大举进攻，即是东路、中路、西路，东路由福建沙县，进攻我们的归化清流泉上，企图占领石城瑞金，由蒋鼎文充当总指挥。中路由黎川向我们建宁苏区前进，前昨两天战事极为激烈，他们的目的要占领我们的建宁广昌与博生，由陈诚充当总指挥。西路由永丰经过荇田沙溪，企图进攻我们的兴国，由薛岳充当总指挥。

关于敌人对于我们的五次“围剿”，在这几天报告与讨论中，已经有了正确的估计，我们已经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取得了第一步的胜利，但是五次“围剿”的最后决战还是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这一种估计，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了。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五次“围剿”的最后粉碎，把敌人的三路进攻打他一个落花流水。我们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有着坚强的红军，有着第二次全苏大会决定的正确的方针，粉碎敌人进攻的把握是在我们的手里的。但是我们应用极大的努力去实现许多紧急任务。第一是扩大红军，要继续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一月上半月突击运

动的经验，学习瑞金兴国西江等县扩大红军的光荣模范，要打败敌人的三路进攻，就要十分努力扩大红军。第二要实行赤色戒严，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赤色戒严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切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都要动员起来。第三要镇压反革命的活动，地主富农资本家一定会在这次敌人三路进攻中乘机活动，企图做国民党的内应，我们应当提高阶级警觉性，随时随地注意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第四要在敌人进攻的那些地方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一粒米吃，找不到一个带路的。第五要动员运输队上前线挑胜利品，抬伤兵，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就有人出发。第六要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要发动群众，把公债销完，把公债谷子收齐，把土地税谷子赶快送到苏维埃来，要节省经济帮助战争。第七要粉碎敌人的三路进攻，就要发动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战斗的动员起来，加紧自己的工作，就要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一致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用全力帮助战争去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用全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应当用全力去回答他，我们要一致团结起来对付敌人，要向群众作普遍的宣传鼓动，告诉每一个男同志，每一个女同志，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小同志，使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一致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

我们已经粉碎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围剿”，在五次“围剿”中又已取得第一步胜利，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我们已经经过了许多的大风浪，我们不是毫无经验不禁风浪的小孩子，我们要收集过去胜利的经验，为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而奋斗！

我们要严厉反对一切在敌人进攻前面惊惶失措，悲观动摇，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

我们更要反对一切忽视战争严重性的放松动员工作的“左”倾机会主义！

我们要团结一致，争取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全部胜利！

努力扩大红军！

加紧赤色戒严！

实行坚壁清野！

动员运输队上前线去！

集中粮食保障红军给养！

使一切苏维埃工作配合革命战争！

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苏维埃中国万岁！

红军万岁！

百战百胜的红军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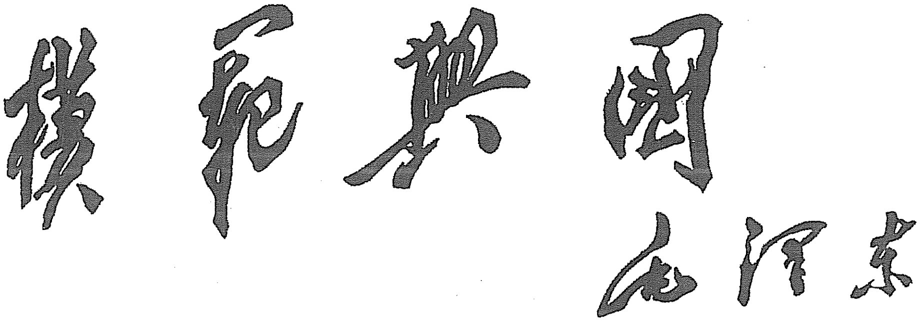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兴国代表题词[1]

（1934年1月）

模范兴国

毛泽东



毛泽东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兴国代表的题词。

---

[1] 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并发出号召“要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就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欣然给江西兴国的代表题写了“模范兴国”4个大字。代表们当时把毛泽东的题词带回来后，为鼓舞全县人民争创永久的模范县，特地将题词制成4块红漆匾额，高悬在兴国城的东、南、西、北4个进城的街口上。“模范兴国”从此闻名遐迩，传颂至今。

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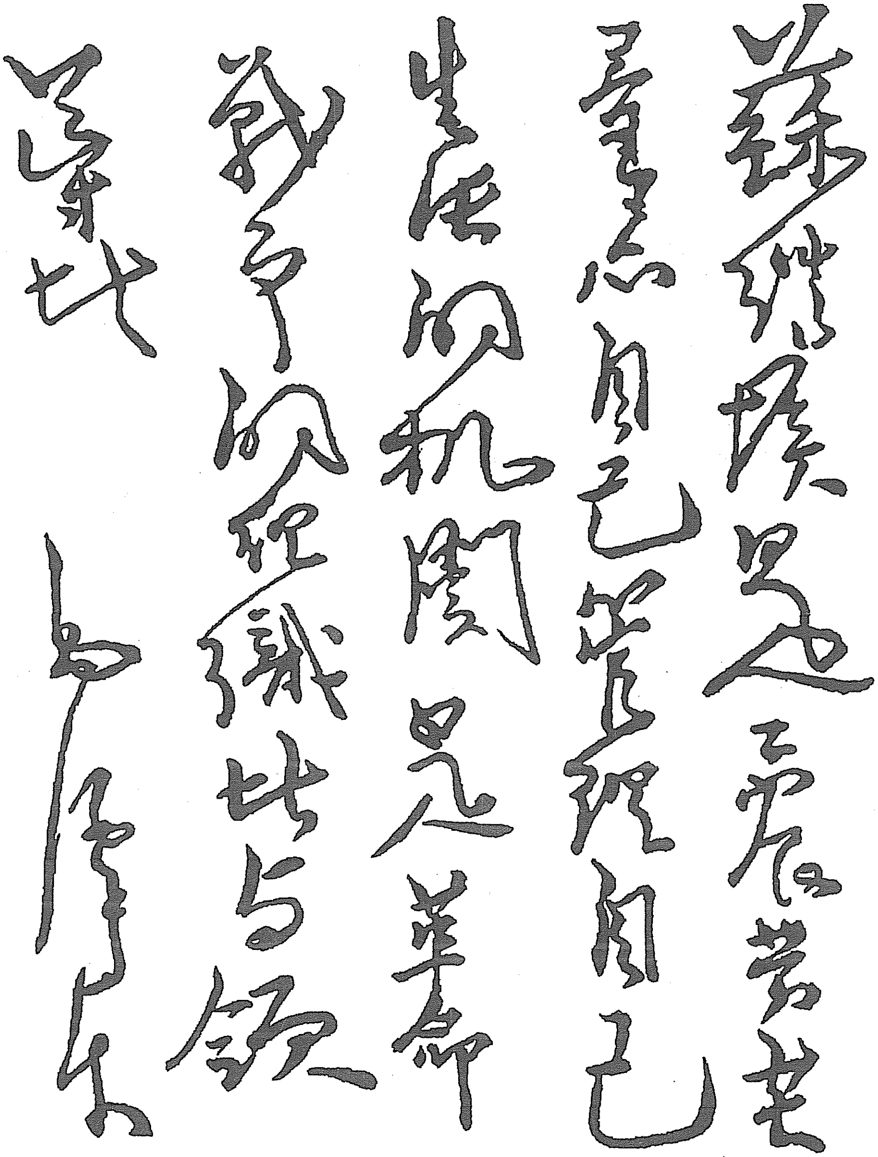
（1934年1月）

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毛泽东

---

[1] 1934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给这次会议的题词。



苏维埃是工农劳苦
群众自己管理自己
生活的机关是革命
战争的组织者与领
导者

毛泽东

毛泽东为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题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

（1934年2月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完全同意张闻天同志关于苏维埃外交政策的报告，批准上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与人民委员会所采取的对于福建十九路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一切步骤，并决定公布下列三个主要文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词

（1934年2月1日）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经过了十一天，完全成功完全胜利地结束了！（鼓掌）我们已经决定了在全中国革命胜利的方针与计划！（鼓掌）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我们的手中！（鼓掌）我们要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我们的方针与计划已经决定了！（鼓掌）现在的问题，是要百分之百地去执行这些方针与计划！我们要有坚决执行的勇气，我们要有干的勇气，要把全体苏维埃人员的工作热忱提高起来，要把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起来，我们的责任是很大的，我们担负着大会交给我们的担子，这就是伟大的革命的担子，我们要热心要坚决要有勇气来挑起这一副担子前进，我们一定要把这副担子挑到目的地去！（鼓掌）彻底粉碎五次“围剿”，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工农民主专政的全国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把大会交给我们的担子挑到这个地方去，我们一定要到达这个地方，要迅速到达这个地方！（鼓掌）

但是革命的担子挑到这个地方去就完了吗？工农民主专政是我们的最后目的吗？同志们！还没有完，还不是最后的目的，革命的担子还要挑到更远的地方去。在今天我们就要指出这种地方，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但要完成民主革命，而且

要使革命转变到将来的社会主义方向去！我们不但要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要消灭地主阶级，而且现在就要准备着，准备到了将来，到了适当的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像苏联现在所做的一样，最后还要进到共产主义，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办法，进到最自由光明伟大的世界去。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才是人类最后的解放，才是人类最后的胜利！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今天闭幕了。我们要实行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勇敢地担负起革命的伟大的责任向前头去，争取我们的最后胜利！

苏维埃万岁！

革命胜利万岁！

全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全世界革命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震动全场的欢呼与鼓掌）

关于二全大会选举与中央执行委员、人民委员[1]

（1934年2月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苏区赤色首都正式开幕，大会轰轰烈烈地经过了十一天，完全成功地闭幕了。大会总结了两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经验，提出了苏维埃今后最战斗的历史任务，并且具体地讨论了红军建设、经济建设与苏维埃建设等重要问题，通过了修正的苏维埃宪法及上述各重要问题的决议案。最后，大会选举了下列一百七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博古、陈绍禹、何克全、刘少奇、毛泽东、项英、吴亮平、瞿秋白、周月林、金维映、黄发桂、谢玉钦、李富春、谢名仁、萧世榜、林国宋、黄长娇、蔡畅、钟葆元、娄梦侠、张绩之、徐达志、曾山、钟昌桃、刘启耀、钟循仁、李卓然、刘广臣、谢先霊、朱德、周恩来、王稼蔷、刘伯承、贺昌、何长工、滕代远、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董振堂、刘伯坚、黄甦、蔡树藩、聂洪钧、王如痴、万永诚、陈光、寻准州、罗瑞卿、张纯清、周建屏、周昆、乐少华、陈阿金、袁国平、叶剑英、陈毅、毕士梯、陈洪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签署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告（第一号）。

时、萧克、孔荷宠、朱瑞、刘畴西、徐彦刚、陈昌浩、徐向前、张国焘、张琴秋、贺龙、关向应、夏曦、宋白民、王维周、罗炳辉、洪水、蔡干、张然和、余宏文、王世泰、潘士忠、姜阿三、张寇一、古大存、郑振芬、朱琪、高俊亭、詹以锦、郑位三、王凤鸣、成仿吾、郭述申、张德三、祝维垣、顾作霖、邵式平、黄道、朱兆祥、孔书安、刘晓、钟世斌、傅才秀、周义开、刘明辉、熊仙璧、刘国珠、钟桂新、罗迈、陈祥生、林伯渠、刘群先、胡海、范乐春、曾洪易、巫子元、张太和、黄宜章、张鼎丞、李见珍、吴兰甫、吴必先、邱先英、张闻天、陈云、王盛荣、邓发、陈潭秋、潘汉年、黄加高、张云仙、张金楼、周少文、何振吾、陈寿昌、黄光保、谭余保、刘士杰、王震、旷彪、彭仁昌、任弼时、吴德峰、王秀章、熊国炳、余洪远、李维海、何畏、李先念、曾广澜、周光坤、李成甲、陈子谦、方志敏、余汉朝、黄万生、汪金祥、关英、涂振农、关春香、吴玉章、失地元、杨其鑫、邓振询、何叔衡、高自立、梁柏台、徐特立、阮啸仙、邓颖超、董必武、赵云、王贤选、罗梓铭、杨世珠、赖美玉。

并以下列三十六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

杨炳龙、谢振富、邱时凤、邓尧盛、董长胜、刘毅、李美群、邹中才、徐顺洹、徐明富、叶德贵、邓子恢、朱荣生、贾元、冯雪峰、李一氓、李克农、张爱萍、罗荣桓、李赐凡、颜立记、尹仁桂、刘燕玉、方敬和、谢炳煌、钟义谨、黄富武、方振华、邹敦厚、廖汉华、龙春山、华新湘、周桂香、旷朱权、邓萍、康克清。

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以此正式的和候补的二百十一委员组织之，为全苏大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

二月三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

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周月林等十七人组织主席团为执行委员会闭幕后之最高政权机关，并以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同时又选举张闻天（洛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下列十一人民委员部为中央行政机关：

王稼蔷为外交人民委员

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

邓振询为劳动人民委员

高自立为土地人民委员

林伯渠为财政人民委员

吴亮平为国民经济人民委员

陈潭秋为粮食人民委员

梁柏台为司法人民委员

曾山为内务人民委员

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

项英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

又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王稼蔷为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

并委任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

中央执行委员会除了全部接受二苏大会给予我们一切战斗任务以外，并号召全体苏维埃工作同志紧急动员起来，加紧自己的工作，动员最广大的工农群众，一致团结在苏维埃政府周围，集中一切力量，开展革命战争，为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

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

为福建事变宣言

（1934年2月11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福建的所谓人民革命政府由于蒋介石的武装干涉与人民革命政府领袖们的投降出卖，是最后的失败了。

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领袖们，自从去年受到我们工农红军东方军在连城与闽北的严重打击之后，自知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暂时让步，已成为保持他们的实力与统治的必要条件。同时卖国残民的国民党统治的破产，全国千千万万工农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国民党日益增加的愤怒与反抗，和对于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红军的同情与拥护，使当时福建国民党省政府与十九路军的官僚政客军阀们不能不在国民党旧的统治方式以外，找寻新的统治方式，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官僚政客军阀们，当时首先派遣专使徐名鸿到苏维埃中央政府，表示愿意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宣布的三个条例，即（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等自由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苏维埃政府对于当时福建国民党省政府与十九路军官僚政客军阀们的这一企图是完全了解的。一切空口的说话，决不能欺骗苏维

埃政府的领导者。而在另一方面，苏维埃政府根据自己的宣言，对于一切反帝反蒋的企图，都愿给以实际的推动与援助。所以当时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在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代表允许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与条件之下，根据自己革命的基本立场，同他们订立了初步的协定。从最初，苏维埃政府的领导者即告诉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的代表们，只有坚决地发动与赞助广大群众的反日反帝反蒋的革命斗争，武装他们，给他们以一切民主的自由权利，才能够救中国民族于沦亡。任何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只能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充当辅助的工具。

福建省政府与十九路军的代表们，同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订立了初步协定之后，即声明脱离国民党成立了他们的所谓人民革命，宣布了一些“左”的改良主义的政纲，并且公开发表了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的宣言。但这只是在口头上。在实际上他们还是照旧勾结日美帝国主义，向他们献媚。对福州日本浪人的挑衅，默不作声，在容许民众的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方面，则借口军事时期，概不兑现。对于工人农民及一切劳动者则不但没有任何具体办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相反地竭力禁止工人罢工斗争与农民反抗地主与夺取土地的斗争。在军事上，也完全采取了失败主义的路线。在蒋介石积极进攻的前面，他们事先毫无具体的军事布置，事后则接二连三地投降出卖，从司徒非、谭启秀一直叛变到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与张炎。十九路军阀蒋光鼎、蔡廷锴之流则不战而退，投降广东军阀以自保。其他许多官僚政客们，如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之流，则终日空谈，欺骗民众。然一闻枪声，即鸡飞狗散，向帝国主义的公使馆与军舰逃命。虽是我们红军为了配合他们反蒋的战争，曾经在闽北积极行动，从占领沙县直下尤溪，但是这

对那些表现丧魂失魄的狐群狗党依然是无用的帮助。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根据于初步协定曾经向人民革命政府一再提出警告，指出只有实现协定上的每一条文，发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战胜蒋介石的武装进攻，真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警告，并不能引起人民革命政府中官僚政客军阀们的注意，他们仇视民众，同其他国民党官僚政客军阀们，没有丝毫的区别，结果，正像我们所指出的，这个人民革命政府，在蒋介石武装面前，结束了他五十余天的悲惨的命运。

全中国的民众们！你们从苏维埃政府与人民革命政府所订立的初步协定与苏维埃政府的电文中，充分地可以看到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他的走狗蒋介石，为了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怎样毫不动摇地斗争着。一切事实证明，只有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反帝国主义的先锋队，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一切改良主义的派别，从生产大众党，社会民主党，第三党一直到托洛斯基陈独秀取消派，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应声虫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民众的帮凶！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再一次地向全中国民众、革命的士兵与一切武装队伍宣言，苏维埃政府决不因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失败，与人民革命政府中官僚政客军阀们的背约，而放弃过去三个条件之下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的提议。相反的，经过福建的事变，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士兵、每一个知识分子与反日的中国人，更可清楚地看到：苏维埃政府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愿意同一切真能抗日反蒋的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解放。一切真能抗日反蒋以及一切反帝国主

义与反国民党的力量都可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方面得到有力的指导与援助，但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一切企图以空口的允诺与欺骗宣传，来维持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反革命的改良主义派别，将继续给以无情的打击与揭破。

全中国的民众们！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惨败的历史，又一次地指出，只有你们自己的英勇的坚决的斗争，才能最后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保证中国的独立、自由与领土的完整。中国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中几千万劳动者胜利的成功的经验，告诉你们：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才能取得全国民众的民族的与社会的解放！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埃区域的进攻，保卫中国苏维埃，也即是为了保卫中国革命，保证你们自己的胜利！

全中国抗日反帝的力量，联合起来！

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

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卖国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

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中国万岁！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一日

组织法

（1934年2月17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

（中字第一号）

兹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特公布之。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组织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组织法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原则而制定，苏维埃中央政权机关须依本法组织之。

第二章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第二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

第三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直属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而组成。

第四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每两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一次。如遇特别情形不能按期召集，得延期召集之。

第五条　全国苏维埃的临时代表大会，遇必要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自动召集之，或由代表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的地方苏维埃的要求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之。

第六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听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并讨论之，制定和修改宪法及其他法律决定全国的大政方针，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三章　中央执行委员会

第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期间的最高政权机关。

第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额，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五人。

第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每六个月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集一次。如遇特别情形不能按期召集时，得延期召集之。

第十条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或中央执行委员半

数以上的要求，得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临时会议。

第十一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负责，应向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

第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得颁布各种法律和命令，并施行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全境。

第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审核和批准，一切关于全国政治上、经济上的政策和国家机关的变迁。

第十四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人民委员会及其他机关的法令和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停止执行和变更之权。

第十五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主席团，其人数不得超过二十五人，并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至四人。

第十六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被选任为人民委员的，应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第四章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第十七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期间的全国最高政权机关。

第十八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监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种法令及决议之实施。

第十九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停止或变更人民委员部的决议和法令之权。

第二十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停止或变更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或命令之权。

第二十一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有颁布各种法律命令之

权，并有审查和批准人民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及其他所属机关所提出的法令、条例和命令之权。

第二十二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解决人民委员会与各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各省苏维埃之间的关系问题。

第二十三条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完全责任，须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第五章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

第二十四条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规定如下：

（一）颁布和修改宪法。

（注）此项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专有权。

（二）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外订立各种条约及批准国际条约。

（三）制定法院的系统组织，并颁布民事刑事及诉讼等法律。

（四）颁布劳动法、土地法、选举法、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及一切单行的法律。

（五）决定内政外交的大方针。

（六）改订国家的边界。

（七）确定地方苏维埃的权力，并解决地方苏维埃间的争执。

（八）划分行政区域，并有建立合并改造或解散地方政权机关之权。

（九）对外宣战与媾和。

（十）制定度量衡和币制。

（十一）发行内外公债。

（十二）审查并批准预算决算。

（十三）制定税率。

（十四）组织并指导海陆空军。

（十五）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的公民权及居住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的其他国籍人民的居留和公民权。

（十六）宣布全部或一部的赦免。

（十七）制定国民教育一般原则。

（十八）选任和撤销人民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

（十九）规定工业、农业、商业及交通事业的政策和计划。

（二十）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国境内各民族订立组织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条约。

（二十一）有撤换和变更下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之权。

第六章　人民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负指挥全国政务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人民委员会以下列的人员组织之。

（一）人民委员会主席，

（二）外交人民委员，

（三）劳动人民委员，

（四）土地人民委员，

（五）军事人民委员，

（六）财政人民委员，

（七）国民经济人民委员，

（八）粮食人民委员，

（九）教育人民委员，

（十）内务人民委员，

（十一）司法人民委员，

（十二）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

附注（一）看工作的需要，各人民委员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随时增加之。

附注（二）人民委员这个名称，只有人民委员会的委员才能用，中央和地方的其他委员不得用这个名称。

第二十七条　为镇压反革命之目的，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其组织另定之。

第二十八条　人民委员会为达到本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的目的，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指定的范围内得颁布各种法令和条例，并得采取适当的行政方针，以维持行政上的迅速和秩序。

第二十九条　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及所颁布的各种法令条例，须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第三十条　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如与大政方针有关系者，应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他的主席团去审查批准。但遇紧急事项，人民委员会得解决，并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其主席团。

第三十一条　人民委员会有审查修改或停止各人民委员部所提出的法令及其决议之权。

第三十二条　各人民委员部及各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如对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和各种法令有不同意见时，可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他的主席团提出意见，但不得停止执行。

第三十三条　人民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负责，

须按时向他们作工作报告。

第七章　最高法院

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法律的效力，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最高法院。

第三十五条　最高法院设院长一人，副院长二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之。

第三十六条　在最高法院之下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及军事法庭，各设庭长一人。

第三十七条　最高法院的权限规定如下：

（一）对于一般法律作法定的解释。

（二）审查各省裁判部及高级军事裁判所的判决书和决议。

（三）审查中央执行委员以外的高级机关职员在执行职务期间内的犯法案件（中央执行委员的犯法案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主席团另行处理之）。

（四）审判不服省裁判部或高级军事裁判所的判决而提起上诉的案件，或检察员不同意省裁判部或高级军事裁判所的判决，而提起抗议的案件。

第三十八条　在最高法院内组织委员会，其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按需要规定，以最高法院院长为主席，讨论并决定关于最高法院职权内各项重要问题及案件。

第三十九条　最高法院设检察长一人，副检察长一人，检察员若干人。检察长、副检察长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之。

第四十条　最高法院的详细组织另定之。

第八章　审计委员会

第四十一条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设立审计委员会，其职权是：

（一）审核国家的岁入与岁出。

（二）监督国家预算之执行。

第四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由五人至九人组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之。

第四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设立主任、副主任各一人。其他职员，按需要设置。

第九章　各人民委员部及部务委员会

第四十四条　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各人民委员部。

第四十五条　各人民委员部设副人民委员一人至二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之，以助理人民委员的工作，人民委员因故缺席时代理人民委员的职务。

第四十六条　为便利各人民委员部进行工作起见，得在各人民委员部之下设立部务委员会，为讨论和建议该部工作的机关。

第四十七条　各部委员会的委员，由人民委员会任命之。委员的人数，由人民委员会随时规定增减。以各该人民委员为该部委员会的当然主席。

第四十八条　各人民委员在他的权限内有单独解决一切问题之权。但重要的问题须交该部的委员会去讨论。如委员会对于人民委员的决定有异议时，有提交人民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之权。

第四十九条　各人民委员部的职权及详细组织，另定之。

第五十条　人民委员会之下设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工农检察委员会，其职权及组织另定之。

第十章　附则

第五十一条　本组织法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雇用辅助劳动暂行条例

（1934年2月2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命令

（中字第三号）

兹制定雇用辅助劳动暂行条例公布之。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雇用辅助劳动暂行条例

第一条　本条例依据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颁布的劳动法第一条注一的规定制定之。凡靠自己劳动力为生活而劳动力不足的中农、贫农、小船主、小手工业者雇用他人劳动力以辅助自己劳动力之不足者，均得遵守本条例，免除劳动法某条文的拘束。但经常剥削他人劳动力的富农及经常雇用二人及二人以上的企业、机关、商店、作坊等不能适用本条例。

第二条　雇用辅助劳动力的劳动介绍手续，依照劳动法关于雇

用手续的一般规定施行之。但在农忙时候或其他季候工作期间，雇用季候工作者，雇主得自行招雇劳动者工作，但须到介绍员处报告。

第三条　被雇用为辅助劳动的劳动者，每日平均的实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但在工人同意之下，得进行额外工作，额外工作时间，连续二天内不得超过四小时。

第四条　被雇用为辅助劳动的未成年人，每日平均实在工作，一般不得超过六小时，但因工作需要须与成年人做同等时间工作时，在被雇人同意之下，雇主得要求被雇人延长相当工作时间进行额外工作。但此项工作时间，以与成年人共同担负该项工作为限。

第五条　每日实在的上工与休工时间，由雇主与被雇人在工作前双方议定，如为长工、月工，则在合同内订定之。

第六条　每日工作时间内上午及下午应有一次至二次的停工时间，为工人休息、喝茶、吃烟的需要，中午应有较长时间的停工为工人吃饭及午睡等之需，这些停工时间均不计入实在工作时间之内。

（注）哺乳的妇女，其哺乳小孩，在停工时间行之。

第七条　长工、月工工作，每逢例假，应行休息，工资照发，其不在例假日休息，于相当时期内补给若干日一次休息者亦可。

第八条　劳动法上规定的纪念节日及地方政府所规定的地方性的革命纪念节日，一律停工。其在纪念节日进行工作者，无论为长工、月工、零工必须得到工人同意，并一律发给加倍工资。

第九条　被雇用为辅助劳动的劳动者，连续工作五个半月以上者，其休假期限、休假办法及休假期间的工资，依照劳动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办理之。

第十条　所有被雇用为辅助劳动的劳动者，应得工资的额数及工资的支付办法，应在合同内规定。如系零工，应在工作前由雇主

与工人双方议定，但均不得少于当地政府所颁布的最低工资。

第十一条　工资以当地通用的货币支付为主，但得到被雇人的同意时，可以物品代替工资。

第十二条　工资不得拖欠，长工、月工分期支付工资的日期，应在合同内规定。

第十三条　法定时间以外的额外工作，应给额外工资，额外工资的支付办法，应在合同内订定，如系零工应于工作前议定。

第十四条　凡担负各种有害卫生的工作（如担粪、拆除破坏房屋等），雇主应给被雇人以围裙等用具，并给与鸡蛋、肉类等特别食品。

第十五条　被雇人的住宿地点，应分配于清洁适合卫生的所在，不得叫被雇人在灰寮、牛栏或厕所侧近住宿，寒天应给被雇人以棉被，热天应给蚊帐或蚊香。

第十六条　雇主对被雇人的饭餐待遇，应与雇主同等，并须有足够的菜饭。

第十七条　被雇用的妇女，如系长工，在产前产后共应有二个月的休息，工资照给。此项休息期间的工资须由雇主付给。

第十八条　被雇人担任连续六个月以上的长工工作者，其工作已满二个月后，如有疾病或受伤，在一月以内由雇主医治，工资照给，工作不满二个月者，照本条例第十九条办理。

第十九条　被雇人担负连续三个月以上的月工者，其工作满一个月后，发生疾病或受伤，在一星期内由雇主负责医治，并发工资，工作不满一个月的，照本条例第二十条办理。

第二十条　论月工作的月工，被雇人在上工满十天后发生疾病或受伤，在三天之内，由雇主负责医治，并照发工资，上工不满十

天的，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办理。

第二十一条　按日计工的零工，被雇人在工作中发生疾病或受伤，应给予当日工资及药物。

第二十二条　被雇人为辅助劳动的劳动者，如遇在雇用期间死亡时，雇主应给被雇人家属以丧葬费，此项津贴的付予照下列办法付给：

（一）长工因职业病及因工作受伤致死者，无论上工久暂，均给被雇人两个月工资额数的津贴。若系因普通原因受伤致死者，如其工作已满一个月的，则雇主应给与被雇人家属以被雇人一个半月的工资全额为死亡丧葬津贴；工作未满一个月的，则雇主应给被雇人的家属以被雇人一个月工资金额为死亡丧葬津贴。

（二）月工因职业病及因工作受伤致死者，不拘上工久暂，雇主均须给被雇人家属以被雇人一个月工资额数的死亡津贴。如系由普通原因生病或受伤致死者，如被雇人上工已满十天，雇主应给被雇人家属以被雇人半个月的工资金额为死亡丧葬津贴；上工不满十天的，雇主应给被雇人家属以被雇人十天工资的金额，为死亡丧葬津贴。

（三）零工因工作受伤致死者，雇主应给被雇人家属以被雇人丧葬费十元。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日发生效力。

和乌石垅老者应对联[1]

（1934年2月）

雾锁高山，哪个尖峰可出？（乌石垅老者）
火烧原野，这杆红旗敢行。（毛泽东）

---

[1] 1934年1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条例》。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机关都积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1934年2月的一天，正值星期六，毛泽东来到离中央政府所在地沙洲坝不远的乌石垅的田垅上，帮助红军家属犁地。快到中午时分，红军家属和在田垅春耕的农民一起到路旁的大樟树下歇息喝茶。这时，有一位老者深知毛泽东是个有学问的人，便想向毛泽东讨教。此时，老者看到沙洲山峰云雾缭绕，于是出了一个上联。毛泽东听后，凝视了一下田野，看见插在田头的竞赛红旗，于是指着红旗对出下联。众人听后，齐声喝彩。

和某私塾先生应对联[1]

（1934年2月）

涓涓溪流，岂能作浪？（某私塾先生）
星星火炬，可以燎原。（毛泽东）

---

[1] 1934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来到离中央所在地不远的乌石垅帮助红军家属犁田。休息时和一老者谈话。恰好有一路过的私塾先生看到热闹非凡，也驻脚在此休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对大家说：“我出一上联给大家对对。”私塾先生沉思了一下，见路旁一条小溪流有所触动，于是出了上联。在场的群众听后，无人回答。有好些群众的目光投向毛泽东，意思要毛泽东作答。毛泽东深解众意，看了看群众点烟的火柴上的点点火星，即生灵感，回答了对句。私塾先生听了，夸赞说：“妙！妙！”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1934年3月20日）

前任于都县苏主席熊仙璧领事与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谋利，熊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日

司法程序

（1934年4月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中字第五号）

兹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公布之。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

在国内战争环境内，苏维埃法庭、政治保卫局、肃反委员会等机关，应该采取坚决迅速正确的办法，去镇压反革命，保障革命民众的利益，巩固苏维埃政权。因此，特制定下列的司法程序：

（一）区保卫局特派员、区裁判部、区肃反委员会（新苏区革命委员会之下的）、民警局、劳动法庭，均有捉拿反革命及其他应该捉拿的犯人之权，过去关于区不得上级同意不能捉人的规定，应废止之。并且规定：当紧急时候，乡苏维埃与市区苏维埃，乡革命委员

会与市区革命委员会，只要得到了当地革命民众的拥护，均有捉拿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犯人之权。捉拿后分别送交区级肃反裁判机关。

（二）区裁判部、区裁反委员会，有审讯和判决当地一切犯人（反革命分子及其他）之权。

新区边区，在敌人进攻地方，在反革命特别活动地方，在某种工作的紧急动员时期（例如查田运动、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等），区裁判部、区肃反委员会，只要得到了当地革命民众的拥护，对于反革命及豪绅地主之犯罪者，有一级审判之后直接执行死刑之权。但执行后须报告上级处置。

（三）省县两级裁判部、肃反委员会、高初两级军事裁判所，均有捉拿、审讯判决与执行判决（包括死刑）一切犯人之权。

（四）一切关于反革命案件，各级国家政治保卫局，均有预审之权，预审后交法庭处置。

但在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刀匪团匪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采取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在严重的紧急的反革命案件上，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地方分局、红军分局、军区分局，有权采取紧急处置。紧急处置后，如与地方政府、军政首长或其他机关发生争议时，决定其处置当否之权，属于人民委员会；在与中央区不相连属的苏区，属于省主席团。

（五）废止上级批准制度，实行上诉制度。犯人不服判决者，准许声明上诉，并规定声明上诉之期最多为七天，从判决书送到被告人之日算起（被告人不识字的须对他口头说明）。

但在新区边区，在敌人进攻地方，在其他紧急情况时，对反革

命案件及豪绅地主犯罪者，得剥夺他们的上诉权。

（六）规定苏维埃法庭为两级审判制，即限于初审终审两级。如区为初审机关，则县为终审机关。县为初审机关，则省为终审机关。省为初审机关，则最高法院为终审机关。初级军事裁判所为初审机关，则高级军事裁判所为终审机关。高级军事裁判所为初审机关，则最高法院为终审机关。最高法院在审判程序上为最后的审判机关。任何案件，经过两级审判之后，不能再上诉。但是检察员认为该案件经过两审之后，尚有不同意见时，还可以向司法机关抗议，再行审判一次。

（七）除本程序规定各机关外，其他机关没有逮捕、审判处罚各种犯人之权。只在紧急情况时不在此内。

（八）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所颁布的第六号训令，一九三二年六月九日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颁布的军事裁判所暂行条例上规定的司法程序，均废止之。

惩治反革命条例

（1934 年 4 月 8 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中字第六号）

兹制定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之。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第一条　凡犯本条例所列举各罪者，不论是中国人、外国人，不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内或在领土外，均适用本条例以惩治之。

第二条　凡一切图谋推翻或破坏苏维埃政府及工农民主革命所得到的权利，意图保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不论用何种方法，都是反革命行为。

（注）本条例所称为对于苏维埃或在苏维埃境内的反革命犯罪行

为包括对于革命委员会或在革命委员会管理之下的一切反革命犯罪行为。

第三条　凡组织反革命武装军队及团匪土匪侵犯苏维埃领土者，或煽动居民在苏维埃领土内举行反革命暴动者，处死刑。

第四条　凡勾结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以武力来进攻苏维埃领土，或抵抗苏维埃红军的行动者，处死刑。

第五条　组织各种反革命团体，实行反对或破坏苏维埃，意图维持或恢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统治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三年以上的监禁。

第六条　组织或煽动居民拒绝纳税，或不履行其他义务，企图危害苏维埃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一年以上的监禁。

第七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反对或破坏苏维埃的各种法令及其所经营的各种事业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一年以上的监禁。

第八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混入苏维埃机关或苏维埃经营的事业，意图窃取或破坏苏维埃政权及其事业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二年以上的监禁。

第九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暗杀或谋害苏维埃政府、红军、革命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他革命分子，不论用何种方法，其指使者以及其执行者，均处死刑。

第十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或企图取得报酬为反革命服务，进行各种间谍行为，或传达、盗窃、收集各种有关国家秘密性质的材料或军事秘密者，处死刑。因玩忽职务，不感觉其行动所能发生的结果而泄露上项秘密者，处一年至五年的监禁。

第十一条　在反动统治方面曾担负重要责任，对工农利益及革

命运动作积极反对行为者，处死刑。但遇特种情形时，得减轻其处罚。

第十二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用反动的文字、图画、讲演及谈话，对于居民或红色战士进行宣传鼓动，或制造散布谣言，使社会发生恐怖，破坏苏维埃及红军信仰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第十三条　制造或保存各项反动煽惑的文字、图画以便作反革命的宣传鼓动者，处一年至五年的监禁。

第十四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居民破坏苏维埃及其法令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第十五条　投降反革命并向反革命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种秘密，或帮助反革命积极反对苏维埃和红军者（革命叛徒）处死刑。

第十六条　携带枪械或其他军用品投敌者，教唆或组织他人投敌者，均处死刑。

第十七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混入革命武装部队，企图夺取或破坏这种部队以帮助敌人者，处死刑。

第十八条　领导和组织红色战士逃跑，或红色战士逃跑至五次以上者，均处死刑。有特殊情形者，得减轻其处罚。

第十九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破坏或抛弃枪支及其他军用品者，或偷卖军用品于敌人者，均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一年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故意违抗上级指挥员的命令，意图破坏某种战斗任务，或在战线上故意向自己部队打枪，或乘机扰乱战线者，均处死刑。

第二十一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杀害革命民众，或故意破坏与抢夺革命民众的财物，致损害苏维埃与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二条　藏匿军火，意图达到其反革命目的者，处死刑。

第二十三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组织秘密机关，破坏水陆交通、公共仓库、国营企业及各项建筑物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四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放火焚烧房屋或山林，致国家及居民遭受重大损失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五条　以破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为目的，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及信用券者，或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者，或藏匿大批现金，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均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六条　以反革命为目的，阻止或破坏苏维埃共和国的贸易，使国家企业合作社及居民受到重大损失者，或故意停闭企业造成经济恐慌者，均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一年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七条　假冒苏维埃红军或革命团体的名义，或假造苏维埃红军或革命团体的公私印章文件，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八条　凡以反革命为目的混入苏维埃机关，对于反革命分子或地主资产阶级之任何犯罪分子故意纵容，或唆使逃跑，或重罪轻罚，对于革命分子则加以冤枉，或施以非刑，或压制其对于反

革命分子控告与揭发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二年以上的监禁。

第二十九条　被苏维埃驱逐出境，又秘密进入苏维埃境内，意图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

第三十条　凡藏匿与协助本条例第三条至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各种罪犯者，与各条之罪犯同罪。

第三十一条　凡犯本条例第三条至第三十条所列举各罪之一项或一项以上，经法庭判处监禁，又再犯本条例所举各罪之一项或一项以上者，加重其处罚。

第三十二条　虽有本条例规定的犯罪行为之企图而未达到目的者（未遂罪），或为该项犯罪行为所附和者，得减轻其处罚。

第三十三条　凡被他人胁迫，非本人愿意，又确无法避免其胁迫，因而犯罪，或未觉察该项犯罪行为的最终目的者，或与实施该项犯罪行为无直接关系者，均得按照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第三十四条　工农分子犯罪，而不是领导的或重要的犯罪行为者，得依照本条例各条文的规定，比较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有同等犯罪行为者，酌量减轻其处罚。

第三十五条　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

第三十六条　凡犯本条例所列各罪之一，未被发觉，而自己向苏维埃报告者（自首分子），或既被发觉而悔过，忠实报告其犯罪内容，帮助肃反机关破获其他同谋犯罪者（自新分子），得按照各项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

第三十七条　年龄在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本条例所举各罪

者，得按照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如为十四岁以下的幼年人，得交教育机关实施感化教育。

第三十八条　凡本条例所未包括的反革命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相类似的条文处罚之。

第三十九条　凡犯本条例所列各罪之一者，除按照该条文上的规定科罪外，得没收其本人的财产全部或一部，并得剥夺其公民权一部或全部。

第四十条　本条例所规定的监禁期限，以十年为最高限度。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发生效力。

婚姻法

（1934年4月8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中字第七号）

兹制定婚姻法公布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作废。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四月八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

第二条　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

第二章　结婚

第三条　结婚的年龄，男子须满二十岁，女子须满十八岁。

第四条　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不许任何一方或第三者加以强迫。

第五条　禁止男女在三代以内亲族血统的结婚。

第六条　禁止患花柳病、麻风、肺病等危险性传染病者的结婚。但经医生验明认为可以结婚者，不在此例。

第七条　禁止患神经病及风瘫者结婚。

第八条　男女结婚须同到乡苏维埃或“市区”苏维埃举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废除聘金、聘礼及嫁妆。

第九条　凡男女实行同居者不论登记与否均以结婚论。

第三章　离婚

第十条　确定离婚自由，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可离婚。

第十一条　红军战士之妻要求离婚，须得其夫同意。但在通信便利的地方，经过两年其夫无信回家者，其妻可向当地政府请求登记离婚。在通信困难的地方，经过四年其夫无信回家者，其妻可向当地政府请求登记离婚。

第十二条　男女离婚，须向乡苏维埃或“市区”苏维埃登记。

第四章　离婚后男女财产的处理

第十三条　离婚后男女原来的土地、财产、债务，各自处理，在结婚满一年，男女共同经营所增加的财产，男女平分。如有小孩，则按人口平分。

男女同居时所负的公共债务，则归男子负责清偿。

第十四条　离婚后女子如果移居到别的乡村，得依照新居乡村土地分配应分得土地。如新居乡村已无土地可分，则女子仍须有原有的土地，其处置办法，或出租，或出卖，或与别人交换，由女子自己决定。决定归女子抚养的小孩，随母移居后，其土地分配或处理办法，完全适用上述的规定。

第十五条　离婚后女子如未再行结婚，并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因而不能维持生活者，男子须帮助女子耕种土地，或维持其生活。但如男子自己缺乏劳动力，或没有固定职业，不能维持生活者，不在此例。

第五章　离婚后小孩的处理

第十六条　离婚前所生的小孩及怀孕的小孩均归女子抚养。如女子不愿抚养，则归男子抚养。但年长的小孩同时须尊重小孩的意见。

第十七条　所有归女子抚养的小孩，由男子担负小孩必需的生活费的三分之二，直至十六岁为止。其支付办法，或支现金，或为小孩耕种分得土地。

第十八条　女子再行结婚，其新夫愿抚养小孩的，小孩的亲父才可不负担前条规定的小孩生活费用之责。领养小孩的新夫，必须向乡苏维埃或市苏维埃登记，经登记后，须负责抚养成年，不得中途停止和虐待。

第六章　私生子的处理

第十九条　一切私生子女得享受本婚姻法上关于合法小孩的一切权利。禁止虐待抛弃私生子。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违反本法的，按照刑法处以应得之罪。

第二十一条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乡苏怎样工作?

（1934年4月10日）

乡苏维埃（与市[1]苏维埃）是苏维埃的基本组织，是苏维埃最接近群众的一级，是直接领导群众执行苏维埃各种革命任务的机关。在国内战争环境内，战争动员工作十分紧张，群众生活需要更加改善，因此极力改善乡苏（与市苏）的工作，健全乡苏的组织与领导，使他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事。改善乡苏工作的方向，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最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这是苏维埃工作的原则。现在我们的苏区，已经有许多乡苏工作能够适合这样的原则，创造出许多好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了。但还有许多乡苏的工作违反这样的原则或者没有完全适合这样的原则。因此根据这种原则明白具体的规定乡苏怎样工作，使每个乡苏工作人员有一个一般的标准去进行他们的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了。

乡苏究竟应该怎样进行他们的工作呢？应该依照下面的规定。

---

[1] 本篇中的“市”，指市镇。

一　乡苏主席团的工作

（1）主席团人数大乡七人，小乡五人，他们是代表会议选举出来的，应该选举出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分子。

（2）主席团是代表会议闭会后的全乡最高政权机关，他应该坚决执行代表会议和上级苏维埃的决议与指示，他应该积极领导全乡的工作。

（3）主席团要懂得抓紧每一时期内的中心工作，把这些工作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讨论，而不应该只忙一些零碎事务，把中心工作丢掉了。

（4）主席团会议要开得好，常驻人员的工作要很紧张、很切实地做，松懈懒惰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强迫命令主义要完全废掉。

（5）主席团要明白各村的情形，要了解各村的特点，要注意各村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去推动各村的工作，解决各村群众的困难问题。

（6）要使各村的工作很快进步，就要注意推动各村正、副主任，注意各村的代表会议、群众大会与各个代表领导之下的小单位群众会，都能够按时开，开得好。

（7）主席团要注意团结全体代表、各种委员会、各个群众团体于自己的周围，推动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去动员全乡群众执行各种工作。而不应该离开代表、委员会与群众团体，只是少数人忙着干。

（8）主席团要极力注意代表会议时的领导，每次代表会议事先都要有好的准备。

（9）主席团会议应该五天有一次，即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的中间主席团要开两次会。村主任可以要他来参加会议。

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头一次，主要是讨论督促各村的主任、副主任及代表同志们怎样执行上一次及以前代表会议的决定，最好在上一次代表会议之后两三天内开。第二次，主要收集近几天各个村里的工作经验，准备下一次代表会议的议题，最好在下一次代表会之前两三天内开。

主席团会议还要解决一些比较小的问题，不要把这些小问题都提到代表会议上去。还要解决那些有时间性急于要解决的问题，不要把这些紧急问题拖延到下次代表会议才讨论。

主席团会议最好在吃晚饭后，开会时间不要多过两点钟。

（10）主席团要有一种分工，要给不常驻的那几个主席团同志一些工作做，比如要他们督促某些村里的某几项工作。

主席自然是主持全乡工作，主席团会议上当主席，出席上级召集的会议，处理日常事务。他应该抓住每一个时期中上级指示的几件中心工作（如扩大红军、查田运动、选举、修路、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发展合作社、春耕运动等），应该注意那些经常的工作（如赤少队训练、赤色戒严、粮食、教育、卫生、优待红军家属等），还应该注意本乡发生的特殊问题（如饥荒、瘟疫、水灾、反革命活动等）。他应该把这些工作或问题时常地想一想，看这些工作在各个村里是怎么样做的，哪一村的工作比较落后要加紧对哪个村里的突击和帮助。他应该与副主席、文书分工，出席各村的会议，收集各村每一件工作上好的经验和坏的现象，提到主席团会议上或代表会议上作报告，供给会议讨论的材料（当着讨论那个问题的时候）。主席还应与别人分工，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出席各

村的群众大会。

副主席要与主席、文书分工出席各村的会议，对于自己担任一个村或两个村的工作，要能够切实督促，收集材料，回来作报告。对全乡工作，也要求得明白，以便主席不在时代理主席处理工作。副主席常驻的要帮助主席处理日常事务，并且经常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

文书的工作是办理人口册，土地册，婚姻生死登记，各种调查表，写对区苏的报告，派交通，下通知于各村，经手打路条，帮助红军家属写信，主席、副主席不识字的读上级的文件给他们听，在主席团及代表会议上读文件中的重要地方，会议时写记录，主席、副主席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告诉主席、副主席。文书也应该担任出席几个委员会及群众团体的会议。文书如果是代表，应该参加主席团。

（11）主席团应该注意于代表的考察与教育。如果代表中有些是积极工作的，又有些是消极怠工的，那便要将积极分子的模范工作表扬出来，给那些消极分子看样。对于消极分子要有批评，有些要在代表会议上提出他们的名字来引起大家向他们斗争，这样来教育全体代表，使消极分子积极起来。有些是初次当选为代表不知道工作怎么样做的，那便要好生告诉他工作的做法。那些经过了几次的批评斗争教育还不改变不进步的，如经过一两个月全不能完成交代的工作，或者简直连会也不到，接连五六次故意不到代表会议，那就应该提到代表会议通过开除他出去，把候补代表补上来。如果对于这种坏得很的代表还不开除不补充，那是不对的。调动了工作的代表，也要即刻补充。

还要考察有无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混当代表来破坏我们的苏维埃，如果有，应该即刻开除他。如果是反革命，更要即刻捉起来

惩办。

（12）乡苏的交通与哨口检查员可在下列三个办法中选择一个：或者找人经常担任，吃自己的饭，但免除他们的各种勤务，并派人帮助他家耕田；或者是从少先队中轮流派出，先日下午通知他们，次日来做工作，饭回家里吃，但不派人帮他耕田；或者是由居民出钱米供给伙食，经常住在乡苏。这三个办法由各地自己决定，但以第一个办法为最好。交通与哨口检查员都须选用青年同志，哨口检查员更要精干分子，并要认得字。他们的工作须加以训练。

二　代表会议的工作

（1）乡代表会议是全乡最高政权机关，经过代表会议的讨论，实行苏维埃的一切法令政策，完成苏维埃的各种任务，所以对于代表会议的领导是十分要紧的。

（2）代表会议通常是十天开一次。农忙时候应在晚上开。开会时间通常以两点钟为好，最多不要超过三点钟。

每次会只分报告与讨论两项，主席与区苏参加人各报告十分钟，多的话到讨论时再讲。在讨论每个曾经在本乡进行过的工作问题时，各村主任可以每人报告几分钟，多的话也在讨论时再讲。其余都是讨论的时间。但在专门检查工作的会议上，各村主任报告的时间要多些。报告的内容要有切实的材料与意见，只讲空话的报告要取消。

（3）每次代表会议只应有一个主要的问题，此外，可以有一个两个次要的问题。讨论主要问题的时间要多些，讨论次要问题的时间要少些。倘若每次提出好几个大问题来讨论，就会使会议得不到

结果。

（4）讨论的问题要实际化。比如讨论春耕问题，要分出“发展劳动互助社”“发展犁牛合作社”“耕田队怎样优待红军家属”“增加肥料”“多犁多耙”“开荒田荒山”“修理陂圳池塘水车”“种棉”“多种黏谷少种糯谷”“多种杂粮蔬菜”等项。要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来讨论。每项要规定切实办法，比如“发展劳动互助社”一项，要估计全乡现时还可以发展多少人，定出一个总数，然后按各村的实际情形定出每村要发展多少，再交代各村主任、副主任回去按照各代表管辖居民的情形去作更实际的分配，并要规定完成的时间。讨论时要一项一项讨论，第一项得了结果，再讨论第二项。讨论的结果成为决议，写在记录簿上，下次好考查，主席团好督促。讨论不完的下次再讨论。

第二次讨论春耕，要按照上次的决议逐项加以检查。检查某一项时应由各村主任报告实行情形，完成与未完成的原因，主要是找出经验教训来供给代表和群众学习。检查之后再讨论春耕中新发生的问题。在检查时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代表与村主任，要按情形给以适当的批评，唤起他们的注意。以上举一个例子，讨论其他问题，都仿这个办法。

许多乡代表会议讨论问题不切实，不分出大问题中的小项目，或者把许多项拢总讨论一顿，不是一项完了再来二项，使人带不到一个明白的结论回去。讨论时不按照各村的实际情形与特点，又不规定各村应该完成的数目（指那些应该规定数目的问题），又不规定完成的日子，又不责成村主任回去再行分配与督促各个代表去完成他们一定的任务；或者对于按照某村特点规定的任务（如规定某村要开几眼塘，而别村则不须开），又不特别提出来问某村的代表们一

声“你们觉得这样规定好不好”，使他们切实负责，而只是一般地通过。有些乡苏则只有讨论决定，不在以后相隔不久的会议上提出来检查，即检查也不能指出各村各屋的特点，成功或者失败的原因，又不对于怠工的代表与村主任加以批评。那么这样的讨论与检查有什么用处呢？这种讨论检查是空洞的、官僚主义的，白费去时间，不能完成苏维埃的任务。对于消极怠工的人采取和平主义，代表会议就缺乏生气，不能激发落后村子、屋子（小村子）的代表们，领导群众努力工作，赶上先进的村子、屋子。这些都是不对的。

（5）要使代表会议开得好，一定要主席团准备得好，所以前头说的主席团要在代表会议之前开一次会，好好准备下次会议的报告与议题，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准备工作，特别是主席要负责任，副主席、文书要帮助主席。

（6）代表会议开会时会场上的主席，许多地方是临时推举的，有些地方还规定不要推举主席团里头的人，这是不好的。会场主席一定要是常驻的工作人员，最好就是乡苏主席充当，因为只有他们才熟悉全乡的情形，明白前后的经过。

（7）代表会议开会每次都要点名，没有到会的在他的名字上打个记号。主席团要有一张代表名单，分村、分屋写出各个代表的姓名、性别、年龄与成分。

三　村的组织与工作

（1）乡的工作重心在村，所以村的组织与领导，乡苏主席团应该极力注意。

（2）一切没有分村的乡，都要实行划分，有些乡可只分两村，

有些乡可分三村，有些大乡则可分为四村五村，按照实际情形划定。但一般以划得小为好，村划大了不便领导工作。

（3）村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由乡代表会议在代表中推举出来，要推举各村代表们中间最积极、最有工作能力的人充当。在有几个屋子的村，主任、副主任不要选在同一个屋子里头。

村主任担负督促全村工作之责，副主任帮助主任督促全村工作。

（注）村主任、副主任如果是家中缺乏劳动力的，当农忙时候，可由乡苏规定发动群众酌量帮助他们一些工，以补充他们因努力苏维埃工作而费去的（比较别的代表要多些的）工作时间。如果得到群众同意，可以完全优待一个村主任，使他能把全部时间用在苏维埃工作上，为全村群众谋利益。

（4）村主任通常每十天召集全村代表开会一次（比如某村有代表十五人，即召集此十五人开会），工作忙时可以五天开一次，检查各代表的工作，按照各屋子各人家的特点，讨论怎样完成乡代表会议交给本村的任务，解决本村居民中间互相救济问题及小的争执问题，准备开村群众大会时的报告，推动村委员会工作。

（5）这种村代表会议的日子，由乡苏主席团排定，最好在前后两次代表会议中间而比较接近后一次代表会议的日子开会。比如某乡有三村，乡代表会议是逢五开会，便可将第一村排在逢一，第二村排在逢二，第三村排在逢三开会，以便乡苏常驻人员特别是主席到各村去参加会议。如果是五天开一次，便可一次排在上次乡代表会议之后几天，一次排在下次乡代表会议之前几天。这种会议主要是检查与督促工作，并将检查的结果由村主任到下次乡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6）实行每个代表分工领导居民群众的制度。比如某村有代表

十五人，有居民五百人，即将此五百人按家屋接近划分为十五个单位，分配每个代表管一个单位的群众，但不应该平均分配，而应该按照家屋的位置，代表能力的强弱，适当的分配人数，多的可以管至五十人、六十人，少的可以只管三十人、四十人。

这个代表分工的办法，是使全体代表都负起责任来，每个代表要在一定范围内去领导居民群众执行苏维埃工作（例如督促所管的几十个人努力春耕，宣传几十个人中间的积极分子当红军，宣传各人加入合作社，督促儿童进日学，督促大人进夜学，督促各家扫屋通沟讲究卫生，带领几十个人去开群众大会，监视地主富农的活动等等），很快吸收群众的意见提到村代表会议及乡代表会议上来，很快去解决群众中间的困难问题，真正有莫大的利益。但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实行这个代表分工制度，一定要立即实行起来。

（注）村主任手里要有一本簿子，上面登记本村人口数、土地数、赤少队数、粮食数（共有几多，几家有余，几家不足）以及其他必要事项。每个代表也要有一张开列所管几十个人的名单。

（7）每个代表要召集所管的几十个人开会，检查各家执行苏维埃工作的情形，讨论现在要做的工作，报告竞赛条约，报告乡苏的决议，征集群众的意见向村乡代表会议作报告。这种会议用谈话的方式，代表就是会议的主席，时间有一个钟头就够了，要在大家得闲的时候开。

这种会议应该规定每十天开一次，全村各代表所管的单位，可以在同一天内开。如果某个代表因为有事而未开会的，责成他另日补开。由乡苏主席召集各村主任排定日子，使不同乡的、村的其他会议时间相冲突。在这种会议上，要引导群众发展相互间的批评，例如某家收留逃兵不归队，某家春耕不努力，某家帮助红军家属耕

田不上紧，某家孤老应该帮助而大家不注意，某家不督促子女读书，某家不讲卫生等等。经过这种会议能够使苏维埃的决定很快传达到群众中去，使苏维埃工作争取更快的速度，使群众生活迅速改良，使群众斗争情绪很快提高。

每个代表在这种会议以外，还要拿出一些时间到所管的个人家去访问，看他们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看他们实行了苏维埃的决定没有，首先是到红军家属与最贫苦人民家中去访问，地主富农家里也要去看一看，看他们有什么不对的行为没有。

各代表的小单位会议与按家访问，村主任负了督促之责，各代表工作的好坏，可以在这些上头考察出来。

（8）村的群众大会，是极能够教育群众、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应该把它看作一种重要的动员与教育群众的方法。许多地方不注意开这种群众大会，那是不对的。

在这种村的群众大会上报告乡苏的决议，报告本村与别村、本屋与别屋的革命竞赛项目，解释上级苏维埃提出来的革命任务，使群众在完全明白之后努力迅速地执行起来。

这种群众大会，应该每半个月开一次，由乡苏主席团排定各村开会日期，通知村主任，不要与别的会议相冲突。各村群众大会日期不要同在一天内开，以便乡苏派人去参加。

这种群众大会在人口集中只有一个屋子的村，自然全村作一个单位开，村主任即是会场的主席。但在目前苏区多数村是有两个以上屋子的，这些村里就应该分成两个单位开，使男女老幼大多数都能到会，村主任与副主任各在一个会场做主席。对于这种群众大会，事前应该好生准备。怎样推动各代表邀集大多数群众到会，会场上报告些什么，怎样引导群众发表意见，都要在村的代表会议上

预先商量好。开会时间不要超过两点钟，要在多数群众得闲的时候开。

至于全乡群众大会，没有重要问题，不是纪念节日，不应随便召集。主要要利用村的群众大会与每个代表的小单位群众会去进行动员与教育工作。

四　乡与村的委员会

（1）乡苏之下，应该组织各种辅助乡苏管理各种专门工作的委员会。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乡代表都要加入一个或者两个委员会，在里面起领导作用。要把委员会制度看作联系广大群众推进苏维埃工作的一种重要方法，没有组织委员会的要很快组织起来。

（2）有些委员会是经常组织的，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农业生产（春耕、夏耕、秋收、秋耕、冬耕）、生产教育、山林、水利、调查登记、教育、卫生、桥路、粮食、国有财产（有国有财产的乡）、工农检察，这些委员会，它们都有经常的工作。

有些委员会是临时组织的，如查田、没收征发、土地税、公债、开荒、选举，这些委员会是临时性质，工作做完了委员会就不要了，等到下次再做这些工作时再去临时组织起来。查田与没收征发委员会在土地问题彻底解决后也就不要了。

（3）有些委员会只有乡的就够了，但有些委员会村还应该有组织。如扩大红军、优待红军、生产教育、春耕、山林、水利、教育、卫生，这些委员会，村里有了组织，工作才更容易普遍深入。

（4）委员会人数，按他们的性质，少的五个人，多的七个或者九个人，不要太多了。凡是乡村都有的（春耕委员会等），乡的村的各有五个委员就够了。村委员会的主任，即可以做乡委员会的委员。

（5）委员会的主任及委员，乡一级的，由主席团准备名单提在乡代表会议通过。村一级的由村主任准备名单提在村代表会议通过。

（6）各委员会都要找得一个最积极的同志当主任。主席团要教育各主任怎样去做工作，要督促各主任按时召集他们自己的会议，要检查各主任的工作。主任怠工的要撤销他，换过一个新主任。

（7）主任对于自己委员会的开会，事先要有准备，才使每次会议都能得到结果。会后要分配每个委员一份工作，告诉他们如何做法，下次会议要他们作工作报告。怠工的委员要撤销他，换过新的。

（8）委员会通常六个月改选一次，改选时留下积极分子，去掉消极怠工分子。

（9）乡苏主席团要分工参加乡一级的各个委员会的会议。这种分工最好在一个时期内固定起来，每个人分管几个委员会。例如主席管军事、财政方面（扩大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毒、土地税、公债、没收征发、国有财产等），副主席管生产、经济方面（优待红军、春耕、山林、水利、粮食、桥路、生产教育等），文书可管其他方面（教育、卫生、工农检察、调查登记等）。在主席团会议上商量分定，各有专责，收集材料，好到主席团及代表会议上作报告。

村的委员会开会，乡委员会主任各要出席自己的下级那个委员会（例如乡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出席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村的代表主任与副主任也要分工参加。

（10）乡的、村的各个委员开会日期，由乡苏主席团按照各个时

期各项工作的缓急去规定，例如春天，春耕委员会开会要多些，但到冬天，冬耕委员会开会就可以比较少一些。每次开会时间不要多过两点半钟。

五　乡苏与群众团体的联系

（1）乡的各种群众团体（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反帝拥苏同盟，互济会，儿童团，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消费、生产、粮食、信用各合作社，托儿所，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俱乐部等），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注意与帮助，依靠他们的努力去动员广大群众完成各种革命工作。

那些没有上级组织的团体，如像贫农团、女工农妇代表会、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托儿所等，乡苏更负了完全领导的责任，要按期检查他们的工作，如果发生了不好情形，要赶快讨论改正。不论什么群众团体，如果他们发生了困难问题，乡苏要帮助他们解决。

（2）当着主席团及代表会议讨论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系的工作时，应该邀那个团体的负责人来参加。各团体开会时，乡苏也应派人去参加。村代表会议与村群众团体的关系也是这样。乡苏主席团应同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商量，排定他们的会期，使不同乡的、村的其他会议时间相冲突。

（3）乡苏应该注意对于赤卫军少先队的领导，要使全体男女青年成年都加入赤卫军少先队，要使他们的村操、乡操都有大多数人到操，使他们的训练天天进步。他们的干部会议要派人去参加。

六　革命竞赛与突击队

（1）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与速度，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革命竞赛的方法与突击队的组织，应该在各乡、各村实行起来。

（2）每一项革命工作的竞赛，不管是上级指示的或本乡发起的，都要经过乡代表会议的讨论，村群众大会上与各代表小单位群众会上的报告。同某个群众团体有关系的还要提到那个团体的会议去报告，得到每个代表每个民众的明白与承认，只有在大家完全明白了承认了之后，才能使大家负起责任来，才能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努力去做，才能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按期或提早完成竞赛的要求。在这个上面，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

（3）每一件工作的竞赛，不只是讨论了报告了就可以完事，还要紧紧跟着去检查。每个代表检查各家，村主任、副主任检查各代表，乡苏主席团及代表会议检查各个村主任与副主任。没有这种检查，有些人家，有些代表，有些村屋，就会马虎过去，到期不能完成要求，或者数目上有了而工作内容不好。检查制度是争取苏维埃工作质量速度极其要紧的办法，只有决定，没有检查，就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4）每一工作的竞赛，到了期满，一定要在村的、乡的代表会议上作出结论，分出优劣，对优胜者给以奖励，劣败者给以批评。

（5）为了争取苏维埃工作的质量、速度，可以每村组织一个五个人至七个人的突击队，在代表中、群众中，依照自愿的原则，挑选最积极会做工作的同志充当，每村一个队长。队员不要选在同一个屋子里头。

突击队工作的方法分两种：一种是在村内，各个屋子的队员互相到别个屋子去突击（甲屋的到乙屋，乙屋的到甲屋），但主要是使先进屋子的队员到落后屋子去突击。一种是在乡内，各村的突击队互相到别个村里去突击（甲村的到乙村，乙村的到甲村），但主要是先进村里的突击队到落后村里去突击。去突击不是去骂人，而是去帮助那里的工作，把好方法告诉那里的同志们，使那里的工作很快进步，使那里学到先进村子屋子里头的工作方法。

在乡苏主席团之下设一个管理全乡突击队的队长，他有权调动各村的突击队。主席团要按时召集乡队长、村队长开会，检查他们的工作，告诉他们的工作方法，队长再去召集队员开会训练队员。主席团还应该每半月或每月召集全体突击队员开一次大会训练他们。

七　区苏对乡的领导

区苏要按照前面所说各项切实指导乡苏完全实行起来，要把前说各项好生解释给乡苏同志们听，使他们完全明白，要随时检查各乡苏是不是都照着前说各项实行了，特别对工作落后的乡苏要给与多次的解释和帮助。上级政府检查区苏的工作，就看区苏是不是切实指导所属各乡都实行了前说各项办法，争取了各种苏维埃工作的最快速度与最好成绩。

（注）本文件一般适用于市、区苏维埃。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援助上海美亚绸厂工人罢工斗争宣言

（1934年4月16日）

亲爱的全国工友们！劳苦群众们！

四月十日，上海发生了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蒂屠杀数千工人的空前残酷的惨剧！

工人阶级的英勇的战士、上海美亚绸厂的罢工工友们，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下面，流了他们的鲜血。一百个工人被枪毙了，九百个受伤了。在风雨交迫的寒夜中，几千个美亚工人，饿着肚皮与国民党的警察保安队，搏斗了二十三小时。他们在国民党法西斯蒂血手的野蛮的袭击下面挣扎着、抵抗着。

全国工友们！国民党法西斯蒂就是这样企图用最残酷的血的屠杀来镇压工人阶级的斗争！

但是，不管刽子手蒋介石和他的党徒勾结了帝国主义者，采取何等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从唐山五矿总同盟罢工一直到美亚工友的血战法西斯蒂，不但没有被镇压下去，反而发展到了与国民党军警直接肉搏的更高的阶段了。这次美亚工人的斗争更显示了我们工人阶级战士的可敬的英勇性与顽强性。正因为我们有这样英勇的斗争，所以引起了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极端仇恨，遭到了他们的极端野蛮的暴行。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始终是最坚决地反对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屠杀政策的，始终是和全国工友们站在一起奋斗着。正因为如此，帝国主义国民党调动了全部军队向苏区与红军进行着最残酷的五次“围剿”。而我们也正在集中一切力量，以胜利的进攻与全国工人斗争呼应着，我们要在这一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中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才能消灭法西斯蒂白色恐怖，只有建立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

我们苏区的广大群众与工农红军自从听得美亚工友被惨杀的消息后，已经在各种会议上表示他们对于国民党法西斯蒂这种暴行的忿恨，誓死为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而斗争，同时正在各方面募集捐款援助美亚罢工工友与被难的家属。我们并且号召全国工友及一切劳苦群众一致起来援助美亚工人，鼓励他们坚持到底，直至获得最后的胜利。

全国工友们！我们相信你们的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都是给予苏维埃与红军的最有力的帮助。为着争取苏维埃的伟大胜利，求得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让全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与苏维埃红军粉碎五次“围剿”的血战最亲爱地汇合起来罢！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蒂的血腥屠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

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

（1934年4月）

日本外务省最近的通牒，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在这一通牒上，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公开地确定了中国为日本的保护国，并且直接地提出了日本将以武力保持日本对于中国的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垄断。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就是要在日本单独把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用日本帝国主义自己的力量直接镇压中国的革命，并且造成更巩固的后防来进行反苏维埃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企图虽然遭受了帝国主义的反对，但是他们表示反对的真实的意义，只是限于不愿意日本把中国独占，要使中国由国际帝国主义来瓜分，成为“门户开放”的公共殖民地。至于直接镇压中国革命和增强反苏维埃战争的后防，各个帝国主义与日本当然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里表现最无耻、最可怜的就是出卖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代言人，于十九日发表了卖淫妇那样可丑的声明书，认为国民党政府“对于提倡国际合作促成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是说，提倡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与保障国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安全，是国民党“应有之义务”。

当然国民党确定“从无欲中伤他们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而且国民党慎重地向日本声明：“购买军用品（如军用飞机

等）及雇用外国军事教官或专家亦仅为国防之必要，大都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

然而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国民党从英法德美意各国所借债款和买来的军器，并没有用过半个铜片或一颗子弹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满洲和华北以及英法帝国主义强占藏康的暴行。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的投降与妥协，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国防。

但是国民党所谓“维持本国秩序与安宁”，实际上就是镇压中国工农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对于苏区与工农红军的进攻。卖国罪魁蒋介石把全国正规军百分之七十调到江西来进行第五次“围剿”，正是表明国民党对于帝国主义的忠诚，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尽清道夫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国民党向日本声明时已经特别着重地提出来了，并且国民党更进一步地申明了国民党对于日本“倘现有不平等之事态，可予纠正，中日之关系，可令其改善而顾及两国之共同愿望”。这充分地表明国民党走狗的奴隶性，国民党生恐不能完善地尽其狗职，不能博得每个主人的欢心，所以才向日本表示这样无耻的摇尾乞怜。

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及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国民党引导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阴谋。中国工农大众要求得民族与社会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只有一致起来在苏维埃政权领导之下，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苏维埃红军的五次“围剿”，才能阻止中国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中央政府五一劳动节宣言

（1934年4月）

全苏区的工农群众们！

今年的五一节，正值我们同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进行残酷决战的一天！

国民党全国正式部队的三分之二，所有法西斯蒂匪首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六十六个师、八个独立旅，七十万以上的白军，正向着我们中央苏区进攻！

在前方各个战线上都是国民党白军飞机大炮的轰炸，机枪步枪的扫射，堡垒线的封锁与残酷的、非人的烧杀，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想这样来把我们工农的苏维埃政权，浸到血海中去！

但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这种疯狂的绝望的进攻，丝毫也不能造成我们前方英勇红军与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的恐怖与失望。恰正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种进攻，更引起了前方每一个红色战士与全苏区每一个劳苦群众的忿怒与斗争的决心！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卷入了参战的洪流，誓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到底！

五次战争，是比较过去所有的战争，更为残酷的与持久的战争。这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与工农的苏维埃政权，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只有动员全苏区所有的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这一战争，我们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今年的五一节，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到红军中去！加入到赤卫军、少先队、模范赤少队与游击队中去！为保卫我们的苏区，同进攻的敌人决战。

红五月参加武装检阅的模范赤少队的队员同志们！整连、整营、整团地加入到红军中去！为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而斗争到底！

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来扰乱敌人，围困敌人，疲劳敌人，打击与消灭敌人，来保卫我们每一寸的苏区！来帮助与配合我们主力红军，争取决战的胜利！

只有武装斗争的胜利，首先是消灭蒋介石匪首的主力，我们才能保障苏维埃革命所给与我们的土地、自由、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一切革命的权利；只有武装斗争的胜利，我们才能最后地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从地主资产阶级的铁蹄之下，最后解放出来！

后方的工农劳苦群众们！集中我们的一切资财，来保障我们红军的给养，每个工农群众，节省三升米来帮助红军的粮食，多种蔬菜，多养肥猪，来慰劳我们前线上战斗着的红色战士！最迅速地完成经济建设公债的推销，集中与运输我们的粮食到需要的地方去！节省后方一切的用费，节省每一个铜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而斗争！

全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们！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是在我们的前面。拿铁的拳头，与工农群众统一的坚强的意志，去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来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只有苏维埃的道路，是一切被剥削民众与被压迫民族解放的道路。

五一劳动节万岁！

苏维埃的新中国万岁！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和刘晓、何长工的谈话[1]

（1934年4月）

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济棠[2]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

总的是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又说：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

现在应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的打法，牵着敌人的鼻子兜圈子，把它肥的拖瘦，瘦的拖垮；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

---

[1] 毛泽东离开瑞金，前往中央根据地南线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到达粤赣省委和省苏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这是毛泽东和刘晓、何长工谈话的一部分。

[2] 陈济棠，当时任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南路军司令。

对红二十二师的指示[1]

（1934年5月）

你们是新部队，敌人又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钳制敌人。在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挡不住敌人、不能打好仗、不能消灭敌人的原因。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消灭敌人，仍要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并取得地方党的帮助，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政府多做群众工作，争取群众，教育群众。对反革命分子则坚决打击。

---

[1] 毛泽东得知红二十二师于4月21日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召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利的教训，立即赶到粤赣省委办公室给红二十二师负责人打电话。这是毛泽东在详细了解敌我情形后和政委方强通话的一部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1934年6月19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政府，自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内蒙古，出卖了平津之后，现在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了。

经过了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的庐山会议、南昌会议，经过了汪精卫、黄郛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在上海、南京的直接交涉，国民党已经愿意把黄河以北所有中国的领土，完全划为“满洲国”的领土。“满洲国”与华北的通车、通邮已经开始，华北的军队全部南调“剿共”或改编为“满洲国”军队亦正在进行，北平的整委会已经进一步改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的傀儡组织了。国民党更允许“满洲国”在华北增设关卡征收捐税，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则可以毫无障碍地通行华北。在“中日满经济提携”下，国民党承认日本在华北投资的优先权，“共同”开发华北财富与华北交通。同时，国民党方面负责取缔华北所有反日反帝的革命组织与活动，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允许以大批的借款军火供给国民党去进攻中国苏维埃与红军。

全中国的民众们！华北已经为万恶的国民党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了。但是华北的出卖不但不能停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

掠，而且更引起了它并吞全中国的野心与贪欲。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正在伸向福建与长江一带。在今年的四月十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宣言，中国是日本的，日本是东亚的主人翁，日本反对任何其他国家在任何名义之下“掠夺中国”！同时华北的出卖，和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企图，自然更促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加速地来直接瓜分中国，英帝国主义在新疆、青海与康藏等广大的区域内正在建立着他的“西藏国”。云南的班洪与澜沧等地亦已为它所占领。法帝国主义在云南、贵州、广西侵掠以及美帝国主义争取统治中国的行动都在疯狂地进行着。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如英日同盟）与冲突（如日美冲突），都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正是为了更快地瓜分中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地投降出卖。国民党不但要出卖华北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把全中国出卖给一切帝国主义！南京国民党政府与广东国民党政府的冲突，决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出卖中国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而正是由于他们在卖国时的分赃不均与卖国时的争宠与竞赛。

全中国的民众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整个华北，在一切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在国民党卖国辱国的情形之下，只有全中国民众一致地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出卖华北、出卖整个中国的国民党，我们才能免去亡国奴的痛苦，才能把中国从殖民地道路上挽救过来，建立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时间是很紧迫了，我们不能有一刻的狐疑与犹豫不决。迟缓等于死亡！

只有卖国贼国民党才会无耻地说，中国目前“国力未充，无力抗日”，国民党有着二百万军队，但国民党说“无力抗日”。国民党有着大批的武器，但国民党说“无力抗日”，国民党有着数万万元的

借款与岁收，但国民党说“无力抗日”，而一切这些，国民党都用来进攻中国唯一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用来镇压全中国民众的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革命者都会看到这不是国民党的“无力抗日”，而是由于国民党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一切压迫、屠杀与欺骗，同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作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反帝纲领。这一纲领是：（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出卖东北、华北与全中国的塘沽协定和中日直接交涉，抛弃对国联与美国的任何幻想。只有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的团结与统一才是中国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抵抗力量与胜利的保证。（二）全中国民众必须起来为保卫中国领土与独立而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三）号召民众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用所有军器库及入口武装来武装民众，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积极援助与参加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广大群众抵制日货的行动。（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财产，停止支付一切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来作为抗日的费用。（五）中国必须立即完全对日绝交，动员整个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及军阀战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在中国共产党这一反帝纲领之下团结起来，只有执行这个纲领，中国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曾经向全国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一再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反对帝国主义的

作战战斗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民主权利；（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但卖国贼首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等对于我们这些宣言的回答，是出卖整个华北与整个中国给日本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金钱武装，加紧对于我们苏区的五次围攻。这使得我们苏维埃政府不得不集中一切力量首先消灭卖国贼首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不消灭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等的武装力量，我们全苏区的工农红军以及全苏区千百万劳苦群众直接同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作战是不可能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向全中国民众宣言，在上列三个条件之下时刻准备着动员我们数十万工农红军与千百万劳苦群众首先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我们相信一切愿意反对帝国主义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会自动地参加这一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相信卷入全中国千千万万群众参加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但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能够战胜一切帝国主义！我们已经从苏维埃区域内把帝国主义完全驱逐出去，我们还要从全中国把他们扫荡干净。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收复东北与华北的中国领土！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

反对国民党出卖东北与华北的中国领土，取消一切卖国辱国的中日密约！

打倒出卖东北、华北与出卖中国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与一切国民党政府！

粉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苏维埃与红军的五次“围剿”，保卫反帝

国主义的中国苏维埃政权！

拥护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纲领！

全中国民众反日反帝的统一战线万岁！

独立自由的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九日

告白军官兵书

（1934年6月）

白军官长士兵弟兄们：

日本兵已经如狼似虎地杀到北方，飞机大炮正在轰炸你们的家乡，日本兵杀你们父母，奸淫你们姊妹，烧你们村庄，掘你们祖坟，日本杀得你们家破人亡。国民党呢？又订立卖国条约，把北方卖给日本，北方已经不是你们的家乡。你们的父母妻子天天盼望着你们到北方去救他们！

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救国家，救家乡，救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到北方去打日本，真是我中华好男儿，保国卫民，立功于国家的时候了！但是正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时候，蒋介石不肯派你们去抵抗日本，反而强迫你们到江西来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是什么道理？这就是蒋介石卖国，蒋介石出卖了你们的家乡，蒋介石是日本兵烧杀你们父母妻子的“帮凶”！

蒋介石欺骗你们说“红军捣乱后方”，实际上是蒋介石卖国不抵抗，你们只要想一想；这三年来的事实：出卖东三省的是谁？把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撤退到福建的是谁？撤退长城抗日军的是谁？现在又把北方军队撤退到南方来的是谁？都是蒋介石、张学良一帮卖国军阀。红军前三年早已对日宣战！早已宣布随便哪个部队，只要真正抗日，都愿意联合一起去打日本，这是你们早已知道的。因为

红军要抗日，所以蒋介石帮助日本来“围剿”红军，用七八十万大军围住红军，不让红军北上抗日，蒋介石说“抗日必先剿共”，实际上就是蒋介石帮助日本一方面消灭红军，一方面不让蒋军弟兄开到北方去打日本；把中国的抗日力量完全消灭，使日本不费力的灭亡中国。所以不打倒蒋介石这个汉奸，四万万同施就只有做亡国奴。

蒋介石欺骗你们说“中国无力抗日”！这更是胡说八道，中国有三百万正式军队，有四万万同胞，只要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难道这样大的中国还打不过小小一个日本？说中国没有枪炮吧，全国有几十个大小兵工厂。军阀手里有的是枪炮！说中国没有军费吧！只要对日开战，立刻没收日本银行、工厂、商店，就有四十万万大洋。说打日本怕孤立吧！至少高丽、台湾和日本的工农，都会暴动响应，我们前后方夹攻，不怕打不过日本！中国一定可以打胜日本！蒋介石说“中国无力抗日”，实际上他是欺骗你们，使你们不打日本，好让日本灭亡中国。

弟兄们！你们到江西来得到什么好处？你们自己的家乡呢？正在被日本兵烧杀。你们自己的母女呢？正在被日本兵奸淫。你们自己在江西呢？翻山过岭，造堡垒，修马路，累得筋疲力尽。你们的父母妻子天天盼望着你们到北方去救他们，但是你们自己都“归不得家乡，救不了爹娘”。这种苦楚像乱箭穿心。

弟兄们！蒋介石不许你们救家乡，强迫你们打红军，究竟你们有什么好处？说升官发财吧！坐汽车，抱姨太太的是蒋介石，轮不到你们。你们呢？还是肚子不饱，双手空空！你们不愿打仗想后退吧！蒋介石摆着机关枪、大刀队，不要坐看家乡被日本烧杀，不要为蒋介石个人牺牲，救国家、救家乡去！光荣！快点抱定主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红军打日本！

红军早已准备着联合你们，红军可以与任何部队,在下列的三个条件之下，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

不要怕！不要迟疑不决，枪炮在你们手里！只要你们大家自动不打中国同胞开回北方去打日本，蒋介石就没有办法，四万万同胞都会拥护你们！

我们向你们建议：

（一）你们不要打红军，或者枪口朝天放！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军决不先来打你们。

（二）快点约定红军，两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

不论白军官长与士兵，不论政治派别，只要真正抗日，红军都愿与他一起去抵抗日本。

弟兄们！日本是我们的敌人，不许你们去救家乡，不让我们联合抗日的目的是□□□□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蒋介石！

有意联合你们的红军
德
泽东
四年六月

和刘晓、何长工的谈话[1]

（1934年6月）

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

[1] 这是毛泽东在站塘等地调查后回到文武坝，和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及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谈话的一部分。

给中共会昌县委和县苏维埃的信[1]

（1934年6月）

普遍深入地开展查田运动，分清阶级阵线；发动群众搞好阶级斗争，纯洁干部队伍；做好扩大红军的工作；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搞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好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的封锁；壮大地方武装力量，保卫苏维埃政权，反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

[1] 这是毛泽东致中共会昌县委和县苏维埃信的主要内容。

视察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时的谈话[1]

（1934年7月1日）

我们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克服它，我们也一定能够克服它。怕困难，消极，懒散，请假回家，开小差，在工作中口称没办法，用平常样子对付紧急工作，战争空气的缺乏，工作的不实际、不深入、不抓紧，这些凶恶的毒菌立刻给它消灭掉。一切积极奋斗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开展反机会主义动摇消极的斗争，为着革命胜利奋斗到底。

---

[1] 这是毛泽东视察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时谈话的一部分。谈话的要点发表在粤赣省机关报《前线》第八期上。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4 年 7 月 15 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们：

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了我们的东三省，侵占了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又夺取了我们的整个华北。在中国南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大炮与海陆空军，正在计划福建省的直接占领。日本帝国主义是想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把全中国的民众变为亡国奴，永远受日本盗匪们的屠杀、奸淫、剥削和蹂躏！

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一贯地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和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元，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的反日反帝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历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曾经一再号召全中国民众武装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侵略，公开对日宣战，并下了对日宣战的紧急动员令，动员全体苏区的民众准备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曾经向全国民众一再宣言：“（一）停止进攻苏区与红军，（二）给民众以初步的民主权利——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示威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与创立群众的反日义勇军，在保卫中国”的三个条件之下，愿意同全中国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战斗协定。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曾经一再反对承认傀儡政府“满洲国”，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公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以及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反日反帝运动的一切镇压与屠杀。

全中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以及一切革命的民众，都反对国民党出卖东三省，出卖热河、内蒙古，出卖华北，出卖福建与全中国，而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反日主张与反日运动，这不能不使国民党更疯狂地封锁我们，向我们进攻，使我们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能同全中国民众直接联合起来，不能同东北抗日义勇军一致行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驱逐出中国。国民党军阀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一致联合起来共同反日的提议，完全置之不理，而且更无耻地出卖中国，加紧他们对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的五次“围剿”，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

因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要动员全部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不能不首先同进攻我们的百万以上的国民党匪军血战，保持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的自由的苏维埃领土，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匪徒的蹂躏与出卖。从无数次同国民党匪军血战中创造起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我们是决

不放弃的，但是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决不能坐视中华民族的沦亡于日本帝国主义，决不能让全中国为国民党汉奸卖国贼所拍卖干净，决不能容许全中国广大劳苦民众为日本帝国主义整批地屠杀与蹂躏以及东北义勇军的孤军奋斗，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只要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接受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那我们工农红军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队之后全部出动，同全中国一切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同全中国的民众与一切武装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开展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切反日的民众都应该帮助我们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团结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周围，加入我们的抗日先遣队，武装起来，直接同进攻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盗匪们作战，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应该联合起来。一切禁止与压迫我们抗日的个人团体与武装队伍都是汉奸卖国贼，我们应一致起来消灭他们。

我们认为只有全中国民众的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才能打倒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取得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与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

为了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更具体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东三省、热河、内蒙古、华北、福建以及全中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辱国的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满洲伪国。抛弃对帝国主义强盗集团国际联盟以及美帝国主义的帮助的幻想。（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

中日秘密条约的无效。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对日作战。立刻停止进攻苏区与封锁苏区，使工农红军能够完全用来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三）号召全国民众将国民党军库中央工厂中所有武装以及一切入口武器用来武装自己，组织民众的反日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与游击战争。积极援助东北义勇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汉奸的一切企业与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国债款本息，设施累进税，并将国民党全部军费，拿来作为反日战费。（五）普遍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如反日会、抵制日货委员会、募捐援助义勇军与红军委员会以及各种反日的纠察队、破坏交通队、宣传队、运输队等，吸收广大群众，不分男女老幼、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到反日团体中来，利用罢工、罢课、罢岗、罢市与示威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投降。

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不顾一切牺牲，要为这一纲领而奋斗！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全国民众拥护这一纲领，同我们在一起为这一纲领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让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让国民党的汉奸卖国贼去叫喊“中国无力抗日”罢！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总动员，全中国民众的反日武装，全中国民众的反日大团体，有全部的力量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汉奸的集团的国民党！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蔷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

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1]

（1934年7月31日）

日本帝国主义自从劫夺了满洲热河[2]，控制了平津，取得通车通邮[3]，发表独霸中国的宣言[4]，向国民党要求解决一千余件“悬案”以后，加紧了吞并中国的新进攻。最近日本政府向美国提出日

---

[1] 这是毛泽东就当时形势和抗日先遣队问题向《红色中华》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冲破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于1934年7月派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它最初由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军第七军团担任，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同年11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后，组成红军第十军团，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随后，先遣队继续北上，沿途不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截，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1935年1月在返闽浙赣根据地途中，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绝对优势兵力的围攻，部队受到重大损失，方志敏被俘，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余下的部队继续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编入新四军。

[2] 满洲，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旧称。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3] 1934年5月14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代表在榆关就华北与“满洲国”通车问题达成协议，7月1日正式通车。同年12月达成通邮问题协议，1935年1月10日起恢复通邮。

[4] 指“天羽声明”。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称日本对中国有特殊权利，维护东亚秩序是日本的单独的责任，反对欧美各国插手中国事务。

美平分太平洋的意见，以及疯狂地在北满布置反苏联战争，与国民党代表开大连会议[1]，明显地表现着日本帝国主义极力企图缓和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斗争，企图求得帝国主义相互间暂时的谅解，一致地来瓜分中国，进攻中国革命与反对苏联。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在散放“撤废塘沽协定[2]”“收回战区”的烟幕弹，来掩护迅速出卖整个中国的大连会议。一面北洋军阀亲日老手安福系[3]完全与国民党合作，其要人如王克敏[4]等纷纷南下与黄郛、唐有壬[5]等在上海及莫干山密商，安福系头子段祺瑞[6]跑到庐山同蒋介石开秘密会议。这种新旧汉奸的大合作，完全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新进攻的十分紧张，中国民族已经到了极端危急的关头，死亡奴役的命运威胁着全国的劳苦群众！

---

[1] 1934年7月24日、25日，国民党政府派华北战区接收委员殷同等，在大连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参谋喜多诚一就接收战区、通邮、设关等问题进行谈判。大连会议即指这次谈判。

[2] 塘沽协定，指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在天津塘沽签订的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中国军队立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上述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

[3] 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推定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台，该集团随之瓦解。

[4] 王克敏，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

[5] 黄郛，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唐有壬，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6] 段祺瑞，北洋军阀皖系首领。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北京临时政府执政等职。1933年被蒋介石迎居上海，三年后病死。

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同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我们的基本苏区是完全配合一致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正从苏区的门户——广昌、连城、龙冈、泰和各地向我们中心地区前进，来实行他五次“围剿”的最后步骤，企图血洗苏区，消灭苏维埃红军，做个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最尽职的走狗。这就是目前时局的特点。

苏维埃政府与红军，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讨伐卖国贼国民党，正在领导广大群众与英勇红军在各个战线上与优势兵力的敌人开展最激烈的血战，正在以一切力量用各种办法去粉碎这个凶恶的“围剿”。苏维埃与红军早已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粉碎这个凶恶的“围剿”。目前我们更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与持久性，去粉碎这个“围剿”。我们这样做也就一定能够最后的粉碎他。

在苏区我们最近期间已经创造了七万新红军，动员了几十万担粮食解决青黄不接时的给养，目前又正在进行伟大的秋收动员。我们的游击部队大大扩充了，并在继续扩充，游击战争是广泛地发展着。物质供给如盐、布等正在扩大熬盐织布的群众运动。军事工业如弹药等的制造，是几十倍地增加了。我们这些力量，国民党做梦也想不到的。国民党早就说我们怎样“不得了”，他们却得到如何大的胜利，而事实证明，并且将最后地证明，“不得了”的只有腐朽透了的国民党。蒋介石自鸣得意，他向苏区筑了几千里几十层的堡垒，他们的“车水捉鱼”政策是怎样的快要“成功”了。不错，蒋介石筑了很多堡垒，蒋介石占领了我们一些地方，并且他还想进占汀州[1]、石城、宁都与兴国。然而国民党许多部队在红军铁拳之下溃败覆灭，却是蒋介石所讳言与禁说的。而且蒋介石之流的蠢猪是

---

[1]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不懂得最后“不得了”的不是苏维埃红军，而是蒋介石和整个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而是指挥蒋介石国民党的帝国主义，这是他们不懂得的。让我再来指出两件事：第一是他们这百多万向我们苏区（江西、四川、湖南、福建、鄂豫皖）进攻的士兵群众，在苏维埃红军的面前所得的影响怎么样。我们要说，这样广大的士兵是在一面被强迫进攻我们，一面却在受我们的革命教育。各个苏区可以说都是白军士兵学习革命的大学校。因此替蒋介石挖坟墓的不只是红军，而且是他自己的士兵。试问蒋介石这个蠢货懂得么？第二是国民党如此拼命卖国，天天向全国民众的死对头帝国主义下跪下拜，把半个中国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对日本几十万强盗军队的进攻不打一枪，而把所有的东三省、热河、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汉口以及河南、河北、江苏、浙江的军队尽行调了来打红军，把这些地方送给帝国主义摧残压迫。同样陈济棠[1]不去防御香港（英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根据地），却把广九铁路送给英国，把他的队伍十分之八开到江西、福建来打红军。请问这些地方的广大民众就听任蒋介石、陈济棠这样卖国到底么？能听任帝国主义自由自在跑进中国来杀人放火么？又请问被调军队的兵士群众能听任帝国主义烧杀他们的家乡而安心被国民党强迫来打自己的弟兄——工人、农民与红军么？不，决然不能的。蒋介石、陈济棠（以及张学良、何键[2]等等）自己的胯下埋伏了千千万万的炸弹，这些炸弹有些地方已经爆

---

[1] 陈济棠，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南路军总司令。

[2]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何键，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西路军总司令。

炸或正爆炸（东三省抗日义勇军[1]、人民革命军[2]、上海战争[3]、各地的游击战争与群众暴动），有些地方是等候时机大大爆炸起来。请问全国劳苦民众与白军士兵，谁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六大纲领[4]？谁不拥护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宣战命令？谁不接受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不打红军，与红军联合，共同去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呢？无疑的，只要他们看到了听到了我们的纲领、命令与号召，他们是会跳起来愿意干的。无疑的，全国反日反帝的大风暴一定会在我们的鲜红旗帜号召之下掀发汹涌起来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国民党卖掉半个中国、全国民众望红军北上抗日如大旱望雨的时候，在今年八月一日全世界劳动民众举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大示威的时候，派遣了一个抗日先遣队，这两天已经可以迫近福州，即将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目的在使全国民众明白，红军是全中国内真正抗日的军队。红

---

[1] 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其中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2] 即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发生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将原国民党军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同时保存十九路军番号。

[3] 即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

[4]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组织中国人民开展民族自卫战争，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提出了《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亦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1. 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2. 全体人民总动员去参加抗日战争的前线和后方工作；3. 全体人民总武装；4. 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战费；5. 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产生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6. 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善意保持中立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

军的主力虽因国民党五次“围剿”挡住了北上的路，正在也只有在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剿”之后，才能大举北上，却在此时派出了自己的先遣部队。这个部队虽然只是一个先遣部队，但是有充分的战斗力，配备了充足的火力。战斗员指挥员都是质量很好的，曾经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表现了他们最大的英勇。这个部队虽不很大，但我们相信必能得到沿途民众的援助，凡是国民党军队中决心抗日的分子也必会不断参加这个部队，或同我们联合起来携手并进。这样，我们的抗日的先遣队，将很快壮大成为抗日作战的大力量。只是一件，部队取道北上的时候，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死走狗，为了尽忠日本起见，必会派兵拦阻，如果这样，那么先遣队的前进，还须同蒋介石的拦阻队作战。这就要用大力宣传这些拦阻队的士兵同情我们，瓦解这些拦阻队，以便北上能够迅速。抗日作战是越快越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立即就要来到。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行动都正在张牙舞爪，全国民众的灾难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号召全国一致起来援助苏维埃与红军，使我们能够迅速粉碎五次“围剿”，集中力量抗日反帝。援助我们的抗日先遣队，反对南京政府的拦阻政策，使抗日红军迅速前进。

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日先遣队已经出动了！我们英勇工农红军已经以实际的行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中国于危亡。同时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下令全国红军准备随时随着先遣队出发。但是国民党却以几十万大兵拦阻红军，封锁红军，抽调全部北方军南下入赣。全国民众们，难道还不明白么，国民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全国民众们，白军兄弟们，反对国民党这个卖国的投降政策！要求动员全体海陆空军去抗日，反对进攻红军！中国一切军队都应该枪口向日本帝国主义放，向着卖国的汉奸放！这样我们才能够而且必然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为《红星》报[1]题词

（1934年8月1日）

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

[1]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1年12月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由邓小平主编。在红军长征前，《红星》报共发行80期。从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停刊为止，在红军长征前有关长征准备的报道有3期，在长征中《红星》报共出版长征专号28期，共计31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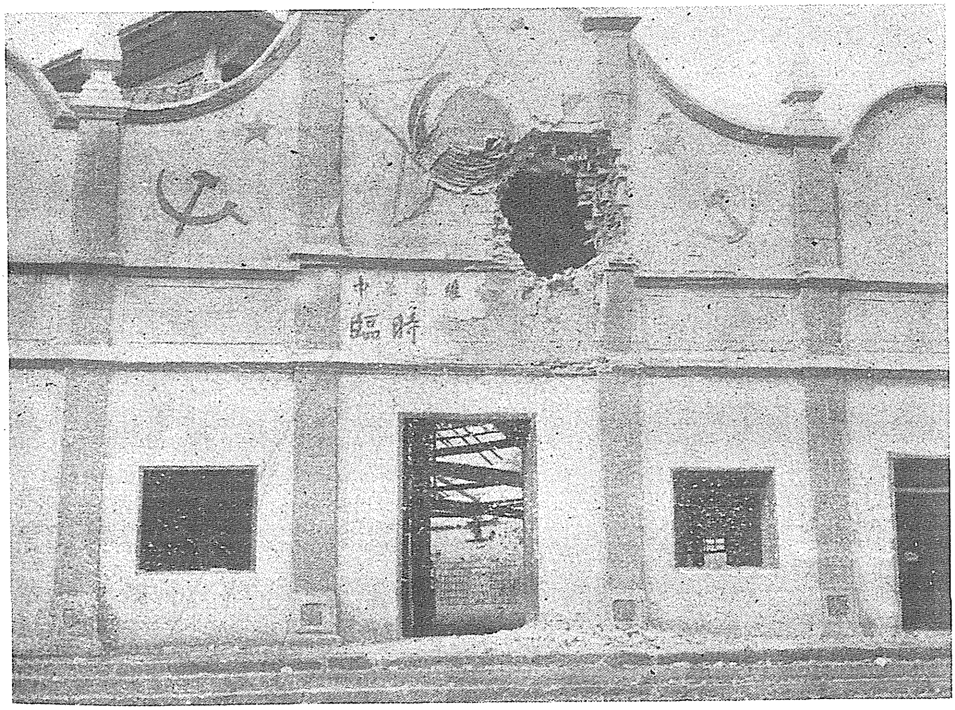
（1934年8月15日）

孔荷宠，中央执行委员，原红军第十六军军长，在湘鄂赣苏区工作，屡次违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对敌进攻恐慌动摇，领导红军退却逃跑，容忍反革命取消派分子混入部队，致红十六军与湘鄂赣苏区群众受到严重损失，多次批评教育毫无改变，去年十月撤销其十六军军长，但望其尚可教育，令来中央入红军大学学习，不但毫无进步，竟由动摇走到公开的反革命，今年七月于被派往补充师工作时，乘机逃跑投敌。孔荷宠身任中央执行委员，有过较长斗争历史，当我英勇红军与广大群众向着敌人五次“围剿”作最后决战时期，不认识革命胜利前途，竟出于最可耻的叛变行为。除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外，特通令全国各红军，各地方部队，各级苏维埃政府，及号召各地革命团体，及苏区白区工农群众，如遇该孔荷宠者应就地扑杀之以为动摇叛变者戒。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进行战略转移后，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央苏区。图为国民党方面拍摄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大礼堂。

在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

（1934年10月15日）

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中央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你们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苏区，团结人民，开展游击战争。你们不要怕，不要认为红军主力部队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

[1] 1934年10月15日，中共赣南省委召集的省、县、区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在于都县城谢家祠召开。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

（1934年10月）

第一章　概　论

（一）游击队的任务

游击队依其所处环境有如下的任务：

（1）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他们的基本任务是，用自己主动的积极的动作消灭或削弱一切在自己力量上能够胜任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发动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直至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繁殖新的游击队并领〔导〕他们发展游击战争，扩大并加强自己的力量使游击队变为新的红军，用这一切去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向苏区的进攻，争取革命在广大地区内以致在全中国内的胜利。

（2）在苏区边境的游击队：当敌人向苏区举行围剿与封锁时，一切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游击组等共同的基本的任务是用自己一切积极的动作去配合红军的行动，保卫苏区，消灭或削弱进攻的敌人，粉碎围攻与封锁。当敌人围剿与封锁的计划遭受失败时，即配合红军胜利地前进，使苏区各方面向着敌人占领区域与白色区域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消灭这些区域内的敌人，恢复苏区，与扩大苏区。

（二）游击队的组织

（1）游击队依据他的任务，并适应具体环境的需要，得分为独立团、独立营、游击队、游击组等几种形式的组织（独立团、营谁〈虽〉不再为游击队，但按他们性质仍属游击队一类）。

甲、独立团

分为完备的与不完备的两种。完备的独立团，由三个营编成，每营各有三个连，团部并得编一个机关枪排及特务连。总的人数从一千到一千五百人。

不完备的独立团，至少应有四连，各连直属于团部。如有五连到六连则编两营，每营三连。如有七连，则以一连直属团部，余编两营。如有八连，则编三营，其中两营各有三连，一营只有两连。总的人数从五百到九百。

连的编成照规则为三排。人数不足够，在团的各连中可容许有一连缺少一排，此外必须都是三排。

排的编成是三班，每班九人（班长在内）。

乙、独立营

一般相当于独立团的一个营，即由三个连的编成。但大的独立营可有四连，小的可只有两连。连的编成同于独立团的连。

丙、游击队

单个部队，从一排到一连人，均称游击队。游击队内排与班的编成同于独立团的排班。但三十五人以下的游击队不分排，各班直属于队部。

为了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发展与保卫苏区，在一切接近敌人的地方，三十五人左右的小游击队，可以每二乡或三乡编成一队。一百人左右的大游击队，则可每区编成一队。

丁、游击组

（1）三人以上十五人以下原则上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队伍，称为游击组。以村为单位，或以一个集团家屋为单位，选择志愿的工农积极分子编成之。

（2）各游击部队，按照其编制设置必要的指挥人员及服务人员。独立团、独立营均设政治委员，独立团、营的连及游击队，均设政治指导员。但服务人员及一切非战列人员须求节省，不使部队下轻上重。

（3）游击部队的干部（各级军事政治指挥人员）除了社会成分必须是工农出身或有斗争历史的革命分子外，并须具备下列的条件：忠实于工人农民的利益，服从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指导，服从上级的命令，坚决、机警与刻苦耐劳。当选择游击队干部时，必求合于这些条件；当教育游击队干部时，必须使他们增强这些条件。

对于在行动上表现不忠实与不坚决（虚伪与动摇）的干部，必须洗刷出游击队。

（4）游击队员的成分，必须是工人、雇农、贫农、积极分子与最觉悟的工人分子，坚决拒绝一切地主、富农、商人、老板、剥削分子等参加游击队。

必须审查游击队员的现在成分。如果发现了某些剥削分子混进了游击队，应该立即处置他们。只有在过去斗争中说明了确是坚决为工农利益而斗争的个别分子，方才允许继续留在游击队中。

国民党军阀及豪绅地主常常利用一些没有阶级觉悟的分子，经过他们的训练派遣到游击队区域附近，乘机混入游击队进行反革命破坏工作。游击队领导者对于这种反革命分子以及已经受到这种分子影响的游击队员，必须有分别地给予坚决正确的处置。在处置

时，须发动全体队员对这种反革命分子的仇视与斗争，并把这种事件经常地警惕游击队员，提高队员的阶级警觉性与觉悟程度。

如果游击队干部中存在着这种分子时，对他们的处置，便更加要坚决，严密与有方法。

（5）游击部队的武器在其开始，通常的多是单响枪、抬枪、鸟枪、梭镖、大刀、土大炮、松树炮以及土造地雷等，然后在自己的战斗中从敌人手里夺取各种新式武器（五响枪、机关枪、手榴弹、刺刀等）来武装自己。游击部队可以而且应该配备许多很好的武器，但这要坚决从敌人手里夺来。服装粮秣的解决也是如此。

（三）游击队发展成为红军

为了战胜更大敌人争取更大胜利起见，游击部队必须将扩大自己看作经常的任务。每个游击队的领导者必须随时作出实际的计划，使自己的游击组组织成游击队，游击队变成独立团、营，独立团、营变成正规红军。

当部队已经扩大，或由若干较小部队合编成了较大的部队，因而他的行动范围扩大了，任务的负担也加重了，这种时候，每个游击队的领导者必须注意动员群众成立新的游击队，去代替自己过去的地位。为达此目的，扩大了的游击部队，须可能给与〈予〉新游击队以一切必要的帮助（领导干部、部分有经验的队员等）。

游击队还要尽一切可能，在那些已经需要并且已有可能但过去远没有组织游击队的地方，去组织那里的游击队。为达此目的可以从自己部队中派遣小的分队（如一班或一排）到应该组织游击队的地方去，作为那里游击队的骨干，而从那里发动大批的工农积极分子团集于这个骨干上，使之成为很快就能作战的队伍。

在游击队发展成为红军的过程中，除了数量上扩大外，还要在

不口的行动中，争取可能时间锻炼自己，训练自己，极力学会与提高军事上的技术与战术，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着完成游击队的基本任务，而逐渐走向红军的道路。

（四）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1）每个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必须在自己的活动范围内选择一个适当地区作为经常的根据地，在这一个地区的深固之处（军事上有意义之处）储集粮食，收藏战利品，安置伤病员，同时又是游击队休息待机之所。此外还可以在自己主要行动的那些方向找得有战术意义的地点，作为〔临〕时根据地，使自己依据了这些地点能够更顺利地进攻敌人，同时又便利于击破敌人对于自己的“围剿”。游击队根据地的选择，依照当地敌情、地形、群众条件与游击队本身力量来决定。但通常是选择在山地或森林，如小的游击队在特别情况下可以选择在湖沼中或河汊中。

（2）游击队建立军事根据地的任务也就是建立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只有向着建立苏区的道路前进，才能真正创造根据地。因此当游击队选定了根据地的时候，就要用自己的坚决动作，消灭当地及其附近的反动武装，发动群众的阶级斗争，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镇压内部的反革命，建立群众的赤卫军、少先队与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来巩固这一根据地；并且向着那些最有力的方向极力发展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来扩大这一根据地。必须记着：游击队没有根据地是不能生存的；而不发动群众斗争，不消灭反动势力，不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3）游击队完成其建立苏区的任务，是需要艰苦工作与相当的时间的，其开始的阶段是使之成为游击区域。打击反动势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斗争，吸引群众相信推翻统治者夺取土地建立政权

的必要与可能，而坚决行动起来，这是开始时期的中心工作。估计到部分地方（敌人交通要道、大城市附近等）将在较长时间处于游击区域的地位，因此游击队将这些地方转变成为苏区的计划，是应该慎重考虑的。

（五）游击队动作的基本原则

游击队（敌人后方的与苏区边境的）为了完成自己任务而采取的一切动作，不能离开下列两个基本原则：

（1）密切地结合群众。因此游击队必须首先约肃〈束〉自己的纪律，再则积极争取工农群众使之脱离一切阶级敌人而转到自己方面来，至少使之不反对游击队；并用一切方法瓦解敌人部队，争取白军士兵、民团团丁脱离其长官，哗变到游击队中来。

（2）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因此游击队的军事动作须力求震动、坚决与秘密，而迟钝、游移与暴露自己，及〈都〉是应该极力避免的。

第二章　游击战争

第一节　要则

（六）游击队**战斗动作的目的**

概括说来有如下各项：

（1）消灭地主武装；

（2）消灭敌军小部队；

（3）截击败军；

（4）扰乱或钳制大集团的及有巩固阵地的敌军；

（5）袭击敌人的运输队、征发队、抢禾队；

（6）袭击敌人的兵站；

（7）夺取并破坏敌人的弹药、粮食、被服等储藏所；

（8）袭击敌人的汽车、火车、船舶，破坏汽车路、铁路，必要时破坏普通行军路；

（9）破坏敌人的电话线电报线；

（10）袭击敌人守备薄弱的堡垒、寨子、土围子与城市；

（11）为红军担负侦察职务。

（七）为达上述目的游击队**一般的战斗计划**，应包括如下各项：

（1）袭击驻止的敌人；

（2）袭击行动的敌人；

（3）破坏敌人的后方；

（4）对付敌人的围剿与追击；

（5）关于行军宿营给食卫生事项。

（八）游击队为了执行自己的任务，规定战斗计划，必须了解自己的环境，对于下列事项须有经常的确实的**调查与侦察**：

（1）敌情：敌人（民团及军队）的驻所、人员数、武器数、战斗力、首长能力、敌人企图等。

（2）地形：山地与河流的形状、位置、名称；桥梁与渡河点的位置，船只数；村庄与田野的形状、位置等。

（3）道路：所在地附近的大路小路、路上著名村镇、各段里数等。

（4）行政区划：县的位置；县内区的划分、区的名称与位置、附近乡的划分等。

（5）居民状况：附近各地人口数、剥削状况、工农群众的斗争

情绪等。

游击队军事政治人员调查侦察了上述事项，最好把它记载起来，地形道路行政区划等须写成简明的图，并把这些情形讲给各分队的指挥员与工作员听。

（九）游击队每到一地，立即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游击队必须具有高度的灵动性。当游击队指挥员了解了当地情况之后，就要迅速定下决心，作出自己的战斗计划——对于某一敌人（当地的某一民团或某一白军）迅速地攻击他，或者自己迅速撤走。

如果游击队不知道灵动，过久停顿在敌人很〈附〉近，敌人已有准备的时候，如果游击队指挥员还看作太平无事，或游移不决，那末受袭击的危险就更大了。所以高度的灵动，迅速地明了情况与定下决心，是游击队夺取主动权而避免陷入任何被动状况的一个重要关节。

（十）使游击队的灵动能够经常的具备正确性，而不成为错误的行动，就要依靠游击队指挥员对于情况的正确的判断。游击队应该坚决攻击一切在力量对比上可能取得胜利的敌人，但对于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则要坚决地避免。决定应该攻击，或者应该避免，不但在于情况之充分明了，还在于游击队指挥员对于已知情况能作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如果游击队指挥员对于情况的分析与判断错误了，就会产生错误的行动；或者过分估计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就会放弃可能取得的胜利，如某一游击队在一个时期中有了连续多次的这样的错误行动，就会减弱这个游击队的活动能力，甚至将影响游击队的生存。或者轻视敌人力量，以游击态度对付战斗，就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这两种情形，都将使游击队失掉主动地位，而造成敌人对自己的压迫。因此，游击队要经常夺取主动权在

自己手里，要使震动不变为错误，就要在每一次战斗计划决定之前，慎重地作出正确的判断：一遇有利时机就坚决进攻敌人，不然就坚决避免战斗保存自己的力量。

（十一）游击队指挥员必须估计到自己活动区域（边区、新区、白区），敌人的耳目是很多的，为了保证游击队经常主动地争取战斗的胜利，必须善于把自己的军事动作尽可能的隐蔽起来。伪装、弯路、迁移驻地、散布谣言、击东击西、保守秘密等，都是游击队隐蔽自己欺骗敌人的方法。只让自己知道敌人，不让敌人知道自己，是游击战术的原则之一。

必须记着：谁〈虽〉则善于灵动，谁〈虽〉则有正确计划，如果让敌人先知道了，胜利仍然是没有的。

（十二）游击队动作的特性是经常有计划地攻击敌人，而不是配置防御等待敌人的攻击。游击队攻击敌人的方法主要是袭击。只要〈有〉袭击，才能在敌人无准备的状态中出其不意，把敌人抛入被动地位，而游击队取得了大的胜利。

第二节　袭击驻止的敌人

（十三）袭击驻止敌人的原则，就是要有秘密而周详的准备，迅速而忽然的动作。

（十四）决定袭击计划之前，要用各种手段查明下列事项：

（1）拟定袭击之敌兵力多少，战斗力怎样，配置怎样，警戒程度及其换班秩序怎样；

（2）附近有无其他敌人，如有，兵力多少，距拟袭之敌多少里，能否增援拟袭之敌，从哪个方面来援，两敌间有无电话电报线

连络；

（3）到拟袭地点有哪些大小路，有哪些隐蔽接近地。

侦察上述事项，须以秘密方法出之。侦察越确实，袭击计划就越正确，袭击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十五）**袭击时间的选择**：

（1）**在夜间**：这是最好的袭击时间。一则利用夜暗，行军接敌最能隐蔽；二则利用夜暗冲锋，最能使自己扩大声势，敌人惊慌失措；第三，附近敌人增援是困难的。因此袭击应多选在夜间；而学习夜间战斗，成为游击队的紧要功课。

（2）**在拂晓**：这是袭击第二种有利时机，其实施是夜间接近，拂晓攻击。因为夜间接近容易隐蔽自己，拂晓攻击容易辨别敌我，在迅速解决战斗的条件下敌人增援也不如在白天举行袭击之来得快，并且利于从远道去袭击敌人（如从六七十里外举行袭击)。因此，在对夜间我们还缺乏经验的游击队，选择这种时机是好的。但须注意一点，即冲锋开始时间应尽可能放在敌人起床之前。

（3）**在白天**：袭击在白天常常得不〔到〕很好的成绩。因为敌人容易侦察，因而容易戒备，又容易跑掉。因此，白天袭击须少采用。但在下述情况下是可以采用的：（A）敌人腐败不机警，兵力薄弱，又无工事堡垒，或有也是极差的；（B）敌人离游击队远不知游击队消息，而游击队从远地袭击他；（C）无增援之敌，或有而是弱的；（D）大雾迷空大雨倾盆之际。这些情况下，白天袭击是可能成功的。

（十六）不论袭击时间**怎样**，**必须使袭击企图完全迷却敌人**。因此游击队指挥员在袭击前须注意下列事项：

（1）袭击计划严守秘密。不但不能使居民中任何一人知道，对

自己部属也不应过早告知，到了一定时机才告以应知事项（不能籍〈借〉口秘密而不告诉部属以袭击动作中应知事项，不能藉〈借〉口告诉而将不必告知的事项宣布）。

（2）利用居民散布假消息，掩饰游击队的行动方向。

（3）找可靠的贫苦工农做向导，但不能使他知道袭击企图。

（4）先向假的方向走一天，第二天突然袭击拟定之敌。在敌人耳目甚多的地方可用此法。

（十七）袭击部队的**开进**：

袭击部队向着袭击目标开进时，须注意以下各项：

（1）选择隐蔽小路；

（2）行进中保持肃静；

（3）在行军纵队的先头派出少数侦察人员，担任侦察与警戒；

（4）行进尽可能的快。

（十八）**到达袭击目的地附近的动作**：

游击队到达袭击目的地附近，即离敌人警戒线不远的地点，应立刻把部队隐蔽集结，准备攻击。首长率领各分队指挥员迅速视察敌人配置，如在夜间则听察敌人动静，立即指示各分队指挥员以攻击的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部署兵力，给各分队以战斗任务。

对于部署兵力，依部队的大小决定。如举行袭击的游击队，只有几十个人，则由首长亲率最大力量从一个敌人配置最薄弱的方向（最好是从敌人的后面）突袭进去，而于另一个相隔不远的方面派遣最小力量去起钳制的作用。

如袭击部队是大游击队或独立团、营，则应该将部队分为两队或三队，从两个或三个方面同时袭击。

但实行这种办法要遵守下列的条件：（1）不可平分兵力。要在

一个主要方面配置较大兵力，而在其他一个或二个次要方面配置较小的兵力。（2）不可远远分兵。应在离开敌人警戒线大概夜间约两里白天约五里之处分兵，才可使各方面突击时间一致，并使夜间不迷失道路。（3）要截断敌人退路。两个至三个方面必须有一个是当着敌人主要退路的，阻止敌人从这里逃跑，敌人逃跑时能截击消灭之。袭击的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将其缴械，只有用包围或迂回方法将敌人主要退路截断才能达到目的。（4）要约定识别的记号，使在冲锋错乱之时，能认得清敌人与自己。所有这些办法，在行军出发之前都应依照当时所得情况大致规定出来，此时只依照实地视察，加以审查，如有不合才加以改变。

如对附近某方向有敌人增援的顾虑时，应派出少数人去指定地点担任警戒。

所有到达袭击目的地附近的一切必须的动作，要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以便迅速转入进攻和冲锋。决不可停止过久，致敌人发觉加强其守备，使我攻击困难，或乘机逃跑使我扑一个空。

（十九）冲锋动作：

（1）开始冲锋，须照预定时间突然实行之。如有两个或三个方面同时攻击时，必须计算到主要方面的情况（地形道路等），而以主要方面部队到达冲锋出发地所需要的最少时间，作为各方面共同的开始冲锋时间。

（2）不要作声，不要打枪，不要唤杀，用刺刀、梭镖、大刀等一下冲入敌人的配置，扑拢敌身而格杀起来，这样把敌人解决。使用手榴弹（有手榴弹时），也不要过远抛去。要逼近抛向密集的敌人，趁着一声爆炸，即拿白刃挺进解决战斗。

（3）只有在钳制方面，才可以用少数火器射击敌人，目的在吸

引敌人到自己方面来，使突击方面易于取胜。

（4）如敌人依据房屋顽抗，应放火烧屋，逼其投降。不肯投降时，乘着房屋一部起火敌人慌乱之际，从房屋的另一部登墙突入，将其缴械。不能突入，也把敌人烧死。因此，在出发前，估计敌人有围守房屋可能时，即应准备点火器材（洋油、长把上扎草等）带去。出发前，如查明敌人有竹钉、外壕或土围子时，就要带禾草、板片、楼梯等去，以便通过障碍物，爬入土围子。

（5）追击。袭击成功，如敌人一部或大部溃退时，则用迅速的追击手段解决之。追击一般不宜过远，只有附近无敌顾虑，才可追击得远些。

（二十）袭击**后的动作**：

（1）**袭击成功时**：立即把部队集合，连同已收容的伤员，已集中的俘虏战利品等，带往通来路的地方，占领阵地，集结整理，严防残敌反攻及附近敌人增援队的袭击。

主力集结后，再派出一个小的分队及必要工作人员，到作战地点，收容遗下的伤员，清查散处的俘虏与胜利品，征集资材及捉土豪。

关于处置俘虏：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应把重要的及为士兵所痛恨的俘虏官而特别是法西斯蒂清出，立即枪毙；俘虏士兵则向之作简短讲话立即放走。在苏区边境的游击队，则将俘虏带回后方处置。

如情况紧张，须把这些战后工作尽可能缩短时间，以便游击队迅速地胜利地撤去。

只有在敌人消灭，或残敌已无反攻能力，附近又没有敌情顾虑时，才可容许相当延长时间散发财物给当地工农群众，并作简明有

力的政治宣传。不管怎样，游击队不应在那里宿营。

游击队撤去，可先向假方向走，再转到真的方向，使敌人难于追寻。

（2）不成功时：如敌人占领阵地顽抗无解决战斗希望时，即应退出战斗，有计划地向〔后〕撤退，此时需要指挥员当机立断，不稍犹豫。如敌人举行反攻或追击时，小游击队因其轻便可以先行分路退却，然后会集于预定的集合场。独立团、营则应在退却方向的有利阵地上配置掩护队，抑制敌人的追击，掩护主力分路向预定集合场撤退。主力撤退完毕，掩护队才能撤退。不论怎样，撤退要是有计划有秩序的。掩护必须收容遗下的伤员。

预定集合场，原是准备失利时用的，在下达袭击命令时，就要规定出来，通常规定在前一夜的宿营地。

（二十一）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及城市：

力量薄弱的地主武装及少数敌军驻守之堡垒、寨子、土围子与城市，游击队有去袭击的责任。但实行时须分别采用下述方法：

（1）夜间秘密接近，乘其不备，悄然爬入。

（2）如被敌人发觉，则改为小部队易攻他方吸引敌人，主力从戒备松懈处袭入。

（3）白天伪装敌军，使守备之敌误为友军，乘机袭入。

（4）野战将其击溃，跟踪追击，乘势袭入。

（5）各种方法都不能袭入，敌人固守不出，而我游击部队力量充足，又必须消灭这个敌人时，则可将袭击计划，改为围攻计划，而用地道爆破之法攻入。但这只限于苏区边境的游击队有十分必要时行之。

（二十二）扰敌或钳制敌人：

当红军与敌人作战期间，为了疲劳敌人兵力，引起敌人恐慌，在敌人宿营地附近的游击队、游击组，可举行扰敌动作。时间以在黄昏、半夜或拂晓为最适宜。每次人数要少，以便轮番去干；动作要快，使自己不受损失，要接近敌人宿营地突然向之射击，以引起敌人惊慌。

当红军与敌人战斗之际，游击队、游击组可在红军意图之下担负钳制敌人一部的任务。主要是虚张声势，多作疑兵，使敌人误以为是红军，分散兵力来对付游击队，并不须进入严重的战斗。

第三节　袭击行动的敌人

（二十三）游击队不但要善于运用袭击战术去消灭和打击驻止中的敌人，还要善于运用袭击战术去消灭和打击行动中的敌人。因为在敌人后方与苏区边境的红色游击队，是经常可以看见敌人大小部队及其辎重的移动的。袭击行动中的敌人，学会“伏击”与“急袭”——袭击敌人行动的两个主要方法，给予这些敌人以随时随地出其不意的打击，是游击队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十四）**伏击**就是游击队有计划地隐蔽埋伏于道路旁边，向着正在进行的敌人及其辎重举行突然的袭击，从而消灭或打击这些敌人夺取他们的辎重的一种有效方法。其中如侦知敌人走某条路来，埋伏等候该敌，待他一到立起袭击，这个叫做“等候伏击”。不知敌人走哪条路来或者敌人并未准备动作派一个队伍去引诱该敌，待他一到立起袭击，这个叫做“引诱伏击”。

（二十五）伏击首要注意侦察：

（1）没有侦察，不明敌情，根本就不能设埋伏。侦察不准确，

误以敌人大部队为小部队伏击就会错误；该以敌人走甲路而敌人走了乙路伏击就要落空。

（2）为了侦察确实，游击队一面要利用居民中拥护与同情自己的人，多方接近敌人驻所或行军中的宿营地，从敌人士兵夫子口中得必要情况（部队大小、武器、战斗力、辎重种类、何时将走何路）；一面派出自己有训练的侦察班直接进行侦察，单靠居民报告是容易误事的。

（3）侦察得来的情况要给以仔细分析，才能得出正确判断，定下伏击决心。

（4）要严守秘密。一面使派出的侦察人员不于疏忽中走漏消息；一面在自己驻地周围封锁交通，使敌无从侦察游击队消息，否则敌人有可能对游击队先来一个袭击，或于埋伏时敌人对游击队来一个相反的“设埋伏”。必须记着：不论在敌人后方或苏区边境，敌人的侦探是很多的。

（二十六）其次要注意**选择地区**：

好的伏击地区能帮助游击队发挥极大的威力，敌人却为地形限制不易施展，甚或只好束手待毙。伏击地区以具备下列条件为合宜：

（1）有良好隐蔽：使游击队容易看见敌人，敌人不容易看见游击队；

（2）有良好地形：使游击队容易攻击敌人，敌人不容易攻击游击队。

（二十七）**实施伏击**：

（1）开进：第一，时间不要早了，早了使游击队久处于埋伏中，减弱了紧张性与慎重性，容易暴露企图，增大被敌发觉的危险；也不要迟了，迟了来不及设埋伏。第二，行进路要隐蔽，当常

走小路走无路的山地谷地。

（2）设埋伏：主要是配置兵力，按照游击队兵力大小，地形情况而定。通常在险要的地方派出钳制队。钳制敌人一部，其兵力不得多于全队百分之三十。在利于突击的地方派出突击队，为解决战斗的主力，兵力不得少于全队百分之七十。在有其他敌情顾虑的地方派出警戒队，通常派出七至十五人的侦察组任之，只有独立团、营，才可于必要时派出一排人左右的警戒队，以免分散兵力。

伏击计划中，如确知敌人是小部队，应堵塞其先头，截断其退路，企图将敌人整个消灭。如知敌人是大部队，则应放走其先头，甚或本队也放他走，专门截击其后尾。这些都是要预先布置的。

开始出击的信号，各分队出击的方向与运动路，都要事先告知各分队首长。

埋伏中保持极端的隐蔽与肃静，不准吃烟，不准讲话，不准随意探看。

（3）**战场观察**：设立两个观察所，第一个设在通敌人来路十里至十五里之处，派一负责人带三至四个通信员到那里去观察敌人来的情形，不断报告指挥员。指挥员根据报告重新审查自己的配置，如与敌情不相符合，立即改变配置的全部或某些部分。

这个观察所直至敌人全部通过方才收回。第二个设在埋伏地区，指挥员亲去观察，以便适时发出开始出发信号。

（4）**出击**：第一，开始出击时间要选择得很好，这要指挥员能够抓住敌人行进中一个恰好的最利于自己出击的时机；同时还要全部队员服从指挥员的统一号令，不得自由行动，让人事先发觉。第二，出击动作要迅速、猛烈，时机一到，指挥员发出了信号，部队就立刻动作，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此时钳制队极力把敌人钳制住，

而突击队，则猛力奔向敌人猛烈开火，跟即冲锋，迅速解决战斗。任何迟疑与畏缩，都是不利的。

（5）**战斗成功**：立即集结部队，收容伤员，处置俘虏，收集战利品，迅速撤去。如消灭的只是敌人一部，撤去尤其要快，不然就有受敌人反攻的危险。

（6）**不成功**：战斗遇到敌人顽抗没有胜利希望时，应迅速退出战斗。已知不利而继续硬打，那是蠢的干法。这种时候，指挥员要有最大的机灵性。

（7）**再一种机断**：指挥员的机断性还要表现于别一种时候，即在开始出击以前，如发现敌人兵力过于强大，或埋伏计划被敌人发觉，敌人已经占领了阵地，出击毫无胜算，就应停止出击，断然撤退，保存自己力量。

（8）**但有一种伏击**：目的不在消灭敌人，而在杀伤敌人扰乱敌人的行军，则不论敌人多少，埋伏是否发觉，都应执行任务的。举行这种伏击部队要小，地点要多，动作要机警敏捷，如果这样做，是通常能够完成任务的。

（9）伏击敌人落伍兵、传令兵、采买、侦察等**单个或少数人员**，这是游击组会干的事，这种机会很多，不应放弃。

（二十八）伏击敌人的**运输队**、**征发队**、**抢禾队**：

游击队、游击组伏击敌人的运输队、征发队、抢禾队，通常是容易成功的，因为运输队行动不灵便，征发队、抢禾队则要分散去征发与抢割。

（1）**布置伏击运输队**：应把游击队分为两部，一部准备同敌人掩护队战斗，另一部则准备夺取或毁坏其运输品。当着敌人运输队行进到埋伏地区时，先射击其先头部分，使整个运输行列停止下

来，伕子则惊慌乱跑，跟即驱逐或消灭其掩护队，而夺取其运输品，夺取不完的毁掉它。如要防止运输队向后跟走，须派少数人射击其后尾。

（2）布置伏击征发队：或在敌人尚未接近村庄时行之：游击队预先埋伏于敌来必须地点，待其一到，立起袭击而消灭之。或在敌人进了村庄分向各家征发时行之：此时最为有利，因为征发队的大部分分散各处不容易集合。或待敌人征发完毕满载而归之时行之：乃在游击队事先有准备不能实行前两项办法时，可以这样做。但不论何时伏击，游击队均须用突然的动作袭击敌人的掩护队，方能达到目的。

（3）布置袭击抢禾队：与伏击征发队办法相同，可于敌人刚来时、割禾时、回去时这三种时机，依据情况实行之。

（二十九）伏击汽车火车船舶：

（1）伏击汽车：地点应择在转弯处或上下坡处。在这种地点横放石头木头，或挖成陷阱，或埋设地雷（陷阱、地雷之上加作伪装），使汽车碰坏、跌倒、炸烂。游击队则埋伏于其近旁隐蔽地点，汽车一到，以一个小的分队拦阻先头，再一个小的分队截断后路，中间多数人捕捉汽车，掳其人物，而把汽车破坏，驾车工人则宣传释放他。车中如有护卫兵，须用迅速手段解除其武装。袭击汽车的战术，在敌人汽车路旁边的游击队、游击组都要学习而实行之，以破坏敌人利用汽车运输进攻苏维埃红军的计划。

（2）伏击火车：转弯处、上下坡处、有高堤处、洼地、隧道口，都是伏击的好地点。方法：卸松拆散路轨的一段，使列车到时跌出轨外；或在轨上用大石大木横塞起来，碰坏列车，制止列车前进。游击队分成三部：一部占领阵地防列车卫队抵抗，一部占领路

旁对车厢射击，又一部进入车厢收缴枪械，俘虏人物，最后放火焚烧车辆。中国铁路虽不发达，帝国主义国民党却利用已成各路为进攻苏维埃红军之用，因此铁路两旁的游击队、游击组有破坏铁路袭击列车的责任。

（3）**伏击船舶**：为敌人利用装兵装物以进攻苏维埃红军的船舶，游击队、游击组有责任去袭击他，但民用船舶不在此内。埋伏时游击队分为两部：主要一部准备迎接船头，次要一部准备截击船尾。敌船一到，游击队从埋伏中出来占领河岸之高起处，或弯曲处，对着进入伏击地段的船舶施行突然射击，命令船舶靠向自己岸边，要在船舶表示遵令靠岸时才可停止射击。靠岸后立即分别处置船中人物，官船破坏，民船放回，船工散给财物。如船里有敌人护卫队，须用火力压迫而降服之。

（三十）**对遭遇的敌人举行急袭**：

袭击行动中的敌人，除有计划地设埋伏外，还有游击队在行进路上遭遇敌人，这时战斗的方法是举行急袭。

急袭要看敌人兵力的大小强弱。

游击队预见有遭遇敌人的可能时（预期遭遇），指挥员要同伪装侦察组在部队先头三至五里行进（政委率领本队前进），以便亲自观察敌情，争取机动。如遭遇的是弱小敌人，即应抓住先机之利，立下决心，乘机急袭。这种急袭，要是一种带埋伏性质的突然袭击，即把游击队迅速转入敌人侧面，配置于隐蔽地点，对行进之敌突然开火，跟即冲锋，一气解决战斗。敌人溃退时，附近如无敌情顾虑，则跟踪追击，期于尽数扑灭，但不得追击太远。

如遭遇的是强大敌人，即应避开战斗，迅速撤退，不稍犹豫。

对一切不预期遭遇的以及情况不明的敌人，都应避开不打，免

受无益的损失。

骤遇强敌，既难战胜又难避开时，先用火力制止敌人前进，然后自己迅速撤退。

遭遇战要有最快决心与最大机动，迟疑不决是危险的。

（三十一）用急袭直接帮助红军作战：

当红军与敌军战斗之际，靠近这一会战地不远的游击队，应该在敌人战线附近施行急袭，帮助红军取得胜利。在战斗时，敌人的后方勤务是十分要紧的，游击队、游击组应在敌人的直接后方向其辎重队、野战医院、参谋处以及未列入战斗一切人员，施行急袭，引起其惊恐与扰乱，使敌人不得不从预备队中抽出一部分兵力来对付游击队，这就削弱了在战线上战斗的敌人，直接帮助了红军。

游击队亦可向靠近战线的敌人预备队挑战，这并不须进入严重战斗，仅将敌人的兵力和注意力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即已大大地帮助了红军作战。

当敌人退却之际，游击队、游击组以不间断的动作向退却敌人沿途袭击，使敌人惊慌失措，增大他的损失。

第四节　破坏敌人的后方

（三十二）敌人进攻苏维埃红军，依靠了各种交通运输工具连络其后方与前线，集中大量的资材以接济前线，如果敌人的交通发生障碍，资材受到损失，就要立即影响他的进攻部队。因此，破坏敌人的交通、通信及一切军用设备和资材，是游击队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十三）游击队执行破坏任务时须注意如下事项：

（1）熟悉情况、利用地形、忽然出来和迅速退去。

（2）分为工作队与掩护队。工作队实施破坏。掩护队位置于有发现敌情可能的方向，发现敌人向工作地行进时，则开火抑制之。因此掩护队须有足够的力量，并须准备同敌人战斗。如遇少数敌人出来，则奋力解决之。两队之间须有密切的通信联络。工作完毕，即用约定的信号通知掩护队，两队迅速集合于预定地点，遮盖行踪，飘然而去。

（3）专门实施破坏工作的时间，通常以在夜间为好。但游击队普通作战时，也要尽可能联系破坏工作。

（4）破坏普通行军路及桥梁须估计情形，要是能给敌人行军以直接重大影响的与红军所不能利用的，才破坏他。并要向居民群众解释破坏的意义，否则容易引起居民不满意。

（5）夺取敌人的资材，除带走供游击队自用，并尽可能帮助红军外，尽量散发当地群众，散发不完的，毁掉他。

（三十四）下述简易的破坏法，游击队可参照自己的经验执行之：

（1）破坏电线：

不论电话线、电报线，最好在架线通过河流及谷地等处以及在两个通信所的中央，扼要剪断，使敌人不易修复。电杆烧毁，电线收走或抛入水中。

（2）破坏桥梁：

破坏木桥浮桥：破坏木桥办法：将桥脚捆上禾草、干柴、松光，或其他易燃物，点起火来，将全桥烧掉，这是最难修复的，其次拆去桥板，仅留桥脚。再次，从靠岸搭板处两头各拆一段，或从中央拆去数段。这三种办法，可依情况选用一种。破坏浮桥，主要适用火烧办法；次则拆断其一端或两端使桥材随流逐走。其他渡河

器材，一并烧掉，或抛河中。

破坏石桥：最快是用黑色火药从桥石缝口（略为凿大）填入筑紧，插上引线，点火爆塌。爆处应在桥的中央，长桥则每段给它爆塌。无火药时用锄挖毁。

（3）破坏汽车路与铁路：

破坏汽车路：挖毁路基之一部，主要挖毁其转弯处，上坡下坡处。敌人运输很多利用汽车路，破坏汽车路是重要工作。

破坏铁路：主要拆毁路轨。拆法：拔起其狗头钉，使铁轨离开枕木。次将螺丝卸下，使铁轨两段〈端〉离开。此外，或挖空枕木下面的砂土或将隧道填塞起来。这些都是使火车到时，出轨倾复。破坏路桥特别是铁桥，影响更大，方法采用爆炸。沿途电杆，则砍倒焚毁。车站上的信号、分轨器、十字杆、蓄水台，特别是车辆，都应尽可能拆烂、炸毁、烧掉。

（4）破坏兵站仓库：

办法都用火烧。最好摸入屋内放火。其次用长把点火引烧其屋檐。还有一法，即用黑色火药数斤，装入布袋或竹篓内（不要塞紧了）再包上些硫磺同松香的混合物，一起装在箱子内或洋油桶内，用长的引线从黑色药包通到箱外，点火向着窗内抛入，达到焚烧目的。

第五节　对付敌人的围剿与追击

（三十五）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因为积极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破坏敌人的交通及其后方机关，这些动作，都直接动摇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削弱与分散敌人对苏维埃红军进攻的力量。因

此，敌人决不会放松游击队，敌人将依据游击队力量的大小与对于他们损害的程度，调动可能的力量，举行对于游击队的围剿与追击，企图消灭游击队，保护他的后方。这种情形，是游击队领导者必须估计到的。游击队的同志们必须明白：调动敌人的力量越多，证明游击队活动的成绩越大，给予红军的帮助也就越大。同时也可以明白：游击队不但要有计划地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与后方机关，**还一定要有计划地战胜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如果游击队不能战胜敌人的围剿与追击，就不能继续发展游击战争；也就不能真正创立根据地，开辟新苏区，发展自己成为红军。并且要明白：围剿与追击将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有时游击队的环境将是非常困难的，只有战胜围剿与追击，战胜任何困难环境，才是游击队的彻底的胜利。

在苏区边境的游击队，因为他是主力红军直接作战的助手，所以敌人对付游击队也是同他进攻红军及防止红军直接连在一块的。因此游击队对付敌人的围剿，也是直接包括在我们整个粉碎敌人围剿的计划之内，游击队在红军总的任务之下执行自己的任务。

（三十六）游击队指挥员须随时估计敌我形势，估计自己某一时的活动会引起敌人怎样的行动，敌人当时已有何种对付游击队的计划（从敌人行动上看出来），依据这些情况**作出自己对付围剿计划**。游击队作出自己计划时必须依据下列的原则：

（1）争取主动地位，不让敌人占去先机之利；

（2）密切依靠群众，动员与武装群众，坚决反对敌人的围剿；

（3）团结干部与战斗员。随时向他们说明敌我形势，反对因形势变动而发生的不正确的倾向，准备最艰苦的战斗；

（4）坚决镇压反革命，严防内部反革命分子的捣乱与叛变；

（5）集中主力行动不分散力量，在有胜算与避免无益损害的条件之下作战，巧妙机动地去战胜敌人；

（6）粮食金钱等物质条件的保证。

（三十七）游击队对围剿之敌作战应采用下列方法：

（1）不待敌人前进就去袭击敌人，打破敌人的进攻计划。当敌人不强大又无坚固的工事堡垒时采用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敌人布置几路进攻时，首先消灭其薄弱者。这样的作战适用第二章第二节所述各种方法。

（2）待敌人进到适当地点在运动中消灭之。当敌人有坚固的工事堡垒，不利游击队袭击时，采用这种方法是最好的。这样的作战，适用第二章第三节所述各种方法。

（3）派出支队到敌人围攻线外，破坏敌人后方，分散敌人力量，这是辅助的方法。从地方小游击队派出，不应分割主力。

（三十八）当敌人有力部队突入赤色根据地追寻游击队作战，或几路配合同时进迫，游击队战况不利，继续作战无胜利把握时，游击队可以而且应该脱离这些敌人，超出围攻线外，保存自己有生力量，主动地有计划地引退敌人，打破围剿。

游击队超出围攻线后，可到更大的范围内去活动，在那里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根据地。而在原地留下地方的小游击队，继续发展斗争。一有可能，游击队又可回到原地活动。游击队采用这样的飘忽不定灵动机警的战术，可使敌人的许多进攻部队没有办法。而游击队在这样的动作中，可以找到许多机会消灭弱小的敌人，扩大自己的力量。

但必须严格防止无必要与无计划的动作。必须记着：灵动机警不是无目的无计划的逃跑。

（三十九）游击队必须有计划地对付敌人的长途追击：

敌人举行长途追击，虽则敌人的力量强大，也常常不能用于本地生长的游击队，因为这种游击队，熟悉地形，与群众联系密切，而敌人则否。敌人的长途追击却常常用于远道新去不熟悉情形的游击队，因此被强大敌人追击的游击队一定要有坚决的计划、巧妙的方法，去脱离这些敌人。首先游击队的领导者要坚定自己的决心，并拿这个决心去团结部属，镇静地计划脱离追击的办法，克服部属中的动摇情绪（特别当遭受了敌人打击及行军疲劳给养困难时，这种情绪是容易生长的）。游击队首长的领导艺术，也就最需要在这种特殊困难时候表现出来，这是第一件要紧的事。第二，虽在被敌人追击中，行军时仍须极力接近群众，细心向群众查问附近及前进方向的敌情地形，并尽一切可能争取工农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从他们更加了解情况，使用他们作向导。游击队接近群众了解情况，就同鱼得了水、瞎子得了光明一样，这是第二件要紧的事。第三，采用最好的隐蔽法（打圈子、走偏僻路、设置假路标、从宿营地深夜开走以及于情况许可时从隐蔽中绕道弯回突然插入敌人后面向相反方向行进等）与伪装法（变换服装、有时假装敌人部队等），并于必要时采取最强度的行军法（如一天走百余里）。用这些方法，通常可使追击的敌人忽然失掉游击队的行踪，而不得不停止其追击。第四，脱离了敌人追击之后，立即选定好的落脚地，争取群众拥护自己，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这时游击队便又开辟了自己的新环境。

游击队在确实查明了向自己追击的敌人是不强的地主武装或白军小部的时候，就要精密选择最适当的时间与地区，用设埋伏方法给敌人以突然的出其不意的打击，来制止敌人的追击。这是对追敌采用反攻战术，这种战术的采用应该特别谨慎，首先是查明敌情估

计其确能战胜，第二是伏击的时间地区都要恰好，第三要用绝大努力提起全队的决战精神，而在实施时要用最坚决迅速的动作，将敌人扑灭于游击队的一击之下。不注意这些条件而轻率举行有决战意义的反攻是不许可的。

第六节　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

（四十）行军应注意事项：

（1）多走隐蔽小路，少走大路，多走不相同的路，少走老路；必要时可采用打圈子法，深夜开走法，强行军法，有时还可采用隐蔽绕至敌后相反方向行进法。

必要时采用伪装（假装敌人），使敌人认不清是游击队，但这只于必要时行之，并要向队员说明其意义。

（2）在行军纵队先头配置伪装的侦察班（如装着担伕之类）。其任务是：（A）侦查敌人道路；（B）有袭击任务时，如发现向相同方向前进的行人，则超过行人，而把行人抑留在后面，以免走漏消息；（C）发现敌人个别的侦探或步哨，如有袭击任务，则或报告首长弯路前进避免发觉（有此可能时）；如无袭击任务，则一概捕捉或袭击之；（D）遭遇敌人部队时，立即报告首长，依据任务与情况迅速处置：或举行急袭，或避开他；（E）设置路标（首长须令后卫分队指定专人将路标收起）。

侦察班应是经常的组织，依游击队大小，以七至十五人编成之，成分均要是游击队中机警、勇敢、沉着的队员，用好的干部当班长。侦察班夜间在部队先头一至二里行进，白天在先头三至五里行进。侦察班与游击队首长之间要有好的通讯连络。

后面有敌情顾虑时，派出少数侦察员于后卫分队的后面行进，侦察敌情。

（3）行军时首长的位置：前面有敌情顾虑时，首长随先头分队指挥员一起行进，留政指（或政委）及副长率领本队；后面有敌情顾虑时，首长随后卫分队指挥员行进；翼侧有敌情顾虑时，首长在本队位置。

（4）向导：白天要两个，一在侦察班，一在前卫分队；夜间每分队要一个。但道路熟悉时不在此例。

（5）游击队行军通常只要小休息，不要大休息；休息时要择森林隐蔽地，免暴露目标。

（6）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要作出严密的行军计划。特别注意如下几点：（一）预先将敌人堡垒数，堡垒位置，各堡垒间距离，敌人配置，何处有何路可容游击队通过等，调查明白。（二）通过时间要在夜间；预先把通过时应注意事项详告各分队首长及队员，并须预先演习夜间通过动作。（三）预先规定通过后的集合地告知各分队首长，如失联络，则各分队单独前进，到指定地点集合。（四）准备被敌人发觉时的处置。（五）部队最高级干部（游击队的队长、政指，独立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总支书）临时分配到各分队去加强领导。（六）如敌人堡垒密集，游击队较大，不能一路通过时，可用分路通过法，将部队分为若干小队，从许多堡垒间穿插过去，到指定地点集合。

（四十一）宿营应注意事项：

（1）游击队配置宿营的原则，既要能休息兵力，又要能防御事变。

（2）首先是依据情况来选择宿营地与配置警戒。如四面两天行

程内没有敌人，居民群众拥护游击队能对外封锁消息，地形又复杂险要，则游击队可以在当地村庄中宿营，警戒也只要派出潜伏哨（这是一定要派的，从侦察班派出）就够了。

如果没有这种条件，或条件不完备时，宿营地的选择与警戒设置就要十分注意。（一）不要在大村庄中宿营，情况严重时要在村外森林地宿营。（二）最好每夜变换一个宿营地，使敌人无从捉摸游击队。情况严重时，应一夜换两个宿营地，先在一地配置宿营，几点钟后又悄然移到别地宿营去了，两地相隔须在十里左右，敌人要来袭击也使他在前一假宿营地扑一个空。（三）进入宿营地要在黄昏时及黄昏后。（四）四面派出潜伏哨，重要路上派出军事哨。独立团、营则要向重要路上派出排哨或连哨，要有一个军事哨配置在紧靠宿营地的制高点上。（五）宿营地一定要背靠着山或好的森林地。（六）警戒位置要隐蔽，又要能看得见各方来的接近地。

（3）不论何种情况，一到宿营地（即使在深夜），首长要率领各分队指挥员亲自察看地形，道路（敌人可能来的，自己准备撤退的），和紧急集合场，亲自配置警戒，亲自指示各分队在发生敌情时，队伍如何动作，不得顾惜疲劳不去察看与指示。

（4）不论何种情况，部队除派出警戒外，要集结一起宿营。如村内有许多房屋，游击队只应占据必要部分，并要是利于防御敌人的，不可贪图方便多占房子、找好的房子。首长要同队员一起睡觉，不要单独找房子，通信员要在首长身边。

（5）不论何种情况，都要作战斗准备。枪枝包袱要靠放身边。情况严重时，不要脱衣、解子弹带睡；并可将屋壁凿成枪眼。要规定敌人袭击时的警戒信号。

（6）对付敌人袭击的动作：

一接敌人来袭的警报，立即将部队照预先指定道路带往紧急集合场集合，点查人员与武装。警戒队须同敌人抗战，以掩护部队集合，直至接到首长命令才能撤退。无论如何撤退要是有秩序的。夜间要十分肃静与镇静，不要做声，不要打枪（除警戒队外），不要惊慌乱走，以免敌人察知游击队集合场在何处及向何路退却。

如袭击之敌已经突入警戒，配置不能安静撤退，便要立即利用附近阵地抵抗敌人，直至部队完全到集合场集合，方才有秩序地撤退。

如敌人已包围房屋，游击队还在房屋内时，则首长应立即派部队之一部从墙头、窗口及凿的枪眼向外射击，制止敌人接近及冲入房屋，而将余部集结一起作预备队。此时首长应一面指挥抗战，一面向分队指挥员及队员说明坚决抵御及准备冲出的必要与可能，一面敏锐观察敌人情况，选择敌人的薄弱部，须知夜间袭击，敌人是难于一下子冲进房里来的，只要首长有决心、有指挥，能团结部属，冲出包围是完全可能的。待敌情已弄清，部队已集结，薄弱部已选好，即应突然举行反冲锋，从敌人的薄弱部一下冲出去。如敌人不强，这常常能够将他打退，或消灭其一部，而游击队可胜利地再返原地。

如在敌人突然袭击中丧失了宿营地，而有一部分队员被捕或没有退出房屋时，游击队应马上试图夺回宿营地，以便救出这些同志。这种目的许多时候是能够达到的，因为刚才胜利的敌人，战斗后常常在紊乱状态中，并且常常疏于警戒不防备游击队的反攻。

如敌人白天袭击，那末游击队就更易观察敌情与选择弱点，只要游击队能迅速集结部队，很好利用阵地，适时地坚决地举行反突击与反冲锋，也是能够把敌人打退的。

不论何时受敌袭击，游击队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主要条件，就是镇静、坚决、动作敏捷与集结兵力。

（四十二）给养事项：

游击队的给养，通常要从夺取敌人资材没收豪绅地主征发富农的财产去解决，只于必要时才在自愿原则下发动农民群众帮助给养。游击队应在自己根据地储藏必需的粮食；并从豪绅地主取得金钱，以便缺乏粮食时向居民购买。游击队应有计划地解决自己的给养，不要因给养困难，妨碍自己执行战斗任务。

游击队员都要制备米袋子，以便随时带粮食行动。

游击队为了解决自己给养及尽可能帮助红军给养而采取“打土豪”的办法，是必要的。但拘留土豪及与土豪代表接头的地点，必须与储藏粮食、军械，安放伤病员等军事秘密地点分开，并派专人管理，以免泄露秘密。

（四十三）卫生事项：

游击队的伤病员或安置于根据地内居民群众的家里，或自己在根据地设立医务所，按游击队大小及当时情况决定。

游击队须有担架与救护之组织，以便当作战时、工作时对负伤与患病人员能尽可能收容起来，并给以适当的治疗。为了治疗，须设法找得医生及必要药品。医生可从居民中去找，并可利用俘虏医生强迫其服务，没有西医也可用中医。药品除夺取敌人的外，可设法购买，并可强迫捉得土豪办来。

伤病员须给物质上较好的待遇，并发动群众慰劳他们。

第三章　游击队的政治工作

（四十四）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在于使游击队的一切动作适合于他的基本任务，因此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一）巩固与扩大游击队，提高游击队员的政治觉悟与军事智〈知〉识，增强游击队的战斗力，争取战斗的胜利，保证上级给予的一定任务的完成。（二）宣传党与苏维埃的政策与主张，发动、组织与领导地方居民群众的斗争，繁殖与扩大新的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与红军。（三）破坏敌人的部队，争取白军士兵、民团团丁哗变到革命方面来。

（四十五）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是在游击队的**政治机关与党的组织**的领导之下进行的，这种政治机关与党的组织的基本形式应如下：

在敌人后方的：独立团设政治部，由主任、组织干事、宣传干事、青年干事、破坏干事、地方工作干事、总支书记及技术书记九人组成之，在政治部之下，可成立地方工作团，地方工作干事则为工作团主任，政治部在政治委员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主任缺人时由政治委员兼任之。独立营设政治处，以营政治委员、营总支部书记、俱乐部主任、破坏干事及技术书记五人组成之。独立团、营的连与单个的游击队均设政治指导员，每班设一政治战士。连与队均组织党的支部，在党的支部内成立列宁青年组。

在苏区边境的：独立团设政治处（不设政治部），其余与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同。

（四十六）在敌人后方游击部队的活动区域，其区域内有两个以上的游击队，或一个以上的独立团、营，均组织**军事政治委员会**，

统一指挥这一区域内游击部队与地方党的组织的一切军事政治的行动。委员三至七人，以其中一人为主席。军事政治委员会随当地一个较大的游击部队行动。

（四十七）游击队对自己部队的政治工作：

（1）使全体人员深切了解中国革命的形势与任务，游击战争的意义，与游击队的基本任务。

（2）使全体人员了解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了解游击队服从共产党领导的必要。

（3）使全体人员了解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分别，巩固游击队为推翻国民党政权争取苏维埃政权的决心。

（4）使全体人员了解国际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了解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以及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了解发展游击战争与推翻帝国主义尤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

（5）提高全体人员的文化程度。

（6）保证全体人员学习与提高军事技术。

（7）保证全体军事指挥员与政治工作员学习与提高游击战争的战术。

（8）在平日，特别当决定了作战计划之时，巩固全体人员战斗胜利的自信心，养成坚决、勇敢、迅速、机警、沉着的精神，养成保守军事秘密的习惯，消灭部队中恐惧敌人怕上火线的心理。在行军时，维持行军纪律，注意隐蔽自己。在战斗时，领导队员们坚决勇敢作战，争取动作上的机警与敏捷。在战斗胜利时，注意不发生轻敌心理，注意不因收集财物而放松对于残敌的追击与消灭，注意迅速集结部队准备新的动作，注意伤员的收容。在战斗失利与退却

时，注意防止与消灭部队中的恐慌心理，颓丧情绪，与无秩序状态，注意使部队在最困难时不丧失其朝气。在宿营时，注意不使因宿营地选择与警戒配置的不适当而遭受敌人的袭击，游击队一般不应宿营大的村落与易受敌袭而不易警戒的地方，在遭受袭击时注意镇静与坚决击退敌人，或有秩序地把自己撤退。在警戒部队中，注意领导队员们不要疏忽了敌人及敌人的侦探。在侦察组织中，注意以沉着与机警完成自己的任务，消灭谎报的错误。在这一切时机中，游击队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与全体军事政治人员均要以身作则，成为全体队员的模范。

（9）要养成全体队员服从军事政治人员的命令的习惯，养成下级服从上级的习惯（只要这些命令是为了革命利益的），因此要同部队中的自由行动与散漫混乱现象作无情的斗争。在这里党团员要成为服从命令与纪律的模范。

（10）使从豪绅地主与敌人方面没收来的财物（除发给群众者外）能归于游击队全体，并供给红军与供给革命费用，防止与消灭个人“私打土豪”与“发洋财”的错误。游击队人员在物质待遇上一律平等，无指挥员与战斗员的分别。游击队人员除供给伙食与衣服外，原则上不应发薪饷，没收来的多余的财物，应为供给红军与供给革命经费而使用。只有在敌人后方的游击队当经费充裕时，才允许发给指挥员与战斗员以少数的零用钱，更多地发给零用钱甚至将没收的银钱拿来均分的办法，足以引导游击队走上不正确的方向。在这些问题上党团员与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均要首先作模范。

（11）保证游击队的给养，是政治工作重要的事。这里首先要训练征集资材的人员采取一切正当的与坚决的办法（主要是没收敌人与豪绅地主）。其次要同给养人员中的贪污浪费现象作斗争。其次要

在每个伙食单位中成立三至五人的经济委员会，监督米菜油盐等的收支采买，每七天算账一次，向队员公布伙食钱。

（12）对伤员与病员的关心保护与对他们的政治教育，是政治工作应该注意的。

（13）有计划地动员游击队活动区域中的工农劳动群众加入和扩大游击队本身，并建立和繁殖新的游击队，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使白色统治区域发展成为游击运动。游击队的扩大与繁殖，应争取其发展成为红军，以创造新的苏区或恢复与发展原有苏区，这种工作要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基本任务。要坚决反对游击队不敢到白色区域行动或到白色区域不发动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错误，要反对游击队经常缩回苏区的错误，要认识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永远是向外的，游击队要有决心在白色区域生根，创造新的苏区而不回原有苏区。

（14）对新队员施以必要的政治训练，这些必须放在游击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极力以教育与宣传鼓动工作保证队员不逃跑，对逃跑分子争取归队，并得以分别情形的处罚加于屡次逃跑者。

（15）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游击队，必要时对干部队员施行检举，清洗部队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消灭叛变与投敌现象，是政治工作的重要部分。

（16）上述各项是游击队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这些任务都是为了达到提高游击队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与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为了充分地执行这些任务，必须采用下列的方式：（一）上政治课；（二）上识字课；（三）保证军事教育的实施；（四）军人大会上的宣传鼓动；（五）晚会上的宣传鼓动；（六）读革命报纸；（七）演戏；（八）做活报；（九）出墙报；（十）专为某一事件的集合讲话；（十一）

早晚点名时的十分钟讲话；（十二）晚饭后做游戏；（十三）唱革命歌；（十四）讲革命故事；（十五）个人谈话等。

（17）执行上述方式时**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不妨碍战斗动作，如当敌情紧张时与行军时，不应用上课与开大会的方法。（二）不泄露军事秘密，各种大会与各种讲话，不应说及当前对付敌人的计划，行军应肃静时不应唱歌、讲故事等。（三）分别采用适合情况的方式方法与内容，使教育与宣传鼓动工作不间断地在部队中进行。如当行军出发时讲行军纪律、讲作战任务、讲战斗纪律与振起队员的勇气；当作战时鼓励勇敢冲锋；当每次战斗任务完毕时检查战斗中的教训，并拿来教育部队；当出发打土豪时讲阶级政策及如何发动群众的斗争；当没有作战任务时进行上课、开大会等。无论何时都要进行适合那时情况与任务的政治工作，要同藉〈借〉口行军作战没有时间进行政治工作的错误作斗争。（四）一切政治工作在事前要有充分的准备。如每次上课，讲课人要预先想好，使课的内容适合队员的需要与部队的特点，并密切联系部队过去的经验，其他一切宣传鼓动工作也都应事先将方法与内容准备好。（五）要随时检查政治工作的经过，以便迅速纠正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

（18）军事政治工作人员要使自己的教育与宣传鼓动达到目的，**必须深入队员群众之中**，与队员保持经常地密切地接触，发生同志的关系，注意每个队员的生活，替队员解决困难，并且要由此去了解每个队员的成分、个性、能力与觉悟程度。因此，要同领导人员中的军阀习气与官僚主义作斗争，要同打人骂人与不接近队员不明了下层情形的坏现象作斗争。

（19）党员是游击队中的领导骨干，经过党员青年团员的积极活动去团结全体队员，加强教育与宣传鼓动工作。因此，须在游击队

员中极力发展党团员，争取党团员在队员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数量。须极力加强党团员的教育，使党团员真正成为全体队员的模范。每次准备作战与准备出发做群众工作之当前时间，最好能召集连或队的支部大会传达作战与工作任务，使他们在战斗中起最积极的作用，但须注意在情况不许可时，则应改用组长与个人传达的方式，通知全体党团员起最积极的领导和模范的作用。

（四十八）**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

（1）游击队须极力保守军事上的秘密，**而在政治上却无论何时均须表明自己的鲜明的面目**。因此要同游击队中不发布政治纲领，不领导群众斗争，不在群众中公开宣传鼓动的错误作斗争。必须记着，游击队消灭敌人的任务是与争取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创造苏区的任务密切联系不能分开的，游击队中的军事政治工作人员与共产党员必须在不妨碍作战任务的条件下，领导全队尽一切可能在居民群众中进行充分的工作。

（2）为了密切地结合群众，首先必须建立**游击队人员与地方居民之间的正确关系**。必须使游击队全体人员了解自己的每一小的动作都会在居民中间发生好的或坏的影响，如游击队与居民群众的关系不好，因而引起居民群众不满意甚至反对游击队，则游击队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但如果游击队与居民建立了正确关系，则居民群众对于侦察、警戒、补充粮食与保护伤病员方面，必能给游击队以很大的帮助。因此必须森严游击队的纪律，**严格禁止游击队中任何人侵犯工农利益的行为**，要将这种纪律在部队中进行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要向破坏纪律的分子作斗争，屡犯的人要分别处罚直至执行枪决。在这里应注意给养人员与非战列人员是最容易违反纪律的，对这些人员要比较其他人员更加注意纪律问题上的教育工作。

为了引导工农群众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同情与拥护游击队，必须在游击队与这些群众相接触的一切时候，**采取良好的态度与方法**，如对他们说话和气，交还借用他们的物件，赔偿损坏了的物件，离开宿营地时上门板、捆禾草、扫房地，向房主告别，如村中居民逃避他去不得已拿用米菜等物也要将价钱封留，向工农群众以至商人买物必须按价付钱，禁止强买强卖，要认识强奸与抢劫是极大的罪恶。

当游击队某些人员对居民群众有不正当行为引起了居民群众不满意甚至反对游击队时，游击队必须设法恢复居民群众的感情，如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赔偿群众的损失，必要时当群众面前处罚部队中犯了错误的分子。当某地群众对游击队逃避不见面，或不肯卖物给游击队时，游击队不应迁怒于群众，而应细心查明原因，一面处置当地的反革命领导分子，一面更加采取良好的态度与方法，争取这些群众。

（3）游击队与居民建立正确关系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坚决地**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对反革命分子与一切群众不满意的剥削分子采取严厉镇压的办法**，游击队对这些分子采取妥协态度，是不可容许的错误。只有坚决地没收地主与镇压反革命，使群众得到实际的利益，游击队才能迅速地发动广大群众斗争，争取群众拥护与参加游击队，帮助与加强游击战争的发展。没收地主与镇压反革命，须在发动群众使群众了解的原则之下进行。没收的财物，除供给游击队与红军的需要外，必须尽量地大批地发给群众，要与不愿将没收的财物分给群众的现象作残酷的斗争。游击队一般没收富农与没收商人是不正确的，对这些人只应没收其坚决参加反革命的分子。但游击队绝对不能给富农商人以任何政治上的信用。

（4）游击队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普遍的与深入的宣传鼓动工作。对群众宣传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将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尤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以及发展游击战争的意义与具体方法，清楚地通俗地告诉群众，引导群众相信这些口号的正确而自动地坚决地斗争起来，参加与组织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

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方式如下：（一）出布告；（二）发传单；（三）用石灰或其他颜色在墙壁上写口号标语；（四）个人谈话；（五）向集群的民众演说；（六）开群众大会；（七）开军民联欢会；（八）各个伙食单位，开小范围的晚会与谈话会；（九）帮助群众劳动；（十）帮助群众解决困难问题等。

（5）游击队要使自己在居民群众中的宣传鼓动工作收到最快与最大的成效，必须使党团员与军事政治工作人员极力接近群众，深切了解工作地方各阶层群众目前的迫切需要，一切宣传鼓动必须以当地群众的目前的需要做出发点。因此，要同游击队中不接近群众不了解群众情绪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要耐心地教育党团员与工作人员以接近群众了解群众的态度与方法，指导他们对不同的群众阶层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候，采取不同的宣传鼓动的方式方法与内容，引导群众由初步的斗争，发展游击战争，走向武装暴动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斗争。

（6）游击队对地方群众中的不良风俗与宗教迷信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当群众还没有了解自己的不良风俗与宗教迷信应该抛弃时，游击队不应任意讥笑某项不良风俗以及打菩萨、打祖宗牌等，如果对这个问题不采取谨慎态度，就会引起群众对游击队的不满，而使反革命分子得到煽惑群众反对游击队的机会。

（7）游击队对土匪的政策，要把土匪的群众与首领分别看待，

把已经为敌人利用的与还没有为敌人利用的土匪分别看待。对土匪首领与为敌人利用的土匪，必须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同这种土匪妥协是不许可的。游击队不应该收编成队而没有经过改造的土匪。对自称红色游击队与实际是土匪的队伍，须向群众揭破其欺骗，争取其队伍中的工农分子，破坏这种土匪。

（8）游击队进行地方工作时**须与地方党的组织**取得密切联系，地方性质的小游击队则完全在地方党的领导之下行动。还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游击队中的党与政治机关有创立与发展地方党的组织的责任。

（四十九）**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

（1）游击队对于敌人军队与民团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即要把敌人军队民团的官长与士兵群众分别看待，要把士兵群众中为官长所收买的分子与因生活痛苦及被强迫当兵、当团丁的广大群众分别看待，敌人军队与民团的官长及部分为官长收买去了的士兵、团丁是革命的敌人，而因生活痛苦及被强迫入伍的广大士兵、团丁、群众则是完全可能用政治工作争取参加革命的。因此在敌人兵士与民团团丁之中进行广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以破坏敌人部队与民团，是游击队的**重要的任务**。

（2）对敌军士兵与民团团丁进行**宣传鼓动的方式与方法**，应注意如下各项：（一）在布告中提出士兵、团丁参加革命的口号。（二）制备专门传单，靠行军与作战散发于容易为士兵、团丁看见的地方。（三）在墙壁上写号召士兵、团丁参加革命的口号标语，特别是写在敌人驻所的附近。（四）从居民群众中进行破坏敌军与民团的工作，即经过广大居民群众接近士兵团丁进行个人谈话，并输送传单到敌人部队中去，这是破坏敌军民团的重要方法，游击队要用大

力去做。（五）从居民中与自己部队中选择与训练好的与适宜的分子设法派遣到一定的敌人部队与民团中去，在那里组织士兵与团丁的斗争，直至举行武装暴动与拖枪哗变，这也是破坏工作的重要部分，游击队必须有计划地去做。当战斗停顿之际进行喊话宣传，在敌军士兵与民团团丁中引起动摇情绪，以至投降到游击队来。实行喊话的人要预先有训练，喊话内容也要预先准备好。（六）正确地待遇俘虏士兵，如对俘虏士兵不搜他们的腰包，不没收他们的衣服用具，给他们以好的宣传鼓动，可能还发给他们以路费，欢送他们回去传播游击队的革命口号。对俘虏来的敌人官长应坚决处决（其中）一切法西斯蒂与为士兵、团丁所不满的分子，而对部分的下级官如连排长等，则可采取释放的政策。对敌人伤兵应加以优待安慰，送他们回去。游击队采用这些方法，对破坏敌军民团是能够收到很大成效的。

（3）游击队进行破坏敌军与民团的工作，一定要了解游击区附近各个敌军与民团的组织状况，士兵与团丁群众的痛苦，他们的情绪，他们中哪些人的家庭是在游击区域中，根据这些材料，作出具体的破坏敌人部队的计划，并且不间断地坚持地进行这种计划。游击队的同志们必须记着做艰苦的建立兵运小组，使破坏工作成为群众运动，进行破坏敌军与民团的工作，是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

和吴吉清的谈话[1]

（1934年11月）

你就安心坐着我的担架养病好了，同志们抬着你走是要累一些，这不要紧，因为我们都是同志。

---

[1] 1934年11月上旬，毛泽东发现警卫员吴吉清患疟疾发高烧，将自己坐的担架让给吴吉清，并给他说了这段话。

出路在哪里？

（1934年11月7日）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

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陈济棠，何键等，不但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使你们变为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奴隶牛马，而且他们自己也拼命的屠杀你们，压迫你们，剥削你们，你们整年整月做着苦工，然而你们总是养不活你们自己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苛捐杂税，是永远还不清的，修堡垒筑马路等各种兵差劳役是永远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土豪恶棍，对于他们的残酷剥削，使你们倾家荡产出卖妻子儿女，也还不清他们的田租与债款。

你们是在忍受着饥饿，疾病，寒冷与痛苦。你们像牛马一样，死在道路田野里，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你们。

你们不能反抗，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国民党军阀，民团，警察，流氓恶棍，会如狼似虎一样，鞭打你们，杀死你们，砍你们的头，把你们放到监狱里。他们还要说你们是“共匪”，要杀你们全家的老少。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都威吓你们，说“共匪”是“杀人放火”，是“共产共妻”。他们要压迫你们出钱，出力，出性命

去帮助他们“围剿共匪”，要你们组织民团，守望队，铲共团，防堵“共匪”，但是你们自己还只是听到人家骂共产党，骂苏维埃红军，你们自己还没有看到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什么东西。

你们只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的主张：

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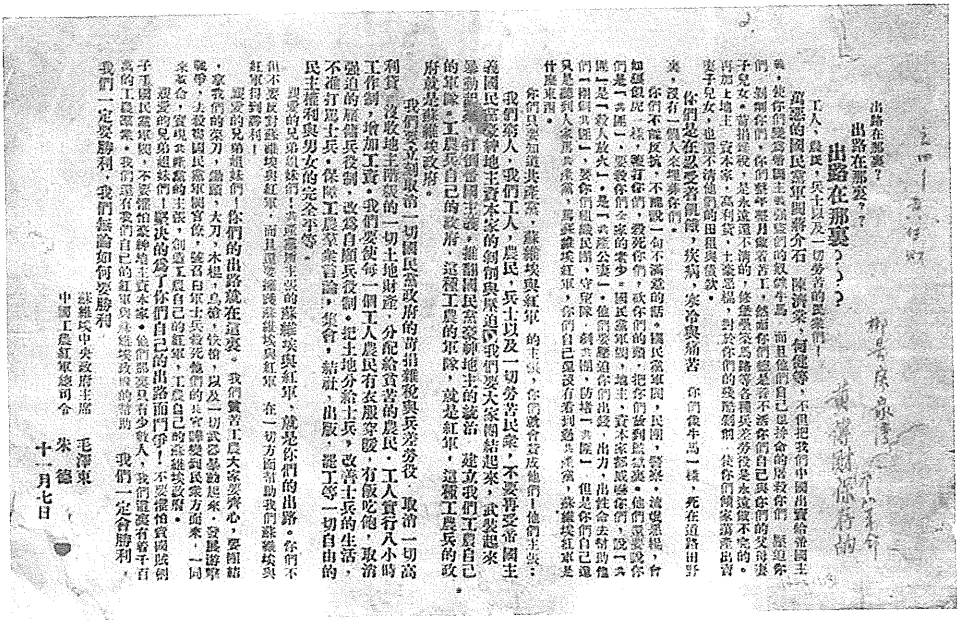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兵差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们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取消强迫的雇佣兵役制，改为自愿兵役制，把土地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生活，不准打骂士兵。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与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与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得到胜利。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齐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的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　朱　德
十一月七日



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发布的《出路在哪里?》。

清平乐·会昌[1]

（1934年夏）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2]
踏遍青山人未老，[3]
风景这边[4]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5]
颠连[6]直接东溟[7]。

---

[1] 会昌，县名，在江西省东南部，东连福建省，南经寻乌县通广东省。早在1929年，毛泽东为开辟赣南根据地，就率领红军到过会昌，以后又常途经和居住在这里。这首词是1934年夏天毛泽东在中共粤赣省委所在地会昌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工作时所作的。

[2] 莫道君行早，旧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3] 踏遍青山人未老，毛泽东自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本句的"人"和上句的"君"，都指毛泽东。

[4] 这边，指中央革命根据地南线。

[5] 会昌城外高峰，指会昌城西北的会昌山，又名岚山岭。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回忆说：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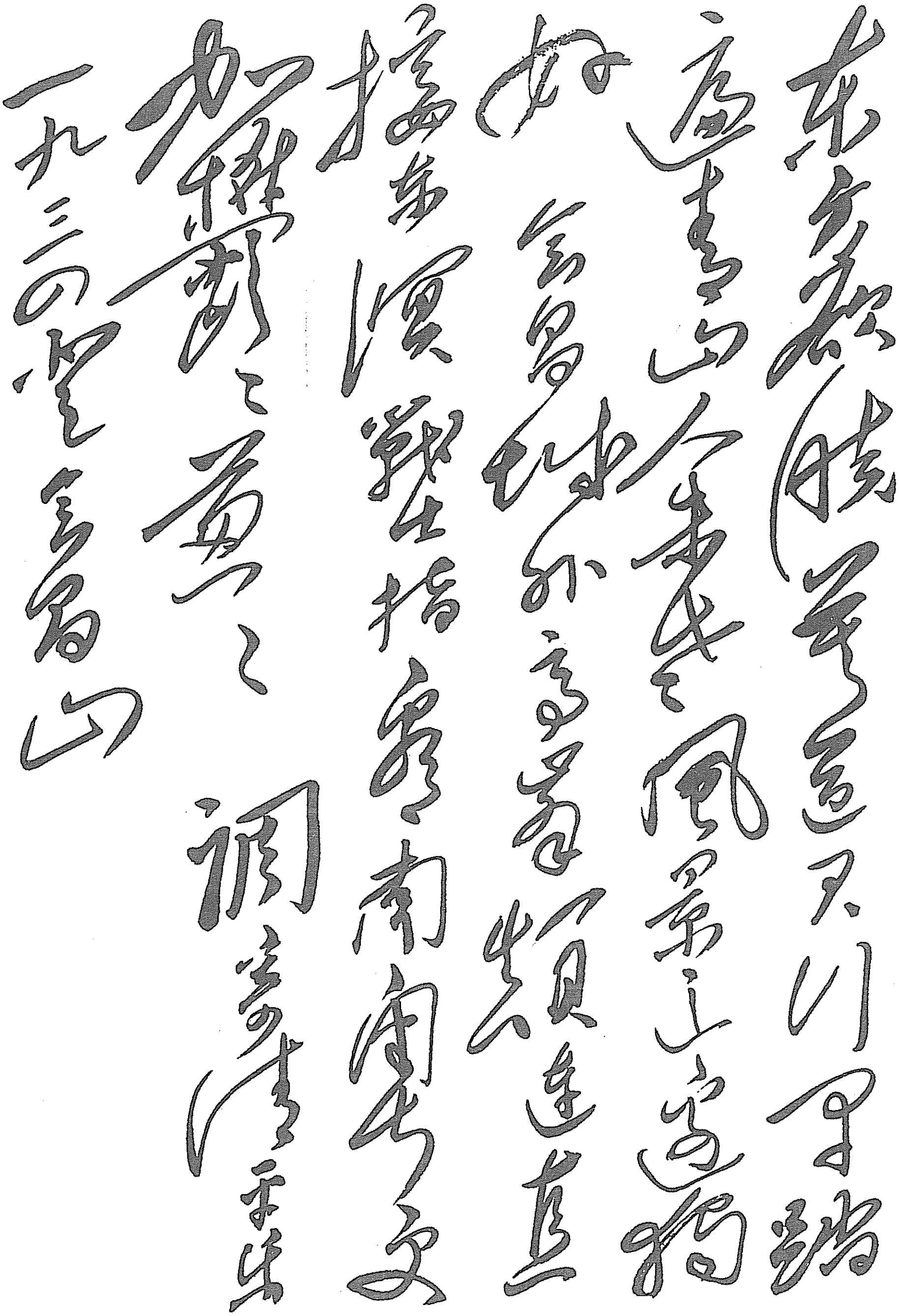
[6] 颠连，起伏不断。

[7] 东溟，指东海。

战士指看南粤[1]，
更加郁郁葱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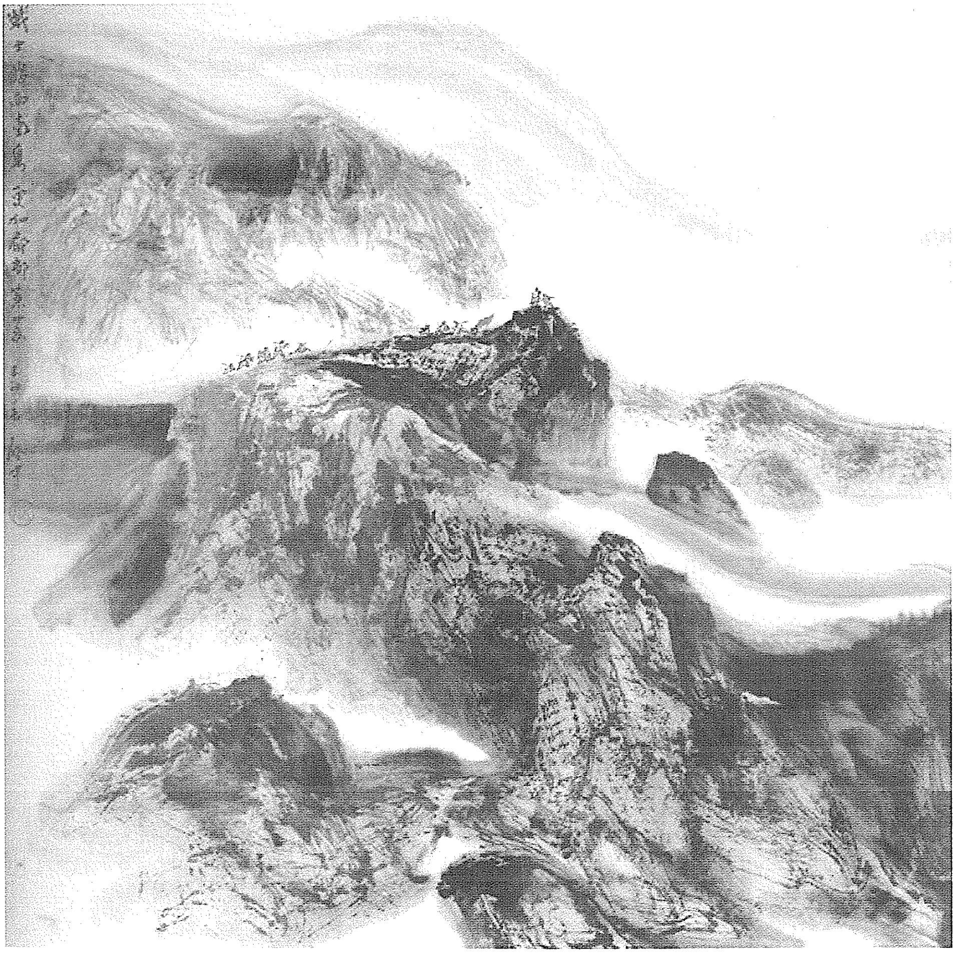
---

[1] 南粤，古代地名，也叫南越，在今广东、广西一带。这里指广东。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
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
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
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调寄清平乐
一九三四年会昌山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会昌》。



《会昌》（诗意画）

向白军士兵抗日六条纲领的建议

（1934年）

（一）要求北上抗日立即停止进攻苏区，实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打红军，枪口向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放！

（二）要求士兵抗日的集会、结社、言论、行动自由，组织士兵抗日联合会，决定抗日大事与士兵本身的问题！

（三）改良士兵生活和待遇，要求发清欠饷，反对打骂，反对法西斯蒂的压迫和屠杀！

（四）约定红军，双方互派代表，订立停战抗日同盟！

（五）杀死不准士兵抗日的官长哗变到真正抗日的红军中去！

（六）不烧杀苏区工农，反对国民党压迫民众抗日运动，联合全国同胞一致抗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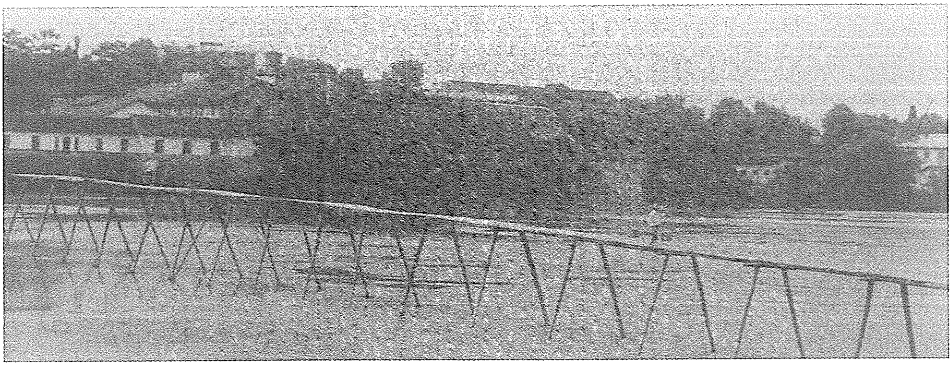
白军士兵弟兄们！

要想不做亡国奴，要救中国，就要立即团结起来实行这六条抗日纲领！红军时刻地准备着欢迎你们派代表前来共同订立停战抗日同盟，大家联合起来开到北方打日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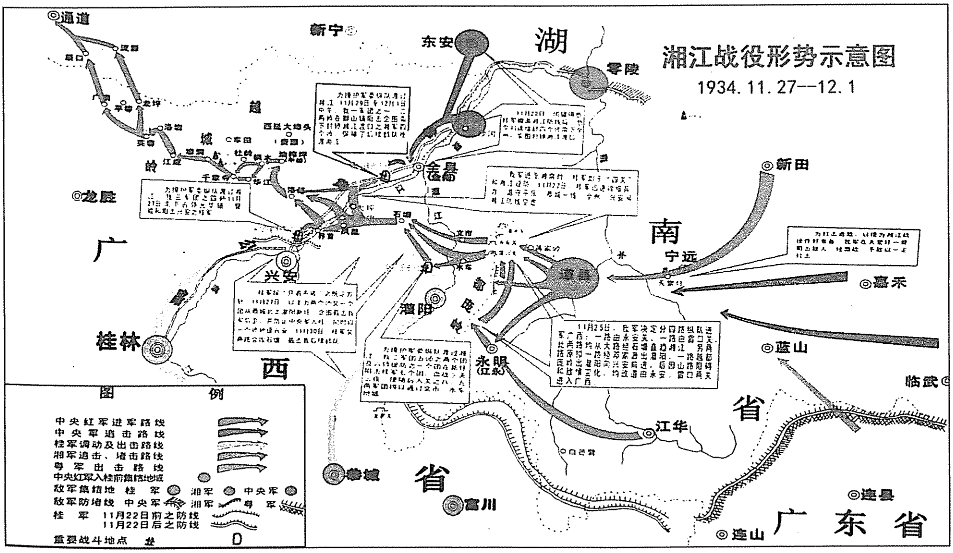
白军士兵同红军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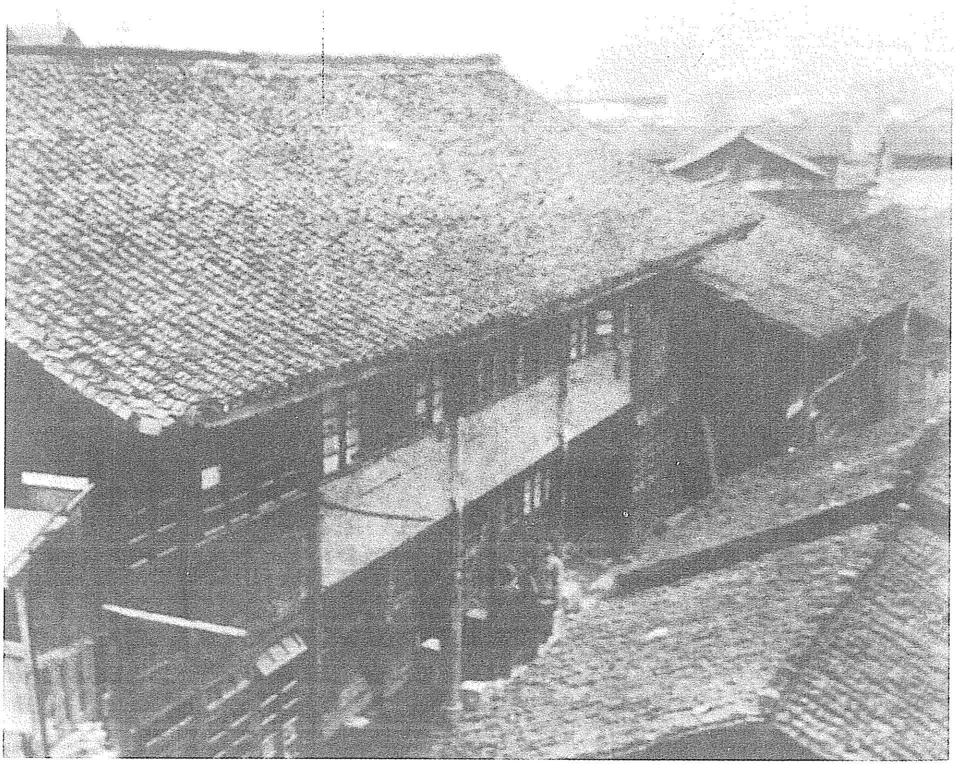
打倒卖国贼国民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图为江西于都红军桥，毛泽东就是从这里离开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
1934.11.27--12.1
通道
新宁
东安
湖
零陵
越
城
岭
龙胜
广
西
省
桂林
兴安
全县
湘
江
灌阳
道县
南
宁远
新田
嘉禾
蓝山
临武
永明
(江永)
江华
恭城
富川
广 东 省
连县
连山
图 例
中央红军进军路线
中央军追击路线
桂军调动及出击路线
湘军追击、堵击路线
粤军出击路线
中央红军入桂前集结地域
敌军集结地 桂军 ● 湘军 ● 中央军 ●
敌军防堵线 中央军 湘军 粤军
桂军 11月22日前之防线
11月22日后之防线
重要战斗地点

湘江战役形势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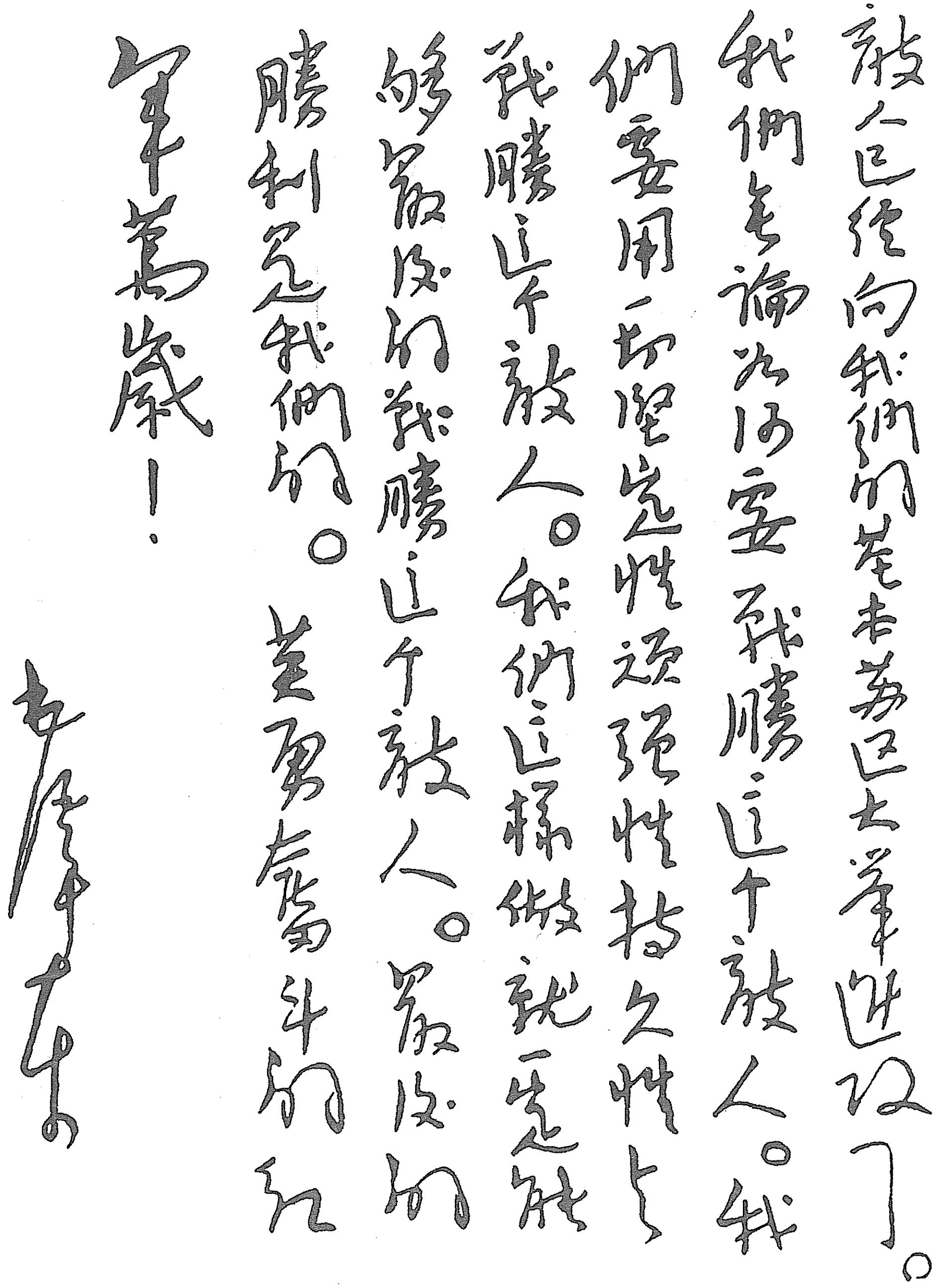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改向国民党力量较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使红军摆脱险境。图为黎平会议旧址。

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

（1934年）

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毛泽东



敌人已经向我们老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勝这个敌人。我们要用坚决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勝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的战勝这个敌人。最后的勝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萬歲！

毛泽东

毛泽东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

十六字令三首[1]

（1934年至1935年）

其一

山。
快马加鞭未下鞍。
惊回首，
离天三尺三。[原注]

其二

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2]。
奔腾急，
万马战犹酣。

---

[1] 十六字令三首，这三首词都描写毛泽东在行军途中所经过的群山形势的险峻。

[2] 巨澜，大浪。这里所说大浪的翻卷和下文“万马”的奔腾，都是比喻群山的起伏。

其三

山。
刺破青天锷[1]未残。
天欲堕，
赖以拄[2]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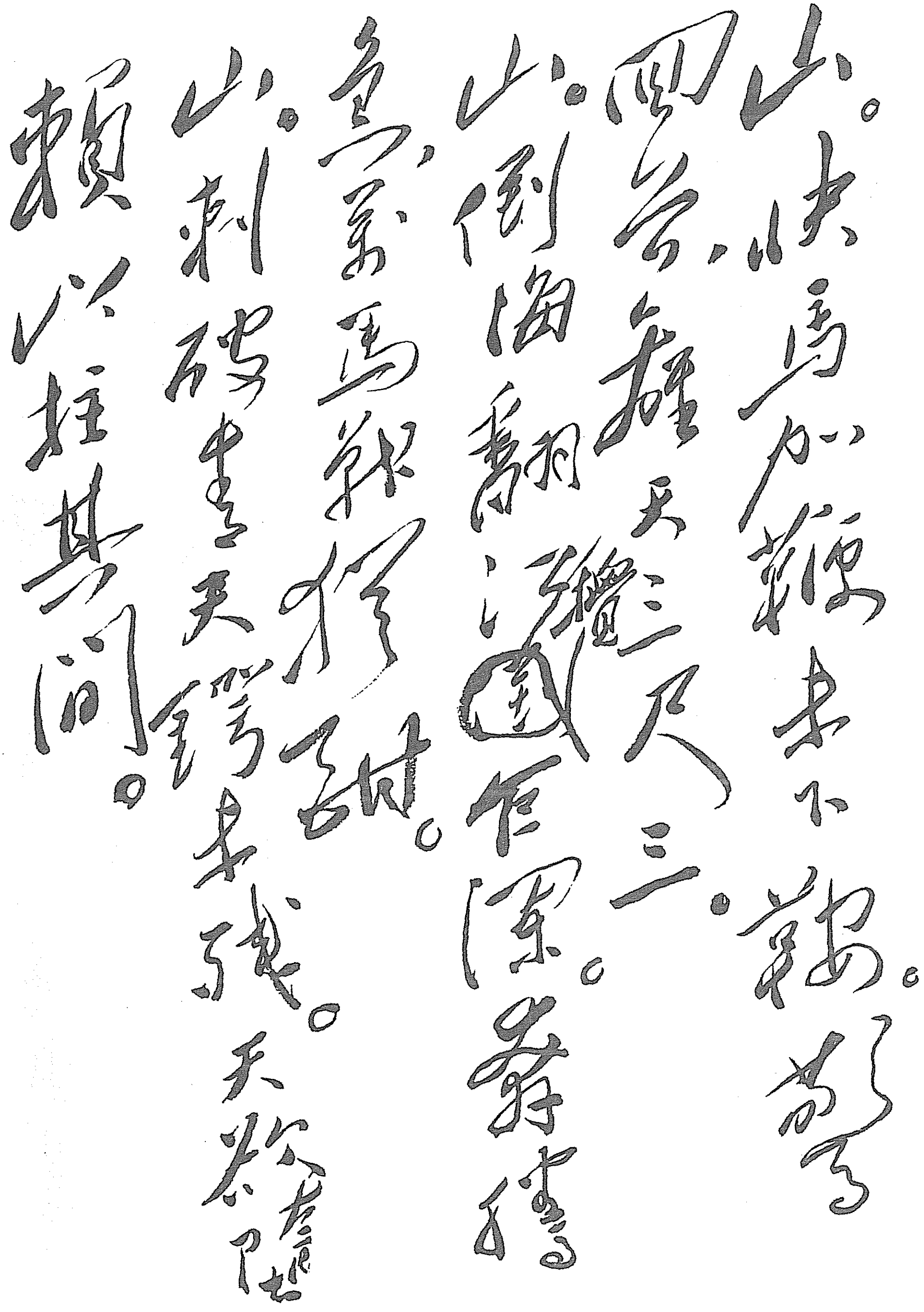
毛泽东原注

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

---

[1] 锷，刀口，剑锋。

[2] 拄，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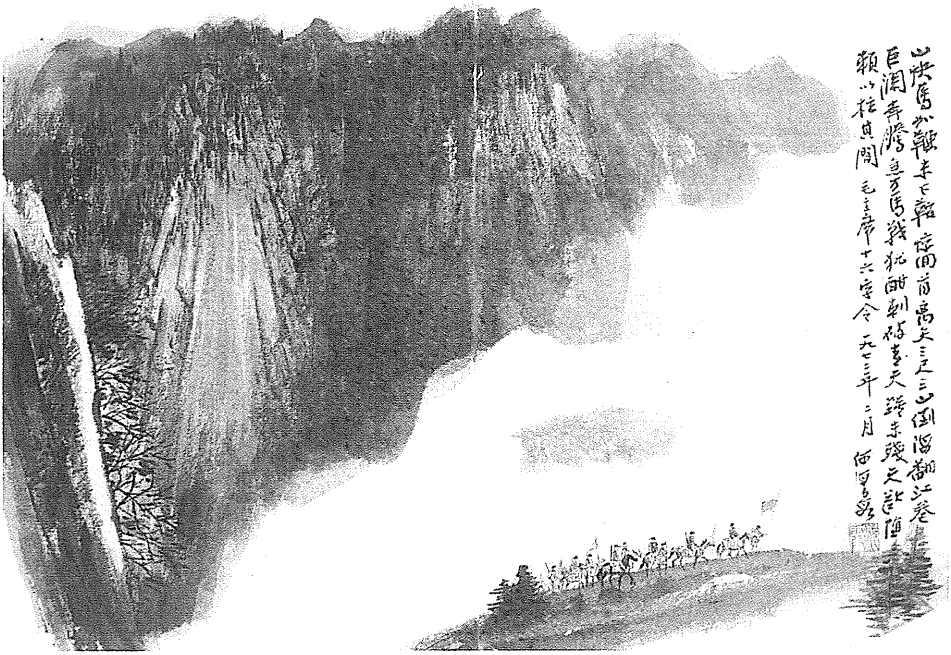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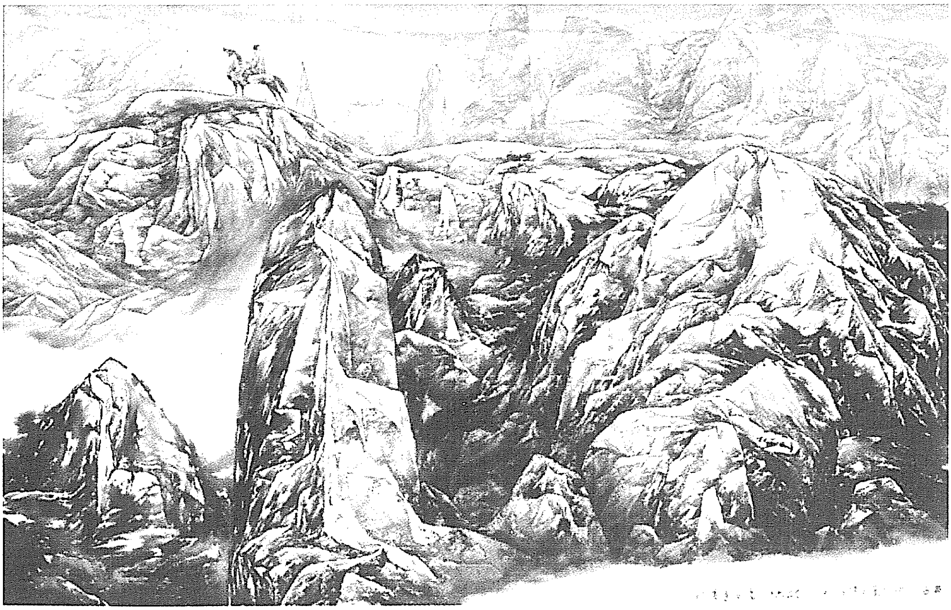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毛泽东手书《十六字令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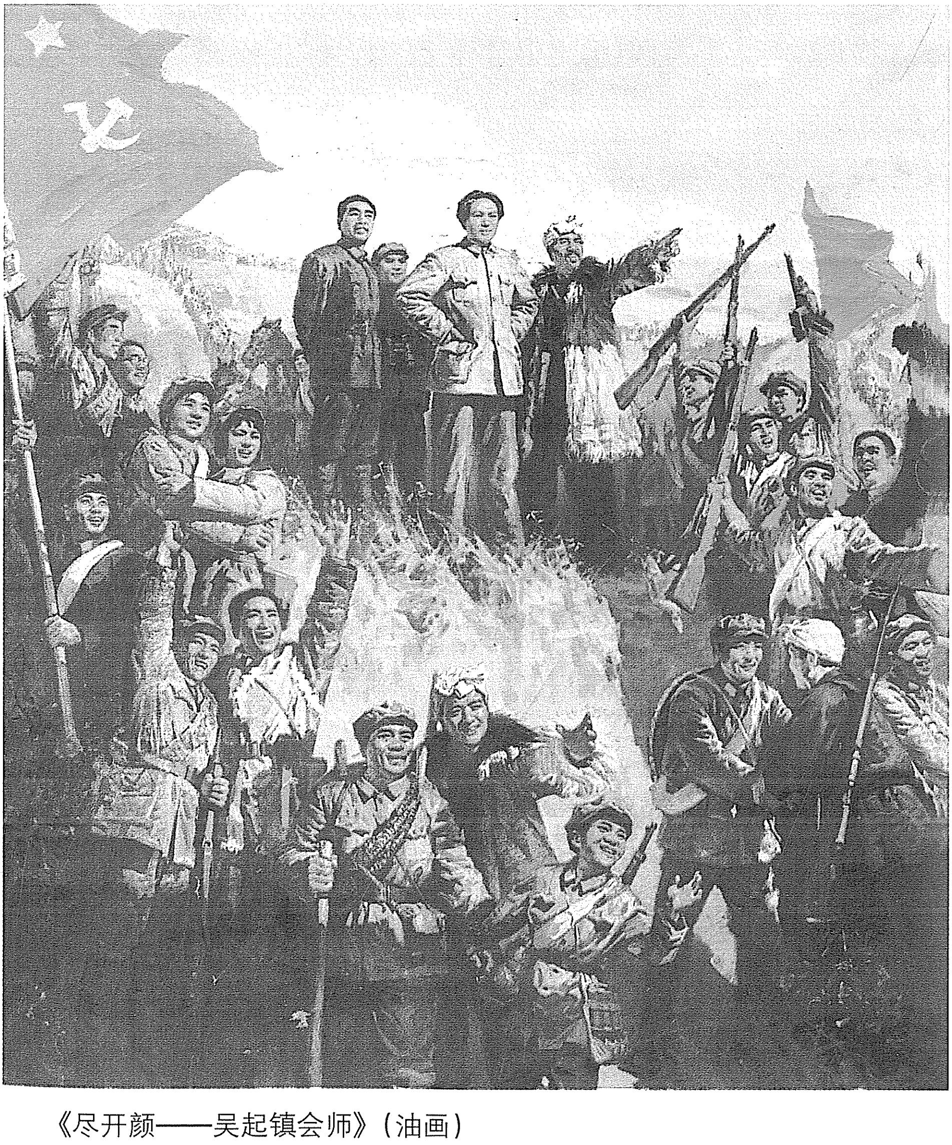

山快馬加鞭未下鞍驚回首離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
巨瀾奔騰急萬馬戰猶酣刺破青天鍔未殘天欲墮
賴以拄其間　毛主席十六字令　一九七三年二月

《十六字令三首》（诗意画）



《快马加鞭未下鞍》（诗意画）

1935



《尽开颜——吴起镇会师》（油画）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1935年1月8日）

听了博古同志关于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及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一、党中央关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议中，曾经清楚地指出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反动对于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更加残酷的进攻，但同时指出了在这一剧烈的阶级决战中帝国主义国民党内部的弱点与革命形势的新的紧张化，这造成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得出了“在五次‘围剿’中间我们有着比以前更加充分的取得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的正确结论（一九三三年七月廿四日中央决议）。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

二、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艰苦战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动员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

线，达到了十万人以上，使红军大大地扩大了。模范赤少队开始成为红军的现存后备军，赤少队的群众武装组织有了极大的发展。党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其他一切物质上的需要。苏区内部阶级斗争的深入，苏维埃的经济建设以及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彻底地改善，更大大地发扬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斗的热情与积极性。一切这些造成了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而□□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对于这些顺利的条件，显然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估计不足，也必然得出在主观上我们没法子粉碎“围剿”的结论。

长征途中，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议论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说服他们支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图为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在一起。

三、应该指出在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许多严重的缺点：党对于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依然没有显著地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士兵工作依然薄弱，各苏区红军在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相互呼应与配合还是不够，这些弱点无疑地要影响到反对五次“围剿”的行动，成为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但决不应该以为这些弱点的存在乃是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而□□同志在报告中与结论中却夸张这些工作的弱点，对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估计，却又不认识与不承认，这就使我们没有法子了解我们红军主力不能不离开中央苏区与我们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里。这就掩盖了我们在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所产生的恶果。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如果我们不能在军事领导上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四、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之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源，紧缩我们的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作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的防御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

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使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部分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五、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作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地粉碎“围剿”与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围剿”，保卫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这一战略路线之下，当我们还没有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时，我们对于进攻的敌人不应该即刻与之进行无胜利把握的决战，我们应该以次要的力量（如游击队群众武装，独立营、团，部分主力红军等）在各方面迷惑或引诱敌人，在次要方面主要地以运动防御钳制敌人，而主力则退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侧翼后方隐蔽集结，以寻求有利时机突击敌人。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足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矜骄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要最审慎地分析与判断敌情，以便适时地恰当地部署战斗。不要由于敌人向我们挑衅与佯攻，而不必要地调动我们的力量与投入战斗，使我们疲于奔命，失去了在一

定方向取得决战胜利的机会。为了求得胜利，当敌人按照某计划前进时，我们在突击方向用不着去阻止他，应该待他进至适当距离，然后包围消灭之（即诱敌深入）。为了求得胜利，就是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的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够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一切这些，都为着使红军能够经常主动地有利地去战胜敌人的进攻与“围剿”，而避免一切被动的与不利的结果。

然而在五次战争中，对于这些原则却统统是违反的。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我们觉得似乎在目前这一时期中，军事指挥所采用的计划和步骤，差不多可以说常常是由敌人逼近而产生的，敌人向我们挑拨，使我们常常不必要地改组我们的力量。因此我们的力量由于继续不断地变动，就不能积极地参加作战。我们觉得应该在那些我们已经获得了某些胜利的地方击败敌人，不要企图在全部战线上同时击败敌人。”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甘心情愿把自己处于被动地位的单纯防御路线，并不是也不能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击败敌人，而是企图在全部战线同时阻止敌人。□□同志过去提出过的“全线出击”的口号，在五次战争中则变为全线抵御，而在战略上则二者都是错误的。“不放弃苏区寸土”的口号，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而机械地运用到军事上尤其在战略上则是完全的错误，而适足成为单纯防御路线的掩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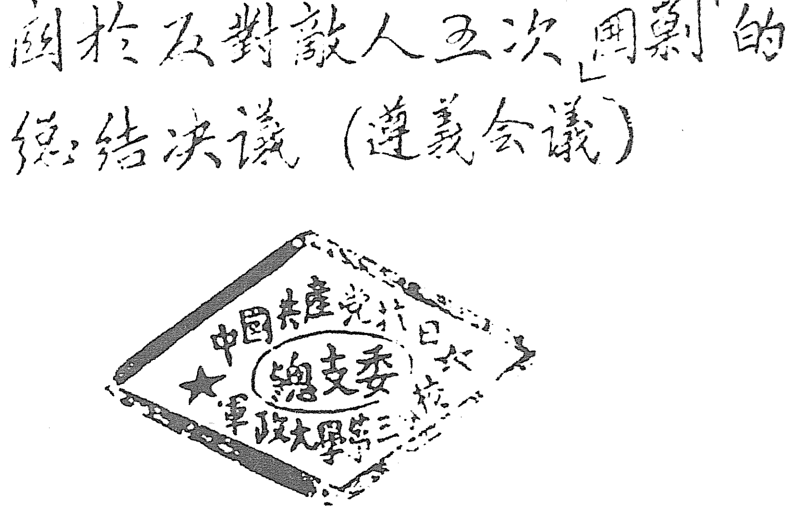
六、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优势，他们常常

剿”与过去一、二、三、四次“围剿”绝然地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而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之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堡垒即失去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

队，即是在堡垒线外在红军转到广大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地、艺术地、出奇制胜地运用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并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地领导战役，并正确地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指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
總結決議（遵義会議）

中國共產黨抗日
總支委
軍政大學第三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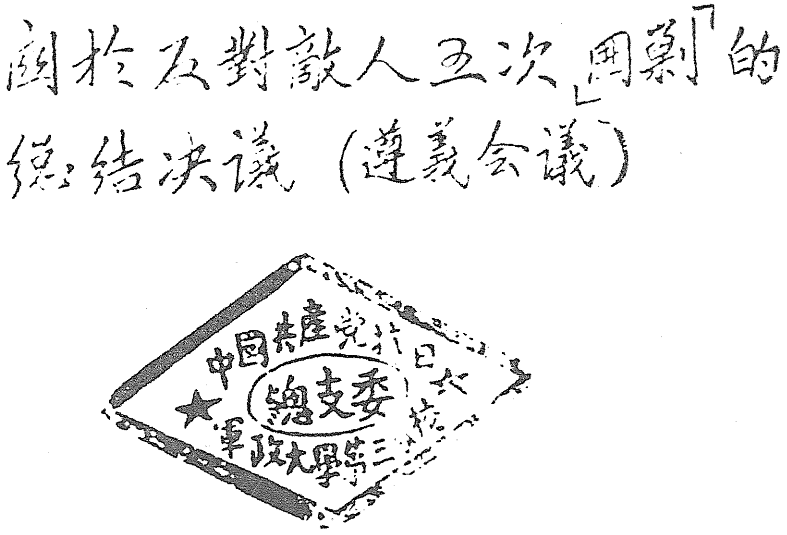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

剿”与过去一、二、三、四次“围剿”绝然地分开，因而绝然否认过去运动战的经验，绝然否认诱敌进来给以消灭的战法，并且不得不在实际上拒绝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这在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的领导者是自然的道理。

八、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的估计过高与对运动战的可能估计不足，便产生了胜利只能起始于战术上的理论，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而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华夫同志的文章及□□、□□两同志给林彪、彭德怀两同志的信）。以为在堡垒主义之下，只能有许多小的胜利，而不能有“痛快淋漓的胜利”（见□□同志政治局发言及□□同志《红星》报文章），以为只有分兵抵御与“短促突击”才能对付堡垒主义。所有这些革命战争中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

我们不能否认堡垒主义造成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新的困难（而他们最初却以“左”的空谈轻视堡垒主义，见□□同志《红星》报文章），不否认而且应准备红军的技术条件（飞机大炮），特别是堡垒内的工农士兵暴动，以战胜将来敌人更坚固的堡垒，但就在现时条件下，堡垒主义也是能够粉碎的。堡垒主义疲劳了敌人的兵力并分散了兵力，养成了敌人对于堡垒的依赖性，使他们脱离堡垒即失去胜利的信心，同时敌人无法不脱离堡垒向我们前进，又无法在全国范围内遍筑足以限制红军行动的堡垒。一切这些，造成了使我们能够克服堡垒主义的顺利条件。因此我们红军粉碎堡垒主义的方法依然是依靠于运动战，依靠在堡垒线前后左右发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红军的行动，以及依靠深入的白军士兵运动。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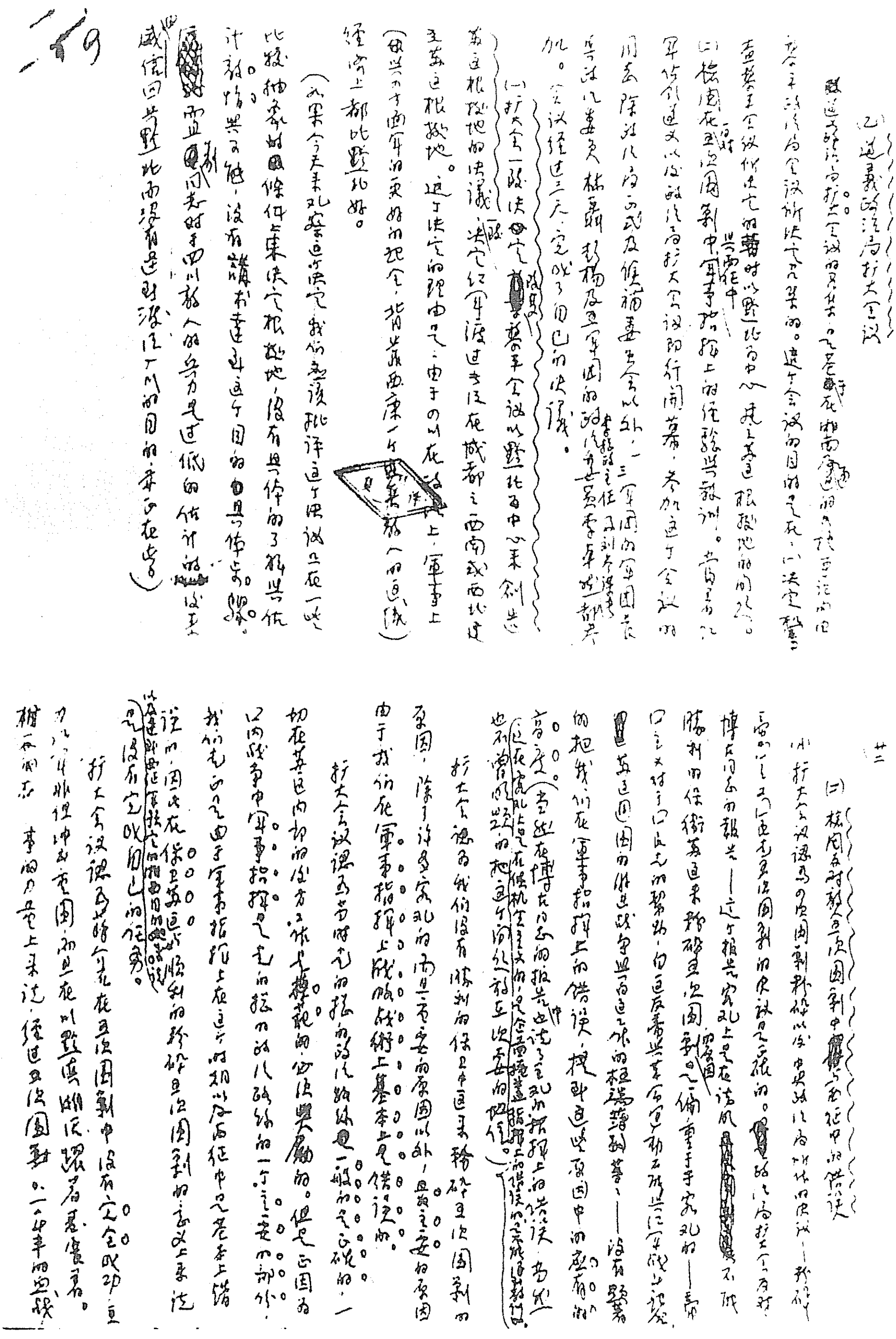
队，即是在堡垒线外在红军转到广大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只要我们灵活地、艺术地、出奇制胜地运用运动战战略战术原则，我们就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堡垒主义。并且只有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正确地领导战役，并正确地运用战术以粉碎堡垒主义与粉碎“围剿”。单纯防御与“短促突击”，胜利主要不依靠于战略战役的正确指导，而仅仅依靠于战术，实际上只是对于堡垒主义的投降，到底不能粉碎堡垒主义。



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
總結決議（遵義会議）

中国共產党抗日軍政大學第三校總支委

遵义会议通过的决议。



二

（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illegible]的[illegible]，而在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来的。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一）决定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illegible]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的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illegible]都参加。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

（一）扩大会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illegible]配合，背靠西康一个[illegible]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

（如果今天来观察这个决定，我们应该批评这个决议只在一些比较抽象的条件来决定根据地，没有具体的了解与估计敌情与可能，没有讲到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步骤。而且个别同志对于四川敌人的兵力是过低的估计的，以后威信回黔北而没有达到渡江入川的目的，[illegible]在此）

三

（二）检阅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的错误

（1）扩大会议认为五次围剿[illegible]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我们的[illegible]是正确的。[illegible]政治局扩大会[illegible]博古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实[illegible]上是在说明不能胜利的保卫苏区[illegible]粉碎五次围剿，偏重于客观的——帝国主义对于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作战[illegible]，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illegible]等等——没有把我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illegible]五次围剿中所应有的高度。（当然在博古同志的报告中也说到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illegible]）

扩大会认为我们没有胜利的保卫中央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除了许多客观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

扩大会议认为当时党的政治路线无疑义是一般的正确的，一切在苏区内部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但是正因为[illegible]军事指挥上[illegible]一个主要的部分。我们也正是由于军事指挥上在这个时期以及西征中是基本上错误的，因此在保卫苏区胜利的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扩大会议认为在五次围剿中没有完全成功，[illegible]非但冲出重围，而且在[illegible]

[illegible]上来说，经过五次围剿[illegible]

陈云关于遵义会议有关内容的传达提纲。

九、在**持久战与速决战**问题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的了解也是错误的。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是在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完全应该从防御转入反攻与进攻，消灭敌人粉碎“围剿”（如一、二、三、四次战争及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前）。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暂时地退却，以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在另一有利条件下转入反攻与进攻（如五次战争广昌战役以后）。这是第一个基本原则。但同时必须了解另一个原则，即为了进行长期的持久战，对于每一次“围剿”与每一个战役，必须极力争取战局之速决。因为在现时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对于一次“围剿”与一个战役采取持久战的方略，对于我们是极端不利的。当着敌人以持久战来对付我们的时候（如五次“围剿”），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打破敌人这种计划。在我们可能支持的时间之内取得决定的胜利，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拿我们的人力物力及军火补充的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即所谓同敌人拼消耗，见□□同志《红星》报的文章），这种持久战的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这些方面，现时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这种数目字的比较，只能证明相反的结论，即持久战对我们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正因为要进行长期国内战争的持久战，同时对每一次“围剿”与每一战役却要进行速决战，所以我们特别要谨慎决定我们的战略战役计划。五次战争中单纯防御战略是根本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战略之下进行许多拼命主义的战斗（如丁毛山、三溪圩、平寮、广昌等战役）同样是错误的，红军一定要避免那种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就是作战的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

时，我们即应拒绝这种战斗。玩弄暴动是极大的罪恶，玩弄战斗同样是罪恶。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予红军以必须的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这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以为五次战争中没有休息训练的可能的说法是不对的，那只是单纯防御“短促突击”主义者必然的结论。以为红军行动积极化便是使他经常地不停止地打仗而不必注重休息训练也是不对的，须知没有必要的休息和训练就不能好好地打胜仗。红军的编制一定要适合现时国内战争的环境，主力还未充实就去建立许多新的师团单位是不对的。应该于充实主力之后再去建立新单位。拿全无教育训练又无战斗经验的新兵师团去单独作战是不对的，应该使新兵师团中有老兵骨干，并尽可能在初期使他们在老的兵团指挥之下训练出战斗经验来。那种不必要的笨重的与上重下轻的组织与装备是不对的，应该是尽可能的轻装，必须充实连队与加强师以下的领导。

正因为要进行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互相对立起来的理论。为了进行胜利的战斗，红军的英勇牺牲是完全必要的，这是阶级武装的特质，是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这种牺牲换得了胜利，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但这不能适用于无代价的拼命主义的战斗，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地保卫苏区。没有坚强的红军，苏区即无法保存。有了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遭到部分的损失，也终究能够恢复，并且新的苏区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起来。

在战争持久战的原则之下，要反对当敌人的“围剿”被我们用反攻战斗粉碎了之后可能发生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对于疲劳情

绪与过分估计敌人力量所产生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我们懈怠消极，使我们停顿不动，使我们不能由反攻转入进攻，消灭更多敌人，发展更大苏区，扩大红军力量，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充分条件。另一种是由于对自己胜利过分估计与对于敌人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冒险主义。这种冒险主义使我们进攻得不到胜利（如无把握地及在当时无必要地进攻中心城市等），甚至使反攻中已经得到的胜利归于减削或抛弃，使红军有生力量过分牺牲，使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的任务放弃不顾，这同样使我们不能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他的充分条件。因此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是党在战略的进攻问题上即在敌人两次“围剿”之间的严重任务。

在战役速决战的原则下，要反对根源于恐慌情绪的仓猝应战，或对战略上初战的不慎重，或对敌人战略计划企图先发制敌，一战不胜就认为没有办法，或借口速决战而不作充分准备，即对于敌人的“围剿”不作必要的与尽可能支持的时期内的一切准备等机会主义的倾向。速决战是要求具备一切必要条件（战略的优胜、战役领导的正确、运动战不失时机、集中兵力等等）去消灭敌人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部队才能使战局速决，才能使敌人的进攻与“围剿”归于粉碎。

十、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转入反攻与进攻，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党中央当时采取了利用国民党内部这一矛盾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同十九路军订立了停战协定，来推动十九路军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然而当时的□□同志等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在战略上

采取了相反的方针，根本不了解政治上、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相反的，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的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这不过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企图用更多的欺骗与武断宣传，甚至“社会主义”之类的名词来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表现给在十九路军欺骗下的工农士兵群众看，我们帮助任何派别反日反蒋的斗争，我们才能更容易地揭破十九路军军阀的欺骗，在共同反日反蒋的战争中争取他们到我们方面来。只有我们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才能使我们在当时这一重要关键上，不失去消灭蒋介石主力的机会，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的。然而在我们军事上没有去利用，这对于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的目的原来不过为了抵御敌人的前进，至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他们看来是冒险的行动。

十一、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性的错误。首先应该说的：当我们看到在中央苏区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的胜利已经极少可能以至最后完全没有可能时（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我们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我们的战略方针，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我们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与保

卫老苏区。国际六月廿五日来电曾经这样的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央苏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必须进行解释的工作，说明这种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这一重要关节上，我们的战略方针，显然也是错误的。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根本没有提出这一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是提出了这一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的基本原则依然同当时应取的战略方针相反，“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的情况的变更”，这些依然是新计划基本原则的第一节第二条。关于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完全忽视，而这正是决定退出苏区的战略方针的基础。这一战役时机上的错误，再加上阵地战的发扬，给了红军以很大的损害。这种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的矛盾态度，正是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到了转变关头，必然的惊慌失措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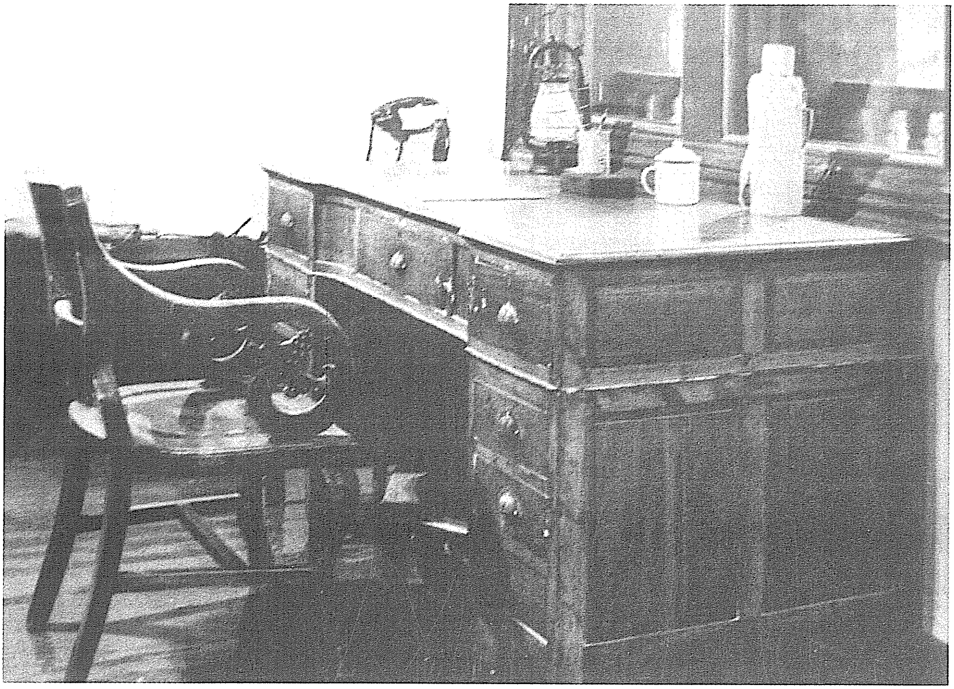
其次，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种巨大的转变不但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军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万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在主力红军方面，从苏区转移到白区

去，从阵地战场转移到运动战场上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地出动。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庞大的军委纵队及各军团后方部的组织，使行军作战受到极大的困难，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使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这是根本地忘记了红军的战略转变，将遇到敌人严重的反对，忘记了红军在长途运动中，将要同所有追堵截击的敌人作许多艰苦的决斗，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些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于必要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的原则上，就使得自己差不多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不能有力地打击敌人；就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而没有主动的放手的攻击战；就使得口头上虽然常说“备战”，而实际上除掩护战外，却经常是“避战”；就使得红军士气不能发扬，过分疲劳，得不到片刻休息，因而减员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就使得“反攻”的正确口号在实际上变成了□□同志等的避战主义的掩盖，而不准备于必要时与有利时机争取真正反攻的胜利；就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保卫中央苏区，以粉碎五次“围剿”，以建立湖南的根据地，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所以这些，都是基本的战略方针上采取了避战主义的必然的结果。这种战略避战主义，是从一种错误观点出发，即是说红军一定要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能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对追击敌人（如周、薛两纵队），就在他们分离时与疲惫时也是不敢作战的。而这种错误观点的来源，则

在于不明了当前的环境，是不容许我们这样简单地轻巧地径情直遂地干的，在于对追击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殊不知这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在短距离的环境不严重的与小部队的行动，或者是可能的，而在数千里的五次“围剿”环境中的主力红军的巨大的战略的转移，则是不可能的。对不必要与敌人无隙可乘的那种战斗是应该避免的，而对必要的与敌人有隙可乘的战斗则是不应该避免的。此次突围行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其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一原则上的错误，一直发展到突围战役的最后阶段，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却还是机械地要向二、六军团地区前进，而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红军到了乌江地域，又不知按照新的情况变化提出在川黔边转入反攻消灭蒋介石追击部队的任务，而只是看见消灭小部黔敌以及消灭所谓土匪的任务。虽则最后两次错误都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而在华夫同志等则适足表现其战略上一贯的机会主义的倾向。

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此外决不能有别的东西。

十二、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作辩护（如□□同志的报告、华夫同志的发言）是劳而无功的。



毛泽东在遵义时的办公室。

政治局扩大会议更认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他的来源是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客观的困难，特别是持久战堡垒主义的困难，有了过分的估计，是由于对于自己主观的力量特别是苏区与红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是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十三、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

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斗中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曰之为游击主义，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经常的现象。

同时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常不够的。书记处与政治局最大部分的注意力是集中于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物质供给方面，因此在这些方面得到了空前伟大的成绩，然而对于战略战术方面则极少注意，而把这一责任放在极少数的同志身上，首先是□□同志与华夫同志。我们没有清楚地了解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的成绩化为乌有。政治局对于这一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自己应该承认的，书记处的所有同志在这方面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有些重要的决定或战略计划是经过书记处批准的。

然而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提出□□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拥护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一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而□□同志在他的结论中对于绝大多数同志的批评与自己的错误是没有承认的。必须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一错误如果坚持下去，发展下去，则必然走到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

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

十四、最后，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虽是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了部分的损失，然而我们英勇的红军主力依然存在着，我们有着优良的群众条件，我们有着党的正确的领导，我们有着物质上地形上的比较良好的地区，我们有着全国广大的群众拥护与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胜利的配合，再加上正确的作战指挥，我们相信，这些困难在我们全体同志与红军指战员努力之下是可以克服的。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是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活动地区远远地离开了南京政府反革命的根据地，蒋介石几年经营的堡垒地带的依靠是没有了，军阀内部的矛盾与不统一有了进一步的增加。我们主要敌人蒋介石的主力在五次“围剿”中是削弱了。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全国国民经济的空前崩溃，使全国民众更清楚地看到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而更加同情与拥护苏维埃革命运动以至直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些都是我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发扬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利条件**。

必须指出，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任务，这就是因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国民党军阀任何时候都不会放松我们，我们现在是在敌人新的围攻的前面，中央红军现在是在云南贵州地区，这里没有现存的苏区，而需要我们重新去创造，我们的胜利要在自己艰苦奋斗中取得。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蒋这些敌人的军队。为了战胜这些敌人，红军的行动必须有高度的机动性，革命战争的

基本原则是确定了，为了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灵活地使用这些原则。红军运动战的特长在五次战争中是被长期的阵地战相当减弱了，而在目前正要求红军各级指挥员具有高度的运动战战术。因此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地迅速地转变，是严重的工作。对战斗员尤其是新战士，则须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在政治工作上一切须适应目前运动战的需要，以保证每一个战斗任务的完成。红军更要从作战中修养与整理自己，并大量地扩大自己。红军必须严肃自己的纪律，对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联系必须更加密切与打成一片，极大地加强对地方居民的工作，红军应该是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目前的环境要求党与红军的领导者用一切努力，具体地确实地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

白区党的工作必须建立与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方式必须有彻底的转变。瓦解白军工作必须真正地开始。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是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之一。在中央苏区，湘赣、湘鄂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党必须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最后同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必须取得更密切的关系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以求得全国红军的一致行动与互相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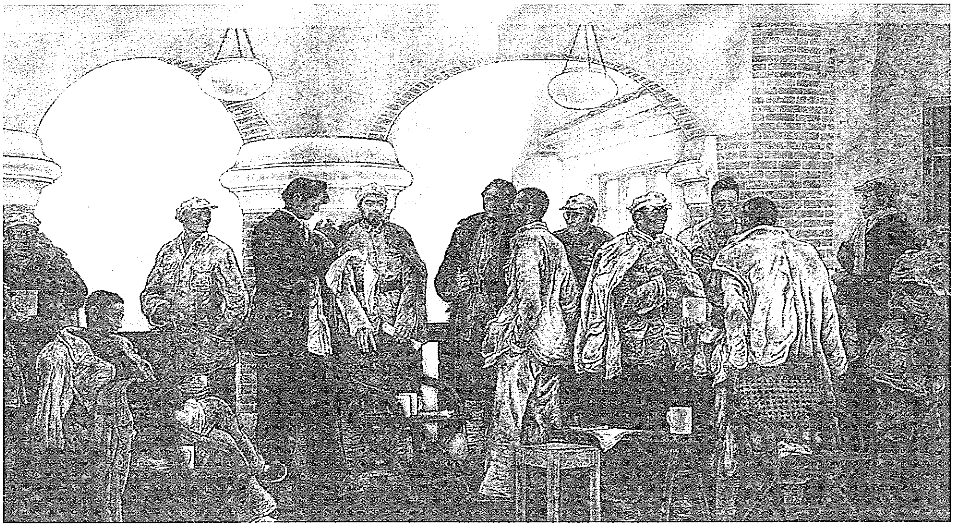
政治局扩大会议相信放在我们前面的这些严重的任务，我们是能够完成的。完成这些任务是以后革命战争的新的胜利的保障。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到胜利的大革命。

政治局扩大会议相信，中国苏维埃革命有他雄厚的历史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湘赣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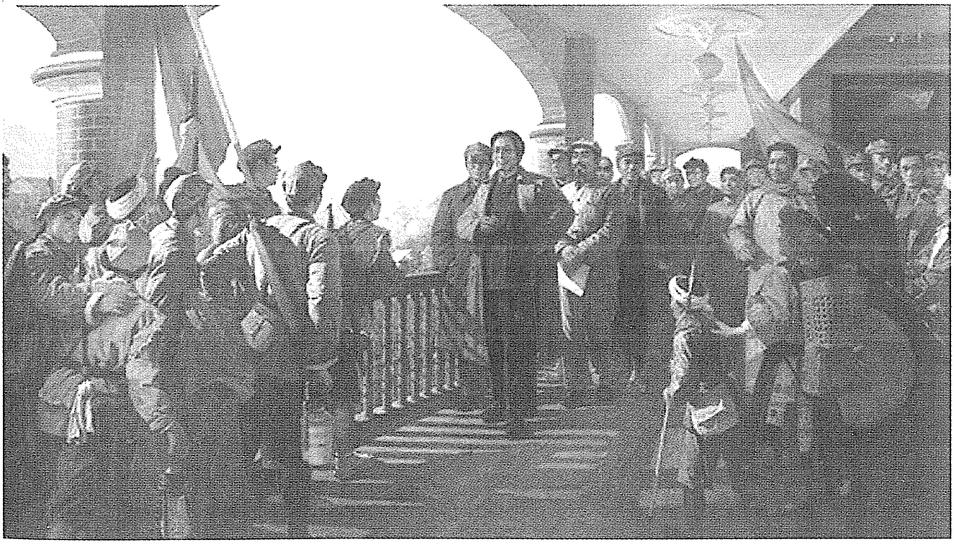
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前进表示惊慌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内的活跃，以及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正在前进中。

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过去党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说来，不过是部分的错误。这种错误不足以使我们悲观失望。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学习了如何更好地来领导革命战斗到彻底的胜利。党在揭发了这种错误之后，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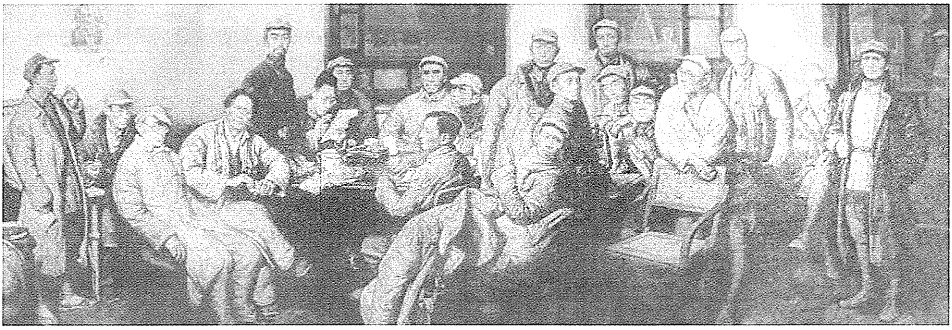
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反对一切惊慌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首先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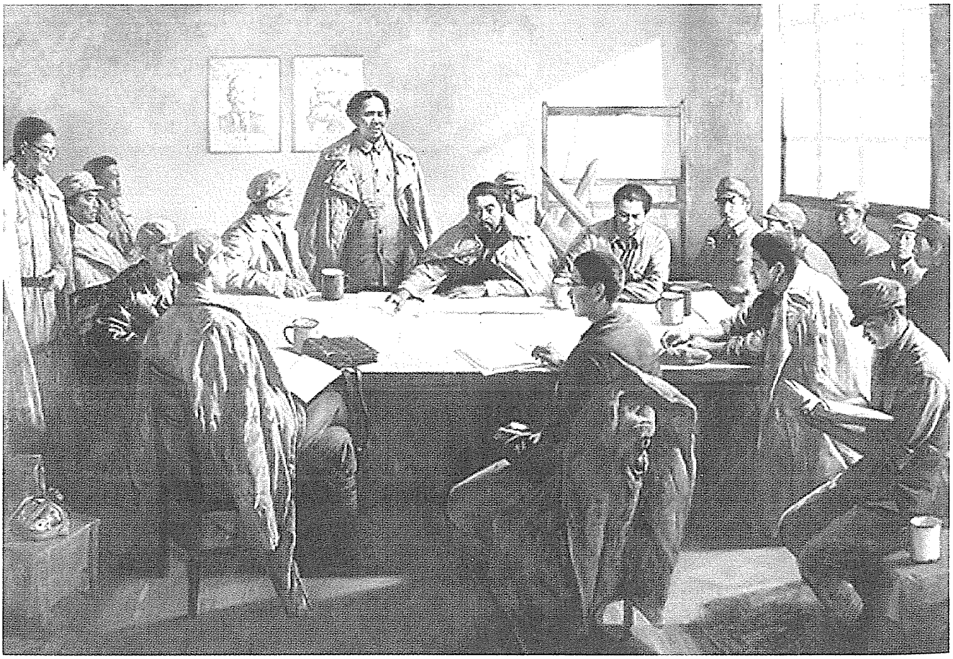
《遵义会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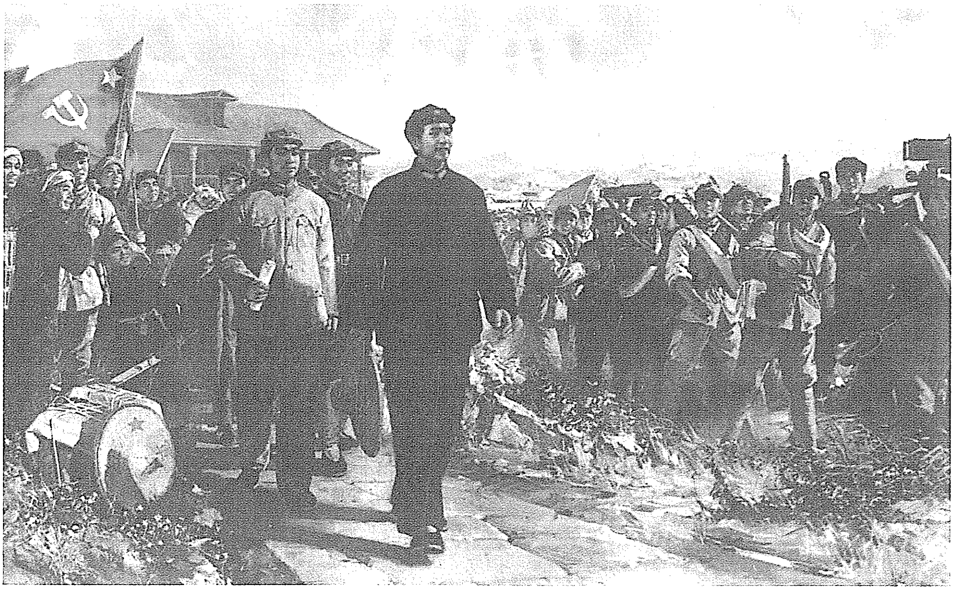
《遵义会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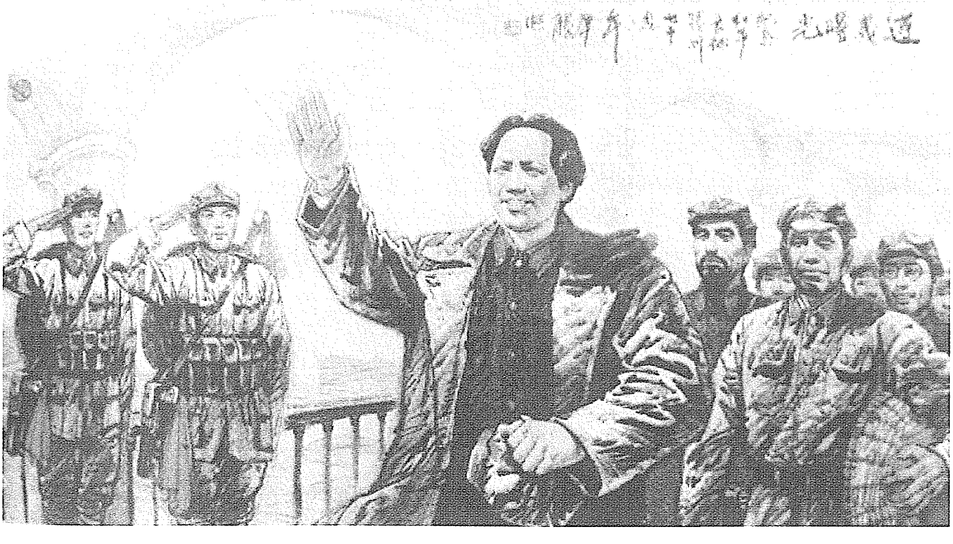
《遵义会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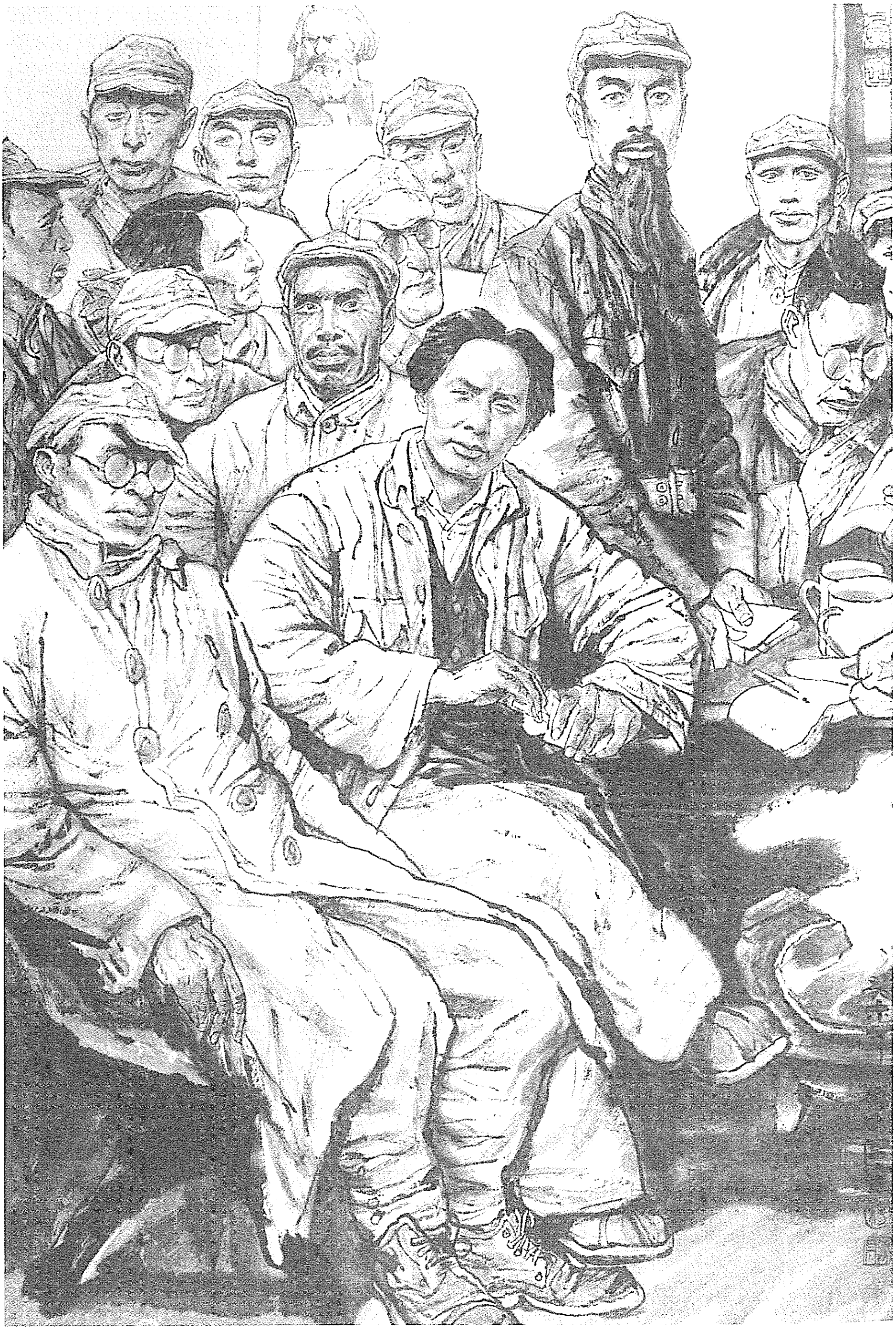
《遵义会议》（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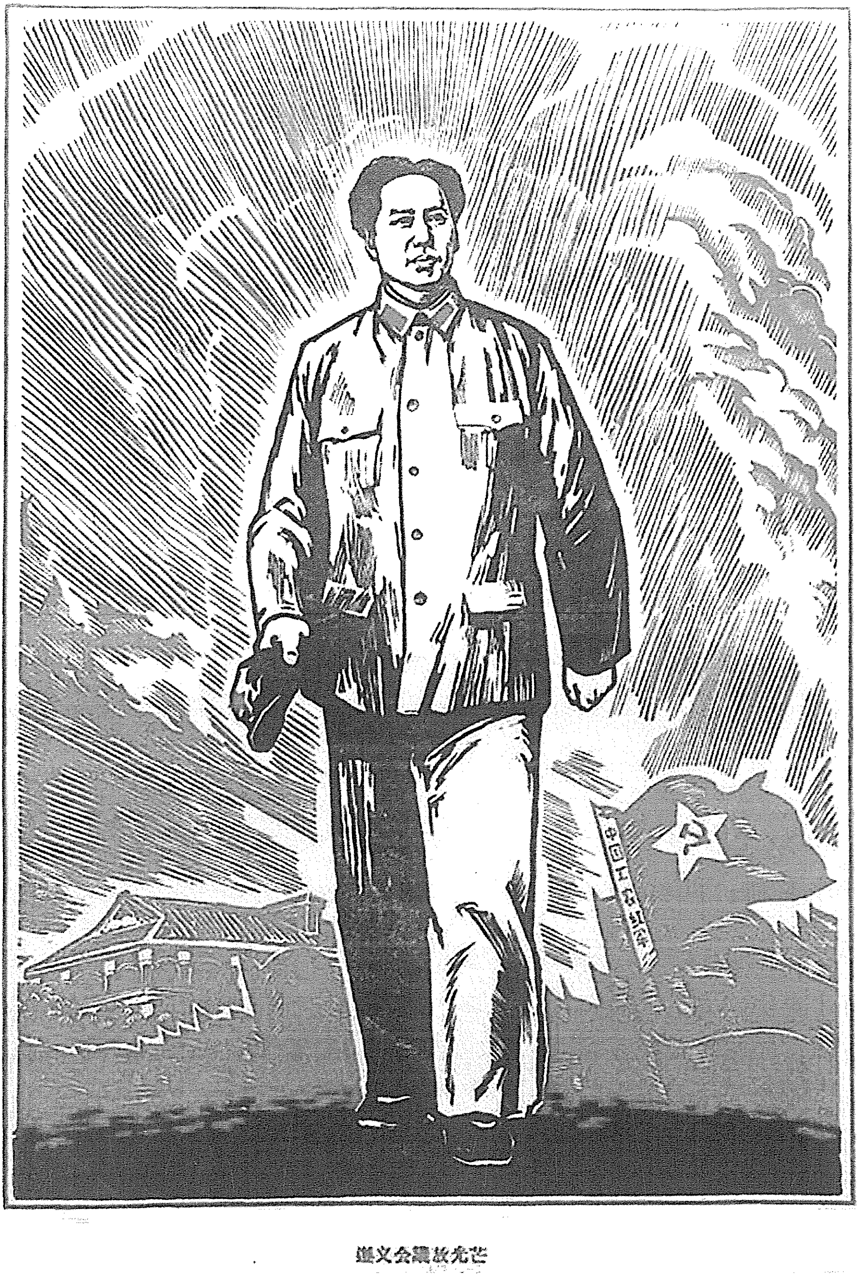
《走向胜利》(油画)



《遵义曙光》(中国画)



《遵义会议》(中国画)


中国工农红军
遵义会议放光芒

《遵义会议放光芒》（版画）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给张国焘的电报*

（1935年1月22日）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

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应从速决定电复。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给张国焘的电报*

（1935年1月22日）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

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应从速决定电复。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给张国焘的电报*

（1935年1月22日）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地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部将南调，杨、李、罗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趁野战军立足未稳之

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应从速决定电复。

杂言诗·改李白《赠汪伦》[1]

（1935年1月）

桃花潭[2]水深千尺，
不及你我手足情。
祝总司令多抓俘虏，
多打胜仗。

---

[1] 李白，唐代诗人。汪伦，唐代安徽泾县贾村人。李白游桃花潭，汪伦酿美酒招待，临别又送行。李白很感激他的热情，写了《赠汪伦》送他。宋代杨齐贤说，直到宋代汪伦的子孙还保存着李白的赠诗。

[2] 桃花潭，在今安徽省泾县西南。

忆秦娥·娄山关[1]

（1935年2月）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2]。

---

[1] 娄山关，在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上，是防守贵州北部重镇遵义的要冲。中央红军长征时，于1935年1月占领遵义，召开了在革命历史上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会后，红军经娄山关北上，原准备在泸州和宜宾之间渡过长江，没有成功，就折回再向遵义进军，在途中经半天激战打败了扼守娄山关的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一个师，乘胜重占遵义。这首词写的就是这次攻克娄山关的战斗。前阕写红军拂晓时向娄山关进军的情景；后阕写红军攻占和越过徒称天险的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词中的“西风”“雁叫”“霜晨”都是当地二月间的真实情景。毛泽东自注：“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按：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以下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反映了这一种心情。”

[2] 咽，在这里读入声。本义是声音因梗塞而低沉，这里用来描写在清晨寒风中听来时断时续的军号声。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1]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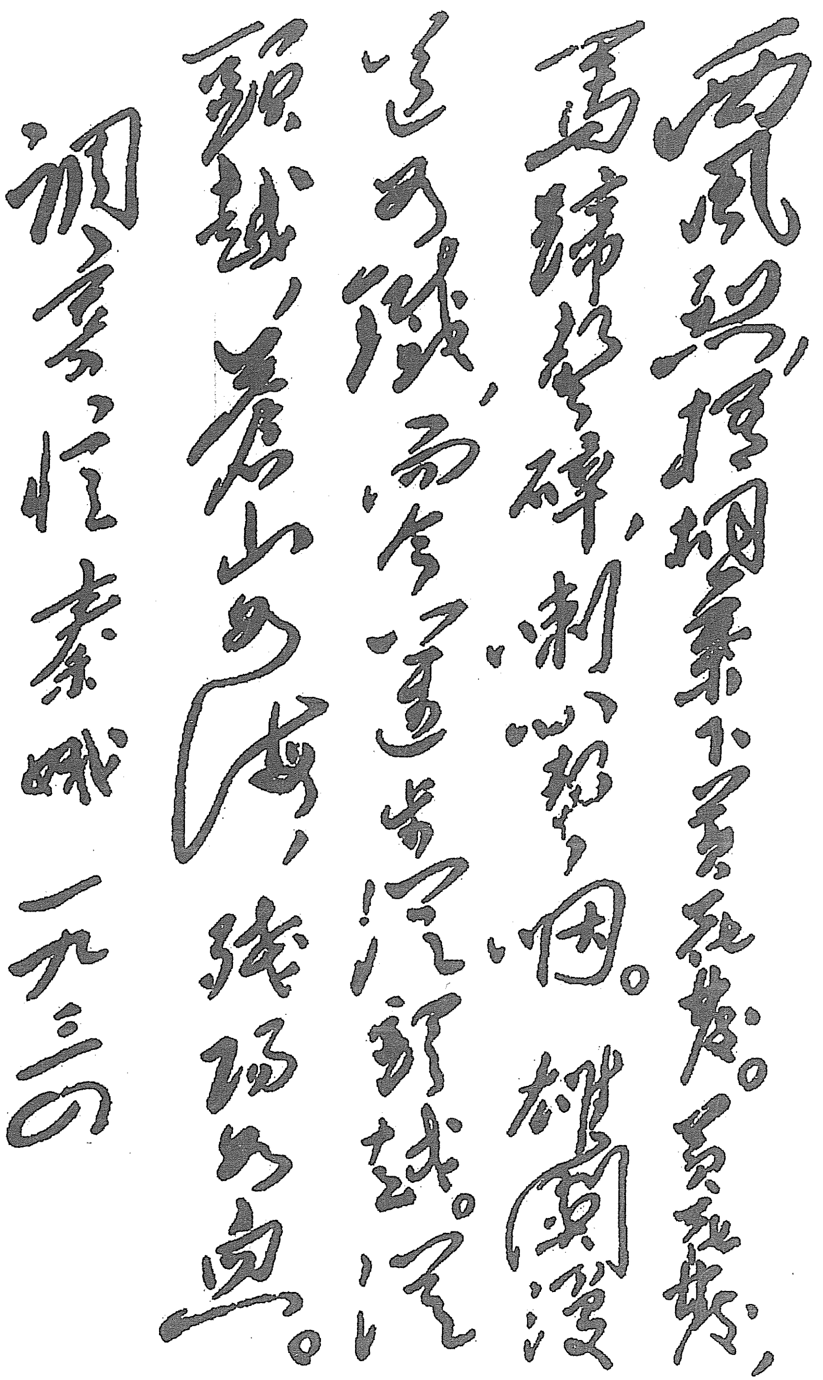
[1] 从头越，重新跨越。

[2]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据毛泽东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他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

附录：1934年的原版本

西风烈，
梧桐叶下黄花发，
黄花发，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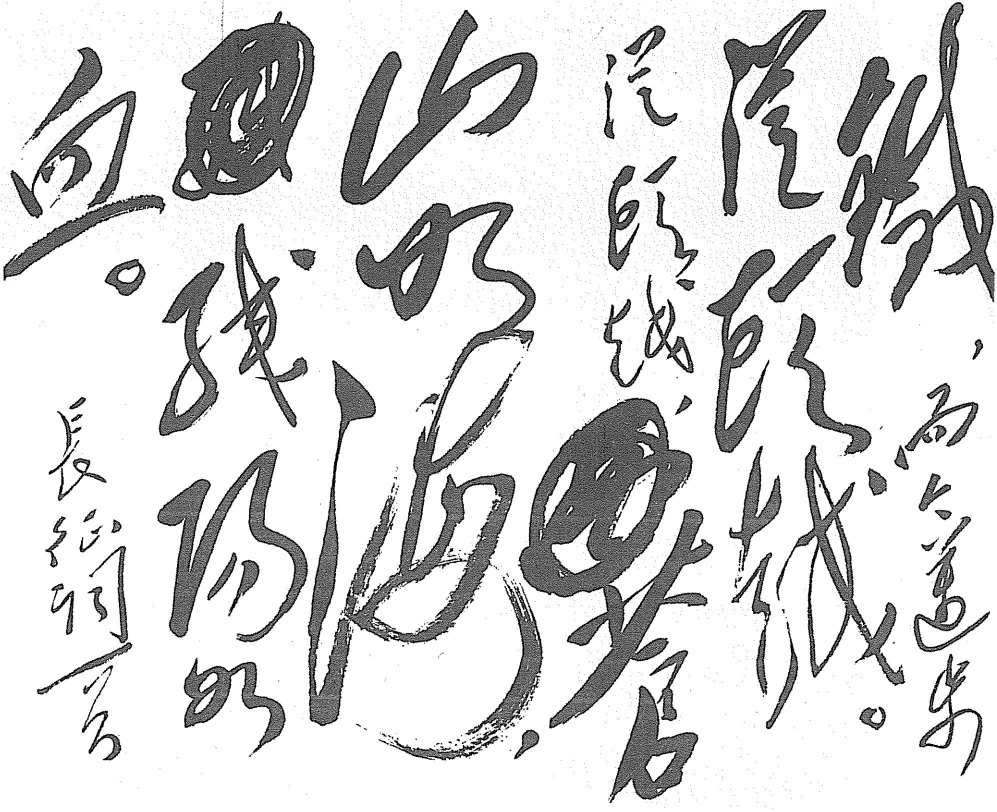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詞寄憶秦娥　一九三四

毛泽东写于1934年的《忆秦娥·娄山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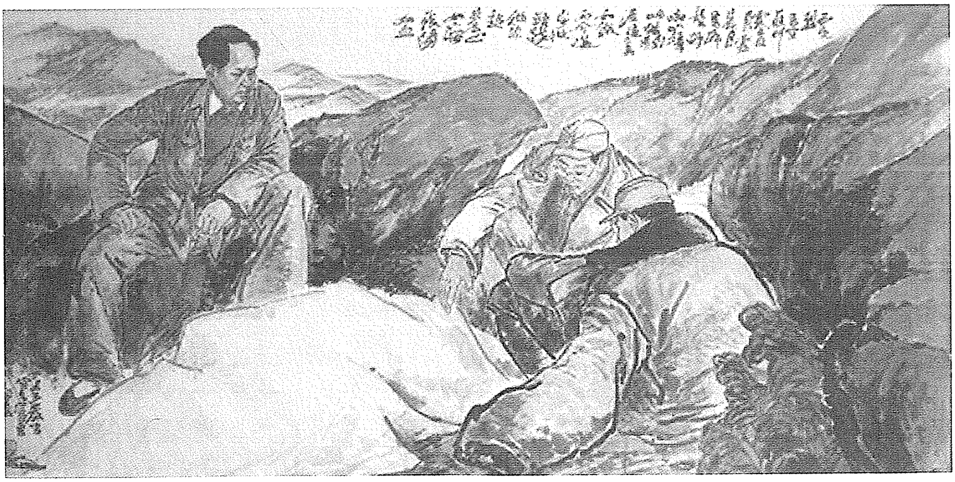
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從頭越，蒼山如海，殘陽如血。

長征詞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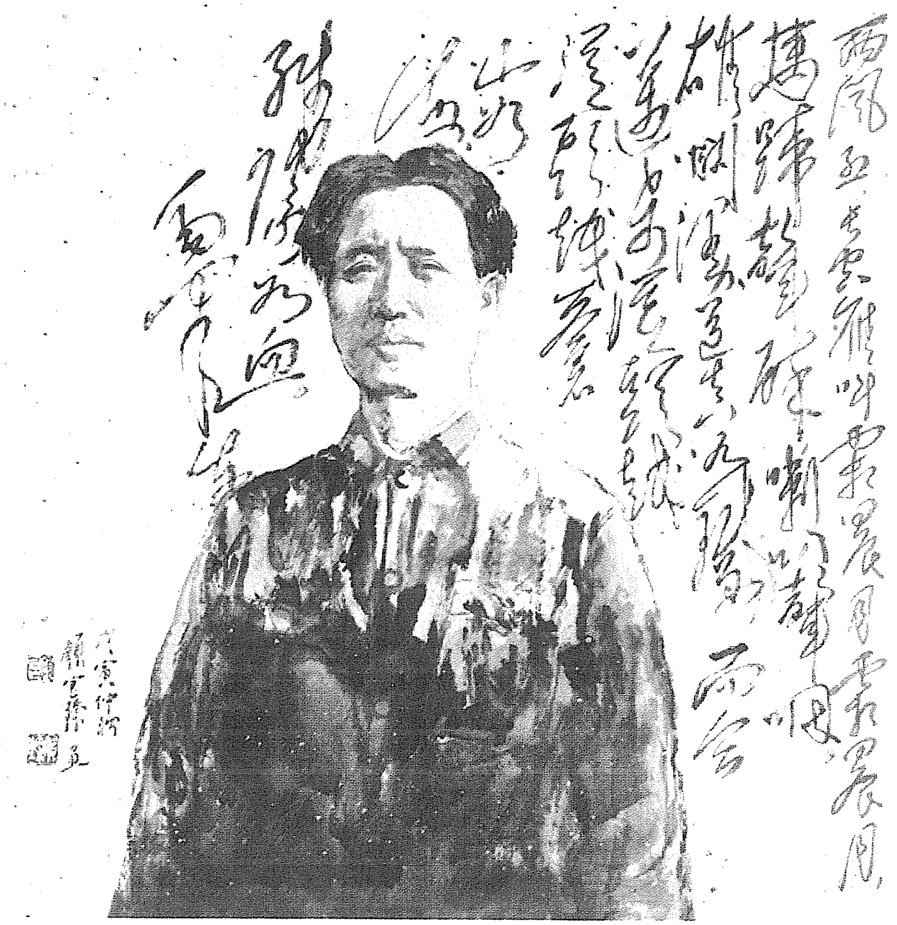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忆秦娥·娄山关》。

西風烈，長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馬蹄聲碎，喇叭聲咽。雄關漫道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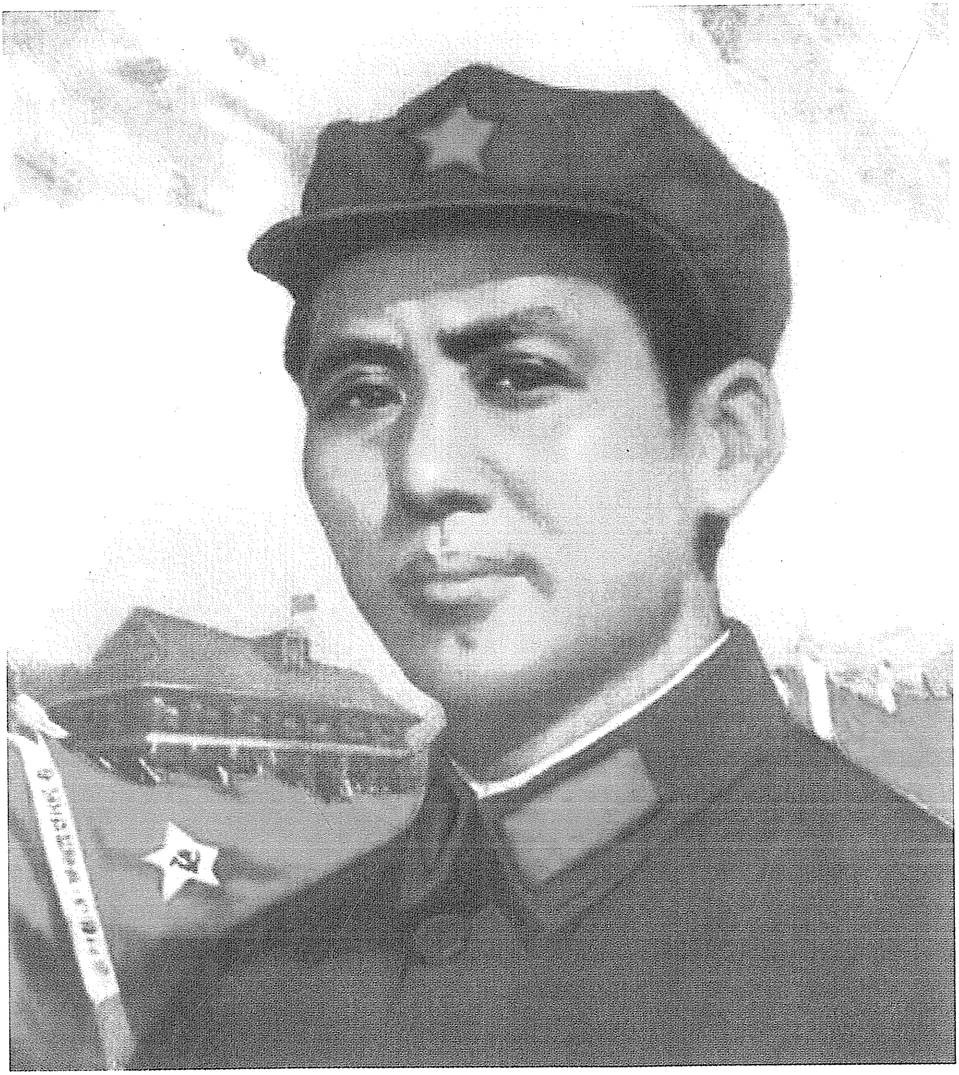
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再次占领遵义。毛泽东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图为娄山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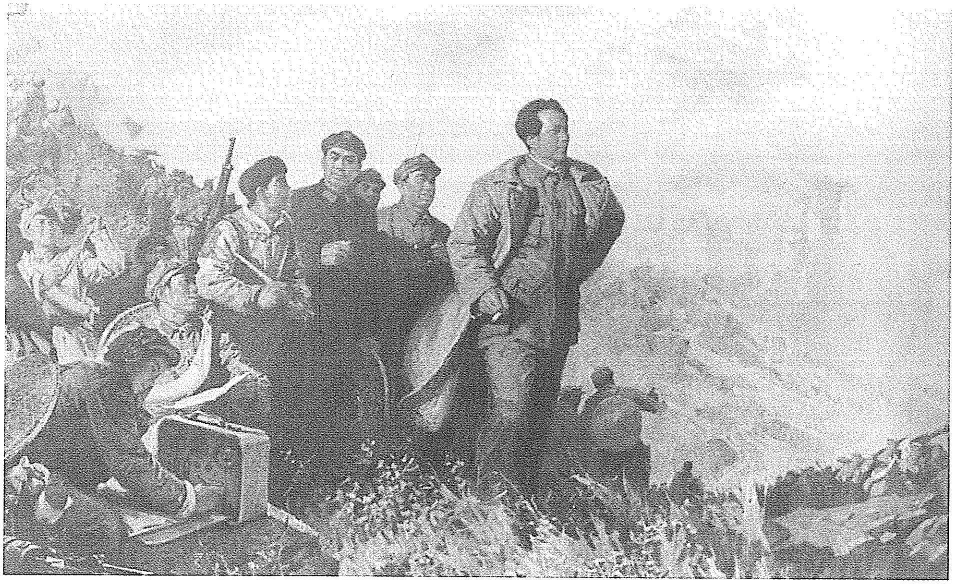
《忆秦娥·娄山关》（诗意画）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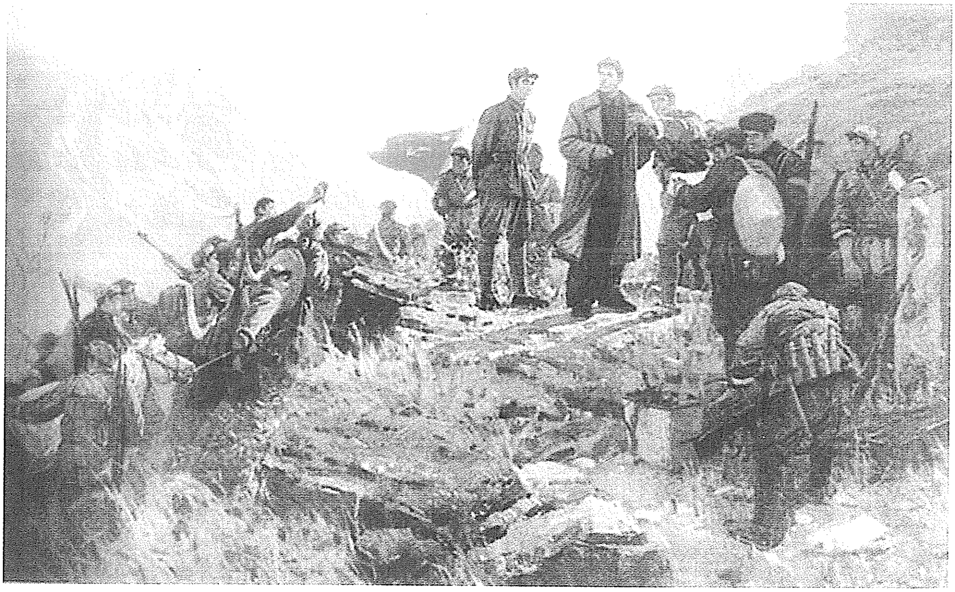
《西风烈》（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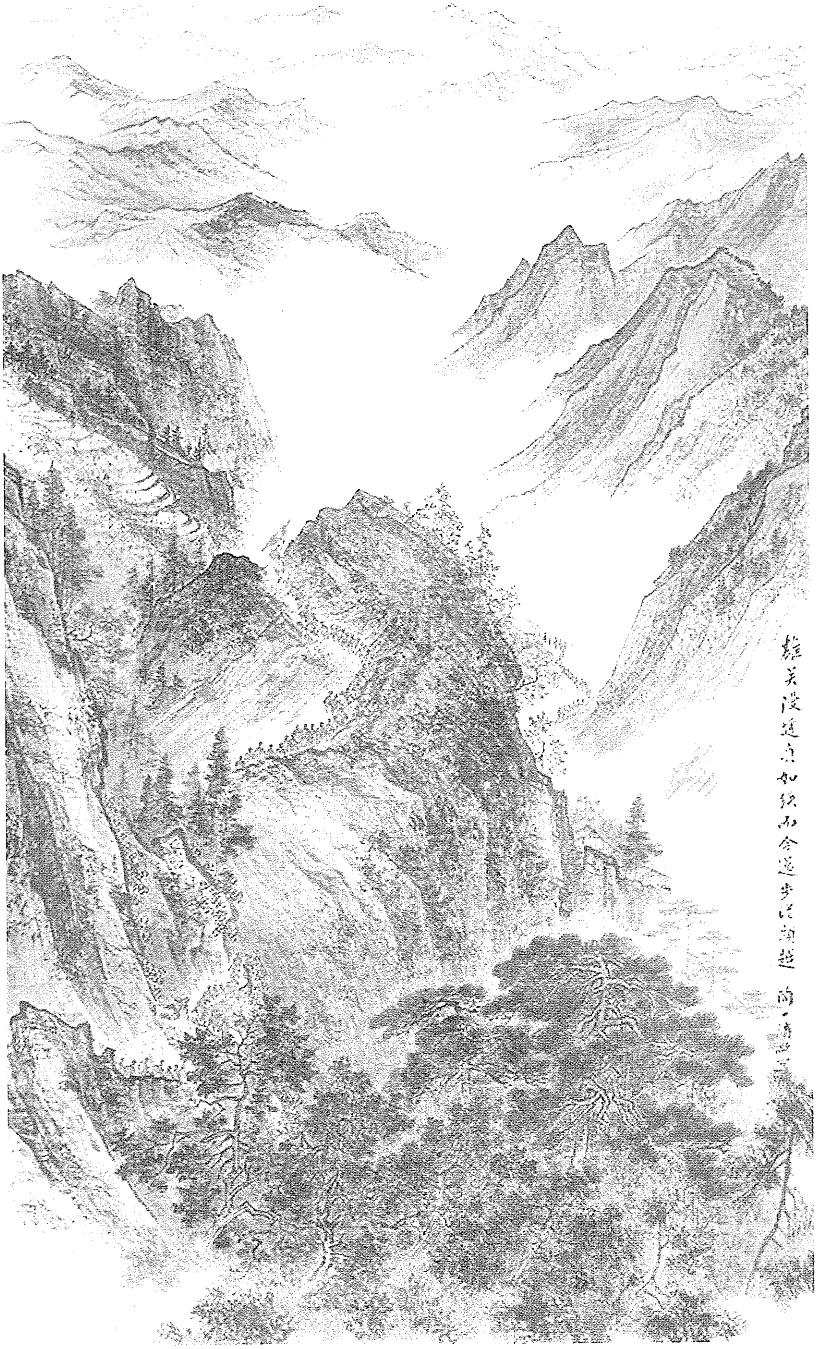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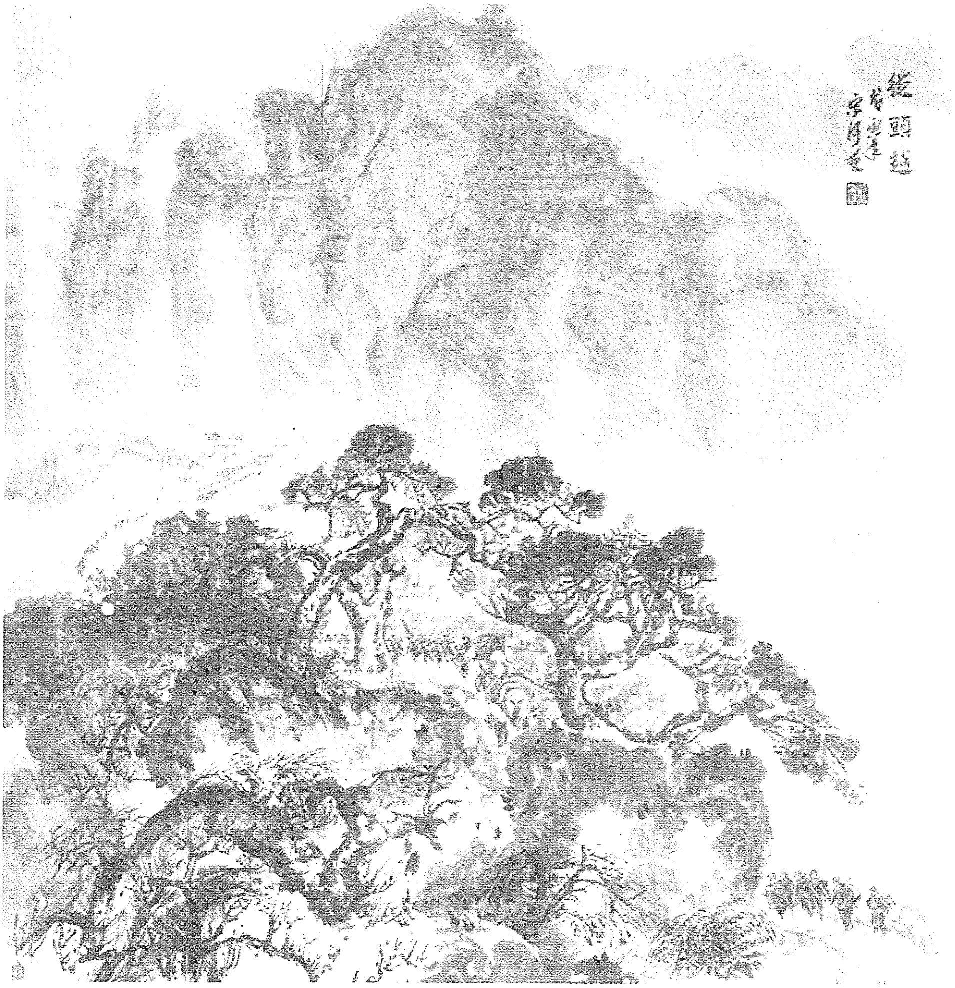
《而今迈步从头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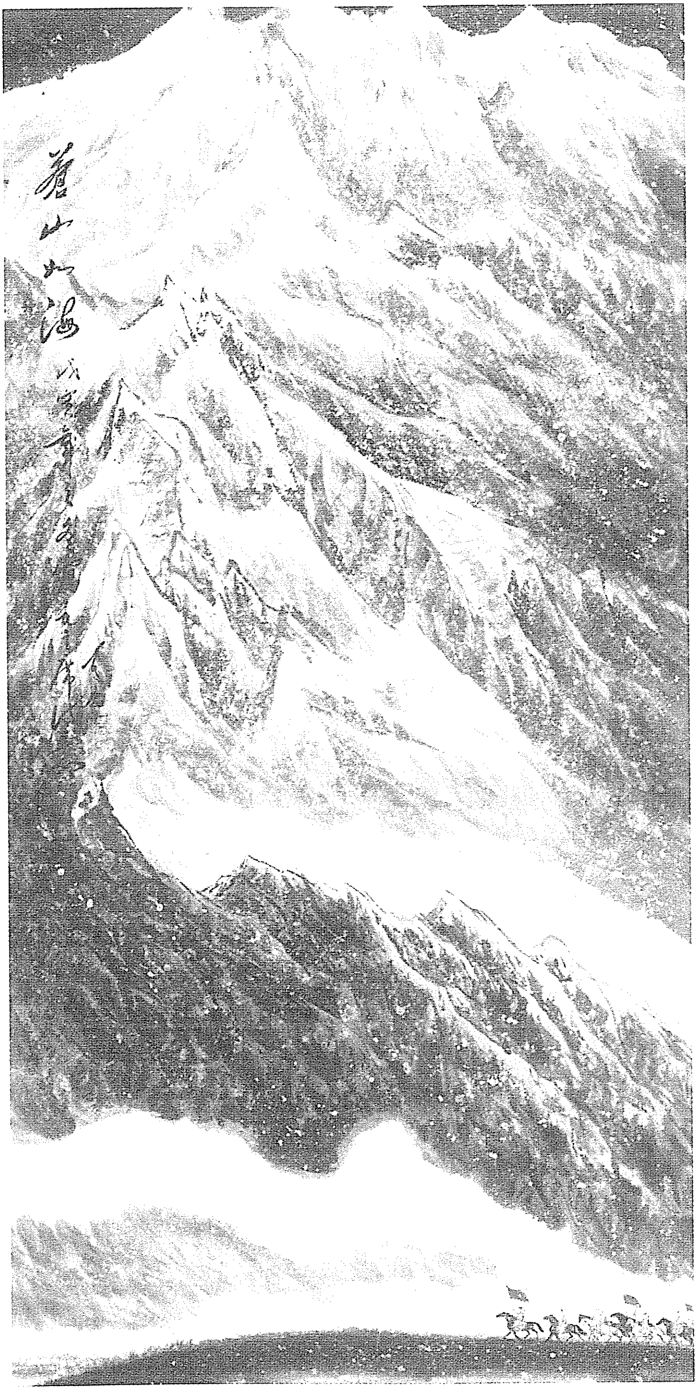
《而今迈步从头越》（油画）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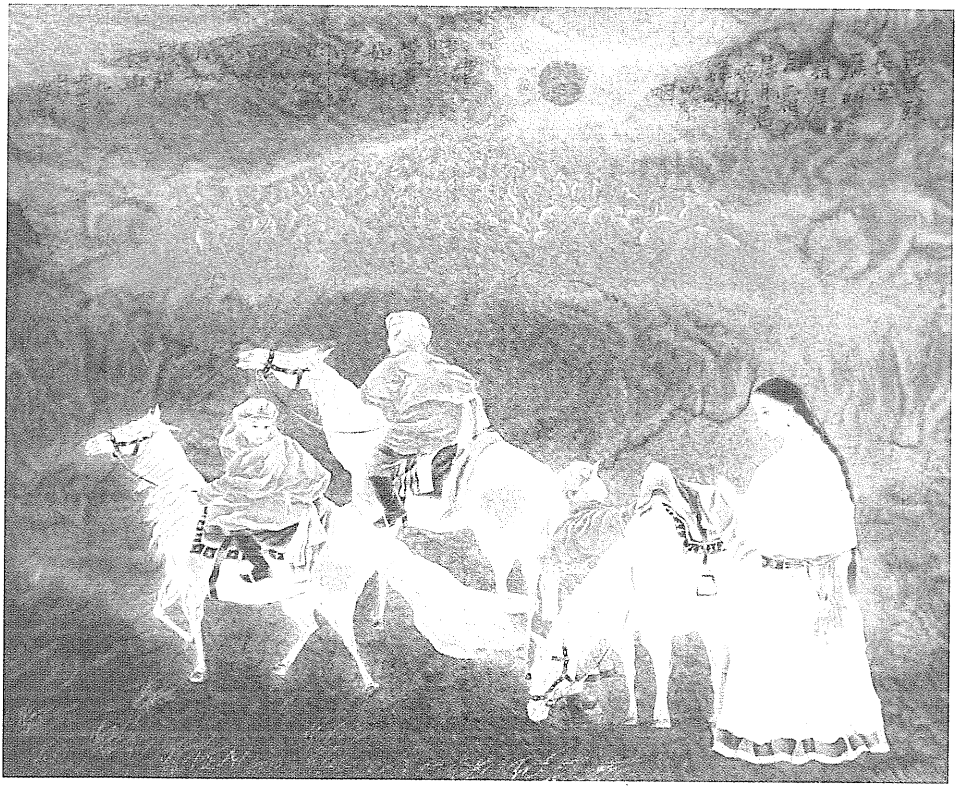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诗意画）



《从头越》（诗意画）



《苍山如海》（诗意画）



《残阳如血》（诗意画）

中央军委命令[1]

（1935年3月5日）

1. 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师共七个团，明（六日）有由长赣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模样，万师六个团则有向长赣山前进模样，黔敌何知重部三个团将由石坑坳口向大黑水前进。

2. 我军有首先消灭肖谢两师之任务，明（六日）部署如次：

甲、一军团及干部团为右纵队，于明（六日）拂晓取道花苗田向长赣山枫香坝之间攻击，其第一师应绕至倒流水李村地域突击敌后尾，以第二师向青坑地域之敌侧击，干部团随第二师前进，受林聂指挥。

乙、三军团为左纵队，以主力三个团经温水沟绕过温水大山西端向倒流水青坑养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龙山白腊坎正面吸引敌人东进，该军团应派出小部至太平场以南迷惑并钳制何敌。

丙、五军团为总预备队进至白腊坎附近待命。

3. 明（六日）各兵团须以猛烈动作解决肖谢两师，以便七日继续对万师作战。

4. 总后方在鸭溪花苗田至遵义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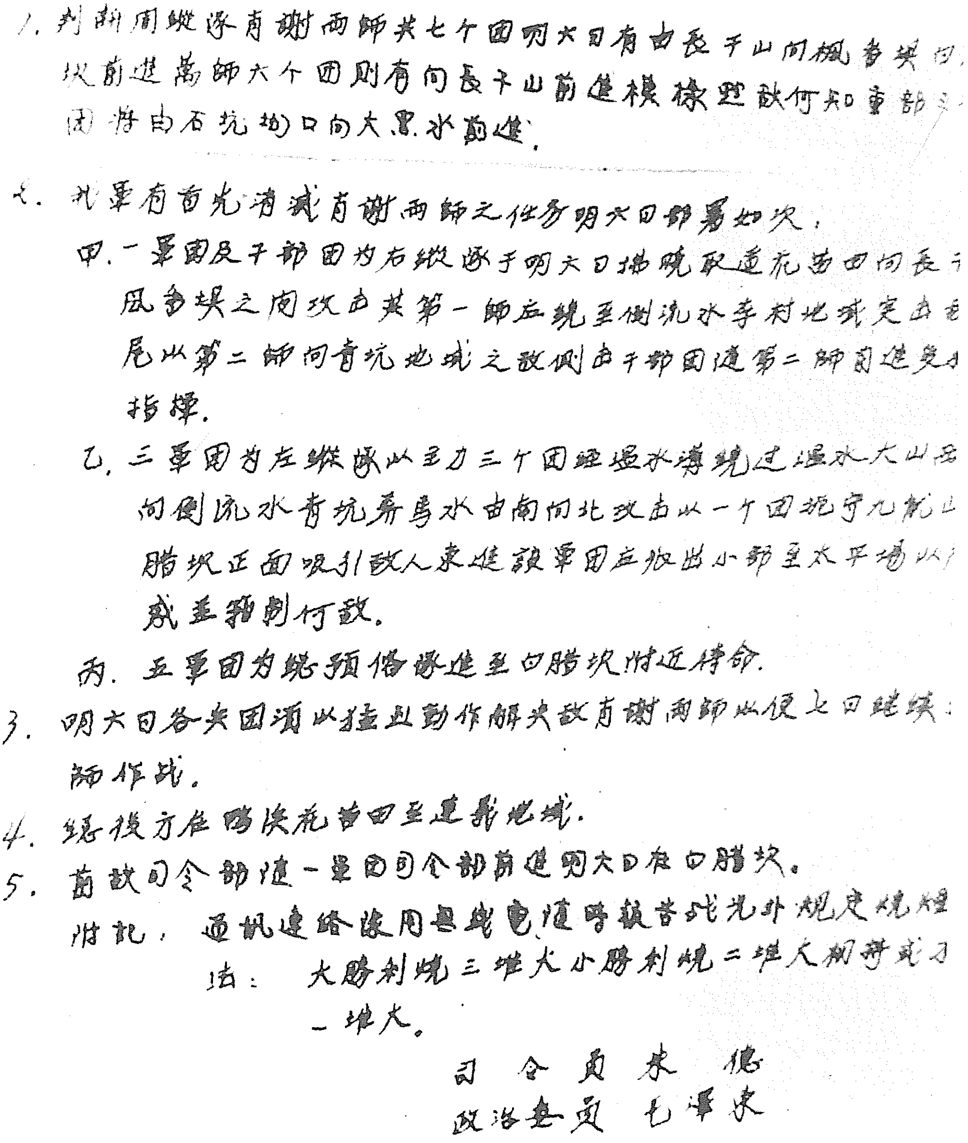
---

[1] 1935年3月，中央红军在娄山关、遵义城乌江北岸地区连续作战中，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军委部署迎击敌人的作战电令。

5．前敌司令部随一军团司令部前进，六日在白腊坎。

附记：通讯连络除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规定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等或不利烧一堆火。

司令员　朱　德
政治委员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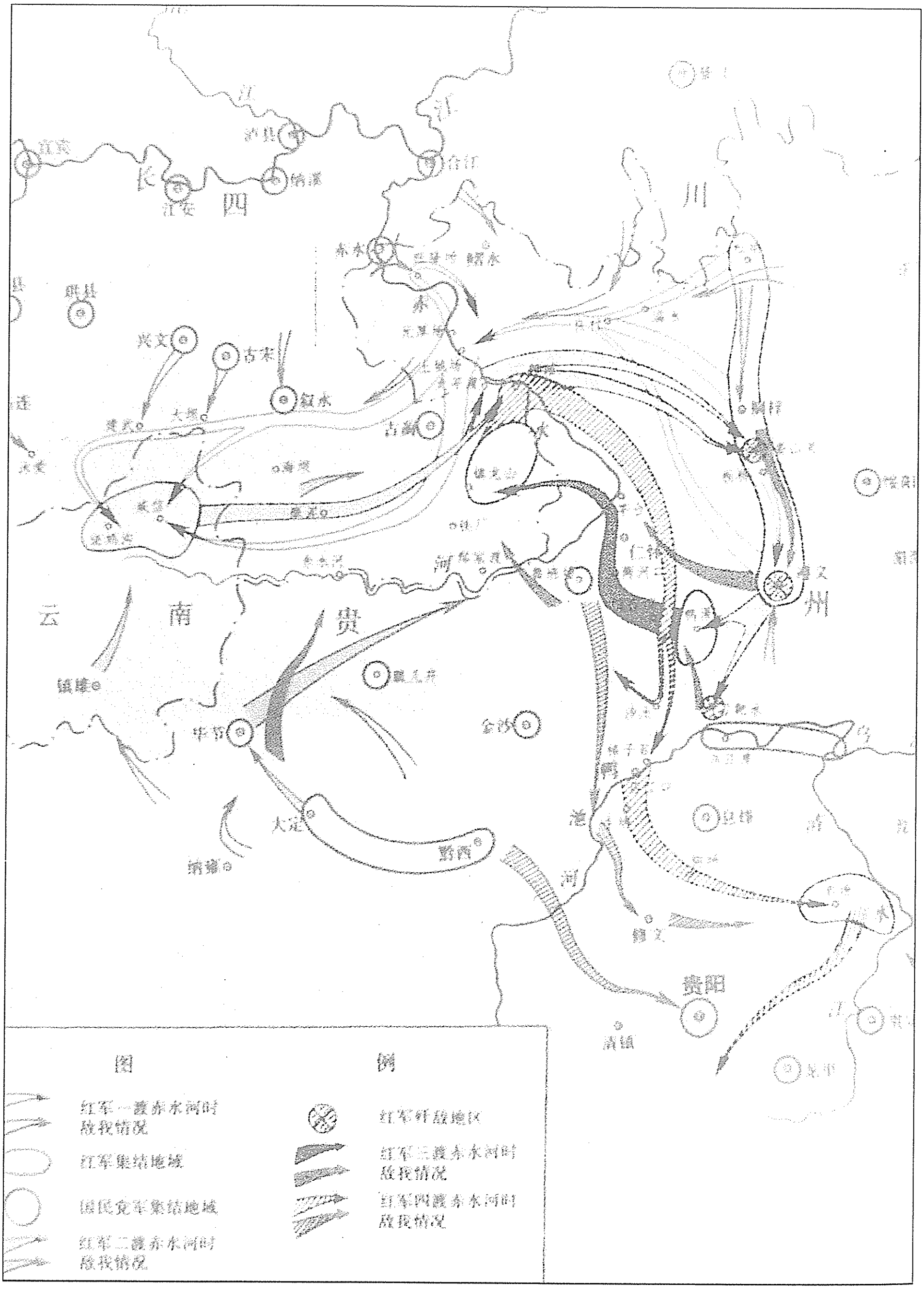


1. 判断周纵队肖谢两師共七个团明天日有由長干山向楓香坝
似前进萬師六个团则有向長干山前進模樣黔敌何知重部
团将由石坑垇口向大黑水前進.

2. 我軍有首先消滅肖謝兩師之任务明天日部署如次;
甲. 一軍团及干部团为右縱队于明天日拂曉取道花苗田向長
風香坝之間攻击其第一師应繞至側流水李村地域突
尾以第二師向青坑地域之敌側击干部团隨第二師前進受
指揮.
乙. 三軍团为左縱队以主力三个团經温水溝繞过温水大山
向側流水青坑靠馬水由南向北攻击以一个团扼守九龍
腊坝正面吸引敌人來進該軍团应派出小部至太平場以
威脅箝制何敌。
丙. 五軍团为總預備隊進至白腊坎附近待命.
3. 明天日各兵团須以猛烈動作解决敌肖謝兩師以便七日继续
師作战。
4. 總後方在鴨溪花苗田至達兆地域.
5. 前敌司令部随一軍团司令部前進明天日在白腊坎。
附記; 通讯連絡除用無綫電、陸路报告战况外规定烧烟
法: 大勝利烧三堆火小勝利烧二堆火相持或
一堆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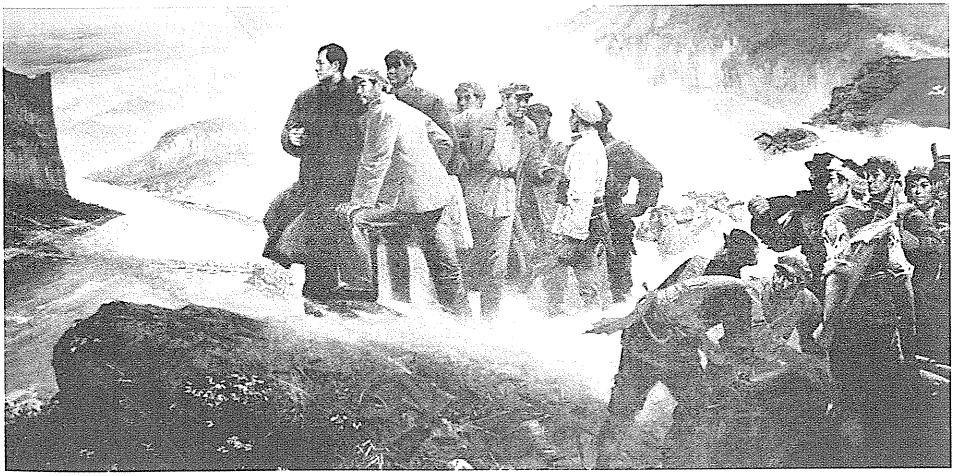
司令員朱德
政治委員毛澤東

毛泽东、朱德在遵义鸭溪地区下达的作战命令。


长
江
四
川
宜宾
江安
泸县
纳溪
合江
赤水
赤
兴文
古宋
叙永
古蔺
威信
扎西
云
南
贵
州
镇雄
毕节
大定
黔西
金沙
仁怀
遵义
桐梓
息烽
乌
江
贵阳
清镇
图
例
红军一渡赤水河时敌我情况
红军集结地域
国民党军集结地域
红军二渡赤水河时敌我情况
红军歼敌地区
红军三渡赤水河时敌我情况
红军四渡赤水河时敌我情况

红军四渡赤水示意图。

红军四渡赤水的渡口之一太平渡。



《四渡赤水》（油画）

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4月28日）

遵义会议后，我军大胆穿插，机动作战，把蒋介石的尾追部队甩在侧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时机。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我军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先机。

---

[1] 1935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到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当晚，出席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1935年6月15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昨日夺取了东三省、热河、察东、河北非武装区，上海非武装区，侵略了福建，深入了广东、广西；今天实行占领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整个华北（淮河以北）；明天将并吞整个中国！想把全中国都变成日本殖民地，把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奸淫、蹂躏！都变成万劫不复的亡国奴！

日本并吞中国最卖气力的开路先锋，就是蒋介石卖国贼和他的蓝衣社匪徒，蒋贼等几年来的实际行动，就是代替日本帝国主义镇压反日运动，抵制日货运动，解除义勇军的武装，压迫、解散、屠杀上海与日本作战的工人及十九路军士兵，逮捕、屠杀无数抗日的领袖与群众，拿全国民众捐助的飞机大炮来轰炸捐钱的民众及民众自己的队伍——工农红军，调遣东北及华北几十万大军南下来“围剿”“追剿”唯一抗日反帝的工农红军！同时蒋贼等大肆宣传“复兴民族”“礼义廉耻”“无力抗日”“中日亲善”来掩盖卖国的面目，并且愚弄民众想使民众都做毫不抵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蒋贼等出卖土地之广大，屠杀民众之众多，欺骗民众之巧妙，实已打破世界史的纪录！蒋介石是古今中外最大的卖国贼！

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老早就公开反蒋贼等的卖国辱国，宣布塘沽协定与一切中日秘密条约为无效，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陆海空军订立作战协定，与红军共同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拥护对日作战基本纲领六条，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人力、财力来援助在东三省直接与日伪军肉搏的人民革命军：抗日义勇军。蒋贼等污蔑苏维埃红军为“杀人放火的土匪”“等于伪满的傀儡”，现在蒋贼等已将等于半个欧洲大的中国领土双手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动员百万白军拦阻红军北上抗日，打算消灭反日的工农红军。这一切铁一般的事实都足以证明：谁是卖国贼土匪，谁是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四万万同胞的政府和军队。工农群众与一切知识分子！你们的失业、饥饿、死亡、流离失所，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蒋贼等及其蓝衣社匪徒已把中国的民族利益给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使中国一切事业都被日本帝国主义破坏无余。

陆海空军的弟兄们！你们好久得不到一个铜板，蒋贼等不但要你们上火线来残杀你们自己的同胞，而且要你们做毫无报酬的苦工，这就是因为蒋贼等卖国和克扣你们的军饷，日本帝国主义和蒋贼及其蓝衣社匪徒就是你们的死对头！就是你们最主要的公敌！

现在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陆海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来夺取蒋贼的兵工厂内的和进口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停付日本的赔款借款本息，没收日本在华的财产企业和一切卖国贼的财产来充足抗日的经费，动员中国所有民众，组织成为反日会、义勇队、没收日货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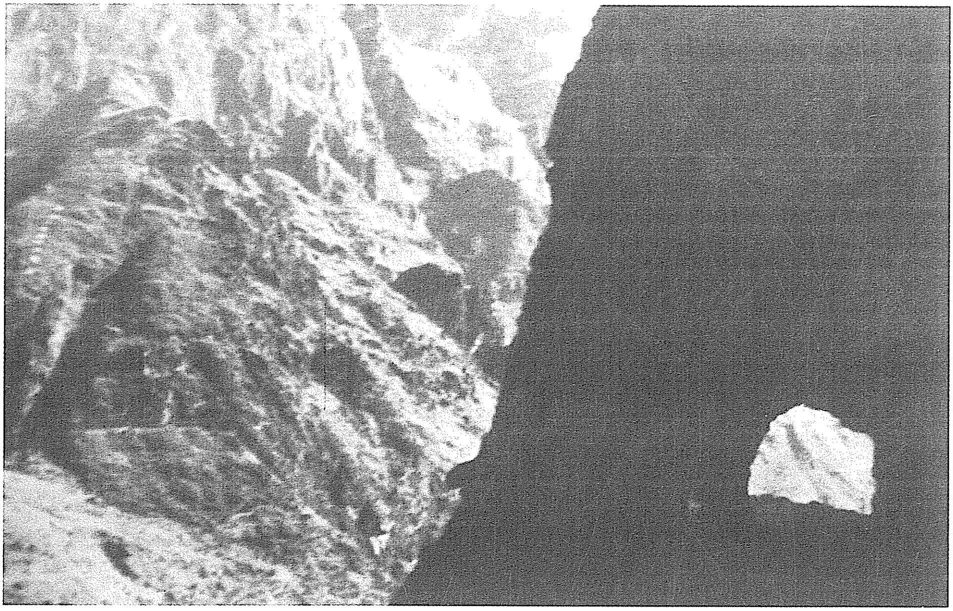
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定蒋介石卖国贼以死罪，号召全国民众都来消灭这只卖国辱国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中国四万万

人民都有权力活捉蒋介石，将蒋介石就地正法！同时苏维埃政府宣布凡过去被蒋贼蒙蔽的白军弟兄，只要现在觉悟过来，实行反蒋，都是我们亲爱的朋友。目前中国的唯一救法，只有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及蓝衣社匪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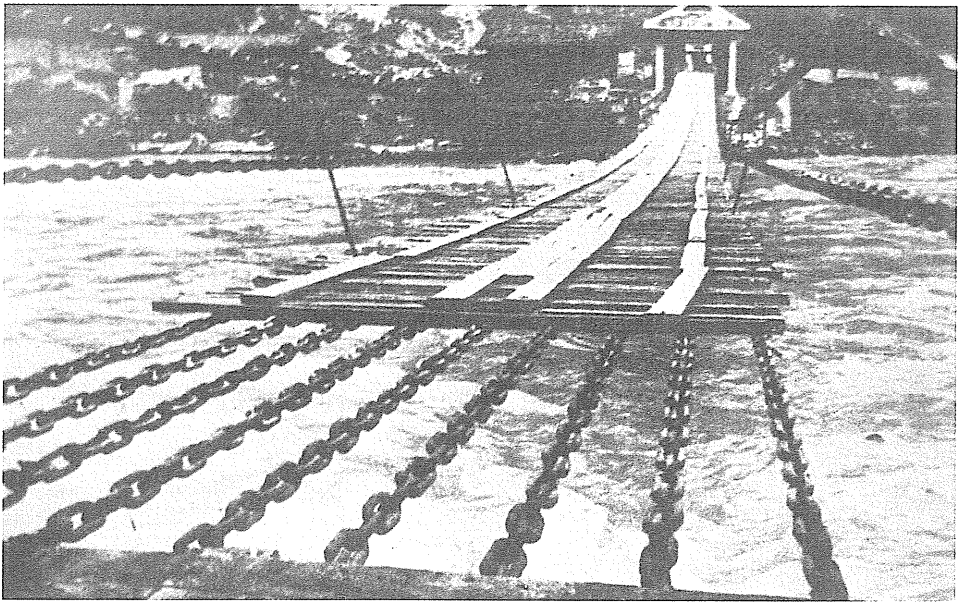
中华苏维埃政府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陆海空军、学生、教员、商人、新闻记者、医师、看护、律师、工程师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统统起来罢工、罢课、罢口、罢市来抗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收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枪毙蒋介石，消灭蓝衣社匪徒！

过去上海工人和十九路军士兵及东三省人民革命军、义勇军屡次打败日伪军队，在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直接领导之下的蒋贼以一百多万白军来进攻数量较少技术较差的工农红军，结果非但不能消灭红军，而红军及游击队且已发展到江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西康、云南、陕西、甘肃、山西、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十九省。红军胜利的消息已传遍了全世界！这证明：凡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和被几千万、几万万民众热烈拥护的红军，是不能消灭的军队。我们的确有力量足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卖国贼及其蓝衣社匪徒！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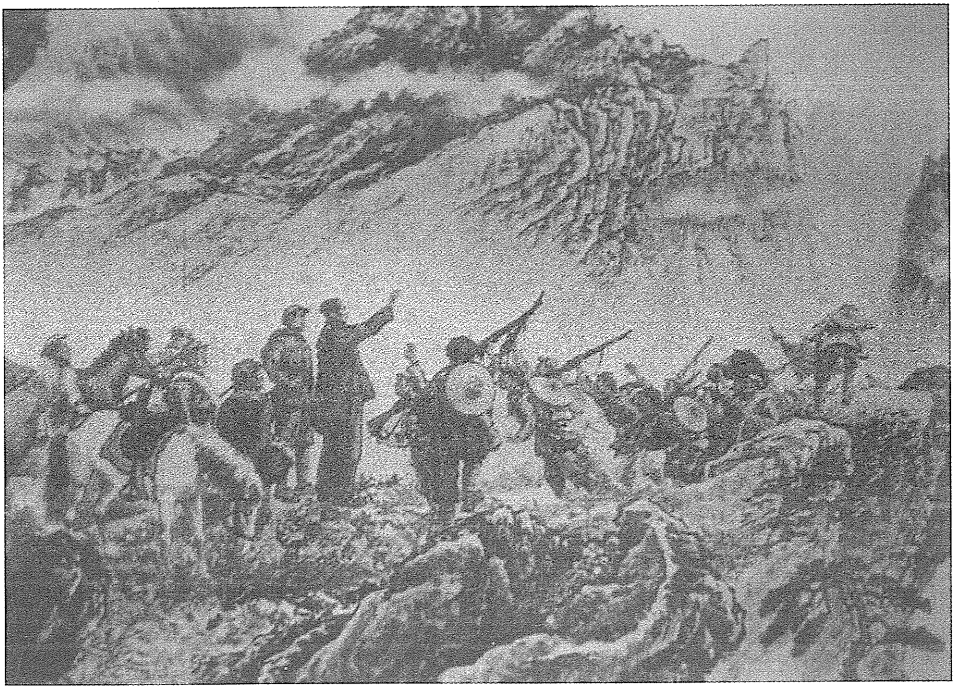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中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副主席　周恩来　王稼穑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指挥红军巧渡金沙江时住的岩洞。



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又强渡大渡河，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图为泸定铁索桥。



《巧渡金沙江》（油画）

为同四方面军会合复四方面军电[1]

（1935年6月16日）

来电欣悉。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2]、胡宗南[3]、邓锡侯[4]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我们誓与你们一起，为苏维埃奋斗到底。特此电复。

---

[1] 这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军先头部队会合后，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暨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给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复电。

[2] 刘湘，四川地方实力派。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兼第二十一军（川军）军长。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剿匪”军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

[4] 邓锡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五军（川军）军长兼第一二八师师长、四川“剿匪”军第一路总指挥。

应在川陕甘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1]

（1935年6月16日）

张、徐、陈[2]各同志：

迭电悉。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3]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4]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

---

[1] 1935年6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前往懋功途中给第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

[2]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徐，指徐向前，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指陈昌浩，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指中央红军。

[4] 威州，镇名，即今四川省汶川县县治。

南[1]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2]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3]，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于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4]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5]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朱　德　毛泽东
周恩来　张闻天
十六日二时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兼第一师师长。

[2] 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省小金县。

[3] 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两河口，村名，位于今四川省小金县北部。

[5] 理番，旧县名，即今四川省理县。

1935年6月，中央军继续北上，翻过了冰雪覆盖的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图为红军翻越的大雪山。

四方面军须力攻平武松潘[1]

（1935年6月18日）

国焘、昌浩、向前[2]同志：

甲、穆坪[3]已放弃，但夹金山南之大硗碛、盐井坪在我手。我野战军现在大硗碛、达维、懋功[4]、抚边一线，拟休息两三天。已令先念[5]派两团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东山[6]已向水磨沟前进。

乙、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7]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给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

[2] 国焘，即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昌浩，即陈昌浩，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3] 穆坪，即四川省宝兴县县治。

[4] 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省小金县。

[5]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

[6] 东山，即韩东山，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7] 理番，旧县名，即今四川省理县。

向雅名邛大[1]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张　朱　毛　周

十八号二十一时

---

[1] 雅名邛大，指四川雅安、名山、邛崃和大邑。

四方面军须力攻平武松潘[1]

（1935年6月18日）

国焘、昌浩、向前[2]同志：

甲、穆坪[3]已放弃，但夹金山南之大硗碛、盐井坪在我手。我野战军现在大硗碛、达维、懋功[4]、抚边一线，拟休息两三天。已令先念[5]派两团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东山[6]已向水磨沟前进。

乙、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7]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给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

[2] 国焘，即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昌浩，即陈昌浩，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3] 穆坪，即四川省宝兴县县治。

[4] 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省小金县。

[5]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

[6] 东山，即韩东山，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

[7] 理番，旧县名，即今四川省理县。

向雅名邛大[1]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张　朱　毛　周

十八号二十一时

---

[1] 雅名邛大，指四川雅安、名山、邛崃和大邑。

力争实行川陕甘方针[1]

（1935年6月20日）

国焘同志：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2]或田颂尧[3]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须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因北出草原游牧地，此时极少可能，只有坚决的川西南方针才是出路。如此战役部署，则应以有力一部在东岸佯攻，西岸松潘方面亦不必使用多的兵力，主

---

[1]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在前往懋功的途中即致电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这一主张为张国焘复电婉拒，张国焘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的计划。周恩来等人在18日到达懋功后，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人，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20日，张国焘再次致电党中央坚持己见，反对北上的战略方针。本篇是周恩来和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给张国焘的复电。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剿共”军第三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兼国民党军第一师师长。

[3] 田颂尧，当时任国民党四川“剿共”军第二路总指挥兼第二十九军军长。

力速向懋功开进，向雅名邛大[1]打去。这一动作，关系全局，须集中二十个团以上突然出击，且后续飞速跟进，方能一下消灭敌人大部，夺取广大地区，展开战局。兄亦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　朱　毛　周
二十日四时

---

[1] 雅名邛大，指四川省雅安、名山、邛崃和大邑四县。

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的五点意见

（1935年6月26日）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作解释，他们是要打成都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实现向北发展的可能。（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如不与我打野战，守堡垒，就一定要打破驻点，牵制敌人。现在就是迅速打破胡敌向前夺取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6月29日）

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

---

[1] 1935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两河口召开。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博古（秦邦宪）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的情况报告后发言的一部分。

1935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在两河口、沙窝、毛儿盖多次召开会议，讨论红军落脚问题。图为两河口会议旧址。

四方面军应迅速北上[1]

（1935年7月10日）

张：

甲、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乙、目前四方面军主力未到黑河坝东北，沿途番民[2]捣乱。三军团须使用于配置警戒及打通石碉楼方面。一军团及八十八、八十九两师三团在毛儿盖未攻下前，不便突入。

丙、弟等今抵上芦花，急盼兄及徐陈[3]速来集中指挥。

朱　毛　周

十号

---

[1] 1935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红军第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会上同意中央北上方针，会后延迟执行。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给张国焘的电报。

[2] 指当时四川西部的少数民族。那时他们因对红军不了解，一时有用对待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来对待红军的现象。

[3]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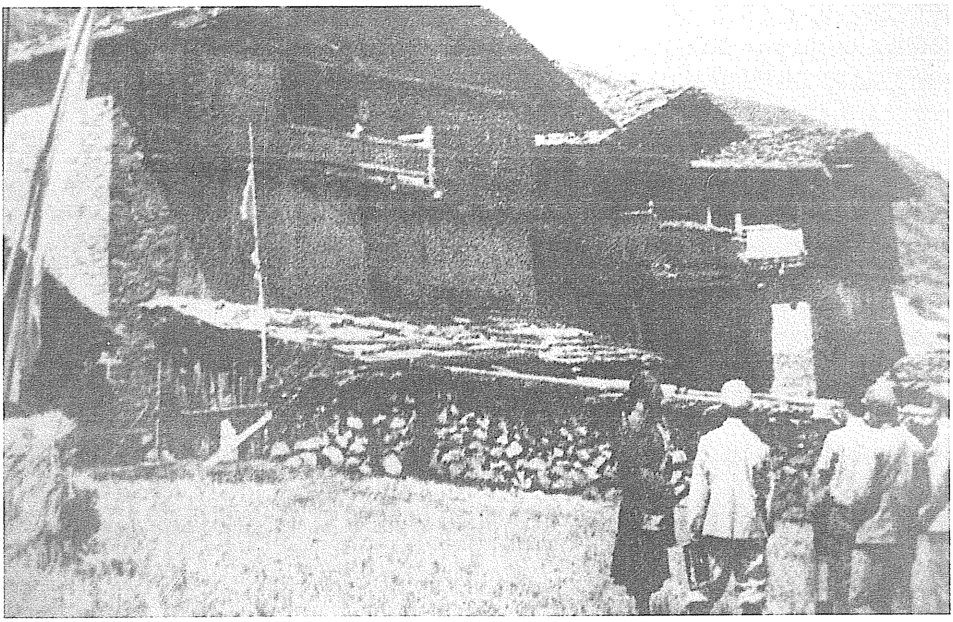
（1935年7月21日）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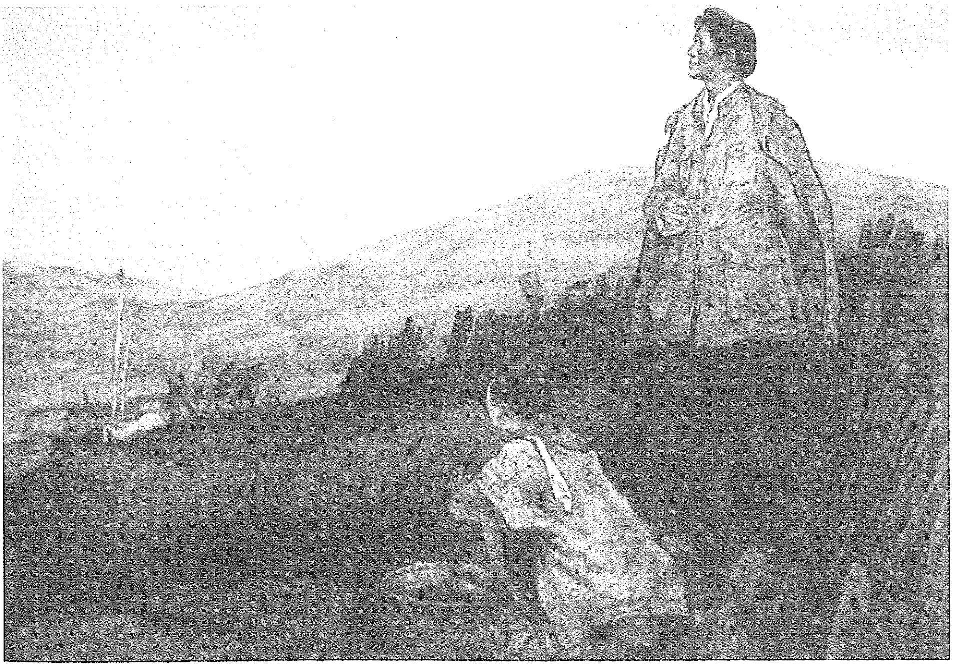
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

[1] 7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芦花召开，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毛儿盖的住地旧址。



《毛儿盖的早晨》（油画）

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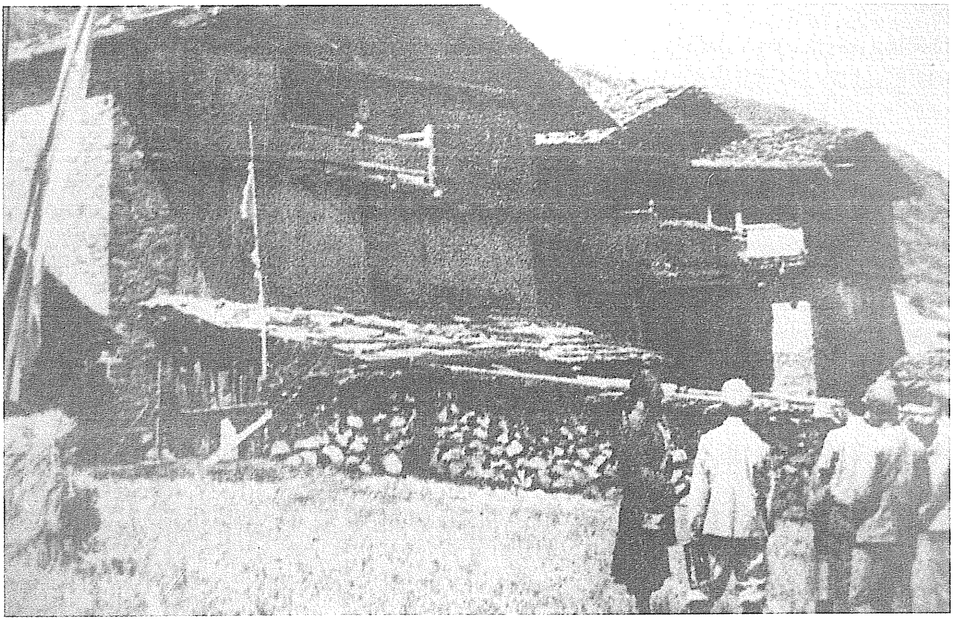
（1935年7月21日）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起，关于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和巩固，无数次击破敌人，总的看路线是没有问题的，但有缺点和错误。军事指挥上的缺点，军委将另行讨论。在鄂豫皖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时，没有充分准备，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在通南巴打退了刘湘部队，胜利后又放弃是个严重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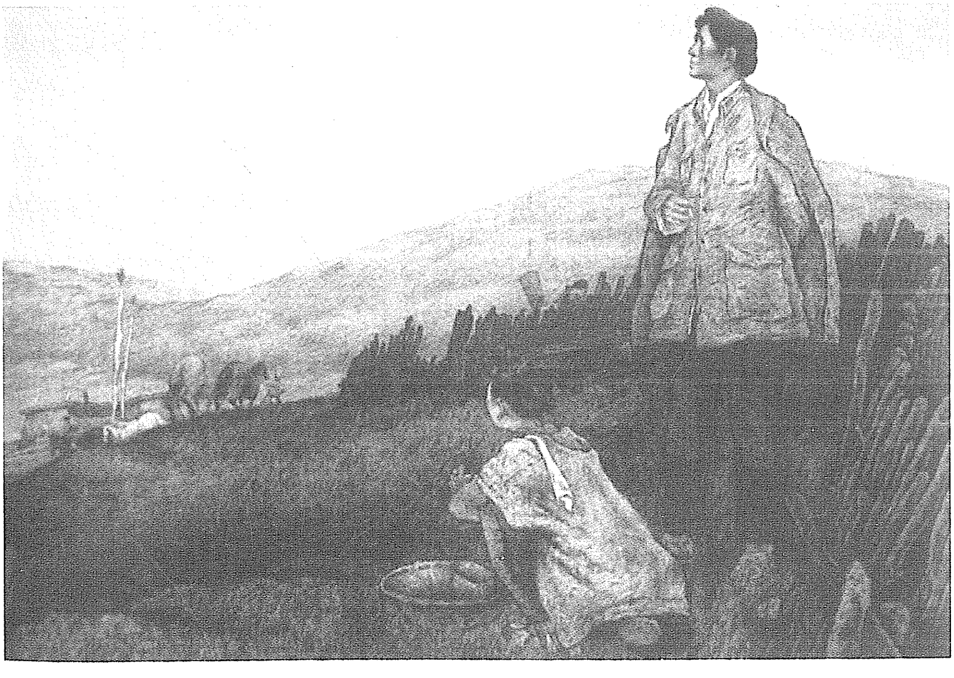
红四方面军领导对建立政权有不足和错误的地方，没有严格了解建立政权与建立红军的密切关系，提出西北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

[1] 7月2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芦花召开，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会议听取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毛儿盖的住地旧址。



《毛儿盖的早晨》（油画）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1]

（1935年7月）

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红一、四方面军要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和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谈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8月4日至6日）

一

（一）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削弱了。（二）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三）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像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中央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

---

[1] 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沙窝举行，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并讨论组织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补充成员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二

四方面军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的。其他部队也有很多好的干部，可以吸收他们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议*

（1935年8月5日）

一　目前形势与特点

帝国主义侵略的更进一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造成“华北国”的实际行动，国民经济总崩溃的深刻化，全中国的水旱灾荒，农村经济的崩溃与毁灭，造成了中国政治上的严重形势。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无法而且不能消灭或暂时削弱造成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因，相反的，它使这些原因更进一步地紧张化了。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

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是继续存在的，虽然许多斗争往往带着自发性，虽然目前尚未广泛地爆发带有全国性的大的群众斗争，然而这种斗争是普遍地蕴藏着，造成了伟大事变立刻就要来的形势。

苏维埃革命行动，虽是由于长江下游的几个苏区暂时变为游击区，而遭受到部分的损失，然而这些苏区中广大的游击战争是继续坚持着。湘鄂赣与福建沿海的红军得到许多胜利。红二、六军团击破了陈渠珍一路之后，现在又消灭了张振汉一路，巩固了原有苏区根据地。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

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一切这些，说明了中国革命形势的依然存在，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国民党正在以空前的仇恨与疯狂向着白区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苏维埃革命进攻。国民党反动统治力量的绝对的削弱，促使它以更大的积极性更进一步地出卖中国，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进攻苏维埃革命。一、四方面军在西北的发展，使华北的军阀更直接地与积极地参加围攻苏维埃与红军的斗争。有计划地追击、截击，特别是堵击我们，企图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用堡垒主义封锁我们，使我们陷入不利地区内，然后寻求我主力决战，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的基本战略方针。

但是敌人向我们进攻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部队的远离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交通的不便，给养的困难，内部的不统一与冲突，减员、疲劳、冻饿、不满意与失败情绪的增长，财政支出的空前不敷等。而在另一方面，全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各地苏维埃红军的发展，尤其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大大兴奋了全中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坚强了他们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由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革命战争经验的交换，指挥的统一，红军战斗力不但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增加了。一、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地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地扩大，同时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适当的战略战术方针，更使我们坚信我们一定能够彻底粉碎敌人对我们的进攻，创造和巩固西北苏区根据地。

二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地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六月廿八日中央政治局曾经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这个根据地的造成，不但是红军作战的后方，而且是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的苏维埃国家的领土。它的存在，是以鼓励全中国被压迫的工农劳苦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它的模范的作用，给全国民众指出了政治经济解放的道路。它是一个团结全中国革命力量的核心，与散布革命种子到全中国去的发源地。

红军基本的严重的责任，就是在川陕甘及广大西北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根据地。彻底地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和平创造新苏区是不可能的。把一切努力与牺牲去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把一切利益服从于革命战争的最高利益，才能创造出西北苏区根据地，才能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为了建立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必须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必须经过革命委员会的阶段建立真正工农民众的苏维埃政权，必须普遍建立赤卫军，少先队，独立师、团，游击队等民众自卫的武装，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要使反革命统治区域变为真

正革命的苏维埃区域，必须坚决地执行上述各项基本政策。

三　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历史任务，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唯一的绝对的领导之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的个别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和弱点，而认为是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但政治局认为对于其他个别同志的不了解与怀疑党应给以明确的解释与教育。

五中全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开）在它的决议案中曾经清楚地指出：“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在艰苦的环境之下，忠实地执行着共产国际与四中全会的路线，坚持地进行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倾向与动摇，粉碎了各种机会主义，在实际工作中间开始了党的全部工作之彻底转变，得到许多重要的成功与胜利。”在思想方面指出：“自从四中全会以来，党在坚决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强了、锻炼了自己，获得了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一致，最后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必须指出五中全会的决议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的。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重新指出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党中央根据于自己的正确估计，定出了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具体任务。一年半反对‘围剿’的艰苦斗争，证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

疑义地是正确的。特别中央苏区的党，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在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成绩。”扩大会议同时指出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使主力红军退出苏区，受到部分损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在军事上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这种军事上的错误，不但对于党中央的总的政治路线说来是个别的错误，即对于这一错误的主要负责者，也“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地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的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清楚地了解，党的总路线是否正确，要看党是否正确地估计了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是否正确地估计了当前的形势，是否正确地提出了并执行了策略上与战略上的各种任务。军事指挥问题是这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上是基本正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在军事问题上却在一个时期中犯了错误，那这一错误对于党只是部分的错误，不是严重的政治的错误。

关于一方面军的减员的原因，党在遵义会议上已经在全党内充分地开展了自我批评。党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没有丝毫的隐蔽。遵义会议后党在军事指挥上固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实际工作中还有某些弱点，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部队中政治工作的薄弱，首先是总政治部没有尽一切可能给下级政治部以适时的指示与推动，使下级政治部得不到坚强的领导。反右倾的斗争没有很大地开展起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没有利用机会来及时整顿一方面军。

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以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四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甘陕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地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的，对于敌人有利的。

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得不够，缺乏对一、四方军的正确的估计。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破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给予他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脱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内（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地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间的缺乏，更由于政治

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表现在：部队组织的松懈，纪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的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思想。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地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的过左或过右的估计。过左的估计可以掩盖目前必须整顿部队，加紧反右倾肃反及严禁纪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计则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军力量的不相信。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间与补充扩大，不但可以恢复过去的战斗力，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气馁。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给一方面军以最切实的兄弟的帮助。

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强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和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巩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地去消灭敌人。

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以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四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甘陕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地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的，对于敌人有利的。

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得不够，缺乏对一、四方军的正确的估计。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破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给予他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脱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内（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地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间的缺乏，更由于政治

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表现在：部队组织的松懈，纪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的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思想。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地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的过左或过右的估计。过左的估计可以掩盖目前必须整顿部队，加紧反右倾肃反及严禁纪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计则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军力量的不相信。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间与补充扩大，不但可以恢复过去的战斗力，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气馁。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给一方面军以最切实的兄弟的帮助。

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强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和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巩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地去消灭敌人。

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以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四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甘陕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地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的，对于敌人有利的。

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得不够，缺乏对一、四方军的正确的估计。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破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给予他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脱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内（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地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间的缺乏，更由于政治

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表现在：部队组织的松懈，纪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的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思想。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地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的过左或过右的估计。过左的估计可以掩盖目前必须整顿部队，加紧反右倾肃反及严禁纪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计则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军力量的不相信。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间与补充扩大，不但可以恢复过去的战斗力，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气馁。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给一方面军以最切实的兄弟的帮助。

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强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和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巩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地去消灭敌人。

显然的，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以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四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

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甘陕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地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的，对于敌人有利的。

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得不够，缺乏对一、四方军的正确的估计。

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为蒋介石以及七八省国民党军队所包围追击截击与堵击，完全没有休息的长途行军，历尽艰难困苦与饥饿寒冷。然而一方面军的全体指战员在党中央与军委领导之下始终以惊人的英勇与坚决同敌人作无数次的血战，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击破了敌人的追击截击与堵击，消灭了蒋介石等军阀的许多部队，渡过了天险的湘江、乌江、金沙江与大渡河，最后达到了与四方面军会合的预定目的，使蒋介石等进攻我们的计划完全失败。

然而这丝毫也不能否认一方面军在一万八千里长征中所给予他的损失。一方面军在脱离中央苏区后这一时期内（十个月），不但在数量上极大地减员（遵义会议前军事领导的错误负最大的责任），即在质量上，由于肉体上的疲劳，由于休息时间的缺乏，更由于政治

工作的不深入，而受到了相当的损失。这表现在：部队组织的松懈，纪律性的薄弱，游击主义倾向与军阀习气的部分生长，在某些干部中发展着疲倦、不负责任以及右倾的悲观失望的情绪与思想。这就使部队的战斗力相当地削弱，不看到一方面军的这些弱点或夸大这些弱点与不去分析这些弱点的来源，必然会产生对于一方面军的过左或过右的估计。过左的估计可以掩盖目前必须整顿部队，加紧反右倾肃反及严禁纪律的实际工作的消极，而过右的估计则可以产生对于一方面军力量的不相信。一方面军的同志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整顿自己的部队，学习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坚决相信只要取得相当休息整理的时间与补充扩大，不但可以恢复过去的战斗力，而且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决不要因为目前的相当减员与部分损失而气馁。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该给一方面军以最切实的兄弟的帮助。

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强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决不应该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和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巩固的与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地去消灭敌人。

五　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

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地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即汉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对他们的内奸卖国贼、土司喇嘛与他们自己的剥削阶级。

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上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在另外一种民族中，或在阶级斗争深入的阶段中，则可采取组织工农苏维埃或劳动苏维埃的形式。一般地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

在一、四方面军没有会合以前，四方面军在帮助番民组织游击队、在建立革命政权上、在发动番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上得到了相当的成绩，但目前建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是过早的。因为目前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应首先帮助他们的独立运动，成立他们的独立国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应公开号召蒙、回、藏等民族起来为成立他们自己的独立国家而斗争，并给这种斗争以具体的实际的帮助。在他们成立了独立国家之后，则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他们

自愿的原则，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联邦。在这个时候联邦的策略才是正确的。

在许多其他问题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我们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最可靠的武器。只有根据这种理论与方法，我们在工作上，才能有明确的方针与路线，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

六　目前的中心工作

为了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应该是：

（一）立即在一、四方面军中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胜利信心与刻苦耐劳的精神，准备大量消灭当前敌人，取得北进战略中各个战役的完全胜利，以实现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二）利用并争取时间整顿部队，进行军事政治的教育训练，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三）为了加强红军党的领导，必须使政治委员制度更加确立，加强红军中党的组织及政治部的工作，把政治工作的重点深入到连队与支部中去。

（四）大大提高与严紧一方面军的纪律，必须采取严厉办法保障纪律的执行。同时应使四方面军的同志了解红军的纪律，主要的不是依靠于强迫，而是依靠于阶级的觉悟，极大发扬党员间与红军指战员间阶级友爱与服从纪律的精神。

（五）加紧对于全体党员与红军指战员间的基本的阶级教育，使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与变化的环境下坚决不动摇地为苏维埃革命

斗争到底。设立红军大学与高级党校，大批地培养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

（六）番民中的工作必须有迅速的转变。总政治部应搜集各地番民工作的经验与教训以教育自己的干部。用一切办法，争取番民群众回家，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革命政府等。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与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主力到甘陕青宁等区域后对回蒙民族须作更大的努力。

（七）广大的白区的工作，首先是邻近白区工作，目前应该有计划地开始，发动白区广大工农群众的斗争与游击战争，响应与配合红军的行动，创造游击区与新苏区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党中央必须利用一切方法去加强川陕甘三者白区党的领导。同时对长江下游及华北华南各中心城市，产业区域及农村中的斗争应该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及新的有利的环境中极力加强自己组织与领导的力量。

（八）必须立刻开始与加强白区士兵的工作，以瓦解国民党的部队。各级政治部的白军工作部或白军工作委员会，必须真正地给连队工作组以各种具体的材料（小传单、口号、标语），适合于当前环境的简单指示，使每个红军指战员了解目前白军工作的顺利环境，这一工作的重要，与如何进行白军工作。（原稿如此）

（九）必须加强川康省委与省军委的工作，使他们能够真正集中对地方工作与游击战争的领导，以巩固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红军到甘陕后则须更大地建立与加强当地地方党的工作。

（十）建立保卫局的组织系统，加强同反革命的斗争。

（十一）吸收四方面军中党的最好的干部，参加党中央及其他军事政治机关的负责工作。

（十二）采取必要方法加强对于其他苏区与游击区的领导，使各方面的行动更能取得互相的呼应与配合。

七　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路线的斗争

毫无疑义的，在创建川陕甘新苏区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碰到许多困难，敌人决不放松我们，他必然重新布置他的兵力向我们进攻，同时高山、河流、草地、粮食、气候等还会给我们许多阻碍。虽然如此，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发扬我们的创造精神，我们是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

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这种动摇是由于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内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时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这种动摇具体地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示怀疑，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惧怕少数民族中工作的困难，没有决心在少数民族中进行艰苦的工作。这种动摇具体地表现在对于一、四方面军力量的不信任，不了解一、四方面军会合的伟大意义，甚至根本怀疑到自己部队的战斗力。这种动摇具体地表现在碰到某些困难即表示悲观失望、消极怠工、不负责任与自暴自弃。这种动摇更表现在对于目前时局的估计不正确，怀疑到革命形势的存在，推想到苏维埃运动的低落，因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

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无疑地在部队中存在着，而且部分地生长着，这对于执行党目前的任务是最大的危险，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当前中心任务之一。在这种斗争中必须向每一党

员与红军指战员细心地解释目前的形势与我们胜利的前途，使他们确信苏维埃革命现在虽是遭遇到一些困难，但苏维埃革命必然要胜利。必须使反倾向斗争同最具体的实际工作的转变密切地联系起来，必须在反倾向斗争中，加紧肃反的工作，反对任何对反革命活动的放任和宽恕。

《革命理想高于天》（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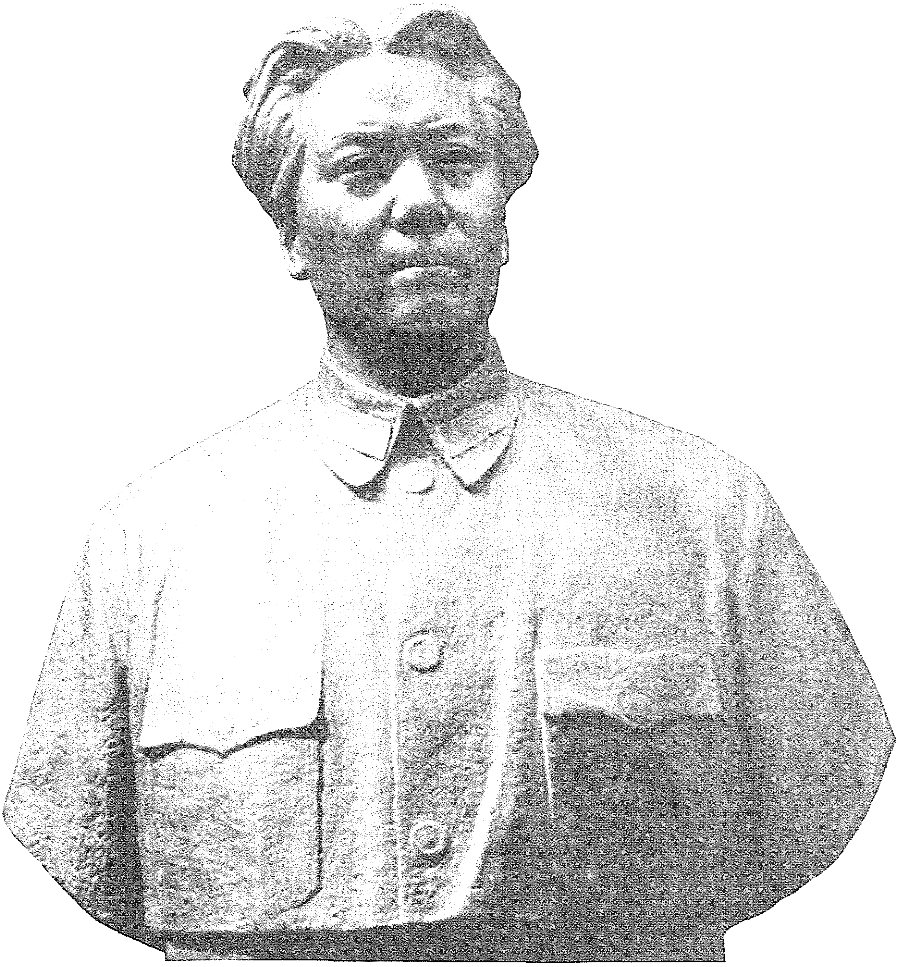
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左”倾的空谈，这种“左”倾的具体表现在拿“吹牛皮”来代替敌我力量的正确的分析。因此便自然造成对目前形势的过“左”的估计，这种“左”的估计的结果，或者是走向轻敌的冒险主义，或者是掩盖自己惧怕敌人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

党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教育我们的党员与红军指战员，冷静地来估计敌我力量的对比与目前的形势。只有这种正确的估计，才能使我们正确地提出党的任务与口号，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拥护真理而反对欺骗。

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教育全体党员与红军指

战员，以一切努力与牺牲来完成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只有对于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迟疑地采取纪律的制裁。

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们相信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及军委领导之下，我们自信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创造川陕甘西北苏区，以争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的胜利。



《红军时期的毛泽东》(雕像)

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1]

（1935年8月20日）

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2]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

---

[1]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2] 岷州，今岷县。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1]

（1935年8月20日）

政治局听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之后，对于六月廿八日“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有如下之补充的决定：

（一）在目前具体的敌我情况之下，为实现六月廿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这个决定，是根据下面的理由和考虑出发的，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这些理由与考虑是：甲、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廿五、廿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这给我们可能在短时期中，迅速造成巩固的苏区根据地，这就能够迅速地形成在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

乙、在敌情上，在这个地区中，是几个军阀的系统，他们虽然联合地向我们进攻，然而存在着自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敌人一般

---

[1] 这个决定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的战斗力之薄弱，及士气之不振，特别是东北军，正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刀锋前从河北调来，以及十九路军改编的士兵，他们中间反帝与不满的情绪，正是我们革命工作顺利的条件，东北军与陕甘部队之缺乏与主力红军作战的经验，敌人一般地远离其军事战略及政治军事之中心地区，凡此等等，都给我们以顺利的条件，在灵活的机动之中，去各个击破敌人，取得重大的胜利。

丙、在居民群众的条件上，这个地区，由于连年继续不断的深涸的农业危机、饥荒、沉重的捐税、土地的集中，迅速地生长着伟大的农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并已开展着反捐税争土地的农民斗争和游击运动，这使我们在当地基本的汉族群众中，能够给这种自发的农民斗争，以组织领导提高其觉悟程度，而走上苏维埃革命的道路，并便利于红军扩大与发展。这给在这个区域居住的及其邻近的非汉族群众（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及建立他们自己人民共和国的运动，以大的激励和推动，并经过我们的帮助、发动、领导，能够迅速争取这个运动，汇流于苏维埃的巨涛之中。

丁、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要。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目前战役之疏忽，与失着，将使整个战略计划之实现困难，甚至失败。因之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的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1]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因为：

甲、非汉族的民族（回、蒙、番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是酝酿与发展着，但是汉族红军之全部地与长期地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党在民族运动中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而绝对不是强制的苏维埃化。

乙、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这一不利的情况，在我们还没有在军事上与政治上保证克服堡垒封锁以前，将是不可避免要到来的。

丙、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显然的，如果我们目前采取这种方针，将使苏维埃与红军遭受着损失，并限制其发展。所以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政治局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以布尔什维克的坚定，以工农红军特有的英勇，团结在中央的路线之下歼灭敌人，实现赤化川陕甘，而为苏维埃中国确立巩固不拔之基础。

---

[1] 指青海、宁夏、新疆。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5年9月1日）

目前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右路军须以主力向前推进，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线为度。

候左路到达，即以一支队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队向文县方向佯攻胁敌，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和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催促张国焘率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红一方面军的工作方针[1]

（1935年9月2日）

现在一方面军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很重要的任务是整理部队。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人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要从头做起，重新开始，军长、师长要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课，可参考在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并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对群众纪律的加强，与扩大红军是成正比例的。为进行整理，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

[1] 1935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若尔盖县巴西召开会议，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左路军应改道北上[1]

（1935年9月8日）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2]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报。1935年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共中央根据“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在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和巴西地区。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要求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批评张国焘关于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的错误主张。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9月9日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分裂和企图危害中央。中央经紧急磋商，决定迅速脱离险区，10日凌晨率领右路军中的第一军、第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2] 左路军，下辖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1]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2]直至懋抚[3]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4]者，仅一磨西面[5]而已。绥崇[6]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7]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8]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9]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

---

[1] 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省小金县。

[2] 康、泸、天、芦、雅、名、邛、大，指四川康定、泸定、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3] 懋，指懋功。抚，指抚边，村名，位于今四川省小金县北部。

[4] 毛儿盖，村名，位于四川省松潘县西部。

[5] 磨西面，村名，位于四川省泸定县南部。

[6] 绥，指绥靖，旧县名，即今四川省金川县。崇，指崇化，村名，位于四川省金川县南部。

[7] 卓克基，位于今四川省马尔康县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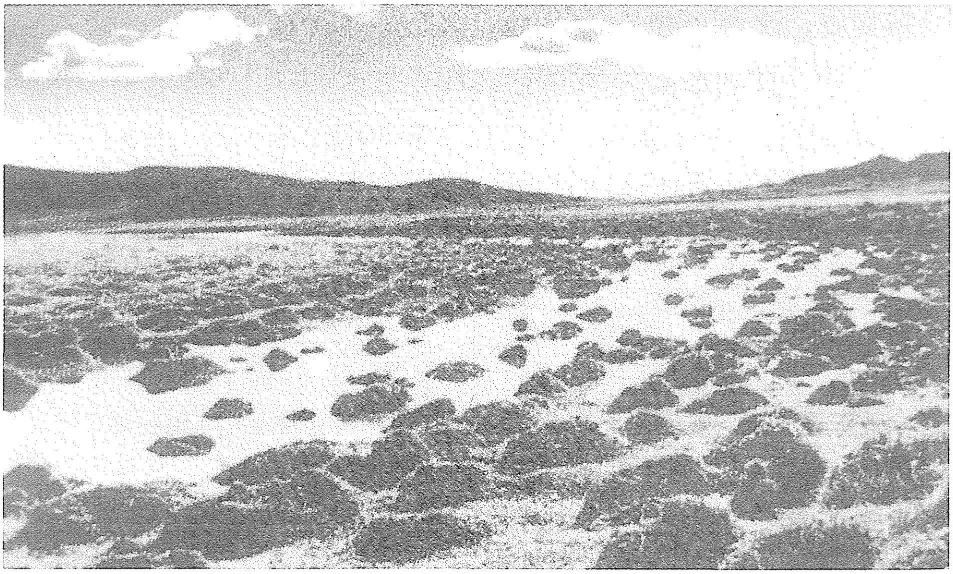
[8] 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与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9] 周，指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军“剿匪”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剿匪”第三路军第三纵队第三军军长。

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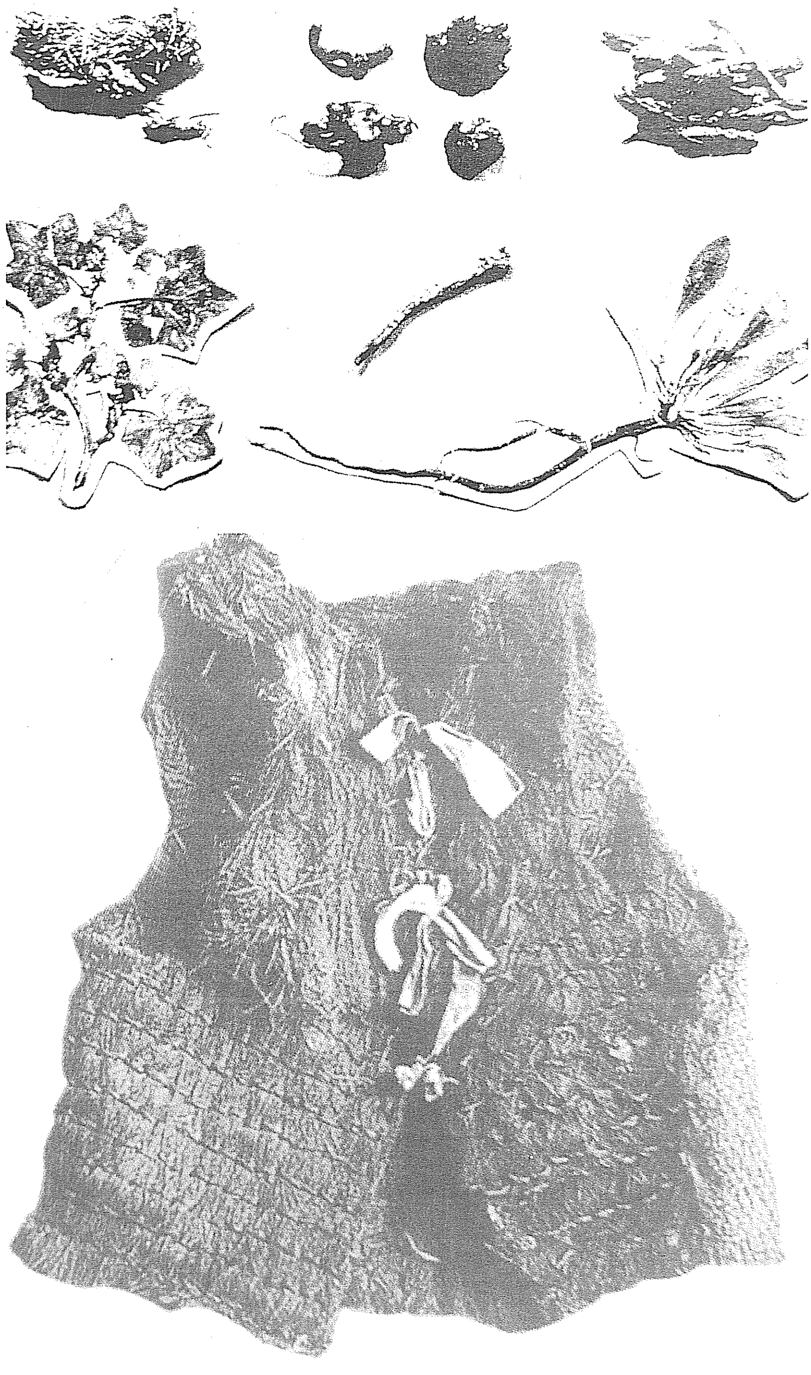
恩来　洛甫　博古　向前
昌浩　泽东　稼蔷[1]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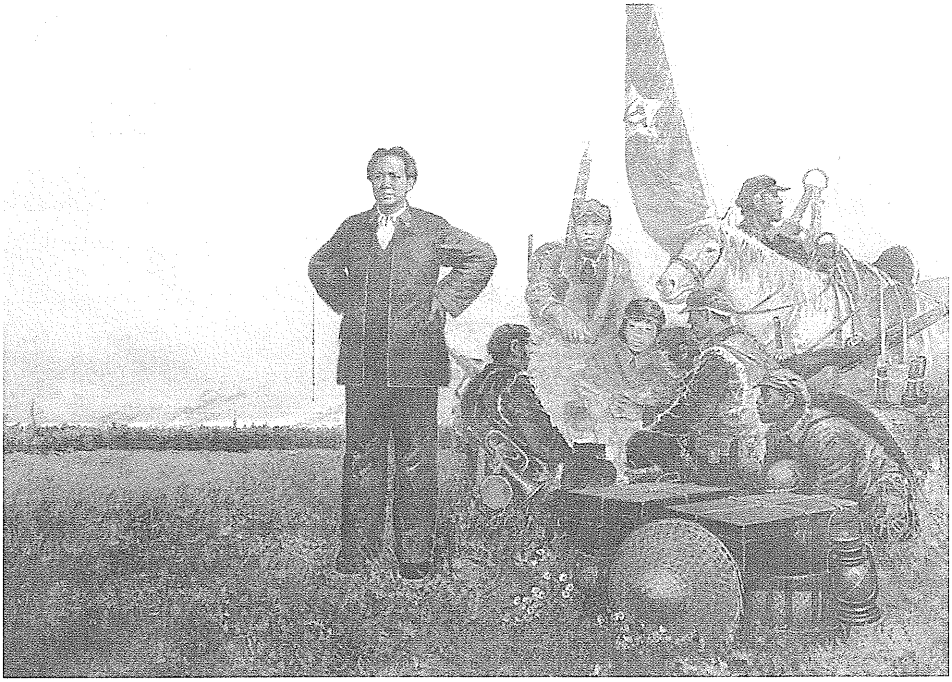
1935年8月下旬开始，毛泽东等率领红军右路军穿过荒无人烟的草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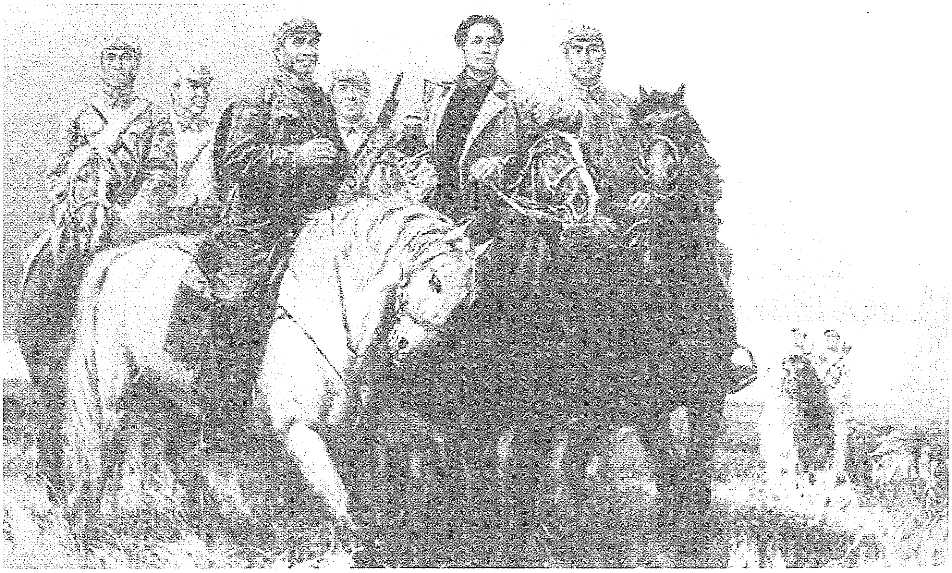
[1]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负总责。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前，即徐向前。昌浩，即陈昌浩。稼蔷，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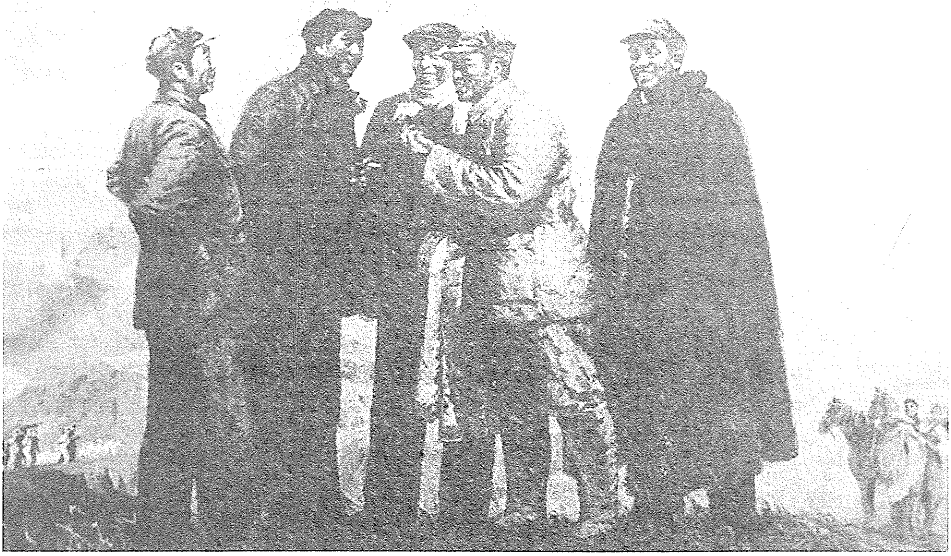
红军长征期间吃过的部分野菜标本和御寒用的棕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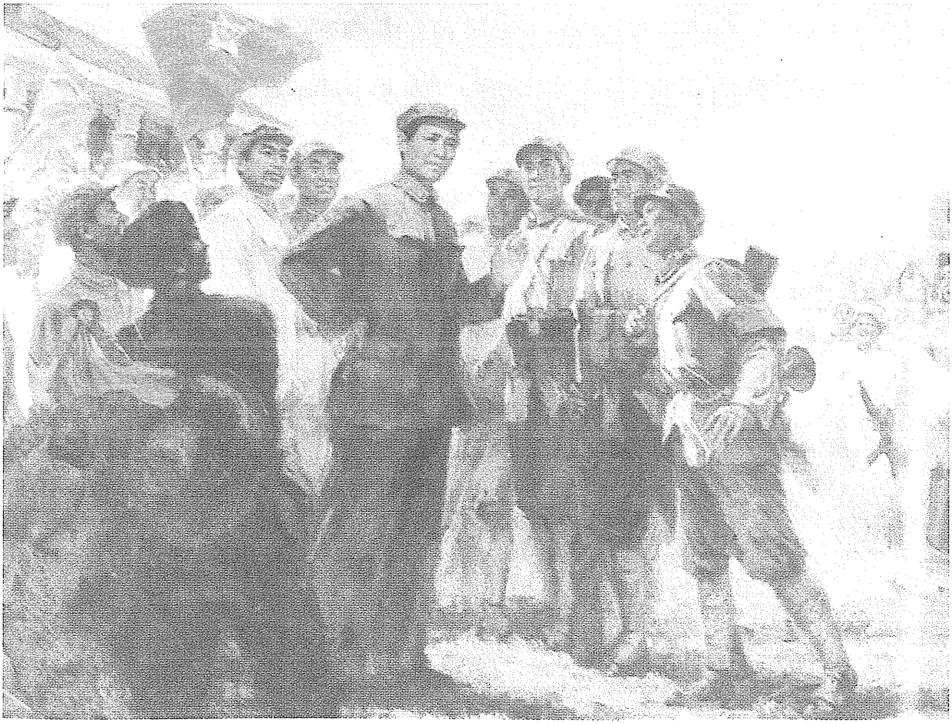
《长征路上》（油画）



《峥嵘岁月》（油画）



《战争年代》（油画）



《迷雾途中见太阳》（油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9月12日）

一

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二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

---

[1]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本篇一是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结论的一部分。

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9月12日）

一

中央常委决定的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请政治局批准。有同志反对这个方针，有他机会主义的方针，代表是张国焘。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是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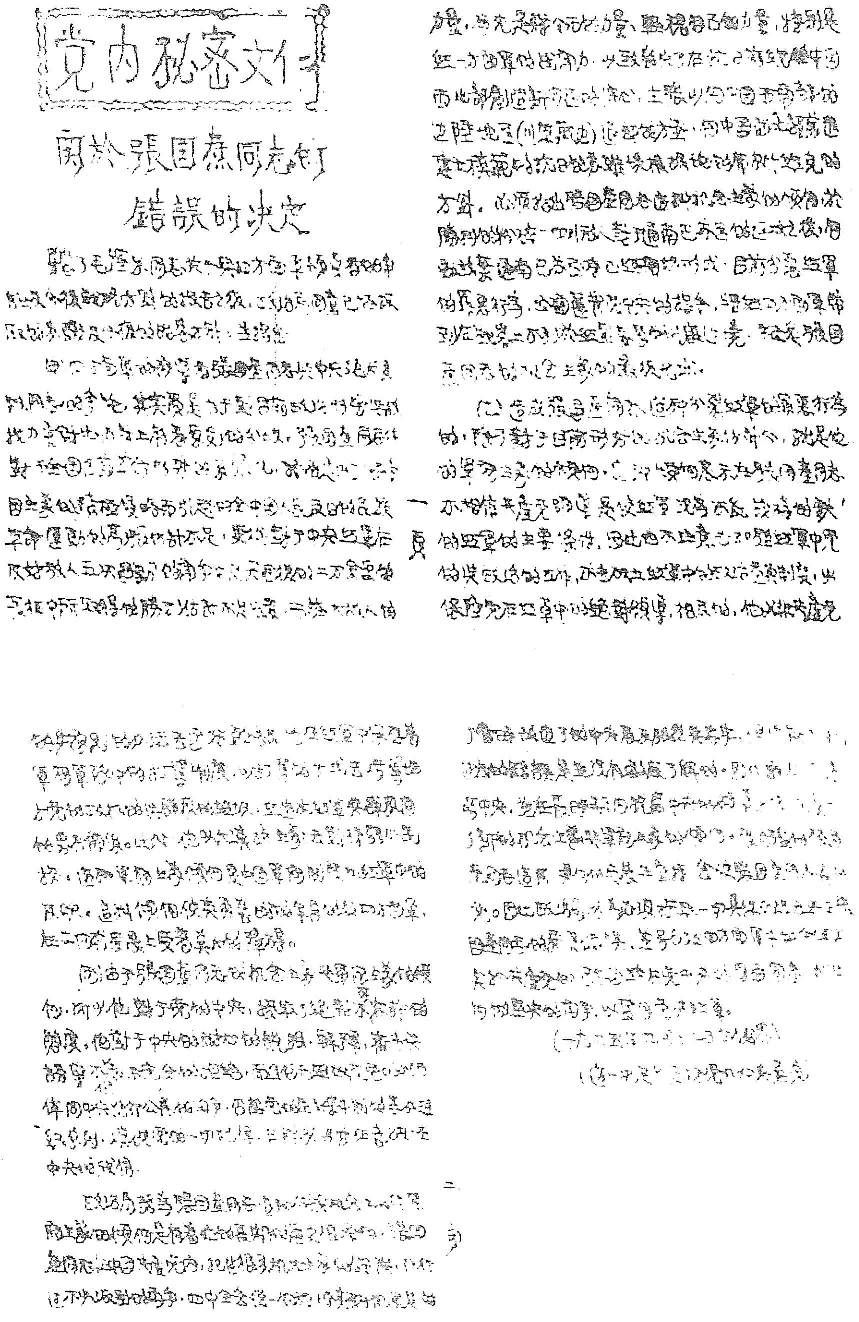
二

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军阀

---

[1]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本篇一是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结论的一部分。

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前所未有的。关于目前的战略方针，同在川、陕、甘创造根据地的计划是有变更的，因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损失。但是我们并不是走向低落，而是经过游击战争，大规模地打过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



党内秘密文件

關於張国焘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1935月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图为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

消灭腊子口之敌的部署[1]

（1935年9月16日）

彭：

1. 顷据二师报告，腊子口之敌约一营据守未退。该处是隘路，非消灭该敌不能前进。似此，三军及军委纵队除派一个团至刀扎里接防并筑工事外，余在黑拉原地不动。我们在黑朵寺[2]不动。各部待命出发。

2. 据夺获敌电称，杨土司[3]有派骑兵千名来黑拉扰乱说，请注意。

3. 每人筹粮十一天。

4. 二局速侦王胡两部。

毛　林　聂

十六日二十四时

---

[1]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随后，陕甘支队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这是毛泽东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给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黑朵寺，即黑多寺，位于今甘肃省迭部县东部。

[3] 杨土司，指甘南土司杨积庆。

部队的行动部署和严整纪律问题[1]

（1935年9月18日）

彭及彭、李：

一、岷敌[2]守城，哈达铺[3]无敌。第一纵队驻地回、汉民众已大发动，我军纪律尚好，没收敌粮数十万斤、盐二千斤。过大拉山后已无高山隘路。现一纵队驻占扎路、麻子川，纵队部驻鹿原里。

二、明（十九）日你们全部开来此间。中央队一科、二科驻鹿原里，二纵队驻漩窝、大草滩，三纵队驻红土坡。

三、部队严整纪律，没收限于地主及反动派，违者严处。请在明日行军休息时宣布。

四、缴获手提迫击炮三门，炮弹百余发，尚在大拉。请动员战士带来，可抛弃粮食拿炮弹。

毛

十八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及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的电报。

[2] 岷敌，指当时据守甘肃省岷县的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唐淮源部和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

[3] 哈达铺，镇名，位于今甘肃省宕昌县西北。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1]

（1935年9月20日）

一

组织部应该调查了解干部，要了解连以上干部。我们现在只了解高级干部，中下级干部还不了解。为了巩固部队，需要了解干部；为了扩大干部，需要支配干部；为了与反革命作斗争，需要了解干部的一些倾向问题。组织部需要了解下层情形，这是组织部的主要工作。要把教育工作包括在组织工作之内。此外，对地方工作，组织部也应该给予帮助。

二

“编余”二字不大好。对于一些工作上需要的，就是编制上没有，也应该写上。我们应该承认，过去对干部的优待不够。现在的干部是精华，应该注意保护。

---

[1] 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宕昌县哈达铺召开。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讨论组织部工作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编制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1]

（1935年9月20日）

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的一部分。

部队宿营位置及三日行动部署[1]

（1935年10月2日）

林、聂，彭、李，叶、邓：

（一）本日宿营，一纵队在寺子川、鸡口场之线，三纵队及支队部在距陇西川二十里之处，二纵队大约在陇西川与义江川之间。（二）据林、聂报：敌二十四师一个旅到蔡家铺（本日被我击溃之连），另一团在其后，似八师全部在马营、定西之线，静宁有邓宝珊（新一军）一部。（三）明（三）日，一纵队应由聂、陈率两个大队走右路，进至宋家沟，侦察静宁情况，并准备后日进至常家七。控置〈制〉静宁通固原大道的南端，以利全军向固原转进。林率其余走左路，进至高家铺、界石堡[2]。支队部及二、三纵队均进至清江益。（四）硝河城、固原一带均回人区域，各部队从三号起须带足十七天粮食，无粉则带麦子，在汉人区域发动部队挖窖筹款。（五）各纵队注意收容落伍人员。

彭　毛

二日十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给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和政治委员邓发的电报。

[2] 界石堡，今名高界。

近日各纵队的工作[1]

（1935年10月3日）

林、聂，彭、李，叶、邓：

（一）我一、二、三纵队本日到达清江益、界石堡、高家铺之线，支队部到界石堡。明（四）日，除一纵队之两个大队外，其余一纵队主力、二纵队、三纵队及支队部均各在原地休息一天，进行纪律教育，打土豪筹粮食，准备后日向常〈单〉家七〈集〉、硝河城之线前进。（二）一纵队应以两个大队附电台由聂、陈率领，于明（四）日经圣庙到达延家庙地域（在静宁北三十里），调查隆德情况并准备后天向隆德前进相机袭取之，以利我军向平凉、绥远川、镇原、西峰镇之线前进。（三）敌八师在马营，二十四师在蔡家铺并有回援静宁讯，静宁住邓敌一部，隆德、平凉不明，但似无多敌。

彭　毛

三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给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治委员邓发的电报。

日内无急于求战之必要[1]

（1935年10月6日）

彭：

十七时电[2]悉。两三日内无急于求战之必要。明（七）日我们由张易堡，你们由马莲川经张易堡均向青石咀东进。张易堡北去固原六十里，西去马莲川三十里，东去青石咀五十里，南去隆德五十里。

毛

六日二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35年10月6日17时30分彭德怀给毛泽东、林彪、聂荣臻的电报。电报除通报敌情外，建议陕甘支队相机袭取固原之敌。

陕甘支队近期行动部署[1]

（1935年10月6日）

彭，彭、李：

一、一纵队全部本日十四时到达张义铺附近宿营，行程七十里。张义铺去固原、去硝何〈河〉城均六十里。据群众说，固原有敌三十五师两营，待证。你们现到何处，敌情如何，即告。二、据昨日在先圣庙追敌后归之一大队报，昨下午先圣庙附近到敌应是二十四师主力或一部，该敌本日有到十字路可能。三、我军以从固原、镇原之间向环县方向转进，选择适当时机、地点与追敌作战之目的，明（七）日一纵队以陈光率十三大队在张义铺西南十五里之黄父子湾扼阻追敌，掩护二、三纵队通过张义铺作为后卫跟进，主力经固原城附近进至固原南端四十里之青石咀宿营（如固原敌小则袭取之）。第二、第三纵队明日应经张义铺向青石咀方向前进，里程及宿营地查明即告。四、望利用电报线与我们通话。

毛　林　聂

六月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给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富春的电报。

通过洪德城环县时须做战斗准备[1]

（1935 年 10 月 13 日）

彭：

（一）一纵队本日行七十里左右到达苗家庄、郑家湾、小南沟之线宿营。明（十四）日拟经河连湾到洪德城及其以东地区宿营。

（二）二、三纵队明日应经河连湾南端进至洪德城东南地区宿营。

（三）据十二日由环县来人称，环县有敌三十五师两团，曲子镇有敌多少不明。该日晨环县尚未到骑兵，但昨今两日骑六师有到达可能。至追我之敌，今日可能到毛家川、连家川之线。

（四）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毛

十三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致彭德怀电[1]

（1935年10月14日）

二、三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明日到耿家湾（不含）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一纵队取平行路东进。[2]

---

[1] 这是毛泽东在洪德城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关于陕甘支队通过洪德城的情况，毛泽东在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二点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

部队争取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1]

（1935年10月16日）

彭：

（一）敌情无新得。

（二）一纵队本日行五十里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明（十七）日拟进至铁边城、吊掌、田百户之线约五六十里，后日则向吴起镇[2]进。

（三）二、三纵队明日应向金汤镇[3]进。在敌情许可下，每日行五十至六十里，准备以三天至四天行程到达金汤镇。

（四）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4]、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

（五）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毛

十六日十九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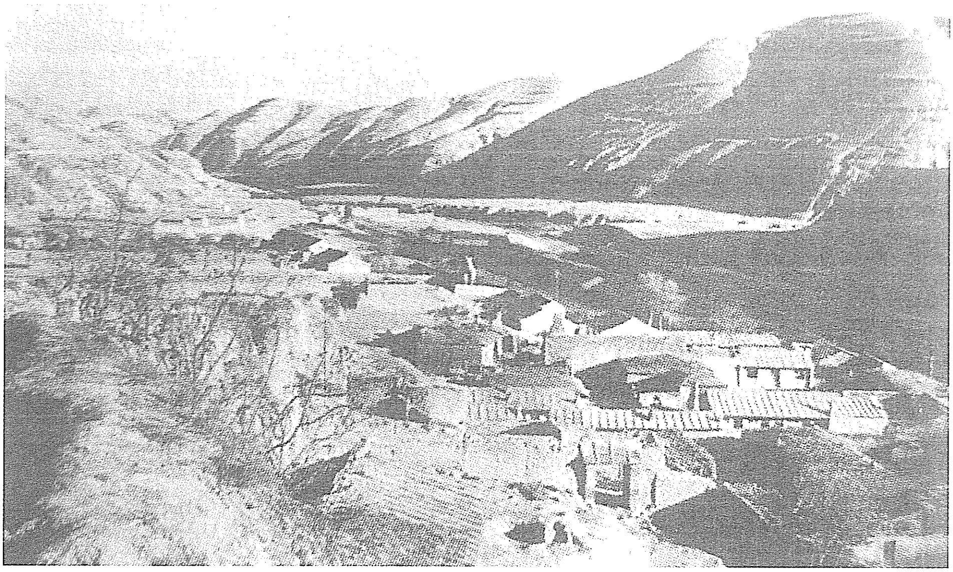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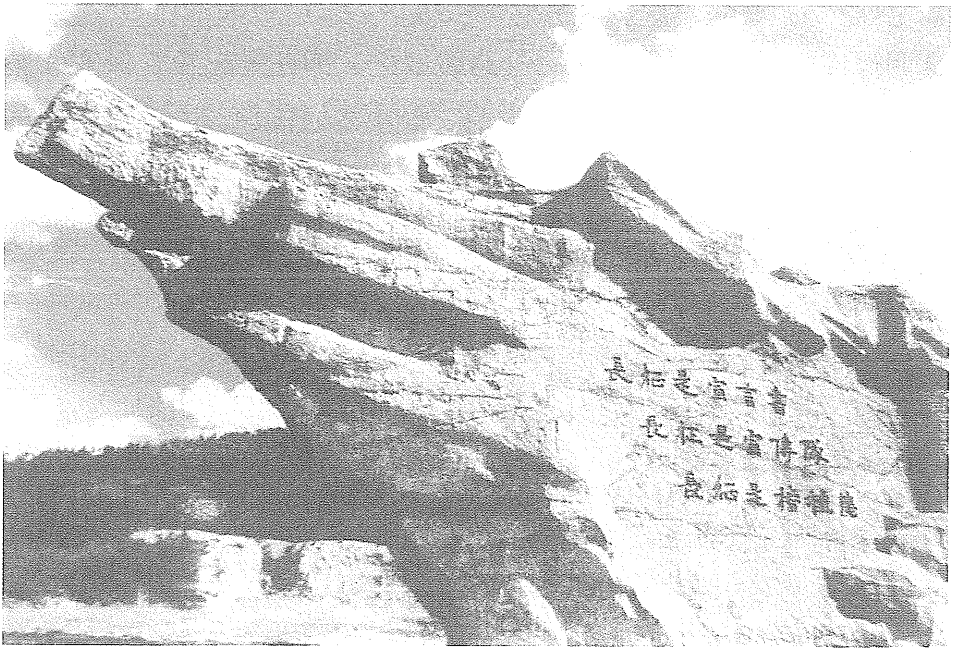
[2] 吴起镇，今名吴旗镇，为陕西省吴旗县县治。

[3] 金汤镇，位于今陕西省志丹县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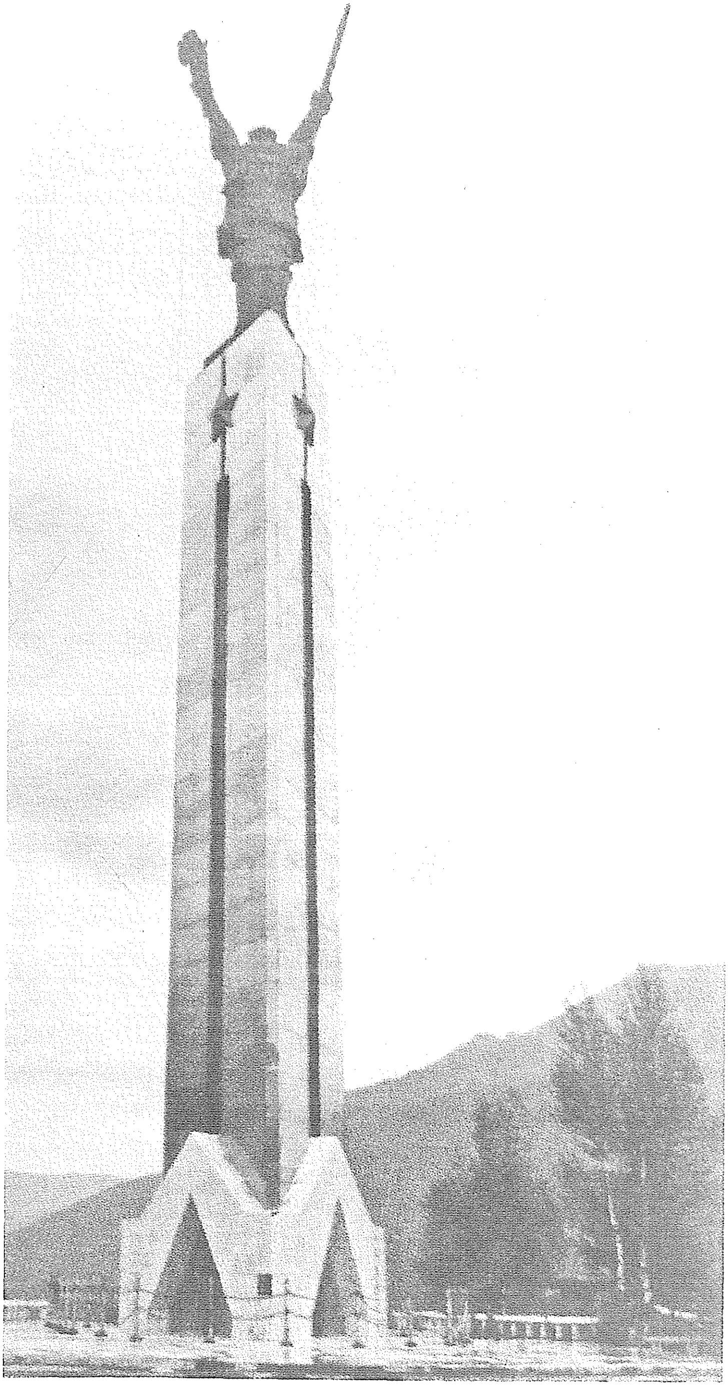
[4] 保安，旧县名，即今陕西省志丹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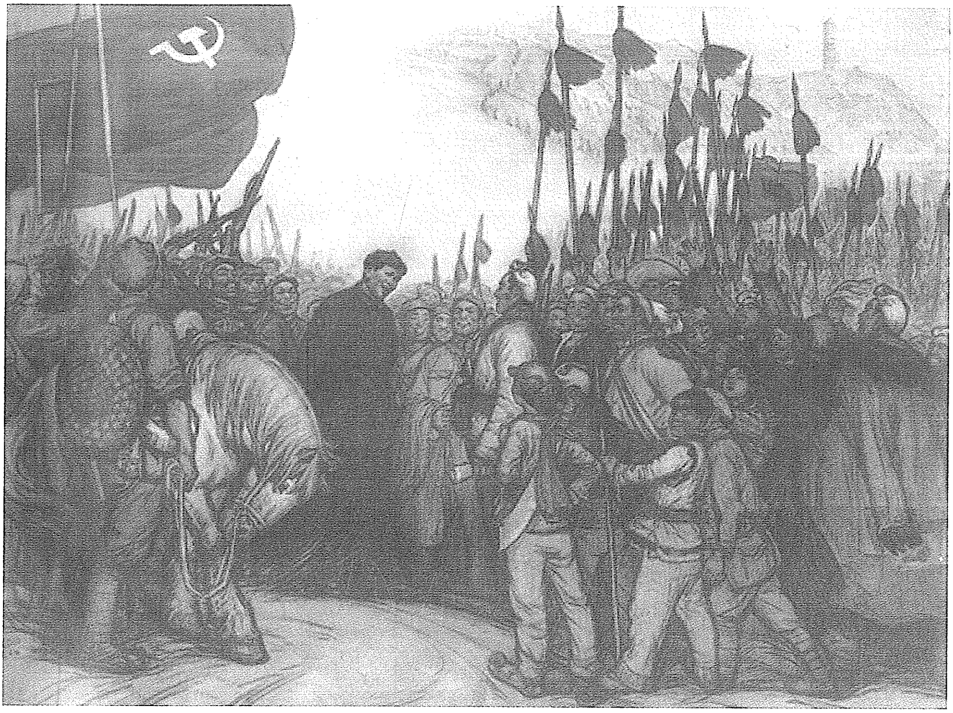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长征胜利结束。图为吴起镇全景。


長征是宣言書
長征是宣傳隊
長征是播種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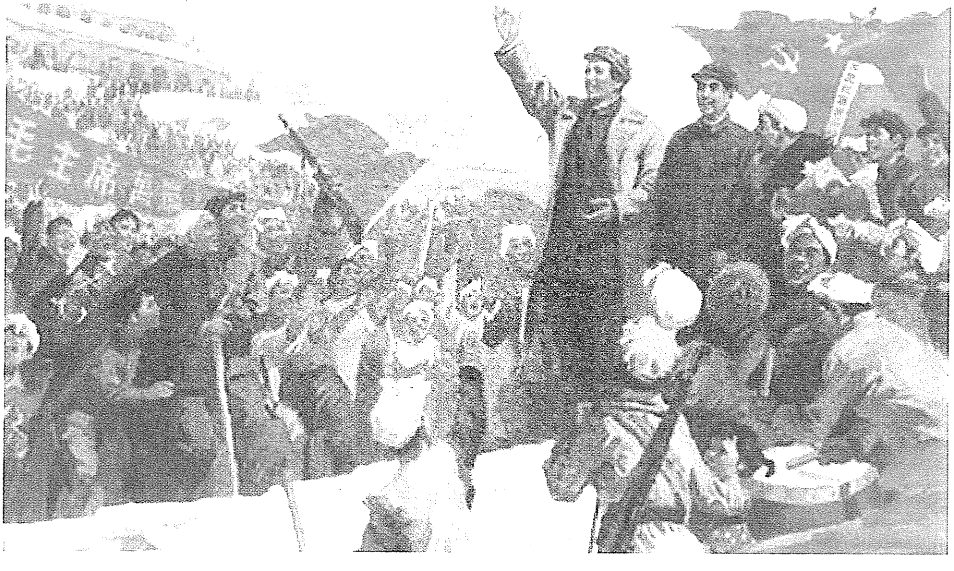
吴起镇的火炬碑文。



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毛主席在陕北》（素描）



《吴起镇会师》（油画）

拟在铁边城以东地区消灭追敌[1]

（1935年10月17日）

彭：

（一）一纵队本日由木瓜城出发，进至离铁边城四十里之牛圈圪坨一带宿营。

（二）毛炳文令陶峙岳[2]进至环县、洪德城之线整理待命，其骑兵团仍令其尾追侦察。本日十四时，我后卫大队在木瓜城东端高山与敌接触，似即其骑兵团。

（三）如该敌续追，拟于后日在铁边城以东地区回击消灭之。

（四）为准备后日作战，一纵队明（十八）日拟进至铁边城以东之张家湾、杨家庙台之线宿营，后卫则在铁边城。后日以后卫部队引敌跟进，主力则从道侧突击之。

（五）二、三纵队明日务相当靠近一纵队宿营（史家河、阎家崾岘之线），以便后日协同消灭该敌。

毛

十七日二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毛炳文、陶峙岳，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和第八师师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10月18日）

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由司令部、政治部发一训令下去：第一，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第二，与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扩大红军，组织游击队；第三，解决物质器材问题、衣服问题，自己解决，不要麻烦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

---

[1] 1935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陕甘支队的行动部署[1]

（1935年10月19日）

彭司令员：

（一）一纵队本日到吴起镇[2]及其前后十五里宿营，明（二十）日以准备作战姿势在此休息一天，对来敌筑工事警戒并派队向来路游击。

（二）二、三纵队明日宜靠近吴起镇，在其以南二十里左右地区宿营。

（三）吴起镇已是苏区边境，此地以东即有红色政权，保安城[3]闻有红色部队，但吴起镇、金汤镇[4]之间之金佛坪有地主武装百余守堡，拟派队消灭之。

（四）明日请彭来吴起镇商行动方针，二、三纵队交叶邓[5]指挥。

毛

十九日十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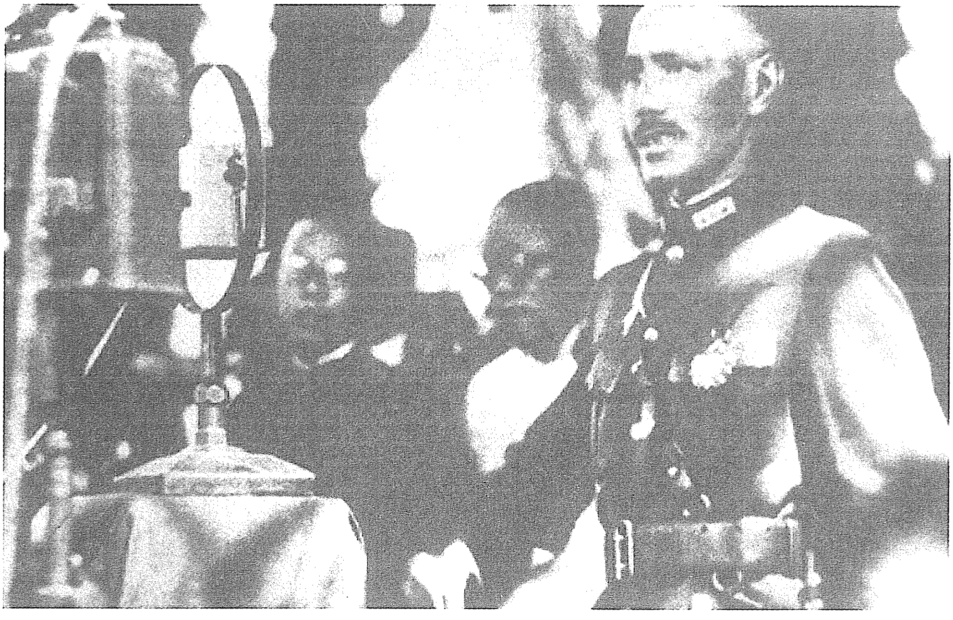
[2] 吴起镇，今名吴旗镇，为陕西省吴旗县县治。

[3] 保安城，原保安县城，今为陕西省志丹县县治。

[4] 金汤镇，位于今陕西省志丹县西部。

[5] 叶邓，指叶剑英、邓发，当时分别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35年，陕甘支队和红十五军团部分领导人在会师后的合影。



1935年10月27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部署“督剿”红军。图为蒋介石在西安城南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话。

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5年10月21日）

林、聂：

一、本日已将敌卅五师骑兵团全部击溃，缴获正清查中。二、敌毛炳文军主力尚在廿里铺、洪德城之线及其以东地区，距我约三四日行程，但其先遣兵力步、骑各一团则距我较近。□镇、铁角城到有奉军一部。三、我军坚决准备消灭毛炳文先遣兵力及求得整理之目的，明（廿二）日：甲、一纵队移至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宿营，派队向两川上游侦察。乙、二纵队在杨城子及吴起镇原地休息，派队向头道川（河流名）上游侦察。丙、三纵队在宁邑川原地休息。丁、支队直属队在吴起镇。四、准备廿三日再休息一天。五、加紧筹足三天粮食。六、加紧进行教育，解释支队训令。

彭　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10月22日）

一

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期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要极大地注意同西北同志的关系，应以快乐高兴的态度和他们见面。当前世界革命进到新的阶段，帝国主义到处冲突。日本帝国主义独占华北，反帝运动高涨，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陕北群众急需革命，这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条件。粉碎敌人“围剿”还要有好的领导。

二

结束一年长途行军，开始了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提高战斗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本篇一是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结论的一部分。

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质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要加强白区、白军工作和游击工作的配合。要尊重地方群众的意见，不要自高自大地压制他们。动员群众主要依靠地方工作，不依靠他们没有办法。

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10月25日）

（一）胜利地到达目的地，一年来的奋斗能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是由于党的领导正确。（二）目前革命形势已到拂晓。（三）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致朱德等电

（1935年10月27日）

朱、张，徐、陈：

（甲）廿六日电悉。我一、三军在中央个别直接领导下，自九月十日由川甘边出发，经过四十天横扫甘肃全省，行程二千余里，于十月廿日安任〈全〉到达陕北苏区。沿途击溃鲁大昌第十四师，许克祥第廿四师，奉军骑兵第三师、第六师、第七师（这些骑兵战斗力极弱往往一击即溃）及马鸣〈鸿〉宽〈宾〉之第卅五师，俘虏缴获人马枪械统计在三千以上，得到回汉民众的热烈拥护，坚持了而且达到了党的战略任务。在陕北苏区西起甘边，东批〈毗〉黄河，北到长城，南至甘泉、耀县，已成为长〔江〕以北第一个大苏区。部队有廿六、七两军，为拥有广泛的游击队，有进步地做群众工作，自与廿五军会合后，消灭奉军一师，昨日又在甘泉附近消灭奉军两团。我一、三军正与蓝〈其〉会合大举进攻中。（乙）自我军接近陕北时起，蒋介石亲自任陕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付〈副〉之，除蒋、杨一团〈部〉外，奉军共出兵四十余团，现围绕我陕北苏区，此在□□□□以上。我们正在中央的领导下，动员苏区广大民众，配合廿五、廿六、廿七军行动。

洛浦　泽东　荣臻　富春

二十七日十五时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5年10月27日）

部队减员，队伍虽小，但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现在环境改变，二万里完结，将来再不会有二万里，应向干部解释发展前途。

二十五、二十六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杨虎城、孙蔚如[2]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予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围剿”。要在严冬之前粉碎敌人“围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部队工作和关于陕甘支队南下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七律[1]·长征[2]

（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3]
乌蒙磅礴走泥丸。[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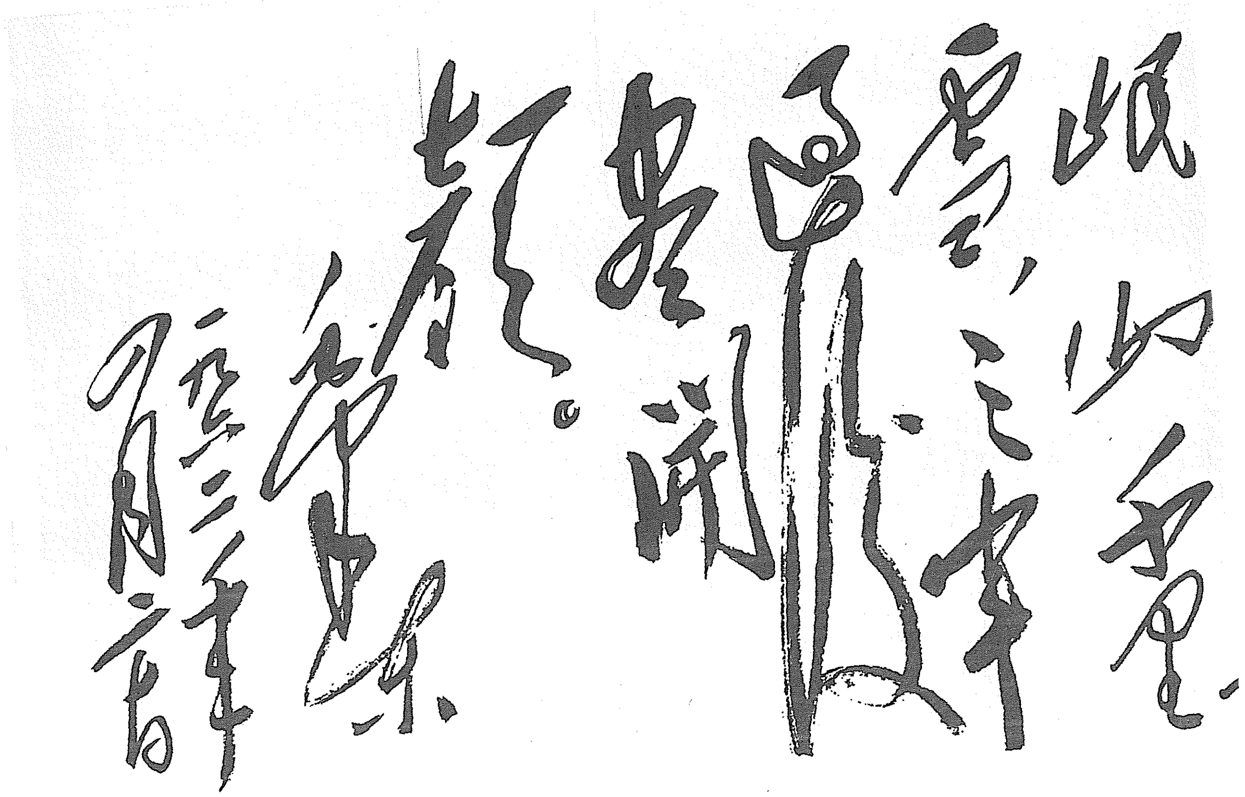
---

[1] 七律，七言律诗的简称。七律是律诗的一种，每篇一般为八句，每句七个字；偶句末一字押平声韵，首句末字可押可不押，必须一韵到底；句内和句间要讲平仄，中间四句按常规要用对仗。

[2] 长征，1934年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这首诗和《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都是在长征取得胜利时所作的。

[3] 五岭逶迤腾细浪，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绵延（“逶迤”）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福建、江西出发，沿这四省边境的五岭山道，越过敌人封锁线，向西进军。“腾细浪”是说险峻的五岭绵延起伏，在红军眼中只像水面吹起的细小波浪。

[4] 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绵延在贵州、云南两省之间，气势雄伟（“磅礴”），在红军看来也只像滚动着的泥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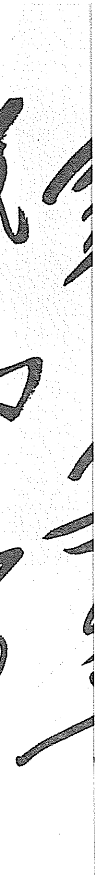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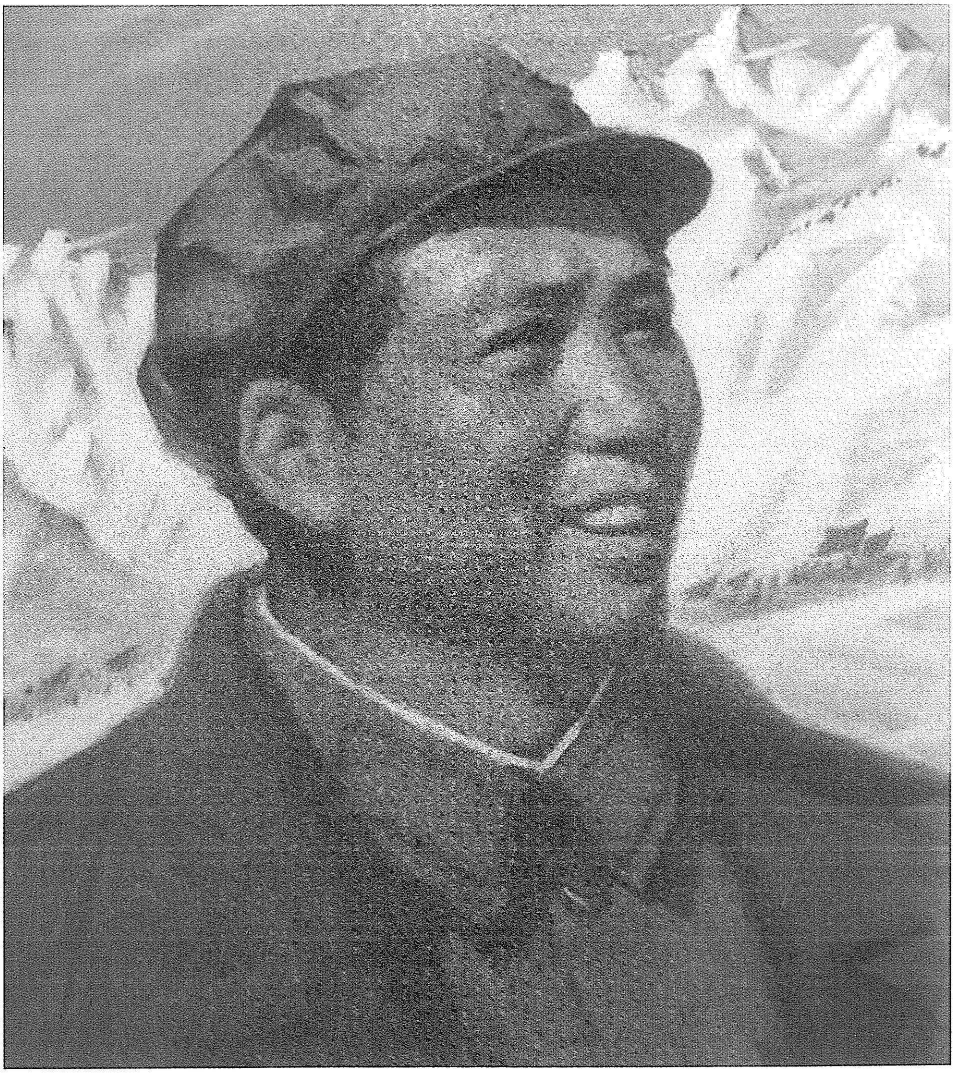
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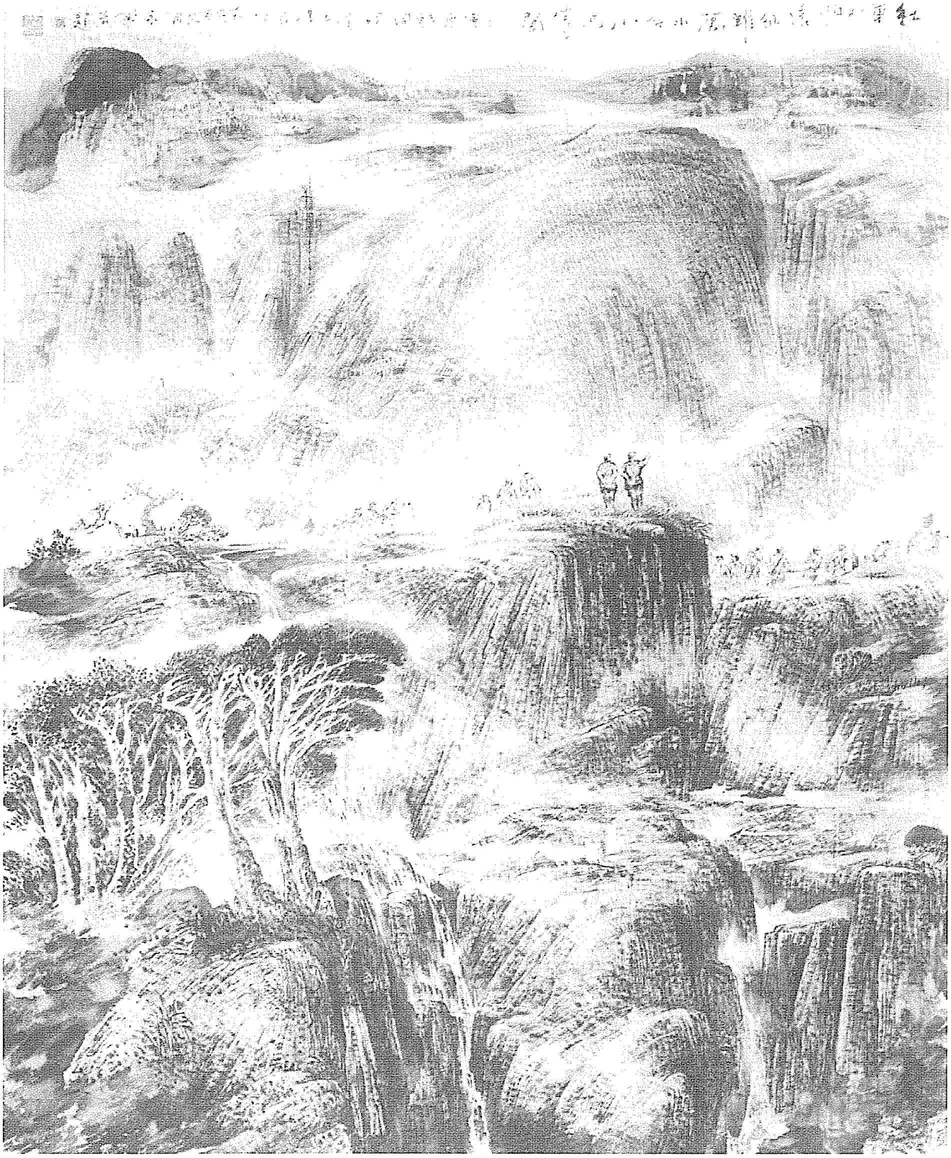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毛泽东手书《七律·长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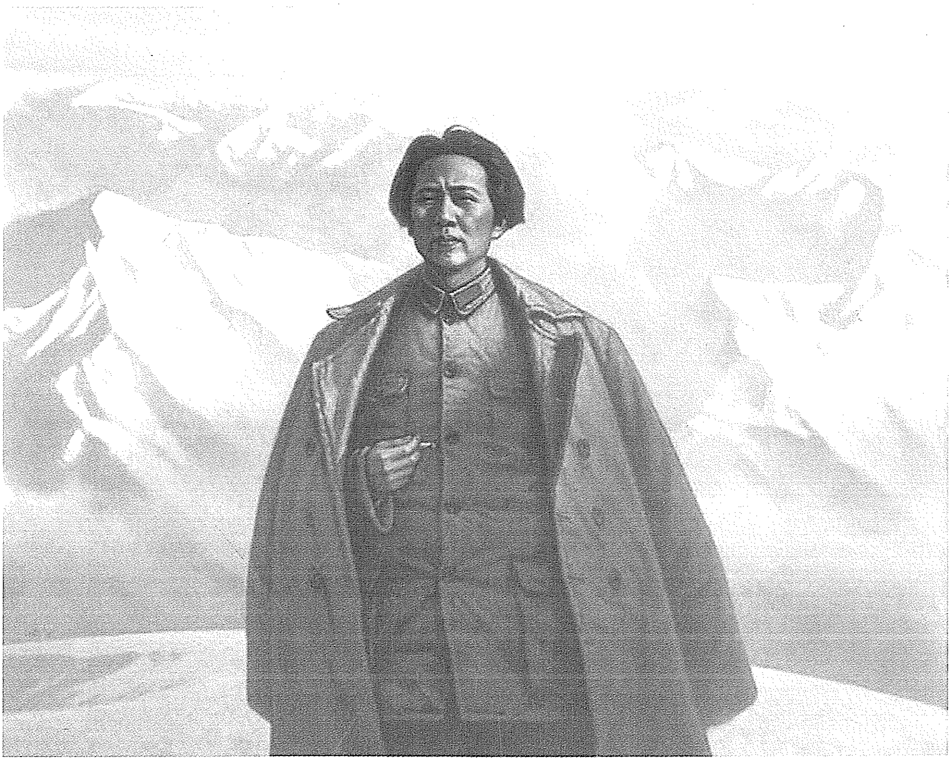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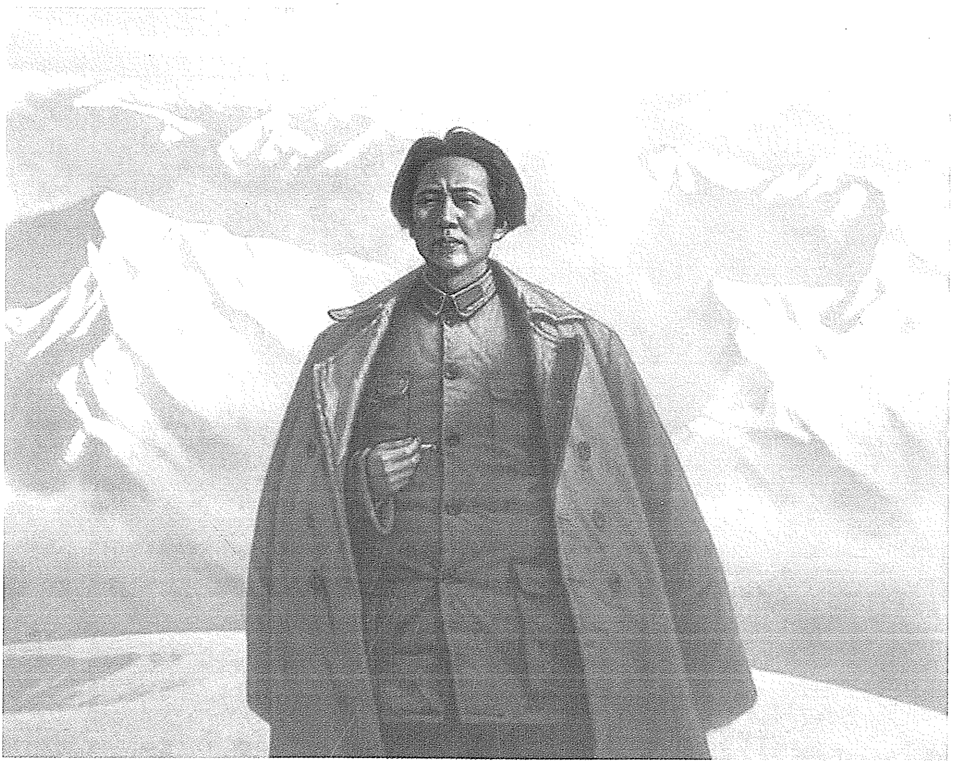


《红军不怕远征难》（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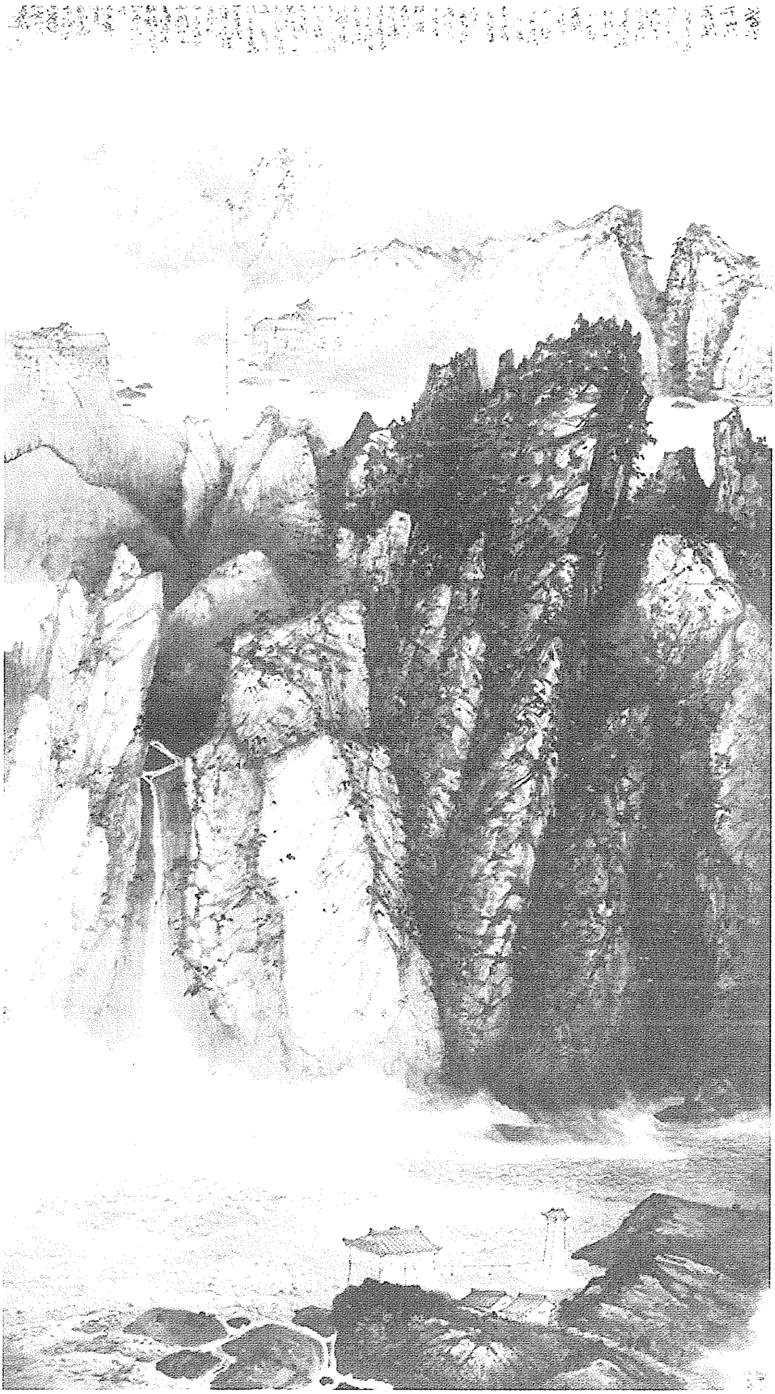


《万水千山只等闲》（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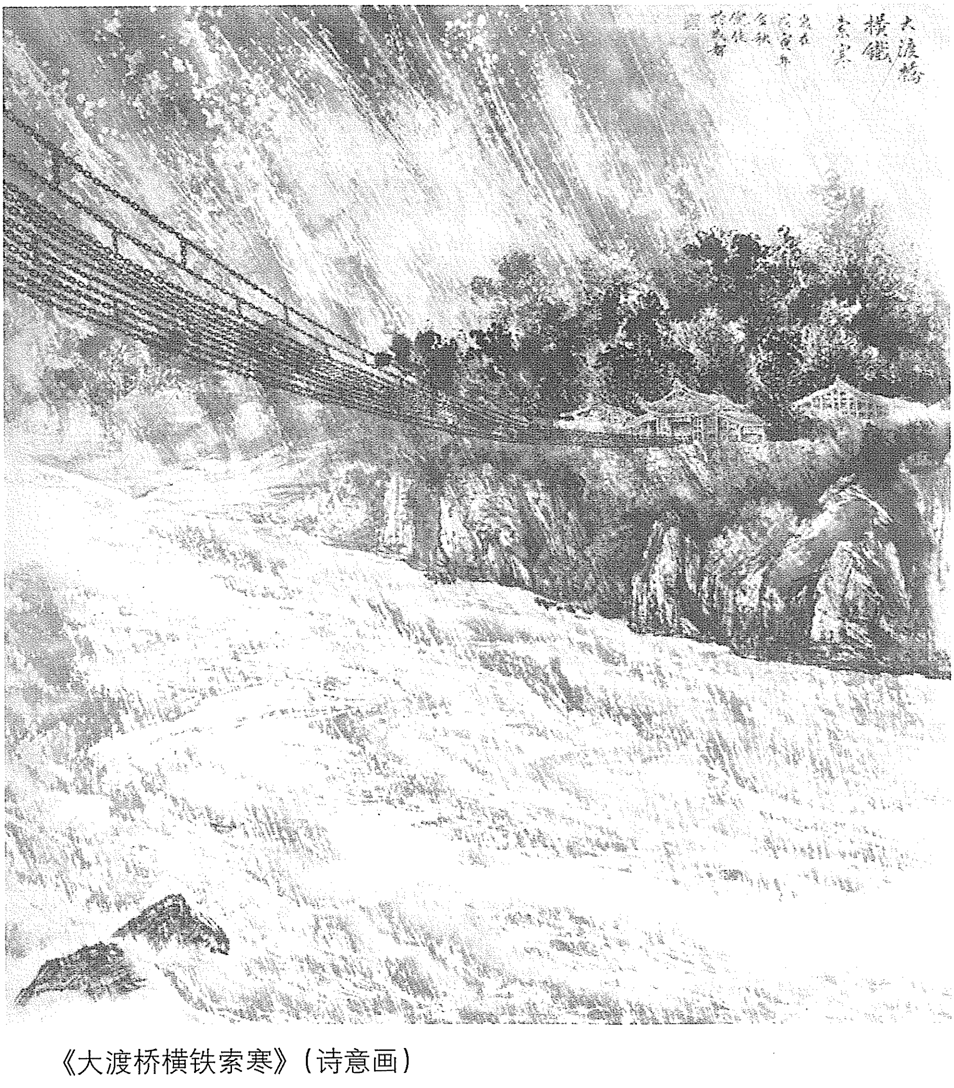
《红军不怕远征难》（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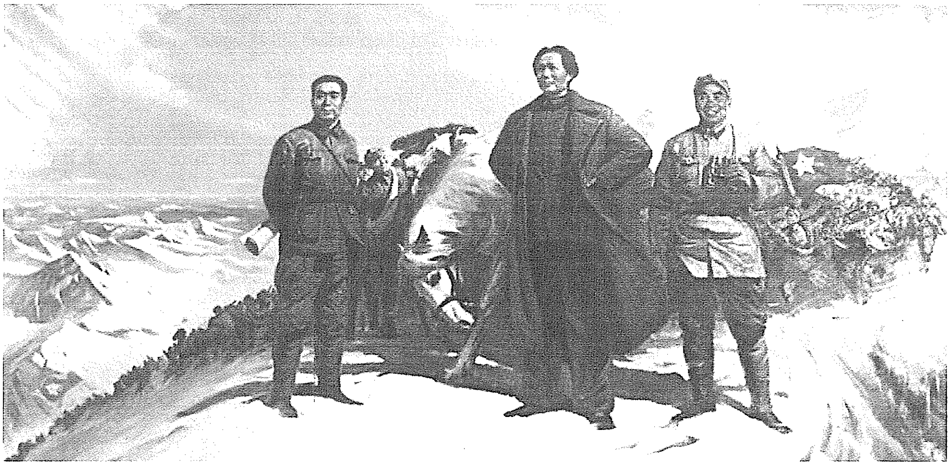
《万水千山只等闲》(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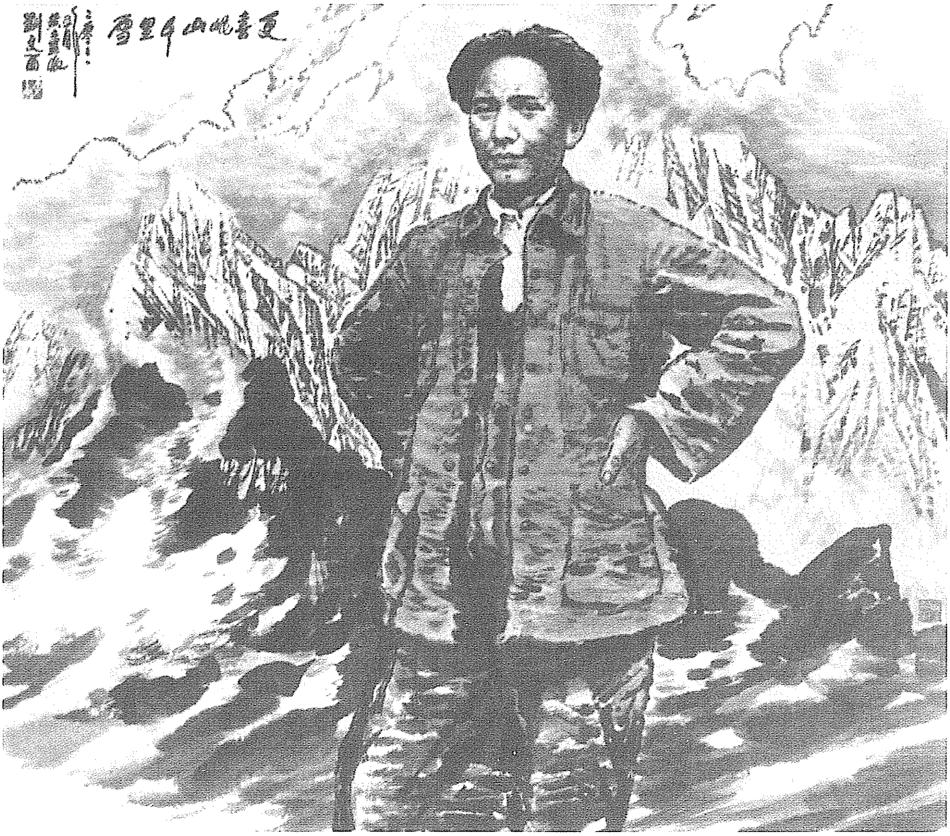
《万水千山只等闲》（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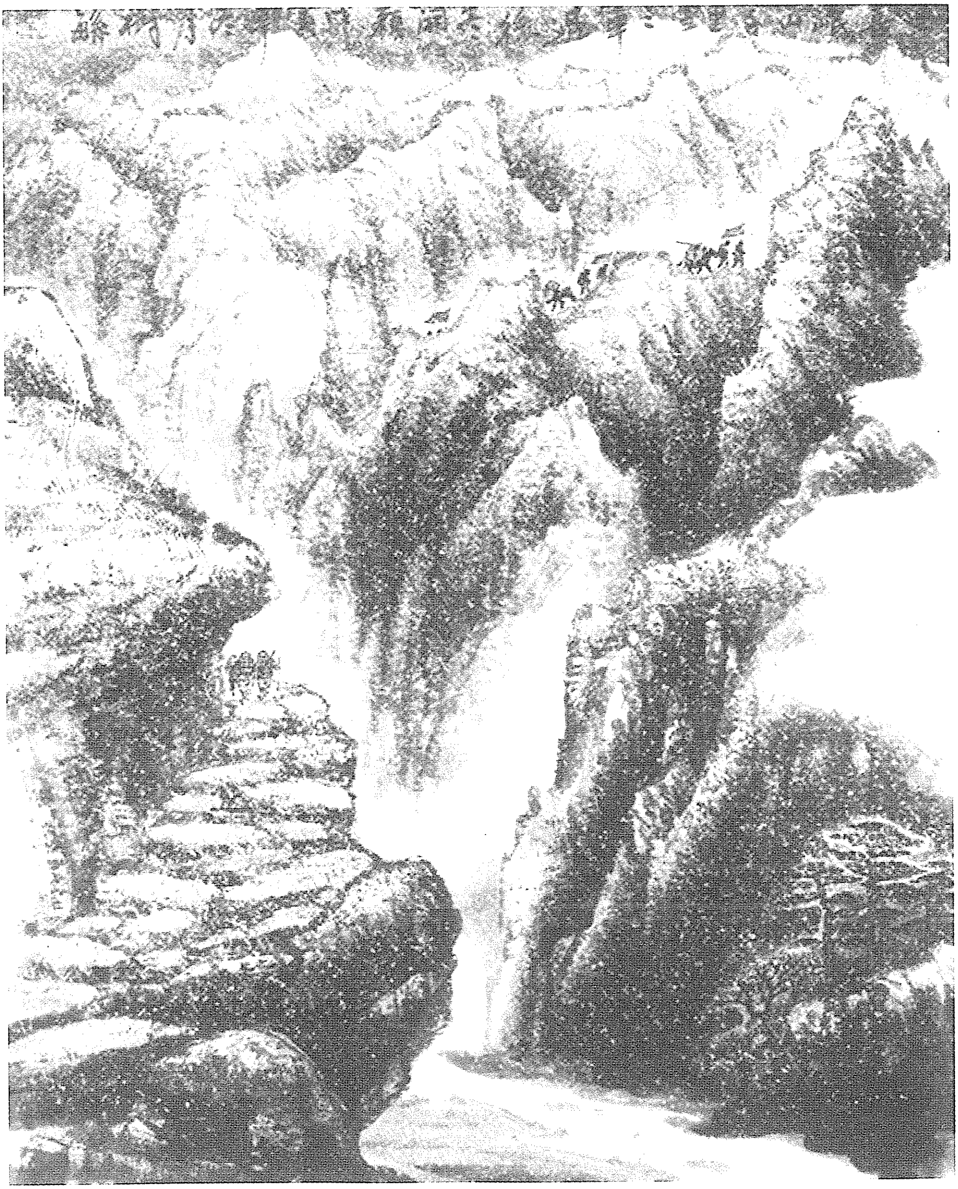
《大渡桥横铁索寒》（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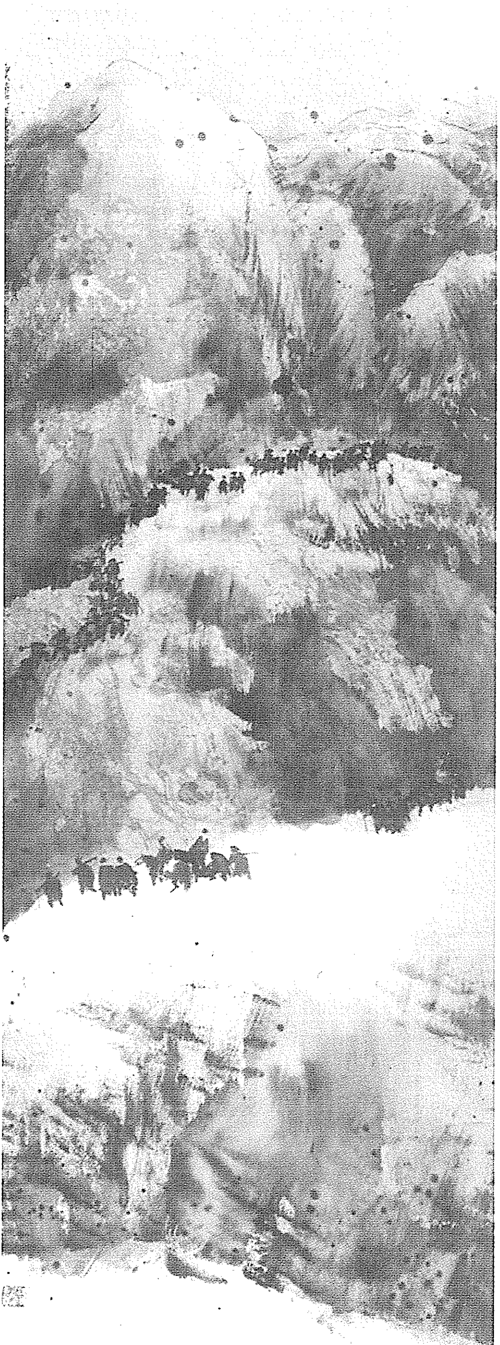
《更喜岷山千里雪》（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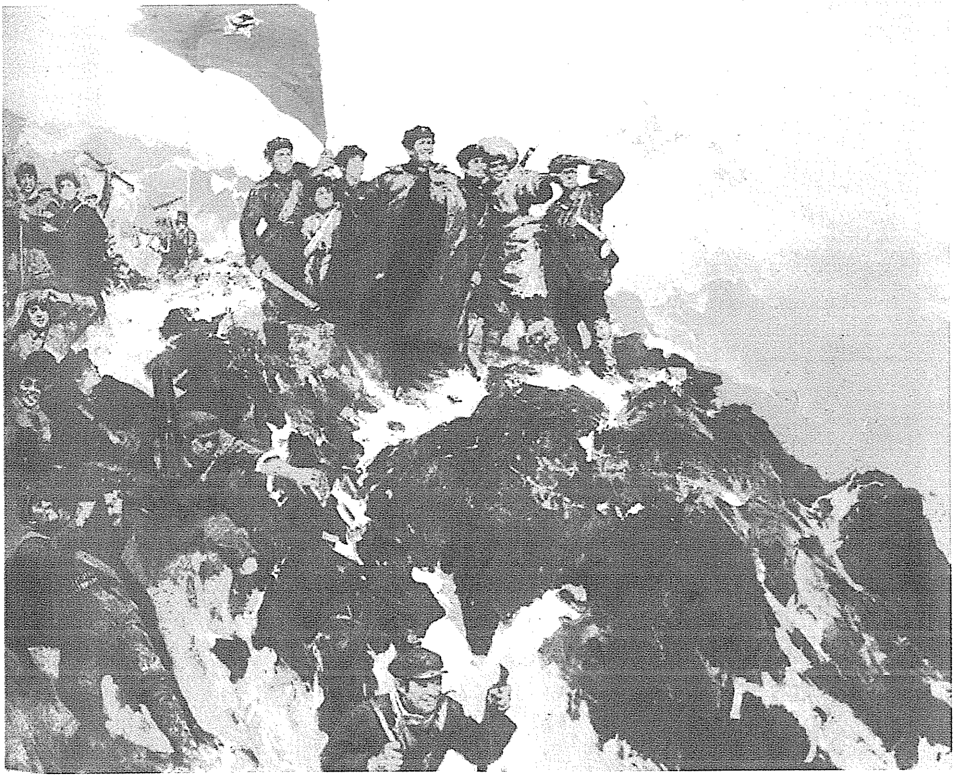
《更喜岷山千里雪》（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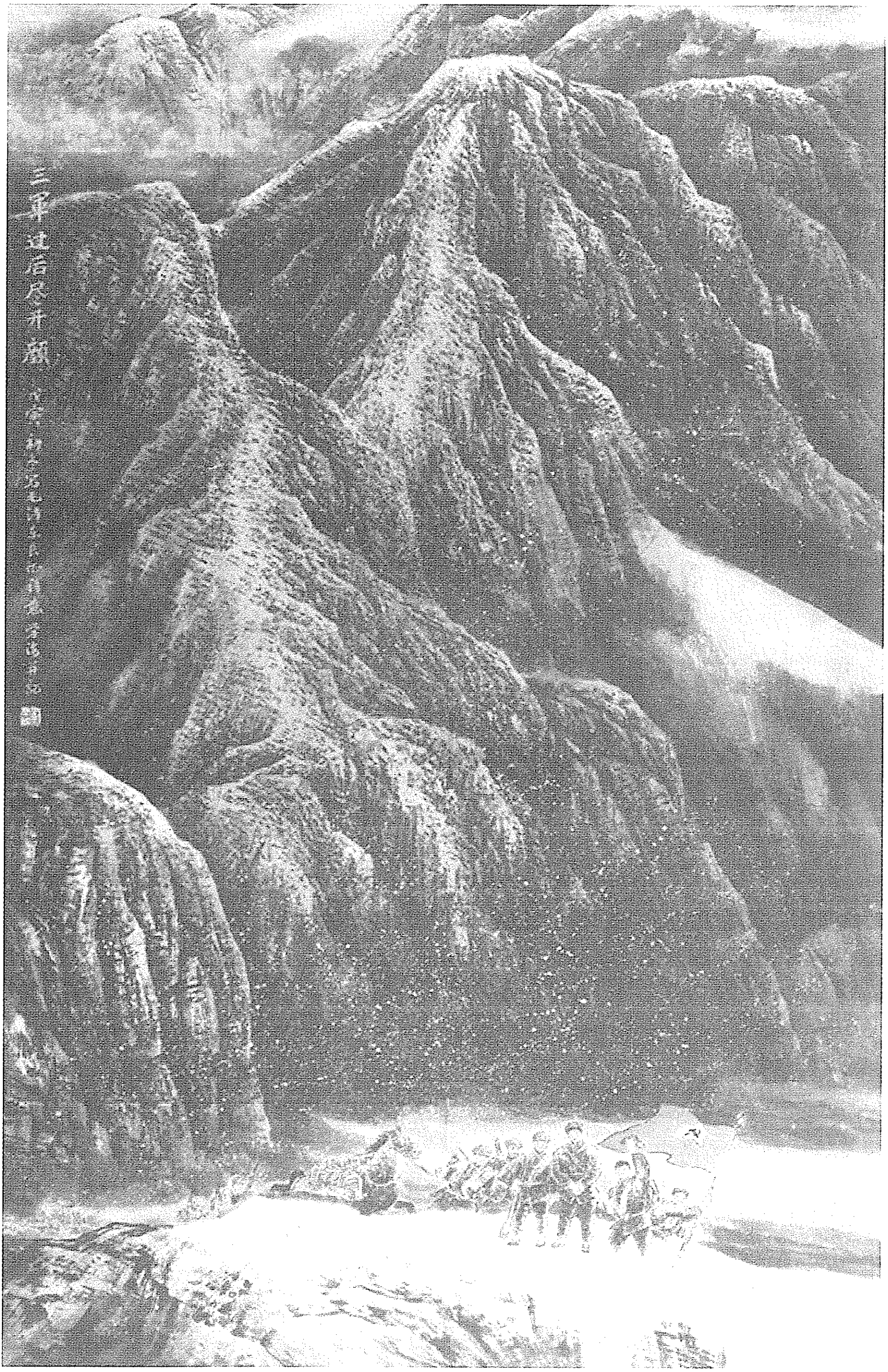
《更喜岷山千里雪》（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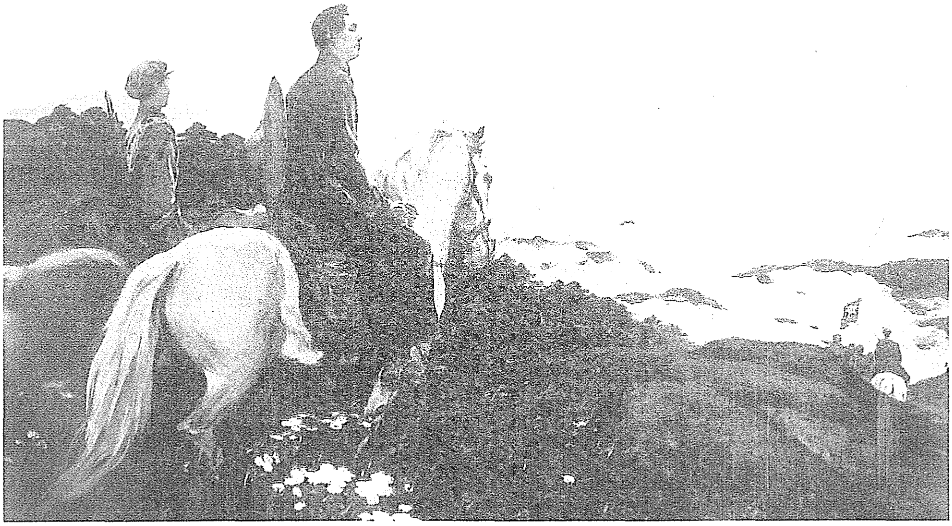
《更喜岷山千里雪》（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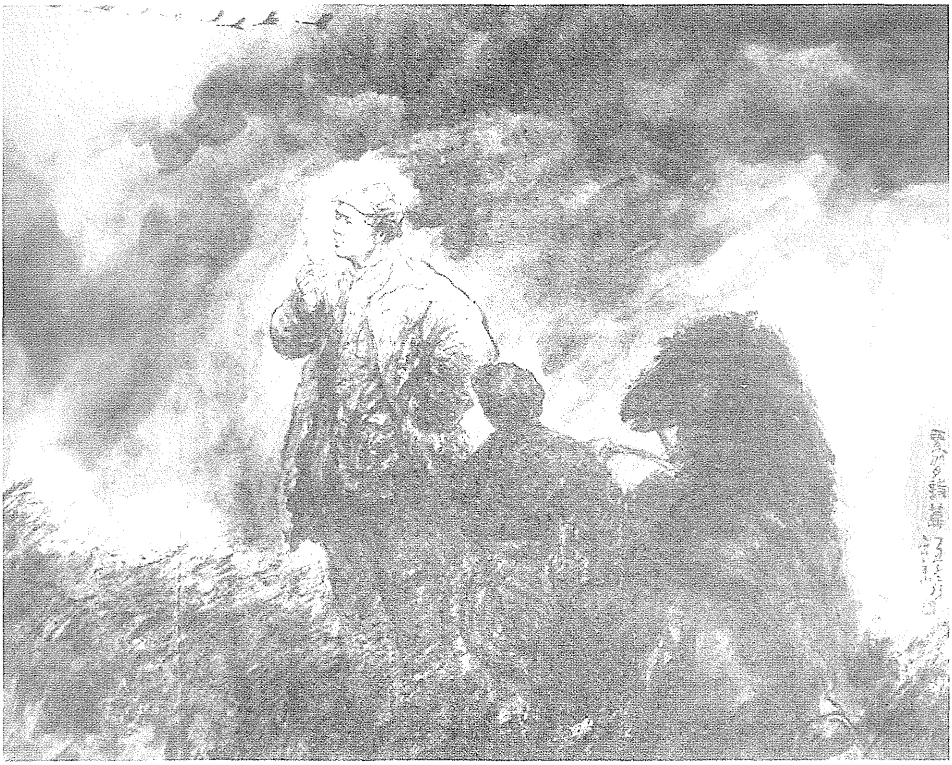
《三军过后尽开颜》（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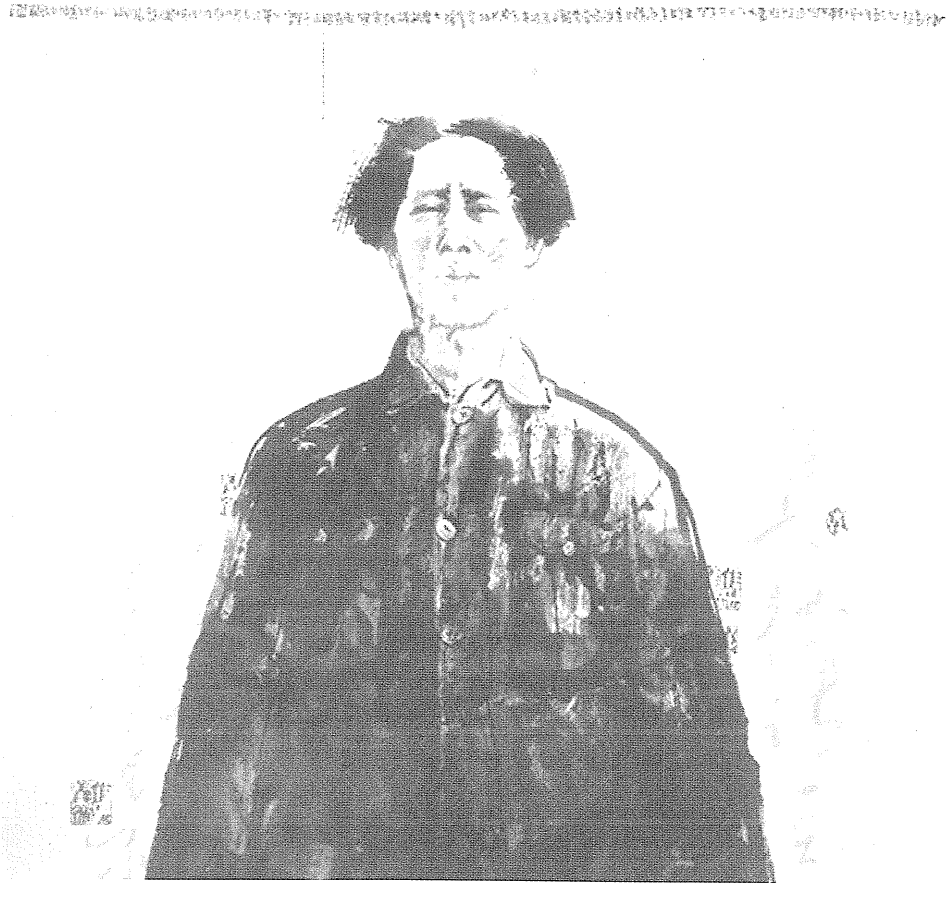
《三军过后尽开颜》（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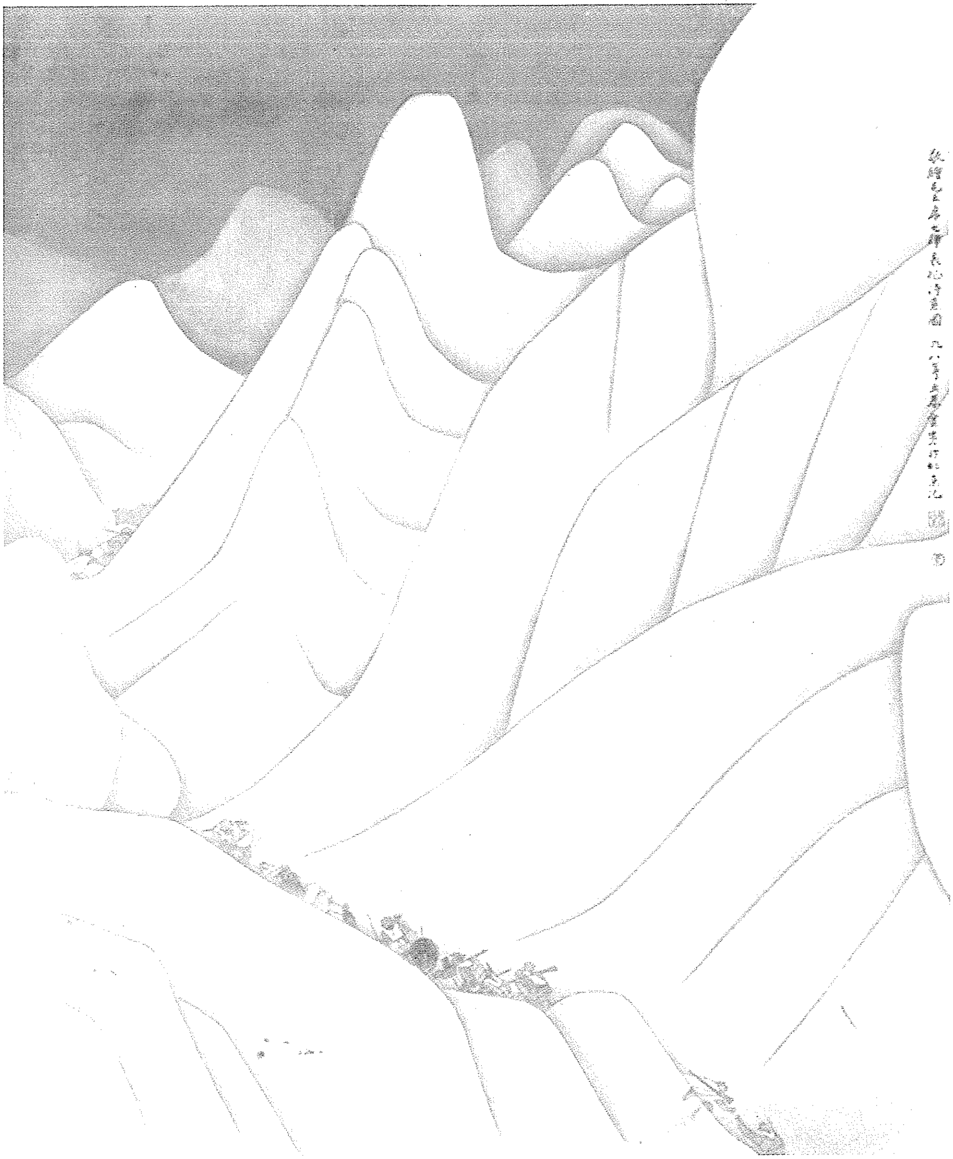
《万里征程诗不尽》（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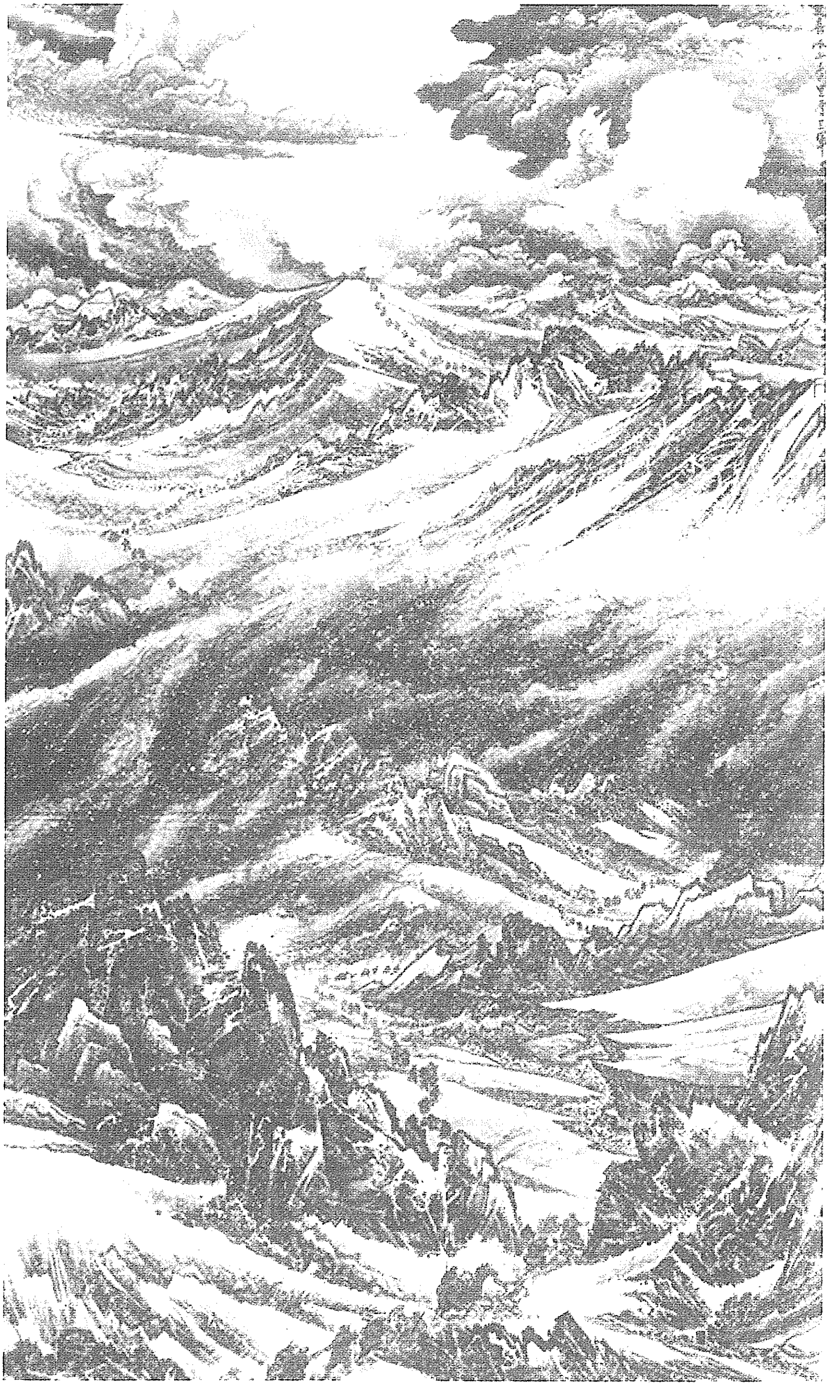
《马背诗篇》（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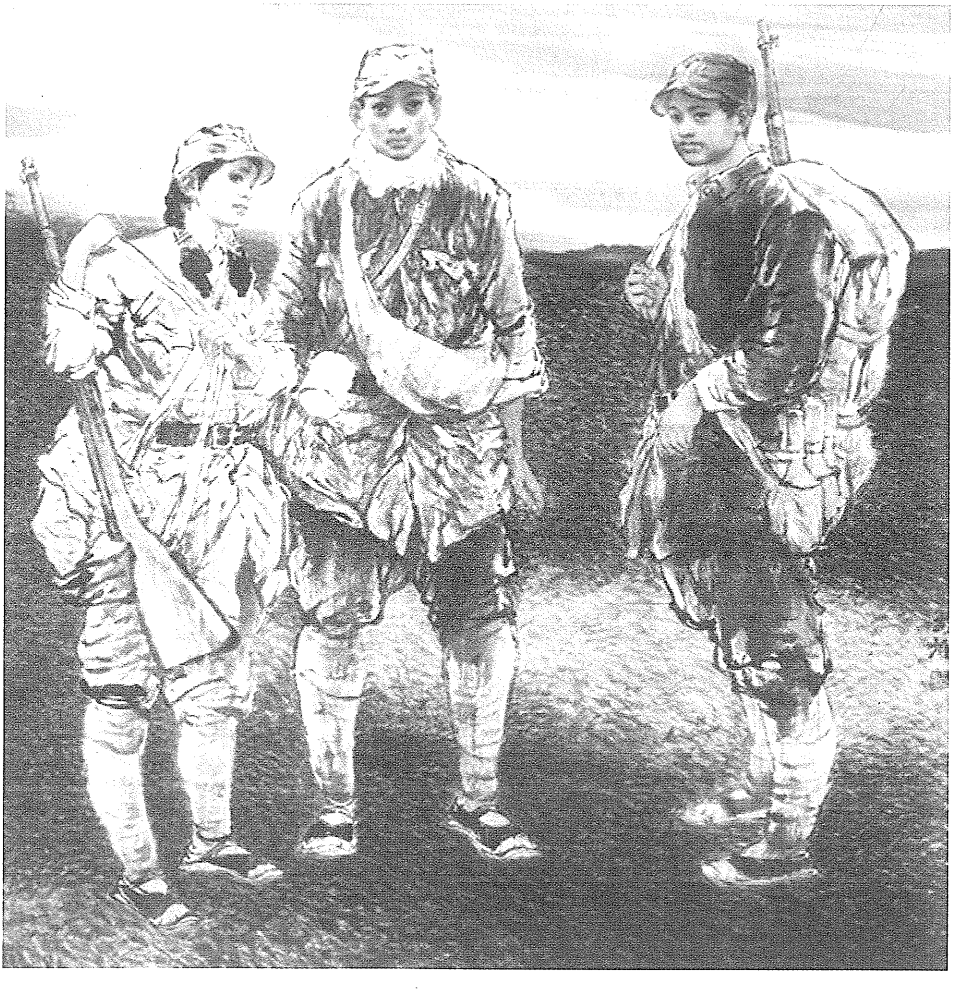
《长征》（诗意画）



《长征诗意图》（诗意画）



《过雪山》（诗意画）



《小红军》（诗意画）

念奴娇·昆仑[1]

（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2]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3]
搅得周天寒彻[4]。

---

[1] 昆仑，山脉名称。其主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交界处，东段分三支伸展。其南支向东延伸后与岷山相接，因而红军长征时所经过的岷山，也可以看作昆仑山的一个支脉。

毛泽东自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2] 横空出世，横空，横在空中；出世，超出人世。形容山的高大和险峻。

[3] 飞起玉龙三百万，玉龙，白色的龙；三百万是形容其多。这里是说终年积雪的昆仑山脉蜿蜒不绝，好像无数的白龙正在空中飞舞。（按：毛泽东原注中的“前人”指北宋张元。张元句，始见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原作“战死玉龙三十万，败鳞风卷满天飞”。以后有关记载渐有出入。南宋魏庆之辑《诗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条作“战退<旧时通行本作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似为毛泽东原注所据。

[4] 周天寒彻，满天冷透。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1]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2]，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3]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4]。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

[1] 人或为鱼鳖，人们也许要被洪水淹死。《左传·昭公元年》：“微（没有）禹，吾其鱼乎！”

[2] 倚天抽宝剑，传楚宋玉作《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天之外。”倚天，形容宝剑极长和带剑的人极高大。

[3] 遗，赠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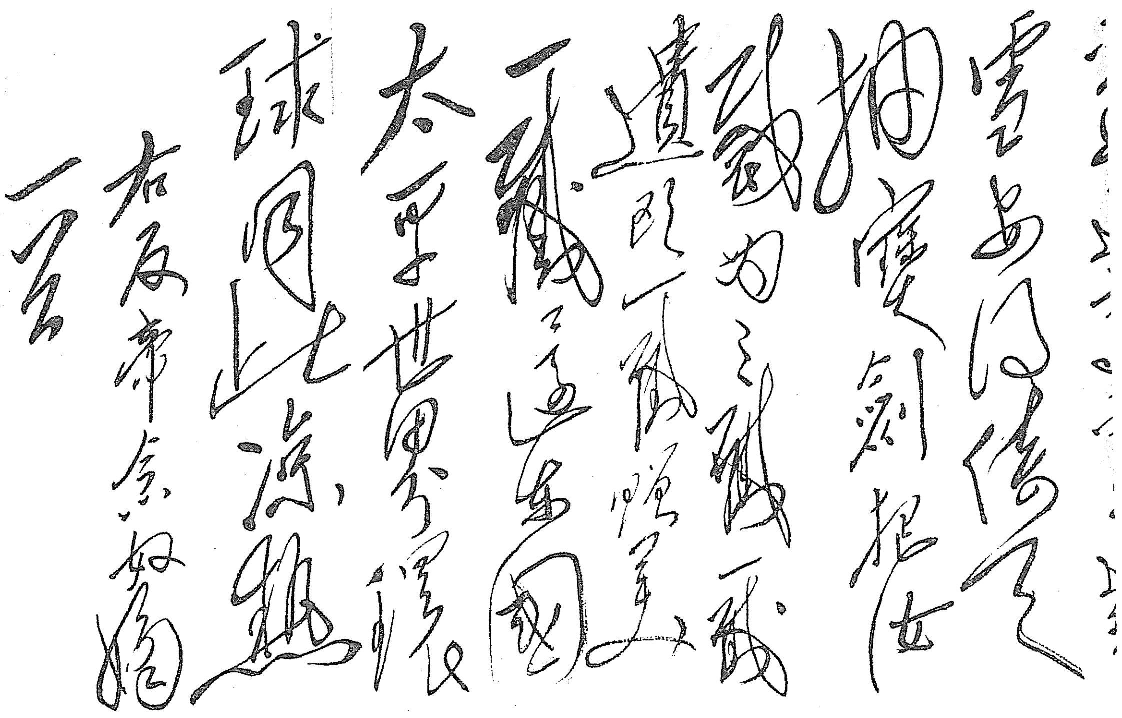
[4] 还东国，首次发表时原作“留中国”，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改为“还东国”。

毛泽东自注：“宋人咏雪诗云：‘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昆仑各脉之雪，积世不灭，登高远望，白龙万千，纵横飞舞，并非败鳞残甲。夏日部分消溶，危害中国，好看不好吃，试为评之。”

毛泽东原注：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

横空出世莽昆仑
毛泽东诗词

《横空出世莽昆仑》（诗意画）



雪安得倚天

抽宝剑把汝

裁为三截一截

遗欧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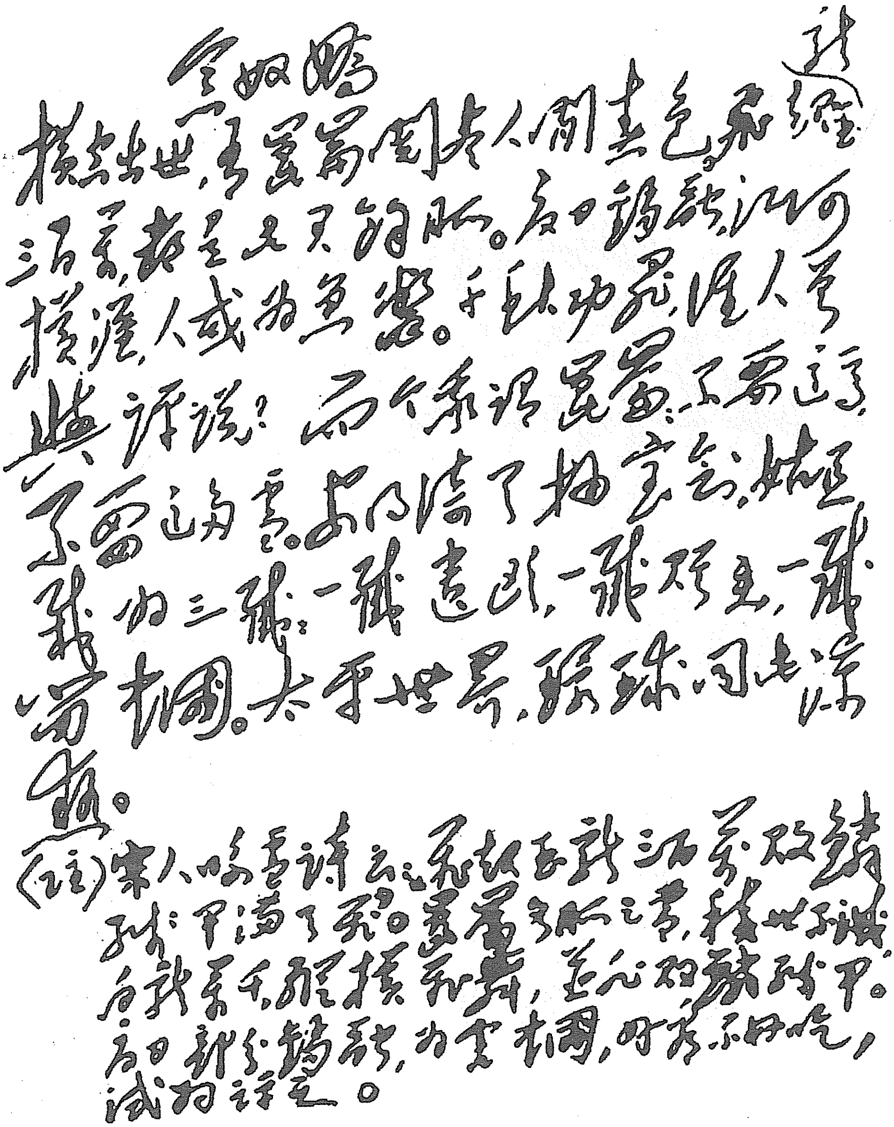
球同此凉热

右念奴娇

一首

毛泽东手书《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
彻夏日消溶江河
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
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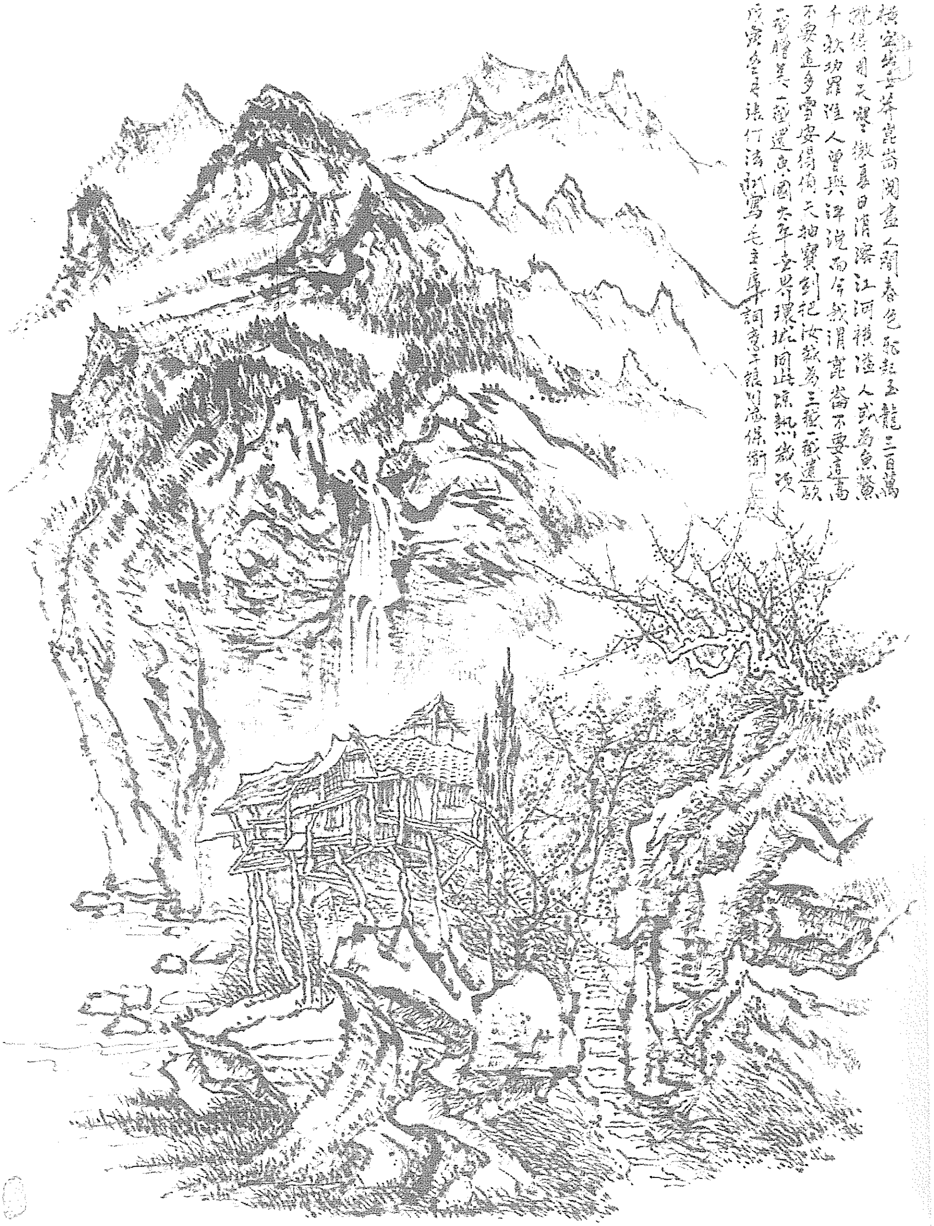


念奴娇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
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
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
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
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
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
热。

（注）宋人咏雪诗云：飞起玉龙三百万，败
鳞残甲满天飞。夏日雪化之季，横世不灭，
白戟万千，飞腾横飞舞，意是龙的败鳞残甲。
而且新的诗歌，为资本国，可有不同呢，
试为评之。

毛泽东手书《念奴骄·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崙閲盡人間春色飛起玉龍三百萬
攪得周天寒徹夏日消溶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而今我謂崑崙不要這高
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
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微頌
戊寅冬月張仃法戲寫毛主席詞意于銀川為保衛

《昆仑》（诗意画）

清平乐·六盘山[1]

（1935年10月）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2]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3]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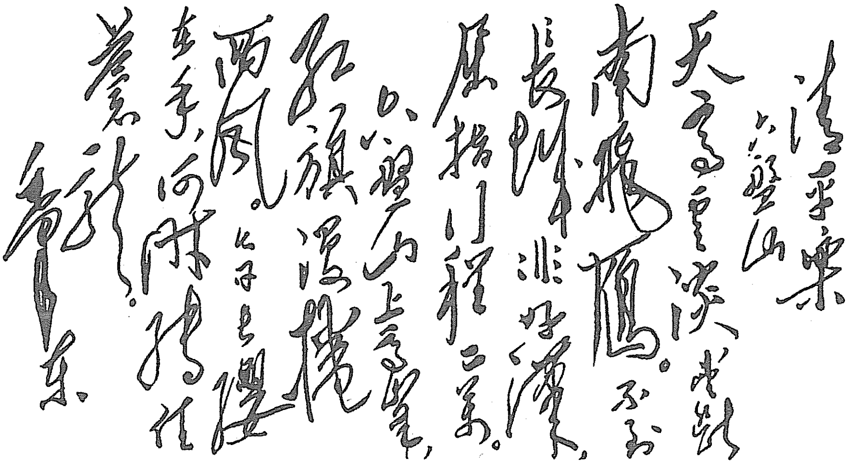
[1] 六盘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固原县西南，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险窄的山路要盘旋多重才能到达峰顶。毛泽东在1935年9月中旬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省南部，10月上旬，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部队，胜利地越过六盘山。

[2] 长城，借指长征的目的地。

[3] 红旗，首次发表时原作“旄头”，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改为“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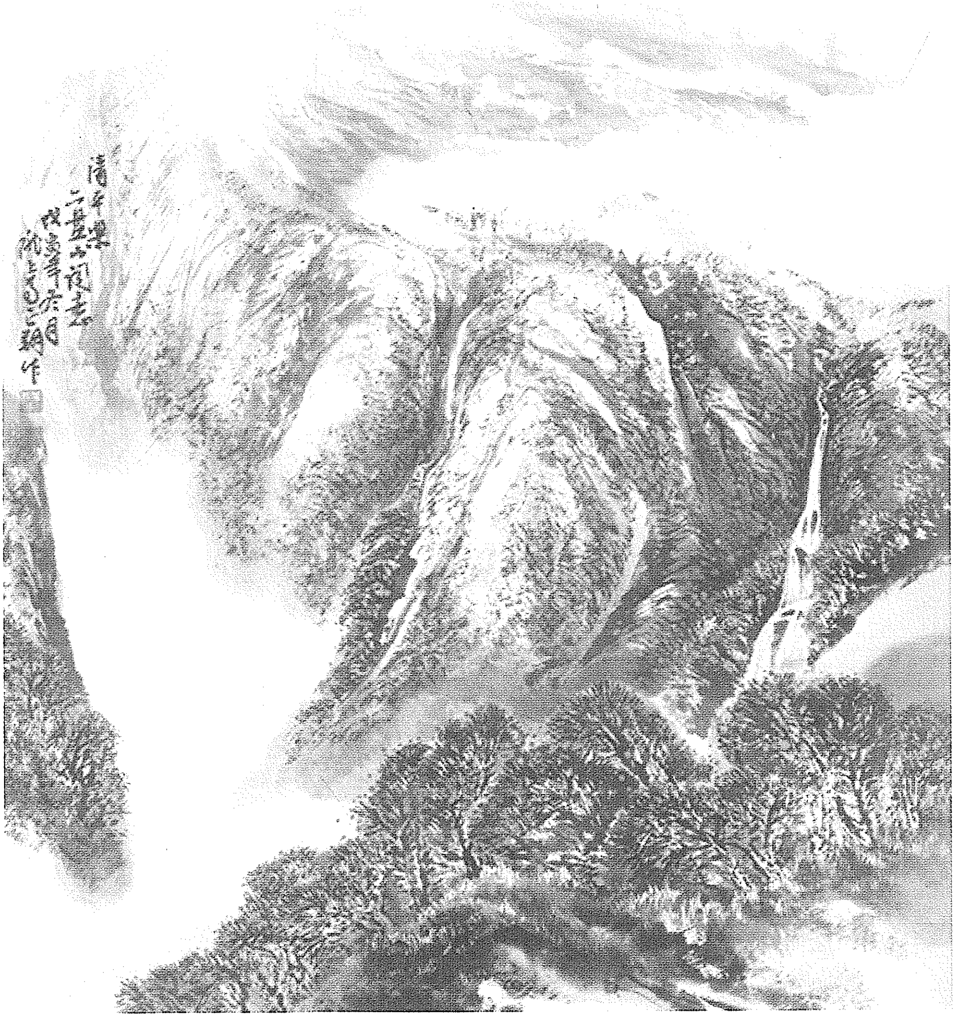
[4]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化用南宋刘克庄《贺新郎》词：“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苍龙，是一种凶神恶煞。《后汉书·张纯传》注：“苍龙，太岁也。”古代方士以太岁所在为凶方，因称太岁为凶神恶煞。

毛泽东自注："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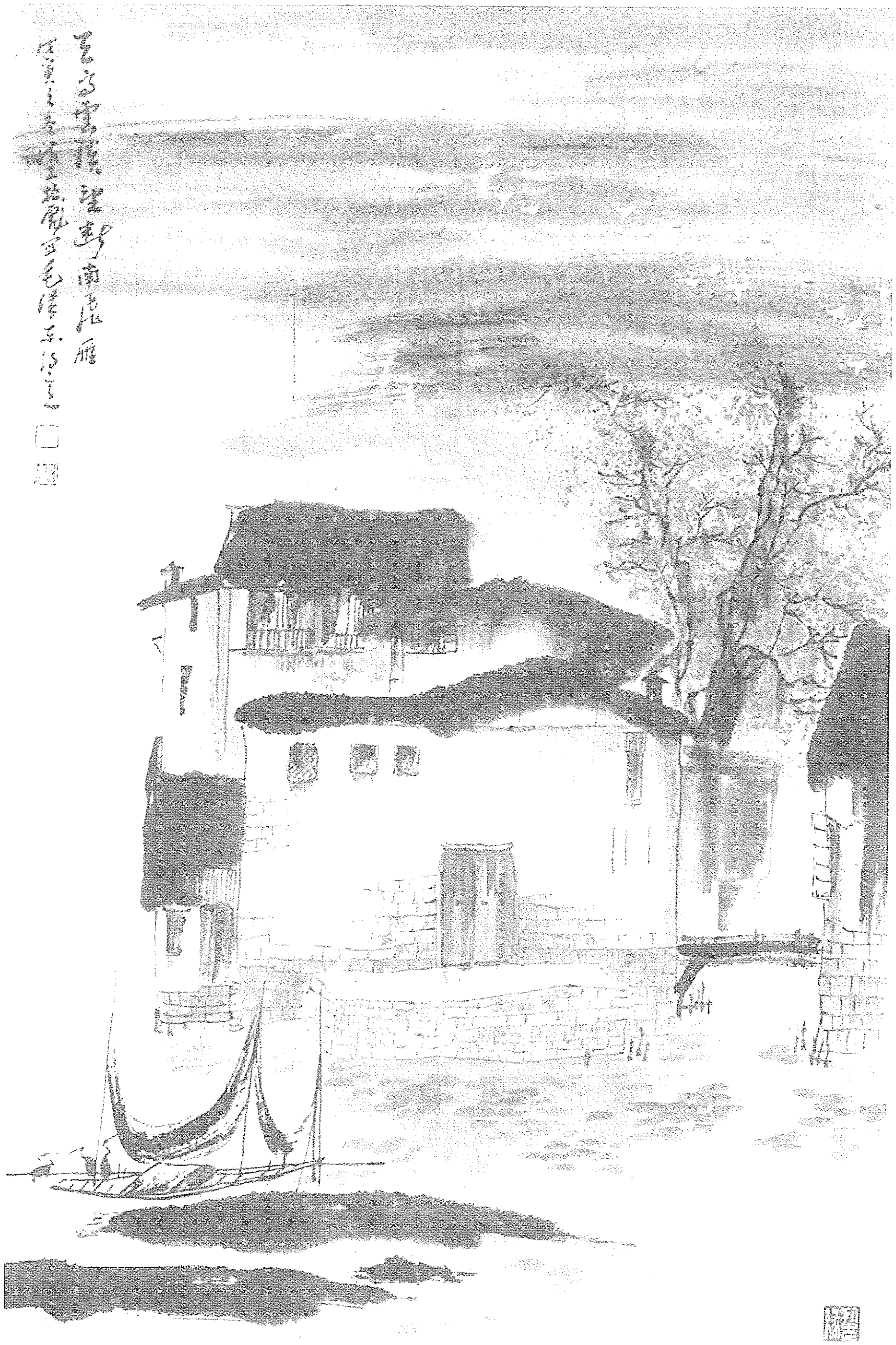


清平乐
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
南飞雁。不到
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
西风。今日长缨
在手，何时缚住
苍龙。
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


清平乐
六盘山词意
戊寅年秋日

《六盘山》（诗意画）



《天高云淡》（诗意画）

六言诗[1]·给彭德怀同志[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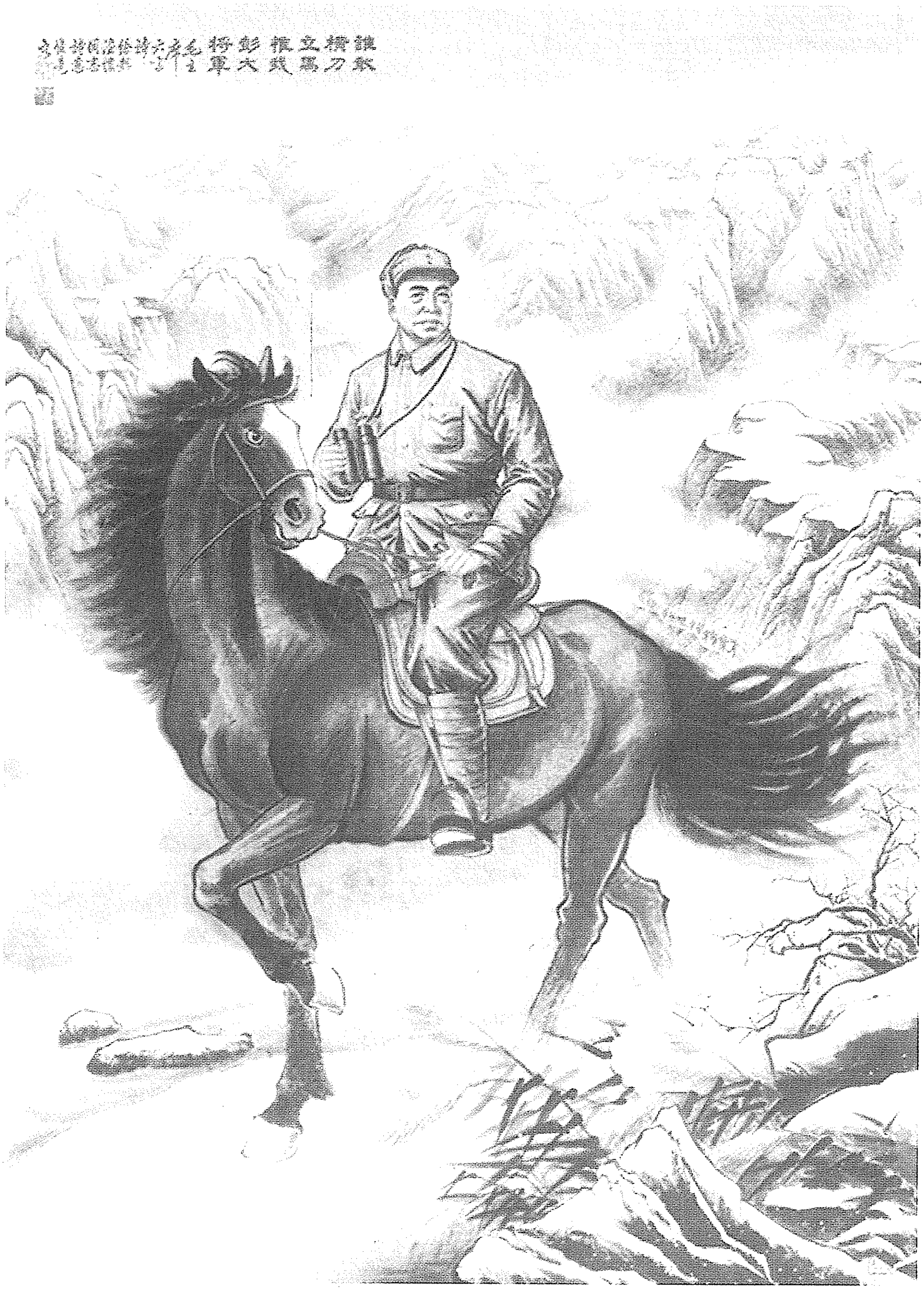
（1935年10月）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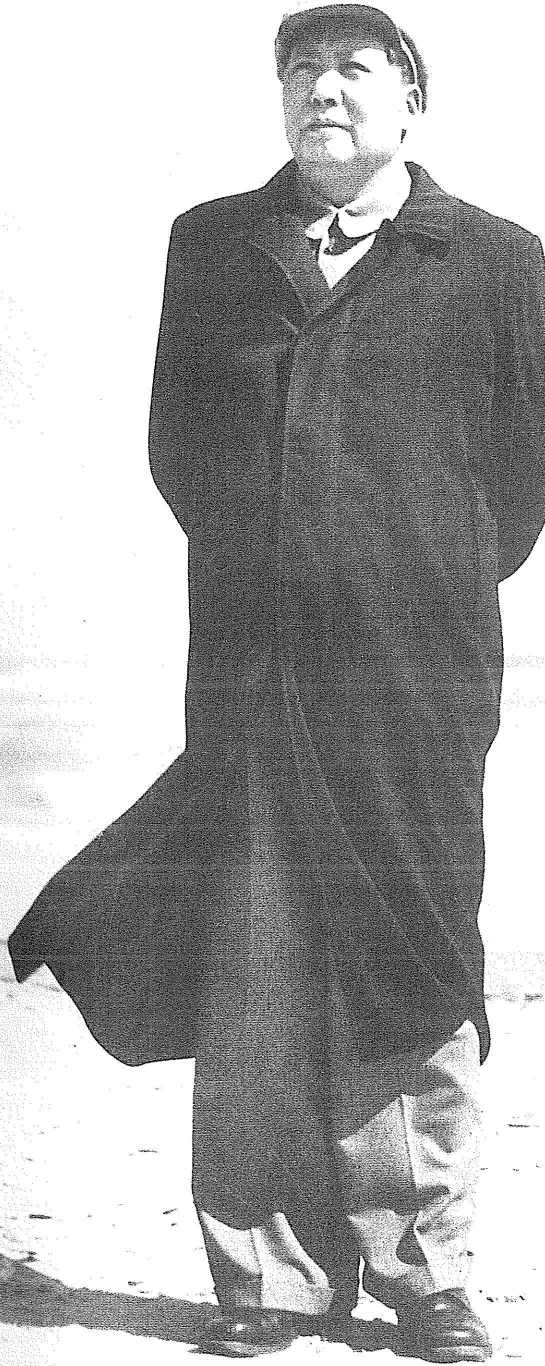
[1] 六言诗，旧体诗的一种格式，每句六个字，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句数和平仄都不像律诗那样严格。

[2] 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和彭德怀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有“山高路远沟深”句。击败追击骑兵后，毛泽东写了这首诗，首句即用电文句，但改“沟深”为“坑深”。据《彭德怀自述》一书206页至207页说，彭收到这首诗后，把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7月，领导平江起义参加红军，任红军第五军军长。1930年6月任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7月曾一度攻占长沙。同年8月与红军第一军团会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原曾计划分别扩编为一、三方面军，因兵力不足作罢。）1935年9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时，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兼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11月初，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仍由毛、彭以原职领导。


誰敢橫刀立馬
惟我彭大將軍

《彭大将军》（诗意画）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淦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肃反工作的指示……………………………………1
（1935年10月、11月）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3
（1935年11月2日）
中央对外名义和作战方针问题……………………………………4
（1935年11月3日）
关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5
（1935年11月3日）
关于委任红一方面军领导人的命令…………………………………6
（1935年11月3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7
（1935年11月4日）
对随行部队的讲话…………………………………………………………8
（1935年11月5日）
调查直罗镇附近道路地形情况……………………………………9
（1935年11月6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 …………………………………………………11
（1935年11月7日）
关于委任军委各部首长的命令 ……………………………………12
（1935年11月8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 ……………………………………………14
（1935年11月8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 ……………………………………………15
（1935年11月8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 ……………………………………………16
（1935年11月9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 ……………………………………………17
（1935年11月11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8
（1935年11月13日）
关于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林彪等电 ……………22
（1935年11月13日）
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 …………………………23
（1935年11月18日）
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 ………………………………24
（1935年11月18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 ………………………………………………25
（1935年11月19日）
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 ……………………………………………26
（1935年11月20日）
致林彪等电 ………………………………………………………27
（1935年11月21日）
直罗镇战役歼敌情况 ……………………………………………29
（1935年11月21日）
对敌一〇六师及董英斌部作战部署 ……………………………31
（1935年11月22日）

从侧面和正面抑制敌一一七师 ……………………………………………32
（1935年11月22日）
消灭董英斌沈克两师之部署 ………………………………………………33
（1935年11月23日）
一军团十五军团行动部署 …………………………………………………34
（1935年11月23日）
关于在直罗镇战役的指示 …………………………………………………35
（1935年11月23日）
追击逃敌董英斌的部署 ……………………………………………………37
（1935年11月24日）
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 ………………………………………………38
（1935年11月25日）
致聂荣臻并林彪电 …………………………………………………………42
（1935年11月25日）
对沈克一〇六师的基本方针 ………………………………………………43
（1935年11月26日）
致董英斌电 …………………………………………………………………44
（1935年11月26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 ………………………………………………………45
（1935年11月2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46
（1935年11月28日）
致博古电 ……………………………………………………………………49
（1935年11月28日）
目前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 ……………………………………………50
（1935年11月30日）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51
（1935年11月30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61
（1935年11月）
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 ……63
（1935年12月1日）
致朱德等电 ……65
（1935年12月2日）
致洛甫、李德电 ……66
（1935年12月5日）
给杜斌丞的信……67
（1935年12月5日）
给杨虎城的信（节录）……68
（1935年12月5日）
关于规定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及抚恤费的通令……70
（1935年12月5日）
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71
（1935年12月8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74
（1935年12月1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77
（1935年12月15日）
同意夺取甘泉宜川 ……79
（1935年12月17日）
致彭德怀电 ……82
（1935年12月19日）

致彭德怀并转林彪电 ……………………………………………………83
（1935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84
（1935年12月23日）
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 ……………………………………………………93
（1935年12月24日）
致彭德怀电 ………………………………………………………………96
（1935年12月24日）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97
（1935年12月25日）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18
（1935年12月27日）
致彭德怀等电……………………………………………………………147
（1935年12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148
（1935年12月29日）
关于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的组建问题………………………………149
（1935年12月30日）
致彭德怀等电……………………………………………………………150
（1935年12月31日）
歌谣诗·洛甫摔跤 ………………………………………………………151
（1935年）
在抗大校务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52
（1935年）
和穰明德的谈话…………………………………………………………153
（1935年）

致朱德电……157
（1936年1月1日）
致彭德怀电……158
（1936年1月1日）
致彭德怀电……159
（1936年1月4日）
一军团及二十五军的行动部署……160
（1936年1月5日）
同意北征军打敌援兵的部署……162
（1936年1月7日）
消灭袁克征团等部的部署……163
（1936年1月9日）
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64
（1936年1月9日）
敌我力量对比情况……165
（1936年1月10日）
休息训练准备接受新任务……166
（1936年1月13日）
关于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致彭德怀电……168
（1936年1月15日）
致彭德怀电……169
（1936年1月16日）
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170
（1936年1月17日）
关于红军东进抗日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71
（1936年1月19日）

致彭德怀电……172
（1936年1月19日）
致彭德怀电……173
（1936年1月20日）
致彭德怀等电……174
（1936年1月21日）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75
（1936年1月25日）
复彭德怀电……179
（1936年1月25日）
致左权电……180
（1936年1月31日）
和红色中华社记者的谈话……181
（1936年1月）
致周恩来、博古、邓发电……185
（1936年2月3日）
致林彪等电……186
（1936年2月3日）
致曾希圣电……187
（1936年2月3日）
致叶剑英、林彪等电……188
（1936年2月6日）
致叶剑英等电……189
（1936年2月8日）
致叶剑英、杨立三电……190
（1936年2月8日）

致叶剑英等电……191
（1936年2月10日）
致叶剑英等电……192
（1936年2月10日）
致林彪等电……193
（1936年2月11日）
传达与讨论东征命令及部队开进问题……194
（1936年2月12日）
致周恩来电……197
（1936年2月12日）
东渡前抓紧提拔干部……198
（1936年2月13日）
行军中严格注意隐蔽……199
（1936年2月16日）
全力争取东面胜利与二十八军的行动部署……200
（1936年2月17日）
红军东征的任务……202
（1936年2月18日）
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203
（1936年2月18日）
致林彪等电……207
（1936年2月18日）
致周恩来电……208
（1936年2月19日）
关于坚持联合抗日不为谣言所动致王以哲、张学良电……209
（1936年2月19日）

致林彪等电……………………………………………………210
（1936年2月20日）
致彭德怀等电…………………………………………………211
（1936年2月21日）
致徐海东、程子华电……………………………………………212
（1936年2月21日）
给李克农的训令 …………………………………………………213
（1936年2月21日）
两军团应乘胜向石楼急进………………………………………214
（1936年2月21日）
游击队过河后的任务及组织担架队问题………………………215
（1936年2月21日）
我军目前方针是建立作战根据地………………………………218
（1936年2月23日）
致徐海东、程子华电……………………………………………220
（1936年2月23日）
致徐海东、程子华电……………………………………………221
（1936年2月23日）
致周恩来电………………………………………………………222
（1936年2月24日）
致周恩来电………………………………………………………223
（1936年2月24日）
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224
（1936年2月24日）
致林彪等电………………………………………………………226
（1936年2月25日）

派一个师开赴车鸣峪关上等作战要地……227
（1936年2月25日）
消灭关上水头两地之敌……228
（1936年2月25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229
（1936年2月26日）
全力消灭关上之敌……230
（1936年2月26日）
在有利条件下攻击水头之敌……231
（1936年2月26日）
关上村战况及我继续歼敌之部署……232
（1936年2月28日）
两军团宿营位置以利于打击前进之敌为原则……233
（1936年2月28日）
在关上水头地区创造作战根据地……234
（1936年2月28日）
致李克农电……236
（1936年2月28日）
复李克农电……237
（1936年2月29日）
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238
（1936年2月）
沁园春·雪……241
（1936年2月）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253
（1936年3月1日）

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255
（1936年3月1日）
渡河以来战况与黄河以西的军事部署…………………………257
（1936年3月1日）
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259
（1936年3月2日）
关于向东北军传达我东征军捷信及与之合作抗日等问题致李克农电 …260
（1936年3月3日）
致博古电……………………………………………………………262
（1936年3月4日）
谈判联合抗日的三个基本条件……………………………………263
（1936年3月4日）
与南京当局谈判之意见……………………………………………264
（1936年3月4日）
关于与王以哲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等问题致博古、罗迈等电……………………………………………………………265
（1936年3月4日）
关于阎锡山进攻部署给各部队的指示……………………………266
（1936年3月4日）
致博古等电…………………………………………………………268
（1936年3月4日）
致曾希圣电…………………………………………………………269
（1936年3月4日）
消灭关上之敌的部署………………………………………………270
（1936年3月5日）
关于对南京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致李克农转王以哲电…………271
（1936年3月5日）

复李克农电……………………………………………………272
（1936年3月5日）
消灭中阳一带敌军的部署…………………………………273
（1936年3月5日）
我方与东北军王以哲部订立口头协定的通报……………275
（1936年3月5日）
各个击破向大麦郊推进之敌………………………………277
（1936年3月6日）
消灭兑九峪之敌的部署……………………………………278
（1936年3月6日）
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包围消灭之…………………………280
（1936年3月6日）
致萧劲光、朱理治电………………………………………281
（1936年3月10日）
第四团应迟滞敌向水头进攻………………………………282
（1936年3月10日）
打破敌军进攻争取创造山西苏区…………………………283
（1936年3月11日）
稳固山西抗日根基…………………………………………285
（1936年3月12日）
关于周恩来为我方代表与张学良会谈问题致王以哲电……286
（1936年3月16日）
给红军的作战命令…………………………………………287
（1936年3月17日）
十五军团乘虚北进相机袭取介休等地……………………289
（1936年3月17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291

（1936年3月19日）

一军团十五军团应扩大占领区域………………………………292

（1936年3月20日）

关于阎锡山拦阻抗日红军及与东北军共同维护抗日后方等问题致张学良及东北军全体官兵电……………………………………293

（1936年3月20日）

致林彪等电…………………………………………………………295

（1936年3月21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296

（1936年3月22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297

（1936年3月22日）

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创造根据地的行动方针……………………298

（1936年3月22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300

（1936年3月23日至27日）

创造河东战场及加强要道工作　……………………………………304

（1936年3月25日）

第一军团的行动方针…………………………………………………305

（1936年3月25日）

致任弼时等电…………………………………………………………307

（1936年3月26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军事等问题的通报…………………308

（1936年3月28日）

致林彪等电……………………………………………………………310

（1936年3月29日）

致徐海东、程子华等电……………………………………311
（1936年3月29日）
为反对蒋介石阻拦一致联合抗日致全国同胞抗日士兵书…………312
（1936年3月29日）
集中全力与东西来敌打遭遇战……………………………313
（1936年3月31日）
第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及其方针任务………314
（1936年4月1日）
致林彪等电…………………………………………………316
（1936年4月1日）
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317
（1936年4月2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318
（1936年4月2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319
（1936年4月2日）
敌军布防及红军第十五军团之部署………………………320
（1936年4月2日）
东征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问题………………322
（1936年4月3日）
各地斗争分子应加入团体…………………………………324
（1936年4月3日）
给红军的作战命令…………………………………………325
（1936年4月3日）
和东北军接洽、商谈统由周恩来负责……………………327
（1936年4月4日）

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
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328
（1936年4月5日）
致刘志丹等电……………………………………………………331
（1936年4月6日）
致王以哲、张学良电……………………………………………332
（1936年4月6日）
一军团继续留在晋西南的任务…………………………………333
（1936年4月8日）
七十八师应消耗敌军滞其南进…………………………………335
（1936年4月9日）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336
（1936年4月9日）
红一军团的近期任务……………………………………………338
（1936年4月10日）
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339
（1936年4月10日）
关于和张学良谈判结果致林彪、聂荣臻电………………………340
（1936年4月11日）
同意集中兵力在乡宁等地域作战………………………………342
（1936年4月12日）
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的行动部署………………………………343
（1936年4月12日）
左、中路军的战斗成果…………………………………………345
（1936年4月13日）
东征军近期工作成绩……………………………………………346
（1936年4月13日）

致刘志丹、宋任穷电……347
（1936年4月13日）
外示统一，内专责成……348
（1936年4月14日）
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不宜兼顾……349
（1936年4月14日）
致林彪等电……350
（1936年4月15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351
（1936年4月16日）
关于举行五一节全苏区赤卫队、少先队总检阅的命令……352
（1936年4月16日）
致林彪等电……354
（1936年4月17日）
致林彪等电……355
（1936年4月19日）
诱大宁之敌西进消灭之……356
（1936年4月20日）
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目前休整计划与扩红问题……357
（1936年4月22日）
赴苏联商谈在军事方面的任务……359
（1936年4月22日）
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和部署……360
（1936年4月22日）
针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对红军的行动部署……361
（1936年4月24日）

致洛甫电……362
（1936年4月28日）
关于西渡黄河的部署……363
（1936年4月28日）
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364
（1936年4月28日）
各兵团目前的工作方针……366
（1936年5月5日）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367
（1936年5月5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370
（1936年5月5日）
致林彪等电……371
（1936年5月6日）
复刘鼎电……372
（1936年5月7日）
在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73
（1936年5月11日）
国际关系和我党的外交政策……374
（1936年5月15日）
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375
（1936年5月18日）
红军大学的建立问题……378
（1936年5月20日）
对外宣传口号及国内外政治形势与国焘关系……380
（1936年5月20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383
（1936年5月25日）
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386
（1936年5月25日）
给阎锡山的信……389
（1936年5月25日）
致阎红彦、蔡树藩电……390
（1936年5月26日）
致林彪等电……391
（1936年5月26日）
关于军事行动问题的报告……392
（1936年5月28日）
致彭德怀等电……393
（1936年5月28日）
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394
（1936年5月29日）
关于当前军情变化和基本任务等问题的通知……395
（1936年5月29日）
在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398
（1936年5月）
给盟克耳纪的信……399
（1936年5月）
成立野战军后方勤务部及设小后方……400
（1936年6月1日）
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401
（1936年6月1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403
（1936年6月1日）
优待、训练和释放俘虏……405
（1936年6月2日）
一军团主力应向环县急进……406
（1936年6月2日）
横山定边间的作战部署……407
（1936年6月6日）
红军和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情况…409
（1936年6月6日）
西方野战军在西征战役第一阶段中的战果……410
（1936年6月7日）
关于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411
（1936年6月8日）
关于两广事变的谈话……413
（1936年6月8日）
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416
（1936年6月9日）
关于加强悦乐、曲子等地兵力及争取东北军工作致李富春、萧劲光等电……417
（1936年6月10日）
致彭德怀电……418
（1936年6月10日）
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419
（1936年6月12日）

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420
（1936年6月12日）
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423
（1936年6月14日）
东北军活动情况和中央机关转移的部署……426
（1936年6月15日）
第二第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428
（1936年6月19日）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430
（1936年6月20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440
（1936年6月25日）
致彭德怀电……441
（1936年6月28日）
全国抗日反蒋形势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情况……442
（1936年6月28日）
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443
（1936年6月29日）
和同桂荣的谈话……445
（1936年6月）
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446
（1936年7月1日）
庆祝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致朱德张国焘等电……449
（1936年7月1日）
致朱德等电……452
（1936年7月）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454
（1936年7月14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456
（1936年7月15日）
为汪锋等中共代表亲自签名盖章的介绍信……459
（1936年7月15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460
（1936年7月、9月）
致彭德怀电……486
（1936年7月20日）
致周恩来电……487
（1936年7月21日）
关于二、四方面军迅速出至甘南致朱、张、任电……488
（1936年7月22日）
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489
（1936年7月22日）
致彭德怀电……492
（1936年7月23日）
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并用的原则……493
（1936年7月23日）
和斯诺关于特殊问题的谈话……495
（1936年7月23日）
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工作……501
（1936年7月26日）
我军应继续执行三大战略任务……502
（1936年7月27日）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505
（1936年7月28日）
询问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情况致朱德等电…………………506
（1936年7月28日）
白区工作的主要问题……………………………………………507
（1936年7月30日）
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提前毕业学员赠词………………………508
（1936年7月）
和斯诺、马海德的谈话…………………………………………509
（1936年7月）

对陕北革命根据地肃反工作的指示

（1935年10月、11月）

刀下留人，停止捕人。[1]

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革命政权是巩固的。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的。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2]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疯狂病”。[3]

你受委屈了！不过，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坐牢既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起革命来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

---

[1] 毛泽东率红军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正当他紧张布置直罗镇战役时，听到关于刘志丹等大批陕北革命根据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被捕和被杀的情况反映后，立即作出了这个指示。

[2] 这是对反映情况的干部和群众讲话的主要内容。

[3] 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听到了关于刘志丹“案件”审查情况的汇报，毛泽东作出了这样的指示。

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1]

---

[1] 刘志丹出狱后，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询问他的健康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是毛泽东和刘志丹谈话的一部分。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1]

（1935年11月2日）

林、聂，彭、李，叶，并转杨：

（甲）第一、二两纵队及支队直属队明（三）日即现地休息一天，四号继续南进，各走六七十里宿营。（乙）打草鞋、洗衣、洗澡、补充粮食。（丙）沿途群众热烈欢迎须准备回答其口号，并注意与十五军团见面时应说的话。（丁）力求部队清洁、整齐。（戊）后方究到何处，如果无钱买柴菜时，须发给陕北苏票二百元，每人每日发六分。

彭　毛

二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并转杨尚昆的电报。

中央对外名义和作战方针问题[1]

（1935年11月3日）

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名义较适当，公开使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名义可在打破“围剿”之后再定。作战方针，应在这个月解决第三次“围剿”问题，经过一个深冬让敌人慢慢做堡垒是不好的。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后，红十五军团编制应保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因历史关系也不要合并。陕甘支队可编成红一军团，并成立红一方面军。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中央对外名义和作战方针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1]

（1935年11月3日）

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2]、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3]九同志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此令遵即就职进行工作，特此通令知照。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十一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颁布的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令。

[2] 聂洪钧，当时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北方局驻陕北苏区代表团成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3] 徐海东，当时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当时任红十五军团政治委员。郭洪涛，当时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

关于委任红一方面军领导人的命令[1]

（1935年11月3日）

兹委任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十一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颁布的第一号命令。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

（1935年11月4日）

林、聂，叶，彭、李，并转周[1]：

一、敌董英彬率一〇八、一〇九、一一一师有日到大白镇的，因补粮并候其一〇六师，二、三两日在大白镇未动。王以哲一一七师本日向富县进。二、我军为消灭该敌继续南进。（甲）下纵队明五号由王家坪过河，取小路经克劳、九牛塔进至桥家庄、毛家庵、塔儿上、老人仓之线宿营，准备后日进至安沟、白灵沟、林家沟之线。（乙）叶率直属队随二纵队司令部明日进至下寺湾，二纵队全部进至下寺湾、王家坪之线宿营，后日叶率直属队及二纵队准一纵队路线进至桥家庄、老人仓之线。（丙）我们本日到桥家庄，明日拟到道左铺。三、务须带足七天粮食，不得误事。

彭　毛

四日十九时

---

[1] 彭、李，指彭雪枫、李富春。周，指周恩来。

对随行部队的讲话[1]

（1935年11月5日）

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长征。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做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

---

[1] 这是毛泽东在甘泉南边的象鼻子湾，对随行部队讲话的一部分。

调查直罗镇附近道路地形情况[1]

（1935年11月6日）

海东：

（一）百十七师已到富县，董英斌[2]尚未动。

（二）请注意下列三事：

甲、尽快消灭张村驿[3]团匪[4]。

乙、指示游击队之两个连进驻直罗镇[5]，对黑水寺[6]游击。

---

[1]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完成了长征。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11月初，在甘泉附近地区与由红军第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组成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原陕甘支队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建制。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给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电报。

[2]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司令。

[3] 张村驿，村名，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4] 团匪，当时对反动地主民团武装的蔑称。

[5] 直罗镇，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6] 黑水寺，村名，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丙、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及以南地区之道路、地形、人家情况，葫芦河能否徒涉，电告。

（三）我们及二十五军明日在原地不动。

彭　毛

六日二十时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1]

（1935年11月7日）

要一、二纵队次日各在原地休息一天，加紧教育战术及政治动员；还要林彪对直罗镇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地形、道路、人家详加调查当面报告，并摘要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委任军委各部首长的命令[1]

（1935 年 11 月 8 日）

（一）本会设立下列六部并委任各部首长如下：

参谋部——参谋长叶剑英
　　　　副参谋长张云逸
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副主任杨尚昆
动员武装部——部长戴继英
兵站部——部长杨立三
供给部——部长叶季壮

（二）本会设立后方办事处，以周恩来兼主任，聂洪钧兼副主任，钟赤兵为政治部主任。

（三）本会参谋部暂设如下各局，并委任各局首长如下：

第一局长　张云逸（兼）
第二局长　曾希圣
第三局长　王诤
第四局长　宋裕和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颁布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号命令，委任军委各部首长及所属机构负责人。

（四）委任叶剑英兼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十一月八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1]

（1935年11月8日）

各纵队在驻地自行筹足七天的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

---

[1] 这是1935年11月8日12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1]

（1935年11月8日）

林、聂，彭、李：

一、董英彬〈斌〉七日称，候一〇六师到，该军各师由大〈太〉白镇依次东进。现一〇六师一部已到太白镇附近，估计该敌三个师一二日内有向黑水寺、直罗镇前进可能。二、我军为消灭该敌明九号部署如下：（甲）第一军团主力在原地不动，但将白灵沟以东地区之部队移驻秋林子西北地区。（乙）第二十五军明日移至白灵沟、安沟、大星〈升〉号一带，后日经秋林子移至桃花砭、张村驿之线。（丙）第二纵队明日移至油房原、老人仓之线。（丁）我们明日在原地不动。林对黑水寺、桃花砭一线及其以东、以南地区地形、道路、人家限两日内绘图具报。

彭　毛

八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给林彪、聂荣臻、彭雪枫、李富春的电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1]

（1935年11月9日）

林、聂，徐、程：

一、探悉：童英彬〈斌〉令其一〇六师十号以前进出〈至〉黑水寺、龙益湾、锯家角、崇家湾筑碉，以掩护尔后该军东进，并有将占领该地南北地区说，似该军主力一二日内尚难进至直罗镇。二、明十号部署如下：（甲）一军团在原地不动。（乙）子华率七十五师进至桃花砭、张村驿之间地区荫蔽集结。（丙）海东指挥张村驿、羊泉地区部队肃清金村、东村、套通、久原一带团匪。这一任务对于今后作战甚为重要。（丁）海东速令独立营发动直罗镇、黑水寺一带及其附近地区群众坚壁清野，务将粮食、锅头搬尽，并令骑兵速向大〈太〉白镇侦察。（戊）我们在原地不动。

彭　毛

九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给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的电报。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1]

（1935年11月11日）

张学良以我们两军会合，令其各部一津〈律〉不动，筑碉办粮，候其大会[2]开后增援队到再行进攻。似此，短时间内尚无机动可能，各部应就原地加紧训练，测绘葫芦河两岸各数十里地区五万分之一地形图，肃清团匪，筹集一个月粮，派出部分人员深入地方工作，以利今后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彭德怀、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学良出席了这次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935年11月13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对于中国的进攻，正在急转直下。察哈尔事变之后，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实际上已经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贪欲，新的进攻的行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又开始了，请看他们最近所提出的八个条件：（一）华北五省政治经济的完全独立。（二）国民党军队全部退出陕西与西北各省。（三）将临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完全变为非武装区域。（四）中国退出国联与放弃英美的一切援助。（五）承认“满洲国”与中日满三国的亲密合作，以创立远东政治经济集团。（六）停止全中国的一切反日运动。（七）集中中日两国的全力来进攻中国苏维埃革命，特别在西北的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八）日本代表有参加国民党大会之权利，来观察中国对中日亲善是否诚意。

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不但要并吞

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稍有天良的中国人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前面，决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与顺民。然而以蒋介石为罪魁祸首的国民党政府却泰然不以为耻地答应了日本的这些要求，轻易把整个华北整个中国出卖了！这是空前的出卖，这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蒋介石国民党又一次地证明了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卖国贼首蒋介石的罪恶是屈指难数的。他血腥地镇压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屠杀全中国的革命战士，他不断地对苏维埃与红军进行凶残的“围剿”，他取消一切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他组织法西斯蒂的流氓，摧残一切革命组织与社会团体，毒打与杀戮自己的敌人，他利用一切阴谋毒计，铲除异己分子，改编其他派系的武装队伍，以建立自己的清一色的独裁。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清道夫，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支柱。

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地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一切“反蒋不能抗日”“先反蒋后抗日”的思想，是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其作用也不外给日本帝国主义做辩护士。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后，即于同年十月开始了北上的远征。不论蒋介石如何的动员一切力量，在沿途追击、截击与堵击我们，帮助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935年11月13日）

全中国的民众们！

中国现在是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对于中国的进攻，正在急转直下。察哈尔事变之后，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实际上已经放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而这并不能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贪欲，新的进攻的行动，在更大的规模上又开始了，请看他们最近所提出的八个条件：（一）华北五省政治经济的完全独立。（二）国民党军队全部退出陕西与西北各省。（三）将临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五省完全变为非武装区域。（四）中国退出国联与放弃英美的一切援助。（五）承认“满洲国”与中日满三国的亲密合作，以创立远东政治经济集团。（六）停止全中国的一切反日运动。（七）集中中日两国的全力来进攻中国苏维埃革命，特别在西北的苏维埃与工农红军。（八）日本代表有参加国民党大会之权利，来观察中国对中日亲善是否诚意。

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提出的这些条件，不但要并吞

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
的中国人在亡国灭种的危险前面，决不会接受这些条件
帝国主义的亡国奴与顺民。然而以蒋介石为罪魁祸首的国
却泰然不以为耻地答应了日本的这些要求，轻易把整个华北
国出卖了！这是空前的出卖，这是中国民族的奇耻大辱，蒋介
民党又一次地证明了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卖国贼首蒋介石的罪恶是屈指难数的。他血腥地镇压全中国的革命运动，屠杀全中国的革命战士，他不断地对苏维埃与红军进行凶残的“围剿”，他取消一切言论、结社、集会、罢工的自由，他组织法西斯蒂的流氓，摧残一切革命组织与社会团体，毒打与杀戮自己的敌人，他利用一切阴谋毒计，铲除异己分子，改编其他派系的武装队伍，以建立自己的清一色的独裁。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清道夫，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反动支柱。

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地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无法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不打倒蒋介石国民党，我们也无法停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日本在中国的统治！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一切“反蒋不能抗日”“先反蒋后抗日”的思想，是反革命派别的欺骗宣传，其作用也不外给日本帝国主义做辩护士。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在一九三四年七月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后，即于同年十月开始了北上的远征。不论蒋介石如何的动员一切力量，在沿途追击、截击与堵击我们，帮助日

本帝国主义阻止红军北上抗日，然而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还是战胜了一切空前的困难，消灭了敌人许多拦阻的队伍，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击溃与消灭了不抵抗将军卖国贼张学良的部队，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苏区，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中国工农红军这一伟大胜利，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

中国工农红军的到达西北，更使日本帝国主义张皇失措，加速了它并吞华北与全中国的过程，同时也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为日本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蒋介石张学良自然决不会放松我们，他们必然要动员他们的主力继续进攻我们，以帮助与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地武装干涉，这将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与打倒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成为不可分离、两位一体的任务。中国工农红军现在是站在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他坚决地相信，他是能够胜利地担负起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的。

全中国的民众们！全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只有全国民众的总动员与坚决的武装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抗日反蒋的最后胜利。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一切斗争的方式，不论是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军警罢岗、群众示威游行、游击战争，以至任何部队的反蒋战争，我们都应该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

国贼头子蒋介石。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

全中国的民众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声讨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拥护中国苏维埃与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反蒋的英勇斗争，拥护中国共产党救国图存唯一正确的主张！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并吞全中国！

打倒卖国贼汉奸蒋介石国民党！

中国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万岁！

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关于举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问题致林彪等电[1]

（1935年11月13日）

林、聂，徐、程，并彭、周：

甲、敌情短期内不致有变化，各部照现位置进行工作，在此期内不发每日行动电令。乙、拟于十八日在张村驿开军委会，请彭、周等候，并已函告朱理治来参加。军委会议拟总结并讨论下列问题：一、方面军及游击队的部署；二、军事、政治教育；三、军区、军分区组织与工作；四、地方工作计划；五、筹粮计划；六、筹款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彭德怀、周恩来的电报。

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

（1935年11月18日）

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根据地，扩大红军，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具体部署是将红军主力集中在南线，出中部、洛川，切断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相机夺取中间县城，争取攻占甘泉、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召开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详细考察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1]

（1935年11月18日）

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电的部分内容。

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5年11月19日）

林、聂：

（甲）董率一一一师（师长常恩多）本日如到张家湾，则明日有到黑水寺〔之可能〕，而在黑水寺、安家川之一个师明日有到直罗镇之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廿一）作战。明、后两日，你们应在安家川、直罗镇两点以北各设置一个观察哨。（乙）你们移驻位置即告。（丙）林看地形情况及对作战意见即告。（丁）我们已移到张村驿西端之川口子，望派参谋率武装一班来此接收命令。

彭　毛

十九日十九时

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1]

（1935年11月20日）

林、聂：

甲、方面军明（二十一）日有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师至两师之任务。

乙、一军团于明四时出发，主力进至袁家山、直罗镇以北地区，由北向南突击之，以一个团进至老人山附近钳制敌后续队，于敌溃退时截击之，以侦察连向黑水寺佯动。

丙、十五军团由药埠头以北地区由南向北突击。

彭　毛

二十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合后，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首长决定集中兵力向南寻机作战，求歼敌一至两个师。1935年11月中旬，第一方面军主力进到陕西富县西部直罗镇以东地区隐蔽待机。20日夜将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包围，21日发起攻击，歼其大部。随后第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围歼残敌，主力转为打援。23日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援敌第一〇六师1个团。24日直罗镇残敌在突围中被全歼。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俘其5300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致林彪等电

（1935年11月21日）

一

林、聂、李、邓：

一、本日已将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全部击溃、缴获正清查中。

二、毛炳文主力尚在廿里铺红德城之线及其以东地区，距我约三四日行程，但其先遣兵力步骑各一团则距我较近，镇铁城则有奉军一部。

三、我军坚决准备消灭毛炳文先遣兵力及求得整理之目的。明二十二日：

（甲）一纵队移至二道川、三道川一带宿营，派部队向两川上游侦察。

（乙）二纵队在杨城子及吴旗镇原地休息，派部队向头道川上游侦察。

（丙）三纵队在宁包川原地休息。

（丁）支队直属队在吴旗镇。

四、准备二十二日再休息一天。

五、加紧筹足三天粮食。

六、加紧进行教育解释支队训令。

毛

二十一日十时

二

林、聂：

我们率二十三分队到二道川口两端十金处之刘河湾，战斗情况如何望告，二十分队留吴旗镇。

毛

二十一日十三时半

三

林、聂：

一、明（二十二）日在吴起镇附近休息一天，一纵队在二道川、三道川、纵队部驻地。

二、第二纵队在吴起镇，杨城子支队部，在吴起镇各加足准备二三天粮食。

毛

二十一日十八时

直罗镇战役歼敌情况[1]

（1935年11月21日）

洛甫[2]及中央各同志：

捷报：敌一〇九师及一一一师[3]一个团昨日侵入直罗镇[4]，方面军本二十一日包围该敌，激战至十二时，被我一军团将一〇九师之两个团及其师直属队整个消灭，未令逃脱一人一枪，缴获丰富，正清查中；其余两团困守土寨，已为我十五军团包围，决乘夜消灭

---

[1] 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为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决定集中兵力向南寻机作战。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陕西富县直罗镇以东地区隐蔽待机。2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彭德怀共同指挥直罗镇战役。21日，向进驻该镇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发起攻击，激战后歼其大部，其残部在突围时均被歼。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本篇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及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给洛甫（张闻天）及中央各同志的电报。

[2]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负总责。

[3] 一〇九师，指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一一一师，指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师长由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兼任。

[4] 直罗镇，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之。董英斌[1]亲率两个团增援，现在我阵地附近，亦决于明日继续攻击该敌。

毛　彭　周　林　聂　徐　程

二十一日二十时

---

[1]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二路军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司令兼第一一一师师长。

对敌一〇六师及董英斌部作战部署[1]

（1935年11月22日）

彭：

甲、敌一〇六师本日由黑水寺[2]增援，董英斌[3]指挥之两个团在安家寨一带我阵地附近。估计董敌本日当向袁家山、北山攻击，一〇六师当从老人山、东沟向我右翼迂回。

乙、本（二十二）日我十五军团主力从正面对付董敌，我一军团从右翼打一〇六师，最后协同消灭董敌。

丙、信送吴家塔转。

毛

二十二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黑水寺，村名，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3]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司令。

从侧面和正面抑制敌一一七师[1]

（1935年11月22日）

叶：

甲、一一七师有进攻羊泉镇[2]模样，望派人指挥二十七军在曲儿之一个营及地方武装及骑兵两连，努力从侧面正面抑制之。后方机关及俘虏师速移至套通、照八寺。

乙、司令部应在桃花砭。后方工作及东面对敌统由你指挥之。

丙、从俘虏中清查连以上官长，尤注意牛元峰[3]。

丁、昨日被我消灭者是三个团及一师部，有一师参谋长及一团长向东北苏区跑，请通知地方捉拿。

戊、通知省委、军区[4]协同作战。

毛

二十二日七时

---

[1] 红军第一方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后，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为解救被围之敌，由陕西省富县增援。这是毛泽东关于阻击该敌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的电报。

[2] 羊泉镇，位于陕西省富县西南。

[3] 牛元峰，当时是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师长，在直罗镇战役中毙命。

[4] 指中共陕甘省委和陕甘军区。

消灭董英斌沈克两师之部署[1]

（1935年11月23日）

彭：

甲、为解决董沈两师[2]，克服黑水寺[3]战略要点之目的，决对黑水寺取包围步骤，期在两星期内完成此任务。

乙、已令第一团带十七分队上午补粮，下午出发，开至小由子、任家店地区，于明拂晓相机袭取龙义湾，在其附近要点首先构筑坚固野堡，在五天内完成主碉一座、辅碉三座。

丙、请着徐程[4]派二十五军之一个团首先派出一营至孟家油房地域，相机袭取王家角，在其附近构筑堡垒，断敌粮道，阻止增援，与第一团切取联络，其余两营待命出发。

毛

二十三日七时于宽坪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董沈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一师和第一〇六师，师长分别为常恩多（原为董英斌）和沈克。

[3] 黑水寺，村名，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4] 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一军团十五军团行动部署[1]

（1935年11月23日）

彭、周：

甲、在包围黑水寺[2]整个解决董英斌[3]的基本方针下，决以一军团主力进至韩家河、甘沟门、王家庄地区，由荣臻[4]率第一团、第十三团及侦察连进至龙义湾、王家角及其以北地区，均于本日下午到达。

乙、十五军团应以一部包围直罗镇，保证消灭此敌，而以主力于明（二十四）日一时出发，秘密离开现地移至下瓦房、孟家油房、水磨上、孟坪寺、月亮山、二十里排、马渠寺沟地区，配合第一团、第十三团夺取黑水寺、太白镇[5]两点中间之三四十里地区，准备打击西面增援之敌。

毛

二十三日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和周恩来的电报。

[2] 黑水寺，村名，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3]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司令。

[4] 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5] 太白镇，位于甘肃省合水县东北。

关于在直罗镇战役的指示

（1935 年 11 月 23 日）

甲、部队西移，保证十五天粮食极为重要，请与叶、杨面计，动员输送办法。

乙、在十二月十日前，要求后方输送棉衣裤三千五百套，新兵三千名，确实到达前方直接补入部队中训练。

丙、陕甘省委只能管下寺湾以南，保安、子昌、安寨宜即划归陕北，以利工作。

丁、请告省委扩大直罗镇宣传请告劲光速令中宜独立营阻扰中宜敌人交通路，令羊泉道左铺游击队迫近鄜州。

胁敌阻敌，宣传红军即攻鄜州，再要劲光向韩家河建立交通站与我每日通讯一次。

戊、请告尚昆瑞卿限一星期整顿红一团完毕改设政委，以便执行新任务，如何望复，我与林聂今下午移韩家河。

二十三日十一时

甲、黑水寺之敌有向太白镇撤退模样。

乙、一军团现向太白镇方向追击。

丙、十五军团应以主力立即出发取急行军经孟家油房直到太白

镇和尚原一带截击该敌协同一军团消灭之。

二十三日十二时

追击逃敌董英斌的部署[1]

（1935年11月24日）

聂政委：

一、直罗镇之敌已向北突围，正追堵中。谍息：董英斌[2]昨晚已退至太白镇，并拟继续退至合水集中。

二、我十五军团有两个营由程子华[3]率领，今晨由药埠头[4]向和尚原、太白镇追击。我二师、四师及十三团昨今两日均在向太白镇追击中。

三、如敌现已退至太白镇集中，则你们须威逼其续退。如敌自太白镇继续西退，则你们须乘其在退却运动中截击之，尔后以一部继续追击，主力在太白镇停止待命，并扩大胜利宣传。

四、我们昨日迷路走到石咀子来了，今日在此未动。一及十五军团之追击队统由你指挥，望相机处置一切。

毛　林

二十四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给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司令。

[3] 程子华，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政治委员。

[4] 药埠头，村名，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

（1935年11月25日）

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蒋介石卖国的罪恶，真是屈指难数。他出卖了东三省，他以机关枪压迫上海英勇抗日的士兵退却，出卖了松沪，他出卖了热河，他签订了塘沽协定，出卖了平津、河北，他承认了察哈尔事件中日本所提的□要求，出卖了察省、华北，他更承认了最近日本所提的亡国灭种的八大要求，出卖整个华北及全中国；他要使全中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全中国人民成为亡国奴！在这些……大恶极的卖国事实之前，蒋介石更在国民党的所谓“五全大会”前面作了最荒唐的、无耻的申辩！

蒋介石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狠毒的侵略，是要直接并吞全中国领土，灭亡中国民族。凡是称作有血气的中国人，都应该奋猛直前地抗日到底。而卖国贼蒋介石则相反地竭力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万恶侵略作辩护，他说“所谓民族运动绝非单纯对外运动”“国家与国家间绝无百年不解之仇”“更就另一事件，另一方面观察，似甲乙两国又绝无可离之道”“吾东邻日本，关于东亚和平与彼此两国福利，亦必关心更切”。这是何等丑恶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日帝国主义以枪

炮炸弹屠杀我们民众、吮吸我们膏血，反说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决无什么仇恨，中国离不得日本，日本刽子手对于中国福利关心更切！天下荒唐无耻之尤，孰有甚于此者！只有日帝国主义的最忠顺走狗像蒋介石那样的卖国贼，才能说得出这样献媚的鬼话！

蒋介石以为亡国灭种是中国人民自己不好

我们中国人有力量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暴侵略与并吞，我们动员全体人民，武装人民，动员全中国数百万的海陆空军，没收日帝国的银行企业及汉奸财产，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苏联世界无产阶级，被日本压迫的殖民地民众，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无产阶级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战胜日本以及任何日本帝国主义，将日本驱逐出中国去。松沪十九路军英勇士兵抗日战争的历史，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虽然国民党不断镇压与出卖他们），中国唯一反帝主力工农红军历年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艰苦奋斗，日本对于中国人民反日斗争的畏惧……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恢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

可是卖国贼蒋介石，既用一切方法为日本的侵略开辟道路，既用一切力量来镇压反日运动，首先是进攻工农红军，反说中国无力抗日，说：“吾人今日尤应切实反省，数年来全国对一切精神建设，物质建设所谓自立自强之道，究竟努力至何程。”“若仅求一面（指对外）突出，必遭意外波折”，毫无问题的蒋介石所谓“精神建设”即是新生活运动所提出的奴隶道德，所谓“物质建设”即是进攻红军用的堡垒马路与交通的建设。蒋介石既用全力摧残争取民族独立的反日力量，反说中国应求自立自强，这真荒唐之至。再进一步，

蒋介石更将帝国主义侵略及其自身卖国之罪，转嫁于广大民众身上，说：“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切都是中国自己不好，民众自己不好?！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种狂呓更无理更无耻的吗?

蒋介石要全中国人民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恭顺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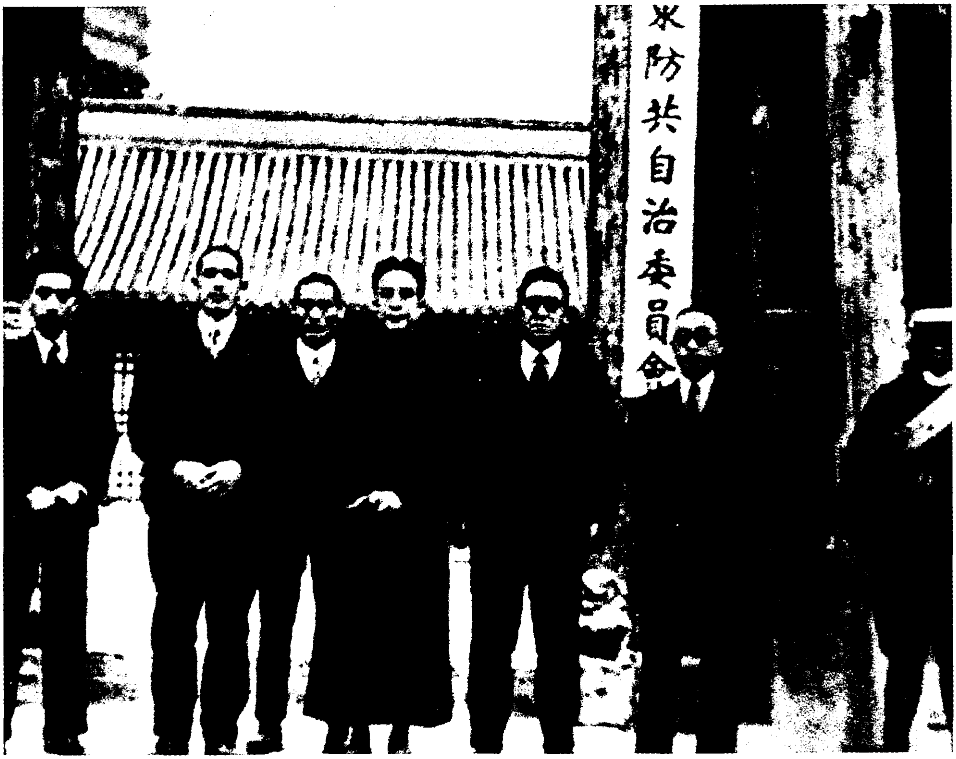
为着主人家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卖国贼蒋介石赤裸裸地要中国民众恭顺地不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民众“不应斤斤于一时利害冲突”“不应因一时感情及局部利害为对象”，说“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的忍耐”“吾人当此困难之际惟有努力自助与自求而已”“吾人今日所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诚，对国际求共诚而已”。这样，日本亡我们的国灭我们的种，是“枝节问题”（荒唐至极的鬼话），中国民众丝毫不应计较，全中国民众只有忍耐，只有束手等待帝国主义的宰割奴役，恭顺地来做日本帝国主义屠刀下的亡国奴；蒋介石告诉民众走这样的死路，真是卖国贼的狼心狗肺的胡说。

蒋介石要卖国到底

蒋介石竭其全力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镇压一切反日斗争，告诉全中国人民忍耐地做亡国奴，并且大声地宣告他的这样卖国是一贯的坚决的，说：“中正……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自身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所谓“和平”就是毫不抵抗的卖国。这样，蒋介石“绝不放弃”他的卖国事业，要卖国到底，“绝不放弃”他的卖国头子的地位要恋栈到底，他要鞠躬尽瘁

地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死走狗！

苏维埃中央政府已经在自己的屡次宣言中声讨蒋贼的卖国宣告他的死罪，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全国唯一反帝的主力工农红军，并号召全国民众总动员起来，武装起来，抗日反蒋，消灭这一丧心亡胆的卖国贼蒋介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来扫除这中国人民的□大贼——蒋介石，只有坚决消灭这一大贼，彻底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国人民才能得到独立解放与领土完整！



1935年11月24日，在日本的指使下，汉奸殷汝耕在北京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企图实现华北五省自治。居中者为殷汝耕。

致聂荣臻并林彪电[1]

（1935年11月25日）

聂政委，并致林：

（一）速放俘虏官数名与沈克办交涉，如他同意反蒋反日，则允许日后人枪如数退还。（二）仍向太白镇威迫促其西退，乘其退而消灭之，夺取太白镇。（三）直罗敌昨日突围，被我十五军团全数消灭，活捉牛元峰。十五军团有一个营向太白镇追击。

彭　毛

二十五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并致军团长林彪的电报。

对沈克[1]一〇六师的基本方针

（1935年11月26日）

聂政委，并致林：

昨二十时电悉。

甲、对一〇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

乙、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

丙、告董彦文[2]到张村驿[3]的路线，以便日后接头。

丁、给彦文以出入苏区证书。

戊、十五军团现向张村驿集中，准备追击一一七师。

彭　毛

二十六日五时

---

[1] 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〇六师师长。

[2] 董彦文，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是董彦勋，情况不详。

[3] 张村驿，村名，位于陕西省富县西部。

致董英斌电[1]

（1935年11月26日）

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

[1] 这是毛泽东致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聂荣臻等电[1]

（1935年11月26日）

各部集中后，拟整理一星期，开军委会，开干部会，开祝捷会，以后按新部署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电的主要内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

（1935年11月28日）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

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

在亡国灭种的前面，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联名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

经不断唤醒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曾经派遣了自己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现在正是要求我们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的时候。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向全国人民宣言，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这个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我们认为应该有以下的十大纲领。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发薪发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中国抗日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国人民拥护我们这一主张，并立刻互派代表协商具体进行办法。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同心协力实现这一主张，则最后

的胜利是我们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图为北平学生的游行队伍。

致博古电[1]

（1935年11月28日）

一方面军本日已全部集中于羊泉镇以北地区，进行十天整理训练，至十二月八日止，九日接近部署出动。后方新兵、衣服、食粮等项，均请令其于八日前赶到，否则不便补充。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1]

（1935年11月30日）

洛甫：

甲、方面军休息十天后拟包围宜川、洛川两城，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延安之敌逃跑则截击消灭之。同时可赤化宜洛两县，筹款就粮。

乙、如阎锡山[2]确向延长、瓦窑堡[3]进，则移至延川附近待命。

丙、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我们有详信复你。

丁、为准备东进，四个月内应扩大红军一万。

泽东

三十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洛甫（张闻天）的电报。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瓦窑堡，镇名，为今陕西省子长县县治。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

（1935年11月30日）

一　直罗战役

（一）此次敌人进攻的严重性：

劳山、榆林桥两次胜利[2]后，敌主力由西边进，企图构成葫芦河东西封锁线，然后北援甘泉、延安，构成洛河南北封锁线，如果没有直罗胜利，则我们向南发展就被限制了，已有的苏区也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

（二）我们胜利的原因：

1. 两个军团[3]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2. 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
3. 战斗准备的充足；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直罗战役总结和目前形势与任务报告的提纲。直罗战役，是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西部直罗镇及周围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歼灭国民党军1个师又1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2] 指1935年10月红军第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县劳山歼灭国民党军第一一〇师大部和在榆林桥歼灭第一〇七师4个营这两次战斗的胜利。

[3] 两个军团，指当时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

4. 群众与我们一致。

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没有第一个条件，不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不能使董英斌[1]五个师（西边四师、东边一师）在其先头百〇九师消灭后，主力即溃退，我军又于追击中消灭百〇六师一个团，使百〇八、百十一两师不得不退到甘肃境内，东边侵入羊泉之百十七师，也不得不退回富县城。没有第二个条件，就不能取得这次胜利，而让敌人占去了葫芦河与直罗镇。没有第三个条件，则部队没有休息训练，士气与战斗力不能提到这样高；张村驿、东村等五六个民团土围子不消灭驱逐，便不能荫蔽主力与便利战斗；没有团长以上的地形观察与地形图测绘，便不能布置得这样适当，打得这样漂亮。没有第四个条件，则荫蔽主力，搬运伤兵，供给粮食，都不能做得这样好。这四个条件是造成这次大胜利的原因。而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由于方面军各级首长与战斗员的坚决执行，已经完满地实现了。这次胜利的战斗告诉我们，对于以后作战亦必须争取这四个条件：（1）两个军团更加团结；（2）抓住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部署战斗；（3）要争取在战前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的充分准备；（4）努力地方工作，争取居民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三）这次胜利与下次胜利的关系：

这次胜利，最后地解决了第三次“围剿”，敌人非重新调兵重新部署，不能向我们进攻了。这就给了我们以准备打破新“围剿”的条件：时间与地区。时间与地区对于我们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利

---

[1] 董英斌（1894—1950），辽宁沈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用已经取得的每一点钟时间与每一方里地区来进行我们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一切基本工作。

（四）这次胜利的影响：

1. 使刚刚会合的南中北三支红军[1]得到进一步的团结。到现在人人都相信这种会合与团结是很好的，是必要的，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2. 使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去猛烈扩大红军。这是目前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在胜利影响之下，当红军的也更多了，指导扩大红军的同志们也更起劲了。

3. 巩固了苏区。苏区群众人人高兴，群众拥护红军帮助战争的积极性必定更加提高起来。“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真不错”，这种舆论是在沸腾着。

4. 容许我们猛烈扩大苏区。洛川、中部[2]、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游击区与白区，都可以变成苏区，这些地方的群众在胜利影响之下，必会更加积极起来。

5. 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3]。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卖国的国民党请滚开，全国人民的救星——红军与苏维埃要同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国民党，打倒卖国贼总头子蒋介石。全国人民，尤其是

---

[1] 指从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长征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和在原地坚持斗争的陕甘红军。

[2] 中部，旧县名，今陕西省黄陵县。

[3] 指1935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

6. 配合了全国红军与游击战争的胜利。“你们看：我们在北方最后的粉碎了第三次‘围剿’呢！二万五千里远征的中央红军同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战场上会合了，并且活捉了牛师长[1]呢！你们勇敢地向前吧!”

7. 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8. 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的。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同志们，这次胜利的影响是大得很的，我们要发挥这些影响出去，要向每个红色战士说明，要向前方、后方、苏区、白区一切工农群众与一切白军的兵士、官长解释清楚，使他们了解与同情我们。

二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一）在世界：

---

[1] 牛师长，指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在直罗镇战役中毙命。

——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走向大战（东方、西方）。

——无产阶级及民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大战（法国七月十四日的四十万人大示威，今年美国的空前大罢工，西班牙与希腊的民主革命，各国的革命形势）。

——殖民地的反帝运动（阿比西尼亚[1]的民族战争，中国的高涨的革命运动，英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

——苏联的强盛（生产赶上与超过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又一个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红军的新任务——“胜利是定了的，现在只是用小的牺牲去换得大的胜利的问题，红军要进行技术与战术的突击”。

——世界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时期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二）在中国：

——日本的行动（独霸中国的严重局面）。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英美与日本）。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蒋系与反蒋系的酝酿与展开）。

——以陕甘红军为领袖的三个主力红军（我们，二、六军团，四方面军）。

——恢复了及发展了的游击战争。

——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

——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三）在西北：

---

[1]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1．在敌方

——张学良[1]三个主力军的击破（王以哲军、董英斌军、何柱国骑兵军）。

——于学忠万福麟[2]两军的徘徊。

——刘多荃[3]的孤军。

——杨虎臣[4]的防御地位。

——阎锡山[5]是辅助作用。

——蒋介石在待机位置。

所以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了。

2．在我方

——红军不可侮的力量（莫以为队伍比过去小）。

——游击战争的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工农群众的积极性（表现着与蕴藏着的力量）。

——党的正确领导（中央）。

——白区群众的同情。

---

[1] 张学良（1901—2001），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副总司令。

[2]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万福麟（1880—1951），吉林农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军军长。

[3] 刘多荃（1898—1985），辽宁凤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第一〇五师师长。

[4] 杨虎臣，即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总司令、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白军士兵与下级干部的同情。

——少数民族的同情。

所以我们是有良好阵地的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向前发展着。

（四）第四次“围剿”的问题

——我们的发展对日本帝国主义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对国民党的卖国政府是大威胁。

——我们的发展使张学良下不得台。

——我们的发展使杨虎臣、阎锡山、马鸿逵[1]寝食不安（特别是阎锡山，他同张学良是我们当前的两个主要敌人，第四次“围剿”中阎锡山必从山西向陕西打来）。

三　新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从现时起用极大努力争取与积蓄更加充足的力量，迎接敌人新的大举进攻而彻底粉碎之，开辟我们的苏区到晋陕甘绥[2]宁五个省份去，完成与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打成一片的任务。在那时，我们便可以争取更大的力量，给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革命（这是必然的而且是不远的）与进攻苏联，国民党各派军阀进攻北方红军与进攻全国红军，以空前未有的大打击，争取苏维埃在北方七八个省内、南方若干个省内的伟大胜利，把抗日战争掀起到最高的程度。这是我们的总任务。

（二）猛烈发展游击战争

---

[1] 马鸿逵（1892—1970），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防守区司令。

[2] 绥，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使游击战争向晋陕甘绥宁五个省内广泛地有力地发展去。

——四个月内游击部队扩大一倍。

——使游击战争的发展增加计划性。

（三）一方面军的任务是：

1. 继续消灭困守苏区境内的敌人，并调动可能来援之敌而消灭之，以求得人员武器的补充与苏区的巩固。

2. 猛烈扩大自己，争取四个月扩大一倍（各兵团从居民中扩大，中央局军委会从后方扩大，俘虏兵中大量争取）。我重复地说，这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任务。

3. 切实训练自己，提高方面军的战斗力到很高的程度。一方面着重射击教育与战术教育，一方面着重基本的政治教育与识字教育。我们的射击和射击指挥还有严重的缺点，我们的战斗指挥还非常之不精熟，一定要求得一个彻底的转变。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应该努力提高一步，指挥员要做到能写能看，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通道理。教育首先是干部教育，只有提高了干部的军事政治程度，才能使战斗员的军事政治程度真正提高。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红军在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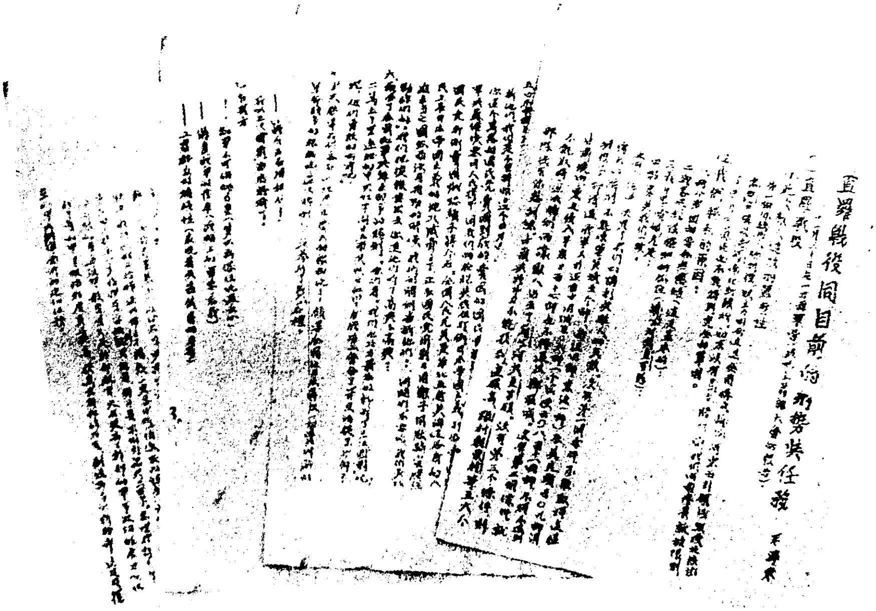
4. 猛烈扩大苏区，造成有利的战斗环境。这有地方党政力量与我们配合去做。红军指挥员战斗员要尊重地方党政领导机关，拿命令的甚至骂人的态度去对付地方同志是完全不对的。

5. 猛烈破坏敌军，把破坏工作变成红军与居民的群众运动。改变对待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

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弟兄看待，严禁报复行动。所以，消灭敌人、扩大红军、坚强红军、赤化地方与破坏敌军，是今后时期内一方面军的五项具体的严重的任务与工作，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中心的一环。这里提出消灭敌人的任务，不会妨碍也不应使它妨碍其余工作（尤其是扩大红军）的完成，即不去追求不可必得的战斗，不跑到很远的白区去求战斗。提出的这些任务与工作，虽然是红军经常的任务与工作，但处在两次“围剿”之间的目前时期内，是有它的特殊的内容与意义的。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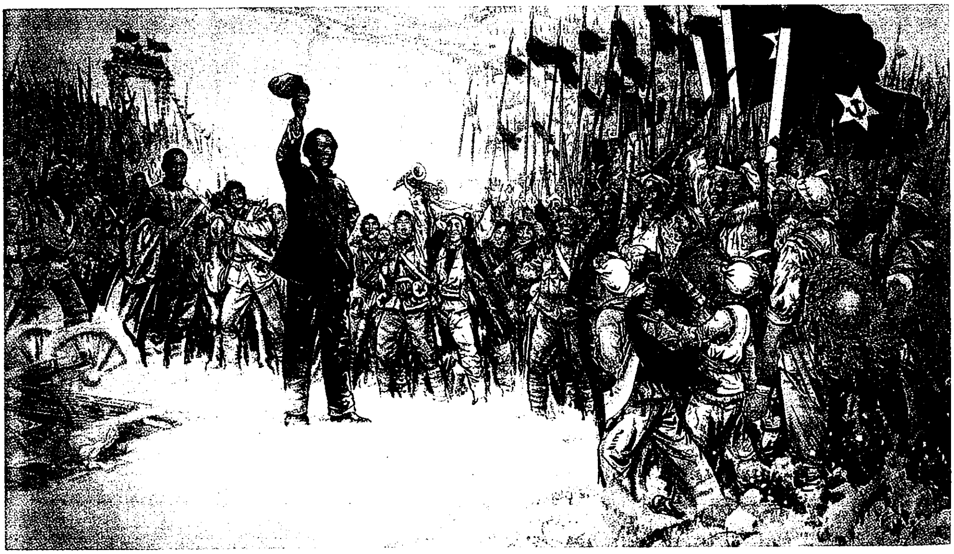
我们拿了这些去粉碎敌人的新进攻，我们拿了这些去取得对于全国红军游击战争与抗日反蒋战争的领导，我们拿了这些去具体地准备着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直接作战——我们领导着用武装制止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并吞全国与进攻苏联。我们的神圣的责任，要求我们的同志们拿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去进行自己的工作，只要我们这样做，伟大的胜利是我们的。



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

毛澤東

1935年11月，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提纲——《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



《奠基礼——欢庆直罗大捷》（中国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

（1935年11月）

官兵弟兄们!

国民党南京政府已经答应日本的要求，实际上将中国归日本管理，国民党军队归日本派军官训练，并由日本直接指挥你们到陕甘“剿共”。你们名义上虽然还是受蒋介石等卖国贼指挥，实际上已受日本军部的指挥来打抗日的红军，以便日本独占中国!

红军在四年前，已经正式对日宣战，最近中央红军和二十五军为了实行北上抗日，都到陕甘来了。红军是日本的死敌，所以日本要亲自来指挥进攻红军!

现在中国就要亡了！全国同胞都要当亡国奴了！你们还甘心受日本鬼的指挥来打抗日的红军么?

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官兵们!

一切不愿受日本鬼指挥的官兵同胞们!

红军最诚恳的向你们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

日。谨此宣言。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彭德怀
政治委员　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　王稼蔷
第一军团长　林　彪
政治委员　聂荣臻
政治部主任　朱　瑞
第十五军团长　徐海东
政治委员　程子华
政治部主任　郭述申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

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等问题

（1935年12月1日）

洛甫：

二十号及二十五号信均到。

甲、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因为这个方针是使中国革命战争，尤其不久就要到来的反日民族战争，取得更加有力量与更加迅速发展的正确方针。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1]的道路，这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为完成上述两种任务，我想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够了。所以我们应在明年夏天或秋天与外蒙靠近，目前应立即开始组织蒙民游击队。

乙、反蒋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及具体的口号与纲领完全同意，宣言[2]请立发。

丙、对富农策略的转变基本同意，但决议[3]上应指出，当斗争

---

[1]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2] 指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

[3] 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对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农村中的党应善于领导与监督富农，严防为富农所领导。要指出当斗争深入时富农必然转入地主阵线，这是中国半封建富农阶层的特点。对有劳动力又破产了的小地主阶层，在群众同意下应按富农待遇。

丁、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我给董英斌的信[1]已普遍发表，现正进行广泛瓦解白军的工作。

戊、我或于数日后回后方一行。

泽东

一号二十四时

---

[1] 指1935年11月26日毛泽东给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五十七军）司令董英斌的信。信中申明：（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致朱德等电[1]

（1935年12月2日）

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致洛甫、李德电[1]

（1935年12月5日）

我率三十一分队拟明六号动身来后方。德怀、林彪、子华三人须参加六号及七号的祝捷运动大会，定九号同朱理治[2]来后方。开会地点以安塞为便。

完全同意李德同志对延川、延长的部署[3]。一方面军十天内仍在原地集结训练，俟阎锡山情况明了后，再定向南或向东的方向。

---

[1] 这是毛泽东致洛甫（张闻天）、李德电的主要内容。

[2] 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

[3] 1935年12月3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刘志丹奉命率一部兵力到达延川，防止延川、延长黄河东岸国民党军西渡，并相机歼灭从肤施逃出之敌。同日，李德将这个部署电告彭德怀、毛泽东。

给杜斌丞的信[1]

（1935年12月5日）

从汪锋同志知先生不忘情于革命，甚感事也。时至今日，论全国，论西北，论陕西，均舍抗日反蒋无第二条出路。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城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城先生成立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此次敝军追击董英斌，消灭沈师一个团，非所愿也），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君宝珊[2]，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

---

[1] 这是毛泽东致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信的主要内容。

[2]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给杨虎城的信（节录）

（1935年12月5日）

虎臣[1]先生总指挥阁下：

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敝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耽耽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喘喘〈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绥靖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如言国家，则今日者，乃亡国灭种之日也。凡属爱国志士，革命军人，应如何泣血椎心，一致奋起，为抗日讨蒋而战。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我民族国家之世仇，而蒋介石则通国人民之公敌。日本而无蒋介石，则吞并华北灭亡中国之诡计不得售，蒋介石而无日本，则其卖国家戮民众祸军队排异己之奸谋不得逞。是以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驱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百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奋，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镳并进，则河山有幸，气

---

[1] 虎臣，即杨虎城。

势更雄，减少后顾之优〈忧〉，增加前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机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此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十二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如荷同意，即祈派遣代表，前来苏区，商洽一切。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冰霜匝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专此布臆。

顺颂勋祺。

毛泽东

彭德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五号

关于规定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及抚恤费的通令

（1935年12月5日）

为使伤病员能迅速治愈并恢复体力，依据目前我们行动地区较低的物质条件，特规定伤病员柴菜费、调养费及抚恤费如下：

（一）轻重伤病员在治疗期间，每日供柴菜费五分。

（二）重伤员每人发调养费四元，轻伤员每人发调养费二元。

（三）病员如不能随队休养而须入医院治病者，每人发入院费一元。

（四）因伤残废者，按全残废半残废情形分别发给抚恤费。全残废每年二十五元，半残废每年十五元，须经各该级首长报告，抚恤委员会审查批准，然后发给。

（五）在红军中工作积劳成病或身体衰弱者，应酌发调养费，按其情形每月至少五角至多三元，至身体恢复健康为止。其审查批准手续亦须经过抚恤委员会。

此上规定如物价有重大变化得改变之。特此通令，前后方各部队各军事机关一体知照并向所部宣布执行。右令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1]

（1935年12月8日）

陕甘苏区的工农劳苦群众们：

亲爱同志们，你们总不会忘记国民党统治下面所受的无比痛苦吧？那时军阀官僚怎样压迫我们来，出不尽的捐款，催款的人像毒虫那样咬着我们，一次捐款还没付清，下次捐款又已派到。赶付不起时就立即把我们捉去坐牢，或枪杀！同志们，这些我们不能忘记！

记得豪绅地主怎样凶恶地天天的上门来催我们的租，逼我们的债，交不出租债时，我们的牛羊牲口家里器具都被牵去拿去。甚至我们的儿女都抢去卖掉。同志们，这些我们怎么能忘记！

更伤心的，白军来时把我们的粮食、牛羊、鸡子、猪子一起吃完。把我们的牲口赶走抢去，把我们房屋拆净烧毁，将我们的壮丁，拉去当兵，将我们的妇女轮奸奸死！同志们，这些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主要是要使我们死亡！

我们忍受不了这样残酷的痛苦，我们勇敢的起来革命，推翻反革命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现在再没有人催我们捐款，追我们租

---

[1]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军民反对卖国，积极参军抗击帝国主义。

债了，我们分得了土地房屋，我们获得了自由解放，现在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要以一切的牺牲，用一切的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土地和自由，来保卫我们的苏维埃政权。

同志们，现在国民党军阀和豪绅地主，受着帝国主义指挥，向我们苏区残酷的进攻。国民党匪军到处乱抢乱捉，大烧大杀，豪绅地主要抢回我们所得土地，要我们加倍缴租还债，要剥夺我们一切革命利益。国民党匪军非但要恢复地主资本家统治，而且还引帝国主义进来屠杀我们。蒋介石正在把我们陕甘的土地人民，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要使我们做亡国奴，使我们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宰割摧『杀』残，使我们灭族灭种。

同志们，我〔们〕难道能让国民党匪军和日本强盗来屠杀宰割我们吗？我们难道能受亡国灭种的痛苦吗？万万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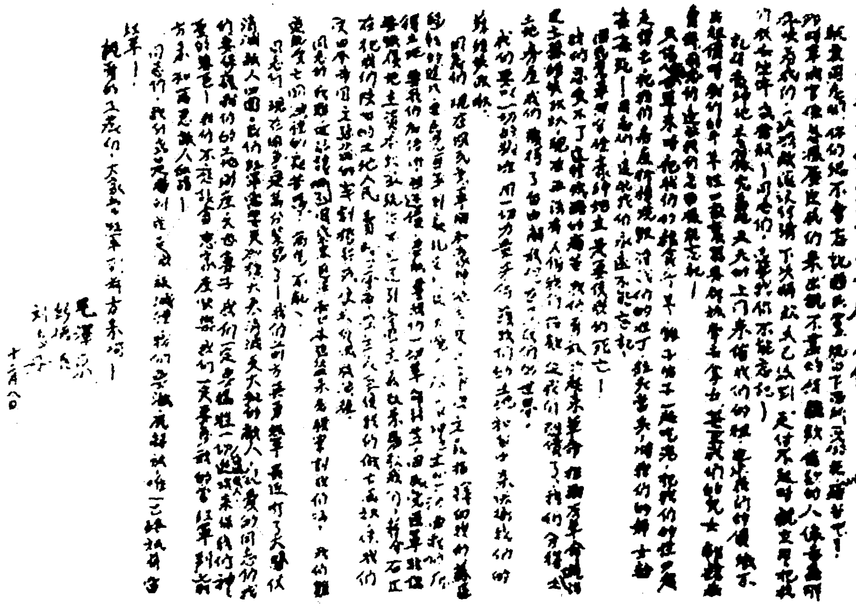
同志们，现在斗争是万分紧张了！我们前方英雄红军最近打了大胜仗，消灭敌人四团。我们红军需要更加扩大，来消灭更大批的敌人。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土地，财产，父母，妻子。我们一定要牺牲一切，消灭敌人进攻，来保〔护〕我们神圣的苏区！我们不应该贪恋家产快乐，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当红军，到前方来和万恶敌人血战！

同志们，我们或是胜利，或是灭族灭种，我们要彻底解放，唯一出路只有当红军！

亲爱的工农们，大家当红军，到前方来呵！

毛泽东　彭德怀　刘志丹

十二月八日



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联合署名发表的《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

（1935 年 12 月 10 日）

亲爱的内蒙古的全体民众们!

现在我们是处在全世界大变动的关头。你们还是甘受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军阀的宰割，做他们的炮灰而趋灭亡，还是乘机奋起，努力图强，以争得至尊的蒙古民族在全世界民族中，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二者必居其一，望速择之。

野心勃勃凶焰逼人的日本帝国主义，欲占领全中国，必先占领满蒙，欲称霸于全世界，必先占领全中国。这个野蛮计划，现在已逐步实现。首受其害者，为东三省〔华〕北五省的民众和内蒙古的整个民族，狡猾卑鄙口蜜腹剑的日本强盗，正在用各种欺骗手段，假借“大蒙古主义”，来达到占领蒙古的整个土地财富，奴役整个内蒙古人民的目的。他准备把你们的土地作战场，人民当炮灰，以达到他进攻中国〈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进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及苏联，并最后消灭蒙古民族的目的。不信，请看朝鲜、台湾、东三省的人民，不能用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能有居住、行动、耕种、牧畜的种种自由，一切政治经济的权限，完全操在日本矮〈倭〉奴之手。再看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察哈尔的军事布防与军事设备，及兴安总署与其他的一切阴谋，便可以了然内蒙古民族达到了空前未有

的危机。何况还有恬不知耻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军阀，不独自命为宗主国，更进而把内蒙古整个的区域划为行省，驱逐蒙古民族于黄河以南、阴山以北，更时常指使井岳秀、高石秀等小军阀，不断地强占蒙古民族的牧地、盐池，企图逐渐消灭蒙古民族，做日本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加速内蒙古民族之灭亡。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所有的英勇红军，在数年来的英勇战斗中，无数次地给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军阀以严重的打击。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纪录，胜利地达到了北上抗日的预定计划，中国红军战斗的目的，不仅是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同样的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我们认为只有我们同内蒙古民族共同奋斗，才能很快地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同时相信，内蒙古民族只有与我们共同战斗，才能保存成吉思汗时代的光荣，避免民族的灭亡，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而获得如土耳基〈其〉、波兰、乌克兰、高加索等民族一样的独立与自由。因此，本政府向你们宣言：

（一）认为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二）我们认为只有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地组织起来，他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

府，有权与其他民族结成联帮〈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三）凡在蒙古区域的汉、回、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平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

（四）首先将井岳秀所占领的把兔湾，与高石秀所占领的区域及两个盐池，交还内蒙人民，并将长城附近，如宁条梁、安边、定边等地划为商业区域，以发展你我双方间的贸易。

（五）我们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或其他的武装队伍，绝对没有向草地进攻的企图，但你们亦不要允许中国军阀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经过草地来向我们进攻，来加速你们自己的灭亡。我们愿意彼此缔结攻守同盟，去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

总之，只要你们真正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意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蒙古人民素以饶〈骁〉勇善战见称于世，我们相信你们若一旦自觉地组织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于〕内蒙古之领域以外，则谁敢谓成吉思汗之子孙为可欺也！请为熟思，并望互派代表以建伟业，则不胜幸甚！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1935年12月15日）

鉴于日本帝国主义之积极侵略，中国沦亡之危迫，全国工农及爱国志士均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斗争，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蒋介石辈；又因蒋介石等的卖国贼统治，陷中国经济于万劫不复之域——特别是农村经济，全国农民均群起反抗与暴动，富农已改变其仇视苏维埃革命而开始同情于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为扩大全国抗日讨蒋之革命战线，特决定改变对于富农之政策。

（甲）富农之土地，除以封建性之高度佃租出租于佃农者，应以地主论而全部没收之外，其余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

（乙）富农之动产及牲畜耕具，除以封建性之高利贷出借以剥夺农民者外，均不应没收。

（丙）除统一累进税外，禁止地方政府对于富农之征发及特殊税捐。

（丁）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

（戊）在实行平分一切土地之区域（乡、区），富农有与普通农

民分得同样土地之权。

（己）富农在违反苏维埃法令时应依法惩治之，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应按暂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之。

（庚）富农仍无权参加红军及一切武装部队（包括赤卫军在内），并无选举权。

（辛）以前颁布之土地法及一切其他法令，凡与本命令有抵触者悉废除之。

（壬）本命令自公布日起实行之（在未联系一片之区域，文到之日实行之），在本命令实行前依以前法令施行者仍属有效，不得翻案。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同意夺取甘泉宜川[1]

（1935年12月17日）

德怀：

甲、同意现部署。一军团攻甘泉之一团可立即出发，用坚决而机巧的手段，期于在七天内外取得甘泉。一军团主力可于二十一日从现地出动，开到宜川龙泉镇[2]地域工作，相机夺取宜川。十五军团主力亦可于二十一日出动，进到牛武镇[3]、龙泉镇之间地域工作。两军团以后发展方向为向正南，首先赤化洛川宜川两县，加紧扩红。

乙、第二十六军[4]全部立即北上配合骑兵团，受刘志丹宋任穷[5]

---

[1] 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民党军在东南、西南和北面几个方向布置重兵，形成了对红军的包围。为打破这种局面，迅速扩大苏区和红军，1935年12月16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夺取甘泉、宜川两县的意见。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彭德怀的复电。

[2] 龙泉镇，位于陕西省宜川县西部。

[3] 牛武镇，位于陕西省富县东北。

[4] 二十六军，指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1935年9月同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从鄂豫皖长征抵陕北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等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二十六军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这里沿用的是原来的番号。

[5] 刘志丹、宋任穷，当时分别任正在组建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指挥，执行消灭井岳秀[1]之任务。

丙、如甘泉被夺取，送些俘虏官入延安，则延安敌有跑的可能。应以二十七军[2]全部改任消灭该敌之任务，其办法不去围城而位于甘谷驿[3]附近，候敌逃出而消灭之。

丁、方面军司令部在头一时期，以位于甘泉附近直接指挥夺取甘、延之战斗为合宜。宜、洛部队则经过电台指挥之，并注意建立甘泉至龙泉镇之运输联络线。

戊、百〇七师之李团长[4]即送省委，请嘱富春劲光[5]善为引导，与立石连长接头，争取该连投降，有非常大的意义。

己、棉衣送前方者三千七百套，收到否？全部收到，请查复。尚差二千四百套，前后方分任解决，前方一千，后方一千四百，因后方尚须解决新战士衣服。

庚、二十六军何日开始向子长县进，该军缺乏物件，如碗筷被毯尚差多少，查明电告，以便补充。

辛、前方夜寒，拟发棉花解决。拟每人发棉花一斤半，两人合睡共三斤。后方十五天内可供给棉花一万斤，余数约八千斤（以一

---

[1] 井岳秀，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防区副司令兼第八十六师师长。

[2] 二十七军，指陕北红军第二十七军。1935年9月同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从鄂豫皖长征抵陕北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等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二十七军编为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这里沿用的是原来的番号。

[3] 甘谷驿，镇名，位于陕西省延安市东部。

[4] 李团长，指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三〇团团长李东坡。

[5]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劲光，即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

万二千人计）由林聂、徐程[1]从宜川、洛川购买解决。

毛泽东　周恩来

十七日二十一时

---

[1] 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致彭德怀电[1]

（1935 年 12 月 19 日）

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是有着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并转林彪电[1]

（1935年12月21日）

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彭德怀并转林彪电的主要内容。据《聂荣臻回忆录》载："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以前，曾征求军团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在信中就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去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

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1]

（1935年12月23日）

甲　战略方针

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一）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这即是“抗日联军”“红军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队”“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头子——蒋介石”“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巩固抗日后方”“扩大抗日根据地”“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

---

[1]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军事战略方面，会议确定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23日通过。

倒日本帝国主义”“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做抗日军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做抗日军的经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战到最后一滴血”“民族革命战争万岁”等等的口号及行动。

（二）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一九三六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一九三六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1]，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2]方面）。

（三）猛烈扩大红军，一九三六年全国主力红军应有二十万人，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

（四）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一）（二）（三）项所述之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

---

[1] 这里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的地区。1935年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2] 绥，指绥远省。察，指察哈尔省，当时的辖区是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五）第一方面军以外之红军（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对于南京卖国贼军队之削弱与牵制，有极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行动应适当地指导之。

（六）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其指导原则应如下：

1. 一切游击队以民族战争的面目出现（日本占领区、自治区及其附近省份称中华抗日义勇军。其他地区——华中、华南，称中华抗日游击队，在这些地方——华中、华南游击队壮大起来时，称中华抗日人民革命军）。土地革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与策略之下执行。

2. 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而着重于主要的省份（河北，山西，热[1]察绥，东三省，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陕甘）。在大江南北原有苏区变为游击区域的地方，使之从恢复形势迅速地提高到发展形势。

3. 地方党对于游击战争，在白区是唯一的指导者，在苏区是主要指导者。

4. 大量地吸引卷入反日浪潮中的白军士兵与青年学生到游击战争中去。

5. 游击队应有根据地，但反对保守主义（这容易给游击队以损害）。

6. 游击队同当地革命民众密切地结合起来。

7. 提高游击战术。

8. 使游击队变为正规的革命军。

9. 游击队是苏区的创造者。

---

[1] 热，指热河省，1955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10. 使游击战争增加计划性。

（七）使白军士兵革命运动在民族战争旗帜之下，同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结合起来，注意如下的指导原则：

1. 没有士兵的援助（中国的，还有日本的），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2. 士兵的援助是可能的（亡国奴境遇，饥寒交迫，不得休息）。

3. 把运动放到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去，从关门主义解放出来，公开运动同秘密工作相结合。

（八）把蒙回两族（首先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到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九）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

（十）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

乙　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一）战略防御时：

1. 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

2. 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二）战略进攻时：

1. 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

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

2. 反对冒险主义：

（1）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胜利是可能丧失的）。

（2）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党报[1]），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3）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

（4）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反“东北路线”[2]是错了的（一九三二年）。

（三）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1. 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

---

[1] 党报，这里指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该报在1932年4月25日出版的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

[2] 1932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会议多数人的否定。这个主张被要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称为“上山主义”“东北路线”。

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2. 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3. 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 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5.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

6. 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7. 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 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 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 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丙　拿主要的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发展现有苏区的任务

第一步　在陕西：

二月五日前完成下列任务：

1. 扩大五千新兵。

2. 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一个打击。

3. 夺取甘泉宜川两城。

4. 赤化宜川洛川两县。

5. 组织第二十八军（北面）第二十九军（南面）。

6. 着手组织骑兵旅。

7. 扩大游击队到原有数的二分之一。

8. 完成渡河准备。

9. 完成政治准备（部队中的，对山西方面的，对陕甘宁的，对苏区的）。

10. 赤少队的扩大整理。

11. 三百个地方干部准备到山西去。

12. 着手绥远方面的布置。

13. 红校[1]第一期出校，第二期入校。

14. 为准备三百个排长，在三月后使用，方面军开办教导营。

15. 治疗突击（办药），争取二分之一伤病员在一月底出院。

16. 着手组织蒙古游击队。

17. 其他组织上的准备（党的，政权的，军事的）。

第二步　在山西：

准备以六个月（二月——七月）完成下述任务，依情况延长或

---

[1] 红校，即工农红军学校。1935年11月，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干部营（由原干部团缩编而成）与陕甘红军干部学校等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合并组成。1936年1月，改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6月，扩建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缩短之：

1. 击破阎锡山[1]的主力，消灭其一部。

2. 开辟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五县以上地区，使之成为初期的苏区。

3. 扩大红军二万人，山西一万三千人、陕西七千人。

4. 创立占领区域内的游击队到一千人。

5. 调动敌军，恢复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清涧、米脂、绥德等县敌占地区之全部或一部，陕北游击队大部或一部过山西去。

6. 着手对内蒙民族的宣传工作，取得部分的切实成绩。

7. 扩大蒙古游击队最少二百人。

8. 加紧对绥远的布置。

9. 完成骑兵旅。

10. 组织上指导上加强河北游击战争。

11. 创立晋直[2]察绥交界地区及晋豫交界地区的游击战争。

12. 指挥上加强陕甘游击战争。

13. 二十八、二十九两军各完成二千人。

14. 陕北陕甘两苏区游击队扩大至一月时的一倍。

15. 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

16. 红校出产五百个连长，三百个指导员，五十个营长，三百五十个游击战争的干部，以两期计算（每期六百共一千二百）。

17. 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

---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2] 直，指直隶，旧省名，辖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和河南、山东两省的小部地区，1928年改为河北省。

18. 着手抗日联军的组织。

19. 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

20. 保证黄河船渡，必要时回陕西一行。

第三步　在绥远：

1. 由山西向绥远转进之时机，依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之行动如何而定。

2. 向绥远转进之估计，有困难的（日本可能的阻挠，阎锡山的骑兵，内蒙民族与我们间政治上联系的薄弱），但是可能的（三种困难，都是相对的）。

3. 即使暂时不容许背靠外蒙，或靠近了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时，下文的问题，因地区宽大，人口众多，反日潮流高涨，有许多文章可做。

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

（1935 年 12 月 24 日）

彭、杨，林、聂，徐、程，左[1]：

甲、中央讨论了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及行动计划，通过了军委的报告。关于行动方向，如东村时所定。

乙、以四十天为准备期，完成一切行动准备。

丙、四十天内须做以下工作：

（一）夺取甘泉宜川两城。

（二）赤化宜洛两县。

（三）前线部队用极大努力扩红。

（四）突击治疗，前后方医院争取一月底二分之一出院。

（五）后方完成五千人扩红计划（包括已送的）。

（六）给北面进攻着的敌人一个打击，北路军[2]立即出动。

---

[1] 彭、杨，指彭德怀、杨尚昆，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左，指左权，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

[2] 北路军，指当时正在组建的红军第二十八军和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骑兵团等部，其任务是消灭侵入陕甘苏区北部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井岳秀部。

（七）后方准备二百地方干部随军出发，前方准备一百个。

（八）红校第一期出校，第二期入校。

（九）准备三百个排长在三个月后使用。方面军开办教导营（一军团二百名，十五军团一百名，抽选优秀士兵）。

（十）着手组织蒙古游击队（已有线索）。

（十一）着手组织骑兵旅，由前后方各部队各机关抽调人马武器，先组成第二团两个连，委托李德[1]同志教练。

（十二）北面组第二十八军，南面组第二十九军，以独立团营充之。

（十三）扩大赤少队[2]，保卫地方。

（十四）政治上的准备。

（十五）其他由后方办理的许多事项。以上十四项，由方面军负责的计七项，请你们切实具体而坚决地做去。

丁、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部队在宜洛两县的具体部署及工作计划。

（二）十天内由宜洛两县买棉花八千斤以上（加上后方正在买的一万斤，共一万八千斤），发给战士装被御寒。可能完成否？

（三）前方自己制棉衣服一千套能做到否？能加多否？方面军司

---

[1] 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1932年10月来中国，1933年10月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由于他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和长征初期实行了一系列错误的军事战略，遵义会议后即不再担负指挥责任。1939年离开中国。

[2] 赤少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成立的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的统称。赤卫军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是半军事性质的青年群众组织。他们都不脱离生产。

令部、一军团、十五军团各担任做多少？

（四）拟从一军团调好马五十四（人枪齐全）及十五军团调好马三十四（人枪齐全）来后方组骑兵连，能如数做到否？还能加多否？

（五）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四日二十一时

致彭德怀电[1]

（1935年12月24日）

取得宜川城，对于以后有很大利益。现有四十天工夫，请令一军团详细侦察用地道法攻开该城的可能性。

强袭甘泉如不奏效，即改用地道法。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夺取宜川城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1935 年 12 月 25 日）

一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战争与革命的前夜。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

日本帝国主义鉴于直接公开的武装占领东北四省，曾经引起了全中国反日的怒潮，这次他就采取比较隐秘的方式，即用国民党南京政府下命令委任中国某些卖国的军阀政客，作为他在华北的代理人，以进到直接武装占领华北。这种方式虽是比较“九一八”的方式更为奸猾与凶恶，但仅是过渡到直接武装占领与建立华北国及其傀儡政府的步骤。第二个满洲国傀儡政府是其必然的归宿。作为中国汉奸卖国贼集团的主要成分的许多军阀政客、土豪劣绅、银行资本家，特别是其中的亲日派，是这个傀儡政府的组成分子及其赞助者，没有这一大群汉奸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是不

能如此顺畅的。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血战到底，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亡人之国灭人之种的冒险事业的前进路上必然得到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于吞下了东北四省这个较小的炸弹之后，又着手吞下中国本部这个绝大的炸弹了。

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了空前紧张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完全为着它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太平洋战争是必然的结果。而英国却妄在求得日本的某些让步与妥协，使他的主要力量能够拿了去对付他的主要敌人：苏联、美国与意大利。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本部的行动，促进了中国反革命统治，首先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统治之削弱与崩溃。一贯的卖国政策不但使蒋介石丧失了某些社会的与群众的基础，而且缩小了他的地盘。同苏维埃红军的长期斗争，尤其是五次“围剿”与对于中央红军的追击，使他的兵力消耗了，疲劳了，分散了。以法西斯蒂统一中国的梦想，是宣告了最后的破产。国民党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实际上是不利于蒋介石的分赃会议。蒋介石只有更加依靠出卖中国，以维持垂死的统治，但是他的出卖，更促使他的统治加速度地走向死灭。这种情形，也就更加加深了蒋系军阀与其他军阀间的矛盾与冲突，增加了以新的形势与新的性质而出现的反蒋战争的爆发之可能性。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正当中国苏维埃运动转入了一个新局面的时期。自从中央红军退出中央苏区，长江下游的一些苏区受到了部分损失之后，现在是各地红军的新胜利，新根据地的创造，老苏区的游击战争的开始转入反攻，与新的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时期。困难的关头已经过去了。中央红军以十二个月工夫，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战胜了蒋介石的长追，宣告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突破了历史上军事远征的记录。并以宣传队的作用向着他所纵横驰骋的十一个省区二万万以上的民众，指出了解除痛苦，救己救国的道路；以播种机的作用，散布了许多的革命种子。中央红军与廿五、六、七军会合之后，对于向着陕甘苏区进行的敌人第三次“围剿”之彻底的粉碎，更加表示了苏维埃运动新时期的到来。它同目前总的革命形势的新局面相会合，成为中国革命新形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吞并，挽救中国出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重新推醒了全中国人民，懂得了亡国灭种大祸临头的危险形势，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这种民族革命高潮，在中国革命经过历史上无数次的锻炼之下（主要的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产生的，是在目前中国已经有了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革命形势存在之下产生的，是在世界革命与战争的新周期即将来临的形势之下产生的，是在苏联已经有着一切力量，足以战胜侵略国家援助被压迫民族的形势之下产生的。因此，它就将以特别广大，特别坚决，特别与世界革命因素互相影响与互相帮助的性质而出现的。

无疑地，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不但推醒了中国工人阶级

与农民中更落后的阶层，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现在又转入了革命。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千千万万人民的失业失地、千千万万的灾民难民，更使得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群众救死求生的日常斗争密切地联系起来，大大地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革命义愤是在全中国一切地方酝酿着，并已经在普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反日示威运动中再一度地开始表现出来了。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以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

目前的世界是处在大革命与大战争的前夜形势中，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革命危机，使得帝国主义除了战争找不出第二条挽救死亡的道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与意大利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冒险战争，无疑地存在着引导到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而中国与阿比西尼亚的民族革命战争，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危机的成熟，无疑地要引导到世界的大革命。在目前革命与战争的前夜时期，已可明显看到世界反革命力量的削弱与世界革命力量的增涨。在将来就是大战争与大革命，葬送世界上的一切反革命，这一形势使得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有力的帮手，同时中国革命现在就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则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阵势帮助着世界的革命。

这在日本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一样。在有力量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日本工农及被压迫民族（朝鲜、台湾）正在准备着伟大力量，为打倒帝国主义日本，建立苏维埃日本而奋斗。这就把中国革

命同日本革命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会合起来。日本革命民众是中国革命民众的有力的帮手。

苏联也是一样。今日的苏联是有战胜敢于向它开火的帝国主义的力量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红军的威力），在向日本帝国主义使用一切和平方法无效（屡次提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等），而日本积极向苏联挑战的情况之下，苏联是准备着打击这个野蛮侵略者的。这就把中国革命、日本革命和苏联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会合在共同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苏联是中国革命最有力量的帮手。

中国革命是处在有利的环境中，中国革命有着光明灿烂的前途，但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尤其是目前凶横直进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准备了决心和力量来对付中国革命的。在中国反革命集团方面，由于其统治力量之更加减弱，而不得不更加为虎作伥，投靠于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向着革命的民众作绝望的进攻与决斗。把这一形势同目前依然存在着的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形势合起来看，就知道中国革命保存了一种持久性。他向中国革命民众及其首领中国共产党指明：准备着长时间同敌人奋斗罢，为着同敌人作持久战而准备自己的艰苦工作罢，没有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军，是不能最后解决敌人的；一切策略，一切努力，向着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准备了伟大的力量，就是准备了决战的捷报。

二　党的策略路线

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震动了

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只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以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有的愿意奋斗到底。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

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可靠的同盟者。工农

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制度，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削弱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手段，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

党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作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积极的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的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兵士、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运动中的领导权。

三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

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由于不同意苏维埃制度与土地革命而同意于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的存在，由于中国政治经济不平衡而产生的地方割据状态，由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现在还只在中国一部分领土上胜利，此外，还由于汉奸卖国贼等民族反革命为日本帝国主义帮凶的严重性，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国人民反日反卖国贼的方式，是多样的，参加斗争的分子的觉悟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共产党员应该不放松一切机会去发动、组织与领导各种方式与各种程度的斗争，把这些斗争引导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阶段。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哪一阶级，哪一政治派别，哪一社会团体，哪一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国防政府。一切反日反卖国贼的武装队伍，都可以加入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在阶级意义上说来，他是在反日反卖国贼共同目标之下的各阶级联盟。

为了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迅速组织起来，为了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更广大的群众基础与武装力量，共产党的策略不是等待着那些自然发生的抗日人民团体与抗日武装力量已经存在了，才去把他们组织起来，而是指导自己的党员从各方面努力去推动一切爱国的分子，团体，阶层，阶级，党派，生产的与商业的，文化的与教育的，学生的与教员的，工农的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城市与乡村的，新式的与旧式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武装的等等力量，发起各种各样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团体（抗日会、抗日联合会等），组织各种各样反日反卖国贼的军队（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

军、新的十九路军等），政权（县区市抗日政府、人民革命政府等），把这些团体、军队、政权集合起来，加上苏维埃与红军的力量，这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组成之后，在他的行动过程中，每日都要去发动新的团体，新的地方政府与新的军队，一面不断淘汰动摇叛变分子，一面不断涌进新的力量，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成为不是腐朽的，而是有朝气的，不是软弱的，而是有伟大战斗力量的政府与联军。对于有些地方因为党的力量的薄弱，所以没有经过党的推动与领导，或是因为离开苏区与红军较远，所以没有苏维埃与红军参加，而自动产生的抗日政府与抗日联军，那里的党同样应积极地援助拥护与参加。这就是共产党实现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的工作路线。

因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所以它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这纲领如下：

一、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作抗日经费。

二、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土地财产分给工农及灾民难民。

三、救灾治水，安定民生。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发展工商业。

五、加薪加饷，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职员的生活。

六、发展教育，救济失学的学生。

七、实现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八、发展生产技术，救济失业的知识分子。

九、联合朝鲜、台湾、日本国内的工农，及一切反日力量，结成巩固的联盟。

十、对于中国的民族运动表示同情赞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

国家，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共产党必须在抗日战斗的过程中，求得这些纲领的实现，并经过这些纲领，以求得党的十大政纲的实现。

四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最广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在今天有着它的特殊的意义，就是苏维埃已经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胜利了。这是同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基本上不相同的。九年以来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胜利，使得新的反帝高潮得到了基本的力量，使得全国人民有了靠望，有了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手里争取自由解放与独立的活榜样，使得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固基础与根据地，保证了在新的大革命中能够坚持下去与走向彻底胜利，使得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了中心支柱。

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

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地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而这一基本利益，只有在苏维埃的坚决方针之下，才能取得，才能保持，才能彻底战胜反对这种利益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卖国贼。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愿意把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一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苏维埃愿意给予以选举

权与被选举权。一切为帝国主义及中国反革命所打击的城乡小资本工商业，苏维埃尽自己的政策与权力所及去保护他们，苏维埃老早就废除了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宣布了有利于一切小生产者的统一累进税。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告，一切白军官长（不分官级）士兵，凡愿意反日反卖国贼者，都有受苏维埃优待的权利。一切被国民党卖国政府所排斥裁遣的失业军人，苏维埃红军愿意给以工作。即使同红军作战者，一经解除武装，不问官兵，一律优待。其负伤者，一律医治。一切白军官兵愿意在红军服务、忠心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者，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红军向全国愿意参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之事业的个人、团体、政治派别，与武装部队提议，共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不问何种武装部队，苏维埃及红军愿与他们订立抗日讨卖国贼的协定，如过去苏维埃红军与十九路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一样，但过去红军没有能够及时的用实力直接帮助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也没有积极要求），击破蒋介石对福建的

进攻，这是不对的。今后对一切抗日讨卖国贼之友军，必须尽可能地给予实力的援助，直至直接配合作战，要达到反对共同敌人的目的，苏维埃红军不但需要自己的胜利与发展，而且需要同盟的友军之胜利与发展。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使得全国人民明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告，称赞他们历来帮助中国革命的爱国举动，蒋介石辈虽然久已背叛革命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全民族爱国人民却继承了太平天国以来的英勇事业，决心挽救中国于危亡，而置之于富强隆盛之域。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胜利之日，即华侨得到解放之时，一切国民党政府引导华侨沦于奴隶牛马的政策，均当彻底铲除，而代之以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在目前，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排斥驱逐的华侨同胞，苏维埃给予托庇的权利，并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

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为了顺利地执行这些政策，为了很快地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为了保证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党与苏维埃自始不变，但须更加努力，更加使之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之要求的政策，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的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贼军队进攻，肃清抗日道路，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等。

红军是抗日的先锋队，只有这个先锋队的扩大巩固与善于使用，才能保证反日战争的胜利。为扩大百万红军而斗争的口号，在今天须使之紧密联系到挽救危亡迫不及待的反日战争的时机。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须扩大数百万红军才能济事，首先是扩大一百万。不但每个红色指挥员、战斗员、地方干部、苏维埃人员，而且是全国革命的人民，对于这一任务的积极努力，是十分重要的。红军技术条件的提高、技术与战术教育的进步、政治工作之深入与普遍、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集中、物质供给的保证，尤其是战略与战役指挥之合乎正确的原则（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都是战胜敌人不可缺少的条件。

游击战争应在全国发展起来，而着重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域、附近区域，卖国贼蒋介石的区域，红军抗日根据地（苏区）及其附近区域的发展。一切游击队应以民族战争的面目而出现，密切地联系于农民群众的土地斗争。要使游击战争在反日反卖国贼战争中担负起战略上的伟大作用，党应使游击队都成为抗日根据地（苏区）的创造者，应使一切游击队所在区域建立脱离日本帝国主义与

卖国贼统治的抗日人民革命政权（县区乡抗日政府、革命委员会以至苏维埃），应使游击队迅速扩大而成为抗日革命军，应使卷入反日浪潮的青年学生与革命士兵，大量加进游击战争中去，应把党所领导的与非其所领导的游击队，在共同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不扩大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即抗日红军的根据地，是不能成功的。只有把卖国贼统治着的土地，大块的变为苏维埃领土，红军才有依靠，抗日战争才有后方。苏维埃领土中许多工作要力求做到完善的程度，实行正确的政策，把它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羡慕爱护与仿效的地方。

一切卖国贼军队进攻这种抗日战争根据地的与人民政权模范区的企图，应该予以无情的打击。粉碎与破坏这种反革命进攻，不但是抗日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的责任，而且是全中国抗日人民的责任。党应号召全中国全苏区一切抗日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根据地而奋斗，号召这些人民反对卖国贼捣乱抗日战争的后方，反对卖国贼拦阻抗日红军的去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是党指导革命战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没有千千万万在日本与卖国贼统治之下的工人、农民、兵士、贫民与革命民众大多数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不能成功的。党和苏维埃红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要扩大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应使一切群众斗争从初级提到高级，从地方提到全国，从经常程度提到反日反卖国贼的政权与武装程度。只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内的同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这两种斗争相会合，才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不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心城市与主要企业中建立巩固的堡垒，利用一切公开的与半公开的可能建立广大的群众组织；从估计具体环境，争取胜利结果（即使是很小胜利）的观点出发，去发动、组织、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与政治的斗争；注意保护与教育企业中的干部，积蓄工人群众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争取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这是党在工人运动中基本的原则。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不争取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参加斗争的战线，是不能成功的。共产党与苏维埃一定要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解除农村封建压迫而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几千万几万万的农民群众武装走上抗日讨卖国贼的阵地上去，才能使民族革命战争有源源不绝的补充，才能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民族反革命对于中国的主要掠夺对象——农民，变为反掠夺的中华民族革命军。在日本占领区域，及其附近区域，首先是没收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分配给农民，然后从斗争过程中依据群众自己的经验，把斗争深入下去，进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党的基本原则，就是把土地革命同民族革命结合起来。

没有士兵的援助，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数百万的军队，也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应该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去进行士兵的工作，党应号召一切苏区人民、白区人民、红军战士、游击队战士，为瓦解卖国贼军队而努力，几千万几万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向着几十万几百万不愿当亡国奴的兵士官长苦口劝说，亲友招致，书函责备，与口号鼓动，是没有不能感动他们的。我们的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红军白

军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愿意耕田的分土地，愿意抗日的当红军当义勇军。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拿自己的榜样和真诚的口号给蒙古人、回人等被压迫民族看，你们也组织自己的国家呵！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打倒这个敌人呵！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建设于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的胜利的基础之上，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等等的交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并不是不择目标而随便放矢的，谁愿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同时有利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抗日讨卖国贼的斗争者，苏维埃政府均愿与之发生友谊的关系。

一切政策，一切努力，为着反日反卖国贼的胜利，一切与此目标相违背者，均在排弃之列。这就是共产党与苏维埃的策略路线。

五　党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

要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这里，主要的关键是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广泛的统一战线，一方面是在集中最大的力量，去对付最重要的敌人，另一方面，是在使广大的群众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经验，来了解党的主张的正确，争取他们到党的旗帜之下。

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他的一切党员在

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只知道如何在下层群众中间进行工作（这是主要的）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同别党别派和下层群众有关系的上层领袖进行谈判、协商、妥协、让步，以期争取其中可能继续合作的分子，以期在群众前面最后地揭穿那些动摇欺骗与叛变分子的面目，而以群众的力量把他们驱逐出去。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的工作。只有当共产党员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而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共产党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

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的来源，第一，是由于对目前新的政治形势的不了解，因此，就不了解变更自己的策略，以适合新的形势的必要。第二，是由于不会把党的基本口号与基本政纲同目前的行动口号与行政纲领，在实际行动中联系起来。第三，基本的是由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去，而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主义变为死的教条。这种关门主义倾向，实质上表现出惧怕敌人、惧怕群众，与对于自己力量的不相信。因此就惧怕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的

倾向，实质上是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关门主义继续的结果，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任务。因此党必须坚决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大胆地运用广泛统一战线，深入到千千万万的群众中去，不怕可能发生的某种错误，从斗争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

当然，党在反对“左”的关门主义的斗争中，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压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斗争，牺牲农民夺取土地、工人兵士贫民改良待遇的要求，去适合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的利益，去适合同盟者的部分利益，对同盟者惧怕使用言论批评的武器，惧怕率领群众逼迫同盟者走上革命的更高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接受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乡村富农的政治影响，而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尾巴。一九二七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是可能的，毫无疑义，党应该向着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目前的反对右倾，正是为得要顺利地克服“左”倾，彻底地击破关门主义，使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地大胆地运用到一切工作中去，使党不落在群众斗争的后面，使群众从争取日常的与切身的利益出发，提高到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位置。

六　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担负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才能率领中国革命进入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也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事实证明，这样成分的党，是能够完成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光荣任务的，是能够艰苦奋斗百折不回的。在世界各国共产党中，除联邦共产党外，中国共产党站在光荣的先进的地位。

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作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与共产主义的教育，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是党的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之具体表现，不从积极的战斗需要出发，而从恐惧观念出发的组织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必须彻底地击破，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已经涌出和正在涌出无数的积极的分子与群众领袖，党的组织应以热烈欢迎的态度，向他们开门。党不惧怕某些投机分子的侵入，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去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地位。

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

批的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不是以如同使用机械一样的态度，去使用干部与党员，而是爱护他们，信任他们，分配他们以适当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天才与自动性。不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去对付干部和党员，而是以对于任务的解释说服，对于工作的具体指示，把党的领导机关，同他们活泼有生气地联系起来。对于干部与党员在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不是轻易地给以打击，加上机会主义帽子，以及轻易地处罚他们，而是给以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说服教育，思想上与工作上的错误，是免不了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列宁主义的学习精神，与从斗争中求锻炼，是改正错误的最好方法。党内斗争的火力，应该向着那些坚持错误观点、不愿学习锻炼、不受指导教育的同志。一定限度的组织上的结论，也仅仅对于那些错误严重与无法说服的同志才是必要的。但一切必要的党内的斗争与组织结论，仍然是带着对于本人与党的教育性质。只有对于那些有一贯错误路线的机会主义者，党才不应该因为他们一时的表现改正，而轻易给他们以重要的工作。

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地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作纽带，是不能成功的。正确的组织路线与干部政策，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中央号召全党及其干部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把统一战线运用到全国去。把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建立起来。把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全民族的国家。把红军变成全民族的武装队伍。把党变成伟大的群众党，把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结合起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

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万岁！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

（1935年12月27日）

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同志们！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种变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之后作的。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毛泽东根据中央决议在这里充分地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但那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够对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了决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才获得可能去有系统地说明政治策略上的诸问题。对于这类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化了的形势，我们的党已经规定了自己的任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
瓦窑堡会议会址

1935年12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会后，毛泽东在中共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图为瓦窑堡会议旧址。

目前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在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

但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使得经过那时的卖国头子袁世凯[1]签了字的对日屈服投降的条约二十一条[2]，不得不宣告无效。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3]，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

---

[1]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的头子。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又利用当时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篡夺了总统的职位，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他要做皇帝，因为想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就承认了日本的旨在独占全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同年12月，在云南发生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随即在许多省得到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同年6月死于北京。

[2]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五号，分为二十一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一概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3] 1921年11月，由美国政府发起，美、英、法、意、日、葡、比、荷和中国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开会。这是一个美国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的会议。次年2月6日，根据美国提出的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侵略原则，缔结了九国公约。九国公约的作用，是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中国来代替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公约实际上为美帝国主义用“机会均等”的名义压倒对手，进而独占中国准备了条件。

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1]，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2]，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3]和外交谈判[4]，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

---

[1]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2] 东北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1955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3年又侵占热河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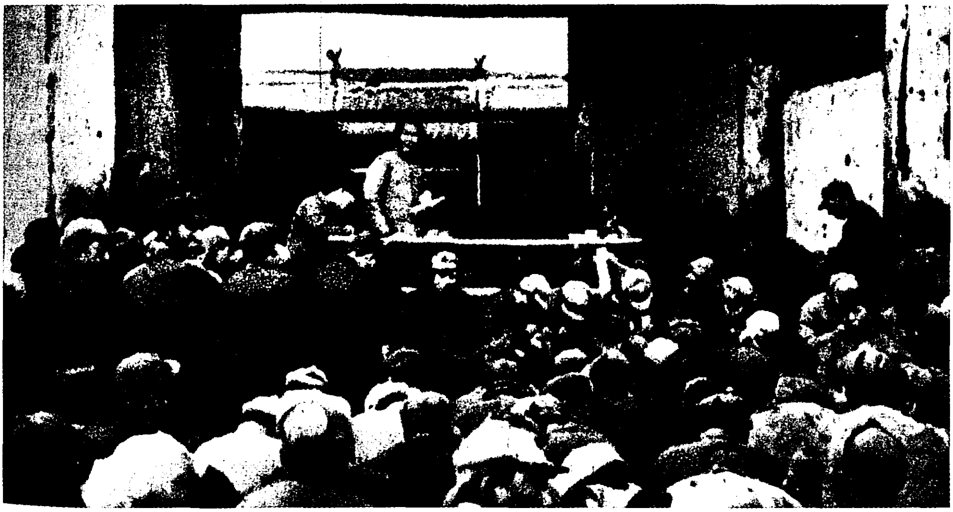
[3] 1935年11月25日，日本帝国主义嗾使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傀儡政权，名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使当时河北省东部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这就是冀东事变。

[4] 外交谈判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所进行的关于所谓“广田三原则”的谈判。“广田三原则”是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各个阶级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反日浪潮，证明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一个广大的反日运动[1]吗？中国的这些小

---

[1] 1935年，全国人民的反日爱国运动开始新的高涨。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首先在12月9日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第二天，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1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开始了中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新高潮。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阶级的关系由此很明显地表现出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一切爱国人们的公开拥护。

资产阶级成分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农民一样，他们有同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小生产的经济地位。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曾经给了他们以重大的损害，使他们中的很多人陷于失业、破产或半破产的境地。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

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摆在国民党面前，又是怎样的呢？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1]。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

---

[1] 毛泽东作这个报告的时候，蒋介石继续实行对日妥协、对内屠杀和镇压的反动政策，如出卖华北主权，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围攻要求抗日的红军等等。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尽量揭穿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也因此，党在这时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已经说到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国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的分化，党应当利用这种矛盾，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来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紧，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中国共产党认为和英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联系的蒋介石集团可能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因而采取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1936年5月，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要求组织两党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并派遣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直到1936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国民党内主张联共抗日的军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要求。

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阶级曾经参加过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随后又为这个革命的火焰所吓坏，站到人民的敌人即蒋介石集团那一方面去了。问题是在今天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我们暂且不去估计他们的变化的可能性。问题是在没有那些关系或者关系较少的那些部分。我们认为在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这就说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他们为什么参加了革命，及到这一时期之末，他们又为什么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现在的时期，同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期有什么分别呢？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现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来，他们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了什么好处没有呢？没有什么好处，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因为这些情况，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变化的程度怎样呢？总的特点是动摇。但在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

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1]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

让我再讲一点历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

---

[1] 蔡廷锴曾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第十九军军长，与蒋光鼐（前任总指挥）同为该路军的负责人。十九路军原来在江西与红军作战，九一八事变后调往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以很大影响。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攻击，十九路军和上海人民一起进行了抗战。但是这个战争后来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而失败。随后，十九路军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去同红军作战。这时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逐渐觉悟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1933年10月，他们同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一起，代表十九路军同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11月，他们又拥戴李济深为领袖，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兵力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祥[1]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再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曾经和十九路军一道进攻江西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举行了宁都起义[2]，变成了红军吗？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马占山在东三省的抗日行为[3]，也是统治者营垒中的一个分裂。

所有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

同志们，现在让我们把问题转到另一点。

---

[1]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河南的督军及陆军检阅使等职。以后曾赴苏联考察。1926年9月，当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领他的军队在绥远省（现属内蒙古自治区）宣布脱离北洋军阀的系统而参加革命。1927年5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随后，他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同蒋介石集团间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在1933年5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蒋介石势力和日本侵略军的双重压迫，这次抗日起义于10月间失败。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2] 1931年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12月，该路军1万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成立红军第五军团。

[3] 马占山（1885—1950），吉林怀德人，国民党东北军的军官。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同年11月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他曾率领部队进行抵抗。

如果有人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这一点来反对我们的论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处在新环境，还是没有改变态度的可能，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认为也是不对的。如果不能改变态度的原因，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为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常态，不仅是动摇，简直是参加了革命呢？难道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后来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们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吗？难道今天软弱，那时就不软弱吗？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正是因为这样，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自然，我们不但不否认，并且完全承认：又是因为这一点，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容易拿某种临时的贿赂为钓饵将他们拉了过去，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不彻底性。可是总不能说，在今天的情况下，他们同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没有任何的分别。

所以我们着重地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这种破裂，表现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表现于冯玉祥，蔡廷锴、马占山等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这种情况，基本地说来是不利于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增大了这种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们！这个问题的正面，已经说完了。让我再来说一说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骗民众的好手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除了那些真正拥护人民革命事业的人们而外，有许多人在一个时期内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现，所以他们同时就具备着欺骗民众的资格，使得民众不容易认

识他们的不彻底性以及装模作样的假相。这就增加了共产党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的责任。如果我们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有动摇及参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减轻了我们党对于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因为，如果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地主买办一模一样，以卖国贼的狰狞面孔出现，争取领导权的任务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减轻了。

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们不去说它。于今只说被蒋介石禁闭过的国民党政客胡汉民[1]，不久以前也签名于我们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文件[2]。胡汉民所依托的两广

---

[1]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孙中山逝世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策。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后因与蒋争夺权力，1931年2月被蒋监禁。九一八事变后被释放，由南京到广州，依托两广派军阀势力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长期对立的局面。1934年，他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表示了赞成抗日的态度。

[2] 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1934年4月提出，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1700余人署名公布的。纲领包括下列各项条款：（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财产及卖国贼财产以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作友军，与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派军阀[1]，也在所谓“收复失地”和“抗日剿匪[2]并重”（蒋介石的是“先剿匪，后抗日”）的欺骗口号之下，同蒋介石对立。你们看，不是有点奇怪吗？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现在我们来说中国民族革命营垒里的情形。

首先是红军的情形。同志们，你们看，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大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3]同志

---

[1] 指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2] 国民党反动派把革命人民和革命军队叫做“匪”，把他们自己进攻革命军队屠杀革命人民的行为叫做“剿匪”。

[3]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4年7月，任中央代表、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红军第六军团和第二军团会合，任第二军团政治委员，随后创建了湘鄂川黔边区，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1936年7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任政治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六、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逝世于北京。

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1]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2]。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3]。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

---

[1] 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原驻湘赣边区根据地，1934年8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在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等率领下，誓师突围转移。同年10月，在贵州东部与贺龙率领的红军第三军（后改称第二军团）会合，11月成立了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和军区，后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2]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1935年6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11个省，走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敌人的多次围追堵截，长征两万余里，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

[3] 川陕边区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1935年3月，第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后，离开川陕边区根据地，5月开始向四川、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两省的边境转移。同年6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8月，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卓克基地区组织右、左两路军北上。9月，曾经长期领导第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北上命令，擅自率领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936年6、7月间，由湘鄂川黔边区突围，经湖南、贵州、云南到达西康的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在甘孜等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会合以后，第二、第六军团正式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这时，张国焘被迫率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一起北上转移。同年10月，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先后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地区，与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1]）：中央红军[2]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

---

[1]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

[2] 中央红军指主要在江西福建区域发展起来而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主力红军如此，南方各省的游击战争怎么样呢？南方的游击战争，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1]。

---

[1] 1934年至1935年间，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曾经留下了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这些部队，在8个省份内15个地区坚持了3年之久的游击战争。这些地区是：赣粤边地区、闽赣边地区、闽西地区、闽粤边地区、皖浙赣边地区、浙南地区、闽北地区、闽东地区、闽中地区、湘鄂赣边地区、湘赣边地区、湘南地区、鄂豫皖边地区、鄂豫边地区和广东省的琼崖地区（今为海南省）。

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

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止过。在外祸、内难、再加天灾的压迫之下，农民广泛地发动了游击战争、民变、闹荒等等形态的斗争。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1]，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将来一定还要有更大的发展。但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要冲破卖国贼的戒严令，警察、侦探、学棍、法西斯蒂的破坏和屠杀政策，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

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

少数民族，特别是内蒙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威胁之下，正在起来斗争。其前途，将和华北人民的斗争和红军在西北的

---

[1]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东北地区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协助和影响下，组成不同名称的抗日义勇军。1933年初，绝大部分义勇军都溃散了。同年秋以后，中共满洲省委在各地原已创建的反日游击队（当时也称工农义勇军）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2月，东北人民革命军联合其他反日部队，发表了统一建制宣言，改称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11个军，在共产党员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领导下，长期坚持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入热河省（现分属河北省、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和冀东，当地人民纷纷起来武装反抗，其中规模较大的是1933年12月爆发的孙永勤领导的民众军的抗日起义。1934年，孙永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把民众军改编为抗日救国军，在河北省东部的兴隆、遵化、迁安、青龙和热河省南部的承德、平泉（这两个地方今属河北省）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一直坚持到1935年。

活动，汇合在一起。

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民族统一战线

观察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以后，我们就容易说明党的策略任务了。

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

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这须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革命势力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是下了凶横直进的决心的。国内豪绅买办阶级的反革命势力，在目前还是大过人民的革命势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衰弱了，中国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较过去更加增长了。这是正确的估计，这是一方面的估计。但是同时我们应当说，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这也是正确的估

计，这是又一方面的估计。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这是中国革命在过去长时期内已经遇到的情形。在将来，可以想到，在某些阶段里，革命的总的形势是更加发展了，但是不平衡状态还会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状态变到大体上平衡的状态，还要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依靠党的策略路线的正确。如果说，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1]是在三个年头里完结了的话，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了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来的。不是说中国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干，中国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干，亡国的危险不容许我们有一分钟的懈怠。今后革命发展的速度，也一定比过去要快得多，因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临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期了。虽然如此，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我们说，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

---

[1] 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指1918年至1920年苏联人民反对英、美、法、日、波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平定白党叛乱的战争。

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这里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关系，也不来说冒险主义在将来大的时局开展中可能发生的危险性，这点等到将来再说不迟。这里只说统一战线的策略和关门主义的策略，是正相反对的两个不同的策略。

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

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一个说，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采取坚决的办法去打破关门主义；就不会拿着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而攻击前进；就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这样，就不能把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这样，就不能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而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到失败的道路上去。

一个则说，这些批评都是不对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

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人民共和国[1]

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政府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那末，从现在起，应当改变为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

在目前，这个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这个政府的成分将扩大到广泛的范围，不但那些只对民族革命有兴趣而对土地革命没有兴趣的人，可以参加，就是那些同欧美帝国主义有关系，不能反对欧美帝国主义，却可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参加。因此，这个政府的纲领，应当是以适合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个基本任务为原则，据此以适当地修改我们过去的政策。

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

---

[1] 毛泽东在这里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国性质的政权及其各项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已经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区完全实现了。因此，共产党能够在敌后战场领导人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胜利的战争。在日本投降以后爆发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随着战争的进展，人民解放区逐步扩大到整个中国大陆，这样就出现了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关于人民共和国的理想，就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

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在今天，这件事起了变化了，坚强的共产党和坚强的红军都已经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没有疑义，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们是要十分留神的。

当然，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的队伍，我们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产党和红军一样程度的巩固。在他们的活动过程中，有些坏分子因为受了敌人的影响退出统一战线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不怕这些人退出去。一些坏人受敌人的影响退出去，一些好人却会受我们的影响加进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

的，发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也会是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他们能够拉了我们队伍中的坏分子跑出去，我们当然也能够拉了他们队伍中的“坏分子”（对于我们是好分子）跑过来。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一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总之，现在是两个基本势力相斗争，一切中间势力，不附属于那一方面，就附属于这一方面，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灭亡中国和出卖中国的政策，不能不驱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们方面来，或者径直加入共产党和红军的队伍，或者同共产党和红军结成联合战线。只要我们的策略不是关门主义，这个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呢？

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1]，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

---

[1] 1928年6月至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族的利益。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

那是没有问题的，人民共和国不代表敌对阶级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国同帝国主义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是处在正相反对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分放在所谓人民之列。这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仅仅代表最大的富翁，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谓“国民”之列，是一样的。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虽然也住在中国的土地上，可是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的利益是同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的。我们仅仅离开他们这些少数人，仅仅同他们这些少数人相冲突，所以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要开展民族革命，对于民族革命的先锋队不给以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不使工人阶级能够拿出力量来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资产阶级如果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那末，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

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

让这些人参加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不危险吗？不危险的。工人农民是这个共和国的基本群众。给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他拥护反帝反封建纲领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权利，给他们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能违背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我们纲领的重要部分应当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工农基本群众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占了大多数，共产党在这个政府中的领导和活动，都保证了他们进来不危险。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1]，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次革命没有完成，而是失败了。一九二七年至现在，我们领导的土地革命，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因为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

---

[1] 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

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革命还是如此。

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

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中国是一个何等样的政治经济情况的国家，他们不知道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国际援助

最后，需要讲一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关系。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古人说：“春秋无义战。”[1]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

---

[1] 参见《孟子·尽心下》。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中国许多诸侯相互不间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所以孟子有此说法。

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1]，太平天国战争[2]，义和团战争[3]，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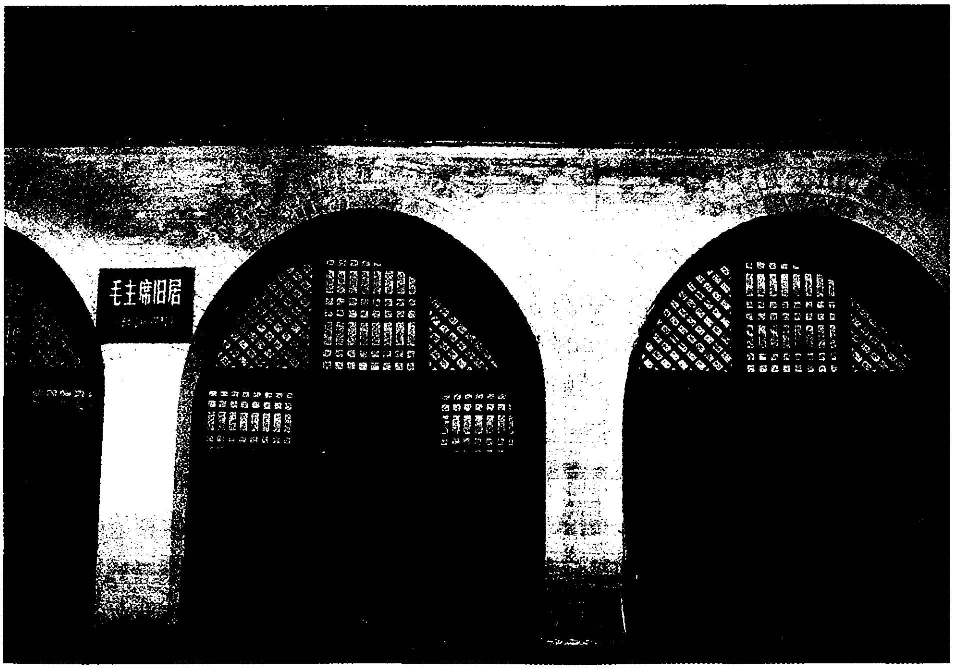
---

[1] 1840年至1842年，英国因中国人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1842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2] 太平天国战争是发生于19世纪中叶的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农民革命战争。1851年1月，这次革命的领导者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攻入湖南、湖北。1853年，经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这里建都。随后从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军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军在它占领的地方都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在清朝军队和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进攻下，太平天国战争于1864年失败。

[3] 义和团战争是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参加这次战争的，有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群众，他们用宗教迷信互相联系，在秘密结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对英、美、德、法、俄、日、意、奥的联合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八国的联合侵略军在占领天津、北京以后，极残酷地镇压了这个运动。

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1]。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他们也一定会援助我们，因为我们和他们是休戚相关的。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就这点上说，我们是孤立的。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在瓦窑堡的旧居。

---

[1] 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单行本。

致彭德怀等电[1]

（1935年12月27日）

凡属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不念其社会关系如何，均应广泛地吸收入党，尤其是陕甘支队及二十五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宽广地吸收入党。

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1]

（1935年12月29日）

我们东进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我们要将各种运动联系起来，各种力量，各种运动，都要总结到政权中去。游击队在晋东北及河北、河南、山西特别发展，要布置几个要紧的地方。

---

[1] 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北方局的工作。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关于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的组建问题[1]

（1935年12月30日）

依前电所告战略计划，二十八军已在陕北组成，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预计一月份扩大到一千五百人。陕甘二十九军亦应着手组织，由萧劲光负责，限一月底扩大到八个连约一千人。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抄送陕甘省委及萧劲光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5年12月31日）

徐、程、郭三同志对此项有深刻认识、正确的指导与教育工作，使十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团结如一个人一样。

对一军团调去的干部，同样要教育他们不得发生任何骄傲与轻视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电的主要内容。

歌谣诗·洛甫摔跤[1]

（1935 年）

洛甫洛甫真英豪，
不会行军会摔跤。
四脚朝天摔得巧，
没伤胳膊没伤脑。

---

[1] 这是1935年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洛甫（张闻天）一次摔跤的调侃。

在抗大校务办公会议上的讲话[1]

（1935 年）

我们要来一个读书比赛，看谁读的书多，掌握的知识多。只要是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正面的，反面的，大家都可以涉猎。但不能一目十行。……读书先是粗读，有个大概的印象，然后是复读，重温一下重要章节，也叫精读。在这个基础上再写点读书笔记，问几个为什么，联系实际思考一下周围的事情。这样才能防止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校务办公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和穰明德的谈话[1]

（1935年）

你要博览群书！像你这样的同志出身苦，有斗争经验，但文化程度不太高，尤其应该多读书，这样可少犯经验主义错误。

---

[1] 穰明德（1912—2000），当时在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学习，任一团总支书记。这是毛泽东和穰明德谈话中的一部分。

1936

毛泽东在陕北。

致朱德电[1]

（1936年1月1日）

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受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中央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接上了联系，与国际也接上了联系，这是大胜利。

兄处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红四方面军的发展方针，应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对党内过去的争论，可留待共产国际及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乃致于自弃于党。[2]

国际除派林育英来华之外，又派阎红彦[3]来华。据说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的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

---

[1] 1935年12月30日，朱德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并转林育英，通报四川、青海国民党活动情况，提出红一方面军方面应互通情报。这是毛泽东复朱德电的主要内容。

[2] 此段内容毛泽东请朱德转告张国焘。

[3] 阎红彦，1934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赴莫科斯，未及参加会议即受共产国际之命送密电码回国，1935年12月返抵陕北。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月1日）

原则上可以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

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月4日）

三个月后红军大量扩充，必须现在就准备，抽出老兵入教导营。有了红校就不需要教导营的理由是不对的，红校是训练连长的，教导营是训练排长的。

陕甘支队和二十五军经过远征的战士，原则上每人都要使之成为干部，不应该使之当作一个兵去消耗掉。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一军团及二十五军的行动部署[1]

（1936年1月5日）

彭、杨，左、聂，徐、程，郭、朱[2]：

甲、为使洛河以东苏区与洛河以西苏区平衡向南发展，为使苏区愈加向南发展，将来南面敌人向北进攻愈困难，为使晋敌减少威胁，一军团及二十五军[3]有进出于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五个县城之间，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扩大抗日宣传，筹足战费之任务。

乙、部署：以主力置于洛河、黄河间山脉之东及南，一部置于其东为原则，沿着山脉创造初期的苏区，交于地方部队，继续深入发展。

丙、时间十八号开始南移，二十五号结束，准备二十六日开始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的电报。

[2] 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郭、朱，指郭述申、朱瑞，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和第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3] 二十五军，即红军第二十五军，1932年11月底在湖北红安县成立，1935年9月长征到达陕北后，同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二十五军改编为第七十五师。这里沿用的是旧番号。

执行新的行动任务。

丁、方面军司令部可仍旧在甘泉附近。

戊、详细部署由彭计划令行。

己、二十五军行动前，抽出十名较好的陕南党员，最好宁陕、镇安、商南各县都有人，交与陕甘省委分其派往陕南工作。

庚、省委应派地方干部、地方部队，随一军团、二十五军行动，发展并接收苏区。

辛、杨应有政治工作计划。

毛　周

一月五日十四时

同意北征军打敌援兵的部署[1]

（1936年1月7日）

刘、宋：

甲、为使伏击敌人有广大回旋余地，同意我北征军改向韩家岔[2]、石牌子行动。该处敌堡如已完成大部，即应改袭击为包围，准备打敌援队；如敌已退走，即应直逼横山，调动援敌。

乙、围困敌堡城镇，必须断其交通，方易速敌增援。打援敌不论大小，必须以主力出动，实行两翼包围（自然要有主要突击方面），并切实断敌退路，以期一举消灭，勿使漏网。

毛　周

七号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电报。从1935年12月起，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率部大肆骚扰陕甘苏区北部，企图袭占瓦窑堡，夺取安塞、安定等地。为消灭侵入苏区之敌，巩固陕甘苏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红军第二十八军、第七十八师和骑兵团组成北征军（又称北路军）。北征军在北线击退了敌人侵扰，并包围了横山县城。

[2] 韩家岔，村名，位于陕西省横山县中部。

消灭袁克征团等部的部署[1]

（1936年1月9日）

彭，徐、程，并转左、聂[2]：

甲、敌袁团[3]及六八四团五个连外，今（九）日又增派六三〇团两营，一一七师四营，共计三团零五个连。本日情况如何？望徐程转告彭并告我。

乙、徐程、左聂应遵照彭杨九日七时部署电[4]坚决消灭该敌。兵力要集中使用，如左聂未到，则以小部钳制敌主力，而以我最大主力包围敌一个团而消灭之；如左聂及十三团到，则采取包围消灭敌主力之计划。

丙、估计左聂何时可到洛生镇，请彭见告。

毛

九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等的电报。

[2] 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和政治委员。

[3] 袁团，指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二九师第六八五团，团长袁克征。

[4] 指1936年1月9日7时彭德怀、杨尚昆给徐海东、程子华抄转左权、聂荣臻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电报命令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一军团第二师和第十三团消灭向三皇丈、永乡镇前进之敌。

致彭德怀、杨尚昆电[1]

（1936年1月9日）

目前财政状况因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望在今后行动区域中特别加强督促，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之下进行。

---

[1] 这是毛泽东和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周恩来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敌我力量对比情况[1]

（1936年1月10日）

阎锡山[2]有四个优势：（一）优势兵力；（二）本身作战能力强；（三）防御力较强；（四）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他有五个弱点：（一）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二）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三）人民一般不满；（四）作战指挥差；（五）攻击精神差。我们的长处是：（一）进攻的；（二）能打运动战；（三）有侦察条件；（四）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五）有人民援助；（六）红军能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敌我力量对比情况讲话的一部分。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休息训练准备接受新任务[1]

（1936年1月13日）

彭，左、聂，徐、程，陈、彭[2]：

甲、左聂今日当可到洛生镇，第四师已到吴庄镇。

乙、所有一军团、十五军团部队，应即集结于洛生镇、仙姑镇及其附近地区，勿须远离，着重休息体力，训练进攻战斗，政治上提高抗日讨卖国贼情绪到最高度，不分心于其他工作。

丙、第四师应靠近主力，由左聂指挥之。

丁、准备十八号起执行新任务，办足五天好的粮食，备行军中用。

戊、已开三个医务所到乔家庄、白龙沟，请彭即查到否，并令其立即接收伤兵员，换出野战医院、兵站医院，限于十九号以前开至麻子街。

己、不论甘泉得手与否，八十一师及第一团现任务须在十九号结束完毕，准备新的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陈、彭，指陈光、彭雪枫，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庚、甘泉如不得手，以二十九军现已集中之一个团担任围城，请彭立令该团开甘泉。

辛、两军团有在后方未完事务立即结束，可能随军之人员限十九号在麻子街集中，但在临真镇者不动。

毛

十三日二十时

关于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致彭德怀电

（1936 年 1 月 15 日）

彭：

甲、对张、王[1]提出如下条件：

一、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

二、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

三、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要求张、王意见。

四、请张、王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

五、立即交换密码。

六、欢迎王军长与彭见面，目前亦派周恒去洛川为宜。编一适当密码带去，来回最好是七天以内。

毛泽东

十五日二十时

---

[1] 张、王，指张学良、王以哲。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月16日）

要从前方选派赴洛川同国民党军东北军谈判的代表，立即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交到甘泉来，由邀请红军谈判的东北军原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2]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伍修权带给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3]等人。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国民党军东北军谈判的代表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同日，彭德怀来电：谈判人改派李克农，由他带发电密码同高福源去洛川。19日，李克农赴洛川。

[2] 高福源，原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1935年10月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1936年初被释放返回洛川。1月16日前后，受东北军委派，到甘泉邀请红军派正式代表赴洛川会谈。

[3] 王以哲，东北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六十七军军长。

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1]

（1936年1月17日）

今年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扩大苏区，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二月至七月，我们的行动在山西，由山西到绥远的转机，要看日本对山西、绥远进攻的程度及我们力量如何而定。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扎稳打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下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

---

[1] 1936年1月1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的常委会议，并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计划的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关于红军东进抗日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

（1936年1月19日）

阎锡山接受日本天皇的命令，秘密把陕西[2]卖出。本会命令我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打倒万恶的阎锡山，保卫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根据地，开通抗日前进路，同日本直接开火，把日本帝国主义尽快赶出中国。命令陕甘宁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宁苏区、扩大陕甘宁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

[1] 这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发出的《关于红军东进抗日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予以公布。

[2] 原文如此，疑有误。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月19日）

近与高桂滋[2]谈判合作问题，有成功希望。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驻守陕北绥德、米脂、清涧地区。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月20日）

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与东北军谈判问题致彭德怀即转赴洛川与国民党东北军谈判的中共西北中央局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电的主要内容。20日晚，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会谈。21日李克农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报告同东北军会谈中了解的情况：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的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月21日）

甲、前电七十五师在段县待命，昨等待。程电已到道左铺，并未执行前电。现七十五师、八十一师及方面军司令部应在道左铺、麻子街、甘泉一带整理待命。乙、目前，进路尚未侦察好，新兵需月底方能到齐，洛川谈判需待数日才有结果，我军集中延长及开始渡河需推迟到下月初。丙、一切关于行动方针之文件非得命令不得下达。

---

[1] 这是1936年1月21日14时，毛泽东致彭德怀、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林彪、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1月25日）

张副司令、于主席、王军长、何军长、董军长、万军长[1]，并转东北军各师团长及全体将士：

从“九一八”之后，一直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在这四年中间，不但东三省三千万同胞，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刀下鬼与俎上肉，而且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亦相继被占，整个的华北，快要变成“满洲国”第二。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事实上证明只是永久的不抵抗。蒋介石是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要把整个中国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东北军在蒋介石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之下，放弃了你们自己的家乡与你们自己的土地财产，让你们自己的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们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所蹂躏、压迫、奸淫、残杀。想起这些，好不伤心，好不可恨！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是你们东北军不共戴天之仇，你们应该誓死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收复我们的东三省及整个华北而奋斗！

因为东北军的将士们绝大多数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同

---

[1] 指张学良、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董英斌、万福麟。

日本帝国主义拚命的，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和卖国头子蒋介石是不喜欢东北军的。自东北军退出东三省以后，蒋介石总是不给东北军一个休息整理的地方与时间，他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把东北军今天调到鄂豫皖打红军，明天又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他要中国人与中国人自相残杀，他要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同决心抗日的红军打仗，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你们想，蒋介石卖国贼的毒计可恨不可恨?

蒋介石不但要东北军打红军，而且处处在压迫东北军。他不给东北军一块好地方，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就是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也是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待遇是极不平等的，东北军官兵的薪饷，那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东北军官兵的生活真是痛苦得很，赡家养子更是说不上。

蒋介石的毒计还不止此。他把他自己法西斯蒂的党羽派到东北军内，监视东北军官兵的行动，到处挑拨离间，威迫利诱，破坏东北军内部的团结，以瓦解东北军。人员的补充，武装弹药的补充，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里是得不到的。

总之，蒋介石要消灭东北军，使东北军官兵流离失散，冻死、病死、打死，好教日本帝国主义少一个敌人，好使蒋介石少一个对头。你们想，东北军的前途危险不危险呢?东北军现在是在彷徨歧路上面，东北军现在是在困难的中间，东北军内部现在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因此，军心涣散，上下不团结。东北军长此下去，好不危险!

试想，东北军的出路在那里呢?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

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不要认错了你们的冤家对头，不要把你们的朋友认作了你们的仇人。一错不能再错，一误岂堪再误。

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东北军中间，那一个爱国军人说起打日本帝国主义、打卖国贼不磨拳擦掌，挺身而出，愿为中国民族争一口气呢？那一个东北人不愿意为了收复东三省，收复华北各省而去赴汤蹈火呢？

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那时，那一个中国人不愿意拥护东北军，爱戴东北军，在精神上、物质上援助东北军？那一个有热血的爱国男儿不愿意投效东北军共同杀贼，为中华民族申义愤，争光荣？那一个东北军的将士不将成为全中国的民族英雄，闻名全中国、全世界？试问大丈夫立功救国，不当如是耶？

东北军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振华夏。假使当日以东北军的全力与中国人民的拥护而抗战到底，那东三省是早已收复了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如此猖獗的。但过去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要重整旗鼓，发扬当时抗日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是全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响亮的回答，也是东北军抗日的鲜明的口号。

中国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对于有抗日光荣历史的东北军，是极端爱护的，对于他的发展的前途，是非常关心的。因此，我们不揣冒昧，敢为东北军的领导者与将士们贡献一点意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

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素闻东北军将士均是深明大义的爱国志士，定能抛开过去的一切疑虑误会，来首先响应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抗日号召。在四万万同胞中，甘心作日本帝国主义的孝子顺孙，甘心作亡国奴的，除了极少数的汉奸卖国贼外是没有的。只要我们登高一呼，我们相信，响应我们的不是十万、百万的中国人，而是几千万、几万万的中国人。拿四万万中国同胞的人力、财力、武力、智力是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无力抗日”，是蒋介石辈汉奸卖国贼欺骗中国人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口号，而不是我们有数千年历史的黄帝子孙的口号。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请互派代表共同协商。一切愿意抗日的个人或代表，都是苏维埃红军的朋友，我们都欢迎他们到苏区来，并愿竭诚招待。同时，苏维埃制度的是否适合于中国，亦请亲来考察，加以判断。

书不尽意，敬布腹心，望公等熟思之。顺致民族革命敬礼！

毛泽东　彭德怀　叶剑英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刘志丹　刘亚楼　肖　华
高　岗　周恩来　林　彪
杨尚昆　朱　瑞　徐海东
郭述申　陈　光　彭雪枫
杨　森　阎红彦等同启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复彭德怀电[1]

（1936年1月25日）

常委考虑过你的意见，认为向北是没有出路的。

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基本的作战方针取稳扎稳打，依据黄河发展并以调孙楚[2]求得陕北残敌的肃清，跃进深入敌后野战急进，有大批分派撤退无隔断危险时才行之。同时保证第二批退回渡河船只。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方针问题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晋绥军正太护路军司令、西北“剿总”第三防守区司令兼陕北“剿共”总指挥，率晋绥军5个旅在黄河以西“进剿”陕北苏区。

致左权电[1]

（1936年1月31日）

侦察任务至迟二月五日完成。每天与我们联络一次。龙王池[2]以南闻是白区，暂不要去，着重龙王池至禹王坪之线。侦察进行要十分隐秘。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渡河侦察注意事项致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2] 龙王池，即山西省吉县黄河东岸边的龙王辿。

和红色中华社记者的谈话

（1936年1月）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对目前华北问题有何观察，有何主张？

答：南京政府在日寇挟持之下，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其实就是实现所谓“华北自治”，而“华北自治”就是日寇予定计划中的所谓“华北国”之变像，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代会上作外交讲演时，大玩了一套老奸巨稽的外交辞令，说了许多模棱两可的话。可是，事实偏不让他躲闪，土肥原毫不留情地要马上实现“华北自治”，这就逼得蒋介石不得不给他自己的外交辞令下忠实注解。对殷汝耕之空口申讨，对变像“华北自治”之公然承认，这都说明蒋介石究竟居心安在。所以，当此日寇进攻无已，南京还无抵抗决心的现在，我民族的生存实在已危如千钧一发。必须全体人民自动起来进行抗日救国的运动，实行抗日救国的大联合。救国家即所以救自己，救自己必须救国家，这无论对于工人或资本家，农民或地主，对于工农商学军政各界，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样。一切党派，一切团体，都应抛弃一切门户之见，真诚合作，以谋挽救国家之危亡。中国苏维埃政府，早就主张全国武装一致抗日，并再三宣言，愿与一切真心抗日的党派合作，共同救国。去年八月，本党和政府更发表宣言，提议愿与全国各党派，各方面进行谈判，共同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列举十大要求作为国防政府底纲领。中

国苏维埃政府认为只有统一，才能救亡，所以凡能以统一救亡为前提的，无论其别项主张如何，中华苏维埃政府皆愿与之推诚合作，以求达到救国救亡之目的。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最近全国学生救国运动有何感想与主张？

答：我国学生在救国运动历史上，素著光荣，这次的伟大救国运动尤为难能可贵。这些青年，是全国人民的子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们对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表示无限敬爱，对于他们的横被迫害，表示异常痛愤。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学生救国运动，决尽力援助，刻己鼓励苏区内各大中小学学生齐起声援，并号召全国工农市民各界一致行动，帮助学生达到其讨逆救国的目的。这次学生运动，实在是全国人民救国运动底反映，学生所提“停止内战”，“一致救亡”等口号，实在是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现在我国存在的内战，就是蒋介石所集中其一切兵力来进行的「剿共」战争。红军为我民族底唯一忠勇英锐，矢志抗日的队伍，我们当然不能任蒋介石来加以损害，苏区人民都是坚决实行抗日救国斗争的战士，都是我各界同胞的本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决不能让蒋介石加以摧残，故不得不作自卫的战斗。我代表中国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要是蒋介石或任何方面底军队能够停止进攻红军，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立刻命令该对敌地方的红军停止军事行动，并实行动员来进行共同抗日战争，这样来回答学生和人民的要求。

问：最近各方盛传蒋介石已与红军成立停战协定，究竟事实内幕如何？

答：自“九一八”以来，中国苏维埃政府即不断地号召全国同胞，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问一切旧日关系，大家一致团结来共

同救亡。在这一坚决不移的原则下，中国苏维埃政府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真正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从前十九路军也曾用战争来反对人民和红军，但当该军实行抗日时，红军即□其合作，即其明证。总之，红军与蒋介石间能否成立协定，并不是决定于中国苏维埃政府而是决定于蒋介石是否决心抗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在不分党派，不问过去关系，只求一致抗日这一主张上，决不保留任何例外，决不绝人自新之路。但蒋介石若依然不肯下抗日决心，则即放出任何空气，中国苏维埃政府亦决不为之眩动。红军数年来和蒋介石的苦战，并非私斗，而是为着抗日救国的迫不得已的自卫。正因为蒋介石可以欺骗国民，我们则只知道为国民服务，蒋介石可以抹煞公意，我们则只知道尊重人民公意。如果蒋介石继续降日卖国，我们决定抗日到底。我们相信全国同胞和全国军队终会和我们一起抗日的，我们竭诚欢迎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各界青年迅速加入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

1936年的毛泽东。

致周恩来、博古、邓发电[1]

（1936年2月3日）

河冰全解，我军决从上游过河，主要作战方向仍应在东边。副主席速布置清涧封锁，免走漏消息。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彭德怀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邓发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2月3日）

（甲）据县苏报，河冰已退至龙王岔，决心从上游渡河。（乙）两军及方面军直属队各在原位置集结待命。（丙）我们率电台出发侦察，左即率侦察人员取延河以西，延长、延川两城以东之中间道路，隐蔽向老娃关以北之马灰坪跟进侦察。

---

[1] 这是2月3日14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左权、徐海东、程子华并报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曾希圣电[1]

（1936年2月3日）

将所得山西部队的番号、兵力、官长姓名及驻地情形来电详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第二局局长曾希圣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林彪等电[1]

（1936年2月6日）

情报：据最近由东岸来投诚者称：一、第六十六师杨效欧临汾、大宁、蒲县、解县、赵城、洪洞一带。二、第六十七师于振河晋北、大同。三、第六十八师王靖国绥远。四、第六十九师傅作义亦说正太路之平定。五、第七十师杨爱源省城。六、第七十一师杨耀芬师汾阳，其温玉如旅在中阳、石楼，其黄克有旅在吴堡、宋家川。七、第七十二师李生达，其陈长捷旅在绥德义合镇，余似在葭县一带。八、第一零一师似为孙楚兼领，似在兴县、临县、碛口一带，柳林有其马延守旅一团。九、另两个独立旅四个团绥远及晋西北一带。十、据二科报：晋南之长治、长子有某师一部。

---

[1] 这是2月6日22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曾希圣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等电[1]

（1936年2月8日）

各部加紧训练，准备十二三号行动。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隐蔽，走延水城[2]、双庙河、川口镇至袁家沟（地方干部、警卫连今后随剑英）。

---

[1] 这是1936年2月8日21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转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2] 延水城，即延川县城。

致叶剑英、杨立三电[1]

（1936年2月8日）

将皮筏、水手于十一号集中剑英手中，立三和兵站组织准备在十三、十四号行动。

---

[1] 这是1936年2月8日23时毛泽东致叶剑英、杨立三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等电[1]

（1936年2月10日）

（甲）政治上解释新策略，着重于对俘虏、对商人、对富农、对小地主的具体政策，部队中了解程度如何即告。（乙）大批准备将来使用的干部，消灭降级使用现象，不要把骨干的干部通通使用于现职。立即扩大教导队（一军团）。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叶剑英、杨尚昆、林彪、聂荣臻、朱瑞、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等电[1]

（1936年2月10日）

甲、调查结果情况无变化，现正准备一切。乙、各部加强训练，十二三号行动。丙、前令装备三天干粮现须加一天，共制四天的干粮。丁、请前委先来前方，注意林聂抄送洛甫同志：一、请他先到前方来。二、延长到袁家沟二十二里，第一天经交口镇到甘家沟七十五里，第二天经延水城到双庙子七十五里，第三天经张家河、川口镇到袁家沟七十里。三、请注意隐蔽，前委在路上以陕北工作团名为好，用一陕北同志先头，有问答以此答之。

---

[1] 这是2月10日16时毛泽东和彭德怀、张浩致叶剑英、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2月11日）

甲、请林彪、海东同志并两军团各一先头师师长、各一先头团团长来河口一定亲看地形。来时各带一个至两个特务员。取延水城、双庙河、刘家河、川口镇道路，到高家村集合。十三号起程，十四号或十五号到达。沿途注意保密。乙、部队准备十五号开动。

---

[1] 这是2月11日18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传达与讨论东征命令及部队开进问题[1]

（1936年2月12日）

叶、杨，林、聂、朱，程、徐、郭[2]：

甲、东征命令[3]即行发布，于十三十四两日传达解释完毕。十五日一军团，十六日十五军团及方面军直属队向渡河点开进，各以四天行程到达准备渡河位置，待命渡河。在开进时连队中讨论东征令，在指战员中建立巩固的信心，发扬高度的积极性。

乙、东征行动在渡河之日以前对居民群众仍须严守秘密，每个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等的电报。

[2] 林、聂、朱，指林彪、聂荣臻、朱瑞，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程、徐、郭，指程子华、徐海东、郭述申，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政治委员、军团长和政治部主任。

[3] 东征命令，指1936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名义发布的关于《东进抗日及讨伐阎锡山的命令》。命令指出：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抗日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及广大的抗日民众，要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民众，要趁着抗日红军主力打过山西去的时候，奋勇过河东去，收缴敌人武装，夺取敌人船只，替主力红军运伤兵、运粮食、运枪械，配合红军打大胜仗。为严守行动秘密，这项命令直至2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前才予以公布。

指战员注意严守秘密。

丙、开进取道延水城、双庙河、刘家河、川口镇[1]到河口、袁家沟[2]一带集中，集中地区另电遵照。

并告恩来，东征命令在后方仍不宣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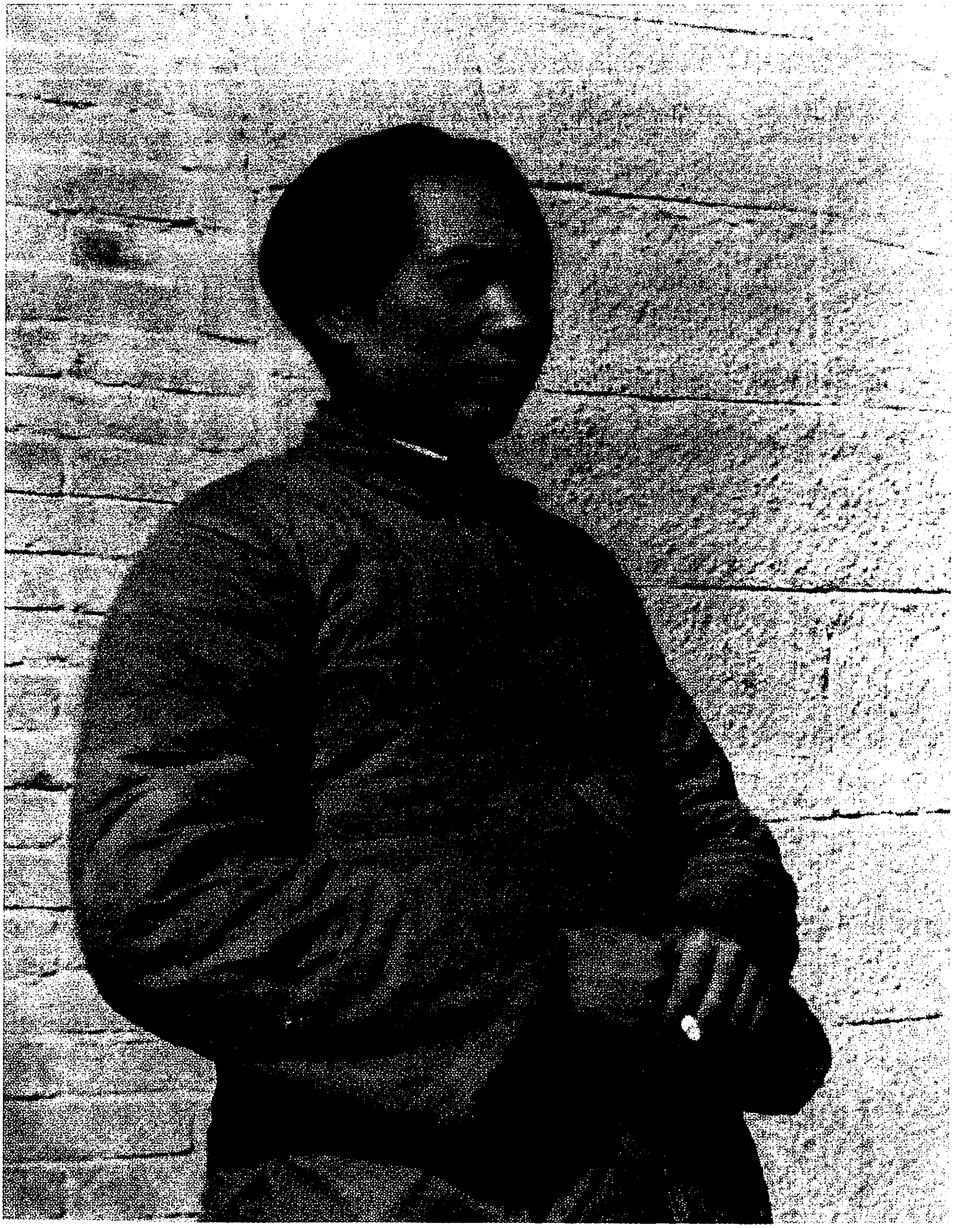
彭　毛

二月十二日八时

---

[1] 双庙河，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南。刘家河，位于陕西省延川县西北。川口镇，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

[2] 河口、袁家沟，均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



指挥东征作战时的毛泽东。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2月12日）

红一方面军东渡后，拟调红二十八军之第一团以刘志丹、宋任穷二人中一人指挥，由河东向军渡、柳林、中阳行动；阎红彦、蔡树藩所部则巩固东岸沿河，以便主力向正东并以后转到东南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红军主力东渡后巩固渡口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东渡前抓紧提拔干部[1]

（1936年2月13日）

林、聂同志：

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我们向你们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单从发展一军团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发展北方以至全国的革命武装力量出发，要求你们在原则上与实际上更大与更具体的注意。部队一经东渡即难于进行这种组织工作，因此请利用这几天时间，切实解决下列问题：

1. 清查降级使用人员，把他们提升起来（甘泉战斗[2]尚有两营长当连长的伤亡了）。
2. 提拔老战士开办教导营（须有三连至四个连）。
3. 此外，此次红校毕业生原则上应保存，继续训练。

彭　毛

二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指红军围攻陕北甘泉县城的战斗。1935年9月下旬，红军第十五军团开始围困甘泉县城的国民党守军。直罗镇战役后，红军第一方面军加紧了对甘泉城的围攻。由于红军缺乏攻城武器和炸药，致使几次攻城均未成功。

行军中严格注意隐蔽[1]

（1936年2月16日）

聂、程：

甲、隐蔽运动，避敌发现，为争取胜利之严重条件。各兵团应遵照迭次命令，于敌机活动时间停止运动，派出主官首长指挥，绕过暴露地段及集中地。如不严格隐蔽，因而暴露企图，将唯各兵团首长是问。

乙、子华即令延水之水手，荣臻即令在双庙河之水手开来高杰村。

丙、此电由子华派人交叶参谋长[2]。迭次令交叶之电报均送交否？即复。

彭　毛

十六号二十三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第十五军团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叶参谋长，指叶剑英，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

全力争取东面胜利
与二十八军的行动部署[1]

（1936年2月17日）

周：

甲、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

乙、因此二十八军主力须移于吴堡附近。第一步，乘李生达[2]撤退，肃清吴堡、佳县、神木、府谷一带；第二步，配合沿河武装相继渡河，向柳林、军渡[3]以北山西地方发展苏区。

丙、对付高井[4]两敌，以二十八军第三团及地方武装即足。高、井现取守势，若以二十八军置此，势必无事可做。三边[5]方面不是着重地方。

丁、若高井两敌侵入，二十八军仍移对高、井。二十八军、陕

---

[1] 这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

[2] 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军军长兼第七十二师师长。

[3] 军渡，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部。

[4] 高井，指高桂滋、井岳秀，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和第八十六师师长，驻防陕西绥德、米脂、榆林和靖边等地。

[5]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北地方军队的基本任务仍不变。

戊、恩来暂时指挥重心移至清涧县委驻地，指挥二十八军及阎蔡[1]所部，沿河西岸七八县群众动员，沿河东岸七八县拆毁堡垒，争取群众，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如此长线无统一指挥，必致零乱。盼即复。

张　毛　彭

十七日十三时

---

[1] 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沿河游击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红军东征的任务[1]

（1936年2月18日）

东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到外线打击卖国贼阎锡山，并调动他在陕北的四个旅的兵力，借以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区新的“围剿”；二是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三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当前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渡过黄河。

---

[1] 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分。

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1]

（1936年2月18日）

一、情况：

（一）满洲军一师占领张家口，日本在太原包头两处设军事机关，北京傀儡政府正进行华北的满洲化。

（二）阎锡山[2]在日本指挥下进行各种卖国贼工作。其兵力部署如下：太原一师，晋北大同一带一师，晋南长治、长子一带一师，汾河下游及大宁、吉县一带一师，晋西永和、石楼、中阳、离石、

---

[1] 1936年2月20日红军第一方面军自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接着，分三路发展胜利。中路军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左路军、右路军分别南下北上向晋绥军进攻。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抗日和援救山西阎锡山，先后派遣约10个师兵力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根据地进攻。在此情况下，红军右路军、左路军即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敌。后来，为了团结抗日和避免不利决战，红军于5月2日至5日全部西渡黄河，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这次东征作战历时75天，共歼灭国民党军约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获枪4000余支，炮20余门，扩大红军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的东征作战命令。命令原件不全。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汾阳、柳林、军渡[1]及沿河守备一师（七十一师杨耀芳[2]），晋西北兴县、临县、碛口[3]、保德一带两独立旅，侵入陕北吴堡、绥德、佳县一带一师（七十二师李生达），绥远[4]全省两师。孙楚[5]之“剿匪”总指挥部似在碛口（孙楚现去南京谒蒋[6]，职务由参谋长代），杨耀芳之晋西防守司令部在汾阳。

（三）河北抗日义勇军在发展中（大名、昌平、阜平等地）。晋豫之交有红色部队活动（阎锡山派兵一旅去对付）。内蒙德王[7]独立与晋方对抗。阎锡山部队中抗日革命情绪在发展着。黄河东岸民众有欢迎红军之表示。

二、任务：

在党中央及军委会抗日讨卖国贼，向山西消灭阎锡山部队，发展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号召全国抗日讨卖国贼运动，并在军事上巩固向前发展的基本方针之下，方面军第一步有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的任务。

三、渡河战役：

---

[1] 军渡，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部。

[2] 杨耀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师师长、晋西警备司令。

[3] 碛口，位于山西省临县西南。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防守区司令、第三十三军军长兼第一〇一师师长。

[6] 蒋，指蒋介石。

[7]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1936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一）敌情判断

我军渡河区域是晋敌七十一师杨耀芳防地，判断其六个团分布：永和一团，石楼城一团（一说一团部附一炮兵连），石楼所属沿河防御（河口[1]对岸之辛关[2]至沟口[3]对岸之三交镇[4]百余里）两团，中阳城及中阳沿河防御一团，柳林一团，师直属队在汾阳。我军渡河之第二日（二十二号），在三交镇附近地区敌有以二个至三个团与我作战可能，而在义牒镇[5]附近，有以一个至两个团与我作战可能。在三天至七天之内，敌有以两个师左右兵力与我在石楼、中阳、永和一带作战可能。至于以更大兵力集中前进则须时间较多。

（二）我军部署

我军以从沟口、河口一带渡河，占领留誉镇[6]、义牒镇并相机占领石楼城之目的，部署如下：

1. 集中地区

一军团沟口附近。

十五军团主力河口附近。

十五军团之八十一师解家沟附近。

方面军直属队川口镇附近。

2. 渡河地区

一军团沟口附近。

---

[1] 河口，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

[2] 辛关，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3] 沟口，位于陕西省绥德县东部。

[4] 三交镇，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南。

[5] 义牒镇，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6] 留誉镇，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南部。

十五军团主力、方面军直属队河口附近。

十五军团之八十一师准备跟一军团渡河。

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老关、舍峪里[1]两处为辅渡点（两辅渡点均属十五军团）。

3．渡河指挥

每个渡河点由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每船一人），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

4．渡河时间

以二月二十一日二十时为各兵团在各个渡河点同时开始渡河之时间。

5．渡河手段

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被敌发觉，立即改为强渡。

6．渡河后之动作

一军团须准备与进入渡河点附近二三十里地区之援敌战斗而消灭之。在消灭该敌后或该地区无敌情，均须于第二日（即二十二号）或第三日（依渡河快慢及敌情决定）相机占领留誉镇地区。

---

[1] 舍峪里，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2月18日）

甲、十九号红军第一军团全部休息（一师进至海家沟），二十号进至沟口、普阳沟地区。由林规定适当驻地，以不暴露又利渡河为原则。乙、红军第十五军团主力集中高家村一带，由徐规定驻地。八十一师进至袁家沟待命。丙、三天内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二十一号二十时开始渡河。

---

[1] 这是2月18日19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2月19日）

东征军渡河准备工作已提前完成，改为二十日黄昏开始渡河；你要于二十三日前来河口，指挥在东征军前进后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提前渡河相关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坚持联合抗日不为谣言所动致王以哲、张学良电

（1936年2月19日）

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勋鉴：

最近情况：

（甲）冀察政委会实际上已成为第二傀儡政府，南京已决定成立绥省内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政委会，这就等于将绥远出卖给日本。包头、五原等地日人已遍设特务机关，日本军人到处活动，山东、山西正循着冀察绥之亡国道路前进，华北五省首先变为华北国亡基础。

（乙）日本灭亡中国之一切行动，均得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希望其起抗日实无异于与虎谋皮，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贼等所深恨，造作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面之团结，实意中事。

（丙）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则他胜幸甚，但对于蒋贼之阴谋暗算，须切实严防，将派李克农即日赴洛川，面谈一切，望接洽。

彭德怀　毛泽东

十九日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2月20日）

甲、渡河时间一律本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开始，不得先后参差。乙、本日二十时起至明晨八时，各电台每二时联络一次，特别是渡河得手与否立即电告。丙、林、聂以小部从福禄坪佯攻，徐、程以小部从辛关佯攻。丁、阎红彦率八十一师第三营从马花坪渡河，徐、程派一个营从社里渡河。戊、彭从沟口渡河，毛依河口得手与否决定从河口或从沟口渡河。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渡河时间、地点等问题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萧劲光并告毛泽民、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2月21日）

下决心速进，夺取中阳。

---

[1] 这是1936年2月21日20时毛泽东致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致徐海东、程子华电[1]

（1936年2月21日）

二十二日，十五军团主力须尽一切可能夺取石楼；所有未渡部队改从辛关渡河。

---

[1] 这是1936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徐海东、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给李克农的训令[1]

（1936年2月21日）

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二十五日李克农等到达洛川，同王以哲会谈。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军委名义发出的《给李克农的训令》的主要内容。

两军团应乘胜向石楼急进

（1936年2月21日）

彭，聂、林，徐、程[1]：

甲、我两军团主力本日上午均可渡河完毕，下午可全部渡完。

乙、从河口[2]至三交镇[3]沿河之敌约两团，现在我大包围中。估计该敌本日有转向石楼撤退之可能。

丙、我一军团应速向小蒜镇，十五军团速向义牒镇截敌追敌，两军团并各以先头师乘胜向石楼急进，相机占领该地。

丁、义牒镇、河口两点是方面军主力后方联络线，十五军团须酌派小部保护，候抗日游击队明日或后日接替。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一日七时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聂、林，指聂荣臻、林彪，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和军团长。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2] 河口，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

[3] 三交镇，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南。

游击队过河后的任务及组织担架队问题

（1936年2月21日）

立三[1]同志：

一、作战命令一份付上，可了解红军行动方向及任务。

二、杨森、蔡树藩、赖传珠[2]领导之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过河后，以义牒镇为指挥中心。其任务是：（一）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二）拆毁沿河堡垒，消灭残敌；（三）发动辛关、老鸦关、清水关、义牒镇[3]四点之间的群众斗争，组织山西本地游击队；（四）保持主要渡口。

三、已下令从绥德、清涧、延水三县动员三千人当担架队，本月底集中一千，三月十五、三月三十各集中一千。但三县人口多少不等，这个平均分配数恐不适当，应以按照可能实情为动员原则，首先集中一千，看前方需要情形等候命令再集中二、三两批。办法：（一）有适当组织，有好干部带领；（二）有支部组织；（三）有

---

[1] 立三，即杨立三，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兵站部部长。

[2] 杨森、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沿河游击队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赖传珠，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政治委员。

[3] 辛关，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老鸦关，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清水关，位于陕西省延川县东南。义牒镇，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伙食组织；（四）带衣毯碗筷；（五）服务期一个半月；（六）每四人一付担架；（七）均到河口你处集中，待命前送。

四、戴季英[1]负责加造船十二只，计马花坪三只，老鸦关三只，河口六只（此六只准备开赴下游适当渡口应用），请与联络。

五、你须与清涧县委及河边各区区苏[2]密切联系。

六、周副主席[3]日内来河边主持，你的工作向他请示。带有电台。

七、我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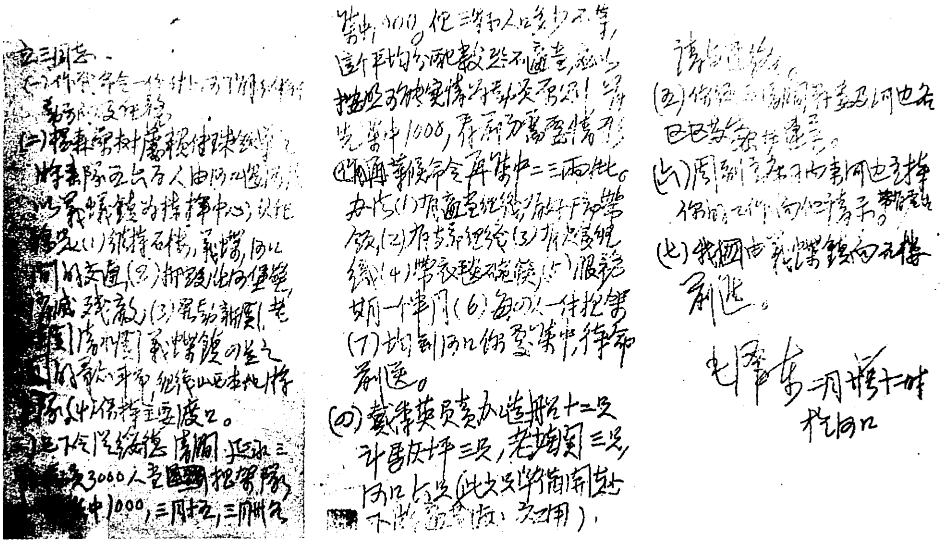
二月二十一号十二时于河口

---

[1] 戴季英，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武装部部长。

[2] 区苏，区苏维埃的简称。

[3] 周副主席，指周恩来。



立三同志：

（一）作战命令一份付上，[illegible]

（二）[illegible]游击队五六百人由河口[illegible]义牒镇为指挥中心，以任务是(1)维持石楼、义牒、河口间的交通，(2)[illegible]，(3)[illegible]义牒镇[illegible]山西本地游击队（由你指挥）主要渡口。

（三）[illegible]3000人[illegible]担架队中1000，三月[illegible]，三月卅[illegible]1000，[illegible]

（四）戴季英负责办造船十二只，计马家坪三只，老鸦关三只，河口六只（此六只[illegible]之用）。

[illegible]

（五）你[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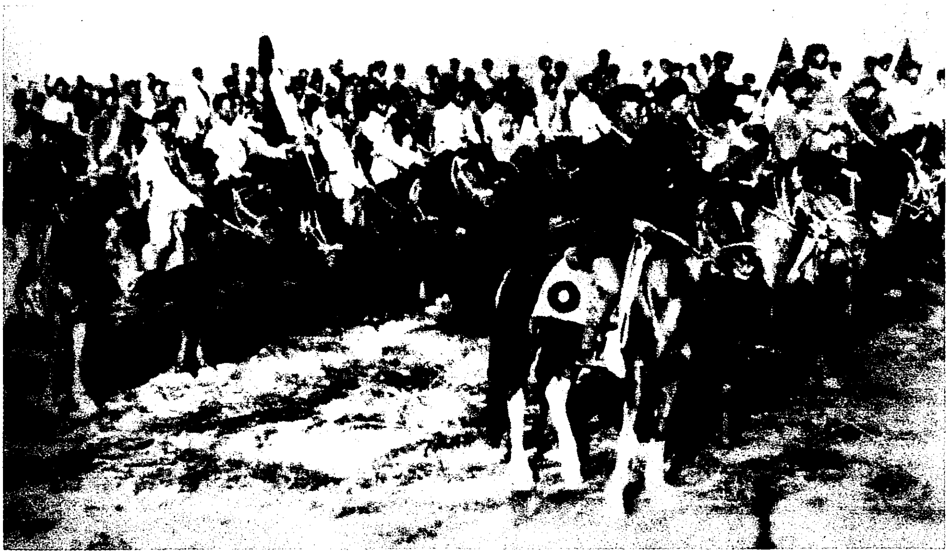
（六）周副主席[illegible]

（七）我们由义牒镇向石楼前进。

毛泽东 [illegible]

于河口

东征作战中毛泽东写给杨立三的亲笔信。



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统率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图为东渡黄河的抗日先锋军骑兵一部。

我军目前方针是建立作战根据地[1]

（1936年2月23日）

德怀同志，并告林、聂，徐、程[2]各同志：

甲、阎[3]敌因我突然东渡颇现惊惶失措之态，正在布置防御。判断该敌短时间内尚难集中大力向我进攻。

乙、三交镇、留誉镇、义牒镇[4]均为我攻克，三交至辛关沿河守兵全部溃退，三交、转角、老鸦关[5]、辛关各渡口均在我手中。群众表示欢迎红军，打倒阎锡山的口号得到广大群众同情。但石楼未得手，中阳无报告，辛关以南沿河守敌退否不明。

丙、不论中阳、石楼等城能否攻克，不论阎锡山向我进攻之力量与时机如何，方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4] 三交镇，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南。留誉镇，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南部。义牒镇，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5] 转角，镇名，位于山西省石楼县东北。老鸦关，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

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为迎接阎锡山向我进攻之战场，全部工作的中心放在更大战斗的基础上。

丁、拟以一军团位于留誉镇、暖泉镇、水头镇、坪底[1]及中阳城附近，十五军团主力位于永和、隰县两县，并相机占领两城，一部在石楼城附近控制黄河，北自三交镇南至马头关[2]二百余里于我手中。以上部署拟从二十五日起实行。

戊、诸同志意见及所得军事、政治、群众材料即时见告。

己、方面军直属队今日宿义牒至石楼之间，明日在此不动。

庚、请彭[3]率八十一师明日到石楼附近。

毛

二十三日二十时

---

[1] 暖泉镇，位于山西省中阳县西南。水头镇，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坪底，位于山西省石楼县北部。

[2] 马头关，位于山西省大宁县西北。

[3] 彭，指彭德怀。

致徐海东、程子华电[1]

（1936年2月23日）

石楼为东征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

---

[1] 这是1936年2月23日9时毛泽东在距石楼40里的张家塔致徐海东、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致徐海东、程子华电[1]

（1936年2月23日）

二十四日来张家塔一叙，把所有报纸杂志及敌情材料带来。

---

[1] 这是1936年2月23日21时毛泽东在张家塔致徐海东、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2月24日）

甲、敌有四路总攻计划，大战在即，我们准备一切。乙、现派红十五军团两个团分向永和、隰县前进，发动各县群众，相机攻下两城，扫除辛关两个大渡口。丙、请速动员绥德、清涧、延长、延川四县沿河赤少队迅速过渡，拆毁堡垒，发动群众保护渡口。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彭德怀关于准备对付国民党军晋绥军的四路进攻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2月24日）

二十八军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训令[1]

（1936年2月24日）

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

甲、我方面军已胜利地渡过黄河，粉碎了阎锡山[2]的封锁线，占领黄河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了东征战略之第一步任务。

乙、卖国贼阎锡山在战略的防御形势下，正在准备着战役的进攻，企图集中兵力打击我军，救援石楼城，驱逐我军于黄河以西六十里之封锁线地带。

丙、阎锡山因仓促应战，须从陕北及远地调兵，因对我企图不明，其从调动、开进、展开到战役攻击之日，尚须十天左右时间，况兵力当小于三个师。其部署似将以一路从离石经中阳向石楼，以一路经孝义、水头镇[3]向石楼，以上两路当是主攻部队。以一路由柳林郊留誉镇[4]向石楼，以一路由隰县向石楼，以上二路当是辅助部队。

丁、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基本方针是在柳林、离石、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一线内围石楼求得打增援部队，用大的速度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之一路至两路，取得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各军团、各师、各团首长的电报。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水头镇，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4] 柳林郊，即柳林镇，为今山西省柳林县县治。留誉镇，位于山西省柳林县南部。

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

戊、目前极短时间之内（估计十天左右），我们是处在两个战斗任务之间，即渡河战斗已经完结，而进攻尚未到来。这个中间阶段的任务是集中全力准备作战，具体任务是：

一、使红军与居民群众相结合。

二、使红军干部与山西的敌情、地形、政治经验、社会情形等之了解与熟悉相结合。

三、从政治、军事工作提高战斗力。

己、部署：

一、一军团位于留誉镇、晏家荣、暖泉镇、坪底、土门一带，其赤化工作范围包括柳林镇、金罗峪、中阳城、暖泉镇、坪底、小蒜镇、三交镇这一线以内。

二、十五军团以石楼为中心，以小部围城，主力位于坪底、水头镇、隰县城、永和城、张家畔[1]这一弧线以内。

三、抗日游击队以义牒镇[2]为中心，工作范围包括转角镇、贺家畔对岸张家塔这一区域。

四、方面军司令部位于义牒、石楼间之张家畔。

五、各兵团部队勿过于分散，赤化工作着重于大道及要点。

六、工作时间暂定七天（二十五日至三月三号）。

附记：此训令发到团一级止。

彭　毛

二十四日于张家畔

---

[1] 张家畔，疑为张家塌，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2] 义牒镇，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2月25日）

辛关下面贺家凹之守敌一连，二十一日受我游击队宣传全部出围缴枪。计缴轻机枪二挺、重机枪二挺、手提冲锋枪八支、步枪三十五支、短枪二支、子弹数千发，手榴弹百余个，俘连长以下官兵七十余名。

---

[1] 这是2月25日9时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派一个师开赴车鸣峪关上等作战要地[1]

（1936年2月25日）

林、聂：

甲、中阳河上游车鸣峪、关上[2]之线，为东出要道，敌正派兵前去。为争先着，望立即派一个师附电台开赴该地，发动该地向东向南向北道路上的群众，创造作战根据地。

乙、暖泉镇[3]亦应即去占领。

丙、孝义、石楼、隰县三县交界之水头镇[4]亦作战役要点，已令十五军团派队占领。

彭　毛

二月二十五日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车鸣峪、关上，均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

[3] 暖泉镇，位于山西省中阳县西南。

[4] 水头镇，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消灭关上水头两地之敌[1]

（1936年2月25日）

林、聂：

甲、据曾希圣[2]报杨耀芳[3]电称，汾阳周旅[4]（两团）二十四日可达关上村。查关上村在中阳城正南约四十里中阳河上游，为我军东出要道。又据报隰县到敌一旅，其一部进至水头镇。该镇在石楼正东九十里，亦为东面要地。

乙、一军团有消灭关上村周旅之任务，十五军团有消灭水头镇之敌之任务。

丙、一军团全部应于本日开始运动，向关上村前进，于明日包围周旅而消灭之。

丁、十五军团向隰县前进之两个团，改于明日向水头镇消灭该敌。

彭　毛

二月二十五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曾希圣，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局长。

[3] 杨耀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一师师长、晋西警备司令。

[4] 周旅，指国民党军独立第二旅，旅长周原健。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36年2月26日）

林、聂：

（甲）你们行动望即见告。（乙）徐海东率三团昨（二十五）日上午在石楼南端消灭敌一一三团一个营，下午在隰县北端又消灭敌四零五团之一营，俘营长李玉田，并击溃其一营，共俘三百余人，缴步枪二百余〔支〕，迫炮二门，机枪多挺。（丙）据李玉田供：李生达七十二师二八〇旅二十五日到石口镇，增援石楼。（丁）已令徐程率红军第十五军团（缺直属队包围石楼之两个营），本日向石口进四十里，明日包围该敌而消灭之。

彭　毛

二十六日四时三十分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全力消灭关上之敌[1]

（1936年2月26日）

林、聂：

甲、敌情如另电。

乙、对关上[2]之敌，如地形有利，应于明（二十七）日坚决消灭之。

丙、如地形不利，无解决战斗之可能，则明日以小部监视该敌，主力撤至关上以南（即关上、水头镇[3]之间）荫蔽休息，以便待敌增援，向其攻击前进，并待十五军团靠近你们，然后全力消灭之。

丁、十五军团明日到水头镇。

彭　毛

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关上，村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

[3] 水头镇，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在有利条件下攻击水头之敌[1]

（1936年2月26日）

徐、程：

甲、明日你们向水头[2]前进，须先侦察，看地形有利，敌无堡垒险地或工事之依靠，然后攻击之，否则不应开始攻击。又须看时间许可，能解决战斗，然后攻击之，否则不应攻击，即在水头附近宿营。

乙、一军团本日十四时才赶到关上[3]，战未几即天黑，时敌溃退入工事与村房内，尚未解决战斗。已令他们明日相机消灭该敌或撤退至关上、水头间地区。

彭　毛

二十六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3] 关上，村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

关上村战况及我继续歼敌之部署

（1936年2月28日）

徐、程，并告林、聂：

甲、据林聂报，独二旅第四团被我完全消灭，其旅部及第三团被我追及，正在解决中。

乙、中阳来敌两团，亦说三团，昨（二十七）日十五时进至距关上三十里处，被我一军团一部正抗击中，一军团主力本（二十八）日向关上村转进。

丙、着徐程率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八十一师及七十八师之一个营，接电后由水头出发向关上开进（关上在水头正北六十里，中阳正南五十里），由南向北攻击该敌。

丁、一军团则由北向南攻击。

戊、如发现中阳续有援敌，一军团派小部拒止之。

己、一军团、十五军团由林聂统一指挥之。

庚、林聂与徐程互相派员至关上附近取联络，徐程令骑兵连保持水头于我手中。

彭　毛

二月二十八日一时

两军团宿营位置以利于打击前进之敌为原则[1]

（1936年2月28日）

林、聂，徐、程：

甲、敌既退入中阳，两军团即在关上[2]南北及其以东地区集结休息，待敌再进消灭之。

乙、两军团宿营位置以利于打由中阳向关上前进之敌，或由富家塔向普善庄前进之敌，又利于打由大麦郊[3]向水头[4]前进之敌为原则。由林聂区分之。

丙、派队向大麦郊，向孝义，向中阳，向富家塔，向留誉五条路上游击侦察。

丁、十五军团留水头之骑兵连每日应向大麦郊游击，石口方向亦须侦察。

彭　毛

二月二十八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关上，村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

[3] 大麦郊，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北。

[4] 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在关上水头地区创造作战根据地[1]

（1936年2月28日）

林、聂、朱，徐、程、郭：

甲、关上、水头[2]之线，即石楼、中阳、孝义、隰县四县交界地区，是我军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望下创造作战根据地的决心，努力进行该地东南西北四方面各五十里地区的群众工作，详细调查该地地形、道路、村庄、人口、经济等状况电告。

乙、工作重心，放在该线附近及通石楼，通暖泉[3]，通留誉[4]，通中阳，通汾阳，通孝义，通大麦郊[5]，通水头、石口、川口[6]，通双池[7]各条大道上，每地派一工作组。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的电报。

[2] 关上，村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3] 暖泉，镇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西南。

[4] 留誉，镇名，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南部。

[5] 大麦郊，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北。

[6] 石口，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南。川口，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南。

[7] 双池，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部。

丙、以关上为中心之各路，由一军团担任。以水头为中心之各路，由十五军团担任（十五军团准备于二号派二二四团第三营回水头配合骑兵连进行工作）。

丁、目前的中心是作战，地方工作的任务积极努力以能直接有利于作战并不妨碍作战（部队须集结休息）为原则。

彭　毛

二月二十八日十九时

致李克农电[1]

（1936年2月28日）

周继吾、张子华[2]昨日到瓦窑堡。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我方所组织抗日东征军，连日突破东岸二百里封锁线，消灭与击溃杨耀芳、杨澄源、李生达[3]等部共三个旅，占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五县广大地区。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和东北军领导人谈判的中共谈判代表李克农电的主要内容。从此，中共中央开始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随后逐步明确地提出“联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口号。

[2] 周继吾，即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为上海圣彼得堡教堂的牧师，1935年年底受宋庆龄、宋子文委托前往陕北，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张子华，当时受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委派，与董健吾同行，向中共中央汇报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等会商的情况。

[3] 杨耀芳、杨澄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绥军第七十一师师长和第六十九师师长。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七十二师师长。

复李克农电[1]

（1936年2月29日）

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宁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往来。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和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协定草案的补充意见和彭德怀复李克农电的主要内容。

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

（1936年2月）

一、宗旨：

目前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正在尽心竭力，要把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民族已经临到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本校为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材，特决定招揽各地革命青年爱国志士来校学习，以期培养和造成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为宗旨。

二、科目及学额：

本校分为四科：

1．军事指挥科　　培养营长团长等军事指挥干部为目的，学额一千名。

2．政治工作科　　培养营团师的政治干部为目的，学额一千二百名。

3．游击战争科　　培养抗日游击队、抗日义勇军各级军事政治干部为目的，学额三百名。

4．特科　　培养工兵、骑兵、炮兵等各特种兵的军事指挥员为目的，每科学额三百名。

其入学资格与待遇均与正科同。

三、入学资格：

1．凡愿牺牲一切，坚决抗日，而献身民族革命的爱国志士，不论阶级成分和社会出身，以及过去参加过何种党派而志愿学习者。

2．不分性别，而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者。

3．身体康健而无传染疾病以及不良嗜好者。

4．文化程度至少以高小毕业及具有同等程度者为合格。中学生、大学生、失业教职员及其他知识分子与退伍军人，特别是曾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当过干部的，不论程度，均受欢迎。

5. 稍识文字与参加过斗争的工人与农民，本校均同样欢迎。

四、待遇：

1. 免除一切学费，膳费及书籍费，并发给衣服毯子鞋袜，享受在职红军的待遇与优待。

2. 毕业后愿由本校分配工作者，则由本校分配适当抗日工作，如愿意到别处工作者（如抗日军队，抗日地方政府，义勇军与抗日游击队等），则由本校发给路费，依其自愿，送其前往工作目的地，并给介绍。

五、报名地点：

1. 各级苏维埃政府、抗日红军部队、抗日游击队均可报名，并由该负责机关供给沿途膳宿费，并派人护送。

2. 因交通关系而不能按期报名的，可随到随收。

六、学业期间与开学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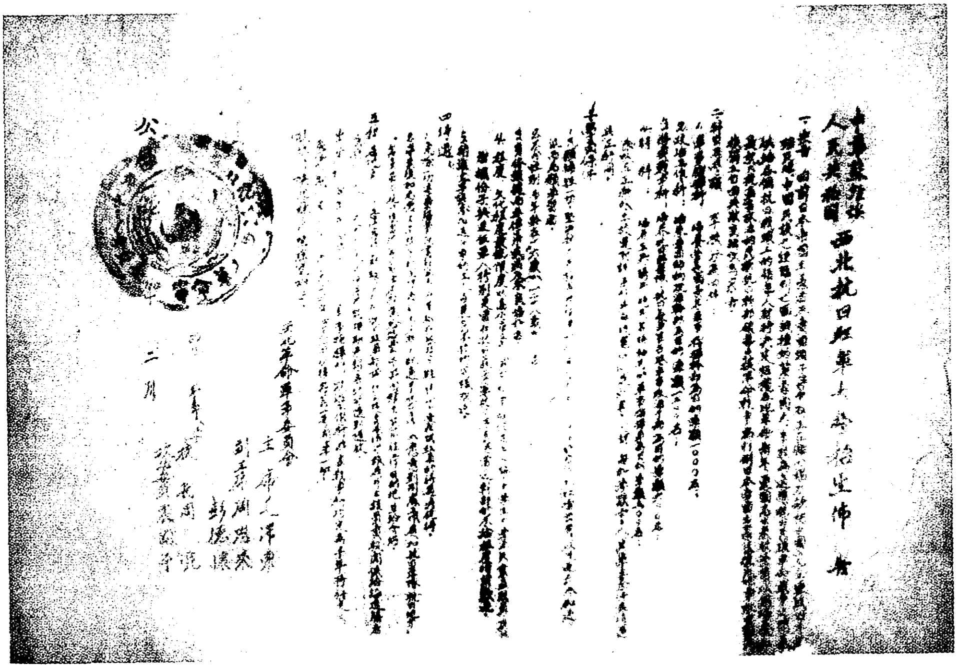
1. 军事指挥科、政治工作科、游击战争科均为半年，特科为一年。

2. 第一期开学期为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以后每月一日开工一班。

七、校址：

陕北苏区望瑶堡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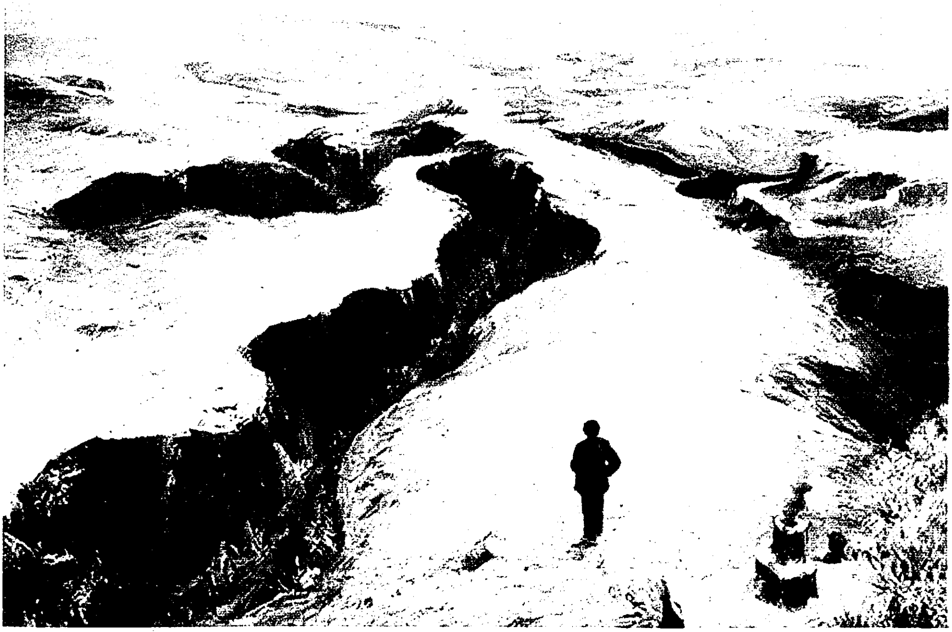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校长　周　昆
政治委员　袁国平
公历一九三六年二月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招生布告。

沁园春·雪[1]

（1936年2月）



《沁园春·雪》（油画）

---

[1] 这首词作于红一方面军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的时候。作者在1945年10月7日给柳亚子信中说，这首词作于“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

作者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1]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2]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3]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4]。
惜秦皇汉武[5]，

---

[1] 顿失滔滔，这里指黄河因冰封而立刻消失滚滚的波浪。

[2] 作者原注：原指高原，即秦晋高原。

[3] 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红日和白雪互相映照，看去好像装饰艳丽的美女裹着白色外衣，格外娇媚。

[4] 竞折腰，折腰，倾倒，躬着腰侍候。这里是说争着为江山奔走操劳。

[5] 秦皇汉武，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秦朝的创业皇帝；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汉朝功业最盛的皇帝。

略输文采；[1]
唐宗宋祖，[2]
稍逊风骚。[3]
一代天骄[4]，
成吉思汗，[5]
只识弯弓射大雕。[6]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

[1] 略输文采，文采本指辞藻、才华。“略输文采”，是说秦皇汉武，武功甚盛，对比之下，文治方面的成就略有逊色。

[2] 唐宗宋祖，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朝的建立统一大业的皇帝；宋太祖赵匡胤（927—976），宋朝的创业皇帝。

[3] 稍逊风骚，意近“略输文采”。风骚，本指《诗经》里的《国风》和《楚辞》里的《离骚》，后来泛指文章辞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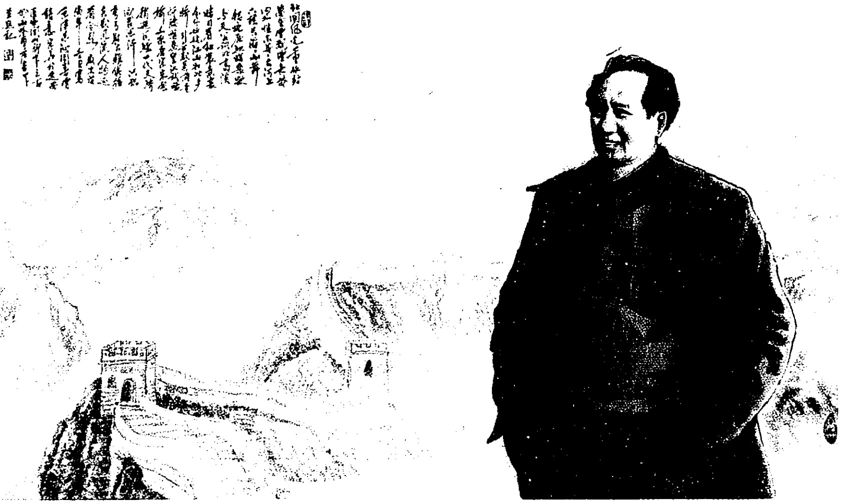
[4] 天骄，汉时匈奴自称为“天之骄子”（参见《汉书·匈奴传》），后以“天骄”泛称强盛的边地民族。

[5] 成吉思汗，元太祖铁木真（1162—1227）在1206年统一蒙古后的尊称，意思是“强者之汗”（汗是可汗的省称，即王）。后来蒙古在1271年改国号为元，成吉思汗被推尊为建立元朝的始祖。成吉思汗除占领中国黄河以北地区外，还曾向西远征，占领中亚和南俄，建立了庞大的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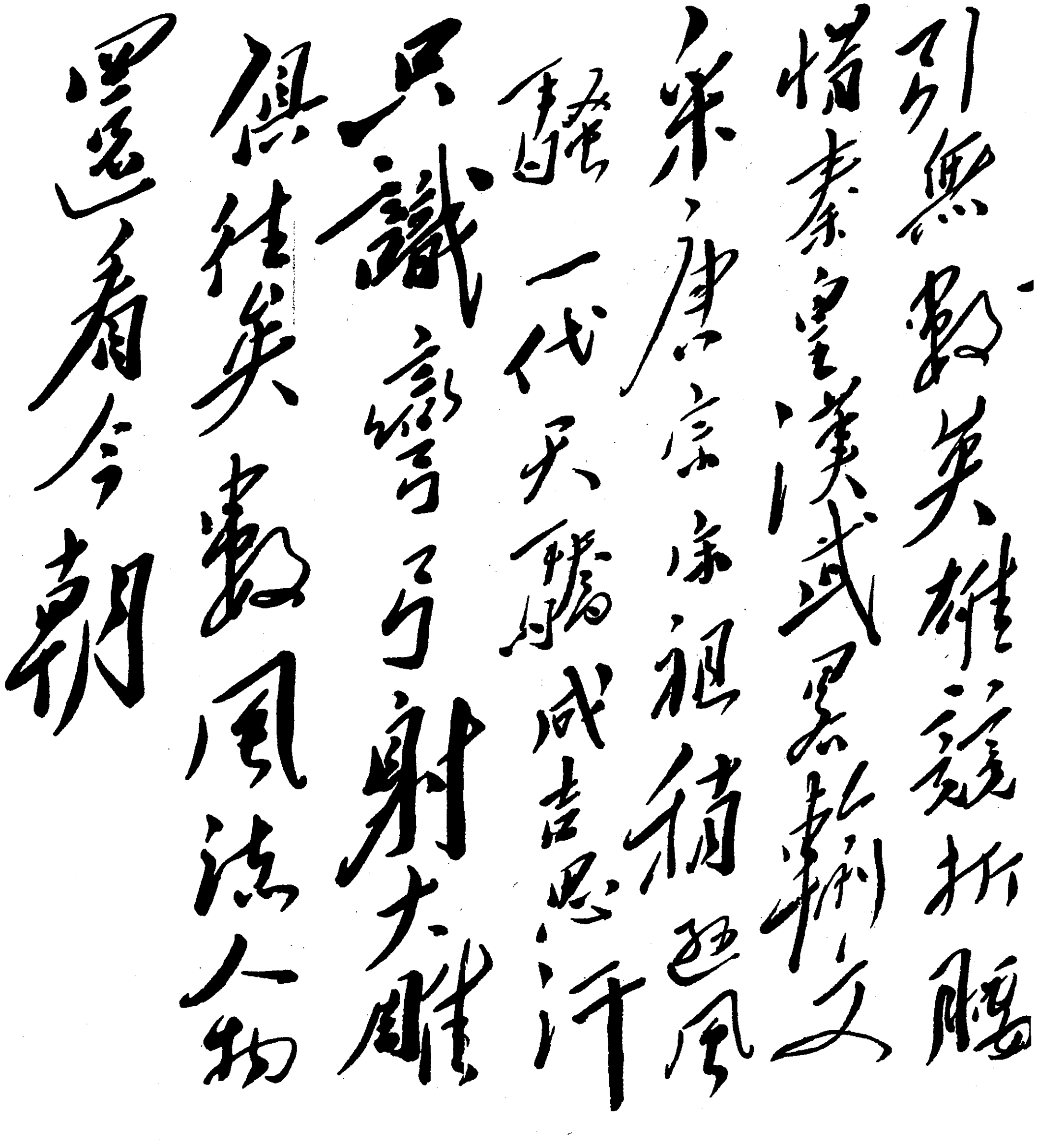
[6] 只识弯弓射大雕，雕，一种属于鹰类的大型猛禽，善飞难射，古代因用“射雕手”比喻高强的射手。“只识弯弓射大雕”，是说只以武功见长。

沁园春·雪 创作地
1936.2.22
山西·石楼·留村
毛泽东路居地
1936.2.22-2.23

毛泽东在石楼的路居地留村客栈。毛泽东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沁园春·雪》。



《雪》(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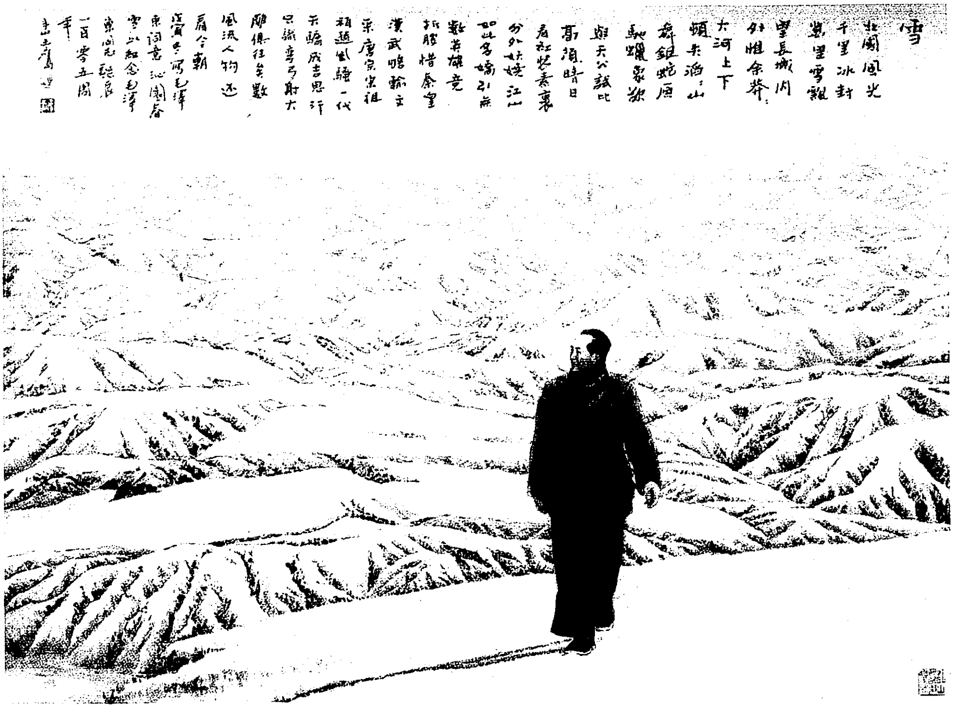


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惜秦皇漢武畧輸文
采唐宗宋祖稍遜風
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
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
還看今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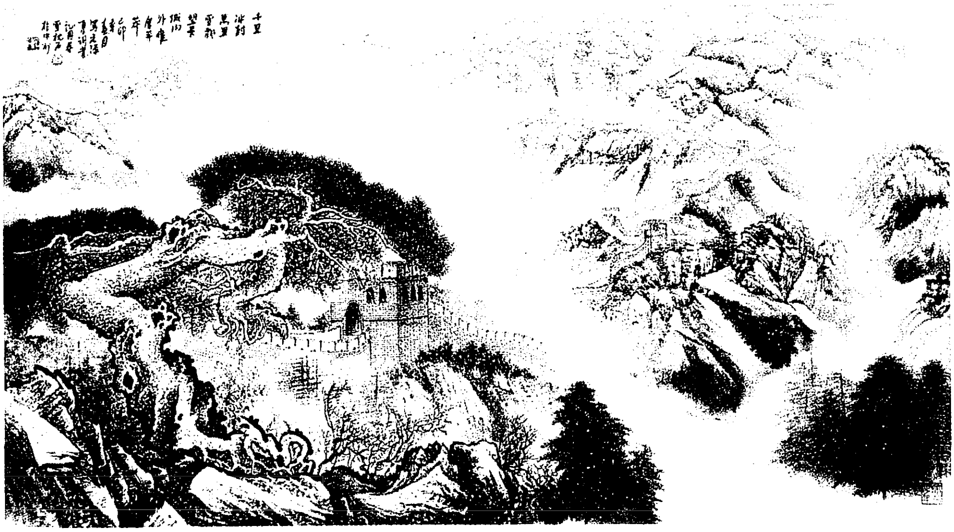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雪》。

沁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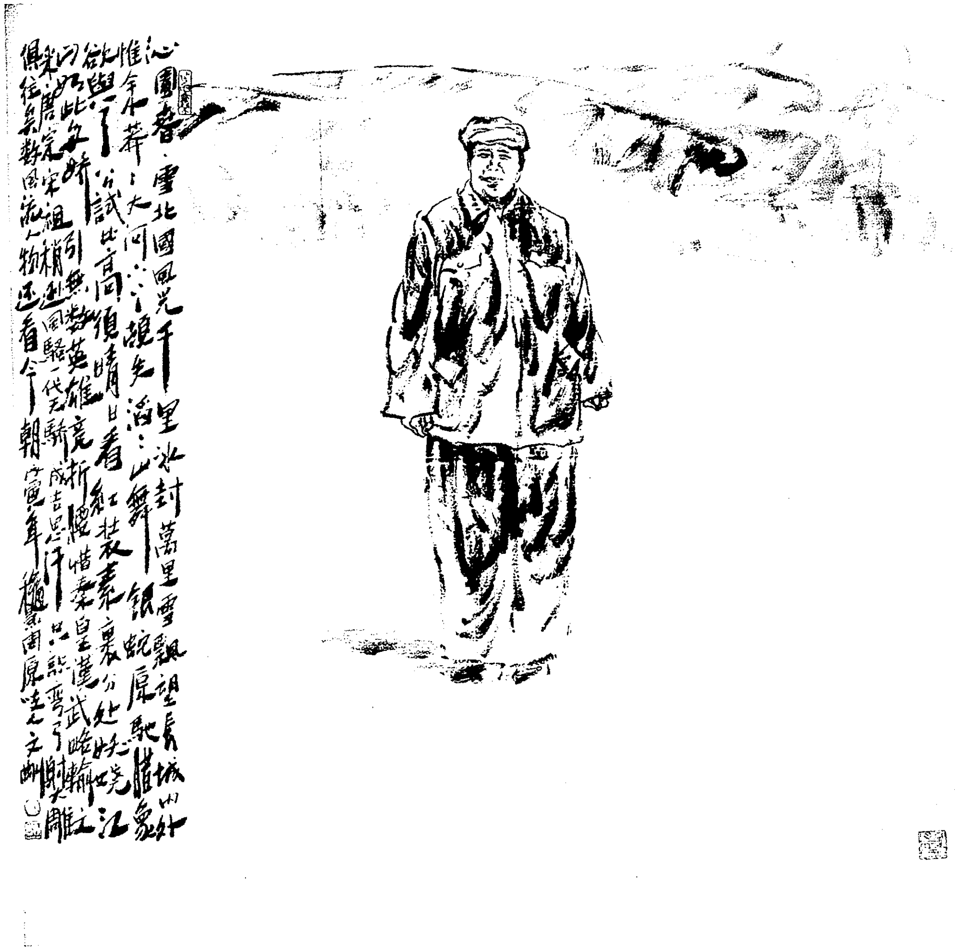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
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
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
舞銀蛇原驅臘象
欲與天公試比高須
晴日看紅裝素裹分
外妖嬈江山如此多嬌


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写毛泽东词意沁园春雪以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零五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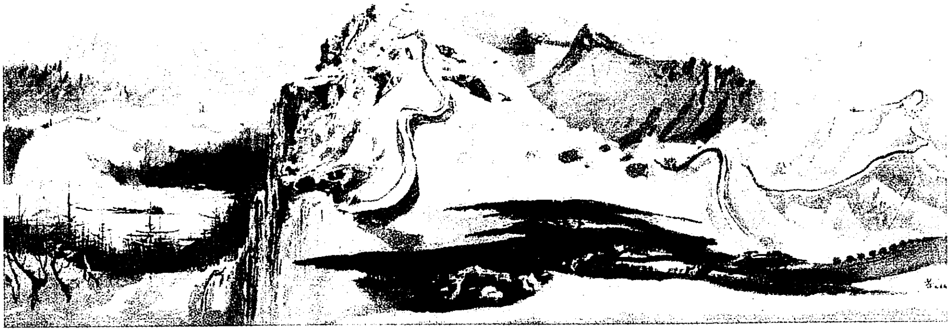
《雪》（诗意画）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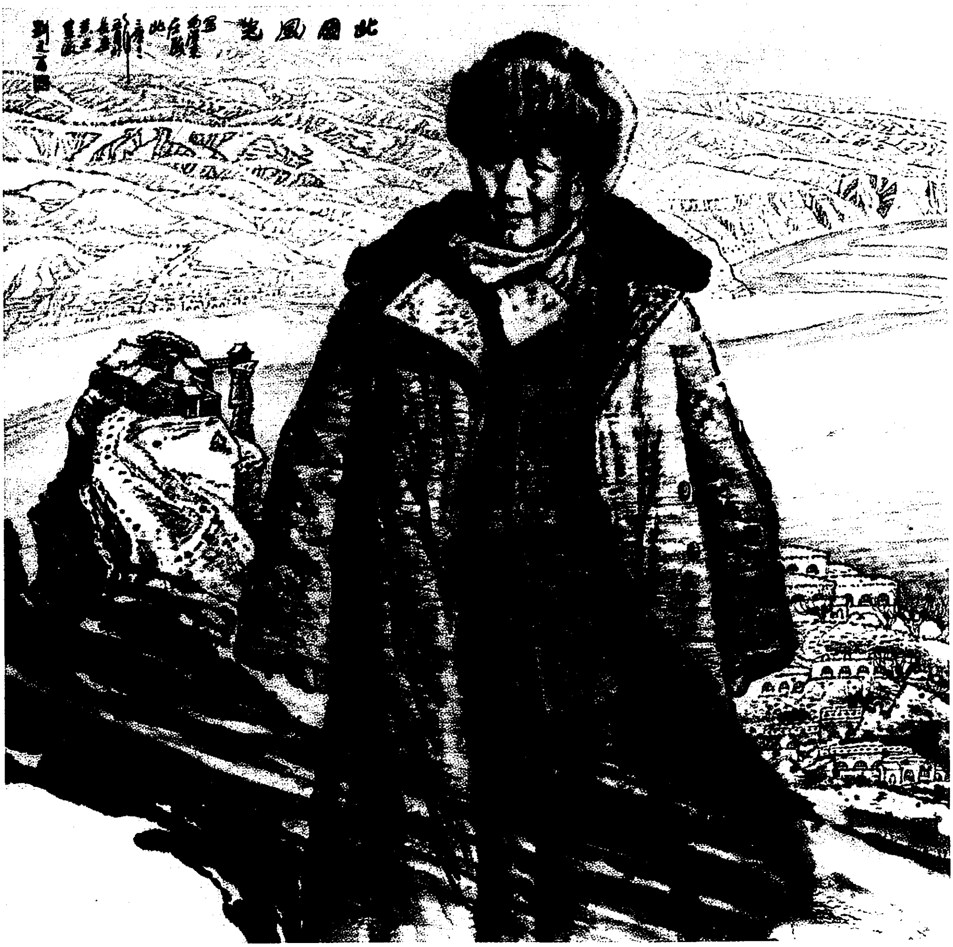
《雪》（诗意画）


沁園春·雪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
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
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江
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
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
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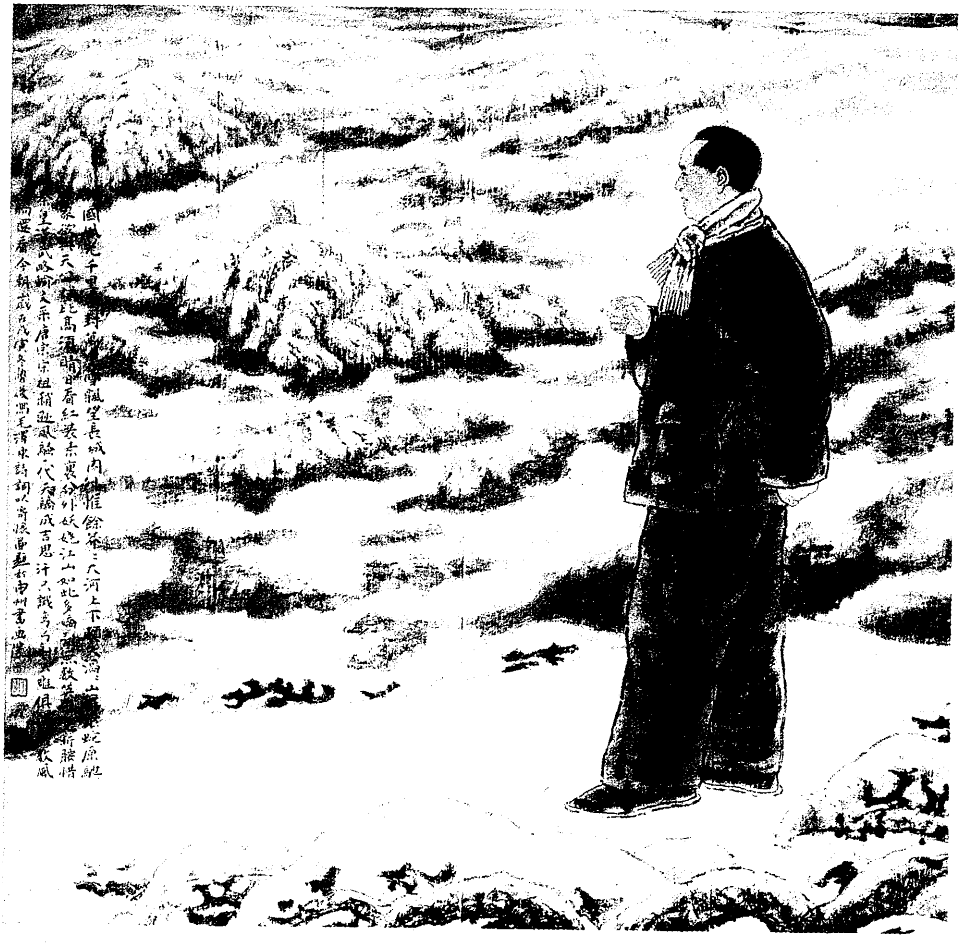
《雪》（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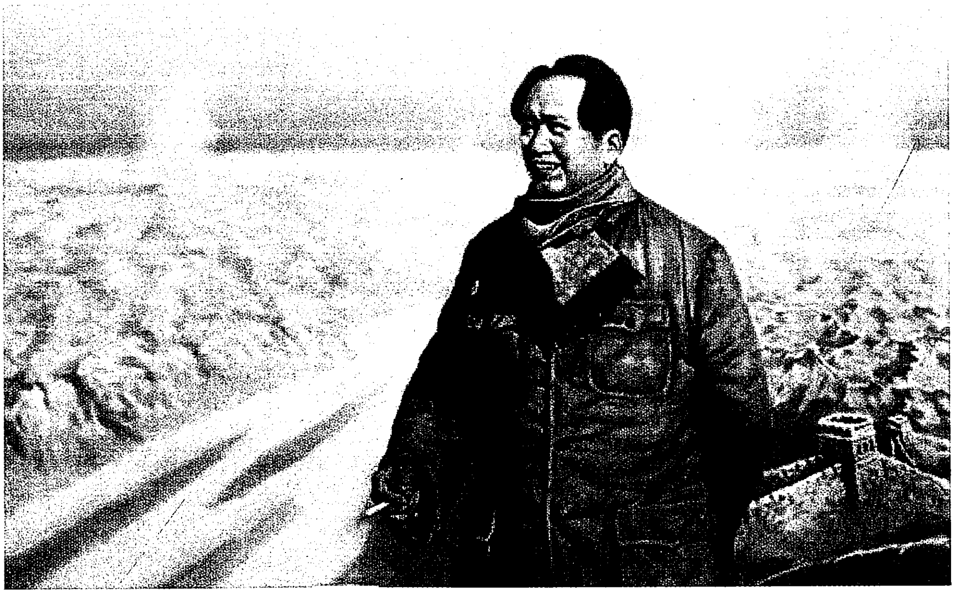
《北国风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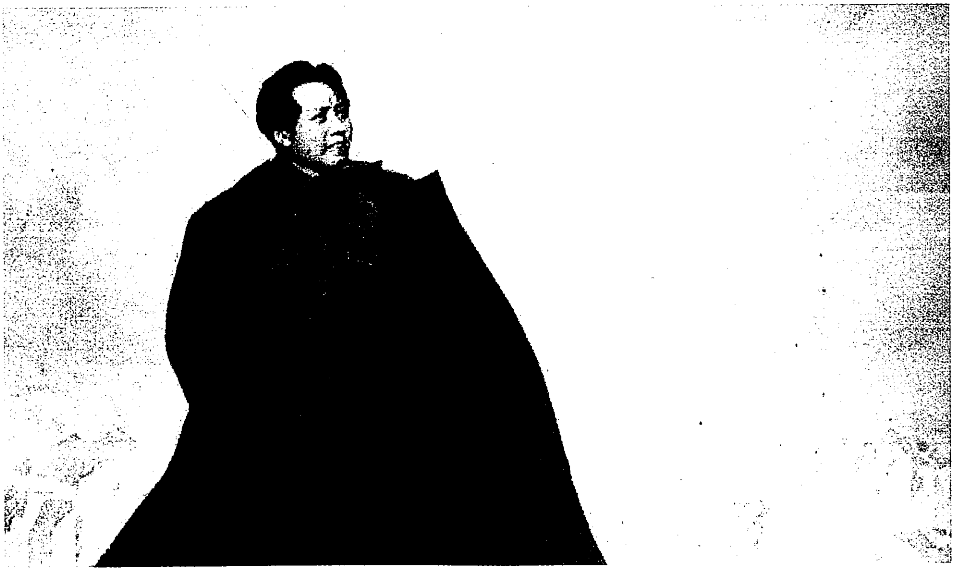
《北国风光》（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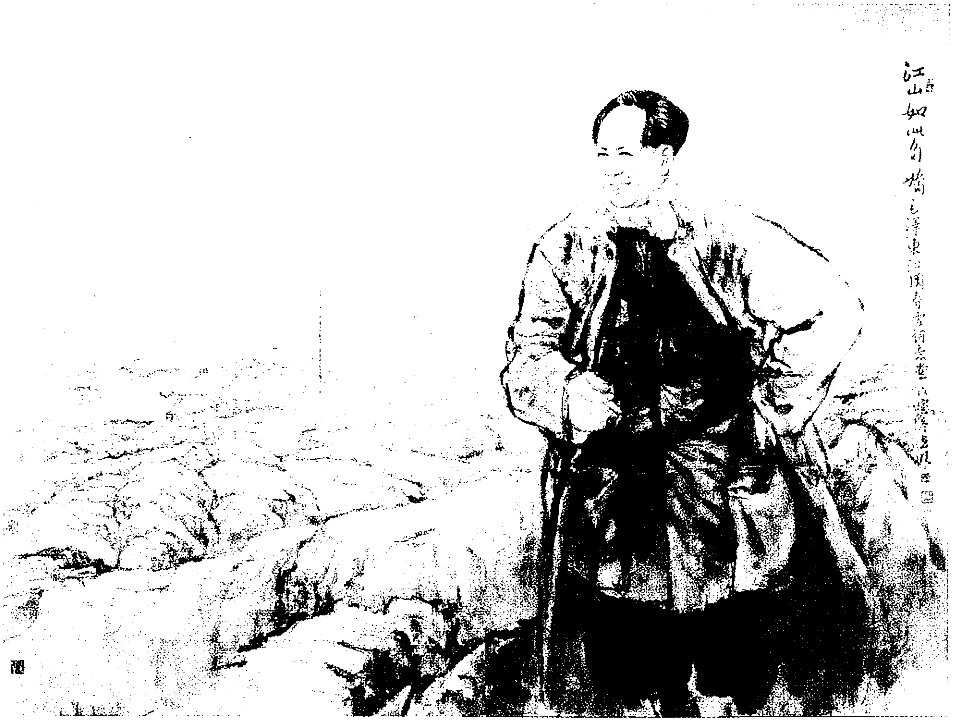
《北国风光》（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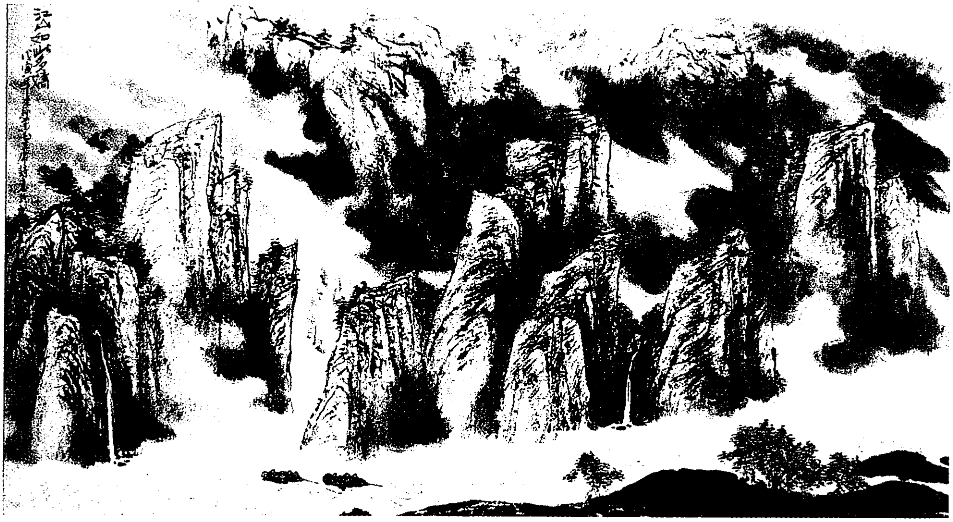
《北国风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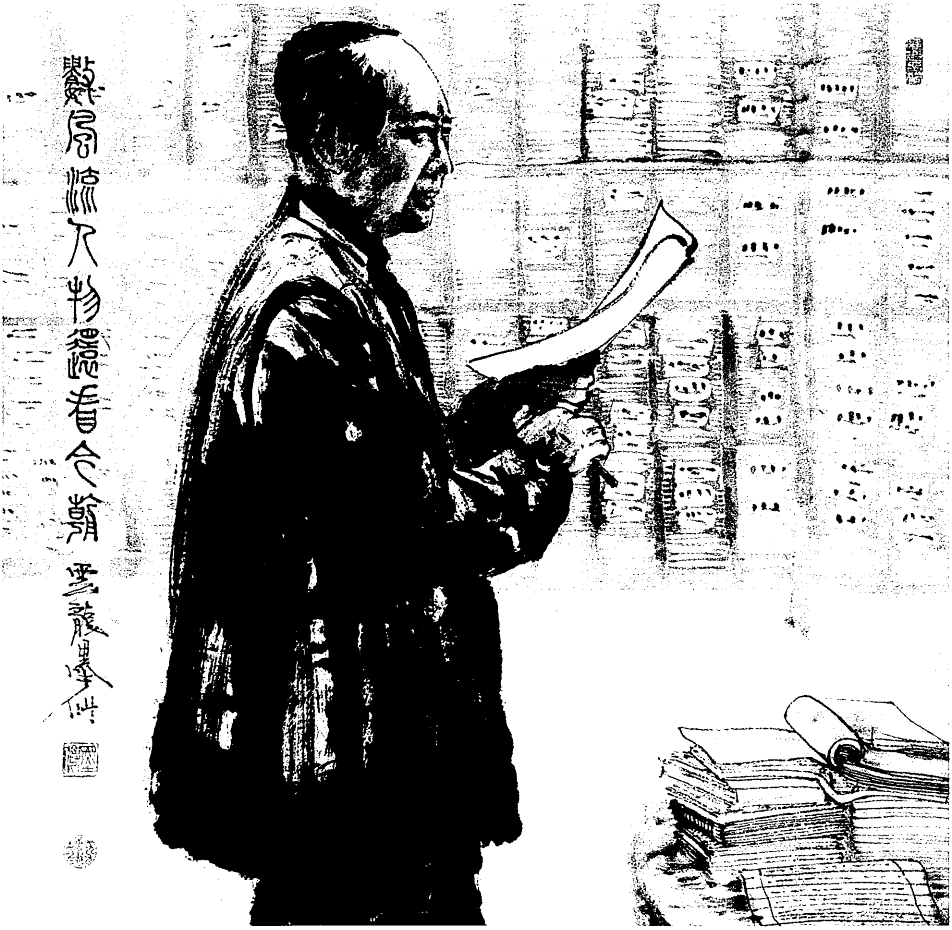
《北国风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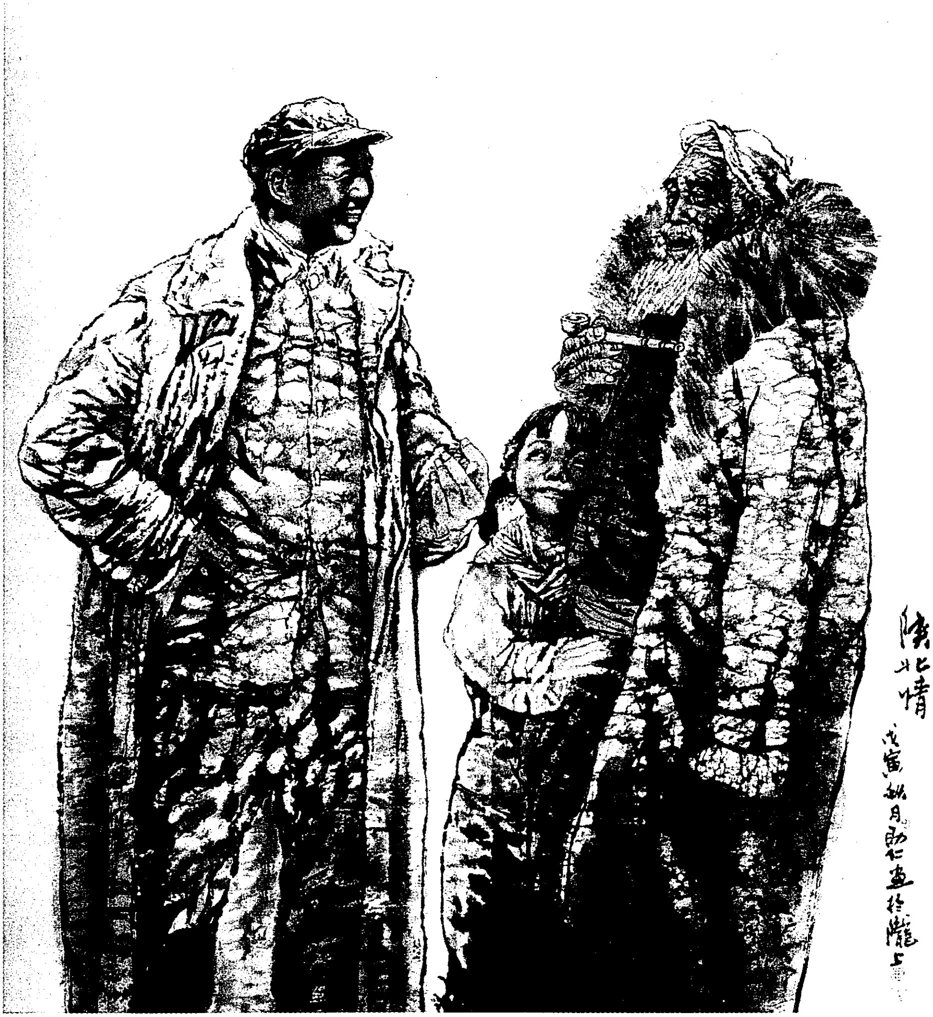
《江山如此多娇》（诗意画）



《江山如此多娇》（诗意画）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诗意画）


陕北情
戊寅秋月劭仁画于陇上

《陕北情》（诗意画）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1936年3月1日）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1]，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

---

[1]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国贼论罪。

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

特此布告。

总　司　令　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一切为着打第二个胜仗[1]

（1936年3月1日）

林、聂，徐、程各同志，并告周、博[2]两同志及二十八军首长：

甲、一军团与十五军团连日的胜利，特别是关上的胜利与水头[3]的占领，使红军取得了在山西创立根据地的初步自由。今后任务是确切粉碎新进攻与用切实工作创造根据地。

乙、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汾阳马路与汾水铁路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使阎锡山[4]对我们的进攻与防御陷入极大困难中。但此时不应估计阎锡山即时转入防御，他使用四个师至五个师在短期内向我们作坚决的进攻是没有疑义的。因此，一切为着打第二胜仗，是我们现时唯一正确的口号。

---

[1] 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以后，迅速扩大占领区域。红军第十五军团于1936年2月27日推进至隰县、孝义之间的水头、大麦郊地区。红军第一军团于2月26日占领中阳县的关上村。下一步行动是巩固已占领的区域，争取打第二个胜仗。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周，指周恩来。博，指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

[3] 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4]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丙、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我们夺取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五县交界这个在军事上有极大意义的地区，因为他把红军处在军渡、离石、汾阳、孝义、介休、灵石、汾西、隰县、永和这一广大弧线的中间，对于我们的作战与创造根据地给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丁、为巩固这一区域，争取打第二个胜仗，两军团主力应在以关上为中心与以水头为中心的地区，蓄养部队锐气，发动群众斗争，把英勇的红军与有利的地区结合起来，在不妨碍主力集结休息条件下，要用极大努力向着地方工作，把时间看做千金一刻。

戊、石楼全县及永和北部是我军后方联络线，由方面军直属队、抗日游击队及十五军团一部担任地方工作，加造船只，巩固渡河点。

已、吴佳神府[1]广大区域的恢复与占领，使红军战略后方增加了力量。南边讲和的策略使东北军成为革命的友军，亦已达到第一步成功。这些都是大有助于主力红军的。

庚、以上这指示转达于师、团首长及军、师之政治部主任。

彭德怀　毛泽东

三月一日

---

[1] 吴佳神府，指陕西吴堡、佳县、神木和府谷。

渡河以来战况与黄河以西的军事部署[1]

（1936年3月1日）

周副主席，刘、宋，并告博，迈，林、聂，徐、程[2]：

甲、吴佳神府[3]晋军五个步兵旅已完全东调，最后守备吴堡、宋家川[4]之方旅[5]，亦于今明两日撤至军渡[6]（吴堡恐只有民团）。神木还有一骑兵旅，估计亦有东调可能。

乙、我军在东岸消灭与击溃了阎敌五个团，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永和六县广大地区，占据了石中孝隰四县交界地区这个战略战役枢纽，巩固了作战的阵地，取得了创造根据地的初步自由，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完成了战略侦察，开始发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2] 刘、宋，指刘志丹、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博，指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迈，指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陕北省委工作。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3] 吴佳神府，指陕西吴堡、佳县、神木和府谷。

[4] 宋家川，镇名，为今陕西省吴堡县县治。

[5] 方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四纵队第七十一师第二〇六旅，旅长方克猷。

[6] 军渡，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部。

了广大群众。目前是争取打第二个胜仗。

丙、请副主席直接指挥二十八军及吴佳绥米[1]地方部队大举袭敌堡垒，扩大胜利。无定河以西部队还须多调向东岸，与神府红军连成一片，企图夺取一、二个城。

丁、沿河工作，暂由我们指挥杨立三[2]（河口[3]）、蔡树藩[4]（义牒镇[5]）二人，副主席请专任北面敌。

彭　毛

三月一日二十时

---

[1] 绥米，指陕西绥德和米脂。

[2] 杨立三，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兵站部部长。

[3] 河口，位于陕西省清涧县东部。

[4] 蔡树藩，当时任红军沿河游击队政治委员。

[5] 义牒镇，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关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的问题[1]

（1936年3月2日）

林、聂、朱，徐、程、郭，并致张云逸，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2]转告各地方武装首长：

关于改变待遇俘虏军官的政策，此次战斗中一团仍未能全部执行（四〇五团王营长大衣帽子被剥）。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

彭　毛　杨

三月二日二十一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等的电报。

[2] 张云逸，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刘志丹、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萧劲光，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关于向东北军传达我东征军捷信及与之合作抗日等问题致李克农电

（1936年3月3日）

李克农：

甲、我东征军自消灭阎敌五个团后，连日大举进攻。占领中阳、离石、汾阳、孝义、灵石、汾西、隰县、永和广大地区，前锋直迫汾阳城下，阎卖国贼措手无及，侵入陕北之卖国贼部队悉数溃退，将军渡船只焚毁。我左路军占领吴堡，乘胜向葭县、神木、府谷急进，请传达此捷信于张副司令、王军长。

乙、正约高福源兄来前方，商向河北一带爱国军人活动办法，王军长愿向宋哲元、韩复榘活动，甚为得计。国难日亟，孙科、冯玉祥、陈果夫、于右任、胡汉民辈均有联俄联共一致抗日之表示，蒋介石亦有不打红军、释放政治犯之口头传说，惟蒋系右派曾扩情等及政学系黄郛、王克敏等则主投降日本，破坏联俄联共。国民党内部正分化中，弟等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们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当今之世，惟有苏联是真正反侵略者、又真正有实力者。英国已采联俄政策，中国更应速决大计。

丙、请向王军长询问有无河北、热河、察哈尔、绥远四省十万分之一或其他军用图，如有要求赠送二、三份，为河北一带与日帝作战之准备。

丁、克农应在洛川再停一星期。

彭　毛
三号十一时

致博古电[1]

（1936年3月4日）

同意周继吾先回南京。兄偕高、张[2]二人来此开会。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彭德怀致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2] 高，指高福源。张，指张子华。

谈判联合抗日的三个基本条件[1]

（1936年3月4日）

博古同志，并周：

（甲）向彼方提出如下三个基本条件，作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先决条件：（一）停止进攻红军，并容许主力红军向河北集中，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二）政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

（乙）邓发、稼蔷能来石楼均请同来。

彭[2]已电王以哲[3]许高福源[4]来前方一行，商向晋冀鲁活动问题。

张　毛　彭

四日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彭德怀给博古（秦邦宪）并周恩来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说明我方应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三个作为谈判联合抗日具体步骤的先决条件。

[2] 指彭德怀。

[3] 当时任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

[4] 当时在东北军和红军中做联络员工作。

与南京当局谈判之意见[1]

（1936年3月4日）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

（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的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意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

（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意见：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丙）同意我兄即返回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张　毛　彭

四号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彭德怀给博古（秦邦宪）转周继吾（董健吾）的电报。

关于与王以哲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等问题致博古、罗迈等电

（1936年3月4日）

博古、罗迈、伯渠、云逸，并告恩来：

甲、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业已订立，关于通商者为红军往白区六十七军防地办货，六十七军任保护之责。为了暂时避免外人耳目，红军采办人员须穿便衣，六十七军往苏区办货者，红军任保护之责。

乙、关于此事处置如下；

一、即派钱之光去洛川找克农，我们即电克农再在洛川停一星期，候钱之光到，介绍于王以哲之军需处长，求其管〈关〉照帮忙，以弄好开始的关系。目前办货最急西药、布匹，请令钱一、二日内即动身去。

二、通知陕甘省委、省苏、军区，对富县、甘泉、立石、延安、洛川等地几县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招待。

丙、口头协定全文另告。

张　毛　彭

四号十九时

关于阎锡山进攻部署给各部队的指示[1]

（1936年3月4日）

林、聂，徐、程，并告刘志丹，萧劲光[2]：

甲、情况：一、据刘、萧报告，本日上午傅家塔之敌一营，向我土虎圪之警戒连进攻，战斗二小时，敌占土虎圪筑工，我警戒连撤万年包。二、二科报告：杨耀芳称一〇一师集中中阳一带，二三日内可到石楼，仍令石楼邢团固守待援。三、杨澄源军部，二日进驻隰县。四、据林、聂报：六十六师由风陵渡一带移至介休一带。乙、判断阎敌进攻部署业已完毕。其主力四个团，将由中阳、傅家塔、留誉镇向关上、暖泉镇之线前进，其辅助队三个团左右，将由隰县向水头或石楼进。另一部由介休、孝义之线进，其总攻时期，有在二三日内举行之势。丙、我军以待敌前进，弄清情况，然后迅速集中主力消灭其进攻部队一路或两路之目的，部署如下：一、红军第一军团、红军第十五军团各师，明（五）日各在原地不动，集结休息，派队游击，并于当日回至原地。二、红军第一军团继续侦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刘志丹，当时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萧劲光，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察中阳、汾阳、孝义情况，二师特别注意土虎圩、中阳城之敌。三、红军第十五军团在暖泉、干村之一个团，特别注意邢家岭、普善庄、留誉镇情况。在石口部队则侦察隰县情况。四、除进行驻地附近地方工作外，加紧部队的作战准备。

彭　毛

四日二十二时

致博古等电[1]

（1936年3月4日）

告之我军与王以哲军已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的口头协定，要求通知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对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与招待；另要钱之光前往洛川找李克农，采办药品、布匹等物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彭德怀致博古（秦邦宪）、李维汉、林伯渠、张云逸电的主要内容。

致曾希圣电[1]

（1936年3月4日）

二科工作在希[2]指导下，是表现了大成绩的。这一工作虽偏技术性质，但其意义与结果都是军事政治上一助力。前方的胜利你们是有劳绩的，望以此鼓励二科同志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曾希圣电的主要内容。

[2] 希，即曾希圣。

消灭关上之敌的部署[1]

（1936年3月5日）

林、聂，徐、程：

甲、关上以北之敌已进至土虎圩，川口之敌已进至上下李村。乙、着红军第十五军团全部本日集中水头待命，派小部队向上下李村游击。丙、着红军第一军团一、四两师，本日集中关上东端距关上二十里或三十里地区。二师主力集中关上附近，一部阻滞敌于万年包附近。丁、两军团均准备六号或九号回合消灭该敌。红军第十五军团不应向上下李村前进。

彭　毛

五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关于对南京代表提出的谈判条件致李克农转王以哲电

（1936年3月5日）

李克农转王以哲兄：

我方对南京代表提出五条如下：

（甲）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乙）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丙）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抗御日帝迈进。

（丁）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戊）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特达并望王以哲兄转达张学良先生。

弟　彭德怀　毛泽东

五日十二时

复李克农电[1]

（1936年3月5日）

本日两电[2]均悉，甚慰。

周、博[3]均来前方商事，十号可毕，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4]及驻西安常驻代表人选即可决定。

直接来石楼汇报谈判情况，并将书报直接带来。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复李克农电的主要内容。

[2] 李克农3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4日、5日同张学良在洛川会谈的情况。张学良提议，中共方面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负责人中推出一位与他在肤施再作一次商谈，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双方商定，红军和东北军代表经过新疆去苏联，由张学良负责同盛世才交涉；中共选派一位色彩不浓而能负相当责任者常驻西安。

[3]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

[4] 友邦，指苏联。

消灭中阳一带敌军的部署[1]

（1936年3月5日）

林、聂，徐、程：

甲、阎[2]敌东面三路已明，北面当亦有三路，南面将是两路，八路估计共有十六个团，至多二十个团。

乙、我军应以关上、水头[3]为枢纽，背靠石楼，集中两军团最大主力，以连续战斗，消灭其东面之两路或三路为基本作战方针。如南面之敌迫近水头，亦可从南面打起，依明日情况决定。

丙、我以准备七日作战之目的，明（六）日部署：

1. 一军团一、四两师在关上东端约二十里地区集中，一部保持与兑九峪[4]、高阳两路之敌接触，二师主力控制关上、车鸣峪间，向中阳阻敌。一军团七日作战准备任正面。

2. 十五军团以七十五师两个团，明日位于水头东面三十里通大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关上，村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4] 兑九峪，今名兑镇，位于山西省孝义县西部。

麦郊路上，七十八师、八十一师集中水头，而于石口置一游击队。七号作战，十五军团准备从右翼打去。

3. 我们率二十三分队明日到水头与徐程见面。一军团地图应送水头不误。徐程明日在水头不得移动。

彭　毛

三月五日二十四时

我方与东北军王以哲部订立口头协定的通报[1]

（1936年3月5日）

林、聂、朱，徐、程、郭，刘、宋，阎、蔡，罗迈，云逸，洪涛，理治，劲光[2]诸同志：

甲、关于我方与东北军整个协定尚在磋商，现先与六十七军王

---

[1]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周恩来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重点做东北军的工作。次年1月，与毛泽东、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接着就与东北军将领进行谈判。当时，因张学良不同意讨蒋，中共中央采取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的策略，与东北军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洛甫（张闻天）等发给林彪、聂荣臻、朱瑞等红军将领的通报。

[2] 林、聂、朱，指林彪、聂荣臻、朱瑞，当时分别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徐、程、郭，指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当时分别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刘、宋，指刘志丹、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管陕北省委工作。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西北军委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洪涛，即郭洪涛，当时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理治，即朱理治，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兼红二十九军政治委员。劲光，即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一方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军长以哲所部订立如下之局部的口头协定，并于三月五日开始执行。

一、为巩固红军与六十七军一致对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六十七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四、恢复红白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富县等地，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六十七军入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饰外人耳目计，红军出白区办货可着便衣。

乙、两省苏、省委[1]及军区，应将本协定各项之意旨，向延安、甘泉、富县等靠近六十七军防地附近及交通路上之县、区、乡党部、政府、民众团体、红军游击队、赤少队解说明白，并遵照执行，给予六十七军以粮柴之便利。对六十七军人员通过马路者表示好意与欢迎，入苏区办货者加以保护，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订立抗日讨卖国贼协定之目的。说明方法，应口头传达，不得出布告，因为此种协定对于蒋介石还要保守秘密。特达。

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彭德怀　博古

三月五日

---

[1] 两省苏、省委，指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

各个击破向大麦郊推进之敌[1]

（1936年3月6日）

林、聂，徐、程：

一、汾西、隰县、永和方向似无进攻大麦郊[2]敌，主力仍是东、北面之李生达孙楚[3]两部，其方法是分路推进，不是冒进。

二、我军以待机各个击破、集中主力、连续战斗、先打东面、再打北面、击其侧后包围消灭之战法，本日两军团均须集结休息不应作战。

三、一军团伤兵速移界元里一带。

四、望林聂以作战意见送水头[4]。

彭　毛

六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大麦郊，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部。

[3] 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七十二师师长。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一〇一师师长。

[4] 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消灭兑九峪之敌的部署[1]

（1936年3月6日）

林、聂：

一、十五军团七十五师由海东[2]率领，明拂晓出发，先头十二时可到大麦郊[3]。

二、兑九峪[4]之敌明日如不动，则一军团在原地、十五军团在大麦郊宿营，后天（八号）攻击兑九峪。

三、兑九峪之敌明天如不向大麦郊，而向一军团位置前进，则一军团向后撤退二十里宿营，十五军团在大麦郊宿营。八号攻击。

四、敌明天如进至兑九峪与大麦郊中间地区停止宿营，则一军团在原地、十五军团在大麦郊宿营。八号攻击。

五、敌明天如向大麦郊前进，则一军团应候敌完全通过后，从敌右侧后攻击，十五军团以一部正面遭遇，主力从敌右侧攻击而消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1936年3月初，阎锡山一面请求蒋介石派军队支援，一面将自己的机动部队编为4个纵队，向红军东征部队发起第一次反击。3月10日，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向兑九峪发起进攻，击溃了晋军的第二、第三两个纵队。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2] 海东，即徐海东，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3] 大麦郊，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部。

[4] 兑九峪，今名兑镇，位于山西省孝义县西部。

灭之。

六、以上四种情况，只有敌向大麦郊攻击，我军方与之作战，否则均在后天作战。

七、二师仍在关上以北钳制孙楚[1]，十五军团一个营在石口以南钳制梁旅[2]。

八、我们随七十八师及八十一师明日七时从水头[3]出发，十四时可到大麦郊。

彭　毛

六日二十时半

---

[1] 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一〇一师师长。

[2] 梁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一纵队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三旅，旅长梁鉴堂。

[3] 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包围消灭之[1]

（1936年3月6日）

林、聂：

为准备打一仗后，又打第二仗，又打第三仗，必须以主力一部抄敌后路，把敌包围消灭，免去追击。必须免去追击，才能当日集合队伍于一处，才便于打第二仗，才便于应付意外变化。敌人战斗力虽弱，但主力数不少，我们应该集结部队好好的打。

彭　毛

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致萧劲光、朱理治电[1]

（1936年3月10日）

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我们已同意。无论王以哲是否好意，你们应执行前电不得对王部攻击。王即增兵一团到甘泉，对于我们亦无大妨碍。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红军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和政治委员朱理治电的主要内容。

第四团应迟滞敌向水头进攻[1]

（1936年3月10日）

李、邓：

甲、敌六十六师昨（九）日进占离大麦郊十五里处，李生达[2]部主力本日有向郭家掌[3]攻击可能。

乙、两个军团主力本日有消灭敌左路之任务。

丙、第四团仍应钳制进入关上之敌，迟滞敌向水头进攻企图。部署如下：

（一）背靠凤尾村[4]，掩护该地伤兵，主力控制大道要隘，取运动防御。

（二）派小部队向敌两侧翼袭击，并告以集合地点。

彭　毛

三月十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副师长李天佑、政治部主任邓华的电报。

[2] 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七十二师师长。

[3] 郭家掌，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部。

[4] 凤尾村，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

打破敌军进攻争取创造山西苏区[1]

（1936年3月11日）

林、聂，徐、程：

甲、敌三、二纵队杨李李三师[2]昨日被我击溃，向兑九峪[3]方面退走。

乙、我军有以主力乘胜东进，致迫太原，彻底打破阎敌总进攻部署，扩大战略上的战果，扩大宣传，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夺取民众，争取创造苏区有利条件之任务。

丙、部署如此：

一、一军团以一、四两师及直属队一部由林率领，附十七分队，十五军团以七十五师（缺一团）由徐率领，两军团统归林指挥，明（十二）日进至南北马庄，十三日占领汾县[4]西端马路待命。

二、一军团以二师及直属队之一部由聂率领，控制于中阳城、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杨李李三师，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纵队第六十六师、第三纵队第六十八师和第七十二师，师长分别为杨效欧、李服膺和李生达。

[3] 兑九峪，今名兑镇，位于山西省孝义县西部。

[4] 原文如此，似应为汾阳。

兑九峪、水头[1]之三角地区内，迫退孙纵队[2]，巩固与赤化此地区。

三、十五军团以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及直属队控制于水头、大麦郊[3]以南地区，由程率领，以主力直迫隰县，引退杨纵队[4]，赤化此地区。

四、七十五师之一个团包围石楼城，方面军直属队担任石楼赤化任务不变。

五、我们在大麦郊指挥。

彭　毛

三月十一日十二时

---

[1] 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2] 孙纵队，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孙楚。

[3] 大麦郊，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部。

[4] 杨纵队，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一纵队，纵队司令杨澄源。

稳固山西抗日根基[1]

（1936年3月12日）

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红军要迅速东进，奔赴抗日前线，坚决消灭一切阻拦前进的反动分子，同时要猛烈地扩大红军，扩大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让抗日种子在山西扎根。

---

[1] 193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郭家掌主持召开红一和红十五军团领导干部会议，并作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这是报告的一部。

关于周恩来为我方代表与张学良会谈问题致王以哲电

（1936年3月16日）

王以哲兄勋鉴：

甲、敝中央已决定派周恩来同志为全权负责代表到肤施与张学良先生晤面，共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根本大计。现张学良先生既抱清恙、周同志当可缓日成行，晤面时间可定在本月杪〈杪〉，究在月杪〈杪〉何日，由张学良先生确定电告。周同志俟得电复即启程赴肤施。惟请兄处严守秘密，此节即祈转达张学良先生。

乙、李克农本日回到石楼，得悉吾兄及张学良先生对于抗日救国有进一步之计划，甚以为慰。并承惠赠图书感纫无既。特此奉复。

彭德怀　毛泽东

十六日二十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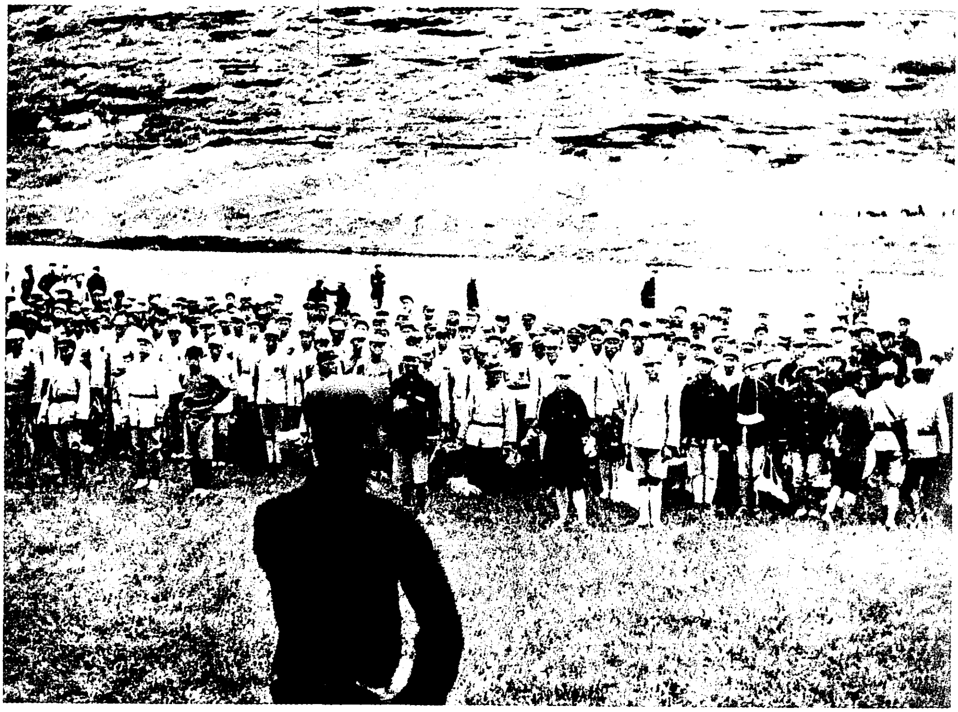
给红军的作战命令[1]

（1936年3月17日）

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沿汾河和同蒲铁路继续南下，相机夺回赵城、洪洞、临汾，并向曲沃、闻喜、运城前进。红十五军团主力乘虚北上，相机占领文水、交城及其附近地区，威胁太原，尔后继续北进，占领静乐、岚县、苛岚等县，创造晋西北游击根据地，并与陕西省的神府根据地打通联系。此外，红十五军团一个团又一个营、方面军直属队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不到一千人）、山西游击队等部队，在军委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下，担任钳制反击之敌，继续包围石楼，控制黄河渡口，维护后方交通任务。

---

[1] 1936年3月，阎锡山为夺回晋西被占地区，令其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毛泽东、彭德怀乘太原和晋南、晋西北的防守兵力比较空虚之机，发出了这个作战命令。



1936年，毛泽东给红军指战员作报告。

十五军团乘虚北进相机袭取介休等地[1]

（1936年3月17日）

徐、程，并告林、聂：

甲、敌二、三纵队本日一部进占郭家掌，主力仍进至兑九峪[2]、郭家掌之间。敌第四纵队主力至车鸣峪、中阳城，一部至暖泉，有救援石楼模样。我一军团本日进占霍县地域。

乙、十五军团（缺八十一师）有乘虚北进，破坏敌后方，动摇敌人兵心，扩大我宣传之任务。明（十八）日主力进至北师屯、南师屯[3]，一部渡河相机袭取介休城，如介休得手，则进到介休宿营，准备十九日向平遥前进，相机袭取之。如介休不得手，则明日全部在南、北师屯宿营，十九日以前出发到介休、孝义之间，经大庄村[4]、演武镇[5]进到汾水之间尽善村，并以一部相机占领文水城[6]。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并告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兑九峪，今名兑镇，位于山西省孝义县西部。

[3] 北师屯、南师屯，即师屯北、师屯南，均为村名，位于山西省介休县西部。

[4] 大庄村，疑为东大王村，位于山西省汾阳市东南。

[5] 演武镇，位于山西省汾阳市东南。

[6] 文水城，即文水县，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东部。

丙、随时集结兵力准备消灭敌骑兵。

丁、注意宣传发动群众，不得破坏商店学校。

彭　毛

三月十七日二十时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36年3月19日）

林、聂：

甲、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前两日是全线向西进攻，昨日已全线停止。估计今日或明日才能有新部署。乙、红军第十五军团昨日在介休南十里之义棠镇消灭商震之一四一师一个连，该师（三团）有全部到介休讯，本日红军第十五军团北向袭取文水。丙、你们尽可能占领一二个县城，并彻底破坏铁路、电线。

彭　毛

十九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一军团十五军团应扩大占领区域[1]

（1936年3月20日）

林、聂，徐、程：

甲、晋敌新部署尚在迟疑未决中，我一军团在南面，十五军团在北面，应利用此时间扩大占领区域，扩大进攻声势，扩大政治宣传，破坏统治基础，加紧争取民众当红军，尽可能占领几个县城。

乙、林聂注意对杨澄源[2]六十九师之侦察警戒，徐程注意对商震[3]部及敌骑兵之侦察。

彭　毛

三月二十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杨澄源，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一纵队司令兼第六十九师师长。

[3] 商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

关于阎锡山拦阻抗日红军及与东北军共同维护抗日后方等问题致张学良及东北军全体官兵电

（1936年3月20日）

王以哲兄转张学良先生及抗日东北军全体官兵同志均鉴：

卖国贼阎锡山勾结日帝侵略华北，危及晋绥，复受日帝指挥，派兵六旅之众，屠杀陕北苏区民众。国人痛愤，罪不容诛。敝军鉴于日帝之迈进华北之急，特遣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抵抗暴日。阎锡山竟为暴日效命，集中全力拦阻红军，连日迭接前方楼〈数〉电，因红军战士之用命，晋军士兵与山西人民之同情，先后消灭与击溃杨跃芳、李生达、杨澄源、杨效欧各部共十九团之众，前锋已达文水、交城、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之线，占领同蒲铁路与汾阳汽车路。敝军迭次宣言，全国红军白军亟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阎锡山置若罔闻，不顾民族国家之存亡，甘心依附仇人而与同胞为敌，诚不识是何居心？诸公深明大义，抗日救国早具同心，应请仗义执言，责阎锡山以判〈叛〉国之罪，劝其即刻悔悟，撤其拦阻红军之兵，开赴张家口，与红军一同执行抗日任务。敝军本民族大义，决不追究其既往。若其甘心卖国，继续执行日本拦阻队之任务，则我军为贯彻抗日目的计，不得不首先诛此卖国

贼。至于陕甘苏区（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为抗日战争之后方，坚决巩固此后方，使我抗日将士安心杀敌，应不独红军与全苏区抗日人民之责，诸公近在接壤，自亦具有爱护维持之心。倘有捣乱此抗日后方者（例如毛炳文辈），愿诸公与敝军联合制止之。特此奉达，诸祈明鉴。

弟　彭德怀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晨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3月21日）

林、聂，徐、程：

甲、敌对红军第一军团，除令关[2]师及黄[3]师一旅共六团兵力对付外，尚无整个部署。对红军第十五军团系用商[4]军五个团缺一营及傅[5]旅两团共七团缺一营，布于介休、平遥、徐沟，主力在平遥。一面防我破坏铁路，同时准备向文水、交城侧击，此外尚无布置。乙、如城高难下，不必强攻，以扩大宣传、扩大红军为第一。

彭　毛

二十一日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关，即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十五师师长。

[3] 黄，即黄杰。

[4] 商，即商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

[5] 傅，即傅存怀，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左路副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独立第三旅旅长。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36年3月22日）

林、聂：

甲、敌第四纵队进至凤尾村附近，第三纵队在兑九峪附近未动。第二纵队进至大麦郊，第一纵队进至石口、隰县间之上下李村。以上四个纵队，企图占领水头、石口、双池三点。关麟征有派两团与二杨会攻双池讯。乙、关麟征派一团向南关王村附近，占领阵地，截击由双池向南关王村之红军。丙、风陵渡有一团，运城有一营，另有一团由罗旅长率领向汾阳进。丁、根据以上情况，你们可在霍县、赵城、洪洞、汾阳、曲沃广大区域，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能达千人目的即是大胜利。

彭　毛

二十二日十一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36年3月22日）

林、聂：

甲、本日十七时电悉部署及工作计划均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乙、注意搜缴民团枪支，武装游击队，霍、赵、洪、临四县东西均山地，可能造成部分苏区。丙、注意建立党支部。丁、你们是否得有大批新报纸，如有，我们即派人来取。戊、你们的部署与工作计划及工作成绩，望同时告知徐程，以备参考。徐程现仍在汾阳、太原之间洪洞。

彭　毛

三月二十二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十五军团在晋西北创造根据地的行动方针[1]

（1936年3月22日）

徐、程，并告林、聂：

行动方针训令：

甲、十五军团有在晋西北创造苏区根据地，并配合在神府[2]行动之二十八军，控制黄河一段，打通与陕北联系的任务。

乙、行动区域，是以苛岚、岚县为中心之各县，包括交城、静乐、宁武、五寨、河曲、保德、兴县、临县、方山各县苏区之创造，则着重苛岚、岚县、兴县、临县。

丙、在此区域内，消灭地主武装，消灭北上小于自己之敌军部队，尽最大可能，用一切努力夺取一二个县城于我手中。

丁、广泛的扩大宣传，分发财物，发动广大群众，直至普遍建立游击队，建立政权，分配土地。

戊、猛烈扩大红军，争取在一个月扩大一千五百人。

己、行动与工作时间不限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并告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庚、万一电报不通，仍在指定地域活动，我们当令宋时轮[1]率七分队找你们，但目前时期宋时轮及其部队仍在水头为中心之地区，吸引敌人，进行工作。

彭　毛

三月二十二日十四时

---

[1] 宋时轮，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此时奉第一方面军首长命令，率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1个营和第八十一师1个营，在水头、关上等地，钳制晋绥军主力对红军的第二次反攻。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3月23日至27日）

一

中央十二月决议[2]符合共产国际“七大”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现在世界已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其特点是革命一天天向上，反革命一天天向下。中国共产党处在战争中，要把革命与民族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

---

[1]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山西省晋西地区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本篇一是3月23日毛泽东在隰县石口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3月24日毛泽东在石楼城西南端四江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3月25日毛泽东在四江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四是3月27日毛泽东在石楼县城附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

[2] 指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

二

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1]、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三

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必须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实行以多胜少，力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

---

[1] 苏维埃，这里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力量。

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四

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1]，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李克农的外交训令，今天仍然适用。对张学良的策略是：（1）蒋、张分开；（2）互不侵犯；（3）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4）不破裂，求得实

---

[1] 指1936年3月4日中共中央请周继吾向南京当局提出的进行谈判的五条意见。

际利益；（5）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6）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7）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

创造河东战场及加强要道工作[1]

（1936年3月25日）

叶、李：

甲、猛烈扩大红军，创造河东战场，即或遇着某些困难，必须坚决地克服之。你们应首先以赤化石楼全县为中心，及永和、隰县以北，中阳、柳林以南。

乙、特别要加强下述要道工作：一、石楼到水头[2]。二、石楼到石口镇[3]。三、石楼到隰县。四、石楼到永和。五、石楼到坪底、留誉[4]。以上五条道路，充分地发动群众，加强游击工作和干部领导，准备石楼敌人深入后造成对敌群众封锁，断绝敌人一切供给，以群众力量和坚壁清野来疲困敌人。

丙、破坏白军的标语传单，首先布置上述要道。

丁、如何具体布置，望送报来四江村。

彭　毛

二十五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兼中路军总指挥叶剑英、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电报。

[2] 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3] 石口镇，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部。

[4] 坪底，位于山西省石楼县北部。留誉，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南部。

第一军团的行动方针[1]

（1936年3月25日）

林、聂：

一、为普遍摧毁反动基础，为普遍发动民众，为破坏千里黄河堡垒线与主要铁路线，先锋军（右路军）今后行动方针如下：

甲、在现地区尽可能长久打，第一网分兵翼城、绛县，小部包围沁水，示欲东向。

乙、第二网打在汾城[2]、新绛、稷山、河津、乡宁五县，任务扩红，一部在临汾、襄陵吸引敌人南向。

丙、第三网转至永和、大宁、吉县、隰县、蒲县，任务第一破坏黄河堡垒，第二扩红。

丁、第四网突然打向介休、平遥、祁县、太谷，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1936年3月10日兑九峪战斗后，毛泽东、彭德怀决定避敌主力，分兵作战，遂以红军第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为右路军，向霍县以南发展；以第十五军团（缺第八十一师）为左路军，向灵石以北发展；以第十五军团第二二四团、第八十一师1个营、第三十军和山西游击队等组成中路军，在石楼、中阳一带钳制敌人主力。

[2] 汾城，以及下文中的襄陵，均为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省襄汾县。

戊、第五步占领正太铁路[1]，任务第一毁路，第二扩红。

己、尔后或出河北，或出长治、晋城，依情况决定。

二、十五军团（左路）在此时期在晋西北转动，包括破坏黄河北段敌堡垒线，与神府[2]苏区打通。

三、我石楼一带部队（中路军）在此时期吸引敌第一纵队不使南下。

四、你们的行动依此总方针，如敌情不许可则临时改变。

彭　毛

二十五日二十时于石楼附近

---

[1] 正太铁路，指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2]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致任弼时等电[1]

（1936年3月26日）

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秦邦宪）致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政治军事等问题的通报[1]

（1936年3月28日）

林、聂，徐、程，并告朱、郭：

甲、中央政治局会议完毕，完满地讨论了政治、军事、外交三问题。到会同志对于方面军各兵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英勇作战及扩红伟大胜利，深致慰劳与庆祝之意。

乙、关于政治问题，分析了华北时局，决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

丙、关于军事问题，批准军委的提议：

1. 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2]三省境内作战役的跳跃是许可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的电报。1936年3月20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地区举行扩大会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讨论政治、军事和开展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确定了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和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2. 决定了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

3. 十月革命节前扩大红军三万六千人，前方担任三万，争取超过。

4. 四个月内完成三个军九个师二十七个团的编制，每团七百五十人。

5. 地方红军，三个月内完成四个军，每军一千五百人。

6. 陕甘及华北五省发展游击战争。

7. 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军事水平，保证红军战争中优秀的与坚强的领导。

8. 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统一与团结。

彭　毛

二十八日一时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3月29日）

林、聂，徐、程，并告罗迈、张云逸：

甲、我二二四团两营昨（二十八日）在石楼、义牒之间抗战一天，敌以我集中兵力谋反攻，令其第四纵队，冯、陶三个旅，第一纵队刘旅集中炮火会攻义牒。其第一纵队已任任务，另一旅一团在石楼城南，一团在石口。乙、我炮兵营及后方笨重对象安全渡过河口，叶参谋长率二二四团本日来永和北部，放弃义牒及沿河渡口，让其达到所谓封锁黄河之妙计。丙、我红军第一军团、红军第十五军团须依前令，分别以迅速行动扫除南北段黄河封锁线，使敌得了数十里，而失掉数百里。

彭　毛

二十九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等的电报。

致徐海东、程子华等电[1]

（1936年3月29日）

红十五军团即到兴县县城附近，速与红二十八军配合破坏黑峪口、罗峪口一段封锁线，同时以一部拒止东边敌人，然后寻机配合红二十八军消灭敌之一部，才能停止敌人尾追，开展我们自己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并告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电的主要内容。

为反对蒋介石阻拦一致联合抗日致全国同胞抗日士兵书

（1936年3月29日）

全国工农们、学生们、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义勇军战士们以及革命的武装官兵们、爱国的民众们均鉴：

自冀东自治、张北独立、冀察政委会成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宋（哲元）、阎（锡山）、殷（汝耕）等逆，奴顾〈颜〉婢膝，卖国成性，惨杀爱国同胞，献媚于日本帝国主义，全国沦亡迫在眉睫。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为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红军愿争先驱，要求全国红军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军迈进。无如最大卖国贼蒋介石，丧心病狂，不顾民族存亡，甘为日本帝国主义奴隶，不允许红军抗日要求，竟以六七师之兵力入晋，阻拦抗日红军前进。为民族独立、自由、领土完整，誓与全国爱国同胞共同奋斗，反对卖国贼阻拦抗日红军道路。起来！中国人起来救中国！

抗日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3.29.

集中全力与东西来敌打遭遇战[1]

（1936年3月31日）

徐、程，刘、宋：

甲、十五军团应集中全力找寻有利机会，与东西来敌打遭遇战，再消灭敌一团，停止追敌，分散工作。此刻万不能分散。在不便作战时，则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息，准备作战。

乙、刘宋专任由南向北扫除堡垒，消灭守敌。

丙、刘宋通知特委[2]加造大船十只、小船十只，分散于罗峪口[3]以北以南数十里五个渡口中。

彭　毛

三十一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和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电报。

[2] 特委，指中共神（木）府（谷）特委。

[3] 罗峪口，位于山西省兴县西南。

第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及其方针任务[1]

（1936年4月1日）

我方面军：

甲、为执行党中央争取迅速对日作战的决定，将第一方面军全部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军团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十五军团改为第二路军，并在五个月内成立第三路军。

乙、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2]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3]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反对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绥远作为第一阶段之基本战略方针，也反对不能以临时的跳跃作为战役方针。

丙、以发展求巩固。

丁、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为目前军事指挥的基本原则。

---

[1] 这是毛泽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周恩来给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电报。此前第一方面军已经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称号。

[2] 华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和绥远。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戊、先锋军七个月内完成五万人的编制并武装起来，扩红为总方针的第一等任务。

己、地方三个月内完成四个地方军，陕西、山西各两军。

庚、在新苏区每县创造一个独立团。

辛、提高抗日先锋军到全国抗日红军的领袖地位，提高抗日先锋军及其他红军干部人员的政治军事水平到列宁主义原则与战略原则的程度，保证红军的团结与统一。

（传达到团以上的干部）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　彭　周
四月一日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4月1日）

林、聂：

甲、杨澄源到蒲县，其方旅[2]由蒲县到临汾进，其梁旅[3]由石口向康城镇进，其刘旅[4]不敢走石楼隰县大道，因我们在这里而绕经石口向隰县进，各旅均向临汾进。乙、凡等敌人只须以有力一部与之作出其不意的遭遇即能消灭之，望注意方旅。丙、根据双池之六十九师三十日系向兑九峪退去，判断系执行经子洪镇到沁县之原计划。

彭　毛

四月一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方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四纵队第七十一师第二〇六旅，旅长方克猷。

[3] 梁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一纵队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三旅，旅长梁鉴堂。

[4] 刘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一纵队第六十九师第二一四旅，旅长刘光斗。

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1]

（1936年4月2日）

林、聂：

一、蒲县到土门附近之敌系六十九师一个旅共两个团，阎敌因中央军迟迟不进，令其不顾牺牲救临汾豪绅出水火者。六十九师之梁、刘两旅尚在隰县以北，杨澄源本人前由隰县移到蒲县。二、我兵力位置如赶得及，以遭遇姿态迎击而能解决，否则该敌明日将入临汾城。

彭　毛

四月二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36年4月2日）

林、聂：

一、李生达北出静乐，杨效欧东往沁县，孙楚西往义牒、辛关，杨澄源两旅被我中路军阻在隰县以北。中央军二师（黄杰部）仅一团向运城，其余尚未过风陵渡。吕、梁两师一部在灵石、霍县守备，主力不足五团，在赵城以北。关师在赵城附近。汤师分在曲沃、新绛一带。阎敌、蒋敌三部之间存在着冲突，你们区域已造成有利的群众条件。二、根据上述情况，先锋军应即依据现地区作战，各个击破敌人，首先消灭进入土城附近之一个旅。

彭　毛

四月二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36年4月2日）

林、聂：

甲、晋军四个纵队已大分散，杨耀芳亦被红军第十五军团吸引北去。你们区域已造成最好群众条件，极有利于作战，战后伤员即存现区。中路军主力去打破黄河堡垒接运伤员去陕北，三十军在隰县钳制六十九师主力，宋时轮率八十一师之一营出灵石毁路钳制吕、梁、关等。你们不动，专事整理训练扩大，再打二仗、三仗。乙、蒋介石压迫张学良、杨虎城出兵延长、延水，即将出动。你们在现在地区取得胜利，可将现区变成苏区。由中路军去晋西南配合你们也把你〈它〉变成苏区，把黄河与陕北打通，张杨出兵便可能延缓，外交有所凭借而进行，所以你们应把握此时机，坚决在现地区作战。丙、基本上不改变你们出晋东南方针，取得上述胜利后，你们仍出晋东南，你们现有大批新兵，打仗又可增扩新兵，这样无论从哪方面说，在现地区作战都是最正确方针。

彭　毛

二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敌军布防及红军第十五军团之部署[1]

（1936年4月2日）

徐、程，刘、宋：

甲、杨耀芳[2]率六七个团在兴县、岚县一带，防我向北，李生达[3]率两三个团正往娄烦、静乐一带，防我向东。临县、方山、离石、中阳、汾阳一带，仅七十一师方旅[4]两团，丁旅[5]一团，甚为空虚。

乙、十五军团部署：

一、在现地休息训练三、四日后逐步向南，到达离石马路、隰县区域回旋一时期，尔后依情况或出汾阳、文水，或出介休、灵石。

二、注意找寻机会，以遭遇姿势向后回击，或向前迎击，消灭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和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电报。

[2] 杨耀芳，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河防部队第七十一师师长。

[3] 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七十二师师长。

[4] 方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四纵队第七十一师第二〇六旅，旅长方克猷。

[5] 丁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河防部队第七十一师第二一六旅，旅长丁炳青。

敌人之小集团兵力。

三、整个工作中，扩红列入第一位。

四、群众中组织秘密支部。

丙、二十八军与十五军团，在现在休息时间位于黑峪口、罗峪口之线努力扩红拆堡。十五军团南下时依情况决定，或仍回神府[1]区域，或在河东[2]行动一时期。

彭　毛

四月二日二十二时

---

[1]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2] 河东，指黄河以东。

东征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问题[1]

（1936年4月3日）

周副主席，并告林、聂，徐、程，刘、宋，宋，萧[2]：

甲、因敌情变动[3]，复令一军团暂不去晋东南，明日开始转入蒲县地区集中训练，准备作战。尔后一时期内，由一军团与我们共任这一区域之赤化与破坏封锁线。

乙、十五军团现在汾临[4]交界，明日起令其逐步向南，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域猛烈扩红赤化。

丙、二十八军决令其随十五军团行动一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练，责其扩大至二千，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

[2] 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刘、宋，指刘志丹、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宋，指宋时轮，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萧，指萧劲光，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3] 1936年4月初，国民党军晋军和中央军分别向兴县以南地区和临汾、侯马、赵城地区集结，寻歼红军东征部队。蒋介石还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延长、延川进击，袭扰陕甘苏区。

[4] 汾临，疑是兴临之误。兴临，指山西省兴县和临县。

丁、请你即依陕北独立团营基础，立即编成第三十一军[1]，位于神府米佳[2]区域。

戊、为对付张杨[3]进攻，四月份陕北、陕甘扩红全部编入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应有一扩红新计划，我意数目不必大，求确实做到。

己、前后方联络，准备开辟永和关、三交镇[4]以北两处渡口，以一军团任南面，十五军团任北面，实行当在一星期后。

德怀　泽东

四月三日二十时半

---

[1]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曾酝酿以神府地区地方红军、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军第三十一军，后未实现。1936年8月，这支武装组成独立第二师。

[2] 神府米佳，指陕西神木、府谷、米脂和佳县。

[3] 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和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永和关，位于山西省永和县西部。三交镇，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部。

各地斗争分子应加入团体[1]

（1936年4月3日）

林、聂、朱：

甲、新成立之地方独立团应暂随你们行动，加强其领导骨干，建立党组织，继续扩大至四百人。乙、鉴于石楼屠杀之教训，凡公开地方活动积极斗争之分子，应令其加入独立团游击队，转为游击战争骨干，同时将一切积极而未公开活动之分子转入秘密党与农会。丙、责成你们在蒲县、大宁、吉县地区建立第二个地方独立团、秘密的党与农会。

彭　毛

四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的电报。

给红军的作战命令[1]

（1936年4月3日）

红一军团和第八十一师主力，逐步向蒲县、大宁地区转移，集中训练，准备作战，尔后协同红三十军等部夺取永和关黄河渡口；红十五军团主力和红二十八军逐步向南转移，在临县、离石、中阳地区扩军和做群众工作，尔后夺取三交镇北黄河渡口；红三十军等部主力在限县、灵石地区钳制敌人，一部兵力在永和以西破坏敌人黄河沿岸据点，保障后方运输。

---

[1] 这是1936年4月毛泽东、彭德怀发现蒋介石、阎锡山调集兵力，封锁黄河渡口，分别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的企图后，向红军发出的作战命令。

1936年，毛泽东在给红军指战员做报告。

和东北军接洽、商谈统由周恩来负责[1]

（1936年4月4日）

从本日起，我方与贵方一切具体接洽与商谈关系，统由周恩来负责。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电的主要内容。

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

（1936年4月5日）

全中国爱国的同胞们！

自华北五省名存实亡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们正向着并吞整个华北与整个中国的目标急进着。

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经一再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联合抗日，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以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迈进。为了响应全国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抗日讨逆，告全国抗日同胞打先锋申义愤。乃山西阎锡山甘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动员他的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万恶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则又以上十师的兵力协助阎锡山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更命令张学良杨虎臣[1]等部队向北推进，以捣乱我陕甘苏区的抗日后方！

---

[1] 杨虎臣，即杨虎城。

看吧！当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五省，日军与满洲国军队开入平津察绥时，蒋介石命令他的军队全部退出华北五省。但当红军东下抗日而危及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五省的安全时，蒋介石则又把他的军队调入山西，进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现在谁都明白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的新的阴谋毒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所谓广田三大原则的具体实施。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协定，现在由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坚决执行了。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与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全国爱国同胞宣言：日本帝国主义想在中日“满”联合“防共”的名义下灭亡中国，动员所有汉奸卖国贼的军队向我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进攻。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我们誓以全力消灭阻拦我先锋军抗日去路与捣乱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军队，以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计划，以争取迅速地对日直接作战。我们更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中国于灭亡。红军抗日讨逆的胜利，即是我全中国爱国同胞的胜利，即是中华民族的胜利。

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创立各党各派抗日的人民阵线！

反对中日“满”“联合防共”，灭亡中国！

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国的独立自由！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拥护红军迅速对日直接作战！

拥护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

打倒拦阻红军抗日捣乱红军抗日后方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

全中国人民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四月五日

致刘志丹等电[1]

（1936年4月6日）

红二十八军要逐步向南，而不是要你们一气走四五天，走一二天即展开工作，休息整理，发动民众，扩大红军，待敌接近，然后收齐队伍再跃进一步，再散开工作。徐、程到三交镇时，应即展开于三交南北一线，休息扩红。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红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并告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致王以哲、张学良电

（1936年4月6日）

王以哲兄，并转张学良先生勋鉴：

甲、敝方代表周同志偕克农依约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

1.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 联合苏联及先〈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 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为盼。

彭德怀　毛泽东

鱼午

一军团继续留在晋西南的任务[1]

（1936年4月8日）

林、聂：

甲、你们不是迅速离开晋西南的问题，而是尽可能长久地在晋西南工作，直至敌情不许可继续留此区域时，然后离开此区域，转至另一区域。

乙、你们在晋西南须尽可能完成如下任务：

1. 打仗，收缴枪枝，武装新兵，训练新兵。

2. 发动民众，造成游击区域，创造新的游击区域。

3. 粉碎沿河封锁线之一段，接收河西[2]游击队及其归队人员过河东后送资材过河西。

4. 继续扩红。

丙、目前准备转入乡宁地域，第二步转至蒲县、大宁、永和。

丁、为利于你们尔后向东北与向东的长距离跃进，与到达新区域后有展开工作的余裕时间，必须采取尽量吸引敌人向晋西南与向沿河的方面，尤其在胡宗南[3]入晋的条件下，必须如此估计到。尔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河西，指黄河以西。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后东边的胜利，将使西边敌人没有长久留驻之可能。

戊、灵石、孝义、双池、大麦郊、水头[1]地区不派一兵去引起敌人注意。我们直接指挥之部队，在隰蒲两县中间地区工作。

彭　毛

四月八日二时

---

[1] 双池，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部。大麦郊，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部。水头，镇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西北。

七十八师应消耗敌军滞其南进[1]

（1936年4月9日）

徐、程：

甲、不管方山来敌多少，七十八师应择有利地形节节抵抗方法，使用小部占领优势阵地，构筑工事，用少数子弹（十分注意节省子弹）同敌打着，逼敌展开，有时可用向敌前进办法逼敌展开，以消耗其弹药，迟滞其南进时间，以利我工作部队之工作。

乙、除七十八师掩护部队外，其余以营以连为单位，展开于南北一线放手工作，极大的宣传鼓动群众，尽量散发财物，努力扩红。

丙、遍写争取晋军抗日的标语于各大小村庄。

丁、注意临县方面方旅[2]之警戒。

戊、注意在大武镇[3]选择利于回击之形势。

彭　毛

九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方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四纵队第七十一师第二〇六旅，旅长方克猷。

[3] 大武镇，位于山西省方山县南部。

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讨蒋令[1]

（1936年4月9日）

洛甫：

（甲）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

（乙）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在这口号之外，同时发布主张内战的讨蒋令，在今天是不适当的。

（丙）提议用党与苏维埃政权名义，立即发出告国人书与通电，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2]，反对拦阻红军抗日与捣乱抗日后方，申明我们愿与一切受蒋氏的命令来执行拦阻红军任务之部队订立抗日讨逆协定。此种立场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最能取消蒋介石之政治资本。

（丁）无疑的，日本正在企图用反共统一战线来击破我们的反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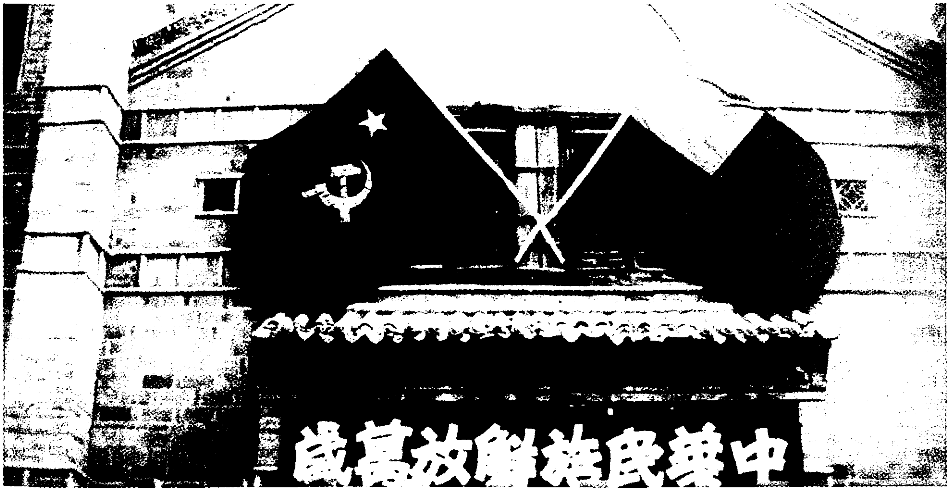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给洛甫（张闻天）的电报。

[2] 1935年10月28日由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对华政策新方针，后来称为“广田三原则”。内容是：第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第二，中、日、“满”经济合作；第三，中、日共同防共。

统一战线。此时我们应紧握反日统一战〔线〕去击破日本反共的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戊）至于将来可以而且应用国防政府发布讨蒋令，那是建筑在更多的人民与军队拥护之下之必须的策略行动。此刻则为争取国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坚持的“停止内战”之宣传鼓动口号。如何请复。

德怀　泽东
九日二十四时



1936年4月9日，党中央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和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今延安）举行会议，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图为会谈地点。

红一军团的近期任务[1]

（1936年4月10日）

林、聂：

甲、李生达、杨耀芳共率十四个团从方山、兴县、临县，向南尾追，徐程、刘宋颇急。已令他们逐步移至车鸣峪、关上、暖泉、留誉地区，利用地形与敌相持，吸引李、杨、孙三部于该狭小地区，以便尔后再转入晋西北，或与你们一同向晋东南。因为晋军较蒋军为积极，同时徐程指挥上不甚强，此次去晋西北没有得到很大结果，行走太快，扩红甚少。估计其到中阳、石楼间地区亦难久顿，从三交一带打一缺口，与后方交通亦不可能。乙、你们须在一星期内，从永、大、吉[2]方面打一缺口，完成与后方交通之任务。此时正是，蒋令张学良、杨虎城一举进攻陕北苏区，我们与张、杨进行具体谈判，也正在这几天内。恩来本日入肤施城与张会面，同时与杨接洽代表（前三日起程去西安）。你们破除永、大、吉封锁线之行动，敌必疑为渡河陕西，可与当前外交以实力帮助。

彭　毛

四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永、大、吉，指永和、大宁、吉县。

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

（1936年4月10日）

林、聂，徐、程，刘、宋，朱、萧，周昆：

奉苏维埃中央办事处命令，委任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令，特此通知。

彭　毛　周

四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周恩来给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第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治委员朱理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周昆的电报。

关于和张学良谈判结果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6年4月11日）

林、聂：

（甲）同意你们第一个行动方案，打封锁线是你们任务的一部分，可以推迟至两星期内完成之。

（乙）外交情况，周副主席于九日下午八时入肤施城，十日晨四时出城，与张学良谈一夜，结果：

一、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认为唯一出路，十大政纲张研究后，提出意见。

二、赞助红军集中河北，四方面军出甘肃，张之部队可让路，二六军则须得中央军同意，彼可任斡旋。

三、派赴苏联代表，他的由欧洲去，我们的张任保护由新疆去。

四、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谓如红军与日军接触，则全国停战运动更有力。

五、在他未公开表明抗日以前，不能不接受蒋令进占苏区，彼现准备以王以哲军入肤施，沿路筑堡，双方交通仍旧如此，一个月〔后〕，再看形势发展决定。对杨虎臣集中宜川进占延长，彼要我们派队至韩城阻扰，同时陕南陈先瑞部北出扰乱西安同关中区大活动，如此彼有所借口对蒋。

六、通商问题，普通办货由我们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他代办，子弹可供给。

七、互派代表常驻。

八、张云红军出河北恐不利，在山西亦恐难立足，彼主张红军经营绥远，但如红军决定出河北，他可通知万福麟部不打我们。

彭　毛

十一日十七时

同意集中兵力在乡宁等地域作战[1]

（1936年4月12日）

林、聂同志：

同意你们首先集中全部兵力在乡宁、吉县、大宁、蒲县地域找寻作战机会，求得在此地域打一、二仗，消灭敌一、二个团，这是最好的方针。你们准备以十天至十五天时间，完成作战与破坏封锁线任务，而把作战置于第一阶段。只要能打一胜仗，打破封锁线就不是迫切问题了。

彭　毛

四月十二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十五军团和二十八军的行动部署[1]

（1936年4月12日）

徐、程，刘、宋：

为吸引孙楚[2]主力到中阳，便利尔后二十八军向留誉[3]、石楼行动；为吸引杨效欧[4]到吴城镇[5]，便利徐程向中阳、关上、兑九峪[6]之中间地区行动，部署如下：

甲、明日十五军团移至中阳、离石、吴城镇中间地区（苏村、桃园上、石戴上、禅房上），依队派至王营庄、义居村游击，破坏电线，阻止汽车交通。西向中阳城游击，威胁孙楚，另派便衣侦察。南至中阳，东南至相家塔、滚牛城、师庄村侦察敌情。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和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电报。

[2] 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一〇一师师长。

[3] 留誉，镇名，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南部。

[4] 杨效欧，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纵队司令兼第六十六师师长。

[5] 吴城镇，位于山西省离石县东南。

[6] 关上，村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南部。兑九峪，今名兑镇，位于山西省孝义县西部。

乙、二十八军明日主力移至金罗镇、朱家店[1]，派队北向离石，南向中阳，逼近城边游击，准备十四日移至中阳西面之下枣村、冯家坡，从西面佯攻中阳。

丙、十五军团所捉之俘虏，多作宣传，多发路费，分向中阳、离石、汾阳放去。

丁、十五军团、二十八军准备在上述地区工作两三天，努力扩红，尽量散发财物于居民，多写抗日标语影响白军。

彭　毛

十二日十六时

---

[1] 金罗镇，位于山西省中阳县西北。朱家店，村名，位于山西省中阳县北部。

左、中路军的战斗成果[1]

（1936年4月13日）

林、聂：

一、我左路军到兴县南下连战皆捷。四月七日消灭敌七十五师之一连，俘人枪各四十一余。十一日在方山圪洞镇、离石之间朱家店，击溃孙楚一〇一师两个营，俘虏八十余人，缴获步枪八十余支，手提十三支，轻机枪三挺。三角庄击溃杨效欧六十六师一旅，消灭其一团，活捉团长一名、营连长十余名、士兵六百余人，缴获正在清查中。二、我中路军宋支队，昨十二日在汾西之鲸香镇击溃敌七十二师西进之一个营，俘虏六十余名，缴获步枪五十余支，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

彭　毛

四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东征军近期工作成绩[1]

（1936年4月13日）

右路军发动了汾河群众，筹措了巨款，解决了被服，特别争取了扩大红军的胜利；左路军亦连战皆捷，特别十二日三角庄战斗，击溃敌第六十六师一个旅，消灭一个团，团长被俘；中路军在石楼、隰县、汾西广大地区发动了群众，组织了游击队，二十余区域开始分散土地，打了些小仗。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致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并转红一军团全体同志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志丹、宋任穷电[1]

（1936年4月13日）

二十八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治委员宋任穷电的主要内容。14日，刘志丹在指挥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牺牲。

外示统一，内专责成[1]

（1936年4月14日）

十三日十二时电[2]悉，我们完全同意。张、杨两部关系，由你同意接洽并指导之，以其处置随时告我们，我们一般不与发生关系，对外示统一，对内专责成。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4月13日致电毛泽东、彭德怀说：后方与张电台呼号由刘鼎带去，前方仍保持与王以哲电台关系。

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不宜兼顾[1]

（1936年4月14日）

林、聂：

甲、你们现到吉县，如估计数日内无良好作战机会，则以先打开河防为有利。

乙、目前北敌集中中阳附近，南敌主力在乡宁以南，数日后北敌必至关上、中阳、兑九峪之线，南敌必至乡宁、黑龙关之线。此时如我河道已通，便可放心作战，不受压迫，如万一找不到良好作战机会，要向另一区域转移，亦较为从容，望考虑部署之。

丙、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二者不宜兼顾。

丁、寻敌作战以运动战为上策，以打停止中之敌为下策。

戊、十五军团三角庄胜利[2]后不能不到大麦郊[3]休息，他们减员颇大，必须整顿。

彭　毛

四月十四日二十一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三角庄，位于山西省中阳县东部。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主力于1936年4月12日在师庄、三角庄一带歼灭国民党军第六十六师第一九六旅的第三九二团，并将余敌击溃，俘敌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

[3] 大麦郊，村名，位于今山西省交口县东部。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4月15日）

林、聂，张，陈、杨：

一、一师占领清水关东岸，至诚等已渡过河东。二、红一军团伤员及全部现立即开始西渡。三、冯文彬等二十三日才能到清水关西渡，一师在清水关东岸一带待命，准备二十三日行动。四、一切东渡人员、部队机关、器材文件，统由杨至诚、宋裕和（军委四局副局长）率领随一师行动。

彭　毛
十五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红军第一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杨成武的电报。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36年4月16日）

林、聂：

甲、关麟征受我宋支队及三十军在克城、义泉之威胁停止于蒲县，杨澄源假称与我数千对战，亦在乡宁未动，汤恩伯在吉县以南。乙、估计数日内无与上述诸敌作战之良好机会。丙、红军第一军团明十七日起：一、以两个师打马头关至永和关之河防。二、以两个师相机夺取大宁，不论大宁夺取与否，此两个师应位置于大宁及蒲、大、隰三县之交，发动群众，拒止蒲县、吉县敌之急进。三、打河防之部队于任务完成后，住〈驻〉于永、大、隰之间准备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关于举行五一节全苏区赤卫队、少先队总检阅的命令[1]

（1936年4月16日）

为了执行与实现党中央的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号召，本会决定在今年战争的五一节举行全苏区赤少队总检阅，动员全苏区抗日人民的武装力量，特别是动员苏区抗日人民赤少队积极参加抗日讨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完成抗日先锋军的任务：

1. 责成各级军事部长须以战争的紧张速度保证到五一节前完全完成自己关于赤少队整理与扩大的计划。

2. 立即把五一节检阅的意义在群众中加紧进行战斗的动员，提高赤少队员的政治情绪并号召群众踊跃的加入红军，赤少队积极准备参加伟大的五一大检阅。

3. 赤少队均以区为单位进行检阅，赤少队须于四月三十号下午完全集中到区并自带粮食（二天）武器，必须保证没有一个赤少队员不到参加检阅和不带粮食武器等。

4. 规定区苏主席为检阅首长，区军事部长为检阅总指挥。

5. 在五一节赤少队检阅中，应检阅之项目如下：

---

[1] 这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的关于在五一节举行全苏区赤卫队、少先队总检阅的命令。

A. 队员干部和武器是否齐备。

B. 政治情绪是否旺盛，纪律是否严肃。

C. 军事上检阅：Ⅰ刺锚子（照刺枪动作）；Ⅱ盘查哨；Ⅲ紧急集合。

D. 政治上测验每一个赤少队员是否了解目前赤少队的任务。

6. 在五一节赤少队检阅中并举行抗日讨逆的宣誓（誓词另颁发），检阅后参加当地五一节游行示威。

7. 区军事部应把检阅结果做成总结，向赤少队员宣布，并特别表扬与奖励模范的赤少队。

8. 检阅时间一天，仪式另定。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4月17日）

林、聂，宋：

一、河东游击队张克来、涂则生、萧克（萧望东）、张国华有信来，他们情形颇好，收缴了十支枪及一些手榴弹、梭镖、马刀，共有人数二百七十名，与我宋支队在克城镇见了面，现向黑龙关附近行动威胁关敌侧后。二、责成你们在大宁、蒲县、永和区域，创造一个三百人左右的游击支队，如同河东支队模样，配备干部和武装，以便而后你们向另一区域移动时，增加晋西南北为苏区的力量。三、吉县县长及民团首领送信给我们，以派去太原活动。

彭　毛　杨

十七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的电报。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4月19日）

林、聂，陈、杨：

甲、杨澄源既到大宁，关麟征有向隰县推进讯，汤恩伯有向临汾讯。由于敌行动不明，我河西归队人员，明上午可在清水关渡河完毕。乙、第四师应于明（二十）日，第一师应于二十一日，均向桑壁镇以西地区集结待命，但第二师主力应在大宁西北监视大宁之敌。丙、准备迎击关师或杨师。

彭　毛

十九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红军第一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杨成武的电报。

诱大宁之敌西进消灭之[1]

（1936年4月20日）

甲、我一军团宜装浮桥西渡模样，引诱大宁之敌西进而消灭之。

乙、大宁之敌系六十九师梁鉴堂刘光斗两旅[2]，其中梁旅樊团曾被第十五军团在隰县北之蓬门消灭一营，俘其营长。昨日梁旅被我二师消灭一连。郭宗汾旅[3]在临汾。

丙、今明两日，一军团各师应全部集结于桑壁镇[4]以西、清水关以东之地区荫蔽待机，仅令二师派小部附电台监视大宁之敌，候其离开大宁城向马头关或清水关之道路前进时，我以遭遇而攻击之。

丁、如敌停止不进，则一军团在上述地区，休息训练若干天。

彭　毛

四月二十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的电报。

[2] 梁鉴堂刘光斗两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一纵队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三旅和第二一四旅，旅长分别为梁鉴堂、刘光斗。

[3] 郭宗汾旅，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第二路第一纵队第六十九师第二〇二旅，旅长郭宗汾。

[4] 桑壁镇，位于山西省永和县东南。

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
目前休整计划与扩红问题[1]

（1936年4月22日）

林、聂，徐、程，并告周副主席，张参谋长[2]：

甲、山西敌人已暂时全部转入守势，其主力正构筑从三交镇[3]起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至河津之东南北三面封锁线，一部在永大隰石[4]守城，估计本月底或下月初将有数路向我进攻。陕西方面张学良[5]之王以哲[6]军已开始进至富县、甘泉之间构筑堡垒，杨虎城[7]部四个旅进至韩城、宜川之间，均准备继续向北进攻并从西面封锁黄河。

乙、我军目前短时间内需要休息训练并继续扩大各部。依此方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周副主席，指周恩来。张参谋长，指张云逸，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参谋长。

[3] 三交镇，位于今山西省柳林县西部。

[4] 永大隰石，指山西永和、大宁、隰县和石楼。

[5]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6]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

[7] 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针适当部署兵力，从二十三日起至二十八日止作出六天计划。

丙、一军团派出一部占领永和关，保证将贺家畔船只全数放下，另派小部保持清水关、铁罗关、马头关、平渡关[1]四处渡口于我手中，再派队分向永大隰三城游击，打通桑壁镇、义泉镇[2]之联系。十五军团派队分路侦察中阳、孝义间，孝义、介休间，介休、灵石、霍县间敌封锁线之程度、位置、空隙及道路，以为尔后向东打破封锁线，或向西回击张学良、杨虎城之准备。

丁、各部除了训练外仍以扩红为第一位，规定一军团扩大一千，十五军团五百，宋支队[3]、二十八军、三十军一千。

戊、除日食外准备携带粮食十五天。

彭　毛

二十二日一时

---

[1] 清水关，位于陕西省延川县东南。铁罗关，位于山西省永和县西部。马头关、平渡关，分别位于山西省大宁县西北和西南。

[2] 桑壁镇，位于山西省永和县东南。义泉镇，位于山西省隰县南部。

[3] 宋支队，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宋时轮所率第七十五师第二二四团1个营和第八十一师1个营，此时在水头、关上等地钳制晋绥军主力对红军的第二次反攻。

赴苏联商谈在军事方面的任务[1]

（1936年4月22日）

（一）对日作战彼我双方的共同步骤问题；（二）两军委间通信联络问题；（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四）技术帮助问题；（五）人员帮助问题。

---

[1] 1936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邓发为中央代表经新疆赴苏联。4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并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邓发，要邓发尽快动身去苏联。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同年6月，邓发启程赴莫斯科，1937年秋回国。

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和部署[1]

（1936年4月22日）

行动方针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叫西渡打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正向陕北进攻）。红一军团坚持桑壁镇及其以西地区，保证清水关、铁罗关两渡口及必要的回旋地区于我手中；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在义泉镇以西吸引敌军第五纵队而迟滞之；红一方面军总部率红十五军团以三天进至克城镇、午城镇之线。

对于作战无论在何种情况，均须选择十分有利之条件，极力避免无把握之战斗。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地回到陕、甘，经营神府区域[2]、三边区域[3]、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并告周恩来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张云逸电的主要内容。

[2] 神府区域，指神木、府谷区域。

[3] 三边区域，指靖边、安边、定边区域。

针对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对红军的行动部署[1]

（1936年4月24日）

红一军团三个师以桑壁镇为枢纽，位于永和、隰县、大宁三城之间，并派兵向永和、石楼、大宁三城及永石、石大之间游击侦察；红十五军团进至康城镇、勍香镇之线；红二十八军在义泉不动，派队向隰县、午城游击侦察；红三十军由勍香镇出发，在黑龙关、土门镇之线扩大影响，迷惑陈诚。总部于明日率第一分队由康城镇出发，以三天到桑壁镇与林、聂开会。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致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蔡树藩，红三十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阎红彦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洛甫电[1]

（1936年4月28日）

东面情况已根本地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

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相关的问题，地点拟在延长。

新的行动方向有二方案：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全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二十八军、三十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洛甫（张闻天）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西渡黄河的部署[1]

（1936年4月28日）

方面军及两军团直属队先渡，五月三号前渡完。我们即赴清水关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致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西渡黄河扩大陕甘苏区的命令[1]

（1936年4月28日）

周副主席，林、聂，徐、程，叶、杨[2]：

甲、目前情况：

（一）在山西是阎锡山[3]加蒋介石（五十一个团），再加堡垒主义。

（二）在陕西是张学良杨虎臣[4]在蒋介石令下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但神府[5]区域、三边[6]区域空虚。

（三）在甘肃是蒋介石之胡宗南周喦[7]两部入山西，毛炳文[8]调甘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2] 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叶、杨，指叶剑英、杨尚昆，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4]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杨虎臣，即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6]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7]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周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师师长。

[8]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南，王均伍诚仁[1]等在陕南与甘南，张学良原在环水区域之部队，大部调陕西，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

乙、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则有派一支队去陕南扩大苏区，吸引敌人之必要。

丙、我军决西渡黄河，第一步集结于延长地域。渡河时机、渡河秩序及集结地域之区分，另命令定之。

丁、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

戊、此命令仅给军团与师两级主要军政首长。

彭　毛

二十八日二十时

---

[1]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伍诚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各兵团目前的工作方针[1]

（1936年5月5日）

以十天为教育部队、总结经验及准备新行动的时间。各部队依照自己的情况，立即定出军事教育、政治教育、整理组织及总结在山西作战经验的具体办法。政治上解释与鼓动的基本口号：反对卖国贼蒋介石捣乱抗日后方，粉碎卖国贼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猛烈扩大抗日根据地陕甘苏区，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在十天内由军委召集一次方面军以上干部大会，由军团及军召集一次庆祝胜利并追悼刘志丹同志大会。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工作方针致各兵团首长电的主要内容。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936年5月5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臣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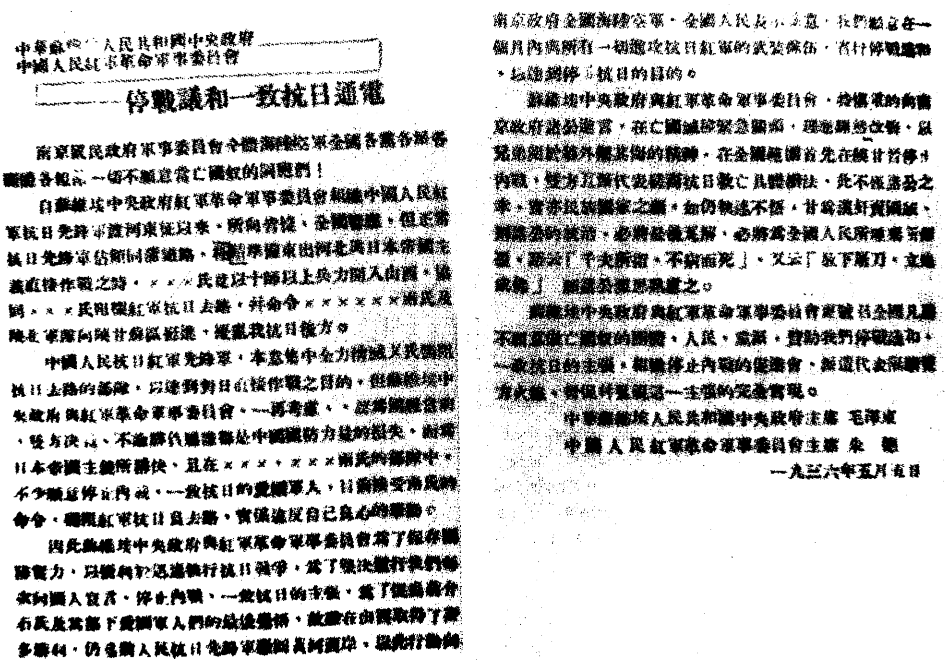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

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
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

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 毛澤東
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1936年5月5日，毛泽东等发表通电，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

致林彪、聂荣臻电

（1936年5月5日）

林、聂：

（一）陈诚四日十时电令关、汤分向佛堂、于家嘴猛追，吕团先截断于家嘴，杨澄源主力向马斗关，均星夜猛追，以求消灭我军于河东岸。（二）接电后立即出动，在石家湾、冯家窑占领纵深，掩护阵地逐次渡河，并按七十五师、第四师次序。

彭　毛

五日一时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5月6日）

林、聂，徐、程，宋、蔡，宋、阎：

甲、各军兵团为了便利训练，于明（七）日十六时出动移至下述地点：一、红军第一军团移至延水县以西文安马同、马家湾、马家坪、高家坪、高家沟、梭家沟、史家河一带。二、红军第十五军团移至延水县、永平间的白家坪、贺家坪，梭川、田家川之线。三、三十军移至延长县、延水县之间交口镇附近。四、二十八军在延水县附近不动。五、方面军直属队准备八号移至大相寺、张家村、周家庄、盆口一带。乙、各兵团现驻地的粮食应尽量收集，搬运至新边缘地区为要。

彭　毛

五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给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红二十八军军长宋任穷、政治委员蔡树藩，红三十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阎红彦的电报。

复刘鼎电[1]

（1936年5月7日）

再度会谈极为必要，即请张学良决定时间，愈快愈好。

会谈问题为：（一）张学良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二）同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邓宝珊、盛世才、王均[2]、毛炳文七部建立联合战线问题；（三）东北军和红军今后行动方针问题。

---

[1] 刘鼎，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刘鼎5月4日来电称，此间悉红军西渡，张学良要求早日与周恩来见面商谈。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复刘鼎即转张学良、王以哲电的主要内容。

[2] 盛世才，当时任国民党新疆省边防督办。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在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5月11日）

此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了款子，达到了预期目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出席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时讲话的一部分。

国际关系和我党的外交政策[1]

（1936年5月15日）

现在对国际各国统一战线与国内统一战线问题，我们只能说日本侵略中国，也侵犯了各国在中国的利益。我们同各国的关系，将来可根据双方的利益得到解决，尊重各国的利益。

---

[1] 这是毛泽东在大相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发言的一部分。

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1]

（1936年5月18日）

一、蒋阎[2]二卖国贼，以我军西渡，似有以四师以上兵力由吴堡入陕的企图。南线、北线及西线情况无变化。

二、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3]决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4]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

---

[1] 这是东征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在陕西延川县大相寺发出的西征战役命令。此次战役从1936年5月19日开始到7月下旬结束，在两个多月的战斗中，除歼灭大量国民党军外，还俘旅长以下人枪2000余，战马500余匹，占领了环县、豫旺、同心、定边、盐池等城镇，开辟了纵横200余公里的新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迎接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

[2] 蒋，指蒋介石。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西北军委，全称为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1935年11月3日成立，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

[4] 陈先瑞部，指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

三、依上述目的，重新规定我军战斗序列如下：

西北军委主席
- 司令员 西方野战军兼政委 彭德怀
  - 第一军团
    - 代军团长　左　权
    - 政治委员　聂荣臻
  - 第十五军团
    - 军团长　徐海东
    - 政治委员　程子华
  - 总兵站及兵站医院
  - 第八十一师
- 陕南部队
  - 第二十八军
    - 军　长　宋时轮
    - 政　委　宋任穷
  - 陈先瑞军
- 陕北部队
  - 第三十军
    - 军　长　阎红彦
    - 政　委　蔡树藩
  - 第三十一军
  - 神府支队
- 渭北部队
  - 第二十九军
    - 军　长　萧劲光
    - 政　委　朱理治
    - 副军长　谢　嵩

四、各兵团第一步行动指导如下：

（1）野战军第一步以夺取并赤化安边[1]、定边、环县、曲子[2]之

---

[1] 安边，镇名，1935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曾置安边县，1949年裁入陕西省定边县。

[2] 曲子，镇名，位于甘肃省环县东南。

目的，在五月十九、二十两日由现地[1]出发，分两路西进（行军计划另发），以七天行程到达新城堡、沙集、吴起镇之线集结，休息两天，一军团完成环县、曲子、庆阳一带侦察，十五军团完成安边、定边侦察，十五军团准备攻占安边定边两县城，左聂率一军团相机攻占曲子及环县。其战斗部署及后方勤务机关均由彭司令员规定之。

（2）二十八军应于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一切南进准备，待命出动。

（3）三十军以迟滞晋敌西进之目的，五月十八日由现地出发，取捷径以五天行程进到宋家川[2]附近活动，相机破坏敌之碉垒，并迫近河边游击，以阻扰敌之渡河。

（4）三十一军以进入神府区域活动并威胁高敌双成[3]后方之目的，应于七天内（至五月二十四日止）完成一切准备，待命北上。

（5）二十九军主力（两个团）仍由副军长谢嵩指挥，在韩城区域执行原任务。其另一个团应配合保安独立团及关中红军之一个团（归萧军长统一指挥）于六月初开始活动于吴起镇与环县、曲子、庆阳之间，配合我一军团行动。

五、所有西北军委直接指挥之诸兵团，须经常用无线电与军委联络，以保证随时接受军委的补充指令。

六、此命令发至师及独立军为止，不得下达。

此令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五月十八日于大相寺

---

[1] 指陕西延长、延川地区，是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前驻地。

[2] 宋家川，镇名，今为陕西省吴堡县县治。

[3] 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六师师长。

红军大学的建立问题[1]

（1936年5月20日）

（一）学习时间为六个月，部分的九个月到一年。前方干部现可自给，目的是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二）教育方针：高级及上级科，前三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三个月政治、军事并重，军事上战役战术与战略各占一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文化学习；普通科前三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三分之一，后三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从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时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上级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五）组织：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校务部主任周昆，教务部主任何涤宙，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教育委员会，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员，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

---

[1]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陕北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红军大学的建立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凯丰、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

对外宣传口号及国内外政治形势与国焘关系[1]

（1936年5月20日）

朱、张、刘，徐、陈，任、贺，萧、关、夏[2]诸同志，并转各负责同志：

（一）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与同盟之友军，于时机成熟时共同组织的，不是我们单独组织的，我们的组织仍是革命委员会与苏维埃。

（二）现在对外宣传口号是：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至于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在目前仅能使党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给红军总部暨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及第二、第六军团领导人等的电报。

[2] 朱、张、刘，指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当时分别任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和总参谋长。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第二军团政治委员和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第二军团军团长。萧，指萧克，当时任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关，指关向应，当时任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总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红军第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夏，指夏曦，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夏曦已牺牲，因通讯不便，中央尚不知晓。

内高级干部知道，对外应守秘密。

（三）关于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的计划，我们正在进行全国性与国际性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必须严密对付日帝与蒋介石的阴谋破坏与军事进攻，对外尤须严守秘密。

（四）党的十二月政治决议及七次政治宣言与绍禹同志在七次国际大会的报告，均得到全国广大人民包括知识界最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拥护。红军的东征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鲁迅、茅盾、宋庆龄、覃振等均有信来，表示拥护党与苏维埃中央的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亦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与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正在斗争中，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三十余种，其中《大众生活》一种销数约达二十余万份，突破历史总纪录，蒋介石无法制止。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许多外国新闻记者赞助反日运动，从蓝衣社、国民党起至国家主义派止，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中国革命发展是取着暴风雨的形势。

（五）在国际各国备战益亟，意大利已占领亚比西尼亚，德国占领莱茵河，日本积极向外如箭在弦；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号召，已在许多国家得到胜利，特别在法、捷、西、美等国。苏法、苏捷、苏罗、苏蒙四种军事互助条约业已订好，和平阵线已有强大势力，英苏关系亦有进步，国际已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在西北成立大局面。

（六）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

林育英　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　古　邓　发　王稼祥　凯　丰
彭德怀　林　彪　徐海东　程子华

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1936年5月25日）

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

帝国主义重分殖民地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快要暴发，我们中华五族的人民和土地，已一大块一大块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宰割，现在更向着绥远，宁夏，甘肃，新疆前进，破坏你们的根本，灭亡你们种族的大祸，已经临头。你们是甘就灭亡，任人宰割，还是奋起抗战，争取回族的独立与自由！土耳其回族复兴的荣誉，将为整个回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南针，当此紧急存亡的关头，望即奋起！

回民在十余年以来，历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制之下的苛捐杂税，使回民的生活，陷于艰难深苦不能生存的地位，复时常挑起回汉两民族的恶感，甚至互相残杀，最后则以大兵镇压，必使回汉两民族民众的元气丧尽，然后，得以遂其残暴贪婪的统治。近几年来，以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阀，更丧心病狂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全中国反对民族的利益完全出卖，东北四省的丧失、华北五省的名存实亡，闽南的自治运动的活跃，现在更要把西北四省划为“防共”地带，南京军队之入甘肃，即是灭亡西北，镇压回蒙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步骤。

中华人民苏维埃政府及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素以反对帝国主义

（六）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希兄等共鉴之。

林育英　张闻天　毛泽东　周恩来
博古　邓发　王稼祥　凯丰
彭德怀　林彪　徐海东　程子华

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

（1936年5月25日）

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

帝国主义重分殖民地的世界第二次大战，快要暴发，我们中华五族的人民和土地，已一大块一大块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宰割，现在更向着绥远，宁夏，甘肃，新疆前进，破坏你们的根本，灭亡你们种族的大祸，已经临头。你们是甘就灭亡，任人宰割，还是奋起抗战，争取回族的独立与自由！土耳其回族复兴的荣誉，将为整个回族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南针，当此紧急存亡的关头，望即奋起！

回民在十余年以来，历受中国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特别是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统制之下的苛捐杂税，使回民的生活，陷于艰难深苦不能生存的地位，复时常挑起回汉两民族的恶感，甚至互相残杀，最后则以大兵镇压，必使回汉两民族民众的元气丧尽，然后，得以遂其残暴贪婪的统治。近几年来，以卖国贼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阀，更丧心病狂的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将全中国反对民族的利益完全出卖，东北四省的丧失、华北五省的名存实亡，闽南的自治运动的活跃，现在更要把西北四省划为“防共”地带，南京军队之入甘肃，即是灭亡西北，镇压回蒙藏各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步骤。

中华人民苏维埃政府及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素以反对帝国主义

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及其他各弱小民族为其基本任务，现鉴于东进抗日为卖国贼蒋介石所阻，认为巩固后防、发展抗日根据地，联合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及各民族，首先是联合西北的各民族的人民，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是更为重要的，所以抗日人民红军的西进，不仅是实际准备抗日的必要步骤，而且是蒙回及其他弱小民族特别是回族独立解放的大好时机，因此我们谨向回族人民宣言：

一、我们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凡属回民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凡属回民占少数的区域，亦以区乡村为单位，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

二、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保护阿洪〈訇〉，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

三、武装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民族所不可少的条件，我们联合回族中自己的一切武装力量，并帮助与发展，更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我们希望回民的武装，将来能成为抗日联军的主要力量之一。

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

五、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举办回民的报纸，提高回民政治文化的水平。

六、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七、联合土耳其，外蒙古，苏联及其他同情中国各民族彻底解放的民族与国家，共同抗日。

亲爱的回族的兄弟们！现在是弱小的民族被宰割的时代，同时也是弱小民族奋起图存争取彻底解放的时期，你们处在已经解放的苏联外蒙古土耳其及正在谋解放的中华苏维埃红军之间，只要你们觉悟起来，努力奋斗，胜利必是你们的。谨此宣言。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前形势与战略方针[1]

（1936年5月25日）

朱、张、刘，徐、陈[2]，并转任、贺、萧、关、夏[3]诸同志：

目前形势及战略方针：

（一）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4]，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二）西北的形势是：红军与东北军取得密切合作，与杨虎城邓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等给活动在四川甘孜地区的红军总部暨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并转第二、第六军团领导人的电报。

[2] 朱、张、刘，指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当时分别任红军总司令、总政治委员和总参谋长。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3] 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第二军团政治委员和总指挥部总指挥兼第二军团军团长。萧，指萧克，当时任红军第六军团军团长。关，指关向应，当时任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总指挥部副政治委员兼红军第二军团副政治委员。夏，指夏曦，红军第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夏曦已牺牲，因通讯不便，中央尚不知晓。

[4] 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主张。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为实现全国一致抗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了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政策。

宝珊[1]亦有联系。胡宗南[2]由山西向陕南，王均[3]在汉中，毛炳文[4]在甘南，阎锡山[5]受红军重大打击后，现只能出八团入陕。汤恩伯[6]率十八团（四个师）准备入陕，亦颇动摇。于学忠[7]率两师在兰州、天水间，奉军[8]主力在洛水、环水、泾水流域，陕军[9]在韩城、宜川线，马鸿宾[10]主力在宁夏，马麟[11]在青海，一部在兰州以西。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12]，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三）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

---

[1] 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一军军长。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

[3]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4]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5]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6]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

[7]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十一军军长。

[8] 奉军，指当时张学良所率之国民党军东北军。

[9] 陕军，指当时杨虎城所率之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

[10] 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

[11] 马麟，当时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1936年6月因受马步芳排挤，被迫出国。

[12] 1936年7月2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与第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5日，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原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于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改编为第三十二军，随第四方面军行动）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此电发出时，第二方面军尚未正式编成。

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四）兄处情况与计划甚盼速告。

育英[1]　洛甫　泽东　恩来
博古　德怀　林彪　海东[2]
二十五日

---

[1] 育英，即林育英，又名张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1935年11月由苏联抵陕北。

[2]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海东，即徐海东，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

给阎锡山的信

（1936年5月25日）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致阎红彦、蔡树藩电[1]

（1936年5月26日）

蒋、阎以三十个团入陕，晋敌有本月底渡河消息。红三十军应以主力位宋家川之线以南，迟滞国民党晋绥军前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等电[1]

（1936年5月26日）

陕甘宁省委[2]、省苏于本月底可到保安。萧劲光为陕甘宁边区军事部长，赖传珠为副部长兼政治工作部长。萧已于昨日去保安。陕甘宁省一级拟驻吴起镇。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彭德怀致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电的主要内容。

[2] 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将陕甘省委改为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任书记。

关于军事行动问题的报告[1]

（1936年5月28日）

我们在六、七、八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东边蒋介石、阎锡山以三十个团向我们进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对陕、甘加紧部署，企图将我们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隔开，与东北军隔开，与苏联隔开，在西北军阀特别多，于我们有利。我们的阵势在西，而蒋介石集中兵力在东。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最好是在白龙山及神木地区，变“太平世界”为“不太平世界”，方式以小游击队活动为最好，短小精悍，在每区中应有一大的游击队。

---

[1] 193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会议主要研究军事行动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5月28日）

你们取得宁条梁[2]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当占领教堂区域时，如俘得神父，应特别优待，不应侮辱。宣布凡属以前教堂及军阀所占领的蒙地，完全退还内蒙民众。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2] 宁条梁，今陕西省靖边县梁镇。

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1]

（1936年5月29日）

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是重要的事，不必提高条件[2]。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彭德怀在5月28日致电毛泽东说：“徐、程来电，小桥畔教徒回信，允本日派代表接头。我们答应以信仰自由但传教不得干涉政治为原则，与之谈判。”

关于当前军情变化
和基本任务等问题的通知[1]

（1936年5月29日）

彭，并告刘晓，左、聂、朱、邓，徐、程、王[2]：

通知下列数事：

甲、二、六军团六月中可到甘孜。四方面军已接受我们方针，六月底北上，七月底到夏洮[3]，二、六军团跟进。如不生枝节，当是西北计划一生力军。

乙、对国焘[4]关系承认暂时采取协商方式[5]，并告国焘我们与他们之间已没有政治上、战略上之分歧，过去分歧不必再谈，务以协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刘晓，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左、聂、朱、邓，指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徐、程、王，指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3] 夏洮，指甘肃夏河和洮河。

[4] 国焘，即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5]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是：“对国焘关系承认时，仍采取协商方式。”

和团结为目标。

丙、估计六、七、八三个月形势：李生达、汤恩伯[1]当进至绥德、清涧、安定[2]之线，王以哲[3]进延安、瓦窑堡之线，杨虎城[4]在韩城、延长之线，东北军主力在庆阳、固原、平凉、隆德之线，胡宗南[5]在汉中、碧口之线，王均、毛炳文[6]在西固、岷州[7]之线，何柱国[8]骑兵军有进天水、陇西之可能。

丁、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争取东北军，为六、七、八月之三大基本任务。东南两面正着力布置，西面由野战军与陕甘宁省委集全力赴之。

戊、二十八军暂缓派出，候二、四方面军北上，胡宗南西进汉中时，再派赴陕南出河南，目前拟用于三边[9]。萧劲光[10]率两个团用

---

[1] 李生达，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

[2] 安定，旧县名，即今陕西省子长县。

[3]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

[4] 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6]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7] 西固，旧县名，即今甘肃省宕昌县。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8]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9]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10] 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于环县、庆北[1]方向。三十军在无定河东、宋家川[2]南。

己、东边游击战争分为数个小军区，给以独立性。正作政治动员与完成组织事项。

庚、红校（一、二、三科一千四百人），以林彪为校长，罗瑞卿为教育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六个月毕业，开始着重政治教育，六月一日正式开学。

辛、瓦窑堡[3]粮食仅够一个月，吴起镇[4]以西须为后方筹粮三千六百担。

对四方面军北上，我们与东北军关系，二十八军将来行动，敌情将来变化等不得通知下级。

毛

二十九日

---

[1] 庆北，指甘肃省庆阳县北部地区。

[2] 宋家川，镇名，今为陕西省吴堡县县治。

[3] 瓦窑堡，今为陕西省子长县县治。

[4] 吴起镇，今名吴旗镇，为陕西省吴旗县县治。

在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5月）

一

此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了款子，达到了预期目的。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

二

这次会议开得好，打倒了本位主义，反对了自由主义，我们有了更加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

---

[1] 1936年5月13日至15日，红军第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在延川大相寺召开。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15日晚，毛泽东所作大会结论的一部分。

给盟克耳纪的信[1]

（1936年5月）

蒙族内部事务，应由蒙族自己解决，国民党绥远政府不得借此挑拨离间；愿与蒙族人民团结一致，以实力援助其解放；蒙人自己组织政府，有应用自己语言文字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坚决反对日本侵略内蒙及国民党官员的欺凌压迫；将长城沿边各地如宁条梁等地划为通商地区，增进汉蒙商业的发展；愿与蒙族联合一起，缓急相助，共同打倒公敌。

---

[1] 这是毛泽东致盟克耳纪信的主要内容。

成立野战军后方勤务部及设小后方[1]

（1936年6月1日）

彭，并转杨，并告萧、李，左、聂，徐、程[2]：

甲、为胜利进行野战军后方勤务工作，决组野战军后方勤务部，以杨至诚兼部长，统一指挥野战军兵站、供给、卫生诸机关（不另设机关）。

乙、决在吴起镇附近设小后方，选择适当地点成立小规模的兵工、被服、鞋袜各工厂，由叶季壮[3]负责。组成后开往吴起镇，归后方勤务部管理（共须使用三十个窑房，由劲光、至诚负责办理）。开动时日另电告。

丙、望在三边一带收集多量牛皮，供做鞋用。

毛　周

一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兵站部部长杨至诚的电报。

[2] 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李，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军事部政治委员。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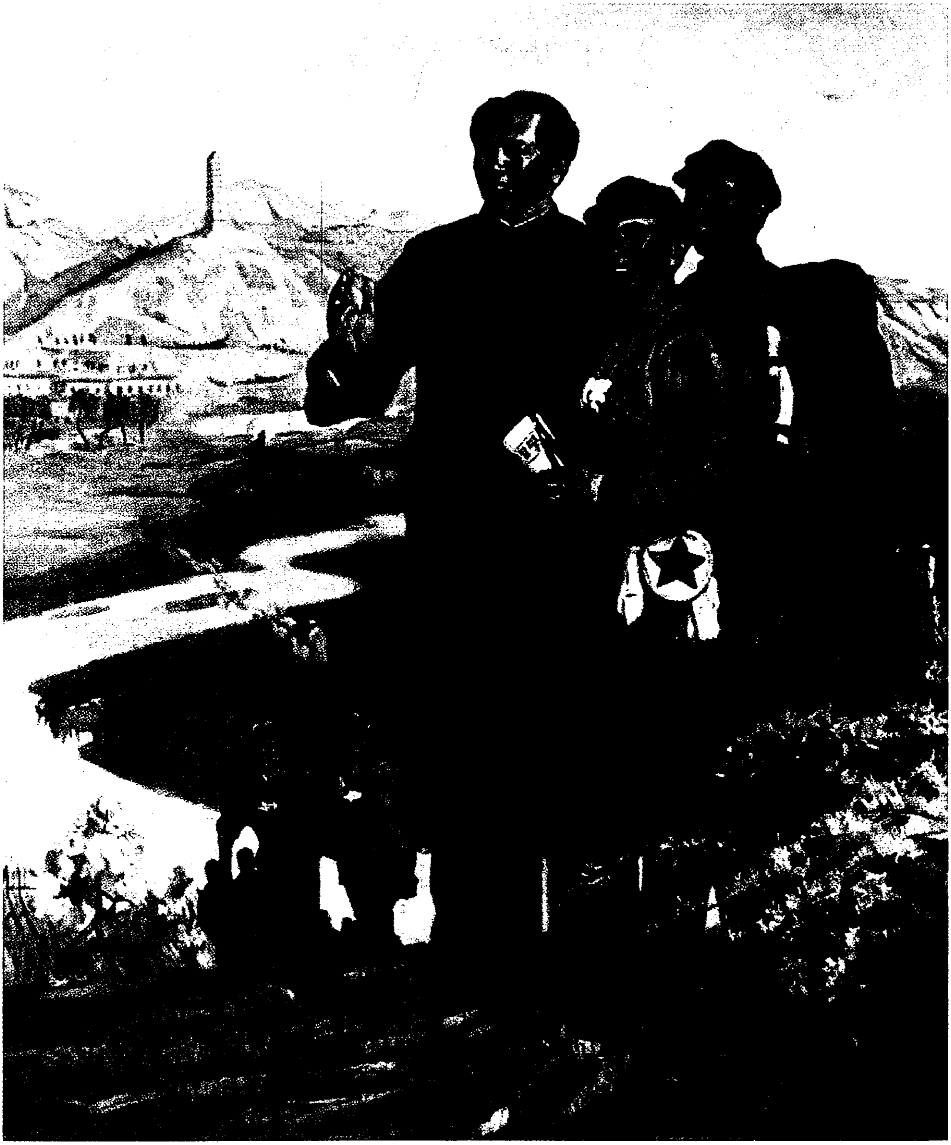
[3] 叶季壮，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部长。

在抗大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

（1936年6月1日）

第一次大革命有一个黄埔军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还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那就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前一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可也走了两万五。要是也会腾云驾雾，就不晓是会走到哪里去了。我们红军曾经有几十万，现在只剩下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我们安排这个好地方，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反正我是不到外国去。我们中国的地方大得很，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还有北方。



《毛主席送我们上红大》(油画)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

（1936年6月1日）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四年以来，我国失地八百万方里，东北四省亡掉之后，华北五省也名存实亡，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宁夏和阿拉善旗设立特务机关，要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广田三原则，并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送给他。日本帝国主义的血手，伸到我们西北五省同胞的头上来了！

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丧尽天良，实行联合日本，灭亡中国。爱国有罪，卖国有赏，阻拦红军东进抗日，捣乱红军抗日后方，非把中国统统送给日本不止。

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抗日的先锋，在此国难严重，大祸临头日子，用自己的热血，坚决同人民在一起，向人民的仇敌作战，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指挥下的红军，向全国人民、党派、团体、军队提出下列救国救民的主张：

一、全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抗日救国。

二、停止内战，不分红军白军一致抗日。

三、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创立抗日人民联合战线。

四、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五、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取得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

六、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抗日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七、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八、全国红军与全国军队集中河北打日本。

九、全国人民一致武装起来一致对日作战。

十、推翻汉奸卖国贼的统治。

十一、废除苛捐杂税。

十二、废除高利贷。

十三、打倒贪官污吏。

十四、打倒土豪劣绅。

十五、救济灾民难民及一切失业人民。

十六、保护爱国运动。

十七、保护知识界、科学界、文艺界一切进步分子。

十八、保护工农利益。

十九、保护工商业。

二十、帮助回族与蒙古族人民建立独立政府。

全国人民全国军队团结起来，拥护苏维埃红军的主张，为保卫西北而奋斗，为保卫华北而奋斗，为保卫中国而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公历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

优待、训练和释放俘虏[1]

（1936年6月2日）

要特别优待冶成章[2]旅长，治好其伤口后，送其到后方一行，谈后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护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致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等电的主要内容。

[2] 冶成章，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〇五旅旅长。6月1日在红一军团进占阜城的战斗中投降红军。

一军团主力应向环县急进[1]

（1936年6月2日）

彭：

甲、一军团主力应向环县急进。

乙、一部在庆阳、曲子[2]之线。

丙、主力占领环县后准备占领洪德城[3]。

丁、派一个团附骑兵一连及电台向三岔[4]前进，准备三天内占领三岔。

毛

二号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曲子，镇名，位于甘肃省环县南部。

[3] 洪德城，镇名，位于甘肃省环县北部。

[4] 三岔，村名，位于甘肃省镇原县北部。

横山定边间的作战部署[1]

（1936年6月6日）

彭：

甲、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2]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3]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八十一师与二十八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一个半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先令宋任穷[4]率一个团限十号到宁条梁[5]，宋时轮[6]率主力随后跟进。请你候宋任穷到当面部署工作后再赴洪德城。

乙、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

丙、安边、定边是战略要点，保持于敌人之手将成后患，清涧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西征基本完成第一步作战任务，准备继续西进进行第二步作战时给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工作”二字，似是衍字。

[3] 绥宁，指当时的绥远、宁夏两省。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宋任穷，当时任红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

[5] 宁条梁，今名梁镇，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西部。

[6] 宋时轮，当时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

等城可为殷鉴。但一时不易攻下，应计划于二月至三月内多方设法攻下之。请你于赴洪德城时取道两城附近作一调查，并当面部署八十一师工作。爆炸药物与步枪子弹均已向外面设法。目前可撤回，打其出扰部队，弹药到后再行攻城。

毛　周

六日十二时

红军和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情况[1]

（1936年6月6日）

统一战线工作更进一步，各种准备正向着具体化。

日军五千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趋势。

反蒋运动呈开展局面，两广有宣布独立之传说，刘湘、何键似均不稳。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红军和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情况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西方野战军在西征战役第一阶段中的战果[1]

（1936年6月7日）

我野战军执行军委西征战役计划，左路军在曲子、阜城战斗，缴获马鸿宾师步枪一千二百余支，迫炮数门，俘敌冶旅长一，官兵千六百余人，占领洪德城、环县、曲子、阜城、三岔纵横约三百余里广大地区；右路军占领了宁条梁，打击三边、盐池一带地主武装，争取长城内外教民、蒙民数万拥护抗日红军，恢复并扩大了三边苏区版图。

目前，野战军已完成了第一步作战任务，正胜利地向西猛烈进展中。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红军第一方面军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政治委员宋任穷，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回民工作的基本原则和政策[1]

（1936年6月8日）

彭、刘，左、聂、朱、邓，徐、程、王[2]：

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

1. 政权形势在回汉民杂居地方，组织联合政府，回民区域组织回民政府，凡愿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红〈訇〉及一切回民均可参加。

2. 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必需资材经过回民捐给，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

3. 群众团体是回民联合会、解放会、抗日会，回民新战士成立单独伙食单位称回民抗日军。

4. 由回民中最先进的分子组织回民自己的党：革命党人民党。我们只吸收个别最觉悟分子入党。

5. 对回民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第一、第十五方面军的指示。

[2] 彭，即彭德怀。刘，指刘晓，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左、聂、朱、邓，指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徐、程、王，指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坏回文经典。其四大注意：A. 讲究清洁；B. 尊重回民风俗习惯；C. 不准乱用回民器具；D. 注意回汉两族团结。

毛泽东　周恩来　杨尚昆

关于两广事变的谈话[1]

（1936年6月8日）

在广播中听到广东的消息，说两广的军政领袖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并在广东成立抗日救国政府与抗日救国军。南京政府没有接受广东的要求，因此两广抗日救国军已经向北推进，讨伐汉奸蒋介石，并北上保卫华北地区，这样看来战争是不能免的了。

依据我们的观察，因为蒋介石一贯对日投降，放弃东北天津及华北，南京政府的地位日见沉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有一些人不愿同蒋介石一起去做卖国贼与亡国奴，他们勇敢地单独来抗日并打倒南京的屈辱外交，这是值得庆幸的壮举。

有人说部分的抗日是失败之道，吾人尚没有得到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真理。“一·二八”的上海抗战与长城的抗战非失败于部分的抗日，乃失败于抗战的领导者没有决心抗战到底，及采用一切方法使各种抗日力量参加进来，成为全国的抗战。领导者动摇无抗战到底的决心与自信，再加上汉奸的捣乱与日本的强攻，是“一·二八”

---

[1] 这是毛泽东对红色中华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上旬，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成立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并进军湖南。蒋介石急调部队入湘，阻拦联军北上。7月，在蒋介石的压迫与分化下，陈济棠失败。9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与长城抗战失败的主因。吾人试观满洲义勇军的部分抗战，（不还是零碎的，□□战的抗战）至今还未失败的事实，即是以证明吾人之所信者为不差。

在中国有一大群汉奸握着实权，若要等到全国整齐划一地来实行抗日战争（固然很好），但恐怕终究不会有这一天到来。

倘西南各领袖能决心抗战到底，能用严厉的办法对付汉奸，能善于团结发动全国的抗日力量，一致起来抗战，吾未见其有必然失败的征兆；反之，吾信其必然能取得伟大而光荣的胜利。

现在蒋介石也在人民面前用“停止内战”与“全国统一对外”的口号来反对西南，但这是蒋介石的无耻。蒋介石从“一·二八”以来拒绝了红军数次“国共停战一致抗日”的提议之后，今天居然也用这个口号来掩盖他的汉奸面孔了。但全国人民应该了解，只有蒋介石也应该立即对日宣战，并援助全国人民的武装对日作战，内战的停止与全国的统一便可以做到。若蒋介石自己不能抗日，而要求西南取消对日作战的宣言与抗日救国的抗日政府，要求红军取消抗日救国的主张，那么西南的领袖与吾人都应声明：“我们不愿与汉奸讲统一。”我们认为“制裁汉奸的内战”是必要的，我们内战的理由很简单，只是不愿做亡国奴和卖国贼。

蒋介石继续投降卖国，统一与停止内战已是不可能。全国必将继西南之后到处举起反蒋的旗帜。蒋介石除做溥仪之外必被推翻。

吾人认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几个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因此，吾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他各方面给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

吾人更希望西南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

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地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西南的领袖须执行这些彻底的革命纲领，来卸除一部分人民对你们的怀疑，并吸引全国人民的同情羡慕，则胜利可操左券。

吾人号召全国人民及一切真心爱国的党派团体与军队，一致起来响应西南的抗日救国行动，推翻汉奸头子蒋介石。全国规模的武装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在我们面前了。让我们在这个战争中取得胜利，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肃清一切汉奸，恢复我们的失地，统一中国！

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1]

（1936年6月9日）

目前国际情况，一面日本对华猛进，一面英苏妥协对日之形势。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死亡，做其冬天做总统的迷梦，并扩充兵力，大借美债。反蒋运动之开展是必然无疑的。

自胡汉民死后，亲蒋派邹鲁出洋，证明反蒋已成定议。唯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桂进较急，粤进较缓，内幕尚待续证。

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加强悦乐、曲子等地兵力及争取东北军工作致李富春、萧劲光等电

（1936年6月10日）

富春、劲光，并告彭、左、聂[1]：

甲、左、聂提议加强在悦乐、曲子、阜城地域的军区兵力，劲光应于派去的二五七团以外再加派得力的一连兵力，会合庆游击队成一小支队，在该地域以南及其西南活动，以掩护赤化并连接三岔交通。

乙、二五七团及上述小支队除在指定地域向庆设防警戒并肃清团匪外，应以主要力量进行争取东北军工作，而不是向东北军突击或攻击，省委并应派专人去指导。

毛　周

十号十时

---

[1] 指彭德怀、左权、聂荣臻。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6月10日）

宁夏根据联合抗日与回人自决两原则负责与宁夏各方势力的联系。

安边、定边的外交争取要用大力，且八等寨子亦然。庆阳方向则着重东北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1]

（1936年6月12日）

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事变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蒋介石在群众中还有欺骗作用。我们的办法是坚决驳斥胡适之[2]的亦即蒋介石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言论，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卖国的政策。要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大会，以对抗蒋介石的国民大会。要使西南从不是武装民众抗日变为武装民众抗日。

---

[1]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问题。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2] 胡适之，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

（1936年6月12日）

最近日本帝国主义大批增兵冀察以直接占领华北，组织全国性的走私，以破坏中国关税制度与国民经济，发动福建自治运动以侵略华南。无一不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预定计划，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前进。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抵抗的表示，而且处处替日本帝国主义为虎作伥，镇压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救亡运动，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抗日，签订《中日防共协定》，引狼入室，排除异己企图创立个人独裁，使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为所欲为。一切有良心的，有热血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际此日本强盗无耻汉奸横行华夏之时，无不义愤填胸，誓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奋斗到底！

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并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义声所播，全国人民无不振奋。我们谨代表全苏区抗日人民与抗日红军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我们更号召全中国爱国军人自告奋勇，出兵响应，全中国爱国同胞再接再厉，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两广的起义，务使此次抗日的军事发动扩大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翻然改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中国人

民红军更愿首先全部集中河北，担任抗日先锋军的任务，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

然而自两广发难以来，蒋介石南京政府不但丝毫没有接受两广请求的任何诚意表示，而且一再迁移时日，公开诬蔑两广当局为鼓动内战破坏团结，而暗中却调集大军企图拦阻两广军队北上抗日，挑拨离间，发动内战以捣乱抗日战线。对于蒋介石的这种罪恶行为，全国人民决不宽恕！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应该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同时要求与赞助蒋介石军队中很多有良心有热血的爱国将校，立即脱离蒋介石的降日政策自动率领部队与两广及红军联合北上抗日！

事急矣！全中国的爱国军人爱国同胞大家立即紧密的联合起来，集中力量向着日本帝国主义一致进攻！中国人民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更迫切的要求着坚固的抗日的联合战线。蒋介石所要召集的一切降日卖国的国民党二中全会，或御用的国民大会我们都要坚决反对。我们主张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政治的，社会的，职业的团体与武装队伍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并立刻实现下列的纲领：

（一）宣布对日绝交宣战，讨伐“满洲国”，收回华北与东北失地。

（二）取消一切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与卖国借款。

（三）惩办丧权失地祸国殃民的汉奸卖国贼。

（四）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直接对日作战。

（五）没收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六）保证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完全自由，释

放一切政治犯。

（七）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

（八）联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的国家与民族，联合日本国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众。

这是全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抗日救国的纲领，也应该是两广出师抗日的纲领。我们竭诚希望两广的爱国领袖们能够到处大胆的发动与拥护抗日人民的爱国运动，大量的武装与组织抗日人民，联合全国人民，为这一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我们相信只有当抗日的武装与抗日的人民打成一片，只有抗日的武装变成抗日人民的武装时，两广所发动的解放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拥护两广出师北上抗日！

全中国爱国军人联合两广一起打日本！

反对蒋介石拦阻两广义师北上抗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捣乱抗日！

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反对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与国民大会！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私，没收一切私货！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全中国人民抗日的联合战线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　德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

我军决定出瓦窑堡准备作战[1]

（1936年6月14日）

阎、蔡：

甲、东北军分三路向瓦市[2]前进，明（十五）日可进至永坪、蟠龙、安塞之线。绥清[3]敌人有配合可能。

乙、我军决定出瓦市准备作战。

丙、三十军得令后应以三天行程限十七日赶到延水城集中，准备侧击由清涧或由永坪向瓦市前进之敌。到达延水城后并应与二十九军密取联络，以便协同行动。

丁、三十军明拂晓前应脱离吴绥封锁线[4]以南，其向吴绥封锁线游击任务应交给清绥第三作战分区。

戊、已令谢嵩甘渭汉[5]率二十九军由临真经禹东于十七日起至

---

[1] 1936年6月中旬，在蒋介石命令下，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乘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在陕甘宁三省边界进行西征战役之机，分三路向中共中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瓦窑堡逼进。6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及中央各机关撤离瓦窑堡。当日，东北军进入。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治委员蔡树藩的电报。

[2] 瓦市，即瓦窑堡，今为陕西省子长县县治。

[3] 绥清，指陕西绥德和清涧。

[4] 指国民党军当时在陕西北部吴堡至绥德设置的封锁线。

[5] 谢嵩、甘渭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和政治委员。

延水、冯家坪之间待命。望与联络，因他们并无电台。

己、望将行动及作战分区部队电告。

毛　周

十四日二十三时

1936年，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

东北军活动情况和中央机关转移的部署[1]

（1936年6月15日）

彭，左、聂，徐、程，宋、宋，阎、蔡，李，萧[2]，并转至诚[3]：

甲、东北军现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昨日其左中两路已抵安塞、蟠龙，右路则达坪不塌，今日可到永坪。清绥敌人亦有配合前进可能。

乙、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4]一带，其辎重先行，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给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人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前线指挥作战。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李，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军事部政治委员。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3] 至诚，即杨至诚，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兵站部部长、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后方勤务部部长。

[4] 洪德城、河连湾，均位于甘肃省环县北部。

以杨家园子[1]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

丙、军委决定：

1. 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

2. 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红校在内），期于本月底完成。

3. 林彪[2]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定十六日开始。

丁、为顺利进行迁移，责成：

1. 两宋以两连兵力担任杨家园子、沙集[3]之线以北的掩护，并肃清该地带的团匪。

2. 劲光以一团兵力担任杨家园子、沙集之线的掩护，并肃清保安附近团匪。

3. 至诚至少集中二百只牲口，从十六日起驮粮来杨家园子，以便接运资材、机器及一部分伤病员至吴起镇、洪德城，并于吴起镇附近布置窑舍及粮食。

戊、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4]，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利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回攻。

军委　毛　周　彭

十五日二时半

---

[1] 杨家园子，村名，位于陕西省安塞县西北。

[2]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3] 沙集，村名，位于今陕西省吴旗县东北。

[4] 西南事变，即两广事变。

第二第四方面军宜北出甘南[1]

（1936年6月19日）

朱、张二同志，并转弼时同志：

甲、时局形势已起重大变化，这使中国革命走上了一个新阶段。党的任务是使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进到高度具体化，即实行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乙、西北国防政府[2]已经有了迅速组织的可能与必要。我们应以西北的发动去配合两广的发动。

丙、西北发动的时机与战略部署须以争取胜利为原则，依此原则并顾到各方面的条件。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3]地域。其理由：

第一，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4]。过去回汉仇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并转红军第二、第六军团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兼第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主张。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为实现全国一致抗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了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政策。

[3] 夏洮，指甘肃夏河和洮河。

[4] 三马，指马麟、马步芳、马步青叔侄三人，当时分别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〇〇师师长、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二军骑兵第五师师长。

恨是非常之深的，我们欲在西北建立局面，必须联合回人，否则将有重大不良影响。如出夏洮则引起冲突之可能极大。

第二，甘南敌情较弱。胡宗南[1]调走后，仅余王均、毛炳文、鲁大昌[2]等部。马步芳不会向甘南。若出夏洮则将聚王、毛、鲁、马各部于一狭小地区，红军行动将较困难。

第三，红军出至甘肃南，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

第四，甘南利于补充。

上述方针请考虑电复。

育英　洛甫　恩来
博古　泽东　德怀
十九日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2]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1936年6月20日）

一　对东北军的估计

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

但东北军现在还处在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过渡的时期。现在一般的他还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指挥下的军队；蒋介石的爪牙法西斯蒂的政训处，在那里是处于合法的监督者与宣传者的地位。在另一方面东北军的最高领导者以及一部分高级将领，已经有了抗日的决心与诚意。中下级官兵中间的抗日情绪是很高涨的，这就便利于我们抗日救国的宣传与活动。

但东北军内部转变的速度是不平衡的，有的部分则处于最先进的地位，有的则转变得异常迟缓，有的则尚未开始转变，而在蒋介石法西斯蒂政训处的直接影响之下。因此东北军内部觉悟的程度也极不一致。但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并不能否定全部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的基本估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一致就应该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

二　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

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就依靠于我们的争取工作。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目前超出于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但这并不排除对部分的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当觉悟程度不够的、自骄自大的、在蒋介石与政训处压迫与欺骗之下的部分的东北军，向我们采取积极进攻的敌对行动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可能与有利的条件之下应给以打击。这种行动一方面是为了自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这一部分东北军的教训，开辟以后在他内部能够顺利地进行政治工作的可能。所以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同样的也是为了政治上的争取，而不是为了消灭东北军。

三　目前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

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

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蒋介石在东北军的代理人，就是那个法西斯蒂的政训处。

我们在东北军全体将士面前，应该利用蒋介石每一丧权辱国的事实，来揭破蒋介石与他的政训处的每一欺骗。对于政训处每次所提出的反对我们的口号，我们必须给以及时的有力的答复。我们的答复应该利用铁一般的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们必须集中火力向着蒋介石与他的政训处猛烈进攻，处处把东北军的全体将士同法西斯蒂的政训处对立起来，使政训处完全陷于孤立，处于四面楚歌的环境中。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把东北军中个别最忠实于蒋介石的分子放到汉奸卖国贼的走狗的地位，放到东北军中的内奸的地位，而受到东北军全体将士的唾骂。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动摇的、中立的分子转变到抗日的战线上来。也只有这种斗争才能使东北军内部政治上的团结，更加巩固。

同时我们并不放松去分化法西斯蒂政训处内部的工作。在开展反法西斯蒂的斗争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号召法西斯蒂中一切有良心的有热血的，爱国的青年，同我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使法西斯蒂内部分裂，内部发生斗争。这一定使我们能够更顺利地开展反法西斯蒂的斗争。

当部分的东北军从部分的反蒋反政训处的斗争转变到整个东北军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反对法西斯蒂政训处的时候，也即是整个东北军公开起来号召抗日与实行抗日的时候。

四　东北军中的统一战线

我们的目的是在争取整个东北军，所以我们在东北军中的统一

战线应该是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而且都是为了达到同一的目的，即是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的目的。

上层统一战线在东北军中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东北军中许多军官都是东北人，所以他们中很多具有抗日的情绪与意志，便利于我们同他们成立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成文的与不成文的方式（如互不侵犯，互相通知，互相协商等）。特别重要的在统一战线中，我们应该同他们力求接近，向他们竭诚提出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与方法，对于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应该给以最清楚的详尽的与诚恳的答复，对于他们所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应该站在友军的立场上，共同协商，以求得适当的解决，决不因为某些部分的冲突与误会而妨碍大局。在这种合作的过程中，应逐步地把抗日救国的方针具体化，以引导有准备的抗日讨逆的行动。

为了加紧准备，以争取有利的发动时机。东北军的首长在目前对南京政府蒋介石以及政训处，采取外交上的应付的办法，是可以容许的，在发动以前也是必要的。但这种办法不应该使东北军在全中国人民的面前，失去抗日救国的政治立场，同时，凡同苏维埃红军有关的，应协商决定。

在东北军中的下层统一战线，是为了使东北军的下层官兵在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下团结起来，给东北军造成一个坚强的下层基础与推动的力量。这样，个别上层官兵长的叛变，不能影响下级的官兵，下级官兵可以拿他们的抗日的要求与情绪，去推动他们的官长走向抗日，坚定他们官长的抗日决心，而抗日的官长，也可以得到确实的依靠的力量。

下层统一战线也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从互不打枪，或枪

口朝天放起，一直到互相联络为止，下层统一战线应该对于东北军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表示消极怠工与敷衍塞责（如上级命令要筑堡垒，他们可不筑，或筑而不坚等）。

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一定能够使东北军在政治上坚强起来，加速争取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过程。

五　在东北军中创立坚强的领导的核心

我们各级党部现在对于东北军的工作，主要的还是从外面去影响东北军。我们利用我们的宣传品喊话、谈话、联欢、慰劳、演剧等等方式，去影响东北军。这种方法开始是必须的，我们也必需经过这种方法才能在东北军的内部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领导的核心，在内面去进行工作。

东北军中现在极大的弱点是只有个别的领导的首长，而没有一个领导的核心。我们从外面去进行东北军的工作过程中，应该帮助东北军去发现、物色与教育一批东北军自己的勇敢积极的分子，使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坚强的核心，经过它来推动整个东北军中抗日救国的工作，同时也可以经过它来同法西斯蒂的政训处以及一切内奸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这个组织首先应该普遍到各军师团中去。这个组织可以用“东北抗日军人社”或“东北抗日会”“复东会”“东望社”等名称。没有这个东北军自己的组织领导，东北军的工作是无法步伐整齐地与顺利地来进行的。

我们从外面对东北军中的工作，不但要找到个别的抗日的同情者与拥护者，而使每一个我们所找到的分子，本身在东北军中成为抗日救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我们不但要告诉这些同志以抗日救国

的道理，而且要告诉他们以活动的方法与方式。我们要懂得，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是处在帮助者、指导者的地位，而不是代替东北军包办一切。东北军的工作，要东北军中自己的积极分子与干部去办理，没有无数这类积极分子与干部，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力量，没有基础。

六　东北军中应该有共产党的小组与支部

在东北军中间，应该吸收最优秀的分子到共产党内来。东北军中凡愿意加入共产党的，我们必须加以必要的选择与考察，共产党的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发生横的关系。但共产党员的活动除党内生活外，应该完全是公开的。因为共产党员在东北军中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与团结东北军中一切抗日救国的积极分子，使东北军成为一个坚强的抗日军队。他们在东北军中完全以抗日的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东北军的领导核心中，应该有共产党的精干的小组，以实现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一切策略与决定。共产党的组织愈有力量，则东北军亦愈是坚强，必须批斥共产党的发展会瓦解东北军的思想。

在每一个可能的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进行工作，并在里面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将来开展的形势，我们现在即应该培养与训练一批专门到东北军中去的干部。

七　凡东北军驻扎的地方都应该有党的工作

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

心工作。党的支部干事会就是这一工作的领导者。但除了支干负总责外，支干中应该有一个同志去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由他去计划、组织与领导。经过党的支部，动员所有当地群众、妇女儿童、游击队、赤少队去进行工作。区委、县委、省委都应该有专门的人或委员会（如省、县）负责进行工作。

地方党在东北军中进行工作的方法，不应该是刻板式的，到处一样的，他们首先必须考察当地东北军的表现，内中政训处的活动，他们同民团的关系，然后采取适合于这种具体条件的方法。如果他们是捣乱的、抢夺的、捉人的，那我们应该采取坚壁清野与发动游击战争的方式以打击之，造成各种困难，以促使他们的觉醒。同时在这种行动中，我们依然进行我们的宣传鼓动的工作（如到处发散传单、写标语、喊话等）。对于我们游击队所俘虏的士兵，在解除武装之后，应很好的给以优待，然后放回（有宣传品则给宣传品，能写信则写信），并同他建立经常的关系。对于那些万恶的法西斯蒂小头子，或民团头子，如被俘获则枪毙之，并公布其罪状。如当地驻扎的东北军表现好，则可以用慰劳、联欢等方式来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

共产党是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是站在敌人之上，他的目光是远大的，不论东北军的表现怎样，他决不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但他也不是傻子，不管东北军的表现怎样，总是拿一种方式去对付东北军，而使自己受损失。他是要拿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各种各样表现的东北军。

八　办事处与工作委员会的统一与区别

只有在东北军驻扎的重要地点，只有东北军已经同我们有协约

的地方，我们才设立办事处。办事处是一个专门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机关。在办事处的周围，应该团结许多东北军中的积极分子。它对于当地东北军的一切行动与情况有最清楚的了解。办事处的组织应该简单灵便，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应该在政治上是很坚强的。办事处是地方性的组织，受地方党的直接的领导。凡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一切关于东北军中工作的情形，应该报告省或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取得经常的指示。

除办事处在中央或省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下，应该有许多流动的小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这些委员会拿一定的部队做对象，那个部队移动时，他亦跟着移动，使各种过去的关系能够经常保持与发展。凡工作委员会在有办事处的地方即同办事处合并在一处工作，办事处应受其领导。

工作委员会较办事处应该是更轻便与简单的组织。为便利于工作，与防止团匪与法西斯蒂的袭击，可采取化装等办法。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在政治上更应该是坚强的。

九 向苏区群众说明我们对东北军的方针为保护苏区群众的利益而奋斗

许多苏区的群众不了解我们对东北军所采取的策略，这是不足怪的，因为这种争取的方式是最复杂的，完全是新的方式，尤其是东北军中那些不好的表现，更使群众怀疑。

我们必须向苏区群众不断地解释这个问题，同时必须指出东北军中的觉悟程度是极不一致的，东北军同红军不是一个东西，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争取方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争取东北军与保卫苏

区群众的利益不是冲突的，而是互相配合的，牺牲苏区群众的利益以争取东北军不但是根本错误的，而且也无法动员苏区群众去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东北军就是保卫苏区群众利益的重要一部分。至于某一地区因为受到了东北军的摧残，而就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而心存报复，这无异因为部分的利益，而牺牲整个革命的利益，这自然也是错误的。

在任何情况之下，党应该是群众行动的领导者，党应该掌握当地的群众在自己的手里。群众的组织，群众的武装，和游击队的创立扩大，在任何情况之下是必要的。在和平的时候，这些组织与武装队伍，进行和平的工作；在战斗的环境下，那我们就进行战斗的动员。一切群众的组织与武装，时刻应该准备着应付一切新的事变。绝对防止某一事变的突然的发生，而仓皇失措，而组织解体。这是最大的危险。

现在是战争的时期，苏区的党与所有苏区的群众，都应该有战争的准备。我们要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为了整个革命的利益而奋斗。

十　同党内关于东北军问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关于东北军问题在我们党内现在有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倾向。

一种倾向，以为东北军既然同我们联合，是我们的友军，那东北军同红军是没有区别的。这种倾向自然是错误的，因为东北军同红军有很大的基本上的与性质上的区别。红军是从中国革命苏维埃革命中产生与壮大起来的革命军。而东北军则是有转变为抗日军队的可能的统治阶级的雇佣的军队（其他区别，不必多说）。

这种倾向的结果，必然使我们放弃争取东北军的战斗任务，放弃提高现在的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的任务，拿对付红军的态度去对付东北军。但这些同志在东北军表现不好时（这种不好的表现到处会遇到）就表示悲观失望，对于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就表示怀疑以至反对。

另一种倾向，因为到处看到东北军中的一些不好的表现，一开始就怀疑以至反对党争取东北军的策略。他们以为一切东北军同我们的联合行动，都是假的，都是为了要进攻苏区，达到他们消灭苏区的目的。这种倾向因东北军内部某些坏人的这种宣传而更加言之有据，这种倾向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根本否认了东北军转变为抗日军的极大可能，抹杀了东北军同红军合作的一切事实，结果也会放弃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这两种倾向的错误的主要来源，即是这些犯错误的同志不看到事情的本质，而迷惑于一时一刻的现象。今天看到这部分东北军好，就说东北军同红军一样，明天看到那部分东北军表现不好，就说东北军根本要不得。这种朝三暮四的估计，使我们无法决定一个对于东北军的确定的方针，而始终摇摆不定。

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来执行党对于东北军所采取一贯的坚定的方针。

（六月二十日于瓦窑堡）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6月25日）

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均请见告。

“两广事变”爆发，时局发展，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红四方面军行动问题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6月28日）

国民党东北军缺乏食盐，请令盐池、定边部队运送五千斤到吴起镇。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全国抗日反蒋形势
及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情况[1]

（1936年6月28日）

……

全国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央估计革命已走向了新阶段，是完全正确的。

南京以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出面答复我们的信已收到，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并转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和时机问题

（1936年6月29日）

德怀[1]同志：

甲、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

乙、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2]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3]这一条路，能够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

丙、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天或秋天，如能解决渡河船只，这是最好时机。一是冬天，夏秋不成功则只好等候结冰。

丁、不论采取哪一条路与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因此，请你考虑在七月下半月一及十五军团向金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3] 甘凉肃，指甘州、凉州、肃州，均为旧府名，即今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积宁安[1]之间或宁安中卫之间行动的问题，及在黄河抢夺船只的问题。

戊、如能在东岸解决马鸿逵一部又能抢到船只时，或东岸虽不能而依据已得材料我军有在西岸战胜马部之把握时，则均应准备西渡。

己、远方[2]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同时告诉左聂徐程[3]四同志，亦望对此问题提出意见。

毛泽东

二十九日

---

[1]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宁安，指宁安堡，为宁夏中卫县县治。

[2] 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3] 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和同桂荣的谈话[1]

（1936年6月）

刘嫂子，病好些了吧？

革命同志如同兄弟，大家都叫你刘嫂子，我怎么不能叫呢？

没有刘志丹他们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我们还没个落脚地哩！

---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志丹夫人同桂荣谈话的一部分。

今后战略方针和任务[1]

（1936年7月1日）

德怀同志：

一、各电收到。宁马[2]情况、红军情况、地方工作情况与西渡利害，大体已明白了。

二、二、四方面军业已开动，约七月半到松潘地区，八月初可出甘东南攻击王均毛炳文[3]。我方当派二十八军南下策应，尔后即转入陕南向河东行动，策应两广。

三、我野战军行动方针应依你的计划，七月以赤化现地为目标，八月以迫近河边求战为目标，九月以后依情况决定。如外蒙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我军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否则只好候冰期。如须等候冰期，则十二月以前我军活动区域除灵武、金积[4]外，自当展及固原、海原、靖远地区，将三边[5]、靖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3] 王均、毛炳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和第三十七军军长。

[4]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5]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远之间完全赤化。那时东北军当无理北进，甘宁之交当可巩固。

四、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可能。二、四方面军北上后局面当有变化，也许就在此时发动西北政府[1]。我们方针力争此着。但即能如此，打通苏联取得接济，仍是总的战略方针中重要一着。不论为红军为东北军均须如此，不过彼时行动更有便利条件。

五、七月工作应以赤化扩红训练三件为中心。关于增加新兵之重要性，即是准备接受远方的赠品，因此连带问题要把队伍训得更整齐些。还有附带问题，即应注意征集大批骡马。新兵与骡马之数目，以准备负载步枪一万枝，子弹三百万发为标准。再则西渡过冬衣服要多些，每人须准备棉衣、风衣，冬天是应该注意的。

六、为准备在二、四方面军北上后不久时间东北军能作政治军事上的发动（为策应西南甚宜早动），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部军师团三级。目前分工，甘肃境内完全由你任之，陕西境内周[2]与我任之。办法：须派较得力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抗日”“反蒋”“联俄”“联共”“东北军本身问题”“组织问题”等五六个根本而且具体的问题。现请先在前方征集干部（如邓小平、黄克诚[3]等），经过你的训练，找得适当线索，派遣出去，往来于彼我之间。我们于若干天后或派克农云逸[4]二人来加

---

[1] 指西北国防政府。这是中共中央当时的主张。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为实现全国一致抗日，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了建立地区性国防政府的口号。

[2] 周，指周恩来。

[3] 邓小平、黄克诚，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和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

[4] 克农，即李克农，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保卫局局长。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参谋长。

强之。此事请大大注意。这边正动员剑英克农章伍[1]三人向王刘[2]两部三师三旅十八个团分途突击，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至于上层及在东北军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七、此电不准告知下级，其中许多执行事项，统由你负责指挥之。

泽东

一号二十时

---

[1]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克农，即李克农。章伍，即边章伍，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五科科长。

[2] 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刘，指刘多荃，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〇五师师长。

庆祝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致朱德张国焘等电

（1936年7月1日）

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萧克各同志转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之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中央及一方面军自去年北上与陕甘红军鄂豫皖红军会合以来，首先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围剿。在中央十二月政治决议案，及国际七次大会决议案的领导之下，组织了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占领了同蒲铁路，击溃了阎锡山的主力，推动了全国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向前发展，唤醒了许多国民党军队同情于我们抗日救国的主张。第一方面军现在转向甘肃宁夏方面策应你们北上，又复连战皆捷，占领了定边县，盐池县，豫旺县，环县，宁条梁，曲子镇，洪德城，同心城等十余个大小城镇。消灭马鸿逵、马鸿宾的许多队伍，开辟了九个苏维埃县，夺取了出产丰富的盐区与长城外的蒙古民族

及甘宁回族，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同志们，西北的政治环境是很好的，二四方面军北上之后，我们就有更伟大的力量来进行西北各民族各党派各武装势力的大联合。目前全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向华北大举进兵之后已经引起了与正在引起着中国内部许多重大的变化，平津沪粤各地如火如荼的抗日人民阵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踏步的前进着，东三省境内的人民抗日联军是英勇的斗争着，两广当局抗日救国军的发动，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在广西是执行着联俄联共的政策，在各省已有许多反蒋势力正酝酿着继续的发动，蒋介石一贯的卖国政策，不但引起了全国的反对，而且把他自己系统里的势力，推进到动摇分化与缩小的道路上去了。各方面的特点都指出中国革命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了。在国际，苏联是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地位，他不但有力量防御外国的侵略者，并且能够广泛的援助世界上一切反对侵略的和平集团及一切弱小的国家与民族，苏联对于中国红军与人民抗日的集团是更加积极援助的。此〔外〕法国人民阵线的伟大胜利，西班牙的革命胜利，欧洲反侵略阵线的扩大，英国和美国和平运动的增长，埃及，印度，阿拉伯民族斗争的展开，亚比西尼亚[1]英勇战争的影响，中美洲与南美洲半殖民地各国革命运动的前进，主要侵略国家日本德国意大利各阶级营盘间的斗争与统治营盘内部间的斗争之极端的尖锐化，所有这些，指出世界革命形势，也是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上面去了。全世界的共产党与革命势力包括中国的共产党，红军，苏维埃与一部〈切〉革命势力在内，通通都在共产国际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压迫剥削的统一战线的方针之下而一天一天团结起来

---

[1] 即埃塞俄比亚。

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联结起来了，革命在全中国全世界上的胜利是有了保障了。同志们：我们相信你们将更加激励你们无尚热忱，勇敢，与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为苏维埃红军的光荣旗帜而斗争，为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斗争。我们是准备着庆祝你们北上抗日的伟大胜利。中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万岁！西北革命大联合万岁！全中国抗日讨逆的统一战线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王稼蔷，林彪，凯丰，罗迈，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叶剑英，杨尚昆，罗瑞卿，张云逸，左权，聂云臻，朱瑞，邓小平，徐海东，程子华，郭述中〈申〉，王首道，周昆，袁国平，罗荣桓，陈赓，黄克诚，周士梯〈第〉，宋时轮，宋任穷，萧劲光，阎红彦，蔡树藩，王相〔传〕，冯文彬，郭洪涛，马明方，李富春，贾拓夫，朱理治，聂洪钧，蔡畅，邓颖超，刘群先，刘英，周兴，杨森，高岗，马锡武，崔田夫，贺景〈晋〉年，张达光〈志〉，郑〈霍〉维德，马义，刘英勇，钟赤兵，王达成，赖大超，马丕勋，刘子义〈久〉，刘景范，史秀芸，白爱玉，崔田民，王世泰及中国人民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国陕甘宁人民红军各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共产主义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陕甘宁三省苏维埃政府，共产党部，青年团部，抗日人民团体，抗日赤卫军，抗日少先队联合致意。

七月一日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7月）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这样，对打马步芳、毛炳文、王均等部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

两广因无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发生内变；然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从东北来说，统一战线方面又“有了进步”。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旧居。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7月）

红二、红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这样，对打马步芳、毛炳文、王均等部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势”。

两广因无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发生内变；然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从东北来说，统一战线方面又“有了进步”。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旧居。

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1]

（1936年7月14日）

德怀同志：

甲、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战时，似宜集结更优势之兵力，期于一举消灭之。

乙、在作战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再引退些，把敌诱至条件具备之情况下，以便一举消灭，这里须要更多的忍耐性。

丙、扩大与训练部队，使红军生息强大，造成将来战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条件。

丁、对何柱国[2]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戊、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以上各条，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请特别考虑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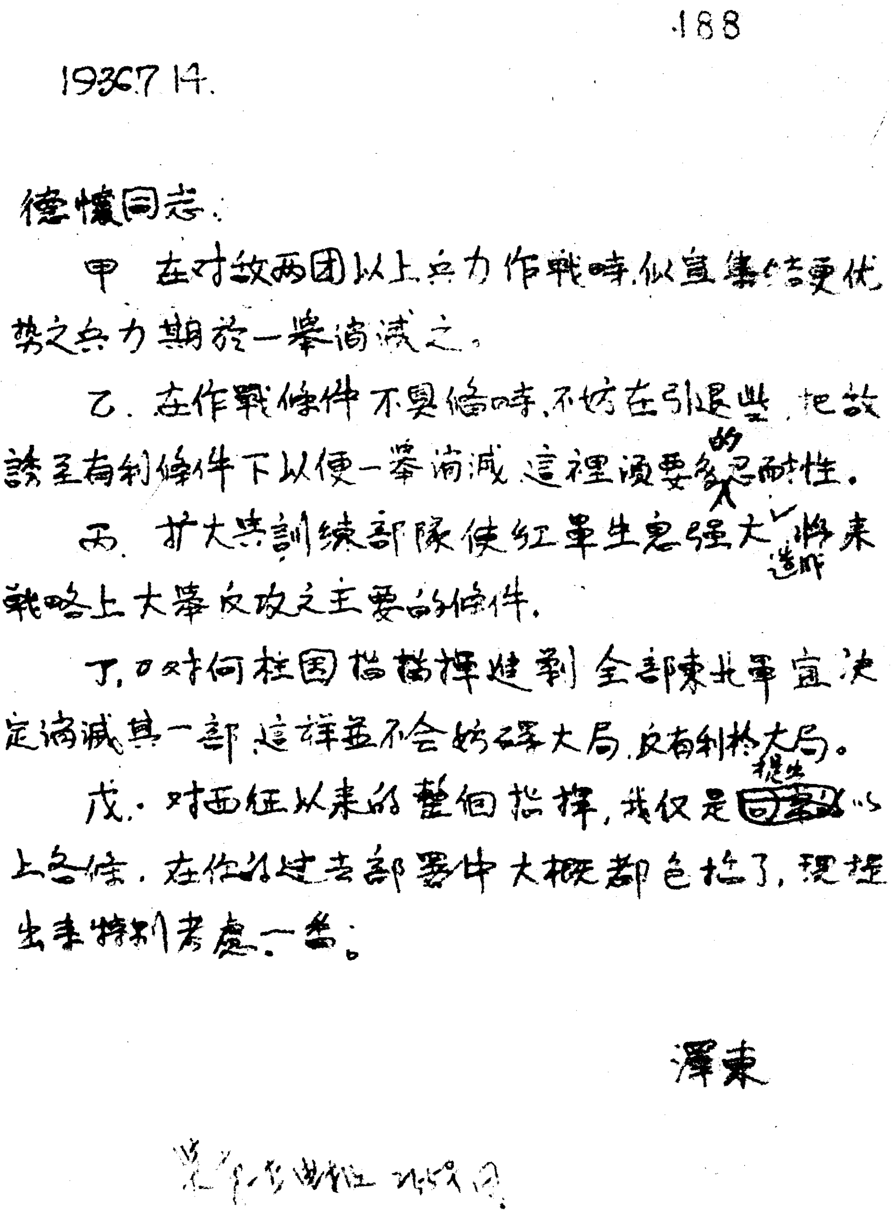
泽东

十四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所发现的抄件中，有个别不同之处，均按原稿排印。

[2]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188

1936.7.14.

德懷同志：

甲 在对敌两团以上兵力作戰時，似宜集結更优势之兵力期於一举消滅之。

乙. 在作戰條件不具備時，不妨在引退些，把敌誘至有利條件下以便一举消滅，這裡須要多的忍耐性。

丙. 扩大与訓練部隊使红軍生息强大，造成將来戰略上大举反攻之主要的條件.

丁. 对何柱国指揮建制全部東北軍宜决定消滅其一部，這样並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於大局。

戊. 对西征以来的整個指揮，我仅是~~同意~~提出以上各條，在你的过去部署中大概都包括了，现提出来特别考慮一番。

澤東

[illegible]

毛泽东关于西征作战给彭德怀的电报。

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

（1936年7月15日）

哥老会的弟兄们!

我们中国民族的死敌，日本帝国主义，最近吞并中国的野蛮强盗行为，是愈来愈凶狠了。他们不但强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并且进而实际地统治着整个的华北。不独利用走私，破坏我国的整个经济生活，增加破产失业的种种痛苦，并且采用对台湾朝鲜殖民地的制度，向华北增兵五万之多。这些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设施，都是在把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把华北变成进攻全中国的根据地。而且正向着中国的西北、华中、华南进行强暴的侵略，要吞并全中国成为他的殖民地，要变四万万同胞成为他的奴隶牛马。亡国灭种的惨祸，已经燃烧到我们的眉睫了，我们是处在千钧一发，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除了少数卖国贼汉奸之外，稍有血气的中国人，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莫不怒发冲冠，气愤填胸，要和日本帝国主义作一拼死活的抗战！近日西南的军人领袖李宗仁、陈济棠等高举抗日大旗，北向进兵，并要求南京政府蒋介石氏出兵抗日。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走上了新的阶段。

哥老会素以兴汉灭清打富济贫为宗旨，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哥老会曾积极参加过，陕北革命亦得着了哥老会同志不少的帮助拥护与积极参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

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这种革命的精神，光荣的事绩，现在更应大大地发挥起来，为了救中国救自己而奋斗。

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曾历次宣言，宣布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凡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应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亲密地团结起来，一致去打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而取得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哥老会历来是代表民族志士及广大农民与劳苦群众的组织，始终受政府军阀官僚的压迫，被目为“下等人”，被诬为“盗匪”，而不能公开存在。哥老会所遭受统治阶级的待遇，同我们所遭受的待遇，实是大同而小异！你们过去主张兴汉灭满，我们现在主张抗日救国，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你们轻财仗义，结纳天下英雄好汉，我们舍身救中国救世界，联络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与阶层，我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主张都相差不远，我们的敌人及我们的出路更完全相同。因此，现在更以至诚特向全国哥老会的全体弟兄们宣言，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这是你们的神圣义务，也是全中国人民的神圣义务！

苏维埃政府是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的政府，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摧残和通缉的人民，我们负招待保护之责。因此，哥老会可以在苏维埃政府下公开存在，我们更设有哥老会招待处，以招待在白区立不住脚的英雄好汉、豪侠尚义之士。我们希望，我们要求，我们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我们是在热烈地等待着，欢迎着你们！我们高呼：

发扬哥老会过去革命的精神！

哥老会和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日本兴中华！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为汪锋等中共代表亲自签名盖章的介绍信

（1936年7月15日）

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国家危急亟，宜一致奋起组成坚固的抗日阵线，为着坚决保卫平津，保卫冀察、晋绥、山东，与仇敌血战到底之总方针而斗争。弟等对　　先生抗日决心甚为钦佩□□　　　　同志前来晋谒。请予接洽交换意见，并赐指示，以期驱除强敌，共救危亡。临书不胜屏营系念之至。

敬致

抗日民族战争之敬礼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

（1936年7月、9月）

外交问题

（7月15日）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

---

[1] 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1936年7月他到达陕北保安，是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区域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毛泽东多次接受他的采访。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和他的3次谈话，分别刊载在美国《美亚》杂志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问：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答：关于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1]、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2]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

---

[1] 暹罗，泰国的旧称。

[2] 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

1936年，斯诺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重要领导人，并写出了第一部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的书《红星照耀中国》。

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

益。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如果承认，是哪些条约？

答：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他们通过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华北走私，以及各种非法活动，正在逐步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别国政府可能要问："你们对于我们同以前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日本，收复中国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国的主权，到那时它对类如治外法权这样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到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伪满洲国建立特殊关

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包括像何梅协定、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问：*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末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

答：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

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问：关于（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问：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

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对英国人民的态度同对美国人民的态度差不多。英国人民中也有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我们尊敬并欢迎这种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

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

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亚[1]时，他宣称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隶。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时，他对德国人民说光荣胜于面包，对欧洲人民则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者。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也说，他们是在解放中国人民。

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G. Wells）[2]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传多么愚蠢，少数人还是受了骗。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虚假性。由于中国现在谋求同苏联订立一个条约，法西斯分子就断言俄国企图“收买”中国。如果这样，那法国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块殖民地了——欧洲其他几个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也都如此了。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的这个“逻辑”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欲望——就像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行动，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等等。他们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希特勒在欧洲某些部分的行动，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可以说都不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胁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法西斯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迹象。

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随着中国革命的胜

---

[1]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2] 威尔斯（1866—1946），英国作家，早期写过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如《时间机器》《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后来又发表长篇小说，并著有《世界史纲》等。

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假如你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个“威胁”，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将领，问问他的意见。他将告诉你，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缔结条约来反对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民所要的就正是这个。中国人民不怕这样的运动，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将高呼：“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万岁！一个自由、团结、自主和完整的中国万岁！”

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1]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

[1] 参见斯大林1936年3月1日《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斯大林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在其他国家也要产生。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的革命者觉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时候，革命才能产生。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页）

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

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1937年，英国伦敦最早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7月16日）

问：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问题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答：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许多呼吁和宣言，主张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各方面的军队等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誓死斗争，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国目前能单独打败日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

答：让我先提醒你，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

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连某些国民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

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

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你认为日本会发生革命吗？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愿意与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好同盟，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

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说，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的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答：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

答：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

问：作为这种合作的报答，共产党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答：共产党会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此外，它还会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

问：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红军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论基地大小，红军都能进行战争。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动员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有三四个省，我们就

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的革命斗争了。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参加到这样一场战争中来呢？

答：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准备。但学生与革命的抗日群众仍然没有自由，不能得到动员、训练和武装。如果情况与此相反，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末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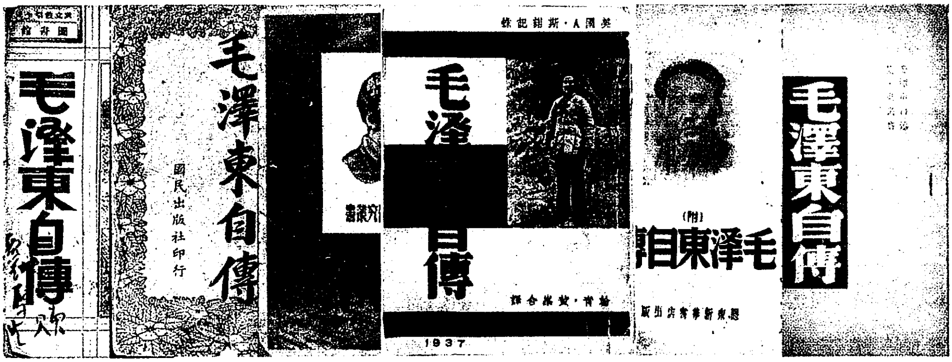
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

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根据斯诺著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中文版《毛泽东自传》(部分版本)。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

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论统一战线

（9月23日）

问：能否请你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改变。

答：有三个主要因素使我们决定最近的宣言[1]中所公布的政策。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

[1] 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第二，从去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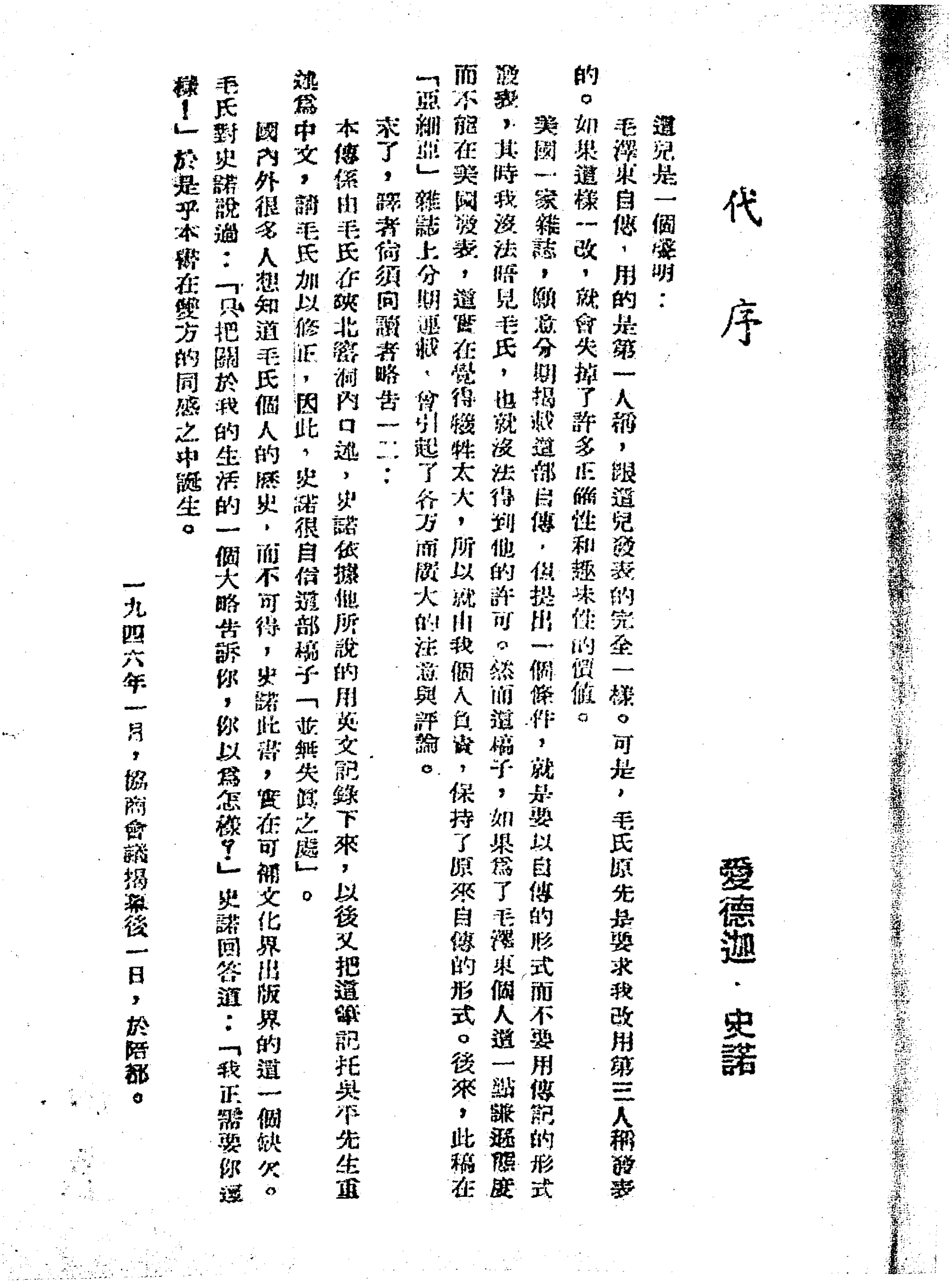
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主要特点。由于有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已经在我们最近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来了。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

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问：这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在苏区也同样有效？

答：是的。



代序

愛德迦．史諾

這兒是一個聲明：

毛澤東自傳，用的是第一人稱，跟這兒發表的完全一樣。可是，毛氏原先是要求我改用第三人稱發表的。如果這樣一改，就會失掉了許多正確性和趣味性的價值。

美國一家雜誌，願意分期揭載這部自傳，但提出一個條件，就是要以自傳的形式而不要用傳記的形式發表，其時我沒法晤見毛氏，也就沒法得到他的許可。然而這稿子，如果為了毛澤東個人這一點謙遜態度而不能在美國發表，這實在覺得犧牲太大，所以就由我個人負責，保持了原來自傳的形式。後來，此稿在「亞細亞」雜誌上分期連載，曾引起了各方面廣大的注意與評論。

末了，譯者尚須向讀者略告一二：

本傳係由毛氏在陝北窰洞內口述，史諾依據他所說的用英文記錄下來，以後又把這筆記托吳平先生重述爲中文，請毛氏加以修正，因此，史諾很自信這部稿子「並無失眞之處」。

國內外很多人想知道毛氏個人的歷史，而不可得，史諾此書，實在可補文化界出版界的這一個缺欠。

毛氏對史諾說過：「只把關於我的生活的一個大略告訴你，你以爲怎樣？」史諾回答道：「我正需要你這樣！」於是乎本書在雙方的同感之中誕生。

一九四六年一月，協商會議揭幕後一日，於陪都。

根据斯诺著《红星照耀中国》翻译的中文版《毛泽东自传》的代序。

问：这是不是说，苏区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法

律，将被废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与中国的亲日派会强烈地反对这个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但是中国人民将会欢迎这个纲领，我们相信他们将进行斗争以促其实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看到，如果不这样做，就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就要灭亡。

我们知道，一部分国民党人已在反对进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军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同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组成一个联合的力量去压倒亲日派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即（一）联合苏联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二）联合中国共产党，（三）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能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我们准备同它合作，给予支持，并同它组成一条反帝统一战线，就像一九二四——二七年存在过的统一战线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如果这样的纲领实现了，我们是不必惧怕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

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打算组成它自己的反共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灭亡中国的战线。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

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

问：你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例如，在选举权方面，你将坚持什么样的最低条件呢？

答：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不受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别的限制。

问：如果南京接受这样的纲领，红军将同意改变它的名称，并服从南京的上级命令吗？

答：我们承认，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

至于红军换不换名称，要视重新联合的情况而定。

问：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

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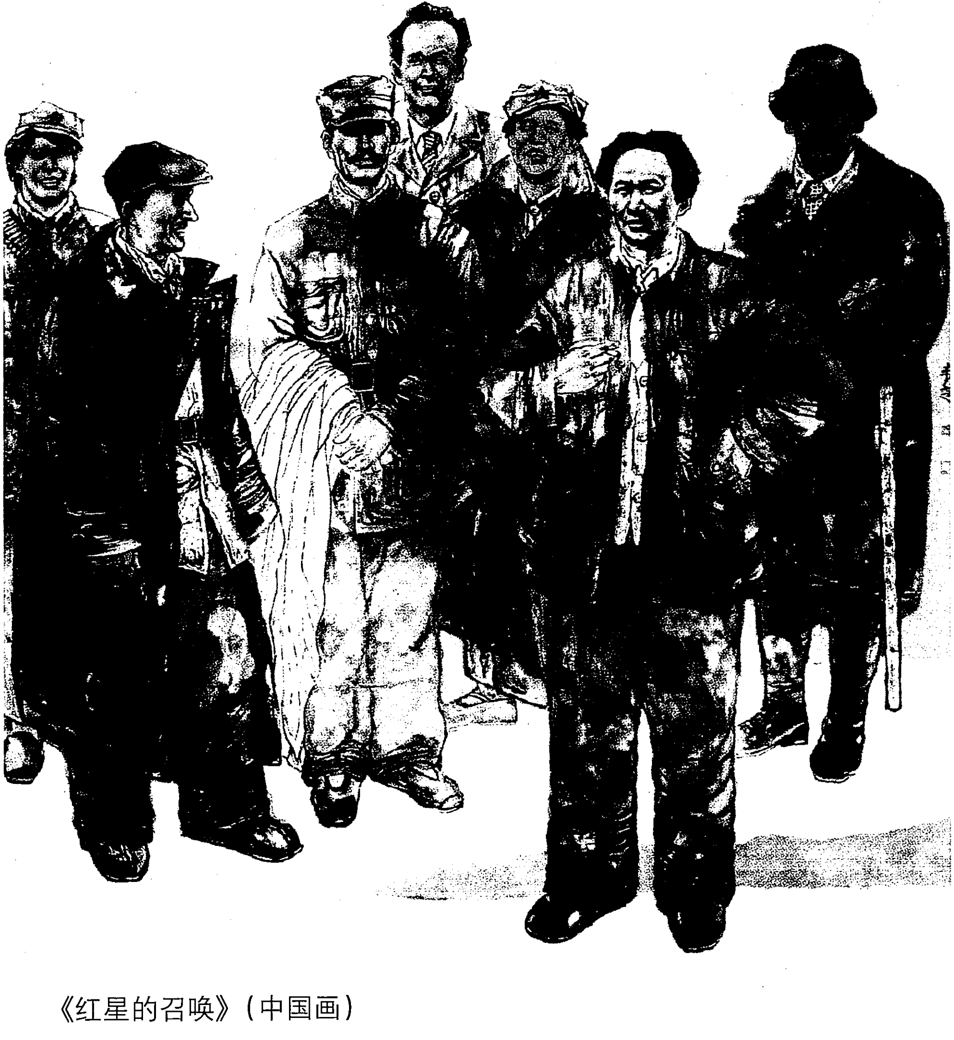
问：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

答： 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问： 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实际上意味着立即向日本宣战？

答： 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联合，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斯诺拍摄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小号手。



《红星的召唤》（中国画）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7月20日）

何柱国集中五个师向我进攻，我军如何部署？如与之决战，须集中最大兵力方为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7月21日）

红七十八师、红八十一师调豫旺，红二十八军调定边、盐池。现安边、靖边之线防御力量甚少，感吴起镇、保安之线颇受威胁。请周恩来令红三十军飞速开新城堡。萧、赖[2]将吴起镇以北部署情况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萧劲光并告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萧、赖，即萧劲光、赖传珠，当时分别任陕甘宁省军事部长和政治委员。

关于二、四方面军迅速出至甘南致朱、张、任电[1]

（1936年7月22日）

朱、张、任同志：

（甲）目前陕甘宁为汤恩伯、杨虎城、高桂滋、高双成、张学良、何柱国、于学忠、马鸿逵各部共150余团，在蒋介石命令压迫之下，向我进攻。毛炳文全部、马步芳一部亦被我吸引到甘北附近，正图先击破我再阻止你们北上。

（乙）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

（丙）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丁）国际电台联络从6日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

育英　洛甫　泽东
恩来　博古　德怀
七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

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

（1936年7月22日）

为着使苏维埃真正成为全国人民团结的中心，必须使苏维埃现行各种政策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性质。土地政策在苏维埃各种政策中至今占着主要的地位。实现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自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苏维埃在土地政策方面作了许多重要的改变（如富农政策小地主政策，分析阶级及一些特殊问题的决定等等）。这种改变已经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苏区里面已经收得实际的成效，但是为要使土地政策实施能够清算封建残余，尽可能地建立广大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的目的，需要进一步地审察现施土地政策，并给以必要的改变。

因此中央对这个问题有如下的决定：

（一）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等全部没收；

（二）对于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一律没收，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分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地主耕种分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

（三）对于下面各种小业主的土地，不应没收：

（甲）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和手

工业者等小业主的土地；

（乙）凭自己劳动所得积蓄起来的工人所有土地；

（丙）生活情况很坏的小地主；

（丁）原非地主，因失去劳动力而不得不出租土地的；

（戊）将土地出租而自己仍受雇于人的。

上述各项小业主如有为汉奸卖国贼者，照汉奸卖国贼处置。

（四）一切抗日军人及献身于抗日事业者的土地不在没收之列；

（五）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如果在基本农民要求之下，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地主也当拿出平分，但富农应照一般平分条件得到土地（即与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

（六）对于大农主、企业主（主要的不依靠地租剥削而依靠大量雇农经营土地或畜牧的业主）的土地，因其生产方式带有进步的色彩，应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大农业企业主的土地牲口粮食等如多数农民要求平分时，应拿出平分之；

（七）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侵犯他的商业部分；

（八）对高利贷宣布取消。由苏维埃人民政府颁布新的借贷条例，限制苏区人民借贷利率，但商业借贷及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

（九）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但无论何种出租土地的业主，均须废除旧时残酷的和奴役的出租办法，一律遵守苏维埃政府所颁布的出租条例，无有例外；

（十）应改善农村工人生活条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专门的农业雇佣条例通行之。

上述各项决定，在新开创的苏区中立即执行，老苏区已经分配土地的照原办法不变更，实行这些决定的各种具体条例及其细则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另行规定颁发之。

中央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7月23日）

部队[2]集中之后，宜作十天训练计划，军事政治的突击，即以此为对何柱国作战的准备。十天后如果还没有良好作战机会，则再训练十天。目前休息、训练是主要要求。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指由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为主组成的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地方武装集中与分散并用的原则[1]

（1936年7月23日）

彭：

关于地方武装集中分散问题：

甲、地方武装分散与集中并用的原则，分散以到班为止，集中以到独立师为止，中间有排、连、团的各种形式，依照敌情及苏区巩固的程度而适宜配置之。在敌情严重及苏区尚未巩固之时，应偏重于分散配置。

乙、过去中央苏区与今年春季陕北苏区采取过于集中的配置，致使县、区、乡失去了自卫武力，县、区、乡的党与政府失去了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在敌人进攻时便变为不利于我们。

丙、陕甘宁新苏区在肃清团匪[2]、防卫外敌活动、群众建立并巩固政权的任务面前，一般在一县之内或两县之内，特殊的在一区或两区之内，至少必须有一连一排或一班不等的自卫武装的配置。例如定安二县[3]，其有散匪七、八股，因地方无武装，至今不能建立政权，工作员被匪杀者十人之多。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团匪，对反动地主武装民团、靖卫团等的蔑称。

[3] 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和安边。

丁、请考虑独立师的分散配置及其他地方武装不过分集中的问题。

泽东

二十三日三时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和贺子珍。

和斯诺关于特殊问题的谈话

（1936年7月23日）

问：在实际情形下，倘若中国革命胜利了，那么苏维埃中国和苏维埃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否仍维系于第三国际或类似的组织中，或者是否会是实际上某种政府的合并呢？中国苏维埃政府与莫斯科的关系，是否可以和现在外蒙政府与莫斯科的关系相比呢？

答：我想这纯粹是一个假设的问题。我对你说过，现在红军并不在谋求统治权，而在谋求有一个统一的中国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第三国际是一个汇集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体经验而使世界各国革命人民获益的组织。它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它的内容和第二国际大不相同，但组织上却没有多大的区别。正如没有人会说因为某国的内阁由社会民主党组成，就是第二国际在统治一样，所以，如果说一个国度里有了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在那里统治，也是很可笑的。

在苏联，共产党掌握着政权，但即使在那里，第三国际也没有统治权，更无对民众的任何直接的政治权力。同样，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所统治。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绝对不是为了把中国交给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

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只有在中国群众和俄国群众的利益相符的时候，才可以说是“服从”莫斯科的“意志”。当然，一旦中国群众像他们的俄国弟兄一样，建立了民主政权以及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获得解放以后，这种共同利益的基础将极大地扩大。

当许多国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以后，也许会产生苏维埃国际联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也是很有趣的。但是今天我提不出什么方案，这是一个尚未解决而且不能事前解决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上，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日益密切，这样一种联盟看来是急切需要的，如果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话。

但是，显然最后一点是极为重要的，那就是各国按照人民意志有加入或退出的权利，各国主权完整，绝非“听命”于莫斯科，这样的世界联盟才能成功。此外，共产主义者从未有过其他别的想法。“莫斯科统治世界”的神话，只是法西斯和反革命者的发明罢了。

外蒙和苏联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一向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原则之上。中国人民革命成功以后，外蒙共和国将按照自己意愿，自动地成为中国联邦的一部分。回族和藏族人民同样可以建立自治共和国参加中国联邦。如国民党所实行的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待遇，绝不能包括在苏维埃政纲之中，也不能包括在民主共和国的政纲之中。

问：请你解释，为什么苏联将来对胜利了的苏维埃中国的援助，跟过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活动有根本的不同？为什么你认为关于“赤色帝国主义”的指责是荒谬的呢？

答：有人说法西斯没有什么创造能力，对此我却不完全同意。“赤色帝国主义”一词实际上就是他们所创造的，这可说是法西斯头脑创造力水平的一个绝妙的实例。日本和中国的法西斯在这个名词的背后，希望奴役中国。我们其实不必回顾国民党以往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这种宣传究竟是否起了作用。

假使真有“赤色帝国主义”这个东西，那么南京政府自己之有今日还全亏了它。当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进行革命的时候，谁都知道，鲍罗廷和加伦将军帮助了国民党，共产党也同它进行了合作，共产党人领导了国民革命中许多最优秀的干部。那时候没有国民党员谈起“赤色帝国主义”。但是当国民党变为反革命，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义，开始压迫工农，与帝国主义妥协之后，他们之中的最恶劣分子，才创造了“赤色帝国主义”这个名词，并在反动报纸上把它变成了掩盖他们背叛中国人民行为的护身符。

事实到底怎样呢？即使蒋介石也不能否认，当国民党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时候，革命达到了一个高潮，帝国主义的基础动摇了，而民族解放的前景非常光明。孙中山先生死后，他的不肖党员开始背叛他的主义和政策，国民革命运动突然衰落了，国民党失去了所有的革命性，向帝国主义妥协，把中国最好的省份不抵抗地送给了日本，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帮助，进行长期内战来反对人民的革命。

只有经过了十年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群众迅速沦为奴隶，南京现在方开始明白苏联才是中国真正的朋友，而国民党要反抗帝国主义，只有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重新联合。

今天，斗争已经尖锐到成为两个阵营之间的战争了：第一个由日本领导，包括汉奸和反动派在内，组成所谓与日本帝国主义提携

的反共阵线；第二个由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及一切同情中国革命的国家组成，这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阵线。反共阵线基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合作，反日战线基于和苏联及所有同情中国为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合作。反共阵线就是民族奴化，反日战线就是民族解放。中国人必须会逐渐地要末投入这一个阵线，要末投入那一个阵线，二者必择其一。

的确，许多国民党人如今迫于环境，或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在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了。过去有许多爱国人士，如宋庆龄、何香凝、陈铭枢、蔡廷锴、李济深和蒋光鼐等，都明了国民党的基本错误是继续“剿匪”。现在李宗仁、冯玉祥、孙科、宋子文、张学良和其他人也正在改变他们的观点，似乎愿意恢复他们和苏联的合作。

我们坚决主张和苏联密切合作抗日。哪个派别希望结束中国的内战，建立一个联合的民主的人民抗日政府来保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我们就欢迎并跟它合作。

问：你怎样解释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红军仍然节节胜利呢？它不可征服的秘决究竟在哪里？

答：这有三个原因。第一，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支持它。除非先消灭了爱护它的人民群众，否则是没有办法消灭它的。白军进攻苏区时，他们不仅是在打红军，而且是在打那些苏区所有的老百姓。

第二，我们之所以能生存是依靠共产党正确的战略技术的领导。

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能干、正确、聪明、忠实和真诚的。每个红军指挥员，只要他接受南京的贿赂和奖赏，随时都可以发一笔财不干了，然而九年战争以来，我们倒向国民党的指挥员屈指可数。

问：在中国赤色运动胜利的时候，你认为在其他亚洲的殖民地

或半殖民地国家，如朝鲜、印度支那、菲律宾或印度，会很快发生革命吗？中国现在是不是世界革命的关键呢？

答：中国革命是世界形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它的胜利是各国人民，尤其是殖民地国家的劳苦大众所热诚期待着的。中国革命一旦完全成功，许多殖民地国家的群众一定会仿效中国，赢得他们自己国家革命的同样胜利。不过，我现在得重新强调，“夺取政权”并非我们的目的。我们现在希望停止内战，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一起建立一个人民民主政府，为抵抗日本、争取独立而战。

问：中国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你有什么看法？

答：中国革命的胜利，自然要由革命斗争发展的客观形势来决定，而这个形势太复杂了，现在难以预测。但是我们可以说，这个胜利并不很遥远，它将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胜利同时来临。

中国人民将会采用最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政体。我们以为这种政体是一种民主共和国，全部权力掌握在有了选举权的人民群众的手中。在组织上，我们相信，苏维埃制度——自中央权力机构以至最小乡村的代表制，是最适合于实现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也是最能为中国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的。

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结束以后，革命在国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此它的首要工作是调整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农村急需改革，这可以从现在土地分配的数字中看出。国民革命的时候，我是国民党农民委员会的秘书，负责搜集二十一省的土地分配统计数字。我们的调查表明了惊人的分配不均。大约百

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是贫农、佃农或半佃农以及雇农。大约百分之二十是自耕的中农。高利贷者和地主约占百分之十，在这百分之十中还包括有富农、军阀、包税人之类的剥削者。

这百分之十的富农、地主和高利贷者，共占有约百分之七十的耕地。中农占有百分之十二至十五。而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佃农、半佃农和雇农，只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

这些统计当然在全国各地有极大的差别，甚至相邻的两县差别也很显著。我所引用的数字，是当时我们调查到的全国平均数，农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曾汇编了二十一个省的数字。当然，在反革命事变之后，这些统计材料就搁置起来了，而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无法从南京政府听到关于中国土地分配的任何意见。

但是，这些事实可以很大程度地解释红军的成功。革命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者和百分之十的中国地主以及剥削者的双重压迫而引起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争取民主、土地改革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新要求，至多遭到占人口百分之十的人的反对，而实际上不是百分之十，大约只有百分之五。甘愿做汉奸，上日本共同“防共协定”的圈套，联合日本人来征服自己同胞的中国人，不会超过百分之五。

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工作[1]

（1936年7月26日）

上海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对他们的指示，着重点在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但须分清谁是敌友。对一切可能同情我们的应大大地开门，但对真正的法西斯分子是应该关起门来的。对文化界的矛盾，也应注意，并要好好说服他们。对他们的指示信，不要太简单。对华北方面，也应去一封信。华北工作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对他们的弱点，同样亦应给予指出。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统战联络工作和上海党组织工作讲话的一部分。

我军应继续执行三大战略任务[1]

（1936年7月27日）

德怀同志，并转左、聂、朱，徐、程、王，宋、宋，萧，李，刘晓[2]：

关于野战军的任务问题。

甲、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决机动的指挥与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东方的游击战争是坚决的持久着，南方的统一战线是发展了。中央与军委三大战斗任务[3]已经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杨尚昆给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人的电报。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前线指挥作战。左、聂、朱，指左权、聂荣臻、朱瑞，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徐、程、王，指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李，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省委军事部政治委员。刘晓，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3] 东征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于1936年5月在陕西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东征战役作出总结，并布置西征战役。当时中央赋予红军第一方面军和陕甘苏区的三项战略任务是：向西面进攻，以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并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打通同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军第二、第六军团的联系；东面坚持游击战争；南面争取东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走向抗日。

完成第一阶段的要求。

乙、目前情况是蒋介石压迫西北各派军队，为了阻止我野战军的发展，为了阻止一、二、四方面军的会合，为了摧残苏区，指挥何柱国、马鸿逵、杨虎臣[1]等对于我野战军、陕甘宁及陕北的进攻，并部署王均、毛炳文[2]对二、四方面军的拦阻。

丙、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执行三大任务，争取三个任务在第二阶段上的胜利。在西方是打破马、何进攻，极力扩大红军，巩固根据地。在沈克[3]、何柱国、马鸿逵三个集团中进行统一战线，并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到比较其他任务在政治比重上更加高的地位，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中心任务。在东方亦是把争取汤、陈、二高[4]加入统一战线作为第一任务，同时继续游击战争的坚持，以保老苏区。在南方最主要的是发展统一战线于杨王刘[5]各部中。综合

---

[1]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杨虎臣，即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王均、毛炳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和第三十七军军长。

[3] 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沈克纵队司令兼第一〇六师师长。

[4]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陈，指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

[5] 杨，指杨虎城。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刘，指刘多荃，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〇五师师长。

这些任务，在第二个阶段上完成，就能使我们更有力量地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与完全会合，更有力量去造成西北大联合与打通苏联，使得我们有一切优良条件去准备打破蒋介石在两广问题结束后可能增加兵力到西北的阴谋，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

丁、野战军在集中时期宜注意如下六点：

（1）检查统一战线的成绩。

（2）检查扩大红军与训练红军的成绩。

（3）检查干部教育的成绩。

（4）检查创造根据地的成绩。

（5）进行积极的训练。

（6）完成对马、何作战的一切准备。

（传达至团一级）

毛　周　彭　杨

七月二十七日

西征的红军在举行同乐晚会。

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1]

（1936年7月28日）

这个时期的工作委员会有很大的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请恩来同志写出一篇文章来。过去我们确定的工作方针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这三条，但次序要变更，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庆阳方而，这里敌军多，应广泛地去联合他们。建立联合战线的工作，应大家出马，不应关起门来。不仅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级的工作。红军的行动应配合这一工作。在目前，要注意蒋介石的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询问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情况致朱德等电[1]

（1936年7月28日）

……

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两广[2]因无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发生内变，然而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关于询问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情况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发动两广事变的广东、广西军事当局。

白区工作的主要问题[1]

（1936年7月30日）

白区工作，在政治策略的影响方面有很大成绩。现在要加强组织建设，使之能担负起政治任务。目前白区工作在组织上很有发展的线索，据外来的同志说，在许多地方有很多大革命时期的落伍分子，现在又积极地肯干起来。他们过去没有犯什么罪，错误是声明过一下，尽可利用他们去做工作。西安周围、渭水南北，都有党的组织，应去发展扩大。各方面的工作，都须有党的组织才有力量。目前外面情报，只有军事情报，没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情报，这是因为没有归党去进行。外交工作，原则上要建立独立系统，分清责任，限于政治军事方面的外交。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提前毕业学员赠词

（1936年7月）

我送你们一根打狗棒，就是四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和斯诺、马海德的谈话[1]

（1936年7月）

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我们这里来，是国民党反动派。你可以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们的采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方便和帮助。

我们的医疗技术很落后，设备很差。你在考察的时候，请你多批评指导我们的医疗工作。

---

[1]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保安接见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这是毛泽东和斯诺、马海德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给高桂滋的信……………………………………………………1

（1936年夏）

致朱德等电………………………………………………………4

（1936年7月）

目前西方野战军以休养生息为主…………………………5

（1936年8月1日）

甘南敌情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意见……………………6

（1936年8月1日）

关于红军各部指挥权的通令……………………………………8

（1936年8月1日）

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9

（1936年8月3日）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 ……………………………………10

（1936年8月5日）

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 …………………………………11

（1936年8月9日）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 ……………………12

（1936年8月10日）

致章乃器等及全体救国会会员函 …………………………14

（1936年8月10日）

致刘鼎电 ……………………………………………………23
（1936年8月11日）
广泛宣传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胜利 ……………………24
（1936年8月11日）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 ………………………26
（1936年8月12日）
致左权、聂荣臻电 ………………………………………30
（1936年8月12日）
致彭德怀电 …………………………………………………31
（1936年8月13日）
对白军俘虏着重施以政治教育 ……………………………32
（1936年8月13日）
攻占岷州战略上十分有利 …………………………………34
（1936年8月13日）
给杜斌丞的信 ………………………………………………35
（1936年8月13日）
给杨虎城的信 ………………………………………………37
（1936年8月13日）
给王世英的信 ………………………………………………39
（1936年8月14日）
给宋哲元的信 ………………………………………………40
（1936年8月14日）
给宋子文的信 ………………………………………………42
（1936年8月14日）
给傅作义的信 ………………………………………………43
（1936年8月14日）

给易礼容的信 ……………………………………………45
（1936年8月14日）

关于筹款的训令 ……………………………………………47
（1936年8月18日）

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 ………………………………48
（1936年8月19日）

致周昆、袁国平电 …………………………………………49
（1936年8月22日）

征询对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作战部署的意见 ……………50
（1936年8月22日）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52
（1936年8月25日）

关于向南京进一步谈判等问题致潘汉年电 ………………63
（1936年8月25日）

致陈绍禹电 …………………………………………………65
（1936年8月25日）

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 ………66
（1936年8月25日）

给林彪的信 …………………………………………………67
（1936年8月26日）

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68
（1936年8月26日）

冬季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 …………………69
（1936年8月30日）

戏赠周小舟联 ………………………………………………73
（1936年8月）

给王以哲的信 ……………………………………………………74
（1936年8月）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76
（1936年9月1日）
关于取消敌对行为互不侵犯等问题给孙蔚如的信 ………………78
（1936年9月3日）
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 ……………………………………79
（1936年9月4日）
致刘鼎电 …………………………………………………………80
（1936年9月7日）
致宋时轮等电 ……………………………………………………81
（1936年9月7日）
给邵力子的信 ……………………………………………………82
（1936年9月8日）
给王均的信 ………………………………………………………84
（1936年9月8日）
给朱绍良的信 ……………………………………………………85
（1936年9月8日）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86
（1936年9月8日）
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 …………………88
（1936年9月8日）
给毛炳文的信 ……………………………………………………89
（1936年9月8日）
致朱德等电 ………………………………………………………90
（1936年9月10日）

致彭德怀等电 ……91
（1936年9月10日）

致贾拓夫电 ……92
（1936年9月10日）

给彭德怀等的信 ……93
（1936年9月11日）

占领宁夏的部署 ……94
（1936年9月14日）

致彭德怀等电 ……97
（1936年9月15日）

聂荣臻部应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 ……98
（1936年9月15日）

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意见 ……99
（1936年9月15日）

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01
（1936年9月15日）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103
（1936年9月16日）

阻滞胡宗南部西进……104
（1936年9月17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105
（1936年9月17日）

应以红一军团一部先占界石铺……106
（1936年9月17日）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07
（1936年9月17日）

给宋庆龄的信……………………………………………………………113
（1936年9月18日）
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115
（1936年9月18日）
一军团主力暂在现地待机…………………………………………………117
（1936年9月18日）
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118
（1936年9月19日）
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夺取宁夏………………………………………………121
（1936年9月19日）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122
（1936年9月21日）
给蔡元培的信……………………………………………………………124
（1936年9月22日）
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127
（1936年9月22日）
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信……………………………………………………129
（1936年9月22日）
给于学忠的信………………………………………………………………131
（1936年9月22日）
致朱德等电…………………………………………………………………132
（1936年9月23日）
致刘鼎电……………………………………………………………………133
（1936年9月23日）
给李济深的信………………………………………………………………134
（1936年9月23日）

致彭德怀电……………………………………………………………135
（1936年9月24日）
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136
（1936年9月24日）
复任弼时等电…………………………………………………………137
（1936年9月24日）
致彭德怀电……………………………………………………………138
（1936年9月25日）
阻止胡宗南西进确保界石铺…………………………………………139
（1936年9月25日）
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40
（1936年9月26日）
致彭德怀电……………………………………………………………141
（1936年9月26日）
与南京谈判重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142
（1936年9月27日）
四方面军宜迅即北上…………………………………………………144
（1936年9月27日）
关于再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致朱、张、徐、陈电…………………147
（1936年9月27日）
拟令一、二师策应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149
（1936年9月28日）
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151
（1936年9月29日）
致朱德等电……………………………………………………………153
（1936年9月29日）

力求迅速争取和刘湘建立关系……………………………………154
（1936年10月1日）
应与国民党军积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155
（1936年10月1日）
致朱德等电……………………………………………………………156
（1936年10月2日）
二师宜位于硝河城地域………………………………………………157
（1936年10月2日）
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我军行动部署………………………………158
（1936年10月2日）
二方面军宜乘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转移……………………161
（1936年10月3日）
四方面军应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163
（1936年10月3日）
致彭德怀电……………………………………………………………165
（1936年10月4日）
致朱德等电……………………………………………………………166
（1936年10月4日）
截断会静定间道路并立即占领庄浪………………………………167
（1936年10月5日）
派人侦察宁夏及绥远等地敌情………………………………………169
（1936年10月5日）
给张学良的信…………………………………………………………171
（1936年10月5日）
致林育英等电…………………………………………………………173
（1936年10月5日）

致朱德等电……………………………………………………174

（1936年10月5日）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175

（1936年10月6日）

对一军团主力行动的意见……………………………………176

（1936年10月6日）

集中渭水以北后的行动部署…………………………………177

（1936年10月6日）

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179

（1936年10月8日）

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目前的部署………………………181

（1936年10月10日）

致彭德怀电……………………………………………………182

（1936年10月10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及军事部署致潘汉年、叶剑英电………183

（1936年10月10日）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84

（1936年10月）

致潘汉年、叶剑英电…………………………………………187

（1936年10月）

致左权等电……………………………………………………188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189

（1936年10月11日）

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190

（1936年10月11日）

致彭德怀等电……………………………………………………191
（1936年10月13日）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92
（1936年10月13日）
复彭德怀电……………………………………………………195
（1936年10月14日）
关于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致叶剑英电………………………196
（1936年10月14日）
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197
（1936年10月15日）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话…………………………………199
（1936年10月15日）
目前我军应坚持休整与迟滞敌人前进的方针…………………200
（1936年10月16日）
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201
（1936年10月16日）
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202
（1936年10月17日）
为徐向前起草的致胡宗南信……………………………………203
（1936年10月18日）
当前统一战线形势………………………………………………205
（1936年10月18日）
致彭德怀电……………………………………………………207
（1936年10月1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208
（1936年10月20日、22日）

给叶剑英、刘鼎的信……………………………………212
（1936年10月22日）
致彭德怀电………………………………………………216
（1936年10月22日）
给彭雪枫的信……………………………………………217
（1936年10月22日）
给刘少奇的信……………………………………………218
（1936年10月22日）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致叶剑英、刘鼎电………………219
（1936年10月23日）
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220
（1936年10月24日）
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222
（1936年10月25日）
给傅作义的信……………………………………………224
（1936年10月25日）
致彭德怀电………………………………………………226
（1936年10月26日）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227
（1936年10月26日）
致彭德怀等电……………………………………………231
（1936年10月28日）
致朱德等电………………………………………………232
（1936年10月28日）
对胡宗南部作战的部署…………………………………233
（1936年10月29日）

打击胡敌周孔两师之部署……235
（1936年10月30日）
先打胡宗南后攻宁夏……237
（1936年10月30日）
致林育英电……238
（1936年10月30日）
致彭德怀等电……239
（1936年10月30日）
给许德珩等的信……240
（1936年11月2日）
关于过河部队的行动问题致朱德等电……242
（1936年11月3日）
关桥堡地区作战应依实况决定……243
（1936年11月3日）
集中全力歼灭饥疲之敌……245
（1936年11月3日）
给陈公培的信……246
（1936年11月4日）
争取在运动中打敌一个师……247
（1936年11月8日）
力求消灭敌一部……248
（1936年11月8日）
作战新计划……249
（1936年11月8日）
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252
（1936年11月8日）

为抗日计红军愿停止攻击国民党……………………………253
（1936年11月9日）
关于询问西路军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255
（1936年11月11日）
关于打曾万钟的部署…………………………………………256
（1936年11月12日）
和南京谈判的协定原则………………………………………258
（1936年11月12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259
（1936年11月12日）
关于同意曾养甫、陈立夫所提四条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致刘鼎电…260
（1936年11月12日）
致彭德怀电……………………………………………………261
（1936年11月14日）
致朱德等电……………………………………………………262
（1936年11月14日）
打敌办法………………………………………………………263
（1936年11月14日）
可让王以哲部进豫旺…………………………………………264
（1936年11月14日）
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265
（1936年11月15日）
胡宗南进攻定边盐池及我军之部署…………………………266
（1936年11月17日）
复徐向前等电…………………………………………………268
（1936年11月18日）

致朱德、张国焘电……………………………………………269
（1936年11月18日）
朱瑞支队的作战部署…………………………………………270
（1936年11月18日）
决战动员令……………………………………………………271
（1936年11月18日）
先打丁德隆后打周祥初孔令恂………………………………272
（1936年11月19日）
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273
（1936年11月20日）
致红军战士与苏区人民电*……………………………………276
（1936年11月20日）
打丁德隆胜利后立即打周祥初………………………………277
（1936年11月21日）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279
（1936年11月21日）
坚决阻敌第一旅占领盐池……………………………………280
（1936年11月22日）
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281
（1936年11月22日）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82
（1936年11月22日）
组成南北纵队打击敌军………………………………………284
（1936年11月22日）
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胡宗南………………………………286
（1936年11月23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287

（1936年11月23日）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288

（1936年11月25日）

国内国际及红军的情况……290

（1936年11月28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291

（1936年11月28日）

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292

（1936年11月30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293

（1936年11月30日）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294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00

（1936年12月1日）

给蒋介石的信……403

（1936年12月1日）

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406

（1936年12月1日）

致彭德怀电……409

（1936年12月1日）

致刘少奇电……410

（1936年12月2日）

给冯玉祥的信……411

（1936年12月5日）

关于联合抗日救国等问题给杨虎城的信……………………413
（1936年12月5日）
给孙科的信……………………………………………………415
（1936年12月5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416
（1936年12月6日）
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417
（1936年12月10日）
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我们的原则立场致张学良电…………418
（1936年12月10日）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条件等事致潘汉年电……………………419
（1936年12月10日）
致张学良电……………………………………………………420
（1936年1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23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等问题致张学良电………425
（1936年12月13日）
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427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周恩来等拟十六日到延安致张学良电…………………429
（1936年12月13日）
关于日本、南京情况及我们的建议致张学良电……………430
（1936年12月14日）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我方行动方针致张学良、杨虎城电……431
（1936年12月14日）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433
（1936年12月14日）
关于注意洛阳、咸阳之敌致张学良电…………………………434
（1936年12月14日）
应奉行大的战略击破敌之要害……………………………435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436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周恩来十六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致张学良电………………439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通过端纳活动停止南京发动内战致张学良电……………440
（1936年12月15日）
关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等情况致张学良电……………441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发动民众反对中央军进攻致张学良、杨虎城电………………442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等事给阎锡山的信…………………443
（1936年12月16日）
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444
（1936年12月17日）
关于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龙海线等问题致张学良电………………445
（1936年12月17日）
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447
（1936年12月19日）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449
（1936年12月19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451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潘汉年电……………455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要坚持更有前途致周恩来电………………456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争取十七路军抗日反内战问题致周恩来电…………………457
（1936年12月19日）
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消灭东来之敌……………………………458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致周恩来电…………………………459
（1936年12月19日）
关于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460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和宋子文见面问题致周恩来电……………………………461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后方问题致周恩来电…………………462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同意军事计划等问题致周恩来电…………………………463
（1936年12月20日）
给彭雪枫的信……………………………………………………464
（1936年12月20日）
关于共同抗日问题致王以哲转马鸿宾电………………………466
（1936年12月21日）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467
（1936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468
（1936年12月21日）
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470
（1936年12月21日）
致周恩来电……………………………………………………………471
（1936年12月22日）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信……………………………………………472
（1936年12月22日）
给阎锡山的信…………………………………………………………474
（1936年12月22日）
致南汉宸电……………………………………………………………476
（1936年12月23日）
关于胡、曾、关敌南下及我军部署致周恩来电……………………477
（1936年12月23日）
关于时局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致周恩来电……………478
(1936年12月23日)
致阎锡山、赵戴文……………………………………………………479
（1936年12月23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480
（1936年12月24日）
关于坚守固原等处及罗炳辉等均为配合东北军作战之部队致王以哲电…481
（1936年12月24日）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后方致周恩来电…………482
（1936年12月25日）
对张学良杨虎城击破东敌部署的提议………………………………483
（1936年12月25日）

关于争取陈诚、朱绍良、邵力子诸人致周恩来电……………………485
（1936年12月25日）
关于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86
（1936年12月25日）
和军委电台部分同志的谈话…………………………………………487
（1936年12月25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88
（1936年12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89
（1936年12月27日）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491
（1936年12月27日）
给韩复榘的信…………………………………………………………493
（1936年12月27日）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494
（1936年12月27日）
与教堂订立的协定……………………………………………………495
（1936年12月28日）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496
（1936年12月28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500
（1936年12月31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501
（1936年12月31日）

给高桂滋[1]的信

（1936年夏）

培五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胄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

---

[1] 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1]）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

---

[1] 井岳秀（1879—1936），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

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7月）

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红四方面军在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

---

[1] 红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第三次通过了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包座地区。是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告诉他们收到攻占包座的电报。这是电报的部分内容。

目前西方野战军以休养生息为主[1]

（1936年8月1日）

德怀同志：

目前情况下，野战军似宜以休养生息为主，如无充分有利的作战条件，不妨以八月全月为训练时间。从政治的军事的党的各方面进行有计划的教育，务达到一定的进度。一面派出人员从陕甘宁全省进行扩红，后方医院进行治疗改善，以便在八月增加兵员。团以上高级干部宜有特别的教育计划，为将来计，高级干部教育占了特别重要地位。高级教育内容主要的是学习政治。以上意见如得到你的同意，就请你召集团以上干部大会宣布执行。如果我们在八月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成绩，到九月纪念[2]二、四方面军南北夹击夺取陕甘大道的战斗，就将更有力量地进行了。如何盼复。

泽东

一号十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纪念”二字似为“配合”之误。

甘南敌情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意见[1]

（1936年8月1日）

朱、张、任同志：

（甲）接占包座[2]捷电，无任欣慰。

（乙）王均[3]正在陕南集中部队，两星期内可达甘南布防，其配置：一部将向天水、秦安、甘谷[4]，接毛炳文[5]之防；一部似将向文、武、成、康、西、礼、武、固[6]各县。该部为第三军，仍辖第七师、第十二师各六个团。毛炳文之第二十四师由秦安、天水、甘谷移陇西；第八师原在定西，该部两师共十团，任务为保卫兰州。鲁大昌[7]似在岷州[8]，该部虽有六团，但战力甚弱，其第一、第五、第六团曾被我消灭大半。王耀武[9]在汉中，接王均防。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

[2] 包座，有上包座、下包座之分，上包座即今达戒，下包座即今包座，又名俄苦塘，位于四川省若尔盖县东部、包座河东岸。

[3]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4] 天水、秦安、甘谷，均为甘肃属县。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6] 文、武、成、康、西、礼、武、固，指文县、武都、成县、康县、西和、礼县、武山、西固（今舟曲），均为甘肃属县。

[7] 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8]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9]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师师长。

（丙）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1]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望酌。

（丁）包座到哈达铺五百里，有险隘五、六处，主要是瓦藏寺、莫牙寺[2]间二十五里路上之两座河桥，及罗达[3]西边六十里之腊子口[4]山隘。宜选精锐二千余人，以机敏坚毅之首长率领向前开路。最好除此路外，再在西边选一条，直达岷州附近之路，分两路北进较为妥当。腊子口以北即脱离番区[5]，地势宽敞，人烟稠密，便于部队之休息、整理。

毛　周　彭

---

[1]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宕昌县西北部。

[2] 瓦藏寺、莫牙寺，即今旺藏寺、麻牙寺，均属甘肃省迭部县。

[3] 罗达，即今洛大，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部，邻近舟曲、宕县。

[4]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

[5] 番区，指少数民族居住区。

关于红军各部指挥权的通令[1]

（1936年8月1日）

命令红军大学及总政治部直属毛泽东指挥，所有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各直属独立部队，各省军事部，军委各部门，后方各机关，统归周恩来指挥。任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兼保安城卫戍司令。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签署的通令。

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北上[1]

（1936年8月3日）

接八月一日电[2]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经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8月1日致电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我二、四方面军此次向包座、巴西、阿西前进便利，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8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兰州大道出击，以消灭毛炳文、于学忠为目的，来配合你军。在蒋敌进攻的严重关头，我一、二、四方面军只有在积极密切关系和一致战略方针下坚决对敌，才不致受敌各个击破，可能造成西北新局面。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3个方面军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好了一切，为谋西北首先胜利奋斗到底。

为出版《长征记》征稿[1]

（1936年8月5日）

一

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二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

---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给各部队的电报和给参加长征同志的信。《长征记》后来在延安出版。

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1]

（1936年8月9日）

根据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南事变发展，日本对绥蒙进攻等情况，我们认为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

蒋介石一解决西南问题，就有极大可能进攻西北。无论如何兄不要再去南京了，并要十分防备蒋的暗害阴谋。目前此点关系全局，卫队的成分应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中。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关于目前形势和战略方针问题致张学良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1]

（1936年8月10日）

一

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三省，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日本的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我们愿意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要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创造西北国防政府，红军与东北军正在协商中，两方面都要做艰苦的努力，在东北要加强政治工作，在地方应加紧巩固工作。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的意义，应极力地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领导之下。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会议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二

民众抗日已经冲破蒋介石的压迫，但是还没有冲破蒋介石的最高界限，即还没有实现民主。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我们则要求他先给抗日的民主。“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

致章乃器等及全体救国会会员函

（1936年8月10日）

乃器、行知、韬奋、钧儒诸先生及全国救国联合会全体会员们！

不久以前，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了章、沈、陶、邹四先生所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和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宣言和纲领。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们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所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你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当立刻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对富农、地主、商人，应当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各党战线的开展，才不至受到阻碍。”

真的，我们应当这样做，而且已经是这样做。我们在自己的行动上，经常是忠实于自己的提议和政治路线。在九一八事变开始后，我们首先向全国一切党派提出，愿意合作抗日。有些人说，我

们的提议只是宣传的作用，而在实际上并不愿意实行这些提议，但是，几年来的事变证明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诬蔑。我们曾与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合作。不久以前，当西南派首领发表通电表示抗日的时候，我们宣言同意他们的抗日主张，同时我们向西南派的军政领袖和一切党派与社会团体发表了合作抗日的提议，并郑重声明：我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事实上诚恳希望一致联合，共同斗争以挽救祖国的生命。一年多以来我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实现我们北上抗日的目的。虽然我们已经到了北方，可是我们想集中河北实行首先直接抗日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今年春季，我们在渡过黄河以后，如果没有驻扎在同蒲路一带十万以上的中央军的封锁与阻挡，是无疑可以实现我们的愿望的。当时若是我们集中力量来冲破封锁线当然可以做到，但是，这样必然使双方受到很大的牺牲，我们为了避免无价值的内战损失，所以暂时渡河回转陕西。在回军以后，不管对我们继续“围剿”，我们再一次地向南京政府、太原阎锡山将军、河北宋哲元将军表示愿意把我们的力量集中在河北，进行抗日，并要求他们的同意。虽然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满意的回答，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放弃我们所始终坚决主张的抗日救国的目的。在民族存亡千钧一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继续任何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无论何时也不会进攻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如果他们不向我们进攻，不阻碍中国军队抗日斗争的话。如果南京中央军或其他军队实行抗日，不压迫群众爱国运动，我们准备以自己的一切力量，诚恳地帮助他们。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许反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完全自由。

有人怀疑，现在红军的力量很难单独抗日。又有人说，抗日的

先决条件，是民族统一和内部和平。还有人说，部分的抗战是有害的。但是我们不这样想。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勇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的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说东北义勇军不能单独抗日了。我们红军在一切方面都不比东北义勇军薄弱，而北方人民的爱国热情亦不落后于东北人民。如果不是想混乱人民耳目的话，那么就没有根据说红军不能单独抗日。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失败的原因，只是因为当时领导者的动摇不坚定，没有运用紧张的运动战术，没有充分广泛地与人民合作，然而，中国红军是没有这些弱点的，所以我们认为红军能够单独抗日，并不会轻受挫折而能持久抵抗。虽然红军不能期待以现有的力量，达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无论如何，是能单独抗日的。并且在红军继续抗日的过程中，必然能够统一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力量来达到最后的胜利。

如果说，要统一全国力量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要先统一，然后抗日，这是不正确的。应当记得，部分的力量，已能实行抵抗；应当记得，在没有开始抵抗运动的地方，敌人决不让我们集中力量。敌人已经严密监视着南京中央和地方政府，并一省又一省地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在这样情形之下，只有在开始抵抗的时候，才有全国总动员的可能。实行抵抗与全国总动员应当同时开始的。在“和平”状况之下，很难有全国总动员之可能。

你们要求一切爱国运动的自由，而敌人必然马上用武装来压迫爱国运动，很明显地，战争就不可免了。现在情况日益危急，如果

不立刻开始抗日战争，全国统一自卫与全国总动员必然益加困难，如果坐失时机，甚至将无统一自卫与总动员的可能。就在今日，全国总动员已经不能包括东北和北方的一部分区域了。这样继续下去，敌人可以组织更多的汉奸军队，可以宰割中国更大的区域，可以夺取一切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那时，我们的总动员将只能在很小一部分的领土上与乡村区域中实行。难道现在还可以用统一未成、准备不足等借口来延迟对日抵抗吗？

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准备，可是我们反对借准备之名，行不抵抗之实。任何抵抗斗争，决不会阻碍准备与总动员的工作。任何抵抗的本身就是极大的动员，上海与长城抗战的经验便是最好的证明。

在敌人监视之下进行秘密准备工作，须花费几年时间所达到的成绩，也许在抗战开始以后，只要几个星期就能达到。而且秘密准备所培养的力量，决不能补偿同时间损失的力量，更不能达到敌人在同一时间所可聚集与准备的力量。

有人说我们的单独抵抗，破坏了他们的抗日总计划。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所谓“抗日总计划”是什么。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落后的人迅速赶上我们，还未准备抗战的军政首领和党派立刻和我们一块进行抗日斗争。没有任何根据来要求我们拒绝抗日政策，停止抗日行动来适合这些“批评家”的纲领和行动。

对日抗战将是长期残酷的战争，不经过千百次的苦战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在长期苦斗的当中必然可以动员与集中全国的一切力量，而决不能把抗日战争延迟到动员与集中完成以后。

因此，我们要求立刻开始对日抗战，首先把红军集中河北，使红军能最先开始对日抗战，我们反对利用任何借口延缓和避免对日抵抗。竭诚希望你们帮助实行这些要求。

为了集中国力去对日抗战，我们在各方面改善了苏维埃法律与工作。除了把工农政府、工农红军改成人民苏维埃政府和人民红军外，在苏维埃选举法上，补充了一切小资产阶级职员、自由职业者、专门家和小商人与小企业主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布在苏维埃区域内一切政党、社会团体、群众组织均享有公民权。欢迎一切愿意共同抗日的党派、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苏维埃政府，共同担负责任。我们已经通过决议不没收富农的土地，如果他们愿意和我们共同抗日的话，我们并不拒绝与他们联合。不没收大小工商业者的财产与工厂，并保护他们的企业，帮助他们发展，以增加苏区抗日运动所必需的物质供给。不没收积极抗日的军官与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邀请一切失业军官、兵士、职员、专门家到苏区来，并给予他们以适当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才干。特定办法优待俘虏的军官和兵士，愿意归家的，发给路费；愿意留在苏区共同抗日的，便给予工作。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征收不重的统一累进税。

这就是在我们苏区通过的和施行的政纲。我们决不敌视民族中反日的阶级。红军将来进入抗日友军的区域，在友军遵守协定之下，红军同意遵守友军所规定的法令与规律，并不干涉友军区域的地方行政。关于劳资关系问题，规定了改良工人生活最低条件，按照每个企业的实际情形，订立劳资协定，劳资双方必须遵守，并避免不必要的罢工、怠工。过去监督生产、工人领导工厂的法律，已经取消了。劝告工人不提出超过本企业能力的要求。在非苏维埃区域，我们主张必须改善工人生活，但希望不加深反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相信争取海关自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对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有利益的。相反的，在帝国主义继续进攻之下，无论工人还是资本家，都不能期待自己情形改善。劳资的共同利益，是建立在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之上的。

至于现在河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及其他区域的游击队，还未能执行我们在最近所通过的法律，这是由于有许多的阻碍，使他们不能得到我们的指令。此外，残酷屠杀的围剿是可以激起某些报复的手段，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行动是错误的。我们肯定希望立刻改正这些游击队的错误。可惜得很，我们还不能马上执行这些条件，因为决定的力量不在我们。我们认为红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无条件地尊重并实行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批评、意见与要求。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问题，我们愿意服从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民主的决议。

当然，我们的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救国运动。我们愿意牺牲一切力量来拥护这些运动与组织，以便与一切党派和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民共同斗争，挽救中国人民的危亡。我们的党员，无条件地服从这些组织大多数所通过的规则、纲领和决议。同样，在实际工作上，甚至当我们在原则上不同意的时候，也无条件地服从大多数的意见，我们的党员不会与这些组织中的其他派别对立和竞争来争夺群众与领导权。相反地，我们愿意拥护任何派别的彻底反日的领袖，使他们能毫无阻碍地在群众中发挥自己的能力。我们的党员愿意在他们领导之下工作。为了达到战胜强大敌人的目的，不仅需要我们自己的发展与胜利，而且需要一切联合力量的胜利与发展。我们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各政党各阶级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因此我们认为在统一战线中提出推翻某一阶级和某一政党的口号是错误的。我们认为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应有不少的领袖、党员、官吏能够抗日的，我们完全愿意与他们联合。因此，一般地反对国民党和各地政府是不适宜的。我们不同意

并且反对宗派主义、包办把持操纵等方式以及现在有些青年分子在实际上采用的强迫群众参加救国运动的方法。

最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党派了解抗日救国的任务，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关于其他问题的意见，都是不重要的。可是有人重视其他问题的许多意见，因此，就产生许多冲突和矛盾。我们完全愿意改变这些缺点。如果我们的党员在救国运动中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希望其他党派的领袖和青年，本着救国热忱，互相劝勉。我们相信，如果为了抗日救国的必需，排除一切相互的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那么全民统一战线就可胜利完成，并可保证广泛光明的前途。依靠着统一战线力量发展的程度，不只是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而且经过统一战线运动的一定阶段可以使中华民族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并达到全中国的真正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决不是一个很短的暂时的现象。当然，在统一战线的各个阶段上可以有个别的人发生动摇，叛变与逃走，但是这决不能认为是统一战线的破裂。

现在统一战线比之一九二七年还有更明白的前提和更巩固的基础，因为现在民族危机比之一九二七年百倍地加深。一九二七年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反对内部敌人（反对北洋军阀），现在统一战线是反对外部敌人。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脱离统一战线的人们，还能组织半独立式的政府。而在现在，哪一个要脱离统一战线或者不参加统一战线，他再也不能建立半独立式的政府，并不能在中国人民各阶层中找到拥护。并且，一九二七年的经验，对于任何阶级都不能机械地运用。因为现在国际的与国内的形势，比之一九二七年已有了急剧的改变，而有利于全民统一战线。所以我们对于现在统一战线的前途毫不悲观，这里没有任何可以悲观的根据。我们为了统一

战线的事业，不害怕被其他党派利用，因为我们有考虑过坚决抗日纲领。我们愿意与一切抗日讨贼的政派组织合作到底。

但是，现在最危险的是有些人幻想实现武力统一的计划。很明显的，武力统一就是不断的内战。如果我们回忆袁世凯及其他军阀武力统一计划的失败，就可以知道这些人的前途是如何的黑暗。而在现在条件之下，在任何方面，武力政策危害中华民族的程度，都远超过于当时。不幸有些人对于这样的政策，还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还有人企图以另一“集中战线”来对立和破坏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统一战线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你们说过去的争论是在于抗日斗争的方法和“安内”“攘外”的先后。我们觉得，这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是有些人在民族叛徒与民族英雄之间动摇，在抵抗与投降之间选择道路。我们不相信那些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安内”政策造成怎样的结果，但是，为什么还这样坚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呢？我们不反对统一，我们反对的是国内战争与民族叛徒。我们认为今天中国只有一个出路，就是一切党派在平等基础上团结起来，实行抗日，并服从全国人民的民主政治。如果不走这一条道路，而想用武力统一，那就永远不会有中国人民的统一，只有更加使中国分裂和破坏。仅就这一原因，我们就反对这样的企图。我们拥护在平等基础上的联合抗日与民主的方法来统一中国。我们愿意服从真正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任何全国大会的决议，并主张把一切问题提到这样的大会去解决。并且我们同意把是否应当在全中国施行苏维埃制度的问题让全国人民实行民主地解决。

但是我们应当声明，南京政府在今年五月五日所公布的宪法草案和国民会议的组织条例和选举条例，我们认为是完全反民主的。

我们不承认根据这些法律所选举的国民会议有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权利，我们不能参加这样国民会议的选举，我们与全国人民都不应服从这样“国民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认为这一“国民会议”的存在是有害的。但是我们同意参加任何真正合于民主原则所创立的人民代表机关。

最后，我们希望你们和各地一切救国组织派遣代表来参加苏维埃政府，我们希望你们介绍其他政党派别的代表来与我们进行合作的谈判。一切愿意与我们进行谈判的代表，都请直来苏区，保证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如果在苏区外任何区域也保证我们的代表不受危险的话，我们愿意派代表到其他区域去进行谈判。

我们诚意地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

此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

致刘鼎电[1]

（1936年8月11日）

红二、四方面军即出岷州、陇西之线打毛炳文，速乘此机调固原两师入兰州，我一方面军可不打固原。望派飞机到肤施接潘汉年，以便快晤张学良。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广泛宣传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胜利[1]

（1936年8月11日）

彭，林，叶，左、聂，徐、程，宋、宋，李，阎、蔡，谢、刘，戴，郭，钟[2]：

我二、四方面军前锋已抵哈达铺[3]及西固[4]附近，西岷大道[5]被我切断，毛炳文王均鲁大昌[6]惊慌异常，我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势已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叶，指叶剑英，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参谋长。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李，指李夫克（李富开），当时任第一作战区参谋长。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兼第二作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刘，指谢嵩、刘幼安（刘攸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戴，指戴季英，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动员武装部部长。郭，指郭宝珊，当时任红军第三作战区总指挥。钟，指钟赤兵，当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第六作战区部长。

[3] 哈达铺，镇名，位于今甘肃省宕昌县西北。

[4] 西固，旧县名，即今甘肃省宕昌县。

[5] 西岷大道，指甘肃西固（今宕昌）到岷县的公路。

[6]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成。这一空前的伟大胜利，将兴奋着全苏区全中国的广大群众和同情我们的武装部队，将震惊着我们的敌人。望即根据上次军委总政的电令[1]，分别在部队中、地方群众中广大宣传，并以扩大部队，训练部队，培养干部，争取胜利，巩固苏区，争取白军，联合苏蒙，共同抗日，保卫西北，庆祝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胜利，庆祝三个方面军大会合等为中心口号，来作庆祝胜利的动员。

毛
十一号

---

[1] 指1936年8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总政治部发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的电报。该电通报了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情况，号召全军准备热烈欢迎3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致朱、张、任电[1]

（1936年8月12日）

朱、张、任同志：

关于今后战略方针有如下的建议：

（1）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甲军[2]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

（2）根据一、二、四方面军会合，甲军与我们联盟，日本指挥蒙伪军进攻绥远、内蒙，企图割断中苏关系及蒋介石注意西南、暂时无法顾及西北等情况，上述任务可能而且必须在较短时期内实行之。

（3）打通苏联为实现全国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新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重要一环，其步骤为：

甲、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候部队相当整理后，即以有力一部出陇西攻击毛炳文，相机消灭之，目的在威胁兰州，以便甲军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林育英（张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彭德怀、凯丰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

[2] 指东北军。

李忠[1]部三个师全部集中于兰州为战略枢纽，另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马步芳家乡，目的一在威胁青海吸引西路甘、凉、肃三州步芳[2]兵力之东援，以便甲军派出一部接防，使西路三州落于甲军之手；一在消灭青马[3]一部促其与我讲和，李毅[4]现有代表在青马处，以上是李毅与我商定之计划。此外，再派较小一部拒止王均于西礼之线并派员与王进行外交，同时也对毛炳文进行外交，彼等均在极危惧中，外交成功有大的可能。上述计划大概以一个半月时间实现之。在此期间二、四方面军努力解决人员补充与被服补充两问题，以免进到甘北较贫苦区域发生若干困难。

乙、完成上述任务之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这一步骤约在十月到十一月实现之。

丙、十二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任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甲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

（4）巩固内部的计划如下：

甲、陕北、甘北、宁夏新老苏区之巩固及三个方面军之扩大与巩固，使之成为西北局面之坚强的领导中枢。

乙、甲军政治上的改造与军事上的立于不败之地。

丙、陕、甘、青三省各部统一战线的完成，三省反动分子肃清，三省民主纲领之初步实现。

丁、以上步骤的实现，使得西北局面政治上军事上均置于巩固

---

[1] 指于学忠。

[2] 指马步芳。

[3] 指青海马步芳。

[4] 即张学良。

的地位，一方面足以防御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后转向西北之可能的进攻，足以防御日本向宁夏进攻而打断其隔离中苏关系之企图；另一方面，作为出兵绥远之准备，并准备使陕、甘、宁、青四省抗日革命化转向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5）甲乙两军[1]各出一部合组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实行抵御德王[2]与李守信蒙伪军之进攻，用此行动号召全国抗日运动，使之进到更高的阶段。

（6）所有以上各个步骤，都是为着形成并巩固西北国防政府，用此国防政府去推动全国统一战线，造成全国国防政府的基础。

（7）甲乙两军苏维埃政府与国防政府对于南京的策略，适用统一战线的一般原则：

甲、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

乙、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目前不出河南，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

丙、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

丁、防御时用反对卖国贼捣乱抗日后方口号，进攻时用反对卖国贼拦阻抗日去路口号，但不论何时，均取一面作战一面讲和政策。

---

[1] 指东北军与红军。

[2] 即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

戊、向白军进行统一战线，注重其上级官长。

己、一切统一战线的谈判，以忠诚态度出之。

庚、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同时又影响南京以外各派，便利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求得党在全国活动的便利，求得人民爱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并求得创造西北局面的便利。

辛、不可忘记对于真正敌人之革命的警觉性。

（8）以上意见请三兄考虑电复。

洛　育　恩　博　稼　怀　凯　泽

八月二十日

致左权、聂荣臻电[1]

（1936年8月12日）

红军大学第一、二两科拟于十月底开始上军事课；第三科过去两个月着重政治，下半期始军事政治并重；目前军事学习尚未开始，不宜调给教导营教员。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致左权、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8月13日）

红一方面军八月至九月中旬仍以训练休养生息为宜，同时求部分扩红，巩固现有根据地，形成强有力的中心力量。准备九月中旬以后向西出动一步，仍以休养、训练、扩红、扩大根据地为目的，对东北军何柱国、董英斌[2]二部全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当红二、四方面军甘南任务完成，九、十月间北上时，红一方面军便以军容整壮之姿态与红二、红四方面军在固原、海原地区会合。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总”第二路军第七纵队司令、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

对白军俘虏着重施以政治教育[1]

（1936年8月13日）

彭，刘，左、聂、朱、邓，徐、程、王，宋、宋，阎、蔡，萧，李，谢、刘，钟，郭，黄[2]：

甲、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奔走各方的人材，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因此特规定：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刘，指刘晓，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左、聂、朱、邓，指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徐、程、王，指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阎、蔡，指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兼第二作战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李，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省委军事部政治委员。谢、刘，指谢嵩、刘幼安（刘攸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钟，指钟赤兵，当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第六作战区部长。郭，指郭宝珊，当时任红军第三作战区总指挥。黄，指黄春圃，即江华，当时任关中特区军事部部长兼第一作战区司令员。

1. 凡遇大批俘虏，必须选出一部优秀官兵施以特殊训练。

2. 各个战线上的零星俘虏和投诚的应全部留下训练，概不立即放回。

3. 训练机关，以一部留前方各政治部训练，一部送后方总政治部抗日战线部。

4. 训练内容着重讲统一战线、白军工作。

5. 训练好后应即派出做白军工作，并着重上层活动与军官来往。

乙、为适应目前工作开展，望分别将两马、何、董、沈、王[1]及两高、汤、杨[2]各部俘虏和投诚官兵现留在前方各政治部者，一律送来军委训练。

毛　周　杨

十二日二十四时半

---

[1] 两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董，指董英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十七军军长。沈，指沈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沈克纵队司令兼第一〇六师师长。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

[2] 两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杨，指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攻占岷州战略上十分有利[1]

（1936年8月13日）

朱、张、任同志：

如能攻占岷州[2]城，则打马[3]打毛[4]打王[5]均十分有利，战略上大占优胜。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毛炳文现正以一部从陇西增援，是消灭他的好机会。朱总司令宜速派人去见王均曾万钟[6]，彼等孤危，不难收效。城内鲁大昌[7]亦宜派人，允许放他向临潭跑。如何，望酌。

毛　周　彭

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岷州，即甘肃岷县。

[3]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代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二军军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5] 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6] 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

[7] 鲁大昌，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给杜斌丞[1]的信

（1936年8月13日）

斌丞先生左右：

仲节君回，盛称德意，并聆抗日救国宏论，无任钦迟。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2]质量之改组，凡此种种，愈见日寇之变本加厉。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3]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

---

[1]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对促成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过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7年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2]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而设立的政权机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区域来达到并吞华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相继签订丧失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于同年12月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3] 虎臣，即杨虎城。

勉之。特派张同志[1]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云山在望，延企为劳，诸惟心照，不尽。即颂

日绥

毛泽东　手启

八月十三日

---

[1] 指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44年在国民党监狱中牺牲。

给杨虎城的信

（1936年8月13日）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1]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2]，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

---

[1] 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准备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

[2] 肤，指肤施，即延安。洛，指洛川。

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给王世英的信[1]

（1936年8月14日）

必须向宋哲元及国民党军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2]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

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致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信的主要内容。王世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刘少奇，当时为中共中央派驻华北局的代表。

[2] 商震，当时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

给宋哲元的信

（1936年8月14日）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1]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2]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3]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

---

[1] 刘子青，当时是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

[2]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蒙古王公。1936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3]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1935年12月在北平设立的政权机构。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1]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2]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专此。即请

勋祺

弟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

[1] 张金吾，即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2] 鲁韩，指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绥傅，指当时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晋阎，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给宋子文[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子文先生：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2]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

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

[1]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2] 董健吾（1892—1970），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给傅作义[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作义先生主席勋鉴：

涿州之战[2]，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3]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4]，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

---

[1] 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他正指挥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对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进攻。

[2] 涿州之战，指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晋军傅作义部和奉系军阀部队之间在河北涿州进行的攻守战。在奉军的猛烈围攻下，傅部孤军坚守涿州城3个月。

[3] 李守信（1892—1970），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任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1873—?），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

[4] 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退位，1932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

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给易礼容[1]的信

（1936年8月14日）

韵珊兄：

还是在五年之前，从文亮[2]口中得知吾兄尚未忘记故人，那时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你，不知寄到你手否？近有人来，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我听了非常欢喜。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统一战线之能得全国拥护，可知趋势之所在了。兄之苦衷，弟所尽知。然今非昔比，救国自救只有真诚地转向抗日革命工作，这个意见不知能得兄之完全赞成否？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如有进一步办法，希望能建立秘密联系，可以时常通信。李鹤鸣王会悟[3]夫妇与兄尚有联系否？我读了李之译著，甚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能建立友谊通信联系更好。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

---

[1] 易礼容（1898—1997），乳名闰三，有时写成韵珊，湖南湘潭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1936年在上海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2] 文亮，即许文亮，易礼容的内弟。1923年以前曾在长沙文化书社工作。1931年去江西苏区，不久牺牲。

[3] 李鹤鸣，即李达，当时是北平大学教授。王会悟，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工作。

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文煊[1]还在你身边否？她好否？一同致意。弟躯体如故，精神较前更好，十年磨炼，尚堪告慰。临书仓卒，不尽欲言。敬祝
健康

杨子任[2]
八月十四日

---

[1] 文煊，即许文煊，易礼容的夫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在长沙文化书社当会计。

[2] 杨子任，即毛泽东。

关于筹款的训令[1]

（1936年8月18日）

根据最近中央对于土地政策的新决定，对于地主，只要他不反对抗日红军，应避免用没收办法，而以捐募的方法使其尽量拿出金钱、粮食和物品，宁可少没收一家，不可错没收一家。在筹款中，必须注意经济政策，没收地主的商店固然不对，没收一般的商店尤不容许。在苏维埃法律范围内，给商人以适当的保护。在不损害商业的条件下，向富商作深入的救国宣传，进行募捐运动，筹得抗日经费。

---

[1] 这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联名发布的关于筹款的训令。

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1]

（1936年8月19日）

我们对哥老会以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其大多数到抗日战线上来；不应勉强使回人哥老会加入汉人哥老会，也不应勉强将他们合并，必须坚持回人事情由回人自己处理的原则。

---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关于改哥老会为江湖抗日救国会问题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昆、袁国平电[1]

（1936年8月22日）

红校第三科游击连应暂勿毕业，继续学习至明年一月一日与三科其它连队同学同时毕业。一、二两科因学习内容较多，毕业时间延至明年二月一日，每日上课时间改为四小时，各课进度加快，学习军事时间应提前。全国图书目录望交人带来，应买之战略、战役、战术书籍请先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致红军学校校务部长周昆、训练部长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

征询对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作战部署的意见[1]

（1936年8月22日）

彭：

下列各点请在今明两日考虑见复。

1. 据调查宁二马[2]共有步兵二十个团、骑兵八个团。这个数目属实否。

2. 黄河结冰期究有三个月，还是两个月。

3. 假如以四方面军待机独立攻青海，一方面军独立攻宁夏，而以二方面军位于中央（例如在岷州[3]、静宁、天水地区）钳制敌人，策应两方，估计能达占青宁两地之目的否，主要的是一方面军有独立战胜宁马之把握否，如果缺少把握之点在于攻城方面而不在于野战方面，则用多兵攻城与少用兵攻城是否有重大之区别。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二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

[3]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4. 如以二方面军位于陕甘大道附近钳制毛王何[1]敌，看一四两方面军分攻宁青之第一步作战结果，再定增加与否及向何方增加，距离与时间上来得及否。我觉得如果冰期在两月以上，则增加是来得及的。判断合于事实否。

毛

二十二日

---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

（1936年8月25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诸位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大鉴：

自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2]以来，忽已一年多了。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创议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一致抗日的主张，虽然得到了全国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的拥护，但因贵党及贵党政府迟疑不肯采纳，致使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直到今天还未发动。而日寇则已乘虚直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目前，全国彷徨，不可终日，这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完全是由于贵党及贵党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地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掉转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这封信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当时的国民党二中全会，作了义正词严的批判，同时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建立国共合作的政策。

[2]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5年8月1日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挽回。为了这个原故，我们特以诚恳的态度致书于诸位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之前。

读了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及蒋委员长在全会的报告之后，认为贵党二中全会对于全国人民日夜焦虑的救亡图存问题，依然没有肯定的答复，对贵党五全大会“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作彻底的改变，这对于全国爱国人民，不能不是非常失望的。

蒋委员长的报告曾经对贵党五全大会的政策给了新的解释，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是非常需要的，因为中国人民始终不了解如何方可称为“和平的绝望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的最低限度。我们承认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较之过去是有了若干进步，我们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然而蒋委员长的这种解释，基本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因为蒋委员长在自己的报告中又认为：“半年来外交的形势，大家相信并未到达和平绝望的时期，与其说是和平绝望，反不如说是这半年来较之以前的形势，还有一线的希望。我敢说最近外交途径，并未达到最后关头。”因此蒋委员长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以阿比西尼亚的失败为借口，继续了自己的退让政策。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非常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的。在全国人

民看来，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的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国的公开走私，民族工商业的陷于绝境，国家财政的趋于破产，海关权的破坏，华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务机关的遍设，日、伪蒙军对于绥远的大举进攻，内蒙独立政府[2]的成立，敌机在我领空上无限制的飞行，日本浪人的横行无忌，学生爱国运动与人民爱国言论遭受日寇直接间接的干涉，大批工农群众的遭受屠杀，许多爱国人民、爱国军人、爱国警察、爱国记者，甚至许多贵党的要员与贵党政府的官吏，无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军队的被迫撤退，青岛的告警，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无一而非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大损失。在全国人民看来，淞沪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华北防共协定，以及其他没有宣布的成文与不成文的协定，无一不是丧权失地的条约。因此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强盗计划，除了动员全中国的力量给以坚决的击破之外，是决不会改变的。它的侵略方式的变换，侵略方向的转移，以及所谓“经济提携”的表示，丝毫不是因为它要停

---

[1] 指1935年11月25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由原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的傀儡政权，成立时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个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而使河北省东部的22个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

[2] 1936年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策划下，蒙古上层反动分子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公开投降日本，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同年5月，在嘉卜寺（今内蒙古化德）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止侵略，而正是为了便利于侵略。所以如果以为冀察进兵之后，日寇一时着重于华北五省的经济侵略，而即以为和平途径有了希望，这是自欺欺人之谈。如果以为日寇的侵略会停止于黄河以北，而我们可偏安于黄河以南，也是完全的幻想。看吧，正在先生们高谈和平尚未绝望的时候，察北的日伪军又大举向绥远进攻了。绥远、宁夏、内蒙、甘肃各地遍设特务机关之后，又在这些地方建立航空总站与许多分站了。在四川强设领事馆激动了残杀爱国同胞的巨变。华北增兵之后，凶横的日军蠢蠢欲动，二十九军的防线时有小接触，华北局势日趋险恶。日寇军事考察团、经济考察团等侦察集团遍行各地，无孔不入。日寇的侦探网遍布全国，并且遍布于贵党与贵党政府的各种组织中。所有这些，只是指明日寇灭亡中国的形势是十分危急了。和平绝不可能，抗战决不可免，已经是明白无疑的事实，先生们的想法是完全错了。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中曾郑重申说："御侮之先决条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国力量于中央指挥之下，齐一其步调，巩固其阵线，故御侮救国之有需于统一与纪律，实为无可动摇之铁则，而军政军令之统一，尤为完成'近代国家'组织之最低限度。"我们完全承认，为了发动全国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为了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集中与统一全国的救国力量，是绝对必要的。还在九一八事变时，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即已号召全国人民与全国军队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曾向围攻苏区的所有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武装队伍提议，立刻停战议和共同抗日。华北事变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迅速组织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最广泛抗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无数次地请求贵党及贵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议立即召集由全国人

民及全国愿意抗日的武装队伍选举出来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抗日救亡大计，由此大会选举统一全国的国防政府与组织抗日联军，实行大规模的抗日战争，并坚决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成为这样的国防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担任一定的战线，并保证每一作战任务的完成。本党及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所有这些主张，是完全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的，是救亡图存唯一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的了，只有日寇及其代理人，才会煽动中国的继续分裂与继续内战，因为这只能给日本强盗造成灭亡中国的条件。

然而贵党二中全会所说的“集中统一”，实在未免本末倒置。须知十年以来的内战与不统一，完全是因为贵党及贵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贵党及贵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之下，进行了连年不绝的内战，举行了无数次对于苏维埃红军的围攻，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与民主运动。直至最近还是放弃东北与华北不顾，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最大敌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对苏维埃与红军，从事贵党自己营垒之间的内争，用一切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捣乱红军的抗日后方，漠视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剥夺全国人民的自由权利，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正告诸位先生：如果你们不根本改变自己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去，而依旧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话，那末你们即欲勉强维持现状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统一以及所谓“现代国家”更是完全的空谈。

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全国人民现在热烈要求一个真正救国救民的政府，要求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全国人民要求一个为他们自己谋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纲领，必须：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给予人民以民主权利的，第三，是能够发展国民经济减轻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说“现代国家”，这些纲领才是真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中国在现时代所要求的，全国人民现在正以热烈的愿望与坚毅的决心为着实现这样的目标而斗争。而贵党及贵党政府的政策，则与此种全国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决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我们认为贵党二中全会所决定组织的国防会议，以及贵党与贵党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国民大会，是不能完成集中统一抗日救亡的任务的。依照贵党二中全会所通过的国防会议条例看来，则国防会议的组织只限于贵党及贵党政府当权执政的少数官员，国防会议的任务是仅充贵党政府的咨询机关，这种会议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与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显的。而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国民大会，依据贵党政府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组织法及代表选举法》看来，也同样的不能有什么成就与不能得

到人民的任何信任，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仅仅是贵党及贵党政府少数官员们所操纵的机关，是这些官员们的附属品与装饰品，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同本党所主张的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国防会议），中华民主共和国和它的国会，是没有丝毫相同之点的。我们认为抗日救国的国防会议，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各界各武装队伍的代表，构成真正能够决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权力机关，并从这一会议中产生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而国民大会也必须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国会，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这样的国防会议与全国国会，才能是全国人民所欢迎、拥护与参加的，才能把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放在坚固不拔的基础之上。否则任何好听的名词，均决然无补实际，决然不为全国人民所同意。贵党及贵党政府历来所召集的各种会议之失败，就是最好的明证。

贵党二中全会宣言又说：“险阻之来，本可意计，断不因国事之艰虞，而自懈其应负之职责”；本党“对于国家兴亡，必当尽其心思才力，贯彻始终”。诚然，贵党是中国最大部分领土中的统治的政党，一切过去实施的政治责任不能不由贵党负担，在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府之下，国民党决不能逃避其责任。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来，贵党违背全国民意，违背全民族利益，执行了绝对错误的政策，得到了丧失半个中国的结果，这个责任是绝对不能推诿于任何别人的。然而在我们及全国人民看来，半个中国由贵党而沦亡，决不能不课督贵党以恢复领土主权的责任。同时贵党中许多有良心的分子，现在也确然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而开始了新的转变，开始了对于自己党中祸党祸国分子之愤怒与不满。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于这种新的转变，热烈地欢迎这些有爱国心的有良心的，保存着并正在激发着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中国国民党员的志气

与觉悟，欢迎他们在民族危亡面前愿意牺牲奋斗与勇于革新的精神。我们知道在贵党中央及各省党部中，中央及各省政府中，在文化界、在科学界、在艺术界、在新闻界、在实业界、在妇女界、在宗教界、在医药界、在警察界，在各种民众团体，尤其在广大的军队、国民党的新旧党员与各级领袖中，实在有很多觉悟与爱国之士，并且这样的人还在日益增加着，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着同这些国民党人携手，组织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是坚决地赞助你们的，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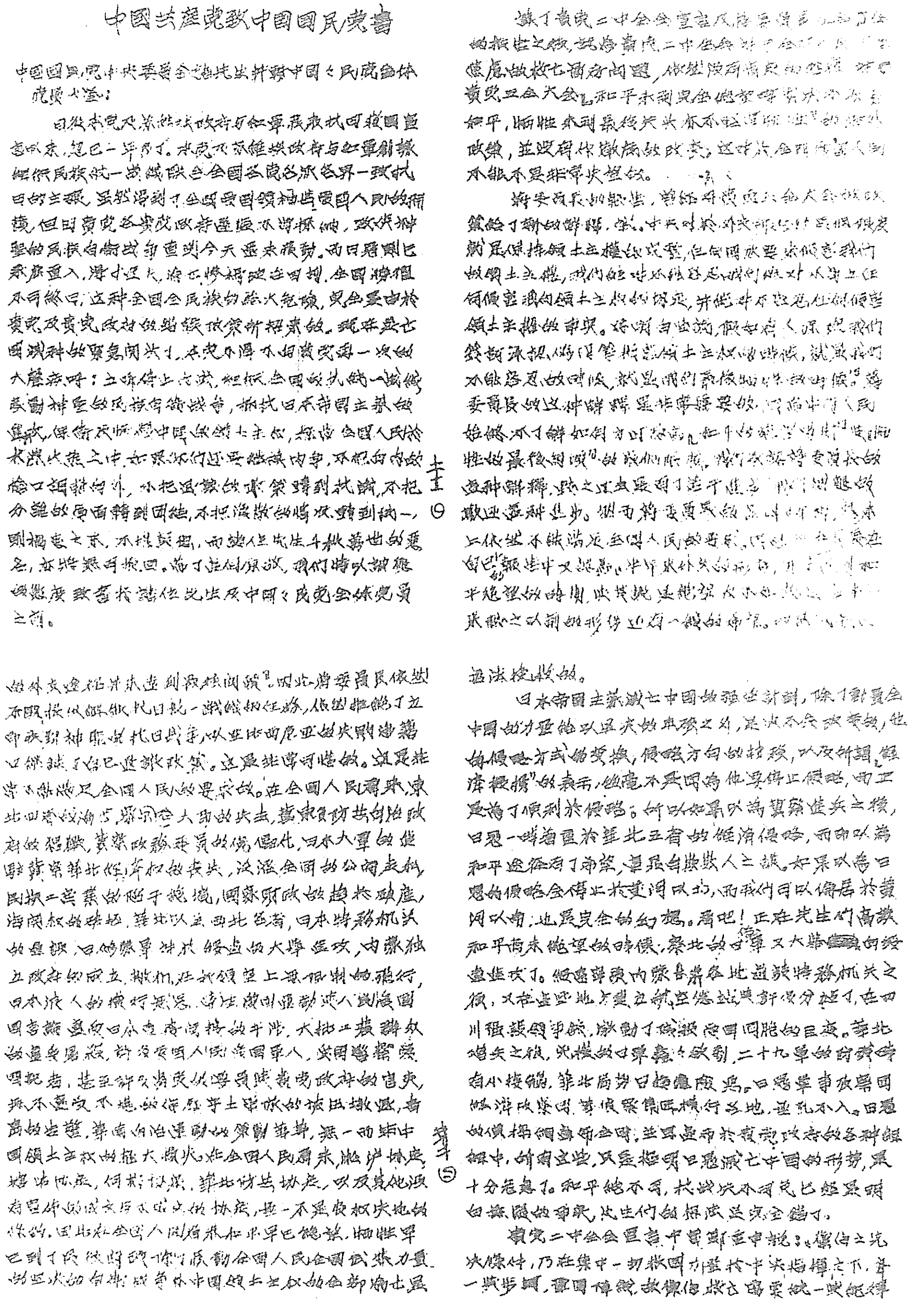
诸位先生及国民党全体党员，还没有忘记上次大革命时两党合

作的光荣历史吧，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起抖来了！那时的民族压迫者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深悉我们的合作会要进到彻底的胜利，会要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他们就挑拨离间威迫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终于挑动了合作的一方，葬送了这个第一次的统一战线。先生们清夜扪心，也应该喟然兴叹吧！现在是谁也明白，如果那时中国国民党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到底，那中国就决不会有像现在这样任人宰割、沦亡及半的惨状，而决然是独立自由的中国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但是问题是很明白的，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一切犹豫动摇，只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只是成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诚如贵党二中全会所说：国家兴亡，贵党有责。如果贵党真正愿意担负救亡图存的责任，那末现在是要下决心的时候了，等到做了亡国奴的时候再讲什么合作那就会悔之无及了。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地遵守这个协定。

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专此，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部分）。

关于向南京进一步谈判等问题致潘汉年电

（1936年8月25日）

小开兄：

甲、向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兄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到保安，受领新的方针，再以七天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乙、向李毅[1]说明这种谈判的成功，对于甲乙两军合作有大的帮助，将使两军合作更加密切，而不是不利于合作，并要求李毅于外出活动时，注意督促南京与我们迅速成立谅解。

丙、对李、白[2]代表暂时抑留在西安，但不可向他作具体表示。李毅对之亦然。

丁、我们与杨虎臣谈判交通、工商问题，张文彬如到，速查其交涉程度，并请李毅向杨交涉，务在日内将肤施、洛川间交通恢复原状。

戊、张子华如尚在西安即与同来，特别注意将他手中之曾养甫亲笔信及密码带来。

己、为求迅速，要求李毅派飞机送你至肤施，要李向杨交涉保

---

[1] 即张学良。

[2] 即李宗仁、白崇禧。

护，以利与南京谈判。

庚、需款甚急，三万元速送来。

赵　东

八月二十五日午速复

致陈绍禹电[1]

（1936年8月25日）

为着避免与南京冲突，为着靠近苏联，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这一带布满着为红军目前技术条件所不能克服的许多坚固的城池堡垒及围寨，希望苏联方面替我们解决飞机大炮两项主要的技术问题。陕北、甘北苏区人口稀少，粮食十分困难，非多兵久驻之地。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否则，只好把三个方面军的发展方向放到甘南、陕南、川北、豫西与鄂西，待明年冬天再执行黄河以西的计划。而这种做法，对我们非常不利，将造成许多损失。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王明）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1]

（1936年8月25日）

在九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我西方野战军九至十一月的任务是，消灭二马部队于运动战中，在不付过大代价条件下，克服若干必要的城寨，占领海原、打拉池、同心城及其以北地区；从发动回民群众斗争之中，争取回民大量加入主力红军；发展西北苏区，保障定边、盐池、豫旺苏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作战。三十一日，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地区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九月十四日，又占领将台堡和打拉池。红二方面军于九月十一日从哈达铺附近出动，至十九日，先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红四方面军则在九月七日前攻占漳县、临潭、渭源、通渭四座县城，以及岷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县的广大地区。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发布的关于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及红二、四方面军任务的训令。

给林彪[1]的信

（1936年8月26日）

林彪同志：

你的信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就是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请你与瑞卿[2]同志考虑这个问题。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布礼！

毛泽东

二十六日十四时

---

[1] 林彪，当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

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1936年8月26日）

小开[1]兄：

（甲）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李毅[2]兄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乙）你来信及南京密码今日收到，但张子华[3]未到。现急需兄去南京谈判，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但如不能取道肤施[4]，则往返需时过久。能否取道肤施，即复。

东[5]

二十六日二十二时

---

[1] 小开，指潘汉年。

[2] 李毅，即张学良。

[3] 张子华，当时是上海地下党员。

[4] 肤施，指延安。

[5] 东，即毛泽东。

冬季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1]

（1936年8月30日）

朱、张、任同志：

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我们有下列意见。

甲、情况

（一）日本向绥远[2]有急进势。

（二）全国民众抗日运动有更大发展。

（三）广西与南京的斗争尚未解决，估计蒋在西南问题解决后出兵到西北时，尚有两个月左右时间。

（四）成都感日近万民众暴动[3]，打死日人二，打伤日人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中共中央根据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后，将继续增兵西北和进一步分化东北军这一情况，对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冬季以前的部署作了调整。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日本为向中国腹地刺探情报，继在九江、武汉等地设立领事馆后，又要在成都、昆明等地设立领事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对。1936年8月24日，成都万余学生和民众举行抗议示威，愤怒的群众打死日本人两名，打伤两名，并捣毁日本人居住的大川饭店及经营日货的交通公司和益晋、恒宝商号。感日，系韵目代日，指27日。此处时间有误，应为24日。

本有借此大举压迫中国之势。

（五）南京抗日联日两派斗争颇烈。

（六）胡宗南[1]之钟松[2]旅开始由郑州向兰州开。

（七）蒋介石有于西南问题解决后，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3]之企图。

乙、我们的基本方针

（一）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

（二）紧密地联合东北军，并进行西北其他各部的联合谈判，造成西北新局面。

（三）反对日本截断中苏关系的企图，准备冬季打通苏联。

（四）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

（五）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丙、九至十一月的具体部署

（一）一方面军主力占领海原、靖远、固原及其南北地区，一部保卫定边、盐池、豫旺[4]、环县苏区，一部保卫陕北苏区，另一部保卫关中苏区（泾水、环水、洛水之间）。

（二）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2]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二师补充旅旅长。

[3]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4]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但岷州[1]如无办法夺取，则用少数监视之。

（三）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插出王均[2]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作战。

丁、上述部署的利益

（一）一方面军主力出至海原、靖远地带，四方面军出至武山、通渭地带的结果：一面使得李忠[3]三个师有所借口，全部控制兰州、定西地区，李仁李义[4]之一部得由平凉向西延伸，控制隆德、静宁、会宁等城；一面使得毛炳文[5]离开兰州，吸引之于陇西地区，相机给以打击，吸引宁夏二马[6]部队向中卫及以西地区，并相机给以打击，使定、盐、豫苏区不受威胁。

（二）二方面军向东的结果：首先吸引钟松旅于陕甘交界，使之无法西进；其次相机给王均以打击；其次把陕南苏区与甘南联系起来。

（三）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不但是冬季红军向西北行动的必要步骤，而且在目前我们与蒋介石之

---

[1] 岷州，指甘肃岷县。

[2]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3] 李忠，即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十一军军长。

[4] 李仁，即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六十七军军长。李义，身份不详。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6] 二马，指马鸿逵、马鸿宾。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兼新编第七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五师师长。

间不久就将举行的双方负责人谈判上也属必要。此外，在保护甲军[1]与李毅[2]，使不受蒋介石可能的打击，以及解决给养补充问题，都是必要的。以上意见，请你们考虑见复。

育洛恩博泽

八月三十日

---

[1] 甲军，指东北军。

[2] 李毅，即张学良。

戏赠周小舟联[1]

（1936年8月）

江河移胯[2]下；
蚂蚁做波臣[3]。

---

[1] 1936年8月，周小舟从延安启程去新疆宣传抗日。新疆军阀盛世才心狠手辣，不好对付。临别时，毛泽东见小孩撒尿，触景生情，吟成这副对联相赠，鼓励他藐视困难，勇往直前。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原名怀求，化名元诚、西苇，1937年由毛泽东改为现名。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毛泽东秘书。建国后，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因被迫害自杀。

[2] 胯，腰的两侧和大腿之间的部分。

[3] 波臣，指水族。古人设想江河湖海中的水族也有君臣之分，其被统治的臣仆奴隶，称为波臣。

给王以哲[1]的信

（1936年8月）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

---

[1] 王以哲（1896—1937），字鼎方，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9月1日）

（一）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二）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

（三）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因此要解释我们是真正主张“和平统一”的，我们的主张同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并宣布他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出的全国的国会，拥护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破坏和平统一的，南京的国防会议与国民大会是不能集中统一全中国抗日力量的。

（四）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

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出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对他们的错误决不放弃批评的自由。对蒋方应指出用内战决不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争论，应付之全国人民的公决。

（五）在对付宁粤两方这种冲突时，我们应力求避免在全中国人民前面，袒护一方面的态度。在全国人民前面，我们应表现出我们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决主张者，是全国各党各派（蒋介石国民党也在内）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种态度最能争取广大抗日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在国民党区域中也便利于我们的活动。

（六）关于建议“国共合作”的宣言，下次交通即带上，到时广为翻印，分发南京及各省党政军学商工农各界。

中央

九月一日

关于取消敌对行为互不侵犯等问题给孙蔚如的信

（1936年9月3日）

蔚如军长勋鉴：

孙君作宾来，知先生抗日情殷，愿赋同仇，甚感甚佩。敝军去岁入陕，及今之二四两方面军继续北上，其志悉在抗日。贵我双方虽彼此接壤咫尺，弟亦未尝视贵军为敌，良以同是中国人，何嫌何仇，自相煎灼！且先生与虎城先生所处环境，敝方甚为谅解，故十个月来贵方对弟等合作之要求，虽无明确的表示，弟方亦始终未变自己之方针。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尤以贵部移驻肤洛，双方益加接近，团结一致，更所必需。孙君转达各节，弟等极表欢迎。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允许经济通商，保证双方来往人员之安全，贵方民团与敝方之游击部队彼此负责约束，不使再生误会，为掩饰外间耳目计，一切可以隐蔽方式出之，至于交换情报，互派常驻代表，互约通信电本，均属必要，统请裁夺，其余由孙君面达，另付敝方致中国国民党书，并祈省察。匆此，顺颂勋祺。

虎城先生即此致意。

弟　毛泽东敬启

九月三日

陕西、甘肃、宁夏各苏区情况[1]

（1936年9月4日）

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地形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物产一般贫乏，不能供给大军久驻。神木特区，东西长二百余里，南北约三百余里，游击战争颇发展。关中苏区，南界距西安九十里，中部、三原、庆阳等十县的乡村已连成一片，县城非我所有。陕南苏区发展至二十余县，部队约二千人。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鼎电[1]

（1936年9月7日）

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付来。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致宋时轮等电[1]

（1936年9月7日）

我们委任回人马怀蘭为西北抗日救国军第一路游击司令。马为哥老会首领，在宁夏有群众，应优待和帮助他。马由保安到定边，需沿途派兵接送。

---

[1] 这是毛泽东致宋时轮并转贾拓夫电的主要内容。

给邵力子[1]的信

（1936年9月8日）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2]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3]，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

---

[1] 邵力子（1881—1967），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平未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2] 《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1919年创刊，由邵力子主编。从1920年起，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4年国共合作后，继续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去广州，国民党右派分子逐步控制了《民国日报》，《觉悟》的面貌随之右转。

[3] 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佥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给王均[1]的信

（1936 年 9 月 8 日）

治平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2]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顺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王均（1891—1936），字治平，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 朱玉阶，即朱德。他和王均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

给朱绍良[1]的信

（1936年9月8日）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2]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3]，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

勋祺！

毛泽东　启

九月八日

---

[1] 朱绍良（1891—1963），原籍江苏武进，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主任。

[2] 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并入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在陕北进攻红军。

[3] 指蒋介石。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1]

（1936年9月8日）

朱、张、任同志：

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2]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乙、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丙、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王[1]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丁、对张学良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于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与蒋有联系，张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

戊、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己、德怀在前线指挥野战军，育英[2]在环县进行东北军工作，我们在保安。

洛恩博泽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

[1] 毛，指毛炳文（1891—1970），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1891—1936），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 育英，即林育英（1897—1942），又名张浩，湖北黄冈人。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11月回国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林育英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红二、四方面军行动计划和统战工作进展情况[1]

（1936年9月8日）

红二方面军出两当、徽县，扩大占领区域，相机消灭王均。红四方面军在岷县、临潭、渭源、漳县、陇西、武山地域，一部出通渭、静宁。林育英率一组人在曲子主持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指挥。南京代表来而复去，约主要负责人见面，有成就希望。李宗仁、白崇禧有代表来华北，我们有人去南京。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毛炳文的信[1]

（1936年9月8日）

红军北上为抗日，此外悉无所求，先生断乎不可以恶意抗拒。

已电告甘南甘北部队，在贵军不过为已甚条件下，不与先生以困难。如先生赞同一致抗日之议，可随时派人与前线红军首长协商。

---

[1] 这是毛泽东致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毛炳文信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10日）

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师准备向通渭进攻，红四方面军通渭、庄浪部队宜向西迫近秦安游击，迟滞敌军，掩护红二方面军提前北进。红二方面军速通过通渭进至界石铺、通渭之间休息，准备经界石铺转静宁、固源、隆德之间。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9月10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速转移至静隆大道，相机袭占庄浪，迟滞胡宗南、王均部进攻通渭，以便红二方面军转移至通渭以北地域休息。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左权、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致贾拓夫电[1]

（1936年9月10日）

马怀蔺到定边后，要经常以开会方式同他讨论，争取马部军队，争取宁夏军队、群众及组织游击队，并详细调查宁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各方面的情况。

---

[1] 这是毛泽东致贾拓夫电的主要内容。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给彭德怀等的信[1]

（1936年9月11日）

彭、刘、富春：

（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

（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

（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

（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毛　周　博

十一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中国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刘晓和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的信。

占领宁夏的部署[1]

（1936年9月14日）

朱、张、任三同志：

甲、国际[2]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

乙、胡宗南[3]部第一师及四十三师、七十八师、九十七师，十号从长沙开动，先头十八号到咸阳，月底集中定西，其补充旅已由静宁向定西开。其目的不外控制兰州地区，妨碍甲乙两军[4]打通苏联，使联俄后苏方接济归其垄断，并于某种时机策应绥远[5]。

丙、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国际，指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决定，宣布解散。在这期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做过许多指示。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甲乙两军，指东北军和红军。

[5]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一）一方面军主力，九十两个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区，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开始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一方面军之其余部队，保卫陕甘北苏区。

（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1]，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2]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3]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

（三）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以南地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

（四）由陕北派出游击支队，经关中苏区出至泾水以南活动，牵制胡宗南之侧后。

丁、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当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在西兰大道以南，包括陕甘边与甘南，担负钳制敌军之任务。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在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中，三个方面军须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并与甲军取得密切之配合。

戊、宁夏马[4]部之士兵运动与回民运动，此间正用大力工作，

---

[1] 西兰大道，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2] 硝河城，镇名，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

[3] 宁安堡，镇名，为宁夏中宁县县治。

[4]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敌情、地形之详细调查不日电告。

己、请兄等考虑电复。

育英　洛甫　恩来　博古　泽东

九月十四日十八时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9月15日）

九、十两月须用全部精力进行宁夏的军队运动与回民哥老会运动，务必取得决定的成绩。所有各兵团领导及政工人员，务必克服对统一战线及回民工作认识不足、教育不力、工作不切实的弊病，必须选拔与指定多数得力干部担任此种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致彭德怀等红一方面军负责人及陕甘宁省委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聂荣臻部应南下策应红四方面军[1]

（1936年9月15日）

彭：

甲、李毅[2]无被刺事。他应与南京保持统一，但应准备万一时的防御阵地。

乙、胡师[3]补充旅进兰州，不是去甘凉肃[4]。胡宗南主力前进甚速，故令四方面军速控制静宁、会宁大道。

丙、聂荣臻[5]部应直下静宁、隆德间策应，尔后应迫近固原、瓦亭[6]线活动，使该线敌军不敢北进。

毛

十五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3] 胡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

[4] 甘凉肃，指甘州、凉州、肃州，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5] 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6] 瓦亭，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南部。

对三个方面军的行动意见[1]

（1936年9月15日）

朱、张、陈同志，并致任、贺、刘[2]：

战略建议电[3]发出后，适接十三日二十时电[4]，彼此意见大体一致。惟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5]为中心之隆静会定[6]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7]军占领该线。[8]以一部附电台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总指挥。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即《占领宁夏的部署》。

[4] 指1936年9月13日20时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电报。电报建议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向静宁、会宁地区，南同红军第四方面军以袭击方式侧击运动之胡宗南；红军第二方面军以主力在徽县、两当、凤县以北地区，并以一部进到宝鸡，牵制王均，吸引胡宗南。

[5] 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省静宁县西北。

[6] 隆静会定，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和定西。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8]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在“不让胡军占领该线”之后，还有“此是最重要着”几字。

东出华亭、陇县区域纵横游击，成一远出支队。二方面军之支队附电台直出宝鸡、眉县以东。我们已派一个师向静隆线出动，如此当可滞阻胡宗南之行进，而便于四方面军之出至隆定大道[1]，并准备作战。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2]三城必被马[3]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增至一个军协助之。请斟酌。

毛　周　彭
九月十五日

---

[1] 隆定大道，指甘肃隆德至定西的公路。

[2] 定盐豫，指陕西定边、宁夏盐池和豫旺（今同心县）。

[3]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四方面军宜以主力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

（1936年9月15日）

朱、张、任同志：

甲、蒋桂妥协。李宗仁为绥靖主任、五路军总司令。白崇禧[2]调南京。胡宗南[3]编入第七路军，第一师、第七十八师十八日全部到咸阳，四十三、九十七两师随后开来，尔后配置于静宁、会宁、定西、兰州线，配合川军及毛王[4]等军向岷州[5]压迫。

乙、一方面军已向海原、固原出动，一军团派第一师出静宁、隆德大道，策应四方面军。

丙、四方面军宜在五天至七天内以主力出至隆德、静宁、会宁、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之有利基点（界石铺比通渭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抄件，收电人是朱、张、任、陈、王。陈、王，指陈昌浩、王树声，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和副总指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副总司令。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5] 岷州，即甘肃省岷县。

大），迟则有被隔断之虞。渭水以南留小部队活动。以上建议请考虑。

毛　周　彭
十五日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1]

（1936年9月16日）

民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时参加过革命，一九二七年叛变了革命。现在，由于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的压迫，买办资产阶级在南京政权占据了绝对优势，民族资产阶级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统一战线，但这样的领导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取。国民党也正在争取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中间阶级有成立新的政党的可能，他们有广大的群众，但他们是动摇的，我们应当争取他们。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重新与资产阶级联合，更应该由我们领导，这样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建立民主共和国是当前的任务。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不是国民党所说的西方现代国家，它是有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农民的国家。一旦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我们应该参加，但要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的独立性。民主共和国一定要在群众运动、红军和苏维埃不断扩大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阻滞胡宗南部西进[1]

（1936年9月17日）

彭：

胡宗南[2]全部到西安，正陆续西运，甚速。已连电朱张[3]速以主力进占界石铺。为配合打击胡宗南，似有以我一军团一部向固原南部及西南部出动之必要。而在一、二日内聂[4]率之第一师宜集中行动，配合策应于静隆大道[5]北侧，向大道绕击，阻滞胡敌西进，同时以利我四方面军北出界石铺大道。如何，盼复。

毛

十七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3]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4]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

[5] 静隆大道，指甘肃静宁至隆德（今属宁夏）的公路。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9月17日）

我第一师已到静宁、会宁北端的单家集一带，红四方面军主力务须在三天内进占界石铺及以西地段，否则胡军乘汽车将在二三日内控制界石铺，我野战军昨日在固原北消灭骑六师主力，现令其向南进展策应你们。机不可失，千祈留意。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应以红一军团一部先占界石铺[1]

（1936年9月17日）

彭，并报聂[2]：

界石铺既无敌，一师应以一个团附骑兵一部在明日确实占领之，并向东南游击，以待四方面军来接替。否则胡宗南[3]先占该地大为不利。另派一部直达隆德、静宁道上扰乱。

毛

十七日十五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率该军团第一师前出静宁、隆德，策应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9月17日）

（一）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策动华北独立以来，对于中国的侵略没有一刻停止的，不论它侵略的方法与方式怎样〔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它并吞全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始终不变的。在华北进兵之后，高唱着的“经济提携”，实际上不过是以经济的侵掠方法巩固已得的阵地，并给新的进攻准备基础。平津与察北的增兵，绥东的进攻，城〈成〉都、北海、海口、上海、丰台等地的挑衅，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动又将开始。民族危机，较之过去是更加严重了。这就指出保卫华北、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的任务，更加严重的放到革命政党与全民族的身上了。

（二）一年来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广大发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发动，已经给了日寇侵略计划以相当的打击，暂时的阻止了日寇建立华北国与建立“防共统一战线”的实施，这是中国人民一年来抗日救亡运动的胜利。然而由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还不够广泛，它的力量还不够雄伟，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有组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时还『不』仅在开始的阶段，最大的政党——国民党及其领导与影响下的军队还没有参加这个战线，国民党的政策还

没有基本的转变，因之，民族革命战争还没有能够发动，以致我们不但没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继续侵略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的再不受到损害，而且日寇不〈还〉巩固了它在华北的地位，获得了对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新的侵占，并准备新的大举进攻。这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能够战胜的，但是需要全中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共同行动与艰苦卓绝的奋斗。

（三）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的表现在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继续增长，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抗日救国主张的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赞助与全国主力红军的集中于西北抗日前进阵地，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开始转向抗日战线，国民党军队官兵中广大成分抗日情绪的增长，和在这些基础上产生的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它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四）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复〈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容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但这绝对不应放松对于国民党南京政府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内部的抗日倾向日渐

发展，扩大抗日分子的影响，克服其本身的动摇，战胜亲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国的大道。中央必须着重指出：共产〔党〕在为着实现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不但对于统一战线之公开的或秘密的敌人，应该进行严厉的斗争，而且对于口头上赞成而实际上消极的假抗日分子，以及各种各种〈样〉的同盟者，应该保持批评有完全自由。同时中国共产党赞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战争之发动，即〔使〕这种发动是部分的。但是主要的，应用尽一切方法与力量，最迅速的促进与〔组织〕大规模的全国性的真正对日武装抗战。为此目的，共产党应继续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反对一切在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残杀的内战。

（五）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式〈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残〈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起

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方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决议上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大半年来党在执行这一总路线下，虽然得到了许多成绩，主要的在于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是加强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是扩大了，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行统一战线的工作是进步了，这些成绩应当成为今后工作的有利基础。〔但是〕许多党的组织极不善于具体的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对于每一个人、每一个派别、每一个社会团体、每一武装队伍、每一阶级与阶层，常常不善于根据它们不同的情况，不同的需要与要求，在抗日救国的总方针下，同它们接洽、协商、谈判，以求订立各种地方地〈的〉、局部的、暂时的，或长久的、成文的，或口头的，这种具体实际的行动纲领，并在为着实现这些纲领的共同斗争中，引导推动与组织他们走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全国抗日救国代表会议（或国防会议），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以至民主共和国。我们许多党的组织不善于这样做，而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满足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活动，以抽象的，刻板的与机械的方法方式去对付各个具体的问题。同时在统一战线一时不能建立的场合，却又表现出：

“共产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来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与组织群众的独立工作”之放松或不足。这些弱点，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今天还没有成为千千万万抗日大众实际参加的主观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认为必须及时纠正那种以为阶级斗争的发动会妨碍民族统一战线的观点。民族革命的胜利决不是少数上层分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万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动与逼迫动摇的游移的上层分子与当权者走向真正的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实现民主共和国。而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解决他『他』们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组织他们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关键。但在领导这种日常经济政治的斗争中，共产党要同样的善于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并根据于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把群众的日常斗争提到更高的阶段，使这种斗争成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扩大，继续发展与继续前进的力量，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的基础。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斗争过程中，绝对不应该削弱苏维埃红军的力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苏维埃红军在一定纲领上同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所成立的政治军事协定，但并不与其他政权及武装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统一指挥之下，但并不取消苏维埃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须充分注意于红军的扩大与巩固，那种不经过选择的允许学生及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加入红军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样足以破坏红军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充分注意加强苏维埃红军的领导成分，那种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苏区政治管理的意见，也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从内部来破坏苏维埃机关。即使在

民主共和国建立之后，共产党也决不放弃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的领导，相反的，党在坚决领导全中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与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要坚持着扩大与巩固自己的政治的与军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彻底的胜利，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实现。

（十）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的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在苏区内特别在非苏区内有系统的征收党员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须避免大批入党的办法，而只吸收经过考察的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入党。在这个意义上，去年中央十二月决议中“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社会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与“党不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采取实际办法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因为不论在苏区与非苏区，在彻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上，有独立工作能力『能』的优秀干部，有着决定一切的意义。动员成千成万的党员到一切无组织与有组织的群众中去争取千百万的群众在自己的周围，正确的建立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在为着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政治〔任务〕面前一刻不可放松的任务。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对于忽视党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性，忽视巩固苏维埃与红军，放松对于广大下层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领导，对同盟者批评不够等等右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及时的给以纠正。但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的危险。正确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将是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的有力武器。

给宋庆龄的信

（1936年9月18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1]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2]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3]、孔

---

[1]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2] 指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3] 吴稚晖（1865—1953），江苏常州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在1937年至1950年的国共斗争中，扮演积极反共的角色。

祥熙、宋子文、李石曾[1]、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

[1]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中国教育家，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曾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给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1]的信

（1936年9月18日）

乃器、行知、钧儒、韬奋先生：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2]，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

---

[1]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中国征信所董事长。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爱国民主人士，律师。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新闻记者和出版家，曾先后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当时他们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

[2] 1936年5月，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7月15日，他们四人联合署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

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

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1]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致

抗日救国的敬礼！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

[1] 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一军团主力暂在现地待机[1]

（1936年9月18日）

彭司令员：

两次电[2]达朱张，要其速占界石铺，尚未得复。打击胡军[3]，须以四方面军为主力，在其部署与决心未明之前，一军团主力暂时宜在现地待机。如能在固原北部再给何柱国[4]一个打击，使后路无被切断之虞则更稳妥。将来进攻宁夏，一方面军只能从盐池、豫旺、同心城分路前进，而以同心城以西划为四方面军之作战线，故后路保持甚为重要。请酌行。

毛

十八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17日12时毛泽东、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的电报。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1]

（1936年9月19日）

朱、张，并致任、贺[2]：

篠申电十九日十二时收到，敬复如下：

甲、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

乙、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能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

丙、外蒙、宁夏间是草地，有许多汽车通行路，过去即从这些道路接济冯玉祥。邓小平[3]同志亦亲从定远营[4]汽车路走过。他们从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任、贺，指任弼时、贺龙，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和总指挥。

[3] 邓小平，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26年底他从苏联回国，曾经定远营到银川，后又从银川到西安，在中山军事学校工作。

[4]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即今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外蒙接济，我们先占领定远营。

丁、据宁夏同志云，宁夏因有贺兰山，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实行攻甘西，亦须得到苏联协助才能攻克甘凉肃[1]三州等坚固城池。现盐池、定边可大批买布，我们在向李毅[2]借款，为你们制备一批衣服。从中卫到红水[3]、永登，沿黄河西岸并不通过沙漠。

戊、攻宁夏须待结冰（无造船把握），结冰从阳历十二月开始，距今还有七十天左右。此七十天内，四方面军占领静宁、通渭、会宁、靖远、海原、中宁（中宁县在金积县西南）及金积之一部，粮食不成问题。一方面军则占领固原、灵武、同心城及金积之一部，准备十二月初渡河。

己、因马鸿逵[4]有二十余团，汤恩伯、何柱国、高桂滋、高双成[5]等军在我军侧后，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6]，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

---

[1] 甘凉肃，指甘州、凉州、肃州，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武威和酒泉。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3] 红水，位于甘肃景泰县北部。

[4]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5]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高桂滋，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八十四师师长。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八十六师师长。

[6]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1]，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

庚、据最近调查，靖远以上至兰州不结冰，靖远以下均结冰。

辛、目前对胡宗南不宜进行决战，只须速进静宁以西，占领广大阵地，让他展开筑碉。我在七十天内逐步北移，至十二月一四两方面军各以一部拒止南敌，各以主力北进攻宁，配合苏联帮助，夺取宁城[2]，至明年春暖再行决定分路西进、南进、北进。

壬、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毛　周　彭

十九日十五时

---

[1] 马步青，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五纵队兼第二防守区（新编第二军）骑兵第五师师长。

[2] 宁城，即今银川市。银川旧为宁夏府治，称宁夏城。

一切工作都应围绕夺取宁夏[1]

（1936年9月19日）

今天讨论一个军事问题，就是夺取宁夏，大体计划已定下来了。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夺取宁夏的胜利，对开展局面有决定的意义，陕甘亦可巩固。宁夏堡垒比较多，如果没有群众工作，专靠硬打是不行的。在这里，白军工作、哥老会工作、回民工作是整个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加紧十一、十二两月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决定成立宁夏工作委员会，李维汉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并以叶参谋长名义指挥军事。对于马鸿逵，要坚决、迅速地消灭之。我们总的策略是联合一切，但不联合马鸿逵，要估计到马鸿逵是绝对无联合可能的。对于土豪，目前一切不打。以后在不妨碍军事行动时，原则上不打，但在红军需要时、群众需要时，也可以打，并要估计到一切土豪没有不站在马鸿逵方面的。

---

[1] 1936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着重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李维汉、林彪、叶剑英、王观澜、宋任穷等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特别强调了夺取宁夏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发言的一部分。

统一指挥十分必要[1]

（1936年9月21日）

朱、张，徐、陈，任、贺、刘、关同志：

来电均悉。

甲、四方面军北进部署既定，对整个战略计划甚为有利。

乙、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的意见[2]，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3]指挥三个方面军。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以毛、彭、王[4]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5]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指挥贺龙、随营学校（稍后改称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电报。

[2] 指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1936年9月19日22时致朱德、张国焘、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的电报，该电提出“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的建议。

[3] 这里指的六人军委主席团后因情况变化未成立。1936年10月10日20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朱德、张国焘及各方面军领导人电中，确定：“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

[4] 毛，指毛泽东。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5] 朱、张、陈，指朱德、张国焘和陈昌浩。

三同志一起工作。

丙、主席团地点暂时以在同心城[1]附近为适宜。

英　洛　恩　博　稼　泽

九月二十一日

---

[1] 同心城，当时属宁夏省豫旺县，1938年豫旺县改名为同心县。

给蔡元培[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子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

---

[1] 蔡元培（1868—1940），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1905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主盟员。1917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伧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

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2]，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

---

[1] 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927年国共分裂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组织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两广事变时，曾赴广西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1948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1949年一度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同年12月去美国。1965年7月回到北京。白崇禧（19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

[2] 指1936年两广事变中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议和避免战争一事。

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给蒋光鼐、蔡廷锴[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憬然、贤初先生勋鉴：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兄我双方合作救国[2]之时，又已整整三年矣。而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然而国际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弟等则转战南北，接近了抗日阵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即国民党内部亦有了若干开始的转变。凡此都是不同于昔

---

[1] 蒋光鼐（1887—1967），字憬然，广东东莞人。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2年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与蔡廷锴等指挥十九路军进行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军长。1932年参加指挥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蒋光鼐、蔡廷锴等组织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期间，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签订停战协定和抗日反蒋协定。

的新局面。驱除日寇，挽救危亡，为期实不甚远。敝党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提出了新的具体方案，检呈一份，敬祈审察。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于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1]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2]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如兄方以为尚有需磋商增改之处，不妨往复商洽，使臻完善，然后签订。总之，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钱寿康先生南旋，托致手书。海天在望，不尽依迟。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1]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方面起草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全文共8条，主要内容包括国共双方停止敌对行为，互相合作，唤起民众，实行对日武装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等。这个协定草案，当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

[2] 陈真如，即陈铭枢。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赴欧洲游历。

给于学忠[1]的信

（1936年9月22日）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雨峰[2]君晋谒崇阶，申述敝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佞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

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1]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十一军军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2] 彭雨峰，即彭雪枫，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23日）

已照来电向部队大动员，拥护与庆祝会合胜利，并通知全党全军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林育英俟朱、张到达界石铺大道即动身来前方。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并告贺龙、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鼎电[1]

（1936年9月23日）

我党与南京谈判条件已交潘汉年带来西安。张学良从中斡旋甚好，迅速达成和平统一，国家民族之福。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鼎电的主要内容。

给李济深的信[1]

（1936年9月23日）

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

[1] 1936年9月23日，毛泽东致信李济深，希望李济深和李宗仁、白崇禧派遣政治上负责人员来陕，能有专人常驻，沟通情意。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4日）

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为使胡宗南部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1]

（1936年9月24日）

胡宗南部陆续入陕，企图压迫与削弱红军，隔断中苏，隔断东北军与红军，然后强迫我们就范，成立妥协。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掠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

红一方面军一师已占领界石铺，红四方面军宜以先头师迅速进入，余部陆续北上。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致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复任弼时等电[1]

（1936年9月24日）

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

当前政治的军事的总方针，已为大家所同意，则中央内部的团结已有充分保障无疑。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复任弼时、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5日）

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阻止胡宗南西进确保界石铺[1]

（1936年9月25日）

彭，并告聂：

（一）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2]，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

（二）但目前阻止胡[3]敌西进仍属重要，十三团已否归还第一师，如未宜先派去加强之，界石铺仍应确保于我手中。此外是否可用一军团主力及八十一师占领固原、镇原线，威胁平凉、瓦亭[4]，请酌复。

（三）二方面军如何动作，我们正考虑与电商中。

毛

二十五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4] 瓦亭，镇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南部。

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1]

（1936年9月26日）

朱、张：

确息：胡宗南[2]部到咸阳未动，其后续尚未到齐。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3]，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北上后粮食不成问题，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

英　洛　恩　博　稼　泽

二十六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育英（张浩）、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3] 隆静会定大道，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静宁、会宁、定西间的公路。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9月26日）

国焘动摇，老总[2]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3]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老总，指朱德。

[3] 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

与南京谈判重提国共合作停止内战[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

彼方[2]又来电，来着重弟等前电所指地区正作一切准备[3]，兄等二十六日十二时电之估计并非事实。

（甲）与南京谈判系国际指示，南京内部已起变化，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均与以前不同，所以我们重提国共合作，力求停止内战，以便真正抗日，是当前唯一正确方针。恩来准备出去，仍应南京要求，实亦有此必要，因七个月来，往来接洽者均次要代表，非负责人不能正式谈判。

（乙）李毅[4]与我益加接近，杨虎城亦与我们实行停战，李、白[5]有代表来求订抗日协定，华北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均接洽中，马步芳亦有妥协线索，唯马鸿逵坚决反动，我应集力消灭。

（丙）宁夏人口百二十万以上，在西北为最富，与陕甘苏区连成一片，得之老苏区易于巩固，与凉州永登接壤可向甘西发展，与绥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

[2] 彼方，指国民党当局。

[3]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4] 李毅，指张学良。

[5] 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

远交界便于东进抗日，实政治军事经济国内国际之主要一环，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

毛　周　彭

九月二十七日

四方面军宜迅即北上[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2]同志，并致贺、任、刘[3]：

甲、迭接二十六日两电[4]，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

---

[1] 为贯彻关于红军第一、第四两个方面军合力北上夺取宁夏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屡电张国焘等，要其北上。1936年9月18日，张国焘在中共西北局朱德等多数同志的反对下，被迫放弃西进计划。9月22日，张国焘又违背西北局多数同志意见，致电中央，仍主张红军第四方面军先机占领甘肃北部，并于9月26日两次致电中央，告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出本电。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3]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4] 指1936年9月26日12时、22时张国焘等给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电报。前电说：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先机抢占永登一带地区，将胡宗南向北吸引。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务祈采纳。后电说：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乙、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且胡[1]敌因西兰路[2]断怕我夹击，又怕东北军不可靠，不敢向隆德、静宁，拟向天水靠近王均[3]。如四方面军西渡，彼将以毛[4]军先行，胡军随后，先堵击青兰线[5]，次堵击凉兰线[6]，尔后敌处中心，我处僻地，会合将不可能，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虑。

丙、因此，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7]，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一方面军目前一面确占界石铺，一面立即出四个团以上通过隆静线[8]，直迫秦安、天水，使胡敌不敢动作，以便四方面军十分安全的北上。

---

[1]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2] 西兰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3] 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军长。

[4]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十七军军长。

[5] 青兰线，指青海西宁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6] 凉兰线，指甘肃凉州（武威）至兰州的公路。

[7] 指朱德、张国焘、陈昌浩1936年9月18日发布的关于北上夺取通渭、庄浪、静宁、会宁的战役计划。

[8] 隆静线，指甘肃隆德（今属宁夏）至静宁一线。

务请朱张陈徐四兄顾及整个局势，采纳此方针，亦即九月十八日朱张陈三同志之方针。

丁、请诸兄速决速复。

毛　周　彭

九月二十七日十四时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

关于再令四方面军迅速北上致朱、张、徐、陈电[1]

（1936年9月27日）

朱、张，徐、陈：

（甲）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乙）俟得复电，我二师即出庄浪、秦安，一师出瓦、隆、静、界线策应。

（丙）胡宗南之补充旅已由会宁退兰州，会宁城仅留二个连，甚恐慌。有袭占该城可能。胡之余部不敢走西兰大道向宝鸡、天水进，我二方面军足以箝制之。二师出庄浪后，胡更不敢冒进。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

（丁）兰、凉线虽有五六百里，但沿途人户稀少，粮食不足，且中有大雪山。此为邓发亲历函告者。敌如先占要点，我将遇绝大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四方面军领导人接此电报后，即于当日致电中央，表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并说红四方面军“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决不再改变”。10月9日，四方面军到达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22日，二方面军到甘肃省隆德西北之将台堡（今属宁夏）与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二、四两个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困难。

（戊）请速决速电。

毛　周　彭

廿七日十八时

拟令一、二师策应第二第四方面军北上[1]

（1936年9月28日）

彭，并告聂：

甲、朱张来电[2]：停止西渡转向北进，先头师十月四日可到通渭，八日到界石铺[3]。

乙、谍息，胡[4]敌六个团到天水、秦安，六个团在凤翔及天水道上。关师[5]向宝鸡。

丙、我军有策应四方面军北上之任务，拟作如下部署：

一、第二师立即南下，取直径超越隆静大道，相机袭取庄浪、秦安、天水，然后在大道渭水之间向华亭、陇县广大地区纵横游击，成为三个方面军之中间的战略支队。加强其政治工作人员。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27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给中共中央和红军第二方面军领导人的电报。电报说：为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部队即出动，决不再改变。

[3] 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省静宁县西北。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5] 关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

二、第一师在原地区与第二师相呼应。

三、其余任务不变。

毛

九月二十八日二十二时半

开办随营学校非常必要[1]

（1936年9月29日）

贺、任、关、刘同志：

甲、二十八日电[2]悉。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乙、随营学校非常必要，你们所需干部主要靠此供给。我们从前线部队抽出大批高级干部开办红大[3]训练，储为将来之用。林彪为校长，罗瑞卿教育长，陈光、罗荣桓、周建屏、刘亚楼、谭政、周士第、周昆、袁国平、彭雪枫及师团营长百余人均在学习。前四个月专学政治理论，后四个月政治军事并重。此外，尚有造就连排长的普通科六百人，均长征中之优秀下级干部与战士。因此，暂时不能供给你们，但准备于毕业后分配你们一部分。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的电报。

[2] 指1936年9月28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关于红军第二方面军状况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因远征中经过大小十余次战斗，干部伤亡颇多，请派师团级军政干部若干人来，并决定开办随营学校培养干部。

[3] 红大，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丙、在四方面军北上条件下，只要你们当前情况许可，应该尽量争取在现地区休息整理扩大。

毛　周　彭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9月29日）

回师北上之电敬悉，各同志十分佩服与欢慰。

兄处似宜即用原占通渭部队，日内迅占通渭，以取先机。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力求迅速争取和刘湘建立关系[1]

（1936年10月1日）

刘湘代表如在天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

应与国民党军积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1]

（1936年10月1日）

朱、张，徐、陈同志，并致贺、任、关、刘：

据报：静宁骑三师第七团曾派代表到通渭与通渭红军联络，但通渭方面仅估计骑七团派代表来的原因是怕我们打他，因此似未十分积极地与之建立统一战线关系。我们向兄等建议：发一通知于各部队，对一切白军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均一律用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根据我们十个月经验，红色指战员中如无深切的教育及工作中自己的经验，对于与白军建立统一战线工作是困难的。因为又要打又要和的复杂情况，一般的同志颇不易了解。

毛　周　彭
十月一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等的电报。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2日）

现全国人心愤激，要求南京抗战，南京亲日、抗日两派争论未决，新事变在酝酿变化中。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二师宜位于硝河城地域[1]

（1936年10月2日）

彭：

胡宗南还在陇县一带。我二方面军将于一星期后转移至渭水以北。据李富春[2]报，宁夏群众很好，马[3]部恐慌，除少数据点外，大部围寨可不战而定，并有抢夺渡船之可能。似此二师宜即位置于硝河城[4]地域，以便待提早攻宁问题决定后，二师调动便利，不致过于疲劳。关于提早攻宁问题，请你提出意见。

毛

二号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

[3]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第十五路军）司令兼新编第七师师长。

[4] 硝河城，镇名，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

二方面军渡渭水后的我军行动部署[1]

（1936年10月2日）

朱、张，徐、陈，并致任、贺、关、刘[2]：

甲、关于二方面军的行动，根据他们现处地域的情况和他们本身需要休息的情况，似不宜于在渭水以南单独的打仗。故我们曾对他们提议，侦察渭水渡河情况，并准备在一星期后，作战略的或战役的行动。今据他们一日来电，拟一星期后渡到渭水以北地域，我们觉得是可行的。你们意见如何，请告。

乙、二方面军渡到渭水以北之后，三个方面军均处内线，主要的敌人胡关王毛[3]等军，将首先依据渭水流域构成封锁，然后将我压至陕甘大道以北，再凭大道筑起封锁线来。敌之两个步骤完成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等的电报。

[2] 任、贺、关，指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总指挥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司令。

间大约需两个月左右，如我能合力给敌相当打击，还可延长些时间。从十二月起，我之主力向北开展新局面，二方面军即从内线拒止南敌至明年二月，以后我们进入新的地位，自可使用若干力量打出南面封锁，转向外线活动。

丙、估计胡敌集中以后，如不遇到我们打击，二方面军在大道渭水间是[1]能久停的，那时当然再可以北进一步，即进到固原、镇原、庆阳以南地区。严重的缺点是要与李毅[2]冲突。再则长期停留，给养也较困难。所以在十月、十一月内，似有集中三个方面军全力选择有利机会给南敌以打击之必要，但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迅速在靖远、中卫地段渡河，则自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

毛　周　彭

十月二日十四时

---

[1] 原件“是”后似漏一“不”字。

[2] 李毅，即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

二方面军宜乘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转移[1]

（1936年10月3日）

贺、任、关、刘：

胡宗南[2]第一师及七十八师，其三个团已到清水，余六团从扶风、岐山跟进。关麟征[3]四团向宝鸡开，有配合王川各部[4]先向你们攻击之势。你们宜乘胡敌尚未全部集中之时迅速开始转移为佳。转移道路似宜走武山附近，并先以支队附电台从天水附近渡河，向胡敌前进，迫近胡敌，节节钳制，掩护主力转移。如有可能，最好再用一支队附电台留在现地若干时，一面吸引敌人，一面候胡敌后续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4] 指国民党军王均部和川军一部。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川军，主要指编为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十二纵队的川军第四十一军及第四十五军一部。

六团集中清水时，从清水以东渡河转入华亭、陇县一带，在敌后活动。此两支队均以不少于一个师为适宜。仍望斟酌处理。

毛　周

三号一时

四方面军应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1]

（1936年10月3日）

朱、张，徐、陈：

甲、九十三师[2]宜迅占庄浪，以后续部队接占通渭。庄浪通渭两处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掩护四方面军主力北进，并掩护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北转移。五军仍宜照原计划向庄浪进，以增厚东面兵力，因胡宗南[3]已有六团进至秦安、清水，但其后续尚在扶风、岐山道上，估计还要五天至七天才能在清水集中完毕。

乙、会宁城已为我西路支队[4]占领，似此，静宁定西两城以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九十三师，指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师长柴洪儒、政治委员叶成焕。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陈漫远率领的由第七十三师1个团和骑兵第三团组成的特别支队。该部于1936年9月中旬与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特别支队相呼应，南下策应红军第四方面军北上，于10月2日凌晨袭占甘肃会宁城。

外，以界石铺、会宁城为中心的大道已控制在我手中。兄处除以一部接替会宁、界石铺大道外，宜迅将主力集结马营、通渭地区，主要注意天水、秦安方面。岷县、临潭部队宜迅速北撤。

丙、武山、甘谷方面宜布置相当兵力，掩护二方面军转移。

丁、因兄处已部署占庄浪，二方面军亦将北上，我二师暂停止于硝河城。

毛　周　彭

三号十二时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4日）

朱、张来电主张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他们有造船工人，只要木料铁钉。同心城地区有铁匠能打铁钉否？我们准备派铁匠来同心城。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4日）

准备即派铁匠至同心城造铁钉。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截断会静定间道路并立即占领庄浪[1]

（1936年10月5日）

朱、张，徐、陈，并告贺、任、关、刘[2]：

甲、为彻底消灭迫近会宁城西南门之敌，请你们令向会静[3]前进之部队即速截断会、静、定西间道路，以便我第一师及守城陈支队[4]明（六）日将敌击溃后全部俘虏之。该敌大约是邓宝珊[5]部一团至二团。

乙、胡宗南[6]先头才到清水、秦安，大部尚在咸阳、清水道上。判断该敌再须十天左右才能全部集中并开始展开。二方面军从六号起以四天行程经天水以西到达通渭。千万请你们派有力一部立即占领庄浪，在通渭、庄浪两地部队均向秦安迫近游击，以确实掩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贺、任、关，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会静，指甘肃会宁和静宁。

[4] 陈支队，指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陈漫远率领的支队。

[5]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新编第一军军长。

[6]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护二方面军之到达。

毛　周

五号十五时

派人侦察宁夏及绥远等地敌情[1]

（1936年10月5日）

罗迈，宋、宋：

甲、立即派妥人分两次出发（装做生意的），经宁夏直到阿拉善旗达王[2]根据地之定远营[3]，确实侦察该地日本人修建机场、储存飞机情形，该地城堡高厚程度，达王步骑蒙兵数目及宁夏到该地沿途里程、房屋、关隘等情形。

乙、宁夏绥远[4]两处日本人是否已筑飞机场及设特务机关，亦派人专查。

丙、上两项限十一月五日以前报告我。

丁、张心余[5]十一月五日须到定边待命。并请立即函张将他所

---

[1] 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为实现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专门成立了定边工作委员会，从事夺取宁夏的准备工作。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迈（李维汉）、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治委员宋任穷的电报。

[2] 达王，当时任宁夏阿拉善旗旗长、国民党军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司令。

[3]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俗称王爷府，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张心余，即张德生，中共三边特委书记。

知宁夏至定远营道路、房屋、关隘及定远营之一切情形先期妥报你处。

毛
五号十五时

给张学良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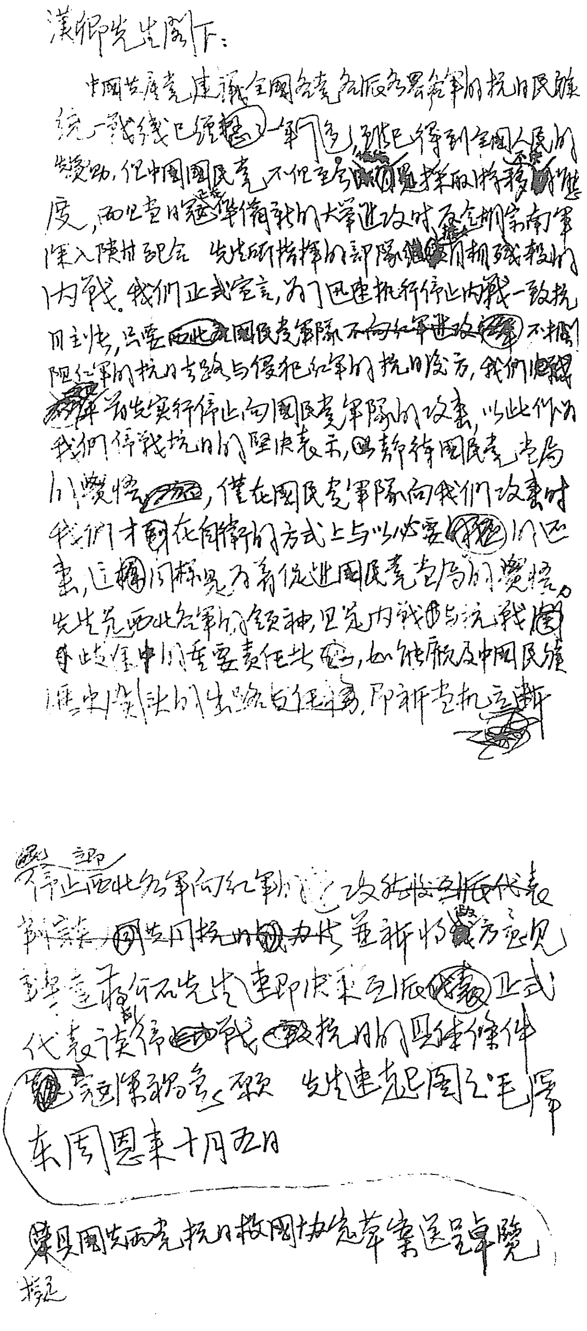
（1936年10月5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进入一新阶段，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尚未采取抗日态度，而且至今还准备对我们大举进攻，并企图胁迫东北军及先生所指挥的部队继续对我们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向红军进攻~~不阻碍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愿意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回击，这样的标明了我们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为西北各军的领袖，且为内战与抗战问题此时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与先生的出路与任务，即请考虑立即

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派代表~~ ~~到苏区商谈共同抗日办法~~并将我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定派遣正式代表谈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illegible] 先生速复是盼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

毛泽东、周恩来给张学良信的手稿。

致林育英等电[1]

（1936年10月5日）

红四方面军屡次来电要求你去一次，我们觉得有此必要。请你立即结束现任工作，十月二十日前到达同心城，与朱、张会面，转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党中央新政治决议案日内即送同心城。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致林育英（张浩）并告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5日）

同意迅速从靖远、中卫渡河之意见，但甘谷、庄浪仍宜配置必要兵力迟滞胡宗南部，以掩护二方面军北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1]

（1936年10月6日）

罗、宋：

目前不应过分威胁宁夏，因此东方仍以支队活动为适宜。二十九军亦不宜过早到定边。

毛

六日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定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罗迈（李维汉）和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的电报。

对一军团主力行动的意见[1]

（1936年10月6日）

彭，并告左、聂：

甲、四方面军同意我们意见，以一个军到靖远布置渡河，以一部向甘谷、武山间及庄浪活动，掩护二方面军北移。主力位于通渭、马营、陇西、会宁地区，对付胡毛[2]及定西敌。二方面军五号由徽县到天水以南，约九号到通渭。尔后拟令其转至瓦亭、隆德、静宁大道及其以南地区。

乙、在四方面军接替会静段任务后，一军团主力（一二两师）如何行动问题请即提出意见。我意以占领固原城、硝河城、青石咀三点之间地区及其附近，南与二方面军接近为适宜，以便尽量将胡宗南军与东北军向西吸引，利于尔后之机动。如何望即复。

毛

六号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集中渭水以北后的行动部署[1]

（1936年10月6日）

朱、张，徐、陈，贺、任、关、刘[2]：

甲、四方面军五号电部署及二方面军从天水以西向通渭转移，我们均完全同意。

乙、我三个方面军在渭水以北集中后，胡毛王[3]三军及东北军均必须从新部署，需要相当时间。尔后，拟四方面军主力仍在通渭、马营[4]、陇西川、会宁、界石[5]地区，一个军相机攻占靖远，布置从靖远以北至中卫段渡河事宜；二方面军拟从通渭再转进至通渭、静宁、隆德、庄浪之间；一方面军之一二两师则将会宁、界石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贺、任、关，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4] 马营，镇名，位于甘肃通渭县西北。

[5] 界石，即界石铺，村名，位于甘肃静宁县西北。

防务交给四方面军后，转至隆、静大道以北固原以南地区，使胡、王、毛、何、王（以哲）[1]各军不得不展开筑碉前进，我则利用时间休息兵力，待十一月即可开始执行新任务。

毛　周

六日十七时

---

[1] 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骑兵军军长。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争取迅速开始与南京主要代表谈判[1]

（1936年10月8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八同志，德怀同志：

（甲）为确保政治、军事、外交秘密，从今日起用秘字编号发给你们之电，请指定专人翻译，限于你们九同志阅看后立时烧毁。请你们向我们负责，不使任何别人知道。

（乙）第三次与南京联络的代表九月二十日到达广州，二十八日来电称彼方[2]代表北来恐惹人注意，约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电：

第一，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切望南京政府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相助，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

第二，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以便双方主要代表谈判。恩来飞赴广州，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第三，我方宣言，只要彼方不拦阻抗日去路与侵犯抗日后方，红军首先实行停止向彼方攻击，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仅在彼方进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形式下给以必要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的电报。

[2] 彼方，指国民党当局。

回击。

（丙）估计南京政府在日本新进攻面前有与我们成立妥协可能，但一面仍以重兵压境，企图迫我就范。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

洛甫　泽东
十月八日

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目前的部署[1]

（1936年10月10日）

宋、宋，并告彭：

甲、高敌双成[2]现无西进模样，敌横山、石湾部队现正积极筑堡垒，因我游击队迟滞之，前进甚缓。如三十军向米横方向活动会引起重新部署，造成对峙，而该地粮困，又不力持久，因之三十军仍以留安、靖边之南清匪与进行赤化为宜。

乙、二十九军于本月半后移铁边城以北清匪就食，逐渐向北转移，月底达安、定、靖边[3]间，以免过早暴露。

丙、同意对二十八军目前部署[4]。

毛

十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和政治委员宋任穷并告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六师师长。

[3] 安、定、靖边，指陕西西北的安边、定边和靖边。

[4] 指宋时轮、宋任穷1936年10月7日8时电报中拟以红军第二十八军西路支队出盐池西南活动7天后再转向西北，其余部队仍担任定边、盐池两县防务的部署。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0日）

朱、张已到会宁，询问见面人员与地点，中央已复。我们意见，以兄西去就他们为宜。朱、张来电称中央及毛、周、彭，自称西北军委，又一电称执行毛、周、彭所示任务，亦事实上承认我们军委。我们方面曾有两电去，称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以后即照此种方式解决，以便顺利执行宁夏战役。朱、张以两总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各军作战。为使之增加对于执行军事任务之坚决性，防止可能的动摇性（在目前是防止对宁夏战役之某种可能的动摇），兄须加以特别之注意。

见面时对老问题请一概不谈。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及军事部署致潘汉年、叶剑英电

（1936年10月10日）

开、剑：

甲、张子华二十日到广州，二十八日发一来电，九日收到。据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乙、二方面军外翼已不利，决集内线，朱、张已到大道。

丙、为执行尔后战略行动之便利，须设法使王以哲驻固原指挥，将何柱国南调，可借二方面军北进调换之。

丁、毅兄[1]主力宜集平凉，在固原不宜置多兵，蒋即有意调固原两师向南，宜即执行于我有利。

戊、抗胡、侯二方面军到通渭后再部署，兄等设法推延时间。

东

十月十日十时

---

[1] 指张学良。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

（1936年10月）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准备由周恩来带去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后来没有签订。

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

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关于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致潘汉年、叶剑英电[1]

（1936年10月）

张子华[2]来电称，陈立夫[3]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

[1] 这是毛泽东致潘汉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3] 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致左权等电[1]

（1936年10月11日）

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1]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

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

[1] 1936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指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成绩，总结了政治工作在干部教育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致左权等电[1]

（1936年10月11日）

同哥老会建立统一战线，是在争取其中优秀的分子及扩大群众参加抗日，并利用它进行白区白军工作；而不是在苏区内另外给哥老会组织团体与军队，扩大与加强它在苏区内的影响与力量，造成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困难。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左权、聂荣臻、刘晓、李富春、李维汉、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政治工作的问题[1]

（1936年10月11日）

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克服长征中的疲劳现象，提高政治情绪上有成绩。应特别注意干部教育，在这方面过去有成绩，也有很多经验，主要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教育课少而精。

政治工作的方式要有计划性、纲领性和灵活性，既要集中统一，又要有伸缩性，注意各地方、各时期、各部队的差别，要适应游击战争的特点。整个红军教育，包括军事教育、政治教育、纪律教育和文化教育，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的干部政策：第一，是信任干部，对干部应用之不疑；第二，对个别干部的错误，不应扩大化，应帮助他彻底解决问题；第三，尊重地方干部，他们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第四，注意对干部进行政治教育。我们的干部标准是：第一执行党的路线，第二能与群众联系，第三有独立工作能力，第四遵守党的纪律。

---

[1] 1936年10月11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问题。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指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成绩，总结了政治工作在干部教育方面的经验。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的主要内容。

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1]

（1936年10月11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彭九同志：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草案电达，请你们提出意见。此草案是我方起草，准备恩来带往谈判。彼方所能容纳之最后限制，尚不详知。

洛甫　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彭德怀的电报，向他们征求对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意见。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13日）

九月二十三日小平同志来信，及一军团党务委员会的决议，我们完全同意。盼你们坚持这种方针，深入干部中去，从根本上转变工作作风，与发展思想上的斗争，教育干部，将干部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一步，是执行一切政治军事任务的决定一环。

---

[1] 这是毛泽东和杨尚昆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1]

（1936年10月13日）

彭：

甲、吊堡子到打拉池、到硝河城若干里，会宁到打拉池、硝河城到打拉池若干里。

乙、已电询朱张[2]何时到打拉池。

丙、二方面军大约七天内到单家集、硝河城之线。

丁、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3]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

戊、请准备派一负责人（聂鹤亭[4]如何）带电台或用陈漫远[5]电台到黄河边，参加朱张所派之一个军造船与部署渡河战役之指导事宜。

己、一二两师本月底须集中固原以北，以便全野战军集中训练至少半个月，预先准备粮食。

庚、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6]。

辛、中日形势极度紧张，汤恩伯[7]奉蒋令集中候命援绥[8]。

毛

十三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就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纲要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准备12月利用冰期过黄河占领宁夏，打开西北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为贯彻这一计划，10月11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3] 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36年10月11日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其内容是：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作战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1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进至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固原、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及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进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

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11月10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击准备。

庚、11月10号前各部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的执行新任务。

辛、宣传鼓动以庆祝会合，消灭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扰乱抗日红军后方之敌，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日寇侵略中国，为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等口号为中心，不提宁夏任务以免泄露。

壬、本纲领依情况变化得部分修正之。

癸、本纲领不得下达，各部任务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4] 聂鹤亭，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参谋长。

[5] 陈漫远，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政治委员。

[6] 冰期计划，即红军准备在1936年乘结冰期过黄河，消灭国民党宁夏军阀部队，占领宁夏的计划。

[7]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

[8] 指援助当时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中国军民抵御日本侵略的抗战活动。

复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4日）

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任务，对张国焘及其他干部不可求善太急。我们政策应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他们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周恩来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已向南京提出四项意见致叶剑英电

（1936年10月14日）

剑：

甲、迟延胡宗南进攻，使我在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保持西兰大道于手中，以便二、四方面军休息整理，顺利执行新任务。

乙、已向南京提出：第一，日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第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此项请告毅[1]并转年[2]。

丙、年何日去沪，毅何日赴宁？

东

十月十四日十六时

---

[1] 指张学良。

[2] 指潘汉年。

当前形势与扩大停战抗日运动[1]

（1936年10月15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并告彭：

（甲）现中日关系极度紧张，日帝在上海及长江沿岸增兵增舰，甚至提出驻兵海南岛的要求。意在引导全国视线注意华中、华南，压迫南京政府屈服，诱致英市[2]让步，以便实现华北五省自治与进占绥蒙的根本计划。据驻归绥日本特务机关宣称，绥远地处特殊，日本志在必得，现察北，内蒙李守信、王英等部，已重新武装二三万人，日本派大批军事顾问随军，其前锋已入绥境，与绥远军队已发生前哨战，正式接触即在目前。晋绥军已有一部开往绥东，汤恩伯队亦奉蒋密令，准备开绥抗战，万耀煌师在洛阳布置防御工事。蒋并密令粤军调集沪抗战，湘军调集平汉线，蒋似有以重兵保长江流域及黄河以南，而于晋绥实行局部抗战意。

（乙）我们为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扩大停战抗日运动，除以送致公开函给国民党并去电要求停战谈判外，现拟以红军各将名义发布致西北各军，重申请其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援绥，并表明红军愿作前驱，以保卫西北，保卫华北，保卫中国，收复东北。此文件苏区发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2] 原文如此，疑有错漏字。

布后，拟向我周围白军白区进行广大的停战抗日运动，以响应和援助可能发动绥东的抗战，现请二、四方面军将现在各军师长政委姓名电告，以便列入在内，以广宣传，以壮声势。兄等有何意见，亦请电告。

洛　泽　博

十月十五日午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话[1]

（1936年10月15日）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现已发布命令：

（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为；

（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

（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

（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举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援助。

吾人已决定再行恳切申请一切国民革命军部队与南京政府，与吾人停战携手抗日。该项申请书已在草拟中。目前察晋绥三省形势，已属危急万状。吾人极愿与南京政府合作，以达援绥抗日救亡图存之目的。如南京政府诚能顾念国难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苏维埃愿以全力援助，并愿以全国之红军主力为先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

[1] 这是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名义通过苏维埃新闻社发表的谈话。

目前我军应坚持休整与迟滞敌人前进的方针[1]

（1936年10月16日）

任、贺、关、刘，并致朱、张[2]：

甲、十四日电悉。二方面军进至单家集、硝河城[3]线后即可开始休息整理。该地区比较丰富，待一方面军执行新任务时接替对南防御任务，亦当有休息机会。

乙、我三个方面军目前应以休息整理蓄积锐气准备执行新的战略任务为基本方针，对敌采迟滞其前进方针。判断在敌情地形等条件下可能达此目的。即使船渡不成，我亦应坚持此方针，方于尔后行动有更大利益。

毛　周

十六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任弼时、总指挥贺龙、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和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等的电报。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

[3] 单家集、硝河城，均位于今宁夏西吉县东南。单家集，今作单民。

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1]

（1936年10月16日）

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一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

[1] 1936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育英（张浩）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情况和中央的方针。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条件[1]

（1936年10月17日）

朱、张，徐、陈，任、贺、关、刘，并告彭：

（甲）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来国民党条件如下：

（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

（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

（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

（四）即派人具体谈判。

（乙）蒋介石十六日到西安，我们正交涉由蒋派飞机到肤施接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

（丙）为根本停止胡宗南进攻或延缓其进攻期，请你们速将十五日泽东谈话大批印刷，多数小支队直接送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胡宗南、朱绍良，另由向前写信给胡，内附泽东谈话，派专人由静宁送胡（静宁已由胡部接防）。如何，盼即复。

洛　泽　周

十七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为徐向前[1]起草的致胡宗南信

（1936年10月18日）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2]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

---

[1]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2] 蒋，指蒋介石，曾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为唐突也。专此。顺叩

戎绥！

学弟　徐向前　手上

十月十八日

当前统一战线形势[1]

（1936年10月18日）

朱、张，并告彭，贺、任，徐、陈：

我党致国民党书已在全国各地及国民党军队中发生极大影响，得到国民党中及各阶层中广大同情。日本侵略日亟，亦不能不影响国民党军队之干部。我三个方面军集中，彼等又有所畏惧。正与国民党谈判，彼方当有不欲使谈判弄僵之意。张[2]本拟飞宁面蒋，请允蒋使入苏区调停，蒋复日内来陕，主要为对我对日两事。昨日胡、王、关、毛、沈、李、曾、唐[3]各蒋系将领联名电蒋、张，以交通阻滞运输困难为词，拟先从改善给养运输着手，亦似有不欲迫我过急，延缓前进之意。李旺堡白团经双方接洽，李毅演假进攻，我把白团放出了事。汤恩伯准备援绥抗日，南京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总观各方情况，目前时局正处在转变交点，我应不失时机，善于运用，争取国内和平，转向对日抗战。请照昨电意旨由朱总司令致书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书胡宗南及其他黄埔生，贺龙同志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给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

[2] 指张学良。

[3] 指胡宗南、王均、关麟征、毛炳文、沈克、李默庵、曾万钟、唐淮源。

致书何柱国各部及胡部，发展我们影响。书中一本诚恳相劝之意，不作任何自夸语，自能发生效力。一面严整壁垒，提高士气，立于不败之地。办理情形望复。

洛　毛　周

十月十八日十五时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19日）

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红四方面军有残废干部及老弱幼孩等六百四十人，由余洪远率领来同心城，请处理并发动慰劳。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鲁迅逝世发出的电报

（1936年10月20日、22日）

一　致许广平的追悼鲁迅先生的唁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许广平女士鉴：

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震悼。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的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仅以至诚电唁，深信全国人民及优秀之文学家能继续鲁迅先生之事业，与一切侵略者、压迫势力作殊死的斗争，以达中华民族及其被压迫的阶级之民族和社会的彻底解放。

肃以电达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

二　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噩耗传来，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

的巨星鲁迅先生陨落于上海。当此德日等法西斯蒂张牙舞爪，挑拨世界大战，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对于鲁迅先生的死表示最深沉痛切的哀悼！

鲁迅先生的一生的光荣战斗事业，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被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锐〈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和毒物无处躲避，他不但鼓励着大众的勇气向着敌人冲锋，并且他的伟大，使他的死敌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惧怕他。中华民族的死敌，曾用屠杀监禁，禁止发表鲁迅的一切文学，禁止出版和贩卖鲁迅的一切著作来威吓他，但鲁迅先生没有屈服，民族的死敌想用“赤化”“受苏联津贴”等捏造的罪状来诬陷他，但一切诬陷都归失败；民族的死敌，特别是托洛茨基派想用甜言蜜语来离间大众的阵线，但鲁迅先生给了他以迎头痛击。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巨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

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已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南京国民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及全世界拥护和平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人士，一致起来要求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南京国民政府执行上列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尤其是文学界，一致起来继续鲁迅先生光荣的事业，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为中国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十月二十二日

三　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南京国民党政府公鉴：

噩耗传来，鲁迅先生病殁于上海。我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上的权威、文坛上最灿烂光辉的巨星竟尔陨落，此乃我中华民族之大损失，尤其是当前抗日运动的大损失。鲁迅先生毕生以犀利的文章、伟大的人格、救国的主张、正直的言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其对于我中华民族功绩之伟大，不亚于高尔基氏之于苏联。今溘然长逝，理应予以身后之殊荣，以慰死者而示来兹。敝党敝政府已决定在全苏区内实行：（一）下半旗志哀，并在各地方与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设立鲁迅纪念碑；（五）搜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贵党与贵政府为中国最大部分领土的统治者，敝党敝政府敬向贵党贵政府要求：（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立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收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贵党贵政府所颁布的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之法令。表扬鲁迅先生正所以表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敝党敝政府的要求，想必能获得贵党贵政府的同意。特此电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给叶剑英、刘鼎[1]的信

（1936年10月22日）

剑、鼎二兄：

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2]、理治[3]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4]

---

[1]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刘鼎（1903—1986），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2] 雪枫，即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3] 理治，即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东北军的特派员。

[4]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

的《大众哲学》，柳湜[1]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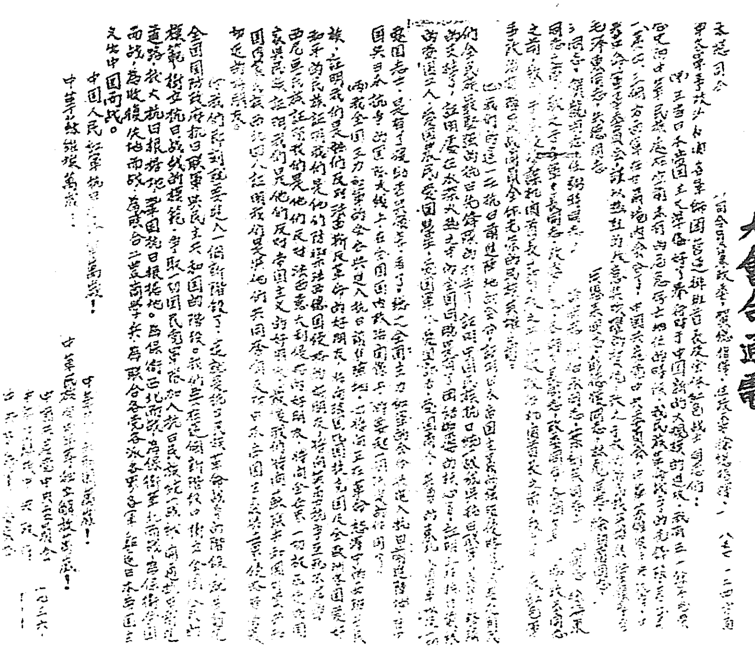
请你们写一个带分析性与综合性的报告来。

润之
十月二十二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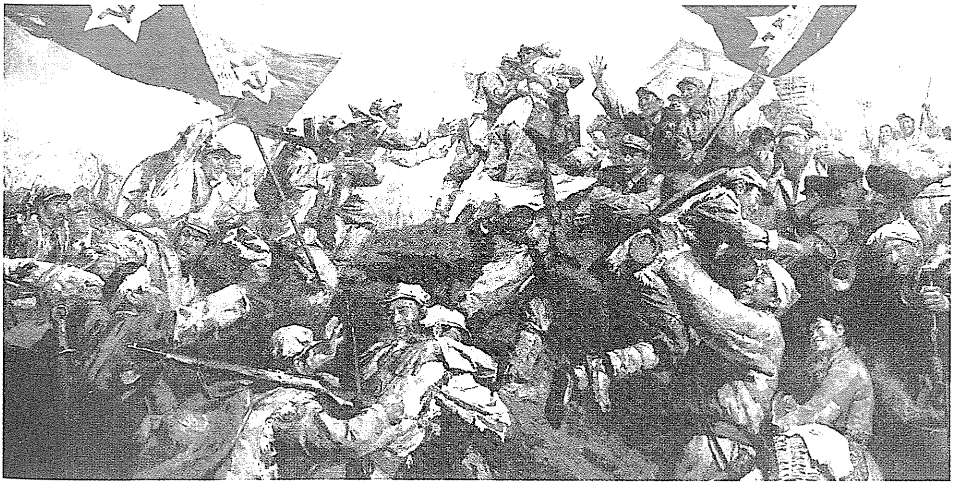
[1] 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图为三军会师的会宁县城城楼。



中央為慶祝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通電

中共中央为庆祝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通电。



《三大主力会师》（油画）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22日）

会谈时请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关于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城堡困难及如何接取远方货物等，均须注意，并以商定结果见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转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给彭雪枫的信[1]

（1936年10月22日）

急须将与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付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

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

如傅[2]同意，待绥远办好后，请傅介绍见阎[3]，不同意则罢，你的工作以傅为主。

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工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雪枫信的主要内容。

[2] 傅，指傅作义。

[3] 阎，指阎锡山。

给刘少奇的信[1]

（1936年10月22日）

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2]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

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内部已基本上统一团结。玉阶、特立[3]任前线指挥，在中央与军委决定之下行动。二、四方面军均保存了基本力量并比前进步，一方面军亦加强了。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主要内容。

[2] 民族革命同盟，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由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建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主张。

[3] 玉阶、特立，指朱德、张国焘。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
致叶剑英、刘鼎电

（1936年10月23日）

剑、刘：

经过李毅或另设他法向阎锡山表示下列各点：

一、完全同情晋绥当局及其军队对日抗战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他们的这种决心与行动将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苏维埃与红军将竭力以全力以为之助。

二、我们十分盼望与晋绥当局成立谅解以至订立抗日协定。

三、只要晋绥当局真正抗日，而不与日本妥协，红军在未得晋绥当局同意之前，决不冒然向晋绥开进。

四、在双方谅解之后，红军依约进入划定之地区与防线，担任一定战斗任务，并服从统一之指挥，红军不干涉晋绥当局之行政事宜。

五、某方援助我们可担任介绍。

东

十月二十三日十六时

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1]

（1936年10月24日）

彭，并致朱、张，贺、任，徐、陈：

甲、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2]之计划。

乙、胡毛王关[3]业占大道[4]，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5]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指1936年10月23日9时彭德怀关于宁夏战役的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宁夏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攻击中卫，牵制马鸿逵。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兵力袭占定远营，相机攻占宁夏省会。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4] 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5] 南敌，指从会宁、静宁至隆德、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之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以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指沿黄河一线布防之马鸿逵、马步青和邓宝珊等部。

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丙、前电各项请即复。

毛

二十四日二十四时

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1]

（1936年10月25日）

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2]：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3]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

---

[1] 193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对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和各部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决定以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第四方面军3个军进攻宁夏。20日，国民党军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等部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等，提出红军先行击破南敌，然后再集中向北。

[2]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3] 打拉池，村名，位于甘肃靖远县东部。

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1]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2]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3]、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

毛　周

十月二十五日

---

[1] 定远营，也称定远城，俗称王爷府，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

[2] 七营，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北部。

[3]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给傅作义的信

（1936年10月25日）

宜生先生主席勋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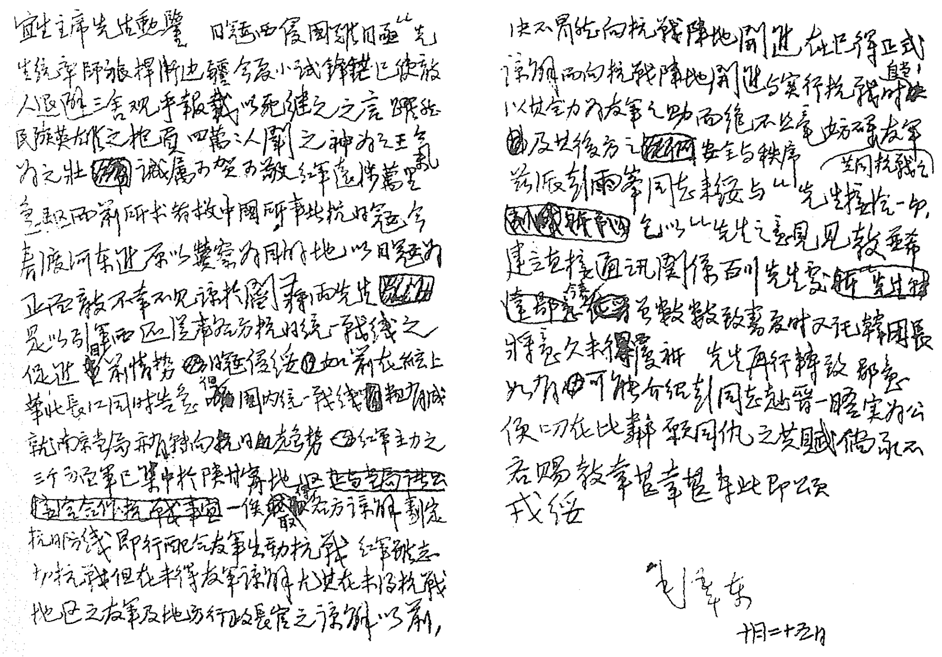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红军虽志切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冒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意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

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

戎绥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傅作义信的手稿。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0月26日）

（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击胡敌、夺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四）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五）一方面军速集结同心城休息。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1936年10月26日）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邓军长[1]，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

[1] 这里依次指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朱绍良、于学忠、马鸿逵、马步芳、陈诚、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汤恩伯、萧之楚、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

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

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

致以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　彪　贺　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蔷　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萧　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　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　震　张子意　陈再道
王宏坤　黄　超　孙玉清　陈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　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光〈先〉瑞　　周　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　瑞等同启

十月二十六日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28日）

甲、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2]向靖远进。乙、我三个方面军主力应依兄等二十七日部署，立即集结在有利阵地，在数日内坚决突击消灭胡敌先头一个师至两个师，以小部抗阻靖远王、毛。丙、九及三十军速复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丁、此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请兄等速图之。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王、毛，指王均、毛炳文。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0月28日）

完全同意前敌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同志俭日七时之海打战役战略计划[2]，望各兵团首长动员全体红色指战员下最大决心，努力争取整个战役的全部胜利，开辟今后伟大的战略胜利之途径。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彭德怀10月28日提出的在海原、打拉池地区打击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战役计划。

对胡宗南部作战的部署[1]

（1936年10月29日）

彭：

与南敌决战，关系重要。现敌轻我锐进，胡[2]敌先头又是郭华宗[3]旧部周孔[4]两师，打得好可获大胜。我有如下提议：

甲、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

乙、以野战军[5]全部为主力，从二方面军抽二分之一辅助之，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乘红军主力准备宁夏战役之机，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胡宗南部先头向海原、打拉池之间急进，左翼毛炳文、王均两路均向靖远猛进。中共中央军委为阻止南敌追击，遂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胡宗南部。1936年10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复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海打战役计划。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郭华宗，1931年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时，曾受到红军第一方面军打击。

[4] 周，指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孔，指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野战军，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

专打周孔两师。四方面军为右翼钳制队，或任右翼之部分突击，专对付胡之西路及毛王[1]两路。

丙、以二方面军二分之一替换七营[2]、同心城等处任务，使一方面军全部集中。

丁、需有充分之准备，须召集贺任、左聂、徐程[3]开会，部队要有充分之休息与鼓动。

戊、实行打时要在有利之地形条件下，首战限于打两个师，并首先消灭其一个师。不合此条件时再退一步，总以胜仗为目的。

毛

---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2] 七营，村名，位于宁夏固原县北部。

[3]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左聂，指左权、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打击胡敌周孔两师之部署[1]

（1936年10月30日）

彭，贺、任，左、聂，徐、陈，并朱、张：

甲、情况：

（一）蒋[2]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3]敌猛追。

（二）胡令周、孔[4]两师经过红羊场向打拉池[5]急进，其军部退回静宁[6]，一师停止于平峰镇，仅派一部为追击队，昨到红羊场。

（三）关[7]师向靖远[8]追击，毛[9]各尚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组织海打战役期间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人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周，指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孔，指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打拉池，村名，位于甘肃省靖远县东部。

[6] 静宁，县名，在甘肃省东部

[7] 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三路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8] 靖远，县名，在甘肃省白银市东部。

[9]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四）何[1]令白[2]骑兵师三十日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该师主力控制阳明堡，一部晏家窳，准备增援白师。朱敌与我二、四方面军均经[3]，去向已明，唯一方面军是否渡河不明。

乙、据以上情况，给我以打周、孔两师之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之白师须以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扼阻之。

丙、三十一军必须遵彭[4]令由西向东打。

丁、三十二军附电台每日与周、孔两师接触，务不失联络，吸引之向打拉池或西安州行进，贺、任[5]即率三十二军，密码呼号等送彭，并使之直接通电。

戊、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万不可失，深望注意。

毛　周

三十日二十二时

---

[1] 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骑兵军军长。

[2] 白，指白凤翔，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骑兵军第六师师长。

[3] 原件如此，似有缺漏字。

[4]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先打胡宗南后攻宁夏[1]

（1936年10月30日）

朱、张：

目前方针，先打胡[2]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3]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毛　周

三十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3] 指1936年10月2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发布的关于各兵团集中协同消灭胡宗南部的命令。命令说：“胡宗南向打拉池，毛炳文、王均向靖远前追甚急，我三个方面军主力有协同消灭胡宗南一两个师，迟滞毛炳文、王均之任务。红军各部应于三十一日前集中完毕。第一方面军在古西安州、关桥堡、麻春堡一带集结；第四方面军第四军应注意在打拉池以南设置钳制阵地，第三十一军在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靠拢第一方面军从东向西侧击北进之敌。”

致林育英电[1]

（1936年10月30日）

一、目前方针是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二、你与朱、张略谈后即转二方面军，提高其士气，再转朱、张处。三、对张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育英（张浩）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6年10月30日）

蒋介石以我军大部西渡，东岸所余不多，令胡宗南猛追。胡令周祥初、孔令恂两师向打拉池急进。关麟征师向靖远追击，毛炳文、王均部尾其后，似不会全部北进。何柱国令一骑兵师随胡军右翼相机追击。据以上情况，给我们打周、孔两师的极好机会。对周、孔右翼的骑兵师须以红二方面军有力部队拦阻之。红三十一军必须照彭令，由西向东打。

打拉池、西安州为我军尔后宁夏战役之屏障，万不可失，深望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并告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给许德珩[1]等的信

（1936年11月2日）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2]，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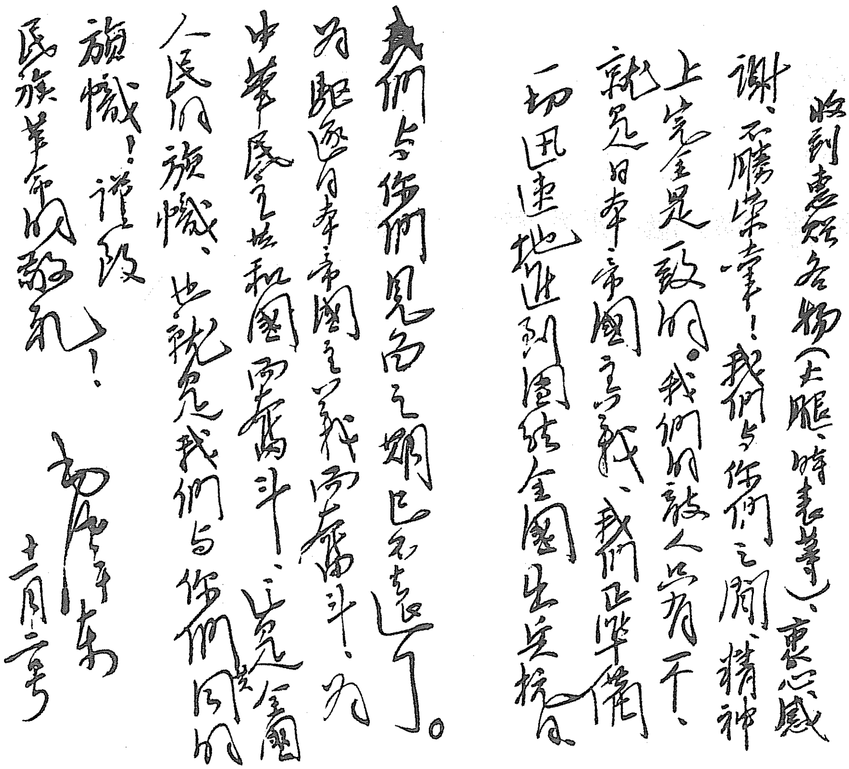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

[1]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193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与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四、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2] 1935年底，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得悉毛泽东已到达陕北，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的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陕北。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木雕、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毛泽东致许德珩等信的手稿。

关于过河部队的行动问题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1月3日）

朱、张，徐、陈：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2]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毛　周

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一条山，镇名，今为甘肃省景泰县县治。五佛寺，村名，位于甘肃省景泰县东北。

关桥堡地区作战应依实况决定[1]

（1936年11月3日）

彭：

甲、本日情况：

（一）丁德隆师[2]尚在种田沟、吴家庄，明（四）日向干盐池进。

（二）关麟征马鸿宾[3]奉令开石咀子。

（三）第一师在新营、王家河集结。

（四）刘翰东熊正平[4]两师奉令维护海郑[5]交通，一个师驻脱烈堡。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丁德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

[3]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

[4] 刘翰东，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一〇七师师长。熊正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七纵队第一一五师师长。

[5] 海，指今宁夏海原。郑，指郑旗堡，村名，位于今宁夏海原东部。

（五）毛王[1]尚在靖远以南。

（六）骑十师不明。

（七）周祥初[2]由海原向关桥堡[3]，孔令恂[4]师由西安州向关桥堡。孔师后梯队原系第一师之李旅[5]，本日似到西安州及其以南。三部共计九个团，比较孤立。

乙、诱敌深入关桥堡东西地区，以全力向之作战的部署是很好的，但宜估计周孔两师到关桥堡后发生戒心，停一二天等候第一师或丁师增加之可能。因此，明（四）日我之一部能保障关桥堡不失，后（五）日继续扼守该点，吸引周向之攻击，全军即于五日拂晓以前出动，从三面攻击周孔，未知是否有利。如关桥堡不失，而该地附近地形又利于我作战，则似五日向该处攻击为利，否则，让敌更进一步攻击为宜。请依照实况审察裁决，总以打得最适当为目的。

毛

---

[1] 毛，指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2] 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

[3] 关桥堡，村名，位于今宁夏海原北部。

[4] 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5] 李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师第一旅，旅长李正先。

集中全力歼灭饥疲之敌[1]

（1936年11月3日）

各首长：

关麟征[2]称：率师近日以来星夜追剿，所过之地给养万分困难，官兵日夜不得一餐，现已丧失靖远、打拉池一带，给养仍日不得饱等语。以情势观察，不独关师，追敌各部当有相同困难，目前敌疲惫已达最高度。宜以此特别情况激励士气，集中全力消灭敌人，争取全战役之胜利。

毛 周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各部队首长的电报。

[2] 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兼第二十五师师长。

给陈公培[1]的信

（1936年11月4日）

公培兄大鉴：

又数年不见了，得悉吾兄依然奋斗不懈，同人闻之十分佩慰。相距尚远，不能聚首，望用书面时通消息。各方统一战线，深仗大力斡旋，对内则化干戈为玉帛，对外则求一致之抗战，争取民族革命战争与民主共和国之联系及其彻底胜利之前途。疾风劲草，愿共努力！顺祝

行止佳胜！

毛泽东

十一月四号

---

[1] 陈公培（1901—1968），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933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期，他是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参事。

争取在运动中打敌一个师[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彭，贺、任[2]：

甲、目前七天内仍求得于运动中打周孔[3]中之一个师。

乙、不可能则向金积[4]、灵武、豫旺[5]出动，诱敌深入以利机动。

丙、徐陈[6]向凉州[7]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

毛　周

八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等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

[7]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力求消灭敌一部[1]

（1936年11月8日）

彭，并转张、朱，贺、任[2]：

甲、现在地区力求消灭敌一部，就是一、二个团也好。给此打击的作用有二：第一调动胡[3]部第一师增加到宁夏，以利尔后机动；第二使敌进得慢些，我在金灵[4]才有余裕时间筹粮休息。

乙、打法仍以待其前进为妙，惟不必待周孔两师[5]，打一个师亦好。望酌。

毛　周

八号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朱，指朱德。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金，指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灵，指宁夏灵武。

[5]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作战新计划[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彭，贺、任[2]五同志：

甲、胡毛王关[3]各部北进，我宁夏计划暂时已无执行之可能。

乙、拟作如下之新计划：

（一）三个方面军主力十一月份在关桥堡至金积[4]、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胡师北进，并使关师进到石咀子，王以哲进到豫旺[5]。

（二）十二月上旬以后分两路出动。

（三）一二两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西峰、合水、正宁、宁县地域，第二步占领同官、耀州、淳化、中部[6]、宜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秦邦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张浩）给朱德等的电报。

[2]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毛王关，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第一纵队和第三路第十一纵队司令。

[4]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君、洛川、富县地域，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域。以上三个步骤尽可能延长时间，估计可容许活动三个月左右。其任务不是消灭张学良杨虎城[1]，而是扩大苏区，扩大红军，解决给养。

（四）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待绥[2]东抗战起后开始出动。第一步安边地区，设法夺取安边城；第二步横山、榆林地区，以佯攻两城姿势吸引二高[3]及二十一师向北增援，以便恢复瓦市[4]、延川一带，并吸引神府[5]残敌向西；第三步神府地区，与南路军同时到达黄河沿岸。

（五）于适当时机开始在两延[6]，在清绥[7]，在神府分三区造船，准备渡河入晋。

（六）如此时我与蒋阎[8]之妥协成功，则依协定行动。

（七）如此时妥协不成，则实行东征。

（八）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

（九）如不能抗日，则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作战，扩大红军；第二步如蒋阎尚无妥协希望，东进有甚大困难，而陕甘蒋军已东调，我可仍回陕甘，如东出有利，则出至冀豫晋之交；并应计划第三步

---

[1] 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第八十四师师长和第八十六师师长。

[4] 瓦市，指瓦窑堡，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

[5]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6] 两延，指陕西延长和延川。

[7] 清绥，指陕西清涧和绥德。

[8] 蒋，指蒋介石。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豫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准备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

（十）第二步至第六步之目的在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

（十一）徐陈[1]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2]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丙、上述新计划暂时还不作为最后决定，征求五兄意见，准备在两星期内决定之。此计划不能过早执行，故十一月内全军须以求战与引敌入宁夏为目的。

丁、请五兄开一秘密会，慎重考虑见复。育英参加。

张　毛　周　博　林

十一月八日

---

[1]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和总政治委员，正率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转战黄河西部镇虏堡、打拉牌、锁罕堡一带。

[2] 远方，指苏联。

河西部队称西路军
及其领导机关名称人选问题[1]

（1936年11月8日）

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2]，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　毛

八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李特等的电报。

[2]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昌浩和李特等在给中共中央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中说：“（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以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义斋、卓然等各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五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三）上二项提议当否请中央及军委复准，以便遵照。”

为抗日计红军愿停止攻击国民党[1]

（1936年11月9日）

子华同志：

俭日[2]电昨始收到，兹复如下：

（甲）请告陈委员、曾市长[3]：日本新的大举进攻，迫在目前，我方切望南京当局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我方愿以全力赞助；方不可作任何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再使全国失望，以符蒋介石先生七月间对全国人民宣示之诺言。

（乙）当此国难严重关头，我方正式宣言：只要国民党方面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红军愿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攻击，以此作为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表示，静待南京当局回答。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方攻击时，我方才在不得已的防御方式下给以必要的回击。

（丙）我们提议国民党方面，立即下令暂时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进攻，双方各守原防，以便双方代表举行谈判。至于恩来飞赴广州会谈，在确保安全条件下，是可行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中共地下联络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指28日。

[3] 陈委员，指陈立夫。曾市长，指曾养甫，当时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委员、广州市市长。

（丁）国方未下令停止攻击，双方主要代表未会谈前，我方拟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先与陈、曾会谈，望征同意。

毛　周

九日十六时

关于询问西路军情况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11日）

徐、陈：

甲、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

乙、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2]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

丙、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

（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

（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

（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毛　周

十一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胡毛，指胡宗南、毛炳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和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王，指王均，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1936年11月9日死于飞机失事。

关于打曾万钟的部署[1]

（1936年11月12日）

彭：

甲、王均[2]已死。曾万钟[3]所率三旅，马旅[4]远至宁安堡，沈旅[5]今（文）日由关不得儿出发向丁家塘大道攻进，李旅[6]由三不拉出发向马家塘攻进。我军布置得好，有打着可能。

乙、打曾敌并相当休息后，似宜以一方面军先行出动，经毛居井或其以西南进，三十一军、四军跟进，二方面军最后出动，方免拥挤及其暴露。如何，请依据实况酌定。但二方面军现时即应以一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王均，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副总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1936年11月9日死于飞机失事。

[3] 曾万钟，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三军第七师师长，王均死后，继任第一纵队司令、第三军军长。

[4] 马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崐。

[5] 沈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沈元镇。

[6] 李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一纵队第七师第十九旅，旅长李世龙。

部置王以哲[1]右纵队前进道上，迟阻敌进，并掩护一、四方面军。

毛

十二日二十一时

---

[1]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二路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和南京谈判的协定原则

（1936年11月12日）

汉年同志：

（甲）真[1]电悉，张子华亦到。

（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许至何限度，望询实电告。如何〈果〉条件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也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

（丙）据张子华说，曾养甫云：

（一）党公开活动；

（二）政府继续存在；

（三）参加国会；

（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为一致对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五）你在南京谈判地待命。

子任[2]

文亥[3]

---

[1] 指11日。

[2] 毛泽东的笔名。

[3] 指12日21时至23时。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11月12日）

河西徐、陈所部现进行何处？情况如何？

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同意曾养甫、陈立夫所提四条并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致刘鼎电

（1936年11月12日）

刘：

甲、宁夏计划蒋介石正积极破坏中，我方正想对策，请毅[1]亦为我筹之。

乙、借毅之款五个月后可交还，但目前尚需五万元应急，毅处还可设法否。

丙、张子华已到，对曾养甫、陈立夫所提之：（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维埃继续存在。（三）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四）及红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更原有人员等四条，我方均可同意，并派汉年为正式代表，迅速进行谈判，请告毅知之。要毅多方设法促其早成，并告卢伟良面告汉年，速按此方针谈判。

丁、十六团人马已交还矣。

毛

文亥

---

[1] 指张学良。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1月14日）

朱、张来保安后，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做去。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等电[1]

（1936年11月14日）

据彭电胡敌继续向豫旺进攻，不消灭其一部不能南进。似此有打胡敌之机会，自以集中一、四、十五、三十一军在数日内打一仗，再南进。

究应如何，统由彭依前线实况决定可也。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打敌办法[1]

（1936年11月14日）

彭：

打敌办法，如两翼伏击不便，可以一翼伏击。正面敌前进与之遭遇而消灭之。请依情况酌定。

毛

十四日亥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可让王以哲部进豫旺[1]

（1936年11月14日）

朱、张、彭[2]：

甲、王以哲[3]电称，因胡[4]军堡垒同心城[5]，如掩耳目，彼以右纵缓，左纵删日[6]进至虎家山、铣日[7]进至豫旺县。

乙、因胡宗南有向豫旺之由，不如让王以哲进豫旺。已电复同意，请速处置。

毛　周

十四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我军行动进行重新部署的电令。

[2] 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3]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二路军第六纵队（第六十七军）司令。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第一路军第二纵队（第一军）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5] 同心城，当时属宁夏豫旺县，1938年豫旺县改名同心县。

[6] 删日，指15日。

[7] 铣日，指16日。

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1]

（1936年11月15日）

蒋介石仍坚决打红军，与南京妥协一时难成，我们应坚决粉碎其进攻。胡宗南占领豫旺后之行动，两三天后即可明白。

目前两三天内，四方面军即在甜水堡、保牛堡集结，二方面军在毛居井及以北集结，一方面军在环县西集结，各兵团鼓动作战准备，胡敌东进时消灭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集结红军准备与胡宗南部作战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胡宗南进攻定边盐池及我军之部署[1]

（1936年11月17日）

彭：

甲、胡宗南向定盐追击，十七日第一旅由惠安堡进，詹旅[2]向萌城进，丁师[3]由西家原[4]进，周孔两师[5]在豫旺待命。

乙、我宜以二十八军钳制第一旅，第四军钳制詹旅，集结一军

---

[1] 红军第一、第二、第四3个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集中5个军，从会宁至隆德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对红军进攻。红军主力由同心城、李旺堡之线向陕甘宁根据地内逐次转移，寻机给进犯之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第一军以歼灭性打击。1936年11月中旬，胡宗南部孤军深入，进至宁夏、甘肃边境豫旺地区，分3路尾追红军。17日，红军第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甜水堡地区设伏，将其中路军第一师之第二旅击溃。19日，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甘肃环县以北之山城堡南北地区，诱敌右路第七十八师大部于20日进入山城堡地区。21日，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主力，对该敌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歼其1个多旅。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詹旅，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一师第二旅，旅长詹忠言。

[3]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4] 西家原，似为西田家原。

[5]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团、十五军团及三十一军首先消灭丁师，然后再打詹旅，向西北横扫。

丙、速以二方面军有力一部或大部拒止王以哲[1]东进。

丁、二十八军及骑兵团令其在盐池待命，受你调动。二十九军谢甘[2]部在定边任保卫。

戊、部队何日可达集中地?

毛

十七日十八时

---

[1]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六纵队司令。

[2] 谢甘，指谢嵩、甘渭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复徐向前等电[1]

（1936年11月18日）

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严整政治纪律，建立会计给养制度，使尔后和远方同志见面时焕然一新。

肃州[2]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复徐向前、陈昌浩并告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肃州，指酒泉。

致朱德、张国焘电[1]

（1936年11月18日）

四军萌城抗战[2]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止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二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惫，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电的主要内容。

[2] 萌城抗战，指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11月17日在宁夏盐池县萌城地区设伏，击溃胡宗南部第一师第二旅，毙伤敌600余人的一次作战。

朱瑞支队的作战部署[1]

（1936年11月18日）

彭：

朱瑞[2]支队附电台，以经豫旺堡以西取间道急行军进同心城、豫旺堡城之间，相机袭击胡宗南[3]指挥部（王家团庄），或扰乱周孔两师[4]后尾为宜。惟须注意马鸿宾[5]部。

毛

十八日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朱瑞，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临时率第一方面军特务团与第一军团教导营在今宁夏同心县豫旺堡附近地区活动。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4] 周孔两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和第九十七师，师长分别为周祥初和孔令恂。

[5] 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

决战动员令

（1936年11月18日）

一、二、四方面军各兵团军事政治首长钧鉴：

从明日起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各首长务须以最坚决的决心，最负责的忠实与最吃苦耐心的意志去执行。而且要谆谆告诉下级首长转告于全体战斗员，每人都照着你们的决心，忠忱与意志，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克服任何的困难，并准备连续的战斗。因为当前的这一个战斗，关系于苏维埃，关系于中国，都是非常之大的，而敌人的弱点我们的优点又都是很多的。我们一定要不怕疲劳，要勇敢冲锋，多捉俘虏，多缴枪炮，粉碎这一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三个方面军会合于西北苏区的胜利作第一个赠献给全苏区的人民的礼物。

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胜利万岁！

抗日民族战争万岁！

毛泽东　张国焘　彭德怀　任弼时
朱　德　周恩来　贺　龙

先打丁德隆后打周祥初孔令恂[1]

（1936年11月19日）

彭：

我军先打其右路丁师[2]。对周孔[3]似宜让其北进数十里，然后坚决扼阻之，以便我军消灭丁师后，向其周孔之侧后打去。又二方面军主力宜跟进为预备队，其一部则坚决扼阻王军[4]。如何，请依情况决定。

毛

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王军，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六纵队司令王以哲指挥的东北军一部。

胡宗南部的行动及我军部署

（1936年11月20日）

彭[1]：

甲、敌现陷在困难中，遵蒋[2]令由保宁堡改向定盐[3]，解决给养，控制战略要屯，其主力进路必经红柳沟[4]，但丁师[5]有经山城堡[6]、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

乙、我以集结四个军从其右侧后打去最好，四军则从正面吸引之。

丙、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个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

丁、敌以为我一、二方面军向环县逃，目前企图胡[7]敌完全不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

[2] 蒋，指蒋介石。

[3] 定盐，指陕西定边和宁夏盐池。

[4] 红柳沟，村名，位于陕西定边西南。

[5]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6] 山城堡，村名，位于甘肃环县北部。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知，但敌增师至山城堡后则必发觉，务望注意。

戊、曲子红大三科[1]及定、盐二十九军归你统一指挥。

毛泽东

二十日五时

---

[1] 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第三科，亦称红军大学附属步兵学校，对外又称中央教导师，当时驻甘肃环县曲子镇。

毛泽东等在陕北的合影。

致红军战士与苏区人民电*

（1936年11月20日）

（甲）蒋介石此次大举向苏区进攻，不但不许红军抗日，反要消灭红军，消灭苏区人民，命令胡宗南各军向盐池、定边、环县猛攻，并要向陕北苏区前进。

（乙）我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士气大振，坚决拥护中央与军委之路线，消灭进攻敌人，扩大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定、盐南边之山城堡打了第一个胜仗，消灭胡宗南之一个旅。

（丙）这个胜仗是粉碎蒋介石全部进攻的开始，我全体红军战士要更加团结起来，忍苦耐劳，服从命令，勇敢作战。我全苏区人民要帮助红军作战输送粮食，转运伤兵，搬运战利品。白军来时，用坚壁清野对付之。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扩大抗日根据地而战，为消灭全部进攻之敌人而战。

红军万岁！

苏维埃万岁！

抗日救国之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十一月二十日

打丁德隆胜利后立即打周祥初[1]

（1936年11月21日）

昨日止敌情大体明白，第一旅及孔令恂[2]在大水坑一带，周祥初[3]在攀家沟、保宁堡一带，昨日一部向山城堡，主力二十一日当向山城堡以北距离三、四十里地区前进。丁德隆[4]在山城堡一带。第二旅似在豫旺[5]整理，胡[6]军部到豫旺。我本日打丁师，除周师下午或能赶到外，余均须第三天方能赶到，到亦疲劳不堪矣。我打丁师胜利后，须立即整顿队势打周师。

毛

二十一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电报。当时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2] 孔令恂，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九十七师师长。

[3] 周祥初，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

[4] 丁德隆，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

[5] 豫旺，旧县名，县治在今宁夏同心县下马关。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毛泽东、彭德怀等指挥红军沉着应战，1936年11月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图为回师陕北后的彭德怀。

红军领袖贺绥远守军抗日胜利

（1936年11月21日）

绥远傅存怀将军台鉴：

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非特足以媲美十九路军，且令□□重兵，专以残杀本国同胞为其唯一事业者，羞愧至死！近闻少数卖国汉奸意欲假手于某有力者，假抗日之名，实际上控制足下之爱国行为，吾人深信足下必能以对民族之大义感化万安，不仅使汉奸卖国贼无所售其计，且转而□□抗日力量之团结也。红军抗日援绥且早决心，无□少数汉奸卖国贼竟仍高唱其抗日必先剿共之□调，驱使□国□□实行进攻红军，以求削弱国防力量，而迎日本帝国主义根绝中国抗日运动之要求，抗日人民红军誓以其全力与若辈无耻之徒相同□，庶几民族解放之大□□，而我全国人民与血性军人所高举着不致堕落，永增光辉，吾人深信吾人现所努力□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之行动，必能对于足下之抗日义举遥为声援敬以一瓣心香祝将军之胜利。并希以此竟传达贵军全体将士。

毛泽东　朱德叩

二十一日

坚决阻敌第一旅占领盐池[1]

（1936年11月22日）

彭，并告宋、宋，谢、甘[2]：

胡[3]令四十三师向萌城、甜水堡增援，而第一旅昨日已至青山街，离盐池不远。二十八军及骑兵团全部应立即转至青山街，小部由正面，主力由侧后，坚决阻止第一旅，不使盐池落入敌手，以待主力之到达。谢甘所部除小部警戒安边外，主力应立即集结盐池守城。

毛

二十二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宋、宋，指宋时轮、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谢、甘，指谢嵩、甘渭汉，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迫蒋停止剿共是目前中心关键[1]

（1936年11月22日）

小开[2]：

甲、南京两电、上海两电均收到。目前此事无从谈起。恩来事忙，暂难出去。

乙、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丙、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详容另告。

东　天

十一月二十二日亥

---

[1] 这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给潘汉年的电报。

[2] 小开，即潘汉年。

在中国文艺协会[1]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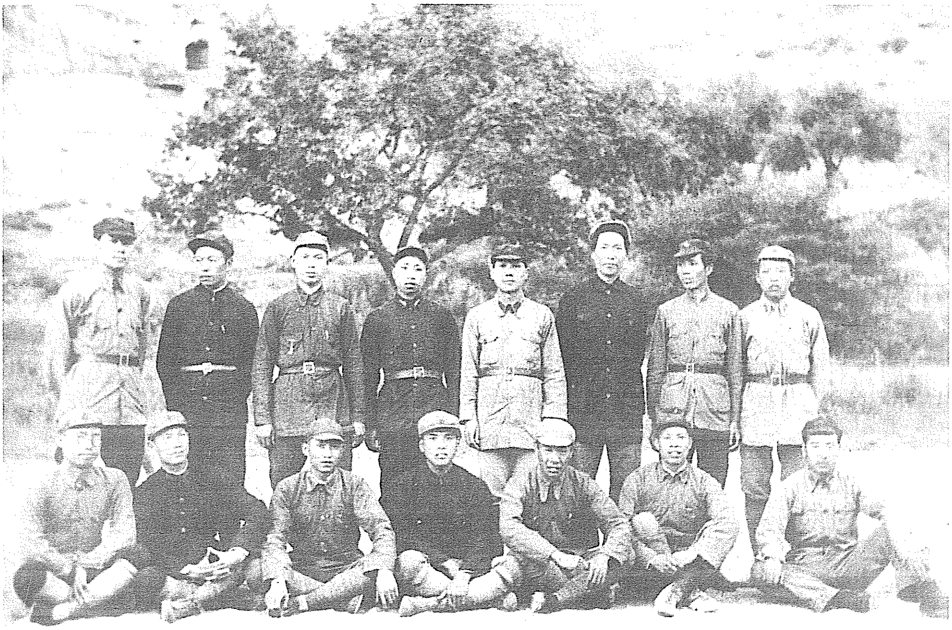
（1936年11月22日）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

---

[1] 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34人倡议，于1936年11月22日在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组织协会是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和红四军部分负责干部合影。

组成南北纵队打击敌军[1]

（1936年11月22日）

彭：

似宜由你亲率一方面军昨日作战未使用之一个师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全部组成北纵队，今夜或明晨即向青山街转移，配合二十八、二十九军消灭第一旅及马全良[2]部。若周孔[3]再向山城堡进，则以一方面军主力，由二方面军贺任[4]指挥组成南纵队，消灭其一个师有把握。或你消灭驱逐第一旅后，可从青山街向萌城、甜水堡周孔之后路打去，使周孔进退维谷。萌城一带地形条件，我全部集中事实上难于使用，且在丁师[5]惨败后周孔前进当更谨慎，若乘敌从山城堡转移时，主力从一翼侧击才能出敌不意，或可打一、二个胜

---

[1] 这是山城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关于发展胜利、继续歼敌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马全良，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防守区马鸿逵部新编第七师第二十旅旅长。

[3] 周孔，指周祥初、孔令恂，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四十三师师长和第九十七师师长。

[4]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5] 丁师，指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

仗，且使敌知无大望。尔后敌若转入守势，我北纵队可向金灵[1]以东活动之，使整个局势变化。如何，请解决。

毛

二十二日

---

[1] 金，指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灵，指宁夏灵武。

捉住敌军矛盾彻底击破胡宗南[1]

（1936年11月23日）

朱、张，彭，贺、任[2]：

现时敌军中发展着四种矛盾：第一种是抗日与“剿共”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蒋军与东北军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上级的严令进攻与下级的对红军恐惧的矛盾，此种矛盾现在极大发展着；第四种是官长与士兵间的矛盾，此种矛盾以近日的物质困难与疲劳而加深。我们的任务是捉住这些矛盾，更加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忍受与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每一个有利时机，灵活调动部队，准备连续战斗，坚决地各个击破进攻之敌，首先是彻底地击破胡宗南[3]。

毛

二十三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和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红军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贺、任，指贺龙、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第一路第二纵队司令兼第一师师长。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23日）

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1]

（1936年11月25日）

徐、陈：

一、告指战员书[2]及二十五日部署电[3]收到，甚慰。

二、毛炳文[4]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5]敌之后，主力

---

[1] 这是毛泽东给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电报。

[2] 指1936年11月22日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和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发布的告西路军指战员书。文中说，在西北创造巩固的抗日根据地的光荣历史责任已落在西路军全体指战员肩上，全体指战员要坚决战胜敌人，正确运用统一战线，为完成光荣的历史任务而艰苦奋斗。

[3] 指1936年11月25日8时徐向前、陈昌浩给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电报说，西路军虽有许多困难，但还有寻机歼敌之把握。为创造根据地，策应河东主力，接通远方，决定在凉州、永昌、甘州间寻机歼敌，以五军两个团位于东乐，两团出肃州，指挥部及直属队必要时位于山丹，尔后适时在四十里铺、永昌之间或永昌附近集中第九、第三十军寻机歼敌。并要求接济越快越好。

[4]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兰州绥靖公署第一路第三纵队（第三十七军）司令。

[5]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兰州绥靖公署第一路第五纵队司令兼第二防守区司令、第一〇〇师师长。

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

三、远方[1]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四、关于作战方面：

（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

（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

（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

（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

（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

（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

（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

（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望酌行之。

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

[1] 远方，指苏联。

国内国际及红军的情况[1]

（1936年11月28日）

蒋介石还站在中间地位，对日仍力求妥协，但比过去强硬了许多，对我力求缩小苏区打击红军，但已觉得困难，许其部下二陈[2]与我谈判。潘汉年去南京两次，距离甚远，一时不易成就。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苏区与红军任务坚持打蒋，不稍放松。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1月28日）

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地进，退则集中地退，打则集中地打，不打则已，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如此打两三次，有问题就解决了，教育训练也方便些，只要粮食不缺，似以此法为好，望酌行之。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1]

（1936年11月30日）

我们完全同意张的建议，希望立即采取如下具体办法：（一）首先释放一部分俘虏，勿骂其长官。（二）用诚恳和气与尊重彼方态度，分别写信致胡宗南、孔令恂、周祥初。（三）派人到豫旺见胡。（四）用毛、朱、张、周及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首长名义，发表告胡军官佐士兵书，简单明了说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志愿。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该电报通报胡宗南败后其内部充满联俄容共、一致抗日空气，张学良建议“对胡军勿作仇敌，应尽力争取”。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1月30日）

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胡军仍有进攻可能。如敌改取守势，我军全军在此地区休息训练一个月，包括三个方面军政治上团结、体力休养、部队改编、制度统一、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地方工作训练、党的路线解释、政治形势与红军任务解释、各种干部会议等项。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读西洛可夫[1]、爱森堡[2]等著李达[3]、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绪论　哲学的党派性

二　哲学是党派的科学

……

在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的伊里奇的学说中，理论与实践不可分离地被结合起来，去征服盲目的必然，这是唯一的任务。“理论的思想

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

---

[1] 西洛可夫，现译希罗科夫。苏联哲学家。

[2] 爱森堡，现译艾森贝格。苏联哲学家。

[3]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译著有《马克思经济学说》《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主要著作有《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

离，是认识论上的分离。

（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统一”[1]——伊里奇把自己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评注的中心思想之一，这样明白的力说了。[第13页]

自流主义与革命主义的斗争

伯伦斯泰因[2]，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平和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对于唯物论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伦斯泰因不去提高普罗列达里亚[3]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不可能。

普列哈诺夫[4]……虽然暴露了伯伦斯泰因的观念论，却没有冲倒修正派在辩证法问题上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根基。特别是他并不曾顾虑到修正派放弃了“辩证法上决定的东西”——对立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理论观念（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要注意这点——这个统一正是在认识论中。”（《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6页）。

[2] 伯伦斯泰因，在其他处又译柏伦斯泰因，伯因斯坦等，现译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3] 普罗列达里亚，意即“无产阶级”。

[4] 普列哈诺夫（1856—1918），在其他处又译蒲列哈诺夫等，现译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

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

的统一。伯伦斯泰因及其一党，建立阶级协调论代替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最后，对于辩证法的本质之无理解表现得最厉害的地方，是普列哈诺夫和其他少数派在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公然喊出“防御祖国”的布尔乔亚[1]的口号。……[第14～15页]

三　为党派的哲学而实行的、伊里奇与少数派[2]的斗争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

少数派的实践观，是机会主义的把实践迎合于现实，这种实践观，产出和现实完全不同的现实的反映，完全不同的理论。少数派……终于从现实的具体形象中排除了给现实以具体性的东西，即排除了特定阶级的革命行动。伊里奇估计着我们怎样进行并向什么方向进行，才能够具体的更好的推动各阶级的势力。但少数派却不这样，他们只记述现成的东西，并没有指摘在普罗列达里亚与农民的积极的革命任务之上，能够发生什么事。

---

[1] 布尔乔亚，意即“资产阶级”。

[2] 少数派，现译为孟什维克。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生分裂。选举中的少数派被称为孟什维克，即俄语меньшевик（意即少数派）的音译。

“他们不指明普罗列达里亚在一定的瞬间应当怎样去‘推动革命的发展’……只是记述过程的一般，关于我们对于现实的具体任务却不曾提起。我们看看新火花派[1]说明自己思想的方法，使我们想起马克思对于与辩证法的观念无关的旧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说：哲学者们，只是各色各样的说明了世界；但紧要的事情，是变革世界，新火花派的人们，虽曾努力记述并说明在他们眼前发生着的斗争的过程，却完全不能定出关于这个斗争的正确口号，他们杂乱的进行，而指导却是拙劣；他们忽视了党——能动的意识着指导的作用即变革的物质条件，并站在前卫阶级先锋的党——在历史上所能做的并且必须做的工作，因此把唯物史观降低了”[2]。（伊里奇）[第25～26页]

目前斗争的正确口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首先的问题是国内和平即国共合作。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一九〇五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

---

[1] 新火花派，即新火星派。指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从第五十二号《火星报》起把持该报编辑部的孟什维克分子。党内将他们称为“新火星派”，以与列宁主办布尔什维克的《火星报》时的“旧火星派”相区别。

[2] 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5页）

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迂回的经验论。就是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

以离开一般联结的个个散乱事实为满足，现在正有此种人。

……伊里奇依照辩证唯物论的原则，不从一般的命题出发，而从客观的现实的运动出发，从客观的现实的一切方面的考察出发，从各种阶级的地位与任务的分析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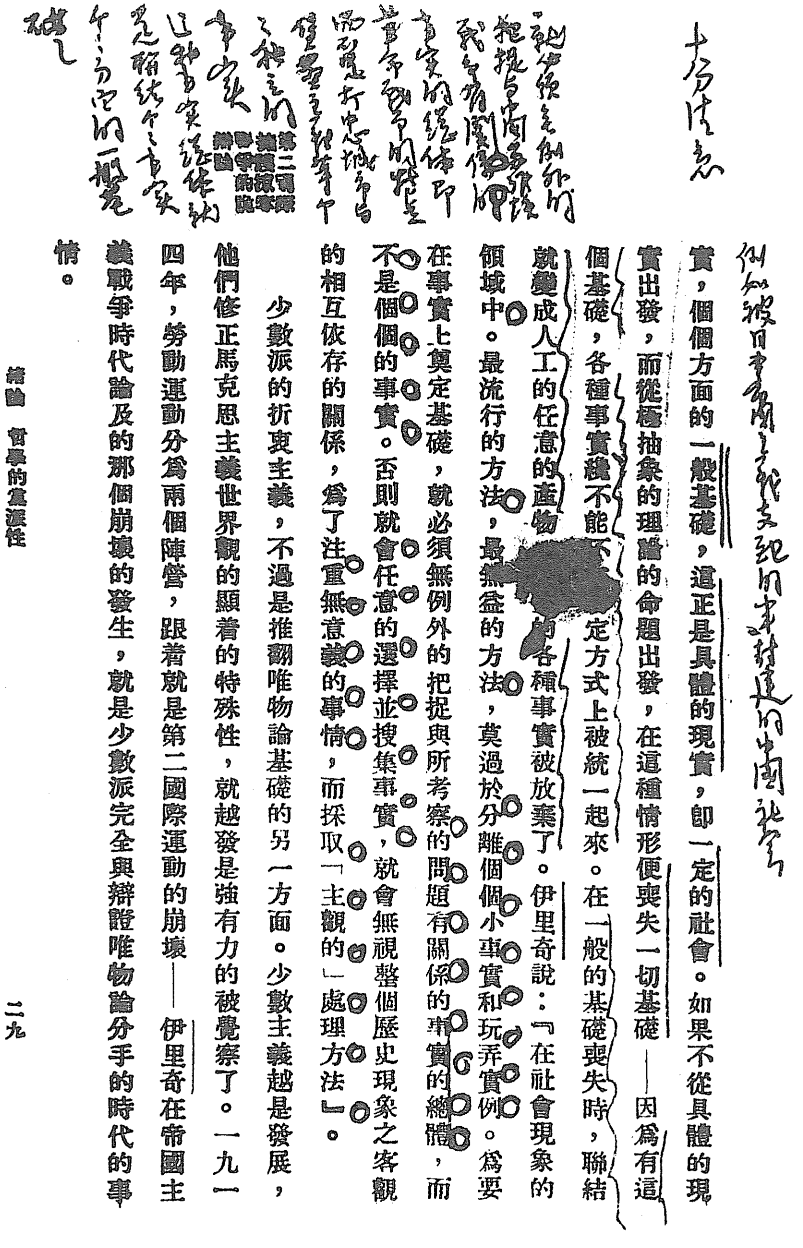
少数派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的命题出发，所以结果违背了唯物论的世界观之第一的而且根本的要求。对于辩证法的背叛，与对于唯物论的背叛，是怎样联系着，这可以从少数派的实例看出来。少数派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

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

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

十分注意



十分清楚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實，個個方面的一般基礎，這正是具體的現實，即一定的社會。如果不從具體的現實出發，而從極抽象的理論的命題出發，在這種情形便喪失一切基礎——因爲有這個基礎，各種事實纔不能不[illegible]定方式上被統一起來。在一般的基礎喪失時，聯結就變成人工的任意的產物[illegible]的各種事實被放棄了。伊里奇說：『在社會現象的領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無益的方法，莫過於分離個個小事實和玩弄實例。爲要在事實上奠定基礎，就必須無例外的把捉與所考察的問題有關係的事實的總體，而不是個個的事實。否則就會任意的選擇並搜集事實，就會無視整個歷史現象之客觀的相互依存的關係，爲了注重無意義的事情，而採取「主觀的」處理方法』。

少數派的折衷主義，不過是推翻唯物論基礎的另一方面。少數主義越是發展，他們修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顯着的特殊性，就越發是強有力的被覺察了。一九一四年，勞動運動分爲兩個陣營，跟着就是第二國際運動的崩壞——伊里奇在帝國主義戰爭時代論及的那個崩壞的發生，就是少數派完全與辯證唯物論分手的時代的事情。

第二國際的折衷主義與辯證法的學說

认个别和个别的把握与联系[illegible]我们[illegible]事实的总体即事物的[illegible]是历史运行中的[illegible]种种关系的整个之种之间[illegible]事实这种事实总体是指这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緒論　哲學的黨派性　二九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伊里奇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1][第27～29页]

十分注意

例如被日本帝国主义支配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中国苏维埃战争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即革命战争的特点，而不是打中心城市与堡垒主义等个个独立的事实，这种事实总体就是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

---

[1] 参见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的原话不是一段话，这段引文在摘录和翻译上都与列宁的原话有出入。

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孙鸣九[1]说

……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第30～31页]

第一章　唯物论与观念论

一　唯物论及观念论的本质及根源

……

实践使人们确信物质是客观的实在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作用于自然，并且直接变化自然，使物质受人类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人类深信物质是客观的存在着。

中国是否存在

苏联劳动阶级当着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内工业化、电气化、改造农民阶层、并且与豪农[2]实行阶级斗争时，他们不疑惑苏联离开他们的意识独立的客观的存在。他们深信在日常的实践上，

---

[1] 孙鸣九（1909—2000），原名孙铭久，亦即孙铭九等。辽宁新民人，西安事变时任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卫队第二营（手枪营）营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并调遣军队开进陕西，威逼西安。这以后，东北军内部在如何营救张学良和是否应允中央军开进西安等问题上，发生分裂。孙铭九等人主战，认为为了营救张学良，应对南京中央军作战，反蒋战争与抗日战争并不矛盾。

[2] 豪农，即富农。

苏联现实的存在着，普罗列达里亚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现实的存在着。[第49页]

五　康德及马克思主义之新康德主义的修正

……

殖民地资产阶级类似此种情形

……德国布尔乔亚的发达之比较落后，以及他们之依存于封建制度，规定了他们对于布尔乔亚革命的态度之二重性。德国布尔乔亚，一方面梦想革命，梦想废除封建的桎梏；他方面害怕革命，投靠于封建领主，而与他们妥协。[第121页]

六　新康德主义

……

……那么，社会生活受什么所支配呢？正是对于这问题的回答，表现着里喀尔特[1]的观念论哲学的特性。在社会中，价值支配着。这个价值，并不是人类在其实践的活动中用作估评种种事件及现象那样的规准。里喀尔特说，这个价值是主观的并且相对的，他依存于各个人的意识。支配社会的价值，不依存于各个人，在这种意义

---

[1] 里喀尔特（1863—1936），现译李凯尔特。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上，它是“客观的”。里喀尔特随后行着极端混乱的论述，表现出他不能给与价值的定义。……［第139～140页］

第二章　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

一　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斯[1]主义中是决定要素。

客观世界是发展的，主观认识也是发展的。

如前章所说，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决定的要素，据恩格斯的定义，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及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学问。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不同。形而上学把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2]，当作不变的东西，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而辩证法却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运动上、在其发生与消灭上，去把握事物及其知的反映（即概念）。辩证法教给我们，不但客观的现实是发展的，并且认识也是发展的。

七月革命以后，客观形势发展了，主观认识也应跟着发展。认识新形势中

一九一七年七月革命以后，……

伊里奇明白的指出：应当理解变化了的现实怎样使人们认识新的矛盾，新的联结。他指出了“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到七月革命止，它正确的反映了一九一七年革命中的阶级势

---

[1] 马克斯，即马克思。

[2] 本段中“即概念”两边的圆括号系毛泽东所加。

的新矛盾与新联结。

力和党的相互关系。在一九一七年革命的一定阶段上，“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个口号“是向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一步的、能够直接实现的第一步的口号。它是革命的和平发展的口号，从二月二十七日到七月四日为止，是可能的，当然又是最有望的东西，但在今日，却无条件的变为不可能了。”[1]——伊里奇指出阶级势力的配置在根本上起了变化，并且这样写着。这个口号，在今日已不正确了。因为在新的情势之下转移权力，只有依据公然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反映论不是被动的摄取对象，而是一个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认识是能动的因素，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

现实变化着、发展着。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也随着现实一同变化。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受动的反映现实，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像照相镜那样，无条件地摄映在自己眼界中的一切对象。人类的认识，是当作一个动因被包含在多方面的社会的实践之中的能动的过程。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人类的认识，表现为能动的起作用的动因，参加于世界的改造。

新的形势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口号

例如伊里奇提起“一切权力都归苏维埃”这口号怎样变化了的问题，不把这个口号当作受动的反映革命的现实的东西去观察，而把它当作在革命的实践上决定大众可以前进的方向，并团结他们的力量去观察。……如伊里奇所说，变化了

---

[1] 参见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7～108页）

反映了形势的新矛盾，并指导群众团结起来为改变此形势而斗争。

的现实，如何地引导到新的口号、新的认识；并且这新的认识，能动地反映出现实的新矛盾，它本身是向着现实的变革的一条道路。“看前面勿看后面。勿用陈旧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要用新的，七月革命以后的范畴”。[1]

九月以后再变化了的形势，又引出苏维埃口号，但此口号的内容大不同于过去的苏维埃。

从七月到九月这个阶段上变化了的阶级关系，变化了的革命的实践，使伊里奇能够再度提出苏维埃的问题，作为在阶级斗争中夺取国家权力的手段。……这个新口号，并不是重复着与七月革命以前所定出的东西相同的口号，它是由于革命的实践之新内容而被弄得丰富了的东西。新的阶段上的苏维埃，不论从阶级的构成上看，或从革命的变革中它的作用看，都与以前的苏维埃不同。[第193～196页]

认识主体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

在实践中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的统一。

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

阐明了这种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阐明了现实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运动的人，首先是马克思。马克思指示了：现实与认识——客体与主体——之辩证法的统一，实现于社会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不只认识客体，并且认识主体，也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起变化。人类作用于外部自然，一面变革它，同时又变革自己的性质——马克思说。……与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一样，费尔

---

[1] 参见列宁《论口号》。（《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巴赫[1]也不把认识看做历史的过程。在费尔巴赫说来，认识是不变的自然之不变的反映。在他说来，认识主体，也和认识客体相同，是不变的，不发展的东西，而是在实践过程之外被把握的。他以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是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上发生的东西。他没有看到社会的实践变化了认识的客体。……他并不理解：物质的＝感性的人类，连同他的五官，都是世界史的产物。他不知道：人类的感官，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中，在人类的实践之历史的发展中，都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发展的分化的东西。……费尔巴赫心目中的人类，不是由于社会的活动而能动的改造世界的主体，而是直观的实体。马克思批评他说："他不离开抽象的理论之范围，他不在使人类变成现在这样的一定社会关系中、不在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去考察人类，所以他决不能到达于现实的存在着活动的人类，而停止于所谓'人类'的抽象物的境界，只能感觉上稍微认识'实在的，个别的，肉体的人类'。"[2]……

费尔巴哈：主体与客体都不是历史上发生与发展的东西，认识是不变的自然的不变的反映。二者的统一，是不变状态的统一。

人类的感官是在劳动过程中发展的与分化的。

抽象的人与具体的人

马克思说过，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期中显现得强烈而明了。这一层，可以用革命的实例表示出来。普罗列达里亚，在俄国革命

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变化，在革命期中现得

---

[1] 费尔巴赫（1804—1872），现译费尔巴哈。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2] 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页）

特别强烈，例如俄国无产阶级与中国农民。

过程中，一面变革现实，同时在根本上变革着他们自己的性质。……

……黑格尔是观念论者，他不承认离意识独立的客观世界之实在性，所以主张认识的能动性，首先是在于思维或绝对精神能动地创造出为这种精神的“他在”的自然。能够成就独自的发展的东西，据黑格尔说来，只是能动的思维。自然界一切种类的发展阶段，都被给予于精神之中。思维，“主观精神”对于自然之能动的认识，虽是发展的，而自然本身却不发展。能动的精神，据黑格尔说来，在认识自然，即认识客观世界时，就是认识它自身的“他在”，即认识自己。照这样说，认识之能动的主体，与其客体，在绝对精神上变为一致的东西，同一的东西。黑格尔不用这个来解决认识上主客关系如何的问题，却把客体解消于观念的主体中，离这个问题的解决愈远了。

赫格尔[1]把客体消解于主体中，把主客等同起来。

费尔巴赫暴露了把主客看作同一的见解之观念论的性质。他说，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视为同一，弄到使任何认识都成为不可能；因为认识

---

[1] 赫格尔（1770—1831），在其他处又译黑智儿等，现译黑格尔。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不是与现实同一的东西，而是现实在人类的感官及思维上反映了的东西。费尔巴赫主张，认识客体与主体不同，它是离人类意识独立的自然。不过费尔巴赫未曾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的性质，这是在前面说过的。

费尔巴哈不了解主客统一之辩证法性质。

蒲列哈诺夫对于认识论的理解，并不曾注意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费尔巴赫所下的深刻的批判，仍没有超出费尔巴赫的范围，蒲列哈诺夫，与费尔巴赫一样，没有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所以他没有在辩证法上考察认识论。他不能阐明认识的充满矛盾的性质，不能阐明认识与社会的实践之结合，关于主客统一问题，仍旧站在费尔巴赫的立场。他与费尔巴赫一样，虽然表示了主客统一的物质，而这种统一，在他说来，带有与实践的活动无关的直观性。他与费尔巴赫一样，主张主客的统一，被给予于在自己为主体同时在他人为客体的个人之中。他不但没有批判过费尔巴赫，并且追随于费尔巴赫之后，重说人类的本质是他的肉体，没有见到人类的本质并不是肉体的东西，而是社会的性质。认识论中蒲列哈诺夫的反历史主义，是从这种地方发生的。

普列哈诺夫以为主客统一带有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直观性，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法则），所以不能在辩证法上了解认识论，他的反历史主义是同费尔巴哈一样的。

……机械论者亚克瑟洛特[1]不能理解对立的统一之辩证法的本质，机械地考察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只看到相互的关系，没有看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两者的相互渗透之辩证法的统一。

机械论——只看见相互关系，不看见相互渗透。

……德波林常常说起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说起两者的相互渗透，却不曾理解这种相互渗透是在实践上实现的，因而在事实上证明了他没有理解这辩证法的能力。对立的相互渗透，在德波林之下，没有辩证法的性质，只有外的性质，而终结于主体与客体之单纯的移动。他说，主体变为客体，客体变为主体。于是我们依据蒲列哈诺夫及其门徒的谬误的实例，看到如下的事实。即，从实践分离认识，不理解认识上的辩证法的作用，到了解决主客统一的问题时，必然要走到直观的立场，走到费尔巴赫主义。[第196～203页]

德波林不知主客相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只有机械的性质（外的、直观的），没有辩证的性质，从实践分离了认识。

---

[1] 亚克瑟洛特（1868—1946）现译阿克雪里罗得。苏联女哲学家和文艺学家，社会民主党人。1917年年初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后任普列汉诺夫的“同一派”中央委员。1918年起不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在高等院校任教。主要著作有：《哲学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等。

二　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

如何认识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

认识运动的路程

前面说过：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现在我们来详细研究认识的运动的路程；说明认识的运动在其发展上通过什么样的阶段，说明这种运动是由什么动因构成的。

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

无产阶级的认识发展过程，是阶级认识运动的标本。

当作认识物质的现实之主体而出现的东西，如前节所说，不是从社会游离了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类，社会的阶级。在阶级社会中，周围世界的认识，带有阶级的性质。在阶级斗争上,从“自在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之发展，成为阶级的认识之运动的标本。……

然则普罗列达里亚的认识，是怎样发展，并通过怎样的阶段呢？

土地问题
中国革命
战争问题

普罗列达里亚，在其发展的最初期，还不曾完全意识到在自己周围发生的事实。这一层，在英国的产业革命时代，就可以明了看出来。当时，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非常浅薄，劳动者们虽然随着机械的采用而成为产业预备军而被抛弃于街头，但他们却不能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看出自己的贫困的原因，而只是在机械当中去寻找那原因。他们不对布尔乔亚作

对轮船、对汽车

第一期：非常浅薄，不了解资本主义本质，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法，还在“自在阶级”的阶段。

中国对帝国主义的认识

第二期：由于日常斗争的实践，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了，使得无产阶级懂得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剥削关系与阶级斗争关系），马克斯主义出现了，进到了“自为阶级”

意识的阶级斗争，而做出了反抗机械的暴动。……普罗列达里亚，由于抗抵机械的运动，就已经是和成为阶级的资本家或布尔乔亚斗争过了，只因他们不曾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所以才做出了错误的斗争方法。那时普罗列达里亚，虽不曾理解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本质，而对于自身所受的一切压迫和剥削，却已经是感觉到意识到了。他们为饥饿所苦，又不能满足迫切的生活的必要，他们被放置在今日或明日就要和家属一同挨饿的运命之下。因为这样，所以劳动者们只知道恼恨自己所属的企业家，还不知道那企业家即是剥削者阶级的代表。普罗列达里亚是自然地起来反抗的；他们的斗争，不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之科学的理解，而是基于在奴隶生活条件下得到的体验与知觉。然而他们与企业家作日常的斗争，与其他企业中的劳动者相接触，以及资本家们互相支持的事实的反复等——这一切事情，就弄到使劳动者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雇佣劳动与资本间的斗争），教训他们在自己的主人一个人物之中，去看出一个剥削者阶级、布尔乔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日常的实践，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周围现实的认识，从自然的感觉和体验的阶段，提高到革命的变革现实的水平。于是说明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没落的必然性的马克思学说，在劳动大众方面，就能够依据他们自己的阶级斗

的阶段。

争的实践去理解。革命的普罗列达里亚，已经不是盲目的了。于是阶级对阶级的战争，就以现在世界为舞台而开演。

从感性阶段进到理性阶段，再从理性阶段进到革命实践。

从直观到思维

从思维到实践

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认识的路程，最初从感觉、表象、与对象的直觉的阶段，进到对于现实的较高度的理解的阶段，其次再从这高度的阶段，进到革命的实践，进到要实现从前只蕴藏在头脑中的东西的阶段。“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是认识真理的辩证法的路程，是到达于客观的实在之认识的路程。”[1]（伊里奇）

认识目的在把感觉材料作论理理解，两个阶段有区别，但不是不可逾越的。

这一段话，包含着说明我们的认识发展之辩证法的路程的很深的思想。认识的要点，认识的终极目的，在于发见周围的现实之法则，而把我们在感觉、知觉和表象上所领受的材料，作论理的理解。但我们的认识之到达于论理的理解，是认识过程全体的结果。何种动因占优胜的那种差异，也决定认识本身的发展阶段的差异。因而认识过程的阶段，是不能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去互相区别的。

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主义的本质的能力——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

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

但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使得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特定的社会制度，当作基于剥削的生产方法去理解。感性的理解，对于普罗列达里亚，不表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发露那矛盾的“内容”。因为劳动者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之内的矛盾（剥削关系），所以他们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一切方面，是怎么样并为什么去互相结合的。……资本主义的个个现象，在他们的认识上，只单是外的联结的东西。但是阶级斗争一进到较高的发展阶段而转化于“自为的阶级”时，普罗列达里亚就开始把从前个个散乱的资本主义诸现象的总体，当作内的联结的东西去把握了。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

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伊里奇发展了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并说明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认识过

概念比感觉更为深刻，是进一步的东西，例如商品与价值。

？

程中所领会的概念，比较感觉和表象，更为深刻。他说：“每秒有三十万基米的速度的运动，我们不难表象出来，至于光用那样快的速度而运动这件事，我们却不能理解。”[1]为要理解诸现象之内的联结，单靠感觉是不够的。和这同样的思想，马克思在论价值时，也曾说起过价值是表现各商品所有者间的关系的范畴。这种关系，是不能靠感觉去把握的。能够看，能够触的东西，只是个个的商品，而不是价值，不是商品所有者的关系，也不是当作全体看的资本主义。这些东西，是不反映“于肉眼”之上的。关于这点，马克思曾经爽直地说过：“商品价值的实体，在不知道它的所在这一点上，与胡尔斯达夫的情妇郭克里寡妇不同……各个商品，无论怎样把它反复舞弄，依然不能抓住它的价值。”[2]

感性认识不从论理认识分离，感性认识中已有论理认识的萌芽。一般性的东西已在具体性

从感性的认识推移到论理的认识，就是从个个的方面和现象的理解推移到法则，即现实之内的联结的理解。感性的认识，不从论理的认识分离。它在已经萌芽的形态上，包含着我们后来借概念之力所实行的普遍化。

费尔巴赫所谓某种普遍化已被给予于现实之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这里的译文有误。（《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一章《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页）

的东西中间包含了的，但包含的只是外的联系，不是内的联系。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是认识之突变。这一深化与突变，才比较正确与完全的反映自然。

感性的知觉的那个思想，伊里奇是表示赞同的。伊里奇引用过费尔巴赫所说的“只看见树叶不看见树么？”[1]这一句话。不过费尔巴赫虽然述说过人的感官常与思想相联结这句深刻的话，却不曾力说到这种联结只是外的顺列的联结；现实的法则，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发见。费尔巴赫把在直观和表象上被给予着的联结，当作论理的认识。反之，伊里奇却力说到认识之深化的运动，力说到从感性的认识到论理的认识之推移。他这样写着：“物质的抽象、自然的法则、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即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重要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比较深刻，比较正确，比较完全地反映自然。”[2]

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

伊里奇把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当作人类认识周围世界过程中两个不同的阶段，又说明了把握实在过程时的感性的知觉与思维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显现为感性的东西；在高级阶段，认识显现为论理的东西。但任何阶段，都是

---

[1] 参见列宁《费尔巴哈〈对莱布尼茨哲学的叙述、分析和批判〉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5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

此例很好

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被用不可逾越的界限互相分离的。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我们与曲解党的一般方针的人们斗争时，不一定是在最初就把握着那事实的本质的。最初我们只感到有些地方不对，往往不能彻底证实它，这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才开始理解到反对者的错误的体系。虽然那样，但我们在最初仍然理解着，关于某一问题，左翼或右翼是怎样离开党的一般方针的。以伊里奇的中委为首班的党，当着和托罗斯基[1]派及右派相斗争时，多数的党员虽知道两派的个个的错误，却没有知道两派错误的全体系。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即托派和右派的曲解到最后完全结晶时，我们才能在其全体上，在其内的联结上理解了托派与右派的反党的见解。

认识与情感之关系

当我们理解某件事之时，我们当然不仅是说明它，而且还悲叹，还发怒，还愤慨。……

思想与感情的统一

多数派[2]党员的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他们底下，思想感情与兴趣，并不抵触，如激流一般向着阶级的敌人斗争，去实现社会革命所课责于

---

[1] 托罗斯基（1879—1940），现译托洛茨基。

[2] 多数派，现译为布尔什维克。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时占多数。

我们的伟大的任务。

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互相发展，互相丰富其内容，这一层，可举实例来说明。……于是从小布尔乔亚[1]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意识之急速转变，就在农民之中发生了。可是随着对于现实的新理解，随着普罗列达里亚意识的成熟，又现出新的感觉。从前伟大建设的欢喜，在他是一场空。于是劳动变成于他不适宜的东西了，在他看来，劳动只是“绞汗”，只是压迫。……于是劳动对于他已不但不是压迫自己的负担，而渐渐变为“名誉，勇气，与光荣事业”了。

？

此例不甚清楚

感性的认识与论理的认识，只是反映了离我们意识独立存在的客观的实在的不同阶段。感觉是当作外界作用于感官的结果而发生的。至于概念，就是从感性的经验发生的。概念是把认识主体在感觉或知觉现实的过程上所得的材料，加以改造，加以普遍化的东西。

对

感觉和概念，都是对象的肖像，即离开我们意识独立显现的过程的模写。

对

我们的感觉和概念，是客观的现实之正确的反映么？答复这个问题的，就是实践。“对象的真理到达于人们的思维与否的问题，不是什么理

说得很好

---

[1] 小布尔乔亚，即小资产阶级。

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

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们必须在其实践上去证明真理，即证明其思维之现实性与力，证明其此岸性。从实践游离了的思维之为现实的与否之论争，是一个纯粹烦琐哲学的问题。”[1]（马克思）[第 203～213 页]

在实际上实行理论，也就是试验理论。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并不是真理向它前进，停在那里试验它的努力而又进行的那样的阶段。实践并不是一种“装饰”。一切社会生活，并不是像垫子那样用理论与实践的布片缝合了的东西。

实践贯串着我们认识的全路程

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贯串着我们的认识的全路程。整个的革命，实行了马=伊主义[2]，即只有革命，纠正了并论破了马=伊主义的曲解。

理论从实践产生，如果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发展过程，然后再应用这种理论于实践，就能在实践上实现这种

为真理标准的实践之完成认识的路程，这是在理论被实现于实践之中的意义上说的。但在实践上能够实现的理论，必须是从现在之社会的实践产生，而正确反映自然及社会的现实之发展路程的那种理论。

照上面所说，唯物辩证法，是认定“生活的见地、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而且根本的见

---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2] 马=伊主义，即马列主义。“伊”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所以认生活与实践的见地为认识论的第一与根本的见地，是唯物辩证法的见地。

地”[1]的。

然而反马=伊主义的理论，也是依赖于实践的。它们究竟是怎样解释实践的呢？

资产阶级的实践观——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只顾目前不顾将来的实践观。他们所谓真理，是主观的部分的真理，没有客观性与全体性。

就资本主义美国“流行的”布尔乔亚的实用主义，举例来说。……实用主义的实践观，是逃回过去的阶级的、具有利己主义与私有财产的阶级的，适合于布尔乔亚状态的布尔乔亚的见解。资本家是所见不远的。对于利润的渴望，使他们不能洞察将来。“捉住这一刹那呵！”——这是美国“实业家”的口号。这就是典型的实利主义的实践观。

机会主义的实践观的特点：（一）埋没弱点；（二）不把握整个发展，屈服于个个事实；（三）没有看穿

布尔乔亚的=少数派的实践观，我们的托派和右派，也是有的。埋没弱点；不把握整个发展而盲目的屈服于个个事实之前；没有看穿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这些，便是机会主义的实践观的特征。对于实践作这样的解释，就是从科学的理解——只有科学的理解，才能使人们把握并理解整个的现实与整个过程的运动——分离出

---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2页）

现实的矛盾的深处之能力。这就是抛弃科学理解的实践观。

行动。

马克斯主义的实践观，是伴随着洞察究极目的之实践。

马=伊主义的实践观，和它完全相反。马=伊主义的所说的实践，是伴随着洞察和究极目的之理解的实践，是当作展开了的阶级斗争看的实践。

在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的认识论，也和观念论的认识论一样，想在物质的实践，在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之外，去解决认识的路程如何的问题。因而在认识的种种阶段与要素（感官与思维）之间，就缺乏了联结。这种分离，就进到了从论理的认识分离感性的认识之方向。哲学家之中，有认定感性的经验为认识的真实源泉而轻视思维的意义的人；反之，也有只认定思维为真实的东西而怀疑的去处理感性的经验的哲学家。前者是从含有“经验”意义的希腊语的“Empiria”采取的，被称为经验论；后者是从含有“理性”意义的拉丁语“Ratio”采取的，被称为唯理论。[第213～216页]

经验论和唯理论

经验论——倍根[1]与巴克

经验论的创始者，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但他的学说，没有如后起的洛克的学说，以及主观观

---

[1] 倍根（1561—1626），现译培根。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来[1]、休谟的区别。

念论代表巴克列与休谟的学说中那种粗笨的一面性，也没有使感性的东西与论理的东西相分离。至于巴克列和休谟的哲学，是从极端的经验论出发，从专承认知觉一事出发的，他们否定论理的概念对于认识所具有的意义，把论理的概念，看做是由悟性引入于我们的认识中的制造品。[第216页]

唯理论的缺点

唯理论有两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否定概念由经验而生，所以最初的概念，从他出发而到达于真理概念，究竟是从什么处所发生的问题，他们是不能说明的。第二，唯理论是同样从否定经验的认识的真理一事出发的，所以不能从抽象的思维过渡到个个感性的事物之认识。唯理论的这些缺点，在它的发展中显现了出来。[第217页]

根源的性质

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

……伊里奇说：“马赫很知道：在实践上，人们不可避免的就变为唯物论者。人们在社会的活动上，直接与自然联结着，因为要做出某种事物，人们必须从自然所供给的材料出发，即在实践上承认物质的第一次的性质，而变为唯物论者。所以马赫应用观念论者的全气力，要从认识论排除实践。因为这件事是把认识论变为观念论的东西的唯一手段。”……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据伊里奇的意见，其中必含有实践。……

---

[1] 巴克来（1684—1753），在其他处又译巴克列等，现译贝克莱。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第218页]

普列哈诺夫看轻实践

……蒲列哈诺夫超出论理的证明之界限以外的事是很稀少的，但他对于实践却看得很轻。譬如，一切观念论对于现实的曲解，其本质与根源，是在于从认识过程分离实践，是在于放弃为真理之标准的实践，这种地方，蒲列哈诺夫并不曾用力说来。[第219页]

四　真理论

……

？[1]

……人类的认识，在各个被给予的历史的瞬间，不能完全究明无限的这些联结。所以各个一定历史的瞬间中所得到的知识，是被限制着。绝对的知识固是不可能的，而知识之渐趋于完全和深刻，即是可能的。[第236页]

我们主张参加反法西〔斯〕战争。

……还有更奸巧的诡辩论，就是普列哈诺夫和考茨基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劳动者在特定情形参加某一类战争的理论，去辩护第二国际对于国际劳动运动的背叛。例如，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曾经主张西欧国民参加于对俄战争。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也曾表同意于德国对法国的战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在当时陈述那样的

---

[1] 毛泽东在此处用红铅笔、黑铅笔、毛笔批了三个相叠的问号。

意见呢？这是因为在一八四八年当时，封建的俄国演着国际的宪兵之任务，演着扑灭波兰及匈牙利的革命之任务；在一八七〇年当时，德国对法国的战争，含有对拿破仑三世的世界帝国的战争的意思，含有德意志国民的统一的意思。……[第250～251页]

96[1]

第三章　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

一　发展之质的规定性

……科学的认识之任务，在于渗入过程的深处，暴露过程之发展的原因，认识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内的规律性，并由此去阐明多种多样的现象与现象间的相互联结。但，我们并不是一次就认识现象的法则，而是经过许多的阶段才认识它。我们在社会的实践上，首先碰到相互联结的极复杂的种种现象。我们的思维集中注意于这些现象时，首先要确定一种现象和他种现象的差异，这个事物和别个事物的差异。

？

研究从辨异入手

我们当观察在与他种事物相互作用中的某种事物、某种现象之时，首先不能不确定这种事物

---

[1] 这是毛泽东注明的本章页数。

和他种事物不同的所在，这一过程和另一过程不同的所在。

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

苏维埃经济，究竟和资本主义经济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苏联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阶段，和新经济政策最初的阶段，究有怎样不同的处所？认识任何过程时的第一任务，就是确定那过程的特性。这即是暴露那过程的“质”。所谓“质”的范畴，自古以来，就已知道了。古代希腊哲学者们，譬如说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求了研究任何过程的质。

认识其最简单最根本的性质，由此再进到深处。

所谓暴露过程的质，就是指示过程之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我们暴露出过程的质，就踏上认识的第一阶段。在认识了过程之质的特性后，我们就更进到过程的深处。

过程的简单的特性，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他是客观存在的。

质，是唯物辩证法最初的范畴。过程的质，不是如机械论者莎拉比雅诺夫[1]所主张的那样，也不是如一切主观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它不单是我们思维能力的产物，它是在实在的现实中存在着而被人类意识所反映的东西。进到社会主义时代那个阶段的特殊性，不是人类头脑所规定的东西；不论人类意识它与否，它现实的存在着。

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

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地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即，发达了

---

[1] 莎拉比雅诺夫（1886—1952），现译萨拉比扬诺夫。苏联哲学家。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等。

线也是首先分析特点——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

的商品交换，剩余价值的占有，产业预备军，资本家的企业，利润，商业的利益，利息，货币地租，加特尔，托拉斯，金融公司，产业恐慌等等。我们仔细去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就看到这些现象是贯穿于自由竞争时代及帝国主义时代的各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同时具有自由竞争及独占，同时具有个人企业及托拉斯，加特尔，金融公司，同时具有商品输出及资本输出，等等。

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例如劳动动〈力〉买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性，他规定这社会中其他许多特性。

前面说过，质就是一定过程之根本的最初的规定性。我们要确定资本主义的质，不可以单只数出资本主义的全部特殊性就算了，还有阐明它的最初的规定性之必要。资本主义之最初的规定性，是当作商品交换的发展及生产手段从生产者分离了的过程之结果看的、所谓劳动力那种特殊商品的发现及存在。资本主义的其他特性，完全受这个根本的特性所规定。（所谓最单纯的最根本的规定性，最初的规定性，根本的特性，就是所谓本质。本质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特性，为本质所规定。）[1]如果只把一定过程的标帜一齐数出来，那还不能探出那个过程的发展法则。例如培根那样的经验论者，他分析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时，是数出那过程的一切标帜的。固然，这种

指出过程的一切特性是必要的，尤要指出根本特性，才能认

---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在行间的批语，下同。

识过程之发展法则，因法则是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例如资本主义法则包含于劳动力买卖这个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

工作是必要的；但只是这样，还不能认识一定过程的运动法则。（倍根研究方法之错误。）反之，暴露出最单纯的规定性时，我们就能够确定运动法则。因为，法则的本身是被包含在这样最初的、最单纯的规定性之矛盾的发展中。

过程发展，根本特性（规定性）也随之发展，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获得特性，直至过程完结为止。例如劳动力出卖者（工人）的性质。

适应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那个最单纯的规定性也随之而发展，愈益获得新的方面，并丰富其内容。商品交换越发展、扩大，劳动力出卖者的质，就越发增加。不论资本主义通过如何的阶段，这个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单纯的规定性，就在每一阶段获得特殊性而被保存着。在一定的过程存在而没有消灭的限度内，那个过程的质是被保存的。

帝国主义时代，虽说由于许多特殊性而与自由竞争时代有区别；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质，在帝国主义时代，仍然保存着，发展着。

帝国主义阶段与自由主义阶段各有许多不同的特性，但资本主义的性质是始终存在的。[1]

---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语。下同。

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

对于任何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不仅要求研究整个过程之质，并且要求在其相互的质的差异上，去研究这个过程的种种发展阶段。

苏联经济三个阶段中，不但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加强了，而且各阶段都有不同的质。

例如，苏维埃经济，在其发展中，经过了两三个阶段。即，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复兴期、再建期，现在进入于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一阶段都把全体的苏维埃制度的根本特性发展了，并且加强了；同时，各个阶段又各自具有相异的质。[第253～257页]

？

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中都有新的发展，认识各阶段中的特点是必要的。

固然，各个发展阶段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先行的阶段是以后各阶段的准备，但各个阶段，都独特的发展了整个苏维埃制度之规定的特殊性，即“质”；我们必要记住这一层，去考察各阶段之质的特殊性。

质表现于许多特性中。

发展的各过程各阶段之质，显现于许多特性之中。

任何过程都有许多特性，为其根本的质

不单是社会过程如此，即客观世界的任何过程，也都具有为其固有的质之发展所规定的许多

所规定。

特性，都具有许多的固有性。

一切过程依一定方面互相联结，例如苏联与外国依条约与军备与外国联结，这些方面根本上为过程的质所规定。

我们知道，所谓孤立的过程是没有的，一切过程都依一定方面互相联结着。例如，苏联即处于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结之中。这个联结，显现于许多固有性之中，这些固有性，如以对外贸易的独占及苏联之强化为目的的许多条约关系，以及巩卫苏联之必要的军备等即是。

过程中质的发展使得过程的固有性随之发展，例如恐慌随资本主义之根本特性而发展。

过程的质之发展，规定过程的固有性之发展。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根本特性的发展，恐慌也发展起来，尖锐化起来；产业循环期，每次都呈现为新的独特的形态。譬如，在战后帝国主义时代中，恐慌及不景气的期间延长了，好景气的时候非常的缩短了。

固有性有本质的非本质的。

固有性有本质的及非本质的。例如，产业循环期之周期的交替，对于资本主义是本质的东西；但在好景气之时，某部分的恐慌高涨起来，那是非本质的。就运动过程的各阶段说来，某种固有性虽是本质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在以前的发展阶段上虽不是本质的东西，而在特定阶段上却变成本质的东西。这在相反的情形也是一样。……

过程发展有原为本质的固有性变为非本质的，有原为非本质的变为本质的。这个区别是

对于固有性之本质的东西及非本质的东西，

必要的，否则错误。

如没有区别的能力，就要引到错误的结论。……[第 258～260 页]

过程的质只有通过各阶段的固有性才能发展。

任何过程之根本的规定的特性、即它的质，只有通过各阶段的固有性之发展而发展。[第 260 页]

固有性的发展，促进过程由一阶段转变到他阶段。

保存整个过程的质的固有性之变动，促进那过程的发展，招致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之过程的转变。

过程有共同特性又有多数方面，这些方面又都有其特性。

各过程互有质的区别，同时，又具有被一个规律性所连系的多数方面。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分配、消费，表现为一个生产方法之质的差异的方面。

过程有质的一方面，还有量的一方面。

质的规定性，只给与我们以过程的一方面的认识。在确定了过程的质及其固有性之后，我们的认识更加前进，进到下面的阶段——过程的量的规定性之认识。

二　发展之量的规定性

……

世无无量之物。

我们在一切过程上，都与量的规定相接触。过程之量的规定性，不是我们头脑的创造物。它不像怀疑论者及主观主义者所想的那样，它不单

依一定方法，使过程的要素及方面完成量之发展。

是我们的表象，而是存在于客观的现实之中。不具有量的规定性的事物，一个也没有；又，不依一定方法使其自身的要素、自身的方面成就量的发展的过程，一个也没有。

量与质，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着的东西。

量与质是同时存在（非分割的），同时发展，二者是统一的。

不同过程，量也不同。布匹、人寿、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量之发〔展〕都不同。

量的发展速度，依质的情况而不同，质规定量。

……不同的过程，具有不同的量的规定性。布匹不能用里特[1]去测量，人的寿命不能用启罗格兰姆[2]去测量。资本主义，描画着腐朽的曲线而发展；苏维埃制度，描画着成长的曲线而发展。过程之量的规定性，其发展的期间及速度。依存于过程之根本的特性，为过程之质所规定——这一层，从前面关于质的陈述看来，是不难理解的。[第 261～263 页]

任何过程量的特殊发展，为特殊的质所规定。

任何事物，任何过程之特殊的量的规定性，都为那事物的质所规定。

质在过程各

特殊的被规定了的量之变动，起于过程之各

---

[1] 里特，现译升。

[2] 启罗格兰姆，现译千克。

阶段中起变〔化〕，规定着量也起变化。

阶段的发展之中。

量的变化也促进质的变化。

计划经济的发展及强化，社会主义关系的优势，农业的半数以上引入了社会主义关系，这些事，使得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速度显著的增高，超越再建期及复兴期的速度，而使经济上发生质的变化，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工事的完成。这样沿着加速曲线的成长，变成苏维埃经济之规律的发展现象。

认识质量联结不可分，认识量的发展之特性是最要任务之一。

确定量与质之不可分的联结，确定过程之量的方面之特殊的规定性，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要求之一。

不了解过程质的特殊量也特殊，以为不同的质却是相同的量。

右翼，左翼以及一般害虫们的见解之理论的基础之一，即在于他们不能理解量之特殊规定性。

红白军质不同，量也不同——行军速度，任苦程

孔德拉捷夫[1]，克鲁曼，查亚诺夫[2]及其他害虫们，都以为苏维埃经济不能成就在资本主义经济以上的发展速度。他们以为，前者和后者一

---

[1] 孔德拉捷夫，现译孔德拉季耶夫。苏联经济学家。

[2] 查亚诺夫，现译恰亚诺夫。苏联经济学家。

度，作战力量。

国共两党，质不同，量也不同。

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

压迫的政策大减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我们学校则不然。

睡得死，能力增加；精神疲劳，则产量减少。

新量〈质〉规定了新量的发展。

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的质，规定了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大量的扩大红军，发

样，也是沿着腐朽的曲线发展。这种速度论是从那里发生的呢？这种速度论，是由于把苏维埃经济看成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这种速度论，是由于他们没有理解资本主义体系及社会主义体系在原则上是两个相异的体系。右翼机会主义者们，也宣传了同样的腐朽曲线的理论。……他们的任何一方面，都不理解苏维埃制度的特性，开拓着生产力之未曾有的新的发展速度之可能性。他们的任何一方面，都把资本主义的产业发展速度，机械的转用于异质的俄国的条件之上。

右翼之机械论的立场，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当布哈林、路易柯夫、特姆斯基等主张要减低党所公布的速度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应当按照与复兴期最后数年间相同的速度进行。他们不能理解新的质给与了发展之新的量的规定性，不能理解进到再建期就是意味着新的发展速度——这种无理解，是他们那种见解之方法论上的基础。在苏联进到社会主义时代的今日，右翼及左右两派反对党所采纳的发展速度；其反对的论据，也是这个同样的方法论上的特征。

展农业经济与合作社。

和平与民主政策的结果，使得抗日力量大为增加。

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制度，全国各方面的发展将不可限量，故必须量与质之联结。

对于过程及其各个阶段上量的发展之特殊的规定性，没有理解，这在托罗斯基的场合，特别显明。托罗斯基在第十五次党大会以前，就已要求国内之过度工业化。但是，在俄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用非常的速度向前发展之时，托罗斯基却不能挝住这一时代之特殊的特性，却反对这个速度，以为过于极端。[第265～267页]

机械论者不承认质，只承认量，忘掉一方面。

机械论者们不以暴露过程的质为任务，他们以为科学之唯一的任务只在作出现象之纯量的说明。

把一切不同质的现象对立起来是必要的。

……布哈林在史的唯物论[1]中，大声疾呼把力学的现象和“有机的现象对立起来……是没有意义的”。机械论者们，要求只研究过程之量的方面。……[第268页]

恩格斯批评那否定质与量之联结的机械论的思想。他说：“机械论的意想，在从地点的移动去说明一切变化，从量的差异去说明一切质的差

因为量的变

---

[1] 现译名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布哈林1921年著。

化产生了质的变化，反过来质的变化又产生了量的变化。

异；致于质量相互之间所有的关系，质到量的转变，量到质的转变，其中的相互作用，是没有注意的。如果一切质的差异及变化，不能不归约于量的差异及变化，不能不归约于机械的转动，那末，我们就必然的到达于如次的命题。即，一切物质都由同一的极微体构成；物质的化学要素之一切质的差异，都起于这些极微体在原子中被统一时之数量的差异及空间的集结。”[1]

?

三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质在量中发展。

如上所述，没有无量的质，也没有无质的量，——质量这两个方面，在客观的现实上，是在统一之中被给与着。质在量之中发展，即一定的，特别的，被规定了的过程在量之中增大，使其一切方面或要素发展。量，特别的被规定着。过程发展其一切方面而转化为其对立物。过程之量的增大引导其自身转化为新质。——量转变为质。

量发展便变为新质，新质发生，新量也发生，质变为量。

另一方面，新质的生成，同时就是新量的发生。——质转变为量。

只有依量的变化质才能变

恩格斯把由量到质的转变及由质到量的转变，认作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之一，他说：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6～597页）

化，也只有依质的变化，量才能变化。

“这个法则，为着我们的目的，可以这样表示出来。即，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只有依着各个场合中正确的被规定了的方法——物质之量的增减及运动，才能发生。”[1]

人多成王。温度增减成固、液、气。王子筷子集散。地小不足回旋，地大则否。英勇〈雄〉无用武之地。有机体。帝国主义。苏联经济。民主运动。抗日运动。长袖善舞、多财善贾[2]。韩信将兵。

无论观察任何过程，过程之量的增大都引到新质。在气压不变的情形下，温度降至摄氏零度，水变成冰；温度升至摄氏百度，水变成蒸气。

如达尔文所证明，有机体中渐次的量的变化，引到有机体中之质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独占之量的增大及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现实的其他方面的增大相并行，导入了资本主义之新阶段的发展，即帝国主义。在苏联，贯通于国民经济全线之社会主义要素的成长，引起了由复兴期到再建期的转化。[第269～272页]

第二种见解，对 过程间的转变的方法

各过程之量的增大，受那过程的构造所规定。各以独特的方法显现。苏联向社会主义的推移，向过渡期的社会主义时代的转化，也各以独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2] 参见《韩非子·五蠹》。原文是：“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

特的方法显现着。

对

所谓量到质的转变，就是一定的质及其量的规定性，同时转变为具有别种量的规定性之别种质。

对

过程间的转变与过程中的转变之区别

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

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段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的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过程与阶段的区别

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就是到新形式的规律性的转变。反之，质量内部的转变，例如由单纯的资本主义协作转变到工场手工业，更进而转变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乃是质量之特性的发展，乃是质量由一阶段到他阶段的转变。各阶段，使从前阶段的各方面在量之中发展着，并且添加几多新的方面和属性，而与从前的阶段有质的区别；但是，截至某一定的瞬间，还没有引导到全体的质量向新的质量之转变。

连续的中断

一切质量，到达某一发展阶段时，就中断其一定的发展过程，而转化为别种质量。

通过飞跃或

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一种质量到他种质

革命而表现

量的转变，通过飞跃而显现。例如，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是通过革命而显现的。

承认飞跃的发展，是辩证唯物论中心特点之一。

承认飞跃的发展的道路，乃是辩证唯物论之中心的特性之一。

自然、社会、思维，都有飞跃。

飞跃的瞬间，旧质消灭，新质产生（以旧质为基础）。

旧物之质与量都中断，新质与量开始发生。

不论在客观的现实之一切领域中，或在思维之中，都发生飞跃。一种质到他种质的转变，完全是飞跃。这因为在那一瞬间即转变的瞬间，旧质失去了作用，以旧质为基础而生长了的新质开始发展。一切飞跃，都是“连续性的中断”。这因为在那一瞬间，旧物之量的发展被中断，而新物的发展即新质量及新质的规定性开始发展。

旧过程是新过程的准备，旧阶段是新阶段的准备。

新质不是一时突然出现的。旧质之一切从来的发展，是新质的准备。机械的生产方法是由工厂手工业的发展所准备的；手工业之部分作业的细分，准备了向着机械的推移。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进行，资本的聚积及集中，普罗列达里亚的成长等等，所准备了的。

新过程或新阶段中保存着旧

新质从旧质生长出来，而且在长时间还保存着若干旧来的特征及方面。资本主义，在长久期

质的残余，而且长时间新旧错综，但有主导。

间，还保存着单纯商品关系及若干封建的遗物。

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

我们不仅要考察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飞跃，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例如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并且还要考察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在资本主义以及苏维埃经济中，由一发展阶段到他发展阶段的转变，是一个飞跃。这因为它在质的方面转变到新阶段。

这一认识却要紧。

这种飞跃是与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飞跃有区别的，因为它是在当作全体看的过程之一定规律性的范围内所发生的飞跃。

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

质量内部的飞跃、种种方面的飞跃的发展路程，是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之发展中所固有的。在动物及人类的有机体中，显现着万千的飞跃的变化；生物学上的种，通过若干的飞跃而变化；化学上的原素，其形成及分散，都是飞跃的。

飞跃各以独特的方法

各种质量，以其独特的方法，转化为他种质量。唯物辩证法要求认识特殊性及规定性，要求认识转变及飞跃。

举例

由新经济政策的再建期到社会主义时代的飞跃，和那到资本主义过渡期的转变，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飞跃的特

飞跃的特殊性及形式、期间、速度及强度，

性、形式、速度、强度，因过程的不同而不同，即受旧质的特性所规定。

都受旧质的特殊性——它的构造、及新生长着的质的特性所规定。由水到冰的飞跃，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但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飞跃，却必须伴着资本主义内部的发展的若干飞跃的方面所经历的长时间。唯物辩证法要求认识过程之质，要求摘出飞跃的特殊性。

举例

辩证法要注意飞跃的特性。

德波林的离开实际，也不知过程内部的飞跃。

德波林一派，对于飞跃的特殊性虽曾给以一瞥，但他们之中，谁也不能用具体的实例去指示这种特殊性。德波林一派，更没有提出质量内部的飞跃的问题。

托洛斯基也不懂

不能理解飞跃的本质及其特殊性，这是把不同时代不同过程的飞跃作同视的托罗斯基的特征。

机械论

对于飞跃的发展方法之否定，是机械论者的特征。机械论者否定质，只承认量的发展，因此，他们当然也否定飞跃。

视飞跃为神秘

波格达诺夫[1]肆口嘲笑了辩证法之神秘的飞跃。有些现代机械论者，以为飞跃只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只是不断的量的

渐进主义

发展。机械论者，是站在所谓渐次的发展、过程

---

[1] 波格达诺夫（1873—1928），在其他处又译波格达洛夫等，现译波格丹诺夫。俄国社会哲学家，经济学家。

庸俗进化论

的渐次的增减之见地上的。这种渐进主义的见地，正是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第272～276页]

渐进主义是庸俗的经验论，忘记阶级根本利害。

……渐进主义的见地，陷于鄙薄的经验论及拜金主义，忘记阶级之根本的利害，导入于基尔特气习[1]的游戏。

以上论过程质的特性及量的特性。

四　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

以下论过程发展之内的规律性。

以上，我们确定了过程的特殊性、其质的特性及量的特性，现在，要进而考察过程的发展之内的规律性。

两种见解

在人类思想的历史上，有关于发展的两种根本的见解。依照第一种见解，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

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分裂而发展。……

第一种见解，机械的发展观，发展由于量的增减。只从片

第一种见解是机械的。这种见解，从现象的表面出发，只能从外面去记载过程的增减，而不能说明过程的运动之内的原因，不能指示出一定

---

[1] 基尔特气习，基尔特，现译行会。基尔特气习，即行会习气。

面与外面看问题，不从全面与里面看问题，不能说明事物发展的原因。

的过程怎样发展并为什么发展。……

第二种见解，唯物辩证的发展观，暴露过程自己运动的源泉。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之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第二种见解，不停留于现象的表面，而深入于过程的底层，暴露过程的发展之内的法则，确定一定过程之发展的原因，在这种场合，不在过程的外部而在过程的内部去发现发展的原因，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依照这种见解，所谓认识过程就是暴露出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确定这些方面的相互关系，追求过程之矛盾的运动。……

第二种见解，是辩证唯物论的主张。

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

伊里奇说，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这是说，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这个法则，贯穿于客观的现实及我们的思维之一切方面。

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

仅认识过程之互相区别、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与许多属性，以及认识这些方面与这些属性之互相联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够的；还须认识所以使过程〔发展〕之根本的矛盾，这就是自己运动的源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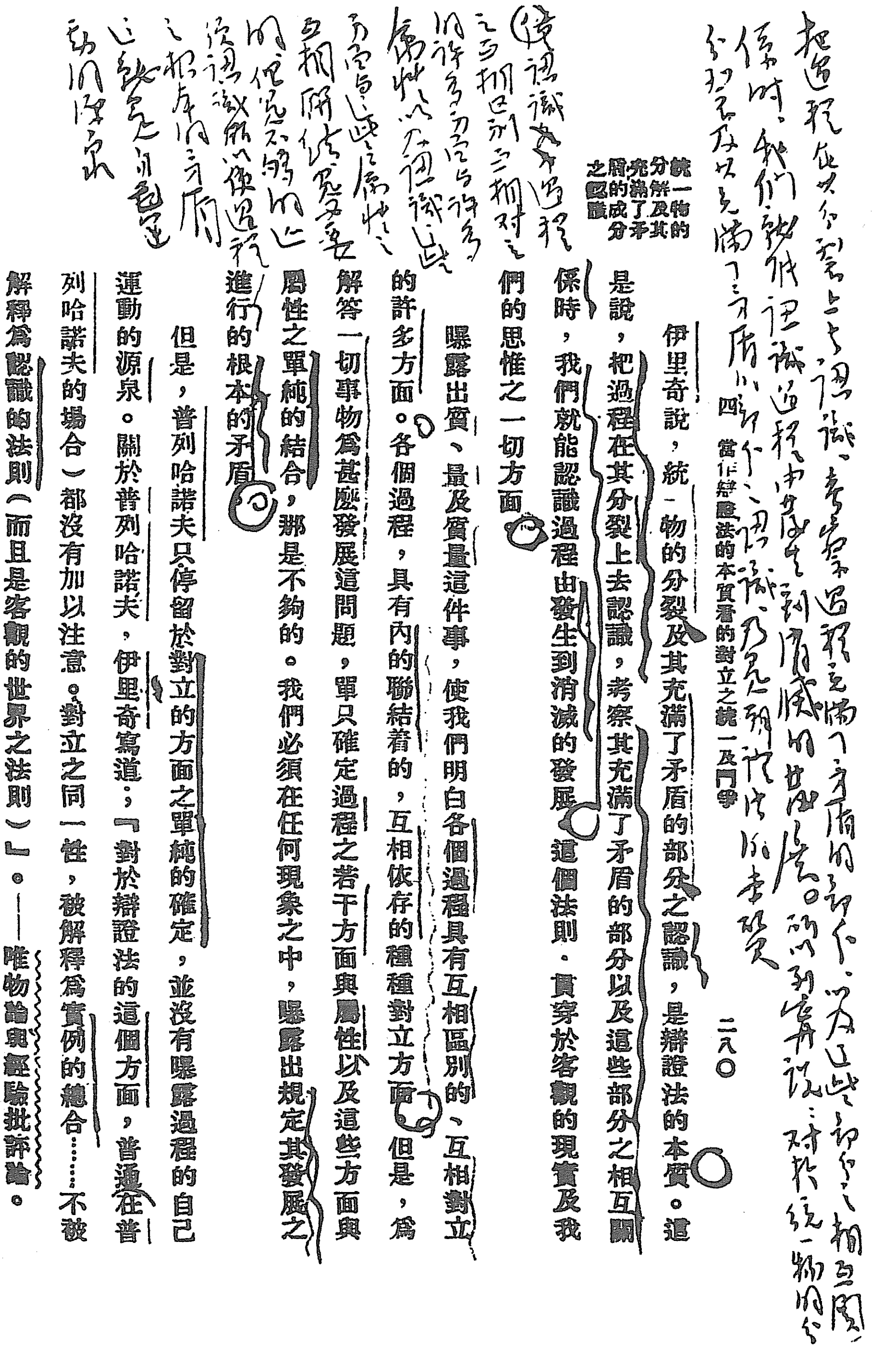
暴露出质、量及质量这件事，使我们明白各个过程具有互相区别的、互相对立的许多方面。各个过程，具有内的联结着的，互相依存的种种对立方面。但是，为解答一切事物为什么发展这问题，单只确定过程之若干方面与属性以及这些方面与属性之单纯的结合，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任何现象之中，暴露出规定其发展之进行的根本的矛盾。

但是，普列哈诺夫只停留于对立的方面之单纯的确定，并没有暴露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第277～280页]

五　统一物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

不认识矛盾，便不能认识过程的发展法则。

马克思前后的布尔乔亚经济学，认为布尔乔亚制度不但现在存在着，今后也将永久存在;那种经济学不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不认识资



把过程在其分裂上去认识，考察过程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以及这些部分的相互关系时，我们就能认识过程由发生到消灭的发展。所以列宁说：对于统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满了矛盾的部分之认识，乃是辩证法的本质。

四　當作辯證法的本質看的對立之統一及鬥爭

二八〇

統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成分之認識

伊里奇說，統一物的分裂及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之認識，是辯證法的本質。這是說，把過程在其分裂上去認識，考察其充滿了矛盾的部分以及這些部分之相互關係時，我們就能認識過程由發生到消滅的發展。這個法則，貫穿於客觀的現實及我們的思惟之一切方面。

曝露出質、量及質量這件事，使我們明白各個過程具有互相區別的、互相對立的許多方面。各個過程，具有內的聯結着的，互相依存的種種對立方面。但是，爲解答一切事物爲甚麽發展這問題，單只確定過程之若干方面與屬性以及這些方面與屬性之單純的結合，那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在任何現象之中，曝露出規定其發展之進行的根本的矛盾。

但是，普列哈諾夫只停留於對立的方面之單純的確定，並沒有曝露過程的自己運動的源泉。關於普列哈諾夫，伊里奇寫道：「對於辯證法的這個方面，普通在普列哈諾夫的場合）都沒有加以注意。對立之同一性，被解釋爲實例的總合……不被解釋爲認識的法則（而且是客觀的世界之法則）」。——唯物論與經驗批評論。

停认识在过程之互相区别与相对之的许多方面与许多属性，以为认识已足，方面与此之属性，互相联结是至要的，的，仍是不够的，必须认识所以使过程之根本的矛盾，是统一之自己运动的源泉。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本主义走到死灭的内的矛盾。甚至于亚丹斯密[1]、李嘉图一流的进步学者，虽承认价值是体现于商品中的人类劳动，却仍不能暴露资本主义之根本的发展法则。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看见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之现实的辩证法，去对抗布尔乔亚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他说：“不要矛盾的独断，而代置以构成那独断所掩蔽了的基础的矛盾的事实及实在的矛盾，才能使经济学成为实证科学。”

旧经济学与新经济学的区别

马克思暴露了布尔乔亚生产方法的主要矛盾，由此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则。

从生产社会性与占有私人性间的矛盾看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这是根本矛盾。由这根本矛盾发生其他一切矛盾，由这根本矛盾规定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指摘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及其“自己运动”的主要源泉，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及生产关系间的矛盾规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矛盾，在于：生产力之发展，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名义上显现，而又成为产生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之发展，陷入于和那狭隘的目的即剩余价值的产生之间的日益不能相容的矛盾。

不平衡发展

伊里奇指示了资本主义在其最后的发展阶

---

[1] 亚丹斯密（1723—1790），现译亚当·斯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

段，转化为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矛盾极度激化的帝国主义。从分析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出发，从各国的帝国主义之不均等的发展法则出发，伊里奇论证了帝国主义的锁链中最弱的一环被冲破的现实性，科学的证明了一国中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

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

苏联过渡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有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

伊里奇和斯达林[1]在其著作中，指摘出过渡期之根本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证明使这个矛盾不断的再生产的根柢，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分散的小布尔乔亚农业之间的矛盾，是主要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的矛盾，——这农民层中的勤劳者是普罗列达里亚的同盟者，但农民层中的小所有者，却时时刻刻产出资本主义。他们指示了苏联普罗列达里亚和资本主义要素之间的对立（不能相容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并怎样成长的。

---

[1] 斯达林，在其他处又译斯丹林等，即斯大林。

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之可能。

一切客观过程都由内部矛盾而发展。

内部矛盾，不但使社会现象发展，并且使客观现实的一切现象发展。

原子的内部矛盾规定原子之物理化学性质。

化学元素的发展由于内部矛盾。

现代科学早已不把原子看作物理学上的物质被分解的最后界限，现代科学发现了原子是阴阳电子的统一，并且阐明了这阴阳两电子的交互渗透规定原子之物理的及化学的性质。不仅如此！在二三十年前，物理学及化学尚被认为绝对不变的东西。基于历史的见地，去考察化学元素的性质，还是最近的事情，化学元素在发展着。化学元素之发展的内的根据，就是元素的内的矛盾之运动。

生与死、发生与消灭、同化与异化，由于内部矛盾规定有机体现象的发展。

生命现象的自然过程之辩证法的性质，特别明了的表现着。不论在有机体的生命中，或在各个细胞的生命中，生和死、发生和消灭、同化和异化（物质和能力的新陈代谢），都是被给与的内的统一。

变异性、遗传性之矛盾统一——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生存竞争中的变异性及遗传性之充满了矛盾的统一，是有机体发展的主要原动力。

矛盾统一及其分裂也是思维的法则。

对立的统一和统一物的分裂，是我们思维的普遍的发展法则。如前所述，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运动于相对真理及绝对真理的矛盾中，我们虽认识绝对真理，但在各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上，我们的认识是相对的。

认识受实践状态及社会历史所规定。

我们的认识，受我们的实践状态及一切从来社会的历史所规定。

统一物的分裂，是一切客观现实过程及思维过程之普遍的发展法则。

所谓对立统一，就是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联结。这就是所谓主要矛盾，所谓自己运动的源泉。

统一物的分裂，是客观现实及一切思维过程之普遍的发展法则。辩证唯物论——伊里奇说——“是把发展当作对立之统一（统一物分裂为互相排除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间的相互关系）”去观察，因此，“主要的注意在于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1]。统一物的分裂，正确的摘发出过程的本身、过程的内容、过程的矛盾、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的主要矛盾。

矛盾的特殊

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

盾，是不同质的。那只有依着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过渡的经济之矛盾，各不相同。

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

托罗斯基主义的特征，就是不理解各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托罗斯基不知道帝国主义时代中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的特性，不知道不均等的发展法则。他之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可能性，其第一论据就是从此产生。在托罗斯基看来，苏联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经济中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是同型的矛盾；后一矛盾和前一矛盾同样，只有由于国际革命才能解决。他反对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之第二论据，就是由此发生。实践，反驳了托罗斯基的理论，证明了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被革命所解决；而在苏联条件下的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层的矛盾，却由国内的工业化及农业的集体化所解决。实践，把一国内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可能的理论，精当的确证了。[第281～286页]

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

决。在国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用革命去解决。苏联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则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中，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地位，即每方的特性如何，各用怎样的具体形式同对方发生依存关系，在依存破裂时，又各用何种形式同对方斗争。研究这些问

与托罗斯基主义及与右翼机会主义相斗争的课题，教给我们有暴露任何过程之内的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那为全体过程的矛盾所规定的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这样说过：

“普罗列达里亚和财富，是互相制约的对立。并且两者形成一个总体，两者都是私有财产的世界产生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两个对立，在矛盾之中，各占着怎样的特定的地位呢？单只说明统一物的、整体物的这两个方面，那是不够的。”[1]

为理解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必须认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特殊性，必须认识两者相互的关系及其具体的依存关系，必须认识被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规定的两阶级的相互制约性。

---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页)

题，是我们的任务。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六　对立的相互渗透

对立的方面互为条件，一方存在他方才能存在。

内的对立互相结合，对立的一方面如没有他一方面就不能存在。

国家统制与商人自由之对立的统一，此类例子可举出许多，都有这样不可分的两方面互相联结。

新经济政策，内部存有矛盾。斯丹林说：“在新经济政策中，必须保存两个方面——一方面与战时共产主义相对抗，以买卖之一定自由的保证为目的；他方面与买卖之完全自由相对抗，以国家的市场统制的任务为目的。这两个方面中，去掉一个方面——那样，在我们之下就没有新经济政策了。”[1]

一切过程都如此，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

充满了矛盾的方面这样不可分的联结，在客观现实的一切过程中，也可以看见。

---

[1] 参见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5页）

对立的两方面相互结合，并转变到新的对立，即所谓相互渗透。

对立，不仅处于不可分的联结中；并且一个对立转变为别一对立，相互的渗透着。

对立的互相结合及其转变即是相互渗透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对立关系的相互渗透

矛盾的一方面以他一方面为前提，向着他一方面转变。……由工厂手工业到机械的生产方法之发展，同时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新生产关系的发生。劳动力和生产手段的统一，同时是生产力的联结，又是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联结即生产关系。工厂手工业中的分业，是生产关系，又表现为生产力。以此为基础，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渗透为基础，展开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之激化的矛盾的过程。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保存游击性与克服游击性；分配土地的土地私有与准备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党的民族性与国际性；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

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之中。为要暴露及指摘这种相互渗透的性质，必须具体的分析过程。

我们进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但又经历着新经济政策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矛盾。我们巩固货币制度及信用组织，实行节约冗费及统制卢布，以节约冗费为基础发展着苏联的商业。货币制度及银行的强化，同时又是社会主义会计、计划训练的造出及强化；冗费节约的实施，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伸张到作业场、工作组及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与战争；同资产阶级联盟与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变；共产党同国民党妥协，正是加强共产党的独立性；军队的休息训练，同时即是加强战斗力；退却与防御，同时即是准备进攻；良药苦口，同时却利于病；忠言逆耳，同时却利于行；羊肉好吃，无奈烫的〈得〉慌；玫瑰花儿可爱，刺多扎手；佳人却可倾国；[2]祸兮福

集体商场。苏维埃商业的发展，同时又是作出生产物之社会主义分配的要素的路程。集体农场是在内部分配利益的亚尔特尔，同时又是社会主义的企业之一种模型，并且这种企业不久就会变成彻底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在国家问题之中，也有与此同样的对立之渗透。社会主义是以国家之消灭为目标的制度。但是，我们正在策进普罗列达里亚独裁[1]的强化。我们所以使国家发展，因为要造出把国家引到死灭的条件。“国家权力之最高的发展，是以准备消灭国家权力的条件为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它‘矛盾着’吗？是的，它‘矛盾着’。但是，这个矛盾正在生动着，它完全反映着马克思的辩证法”。（斯大林）

---

[1] 普罗列达里亚独裁，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的旧译。

[2] 佳人却可倾国，参见《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倾国，既可指倾覆国家，也可用形容女子的绝美。毛泽东这里指旧谓绝美的女子可以误国、亡国。

所倚，福兮祸所伏；[1]都是互相渗透、互相转变的对立。一切对立都是这样的。

在民族文化和国际关系的交互关系的问题中，也有与此同样的相互渗透。我们使民族文化发展，但是那种发达，同时是使民族文化死灭、是准备融合民族文化为一个共同的国际社会主义文化的条件。对立的统一及互相渗透，“使得多数派能够在民族问题的领域中，建立坚固不拔的要塞，反映着生动的真理”。

以上苏联的八个例子。

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

由对立转到同一：战争是双

正是这个对立的相互渗透，伊里奇名之为对立的同一性。暴露任何过程中对立的相互渗透及同一性，是我们的认识论、我们的辩证法之中心任务。

伊里奇说：“辩证法，是关于对立怎样能是同一性？又怎样是同一性（怎样变成同一性）？

---

[1] 参见《老子》第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方对立，同一是双方和平；国家是双方对立，同一是国家消灭。因为处在一个过程中对立互为条件，经过斗争克服对立，所以能变成同一性。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之下，国共对立却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线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因为客观现实一切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对立与转向

在怎样条件之下，对立变成同一性而互相转化？为什么人的悟性不把这些对立当作死的、凝固了的东西去观察，却当作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观察？等问题的学说。”[1]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1页）

同一性，转向否定之否定。他们本是生动的、附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所以人的悟性这样去观察。

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对立与转向同一。

对立的互相渗透，同一性，又是我们的认识过程的特征。人类认识的主要矛盾之一，如前所述，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矛盾。相对真理在种种形态上反映绝对真理；绝对真理由顺次的相对真理所组成。

如不具体研究过程，无法了解对立的同一性即相互渗透。

对立的同一性及其相互渗透之暴露，要在过程之具体的研究以后，即在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方面，这些方面的联结及相互制约性的特殊性之具体的研究以后，才有可能。……[第 287 ~ 292 页]

认识过程中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就是认识过程中矛盾着的那些方面（即过种〈程〉中主要矛

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同一性，就是认识过程之充满了矛盾的方面的运动、发展、被制约性及其一切限界的可动性、与这些限界的互相转化。[第 292 页]

盾与若干其他次要矛盾每一种矛盾之两方面）之运动，那些方面的被制约性，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可动性，以及那些方面所设界限的相〔互〕转化。辩证法研究这许多，就是对立的同一性或相互渗透。

依照布哈林的意见，互相独立的力存在着，它们互相作用。而且，运动之引起，由于不同方向之力的外的冲突。伊里奇要求首先要认识过程之内的矛盾，发现自己运动的源泉；但布哈林却要求去确定互相冲突的外力。伊里奇要求论证统一物的分裂，暴露对立的同一性，即确定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但布哈林却要求只去考察互相独立的力，各自能够个别存在的那样的力。布哈林把对立之统一的法则，机械的去理解。这是由于他从力学的概念、互相独立的力之单纯的冲突出发的缘故。

不是统一物的分裂，而是外在地存在的两种力；不是内的矛盾，而是外的矛盾；不是对立的两方面不可分地结合着，而是而是二力各能独立生存——反

从对立的互相渗透之机械的解释出发，对于

辩证主义的形而上学。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矛盾普遍的存在着，对抗是某些过程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党派与党派间〔的〕矛盾，如此等等的矛盾，都有发展为对抗的形势。社会过程中这种对抗，取压迫与战争的形式；自然过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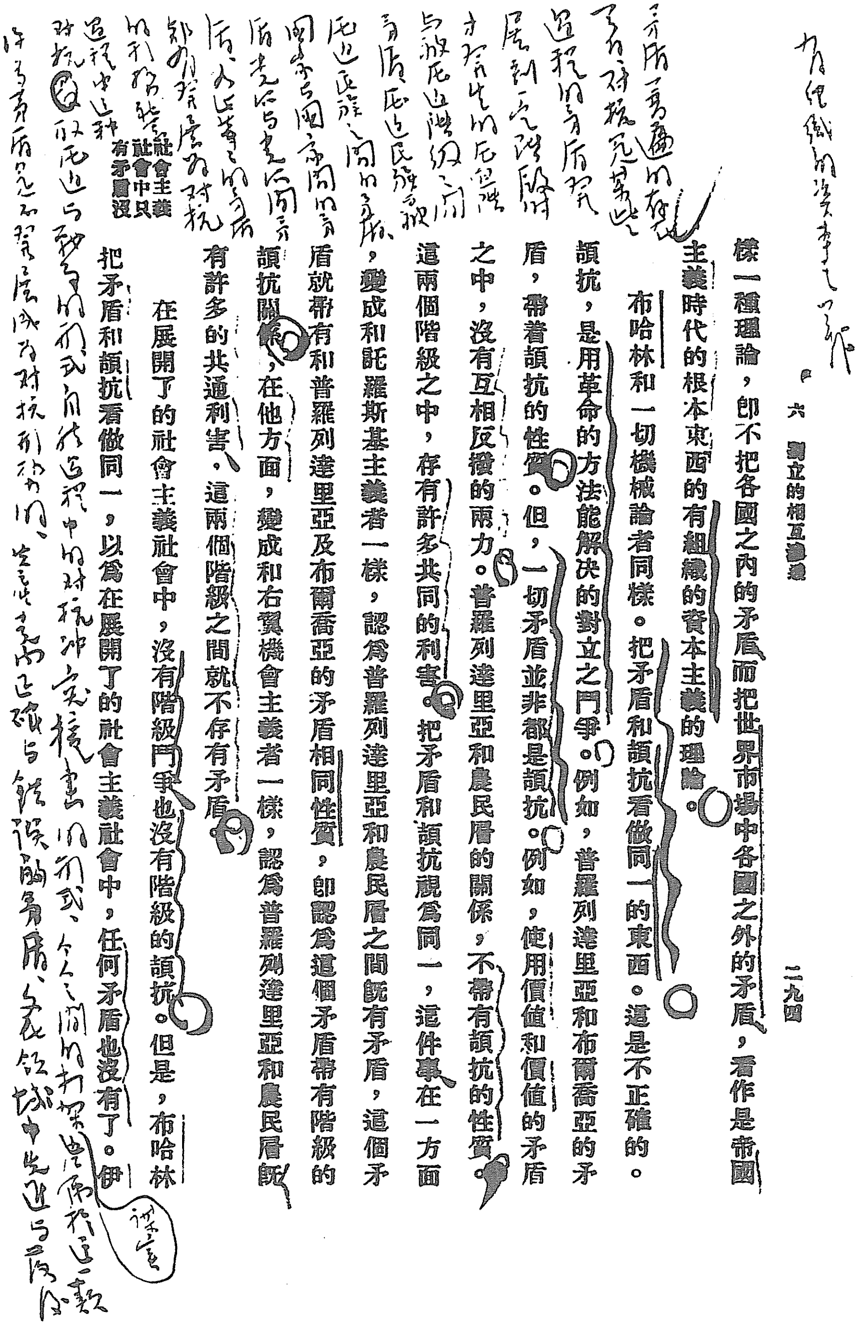
现时帝国主义的研究，就会产生这样一种理论，即不把各国之内的矛盾而把世界市场中各国之外的矛盾，看作是帝国主义时代的根本东西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

布哈林和一切机械论者同样，把矛盾和颉抗[1]看做同一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颉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决的对立之斗争。例如，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矛盾，带着颉抗的性质。但，一切矛盾并非都是颉抗。例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之中，没有互相反拨的两力。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的关系，不带有颉抗的性质。这两个阶级之中，存有许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颉抗视为同一，这件事在一方面，变成和托罗斯基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既有矛盾，这个矛盾就带有和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的矛盾相同性质，即认为这个矛盾带有阶级的颉抗关系；在他方面，变成和右翼机会主义者一样，认为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既有许多的共通利害，这两个阶级之间就不存有矛盾。

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阶级的颉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颉抗看做同一，以为在展开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任何矛盾也没有了。伊里奇回答这种主张，这样说

---

[1] 颉抗，在其他处又译颉颃、拮抗等，现在一般译为“对抗”。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论

樣一種理論，即不把各國之內的矛盾而把世界市場中各國之外的矛盾，看作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根本東西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

布哈林和一切機械論者同樣。把矛盾和頡抗看做同一的東西。這是不正確的。頡抗，是用革命的方法能解決的對立之鬥爭。例如，普羅列達里亞和布爾喬亞的矛盾，帶着頡抗的性質。但，一切矛盾並非都是頡抗。例如，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之中，沒有互相反撥的兩力。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的關係，不帶有頡抗的性質，這兩個階級之中，存有許多共同的利害。把矛盾和頡抗視爲同一，這件事在一方面，變成和託羅斯基主義者一樣，認爲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之間既有矛盾，這個矛盾就帶有和普羅列達里亞及布爾喬亞的矛盾相同性質，即認爲這個矛盾帶有階級的頡抗關係，在他方面，變成和右翼機會主義者一樣，認爲普羅列達里亞和農民層既有許多的共通利害，這兩個階級之間就不存有矛盾。

在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沒有階級鬥爭也沒有階級的頡抗。但是，布哈林把矛盾和頡抗看做同一，以爲在展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任何矛盾也沒有了。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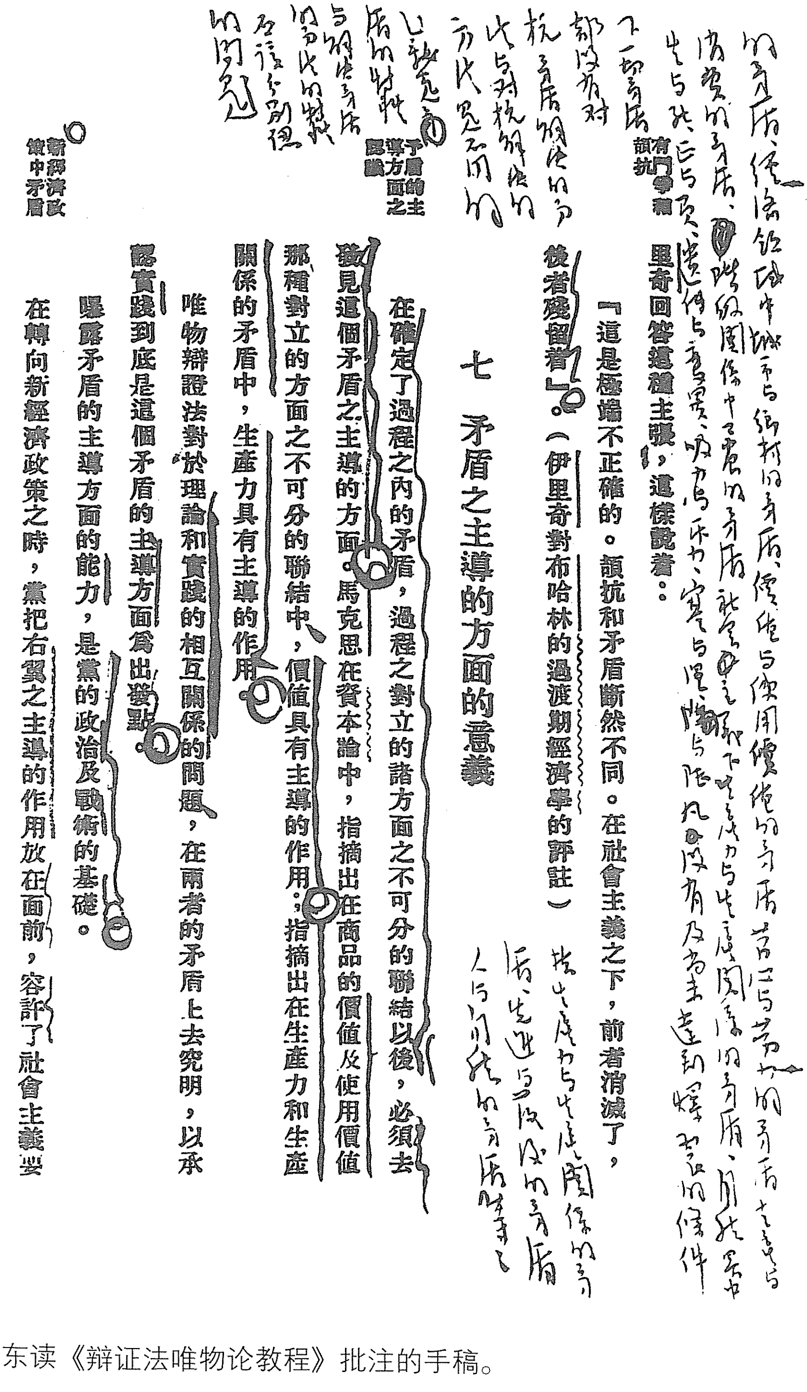
讲座

矛盾一万年后的存在，但对抗只某些过程的矛盾现展到一定阶段才发生的，在阶级社会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矛盾，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间的矛盾，[illegible]与[illegible]间的矛盾，大的集团的矛盾，都以阶级对抗的利益[illegible]

社會主義社會中只有矛盾沒

过程中这种对抗[illegible]取而代之与和平的形式，自然过程中的对抗冲突表现的形式，个人之间的打架，[illegible]偶然的一类，许多矛盾只[illegible]发展层成为对抗形式的。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在组织中先进与落后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的矛盾、經濟領域中城市與鄉村的矛盾、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矛盾、勞心與勞力的矛盾、生產與消費的矛盾、階級關係中之農民的矛盾、社會主義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內外矛盾、生與死、上與下、遺傳與變異、吸力與斥力、實與虛、陰與陽、凡沒有或尚未達到對抗的條件下一切矛盾都沒有對抗。矛盾須解決的方法與對抗解決的方法是不同的

以認定主盾的特性與領導矛盾的另外的特性不注意分別但的則不見

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先進與落後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等等

有鬥爭和頡抗

里奇回答這種主張，這樣說着：

「這是極端不正確的。頡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之下，前者消滅了，後者殘留着」。（伊里奇對布哈林的過渡期經濟學的評註）

矛盾的主導方面之意義

七　矛盾之主導的方面的意義

在確定了過程之內的矛盾，過程之對立的諸方面之不可分的聯結以後，必須去發見這個矛盾之主導的方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摘出在商品的價值及使用價值那種對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聯結中，價值具有主導的作用；指摘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生產力具有主導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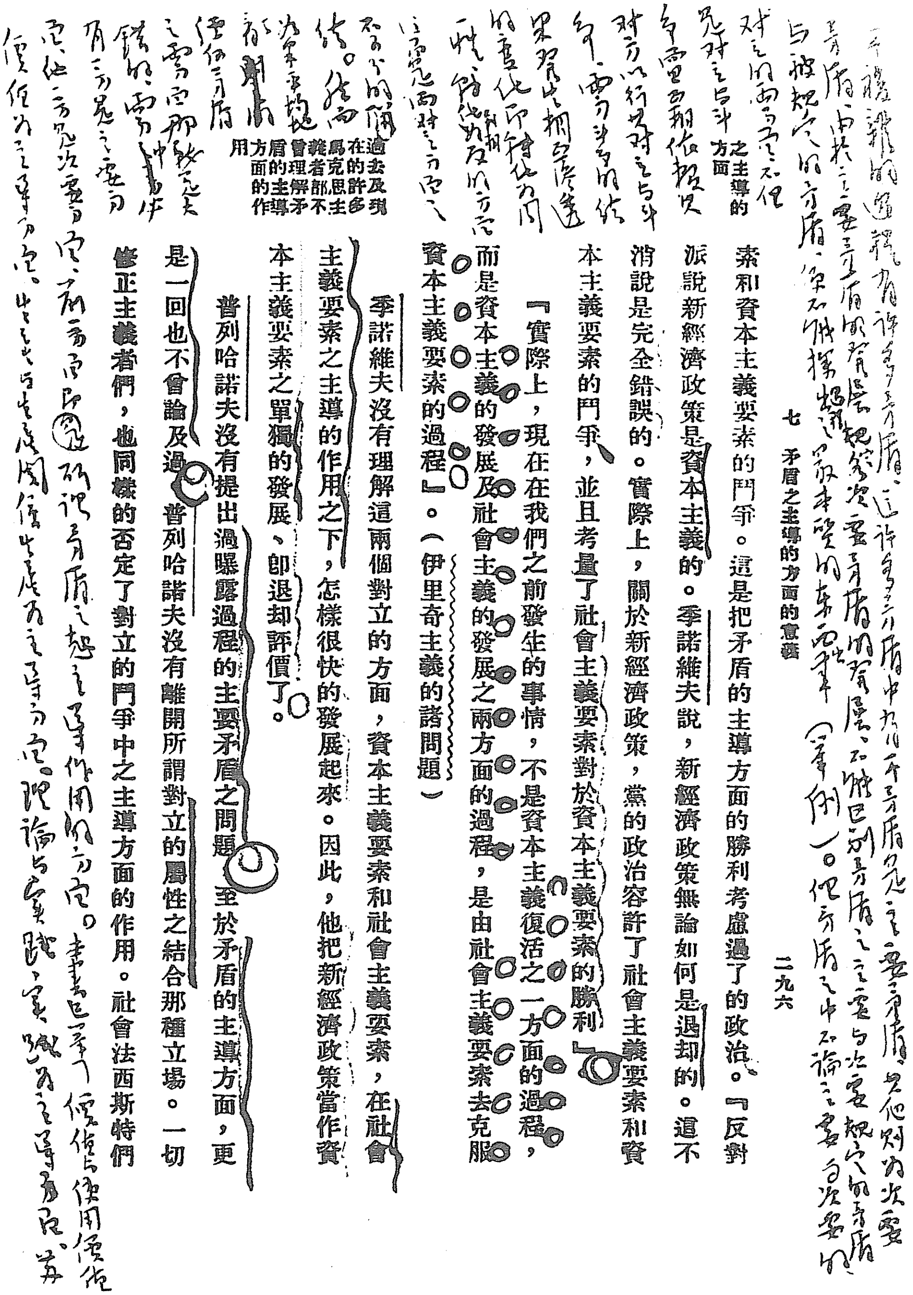
唯物辯證法對於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在兩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認實踐到底是這個矛盾的主導方面爲出發點，暴露矛盾的主導方面的能力，是黨的政治及戰術的基礎。

新經濟政策中矛盾

在轉向新經濟政策之時，黨把右翼之主導的作用放在面前，容許了社會主義要

第三章　辯證法的根本法則　二九五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一个複雜的過程有許多矛盾，這許多矛盾中只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則為次要矛盾，由於主要矛盾的發展，規定次要矛盾的發展，不能區別矛盾之主要与次要，把它們的矛盾[illegible]与被把它們的矛盾，便不能掌握過程之最本質的東西（事例）。但矛盾之中，不論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与斗争，而且相依賴，只对方以存在对立与斗争。而另一方面的依果發生相互依从達的東化即轉化為同一性。[illegible]的方面注意兩對立之方面、不同的關係。矛盾[illegible]平等地[illegible]便矛盾之主要方面[illegible]錯的，而只[illegible]有二方是主要方面，他方是次要方面，而所謂矛盾之起主導作用的方面。書[illegible]便作与使用便作為主導方面，[illegible]理論与實踐，實踐為主導方面，[illegible]

二九六

七　矛盾之主導的方面的意義

素和資本主義要素的鬥爭。這是把矛盾的主導方面的勝利考慮過了的政治。「反對派說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季諾維夫說，新經濟政策無論如何是退却的。這不消說是完全錯誤的。實際上，關於新經濟政策，黨的政治容許了社會主義要素和資本主義要素的鬥爭，並且考量了社會主義要素對於資本主義要素的勝利

（矛盾之主導的方面）

「實際上，現在在我們之前發生的事情，不是資本主義復活之一方面的過程，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及社會主義的發展之兩方面的過程，是由社會主義要素去克服資本主義要素的過程」。（伊里奇主義的諸問題）

（過去及現在的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部不曾理解矛盾的主導方面的作用）

季諾維夫沒有理解這兩個對立的方面，資本主義要素和社會主義要素，在社會主義要素之主導的作用之下，怎樣很快的發展起來。因此，他把新經濟政策當作資本主義要素之單獨的發展，卽退却評價了。

普列哈諾夫沒有提出過曝露過程的主要矛盾之問題，至於矛盾的主導方面，更是一回也不會論及過。普列哈諾夫沒有離開所謂對立的屬性之結合那種立場。一切修正主義者們，也同樣的否定了對立的鬥爭中之主導方面的作用。社會法西斯特們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的对抗，〔取〕冲突撞击的形式；个人之间的打架、谋害，也属于这一类。许多矛盾是不发展成为对抗形势的：共产党内，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文化领域中，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经济领域中，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劳心与劳力的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矛盾；阶级关系中，工农的矛盾；社会主义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自然界中，

着：“这是极端不正确的。颉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之下，前者消灭了，后者残留着。”[1]（伊里奇对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的评注）

---

[1] 参见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2页。

生与死、正与负、遗传与变异、吸力与斥力、寒与温、海与陆。凡没有及尚未达到爆裂的条件下，一切矛盾都没有对抗。矛盾解决的方法与对抗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是矛盾的特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特性，应该分别认〔识〕的问题。

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等等。

七　矛盾之主导的方面的意义

在确定了过程之内的矛盾，过程之对立的诸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以后，必须去发现这个矛盾之主导的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摘出

在商品的价值及使用价值那种对立的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中，价值具有主导的作用；指摘出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具有主导的作用。

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两者的矛盾上去究明，以承认实践到底是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为出发点

……

季诺维夫[1]没有理解这两个对立的方面，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在社会主义要素之主导的作用之下，怎样很快的发展起来。因此，他把新经济政策当作资本主义要素之单独的发展、即退却评价了。

……德波林主义者们，在任何的论文中，一点也没有述及应当暴露主导的对立之必要。他们不但没有把对立统一之法则的这一方面作出定式，并且无视了这一方面；这在他们的全体著作中，明白的表现出来。至于卢波尔[2]，则以为理论决定实践，实践决定理论。他没有阐明实践之主导的作用，以为两者单只存有交互作用。德波林把新经济政策只当作资本主义要素和社会主义要素的斗争去下定义，并没有阐明社会主义关系

---

[1] 季诺维夫（1883—1936），在其他处又译季诺维埃夫，现译季诺维也夫。曾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主席等职。

[2] 卢波尔（1896—1943），在其他处又译鲁波尔。苏联哲学家。

> 之主导的作用，也没有指摘新经济政策向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前进的事实。

一个复杂的过程有许多矛盾，这许多矛盾中，有一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其他则为次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的发展规定各次要矛盾的发展，不能区别矛盾之主要与次要、规定的矛盾与被规定的矛盾，便不能探出过程之最本质的东西出来（举例）。但矛盾之中，不论主要与次要的，对立的两方面，不但是对立与斗争，而且互相依赖其对方，以行其对立与斗争。两方斗争的结果，发生相互渗透的变化，即转化为同一性，转化到相反的方面，这即是两对立方面之不可分的联结。然而，如果平均地去看任何矛盾之两方面，那就是大错的。两方中必有一方是主要方面，他一方是次要方面，前一方面即所谓矛盾之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本书已举了价值与使用价值，价值为主导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为主导方面；理论与实践，实践为主导方面；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主导方面等四个例子，都证明主导方面对于他方有决定的作用。不是单纯的互相结合，如普列哈诺夫的错误说法；也不是互相决定即交互作用，如卢波尔的说法；而是一方起着主导的与决定的作用。究竟哪一方是主导的呢？这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方面，封建势力是次要方面。然在革命前的俄国与现在的日本，封建势力还是主导方面，资本主义不过占次要地位。在中国社会，主导势力属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他们的作用决定一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定了各种

的变动。然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大革命猛烈发展中，南方革命势力与北洋军阀对抗中，南方势力由次要地位转变到了主导地位，北洋势力作了相反的转变。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影响到中国革命之前途。无产阶级要在政治上、物质上都居于主导地位，只有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工农小资产阶级多数觉悟与组织起来的话，那末，革命之决定的主导的作用，就属于无产阶级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因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广大的与坚固的建立起来，加上国际的因素（苏联、日本民众、其他和平国家），就有造成优于日本方面之势。在农民与无产阶级之矛盾中，无产阶级是主导。在产业工人与手工工人的矛盾中，产业工人是主导。在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的矛盾中，熟练工人是主导。在城市与乡村的矛盾中，城市是主导。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经济基础是主导。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矛盾中，感性是主导。在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的矛盾中，主力红军是主导。在进攻战术与防御战术的矛盾中，进攻是主导。在战略与战术的矛盾中，战略是主导。运动战与阵地战的矛盾中，运动战〔是〕主导。各兵种中，部〈步〉兵是主导。劳心劳力的矛盾中，劳力是主导。凭谁决定？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

八　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的运动

……

研究的原则如此

伊里奇接着说："这正是辩证法的一般的叙述方法或研究方法。"[1]（《伊里奇文集》第十二卷）发现过程之最单纯的最根本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中，暴露主要矛盾；探求主要矛盾的发展、斗争及以主要矛盾为基础而出现的全体矛盾、充满了矛盾的方面、发展的倾向——过程之自始至终的发展；探求发展中的过程各阶段的质的变化，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的运动之相对的特殊性；充满了矛盾的各方面之相互联结及相互推移——这是必须的[2]研究任何过程的路程。[第293～299页]

九　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

……

同中国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中国同某些和平国家之和平外交也是相对的，苏联同

永久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随时随地，一种形态转变为他种形态；一切过程，都有始与终。一切过程，转化为其自身的对立物。任何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变为他种过程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伊里奇说了这斗争的绝对性及统一的相对性，并且作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各国之共居及同盟条约也是相对的，党内的一致亦然，一切过程之一致皆然。

思想斗争所以是经常的方法。

两例甚好。

对立的同一性、合致、统一、常住性，被包含于对〔立〕的斗争中，不过是对立的斗争的一动因。静止被包含于运动之中，为运动之一动因。认识同一性、常住性、静止性是辨别斗争或运动的条件，

出极明确的定式。他说：“对立的统一（合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除的对立之斗争，是绝对的，发展、运动是绝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

在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之中，普罗列达里亚与那包含农村布尔乔亚在内的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农奴的关系。这种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村布尔乔亚之活动的合致以及两者之利害的同一性，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把同一性作为其动因而包含着。在法国大革命时，未发达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的利害，彼此合致，形成了统一、同一性。但是，这种统一，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这种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久就出现于表面，暴露了普罗列达里亚及布尔乔亚间的阶级斗争之绝对性及不联合性。两者的这种

不统一，不合致[2]

同一性，不过是包含于两者之绝对的斗争中的一个动因。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原译《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又译《论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2] 这是毛泽东在行间的批语。

是必要的；然而，他是暂时的、相对的，并且即是斗争、运动之一动因。

一切过程矛盾的运动，同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是任何过程如此。但因矛盾性质每个过程不同，内部构造每〔个〕过程不同，这种绝对性、统一性的表现方法因而各异，这是要明白的。

承认矛盾引起运动是对的，但是不够的，还须明了矛盾在何种状态引起运动。矛盾在统一状态虽然是运

客观的现实之一切过程，也和这相同，只是在各个过程上，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与统一，各以其独特的方法显现，由过程的质及其内的构造所规定。

马=伊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不同之点，在于理解对立的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统一的相对性。社会民主党的任何一个理论家，考茨基也好，普列哈诺夫也好，虽然他们反对伯伦斯泰因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修正，承认矛盾引起运动，可是他们毕竟没有认知统一物的分裂引起运动，没有认知对立的斗争的绝对性及其统一的相

动，但那是运动之特殊状态，相绝〈对〉状态，普通叫做静止、常住、不动、死、止、停顿、僵局、相持、和平、和气，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必须承认运动之一般状态，即统一物的分裂，斗争、冲突、动、无常、生、行、活跃、战争、相争，这是绝对的。同一、统一、静、死、和平等相对的矛盾状态，包含于绝对的矛盾状态之中。不明此理，就是形而上学、

对性。考茨基所以只在形式上承认辩证法，而不曾理解辩证法，那是什么意味呢？那是因为：考茨基仅仅[1]主张矛盾引起运动，是革命的形而上学；事实上，他拒绝了辩证法。

---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机械论，事实上拒绝了辩证法。

和解、妥协、调和是可以有的，〔在〕过程发展〔的〕一定状态必是〈是必〉要的。停战、媾和、终止罢一〈工〉、临时的统一战线、某些合作，是阶级斗争中有过的，会有的，但不是总战术。不能和解与妥协，最后还须用革命解决矛盾，则是总战术。

列宁党也有过和资产阶级合作的时期，提出分进合击的口

现代社会法西斯特[1]们的政治上的总战术，都以对立的和解为基础。他们弃去马克思所说阶级斗争不能和解的命题，而宣传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之利害的调和，两个阶级的妥协，援助资本家的产业合理化，援助民族布尔乔亚之夺取市场的斗争，诱引普罗列达里亚去参加布尔乔亚的国家。

多数派理解对立的斗争之绝对性，及其统一同一性的相对性；少数派却高唱统一之永久化的理论；这两种不同的主张，是两者在阶级斗争上种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之理论的基础。

多数派对于自由主义布尔乔亚的战术，在赞姆斯特瓦选举战时代的“分开前进，共同攻击！”的口号中，表现了出来。在一定阶段上的、与一定形态中的自由主义布尔乔亚的这种共

---

[1] 法西斯特，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者。

号。中国党同国民党合作，原则上也是分进合击，不过表现的方法不同。分进是阶级与党的政治独立性，合击是统一战线。

同动作，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战术之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动因。少数派对于这种相对的动因，附与绝对的意义，以之为自己的全部战术的基础；其结果，少数派转入了布尔乔亚的奴仆的任务。一九一七年，以普列哈诺夫为首领的少数
在另一定阶段
派，支持了取得胜利的布尔乔亚，宣传利害的调和，
上与另一定形态中的资产阶级共同动作　陈独
高唱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妨阻资本主义强
秀主义高唱不要违背国民革命对于妨阻国民党强
化的一切，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却倾注全
化的一切　特别对于土地斗争
力加以反对。十月革命以后，他们直接支持白党
现在他们直接支持
了。苏联中资本主义要素的驱逐，使得少数派和
日本侵略[1]
妨害革命的布尔乔亚政党缔结同盟；贯通全线的广泛的社会主义的进攻，使得少数派去援助那准备干涉苏联的国际布尔乔亚。

这两句是说的陈独秀主义

在主张对立的统一之时，而不理解斗争的绝对性，必然不可避免的引到对立物的和解。对立物的和解论，是右翼派的立场之特征。右翼派，抛弃马克思=伊里奇所说阶级斗争是不和解的那

---

[1] 以此种形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在行间的批语，下同。

命题，而建立所谓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主张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被取去而移至外部的斗争场中——世界市场之中。在苏联中，他们建立了所谓豪农向着社会主义和平的成长之理论。他们以阶级斗争之自然的消灭，和平的死灭之理论，去代替伊里奇所说阶级只有依著激烈的社会革命才能消灭的理论。右翼派忘记农民层内部的矛盾，在他们看来，农民是涂上了灰色的集合体。他们不曾注意：我们和农民的同盟，是把普罗列达里亚和布尔乔亚不能相容的利害考虑过了的同盟，因而是和农民之资本主义要素相斗争的同盟。“没有辩证法的理论家，烦琐哲学的理论家布哈林”，不理解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学说。

辩证法的本质是矛盾斗争的问题，烦琐哲学即形而上学　陈独秀同样不理解。

是把无产阶级和富农不能相容的利害考虑过了的同盟，即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亦然，何况十月后的苏联。

对立的和解论，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没有发现从一种状态到他种状态的出路。

对

辩证法的本质却在此

对立的和解论，没有注意新事物的发生，没有注意新现象、新过程的前提、可能性、条件及其发生，乃是以一定过程的发展为基础而作出的。这种理论不注意一定过程之矛盾的发展，不考察一定状态怎样转变为其他状态。……

所谓以一定过程之发展为基础，即是过程由一种状态转变到他种状态，即是矛盾的发展，即所谓飞跃、突

变。以此为基础，乃作出新过程的前提、可能性、条件及其发生。

对立的和解之见地，变成了德波林一派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所加入的少数派的=观念论的修正之基础。……在他们的任何著作中，对于对立的和解论从没有加过批判。反之毋宁说他们简直
对
是从这样理论出发。德波林不在对立的斗争中而在对立的同一性中，去发现辩证法的本质；……德波林的特征，在于不理解伊里奇的思想——伊里奇所说对立的同一性不过是充满了矛盾的对立的统一中之一动因。[第 303～308 页]

对立的统一性不是本质，对立的斗争〔是〕。

一〇　均衡论

以为对立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相对的，而所谓对立是外的对立，体系与体〔系〕间的对立；

……在布哈林看来，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译为现代力学的言词，是必要的。布哈林忠实于自己所提起的问题，认为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引起运动，实际是两个反拨的力之冲突，外部之力互相冲突，暂时形成可动的均衡，这均衡以后被扰乱，再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均衡。……布哈林这样写着：一切事物是某种总体的东西，由互

体系内部由互相联结的一群要素所组成，体系中各要素之间也有矛盾，但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外的矛盾，起着对于内部矛盾的决定作用。

相联结的一群要素所组成，即成为某种体系。一切这样的“体系”，和那构成其本身的环境的其他体系，互相结合。环境和体系互相矛盾。这种体系和环境的矛盾，在布哈林说来，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布哈林学习斯宾塞[1]、谢林格[2]、波格达洛夫。

布哈林所乱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均衡论，并不是新的东西。这种均衡论，在布尔乔亚的社会学及经济学上，广泛的一般的被应用着。布尔乔亚的哲学者及社会学者的斯宾塞，在这种均衡论之上，构筑了他的机械论的进化论。……在斯宾塞之前，已直接反对黑格尔及马克思之辩证法的谢林格，这样说过——

“在反对的方向中互相抗争的力之对立，也是自然及其发现体的一切作用的根本形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严格的批判了这种见解。把均衡作成了极完全的定式之人，是波格达诺夫。波格达诺夫在布哈林以前，就把辩证法翻译为“力学的言词”了。……波格达诺夫把

---

[1]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宣扬不可知论和庸俗进化论。主要著作有《社会静力学》《第一原理》等。

[2] 谢林格（1775—1854），现译谢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

辩证法定义为："由对立的力之斗争而显现的组织过程。"在他看来，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其后，这个均衡为两个对立的力之斗争所搅乱，然后再在新的基础之上恢复。波格达诺夫所认为根本的东西，规定的东西，是制约内的矛盾之外物。他以为，主要矛盾是环境和体系间的矛盾。这样，我们看出布哈林之大智的源泉，就是布尔乔亚的社会学，和他受过强烈影响的观念论者、折衷主义者波格达诺夫的哲学。

运动从没有任何矛盾的均衡发生。

问题：为什么中国与日本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均衡论在一切有害的团体中受非常的欢迎，它成为他们的理论的见解之方法论的基础。……即一般思想原理。（经济评论，一九二七年第六号，第二一页）〔第310—320页〕

"在由相互间必要不可缺少的一联环子所组成的全部体系中，具有决定的意义的，是最弱的环。例如，铁对于社会经济中的一切部门都是必要的，如果铁的生产低降至标准以下，那末，只好停止一切部门，专事采掘铁量到够用的程度，除此以外是不可能的。"（波格达诺夫《一般组织学》二七四页）

除此以外不可能吗？恰好可能是另外一面。不是扯高补低，而是克服落后，把低、落后提到先进的水平。不是先进向落后看齐，而是落后赶上前去。履与足矛盾时，削足适

均衡论的一切党徒，一切机械论者，都宣传补救弱点，孔特拉捷夫仿效布哈林的经济学者的摘

履，正是布哈林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吗？不可能的。补救弱点是可能的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谓补苴罅漏[2]的办法，结局将使大局溃败。这不是扩大矛盾去解决矛盾，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堵住矛盾发展，取得内部的安定，以求得所谓平衡，结果是无济于事的，这是破落户救穷的办法。从构成外部平衡来求得内

要[1]，重复着相同的口号，他在财政人民委员会的廓清会中说：

“如果没有砖，房子就不能建筑，在这一点上，我和布哈林同意，是的，应当补救弱点。在我看来，除此以外，再没有方法。”

从均衡论从补救弱点的思想，生出一切右翼机会主义的问题。例如说，在建筑材料的生产比较其他生产部门落后时，不去克服这种落后的状态，却以为应当减低资本的建设。

---

[1] 《经济学者的摘要》，布哈林著，原载苏联《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现译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为迎接新的经济年度而作》（《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99页）。

[2] 参见韩愈《进学解》。原文有“补苴罅漏，张皇幽眇”之句。

部平衡，这是布哈林的根本方法。

依靠斗争，依靠社会主义农业与基于分散性而自由〔倾〕向资本主义的农业之间的斗争，来克服农业分散性（这个同社会主义经济不相容，而有利于资本主义根苗的生长）〔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最弱的环，是小商品农业的分散性，均衡论的党徒们，认为这个矛盾的克服，不是由于把农业的发展引上大产业的水准一事——这要靠把农业转移为社会主义的形态才有可能——所能做到；反之，他们以为要由于缩小产业的发展速度才能做到。均衡论的党徒们，以为上述矛盾的解决，其可能性在于保持这两个对立的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大产业和小商品农业，在于利用这两个方面之机械的相互关系去补救弱的方面，而在两者之间设置均衡。[第315～316页]

很清楚

过程外的矛盾与过程之内的矛盾，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但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他须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

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定外的矛盾的作用、即某种过程对于其他过程的作用，反之，毋宁说是从现实的一切过程之不可分的联结那种观念出发，而要求认识过程之相互的作用、过程之相互的影响及其相互的渗透。马克思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其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确定对立的同一性，认识过程之自己运动的源泉。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

过程之发展。他不是主要与决定的东西，主要与决定的矛盾是在过程之内部。

例

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马克思和伊里奇的辩证法，不否认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但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在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地形、动植物、天然富源，在长期间内没有变化，而社会关系却变化了，即封建制度变为资本主义了。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内部的矛盾，给予决定的影响于社会与自然的矛盾，即所谓人定胜天。从有劳动工具之产生以来，就是如此的。此处举例是进步社会之事。

在社会构成的发展中，譬如说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辩证法所看作主要的东西、决定的东西的，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社会和自然的矛盾，不消说也作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是直接起作用，而是通过资本主义之主要矛盾的发展才起作用，地理环境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时，社会依其内的规律性，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变化地理环境。

“物必先腐也，然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之”。[1]

……国际资本企图实行要粉碎苏联之绝望的尝试。这个尝试成功吗？或终于不成功吗？——其程度，完全系于苏联的强度如何。国际资本依其内的矛盾而发展。这些矛盾怎样急剧的激化起

---

[1] 参见苏轼《范增论》。原文是：“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

“非战之罪，乃天亡我”[1]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帝国主义吸引与国民罪〈党〉变，对于革命说当然是原因。外的力量，须通过内的规〔律〕性（机会主义

这是主要的

来，在某种程度上，也依存于苏联。苏联社会主义的成长，使得资本主义体系之内部的矛盾激化起来，因而促进普罗列达里亚的世界革命。理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对于社会主义之终极的胜利，具有绝大意义。

这样，我们看到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内的规律性的发展，才在过程的发展之上，曲折的发生影响。我们只有具体的分析两个互相作用的过程，才能把其影响的性质、程度及力量，暴露出来。

具体分析两个过程，才能把互相作用的性质、程度、力量发现出来，各过程的情况是互不相同的。[2]

---

[1] 参见《史记·项羽本纪》。原文有“天亡我，非战之罪也”的话。

[2] 这是毛泽东对上面一段话的批语。

等）才能曲折的即间接的发生影响。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1]。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若能克服弱点，自己巩固，则谁也不能破坏。红军至今没有被破坏，就因为此。中央苏区、鄂予〈豫〉皖苏区被破坏，主要的〔是〕内的原因。西路军亦然。“内省不

---

[1] 参见《吕氏春秋·尽数》。原文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后来唐朝马总撰的《意林》等都引“不蝼”作“不蠹”。

疚，失何忧何惧”。[1]九一八之不能抵御，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与巩固，不决定于日本。国民党之不能照旧不变的存在，原于其政策与组成之弱点。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原于其内在的矛盾。阶级与政党之兴亡，原于其自身之条件。人之健病、生死，原于其自身条件。机械力推动物体运动，通过

---

[1] 参见《论语·颜渊》。原文是：“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物体自身的可动性。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

均衡论，忽视了暴露过程之具体的内容及
“自己运动的源泉”之必要，因此，在一方面，
对于哲学问题抽象的唯理论那样去处理，从所
非具体的
谓“一般”的见地去处理，因而到达于空洞的
非特殊的无个性的
图式主义；在他方面，到达于忽视根本的东西及
形式主义　近视病与琐屑病
具体的东西之经验论。这种二重性，也就是右翼
派的特征。他们对苏维埃经济的问题，一方面，
抽象的去处理；不分析其发展之具体的条件、局
面及阶段；无力暴露那新转化向着新局面出现的
条件及可能性是怎样造成的；不注意新的发展阶
段从新提出[1]问题，从新解决其矛盾。他方面，
这是唯理论
们从补救弱点的均衡设置论出发，因而到达于拜
这是经验论
金主义。例如，他们的困难打开策——在社会主
义的大产业及小商品农业之间从速设置均衡
——，当一九二八年——一九二九年时，这只有
基于个人农业的成长才是可能的。由此，生出了

试举具体处理之例

---

[1] 毛泽东在此处删掉了一个“了”字。

使提供大部分谷物商品的个人经济（主要的是豪农经济）发展的政策，而回避了那打开困难的根
援助富农发展的政策
本的决定的路线——农民经济之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农业形态。

当时的阶段已经存在了这种转变的条件，造出了可能性。

均衡论，不承认过程的发展是始终都依存于在发展中的矛盾而进行。从这种理论的见地说来，所谓均衡乃是过程中没有矛盾的瞬间之东西，因而过程的运动，在矛盾发现的瞬间以前，只有由于外的原因才有可能。

世上无此过程，只是机械论者的幻想——资产阶级的幻想，一面自慰，一面迷惑劳动群众。

德波林一派对于均衡论加以时代落后的批判，不能给与这种理论以决定的打击。德波林派的那种批判是极一般的，极抽象的，他们不能抓住均衡论的最主要点——均衡论不承认过程是自始至终依着矛盾，依着统一物之分裂而发展，即均衡论使对立和解之点——，去加以批判。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对立之统一的法则的理解，是与均衡论合体的。他们也和均衡论同样，认为矛盾不是从过程发生的瞬间就在过程中固有的，而是在过程发展为某阶段上才出现的——这样，他们作出了他们自己所恐怖的结论，即所谓过程在

一针见血之言

德波林也不承认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矛盾发生的瞬间以前，由于外的原因而发展的结论。而且，和均衡论的党徒们同样，他们也支持着社会民主主义的对立和解的理论。极端和极端，是相通的。

左的与右的相通，因为都离开过程之正确的了解，到达于不顾过程内容，不分析具体的阶段、条件、可能性等抽象的一般的空洞见解。因此，他们两极端就会于一点。

一一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从上面所述看来，当作通过质与量的发展而进行的、基于对立的运动之飞跃的转变的过程看的辩证法的过程，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现实以及我们认识的发展之辩证法的过程，不止是量到质及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和对立之统一的法则。与以上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相并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建立了辩证法的第三个根本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基础。

所谓现实与认识发展之辩证法过程，就是质量互变、矛盾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

“私有，和社会的集团的所有不同，只存立于劳动手段及外的劳动条件属于各个人的场合。劳动者私有生产手段，是小生产的基础；小生产成为社会的生产及劳动者自由的个性之发展的必

多数劳动者私有——少数资本家私有——社会公有的私有

否定之否定的范例

要条件……

……

恩格斯之言

三段法是对的

这样说是不对的。甚么也乱嵌进去，这是外的连〈联〉结，表面现象，图式主义，不是内的联结与本质发展的东西。否定之否定律是论内的联结的理论。

赫格尔也犯了图式主义。

……恩格斯说：否定之否定，“实际上是极单纯的随时随地进行着的程序。这个程序，只要把旧观念论哲学掩蔽着它的秘密的破衣取去，就是三岁的儿童也能理解”[1]。……形而上学者们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当作图式的“三段法”描写出来，而说马克思主义者们无理的把具体的现实之发展嵌入三段法之中。但是，这里不能不声明一句，黑格尔自身，特别在所著《法律哲学》[2]之中给与了一个根据：即不把“三段法”的性质解释为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一个方面，而是可以把它解释为发展法则本身。例如，黑格尔把犯罪当作法律的否定去观察，把刑罚当作犯罪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去观察。在这里，实际上，三段法成为把现实的现象嵌入于其中的外的图式。……

横的联结与纵的连〈联〉结。横的联结是

马克思及恩格斯在说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时所力说了的，不是这个法则之“三段法的性质”，而只是互相发展并且互相推移的现象之内

---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页)

[2] 现译名《法哲学原理》。

在的联结。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倾向之分析，上面已经引用过了；在那引用文中，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这种本质，被力说着。

矛盾的两方面在发展中相互依赖与相互斗争的关系。纵的联结是过程经过飞跃向前发展的关系。两者都是内的联结。

第二个否定的结果，再归于最初的东西，然而性质与数量变了。谷物等〔种〕类因变化缓慢，不容〔易〕看见质变，但看〔见〕质变的事物或过程是极多的。举例。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麦粒为例。落在地中的麦粒，置于适当的条件之下，发出芽来。“麦粒被消灭，被否定，而从麦粒生出来的植物，出现为麦粒的否定。究竟，这种植物之正常的生涯是怎样的呢？它成长，开花，结实，最后再生出麦粒。而且麦粒成熟时，麦茎枯死，轮流的被否定。当作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再获得最初的麦粒，然而这不是一个麦粒，而是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的麦粒”。

恩格斯并且事先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单只是发展之量的方面。“谷物的种类仅是极缓慢的变化。所以，今日的大麦和一百年前的大麦，几乎完全一样。但是，试考察粘质的观赏植物；例如牡丹或兰花罢。如果我们把种子及由种子生出的植物加以人工，这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不但得到更多量的种子，又得到生出更美丽的花的、质的方面被改良了的种子；并且，这种过程的每

不是单纯的纯量的循环，每次都有质的变化。

次的反复，每次的新的否定之否定，这个改良是被促进了”[1]。[第324～327页]

民粹派的密海洛夫斯基[2]，以自己的方式去解释恩格斯的麦粒之例。他说：茎否定粒，花否定茎，果实否定花。这样，三段法在哪里呢？在这里，不只两个否定，而有三个否定。恩格斯恰好像预知这样的“反驳”一样，他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和麦粒的场合同样，这种过程在许多昆虫的场合，譬如蝶的场合，也显现着。蝶由于卵的否定，由卵生出，通过到性的成熟为止的种种变异阶段，交尾，于是再被否定。即，雌蝶完成种属的持续过程而在生下多数的卵时就死灭。

在其他植物及动物的场合中，这种经过不是那样简单的被解决。在其死灭之前，不只一次而是多次的产生种子、卵或幼儿，这种事实在这里与我们没有关系。在这里，只是证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现实的显现于有机界的两个领域中，就够了”[3]。

问题是明显的，否定之否定律是论由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之内的联结。其行程只有两个否定，多数否定说法，如蚕蛹蛾、茎花果、少壮老，等等，是不对的。因为都是同一规律性所发生的现象，虽通过种种变异阶段，依然只是完成一个种属的持续过〔程〕，依

---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5～176页)

[2] 密海洛夫斯基（1842～1904)，现译米海洛夫斯基。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在哲学上倾向实证主义、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的观点。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进步?》《社会科学中的类比方法》等。

[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6页)

然处在同一的规律性中。密海洛夫斯基的错误：不看发展的全生涯，只看量之变异。而重要恰好不在量，而在发展之质的生涯。必须当作新生命的出发点，即新规律性之出发点之一定过程的否定，才是否定之否定律的真义或本质，否则只是空虚概念的游戏。普列哈诺夫在这里是正确的。过程中的阶段有表现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现象中此例甚多。但不是一切

这样，重要的事情不是否定之量，而是发展的全生涯，把其自身的否定当作向新的规律性之转变——否定之否定——，在其自身之中包含着。过程之发展中的现象及阶段，并不是一切都表现为否定之否定。

“花是植物的一机关。并且，当作这样东西看的花之不否定植物，恰如密海洛夫斯基的头之不否定密海洛夫斯基本人一样。但是，果实，正确的说来，受胎了的卵，实际上当作新生命的发展之出发点看，是一定的有机体之否定。恩格斯从那由受胎了的卵生出的植物之发展的开始，到植物把受胎了的卵再现为止，观察植物的生涯”。[1]（普列哈诺夫《史的一元论》）这样，普列哈诺夫把那企图反驳否定之否定的密海洛夫斯基的尝试，加以还击了。密海洛夫斯基不但把三段法偷换为多数的否定，并且把否定变为现象之外的交替。因此，密海洛夫斯基终于不理解辩证法的否定之本质和否定之否定的本质。这否定之否定，正存于通过过程之矛盾的发展而发生新的规律性的问题中。[第327～329页]

---

[1] 参见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原译《史的一元论》）。（《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64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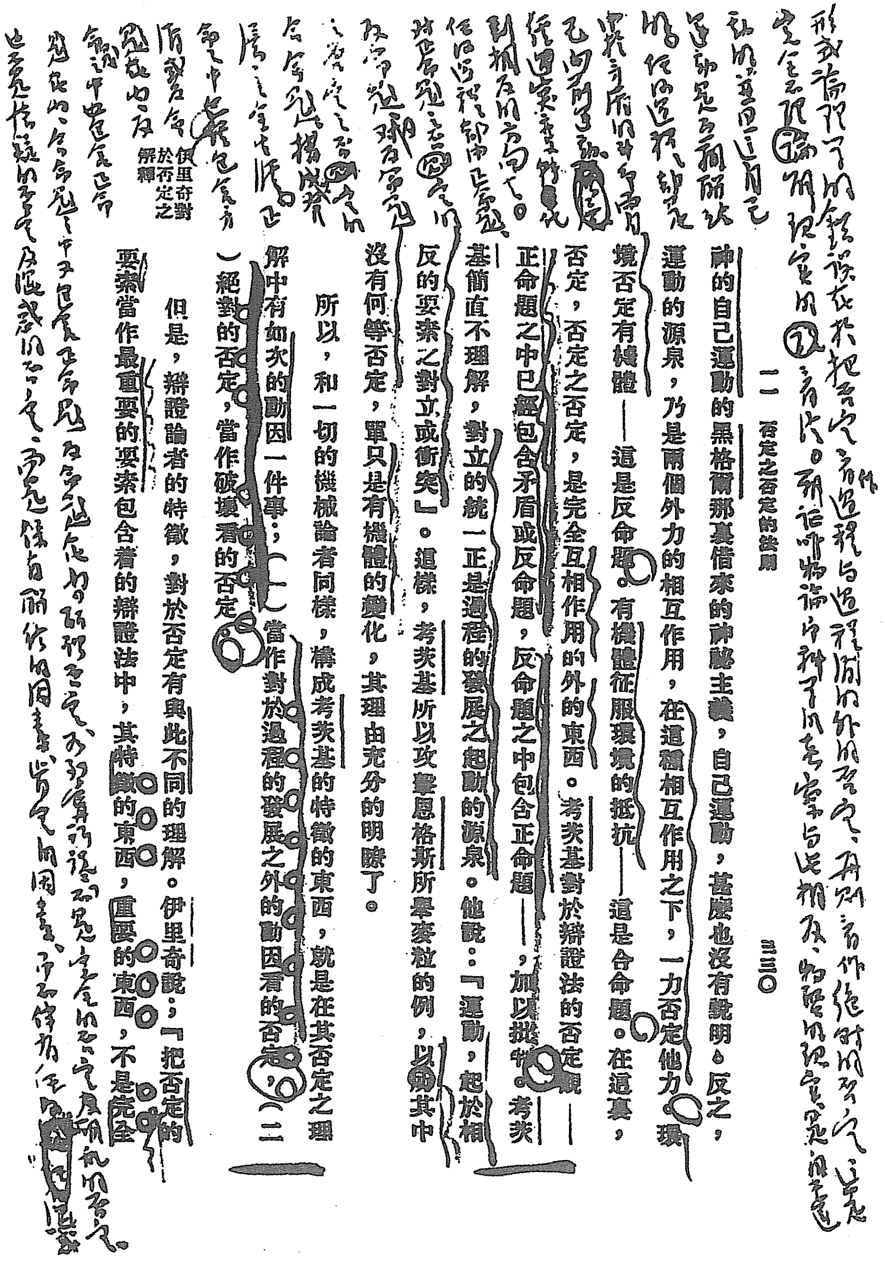
都表现为否定之否定，例如动植物之生涯。

形式论理学[1]的错误在于把否定看作过程与过程间的外的否定，再则看作绝对的否定，这是完全不理解现实的看法。辩证唯物论即科学的考察与此相反，物质的现实是自己运动的，并且这自己运动是互相联结的。任何过程都是由于矛盾的斗争而自己向前运动，经过突变转化到相反的方向去。任何过程都由正命

在形式论理学，所谓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形式论理学把否定看作完全的取消。例如，动物界中某种动物为他种动物所灭亡，这是否定。形而上学的论理学，没有看见过程之内部的矛盾的发展，过程之自己的否定；认为否定性不是发展着的矛盾之内部的起动的动因，而是外的动力。机械论者恰好把这样对于否定之外的理解，作成其方法论的基础。所以，考茨基在所著《唯物史观》之中，攻击基于物质的自己运动之辩证法的否定。他说，在物质之中，没有任何的自己运动。这完全是从那说精神的自己运动的黑格尔那里借来的神秘主义，自己运动，什么也没有说明。反之，运动的源泉，乃是两个外力的相互作用，在这种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环境否定有机体——这是反命题。有机体征服环境的抵抗——这是合命题。在这里，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相互作用的外的东西。考茨基对于辩证法的否定观——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反命题之中包含正命题——，加以批判。考茨基简直不理解，对立的统一正是过程的发展

---

[1] 形式论理学，旧的译法，即形式逻辑学。



二　否定之否定的法則　三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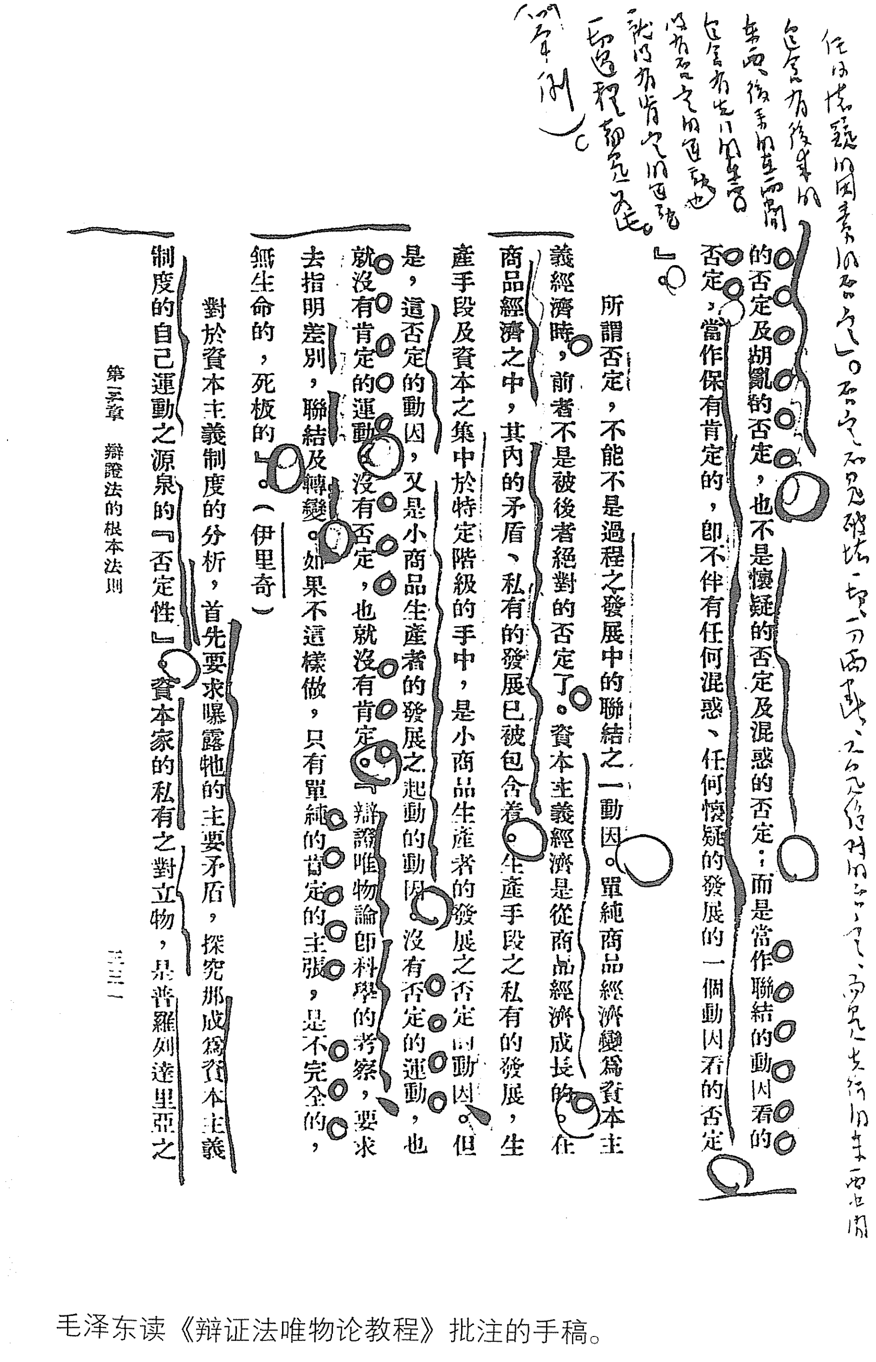
神的自己運動的黑格爾那裏借來的神秘主義，自己運動，甚麼也沒有說明。反之，運動的源泉，乃是兩個外力的相互作用，在這種相互作用之下，一力否定他力，環境否定有機體——這是反命題。有機體征服環境的抵抗——這是合命題。在這裏，否定，否定之否定，是完全互相作用的外的東西。考茨基對於辯證法的否定觀——正命題之中已經包含矛盾或反命題，反命題之中包含正命題——，加以批判。考茨基簡直不理解，對立的統一正是過程的發展之起動的源泉。他說：「運動，起於相反的要素之對立或衝突」。這樣，考茨基所以攻擊恩格斯所舉麥粒的例，以爲其中沒有何等否定，單只是有機體的變化，其理由充分的明瞭了。

所以，和一切的機械論者同樣，構成考茨基的特徵的東西，就是在其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次的動因一件事：（一）當作對於過程的發展之外的動因看的否定，（二）絕對的否定，當作破壞看的否定。

伊里奇對於否定之解釋

但是，辯證論者的特徵，對於否定有與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說：「把否定的要素當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辯證法中，其特徵的東西，重要的東西，不是完全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作为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的两极，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的联

这里为后来的东西，后来的包含前

这里有先行的东西，保存否定的因素也说明肯定的因素一过程都包含之。

（以下举例）。

的否定及胡亂的否定，也不是懷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當作聯結的動因看的否定，當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懷疑的發展的一個動因看的否定』。

所謂否定，不能不是過程之發展中的聯結之一動因。單純商品經濟變爲資本主義經濟時，前者不是被後者絕對的否定了。資本主義經濟是從商品經濟成長的，在商品經濟之中，其內的矛盾、私有的發展已被包含着。生產手段之私有的發展，生產手段及資本之集中於特定階級的手中，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否定的動因。但是，這否定的動因，又是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之起動的動因，沒有否定的運動，也就沒有肯定的運動。沒有否定，也就沒有肯定。『辯證唯物論即科學的考察，要求去指明差別，聯結及轉變。如果不這樣做，只有單純的肯定的主張，是不完全的，無生命的，死板的。（伊里奇）

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首先要求曝露牠的主要矛盾，探究那成爲資本主義制度的自己運動之源泉的『否定性』。資本家的私有之對立物，是普羅列達里亞之

第三章　辯證法的根本法則　　三三一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手稿。

题，对正命题之否定的反命题，及对反命题之否定之否定的合命题，构成其发展之全生涯，正命〔题〕之中已经包含矛盾或反命题在内，反命题之中也包含正命题在内，合命题之中又包含正命题反命题在内。所谓否定，如列宁所说：“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保存联结的因素，肯定的因

之起动的源泉。他说：“运动，起于相反的要素之对立或冲突。”[1]这样，考茨基所以攻击恩格斯所举麦粒的例，其中没有何等否定，单只是有机体的变化，其理由充分的明了了。

所以，和一切的机械论者同样，构成考茨基的特征的东西。就是在其否定之理解中有如此的动因一件事：（一）当作对于过程的发展之外的动因看的否定，（二）绝对的否定，当作破坏看的否定。

但是，辩证论者的特证，对于否定有与此不同的理解。伊里奇说：“把否定的要素当作最重要的要素包含着的辩证法中，其特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不是完全的否定及胡乱的否定，也不是怀疑的否定及混惑的否定；而是当作联结的动因看的否定，当作保有肯定的，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发展的一个动因看的否定。”[2]

---

[1]　参见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分册，第141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4页）

素，即不伴有任何混惑、任何怀疑的因素的否定。”否定不是破坏一切，一刀两断，不是绝对的否定，而是先行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后来的东西，后来的东西中间包含有先行的东西。没有否定的运动，也就没有肯定的运动，一切过程都是如此。(举例)。

得之否定为失，得之出现以失为前提，得之中包含失。资本家之得包含劳动者之失，二者互相结合而运动。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首先要求暴露它的主要矛盾，探究那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己运动之源泉的“否定性”。资本家的私有之对立物，是普罗列达里亚之不保持任何生产手段的私有之事实。但是，这“否定性”和肯定物密切的结合着。这两个对立方面[1]，彼此相互作为对方的前提。资本家的私有，包含其本身的“否定

---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性”、对劳动者之私有的否定；又，反之，劳动者之不保持任何生产手段的私有，以生产手段之集中于资本家的手中为前提。

反面，失之否定为得，失之出现以得为前提，失之中包含得。劳动者之失包含资本家之得，二者互相结合而运动。

伊里奇说：“辩证法的动因，要求指摘否定的东西及肯定的东西之‘统一’，即两者的联结，发见否定的东西中之肯定的东西。由肯定到否定，由否定到包含肯定的‘统一’——没有它，辩证法就变成完全的否定、游戏或怀疑论。”[1]所谓否定，不能不是为表现过程之发展中的联结之特定的否定。

至理名言

“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单纯的说‘否’，或宣布事物不复存在，或随便的把事物取消……在这里，否定的方法，第一，由一定过程的一般性来决定，第二，由那过程的特殊性来决定。所以，我不能不使第二个否定是可能的[2]或成为可能的那样去建立第一个否定。但这事怎能做到呢？这是依从于各个场合之特殊的性质。如果，

至理名言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5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修改。

完全否定，乾坤或几乎息。[1]

我把麦粒磨碎了，或把昆虫踏死，我诚然完成了否定之第一个行为，但第二个行为却成为不可能。因此，对象的各范畴之中，具有着发展由否定造成的、特殊的、其自身所固有的否定的方式”。[2]

否定是过程更向上的发展。

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

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

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

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的麦粒之例中，植物不是麦粒之完全的否定，而是麦粒之更向上的发展。麦粒之单纯的死灭，昆虫之被鸟所破坏，不表现这样的联结，不是辩证法的否定。反之，麦粒的死灭，在植物出生的场合，同时又在一定发展阶段上，被保存于再生产其他麦粒的植物之中。否定同时是肯定，“死灭”同时是保存。辩证法的否定是过程的发展中之一动因，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表现为旧事物的克服，他方面，把旧事物当作附属的动因而保存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之私有制中，小私有当作独立的规律性被克服着，当作资本主义规律性之附属的、“被扬弃了的”形态，被保存着。

辩证法否定是过程发展之动因，这种否定有

---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182页）

[2] 参见《周易·易传，系辞上》。原文是：“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扬弃，即克服旧物事〈事物〉之主要的不适于保存的东西；一方面表现为肯定，即把旧事物中某些还暂时适于生存的东西给以合法的地位而保存起来。正规红军阶段，否定者是游击主义，保存者是作战的游击性、组织的轻快等。

过程之矛盾解决的结果，即一个一定的规律性腹内包含的另一个一定规律性二者间矛盾的解决。即旧规律性倒，新规律

否定不能不把现阶段和过程之发展中的从前阶段的联结表现出来，恰好与此同样，否定之否定不能不是过程的矛盾之解决的结果，即一定的规律性向他一规律性的转变。

性生。

有关系的、亲属性的、因果性的、先行后行、新阶段旧阶段的联结，即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不是不相干的两规律性人工的机械的衔接，不是三段法儿戏，而是向特定方向中的发展。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本质。

在否定之否定中，也不能不力说新阶段和从前阶段的联结、即发展的过程。恩格斯，对于那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归着于现象之外的交替的见解，曾经加以批判。那种见解，是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归着于那构成辩证法的过程之“外部的表面的一方面”（伊里奇）的“三段法”，归着于“三段法”的儿戏——“交错的写上A字又涂灭A字，或关于蔷薇，交错的主张是蔷薇又主张不是蔷薇的儿戏”。

否定之否定表示过程发展的一个循环之终结，另一个循环开始。

在植物的发展中，果实即种子的出生，是植物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但是，种子是植物的发展所生出的，构成植物的一动因，并且是意味着植物发展的终结的动因。植物死灭，种子存留。发展的一个循环就终结。[第329～334页]

第五章　可能性及现实性、偶然性及必然性

三　可能性和现实性

……

条件

新东西之生成的源泉，是根据的运动。可是，这并没有说，种种的条件在这种过程上不发生任何的作用。如前面所述，在发展的全部过程上，条件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不论在新东西的生成之际，或在实在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之际，条件都具有意义，这是不待言的。……〔第450页〕

第六章　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三　普列哈诺夫的形式论理学之批判

……

在人的头发脱落的那种场合，不能说他是秃着，也不能说他是不秃着。在青年的面颊上生须的那种场合，不能说他是白面的青年，也不能说他是有须的男子。在这种场合，“对立物”实际上是一致的。〔第499页〕

?

四　形式论理学与实践

……

理论上——辩证法，实践上——形式论理学，亚斯姆斯[1]这样说。

如果从这种见地说来，伊里奇就变为反对辩证法的“全面性”而拥护形式论理学的规律性及论理性的人了！因为伊里奇，在其革命活动的全生涯中，对于党的各个的环的动摇与踌躇、观照的客观主义、少数派的小布尔乔亚的折衷主义“在这方面在那方面”等等，都斗争了的。〔第505页〕

？

1936，11

1937，4，4[2]

---

[1] 亚斯姆斯，苏联哲学家。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和逻辑》（1924）等。

[2] 这是毛泽东批写在书末空页背面的字。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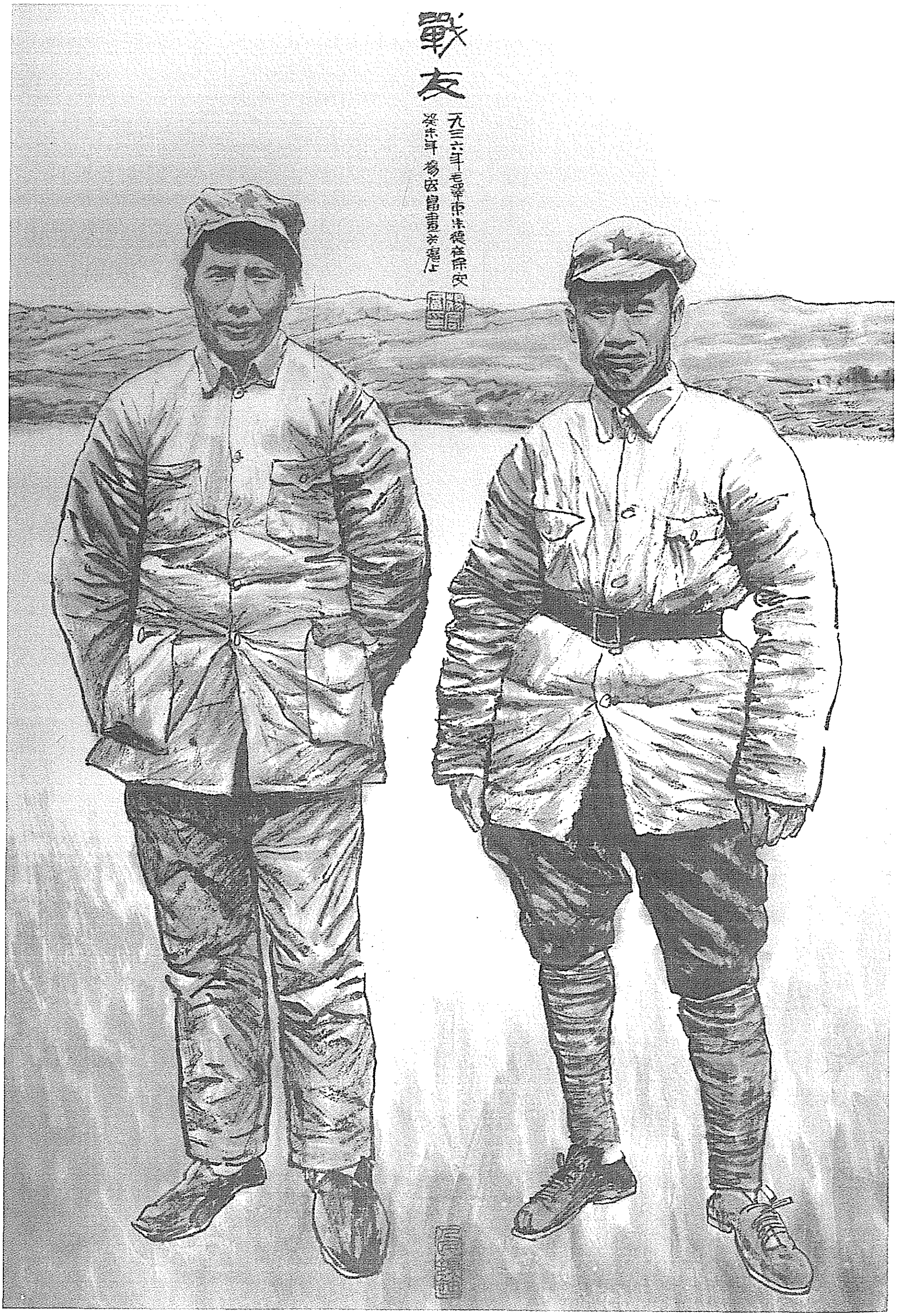
张学良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战，但又谓无法长停，似蒋介石尚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2]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定边、盐池、环县地区。

1936年，毛泽东、朱德在陕北保安。


戰友
一九三六年毛澤東朱德在保安
癸未年 楊啓昌畫於

《战友》（中国画）

给蒋介石的信

（1936年12月1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1]。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

---

[1] 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1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1]。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2]与上海一二八之役[3]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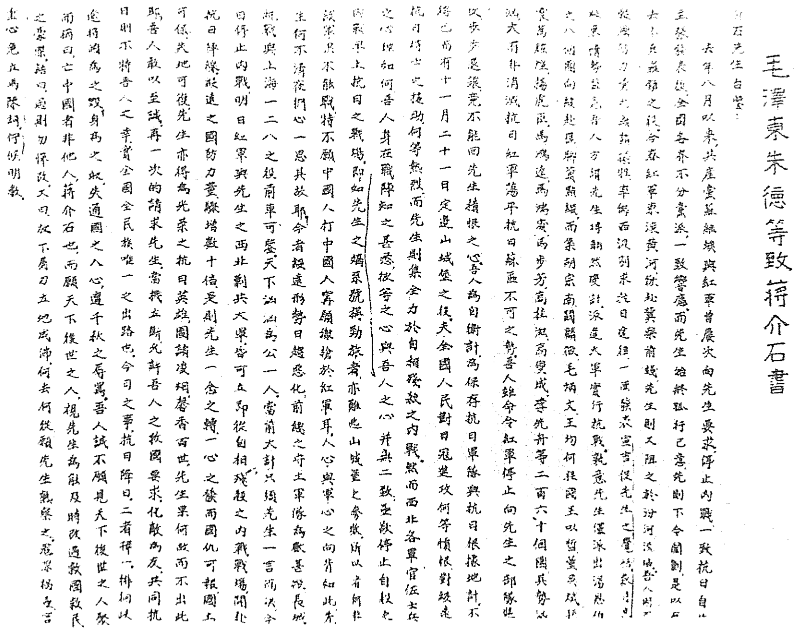
[1] 山城堡之役，指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1个多旅，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2] 长城抗战，指1933年3月驻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3] 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1932年1月28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二十八万人　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毛澤東朱德等致蔣介石書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致函蒋介石，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

（1936年12月1日）

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党派各界各武装队伍及全国人民均鉴：

日伪匪军进攻晋绥的前哨战已经开始，大规模的侵掠战争即将爆发。当此中华民族生死关头，非动员全国兵力人力财力以抗战，则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实行下列处置：

（一）调集大军增援晋绥前线，动员全中国海陆空军准备全国性的抗战。

（二）停止进攻红军，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三）开放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立即释放政治犯及上海各爱国领袖。

（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商讨救国大计。

我们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弃对日妥协政策，停止中日谈判，实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误，坐视傅作义将军等局部抗战而不救，而仍旧专心致力于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与进攻抗日红军，则其结果不但将给民族国家以不能补救的损失，而南京当局亦将自绝于国人。

为了实现全民族的抗战，我们更号召全中国人民不分党派、不

分阶级、不分职业、更亲密的联合起来，督促南京政府实现我们的主张，克服一切困难，自动的组织各种救国团体与武装力量，如救国会、后援会、义勇军、宣传队、救护队、慰劳队、募捐队等，努力扩大救亡阵线，加强抗日力量，援助现在绥远坚决斗争着的英勇将士。抗日救亡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天职，也只有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决心抗战，给日寇以致命的打击。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红军，一年来艰苦奋斗，东进山西，西出宁夏，无非要寻找一条抗日去路，以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然而南京当局总不见谅，一再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当此晋绥危急，全国人民均愿效命疆场，为民族争生存之时，南京当局偏又调动大军向抗日红军进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红军在山城堡消灭胡宗南军一部，实出于不得已的自卫行动，并向对外妥协，对内黩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们认为今日而犹继续内战，实属对民族国家之罪恶行为，实际上不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之使命，而遗民族国家以无穷之祸。

我们现在向全中国人民宣言：全中国主力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现已集中完毕，只要给我们以抗日去路，我们准备立刻开赴晋绥前线，担任一定的抗日战线，并愿受全体抗日军最高统率机关之指挥，以抗击日伪匪军的进攻，为保卫晋绥，保卫华北，保卫中国而血战到底。我们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认我们的要求，希望全国人民拥护与赞助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1936年12月，中央军委主席团组成，毛泽东为军委主席。图为1936年的毛泽东。

致彭德怀电[1]

（1936年12月1日）

朱、张、周已到保安[2]，情形甚好。

你对团结与改进一、二、四方面军的方针及对许多问题的意见，我都同意，很对的。但在某些步骤上，我的意见还宜改得温和一点。两星期前批评国焘一电，昨日整顿纪律一电，原则上完全正确，但在措词上有一二句颇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请留意及之。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于11月30日到保安。

致刘少奇电[1]

（1936年12月2日）

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给冯玉祥[1]的信

（1936年12月5日）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2]犹不悟也。

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悔，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3]，前

---

[1]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 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

[3] 即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致中国国民党书》。

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1]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

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十二月五号

---

[1] 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董任该部第七十三旅旅长。同年12月14日董振堂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1936年董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关于联合抗日救国等问题给杨虎城的信

（1936年12月5日）

虎臣主任总指挥阁下：

侧闻先生发表告民众书，重申十五年前革命大义，快何如之，数月来乞尊处对于敝方多所协助感级〈激〉莫名，从此双方日臻密切，统一战线之基础益固，远大之图基于此矣。蒋介石氏孤行己意，萌城山城堡两役略施教训，半月来欲前又却，垂丧之态可搁〈览〉，银样腊枪头可恨复亦可笑。

张文彬君他适，兹派李涛君来见，幸赐接洽。有数事奉商于阁下者：其一，联合救国之大计，以长安为中心之五六省区宜有一种具体合作计划。此事多仗大力出而斡旋苟利抗日救国，弟方无不乐从。蒋氏徘徊歧路，对外则力求妥协，对内仍继续内战，非举各方团结抗战之力不足迫令其走上抗日救国之途。此救亡大计之宜商酌者一也。复次，敝方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团结巩固士气甚盛。目前方针坚决保卫苏区，有进犯者决消灭之。然部队甚大，给养困难，弹药亦待补充。叨在抗日友军之列，拟向兄处暂借三十万元。除以十万元请兄处代购弹药外，二十万元作为给养被服费。如承兄慨允，请分批拨付，部队骤增，无米难继，不得不向兄阁下作庚癸之呼，阁下交友出于至诚，谅不固拒其请。还期约明年三月，决不

失信。另备轻机关枪一百挺，如兄处需此，敬以奉赠。此款弹急需，仅以奉商者二也。复次，尔后敝军行动方向目前虽尚难确定，然不论东西南北，均与贵军唇齿相关患难与共。在未与南京订立合作以前，无论对日对蒋，均须恳求兄处协助。此项方针一俟确定即以奉告。兄高明，有何见教，密为示及，无任感幸。此双方行动之务求协助者三也。复次，空间通信再不可缓。承允即立实行幸甚，某君另有任务，兹重选一人，携带密码呼号，随李君来尊处。从十二月十五日起，重要机密均经电报交谈，此外甘肤道上抢劫案时出，竟有伤人劫车之事。有由苏区地方游击队因约束不严发生者，敝方深为抱歉。查明属实愿出抚恤赔偿费，一面已下令严禁，期于弊绝风清。有由东山土匪散兵所为者，亦请贵方派队剿办，务期维护交通毫无阻碍。此通信交通之亟宜创设或整理者四也。

上述四事或关抗日大计，或属军需紧急，或系两军行动，或为通信联络，敬以鄙意披沥奉商，务祈审察示覆。朔风加厉，为国珍摄。肃颂

公祺不赘

弟　毛泽东手启

十二月五号

给孙科的信[1]

（1936年12月5日）

今日天下之人莫不属望国民抗日，然国民党中如不战胜其降日派与妥协派则抗日不可能，因此天下之人莫不展望于国民党中之抗日派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向着降日妥协之辈进行坚决之斗争。进行此种斗争，非有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可，非有领袖不可，因此天下之人又莫不属望于哲生先生。

---

[1] 这是毛泽东致孙科信的主要内容。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之子。

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

（1936年12月6日）

（甲）远方[2]可于两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乙）你们第一步相机夺取甘州[3]，第二步夺取肃州并调查肃州至安西道上是否便于行军，计算占领甘、肃两州包括休息补充时间在内共需多少天，并计划西路军全部包括红五军在内，在甘州地区集中训练一二星期，休息体力恢复力气。（丙）我主力在保卫苏区、消灭胡军的任务下暂不西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的主要内容。

[2] 远方，指苏联和共产国际。

[3] 甘州，今张掖。

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

（1936年12月10日）

为纪念宁都暴动五周年，特对五军团全体英勇的指战员，致以无限的敬意，更望在董军团长领导下继续宁暴伟大的精神，坚决配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以中革军委主席团的名义致徐向前、陈昌浩、董振堂、黄超及红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电的主要内容。董振堂、黄超，当时分别任红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

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我们的原则立场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0日）

李宜兄：

（甲）雨苍[1]已动身，删日可抵兄处。

（乙）陈立夫第三次找汉年谈，红军留三万，服从南京，要我方让步。我们复称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

（丙）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

（丁）因上海电台尚未建立，暂时不得不由兄转，今有一要电致汉年，祈赐转为荷。

弟　东　来

蒸申

---

[1] 指叶剑英。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条件等事致潘汉年电

（1936年12月10日）

汉年同志：

齐电悉。

甲、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天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

乙、根本不能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更根本拒绝其侮辱红军之态度。

丙、红军在彼方忠实的与明确的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的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协定，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丁、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止进攻并将军队撤退于苏区以外，静〔候〕谈判之结果。

杨子任

蒸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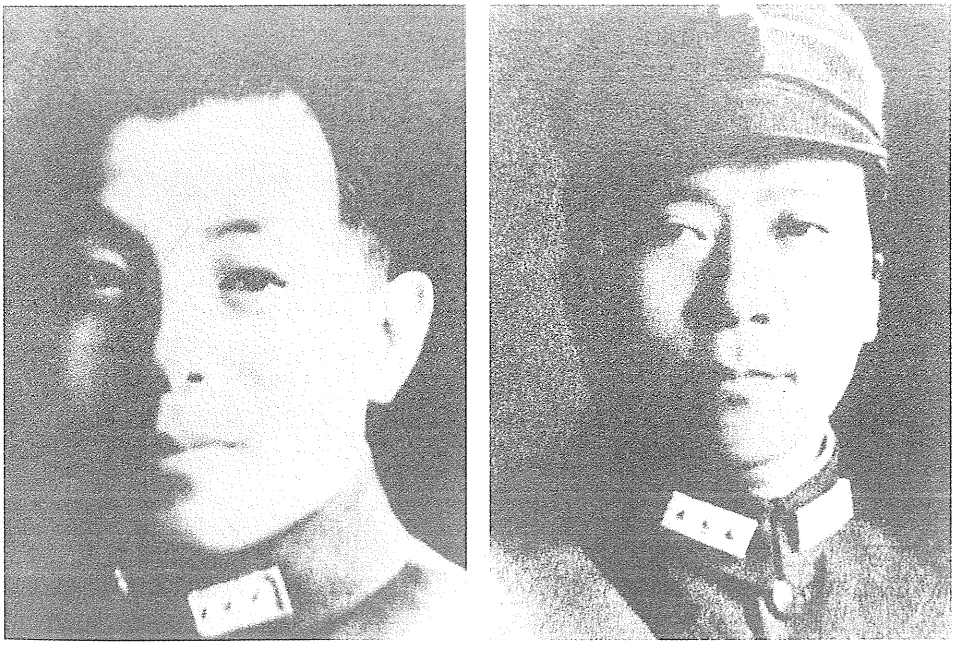
致张学良电[1]

（1936年12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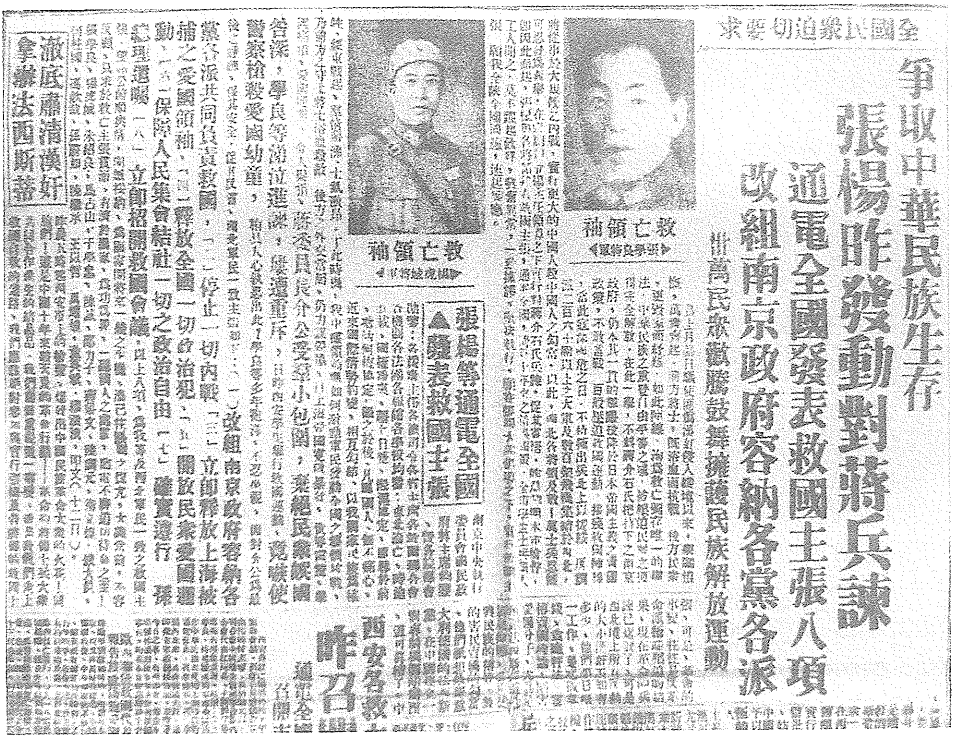
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仅留少数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

---

[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当日，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张学良电的主要内容。



西安事变的发起者张学良、杨虎城。



全國民衆迫切要求

爭取中華民族生存

張楊昨發動對蔣兵諫

通電全國發表救國主張八項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卅萬民衆歡騰鼓舞擁護民族解放運動

救亡領袖 ◀張學良將軍▶

救亡領袖 ◀楊虎城將軍▶

張楊等通電全國

▲發表救國主張

徹底肅清漢奸

拿辦法西斯蒂

西安各救

昨召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刊登的西安事变的消息。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12月13日）

一

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围绕这一环，我们要向人民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稳定黄埔系、CC派，推动元老派、欧美派以及其他杂派赞助西安事变。对英美应很好联络，使它们对西安事变在舆论上表示赞助。我们的政治口号是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的。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西安事变的一段讲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极去做。

二

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关于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等问题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3日）

李毅兄鉴：

文寅电悉。

元凶被逮，薄海同快。目前任务，在全国者已见致汉年电，昨已奉达，并祈转沪；在西北者略陈如次，敬祈酌夺。

（甲）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严拒樊崧甫。

（乙）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弟等认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起义才能确定的发展其胜利。

（丙）宜即逮捕或驱逐部队中法西斯分子，对全军奉行广大深入的政治动员，向全体官兵宣布蒋氏卖国残民罪状，政治上团结全军，此着是最紧急任务之一。

（丁）胡、曾、关[1]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如何部署，请随时电知。此外，国际方面弟等已有所布置，详容后告。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并求杨虎城兄电知延安驻军密为保护，如何盼复。请令

---

[1] 指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

电台时刻联络。

弟　东　来叩
元午

提议东北军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1]

（1936年12月13日）

李毅兄：

关于军事方针提出下列各点，请考虑见复：

甲、刘峙[2]有指挥河南集团，进占潼关极大可能，似宜提起杨虎臣[3]兄注意，以主力集中潼关而坚拒之。

乙、为确占兰州汉中两战略要点及隔离甘肃蒋军为二部起见，提议：

（一）于军[4]全部巩固兰州城，严防毛炳文[5]及西北补充旅之进攻。

---

[1] 1936年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内战，拒绝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一致要求，国民党爱国将领、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附近的临潼联合发动了扣押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调动大批军队，逼近西安，企图扩大内战。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内战，就有关军事方针向张学良提出的建议。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3] 杨虎臣，即杨虎城。

[4] 于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

[5] 毛炳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

（二）兄部王董两军[1]及骑兵军集中平凉、会宁线，将该线上之蒋军压向陇南一面，拒止胡曾关毛[2]南下，将海原、固原防务交于红军。

（三）红军以主力进至海、固地区，以有力一部尾随胡军于豫旺[3]地区，配合在静宁、平凉之兄军，乘机消灭南攻之胡等。如胡等在现位置不动，则压迫之入宁夏为最好。

（四）商刘甫澄[4]，调川军十五团至二十团进据汉中。

以上意见是否有当，统祈见复。军事大计，祈兄主持，随时示知为盼。

弟　东　来叩

元申

---

[1] 王董两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第五十七军，军长分别为王以哲和董英斌。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曾，指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关，指关麟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师长。毛，指毛炳文。

[3]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4] 刘甫澄，即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关于周恩来等拟十六日到延安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3日）

宜兄：

甲、电悉。稼蔷、剑英早去霍师，候车接或电霍师转送。

乙、恩来及同行人员计共二十人，拟于十六号午赶到肤施城外，请派飞机届时往接，并商虎城兄电告驻肤程团，烦其负责保护，如何，盼复。

弟 东 来

元亥

关于日本、南京情况及我们的建议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4日）

李宜兄：

甲、情况：

（一）日本三相会议，认文变为革命的，准备支持南京。

（二）南京甚慌乱，恐事变扩大，急下免职令，军队交军委直辖。

（三）何应钦到郑州，判断专为指挥进攻。

（四）樊[1]军向潼关，万[2]师守咸阳。

乙、建议：

（一）闻冯钦哉师集中西安，冯不可靠，希注意，宜以孙师集中西安、潼关间。

（二）胡、毛、曾、关[3]甚恐慌，日内尚无可为，主要注意樊、万。

（三）东北军愈集结愈好，但兰州万不可失。

（四）红军准备全力增援。

弟　东　来

寒子

---

[1] 指樊崧甫。

[2] 指万耀煌。

[3] 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关于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及我方行动方针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1936年12月14日）

汉卿、虎臣两将军勋鉴：

（甲）文日举义，元凶就逮，抗日救亡，举国同情，弟等率领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谨就所见略陈如次。

（乙）日本决定压迫南京扩大内战，俾遂其灭亡我国之谋。南京一部分亲日分子接受日本指示，继续发展蒋氏对外和平对内战争之政策，准备向西北大举压迫。然而全国民众、国民党之大多数、各省有力军人无不渴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热烈欢迎西安之抗日起义，反对日本与中国汉奸之阴谋。

（丙）我们行动方针似应立即进行如次各项，应急变：

（一）立即宣布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军编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第一集团军，张学良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十七路军编为第二集团军，杨虎臣为总司令；红军编为第三集团军，朱德为总司令。设立西北抗日援绥军事政治委员会，以三个集团军高级将领为委员，每集团军三人至五人，以张学良、杨虎臣、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统一军事政治领导。以上组织如荷同意，立即以三方抗日救亡联席会

议名义向全军全国宣布。此外，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援绥联军总司令。

（二）目前军事步骤：抗日援绥联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之地区，发扬士气，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在目前三星期内，由杨兄所部固守西安城，张兄所部及弟部担任野战。如荷同意，弟部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依情况决定；弟军一部则在定、盐、环钳制胡敌，另一部则在肤、甘钳制汤敌。王以哲兄部仍在固原防御胡敌，于学忠部仍守兰州。只要打得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战局，即有若干失利，亦于大局无碍。以上第一个步骤实现之后，依情况再决第二步。

（三）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战胜敌人，提议：

（子）在联军三部分中一致提出下列十个口号：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起来；抗日军队同抗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召集救国会议，建立救国政府；争取人民自由；反对日本灭亡中国，反对汉奸扩大内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保卫中国而战，为援助绥远而战，为收复东北而战；抗日联军万岁！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

（丑）在部队中进行热烈的政治鼓动。

（寅）肃清部队中之亲蒋分子。

（卯）鼓动全军战斗勇气，造成至死不屈精神。

以上各项作为弟等之提议，敬祈需择，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并乞电复。

弟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彭德怀
　　贺　龙　肖　克　林　彪　徐海东　徐向前同上

十二月十四日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

（1936年12月14日）

彭、任[1]：

野战军应开至西峰镇[2]。有如下理由：

甲、南京已发动大规模内战，全力对付张杨[3]，主力由潼关进。

乙、张杨内部有许多不稳成分，南京政策又拉杨打张，红军与之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

丙、靠近张杨，可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

丁、西峰镇靠近王以哲[4]，仍可打胡[5]。

戊、不管西安能守与否，南下有几种机动。

己、暂时出宁夏不可能，且变为单独的。张杨同时则进入隘路。

庚、在现地暂时不动，无仗可打，对张杨危急又不能救。依上理由，所以第一步到西峰镇。

毛泽东

十四日

---

[1]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西峰镇，即今甘肃西峰市。

[3]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4] 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5]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

关于注意洛阳、咸阳之敌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4日）

李宜兄：

十分注意洛阳、咸阳之敌，彼等有围城救蒋之企图，请将全部精力注意于集中与团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上面。

东　来

寒二十

应奉行大的战略击破敌之要害[1]

（1936年12月15日）

彭、任：

无论军事政治方面，目前均须击破敌之要害。敌之要害不是宁夏或甘肃，而是河南与南京。敌已奉行大规模内战，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然在敌主力向西安进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敌头脑之南京政府。此方针应无疑义。行动务求荫蔽，一切人不得下达。

毛

十五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后为应付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大规模内战，关于红军大的战略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1]

（1936年12月15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3]、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共方面的军政要员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给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电报。

[2] 指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3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 福建事变，指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

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北一角，姑无论西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1]，取青济[2]，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

---

[1] 沪宁，指上海、南京。

[2] 青济，指青岛、济南。

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1]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

[1] 王稼穑，即王稼祥。

关于周恩来十六日到延安请派飞机去接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5日）

李宜[1]兄：

（一）已派红军一部去肤施接防，不知城内民团抗拒否。

（二）恩来本晨出发，明十六日晚到肤施。

（三）请派飞机于十六日上午到肤施机场视察，见有“天下”二字即降下接周。

（四）川刘、晋阎接洽如何。

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

[1] 即张学良。

关于通过端纳活动停止南京发动内战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5日）

李毅兄：

（一）法国舆论颇佳，英国亦不坏。

（二）闻兄之前顾问英人瑞〈端〉纳有来陕说，如宜经过瑞〈端〉氏停止南京正在发动之内战，并争取英国同情，乘瑞〈端〉氏返宁派人同去接洽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三人。

（三）弟方本日发表正式通电：“坚主停止内战。”另有电致陈立夫。

（四）昨电组织抗日联军，对外请暂勿发表，惟对内似宜宣布，以一军心。上述各点统请裁夺。

弟　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关于国内外对西安事变的反应等情况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6日）

李宜[1]兄：

（甲）西安事变震动了全世界，除日、意指为赤化外，法国急进党谓：张学良已成中国第一有权威之人物；英国取调和态度。

（乙）国内纷扰已极，江浙金融大恐慌现象。

（丙）正面前进之敌，尚仅樊崧甫两师，黄杰师之第二旅，似向洛阳进，第十师方从汉口开动，共不过十三四团。李铁军师向南阳；王耀武等在汉中陇南；胡、毛、曾三部有向韦州、同心城集中讯；汤恩伯想回陕，尚未开动。

（丁）望兄坚持底集结部队，提高士气，发动民众，防止反侧，胜利前途是伟大的。

毛泽东

铣酉

---

[1] 即张学良。

关于发动民众反对中央军进攻致张学良、杨虎城电

（1936年12月16日）

汉卿、虎城两先生：

为了坚〔持〕决战胜利，千祈注意发动民众，主要将沿陇海路、西兰公路、西梁公路各县之民众发动起来，拥护抗日联军，拥护西安起义，反对中央军进攻，保卫抗日首都，保卫抗日根据地。是否有当，尚祈卓酌。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关于西安事变应和平解决等事给阎锡山的信

（1936年12月16日）

飞送山西阎百川先生勋鉴：

接彭雪峰〈枫〉转来电，知先生抗日救国义薄云天，敝方奉商各端，倘荷赞谅，感幸实深。西安事变后，时局急转直下，有数事就商于先生者：

（一）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自速覆亡，敝方删日通电详申斯旨，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宁陕之间，先停军事行动，再议时局善后。

（二）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谓宜举宁方西进之军改道北进，张、杨二公所部尤志切同仇，红军则久矣，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给养方面以红军言所需甚少，但能发伙食费，即可不事征发，一切地方行政社会秩序不加丝毫干涉，乞速指示以便遵循。

（三）立即建立无线电联络，雪峰〈枫〉带去呼号密码，未知此处已否启用，敝方电台屡叫未通，幸赐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关于请接周恩来到西安致刘鼎转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7日）

刘鼎转李毅兄：

甲、恩来昨到肤施城外，肤施民团守城不开，交涉不听。

乙、有何方法接恩来到西安请即示。

丙、可否派武装大汽车两辆到甘泉，何日可到。

弟　泽东

十七日五时

关于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龙海线等问题致张学良电

（1936年12月17日）

李毅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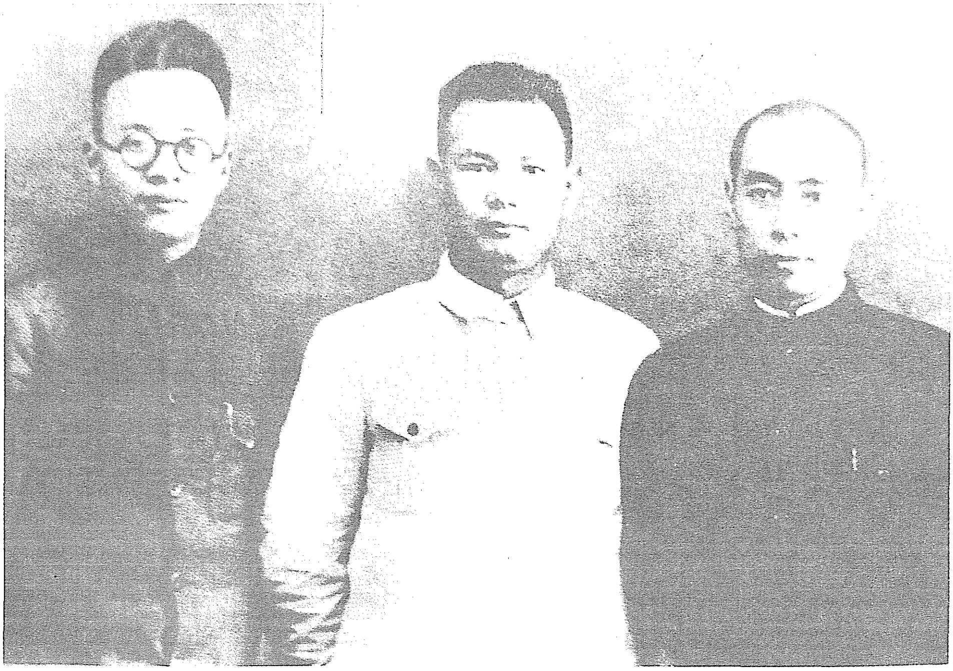
筱电奉悉，集力抗战甚妥。惟对敌意见，弟认胡宗南、汤恩伯均不过一支队，各以一部钳制之可也，敌之要害在南京与京汉、陇海线，若以二三万人之战略迂回部队突击京汉、陇海取得决定胜利，则大局立起变化，此点祈考虑。我们对远方[1]已作几个报告，尚无回报。兄令刘鼎将每日群众运动情形电告一次，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联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惟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恩来在肤施城外等候，请速饬肤施民团让出该城。如何盼复。

弟　赵东

十七日

---

[1] 指共产国际。



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到西安参加谈判。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飞抵西安，立即和张学良举行会谈。

关于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6年12月19日）

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面。这次事变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线更为扩大，这是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面。现在光明面被黑暗面掩盖住。我们应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上，对于光明面予以发扬，对于黑暗面给以打击。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应与东北军、西北军接近，对他们的态度，不仅不与南京混同，而且与阎锡山也不同，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它要取得斗争的胜利，无疑地是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广大群众的帮助。现在的营垒是两方面，一方是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另一方是共产党与抗日派。中间还有动摇与中立的一派，我们应争取这些中间派。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只有内战结束才能抗日。有六种力量可能使内战结束：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

内部分化，六是国际援助。应把六种反内战的力量团结起来，使内战结束，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1]

（1936年12月19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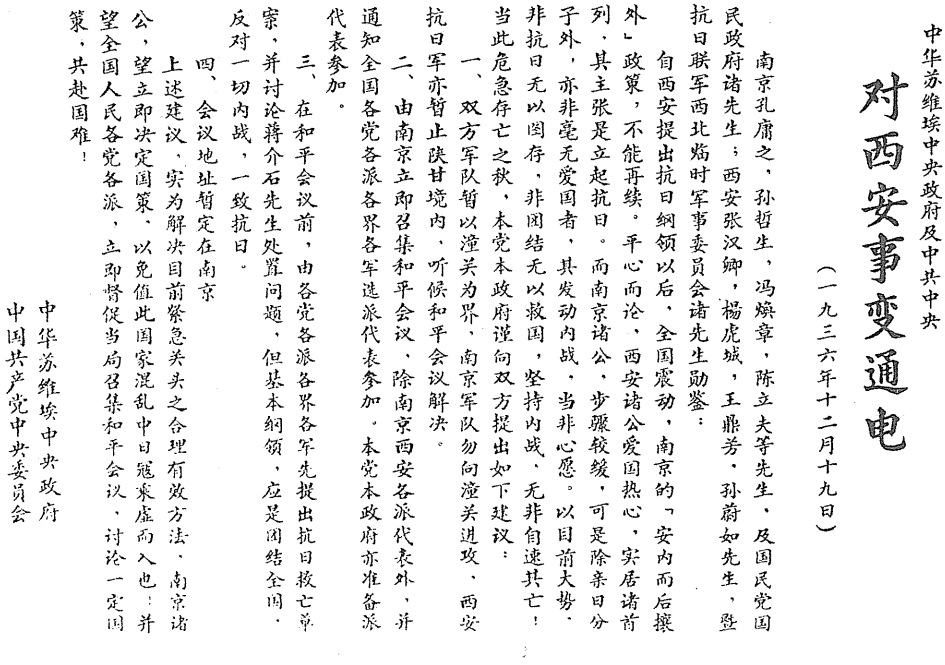
[1] 本通电于1936年12月19日还全文向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发表，文字基本相同。

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

对西安事变通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京孔庸之，孙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前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

一　西安事变产生前的形势

（一）在绥东局部抗战开始后，在全国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绥远），抗日运动突飞猛进，不但使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参加，即大资产阶级内部也发生着决定的分化。

（二）南京政府正面对着这一迅速发展着的抗日运动，它被迫着很迟慢的与不坚定的改变着它过去对日退让的政策。在这转变过程中，它还是对日力求妥协，对绥远局部抗战表示不积极，对全国抗日运动，采取压抑政策，对红军不肯停止进攻。

（三）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将士，在全国与西北人民及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与推动之下，抗日情绪特别高涨，因此要求迅速停止进攻红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们的这种要求，为蒋介石所严拒。

二　西安事变的意义

（一）这一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

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因此，这次发动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

（二）但是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害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

三　西安事变发展的两个前途及其拥护者

（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造成的。[1]

（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

---

[1] 《六大以来》版此处为：“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

四　为实现第二个前途中共的基本方针是

（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

（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

（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西安事变发生后，红军在军事上给张学良、杨虎城部以援助，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为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和国民党东北军部分将领在陕西三原的合影。

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致潘汉年电

（1936年12月19日）

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要坚持更有前途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端纳谈些什么。

（乙）有蒋鼎文释放讯何故。

（丙）严防于右任。

（丁）欢迎宋子文来西安。

（戊）胡、毛、曾、关[1]准备集中天水。我意让他集中空出甘北。

（己）汤恩伯未动，不一定回陕。

（庚）张、杨必要坚持，更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

（辛）情况望详告。

毛

---

[1] 指胡宗南、毛炳文、曾万钟、关麟征。

关于争取十七路军抗日反内战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一）争取十七路全部稳定于抗日、反内战立场，是当前重要一着。

（二）十四个政治口号，应提出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全军中，早晚点名呼唤。

毛

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消灭东来之敌[1]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时局正在发展，一方面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局面；另一方面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中国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国际和平国家，正在结合反对内战，拥护抗日。

乙、苏维埃、共产党十九日主张召集和平会议之通电，乃为团结一切国内、国际左翼及中间势力，为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而斗争。

丙、西安抗日军亦应本此共同之总方针而前进。

丁、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为执行此总方针之重要手段。

戊、红军决向西安集中，配合张杨首先消灭东来之敌。

毛泽东

十九日二十三时

---

[1]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为代表到西安与张、杨和各界爱国人士共商国是，并同蒋介石直接谈判；同时，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部署。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关于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19日）

周：

（甲）坚守渭南、临潼、西安线，二十天红军便可赶到，一战击破东敌，则西敌不成问题矣。

（乙）单用十七路于渭南西安线，十七路必胆怯，提议东北军、十七路集中力量守该线。

（丙）从渭南至西安筑坚二十道至三十道，并筑碉堡死守二十天。

（丁）敌仅二十八及七十九两个师，第二师之第二旅及第十师尚未到，其力甚薄。

毛

十九日二十三时

关于共产国际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国际来电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

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毛

二十日二十时

关于和宋子文见面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 年 12 月 20 日）

周：

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对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

毛

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后方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东北军应以洛川为后方，十七路以韩城为后方，两军辎重宜逐渐向两地迁移，准备万一放弃西安时，不至仓卒误事。但迁移宜秘密，并且是在坚守西安的决心下，才这样做的。

毛

关于同意军事计划等问题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0日）

周：

各电均悉。

（甲）同意军事计划。

（乙）红军主力第一步集结庆阳，如胡宗南南下决消灭之，王以哲军应固守固原西峰。

（丙）杨要之人正准备，并电南汉臣〈宸〉回。

（丁）汉年有电从天津发来，邓文仪请他同飞西安说和，汉年正向各方活动和平。

毛

给彭雪枫的信[1]

（1936年12月20日）

雨峰同志：

致百川[2]先生信阅后即送交，并求回信。建立电台交通、吉县延长徒步交通及晋陕通商关系，务须即办，不可延缓。以后往华北交通多须通过晋境，请与阎先生妥商，得其同意。兹派宋绍林同志送信与阎并给你此信，即将回信交彼带回，以快为好。璩象咸县长如得阎许可，最好往来彼我之间，因他情形已熟悉。你在外间交接，态度务须诚恳，立场务须坚定，用费务须节省。对陕变[3]方针，已详十九日通电[4]，望本此作去。晋方交涉经过写一报告来。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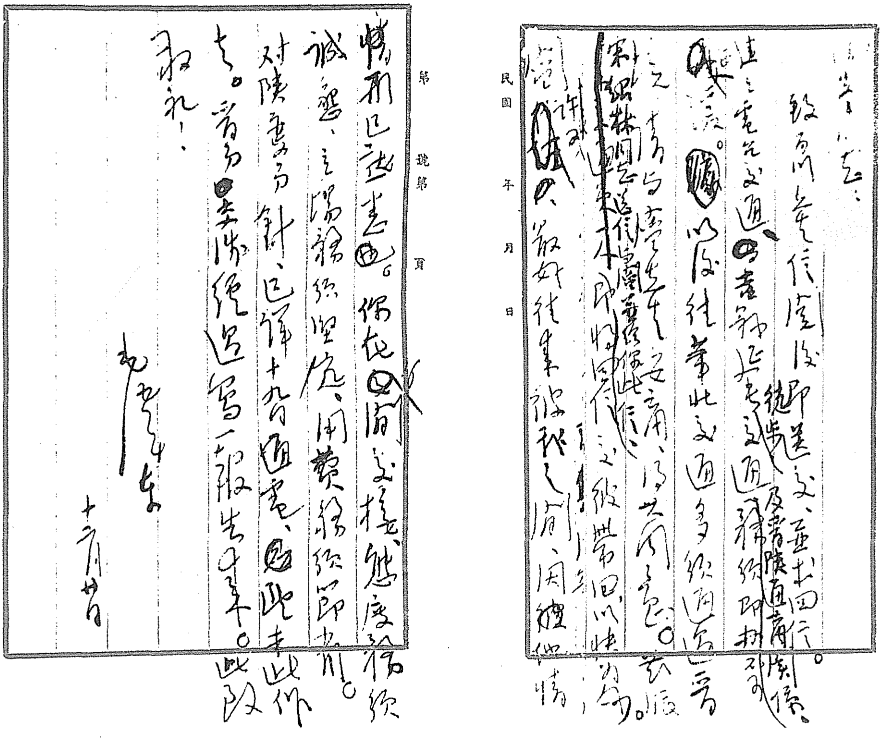
---

[1] 彭雪枫（1907—1944），又名彭雨峰，河南镇平人，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支队长、师政治委员。1936年任中国共产党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1941年任新四军新四师师长。1944年在河南夏邑作战中牺牲。

[2] 百川，即阎锡山。

[3] 陕变，即西安事变。

[4] 指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1936年12月19日发出的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通电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毛泽东致彭雪枫信的手稿。

关于共同抗日问题
致王以哲转马鸿宾电

（1936年12月21日）

王军长鼎方兄：

转马师长鸿宾勋鉴：

承王军长介绍贵师与敝方结为抗日友军，曷胜欢迎，从此纪〈化〉敌为友，谊同一家，为抗日而誓师，为救亡而奋斗，相亲相爱，互助互援，谨电申意。

敬颂

勋祺。

弟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1]

（1936年12月21日）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致周恩来电[1]

（1936年12月21日）

恩来同志：

（甲）目前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派在动摇中。

（乙）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丙）请与张杨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骤：

（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

第二，取消何应钦等之权力，停止讨伐，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

第三，保障民主权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周恩来的电报。

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1]派等谈判。

（三）对阎锡山迁蒋至山西办法应表示可以考虑。

（四）招致一切愿意和平之人士来西安谈判。

（五）招致英美顾问再来西安，经过他们使英美赞助和平。

（六）巩固西安军事阵地，使尽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谈判之成功。

（七）对陕甘之黄埔军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钊等进行接洽。

（八）兄应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陈、宋、阎、于等，基于上述条件与谈判，调停双方。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一日

---

[1] 指陈果夫、陈立夫。

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害蒋之阴谋[1]

（1936年12月21日）

周：

派人去董钊、樊崧甫、王耀武、胡宗南等处，告以何应钦、何成浚等亲日派实欲置蒋于死地之阴谋，愿与谈判恢复蒋自由之条件，黄埔系不要受亲日派、阴谋派所愚，并发传单揭破日本与何应钦派联合加害蒋之阴谋。

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周恩来电[1]

（1936年12月22日）

红军正向南急进，二十天内准可集中咸阳[2]。罗炳辉、萧劲光、谢嵩[3]三部钳制胡宗南，必要时宋时轮部也加入。陕北苏区均恢复，瓦窑堡、延川、延长、延安四城均入我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红军进军和陕北苏区恢复情况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2月21日致电毛泽东，提出希望红军主力十天内集中长武、彬县一线，再十天集中兴平、咸阳一线。

[3] 谢嵩，当时任红二十九军军长。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的信

（1936年12月22日）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

---

[1]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指1933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1935年在香港建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办有《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

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陕北苏区

给阎锡山的信

（1936年12月22日）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1]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2]，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方面，前遣彭雨峰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3]，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

---

[1] 陕变，指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事件通称西安事变。

[2] 删电，指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报。皓电，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6年12月19日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3] 1936年8月和11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两次进攻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勇抗击，并于11月收复百灵庙等地。

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敬颂

公祺！

毛泽东　敬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致南汉宸电[1]

（1936年12月23日）

因十七路军不巩固，极须大力进行政治工作，杨虎臣极望兄回帮助。

兄至十七路军，应坚定其军政干部抗日救国、联红联共、不怕牺牲、直干到底之决心，并发展党的组织，争取十七路军变为真正的人民抗日军。

---

[1] 这是毛泽东致南汉宸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胡、曾、关敌南下及我军部署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3日）

周：

甲、胡、曾、关准备南下，判断不走海静即走固镇，但不会走庆阳。现周、孔[1]退金积，再向中宁堡，顾祝同到宁夏后尚须与胡、关会商，判断须一星期后才能开始动作。

乙、提议作如下部署：

一、固原、平凉、西峰、镇原四点东北军位置四个师筑碉屯粮，为死守计，必要时固原、西峰再增加一个师，马洪〈鸿〉宾守黑城镇李旺堡线。

二、庆阳、合水由萧劲光占领。

三、罗炳辉为司令员，宋时轮为副司令员，宋任穷为政委，指挥二十八军、三十二军、骑一团及二十九军主力，尾敌前进威胁敌侧后。

四、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

毛泽东

二十三日十二时

---

[1] 指周祥初、孔令恂。

关于时局正在变化中
张、杨不会久处孤立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3日)

周：

甲、南汉臣〈宸〉来电，王世英去沪返南京即动身，他问回陕做何事。

乙、津电二十九军高级干部开会，主张停止内战，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事，已授意教育界出面要求宋哲元发表此主张。

丙、时间正在变化中，张、杨不会久处孤立，但应告诉张、杨及其干部，把工作放在困难点上，即使困难，奋斗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如无此种决心，则遇有挫折将不能支持，凡事向好坏两面着想，力争好的前途，同时也准备对付坏的局面。

毛泽东

二十三日二十时

致阎锡山、赵戴文[1]

（1936年12月23日）

（一）十分钦佩晋绥当局对日寇的英勇抗战、开放爱国运动及取消防共组织，敝方与晋绥的基本方针已属一致，希望晋绥当局坚持此方针不变更。（二）希望即刻实现双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停止对西北的全部内战（包括对红军的与对西安的），给南京亲日派以压力达到此目的。（三）红军要求晋绥当局同意开赴绥察抗日，愿受阎之指挥，不干涉晋绥行政与社会秩序，晋绥发给伙食、弹药。（四）建立晋西、陕北交通通信，恢复通商关系，从吉县、延长局部开始。（五）不使汤恩伯回陕，并调出李仙洲、高桂滋、高双成离开陕北，此事请阎、赵大力帮忙。

---

[1] 这是毛泽东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代向阎锡山、赵戴文面陈的内容。赵戴文，当时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自强救国同志会副会长。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24日）

对临时军政委员会名单，我们方面拟参加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徐向前五人。恩来、伯渠参加实际工作不参加名单，以便将来进行国民党工作。泽东不参加。对张、杨说明，共产党为争取全国各派，应采此种方针，对张、杨亦是有利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博古是12月23日和叶剑英等一起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

关于坚守固原等处及罗炳辉等均为配合东北军作战之部队致王以哲电

（1936年12月24日）

鼎芳兄：

两电均悉，敬复如下：

一、胡军孔、周[1]两师现由金积向同心城集中，第一师在其后，曾万钟师似在预旺城未动，毛炳文部不明。彼等均有向固原进攻讯。兄部宜在固原、镇原、西峰、平凉等处重新配备兵力，加修碉堡，屯集粮食为坚守计。

二、罗炳辉、宋时轮、萧劲光三部，红军大学第二校办，陕甘宁省所属游击队均为配合兄部作战之部队。罗、宋两部现在预旺城东侧，曾南进时彼即尾追其侧后，因相距尚远，暂时不容出击，联络由保安送克密去已来不及，有电应由弟处转令执行。肖劲光率独立师在预旺堡三岔线，红大第二校不日进驻庆阳，请令西峰周师与之联络，由陕甘宁省委负责。李富春在曲子镇，周师亦可出击联络。

毛　朱　彭

敬午

---

[1] 指孔令恂、周祥初。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以西安为中心建立后方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5日）

周：

提议东北军、西北军均以富县、甘泉、延安、牛武镇、羊泉镇、张村驿为总后方，再以庆阳、曲子、环县为第二后方。立即开始输送，先搬最重要物品。为避飞机，主要不置于城市，而置于乡村，靠近苏区万无一失。但此决不动摇以西安为中心持久作战奋斗到底之决心。

泽东

二十五日十二时

对张学良杨虎城击破东敌部署的提议

（1936年12月25日）

周、博[1]：

甲、据本日情报：何应钦[2]以主力周喦黄杰[3]两纵队共二十团用于渭北，李默庵[4]纵队大概八个团用于洛南，正面仅置樊松甫[5]纵队八个团起吸引与钳制作用。

乙、敌之部署甚便于红军主力到达咸阳后从蓝田击破李默庵纵队，突击陇海线，断其归路，开展战局。提议速作如下部署：

一、立即派人秘密解决冯钦哉[6]，巩固大荔于我手中。

二、巩固孝义镇[7]沿河，迟滞敌之渡河。

三、以东北军两个师秘密输送于富平，巩固该重点于我手中。

---

[1]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

[2]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国民党军“讨逆”军总司令。

[3] 周喦，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六师师长。黄杰，当时任国民党军潼关警备司令。

[4]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十师师长。

[5] 樊松甫，即樊嵩甫，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6] 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西安事变后不久背叛杨虎城投靠蒋介石。

[7] 孝义镇，位于陕西省渭南市东北。

四、三原、高陵、康桥镇[1]各置一个师。为坚守计，渭南、临潼间及临潼、西安间各架桥一座，并多准备船，以便红军必要时转向北岸作战。

五、置一个师于蓝田，出一个团于厚子镇[2]，另置一部于保安镇[3]，再于商县置一旅，均坚工死守，保证后方，便红军突击陇海路。

六、渭南、临潼正面置两个师。

七、西安暂时置一个师足矣，其余集中于机动位置。以上建议速向张杨[4]提出。

毛泽东

二十五日三时

---

[1] 康桥镇，位于陕西省临潼县北部。

[2] 厚子镇，今名厚镇，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东北。

[3] 保安镇，位于陕西省洛南县西北。

[4]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关于争取陈诚、朱绍良、邵力子诸人致周恩来电

（1936年12月25日）

周：

向陈诚、朱绍良、邵力子、陈继承、曾扩情诸人解释我们的方针，争取他们。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关于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致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6年12月25日）

彭、任：

在五个条件下，恢复蒋之自由，以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昨晚电恩来，待先决条件履行及局势发展到蒋出后不再动摇才释放。但他们今日已经释放蒋介石，宋子文、张学良、宋美龄今日同机飞洛。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是否达成有利，当待证实后告。

野战军仍速开咸阳集中。

毛泽东

二十五日

和军委电台部分同志的谈话[1]

（1936年12月25日）

革命嘛，总是难免走点弯路，总是要吃点苦的。如果有人因为吃了点苦，就不愿意在四方面军工作，那就不对了，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军队嘛！我们干革命，就得听党的话，就要服从革命的需要，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革命事业嘛，总得有个分工，分到哪里，就在哪里战斗，不能挑挑拣拣。如果，认为革命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的话，那是不对的。

---

[1] 在长征的路上被分配去左路军工作的军委电台的部分同志来到保安。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他们走了许多冤枉路，吃了不少苦，觉得心里委屈，工作上不安心。毛泽东得知后便去驻地看望他们，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这是毛泽东等和他们谈话的部分内容。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6年12月26日）

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利扩大补充野战军，仍应执行原计划，惟不驻咸阳，而照一、二、四方面军次序，驻兴平、武功、扶风、凤翔线，处在南京军天水集团与潼关集团[2]之间，对东北军、西北军则处在其外侧。

西安已有五万元向庆阳运送。一切购买，不打土豪。驻乡村不驻县城。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天水集团，指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的西集团，由顾祝同指挥，集结于天水等地。潼关集团为其东集团，由刘峙指挥，集结于潼关等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6年12月27日）

一

我们过去估计西安事变带有革命性是对的，如果它没有革命性便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蒋介石释放后，他的动摇是否最后结束？现在还只能说是结束的开始，我们要动员一切力量结束他的动摇。西安事变使蒋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们的地位提高了。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应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开展全国局面，把红军扩大起来，与张、杨更加团结，成为抗日的核心，这是我们当前的任务。我们的具体策略是推动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关于西安事变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大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

二

巩固西北根据地，扩大红军和苏区，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做好全国群众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这是工作的重心。加强对国民党的工作，特别要作好左派、中派和军队的工作，重视宣传工作，党报应办起来。培养干部，要办党校和红军学校，造就群众的、军事的、党的、政治的四种人材。应督促国民党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

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1936年12月27日）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地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的实际，即是中国抗日派与中国亲日派的剧烈斗争，也即是世界和平阵线与世界侵略阵线的斗争之一部分，并在斗争中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间派最后结束他们的动摇地位，而坚决走上改革内政、对外抗战的道路。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因此，我们目前必须：

（一）宣传此次和平解决的胜利及日寇与亲日派挑拨内战阴谋的失败，号召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亲密地联合起来，实行改革国内政治与对日抗战。

（二）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许诺的条件，即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改组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共产党，召开救国会议，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与实行对日抗战等条件。

（三）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赞助张杨改造东北军、西北军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发动与组织西北民众，联合西北少数民族，扩大与巩固红军，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根据地与策源地。

（四）继续推动各地实力派参加对日抗战、对内民主的运动，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实行合作，以促进南京的改革与抗战的发动。在南京政府中，推动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行改组南京政府。

（五）努力扩大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广大的下层群众到运动中来，消灭严重存在着的缺乏组织性的弱点。

（六）在原有基础上发展与巩固共产党的组织。

（七）党应准备实现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必要的改变，以适合于全国统一战线建立后的新环境。

给韩复榘的信[1]

（1936年12月27日）

西安事变，西北抗日局面成立，先生主张和平解决，今已达到目的。惟蒋氏难免又受群小包围，延缓抗日发动亦意中事。今后如何改组国防政府，如何组织全国之抗日联军，如何确定救亡大计，均愿与先生及鲁军方面切实合作。

---

[1] 这是毛泽东致韩复榘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1]

（1936年12月27日）

现在蒋介石出于无奈，已经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行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逼迫蒋介石执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

---

[1] 这是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的一部分。

与教堂订立的协定[1]

（1936 年 12 月 28 日）

（甲）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乙）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丙）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丁）经济通商不加阻碍。（戊）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

[1] 为争取教堂与苏维埃红军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提出与各教堂订立协定。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协定的主要内容。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

（1936年12月28日）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1]，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2]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蒋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

---

[1] 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因受中国红军和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积极布置“剿共”军事，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被释放回南京。

[2] 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

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相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

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我们将在蒋氏撤兵后看他是否确守信义，是否实行他所允诺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1]，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些条件的实行，首先需要确守信义，并且需要一些勇气。我们将于蒋氏今后的行动表现中考察之。

然而蒋氏声明中又有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话。可惜蒋氏没有说明他所谓“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物，也不知道蒋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释。但是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

---

[1] 上海爱国领袖，指当时在上海领导抗日爱国运动的全国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他们在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到1937年7月才被释放。

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蒋氏所说的“反动派”，不是别的，就是这些势力，不过人们叫作革命派，蒋氏则叫作“反动派”罢了。蒋氏在西安曾说了将要认真抗日的话，当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击革命势力，因为不但信义问题关系蒋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实际的政治道路上，在蒋氏及其一派面前横着一种已经膨胀起来而不利于他们的势力，这就是在西安事变中欲置蒋氏于死地的所谓讨伐派。因此，我们劝蒋氏将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将“反动派”三字改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实，较为妥当。

蒋氏应当记忆，他之所以能够安然离开西安，除西安事变的领导者张杨二将军之外，共产党的调停，实与有力。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坚决揭破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汪精卫[1]、何应钦[2]等的阴谋，坚决主张

---

[1] 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首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他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贯主张妥协。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外通电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大张挞伐，迅予围剿”；同时立即从德国动身回国，企图夺取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继续散布降日言论，反对国共合作抗日。

[2]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西安事变发生后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推任为“讨逆总司令”。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部署国民党军队沿陇海路进逼陕西，调派空军轰炸渭南等地，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

和平解决这次事变，这和张杨二将军及宋子文[1]氏等国民党人的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这就是全国人民的主张，因为现在的内战是人民所痛恶的。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共产党早已于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中将此种赞助的诺言许给蒋氏和国民党了。共产党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来全国人民早已承认。全国人民信任共产党的言行，实高出于信任国内任何党派的言行。

---

[1] 宋子文为亲美派。由于当时美日两帝国主义在远东争霸的矛盾，他根据美国的利益，对于西安事变，也主张和平解决。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31日）

中央十日内迁移延安，南面甘泉、北面瓦窑堡两城不能不交给我们，否则殊为不便。请与杨商交出甘泉，并请杨电高桂滋交出瓦窑堡，陕西红军可不进攻清、绥[2]，野战军可不进占旬邑、淳化、耀州为交换条件。[3]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要求周恩来等和杨虎城商谈中共中央迁移延安后红军驻地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2] 清、绥，指清涧、绥德。

[3] 12月30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谈红军驻地问题，杨提出红军不要进入太逼迫西兰公路的旬邑、淳化、耀州（耀县）。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6年12月31日）

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进，但二马[2]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2] 二马，指马步芳、马步青。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32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0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沧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

（1936年12月）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70

（1936年12月）

为李治题词 …………………………………………………………73

（1936年）

准备对付亲日派进攻 ………………………………………………77

（1937年1月1日）

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 ………………………………………………79

（1937年1月1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81

（1937年1月2日）

关于通电拥蒋迎张揭破何应钦阴谋致周恩来、博古电 ……………82

（1937年1月2日）

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 ………………………………83

（1937年1月2日）

和张宗逊的谈话 ……………………………………………………84

（1937年1月3日）

十五军团应出陕南 …………………………………………………85

（1937年1月3日）

关于罗炳辉部配合东北军作战等问题致王以哲电 ……………………86
（1937年1月3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87
（1937年1月5日）
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致周恩来、博古电 ……………88
（1937年1月5日）
关于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电…89
（1937年1月5日）
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致潘汉年电 ………………………91
（1937年1月5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92
（1937年1月5日）
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 …………………………………………93
（1937年1月6日）
野战军集中后的工作 ……………………………………………………94
（1937年1月7日）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给刘少奇的指示*…………………………96
（1937年1月7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 ………………………………………………………98
（1937年1月7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99
（1937年1月8日）
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可分三步出击…………………………………101
（1937年1月8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102
（1937年1月8日）

力主和平避免内战保持西北目前局面……………………………103
（1937年1月9日）
关于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的内容致周恩来、博古电……………104
（1937年1月9日）
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105
（1937年1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06
（1937年1月15日）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的条件致周恩来、博古电…………………107
（1937年1月16日）
关于准备对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及要求张学良回陕等问题致
周恩来、博古电…………………………………………………108
（1937年1月18日）
对张宗逊的指示…………………………………………………109
（1937年1月19日）
致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电…………………………110
（1937年1月20日）
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111
（1937年1月20日）
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题词………………………………………112
（1937年1月20日）
给马海德的信……………………………………………………114
（1937年1月20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116
（1937年1月21日）
谈判原则和军事部署……………………………………………117
（1937年1月21日）

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19
（1937年1月21日）
和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121
（1937年1月22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124
（1937年1月22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126
（1937年1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27
（1937年1月24日）
致潘汉年电…………………………………………………………………129
（1937年1月25日）
要蒋介石手书消除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130
（1937年1月25日）
致周恩来等电………………………………………………………………131
（1937年1月25日）
关于目前谈判要点等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电…………………132
（1937年1月26日）
致潘汉年电…………………………………………………………………133
（1937年1月26日）
关于对南京让步说服左派撤兵致张闻天、周恩来等电…………………134
（1937年1月27日）
致潘汉年电…………………………………………………………………135
（1937年1月27日）
致周恩来、博古等电………………………………………………………136
（1937年1月28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137
（1937年1月29日）
关于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致潘汉年电……138
（1937年1月29日）
为《红色中华》报的题词……139
（1937年1月29日）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140
（1937年1月30日）
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军应同进同退……146
（1937年1月30日）
关于提醒杨虎城等对整个政治前途自信心致周恩来、博古电……147
（1937年1月30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148
（1937年1月31日）
给李克农的信……149
（1937年1月31日）
题财经工作联……150
（1937年1月）
关于和平逐步实现，请蒋坚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不变致潘汉年电……151
（1937年2月4日）
致王以哲家属的唁电……152
（1937年2月4日）
致周恩来电……153
（1937年2月8日）
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谈话……154
（1937年2月9日）

和南京谈判的主要内容……155
（1937年2月9日）
和南京谈判的补充内容……157
（1937年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158
（1937年2月10日）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61
（1937年2月11日）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原则的批复……162
（1937年2月12日）
向南京方面要求增加防地……164
（1937年2月14日）
致周恩来电……166
（1937年2月15日）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 ……167
（1937年2月15日）
致周恩来电……170
（1937年2月18日）
致周恩来等电……171
（1937年2月21日）
致周恩来电……172
（1937年2月21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彭德怀等电……173
（1937年2月2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74
（1937年2月24日）

致周恩来电……………………………………………………175
（1937年2月24日）
致彭德怀等电…………………………………………………176
（1937年2月25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77
（1937年2月26日）
致周昆、袁国平电………………………………………………178
（1937年2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79
（1937年2月28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81
（1937年2月28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82
（1937年3月1日）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183
（1937年3月1日）
与国民党谈判红军编制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204
（1937年3月1日）
为抗大第二期第二队学员题词…………………………………205
（1937年3月2日）
复周恩来电………………………………………………………206
（1937年3月3日）
为抗大题写教育方针和校风……………………………………207
（1937年3月5日）
关于周恩来赴南京谈判内容的批复……………………………208
（1937年3月5日）

致彭德怀等电……210
（1937年3月5日）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211
（1937年3月6日）
国共合作大局已定……212
（1937年3月7日）
致周恩来电……213
（1937年3月9日）
给埃德加·斯诺的信……214
（1937年3月10日）
致周恩来电……216
（1937年3月11日）
致周恩来等电……217
（1937年3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218
（1937年3月12日）
致周恩来电……219
（1937年3月13日）
致绥远追悼大会唁电……220
（1937年3月13日）
致周恩来电……221
（1937年3月14日）
致周恩来电……222
（1937年3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223
（1937年3月16日）

在延安大扫除时的讲话……224
（1937年3月21日）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225
（1937年3月23日）

致周昆、袁国平电……229
（1937年3月25日）

复叶剑英电……230
（1937年3月26日）

致周恩来等电……231
（1937年3月27日）

现阶段的中日关系* ……232
（1937年3月28日）

给范长江的信……234
（1937年3月29日）

四言诗·祭黄帝陵 ……236
（1937年3月）

和南京谈判的两个原则……239
（1937年4月1日）

关于西路军的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243
（1937年4月3日）

关于青年工作问题的讲话……244
（1937年4月10日）

致潘汉年电……245
（1937年4月11日）

在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训词……246
（1937年4月12日）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248
（1937年4月12日）
致潘汉年电……………………253
（1937年4月12日）
致叶剑英电……………………254
（1937年4月13日）
致叶剑英电……………………255
（1937年4月16日）
致叶剑英电……………………256
（1937年4月18日）
致刘伯承、张浩等电……………………257
（1937年4月2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58
（1937年4月20日）
复周小舟电……………………259
（1937年4月22日）
关于党内组织上的一致问题的讲话……………………260
（1937年4月24日）
致徐向前电……………………261
（1937年5月1日）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262
（1937年5月3日）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复周恩来电……………………281
（1937年5月5日）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282
（1937年5月8日）

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294
（1937年5月9日）
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295
（1937年5月10日）
复李宗仁电…………………………………………………………297
（1937年5月13日）
关于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致周恩来电……………………298
（1937年5月14日）
给西班牙人民与人民军的信………………………………………299
（1937年5月15日）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302
（1937年5月15日）
致李富春、黎林电…………………………………………………312
（1937年5月23日）
会见蒋介石须谈两方面的问题……………………………………313
（1937年5月24日）
和国民党谈判要点…………………………………………………314
（1937年5月25日）
给抗大的信…………………………………………………………315
（1937年5月28日）
在欢迎中央考察团晚会上的讲话…………………………………316
（1937年5月29日）
在延安纪念“五份”和欢迎“中央考察团”大会上的讲话………320
（1937年5月30日）
为参加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321
（1937年5月）

观赏万花山牡丹时的谈话……323
（1937年5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324
（1937年6月3日）

给郭化若的信……326
（1937年6月4日）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327
（1937年6月5日）

复叶剑英电……334
（1937年6月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335
（1937年6月10日）

致王世英电……336
（1937年6月12日）

致潘汉年电……337
（1937年6月12日）

在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338
（1937年6月20日）

和美国学者T·A·彼森的谈话……339
（1937年6月22日、23日）

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353
（1937年6月24日、7月4日、8月13日）

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信……359
（1937年6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360
（1937年6月24日）

致张云逸电……………………………………………………361
（1937年6月24日）

给何香凝的信…………………………………………………362
（1937年6月25日）

和廖承志的谈话………………………………………………365
（1937年6月26日）

致潘汉年电……………………………………………………367
（1937年6月26日）

致叶剑英电……………………………………………………368
（1937年6月28日）

致叶剑英电……………………………………………………369
（1937年6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370
（1937年6月29日）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致彭德怀等电……372
（1937年6月30日）

关于剿匪的基本方针…………………………………………373
（1937年7月6日）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致蒋介石电………………………………375
（1937年7月8日）

为日军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378
（1937年7月8日）

致叶剑英电……………………………………………………379
（1937年7月9日）

致上海、太原、广西、西安党的负责人电…………………380
（1937年7月9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381
（1937年7月11日）
关于对日作战方针的题字……382
（1937年7月13日）
在延安全市共产党员及各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的讲话……384
（1937年7月13日）
致叶剑英电……386
（1937年7月13日）
致王稼祥电……387
（1937年7月14日）
军委主席团命令……388
（1937年7月14日）
各地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389
（1937年7月14日）
致中共神府特委电……390
（1937年7月14日）
致叶剑英电……391
（1937年7月14日）
致红军各将领电……392
（1937年7月14日）
红军政治工作决定要重新起草……393
（1937年7月15日）
红军出动应做真实准备……394
（1937年7月15日）
给阎锡山的信……395
（1937年7月15日）

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397
（1937年7月16日）
给阎锡山的信…………………………………………………………399
（1937年7月17日）
蒋介石如不让步不再与谈………………………………………401
（1937年7月20日）
为力保平津、张家口致阎锡山电………………………………402
（1937年7月20日）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403
（1937年7月23日）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411
（1937年7月23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415
（1937年7月24日）
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416
（1937年7月25日）
向蒋介石转达红军改编计划………………………………………417
（1937年7月28日）
红军将领庆贺平津胜利通电………………………………………420
（1937年7月29日）
实践论……………………………………………………………………422
（1937年7月）
读米丁等著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 …438
（1937年7月以前）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481
（1937年8月1日）

致周恩来等电……482
（1937年8月1日）
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483
（1937年8月1日）
致朱德、周恩来等电……485
（1937年8月1日）
向南京面交国防计划等事……486
（1937年8月3日）
对国防问题的意见……487
（1937年8月4日）
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489
（1937年8月4日）
复彭德怀、任弼时电……490
（1937年8月5日）
复朱德、周恩来、博古等电……491
（1937年8月5日）
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492
（1937年8月5日）
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494
（1937年8月6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95
（1937年8月8日）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496
（1937年8月8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497
（1937年8月9日）

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498
（1937年8月10日）
致朱德、周恩来电……500
（1937年8月12日）
和韦尔斯的谈话……501
（1937年8月13日）
致彭德怀电……502
（1937年8月14日）
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电……503
（1937年8月14日）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欢送晚会上的讲话……504
（1937年8月15日）
和丁玲的谈话……505
（1937年8月15日）
红军主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506
（1937年8月17日）
坚决不同意黄白案……507
（1937年8月18日）
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508
（1937年8月18日）
给任弼时、邓小平的信……510
（1937年8月19日）
致谢觉哉电……512
（1937年8月21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

（1936年12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战争

第一节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

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革命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任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能

---

[1] 毛泽东的这部著作，是为着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当时曾在建立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过讲演。据著者说，这部著作只完成5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这个路线上的争论，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作出了结论，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在1935年10月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随即在12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解决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第二年，即1936年，毛泽东又写了这部著作，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战争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导战争，就不能打胜仗。

革命战争——革命的阶级战争和革命的民族战争，在一般战争的情形和性质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的战争规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不懂得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质，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规律，就不能指导革命战争，就不能在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

所以，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有一种人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反动的中国政府或反动的中国军事学校出版的那些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这些条令仅仅是一般战争的规律，并且全是抄了外国的，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照抄来用，丝毫也不变更其形式和内容，就一定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他们的理由是：过去流过血得来的东西，为什么要不得？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

又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已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只要研究俄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就得了，具体地说，只要照着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和苏联军事机关颁布的军事条令去做就得了。他们不知道：苏联的规律和条令，包含着苏联内战和苏联红军的特殊性，如果我们一模一样地抄了来用，不允许任何的变更，也同样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这些人的理由是：苏联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我们的战争也是革命的战争，而且苏联是胜利了，为什么还有取舍的余地？他们不知道：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因为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战争的经验，是在列宁、斯大林指导之下获得的；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

再有一种人的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也早就批驳了这种意见了；他们说：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的经验是最好的，我们应该学习它，具体地说，学北伐战争的长驱直进和夺取大城市。他们不知道：北伐战争的经验是应该学习的，但是不应该刻板地抄用，因为我们现时战争的情况已经变化了。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

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

由此看来，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还不止此。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指挥小兵团，后来又会指挥大兵团，这对于他是进步了，发展了。一个地方和许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会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会作战，这对于一个指挥员又是进步了，发展了。因为敌我双方的技术、战术、战略的发展，一个战争中各阶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级阶段会指挥的，到了高级阶段也会指挥，这对于一个指挥员更是进步和发展了。只能适应于一定兵团、一定地方和战争发展的一定阶段，这叫做没有进步和没有发展。有一种人，抱着一技之长和一孔之见，再也没有进步，这对革命虽则在一地一时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大的作用。我们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战争指导者。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第二节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

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人类的战争生活时代将要由我们之手而结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属于最后战争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所面临的战争，毫无疑义又是最大的和最残酷的战争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残酷的非正义的反革命的战争，迫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如果不打起正义战争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就要遭受摧残。人类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人类的旗帜，中国正义战争的旗帜是拯救中国的旗帜。人类的大多数和中国人的大多数所举行的战争，毫无疑义地是正义的战争，是拯救人类拯救中国的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反革命战争没有了，革命战争也没有了，非正义战争没有了，正义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我们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出发于我们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这是区别我们共产党人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界线。

第三节　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

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

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

要求战役指挥员和战术指挥员了解某种程度的战略上的规律，何以成为必要呢？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

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有的时候，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于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战争中有些战术上或战役上的失败或不成功，常常不至于引起战争全局的变坏，就是因为这些失败不是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若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所有这些，都在说明关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

面。主要地是依据情况，照顾部队和兵团的组成问题，照顾两个战役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照顾我方全部活动和敌方全部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说到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不但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是如此，战役和战术的关系也是如此。师的动作和团营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就是实例。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作战时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要按照当前的敌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况去规定。在给养丰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战士吃得太饱，在给养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战士饿肚。在白色区域，可以因为仅仅一个消息的走漏而使尔后的战斗失败；在红色区域，则走漏消息的问题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战役，高级指挥员有亲自参加之必要，其他则无此必要。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一个民众大会，主要应注意动员民众到会和提出恰当的口号。如此等等。总之，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

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战略问题，如所谓照顾敌我之间的关系，照顾各个战役之间或各个作战阶段之间的关系，照顾有关全局的（有决定意

义的）某些部分，照顾全盘情况中的特点，照顾前后方之间的关系，照顾消耗和补充，作战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荫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击方面和钳制方面，集中指挥和分散指挥，持久战和速决战，阵地战和运动战，本军和友军，这些兵种和那些兵种，上级和下级，干部和兵员，老兵和新兵，高级干部和下级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红色区域和白色区域，老区和新区，中心区和边缘区，热天和冷天，胜仗和败仗，大兵团和小兵团，正规军和游击队，消灭敌人和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和巩固红军，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过去的任务和现在的任务，现在的任务和将来的任务，那种情况下的任务和这种情况下的任务，固定战线和非固定战线，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这一历史阶段和那一历史阶段，等等问题的区别和联系，都是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就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这就是说，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研究战略问题的任务。

第四节　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为什么要组织红军？因为要使用它去战胜敌人。为什么要学习战争规律？因为要使用这些规律于战争。

学习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战争史和我们自己的战争生活，都证明了这一点。

那末，关键在哪里呢？

我们不能要求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这是从古以来就很少的。我

们要求在战争过程中一般地打胜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将军——智勇双全的将军。要达到智勇双全这一点，有一种方法是要学的，学习的时候要用这种方法，使用的时候也要用这种方法。

什么方法呢？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许多国家颁布的军事条令书上，都指示了“按照情况活用原则”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败仗时的处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挥员因死用原则而主观地犯错误；后者是当着指挥员主观地犯了错误，或客观情况起了非所预料的和不可抗的变化时，告诉指挥员怎样去处置。

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举战术的例子来说。攻击点选在敌人阵地的某一翼，而那里正是敌人的薄弱部，突击因而成功，这叫做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指挥员的侦察、判断和决心，和敌人及其配置的实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击点选在另一翼，或中央，结果正碰在敌人的钉子上，攻不进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击时机的适当，预备队使用的不迟不早，以及各种战斗处置和战斗动作都利于我不利于敌，便是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

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挥大体上适合情况，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部分适合情况，那就是胜利的基础了。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粗心大意的军事家，不去这样做，把军事计划建立在一相〈厢〉情愿的基础之上，这种计划是空想的，不符合于实际的。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不免于受敌人的欺骗，受敌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况的引诱，受自己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的鼓动，因而不免于碰壁，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是应该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敌我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周密思索的基础之上的缘故。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说的是一个战略的行动，或一个战役和战斗的行动。经验多的军人，假使他是虚心学习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时间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干革命，干战争，就是消灭这个距离的方法。说学习和使用不容易，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说老百姓很快可以变成军人，是说此门并不难入。把二者总合起来，用得着中国一句老话：“世上无

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

军事的规律，和其他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1]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2]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一切关于战争的规律，都是进行战争的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为了争取自己的胜利而使用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

[1]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字，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是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著《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参见《孙子·谋攻》。

来。因此，我们红军的指导者，在既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即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之上，就必须发挥我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阶级的敌人，改变这个不好的世界。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以上是我们的方法。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

自一九二四年开始的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了两个阶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阶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阶段；今后则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三个阶段的革命战争，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革命战争，然而由于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缺乏独立性，不愿意也不能领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彻底胜利的道路。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

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争，是在新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战争的敌人不但是帝国主义，而且是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联盟。民族资产阶级则做了大资产阶级的尾巴。领导这个革命战争的惟有共产党，共产党已经形成了对于革命战争的绝对的领导权。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权，是使革命战争坚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条件。没有共产党的这种绝对的领导，是不能设想革命战争能有这样的坚持性的。

中国共产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战争，在十五年的长岁月中[1]，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

---

[1]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6年毛泽东著此文时，正是15年。

都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有了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现在共产党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1]和

---

[1]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1]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2]，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

---

[1]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2] 193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而且继续领导着轰轰烈烈的光荣的胜利的革命战争。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达到战胜民族敌人之目的。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章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

第一节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不承认、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中国革命战争有其特点的人，

把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看做和一般战争相同，或和苏联内战相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内战的经验是有世界的意义的。所有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都是以这个经验和列宁斯大林对这个经验的理论综合作为指南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机械地运用这个经验。中国革命战争的许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于苏联内战的特点。不估计到这种特点，或否认这种特点，当然是错误的。这点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已经完全证明了。

我们的敌人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他们不承认和红军作战需要有和其他作战不同的战略和战术。他们依仗其各方面的优势，轻视我们，固守其老一套的战法。这是一九三三年敌人的第四次“围剿”时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结果就是招致了他们的历次的失败。首先在国民党军队中提出在这个问题上的新意见的是国民党的反动将军柳维垣，后来有戴岳。最后他们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了。这就是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1]及其在第五次“围剿”中施行的反动的新军事原则[2]产生的过程。

然而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

---

[1]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1933年7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到1934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2] 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则，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上胜利的途径。

第二节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

我以为有四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

---

[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次代表大会[1]）。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现在把这个问题分开来看一看：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不统一，影响到中国统治集团间的不统一。数国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和一国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区别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中国是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

所以我们说，中国是一个经过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

---

[1]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5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不但基本地规定了我们政治上的战略和战术，而且也基本地规定了我们军事上的战略和战术。

第二个特点是敌人的强大。

红军的敌人国民党，它的情况是怎样呢？它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中国红军是处在这样强大的敌人的面前。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二个特点。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

第三个特点是红军的弱小。

中国红军是产生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从游击队开始。不但处在中国的反动时期，而且处在世界上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比较稳定的时期。

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

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

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

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

第四个特点是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

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援助。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不能使兵士群众和许多小生产者出身的下级干部自觉地为国民党拼命，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这就减少了它的战斗力。

第三节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

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我们的十年战争史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正确性。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

很明显的，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反对战略方向的两个拳头主义，承认一个拳头主义；反对大后方制度，承认小后方制度；反对绝对的集中指挥，承认相对的集中指挥；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承认红军是中国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反对土匪主义，承认严肃的政治纪律；反对军阀主义，承认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军事纪律；反对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承认正确的干部政策；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后，反对把红军停顿于旧阶段，争取红军发展到新阶段——所有这些原则问题，都要求正确的解决。我们现在要讲的战略问题，就是要就中国革命战争的十年血战史的经验，好好地说明这些问题。

第四章　“围剿”和反“围剿”——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

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这种形式，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没有民族战争代替国内战争，那末，直到敌人变成弱小者、红军变成强大者那一天为止，这种形式也是不会变化的。

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在一次“围剿”没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许多战斗的胜利，还不能说战略上或整个战役上已经胜利了。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互相采用进攻和防御这两种战斗的形式，这是和古今中外的战争没有两样的。然而中国内战的特点，则在二者的长期的反复。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是长期地反复的。

说长期反复，是说战争和战斗形式的反复。这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围剿”和反“围剿”，是战争形式的反复。敌以进攻对我防御、我以防御对敌进攻的第一阶段，和敌以防御对我进攻、我以进攻对敌防御的第二阶段，是每一次“围剿”中战斗形式的反复。

至于战争和战斗的内容，则不是简单地反复的，而是每次不同的。这也是事实，任何人一看就知的。这里的规律，是“围剿”和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情况一次比一次复杂，战斗一次

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没有起落的。第五次“围剿”之后，因为红军极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红军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样处在威胁国内敌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围剿”的规模、情况和战斗，就比较小些，简单些，缓和些了。

红军的失败是什么呢？在战略上说，只有反“围剿”根本没有成功，才叫做失败，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暂时的失败。因为国内战争的根本的失败，就是整个红军的覆灭，然而这样的事实是没有的。广大根据地的丧失和红军的转移，这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失败，不是永远的和全部的失败，虽然这个局部是包括了党和军队和根据地的百分之九十。这种事实，我们把它叫做防御的继续，而把敌人的追击叫做进攻的继续。这就是说，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我们没有由防御转到进攻，反而被敌人的进攻打破了我们的防御，我们的防御就变成了退却，敌人的进攻就变成了追击。然而等到红军到达一个新的地区时，例如我们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陕西，“围剿”的反复又出现了。所以我们说，红军的战略退却（长征）是红军的战略防御的继续，敌人的战略追击是敌人的战略进攻的继续。

中国国内战争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一样，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中国内战的特点，是“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地反复和攻防两种战斗形式的长期地反复，并且包括着一次一万多公里的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1]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所谓敌人的失败，也是如此。他们的战略失败，就是他们的“围剿”被我们打破，我们的防御变成了进攻，敌人转到防御地位，

---

[1] 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

必须重新组织才有再一次的“围剿”。敌人没有如同我们所谓一万多公里的战略转移的那种情形，这是因为他们是全国性的统治者，他们比我们强大得多的缘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过的。若干根据地中被红军围攻的白色据点内的敌人突围而出，退却到白区里去重新组织进攻，这样的事是发生过的。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也不相信“围剿”反复这一规律。在鄂豫皖边区根据地则有所谓“偏师”[1]说，那里的一些领导同志认为第三次“围剿”失败后的国民党不过是偏师了，要进攻红军，就得由帝国主义亲身出马担当主力军。在这个估计之下的战略方针，就是红军打武汉。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号召红军打南昌，反对进行使各根据地联成一片的工作，反对诱敌深入的作战，把一省胜利放在夺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点上，以及认为“反对五次‘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等等，是在原则上一致的。这个“左”倾机会主义，种下了鄂豫皖边区反对第四

---

[1]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次“围剿”、江西中央区反对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的错误路线的根苗，使红军在敌人的严重的“围剿”面前不得不处于无能的地位，给了中国革命以很大的损失。

跟否认“围剿”反复的“左”倾机会主义直接联系，而说红军根本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的一种意见，也是完全不正确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正确性。革命和革命战争从发生到发展，从小到大，从没有政权到夺取政权，从没有红军到创造红军，从没有革命根据地到创造革命根据地，总是要进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是应该反对的。

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这种说法才是完全正确的。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

上述两个论断中的前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种情况说来（革命前进时）是对的，移到另一种情况（革命退却时：全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〇六年[1]、中国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国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条约时）也就不对了。只有后一论断，才是全部地正确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机械地反对使用军事防御的手段，不过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思想。

“围剿”反复的形式何时结束？据我看来，如果内战延长的话，

---

[1] 指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那是在敌我强弱对比起了根本变化之时。如果红军一旦改变到比自己的敌人更为强大时，那末，这个反复就结束了。那时是我们围剿敌人，敌人则企图反围剿，但是政治和军事的条件将不允许敌人获得如同红军一样的反“围剿”的地位。那时，“围剿”反复这种形式，即使不说完全结束，但是一般的结束是可以断言的。

第五章　战略防御

这个题目中，我想说明下列各问题：（一）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二）反“围剿”的准备；（三）战略退却；（四）战略反攻；（五）反攻开始问题；（六）集中兵力问题；（七）运动战；（八）速决战；（九）歼灭战。

第一节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为什么从防御说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失败后，革命成了极深刻极残酷的阶级战争。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打破“围剿”的过程往往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十年战争中，对于战略防御问题，常常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轻视敌人，又一种是为敌人所吓倒。

由于轻视敌人，许多游击队失败了，红军对若干次敌人的“围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红军因为和这同样的原因不能打破“围剿”的例子，则有一九二八年广东海陆丰区域的红军的失败[1]，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在所谓国民党偏师说的指导之下，使得反对第四次“围剿”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实。

为敌人吓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轻敌者相反，人们太看重了敌人，太看轻了自己，因而采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针，精神上同样地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其结果或者是游击队失败，或者是红军的某些战役失败，或者是根据地丧失。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

---

[1] 1927年10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11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1928年3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领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1]，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

后起而且发展得很快的帝国主义国家，即德日两国的军事家中，积极地鼓吹战略进攻的利益，反对战略防御。这种思想，是根本不合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德日帝国主义的军事家们指出防御的一

---

[1]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个重要的弱点是不能振奋人心，反而使人心动摇。这是说的阶级矛盾剧烈，而战争的利益仅仅属于反动的统治阶层乃至反动的当权政派的那种国家。我们的情况不同。在保卫革命根据地和保卫中国的口号下，我们能够团结最大多数人民万众一心地作战，因为我们是被压迫者和被侵略者。苏联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在防御形式之下战胜敌人的。他们的战争不但在帝国主义各国组织白党进攻时，是在保卫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的，就是在十月起义的准备时期，也是在保卫首都的口号下进行军事动员的。一切正义战争的防御战，不但有麻痹政治上异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动员落后的人民群众加入到战争中来。

马克思说的武装起义之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1]，这是说乘敌不备而突然起义的群众，应该不让反动的统治者有保守政权或恢复政权的机会，趁此一瞬间把国内反动的统治势力打个措手不及，而不要满足于已得的胜利，轻视敌人，放松对于敌人的进攻，或者畏缩不前，坐失消灭敌人的时机，招致革命的失败。这是正确的。然而不是说，敌我双方已在军事对抗中，而且敌人是优势，当受敌人压迫时，革命党人也不应该采取防御手段。如果这样想，那就是第一号的傻子。

我们过去的战争，整个地说来是向国民党进攻，然而在军事上采取了打破“围剿”的形式。

在军事上说来，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对于

---

[1] 参见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我们，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后，或说进攻是在防御之前都是可以的，因为关键在于打破“围剿”。“围剿”没有打破以前是防御，“围剿”一经打破就开始了进攻，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阶段，而敌人的一次“围剿”和它的又一次“围剿”是衔接着的。这两个阶段中，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从国内战争说，假如红军的力量超过了敌人时，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这种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了。

第二节　反“围剿”的准备

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因此，在和敌人准备“围剿”同时，进行我们的反“围剿”的准备，实有完全的必要。我们队伍中曾经发生过的反对准备的意见是幼稚可笑的。

这里有一个困难问题，容易发生争论。就是，何时结束自己的进攻，转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呢？因为当自己处在胜利的进攻中，敌人处在防御地位时，敌人的“围剿”准备是在秘密地进行的，我们难于知道他们将在何时开始进攻。我们准备反“围剿”的工作开始早了，不免减少进攻的利益，而且有时会给予红军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响。因为准备阶段中的主要步骤，就是军事上的准

备退却，和为着准备退却的政治上的动员。有时准备过早，会变为等待敌人；等了好久而敌人未来，不得不重新发动自己的进攻。有时我们的重新进攻刚在开始，又恰好遇到了敌人进攻的开始，把自己处在困难地位。所以开始准备的时机的选择，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断定这种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对自己方面，不可夸大过去胜利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足够地估计到过去胜利的影响。

但是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

准备阶段中的主要的问题，是红军的准备退却，政治动员，征集新兵，财政和粮食的准备，政治异己分子的处置等。

所谓红军的准备退却，就是说不要使红军向着不利于退却的方向，不要进攻得太远了，不要使红军过于疲劳。这是在敌人大举进攻的前夜主力红军的必要的处置。这时红军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创造战场，征集资材，扩大自己和训练自己的计划上。

政治动员是反“围剿”斗争中第一个重要问题。这即是说，明确、坚决而充分地告诉红军人员和根据地的人民，关于敌人进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敌人进攻危害人民的严重性，同时，关于敌人的弱点，红军的优良条件，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志愿，我们工作的方向等。号召红军和人民全体为反对“围剿”、保卫根据地而斗争。除开军事秘密外，政治动员是必须公开的，而且力求普及于每一个可能

拥护革命利益的人员。重要的关节是说服干部。

征集新兵须从两方面出发：一方面顾到人民的政治觉悟程度和人口情况；又一方面顾到当时红军的情况和整个反“围剿”战役中红军消耗的可能限度。

财政和粮食问题，不待说对于反对“围剿”是有重大意义的。要顾及“围剿”时间的可能延长。应当计算，主要的是红军，再则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整个反“围剿”斗争中物资需要的最低限度。

对待政治异己分子，不可对他们不警戒；但也不可过于恐惧他们的叛变，而采取过分的警戒手段。对地主、商人、富农之间是应该有分别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们说明，争取他们中立，并且组织民众监视他们。只有对极少数最带危险性的分子，才可以采用严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由轻敌而发生的对于准备的放松，和由被敌人进攻所吓倒而发生的惊惶失措，都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不良倾向。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节　战略退却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1]。

春秋时候，鲁与齐[2]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3]的叙述：

“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

---

[1]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14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的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参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

[2] 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722—前481）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省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693年至前662年鲁国的国君。

[3]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本文引的一段文章参见《左传·庄公十年》。

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1]

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2]、吴蜀彝陵之战[3]、秦晋淝水之战[4]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

[1]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和“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轼可以望远。

[2] 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公元208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3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带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个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4] 公元383年，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卫队3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8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我们的战争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根本没有经验。南昌起义[1]、广州起义是失败了，秋收起义[2]在湘鄂赣边界地区的部队，也打了几个败仗，转移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第二年四月，南昌起义失败后保存的部队，经过湘南也转到了井冈山。然而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个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立三路线以前的中央是承认了的。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

---

[1]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10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1928年4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2]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9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0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性，然而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十六字诀包举了反“围剿”的基本原则，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两个阶段。后来的东西只是它的发展罢了。

然而从一九三二年一月开始，在党的“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个包含着严重原则错误的决议发布之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向着正确的原则作斗争，最后是撤消了一套正确原则，成立了另一整套和这相反的所谓“新原则”，或“正规原则”。从此以后，从前的东西不能叫做正规的了，那是应该否定的“游击主义”。反“游击主义”的空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其第一阶段是军事冒险主义，第二阶段转到军事保守主义，最后，第三阶段，变成了逃跑主义。直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的遵义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这是费了何等大的代价才得来的啊！

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并且不放弃土地又能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在敌区或在我区敌区交界地方去打胜敌人不是更好些吗？过去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正规性，只是游击队使用的办法。现在我们的国家已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

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

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这里单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对此也没有任何的增加。

战略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军力，准备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处在强敌的进攻面前，若不退让一步，则必危及军力的保存。过去却有许多人坚决地反对退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反对是完全错误的了。

准备反攻，须选择和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若干条件，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然后进入反攻阶段。

依我们的过去情形说来，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

（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

（二）有利作战的阵地；

（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敌人疲劳沮丧；

（六）使敌人发生过失。

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根据地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比较一般的作战起了很大的变化，也是使后来敌人不得不采取堡垒主义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军队能够选择自己所欲的有利阵地，使进攻的军队不得不就我范围，这是内线作战的一个优良条件。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再则还要求好打的敌人，例如敌人疲劳了，或者发生了过失，或者该路前进的敌人比较地缺乏战斗力。这些条件不具备时，虽有优良阵地，也只得置之不顾，继续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条件。白区未尝无优良的阵地，但无优良的人民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也还未造成或未发现时，红军便不得不向根据地退却。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的分别，也大体是如此。

除地方部队和钳制兵力外，一切突击兵力以全部集中为原则。当着我们向战略上取守势的敌人进攻时，红军往往是分散的。一旦

敌人大举向我进攻，红军就实行所谓“求心退却”。退却的终点，往往选在根据地中部；但有时也在前部，有时则在后部，依照情况来决定。这种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红军主力完全集中起来。

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退却的最后一个要求，是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

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要这样做，退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条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说，须待这些条件完全具备方能举行反攻。要同时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必要。但依据敌人当前情势，争取若干必要条件，是以弱敌强的内线作战军队所应该注意的，在这上面的反对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决定退却终点究在何处，须以整个形势作出发点。在局部形势看来有利于我转入反攻，如果不是同时在全体形势看来也对我有利时，则据此决定退却终点，就是不正确的。因为反攻的开始，必须计算到以后的变化，而我们的反攻总是从局部开始的。有时退却终点应该选在根据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围剿”，陕甘第三次反“围剿”时。有时须在根据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有时则在根据地的后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这些都是将局部形势联系到整个形势来决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形势是由条件造成的；观察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的联系，应从当时敌我双方所具条件之见于局部的和见于全体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于我之开始反攻以为断。

退却终点，在根据地可以大体上分为前部、中部、后部三种。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绝在白区作战呢？不是的。我们拒绝在白区作战，仅仅指的对付敌军大规模“围剿”。敌我强弱悬殊，我们在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原则下，才主张向根据地退却，主张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造成或发现利于反攻的条件。如果情况并不这样严重，或者情况的严重性简直使红军连在根据地也无法开始反攻，

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势之变化时，那末，把退却终点选在白区也是应该承认的，至少在理论上是应该承认的，虽然我们过去很少这种经验。

白区退却终点大体上也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在根据地前面，第二在根据地侧面，第三在根据地后面。第一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如果红军没有内部不统一和地方党的分裂，即立三路线和AB团[1]两个困难问题存在，是可以设想在吉安、南丰、樟树三点之间集中兵力举行反攻的。因为当时从赣抚两河间[2]前进的敌人军力，比起红军来优势并不很大（十万对四万）。人民条件虽不如根据地，但阵地条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敌分路前进时各个把他击破的。第二种终点，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第三种终点，同样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敌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们也许被迫着退到会昌、寻乌、安远地区（那里是白色区域），引敌更向南进，然后红军由南而北向根据地内部打去，这时北面根据地内部的敌军当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这些说明都是假定，没有经验，可以作为特殊的东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则看待。对于我们，当敌举行大规模“围剿”时，一般的原则是诱敌深入，是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我们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

[1] AB团是1926年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2] 指江西省中部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产生不良影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则谓我退一步，敌之堡垒推进一步，根据地日蹙而无法恢复。如果说诱敌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垒主义的第五次“围剿”是无用的。对付第五次“围剿”，只能用分兵抵御和短促突击的方法。

回答这些意见是容易的，我们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市场交易，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果不丧失货物，也不能取得金钱。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丧失是破坏，而其取得是进步的建设。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亚的打硬仗，也得到丧失全国的结果，虽然阿国失败的原因不仅仅这一点。

危害人民的问题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如果依照“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拒绝对德和约时，新生的苏维埃就有夭折的危险[1]。

---

[1] 参见列宁《关于立刻单独媾和并签订割地和约问题的提纲》《奇谈与怪论》《严重的教训与严重的责任》《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等著作，和《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第七章第七节。

这种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的，一切依照当时具体情况看来对于当时的全局和全时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决定意义的一局部和一时间，是应该捉住不放的，不然我们就变成自流主义，或放任主义。退却要有终点，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这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当然，战略退却是有困难的。退却开始时机的选择，退却终点的选择，政治上对干部和人民的说服，都是困难问题，都必须给予解决。

退却开始时机的问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江西第一次反“围剿”时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种时机，即是说如果再迟，那至少我们胜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响的。退却过早和过迟，当然都有损失。但是一般地说来，过迟的损失较之过早为大。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这对于到达退却终点以后，整顿队势，以逸待劳地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江西粉碎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围剿”的战役，都从容不迫地对付了敌人。惟独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我们结束第二次反“围剿”的作战，七月一日蒋介石就开始了他们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仓卒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如何选择这个时机，全靠收集必要的

材料，从敌我双方大势上去判断，和前面说过的选择准备阶段的开始时机所用的方法一样。

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张国焘路线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1]地区不能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直待碰壁以后方才相信，也是实例。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需的，失败确是成功之母。但是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我们的战争吃这种亏是不少的。

人民由于没有经验而不相信战略退却的必要，莫过于江西第一次反对“围剿”的时候。当时吉安、兴国、永丰等县的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无不反对红军的退却。但是在有了这一次经验之后，在后来的几次反对“围剿”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了。大家相信，根据地的损失，人民的吃苦，是暂时的，大家都有了红军能够打破“围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与否，密切地联系于干部的信任与

---

[1]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分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说服干部。

战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于转入反攻，战略退却仅是战略防御的第一阶段。全战略的决定关键，在于随之而来的反攻阶段之能不能取胜。

第四节　战略反攻

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依靠于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比较敌人开始进攻时起了变化的形势，而这种形势是由各种条件造成的。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

然而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的存在，还没有使敌人失败。这种条件和形势，具备着决定胜败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败的现实性，还没有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这就是战略反攻阶段的全任务。反攻是一个长过程，是防御战的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就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所谓积极防御，主要地就是指的这种带决战性的战略的反攻。

条件和形势，不仅仅在战略退却阶段中造成，在反攻阶段中继续地造成着。这时的条件和形势，不完全和前一阶段中的条件和形势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

可以是属于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质的，例如，此时敌军的更加疲劳和减员，不过是前一阶段中疲劳和减员的继续。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条件和形势出现。例如，敌军打了一个或几个败仗，这时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就不仅敌军疲劳等等，而是增加了敌军打败仗这个新的条件了。形势也起了新的变

化。敌军调动忙乱，举措失当，两军优劣之势，也就不同于前了。

假使一个到几个败仗不是属于敌军，而是属于我军，那末，条件和形势的有利与否，也变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说，敌之不利减少，我之不利开始发生，以至扩大起来。这又是完全新的不同于前的东西。

无论何方失败，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败者方面的一种新的努力，就是企图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脱出这种新出现的不利于我有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而重新创造出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去压迫对方。

胜利者方面的努力和这相反，力图发展自己的胜利，给敌人更大的损害，务求增加或发展有利于我的条件和形势，而务求不让对方完成其脱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图。

所以，不论在何方说来，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反攻阶段中，问题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问题、速决战问题、歼灭战问题等。

这些问题的原则，不论对于反攻说来，或对于进攻说来，在其基本性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反攻就是进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进攻。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有若干的区别了。

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里把作战的许多问题统统说在战略防御的反攻部门中，而在战略进攻部门中只说些另外的问题，以避重复，但我们应用时，却不可忽略其相同点，也不可忽略其差异点。

第五节　反攻开始问题

反攻开始问题，即所谓“初战”或“序战”问题。

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为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江西反对敌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围剿”的作战给了我们以丰富的经验，研究一下这些经验不是没有益处的。

第一次“围剿”时，敌人以约十万人之众，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八个纵队向红军根据地进攻。当时的红军约四万人，集中于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

当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不过十万人，且均非蒋之嫡系，总的形势不十分严重。（二）敌军罗霖师防卫吉安，隔在赣江之西。（三）敌军公秉藩、张辉瓒、谭道源三师进占吉安东南、宁都西北的富田、东固、龙冈、源头一带。张师主力在龙冈，谭师主力在源头。富田、东固两地因人民受AB团欺骗一时不信任红军，并和红军对立，不宜选作战场。（四）敌军刘和鼎师远在福建白区的建宁，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敌军毛炳文、许克祥两师进至广昌宁都之间的头陂、洛口、东韶一带。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东韶有AB团，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六）张、谭两师是“围剿”主力军，“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约一万四千人，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七）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条件好，能荫蔽接近。（八）龙冈有优良阵地。源

头不好打。如敌攻小布就我，则阵地亦好。（九）我在龙冈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龙冈西南数十里之兴国，尚有一个千余人的独立师，亦可迂回于敌后。（十）我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后，敌之东西诸纵队便被分离为远距之两群。基于以上理由，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进剿”军二十万人，何应钦为总司令，驻南昌。（二）和第一次“围剿”时一样，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为最强或较强，其余均较弱。（三）AB团肃清，根据地人民全部拥护红军。（四）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从北方新到，表示恐惧，其左翼郭华宗、郝梦龄两师，大体相同。（五）我军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征集资材，便于打破下一次“围剿”。若由东向西打去，则限于赣江，战局结束后无发展余地。若打完再东转，又劳师费时。（六）我军人数较上次战役时虽略减（三万余），然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基于以上理由，乃决找富田地区的王金钰、公秉藩（共十一个团）打第一仗。胜利后，接着打郭、打孙、打朱、打刘。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当打王金钰时，处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距郭十余里，距蔡四十余里，有人谓我们“钻牛角”，但终究钻通了。主要因为根据地

条件，再加敌军各部之不统一。郭师败后，郝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主力军是蒋嫡系之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每师九团，共约十万人。次是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三师，四万人。次是孙连仲军，二万人。余均非蒋嫡系，较弱。（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上官指挥他自己的一个师及郝梦龄师）前哨接触。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

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对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则打成对峙，让其逃去了。

第四次“围剿”时的情况是：敌分三路向广昌进，主力在东路，西路两师暴露于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于宜黄南部地区，一举消灭李明、陈时骥两个师。敌从左路分出两个师配合中路再进，我又得消灭其一个师于宜黄南部地区。两役缴枪万余，这个“围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却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年之久，绝无自主活跃之概。最后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时期我军作战的经验，证明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

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否则宁可退让，持重待机。机会总

是有的，不可率尔应战。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只有第五次反“围剿”时全不知初战关系之大，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从挽救的企图出发，北上就敌，于洵口不预期遭遇战胜利（消灭敌一个师）之后，却不把此战看作第一战，不看此战所必然引起的变化，而贸然进攻不可必胜的硝石。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最坏的打法。

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例如第五次“围剿”时的洵口战斗）。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假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虽结果不见得乃至决不会尽如所期，然而必须依据双方全局，仔细地切实地想明白。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若只顾反攻，不顾反攻

胜利后，或万一反攻失败后，下文如何做法，依然未尽得战略指导者的责任。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尽管往后变化难测，愈远看愈渺茫，然而大体的计算是可能的，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然而贯通全战略阶段乃至几个战略阶段的、大体上想通了的、一个长时期的方针，是决不可少的。不这样做，就会弄出迟疑坐困的错误，实际上适合了敌人的战略要求，陷自己于被动地位。须知敌人的统帅部，是具有某种战略眼光的。我们只有使自己操练得高人一等，才有战略胜利的可能。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张国焘路线的战略指导之所以错误，主要地就在于没有作到这一点。总之，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

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是反攻开始，即打第一仗时，不可忘记的三个原则。

第六节　集中兵力问题

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

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

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

防御战本来容易陷入被动地位，防御战大不如进攻战之能够充分地发挥主动权。然而防御战是能够在被动的形式中具有主动的内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动阶段转入形式上内容上的主动阶段的。完全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内容上是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是诱敌深入，准备反攻。只有不肯退却，仓卒应战（例如硝石战斗），表面上似乎在力争主动，实际上是被动的。战略反攻，则不但内容是主动的，形式上也放弃了退却时的被动姿态。对于敌军说来，反攻是我军强迫它放弃主动权，同时即给以被动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达到这种目的，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都是必要的条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就达到了，也给予影响于全战役。

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上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阶段，即“攻”的阶段。虽然在整个战略防御中并没有脱离防御性质，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较，不但形式上，而且内容上，是起了变化的东西。反攻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之间的过渡的东西，带着战略进攻前夜的

性质，集中兵力就为达此目的。

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国红军的战史中，这个问题常常成为重要的争论问题。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

从一九三二年开始，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西南北四面出击。这不但在战略防御时不对，就是在战略进攻时也是不对的。在整个敌我对比的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的时候，无论战略或战术，都有防御和进攻、钳制和突击的两方面，事实上绝少所谓全线出击。全线出击的口号，是伴随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

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

能取得的最大胜利。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一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宁都县东韶地区打谭道源的作战，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一九三二年七月广东南雄县水口圩地区打陈济棠的作战，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江西黎川县团村地区打陈诚的作战，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如像水口圩和团村这一类的仗，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前者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后者击溃陈诚十二个团），然而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

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由于看不见根据地人民的力量，常常发生惧怕红军远离根据地的错误心理。这种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红军远出打福建的漳州时，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后红军转向福建进攻时，都曾发生过。前者惧怕整个根据地被占，后者惧怕根据地的一部被占，而反对集中兵力，主张分兵把守，结果都证明不对。在敌人看来，一方面根据地使他们畏进，一方面打到白区去的红军是他们的主要的危险物。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在红军实行防御时，敌人的注意力也还是集中于红军。缩小根据地的计划是敌人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红军集中主力消灭其一路，敌军统帅部就不得不把他们的注意力和他们的军力更大地向着红军。所以，敌人缩小根据地的计划，也是能够破坏的。

“堡垒主义的五次‘围剿’时期我们不能集中作战，只能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敌人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作战法，完全是红军自己的节节抗御促成的。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

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并不包括放弃人民的游击战争在内。立三路线主张废弃小的游击战争，“一枝枪也集中到红军中去”，早已证明是不对的了。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看来，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

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

置红军的支队于次要的作战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仗，集中四万人打张辉瓒的九千人。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第二次反“围剿”的最后一战，向建宁打七千人的刘和鼎师，红军只用了一万多人。

也不是说每次都要优势兵力。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用相对劣势或绝对劣势兵力出现于战场。相对劣势，例如某一区域仅仅有一支不大的红军（不是有兵而不集中），为着打破某一优势敌人的进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条件能给我们以大的援助时，以游击队或小支队钳制其正面及一翼，红军集中全力突然袭击其另一翼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可以胜利的。当我袭击其一翼的一部分时，兵力的对比仍适用以优势对劣势、以多胜少的原则。绝对劣势，例如游击队袭击白军大队伍，仅仅是袭击其一小部分，同样适用上述的原则。

集中大军于一个战场作战，受限制于地形、道路、给养、驻处等的说法，也应分别情形去看。这些限制，对于红军和白军是有程度上的区别的，因为红军较之白军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难。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敌人一般地都摸熟我们的脾气了。然而

敌人不能取消我们的胜利，也不能避免他们的损失，因为何时何地我们这样做，他们不晓得。这一点我们是保守秘密的。红军的作战一般是奇袭。

第七节　运动战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的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地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得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种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生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相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将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

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且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的。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

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是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动，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单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军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不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的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不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

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实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到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用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军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围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现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第八节　速决战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1]，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响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离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

---

[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8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3句至5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4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4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8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急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在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对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里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大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战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又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

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第九节　歼灭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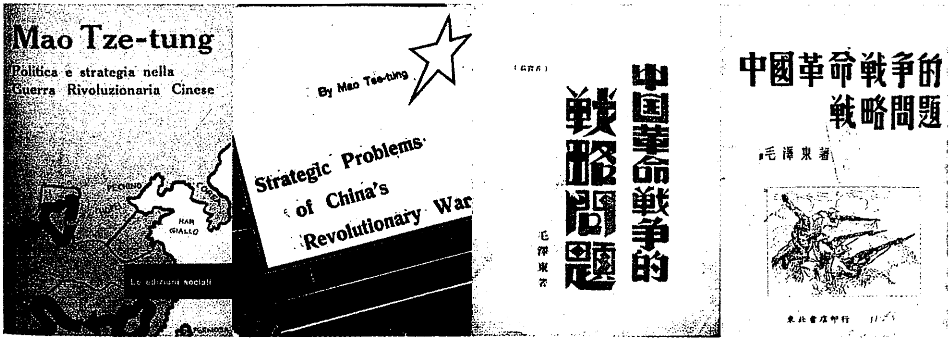
“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义，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有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Mao Tze-tung
Politica e strategia nella Guerra Rivoluzionaria Cinese
PECHINO
COREA
MAR GIALLO
Le edizioni sociali
By Mao Tse-tung
Strategic Problems of China's Revolutionary War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著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著
東北書店印行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分版本)。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

（1936年1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2]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3]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4]精兵。

---

[1] 给丁玲同志，1936年夏，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逃离被国民党囚禁3年多的南京，秘密经上海、北平、西安于11月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孔大窑洞里开会欢迎她，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答“当红军”。她随后就到前方总政治部工作。毛泽东因此写这首词送她。丁玲（1904—1986），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2] 保安，在陕西省西北部，当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1936年改名志丹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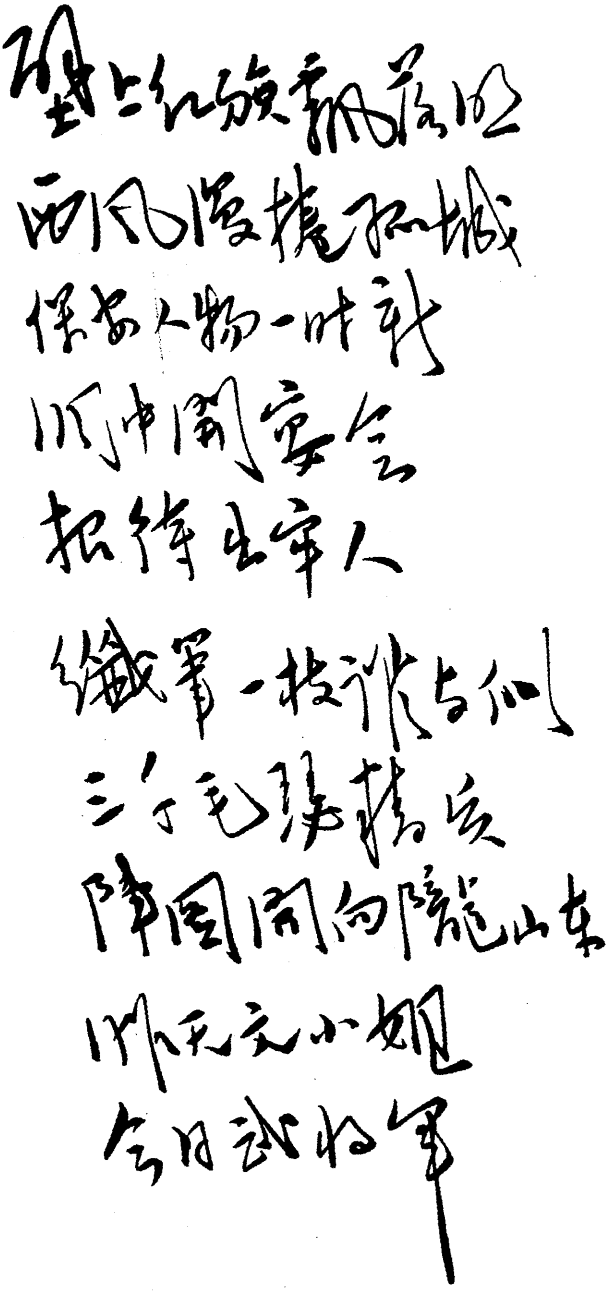
[3] 纤笔，细致描绘的笔，指丁玲的文笔。

[4] 毛瑟，德国毛瑟工厂所制造的步枪和手枪。孙中山在1922年8月24日《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

阵图开向陇山[1]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

[1] 陇山，在陕西省陇县西北，延伸于陕甘边境。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開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陣圖開向隴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为李治题词[1]

（1936年）

李治不能死！

毛泽东

---

[1] 李治（1899—1989），原名李圣治，又名李守镜，江西省永新县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卫生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长征中，曾救治过周恩来和贺子珍。长征胜利后，李治患重病，昏迷不醒。毛泽东除了派优秀医生给他治疗外，又委托贺子珍去看望他，并送给他亲笔写的字条："李治不能死！　毛泽东"

1937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

准备对付亲日派进攻[1]

（1937年1月1日）

周、博，并告彭、任[2]：

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李毅、进攻西安之危险。昨日何应钦[3]令刘峙[4]将复员各军原地停止，举行演习。本日何令李默庵[5]，称张杨已与红军联合，形势紧急，该军应以演习为名，秘密向洛南前进。政局已起变化，请立作如下处置：

---

[1] 1936年12月25日，被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在张学良陪同下返回洛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监禁张学良，并调集25个师部署于陕甘，从1937年1月起，重新逼近西安。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积极备战，准备支援东北军、第十七路军打退国民党军“讨逆”军的进攻。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和博古（秦邦宪）的电报。

[2]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国民党军“讨逆”军总司令。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总司令。

[5]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十师师长。

甲、与杨王[1]筹商团结对敌。

乙、秘密通令东北西北两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

丙、布置渭河北岸及渭南、洛南、商县、蓝田之阵地，为坚守计。

丁、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

戊、加紧晋、绥[2]、川、桂、直、鲁之活动，反对内战。

己、布置张杨之后方。

毛泽东

一日二十四时

---

[1] 杨，指杨虎城。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去南京后，在西安他是东北军的实际主持者之一。

[2]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1]

（1937年1月1日）

汉年同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委员长新政策之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此仅于政学系[2]及日本有利，将给民族、国家及国民党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3]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

---

[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当局就红军的驻地、给养等问题进行谈判。本篇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2] 政学系，是对1916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政学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也被称为“新政学系”，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

[3] 陈立夫，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经济委员会主席。孙哲生，即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冯焕章，即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洽，并以结果电告。

又红军全部已集结训练，静待划定防地，准备抗日，绝无扰乱中央军及侵入国民党区域之企图。

毛　周

东午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日）

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发展。

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通电拥蒋迎张揭破何应钦阴谋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2日）

周、博：

甲、昨夜二局通报李默庵转何应钦世申电，中间脱落“中央派大员往前方改编，为使该部易于就范，应充分为军事之准备”。

乙、南京以王树常代李毅之阴谋已极明显。

丙、应立即通电拥蒋迎张反王，并准备以王以哲或于学忠代张职，着重揭穿何应钦之阴谋。因目前数日内敌布置还在秘密，最怕事先揭穿。

丁、速谋张、杨、我三军之团结。

毛泽东

一月二日十二时

谈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和我们的方针[1]

（1937年1月2日）

自张学良被扣留南京的消息传出后，西安左派要积极起来，同时右派也要积极起来。南京方面，左派在奋斗中，亲日派也在大大活动。蒋介石的态度还不甚清楚。目前局势在混乱中，亲日派与各个右派结合起来，他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弄坍西安，正向西安进军。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是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以下两点是不变的：一、与西安合作；二、打击亲日派，争取中间派。至于蒋介石是否能改变态度，还要看一看。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和张宗逊的谈话[1]

（1937年1月3日）

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抗日，但还会有斗争。

释放蒋介石是对的，有人[2]主张杀掉蒋介石是不对的，杀了蒋介石有利于亲日派，不利于抗日。

---

[1] 1937年1月3日，张宗逊率红军大学学员到保安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学校的情况。毛泽东和他谈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后有关蒋介石飞回南京的情况。这是谈话的部分内容。

[2] 指张国焘。

十五军团应出陕南

（1937年1月3日）

彭、任[1]：

十五军团出陕南有如下理由：

（一）该地为影响数省之战略区域，为敌进攻之一翼。该军向陕南，不但可打击正向洋县集中之万耀煌王耀武[2]两师，且可钳制正向商县进攻之李默庵李铁军[3]，以保障西安右翼。

（二）与陈先瑞[4]配合，扩大苏区，扩大红军。

（三）敌遇我军消灭其一个师左右，该战场之敌必立即停顿，我集中大兵无所用之。故十五军团出陕南有助于主力而不妨碍主力之作战。

毛泽东

三日二十时

---

[1]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万耀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十纵队指挥官兼第十三师师长。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第十纵队第五十一师师长。

[3] 李默庵、李铁军，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讨逆”军东路集团军第十师师长和第九十五师师长。

[4] 陈先瑞，当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在陕南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关于罗炳辉部配合东北军作战等问题致王以哲电

（1937年1月3日）

鼎方兄：

（甲）时局变化，亲日派回师进攻我抗日联军，惟有万众一心，巩固团结，坚决作战，争取最后之胜利。

（乙）罗炳辉军明四日从大水坑向固原附近开进，配合兄部作战，大概五天至七天可达固原附近。

（丙）我二十九军在定盐一带，一部向宁夏钳制马鸿逵，我独立师在三岔一带，我红军大学附属步兵学校在庆阳，请饬贵军与之连结。

弟　毛泽东叩
江亥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5日）

周、博：

南京报复派现在没有政治口号，只能偷偷摸摸地干，希望吓一吓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等吓得就范，然后慢慢宰割，孤立红军。目前只要三方面[2]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你们速发拥蒋迎张通电。我们把朱老总谈话在上海散播。彭、任[3]速令十五军团出陕南。

洛甫　泽东

1月5日21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援救张学良给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的电报。

[2] 指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

[3] 指彭德怀、任弼时。

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5日）

周、博：

（甲）基本上同意你们商定的军事计划。

（乙）十五军团第一步到西安西南地区集结待命，准备或出东江口或出商县。

（丙）野战军主力集中旬邑、淳化地区待命。

（丁）请周注意补充二、四方面军的子弹，并发给十五军团一万五千元至二万元经费。

毛　朱　张

一月五日二十时

关于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5日）

周、博：

汉年四日由南京来电转上，他与张冲即来西安，关于此事处置我意如下：

甲、蒋、宋[1]责备我们宣布西安协定无信义，我们回答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破坏信义。

乙、同意南京用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善后问题，但须在下列条件之下。

一、立即撤兵。

二、立即释张学良回陕。

三、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

丙、两党关系，三大纲〔领〕已与蒋、宋磋商，并已明白为蒋、宋所承认，细目委潘汉年全权接洽，恩来无去南京之必要。但在撤兵释张改组政府实行后，即证明南京尚愿顾全信义时可去南京一行，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

---

[1] 蒋、宋，指蒋介石、宋子文。

丁、请在汉年、张冲来西安前，预先考虑并望飞告。

戊、电台应时刻联络。

毛泽东

五日二十二时

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致潘汉年电

（1937年1月5日）

汉年同志：

恩来在西安与宋子文及蒋介石商定之条件：（一）停战撤兵。（二）初步改组南京政府，三个月复彻底改组。（三）释放政治犯，保证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划定防地，供给军费，苏区照旧，共党公开。（五）联俄并与英美合作。（六）西北交张学良处理。

宋子文要我派代表在上海与他接洽，你应速找宋子文弄清南京近日之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上述诺言。

洛　毛

五日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5日）

向张冲表示，只要南京军不开火，红军决不向南京军开火，仍处于调人地位。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迎张[1]

（1937年1月6日）

周、博：

甲、目前中心在坚决备战，拒顾[2]迎张[3]。

乙、顾来则张杨[4]两部全被宰割，红军将被迫登山。

丙、张杨两军速筑坚固阵地，红军担任野战，坚决为保卫西北革命局面奋斗到底，不为南京和平空气所松懈。如此干法才能求得和平，广西前事可证。

丁、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张学良去宁[5]已上了大当。

洛　泽

六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的电报。

[2] 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主任、国民党军“讨逆”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

[3] 张，指张学良。

[4] 杨，指杨虎城。

[5] 宁，指江苏南京。

野战军集中后的工作

（1937年1月7日）

周、博，彭、任[1]：

甲、野战军十号全部在耀县、三原、咸阳集中后，应于十二日以前（愈快愈好）完成下列工作：

（一）款项、弹药、被服、交通、通讯器材、军用地图及书报等交与应补充之各兵团，款项须发足两个月三十万元（对外说一个月）。

（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解释政治任务，鼓动作战。

（三）解释对友军[2]关系。

（四）解释地方工作方针，严整群众纪律。

（五）努力扩红。

以上五项请彭任办理，并须深入战斗员。干部会议如可能时，拟请周博或罗瑞卿[3]分往三原、咸阳参加。

乙、准备以主力（拟一、四方面军）出商洛[4]，控制陕豫鄂边

---

[1]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友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

[3] 罗瑞卿，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协助中共代表工作的成员。

[4]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境，留一部于渭北（拟二、四方面军），战略上突破敌人包围形势，使平汉[1]陇海两路暴露于我面前，迫蒋[2]就范。此项周办理。如何望复。

毛泽东

七日二十二时

---

[1]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2] 蒋，指蒋介石。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给刘少奇的指示*

（1937年1月7日）

胡服：

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如下：

（一）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但事变发生后，本党即通电主张和平解决。

（二）本党对一切足以引起内战的行动，一律反对，故一方面反对南京的剿共内战政策，而对张杨亦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办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

（三）蒋之释放，张之赴京，以及南京政府对此案之处置，本党也认为是南京内部的问题。本党站在公正的立场，赞同一切使事变引向和平解决的办法，反对使事变引向纠纷，便利日本帝国主义。

（四）为使中国从此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本党主张南京政府在张氏特赦之后，即应命令张回陕，率领东北军及西北全部军队开赴抗日前线，实现蒋氏、张氏共同救国的意见。

（五）但如南京政府不顾国家民族的整个利益，在特赦令之后，仍将张氏幽禁于南京，并将已撤退之军队重新开回，企图以武力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则内战之祸必将继起。这种内战应由南京政府完全负责。

（六）本党将继续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而奋斗，反对日寇及亲日派挑拨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本党这种主张，虽为全国人民所拥护，但总是遭日寇及亲日派所反对。因此，我们成了日寇及亲日派的攻击目标，并以此作为造成灭亡中国的“防共”协定的资本。

中央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7日）

西路军现占领高台、临泽，令其暂时在该地停住。但二马骑兵扰击甚紧，子弹十分缺乏，希望派飞机送子弹去，如有可能请设法运送十万发。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维埃中央政府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

（1937年1月8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奉化蒋介石先生，各省党、政、军首长，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公鉴：

自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亲日派，均认为千载良机，以“拥蒋”为名，挑拨内战，以遂其灭亡中国之阴谋。当时本党、本政府及全国人民，南京与各省抗日志士，均主张和平解决，以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卒因蒋介石先生之接受张、杨二先生之抗日主张，张、杨二先生亦均以国家民族为重，致内战之祸，幸而得免。本党、本政府深庆国内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从此完全实现，红军主力亦正准备接受抗日命令，开赴前线，参加抗战。然而日寇与亲日派终不愿中国真正和平统一，见诸事实，当蒋介石先生一返南京，形势突趋险恶，在日寇援助下，亲日派一面扣留张汉卿先生，一面指挥已奉蒋先生命令正在撤退之中央军又向西安进攻，企图爆发空前之内战，为日寇效忠。日寇与亲日派的阴谋毒针，凡属国人，已洞若观火。当此危急关头，本党、本政府站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立场，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肃清亲日派，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本党、本政府认为此时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

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这对于蒋先生是可能的，因为今天参加进攻西安的中央军均愿听命于蒋先生；这对于蒋先生也是必要的，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之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今日中国人心之向背，已显而易见，一切甘冒不韪、投降日寇之亲日分子，必将自趋于毁灭之途。全国人民团体与舆论机关，各武装部队，尤其是蒋介石先生及当权之国民党诸公与其大多数党员，亟宜一本救国至诚，起而裁制亲日派分子，化内战为抗战，此其时矣。临电不胜企祷之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一月八日

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可分三步出击

（1937年1月8日）

彭、任[1]：

甲、到三原后，准备休息三天，情况许可，再延长至五天或七天，请规定工作日程。十五军团在咸阳亦然。

乙、如敌决心开战，红军主力应以第一步出商洛[2]，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汉路为上策。如此方能改变整个局势，分化南京，迫蒋就范。留二方面军在渭北策应友军[3]在内线作战。尔后内线之红军与友军同外线之红军主力互相策应为战略上之配合作战。但目前争取在三原、咸阳多休息几天，不致和平被敌人破坏，一时不向东出动。

毛泽东

八日二十四时

---

[1]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2]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3] 友军，指国民党军东北军和西北军。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 年 1 月 8 日）

解放社昨日广播过于尖锐，在没有开火以前，要着重要求南京撤兵释张，和平解决，攻击的锋芒放在少数亲日派身上。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力主和平避免内战保持西北目前局面[1]

（1937年1月9日）

周，并告彭、任：

甲、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2]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

乙、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商县方面加派杨部一团固守，但十五军团准备休息三天后开至商县待机。

洛　毛

九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并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和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杨，指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孙，指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缪，指缪澂流，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刘，指刘多荃，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杜，指杜斌丞，当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黄，指黄显声，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副军长。

关于周恩来给蒋介石的信的内容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9日）

周、博：

汉年出去及周致蒋信内容：

（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限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帮助日本大损中国。及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

（乙）撤兵组府请蒋一力主持不为外方所阻挠。

（丙）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

（丁）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戊）措词不可太尖锐并须有恭维蒋初出时撤兵赦张顾全大局甚可钦佩的话，把主战责任放在何应钦一人身上，以留转圜余地。

（己）汉年，可多留一二天不必明日就去，以利军事布置。

洛　毛

九日十四时

红军主力以出商洛为宜

（1937年1月11日）

周、博[1]，并告彭、任[2]：

过细考虑，红军主力以出商洛[3]为宜。该路击破即可转入豫西，敌中右两路无能为矣。使用二方面军及二十七军[4]于蒲城，威胁陈诚[5]集团之翼侧，使之不敢猛进，协助我主力在商洛之成功。请即取得杨[6]之同意。如主力用于渭北，则战略上全处被动地位，战术上亦有许多困难，如彭任所顾虑者，故不宜取此方针。

毛泽东

十一日二十一时

---

[1] 周、博，指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

[2] 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4] 二十七军，指1936年12月组建的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王平。

[5]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讨逆”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6] 杨，指杨虎城。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1月15日）

一

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

二

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2]、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延安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金融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的条件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16日）

周、博：

（甲）杨、于即日通电就职。

（乙）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以后留出再退一步之余地。

（丙）条件中主要者为：

（一）张回陕，顾驻洛。

（二）华县以西属张、杨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

（丁）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洛　毛

十六日二十四时

关于准备对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及要求张学良回陕等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18日）

周、博：

（甲）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

（乙）南京已宣传陕北〈变〉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于、孙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洛　毛

一月十八日十四时

对张宗逊的指示[1]

（1937年1月19日）

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

---

[1] 毛泽东任命张宗逊兼任甘泉警备司令。赴任前，张宗逊向毛泽东请示工作。这是毛泽东给张宗逊的指示。

致周恩来、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电

（1937年1月20日）

周、博，彭、任：

上海十五日情报：

一、京息：十二月二十七日蒋到京后，即会表示张、杨八项主张除容共联俄外，余可交三中全会讨论，又云暂时可由汪精卫过渡行政院长以后是否由宋子文长行政院，要看英美派如何做法而定，检查过去消息，仍可作参考。

二、十六晚京息：以前力主扣留张的何应钦，现亦云要放张回西安，因西安已赤化，不在乎一个张学良。

三、蒋表示谋和平解决西安，而不改变反共政策，京方以杨、张软化东北军、西北军。以赤化相恐吓，令与红军分裂。

四、汪现有上台过渡形势。

五、陈诚已去山西布置军事，以胡、关二部包围于学忠，杨等从绥撤陕，中央军对山西红军部队作孤〈弧〉形包围。

六、二宋[1]仍在奉化。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十八时

---

[1] 指宋子文、宋美龄。

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的演讲[1]

（1937年1月20日）

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磨他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钢刀，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

[1]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第二校由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第二学期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一部分。

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题词

（1937年1月20日）

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毛泽东

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题词

忠诚党的教育
事业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第二期教职工的题词。

给马海德的信[1]

（1937年1月20日）

马海德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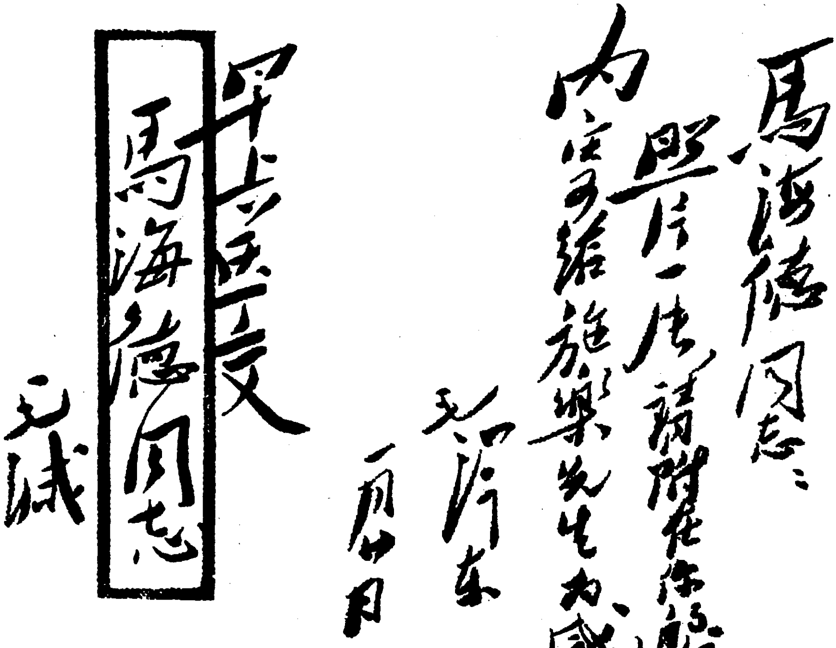
照片一张，请附在你的信内寄给施乐先生为感。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

---

[1] 1937年1月20日，毛泽东写信给马海德，请他将一张有自己签名的照片转给斯诺。



馬海德同志：

照片一張，請附在你的信內寄給施樂先生為感。

毛澤东

一月廿日

軍[illegible]医交

馬海德同志

毛緘

毛泽东致马海德信的手稿。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1日）

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二十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谈判原则和军事部署[1]

（1937年1月21日）

周、博，并告彭、任：

甲、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2]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

乙、无论和战，应使杨、孙、何、王、于、缪、刘[3]及左派自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并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军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1936年12月12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3] 杨，指杨虎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孙，指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骑兵军军长。王，指王以哲，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于，指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缪，指缪澂流，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刘，指刘多荃，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军第一〇五师师长。

已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

丙、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除二方面军留渭北外，其余应准备在数日内向南出动。请即调查山阳、柞水、镇安、旬阳、安康、紫阳、汉阴、石泉等城驻军情形，并要求杨同意让出各该县。

丁、西路军东进，徐陈电[1]士气尚旺，十天可达古浪。如该军不再遭挫折，尔后当位于文、武、成、康[2]地区。如此，我主力在陕南、甘南，便可破坏南京把联军围困于渭水以北之计划。

戊、汉年[3]从南京来长电述蒋[4]答复周信之意见，内容与米春霖李志刚[5]所述略同，我们复电要求保证。

洛　毛

二十一日二十时

---

[1] 指1937年1月21日红军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相机取凉、古接通兰州，增援抗日联军之目的，决今晚全军集结出动走南大路，以十天行程到达古浪、土门地区，尔后向平番或靖远集中。

[2] 文、武、成、康，指甘肃文县、武都、成县和康县。

[3] 汉年，即潘汉年，1936年至1937年任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代表。

[4] 蒋，指蒋介石。

[5] 米春霖，曾任国民党军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李志刚，当时是杨虎城派驻南京的代表。1936年12月下旬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南京遭扣留后，为营救张学良，杨虎城曾于1937年1月派米、李分别代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由西安飞往南京进行交涉。

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

（1937年1月21日）

汉年同志：

电悉。

（甲）我们自始即主张和平，决不愿意战争。

（乙）但南京讨伐与剿共空气又形高涨，刘峙[2]谈话尤为显然，不能不令人怀疑是否确有团结对外之诚意。

（丙）我们可保证，一方面红军只要有适当驻地与相当给养，不但不向白区作任何攻击行为，而且停止打土豪，目前红军已实行此两点。另方面可向西安当局进言，服从蒋先生及南京。杨、于、孙[3]已通电就职并取消临时组织。剩下仅一适当分配防区与张汉卿回陕问题，此须蒋先生从大处着眼，采取适当办法以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心。蒋能如此，我们当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不但在西北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赞助蒋先生，团结各方一致对外，但蒋先生须给我们以具体的保证。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主任。

[3] 指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

（丁）我们要求蒋先生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望与蒋先生商量这种保证问题。

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三七年一月马亥

和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1]

（1937年1月22日）

汉年同志：

本日十一时电悉。答复如次：

甲、红军干部所担心的是继续“剿共”战争的危险问题，这种可能如果存在，则红军束缚于渭水黄河之间是危险的。因为现有红军实数即照过去一样仅发很少的伙食钱，每月也需五十余万元，以后停止打土豪将决无办法，这是第一。庆阳、淳化、富县、延安等县粮食极少，多兵久驻，亦绝无办法，这是第二。因此要求：第一，蒋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对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我们并不要求商洛大道及汉中等要地，但请指定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上述各县本来大部是苏区。至红军主力则请指定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2]、旬邑、淳

---

[1] 由于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一致要求，由于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了对付国民党军“讨逆”军的充分准备，西安事变后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终于得以制止。中国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及红军驻地、给养等问题进行谈判。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2] 西峰，旧镇名，即今甘肃西峰市。

化、中部[1]、洛川、富县、甘泉、肤施[2]、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3]等十五县三镇[4]。我们本来拟请蒋调去陕北二高[5]及宁夏马鸿逵[6]，以其防地让与红军，但在目前恐增加蒋之困难，留待将来可能时再商。此外红军在肃州[7]附近部队，现亦因粮食困难，不得不东回，并非增援西安，请蒋勿误会。并商蒋如能停止马步芳[8]进攻，则令马军让出凉州[9]以西各城，使其有粮可食，该军自可停止东进。如蒋同意，则请速办。

乙、对张杨[10]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确定爱护政策，其方式宜表现在防地分配及对张杨二人之待遇上。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他们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的，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他们现在所顾虑的，完全在事件解决后，抗日主张实现与部队之保存恐无保证，蒋应于此点施以宽大，以安其心，在共同对付日本与汉奸面前，是决不会也不能与蒋分歧的。

---

[1]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2] 肤施，旧县名，即今陕西延安。

[3] 瓦窑堡，镇名，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安边，位于今陕西定边县东部，1935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曾置安边县，1949年10月撤销。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4] 按原文所列是十五县两个镇。

[5] 二高，指高桂滋、高双成，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和第八十六师师长。

[6]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路军总司令、“讨逆”军第三预备军总司令。

[7] 肃州，旧府名，即甘肃酒泉。

[8]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军长。

[9]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10] 张，指张学良，当时已被蒋介石扣押。杨，指杨虎城。

丙、向蒋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二日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要求蒋介石执行的条件[1]

（1937年1月22日）

汉年[2]同志：

甲、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3]以宽大，以安其心。

乙、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

（一）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

（二）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之给养。

---

[1]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监禁了张学良，并调集25个师部署于陕甘，从1937年1月起重新逼近西安。与此同时，派人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返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豫皖，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在周恩来的斡旋说服下，杨虎城表示可以接受甲案。本篇是周恩来和毛泽东就和谈问题给驻南京的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的电报。后蒋介石托宋子文答复潘汉年，同意联合抗日。

[2] 汉年，即潘汉年，1936年至1937年任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国民党当局进行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谈判的代表。

[3]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三）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可不驻商洛[1]）因为合水、庆阳、正宁、淳化、富县、肤施[2]等地，粮食十分缺乏，以后可移驻别处。

（四）请令马步芳[3]停止进攻河西红军[4]。

丙、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以便很好的准备抗日，要求蒋亲笔答复恩来一信，我们可保证绝对守秘密，因为红军干部尚有许多怀疑者。

丁、西安现没有什么变化，红军亦未宣传与张、杨联合。西安供给了一个月经费，因此红军停止了打土毫〈豪〉。亲日派的造谣，蒋不应相信。

戊、美国女记者斯密特莱，西安事变后在西安所作的错误宣传，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该记者现来苏区，当劝其谨慎发言。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二日午

---

[1] 商洛，指陕西省商州和洛南。

[2] 肤施，即今陕西省延安。

[3]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军长。

[4] 河西红军，指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在黄河以西作战的西路军。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3日）

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接应西路军东进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1月24日）

一

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发言的一部分。

二

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1月25日）

全部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每月伙食费至少需一百万元。如照国民革命军待遇，发给薪饷再加购买费，每月至少一百二十万元。徐向前部如在河西，可照蒋意在凉州以西，但请蒋电劝马步芳让出凉州、肃州等城，以便就食，并令马部停止攻击徐部，如向河东开则另外指定防地，此点望速复。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红军经费等问题致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要蒋介石手书消除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1]

（1937年1月25日）

汉年同志：

电悉。

（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

（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旦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

（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2]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毛泽东　周恩来

有午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

[2] 指马步芳的军队。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1月25日）

立即准备退出西安的一切事情。

现在一切工作应放在退出西安后可能发生的新战争或新压迫的基点上去布置。西安退出后，应注意张、杨两军内部间以及与我们间进一步团结，而避免可能的分化与分歧。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目前谈判要点等问题致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电

（1937年1月26日）

周、博、王：

（甲）目前谈判要点，在要求陕甘不驻多兵与红军一部驻陕南，后者由汉年交涉，前者应由杨向顾祝同严重提出，要求不超过十个师至低不超过事变前数目。蒋如有不继续战争的诚意，无拒绝此点之理由。

（乙）严重注意左派的过左情绪，宜由左派中明白分子自己说服左派，我们不宜说得过多。

（丙）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时

致潘汉年电

（1937 年 1 月 26 日）

汉年同志：

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六日

关于对南京让步说服左派撤兵致张闻天、周恩来等电

（1937年1月27日）

洛，周、博，王，彭、任各同志：

（甲）无论从那一面说，主要的从政治方面说，均〔不〕应对南京让步。

（乙）全力说服左派实行撤兵。

（丙）十五军团亦准备撤退。

（丁）和平解决后，三方面团结一致，亦不怕可能发生的新的战争。

毛　朱　张

二十七日二十时

（1937.1.）

致潘汉年电

（1937 年 1 月 27 日）

汉年同志：

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毛泽东

二十七日

致周恩来、博古等电[1]

（1937年1月28日）

罗、宋[2]所部可出平凉。西路军东进至山丹的沙河堡，敌集中防堵，又不能东进，在该地回旋一时期，相机消灭敌人。近日打一胜仗，缴枪二百余枝。请与王以哲交涉，罗、宋所部开至平凉附近策应，防胡宗南军由天水东进。和平解决后，罗、宋可由平凉向兰州以西策应西路军。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罗，指罗炳辉，当时任红三十二军军长。宋，指宋时轮，当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29日）

蒋介石令胡宗南绕过难攻的据点，向西安进迫，已达静宁、会宁地区。

判断蒋意，仍以军事威胁求不战解决问题，因正面不好进，故从天水、汉中两方前进，威胁西安，以此尚有相当时间，以利交涉与说服左派。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决定放弃陕南驻兵要求致潘汉年电

（1937年1月29日）

汉年同志：

（甲）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与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步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乙）关于北军北路军[1]撤兵问题，见另电。

毛泽东　周恩来

二十九日午

---

[1] 另一份文件此处为“东北军十七路军”。

为《红色中华》报的题词

（1937年1月29日）

努力学习。

为徐特立[1]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1937年1月30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2]，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

---

[1]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2] 徐特立1913年至1919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求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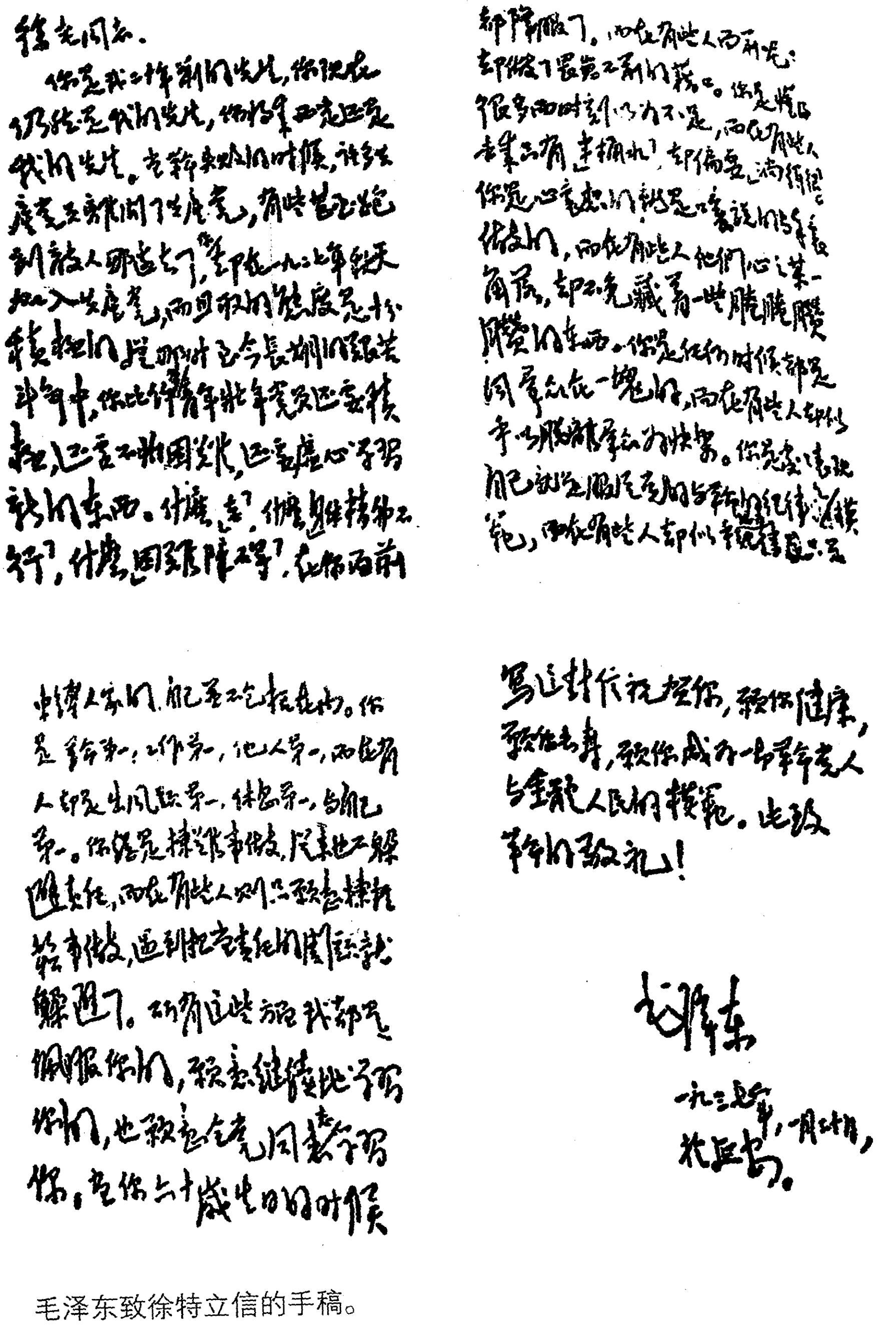
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徐老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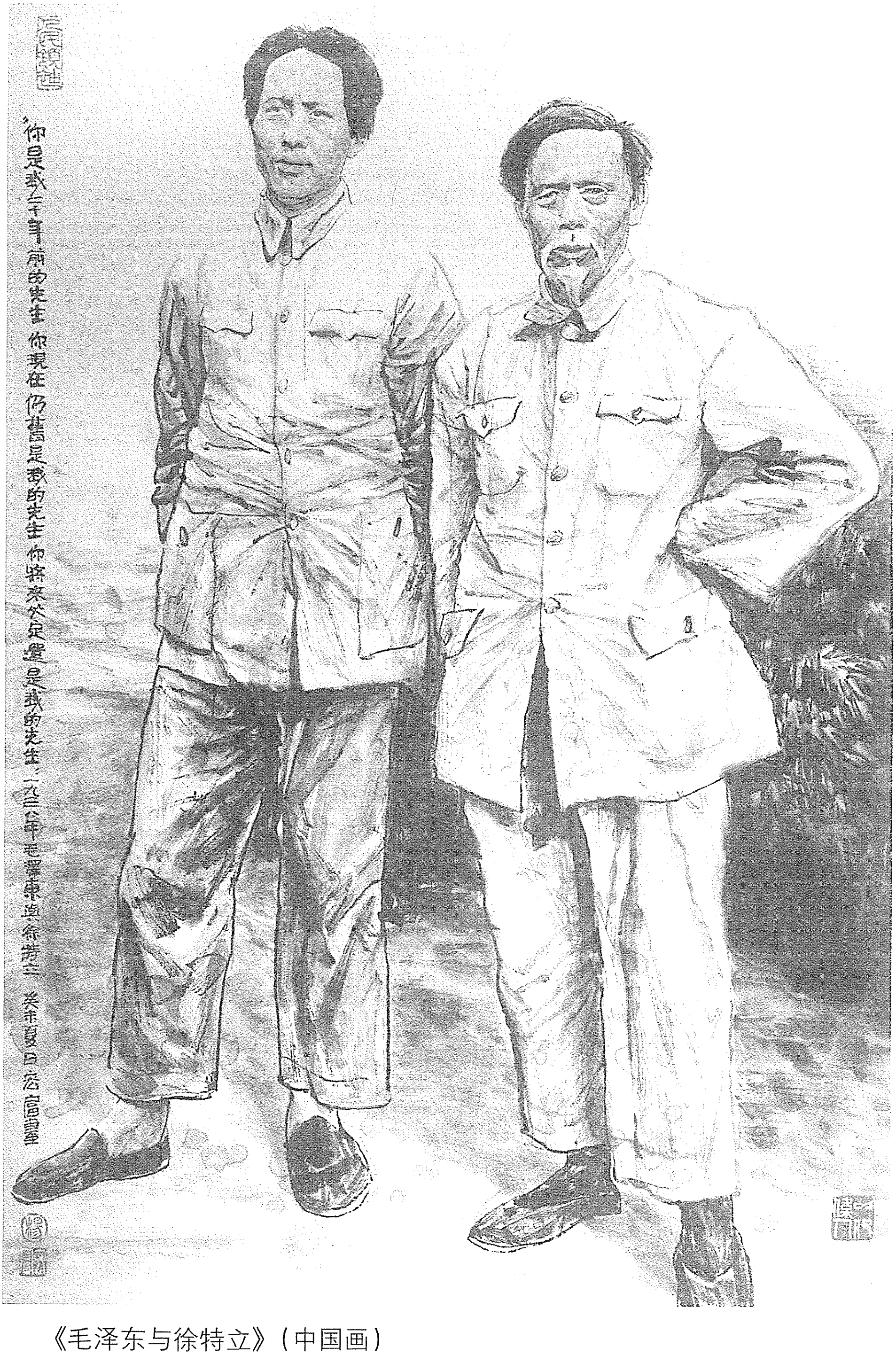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力不行了"，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的，而时刻感觉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的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给党与群众以纪律的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都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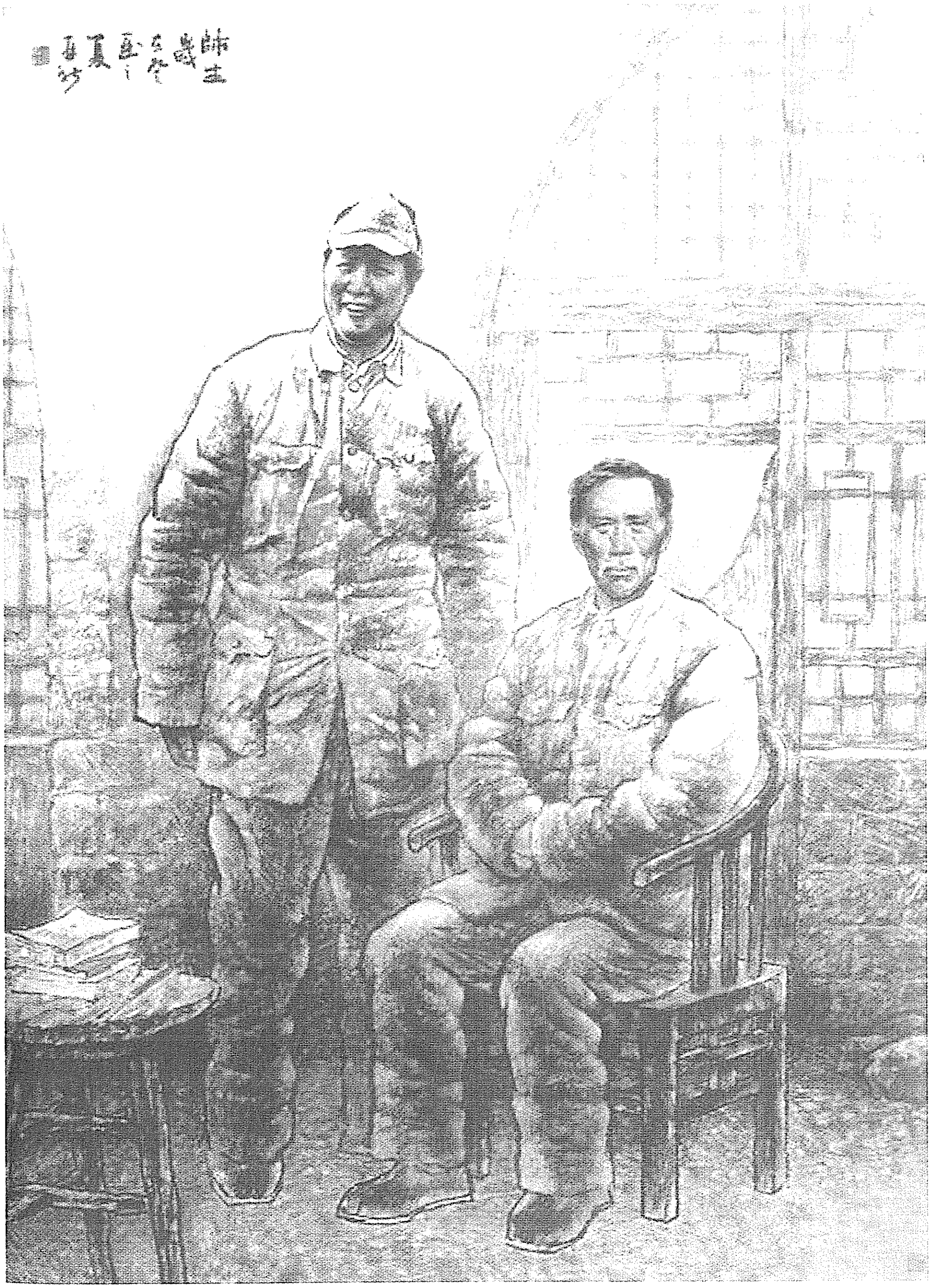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一月卅日，于延安。

毛泽东致徐特立信的手稿。

毛泽东和他青年时代的老师徐特立在保安。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 你現在仍舊是我的先生 你將來必定還是我的先生"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徐特立 癸未夏日 宏富畫

《毛泽东与徐特立》（中国画）



《师生》（中国画）

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军应同进同退[1]

（1937 年 1 月 30 日）

周、博，洛，王，彭、任[2]：

我们意见如下：

甲、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3]的基本方针。

乙、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丙、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丁、用以上态度争取最后的和平。

毛　朱　张

三十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红军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给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的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的电报。

[2]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当时在西安。王，指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

[3] 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

关于提醒杨虎城等对整个政治前途自信心致周恩来、博古电

（1937年1月30日）

周、博：

（甲）杨说愿意做我们政策牺牲品，应向他说明此政策非我们的，乃张、杨与我们共同的。提醒他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乙）对东北军宜以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电为根据说话，说明张之意见是正确的。

（丙）杨之绥署宜设三原，王树常宜来。

（丁）杨如不愿放弃富、甘两城，可仍交还他，我们驻乡下可也。

毛泽东

三十日三时半

致周恩来、博古电[1]

（1937年1月31日）

我们与张、杨两部应取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之方针，我们立场已向南京表时，即打亦不至基本妨碍我们方针，无论打胜打败，结果仍是讲和，但对张、杨两部影响较好。当然在打之前，力争张回，而免去打。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电的主要内容。

给李克农的信[1]

（1937年1月31日）

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

[1] 这是毛泽东致李克农信的主要内容。

题财经工作联[1]

（1937年1月）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

---

[1] 这是1937年毛泽东提出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1942年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个总方针。

关于和平逐步实现，请蒋坚持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不变致潘汉年电

（1937年2月4日）

汉年：

甲、接恩来电，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杀王事件东北军各将领均欲追究祸首，激烈派已悔过认罪，离队远避。

乙、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七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

丙、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我们诚意为国为蒋，要蒋不要认〔为〕我们所提建议含有外交性，我们对蒋无任何外交用意。

丁、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来』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戊、如何望复。

毛泽东

支午

致王以哲家属的唁电

（1937年2月4日）

杨主任虎城先生、于主席孝侯先生转王鼎芳先生之家属诸君大鉴：

鼎芳先生遇难不胜惊悼，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力求统一团结，乃见恶于少数不顾大局之分子，遂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特电致唁，敬候起居。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四日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8日）

请与顾祝同面商：防地必须增加金积、灵武、中宁、豫旺、安边、宁条梁、瓦窑堡、清涧、宜川等处。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和《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的谈话[1]

（1937年2月9日）

一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不应当搞广昌大决战，不应同陈诚指挥的主力硬拼。应当暂时放弃苏区，分红军为四路，猛出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施以佯攻，以诱动江西兵力，然后择弱点一战，胜而后回江西，再突破弱的方面，则苏区可以保全。

二

希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以民主求统一求和平。和平统一之后，始可以言抗日。故为实现民主政治，共产党可放弃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名义。有人反对共产党谈爱国主义，这是不彻底懂得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是反帝国主义的，在半殖民地的国家提倡爱国主义，本质上就是反帝国主义的。

---

[1] 1937年2月9日傍晚，《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到达延安，毛泽东出席欢迎宴会。晚10时，在凤凰山住处会见范长江，彻夜长谈。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一段谈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共产党现时的要求的一段谈话。

和南京谈判的主要内容[1]

（1937年2月9日）

周：

（一）关于和宁方[2]交涉之政治的立场，请参阅致三中全会电[3]。

（二）军事方面，同意提出初编为十二个师四个军，林贺刘徐[4]为军长，组成一路军，设正副总司令，朱[5]正彭[6]副。[7]

（三）饷项，如对方允即改番号，即照中央军待遇领受，如对方仍欲缓改，则每月接济至少八十至一百万。

（四）如有国防委员会之组织，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如暂时无此种组织，红军亦需要驻京代表参与国防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

[2] 指南京国民党政府。

[3] 指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电报。

[4]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徐，指徐向前，当时任红军西路军总指挥。

[5] 朱，指朱德。

[6]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

[7] 1937年2月1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补充提出："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

（五）党的问题，求得不逮捕、不破坏组织即可。红军中组织领导不变。

（长江[1]明日回）

毛　洛

九日二十三时

---

[1] 长江，即范长江，新闻工作者。当时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延安采访，2月10日回西安。

和南京谈判的补充内容[1]

（1937年2月10日）

周：

我们参加者：（一）军事机关如军委会、总司令部、国防会议等。（二）政治集会如各派各党之代表会议、国民大会等。（三）抗日时参加政府。

洛　毛

二月十日午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

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1937年2月10日）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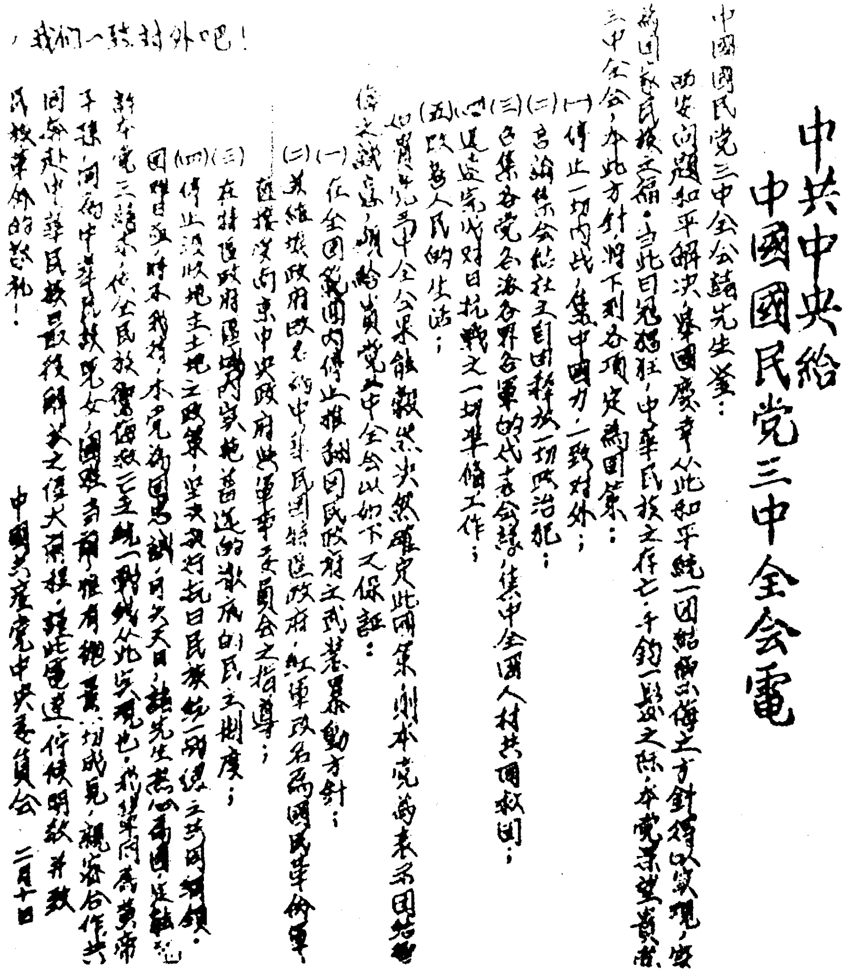
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惟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谨此电达，伫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党三中全会電

中國國民党三中全会諸先生鑒：

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会，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言論集会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会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

（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貴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党為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証：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会之指導；

（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國難日亟，時不我待，本党為國忠誠，可矢天日，諸先生熱心為國，諒能鑒許本党之請求，使全民族團結救亡之統一戰線從此實現也。我們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謹此電達，佇候明教，并致民族革命的敬禮！

，我们一致对外吧！

中國共產党中央委員会　二月十日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

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7年2月11日）

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关于和国民党谈判原则的批复[1]

（1937年2月12日）

周：

下列各事请注意：

（甲）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但我们不是促成东北军调走，而是东北军调走后无可避免时，至要求整个陕北与宁夏，前已向南京提出，此时亦宜提一提。但为不增加蒋之困难，允候将来再商。

（乙）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

（丙）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

（丁）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

（戊）经费须从二月领起。

（己）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且实行尚需时间（说服干部与民众大不易），只有要求彼方实行五条，方能避免迫我再让与立即实行。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电报。

（庚）三中全会孙夫人等左派不可太突出，提议宜先问蒋，估计蒋不能采纳者则不提此点，请告汉年。

洛　毛

十二日三时

向南京方面要求增加防地[1]

（1937年2月14日）

周：

甲、立即派飞机来接伯承[2]。

乙、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3]、灵武、中宁、豫旺[4]、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5]。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现驻李仙洲[6]部须退出。

丙、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

丁、蒋[7]指定凉州[8]以西，甘州府、肃州府[9]及安西州[10]所有各县在内。

---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2]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红军总参谋长。

[3] 金积，旧县名，1960年撤销，辖区裁入宁夏吴忠、青铜峡二市。

[4] 豫旺，旧县名，即今宁夏同心县。

[5] 瓦窑堡，镇名，今为陕西子长县县治。

[6]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7] 蒋，指蒋介石。

[8] 凉州，旧府名，即甘肃武威。

[9] 甘州府、肃州府，均为旧府名，即甘肃张掖和酒泉。

[10] 安西州，旧府名，即甘肃安西。

戊、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1]部退出该地。

己、以上请斟酌办法。

毛

十四日二时

---

[1]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军军长。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15日）

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

（1937年2月15日）

（一）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国内战争，结果分裂中国，便利于日本之侵略与汉奸之卖国；一是国内和平，结果团结中国，便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对日抗战之实现。

（二）中央采取一贯的和平方针，避免了战争危险，基本上建立了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

（三）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实行对日抗战。对此任务，我们须给予极大的努力。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即为执行此种新任务的具体方向。

（四）我们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条：

甲、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乙、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丙、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丁、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戊、改善人民生活。

（五）如果国民党能够保证实行上列各条，即是说国民党放弃了他们过去的老政策，采取了上述的新政策，那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在全国形成了，对日抗战就有了基础了。

（六）我们为了团结全国一致抗日之目的，愿意向国民党及全国保证实行下列各条：

甲、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

乙、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丙、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

丁、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七）上述各条是我们对国民党一个大的原则上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地反对日本的侵略。这个让步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个让步，就不便于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便于迅速实行对日抗战。这是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案与去年九月决议案的具体实行步骤之一部分。

（八）苏区中苏维埃制度取消，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能放弃工人农民已经获得的政治权利，而要继续保障之。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不能放弃工农主要成分与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而要继续保障之。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并不能恢复苏区土地剥削制度，而要继续保障土地在农民手中。但在全国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必须没收汉奸分子的土地。

（九）一九二七年党的八七会议以来一贯执行的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那时以来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仅能执行这样的路线；一九三五年党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决议案以来，我们一贯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与为着

彻底执行此路线，现在又提出取消苏维埃制度与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此时的国内国际环境要求我们执行，也只能够执行这样的路线。

（十）总之中央的政策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从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出发，全党的同志都应彻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团结在中央政策的周围，为民族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斗争。

中共中央
二月十五日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18日）

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2月21日）

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沪两方小开[2]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鲁暂时无办法，过一时再说，但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

后方已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两千多人，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

[1] 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小开，即潘汉年。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21日）

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2]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在西安参与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彭德怀等电[1]

（1937年2月22日）

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2月24日）

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

---

[1] 1937年2月24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2月24日）

听说马步芳很爱钱，请你考虑是否有办法送一笔钱给马，要他容许西路军回到黄河以东。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7年2月25日）

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

（1937 年 2 月 26 日）

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电的主要内容。1937 年 2 月 27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致周昆、袁国平电[1]

（1937年2月27日）

现因准备增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

---

[1] 这是毛泽东致抗大第二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周昆和政治委员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2月28日）

（一）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来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中，大的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是好的。不过在总方针与地方方针隔离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二）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应在暂时的原则下进行与布置。（三）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四）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五）关于取消

---

[1] 1937年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并讲话。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组织参观团到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2月28日）

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

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2]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3]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

[3] 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红三十二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3月1日）

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和史沫特莱[1]的谈话

（1937年3月1日）

史沫特莱问：共产党现在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你去年秋季跟斯诺记者所谈的，基本上有无改变？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

（二）对日抗战；

---

[1] 史沫特莱（1894—1950），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发展工商业；

（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1937年春，毛泽东、朱德和史沫特莱在延安。

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一九二七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1]：要求停止内战，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十九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2]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3]。同年十二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4]，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

---

[1]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1933年1月17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2] 指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通称华北事变。

[3]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35年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1]，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2]开会之前夜，乃于二月十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

[1] 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2] 指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

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

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

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十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

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1]与广田三原则[2]，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取消“满洲国”[3]，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

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

---

[1] 大陆政策，指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吞并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并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又叫田中政策。

[2] 广田三原则，指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3] “满洲国”，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1932年3月在长春成立，扶溥仪为“执政”。1934年3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

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1]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

---

[1]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缔结的这一协定，实际上是同年10月25日德国和意大利通过签订协定形成的柏林—罗马轴心的扩展。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参加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国家的反共同盟（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1]等类和平公

---

[1] 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指由法国外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美、英、法、德、比、意、日、波、捷等国代表1928年8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非战公约）。但在签约同时，美、英、法等国即先后声称各国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争”。截至1933年，加入非战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国家。国联盟约，指1919年在法国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关于建立国际联盟的条约。

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

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渡过这个战争吗？

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

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1]，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

[1]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7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1936年10月起，前后坚持2年零5个月。

1937年，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史沫特莱在延安。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关于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

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1]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2]，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

---

[1] 指《阿Q正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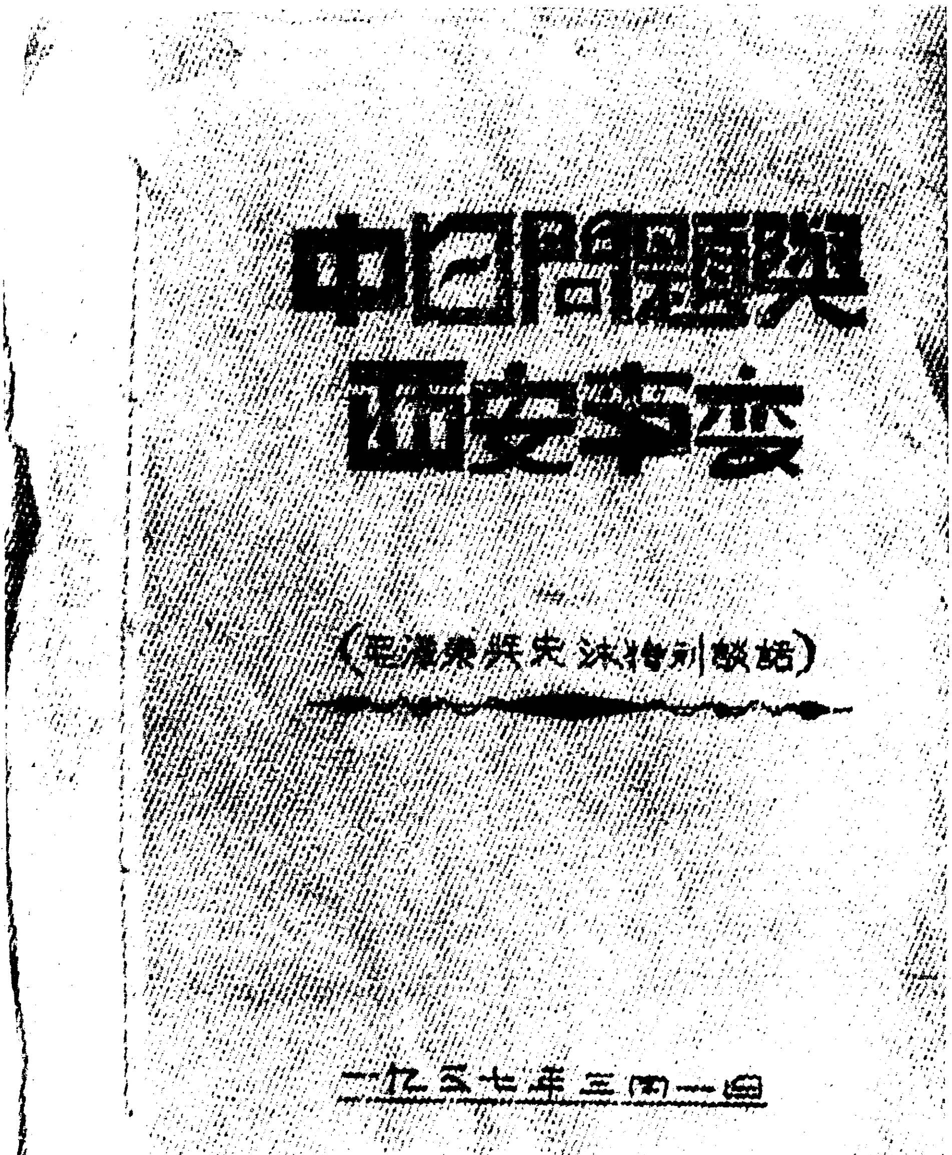
[2] 1936年12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一部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理解的青年军官孙铭九（当时任东北军特务团团长）等，派人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枪杀。

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关于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

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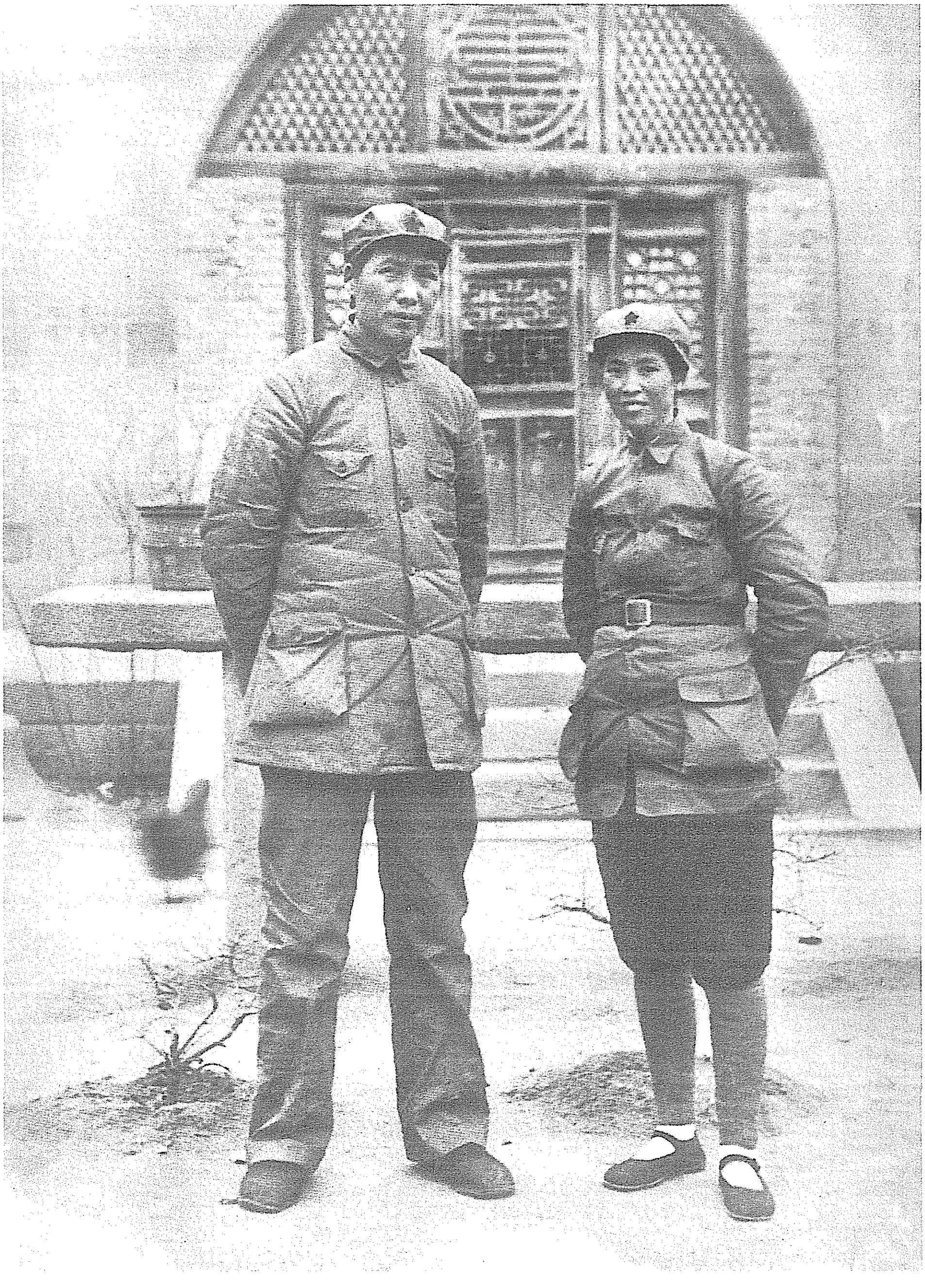
中日問題與
西安事变

（毛澤東與史沫特列談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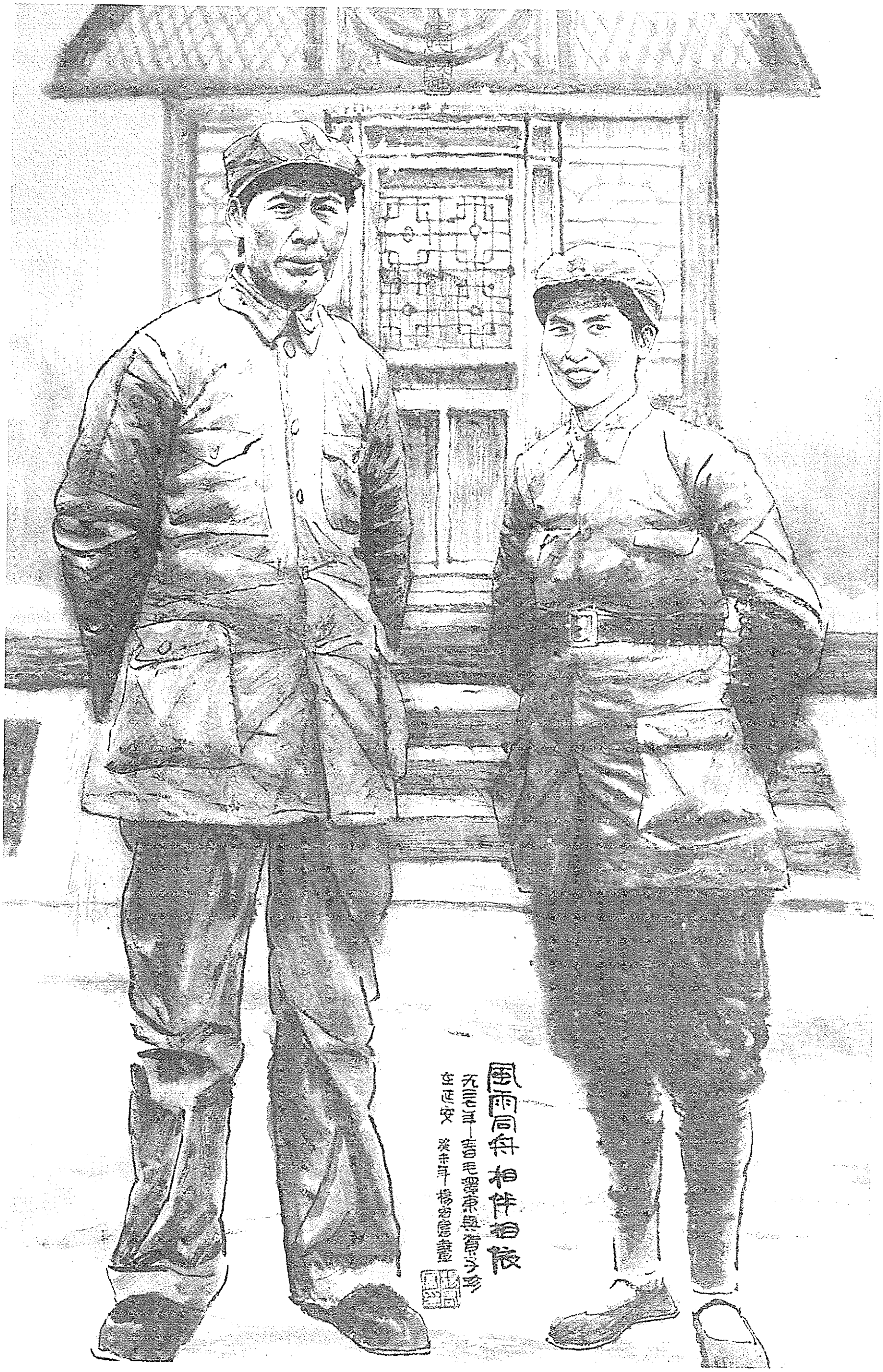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1937年3月，毛泽东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话《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油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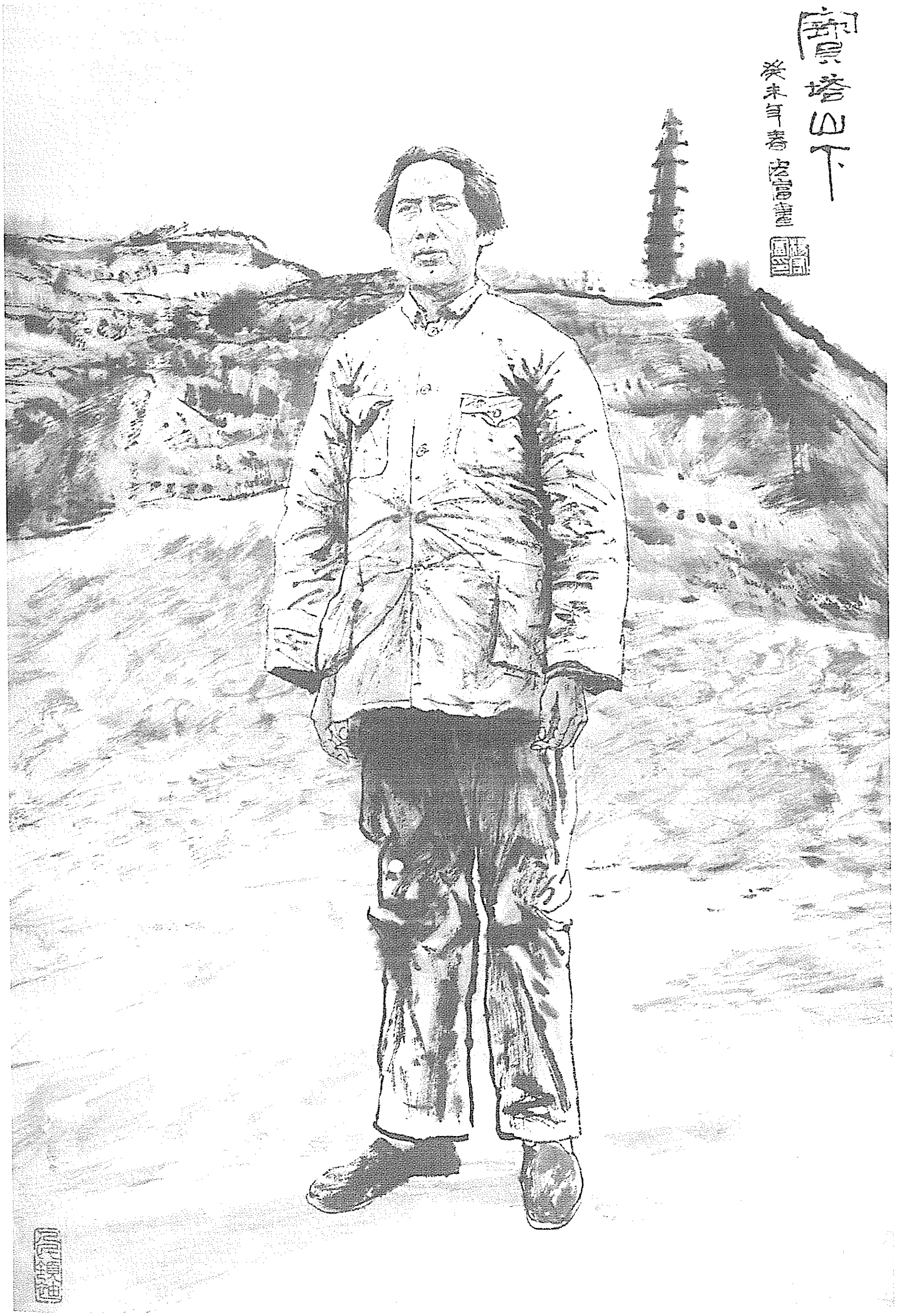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保安。



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風雨同舟 相伴相依
九三七年一春毛澤東與賀子珍
在延安 癸未年 楊

《风雨同舟　相依相伴》（中国画）


寶塔山下
癸未年春 宏富畫

《宝塔山下》（中国画）

与国民党谈判红军编制和对付反蒋派的方针[1]

（1937年3月1日）

周，并告彭、任，叶：

（甲）关于谈判方针：（一）红军编五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五十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二）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各军及地方部队不在五万人之内，均改保安队及民团，在特区行政经费内开支。（三）要求遣散老弱，收回苏票[2]之善后费。

（乙）关于对付反蒋派之方针：（一）坚持拥蒋抗日路线。（二）一方面向蒋建议废除挑拨离间排斥异己政策，改为实际的团结全国一致对外政策，但对于勾结日本之地方派，则与蒋一道反对之。（三）一方面向各反蒋派建议废止反蒋政策，争取推动南京进一步改变国策，并废除军事、财政等方面与南京对立之方针，以达到抗日救国目的。

洛　毛

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

[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一般称为苏票或苏纸。

为抗大第二期第二队学员题词[1]

（1937年3月2日）

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

[1] 1937年3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举行开学典礼，朱德发表讲话。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并为第二队学员题词。

复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3日）

目前谈判焦点只在红军人数问题上，为使谈判迅速成功，我们认为红军主力编为四个师十六个团及两个工兵师共六万人的提议，一般地可以接受。我们今天的中心是在谈判成功后，我们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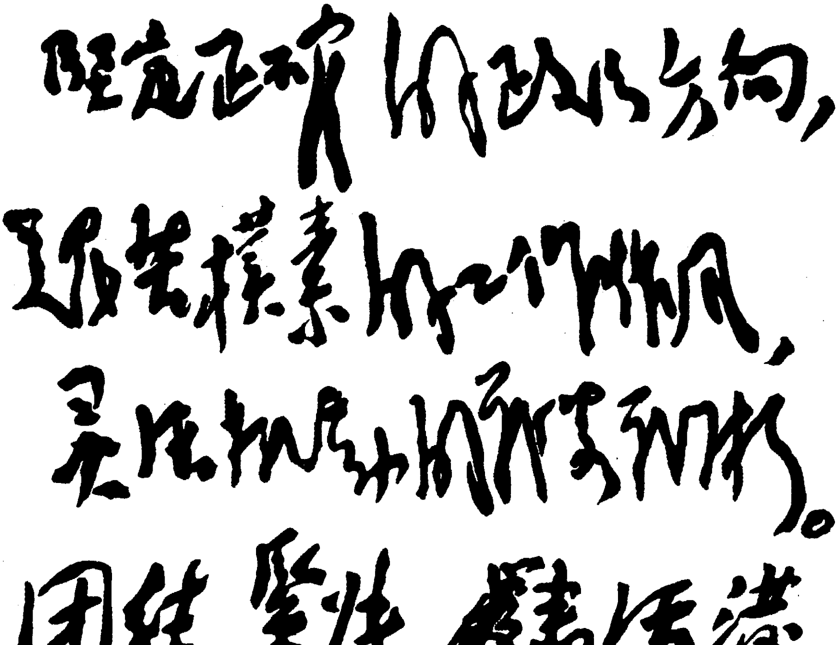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抗大题写教育方针和校风

（1937年3月5日）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泽东为抗大题写的教育方针和校风。

关于周恩来赴南京谈判内容的批复[1]

（1937年3月5日）

万万火急

周：

（甲）总部直属队即以前后方两特务团编成，人数约一千五百，其余均机关，旅长人选及部队编成候彭、任[2]提出意见再复，其余均同意。

（乙）与我们发表宣言同时，要求国民党亦发表宣言形式之公开文件，承认我们之合法地位。

（丙）行政区设主席与委员会制为宜，经费（包括保安团队在内）每月三十万，又收回苏票[3]二百万。

（丁）党员数告以尚待清查，但总数估计约十万，苏区白区各半。暂以周、叶[4]二人参加国[5]会议，毛不参加。林[6]为特区主席，也参加经委。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的急电。

[2] 指彭德怀、任弼时。

[3] 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

[4] 指周恩来、叶剑英。

[5] 原文如此，似漏“防”字。

[6] 指林伯渠。

（戊）请将伙食费与增援西路军二事日内办妥。

洛　毛
五日二十一时

并告彭、任。

致彭德怀等电[1]

（1937年3月5日）

请周于明日或后日，即向顾祝同、张冲说明增援事，特别说明四军、三十一军要求西援之迫切，如顾电令二马停战，或派人乘机赴青海说通二马，我军即中途停止。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伯承、林育英、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1937年3月6日）

弼时：

甲、三中全会[1]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洛　毛

六日

---

[1] 指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国共合作大局已定[1]

（1937年3月7日）

富春：

所传非实，但谈判正具体化，国共合作大局已定，国民党政策正在转变中。

毛复
三月七日亥

---

[1] 1937年3月6日李富春致电毛泽东说：“据□□□传播：南京已组国防委员会，蒋为总司令，阎、张及朱德副主席。毛泽东为甘肃省主席。红军编九个师。”这是7日毛泽东给李富春的复电。

致周恩来电[1]

（1937 年 3 月 9 日）

甲、西援军现停止于白杨城、青石咀之间待命。乙、徐、陈所部在沙河堡仅占地十里，被敌包围，粮水均缺，不能持久。丙、全力用政治方法解决，并须速解免去军事增援为上策。丁、此事须在你去南京之前督促张冲、顾祝同即速办理并得确定结果，如：（一）二马撤兵停战，（二）飞机送款、弹，（三）容许西路军安全东还或容许其去肃州、安西。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西路军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给埃德加·斯诺[1]的信

（1937年3月10日）

斯洛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得列[2]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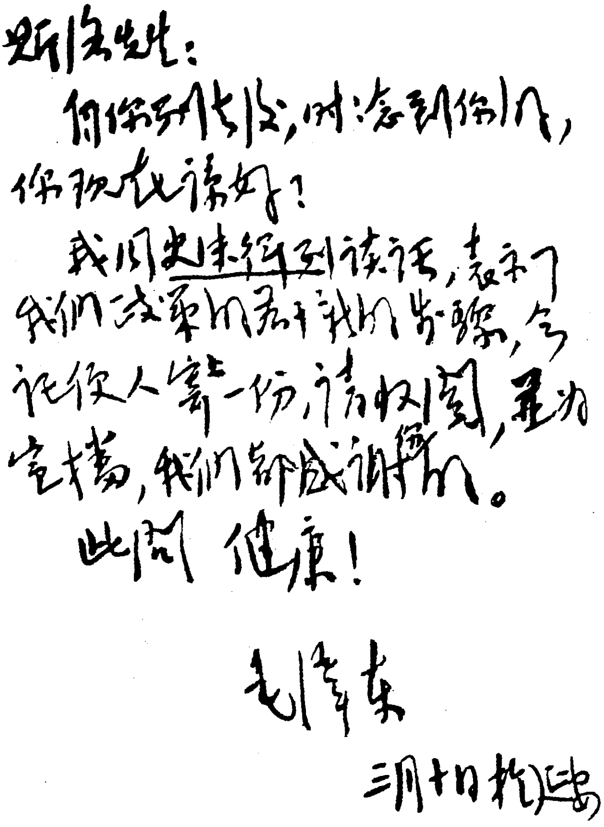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

[1]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新闻记者，1928年来中国，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后根据此次采访所得写成《西行漫记》一书。

[2] 史沫得列，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4—1950），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中国，1937年年初访问延安，著有《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书。



斯诺先生：

自你到长安，时念到你们，你现在谅好？

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这里的人对于我们的关系，今托便人寄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扬，我们都感谢你们。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毛泽东致埃德加·斯诺信的手稿。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1日）

请你估计此刻即去南京或牯岭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现在问题非与蒋谈不能解决。如果承认贺衷寒所提各点[2]不但非常危险，而且过几天有可能连贺案亦被推翻，因此决不能同意。对外宣言，已有毛的谈话[3]（允生[4]带上），党的宣言以暂缓为宜。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和蒋介石直接谈判等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贺衷寒对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商定的准备送蒋介石最后决定的提案所作的重大改动，亦称“贺案”。主要内容有：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政府；裁减红军改编后的定员，三个师，两万七千人；将红军改编后“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不提在河西走廊停止进攻西路军。

[3] 指毛泽东1937年3月1日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

[4] 允生，即李允生，是冯雪峰的化名。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3月11日）

全体的政治局会议，须待与国民党关系确定后才好开会。你如能在近日去南京而在两星期左右确定国共关系，则拟在月底或月初开会。会后并须召集代表会议，拟在四月底或五月初开会。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再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刘伯承、张浩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3月12日）

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谈判应该是政治的斗争，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3日）

请即日动身回延安开会，在延安留三五天出去见蒋谈判。剑英留西安与顾祝同保持联络。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绥远追悼大会唁电

（1937年3月13日）

归绥傅作义将军、赵承绥将军，并转阵亡将士追悼大会鉴：

日寇驱使伪匪，进犯绥东，诸先生领导全军，守土御侮，屡挫敌锋，略洗吾民族所遭受之奇耻大辱。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足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泽东等追念国殇同深恸悼特电奉唁，诸维共鉴。

毛泽东　朱德叩
元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4日）

谈判并不破裂，只是不承认贺案，而对十五条[2]须加以原则上与条文上的补充修改。和平大计已定，现谈判者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包括红军、苏区等组织方式问题）之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故须会商后续谈。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37年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会谈，将一个月来双方谈判作一归纳，由周恩来写成条文，准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周恩来起草的条文，包括政治问题五条，改编问题四条，善后问题六条，共十五条。同日，周恩来将这十五条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3月16日）

（甲）既然张、顾愿不采用贺案[2]，你即在西安顿住几天待命。（乙）惟要顾立电两马停战，否则要顾担负西路军损失的全部政治责任。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37年3月15日，张冲向周恩来申明贺案作废，仍以3月8日提案作为谈判基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3月16日）

财政观点当然是需要的，但有一个原则即须受政治上的限制。关于“平等观念”，在游击时代就有的。将这个原则用到具体事实，红大每人每天八分伙食费是不能动摇的。津贴问题应有分别，红大一队的应特别，一般的是不是平等，要看情形。伙食是第一，应增加到八分，津贴还是其次的。应组织中央一级购买委员会，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购买，以国民经济部部长为该委员会主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财政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大扫除时的讲话[1]

（1937年3月21日）

注意卫生，健康身体，就是增加国防力量。搞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

---

[1] 1937年3月15日至21日，延安举行卫生运动周，21日进行大扫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参加大扫除并作重要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1]

（1937年3月23日）

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这个问题早在以前我已提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上还没有明确规定。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有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这一认识是真理，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

---

[1]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称延安会议）在延安举行。会议讨论的议程有两项：一、国民党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二、张国焘的错误。23日至26日（其中25日休会一天）进行第一项议程，27日至31日进行第二项议程。这是毛泽东在23日就第一项议程的讲话。

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关于过渡阶段问题

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一切都要带国防性，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各方面的都是要为着抗日。

关于领导权问题

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三民主义的武器，我们可以拿来使用。然而我们要得到以下的保障：（一）积极地参加民主与民族运动，（二）党的独立性，（三）我们在全国的宣传任务，（四）我们在全国的组织任务。三十日，毛泽东就第二项议程发言，他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我们欢迎他们转变，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

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成实际家，恰恰证实他是真正的经验论。那次我们接到捉了蒋介石的消息以后，他举出几十条理由要求杀蒋介石。张国焘要改正自己的错误，首先要放弃自己的经验论。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张国焘的机械论，只看见形式，不看见内容。他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魔鬼，害着恐日病和恐蒋病，说什么十倍于现在的力量也不能战胜日本，在革命战争中只想起后梯队的作用。他看不见日本和蒋介石都存在着种种矛盾。他不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不知道红军中、共产党内都有矛盾，只有加强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和党内民主来解决这些矛盾。张国焘在鄂豫皖的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出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反党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那时张国焘的电报却凶得很，“禁止你们再用中央名义”的话头都来了。我们却慎重得很，当时中央通过的关于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决议，只发给中央委员。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

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干起。

致周昆、袁国平电[1]

（1937年3月25日）

国焘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立即开展讨论，彻底揭发，以求党内的统一与团结。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庆阳步兵学校负责人周昆、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

复叶剑英电[1]

（1937年3月26日）

民族扫墓我方决派林伯渠参加，并与张继[2]见面，请询问礼节仪式及日期见告。

---

[1] 这是毛泽东复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张继，国民党元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3月27日）

甲、西路军情况万分紧张，他们东进西进都成不可能，有被消灭危险。乙、对两马不但十万，就是二十万和更多些都可以，而且必需。丙、此事须以最快速度办妥，最好在二十天内。丁、条件：西路军过黄河右岸来，请两马不要阻拦和恶意追击。如果两马同意西路军西进，则西路军可停肃州以西，将来并不东犯。戊、须对两马晓喻和平大义，告以与我们讲和，对他将来有莫大利益。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关于解救西路军危局致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现阶段的中日关系*

（1937年3月28日）

问：阁下如何认识目前之阶段？

答：由于国民党执政人士对目前举国一致之重要性，与国难之艰巨性之进步的了解，与全国人民及中国苏维埃红军之坚决主张停止内战，现在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准备对日抗战之非常时期于兹开始。在此非常时期中，全国人士应深刻明白自己救亡责任之重要，应进一步谋团结之巩固，切勿为敌人之离间毒计所乘，更不应为敌人之甜言蜜语所惑，应切实了解敌人之每一步进攻步骤而努力于切实实现人民之民主权利，以充实国力也。

问：少数人民，颇对佐藤之所谓“和平外交”发生幻想，阁下意见如何？

答：佐藤之所谓“新政策”云云者，明眼人民自不难洞悉其毒辣之阴谋实质，即如津沪大报中亦不少直指其为外蜜中鸩之糖浆，此种描写实亦颇称恰当。今日少数人民之仍为其所惑者，因亦许有种种复杂之原因，但一言以蔽之，主要原因正在于此辈人民不能将其种种顾虑服从在中华民族总利益之下，故不免畏惧抗战，而敌人之甜言蜜语得以乘机奏效矣。佐藤虽已赤裸裸地宣称新政策，无非为执行三大原则之手段变换，但其外里之糖浆，对意志薄弱之辈仍不难发生诱惑力量，对此吾人应充分了解其危险性也。

1937年春，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接见美联社记者厄尔·利夫。

给范长江[1]的信

（1937年3月29日）

长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2]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3]一份，祭黄陵文[4]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

敬颂撰祺！

弟　毛泽东

三月二十九日二十四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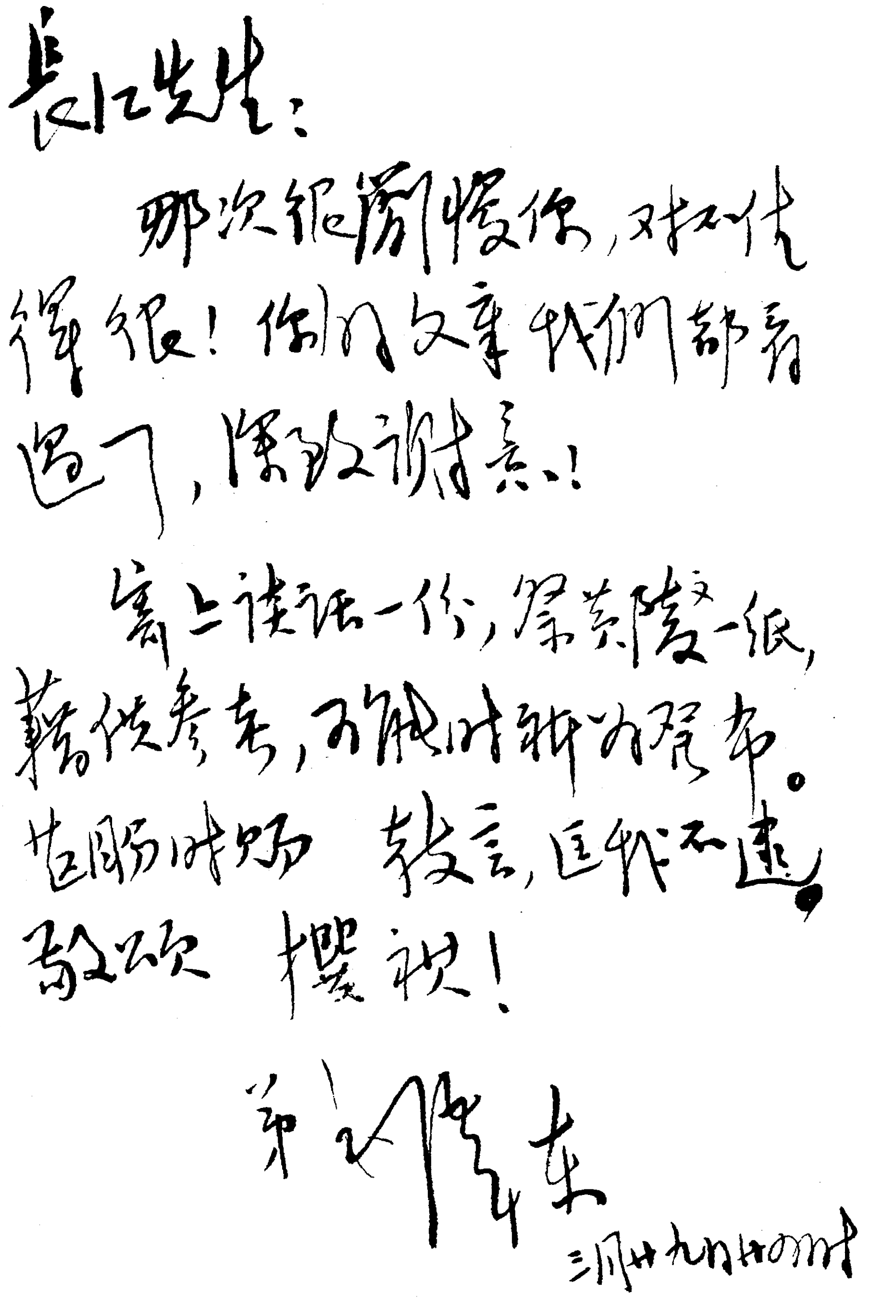
---

[1] 范长江（1909—1970），四川内江人，新闻工作者。1937年2月曾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西安和延安采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党的新闻部门做领导工作。

[2] 指范长江访问西安和延安后，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报道西安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新闻通讯。

[3] 指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这个谈话发表于1937年3月29日至4月3日延安《新中华报》，题为《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4]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人民抗日红军准备在1937年4月5日清明节致祭陕西黄帝陵的祭文。此文后来发表于同年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



長江先生：

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们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

寄上谈话一份，祭黄陵文一纸，藉供参考，可能时祈为发布。尚盼时赐 教言，匡我不逮。敬颂 撰祺！

弟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廿四时

毛泽东致范长江信的手稿。

四言诗·祭黄帝陵[1]

（1937年3月）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2]，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遣代表林祖涵[3]，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4]，吾华肇造[5]。胄衍祀绵[6]，岳峨河浩。

---

[1] 祭，祭祀。这里是表示崇敬之意。黄帝，为传说中的中国上古时代的部落领袖。黄帝陵，轩辕黄帝的陵墓，简称黄陵。在陕西省黄陵县城北约一公里的桥山上，史书称桥陵。

[2]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即1937年4月5日。这一天是清明节，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清明节扫墓祭祖的风俗。

[3] 林祖涵，即林伯渠（1885—1960）。湖南临澧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七大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0年病逝于北京。

[4] 赫赫，显著、盛大的样子，形容显耀盛大。始祖，指黄帝。

[5] 吾华，我们中华民族。肇，开始。造，建造。吾华肇造，即肇造吾华，建造了我们中华民族。

[6] 胄，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子孙。这里指黄帝的子孙。衍，繁衍，繁殖。祀，祭祀。绵，绵延，延续不断。祀绵，对黄帝的祭祀累世不绝。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1]。
琉台不守[2]，三韩为墟[3]。辽海燕冀，汉奸[4]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5]？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6]，命世之英。涿鹿奋战[7]，区宇[8]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9]？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

[1] 强邻，强悍的邻国，这里指日本帝国主义。蔑，无。蔑德，无德行。这里指不讲道义。

[2] 琉，指琉球群岛。本属清朝版图，光绪五年（1879年）被日本侵占。台，指台湾。本属清朝版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被日本侵占。不守，失守，为敌人所攻占。

[3] 三韩，指朝鲜。汉时，朝鲜南部分为马韩（西）、辰韩（东）、弁韩（南），合称“三韩”。后用为朝鲜的代称。为，变为。墟，废墟，原来有很多人家聚居而现在已经荒废的地方。

[4]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败类。

[5] 欲，欲望。岂，哪里。足，满足。敌欲岂足，敌人的侵略野心哪里能够满足！

[6] 懿，通“噫”，古汉语叹词，表示悲痛或叹息。我祖，指轩辕黄帝。

[7] 涿鹿奋战，相传黄帝与蚩尤曾在涿鹿进行大决战，蚩尤全军覆没，为黄帝击毙。

[8] 区宇，区域，疆域，天下。

[9] 其，指代中国。沦，沉没，没落。胥，语助词，用于句末，无实义。沦胥，沦丧衰落。

民族阵线[1]，救国良方。四万万众[2]，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3]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4]。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5]！

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在红军代表叶剑英、陈赓等的陪同下，同祭黄帝陵。图为合影留念。

---

[1] 民族阵线，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 四万万众，即四万万人民，当时全国人口约四亿。这里即全国人民之意。

[3] 兆，古代指一万亿。亿兆，犹言广大人民。

[4] 矢，誓，发誓。勿，不。谖，忘记。永矢勿谖，犹言永志不忘。

[5] 尚飨，旧时祭文结束语，意即请享用祭品吧！

和南京谈判的两个原则[1]

（1937年4月1日）

雪枫：

（甲）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

（乙）南京并无毛出洋之条件，华北消息系误传。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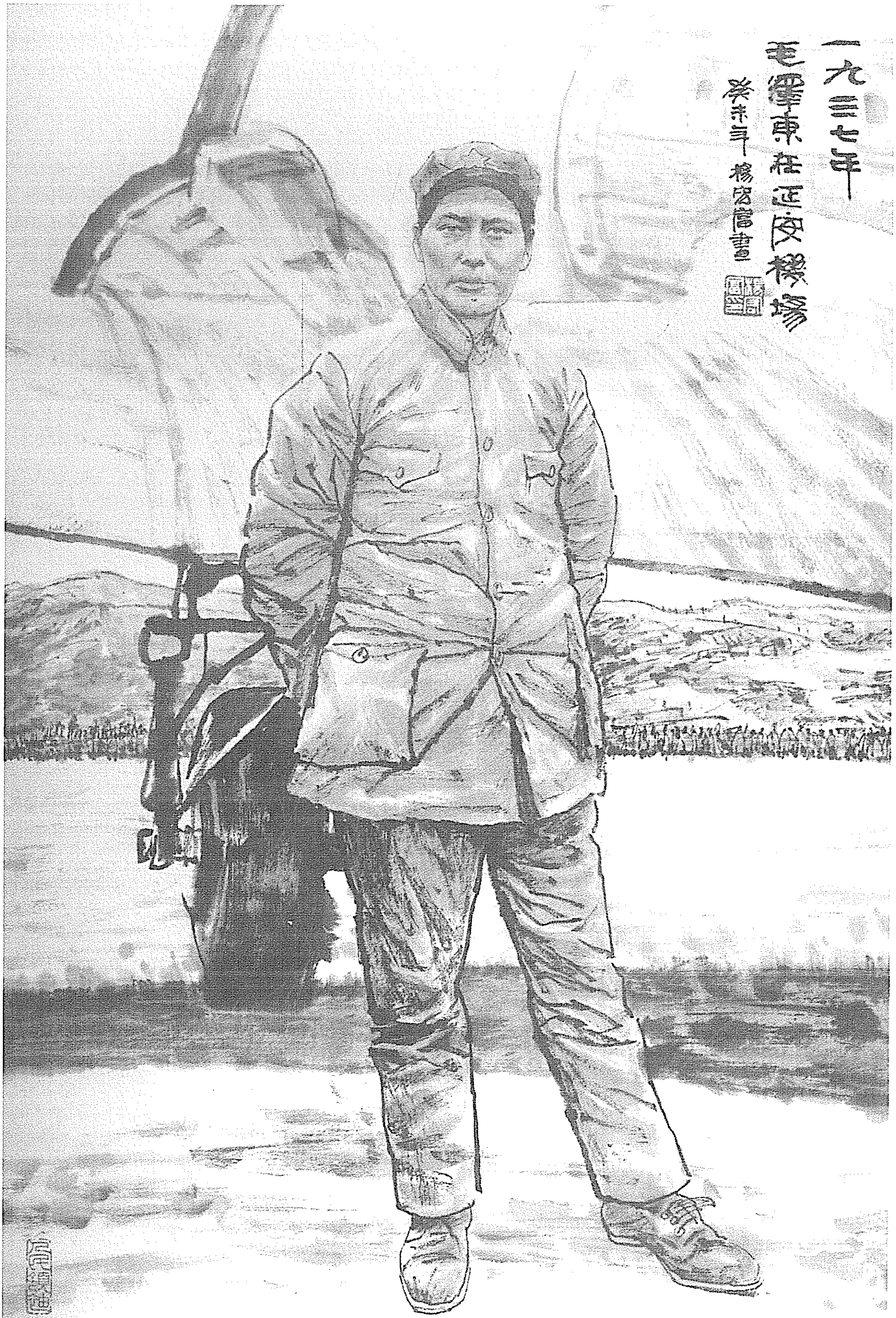
一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彭雪枫的电报。

1937年4月，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迎接从西安返回的周恩来时的合影。

1937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一九三七年
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癸未年 楊宏富畫

《毛泽东在延安机场》（中国画）

关于西路军的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1]

（1937年4月3日）

向顾祝同说明，关于彼方对河西红军见危不救故意使其消灭一事的政治责任，我方保留质问与追究之权。现集凉州的西路军被俘的六千人，要求顾迅即电马步芳全部调来平凉，转至红四方面军归队。徐向前、陈昌浩二同志及其他干部，如为马步芳所虏，应严令马不得加以任何残害行为。对河西余部，请顾令马不得再行追击，让其转赴新疆。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张国焘等关于西路军的善后问题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青年工作问题的讲话[1]

（1937年4月10日）

青年工作，依靠多数是很重要的，不要孤立。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青年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潘汉年电

（1937年4月11日）

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1]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

[1] 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在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训词[1]

（1937年4月12日）

把共产党过去策略与口号，与目前新的口号策略的关系及变化加以解释，说明我们在大革命失败后，为苏维埃奋斗是正确的，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背叛了革命，工农的出路只有与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斗争，再没有别的办法，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形势有了大的变化，日本的进攻，灭亡中国的手段，不仅危害及工农劳苦群众，而且危害及资产阶级，大家均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使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步骤——争取国内和平——基本上完成了，现在是进入第二个阶段——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开展民主权利。未团结全国人民到抗日战线上来，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以后，希望大家把共产党的策略口号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会场热烈的鼓掌）。

---

[1] 1937年4月12日下午1时，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在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幕典礼。大会首先由冯文彬致开幕词，继由毛泽东、共产党代表洛甫、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人训词。这是毛泽东的训词。

1937年，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在延安凤凰山。

在西北青年救国会上的讲演[1]

（1937年4月12日）

同志们：

今天西北青年救国代表开会，将号召西北及全国青年群众与各界联合，走上团结抗敌的道路，我就来说一点关于共产党的团结抗敌的政策。共产党过去的政策是国内战争与土地革命。现在政策是和平团结，对日抗战。这是什么原故呢？为什么我们过去和现在有这样不同的政策呢？原因就在过去若干年间，我们不能不那样做，也只容许我们那样做。过去是两个政权对立的斗争，阶级的武装斗争，因为那时候国民党和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拿着枪，杀革命人民，革命的人民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第二种办法和出路。那时候的那样干，完全必要与正当的。

如果说共产党过去错了，那末请问除了这条道路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道路？难道我们应和国民党一道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吗？不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就得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

---

[1] 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青年抗日救亡运动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号召和团结全国青年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出席大会的代表312人，代表20多万有组织的青年群众。毛泽东、周恩来、洛甫、朱德、博古、林伯渠等到会并发表讲话。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

二者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

“九一八”以后特别是华北事变以后，日本要单独独占中国，灭亡中国，使得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变化了，使得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关系也变化了一些。资产阶级同国民党里面都发生了分化，国家处在危亡面前，我们的政策就有改变旧的采取新的必要与可能，因此我们采取了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我们统一战线的目标是抗日的，而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不分阶级与党派的联合战线，与外国的人民阵线也不相同，这是我们统一战线的特点。

自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号平津学生反日运动以来，经过许多事变直至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中国内部已经由一种状态开始走上另一种状态，即是由内战独裁与不抵抗开始走上和平民主与抗战的阶段。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致国民党书，九月决议，以及西安事变中的和平统一政策，给三中全会通电中的和平政策，都是国内达到新阶段的号召与领导的力量，这些东西都表示我们过去提出了并实行了粉碎国内统治阶级的围剿这个口号，那末，现在就不是如此了，现在是要团结全民族来粉碎日本为首的法西斯蒂对全中国的围剿。倘若内外都有围剿，那中国就唯有灭亡，因此我们提议内面的围剿必须和解，并且建立全民族的大团体来对付外面的围剿，现在这新任务已经开始走了一步，往后就是第二步，第三步，一直粉碎法西斯围剿而后止。

我们停止土地革命是否就不顾民族利益了呢？不是的，恰恰相反，我们更要为民众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坚决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改革与民主改良就是为的这种目的，因为今天的民主改革，正是抗日人民大众的需要，因为没有民主改革，没有人民的自由权利，抗

日会只是一句空话。抗日与民主二者是不能分离的。

以前的不和平不统一，国共两党之间如此，全国各省之间也是如此。抗日救国必须和平统一，相打分裂是不能抗日救国的，因此和平统一成为全国必须的要求。过去一年的工作是坚决要求和争取这种和平统一，现在算是初步的达到了，但和平还没有巩固，要巩固和平并实现真正的统一，就得实行民主政治。

现在全国人民，除了苏区以外，都没有民主自由，说话有罪，走路也有罪，爱国有罪，如沈钧儒等爱国领袖因为爱国而被关起来，现在听说还要起诉。为向日本帝国主义示威而在街上走路就要被捉，出报纸讲爱国话就要被封。这种情形怎能真正抗日呢？所以我们说，没有和平与没有民主，都不能统一团结，便都不能抗日，所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是实现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也是今日的中心任务，是今日必须要做的文章。

我们曾为扩大红军而努力，现在也不相同了。中国人与中国人从前相打的现在应该改为好朋友，大家去打共同的敌人，这样，红军也可改为国民革命军，一切中国的军队都要变为抗日军，我们应该为扩大与训练真正的抗日军而斗争。

过去国民党背叛革命，所以共产党不得不单独负起革命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大家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斗争。

有些同志，以为我们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了三民主义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这个思想在过去是很对的，因为那时三民主义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换上新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不是不可戴的，反而变为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受

南京国民政府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

西北青年有团结全国青年的责任，全国青年都团结起来，跟成年、幼年、老年就一道结成一个几万万人的大团体，那末日本帝国主义凶悍怎么样，我们是能够打倒它的。

毛泽东在讲话。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4月12日）

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

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电[1]

（1937 年 4 月 13 日）

西路军工委来电，约十八号可抵敦煌。现有人数九百多，枪五六百[2]，到后恐更要减少。由敦煌到新疆路极难走，恐不易通过。望你向顾祝同交涉，务使这批人到敦煌后马军不得为难，必须全部送至兰州转给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李先念、李卓然率领的西路军余部。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4月16日）

望将中央关于国民大会选举法的修改意见与张冲当面商榷，要他转达蒋介石、陈立夫及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4月18日）

送兰州的河西红军，望速向顾祝同接洽，派张文彬去接或开至平凉接收[2]。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5月下旬，张文彬到兰州孔心墩机场附近的集中营，经交涉将关在那里的1500多名西路军指战员解往西安，途中至四十里铺，由附近的红军接应，摆脱押送的国民党军队，回到苏区。

致刘伯承、张浩等电[1]

（1937年4月20日）

你们不应在敦煌久停，而应尽可能地只休息两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粮食和骆驼向星星峡进。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刘伯承、张浩并转西路军工委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4月20日）

这一联盟应宽泛，不要严密，我们不要替它造成一个组织来制约我们。所以这个规约愈简单愈好，不用固定代表制、执行委员等组织，用有事议议的方式较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和民族联盟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复周小舟电[1]

（1937年4月22日）

（甲）谈话[2]着重指出，政治制度之民主改革及人民自由权利之重要性与迫切性，为巩固国内和平、增强国内团结、实现对日抗战，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乙）国民大会选举法与组织法，须按照民主原则彻底修改，过去颁布的选举法、组织法，我们是坚持反对的。（丙）我们根本反对苏州六爱国领袖之被审讯，主张立即释放。（丁）向张季鸾[3]征求能否来延安一行，如同意，我表示欢迎。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小舟电的主要内容。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阎锡山约周小舟几天后到五台县河边村谈话。

[3] 张季鸾是《大公报》总编辑兼副总经理，当时在太原。

关于党内组织上的一致问题的讲话[1]

（1937年4月24日）

现在看到一些情况，如有的地方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作法，在陕北也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等等。应当很明白地指出主要是路线上的一致，只有在这一原则上的一致，才可团结一致。过去，我们有过痛苦的经验，陈独秀、李立三的宗派主义等，今后这样的缺点还是不免发生的，因为中国经济落后，容易出现这些缺点。我们的任务是开展反对宗派主义的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党在全国发展中，知识分子的成分是要占一个数目的。这种状况的存在，更加重了我们教育的责任。每一个组织上的错误，总是由于思想上的差误，组织上的一致与思想上的一致是不能分离的。要在思想上保持一致，就要在组织上扩大民主，慎重作组织上的结论。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党内组织上的一致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徐向前电[1]

（1937年5月1日）

庆祝你脱险归来，并相信你一定能够在中央领导下再接再励地为革命奋斗到底。盼于病体痊愈后即来中央。[2]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朱德致徐向前电的主要内容。

[2]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他辗转回陕，“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

（1937年5月3日）

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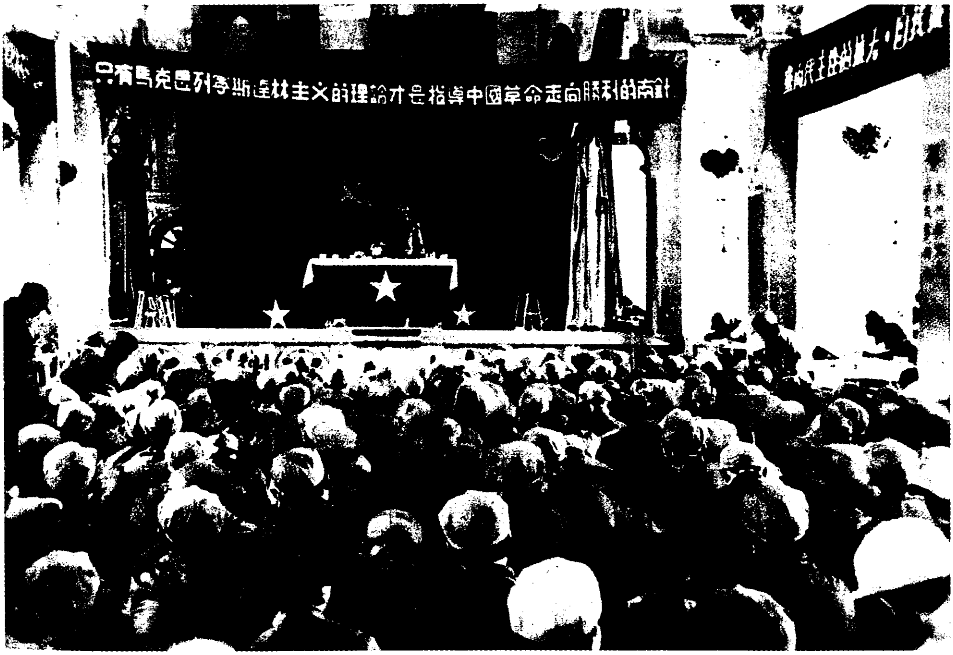
（一）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很久以来就是处在两种剧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出卖民族利益于帝国主义，造成了工农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尖锐对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能不由中国共产党单独负担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2]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使这些矛盾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甲、由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了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这些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扩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

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只有馬克思列寧斯達林主义的理論才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南針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为顺利实现全党全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指明了方向。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乙、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这个任务不但必须完成，而且

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变动了全国人民大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情况和政策。人民更大规模地起来为救亡而斗争。共产党发展了在“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武装人民）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同我们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我党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3]，十二月决议[4]，一九三六年五月放弃“反蒋”口号[5]，八月致国民党书，九月民主共和国决议[6]，十二月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7]等等步骤之所由来。

丁、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政策和中国半殖民地经济状况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这种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若干其他帝国主义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则以极大的努力反对内战与分裂，争取和平与统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是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中国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务：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四）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时，告一段落。此阶段内的

重大事变，是学生界、文化界、舆论界的救亡运动，红军的进入西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上海和青岛的反日罢工[8]，英国对日政策之趋向比较的强硬[9]，两广事变[10]，绥远战争和援绥运动[11]，南京在中日谈判中的比较强硬的态度[12]，西安事变，最后是南京国民党的三中全会[13]。这些事变，统统都是围绕着中国和日本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围绕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历史要求的。这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这就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组成上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五）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今后的要求是国民党政策的彻底转变。这就需要我们和全国人民更大地发展抗日和民主的运动，进一步地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团结国民党内的主张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动动摇犹豫分子，排除亲日分子，才能达到目的。

（六）目前的阶段，是新时期的第二个阶段。前一阶段和这一阶段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如果前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和平，则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地是争取民主。必须知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

不行，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七）对于中国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紧准备的强盗战争相呼应，日本在东方正在用尽一切气力在确定的步骤上准备一举灭亡中国的条件——国内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条件，国际外交条件，中国亲日势力的扶植。所谓“中日提携”的宣传和某些外交步骤的缓和，正是出于战争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战术上的必要。中国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关头，中国的救亡抗战，必须用跑步的速度去准备。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论，反对文恬武嬉饱食终日的亡国现象，这些都是实际上帮助敌人的，必须迅速地清除干净。

（八）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没有巩固的和平与团结，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阿比西尼亚主要地是因为封建制度的统治，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不能发动人民的积极性，所以失败了。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

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这方面，应从改变国民大会的选举和召集上违反民主的办法，实行民主的选举和保证大会的自由开会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宪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执行真正的民主政策为止。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敌对，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地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的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当前几个月内，全国人民的民主运动，必须争取这一任务的某种最低限度的完成，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等，都包括在内。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十）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

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

（十一）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向他们保证下列四项：（1）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些保证，是必需的和许可的。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根据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变化而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这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然而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让步是两党的让步：国民党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抛弃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我们以后者换得前者，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如果说这是共产党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义[14]和恶意的污蔑。

（十二）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15]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

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但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16]和反共战争），实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败，陷民族于危险的地位，于是三民主义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政治经济纲领。其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十三）我们过去的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否错了呢？没有错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变为人民的敌人，则革命的动力便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便只剩下了共产党；革命的组织责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的肩

上。仅仅共产党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保持革命的传统，提出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且为此口号而艰苦奋斗了许多年。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不是违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而是坚决地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没有一项政策不适合这种任务。我们的政策，包括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内，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范畴内私有财产制的界限以外，并没有实行社会主义。新的民主共和国所包括的成分是什么呢？它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及一切国内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这些阶级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联盟。这里的特点是包括了资产阶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为了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共产党愿意停止使用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准备在新的民主共和国建设过程中，用立法和别的适当方法去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还是属于中国人，这是首先待解决的问题。既是在保卫中国的大前提之下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那末，由暴力没收方法转变到新的适当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农民主共和国口号，过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弃，都是正确的。

（十四）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敌，国内的某些矛盾，必须给予适当的解决，其原则是应当有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增强和扩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缩小。在民主革命阶段内，国内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那些不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国内战争，党派敌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一方面暴动政策和不

利于抗日的过高的经济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斗争（批评的自由，党派的独立性，人民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的改善等等）。

（十五）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我们的领导责任

（十六）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那种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至于流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17]，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

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对于共产党发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长久的时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证据。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十七）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是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例如我们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基本口号，又提出了“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第二，是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

（十八）和平实现与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这种改变，主要是从武装的转到和平的，非法的转到合法的。这种转变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干部，成为主要的一环。

（十九）关于民主共和国的性质和前途的问题，许多同志已提出来了。我们的答复是：其阶级性是各革命阶级的联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是在执行民族抗战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是在国际新环境之下（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世界革命新时期的前夜）建立起来的。因此，按照社会经济条件，它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国家，但是按照具体的政治条件，它应该是一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的国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它的前途虽仍然有走上资本主义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时又有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可能，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力争这后一个前途。

（二十）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

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

[1] 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2]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3] 这是指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是：“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共产党愿意作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这种国防政府，应当设法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由工农军政商学各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以及国外侨胞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在民主条件下选出的代表）的代表机关，以便更具体地讨论关于抗日救国的各种问题。共产党绝对尽力赞助这一全民代表机关的召

集，并绝对执行这一机关的决议。”“抗日联军应由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合组而成。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这种总司令部或由各军抗日长官及士兵选出代表组成，或由其他形式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体人民公意而定。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为了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了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4] 这是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期间，于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个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下面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中国的行动，震动了全中国与全世界。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以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当然，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与阶层，不同的武装队伍，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与立场。有的是为了保持他们原有的地位，有的是为了要争取运动的领导权使运动不至超出他们所容许的范围之外，有的真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正因为他们的动机与立场各有不同，有的在斗争开始时就要动摇叛变的，有的会在中途消极或退出战线的，有的愿意奋斗到底的。但是，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

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只有按照这种路线，我们才能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去对付全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不管他们怎样不同意土地革命与红色政权，在他们对于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斗争采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参加之时，对于反日战线的开展都是有利的。因为这就使他们离开了总的反革命力量，而扩大了总的革命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不但如此，即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过去是许多帝国主义互相竞争的结果，产生了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互相竞争的卖国贼集团，他们中间的矛盾与冲突，党亦应使用许多的办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暂时处于不积极的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是如此。党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人民的力量以反对全中国人民的公敌时，应该坚决不动摇地同反日统一战线内部一切动摇、妥协、投降与叛变的倾向做斗争。一切破坏中国人民反日运动者，都是汉奸卖国贼，应该群起而攻之。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也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日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

[5]　指1936年5月5日中国红军要求南京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通电内容如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

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阻拦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6] 指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随后，根据情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政策，估计人民共和国这个口号不会为蒋介石集团所接受，于是在1936年8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接着又在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对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了具体的说明。两个口号形式上虽有不同，实质上却是一致的。下面是1936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民主共和国问题的两节：“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

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民主共和国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工农民主专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并且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中央着重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地巩固红色政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才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给民主共和国的实现准备前提。没有艰苦的持久的斗争，没有全中国人民的发动与革命的高涨，民主共和国的实现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在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过程中，应该使这个民主共和国从实行本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始，一直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彻底的完成。”

[7]　这个电报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

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8] 1936年11月8日，上海的日本纱厂工人开始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先后共达4.5万余人。罢工坚持20天左右，获得胜利。日本资本家被迫同意自11月份起增加工资5%，不无故开除工人，不打骂工人，等等。11月19日，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为响应上海工人的斗争，也开始罢工。12月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罢工工人遭到镇压。

[9]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海关进入华北以后，特别是自1935年《何梅协定》以后，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华中的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因此，英美就开始改变对于日本的态度，并且给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影响。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英国曾经主张拒绝日本所提出的不利于英国在华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还能够继续统治中国人民，就不妨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以便打击日本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政策。

[10] 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在1936年6月间发表通电，宣布“北上抗日”，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买了陈济棠的军队。7月，陈济棠被迫下台。9月，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达成协议，事变和平解决。

[11] 1936年7月底至8月初，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向绥远（现划归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进攻，当地驻军傅作义所部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奋起抗战，击退这次进犯。11月，日伪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当地驻军再次进行抵抗。全国人民开展援绥运动，组织后援会和战区服务团，并且募集款项、棉衣等支援前线。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绥远的中国驻军击溃了日伪军，收复了当时日伪军在绥北的主要基地百灵庙。

[12] 1936年，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压力和英美同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南京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这一年的3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同日本驻华大使举行会谈，最后发表共同公告，宣布双方意见“未能全部一致”。在同年9月至12月的中日谈判中，国民党政府又采用拖延的办法，使谈判未获结果而停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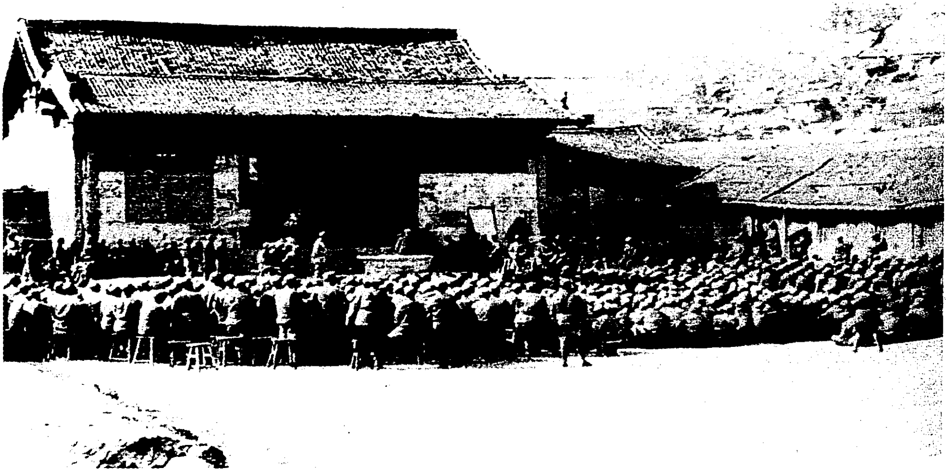
[13]　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所举行的一次会议。

[14]　阿Q是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角。他的突出特点是习惯于用自己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为是胜利者即“精神胜利”者。阿Q主义就是指这种“精神上的胜利法”。

[15]　这里所说的三民主义，是指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同意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但并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

[16]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改组成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曾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在全国各地屠杀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内许多真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他们称之为“清党运动”。从此，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

[17]　这里是指1927年上半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所造成的情况。



1937年5月，红军指战员在听取有关抗日救国形势的报告。

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复周恩来电[1]

（1937年5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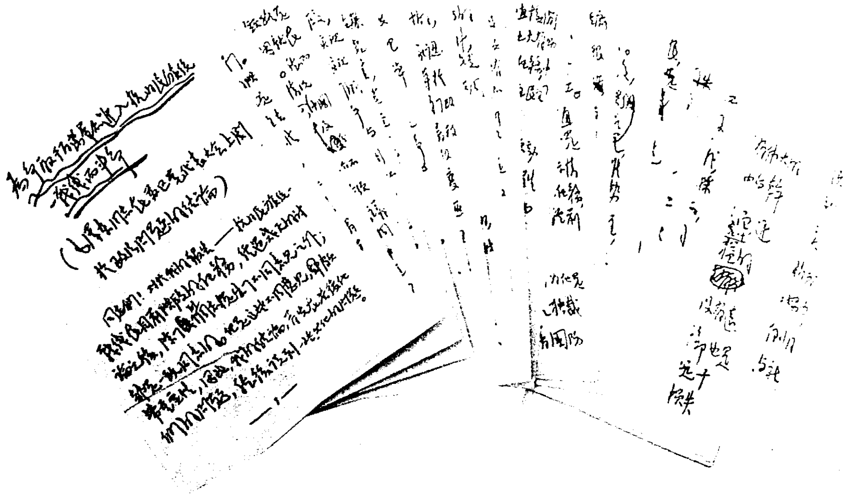
坚持两党发共同宣言为有利，此宣言在共同纲领确定之后发表，宣言大意不外共同纲领草案上所说的。向张、顾说，如他们要我党单独发，则：第一，彼党须同时发宣言，第二，我党宣言中不得不驳复三中全会宣言及根绝赤祸文件中我党及人民不能忍受之许多东西。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关于国共两党发表宣言问题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

（1937 年 5 月 8 日）



毛泽东撰写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手稿。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

---

[1] 这是毛泽东在 1937 年 5 月 2 日至 14 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1]，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

---

[1] 西安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当时已开始实现的中国国内和平和正在逐渐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加紧准备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同时，表面上对国民党当局暂时采取了和缓姿态。1936年12月和1937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曾两次唆使伪蒙古军政府发表通电，拥护国民党政府集中军力进攻红军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宣称同国民党军队停止作战。1937年3月，日本外相佐藤尚武诡称要调整中日两国的关系，协助中国的“统一和复兴”。日本财阀儿玉谦次等还组织了所谓“经济考察团”来华，诡称要协助中国建成现代国家。所谓“佐藤外交”和“日本后退”，就是指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玩弄的这一套骗人的阴谋。

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1]，

---

[1] “佐藤外交”是林铣十郎内阁继广田内阁对华强硬外交失败后，从对苏战略出发，为扭转中国抗日趋势所采取的一种和缓外交。林铣内阁组成之时，南京政府已中止了张群川樾的会谈，中日政府间的交涉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为打破对华关系的僵局，林铣内阁决定大搞以经济文化往来为重心的“民间外交”。以所谓“平等”态度待华，诱导南京政府与日“握手言和”。“佐藤外交”与广田内阁侵华政策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其以“平等”相标榜的对华“民间外交”活动，只不过是引导南京政府与其恢复“政府外交”以便推行全面亡华政策的诱饵罢了。

苏州审判[1]，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2]，杨虎城出洋[3]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4]，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

---

[1] 1936年11月，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随后又把他们押到苏州，在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1937年4月，这个法院的检察官对沈等提出“公诉”，并于6月11日和6月25日两次开庭审判，说他们违犯了所谓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2] 西安事变以前，东北军驻在陕西、甘肃境内，同西北红军直接接触，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193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隔离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并且乘机分裂东北军内部，强令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和苏北地区。

[3] 杨虎城（1893—1949），陕西蒲城人，原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36年12月12日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在释放蒋介石后送蒋回南京，即被长期囚禁。杨虎城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迫令于1937年4月27日辞职，6月29日出国“考察”。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虎城于1937年11月回国准备参加抗日工作，但不久也被蒋介石逮捕长期监禁，到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迫近重庆的时候，在集中营内遇害。

[4] 潼关是陕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处的军事重地。西安事变时，国民党中央军驻在潼关以东，准备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某些号称“左”倾的人们（张国焘是其中之一），主张“打出潼关去”，向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这种主张是同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相反的。

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1]，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

[1] 1918年至1920年，法国政府积极地参加了14个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并在这次干涉失败以后继续执行孤立苏联的反动政策。直到1935年5月，由于苏联的日益强大及其和平外交政策在法国人民中的影响，由于法西斯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法国政府才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但是，法国政府后来并未忠实地执行这个条约。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虑？然而究竟还不是这样；佐藤外交是大

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

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1]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2]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

---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4～286页），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第十二、十三部分（《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97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三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84页）。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第二部分，《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14、279～293、400～402页）。

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1]

---

[1] 参见1935年5月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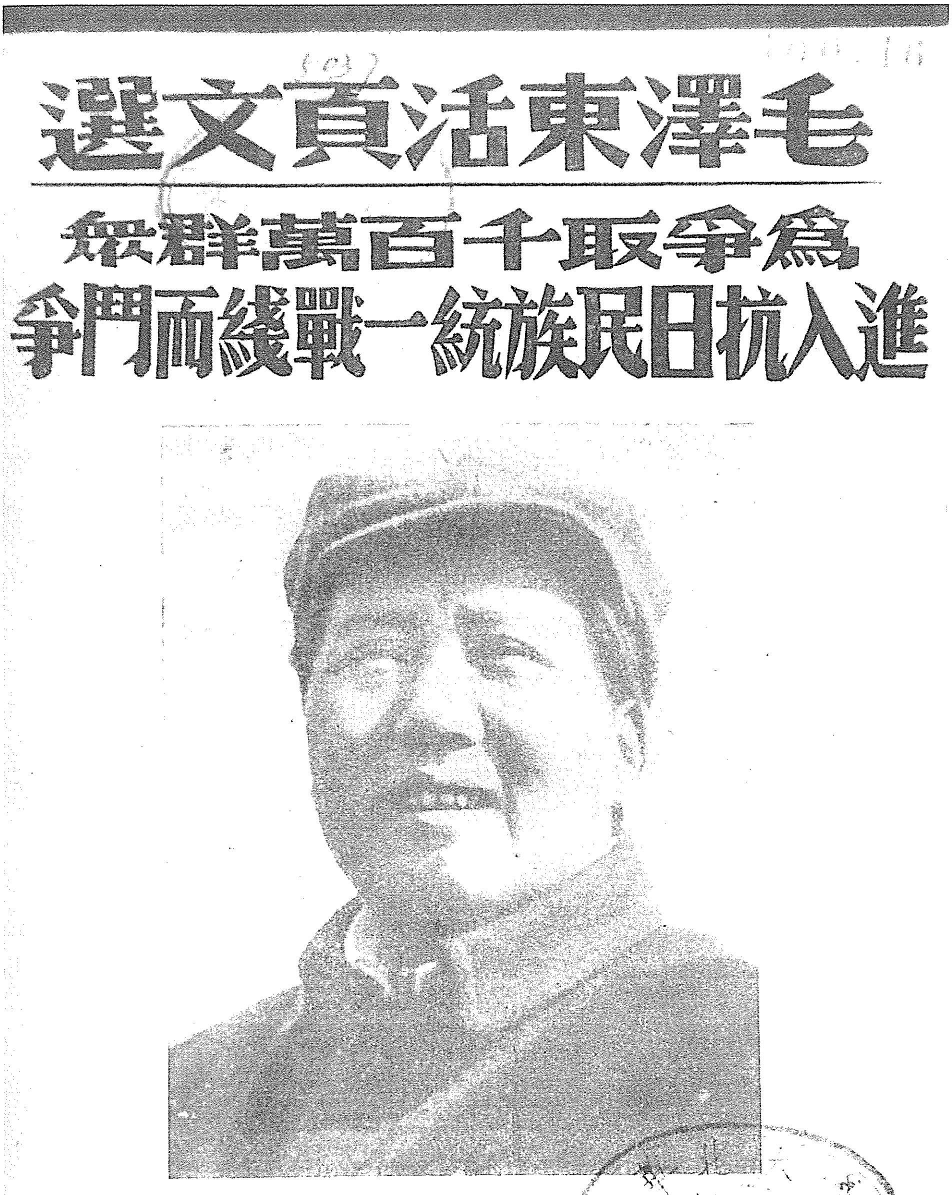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1]，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

---

[1] 这里所说的分歧，指1935年至1936年间党中央路线和张国焘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1936年10月，红军第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地区同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193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对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及其危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总结，使党和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新的一致，标志着这个分歧已经解决。至于后来张国焘公开叛党，堕落为反革命分子，那已不是领导路线上的问题，而只是个人的叛变行动了。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毛澤東活頁文選

為爭取千百萬群衆

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

華北聯合大学教務處選印

华北联合大学出版的毛泽东活页文选《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解决的步骤[1]

（1937年5月9日）

一、确定共同纲领。二、发表共同宣言。三、发表特区政府及四个师师长以上首长。四、我们实行军队改编，南京实行释放政治犯。五、目前为免除顾、张等疑虑，可由周发表一谈话。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

（1937年5月10日）

今年“八一”是中国红军诞生的十周年，在过去这十年中，红军是□下了许多蜚声国内外的辉煌史实，现在在这十年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又滋生了红军新的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一满十年的红军纪念日更带来了特殊的纪念意义。

为着纪念这个有特殊意义的红军诞辰，特决定大规模的编辑十年来全国的红军战史，并指定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溪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萧克，邓小平等十一同志为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整理，委员会以徐梦秋为主任。

现特号召中华民族的英雄——全体红军指战员尽你们最大的努力，各就个人的闻见，把红军各种的历史，战斗等等写出来，并寻各种纪念品，来完成这一部伟大的史著，纪念十年奋斗的红军。

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稿件须在七月半以前送到委员会。稿末必须注明真姓名和机关。征集项目附另纸。

中革军委主席　毛泽东
总司令　朱　德
五月十日

红军历史材料征集的项目

历史——各部红军的产生和发展，
战史——各个战役和重要战斗，
长征史——片断的或全部的回忆，
史略——牺牲的同志传记或红军的故事，
报纸——过去的各种大报小报，
宣传部——过去的传单标语宣言等，
书籍——新编的，翻印的，铅印的，或油印的，
图书——旧存的和新的，
剧本活报——过去印出的□本或补录的，
日记——机关的和私人的，
歌曲——过去的各种歌曲，土调，山歌，
像片——旧摄的或新摄的，
纪念品——牺牲同志的或缴获的，
旗帜——自己的或缴获的，
奖章——牺牲同志的或自己的，
文件——过去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
法令——红军的或苏维埃的。

复李宗仁电[1]

（1937年5月13日）

和平、民主、抗战为今日民族解放斗争不可分割的方针。和平虽已实现，然非民主不足巩固和平。抗战迫在面前，然非民主不足保证抗战。促成全国政治之民主改革与开放人民之自由权利，为当前任务之重心。

---

[1] 这是毛泽东复李宗仁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致周恩来电[1]

（1937年5月14日）

同意他们派考察团，并力争由张冲率领。考察的目的应为增进团结，绝对不能有妨碍团结之表现。坚决反对康泽[2]及其他任何叛徒进来，非叛徒而蓄意破坏的分子也坚决拒绝。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朱德、张国焘关于国民党派考察团来陕北一事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康泽，当时任国民党复兴社中央常务干事会书记长。

给西班牙人民与人民军的信[1]

（1937年5月15日）

西班牙人民及武装同志们：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苏维埃，认为西班牙政府现在所领导的战争，是世界上最神圣的战争。这个战争不只是为了西班牙民族的生命，也是为了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战，因为西班牙政府，是在抵抗破坏世界文明文化和人类正义的德意法西斯蒂及西班牙的卖国贼们。西班牙的政府和人民正在向德意法西斯蒂战斗，而德意法西斯蒂却正是极力支持在远东进攻中国之日本法西斯蒂的。日本法西斯蒂正以其全力进攻中国，它占领了我们东北四省之后，又侵入我们的北部和中部。如果没有德意法西斯蒂的帮助，日本法西斯蒂是不会像今天这样疯狂的向中国进攻的。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在人民阵线中团结的各党派，而且我们也正在号召中国各党各派结成民族统一战线，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蒂。我们的工作正在急切的进行，我们得到胜利必将予日本法西斯蒂以打击，这也就帮助了西班牙人民与政府。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的斗争是不能与你们在西班牙的斗争分开的。中国共产党现在正以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争来帮助和鼓励你

---

[1] 这是毛泽东给抵抗德意法西斯侵略的西班牙人民和武装同志的致敬信。

们西班牙的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为你们保卫马德里及在北方和南方前线上的胜利激动万分。我们苏维埃区域的报纸每天发表着关于你们的英勇斗争的消息。我们坚决相信，你们人民阵线中各党的统一是你们最后胜利的基础。我们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提议的十大纲领也完全赞同。

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在东方的斗争是相同的，除了已经提到之外，在我们的队伍中，都有着托洛茨基匪徒分子的混入。唯有坚决反对这些内奸，我们才能巩固我们的阵线。在反对我们自己敌人的斗争中，我们也在帮助你们在西班牙的斗争。

在中国有着百种以上的杂志报纸发表你们的消息、文章和照片，同情你们为了民主和自由的英勇斗争。我们知道：你们的胜利将要直接援助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蒂的斗争。你们所努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我们激动的读着由各国人民组成的国际纵队，我们很喜欢的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加其间。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是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红军经过了十年的无休止的艰苦斗争，没有财源，饥寒交迫，缺乏武器弹药的供给，直到最后我们得到了现在的胜利。我们知道你们及你们的军队也在经历着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困苦。我们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们十年的斗争指示我们，如果一个革命的人民和军队不怕痛苦，不折不挠的英勇反抗敌人，他们一定会胜利的。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对于你们为了西班牙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英雄男女们，表示深切同志的

敬意。通过他们，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表示了无限的团结和友爱精神。像过去一样，我们将注意你们每一个时辰每一个日子的斗争经过，为你们的一切胜利而欢欣鼓舞，我们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你们的。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于陕西延安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1]

（1937年5月15日）

韦尔斯问：关于国共两党最近的和平谈判如何？

毛泽东答：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则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关于军队之改编及苏维埃之改变诸具体工作，不久即将进行。至现在为止，国民党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够，如对上海救国领袖之起诉[2]，对上海纱厂工人之待遇及对国民大会法规之种种限制，皆使人失望。

问：内战的危险已经完全消灭了吗？

答：内战的危机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内中仍然存在着，不过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现在说和平完全成功，会使群众对于“巩固和平”这一个运动表示松懈。目前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仍然没有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散在全国各处的红色部队停止战争，但是

---

[1] 这是毛泽东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

[2] 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称七君子事件。同年12月，沈钧儒等被押至苏州，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1937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对沈钧儒等提出公诉，并于6月开庭审判。由于全国人民声援和七君子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沈钧儒等被释放。

国民党军队仍然“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我们现在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这些地方的进攻。至于南京与地方的对立，也是存在着，惟有实行彻底民主，才能完全消灭此种对立与内战的危机。

问：共产党对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样？

答：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的革命。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他们挣扎着，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到人民这边来。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谓亲日派，也存在于国民党中，他们为全国所不满，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也不满意他们，这部分人如不改变态度，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

问：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呢？

答：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是有开展的，国共两党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怀疑共产党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反对国共合作；至于“左”倾分子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也比较减少了。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迄未具体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致引起全国的不信任。我们说“大家应该工作”，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它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问：国内各党派对统一战线的反应如何？

答：汉奸除外，其他一切党派，对全国团结都是同情的。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1]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义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问：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

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求得其适当的解决？

答：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但在抗日战争的面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因此在统一战线纲领中，我们提出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农民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压迫，起来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给以民主权利与改善其生活，始能减少其矛盾。我们要在正与国

---

[1]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系、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之。

问： 你们为什么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

答： 关于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我已经在别的机会中讲过许多。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问： 怎样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答： 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

问： 共产党对此次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

答： 今天的国民大会，带着国防性，同时是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因此全国应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是准备参加的。南京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则国民大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全国应联合要求南京修

改其不正当的规定。国民大会的选举，应由人民参加，它的召集与开会，应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务应不限于谈宪法，而须扩展到彻底而具体的讨论抗日救亡的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大会的意见，已向全国发表，并向国民党提出，现在仍继续谈判，目的在使国民大会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务。

问：对释放政治犯问题，共产党的意见如何？

答：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共产党早已提出，现在继续要求，把它当作同国民党谈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彻底转变，则没有理由不释放政治犯；不过目前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口头上答应释放政治犯，但实际并没有做到，而且还有继续逮捕爱国犯的事件。苏州对救国领袖的审判，大失人望，南京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满，南京要真诚表示它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马上释放救国七领袖，并宣告其无罪。

问：关于准备抗战问题，你有何意见？

答：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暂时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在准备侵略期间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我们就应利用此时机作积极准备抗战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

抗战的意见。

问：中日战争的结局你怎样估计？

答：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存在的。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发生此种危险，中国人民如果继续睡觉，房子就会被敌人抢去。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我们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地反对中国殖民地化，要求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并且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与解放的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问：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样看法？

答：日本统治者与英国保守党政府正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进行着妥协谈判，以达到他们牺牲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不能听他人的宰割，中国人民应当严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动摇与消极，人民与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对它都是不能饶恕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英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错，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国欲维持现状，但现状的内容容易时刻变动着，这从“九一八”后英国的步步退让中可以看出来。在基本上，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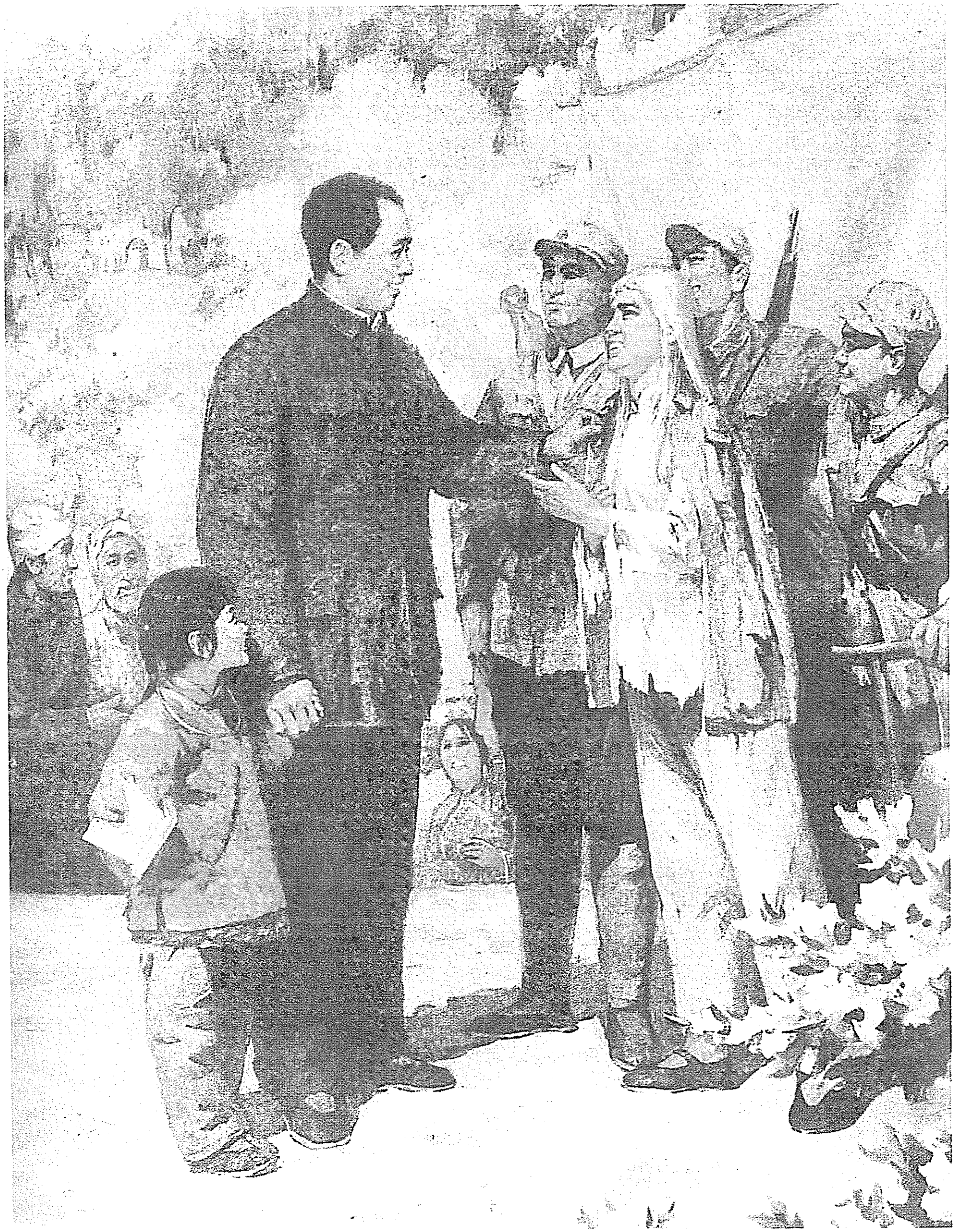
政策是对立的，但是一时的、某些部分的妥协是可能的，因为英国本来随时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达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关于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中国不能完全孤立，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在今天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中苏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接近与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问：你对北方青年有怎样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环；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春暖花开》（油画）

致李富春、黎林电[1]

（1937年5月23日）

为着彻底肃清苏区内的土匪，保障一切建设事业的实施，创造抗日模范特区，陕甘宁地方武装应作出清匪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军事部部长黎林电的主要内容。

会见蒋介石须谈两方面的问题[1]

（1937年5月24日）

周：

我们觉得此次见蒋须谈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关于纲领及苏区、红军、共犯、党报、经费、防地等问题；第二方面，关于对日、对英、对苏外交，国防军事、国防经济及国民大会、人民自由、政治犯等问题。请将你对上述两方面如何提法之意见电告，我们将于二十七日以前有一电报给你。因此请你准备二十八日飞沪。

毛 洛 博

五月二十四日十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给周恩来的电报。

和国民党谈判要点[1]

（1937年5月25日）

周：

关于见蒋谈判之问题，除同意来电所提者外，应增加下述各点：（甲）向蒋提出并询问蒋之方针者：（一）保卫绥远、青岛，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英日伦敦谈判等对日问题；（二）联俄问题；（三）太平洋集体安全问题；（四）国防军事财政之准备；（五）汉奸亲日派退出政府问题。（乙）须力争办到者：（一）特区政府委员九人名单为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二）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但准备让步设总指挥部），至少四个师，一师长林彪，二师长贺龙，三师长徐向前，四师长刘伯承，先发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请委任。为加强抗日政治教育，政治部制度照旧（但准备让步设政训处）。（三）取缔北平陶希圣、杨立奎等凶殴学生，西安扣留解放报及书籍，上海逮捕共党，文化建设杂志，破坏两党合作等行为。（四）取缔利用土匪、流氓、会党破坏红军、苏区之行为。（五）增加红军防地。

洛　博　毛

有午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给周恩来的电报。

给抗大的信[1]

（1937年5月28日）

印度祝大夫捐一〇一□□为抗大射击优胜奖，最好请照他的意见办理。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印度祝凯华大夫为抗大捐款一事给抗大写的一封信。

在欢迎中央考察团晚会上的讲话[1]

（1937年5月29日）

今天这个欢迎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为第一次大革命时代，由是国共两党干起的，现在比那个时候更加不同了，民族比那时更危险，两党一致团结，在今天比以前合作的意义与作用是更增加了，过去十年两党没有团结，现在情形变了，如两党再不团结，国家就要灭亡，中央考察团此来，使两党团结进入新的阶段，其意义是很重大，我认为要说明如下两点：

一、有人怀疑两党合作是否有诚意，对双方都怀疑，今天的事实，考察团之此来就说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方面在两年来政治上的表示，如文件宣言，谈判等都是为着两党团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都表示两方的和平政策，不怕敌人挑拨，始终没有动摇，过去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如何呢？要看以后工作来证明，在以后应巩固两党的团结，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若干必须解决的矛盾（不利于团结的矛盾）结成坚固团体去对付我们的敌人，以求得民族独立，民主权利，民生幸福的实现。

二、又有人怀疑两党合作双方都存阴谋诡计，都是临时的策略作用。这也要看过去我们的工作到底是破坏还是团结，我想在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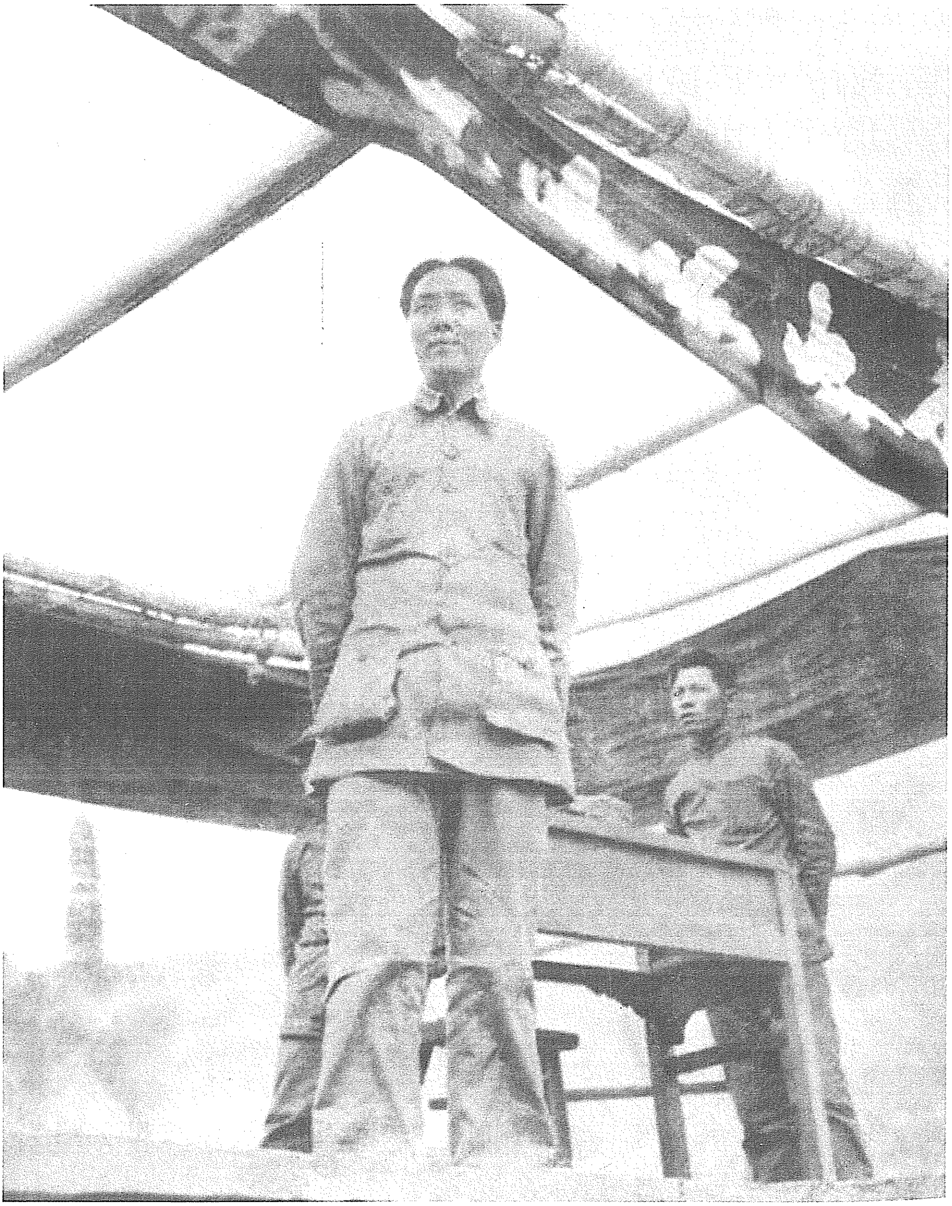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在特区政府欢迎由团长涂思宗（国民党第四军副军长）率领的“中央考察团”晚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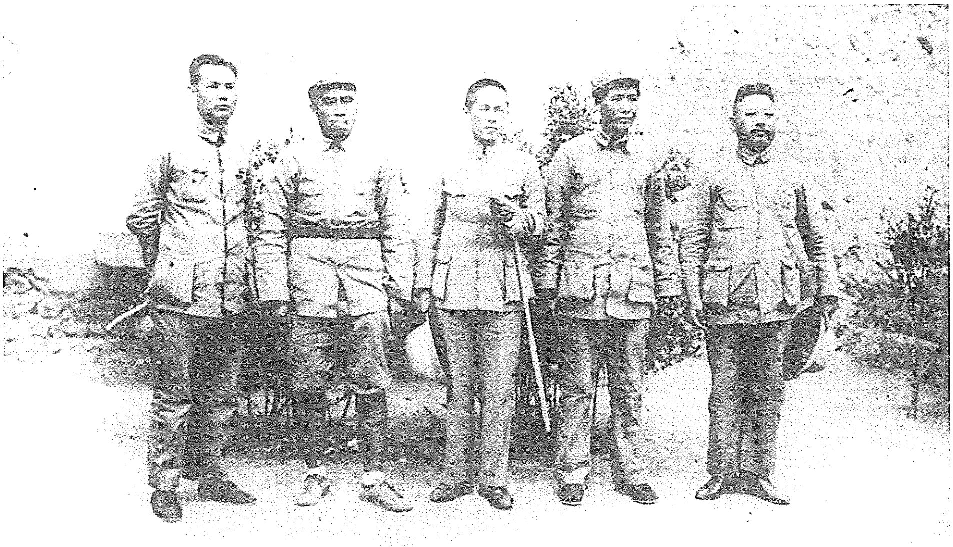
事变以后，事实更加告诉了大家，是向着团结方面的，这主要的看以后，同时有人怀疑两党没有长期合作的诚意，我想这都是一种猜想，我们是希望两党长期的合作下去。并且努力向着这个目标干。

共产党方面诚意的欢迎中央考察团，丝毫没有假意，今天这个欢迎会，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充分的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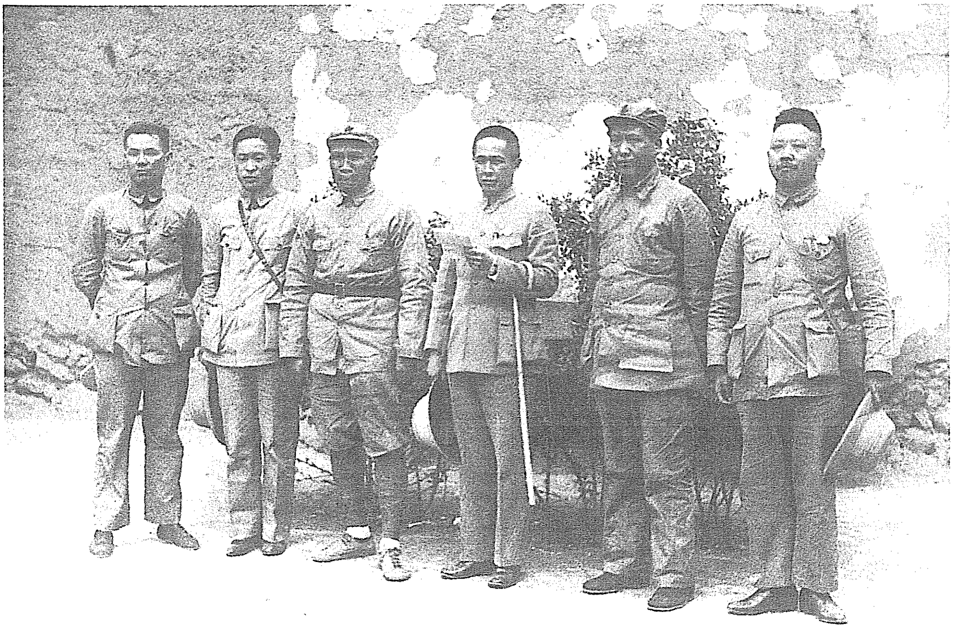
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人员在延安欢迎会上。



1937年5月，毛泽东在欢迎由涂思宗率领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大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合作是长期的。



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等在延安合影。



1937年5月，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和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团长涂思宗等在延安合影。

在延安纪念“五份”和欢迎“中央考察团”大会上的讲话[1]

（1937年5月30日）

今天我们的敌人是日本。日本占领了东四省、察北、冀东等地，到处捣乱，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现在的中心任务是打日本、救中国。我们欢迎中央考察团也是为了打日本、救中国。现在国共双方都感到要团结，共同抗日救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份”和欢迎“中央考察团”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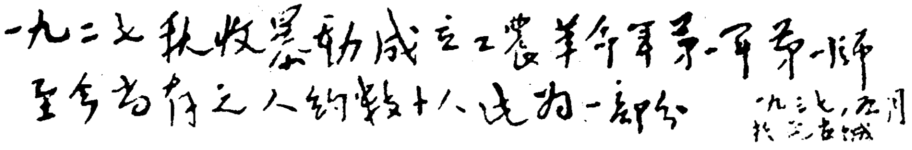
为参加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1]

（1937年5月）

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至今尚存之人约数十人，此为一部分。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五月于延安城



一九二七秋收暴動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至今尚存之人約數十人此為一部分 一九三七，五月
於延安城

毛泽东为参加秋收起义部分同志合影的题词。

---

[1] 这是毛泽东于1937年5月在和18位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同志在延安合影时，在照片的顶端所写的题词。

一九二七秋收暴动成立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
至今尚存之人約數十人此為一部分
一九三七，五月
於延安城

1937年5月，毛泽东和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在延安合影。

观赏万花山牡丹时的谈话

（1937年5月30日）

这是我们民族的财富，一定要管好，等全国解放后，可以在这里修公园，修疗养院，作为劳动人民游玩和娱乐的场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

（1937年6月3日）

群众斗争的策略问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联系这个问题，还有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也是极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于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党与群众工作的发展与缩小、成功与失败，不完全决定于主观方面，也决定于客观方面。在客观有利时而弄得不好，在客观不利时而不使事情弄得不十分坏，这是主观的原因。然而大发展，必在客观有利之时。主观指导受客观可能性的限制，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但是，党员群众与广大干

---

[1] 1937年5月17日至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党代表会议。会议由刘少奇等主持。会议开始，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与会代表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出现了一些分歧，有的代表没摆脱“左”的思想影响，认为刘少奇的报告有右的倾向，批评了刘少奇一些正确的观点。为此，6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问题。这是毛泽东6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避免，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和给以防止。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革命，并且取得伟大的成绩。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宣传教育与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内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左”的传统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并且占着大的数目；（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要克服“左”的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

给郭化若[1]的信

（1937年6月4日）

郭化若同志，并告彭、任、袁[2]：

在保安接到你的信，又看到你给罗瑞卿[3]同志的信，今日又接到来信，你的工作要求与身体情形已经知道了。你在长期苏维埃战争中，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忠诚与劳绩，我们都是完全承认与一致赞扬的。你的身体情形如此，除同意你下期来延安外，正在替你买药，不久当可买来寄你。学习、工作应在不损伤身体的原则下，减少到适当程度。

毛泽东

---

[1] 郭化若，（1904—1995），福建闽侯人。当时任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任，指任弼时，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前敌总政委。袁，指袁国平，当时任庆阳步兵学校政治委员。

[3] 罗瑞卿，当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关于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

（1937年6月5日）

关于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6月5日和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1]，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

---

[1] 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20世纪40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关于党的传统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乙）有，三个人[1]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

---

[1] 三个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1906—1955），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1]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

---

[1] 伯渠，即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

证据。

从洛甫[1]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之存在。因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

[1] 洛甫，即张闻天。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复叶剑英电[1]

（1937年6月5日）

同意派文彬等去兰州任联络。要求顾祝同介绍文彬至青海，释回红四方面军干部，并设法收容流落民间的人员。向徐向前同志问明陈昌浩同志留藏地址，秘密设法接引回来。

---

[1] 这是毛泽东复叶剑英并告张文彬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6月10日）

刘少奇同志提出“保卫华北”“保卫平津”的口号很好，用以进行政治动员，带国防实际性，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我们应积极进行政治宣传，应在不放弃寸土口号下来动员。

北方局要成立，中央代表另派，北方局和省委不需设许多委员会，只设部。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北方局工作讲话的一部分。

致王世英电[1]

（1937年6月12日）

已与彭泽湘[2]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

---

[1] 这是毛泽东致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彭泽湘，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干会成员。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6月12日）

第三党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明日离延安经北平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

---

[1] 这是毛泽东致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在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

（1937年6月20日）

高尔基具有实际斗争精神和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不但是个革命的文学家，并且是个很好的政治家。

---

[1] 苏区文艺协会在1937年6月20日晚上召开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和美国学者T·A·彼森的谈话[1]

（1937年6月22日、23日）

二十二日

问：一九三一年以来，南京对日政策有何演变？这种发展能否分为几个阶段？

答：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由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国民党二中全会为止。在此期间，国民党继续执行它依赖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步步退让、镇压人民的独裁政策。

“九一八”以后，它无条件地放弃了东北。由于一九三二年的上海战争，中国资产阶级让日本帝国主义吓坏了。他们在沿海各省连一点防御工事都不搞，准备把这些省份拱手让给日本。上海战争时，他们就准备迁到洛阳，当陪都，如果必要还要再迁至西安。直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T·A·彼森的谈话。彼森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问题，1924年至1928年曾来中国教书，193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研究中日关系问题，并于同年6月访问延安。1973年3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的《中国研究专刊》第11号上发表了彼森写的《1937年的延安：同中共领导人的几次谈话》，其中第九、十两章为《访问毛泽东》。本篇谈话即《访问毛泽东》。文中问者即T·A·彼森，答者为毛泽东。

到南京发现日本发动上海战争只是作为使占领东北合法化的一种手段，而日本军队并不想占领沿海各省，加以英国和美国也作了一些努力反对日本，南京这才决定不迁都。所以，他们又回到南京，但仍然害怕日本，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二月华北事态发展前，都是如此。[1]

一九三五年，日本企图一举占领华北，南京吓坏了，只得签订何梅协定[2]。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这种态度还占优势。南京当时仍旧表示：只要能和，它并不想打，也即是说，它准备进一步投降。

只有到了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二中全会上，南京才改变了它对日本的腔调。会上，它宣称：假如日本不再进一步侵犯中国主权，不占更多土地，它就不打。这即是表明要求维持现状，从而它也阐明了准备作出牺牲的限度。体现这种路线改变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就是张群和川樾[3]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的谈判。当时南京拒绝了日本的要求。从一九三一年直到一九三六年，南京的投降政策这才第一次表现出有所改变的迹象。

问：这个时期，是否跟南京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关？如果有关系，涉及这一斗争的有哪些主要集团？它们代表哪些社会经济势力？

答：现在我们要谈谈南京改变政策的原因。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因素有三种：

---

[1] 日本搞的“华北自治化”运动，曾激起平津学生广泛的游行示威，并且扩大到全中国，导致在各大城市中组成各界救国会。

[2] 何梅协定，签订于1935年7月6日，主要内容是在华北给予日本特权。

[3] 张群，国民党外交部部长。川樾，日本驻华大使。

（一）中国人民发动的抗日斗争、爱国军队、共产党和红军。这包括：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一九三二年在上海），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打击了日本人的吉鸿昌部队，一九三六年取得保卫绥远胜利的傅作义部队，学生的示威游行，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国救亡运动。

国民党认为，日本的侵略是无法抵抗的。我们知道，东北义勇军已经抵抗了而且还在继续抵抗。国民党认为，人民的抗日运动只会给日本进一步侵略的口实。实际上这种运动给予日本人的打击如此沉重，以致日本人胆战心惊，对侵占更多的土地也产生动摇。国民党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事实上，上海战役和长城战役（在察哈尔和绥远一带）已经证明中国能够抵抗，而且有一段时期制止了日本的侵略。

国民党把共产党视作势不两立的世仇，而不把日本人看作敌人。因此，国民党总想消灭共产党，但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强迫国民党不得不正视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这就是导致南京对日政策发生变化的基本原因。从这点出发，南京开始认识到人民中蕴藏着真正的、整个的民族力量。它开始感到胆大些了，勇敢些了，所以说统一战线使它减少了对日本人的恐惧。

（二）第二个因素是国际形势。苏联同情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这是当然的。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部分：一部分希望和平，保持现状；另一部分，由法西斯侵略者和新的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组成。英国远东政策（具有某些反日行动）的相应改变，也对南京产生了影响。由于以上两种因素，产生了助长南京转变的最后一种因素，这就是：

（三）国民党统治阶级和党内的分化。国民党内部原有许多集团

和派系，但基本上是两个集团：亲日集团和反日集团。分化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已经开始，但直到一九三五年日本搞了华北“自治”运动之后，国民党区域内那种认为中国必须抗日而且能够抗日的见解才形成舆论。过去，这只是相对少数的人所持有的看法；如今，它已日益普遍。到了一九三六年，它已如此广泛，以至于对南京的政治和政策产生了第一次真正有力的影响。

问：南京有哪些集团或者个人赞成或者反对统一战线？南京政府有哪些迹象向民主化发展？沿着这条路线，你认为最近的将来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

答：现在，我们谈下一个阶段，即关于现在和将来。从张群、川樾谈判开始表现出来的南京政策的改变，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明显地继续有所表现。会上，国民党的政策在各方面表现了真正的变化。现在它对日本的态度变得强硬多了，正式通过了国内和平的政策，即不打内战。这种发展，跟中共早就提出的必须团结全国一切力量抗日的政策直接有关。

当前，下一个最重要的步骤是南京有关民主政策的改变。国民党没下决心彻底放弃它统治的根本特色，即其军事独裁。南京没有作出这种改变。实现民主改革，这是当前的首要任务。要巩固国内和平和全国团结一致，民主是基本条件。没有民主，就不能有效地推进抵抗日本侵略的艰巨任务。

因此，今天人民大众的口号是：（1）国内和平，（2）民主改革，（3）抗日战争。所有这些都从属于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国家的总口号。在这个时期，影响国民党政策的上述三种因素将对全国人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借助于这三种因素，我们可以实现这三个口号。

至于那些反对统一战线的集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一）国际方面，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但日本不是孤立的，德国也参加了这个法西斯集团，还有意大利。他们总想引诱中国统治阶级参加他们的阵线。它们不仅要中国成为一个殖民地，而且要它成为用来对抗和平阵线的一支力量。这是第一个有威胁性的因素。

（二）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亲日派和社会上的托派[1]。它们竭力反对统一战线和上述三个主要口号。这是第二个危险因素。

（三）不坚定、动摇分子的危险。统治阶级和整个社会中都有这种人。原则上他们赞成抗日，但又不肯给予人民民主权利。他们的难处是脚踏两条船，结果他们或者是淹死，或者是双脚踏上日本人的船。正是这种情况，造成了五月四日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冲突和将救国会的领导人关进监狱。北师大的杨立奎[2]就是这些分子中的一个。

国际、国内的这三个集团，实际上站的是同一个立场：他们实质上反对中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的任务能否实现，取决于抗日派、主张改革南京制度的民主派和一切争取团结一致的人们能否战胜上述三种反对派。如果战胜了，这些口号就会实现，否则，前途就会困难。结果如何，要由这两个阵线之间的斗争来决定。

至于双方斗争的发展会怎样，应当看到抗日阵线已经取得初步的胜利。主要的迹象是：制止了中国参加法西斯阵线，使它转向反

---

[1] 托派，极左分子，如张国焘等人，曾反对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要作出的妥协。

[2] 杨立奎，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曾大造舆论攻击北平学联接受中共津贴，但从不拿出任何事实来证明他的论断。

法西斯阵线。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日本已经被打败了。中共早就全力以赴地阻止中国参加法西斯阵线。这表现在西安事变前它就长期致力于在统一战线中团结全中国力量的工作；这也表现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并没有利用这个事件在内战中谋取私利；这更表现在西安事变后中共为了团结全国力量抗日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

问：西安事变时以及事变后，前面说到有组成一支西北联军（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反对南京）的可能性，它在政治上有什么好处？

答：首先，中国没有加入法西斯阵线（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在南京由何应钦领导的、不祥的政治动乱已经预示了这种威胁）。其次，如同我刚才所讲的，团结中国一切抗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唯有实施这种政策，才能救中国。

问：西安事变后，燕京大学的学生选举中，左派力量对于要遵循什么方针似乎有所疑虑。他们未有力地参加竞选，结果反动学生取得了控制学生会重要职务的胜利；最近，在新领导召开的一次燕大学生会代表大会上，竟至通过决议要退出北平学联。这会不会是一种迹象，表明群众运动对于理解和正确执行这条新路线遇到的困难？

答：这种情况反映出西安事变引起的一种反作用。西安事变开头还是一种反蒋起义，只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这种性质才起了变化。后来它转变成在承认蒋政权的条件下的大团结。使叛乱变为联合的是红军。中共并没有因此而失利。恰恰相反，中共的力量和影响反而在全中国进一步大大扩展。粗粗一看，似乎我们在燕京的影响有所减退，但这种看法并不全面。我们假如从全国的大学和城市全面来看，实际上中共的影响和威信并未削弱，而是增长了。我们相

信，学生们一定会看清全局，认识我们的政策在西安事变中取得的胜利。

问：承认南京是全国各种力量的领导，会不会使学生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产生混乱？要采取什么行动路线才能避免发生这种困局？

答：对于领导问题，群众不会产生什么怀疑。领导并不靠力量的大小，而在于领导者提出的纲领和作出的努力。中共不谋私利，只为大多数人民的、国家的、劳苦大众的利益服务。如果斗争胜利了，日本人打败了，如果局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那就意味着这个运动是在中共的领导之下。中共指明的道路，是救国的唯一道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如果全国都遵循中共所规划的道路，敌人阵线的钢铁意志也定被粉碎。不论是日本的影响、亲日派或者各种动摇分子，他们统统都要被中共领导的人民斗争所消灭。永远存在下去的是我们，而不是他们。我们的美国朋友们必定会看到这种结局。

问：英国加强中国实力以抗日，是不是为了避免战争和保护它的利益，并且通过使敌对双方保持均势的做法利用双方来反对苏联？这种支持难道不会促使南京出现一个将来企图消灭中共的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

答：英国加强对中国的影响，是当前的一种矛盾现象。抗日斗争中，由于中国处于殖民地的地位，一个第三国有可能在此时加强它在中国的地位。那么，是否可以说这就是前门驱虎后门引狼呢？不行，那是不正确的。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

不能把日本看作是和英国同样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跟侵略阵线勾结，另一个并非如此。把它们一样看待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把它们看成是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结果我们就要同时打它们两家，

或者必须同时打一切帝国主义。这是错误的、危险的。只有托派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必须打一切帝国主义。表面上，它仿佛很革命，但实际上会把英国赶到日本一边去。这是作茧自缚。

中共的政策刚刚与此相反。我们必须从任何反对日本的国家得到援助以打击日本。我们体会到，如果中国像东北那样地被法西斯国家所征服，从托洛茨基的漂亮词句中我们什么也得不到。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给中国提供的援助，这种支援必须限于一种特殊的范畴。这种国家的政策必须不同于日本，主要是在这一点上不同：即维护中国的主权。

从前，英国是反苏十字军的头子，大英帝国的神圣职责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现在，德国和日本接过了这个衣钵，英国正在改变对苏联的态度。目前它采取维持它现有地位的保守政策。尽管英国不喜欢苏联，但新的形势也叫它不能十分喜欢德国和日本。当然，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贯对他们的思想自由引以自傲，他们爱怎么想就可以怎么想，但他们到头来必定会得出这个结论：还是借苏联的援助维护他们的利益好些。思想跟行动并不总是一回事。

英国搞不成你讲的那种远东实力均势。确实，英国很久以前就采取了并一直遵循着均势政策。但是，一旦均势双方力量不均，就要这边加点那边减点以求取得平衡。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任何这样的均势只能是暂时的。英国在欧洲想搞这种均势，但只要出现任何均势，法西斯国家毫无疑问就会破坏它。英国要拯救自己，就不得不援助和平阵线的势力、民主势力。

在某种情况下，因为法西斯势力迅速发展，英国必须利用往往是革命的反法西斯力量。所以，它不能阻挠革命的反法西斯力量成长。妥协政策、均势政策容许革命力量成长。法国和西班牙的实例

体现了这种进程。这两个国家里都有一定的亲法西斯势力，但让这种势力当权，对于英国是太危险了。因此，英国尽管不喜欢联合阵线政府，但也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之合作。英国当前的政策有许多的矛盾。它的妥协行动也助长了法西斯主义者的抬头，而法西斯洪水的泛滥又激起了革命的浪潮，这样一来苏联这条船就升得更高了。

今天中国的形势跟西班牙的弗朗哥境况有某些相似之处。黄埔集团（南京的军事右派）面对着两个敌人——中共和日本。假如它联日反共，它就要扮演弗朗哥的角色，像在西班牙那样，那就要跟中国革命力量打一场内战。假如黄埔集团决心抗日，它就必须扩展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的力量，从而它必须接受中共的纲领。因此，它也不能阻挠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管它怎样做，中共的影响都会增长。

至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很明显，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到现在，甚至从更早些时候起，南京一直在搞军事独裁，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独裁又外加一个亲日政策。现在，国民党改变了它的外交政策，它也必须改变它的国内政策。国民党在同一个时候既要镇压人民，又要抗日成功，那是行不通的。很可能，南京并不愿意深入、持久地执行抗日政策。现在还没有抗战，还没有民主。这只能是一种暂时情况。目前时期具有过渡的特点，它正在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我们正处在这个过渡时期之中。

笼统地说，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也可能看到许多不健康的现象。在中国，我们看到逮捕和审讯救国会的领导人，看到镇压群众运动，看到还未完全放弃的旧政策的一些残余。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健康倾向反对残余弊病的斗争。我们还看得见另外这一面，因此我们不必过分担心。要客观地注视正在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才是

目前时期的本质特点。假如某些国民党成员继续坚持旧政策不求改革，他们有采取这种态度的自由；但是，新生的抗日民主力量正在成长壮大，它必将制止这些人的行动。即使是美国最高法院院长（查尔斯·伊文斯）休斯，也得有所改变，否则只有垮台完事。

二十三日

问：学生和知识分子当前应持什么立场？

答：作为二者择一的情况——或者跟随南京，或者跟随中共——来提出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过去，有些学生跟中共站在一起，一些学生跟南京站在一道。如今，在统一战线中，在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中，有着一个共同的前途。根据反对日本、拥护民主阵线的纲领，我们能够团结绝大多数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只有一小撮右派会动摇。

在过去，知识分子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军事独裁统治的双重压迫。感到这种内外交煎压迫的，还不仅是知识分子，那些受到内外压迫的资产阶级也有同感。

今天，有了一个新的前景。目前情况是，我们取消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国民党取消它的专制独裁，双方联合起来创立一个民主共和国。这是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假如不满足这个要求，假如这个纲领不向前发展，南京的地位将日益削弱，要维持现状也越来越困难。因此，双方都要朝着同一个政治目标——抗日统一战线——作出努力。与此同时，还要跟敌对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的联合阵线——作斗争。

问：你看统一战线将来的发展怎样？

答：统一战线当然是由一些不同的集团组成的，它们之间的斗争将决定它的将来。它将按照不能详加预见的不同阶段向前发展。

它的组成，基本上以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一方，以民族资产阶级为另一方。它们有些东西是共同的，有些是不同的。那些共同点应该而且能够团结统一战线中的双方，但同时它们之间的分歧也带来斗争，这种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问题必须这样来看待。

况且，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外部事件也影响着将来的发展。因此，它取决于中国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发展。但有一点可以断言，显然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阵线胜利，要么就是中国统一战线胜利。一切取决于这两者之间斗争的结局。

至于在最近的将来，中国国内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所有各种集团都有它们在其中的一份利益。基本任务是改善农民、工人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进一步的任务是解决受到殖民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威胁的资产阶级的某些问题。这些就是统一战线纲领第一阶段的任务。

民主共和国创立之后，下一项预定任务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它的未来，首先，是民主共和国；其次，是社会主义革命。

问：为什么你认为中国不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答：第一，无论过去或现在，中国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可能梦想那样一种远景，但无论中国的目前状况或是现时代的要求都不允许那样。

中国不准备长期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但现在它正准备着争取独立的地位。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争取实现

了友谊。你们为了促使美国采取正确立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进行斗争的政策，我们完全同意。

不能把中国的革命看成是孤立的。它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虽然有它本身的特点，但基本上跟西班牙、法国、美国和英国人民的斗争是相同的。这些斗争的固有特征全都相同，全都是为了争取世界进步。美国大众对中国的广泛同情正表明了这种共同性。他们关怀中国人民的命运，我们也关怀他们的命运。请把这个意思转告美国人民。中国存在着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压迫，美国也存在着压迫，只是来源不同。因此，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我们两国人民团结起来的联合斗争，能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崭新的世界。

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在一起。

和尼姆·韦尔斯的谈话[1]

（1937年6月24日、7月4日、8月13日）

一

（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前途。过去一些知识分子站在国民党一边，一些站在共产党一边。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目标，大家都将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团结绝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是可能的，只有极少数右派会动摇。”这个统一战线是反对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它的内部，一方面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有共同点，所以能够联合起来；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所以在统一战线内部还有矛盾和斗争。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根据中国内部和外部的形势而定。抗日战争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日本侵略者胜利，或者是中国抗日阵线胜利；第二种可能性的前途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在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问题，如提高生活待遇等，资产阶级的问题，如避免殖民化危险等，都将得到解决。民主共和国建立后，下一个

---

[1] 尼姆·韦尔斯是美国记者、作家斯诺·海伦·福斯特的笔名，埃德加·斯诺的前妻。1937年访问延安，先后3次采访了毛泽东。她后来根据当时的访问记录，写成了《延安笔记》《革命生涯：传记》《中共杂记》等书。本篇谈话选自《延安笔记》。

任务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不可能成为帝国主义或者十足的资本主义国家。

（二）中国怎样才能摆脱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任何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条件使中国在将来能跳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现在的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胜利当然是属于革命一边的；苏联的存在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都将有决定性的影响；再加上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据这三个条件，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但这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们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在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需要的，因为它是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之一。通过工业的发展，它将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力量。

二

（一）关于中国各阶级的问题。中国的银行家许多是买办和半买办。中小银行家与帝国主义没有联系。宋子文和孔祥熙是国家资本的银行家。一部分地主和买办的利益与日本有着最直接的联系，他们可能成为汉奸。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半殖民地社会里，作为附属品的知识分子处于工作没有保障的地位。学生是社会革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起这种作用。农民是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他们会跟着资产阶级

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他们会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称无地的农民为农村无产阶级，没有足够土地来维持生计的农民为半无产阶级。红军主要由贫农和农村、城市的无产阶级组成，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地主是四位一体的，他们是地主、商人、收税人，但不一定都是高利贷者。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形式有租金、高利贷、征税、商品价格。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上层的联盟，他们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可能性，也有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可能性，这要根据帝国主义所采取的态度而定。蒋介石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也包括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当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问题上合作时，阶级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亲日派和投降派可能会减少。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的性质。基本性质是共产主义运动。在经过民主阶段到达共产主义阶段之后，它才能进入共产主义领域。正如前面提到的，由于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因此必须由它的党来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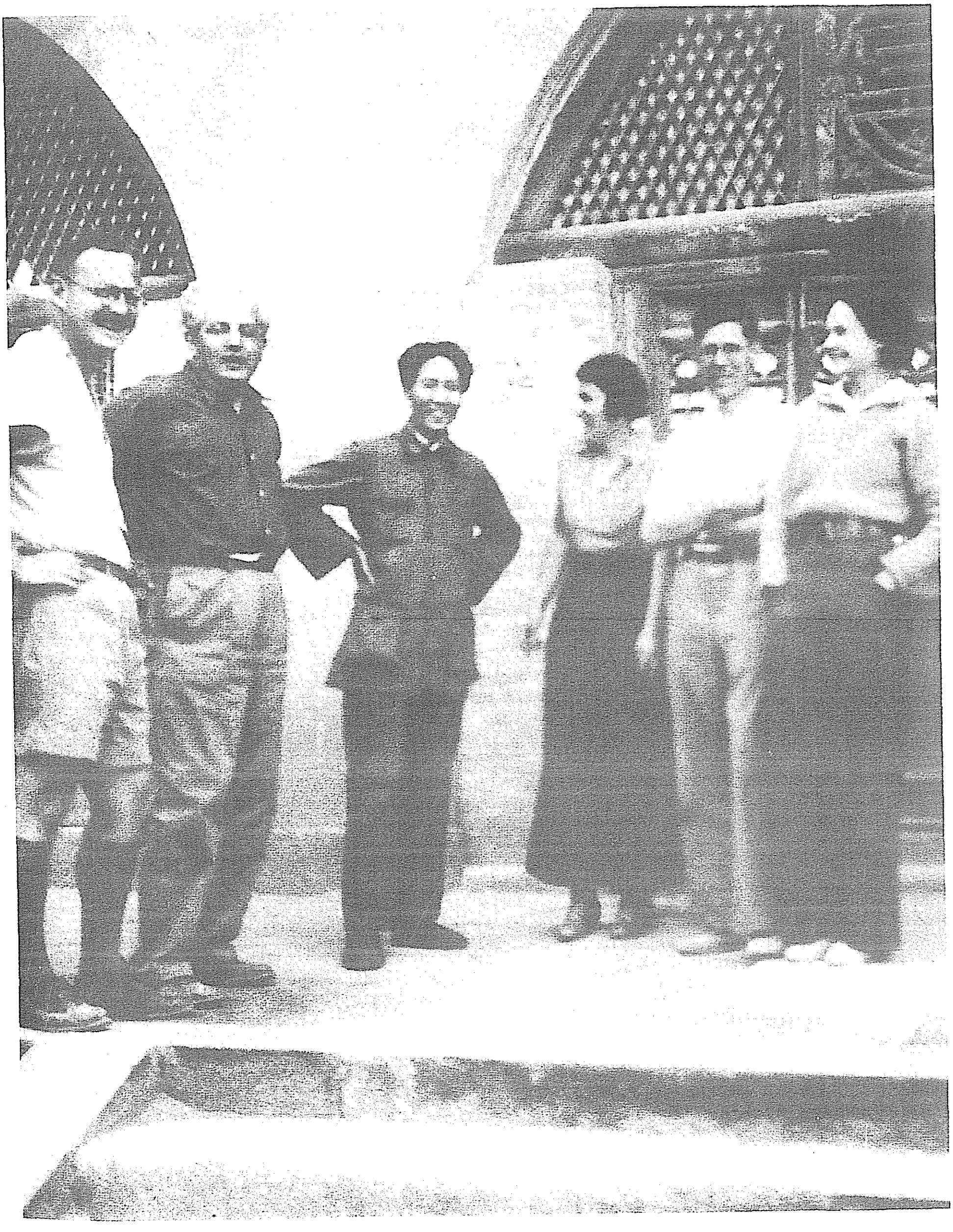
三

（一）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问题。红军刚接到南京的命令，要他们在南京政府指挥下开赴抗日前线；朱德总司令已到南京去参加正在举行的国防会议，但蒋介石还没有允许发表两党合作的政治宣言。由于蒋介石拖延，所以红军还没有改编。南京担心，如果宣言一公布，将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应。我们要求早一点公布，但是南京不同意。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南京要求军队的总司令和政治部首脑由南京来任命，我们拒绝了。而我们有些要求，如释放政治犯，给予言论、出版自由，允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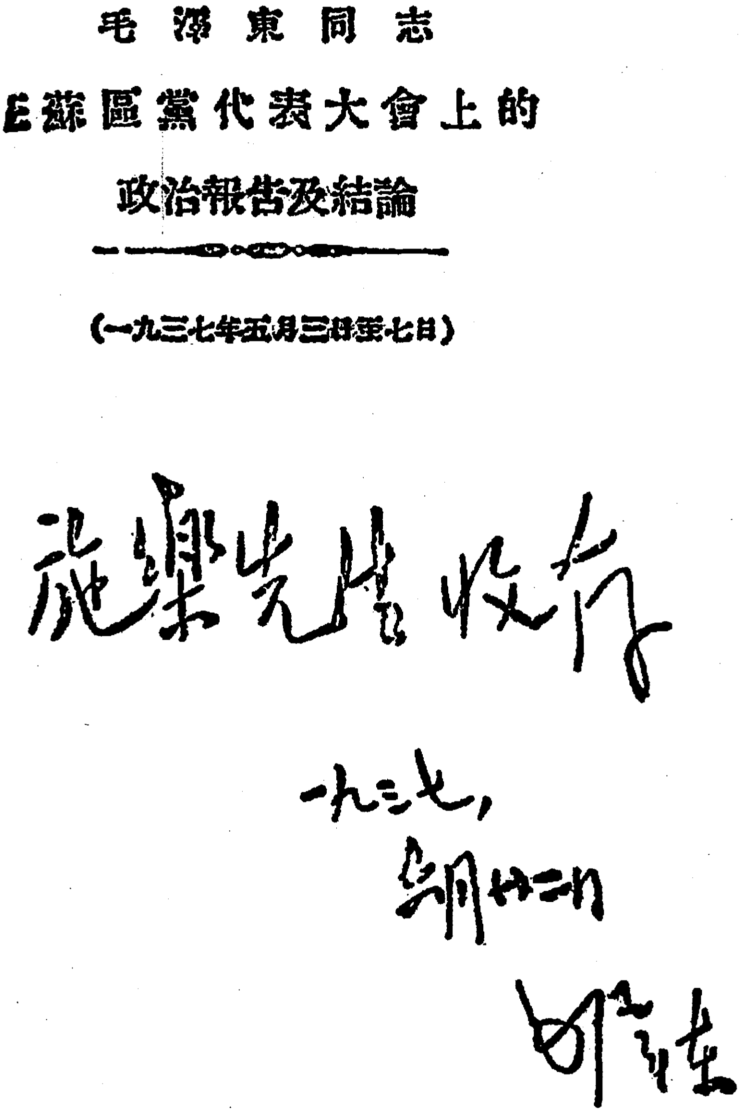
共产党在白区公开工作以及公布宣言等，南京方面都接受了，但还没有实行。

（二）对日作战问题。共产党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将决定这次战争爆发的时间。战争的前途有两种可能：第一胜利，第二失败。我们怎样取得胜利呢？我们必须满怀信心地英勇作战，坚持斗争，我们必须实现共产党提出的十项要求。这样，我们就一定能胜利。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

毛泽东和外国友人在延安。



1937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合影。左起：拉铁摩尔、叶非、毛泽东、阿拉尼斯、彼森、韦尔斯。



毛澤東同志
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
政治報告及結論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

施樂先生收存

一九三七，
五月廿二日

毛泽东

毛泽东在赠斯诺的书上题字留念。

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的信

（1937年6月24日）

我亲爱的白劳德同志：

趁一个同志的访问之便，我致此信与你——我们敬佩的白劳德同志，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和美国人民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同样是面临着一个历史的任务。这就是抵抗和推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努力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我们的工作是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但我们已经有了进步，我们也正在尽力要做到所企求的结果。

从一些美国朋友和其他方面，我们听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大众是深切关心着中国的反日斗争而曾多方援助我们。这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我们从国外得到英勇的援助，同时我们觉得，当我们获得胜利的时候，这胜利会给美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很多帮助。

世界现在正处在一个大爆裂的前夜，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企求解放的人民一定要联合起来进行共同斗争。

此致

革命敬礼！

毛泽东

六月二十四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 年 6 月 24 日）

关于各省工作问题，如果我们在各省的领导弱，讲统一，国民党不发钱，就要发生很大困难。所以还是较缓进行，我们派人弄通了再说。首先要各省变更政策，执行新政策，变更对地主的政策、土地政策。如果军事上敌人进攻，就坚决地打，俟大局定了，不会妨碍我们的军队，我们即可与之协商改编办法。原则上苏区归我们办，红军归我们办，各地都要弄好关系。但对国民党采用经济上限制、硬要缴枪等事，须与之抵抗。基本原则是不能减弱我们的力量。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关于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等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张云逸电[1]

（1937年6月24日）

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致张云逸电的主要内容。

给何香凝[1]的信

（1937年6月25日）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2]，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3]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4]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

---

[1] 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 《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 承志，即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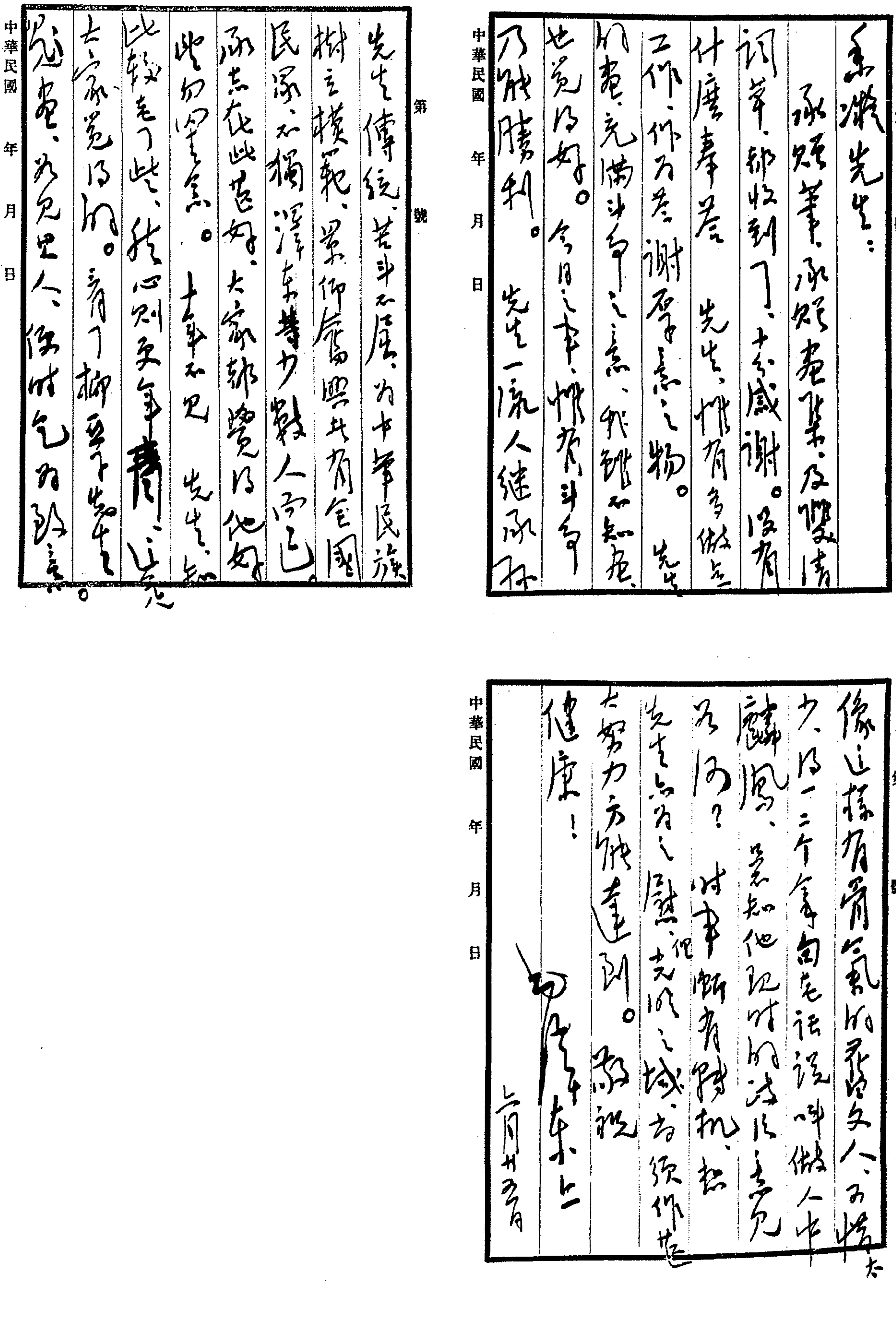
[4]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国民党左派，诗人。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画，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

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六月二十五日



第　號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惠书，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们老，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老，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號

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本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我心则更年青，这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往时气为豪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號

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呼做人中麟凤，岂知他现时的诗作意见为何？时事渐有转机，然先生与为之斗，但光明之域，尚须作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六月廿五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毛泽东致何香凝信的手稿。

和廖承志的谈话[1]

（1937年6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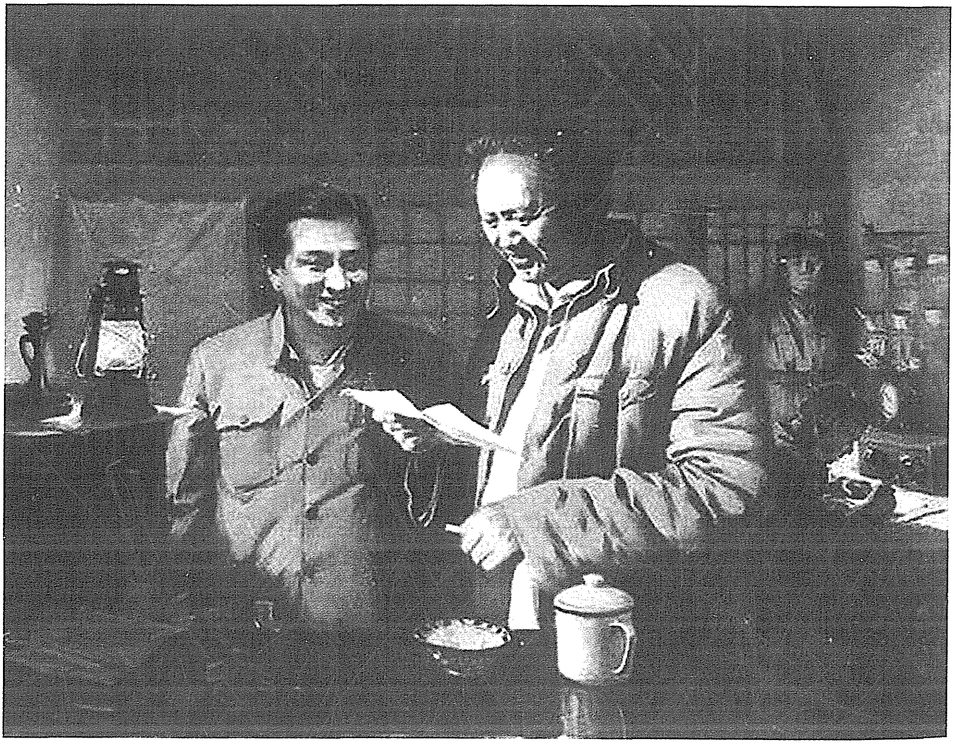
你母亲是个杰出的女性，就你这个独子都不溺爱，把自己最心爱的亲人献给了革命。

有人马上去上海，我给令堂大人写了封回信，你有什么话，也写封信带上，我让他们等你。

偷懒！好，我给你代笔，但可得给润笔费呀！

---

[1] 何香凝托人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份礼物：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一本画集，一本《双清词草》。这是毛泽东和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谈话的一部分。



1937年年初，毛泽东经常到延安新华通讯社视察工作，和廖承志交谈。图为根据廖承志回忆所作的油画。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6月26日）

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6月28日）

对兰州新到被俘人员应除慰问外并向他们解释一切，最好能派人同来西安，免致中途失散。请何柱国致电贺耀祖[2]，将兰州收容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失散。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贺耀祖，当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6月28日）

请商何柱国以电话告顾，我们将派人去鄂豫皖及闽西南两处联络。鄂豫皖为郑位三，同行约十五人，闽西南为方方，同行为十人，均带有小电台，请行营发护照并介绍附近最高长官接洽。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6月29日）

一

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有些地方还保存有游击队，如闽西南、鄂豫皖等。据报纸和新闻记者的报告，很多过去遭到失败的苏区的人民，对共产党很拥护，说明我们过去的斗争没有白费，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这个消息要使红军里面的人都知道。现在应用相当长期的工作恢复我们的力量。对于这些游击队，应采取坚决方针，要保存；但要改变名称不叫红军，又不打仗，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有些准备不改编的，就改为抗日义勇军。保存这些游击队、这些根据地，是有重大意义的。组织上可成立闽粤赣省委，以张鼎丞、邓子恢、谭政、方方为常委，张鼎丞为书记。对于江西的工作，要想各种方法搞进去。鄂豫皖工作，要特别注意重新讨论党与群众工作。那里保存了很大的力量是好的，然而有一缺点就是没有深入的群众工作。党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能够抓紧群众工作，要依靠群众开展鄂豫皖工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闽西南和鄂豫皖的工作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二

关于谈判，我们确定的原则是保持独立性。但现在的情形，是要限制我们党，限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要受同盟会的决定，并且蒋介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次去谈判就要签字。我们的态度，还是在他定的圈子里做事。当然他这个圈子在形式上是大大地损伤我们的独立性，在实质上也若干损伤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应从政治上来观察，是不是根本上损伤独立性，那还不是的。党的独立性主要是政策问题。大革命时期形式上是独立，实质上是做了尾巴。现在我们的政策是逐渐地冲破他的圈子。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限制就与他决裂。在前途上，我们是可以战胜他的圈子的。他这个圈子可以限制我们一些工作，但有两条他不能限制，一是党的秘密活动，一是红军给饭吃，红军、苏区实际上归我们管。

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

（1937年6月30日）

应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由西安介绍这些坚决要进来的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令专人与之谈话并讨论各项问题，发给刊物文件阅看，如愿留作短期训练者可给以一二星期训练。事毕如交通已通，可择其最好者来延安一游，余则直接出去。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暑期各地学生来苏区参观的接待问题和朱德、周恩来致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剿匪的基本方针[1]

（1937年7月6日）

景范、黎林转分区委：

来电悉。

（一）剿匪胜利是很好的，请更加努力。陕北散匪已肃清，股匪李清武[2]已投诚，关中六股土匪已消灭五股。因此请你们加速完成剿匪任务。

（二）根据剿匪经验，基本方针应该是，积极以军事力量打击土匪威胁，同时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分化、改造、改编、瓦解的策略，最后达到消灭土匪的目的。

（三）赵老五[3]匪股暂时可以停止军事进攻，积极进行政治上的争取和瓦解的工作，特别注意甜水堡一带的群众工作，达到争取、分化、瓦解、消灭的目的。至少应使其暂时中立，以便我方集中力量首先消灭最坏的，然后乘其不备解决之。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中共三边特委军事部部长刘景范和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黎林的电报。

[2] 李清武，又作李勤五，系活动于陕甘宁苏区宜川县北部及延安县临真镇一带的土匪头目。

[3] 赵老五，名赵思忠，系活动于陕甘宁苏区盐池县西南甜水堡、环县北部山城堡一带的土匪头目。

（四）子弹现在没有，后需要时请派人来领。

毛　朱

六日

为日军进攻卢沟桥致蒋介石电[1]

（1937年7月8日）

庐山蒋委员长钧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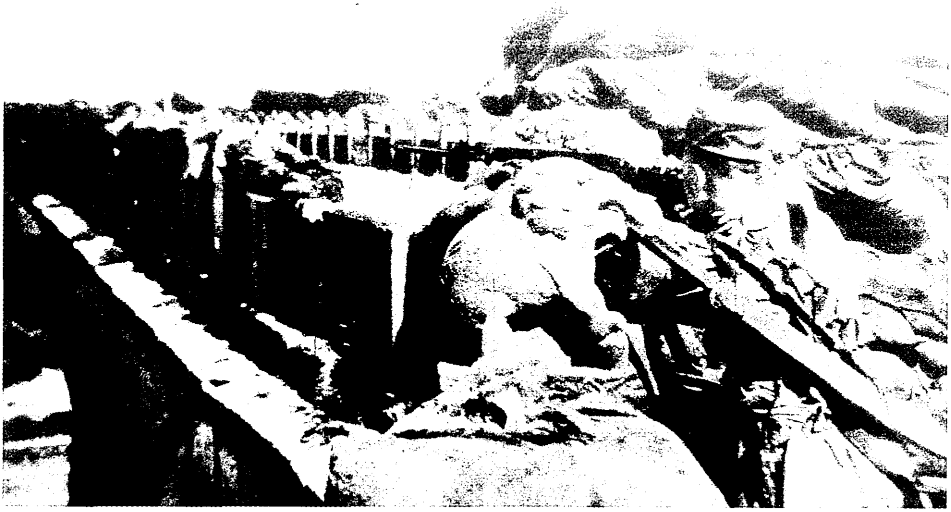
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2]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贺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叩
庚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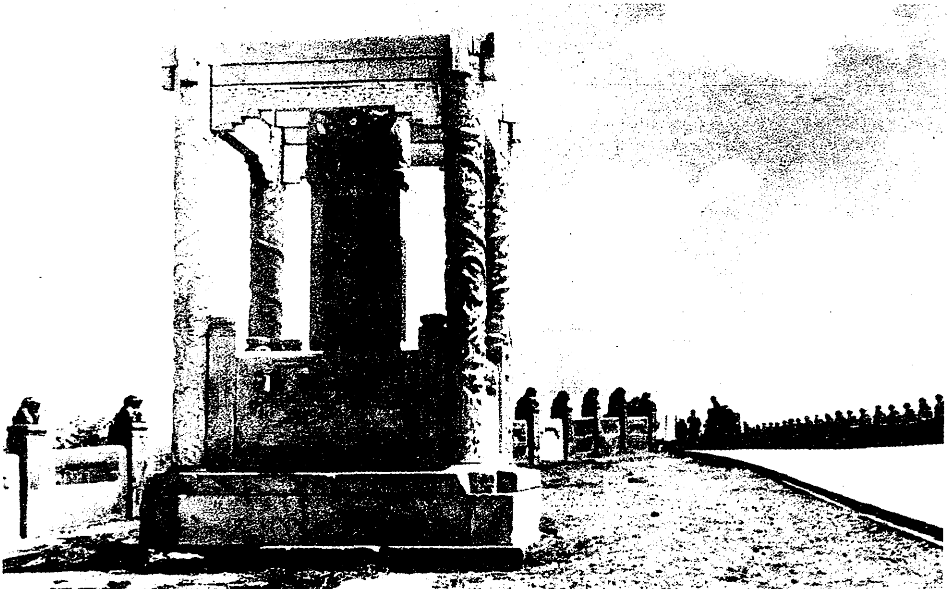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暨各方面军首长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给蒋介石的电报。

[2] 三中全会，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会前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10日电报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会议期间，宋庆龄等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迫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这次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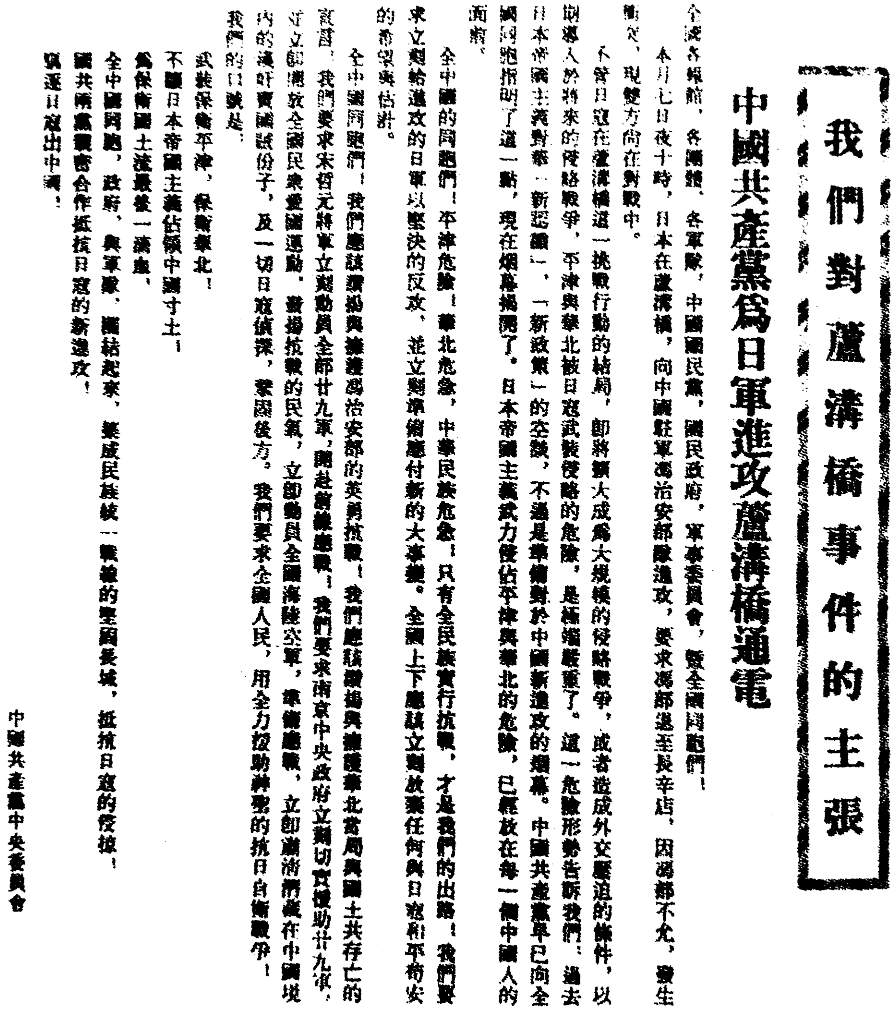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图为中国守军在卢沟桥上奋起抵抗日寇侵略。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图为卢沟桥桥头的“卢沟晓月”碑。

资料图片



我們對盧溝橋事件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爲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

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軍隊，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暨全國同胞們！

本月七日夜十時，日本在盧溝橋，向中國駐軍馮治安部隊進攻，要求馮部退至長辛店，因馮部不允，發生衝突，現雙方尚在對戰中。

不管日寇在盧溝橋這一挑戰行動的結局，即將擴大成爲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或者造成外交壓迫的條件，以期導入於將來的侵略戰爭，平津與華北被日寇武裝侵略的危險，是極端嚴重了。這一危險形勢告訴我們：過去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新認識」，「新政策」的空談，不過是準備對於中國新進攻的煙幕。中國共產黨早已向全國同胞指明了這一點，現在煙幕揭開了。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佔平津與華北的危險，已經放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面前。

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險！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並立刻準備應付新的大事變。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

全中國同胞們！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馮治安部的英勇抗戰！我們應該讚揚與擁護華北當局與國土共存亡的宣言！我們要求宋哲元將軍立刻動員全部廿九軍，開赴前線應戰！我們要求南京中央政府立刻切實援助廿九軍，立即開放全國民衆愛國運動，發揚抗戰的民氣，立即動員全國海陸空軍，準備應戰，立即肅清潛藏在中國境內的漢奸賣國賊份子，及一切日寇偵探，鞏固後方。我們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聖的抗日自衛戰爭！

我們的口號是：

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

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驅逐日寇出中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团结起来，抵抗日寇侵略”。

为日军进攻华北致宋哲元等电[1]

（1937年7月8日）

北平宋明轩先生、天津张自忠先生、张家口刘汝明先生、保定冯治安先生勋鉴：

日寇进攻，全国震愤，卢沟桥之役，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全国闻风，愿为后盾。敢乞策励全军，为保卫平津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除电蒋委员长，及全国友军请缨杀敌外，特此奉达，即祈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叩
庚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7位红军将领为日寇进攻华北致北平宋明轩、天津张自忠、张家口刘汝明、保定冯治安等的电报。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7月9日）

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我们同意他们的各项要求，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与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

---

[1] 1937年7月9日，毛泽东收到叶剑英来电。来电说，卢沟桥事件轰动全国。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上海、太原、广西、西安党的负责人电[1]

（1937年7月9日）

请根据党的宣言及红军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对外之阵容才能应付大事变。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上海、太原、广西、西安党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1]

（1937年7月11日）

已向蒋介石交涉，红军调赴河北应战，第一步拟将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各改为团，加上骑兵团编成一个小师先行派去，主力编成后去。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也准备派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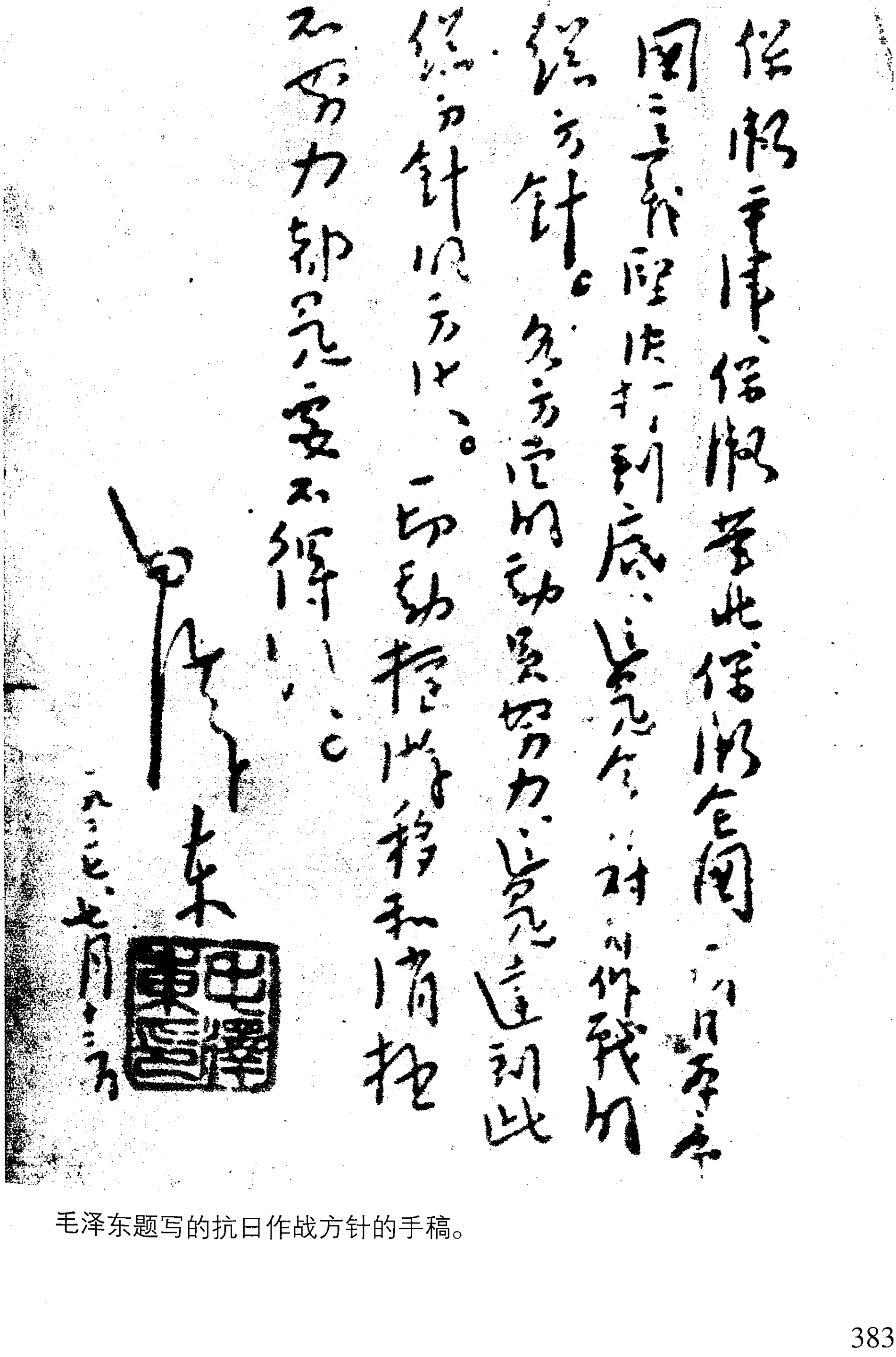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对日作战方针的题字

（1937年7月13日）

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三日



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犹豫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

一九三七、七月十三日

毛泽东题写的抗日作战方针的手稿。

在延安全市共产党员及各革命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7月13日）

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

---

[1] 1937年7月13日，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紧急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1937 年的毛泽东。

致叶剑英电[1]

（1937年7月13日）

积极同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七路军及冯钦哉[2]等接洽，协商对日坚决抗战之总方针及办法。我们拟先派四千人赴华北，主力改编后出发，正向蒋介石提出要求。红军大学增加抗日课程，准备陆续派出。

---

[1] 这是毛泽东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长。

致王稼祥电[1]

（1937年7月14日）

你在上海写的信收到了。闻你已到目的地，不胜欢慰。身体如何？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红军准备开动，赴前线协同作战。八号我党发布宣言，主张坚决抗战，保卫平津，红军将领亦有通电，大得各方欢迎。华北、上海及各地救亡运动正大起来，我们正令各地组织统一战线机关。恩来、博古、伯渠[2]已到庐山数日，谈判抗战方针与亲密合作。

---

[1] 这是毛泽东致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王稼祥于1937年年初离开延安去苏联治病，同年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2] 恩来、博古、伯渠，即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秦邦宪、林伯渠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协助周恩来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军委主席团命令

（1937年7月14日）

彭总指挥、任政委、林校长[1]，各方面军、各军团、各军、各师、各团及各军事学校，首长同志们：

（甲）日本大举向华北出兵，国家危急，二十九军正在抗战，国民政府已调派援军，全国救亡运动正在奋起，我抗日红军，有开赴前线增援友军并配合友军消灭野蛮日军之务。

（乙）令到着即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同时增加抗日政治课程，对干部及兵员教授东四省及华北五省地理，教授日本现状。军事训练着重雪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长途行军，无后方作战等项，各军事学校大体同此办理。

以上各项限十天完毕，听候出动命令。

（此命令对红军公开宣布，惟对日寇及汉奸分子严守秘密，不得疏忽。）

军委主席团

---

[1] 指彭德怀、任弼时、林彪。

各地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1]

（1937年7月14日）

此时各方任务，一方面促成蒋介石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方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

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广东、广西、四川各地方当局对全国抗战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张云逸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共神府特委电

（1937年7月14日）

高桂滋、李仙洲部准备继续开赴抗日前线，望立即严令神府党政机关及地方部队，对他们所遗防地，我们不得有丝毫侵占和骚乱行为，应各守原防不得异动。

毛泽东
十四日

致叶剑英电

（1937年7月14日）

叶：

告蒋：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同时指出，红军特长于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可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并愿意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

毛　朱

十四日

致红军各将领电[1]

（1937年7月14日）

原命令一个月准备完毕，现改为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毛泽东
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改变红军抗日待命的准备时间致红军各将领电的主要内容。

红军政治工作决定要重新起草[1]

（1937年7月15日）

彭、任、杨、邓：

甲、红军政治工作决定依目前情况须加修改，为着重新直接对日抗战的政治工作，望迅即重新起草。

乙、组织决定[2]一项可用。

丙、上二件原则由林彪[3]同志带来云阳[4]。

毛

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副主任邓小平的电报。根据这个电报精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于1937年8月1日正式作出《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在论述了红军进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基本特点以后，明确规定红军改编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第一，一切工作为着积蓄与加强抗战的力量，保证抗战的胜利；第二，保证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地位，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第三，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提高指战员的政治文化水平，迅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并造就大批新的干部，使之适应于对日作战的需要。

[2] 指《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组织的决定》。

[3]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

[4] 云阳，镇名，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北部。当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

红军出动应做真实准备[1]

（1937年7月15日）

彭、任、叶：

红军出发前必须补充之物，如刺刀、工具、高射炮、手榴弹、子弹等，由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交涉办理。红军出动应做真实准备，须迅速，以便在蒋介石、阎锡山同意后，不失时机地向平绥线出动。如情况紧急，补充不及，亦应准备开往太原、大同再行补充。

毛泽东

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的电报。

给阎锡山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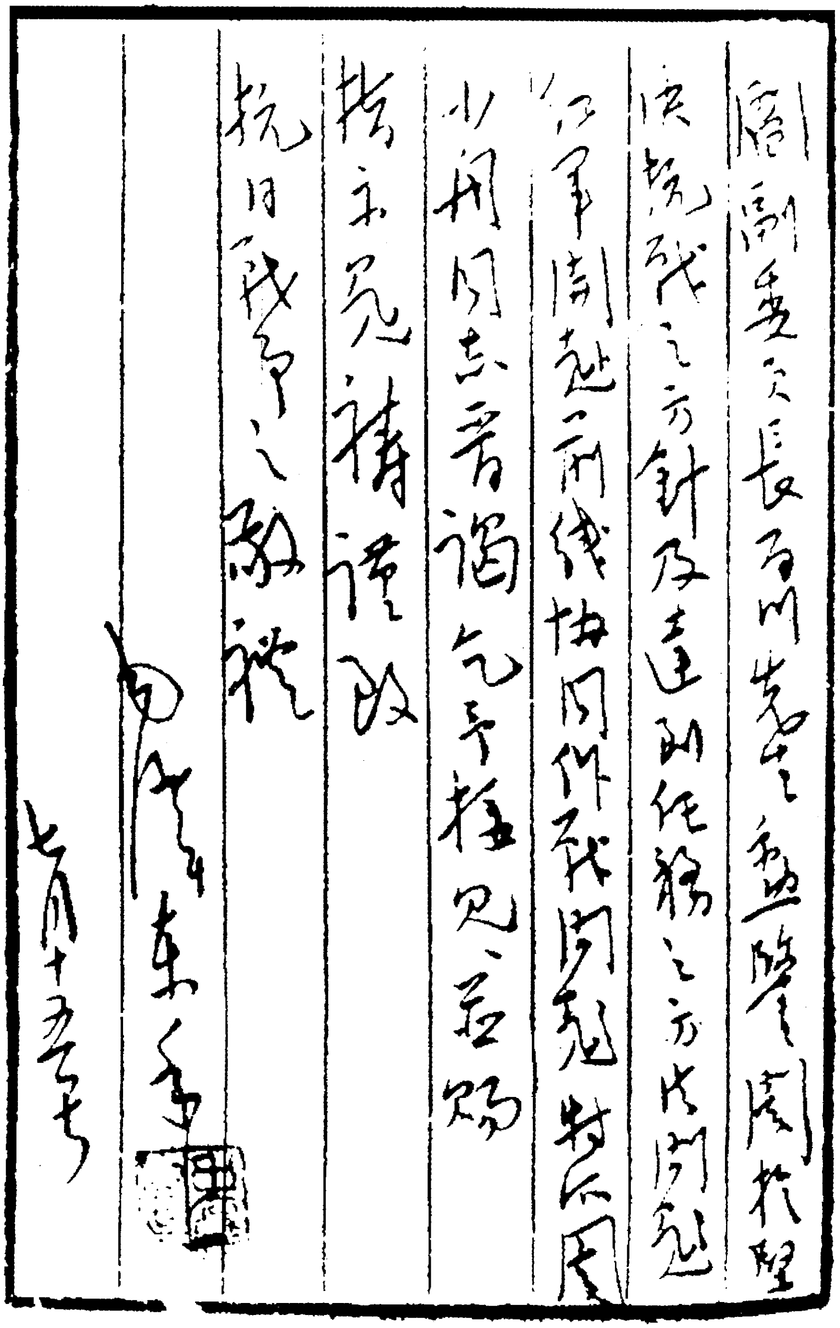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15日）

阎副委员长百川先生勋鉴：

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特派周小舟同志晋谒，乞予接见并赐指示是祷。谨致抗日战争之敬礼！

毛泽东手上

七月十五日



閻副委員長百川先生勛鑒：關於堅持抗戰之方針及達到任務之方法問題，紅軍開赴前線協同作戰問題，特派周小舟同志晉謁，乞予接見，並賜指示。[illegible]請謹致

抗日戰爭之敬禮

毛澤東

七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阎锡山信的手稿。

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1]

（1937年7月16日）

彭、任，并告叶、刘、张：

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

甲、在许可主力红军参战条件下，拟以原一、二、四方面军出动，即以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而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三十一军五部共五千人，连同地方武装，准备编为第四师，留置后方，保卫苏区根据地，必要与许可时，得再派一部增加前线。如此编成，容易前后方兼顾。

乙、在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2]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3]运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的电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初步实现后，中共中央为促成全国抗战，自1937年2月起即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企图通过改编取消、削弱和控制红军，因而直到全国抗战爆发1个多月后，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时，国民党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2] 红大，指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3] 义勇军，即东北抗日义勇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的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组织的抗日武装，其中一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主力红军编制如上。但此计划缺点在于尔后主力可能参战，则游击师已前去，后方留兵太少，故当须谨慎。或者只派数百人去作为创立义勇军之种子，主要依靠多派干部去为适宜。不论如何编制按甲项办理。

丙、陈先瑞[1]全部、王兆相[2]主力各编为团，准备出动作支队使用。

丁、以上计划请加考虑，并与到会各同志讨论一番，以你们意见电复。

毛　朱

七月十六日

---

[1] 陈先瑞，当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

[2] 王兆相，当时任陕北神府特区红军独立第二师师长。

给阎锡山的信

（1937年7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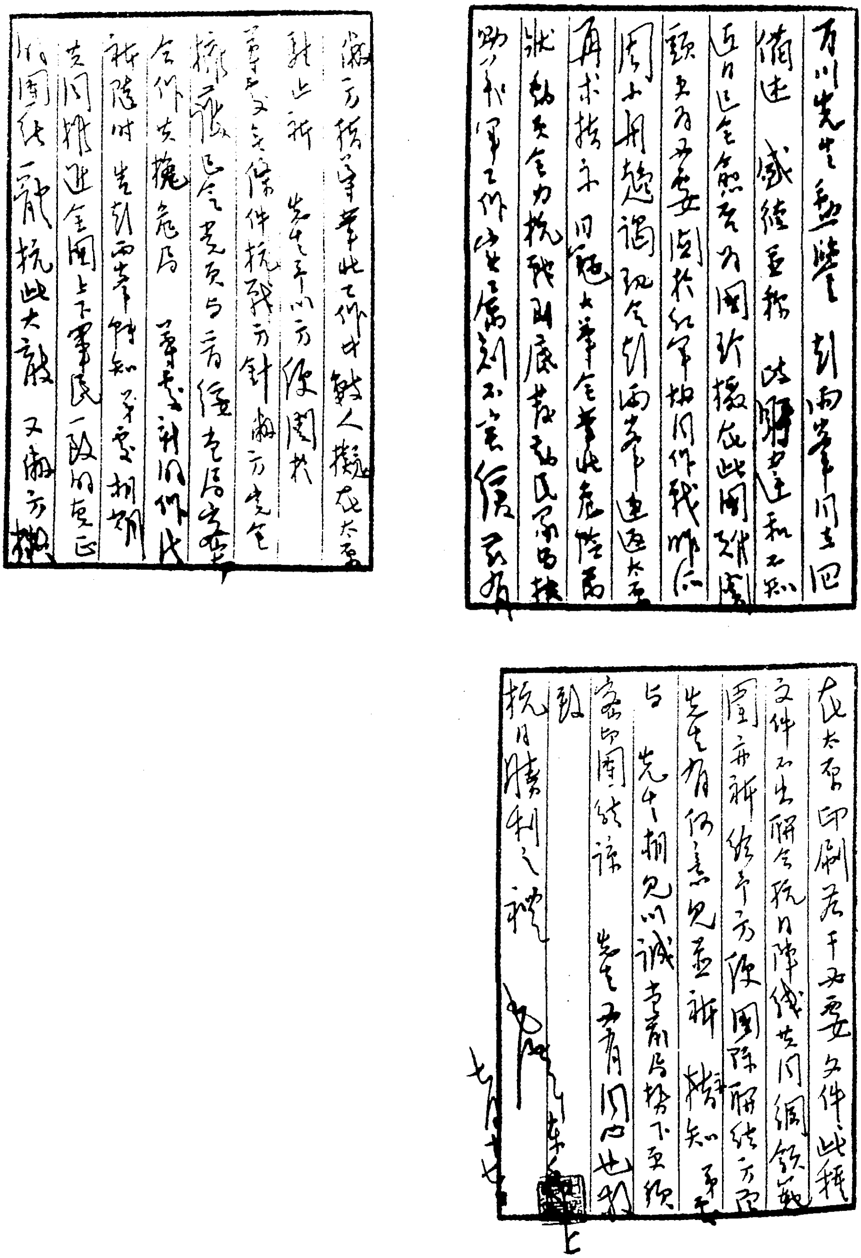
百川先生勋鉴：

彭雨峰同志回，备述盛德，并称政躬违和，不知近日已痊愈否？为国珍摄，在此国难关头更为必要。关于红军协同作战，昨派周小舟趋谒，现令彭雨峰速返太原，再求指示。日寇大举，全华北危险万状，动员全力抗战到底，发动民众与扶助义军工作，实属刻不容缓。兹有敝方指导华北工作者数人，拟在太原住止，祈先生予以方便。关于尊处无条件抗战方针，敝方完全拥护，已令党员与晋绥当局密切合作，共挽危局。尊处新的作法，祈随时告彭雨峰转知弟处。相互共同推进全国上下军民一致的真正的团结一体，抗此大敌。又敝方拟在太原印刷若干必要文件，此种文件不出联合抗日阵线共同纲领范围，亦祈给予方便。国际联结方面，先生有何意见，并祈示知。敝处与先生相见以诚，当前局势下，更须密切团结，谅先生必有同心也。敬致

抗日胜利之礼！

毛泽东手上

七月十七日



百川先生勋鉴：彭雪枫同志回，备述　盛德至殷，[illegible]和不知[illegible]。近日已令[illegible]为阁下[illegible]此间[illegible]，[illegible]于红军抗日作战[illegible]，阁下[illegible]，现令彭雪枫同志速返太原，再求指示。目前大举全[illegible]此危险局势，[illegible]全力抗战，[illegible]民众[illegible]抗敌，[illegible]军工作，[illegible]不[illegible]。

敝方抗战军事工作中缺人，拟[illegible]太原[illegible]此[illegible]　先生予以方便。阁于军事及[illegible]条件抗战方针，敝方完全拥护，已令[illegible]与[illegible]合作，共挽危局。弟等[illegible]，祈随时告彭雪枫同志转知，弟[illegible]。共同排[illegible]全国上下军民一致的意志，以团结一致抗此大敌。又敝方拟在太原印刷若干要文件，此种文件不出[illegible]抗日阵线共同纲领范围，亦祈给予方便。国际[illegible]方[illegible]　先生有何意见，亦祈指知。弟[illegible]与　先生相见以诚，当前局势下亟须密切团结，请　先生[illegible]同心共[illegible]。

致

抗日胜利之礼

毛泽东

七月廿七

上

毛泽东致阎锡山信的手稿。

蒋介石如不让步不再与谈[1]

（1937年7月20日）

周转林：

（甲）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

（乙）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

（丙）请你们回来面商之。

洛　毛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转林伯渠的电报。

为力保平津、张家口致阎锡山电[1]

（1937年7月20日）

百川[2]先生：

尊电诵悉。老成谋国，至为钦佩。日寇大举已定，无可挽回。如令其占据北平、张家口，则晋绥之危至。拟凭全力督责冀察当局坚守平津、张家口等处。部队似宜以一部向张家口出动增援刘汝明[3],一面力促蒋氏[4]增兵北援。诚如尊言，非抗战无以图存。而今日已至力争平津、张家口之紧急关头。一得之愚，尚祈考虑。周小舟、彭雨峰[5]到，祈赐接见。

毛泽东

---

[1]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派彭雪枫到山西太原，开展对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工作。阎锡山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采取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态度，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太原建立了和延安直接通报的电台。这是毛泽东发给太原台抄转阎锡山的电报。

[2] 百川，即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师长。该师当时驻张家口一带。

[4] 蒋氏，指蒋介石。

[5] 周小舟，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受毛泽东派遣，到太原对阎锡山进行团结抗日的工作。彭雨峰，即彭雪枫，卢沟桥事变后，他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电示，多次与阎锡山会晤，进行有关红军通过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

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

（1937年7月23日）

一　两种方针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卢沟桥事变[2]的第二日，七月八日，

---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迟迟至事变后10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同时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行动已严重地打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和蒋介石所直接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就在这时，蒋介石政府仍然和日本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本同中国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一直到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但在这以后，直到1944年，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完全背叛了他在庐山谈话中所谓“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声明，反对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人民战争，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更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正是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一条共产党路线和另一条蒋介石路线之间的斗争。

[2]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10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宣言中说：

“全国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全中国同胞们！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和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第二十九军[1]开赴前线应战。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

这就是方针问题。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了谈话。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该谈话举出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

---

[1] 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西北军的一部分，当时驻在平津、河北、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一带。宋哲元是这个军的军长，他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曾一度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冯治安是这个军的第三十七师师长，该师的一一〇旅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进攻，揭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该谈话的结语说：

“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这就是方针问题。

以上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这两个宣言的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

这是对付日本进攻的第一种方针，正确的方针。

但是还有采取第二种方针的可能。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和坚决抗战的方针是根本矛盾的。这种妥协退让的方针如不迅速改变，将使平津和华北尽丧于敌人之手，而使全民族受到绝大的威胁，这是每个人都应十分注意的。

第二十九军的全体爱国将士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平津和华北的全体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全国爱国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妥协退让，拥护坚决抗战！

蒋介石先生和全体爱国的国民党员们，希望你们坚持自己的方针，实践自己的诺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以事实回答

敌人的侮辱。

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

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二　两套办法

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之下，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一些什么办法呢？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动员我们的二百几十万常备军，包括陆海空军在内，包括中央军、地方军、红军在内，其主力立即出动开到国防线上去，其一部分留在后方维持治安。委托忠实于民族利益的将领为各方面的指挥员。召集国防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统一战斗意志。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对军队的装备和给养给以合理的补充。按照坚决抗战的总方针，必须作如上各项的军事计划。中国的军队是不少的，但不实行上述计划，则不能战胜敌人。以政治条件和物质条件相结合，我们的军力将无敌于东亚。

（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取消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和《新闻检查条例》[2]，承认现有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扩大爱国团体的组织于工农商学各界，武装民众实行自卫，并配合军队作战。一句话，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阿比西尼亚的覆辙[3]，前车可鉴。如果坚决抗战出于真心，就不能忽略这一条。

（三）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数人断乎干不了。勉强干去，只有贻误。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国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众，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这样的政府。国民大会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权力机关，要掌管国家的大政方针，决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计划。

（四）抗日的外交。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立刻

---

[1] 1931年1月31日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用“危害民国”的罪名作为迫害和杀戮爱国人民和革命者的借口。按该法的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的或以文字图书演说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

[2] 《新闻检查条例》，指国民党为压制人民言论自由于1933年1月19日制定的《新闻检查标准》，同年10月5日又作了补充规定。《新闻检查标准》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报刊上发表的任何文字，都要在刊出以前，将稿件送交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检查。检查官可以任意删改和扣留。

[3] 参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第8节。

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

（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苛捐杂税的取消，地租的减少，高利贷的限制，工人待遇的改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生活的改善，小职员的生活的改善，灾荒救济：从这些起码之点做起。这些新政将使人民的购买力提高，市场繁荣，金融活泼，决不会如一些人所说将使国家财政不得了。这些新政将使抗日力量无限地提高，巩固政府的基础。

（六）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

（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穷是错误办法产生出来的，在有了合乎人民利益的新政策之后决不会穷。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说财政经济无办法，真是没有道理的话。

（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执行抗战的方针和上述各项政策，依靠这个联合阵线。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政府、军队、全国各党派、全国人民，在这个两党合作的基础之上团结起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这个口号，不应该只是讲得好听，还应该做得好看。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办事要大方一点，手笔要伸畅一点。打小算盘，弄小智术，官僚主义，阿Q主义，实际上毫无用

处。这些东西，用以对付敌人都不行，用以对付同胞，简直未免可笑。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切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

这一套为着实现坚决抗战的办法，可以名为八大纲领。

坚决抗战的方针，必须随之以这一套办法，否则抗战就不可能胜利，日本永在侵略中国，中国永无奈日本何，而且难免做阿比西尼亚。

对坚决抗战方针有诚意的人，一定要实行这一套办法。试验坚决抗战有诚意与否，看他肯采取并实行这一套办法与否。

另外还有一套办法，那就是样样和这一套相反。

不是军队总动员，而是军队不动员，或向后撤。

不是给人民以自由，而是给人民以压迫。

不是民主集中制的国防性的政府，而是一个官僚买办豪绅地主的专制政府。

不是抗日的外交，而是媚日的外交。

不是改良人民生活，而是照旧压榨人民，使人民呻吟痛苦，无力抗日。

不是国防的教育，而是亡国奴的教育。

不是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而是照旧不变甚至变本加厉的无益于国有益于敌的财政经济政策。

不是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城，而是拆毁这个长城，或是阳奉阴违、要做不做地讲一顿“团结”。

办法是跟着方针来的。方针是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一切办法都反映不抵抗主义，这个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教训。方针如果是坚决抗战，

那就非实行合乎这个方针的一套办法不可，非实行这八大纲领不可。

三　两个前途

前途怎样呢？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实行第二种方针，采取第二套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也没有疑义了。

四　结论

一定要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

一定要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全国的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爱国党派，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实行第一种方针，采取第一套办法，争取第一个前途；坚决地反对第二种方针，反对第二套办法，避免第二个前途。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

（1937年7月23日）

万万火急！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各武装部队，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暨全国同胞们！

据各方面消息已证实冀察当局宋哲元已接受日方所提出的下列三个条件，即：（一）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二）二十九军从平津卢沟桥永定河以东撤退；（三）镇压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这些条件已开始实行。此外有无秘密协定，尚不得而知。

全国同胞们！这些丧权辱国的条件同全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的要求完全相反，同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对于卢沟桥事件之最低限度的四点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能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亦完全相反。我们的政府与人民万万不能接受这种投降屈辱的条约！我们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接受这类亡国灭种的条约！我们要求为保卫平津、保卫冀察的每寸土地而血战到底！

全国同胞们！形势是万分紧急了！日本大量海陆空军正向中国

开进。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再不能有任何的让步与妥协了！正像蒋介石先生所说的：“今日的北平若果变为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亦何尝不可变成北平。”问题的中心就在这里！今天如果我们放弃平津，放弃卢沟桥永定河以东的大块中国领土，则冀察必然不保，必然成为第二个东北四省，冀察不保，华北与全中国即将垂危，亡国灭种即将相继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冀察当局宋哲元对于日寇的让步与妥协！

全国同胞们！我们决不能对于宋哲元的投降屈辱的“已成事实”与中日间的所谓“地方解决”，表示默认与软化。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满足全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来贯彻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先生所宣布的抗日方针。在今天，仅仅是激烈的宣言，不承认的声明与抗议，已经不够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怕这些的。在今天，希望九国公约签字国出来干涉，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横蛮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不管这些的。今天，我们需要最实际的办法来保证全中国人民的希望与要求的实现，来保证蒋介石先生所宣布抗日方针的执行。这些办法应该是：

（一）立即命令冀察当局宋哲元等拒绝执行日本所提的三条件，率领全部二十九军实行武装抵抗，如宋哲元拒绝执行中央命令，则立刻明令撤消宋哲元现任职务，另派大员领导英勇的二十九军将士及华北各军实行抗战。

（二）立刻派遣大军增援二十九军，并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立刻召集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在日军四周

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援助东北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以配合抗日主力军的作战。

（三）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权利，满足人民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

（四）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武装缉私，抵制日货，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

（五）立刻改革政治机构，使中央与地方政府民主化，吸收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与政府，使国民会议真正成为代表民意的权力机关，使国民政府真正成为抗日救国的国防政府，肃清潜在政府内部的一切亲日派汉奸分子，这样使政府与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

（六）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七）立刻实施财政经济土地劳动文化教育等各种新政策，以巩固国防，改善民生。

（八）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

全国同胞们！只要我们的政府与人民能够坚决实行这些办法，我们就有力量战胜日寇，驱逐日寇出中国，收复一切失地。只有中

华民族的伟大的坚强的力量才能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新中国！

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现在是民族存亡紧急关头。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

反对一切对于日寇的让步妥协，坚决抗战到底！

只有坚决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的生路！

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保卫平津华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七月二十三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7月24日）

（甲）恩来已到沪，不日回陕。事情还没有弄妥，改编事待周回后再定。（乙）华北事已妥协，仗暂时打不起来。党已发宣言反对妥协，红军暂时不发电为宜，待周回后再说。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

（1937年7月25日）

红军各首长已集云阳（朱总亦去）讨论改编，现令他们等你们回来讨论决定。蒋对红军办法不能接受，只有拖之一招。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向蒋介石转达红军改编计划[1]

（1937年7月28日）

周、博、林：

甲、请你们即去云阳[2]商定改编。

乙、由云阳回西安后，以根据朱、彭、林、贺、萧、刘、张、徐[3]诸将领意见告蒋鼎文[4]以下之各点，请其转达蒋介石：

（一）八月十五日前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

（二）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5]），以便指挥作战。

（三）三个师四万五千人。另地方一万人，设保安正副司令，高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的电报。

[2] 云阳，镇名，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北部。当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

[3]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贺，指贺龙，当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萧，指萧劲光，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刘、张，指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指徐向前，当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4]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5] 康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汉口禁烟缉私处主任，蒋介石拟派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岗为正，萧劲光为副，军饷照给。

（四）主力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散。

（五）担任绥远[1]方面之一线。

（六）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

洛　毛

二十八日辰

---

[1]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1937年的毛泽东。

红军将领庆贺平津胜利通电

（1937年7月29日）

南京林主席、蒋委员长、国民党、国民政府、北平宋委员长哲元、冯师长治安、张师长自忠、赵师长登禹、刘师长汝明、郑师长大章、孙军长连仲、庞军长炳勋、山西阎主任、赵主席、绥远傅主席、山东韩主席、河南刘主任、商主席、西安顾主任、蒋代主任、孙主席、兰州贺主席、宁夏马主席、全国各总副司令、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各军师团长及全体将士、全国各报馆、各团体公鉴：

日寇进攻，已将中华民族压迫到无路可走之地步。平津一战，申历载未申之积愤，亦寒历载猖狂之敌胆。我前敌抗日将领及全体战士建此殊勋，声振中外，不但敝军同人所积极拥护，亦全国男女老幼所同声爱戴。溯自东北丧失，六年于兹。全国同胞，痛心疾首。此次日寇进攻，华北危急，幸赖国共两党诚意合作，蒋委员长十七日谈话之坚决抗战，宋明轩先生之深明大义，前敌将士之英勇杀敌，全国各界各军之同声援助，致有本月二十八日之大捷。从此军心大振，民意所趋，知日寇非不可抗，但患方针之不当，知国家非无实力，但患办法之失宜。从此方针确定，办法改良，全国一心，军民一体，进一步收复冀东察北及东北四省，决非难事。然日寇经此挫败，必将倾其全力对我作大规模之压迫，一面保守已得地

区，一面进攻华北各地。我全国军民上下，惟有在国共两党亲密合作之基础上，实行坚固的民族团结，发动大规模之抗战，达到保全国土恢复失地驱除日寇消灭汉奸之目的。敝军正在加紧改编，不日出动参加作战。尚望时予指教，民族革命幸甚。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彭德怀
贺　龙　林　彪　刘伯承　徐向前　叶剑英
张云逸　萧　克　徐海东
七月二十九日

实践论[1]

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

（1937年7月）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

---

[1]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1931年至1934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

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因此，人的认识，在物质生活以外，还从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与物质生活密切联系），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种关系。其中，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予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

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列宁这样说过：“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

然而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这只要看一看认识的发展过程就会明了的。

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2]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例如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就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在他们的脑子中生起了许多的印象，以及这些印象间的大概的外部的联系，这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说话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外来的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

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重复地说，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推进了一大步，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

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认识的深化的运动，指出了社会的人在他们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列宁说过："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1]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不能在封建社会就预先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因为资本主义还未出现，还无这种实践。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那些人在他们的实践中间取得了“知”，经过文字和技术的传达而到达于“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间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1]，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

---

[1] 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

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为了明了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认识的逐渐深化的运动，下面再举出几个具体的例子。

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在其实践的初期——破坏机器和自发斗争时期，他们还只在感性认识的阶段，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这时，他们还是一个所谓“自在的阶级”。但是到了他们实践的第二个时期——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由于实践，由于长期斗争的经验，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用科学的方法把这种种经验总结起来，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这时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1]。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2]前后才开始的。

我们再来看战争。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他们是一些没有战争经验的人，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例如我们过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的深刻的指导规律，在开始阶段是不了解的。他们在开始阶段只是身历了许多作战的经验，而且败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于这些经验（胜仗，特别是败仗的经验），使他们能够理解贯串整个战争的内部的东西，即那个具体战争的规律性，懂得了战略和战术，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导战争。此时，如果改换一个无经验的人去指

---

[1] 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2] 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6月3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导，又会要在吃了一些败仗之后（有了经验之后）才能理会战争的正确的规律。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够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来，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这里有两个要点必须着重指明。第一个，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里再重复说一说，就是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问题。如果以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他就是一个唯心论者。哲学史上有所谓“唯理论”一派，就是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以为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觉的经验是靠不住的，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

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

第二是认识有待于深化，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1]。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种理论的错误，在于不知道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我这里不来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要理解，就必须从经验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哲学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或辩证性，虽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对于唯物的唯理论和经验论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则都是错误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对于一个小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认识）是如此，对于一个大的认识过程（例如对于一个社会或一个革命的认识）也是如此。

然而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末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说来，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

---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参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在前面说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认识运动中是没有完全解决的，也不能完全解决的。要完全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所谓“生活、实践底观点，应该是认识论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1]，理由就在这个地方。斯大林说得好：“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2]

说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我们的答复是完成了，又

---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六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没有完成。社会的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不论是关于变革某一自然过程的实践，或变革某一社会过程的实践），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这是因为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然而对于过程的推移而言，人们的认识运动是没有完成的。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如同上面已经说到的，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思想落后于实际的事是常有的，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受了许多社会条件的限制的缘故。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

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马

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1]。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

---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二章第五节。原文是：“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读米丁[1]等著沈志远[2]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一书的批注

（1937年7月以前）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

第三章　辩证法唯物论

第五节　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

……

现在要问，为什么只有实践能证明我人认识底现实性，为什么实践以外就没有认识底真理性底标度（Criterion或作标准——沈）呢？这是因为人底意识只是社会生活底一方面，它在实践以外就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

---

[1] 米丁，1901生，苏联哲学家。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2] 沈志远（1902—1965），浙江萧山人。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主要译作有：《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等。主要著作有：《新经济学大纲》《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近代经济学说史》《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讲话》等。

底生产一经停止，人底意识活动也就立刻停止。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底基础是物质的生产，照马克思底说法，是人底感官实践的有目标的活动。

所以，只有当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维中所预想的结果的时候，人们底认识才会发生力量。假如人底认识不照外界过程底实况来反映这些过程的话，那末人们在实践的活动中也就不能达到意识中所预想的这一活动底各种结果。而且没有实践的活动，甚至连人类社会底生存都不可能；假若人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是虚妄的时候，这种实践的活动就能改变这一虚妄的概念。因此，在社会人底实践中，在他底有目标的活动中，包含着我人关于外界的概念底真理性标度。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底发展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着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诸种概念。社会在实践上去影响自然，改变它底形式，同时它也就改变了自身和自己关于外界的概念。由于人们有目标的活动底结果，创造出了物质的事物，这些事物也是物质的现实界之不可分离的部分。

实践是真理的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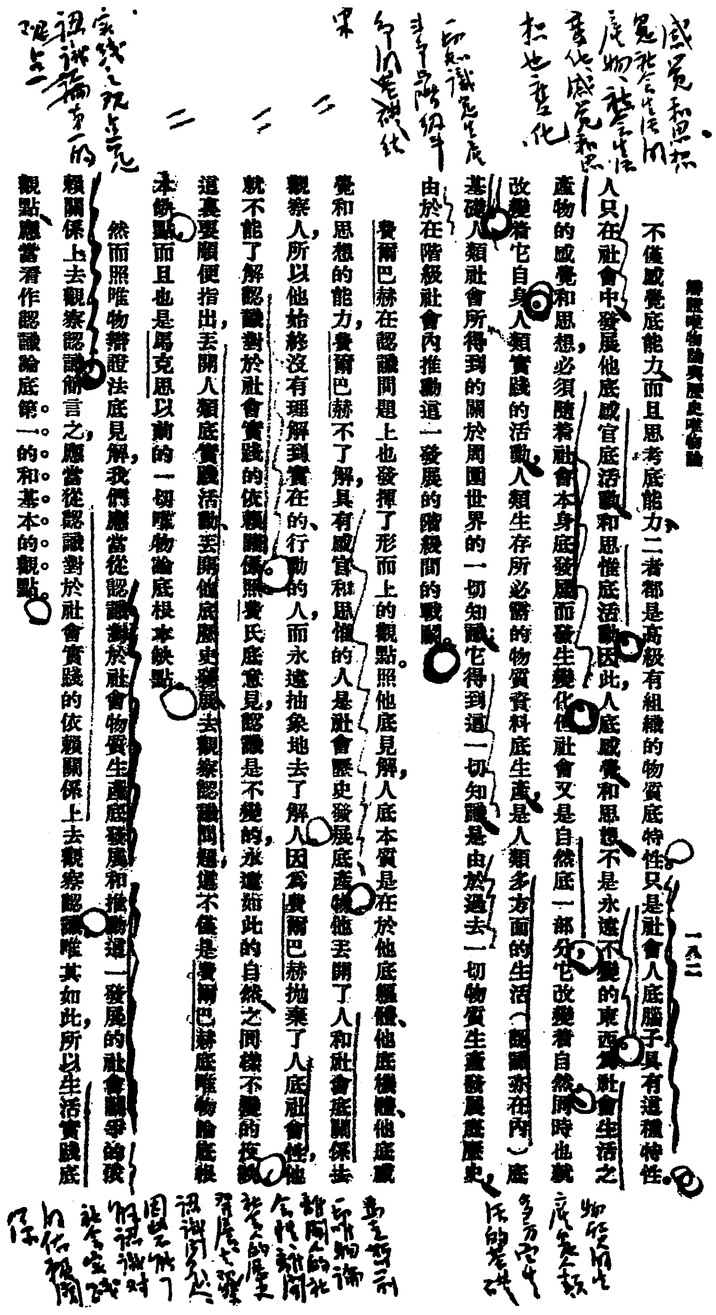
概念的发生和发展

实践高于认识。

照邬梁诺夫[1]底说法，“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一般性底价值而且还有直接

---

[1] 邬梁诺夫，现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



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生活变化，感觉和思想也变化。

二、知识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总结果

实践之观点是认识论第一的观点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一八二

不僅感覺底能力而且思考底能力二者都是高級有組織的物質底特性，只是社會人底腦子具有這種特性。人只在社會中發展他底感官底活動和思惟底活動，因此，人底感覺和思想不是永遠不變的東西，社會生活之產物的感覺和思想，必須隨着社會本身底發展而發生變化，社會又是自然底一部分，它改變着自然同時也就改變着它自身。人類實踐的活動，人類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底生產，是人類多方面的生活（認識亦在內）底基礎。人類社會所得到的關於周圍世界的一切知識，它得到這一切知識是由於過去一切物質生產發展底歷史，由於在階級社會內推動這一發展的階級間的戰鬥。

費爾巴赫在認識問題上也發揮了形而上的觀點。照他底見解，人底本質是在於他底軀體、他底機體、他底感覺和思想的能力，費爾巴赫不了解，具有感官和思惟的人是社會歷史發展底產物。他丟開了人和社會底關係去觀察人，所以他始終沒有理解到實在的、行動的人，而永遠抽象地去了解人，因爲費爾巴赫拋棄了人底社會性，他就不能了解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照費氏底意見，認識是不變的，永遠如此的，自然之同樣不變的反映，這裏要順便指出，丟開人類底實踐活動，丟開他底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這不僅是費爾巴赫底唯物論底根本缺點，而且也是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底根本缺點。

然而照唯物辯證法底見解，我們應當從認識對於社會物質生產底發展和推動這一發展的社會鬥爭的依賴關係上去觀察認識，簡言之，應當從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上去觀察認識，唯其如此，所以生活實踐底觀點，應當看作認識論底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物质生产是人类多方面生活的基础

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社会历史的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懂得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注的手稿。

的现实性底意义。”[1]（见邬氏文集卷九，页二六一。）人类关于外界和外界中所发生的过程之理论的认识，揭露了历史发展底规律性和倾向；但是只有社会的实践予理论以彻底的证实，从实物之历史的具体性上去把握实物。……我们不要忘记，人类底有目标的物质生产的活动，是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的一种实践活动。但社会的实践却不以这一种活动形式为限，它是多方面的。社会的人参加着阶级的战斗，过着政治的生活，从事科学上的创造——简言之，参加着社会底实际生活底一切领域。因此，我人认识底真理性底标度是全部社会实践底总和。[第179～180页]

不止一种实践活动的形式

然而人底认识也是社会生活底诸方面之一、诸原素之一，只要它是正确的话，他对于人底实践的活动具有极重大的意义。正确的认识指示着人们实践活动底道路。假若理论是真实的理论，它就予实践家以决定行动方针的力量，指示他们以明确的前途，使他们对于自己事业具有必胜底自信力。可是为要使理论认识正确，它必须依靠实践，必须跟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

正确的理论积极的〈地〉指导着实践。

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

社会的人底实践本身也不是不变动的，它底每一发展步骤，都要求更新的思考，研究。因此，譬如在苏联目前的条件之下，假使一种科学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0页）

的理论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底实践底要求时，这种理论就没有积极的作用而必然变成劳工阶级底敌人底理论武器。

人的社会性

认识物质的现实的，不是与社会相隔绝的个人，而是跟社会相联系并且依靠社会的社会人。人底本质是具有社会性的。每一个别的人底生活，完全为社会生活所决定，为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社会集团间的争斗所决定；每一个人底生活总跟某一社会阶级底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个别的人是社会的实体，所以他底生活底任何表现，从实践活动起到理论活动止，归根结蒂都是社会生活之特殊的表现。

不仅感觉底能力而且思考底能力，二者都是高级有组织的物质底特性。只是社会人底脑子具有这种特性。人只在社会中发展他底感官底活动和思维底活动。因此，人底感觉和思想不是永远不变的东西。为社会生活之产物的感觉和思想，必须随着社会本身底发展而发生变化，但社会又是自然底一部分，它改变着自然，同时也就改变着它自身。人类实践的活动，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底生产，是人类多方面的生活（认识亦在内）底基础。人类社会所得到的关于周围世界的一切知识；它得到这一切知识是由于过去一切物质生产发展底历史，由于在阶级社会内推动这一发展的阶级间的战斗。

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生活变化，感觉和思想也变化。

物质的生产是人类多方面生活的基础。

一切知识是生产斗争与阶级

斗争的结果。

马克斯〈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

费尔巴赫在认识问题上也发挥了形而上的观点。照他底见解，人底本质是在于他底躯体、他底机体、他底感觉和思想的能力，费尔巴赫不了解，具有感官和思维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底产物。他丢开了人和社会底关系去观察人，所以他始终没有理解到实在的、行动的人，而永远抽象地去了解人。因为费尔巴赫抛弃了人底社会性，他就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照费氏底意见，认识是不变的，永远如此的自然之同样不变的反映。

实践之观点是认识论第一的观点。

然而照唯物辩证法底见解，我们应当从认识对于社会物质生产底发展和推动这一发展的社会斗争的依赖关系上去观察认识。简言之，应当从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上去观察认识。唯其如此，所以生活，实践底观点应当看作认识论底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认识的真任务在思维。

人对于物质现实的认识，开始于感官的知觉，这种知觉是外界事物加于吾人感觉机官的作用所引起的。然而感觉上的认识，只给我人以最接近的感觉环境和外表的有限联系之偶然的、经验的知识。它还不能使我们从客观世界底各方面关系上，从它底内部联系上和完整性上去认识它。可是认识底真实任务却在于理解现实底规律。这一理解，是根据我们和现实的相互作用过

感觉与思维的统一

程中所得到的那些感觉底一般化（Generalization）而达到的。直觉的材料在我人意识中经过改造和一般化的结果，就产生出概念来。这已经是逻辑认识底因素了。自然，认识底感觉方面和逻辑方面不是互相分裂的，它们常常一块儿表现出来。而且，思维发生于概念，在思维跟概念的关系以外，思维就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我们知识底内容是客观的世界。我们底感觉使我们直接跟这一客观世界联系起来。所以只是在感觉概念底基础上，逻辑的认识（即思维）才有可能。

感觉与思维不能等同。

感觉与思维的区别与统一

然而我们却也不能把认识底感觉原素和理解原素等同起来。感觉的认识不会超过个别的事物和这些事物间的外表联系之反映的，可是经过思维而产生的认识却把握着事物之内部的联系，在它们客观的一致性上反映着它们。

“概念不能抓住整个的运动，譬如说，它不能抓住每秒钟速度三十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却能抓住，且应当抓住。”（《邬氏文集》卷九，页二八九。）在邬氏对黑格尔底逻辑学所写的札记本中，他指明了认识中思维对感觉的依赖关系，他很深切地注意到直觉和思维底区别。

二者不等同，思维又倚赖感觉。

他说：“思维由具体提升到抽象，它不离开真理——假使它是正确的话——而是趋向真理。物质底抽象观，自然底法则，价值底抽象观等等——一言以蔽之，一切科学的抽象观念，都更深

刻、更确实、更完满地反映着自然。从活的直觉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便”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底辩证法的途径。”[1]（前书）这样看来，感觉和理解二种原素，是我人思维中反映客观实在的统一的认识过程底二种不同原素。这就是认识过程底经验原素和理性原素间的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理解。

经验原素与理性原素之相互关系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视实践对于理论认识之决定的意义，可是它跟实用主义（Pragmatism）——特别盛行于美国的现代布尔乔亚哲学底唯心论思潮——完全相反。詹姆士所首创的实用主义，以主观唯心论的真理观为根据。照实用主义底见解来说，真理并不是反映客观现实之真实状况的东西，而是对于我们底实际活动有益的、适合目的的东西。裨益于实践的，就是真理的。有益性（或有用性［Usefulness］）是真理性底标度。根据这一点，实用主义就得出来一个真理多数性底相对主义的学说。几种不同的见解可以同样地成为真理，只要它们是适合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某一社会集团、某一个人底利益的。根据这种理论，真理不是客观而是主观的，而且它可以随各种主观利益底殊异而同时存在着

有用性是真理性的标准——实利主义

多数真理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页）

许许多多个真理。这样，真理就不是单一的了。……

单一真理

马克思主义底立场跟实用主义极端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以客观真理为出发点，它驳斥了相对论，它认为有益的并非即是真理的，而真理的即是有益的。在物质的革命批判的实践中，产生和锻炼出世界之客观的认识来，而这种认识又促进世界之继续的改变。

有用非即真理，真理必是有用。

脱离了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没有意义。同时，轻视理论、庸俗的实际主义、“无头脑的事务主义”——这些却也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容的。在实践底过程中生长出来的革命的理论，本身又是实践底引路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邬著《做什么》）[1]只有在马克思、邬梁诺夫底理论指导之下的革命的实践，才具有自信性、远大性、精确性和深刻性以及运用策略上的敏捷性。

反对庸俗的实际主义

辩证唯物论的社会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达到的最大的胜利，就是他们把唯物论的认识运用到人类社会上去。在马氏以前，即使那些比较最彻底的唯物论者，也不曾把唯物论运用到社会发展过程底认识上去，他们始终只是哲学上的和自然科学上的唯物论者。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为旧唯物论底阶

---

[1] 参见列宁《怎么办》（旧译《做什么》）。（《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级本质所决定的。开拓社会生活底真理，揭露它底深刻的矛盾和推动的力量，这不是剥削阶级底思想家——那怕他们底革命性如何浓厚——所能担负得起的任务。这一任务——把人类社会底历史变为科学、变为唯物论的认识对象的任务，只有劳工阶级哲学底创导者才能把它实现出来。[第181～185页]

反宗教

唯物的历史观把反宗教的斗争提到极高的地步。跟宗教取任何形式和任何程度的妥协，直接或间接的跟宗教敷衍或对它取容忍的态度，这都是马克思主义所不容的。……[第187页]

从被动的直觉的世界观到能动的辩证法的世界观

上述各点，就是现代唯物哲学之基本的指导的原则。这种唯物哲学跟被动的直觉的世界观截然不同。马克思在他论费尔巴赫的提纲中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但是事情却在于改变世界。"[1]这是马氏对他以前的哲学所发的言论。辩证法唯物论既为革命的劳工集团底哲学，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哲学，所以它是行动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哲学不是幽静的修道院而是一个战斗的阵营，推进社会发展的社会争斗底阵营之一。现实底认识不产生于好奇心的追求而是为着改造现实。要改造现实就需要认识现实底规律性。由真实的理论所指导的

哲学的研究不是为着满足好奇心，而是为改造世界。

---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认识世界的规律性，找到正确的理论，为着有效的指导实践，改造世界。

实践是最完善的实践，而最完善的理论、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论，是最有实际效果的理论。

斯达〈大〉林的名言

马、邬主义同样地不容那种无原则的事务主义，脱离社会争斗之实践的直觉的理论。在马、邬主义中，理论和实践极紧密地融合着发展起来，它们相互地巩固着。然而在这个一致中，首要的作用却属于实践；理论与实践底一致是在革命的实践底基础之上实现出来的。“假若理论不跟革命的实践相联系，它就变成无目的空谈，同样的，假若实践不按照革命理论所指示的道路走去，它就成为盲目的行动了。”[1]（约塞夫著《邬梁诺夫主义问题》页十六至十七。）

只有那密切地跟劳工集团之斗争的实践在一块儿走的理论，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在资本主义诸国中，加强工人集团推翻资本主义、建立劳工专政之意志，用敌人底知识来武装劳工集团并指示出胜利底道路来。

认识史没有结束。

马克思和恩格斯底学说并不是死的教条。它并未结束认识底历史，相反的，它替认识底历史开辟了远大的前途。……[第187～188页]

---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第四章　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

第一节　对立体一致底法则

恩格斯指出
三大法则

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写道：“……辩证法底法则是从自然和人类社会底历史中抽取出来的。但是它们并非别的，却是这两个历史发展底领域底最普遍的法则。就实质论，它们可以归纳为下列三大法则：

量变质和反过来质变量底法则

对立体相互贯通底法则

否定之否定底法则”[1]

黑格尔

恩格斯又继续指出，所有这一切法则都已被黑格尔所发挥，不过是按照唯心论的方式发挥出来的；这就是说，黑格尔不曾从自然和历史中抽出这些法则来，而把这些法则套到自然和历史上面去，认为自然和历史必须受这些必然法则底支配。于是黑格尔底体系大有令人莫解的意味了。

所谓辩证法
与认识论一致

可是我们只要唯物地去观察这些法则，一切事物就都变成简单而明白了。上面所指出的辩证法底三大基本法则，是客观世界底实在的发展法则，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底法则，要是认识底法则是这一客观世界本身在我人意识中的反映的话。

现在我们来研究唯物辩证法底基本法则——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4页）

对立体一致底法则吧。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在人类底思想史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发展观。根据其中的一种，认为发展就是增和减，是数量的增长和向来如此的同一事物底重复。照这种观念来说，一切形而上学事物，（不论它们最初如何发生）及这些事物在人类头脑中的思想上的反映，都变成永形式论理学远如此的东西了。事物一经发生之后，在其本性上是不变的，它永远绕着同一个不变的圈子，循着同一条运动底道路。任何事物底发展，植物、动物、人底发展，实际上只是各方面和各种特性底发长和增加，而这些特性是事物或人原本就有的，不过原先取“微小”的萌芽状态罢了。在这种观念中，完全没有关于事物发展之实在的历史性底认识；这就是所谓形而上的发展观。……

天不变道亦不变[1]

两点实是一点

根据这样的发展观，第一点无从解释的，是我人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种类不同底原因，新的发生和旧的被代替底原因。第二点——这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运动和发展底渊源，也无从解释了。形而上的观念，不知道内在的原因给发展以刺激和推动，于是它不得不从事物底外部去探求这一发展底渊源（即动底原因），有时用物质的、形而上的“实质”和“力量”来说明运动

---

[1]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原文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底原因；有时则用超世界的精神来说明它！

列宁驳进化论

邬梁诺夫指出说，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对于发展底原则是谁都“赞同”的，不过这种外表的、浮面的“赞同”却歪曲和模糊了对于发展的真正的理解。邬氏说：“假使一切都在发展着的，那末就是说一切都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因为发展不是简单的、一般的和永久的发展和增加（或同样地减少）等等……应当确实一些去了解进化，它是一切底发生和消灭，是相互的转变。”[1]（见《邬氏文集》卷十二，页一八五。）庸俗的进化论不了解发展中的这一基本事实，不明白那反映存在发展的吾人思维底发展道路，不懂得认识底辩证法之客观的意义和作用，不会把发展底原则跟世界一致底唯物论的原则联系起来。

什么是发展，怎样发展。

布尔乔亚的庸俗的发展观，不了解任何事物（和现象）底发展，是事物自己的、为它内部的特质所决定的由此达彼的转变；这种发展观又不懂得发展是事物自身的运动，照黑格尔底说法，是事物底自动。布尔乔亚进化论者认为植物、动物、人类和人类社会底发展，只是取增加形式的重复，是单纯的增长，是此种植物、有机体和社会一开始就有的一些永久不变的特质底扩大和增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页）

长，不过在最初的时候，这些特质隐藏着不显著地表现出来，它们处于萌芽状态中。照这些理论家底意见，它们底这种增长，是在外界环境条件影响之下，由于“力底传递”，由于植物、动物和人类从外界得到营养而发生的。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底发展是某些永久不变的特征——布尔乔亚社会所具备的诸特征，资本主义的剥削、竞争、个人主义等等——之重复和增长，这些特征，他们以为在古代的奴隶制社会中、甚至在原始的野蛮社会中也可以找得出来的。因此，关于社会发展底原因、渊源、动力，布尔乔亚的思想家或者完全不加思索、或者用人类智慧底进步来解释（他们说人类由于很多次的重复底结果，就日益认识一切人类共同生活底永久的和自然的特征），或者用各个社会底外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生活条件，用社会和外界环境底“均衡”底条件来解释社会发展底原因。

未免重复

辩证法跟这种进化观相反，它主张“从事物自身中”、从它对别种事物的关系中去研究事物，它把事物底发展看作它底自动的发展，就是说，看作事物之内部必然的、独立的、自身的运动，即事物底自动。

辩证法的进化观

关于黑格尔论自动的发展底学说，邬梁诺夫写道：“运动和‘自动’，这是（注意！）随己的（独立的）、自发的、内部必然的运动；‘变化’、

马克斯〈思〉

与黑格尔

‘运动和活力’、‘一切自动底原则’、对于‘运动’和‘行动’的‘推动’——谁相信这些都是‘黑格尔的倾向’，是抽象的和拙笨的黑格尔倾向？？这种本质，正应当揭露出来，了解它、挽救它、澄清它；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做了这些工作。”[1]（见《邬氏文集》卷九，页一二七至一二九。）在黑格尔底唯心的自动学说中，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合理的核心，清除了它底关于纯逻辑发展的神秘观念；马克思主义把它当作客观世界底发展来理解了。

外因只能引起机械运动。

单纯增长也是辩证发展。

单纯的外部原因，就其本身论，只能引起某一事物底机械的变动，它底范围和度量等等底增或减。但是即使植物或动物有机体底单纯的增长，也不只是数量上的增加，它同时必然发生此有机体之质的变化，从它底一种状态转变到另一种。

举例

在很多世纪中，欧洲差不多处在同一地理和气候条件底影响之下，可是很显然的，欧洲社会底发展并不能用这些条件来说明。固然在许多非洲和亚洲的种族中，同样的地理条件促成了社会关系底单一性和同一劳动方式底重复，然而欧洲底情形却完全不同，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环境底条件之下，各个国家底历史的发展上的差异性和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7页）

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

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

不平衡性却非常之大。很明显的，外部条件底作用，经过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部的特性而被曲折了。只有明白了发展之内部自身的动力，揭露了使生命本身发展的自内推动，我们才能理解发展之真正的实质——自然、社会和人的思想诸现象之自动。

自动不带神秘性与唯心意义，从客体的自动上去研究客体。

那末究竟什么是自动呢？在事物自动底观念中，有没有譬如像布哈林所设想那样的某种神秘思想和黑格尔唯心论底意味呢？绝对没有的，只要我们不是纯机械地去观察运动和发展，即不把运动看作单纯的转移位置或数量的增加，同时又只要我们不是唯心地去了解自动，即不把它当作纯粹逻辑的发展看，不把它当作概念底自行生产看，而把自动当作客观世界底自动来了解就得。自动，就是事物自己的运动，它是由内部的、同时又由外部的条件所引起的，但是这种运动底发生，系依据内部的、事物本身的法则；自动也就是由于内部的冲动而产生的事物底转变，由一事物到另一事物的转变。从自动上去研究任何客体，能令人避免相信高超的外力（上帝、世界精神之类）或相信高超的内部的精神本质的那种唯心论观念。同时，这样的研究（即从客体底自动

上去研究客体）并不排除这一发展底内部原因以外的外部条件底作用。把发展看作事物自动的这种见解，迫使我们注意于事物自身之内部的、真实的发展渊源底认识。这一渊源，这一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于一切存在底内部的矛盾性，在于内部矛盾底运动和发展。事物自身中的矛盾性，任何自然和社会现象中的内部矛盾力量和倾向，就是唯物辩证法底发展观所根据的基本要素。

任何现象自身的矛盾性引起事物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的基本要素。

照形而上学和形式逻辑底观点，矛盾只在我人思维中有发生的可能，在客观现实中是不会有矛盾的。然而这种逻辑上的矛盾，照形式逻辑底见解说来，正是我们应当设法避免的毛病。根据形式逻辑底观念，矛盾是表示思想底错误，表示思维进程底不正确，它阻碍着思想底正确发展。假如说资产者认为“劳工阶级专政跟民主主义相冲突”，那末在他看来二者同时肯定就成为逻辑的矛盾了；若说“劳工阶级专政是民主主义底最高形式”，在他看来是荒谬之谈了。在辩证逻辑看来，思维底矛盾，乃实在的客观存在底矛盾底反映：辩证逻辑不拘泥于两条原则底外表上似乎互相冲突的情形。唯物的辩证法透视于研究对象之内部的本质，它在对象自身中找出矛盾力量、矛盾倾向、矛盾方面、矛盾定性之内部的联系

形式论理所谓错误正是正确，而所谓正确正是错误。

思想正带矛盾性，二者同时肯定正是对的。

辩证论理[1]与形式论理的区别

---

[1] 辩证论理，旧的译法。现译辩证逻辑。

来。在客观现实自身中，马克思主义发见了它所特具的和推动它发展的矛盾。旧的布尔乔亚民主底否定和新的普洛列塔利亚民主（取劳工专政形式）底建立是实在的、两方面的矛盾过程。邬梁诺夫说，“就本意上讲，辩证法是研究客体本质中的矛盾”。[1]

列宁的辩证法定义，谓是论矛盾的。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承认事物底矛盾性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在事物和现象底联系以外、在它们不间断的相互作用以外[2]去观察事物和现象的。

很对。在静止中看事物不在运动中看，在割断中看不在联系中看。

“但是——恩格斯指示着说——当我们开始在事物底运动上、在它们底变化上、它们底生活上、它们底相互影响上去观察事物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时我们马上会碰到矛盾，运动自身就是矛盾。……”[3]

……许许多多马克思主义底“批评家”，屡次地想推翻上面所述的恩格斯底“运动即矛盾”底原则。他们所凭借的“理由”，是说在现实界中，运动着的事物在不同的刹那间经过了各个不

运动就是矛盾——恩格斯

运动就是矛盾，即是连续和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2]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勘误。

[3]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引文中“恩格斯指示着说”一语系原书作者米丁所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中断的一致。托洛斯基只肯定不间断而否定间断，斯特鲁威等肯定间断而否定不间断，都是错的。动与静的一致，续与断的一致，今与明的一致，上与下、生与死、民主与独裁的一致，矛盾就是运动。

同的空间之点。这些“批评家”（如斯特鲁威[1]、戚尔诺夫[2]）之流）说，假使把事物所不断经过的空间线划分成为许许多多极小的段点、空间底“间断”，那末在每一刹那间事物处于空间底某一地位、某一空间之点，跟上面所划分的某一空间段落相符合的一点。

列宁的话

……这班“批评家”不了解，所谓运动就是处于一点同时又不处于一点；没有这一矛盾，没有这个连续和中断底一致，运动本身就不可能，他们不懂，否定矛盾，就是抹煞运动。邬氏说：“运动是连续（指时间和空间）和中断（亦指时间和空间）底一致。运动就是矛盾，是矛盾底一致。”[3]（见《邬氏文集》卷十二，页一九三。）

---

[1] 斯特鲁威（1870—1944），现译司徒卢威。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2] 戚尔诺夫（1873—1952），现译切尔诺夫。俄国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

[3]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3页）

各个过程中矛盾有特性。

但矛盾不只是最简单和最普通的运动形式之基础。在各种事物和各个过程之特殊的运动和发展形式中，表现着各种辩证的矛盾。

各种不同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矛盾。

恩格斯曾经指出，生底过程跟它相反的死底过程不可分裂地联系着：细胞不断的死亡更新（这就是矛盾呀!）是一切有机体底生活和发展底必要条件。在机械学中，任何一种动作都带着内部的矛盾性，它引起了反动作，而没有这种反动，动作就无从解释起。数学中任何一个数量，也带有内部矛盾性的，它可能成为正的和负的数量。现在社会底社会生活中的任何现象，都贯穿着阶级底矛盾和冲突：不论是劳动力底卖买也好，或是高超的哲理学说也好，都无不具有这种阶级的矛盾。[第194～2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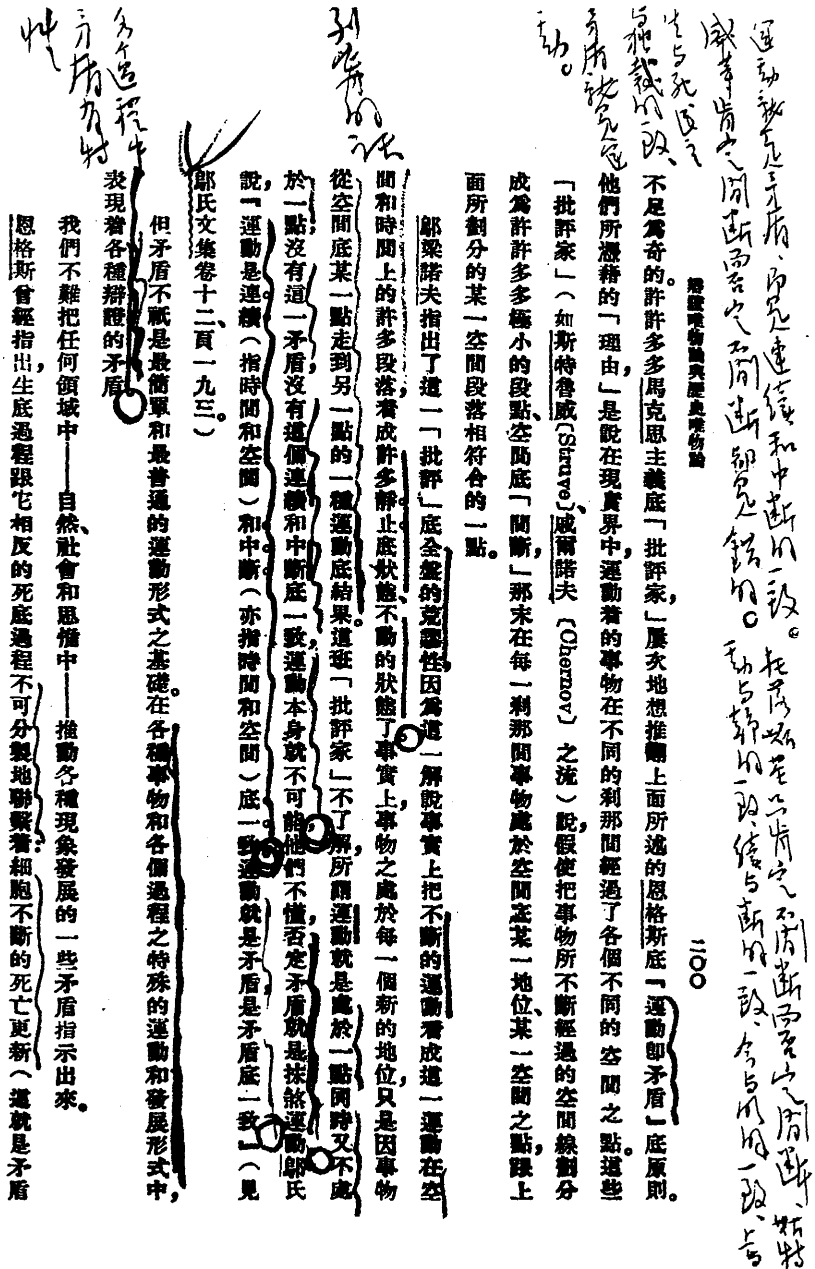
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互相敌对又互为存在条件。

那末事物（和现象）之内部的矛盾性究竟何在呢？是在一个统一的事物（过程、现象等等）中所存在的对立性，同时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贯通。诸对立方在发展中互相内部地联系着，其中一方为他方存在之条件，但同时一方与他方又互相敌对着斗争着。

这种将统一体分解为二，在任何自然、历史和精神生活底现象中看出内部的矛盾性来的见解，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图（Heraclitus）[1]

---

[1]　赫拉克利图（约前540—前470），现译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运动就是矛盾，即是连续和中断的一致。成事肯定之间断而否定之不间断，都是错的。托派如是只肯定之不间断而否定之间断，特别是动与静的一段、续与断的一段、今与明的一段、上与下、生与死、此岸与彼岸的一段、矛盾就是运动。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二〇〇

不足爲奇的許許多多馬克思主義底「批評家，」屢次地想推翻上面所述的恩格斯底「運動卽矛盾」底原則。他們所憑藉的「理由，」是說在現實界中運動着的事物在不同的剎那間經過了各個不同的空間之點。這些「批評家」（如斯特魯威〔Struve〕、車爾諾夫〔Chernov〕之流）說，假使把事物所不斷經過的空間線劃分成爲許許多多極小的段點、空間底「間斷，」那末在每一剎那間事物處於空間底某一地位、某一空間之點，跟上面所劃分的某一空間段落相符合的一點。

鄔梁諾夫指出了這一「批評」底全盤的荒謬性，因爲這一解說事實上把不斷的運動看成這一運動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許多段落看成許多靜止底狀態、不動的狀態了。事實上事物之處於每一個新的地位，只是因事物從空間底某一點走到另一點的一種運動底結果。這班「批評家」不了解所謂運動就是處於一點同時又不處於一點，沒有這一矛盾，沒有這個連續和中斷底一致，運動本身就不可能。他們不懂否定矛盾就是抹煞運動。鄔氏說：「運動是連續（指時間和空間）和中斷（亦指時間和空間）底一致。運動就是矛盾，是矛盾底一致」（見鄔氏文集卷十二、頁一九三。）

列宁的话

但矛盾不祇是最簡單和最普遍的運動形式之基礎。在各種事物和各個過程之特殊的運動和發展形式中，表現着各種辯證的矛盾。

各个过程中矛盾的特性

我們不難把任何領域中——自然、社會和思惟中——推動各種現象發展的一些矛盾指示出來。

恩格斯曾經指出，生底過程跟它相反的死底過程不可分裂地聯繫着：細胞不斷的死亡更新（這就是矛盾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注的手稿。

时起已为思想家所注意；邬梁诺夫指出这一见解是辩证法底实质，是它底基本的特质。马克思、恩格斯、邬梁诺夫底唯物辩证法，视对立底一致为辩证的发展底基本法则。这一法则底特殊表现就是存在于一切运动形式中的诸矛盾。

将一体分裂为二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基本特质。

事物种类底差异是由于各种运动形式底特殊性，在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中，每一种都表示一事物之特殊的质地。在自然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运动底形式，例如：机械运动、发光、发热、电流、化合和分解等等。所有这一切运动形式都互相依赖着，互相贯通着。人底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底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自然中就什么也没有。对于每一运动形式，我们应当注意它底特殊性。注意它跟别种运动形式不同的质的区别。唯物辩证法指明，任何运动形式都内在地具有本身特殊的矛盾，具有自身特有的对立底一致和斗争。关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种对立底一致底认识，构成某一门科学底对象。譬如说，数学所研究的基本对立是正量与负量底对立，分数与整数底对立；机械学中的基本对立是作用与反作用底对立；物理学中有阴极与阳极底对立；化学中有分子底化合与分解底对立；在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中有阶级底斗争。

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由于有不同的性质，由于有不同的矛盾。

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

某种现象领域中的不同的矛盾统一的认识，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辩证的发展观，了解发展为“统一体底分裂为互相排斥的二对立方及其相互依赖的关系”

对

新旧等同与新旧特殊，进化论与辩证法的区别。

好

（见《邬氏文集》卷十二）。这种对立方底“相互关系”也就是运动之内部的原动力。根据这一种发展观，主要的注意重心应放在自动来源底认识上。这一发展观底特点就是承认由于内部的对立方底斗争而发生新陈代谢底过程。一切布尔乔亚的进化论，固然也不否认产生新事物底可能，可是它把注意底重心放在新旧事物（或过程现象）所共同的一般性上，而把新事物看成旧事物底增加和重复了。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就不然，它所重视的是新事物底特点特质。一切原则上跟辩证的发展论相反的布尔乔亚进化论底缺点，就在于它归根结蒂把新的看作旧的，把前者和后者等同起来了。然而实际上产生出来代替旧的那个新的，其所以称为新的，就是由于它底质的特点。照辩证的发展观来说，发展必然促成事物底转变、由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

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

照邬梁诺夫所下的定义，对立体底一致这一法则，就是“承认（发见）一切自然（精神和社会也在内）现象和过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对立倾向”。[1]（前书）

是客观世界和认识之普遍的法则，一切过程

对立底一致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之最普遍的法则。邬氏说，“从世界一切过程底‘自动’上、从它们底自发的发展上、从它们活的生活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1～712页）

都不能外。

上，去认识这一切过程，这样的认识底条件就是把它们当作对立体底一致来认识”[1]。（前书）

最〈这〉一法则之普遍的决定的意义

这样看来，对立底一致律是辩证法底基本法则。对立底一致律，既是最普遍的法则，它就适用于客观世界底一切现象，亦适用于认识底过程。邬氏在其论辩证法问题一篇短文中所指出的普列汉诺夫底错误，就在普氏不了解这一法则——认识底法则和客观世界底法则——之普遍的决定的意义，他把这一法则解释成“许多例子底总和了”[2]。

恩格斯、列宁与普列哈诺夫的区别

恩格斯在《反杜林》[3]一书中，为通俗化的说明计，举了许多关于这一法则的例子，同时他把对立底相互贯通看作最普遍的发展法则（这一观点在恩氏底《自然底辩证法》[4]一书中发挥得最为完满），而普列汉诺夫却把这一普遍的法则简化为它底特殊的场合和表现了。普列汉诺夫只注意于量变质底法则，只注意于内容和形式底矛盾。普列汉诺夫虽然常常斥邬梁诺夫不懂辩证法，可是他自己在许多著作中却不知道把握这一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1～712页）

[2]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7页）

[3] 在其他处又译《反杜林格论》。现译名为：《反杜林论》。

[4] 现译名为：《自然辩证法》。

辩证法底核心、辩证法底实质，甚至不能了解黑格尔逻辑学底理论意义，虽然在逻辑学中这一法则是在唯心论基础上发挥着的。普列汉诺夫常常表露对这一法则的折衷主义的了解，他把对立体底一致了解为“对立体底结合”了。

普是折衷主义。

辩证法是根本敌视一切折衷主义的。假使马克思、邬梁诺夫底主义不能给一个说明事物或过程（不论这种事物或过程如何复杂）之本质的确切而肯定的答案，那末它就不成其为行动底领导。所以在唯物辩证法中，正确地了解对立方底相互关系，是极端重要的。对立体底一致同时就是对立体底相互贯通、它们底统一和它们底相互排斥、相互否定、斗争。

辩证法敌视折衷主义，给物事〈事物〉本质以确切肯定的答案，所以『所以』能成为行动的指导。这本质就是矛盾统一律。

邬梁诺夫解说“事物（现象等）为对立体底总和和一致”[1]；在决定这一个定义时，他写道：“不只是对立体底一致，而且还有每一定义、每一质地、特征、方面、特质之转变到另一个（它自己的对立一方）。”[2]在另一地方他又写道：“平常的概念中包括着差异和矛盾，但不包括由此到彼的转变，可是这却是最重要的。”[3]因

一特性转到另一特性——与自己相反的，这是最重要的。

平常概念有差异、矛盾，但无转变。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2]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9页）

[3]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此，“辩证法这种学说是讨论对立体如何能一致，在何种条件下它们成为一致、由此转变到彼，为什么人底理知不应把这些对立看成死的、固定的，而要把它们看成活的、有条件的、运动的和由此转变到彼的”（见《邬氏文集》卷九）。

相互依赖相互排斥相互转变

在一定条件之下

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

？

生死

对立底统一（即一致），它们底互相贯通，即[1]它们底互相转渡——这便是理解辩证法底实质的最重要之点。同时，应当着重地，指出这一对立底统一底有条件性；对立底统一，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应当着重地指出，对立底一致是相对的，它们底斗争却是绝对的。前面说到过，生底过程和死底过程在某种关系上是互相继续着的：有机体底旧细胞底死亡是新细胞产生之必要条件，是生活过程底必要条件。这里，二对立方——生和死——互相统一着，又互相转渡着。但是这一对立底统一之有条件性却甚明显：生终究是生，而不是死；在这个过程中，生底原素战胜了死底成分、并且统治着死底成分。

生产和消费

马克思指示道，生产和消费二者不仅互相对立而且在许多关系上又互相贯通的。有了生产，消费才有可能；生产创造了消费底资料，予消费以一定的性质。消费则完成生产品底生产过程，

---

[1] 这是毛泽东对原文的勘误。

引起对生产的需要，因此它是生产底组成原素。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马克思说，它们底直接的一致并不消减它们底直接的分裂性。

阶级的对立统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互相敌对的两个对立体。可是这两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中却不可分离地互相联系着，而且一个阶级底存在是另一阶级存在底条件。没有劳工阶级，就不会有资本主义；同样的，没有资产阶级，也不会有资本主义。失去了生产手段的劳工阶级，替购买他底劳动力的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和占有生产手段的资产阶级底剥削劳动力——这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生存的统一过程。同时，这个统一（一致）“相互贯通”底有条件性也是很明显的：在这两个阶级底利益中，是任何一致都谈不到的；并非阶级利益底一致，而是相反，阶级间的争斗，才是社会发展底动力。劳工国家底强固，造成了它将来衰亡底条件。然而如果忘记这两个阶段底对立性而简单地把这两个过程等同起来，以为劳工国家底强固同时就是它底衰亡过程，——如果这样设想，那便犯了极大的错误。

此处说相互贯通较具体

国家存亡的对立统一

现今的机械论和孟塞维化[1]的唯心论根本歪

---

[1] 孟塞维化，指孟什维克式的。

曲了马克思、郇梁诺夫底对立体底一致和互相贯通底概念。机械论者，从杜林起到布哈林为止，把一切处于一致中的对立都看作外部地互相对抗的两种力量。机械论者把一切对立底一致、一切矛盾，都看成外部的矛盾、看成敌对力量底冲突了；同时这些对抗力量底并存和矛盾底保持，他们把它解说为对立体底均衡，恩格斯曾讥笑杜林将矛盾了解为对抗的力量的那种见解。郇梁诺夫阅布哈林著的《过渡时期之经济》一书时，向布氏指出，把矛盾和冲突等同起来是不对的，譬如在社会主义之下，阶级的冲突业将消灭，而自然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仍将存在。

矛盾不同于对抗或冲突。

阶级消灭后的矛盾

冲突是矛盾之个别的特殊的场合，即当诸对立体在其发展过程中，达到了采取外部的物体力量底形式而互相冲突时。……[第201～206页]

冲突是个别的特殊的场合。

……孟塞维化的唯心论者，脱离了郇梁诺夫关于对立底一致律底理解，他们描绘着一个完全机械的表式，依据这个表式，我们首先遇到简单的差异，然后发现对立，再后才见到矛盾。他们不了解，在每一差异中已经包藏着矛盾；他们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地限制矛盾发展法则之普遍的性质。……[第207页]

图式论：差异、对立、矛盾。

每一差异中包含矛盾。

限制矛盾之普遍性

相互依赖是对立斗争的表现，相对中存在绝对。

在相对中存在着绝对——这是邬梁诺夫指示我们的一句话。在对立底相互贯通中，我们也应当看出它们底斗争：对立底统一本身、相互贯通本身，我们应当把它看作对立底斗争底表现。

新事物发生即原有矛盾的解决，原有对立及其统一同时消除，新矛盾开始发展。

新事物底发生就是原有矛盾底解决，在这一解决中，旧的一致和组成此一致的诸对立体也同时被消除了。新的现象代替着旧的而开始它自己的历史，从这时起，这个新现象（或事物、过程）自身内部包含着新的矛盾，推动它继续向前发展的新的矛盾。

两种研究法：具体研究与抽象研究。

任何领域之科学的研究任务，在于依据这一唯物辩证法底总法则（这是全部人类知识发展史底总结论），根据事实的材料、去研究某一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所特具的矛盾发展底具体性。唯物辩证法底原则，是没有一条可以变为抽象的表式（或图表）的，以为可以根据这样的抽象表式、用纯逻辑的方法得出对于具体问题的答案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唯物辩证法要求切实地、具体地研究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中所发生的一切过程。

共同点与特殊点都是要紧的，而特点尤要。

唯物辩证法不仅教我们抓住一切事物和他们底一切发展阶段上所共同的一般之点，而且还教我们把握某一事物及其某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发展底特殊点。……

黑格尔首先发扬了对立底一致底法则，不过

他唯心地曲解着这一法则。黑格尔认为认识底对象是思想底发展阶段，不是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实在的事物，而只是思想的、抽象的事物。因此黑格尔底对立底一致底法则，是具有最普遍的性质的思维法则，这种法则是脱离了自然和历史之具体的、实在的发展的。[第208～209页]

黑格尔脱离具体性。

对于实在的现象发展之具体的分析，应该作为被应用于任何事物的这一法则（对立底一致底法则）底确实的根据。……

具体分析是确实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底唯心的对立一致底学说倒转过来，唯物地改造了它，把它变成客观世界和反映客观世界的思维之普遍的发展法则。当他们将这一法则应用到历史过程底认识上去时，他们看出社会发展底基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社会斗争底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与思想的上层建筑间的矛盾。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底经济结构底认识上去时，他发现了这一社会底基本矛盾——生产底社会性和占有底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于个别企业中的生产底有组织和全社会中生产底无政府之间的矛盾；它底阶级的表现则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斗争[第209～210页]

社会中的矛盾

邬梁诺夫把马克思底对立体一致底法则，提高到了更高的阶段。他特别注意于阐明这一法则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我们对中国革命也应如此。

为辩证法之实质、核心底全部意义。……邬氏根据理论和革命实践之不可分裂的一致，说明和发挥了这一辩证法底实质，他把这一法则应用到劳工社会斗争底各个重要阶段底分析上去。发展底内部矛盾性底认识，对于邬氏底分析俄国革命底发展，对布尔乔亚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底学说，有着极重大的意义。波尔塞维克[1]把布尔乔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作“一根链条底两个环子，看作俄国革命力量底统一的，整个的图景”。[2]邬氏及其信徒，重视俄国的“军阀、封建的帝国主义”底一切特征，这种特征促使反帝制的在劳工集团领导之下的布尔乔亚民主革命之史的发展，有跟攻击资本主义的劳工社会革命相联合的可能。

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条件中两条战线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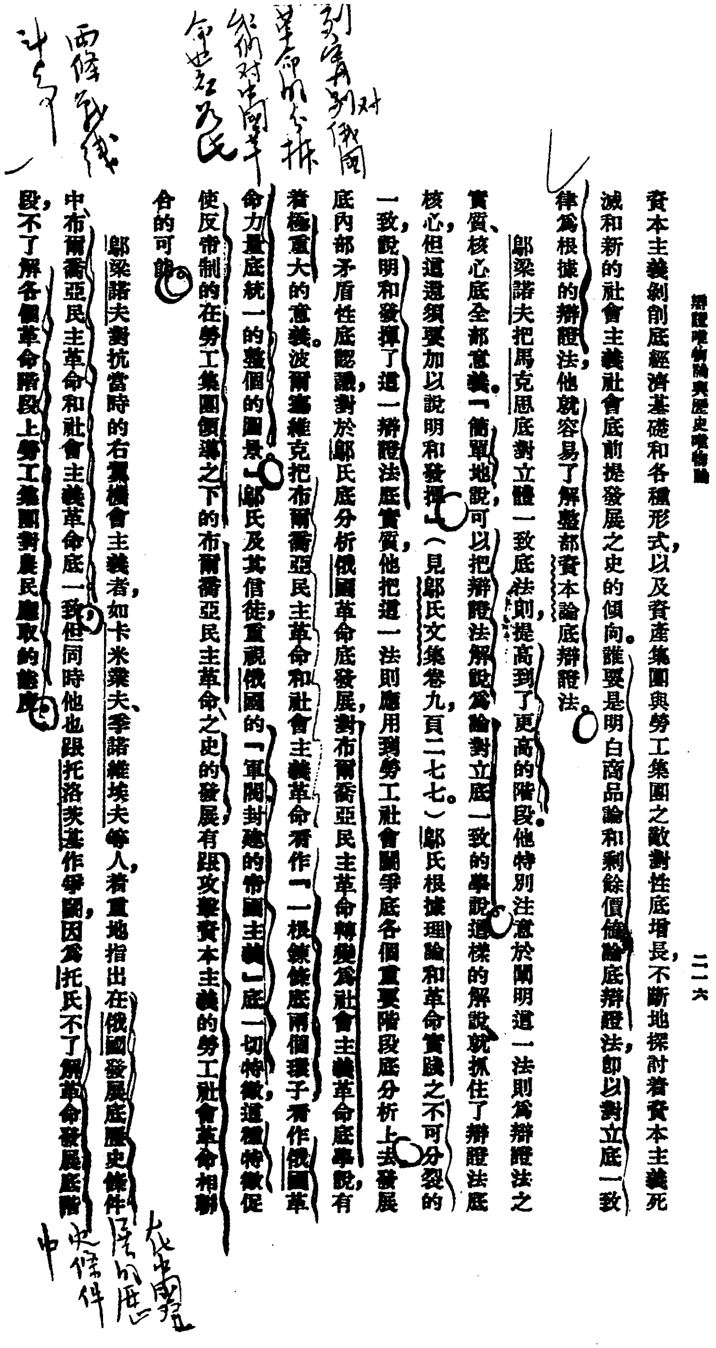
邬梁诺夫对抗当时的右翼机会主义者，如卡米业夫[3]、季诺维埃夫等人，着重地指出在俄国发展底历史条件中布尔乔亚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底一致，但同时他也跟托洛茨基作争斗，因为托氏不了解革命发展底阶段，不了解各个革命

---

[1] 波尔塞维克，即布尔什维克。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8页）

[3] 卡米业夫（1883—1936），现译加米涅夫。曾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資本主義剝削底經濟基礎和各種形式，以及資產集團與勞工集團之敵對性底增長，不斷地探討着資本主義死滅和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底前提發展之史的傾向。誰要是明白商品論和剩餘價值論底辯證法，卽以對立底一致律爲根據的辯證法，他就容易了解整部資本論底辯證法。

鄔梁諾夫把馬克思底對立體一致底法則，提高到了更高的階段。他特別注意於闡明這一法則爲辯證法之實質、核心底全部意義。「簡單地說，可以把辯證法解說爲論對立底一致的學說。這樣的解說就抓住了辯證法底核心，但這還須要加以說明和發揮」（見鄔氏文集卷九，頁二七七。）鄔氏根據理論和革命實踐之不可分裂的一致，說明和發揮了這一辯證法底實質。他把這一法則應用到勞工社會鬭爭底各個重要階段底分析上去，發展底內部矛盾性底認識。對於鄔氏底分析俄國革命底發展，對布爾喬亞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底學說，有着極重大的意義。波爾塞維克把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看作「一根鍊條底兩個環子」，看作俄國革命力量底統一的整個的圖景。鄔氏及其信徒，重視俄國的「軍閥封建的帝國主義」底一切特徵，這種特徵促使反帝制的在勞工集團領導之下的布爾喬亞民主革命之史的發展，有跟攻擊資本主義的勞工社會革命相聯合的可能。

鄔梁諾夫對抗當時的右翼機會主義者，如卡米業夫、季諾維埃夫等人，着重地指出在俄國發展底歷史條件中，布爾喬亞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底一致，但同時他也跟托洛茨基作爭鬭，因爲托氏不了解革命發展底階段，不了解各個革命階段上勞工集團對農民應取的態度。

列宁对俄国革命的分析，我们对中国革命也应如此两阶段论

在中国现在的历史条件中

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批注的手稿。

阶段上劳工集团对农民应取的态度。

列宁论帝国主义

一般和特殊的一致

邬梁诺夫又以对立体一致底法则，作为分析帝国主义之根据。他视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特殊的新阶段。这里他发现了一般和特殊底一致，揭露了资本主义之一般的规律性和矛盾与帝国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诸特殊性底一致。他指出，这些帝国主义底特征（特殊性）不但不消除，而且还加强了一般的资本主义矛盾底表现；垄断和竞争底一致和编合，不但不减轻资本主义矛盾底尖锐性，而且还大大地加强了它，大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竞争底深刻化和尖锐化。

新经济政策的两重性

两方面过程

邬氏又揭示了新经济政策底两重性；这一政策容许资本主义分子与社会主义分子底斗争而促使社会主义分子底必然胜利；这一政策是“资本主义发展与社会主义发展底两方面的过程，是社会主义分子跟资本主义分子斗争底矛盾过程，也是资本主义成份被社会主义成份克服的过程”。

两个世界的矛盾

资本主义矛盾底尖锐化，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时一种新的矛盾又应运而生了。这一新矛盾已非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而是整个资本主义跟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根源上展开了资本主义底一切矛盾，并将它们集合成为一个结子，将它们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底生死问题了。

第二节　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

唯物辩证法底另一法则就是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这一法则，对于发展过程底理解，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因为由一种质变到另一种质的革命的跳跃式的转变，就表现在这一辩证法则上。

极重大意义

所谓质（或质地——沈，）应当了解为现象底定性，各种现象就以其定性之不同而互相区别，并由于此种定性而使它们成为它们。科学的研究，只是从某一客体与其他物体不同的质的特点上去观察此客体时，它才能达到成功。表现事物之特质的定性，就是事物底质地。客观现实各种事物之质的繁复性，这是由于吾人周围之世界中存在着物质运动之各种不同的形式的缘故。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处于一定的物质运动底形态中。自然，也有一些事物中存在着不止一种运动形式而有好几种形式。例如人的机体中就包含着几种物质运动底形式：从机械运动起到思维为止。但是对于每一个特殊的、一定的事物，总有某一种运动形式是表现它底特质的、对于它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当我们谈到“质”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并不是与客观世界无关的各种质底存在，而是具有这种或那种质地的事物或现象本身。质地是具有客观性的；自然界中事物之质的定性，系离意识而独立存在的。人底思维仅仅反

质是现象的定性，规定现象之特殊个性，因此使各现象能互相区别。

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

物质运动之各种不同的形式。每种事物有一定的运动形态，有些有几种运动形态，但必有一种运动形式是表〔现〕该物的特质的。不同的运动形态，就是表现不同的特

质或定性。

质或定性是客观的。

映着客观过程底这种质的定性。

事物因质的不同而区〈互〉相区别，但无绝对界限。世上无绝对独立的物事〈事物〉，每一事物包含着某种同他物相似的共同点，同其他事物维持不可分离的关系。

质的定性是发展变化的，说不变化不对。

由于质底不同，事物就互相区别、互相划分开来。固然，这种划分区别的界限并不带着绝对性的，因为自然界中没有绝对个别、绝对单独的事物。每一事物总包含着跟其他一切事物相似的某种共同点，它经常地跟这种共同点维持着不可分离的联系。事物之质的定性，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不变的东西，像中世纪时代的烦琐哲学（或经院哲学——沈）底代表们所设想的那样。现实现象之质的定性，是经常地在发展着、变化着和复杂化起来的。

质是过程内在的定性，特性则表现此物与他物的关系上的这一定性。物之质的定性在物之许

若要正确地理解质地这一范畴，就必先考察质地和本性（quality and property,）[1]后者亦译特性——沈）底问题。黑格尔在他底《逻辑学》（Wissenschaft der Logik）中讲到过这个问题。他写道：“质地即本性，这首先和主要地

---

[1] 毛泽东在括号上画了一道斜线。

多特性上表现出来，如玫瑰的质之定性，在玫瑰之香气、颜色等许多特性上表现出来。

是指这一种意思来讲的：就是它在外部的关系上表露自己为内在的定性。”[1]（见《逻辑学》页五四）这里黑格尔底意思是说，质地表现某一现象，过程或事物所具有的内在的定性，而本性或特性则表现此事物与其他一切事物的关系上的这一定性。举例来说，譬如玫瑰花这一种花，具有植物形态之一底一定的质地，这一质地也就是它跟其他一切植物形态相区别的定性。而它底这一定性，是在它底许许多多特性上——香气、颜色等等上表现出来的。

质同物之本身不可分的联系。物失掉某些特性还不失去质之定性，但如失了质的定性，就变成他物了。

质的定性表现为特殊的规律性。

质地跟事物之存在（being）本身不可分离地联系着。事物失去了这个或那个本性，它还不失去它底定性，可是假如失去了质地，它就不成其为它了，它变成了别种事物。事物之质的定性，表现于特殊的规律性，表现于它底发展底一定性。事物之科学的定义，只是当它把握住事物之质的定性时，它才具有实在性。

只有认识了质的定性，即特

然而事物底认识却也不只限于质一方面底把握，它同时还包括存在于被考察的事物之量的定性。什么是量呢？我们先来看一看黑格尔下量底

---

[1]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7页）

殊规律性时才算认识了某物。

定义。

量的定性

黑格尔写道：“质是一般地跟存在同一的、直接的定性，它跟在它以后被考察的量（或数量——沈）有区别；量也是存在底定性，可是它已非直接跟存在同一的，而是对存在无关重要的、外在于存在的定性。”[1]（见《黑格尔全集》卷一，页一五七。）

在一定时期内，数量改变，质地不变。

这样看来，黑格尔确定数量为对存在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在这一定义中，真理底种子是在：在一定的时期以内数量底改变实在是外于质地的（意即与质地无甚关系的——沈）。数量虽然改变，质地却依然如是。然而这只是指在某一瞬间以前而言，从这一瞬间起，数量往后的改变即行促成质地底变化。

与过程同一的直接的定性是质，量是过程的定性，但非与过〔程〕直接同一的，而是在某一一定时期内对过程无关重要的、外在的定性。量虽增减，质仍不变。但在一定的瞬间以后，事情就生变化，量的改变促成质的改变。[2]

量也是客观

现象之量的定性，跟质的定性一样，它也具

---

[1] 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2页）

[2] 以这种方式排印的是毛泽东写的批注。

的，量的概念是现象本身所具有的那些数量关系在人的意识上的反映。科学的研究，不但在质的区别上，也应从量的复杂性上去认识他。

量同质是经常在一起的。

一定的特殊的质必具有一定的特殊的量，单纯的质和量是没有的。

有客观性的。量底概念，是现象本身所具有的那些数量关系在吾人意识上的反映。所以科学的认识，也应当不仅从客观现实底质的区别上，而且也应从它底量的复杂性上去把握和反映它。事物之量的定性不存在于它底质的定性以外，量的定性是经常跟质的定性密切地联系着的。譬如我们讲到事物之量的增或减时，我们是指事物质地底增或减。同时这里必须指出，一定的质必具有一定的特殊的量的度量。

质和量在事物中组成不可分离的一致体，这是不同定性的一致，即是对立的一致。

譬如说，在自然界中，没有单纯的质和量，而只有具有质的和量的定性的事物。事物之质的和量的定性组成不可分离的一致体。但是这种一致是不同的定性底一致，是对立底一致。……然而事物之量的变化，是在一定的、与它相适应的质底基础上发生的。在一定的时期以内，质限制着事物之量的变化底界限。例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极度地限制着生产力，物质财富增长底可

能，限制着社会发展底整个水平。这些封建的关系被布尔乔亚革命所扫除，代之而兴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的作用，可是当它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它就变成社会继续向前进展底极端的障碍了。唯其如此，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劳工专政条件之下，社会生活各方面底发展达到了空前未见的速度，这是因为就苏联底生产关系形态言，它代表一种新的质地的缘故。

但是事物之量的变化是在与他相适应的一定的质的基础上才发生的，在一定时期内质限制量之发展。建封〈封建〉制度、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三例。

简言之，量的变化是以事物之质的定性为基础、为限制的。同时，事物之量的变化自身又反影响于它底质的方面。一定的事物之成为该事物，只是在某一瞬间以前。量的变化过程达到了一定的质的限度和在一定的限界底条件之下，它就要求质底变化，引起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的转变。同时，这一转变也是由质到量的转变，因为旧的质一经消灭，新的数量的向前进展就发生了。……

量的变化是以质的定性为基础而受其限制的，但同时质〈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于质。这即是说，受一定的质规定的事物，只在某一瞬间〔以前〕是这样，等到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质的限度和一定的界限时，量就要求质的变

化。同时这一变化，也是由质到量的变化。旧质一消灭，新量就向前发展了。

只有经过量的变化才能发生质的变化。

……恩格斯写道：“我们为着自己的目的，可以把这一法则这样地表达出来：即在自然中，只有经过物质或运动（即所谓能力）之量的增加或量的减少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每一个别的场合均以一定的方式变化着。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发生于不同的化学成份，或是发生于不同的运动（能力〔energy〕）底数量或形式，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是最普遍的情形。这样看来，若不增减物质或运动，就是说，若无物体之量的变化，则此事物之质的变化也不可能。”[1]（见恩格斯著《自然底辩证法》）

同一化学原素纯数量的增减引起质的差别。

为证实这一思想计，恩格斯在《反杜林》和《自然底辩证法》中，举出了许多例子，来证明同一化学原素之纯数量的增或减如何引起质的差别。[第216～222页]

量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

根据上面的说明，可以知道现象之量的变化，在一定的限度以内，带着同质事物之不断增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带着同质事物不断增长的性质。即是说在一定限度内，量虽变化，该事物仍为该事物。只有在一定阶段内，在一定条件下，量的发展才能求质的变化，事物此时就失去旧质而变到新质事物。这种质的变化过程同量的变化过程相反，量是渐渐的变，质是跳跃的变。

长底性质。在同一度量界限以内数量上变化着的事物，不停止其为该事物的。只在它底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事物才失去它底原有的质地而变成另一事物、新质的事物。由一种质变为另一种质的转变，跟不断的量的变化过程相反，它不是渐渐地发生而是跳跃式地完成的。事物既变成了新的质地，它只表现着各种不同的特性、各个不同的方面，在诸对立方底斗争没有引起质底改变以前，它永远是这个质地底事物。跳跃、连续过程底中断，也就是由一质变为另一质的转变之点。[第223页]

恩格斯予机械宇宙观以彻底的痛驳，同时指出来说，“假使我们把一切质底区别和变化都解释成量底区别和变化，解释成机械的转移位置的话，那末我们必然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以为一切物质均由极细小的同一微分组合而成，物质底化学原素底一切质的区别，是由这些结合成原子的微分底空间的组合和它们（指微分——沈）

底数量的差别所造成的”。（见前书，页八一。）[1]
[第224页]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6～597页）

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

（1937年8月1日）

周、博、林[1]：

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我们认为须坚持下列两原则：

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

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

以上原则，请与各同志[2]商定，并准备携告国民党。

洛[3]　毛

东酉

---

[1] 周，指周恩来。博，指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林，指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他们当时是中共中央委派的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代表。

[2] 指当时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朱德、彭德怀等红军总部领导人。

[3]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负总责。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8月1日）

拟复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三人赴京，如何盼复。

---

[1] 毛泽东等于8月1日收到张冲关于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的急电。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1]

（1937年8月1日）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华北来了！平津失守了！如果我们还不动员起来抗战，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打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不要以为平津隔我们这里还远呵，我们这里过去就是山西，山西过去，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用大炮飞机轰炸的平津。所以现在全国无论何处，都应该紧急动员起来。苏区是全国抗日模范区，在这个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已到最后关头的时候，我们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要做一个榜样，表示我们抗战的决心。很久以前，我们就两次三番地对他们说过，希望他们坚决抗战，他们不听，始终动摇不定，始终没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此次平津失陷，是由于动摇不定，没有抗战决心所致。华北当局始终是抱着委曲求全的态度，在军事上不作充分的准备，对于民众是怀着不必要的戒心，不发动民众，不扩大民众爱国运动。相反的，还要出告示下戒严令，要民众“镇静”，使有着满腔热血的爱国民众们动弹不得，这样干的结果，便把平津丢掉了！我希望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对于这个悲痛的教训，有所警惕！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

[1] 8月1日，延安召开第一届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毛泽东出席开幕式并作演讲。

方针，这个方针就是坚决打日本！立即动员全国民众，工农商学兵，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这是民族独立与自由的不二方针。

我们今天举行这个抗战动员运动大会，就是向着这个方针迈进。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底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我们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收复平津！

保卫华北!

收复东四省！

八一运动大会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致朱德、周恩来等电[1]

（1937年8月1日）

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兵力和作战方针，不应请蒋介石决定颁发，只能待适当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向南京面交国防计划等事[1]

（1937年8月3日）

周、博，并告叶：

（甲）国防计划宜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携往面交，不宜由电报拍往。（乙）此种计划我们正在考虑中。请将你们商定者，连同红军作战的方针、步骤等，一并于今日电告。（丙）关于日寇西进危险、中苏国交及红军抗日须求彼方协助等，已分电战士与书记处。（丁）此次赴宁须求得下列问题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洛　毛

江辰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并告叶剑英的电报。

对国防问题的意见

（1937年8月4日）

周、朱、叶[1]，并告博、林，彭、任，刘、张，贺、关，陈、聂，徐、程，陈、王，萧、郭[2]：

国防问题，我们意见如下：

甲、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乙、第二防线大同、保定、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丙、至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叶，指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1937年8月初，经中共中央决定，他们正准备前往南京出席商讨国防问题的会议。

[2] 博、林，指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当时任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彭、任，指彭德怀、任弼时，当时分别任红军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刘、张，指刘伯承、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政治委员。陈、聂，指陈光、聂荣臻，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和政治委员。徐、程，指徐海东、程子华，当时分别任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陈、王，指陈再道、王宏坤，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第四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萧、郭，指萧克、郭述申，当时分别任红军援西军第三十一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只顾此线而不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丁、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戊、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己、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庚、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辛、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1]、晋、绥[2]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3]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与必要的补充。

壬、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癸、其余由你们相机提出，不可过多，要捉住中心。

洛[4]　毛

八月四日

---

[1] 察，指察哈尔省，1952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2] 绥，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

[3] 热，指热河省，1955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

[4]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负总责。

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4日）

红军闽粤边区部队被国民党军阴谋缴械事件[2]，是极严重的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闽粤边区游击队的领导人何鸣，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红军的阴谋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部队在7月16日被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包围缴械。

复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5日）

红军出动抗日，主力仍以在韩城、宜川渡河为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复朱德、周恩来、博古等电[1]

（1937年8月5日）

我们以为朱德同志以即去南京一行为有利。[2]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8月5日致电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说他们反复考虑朱德目前去南京同国民党谈判问题，意见不完全一致，朱德本人认为他目前去南京较以后去有利。6日，朱德、周恩来从云阳镇抵达西安，于9日与叶剑英一起飞抵南京，参加国防问题讨论会，并同国民党谈判。

红军的作战任务与兵力使用原则[1]

（1937年8月5日）

朱、周，博、林，彭、任：

支申电[2]悉，答复如下：

甲、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具体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四角地区，不是三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西进及沿平汉南进之敌，以出击侧面的扰乱、钳制和打击，协助友军作战，并便于派一部远出热河，这不是“独当一面”的意思，均是在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朱德、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秦邦宪）、林伯渠，以及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的电报。

[2] 指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1937年8月4日申时给洛甫（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就对日抗战的方针问题提出：（一）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部署，然后从局部抗战做起。（二）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三）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要积极准备。关于如何实现上述第一、二项方针，电报提出，作战方针要以分区集团的防御钳制敌人，而反对单守不攻与退却逃跑。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绥远、宁夏与陕甘一部）。

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的意思。这样提出较自由、活泼而有效。即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

乙、使用兵力问题。提出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主力在数量上可以是二分之一，可以是三分之二），对蒋[1]不说几分之几，事实上须估计战争的长时间性与残酷性，应估计蒋之军阀割据（红军全部开去是蒋之要求），又须估计陕甘是我们唯一可靠后方（蒋在陕甘则尚有十个师，以便把我们全部送去，他则稳占此后方）等等问题。

丙、补充接济的后方问题。除陕甘不必提出外，可以要求包头、宁夏，但必须着重要求晋西、宁、绥、榆神府[2]，事实上马鸿逵[3]恐难合作，仅在中苏军事同盟订立后有此可能。

洛　毛

微午

---

[1] 蒋，指蒋介石。

[2] 榆神府，指陕西北部的榆林、神木、府谷三县。

[3]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

在延安“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

（1937年8月6日）

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因为我们体育运动应该是大家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要唤起民众坚决打日本，坚决抗战是要每个人民参加的，正好像体育运动也要大家参加一样。

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

---

[1] 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于8月6日闭幕，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致闭幕词。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8日）

拟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地点在洛川，时间十五号左右，由云阳到洛川须几天并估计情况是否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研究讨论红军出动问题、作战问题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8月8日）

三个方面军宜靠拢前进，凡事以谨慎为宜。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出动抗日事致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8月9日）

卢沟桥事变是中国大规模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但离彻底转变还远。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即统治者怕群众起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在华北实际是节节退却。

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各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态度

（1937年8月10日）

雪枫[1]同志：

各电均悉，甚慰。

甲、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2]、晋、绥[3]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并照昨电所开五类十九种物品要求补充，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

---

[1] 雪枫，即彭雪枫（1907—1944），河南镇平人。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在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2] 察，指察哈尔省。

[3] 绥，指绥远省。

乙、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朱、周[1]已于九日飞京，俟接其回电立即出动。如他们问及如何还未改编，则答以因为南京的拖延（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表指挥部，也不颁布番号，最近几天内才把番号颁下，但指挥部还未委任）。

丙、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余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2]交涉一定要办到。

丁、太原公开办事处[3]立即开设，你为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日

---

[1] 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他们当时已赴南京参加商讨国防问题的会议。

[2] 阎，指阎锡山（1883—1960），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指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

致朱德、周恩来电[1]

（1937年8月12日）

阎锡山已答应红军由韩城渡河，经同蒲路输送。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和韦尔斯的谈话[1]

（1937年8月13日）

如果有国民党政府的合作，这个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1] 1937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会见美国记者韦尔斯，给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草案。这是毛泽东和韦尔斯谈话的一部分。

致彭德怀电[1]

（1937年8月14日）

红军本可迅速出动，因南京对于宣言、纲领、指挥部、参谋长等问题诸多留难，以致尚须待朱德、周恩来此次在南京谈判结束才能确定出动日期。此点可向阎锡山说明。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复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37年8月14日）

宣言可以修改，但决不能照康泽提案，我们的修改案即告。

---

[1] 周恩来、朱德等于8月12日在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谈判代表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其间康泽捣乱，他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当时，周恩来、朱德就给以严辞批驳，并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毛泽东。8月14日，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电朱德、周恩来、叶剑英，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最后宣言还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方案修改，于9月22日经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

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欢送晚会上的讲话[1]

（1937年8月15日）

战地服务团是一件大工作，因为打日本，打日本在国内在世界上都是一件大事。我们数年来要求举国团结一致抗日，在今天可说已经开始实现了。这次战争可以说带有最后一次的意义，战地服务团随红军出发到前方工作，你们要用你们的笔，用你们的口与日本打仗，军队用枪与日本打，我们要从文的方面武的方面夹攻日本帝国主义，使日寇在我们面前长此覆灭下去。

---

[1] 丁玲、史沫特莱等发起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随军奔赴前线工作。该团分通讯、宣传两股，通讯股专门从事战事采访；宣传股专门以文艺形式从事抗日救亡宣传，以鼓舞士气，动员民众。1937年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出席并讲话。

和丁玲的谈话[1]

（1937年8月15日）

这个工作重要，对你也很好，前方去可以接近部队，接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扩大党的影响。组织上嘛，在延安属军委管，到了前方由总政管。出发以前，需要什么，找萧劲光同志。宣传工作，问中宣部。组织机构可以小一点，你们几个领导同志，称呼团长可以，称呼主任也可以。下边就不要设“部”“科”，我看叫“股”就行了。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喜闻乐见，要大众化。现在很多人谈旧瓶新酒，我看新瓶新酒，旧瓶新酒都可以，只要对抗战有利。你是写文章的，不会演戏，但可以领导，没有搞过，可以学会。团里有几个人的历史、政治面貌没有搞清楚，这不要紧。在工作中可以慢慢了解，对他们不要有成见，不要轻易作结论，要帮助他们；有这样几个人，你们就有事情做了。

---

[1] 丁玲，当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毛泽东非常关心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这是毛泽东和丁玲关于西北战地服务团谈话的一部分。

红军主力不走平汉路而走同蒲路

（1937年8月17日）

张淮南[1]先生转朱、周、叶[2]三兄：

南密铣辰电悉。

甲、同意我军主力集中阳原、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地域，但前进不走平汉路[3]而走同蒲路，在侯马上车，至代县下车，向目的地集中。

乙、无钱买米，速领得八月份六十万及开拔费。

丙、皮衣、军械、弹药之补充速令太原准备。

丁、在独立自主的指挥与游击战山地战原则下受阎百川[4]节制，速通知阎。

毛泽东

十七日

---

[1] 张淮南，即张冲，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当时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国共谈判。

[2] 朱、周、叶，指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当时他们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

[3]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4] 阎百川，即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坚决不同意黄白案[1]

（1937年8月18日）

周、叶：

黄白案将红军分割出动，其中包含着极大阴谋，坚决不能同意。在根本问题解决后，我军主力（不是全部）决定由韩城渡河，决不走陇海线和平汉线。

洛　毛

十八日

---

[1] 黄白案，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和国民党军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提出的八路军出动方案。具体内容是：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至代县附近下车，到蔚县一带集中。另一师沿陇海路转平汉路，在徐水下车，到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周恩来、朱德在南京同国民党谈判期间，白崇禧、黄绍竑提出这一方案。这是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于8月18日和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叶剑英发给周恩来的电报。

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1]

（1937年8月18日）

博、林，彭、任，并告周、叶：

甲、国民党阴谋已表现得很明显，他的企图是：

（一）将红军全部送上前线。

（二）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

（三）红军受命出动后即变为蒋[2]之属下，彼以命令行之。彼时党的问题与边区问题，由彼解决，甚至将不许发表宣言并取消苏区。

乙、我们对策见中央给周叶训令[3]。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博古（秦邦宪）、林伯渠和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并告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指1937年8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训令提出的十项条件主要是：（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红军之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红军。（十）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锡山节制。

丙、此事关系重大，须在洛川会议[1]中慎重讨论。

丁、请博朱彭任刘张贺关[2]八同志一齐出席，并请于二十日由云阳[3]动身。

洛　毛

十八日未

---

[1] 洛川会议，指1937年8月22日—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本任务的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了红军改编后对日作战的指导原则。

[2] 博朱彭任刘张贺关，指博古（秦邦宪）、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林育英），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

[3] 云阳，镇名，位于陕西省泾阳县北部。当时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

给任弼时、邓小平的信[1]

（1937年8月19日）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事请为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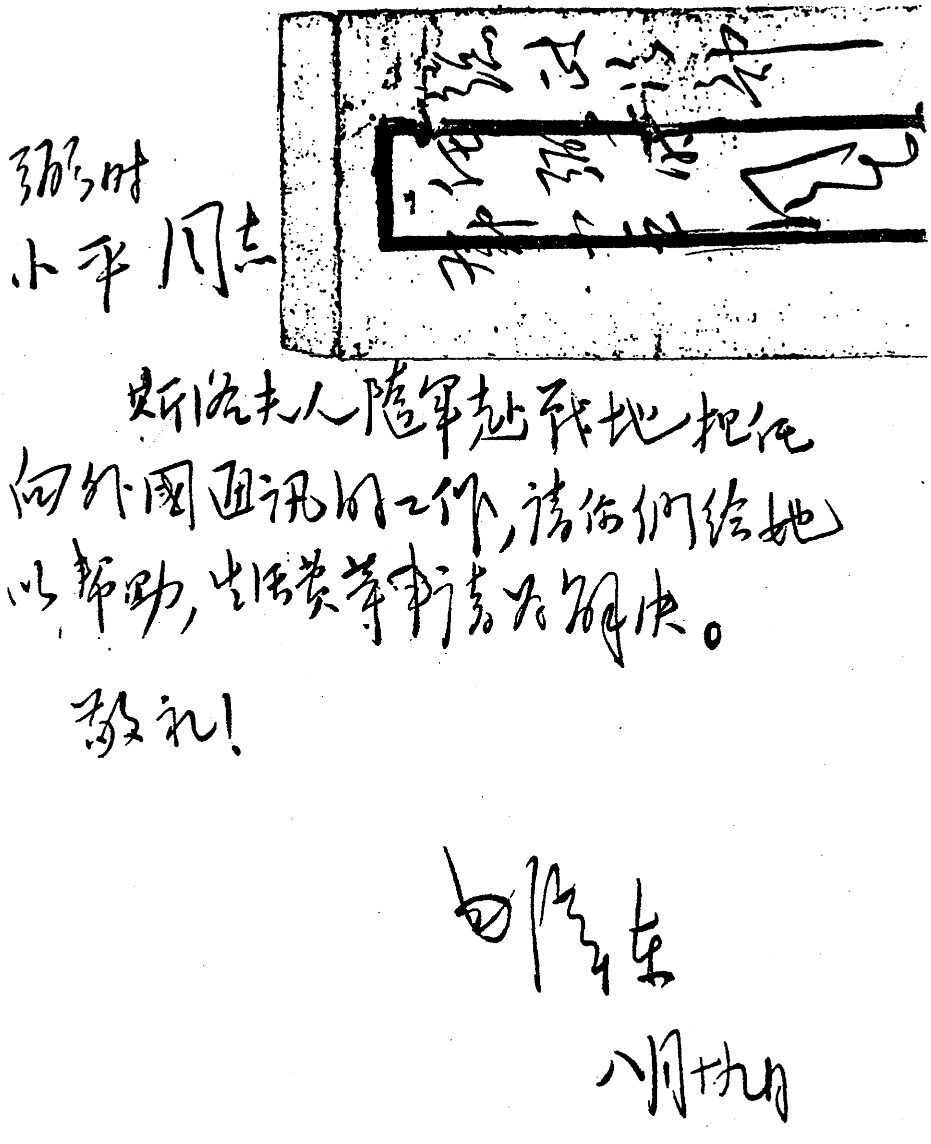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写给任弼时和邓小平的信，请他们帮助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尼姆·韦尔斯到前线采访，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弼时
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军赴战地担任向外国通讯的工作，请你们给她以帮助，生活费等事请为解决。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

毛泽东致任弼时、邓小平信的手稿和信封。

致谢觉哉电[1]

（1937 年 8 月 21 日）

朱、周赴宁已回，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朱为总指挥，彭为副。全国性抗战已开始，我先头部队于十九日出发，其余俟合作宣言发表才开。干部须在本地物色，暂无适当之人可派，回族可组民族性的党，其名称可用回族抗日救亡协会等。嘱我不要回陕。

---

[1] 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毛泽东全集》第10卷
主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划：树　旺
出版：润东出版社
承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852）23500066
电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址：www.enricheast.com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长：言　臣
装帧：平　装
开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面：544面
版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SBN：978-988-12907-0-0
定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洛川会议上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2
（1937年8月25日）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6
（1937年8月25日）
关于陕北红军各独立军师改编的电令 ……15
（1937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19
（1937年8月25日）
为抗大学员毕业证题词 ……22
（1937年8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24
（1937年8月27日）
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 ……25
（1937年8月31日）
致潘汉年电 ……26
（1937年8月31日）
矛盾论 ……27
（1937年8月）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68
（1937年7月、8月）
对党中央关于在陕甘宁建立根据地的解释……106
（1937年8月）
统一论……107
（1937年）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10
（1937年9月1日）
致周恩来等电……113
（1937年9月1日）
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区域……114
（1937年9月3日）
致彭雪枫等电……116
（1937年9月4日）
力争把阜平等县规定为八路军活动地区……117
（1937年9月7日）
反对自由主义……118
（1937年9月7日）
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22
（1937年9月10日）
关于对待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123
（1937年9月10日）
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124
（1937年9月12日）
关于驳斥蒋鼎文的无理态度问题致林伯渠等电……126
（1937年9月14日）

南方游击区谈判改编时应坚持的方针……………………………127
（1937年9月14日）
关于我军应坚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方针的指示…………129
（1937年9月16日）
致朱德、任弼时电………………………………………………130
（1937年9月16日）
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131
（1937年9月17日）
应速向晋西北转进………………………………………………135
（1937年9月18日）
八路军战略区域问题……………………………………………136
（1937年9月19日）
致八路军前线指挥部电…………………………………………138
（1937年9月20日）
王兆相部主力准备配合一二〇师作战…………………………139
（1937年9月21日）
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140
（1937年9月21日）
关于广西统战工作问题致张云逸电……………………………143
（1937年9月21日）
致博古、叶剑英电………………………………………………144
（1937年9月22日）
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145
（1937年9月23日）
在日军占太原的设想下布置五台山脉游击战争………………147
（1937年9月24日）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49
（1937年9月25日）
在保定及晋北决战中八路军须发挥战略作用……………………151
（1937年9月25日）
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152
（1937年9月25日）
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155
（1937年9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57
（1937年9月25日）
致周恩来电…………………………………………………………158
（1937年9月25日）
致朱德、彭德怀电…………………………………………………159
（1937年9月26日）
对日军在华北作战计划的估计和边区应紧急进行备战动员………160
（1937年9月27日）
致刘伯承等电………………………………………………………162
（1937年9月28日）
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163
（1937年9月29日）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65
（1937年9月29日）
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谈话* ………………………………………175
（1937年9月29日）
致博古、叶剑英电…………………………………………………176
（1937年9月30日）

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的摘录……177
（1937年9月）
给艾思奇的信……186
（1937年）
和朱光的对话……189
（1937年9月）
平型关战役战果……191
（1937年10月1日）
致博古、叶剑英电……195
（1937年10月2日）
致张文彬电……196
（1937年10月3日）
正确对待配属八路军指挥之友军……197
（1937年10月4日）
致周小舟电……198
（1937年10月5日）
关于各师在山西的作战部署……199
（1937年10月5日）
在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201
（1937年10月6日）
给周素园的信……203
（1937年10月6日）
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205
（1937年10月6日）
《农村调查》序言一……208
（1937年10月6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210
（1937年10月9日）
给雷经天的信……211
（1937年10月10日）
华北战局重点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214
（1937年10月13日）
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的意见……216
（1937年10月13日）
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219
（1937年10月13日）
关于没收汉奸财产问题……221
（1937年10月15日）
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222
（1937年10月16日）
致朱德等电……223
（1937年10月17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224
（1937年10月17日）
关于对取消“全救”的认识及其取消后上海救亡工作方针的指示……225
（1937年10月18日）
致周恩来等电……226
（1937年10月19日）
论鲁迅……227
（1937年10月19日）
基础战术……230
（1937年）

日军占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282
（1937年10月20日）
一二九师一二〇师等部的作战部署…………………………284
（1937年10月21日）
致周恩来等电……………………………………………………288
（1937年10月22日）
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289
（1937年10月22日）
总部与一一五师的行动部署………………………………291
（1937年10月22日）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293
（1937年10月23日）
边区须立即进行直接抗战的准备和动员…………………295
（1937年10月23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297
（1937年10月23日）
为抗大建设校舍题词…………………………………………298
（1937年10月23日）
我们的责任……………………………………………………300
（1937年10月23日）
在抗大校舍落成大会上的训词……………………………301
（1937年10月24日）
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302
（1937年10月25日）
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303
（1937年10月25日）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304
（1937年10月25日）
对当地统治阶级的策略……316
（1937年10月26日）
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部署……317
（1937年10月27日）
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319
（1937年10月30日）
致王兆相等电……320
（1937年10月30日）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321
（1937年10月）
对留守兵团工作的指示……332
（1937年10月）
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333
（1937年10月）
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指示……334
（1937年10月）
在欢迎叶挺大会上的讲话……336
（1937年10月）
目前的时局和方针……337
（1937年11月1日）
复林伯渠等电……339
（1937年11月2日）
致博古、叶剑英电……340
（1937年11月4日）

对《大公报》记者谈抗战形势……341
（1937年11月5日）

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343
（1937年11月8日）

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346
（1937年11月9日）

在国共两党关系有趋恶化之势的来电上批示……348
（1937年11月11日）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349
（1937年11月12日）

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360
（1937年11月12日）

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华北的任务……361
（1937年11月13日）

关于八路军应积极参加特区大会选举问题致各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电…363
（1937年11月13日）

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则……364
（1937年11日15日）

八路军骑兵团向蒙境出动……366
（1937年11月16日）

致叶剑英等电……368
（1937年11月17日）

巩固河防为目前紧迫任务……369
（1937年11月17日）

对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373
（1937年11月23日）

给文运昌的信……………………………………………………374
（1937年11月27日）
围攻三边地区土匪要有周详的计划………………………………378
（1937年11月28日）
关于在我占区加强部队和民众动员工作问题的指示………………379
（1937年11月29日）
为陕北公学学员题词………………………………………………381
（1937年11月）
致朱德等电…………………………………………………………382
（1937年12月2日）
对进攻晋察冀边区之敌的作战方法…………………………………383
（1937年12月5日）
关于我军应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及加强统战教育问题致朱德等电…385
（1937年12月6日）
复叶挺电……………………………………………………………387
（1937年12月14日）
给抗日军政大学九队的信……………………………………………388
（1937年12月15日）
派两个支队向平汉路东游击…………………………………………390
（1937年12月16日）
关于华北我军应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392
（1937年12月17日）
致朱德、任弼时电……………………………………………………393
（1937年12月19日）
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394
（1937年12月24日）

在敌南进中须集中兵力打两三个胜仗……………………………396
（1937年12月29日）
对日军进攻形势的判断与我之部署的建议………………………398
（1937年12月30日）
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400
（1937年12月30日）
关于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等问题的谈话……………………………402
（1937年12月）
在留守兵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403
（1937年12月）
为古柏题写挽词……………………………………………………404
（1937年）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题词…………………………………………405
（1937年）
为《国防卫生》杂志题词…………………………………………406
（1937年）
为中央社会部题词…………………………………………………408
（1937年）
和美国记者谈中日战争……………………………………………410
（1937年）
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412
（1937年）
对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的指示………………………………425
（1937年）
读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一书的批注…………………………426
（1937年）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让步……………………………………428
（1937年）
谈恋爱三原则……………………………………………………431
（1937年）
和郭奇等的谈话…………………………………………………432
（1937年）
在延安市工人制造品竞展会闭幕式上的演说……………………435
（1938年1月3日）
为延安市工人制造品竞展会优胜者题词…………………………436
（1938年1月3日）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437
（1938年1月11日）
给艾思奇的信……………………………………………………451
（1938年1月12日）
给艾思奇的信……………………………………………………453
（1938年1月12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454
（1938年1月14日）
为抗大举行的一·二八运动大会题词 ……………………………455
（1938年1月28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456
（1938年1月28日）
致邓发等电………………………………………………………457
（1938年1月29日）
和许光达的谈话…………………………………………………458
（1938年1月）

和梁漱溟的谈话……………………………………………………………459
（1938年1月）
为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记者题词………………………………………………463
（1938年1月）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465
（1938年1月至3月）
读书日记…………………………………………………………………………508
（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
为《自由中国》杂志题词……………………………………………………513
（1938年2月1日）
论一党专政……………………………………………………………………515
（1938年2月2日）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531
（1938年2月8日）
应派精干部队发展雾龙山区…………………………………………………532
（1938年2月9日）

在洛川会议上作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

（一）当前形势。由于敌人方面的强大而我们力量的弱小，抗日战争必然是一个持久战，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全国总动员，不分男女老幼，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进行全民族的抗战。（二）团结问题。这个团结一是指国共两党的团结。目前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比较过去有了进步，但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民众和实行民主政治，还没有与共产党合作的诚意，所以抗战中还可能出现失败、退却、分化和暂时局部的妥协等情况，我们党要竭尽全力为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而奋斗，坚持反对违背此方针的一切错误方针，维护统一战线。团结的另一方面是要团结全国各阶层的人民进行抗战，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党的政策要作相应改变，对资产阶级、民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要作相应改变。（三）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方针问题。出征以后，我们主要的作战方针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四）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我们红军开赴前线的主要方向是敌后，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就是发动群众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我们的军队就有来源，武装就能扩大，我们的敌后政权就能巩固，根据地就能发展，从而实现党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打败日本侵略者。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1]

（1937年8月25日）

南京已经开始对日抗战，国共两党合作初步成功。为着实现共产党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红军改名之保证[2]，使红军成为抗日民族战争的模范，推动这一抗战成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战争，以争取最后的彻底胜利，特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3]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着将：

前总指挥部[4]改为第八路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

---

[1]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下辖三个师。9月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第八路军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改称总司令部，朱德和彭德怀分别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

[2]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曾致电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要求国民党将“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条定为国策。同时表示，如果国民党能确定上列国策，则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其中第三项为：“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3] 指1937年2月至8月，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为合作抗日进行的五次谈判。

[4] 指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

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以林彪为该师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该师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

二方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两师及赤水警卫营、前总直之一部等部合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师。以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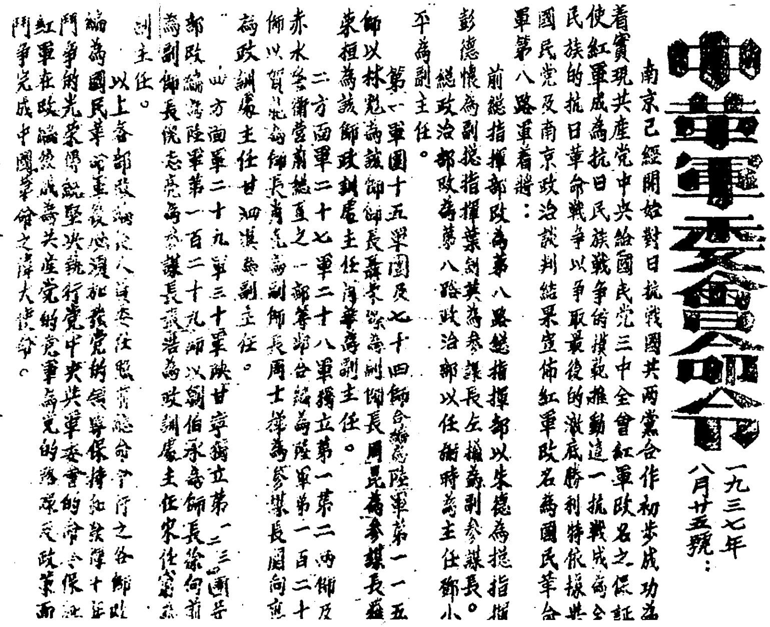
四方面军、二十九军、三十军、陕甘宁独立第一、二、三、四团等部改编为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以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1]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来

---

[1] 张浩，即林育英。



中華軍委會命令

一九三七年八月廿五號：

南京已經開始對日抗戰國共兩党合作初步成功為着實現共產党中央給國民党三中全會紅軍改名之保証使紅軍成為抗日民族戰爭的模範推動這一抗戰成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戰爭以爭取最後的澈底勝利特依據共國民党及南京政治談判結果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着將：

前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

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

第一軍團十五軍團及七十四師合編為陸軍第一一五師以林彪為該師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周昆為參謀長羅榮桓為該師政訓處主任蕭華為副主任。

二方面軍二十七軍二十八軍獨立第一第二兩師及赤水警衛營總直之一部等部合編為陸軍第一百二十師以賀龍為師長蕭克為副師長周士第為參謀長關向應為政訓處主任甘泗淇為副主任。

四方面軍第二十九軍三十軍陝甘寧獨立第一二三四團等部改編為陸軍第一百二十九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倪志亮為參謀長張浩為政訓處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

以上各部改編於八[illegible]依照前總命令實行之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揚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後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

中華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　席　毛澤東

副主席　朱　德

周恩來

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等发布的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延安王家坪。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1]

（1937年8月25日）

（甲）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由于日寇无底止的进攻，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提倡、坚决实行和取得全国的赞助，使得“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战的政策，使得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以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为起点的国民党政策上的开始转变，以及蒋介石先生七月十七日在庐山关于抗日的谈话，和他在国防上的许多措施，是值得赞许的。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中国共产党谨以无上的热忱，向所有全国的爱国军队爱国同胞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乙）但在另一方面，在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又依然继续其“九一八”以来所实行的错误政策，进行了妥协和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这个提纲为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

步，压制了爱国军队的积极性，压制了爱国人民的救国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在夺取平津之后，依靠其野蛮的武力，借助德意帝国主义的声援，利用英帝国主义的动摇，利用中国国民党对于广大劳动民众的隔离，毫无疑义将继续坚持其大规模进攻的方针，实行第二步、第三步的预定的作战计划，向着整个华北及其他各地作猛烈的进攻。察哈尔、上海等地的烽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抵御强寇的进攻，保卫华北和沿海，收复平津和东北，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当局必须深切地认识东北平津丧失的教训，认识阿比西亚尼亡国的覆辙，认识苏联过去战胜外敌的历史，认识西班牙现在胜利地保卫马德里[1]的经验，坚固地团结起来，为保卫祖国而作战到底。今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这里的关键是国民党政策的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进步是值得赞扬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多年企望的，我们欢迎这种进步。然而国民党政策在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等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对人民抗日运动基本上依然不肯开放，对政府机构依然不愿作原则的改变，对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改良的方针，对共产党关系也没有进到真诚合作的程度。在如此的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如果还因循上述的政策不愿迅速改变，将使抗日战争蒙受绝大的不利。有些国民党人说：待抗战胜利后再实行政治改革

---

[1]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1936年7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1936年10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五个月的时间。由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用虚伪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帮助侵略者，又由于人民阵线内部发生了分化，马德里在1939年3月陷落。

吧。他们以为单纯的政府抗战便可以战胜日寇，这是错误的。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丙）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十大救国纲领如下：

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对日绝交，驱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侦探，没收日本在华财产，否认对日债务，废除与日本签订的条约，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为保卫华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战到底。

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

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反对任何的动摇妥协。

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实行全国抗战。

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

设立经常的国防会议，讨论和决定国防计划和作战方针。

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

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

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发扬军队的积极性。

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

实现一切抗战军队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国各地军区，动员全民族参战，以便逐步从雇佣兵役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

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

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运动的旧法令，颁布革命的新法令。

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

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

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机构：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驱逐亲日分子。

国防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

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

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

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日意侵略阵线。

联合朝鲜和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经济政策是：整顿和扩大国防生产，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提倡国货，改良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反对投机操纵。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

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

废除苛捐杂税。

减租减息。

救济失业。

调节粮食。

赈济灾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日战争，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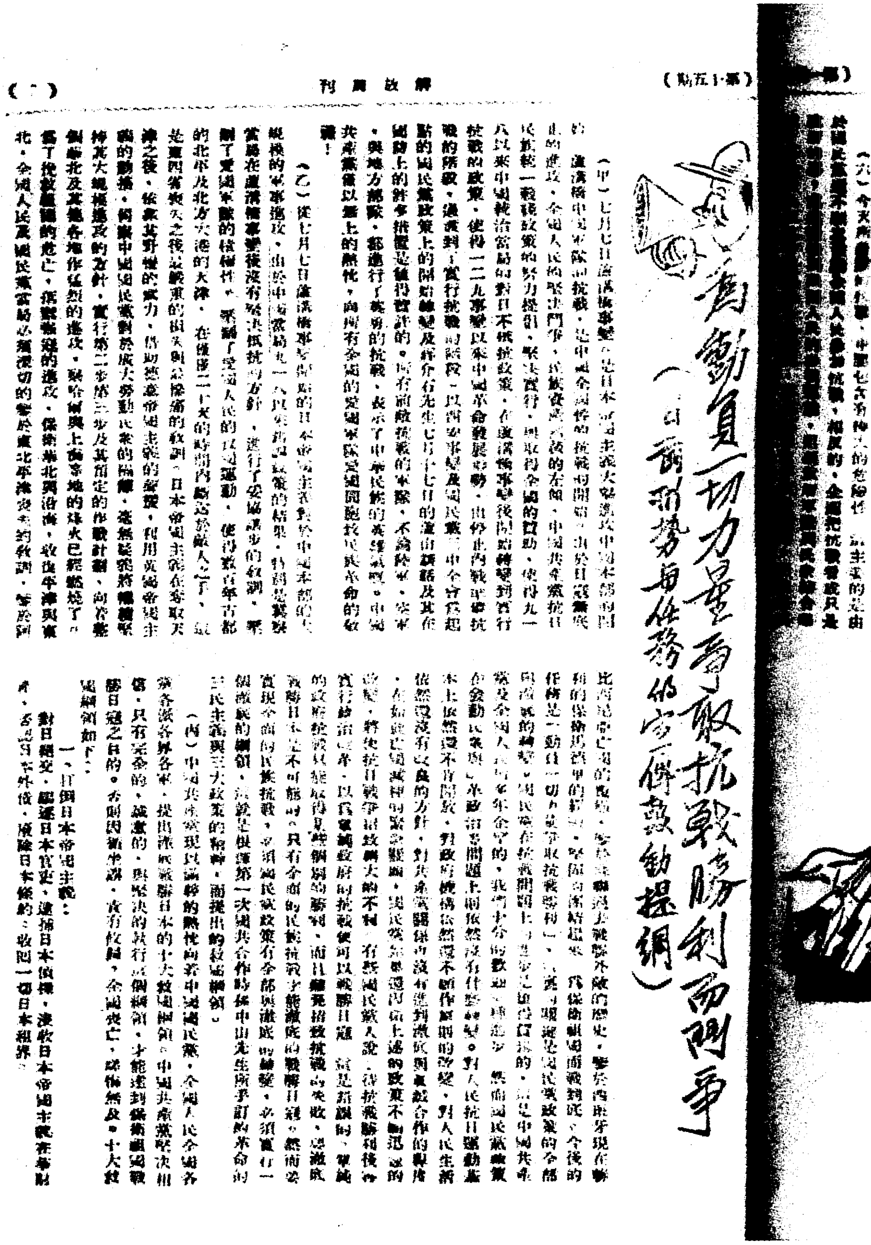
（丁）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恢复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革命精神，实行上述的十大纲领，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及其

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在实现上述十大纲领的条件下，战胜日寇的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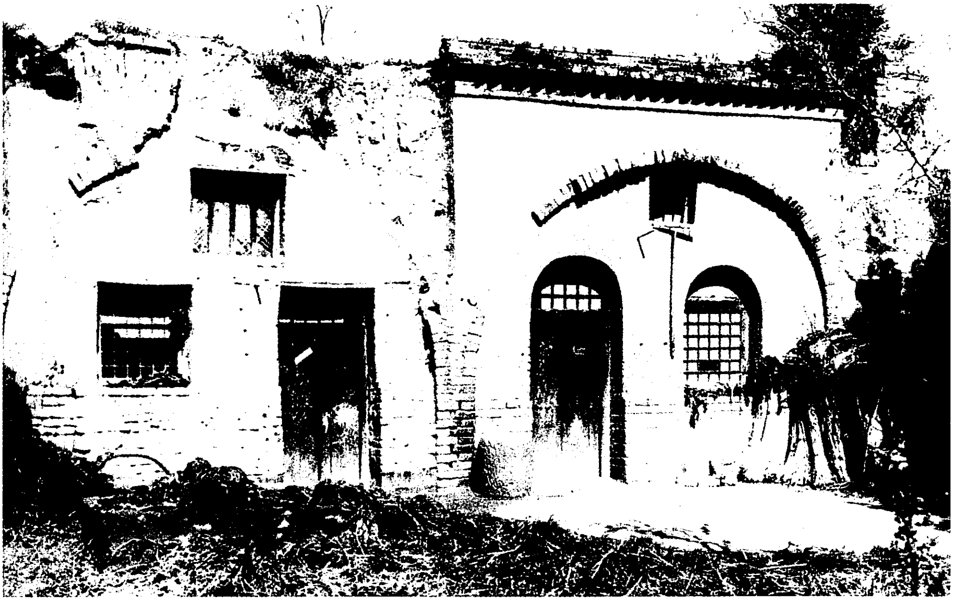
民族革命战争万岁！

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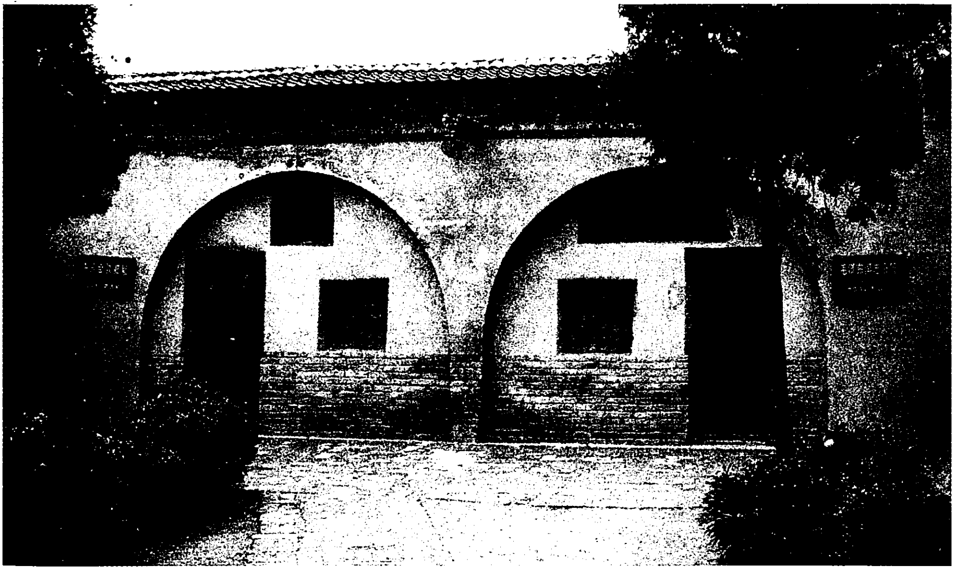


解放周刊
（第十五期）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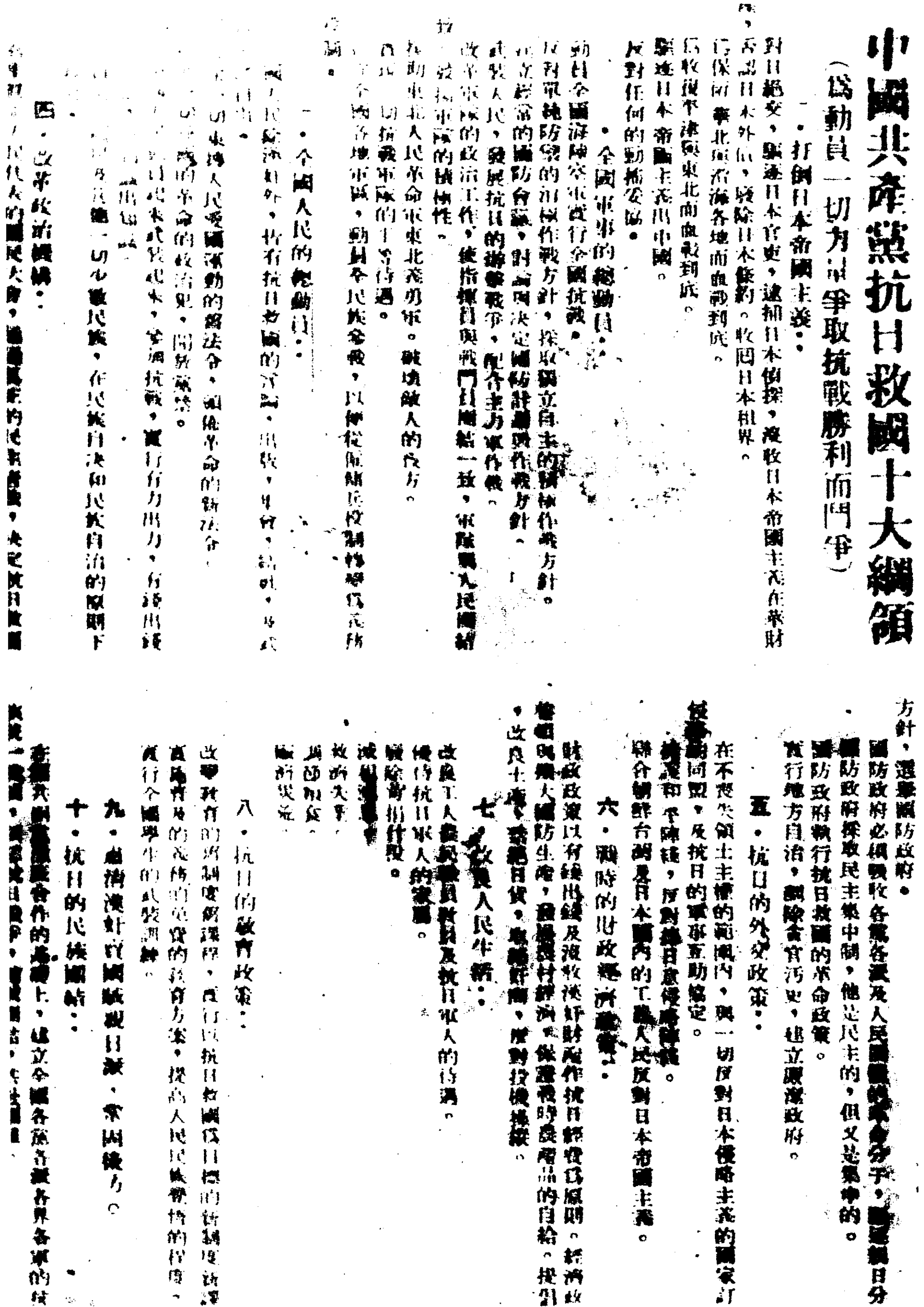
刊登在《解放》周刊第十五期上的宣传鼓动提纲。



1937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图为洛川会议旧址。



1937年，毛泽东在洛川的旧居——冯家村私塾小学。



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對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否認日本外債，廢除日本條約，收回日本租界。

為保衛華北與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為收復平津與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妥協。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

動員全國海陸空軍實行全國抗戰。

反對單純防禦的消極作戰方針，採取獨立自主的積極作戰方針。

成立經常的國防會議，討論與決定國防計劃與作戰方針。

武裝人民，發展抗日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軍作戰。

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使指揮員與戰鬥員團結一致，軍隊與人民團結一致，發揮軍隊的積極性。

援助東北人民革命軍東北義勇軍。破壞敵人的後方。

實行一切抗戰軍隊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國各地軍區，動員全民族參戰，以便從傭兵制度轉變為義務兵役制。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全國人民除漢奸外，皆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武裝抗敵的自由。

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

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開放黨禁。

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

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一切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民族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機構：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

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及人民團體的革命分子，驅逐親日分子。

國防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他是民主的，但又是集中的。

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

實行地方自治，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範圍內，與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

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

聯合朝鮮台灣及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及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為原則。經濟政策整頓與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戰時農產品的自給。提倡國貨，改良土產。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反對投機操縱。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職員教員及抗日軍人的待遇。

優待抗日軍人的家屬。

廢除苛捐雜稅。

減租減息。

救濟失業。

調節糧食。

賑濟災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變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為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

實施普及的義務的免費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覺悟的程度。

實行全國學生的武裝訓練。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关于陕北红军各独立军师改编的电令

（1937年8月25日）

各独立军师，陕甘宁，神府，关中，陕北及王宏坤、陈、李、贺、阎、杜、甘、王、叶[1]、陈伯钧、马、黄、陈、王[2]：

兹拟定各独立军师具体编制如下：

（一）编制原则：以保存原有建制的基础，便于扩大及便于适应陕甘宁地理给养之条件。故决定连以九十个战斗员为限，现四个连的团即缩编为三个连，原三个连的不变动。惟名义上照以下改变：连改为排，团改为连，以排设伙食单位。

（二）原七十四师改为国民革命军一一五师辎炮两营，驻防富县、甘泉一带；原独二师王兆相部改为一二〇师工兵营，驻防神府[3]；原独一师及陕北独立团改为一二〇师特务营，拟驻防靖边、

---

[1] 陈、李、贺、阎、杜、甘、王、叶，指陈奇涵、李宗贵、贺晋年、阎红彦、杜平、甘渭汉、王维舟、叶道志。陈奇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李宗贵，当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政治委员。贺晋年，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阎红彦，当时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杜平，当时任红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甘渭汉，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九军政治委员。叶道志，当时任红军第十师政治委员。

[2] 马、黄、陈、王，指马明方、黄罗斌、陈先瑞、王兆相。马明方，当时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黄罗斌，当时任神府分区保安司令员。

[3]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横山一带；二十七军改为一二〇师辎炮两营，拟驻防安边、宁条梁以南地区；原三十军改为一二九师之炮兵营，驻防庆阳、镇原一带；以陕甘宁第三团之二三两连及关中警卫营合编为一二九师之辎重营，驻防宁县一带；陕甘宁之一、二、四团改为一二九师工兵营，驻防环县、合水一带；二十九军改为一二九师之特务营，驻防定盐[1]；由一二九师留下之一团驻防同官[2]或洛川，由一二九师留下之一团驻防淳化、旬邑、正宁之线。

（三）以神府、靖边、安定、志丹[3]、肤施、甘泉、富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以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副之，驻洛川；以定盐、环县、庆合[4]、正宁、旬淳[5]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以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副之，驻防正宁。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设延安。

（四）以上部队统受萧劲光指挥。

（五）以上部队应于去电令接到后立即进行改编，并将改编情形详报。

（六）其他各地方部队由保安司令部电另行规定。

毛泽东

有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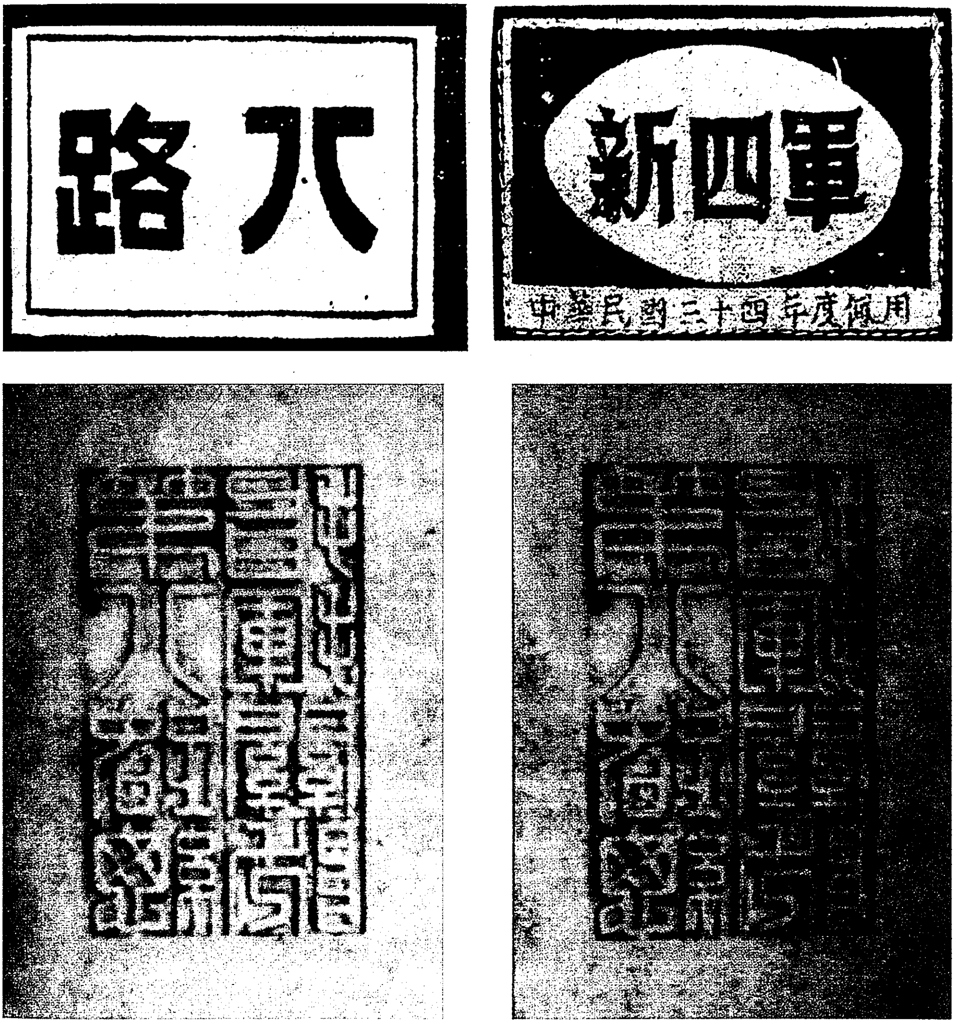
[1] 定盐，指陕西定边和宁夏盐池。

[2] 同官，即今陕西省铜川市。

[3] 志丹，即原陕西省保安县。1936年4月，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率部东征抗日，在山西中阳与国民党军战斗中英勇牺牲，为纪念刘志丹，将其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4] 庆合，指甘肃庆阳和合水。

[5] 旬淳，指陕西旬邑和淳化。


八路
新四軍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度佩用

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臂章，八路军总指挥关防。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

（1937年8月25日）

（一）卢沟桥的挑战与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整个计划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一切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

（二）南京政府在日寇进攻与人心愤激的压迫下，已经开始定了抗战的决心。整个的国防部署与各地的实际抗战，也已经开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三）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和民众的动员不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

（四）在这一新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与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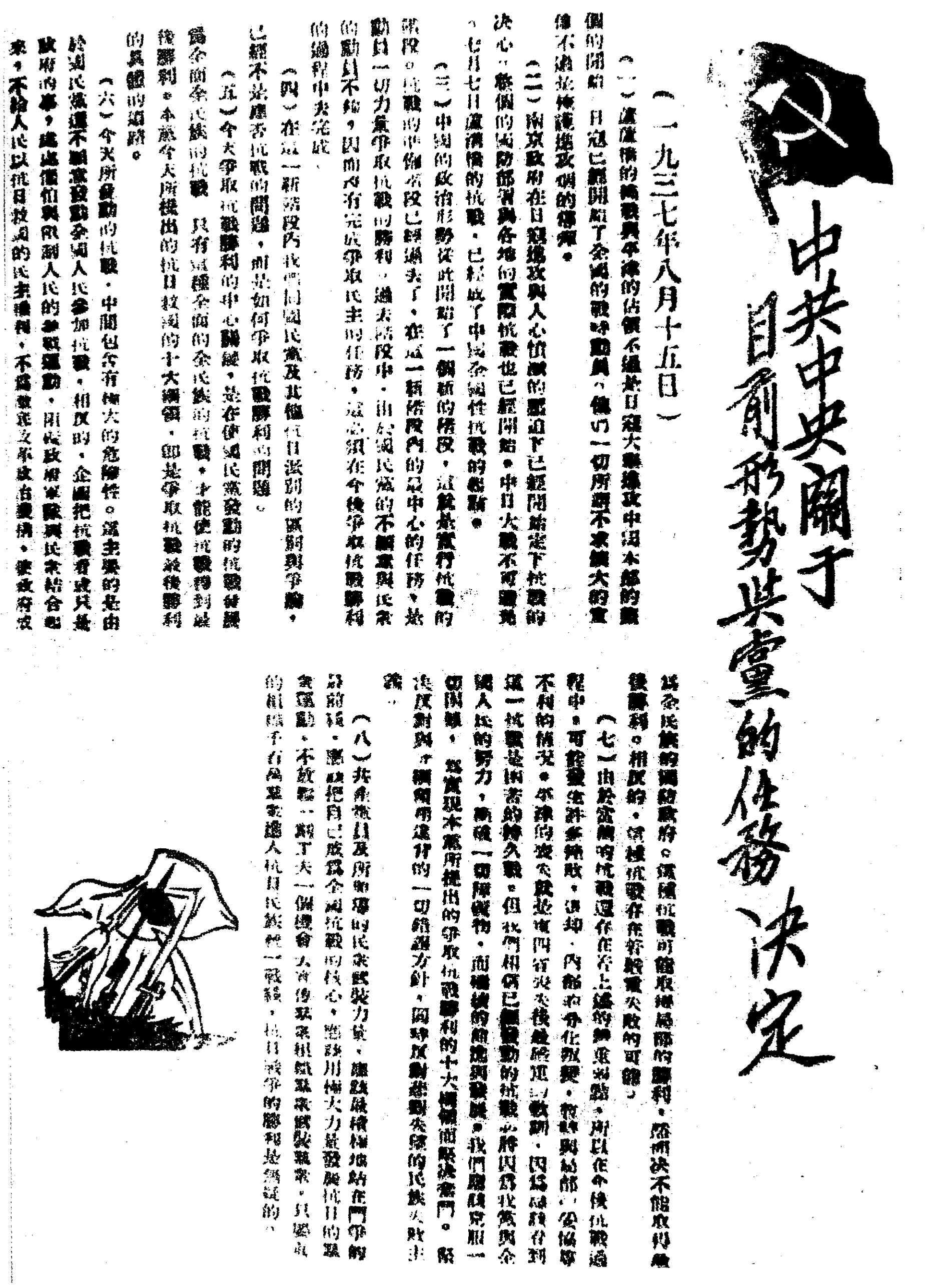
（五）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

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

（六）今天所发动的抗战，中间包含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的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他们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这种抗战可能取得局部的胜利，然而决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相反的，这种抗战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

（七）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与发展。我们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坚决反对与此纲领相违背的一切错误方针，同时反对悲观失望的民族失败主义。

（八）共产党员及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的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



中共中央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決定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

（一）盧溝橋的挑戰與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一切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進攻的煙幕。

（二）南京政府在日寇進攻與人心憤激的壓迫下已經開始定下抗戰的決心，整個的國防部署與各地的實際抗戰也已經開始。中日大戰不可避免。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三）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在這一新階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務，就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過去階段中，由於國民黨的不願意與民眾的動員不夠，因而沒有完成爭取民主的任務，這必須在今後爭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去完成。

（四）在這一新階段內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區別與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

（五）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是在使國民黨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本黨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即是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具體的道路。

（六）今天所發動的抗戰，中間包含有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的是由於國民黨還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相反的，企圖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處處懼怕與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與民眾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肯徹底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成為全民族的國防政府。這種抗戰可能取得局部的勝利，然而決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相反的，這種抗戰存在着嚴重失敗的可能。

（七）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上述的嚴重弱點，所以在今後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卻，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與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況。平津的淪失就是東四省淪失後最近的教訓，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為我黨與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我們應該克服一切困難，為實現本黨所提出的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而堅決奮鬥。堅決反對與這種正確方針相違背的一切錯誤方針，同時反對悲觀失望的民族失敗主義。

（八）共產黨員及其所領導的民眾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的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群眾運動，不放鬆一刻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只要真的組織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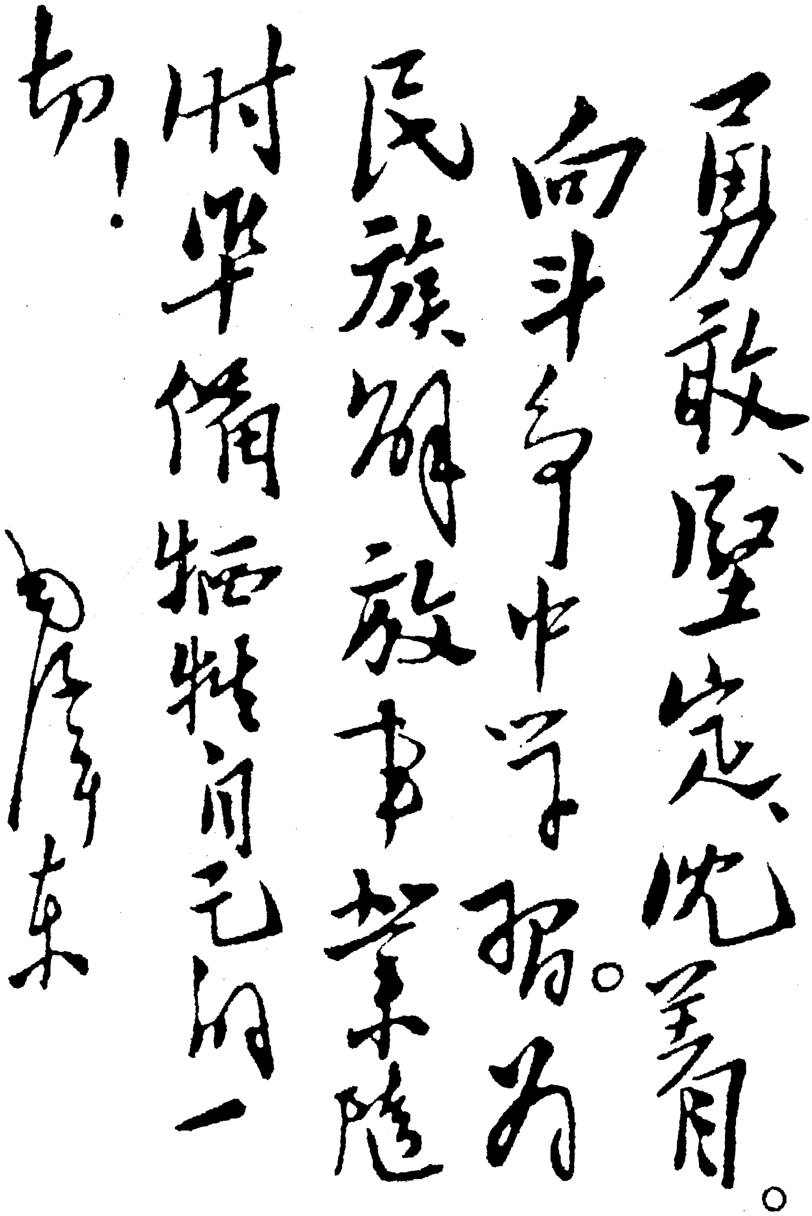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图为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

为抗大学员毕业证题词

（1937年8月）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



勇敢、堅定、沉着。向斗争中学習。為民族解放事業隨时準備犧牲自己的一切！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毕业证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

（1937年8月27日）

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在联合抗日的情况下，要把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贯通起来。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国民党有计划地从各方面影响和吸引共产党及红军，我们要提高政治警觉性，要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跟随我党走。国民党内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这对我们吸引国民党是有利的，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统一战线成功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要注意在党内加强教育。

---

[1] 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洛川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是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

（1937年8月31日）

周恩来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好八路军入山西后各事，即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致潘汉年电[1]

（1937年8月31日）

国民党对红军实行种种限制，每月只给军饷五十万元并非百万元，并无枪炮等之补充，仅有衣物及少数弹药之补充，宣言拖延不发，陕甘宁边区要以丁惟汾为主任，要向红军派政治部副主任及参谋长。我们坚持原则，与之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致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矛盾论[1]

（1937年8月）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2]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3]。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

[1]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

[2]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3页）。

[3]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基本的特点或特征）。”并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关于“辩证法的要素”部分：“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192页）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1]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家认为，世界上各种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从它们一开始存在的时候就是如此。后来的变化，不过是数量上的扩大或缩小。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学家看来，资本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隶社会里，甚至在原始社会里，都可以找得出来，而且会要永远不变地存在下去。说到社会发展的原因，他们就用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去说明。他们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因此，他们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这种思想，在欧洲，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是机械唯物论，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则有庸俗进化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1]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

---

[1] 参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曾经对汉武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道”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通用语，它的意义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则”或“规律”解说。

资产阶级所拥护。

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这样，唯物辩证法就有力地反对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的外因论或被动论。这是清楚的，单纯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机械的运动，即范围的大小，数量的增减，不能说明事物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其互相变化。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帝国主义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苏联，封建的闭关锁国的日本变为帝国主义的日本，这些国家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长期地被封建制度统治的中国，近百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正在变化到一个自由解放的新中国的方向去，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整个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气候也是变化着的，但以它们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相比较，则显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万年为单位而显现其变化的，后者则在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或几个月

（在革命时期）内就显现其变化了。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唯物辩证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并不排除。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影响是时常存在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动，是极其巨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败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挥失宜，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由此看来，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

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

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后来，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又发展了这个伟大的理论。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这个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此，具体地了解事物矛盾这一个法则，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为了叙述的便利起见，我在这里先说矛盾的普遍性，再说矛盾的特殊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已经把唯物辩证法应用在人类历史的分析和自然历史的分析的许多方面，应用在社会的变革和自然的变革（例如在苏联）的许多方面，获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经被很多人所承认，因此，关于这个问题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

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

恩格斯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1]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所下的定义，说它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精神和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和过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趋向"[2]。这些意见是对的吗？是对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恩格斯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简单的机械的移动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生物在每一个瞬间是它自身，但却又是别的什么。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

---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页）。

[2]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同样，我们看到了，在思维的范围以内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并且我们看到了，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与此种认识能力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认识上也被局限的个别人们身上的实际的实现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人类世代的无穷的——至少对于我们，实际上是无穷的——连续系列之中，是在无穷的前进运动之中解决的。”

“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1]

列宁也这样说明过矛盾的普遍性：“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2]

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都是矛盾着的现象。失去一方，

---

[1] 以上所引恩格斯的三段话，均见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其中第二段“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反杜林论》中的原文是：“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0～161页）

[2]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06页）。

他方就不存在。双方斗争而又联结，组成了战争的总体，推动了战争的发展，解决了战争的问题。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

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来，不论是简单的运动形式，或复杂的运动形式，不论是客观现象，或思想现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这一点已经弄清楚了。但是每一过程的开始阶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呢？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劳资之间，从两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工农之间，即使在苏联的社会条件下，也有差异，它们的差异就是矛盾，

仅仅不会激化成为对抗，不取阶级斗争的形态，不同于劳资间的矛盾；它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巩固的联盟，并在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解决这个矛盾。这是矛盾的差别性的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的问题。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新过程的发生是什么呢？这是旧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让位于新的统一和组成此统一的对立成分，于是新过程就代替旧过程而发生。旧过程完结了，新过程发生了。新过程又包含着新矛盾，开始它自己的矛盾发展史。

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作了这样的分析。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列宁自己也正确地应用了它，贯彻于他的全部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

列宁说了上面的话之后，接着说道：“这应该是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1]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来说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这个问题，应从几种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据。自然界存在着许多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发声、发光、发热、电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这些物质的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质上互相区别的。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这种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会现象和思想现象中也是同样地存在着。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

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和阳电，化学中的化分和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我们的

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不但要研究每一个大系统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规定的本质，而且要研究每一个物质运动形式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质。一切运动形式的每一个实在的非臆造的发展过程内，都是不同质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必须着重这一点，而且必须从这一点开始。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过程变化，旧过程和旧矛盾消灭，新过程和新矛盾发生，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

情弄得很坏。

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则暴露过程的本质成为不可能，这也是我们作研究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的。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中国社会各被压迫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复杂的。这些矛盾，不但各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两方面，又各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1]。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

[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这一点，我在《实践论》一文中已经说过了。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1]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2]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3]，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

---

[1] 参见《孙子·谋攻》。

[2] 魏徵（580—643），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本文引语参见《资治通鉴》卷192。

[3]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宋江是这部小说中农民武装的主要领袖。祝家庄在农民武装根据地梁山泊的附近，这个庄的统治者祝朝奉，是一个大恶霸地主。

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作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1]我们应该记得他的话。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也必须注意。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

---

[1] 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新的译文是："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页）

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根本矛盾着的阶级的性质和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两阶级的矛盾激化了，独占资本和自由资本之间的矛盾发生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即由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状态而引起的矛盾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形成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列宁和斯大林正确地说明了这些矛盾，并正确地作出了解决这些矛盾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拿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情形来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阶段。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和在无产阶级领导时期的革命，区别为两个很大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就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根本地改变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过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在这长时间中，经过

了辛亥革命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第一次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统一战线破裂和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新的军阀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抗日战争等等大事变，二十多年间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战争和日本侵入东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暂时地解决了（例如北洋军阀的被消灭，我们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发生了（例如新军阀之间的斗争，南方各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例如国共两党。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

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形成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例如，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予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共产党则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

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这种具体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首先给了我们以很好的模范。

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这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于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在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乃是一般阶级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东西，对于一般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说来，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当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来之后，同时也就更进一步

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阶级社会中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普遍性阐发出来了。

由于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由于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内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发现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许多事物的互相联结。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对于应用辩证法到客观现象的研究的时候，总是指导人们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因为没有这种研究态度，所以弄得一无

是处。我们必须以教条主义的失败为鉴戒，学会这种研究态度，舍此没有第二种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

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残存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小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农民小资产者的矛盾，自由资产阶级和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间

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为这个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规定、所影响。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然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则矛盾的地位起了变化。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还有半殖民地国家各个反动的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例如在中国的军阀战争，也属于这一类。

当着国内革命战争发展到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往往采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图维持其统治；或者分化革命阵线的内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国内反动派。这时，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

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而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发展状态。十月革命后各资本主义国家援助俄国反动派，是武装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蒋介石的叛变，是分化革命阵线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样，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只有一种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作用，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由此可知，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告诉我们的方法。列宁和斯大林研究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时候，列宁和斯大林研究苏联经济的时候，也告诉了这种方法。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种矛盾之中，不论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

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来决定的。

我们常常说“新陈代谢”这句话。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由此可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时代，封建势力则由原来处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转化为附庸的力量，随着也就逐步地归于消灭了，例如英法诸国就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由新的起进步作用的阶级，转化为旧的起反动作用的阶级，以至于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而转化为私有的生产资料被剥夺和失去权力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就要逐步归于消灭了。人数比资产阶级多得多、并和资产阶级同时生长、但被资产阶级统治着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地壮大起来，

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以至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这时，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苏联已经走过和一切其他国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国的情形来说，帝国主义处在形成半殖民地这种矛盾的主要地位，压迫中国人民，中国则由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会变化，在双方斗争的局势中，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所生长起来的力量必然会把中国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国，而帝国主义则将被打倒，旧中国必然要变为新中国。

旧中国变为新中国，还包含着国内旧的封建势力和新的人民势力之间的情况的变化。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将被打倒，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这个阶级也就会要逐步归于消灭。人民则将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这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会起变化，由旧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变为新的民主的社会。

这种互相转化的事情，过去已有经验。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的南方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则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受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打击，变得很小了；但因肃清了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就又逐步地壮大起来。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农民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地主则作了相反的转化。世界上总是这样以新的代替旧的，总是这样新陈代谢、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

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现在的中日战争，中国又处在困难地位，但是我们能够改变这种情况，使中日双方的情况发生根本的变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败了。

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才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

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如果不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这两种情形，也就是说不研究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那就将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体地懂得矛盾的情况，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的方法。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同时，这种具体的矛盾状况，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

---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五　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之后，我们必须进而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

同一性、统一性、一致性、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这些不同的名词都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

列宁说：“辩证法是这样的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1]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里和人们的思想里，都包含着这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新的译文是：“*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作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作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样带矛盾性的方面，无一例外。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则有一对以上的矛盾。各对矛盾之间，又互相成为矛盾。这样地组成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们的思想，并推使它们发生运动。

如此说来，只是极不同一，极不统一，怎样又说是同一或统一呢？

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就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没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没有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这种性质，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列宁所谓辩证法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说的这种情形。怎样能够呢？因为互为存在的条件。这是同一性的第一种意义。

然而单说了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条件，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样就够了吗？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

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种意义。

为什么这里也有同一性呢？你们看，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苏联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试问其间没有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联系和同一性，如何能够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曾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定阶段上起过某种积极作用的国民党，因为它的固有的阶级性和帝国主义的引诱（这些就是条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转化为反革命，又由于中日矛盾的尖锐化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就是条件），而被迫着赞成抗日。矛盾着的东西这一个变到那一个，其间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们实行过的土地革命，已经是并且还将是这样的过程，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无、得失之间，因一定条件而互相联结，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之下，农民的私有制又将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苏联已经这样做了，全世界将来也会这样做。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

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或人民的专政，正是准备着取消这种专政，走到消灭任何国家制度的更高阶段去的条件。建立和发展共产党，正是准备着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政党制度的条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进行革命战争，正是准备着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这许多相反的东西，同时却是相成的东西。

大家知道，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列宁所谓“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作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呢？因为客观事物本来是如此的。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

日”[1]，《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2]，《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3]和《聊斋志异》[4]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5]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

---

[1] 《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 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2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2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3]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4]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5]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为什么鸡蛋能够转化为鸡子，而石头不能够转化为鸡子呢？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有同一性，而战争与石头却没有同一性呢？为什么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东西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就没有任何的同一性。

为什么俄国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直接地联系着，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直接地联系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终于失败了呢？为什么蒙古和中亚细亚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会主义联系了呢？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一定的必要的条件具备了，事物发展的过程就发生一定的矛盾，而且这种或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问题如此。那末，什么是斗争性呢？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列宁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

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

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们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而统一物的分解，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状态的破坏，变到相反的状态，便都是事物在质变状态中、在一种过程过渡到他种过程的变化中所显现的面貌。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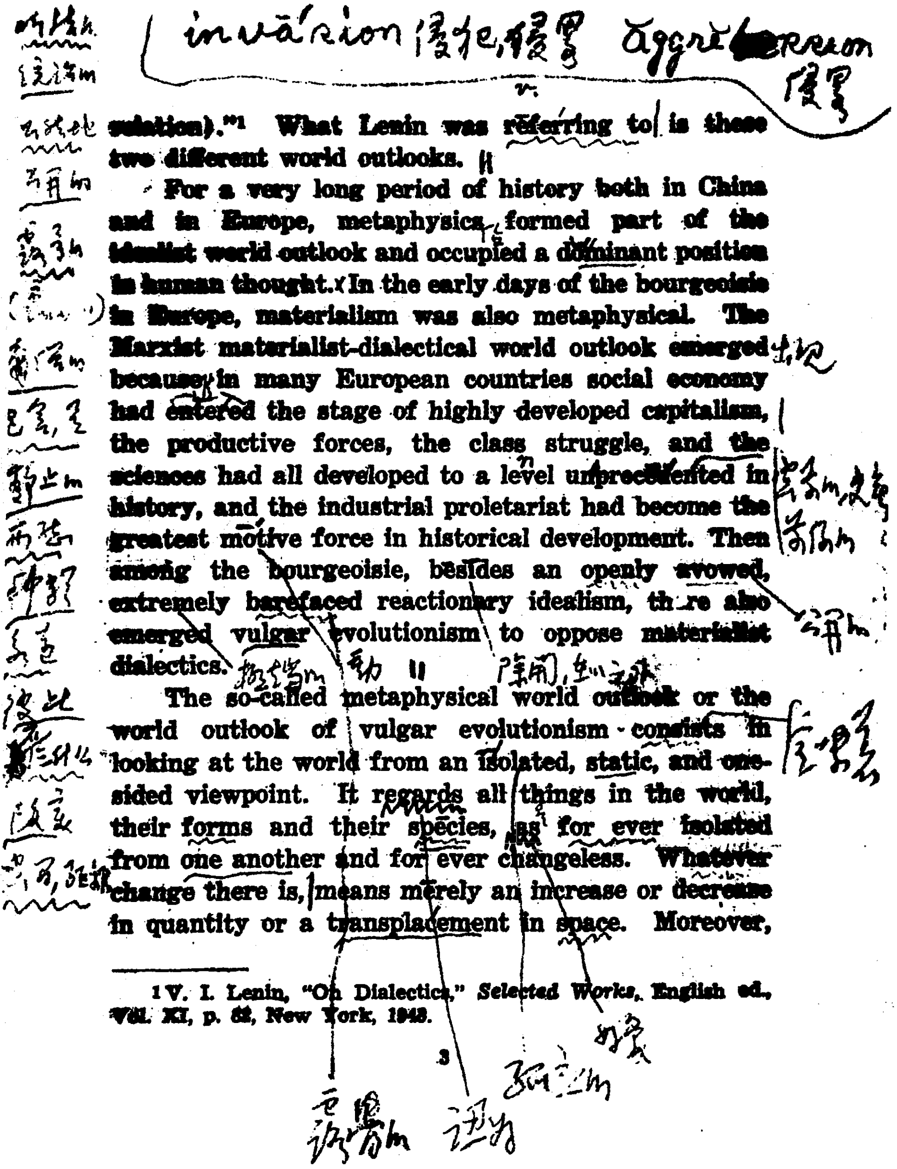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新的译文是：“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6页）

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说，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这种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矛盾也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列宁、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有过这样的情形。我们党内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的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但随后就发展为对抗的了。目前我们党内的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没有表现为对抗的形式，如果犯错误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就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因此，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过火的斗争，显然是不适当的。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存在着发展为对抗性的东西的可能性。

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invasion 侵犯，侵略 aggression 侵略

relation).”[1] What Lenin was referring to is these two different world outlooks.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history both in China and in Europe, metaphysics formed part of the idealist world outlook and occupied a dominant position in human though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bourgeoisie in Europe, materialism was also metaphysical. The Marxist materialist-dialectical world outlook emerged because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social economy had entered the stage of highly developed capitalism,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sciences had all developed to a level unprecedented in history, and the industrial proletariat had become the greatest motive force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n among the bourgeoisie, besides an openly avowed, extremely barefaced reactionary idealism, there also emerged vulgar evolutionism to oppose materialist dialectics.

出现

公开的

The so-called metaphysical world outlook or the world outlook of vulgar evolutionism consists in looking at the world from an isolated, static, and one-sided viewpoint. It regards all things in the world, their forms and their species, as for ever isolated from one another and for ever changeless. Whatever change there is, means merely an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quantity or a transplacement in space. Moreover,

---

[1] V. I. Lenin, “On Dialectics,” *Selected Works*, English ed., Vol. XI, p. 82, New York, 1943.

3

毛泽东写在《矛盾论》（英文版）上的注解。

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1]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七　结论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它是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相反的。它对于人类的认识史是一个大革命。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条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到相反的方面去，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然而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区别；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否则就要犯错误。如果我们经过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这些要点，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

---

[1] 参见列宁《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列宁全集》第6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页）。

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这些，就是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一些简单的结论。

1937年，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在延安。

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1937年7月、8月）

第一章　唯心论与唯物论

本章讨论下列各问题：

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一　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史，都是唯心论和唯物论这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的历史。一切的哲学思潮和派别都是这两个基本派别的变相。

各种哲学学说，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这些人们的意识，又历史地被一定的社会生活所决定。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哲学的命运，看哲学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

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社会根源，存在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构中，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此后生产力发展，促使科学知识也随之发展，唯心论应该衰退，唯物论理应起而代之。然而从古至今，唯心论不但不曾衰退，反而发展起来，同唯物论竞长争高，互不相下，原因就在于社会有阶级的划分。一方面压迫阶级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心论学说；一方面被压迫阶级同样为着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发展与巩固其唯物论学说。唯心论和唯物论学说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战是不会消灭的。唯心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则是革命阶级的宇宙观，它在阶级社会内，从反动哲学的唯心论之不断的战争中生长与发展起来。由此，哲学中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始终反映着反动阶级与革命阶级在利害上的斗争。哲学中的某一倾向，不管哲学者自身意识到与否，结局总是被他们所属阶级的政治方向所左右的。哲学上的任何倾向，总是直接、间接地助长着他们所属阶级的根本的政治利害。在这意义下，哲学中的一定倾向的贯彻，便是他们所属阶级的政策之特殊形态。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的特征，在于要明确地理解一切社会意识（哲学也在内）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那无产阶级的性质的向有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把自己的特殊任务，从属于推翻资本主义组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般任务之下。在中国目前阶段上，哲学的任务，是从属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并准备转变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去的一般任务之下。哲学的理论与政治实践是应该密切联系着的。

二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

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呢？在于对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意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之相反的回答。唯心论认为精神（意识、观念、主体）是世界一切的根源，物质（自然界及社会、客体）不过为其附属物。唯物论认为物质离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不过为其附属物。从这个根本问题的相反的回答出发，就生出一切问题上的分歧意见来。

在唯心论看来，世界或者是我们各种知觉的综合，或者是我们的或世界的理性所创造的精神过程。对外面的物质世界，或者完全把它看成虚构的幻想，或者把它看成精神元素之物质的外壳。人类的认识，是主体的自动，是精神自己的产物。

唯物论相反，认为宇宙的统一就在他的物质性。精神（意识）是物质的本性之一，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发生的。自然、物质、客观世界，存在于精神之外，离精神而独立。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

三　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唯心论认为物质为精神的产物，颠倒着实在世界的姿态。这种哲学的发生与发展的根源何在?

前面说过，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类迷妄无知的产物。但在生产发展之后，促使唯心论形成哲学思潮之首先的条件，乃是肉体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社会发生分工，分工再发展，分出了专门从事精神劳动的人们。但在生产

力贫弱时期，两者的分裂还没有达到完全分离的程度。到了阶级出现，私产发生，剥削成为支配阶级存在的基础之时，就起了大变化了。精神劳动成为支配阶级的特权，肉体劳动成为被压迫阶级的命运。支配阶级开始颠倒地去考察自己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劳动者给他们以生活资料，反而是他们以生活资料给劳动者，因此他们鄙视肉体劳动，发生了唯心论的见解。消灭肉体与精神劳动的区别，是消灭唯心论哲学的条件之一。

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部分版本）。

使唯心论哲学能够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还在于这种哲学意识的表现剥削阶级的利害。唯心论哲学在一切文化领域的优越，应该拿这个去说明。假如没有剥削阶级的存在，唯心论就会失掉它的社会根据。唯心论哲学之最后消灭，必须在阶级消灭与共产主义社会成立之后。

使唯心论能够发达、深化，并有能力同唯物论斗争，还须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寻找其根源。人类在使用概念来思考的时候，存在着溜到唯心论去的可能性。人类思考时，不能不使用概念，这就使我们的认识分裂为二方面，一方面是个别的与特殊性质的事物，一

方面是一般性质的概念（例如“延安是城”这个判断）。特殊和一般本来是互相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把一般同特殊脱离开来，即把一般当作客观的实体看待，把特殊只当作一般之存在的形式，这就是一切唯心论者所采取的方法。一切唯心论者，即是拿意识、精神或观念来代替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的。从这里出发，唯物论便强调着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中的能动性，他们不能指出意识受物质限制的这种唯物论的真理，却主张只有意识是能动的，物质不过是不动的集合体。加上被阶级的本性所驱策，唯心论者便用一切方法把意识的能动性夸张起来，片面地发展了它，使这一方面在心智之中无限制地胀大成为支配的东西，掩蔽着别一方面，并使之服从，而把这一人工的胀大的东西确定为一般的宇宙观，以至化为物神或偶像。经济学上的唯心论，过分夸大交换中非本质的一方面，把供求法则提高到资本主义的根本法则。许多人看到科学在社会生活上发生了能动的作用，不知道这种作用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所规定与限制，而作出科学是社会发展动力的结论。唯心论历史家把英雄看成历史的创造者，唯心论政治家把政治看成万能的东西，唯心论军事家实行拼命主义的作战，唯心论革命家主张白朗基主义，蒋介石说要复兴民族惟有恢复旧道德，都是过分夸张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我们的思维不能一次反映出当作全体看的对象，而是构成一个具有接近于现实的一切种类的无数色调的、生动的、认识之辩证法的过程。唯心论依据于思维的这种特性，夸大其个别方面，不能给过程以正确反映，反把过程弄弯曲了。列宁说：“人类的认识不是直线的，而是曲线的。这一曲线之任何一段，都可以变为一段单独的完

整的直线，这段直线就有引你陷入迷阵的可能。直线性和片面性是见树不见林和呆板固执性，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这些就是唯心论的认识论的根源。”哲学的唯心论是将认识的一个片段或一个方面，片面地夸张成为一种脱离物质、脱离自然的神化的绝对体。唯心论就是宗教的教义，这是很对的。

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机械唯物论）没有强调思维在认识上的能动性，仅给以被动作用，把它当作反映自然的镜子看。机械唯物论对唯心论采取横暴的态度，不注意其认识论的根源，因此不能克服唯心论。只有辩证唯物论，正确地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论。

四　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

承认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于外界的物质是唯物论的基础，这一基础是人类从实践中得到的。劳动生产的实践，阶级斗争的实践，科学实验的实践，使人类逐渐从迷信与妄想（唯心论）中脱离，逐渐认识世界之本质，而达到唯物论。

屈服于自然力之前而只能使用简单工具的原始人类，不能说明周围的事变，因而求助于神灵，这就是宗教同唯心论的起源。

然而人类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同周围的自然界接触，作用于自然界，变化着自然界，造衣食住用的东西，使之适合于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深信物质的客观地存在着。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人同人之间互相发生关系与影响，在阶级

社会中并且实行着阶级斗争。被压迫阶级考虑形势，估计力量，建立计划，在他们的斗争成功时，使他们确信自己的见解并不是幻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上存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被压迫阶级因为采取错误的计划而失败，又因为改正其计划而成功，使他们懂得只有主观的计划依靠于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的正确的认识，才能达到目的。

科学的历史给人类证明世界的物质性及规律性，使人类觉悟到宗教与唯心论的幻想之无用，直到达于唯物论的结论。

总之，人类的实践史——向自然斗争史、阶级斗争史、科学史，在长久年月中，为了生活与斗争的必要，考虑物质的现实及其法则，证明了唯物论哲学的正确性，找到了自己斗争的思想工具——唯物论哲学。社会的生产发展越发进到高度，阶级斗争越发发展，科学认识越发暴露了自然的“秘密”。唯物论哲学就越发发展与巩固，人类便能逐渐从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

资产阶级在为了向封建阶级斗争的必要及无产阶级还没有威胁他们的时候，也曾经找到了并使用了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工具，也曾经确信周围的事物是物质的产物而不是精神的产物。直至他们自己变成了统治者，无产阶级的斗争又威胁着他们时，才放弃这个“无用”的工具，重新拿起另一个工具——哲学的唯心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戴季陶、吴稚晖，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及其以后思想的变化——从唯物论到唯心论的变化，就是眼前的活证据。

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他们本质上是唯物论的。但由于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就使得无产阶级的唯物论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是更彻底、更深刻的，只有辩证法的性质没有机械论的性质。无产阶级吸收了人类全历史中一切实践的成

果，同时又由于自己的实践，经过他们的代言人与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之手，造成了辩证法唯物论。不但主张物质脱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而且主张物质是变化的，成为整个完整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

这个题目中准备讨论下列问题：

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
二、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
四、哲学对象问题；
五、物质论；
六、运动论；
七、时空论；
八、意识论；
九、反映论；
十、真理论；
十一、实践论。

下面简述这些问题的观点：

一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

这个问题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这里再简单地说一点。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历史给无产阶级以消灭

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就用辩证法唯物论作为他们斗争的精神上的武器，作为他们各种见解之哲学基础。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认识世界的时候，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地和完整地把握住；只有从这种立场出发，现实世界才能真正客观地被认识。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先进与最革命的阶级；又一方面，只有辩证法唯物论才是高度的和严密的科学性同彻底的和不妥协的革命性密切地结合着的、一种最正确的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中国无产阶级担负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必须采取辩证法唯物论作为自己精神的武器。如果辩证法唯物论被中国无产阶级、共产党及一切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们之广大革命分子所采取的话，那末，他们就得到了一种最正确和最革命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他们就能够正确地了解革命运动的发展变化，提出革命的任务，团结自己的同盟者的队伍，战胜反动的理论，采取正确的行动，避免工作的错误，达到解放中国与改造中国的目的。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科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

二　旧的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的关系

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之简单的继承者。它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

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不但继承了唯物论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说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说的唯心论，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又不但是一切过去唯物论发展的继续和完成，同时还是一切过去唯物论的狭隘性之反对者，即机械的直觉的唯物论（主要的是法国唯物论与费尔巴哈唯物论）之反对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的、有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

中国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自觉地走上政治舞台及科学水平之提高，发生了与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动。然而在它的第一时期，中国的唯物论思潮中，唯物辩证法的了解还很微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机械唯物论，和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风气占着主要的成分。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了解进了一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最近，由于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的严重性，也由于苏联哲学清算运动的影响，便在中国思想界发展了一个广大的唯物辩证法运动。这个运动目前虽还在青年的阶段上，然从其广大的姿态来看，它将随着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同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发展，以横扫的阵势树立自己的权威，指导中国革命运动勇往迈进，定下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进入胜利之途的基础。

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然而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

发展下去，并确定地指导中国革命向着彻底胜利之途，便必须同各种现存的反动哲学作斗争，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树立批判的旗帜，并因而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才能达到目的。

三　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

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唯心论的马克思主义修正派认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全部实质只在于它的“方法”，他们把方法同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裂开来，把辩证法从唯物论割裂开来。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辩证法，不是如同黑格尔一样的唯心的辩证法，而是唯物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丝毫也不能离开它的宇宙论的。另一方面，机械唯物论者却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般哲学的宇宙观，割去了它的辩证法，而且认为这种宇宙观就是机械的自然科学之各种结论。他们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不是简单的唯物论，而是辩证法的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这两种割裂的看法都是错误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

四　唯物辩证法的对象问题——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什么的

列宁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理科学来看的）唯物辩证法看作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法则及（在辩证法的各范畴中反映这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法则的学问。他说：论理学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问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及精神的事物之发展法则的

学问，即关于世界的一切具体内容及其认识之发展法则的学问。换言之，论理学是关于世界认识之历史的总计、总合、结论。列宁虽然把作为一般的科学方法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强调起来，然而这是因为辩证法是由世界认识的历史中得出来的结论。因此他说：“辩证法就是认识的历史。”

上述列宁对于当作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对象所给予的定义，他的意思是说：第一，唯物辩证法与其他任何科学同样，有它的研究对象，这个对象便是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之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并且研究的时候，唯物辩证法的任务，不是从头脑里想出存在于各现象间的关系，而是要在各现象本身中观察出他们之间的关系来。列宁的这种见解同少数派唯心论者把（事实上离开了具体科学及具体知识的）范畴的研究当作唯物辩证法的对象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因为少数派唯心论者企图建立一个认识历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现实发展中游离了的各范畴的哲学体系，这样他们就事实上放弃了唯物辩证法。第二，各个科学分析（数学、力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是研究物质世界及其认识之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各个科学的法则是狭隘地、片面地被各个具体研究领域所限制了的。唯物辩证法则不然，它是一切具体科学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一般内容，及人类的其他一切科学认识之总计、结论、加工和普遍化。这样，唯物辩证法的概念、判断和法则，是极其广泛的（包含着一切科学的最一般的法则，因此也包含着物质世界的本质的）各种规律性和规定。这是一方面，在这方面，它是宇宙观。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是从一切空想、僧侣主义和形而上学解放出来的，真正科学认识上理论学和认识论的基础，因此，它同时又是研究具体科学的唯一确实的有客观

真实性的方法论。我们说唯物辩证法或辩证法唯物论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在这里更加明白了。这样对于否认哲学存在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歪曲者和庸俗化者的错误，也可以懂得了。

关于哲学对象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反对使哲学脱离实在的现实，使哲学变为某种独立实质的东西。指出了那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而生长出来的哲学之必然性，反对单单以理论观念和理论观念的自身做研究的对象，如同形式理论就是少数派唯心论的那种干法。所谓根据实在生活和实在关系的分析生长出来的哲学，就是唯物辩证法这种论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解说唯物辩证法为论发展的学说。恩格斯称唯物辩证法为“论自然社会及思维之运动和发展的一般法则”的学说。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看作“最多方向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他们都认为在这种学说以外的其他一切哲学学说所述一切发展原则的公式，概属狭隘的、无内容的“失去了自然和社会之实际发展过程的东西”（列宁）。至于唯物辩证法之所以被称为最多方面的、内容最丰富的和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原故，乃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是最多方面地和最丰富地、最深刻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变化过程中的矛盾性和飞跃性，而不是因为别的东西。

在哲学对象问题中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的问题。

列宁着重指出辩证法论理学及认识论的同一性，说这是“极其重要的问题”，说“三个名词是多余的，它们只是一个东西”，根本反对那些马克思主义修正派把三者当作完全各别独立的学说去处理的那种做法。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认识论，也是唯一科学的论理学。唯

物辩证法研究人对外界认识的发生及发展，研究由不知到知，由不完全的知到更完全的知的转移，研究自然及社会的发展法则在人类头脑中日益深刻和日益增多的反映，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世界最一般的发展法则，研究客观世界最发展的姿态在思维中的反映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研究现实事物的各过程及各现象的发生发展消灭及相互转化的法则，同时又研究反映客观世界发展法则的人类思维的形态，这就是唯物辩证法与论理学的一致。

要彻底了解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三者为什么是一个东西，我们看下面唯物辩证法怎样解决关于理论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相互关系这个问题，就可以明白了。

恩格斯说："对于一切哲学家的思维方法来说，黑格尔思维方法的长处就在于横亘在根底面的极其丰富的历史感，他的形式虽说是抽象的唯心论的，然而他的思想的发展却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的，并且历史原来就是思想的验证。历史常常在飞跃地、错杂地进行着。因为有这两种情形，所以假若常常要依从历史的话，不但要注意许多不重要的材料，而且会不得不使思想行程中断。这时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论理的方法。然而这一论理的方法原本是历史的方法，不是舍去了那历史的形态与偶然性罢了。"这种"论理发展与历史发展一致"的思想，是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充分注意了的。"论理学的范畴，是外在的与活动之无数个别性的简约"。"范畴就是分离的阶段，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个网和网的结节点的。""人的实践活动，把人类的意识几十亿次反复不息地应用到各种这样的论理学式子里面，这样，这些式子就得到了所谓公理的意义了。""人类的实践，反复了几十亿次，才当作论理的式子固定在人类意识中。这些式子，都有着成见的永续性，因为是反复几十亿次的结

果，才有着公理的性质。”上述列宁的那些话，指明唯物辩证法的论理学的特点，不像形式论理学那样，把它的法则和范畴看成空虚的、脱离内容而独立的，对于内容无关心的形式，也不像黑格尔那样，把它看成脱离物质世界而独立发展的观念要素，而是把它当作反映到和移植到我们头脑里并且经由头脑加工制造过的，物质运动的表现去处理。黑格尔立脚在存在和思维的同一性上，把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当作唯心论的同一性去处理。反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里，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同一性，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只有照唯物论解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只有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才能使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的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

用辩证法唯物论去解决论理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最好的模范，首先要算马克思的《资本论》。《资本论》中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包含了这一社会的理论发展。《资本论》所分析的，是那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反映出来的各经济范畴的发展的辩证法。这问题之解决的唯物论性质，在于它以物质的客观历史做基础，在于把概念和范畴当作这一现实历史的反映。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一致，资本主义的社会的论理学和认识论的一致，模范地表现在《资本论》里面，我们可以从它懂得一点辩证法论理学和认识论一致的门径。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对象问题。

五　物质论

马克思主义继续和发展哲学中的唯物论路线，正确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即彻底唯物地指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客

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或意识对于存在的依赖关系）。

承认物质反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以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为前提的。隶属于唯物论营垒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承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人类出现以前它就存在，人类出现以后也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承认这一点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拿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证据是多得很的。人类时刻同外界接触，还须用残酷的手段去对付外界（自然界同社会）的压迫和反抗；还不但应该而且能够克服这些压迫和反抗——所有这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人类社会实践的实在情形，就是最好的证据。经过了万里长征的红军，不怀疑经过地区连同长江大河、雪山草地以及和他作战的敌军等等的客观存在，也不怀疑红军自己的客观存在；中国人不怀疑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人自己的客观存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也不怀疑这个大学和学生自己的客观存在；这些东西都是客观地离开我们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的东西，这是一切唯物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哲学的物质观。

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是不相同的。如果说哲学的物质观在于指出物质的客观存在，所谓物质就是说的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作用于人的感官，引起人的感觉，并在感觉中得到反映），那末这种说法是永远不起变化的，是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研究物质的构造，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等等，这些说法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变化的，是相对的。

根据辩证法唯物论的见地去区别哲学的物质观与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彻底贯彻哲学的唯物论方向之必须条件，在向唯物论和机

械唯物论作斗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唯心论者根据电子论的发现，宣传物质消灭的谬说，他们不知道关于物质构造之科学知识的进步，正是证明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论之正确性。因为表现在旧的物质概念中的某些物质属性（重量、硬度、不可入性、惰性等等），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发现即电子论的发现，证明这些属性仅存在于某几种物质形态中，而在其他物质形态中则不存在。这种事实，破除了旧唯物论对于物质观念的片面性与狭隘性，而对于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客观存在之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却恰恰证明其正确。原来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正是以多样性去看物质的世界的统一，就是物质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物质观，对于物质由一形态转化到另一形态之永久普遍的运动变化这一种事实，丝毫也没有矛盾。“以太”、电子、原子、分子、结晶体、细胞社会现象、思维现象——这些都是物质发展的种种阶段，是物质发展史中的种种暂时形态。科学研究的深入，各种物质形态的发现（物质多样性的发现），只是丰富了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的内容，哪里还会有什么矛盾？区别哲学的物质观同自然科学的物质观是必要的，因为二者有广狭之别，然而是不相矛盾的，因为广义的物质包括了狭义的物质。

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不承认世界有所谓非物质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统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即唯物辩证法见地）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

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的见地内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同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切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切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六　运动论（发展论）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物质论，即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这种世界的统一原理，在前面物质论中已经解决了。

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运动论（发展论），即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统一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观，对于（一）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二）离开运动而思考物质，（三）物质运动的简单化，都是不能容许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就是同这些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及机械的观点作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建立起来的。

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论，首先是同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相对立的。一切哲学的唯心论及宗教的神道主义的本质，在于他们从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出发，设想世界的运动及发展是没有物质的，或在最初是没有物质的，而是精神作用或上帝神力的结果。德国唯心论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从所谓“世界理念”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周易哲学及宋明理学都做出唯心论的宇宙发展观。基督教说上帝创造世界，佛教及中国一切拜物教都把宇宙万物的运动发展归之于神力。所有这些离开物质而思考运动的说法都和辩证法唯物论根本不相容。不但唯心论与宗教，就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及现在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唯物论，当他们说到自然现象时是唯物论的运动论者，但一说到社会现象时就无不离开物质的原因，而归于精神的原因了。

辩证法唯物论坚决驳斥所有这些错误的运动观，指出他们的历史限制性——阶级地位的限制与科学发展程度的限制，而把自己的运动观建设在以无产阶级立场及最发达的科学水准为基础的彻底的唯物论上面，辩证法唯物论首先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不是由外力推动的），设想没有物质的运动，同设想没有运动的物质是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把唯物的运动观同唯心的及唯神的运动观尖锐地对立着。

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则有形而上学的宇宙不动论或绝对平衡论。他们认为物质是永远不变的，在物质中没有发展这回事，认为绝对的静止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辩证法唯物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最普遍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属性。一切的静止与均衡仅有相对的意义，而运动则是绝对的。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一切物质形态均有相对的静止或均衡之可

能，并认为这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条件（恩格斯），但认为静止或均衡只是运动的要素之一，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离开运动而考察物质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静止要素或均衡要素夸张起来，把它掩蔽了并代替了全体，把运动的特殊情况一般化，绝对化起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家爱说的一句话："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样的宇宙不动论。他们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现象的变动，但否认其本质的变动，在他们看来，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永远不变动的。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的阶级限制性，封建地主阶级如果也承认宇宙及社会的本质是运动与发展的，就无异在理论上宣布他们自己阶级的死刑。一切反动势力，他们的哲学都是不动论。革命的阶级同民众，却眼看到了世界的发展原理，因而主张改造这个社会及世界，他们的哲学是辩证法唯物论。

此外，辩证法唯物论也不承认简单化的运动观，就是说把一切的运动都归结到一种形式上去，即归结到机械的运动，这是旧唯物论宇宙观的特点。旧唯物论（十七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十九世纪的德国费尔巴哈唯物论）也承认物质的永久存在和永久运动（承认运动的无限性），但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不去说他们在社会论上的见解依然是唯心论的发展观，就在自然论上，也把物质世界的统一，归结到某种片面的属性，归结到运动的一个形态——机械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原因在外力，像机械一样由外力推之而运动。他们不从本质上也不从内部原因上去说明物质或运动，或关系的一切多样性，而从单纯的外面的发现形式上，从外力原因上去说明它，这样在实际上就失掉了世界的多样性。他们把世界一切的运动，都解作场所的移动与数量的增减。物体某一瞬间在某一场所另一瞬间则在另一场所，这样就叫作运动。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

增减的转化，没有性质的变化，变化是循环的，是反复产生同一结果的。辩证法唯物论与此相反，不把运动看作单纯的场所移动及循环运动，而把它看作无限的质的多样性，看作由一形态向他一形态的转化，世界物质的统一和物质的运动，便是世界物质无限多样性的统一与运动。恩格斯说：“运动的一切高级形态必然同力学的（外的或分子的）运动形态结合着，例如如果没有热和电气的变化，化学的作用就不可能，如果没有力学的（分子的）、热量的、电气的、化学的变化等等，有机的生命也不可能，这当然是不能否认的。然而如果只有某些低级运动形态的存在，是绝不能包括各种状况中主要形态的体质的。”这话是千真万确地合于事实。即使就单纯机械运动而论，也不能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去解释它。须知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辩证法的，虽然它们之间的辩证法内容的深度与多面性有着很大差异。机械运动仍然是辩证法的运动，所谓物体某一瞬间“在”某处，其实是同时“在”某处，同时又不在某处，所谓“在”某处，所谓“不动”，仅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它根本上依然是在运动。物体在被限制着的时间内和被限制着的空间内运动着。物体总是不绝地克服这种限制性，跑出这种一定的有限制的时间及空间的界限以外去，成为不绝的运动之流，而且机械运动只是物质的运动形态之一，在实在的现实世界中，没有它的绝对独立的存在，它总是联系于别种运动形态的。热、化学的反映、光、电气，一直到有机现象与社会现象，都是质地上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界时期的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大功劳，就在于发现了运动转化法则，指出物质的运动总是由一形态转化成为另一形态，这样转化的新形态是与旧形态本质上不同的。物质所以转化的原因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由于外部机械力的推动，而是由于内部存在着性

质不同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因素相争相斗，推动着物质的运动和发展。由于这个运动转化法则的发现，辩证法唯物论就能够把世界的物质统一原理扩大到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上去，不但把世界当作永远运动的物质去考察，而且把世界当作由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的无限前进运动的物质去考察，即把世界当作发展、当作过程去考察。做一句话来说：“统一的物质世界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样就把旧唯物论的循环论击破了。辩证法唯物论深刻地、多方面地观察了自然及社会的运动形态，认为当作全体看的世界之发展过程是永久的（无始无终的），但同时各个历史地进行的具体的运动形态又是暂时的（有始有终的），就是说，它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并在一定的条件下消灭的，认为世界的发展过程由低级的运动形态生出高级的运动形态，表示了它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但同时任何一个运动形态都不是绝对最初的，也不是绝对最后的，它是处在永久的长流中（无始无终的长流中）。依据着对立斗争的法则（自己运动的原因），使每一运动形态总是较之先行形态进到了高一级的阶段，它是向前直进的，但同时就各个运动形态来说（就各个具体的发展过程来说），却也会发生转向的运动或后退运动，前进运动同后退运动相结合，在全体上就成为复杂的螺旋的运动，认为新的运动形态是作为旧的运动形态的对立的（反对物）而发生的，但同时新的运动形态又必然保存着旧的运动形态中的许多要素，新东西是从旧东西里面生长出来的。认为事物的新形态、新性质、新属性的出现，是由连续性的中断即经过冲突和破坏而飞跃地产生的，但同时事物的连结和相互关系又决不会绝对破坏。最后，辩证法唯物论认为世界无穷尽（无限），不但就其全体来看是这样，同时就其局部来看也是这样的，电子不是同原子、分子一样表现着一个复杂而无穷尽的世界么？

物质运动的根本形态又规定根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科目。辩证法唯物论把世界的发展当作无机界经过有机界而达到最高物质运动形态（社会）的一个前进运动去考察，这一运动形态的从属关系就成了和它相应的科学（无机界科学、有机界科学、社会科学）的从属关系的基础。恩格斯说："各种各类的科学是把特定的运动形态或相互关系相互推移的一联的运动形态拿来分析，因此科学的分类就在于要依从着运动的固有顺序去把各个运动分类排列起来，仅在这一点来说，分类才有意义。"

"整个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采取质地不相同的各种形式的物质的运动，因此也就不能忘记物质运动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个问题。所谓'物质一般'与'运动一般'是没有的，世界上只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具体的物质与运动。'物质'和'运动'这些字眼只是一些简写的名词，在这些名词中，我们依照它们的共同特性是把各种不同的被感觉的事物一概包括在内。"（恩格斯）

以上就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运动论或世界发展原理。这个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与方法论，无产阶级及一切革命的人们如果拿着这个彻底科学的武器，他们就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改造这个世界。

七　时空论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空间和时间也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运动的物质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并且物质的运动本身是以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为前提的。空间和时间不能与物质相分离。"物质存在于空间"这句话，是物质本身具有伸张性，物质世界

是内部存在着伸张性的世界，不是说物质被放在一种非物质的空虚的空间中。空间和时间都不是独立的非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感觉性的主观形式，它们是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形式。它们是客观的，不存在于物质以外，物质也不存在于它们以外。

把空间和时间看作物质存在的形式的这种见解，是彻底的唯物论的见解。这种时空观，同下列几种唯心论的时空观是根本相反的：（一）康德主义的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不是客观的实在，而是人类的直觉形式；（二）黑格尔主义的时空观，认为发展着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日益接近于绝对观念；（三）马赫主义的时空观，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感觉的种类”“使经验和谐化的工具”。所有这些唯心论观点，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都不承认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自身发展中反映着物质存在的形式，这些错误理论，都被辩证法唯物论一个一个地驳了。

辩证法唯物论在时空问题上，不但要同上述那些唯心论观点作斗争，而且要同机械唯物论作斗争。特别显著的是牛顿的机械论，他把空间看作同时间无关系的不动的空架子，物质被安置到这种空架子里面去。辩证法唯物论反对这种机械论，指出我们的时空观念是在发展的。“世界上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便没有别的东西，而运动的物质若不在空间和时间中便无运动之可能。人类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相对的，但是这些相对的概念积集起来就成为绝对的真理。这些相对的概念不断发展着，循着绝对真理的路线而前进，日益走近于绝对真理。人类关于空间和时间概念的变动性，始终不能推翻二者的客观实在性，这正和关于物质的运动形式及其组织之科学知识的变动性，不能推翻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是一样的。”（列宁）

以上是辩证法唯物论的时空论。

八　意识论

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物质发展之一形式，是一定物质形态的特性。这种唯物主义同历史主义的意识论是和一切唯心论及机械唯物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根本相反的。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意识的来源是由无意识的无机界发展到具有低级意识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人类。高级意识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曾着重指出意识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关系，和意识同人类言语发展的关系。

所谓意识是一定物质的特性，这种物质形态就是组织复杂的神经系统，这样的神经系统只能发生于自然界进化的高级阶段上。整个无机界、植物界和低级的动物界，都没有认识在他们内面或外面发生着的那些过程的能力，它们是没有意识的。仅在有高级神经系统的动物体，才具有认知过程的能力，即具有自内反映或领悟这些过程的能力。吾人神经系统中的客观生理过程，是同它之内部取意识形式的主观表现相随而行的，凡就本身论是客观的东西，是某种物质的过程，它对于具有头脑的实体却同时又是主观的心理的行为。

特殊思想实质的精神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思想的物质——脑子，这种思想的物质是有特别质地的物质，这种物质随着人类社会生活中言语的发展而达到高度的发展。这种物质具有思想这一种特殊性质，这是任何别的物质所不具备的。

然而庸俗唯物论者却认为思想是脑子分泌出来的物质，这种见解歪曲了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念，须知思想、感情和意志的行为，不是具有重量和伸张性的东西，意识同重量伸张等是同一物质

之不同的性质。意识是运动的物质之内部状态，是反映着在运动的物质中所发生的生理过程的特殊性质，这种特殊性，同客观的神经作用过程不可分离，但又不与这过程相同，把这二者混同起来，推翻意识的特殊性，这就是庸俗的唯物论的观点。

和这同样，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附和心理学中某些资产阶级的左翼学派的见解，实质上也完全推翻了意识。他们把意识解作理化的生理的过程，认为高级实体的行为之研究可以由客观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们不了解意识的本质之质的特殊性，看不到意识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他们把客体和主体之具体历史的一致，代之以主客的等同，代之以片面的机械的客观世界。这种把意识混同于生理过程的观点，无异取消了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个哲学中的根本问题。

孟什维克的唯心论企图用一种妥协理论去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论，把唯物论同唯心论调和起来，他们拿客观主义同主观主义的“联盟”原则，去对抗辩证法的原则，而这种原则既非机械的客观主义，也非唯心的主观主义，而是客观和主观之具体历史的一致。

可是还有怪议论，这就是普列哈诺夫关于意识问题的唯活论的见解，在他的“石子也是有意识的”一句名言中充分表现着。照他的意见，意识不是发生于物质发展过程中的，而是从最初就存在于一切物质的，石子及低级有机体的意识人的意识之间，仅仅在于程度上的区别，这种反历史之见解，对于辩证唯物论认为意识是最后发生的具备着质的特殊性的见解，也是根本相反的。

只有辩证唯物论的意识论，才是意识问题上的正确的理论。

九　反映论

做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单承认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是不够的，还须承认意识对于物质的可认识性。

关于物质能否被认识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切过去哲学都觉得无力对付的问题，只有辩证法唯物论能够给予正确的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辩证法唯物论的立场即同不可知论相反，又同直率的实在论不同。

休谟同康德的不可知论，把认识的主体从客体中隔离开来，认为越出主体的界限是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和它的形象之间存在着不可跳过的深沟。

马赫主义的直率实在论，则把客体同感觉等同起来，认为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成就了完成的形态。同时，他们不但不了解感觉是外界作用的结果，而且不了解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即外界作用在主体的感觉机关和思想的脑子中所做的改造工夫（取印象和概念的形式表现出来）。

只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反映论，肯定地答复了可认识性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灵魂”。根据这一理论，指明我们的印象和概念不但被客观事物所引起，而且还反映客观事物。指明印象和概念，既不像唯心论者所说的那样是主体自动发展的产物，也不是不可知论者所说的那样是客观事物的标准，而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照相和样本。

客观的真理是不依靠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它虽然反映在我们的感觉和概念中，但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形态，而是一步一步完成的。认为客观真理在感觉中就已经是完成形态而被我们获得的那种

直率实在论的见解，是一种错误的见解。

客观真理在我们感觉和概念中，虽不是一次就完成的形态，然而不是不能认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的见解，认为意识是能够在认识过程中反映客观真理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未被认识的“自在之物”，反映到我们的感觉印象概念上来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感觉和思维，并不是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把我们同外界隔离开来，而是把我们同外界联系起来的，感觉和思维就是客观外界的反映。思想的东西（印象和概念）并非别的，不过是“人类头脑中所转现出来和改造过来的物质的东西”（马克思）。在认识过程中，物质世界是愈走而愈接近地、愈精确地、愈多方面地和愈深切地反映在我们的认识中。向着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作两条战线的斗争，揭破直率实在论和不可知论的错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任务。

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认为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是无限度的，这和不可知论者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那种见解根本相反。但我们之接近绝对真理，却每一次有其历史上的确定界限。列宁这样说：吾人知识之接近客观的绝对真理，是历史的、有限度的，但是这一真理的存在是绝对的，我们不断地向真理接近也是绝对的。图画的外形是历史的、有条件的，但这张图画描绘着客观上存在的模型则是绝对的。我们承认人的认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真理是不能一次获得的。但我们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又承认真理能够完成于人类认识的历史运动中。列宁还说：对于自然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不要死板地或绝对去了解它。认识不是无运动的与无矛盾的，认识是处于永久的运动过程中。即矛盾之发生和解决的永久过程中。认识运动是一个复杂的充满着矛盾与斗争的运动，这就是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之见解。

一切哲学在认识论上的反历史观点，都不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因此都带着狭隘性。感觉主义的经验论之狭隘性，在感觉和概念之间挖开了深沟。理性主义学派的狭隘性，则使概念脱离了感觉。只有把认识当作过程看待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才彻底除去了这样狭隘性，把认识放在唯物的与辩证的地位。

反映论指出：反映过程不限于感觉印象，也存在于思维中（抽象的概念中），认识是一个由感觉到思维的运动过程。列宁曾说：“反映自然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直接的、整体的反映，而是许多抽象的思考、概念、法则等等之形成过程。”

同时列宁还指出：由感觉到思维的认识过程，是飞跃式地进行的，在这一点上，列宁精确地阐明了认识中的经验元素和理性元素相互关系之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许多哲学家都不了解认识的运动过程中即从感觉到思维（从印象到概念）的运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突变。因此，理解这一由矛盾而产生的飞跃式的转变，即理解感觉和思维的一致为辩证的一致，便是理解了列宁反映论的本质之最重要的元素。

十　真理论

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

真理首先是客观的。在承认了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及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之后，就等于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所谓客观真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知识或概念的内容之唯一来

源，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论者否认物质世界离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这一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才主张知识或概念是主观自生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内容，因而承认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然而这是不合事实的。任何一种知识或一个概念，如果它不是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它就不是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真理，而是主观的自欺欺人的迷信或妄想。人类以改变环境为目的之一切实际行动，不管是生产行动也罢，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行动也罢，其他任何一种行动也罢，都要受着思想（知识）的指挥的，这种思想如果不适合于客观的规律性，即客观规律性没有反映到行动的人的脑子里去，没有构成他的思想或知识的内容，那末，这种行动是一定不能达到目的的。革命运动中所谓主观指导犯错误，就是指的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的真理。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所以都是错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不根据于正确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的妄想。有人说，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主观唯心论者波格达诺夫就这样说）。照这种意见，那末，宗教和偏见也是客观真理了，因为宗教和偏见虽然实质上是谬见，可是却常常为多数人所公认，有时正确的科学的思想反不及这些谬见的普及。唯物辩证法根本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只有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知识，才能被称为真理，一切真理必须是客观的。真理与谬说是绝对对立的，判断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唯一的看它们是否反映客观的规律。如果不合乎客观规律，尽管是一般人都承认的，或革命运动中某些说得天花乱坠的理论，都只能把它当作谬说看待。

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主观真理和客观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是否认前者而承认后者。唯物辩证法真理论的第二个

问题，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它的答复不是片面地承认或否认某一方面，而是同时承认它们，并指出它们正确的相互关系，即指出它们的辩证法。

唯物辩证法在认识客观真理时，就是承认了绝对真理的。因为当我们说知识的内容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时，这就等于承认了我们知识的对象是那个永久的绝对世界。“关于自然之一切真理的认识，就是永久的无穷的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绝对的。”（恩格斯）然而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不是一下子全部成为我们的知识，而是在我们认识之无穷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无数相对真理的介绍，而到达于绝对的真理，这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的表现。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增加新的种子到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中去。但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绝对真理仅能表现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上，如果不经过相对真理的表现，绝对真理就无从认识。唯物辩证法并不否认一切知识之相对性，但这只是指吾人知识接近于客观绝对真理的限度之历史条件性而言，并不是说知识本身只是相对的。一切科学上的发明，都是历史的、有限度的和相对的，但是科学知识和谬说不同，它显示着描画着客观的绝对的真理，这就是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相互关系之辩证法的见解。

有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另一种是唯心论的相对论，对于绝对真理与绝对真理之相互关系问题都是不正确的。

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根据于它们“物质世界无变化”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认为人类思维也是不变化的，即认为在人的意识中这一成不变的客观世界，是一下子整个被摄取了。这就是说，他

们承认绝对真理，而这个绝对真理是一次被人获得的。他们把真理看成不动的、死的、不发展的东西。他们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承认有绝对真理——承认这一点是正确的，而在于他们不了解真理的历史性，不把真理的获得看成一个认识的过程，不了解所谓绝对真理者，只能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开发出来，而每一步向前的认识，都表现着绝对真理的内容，但对于全部真理来说，它具有相对的意义，并不能一下子获得绝对真理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关于真理的见解，表现了认识论的一个极端。

认识论中关于真理问题的再一个极端，就是唯心论的相对论。他们否认知识之绝对真理，只承认它的相对意义。他们认为一切科学的发明，都不包含绝对真理，因而也不是客观真理，真理只是主观的与相对的。既然这样，那末一切谬说都有存在的权利了，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统治阶级剥削劳动群众，这些侵略主义与剥削制度也就是真理，因为真理横竖只是主观与相对的，否认客观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结果，必然到达这样的结论，并且唯心论的相对论，它们的目的本来就是为着要替统治阶级作辩护的，例如相对论的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之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看来，不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是唯心论的相对论，都不能正确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有唯物辩证法，既给思维与存在相互关系问题以正确的解答，并且随之而来又确定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再则，还同时给了绝对与相对真理以正确的理解。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

十一　实践论

（参见《实践论》一文。）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

前面简述了“唯心论与唯物论”及“辩证法唯物论”两个问题。关于辩证法问题，仅有概略地提到，现在来系统地讲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叫宇宙观），是辩证法唯物的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叫机械的唯物论），这一点区别，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问题。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从古至今有三种主要答案。第一种是唯心论（不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辩证法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心造的，引申起来又可说是神造的。第二种是机械唯物论，否认世界是心的世界，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物质是不发展的，不变化的。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答案，推翻了前面两种，说世界不是心造的，也不是不发展的物质，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这样地看世界，把世界在从来人眼睛中的样子翻转了过来，这不是天翻地覆的大议论吗？这世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种议论，在西洋古代的希腊就有人说过了，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还只简单地笼统地说了一说，叫作朴素的唯物论，没有（也不可能有）科学的基础；然而议论是基本上正确的。黑格尔创造了辩证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发展的，但是心造的，他是唯心发展论，其正确是发展论（即辩证法），其错误是唯心发展论。西洋十七、十八、十九三个世纪法德等国的资产阶级唯物论，则是机械观的唯物论，他们说世界是物质世界，这是对的，就是像机械一样地运动，只有增减或位置的变化，没有性质上的变化，这是很不对的。马克思继承了希腊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改造了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心论，创造了从古以来没有过的、放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辩证唯物论，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武器。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也是一个东西。

我们要系统地来讲唯物辩证法，就要讲到唯物辩证法的许多问题，这就是它的许多范畴、许多规律、许多法则（这几个名词是一个意思）。

唯物辩证法究竟有些什么法则呢？这些法则中哪些是根本法则，哪些是附从于根本法则而又为唯物辩证法学说中不可缺少、不可不解决的方面、侧面或问题呢？所有这些法则为什么不是主观自造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则呢？对于这些法则的学习、了解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完整的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学说，创建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发展了这个学说，到了现在苏联社会主义胜利与世界革命时期，这个学说又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更加丰富了它的内容，这个学说中包含的范畴首先如下各项：

矛盾统一法则。

质量互变法则。

否定之否定法则。

以上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除古代希腊的朴素唯物论曾经简单地无系统地指出了这些法则的某些意义，及黑格尔唯心地发展了这些法则外，都是被一切形而上哲学（所谓形而上哲学，就是反

发展论的学说）所否定了的，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唯物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些法则成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之最基本的部分。

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范畴除了上述根本法则外，同这些根本法则联系着的，还有如下各范畴：

本质与现象，
形式与内容，
原因与结果，
根据与条件，
可能与现实，
偶然与自由，
链与环等等。

这些范畴，有些是从来形而上学及唯心辩证法所着重研究过的，有些是从来哲学片面地研究过的，有些则是马克思主义新提出的。这些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家与实践家手里，揭去了从来哲学唯心的及形而上学的外衣，克服其片面性，发现了它们的真实形态，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它们的内容，成为革命的科学方法论中重要的成分，拿这些范畴同上述根本的范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深刻的辩证唯物法的系统。

所有这些法则或范畴，都不是人的思想自己造出来的，而是客观世界本来的法则。一切唯心论都说精神造出物质，那末，在他们看来，哲学的法则、原则、规律或范畴，自然更是心造的了，发挥了辩证法系统的黑格尔，就是这样去看辩证法的。在他看来，辩证法不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中抽取出来的法则，而是纯粹思想上的理论系统，人的思想造出了这一套系统之后，再把它们套到自然和

社会上去。马克思、恩格斯揭去黑格尔神秘的外衣，丢弃了他的唯心论，把辩证法放在唯物论的地位。恩格斯说："辩证法的法则是从自然和人类历史抽取出来的，但它们并非别的，就是这两个历史发展领域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就实质论，可以归纳为质量互变、矛盾统一、否定之否定这三个根本法则。"辩证法法则是客观世界的法则，同时也是主观思想里头的法则。因为人的思想里头的法则不是别的，就是客观世界的法则通过实践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辩证法、认识论、论理学是一个东西，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们学习辩证法是为了什么呢？不为别的，单单为了改造这个世界，要改造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人与物的老关系。这个世界上面的人类大多数都过着苦难日子，受着少数人所控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压迫。在我们中国这个地方生活着的人类，受着惨无人道的双重性制度的压迫——民族压迫与社会压迫，我们必须改变这些老关系，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

要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为什么要学习辩证法呢？因为辩证法是自然与社会的最普遍的发展法则，我们明白它，就得到了一种科学的武器，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革命实践中，就有了同这种实践相适应的理论同方法。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一种哲理的科学），它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又是方法论。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叫作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法，但如果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有人说，许多人懂得实际的辩证法，而且也是实际的唯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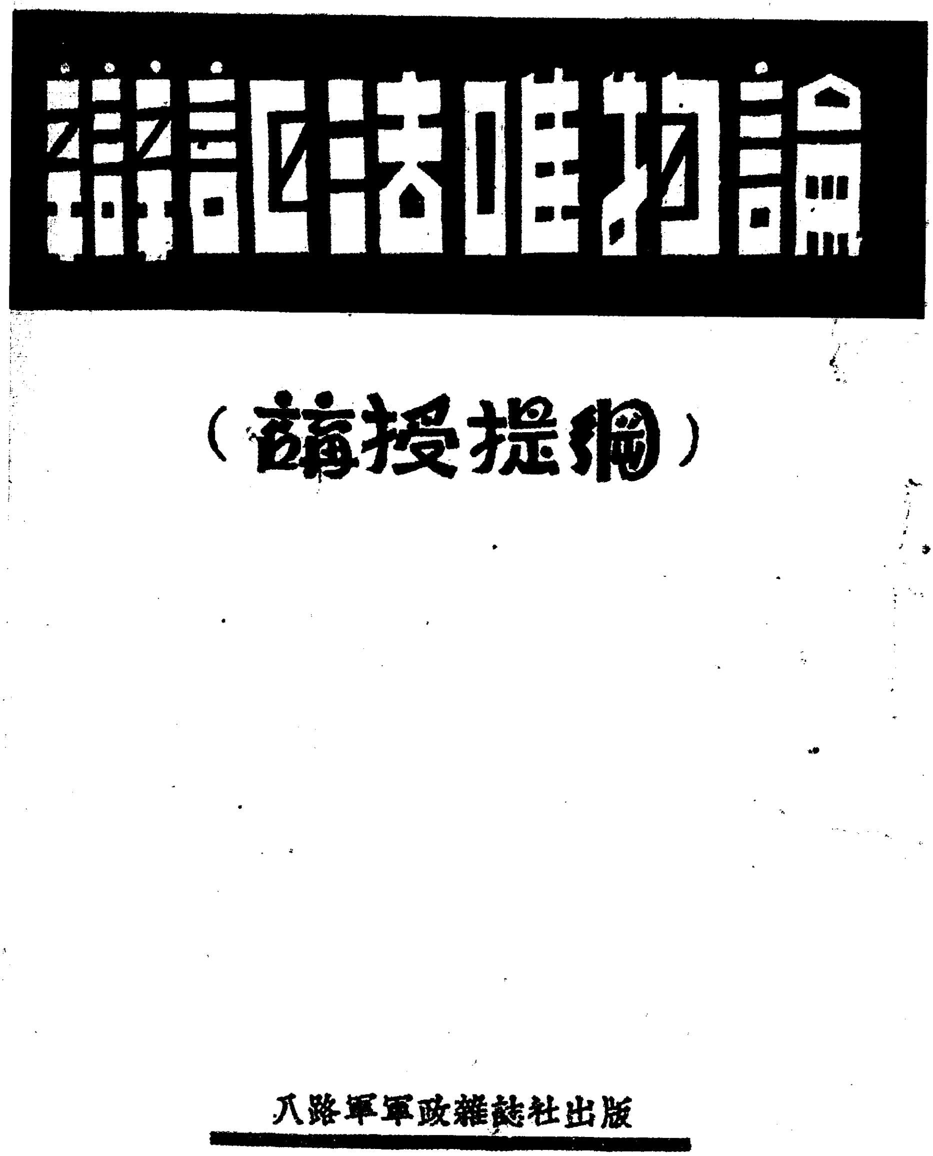
者，他们虽没有读过辩证法书，可是做起事来是做得对的，实际上合乎唯物辩证法，他们就没有特别研究辩证法的必要了。这种话是不对的。唯物辩证法是一种完备的深刻的科学，实际上具有唯物的与辩证的头脑之革命者，他们虽从实践中学到了许多辩证法，但是没有系统化，没有如同已经成就的唯物辩证法那样的完备性与深刻性，因此还不能洞察运动的远大前途，不能分析复杂的发展过程，不能捉住重要的政治关节，不能处理各方面的革命工作，因此仍有学习辩证法的必要。

又有人说，辩证法是深奥难懂的，一般人没有学会的可能，这话也是不对的。辩证法是自然、社会与思想的法则，任何有了一些社会经验（生产与阶级斗争的经验）的人，他就本来了解了一些辩证法；社会经验更多的人，他本来了解的辩证法就更多些，不过还处在零乱的常识状态，没有完备地深刻地了解。就将这种常识辩证法加以整理与深造，是并不困难的。辩证法之所以使人觉得困难，是因为没有善于讲解的辩证法书，中国许多辩证法书，不是错误就是写得不好，或不大好，使人人望而生畏。所谓善于讲解的书，在于以通俗的言语，讲亲切的经验，这种书将来总是要弄出来的。我这个讲义也是不好的，因为我自己还在开始研究辩证法，还没有可能写出一本好书，也许将来有此可能，我也有这个志愿，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决定。

以下分述辩证法的几个法则。

矛盾统一法则

（参见《矛盾论》一文）。



辯證法唯物論

（講授提綱）

八路軍軍政雜誌社出版

1938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对党中央关于在陕甘宁建立根据地的解释[1]

（1937年8月）

（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三）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了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

---

[1] 在洛川会议前，毛泽东针对有些同志提出的陕北地瘠民贫，不宜作为抗日大本营，担心主力走后，根据地守不住，主张党中央随着主力走的疑问，毛泽东作了这样的解释。

统一论

（1937年）

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

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倾向危险，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元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廉洁的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合理的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失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行专政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一党专政的狗肉，死皮赖

脸，乱吹一顿，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1937年，毛泽东在读书。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与任务[1]

（1937年9月1日）

甲　形势

（一）日本大规模进攻开始

是大规模的

是继续的

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并有外援

但又是一个冒险的进攻

（二）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

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

进入了实行抗战的阶段

但还是单纯的政府抗战、压制人民的积极性，包含着严重的危险性

抗日战线中的左派、中派、右派，阶级关系在重新变化，估计到阶级结合之新的情况

全民抗战还没有到来，但非此不能战胜日本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在全国开始组织成功，但还是不充实

---

[1] 这是毛泽东1937年9月1日在中央一级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的，不坚固的

（三）结论

是持久战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充实的坚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乙　任务

（一）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十大纲领，全面的全民族的战争

（二）红军之团结核心的任务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由“壮气军”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

抗日根据地问题与义勇军问题

（三）友党友军区域的任务

党从现在地位到实力领导地位

（四）边区的任务

政治、军事与干部的策源地

（五）战争中建立工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

两个特点

两个前途

（六）资产阶级追随无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追随资产阶级（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

自觉与不自觉

反对急性病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即将成为全党的主要危险（混同不同的阶级、党与政策）

民族失败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左”的——托洛茨基主义；一种是右的——民族悲观主义

（存在于抗日战线的右翼中）

（七）团结干部在党的路线周围

致周恩来[1]等电

（1937年9月1日）

陕甘宁边区设长官，不设主任，任林伯渠、张国焘为正、副长官；委任任弼时、邓小平为八路军政治部正、副主任；拒绝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高级参谋。

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及八路军总部接连出发，第一二九师非待国共间各主要问题解决后决不出动，这种部署是完全正确的。八路军主力接蒋介石第一次命令即由甘肃出发并无丝毫延迟，国民党一切无理的拖延与限制则层出不穷，表示其没有必要的诚意。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

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区域

（1937年9月3日）

周、朱、彭、任[1]：

甲、平绥线[2]情况：汤恩伯[3]军四个师约损失一半，撤集于涿鹿；卫立煌[4]军三个师位于居庸关以西永定河南岸；刘汝明[5]师及晋军之七十二师撤集于洋河南岸；傅作义[6]增援军约六个团大约在怀来地域；赵承绶骑兵军[7]大约在兴和、天镇地域；晋军主力在大同、广灵、代县地域。

---

[1] 周、朱、彭、任，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2]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4]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5] 刘汝明，原为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第一四三师师长，当时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八军军长。

[6]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

[7] 赵承绶骑兵军，指国民党军骑兵第一军，军长赵承绶。

乙、红军一二两军[1]约本月二十五日前后可以展开于北平、石家庄、太原、大同、张家口之间。

丙、周彭到太原应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之如下地区：(一) 涿鹿阳原蔚县三县境内一切友军未驻地区。(二) 宛平[2]房山涞水易县四县友军未驻地区。(三) 完县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六县县城以西地区。(四) 涞源阜平灵丘三个全县作为我军之中心根据地。(五) 广灵浑源繁峙五台盂县五县。以上共二十一县，有些是全县，有些是部分，均必须确实指定，并由南京及晋阎[3]令知三省省政府转令各县县政府，同时令知各县及其附近之县驻军，说明红军之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之任务。因为如不明白规定红军之区域及任务，并用通令下达友军及地方，势必因区域不明、任务不定而发生许多纠纷。

毛泽东
江午

---

[1] 红军一二两军，即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分别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这两个师是分别以红军第一、第二方面军为基础编成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有的文稿仍沿用红军的称谓。

[2] 宛平，旧县名，位于今北京西南，1952年并入北京市，属丰台区。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致彭雪枫等电[1]

（1937年9月4日）

冀、察、晋、绥四省军政人物的做法完全脱离民众，挫败之后失去胜心，整个华北战线酝酿着极大危机，利用红军新到壮其气而相当改变其做法，是一极好时机。请周恩来考虑同他们会面，详细交谈。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雪枫转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力争把阜平等县规定为八路军活动地区[1]

（1937年9月7日）

周、彭、林：

甲、汤恩伯卫立煌刘汝明[2]三部六万余人已将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及其东北地区占据，上述地区已无红军活动余地，如参〈掺〉杂其间，甚为不利。

乙、阎[3]有将红军开赴阳原、大同之意，蒋[4]亦难免有此企图。

丙、此时红军有利地区是阜平、唐县、曲阳、行唐、灵寿、平山、繁峙、浑源、五台、盂县及涞源灵丘两县之南部地区，望与阎力争规定之。

毛

虞亥

---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彭德怀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的电报。

[2]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六十八军军长。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蒋，指蒋介石。

反对自由主义

（1937年9月7日）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

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这是第一种。

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这是第二种。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这是第三种。

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这是第四种。

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这是第五种。

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这是第六种。

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这是第七种。

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这是第八种。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第九种。

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这是第十种。

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这是第十一种。

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

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革命的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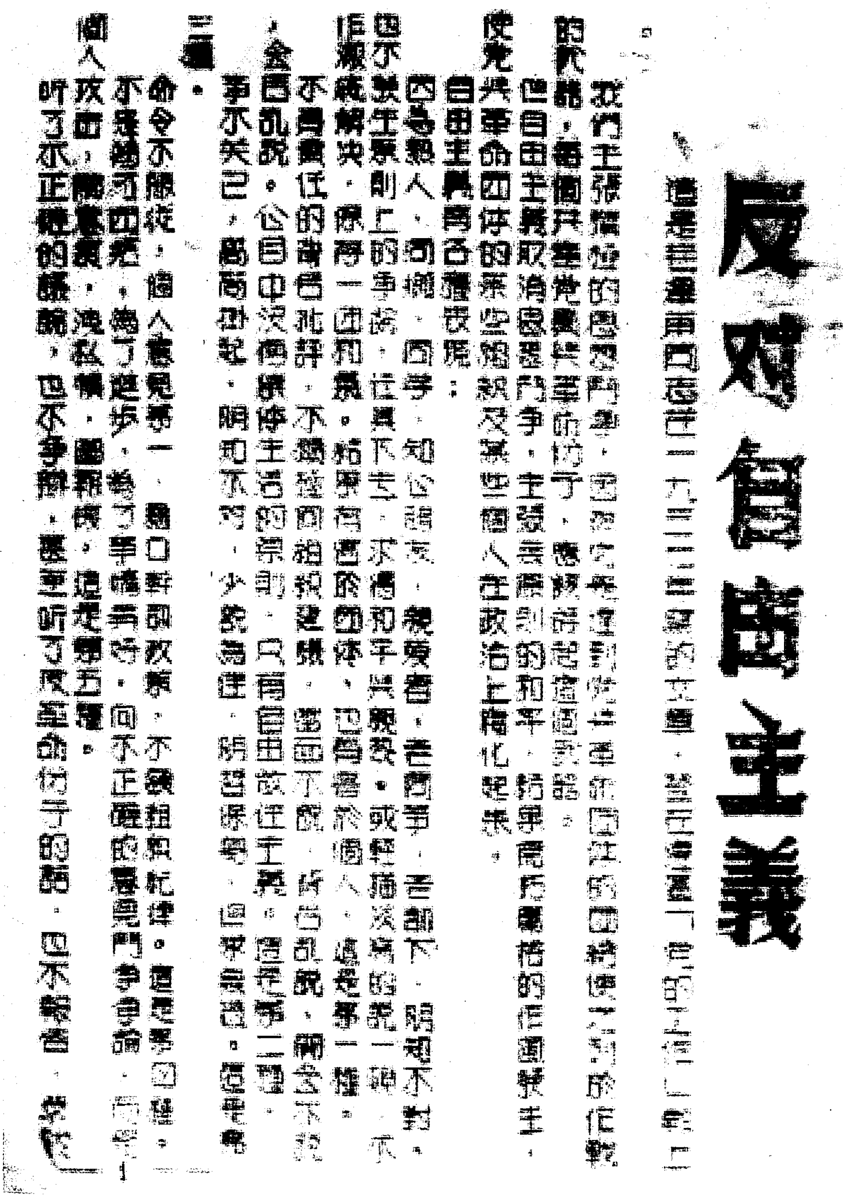
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自由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它是消极的东西，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因此敌人是欢迎我们内部保存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的性质如此，革命队伍中不应该保留它的地位。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

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的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面来。这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反对自由主義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寫的文章，[illegible]

我們主張積極的思想鬥爭，因為它是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於戰鬥的武器。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應該拿起這個武器。但是自由主義取消思想鬥爭，主張無原則的和平，結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風發生，使黨和革命團體的某些組織和某些個人在政治上腐化起來。

自由主義有各種表現：

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與親熱。或輕描淡寫的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結果是有害於團體，也有害於個人。這是第一種。

不負責任的背後批評，不是積極的向組織建議。當面不說，背後亂說，開會不說，會後亂說。心目中沒有集體生活的原則，只有自由放任主義。這是第二種。

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這是第三種。

命令不服從，個人意見第一。只要組織照顧，不要組織紀律。這是第四種。

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鬥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洩私憤，圖報復。這是第五種。

聽了不正確的議論，也不爭辯，甚至聽了反革命分子的話，也不報告，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反对自由主义》油印本。

在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9月10日）

有的高级军事干部，对战略问题毫无兴趣，上不联系战略，下不联系红军实际，变成外国教条主义；教学法要研究，旧的考试方法要改变，现在的教学法多是注入式，要注意启发式。

---

[1] 1937年9月10日，中央召开常委会议。毛泽东就教材和教学法等问题发表意见，强调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军事理论应讲授战略思想、战略原则。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对待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

（1937年9月10日）

伯渠：

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

（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洛　毛

九月十日

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解释

（1937年9月12日）

德怀[1]同志：

真电[2]悉。

甲、同意你偕恩来去南京一行。[3]

乙、在晋、在冀、在京，均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取得他们的彻底了解与同意。

丙、此原则中包含：（一）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现在蒋鼎文[4]还在说刘师[5]应速上前线。彼等用意，或者不明白使用大兵团于一个狭小地域实不便于进行游击战争，如果是这样，可见我们对此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 指1937年9月11日彭德怀给毛泽东、朱德的电报。电报中请示他是否仍随周恩来去南京一次，以便报告前方实情和争取补充，对整个作战方针和发动民众问题亦可相机进言。

[3] 朱德、任弼时1937年9月12日致电毛泽东并告周恩来、彭德怀，认为目前前线紧张，彭德怀可不去南京，在以后适当时机再去为妥。因此，彭德怀这次未去南京。周恩来也因前线战事紧张，这次未能成行。

[4] 蒋鼎文（1895—1974），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5] 刘师，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原则并未向他们有过彻底坚持的说明；或者他们含有恶意，即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二）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如不弄清这一点，必将发生无穷纠葛，而红军之伟大作用决不能发挥。（三）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四）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丁、你未回军以前，属我直接指挥，通知朱、任、林、贺[1]。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

[1] 朱，指朱德。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林，指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贺，指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

关于驳斥蒋鼎文的无理态度问题致林伯渠等电[1]

（1937年9月14日）

游击战争与按照情况使用兵力，是朱、周在京与蒋、何、白、黄[2]决定之战略方针与指挥原则。红军主力已上前线，多兵堆于狭地不合游击战使用，因此一二九师留驻待机是完全正当的。蒋鼎文身为军人不懂军事，还应加意学习我们的兵法，依照他的无知妄想是要打败仗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驳斥蒋鼎文的无理态度问题致林伯渠等电的主要内容。

[2] 蒋、何、白、黄，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黄绍竑。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南方游击区谈判改编时应坚持的方针

（1937年9月14日）

博、叶、周[1]，并告林、董，朱、彭、任[2]：

关于各边区统一战线问题：

甲、湘鄂赣边区傅秋涛[3]等派至武汉谈判代表，承认武汉行营派军需主任、副官主任等许多人到部队中去及其他许多不利条件，完全错误。已电伯渠、必武，通知谈判代表停止谈判，即速回去，由傅秋涛另派代表，否认原定条件，重定办法，坚持下列各点：

（一）国民党不得插进一个人来；

（二）一定的军饷；

（三）驻地依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严防暗袭及破坏，不要求驻大

---

[1] 博、叶、周，指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当时均为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为书记。该委员会负责同国民党武汉行营的交涉、谈判事宜。

[2] 林，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西安方面的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董，指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具体负责武汉方面的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3] 傅秋涛（1907—1981），湖南平江人，当时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

地方。

乙、郑位三[1]到南京已见博、叶否？请转博严嘱郑位三依照上述三点进行鄂豫皖谈判，嗣后豫等不得蹈湘鄂赣及闽粤边之覆辙。

丙、要求南京责令余汉谋[2]退回何鸣[3]部人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博、叶交涉情况如何?

丁、统一战线中，地方党容易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这已成党的主要危险，请严密注意。

洛甫[4]　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鄂东北特委书记。

[2] 余汉谋（1897—1981），广东高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3] 何鸣（1910—1939），广东万宁（今属海南省）人。当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1937年7月，由于他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近千人被包围缴械。

[4]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负总责。

关于我军应坚持以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方针的指示

（1937年9月16日）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雪枫[1]：

（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自蔚县急进，晋阎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斗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决定，周彭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丙）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丁）一一五师现到何处？

毛

十六日

---

[1] 指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雪枫。

致朱德、任弼时电[1]

（1937年9月16日）

日寇分两路进攻广灵、灵丘，晋军已放弃大同，绥远全境实际已失，以五台为中心之晋东北日寇将以重兵进据，并继进攻取太原。在此情况下，我三个师已无集中晋东北一处之可能，更无此必要。

拟以一一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地区；一二〇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一二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

---

[1]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向恒山地区挺进的时候，沿平绥路西犯的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防线，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并沿同蒲路南下，向雁门关、茹越口进攻。与此同时，由平绥路向晋东北进犯的日军，向平型关进犯，企图实施右翼迂回，威胁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的侧背。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南犯的日军也于9月中旬沿滏阳河南下，迂回平汉路沿线国民党军的侧背，企图歼灭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主力于河北省中部地区。在此情况下，9月16日，毛泽东在复朱德、任弼时的电报中对军事部署作出了一些指示。这是复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的战略部署

（1937年9月17日）

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1]：

关于情况判断及战略部署问题：

甲、判断敌攻华北大约分为四路，总兵力约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一路山东，现未出动。又一路津浦线，约一个半师团，现攻至马厂。又一路平汉线，约一个师团，现在涿州以北未动。又一路平绥、同蒲线，约三个师团，为其主力[2]，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完成其夺取华北五省[3]之企图。其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右翼迂回。至于上海进兵，于破坏中国经济命脉外，又钳制中央军之主力，以便利其夺取

---

[1] 朱、彭、任，指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政治部主任。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副师长。贺、萧，指贺龙、萧克，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副师长。刘，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徐，指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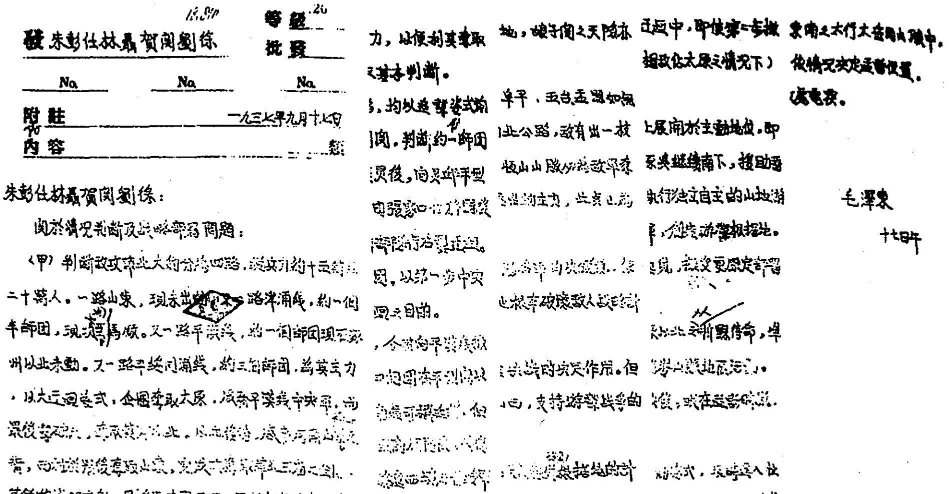
[2] 当时日军进攻华北的主力系沿平汉铁路南下和由滏阳河迂回平汉铁路的六个师团。沿平绥铁路、同蒲铁路西进、南下的日军不是主力。

[3] 华北五省，指当时中国华北地区的河北、察哈尔（今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山东、山西五省。

华北。以上是对日寇第一期作战计划之基本判断。

乙、日寇右翼之主力，又分为三路，均以追击姿势前进。一路沿平绥东段、同蒲北段攻雁门关，判断约一师团，占大同后现未动。一路由天镇占广灵后，向灵丘、平型关进攻，系向晋绥军行右翼迂回。一路由张家口占蔚县后，有攻涞源之势，系向卫立煌[1]军及紫荆关部队行左翼迂回。此两路判断系组成联合兵团，至少两师团，以第一步中央突破之姿势达成其第二步分向两翼迂回之目的。

丙、蒋[2]以卫立煌军处于敌之包围中，令其向平汉线撤退。阎[3]



發 朱彭任林聶賀關劉徐　等級　批

No　No　No

附註　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七日

內容

朱彭任林聶賀關劉徐：

關於情況判斷及戰略部署問題：

毛澤東

十七日午

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根据华北形势变化，为保持战略上的主动，发出变更八路军战略部署的指示。

---

[1]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蒋，指蒋介石。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以灵丘为山西生命线，拟集中十四个团在平型关以北举行决战。判断如决战胜利，则敌之南进可稍延缓，但必增兵猛攻。如决战失败，敌必速攻平型关、雁门关，待后路预备兵团到达后，主力直下太原，使绥远西境之晋绥军、恒山山脉南段五台等处之各军、平汉北段之各军，均不得不自行撤退，彼可不战而得上述各地，娘子关之天险亦失其作用。

丁、涞源、灵丘为敌必争之地。阜平、五台、盂县如无南北公路，或可暂时不被敌占；如有南北公路，敌有出一支向南切断正太路之可能。不论如何，恒山山脉必为敌军夺取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向此中枢出动主力，此点已为浑源、蔚县、广灵之被占所证明。

戊、晋阎指挥下之傅、杨、刘、汤[1]各军均失锐气，使我们不能作出这些军队能够在现阵地根本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之结论。

己、红军此时是支队性质，不起决战的决定作用。但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

庚、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

[1] 傅，指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杨，指杨爱源（1888—1959），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刘，指刘茂恩（1894—1981），河南巩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五军军长。汤，指汤恩伯（1900—1954），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

辛、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1]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面军[2]在外交问题[3]解决后，或在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4]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现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壬、你们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十七日午

---

[1] 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

[2] 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3] 指国共谈判中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当时，党内曾将同国民党谈判称为外交问题。

[4] 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应速向晋西北转进[1]

（1937年9月18日）

朱、任：

恒山山脉是第一战区与第二战区接合部，敌主力必从此进。林彪师现已当了正面，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贺龙师决不能再用此方，应速向晋西北转进。

毛

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电报。

八路军战略区域问题

（1937年9月19日）

德怀[1]同志：

甲、十八日电[2]悉。我十七日战略长电[3]，你收到否。

乙、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

丙、五台、定襄、盂县地域狭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林彪杨爱源[4]二部在此区域，亦属暂时性质，无持久可能。判

---

[1] 德怀，即彭德怀。

[2] 指1937年9月18日彭德怀给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的电报。电报说：一、阎锡山谈，万一平汉不利雁门关被突破时，晋军（第六集团军）与我军保守五台、定襄、盂县、繁峙地域，不须南退。发动群众及作战由我们负责。二、固安被突破，平汉线指挥极混乱。三、目前应尽力争取山西相当持久，以便发动和组织恒山、太行山脉及晋绥群众，造成敌深入太原后仍在我四面游击包围中。四、平汉线与同蒲线之间山脉较大，有利于我发展。五、目前部署：（一）一一五师进到灵丘、涞源以南，相机侧击敌之一部。（二）一二〇师及总部直属队进到阜平、五台及灵丘以西，加紧发动群众及组织游击队。（三）一二九师在南京承认宣言发表后，即出动晋西北，小部向绥远发展游击战争。如平汉、津浦两友军放弃黄河堤岸时，我主力即相机转入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边。

[3] 即《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之战略部署》。

[4]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断该地域只能支持数千人的游击战争。

丁、贺龙部[1]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2]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以相当有效的钳制作用。五台区域有林杨二部，十分足够，贺师[3]再去，则失战略意义。

戊、因此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

己、将来刘师[4]可与林师[5]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中，至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可由陕北抽调一部去策应。

毛泽东

十九日午

---

[1] 贺龙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4]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5] 林师，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致八路军前线指挥部电

（1937年9月20日）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人侧翼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已进占中心城市和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一区。

王兆相部主力准备配合一二〇师作战[1]

（1937年9月21日）

神府特委及王兆相：

甲、日寇进攻雁门关[2]，我一二两方面军已到晋北抗战。

乙、兆相等同志准备五日内率主力出五寨、神池与二方面军配合，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留下三分之一兵力及地方武装保守苏区及渡口。

丙、准备情形速告。

毛

九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神府特委及第一二〇师工兵营营长王兆相的电报。

[2] 雁门关，位于山西代县北部，长城的主要关口之一。

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

（1937年9月21日）

德怀[1]同志：

阎锡山[2]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他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我完全同意你十八日电中“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这个观点。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林彪[1]同志来电完全同意我十七日的判断与部署，他只想以陈旅[2]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以适时把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王震[3]率一个团暂时到五台也是可以的，但请注意到适当时机仍以转赴晋西北为宜。依情况判断，林率陈旅即使能打一二个胜仗，不久也须转向五台来的。统请斟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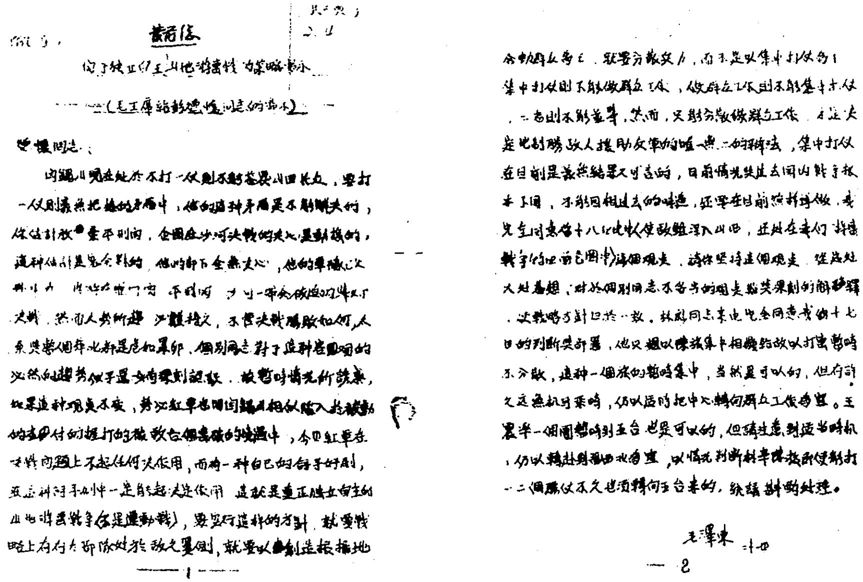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二十一日

---

[1]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2] 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3]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



洛川会议后，毛泽东于1937年9月，先后致电彭德怀、周恩来、刘少奇和杨尚昆等，指出：红军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图为毛泽东给彭德怀的指示电。

关于广西统战工作问题致张云逸电

（1937年9月21日）

云逸：

（甲）中共拥护一切决心抗战的政府，已为全国人民所共知，广西党拥护广西当局的抗战主张也是当然的。

（乙）中共今天同南京与地方政府的磨擦，并不是由于中共不拥护南京与地方政府的抗战主张，而是由于政府当局不肯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主张，特别是关于实现民主权利与改革政治机构方面。

（丙）广西地方党如要发表宣言，一方面应表示我们对于广西当局抗战主张的拥护，但同时应根据党的十大纲领及广西具体情况，提出党对于广西在争取抗战胜利中，应该实行的具体纲领，以动员群众及全党同志。

据你观察广西当局，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中，今天应该做些什么，请你提出具体意见告诉我们，以备将来给广西党起草宣言之用。

（丁）广西当局今天是否已经允许了共产党公开活动，释放了政治犯？如果没有，请你们即刻向他们交涉，取得这些先决条件。

（戊）广西党可以同广西当局合作，但合作必须有共同遵守的具体纲领。这类纲领，你同广西当局商谈过否？望告。

毛　洛

致博古、叶剑英电[1]

（1937年9月22日）

宣言既已发表[2]，目前谈判须解决者，应着重下列三事：（一）发布共同纲领。（二）解决边区问题。（三）解放报[3]在全国发行。

---

[1] 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致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7月提交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3] 指中共中央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1937年4月创刊。

关于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见

（1937年9月23日）

雪枫[1]同志，并告周，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张[2]：

巧电[3]悉。关于阎先生所提，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有下列意见：

甲、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

---

[1] 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山西办事处主任。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贺、萧，指贺龙、萧克，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副师长。刘、徐、张，指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3] 指彭雪枫1937年9月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该电汇报了他同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16日秘密会谈的情况，其中提到阎锡山建议：一旦出现津浦路平汉路失守、晋军败退的不利局势，以八路军会合晋绥军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山脉建立根据地，同日军周旋。

是难以立足的。

乙、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

丙、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及部署与准备，因为敌人必将先行占领该地神池、宁武一带，与东边占领恒山山脉之行动相配合，取居高临下之利，然后进攻太原。

丁、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如若干必要资材之准备迁移等。资材集中于五台一处是不妥当的。

戊、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己、上述部署及计划，并不妨碍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

庚、关于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事，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辛、上述游击战争意见，望即提供阎先生考虑，倘承采取，抗战幸甚。

毛泽东

二十三日午

在日军占太原的设想下布置五台山脉游击战争[1]

（1937年9月24日）

周，朱、彭、任，并告胡服，杨尚昆，朱瑞[2]：

甲、朱彭布置电[3]、周情况电[4]悉。

乙、已令刘师[5]准备出动，该师行进路线仍以走侯马上车为宜。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

[2] 胡服（刘少奇）、杨尚昆、朱瑞，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副书记和军委书记。

[3] 指1937年9月21日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各师首长并报毛泽东的电报。电文要点：一、对日军作战计划的估计。二、我党我军支持华北局面应尽可能保障山西持久战，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八路军入晋后，提高了友军和人民群众的战斗热情。三、红军应在任何方面均起积极的模范作用。四、八路军三个师目前布置的原则：一二〇师主力以灵活的游击战袭击左云方向，组织晋西北等地的游击队，即着手布置五台山以北及以东阜平、恒山以西地区的群众工作；一一五师之陈光旅控制于上寨镇附近，小部经常袭扰灵丘、涞源之敌，徐海东旅最好置于阜平，随时协助陈旅相机袭击由灵丘向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总直属队开进至五台附近，发动群众；预计一二九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后开展太行山脉之群众工作。

[4] 指1937年9月24日周恩来由太原给毛泽东、张闻天关于当时河北、山西的敌情、抗日友军和我军的布置情况以及战区内的地形、战况的电报。

[5]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丙、林师[1]及王震部[2]既均使用于作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山西地方党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之游击战争，而重点于五台山脉，因该处可得阎杨[3]更多协助，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因此，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

[1] 林师，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2] 王震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王震。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杨，指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1937年9月25日）

周[1]，并转胡服、尚昆、朱瑞[2]，并告朱、彭、任[3]：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兵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注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地但是有计划地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4]等再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

---

[1] 周，指周恩来。

[2] 胡服，即刘少奇。尚昆，即杨尚昆，1907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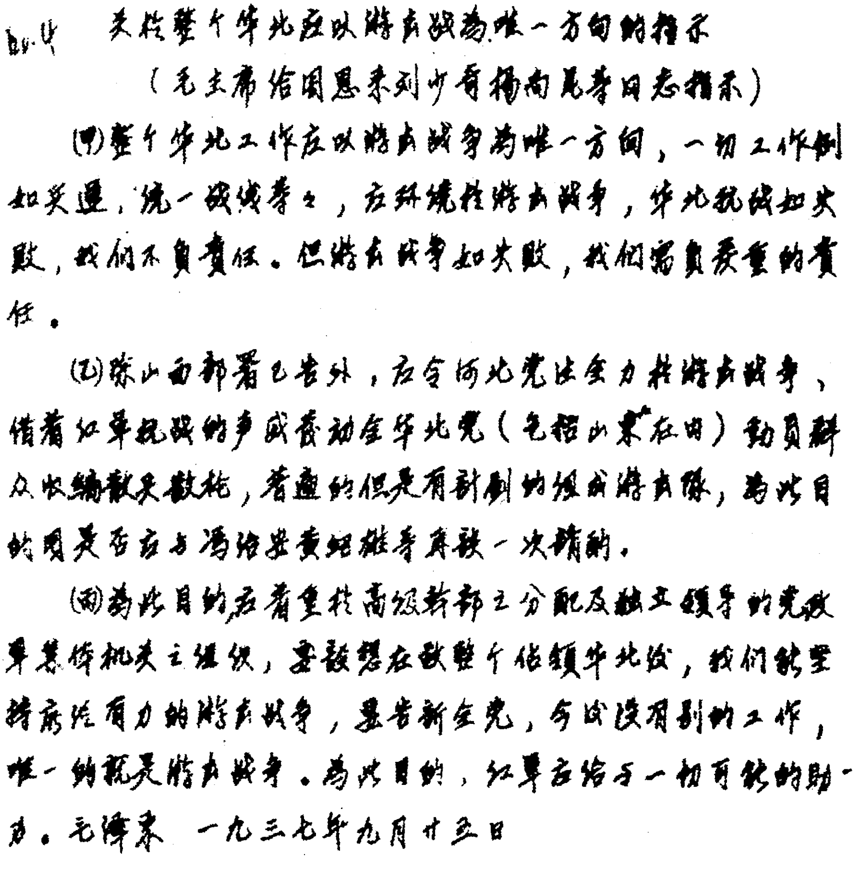
[3]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4] 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七十七军军长。黄绍竑（1895—1966），广西容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

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于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毛主席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同志指示）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抗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须负严重的责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应令河北党以全力于游击战争、借着红军抗战的声威发动全华北党（包括山东在内）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计划的组成游击队，为此目的周是否应与冯治安黄绍竑等会谈一次，请酌。

(丙)为此目的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五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等的指示电。

在保定及晋北决战中八路军须发挥战略作用

（1937年9月25日）

朱、彭、任[1]：

我有一新的战略意见，长电[2]即刻发出。现拟请你们将现在晋东北红军全部暂时按兵不动，隐蔽目标，不去惊动敌人，以便待敌主力深入至代州[3]及保定附近时，向北突击，恢复恒山山脉于手中。在保定及晋北决战中，红军发挥战略上的作用。

毛泽东

二十五日

---

[1] 朱、彭、任，指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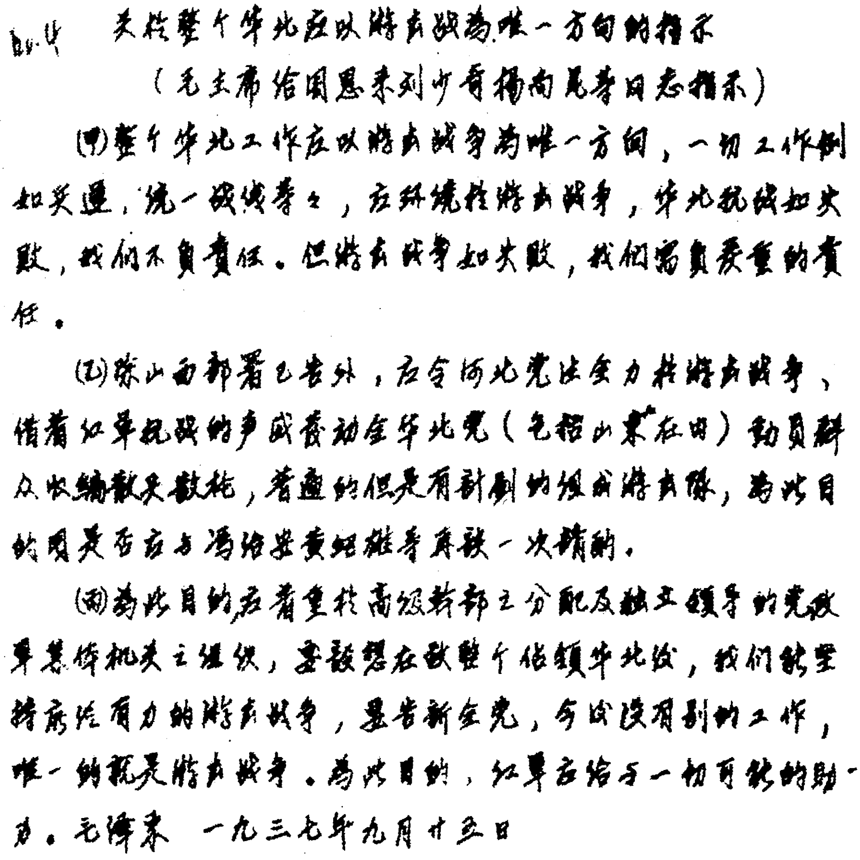
[2] 即《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

[3] 代州，即今山西代县。

集体机关之组织。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要发动党内党外），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为此目的，红军应给予一切可能的助力。

丁、请以整个华北的部署见告。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关於整个华北应以游击战为唯一方向的指示
（毛主席给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同志指示）

(甲)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運，統一戰線等等，應環繞於游擊戰爭，华北抗戰如失敗，我們不負責任。但游擊戰爭如失敗，我們當負嚴重的責任。

(乙)除山西部署已告外，應令河北党以全力於游擊戰爭，借着红軍抗戰的声威發動全华北党（包括山東在內）動員群众收編散兵散枪，普遍的但是有計劃的組成游擊隊，為此目的問題是否应与馮治安黃紹雄等再商談一次請酌。

(丙)為此目的應着重於高級幹部之分配及獨立領導的党政軍集体机关之組織，要設想在敌整个佔領华北後，我們能堅持廣泛有力的游擊戰爭，要告訴全党，今後沒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擊戰爭。為此目的，红軍应給予一切可能的助力。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九月廿五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刘少奇等的指示电。

在保定及晋北决战中八路军须发挥战略作用

（1937年9月25日）

朱、彭、任[1]：

我有一新的战略意见，长电[2]即刻发出。现拟请你们将现在晋东北红军全部暂时按兵不动，隐蔽目标，不去惊动敌人，以便待敌主力深入至代州[3]及保定附近时，向北突击，恢复恒山山脉于手中。在保定及晋北决战中，红军发挥战略上的作用。

毛泽东
二十五日

---

[1] 朱、彭、任，指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2] 即《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

[3] 代州，即今山西代县。

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

（1937年9月25日）

朱、彭、任、周[1]，并告林彪[2]：

战略意见：

甲、依据现时敌攻保定、代州[3]并向石家庄、太原，对灵涞广蔚[4]四县似乎没有多兵据守的情况，依据蒋阎[5]谈决在保定取决战方针，在晋北取固守方针的情况，为阻敌南占太原、石家庄，支持华北的持久战起见，拟建议蒋阎派何柱国[6]骑兵军全部，另派桂军或中央军有力步兵一万五千至二万人，与我林师全部配合，受朱彭指挥，在蔚涞之敌向保定前进，灵广之敌向代州前进确已深入之际，从灵涞之间向北突击（反攻性质的中央突破），恢复灵涞广蔚四县，然后向着大同、张家口、北平线，大同、太原线，北平、石家庄线，举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在灵涞广蔚建立群众的及堡垒的根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周，指周恩来。

[2]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3] 代州，今山西代县。

[4] 指山西的灵丘、广灵和河北的涞源、蔚县。

[5] 蒋，指蒋介石。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6] 何柱国（1897—1985），广西容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

据地。如此着成功，还可用相当一部进出热河[1]方向，如此或能造成华北战争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请你们考虑之后向蒋阎建议。

乙、不管蒋阎协助与否，目前红军不宜过早暴露，尤不宜过早派遣战术支队，应候蔚涞之敌脱离蔚涞攻至满城附近，灵广之敌脱离灵广攻至繁峙附近，上述四县兵力极少之际（此时，涿州之敌当攻至徐水附近，大同之敌当攻至雁门关附近），然后使用我林师全部向北突击，依情况再分成无数小支或分成二三个集团，向着恒山山脉以东以西以北广大地区敌之空虚侧后，举行广泛的袭击战。若在敌之主力尚未集中于其主要的攻击点、敌之后方尚未十分空虚之时，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那是不利的。若仅派遣战术支队，那是无益的。

丙、如同意上述意见，就请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待必要条件具备时实行，那时应以王震[2]部位于策应前方、保持后路之地区。贺师[3]在晋西北之使用同此原则。

丁、如出至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广泛发动群众，红军便不孤立。

戊、蒋阎保定决战、晋北固守的方针（见蒋十九日部署电），完全是处在被动的挨打的姿势下，如无上述一支奇兵袭入敌后，决难持久，只有实行上述计划才能变被动为主动。现在仅仅剩下此一着活棋，应向蒋阎极力建议（暂不说红军单独行动，只要求派兵协助）。

---

[1] 热河，指热河省。

[2] 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

[3] 贺师，指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

己、如能实现上述计划，即使保定、代州失守，也是不怕的。没有某些地方失守之代价，不能取得敌后活动的便利。

庚、实行上述计划须在灵涞广蔚敌军甚少之条件下，须有敌后方敌兵不易活动而我步兵易于活动之地形条件。

辛、以上作为一种提议，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二十五日

1937年9月，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

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1]

（1937年9月25日）

周，林，并告博古、剑英、汉年、胡服、云逸、觉哉（由林转）及朱、彭、任、林、聂、贺、关、刘、张诸同志：

甲、你们谈话请根据下列诸点：

一、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争〈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

二、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民大团结的根本方计。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

三、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联名给周恩来、林伯渠并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潘汉年、刘少奇、张云逸、谢觉哉、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张浩的电报。

四、宣言是三月四日起草的，五月十五日交付的[1]，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

洛甫、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

[1] “三月”“五月”均应为“七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7年9月25日）

目前时局需要有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府，我们要明确提出参加这样的政府，不是提出参加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占领区域，我们可以建立许多小块政权，南方各地也有小块苏区政权，在这些地方，要以共产党为主体组织政权。在战区的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实行抗日纲领，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不反对，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产党员可以去参加。

---

[1]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有些共产党员把参加国民党政权引为荣耀，对国民党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丧失应有的警惕。为纠正政权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25日召开会议，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张国焘、凯丰、郭洪涛、李富春、吴亮平、王首道参加，讨论共产党参政问题。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37年9月25日）

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人民彻底更始”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和阎锡山谈话要点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电[1]

（1937年9月26日）

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

向恒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的计划，暂时还无执行的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

[1] 这是平型关战役后第二天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对日军在华北作战计划的估计和边区应紧急进行备战动员[1]

（1937年9月27日）

陕甘宁各部队首长：

（一）估计日寇在华北作战计划，占领平津、南口、张家口之线为第一步，以占领沧州、保定、代县、涞源、大同之线为第二步。现除保定、代县未下，其余均完成，现正向保定、代县猛进中。在晋绥、平绥、平汉、津浦[2]之线的日军约七个师团，共约十五万人。

（二）敌实现第三步计划困难增多，后方联络线增长，现有兵力疲劳，进入山地给养困难，重炮坦克车不能发挥其威力，现有七个师团非增兵不能达其任务。如此颇利我军今后的作战。

（三）我军已开始入晋，当局[3]表现较积极，群众较前活跃，晋军士气较提高。在保卫山西、收复平津口号下，紧急动员广大群众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兼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给陕甘宁边区各部队首长的电报。

[2] 晋绥，即晋绥路，指山西太原经大同至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包头的铁路。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3] 当局，指国民党山西省当局。

争取山西以及全国作持久战。

（四）边区[1]在该企图下即应紧急动员起来，反对过去太平观念，反对贪污浪费，反对不紧张的作风，彻底肃清土匪、汉奸，协助地方组织训练壮丁，巩固部队，扩大防空、防毒、夜间动作及游击战术的训练和政治的动员，提倡节省，发扬固有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完成目前的紧急任务。

毛　萧

二十七日

---

[1] 边区，指陕甘宁边区。

致刘伯承等电[1]

（1937 年 9 月 28 日）

保定、沧州、献县均失，国军溃乱不堪，卫立煌退石家庄。我一二九师（缺一个团）接电立即出动，经临晋渡河到侯马上车，在太原补充衣、弹，速开正太路南北地区。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伯承、徐向前、张浩并告朱德、彭德怀、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在华北局势危急情况下应坚持游击战争方针

（1937年9月29日）

周，朱、彭、任[1]：

甲、华北大局非常危险，敌已从平汉、津浦两路的中间突破进来，保定已失，敌正迂回石家庄的侧面，河北局面已经完结了。卫立煌、曾万钟、孙连仲[2]三军退阜平、获鹿线，布置侧面阵地，将依托太行山脉。河北失后，敌将从海州登陆进占徐州，则山东将不战而失。不久中国阵地将变为扼守黄河、运河两线。这一形势将影响到上海战线发生某些变化，南京将被大轰炸，国民党如不妥协，必将迁都。估计中国政局在数月后将起变化，我们应争取在彼时达到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实行三民主义与十大政纲[3]，继续支持民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2]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1896—?），云南大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孙连仲（1893—1990），河北雄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3] 十大政纲，指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即：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

族战争之目的。也只有在彼时，真正人民的民族战争才能实现。判断在彼时苏联将给中国以实力的援助。

乙、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1]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坚持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人民参政及改造晋军的根本方针。

丙、目前长城抗战仅是暂时的，而且是极短的暂时。阎必要求我军与他配合来打一二仗。为了给晋军以更好的影响，如果在确实有利的条件下，当然是可以参加的，但须计算。这仅是战役的暂时的局面，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你们应要求阎锡山拿出一万支枪来武装人民。你们应在前方办一个五百至一千人的干部学校，由红军与地方党合办，以充游击战争干部。在六个月后，抗大的一期学生可以大部使用于山西。

丁、关于使用一一五师配合国民党二三个师，待敌相当深入后，向灵涞广蔚[2]及其以北突击，捣其空虚后方的计划，请你们着重研究一番。如实行此着，可能在一个时期内展开一个新局面，虽然不能根本地破坏敌人战略计划，但暂时地部分地破坏是可能的。这就大有利于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泽东

九月二十九日十时

---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指山西的灵丘、广灵和河北的涞源、蔚县。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1937年9月29日）

还在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在停止进攻红军、给民众以自由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之下，准备同任何国民党部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那是因为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但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

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号召各党各派和全国同胞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同民族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一九三六年五月，红军又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同年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对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封信，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战，并组织两党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年九月，共产党又作了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不但发了这些宣言、通电、书信和决议，而且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多次和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然而还是没有结果。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今年二月十日，当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了具体地建立两党合作，乃以一个系统的建议电告该会。在这个电报内，要求国民党向共产党保证停止内战，实行民主自由，召开国民大会，迅速准备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项；共产党也向国民党保证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红军改变名称，在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步骤，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步骤，则两党合作的建立势将推迟，而这对于迅速准备抗日是完全不利的。

自此以后，两党的谈判接近了一步。关于两党共同的政治纲领问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释放政治犯问题，红军改名问题等，共产党方面都提出了更具体的建议。虽然共同纲领的颁布，民众运动的开放，革命根据地的新制度的承认等事，至今还没有实现；然而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按抗日战线的战斗序列，又称第十八集团军）的命令，已在平津失守约一个月之后颁布了。还在七月十五日就已交付了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宣布两党合作成立的宣言，以及当时约定随之发表的蒋介石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的谈话，虽延搁太久，未免可惜，也于九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正当前线紧张之际，经过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氏的这个谈话，宣布了两党合作的成立，对于两党联合救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共产党的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蒋氏的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很好的；但是还没有抛弃国民党的自大精神，还没有必要的自我批评，这是我们所不能满意的。但是不论如何，两党的统一战线是宣告成立了。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

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由于两党在一定纲领上的合作，发动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这是两党结成了统一战线的结果。然而由于一部分人对于革命主义未能坚持，正当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破裂了两党的统一战线，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这是两党统一战线破裂了的结果。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尽管还有某些人还不明了这个统一战线的历史任务及其伟大的前途，还在认为结成这个统一战线不过是一个不得已的敷衍的临时的办法，然而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新的有利的证据已经表现出来了。第一个证据，是还在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就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同。人心的向背，于此可见。第二个证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两党实行停战以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各党各派各界各军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状况。虽然这个团结对于抗日的需要说来还是异常不够的，特别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团结问题至今在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第三个证据，这是最为显著的，就是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这个抗战，就目前的情况说来，我们是不能满意的，因为它虽然是全国性的，却还限制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我们早已指出，这样的抗战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虽然如此，但是确

实已经发动了百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国范围的对外抗战，没有国内和平和两党合作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说当两党统一战线破裂的时候，日寇可以不费一弹而得东北四省，那末，当两党统一战线重新建立了的今日，日寇就非经过血战的代价不能得到中国的土地。第四个证据，就是对国际的影响。全世界工农民众和共产党，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国共合作成立后，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将更积极地援助中国。中苏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1]，今后两国关系有更进一步的希望。根据上述的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判断，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

然而这样伟大的任务，不是停止在现在状况的统一战线所能完成的。两党的统一战线还需要发展。因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仅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

---

[1]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1937年8月21日。

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做，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起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还在今年五月间，就对于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地警告过当权的国民党，指出了没有民众起来抗战，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不但中国共产党人，各地的许多先进同胞以及国民党的许多贤明的党员，都曾指出了这一点。可是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其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隔离，军队和人民隔离，军队中指挥员和战斗员隔离。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

今天的抗日统一战线，还没有一个为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去代替国民党的统制政策。现在国民党对待民众的一套，还是十年来的一套，从政府机构，军队制度，民众政策，到财政、经济、教育等项政策，大体上都还是十年来的一套，没有起变化。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两党的内战停止了，全国的抗日战争起来了，这是从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极大的变化。然而上述的一套则至今没有变化，这叫做没有变化的东西和变化了的东西不相适应。过去的一套仅适用于对外妥协和对内镇压革命，现在还是用了这一套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所以处处不适合，各种弱点都暴露出来。不干抗日战争则已，既然要干了，并且已经干起来了，又已经暴露出严重的危机了，还不肯改换一套新的干法，前途的危险是不堪设想的。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

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像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这才能说得上坚固的团结。我们反对旧的那一套约束，因为它不适应于民族革命战争。我们欢迎建立一套新的约束代替旧的，这就是颁布共同纲领，建立革命秩序。必须如此，才能适应抗日战争。

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上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若干人们对于共产党愿意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觉得奇怪，如像上海的诸青来[1]，就是在上海的刊物上提出这种疑问的一个。他们以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不能并存的。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说到三民主义，还在十年前两党的第一次统一战线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就已经经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共同决定加以实行，并且已经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经过每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和每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的手，在全国很大的地区中实行过了。不幸在一九二七年统一战线破裂，从此产生了国民党方面十年来反对实行三民主义的

---

[1] 诸青来，上海人。1934年参加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上海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新学识》杂志上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后来，他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成为汪精卫汉奸政府中的一员。

局面。然而在共产党方面，十年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仍然是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产党没有一天不在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彻底的民族主义；工农民主专政制度也不是别的，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土地革命则是彻底的民生主义。为什么共产党现在又申明取消工农民主专政和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呢？这个理由我们也早已说明了，不是这种制度和办法根本要不得，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引起了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使联合全民族各阶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必需，而且有了可能。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共同反对法西斯，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也有了必需和可能。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我们用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的各阶层联合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在这种基础之上提出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的政策；我们今天停止实行这个政策，是为了团结更多的人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说中国不要解决土地问题。关于这种政策改变的客观原因和时间性，我们曾经毫不含糊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一贯地坚持了并发展了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所以共产党能于强寇压境民族危急之际，及时地提出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这种唯一能够挽救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现在的问题，不是共产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反而是国民党信仰不信仰实行不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问题。现在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据以定出一定的政纲和政策，并真正而不二心地、切实而不敷衍地、迅速而不推延地实行起来，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真是日夜馨香祷祝之的。为此，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

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这个纲领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不得到国民党同意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现在还是中国的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我们相信，那些贤明的国民党人会有一天同意这个纲领的。因为如果不同意的话，三民主义就始终是一句空话，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就不能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就不能战胜，中国人民的亡国奴境遇就无可避免。真正贤明的国民党人是决不愿意这样的，全国人民也决不会眼看着尽当亡国奴。而况蒋介石先生在其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已经指出：“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现。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这是很对的。现在的急务在谋三民主义的实现，放弃个人和小集团的私见，改变过去的老一套，立即实行符合于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彻底地与民更始。这是今天的唯一的道路。再要推延，就会悔之无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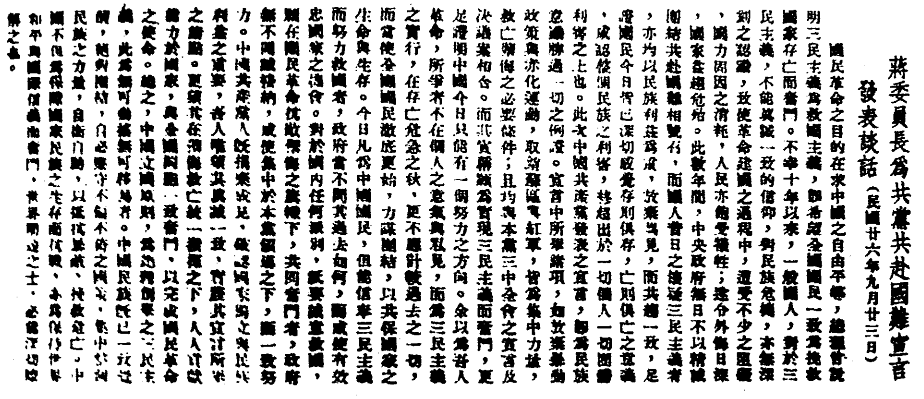
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现在的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的实行，没有一个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的军队都在执行抗战的任务，我们对于所有这样的军队，特别是在前线抗战的军队，都是具有钦敬之忱的。然而国民党军队的制度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

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广大的将士虽有忠勇之心，但束缚于旧制度，无法发挥其积极性，因此旧制度应该迅速地开始改造。不是说把仗停下来改造了制度再打，一面打仗一面就可以改变制度。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应学习西班牙战争的教训，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是从极困难的境遇中创造出来的。中国的条件优于西班牙，但是缺乏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缺乏一个能执行全部革命纲领的统一战线的政府，又缺乏大量的新制度的军队。中国应该补救这些缺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个经验，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当权的国民党的抗日同志们，我们和你们在今天一道负着救亡图存的责任。你们已经和我们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了，这是很好的。你们实行了对日抗战，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继续其他的老政策。我们应该把统一战线发展充实起来，把民众加进去。应该把它巩固起来，实行一个共同纲领。应该决心改变政治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一个新政府的出现是完全必要的，有了这样一个政府，才能执行革命的纲领，也才能在全国范围内着手改造军

队。我们的这个建议是时代的要求。这个要求，你们党中也有许多人感觉到，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实行同样改造的责任，今天是落在你们的肩上了。一切忠诚爱国的国民党人当不以我们的建议为不切需要。我们坚决相信，这个建议是符合于客观的需要的。

我们民族已处在存亡绝续的关头，国共两党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在国共两党团结的基础之上亲密地团结起来啊！实行一切必要的改革来战胜一切困难，这是今日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完成了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要我们努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蔣委員長爲共黨共赴國難宣言
發表談話（民國廿六年九月廿三日）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爲挽救國家存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因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爲重，放棄岐見，而共趨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真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害，轉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爲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祗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爲總理創制之三民主義，此爲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爲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爲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能深切瞭解之也。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图为蒋介石发表谈话的一部分。

和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谈话*

（1937年9月29日）

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救国之伟大事业，已在九月二十二日经过中央通讯社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及九月二十三日该社继续发表的蒋介石氏的谈话，建立起必要的基础了。蒋氏的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在蒋氏谈话中尚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尚没有能坦白地承认国民党过去十年来在民族危机中自己所应负的责任，不免遗憾！共产党的宣言及蒋氏的谈话，宣布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启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用以极大的增强抗日战争的力量。这个宣言是一个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本应早日发表，还是在七月四日起草，七月十五日就交付国民党了的，可是推迟了两个多月才发表；然而宣言的基本精神是没有损失的，这个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人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其基础。

致博古、叶剑英电[1]

（1937年9月30日）

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保安队均须进行政治上的整理，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集中五分之三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陈毅[2]或刘英[3]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任何游击队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致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陈毅，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3] 刘英，当时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闽浙边临时军区政治委员。

读艾思奇《哲学与生活》[1]一书的摘录

（1937年9月）

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

我们所用的一切名词（或概念，范畴），例如“绝对”“相对”等等，都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世界上有现实的马，才有马的名词。相对，绝对两名词，也不是和现实事物离开的。

日常生活中常常有绝对主义在作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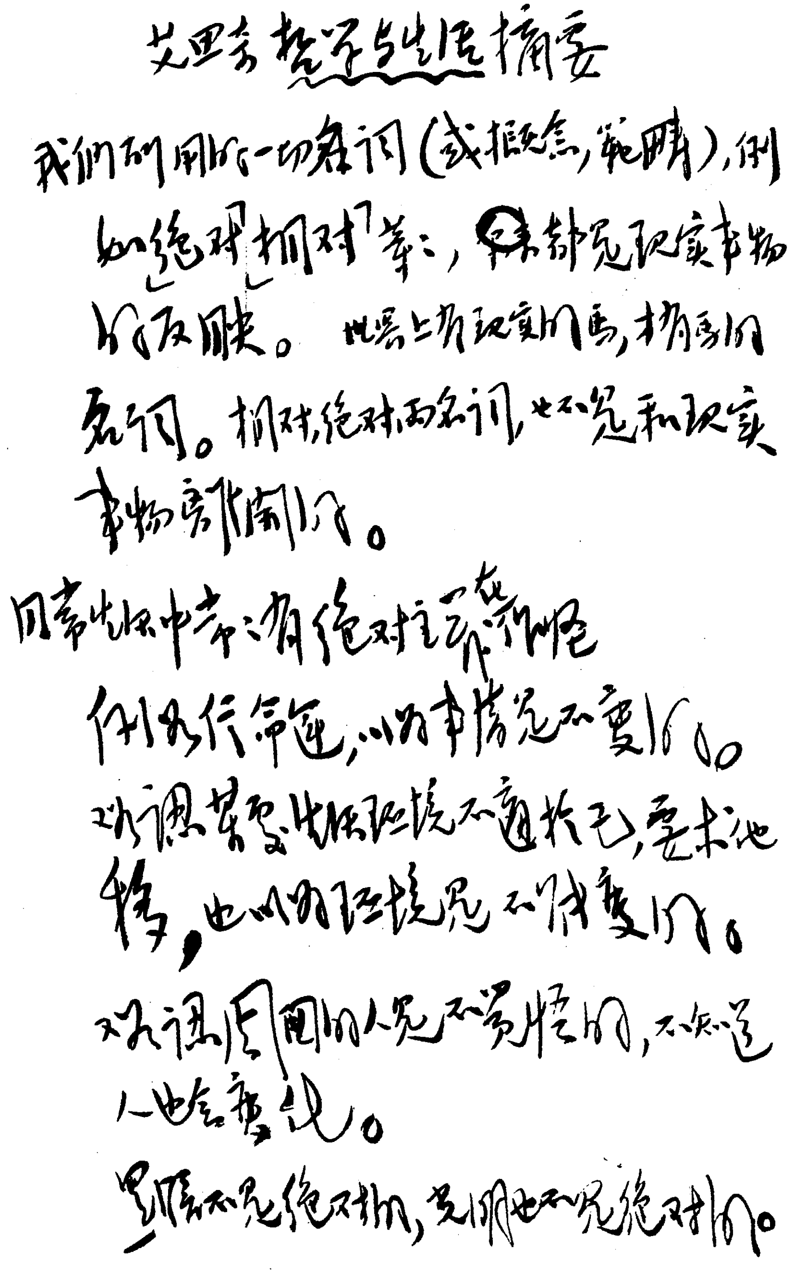
例如信命运，以为事情是不变的。又如认某处生活环境不适于己，要求他移，也以为环境是不能变的。又如认周围的人是不觉悟的，不知道人也会变化。

黑暗不是绝对的，光明也不是绝对的。

超过现实去追求理想的实现，与逃避现实，同是观念论。一切观念论中，大部分都是绝对主义。

---

[1] 艾思奇著，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1937年4月初版。该书以答读者问的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就若干哲学问题、民族问题和生活问题作了解说。毛泽东读这本书时对该书第一部分“哲学问题”中的“相对和绝对”“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3篇中的一些观点作了扼要的辑录，并略有发挥。其中标有“（毛泽东意见）”的一段，对原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艾思奇哲学与生活摘要

我们所用的一切名词（或概念，范畴），例如“绝对”“相对”等等，这些都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世界上有现实的马，才有马的名词。相对、绝对两名词，也不是和现实事物离开的。

日常生活中常常有绝对性存在的观念

例如说命运，以为事情是不变化的。

又埋怨某些生活环境不适于己，要求他移，也以为环境是不能变的。

又埋怨周围的人是不觉悟的，不知道人也会变化。

黑暗不是绝对的，光明也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读《哲学与生活》一书摘录的手稿（部分）。

左倾幼稚病，是一种绝对主义，因为他们把理想看绝对了，不知理想要按照当前实况才能实现。

黑暗的变动和光明的取得，是和努力与否成比例的，努力则然，不努力则否，这些东西的相对性，是对于努力或不努力而言的，是对于时间性而言的。

相对主义认为没有一定的真理，一人一理，十人十理，“还不是差不多”。这是怀疑主义，一切皆疑，无可把握。

怀疑是对的，怀疑一切是不对的。

老年人相对主义多，少年人绝对主义多。

相对主义夸张了事物的相对性。事物变动的绝〔对〕性是应该承认的，夸张到无可把握，就成了相对主义。

承认事物的变动性，相对性，同时又承认变动中相对中的一定的东西，事物发展的一定的规律，在相对中承认绝对的东西。绝对包含于相对之中。相对主义不承认这种规律性。

相对的东西，包含着一定的绝对的东西，绝对的东西，是作为相对的东西的每一个必然阶级〈段〉而表现出来，这就是两者的关系。

扬弃是：一方面把消极的东西抛弃了否定了，一方面又把积极的东西加以批评改作而保留下来，不是简单的抛弃。叶青说：“从前以形式逻辑支配一切研究领域，现在则把他局限在相对的静态中。”这样，我们否定形式逻辑，只能在他的应用范围上，而不能在他的质了，这不是简单的保留是什么？不是本质上承认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有同等意义是什么？（张友仁[1]）

---

[1] 张友仁，系当时给艾思奇写信的一位读者。他在信中驳斥了叶青等人对艾思奇《哲学讲话》（即《大众哲学》）一书的某些攻击。（此信刊于《哲学与生活》一书中）

运动的东西，在空间的任何一点上，都是同时停留，又不停留的，这是运动的矛盾统一。叶青说：“运动是静止的积累，静止是运动的停留，两者相生相成，互为规定。”静止只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决不是运动的停留，运运〈动〉也决不是静止的积累，如果只是静止的积累，根本把运动解消在静止里了。（张友仁）

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是最根本的问题。

辩证逻辑：A是A，同是〈时〉又不是A，一件东西和他本身同一，同时又不同一。形式逻辑只看见同一这一面。辩证法则不仅看见这一面，又看见另一面（不同一），因此他能包摄，吸收，扬弃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看不到的，辩证法能看到，形式逻辑看到了的，辩证法不但看到，而且加了改造与深化。

不能说：“一方面承认A是A，另一方面又承认A不是A”，就算是辩证法。这两个命题的关系不是所谓一方面与另一方面，而是同时，是互相渗透，互相联结。是整个的统一，不是机械的结合，也不能机械的折〈拆〉散。如拆散去看，就成了折衷主义。叶青的辩证法就是这种折衷主义的曲解。

叶青也承认归纳法演译〈绎〉法是建立在形式论理学上，是要被辩证法扬弃的。然而他又说：“我们也可以在应用中，范畴地看待归纳法演译〈绎〉法，而为辩证法研究过程中适当的场合。”这样承认整个研究是辩证法的，但在研究过程中有时要应用归纳法，演译〈绎〉法，将这些方法结合起来就成为整个辩证法研究过程。

归纳法是从许多复杂的特殊事物中找出他们一般的单纯的共通点，采的路径是分析。演译〈绎〉法是用一般原理说明特殊事物，采的路径是综合。前者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后者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照叶青的办法，整个的辩证法，不过将归

纳法演译〈绎〉法机械的折衷的结合起来而已。

照叶青说法，似乎辩证法的研究，也是从特殊到一般，从一般到特殊，他就是归纳法演译〈绎〉法，其实是错的。

在辩证法，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中，虽用到普通归纳法里的观察，比较，分析等方法，但只作为一个要素应用他。因为归纳法在这里只走着分析的路径，只从复杂事物中抽出简单的一面的规定。辩证法却不然，不只是分析，同时也在综合，即不只抽出简单的一面的规定，并要找出全面的矛盾统一的规定。

在从一般到特殊的过程中，是不是只用演译〈绎〉法，取综合路径，把一般法则应用到综合到个别事物上去就行了呢？不行的。如果要贯彻辩证法，就不单只应用法则，采取综合，在应用与综合同时，还要就那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具体条件加以分析，发现其新的特殊的矛盾动向。

不论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我们的方法根本都是辩证法的。归纳法演译〈绎〉法只各自作为研究过程中的要素而被应用，不能离开另一要素而独立存在。他们并不简单地被抛弃，也不简单地被保留，而是被吸收，消化，改作。辩证法是整个的辩证法，不是归纳法演译〈绎〉法拼凑成功的。

事物在量变过程中，他们性质不变，这时在性质说是相对静止的，然在量说始始〈终〉在运动。因为相对的静止仍是绝对的运动的一种特殊形态，所以在相对的静止，仍然要用辩证法去研究，才能看得深刻。形式逻辑只能看见静止一方面，并且会夸大这方面，忘记根本的运动。既然有了辩证法能抓着事物的全面，连形式逻辑的一面也包括在内，为什么对相对的静止还要用形式逻辑去研究呢？

叶青说：“认识中国经济的性质，显然是静态的研究，因而问题

的提出无疑是站在形式论理学上的。”

这是错的，这是折衷主义。照他的意思，只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才是动态的研究，是辩证法问题；形态，性质，关系等只是静态的研究，应该属于形式逻辑，这不是明显的折衷主义么？

性质关系等问题，是发展问题的起点，虽不能把他看作发展的本身，如果是忠于辩证法的，至少应从里面看出发展的动力，看出具体的矛盾，这是形式逻辑做得到的吗？形式逻辑只看见一面，只能成为公式主义。例如封建社会需要资本主义革命，这是公式。因为中国经济是封建经济，就说中国需要资本主义革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演译〈绎〉，在形式逻辑是很通的，也只能如此说，然而中国的具体条件被抹杀了。中国的具体条件不允许限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革命，也不许可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一切问题与此同样，形式逻辑不能解决问题，只有请出辩证法一途，从普列哈诺夫到叶青的公式主义，不能解决任何的问题。

二千年前希腊的诡辩论者，把运动看做空间中的无数停留点，于是结论说，只有无数停留点，没有运动。叶青说，静止是运动的停留，运动是静止的积累，这是诡辩论的还魂。

列宁说：“就是一个简单的判断，也是矛盾的统一，例如‘伊凡是人’这命题，就有着‘特殊等于一般’的意味。”[1]形式逻辑也常

---

[1] 列宁的这段话，是毛泽东从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抄录的，原书说出自列宁的《哲学笔记》。查《哲学笔记》，只有一段话与这段话意思相近，即：“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9页）。

说“青年是店员”这一类命题，而不说“青年是青年”，因为形式逻辑本身也不能严守同一律，否则他就建立不起来了。形式逻辑运用这一类命题时当然没有想到里面含有矛盾，因此不能说这是矛盾统一律的应用。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类的命题本质上包含着矛盾的统一。

艾思奇说：“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如只认善恶，男女等等才是矛盾，其他不能转化为矛盾，这是形式主义的划分法，与张东荪[1]划分‘相反，矛盾，对待’之为形式主义，是没有分别的。”

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

排中律的公式“A是B或非B”，其实包含着这样的矛盾，即“A不是A而是B”，或者说“B可以是B，也可以是非B”，黑格尔早

---

[1] 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曾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

已这样批判过了。

外因不可忽视，却不能决定事物的必然性，决定必然性的是内因。叶青说“须承认内因与外因的交互作用”，这是机械的交互作用，双方没有高下的，这就形成了叶青的折衷主义。辩证法的交互作用则不然，双方有第一义第二义的分别。

承认叶青的问题：“机械需要外部的动力，水遇外部的热化为汽，生物进化由于环境，是不是事实？”并不简单地否定他。然而同时须承认事物变化的本身能动性，这是事物变化的决定的东西。机械有可动性，水有化汽的性质，生物有进化的性质，因此动力，热，环境等外因才能起作用。决定事物变化的必然性的，不是外因而是内因。

一般的东西，总是要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世上没有单纯的一般存在物。所谓“一般之中有特殊”，是指取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一般的东西，不是说有什么独立于一般之外的特殊东西（如像叶青所说内因论是一般原则，但中国的特殊性却不适用他，中国的发展是不合规律性的）。一般和特殊是矛盾的统一，没有单纯的一般，也没有独立在一般之外的单纯的特殊。

辩证唯物论的特点，在于抓住事实的核心，事实的本质，事实的内部发展规律性，不在于尊重事实的表面。机械唯物论者，经验论者，实用主义者也都尊重事实，都只尊重表面的事实。尊重表面事实，是认识的初步阶段，是科学的初期阶段，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和机械的科学思想就是这样的。不否认表面事实也可给人以某些认识，十七八世纪的机械力学曾提供了许多真理，实用主义也比粉饰太平的空论家能多看到一点东西，能相当暴露敌人侵略的罪恶和绝对不抵抗的错误。然而单看见敌人的侵略，而不看见侵略的本

质，单看见不抵抗的错误，而看不见民众抵抗的前途，这种对眼前事实的尊重，与唯物辩证法是完全不同的。机械运动由于外力的事实，只是表面的事实，机械本身有运动可能性，才是事实的本质。机械论时代的科学，只注意外力的研究，是因当时科学还在初期阶段，还不能渗透到运动的本质中去。进到高级阶段的相对论，使人对机械运动也知用内因去说明了。天体运动，牛顿时代只知用引力（外力）去说明，相对论却用运动本身的性质去说明了。

给艾思奇[1]的信

（1937年）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2]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3]（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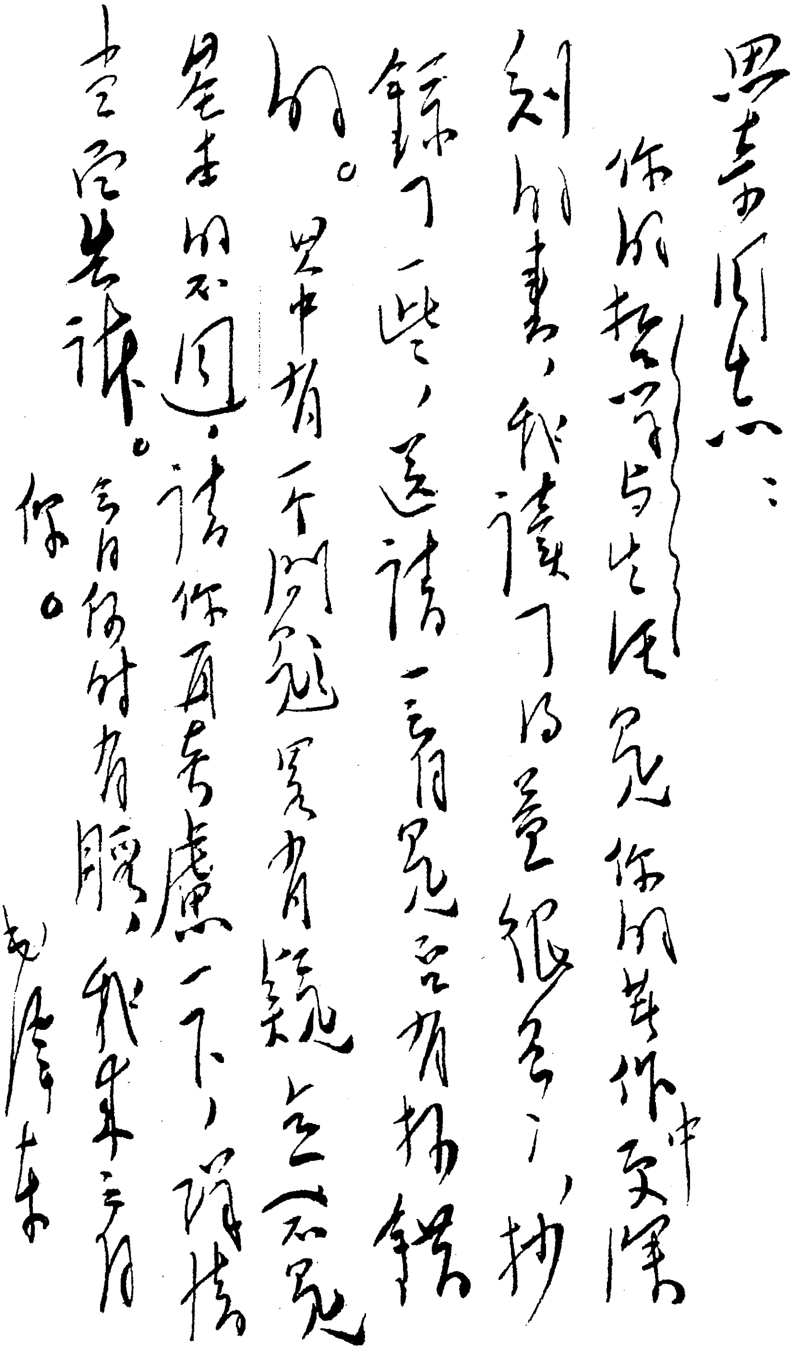
[1] 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哲学家。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

[2] 《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9月毛泽东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3] 指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摘录中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一个论点的质疑。艾思奇的论点是："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这个论点后，写了以下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师傅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毛泽东致艾思奇信的手稿。

和朱光的对话[1]

（1937年9月）

朱光：见面分一半。

毛泽东：岂有此理！

朱光：王羲之父子草隶，在你的笔下已经生花升华。颜柳欧赵书法，你早有临摹的根基。字帖先不说，剧本应该归我。

毛泽东：谁说应该归你？莎士比亚是一代戏剧大师。马克思喜欢读他的书，他的二女婿说马克思家中有一种真正的莎士比亚崇拜热，他的小女儿说莎士比亚是家里的《圣经》。……固然，也有人反对，拿破仑说，莎士比亚的杂剧是不可读的，是可怜的。至于我，我主张公道，马克思正确！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徒，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所有权问题，怎能与你朱光善罢甘休？

朱光：我是南国社元老[2]，有权决定剧本属谁。

---

[1] 1937年平型关大捷之后，一位青年作家在从五台山奔赴延安的途中，从日军轰炸后的废墟中拾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册名著和《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如获至宝，虽经朱德总司令多次通令轻装，但他始终爱不释手。到了延安经朱光引见，这位作家见到了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和朱光关于这几本书对话的主要内容。

[2] 朱光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南国剧社，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朱光：这样分配[1]合理吧?!

毛泽东：权既在你，我只得服从。但我要问你，你自称南国社元老，而今你还能演莎士比亚的话剧吗?

朱光：你听我背诵独白……

(朱光脱口而出的朗诵，声情并茂，唯一不足的是夹杂着客家话口音。)

毛泽东：你的口音不够国语化。

朱光：可我的表演，算是精彩吧?

毛泽东：如此说来，你演出《奥赛罗》，我必须到场领教啰!

朱光：岂敢，岂敢!

---

[1] 朱光得到了《奥赛罗》《李尔王》《石索》碑帖。毛泽东得到了《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三希堂残帖》。

平型关战役战果

（1937年10月1日）

博、叶，小开[1]：

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役[2]，除缴获汽车八十二辆，大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步枪数百支，打死敌人一千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之日文地图。被围残敌乘夜从晋军阵地突围而逃。是役晋军本约定二路出击，乃打至黄昏才出动，致未能全部消灭该敌。我军伤亡四百余人，内有副团长、副营长二三名。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但敌还从雁门关[3]一带进攻。我游击支队正活动于灵丘、涞源、蔚县之间，颇有缴获。敌用大兵团对付我游击队，还不知道

---

[1] 博、叶，指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当时他们代表中共中央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商定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主力整编等问题。小开，指潘汉年，当时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2] 1937年9月，侵入山西北部的日军向平型关、雁门关一线进攻，企图夺取太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以一个团和骑兵营于9月23日向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前进，钳制敌人；以三个团于24日夜冒雨设伏在平型关东北的公路两侧山地待机歼敌。25日7时许，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团一部和辎重车辆进入设伏地区，第一一五师主力向日军发起猛攻，经整日激战，歼敌一千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

[3] 雁门关，位于山西代县北部，长城的主要关口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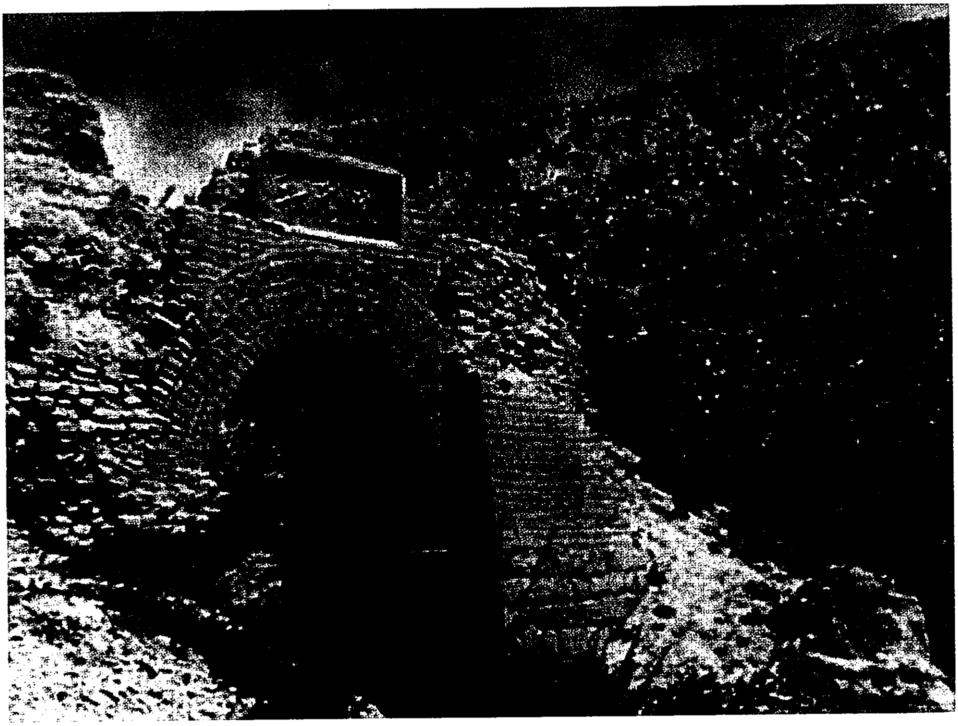
红军游击战法。我们捷报发至全国，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其中有蒋介石、杨虎城、马鸿逵、范长江、龙云、孙蔚如[1]，上海大公报，上海职业救国会，杭州、福州、湖北、广东、陕西、开封各省党部，武汉行营，开封绥靖公署，浙江、福建各省政府，浙江抗日后援会等。

毛泽东
十月一日

---

[1] 杨虎城，西北军爱国将领。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六八师师长。范长江，新闻工作者，1937年2月，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西安和延安采访，开始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龙云，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孙蔚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兼陕西省政府主席。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了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图为凯旋的八路军指战员。



平型关战役是中国抗战以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图为平型关战斗遗址。

致博古、叶剑英电[1]

（1937年10月2日）

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2]。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令项英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改编问题致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1937年9月，项英在南昌同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期间，曾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演说，表示一切服从国民党。项英的这个演说，被国民党利用，给党造成损失。

致张文彬电[1]

（1937年10月3日）

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速派人传达党的正确的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张文彬电的主要内容。张文彬，当时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广东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进行抗日战争，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

正确对待配属八路军指挥之友军[1]

（1937年10月4日）

朱、彭、任，并告林、聂、罗，贺、萧、关，刘、徐、张[2]：

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他们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为达上述目的，除作战指挥由上级负责外，对他们应取态度及方法须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

毛泽东

十月四日

---

[1] 1937年10月初，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为准备忻口会战，将作战地区划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为统一指挥参战部队，阎锡山与周恩来商定，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独立第三旅等十个团归八路军总部指挥。这是毛泽东关于指挥友军问题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电报。

[2] 林、聂、罗，指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副师长和政训处主任。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训处主任。刘、徐、张，指刘伯承、徐向前和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训处主任。

致周小舟电[1]

（1937年10月5日）

你在工作中的政治方向是没有错的，工作中表现了积极与努力，一般说来是有成绩的。但在工作中还表现了一些缺点，这就是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轻躁、粗率与骄傲的作风。改变的方向是用谨慎、周密与谦逊的态度去观察问题，去处理工作，去待人接物，特别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须严格采这样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小舟电的主要内容。周小舟，当时正奉命以中革军委联络员身份前往新疆执行任务。

关于各师在山西的作战部署

（1937年10月5日）

周、朱、彭[1]：

甲、完全同意周与程潜、阎锡山[2]共商决定之作战计划。

乙、我一一五师全部除一部做地方工作者外，应速集中于台怀镇以北，大营镇、沙河镇以南之山地，待敌人被吸引于原平、忻县地区并打得激烈时，袭取平型关、大营、沙河[3]、繁峙线，得手后交友军占领该线，我军向北突击，占领浑源、应县地区，开展新局面。

丙、王震部[4]速归还贺师[5]建制。贺师全部除游击支队外，主力此刻应隐蔽于五寨地区。待原平正面打得激烈时，我一一五师又已实行向大营、浑源行动时，即用主力出长城袭击朔县、左云一带，与一一五师相呼应，捣乱敌人的整个后方。

---

[1] 周、朱、彭，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2]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负责指挥平汉路方面作战。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平型关、大营、沙河，均位于山西繁峙境内。

[4] 王震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当时王震任该旅副旅长，率该团在晋察冀边区平山一带作战。

[5]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丁、一二九师以一个团位于孝义，主力位于包括娘子关[1]在内之正太铁路[2]侧后，主要任务是动员工人及两侧农民战略上策应林[3]贺两师，巩固后路。

戊、林贺两师原来划定之地区，均应派遣必要之地方工作人员，有计划地散开工作，于一定地区完成一定任务。不得因为主力作战而置原定地区之地方工作于不顾。以上部署意见，请朱彭速即考虑执行。

己、我军部署仅能当面告诉阎锡山，不得用电报告诉他，并要阎不得下达于任何人，严防泄漏。

毛泽东

十月五日十五时

---

[1] 娘子关，位于山西平定东北。

[2] 正太铁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3] 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在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6日）

贺、萧[1]：

王兆相[2]部既使用于晋西北地区，我们对工作布置有以下的意见：

一、估计敌人深入后，在后方的兵力，只能守主要的据点，企保持其交通线。

二、故在偏关、朔县、平鲁、左云、右玉与绥远之清水河一带等地区，极便利于我们广泛地开展游击运动，机动地与在南之主力部队配合，在平鲁以东之宋支队[3]配合，以及必要时与友军行动的配合。故你们根据目前的任务，对于工作的布置，应该：第一，在平鲁、偏关、朔县、左云、右玉、清水河、河曲、保德、苛岚地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抗日根据地。以神池、宁武、河曲、保德、苛岚为群众的依托，并掩护工作人员进行工作。留下的游击队均以义勇军[4]的名目出现。第二，在绥远之清水河一带，主要的是繁殖游

---

[1] 贺、萧，指贺龙、萧克，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副师长。

[2] 王兆相，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工兵营营长。

[3] 宋支队，指八路军雁北支队。1937年9月下旬由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一部组成，宋时轮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义勇军是人民群众为了保卫国家而自动组织的武装。这里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武装。

击队、义勇军。第三，在游击队下可以组织若干游击小组。

三、宋支队随我们亦同样，在平鲁以东及岱岳以西繁殖游击等地区联成一片。第一，暂以偏关为后方，工作团之固定指导机关即位置在该处。应从部队中抽一排人为基干，在偏关地区组织一个游击支队。第二，在平鲁、朔县各组织一个游击队，但每一个游击队至少须从部队中抽一排人为游击队的基干，这样才能成队。因山西群众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我们不派武装做基干是困难的。

毛泽东
十月六日酉

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挺进晋西北，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给周素园[1]的信

（1937年10月6日）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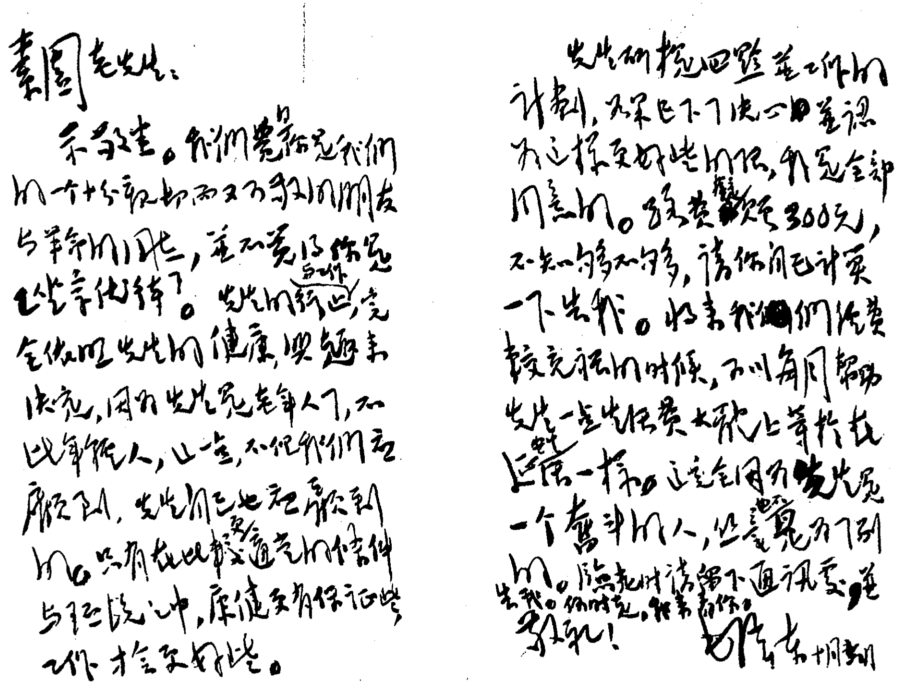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

[1] 周素园（1879—1958），贵州毕节人。1936年随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返回原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生客似的了。先生们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们的健康与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们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安适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们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完全同意的。路费暂定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们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些生活费，大致上等于在延安时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但这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你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廿日

毛泽东致周素园信的手稿。

关于华北作战的补充意见

（1937年10月6日）

周、朱、彭[1]，并告林、聂[2]：

关于作战问题之补充意见：

甲、程潜[3]放弃石家庄，集中兵力守太行山山地是正确的，但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龙泉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右翼除朱怀冰[4]外尚有些什么兵力，能达到坚守任务否？

乙、进入山西之敌，判断总数似不过两师半。为保卫晋北已经占领之数十县，至少分散一个师，则攻太原者似至多不过一师半。雁门关以南又须沿途分兵守备，则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似将不过一个师左右，已处于我三面包围中。如果龙泉关、娘子关能坚守一个月，又如果我方部署适当，则以我方兵力数量与质量计算，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因为我方兵力数量在十五万以上，红军与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 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副师长。

[3]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4] 朱怀冰（1892—1968），湖北黄冈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师师长。

卫立煌[1]军在质量上可为晋北战役之领导者，山西军已处最后关头，将不得不打一仗。

丙、此战役之关键在于下列三点：

（1）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

（2）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

（3）敌后方之破坏。

丁、为达上述目的：

（1）要求南京速加派生力军三四个师位于娘子关。

（2）要求卫军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余任守备。

（3）红军林贺两师[2]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另要求南京派生力军两个师从涞源、蔚县行动。

戊、为此目的，我一一五师主力不但不应出河北，亦不宜位于龙泉关，似应第一步移至豆村、台怀之线，以便适时袭击大营、沙河、繁峙线，并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北越长城出至浑源、应县，以此为中心，分为若干支队，采取夜间行动，袭击雁门大同线、大同张家口线之铁路，袭击张家口广灵线、广灵代县线之汽车路。一一五师这一行动（如再加南京两个师更好），配合贺师主力在左云、右玉、平鲁、朔县之行动，将引起山西敌军正面攻击之停顿，甚至暂时部分的后退，并将引起平汉线敌军停止深入石家庄以南，而采取以一部守备北平、石家庄线，以另一部转向灵、涞、广、蔚[3]地

---

[1]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指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

[3] 指山西的灵丘、广灵和河北的涞源、蔚县。

区对付我军。在一一五师本身，则因转移与作战频繁，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即应准备减员二千至二千五百，并因减员而不得不将枪支一小部分交与地方民众，武装他们。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

己、因此，在经过你们的详细考虑后，如果基本上同意此方针，便请执行下列步骤：

（1）要求程阎[1]确定龙泉关、娘子关新增守备兵力是何部何人，何时到达，保证东面之安全。

（2）要求程阎派二个师出恒山北段。

（3）要求程阎补充我军步枪三千至三千五百支，机关枪三十至三十五挺，并允许补充新兵五千至七千人。

（4）一一五师之教导营应开至太原为中心之地区，实行扩红，不要开到河北去，因为到那里扩红是靠不住的；骑兵营应随主力行动。总部及贺师亦应派人去太原地区扩红。

（5）刘师[2]主力或全部使用于正太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庚、以上意见请详加考虑电复。

此电写完，接朱彭本日六时电，我们意见已根本一致，但不知林聂尚有不同意见否？又向阎程建议，要求他们十分注意秘密，他们部署最好不用无线电，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毛泽东

六日一时

---

[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

《农村调查》序言一[1]

（1937年10月6日）

从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期间起，到一九三四年离开中央苏区为止，我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现在仅剩下下列各部分：（一）寻乌调查；（二）兴国调查；（三）东塘等处调查；（四）木口村调查；（五）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六）分青和出租问题；（七）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八）分田后的富农问题；（九）两个初期的土地法；（十）长冈乡调查；（十一）才溪乡调查。最后两部分，曾在中央苏区的《斗争》报[2]发表过，其余保存原稿，经过长征，尚未损失。此外的东西，就都损失了。其中最可惜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湖南做的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调查，因许克祥叛变[3]而损失；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井冈山做的宁冈、永新两县调查[4]，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为当时准备印的《农村调查》一书写的一篇序言。《农村调查》当年没有印，到1941年才在延安出版，毛泽东又写了一篇序言。

[2] 《斗争》报，是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曾分别在《斗争》报1934年1月第四十二至四十四期和1934年2月第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期上连续发表。

[3] 许克祥叛变，通称“马日事变”。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马），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该军军长何键策动下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

[4] 宁冈调查是1927年11月做的，永新调查是1928年春做的。

因井冈山失守而损失。这里存下来的，都是中央苏区的材料，前九部分是属于初期的土地革命，后两部分是属于深入了的土地革命。虽不完全，亦可见其一斑。为免再损失，印出若干份，并供同志们参考。这是一种历史材料，其中有些观点是当时的意见，后来已经改变了。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10月9日）

在敌人后方地区及迫近敌人地区，必须执行没收大地主政策，因为大地主多属汉奸，不没收大地主不能迅速发动群众，不没收大地主八路军给养难于解决。请通令各部实行。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给雷经天[1]的信

（1937年10月10日）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2]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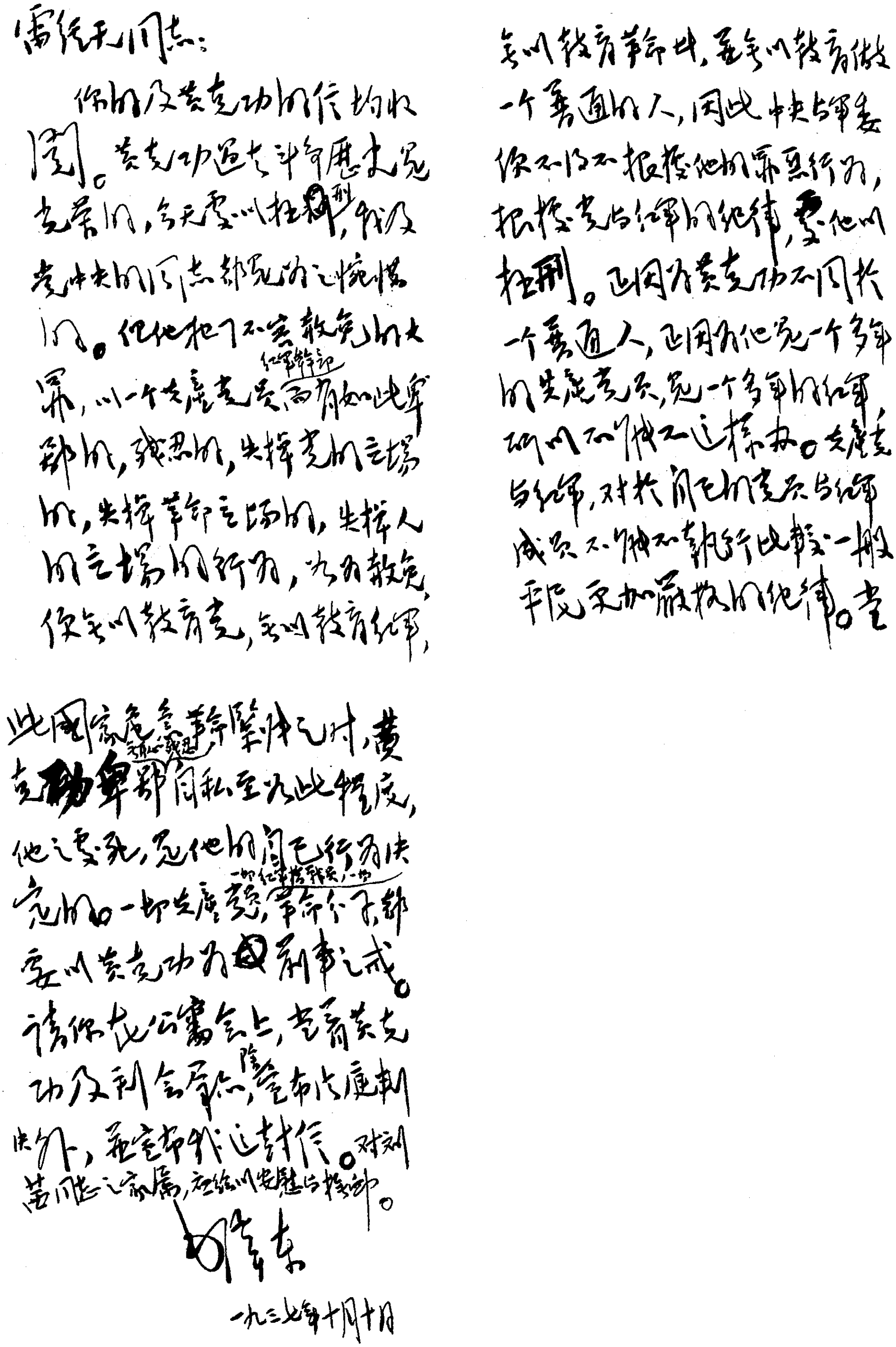
---

[1] 雷经天（1904—1959），广西南宁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是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

[2] 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他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毛泽东致雷经天信的手稿。

华北战局重点
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

（1937年10月13日）

周、朱、彭[1]，并告博、叶[2]：

甲、周灰电[3]判断是正确的，北面忻口[4]反攻无充分把握，东面娘子关[5]守备亦不大可靠。

乙、因此，朱彭任十二日重新划分区域之部署[6]是正确的，一二九师的使用须慎重。

丙、华北弱点在军队太杂，无一个主力军。红军在力求配合作

---

[1] 周、朱、彭，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

[2] 博，指博古，即秦邦宪，当时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叶，指叶剑英，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

[3] 指周恩来1937年10月10日的电报。该电指出，日军如猛攻忻口，卫立煌部是否有极大胜利把握尚难判断。

[4] 忻口，镇名，位于山西忻州北部。

[5] 娘子关，位于山西平定东北。

[6] 指1937年10月12日朱德、彭德怀、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的电报。该电提出为猛烈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地方游击队，特重新划分地方工作区域如下，如沙河、大营、满城线以南，上社（不含）线以东，平山线以北归一一五师负责；正太路及其以南地区归一二九师负责；雁门关以西、离石汾阳大道以北、长城以南归一二〇师负责等等。

战，争取华北持久的原则下，须同时顾到友军不可靠时的处置。

丁、可否向蒋程阎[1]提议任命黄绍雄[2]为娘子关、龙泉关[3]沿太行山脉以东各军（红军不在内）之总司令，以统一指挥确保娘子关。因娘子关不失则太原虽失仍可支持，如娘子关失守则华北战局立即变为局部战，失掉了全局意义。须知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如太行山脉及正太路[4]在我手，敌进太原如处瓮中，我军是还能有所作为的。请你们深刻考虑此点。

毛泽东

十三日午

---

[1] 蒋，指蒋介石。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黄绍雄，即黄绍竑，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3] 龙泉关，位于河北阜平西部。

[4]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关于太原失守后华北战略部署的意见

（1937年10月13日）

周、朱、彭、博、叶[1]五同志：

请你们考虑并向国民党提出下列战略部署意见，准备于太原失守后迅即执行之：

甲、太原即使失守，亦无关大局，因大同、太原线两侧均有我军向该线袭击，敌在我四面包围中。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2]。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我们红军全处被动地位，河南亦立受威胁。

乙、为确保太行山脉、正太铁路于我手中，准备向大同、张家口、北平线作战略反攻，坚持华北持久战，用以消耗敌人，保卫中原各省之目的，应实行如下的部署：

一、以现有太行山脉以东各部，并增加生力军五个至十个师，位于龙泉关、娘子关及其以东地区，以黄绍雄[3]为总司令，并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分向进攻之敌及平汉线[4]举行运动中的歼灭战，以

---

[1] 周、朱、彭，指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博，指博古，即秦邦宪，当时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叶，指叶剑英，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

[2] 正太路，指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3] 黄绍雄，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4]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达确保该两关及整个恒山山脉之目的。

二、以卫立煌、郝梦麟、刘茂恩[1]各部，另加川军两个师，以卫立煌为总司令，位于太原以东寿阳、盂县地区，除构筑坚固侧面阵地外，以运动歼灭战对付太原之敌。

三、以红军一一五师、晋军陈长捷[2]部，另加桂军两师、骑兵一师，位于五台地区，以一部除向平型关、沙河、代县、崞县[3]、原平线袭击外，主力准备于可能与必要时，向北夺取恒山北段，并袭击平绥线[4]。

四、以红军一二九师，位于正太路以南平定、昔阳至榆次南部之地区，创造根据地，准备万一不利时之南面防御战。

五、以红军一二〇师主力配合晋军主力十五个团左右，位于晋西北直至外长城一带，确保该地区，袭击太原、大同线。

六、以晋军二十个团左右配合红军一二〇师之陈伯钧[5]部，位于太原以西之汾阳、孝义直至离石、中阳地区，反抗敌军西进。

七、以晋军之余部，位于太原以南之太谷、平遥地区，完成对太原之四面包围。

八、将太原城及附近之居民，悉迁至汾水流域，准备烧毁太原

---

[1]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中央集团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郝梦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军军长。刘茂恩，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五军军长。

[2] 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军长。

[3] 崞县，旧县名，1958年撤销，部分划归山西宁武，部分与代县合并为山西原平。

[4]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5] 陈伯钧，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

城（此项由朱周彭考虑可能程度，如估计不可能，则不要提出）。

毛泽东

十三日

关于克服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倾向的指示[1]

（1937年10月13日）

小开、刘小〈晓〉二同志，并告博、叶、周、胡、林[2]：

（甲）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左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

（乙）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只有使国民党感觉到群众对于自己的不满与压迫，才能推动它在各方面的彻底转变。同国民党和平共居，只能延长他的错误政策的寿命。

（丙）对于国民党投降主义倾向必须开始斗争。对个别左倾领袖如章乃器等的这类错误，适〈应〉在报纸上有适当的批评。批评的态度应以说服为主，暂时可不指其名。这类左倾领袖今天起着把革命群众带给资产阶级的作用。

（丁）国民党在华北失败后，气焰大杀，其内部如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实力派对国民党老政策均表不满，更由于八路军在华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潘汉年、刘晓的电报。

[2] 指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胡服（刘少奇）、林伯渠。

北的模范作用，以及国际形势的转变，使我们在政治上处于完全优势。因此我们应不失时机对国民党的错误政策采取攻势的批评与斗争，主要方向首先是在改组国民党，然后及于改组政府与改造军队，这不是使国共合作分裂，而是使之更进一步的开展。

洛　毛
十月十三日

关于没收汉奸财产问题

（1937年10月15日）

朱、彭、任[1]：

十一日电悉。没收大地主，指没收汉奸政策的主要阶级内容，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在一切汉奸分子中，首先应坚决没收大地主，而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这是统一战线中的阶级路线，有向全体明确说明的必要。

洛[2]　毛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2]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负总责。

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1]

（1937年10月16日）

林彪同志，并告朱、任，贺、关，聂，雪枫[2]：

甲、据彭雪枫称，日寇某军自天镇向广灵，关东军[3]自蔚县急进，晋阎[4]拟集中十四个团与敌决战，希望我百十五师参加作战等语。

乙、我军应坚持既定方针，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此方针在京与蒋何[5]决定，周彭[6]又在晋与阎当面决定，基本不应动摇此方针。

丙、请你将当前情况及如何配合友军作战之意见即电告。尔后即时电告。

丁、一一五师现到何处？

毛

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的电报。

[2] 朱、任，指朱德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

[3] 关东军，指当时占据中国东北的日本侵略军。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5] 蒋，指蒋介石。何，指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6] 周彭，指周恩来、彭德怀。

致朱德等电[1]

（1937年10月17日）

我军各部胜利之后，易生骄志，易启轻敌观念，而敌在失败之后，对我必增加愤恨之心理，发生谨慎之心理，因此，请你们告戒各部首长，仍一本谨慎沉着精神使之与勇猛奋发精神相配合，争取与日寇之持久战。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7年10月17日）

朱、彭、任：

军分会十月八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洛　毛

十月十七日

---

[1] 10月8日，前方军分会发出《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影响下产生的。在指示中，把山西太原说成是华北抗日战争的堡垒，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特别是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模糊“游击战”和“运动战”两个概念的主次关系，提出“我们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机动果敢的作战原则，以高度的积极动作，争取新的胜利”“必须反对一切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等。这个指示只是根据看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和主观愿望写的，所以它是一个脱离实际和经不起实践考验的指示，因而也是一个错误的指示。这是毛泽东看到这个指示文件后，于10月17日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

关于对取消“全救”的认识
及其取消后上海救亡工作方针的指示[1]

（1937年10月18日）

潘、刘：

甲、关于过去全救取消的是否适当，当可研究。但把全救负责同志，分配到各方面活动，争取群众，组织各种有群众的合法团体的决定是正确的。

乙、全救的取消是我们自己为了开展工作，而不是为了同国民党交换抗敌抗〈后〉援会的上层位置。这同西安西救的取消是不相同的。

丙、上海党目前工作的中心，不是在恢复已经自动取消的全救，而是在加强各种救亡协会与救亡团体的群众工作，扩大这些团体的群众基础与独立民主的救亡活动。用最具体的事实，揭发国民党及抗敌后援会包办政策的错误，以达到抗会的民主的改造。

丁、必须彻底改变在党自己所领导的救亡团体中，命令主义与包办主义的工作方式。尽量发展民主主义，吸收无数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发扬他们最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洛　毛

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潘汉年和刘晓的指示。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10月19日）

在山西须坚持与阎锡山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但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朱德等电的主要内容。

论鲁迅[1]

（1937年10月19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

“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1]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

[1] 指鲁迅1925年12月29日写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发表在1926年1月10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上。

基础战术

（1937年）

第一章　绪论

一　民众怎样负担战争行动

赤手空拳的民众，不比荷枪实弹的武装，怎么能够冲锋陷阵、杀敌报国，去负担战争的实际工作呢？这是一个很普遍的很合理的疑问。但是我们要知道军队所用的兵器效力，和军队所做的工作的目的在什么地方，那就可明了我们民众在赤手空拳中还有制敌兵器和工作！

军队的兵器的最大效用不过是杀敌，最终的目的不过是削弱或消灭敌人的战斗力，那末，我们日常生活中，哪一件东西不可杀敌，哪一种行动不可以减少或消灭战斗力呢？譬如刀、木棍、斧头、锄头、板凳和石头，件件都可以杀人。如剪电线、拆桥梁、造谣言、散毒药、绝接济，处处均可使敌不方便或减少敌人的战斗力，就是我们不肯决心去利用。如果我们实在要去杀敌灭敌，到处都是我们的兵器，到处都有我们的工作，来从事军民联合行动。

二　特别注意事件

此外还须特别注意的，就是现在的国际战争，它的残酷使我们意外，时间也很持久，我们不要受着未曾见过的残酷战争痛苦，就马上受着威胁屈服，我们也不要受长期战争的影响，就马上忍耐不住而厌倦了，我们应该以最刚强的精神，最热烈的爱国情绪和持久的意志，去和敌人作顽强的斗争。我们要知道，战争的状况和时间虽然是残酷和无情的，还不像战争失败了，国家灭亡，使整个民族陷在大劫不复的地位的时候，那是更残酷而无止期的。故而，无论战争如何残酷，最后五分钟的奋斗，我们要绝对地坚持忍耐下来，尤其是我们目下的敌人，是利在战局的速决，而我们失利战局的持久的策略。

三　不要怕敌

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就不要以为敌人手上拿着武器就如老鼠见猫一样怕得不得了，不敢接近他，混入其中去做破坏的工作。我们是人，敌人也是人，均是人，那么怕什么呢？怕他有兵器吗？兵器我们可用方法夺取过来的，不过是怕给敌人打死。可是受敌人压迫到这步田地，难道还有谁怕死？死还不怕，那还有什么敌人可怕呢？所以我们看见敌人的时候，无论他是多少，要当他是可以充饥的面包，马上就可以将他吞下去。以上各件，是我们在实行扩大的时候，亦应该注意的。

四　游击战术的定义

在陆军主力不便和敌人作大规模的会战时，故派出别动队或游击队，采取避实攻虚、飘忽无常、随机制敌，按战术正规的应对敌人的方法，就叫游击战术。

第二章　战术

在我们国防设备未完全，武器不及敌人精备的时候，我们要对敌决战，应该守着下列的几个原则：

一　行军警戒

行军的时候，在前卫之前或后卫之后，侧卫之侧的四五里的距离，均须派遣便衣队，身怀短枪，以充侦察，防敌人意外的攻击，或多余的冲突。

二　驻军警戒

我们驻扎地方如果有敌人接近之虞的时候，每日对于敌方，必派遣一队作远出二三里的侦探，或做联络地方团体，鼓动民众抗战的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报告，使我们能准备警戒撤退，不至打不必要的仗。

三　不可攻坚

若敌人固守，或据险抗拒。我们非有特别把握，切不可去攻他，因为攻他很费时日，我们必有倍敌的死伤，且在游击战中，我们炮兵不健全，若轻易攻坚，则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方敌人很容易从四面包拢来。关于这点，军民务要镇静，不可轻易凭一时气愤乱干。

四　不打硬仗

不有十分胜利的把握的仗不可打，因为杀人一千，自杀八百，那是不合算的，尤其是在我们的游击战中，人员弹药补充困难。如果打不胜仗，自己失了许多人员弹药，在我们算是失败。

五　敌情不明不可战

我们驻在某处忽然发现敌人，不知敌人多少，或从何来，则绝不可战，应决然撤退至十里外。如十分接近，只好派掩护队。因为敌来攻，一定是兵力占优势或有计划的。我们千万不要上他的大当，如敌大我退，自然得便宜，如敌小我退，不过有点疲劳，再去打也不迟。

六　要有民众组织和联络

现代战争，非军队可单独胜任之事，尤其是在游击战斗中，必

需民众的力量，才能有利地把握。因为有了民众的帮助，则凡关于运输、救护，即不幸失败也有方法逃脱或收容，因此，民众没有组织和联络的地方，不可轻易作战。不要侦探、扰乱等，有很大的便利，同时可陷敌于孤立的地方，则于我之便利特多。

七　用民众实行封锁的袭击

在敌人由我们包围封锁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动民众，四方断绝敌人的交通，使敌人不知道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后利用暗夜或拂晓将其击溃。

八　单纯军队的袭击

探知敌人，距我于数里之外，警戒必定疏忽，此时我则轻装速进，于拂晓前，出敌不意，把他歼灭。

九　用民众扰敌

以军队主力决定之。在战斗时，以一部分军队，分为两数组，至少以一排为单位，领导地方民团、警察、义勇军或其他农工民众，打许多军旗，占领四面山头或村镇，利用铜锣、梭镖、土炮、刀矛、喇叭等，满山遍野，叫喊起来，去扰乱敌人耳目，或日夜断续地在四处鸣枪，使他们恐慌，精神疲倦，然后我军以全力出其不意，从侧面击溃他。

十　打圈子脱离敌人

大敌当前，我们无力迎击，则利用打圈子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利用山脚使敌人赶不上。同时沿途利用民众，使之担任前后的侦探工作，不致受敌人前后夹攻。

十一　脱离危境

后有追兵，前有阻挡，或追兵过于强大的时候，为要脱离此危境，可以一部分部队在距离四五里的地方，引敌人走入大道，主力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绕敌后而袭击之，或用民团、警察在另一路上走去，遗些物品与足迹、路标，贴标语，引敌穷追，我主力则从小道冲击，首尾攻击，四面包围而歼灭之。

十二　声东击西

军队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去，绕行他处，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击溃他。

十三　埋伏掩击

敌人急急追来，我择地埋伏，候敌到达，可一网打尽。

十四　中途狙击

探悉敌人要从某方前进，中途山峦复杂，道路狭小的地方，派

一部兵或射击精良者，藏匿于道旁的山上或树林中，候敌人重要部分经过时，从山上滚石，并猛烈扫射，或狙击其乘马的指挥官。

十五　坚壁清野

侦知敌人将临，而我们的力量又不与战的时候，即须实行坚壁清野的计划，把民众的粮食、锅灶、柴米、器具等悉行藏匿，以绝敌人给养；并将乡区的民众除留老人、妇女及儿童，以备侦探消息外，其所有壮丁悉数率其逃跑使敌人无人与之挑运、带路、探消息。同时更派些人击敌后方交通路，截断敌人的接济，捕捉传令兵等，剪断或破坏通信设备。

十六　对于优势敌人的应付

1. 敌进我退：敌人比我们力弱，是不敢攻击前进的，如他向我们前进时，我们可断定敌人定挟优势兵力而来。主动的有计划的和有准备的，则便宜避其锋，预先退却，如中途遭遇，在敌情不明或预知敌军的优势的时候，丝毫不犹豫地掩护退却。

至退却的地区，不宜由大道行远走，而受敌人穷追，必须盘旋于附近，施打圈。敌出我前，便绕其后；敌在山上，我在山下；敌在中间，便退两侧；敌在左岸，便退右岸；敌在右，我便退左。

但退却时可在叉路上，我们不走的那条路，故意遗弃物品或派出一小部分兵马，践踏些足迹或写些标语或符号，而将走的那条路，用标记截断，使敌人追击方向不明。

在这个时候，当地民众和警察、民团或义勇军等武装团体，最

好由各方面路退去，以混敌人耳目。留一部分在原地，把制服或武器等藏于地下，以小贩之类去造谣，或假献殷勤去探敌人数及企图或敌人宿营的地点询问，并警戒的情形。如敌人询问我军退却的方向和兵力，就指东说西，指南说北，以小而大，以大而小，胡乱造谣。等军队未攻打的时候，就把人安置好，武器拿出来从中取利，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无路可归。

2. 敌退我追：敌军退便要乘势前进，因此际敌人军事必有变动，才施行判断没有决心和我们决战，并乘势掩击其后。敌方的掩护部队一定没有决战先头部队。在敌方整个计划上，很难回转。如在山岭崎岖、道路狭小、河流险阻、桥梁很多的地方，即折回亦须很久的时间，即或折回，后卫已被消灭。

当时民众团体就要设法把敌人退路的桥梁或联络电线破坏，最好等他们的大部分退去，趁着后卫和我方军队对峙中，把退路塞住，使他们欲归不得，欲救不能。

但此时民众所负的重大责任，还是要先侦察敌人退却方向和有无埋伏、诈退、从两侧包围我们的企图，马上报告。使我军得放胆去追，或设法逃避。

3. 敌驻我扰：敌人新到我们领土内，地势不熟，言语不通，侦探派出无用，等于走入绝境。此时我们再加扰乱，到处枪声，一定使彼睡卧不宁，使彼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很大的影响。哪怕怎么强悍的军队，也要动摇，也要疲劳的。等到他们精神动摇，肉体倦极之际，我军联合起来，一致突入，定可把他们全歼。

十七　对于劣势敌人的处置

为民族生存而战，为达成游击任务，为消灭敌人的战斗力，扶

起民众勇敢的精神。对于劣势之敌，当然要联合当地人民群起包围，一举歼灭之。

十八　唤起民众

民众每多贪小利而忘大义，往往受敌重利而心为虎作伥。故当敌人到以前，对于当地民众，而尽力鼓吹，唤起他们的抗战情绪，使他们有绝对奋斗到底的精神，不贪利、不妥协、不投降，切实服从指挥，同我军合作抗敌。同时并组织抗战会，和其他职业团体，以便指挥，必要时举行清乡，肃清汉奸为敌人利用。

第三章　战争的目的

游击战争最终的目的，固然在解除敌人武装，消灭敌人的战斗力，收回被占的土地，救出被蹂躏的同胞！然而有时因客观状况及种种关系，不能达到此目的时，则完好的土地，完全地给敌人来支配，那是不应该的，因此，我们就要想法子去破坏他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使他们虽然占领我们的土地也没有用，自己自动地退回去！

在游击战争中，要守着“得地不是喜，失地不是悲”的原则。失城失地是不要紧的，最要紧是想法将敌人彻底消灭。因敌人如实力未损，纵然得到城市也保不住。反之，我们力量不足的时候，虽把城市失去，还有恢复的希望，切不可固守城市，而把实力去作牺牲。

第四章　组织

一　组织时机

1. 在宽阔的地带从事战斗，人烟稀少，文化落后，尤以交通不便，各种通信设备不完全的地区为宜。

2. 狭窄的山陵地带，不容许大部队行动的起伏地及隘路附近。

3. 敌人后方的人民同情于我军时。

4. 敌人的武器精良，实力雄厚，不得不避免真面目的战斗时。

5. 敌深入我境内，企图处处施行扰乱牵制敌人的行动时。

6. 丛林杂草，深可没人的地区，尤以恰逢青纱帐起的夏暑之季，为最有利。

二　组织的方式

游击队动作，是将以下的三个方式而形成：

1. 从本军派出骑兵大部队，并配备骑炮兵，或骑兵随伴排多配属轻自火器，尽可能地迅速潜入敌人的后方，切断后方一切交通联络，从事毁灭其附近粮草弹药存积所。并从该后方分出小的支队和分队，破坏或消灭敌军一切有军事意义的场所，待至任务完成后，迅速地从另一方面以战斗开始道路归还本军。

2. 派出骑兵，或步兵特别支队。其兵力应由一排或几连，尽可能地深入敌人后方，以飘忽的行踪，转战东西，如不得已时或敌某时到达时，亦可秘密地巢居该处若干时间，依情况之需要确定，是用全体人员，或是一部。有时以在敌人后方不能再继续驻扎，或是

所受任务已经完成后，或因敌人已察觉我之行迹及任务，而加以确实的防卫时。

3. 在敌人后方，选当地强悍少壮居民，组成若干分队，受我所派素有经验及训练的人员指导，或是受预先在当地所培植的有经验的人员指导。这些分队秘密的动作，是由此一地区转至彼一地区，变换他们的服装番号与外行，用尽各种方法，掩盖自己的行踪。

4. 或由部队征求志愿者，配以精灵的轻武器，以对此素有经验与研究的官长率领，为特种游击队。

5. 游击队以素质而别，由挑选自愿者为特种游击队。由部队某一部做普遍组织者，为基干游击队。由地方组织者，为地方游击队。基干游击队与地方游击队联合行动时，得由基干游击队队长指挥之。

6. 队员之选择，基干游击队员，要由健康、坚定、忍耐、勇敢、敏活的士兵充任之，而这些兵，要自己愿意加入这支队或分队的，因游击时独立行动，其任务是否按照命令做到，往往无法证实，常常脱离上官监视的行动，故队员的选择与训练以“忠实负责”为中心。

7. 游击队的支队长和分队长之选择及委任尤须审慎考虑，因为他们的智力，以及忠勇的才干和军事知识，尤其是游击队动作的战术知识与相机应变的活泼脑筋、踏实果敢等，为完成企图与任务必具的条件。

三　兵力

游击队兵力的强弱，以任务需要而定，常有五人十人至数百

人，其最大限度不可超过一团。盖如兵力过大，则兵力行动呆滞，粮秣供给困难，难于伪装，难于隐蔽。因此一切企图尚未达到，即被发觉或识破，弹药补充均成问题。又往往受困于不良道路，是以一切企图不独归于泡影，且常陷于往返奔劳之苦。

小游击队主要的优点，就是玲珑敏活，不要多的时间和力量，就可得食物，也易于找到休息场所，既不要多的粮秣和宿营地，更不受恶劣环境所阻止，弹药补充亦易，如不成功，可倏然退回。

四　兵种

游击队之兵种，以骑兵、工兵及大运动型兵种为宜。骑兵为担任扰乱敌人的翼侧，或于边击时压迫敌人的后尾，并扰乱其侧方及后方，骑兵均仍为一，且骑兵无论何时，均为游击队唯一的通讯工具和侦探工具。工兵是破坏敌人的后方交通（如铁路、电话、电线、桥梁等），故骑工兵为游击队不可缺少部分，至于大运动型之部队，益使敌有神出鬼没、行卧不安之感。

五　武器游击队之武器

除步骑枪各种轻机枪手榴弹外，并须多配以手枪及冲锋枪、机关枪。如地形许可，并附以重机枪及迫击炮或小炮。

六　官兵及行李

轻便敏活为游击队之物质，故一切行李马匹、装具弹药等，均

应为极力简单，以求轻便。其战斗员非战斗员，均以适合游击战为适当的编组，其他非必须的人员力求减少。

1. 游击之官兵，每班不得超过八名，每排不得超过二十六名，每连不得超过百名。

2. 如自动火器较多时，更可酌减人数，游击队亦可以五六名更换行动，收扰乱侦探之效最大。

3. 各主管官之勤务兵，至多不得超过一名，其余则按任务之繁简或二人三人合用一名，更注意不得滥增传令兵代替勤务兵之用，或同一任务派遣不必要之多数传达，致减少本身战斗力量。故当派遣传令兵时，其能否达到任务，必宜审慎考虑。

4. 每伙食单位，以不带伙食担子为佳，分带干粮尽时，乘机借居、家具做家粮补充，如必须带伙食担子，每单位不得超过二担。

5. 文件担子，除必要外，不得多带，普通团二担，营一担，连一担即可，每担重量，不得超过四十公斤。

6. 官兵，其私人被着及包袱等，均应自行携带，不必另外长工挑担，但事前须严厉规定之。

七　携带物品

游击队最好有如下各物：

一、破坏铁路、电话、电线以及军械库等的器具和炸药。

二、临时之救急药视季候而定，但绷带等必须长期备用。

三、指北针和游击队动作地域内的地图。

四、尤须携带轻无线电机，以便随时报告敌情及偷取敌人情报。

五、携相当数量之金钱以备不时之需要及采办粮食之用。

八　纪律

游击队之军纪良否，影响我们军的信誉及能否得民众同情与拥护，严格的纪律，方能保障其一切独立行动之彻底胜利。因此，对于违反军纪而危害民众利益，与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的人员，必须毫不客气地严重惩罚之。游击队对纪律之运用，不只是单纯之运用，加强官兵的政治教育，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在无形中减少许多违反纪律之行为，使官兵洞悉民众心理，适时善用与百姓打成一片。

九　政治组织

1. 游击队的各个队各分队，皆为设政治指导员一名，部队应设政训处，以便管理官兵，进行政治工作及司理一切政训人员之人事问题。

2. 游击队每一伙食单位均应设司务员一名，以防反动分子之潜入与活动，和劝导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意志动摇之士兵。

3. 为防止士兵之逃跑，游击队中应成立反逃跑委员会及十人团，十人团与反逃跑委员会是防止逃亡的消极办法，兹将其组织及工作，概要略举如下：

（1）为防止逃跑起见，部队应成立反逃跑委员会，每个伙食单位应成立十人团。

（2）反逃跑委员会之人数，为七人至九人，会长一名，余为会员，由刻苦耐劳、思想坚定之下级干部及十人团团长组成之。十人团之人数共十人，团长一名，余为团员，由忠实可靠之士兵组成之。

（3）十人团在工作时，则服从反逃跑委员会。在军务上，则服从其主管官及反逃跑委员会。在工作上，则服从政训处。在军务上，则服从队长。十人团或反逃跑委员会在工作上，亦得受其主管官之指导。

（4）十人团工作之进行，注意一般官兵之行动与言论，特别是对“营混子”之流。

①秘密监视不稳定分子，□团员亲身或其朋友。

②每于极其困难之后，或我军稍挫之余，于宿营时，宜特别注意士兵所生之不良心理及危及士气的谈话。

（5）反逃跑委员会之工作，主要的是在考查各十人团工作情形，适时监督之，指导之。并可召集各十人团团长会议，或团员大会，讨论一切工作进行。

4. 沙漠式的军人生活，每天学科术所与之疲劳，而使人发生厌烦及反感。为使军中娱乐，调剂枯燥生活，游击队中应成立俱乐部与娱乐室（其组织细则及工作，详后）。

十　特种军事组织

1. 为补救弹药之不足及射击技术不精良起见，每连有三名至九名之特等射手，专为狙击远距离或特种目标（敌军官、机枪射手及炮手、传令兵等）之用。

2. 游击队的各支队及分队长，均应选定目力极强之传令兵，作观察员。通令支队长有两名，分队长有一名，专为补救战场观察之不及。

3. 游击队的各支队、各分队，应有看护兵两名，专为临时医治

官兵病症并进行卫生教育。

4. 为确实明了敌情，不失时机地得以应付起见，游击队中应普遍成立侦探队，通常队有一排，支队的一班，分队一组即可。地方侦探队之建立，亦由侦探队到处组织之，或事先预伏侦探人员。

第五章　任务

游击队动作的主要目的，在尽量于敌以精神的打击和于敌后身引起混乱与骚动，吸引敌人之正面兵力到两翼或后身来，停止或迟缓敌之作战，致分散彼之兵力，各个击破之良果，以神出鬼没的行动，使敌于进退维谷之丧颓状态。

一、破坏敌人行动地域内之铁路及公路，并路上重要之建筑物，电话尤为重要。

二、损坏敌人主要的及次要的兵站。

三、破坏敌人粮食和军械的仓库。

四、袭击敌军后方的辎重队、传递步哨以及骑兵侦探等，并掠夺敌人从后方运到各方的生活品及弹药。

五、袭击敌人独立支队及其未曾确实占领的住民地。

六、主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扶助民众之自卫。

七、破坏敌后方飞机场及空军仓车。

第六章　动作

一　行动

1. 首在秘密和审慎的准备，神速和突然的袭击，如暴风急雨浓

雾密布之时或敌军疲劳困惫之际，或深夜黑暗之天候，皆为游击队进袭之绝好机会。

2. 游击队的动作，应该是一种进攻的战斗，无论游击队兵力之强弱，都可出其不意，乘其无备施行袭击。但如有不利之征候或无胜把握时，宜急速退回，以免受无益的损失。知游击队预定的袭击失利而敌人转为攻势时，则游击队亦宜急速退却。惟在无法避免敌人之追击时，才对敌人抗战，然后逐步退回。

二　战术的运用

1. 游击队之利害，并不全关乎自己兵力之大小，而在于使用自己突然的袭击与埋伏，以声东击西，忽此忽彼地出现，真假立旗帜，虚张声势，散布自己力量的谣言等，以震恐敌人之军心，造成无限的恐怖。此外注意活学活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真伪装挺进等法。

2. 游击队之发动民众，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使敌人消息断绝，给养困难，兵力疲劳，地势不利，然后出击，实为致敌于死地良策。

3. 游击队之袭击埋伏、坚壁清野等法，皆不能奏效时，则采用攻其旗必救之方法，诱敌于运动中，施行不意之袭击。如一部攻击某处，而以大部兵力，潜伏敌援军必经之路旁，施行截击。

4. 游击队应极力避免阵地战及一切真面目之战斗。地方游击队未受正式军事训练，不可以之对敌进行正当的和持久的战斗。因此地方游击队在最初成立时，须使之随基干游击队，或特种游击队行动，经过相当时期，方可独立行动。

5. 或攻敌最感痛苦之处，以吸收其大部兵力来援，然后我分主力至他处，消灭所余的孤弱守军，或截击未至的部队于中途。

三　地区的利害

1. 游击队在开阔地上动作时，因少良好之遮蔽容身，于我稍有不利。因游击队之活动，特以隐蔽地、山地及复杂的地形内有利。

2. 游击队须详知其活动区域内的地形，经常地考虑如何能从敌军料想不到的地方，取秘密而隐蔽的路径、溪谷、森林、羊肠小道等，以接近敌军乘其自信安全，毫不提防之际，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予以突然之袭击，并且忽而隐蔽地遁去无踪，至敌退却、攻战、守行止坐卧均感不安的程度。

3. 较大之村庄、市镇与粮食财物较多的地方，皆为敌人追扰之目标，游击队应经常侦察敌踪，预先埋伏于半途施以截击。

4. 游击队在其所担负的区域内，用尽一切方法，使敌之小部队，无法窜入，敌之主力无法隐蔽，必要时，亦可用暴露游击队区域以外之敌人兵力与配置，或其企图等。

四　季候

游击队应考虑季候（适于动作的冬天、夏天或秋天），考虑敌我力量，特别应考虑战斗兵器，并应详知敌军部队的编制，某季候于我有利否，亦视地域而定。

五　秘密的行动

游击队动作之物质，均在乘敌不意，因此必须采用一切方法，保守军事秘密，其详如下：

1. 队长对部属说明其任务与动作计划时，应在刚出发前，或行进中，必要时得将整个企图，分期逐渐说明之，其他人员不在必要时，不使知之。

2. 游击队之命令下达法，最好是由队长与部属当面说明，一切笔记命令，务宜少用，以防泄露秘密。

3. 对向导与居民，不应与之讨论自己的一切行动和计划，至对我同情的居民也是如此，特别是开往某处袭击时，更要禁止讨论。

4. 预先派出忠实可靠之侦探，前往宿营地点，或埋伏于敌后要道，以封锁彼之消息。

5. 行军时，暗号与路标，由后卫彻底负责除去之，且采用曲线式的行进，使敌莫测我之行进方向。

6. 部队番号皆用规定之代字，严禁直呼部队之本名。

7. 一切文件，除必要外，阅后立即焚毁。

8. 为掩饰游击队之真实企图起见，除采用上述方法外，有时亦可利用当地居民散播关于游击队行动的假消息，以欺骗敌人。

六　运动的部署及准备

为使运动迅速起见，除将一切组织，力求简单外，不论何时，并应有完善之行动准备（路线之调查及侦探、病号之安置、向导之预备，最好用当地同情游击队的农民或可靠的人）以应带

齐三日的干粮为最佳。如是则欲行则行，欲止则止，不须临时部署。

七　胜利条件

1．游击队胜利的条件，是在游击队之官兵，有绝对的勇敢与坚定性，并须具有协同的精神与充分的机构，和忠实于自己的任务。此外还须有健康的身体，能够耐无限之劳苦，善于使用自己的武器等。

2．游击队不应于困难时期，沮丧志气，纵遇危险环境亦不停止其活动。对于战争之必胜心，与事业成功之信念，尤其对于民族敌人的仇恨，更是以唤起勇往迈进之志向。

八　联合行动

如小的游击队，因自己人少，不能进行其所受任务时，可以同时联合几个游击队，来达成此种任务。夜间是游击队活动的最好机会。

第七章　袭击

一　袭击前的任务审慎考虑

当游击队集合完毕时，侦探通信联络等都已设施圆满，预备开始袭击某个住居地时，游击队长首先应查明下列各点：

1. 该住居地卫戍兵力之大小，配置如何？武装如何？战斗力如何？其派出警戒又如何？

2. 附近有无其他敌人？如有，距离若干？能否迅速援助此卫戍队？设想将如何来援？由何方来？

3. 游击队方面和敌人方面，有何种道路可通？所拟袭击地方，有何种隐蔽接近路径？怎么走近袭击的地方？以上三点，不独为袭击所要知道，即事后退回，也不可不知。

4. 袭击时间之决定，最好能在夜间举行，因为有黑暗的掩护，即使袭击失败也可以使敌人恐慌。但我们必须熟悉地形，明了敌人的配备，或者有很好的向导时才行，否则这种袭击，宁可选在拂晓以前。若对兵站袭击，则其时间最好在深夜，因为兵站上的人马和物品，他们重新上路，是从很早的清晨开始。

5. 当地居民能否助战？如何使居民不能因此起而自扰，在谨慎考虑袭击的计划中，但要避免各种繁琐的计划。

二　出发前的注意

1. 游击队在出发前，应完成行军准备（同第三节之六）。并应携带担架，以为运送伤兵之用。

2. 袭击敌人的方法，在事前不只是队长及各支队长和各独立的分队的一切人员，都要根本了解。这种传达方式，应由指挥者与部下当面说明为好，一切笔记命令，务须减少，以免发生遗误。

3. 各级军官在出发前，均应指定代理人，一面为表示自身之坚决牺牲，并为预防其伤亡时，部队动作，不致因彼而影响全局。

三　运动中的注意

1. 游击队之运动须力求隐蔽，勿使敌人发觉，因此行进时应离开大路及大村落，而选择偏僻地方，甚至在完全没有道路的地方，而沿羊肠小径行进。但要避去泥泞湿路，以免过于疲困。

2. 行进时不应老在一条路上行进，因为敌人容易就此寻找出其踪迹。又为秘密其行动起见，通常以夜间运动为宜，甚至长途行进，也应在夜间。

3. 行进时，为遮蔽自己起见，派出的警戒，应减少到最小限度，通常只派出几个路上侦探就够了，并须有很好的向导。

4. 若不能自信绝无敌人间谍来窥时，最好是用小的分队向不同的方向分进，而在秘密的指定地点集合。

5. 游击队运动时，经常应有与敌遭遇之准备，因此游击队之军官，通常率其次级军官，在道路上侦探后或老兵后或部队前方行进(部队则交副者率领之)，情况易明了，部署极敏捷，见可进则进，知难后退，只须二三长官，一度会商，便可决定。既免命令往返，迟又误时机，更少后方遥制，不合情况之弊。

6. 游击队之士兵，除路上侦探外，皆不应装子弹，以防途中走火为敌察觉。

四　途中遇敌时的处置

1. 游击队在未到达目的地以前，绝不应引起无目的战斗，虽于途中遭遇敌军，亦须设法绕过之，甚至与预先指定的有所偏差，亦必如此做去。但在无法避免战斗时，应从埋伏中与迅速准备中，以

出其不意的奇袭以歼灭之。惟是切行之际，须注意敌人停止或前进情况，须从各方面进行侦察。若敌军不曾准备战斗，或有力而乏机警时，即应立即对之冲锋，否则仍然继续隐蔽，静待时机。

2. 路上遇敌之哨所和侦探等，要不被彼等瞧见，静肃地迂回过去，如遇审查有机可乘时，则用迅速手段，不开枪而捕获之。

五　袭击时兵力部署

游击队当袭击时，其兵力之部署，大约如下：

1. 以大兵力，向敌之要害处猛烈攻击，施于迅速坚决之突击。另外一部绕其侧后方，积极活动，以混乱其判断，使其莫测我主力之所在。

2. 全力向敌之一点袭击，但其他方面仍假立旗帜，以少数散兵，虚张声势，以混乱敌之耳目，分散敌之兵力。

3. 如事前能判定敌人之退却路线，则须在可能范围内，派出一部分兵力去堵截。如敌有大炮及辎重配置于村落外时，则指定特别支队夺取之。

4. 如游击队兵力大时，应分成几个纵队，从二三方或多方施行袭击，以求截断敌之退路，但须顾虑周到，以免引起自己队伍的混乱，将自己错认为敌。因此在事前必须预定信号或记号。

5. 在袭击敌军之际，如有某方敌军增援之处时，事前应配置一小部队于其增援路上以阻止其增援，或将此种危害，告于本队。

6. 袭击时对敌攻击重点之选择及兵力之区分（通常主攻方面，用全兵力三分之二，助攻方面，只用三分之一）。务须使敌之兵力不及开展与增加，而为我各个击破。

7. 游击队的各支队，应在袭击的最近距离内，分遣兵力，联络前进，最好在冲锋地点的距离上。因此可以避免迷失道路及过早分散兵力之弊，也可以保障被袭击的危险。如各个独立纵队，或小游击队之间相隔愈大，地形愈生疏，则希望于同时突击愈困难。

六　突然强击的成功

大部在于趁敌不备，而于其惊慌失措中，猝然冲锋。为使袭击能出敌不意而得到成功：第一，须迅速秘密，不可过早暴露自己企图。第二，要敌之警戒不甚机警时。第三，要虚张声势，分数路同时袭击，使敌举措纷乱，自相惊扰，不能尽全力与我顽抗时。第四，在实行袭击时需依照预定的钟点，不喧哗，不射击，不喊“杀”声，要使每一士兵皆须了解袭击时武器的使用，就是刺刀和手榴弹，不可闻枪声而还射。只有在敌人有机可乘时才能前呼后应，选用正面的、侧面的、迂回的、直接的突击。

七　袭击成功后的处置

1. 袭击任务完成之后，游击队即应迅速遁去，遁去之先，最好是先向某个虚假的方向过几里，然后再转到自己真实的方向，以使敌人无从知我踪迹，无法追踪。

2. 游击队不宜押带俘虏及大批的胜利品，以阻碍进行，最好是将俘虏缴械，然后遣散之，或格杀之，胜利品则由地方政府或居民输送之。

3. 战斗期间，每连以官兵三名，专负收集遗弃枪弹之责，战斗

胜利后，须尽全力收拾战场，且可号召附近民众收集之，不使有□锱铢之遗。

八　袭击失利后的处置

若袭击失利时，则迅速退至预先指定的集合场，通常集合场，是在前夜宿营的地方，如兵力充足时，则于指定的退却路上，留置一部预备队以备收容俘虏及伤兵。

第八章　侦察

一　侦察时的注意

1. 一切情报之搜集，必须不失时机地报告上官，或通报友军。

2. 搜集情报时务须详尽，一切马虎敷衍之报告，应严厉地制止。

3. 侦察之范围，不仅限于敌情，且应注意地形，一切有害于我而特别有利于敌的地形、隘路、渡河点，以及迂回渡河点与隘路之可能等，都应该知道。

4. 与游击队有关的一切事物，应力求详细周密，直至彻底明了而后已。

5. 注意人民对敌我双方情绪和关系，是否积极援助我方？其积极性是如何表现的？

二　侦察的手段

游击队派出勇敢而聪明的人员及侦探，向各方进行侦察，尤其

与当地民众，亲密地打成一片，并于紧要地方，利用可靠居民，或同情于游击队的人民（如利用封建关系、找亲戚或找被敌杀害之家属，或仇敌之人民均可）给以较优之工资、秘密地布置侦探网及递步哨，使我消息灵通。

三　对敌人兵力及其技术兵器的侦察

1. 在何处发现敌人的步兵与骑兵、炮兵或其他部队若干？敌人的装甲汽车、装甲火车、坦克、飞机等数目若干？并在何处？

2. 敌人在其正面与后方地域或城市，以及其他地方，如何筑壕？并以何种部队布防？

3. 敌之兵站及其仓库在何处？

4. 敌军情绪如何？是否愿意战争？其对人民及其长官关系如何？

5. 敌军武器、被服、粮秣，以及其他预备品的供给如何？

四　对地形的侦察

1. 首先应注意此地地域内之重要道路及其方向、宽度、土质状况等，是否适合于诸兵种之通行。

2. 有无森林？如有，须注意森林属于何种及所占面积。有无沼泽？在何处？占面积若干？能否通行？如能通行，更须注意其能通行何兵种。

第九章　埋伏

一　埋伏的种类

从隐蔽配置中，突然向正在进行之敌人实行袭击，谓之埋伏。游击队唯一惯技，就是埋伏，埋伏极易得到良好的效果，而且通常皆属顺利，其动作分：

1. 诱伏：即我军所谓伸开两手，诱敌深入也。

其法先以主力，埋伏于道路两旁，或一侧之隐蔽处，另以小部兵力，向敌攻击。佯作败退之势，引敌深入，然后主力由一翼或两翼突出袭击之。

2. 待伏：与诱伏略同，但不须以部队佯败，致敌深入，乃于高处设置观察所，以观察敌军之行动，与其主力达到地点，然后突出袭击之。

二　埋伏的地点与对象

对敌之单独兵、通信兵，整个运动部队、辎重队、运输队，火车等，皆可设置埋伏，其详如下：

1. 对敌之骑兵与步兵，则应埋伏于其不能使用武器及不易发挥威力的地方。

2. 对敌之辎重队和运输队，则应埋伏于森林中或村缘。

3. 埋伏路旁袭击敌之小部队，或整个运动部队、汽车运输纵队乃最有价值。但首先须明了其企图及其前进方向与通过时间，并详虑及侦察易于奏效的埋伏地点，同时对自己的退却道路，亦应预先

选好。

4. 对于铁路列车，实行埋伏时，游击队可分成三部。第一部于铁路附近，占领阵地，以防列车抵抗。第二部占领列车两旁，向车厢发射。第三部是担任冲到车上收查、卸货缴械等。

三　埋伏地形

1. 埋伏的地方应有良好的隐蔽，避免敌之觉察，并且便于观察敌方。

2. 能发扬射击之最大效力。

3. 须能从埋伏地方，迅速地一跃扑进敌前，因此，埋伏地方与敌军之间，须设有丛林之阻、沼泽之陷，以及其他隘路断绝地等。

四　埋伏的距离

突施袭击的游击队，如兵力充足，且欲扑近敌身时，则应埋伏于道路近旁，反之，如敌之兵力甚大，仅图向彼扰乱时，则停留于道路之远处。

五　埋伏的要诀

1. 伏兵最宜静肃，无论日间夜间，绝对禁止高声谈话，或逡巡线上。

2. 久处于埋伏中，足以暴露企图，增大危险，因过久人员紧张

状态，渐趋于减弱，慎重态度，不宜于保持，故而被敌察觉。最宜注意者，如已被敌发觉时，则立即动作，或迅速遁去。

第十章　对敌征发队实行袭击

一　袭击时机

1. 对敌人征发队冲锋，得在下列时机实行之。
2. 在进村庄实行之。
3. 待其进入村庄，分向各户征发时行之。
4. 待其将完成征发事务，满载而归时从埋伏中袭击之。

上列诸种，究以何者为宜，须视当时之情况，由游击队负责者妥为估量，适时处置之。

二　村落中的袭击

在村落中袭击敌人的征发队，最为有利。因此时敌之征发队之大部分，分散各处，不易猝然集合，但此种袭击须偷过敌之警戒哨所，或者毫无声息地捕获其哨兵，然后行之。

三　村落外的袭击

袭击者力量薄弱时，必须等待征发终结，并候征发纵列进到便于袭击的地方，如通过森林、桥梁、隘路等处，然后实行袭击。

四　袭击的目的

游击队击溃敌人掩护征发的部队时，只能算执行了自己任务的一部，必须尽毁或俘虏其车辆。因此，游击队首先要将敌人掩护队卷入战争，而以主力袭击其辎重并夺获之。

五　袭击时应注意的事项

在袭击敌人征发队时，易于得到地方居民之援助，故在可能范围内，须分一部财物于民众，以提高其勇气。

第十一章　袭击敌人运输队

一　袭击敌人运输队

可获得自己需要的武器与粮食，以及供给品等，这是游击队中最有利的一件事。

二　突然袭击

可使敌人惊慌失措，顿成纷乱之象。因运输之夫役，多系压逼而来的胆小农民，加以掩护队之兵力有限，并常是延伸于很长的距离上，如翻倒车轮之一，可使后方的输送车辆全部停止。

三　袭击法

1. 游击队须不要忘记自己的任务，并不是要战胜敌人，而是要夺获敌人的车辆，所以为要同敌人掩护队战斗起见，只须拨出一部分人员即可，而余的人员，则使之掠夺、驱逐和毁坏敌之运输品，故每次袭击，都要力图迅速径向运输队开火，使其停止进行，以扩大其扰敌及恐慌。

2. 为停止整个的运输纵队，只须射击其先头部分已足，因在群情惶惑中，前面停止了车辆，彼此互相倾轧，颠覆道旁，遂演成极度混乱的现象。如大批辎重，因先头部队遭到射击，而后方车辆，为企图折转，躲避时，则游击队必须拨出少数射手，猛烈狙击其纵列后尾，使其不敢回转。

3. 如游击队劣势，而敌掩护队又极机警时，则游击队以继续不断地警报，疲劳敌人，当运输队通过森林谷雪地及其某种隘路，敌之辎重纵列不易由道路上回转过来时，即迅速地实行袭击。

在村庄中，袭击辎重队不能时常有利，因掩护队和辎重队易于利用家屋及其他掩蔽物，实行顽强抵抗。

4. 如掩护队已被击溃，辎重队的抵抗也被压服，而增援队未能赶到时，则游击队便着手毁灭车辆及载物，或将自己不能携带和不能利用的物件尽量毁坏之。

第十二章　游击队的通信联络及后方交通的破坏

一　联络的对象

为求互相援助和随时得到敌情起见，游击队对于地方之居民，

应尽量地保持最密切而最确实的通信联络。

二　联络工具

维系此种通信联络，除在可能范围内，得利用电话外，应使用一切现有的工具，如徒步兵、乘马兵、脚踏车兵、事前部署的秘密的通信兵及递步哨，以及信号与约定记号等。

三　报告送达法

1. 重要的通信联络及有时间性的重要报告，最好用乘马来联系。如不能时，则须派出忠实的长于路行的人员，或预先部署的秘密通信送达之亦可。有时并得派出数人，以保障此报告能确实送达（此法必限于最重要之报告）。

2. 如不甚重要的普通报告，通常是用徒步兵与脚踏车兵转达之。有时还可雇用熟悉道路而忠实的当地居民递送之。

四　联络信号

为便于指挥各游击队或分队，在日间或夜间，在山地或森林中动作起见，游击队长应预先规定若干基本信号和记号（如夜间火光，日间浓烟、色巾、旗帜、旗语、口笛等）。

五　对后方交通路的处置

敌后之交通路，当破坏与否？宜详加考虑，如认为自己军队将

来不须利用或不能利用时，可破坏之。

六　破坏交通路的注意

如欲破坏交通路，须熟知地形，才能神出鬼没地敏捷出现，迅速遁去，不发枪声解除敌人警戒，更不使敌人惊逸。

七　开始破坏交通路的准备

当开始破坏交通路时，须先派出支队到发现敌人的地方，监视敌人巡查及其小支队，使其不能迅速地秘密地接近本队工作的地方。如开始工作后被敌发现，则开始射击，以阻敌接近。

八　各种地物的破坏法

1. 破坏铁路，当在最不易修复的地方，如铁路转弯处，或在铁路掩蔽处、警戒松懈处、能遮蔽工作处，以及能造成大的破坏处。在破坏铁路轨时，须拆却之，或挖空其下面低洼地方，则作成沟渠，隧道则填塞之。

2. 枕木、木桥、电信杆、电话杆则用火烧之，铁丝则拆走或抛入水中。

3. 在车站上的信号转辙器、十字杆、铁路车辆等，则损坏之，最好以炸药炸毁之。

4. 破坏石铺路和公路与桥梁及其他建筑物等，均依该建筑物之

性质而破坏之。

第十三章　经常隐藏地与住址时的警戒

一　队伍的整顿

不仅是休息与整顿队伍，且用以保存弹药粮食和受伤人员与患病人的安身休养地方。故此地，通常在战斗上也是支撑点，一遇敌人追击时，便向此退却，秘密地隐蔽起来，以便待机而动或重新开始对抗敌人。

二　地点的选择

1. 能持久休息的隐蔽地，便是树林深处、沼泽附近的茅舍，土屋、山中的岩洞、独立农庄、隐僻的小村落。因同情故，小游击队寻得经常隐藏地并不困难。

2. 游击队对于选定的几个隐藏地方，务必严守秘密，就是最密切的人如与本队没有关系，也不可使之知道。如原有隐藏地面被敌人发现，则通常不待敌人来袭击，便须迅速迁移。

3. 有时此种隐藏地，又作为军械库、火药库和粮食库，且以之安置伤病员者，但各种仓库，通常是选定独立的秘密地方于隐藏地附近，因隐藏地，一经人们时常出入其间，极易被敌发现。

4. 人民中拥护游击队的人愈多，而游击队又能与人民维持通信联络，则游击队愈易寻得隐藏地，有时为避免敌人追击，求得良好

的隐藏起见，不得已在相当时间内分散本队，使各人设法隐藏于各居民家，在如此场合，居民也是游击队员唯一的救星。

三　粮食问题

1．如在居民仇视游击队的地方，只有强行征发，但须派队中可靠人员以免发生掠夺。

2．游击队在不怕暴露本身时，可派出特别小队征发粮食或收集捐助之食品，或要地方供给。

四　变换驻地

游击队保障自己安全的最好方法，必须动作灵活。如必要时，可每夜变换自己驻地（如白天在甲村，黄昏移至乙村）。

五　驻地的占据

游击队宿营时，其兵力分配，全以动作的性质来决定，但不应该占据自己力量不能扼守之大村落。若不得已而位置于此种地方时，只须占领几个独立配置而便于防御的集团家屋。最好是在适当的村落中，能瞭望各方，特别是敌之来路，但切不可将队员散住于各屋。以贪个人之便，致为敌所乘。为不使敌人知我驻地，最好是深夜才进入村中，并监视村之四周，无论何人均不许外出。

六　警戒的程度

为使队员不致过劳，而得到真实的休息起见，无须派出大的警戒，只要对于各接近地和道路（敌人必经或与我有关的道路）设置军团哨与潜伏哨，对于各主要方面，二里至四里处，派出侦察即可。

七　准备

游击队在驻扎时，无论官兵，随时均须作战斗准备，特别是黄昏后，每官兵收拾身旁的武器和装具，使有秩序，以便于黑夜中如有警报，能迅速出动应战。

八　有敌袭击的顾虑时

1. 如游击队本身非常机警，侦察团之组织非常严密，地方又同情我方，常将一切行动，报告前来时，则敌人之突然袭击，是非常困难的事，但在任何情况下，还须慎重。

2. 为防止敌人借仇视的居民，来袭击起见，必须采取特别预防的特别方法。例如，以恐吓手段、警戒居民和拘捕押人，但部队尤须□□与准备。

3. 设有警报时，可集合全体于有抵抗准备的屋内，此屋内，应派适当之枪前哨和瞭望兵，屋之出入口，应以活动的障碍物封闭起来，并规定防御信号。武装和装具，应准备妥当，靠着身边。

4. 当情况十分紧急之际，支队之一部，须担任阵地和住所的警戒，对于邻近敌方敌人情形随时报告游击队。

5. 用人工的障碍物，来堵塞出路，对于第一线与预备队的交通，以及与地方必要的交通与通信联络，都应设立。

6. 村落内的街道，如有必要时，可完全封闭，或留有通口，各支队兵力在容许时，须有预备阵地。

九　敌袭时的处置

1. 发现敌人向我运动时，如侦知敌兵力不多，则一举而击灭之，如敌优势于我数倍时，则迅速退却。但当退却时，须以虚假方向，显示敌军，而掩饰自己真实的退路。

2. 如敌袭而我不及避免时，则充分利用村落防御战的优点，与之顽抗，然后乘机退却。

3. 已失了的村落，应以反攻或逆袭的手段，迅速夺回，以便救出被俘虏的同志，以及据守一点依然誓死顽抗的同志，如动作迅速，均可达到此种目的，因敌人在胜利之后，常处于极端混乱，且疏于警戒的状态中。

4. 实行这种逆袭或反攻的最好时机，是紧随着在敌人袭击胜利之后，冲锋所受的牺牲，比较逃跑，或比敌人袭击时停在恶劣阵地上所受的牺牲少。

第十四章　训练

一　训练范围

不仅限于军事技术，而政治及识字运动及卫生训练等尤须注

意，因此游击队之操作时间，必须平均分配识字训练，可使之随时随地练习。

为使游击队之一切训练收得圆满效果起见，必须提高官兵自动的学习精神。故除政治方面，提高其政治觉悟外，还应增进军中娱乐，调和枯燥生活，扶助人民自卫，使民众武力，与我打成一片。

二　各科的训练

各种训练步骤，虽难以等齐，惟普遍方式，均由浅入深，先松后严，由简易而入繁难。先局部而后普及，每种必须以实验证明其理论，以坚定其信念。

三　人民自卫力的培植

1. 游击队最迫切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被敌人占据的地方内，不断地往来游击，捕杀一切汉奸和反动分子，保卫民众。同时调查敌方具体罪恶，用尽各种手段揭破其欺骗与阴谋，宣扬我之善战。努力联合民众，扶助民众力量。这种动作即在敌人领土内，亦可施行。更当用尽方法和力量，吸引人民来照本身的行动，鼓舞其积极地对敌战斗，并指导其战斗动作。

2. 扶助人民自卫力量，应有持久性的，而非动于一时，务使人民知道游击队不论何时，都是为民众而奋战和牺牲的，就在危急紧要关头，也决不危害民众抛弃民众，居民被我引发起来的战争，如遭第一次失败，其斗争情绪必有相应消沉，则我应于其颓唐之际设

法鼓舞之，使彼等斗争情绪重新提高起来。

3. 游击队系人民中最觉悟而先进的分子，故先联合不满意敌人的民众，受所派人的指导，更须帮助人民拟定计划，取得武器，并与受压迫毗邻的村落及其他城市中的群众团体，取得联系和助力，但在进行此种工作时，都要保守极端的秘密。

四　卫生的训练

1. 为巩固其本身战斗力起见，每一伙食单位应设一名或二名的看护兵，以便适时医治官兵之病症，并讲解卫生常识，以及协助主官督促队中一切卫生事宜。

2. 医药补充，游击队中最感困难，故须按季候筹备些救急与必须的药品，以防于万一，对受伤或重伤的队员，不得已时只有托付稍能懂得医术的同伴，或同情于我的居民。

五　军事教育

1. 课目：军事教育以敌军为对象，造成超过敌人各项特殊技能。其特殊注意事项，即解散、集合、射击、行军、爬山、工事构筑、夜间战斗、山地战、隘路战、侦探警戒、搜索、联络等动作。

2. 方法：军事教育之进行，宜特别注意教育与进解诸方式，并略举如下：

（1）理论之讲解，可采用启发式及问答式，一切讲演式与注入式教育尽量减少之。

（2）讲解动作时，应注意现地讲话，使士兵易于明了。

（3）多做实际动作少讲空洞理论，因之讲堂时间及次数，应力求减少，实地演习之次数应加多。

（4）讲堂上之一切讲解，以能与野外演习的对照为佳。

（5）一切动作，实施前须精密准备，一切敷衍塞责的马虎现象，务必扫除之。

（6）一切工作，设法鼓动官兵进行比赛，以提高其工作自动性与积极性，致促进工作效率。

（7）增加应有教练，减少制式教练，并纠正制式教练足以维持军纪之错误观念。

（8）教练计划，须适合环境地域及时间，切忌千篇一律的教育计划，抓紧一切机会，厉行机会教育，兹略举如下：

①利用行军时，进行方位判定，地形识别，距离测量，侦探动作，目标指示法与地形物之利用。

②宿营时则利用警戒配备，演习前哨以下之各种警戒动作，与工事构筑等。

③利用作战机会，在出发前，或战斗开始前，根据受领之任务，讲解埋伏袭击或主攻助攻等动作。

④利用待机动作之时机，就实地讲解御敌冲锋与射击等各种战斗动作。

⑤利用战后讲评（这种讲评事前须有详细之调查），指出战斗经过中一般动作之缺点，与个别指挥之当否，给全体官兵以实际的教训。

⑥利用早晚点名时间，进行各种讲话。

⑦利用游戏时间，进行含有军事意义的游戏及歌舞新戏等，使官兵无形中增高其悔改及效法心。

⑧利用每次赏罚，在官兵中深切地宣传，以提高士兵之向上心

及羞辱心，逐渐养成良好之军风纪。

六　政治教育

为使游击队一切独立行动，取得彻底胜利起见，除军事方面，加紧训练外，最主要须使官兵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和“忠实”于自己事业。政治教育，就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唯一办法，其内容详后。

七　识字运动

为提高官兵之文化程度，易于接受一切训练起见，每一伙食单位就必须进行识字教育，其法如下：

1. 甲班，凡识字在五十字左右者编入之。
2. 乙班，凡识字在二十字左右者编入之。
3. 丙班，凡一字不识者编入之。
4. 各班识字之指导者，即以队中文化程度较高者，充任之。
5. 驻止时，每日须有一小时识字时间，行军时，则利用进行中或休息时间进行教育，此项工作，只求经常有恒，不求太速，普通每日能识两字者即算上等。

第十五章　政治工作

一　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

是在坚固并提高队员的战斗力，因游击队的战斗力，不只是靠

军事技术来决定，最主要是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民众，瓦解敌军，使广大民众受我指挥，游击队中无论政治、军事以及其他一切设施，都是向着这唯一目的迈进。

二　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实施复兴民族的政治教育启发其民族意识与爱国、爱民、爱群之观念，使游击队中，每一官兵皆能明了其所负之民族责任，为国家奋斗的必要。

并应注意拥护领袖，精诚团结，彻底执行上级命令，维持铁的军纪，使之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决心与志气。

游击队除了巩固本身战斗力外，更须向群众宣传侵略者及敌人的阴谋。

三　小组讨论

此事系团结意志、坚定信念、宣扬主义的良好工作。

1. 集中各同志意见，以免隔阂，以收集思广益之效。
2. 借以训练干部增强工作能力，更可熟悉开会制式及发言法，借以迅速地介及问题，更可检查过去，改造将来。
3. 考察联络，吸收同志。
4. 便于训练，充分说明了各同志的环境能力和知识。
5. 依性能可分为讨论会、检阅会、批评会。

四　方法

会前准备，即通知组员，确定讨论中心，同时报告上级。

1. 人数，以三五人为最佳。

2. 不拘仪式，随时随地均可讨论。

3. 时限，不宜过长，以一小时为最大限。

4. 以每周一次为适宜，其程序、主席报告、出席人报告讨论，结论由组长担任之，并记录主席某人、讨论题目、出席人数与地点。

5. 问题，不超过两个以上之问题，先从本身问题讨论起。

6. 发言方法，组员方面，发言宜扼要简单明了，做有系统不重复并以诚意和蔼的态度，道答之，切忌含有讥讽意味，并应注意他人发言，同时作根据题目的判断。

7. 组长方面，报告简单，不再重复介绍，抓住时机，引导组员发言。

8. 结论以归纳法，批评整个言论，有不同意结论可再发言。

五　政治工作的进行

不只靠几个政训员，最好能吸收培养觉悟分子，或对此有兴趣的官兵，参加工作，训练全体队员使均能从事政治工作。

六　政治工作分类

大概可分为平时、战时与战后三种，至于宣传鼓动方面如下：

1. 平时政治工作：

加紧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统一思想言论及行动，维持铁的军纪，与民众打成一片，其法略举如下：

（1）确实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如买卖公平、讲话和平、借物归还、损坏赔偿）。

（2）随时随地帮助民众，解除民众困难（助民众收割、耕种，或遣我军医为民众防疫治病，或慰问被难民众，设法救济之），确保军民联合，甘苦与共之精神。

（3）常与民众谈话，借以得知我军之纪律与民众之感情，更详知民间疾苦。

（4）常开军民联欢大会，借以调和军民间一切隔阂，增进军民感情。

2. 调和上下级官兵间一切隔阂，其法略举如下：

（1）政训人员，除与士兵同甘苦外，并常同士兵谈话，详察其切肤之痛苦，随时报告上官，设法改善之。

（2）对上下级之一切意见，须站在纯理智的立场上，以诚恳的态度说服之、解释之，务使上下融洽确如一人，益增其团结力。

（3）对违犯纪律之士兵，应采取教育方法说服之，一切体罚与责骂，务须减少。

（4）常开官兵同乐大会，以提高官兵之感情。

3. 提高官兵之敌忾同仇心，增进誓死杀敌之决心。敌忾同仇心之增进，是巩固士气唯一要素，所以游击队特应注意敌人一切残暴行为及屠杀我军民的事实，在军中作普遍的宣传，以提高官兵之誓死之勇气，坚定其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之杀敌决心。

4. 巩固对敌战争必胜信心，略举如下：

（1）时常地拿着本身过去之光荣战史，对其官兵进行宣传与鼓励。

（2）列举敌军之缺点（及其□间所遭遇之困难或崩溃等情形，

以证敌终必失败之事实）。

（3）列举我方之优点（如军民拥护、消息灵通、地形熟悉等）及现在的胜利情形，以证明我之必然胜利。

（4）就敌方惯用之伎俩，晓示我军今后应注意之处，以防畏敌或轻敌之心理产生。

（5）〔避免〕受打击后，一时陷于困难于疲劳，而妄自菲薄，张大敌人力量，失了胜利心。

七　战时政治工作

出发前之政治工作：

1. 先由最高统帅者召集干部会议，说明“目前政治形势，如何有利于我们及胜利条件，与作战意义及为达到此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注意之处，但不涉及军事秘密”。

2. 政讯处要根据干部会议，立即召集各级政训人员开会，说明宣传之中心与方法，然后具体地分配工作。

3. 支队和各分队立即召集官兵大会，除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必胜的把握”外并提出竞赛条约。如“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喊痛”，又如“看谁枪械缴得多”或“捉得俘虏多”。同时分配各个政训员，分□的工作（如监督、领导去宣传）。

4. 对附近居民，则派员召集开会谈话，鼓励他们参战，或加入担架队、运输队，对民众团体，则指导开会，作战与动员配备之方法。

5. 战斗开始后，担任主攻的或特别重要的作战部队，则指派重要的政训人员，鼓舞之。次要的作战部队，则派次要的政训人员前

往鼓舞之。

6. 预先派出宣传组及歌舞团（皆为活泼可爱的儿童，着一律的好看服装），在军队行进路旁，作短促的讲话，或歌唱，或跳舞，或喊口号，尽量地鼓舞官兵之作战勇气。

八　战斗开始后的政治工作

1. 战斗开始后，应注重向对方士兵讲话，喊口号。以涣散对方士气，即破坏工作之一种也。

2. 当战场入于休战状态中或阵地对峙中，则设法与对方士兵开联欢会，借以送食品给对方士兵，以博其欢心，然后再进行宣传工作，事前应有准备。

3. 战斗开始后，对外固须宣传对内尤须鼓励。其法不一，以适合当时环境为主，例如：

①攻击前进时遇敌袭击时，则进行下列解释：

“同志们，飞机是不能解决战斗的，我们应抓紧这个机会，赶快前进，迅速接近地上敌人，同敌人拼刺刀去。”

②火战开始时，则进行以下鼓励：

“同志们，不要乱射击，不瞄准不发射，我们要做到一颗子弹打死一个敌人。”

③接近敌方将突击时，其鼓励法：

“同志们，解决敌人时机到了，我们要不顾一切牺牲，鼓起勇气，战胜敌人而歼灭之，拿我们的胜利鼓动全军，赶快冲上去吧！杀！”

④第一次冲锋顿挫时，作第二次突击时，仍须进行以下的鼓

励：“同志们，我们是无敌的铁军，我们是每战必胜的劲旅，我们定要消灭这个敌人。保持我们的光荣。”

⑤战斗中如官长伤亡时，则进行以下的鼓励：

“同志们，我们的官长某某已经光荣地牺牲了，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血迹，完成他们未了的任务，消灭当面的敌人，替他报仇去！”

⑥如敌方面呈动摇时，则进行以下的鼓励：

“同志们，敌人动摇了，赶快冲上去，活捉敌人师长！”

⑦追击时，则进行以下之鼓励：

“同志们，敌人退却了，快快追过去吧！冲破敌人收容队，解决主力，消灭全部，看谁缴枪械多，看谁捉得俘虏多，打胜仗不追击，是最可惜的。”

4. 防御时

①受命后即进行下列宣传：

“同志们，敌人来了，这是消灭敌人的最好机会，巧妙地利用地物，沉着射击，杀伤敌人愈多，我们主攻方面就愈容易奏效。”

②敌人冲锋时，则进行下列鼓励：

“同志们，敌人要冲锋了，上好刺刀，准备好手榴弹，拿出我们的威风，保持我们以往的光荣，消灭敌人于我阵地前。”

③被敌包围时，则进行下列鼓励：

“同志们，我们是百战百胜的部队，我们是英勇无敌的铁军。要为民族国家血战到底，流尽最后一滴血，至死不丢枪，杀身不投降，缴枪是自杀，投降是无上耻辱，突破一点，冲出去！”

④反攻时，或攻势转移时：

“同志们！我们反攻了，缴敌人枪去，活捉敌人官长，看谁是最勇敢的！”

⑤退却时之宣传：

“同志们！秘密我们的行动，迷惑敌人的判断，放开两手，诱敌深入，不落伍，不掉队，不动摇，不恐慌，不怕牺牲，坚决到底执行上级命令，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⑥掩护退却时，其鼓励的方法与上略同。

九　战后政治工作

1. 战斗结束后，为防止轻敌或畏敌心理之产生，应注意下列各点：

（1）正确指出胜败的原因，即不可因小胜而矜骄，更不可因小挫失却胜利信心。

（2）确定今后应取之对策，或应注意之处。

2. 收集胜利材料及英勇作战的部队或个别官兵姓名，然后制就宣传大纲、歌舞、新旧剧等。

3. 印发大批捷报、标语，张贴各处，同时组织流动宣传队，分向规定区域宣传并号召民众开捷报大会。

4. 开捷报大会应注意下列各点：

（1）报告胜利意义，与当前的任务，或为达此任务而采取具体办法。

（2）报告勇敢作战的部队及个别官兵之姓名，至于伤亡的官兵可采其最有价值者报告之。

（3）表演新编之剧曲与歌舞。

参加开会的部队，当报告（1）（2）两项或表演戏剧时，应高呼口号以和之，并应提出抚恤阵亡官兵家属的办法。

并将被俘虏的官兵或胜利品，集合于众目之下，则更能增加我军民之斗争情绪与勇气。

5. 各机关在祝捷大会上应发起慰劳运动，其应注意如下：

（1）物质的慰劳，慰劳品不在多少，而有意义，不在精美，而在实用，如草鞋、面巾、猪羊、鸡鸭等，皆可做慰劳品。

（2）名誉的慰劳，当慰劳品缺乏时，应以名誉的慰劳代替物资，如制锦旗或编成歌曲以纪念之，或传令嘉奖亦可。

（3）如小胜后，则不需作扩大的慰劳，仅由战地附近设法慰劳之即可。

6. 宣扬协同动作与独断专行，及坚决执行命令之模范，例如：

（1）于战斗方酣之际，如因协同动作、独断专行坚决执行命令，而取得胜利者，应尽量宣扬赞美之，其不幸而失利者，亦应嘉奖之。

（2）图保存实力观望不前，或执行任务不力，致使友军失利而受处罚者，亦应在部队中作广大宣扬，教育全体官兵或其他部队，使之知所警惕。

十　俱乐部及娱乐室的工作

调剂军中枯燥生活，也是防止逃跑的一种办法，兹将其组织工作及概要，略述如下：

1. 组织条例：

（1）为增进军中娱乐，调剂枯燥生活，提高工作兴趣，鼓舞学习精神起见，游击队中，每一伙食单位，应组织娱乐室，内分军事组、游击组、体育组。每一伙食单位之官兵，均应各就其性之所

近，任选一组，亦可参加二组或三组。

（2）如娱乐室应设主任一名，由连指导员或有活动能力的排长兼任之。其所属各组各设组长一名，由组员会决定之，六月为一期，亦可连任。

（3）组长会议及各组会议，均应每星期举行一次，股员会，每月一次，由主任组长分别召集之。

（4）娱乐室在工作进行上，应服从上级俱乐部之指导，并受主管官之监督与指导，但在军务上，则绝对服从主管官。

（5）为指导并统一各娱乐室之工作进行，大游击队，应成立俱乐部，内设主任一名、干事一名，专司其事。

（6）俱乐部应隶属于政训处，因为娱乐工作，系政训之一种，但在无政训处时，方直属于主管官。

（7）俱乐部之工作进行，在指导与推动各娱乐室之工作，因此，每星期召集各娱乐室主任开会一次，每月召开官兵或军民联欢大会一次。

（8）无论俱乐部、娱乐室，其一切工作之进行，皆以不妨碍军事行政、军事教育、军事行动为原则。

2. 工作概要：

军事组在诱发官兵自动学习精神，讨论军事问题或相互的纠正动作，以补训练射击时之缺憾不及，其内容如下：

（1）刺枪组（与以预想之敌国为目标，而演习之）。

（2）掷弹组（以木刻制手榴弹，向靶投掷）。

（3）军事游击组

（4）架上瞄准

（5）瞄准检查

（6）射击姿势

（7）击发检查

（8）利用地形物

（9）野外各种目标之射击法

3. 体育组。此组工作，强健官兵之体格，更可补助军事教育不及，其内容如下：

（1）球术（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垒球等）

（2）田径赛（跳高、跳远、赛跑、障碍超越）

（3）拳术及大刀

4. 游艺组。此组工作，在增进军中娱乐，调剂枯燥生活，以提高工作情趣与学习精神之增进。

（1）笑话组，不论何时，均可进行，但应注意下列各点：

①说笑话时，应注意通俗，如笑林广集之类，但不可过于猥亵。

②讲故事时要讲古人之丰功伟业及嘉言懿行，以收鼓励之效。

③报告新闻时，应注意我方胜利情形及敌方之残暴行为。

（2）戏剧组利用晚间及日间休息时，表演各种有政治意义的及有滑稽性质的新剧、戏曲、双簧、花鼓，以扬士气。

（3）歌舞组，根据部队所处之环境之任务，编制各种不同歌谱，引起官兵学习唱歌之兴趣，或举行化装跳舞，做种种滑稽形象，引起观者捧腹。

（4）音乐组内分胡琴、口琴、乐琴及其他，歌可与戏剧舞同奏之。

（5）各种工作之推行方式，应根据时间及环境，活泼运用之，切忌呆板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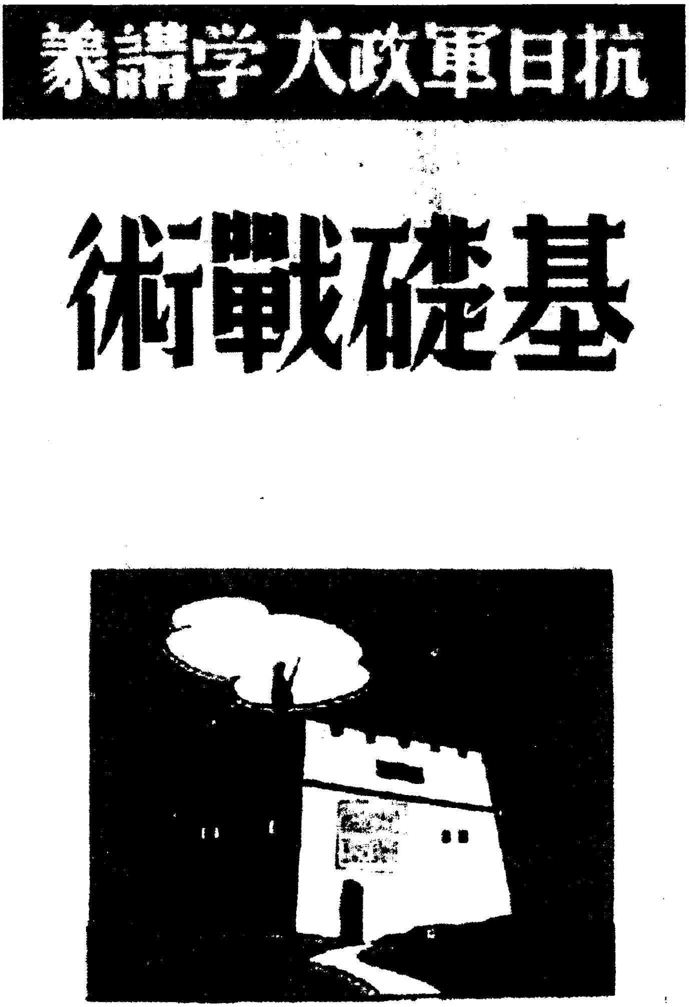
（6）各组工作之进行，因有赖于严格的检查及督促，更应采取

竞赛方式，使全体官兵，自动努力。

（7）各种歌曲及新旧剧等。

（8）各种各系应有专门人才，以利工作之进行。

（9）参加表演之官兵得酌免勤务。



抗日軍政大学講義

基礎戰術

1938年3月，汉口自强出版社出版的《基础战术》。

日军占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

（1937年10月20日）

周、朱、彭、任[1]：

甲、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

（一）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2]，我林师[3]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

（二）太原之敌将出一路于汾阳、离石城，隔断我贺师[4]向南面；出一路于汾河流域，隔断我总部及林刘[5]两师向西。

（三）太原以北抗战部队将溃乱无秩序，娘子关抗战部队亦有溃乱之虑。

乙、因此，林师主力不可过于向北，刘师不可过于向东，总部宜移正太路附近，王兆相部[6]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

丙、拟定之部署意见如下：

---

[1] 周、朱、彭、任，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2] 正太路，指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3] 林师，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4]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5]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

[6] 王兆相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工兵营，营长王兆相。

（一）留杨成武团[1]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二）林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

（三）刘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任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四）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区。

（五）贺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但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神府[2]，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六）陈伯钧部[3]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

（七）上社、洪洞弹药宜急运。

丁、以上判断及准备部署，请速考虑见复。

毛泽东

二十日二十四时

---

[1] 杨成武团，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

[2] 神府，指陕西北部神木县和府谷县。

[3] 陈伯钧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率领的该旅第七一八团，当时该部留守陕甘宁边区。

日军占太原后八路军的作战部署

（1937年10月20日）

周、朱、彭、任[1]：

甲、敌占太原后，将引起极大与极快之变化：

（一）娘子关之敌必速占正太路[2]，我林师[3]及总部有被隔断之虑。

（二）太原之敌将出一路于汾阳、离石城，隔断我贺师[4]向南面；出一路于汾河流域，隔断我总部及林刘[5]两师向西。

（三）太原以北抗战部队将溃乱无秩序，娘子关抗战部队亦有溃乱之虑。

乙、因此，林师主力不可过于向北，刘师不可过于向东，总部宜移正太路附近，王兆相部[6]不宜出长城以北，以便于紧急时能够转移。

丙、拟定之部署意见如下：

---

[1] 周、朱、彭、任，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2] 正太路，指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3] 林师，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

[4]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5]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

[6] 王兆相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工兵营，营长王兆相。

（一）留杨成武团[1]在恒山、五台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二）林师主力准备转移于汾河以西吕梁山脉。

（三）刘师在正太路以南之现任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四）总部准备转移至孝义、灵石区。

（五）贺师坚持晋西北之游击战争，但王兆相部准备于必要时返回神府[2]，巩固河防，加造船只。

（六）陈伯钧部[3]暂在现地不动，准备必要时到河边策应。

（七）上社、洪洞弹药宜急运。

丁、以上判断及准备部署，请速考虑见复。

毛泽东

二十日二十四时

---

[1] 杨成武团，即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

[2] 神府，指陕西北部神木县和府谷县。

[3] 陈伯钧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率领的该旅第七一八团，当时该部留守陕甘宁边区。

一二九师一二〇师等部的作战部署

（1937年10月21日）

朱、彭，并告周：

甲、请准备以一二九师现在使用于忻口[1]以北之一个团全部，或总部特务团之主力，于必要时机赶至介休以南、霍县以北（主要是灵石地区），选择隘路地段破坏道路若干段，阻止敌军南下。实行破坏时，须在太原失守、敌向介休前进之时，以不失时机为原则。

乙、请令贺师[2]准备派出一个营，以一干员率领，附电台开至汾阳、离石交界地区，选择隘路地段，待敌进至汾阳及其以西时，不失时机地破坏该处道路，阻止敌人西进。

丙、杨成武团准备长时期内独立自主地活动于冀察晋三省交界地区，速即配备军事上政治上高级的可靠干部若干人以增强之，通讯方法及通讯材料须准备用至两年之久，须给与一个明确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纲领，并给予一个骑兵连。

丁、五台山脉，杨成武团不能顾及，请考虑从总部特务团中派出一个最好的营，配备能够领导三千人以上的军政干部若干人，独立自主地长期活动于五台山脉地区，与杨成武部相呼应。

---

[1] 忻口，镇名，位于山西忻州北部，为军事上之要地。

[2]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戊、宋时轮团[1]全部（分割之部分应归还建制）准备长期活动于长城以北大同、雁门以西地区，东与杨成武、南与一二〇师主力相呼应。

己、一二〇师主力两个团及师直属队，除准备派出一个营活动于汾阳、吴城镇、离石城之线（首先主要为不失时机地破坏道路）以外，其余分为两部，第一部分为主力，准备活动于神池宁武静乐三县及雁门关、太原线铁道以西地区；第二部分为次要力量，活动于五寨、岢岚、岚县、偏关、河曲、兴县地区。

庚、王兆相部[2]准备于必要时机，以一部或全部返回神府。贺关并负责指导神府工作。

辛、文年生团[3]即日从洛川、富县开动，位于吴堡城、枣林坪、马灰坪、薛家峁、川口、河口、清涧城之线，巩固河防，策应山西，而以七十四师陈先瑞部[4]调至洛川、富县接防（现已至耀县）。

壬、以上各项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二十一日

---

[1] 宋时轮团，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1937年8月至9月，宋时轮任该团团长。9月底，以该团第二营为基础组成雁北支队，宋时轮任支队司令员。这里指的是八路军雁北支队。

[2] 王兆相部，指八路军一二〇师工兵营，营长王兆相。

[3] 文年生团，即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团长文年生。

[4] 陈先瑞部，原为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1937年8月该师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炮兵营和辎重营。陈先瑞当时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东地区留守处副主任。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一部夜袭山西代县阳明堡的日军机场，焚烧敌机24架。图为《新中华报》关于阳明堡战斗的报道。

致周恩来等电[1]

（1937年10月22日）

恩来长电[2]，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

请恩来拟具建议书，即去南京代表我党严重与正式地向国民党建议，并推动各界促进时局之转变。党的宣言，俟恩来南京谈判后再行决定，目前以解放报论文为号召。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0月1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说鉴于日军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国民党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国内妥协和平空气抬头，中国抗战出现新的危机，提出以下建议：（一）中共公开发表宣言，反对和平妥协，坚持抗战到底；（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提出华北的进一步的计划；（四）要求国民党政府增派军队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等等。

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1]

（1937年10月22日）

朱、彭、任、邓，并告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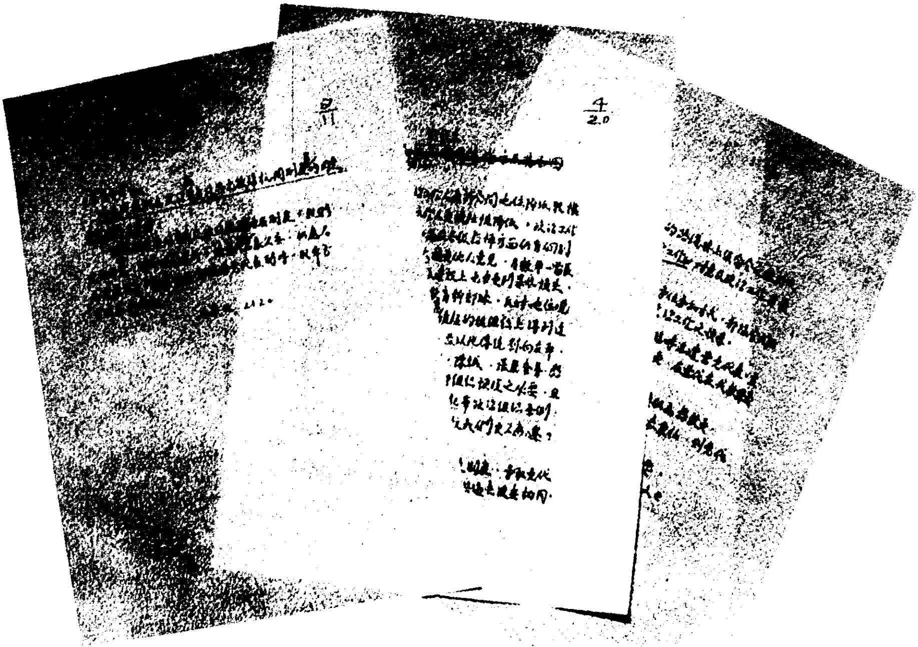
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名为政治委员。将来国民党采用党代表制时，我军方可改为党代表。

洛　毛

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给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告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怀和任弼时给中央的电报说，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职权降低，使政治工作及部队建设受到了损失。为此，建议：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争取党代表名义公开，职权与过去的政委相同，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对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旅设政治处，各旅单独行动时，可临时派遣营党代表，并由团政治处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员在党代表指挥下进行政治工作，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为指导员。军政委员会书记，如不是党代表兼职，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



1937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布的《在八路军各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名称的决定》。

总部与一一五师的行动部署

（1937年10月22日）

朱、彭、任[1]，并告周[2]：

甲、二十一日电[3]悉。你们意见与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不是要总部[4]及一一五师主力马上移至正太路[5]南，而是要不被敌人隔断，确实保证于适当时机能够南移。请你们注意选择这个适当的时机，并立即布置恒山、五台山[6]一切必要工作，并请考虑将总部特务团

---

[1] 朱、彭、任，指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2] 周，指周恩来。

[3] 指1937年10月21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就华北八路军的部署给八路军各师领导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绥东发动和组织群众，王震率七一七团在五台山以北豆村、台怀一带，准备进至阜平、平山以西地域。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位于灵丘、上寨附近，小部经廊下去扰乱灵丘、涞源之敌。第三四四旅在阜平东北，随时准备南移。预备旅相机袭击灵丘、平型关西进或由涞源向平汉路南进之敌。在可能条件下，组织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易县、紫荆关、蔚县、涿鹿之间活动，收编散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第一二九师到达正太路以南，即开展进入太行山区的群众工作。总部直属队在盂县及五台以东地区发动群众。

[4] 总部，指八路军总指挥部。

[5] 正太路，指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6] 恒山，位于山西省北部，是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东接太行山，西至吕梁山。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山西省东北部延至河北省边界的山脉。

全部留驻五台山的问题，将来可另造一个特务团。

乙、将来南移时，第一步一一五师可用一个旅到汾河以西之吕梁山脉，另一旅及师直属在太岳山脉夹河而阵，并可配合在太行山脉之一二九师作战。总部第一步亦可在汾河以东，只要不被隔断就不怕。

丙、总部经晋西北向南似不如经晋东南向西为好，总部以确保安全为第一。

毛泽东

二十二日

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

（1937年10月23日）

雪枫[1]同志，并告周，朱、彭、任，林、聂，贺、萧，刘、徐、张[2]：

巧电[3]悉。关于阎[4]先生所提，假如在不利情况下，两军团结一致，用游击战争坚决抵抗日寇进攻之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有下列意见：

甲、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

[1] 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

[2] 周，指周恩来。朱、彭、任，指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贺、萧，指贺龙、萧克，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副师长。刘、徐、张，指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3] 似指1937年9月18日彭雪枫给毛泽东的电报。该电汇报了他与阎锡山16日秘密会谈的情况。其中提到阎锡山建议，一旦出现津浦路、平汉路失守、晋军败退的不利局势，以八路军会合晋绥军一个集团军，在五台山脉建立根据地，与日军周旋。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乙、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区域之一，现就宜加紧准备，可双方派人察看，并计划一切，不宜迟缓。

丙、同时应该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及部署与准备，因为敌人必将先行占领该地神池、宁武一带，与东边占领恒山山脉之行动相配合，取得居高临下之势，然后进攻太原。

丁、太行、太岳山脉之晋东南与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如若干必要资材之准备、迁移等。资材集中于五台一处，是不妥当的。

戊、游击战争除军事部署以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如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己、上述部署及计划，并不妨碍争取以主力在长城一带举行有利的决战之现时计划。

庚、关于阎先生诚意合作与商量指挥之事，我们甚为佩服与感谢。

辛、上述游击战争意见，望即提供阎先生考虑，倘承采纳，抗战幸甚。

毛泽东

二十三日午[1]

---

[1] 此电所署时间是抄件上原有的，经考证似应为9月23日。

边区须立即进行直接抗战的准备和动员[1]

（1937年10月23日）

二十七军，钟，杜，王宏坤，二十九军，甘，刘，伯钧[2]，陕甘宁，神府，关中，陕北，云阳各政治首长：

（一）日寇进占大同，现正向太原及绥远[3]、宁夏进攻之，企图首先夺取我整个华北。

（二）边区与日寇进攻区域接近，依上情边区即将成为直接抗战的区域。因此必须立即进行直接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三）直接抗战的准备和动员应是：

（1）指明目前日本进攻的形势与这形势对边区的影响，指明边区已结束了和平的环境，将进入直接抗战的状况。在部队中利用支

---

[1] 这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和张国焘给边区各部政治首长的电报。

[2] 二十七军，指原红军第二十七军。钟，指钟汉华，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一团政治委员。杜，指杜平，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三团政治委员。王宏坤，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长兼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西地区主任。二十九军，指原红军第二十九军。甘，指甘渭汉，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二团政治委员。刘，指刘随春，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七团政治委员。伯钧，即陈伯钧，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东地区主任。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部、俱乐部、上课等方式，深入这一动员，改变旧的和平观念，加紧训练，肃清游击主义习气，从政治上、组织上严整部队向正规道路前进。

（2）加紧消灭土匪，根绝日寇。在边区内应加紧本身地方保安队整理训练，严密警戒侦察。

（3）在经济上进行节省运动，改善给养，反对贪污浪费，严格进行经济检查。为了推动这一工作，各级领导机关直至连队中成立节省委员会。

（四）用上述一切工作配合地方党政的工作，为了保障边区而战，同时配合全国工作，为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国，争取民族解放而战。

毛　洛　张
二十三日

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纪念题词

（1937年10月23日）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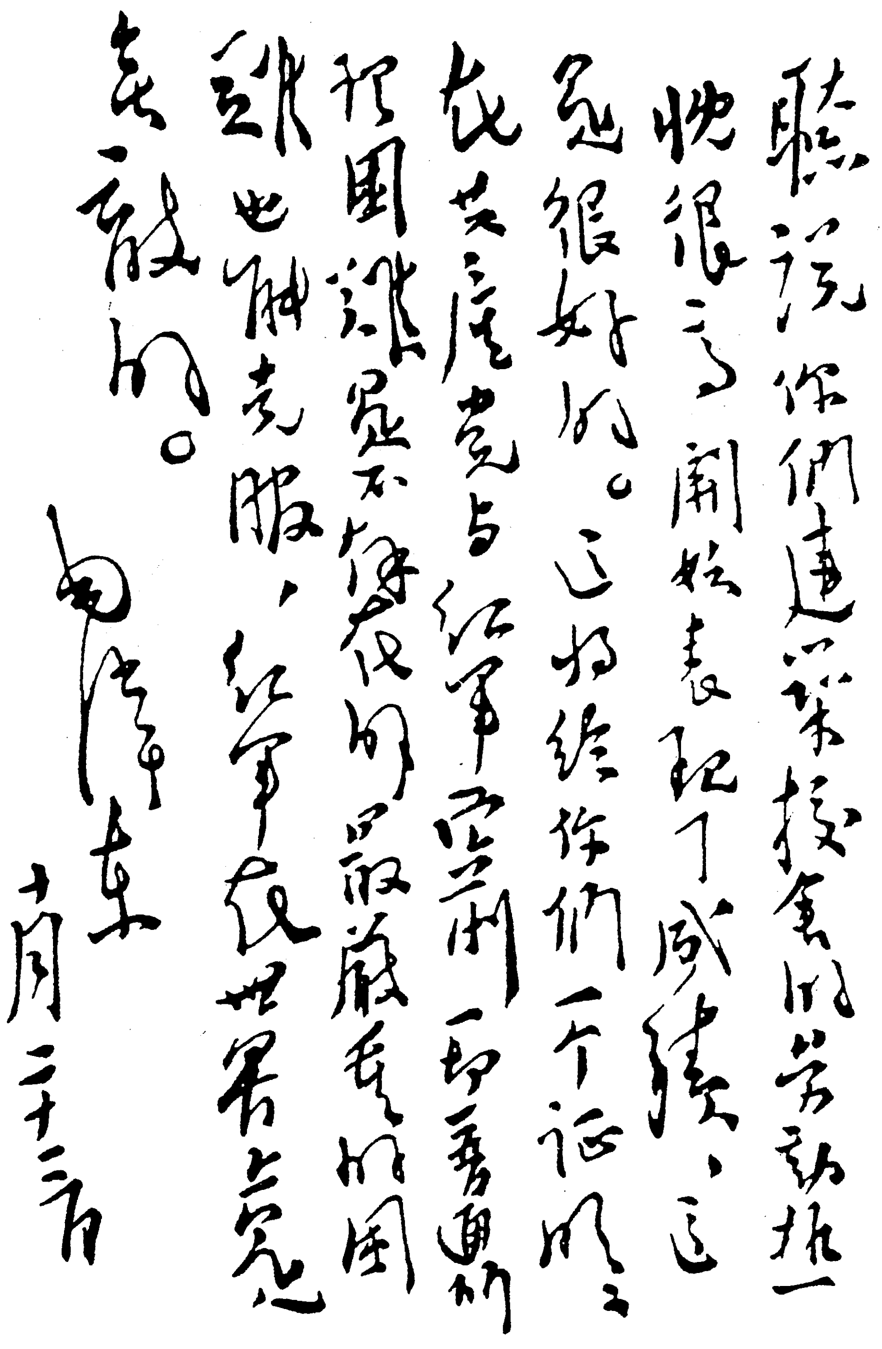
为抗大建设校舍题词

（1937 年 10 月 23 日）

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我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聽說你們建築校舍的勞動極快很好開始表現了成績、這是很好的。這就給你們一個證明，說共產黨與紅軍定則一切要通的打困難是不能阻住的最嚴重的困難也能克服、紅軍在世界上是無敵的。

毛澤東

十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为抗大建设校舍的题词。

我们的责任

（1937 年 10 月 23 日）

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红军，陕甘宁特别区负有这种责任。一定要唤醒全国人民全国党派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用以挽回危局，战胜日寇。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先进分子团结起来，不屈服于任何困难，把一切准备得好好的，最后粉碎日本帝国主义。

十月二十三日

在抗大校舍落成大会上的训词

（1937年10月24日）

我要与同志们说的，在这次伟大的事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把它总起来说，就是能够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过去十年的斗争经验均证明着，你们这次挖洞也证明着，将来在抗战过程中还要证明着，如能如此，可以战胜一切！

克服自然困难战胜泥土与克服活的敌人战胜日寇，虽然有很多方面相同，然而有很多方面不完全相同。它将更艰苦更困难些，所以抗战中，不独要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方针，还要善于运用战略与战术，还要善于组织动员领导群众与争取同盟军等工作补充起来才行。

你们现在已经有克服困难与联系群众的精神，只要在这个基础上经你们的天才把它继续发挥起来，战胜日本，驱逐日本，驱逐日本出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

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

（1937年10月25日）

朱、彭[1]：

二十四日电悉。

甲、你们是否准备以陈光旅[2]使用于正太路[3]？我以为是必要的，并且徐海东旅[4]主力似亦有南下作战的必要，留一部配合总部[5]特务团及杨支队[6]在西北一带已足。目前决定的战斗在正太路。

乙、为确实截断雁门南北大道起见，王震部[7]似以加入雁门关[8]一带配合宋支队[9]作战为有利。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五时

---

[1]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2] 陈光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

[3] 正太路，指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4] 徐海东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5] 总部，指八路军总指挥部。

[6] 杨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杨成武。

[7] 王震部，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王震率领的该旅主力。

[8] 雁门关，位于山西代县北部，长城主要的关口之一。

[9] 宋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第二营为基础组成的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

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

（1937年10月25日）

朱、彭、任，林、聂、罗，贺、关、萧，刘、徐、张[1]各同志并转各级负责同志：

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2]，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斗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指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贺、关、萧，指贺龙、关向应、萧克，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政治委员和副师长。刘、徐、张，指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2] 1937年10月23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在山西省平定县七亘村地区遭日军一个联队和200余骑兵的袭击，伤亡30余人。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

（1937年10月25日）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毛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抗日战争的情况和教训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他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国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察哈尔、绥远三省，山西亦在危急中。惟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垂手而得东四省，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

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但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末，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

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

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广灵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

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再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

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察哈尔、绥远和山西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国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

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

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民主制度和抗日战争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

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国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末，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

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对当地统治阶级的策略[1]

（1937年10月26日）

联合左翼分子，争取中立分子，孤立豪绅与法西斯分子。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常会上讨论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工作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部署

（1937年10月27日）

朱、彭[1]：

甲、苏联远东军似对满洲日本有所示威，华北日军有一部出关一部回国说，但未证实，请勿下达致起轻敌之心。

乙、我右翼主力既集中正太路[2]，如打得好当能有效制止敌进。我前提一二〇师主力北上未见答复，仍盼考虑。我意只留一团在原平以西，主力两团，以宋团[3]全部位于大同、怀仁、岱岳、左云、右玉至平鲁地区，分数支队，主力袭击铁路沿线，一部开辟西面工作；另一团位于山阴、雁门关[4]、朔县地区，主力袭击铁道，一部开辟朔县工作，目的在保证切断运输大道，又能发展北面工作。

丙、王兆相部[5]暂在原地待命，如八十六师[6]不占神府苏区交

---

[1]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2]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3] 宋团，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此时宋时轮已改任由该团第二营为基础组成的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

[4] 山阴，县名，位于山西省北部，内长城雁门关外。雁门关，位于山西代县北部，长城主要关口之一。

[5] 王兆相部，指八路军一二〇师工兵营，营长王兆相。

[6] 八十六师，指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高双成。

涉有效，则该师可以不回，使其在晋补充整理，交涉无效时，再电告调回。

毛泽东
二十七日

关于南方各地游击队整编原则的指示[1]

（1937年10月30日）

博、叶：

关于各地游击队问题：

甲、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并坚持此原则，反对全部集中的国民党要求。

乙、留下五分之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整理，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之暗算，森严自己壁垒。

丙、集中五分之三为一军，以叶挺为军长（待考虑），项英为副军长，陈毅或刘英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

丁、以四个月为理清时间，任何游击队区，均须党中央派人亲自传达，然后集中。

戊、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集中。

己、叶挺能否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并告周、朱、彭、任[2]。

洛　毛

三十日

---

[1] 本文原件没有月份，月份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2] 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致王兆相等电[1]

（1937年10月30日）

十分注意部队的纪律，无论如何困难，不得乱拿工农一草一木，每天出发训话一次。

---

[1] 这是毛泽东致王兆相等并告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电的主要内容。王兆相，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直属工兵营营长，驻防神府地区。

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

（1937年10月）

第一部　目前抗战的形势

一、中日战争的现状与估计

（一）卢沟桥事变后华北与长江一带的最近战况。

（二）日寇在侵略战争中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这是因为：1. 它是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2. 它同中国为近邻；3. 它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进攻。

（三）但是这一次它同“九一八”不同，它所占领的每一寸土地都付了极大的代价，遭到了有力的抵抗。

（四）中国进行了坚决英勇的抗日民族自卫战，虽是遭受了暂时的部分的失利，但是这一民族自卫战：1. 空前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与坚决勇敢的精神，打破了过去的“恐日病”，给了日寇相当的打击；2. 空前地巩固了中国内部的团结与统一，表示了中华民国的新气象；3. 使十年来对立的国共两党重返合作，使国民党有了决定的转变。

（五）这种暂时的与部分的失利，也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关系的国家，所以：1. 军事技术落后；2. 政府与军队陈旧腐败，病态与弱点很多；3. 军事指挥十分落后；4. 政府惧怕开放

民运。

（六）这种失利，在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作战时，一般是难于避免的。

二、目前时局的危机与困难

（一）正由于这种暂时的部分的失利，造成了目前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经济上的许多困难。

（二）这种困难为民族失败主义者、汉奸、亲日派所利用，以证明中国之不能抗日，以便利于他们的投降妥协；他们活动的表面化，他们的危险性，他们的力量，也不能轻视。他们的弱点，是没有军队与人民的拥护。

（三）这种困难使抗日派内部一部分人发生动摇与失望，觉得抗战的无办法与无出路，同时他们又为亲日派分子的“不亡于日即亡于共”的谣言所威吓，这是目前最大的危险。但是抗战派内部的“决定的力量”蒋介石，直到今天仍然主张坚决抗战。

（四）目前是危机转变的关头。

三、我们的立场

（一）我们认定这时失利是暂时的与部分的失利，不是最后的与完全的失败。决胜负的战争尚在前面，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二）但我们认定，我们目前是处在危机的关头，我们当前紧急任务，是在团结抗日派内部，首先是国共两党进一步的合作，以一切力量打破亲日派的阴谋，克服当前的一切困难，继续抗战。

（三）我们要用最具体的事实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中国抗战能够胜利，提出具体的办法去解决目前的困难。

第二部　中国抗战能否胜利

一、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因素

（一）中国的力量。

（二）日本的力量。

（三）国际的力量。

但决定的因素是中国自己的力量。

二、中国的力量正在抗战中坚强起来

（一）抗战扩大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内部的统一与巩固（国共两党的合作，政府与人民，地方与中央）。

（二）抗战使政府开始成为国防性质的政府，打下了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的初步基础：坚决抗战的国防政策，确定国防会议的召集——释放政治犯——取消紧急治罪法——救亡运动的某些程度的合法化——同贪污作斗争——同汉奸作斗争。

（三）国民革命军开始成为统一的国防军队，打下了以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的初步基础：统一指挥大本营的建立——各个战区的划分——调动了各省军队上前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建立新军队——比较进步的军队中开始建立政治工作。

（四）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造成了民族抗战的高潮。

（五）抗战愈坚持则中国内部愈团结，愈有力量，愈能走上民主共和国，战胜日寇。

三、日寇的弱点及困难

（一）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特别是军事工业不发展。

（二）国内矛盾的尖锐化（政府与人民，军部，与资产阶级内部）。

（三）中国的地大物博，使日本军队不够分配，无法巩固占领地区。

（四）日本后方不巩固（朝鲜、台湾、东四省[1]等）。

（五）抗战愈坚持则日本的弱点愈增加，愈有利于我们争取抗战胜利。

四、国际形势

（一）中国的抗战引起全世界上无产阶级与人民的同情与援助——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英国工党、工会的态度——法国工会、社会民主党的同情——美国最反动的工会联合会主张反日抗货——阿姆斯特丹国际[2]苏联工会的加入。苏联。

（二）世界各国的态度——法国——英国——美国——内部态度的不一致。德国、意大利。

（三）一般说来，国际形势有利于中国，而日本比较孤立。

五、结论

（一）中国有力量战胜日本。国内外的形势对中国有利。

（二）今天的中心是在坚持抗战，进行持久战。

第三部　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

一、扩大与巩固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首先必须向党内外人士说明，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

---

[1] 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在1955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2] 阿姆斯特丹国际，指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正式名称是国际工会联合会，1919年7月由第二国际主持，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1945年12月解散。

日，“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

（二）统一战线的内容是：1. 各党各派的抗日合作；2. 统一的国防政府；3. 统一的国防军；4. 统一的民众团体。不是一党一派的政府、军队与民众团体的包办。

（三）统一战线内各党各派合作的目的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不是谁领导谁。如我们对国民党及国民党各派的态度，是帮助他们的发展、巩固与团结，不是削弱它分化它（对国民党各派如CC、黄埔、复兴社、法西斯问题）。

（四）我们对同盟者工作方法：1. 切实的具体的帮助，多采取建议的方法；2. 依照他们觉悟的程度与迫切的需要，提出适当的要求与口号，不要太高太左；3. 善意的批评，也应该赞扬他们的好处；4. 利用群众的力量的推动，即自下而上的推动，但不是对立。

（五）向国民党人说明，共产党不但要在抗日问题上与国民党合作，而且要在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新中国上同国民党合作。因此这是一个长期的几十年的合作，而不是一时期的合作或玩弄手腕。要为统一战线斗争到底。

（六）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磨擦不可避免，只能减弱不能消灭，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与缓和内部矛盾与磨擦。

（七）统一战线中两条战线斗争，反对投降主义与关门主义。什么是“独立自主”？

（八）如何扩大统一战线：1. 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2. 各群众团体加入统一战线；3. 组织无组织的加入统一战线；4. 分化亲日派与争取亲日派影响下的分子。

二、在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

（一）我们要以抗日的国民政府为基础，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不是另外建立一个政府。推动现政府。

（二）我们要求各党各派有威信的分子，共产党也在内，加入政府，巩固中枢，坚持抗战的方针。

（三）逐渐淘汰政府中的亲日派分子与贪污腐化分子。

（四）帮助中央政府改进地方政府，反对封建割据的局面，帮助地方政府进步成为中央政府的有机的一部。消除中央与地方的对立。

（五）迅速解决特区问题。解决特区政府的原则：1. 保持党的领导；2. 使特区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的地方政府；3. 保持特区为抗日的先进地区、全国民主化的推动机和新中国的雏形。

（六）应该严格区别特区及统一战线地区（如八路军驻扎地区）。

（七）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中应该成为坚决勇敢、刻苦耐劳、急公好义、礼义廉耻的模范，并受中央与地方党的严厉监督。

（八）我们的目的，是要实现议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这在国内外的形势均须如此。(西班牙的例子)

三、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

（一）在现有的基础上扩大与建立，不是不要现有军队。

（二）不能说现有抗战的军队还是军阀的军队，现在带兵的人还是军阀。军阀可以转变为民族英雄，良好的军人。

（三）应该如何帮助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1. 建立政治工作制度：(1) 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2) 改善军民的关系，(3) 改善官兵的关系；2. 统一指挥、纪律、武装、供给、作战计划等；3. 反对拥兵自卫的军阀主义，但也反对中央歧视地方；4. 帮助政府实行征兵制；5. 培养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改善与扩大军政学校；6. 改善军事技术与军事指挥。

（四）扩大与巩固八路军，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改善技术装备，使之成为国防军之一部，并在其中起模范作用。

（五）共产党员应该到军队中去，到军官学校中去，到保卫队、壮丁队、义勇军、游击队中去，成为政治觉悟、坚决勇敢、刻苦耐劳、遵守纪律的模范，并利用自己的地位以影响其他的将士，改变军队的质量。

（六）使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起来，仅靠游击战不能战胜日寇。

四、动员与武装人民，帮助政府与军队抗战，组织巩固的后方

（一）国民党在群众运动中的矛盾：一方面“要”，一方面又“怕”。“要”，不能不使运动相当合法，“怕”，不能不统制。

（二）我们的矛盾：我们要发动群众，而我们的同盟者却怕发动群众，要统制。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的区别。

（三）但群众运动在这种情形下仍然能够发动，问题是在经过何种方法、何种道路。

（四）群众运动中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合法”与“统一”。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旧形式也好。一切为了统一，反对分裂。即共产党发起的运动与组织也要服从于这两个基本原则。

（五）关于开展救亡运动中两条战线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

（六）关于政府、军队与民众的关系（如关于民主、民生问题上的磨擦），党应该起桥梁的与调解人的作用。要政府、军队让些步，但也要人民拥护政府抗日。挑动尖锐的对立是错误的。

（七）如何武装民众？1. 主要夺取敌人的武器；2. 向政府要求一部分；3. 设法购买一部分；4. 收集散枪等组织武装的自卫军、纠察队、锄奸团。

（八）同汉奸、敌探、托匪作斗争，巩固后方，特别是托匪：

1. 托匪的作用；2. 托匪的危险性；3. 坚决消灭托匪。

五、坚持华北抗战与游击战争

（一）由于我党在华北力量的增长，我们在华北特别在发展游击战争中担负了重要的责任。我们要在那里做出一个好的模范，影响全国。

（二）应该坚持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一切抗日党派合作，帮助组织，以发展力量，不取吞并政策。

（三）在旧政权存在的地方，去利用与经过旧政权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在没有旧政权的地方，应建立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的政府，保存旧形式，请求上级政府的指导、委任与援助。在旧指挥系统存在时，仍去利用与经过它以达到坚持抗战的目的；没有时则应建立统一指挥部，求得上级机关指导、委任与援助。

（四）帮助国民党在冀、察[1]两省建立国民党部，使之与国民党中央发生联系。

（五）对被占领区域的汉奸组织如维持会等，我们应进行分化，争取这些组织为我们所利用。

（六）应该大规模地武装民众，扩大抗日军与八路军，建立各种名义的自卫军、义勇军、游击队等。

（七）利用一切旧形式与合法的形式组织群众进行互相间的合作与统一，一切斗争应以抗日为第一。

（八）普遍地建立共产党组织，注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到处应该有秘密党的组织。

六、扩大与建立国防工业

---

[1]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1952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

（一）持久战中国防工业的重要，国民政府尚未注意此事。

（二）中央政府应设立国防工业部，统一计划与指导。

（三）募集国防公债，发展国防工业。

（四）国防工业应设置在安全地带。

（五）各省亦应有设置小规模国防工业的必要。

（六）特区亦应着手做这件事。

七、争取国际的援助，加强抗战的力量

（一）加强国际宣传（电影、画册、报章、共同宣言、代表团等），取得各国的同情援助，抵货，不卖军火给日本而卖给我们。

（二）同各和平阵线国家英、美、法等进一步地靠拢，利用国际间的矛盾。

（三）关于同苏联的关系。

（四）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联系。

八、结论

这些任务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不只是共产党的任务，而是全民族的任务。我们愿意同政府当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为实现这些任务共同奋斗。

第四部　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

一、中共在抗战中做了什么?

（一）我们的成绩：1. 国共两党的合作，打开了抗战的局面；2. 指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具体纲领，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并在某些地区实现了纲领的某些部分；3. 八路军的抗战及其作用；4. 华北的抗战与游击战争；5. 全国党员的参战动员；6. 共产党的组织半

公开与公开地位的取得——这些成绩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影响与威信。

（二）我们的弱点：1. 统一战线不够，党员对统一战线的策略的了解也不深刻；2. 动员群众的力量还薄弱，党员不能深入群众中去；3. 组织力量的薄弱，落后于政治影响；4. 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干部缺乏。这些弱点使我们的工作还不能更大的发展。

（三）应该依靠已得的阵地，纠正自己的弱点，发展我们的工作，使党能在抗战中起决定的作用。

二、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

（一）争取党在全国的公开地位，利用一切活动的可能“下山”。

（二）发展党与巩固党，建立各地的领导机关。

（三）提高党内的警觉性，反对叛徒、奸细、投机分子、自首分子混入党内。

（四）建立在全国公开的党报及发行网。

（五）准备召集第七次代表大会。

三、干部政策

（一）目前干部的恐慌，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与提拔，“干部决定一切”。

（二）审查干部，与考察干部政治面目与工作能力。

（三）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并为他们做事，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

四、为党内的团结一致而斗争

（一）党内的团结一致是战胜日寇的先决条件。

（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党，破坏党即是破坏革命。

（三）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与实际的一致。

（四）正确地发展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五）严肃党的纪律，坚决遵守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六）为国际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路线而斗争。

对留守兵团工作的指示

（1937年10月）

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并要在干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

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

（1937年10月）

带有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与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自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关于组建新四军的指示[1]

（1937年10月）

经过中共中央的郑重考虑，认为可争取将新四军的编制定为两师四旅八团。领导人可选叶挺为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参谋长。军部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

[1] 1937年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这是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和叶挺关于组建新四军问题的谈话的一部分。

1937年10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图为新四军部分领导人的合影。

在欢迎叶挺大会上的讲话[1]

（1937年10月）

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

[1] 叶挺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抗大礼堂亲自主持了一次欢迎叶挺的大会。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叶挺受到党中央如此隆重的欢迎，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会上表示："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了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

目前的时局和方针[1]

（1937年11月1日）

同志们：

你们要求我讲时局问题，趁着你们开学的机会，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与你们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

现在的形势是很紧张的。上海第二道防线失守。晋东敌人已经突破了娘子关，要与晋北之敌配合，向太原前进。目前有两个问题提出在我们面前，就是：（一）再打还是不再打？（二）怎么样打？

现在的战争形势，中国显然不顺利。这是由于过去只是片面的抗战，不是全面的抗战。现在外面有好多人说现在已是全面的抗战，这是不对的。因为在地域上说是全面，在成分上说只是一面，还有广大的群众并没有发动到抗战中来，只是军队和政府来干而已，所以遭受了许多失败。在这种情形下，有一种新的危险在增长着，汉奸与亲日派乘机抬头，“战必败”“唯武器论”这一套，一定会跟着活动。他们的结论是：中国打不过，只有投降。民族投降主义是目前新的危险。

我们必须认识，过去的抗战是有着不可抹煞的成绩的，这些成绩是什么呢？（一）中国的抗战是百年来未有的，它的性质是革命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的。（二）在抗战中中国国内即比较团结了。（三）在军事上虽然遭受许多失败，但给了日寇以相当严重的打击。（四）取得了国际间的同情。（五）这最重要的，就是在战争中取得了深刻的教训，片面的抗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我们决不要因现在的局面而悲观，我们完全赞成蒋介石先生在十月九日的演说，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根枪还要再打，这就是共产党“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1]的意思，是对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

一定要再打，但怎么样打呢？在军事上要学第八路军的打法，就是要活打，不要死打。过去只是挨敌人的打，所以必须改变一个打法。我们去打敌人，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这个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全国一定要学习八路军的样子，真正地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用改造军队精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去达到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挽回目前严重的局势。这就是执行再打方针的正确办法。

有了以上的方针与办法这两个方面，我们就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干部，他们是有革命理论的，他们是富于牺牲精神的，他们是革命的先锋队。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

[1] 这句话原为“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参见中共中央1937年7月8日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复林伯渠等电[1]

（1937年11月2日）

我们决坚持山西抗战，即使太原失守，日军也不能安枕，国民党各军也不得不和我军一道作战，不至轻易退回黄河以南。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林伯渠并告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博古、叶剑英电[1]

（1937年11月4日）

陕甘宁边区的名称须叫特别区，“边区”二字对外不好。

向国民党提出并力争解决特区的范围和目前急需的经费等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张国焘致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对《大公报》记者谈抗战形势

（1937年11月5日）

上海、太原等地失守后，不容讳言的，我们在抗战的军事上受到了相当的挫折。但在各个战场的挫折中使我们获得了最宝贵的伟大的教训，这教训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次民族抗战，虽然是革命性的，但它的革命性，还不完全。我们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这是自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以来未有的好现象，但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最大的缺憾是尚未动员全国人民到抗战中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必然会遭遇失败的，在近代弱小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上，阿比西尼亚抗战的失败，可为我们前车之鉴。拿最现实的例子来说，西班牙政府军所以能够坚守马德里，击退德意撑腰的法西斯进攻，主要的在于能够发动群众，使大家能拼其血肉，以保卫马德里，守住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军现有的地区，不及我们江西省之半，因为动员了全体人民，便在抗战中发挥无与匹敌的伟大力量，要是我们真正实践了动员全国人民，不难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此外，已往各个战场上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犯了“专守防御”的错误。军事上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保护自己，消灭敌人。因此，我们要设法减削敌人优势武器之运用，避实就虚，击中敌人致命的弱点。敌人在每次战斗中，采用迂回及中央突破战略，我们便不能专门着重在“单纯

防御”，死守正面，使敌人恰恰施展其优势武器，而集中击破我正面。必要的阵地和城市，我们当然要守，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防御，还要在配合上侧击或敌人后方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要以独立自主的运动战来歼灭敌人。

眼前最要紧的是改造军队素质，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中国只要精兵三十万，具有最高度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自觉性，再配以新式武器，军官与士兵一律富于高度的攻击性，便可以使目前的战局为之全盘改观。

虽然太原失守了，但八路军在冀察晋边区及晋西北绥东一带，已经据有华北游击战的基点，正在进行广泛的游击战，彻底破坏了敌人自大同至太原的公路，以及正太同浦路的交通线。我们一定坚持在华北的游击战中，完成华北抗战的战略基点。不要说敌人占了太原及晋北的几个城市，就是敌人吞了山西全省，我们仍坚持干下去，决不南退。敌人南进，我们得北进，以摧毁敌人的后方。我敢说敌人吞了华北，决不是一服补剂，相反的是一枚炸弹。

日寇原欲在中国不战而赏其大欲，但经中国长期抗战的结果，将使这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帝国主义者陷入崩溃的深渊。从这一方面说，中国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侵略阵线中，尽了最伟大的义务。

太原失守后华北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8日）

周，朱、彭、任[1]，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2]：

甲、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乙、判断国民党为保卫河南，在晋城、临汾未失以前，山西残兵不至退出，刘湘[3]部队亦有开入山西可能，阎卫孙曾冯赵邓孙[4]等

---

[1] 周，朱、彭、任，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

[2] 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刘、徐、张，指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3] 刘湘，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指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六路军总司令。曾，指曾万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路军第三军军长兼第七师师长。冯，指冯钦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路军总司令兼第七军军长。赵，指赵寿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路军第三军第十七师师长。邓，指邓锡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孙，指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三军军长。

各军残部将大量溃散，即游击战争亦恐不能好好支持。阎将无力再过分干涉八路军之地方工作，故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丙、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1]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2]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估计转移至开始工作至少二十天，工作见效（动作后）再须十天，彼时恐敌已深入汾河流域，并占领孝义等处。转移后徐旅以汾阳为中心，陈旅以蒲县为中心为合宜。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

丁、文年生、阎红彦、白志文[3]所部，担任从佳县至延长之河防。陈奇涵为绥米清佳吴五县警备司令，郭洪涛为政委，指挥文阎全部[4]。文部已在绥德、米脂、佳县、吴堡布防完毕。阎部明日由延安出发，接防于瓦窑堡、清涧城、河口、马家坪一带。何长工为两延[5]河防司令，指挥白部督造船，附监护运输。萧劲光[6]为河防总

---

[1] 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2] 陈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

[3] 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八团团长。阎红彦，当时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三团团长。白志文，当时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五团团长兼两延河防司令部副司令员。

[4] 陈奇涵、郭洪涛当时指挥的还有贺晋年任团长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一团。文年生部布防在绥德、吴堡，贺晋年部布防在米脂、佳县。

[5] 两延，指陕西北部黄河沿岸的延川县和延长县。

[6] 萧劲光，当时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指挥，扼住西岸，拒敌于河东，才能有力地保护河西，支援贺师[1]全师在吕梁管涔两山脉左侧之第一等重要任务。

戊、一二九师全部在晋东南，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准备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非至有被截断归路之危险时，其主力不应退出山西，具体部署由朱彭行之。请周经绥德返延。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

[1]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

（1937年11月9日）

朱、彭、任[1]，并告周[2]转胡、杨，彭[3]：

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之下，日寇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晋西北之神池、宁武、静乐，晋东北之五台、盂县、蔚县[4]、广灵、灵丘，晋东南之昔阳、和顺、辽县[5]、晋城，晋西南之离石、中阳、孝义、灵石、蒲县等处，敌军均将向之前进，因此我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6]（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2] 周，指周恩来。

[3] 胡，指胡服，即刘少奇。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彭，指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山西办事处主任。

[4] 蔚县，在河北省西部。

[5] 辽县，今左权县。

[6] 聂部，指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组建的、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贺师，指贺龙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刘师，指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林师，指林彪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

众武装为第一义。大抵靠近铁路公路地带先布兵先工作，偏僻地方后布兵后工作；敌快要到之地区先工作，敌暂不到之地区后工作。各军大溃，阎[1]亦无主。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捐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做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地各县之进攻。

毛泽东

九日四时

---

[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在国共两党关系有趋恶化之势的来电上批示[1]

（1937年11月11日）

国民党自大主义依然十足，国危至此，还是统制政策不变，我们唯有坚持原则立场，逐步前进，最后冲破国民党的统制。

---

[1] 这是毛泽东在博古（秦邦宪）、叶剑英8日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有趋恶化之势的来电上批示的主要内容。

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1]

（1937年11月12日）

一　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

（一）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

（二）但是我们早就指出（今年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

（三）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

---

[1] 这是毛泽东1937年11月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从这时起，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反对这个提纲；直到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2] 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国的目的。

（四）国民党主张的片面抗战，虽然也是民族战争，虽然也带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是决然不能保卫祖国的。

（五）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

（六）在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全面抗战中，必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必须有一个完全执行这个纲领的政府和军队。

（七）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是这样的：

1. 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

2. 英、美、法等国政府为它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的利益表示援助中国，还限于口头上的同情，而没有什么实力的援助。

3. 德意法西斯竭力援助日本帝国主义。

4. 国民党对于它的用以进行片面抗战的一党专政及其对民众的统制政策，还不愿意作原则上的改变。

这些是一方面的情形。

另一方面则表现：

1. 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共产党和八路军决心坚持华北的游击战

争，用以捍卫全国，钳制日寇向中原和西北的进攻。

2. 民众运动开展了一步。

3. 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

4. 国民党中主张改革现状的势力正在增长。

5. 世界人民反对日本和援助中国的运动正在发展。

6. 苏联正在准备用实力援助中国。

这些是又一方面的情形。

（八）因此，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九）在此期间，中国的片面抗战可能向三个方向发展：

第一个方向，结束片面抗战，代以全面抗战。这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要求，但是国民党还没有下决心。

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

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

（十）依目前形势看来，国内国际不许可投降主义得势的因素，占着优势。这些因素是：日本坚决灭亡中国的方针使中国处于非战不可的地位，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存在，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多数党员的要求，英、美、法顾虑到国民党投降对于它们利益的损失，苏联的存在及其援助中国的方针，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深切希望（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等等。如果把这些因素好好地组织起来，不但将克服投降和分裂的因素，也将克服停顿于片面抗战的因素。

（十一）因此，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十二）中国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现在是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危机也许将延长，也许将较快地被克服。决定的因素，在中国内部是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在这一合作的基础上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在中国外部是苏联的援助。

（十三）国民党有在其政治上组织上加以改造的必要，也有这种可能[1]。这主要地是因为日本的压迫，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人民的要求，国民党内部新生力量的增长。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它实现这一改造，以便作为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基础。这一改造无疑须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同意，我们是站在建议的地位。

（十四）改造政府。我们提出了召集临时国民大会的方针，这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一改造也无疑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

（十五）改造军队的任务是建立新军和改造旧军。如能在半年到一年内建立二十五万到三十万具有新的政治精神的军队，则抗日战场上必能开始看到转机。这种新军将影响并团结一切旧军。这是抗日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军事基础。这一改造，同样须得到国民党的同意。

---

[1]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人民曾经希望国民党进行改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也作了许多准备改革的诺言，但随后又一个一个地背弃了自己的诺言。因此，当时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国民党改革的可能性没有实现，正如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明的：“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

八路军应在这一改造过程中起模范作用。八路军本身应该扩大。

二　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

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

（十六）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十七）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

（十八）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十九）还在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时，又在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特别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洛川会议）时，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

（二十）为什么要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呢？这是因为：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

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1]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2]），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二十一）几个月以来，主要是抗战以来，共产党中央及其各级组织，对这种已经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投降主义倾向作了明确而坚决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并且收到了成效。

---

[1] 庐山训练班，又名庐山暑期训练团，是1937年7、8月间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举办的。受训的有国民党党、政、军、警、教育等部门的高中级人员。

[2] 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他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在参加政权问题上，中央发出了一个决议案的草案[1]。

在八路军中，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红军改编后某些个别分子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等等现象上面。这个新军阀主义倾向虽然和表现在打人、骂人、破坏纪律等等现象上面的老的军阀主义倾向同其根源（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同其结果（脱离群众）；然而它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时期发生的，它带着特别大的危险性，所以特别值得注意，需要坚决地加以反对。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拒绝了国民党派遣他们的党员来当八路军干部的要求，坚持了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据地，同样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纠正了“议会主义”倾向[2]（当然并不是第二国际的议会主义，这种议会主义在中国党内是没有的），坚持了反对土匪、敌探和破坏者的斗争。

在西安，纠正了两党关系上的无原则倾向（迁就倾向），重新开展了群众斗争。

---

[1] 即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

[2] 这里所说的“议会主义”倾向，指当时共产党内有些同志主张把抗日根据地内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制度改变为资产阶级国家中的议会制度的一种意见。

在陇东，情况和西安大体相同。

在上海，对“少号召，多建议”的章乃器主义给了批评，开始纠正了救亡工作中的迁就倾向。

在南方各游击区[1]——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还用“围剿”政策企图消灭、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改用调虎离山政策企图削弱的力量——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1）无条件集中（适应国民党拔去这些支点的要求）的防止；（2）国民党派人的拒绝；（3）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2]的警戒。

在《解放周刊》[3]，坚持了严正的批评态度。

（二十二）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

---

[1]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五个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要求停止内战，开赴前线抗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除琼崖游击区外的大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1938年春，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先后创立、发展和巩固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

[2] 何鸣（1910—1939），广东万宁人。1937年曾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同年6月，他作为中共闽粤边特委的谈判代表，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这一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7月，他率领红军游击队进驻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指定的防地漳浦城接受改编。由于他丧失警惕，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致使闽粤边红军游击队近千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

[3] 《解放》周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1937年4月创刊于延安，在1941年《解放日报》创办后不久停刊。

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二十三）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几个月来，更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左翼群众是在我们的影响下团结起来了，国民党营垒中的新生力量是在增长中，山西的群众斗争是发展了，党的组织在许多地方也发展了。

（二十四）但是必须清楚地懂得，党的组织力量，在全国，一般地说来还是微弱的。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

（二十五）上面说的是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它引导无产阶级

去适合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不彻底性。不克服这个倾向，就不能进行胜利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保卫祖国。

但是还有一种投降主义，这就是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它引导中国去适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国人变为亡国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

（二十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翼集团是共产党率领的群众，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集团。这一任务的完成，是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起来的基本条件，是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条件。

（二十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1]；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中[2]。抗战的军队是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其中某些成分是开始了或准备着改造。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

[1] 指当时《申报》等报纸所代表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

[2] 复兴社和CC团是国民党内的两个法西斯组织，是蒋介石用以维护统治的反革命工具。复兴社的主要骨干是贺衷寒、戴笠等，CC团的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但是，这两个组织中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是被迫或者被骗加入的。这里所说的复兴社中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指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一部分中下级军官；所说的CC团中的一部分人，主要也是指当时其中非当权的一部分。

（二十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他们中间有些人之所以暂时加入民族统一战线，是被迫的和勉强的。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目前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中的许多最坏的分子，正在策动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是谣言的制造厂，“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一类的谣言，今后将要与日俱增。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

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关系

（二十九）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要使这一斗争开展于各方面的工作中。

关于上海失守后救亡运动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

（1937年11月12日）

博、潘、刘：

甲、上海失去后，上海救亡运动必将更为困难。公开救亡团体应准备必要时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亦应有新的布置。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乙、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因此党的与非党的干部，亦应重新分配。一部分应去武汉，一部分去战区，一部分环境较好的仍留下。工作方式应召〈有〉必要的转变。

丙、汉年兄及省委所在地问题，待周博来此后再决定，汉年兄应完全秘密起来。

洛　毛

十一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二人给博古（秦邦宪）、潘汉年和刘晓的指示电。

过渡期中八路军在华北的任务

（1937年11月13日）

朱、彭、任[1]及恩来、胡服、尚昆[2]，并告林、聂，贺、萧、关，刘、徐、张[3]诸同志：

甲、全国片面抗战已无力支持，全面抗战还没有到来，目前正处青黄不接危机严重的过渡期中。

乙、山西各军大溃，除刘湘汤恩伯[4]外，暂时均不能作战。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山西统治阶级及各军领袖已动摇无主了。

丙、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任，指任弼时，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

[2] 恩来，即周恩来。胡服，即刘少奇。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

[3] 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刘、徐、张，指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4] 刘湘（1888—1938），四川大邑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兼第十三军军长。

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丁、林师徐旅[1]速到吴城镇地区，准备与贺师之贺廖支队[2]配合作战，打几个小胜仗。总部、林师师部、陈光旅[3]速到汾西隰县地区，准备打几个小胜仗。刘师应以师部及陈赓旅[4]位于太行山脉地区，多打几个小胜仗。刘师之另一团应交总部或林师指挥，位于介休、灵石以东汾河东岸，与西岸之陈旅配合，夹击沿汾河南下之敌，多打小胜仗。荣臻军区以杨团[5]为基础成立第一独立师是很对的，还应以总部特务营为基础准备成立第二独立师。以上均请朱彭迅即处理。

戊、向南方及四川招兵计划暂时是不可能的。扩红方法主要经过扩大游击队，其次则向大地方招募。目前汾阳以东、介休以北虽已不可能，但汾阳以西以南、介休以南还是可能。请总部、林师注意及时抓一把，再迟亦将不可能了。过去一切计划应以太原、娘子关失守为基点；今后一切计划应以军渡、临汾、蒲县、晋城失守为基点；晋西北应以宁武、神池、五寨失守为基点，晋东北应以五台、蔚县、广灵、灵丘、阜平失守为基点。以上均请考虑及之。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

[1] 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

[2] 贺廖支队，指贺炳炎任团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七一六团。

[3] 陈光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4] 陈赓旅，指陈赓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

[5] 杨团，指杨成武任团长的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独立团。

关于八路军应积极参加特区大会选举问题致各军政首长及政治机关电

（1937年11月13日）

各级首长，各级政治机关：

陕甘宁特区大会，在动员特区广大人民及其武装部队，积极参加抗战，保卫特区的任务之下，定于明年一月五日，在延安开幕。当此抗战紧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特区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特区的大会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在巩固和开展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这是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力。因此特区大会的开幕，实有全国性政治意义。我第八路军是抗战序列中的重要支柱，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必积极地热烈地参加特区大会的选举，选举运动必须与抗战任务紧密联系起来。目前应以一切力量支持华北的游击战争，为全国与保卫特区而奋斗，以英勇战斗与政治工作的模范去影响一切友军，达到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军队，最后战胜日寇的目的。在战争进行特区大会代表的选举，选举办法及时间另告。

毛泽东

在统一战线中
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11日15日）

周[1]，并告朱、彭、任[2]：

甲、周元亥电[3]悉。

乙、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因为国民党及阎、黄、卫[4]在日寇打击之下，已基本上丧失在

---

[1] 周，指周恩来。

[2] 朱、彭、任，指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3] 指周恩来1937年11月13日先后给毛泽东等的两份电报。前一份电报中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一切动员的中心；（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财；（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后一份电报中说，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电报还谈到同卫立煌、黄绍竑商谈的情况，建议在同阎锡山、彭德怀商谈后再返延安。

[4] 阎、黄、卫，指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和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例如周电所述各条及朱、彭要求补充等是完全对的，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

丙、同意与朱彭任、阎黄卫见面后回延安，回时取道延长为宜，请朱、彭、任快点过汾河会商，以在隰县为宜。

毛泽东
十五日十二时

八路军骑兵团向蒙境出动[1]

（1937年11月16日）

高岗同志：

（一）太原失守，绥远[2]更加紧急，内蒙各旗盟王有的已动摇倾日，有的徘徊无主。日寇正利用德王[3]及沙王[4]，企图造成内蒙傀儡政府。归绥[5]、包头失守后，马占山[6]等部集于新五原附近，如日伪再西进，恐难支持目前形势，亟需我们有一支兵北出蒙境，以便镇定人心，联络各旗，开展游击战争，保卫三边[7]。

（二）因此决定你为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及蒙汉支队北出东西乌审旗、鄂托克旗一带，行动于三边以北及沙漠以南。其任务是：

---

[1] 这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给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的电报。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向内蒙古出动，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实际交给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德王，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

[4] 沙王，全名沙克都尔扎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绥境蒙政会委员长、伊克昭盟盟长。

[5] 归绥，旧市名，原绥远省省会，1954年改称呼和浩特。

[6] 马占山，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挺进军司令。

[7]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甲、以“蒙汉两民族团结一致抗日”“保卫绥远”的口号去发起与奔走各旗王的联席会议，做到伊克昭盟各旗上层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对德王、沙王采取批评态度），同时进行广大的蒙汉民族工作，组织与武装他们，建立新的抗日游击队与扩大自己。

乙、与马占山何柱国[1]等及当地国民党人取得联络，传达我们抗日主张及八路军在晋情况，督促他们改善民族政策，去团结全绥抗日组织与武装当地人民，坚决向汉奸作斗争，发展独立自主的群众的游击战争，来打击日寇进攻。

（三）省委蒙民部[2]最大部分工作人员必须随你进入蒙地工作。定边只留一二人，任招待联络之责。

（四）骑兵团及支队经过数日整理动员及准备工作后即可出动。如无皮衣可从盐税局拨二千元购皮衣。

毛　洛　萧

十六日

---

[1]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

[2] 指中共陕北省委蒙古工作部。

致叶剑英等电[1]

（1937年11月17日）

八路军仍在长城南北及同蒲以东至平汉线作战，前锋迫近北平、保定、张家口，并无一个人退回陕北，但中央军则确有一部分退过黄河以西。

---

[1] 这是毛泽东致叶剑英并告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巩固河防为目前紧迫任务[1]

（1937年11月17日）

贺、萧、关、甘，王、孙[2]，并致朱、彭，周[3]：

甲、为保障我们河东部队能在晋省支持艰苦持久的游击战争，及于必要时能迅速安全的〈地〉西渡，且增加敌人河渡之阻碍，故河防之巩固为目前紧迫任务。

乙、已将整个河防线由神府[4]马镇到宜川临真河划分三段，各段设河防司令部指挥之。

1. 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5]河防司令部，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五团为河防部队。

2. 从河口到佳县归五县[6]警备区指挥，以七一八团及警备三团

---

[1] 这是毛泽东和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给八路军第一二〇师领导人等的电报。

[2] 贺、萧、关、甘，指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政治部副主任。王、孙，指王兆相、孙超群，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警备第六团团长和副团长。

[3] 朱、彭，周，指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

[4] 神府，指陕西神木和府谷。

[5] 两延，指陕西延川和延长。

[6] 五县，指陕西北部的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

为河防部队。

3. 从佳县到马镇设神府区河防司令部，以神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

丙、为保障河东部队必要时实施西渡，拟选择以下地段之渡河要点：

1. 从三交到绥、米各渡口。

2. 两延间之马头及平渡两渡口。

3. 神府河防区内选择二三渡口（预备晋西北各兵团使用）。

丁、每一渡河地段备置船二十只以上，大船每只可容百人，并征集必须的水手舵手。为隐蔽我之企图，这些船只应隐蔽河之西岸并派兵看管，防敌毁坏及刺探。其他各渡口之船只，除在必要任交通的渡口上留下一二只渡船外，其余一律或集中他处或停泊西岸，并准备必要时破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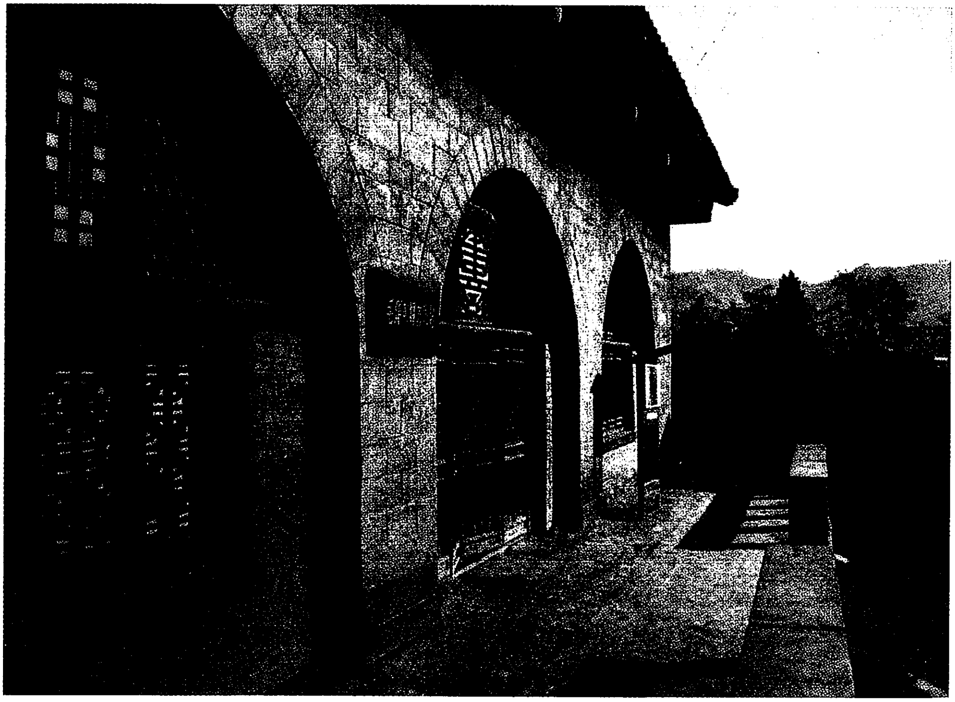
戊、凡对我军不需用之渡口，应依照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彻底破坏，并在沿河某些要点上，特别在我渡河地段上，利用天然险要，或破坏或构筑相当程度工事。其具体布置由各河防司令部负责侦察计划，并告我们。

己、两延及五县河防区已着手布置。关于神府区，请贺萧直接派人，或令王兆相派得力干部为该河防区司令员，前往侦察布置一切与指挥担任该段河防之保安部队，并请转达神府特委知照。

毛　萧

十七号晚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旧居。

对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1]

（1937年11月23日）

（甲）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是中央已定下的方针，谁也不应该对此方针发生动摇。（乙）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决不能束缚红军主力的适当的使用与适当的转移，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丙）红军主力的使用决定于今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于山西一省的形势，你们不要仅看局部，而且要看到全国。（丁）应该及时预防红军主力需要转移时，在同志中丧失坚持山西游击战的自信心。（戊）组织问题待恩来、胡服、德怀来开会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给文运昌[1]的信

（1937年11月27日）

运昌吾兄：

莫立本[2]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3]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

---

[1] 文运昌（1884—1961），湖南湘乡人，毛泽东的表兄。

[2] 莫立本，即方克（1918—2009），湖南桃江人。当时是从湖南长沙去延安的一位青年。

[3] 泽覃，即毛泽覃（1905—1935），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中央苏区独立师师长。1935年牺牲。

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1]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谨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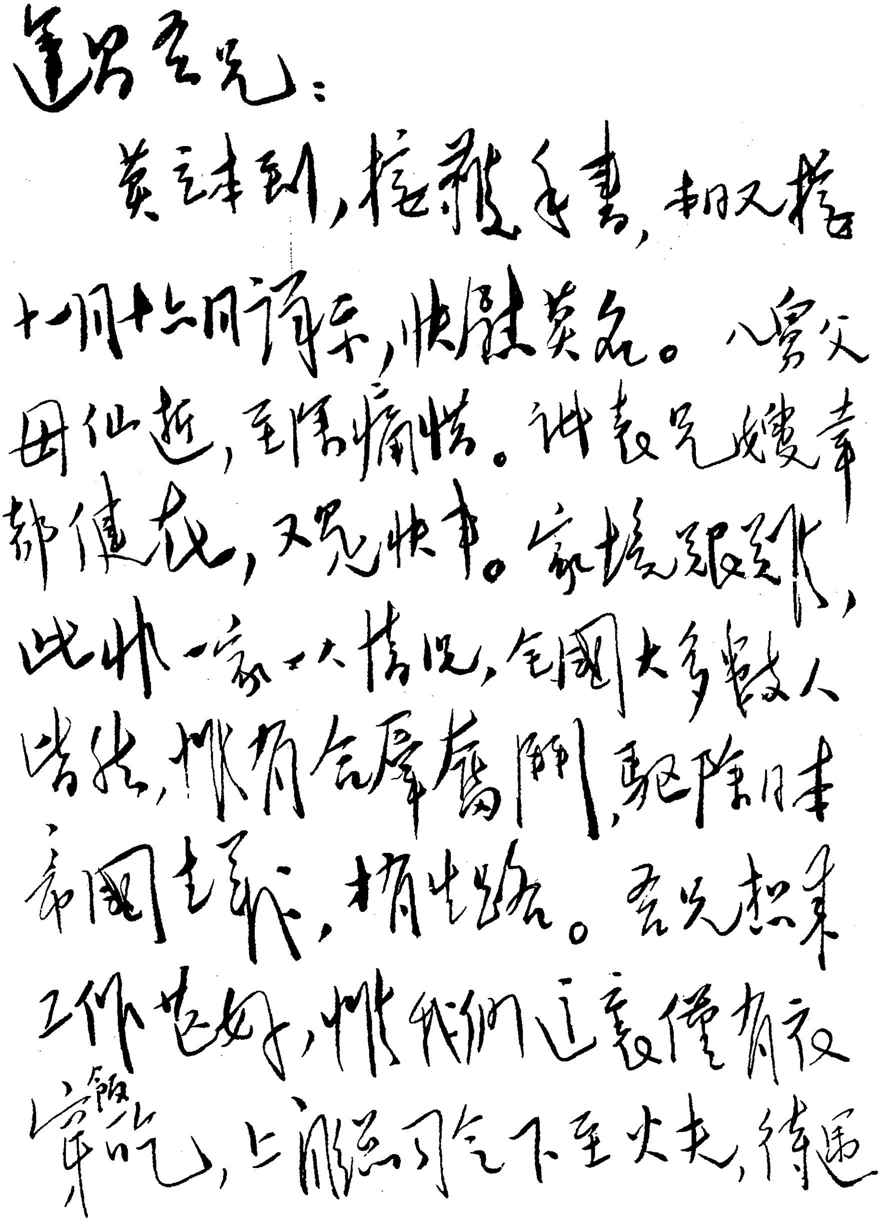
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日二十七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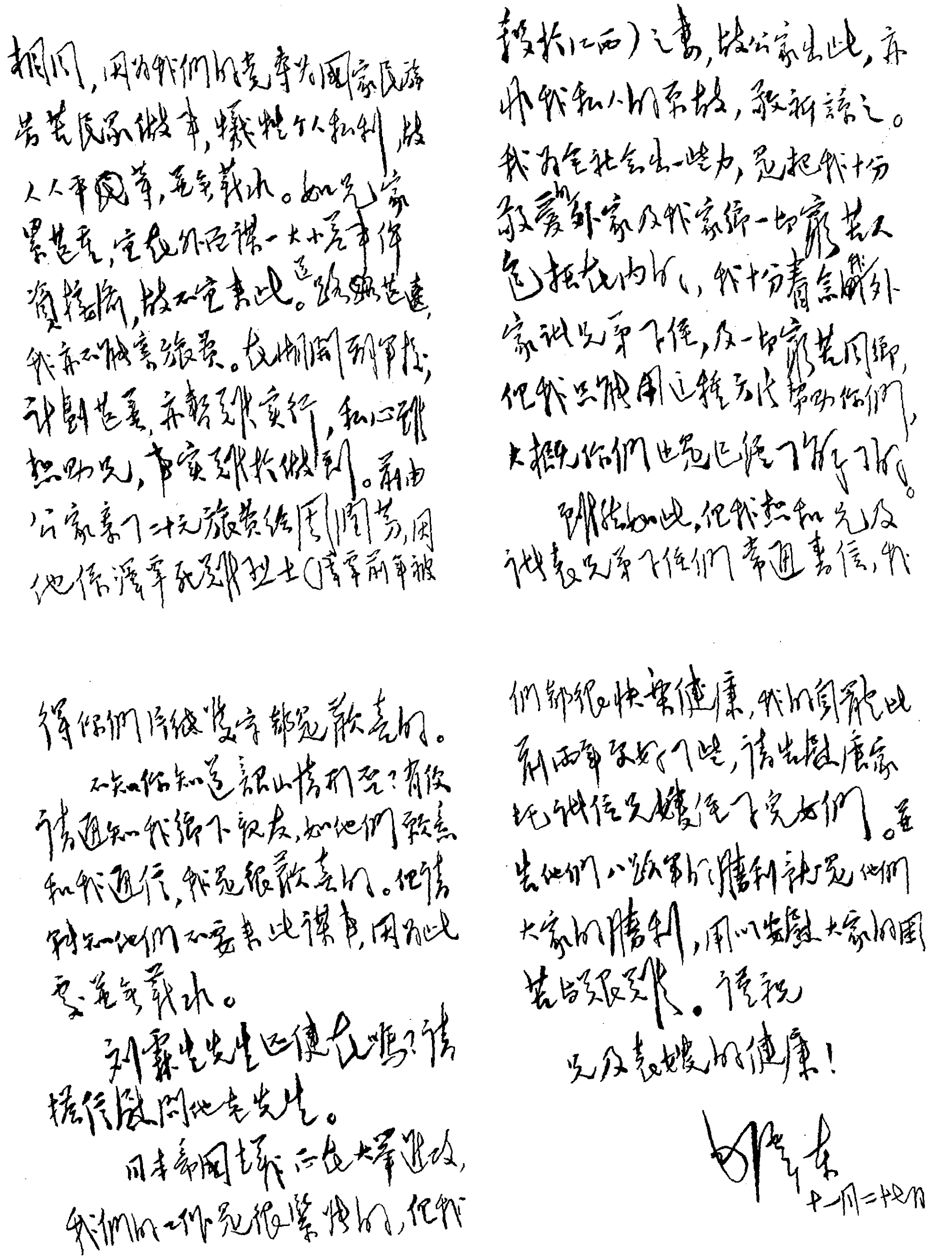
[1] 刘霖生（1865—1949），湖南湘乡人，毛泽东和文运昌的表兄。



运昌吾兄：

莫妹来到，接读手书，并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悼。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出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

毛泽东致文运昌信的手稿。



相同，因为我们的党是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此间则军校计划甚多，亦难于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款项，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候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们自觉比前两年好了些，请告唐家圫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请祝

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致文运昌信的手稿。

围攻三边地区土匪要有周详的计划[1]

（1937年11月28日）

高岗同志：

（一）张范两匪[2]据守土围，强攻土围须有严密的侦察，周详的计划，并对围内及围外之敌须有严密的警戒，不可疏忽。

（二）即请将土围巩固状况，匪之兵力工事，设备粮草柴水之供给，群众条件及匪外援之可能性详细查明告我。

（三）二十七军是否有迫击炮，攻坚的火力如何，均请告，在未有十分把握以前不可轻动。

毛　萧

二十八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萧劲光给八路军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高岗的电报。

[2] 张范两匪，指盘踞在三边（即陕西北部的定边、安边和靖边）地区的张廷芝和范玉山股匪。

关于在我占区加强部队和民众动员工作问题的指示[1]

（1937年11月29日）

前总朱、任：

（一）敌人在晋西后路受我威胁甚大，近日增兵朔县、涿鹿、保定，且停止南进，部分北撤。其主要企图是维护后路安全，似增守沿途据点，依靠据点肃清附近我军，但亦有可能进攻冀察晋区及晋西北区。

（二）我们的占领区域民众及新组织的游击队，缺斗争经验，请立即做以下准备工作：

（1）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与党的工作，成为巩固部队工作的核心。

（2）加强必要的军事与游击动作的训练，最好随老部队实习。

（3）地方民众的动员。

①共产党八路军坚决抵抗敌人，与山西华北民众共艰苦，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②抓紧敌人烧杀奸淫抢掠的事实作鼓动宣传，最好以乡村派代表组织成队到被害区实地察看，组织被害难民到各处宣传。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给朱德、任弼时的指示。

②城市及大村镇要有防空设备。

④封锁消息及宣传坚壁清野的办法与必要。

⑤在群众中开〔展〕反汉奸的斗争，没收汉奸财物分给群众。

⑥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必需具体实现。

以上必需经过群众路线，以村为单位开民众大会，以县或军分区为单位开代表会，只有经过民众的讨论才能取得群众更多的拥护，严格督〔促〕各军区军分区执行。

毛　彭
廿九日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到达延安。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冒雪到延安机场迎接。

为陕北公学学员题词

（1937年11月）

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

1937年，毛泽东、朱德等在延安红军大学和部分干部学员合影。

致朱德等电[1]

（1937年12月2日）

山西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是与阎的关系，特别在日寇缓进阎留山西的条件下，我们更应避免与其作不必要的磨擦。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邓小平等电的主要内容。

对进攻晋察冀边区之敌的作战方法[1]

（1937年12月5日）

1937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挺进晋西北，开辟晋察冀革命根据地。

朱、任：

对进攻冀察晋边区之敌，除上月二十九日电及你们来电外，请注意以下各点：

（一）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

（二）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

（三）同蒲、正太路[2]必须积极活动，予以有力的配合。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给朱德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电报。

[2]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四）注意在敌后方破坏伪组织、伪军。

（五）加紧瓦解敌军工作。

（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增加敌恐怖与进攻困难是必要的，但须详细审慎。

毛　彭

五日二十二时

关于我军应坚决执行统一战线的方针及加强统战教育问题致朱德等电[1]

（1937年12月6日）

朱、任、邓，并告雪枫，尚昆：

（甲）日寇正在进攻我红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及国民党之中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均应执行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基本方针，破坏敌人阴谋。

（乙）对于假借名义及其他一切离开统一战线原则，应即具体取缔。

（一）八路军应带符号，从新规定证章，凡无此据者应一律取缔，并将规定报阎及通报友军及地方行政机关，出布告发表谈话登报。

（二）扩大之地方部队，应与地方政府以合理负担解决给养，避免以八路军此面摩擦。

（三）现在征集粮食资材，应秘密保存，不应现在送回陕北。

（四）贺萧[2]在岢岚银行所拿之五万元应送还，并告以一时款项未到早时假用。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给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并请他们转告彭雪枫、杨尚昆的指示电。

[2] 指贺龙、萧克。

（五）征钱粮布等应即停止，应向当地政府借拨准予筹还。

（丙）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切实检查。

毛　周　彭

六日廿一时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提出放弃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因受到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图为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

复叶挺电[1]

（1937年12月14日）

新四军原则上可以按照何应钦提议作进一步磋商。其他条件如前所商，尤其不要何应钦派人。如暂时说不通，可稍延缓，但不要破裂。项英即来武汉。

---

[1] 这是毛泽东和项英复叶挺电的主要内容。

给抗日军政大学九队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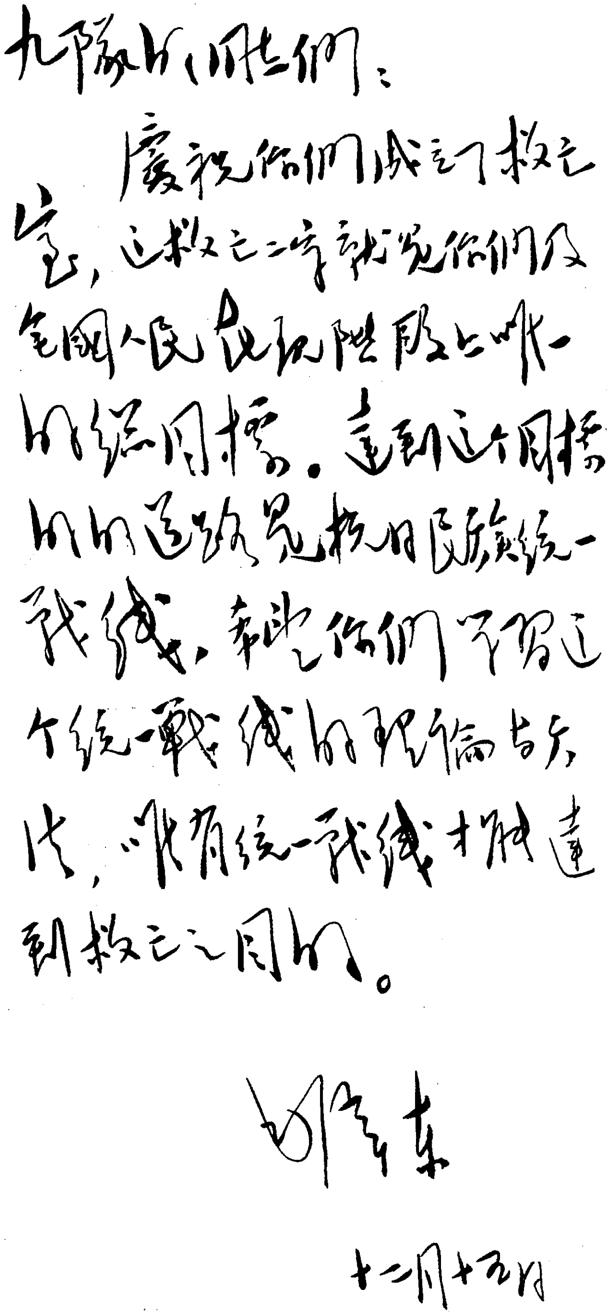
（1937年12月15日）

九队的同志们：

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在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方法，惟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九队的同志们：

庆祝你们成立了救亡室，这救亡二字就是你们及全国人民现阶段上唯一的总目标。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你们学习这个统一戰线的理论与方法，唯有统一战线才能达到救亡之目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抗日军政大学九队信的手稿。

派两个支队向平汉路东游击[1]

（1937年12月16日）

朱、任：

甲、根据聂[2]电，平汉路[3]以东地区现甚空虚，拟向东派出两支队游击。

（一）由一二九师以步兵一个营附骑兵一连，深入到磁县、沙河、赵县以东之永年、广平、曲周、广宗、清河、平乡、南宫、新河、枣强广大地区活动。

（二）荣臻以步兵两连、骑兵一连组成支队，深入到石家庄、保定、定县之线以东，沧石公路以北，天津、霸县至定兴公路以南地区活动。首先即须破坏保定、高阳、任丘至大城公路才易保持机动地区，其次沧石路之破坏亦很重要。

乙、该两支队须配足得力的军政干部及无线电台番号、独用密本。

丙、该两支队任务：

（一）侦察情况。

（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

---

[1] 这是毛泽东和彭德怀给朱德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三）破坏伪组织。

（四）收集遗散武器，扩大本身。

丁、该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

毛泽东　彭德怀

十六日

关于华北我军应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

（1937年12月17日）

朱、彭、任，并告林、聂，贺、肖、关，刘、徐、张，小平、子华，雪枫[1]：

（甲）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八路对华北各友军尤其对阎及各县地方政权，地方绅士，必须保持好的友好关系，一切须求合法与统一，减少磨擦，[2]团结，尤其荣臻所在之晋东北地区，事同一律，不应立异，一切须取得阎之同意者须设法取得其同意，其坚不同意者我们应让步。

（乙）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及晋南各区方针，照此原则办理。

毛泽东

---

[1] 即林彪、聂荣臻、贺龙、肖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

[2] 此处似有掉字。

致朱德、任弼时电[1]

（1937年12月19日）

卡尔逊[2]既坚欲去五台，不便拦阻，但须：（一）除写信给美使馆外，需写一信交总统府说明：如遇危险，中国中央政府及八路军无责任。（二）派可靠队伍送他，严密保护。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2] 卡尔逊，当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观察员。卡尔逊在去前线以前，给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很快要到前方去。""这是我自己要求并且是在朱德总司令劝我不要去的情况下前往的，如果我阵亡或者受伤，我希望明确说明，八路军或中国政府方面没有任何责任。"

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

（1937年12月24日）

五县警备区、两延司令部[1]及警备一、二、三、四、五、七团及关中[2]独立营各级军政首长、各政治机关：

一、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由于敌人的挑拨，汉奸的破坏，某些分子惧怕群众运动，以及党和八路军影响的扩大，各地对于统一战线存在的弱点，某些同志狭隘的观点与方式的机械，在邻近边区的统一战线区域内，引起了与友党友军及地方政府的某些磨擦。这种情形的继续，是可以影响抗日团结的。

二、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

三、为避免不必要的磨擦，为减少可能发生的磨擦，特有如下

---

[1] 五县警备区，指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所属绥德、米脂、清涧、佳县、吴堡五县警备区。两延司令部，指陕西延川、延长两县八路军河防司令部。

[2] 关中，指陕西秦岭以北、黄龙山桥山以南渭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当时八路军留守兵团在关中地区北部一带驻有部队，关中区是军委总参谋部在陕甘宁边区划定的六个军事指挥区之一。

的指示：

甲、对于友党友军及地方当局某些弱点，应采取善意的批评与建议，避免讥笑与讽刺。

乙、除宣传党的主张和八路军胜利之外，对于政府抗战的决心及其他好的设施与表现，友军抗战的英勇与无畏的精神，应加以表扬与赞勉。

丙、因征兵或抽捐税的事，引起群众与政府磨擦时，我们应居中调解，避免对立。

丁、帮助政府进行征兵动员，予以必要之保证，同时应要求政府帮助我们完成募补计划。

戊、在统一战线内，立即停止募捐筹粮的行动，已经借用的仓库存粮，须即归还。没收汉奸财产及处理、捉汉奸必须取得政府的同意，最好是交给他们处理。

毛泽东　萧劲光　谭政[1]

二十四日

---

[1] 萧劲光，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谭政，当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

在敌南进中须集中兵力打两三个胜仗[1]

（1937年12月29日）

朱、彭、任，并告林，聂，贺、萧，刘、徐，胡、杨[2]：

甲、敌向南进攻将分三路，右路占领孝义、兑九地区，威胁蒲城，左路进攻沁县，中路进攻灵霍，至少右中两路同进，不会只走中路，处于我之夹击中。

乙、望按此种判断部署作战，并告阎卫[3]及时准备，地方游击队亦须按此部署。

丙、此次敌南进过程中，我军须集中必要兵力在有利条件下打二三个好的胜仗。因此应及时完成必要的作战准备，以免临事仓惶。盼复。

毛

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萧，指贺龙、萧克，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副师长。刘、徐，指刘伯承、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副师长。胡、杨，指胡服（刘少奇）、杨尚昆，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副书记。

[3] 阎卫，指阎锡山、卫立煌，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对日军进攻形势的判断与我之部署的建议[1]

（1937年12月30日）

陈、周、项、博、叶：

甲、判断敌占济南、徐州、蚌埠或再进占郑州、开封，完成第一期作战任务后，其第二期作战目标，当在占领兰州广州武汉三点，并使相互联络起来。但为早日切断中国对外交通，用以围困中国起见，似将先占兰州、广州而置武汉之占领于稍后。敌由宁夏直占兰州甚困难，其进路似将第一步占宁夏，据确息已经准备三万兵力进攻。第二步分两路：一路西攻凉州，一路南攻平凉，切断新兰西兰两公路。第三步占兰州，此时其正面必已占领郑州，甚至切断潼关。这种危险已迫在目前，蒋及我们须速为部署，否则来不及。

乙、请你们向蒋提议下列部署：

（一）八路三个师主力以一师开甘凉[2]两州，此师须速即开动；以一师开固原地区，此师亦须准备开动；以一师开豫西，此师待敌攻郑州、潼关时开动。三师在鲁、晋各留一团兵力配合游击队，坚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给正在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

[2] 甘凉，旧府名，即今甘肃张掖、威武。

持华北游击战争。

（二）中央军派二师增防宁夏以南。

（三）新疆派一部增防西安、兰州，如何盼复。

洛　康　陈　毛

十二月三十日

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1]

（1937年12月30日）

陈、周、项、博、叶同志：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

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一、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2]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3]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4]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

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5]及浙赣路之敌。

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给正在武汉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

[2] 指安徽的舒城、桐城，湖北的黄梅、广济，河南的商城和固始。

[3] 陈毅支队，指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

[4] 高敬亭支队，指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

[5] 杭甬路，指杭州至宁波的铁路。

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1]南段之敌。

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

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钳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2]提议。

洛　康　陈　毛

十二月三十日

---

[1] 平汉，指平汉路，即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2] 蒋，指蒋介石。

关于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等问题的谈话[1]

（1937年12月）

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等时关于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等问题谈话的一部分。李先念，原任西路军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卓然，原任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原任西路军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郭天民，原任西路军司令部第一局局长。程世才，原任西路军第三十军代军长。

在留守兵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

（1937年12月）

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要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的建军道路。

---

[1] 1937年12月，八路军留守兵团正式成立，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的团结”为兵团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为古柏[1]题写挽词

（1937年）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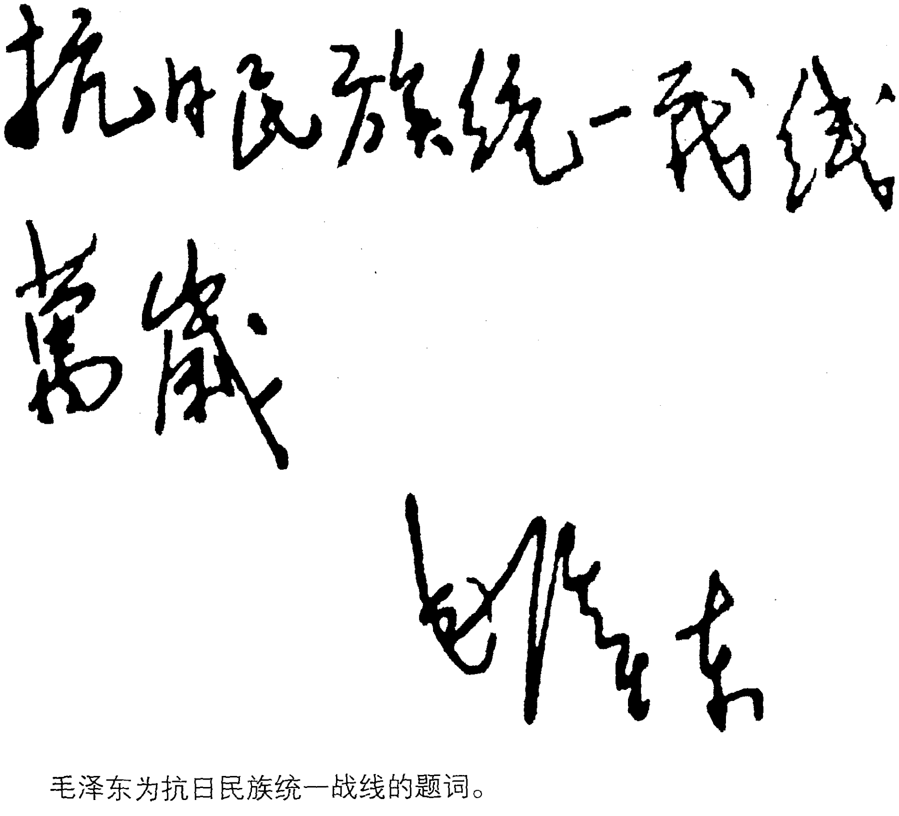
[1] 古柏（1906—1935）男，汉族，江西省寻乌县人，中共党员。1935年3月6日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被国民党军包围，在掩护同志们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本文是噩耗传到延安后，毛泽东给古柏写的挽词。

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题词

（1937 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

毛泽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萬歲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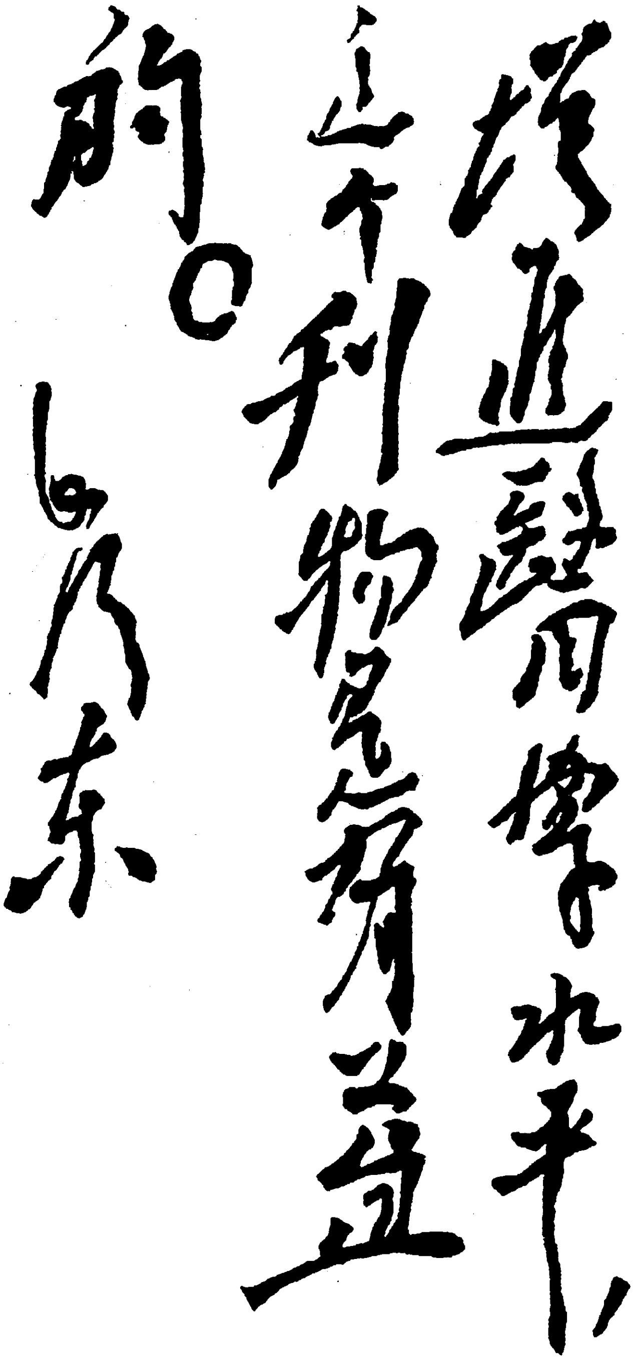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题词。

为《国防卫生》杂志题词

（1937 年）

增进医学水平，这个刊物是有益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国防卫生》杂志的题词。

为中央社会部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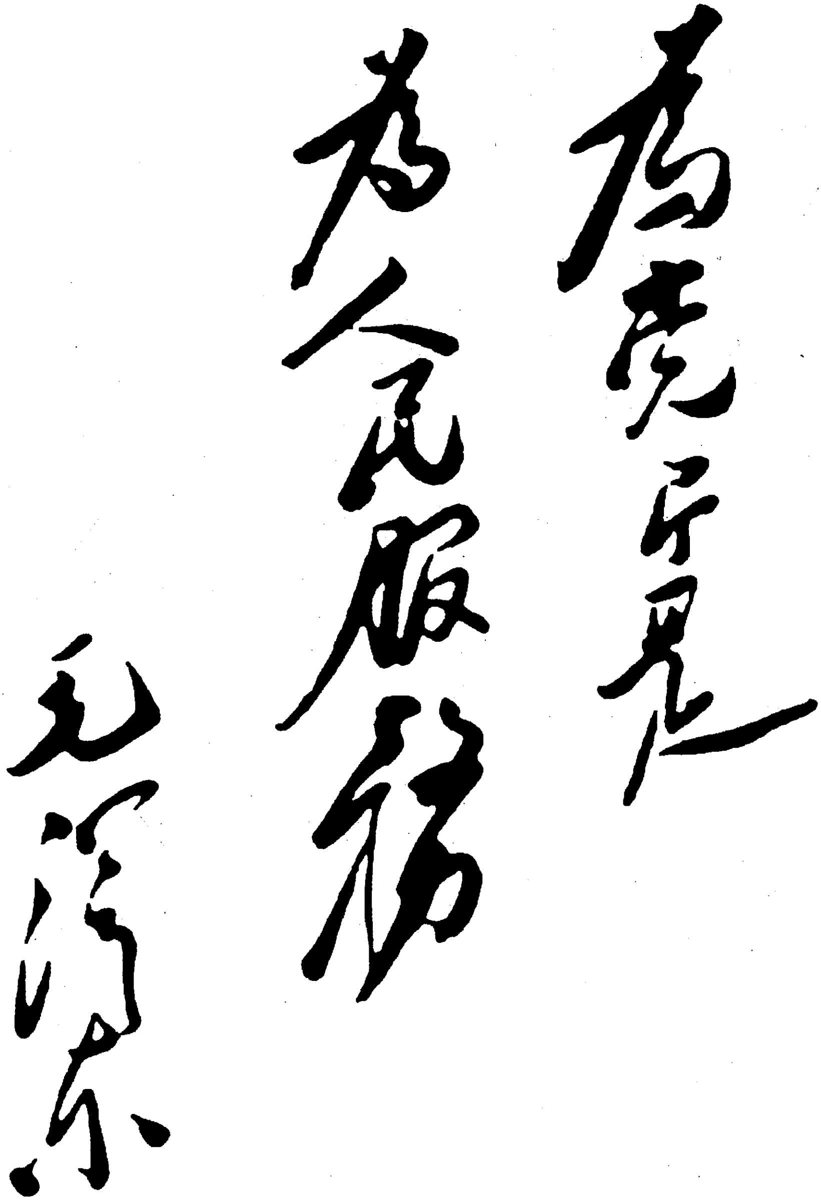
（1937 年）

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

[1] 中央社会部是公安部的前身，最早是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局，1935年11月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更名组建成了西北政治保卫局，成为保卫中共中央的主要机构，由毛泽东的老部下周兴任局长。1937年又改名为边区保安处，它是陕甘宁边区公开的治安管理部门，仍由周兴负责。中央社会部成立之前，边区保安处代行社会部的职能，组成社会部和情报部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是从边区保安处调出，所以保安处与社会部原本是一个机构的派生关系。鉴于边保锄奸肃特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中央社会部内部刊物上，做了“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的题词。



毛泽东为中央社会部的题词。

和美国记者谈中日战争

（1937年）

记者问：你们主张全国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战斗而将其驱逐出中国。这是不是说中国现在已无须外援而能单独战胜日本？

毛泽东答：首先我要提醒你，中国和日本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东方的治乱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日本暗中有其同盟国——如德意等，同时中国要想抗日成功也必须在其他强国中找到帮助。但这并不是说没有外援中国就不能和日本决战，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抗日以前一定要找到外援。

中国蓄有巨大的潜力，在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能够组织而成为有力的抵抗线。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斗争中已经深切地了解这种力量，并且找到了运用它的良方。中国的大众靠了长久的政治经验已能熟练地运用他们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们的敌人。

我们坚信中国人民决不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动员我们的伟大潜力以抵抗日本，以我们最大的精力和侵略者的挑战周旋，在这个斗争中，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假如中国单独作战，自然牺牲较大，战期较长，因为日军有优美的军备，此外它也有它的同盟国。所以要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牺牲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者，中国首先要在自己的境内组成联合战线，其次还要将它扩展到关心太平洋和平的列强。

问：*在何等条件之下，中国人民能战胜日本的军力？*

答：三个条件能保证我们的胜利：一、中国人民反日本帝国主义联合战线之成立。二、世界反日战线之组成。三、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人民革命之发动。但其中最主要的自然还是中国人民本身的联合。

问：*请问这样的战争要拖延到多久？*

答：这要看中国政治动员的力量。中国反日本的许多有利条件的因素，和国际援助中国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发展的迅速而言。假如中国的政治动员是强有力的，假如在纵的和横的方面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假如明了自身利益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国际方面大量地予中国以援助，假如日本的革命很快地爆发的话，那末这次战争很快就能胜利。假如这些条件还不能具备的话，那末这次战争是非常长久，但结局日本还是要败的，只不过牺牲重大，且成为全世界的一个痛苦时期。所以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都已准备和任何国家联合以缩短战期。但假如无人与我们联合，我们还是要单独干的。

问：*你以为苏联及外蒙是否要参加这次战争以助中国？并发生在何种形势之下？*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它不能漠视远东的事变。它是不得不动的。还是坐等日本征服全中国后之以为攻击苏联的根据地？还是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以获得独立，而与苏联的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想苏联一定是采取最后一条路途的。

我们相信只要中国人民开始抵抗并需要和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的同盟时，那末苏联一定会与我握手做先锋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的事业，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自然不会较英美更守中立。

日本进犯中国的近因及其前途

（1937年）

一　我们对敌人的面孔应该认识得更清楚些

六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六年来，中国从日寇得来的教训，本来已经够多了。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对他本身及其行动的观察，常常认识不足，甚至犯严重的错误。就拿最近日寇大规模进犯中国这一严重事件来说吧，对于这一事件，就有许多离奇怪状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这次日寇向华北以至向上海开火，完全是日本少数少壮派军人的行动，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整个的国策（他们认为连日本金融资本家以至近卫内阁也不同意）；有些人认为这次事件的暴发，是出于“偶然”的，而不是日寇预先有布置有计划的行动（他们的证据是，在日本未发动进攻中国之前，东京金融市场并没有紊乱。等到日本在华发动进攻以后，公债及各种商业股票才开始惨跌）；甚至还有些人认为日寇这次行动只是“示威”性质，最少在主观上并“不愿意把事件扩大”等等。

不消说，这些看法，都是极端错误的。第一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把日本的少壮派军人看得太神化，而没有把日本帝国主义和近卫内阁的本来面目认识清楚。固然，在华北发动战争和指挥作战的是日本的少壮派军人；但是，这些少壮派军人是谁派他们来的呢？他们

的行动代表谁的利益呢？稍微注意一点时事的人都知道，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华北的驻屯军干部，大部分都是在“二·二六”事件后，或在去年华北驻屯军强化计划实施后由东京调来的。现在华北驻屯军的首脑，被称为荒木派的香月清中即则是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才由东京方面派来的；经过“肃军”后的东京当局，例如预先没有“放火”的计划，为什么要派这些“点火者”到最容易发火的华北来呢？尽管这些“点火者”在点火和扩大火焰的瞬间不一定要得到东京方面的同意，尽管他们在某些部分的问题上甚至会和他们的主人——金融资本家地主等有不同意见，但是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忠实于他们主人利益的，老实说，日本帝国主义已把“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布置好了，驻华北的少壮派军人不过忠实地活泼地按着这计划去做罢了。如果有人认为日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以至近卫内阁不同意华北驻屯军人这次在华北发动战争的行动，那是完全不合事实的谬误之谈。要知道东京的金融资本家大地主等，希望无事平稳地继续五年来资本收益日益增大的过程固是事实；但是到了除非用战争解除他们的危机和延长他们的生命的时候，他们也决不会同意发动战争的！只要看在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东京各政党对“近卫政策”（其实就是军部的政策）完全表示支持，就可以看到政策背后的金融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态度如何了。至于说，近卫内阁也不同意这次战争，那就更加荒谬，我们早已指出，近卫内阁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调和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为了实现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第二、第三两种观察错误的根源是和第一种相同的，不过其意义来得更加严重。由于没有看得清日本统治阶级的矛盾的一致性，由于没有把握住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必然性，而只凭一些极表面的事实或不可靠的材料不加思索地乱下断语，那只

会在有意无意间中了敌人宣传的毒计了！但我们必须指出，敌人天天宣传这次日中“小冲突”是出于“偶然”，日本政府“不愿意把事件扩大”……完全是具有烟幕作用的！它所以要散布这些烟幕弹，一方面是为向其他帝国主义掩饰它独占中国的既定计划，使得这种计划能畅行无阻；另一方面则是为动摇中国不坚定分子，使这些分子继续保留一线苟安的幻想！对于这些烟幕，中国的舆论界早就应给以揭破；可惜中国的舆论界，当华北战事发生的时候，往往只注意到华北的问题，当上海战争发生的时候，又往往只注意到上海的问题，而对于敌人对中国进攻的整个计划，却不但很少有正确的把握，并且有些论调还陷于严重的错误！反问这次战争真的是出于“偶然”吗？日本政府真的“不想把事件扩大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前，日本政府对言论界彻底的统治，关西几个师团到了除队时间而不下令解散等等，为的是什么啊？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即下总动员令，在短时间内即动员近三十万大军（包括第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九、二十等师团）到中国来，又为的是什么啊？我们根据事实，不能不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向中国实行大规模的进攻，不但是有计划的行动，而这种计划的严密性及其广大性是以往所没有的！不健忘的读者总应记得，当日本军阀在一九三一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统治阶级间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当时的日本原外相居然敢向日本军阀诽议“日本吞下满洲，等于吞下一颗炸弹”（大意如此）。但是这一回却不同了，根据东京的通讯：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各报的专电，各杂志的书论，各政党负责人的发言……差不多是“句句一样，众口一词”的，由此可以看到日本政府对这次在事前事后，都有严密的布置，其严密性甚至连日本的

“交易所”有可能在发动战争之前也不知情（代表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当它执行对主人有利的计划，特别是军事计划时，不一定要在事前完全得到它的主人们的同意），至于说到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次侵略计划的广大性，我们可以断定，是九一八以来所没有的：现在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战和全国性的抗战了。

二　日本为什么要在目前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

日本帝国主义者自从完成了田中奏折里所明白记载的“征服满洲”的计划后，天天在准备着实现“征服支那全土”的计划；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以要选择在目前下决心执行这个计划，当然是由种种客观的原因所促成的。

第一，我们从日本经济方面观察。日本新的经济恐慌的征兆已经非常明白地表现出来了，不管日本的军需工业有怎样畸形的发展；但是由于军费无穷尽和无限制的膨胀，致使赤字公债无法消除，物价的高涨无法抑制；同时由于军需原料须从外国大量购入，致又引起对外贸易的空前入超；跟着国际收支的无法平衡，大量的黄金也不能不往外送了，据日本官厅发表的统计：日本自去年四月到今年一月间，物价总指数高涨了百分之三十一（国内商品高涨了百分之十三，输入商品高涨了百分之五十六），几个月来物价高涨之势，还是有加无已；至于入超和黄金外流之数，尤为惊人，本年上半年的入超达六亿四千万元，至目前为止输往美国的现金共分四次，总额达二亿七千万元。照目前情形看来，日本经济的恶化，只有日益深刻，而丝毫没有“好转”的倾向，如此发展下去，新的恐慌来临，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是无论是怎样蹩脚的经济学家都可

以看得出来。惯于向中国抢劫以“打开”危机局面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要在这样的时候，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不是“偶然”的了。

第二，我们从日本内政方面观察。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日本国内阶级与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这也是应有的文章了！据日本官方发表，本年一月到五月发生的罢工事件达一千三百三十二次，比去年七百次几增加了一倍；农民斗争则仅一月至三月已达一千六百五十六次之多了。由这些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到日本国民生活的不安，和日本工农大众在世界无比的残酷的警察制度压迫下面，如何英勇地要求生存了。

至于日本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也始终不易彻底缓和，虽则日本统治者在面对着各种危机之前，极力设法使军部和党政间的矛盾和缓下去，然而以实现“军资合作”为任务的林内阁的“不幸短命而死”（只有一百十七日的寿命），表示调和前途的不可乐观。近卫文磨的登台，虽则也以“缓和国内之彼此对立，以收举国一致之实”为己任；但是近卫登台以后，不但“军资合作”既得的成绩，无法维持（结城不愿再当财政部长），不但已成的许多对立无法消除，就是在内阁之内，马场广田贺屋之间也未见融洽。光阴易逝，特别议会召集之期已经不远，可是“新党”的组织，毫无把握，这不能不使近卫内阁感到前途的黯淡；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连结在一起的，日本统治者在这样的危机的威胁下，当然要发狂起来，拼命向中国狂噬了。

第三，我们从军事方面观察。侵略主义的日本为要补救军需工业资源的缺乏，为要完成建立进攻苏联和对抗英美的有利的军事根据地，在获得了和相当巩固了满洲、热河等“生命线”之后，进一步夺取华北、华中以至华南，原是必走的路径和既定的方针。现在

眼看着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行将开始。中国抵抗的实力显著地增加，同时世界和平势力和侵略势力最后搏斗的时期也日益迫近，在这样的种种刺激的下面，不能不使这位“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全，而又偏要硬撑好汉”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它日夜企图要实现的既定方针，加速地“断然”执行起来！

第四，我们从日本国际环境来观察。在这一方面，从日本统治者看来，目前执行它的“既定方针”是相当有利的。他们认为欧洲的国家正忙于应付他们的盟友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班牙的“硬干”。当然没有余力干涉远东的事情，他们特别高兴英国“友谊的态度”实在的，英国绅士这种态度对于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给予不少的鼓励。

苏联消息报早已指出，英日谈判是促进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在《中国抗战与英国》一文中，也已说明，英国在远东一贯的动摇不定的老政策对于帮助日本进攻中国是有着莫大的作用。

此外，美国爱玩的“中立”政策，和日本军阀对苏联的厉行清党肃军错误的估计，都使日本军阀误认为是有利的条件。

最后，最近中国内政的动向，对于日本的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可以这样断定：假如中国内部的团结早已十分巩固，民主政治早已实现，那末，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是踌躇一下的；然而不幸得很，中国自西安事变后，和平统一虽已得到初步的成功，但是中央政治机构的彻底改革，国防政府的建立，亲日势力的肃清，民主政治的实现，还相去很远，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便乘着这些空隙，赶快向中国开炮了。

以上的几种因素当然是互相联系的，日本帝国主义就是在这些因素的交互促进和影响下，便决定向中国找寻出路。

三　侵略中国是不是日本的出路

在六年前，日本军阀曾在国内危机非常深刻，国际环境却相当顺利的条件下，干过一回，结果可以说相当得手；现在，它又要干第二回了。这一回也是不是像前一回那样顺利呢？要解答这一问题，也应该从几方面来观察。

第一，日本统治者以为进攻中国可以“打开”经济的危局，我以为这完全是一种错算。在战争还没有发动以前，日本的经济危机已经如此深刻，财政方面已经如此没有办法，在战争发动以后，日本每年将需要多少战费呢？据专家估计，起码要一百五十亿到两百亿元，这是倾日本全国民的收入也不足此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战争除了引起财政的破产外，将使对外贸易更加恶化，物价更加高涨，那也是意想中的事情。据最近东京通讯：“华北事变发生后，金融市场已经被搅得一塌糊涂，一般粮商更乘机操纵粮价，囤积居奇，致使粮食价格猛增不已。”（《申报》）将来战争愈持久，财政和经济的破产必然更加显著，所谓“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将是日本这次企图以战争来打开经济危机的必然归趋！

第二，日本统治者企图以进攻中国来缓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结果也必然适得其反，不能不使日寇企图在中国造成“既成事实”，而逼使英国承认。

日寇以其素来狡猾的手段，一方面实际上在侵略行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在外交辞令上，则散布“不扩大事态”“地方解决”。日寇这种狡猾的手段，一方面用以掩盖他的为世界人类所攻击的侵略战争，以便在这种外交辞令的掩盖之

下，进行“不宣而战”的对中国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借以减弱对国际舆论和英美的刺激；另一方面则用这种外交辞令，以减弱中国的自卫行动，以勾引某些人对日寇的幻想，企图作和平的幻想以牺牲中国；同时以便给某些亲日派的分子，还在南京政府中保持“有用的”地位，因此这些亲日派久为全国人民所痛恨唾弃，自国内和平统一开始以来，他们逐渐地在南京政府内失去地位。

卢沟桥抗战的失败，平津的陷落，还是由于日寇的狡猾的手段所达到的。宋哲元氏上了日寇的老当，受了日寇的欺骗，由于宋哲元反对日寇和平解决的幻想，企图苟且偷安，临事犹豫动摇，不去积极地进行自卫战争，反而与日寇进行妥协谈判。因此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重镇轻易地失去了。当然平津的陷落也有其他原因，如过去南京政府的退让政策，使日寇在平津造成优势的地位。但这早已成为错误，如果在卢沟桥事变时，采取坚决抗战的方针，积极进行自卫战争，是能够补救的。可是冀察当局宋哲元氏没有这样做，而南京政府在卢沟桥虽有□□□坚决抗战的方针，但对于冀察当局与日寇的妥协并没有表示反对，相反的却是容忍了这种妥协，在八月十四日南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说：“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的容忍，对于此次之解决办法，亦未予反对。”在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时候，对于平津之增援，亦未采取积极的自卫战争。平津失守的教训，已经是再一次地说明，如果对日寇还保存“和平解决”的幻想，是要上日寇的老当，是要受日寇的欺骗，而使中华民族遭受莫大的损失。

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战，全国舆论全国空气都是为坚决抗战所压倒。□□□七月十七日所发表的代表南京政府

抗战的方针及南京政府在军事上的措施是值得全国人民所赞许的。在平津、上海、南口的抗战中，中国军队英勇地抵抗是为全国人民所致敬的，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战。

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神圣的任务，就是一切为着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的生路，只有进行全民族的神圣的自卫战争，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去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已经由准备抗战进入了实行抗战的新阶段，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五日的决定中指出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准备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现在已经到了须要进行全国的总动员，须要进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去保障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的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问题。中共中央同时指出：“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同国民党及其他抗日派别的区别和争论，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今天争取抗战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为着保障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十大纲领是保障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唯一正确的方针，我们号召全国人民中国政府为着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只有坚决实行这十大纲领。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到今天为止，还是把抗战限制于单纯的政府抗战，到处限制人民和拒绝人民参加抗战，阻碍政府军队和人民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肯彻底改革政府的政

治机构，这种抗战的方针，是包含极大的危险性，虽然可能取得暂时的局部的某些胜利，但决不能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南口失利的经验就可证明这一点。某些前线作战的部队，不但不发动人民参加抗战，反而压制人民的救国运动，解散在前线的人民的救国团体。

上海抗战中也同样出现这种现象，上海和南京的救亡团体遭受当局禁止活动，文化界出版的救亡刊物亦遭受查封。当八十七、八十八师在上海英勇抗战的时候，上海人民自动地参加和慰劳，都被上海某些当局所拒绝。在某些人操纵下的上海抗敌后援会，没有积极地援助八十七、八十八师的抗战，结果使两师在前线一天一夜没有饭吃没有水喝，而抗敌后援会却有堆积如山的慰劳品，让其腐烂而不送给前线的部队。因此前线抗战的部队埋怨说这次上海的人民不如上次“一·二八”积极。其实这次上海人民积极援助上海的抗战，是大大地超过上次“一·二八”，可是因为国民党的限制政策，使得人民与军队隔离，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上海的抗战又有重复南口教训的可能。

卢沟桥抗战的失利，平津的陷落，虽有廿九军英勇的抵抗，佟麟阁、赵登禹奋勇的牺牲，但是由于宋哲元氏仍没有抗战的决心，当然也就不会去实行正确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当平津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起来援助廿九军时，宋氏不但拒绝了人民的援助，而且宣布戒严禁止人民的爱国运动。平津虽有许多不利的条件，但这并不能说明平津绝对不可保守，如果当时发动广大的人民，武装人民，平津是能够保持相当的时间在中国的手里，以待中国大批援军的赶到，可是宋氏深夜退出北平，宁愿把北平给日寇占去，而不愿北平人民起来保卫北平。

我们号召全国的人民，只有坚决地实行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抗战

方针，才能保障中国抗战的胜利，我们号召国民党全体党员，应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放弃统制的政策，采纳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方针，这是保障抗战胜利唯一的方针。

阿比西尼亚的亡国，并不是因为它发动了对意大利侵略主义者大规模的民族战争，而是因为它没有实行正确的民族抗战的纲领。阿比西尼亚的国皇，没有依靠在全国人民的力量上，他控制着民族战争，他个人曾成为民族英雄，但全民族则陷入亡国的命运。反之，西班牙的民族战争，则依靠人民的力量，结果能够与德意两国最大的法西斯侵略者战争到一年多，而仍保持马德里在政府军的手里，并击退了法西斯屡次的进攻，并取得胜利。我们还应该知道西班牙政府抵抗弗朗哥叛军的进攻时，西班牙原有的军队百分之八十在叛军手里，因为西班牙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抗战方针，迅速地组成了新的军队。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必须要从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两个民族战争中去学得教训。

救中国的关键，是在实行一个正确的抗战的方针。要把政府的抗战变为民族的抗战，要把单纯的军事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中共中央的十大纲领中，就是包括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方针。

要实行中共中央十大纲领的最主要的条件，必须是为着抗战而发展民主权利，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发动人民参加抗战，方能使人民自由地参加抗战，只有人民参加抗战，才能使政府军队与人民结合起来，才能把单纯的军事抗战、政府的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

国民党中有些人说，要等到抗战全面胜利以后才能实现民主。这种意见的错误，显然不懂得没有民主，抗战就不能胜利。因此中共的决定中提出：“过去阶段中由于国民党的不愿意与民众的动员不

够，因而没有完成争取民主的任务，这必须在今后争取抗战胜利的过程中去完成。”争取抗战胜利与实现民主权利不是互相分离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赖的。

国民党中有些人说，要抗战要牺牲自由。这种意见的错误，也正如对于民主与抗战的关系的错误了解是一样的。如果没有政治自由、爱国的自由，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就成为不可能，要争取抗战胜利也无保障。

我们赞成在民主的基础上，以争取抗战胜利为目的，进行全国民众运动的统一。但统一民众运动，并不能解释为统制民众运动。对民众运动的统制，事实上即是对民众运动的压制，在统制政策之下，自然不能动员广大的民众参加抗战。所以我们主张民众运动的统一，而反对民众运动的统制。

某些民族失败主义者，在全国抗战空气压倒的情机之下，不敢公开地揭起反对抗战的旗帜，于是在各种言词的掩盖之下，散布民族失败主义的情绪，如说“中国是弱国不能抗战”，如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是了。这些民族失败主义者，都不了解中国虽然是一个弱国，正因为他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进行正义的神圣自卫抗战，依靠民众力量，是能够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的。

要争取抗战的胜利，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发动全国的民族抗战，我们是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如果把抗战看作只是政府的抗战，单纯的军事抗战，那么这种抗战是包含极大的危险性的，有遭受重大的挫折与失败可能，为要避免这种危险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那只有坚决实行正确的抗战方针，即是实行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这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保证。

维护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坚决实行中共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

动员一切力量为着争取抗战的胜利！

对抗大第三期全校干部会议的指示

（1937年）

一切干部要下定决心来干，要认识抗大的教育是抗日事业的一部很重要的工作，是增强抗日力量的一个有效的具体的方法，抗大的任务是光荣伟大的，我们应该为这光荣伟大的任务而奋斗。

读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一书的批注

（1937年）

思想方法论

第一章　方法论和思想方法论

一　改变世界的方法

并不是没有微弱的进化，永远停滞的东西是没有的，我想。

人类的改变世界，是不断地在进步，决不停止在现状上，动物的改变却不是这样的。蚂蚁蜜蜂始终只依赖着它们生来的能力去生活。[第3页]

二　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为发展，种样日益增多。

世界上的事物是无限地多种多样，各种各样的事物又都有着那各种各样的特性和法则，……。[第9页]

第三章　认识论和思想方法论

一　认识是反映

“跳跃”

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础，没有实践，也就没有认识，整年关在屋子里享福的人，比较起那尝够千辛万苦的人来，对于社会的认识就差得多。单单在书本子上读一年的化学书，不如在实验室里好好的做一个月。认识并不是单单客观的反映，主观的活动对于这反映也有很大的作用。[第 42 页]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让步[1]

（1937年）

问：为了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起见，共产党在他的政纲中作了不少的让步，这些让步是否有相当的限度呢？对于共产党将来政策之影响又如何呢？

毛泽东答：共产党的让步，是为了要与国民党合作，以形成民族统一战线。让步的成立是国民党须实行下列三项主要条件：（一）为中华民族求解放，要进行抗日战争。（二）实现一种民主制的共和国。（三）改善人民生活。在这种谅解之下，共产党作了一些让步，比如，改换红军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中华民国内取消苏区名称而改称“特区”；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些都是为消除中国两大政党的敌对行为而采取的。另一方面，国民党也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同时在八路军中和特区内共产党保留了它自己的独立的领导地位。我们的这些让步，表示我们为了整个民族利益所能做到的限度。国民党里有些分子，想要越出这个范围，而取消共产党独立的领导地位和特区。然而共产党如果作这样的让步，并不对抗日战争有利。共产党现在是忠诚地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合作，并更为它的扩大与加强而努力。这种态度与政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

---

[1] 这是毛泽东和美国来访者谈话的一部分。

为这是代表了中国工农大众的最大利益，也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坚决地坚持它的方针，一定要为实现它的方针而努力奋斗。

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坚决地反对任何对日妥协的倾向，投降主义的妥协是阻碍革命的成功。共产主义者应当像批评家那样密切注意着，无论在党内党外，对任何危害国家独立而进行的妥协，都应提出反对。因此，坚持我们的方针，并为此而长期地继续努力，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民族解放运动。共产党提出的民主共和国不可能一蹴而就，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四年五年，必须是长期不懈的努力，最后中华民族终将实现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和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政治制度。毫无疑义，这样的一个国家必须建立在全民族的完全合作上，不然这样重大的事业必不能完成，因为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共产党为要实现民主共和国，决不更改它现在奉行的政策，它将忠诚地支持民族统一战线，直到其他的政党接受三民主义并实行之。

问：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今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再重蹈一九二七年的覆辙？

毛泽东答：维持今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有四个主要因素：

（一）中国人民在过去十年中已得到许多教训。他们记得他们所遭受的许多痛苦、悲哀和经济困难，都是由于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战线的破裂。他们记得将近十年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中国民众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他们不愿意民族统一战线被社会上的一小部分人破坏。如果有少数人想破坏这个统一战线，大多数的民众必须会反对他们，民众会维护这个统一战线，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个统一战线才能完成国家独立的使命。

（二）在一九二七年那些破坏统一战线的分子也得到许多教训。他们知道破坏统一战线后给民众以极大损害，类似通敌的破坏国民革命之事不能再度发生了。

（三）共产党也在过去许多年中学得许多经验。共产党必定用全力维护并加强民族统一战线。如果没有个共同的纲领发动大多数群众来参加，这个统一战线是不能持久的。如果有了共同的纲领又能借民众的合作来加强它，那末这个统一战线就可以保持到底，以至于完全实现它的目的。共产党一定忠诚地为此而努力。

（四）现在的国际形势是非常有利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它比大革命时期更好，而且不易再发生裂痕。国际形势需要一个比较坚强、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世界和平阵线，以对抗法西斯阵线或帝国主义阵线，这样，民族自由与三民主义之实现才可能胜利地达到。

谈恋爱三原则[1]

（1937年）

第一条原则即政治上一致的原则。现在的革命任务是抗日救国，将来还要实行共产主义，男女之间的爱情首先要有这个基础，我们能爱敌人吗？能同汉奸、卖国贼谈情吗？只有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才有可能说到此人可爱不可爱。第二个原则即是双方自愿，绝非单方面愿意。我们主张男女平等，我们反对男尊女卑，我们反对大男子主义，更不能有变相的强迫。第三个原则即是不妨碍工作。在青年中要提倡工作第一，绝不能恋爱第一。更不能“若为恋爱故，万事皆可抛”。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谈恋爱原则问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和郭奇等的谈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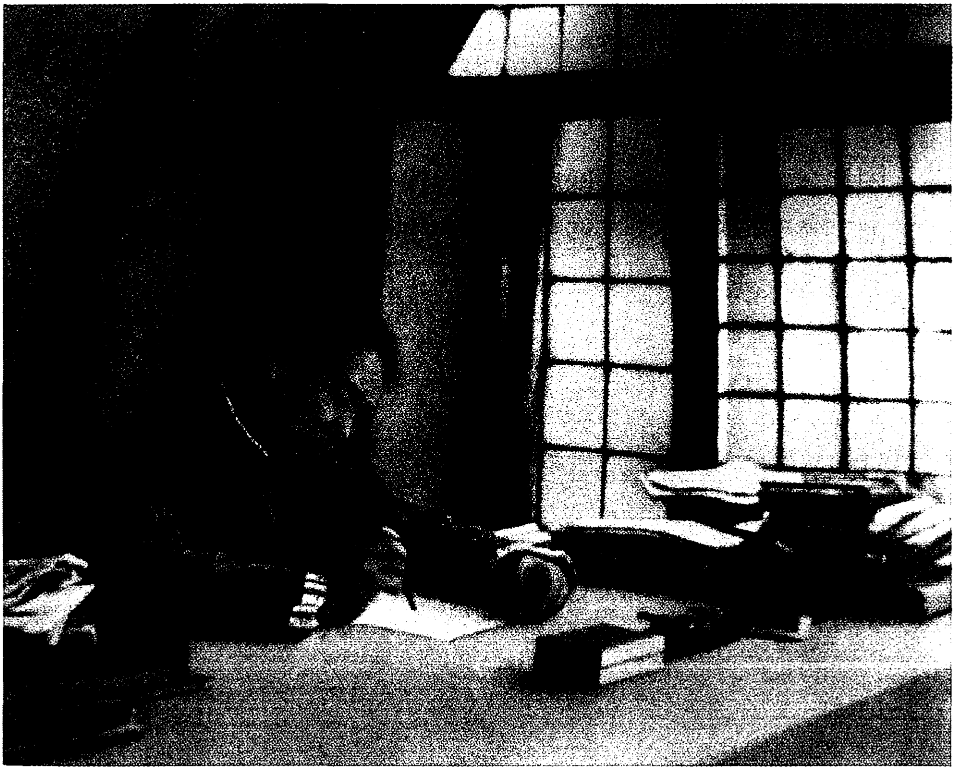
（1937年）

在抗大教学是很重要的，你们教好一个班，就是几十个连长，几十个连长到前线去能起多大作用？要是教好几十个营长，几十个团长，到前线能起多大作用？大家要痛下决心，活着在抗大教书，死了埋在清凉山。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员郭奇等谈话的一部分。

1938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写《论持久战》。

在延安市工人制造品竞展会闭幕式上的演说[1]

（1938年1月3日）

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所以我们这个国防工业展览会是很有意义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市工人制造品竞展会闭幕式上演说的一部分。

为延安市工人制造品竞展会优胜者题词

（1938 年 1 月 3 日）

国防经济建设的先锋。

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1]

（1938年1月11日）

一　袭击是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

游击战争不能一刻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讲到战术，则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不是别的，乃是袭击。袭击是攻击的一种，游击战争不注重正规的阵地攻击这种形式，而注重突然袭击或名奇袭的这种形式，这是因为游击战争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非如此不能达到目的。

二　袭击战术的要领

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要领，一般地可以举出如下十二条：

第一，袭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有秘密而周详的计划，迅速而突然的动作。

第二，游击战争袭击的目的，总的方面，在于消灭小敌，削弱大敌，扰乱敌之侧翼与后方，配合游击部队之政治工作，破坏敌之

---

[1] 这篇文章，是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节录的毛泽东1934年所著《游击战争》一书中论游击战术的一部分，后经毛泽东修改校正，发表在《解放》第二十八期。

政权，唤起民众起来抗敌，保持或恢复抗日政权，由此以创造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因缴获武装使游击队逐渐发展成为抗日的正规军。至于袭击的具体目的，则在各个消灭敌之小部队，扰乱敌之大部队，消灭敌之民团，破坏敌之后方机关，破坏敌之交通路等等。

第三，袭击要选择有利于袭击的条件。无此条件或条件不足时则须注意造成之。这在许多时候是可能的，只须根据敌人部队的素质、指挥者的个性以及其战术的运用等，而采用如下的办法：（1）骄纵敌人。例如故意以战斗力不强之游击小队与敌周旋，使敌以为不要紧，而在敌人不防备时突然袭击之。（2）麻痹与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使敌捉摸不定，因而袭击其一点。又如派遣游击小队或小组用大游击队署名的标语或布告活动于甲地，而大游击队则实行袭击乙地或丙地。（3）疲劳与恐吓敌人。例如动员民众坚壁清野，使进攻之敌饥疲不堪。又如将游击队分为数起，或派遣许多游击小组，不时进袭驻止之敌，使之一夕数惊，发生疲劳情绪，然后选择适当之时机袭击之。若敌人虽多，但素质不良，指挥者懦弱，则散播谣言，虚张声势，以增加其动摇，然后举行袭击。（4）派遣间谍打进敌人驻地，取得当地人民及敌人内部士兵同情于我者，以作我之内应，便利袭击之成功。（5）使用游击小组及人民自卫队四处活动，使他处敌人固守一地，钳制可能应援之敌，使我在另一地之袭击易于成功。以上这些，都是以自己的动作变化敌人的情况，便于游击队的成功，虽不是一定有效的，然而是往往有效的。

第四，袭击前之侦察，这是首先重要的。侦察的内容，应该注意下列各项，即：（1）敌人兵力多少，战斗力强弱，武器如何。如

准备袭击驻止之敌，则须知道敌军配置情形，警戒程度，及其换班秩序等。（2）附近有无其他敌军，兵力多少，可能增援的程度如何，运输速度，距离远近，电话电报联络情形，最低限度的增援时间，增援方向及道路状况，均须一一查明而考虑之。（3）附近居民的情形。（4）袭击部队到达准备袭击地点的大小道路及有无隐蔽接近地。侦察上列各项，须以秘密而巧妙的方法出之。侦察愈详明，则袭击计划愈能正确。可能时顶好预先绘出一简易地形图，并将敌人配备标记出来。

第五，袭击的时间问题。不外下列四种：（1）在夜间。这一般是对驻止之敌，因在其他时间袭击不利而采取的。一则利用夜暗最能隐蔽接近敌人；二则夜暗冲锋，可以减少自己的损伤，并可扩大自己的声势，增加敌人的恐慌；三则邻近敌人夜间增援不易。因此游击队须经常注意夜间动作的练习。（2）在拂晓。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实行的，即是利用夜暗行军接近敌人而于拂晓时实行攻击，这在游击队离敌较远或夜间攻击动作尚不熟习时，是袭击的最好时机。但冲锋开始，须在敌人起床以前为宜。（3）在黄昏。这一般也是对驻止之敌而说，在其他时间敌人均比较注意，同时接近敌人的道路又较隐蔽，白天行军不成问题或通过地区可以伪装时，采用此种时间袭击之。在此种时间，万一袭击不成功亦可利用夜暗安全撤退。（4）在白天。敌人运动多在白天，故袭击行动之敌大都选在白天。游击部队欲最有效果地袭击敌人，必须不丧失敌人正在行动中的机会，此种时机必须普遍采用。此种袭击多为伏击。如欲白天袭击驻止之敌，则须在下述情况下方可采用：（1）敌人素质甚差，不机警，无工事，疏忽已极。（2）敌人根本不知道游击队要来袭击。（3）孤立无援之敌。（4）大雨大雾最易隐蔽袭击动作时。在

这些情况下，白天袭击驻止之敌，也是可能成功的。

第六，必须保持袭击计划的秘密。袭击敌人虽有好的计划，若此一计划被敌人知道了，则不但一钱不值，还有遭受损失的危险。所以袭击计划之严守秘密是最要紧的。除了第三项所述尽量利用抗日人民及游击小组四处活动以迷惑敌人外，还应注意下列事项：（1）袭击计划不应全部告知部下，只告部下以应知之事或分段告知之（如在出发前、行军中及到达目的地以后）。（2）对驻地人民及所请向导，均不应使其知道游击队袭击的企图。（3）可能时，在出发时先向假方向走一段路然后折转向袭击目的地前进，这在敌人耳目众多之处可采用之。

第七，袭击部队的开进。下列各点是值得注意的：（1）如有必须通过的河川及障碍地段，应于出发前研究通过方法及携带必要的器具。（2）携带标语布告等。（3）约定各种记号，例如开始冲锋记号等，并规定袭击不成功及遇特种困难时的集合场。（4）行进中选择极隐蔽的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地方。（5）行进中保持极端的肃静，禁止说话与笑声。除侦察警戒人员外，其余队员均不准装红子（只装暗子）。（6）在行军纵队先头，派出少数便衣武装的侦察人员担任直接的侦察与警戒。（7）行进尽可能地快。（8）行进中，要有遭遇敌人的战斗准备。

第八，到达袭击目的地以后的动作。这是全部袭击计划中的重要关节，应注意的有如下各点：（1）迅速在敌人警戒线外隐蔽集结，如果敌人还不知道，切记不要惊动他。此时部队首长应迅即召集各分队首长，指示具体的攻击方法。在白天，要引导各分队首长隐蔽观察敌人的配置，当面指示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如有可能，则以便衣侦察员不动声色地捕捉敌人的步哨，进一步查明情况。（2）

兵力大（一营以上）则将全部分成两路（不可隔得太远）实行攻击，兵力小（一连以下）则一起投入冲锋就行了。（3）派遣少数人枪，在不易攻击的方面举行佯攻，钳制敌之一面，而以主力投入敌人薄弱较易冲击的一二点，但决不可平分兵力。（4）在兵力优裕时，可派遣一小部埋伏于敌人可能逃走的方向，截断敌人去路。（5）必须在敌人有增援部队的方向，派出少数人的警戒，并破坏其电话电报线及桥梁道路。（6）准备攻击的位置，不应过近也不应过远；准备攻击的时间，要尽量缩短；准备攻击的动作，要尽量地快。（7）夜间袭击，要有很好的识别标记，以免混杂不清。

第九，冲锋动作：（1）冲锋开始，应按照预定的时间、方向、道路而迅速地突然地实行之。如分几路冲锋，则以主要之一路到达冲锋地点所需要时间之多少来决定全部冲锋的开始时间。其他各路应向主要的一路取齐，以免敌人过早发觉。（2）冲锋开始时，不要作声，也不要打枪（就是敌人先打枪也不管），也不要喊杀，而用刺刀、梭镖、大刀，一下冲入敌人配置，实行格斗，迅速解决敌人。如果有手榴弹，应首先投掷手榴弹（注意——不要打倒自己人，只准在最先头的几个人打，后面的不准打。）趁着手榴弹爆炸之瞬间，扑拢敌身而解决之。（3）只有在钳制方面，可以少数火器射击敌人而吸引其注意力，以便突击方向迅速取得胜利。（4）如敌人固守房屋顽强抵抗，可实行放火烧屋逼其投降（只准烧其固守之屋，不准乱烧），或趁敌人混乱之际从其他房屋袭入之。（5）如袭击成功，敌人溃退，则担任埋伏截击之部队首先应努力堵截，此时突入部队应不顾武器、财物之缴获，除管理俘虏、警戒战场之必要部队外，其余均应跟踪追击，期于大量解决敌之有生力量，使敌无反攻之可能。但在有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不应远追。

第十，袭击后的动作：（1）袭击成功时，立即把部队集合，连同伤员、胜利品等，带到通来路有阵地的附近集结，并以一部占领阵地，防止敌人反攻。（2）如残敌远逃，已无反攻力量，又无增援敌人之顾虑时，则袭击部队可在当地留相当时间。此时以一部工作人员担任分发缴获敌人之财物于当地贫民，帮助人民反对著名的汉奸。而游击队主力则选择有阵地的地点，集结休息，绝对禁止自由行动。虽然如此，游击队主力一般仍不应在当地宿营，应移于离此若干里之优良地点宿营。（3）如情况紧张，则应缩短处理战后工作的时间，以便游击队能迅速地胜利地离开此地。（4）关于处置俘虏，在离自己根据地或抗日正规军不远时，则将俘虏全部押送后方或交给正规军去处理。不然，则问明情况，给以适当宣传后立即释放，严禁杀害俘虏，仅对民众痛恶的汉奸首领可以在民众要求之下处决之。就是有时俘虏不愿跟着游击队走，亦只应解除武装将他释放。须知杀害俘虏只是增强敌人战斗力，于抗日战争是完全不利的。但在释放俘虏时要注意保守自己行动的秘密，为达此目的，应把俘虏事先放走，而把没有走的关在一个房子内，使其不能看到游击队退去的方向。（5）如袭击不成功，或袭击刚半而敌人增援已到，则应毫不迟疑地迅速撤退。如在敌人压迫下退出战斗，则应实行分散退却，同时以一部最精干的老游击队员担任掩护。退却后的集合场，多应是先一天的宿营地或是预先指定的。（6）游击队就是在无严重敌情下撤退时亦应伪装，例如先向假方向走若干里，再折到真正要走的道路，用以迷惑敌人，失去敌人可能跟追的踪迹。

第十一，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及城市。以游击队劣势的武器，去袭击堡垒、寨子、土围子或城市，只凭一般的战斗方法是不行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袭击的，但应注意下列的条件:（1）最好在

要袭击的城寨堡垒中，要预伏间谍或有同情于游击队的人民、兵士为内应，这种政治工作游击队要经常有计划地做。（2）选择敌人警戒最疏忽之点，利用夜暗，乘其不备，悄然爬入。或在最危险之处，即是敌人最放心的地点，有时也是我们悄然爬入的最好场所，但这决不是经常的。（3）如袭击被敌发觉，则以小部在他方向佯攻，吸引其主力，而以游击队之主力从其松懈处薄弱点袭入之。（4）在白天实行远距离的袭击，在可能情况下，可伪装敌军，乘机袭入之。（5）在城堡附近的野战中击溃敌人，跟踪追击，乘势袭入，这是最有利的情况，不应放过此种机会。（6）在抗日根据地附近的城堡，有时也在敌人薄弱的远后方，如果民众条件好，而游击队力量优裕时，可以采取围困爆破的办法。但必须在敌人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才能采取此种办法。

第十二，扰乱或钳制敌人。扰乱是游击战争袭击战术的附属部分，但也是必要部分，目的在于增加敌人不安，减杀敌人威势，以造成我们消灭敌人或逼退敌人的条件。其方法如次：（1）在夜间袭击不成功时，则改变其任务为扰乱。高喊口号，大声唱歌，四面打枪，都是方法。退去之前可散发标语传单于空地上。（2）在配合正规军作战，为了分散敌人兵力使其胶着一地不能增援其他方向时，亦可采用扰乱方法。此时可将游击队分为若干起，轮番于黄昏、夜半、拂晓等时间，潜至敌人驻地附近，突然地射击与呐喊，使其惊疑不定，无法增援或迟滞其增援时间。（3）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虚张声势。其法是在敌人驻地附近多插旗帜，多举烟火，即古人所谓设疑兵的办法。目的或在欺骗敌人，便于我方在他处之行动，或在恐吓敌人，增加其惊惶心理。此时我游击队只虚与周旋，决不要进入严重的战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三　袭击行动之敌

上述十二条虽然说到了一般袭击战术的原则，然而主要地是说的袭击驻止之敌。游击战争取得最大胜利的时机，还以袭击正在行动中的敌人为多，所以游击队不应放弃一切当着正在行动而又条件适合的敌人的袭击机会。这种袭击按其性质都是遭遇战，但分埋伏与急袭两种。埋伏是预期遭遇的性质，但采取埋伏的形式。急袭是不预期遭遇而发生的，采取急袭的形式。前者是游击队重要的战术，故说明较详。后者是偶然情况，故只略为述及之。

第一，埋伏即伏击，是游击队有计划地隐蔽配置于敌人必经道路的一旁或两旁，待敌通过时而突然袭击之。这种动作，就叫做伏击。根据情况及配置的不同，分为两种伏击方法：(1）是待伏。预先在敌人必经道路上埋伏好，待其通过而袭击之。(2）是诱伏。以主力埋伏好，而以一小部故意示弱，诱敌至埋伏圈内，然后袭击之。

第二，根据敌人战术、部队素质及地形等各种不同条件，埋伏可以采取一侧埋伏，两侧埋伏，多面埋伏或重层埋伏等几种方法。

第三，埋伏的目的在于：(1）消灭或打击敌之步兵、炮兵、骑兵、运输队、征发队、汽车、火车、船舶等。(2）捕捉敌军单个或多个通讯员、侦察员、电话员、采买员等，以搜集关于敌人的情况。(3）以埋伏截击败退之敌。

第四，埋伏，首先要求明了情况。若情况不明，则或致落空，或反受损失。故埋伏前的侦察，须周详仔细。侦察应注意事项如下:(1）侦察的方法:第一，利用居民中同情于游击队的，使用各种方法去接近敌人，从敌士兵、夫子口中，得出必要的情况。第二，使用便衣侦察员接近敌人，进行侦察。第三，窃听敌人电话。第四，捕

捉敌之人员，从其口头或文件上，得出消息。(2) 侦察的要求，主要的是敌人出发时间，兵力多少，将走道路，要到地点，行军力，有无特种武器及特别装备，有无辎重，行军中之通讯联络情形，行军时的特殊惯性等。(3) 侦察的技术，以能隐蔽自己企图、得到敌人消息为原则。侦察所得之消息，除对必须告知之人外，均应保守秘密，以防泄露。必须记着，不论在敌人后方或抗日区域内，随时随地都有敌人侦探潜伏的可能。

第五，伏击地区的选择。选择伏击地区以利于发挥自己最大威力、不利于发挥敌人最大威力为原则。因之，选择伏击地区时应注意下列各点：(1) 有良好的隐蔽，使游击队容易看见敌人，而敌人不易看见游击队。(2) 有良好的地形，使游击队便于出击敌人，而敌人不便于攻击游击队。(3) 埋伏地点附近之道路，须利于游击队退却，不利于敌人退却。(4) 埋伏地点，须选在敌人一般行军警戒搜索正面以外。有时道旁虽有良好地形，如果过于接近敌走道路，则游击队埋伏时的隐蔽集结地，应选在更靠后的适当地点。(5) 要有良好的观察地点。伏击最好是具备这些条件，但不是一定要这许多条件一一齐备，才能设伏。

第六，埋伏部队的开进：(1) 时间不要过早，免得游击队久处于埋伏中，减弱其紧张性与慎重性，容易暴露企图，增大敌人发觉的危险；但也不要过迟，免得来不及布置埋伏。(2) 行进路要隐蔽，宁肯走小路，甚至走没有路的山地谷底。(3) 行进时，先头须派出伪装的便衣武装侦探，以任警戒。如必须通过住民地，顶好全体伪装，以保持行动的秘密。(4) 到着埋伏地区时，即应封锁消息。

第七，伏击实施：(1) 配置兵力，应按照游击队兵力大小，敌人兵力大小及地形情况而定。通常以一小部（在全兵力百分之三十

以下），占领险要地点，用火力杀伤和钳制敌人，而以主力埋伏于便于出击地点，实行突击。有时，应派出少数人枪在有敌人增援顾虑的方向或为便于撤退而必须占领的掩护阵地上，担任警戒。（2）在袭击敌人大部队时，应放过其先头及本队，而袭击其后尾。此时如能以游击小组于敌人先头部队之前方侧方实行扰击而抓住敌人，则更便于伏击部队之袭击。还可以预先设法将道路、桥梁实行某种程度的破坏（泛滥，淤塞，石头拦阻，将一般的桥变成不良的桥等），加长敌人的行军纵列，使之不易首尾相顾。（3）如果是袭击敌人小部队，则可以堵塞其去路，截断其来路，而全部消灭之。（4）关于开始出击的信号，各分队的具体任务，出击道路，何部首先射击等，均须预先详细告知各分队首长。（5）出击以前，须极端保持隐蔽肃静，不准吸烟，不准说话，不准随便探望。（6）战场观察。顶好能设立两个观察所，第一个设在通敌人来路十里左右的附近，并带通讯员三四人，一律伪装，担任观察。将敌人行军长径，兵力多少，警戒搜索情形，不断报告游击队长，以便指挥者根据情况适时处置。这个观察所，须在敌人全部通过后，始得归回。第二个设在伏击地区附近，指挥者亲自观察，以便适时发出开始出击的信号。（7）开始出击的时间，要选择得最好，要能抓住敌人行进中一个最适合于自己出击的时机。同时，还须要全体队员绝对服从命令，不准自由行动，免致敌人事先发觉。（8）出击时的动作，要迅速猛烈，要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很短促地将所有火器一齐快放，跟着立即冲锋，迅速解决战斗。任何迟疑与犹豫，都是不利的。

第八，战斗成功，立即集合部队，处置俘虏，收集战利品及伤员，以便迅速撤去。如只消灭敌人一部，则撤退更要快，以免遭受敌人的反攻。若有不能带走的笨重物品，一律毁坏之。

第九，伏击不可能或不成功时的处置：（1）如刚出击尚未进入战斗，忽然发现敌人兵力过大或被敌人预先发觉我之埋伏而早已占领阵地，出击毫无胜算，则应马上停止出击，断然撤退，以保存自己力量。这时候，需要指挥者之最高的机断与灵活的处置。（2）已经进入战斗，但遇敌人顽强抵抗，确无胜利把握时，亦应终止战斗，决心引退。

第十，扰乱。有时目的不在消灭敌人，或伏击不能解决战斗，均可实行扰乱任务。其方法是用小部队，分散数处，以火力杀伤敌人，扰乱其行军纵列；或于高山峭壁处，推巨石、倒古木以杀害其人马。

第十一，伏击敌人单个或少数的传令兵、采买、侦探等，则是游击小组或游击队所派出的便衣侦察员的任务。此种机会很多，不应放弃。

第十二，伏击骑兵：（1）敌骑的运动力和冲击力较大，所以埋伏时，应选择在森林或隘路（有时住民地也可以），敌骑运动不便之处而实行之。（2）集中火力杀伤乘马，则人员自易捕获。（3）如伏击少数敌骑确有把握捕捉之时，可设置重层的多面的埋伏。（4）可以伪装居民，预伏某一村庄中，待敌骑进入村庄人马分离时，突然袭击之。

第十三，伏击汽车：埋伏地点，应选在山谷、谷底、沟底、转弯处、上下坡处，并预先设置障碍、陷井，或埋置地雷（束集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亦可），使汽车到此不得不停止或被炸毁翻倒。而游击队则埋伏于附近隐蔽地点，待汽车停止或翻倒之际，以一小部拦住先头，另以一小部截断归路，主力则直扑汽车捕获其人物。如有护卫兵士，则须先解除其武装，再行烧毁汽车。但对被俘之驾驶人员

及士兵，须注意争取，不要杀害。

第十四，伏击火车：（1）在转弯处、上下坡处、有高堤处、洼地、隧道口，都是埋伏的好地点。（2）方法：先卸松铁轨上的狗头钉或径拆散铁轨的一段，使列车到时，跌出轨外。或在铁轨上、隧道口上，用大石头大木头堆塞起来，以制止火车前进。而游击队则分为三部：一部占领阵地，预防列车上卫队抵抗。一部对车厢射击。另一部则准备进入车厢，收缴枪械，俘虏人物。最后放火烧毁车辆。（3）对装甲火车，则更应特别注意，因为它是移动的炮台。游击队一面不但预先卸松狗头钉，而主要是尽量用地雷炸毁之，待其倒坍后，再行出击。

第十五，伏击船舶：（1）游击队可以伏击的船舶，主要是敌人运输用的商船或较小的内河炮舰。（2）伏击的地点，要在河岸上便于隐蔽之处、湾曲处、靠近我岸处。（3）伏击时，游击队主要火器及兵力应准备迎击船头，而以一小部截击船尾，准备敌船回头时用火力拦阻之。待敌船一到，即猛力以步枪机关枪，顶好是炮兵（若无洋炮就是大土炮松树炮也可以），一齐快放。（4）如是木船，则迫令其停止靠岸，搜查其军械及资财。私船放还，并给船工以财物，官船则烧毁之。

第十六，伏击敌人征发队：（1）在敌人征发队尚未接近村庄时而伏击之。游击队须预先埋伏于敌人必经的道路旁边，待敌一到，突然袭击而消灭之。（2）或在敌人征发队已进村庄分向各家征发时袭击之。此时敌人分散，不能集合，最易消灭，若预先在村庄内伪装埋伏一小部，而以大部从村外攻击之，则收效更易。但村内埋伏的，一定要等村外大部队先行动作，方免敌人惊逃。（3）或因时间来不及，未能实行上述两项办法时，即可待其征发完毕满载而归之

时，在敌去路旁边伏击之。伏击成功后，所获财物，应交还原来被征发之民众，只有在民众自愿慰劳游击队情况下，才可分取一部分，帮助游击队的给养。（4）但对敌人征发队，无论何时伏击，均须以突然的动作，首先消灭其掩护部队，方能达到目的。

第十七，伏击敌人运输队：（1）应选择隘路或道路狭窄之处。（2）若敌掩护部队的兵力较大，则可分游击队为两部，以主力同敌掩护部队战斗吸引其向我，以小部夺取运输品或烧毁之。（3）若敌掩护部队较小，则首先消灭其掩护队，再夺取其运输品。（4）伏击敌人运输队一般原则，须先射击其先头，使运输纵列发生错乱，夫子乱跑，道路阻塞；其次猛力消灭或驱逐其掩护部队，再行夺取辎重。（5）若要防止运输队向后逃跑，须先以小部截断其退路。

第十八，急袭：这是处置不预期遭遇的方法。（1）在行动中的游击队，可能遭遇行动中的敌人讨伐队、征发队或运输队，所以，游击队在行动时应经常准备这一着。（2）游击队行进时，应经常派遣便衣侦探在部队先头三五里处行进，以便遭遇敌人时能迅得消息，定下处置方法。（3）如遇小部或兵力相等之敌，应即争取先机，将游击队迅速转入于敌人侧面，而突然向之开火，猛力冲锋，一鼓消灭之。此时若敌溃败，又无其他敌情顾虑时，则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消灭，但追击不应过远。（4）如遇大部之敌或情况不明，则以毫不迟疑、迅速引退、脱离敌人为原则。如敌首先开枪，则我应以小部占领阵地抵抗，掩护主力先撤，掩护部队随后撤走，避免损失。（5）总之，突然遭遇敌人，要有最快的决心，或打或走，不可迟疑。迟疑不决，是危险的。

以上十八条都是袭击行动敌人的方法，抗日游击部队应该加以研究。

但一切战术都以适合情况为原则，文字条文仅能作为实战的参考，不能死板应用。抗日战争中一定有许多新的可贵的经验，胜过过去文字条文的东西，希望大家共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给艾思奇的信

（1938年1月12日）

思奇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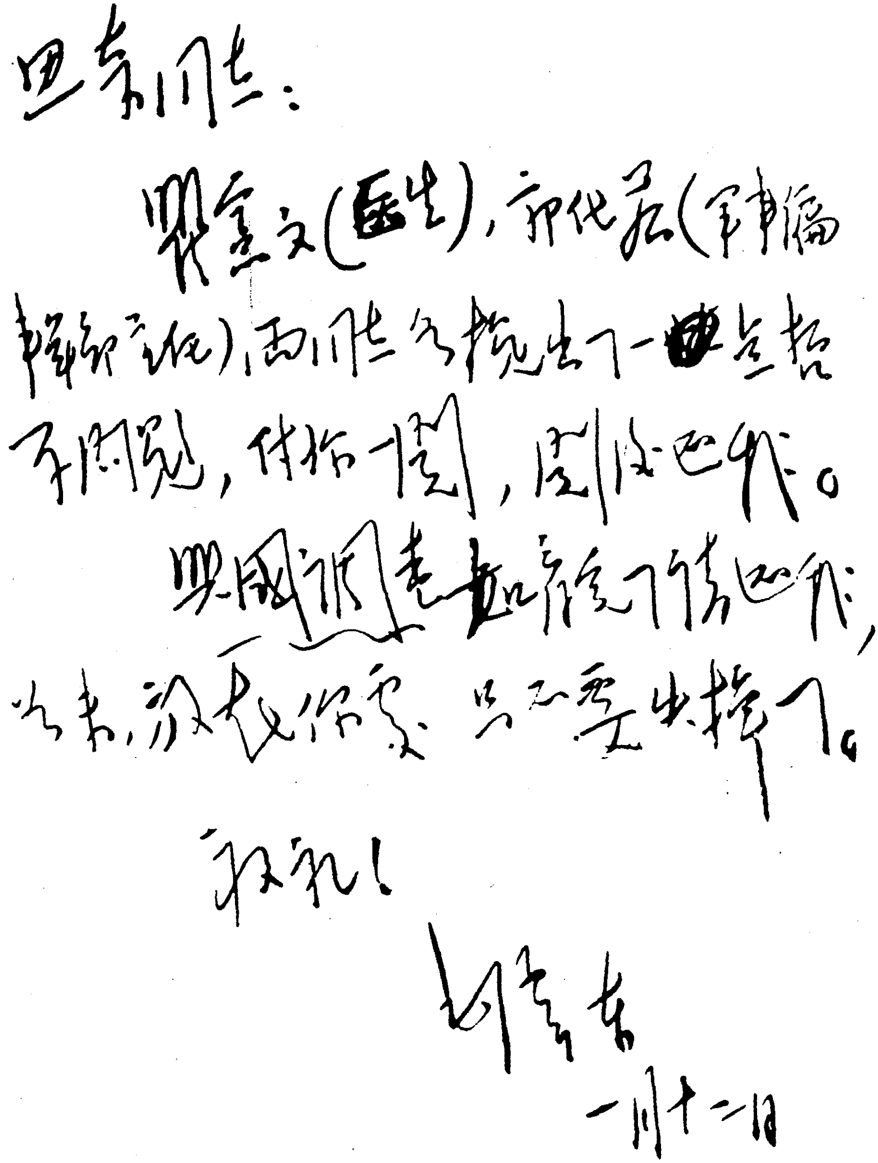
瞿惠文（医生）、郭化若（军事编辑部主任）两同志各提出了一点哲学问题，付你一阅，阅后还我。

兴国调查如看完了请还我，如未，放在你处，只不要失掉了。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思奇同志：

瞿定文（医生），郭化若（军事编辑部主任）两同志各提出了一些哲学问题，付你一阅，阅后还我。

吴国珩同志~~过~~[illegible]读后的信还我，另书，[illegible]，只不要出版了。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艾思奇信的手稿。

给艾思奇的信

（1938年1月12日）

思奇同志：

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华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军事问题我在开始研究，但写文章暂时还不可能。

哲学书多研究一会再写还更好些，似不急在眼前几天。

梁漱溟[1]到此，他的《乡村运动理论》[2]有许多怪议论，可去找他谈谈。

有空可来谈，但请在星一星五两天以外之晚上。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夜

---

[1] 梁漱溟，1893年生，广西桂林人。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进行过有利于地主阶级的“乡村建设”实验。建国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

[2] 这里的《乡村运动理论》，应是《乡村建设理论》。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

（1938年1月14日）

共产国际指示我党在此时不应参加国民党政府。参加华北政权机关，当然也不相宜。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的主要内容。

为抗大举行的一·二八运动大会题词[1]

（1938年1月28日）

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一致前进，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

[1] 1938年1月28日，在淞沪抗战六周年纪念日里，抗大举行一·二八运动纪念会。刘亚楼根据罗瑞卿教育长的指示，向毛泽东报告了纪念会的筹备情况，并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话就不讲了，写几个字吧。”于是挥毫题词：“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努力奋斗，一致前进，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8年1月28日）

八路军前后方和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的政治工作，统归军委政治部领导。为统一对外名义，军委政治部以八路军政治部名义出现。

---

[1] 这是毛泽东和谭政致八路军总部并转各师及政治部电的主要内容。

致邓发等电[1]

（1938年1月29日）

红军大学[2]缺战略教本，请搜集战略书，并找人翻印，先后寄回。

---

[1] 这是毛泽东致邓发并转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王稼祥，当时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2] 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和许光达的谈话[1]

（1938年1月）

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材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之后，好好发挥作用。

---

[1] 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接见了许光达等一批从苏联回国的干部。这是毛泽东在听完许光达在苏联工作学习的情况后和许光达谈话的一部分。

和梁漱溟的谈话[1]

（1938年1月）

毛泽东：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的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

梁漱溟：是的。好记忆，有这事，有这事。

梁：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何在？中华民族会不会灭亡？

毛：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毛：决定中国前途者不外三方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而求中国之胜利，一在中国自身；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随战事的扩大与延久，而日益暴露其弱点，增其困难。所剩的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两年来已逐步趋向团结。既如此，又何

---

[1]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由西安前往延安，1月25日返回，往返共3个星期。在延安城内的一间瓦房里，毛泽东接见了梁漱溟。以上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须悲观？抗战的最终结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也是必然的。

梁：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

毛：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

毛：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

梁：好的，好的。我先送给您一本书[1]，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毛：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论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梁：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的“个人本

---

[1] 指梁漱溟著的《乡村建设理论》一书。

位”而言，西方人讲自由，讲平等，讲权利，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抗礼。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中国人有本着自己的义务，为家庭、为社会去尽自己的责任的光荣传统。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定和发展。

毛：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

梁：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

梁：造成1927年后国共两党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是什么？

毛：大致分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如国际的因素，那时各帝国主义同惧中国的赤化，他们可以统一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但到今天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一边，因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日本的侵略逼成中国的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的团结。1936年西南“两广事件”和“双十二事变”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及其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的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1938年1月，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

为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记者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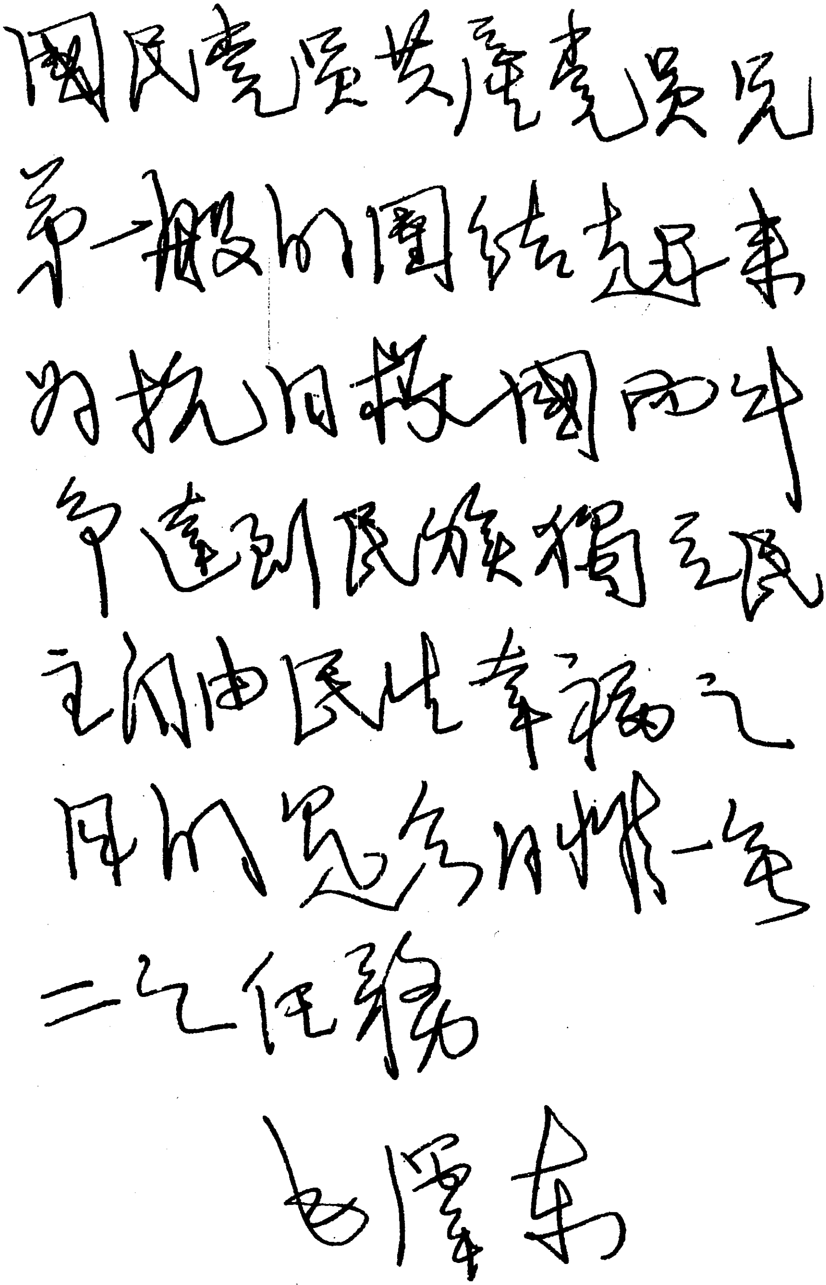
（1938年1月）

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一般的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惟一无二之任务。

毛泽东

---

[1]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月，国民党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毛泽东为随行的记者题词。



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
弟一般的团结起来
为抗日救国而斗
争达到民族独立民
主自由民生幸福之
目的完成此惟一无
二之任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记者的题词。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

（1938年1月至3月）

社会学大纲

第一篇　唯物辩证法

第一章　当作人类认识史的综合看的唯物辩证法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前史

一　原始时代的人类的认识

社会——发展的有机体

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法则之研究

找出法则、

社会学的唯一的科学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的方法，是把社会当作不断的发展着的、生动的有机体解释的。这种有机体的研究，要求对于构成特定社会的生产诸关系，作客观的分析，并探它的（作用及其发展、即由一种有机体进到别种高级有机体的）特殊运动法则。这是意识作用对于历史过程的必然的前提条件。然而单只暴露了上述的法则，还不充分，必要的事情，是基于被暴露了的法则，指示实践的方

指示实践、变革社会——这是本书的根本论纲。

法，以促成由一种社会有机体进到别种高级社会有机体的变革。

以上是本书首先提起的根本论纲，也就是本书的全部的骨干。

社会意识形态是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

关于这一论纲的说明，应当分为下列五大篇：……第五、说明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对经济构造的正确关系，在论理上再造出现实的各种社会的具体的轮廓。[第1～2页]

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的科学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摄取了人类认识的全部历史的成果而积极的创造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研究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之时，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说明唯物辩证法的孕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指出这个哲学实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

用历史主义看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发展过程

原始时代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看法

人类认识的历史，包括着从原始时代起至现在为止的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过程。所以，当我们追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准备时，不能不追溯到原始时代的人类的认识。

长期劳动过程中一面变革自然，一面变革自己（生理与性质）。

从动物状态进化而来的原始人类，在其对于自然的长期奋斗过程（即劳动过程）中，一面变革自然，同时变革了自己的生理器官和本性。由于劳动时呼喊的努力，就反应于呼吸器官与发声器官，促进喉腔的发展，就逐渐能够发出有一定音声的言语。言语是人类劳动行为的结果，又是

言语是劳动

的结果，交通的手段，认识的前提。有言语表现的概念，才能开始思维。	人类互相交通的手段，同时又是人类开始认识自然的前提。
脑的发达是劳动的结果。	人类在其劳动过程中，神经系统变得复杂，头脑也非常增大，同时在经济生活与心理生活中的人类间的相互作用也发达起来了。由于言语的出现，人类就能够用言语来形容关于外界事物的表象，替动作和事物加上名称，因而造出言语的概念。人类有了言语的概念，就能够开始思惟的活动了。
原始思维的两个特点：(一)自然与人类一样是生动的。(二)自然与人类相互转变。这是原始的辩证法，形成了原始思维体系的万物有灵论。	原始的思惟，有两个特征。第一是原始人把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看做和他们自己一样生动的存在……。第二是关于一对象转变为他对象的表象及动物本性传达于人类的表象……。原始人的这种思惟，虽说是非常幼稚可笑，但他们把自然看做活动的、互相转变的世界，这可以说是动的世界观的萌芽，也可以称为“原始的辩证法”。原始的思惟体系之万物有灵论，可说是基于上述的特征而形成的。
万物是灵魂活动的结果。	万物有灵论是原始人认为万物皆有灵魂，因而把万物看做灵魂活动的结果的一种见解。万物

万物有灵论是原始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以前是人物不分，此时能辨人物，这是劳动的结果。

自觉地对自然斗争

有灵论是原始的思惟的较高发展阶段。从前原始人不能分别自然与自己，现在却能够把自己从自然界区别出来了。这完全是人类对于自然斗争的结果。

生产过程中，由于不断认识自然的新方面，就能改变对自然斗争的方法，同时改变了生活方法。于是有了剩余生产物，改良了技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就增大了。在这种时候，就在思维体系中出现了万物有灵论，能把世界分为物质与灵

万物有灵论把世界分为肉体与灵魂（即物质与精神），是人类企图认识外界自然的最初的尝试，是人类有自觉的对自然斗争的端绪。人类在生产的过程中，不断的认识自然的新方面，改变他对自然斗争的方法，同时又改变自己的生活方法，逐渐的由飘泊生活而进到定居生活。于是剩余生产物出现，而技术也不断的改良，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因而增大了。所以万物有灵论虽然假定万物皆有灵魂，而这种假定，正是为了要说明自然现象的因果性才确立的。在这种处所，就表示着原始的思惟的进步性。

魂。这是人类最初企图认识自然，成为自觉地对自然斗争的开端。

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的三个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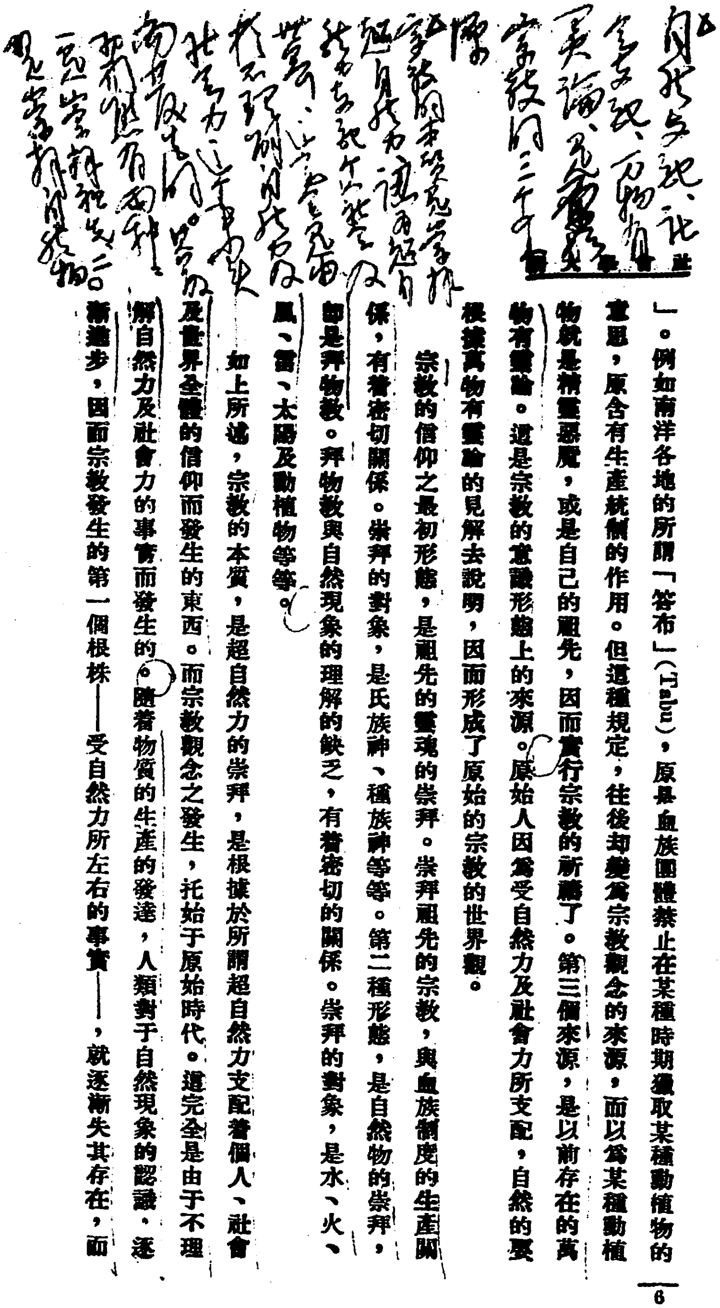
原始的思惟体系之万物有灵论，往后更演变为原始的宗教的世界观。原始的宗教的世界观，其来源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来源，是原始人受自然所左右的事实。……第二个来源，是原始人受社会关系所左右的事实。……第三个来源，是以前存在的万物有灵论。这是宗教的意识形态上的来源。……

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认为超自然力支配个人、社会及世界。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这个事实而发生的。其最初形态有两种：一是崇拜祖先，二是崇拜自然物。

宗教的信仰之最初形态，是祖先的灵魂的崇拜。崇拜祖先的宗教，与血族制度的生产关系，有着密切关系。崇拜的对象，是氏族神、种族神等等。第二种形态，是自然物的崇拜，即是拜物教。拜物教与自然现象的理解的缺乏，有着密切的关系。崇拜的对象，是水、火、风、雷、太阳及动植物等等。

如上所述，宗教的本质，是超自然力的崇拜，是根据于所谓超自然力支配着个人、社会及世界全体的信仰而发生的东西。而宗教观念之发生，托始于原始时代。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的事实而发生的。随着物质的生产的发达，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认识，逐渐进步，因

生产发达，



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是宗教的三个来源。△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illegible]不理解自然力及社会力之事实。[illegible]

」。例如南洋各地的所謂「答布」(Tabu)，原是血族團體禁止在某種時期獵取某種動植物的意思，原含有生產統制的作用。但這種規定，往後却變爲宗教觀念的來源，而以爲某種動植物就是精靈惡魔，或是自己的祖先，因而實行宗教的祈禱了。第三個來源，是以前存在的萬物有靈論。這是宗教的意識形態上的來源。原始人因爲受自然力及社會力所支配，自然的要根據萬物有靈論的見解去說明，因而形成了原始的宗教的世界觀。

宗教的信仰之最初形態，是祖先的崇拜。崇拜祖先的宗教，與血族制度的生產關係，有着密切關係。崇拜的對象，是氏族神、種族神等等。第二種形態，是自然物的崇拜，即是拜物教。拜物教與自然現象的理解的缺乏，有着密切的關係。崇拜的對象，是水、火、風、雷、太陽及動植物等等。

如上所述，宗教的本質，是超自然力的崇拜，是根據於所謂超自然力支配着個人、社會及世界全體的信仰而發生的東西。而宗教觀念之發生，托始于原始時代。這完全是由于不理解自然力及社會力的事實而發生的。隨着物質的生產的發達，人類對于自然現象的認識，逐漸進步，因而宗教發生的第一個根株——受自然力所左右的事實——，就逐漸失其存在，而

6

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批注的手稿。

对自然力逐渐理解的多，宗教发生的第一个根源渐渐失去。然社会的阶级制度确立，社会力仍觉不可理解；加以万物有灵论深入人心，故宗教仍然存在，但依各个特定社会形态而变化了宗教的形式与内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发达，对自然力与社会力之逐渐理解，哲学也出现了。

而宗教发生的第一个根株——受自然力所左右的事实——，就逐渐失其存在，而宗教的观念也开始动摇了。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达，剩余产物的出现，私有财产的形成，奴隶制度的确立等等，而社会力的不可理解的事实，仍然是残存着；同时，原始时代的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也仍然深入人心，支配着一部分人的精神。所以随着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转变，原始的宗教的世界观就沿着另一方面而发展，变为与社会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各种宗教（如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宗教、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宗教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说明见第五篇）了。在另一方面，基于科学的认识而形成的哲学的世界观开始出现了。（不过，观念论的世界观之中，仍横亘着万物有灵论及宗教的世界观的基础）。

二　古代自然哲学中的辩证法

历史上代替原始社会而起的发展阶段，是古代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比较原始社会，是高级的进步的社会。由于物质生产力的发达、主人

开始是分

工，往后是对立。

与奴隶的阶级的分裂，而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工就转变为两者的对立了。从事于精神劳动的人们，免除了物质的生产的劳动，仰赖于肉体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以为生，因此他们就有所谓“必要的闲暇”去做抽象的思索，而考察宇宙如何发生、如何构成的问题了。哲学的世界观，就是在这种前提之下形成的。

没有必要的闲暇是不能出现哲学的，而这种闲暇由于社会进步到奴隶制。生产力发达了，剩余产物增加了，社会分裂为奴隶主人与奴隶。前者由于剥削能够解除劳动，有了时间，从事学问的研究，哲学方能出现。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绝大的跃进。

最古的哲学，是古代希腊的自然哲学。这是反对原始的宗教观念而起的新世界观。这种新世界观的出现，除了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对立的前提以外，还有其社会的历史的根据。

为什么唯物

第一，希腊从纪元前十世纪以来，已由氏族

哲学只能出现于希腊时代而不能在其以前？因为（一）对自然法则的认识有待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才能逐渐窥知自然的性质，才能开始用一种与宗教不同的眼光去说明世界；（二）必待有了手工业与商业，有了商业奴隶主，他们有钱有时间，才能发生求高深学问的动机；（三）必待有了商品交换的经验，养成了思维的抽象能力，才能从事于哲学；（四）必待

社会进到奴隶制社会。奴隶制在其存在的初期，能促进生产力的发达，奴隶所有者在生产上的努力，是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奴隶劳动的生产性，因而手工业与农业就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人们已能逐渐窥知自然现象的法则，而开始用一种与宗教不同的眼光去说明世界了。

第二，手工业与农业发达的结果，商业也跟着发达起来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大都居住于小亚细亚沿岸商业发达的都市。住在这种地方的商人们，蓄积了多额的财产，有求得知识的所必要的自由时间、必要的手段和动机。

第三，住在小亚细亚沿岸的商人们，常常回航于地中海及黑海各地，从事于许多种类不同的商品的交换。他们对于商品的注意，不是商品的自然性质，而是买价与卖价的差额。他们习惯于把各种分量不同的商品换算为货币，而比较其数量的多少。因此，他们自然的养成了抽象的能力。如赫拉克里图所说：“万物与火相交换、火与万物相交换，这种事实，正和一切货物与金子相交换，金子与货物相交换的事实相同”[1]。这便是表示初期自然哲学家抽象的思惟能力的养成之物质的根源。

---

[1] 参见赫拉克利图《著作残篇》。(《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页)

异民族的接触，地理眼界的扩大，才能扩大精神的眼界；（五）必待自然科学的初步发达，有了知识的基础，才能据之找出一种普遍必然的因素。才能形成自然哲学。这些就是反宗教的新世界观即古代自然哲学的历史根据。在这以前，人类束缚于自然力与社会力的压迫，只能用灵魂或神的观念去解释世界，断不能出现唯物的思想。

随着商业的发达，商人们活动的范围愈趋扩大，他们的精神的眼界也愈趋扩大。他们接触了许多异种民族，得到了关于各种不同的生产技术和初步科学（如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的知识，以及关于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风俗和习惯等的知识。因此，他们在这许多特殊的经验和知识之中，能够找寻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因素，而抽象化的思惟能力就更加增进了。

以上是古代自然哲学产生的历史根据。由于技术、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达，地理的、精神的眼界的扩大，人们反对过去氏族社会的遗物的宗教的曲解而依据自然的事实说明世界的思想，就成立起来了。所以古代自然哲学是在上述历史根据之上萌芽出来，并出现为反宗教的新世界观。[第2～9页]

第一个自然哲学家——塔列

古代自然哲学的创始者，是“伊奥尼亚”哲学家塔列斯（Thales，纪元前六二四——五四

斯，第一次对宇宙发生问题作了自然的解释。他说，宇宙是由水发生的，水是万物之源，万物的真正本体。其他原素都由水发。这种见解，认一切物质都是单一的东西，都可互相转变。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唯物论与辩证法，虽然是十分简单的东西。

八）[1]。塔列斯被称为“哲学之父”。他的著作，并没有遗传于后世，而他的学说只是由后来的历史家和哲学家（主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所传播的。

塔列斯的学说的特征，就是对于宇宙如何发生的问题，作了自然的解释。他反对原始的宗教观念，想从单一的物质的始元出发，去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他说，宇宙是由水发生的；又说，水是万物的发端，是真正的本体。其他一切元素（当时的元素分为水、火、气、土四种），他以为都是由水发生的。甚至于生命，也以为是由水发生的。这种见解的根柢，就是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单一的东西，一切物质都可以互相转变。所以塔列斯的哲学见解，实是最初的唯物的世界观，同时也包含了辩证法的胚种。

第二个伟大哲学家是赫拉克利图。他的大功，在发现了辩证法大纲。他是唯物论者，和他以前的哲学家同

其次，我们说到另一主要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里图（Herakleitos，纪元前五四〇—四八〇）。赫拉克里图的哲学最伟大的意义，是发见后来所谓辩证法的大纲并加以解释。他也和从前的自然哲学家一样，主张宇宙万物是由水火气土四种元素构成的。他主张这四种元素互相转变。他说：“火由土灭而生，气由火灭而生，水由气灭而

---

[1] 塔列斯，现译泰利士或泰勒斯。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样，主张宇宙是水、火、气、土四种原素构成的。而他则谓火是基本的原素，这是他的唯物一元论。然而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发现万物不断变化与变化由于内在的对立斗争这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思想。首先，他由宇宙是物质构成的这种见解，到达于万物普遍变化的主张。他说：“土

生，土由水灭而生”[1]。他又称宇宙为永久的火。这是一个比喻，说火是不断的变化过程之比喻的表现。他由宇宙之物质的构成的见解，到达于“万物普遍的变化”的主张。他用“万物变动不居”[2]这个适当命题，来表示他的动的宇宙观。他又用“人不能再渡同一河流”[3]这个比喻，说明自然界及人事界的一切变化。这种万物不断变化的思想，是辩证法的根本思想。依据他的见解，全体的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永远的，在空间上是无限的、无穷的。这个宇宙，不断的变化着，决不是同一的东西。

至于宇宙万物为什么“变动不居”，换句话说，宇宙万物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他的说明是很正确的。他主张一切的变化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说：“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斗争使某种东西变为神，使他种东西变为人；使某种人物变为奴隶，使他种人物

---

[1] 参见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页）

[2] 参见关于赫拉克利特的《文献记载》：“他认为万物都在运动：永恒的事物永恒地运动着，暂时的事物暂时运动着。”（《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7页）

[3] 参见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7页）

灭生火，火灭生气，气灭生水，水灭生土”。又说：“宇宙是永久之火”，用以比喻万物的不断变化。又说“人不能再渡同一河流”，也是比喻自然与社会的变动不居。据他看，宇宙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不断变化着。不但如此，他还指出了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万物由于内在对立物的斗争，而由一种形态转为另一种形

变为自由民”[1]。又说：“斗争随处都有，真理是不和，必然的通过斗争而发生，这是必须知道的事情”[2]。依据这种见解，万物都由于内在的对立物的斗争而由一种形态而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对立物的斗争，是引起一切变化、一切发展的动因。”这也是辩证法的根本思想。总之，他是用一般的方法来表示这种思想的。他又把这种思想应用到有和无的关系。他说有和无的两极端的对立，综合于生成的概念之中。这便是说，一切事物的过程和本质，是在于两极端的对立的综合希腊哲学家中“伟大而有光荣的赫拉克里图”，实是“辩证法之父”。

---

[1] 参见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页)

[2] 参见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页)

态。一切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说：“斗争是万物之父”，“斗争随处都有，真理就是不和”。这样，他用一般的方法表示辩证法的思想，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他有辩证法父亲之称。

德莫克里特的大功绩，是他的原子论的物质观。虽然是很原始的与机械的唯物论，却对后世的原子论学说给了重大的影响，发生了哲学指导科学的作用。他

其次，我们说到古代唯物论者的最高峰德莫克里特（Demokritos，纪元前约四六〇——三五〇）[1]。德莫克里特的唯物论，是古代希腊原子论的唯物论的最优秀的代表。德莫克里特的时代，观念论的世界观已经出现了。德莫克里特，热烈的反对观念论的哲学，提倡了自己的哲学的根本的完全的唯物论的原理。他说：“物质是永远的”，“任何东西不能从无发生”。依据这种唯物论的见地，物质的发生，完全不需要任何神秘的、神灵的创造的活动，因为物质是永远存在

---

[1] 德莫克里特（约前460—前370），现译德漠克里特或德谟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反对观念论哲学，提倡了完全唯物论哲学。他认物质的构成，都是由于极微小的不可入的微粒子即原子；而其运动，是由这种原子与空虚的空间相结合。不可入的原子运动于空虚的空间之中，原子们互相为种种的分离与结合，因而组成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他把物质、人类、灵魂、思想，都看作本质相同而形态互异的诸原子的种种结合。这样，他对万物都一一给以相当的特殊的形态。他认原子

的，物质的运动是出于自己的特质。物质的这种特质，德莫克里特把它称为物质的不可分的微粒子、原子的结合、分离及种种的结合。

当时的自然科学，还在很幼稚的状态，所以德莫克里特的世界观，还是原始的素朴的东西。他对于物质世界的构成，作了如下的观察。宇宙间的一切存在物——火与水、地与天、物质与人类，植物或人的灵魂，都是本质相同而形态互异的诸原子的种种结合。水的原子，具有一种形态；土的原子又具有别种形态；扩而充之，人类及其思想，也都是由原子的结合发生的，也各具有特殊的形态。这样，德莫克里特把宇宙万物，都一一给以相当的特殊的形态。

依据德莫克里特的主张，原子结合的种种形态，虽是各不相同，而一切原子，都具有物质的、不可分的、不可入的共通性。一切原子既然都有不可入性，因而原子结合所产生的物体（如水、火、气、土）也有不可入性。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疑问，即不可入的物体怎样能够运动呢？关于这一问题，他就假定空虚的空间来解决它。他以为一切存物，都是由极微小的不可入的物质微粒子构成的东西，这些微粒子，运动于空虚的空间之中，互相结合，互相组合，构成物质世界的一切多样性。所以他说：“现实之中，原子和

和空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完全否定了神。他认运动是与物质不能分离的，而空虚是物质运动的条件，他的原子与空虚的关系，表现有与非有的统一。他的这种物质运动观，虽是机械的力学的运动，但他看成物质变化的根本法则，看成宇宙的因果必然性，他已企图在物质本身之中探求其自己运动的原因了。

空虚的空间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存在”[1]。

德莫克里特，把原子与空虚看做物质世界的根本原理，而原子与空虚的原理，表现着有与非有的统一的理解。他主张原子的种种结合，产出种种的物质，而空虚是物质运动的条件。他认定运动是与物质不能分离的东西。但他所说的物质的运动，是机械的、力学的运动，而这种机械的力学的运动，又是物质变化的法则，是世界的因果的必然性。在这种处所，他已企图着在物质世界本身中去探求其自己运动的原因了。

---

[1] 参见关于德谟克里特的《文献记载》:“在自然中存在的只有原子和虚空。”(《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7页)

三　古代观念论[1]哲学中的辩证法

代表古代反动贵族的意识形态是古代观念论哲学。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有六：（一）由于希腊奴隶经济的向下发展而产生的深刻的阶级分化与斗争，引起贵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意识形态的斗争，前者便以观念论哲学为其基础；（二）由于奴隶制阻塞了技术的进步，奴隶所有者便不去研究与技术改良有关的自然现象，而集中注意于研究社会现

历史上代替古代唯物论哲学而起的东西，是古代观念论的哲学。古代观念论的发生和发展，自有其历史的根据。

第一，希腊奴隶制经济的发展，进到纪元前五世纪，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而呈现下降的倾向了。在这种过程中，自由民之中的阶级对立日趋发展，而商工业者阶级对于旧日土地贵族的斗争也趋于尖锐化。于是自由民各阶层的注意，就集中于政治权利的争夺，因而引起所谓民主主义与贵族主义的斗争。

第二，由于奴隶制度阻塞了技术的进步，奴隶所有者阶级不去致力于与技术改良有关的自然现象的研究，而集中其注意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了。于是何谓善？何谓恶？人们应如何生存？国家应如何组织？政权应如何分配等问题，就变成他们急待解决的问题了。

第三，自由民都是参加于政权的公民，而公民必须是不从事肉体劳动的人们，所以自由市民轻蔑肉体劳动的观念非常普遍。这种轻视下贱劳动的观念，在古代确实的支配着一切有自由思想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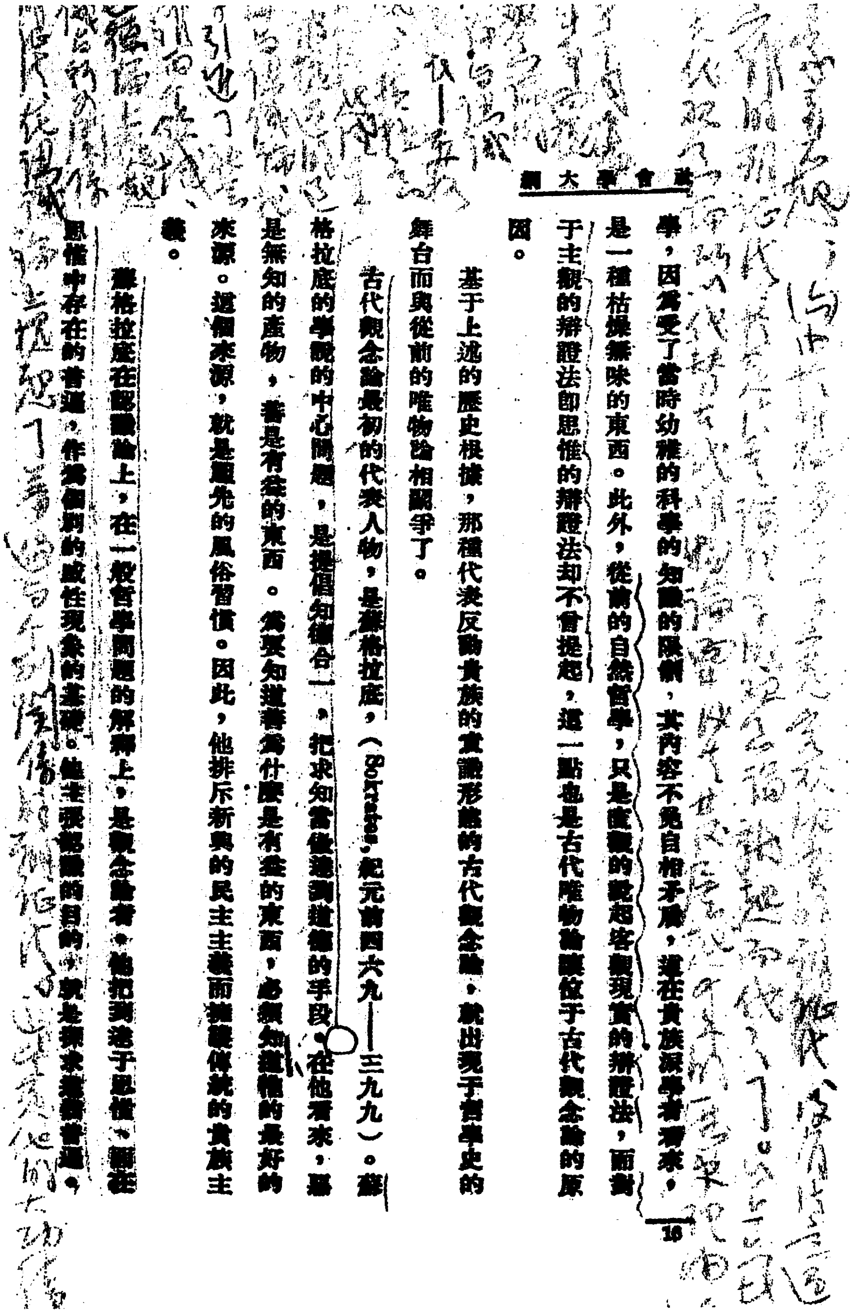
---

[1] 观念论，旧的译法。现译唯心论。

象，于是道德哲学、国家理论就起来了；（三）由于离开肉体劳动的自由民普遍地轻视肉体劳动，因而夸大精神要素，产生了观念论哲学；（四）由此，在意识领域中，贵族们也轻视与厌恶所谓研究“卑劣的物质”的哲学，以为观念论哲学才是真理；（五）由于从前唯物论哲学因受当时科学水准限制，不免幼稚简单与自相矛盾，因而被观念论哲学家看不起；（六）由于唯物论哲学只是客观

第四，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从前那些研究自然现象、研究卑劣的物质的哲学，在自视为高贵的精神的贵族们看来，是损伤他们的自尊心的、非常厌恶的东西。因此，贵族们及其从仆的思索的对象，就从地上的物质世界而移到天上的精神世界了。并且，从前的唯物论哲学，因为受了当时幼稚的科学的知识的限制，其内容不免自相矛盾，这在贵族派学者看来，是一种枯燥无味的东西。此外，从前的自然哲学，只是直观的说起客观现实的辩证法，而对于主观的辩证法即思惟的辩证法却不曾提起，这一点也是古代唯物论让位于古代观念论的原因。

基于上述的历史根据，那种代表反动贵族的意识形态的古代观念论，就出现于哲学史的舞台而与从前的唯物论相斗争了。



社會學大綱

學，因爲受了當時幼稚的科學的知識的限制，其內容不免自相矛盾，還在貴族派學者看來，是一種枯燥無味的東西。此外，從前的自然哲學，只是直觀的把握客觀現實的辯證法，而對于主觀的辯證法卽思惟的辯證法却不曾提起，這一點也是古代唯物論讓位于古代觀念論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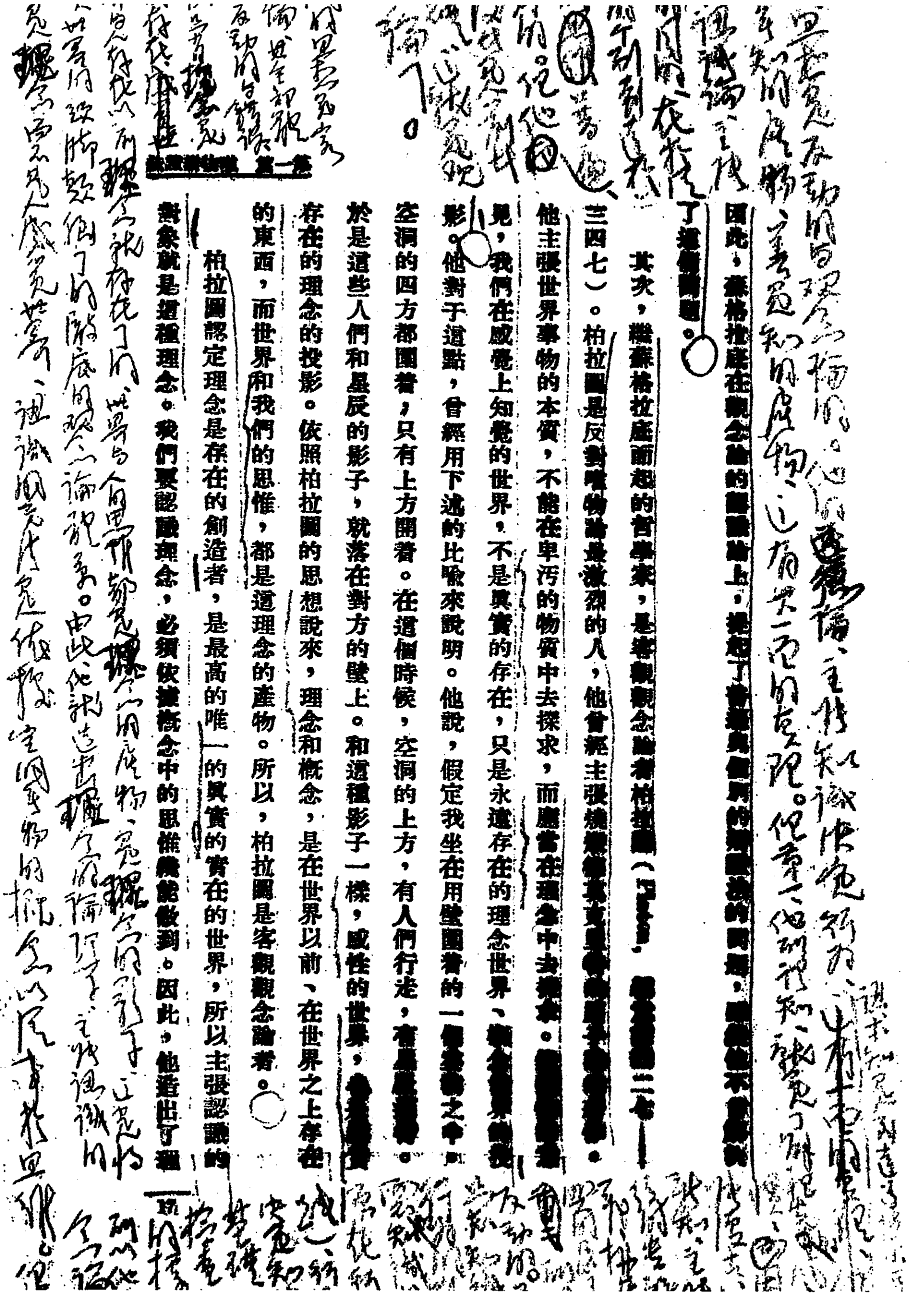
基于上述的歷史根據，那種代表反動貴族的意識形態的古代觀念論，就出現于哲學史的舞台而與從前的唯物論相鬬爭了。

古代觀念論最初的代表人物，是蘇格拉底，（Sokrates，紀元前四六九——三九九）。蘇格拉底的學說的中心問題，是提倡知德合一，把求知當作達到道德的手段。在他看來，惡是無知的產物，善是有益的東西。爲要知道善爲什麽是有益的東西，必須知道他的最好的來源。這個來源，就是祖先的風俗習慣。因此，他排斥新興的民主主義而擁護傳統的貴族主義。

蘇格拉底在認識論上，在一般哲學問題的解釋上，是觀念論者。他把到達于思惟、顯在思惟中存在的普遍，作爲個別的感性現象的基礎。他主張認識的目的，就是探求這種普遍。

16

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批注的手稿。



因此，蘇格拉底在觀念論的[illegible]上，提起了普遍與個別的辯證法的問題，[illegible]了這個問題。

其次，繼蘇格拉底而起的哲學家，是客觀觀念論者柏拉圖（Platon，[illegible]——三四七）。柏拉圖是反對唯物論最激烈的人，他曾經主張燒燬[illegible]。他主張世界事物的本質，不能在卑污的物質中去探求，而應當在理念中去探求。[illegible]見，我們在感覺上知覺的世界，不是真實的存在，只是永遠存在的理念世界、[illegible]影。他對于這點，曾經用下述的比喻來說明。他說，假定我坐在用壁圍着的一[illegible]之中，空洞的四方都圍着，只有上方開着。在這個時候，空洞的上方，有人們行走，[illegible]。於是這些人們和星辰的影子，就落在對方的壁上。和這種影子一樣，感性的世界，[illegible]存在的理念的投影。依照柏拉圖的思想說來，理念和概念，是在世界以前、在世界之上存在的東西，而世界和我們的思惟，都是這理念的產物。所以，柏拉圖是客觀觀念論者。

柏拉圖認定理念是存在的創造者，是最高的唯一的真實的實在的世界，所以主張認識的對象就是這種理念。我們要認識理念，必須依據概念中的思惟纔能做到。因此，他造出了種

毛泽东读《社会学大纲》批注的手稿。

现实的辩证法，没有注意过主观思维的辩证法，于是注重论理学的观念论就起而代之了。以上六者，都是古代观念论所以代替古代唯物论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历史理由。

作为第一个同唯物论斗争而提倡观念论的道德论与认识论的代表——苏格拉底，其积极意义是提起了从来没有被提过的道德论与认识论，把哲学引进了社会与思维两个领域，在道德论上提起了知识与行为关系的辩证

古代观念论最初的代表人物，是苏格拉底（Sokrates，纪元前四六九——三九九）。苏格拉底的学说的中心问题，是提倡知德合一，把求知当做达到道德的手段。在他看来，恶是无知的产物，善是有益的东西。为要知道善为什么是有益的东西，必须知道它的最好的来源。这个来源，就是祖先的风俗习惯。因此，他排斥新兴的民主主义而拥护传统的贵族主义。

苏格拉底在认识论上，在一般哲学问题的解释上，是观念论者。他把到达于思惟、而在思惟中存在的普遍，作为个别的感性现象的基础。他主张认识的目的，就是探求这个普遍。因此，苏格拉底在观念论的认识论上，提起了普遍与个别的辩证法的问题，虽然他不曾解决了这个问题。

法，在认识论上提起了普遍与个别关系的辩证法。这些是他的大功绩。然而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与观念论的。他的道德论，主张知识决定行为，认求知是到达道德的手段，恶是无知的产物，善是知的产物，这有其一面的真理。但第一，他所谓知，就是了解祖先的风俗习惯，因而主张复古，排斥新知，主张传统的贵族主义，排斥新兴的民主主义，所以他是反动的。第二，他只知知识给与行为的影

响，而不知知识的来源在行为（实践），行为是决定知识的基础，又是检查知识的标准，所以他是观念论的。他的认识论，主张认识的目的，在于从感性的个别到达于理性的普遍，这是对的。但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这就是观念论了。

柏拉图的思想是客观观念论，其全部体系都是反动的与错误的。他认只有理念是永久的真实的存在，世界与人存在以前，理念就存在了

其次，继苏格拉底而起的哲学家，是客观观念论者柏拉图（Platon，纪元前四二七——三四七）。柏拉图是反对唯物论最激烈的人，他曾经主张烧毁德莫克里特的原子论的著作。他主张世界事物的本质，不能在卑污的物质中去探求，而应当在理念中去探求。依据他的意见，我们在感觉上知觉的世界，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永远存在的理念世界、概念世界的投影。他对于这点，曾经用下述的比喻来说明。他说，假定我坐在用

的。世界与人的思维都是理念的产物，是理念的影子。这是将真实世界的头脚颠倒了的彻底的观念论体系。由此，他就造出理念的论理学，主张认识的对象是理念而不是感觉世界，认识的方法是依据空洞无物的概念以从事于思维。但是柏拉图的积极作用，也就在他的理念论理学。因为在他的理念论理学中，表示了概念对于思维的作用。这个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的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上有开创的意义。

壁围着的一个空洞之中。空洞的四方，都围着，只有上方开着。在这个时候，空洞的上方，有人们行走，有星辰运行。于是这些人们和星辰的影子，就落在对方的壁上。和这种影子一样，感性的世界，也是真实存在的理念的投影。依照柏拉图的思想说来，理念和概念，是在世界以前、在世界之上存在的东西，而世界和我们的思惟，都是这理念的产物。所以，柏拉图是客观观念论者。

柏拉图认定理念是存在的创造者，是最高的唯一的真实的实在的世界，所以主张认识的对象就是这种理念。我们要认识理念，必须依据概念中的思惟才能做到。因此，他造出了理念的论理学。但柏拉图的概念，是不包含物质内容的概念，因而是死的不动的概念，因而依据于死的、不动的、无内容的概念中的认识，也只是死的、不动的、无内容的神秘论。我们在这里不愿研究他的神秘论，只简单说起他的一点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他的理念的论理学。他的理念的论理学，表示了概念对于思惟的作用。[第10～18页]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生成及发展

四　唯物辩证法的发展

在前段的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出，唯物辩证法，是在哲学斗争的过程中锻炼起来的。哲学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反映，这个命题，是我们理解唯物辩证法的发生和发展的关键。当创始者们最初站在急进的民主主义的立场时，在哲学的领域加入了黑格尔的左派，以哲学的斗争来反映政治的斗争。自从他们接受费尔巴哈的影响，决定的成为唯物论者，并批判的摄取黑格尔辩证的方法以研究现实的社会诸问题以后，他们就更进一步的使用新创的唯物辩证法的精神武器，去从事于哲学上的两个战线——代表布尔乔亚和小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观念论与旧唯物论——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反映着他们所代表的普罗列达里亚与布尔乔亚的实际斗争。[第75～76页]

斗争就是辩证

第二章　当作哲学的科学看的唯物辩证法

第一节　辩证唯物论的一般特征

二　观念论的克服与辩证唯物论

……

所以辩证唯物论，并不是形而上的否定一切

意谓绝对的

从来的哲学历史，并不是单纯的粗笨的否认一切

观念论的存在，而只是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去扬弃一切观念论。……[第104页]

三 物质的概念

……

物质存在形式，首先是运动。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根本形式。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离的结合着。“无运动的物质，和无物质的运动一样，同是不能想象的”[1]。这个命题，指示了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运动，是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这个命题，表明了：绝对不运动的物质或绝对静止的物质，都[2]是没有的；离开了物质，就不能说起运动；[3]并且物质的运动，是非常复杂的。

运动

复杂的运动

“物质是运动的物质。没有运动就没有物质，没有物质就没有运动。但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自动。物质自动的源泉，是物质的内的矛盾、对立物的斗争。……”[第111～112页]

自动

内的矛盾

时间和空间，和物质一样，是离开人类意识独立而为意识所反映的客观的实在。时间和空间的表象，是客观的实在的时间和空间在人类意识上的反映。客观的实在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断的发展着，变化着，因而反映于人类意识上的时间和空间

---

[1]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2] 毛泽东将原文中的“都”字圈掉了。

[3] 毛泽东在此加写了一句话“离开了运动也不能说起物质”。

的表象，也是相对的，发展的。这些相对的表象的日趋发展，就日益接近于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正如关于物质构造的学说的可变性不否定物质之客观的实在性一样，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表象，也不否定两

的可变性[1]

者之客观的实在性。[第114～115页]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对象

一　当作世界观与方法的统一看的唯物辩证法

……

对

……世界观是个别科学的诸结果的概括，它与个别科学的发展水准有极密切的关系。在个别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高级水准之时，科学的世界观是不能成立的，……。[第120页]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

第一节　对立统一的法则

一　对立物的统一及斗争

……

内部的对立

……世界任何事物，都没有不具有内在的矛

---

[1] 这四个字是毛泽东对原文“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表象”一句的补正。

化为外部的对立

盾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具有种种对立的要素；这些对立的要素，是创造事物的矛盾性的东西。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第166页]

矛盾即运动

一切运动本身都是矛盾，一切自己运动的源泉都是运动着的东西的内的矛盾。……唯物辩证法研究客体的自己运动时，当然不否认外的条件的作用。但外的矛盾与内的矛盾之间，有辩证法的相互作用。外的矛盾的作用，通过特定事物的内部矛盾，并由它而受曲折。只有暴露客观实在性的内的矛盾——自己运动的源泉，才能理解自然及社会诸现象的发展的本质。[第168页]

错误?

事物的内的矛盾，必伴随着对立的斗争，因对立的斗争而解决，而转变为新的形态。但是事物之因内在的矛盾与对立的斗争而发展，也有采取连续性的变化的，也有采取非连续性（连续性的中断、即飞跃）的变化的。在采取连续性的变化的场合，矛盾不至发展为互不两立的、拮抗或敌对的矛盾。反之，在采取非连续性（即飞跃）的变化的场合，矛盾就发展为拮抗或敌对的矛盾。所以矛盾和拮抗有相通点，却又互有区别。机械论者（如布哈林）把矛盾和拮抗看做同一，这是错误的。拮抗即是Antagonismus。力学上把Antagonismus解释为采取反对方向的二力的冲

突，即是二力的反拨；但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上，Antagonismus被解释为达到直接冲突状态、矛盾激化的阶段，即是拮抗或敌对。所以在辩证法的解释上，一切拮抗（或敌对）都是矛盾的发展阶级[1]，而一切矛盾，不必都发展到拮抗的阶段。[第172～173页]

要承认飞跃律的普遍性

至于不带拮抗性的矛盾的发展，只通过部分的解决的阶段，矛盾的各个新发展阶段，就是矛盾的部分的解决的表现。自然或社会中凡属不采取飞跃的发展的变化，都属于这种场合。普罗列达里亚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矛盾。……[第174页]

我以为不对

第二节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一　质、量、质量

最初一看，事物的量与质是完全互相独立的。事物具有同一的质而能有增减。大小不同的事物能有同一的质；反之，同样的量的规定性，能存在于质不相同的事物中。……[第189页]

质同量不同
量同质不同

---

[1] 毛泽东将级字改为“段”。

三　飞跃论

……

一切

所以，质的转变是飞跃，这是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历史所证实的命题。……[第200页]

第三节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一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的意义

……

为什么重演？

事物在其矛盾的发展过程中，下级的发展阶段，准备它自身的自己否定的阶段，即准备转变为对立物的、新而较高的阶段。这就是后起阶段克服先行阶段的否定。这个否定，在这两个阶段上[1]间造出内在的联系，在后起阶段上保存先行阶段的积极的结果。但是第二阶段由于新的对立而推移到后起的第三阶段时，事物的发展，就把最初低级阶段的一定的特征和性质，再行重演，而在外观上这第三阶段好象再回到第一阶段。可是发展的过程因后来的发展，变得更为丰富，把那些重演的性质和特征在较高的基础上再生出来，于是当作全体看的发展过程，就描成螺旋线而发展。……[第205页]

---

[1] 毛泽东将原文中的“上”字删去。

三　关于这个法则的曲解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照这样的经过构成三段法的三阶段——正、反、合。黑格尔想依据这些命题，去确证通过对立性的斗争而发展的法则。这无疑的是包藏着关于发展的最深刻的思想。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观念论的。黑格尔替三段法穿上神秘的服装，把三段法化成一个普遍的公式，并把自然的一切现象都嵌入这个公式之中。

不清楚

……

米海洛夫斯基批判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时，把这个法则还元于黑格尔的三段法。他以为现实的生活中，单只两个否定的存在是很少的。他引证恩格斯所举的例子，说麦粒发芽，开花，结实，是三个否定而不是两个否定，因而这是四段法而不是三段法了。米海洛夫斯基是爬行的经验论者，根本上不懂得：这个法则，并不在于否定的数目，而在于发展的全生涯包藏着它自身的否定及否定之否定的一点。过程的各阶段中多数否定之存在，决不排除辩证法的发展的一般性。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并不还元于三段法，这是很明白的。

那末蚕卵是五段法

？

还没有弄清楚

机械论者与形式论者，对于这个法则，也有多少的曲解。机械论者把质的发展还元于量的发展，把辩证法的发展还元于机械的循环。机械论者把物质形态的发展，看做是依从于力学的法则进行的。他们从均衡论之中抽出三段法。例如波格达诺夫说："过程如果有始点，在始点以前，就不存有两个对立力的斗争，而是存有二力的均衡，这是很明白的。均衡在什么地方终结，二力的斗争在那时就消灭，而生出新的均衡，这是无疑的。这就是三段法的全部。即是从均衡—经过破坏它的二力的斗争—到新均衡"。布哈林的均衡论，也和这相同。他说："黑格尔理会运动的性质，把它在下述的形式中表示了。他把均衡的最初状态称为正命题，把均衡的搅乱称为反命题，把新基础上的均衡的恢复称为合命题（矛盾和解的综合状态）。嵌入于这三段法之中的一切存在物的运动的这种性质，黑格尔称为辩证法的性质"。布哈林的这种主张，把综合解释为对立的和解，这无疑的是折衷主义。

?

都没有弄清楚

第四节　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

一　本质与现象

上面已经说明了，对立统一的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的法则、与否定之否定的法

包摄着

许多组

则，是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这三个法则之中，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根本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其他两个法则，可说是对立统一法则的不同的显现形态。所以对立统一的法则，实在是包摄着质量间互相转变的法则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唯物辩证法，由于发见对立统一的法则，才能理解自然、社会及思惟的矛盾的发展的根源。可是，对立统一的法则，不仅包摄着质量间互相转变的法则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并且还包摄着其余的许多法则。在唯物辩证法的哲学上，除了质与量、否定与再否定那样对立的范畴以外，还有许多组对立的范畴。例如：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之类。象这类对立的范畴，都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化的形态。这些对立的范畴，在其互相渗透上，显现着辩证法的一般法则。[第217～221页]

经验论，说得最好。

主观观念论

……经验论者们只把在感觉上给与着的现象当作实在的东西，至于隐藏在现象的根柢中的本质，却认为是信仰或偏见的产物；因此他们认为一切客观的现实都只是现象，对于客观的认识即是现象的知觉。他们以为科学的认识的任务，在于简约现象世界的复杂关系，确定事物间的表面的关系，而不是探求事物之内的统一、内的联结，即不是探求事物之本质的联结。所以他们认为科学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记述而不是说明。主

之来源

观观念论从现象与本质的关联分离出现象来考察，这种见解，是从经验论产生的。主观观念论，把现象归着于现实的假象，并把假象看成一刹那的幻像，从假象本身夺去客观的现实性，因而怀疑现实的认识的可能性，而到达于不可知论。

唯理论

其次，唯理论者从现象分离出本质，而在思惟上加以考察，并把本质看成不变的东西，唯理论者排除在感觉上给与着的现象，想靠概念的分析得到正确的认识。……

比较

经验论者拘泥于事物的现象，不探求事物的本质，把现象看做事物全体的法则；唯理论者，蔑视现实的多样性，而提供永久不变的法则。这两种倾向，是互相对立的东西。康德的哲学，企图调和这种对立的倾向。康德一方面承认在现象的彼岸有当作本质看的“物本体”[1]之存在，另一方面却又否认这种“物本体”的认识的可能性。他主张人们所能认识的东西只是现象，因而把认识限定于现象的领域，这是和经验论的主张相同的。康德这样的把物的本质搬到“物本体”的世界，把本质从现象分离出来，使两者变为形而上学的对立物。由于否定本质认识的可能性，康德的哲学就变成了不可知论。

---

[1] 物本体，又译为“物自体”“自在之物”等。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用语。指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但又不可认识的东西。

赫格尔

至于把握了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的统一的人，要推黑格尔。黑格尔克服了上述许多片面的偏见，严格的批判了康德分离现象与本质的学说。黑格尔确定了本质这概念的相对性，确定了本质与现象、本质与假象之间的密接的相互依存性。他指出了：事物之内的本质并不自行出现于现象之中，为要理解事物的本质就必须研究现象。可以说，他确是阐明了本质与现象之具体的内容。可是，黑格尔是客观观念论者，他虽然也承认现象是客观的存在的东西，却又把本质这个概念作纯观念论的解释。在他说来，现象和本质，对于我们经验的主观，虽是客观的，但两者都只是思惟的内容。所以他主张在思惟上把握了的本质，对于直接给与着的现象，是占居优位的。

三　内容与形式

……

分离形式与内容，是一切形而上学与观念论的偏见。尤其是形式伦理学，分裂形式与内容，把内容表现为没有形式的东西，把形式表现为没有内容的东西。形式论理学的概念，是没有内容的表面的形式，遗弃了现实的内容的一切财富。象这样离开了内容的形式，恰象是离开了存在的意识。这样的概念，只是现实的阴影，并与现实

相对立。[1]这种见解，是形式主义。……[第246页]

第五节　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法则与因果性

一、必然性与偶然性

……

偶然性是与必然性相对立的范畴，它并不是与因果性相对立的范畴。但[2]偶然性的本身，也是有原因的。……偶然的东西本身是有原因的，它是从原因发生的必然的东西，不过它的发生，不是从特定过程的本质而来，它在这过程全体中并无根据。……所以，因为不明白偶然性的原因而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这种主张，实际上简直是承认了绝对性。[第256～257页]

三　可能性与现实性

……

即幻想

抽象的或形式的可能性，是想象上的可能性，是形式论理的、排除了思惟上的矛盾的意义上的可能性。譬如说，太阳明天能与地球碰撞，桃树上能长出梨子，低能儿能变成哲学家，劳动

---

[1] 毛泽东在这里补充了“而不相统一”五个字。

[2] 毛泽东将这里的“但”字改为“因为”一词。

阶级能变成资产阶级，苏俄的共产党能变成资本家团，——这一切都是想象上的可能性。但这样的可能性是不能转变为现实性的。因为这些都不是基于现实性的诸条件的空想的可能性。……[第275页]

必要的条件

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条件的意义，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我们对于条件的意义，不能做过大的估价（否则就变成自然生长论者），也不能做过小的估价（否则变为盲目行动家），这是在研究根据与条件的问题时已经说明了的。……[第278页]

抗日战争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都不足

西安事变，保存军力，游击

关于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是促速或延迟过程的发展的枢纽，是成功或失败的关头。这个选择，必须正确的分析客观的情势，估量主观的条件，注意于整个过程的发展的链与环的关联，把所选择的一种实在的可能性当作链子中的特殊的一环来确定。例如一九一八年的普列斯德媾和[1]，就是当作链子中的特殊的一环而抓

---

[1] 普列斯德，在其他处又译朴列斯特，现译布列斯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苏维埃共和国遭到德帝国主义军队的入侵，为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入侵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1918年3月苏俄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在俄国西部布列斯特订立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得以在1918年至1920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的武装干涉。

住的两种实在的可能性（媾和则新政权有维持的可能性，续战则新政权有崩溃的可能性）之一。又如，第一次五年计划进行的时期中“抓住技术”的口号，也是当作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链子中的特殊的一环而抓住的两种实在的可能性（如能于最短期间使技术赶上先进资本主义诸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就有可能性，否则有崩溃的可能性）之一。所以可能性的选择，要考察整个过程的发展的倾向，把所选择的可能性当作链子中的一环来确定，抓住这一环而接近于其次的一环，[1]决不能因要抓住一个环而拆散整个的链子，不能因为目前的暂时的利益而牺牲后来的永久的利益。

战争，创办学校，发行报纸。

旧军队的破坏与建设

西安事变时抓住两党合作，七七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

今日的游击战争是新的东西。

不是，〔是〕把所选择的可能性之实现条件当作链子一环抓住。

如上所述，社会的实践，是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变的重要的契机，如果忽视这个契机，就会陷入于机械论的宿命论者的立场。机械论把可能性与现实性看成同一的东西，不理解可能性实现的诸条件，也不理解主观条件与客观情势之适应的统一，更谈不到两种实在可能性的选择的问题。他们认为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变是必然的过

自然生长，

---

[1] 毛泽东在这里加了一个“但”字。

就在自然界也不对。

程，既然是必然的过程，它就是自然生长的东西，就不须要什么条件，也不须要人们的努力。如同月蚀是预见了的必然，人们当然没有组织月蚀促进会的必要；劳动阶级的解放也是历史的必然，人们当然也没有组织要求解放的党派的必要。这种见解，就是所谓“自然生长论”。[第280～281页]

第四章　当作认识论和论理学看的唯物辩证法

第一节　认识过程考查的根据、意识的生成

一　当作反映论看的认识论

……

还有，由思维到物质。

论理的东西之反映历史的东西，即是认识。人类的认识，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认识的过程，由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其中包括着由物质到感觉及由感觉到思惟的认识的发展过程。……

将来认识的，将是一个别

认识论即是辩证法。认识运动的过程，是辩证法的过程。“不单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是辩证法，并且由感觉到思惟的推移也是辩证法”[1]。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4页）

有天地的世界。

“认识是思惟对客观的永远的无限的接近。”[1][第280～285页]

……我们当分析认识过程时，第一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推移的辩证法，第二要阐明由感觉到思惟的推移的辩证法。为要阐明由物质到意识的辩证法，就必须展开唯物辩证法的反映论。[第286页]

第三要阐明由思维到物质的推移的辩证法，即检验与再认识。

……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的实践的基础上考察认识过程，去理解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在物质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之主体的活动，与外界物质的对象相结合。即是说，“在劳动的过程中，劳动常由活动形态推移于存在形态”[2]（资本论）。“在劳动过程中，主体的活动，被包括于对象之中，加工于对象，而在其与对象的统一中出现”（库捷诺夫）。所以就物质生产的对象，加以考察，我们就可以在它当中看出主体的活动形态推移于特定对象形态的、无数人类的世代绵延的社会的实践。

互相渗透

……[第287页]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8页）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页）

二　意识与人类肉体的关系

……

运动神经缺

大脑司掌身体诸器官的运动。如果切断了由大脑通到某一器官例如手的神经，手虽然还是存在，而人却失掉运动其手的能力。因而我们所切断的那一种神经，即是由手传达外界刺戟于大脑的所谓知觉神经。所以这一神经如被切断，手的运动能力虽能保持，却不能感受外界的刺戟。因而感觉与手足的运边，是脑髓得到神经之助，知觉[1]神经所受的外界的刺戟，并刺戟器官的作用。[第289页]

第二节　感　觉

一　当作认识的源泉看的感觉

……

感知[2]

与感觉的种类（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相适应，在大脑皮质之中，具有这些感觉的形成与其存在相结托的一定的感觉中枢。大脑皮质的颅顶叶之中，存有所谓知觉中枢及运动中枢的领域。这是刺戟转化为触觉及

---

[1] 原文此处为“觉知”，毛泽东将其改为“知觉”。

[2] 毛泽东原批“感知”二字，后又把“知”字圈掉。

运动觉的场所，如实验及病理学所指明，大脑皮质中某一部分如受损伤，就丧失与它相适应的感觉。[第307页]

二　感觉与思惟

两个过程

从物质到感觉，到意识的过程，上面大致已经说明了，现在进而说明由感觉到思惟的过程。[第317页]

……

对中国革命也一样

普罗列达里亚，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上，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只是直观的，所以他们只是“自在的阶级”，还不能对布尔乔亚作意识的斗争。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所感受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他们的生活水准都被降低到饥饿线上，于是他们依据在奴隶生活条件下所得到的体验和知觉，不断的和布尔乔亚作日常的斗争（虽然不是意识的斗争）。基于多年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就渐渐的把关于资本主义的直观的认识提高到论理的认识，而理解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了。于是他们就具有阶级的意识而由“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了。于是他们深刻的理解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及其没落的必然性，并担负起扬弃资本主义的使命而企图实现新的社会理想了。这样看来，“普罗列达里亚对于资本

主义的现实之认识的过程，最初从感觉、表象、与对象的直觉阶段，进到对于现实的较高级的理解的阶段，其次再从这高级的阶段，进到革命的实践”[1]的阶段。这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觉到思惟的运动过程之实例。[第322页]

---

[1] 参见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二版第206页。

读书日记

（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

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

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一月十七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1～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页387～416。

二日

没有看书。

三日

没有看书。

四日

没有看书。

五日

页417～457。

六日

页458～472，第二篇完。第三篇，社会的经济构造，页473起，484止。

七日

页485～491。

八日

页492～506。

九日

页507～550。

十日

页551～560。

十一日

页561～596。

十二日

页597～624。

十三日至十九日

没有看书。

二十日

页625～640，社会的经济构造完。社会的政治建筑始，641～642。

二十一日

P643～679。

二十二日

P681～728。

二十三日

P729～739。

二十四日

未看。

二十五日

P740～757。

二十六日—三月二日

没有看。

三月三日

P758～780。

四日

未看书。

五日

P781～786。第五篇，社会的意识形态。

六日—八日

没有看。

九日

P787～789。

十日—十四日

没有看。

十五日

P790～830。

十六日

P831～852，本书完。

十七日

没有看书。

十八日

开始看克劳塞维资[1]的战争论，P1～19序言及目录，第一篇论战争之本质，从P24起，本日看完第一章，至P55止。

---

[1] 克劳塞维资（1780—1831），现译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家。曾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著作有《战争论》等。

十九日

没有看书。

二十日

P57～91。

二十一日

P92～102。

二十二日

没有看。

二十三日

P103～111。

二十四日

没有看。

二十五日

潘梓年[1]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2]，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

二十六日

潘书P94～174。

---

[1]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中国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宣传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后，从1938年起在武汉和重庆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2] 《逻辑与逻辑学》，潘梓年著，1937年10月出版。1938年第二次印行时曾改名为《逻辑学与逻辑术》。毛泽东读的是1937年第一次印行的书。该书主要探讨了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将逻辑分为方法论（逻辑学）与技术论（逻辑术）两部分，虽然未彻底克服将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混为一谈的缺点，但它没有完全否定，而是改造、利用了原有的形式逻辑。这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将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完全等同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二十七日

P175～204，完。

二十八日

战争论P112～122。

二十九日

没有看。

三十日

没有看。

三十一日

P123～167。

四月一日

P168～

为《自由中国》杂志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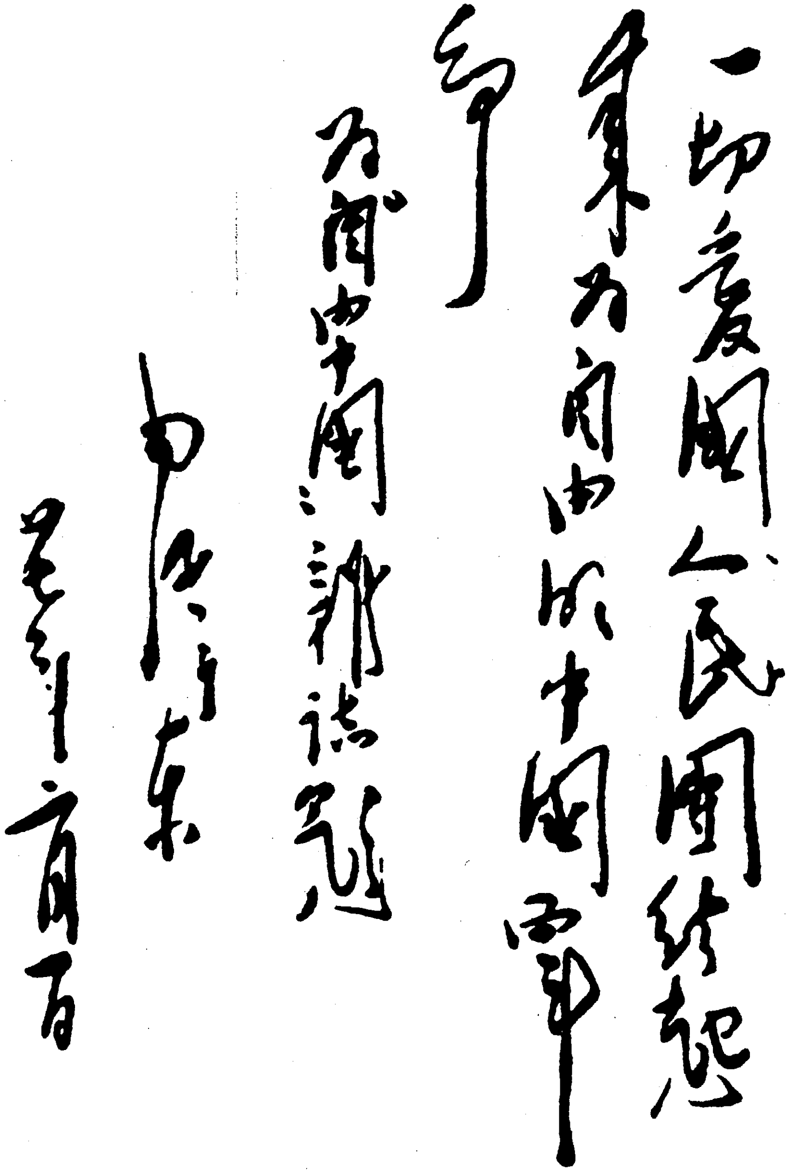
（1938年2月1日）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的中国而斗争！

为《自由中国》杂志题。

毛泽东

廿七年二月一日



一切爱国人民团结起
来为自由中国而斗
争
为自由中国杂志题
毛泽东
是刊首页

毛泽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题词。

论一党专政

（1938年2月2日）

问题一：苏联现在的政治制度是一党专政吗?

答：苏联是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即工农社会主义的国家，但不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看来，阶级的专政与党的专政是有区别的东西，党只是阶级的最觉悟的一部分人的组织，党应当而且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党不应当而且不能代替阶级去实行专政。因此，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创造者，列宁、斯大林从来未曾将党的专政与阶级的专政混为一谈，而他们有时借用所谓党的“专政”这个名词时，不过是指的党在国家系统中的领导作用这一点而已。为使你明了和相信我的这种说法，我乐于将列宁和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介绍一点给你。为了记忆和了解的便利，我特将斯大林所著《关于列宁主义的问题》这本书上对这个问题所引证列宁的意见和他自己的意见介绍一点给你，在这本书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系统里的党和工人阶级”这一节中，斯大林曾将列宁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加以详明的发挥，例如他说：“比方，在我们苏联这里，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应当把这样一件事实看作党领导作用的最高的表现，这事实就是我们的苏维埃的或其他的群众组织，在解决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的时候，都要根据党的指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无产阶级的专

政，在实质上，是它的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的‘专政’，因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的领导力量。”请看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田纳尔说：他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他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完全和我们所了解的一样，他认为我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个有组织的和有觉悟的少数的专政。而且真的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当工人阶级是遭受着不断的剥削而不能发展自己的人类的才能的时候，工人政党的最大特点，正是在于这政党只能包括本阶级的少数，政党只能团结本阶级的少数，正好像在无论哪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真正觉悟的工人，只是占全体工人的少数。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这个有觉悟的少数，才能够指导和引导广大的工人群众。而如果田纳尔同志说他是政党的仇敌，而同时又主张由工人阶级中少数最有组织的和最革命的分子来给整个无产阶级指示道路，那么，我就要说，在我们彼此中间，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见分歧的。”[1]

可是这是不是说，可以在无产阶级的专政和党的领导作用（党的“专政”）之间放一个等号呢？可以将前者与后者看作一个东西呢？可以将后者代替前者呢？当然不是这样说。当然是不可以的。例如苏林同志就说过“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是我们党的专政”[2]。这个说法显然是把“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的专政看作一个东西。从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看来，可不可以认为这种把两个东西看作一个东西的事情是正确的呢？那是不可以的。

由此可见，苏联实行的是工人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共产党的专

---

[1] 参见《列宁全集》第25卷第347页。

[2] 参见《列宁的学说》第95页。

政；把阶级的专政和党的专政混为一谈，是既不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又不合乎苏联的实际。我想，对苏联这方面问题的了解，苏联政治制度的创造者列宁斯大林自己的意见是最有权威和最有信任的意见。

问题二：虽然苏联不是一党专政，但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的原因何在呢？

答：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俄国各党派长期斗争中人民意志选择的结果，即是俄国人从长期斗争中厌弃了其他党派而只拥护共产党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国家内已没有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因而也就没有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与可能。为使你能明了和相信我这种说法，最好也还是将斯大林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介绍给你。苏联只有一个共产党存在这件事实，并非工人捏造或空想或行政命令办法造成的结果，而是历史生活所形成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与第一次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得很明白。他说：“我们共产党的地位，全国唯一的公开政党的地位（一党垄断的地位）并不是造作而成的，也不是有意空想出来的，这种地位决不是故意造作地用行政的方法所能造作成的。我们共产党的垄断是从实际生活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是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这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破产而下台的结果。”

在苏联，除共产党以外，无其他政党存在的社会基础，无其他政党存在的必要和可能，关于这一点，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关于苏联新宪法的报告中，特别解释过。他说：“末了，还有一类批评家，如果上边所述的一类批评家，责备苏联宪法草案是放弃工人阶级专政，那么，这一类批评家，恰恰相反，他们责备苏

联宪法草案，说它丝毫没有改变苏联的现状，说它没有放弃工人阶级专政，没有容许各种政党的自由，仍保存着今日共产党在苏联的领导地位依然有效。同时这一类批评家认为苏联各种政党没有自由，乃是违反民生主义基础的一个标志。”

“我承认苏联新宪法草案的确仍保留着工人阶级专政的制度依然有效，同样也保全着苏联共产党目前的领导地位，而毫无变更。如果可敬的批评家认为这是苏联宪法草案的缺点，那么，只能对这一点表示惋惜而已。我们布尔什维克却认为这是苏联宪法的优点。”

“至于各种政党的自由，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略有不同。政党是社会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阶级的先锋部队，只有在有着对抗阶级，其利益互相敌对、彼此不能调合的社会里面，换一句话说，只有在有资本家和工人、有地主和农民、有富农和贫农等等社会里面，才能谈到数个政党和政党的自由的存在。在苏联，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等这一类阶级早已没有了。现在苏联只有两个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利益不仅不彼此敌对，而且恰恰相反，是互相融洽的。因之，在苏联并没有几个政党存在的基础，因之，也没有这些政党自由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共产党的基础，在苏联只有一个政党——即勇敢和彻底保障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才能存在。它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利益，保护得并不坏，这一点未必有人可以发生怀疑的。”

“人们都说民主，可是什么是民主呢？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有彼此对抗的阶级，那样的民主，归根到底，乃是对于有势力的人的民主，乃是对于有财产的少数人的民主。在苏联的民主，恰恰相反，乃是对于劳动者的民主，亦即对于一切人民的民主。由此可见，违反民主主义原则的，亦不是苏联新宪法，而是资产阶级的宪法。因

此，我认为，苏联宪法，乃是世界上唯一彻底民主的宪法。”

由此可见，一党存在的事实，只有在这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已在革命过程中完全为人民大众所鄙弃、所推倒和没有其他党派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国家——如社会主义的苏联一样，才能够真正形成和做到。

问题三：为什么德国、意大利都能实行一党专政呢？

答：首先必须把国内一党掌握政权与一国内是否真只有一党存在的问题分清楚。在德意两国的确只有一个政党掌握政权，但这不是说，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一个当权的政党存在，在德国，固然今天当权的只有法西斯主义的国社党，但是，在法西斯党上台执政以前的其他各政党——曾在末次（一九三三年）国会选举时拥有千百万选民的社会民主党，拥有五六百万选民的共产党，拥有数百万选民和有历史传统的各种拥护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各党派——都是继续存在着和活动着，不过是不公开不合法的存在和活动着而已。请任何人到德国的城市农村里去仔细考察一下，他便立刻可以看出集中监狱里，虽然囚禁着几十万反政府党派的分子，但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一切拥护民主政治反对法西斯专政的党派，都还潜在地英勇地斗争着，他们秘密地出版自己的报纸杂志，他们艰苦地进行教育和组织民众的工作。在法国、捷克斯拉夫、比利时等国的德国政治侨民正在联合国内自己的党派，为设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拥护民主政治的人民阵线，在社会民主国际（即第二国际）、共产国际领导机关里，均坐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代表。意大利的情形和德国没有两样，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一切民主主义的党派同样英勇地秘密地进行反法西斯党的活动，这些党派的代表，同样地在国内外进行设立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阵线；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和社

会民主党代表，同样在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领导机关内占着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如果说在德意两国内只有一党掌握政权，只有一党有合法地位，这是对的；如果说在这些国家内只有法西斯党存在，那就完全不合事实。

问题四：有些人说：现在国民党应该实行“一党专政”，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呢？

答：对这个问题，我可以分两个方面来回答你。

第一，如果你所说的“一党专政”是指国民党一党掌握国民政府政权而言，那么，今天这是已成的事实，因为，谁都知道，在国民政府内负责的只有国民党党员，或国民党自愿指定的人物，中国的其他各党派，现在还均无代表参加政府。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以外的我国第一个大的政党。我们今天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关于这一点，我们党的领导人陈绍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与美国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中，以及我们党的另一领导人张闻天（即洛甫）同志，在《解放》二十八期所发表的《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一文中，已经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恳切地声明过。关于这一点，我可再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作一次郑重声明：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诚恳地帮助国民党对日抗战，但我们现在并不要求参加国民政府。

第二，一党掌握国家政权的所谓一党执政，并不一定要采取“专政”的办法。如果所谓“一党专政”的办法，实际就是等于国民党过去十年所实行的政策，那我以为有考虑的必要。在我看来，今天国民党是可以维持一党掌握政权的局面，但为了集中抗日救国的人才和表现抗日救国的民意，似应当采取相当的民主办法，当然这

些民主办法是绝对有利于抗战的民主办法，是绝对巩固政府和更增加人民对政府拥护信任的民主办法。

问题五：现在有人说，国民党应当再实行“党外无党”的政策，换句话说，即是不允许国民党以外有任何其他政党合法存在的政策，先生对此问题有何意见?

答：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国家主义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的合法存在地位，而且企图以武装力量去消灭国民党以外的其他党派，这在中国不仅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且是曾经实行过十年的旧的事实。然而这个事实的惨痛结果是：不仅内部纷争不已，而且招致空前未有的外患。十年来中国的实际政治生活的痛苦经验告诉我们：国民党企图用武力消灭其他党派的政策，已经遭受失败；同时，中共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企图造成一党领导的政权，也未收到预期的效果。第一次因国共合作而取得北伐胜利的经验，十年来因国共分裂而形成严重民族危机的事实，教训了国共两党的同志和全国人民的一件苦的真理，即是中国统一局面造成的真实有效的办法，不是以某一党派反对或企图消灭另一党派的内争，而是把各党派力量在共同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线——首先是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六个月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实行对日抗战的根本前提，便是由于国内民族力量的团结和统一，而我国民族力量团结和统一的具体方式和具体内容，便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各党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即是国共两党不仅相互抛弃了过去互不承认和互相对立的立场，而且在抗日救国基础上实行携手合作，即是国民党放弃过去否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立场，实行一切抗日党派团结御侮的方针；共产党和其他反日的党派也放弃过去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实行与国民党合

作，去进行抗日救国的共同事业，由此可见各党派力量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对日抗战的必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破坏了这个前提，便是实际上使中国继续内乱，中国一有内乱，便无法继续对日抗战，这是显而易见人所公认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法西斯军阀于军事侵略之外，时刻企图使用“以华制华”的毒计，首先是企图再挑拨中国各党派之间的内争，以便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此可见，今天有些人宣扬的不许国民党以外的任何政党存在的理论，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事实已经否定了的理论，是使中国回复到团结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的企图，同时就是使中国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因而也就是使中国再形成无力对日抗战的局面。因此，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空喊“国家统一”，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今日已经形成的统一局面；因而无论宣扬这种理论的人口头上如何高呼“抗日”，如果他们的理论不幸而见诸实行，实际上所得的结果，一定是破坏抗日团结，使对日抗战不能继续。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深信：这种借统一之名而行有害统一之实的理论，这种借抗日之名而实行有害抗日之实的理论，这种实际上要使中国退回到国内团结一致对外以前的悲惨局面的理论，一定会受到爱国人民的反对，一定会受到全国抗战军队的否认，同时也就一定会受到国民党的贤明领袖人物和一切为国为民而愿继续抗日的国民党同志们的斥责和厌弃。这是毫不足奇的，首先因为这种理论完全不合于实际，违反着实际。这些人说：国民党之外，如其他党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地位，便因党争而妨碍抗日。事实的证明是：原来只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而不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中国确实有

极大的党派内争，以致中国未曾抗日——顶多也不过局部抗日，以致中国无力进行全面的对日抗战；恰恰相反，当国民党一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的地位并与其他政党合作时，中国的确停止了内战，消释了党争，造成了空前未有的国家政权和军队的统一局面，因而才能进行空前未有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以保障民族的生存和争取民族的解放。这些人说：国民党以外，如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则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便成为妨碍国家统一和破坏国家统一的因素。中国的事实证明是：只国民党一党有合法地位而同时不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地位时，国内纷乱不断地发生战争；恰恰相反，国民党一允许其他政党有合法存在地位时，国内统一的局面立见，各政党之间，对某些问题即有争论，也绝不会用武器作批评，顶多也不过相互以友谊的批评作武器；英美法比捷瑞等国的事实证明：多党合法存在的事实，绝未曾妨碍或破坏这些国家的统一。由此可见，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中国才能统一才能抗日的理论，是不合中国实际生活的理论，是使中国既不能真正统一，又不能真正抗日的理论，这种理论绝不能为中国爱护统一和坚决抗日的军民所接受。

问题六：现在有人说共产党既宣布相信三民主义，便不能再相信共产主义，先生对此问题的意见怎样？

答：首先我要声明的是，有些人说共产党员宣布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就是等于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可以再一次代表我们的党郑重声明：这只是拨弄是非者的谣言，这绝不合乎事实。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宣布愿意与国民党同志们一起去为中山先生的未竟的革命事业——即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经济地位平等的三民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同时，我们绝不会放

弃我们自己虔信多年，并为之牺牲奋斗多年的共产主义。其次，有人说，如果你们宣布为三民主义实现而奋斗，同时又信仰共产主义，这便不合乎三民主义的立场，因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根本不相容。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再一次郑重指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的。这种说法完全既不合乎首创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也不合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从理论上看起来，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民生等主要内容，与共产主义所主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人民达到民族独立；彻底摧毁封建压迫，使中国人民得到民主自由；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制度，使中国人民达到民生幸福这些思想恰能相容的。因此，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绝不是不能融和的，因而本党与国民党也不是不能合法并存和携手合作的。关于这一点，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不止一次地明白指示过。例如，在民生主义第二讲里中山先生公开指责有些国民党员这种意见的错误。他说：“所以一讲到社会问题，多数的青年便赞成共产党，要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去实行。到底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那般青年志士用心是什么样呢？他们的用心是很好的，他们的主张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以为政治社会问题，要正本清源，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所以他们便极力组织共产党在中国活动，我们国民党的旧同志，现在对共产党生出许多误会，以为国民党提倡三民主义，是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由此可见，中山先生公开指出国民党员中有些同志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是一种误会。为什么发生这种误会呢？中山先生在这段演讲里特别指明是：一般地是由于这般人不了解三民主义的互相结合性，特别是由于这般人不了解民生主义。因此，在解释这种原因以后，中山先生在这篇演讲里继续说：“为什么我敢说我们革命同志对于民生主义还没有明白呢？

就是由于这一次国民党改组，许多同志因为反对共产党，居然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同，在中国只要行三民主义便够了，共产主义是不能容纳的。然则民生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在前一次演讲，有一点发明，是说社会的文明发达、经济组织的改良和道德的进步，都是以什么为重心呢？就是以民生为重心，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因为民生不遂，所以社会的文明不能发达，经济组织不能改良和道德退步，以及发生种种不平的事情，像阶级战争和工人痛苦那些种种压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问题不能解决，所以社会中的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接下去发问说：“共产主义既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为什么国民党党员要去反对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或者是由于共产党员也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常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即是不能以个人的行为，便反对全体主义。那么，我们同志中何以发生这种问题呢？原因就是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殊不知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中山先生这段演讲里面，我们应当得出哪些结论来呢？结论应当是：第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能够相容并存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关系。第二，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上是不懂三民主义的人，特别是不知民生主义为何物的人，这些人应该是国民党中的极少数；同

样，认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人，实际上也是不了解共产主义的人，特别是不了解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相互关系的人，这种人也应该是共产党中的极少数。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中山先生认为这只是某一方面的个人行动，任何一方面不能因此来反对另一方面的全党及其主义。第三，中山先生认为，不仅主张共产主义的人应该了解三民主义，同时中山先生指示：主张民生主义的人，也应该细心去研究共产主义。这是一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态度，我们共产党员非常赞美中山先生这种态度。的确，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主义，不会是某一部分人或某一个党的专利品。它应当而且必然欢迎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党来研究、来实行的。我们不仅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样，我们更欢迎任何人——首先是国民党的同志们遵照中山先生的指示来悉心研究共产主义。因为我们深信：凡是愿意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而又真正研究和懂得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高理想，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全人类最美满最愉快最幸福的社会，绝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中山先生才说：“……从前人类战胜了天同兽之后，不久有金钱发生，近来又有机器创出；那些极聪明的人，把世界物质都垄断起来，图他个人的私利，要一般人都做他的奴隶，于是变成人与人争极剧烈的时代。这种斗争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解决呢？必要回复到一种新共产主义时代，才可以解决。所谓人与人争，究竟是争什么呢？就是争面包，争饭碗；到了共产主义，大家都有面包和饭吃，便不至于争，便可以免去人与人争，所以共产主义就是最高尚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1]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中山先生曾说：“至于马克思所著的书和发明的

---

[1] 参见《中山全集》第一集《民生主义》第二讲第38页。

学说，可以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所以他的学说一出来之后，便举世风从，各个学者都是信仰他，都是跟住他走。”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你可以看出，在中山先生亲手著作的三民主义理论中，绝找不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容的指示来，至于讲到中山先生对这个问题在行动中的表现，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一九二一年，自成立以后，中山先生与共产党员便有着亲切的关系，所以到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决心改组国民党时，便公开与共产党合作，而且合作的方式是非常亲密的，即不仅建立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联盟，而且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组织中去，共同担任革命的工作。当时共产党在全国不过几百个党员，成立历史不过几年，而且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去加入国民党，去共同为国民革命而奋斗，即在那种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曾向共产党员提出过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同时相信共产主义的要求呢？没有！即在那种情形下，中山先生是否提出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存在，不允许共产党同时合法存在的主张呢？没有！不仅没有，而且中山先生还坚决反对别人提这种要求和这种主张。这正是中山先生伟大远见和洞悉实情之处，因为中山先生深切懂得：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或消灭的，古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而现今的情形，比当时还更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已经有十七年奋斗的革命历史，有数十万党员，有久经战斗的坚强组织，有为主义、为党、为革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和为全人类解放而百折不屈、英勇奋斗的领导和干部，有千百万群众的信仰和拥护，哪里

能谈得到取消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党的组织呢？如果说只是因为我们宣布了我们愿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一层，就应当取消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完全是误解，因为我们对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关系的了解，的确如中山先生一样，即我们认为他们是好朋友是相容的，所以我们共产党员不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去与国民党同志一起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即在国共分家后，我们在自己单独的革命奋斗中，也还是为了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的目的，即是与三民主义根本思想相符合的目的。今天和过去国共分裂时不同的，只是过去我们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破裂后，单独地为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的三民主义事业而奋斗，今天在国共重新合作时，我们共产党员又与国民党同志们在一起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人要求共产党员放弃其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组织，这不仅不能为共产党所接受，而且直接违反着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

从中国的实际情形看来，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造成了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蓬勃发展和北伐军的伟大胜利，而国共关系破裂，便造成了十年来外患内忧空前严重的局面；现在国共两党一经合作，对外便能发动空前未有的光荣的民族自卫抗战，对内便能造成数十年来空前未有的政权军队的统一，便造成空前未有的全民族中各党派各阶层力量的大团结，使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的唯一生机和希望。两个主义和两个党同时合法并存，对于中国人民和国家是有利或有害，应该根据活的、人所共知的事实来判断，而不应该根据少数人的偏见和主观愿望为决断根据。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铁一般的事实一再证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互助合作，则国家统一，革命发展；三民主义

与共产主义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则国家分裂，革命困难。所以任何违反这种事实的意见，必然都是不能实现的——设或不幸而实现了，定造成国家民族新的灾难。

由此可见，认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能相容的意见，以及由此而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不能同时合法并存的意见，都是毫无根据而且有害国家民族解放事业的意见，这种意见既违背中山先生的理论和行动的遗教，又违反中国的实际情形，这种意见的实际危险，就是有把目前举国一致对外的良好政局，转化成视线对内、增加内部困难局面的可能。

因此，在谈话结束时，对这个问题我再重复郑重地告诉你几句话：如果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即是说国民党一党掌握政府的政权，这是已成的事实，这没有问题。我们共产党员虽然自己不参加政府，但我们对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绝对拥护，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才否认国民政府并企图推翻国民政府，今天只有执行日寇特务机关意旨而行动的托洛茨基及其门徒们，才会造谣说国民政府是克伦斯基式的临时过渡政府，因而才对国民政府采取“表面上虚与委蛇”“实际上准备打倒”的汉奸政策。我们共产党员对国民政府的拥护和帮助，是绝对真诚的，是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场出发的。同时，如果把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内容扩大到和曲解成除国民党外不允许共产党员和其他党派存在，除三民主义外不允许共产党员有自己的共产主义的信仰等等，这绝不是新的理论，而是旧的实际，这是再重新回转到十年来走不通的道路和做不到的办法。这一思想如不幸而见诸实际行动，则既有害统一又有害抗日，即是使中国已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体，因而也就是使抗战救国的事业发生危险。因此，这一思想客观上一定会被日本法西斯军阀

和汉奸所利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确难相信，这种意见能得到国民党中以国家民族根本利害为重的有识之士的同情。当然，更说不上这种意见能得到宝贵统一和彻底抗日而无党派偏见军民大众的同情了。不过，这个问题恰当着民族危机更加紧迫的关头，能公然提出，这就不能不唤起共产党员和其他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同胞们的严重警惕，这的确不只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而且有关于各党各派和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命运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全国各界同胞、各党派有远见的贤明之士，都严重注视这一问题的发展趋势，尽一切努力使各党派合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受威胁，使国家统一和抗日救国的一切事业不受危险，以达到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任务。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8年2月8日）

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以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2]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关于目前军事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杨成武，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第一支队司令员。

应派精干部队发展雾龙山区[1]

（1938年2月9日）

朱、彭，并告胡、杨、周、叶[2]：

甲、雾龙山[3]为中心之区域，有广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须作充分准备。

乙、干部除主要的由荣臻[4]及你们配备外，后方亦正在选择东北及冀热察[5]籍之干部，同时亦请北方局选派干部。

丙、荣臻此刻不能离开冀察边，但应准备至适当发展时期派高级领导人去雾龙山，此事由前后方共同考虑。

丁、徐旅[6]此时在该地域只是寻常的游击战争，可由你们直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胡，指胡服，即刘少奇。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

[3] 雾龙山，即雾灵山，位于河北省兴隆县北部。

[4] 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6] 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指导，林彪[1]同志似可不去。

戊、派队到山东须俟雾龙山行动实现后再考虑，此刻亦不宜同时向国民党提出。

毛
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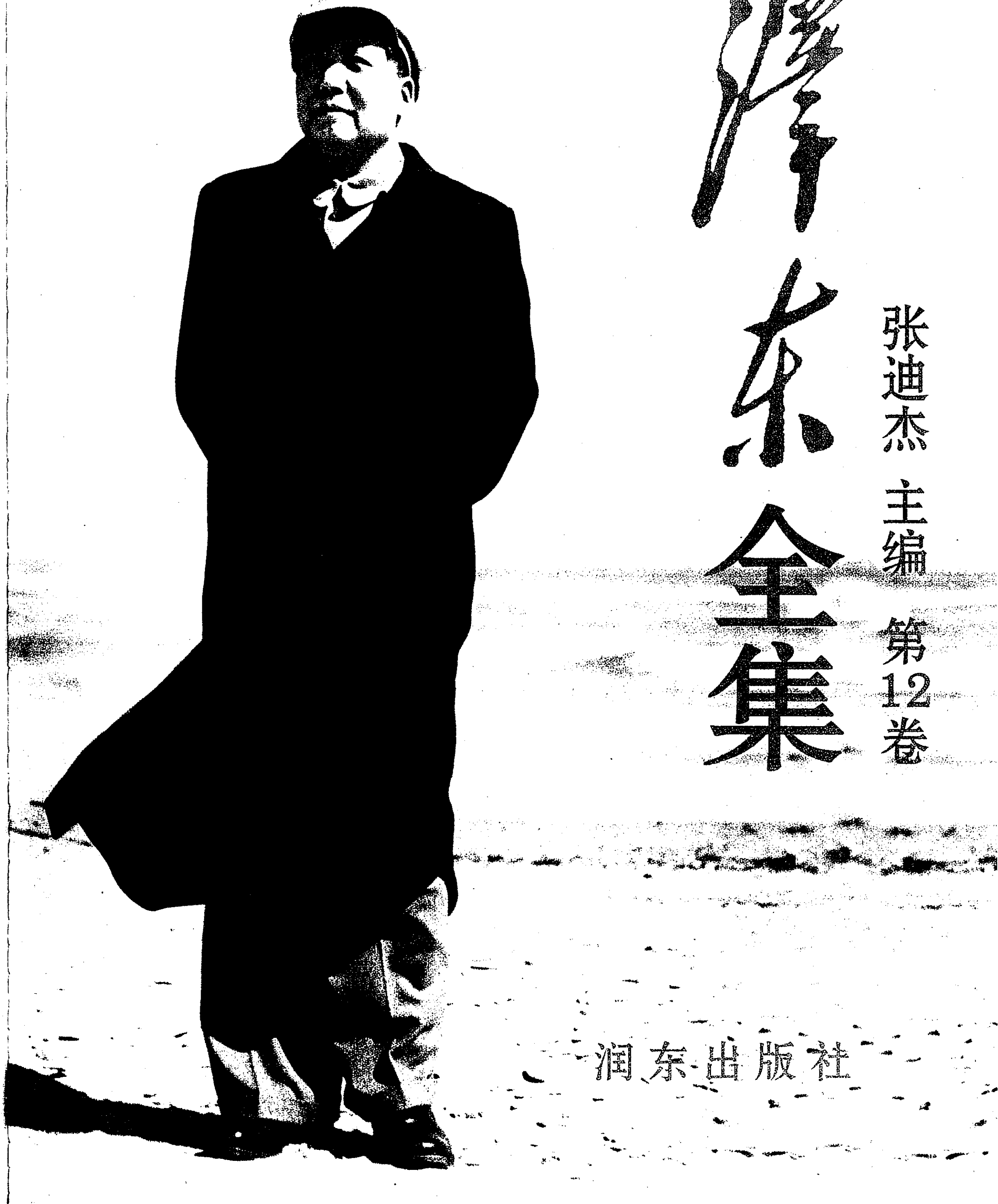
---

[1]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2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1

（1938年2月11日）

给范长江的信………………………………………………………………3

（1938年2月15日）

茅山山脉利于新四军发展……………………………………………8

（1938年2月15日）

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 ………………10

（1938年2月15日）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12

（1938年2月18日）

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 …………………………………13

（1938年2月21日）

为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题词 ……………………15

（1938年2月22日）

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 ……………………………………16

（1938年2月23日）

须尽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 …………………………………………20

（1938年2月25日）

给何长工的信 …………………………………………………………21

（1938年2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2
（1938年2月28日）
三四三旅应即改变作战计划 ……23
（1938年2月28日）
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25
（1938年2月）
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27
（1938年2月）
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 ……32
（1938年3月2日）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 ……34
（1938年3月3日）
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 ……40
（1938年3月3日）
敌情与一一五师之部署 ……41
（1938年3月3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43
（1938年3月4日）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 ……44
（1938年3月5日）
对陈光罗荣桓部行动问题的指示 ……46
（1938年3月5日）
复彭雪枫电 ……48
（1938年3月6日）
有计划地部署晋豫边的游击战争 ……49
（1938年3月6日）

一二〇师应与傅作义协力击破西进之敌 ……………………………51
（1938年3月6日）
三五八旅宜从娄烦方向打起 ……………………………………………53
（1938年3月7日）
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 ………………………………………………55
（1938年3月8日）
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 ……………………56
（1938年3月8日）
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 …………………………………………57
（1938年3月9日）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60
（1938年3月12日）
题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联 …………66
（1938年3月）
给金城的信 ………………………………………………………………67
（1938年3月13日）
刘伯承师徐海东旅主力以担任正太作战任务为宜 …………………68
（1938年3月14日）
在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69
（1938年3月15日）
对巩固吕梁山脉问题的指示 ……………………………………………70
（1938年3月16日）
与国民党谈华北军事时注意分两个阶段 ……………………………72
（1938年3月17日）
刘伯承师目前留东边活动有利 …………………………………………74
（1938年3月18日）

为华侨记者团题词 ……………………………………………………75
（1938年3月18日）
为《南国日报》题词 …………………………………………………76
（1938年3月18日）
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77
（1938年3月19日）
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 …………………………78
（1938年3月20日）
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的讲话 ……………………………………83
（1938年3月20日、21日）
贺龙师主力须逐渐南下以代林彪师陈光旅 ………………………84
（1938年3月21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 …………………………………………………85
（1938年3月22日）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 ……………………………………86
（1938年3月23日）
为梁毅题词 …………………………………………………………87
（1938年3月23日）
和邓静溪的谈话 ……………………………………………………89
（1938年3月24日）
以最快速度创造巩固的冀晋豫根据地 ……………………………90
（1938年3月24日）
晋东南作战的主要任务 ……………………………………………92
（1938年3月24日）
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 …………………………93
（1938年3月24日）

冀鲁豫急需建立军政统一领导 ……………………………………95
（1938年3月25日）
致贺龙、萧克、关向应电 …………………………………………97
（1938年3月29日）
刘伯承师徐海东旅宜位于同蒲路东侧 ……………………………98
（1938年3月29日）
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第二十队学员的讲话 ………………………99
（1938年3月29日）
对抗大干部的讲话……………………………………………100
（1938年3月30日）
在《援助陕北》一书上的题词…………………………………101
（1938年3月）
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102
（1938年4月1日）
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07
（1938年4月2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08
（1938年4月5日）
国共两党合作问题………………………………………………109
（1938年4月5日）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 …………………………………………117
（1938年4月9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22
（1938年4月10日）
在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23
（1938年4月11日）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题词……124
（1938年4月15日）
致贺龙、萧克、关向应电……125
（1938年4月18日）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26
（1938年4月18日）
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128
（1938年4月20日）
结团体，打日本……131
（1938年4月20日）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34
（1938年4月21日）
复项英电……137
（1938年4月24日）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38
（1938年4月28日）
为“五一”节纪念题词……144
（1938年4月30日）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45
（1938年4月30日）
和白求恩的谈话……146
（1938年4月）
为“鲁小”第一届毕业生题词……147
（1938年4月）
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教师》杂志题词……148
（1938年4月）

为抗战文艺工作团写的介绍信……………………………………150
（1938年4月）
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讲话…………………………151
（1938年5月3日）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152
（1938年5月4日）
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57
（1938年5月4日）
和卡尔逊的谈话……………………………………………………160
（1938年5月5日）
给长江局的指示……………………………………………………161
（1938年5月6日）
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讲话……………………162
（1938年5月8日）
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163
（1938年5月10日）
答施方白问…………………………………………………………164
（1938年5月11日）
复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66
（1938年5月12日）
为施方白题词………………………………………………………167
（1938年5月12日）
给郭化若的信………………………………………………………169
（1938年5月12日）
《大公报》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是不对的……………………………170
（1938年5月13日）

致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总部北方局等电……171
（1938年5月14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72
（1938年5月14日）
进攻是主要的，也是有条件的……173
（1938年5月14日）
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174
（1938年5月14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175
（1938年5月15日）
关于接待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电报……178
（1938年5月19日）
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179
（1938年5月20日）
在抗大对第三期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80
（1938年5月21日）
为抗大第四期开学题词……181
（1938年5月21日）
电贺各警备兵团“五三十”抗运大会……185
（1938年5月22日）
给毛宇居的信……186
（1938年5月26日）
在华北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88
（1938年5月26日）
抗日战争没有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190
（1938年5月28日）

给刘雪苇的信……………………………………………………191
（1938年5月28日）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2
（1938年5月）
挽王铭章将军联……………………………………………226
（1938年5月）
为《五日时事》报题写报头…………………………………227
（1938年5月）
论持久战……………………………………………………229
（1938年5月）
为《论持久战》题写书名……………………………………316
（1938年5月）
新四军可放手在敌后活动……………………………………318
（1938年6月2日）
紧急声明……………………………………………………320
（1938年6月3日）
同意郭洪涛关于山东四支队恢复用八路军番号的建议……………321
（1938年6月6日）
在邱琮来信上的批示…………………………………………322
（1938年6月6日）
致邓小平电 …………………………………………………323
（1938年6月7日）
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324
（1938年6月8日）
复美共产党全代大会等………………………………………325
（1938年6月8日）

复周恩来等电……326

（1938年6月9日）

拟创造大青山根据地……327

（1938年6月11日）

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等电……328

（1938年6月12日）

和诸述初的谈话……329

（1938年6月14日）

复林伯渠电……330

（1938年6月15日）

致第一二〇师负责人等电……331

（1938年6月15日）

给吴亮平的信……332

（1938年6月15日）

在华北西北放手发展游击战争……333

（1938年6月15日）

为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七周年题词……335

（1938年6月30日）

为《边区儿童》创刊题词……336

（1938年6月）

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338

（1938年6月）

陕甘宁边区政府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致全国各界人士公函*……340

（1938年6月）

为影片《西北线上》题名……342

（1938年6月）

为香港青年摄影团题词……………………………………343
（1938年6月）
为《解放》周刊纪念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七周年专刊题词…346
（1938年7月1日）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上的欢迎词…348
（1938年7月1日）
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349
（1938年7月2日）
在抗大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上的欢迎词…………………357
（1938年7月3日）
在敌后比较空虚地区发动游击战争……………………………360
（1938年7月3日）
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361
（1938年7月5日）
致国民参政会的贺电…………………………………………366
（1938年7月5日）
关于巩固山西统战工作问题致杨尚昆等电……………………367
（1938年7月5日）
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给蒋委员长及全国抗战将士电* …………368
（1938年7月6日）
为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的题词……………………………369
（1938年7月7日）
冀东敌情及对该地区工作的要求………………………………370
（1938年7月8日）
致西安等处中共负责人电……………………………………372
（1938年7月8日）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 ……373
（1938年7月9日）
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的讲话……374
（1938年7月16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375
（1938年7月17日）
致国际和平大会电……376
（1938年7月18日）
对苏鲁豫皖边区的工作的指示……377
（1938年7月22日）
复周恩来电……378
（1938年7月26日）
和毛华初的谈话……379
（1938年7月）
给李正清题词……380
（1938年夏）
为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题词……382
（1938年8月1日）
在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的讲话……384
（1938年8月1日）
在抗大第四期毕业证书上题词……385
（1938年8月1日）
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388
（1938年8月2日）
复朱德、彭德怀电……389
（1938年8月3日）

抗大同学毕业出去后怎样工作……………………………390
（1938年8月5日）
致陈绍禹、凯丰电……………………………………391
（1938年8月6日）
我们在抗战过程中的总方针……………………………392
（1938年8月6日）
关于目前冀南工作的意见………………………………393
（1938年8月8日）
致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电……………………394
（1938年8月10日）
复贺龙、关向应电……………………………………395
（1938年8月12日）
八路军第四纵队的工作方针……………………………396
（1938年8月13日）
复林伯渠电……………………………………………397
（1938年8月16日）
边区的货币政策………………………………………398
（1938年8月17日）
和鹿钟麟谈判时应坚持的原则…………………………400
（1938年8月18日）
对河北工作的指示……………………………………401
（1938年8月20日）
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402
（1938年8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403
（1938年8月22日）

对山西新旧势力的冲突问题的指示……………………………404

（1938年8月22日）

致彭德怀等电……………………………………………………405

（1938年8月24日）

对晋冀豫党和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406

（1938年8月24日）

为欧阳平题词……………………………………………………407

（1938年8月）

为韦统泰题词……………………………………………………408

（1938年8月）

为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题词……………………………………410

（1938年9月5日）

致郭洪涛电………………………………………………………411

（1938年9月7日）

对张荫梧有计划的获取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对策………………413

（1938年9月7日）

给孔祥熙的信……………………………………………………414

（1938年9月10日）

冀东形势和使冀东游击队迅速正规化…………………………415

（1938年9月10日）

程子华率队进击柳林西北地区…………………………………416

（1938年9月11日）

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突击》杂志题名………………418

（1938年9月17日）

给前线将士的慰问信……………………………………………420

（1938年9月18日）

克服困难创建冀热察根据地……………………………………421
（1938年9月26日）
给蒋介石的信…………………………………………………………423
（1938年9月29日）
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的谈话……………………………………425
（1938年9月）
关于诗歌的指示……………………………………………………426
（1938年9月）
为吴伯萧题词…………………………………………………………427
（1938年9月）
在冀热边区创造根据地具有战略意义……………………………428
（1938年10月2日）
各方动员战胜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431
（1938年10月2日）
论新阶段………………………………………………………………434
（1938年10月）

在延安反侵略大会上的演说

（1938年2月11日）

同志们：

今天举行的反侵略大会，从它的意义来说，不仅是延安的，而且是全国性的，全国各地在这几天均举行同样的大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反对侵略战争。这个大会又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在明天，伦敦将举行全世界的反侵略大会，几十国代表都参加，表示一个空前伟大的世界斗争的开始。现在，世界的侵略者结成一种侵略阵线，破坏世界的和平，反侵略者则团结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保卫世界的和平，反对侵略战争，这样两个相反方向的阵线在全世界斗争着。过去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世界运动，还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动员全世界地区的大运动，现在是全世界大多数好人向着世界上少数坏人算总账的时候。

因为中国今天是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全中国人有了一个空前伟大的团结，这也是过去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我们的全国大团结，现在已经有了基础，正在向着前途扩大。尽管暂时打了一些败仗，失了一些土地，但这样伟大的团结，是力量无比的，加上世界与日本人民的援助，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现在有三个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还有一个是日本的统一战线，在日本有广大人民群众不赞成他们政府侵略中国，正

在组织反侵略的统一战线。这三个统一战线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有人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反侵略运动都失败了，今天的反侵略运动也会失败。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主要因为今天不但有了全国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而且这个统一战线恰好和历史上空前的全世界反侵略统一战线相遇合；不但能和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而且恰好又和历史上空前的日本内部矛盾相遇合，即同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相遇合。这些历史特点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恰巧都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国的打败仗是暂时的，中国的抗战一定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其根据就在这里。这三种统一战线，正如日初升，向着日益巩固日益扩大的方向走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

因此，今天延安城的大会，有它的全国性及世界性的意义。全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男女，不分老幼，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厌恶战争的人，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日本国内的广大人民，也统统向着同一的目标而团结起来。这个目标就是反侵略，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的总方向。这样的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和全日本人民的大团结，其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伟大的力量是无疑要把侵略者的力量逐渐削弱下去，最后把它打倒。因此我们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努力，中国一定能够战胜侵略者，新中国的创立是必然的。

给范长江[1]的信

（1938年2月15日）

长江先生：

马先生来，获读手书，张同志回延，又接一月三日大示，久稽回答，幸原谅之。

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实心承认了它又实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我们已在开始作，并望新闻界及全国各界大家都作。诚如先生所感，这是重要问题，但一面也需要国民党同志们欢迎这种帮助，至少不拒绝。我们已提出互相帮助的口号，如果有了一个共同纲领，事情就好办了。军队问题，先生所虑为两党互信障碍者，实由于没有一个包括从抗战到建国的纲领之故。有了的话，这种顾虑，在任何一党方面就都不会有了，因为在过去十年的

---

[1] 范长江（1909—1970），四川内江人。1937年2月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到西安和延安采访，毛泽东曾在延安会见过他。

教训之下，任何一党要背叛纲领而重起内战，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要打也打不起来。否则不但两党之间可为互信障碍，一党内部，何莫不然，过去十年国民党同一主义同一政党内部的无数战争，不是明显的证据吗？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1]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只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以历史论，十年前的分裂，主动者属谁，被动者属谁，以及因何而破裂，已是人人皆知历史铁铸之事实。彼时谁撕毁那个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因而掀起内战，先生当能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十年前并没有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以此推知即使今天把八路军解散，甚至把共产党解散，谁能担保中国境内不再出一个八路军，不再造一个共产党？要知这些东西不是凭空发生的，并非真如某些人们的见解是若干共产党领导分子从心所欲造出来的，或真是所谓“不合国情”的，而实实在在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至于先生的第二个问题——一方面当局感觉不安，一方面人民要求改革，我以为也即是上面同一性质的问题，症结同在国民党承认并实行一个共同纲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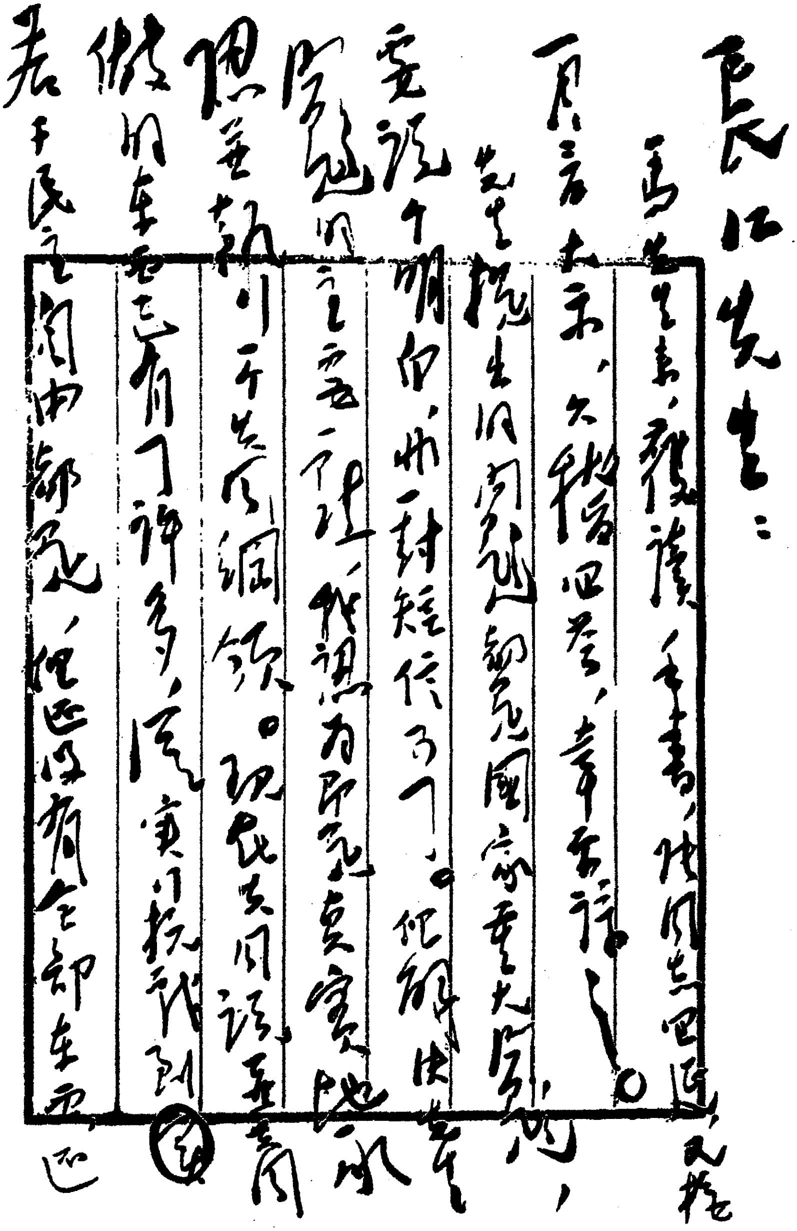
要达此目的，无疑需要各方面努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应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

---

[1] 指毛泽东1937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斗。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无已。远承下问，略述鄙见，尚希进而教之。手此奉复。敬致民族解放之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長江先生：

寫的東西，讀了，手書，[illegible]

[illegible]，久稽回答，幸希諒之。

先生[illegible]的問題，都是國家重大問題，

要說個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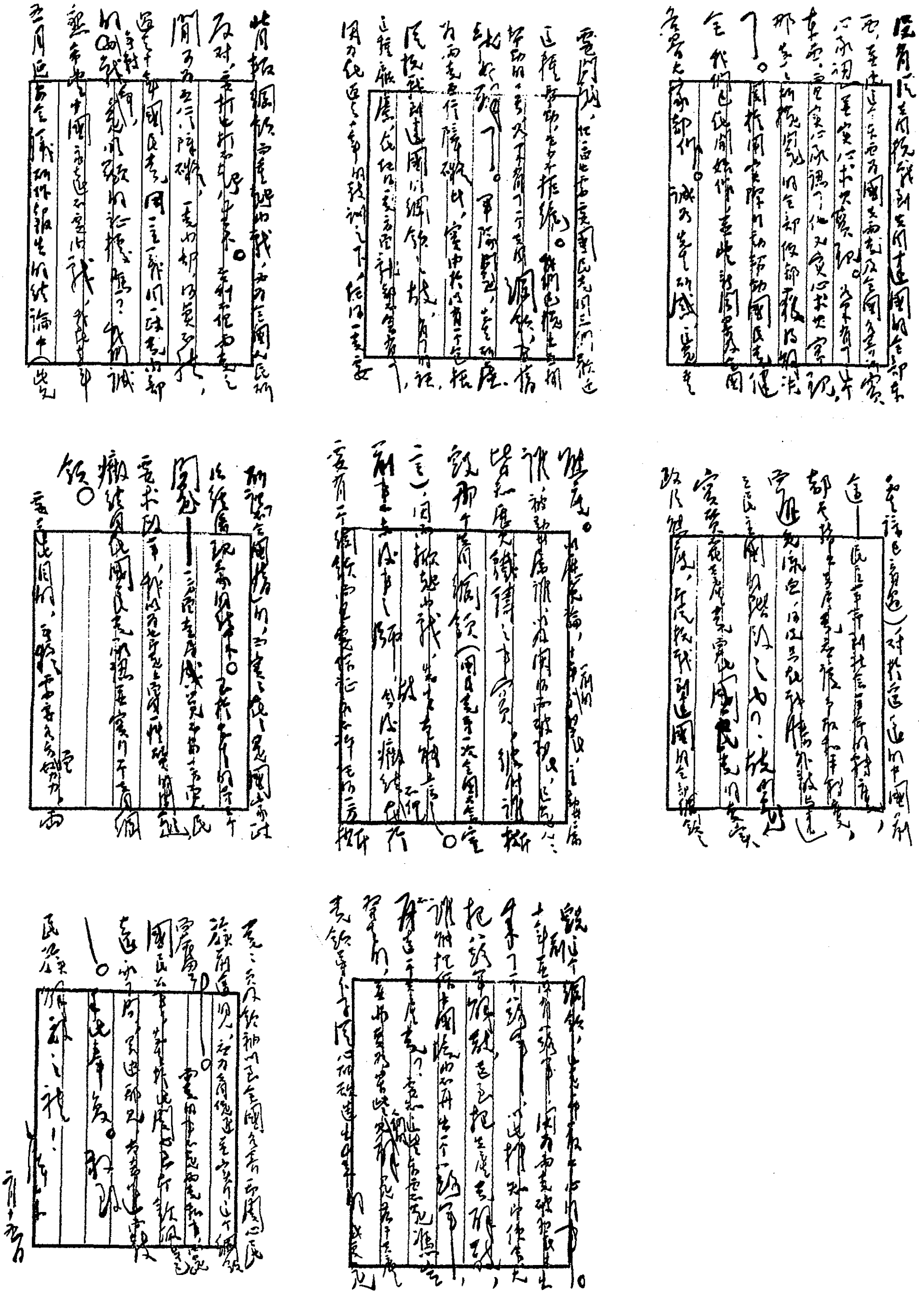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若干[illegible]全部東西[illegible]

毛泽东致范长江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范长江信的手稿。

茅山山脉利于新四军发展[1]

（1938年2月15日）

项、陈：

迭电均悉。

甲、同意十四日电[2]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项英、副书记陈毅的电报。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不含海南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2月，新四军军部成立。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于1938年2月开始向皖南歙县岩寺集中，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2] 指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该电提出，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结岩寺，现首先以第一支队出动，第二支队暂留闽赣，第三支队则在第一支队实际到达之后再行动。叶挺偕陈毅今晨去绩溪会晤顾祝同，要求新四军不住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不能取得所希望要求，则一面到岩寺，一面即出发前进，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城之线以西策应。

乙、干部候抗大[1]三期毕业派一批给四军，目前实在调不出，并望你们多少送一点人来学习。

毛泽东
十五日

---

[1]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抗大共举办八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宣告结束。

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1]

（1938年2月15日）

朱、彭、林、左[2]，并告周、叶[3]：

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4]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你们考虑下述问题并电复。

甲、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5]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6]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7]间活动一时期为第一步。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左，指左权，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指挥部参谋长。

[3] 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剑英。

[4]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6] 陈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

[7] 彰德，旧府名，即今河南省安阳市。

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

乙、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过河，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1]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

丙、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

丁、如第一步实行后，河南、武汉危急，则或不去山东，将第三步改为第二步，或以徐旅出山东，而以陈旅出安徽，此时当另以一二九师主力出豫西策应作战。这时当依情况再定。

戊、但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

己、这一战略行动在国内国际之政治作用很明显不必说，从抗日军事战略说来，也是必要与有利的。问题是比较带冒险性，实际可能程度如何，主要是大小河流障碍能否克服问题。

庚、如经你们考虑认为可行时，则请周叶向国民党接洽出河北的各种必须事件，但切不可提出出黄河以南的问题，第二步以下完全不要提。

毛　滕

十五日

---

[1] 徐海，指江苏徐州和海州（今连云港市辖区之一）。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8年2月18日）

目前要派出军队进行各县作战。政治工作组织条例，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讨论，然后交中央批准。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听取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1]

（1938年2月21日）

甲、在设想国民党能够独力最后保卫武汉的情况下，蒋[2]是不会让我们插足于鄂豫皖的。但如果不然，蒋容许我们插足的可能就存在。

乙、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3]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如果武汉等处万一不守，这一切区域包括武汉附近在内容许我们插足的可能是存在的。

丙、因此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

丁、平汉[4]以西的内线地区虽广大，但仅有汾水渭水汉水三流域较富庶，而汾渭两流域都是敌所必争的。要使三个师都有广大发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和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展前途，在战争中起重要制敌作用，并影响全国，准备以一个师位于鄂豫皖是必要的。这种意见当然还可以继续考虑。

毛泽东
二十一日

为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题词

（1938年2月22日）

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

（1938年2月23日）

朱、彭，林、聂，贺、萧、关，刘、徐、邓，胡、杨，陈、周、博、叶[1]诸同志：

甲、敌情判断

（一）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

（二）敌取潼关，依地形，由洛阳西攻较难，由临汾南攻较易，因此，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似力求由东北两方，分数路向晋南，其总目的在驱逐晋境我军，占领临汾、风陵渡，最后夺取潼关，保障进攻武胜关之右翼。其沿道清路[2]西进之敌，似有由孟津渡河先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副师长。邓，指邓小平，1904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胡，指胡服，即刘少奇。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陈，指陈绍禹，即王明（1904—1974），安徽金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指周恩来。博，指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八路军参谋长。

[2] 道清路，指从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一段铁路。

占洛阳迫令晋境我军南退之企图。

（三）敌攻武胜关之兵力，主要当从津浦路转来。平汉、同蒲两路之敌，主要当用于夺取潼关。

乙、战略计划第一部

（一）为保卫潼关及西安而战，不是将全部兵力处于平汉以西黄河以南之内线所能胜任的，如此必至不能保卫潼关与西安，正和过去将全部兵力处于雁门关、娘子关内线不能保卫太原相同。

（二）为保卫潼关，我们认为必须将兵力分为两部：第一部，刘峙、宋哲元、商震、胡宗南、樊崧甫[1]诸军，固守郑、洛、潼线，策应该线以北诸军之作战，反对敌人渡河。第二部，黄河以北诸军，包括阎、卫[2]及八路全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好的情况下，力图在临汾以北以东两地区歼灭敌人，顿挫敌之进攻，并出有力一部于道清路北，钳制企图渡河之敌。在坏的情况下，即设想万一临汾不守，洛阳被占，我晋境诸军亦万不可过河，而应转入外线，反过来攻敌之背，截断敌之来路，并图歼敌，根本破坏敌攻潼关计划。在敌进占晋城、霍县、隰县三点时，我军即应以不少于半

---

[1] 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9月30日被免职，1938年3月9日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商震（1887—1978），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二军军长。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兼第一军军长。樊崧甫（1894—1979），浙江缙云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

[2]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数之兵力，转入三点之外翼（转入敌后），方能制敌。

（三）我们认为必须力求蒋、白[1]、阎、卫同意上述计划并鼓励各军执行，方能保卫潼关，亦即保卫了武胜关，保卫了武汉。否则潼关一失，武胜关即处危险中。

（四）假如阎、卫不愿或不能执行上述计划而溃退过河时，则这些军队不但不能参加保卫潼关，反有影响洛、潼诸军之虞。

丙、战略计划第二部

（一）为保卫武胜关及武汉而战，首先须潼关确保在我手中，其次则用正面之阵地战，配合两翼之运动战。

（二）两翼运动战，必须确定至少有二十万左右兵力，长期位于平汉以东，这与在山西配置重兵同等重要，非万不得已，不退豫鄂西，方能配合正面及西面诸军，有力地保卫武胜关及武汉，即使武汉不守，亦使敌处于我之包围中。

丁、八路军将来之行动

（一）假设在山西配合阎、卫作战有利，达到了歼灭及钳制敌军确保潼关、西安之目的，同时武胜关尚无危险，则全部继续在山西作战，并准备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华北坚强抗战堡垒，用以捍卫中原、西北及武汉。

（二）假设阎、卫能够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巩固，但武胜关、武汉危险，则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武胜关以东，配合友军作战。

（三）假设阎、卫不能执行前述计划，潼关、西安危险，但武胜关、武汉尚无危险，亦应抽出一个师转入潼、西线，配合友军作战。

（四）假设潼关、武胜关均危险，则应抽出两个师南下，一个位

---

[1] 蒋，指蒋介石。白，指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于平汉以东，一个位于平汉以西，配合友军作战。仍留一个师，活动于山西、河北，非至某种必要时期，不撤回来。

（五）边区留守部队，担负陕甘任务。

戊、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己、以上是我们意见，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任弼时
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时

须尽全力歼灭府城西进之敌[1]

（1938年2月25日）

朱，并告彭：

敬西电[2]悉，判断正确。必须使用全力歼灭府城[3]西进之敌。但请预告阎卫[4]，即使该敌冲入临汾，亦决不可动摇整个战局。该敌甚少，可用一部包围之，其余全军均应决心在敌后打不要后路之运动战，如此必能最后制敌。

毛

二十五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38年2月24日酉时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各师领导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其中对敌情的判断是：敌先头步骑约500人，黄昏时近逼府城。估计敌人企图以此威胁临汾、洪洞，动摇晋中整个战局。

[3] 府城，镇名，即今山西省安泽县县治。

[4] 阎卫，指阎锡山、卫立煌，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兼南路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给何长工的信[1]

（1938年2月25日）

长工同志：

你提的办法，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请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你为院长兼政治科长，王群为政委兼供给科长，另找一专门的卫生科长，就是你们三个人负总院责任，靠近军委留守处找一二间房子办起事来。不日起始的教导院工作会议好好地开一开，由你主持，王群辅之，我可以来讲一次话。先找富春，滕，肖，谭，莫[2]一商开会要点，即将你拟的东西先行讨论一番。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乘此次开会，彻底地把各院全部情形调查清楚。

---

[1] 何长工（1902—1987），湖南华容人。当时任八路军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滕，指滕代远。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肖，指肖劲光。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莫，指莫文骅。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8年2月28日）

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国民党的腐败与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与野蛮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即持久战。中国抗战应有战略退却，前一段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应该知道保存实力到最后便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日军的继续进攻，将使中国被割断为许多块，因此在原则上应分割指挥，以便于发展。将来战争的具体形势，是内线外线作战互相交错，日军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军。中国抗战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抗日军事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三四三旅应即改变作战计划

（1938年2月28日）

林彪[1]同志，并告朱、彭、贺[2]：

甲、敌已进入汾河下游，风陵渡[3]、潼关[4]危急，阎卫[5]已至河边，准备渡河。

乙、敌从军渡碛口两点猛击河西，准备渡河，绥德危急。

丙、你率陈旅[6]全部应即改变作战计划。

（一）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地区，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战略枢纽。

（二）派出足够工作员猛力发动石楼永和两县群众，组织游击队，巩固渡河点。

（三）向灵石汾西两县派出工作员，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准备晋东部队必要时向西转移。

---

[1]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2] 朱、彭、贺，指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3] 风陵渡，镇名，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西南、同蒲铁路线上。

[4] 潼关，位于陕西省潼关县北部，当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

[5] 阎卫，指阎锡山、卫立煌，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兼南路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 陈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

（四）主力转入隰县、午城、大宁地区，寻机作战，相机消灭该敌。

毛泽东

二十八日

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1938年2月）

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侵略，把它从中国赶出去，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全中国人民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一致奋起，各党各派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进行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并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这不仅在平时，而且在战时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在前线和日寇作浴血战斗的干部中，在后方动员工作中，都需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千成万的有力的干部，这是毫无疑义的。

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

我们边区对于抗战教育的实施，积极进行，已建立了许多培养适合于抗战需要的一般政治、军事干部的学校（如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缺如。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

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我们深知，这鲁迅艺术学院的建立是件艰巨的工作，绝非我们少数人有限的力量所能完全达到；因之，我们迫切地希望全国各界人士予以同情与援助，使其迅速成长。这也就是帮助了我国英勇的抗战更顺利地进展，以至获得最后的胜利，把日寇赶出中国！

发起人：毛泽东　周恩来　林伯渠　徐特立
成仿吾　艾思奇　周　扬

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的谈话

（1938年2月）

王公达（以下简称王）：现在有许多人对中国抗战的前途表示悲观，先生对此意见如何?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对此完全是乐观的，因为中国抗战的过程必然是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已经成了确定的方向了。在中日战争初期，一般形势是日本强、中国弱，可是今后的形势必是日本的弱点渐渐暴露出来，中国的力量则渐渐加强起来。日本现在正借钱打仗，除过去半年已经用去二十二万万元以外，今年一年的需要据说是四十万万元，必定还不止此数，这已经消耗它大量的国力。日本的国际信用降低，公债跌落，它的“速战速决”计划已经失败，试问它哪有那许多钱无限长期地打下去?就军事方面讲，日本在中国的战线已经延长到自杭州以达包头的数千里的距离，它的兵力不够分配防守之用，所以它的兵力已随深入与扩大的程度渐渐薄弱。它占领了长距离的铁路，便需要军队去防守每一个车站。日本已动员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了，如果它再要占领汉口、广州等地，至少须再动员几十万军队，那时它的情况将十分困难。因为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加上日本国内国际的其他许多大矛盾，它终必走上完全崩溃之途。

王：先生说中国的力量能够渐渐加强起来吗?

毛：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的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互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我的意见，在目前除应以二三十万精兵组成数个强有力的野战军，从运动战中给敌人前进部队以歼灭的打击之外，还应抽调八九万军队组成二三十个基干的游击兵团，每个兵团三四千人，派坚决而机动的指挥员领导，加强其政治工作，配置于从杭州到包头的敌人阵线前面，从这个长阵线的二三十个空隙中间，打到敌人后方去。如能运用得宜，结合民众，繁殖无数小游击队，必能在敌后方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千百万民众，有力地配合野战军的运动战，而使敌军疲于奔命。至于阵地战，由于我们技术不足，在目前不应看作主要方式。但我们必须建设国防工业，自制重武器与高武器，同时设法输入这些武器，以便能有力地进行防御的与攻击的阵地战，这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它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在政治方面，我们已有国内的统一，更拥有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同情和援助。但现在的成绩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强起来。所有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加强，都是必须的。只要继续努力，也一定能够加强，这就显示着前途的光明。

王：第八路军在日军数面包围之中有被日军驱逐或歼灭的危险吗？

毛：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第一个区域是平汉、平绥、正太、同蒲四铁路中间及其以东以北的地域。

这地域拥有坚决反日的一千二百万民众，都与军队密切结合着，这是一个极大的抗战的堡垒。第八路军在这里已经立稳了脚跟，虽然敌人正在加紧进攻这个区域，但要驱逐他们是不可能的，歼灭更不可能。八路军的几个大的东进支队已迫近津浦线。第二个区域是平绥以南、同蒲北段以西和黄河以东的晋西北地带。第三个区域是平汉、正太、同蒲中间的晋东南、冀西南地带。第四个区域是晋西南。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

王：先生觉得此次国共合作是具有永久性的吗？

毛：我以为是的。民国十六年国共的分裂，原是违反着共产党的志愿的。共产党一向不愿意和国民党分裂。过去十年来国共双方及全国人民都经历了艰苦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增强今后的团结。现在及将来合作的目的是共同抗日与共同建国，在这个原则之下，只要我们的友党能有和我们一样的诚意，加上全国人民的监督，这个合作必然是长久的。

王：是的，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说过，国共两党不但共同抗日，并且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要共同建国。请问这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政党将来怎能合作建立新国家呢？

毛：因为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目前则更处在亡国灭种关头，连半殖民地地位都在危险中。党派与阶级虽不同，这个共同的地位则一，就此决定了两党不但能合作抗日，并且能合作建国。但

合作是在一定纲领下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合作，是真正的合作，而不是苟合与貌合。如果离开纲领与原则，必变成苟合与貌合，这是任何有原则的政党所不许可的。有纲领有原则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间的道义之交，只有这种道义之交，交情才能长久。

王：什么是共产党主张的“民主共和国”?

毛：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共和国，便是全国所有不愿当亡国奴的人民，用无限制的普选方法选举代表组织、代议机关这样一种制度的国家。这种国家就是民权主义的国家，大体上是孙中山先生早已主张了的，中国建国的方针应该向此方向前进。

王：共产党对于目前的中央政府满意吗?还须召开临时国民大会吗?

毛：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但我们希望加以充实和扩大，并在内政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以便更加有利于抗战。我们曾经提出了临时国民大会这种主张，这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倡过的，我们认为有益于团结全国加强抗战的力量。但究用何种方法更于抗战有利，我们并无成见，只要真正有利于抗战，什么方法都可以采用的。

王：东三省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领导吗?

毛：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那里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

王：先生对于美国一般感想如何?

毛：美国民主党的赞助国际和平，罗斯福总统的谴责法西斯，

霍华德系[1]报纸的同情中国抗日，尤其是美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国抗日斗争的声援，这些都是我们所欢迎与感谢的。不过希望美国能更进一步，出面联合其他国家给暴日以实际的制裁。现在，是中美两国及其他一切反对侵略威胁的国家更进一步联合对敌的时候了。

---

[1] 指美国新闻记者、报刊出版商罗伊·威尔逊·霍华德在1925年同罗伯特·斯克里普斯一起创建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

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1]

（1938年3月2日）

朱、彭，并林，聂，贺、萧、关，刘、徐、邓[2]：

甲、敌之企图在一面攻陕北，一面攻潼关[3]。现军渡、碛口之敌两路猛攻，河防有被突破可能，绥德、延安紧急，威胁河东整个军队之归路。

乙、目前部队在晋西北必须照贺萧关已定部署，以警六团对付进攻河曲之敌，以一个旅攻击由五寨向临县进攻之敌，以一个旅星夜兼程至离石以北，攻击碛口军渡两敌之背阻碍其渡河。此三部并须猛力发动群众，巩固北段河防之一切未失渡口，保障后路。如敌突破河防攻绥德，须以一个旅渡河，配合河西部队消灭该敌，保卫延安。

---

[1] 从1938年2月下旬起，日军多次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山西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这是毛泽东就巩固河防问题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刘、徐、邓，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3] 潼关，位于陕西省潼关县北部，当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

丙、徐旅[1]必须立即西移，归还一一五师建制，协同陈旅[2]消灭当地之敌，猛力发动离石、中阳、石楼、永和、大宁、隰县、吉县及整个吕梁山脉之民众，配合友军部队，巩固中段河防一切大小渡口，保障晋东南晋西南整个国军的归路。如潼关、西安危险，在山西国军主力转移之前，准备先以一一五师之一个旅渡河南进，为保卫西安而战。

丁、一二九师应位于同蒲以东，布置侧面阵地，破坏铁路，阻滞敌向潼关进攻，并策应林贺两师作战，如潼关、西安危急，蒋[3]有另调晋境国军主力渡河，改任保卫西安之任务时，该师主力亦应准备西移，而留一部永久位于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上述方针，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望坚决执行。

毛

三月二日

---

[1] 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2] 陈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

[3] 蒋，指蒋介石。

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

（1938年3月3日）

同学们：

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阶层，但有着同一个倾向，即建立新中国的倾向。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

从前有个黄埔[2]，那里表现着一种朝气，这种朝气也就代表着一种倾向。黄埔和陕公一样，同学是从各地方来的，又分布到各地方去。那时的黄埔是要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它是那时中国进步的缩影。我们陕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个方向我们要坚持下去。谁违反这个方向，谁就是违反陕公的宗旨，我们同学们应当互相帮助，互相监督。

今天，敌人要进攻武汉、西安、长沙、南昌等地，中国将会受到免不了的困难，在这个困难面前，会有若干人动摇，这是很有可能的。同学们毕业出去，好像撒入河水里去一样，可能有若干人会

---

[1] 这是毛泽东对延安陕北公学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同学的讲话。

[2] 黄埔，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是孙中山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该校任职，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被潮水卷去，不过大多数人能够战胜潮水，朝着总的方向，达到预定的目的。走这个方向便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在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不怕牺牲一切的精神。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世界上有三个统一战线——国际的、中国的以及日本国内的——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三个统一战线互相配合起来，共同对着一个目标，我们相信一定会把情况变换，中国一定会往新的方向走。

武汉来的一个同志说："现在外面对于我们抗战有一个公式，就是'卢变[1]以来，中国一定会得到最后胜利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中间还差一段文章，这文章就是怎么样取得胜利的问题。这问题是非常要紧的，我们应该答复，应该写好这中间一段的文章。

事情是不断变化的，今天要把将来的事情统统描写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要求与空想社会主义差不多。凭空捏造的乌托邦，我们是不赞成的，科学地来看事情就不是如此。由旧中国到新中国，如何到法？具体的内容今天不能完全描写出来，但其大的方向是可以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是历史变化过程所决定了的。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可以讲下面两句话："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前途。半年来我们中国有着许多进步，抗日，国共合作，联合苏联，开始有言论自由，军队里也开始有政治工作，这是过去所没有的，是敌人侵略我们所决定的要走的路程的内容。这个路程是在什么轨道上走呢？我们回答说："是在艰难困苦的轨道上。"武汉、西安这些地方如果失守了，则大块地方在日本手里，小

---

[1] 卢变，指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

块地方在我们手里，那末这样就完结了吗？不，决不会完结的。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班牙不同，西班牙国土太小，没有多少地方可走，三十五计用完，三十六计就无可用，所以他们采用坚守马德里的战略；中国则不同，我们可以走，地方很多，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国土有十七八个法国那样大，人口也有几个法国那样多，如果大部分中国土地被日本占领了（可能有此情况），我们还是有办法，因为我们有两个致敌人于死命的区域——内线与外线，这是两个作战的区域。内线便是云、贵、川、湘，大体上就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外线便是日本所占领的大块土地的前方。我们一定要努力争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改良政治军事条件，创造新中国的军队，配合着飞机大炮，内外夹攻，这样才能把鬼子赶出全中国。要达到此目的，会有许多困难发生，如武汉失守，就会出现动摇妥协与怀疑应否继续抗战的问题，前方后方都可能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时，便须要有远大眼光的政党来判定时局的动向。

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国民党的历史。国民党历史上经过许多次的失败与成功，历史是艰难曲折的。辛亥革命失败，国民党经过改组才有大革命的新局面；北伐的结果，国共分家，利益被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获得了。我们认为国民党走继续抗战的方向可能性要大些，因为投降是没有出路的。共产党方面无此问题，始终是坚决抗战的，人民的大多数也是反对投降的。现在许多人回想起北伐时候的情形，期望国民党、共产党、人民三方面都主张抗战到底。

武汉失守——这种趋向是可能的。你们都要跑下“山”去，都有可能碰到这种情况。武汉一失守，局势一定是很坏的，主和的人一定会出来的；然而克服这种困难是十分有把握的，除了我们国内

坚持抗战外，还要加上国际有利的条件。虽然德国公开地帮助日本，承认了“满洲国”，不卖军火给中国，英国内阁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只是时局的一面；而代表世界总方向的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苏联，会来鼓励与援助中国的。苏联是一定会帮助中国的，总有一天苏联会是日本的直接对头。美国也会干。这些都使我们相信，日本一定吞不下中国的。哪一年的“天狗”把月亮吞下去了？此其一。其二，即使吞下去也是吞不久的，这个判断是建筑在对中国与国际条件的分析之上的。日本兵力不够，它自己也不能长久支持下去。由此断定，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

现在我们总的方针是保卫武汉，保卫西安，方法是准备撤退，但必须消耗敌人，争取时间。为保卫武汉、保卫西安而战，即使失败，也不要紧。我们已经指明，从内线往外打，得到胜利也是可能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敌人占领的地方是大块的，我们就可以在附近的小块地方做起“文章”来，这就是要做出最后胜利结论前的中间一段文章，像华北全部，江浙皖一部，若武汉不守，有许多地方是可以做“文章”的。

有个青年从长沙写信来说：“中国必亡。设若武汉失掉，则大块地方都完了，还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们陕北公学同学出去一定有办法，办法就是画“豆腐块”，在大路附近画“豆腐块”。在“豆腐块”边上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因为那是大路、大城市，被日本据有优势武器的兵种占领着，这就是说，“中国不是亡国，而是亡路”。日本得到了城市、大路的速决战，也就得到了乡村、小路的持久战。比方，陕北延安被占领了，我们就会在其他小块，无数乡村，无数小路打持久战。城市速决战日本可以取得胜利，乡村持久战是我们取得胜利。这次你们毕业后要分两部分去工作，一部分在后方

发展民运工作，另一部分要到“豆腐块”里去。也许有人怕去画“豆腐块”，我们举出聂荣臻[1]的例子，就会不怕了。聂荣臻在五台山创造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大队伍（不脱离生产的还不算）。我们要把这个例子告诉全国被占领或将被占领的区域的人民，使他们看到抗日的办法与出路。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

陕公是有许多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

你们要到敌人占领的一切地方去工作。山西的“田”字形态势，从几条大路来讲，敌人包围了我们；反过来，我们占据了大路附近的许多“豆腐块”，我们就包围了敌人。从国际范围看，日本虽然包围了中国，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又包围了日本。中日战争不会几天就完结的，国共两党现在力量还不大，日本力量比我们大，假使十年前统一战线不破裂，则今天的情况定不会如此的，这点也规定了中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持久性。国际条件也是如此，世界人民反侵略求解放运动的时间已经接近了。中国不是孤立的，是与世界人民求解放的斗争相联结的。世界不可分割，革命不可分割，胜利也是不可分割的，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斯大林同志说：社会主义建设在一国内可以完成，但世界资本主义存在着，包围着苏联，因此必须要有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人民斗争的

---

[1] 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成功，才能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中国的团结+世界的援助+日本国内的困难=中国的胜利。这个公式是有意义的。当然，自力更生的口号是对的，但中国不能孤立也同样要注意到。

同学们毕业后，要更努力地工作。一方面不要偷懒，这个机会主义的倾向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对急性病，那种一天就要胜利的心理也要铲除。

对今天的困难，我们要以根本的原则结合实际情况去解决问题。比如西安事变，若不和平解决而引起了内战，便是给反革命以机会。你们出去工作，就要根据这一个原则去解决问题。再比如出去组织游击队，省政府要缴游击队的枪械，那末我们的原则是不要打起来，以免给日本以可乘之机。解决得最好的例子，便是八路军。有人要共产党退出八路军，这是绝对主义，是不行的，统一战线是相对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总之，我们的原则是革命的，但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

今天的临别赠言，就是这些。你们在这里主要是学了方向、原则与作风。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我后路不被隔断的条件下主力可留晋击敌[1]

（1938年3月3日）

朱、彭同志：

彭电[2]悉。八路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之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们二人必须回来，即使留一人指挥，亦只宜留在不被隔之地点（如吕梁山脉），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因此，对总部[3]之转移及徐旅[4]与刘师[5]主力之部署，务望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并速告我们。

洛甫　泽东　弼时

三日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38年3月1日彭德怀就战略问题给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等的电报。该电同意毛泽东1938年2月23日关于阎锡山卫立煌所部及八路军全部暂留华北作战的意见，提出："我在华北愈能持久削弱敌人，对全局抗战更有利""不到最后万不得已时决不应变更此计划"。

[3] 总部，指八路军总指挥部。

[4] 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5]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敌情与一一五师之部署[1]

（1938年3月3日）

陈、罗，并告朱、彭[2]：

甲、孝义之敌未遇抵抗直赴石楼而占据之，并进至义牒镇[3]，有袭击军渡可能。王靖国[4]部退中阳方向，吉县之敌迫近圪针滩[5]，有袭击延长渡口可能。判断敌之目的，在驱逐晋军，强占渡口，封锁黄河，切断国军补给联络后路，并威胁延安。

乙、在此情况下，一一五师部署似应以师直位于永和、大宁、隰县地区发动民众，呼应各方，以一个团以吉县为中心，纵横袭击该地之敌，以另一团进到石楼地域，袭击石楼、义牒一带之敌，萧支队[6]仍在大麦郊一带。如此方能配合河西部队巩固河防，如行动适当，可使敌困处石楼、义牒、吉县、乡宁几个城镇，无粮无援，

---

[1] 这是毛泽东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电报。

[2]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3] 义牒镇，镇名，位于山西省石楼县西部。

[4]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

[5] 圪针滩，位于陕西省宜川县东部。

[6] 萧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迫使退走，我则乘其走而消灭之。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

三日二十四时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1]

（1938年3月4日）

亲爱的岸英、岸青：

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1937年年初，岸英、岸青到莫斯科学习。1938年年初，有人从莫斯科带回岸英、岸青的照片，毛泽东喜出望外。不久，有人去苏联，毛泽东便写了这封信，托人带到莫斯科。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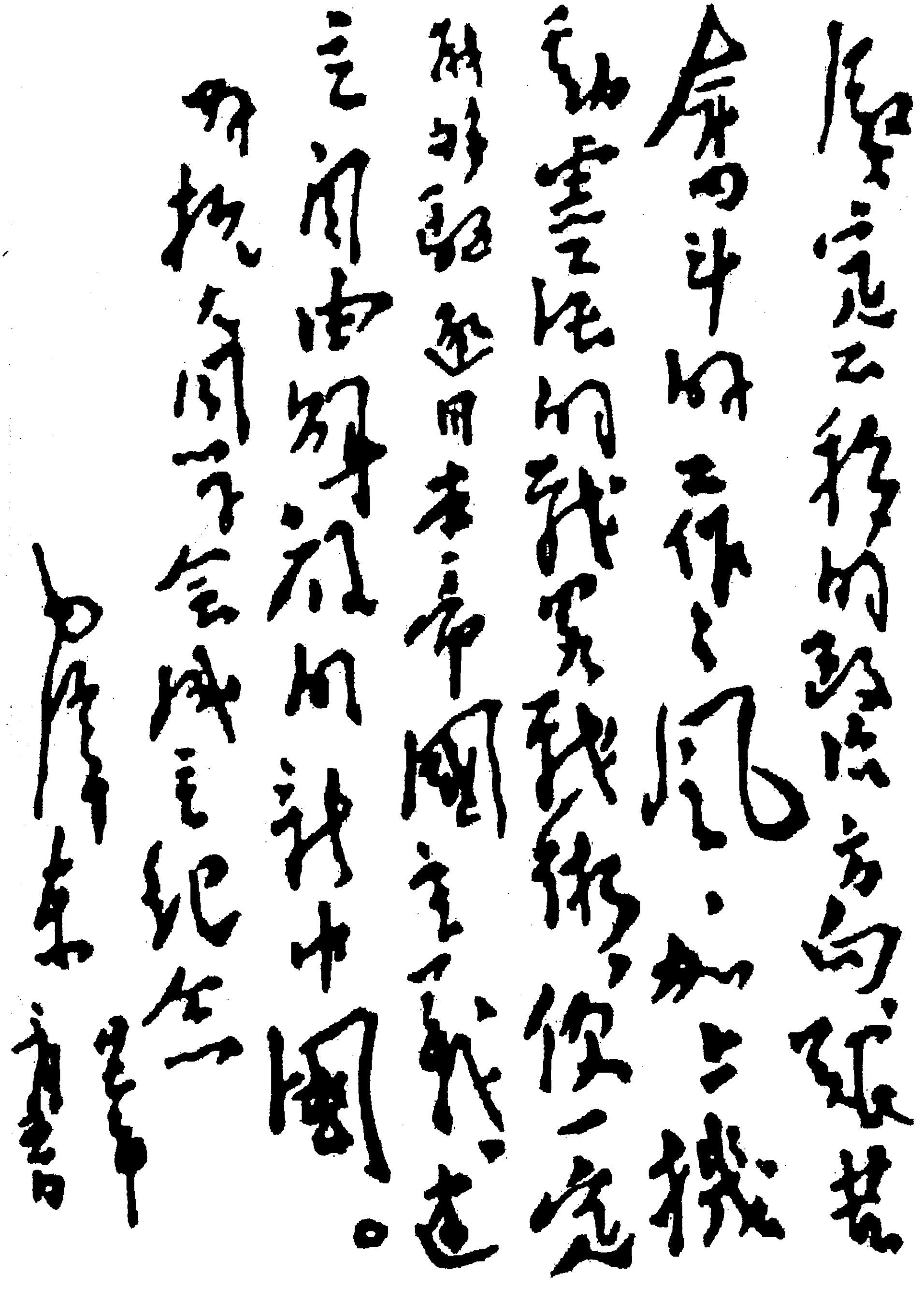
（1938年3月5日）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

毛泽东

三月五日



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加上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使一定能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獨立的新中國。

為抗大同學會成立紀念

毛澤東書

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的题词。

对陈光罗荣桓部行动问题的指示[1]

（1938年3月5日）

陈、罗，并告朱、彭，胡、杨，程子华[2]：

甲、你们行动经常的仍向朱彭请示，军委只在某些临时的特别的事项上给以指示，你们报朱彭电同时告诉军委。

乙、你们可在大宁附近休息数天，查明敌情再定行动，为确实查明敌情应派一个轻装侦察部队，带电台随敌所向紧跟不离报告消息。

丙、除大麦郊西水头、石口、川口，南至隰县城北至关上、中阳城地域以及石楼永和两个全县的地方工作归你们负责外，大宁吉县两县亦应归你们负责组织游击队，发动民众配合河西部队巩固主力我军之后路。抗大学生五十名不日送永和交你们使用。但须注意勿与友军发生冲突。

丁、程子华率地方武装数百正由岚县南下，向吴城镇区域活动，胡杨及总部后梯队正向永和、石楼区域转进。阎红彦[3]之警备

---

[1] 这是毛泽东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电报。

[2]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胡、杨，指胡服（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程子华，当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

[3] 阎红彦，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

第三团在界首、辛关、河口之线，白志文[1]之警备第五团在青水关、延水关、马斗关、平渡关之线，均望与之密取联络。

毛

三月五日二十四时

---

[1] 白志文，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团长。

复彭雪枫电[1]

（1938年3月6日）

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有计划地部署晋豫边的游击战争[1]

（1938年3月6日）

朱瑞同志，并告朱、彭，胡、杨[2]：

甲、三日电[3]悉，部署甚妥。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

乙、应令阳城李县长[4]，将布置七县游击战争及自兼晋豫边游击司令计划，派人绕道至吉县报告阎主任[5]，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枝、子弹、经费。

丙、朱彭率东路军在榆社、辽县地域，卫[6]率南路军在吕梁山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在晋豫边王屋山地区做统战工作的朱瑞等的电报。

[2]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胡、杨，指胡服（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

[3] 指1938年3月3日朱瑞给刘少奇、杨尚昆并告张闻天、毛泽东的电报。电报提出以阳城为中心在晋豫边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组织晋豫边军政委员会，（二）建立晋豫边区游击武装，（三）以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及晋城一带为游击区域等。

[4] 李县长，指李敏之，当时任山西省阳城县县长，中共党员。

[5] 阎主任，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曾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这里使用的是旧称。

[6]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南路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脉，卫本人在河津，傅作义[1]率北路军在汾阳、离石以北，阎在吉县，胡杨向大宁、隰县转进。

丁、敌一路从博爱到阳城，一路从长治、府城[2]到临汾，一路从灵石、赵城向临汾，一路从隰县、蒲城向临汾，一路从汾阳到军渡，一路从文水、交城向娄烦镇，一路从宁武、神池向五寨，一路从平鲁、清水河到保德，总共不过五万人。我八路军各部正配合友军以坚持游击战争之决心，向各路敌之侧后作战。

毛

三月六日

---

[1]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

[2] 府城，镇名，今为山西省安泽县县治。

一二〇师应与傅作义协力击破西进之敌

（1938年3月6日）

朱、彭，贺、萧、关[1]：

甲、据高双成[2]五日电称，府谷之敌已于三日被其左旅张团[3]击溃退回保德，府谷无敌等语；据陈奇涵[4]称，离石、军渡、碛口之敌因攻击渡河无效，暂停进攻，碛口之敌正向临县运动；又据贺萧关称，傅作义[5]一部正与大武镇之敌作战等语，判断该敌将主力分两路转向方山、临县，企图先击破傅作义部保障侧面安全，并配合东北两面三路敌之作战。据陈光罗荣桓白志文[6]称，隰县、大宁、午城镇之敌均向蒲县进，该三地及汾西均无敌；据贺萧关称，岢岚

---

[1]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2] 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3] 左旅张团，指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旅（旅长左世允）第五一二团，团长张杰。

[4] 陈奇涵，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

[6] 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部主任。白志文，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五团团长。

之敌共不过八百人，但文水、交城之敌已进至娄烦镇以南等语，判断该敌企图占领静乐县，求与岢岚及大武镇之敌配合行动。

乙、据上情况，敌分五路包围一二〇师及傅作义军，企图压迫我军渡河情况已明，但每路敌力均不大，我贺师[1]应与傅作义协力各个击破之。

丙、如王旅[2]协同傅军力能击破由岢岚向五寨之敌，则以现至岚县东村镇之张旅[3]转至娄烦镇，相机击破由娄烦向静乐前进之敌为有利。该地得手后，如大武镇之敌继续向方山前进，张旅第二步可协同傅作义军打方山之敌。如此可以保证静乐岢岚方山三县于我手中，使傅军不感敌之数面包围而能在晋西北坚持作战。如觉王旅或张旅单独作战不能击破敌之一路，而集中则确能击破一路，则以集中打一路为合宜。但打岢岚一路为宜或打娄烦一路为宜，须依当前情况妥为决定。

丁、既有傅军八个团在临县以南，足以威胁碛口、军渡之敌，张旅自不必再往碛口、军渡方向。目前重点在坚决击破正向静乐方山五寨三点前进之敌，必须击破此三路中之一路或二路，方能破坏敌之包围计划，巩固晋西北根据地，策应其他区域之作战。

毛泽东

六日二十四时

---

[1]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2] 王旅，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员王震。

[3] 张旅，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

三五八旅宜从娄烦方向打起

（1938年3月7日）

朱、彭[1]，并告贺、萧、关[2]：

甲、柳林、军渡之敌主力向临县进犯，留下少数三日被我阎团[3]侦察排吓跑，退离石。该侦察排恢复柳林。当该排袭击时，民众向该敌报告有八路军三四千来攻，敌即飞逃，遗弃大米罐头等物甚多。我现以一个连驻柳林。

乙、离石、碛口敌之主力均向临县、方山进攻，后路极空虚。此点如证实，我张李旅[4]似不宜进入兴县方向，而宜从娄烦[5]方向打起，得手后由此抄至方山、临县以南敌之后路，便于取胜并解傅作义[6]之围，使临县、方山不入敌手。尔后该旅即使用于太原、汾阳、离石、军渡线以北地区（目前该线是敌主要通道）。同时应派一

---

[1]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2] 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3] 阎团，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三团，团长阎红彦。

[4] 张李旅，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治委员李井泉。

[5] 娄烦，镇名，位于山西省岚县东南，1971年设置为县。

[6]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司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

个小的支队配合程子华[1]袭击汾阳、离石间道路，必生大效，并盼考虑。如果娄烦敌不急进，或径抄方山、临县敌之后路亦可考虑。

毛泽东
七日十四时

---

[1] 程子华，当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

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

（1938年3月8日）

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1]：

甲、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

乙、关于敌我位置、作战情况等，除总部[2]随时向军委报告外，各师给总部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

毛泽东

八日十六时

---

[1]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部主任。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刘、徐、邓，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总部，指八路军总指挥部。

为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1]

（1938年3月8日）

妇女在抗战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必须把妇女群众组织起来，必须有大批的妇女干部领导妇女工作。

---

[1] 1938年3月8日，在延安师范学校隆重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并宣布成立陕甘宁边区妇女联合会。这是毛泽东为大会写的题词。

八路军应准备转战陕甘豫地区

（1938年3月9日）

朱、彭[1]：

虞戌电[2]悉。

甲、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3]，包括现时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

乙、在目前阶段，不但因蒋[4]令，而且主要因战略需要（如二月二十三日电[5]所言），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6]、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

---

[1]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2] 指朱德、彭德怀1938年3月7日给中共中央暨长江局的电报。电报说：（一）战略方面。在友军未撤退黄河以南之前，应坚决而积极地在华北坚持配合友军作战，争取连续的胜利，以达到有力地保卫武汉、保卫西北和巩固统一战线的目的。（二）作战方针方面。在日军主力未转移到华北时，积极保卫华北，收复失地。如日军主力转移华北，津浦路我军应向济南、浦口，江南我军应向京（南京）沪路积极进攻。

[3] 即《关于巩固河防的部署》。

[4] 蒋，指蒋介石。

[5] 即《在日军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

[6] 潼关，位于陕西省潼关县北，当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

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1]处）工作。第一阶段之部署，要照顾第二阶段情况变化时之处置。

丙、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2]、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3]同意后，八路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如敌突破吴堡线，进攻绥德，威胁延安，应准备从一二〇师抽一个旅先行渡河击敌。如敌攻潼关，西安危急，而武胜关、武汉尚不危急，应准备抽出一一五师或至少一个旅，同时并应从阎卫军抽一部，先行渡河击敌。如何具体处置，应依当时情况而定。但不论多少部队过河，那时均应事先力求取得蒋之同意，并与友军协同。

丁、总之，在目前阶段，所有晋境军队，均应负担消灭敌人发动民众之任务。但同时应准备下一阶段情况迅速变化时之转移。如果八路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这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从战争长期性出发，必须如此，方为有利。

戊、因此，你们向阎卫报告及召集军官会议时，应说在敌后作战之战略意义及依靠民众之大有办法，但同时无论如何也不要说全

---

[1]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在晋豫边王屋山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

[2] 武胜关，位于河南省信阳县南部，当河南、湖北两省要冲，为大别山隘口之一。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部长期在华北的话。事实上，蒋虽严令，但卫之五十四师、八十三师已从吉县过宜川（武亭[1]亲见），何柱国[2]一部已从保德过府谷（见贺萧关[3]电）。他们此时过河是完全不对的，但亦可见卫立煌等执行命令之动摇。并请注意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

己、其余另告。

毛泽东

九日十时

---

[1] 武亭，当时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团长。

[2]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

[3] 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1938年3月12日）

空留正氣成仁取義
妖氛碧血丹心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出席由延安各界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并发表讲话。

今天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开这样一个庄严的纪念大会。同时，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八个月，许多英勇将士牺牲了，我们开这样一个沉痛的追悼大会。这些都不是随便的与偶然的，有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理由。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见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新纲领，已被通过于大会，那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如像刚才读过的《总理遗嘱》开头一句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间，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

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今天我们又是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较之过去是更加广大的，这个统一战线所要对付的敌人也是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的。这个统一战线所应执行的纲领，在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那个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所说的东西，但形式与内容有了某些发展，在将来一定还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的。为了实行三民主义，扩大统一战线，战胜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还一定要从革命实践中发扬艰苦奋斗、不动摇、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才能达到。所以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

现在说到追悼抗敌阵亡将士的意义。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东方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大战已经打了八个月。敌人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打，目标是灭亡中国，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呢？也是倾全国的力量来抵抗，目标是保卫祖国，战略是持久奋斗。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祺，姜玉贞，陈锦秀，李桂丹，黄梅兴，姚子香，潘占魁诸将领

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中华民族决不是一群绵羊，而是富于民族自尊心与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了民族自尊与人类正义，为了中国人一定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决不让日本法西斯不付重大代价而达到其无法无天的目的。我们的方法就是战争与牺牲，拿战争对抗战争，拿革命的正义战对抗野蛮的侵略战。这种精神，我们民族的数千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再来一次伟大的证明，郝梦麟将军等数十万人就为着这个而牺牲了。判断日本法西斯是还要前进的，它还要进攻我们的西安、郑州、武汉、南昌、福州、长沙与广州，它想吞灭全中国。但是我要告诉那些发疯的敌人，你们的目的一定达不到。不要以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就算达到了你们的目的，没有达到也不会达到。你们日本法西斯的胜利，历史判定只会是暂时的，不会是永久的，有充足的理由证明，最后胜利只会属于我们一方面。而且战争打到结局，你们也一定只能占领我们一部分地方，要占领全国是不可能的。即使你们得到了一个城市的速决战，同时也就要你们得到一个乡村的持久战，例如你们已经把山西的几条大路与若干城市占领了，但数倍于你们占领地的乡村将始终是中华民国的。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告诉全国的同胞，日本差不多在任何一省都只能作部分的占领，日本的兵力不够分配，它的野蛮政策又激怒了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有广大的军队与人民，中国又实行着统一战线的良好政策，就此决定了持久战以及最后胜利之属于哪一方。将来的形势，双方血战的结果，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半，中国只剩下完整的小半作为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中枢根据地，但在那大半地方，实际上日本仍然只能占领其中的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地，只要我们能够在每个省中组织大多数乡村中的人民一致武装起来打日本，建立许多的抗日根据地，

如像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五台山根据地一样，我们就包围了日本军。我们的这个外线的战争，配合着内线的战争，又从各方努力，把我们全国范围内的党政军民各项紧要工作办得大大进步起来，有朝一日，就可互相配合，内外夹击，打大反攻，那时还一定会配合着世界革命的援助，同日本国内人民革命的援助，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中国的？郝梦麟将军等的热血谁能说是白流的？日本强盗之被赶出中国谁能说不是必然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三大理想，谁能说不会实现于中国的？我们要使全中国人都有这种明确的认识与坚固的信念，都懂得最好的持久战方针，在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领导下，在这回大战中，齐心一致，一定要把亡国奴或亡国奴威胁的锁链摆脱掉。

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等在延安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

在这个大会上，我们要向一切在前线奋斗的将士们致敬礼，因为他们都在为着争取最后胜利作英勇的战斗。我们要向一切抗日军人的家属尤其是死难烈士的家属致敬礼，因为他们家中出了这样为国奋斗不怕牺牲的抗日军人。我们也要向一切在后方各界辛苦焦劳克己奉公以从事于抗战工作的各级工作人员与各级领袖们致敬礼，因为他们的工作都直接间接指导了或帮助了抗战。

题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联[1]

（1938年3月）

国共合作的基础如何？孙先生云：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

抗日胜利的原因安在？国人皆曰：侵略阵线是和平阵线的死对头。

---

[1] 1938年3月12日，延安召开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暨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前一天夜晚听说第二天要开大会，毛泽东亲自改写挽联稿，大约凌晨一两点钟，毛泽东又派通讯员陆续送去亲自拟的三副挽联稿，由郭化若照着抄写。这是其中一副挽联。

给金城[1]的信

（1938年3月13日）

金城同志：

广东材料[2]很好。以后多收集这些材料告我，从外来人口中应该收集各方面材料。

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

[1] 金城（1906—1991），浙江诸暨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科科长。

[2] 指金城根据从广东来延安考察的一位地质工作者介绍的国民党方面的情况整理成的材料。

刘伯承师徐海东旅主力以担任正太作战任务为宜[1]

（1938年3月14日）

朱、彭：

根据周叶[2]所述蒋之意见与河南及陇海路不久即将发生变化之判断，徐旅[3]及刘师[4]主力位于正太路[5]以南担任正太任务较为妥当，将来北转西移较为便利。若深入晋冀豫边，恐往返徒劳无裨大局。照蒋意卫立煌[6]去同蒲以东指挥对同蒲、平汉[7]及南面之作战，朱彭担任北面似尚未最后确定。在此未定之际，刘师、徐旅之部署以慎重为宜，尤其徐旅必须位置于执行现时任务又能待机转移的适当位置。

毛

三月十四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剑英。

[3] 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4]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5]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6]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南路前敌总司令、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7]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在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

（1938年3月15日）

一、尊重对象。在对付环境、处理工作时，要尊重对象，不管是敌人还是友人，都应当认真地考察和研究，而不应当忽视。

二、了解对象。工作无成就的最大原因便是不求甚解，马马虎虎，在形式上大体上望一望便要解决问题，这是错误的。了解应当是在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去了解，了解应当是多方面的，表面、里面、侧面都看到，不是片面的。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

三、继续下去，不要畏难，不要被环境被工作征服和统制，要反过来征服和统制环境。

---

[1] 毛泽东出席在中央礼堂举行的抗大第三期三大队毕业典礼并讲话。这是毛泽东关于抗大同学毕业后的工作方法问题，提出的三点意见。

对巩固吕梁山脉问题的指示

（1938年3月16日）

在敌人向晋西进攻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大部跑散，要巩固吕梁山脉在我手中，保障某些渡口，我军军事部署应考虑徐海东旅西移归还建制，朱德、彭德怀以一人西移指挥该师，好好打几个胜仗，才能解决问题。请和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卫立煌商议，否则将贻误大局。

1938年，任弼时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以求共产国际对中国情况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实际了解。图为毛泽东、周恩来和准备出发的任弼时合影。

与国民党谈华北军事时注意分两个阶段

（1938年3月17日）

周、叶，朱、彭[1]：

甲、与蒋、白、何、陈[2]等谈华北军事时，请注意分为现在与将来两个阶段，说明现在以大军留华北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在将来则情况将起下列变化：

一、敌取大举摧毁我经济基础政策，例如阜平一带已受大的烧毁。

二、加修马路，数路进攻并筑堡垒，使我之活动范围逐渐缩小。

三、占领黄河两岸各主要渡口，使我补给困难回旋不易。

上述三种情况是必然会到来的，有些已在实施。

乙、因此现在可以而且必须留大兵团于华北，在将来则只能留若干较小的兵团即若干个游击兵团于华北。各军主力须在敌未将黄河各渡口封锁以前渡过河来，否则将陷于极大困难。

---

[1] 周、叶，朱、彭，指周恩来、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剑英和朱德、彭德怀。

[2] 蒋，指蒋介石。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何，指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陈，指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部司令。

丙、在敌人后方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是十分必要的。国共两党均须用极大努力去干，对此不应有任何猜疑。但不要把此事看得很容易，不要以为数十万正规军能在华北一隅长期作战。

丁、高双成[1]一团被围于东胜，偏关之敌已渡河向神木以北进攻，临汾之敌向蒲县增加，蒲县之敌复攻大宁，马斗关在危险中。

戊、高岗[2]在河口造船，据造大船一百艘需款二万五千元（每只二百五十元），请向军政部领取。

毛泽东

十七日十四时

---

[1] 高双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2] 高岗，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

刘伯承师目前留东边活动有利[1]

（1938年3月18日）

德怀同志：

甲、十八日辰电悉，有几个字译不清楚，是否说德怀留东边，朱[2]往西边为宜？

乙、刘师[3]目前阶段决心留东边有利，但在敌攻武汉阶段，我想那时黄河下游陇海东段及运河中段必甚空虚，仍有走河北过山东入安徽之必要与可能。如有某一条活路，则即被隔断，亦不怕他。

丙、已有之老鸦关、辛关、河口、永和关一带船只，每昼夜可渡万人，现加造二十只大船，连原有每夜至少可渡两万人，均置无定河[4]内荫蔽待用。

平渡关已失，船沉水内，免被敌用。

毛　滕

十八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彭德怀的电报。

[2] 朱，指朱德。

[3]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4] 无定河，黄河中游支流，在陕西北部，由河口流经绥德、米脂两县。

为华侨记者团题词[1]

（1938年3月18日）

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毛泽东

---

[1] 1938年2月，延安军民迎来了一支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记者队伍——“南洋华侨战地记者通讯团”（简称“记者团”）。“记者团”的领队叫辜俊英，又名辜芳帜，原籍福建省永春县。1938年3月，毛泽东在革命圣地延安为他们题词。

为《南国日报》题词[1]

（1938年3月18日）

马来亚的侨胞用一切力量援助祖国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斗争。

南国日报

毛泽东

廿七年三月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东南亚华侨记者团时，给在南洋有影响力的《南国日报》的题词。

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

（1938年3月19日）

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在抗大要学到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和灵活的战略战术。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1]

（1938年3月20日）

今天我来讲些什么？我还是来讲那一封信。那封信是你们的一位同学写来的，信里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我只记住了这一点。"只记住这一点，别的忘了，这可惜得很，学了许许多多，只记住这一点。不过，能够记住这一点，也算不错，这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我们要在这里革命，就先要知道这里的情形，好像到戏台上去唱戏，不了解戏台的情形就唱不成。知道中国社会性质是半封建性的，但是不要忘了半殖民地的性质，这是最本质的东西。学了三个月，懂得这点，再学三个月，也是需要懂得这一点。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现在许许多多报刊杂志都来讨论这个问题，意见当然是各色各样都有，站在国民党立场有国民党的意见，站在共产党立场有共产党的意见，还有其他种种。

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

---

[1] 这是毛泽东对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毕业学员的演讲。

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有些人说“中国是封建的社会”，这是不对的，照他们的结论，目前革命任务只反封建，这种错误，显然用不着证明。托洛茨基分子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种说法的结论就是：“我们推翻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懂得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的社会，于是乎就忽略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任务。

三民主义里的第一个口号是民族独立，第二个口号便是民权自由。这决不是孙中山先生的胡说，或者说他是“无的放矢”，他也主张要以民权来解除封建的束缚。事实上对于民主，现在已经有着部分的实现。

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可是，有一部分人会不高兴，而且要反对，就是那些买办分子。中国社会有半封建性就要反封建，那末也免不了有些地主会反对的。

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结合的地方，就在于都是要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从这一点说，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可是现在在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还是不到时候。如果他现在主张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变成反革命者。

有人会说：“现在和国民党结合，过去为什么要同它打呢?”是的，真是可惜得很，同它打，一打打了十年。但是那时，我们要结合，他们要分家，要打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被逼上梁山。那时不是梁山是井冈山，被逼而打。

现在外面来了一个东洋鬼子，来打我们，牵涉了民族利益。当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起冲突时，民族利益就要变成首要的地位，所谓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有些人说：中国没有阶级。这样片面地

看问题，是非常不正确的。

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富人和穷人，他们是矛盾的，是对立的，但同时他们都在一起，讲起辩证法来就是矛盾的统一。男人和女人，在哲学上讲也可以说是矛盾的统一，虽然在政治上不能这么讲。一切问题都应该用这个观点去观察。马克思的国家论，有些人认为无意义，其实是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国家者，便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充分地表现着阶级冲突的情况。

现在，我们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外就是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日本陷于孤立，这也含着阶级的意义，是联合着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过去苏维埃运动，就是工人和农民联合的统一战线。

有了这种总的政治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方向，走到社会上就要动摇起来。

这个政治方向就是观察社会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方法论。比方，我们研究中国的结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条规律，是一个总的最本质的规律，所以我们要用这个规律去观察一切事物。这就是今天我所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现在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艰苦的工作作风。有一个同学写信来，他说，他到这里，别的都没有学到，只学到爬山。他也是片面地看事物，看到部分而忘掉了整体；同时，他也不知道“爬山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不是光说不做的。要做，就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爬山者，就是吃苦耐劳地锻炼之一也。艰苦的锻炼当然还有其他种种，这位同学不过是片面的看法，看到一点点。

我们反对空谈马克思的清谈主义者，只说不做，这不合于马克

思主义。我们要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做，就应该刻苦耐劳地做。

现在再来讲一个问题，就是战略与战术的问题。我说你们出去要当连长、排长，那末，你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不懂战略与战术，怎么办呢？我说，战略与战术有得学也好，没有学也不要紧，排长、连长都可以当的，而且还要你去当教师。你们林彪校长，他只在黄埔军校里读过四个月，学了的也忘记了，他现在常常打胜仗。还有贺龙，他没有进过文学校，也没有进过武学校，他用一把菜刀起家，后来搞了一个二方面军。那末你们现在学了三个月，更应该去当排长、连长与教师。战略战术这里学习一点，更要到战场上去学习。你们教人家，又要向人家学习。

有些人见了敌人就恐惧得不得了，不敢抵抗，抱着不抵抗主义，或者逃跑主义。还有一种急性病，见了现在土地一块一块失去了，就着急起来，发着疑问，怎么还不反攻啊？马上反攻啊！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他们都只在脑筋里想，没有看见实际情形，不去观察实际情形，这种唯心主义，我们要反对的。除了这以外，还有一种观点我们要反对的，就是机械主义。我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

有些人只看现在，不看将来，只看片面不看全面，只看部分不看整体，这种非辩证法的看法，是非常危险的。比方，这里一共有三个师的部队，昨日得到侦探报告，说在甘泉有敌人一个师刚开到。于是军长今天就下了判断，派第一师向左面，派另一师向右面进袭敌之背，军长就带大队人马直道前进。虽然这种布置在某种条件下是有用的，但是要注意到事情是变化的，昨日的敌情到了今天也会变化，说不定今天又增加了很多敌军，你依照原来的情况来作

判断，那就会打不赢。

一切存在是变化的，要在变化中去判断事物。

有人来这里，看见山依旧是山，没有高楼大厦，就批评这里没有建设。这又是片面的看法，只不过是一架照相机。他没有见政治的建设，政权已为群众所有；也没有见经济的建设，土地归群众，只见土地依然是土地；也没有见军事的建设，群众已经武装起来。一切问题，须要把部分与整体，特殊与一般，联系起来、统一起来，把各种事物历史地联系起来，这样才能正确解决。

同学们初进这里或陕公[1]，就有着英雄气概来学习，这是第一步。现在毕业了，要出去做工作，感到自己的不够，这是第二步。这两种都是对的，很好，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尊心，除了那些无耻的有奴隶根性者外。自尊心是推动人进步的动力，但是，光有自尊心而没有虚心，那就要变成“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天下第一主义者。所以，你们来时第一步有自尊，第二步就表示着虚心，把这两者统一起来，那末事情就会办好，自己也会进步。

---

[1] 陕公，即陕北公学，1937年8月在延安成立，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

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的讲话[1]

（1938年3月20日、21日）

调查应当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联系的、本质的。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他们的知识比我们丰富得多，实际得多。你们出去，不要先当“老师”，应该先当“学生”，了解情况，调查明白，再说话，再定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查工作对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队讲话的一部分。

贺龙师主力须逐渐南下以代林彪师陈光旅[1]

（1938年3月21日）

朱、彭：

甲、贺师[2]主力须准备逐渐南下，代替林师陈旅[3]，以便陈旅于将来能转入新的方向，目前宜即令贺师抽一个团开至汾阳、孝义以西地区，配合陈旅作战。乙、敌占郑州后，河南、武汉形势当紧速起变化，刘师[4]去信阳以东，林师去豫西配合作战，保卫武汉，当能得蒋[5]之同意。因此，此时徐旅[6]及刘师主力集结晋城长治地区作战是适当的，徐旅出河北计划应作罢论。丙、陈旅此时似无东移可能，宜确定在现地作战。诸请考虑。

毛

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3] 林师陈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师长林彪，旅长陈光。

[4]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

[5] 蒋，指蒋介石。

[6] 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8年3月22日）

在华北对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异常不够，许多地区看不见一句向敌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为在政治上瓦解敌军，教育群众，影响友军，各部队、各地党部及群众团体应用中、蒙、日三种文字大量书写对日军及伪蒙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和材料。

---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致八路军总部、各师和北方局等并转各省委、特委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的讲话[1]

（1938年3月23日）

对日本应有正确的估计，日本是一个强大、精明的帝国主义，日本民族是强悍的，武器是先进的。日军的进攻在占领西安、武汉、广州后将要告一段落，将在华北修路筑堡，使游击队不能有大部队的活动，抗日根据地可能缩小，但能支持。坚持抗战必须有广泛的民主，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将来在日军占领区的后方要建立抗日根据地。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关于华北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为梁毅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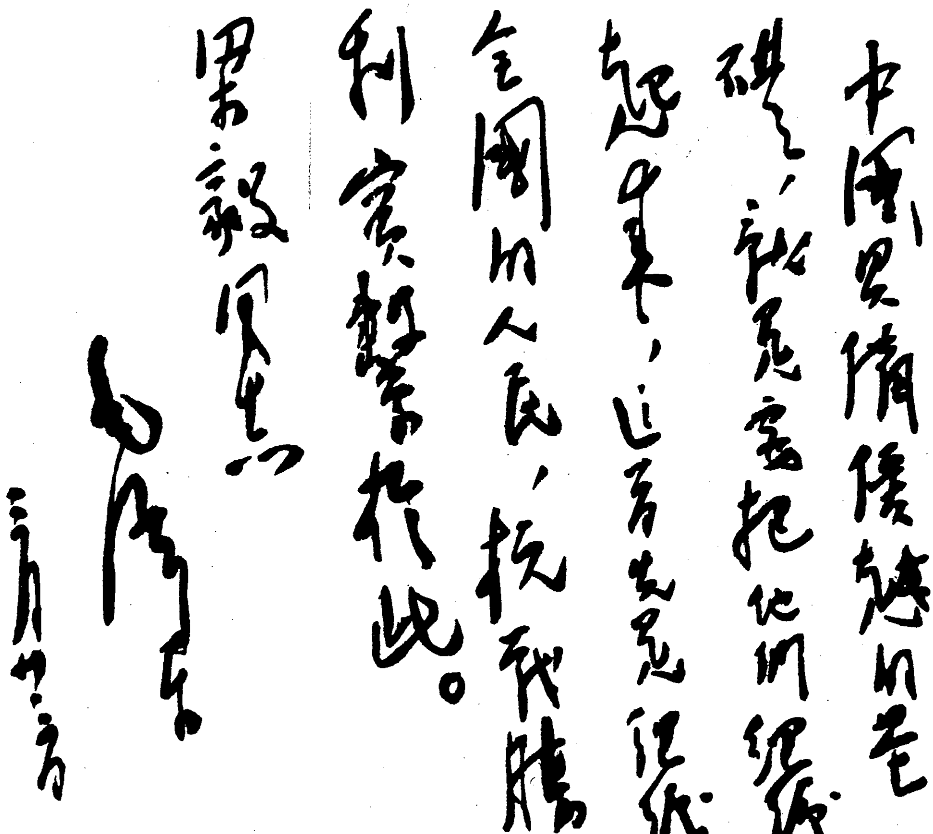
（1938年3月23日）

中国具备优越的基础，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这首先是组织全国的人民，抗战胜利实系于此。

梁毅同志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中國黨倚傍他的老幹部、新幹部，把他們組織起來，這方能組織全國的人民，抗戰勝利實繫於此。

梁毅同志

毛澤東

三月廿日

毛泽东为梁毅的题词。

和邓静溪的谈话[1]

（1938年3月24日）

每月由国民党政府拨给几十万元的经费，枪枝装备都是由日本的“义务输送队”给我们送来，现在差不多有一师人的装备都完全像日本军队了，只有臂章不同。

---

[1] 1938年3月24日晚，毛泽东会见记者邓静溪，回答了他提出的中国抗战前途、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八路军的情形等问题。邓静溪在毛泽东会见他的第二天（3月25日），写了《毛泽东先生会见记》。其中说：“晚上九点半钟的时候，记者被一位科长引进毛先生住的那间窑洞似的屋子”。“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他谈起话来，老是那样的不慌不忙，沉着持重，随时带着征询对方意见的语调。用语很通俗，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谈话结束，“他持着洋烛送我出门”。这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问题和邓静溪谈话的一部分。

以最快速度创造巩固的冀晋豫根据地[1]

（1938年3月24日）

朱瑞同志，并致朱、彭，尚昆，刘、徐、邓，唐天际[2]：

摆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因此你处党与八路军的任务是：

（一）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如荣臻[3]同志的游击支队）及地方游击队。

（二）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并使他们担任侦察、警戒、放哨、坚壁清野等。

（三）争取改造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日军。

（四）逐渐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广泛人民阶层的抗日民主政权，但同时是国民党政权。各级动员委员会吸收真正人民团体及武装部队代表参加，使之成为实际的各级政府委员会，逐渐洗刷机关中的腐败分子，尤其是汉奸动摇分子。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等的电报。

[2]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刘、徐、邓，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唐天际，当时任八路军晋豫边支队司令员。

[3] 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五）逐渐求得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采取必要过渡办法，以准备将来召集冀晋豫边区政府代表大会，成立边区临时政府。

（六）在统一战线方针下坚决执行动员武装群众及肃清汉奸的政策。

（七）设法召集全边区或若干县联合的群众团体的代表会议，以动员群众参战及建立真正有广大群众的团体。在抗日的大前提下，依照阎[1]之法令解除人民一些痛苦，满足人民一些迫切要求。

（八）大大发展党，建立与健全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办一两个较大的学校训练政治军事群众团体及政府的干部，党办训练班。

（九）你准备留在冀晋豫边区负总责，如聂荣臻同志在冀察晋。

洛甫　毛泽东　胡服

二十四日

---

[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晋东南作战的主要任务[1]

（1938年3月24日）

朱、彭：

甲、目前晋东南作战主要任务，似在用打击削弱与断绝后路等方法钳制进至修武、博爱并企图南犯洛阳之敌，其次则在打击进至长治之敌。

乙、因此刘师徐旅[2]两部似宜分开作战，以徐旅（或刘师）从东阳关[3]南下直抵道清路[4]侧，破坏该路并打击该路之敌，以刘师（或徐旅）位于长治附近打击该地之敌。

毛

二十四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3] 东阳关，镇名，即壶口故关，位于山西省黎城县东南。

[4] 道清路，指河南省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1]

（1938年3月24日）

朱、彭，朱瑞，刘、徐、邓，贺、萧、关，陈、罗[2]并各省委，子华，尚昆[3]：

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八路军主力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有转移地区作战的必要。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地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下列游击兵团：

一、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在偏关、河曲、保德、五寨及其以北地区组织一个支队，在雁门关以南崞县、忻县[4]、宁武地区一个支队，在阳曲、交城、文水地区一个支队，在方山、临县、离

---

[1] 这是毛泽东和胡服（刘少奇）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在晋豫边王屋山地区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刘、徐、邓，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贺、萧、关，指贺龙、萧克、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部主任。

[3] 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

[4] 崞县，即今山西省原平县。忻县，即今山西省忻州市。

石地区一个支队，统由贺萧关会同晋西北省委及子华负责。

二、在晋西南中阳、石楼、永和地区组织一个支队，在临汾、孝义、汾西、灵石、赵城、隰县、洪洞地区一个支队，在乡宁、吉县、大宁地区一个支队，统由陈罗、尚昆及省委负责。

三、在晋东南太谷、榆次、平定地区组织一个支队，元氏、赞皇、内丘以西地区一个支队，磁县、武安、涉县地区一个支队，晋城、陵川、修武地区一个支队，阳城、济源、垣曲地区一个支队，沁源、安泽地区一个支队，翼城、沁水、绛县地区一个支队，统由刘徐邓、朱瑞及省委负责。

四、在平汉路[1]以东组织若干支队，由刘徐邓转告陈宋[2]及当地党部负责。

五、各师迅即开办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至少一百个学生，由部队及地方游击队中调集。

六、上述各支队至少各有一千左右，各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之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

七、如上述各地区为友军驻地，八路军暂时不便派队前去时，即暂在其他地区编成，在将来情况允许与必要时，再到指定地区活动。

八、各支队之军事政治干部均须配备妥当，并于编成后以八路军游击支队名义活动，树立威信。

毛泽东　胡服

二十四日

---

[1]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2] 陈，指陈再道，当时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宋，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3月中旬陈宋率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挺进冀南，威胁津浦铁路之敌，策应友军作战。

冀鲁豫急需建立军政统一领导[1]

（1938年3月25日）

朱、彭，朱瑞，刘、徐、邓[2]：

一、铁路以东冀鲁豫地区工作十分重要，我们所得该处情况甚少。陈宋[3]活动情形如何，望经常详细电告。

二、由朱瑞同志负责组织冀鲁豫边区省委，管辖平汉路东、沧石路[4]南、黄河以北及鲁西、鲁北地区工作。

三、鲁北特委有少数游击队。鲁西特委负责人邢金声[5]与专员范筑先[6]合作，有武装数千。直南专员丁树本[7]坚决抗日，有武装三

---

[1] 这是毛泽东和胡服（刘少奇）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在晋豫边王屋山地区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刘、徐、邓，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3] 陈，指陈再道，当时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宋，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3月中旬陈宋率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挺进冀南。

[4] 沧石路，指沧县至石家庄的铁路。

[5] 邢金声，是张霖之的化名，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地区代表。

[6] 范筑先，曾任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1938年11月，在日军攻陷聊城时，壮烈殉国。

[7] 丁树本，当时任河北濮阳（今属河南省）专区专员（又称直南专员），1937年至1939年是以濮阳为中心冀豫边数县地区的地方实力派。

千余，亦急欲与我们合作，要求派干部。丁范两专员均派代表到汉[1]，已受到中央奖励。我们武装除四支队[2]，又扩大濮阳八大队[3]，人枪四百。请转陈宋设法与上述武装联络。

四、该地区目前急需建立军事政治的统一指挥与领导，除建立武装外，并应设法建立与改造地方政权，组织民众，但武装以精干为原则。

毛泽东　胡服
二十五日

---

[1] 汉，指武汉。当时为国民党政府所在地。

[2] 四支队，指河北民军第四支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地方组织在河北濮阳（今属河南省）一带组建的抗日武装。

[3] 濮阳八大队，指河北省濮阳（今属河南省）专区民军第八大队，是中共濮（阳）内（黄）滑（县）中心县委组建和领导的抗日武装。

致贺龙、萧克、关向应电[1]

（1938年3月29日）

能否沿大青山脉创造一个游牧性质的骑兵支队？

---

[1] 这是毛泽东和滕代远致贺龙、萧克、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刘伯承师徐海东旅宜位于同蒲路东侧[1]

（1938年3月29日）

朱、彭：

依此时敌我情况，河南、安徽、潼关[2]、西安乃至武汉有很快发生严重变化的可能，同时敌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之计划。因此，刘师徐旅[3]两部宜位于同蒲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民众，袭击同蒲路，配合林贺两师[4]，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

毛

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潼关，在陕西省潼关县北，当陕西、山西、河南三省要冲。

[3] 刘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徐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4] 林贺两师，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师长分别为林彪（此时由陈光代）和贺龙。

对陕北公学第十一至第二十队学员的讲话[1]

（1938年3月29日）

有了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进步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敌人占去，即使抵抗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地方可以做文章吗？小块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会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抗战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

[1] 这是毛泽东第五次到陕北公学，对第十一至第二十队学员讲话的一部分。

对抗大干部的讲话[1]

（1938年3月30日）

没有共产党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没有干部也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抗大四个月办一期，每期三千人，加上陕北公学和党校，每年训练三万人。以后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处置小的问题。即使是当排长的也应该有个全局的图画，这样才有大的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对抗大干部讲话的主要内容。

在《援助陕北》一书上的题词

（1938年3月）

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

（1938年4月1日）

同志们：

今天开学。你们开过几次学了，很多人毕业了。你们从全国各地，从战区，从后方，从南洋群岛，从几千里、几万里的地方来了。今天举行第二期的开学典礼。我想，中国共产党对于今天的开学是很高兴的，因此，我很光荣地代表中国共产党欢迎各位同志。

像那天我说过的，你们不为升官发财，而且准备着或正在准备着牺牲生命参加抗战。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我想是由于你们对共产党的信仰，如果不是中共中央在这里，你们不会来的。比方，你们到了延安，为什么不出北门一直往北走，那里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啊，你们没有去，留在这里了；或者，你们都知道西安，那里交通方便，也不会住窑洞、吃小米饭，你们也没有留在那里，不怕吃苦，走了八九百里的路跑到这里来了。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

那末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呢？日本帝国主义不喜欢中国共产党，还有很多人也不喜欢。以前，外面有很多画，画着共产党，头发向上长着，牙齿很长，很尖，画得像鬼，还画着共产党杀人放火，不但共产，而且共妻。但是，你们不是把

共产党看成那样的。有位同志告诉我说，在外面想着共产党一定很丑，但是，来到这里一看，共产党并不丑，而且相当漂亮。我看，也相当漂亮，不过，还有一些缺点。所以只能说相当漂亮。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信仰共产党，跑到这里来。

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我想是因为他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就是：

第一，他有一个方向，政治的方向。这一个方向，全国人民都以为是好的，那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这个政治方向是代表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的。共产党，从他生下来的那天起，就决定了这个方向。对外，因为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就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对于国内，有些东西都老了，都腐朽了，必须打倒，建立民主政治。这是中共十七年来提出的总方向，全国人民都赞成的总方向。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大家想想，民主政治建立以后，我们毕业了，还升不升学呢？要升的。有没有学校好升呢？有的，就是社会主义大学。它可以给人民最大的幸福。你不能够走完民主的路就不往前走了，要走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路。可是，你要到社会主义去，就必须先走现在的路，按照现在的方向走。

为什么全国人民特别喜欢共产党呢？因为他不但有了政治方向，而且坚持了这个方向。

有人说，共产党常常有变化，比方，陕北公学几个月变了很多次。他们说，他们办学校不知道有多少了，却从来没有变过，总是一个样，甚至教材还是民国元年的。我们说，我们是变的。十七年来中国共产党变过三次：第一次，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国内战争；第二次，苏维埃运动；第三次，九一八事变以后到西安事变

到现在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确是变了的。但是，有没有不变的呢？有的，就是总的政治方向没有变。第一次大革命为的是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苏维埃运动为的是什么？打倒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这次的抗战，还是为了这个总的方向。你们校歌里有一句说："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这是好的。中共十七年来都是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他不但有了受全国人民欢迎的政治方向，而且还坚持了这一政治方向。但是，有些人就不能这样，而且，还要我们不这样。我们爬过了最难爬的山，过河，过草地，而且不怕杀头，几十万党员牺牲了，却依然前进，死的死了，活着的踏过他们的血迹，依然高举着鲜明的旗帜前进！

这是第一个使全国人民喜欢的地方。

还有一点，就是他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鲁迅有鲁迅的作风，抗大有抗大的作风，你们陕北公学也有陕北公学的作风。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有位同志接到一封信，大概是抗大或陕公的毕业学员写来的。信里说，在延安住了很久，没有得到什么，每天只是爬山。各处都有山，为什么要跑到你们共产党这里爬山呢？他是反对爬山主义者。我是爬山主义者。不知道陕公每天爬山不爬，抗大是每天爬的。我看，爬山是需要的。

马克思主义是头。人有头，还得有脚，爬山主义就是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有脚。爬山成了一种风气，而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像爬山一样会有一种风气，这种风气就是作风。别的民族有他们的作风，我们的民族就有一种勤俭的艰苦奋斗的作风。你看农民在田里，不管什么天气总是工作，吃苦流汗，这不是艰苦奋斗的

作风吗？工人、兵士也是有这种作风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有这种作风。其他的阶层也有，比方孙中山先生就是有的，他在失败的时候还是高举着旗帜前进的。共产党也有这个作风。

不过，大家总觉得共产党在这一点上比别人还要好一些。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了他的政治方向。在十七年当中，遭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候，还坚持了他的政治方向。这种艰苦奋斗，在全党成了一种传统的风气，像成仿吾[1]，就是这样的。我们党对每一个党员，除了教育他们坚持政治方向以外，还要他们有一种作风。那就是坦白，讲真话，不怕一切困难，向一切不好的倾向，向民族的敌人作斗争。无论在哪里，共产党讲打日本，就真正打日本；讲民主，就真正实行民主；讲反贪污，就真正跟那些不良分子作斗争。大多数的党员是有这种作风的。但是，也有坏分子。我们知道，共产党不是说有一个老共产党员住在山上，训练弟子练好法宝，一批批送下山来的，所以也就有坏分子。十七年的事实证明了大多数党员是坚持不变的，他们艰苦地工作着，有这样一群优秀的党员这是民族的光荣。你们这群优秀的男孩子女孩子又团结在党的周围，这也是民族的光荣。但是，我们民族中也有坏分子，他们学的是升官学、发财学，而且还是在大学里、研究院里学了这些学问。不过，很明显的，一方面是大多数的好分子，一方面是少数的坏分子。许多好分子加入了共产党，有些坏分子也说他自己一不想升官，二不想发财，三愿牺牲一切，加入了党，不过是绝对的少数罢了。因为这样，共产党有这些优秀的党员作保证，坚持了自己的政治方向，保持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向民族解放的路上走去。

---

[1] 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当时为陕北公学校长。

有这两个好处，大家就都觉得共产党好了。现在共产党好像是漂亮了，其实，他一直就是这么漂亮，只是画像的不好，他把共产党画丑了。我们也画过他们呵，不过，没有画得这么厉害。现在好了，大家都不互相画了，因为大家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很文明的，不画了。

今天陕公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

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在你们将来的工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大的、很多的问题。路是很难走的，那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磕破或者蹭破一点皮，流了一点血，就苦脸，再碰个钉子，了不得，黄河之水天上来，流泪了，然后，向后转，再开步走。另外一种态度就不是这样。他摔一跤，爬起来再走，从不丢掉自己的旗帜，而且他会想方法，比方上对过这座山，你从成仿吾这个窑洞门口往上爬，是爬不上去的，那末，你就绕绕弯，从南边有路的地方或者不是耸直的地方，就能爬上去了。

这次的抗战，表示出我们民族有这样一个作风，就是不怕一切艰难困苦，不怕一切牺牲，坚持下来。这就保证了我们的胜利。

你们的路走得很对，学习的热情也很高。刚才成校长对你们说的话，我完全赞成，要军事化，接近群众，克服自高自大主义，这是很好的意见。

我的礼物就是这两件，好不好，你们再想一想。我想是有用处的。只要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政治方向，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且坚持这一方向和作风，就可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

（1938年4月2日）

一要开展，就是在政治方面知大局，顾大体，因此在军事方面要讲点战略问题、兵团上的问题。二要积极，就是要有政治热情和政治积极性，有了这种积极性就可以战胜工作中的困难。三要有朝气，就是要有蓬蓬勃勃向上发展之气。

---

[1] 这是毛泽东对即将从延安迁到瓦窑堡的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作临行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38年4月5日）

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二百人、八百枝枪。除决定罗炳辉[2]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罗炳辉，抗日战争开始后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以八路军副参谋长名义进行统战工作。1938年调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司令员。

国共两党合作问题[1]

（1938年4月5日）

同志们！今天我来讲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在时局的中心问题。也会是将来时局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我想来这里学习的同志们也一定很关心。对于这个问题，出现了许多意见：一部分是抱着善意的态度，对这个问题产生忧虑或怀疑；另一部分是采取坏的恶意的态度，实行挑拨离间、任意诬蔑的手段。所以这个问题是需要来解答的。

一　国共为什么能够再合作?

这是国共合作这个大题目里面的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常识，本来用不着多讲，但这是一个根据，是一个根本问题，就应该再来讲一讲。

解答这个问题，用简括的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国共之再度合作，是从共同利害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危机已到最大程度，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据。为陕北公学你们走几千里到这里来，实行国共合作等等，这一切都是以这个主要矛盾为根据而产生的。中国是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的讲话。

一个半殖民地，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决定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所以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抗大有一个同学写信来说，他过去在外边看过许多的言论，弄不清楚哪一个是正确的，到抗大住了一个月，才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现在他出去再看那些五花八门的东西，就懂得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些东西是靠不住的了。了解这些，就可以提出一个正确的口号：“反对民族压迫，打倒帝国主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要使民族独立。根据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所以需要民权革命或民主革命。因为孙中山先生看出了中国有两种病——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要医好这两种病，应该对症下药，所以他提出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

现在再回到问题的本身来说，为什么国共两党能够再度合作呢？这是因为现在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中日矛盾超过了国共的矛盾，超过了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因此，国共再一次合作起来。好，现在是合作了，那末，就会有人问：为什么过去国共要打仗呢？那不是发疯了吗？一般地说来，当然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在十年内战中，表面上看来好像是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但在实质上还是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国共打仗也是反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即是说国共打仗中包含着民族矛盾。同志们！我们知道半殖民地中国的国内战场可以说是世界的一个缩影，前线的枪炮子弹就有外国供给的；如果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共产党历来的口号，第一个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十年前如此，十年来如此，以后还是如此。中国是有两部分地方：一部分是有帝国主义的势力，强迫在中国开工厂；另一部分就不许可这样做。一部分是关税被迫降低；另一部分就是关税自主。过去

江西就是一个例子，如果硬要我们降低关税，我们就不怕打，和它拼。所以我们的口号第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行动上也是打倒帝国主义。有一次，彭德怀同志在湖南赶走了何键先生，帝国主义的兵舰就开起炮来，我们也就同它打。在湖北也打了几次。但是我们是不是反对一切人到苏区经营工商业呢？不，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对善意的和平的经营者，只要不破坏我们的主权，我们是欢迎的；如果是恶意的、坏的，那当然也不会对他客气。我们的第二个口号是实行民主，就是民权主义。过去的苏维埃运动便是民权运动，在苏区里就没有封建的剥削，人民说话也有自由。还有民生主义，我们也实行过。孙中山先生说“耕者有其田”，我们分配土地给农民，那不是民生主义吗？这一切就可以证明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那末，你们就会问：共产党既然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为什么还要同国民党打仗呢？这是两方面的事情。那时双方有一个共同纲领——三民主义，后来被另一方面破坏了，我们是坚持实行三民主义的，这样就打了十年。现在能再一次合作，是因为从外面来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以后，“一二·八”以后，我们曾经让朋友们去看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这些情况。有些朋友是知道了：长此下去，中国就会灭亡。可是，还有一些朋友却不肯去看。到了现在，我们的大多数朋友和大多数的人民，都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的第一个敌人。

这个中日矛盾影响到国内的阶级矛盾及国际间的矛盾。西安事变的结果，英美报纸都同情和赞许我们的实现国内和平的主张，也换了一副面孔，这就是一个证明。

二 要不要和能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要巩固，要扩大。但怎样巩固，怎样扩大，还是一个问题。

关于要不要巩固和扩大的问题，几句话就可以讲完。没有统一战线就不能抗日。从前，红军不能在中国各地自由走路，国共两党天天在打仗，怎么能抗日呢？有了苏联的帮助，全世界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援助，没有国共合作去打日本也是不成的。现在我们各方面的力量都还不够，党、政、军和人民各方面都要增强，就应该把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起来。国共合作，从政党上可以说是两个大拇指，但从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这个数量上说却是两个小指头，单靠两个小指头是打不倒日本的，要用两个拳头才能打倒日本。

现在承认了“要”，那末是不是“能”呢？我们说“能”。只要把几种事情办好就行，第一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第二要互相尊重，第三要互相帮助、互相发展。

三 共同纲领是什么?

我上面已经讲到，我们要有一个共同纲领。为什么要有这个共同纲领呢？我们说，这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武器。打日本除了飞机、大炮、机关枪，还需要有这个武器；而且这个武器是管其他武器的，它是民族解放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在你们开学那一天，我曾经讲过政治方向问题。这个政治方向

就是指示全国人民要走的路。政治方向好像是一个人的头，有了头其他各部分才能动作。这个政治纲领写些什么呢？少写些便是两条三条，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三民主义等；多则写他十条几十条，像十大纲领之类。有了正确的路，才能使走路者不迷方向。这个政治纲领是要国共两党以及全国人民共同来做的。现在这个纲领有一部分已经做了。第一条，抗日已经做了；第二条，国共合作已经做了；第三条，联合苏联也实行了；第四条，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也做了一些，可是还没有做完全。这个共同纲领是要巩固国共合作，国共双方要共同遵守的。对共同纲领的规定实行得不够，这是不行的，要提出批评；但是过分了，超过了共同纲领的规定，也是违反共同纲领的，比如现在没收地主土地分起田地来也是不对的。应该实行得不多不少，恰当地符合共同纲领。我们对于友党，是非常欢迎的，希望大家来巩固统一战线。

四　互相尊重

我前面已经说过，有了共同的政治纲领，还要互相尊重。什么是互相尊重呢？人与人之间是要互相尊重的，否则人家就会不高兴。人对于物就不一样，比如你们把包袱放在地上，一屁股就坐上去，它也不反对，不声不响。我今天来的时候，也很对不起，把那匹马骑了一回，它也没有提出抗议。可是，你若是坐在一个人身上或者骑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他就会提出抗议反对你，所以人是需要尊重的。学校里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尊重。军队里军官和士兵也要互相尊重，如果不互相尊重，军官打起士兵来，就会上下离心。军队对人民也是一样，对敌人要狠，对人民就应该和气。八路军有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里面有两项是“说话和气”和“买卖公平”，就是这个意思。希望同志们上前线去要有两副面孔，对敌人是一副面孔，对友军、对士兵、对人民又是另一副面孔。朋友之间是用不着两副面孔的，朋友之间要和气才能亲密团结，才有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现在讲到问题的本身，就是国共两党要互相尊重。从报上看到，有人要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党，要取消共产党。可是共产党的存在，是有它的阶级基础的。中国有地主、资本家、工人、农民，因此也就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存在，这是毫无疑义的、必然的。目前谁也不能吞并谁。而且，假如没有共产党，事情也难办。没有共产党，西安事变就很难收拾。要消灭共产党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在斗争中扩大起来的。问题不是你想要消灭就能消灭的，而在于帝国主义还没有打倒，封建势力依然存在，便不能没有共产党的产生和存在。因此，过去国民党要消灭我们，打我们，可是越打越多。我们说要互相尊重，是不是和和气气就完了呢？不是的，首先我们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无论共产党、八路军，还是国民党，都要批评自己。同时，我们是互相尊重的，就应该有互相善意的批评。如果国民党提出共产党的缺点，只要是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我们当然乐于接受，批评不对的地方，我们就解释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也要批评，可以在《解放报》上登一登，但要恰当，不要过火了。自我批评，互相批评，是在互相尊重的条件下进行的。

有人说：“统一战线要统一，两党组织独立存在就不统一。”我们非常赞成统一，然而两党各有特点，不能设想共产主义能够在国民党里获得通过，也不能设想共产党会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不是说一句“要”就可以马上实现的。将来的

民主共和国还不够，要更前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只有许多人都赞成了，社会主义社会才可以实现。延长县的国民党政府县长对我说：“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我要没有事做了，这一月二百元的薪水没有了怎么办?”我说将来的薪水会更多。社会主义社会是好事情，并且将来中国可以不经过战争就过渡过去。我在去年五月苏区党代表会议所作的结论中说，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有两条道路：一是经过流血的斗争，像十月革命那样；一是不流血的转变，这是我们所希望的。现在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行不通，因为条件不具备。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小农经济占优势，所以现时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国民党要取消共产党是不行的。两个不同的政党要统一起来就要有一个桥梁，组织一个委员会，无论什么名称都可以，国共两党都参加进去；或者另外组织一个党，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也参加。两个办法都成，这是统一战线的上层组织。

五　国共两党要大大的发展

我们希望国民党越大越好，至少要扩大到一千万党员，共产党至少要有一百万党员，当然少一点也可以。两党在数量上都增加，力量就大，便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赞成青年们加入国民党，也欢迎同志们加入共产党。只要我们能吃苦耐劳，有牺牲精神，为了全国劳苦大众的利益而奋斗，还怕将来实现不了社会主义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不是国共两党的私事，而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共产党力量的大小，政治纲领的正确与否，对全国关系很大。陕公的同志们！你们要爱护这个党，

可以善意地批评它，但不要让人诬蔑它，不要让人损害它。党内自然也有个别腐化分子，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升官发财主义。我们要反对这些腐化分子，肃清这些腐化分子。

希望同志们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同时也希望同志们听到恶意诬蔑时替共产党辩护，爱护共产党，使它发展和扩大。对国民党也是一样。

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1]

（1938年4月9日）

诸同学不避艰苦，从很远的地方，风尘跋涉，来此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决心，是很好的。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也可以说又都认识，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从政治上说，从精神上说，我们是彼此贯通的，是相识的。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的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多学几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具体地说，你们在这里应当学到以下几样东西：

第一，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要学一个达到及完成这种政治方向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必得有这种作风才能达到及完成以上的政治方向。再次是要学点战略战术。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军人是老百姓变来的，大家都不肯做军人，便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广大的老百姓都愿意变作军人，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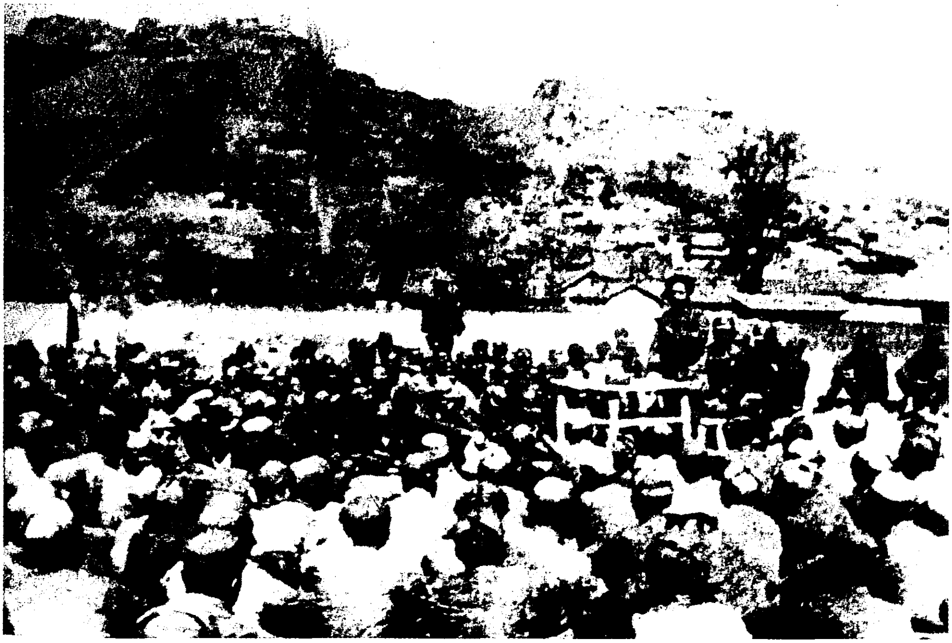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以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这里的战略战术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就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等到敌人技穷了，我们便可以打胜它。总之，你们在这里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有了这三样东西，我们便能够最后战败敌人。这是第一。

第二，你们在这里要学做干部。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没有这广大的有组织的队伍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的组织，至今也还组织得很不够。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因为事实上不可能使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学习，却可以靠你们将来在工作中间把这个政治方向告诉全国的人民，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同时你们也要传播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使广大民众都能坚定地不动摇地与任何困难奋斗。像你们在这里吃小米饭，爬清凉山，也可说是一种艰苦奋斗，是要你们改变不能艰苦奋斗的软弱作风，有点“劲”，譬如跑路跌了一跤，碰坏了牙齿，却依然站起来向前迈进。单是你们有这个作风还不够，要使全国的人民都有这个作风。在我们的征途上摆着一样东西，其名曰“困难”，我们告诉它，我们是从抗日军政大学锻炼出来的，不怕你！它说它有很大的

本领，能使我们没衣服穿，我们不怕；能使我们没饭吃，我们不怕。它说它还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我们都不怕。我们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再问它还有没有，它说没有了，便只好缴枪。我们便是这样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要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而且能克服困难，这样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你们更要以灵活的战略战术教育广大的民众，使他们都知道而且都会打日本。组织全国人民，训练全国人民，是要靠你们这些干部的。所以第二你们要学做干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抗大学生作报告。

第三，你们还要下一种决心。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已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

心的。你们要学抗日救国，我们要帮助你们完成。但有些人是只有一个“大概的”决心，所谓“大概”，是说也许有点模糊，不十分坚决彻底。其中也难免有些人是由于看了别人来自己也跟了来的，没有彻底的认识与决心。这意思是说，他们的决心不是由坚定的政治方向出发的，是没有经过很好的考虑而来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爬山吃小米饭，还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困难，在前方困难要多得多，要知飞机大炮是没有眼睛的。现在，日本侵略军虽在鲁南打了败仗，可是大概还要再来。他们抢了我们的上海、南京，还企图占领我们的潼关甚至武汉，现在在山西的敌军攻下了临汾，抵达风陵渡。如果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头野牛，那末我们中国在山西的几万大军正在这牛的背后拖着牛尾巴，阻止它南下。如我们八路军，在敌人的后方，接济困难，上有飞机，下有大炮，但在这种困难环境之下还要拖牛尾巴，不断地打击敌人。你们从各地出发的时候，有的是想到了，恐怕也有的人没有想到延安的艰苦，在别的地方有鱼有肉有大米饭，这里却只有小米饭，还得爬清凉山。现在你们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决心是有了，但你们将来还要去“拖牛尾巴”，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而且将来还要建设新的中国。我看你们都是没有胡须的，没有胡须的人名之曰青年，青年人是有勇气的，但你们要到长了胡须的时候（自然女同志是不会生胡须的），到老到死，都不动摇，不退缩。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

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

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

（1938年4月10日）

在十年内战时期，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2]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不切实、不好吃是不好的，这不是功利主义而是现实主义。抗日战争使这两部分人会合了，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

---

[1] 这是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 亭子间的人，指从上海等地来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人。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山顶上的人，指来自井冈山等革命老根据地的文化人。好吃，指内容切实、丰富。好看，指艺术形式。

在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1938年4月11日）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缺乏教育的民族，但抗战已大大地改变了中国人，这是几十年的教育所不能成功的，如果抗战再坚持下去，还会造就千百万的新人。我想：今天在座诸君一定可以看到由这些新人所组织起来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新中国之实现，抗战对我们既有这样大的帮助，那末我们就应该用全力来应付抗战，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做抗战教育。抗战教育不是强迫的，而是自发的，它依靠着群众或学生的学习热忱和教育干部的积极性。并且需要把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亲密的联系起来。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一周年题词

（1938年4月15日）

青年是抗日战争的生力军，目前青年团体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一切阶层的青年男女，大批地走上抗日战争的战场去，充实正规军的战斗力，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后方的青年人，也是一切为着战争胜利而工作。中国的解放主要依靠青年人。

致贺龙、萧克、关向应电[1]

（1938年4月18日）

平绥线以北广大地区，能否建立游击根据地，请你们调查见告，并请转告宋时轮调查见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滕代远致贺龙、萧克、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年4月18日）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离中国共产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曾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中央斗争，并自口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然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申明自行脱离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1938年4月，毛泽东和访问延安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左二）等合影。

巩固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1]

（1938年4月20日）

荣臻、彭真二同志，并致朱、彭：

十日来电，今天才到。

甲、由于各种顺利条件与你们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使冀察晋广大地区的抗日运动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根据地的建立，已经大体成功，但在各方面都还不是巩固的。目前你们的任务中心是在各方面巩固已得的胜利，并在巩固现有的基础上去继续发展。

乙、你们的胜利和发展，大大地威胁日寇的根据地——平津，日寇必然想尽一切方法来进攻与破坏你们。除开采用残酷武装进攻外，更必然要派遣和收买大批的汉奸、流氓、土匪混入各党、政、军、群众团体，特别是军事组织中来，进行阴谋破坏。路东党委负责人的被暗杀以及党内和军队内的各种无原则纠纷，难免没有敌人的阴谋作用存在，这应该引起你们的严重注意。

丙、为了迅速巩固你们的力量，以便继续更大的发展，我们提议：

（一）加强对部队的整理训练及党的工作，刷洗混入部队中的流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给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晋察冀代表彭真并致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氓、土匪等不良的分子，考察并团结各级干部，慎重而切实地建立部队的保卫工作。

（二）肃清根据地内部的土匪，采用慎重而有效的办法，改造那些土匪式的抗日部队。加强地方上的除奸工作，恢复与建立抗日的秩序。

（三）除派黄敬[1]去路东整顿党的工作外，应即从王平刘道生赵尔陆[2]三同志中派一人去路东任吕部[3]政治委员，并兼省委军事部长，或成立路东军分区司令部，切实整理吕孟[4]两部。在吕部整理就绪后，可分出一部分兵力随邓华[5]部队向冀东热边发展。

（四）巩固党的组织和党内的团结与统一，提高铁的纪律。在目前，任何破坏党内的团结与统一的行为，都是最大地帮助了敌人。严厉地批评与纠正一切小组织的行动，加强对于党内原则的教育，提高党与主要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

（五）在群众运动中，纠正某些过左的行动与行会倾向，和缓地主富户对于我们的恐惧与反对，但中心工作仍在发动群众抗战热

---

[1] 黄敬，当时任中共晋察冀区委书记。1938年4月21日起任中共冀中区委书记。

[2] 王平，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刘道生，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吕部，指原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三军第三八八旅第六九一团，该团在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率领下于1937年10月在河北晋县脱离国民党军队，后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正操任司令员。

[4] 孟，指孟庆山，当时任河北游击军司令员。

[5] 邓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1938年2月，率领以第一军分区第三大队为主组成的支队（简称“邓华支队”），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4月，与宋时轮率领的雁北支队会合，前往冀东开辟根据地。

潮，建立真正强有力的群众团体，进行切实的组织工作。

（六）政府组织方式不必再有更多的变更。主要的工作除广泛组织训练自卫军外，就是筹集经费与粮食，解决部队给养。筹款方法除经常的税收捐款外，要注意向汉奸筹款。可组织特别的队伍，到铁路车站及城市附近去没收与逮捕汉奸。我们没有可能大批帮助你们的经费。

丁、延安的干部已大批派出，你们所要的高级干部，待查清后看是否可能派一二人来，下级干部可再派一些到你处。文件、电台当设法经晋西北送你们。

戊、你们应设法与天津建立交通，调平津一批干部到你处工作。

毛泽东　洛甫　胡服

二十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38年4月，八路军完成了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等抗日根据地。图为聂荣臻等率部向五台山区进军。

结团体，打日本[1]

（1938年4月20日）

陕甘宁边区的工人代表大会开了好几天，我都没有工夫来参加，今天要我讲话，我讲一个问题，便是“结团体，打日本”。

统一战线，它的别号叫做结团体，就是结了团体打日本。这个团体现在比过去不同了。统一战线是个大团体，由许多小团体结合起来的。这许多小团体中间，工会就是一个团体。中国工人有几千几百万，这几千几百万人的无产阶级要结合起来成一个团体。这几千几百万工人中间，又有七十二行，各行各业的工人，又要组织各种行业的工会。同时一个行业内，又有各个地方的不同，比如延长有延长的煤矿工人，关中有关中的煤矿工人，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煤矿工人工会，陕西省就组织陕西省的煤矿工人总会。最近中国打了大胜仗的台儿庄，那里就出产很好的煤，那里也有许多的煤矿工人，他们也要组织煤业工人的工会，各省有了各省的煤业工人工会，然后再组织全国的煤业工人总工会。还有，各省的、各个地方的各行业工人的工会，联合起来就组织一个全国的总工会。我们就是要这样来组织全国几千几百万人的无产阶级。听说你们正在讨论统一与普及工会组织的问题，这是很好的，要把全国各省、各业的几千几百万人的无产阶级都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工人的团体，这样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晚会上的讲话。

“结团体，打日本”，力量是很大的。

就只有工人要结团体打日本吗？还有别的团体没有？还有一个团体，就是种地的农夫组织起来的。中国有一句俗话：“农夫不下力，饿死帝王君。”不过农夫不下力，我想就不单只饿死帝王君，一定还有许多人也要饿死。我们中国有几万万的农民，也组织成一个团体，无论各省各县各乡到处都组织起农民协会、农民抗日救国会。这样地组织起来，用这样的团体去打日本，还怕日本帝国主义打不倒。

还有商人，做生意的也要组织起来。还有呢？文化人，拿笔杆子的，这些写文章的也要组织起来。现在，陕北公学办起来了，文化界救亡协会也成立起来了。有人说笔杆子有什么用场，难道还可以拿笔杆子打日本人吗？笔杆子也可以打日本人，斧头、锄头、笔杆子，都要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去打日本人。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抵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现在我们说，只要一支笔抵一支枪，全国就有好多万支枪。

这样，全国各种职业的人都组织起来，就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全国的大团体。

还有没有别的团体呢？还有世界性的大团体，这就是和外国结团体。这就要懂得点世界上的情形。从前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听得人家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现在我想这话完全不对。现在还有一些活着的老秀才，他们只知道附近几十里的事情；如果你去问他日本的事情，日本为什么要打中国，他说不知道；你再问他意大利、德意志和西班牙的事情，他又不知道。这些秀才知道什么天下事，我说他一点也不知道。现在另外有一种秀才，如像陕北公学的学生，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人，他们有一种本领，能够看无线电传来的新闻，他们就真正知道世界上的事情。现在西班牙政府打了胜

仗，我就知道，这是因为他们工人团结得很好。台儿庄中国军队打了胜仗，我也知道。我们朱总司令昨天打了胜仗，我今天就知道了！这是什么道理？因为现在有一种东西，是工人们所造出来的，它可以从天空中飞过，叫做无线电。

从前有人说，洋人都是直脚杆，他们的腿是直的，不能走路，跌倒了就爬不起来，等等。这些话是不对的。洋人中间有好的洋人，也有坏的洋人，可以说洋人中间十个有八九个是同情中国或者可以帮中国忙的。我想你们中间一定有人看到的，早几天在汉口《新华日报》上，登载着两篇日本人的文章，那就是两个好的日本人写的。

现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里，那些好的洋人，他们都有团体。无产阶级的苏联，就是个最大的团体。在日本，在德国，在意大利，在西班牙，那些国家里面的好人，都组织得有团体，反法西斯的团体。外国的工人要反对法西斯，我们中国人民也要反对法西斯，目标是一个，这就是世界上反法西斯的一个大团体。这样一来，就是各国的工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国内的工人也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也要组织统一战线。三个统一战线，中国的一个，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一个，再加上日本无产阶级的一个，都要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成了全世界的一个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还要把它好好地组织、好好地扩大起来，一齐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想日本帝国主义可以打倒吗？一定能够的。谁说中国打不胜日本，那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要打胜日本帝国主义，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有重大的作用，所以无产阶级要好好地团结起来。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才不会做亡国奴。做亡国奴，我们不干。我们一定要抬起头来，我们一定要翻身。只有团结，才可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

（1938年4月21日）

朱、彭，刘、徐、邓[2]转陈、陈，朱瑞，宋，聂荣臻，彭真，尚昆[3]诸同志：

甲、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

乙、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秘密的抗日斗争只有在敌人统治的城市与铁道附近才成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刘、徐、邓，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3] 陈，指陈赓，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指陈再道，当时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受中共中央之命，负责筹建冀鲁豫边区省委的工作。宋，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3月中旬率第一二九师骑兵团挺进冀南。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晋察冀代表。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

为主要的方式。

丙、根据上述方针，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军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丁、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

戊、在范专员、丁专员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经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造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

己、吸收民间的枪枝加入游击队与军队，要采用宣传说服及借枪（可给借枪证）的办法，或发动民众自带枪枝来当游击队。筹粮筹款，以自愿及公平摊派为原则，并注意逮捕城市及车站的大汉奸筹款。

庚、以人民自卫军为主要的群众组织形式，可能时再组织农会及青年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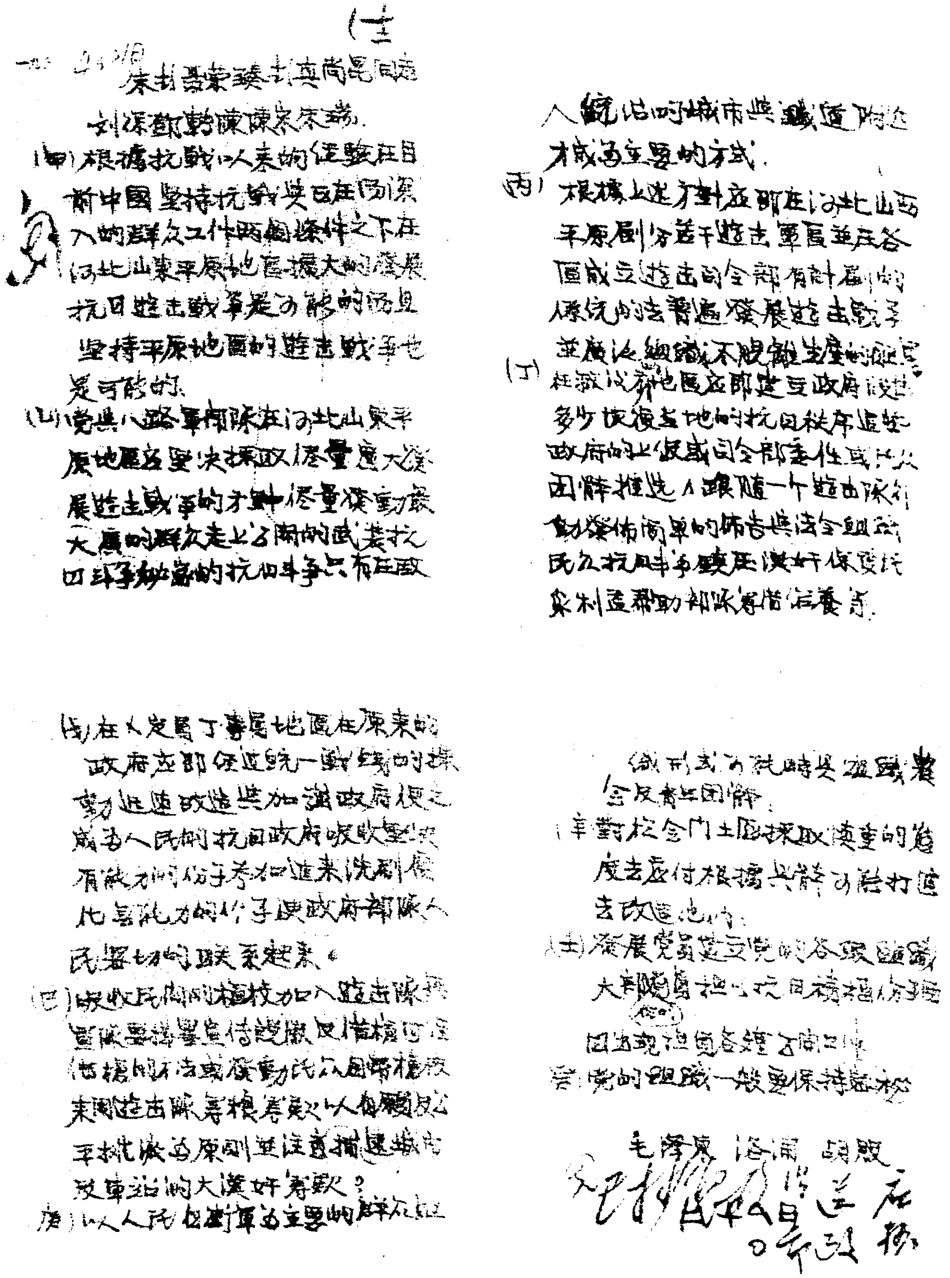
辛、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去改造他们。

壬、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大部分的党员宜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担负各种公开工作。

癸、发展党的组织，一般要保持秘密。

毛　洛　胡

二十一日



(十二

一九三八 [illegible]

朱彭暨黄萧朱杨尚昆同志

刘张邓郭陈陈宋宋[illegible]

（甲）根據抗戰以來的經驗在目前中國堅持抗戰與正在深入的群衆工作兩個條件之下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擴大的發展抗日游擊戰爭是可能的而且堅持平原地區的游擊戰爭也是可能的。

（乙）黨與八路軍部隊在河北山東平原地區應堅決採取儘量廣大發展游擊戰爭的方針儘量發動廣大的群衆走上公開的武裝抗日鬥爭秘密的抗日鬥爭只有在敵人統治的城市與鐵道附近才成為主要的方式。

（丙）根據上述方針應即在河北山東平原劃分若干游擊軍區並在各區成立游擊司令部有計劃的系統的去普遍發展游擊戰爭並廣泛組織不脫離生產的游擊隊

（丁）在敵佔各地區應即建立政府設法多少恢復當地的抗日秩序這些政府以假或司令部委任或以公團推選人跟隨一個游擊隊行動發佈簡單的佈告與法令組織民衆抗日鬥爭鎮壓漢奸保護抗家利益幫助部隊籌借給養等。

（戊）在人[illegible]尚屬地區在原來的政府應即依照統一戰線的綱領進行改造與加強政府使之成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堅決有能力的份子參加進來洗刷腐化無能力的份子使政府部隊人民密切的聯系起來。

（己）吸收民間的槍枝加入游擊隊擴置隊要請群衆借送或獻民槍可用借據的方法或發動民衆自帶槍枝來加游擊隊籌糧籌款以負擔公平為原則並注意捕捉敵寇政權的大漢奸籌款？

（庚）以人民的武裝為主要的群衆組織形式同時要組織農會民衆青年團體；

（辛）對於會門土匪採取慎重的態度去應付根據具體可能打通去改造他們；

（壬）發展黨員建立黨的各級組織大量吸收抗日積極份子因為現在黨員各縣太少

（癸）黨的組織一般要保持秘密

毛澤東　洛甫　胡服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等向八路军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的抄件。

复项英电[1]

（1938年4月24日）

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先派支队去溧水一带侦察甚妥，惟须派电台及一有军事知识之人随去。

---

[1] 这是毛泽东复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1938年4月28日）

你们要我来讲几句话。可是我不熟悉艺术方面的问题，只能贡献一些粗浅的意见给你们参考。

一、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1]，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我们主张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但这并不是那种一味模仿自然的记流水账式的“写实”主义者，因为艺术不

---

[1] 徐志摩（1896—1931），浙江海宁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句话，没有查到出处。

能只是自然的简单再现。至于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有消极的、复古的浪漫主义。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和希望，这才是革命的精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这样的精神。

中国文艺界还曾有所谓“第三种人”[1]，在今天我们也并不排斥他们。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艺术上每一派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方面的，但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二、艺术作品要有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作品好比饭菜一样，要既有营养，又有好的味道。中国人是最会做饭菜吃的，做菜的时候适当地调配各种材料，加上油盐酱醋各种佐料，经过巧妙的烹调，便产生一种美味，并且保持了营养成分。大师傅做得一手好菜，要有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不是学一天便做得好的。他们做菜，用的材料和别人一样，却能做出好的味道来，这

---

[1] 1932年7月，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自称“第三种人”，宣扬超阶级的文艺，受到鲁迅、瞿秋白的批评。

就要研究各种材料的调配和时间火候的掌握。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只注重味道好不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他们的艺术作品内容常常是空虚的或者有害的。艺术作品要注重营养，也就是要有好的内容，要适合时代的要求，大众的要求。比如现在唱京戏，在戏报上已经看不见《游园惊梦》之类的东西了，因为那样的戏在今天卖不了座。演旧戏也要注意增加表现抗敌或民族英雄的剧目，这便是今天时代的要求。艺术作品还要有动人的形象和情节，要贴近实际生活，否则人们也不爱看。把一些抽象的概念生硬地装在艺术作品中，是不会受欢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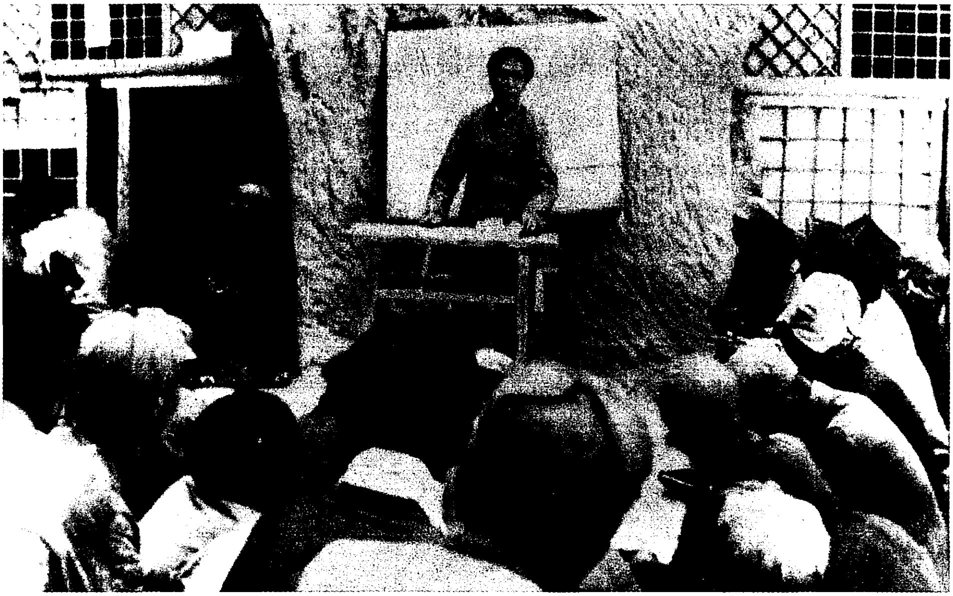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报告。

三、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

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但只有理想还不行，还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良好的艺术技巧。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我们的许多作家有远大的理想，却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不少人还缺少良好的艺术技术。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鲁迅先生在《毁灭》的后记中说到，《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是身经游击战争的，他描写调马之术写得很内行。像上马鞍子这类细微的动作，《毁灭》的作者都注意到了，鲁迅先生也注意到了。这告诉我们，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你们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你们不能终身在这里学习，不久就要奔赴各地，到实际斗争中去，正如你们唱的《游击队员之歌》中所说的，“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你们不但要在口里唱，而且要实际地去那样做。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艺术家固然要有

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1]。要把中国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话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都要下马看花。



1938年4月，为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毛泽东等在延安发起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图为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的情形。

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

---

[1] 五台山，指五台山地区，当时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1]，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们都知道高尔基[2]，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至于艺术技巧，这是每个艺术工作者都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艺术技巧是多方面的，并不只限于语言。但是，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要做伟大的艺术家，必须具备以上所说的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现在，我们阵线上有些人所写的东西，缺乏丰富充实的内容，不合于客观的实际，艺术技巧也比较粗糙。这种缺点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

---

[1] 胡适之，即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他在1917年和1918年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自己对文学改良的主张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八、不避俗话俗字。

[2] 高尔基（1868—1936），苏联著名文学家、政治活动家。主要作品有诗歌《鹰之歌》《海燕》和小说《母亲》等。

为“五一”节纪念题词[1]

（1938年4月30日）

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

五一节

---

[1]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五一”劳动节所写的题词。

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

（1938年4月30日）

八路军都应当成为全国的模范。模范作用不在于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他要求大家学习愚公挖山的精神，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座山统统移掉。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毕业典礼上讲话的一部分。

和白求恩的谈话[1]

（1938年4月）

你的想法很好，前线很需要你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

前线很危险，任务重、条件差、生活艰苦，请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

[1] 白求恩去晋察冀边区时路过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窑洞里接见了他。这是毛泽东知道白求恩要求到抗日前线去工作时，和白求恩谈话的一部分。

为“鲁小”第一届毕业生题词

（1938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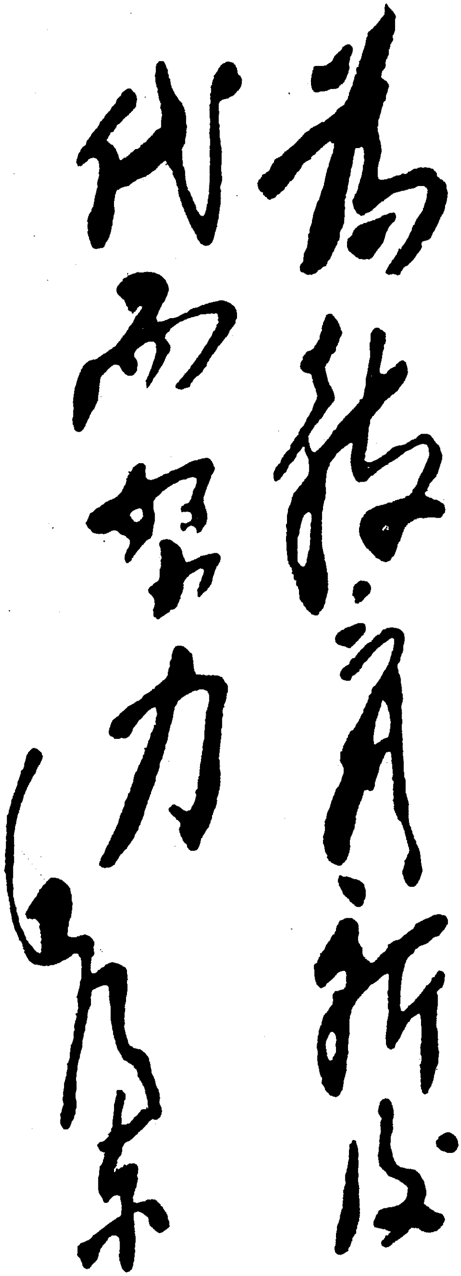
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是为着一个总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

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教师》杂志题词

（1938年4月）

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

毛泽东



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教师》杂志的题词。

为抗战文艺工作团写的介绍信[1]

（1938年4月）

八路军各级负责同志：

现有抗战文艺工作团刘白羽诸同志赴前方工作，望大力支持协助，提供一切方便。

敬礼！

毛泽东

---

[1] 1938年4月下旬，毛泽东约见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刘白羽，同意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到前方工作。毛泽东当场为他们这个团体命名为“抗战文艺工作团”，并写了这封介绍信。

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的讲话[1]

（1938年5月3日）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明了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即“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本质上是三民主义的。中共愿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第三期第二大队关于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1]

（1938年5月4日）

同志们很关心国共合作的问题，问题不是在现在而是在将来。现在合作相当巩固，而且会更巩固。问题是在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国共两党是否还继续合作？两党会不会自己打起来？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不单是你们，国民党员以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也提出过，全国老百姓也都关心着。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答复过别的人。我们有几条理由可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不会打，而且不应该打。

主要的理由有两条：一、国际的，二、国内的。这两条理由使国共两党能合作下去，而且应该合作下去。

国内的又可分为三方面：一、国民党，二、共产党，三、人民。

现在先讲第一方面。

从国民党方面讲有什么理由可以合作下去呢？我又不是国民党的参谋长，怎么能代替他们作保证？不过从大体上看来，即从大体趋向看来，应该不应该、能够不能够合作，是可以说一些的。现在我先来讲国共合作的意义。

国共合作可分为三段：头一段是两党合作；第二段是两党分裂；第三段是两党又合作。按照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开头说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共两党过去分了十年，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一大队成立时演讲的一部分。

现在又合起来的。但把这个话拿到现在来说又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了不一定会再分裂。我们可以把这个话改成：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过去已经证明了的，你看历史上国共的合作和分裂，就会明白这一点。北伐胜利，基本的原因是那时两党的统一战线执行了正确的纲领。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一个宣言，确定了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的纲领。这个会我亲身参加了，是孙中山先生主持的。一九二四年开代表大会，就在那年便开办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统一广东，消灭陈炯明部。陈炯明盘踞广东是多年打不下来的，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他的势力，这也是靠国共合作的力量。那时蒋介石先生为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又如，第一军蒋介石先生为军长，周恩来同志为副党代表。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北伐，势如破竹，占领了武汉、南昌，攻破了上海、南京，把吴佩孚、孙传芳打得落花流水，这都是依靠统一战线的力量，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所以说，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胜利，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同时这个革命的影响那样深入到基层群众中，也是空前的。这就是“合则两利”的证据。

分则两伤有什么证据呢？这就是从一九二七年两党分家到西安事变，这个时期不仅是两伤，而且是三伤，因为那时老百姓也遭难。对国民党有什么好处呢？打了十年，要想消灭共产党，无结果而散，没有打出个名堂来。从前共产党是参加国民党的，那时他们不赞成合作，将共产党赶出来，搞所谓“清党”。他们不准在各地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不准发展工农运动，说我们反封建太厉害了，反帝国主义也太过火了。可是，在全国人民看来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们所做的不仅没有超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

言，而是对实行这个宣言还很不够。究竟是谁忠实地实行这个宣言呢？就连国民党的同志也不能不说是共产党，那上面的民族、民权、民生的纲领，共产党是老老实实地、一五一十地去做的。大革命失败后，几十万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杀害，他们有什么罪呢？“罪名”不过是他们实行了三民主义。那时我们还未实行土地革命，其实土地革命就是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是共产主义呢，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我看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为农民得了土地，自己私有，这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之内的事，没有取消私有财产制度。你们也许会问：共产党为什么不实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我们是要实行的，但那是将来的事，现在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是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末，有人还会说：你们还有一条做得不对，搞了苏维埃。其实，苏维埃就是民权主义，老百姓有说话之权，走路之权，开会之权，这些从前苏维埃政府规定的都有，现在边区政府规定的也有，只不过汉奸除外。从前我们到汉口走一走，人家就会把你抓去，脑壳就要搬家。你们大家都知道苏州看守所关过七君子，为什么把七君子关起来呢？因为他们主张抗日，而那里是没有人民的权利的，不准他们主张抗日。我们这里是实行了民权主义的，“苏维埃”是一个外来语，其实就是代表会议的意思，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都可派代表来参加会议，讨论和决定问题，这就是民权主义啊！至于民族主义在我们这儿有没有呢？这十年中，我们干的事，帝国主义是不喜欢的，因为我们所到之地帝国主义便要发抖，比如我们在长沙，在黄石港，在田家镇。一九三二年我们打漳州时，帝国主义用二十三条军舰封锁我们，大炮对着我们。我们收关税，无论是哪一国的商品，凡是我们需要的，就可以不抽税，不大

需要的，就抽比较重的税，完全不需要的就不让它进口，一切由我们做主，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敢干涉我们？要传教，也非经我们同意不可。在外边，这些年来对于洋人、“洋大人”，何曾如此？那儿老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已经成了规矩。共产党是不怕“洋大人”的，如果同我们平等做生意，自然是欢迎的。这就是我们所实行的民族主义。

十年来我们实行了三民主义，做了这三件主要的大事——民族、民权、民生，别的一点没有干，为什么要打我们？真不明白。现在不算老账了。总之，我们是执行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执行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纲领。“清党”是他们要清的，我们是被逼上梁山的。为什么我们要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没有法子才上山去，打游击战。我们要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可是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内插，我们就只好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以前插在井冈山，插在雪山、昆仑山，现在插在清凉山。你们到这里来，也是因为清凉山上飘扬着这面大旗。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十七年一直高举这面旗帜。你们从南洋、从云南、从四川、从贵州到延安来爬山，并不是你们那儿没有山，而是因为这里山上有这面旗帜。我们很欢迎同志们，你们和我们在政治上是一致的，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变旧中国为新中国。

以前同国民党合作，大革命失败后到西安事变前不合作，现在又合作了。

合作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什么条件呢？就是反帝反封建。谁能遵守这一条，我们就同他合作到底。西安事变时，好些人说我们做得不对，把仇人给放了，现在证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正确

的。一些人以为国民党不会进步，比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在苏州开审七君子，逼杨虎城出洋等等，一些国民党员也很担忧。可是你看七七卢沟桥事变真的打起来了，最近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发布了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基本上是好的，这是国民党十年来进步的表现。国民党想想自己的历史，也不会要打内战，十年来有什么好处？国民党的领袖也都承认没有好处。他们要是实行这个纲领，他们要是继续进步，共产党一定同他们合作下去，因为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现在的合作抗日，则有大利。十年内战，国民党要想消灭共产党而没有能消灭。他们几十万军队来一“剿”，我们在枪支上便有大大的收获，我们的兵工厂是开在汉口、柏林、伦敦、东京等地。国民党军队一打，便把红军与共产党打大了！我想还是不打的好。如果我来讲点辩证法的话，这便是：做的事情与所得的结果相反。

这是国民党方面。

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938年5月4日）

项英[1]同志：

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薛岳[2]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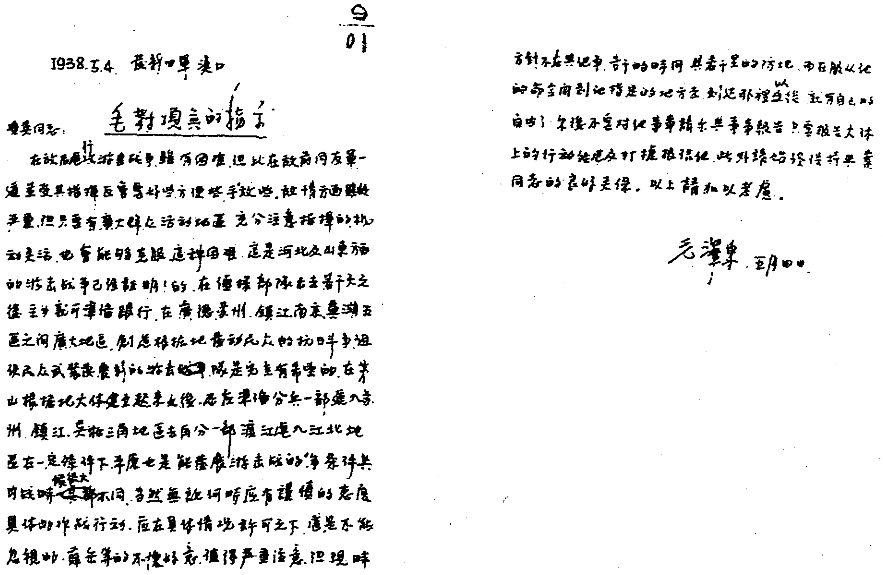
[1] 项英（1898—1941），湖北武昌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2] 薛岳（1896—1998），广东乐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军军长。

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而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1]同志的良好关系。以上请加以考虑。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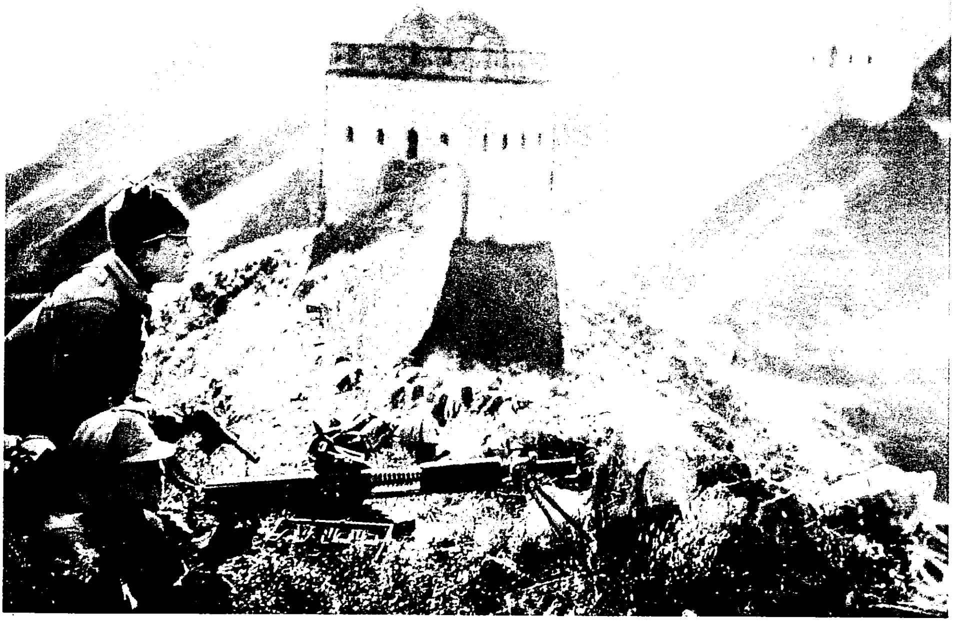
五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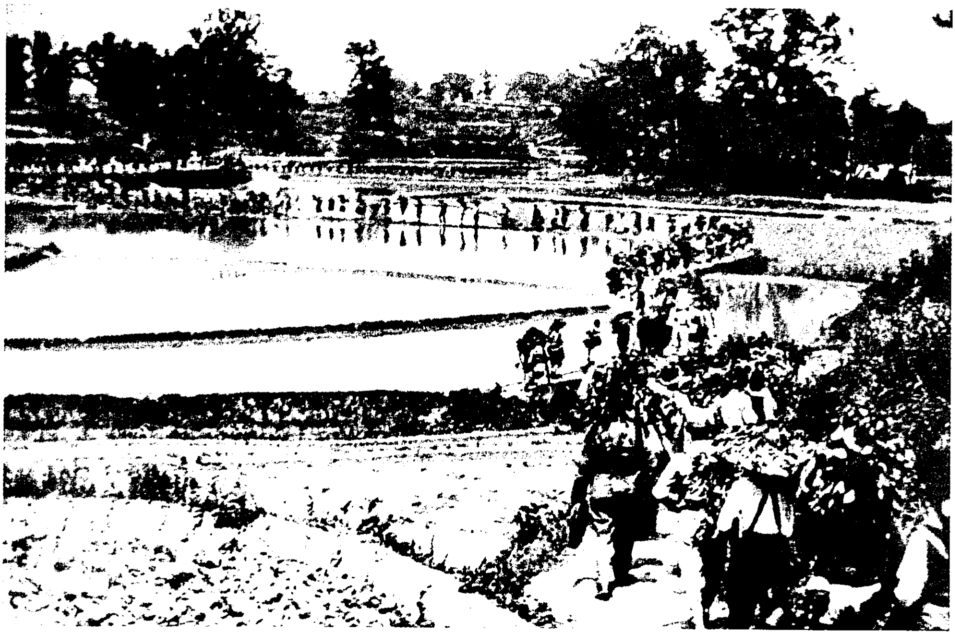
毛泽东关于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项英的指示。

---

[1] 叶，指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



在长城内外战斗的八路军。



在大江南北战斗的新四军。

和卡尔逊的谈话[1]

（1938年5月5日）

只要人民有志气忍受困难，有决心继续抵抗，中国就不会垮台。中国像一个容量一加仑的细颈瓶，而日本灌进了半瓶多水。它的部队进占一地方，我们转向另一地方；他们追击，我们就后退。日本兵力不足，无法占领全部中国，只要人民决心继续抵抗，它就无法用政治手段控制。

有几种围困。日本在五台山包围我们，围困我们。但我们有另一种围困，比如日本在太原驻守，太原的东北是聂荣臻的部队，西北是贺龙的部队，林彪的部队在西南，朱德的部队在东南。日军在山西一出动就会撞上我们的巡逻队。正像山西是华北的战略锁钥一样，五台山地区也是山西的锁钥，我们占领五台山，日本人就不能控制山西。另一种围困应是美国、苏联同中国一道围困日本，这将是一种国际的围困。

---

[1] 这是毛泽东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优秀指挥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关于抗日战争的谈话的一部分。

给长江局的指示

（1938年5月6日）

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以张经武同志去山东。

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讲话[1]

（1938年5月8日）

现在全国团结抗日，工农是其中的大多数，担负着艰苦的工作，责任很大。现在的缺点是工农还没有普遍组织起来，对自己的使命认识不够。希望工农迅速组织起来，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

---

[1] 这是毛泽东对来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1]

（1938年5月10日）

现在蒋介石与我们的估计都认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近《大公报》两篇社论态度变化，认为鲁南战争是准决战[2]，否认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估计，过去也有两种意见。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因为中国是大国，日本不能完全吞并中国，同时中国又是弱国，须要持久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所作关于中日战争形势的报告的一部分。

[2] 1938年四五月间进行的鲁南战役（即徐州战役）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同年4月25日《大公报》社评说："现时的时局，就是抗战前途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这一战胜利了，其有形无形的影响，就可以得到准决胜的功效。全军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4月26日《大公报》社评又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答施方白问[1]

（1938年5月11日）

一

抗战的必胜是确有把握的。

二

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

三

条件还不具备，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战胜利后，中

---

[1] 1938年5月11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对他提出的九个问题作了回答。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抗战胜利的把握如何的问题的回答；本篇二是关于中国是不是需要进行社会革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的回答；本篇三是毛泽东关于是不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进行社会革命的问题的回答。

国的政治当然会有很大的进步，但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复陈绍禹、周恩来等电[1]

（1938年5月12日）

我们首先应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对三青团的方针问题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复陈绍禹、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同年4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同年5月6日，陈绍禹、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

为施方白题词

（1938年5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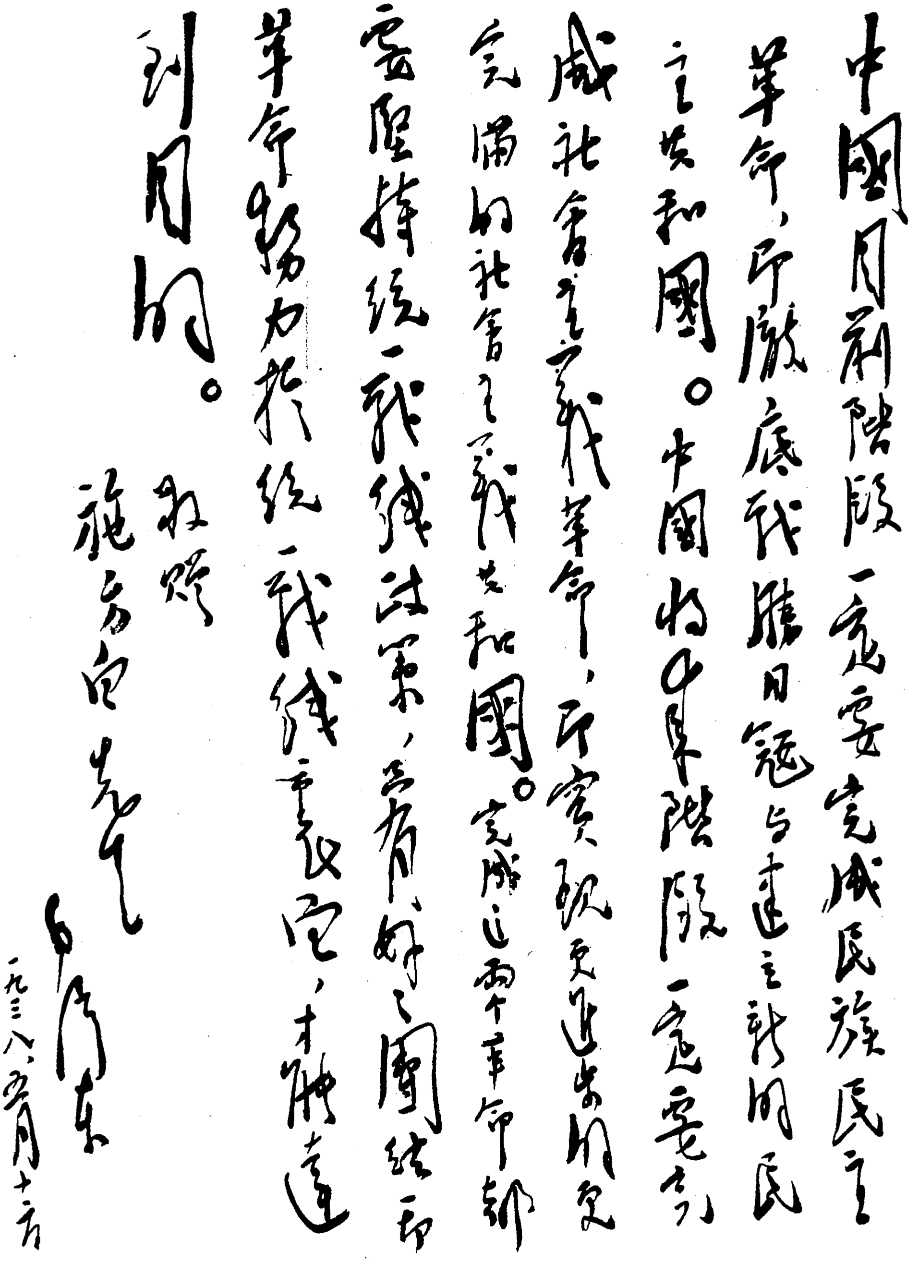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

敬赠

施方白先生

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要有好好的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之中，才能达到目的。

施方白先生

教正

毛泽东

一九三八、五月十六

毛泽东为施方白的题词。

给郭化若[1]的信

（1938年5月12日）

化若同志：

第一节[2]最后修改毕，可即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

二、三、四节抄好后送我再看。

毛泽东
十二日

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

---

[1] 郭化若，当时任中央军委编译处处长。

[2] 指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节。该文1938年5月发表于延安《解放》第四十期，同年6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单行本，1952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将节改为章。

《大公报》提倡准决战的论调是不对的[1]

（1938年5月13日）

陈、周、博、凯：

《大公报》否认持久战，提倡准决战的论调[2]，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徐州决战[3]只应该是某种程度的战役决战，而决不应该看作战略决战。必须准备在徐州决战失败后，仍有充足力量为保卫武汉而战。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长江局成员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的电报。此电还发给了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新四军、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晋察冀军区。

[2] 1938年4月26日的汉口《大公报》针对当时的徐州会战发表社评说："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的最后挣扎。""这一战，从纯军事眼光说，当然不是最后决战，而从精神的或政治的意义论，则可以说是准决战"。

[3]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后，国民党集中军队约60万人，在徐州以北、以东地区同日军进行会战。当日军基本形成对徐州的包围态势后，国民党军遂放弃徐州，向皖西、豫南、鄂北退却。5月19日，徐州失陷。

致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总部北方局等电[1]

（1938年5月14日）

目前山西日军被击退，阎锡山的旧势力极力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在晋西北、晋东南均极力向八路军及新兴抗日势力进攻。为巩固统一战线，改善我们与阎的关系，并继续发展抗日力量起见，请朱德、彭德怀及贺龙、萧克、关向应在集合更多、更大、更忍无可忍的材料之后，用适当的措词公开致电有关方面抗议，将各种破坏八路军的谣言、电文印送各有关方面，并请阎对这类破坏行为加以制止。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刘少奇致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并总部，北方局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8年5月14日）

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进攻是主要的，也是有条件的[1]

（1938年5月14日）

林彪同志：

已经看过，很好。但有些不适合的地方，已为改了，请你再看。“无条件的进攻”一语不妥，进攻也是有条件的，但进攻是主要的，基本的，中心的。

暂缓发表，待决定动身之时发表。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夜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在1938年5月2日向该校全体教职学员所作的《抗大的教育方针》的讲演记录稿后，写给林彪的信。

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1938年5月14日）

（一）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二）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三）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势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与过去有根本的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

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1]

（1938年5月15日）

为布告事：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全国爱国同胞，坚决抗战。前线将士，牺牲流血。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各界人民，协力救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大道，抗日胜利的坚强保障。凡属国人，必须循此前进。我陕甘宁边区[2]军民，服从政府领导，努力救亡事业。凡所实施，光明正大。艰苦奋斗，不敢告劳。全国人民，交口称誉。本府本处，亦惟有激励全区民众，继续努力，以求贯彻。不

---

[1] 这个布告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的，目的是对付蒋介石集团的破坏活动。当时国共合作成立不久，蒋介石集团即阴谋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破坏陕甘宁边区，是这种阴谋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为了保护革命的利益，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这个布告打击了当时共产党内一部分同志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对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甘边和陕北领导革命游击战争，逐步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1935年夏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以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此时称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使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陕甘边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36年红军西征甘肃、宁夏，在陕甘宁三省边境地区又开辟了新的根据地。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共辖23个县。

许一人不尽其职，一事不利救亡。乃近查边区境内，竟有不顾大局之徒，利用各种方式，或强迫农民交还已经分得的土地房屋，或强迫欠户交还已经废除的债务[1]，或强迫人民改变已经建立的民主制度，或破坏已经建立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民众团体的组织。甚至充当暗探，联络土匪，煽动部队哗变，实行测绘地图，秘密调查情况，公开进行反对边区政府的宣传。上述种种行为，显系违反团结抗日的基本原则，违反边区人民的公意，企图制造内部纠纷，破坏统一战线，破坏人民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威信，增加抗日动员的困难。察其原因，不外有少数顽固分子，不顾民族国家利益，恣意妄为。甚有为日寇所利用，假借名义，作为掩护其阴谋活动的工具。数月以来，各县人民纷纷报告，请求制止，日必数起，应接不暇。本府本处，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起见，对于上述行为，不得不实行取缔。合亟明白布告如次：

（一）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属于边区管辖地域内，一切已经分配过的土地房屋和已经废除过的债务，本府本处当保护人民既得利益，不准擅自变更。

（二）凡在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及其他民众团体，本府本处当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

---

[1] 在陕甘宁边区内，大部分地方原已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和废除农民原先所负债务的政策。1936年，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决定停止没收开明绅士的土地。1937年，又宣布以减租减息的政策代替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同时宣布坚决保障农民已经从土地改革中所获得的果实。

（三）凡属有利抗日救国的事业，本府本处在坚决执行《抗战建国纲领》[1]的原则下，无不乐于推行。对于善意协助的各界人士，一律表示欢迎。但是凡未经本府或本处同意并取得本府或本处的证明文件，而从外面进入边区境内停留活动之人，不论其活动的事务属于何项，一律禁止，以防假冒，而杜奸宄。

（四）当此抗战紧张期间，凡在边区境内从事阴谋破坏，或肆意捣乱，或勾引煽惑，或暗探军情的分子，准许人民告发。证据确实者，准许就地逮捕。一经讯实，一律严惩不贷。

右列四条，全边区军民人等一律遵照，不得违背。倘有不法之徒，胆敢阴谋捣乱，本府本处言出法随，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布。

---

[1] 《抗战建国纲领》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同时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关于接待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电报[1]

（1938年5月19日）

各政治部：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抗战文艺工作团[2]一组计五人，由刘白羽[3]率领，随同美国参赞卡尔逊，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到希接洽，并予以帮助。

毛　谭

皓[4]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给陕甘宁边区、晋绥军区各机关、部队政治部的电报。

[2] 抗战文艺工作团，是由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的，于1938年5月中旬成立。其任务是：搜集战地材料，反映前线生活，推动文艺运动，建立文艺组织。该团先后共派出六组到各地开展工作。

[3] 刘白羽（1916—2005），北京人，作家。当时是抗战文艺工作团第一组组长。

[4] 皓，即19日。电报中常以诗词韵目代日。“皓”韵在第19组，即代指19日。

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1]

（1938年5月20日）

朱、彭，刘、徐、邓，并告陈、周、叶[2]：

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彼时蒋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提，也不应向李白程[3]等提，只是自己预作准备，那时刘林两师[4]将作整个新的部署。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越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南渡黄河不成问题。

毛

二十日辰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指陈绍禹（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分管军事。

[3] 李，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刘林两师，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师长分别为刘伯承和林彪。

在抗大对第三期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

（1938年5月21日）

十年来的战争经验使我们在军事上形成了路线，但见之于文字的却不多。过去对战略比较忽略，现在我们提倡写书，提高战略空气，中央组织部因此也发起抗日战争研究会。军队在军事指挥上应强调单一的指挥，强调服从，而官兵政治上平等，生活上同艰苦，这就是民主。

---

[1] 1938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抗大对第三期进行总结的干部会议并讲话，讲安心当教员、编教材和军队的民主等问题。他说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下决心当教员，办好抗大，十分重要。他强调要编游击战、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教材，并说游击战争教材由他负责，战略教材他负担一部分。这是他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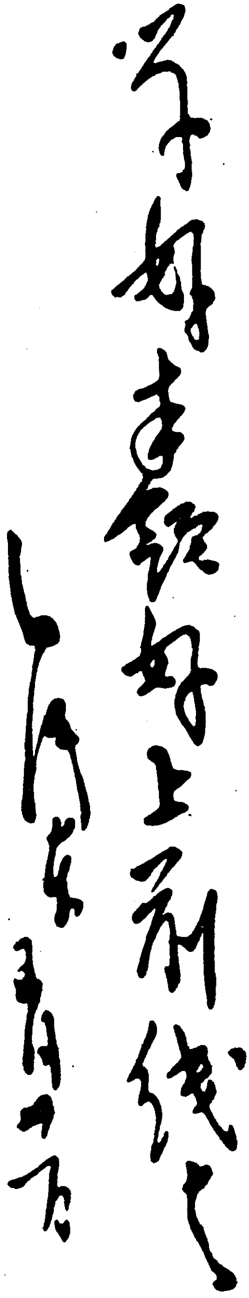
为抗大第四期开学题词

（1938年5月21日）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毛泽东

五月廿一



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

毛泽东

五月廿六

毛泽东为抗大第四期开学的题词。

抗战开始后，延安成了抗战的旗帜，大批爱国青年纷纷涌入延安。图为长途跋涉奔向延安的爱国青年。

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学生在奔赴延安的途中。

全国各地进步青年学生在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门前整装待发，准备奔赴延安。

国民党阻止爱国青年去延安的关卡之一：咸阳桥。

电贺各警备兵团“五三十”抗运大会

（1938年5月22日）

各兵团首长并传全体指战员：

当日寇不断地向我们作更残酷的进攻的时候，我们后方各兵团能以紧张战斗的精神来完成当前的战斗和教育任务，使得部队基础更进一步地巩固和提高，这是我们深感欣慰的。

各兵团“五三十”抗战动员运动大会，是检阅和整饬我们战斗力量的一天。希望在这次大会上，好好检阅自己工作的优缺点，作为今后工作的指导方针，使今后工作能在现有进步的基础上更向正规化的道路迈进！

目前日寇正在疯狂地进攻陇海徐州，再图进攻武汉西安，全国抗战必须有长期艰苦斗争的精神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每个指挥员战斗员在此次抗战动员运动大会中及其以后，要更加发扬高度的战斗精神，提高政治警觉性，消灭部队中一切不良倾向，巩固和整饬自己的力量，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为保卫河防边防，为保卫西北，为保卫全中国，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特电致贺，并祝大会胜利，及诸位同志的健康！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给毛宇居[1]的信

（1938年5月26日）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读。谭季余[2]以不来为上。楚雄[3]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4]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远耀[5]等在此甚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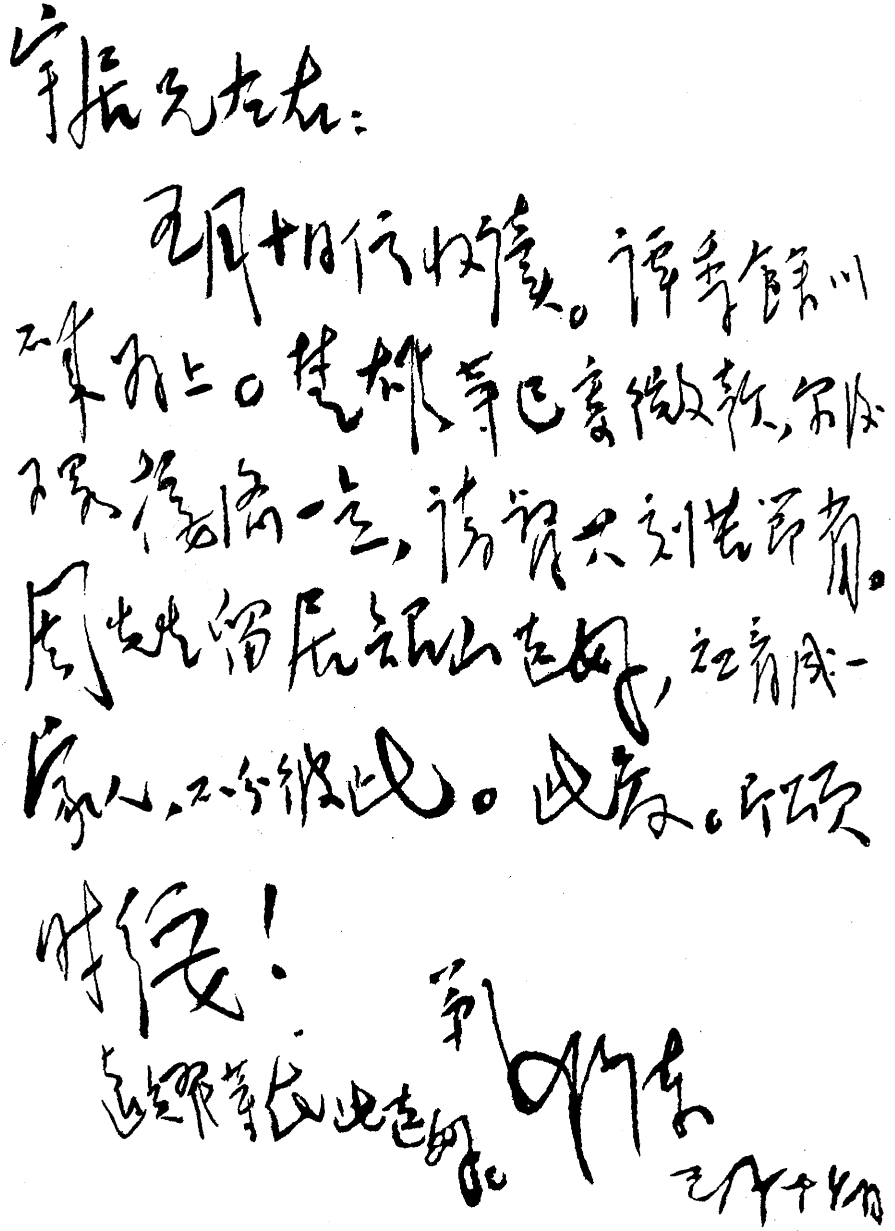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2] 谭季余，毛泽东的亲戚。1938年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延安。

[3] 楚雄，即毛楚雄，毛泽覃之子。当时他随外祖母在韶山冲居住。1945年去延安。1946年牺牲。

[4] 指毛楚雄的舅父周祖余。当时住在韶山冲毛泽东旧居。

[5] 远耀，即毛远耀，毛宇居之侄。当时在延安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



宇居兄左右：

三月十日信收读。谭季余翁川资寄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宗族不宜修谱一事，请[illegible]为荷。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但须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

时绥！

弟 毛泽东

近邻等处均此告好。

三月十四日

毛泽东致毛宇居信的手稿。

在华北应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

（1938年5月26日）

朱、彭、傅，陈、罗，贺、萧、关、甘，刘、徐、邓，聂，彭，叶、项，郭、黎[2]：

甲、徐州失守后，判断敌将以进攻武汉为作战计划之中心。

乙、以为敌置武汉抗日的重心于不顾，而将主力立即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击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的估计，是不适当的。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

丙、如果欧洲发生战争或重大危机，敌将迅速进攻广东。

丁、我们的口号是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坚持华北游击战争。

戊、在上述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部主任。贺、萧、关、甘，指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副师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副主任。刘、徐、邓，指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晋察冀代表。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郭、黎，指郭洪涛、黎玉，当时分别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和副书记。

目前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1]及大青山脉[2]。

毛

二十六日

---

[1]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2] 大青山脉，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土默川平原以北，属阴山山脉中段。

抗日战争没有战略进攻
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1]

（1938年5月28日）

抗日战争当然没有什么战略进攻，只有战役反攻及战略反攻，是整个战略防御中积极的部分，靠此部分战胜日本，通俗地说，谓之进攻当然也是可以的。

毛

二十八日

---

[1] 1938年毛泽东在主持编写《抗日战争丛书》时，指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处同志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是他给秘书处一位同志的复信。

给刘雪苇的信

（1938年5月28日）

雪苇同志：

收到了[1]，谢谢！

我已看了“座谈会记录”[2]，很欢喜。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

[1] 指刘雪苇给毛泽东的信和转交的《七月》杂志。刘雪苇（1912—1998），又名孙雪苇，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文学评论家。当时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汉口《七月》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嘱分赠一本给你，现特转上，祈查收。”

[2] 指《七月》半月刊在这期登载的题为《宣传、文学、旧形利用》的座谈会记录。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胡风、聂绀弩、吴组湘、欧阳凡海、鹿地亘、艾青、吴奚如、池田幸子。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

（1938年5月）

第一章　为什么提起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这一点，我们已经正确地解决了。那末，游击战争就只有战术问题，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

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能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

---

[1]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而只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批驳了这种观点，同时写了这篇文章，指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1937年只有4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100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使蒋介石在抗日时期既不敢投降日本，又不敢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而到1946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

小国，又不像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占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中国的进步，就是说有共产党领导的坚强的军队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存在，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等一全套的东西都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随之也是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等等也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中，都是颇为新鲜的事情。这件事是同时代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一事分不开的，是同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分不开的，这乃是问题的焦点所在。我们的敌人大概还在那里做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国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梦。这等梦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现实的价值，因为今天的中国比之上述历史多了一些东西，颇为新鲜的游击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点。假如我们的敌人少估计了这一点，他们就一定要在这一点上面触一个很大的霉头。

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然处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那末，为什么不将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用之于游

击战争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本来是密切地联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许多东西二者都是一致的。然而游击战争又区别于正规战争，它本身有其特殊性，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许多特殊的东西；抗日战争的一般战略问题中的东西，决不能照样用之于特殊情形的游击战争。

第二章　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在具体地说到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先，还要说一说战争的基本问题。

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这个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何以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每一战争都须支付代价，有时是极大的代价，岂非和“保存自己”相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正确点说，是相反相成的。因为这种牺牲，不但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必要，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必要——部分的暂时的“不保存”（牺牲或支付），是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所必需的。在这个基本的原则上，发生了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一系列的所谓原则，从射击原则（荫蔽身体，发扬火力，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起，到

战略原则止，都贯彻这个基本原则的精神。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则，都是执行这个基本原则时的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

第三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六个具体战略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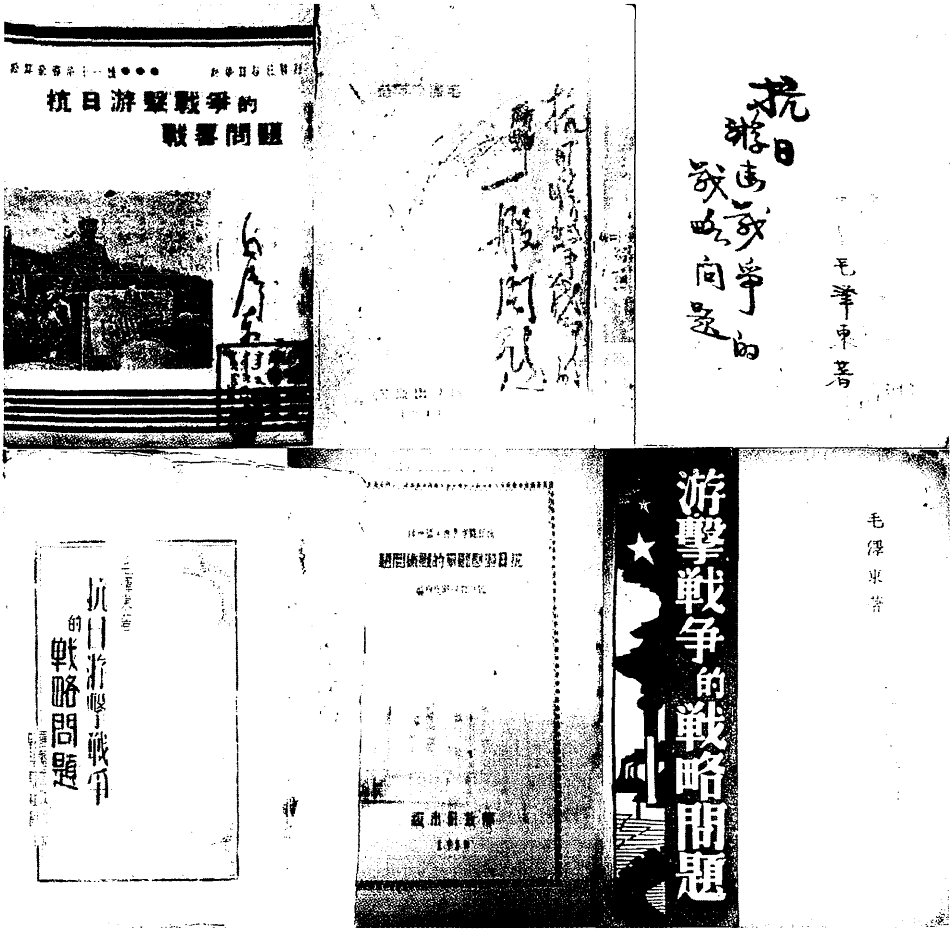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来看，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呢？因为抗日战争中（乃至一切革命战争中）的游击队一般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故在保存自己之外，还须加上一个发展自己。所以问题是：应该采取些什么方针或原则才能达到保存或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目的呢？

总的说来，主要的方针有下列各项：（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三）建立根据地；（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五）向运动战发展；（六）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全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第四章　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这里又可以分为四点来说：（一）防御和进攻，持久和速决，内线和外线的关系；（二）一切行动立于主动地位；（三）灵活地使用兵力；（四）一切行动的计划性。

先说第一点。


抗日游擊戰爭的
戰略問題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著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毛澤東著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阐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战略战术原则，对提高中国共产党指导战争的战略思想水平、坚定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起了重要作用。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部分版本。

整个的抗日战争，由于日寇是强国，是进攻的，我们是弱国，是防御的，因而决定了我们是战略上的防御战和持久战。拿作战线来说，敌人是外线作战，我们是内线作战。这是一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又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敌军虽强（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不多，我军虽弱（同样，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某些素质，某些条件），但是数量甚多，加上敌人是异民族侵入我国，

我们是在本国反抗异民族侵入这个条件，这样就决定了下列的战略方针：能够而且必须在战略的防御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在战略的持久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之中采取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正规战争是如此，游击战争也是如此。游击战争所不同的，只是程度上或表现形式上的问题。游击战争是一般地用袭击的形式表现其进攻的。正规战争虽然也应该而且能够采用袭击战，但是其出敌不意的程度比较小一些。在游击战，速决性的要求是很大的，战役和战斗中包围敌人的外线圈则很小。这些都是和正规战不同的地方。

由此可知，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而要力戒消极防御，力戒拖延，并力戒临战分散兵力。当然，游击战争中不但战略上有防御，战术上也是有防御的；战斗时的钳制和警戒方面，隘路、险地、河川或村落等处为着消耗敌人和疲惫敌人的抵抗配置，退却时的掩护部队等等，都是游击战争中战术上的防御部分。然而游击战争的基本方针必须是进攻的，和正规战争比较起来，其进攻性更加大些，而且这种进攻必须是奇袭，大摇大摆大吹大擂地暴露自己，是较之正规战更加不能许可的。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仍须集中其主要的

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

由此也就可知，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多，即是使得很多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都能因迅速解决战斗之故而取得了胜利，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一方面争取时间加强抗战力量，同时促进和等候国际形势的变动和敌人的内溃，以便举行战略反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也只有每战集中优势兵力，不论在战略防御时期也好，在战略反攻时期也好，一律采取战役和战斗中的外线作战，包围敌人而消灭之，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消灭所包围之全部，也消灭所包围之一部，不能大量俘虏所包围之敌，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敌。集合很多这样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最后配合国际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共同围剿日本帝国主义而一举消灭之。这些结果，主要地依靠正规战取得，游击战只有次一等的成绩。但是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游击战争在抗日过程中起着伟大的战略作用，就是说的这一点。

现在来说游击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问题。

游击战争的主动性是什么呢？

一切战争的敌我双方，都力争在战场、战地、战区以至整个战争中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即是军队的自由权。军队失掉了主动权，被逼处于被动地位，这个军队就不自由，就有被消灭或被打败的危险。本来战略的防御战和内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困难些，而

进攻的外线作战，争取主动较为容易些。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弱点，即是兵力不足和异国作战。并且因其对中国力量的估计不足和日本军阀的内部矛盾，产生了许多指挥的错误，例如逐渐增加兵力，缺乏战略的协同，某种时期没有主攻方向，某些作战失去时机和有包围无歼灭等等，可以说是他的第三个弱点。这样，兵力不足（包括小国、寡民、资源不足和他是封建的帝国主义等等），异国作战（包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和野蛮性等等），指挥笨拙，使得日本军阀虽然处在进攻战和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但其主动权却日益减弱下去。日本目前还不愿也不能结束战争，它的战略进攻也还没有停止，但是大势所趋，它的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三个弱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无限止地吞灭全中国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天日本要处于完全的被动地位，这种情况现在就可以开始看出来。中国方面，开始时战争颇处于被动，现在因有了经验，正在改取新的运动战的方针，即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速决战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加上普遍发展游击战的方针，所以主动地位正在日益建立起来。

游击战争的主动权问题，是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游击队大多处于严重的环境，这就是无后方作战的状态，敌强我弱的状态，缺乏经验的状态（这是说那些新成立的游击队）和不统一的状态等等。但是游击战争是能够建立其主动权的，主要的条件就是抓住上述敌人的三个弱点。欺他兵力不足（从整个战争看来），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广大的活动地区；欺他是异民族，且执行极端的野蛮政策，游击队就可以放手争取千百万人民的拥护；欺他指挥笨拙，游击队就可以放手发挥自己的聪明。一切敌人的这些弱点，正规军也应捉住，作为自己战胜敌人的资本，但游击队尤其应当注意捉住。游击队自己的弱点，可以在斗争中逐渐减少。且其弱点有时正成为

争取主动地位的条件，例如正是因为自己弱小，才利于在敌人后方神出鬼没地活动，敌人无奈他何，这样大的自由是庞大的正规军所不能得到的。

游击队的主动权，在敌人举行数路围攻的场合，是难于掌握和容易丧失的。在这种场合，如果估计和处置得不正确，就容易处于被动，因而打不破敌人的围攻。在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也有这种情形。所以主动权是从正确的情况估计（敌我双方的情况）和正确的军事政治处置产生的。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入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客观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不需要的那种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入悲观者一路。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从虚心研究和正确地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

已经因为估计和处置错误，或者因为不可抗的压力，被迫处于被动地位了的时候，这时的任务就是努力脱出这种被动。如何脱出法，须依情况而定。在许多情况下，“走”是必须的。游击队的会走，正是其特点。走是脱离被动恢复主动的主要的方法。但是不限于这一方法。往往在敌人十分起劲自己十分困难的时候，正是敌人开始不利，自己开始有利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情形，有利的情况和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现在来说灵活性。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是游击战争比较正规战争更加需要的。

必须使游击战争的指导者明白，灵活地使用兵力，是转变敌我

形势争取主动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根据游击战争的特性，兵力的使用必须按照任务和敌情、地形、居民等条件作灵活的变动，主要的方法是分散使用、集中使用和转移兵力。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对于使用游击队，好像渔人打网一样，要散得开，又要收得拢。当渔人把网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浅、流的速度和那里有无障碍，游击队分散使用时，也须注意不要因情况不明、行动错误而受损失。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打鱼要时常变换地点，游击队也要时常变换位置。分散、集中和变换，是游击战争灵活使用兵力的三个方法。

一般地说来，游击队当分散使用，即所谓“化整为零”时，大体上是依下述几种情况实施的：（一）因敌取守势，暂时无集中打仗可能，采取对敌实行宽大正面的威胁时；（二）在敌兵力薄弱地区，进行普遍的骚扰和破坏时；（三）无法打破敌之围攻，为着减小目标以求脱离敌人时；（四）地形或给养受限制时；（五）在广大地区内进行民众运动时。但不论何种情况，当分散行动时都须注意：（一）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于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地平均分散，一则便于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则使分散执行的任务有一个重心；（二）给各分散部队以明确的任务、行动的地区、行动的时期、集合的地点、联络的方法等。

集中使用兵力，即所谓“化零为整”的办法，多半是在敌人进攻之时为了消灭敌人而采取的；也有在敌人取守势时，为了消灭某些驻止之敌而采取的。集中兵力并不是说绝对的集中，集中主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对其他方面则留置或派出部分兵力，为钳制、扰乱、破坏等用，或作民众运动。

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兵力或集中兵力，是游击战争的主要的方法，但是还须懂得灵活地转移（变换）兵力。当敌人感到游击队对他有了大的危害时，就会派兵镇压或举行进攻。因此，游击队要考虑情况，如果可以打时，就在当地打仗；如果不能打时，就应不失时机，迅速地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有时为着各个击破敌人，有刚才在这里消灭了敌人，又立即转移到另一方向去消灭敌人的；也有在这里不利于战斗，要立即脱离此敌转移到另一方向去进行战斗的。如果敌情特别严重，游击部队不应久留一地，要像流水和疾风一样，迅速地移动其位置。兵力转移，一般都要秘密迅速。经常要采取巧妙的方法，去欺骗、引诱和迷惑敌人，例如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即打即离、夜间行动等。

分散、集中和转移的灵活性，都是游击战争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死板、呆滞，必至陷入被动地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但领导者的聪明不在懂得灵活使用兵力的重要，而在按照具体情况善于及时地实行分散、集中和转移兵力。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

最后说到计划性问题。

游击战争要取得胜利，是不能离开它的计划性的。乱干一场的想法，只是玩弄游击战争，或者是游击战争的外行。不论是整个游击区的行动或是单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行动，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事和政治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划，装备的整理，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等，都要包括在领导者们的过细考虑、切实执行和检查执行程度的工作之中。没有这个条件，什么主

动、灵活、进攻等事，都是不能实现的。固然正规战争的计划性更大些，游击战争的条件不容许很大的计划性，如果企图在游击战争中实行高度的严密的计划工作，那是错误的；但依照客观条件允许的程度，采取尽可能的严密的计划，则是必要的，须知同敌人斗争是一件不能开玩笑的事情。

上面所说的各点，说明了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第一个问题——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游击战争战略原则的最中心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游击战争的胜利就有了军事指导上的重要的保证。

这里虽说了许多的东西，但一切都环绕于战役和战斗的进攻。主动地位只有在进攻胜利之后，才能最后地取得。一切进攻战也都要主动地组织之，不要被迫地采取进攻。灵活地使用兵力，环绕于为着进攻战这个中心；计划性的必要，主要地也是为了进攻的胜利。战术上的防御手段，离开直接或间接协助进攻，则毫无意义。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进攻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也是保存自己的主要手段，单纯的防御和退却，对于保存自己只有暂时的部分的作用，对于消灭敌人则完全无用。

这个原则，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是基本上同一的，只在表现形式上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游击战争中注意这个不同是重要的和必要的。正是因为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使游击战争的作战方法区别于正规战争的作战方法；混淆了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游击战争是不能胜利的。

第五章　和正规战争相配合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二个问题，是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的问题。这是依据游击战争具体行动的性质，说明它在作战上和正规战争的关系。认识这种关系，对于有效地战胜敌人，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有三种：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斗的。

整个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所起的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的作用，和给予全国正规军和全国人民精神上的鼓励等等，都是战略上配合了正规战争。例如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平绥、平汉、津浦、同蒲、正太、沪杭诸铁路线两旁的游击战争，所起战略的配合作用，更加容易看到。它们不但在现时敌人举行战略进攻时配合正规军起了战略防御的作用；又不但在敌人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时，将配合正规军妨碍敌之保守；而且将于正规军举行战略反攻时，配合正规军击退敌军恢复整个的失地。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伟大的配合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领导者们，都应明确地认识其作用。

不但如此，游击战争还有其战役的配合作用。例如，太原北部忻口战役时，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争破坏同蒲铁路、平型关汽车路、阳方口汽车路，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是很大的。又如敌占风陵渡后，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主要是由正规军进行

的），对于配合陕西、河南两省沿黄河西南两岸的防御战，所起的战役配合作用更是很大的。再如敌攻鲁南时，整个华北五省的游击战争，对于配合鲁南我军的战役作战，也尽了相当的力量。在这个任务上，一切处于敌后的游击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或临时被派出的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好好地配置自己的力量，各依当时当地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向着敌人最感危害之点和薄弱之点积极地行动起来，达到削弱敌人、钳制敌人、妨碍敌人运输和精神上振奋内线上各个战役作战军之目的，尽其战役配合的责任。如果各游击区或各游击队只是各干各的，不顾战役作战的配合，虽在总的战略作战上仍不失其配合作用，但由于没有战役作战的配合，也就减少了它们的战略配合的意义。这一点是一切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应该深切地注意的。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

最后，战斗的配合，即战场作战的配合，是一切内线战场附近的游击队的任务，这一项当然只限于靠近正规军的游击队，或临时从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在这种场合，游击队应该依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担负其所指定的任务，往往是担负钳制部分的敌人，妨碍敌之运输，侦察敌情，充当向导等。没有正规军首长的指示时，游击队也应自动地做这些事。坐视不理，不游不击，或游而不击的态度，是要不得的。

第六章　建立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随着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

的。因为失地的恢复须待举行全国的战略反攻之时，在这以前，敌人的前线将深入和纵断我国的中部，小半甚至大半的国土被控制于敌手，成了敌人的后方。我们要在这样广大的被敌占领地区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争，将敌人的后方也变成他们的前线，使敌人在其整个占领地上不能停止战争。我们的战略反攻一日未能举行，失地一日未能恢复，敌后游击战争就应坚持一日，这种时间虽不能确切断定，然而无疑地是相当地长，这就是战争的长期性。同时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的利益，必将日益加紧地对付游击战争，特别在其战略进攻停止之后，必将残酷地镇压游击队。这样，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能支持的。

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

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的破产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要或不要根据地、重视或不重视根据地的问题，换句话说，根据地思想和流寇主义思想的斗争的问题，是任何游击战争中都会发生的，抗日游击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是例外。因此，同流寇主义作思想斗争，将是一个不可少的过程。

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

在说明了根据地的必要和重要性之后，下面的问题是实行建立根据地时必须认识和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几种根据地，游击区和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第一节　几种根据地

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

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1]、五台山[2]、太行山[3]、泰山[4]、燕山[5]、茅山[6]等

---

[1] 长白山是中国东北边境的山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长白山区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

[2] 五台山是山西东北部延至河北边界的山脉。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以五台山为依托，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3] 太行山是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的山脉。1937年10月，八路军一二九师向太行山区挺进；11月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4] 泰山在山东中部，是泰沂山脉的主峰之一。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依托泰沂山区，为创建鲁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 燕山是河北省东北部的山脉。1938年夏，八路军第四纵队进入冀东的燕山地区。1939年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后来发展成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6] 茅山在江苏省南部。1938年6月和7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先后从安徽南部进入苏南，开创以茅山山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

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1]。大抵当敌人结束了他的战略进攻，转到了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时，对于一切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残酷进攻的到来，是没有疑义的，平原的游击根据地自将首当其冲。那时，在平原地带活动的大的游击兵团将不能在原地长期支持作战，而须按照情况，逐渐地转移到山地里去，例如从河北平原向五台山和太行山转移，从山东平原向泰山和胶东半岛转移。但是保持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分处于广大平原的各县，采取流动作战，即根据地搬家，一时在此一时在彼的方法，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至于利用夏季的青纱帐和冬季的

---

[1] 抗日战争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平原地区能够建立长期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能够成为固定的根据地，这是由于地区的广大、人口的众多、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人民动员的普遍和敌人兵力的不足等等条件所决定的。毛泽东随后在具体的指示中即把这点加以明确地肯定了。

河川结冰之季候性的游击战争，那是断然可能的。在现时敌人无力顾及和将来顾及也难周到的条件下，确定在现时广泛地发展平原的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方针，在将来准备坚持小部队的游击战争，至少坚持季候性的游击战争，并建立非固定的根据地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

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历史上所谓“海盗”和“水寇”，曾演过无数的武剧，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不过，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这一方面。虽然主观条件还不具备，然而无疑地是应该注意和应该进行的。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

第二节　游击区和根据地

在处于敌人后方作战的游击战争面前，游击区和根据地是有区别的。在四围已被敌占但中间未被敌占或虽占而已经恢复的地区，例如五台山地区（即晋察冀边区）的某些县，太行山地区和泰山地区也有这种情形，这些都是现成的根据地，游击队据之以发展游击战争是很方便的。但在这些根据地的其他地方则不然，例如五台山地区的东部北部——即冀西察南的某些部分和保定以东沧州以西的

许多地方，在那里，游击战争在开始时期还不能完全占领该地，只能经常去游击，游击队到时属于游击队，游击队走了又属于伪政权，这样的地区就还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而是所谓游击区。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消灭或打败了许多敌人，摧毁了伪政权，发动了民众的积极性，组织了民众的抗日团体，发展了民众武装，建立了抗日政权，游击区就转化成了根据地。将这些根据地，增加到原有的根据地里面去，就叫做发展了根据地。

有些地方的游击战争，全部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例如冀东的游击战争。那里已有长期的伪政权，当地起义的民众武装和从五台山派去的游击支队，整个活动地区开始都是游击区。它们在开始活动时，只能在此区中选择好的地点作为临时的后方，或叫做临时根据地。要待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工作开展了之后，才能把游击区状态消灭，变为比较稳固的根据地。

由此可知，从游击区到根据地，是一个艰难缔造的过程，依消灭敌人和发动民众的程度如何而定其是否已从游击区过渡到了根据地的阶段。

有许多地区，将是长期地处于游击区状态的。在那里，敌人极力控制，但不能建立稳固的伪政权，游击战争也极力发展，但无法达到建立抗日政权的目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

至于敌人有强大力量控制着的大城市、火车站和某些平原地带，游击战争只能接近其附近，而不能侵入其里面，那里有比较稳固的伪政权，这又是一种情形。

由于我之领导错误或敌之强大压力的结果，可以使上述的情形发生相反的变化，即根据地化为游击区，游击区化为敌之比较稳固

的占领地。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值得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特别警戒。

所以，在整个敌占地区，经过游击战争和敌我双方斗争的结果，可以变为三种情况的地方：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

第三节　建立根据地的条件

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用这个部队去战胜敌人，发动民众。所以建立根据地问题，首先就是武装部队问题。从事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用全副精力去建立一支以至多支的游击部队，并使之从斗争中逐渐地发展为游击兵团，以至发展成为正规部队和正规兵团。建立武装部队是建立根据地的最基本一环，没有这个东西，或有了而无力量，一切问题都无从说起。这是第一个条件。

和建立根据地不能分离的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凡是被敌人控制的地方，那是敌人的根据地，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要把敌人的根据地变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非战胜敌人无从实现，这是自明之理。就是游击战争控制的地方，如果不粉碎敌人的进攻，不战胜敌人，自己控制的地方就要变成敌人控制的地方，也无从建立根据地。

和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

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要从这种斗争中去武装人民，即组织自卫军和游击队。要从这种斗争中去组织民众团体；无论是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商人、自由职业者，都要依据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斗争情绪提高的程度，将其组织在各种必要的抗日团体之内，并逐渐地发展这些团体。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从这种斗争中去发动民众建立或巩固当地的抗日政权。原来有中国政权未被敌人破坏的，则在广大民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去改造它和巩固它；原来的中国政权已被敌人破坏了的，则在广大民众努力的基础之上去恢复它。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

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

此外，还须指出的是地理和经济的条件。地理条件的问题，在说“几种根据地”时已经指出了三种不同的情形，这里只说主要的要求，即地区的广大。处在四面或三面被敌包围的中间，要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山地当然是最好的条件，但主要是须有游击队回旋的余地，即广大地区。有了广大地区这个条件，就是在平原也是能够发展和支持游击战争的，河湖港汊更不待说。这个条件已因中国领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一般地提供于中国的游击战争了。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

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

经济条件的性质，从其自然性一方面看来，也和地理条件相同。因为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有什么敌人，讨论的是在敌人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一切有中国人又有敌人的地方，不问其经济条件如何，都应尽可能地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永久的或临时的根据地。但从其政治性一方面看来则不然，这里的问题是存在的，这就是经济政策的问题，这一点对于建立根据地是带着严重性的。游击战争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即合理负担和保护商业，当地政权和游击队决不能破坏这种原则，否则将影响于根据地的建立和游击战争的支持。合理负担即实行“有钱者出钱”，但农民亦须供给一定限度的粮食与游击队。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乱没收一家商店。这是困难的事，但这是必须执行的确定的政策。

第四节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为了把侵入中国的敌人围困在少数的据点，即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之内，各个根据地上的游击战争必须极力向其根据地的四周发展，迫近一切敌人的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同时即发展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这是十分必要的。这里，要反对游击战争中的保守主义。保守主义不论是由于贪图安逸而发生的，或由于对敌

人力量的过高估计而发生的，均将给予抗日战争以损失，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本身也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不可忘记根据地的巩固，而其主要的工作是发动和组织民众，以及游击部队和地方武装的训练。这种巩固，是支持长期战争所必需，也是向前发展所必需的，不巩固就不能有力地向前发展。只知道发展忘记了巩固的游击战争，经不起敌人的进攻，结果不但丧失了发展，且有危及根据地本身之虞。正确的方针是巩固地向前发展，这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只要是长期战争，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是每个游击队经常发生的问题。具体解决时应依照情况去决定。某一时期，把重心放在发展方面，这就是推广游击区、扩大游击队的工作。另一时期，则把重心放在巩固方面，这就是组织民众、训练部队的工作。因为二者的性质不同，军事部署和工作执行随之而不同，必须依情况分时期有所侧重，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第五节　敌我之间的几种包围

从整个抗日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处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进攻和外线作战的方针，就使各个分进之敌的每一个处于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一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地区，后者例如晋西北地区。这是敌对于我的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战争根据地和正规军的战线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

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在河北、山东等省，亦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是我对于敌的第二种包围。由是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1]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我们就比敌人多了一个包围，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这一点在今天当然还没有实际意义，但不是没有这种前途的。

第七章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

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四个问题，是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里所述的进攻战方针在抗日游击战争处于防御姿势和处于进攻姿势中如何具体地应用的问题。

在全国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正确地说，战略反攻）中间，每一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上面及其周围，也有其小规模的战略防御和

---

[1] 围棋是中国的一种很古老的棋。双方的棋子互相包围，一方的一个或一群子被对方所包围，就被“吃”掉。但如果在被包围的一群子中保有必要的空格（“眼”），这群子就是“活”的，不被“吃”掉。

战略进攻，前者是敌取攻势我取守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后者是敌取守势我取攻势时的战略形势和战略方针。

第一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防御

在游击战争已经起来并有相当的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敌人停止了对我全国的战略进攻、采取保守其占领地的方针的时候，敌人向游击战争根据地的进攻是必然的。对于这种必然性的认识是必要的，否则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全无准备，一旦遇到敌人严重地进攻的形势，必至惊惶失措，被敌击破。

敌人为达到消灭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之目的，常会采取围攻的办法，例如五台山地区就已有了四五次的所谓“讨伐”，每次配置三路、四路以至六、七路的兵力，同时有计划地前进。游击战争发展的规模越大，其根据地所处的位置越重要，威胁敌人的战略基地和交通要道越大，敌人对于游击战争及其根据地的进攻也将会越厉害。所以，凡属敌人进攻游击战争越厉害之处，就证明那里的游击战争越有成绩，对于正规战争的配合也就越有作用。

在敌人数路围攻的情况之下，游击战争的方针是打破这种围攻，采取反围攻的形态。在敌数路前进，但每路只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部队，没有后续部队，不能沿途配置兵力、构筑堡垒、修筑汽车路的情况之下，这种围攻是容易打破的。这时，敌是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是防御和内线作战。我之部署应是以次要兵力钳制敌之数路，而以主要兵力对付敌之一路，采取战役和战斗的袭击战法（主要的是埋伏战），于敌行动中打击之。敌人虽强，经过多次的袭击，也就削弱下来，往往中途撤退，此时游击队又可于追击敌人时继续

袭击，再行削弱他。当敌人还没有停止进攻或实行退却之时，总是占据根据地内的县城或市镇，我便应包围这种县城或市镇，断绝其粮食来源和交通联络，等到敌人无法支持向后退走时，我便乘机追击之。一路打破之后，又转移兵力去打破敌之另一路，这样各个地击破敌之围攻。

在一个大的根据地内，例如五台山地区，是在一个“军区”之内分为四五个或更多的“军分区”的，每一军分区都有独立作战的武装部队。在上述作战方法之下，往往同时地或先后地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在反围攻的作战计划中，我之主力一般是位于内线的。但在兵力优裕的条件下，使用次要力量（例如县和区的游击队，以至从主力中分出一部分）于外线，在那里破坏敌之交通，钳制敌之增援部队，是必要的。如果敌在根据地内久踞不去，我可以倒置地使用上述方法，即以一部留在根据地内围困该敌，而用主力进攻敌所从来之一带地方，在那里大肆活动，引致久踞之敌撤退出去打我主力；这就是“围魏救赵”[1]的办法。

在反围攻的作战中，地方人民的抗日自卫军和一切民众组织，应全体动员起来参加战争，用各种方法帮助我军，反对敌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为了协助作战（坚

---

[1] 公元前354年，魏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西南）。第二年，齐国国君命田忌、孙膑率军救赵。孙膑认为魏军精锐在赵，内部空虚，主张引兵迅速进攻魏都，迫使魏军弃赵自救。田忌采纳了孙膑的意见。魏军果然回救本国。齐军乘魏军疲惫，在桂陵（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北）设伏袭击，大败魏军，赵国之围也随着解除。后来中国的军事家就用“围魏救赵”来说明类似的战法。

壁），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清野）。这里所说的清野，是指粮食成熟时早日收割的意思。

敌人退却时往往将所踞城市中的房屋和所经道路上的村庄放火烧毁，目的在给予游击战争根据地以破坏，但同时就使得敌人第二次进攻时没有房子住和没有饭吃，害了他们自己。这就是所谓在一件事情上面包含着两种互相矛盾的意义的具体例证之一。

不是在几经反围攻之后业已证明在那里无法打破严重的围攻时，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不应企图放弃那个根据地而跑到别的根据地去。在这里，应注意防止悲观情绪的发生。只要领导上不犯原则错误，一般的山岳地带，总是能够打破围攻和坚持根据地的。只有平原地带，如果在严重的围攻之下，就应根据具体情势，考虑下面的问题：留着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在当地分散活动，而将大的游击兵团暂时地转移到山地里去，等到敌人主力移动他去，我又再往那里活动。

由于中国地区广大、敌人兵力不足的矛盾情况，敌人是一般地不能采取中国内战时国民党的堡垒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某些特别威胁敌人要害的游击根据地中，敌人有可能采取相当程度的堡垒主义，要准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仍然坚持那里的游击战争。毫无疑义的，根据在内战时还能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在民族战争中当然更能够坚持。因为即使在兵力对比上，在某些根据地中，敌能使用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极端优势的兵力，但是敌我民族矛盾无法解决，敌之指挥弱点无可避免。我之胜利，就建立在深入的民众工作和灵活的作战方法之上。

第二节　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

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敌之新的进攻尚未到来的时候，是敌取战略守势我取战略攻势的时候。

这种时候，我之作战方针，不在于攻击不可必胜的、固守着防御阵地的敌人；而在于有计划地在一定地区内消灭和驱逐为游击队力能胜任的小敌和汉奸武装，扩大我之占领地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补充并训练部队，组织新的游击队。在这些任务做得有了些眉目之后，如果敌人还在守势之中，就可以进一步扩大我之新占领地区，攻击那些敌力薄弱的城市和交通线，依其情况而长久地或暂时地占领之。所有这些，都是战略进攻的任务，目的在于乘着敌取守势之时，有效地发展自己的军事的和民众的力量，有效地缩小敌人的力量，并准备敌人再度向我进攻时又能有计划地和有力地打破之。

部队的休息和训练是必要的，敌取守势时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训练的时机。不是一事不做专门关起门来休息和训练，而是在扩大占领地，消灭小敌，发动民众的工作中，争取时间达到休息和训练的目的。解决给养被服等困难问题，也往往在这个时候。

大规模地破坏敌之交通线，妨碍敌之运输，直接帮助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也在这个时候。

这时，整个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和游击部队，都是兴高采烈的时候，被敌摧残的地区也逐渐整理，恢复元气。敌占地区内的民众亦十分高兴，到处都传播游击队的声威。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因此，游击战

争的领导者们不可在自己的战略进攻中得意忘形，轻视敌人，忘记了团结内部、巩固根据地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这种时候，须善于观看敌人的风色，看其是否又有向我进攻的朕兆，以便一遇进攻，就能适当地结束我之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再从战略防御中粉碎敌人的进攻。

第八章　向运动战发展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第五个问题，是向运动战发展的问题，其必要和可能，也是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而来的。如果中国能迅速地战胜日寇，并迅速地收复失地，没有什么持久战，也不是什么残酷的战争，那末，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必要就不存在。然而情形是相反的，战争是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战争既是长期的和残酷的，就能够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地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其作战方式也将逐渐地正规化，游击战就变成运动战了。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

现在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例如五台山等处，是由正规军派出强大的支队去发展的。那里的作战虽然一般是游击战，但开始即包含了运动战的成分。随着战争的持久，这种成分将逐渐地增加。这是今天抗日游击战争的长处，不但使游击战争迅速地发展，并且使之迅速地提高，较之东三省的游击战争，条件优越得多了。

由执行游击战的游击部队化为执行运动战的正规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前者除直接动员人民加入部队外，

可采取集中小部队的办法；后者则依靠战争中的锻炼和提高武器的质量。

集中小部队，一方面，须防止只顾地方利益因而妨碍集中的地方主义；另一方面，也须防止不顾地方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

地方主义是存在于地方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间的，他们往往只顾地方的利益，忘记全局的利益，或贪图分散活动，不惯集团生活。主力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情形，采取逐渐地和部分地集中的办法，使地方保有余力能够继续地发展游击战争；采取首先协同行动然后实行合编以及不破坏其建制不撤换其干部的办法，使小集团能够融合于大集团。

单纯军事主义和地方主义相反，乃是主力部队里头的人们只图扩充自己不顾扶助地方武装的一种错误观点。他们不知道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并非废除游击战，而是在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之中逐渐地形成一个能够执行运动战的主力，环绕这个主力的仍然应有广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战争。这种广大的游击部队，造成这个主力的丰富的羽翼，又是这个主力继续扩大的不断的源泉。所以，主力部队的领导者如果犯了不顾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的单纯军事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加以克服，使主力的扩大和地方武装的繁殖，各得着适宜的位置。

提高质量，须在政治、组织、装备、技术、战术、纪律等各方面有所改进，逐渐地仿照正规军的规模，减少游击队的作风。政治上须使指挥员、战斗员们认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提高一步的必要性，鼓励大家为此而努力，并以政治工作去保障之。组织上须逐渐地具备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机关，军事和政治的工作人员，军事和政治的工作方法以及供给卫生等的经常制

度。装备方面，须提高武器的质量和种类，增加必要的通讯器材。技术和战术方面，从游击部队的技术和战术提高到作为一个正规兵团所必需的技术和战术。纪律方面，提高到整齐划一令行禁止的程度，消灭自由和散漫的现象。所有这些方面的完成，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不是一朝一夕的工程，然而必须向这个方向发展。只有这样，一个游击战争根据地上面的主力兵团才能造成，更有效力地打击敌人的运动战方式才能出现。这种目的，在有正规军派遣支队或派遣干部的地方，是能够比较顺利地达到的。因此，一切正规军均有扶助游击队向着正规部队发展的责任。

第九章　指挥关系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挥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

游击战争的指挥方法，由于游击部队是低级的武装组织和分散行动的特性，不容许高度的集中主义，如同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那样。如果企图拿正规战争的指挥方法施之于游击战争，必然地要束缚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而使游击战争毫无生气。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活泼性是正相反对的东西；对于这种高度活泼的游击战争，施之以高度集中的指挥制度，不但不应该，而且不可能。

然而游击战争不是不要任何的集中指挥就能够顺利地发展的。在有广大的正规战争，同时又有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的情况之下，使二者适当地配合行动是必要的，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规战争和游击战争配合行动的指挥，这就是国家参谋部和战区司令官关于战略作

战的统一指挥。在一个游击区或游击根据地里面，那里存在着多数的游击队，其中往往有一个至数个作为主力的游击兵团（有时还有正规兵团）和许多作为辅助力量的大小游击部队，还有不脱离生产的广大的人民武装，那里的敌人也往往成为一个局面，统一地对付游击战争。因此，就在这种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发生了统一指挥，即集中指挥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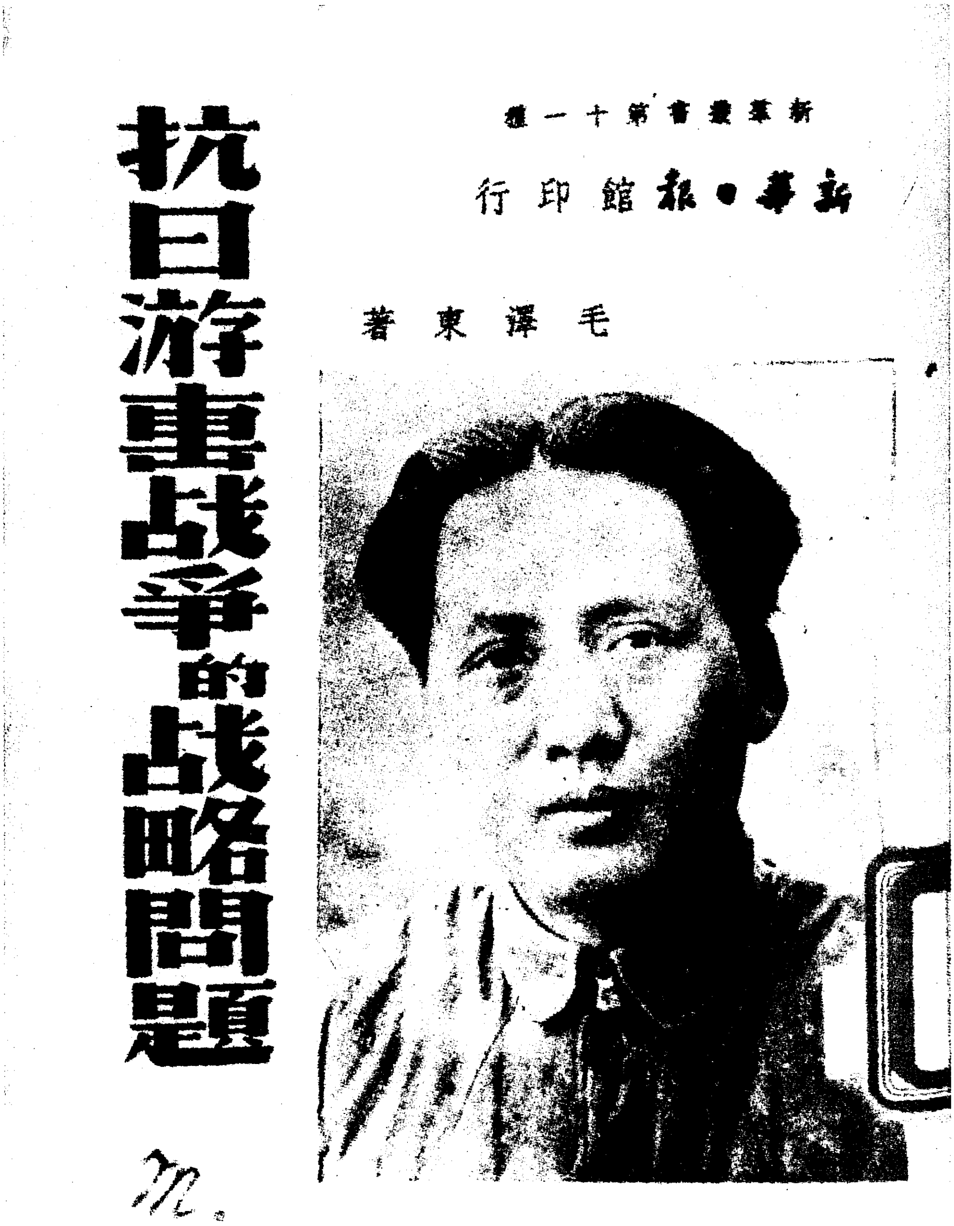
由此，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

战略的集中指挥，包括国家对于整个游击战争的部署，各个战区里面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的配合行动以及每个游击区或根据地里面对于全区抗日武装的统一指导。在这些上面的不协调、不统一、不集中，是有害的，应该尽可能地求得其协调、统一和集中。凡关于一般事项，即战略性质的事项，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接受上级的指导，以收协同动作之效。然而集中到此为止，过此限度，干涉到下级的具体事项，例如战役战斗的具体部署等等，同样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具体事项，必须按照随时变化随地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做，而这些具体情况，是离得很远的上级机关无从知道的。这就是战役和战斗的分散指挥原则。这个原则也一般地通用于正规战争的作战，特别是在通讯工具不完备的情况下。一句话，就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在游击根据地组成一个军区，其下分为几个军分区，军分区之下分为几个县，县之下分为几个区的情况，军区司令部、军分区司令部、县政府、区政府的系统是隶属关系，武装部队依其性质分别地隶属之。它们之间的指挥关系，根据上述的原则，一般的方针集

中于上级；具体的行动按照具体情况实施之，下级有独立自主之权。上级对下级某些具体行动有意见，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训令”提出，但决不应作为不可改变的“命令”。越是地区广大，情况复杂，上下级距离很远，这种具体行动就越应加大其独立自主的权限，越应使之多带地方性，多切合地方情况的要求，以便培养下级和地方人员的独立工作能力，应付复杂的环境，发展胜利的游击战争。如果是一个集中行动的部队或兵团，其内部指挥关系，适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因为情况是明了的；但是如果该部队或该兵团一旦分散行动，便又适用一般集中、具体分散的原则，因为具体的情况无从明了。

应该集中的不集中，在上者叫做失职，在下者叫做专擅，这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军事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应该分散的不分散，在上者叫做包办，在下者叫做无自动性，这也是在任何上下级关系上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上所不许可的。只有上述的原则，才是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针。



新華叢書第十一種

新華日報館印行

毛澤東著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問題

m.

新华日报馆印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挽王铭章将军联[1]

（1938年5月）

奋战守孤城[2]，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3]，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

[1] 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师长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使部队争得时间完成战斗任务，而王铭章本人却因城破与全师将士殉难。在武汉，国民政府举行公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联名送了这副挽联。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早年参加反清爱国运动。后在四川陆军军官学校专攻军事。193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师长。1938年3月任第四十一军前敌总指挥，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战役中，率部坚守滕县，与日军浴血奋战三昼夜，在17日的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

[2] 守孤城，指王铭章率部固守滕县。

[3] 强敌，指日寇。

为《五日时事》报题写报头[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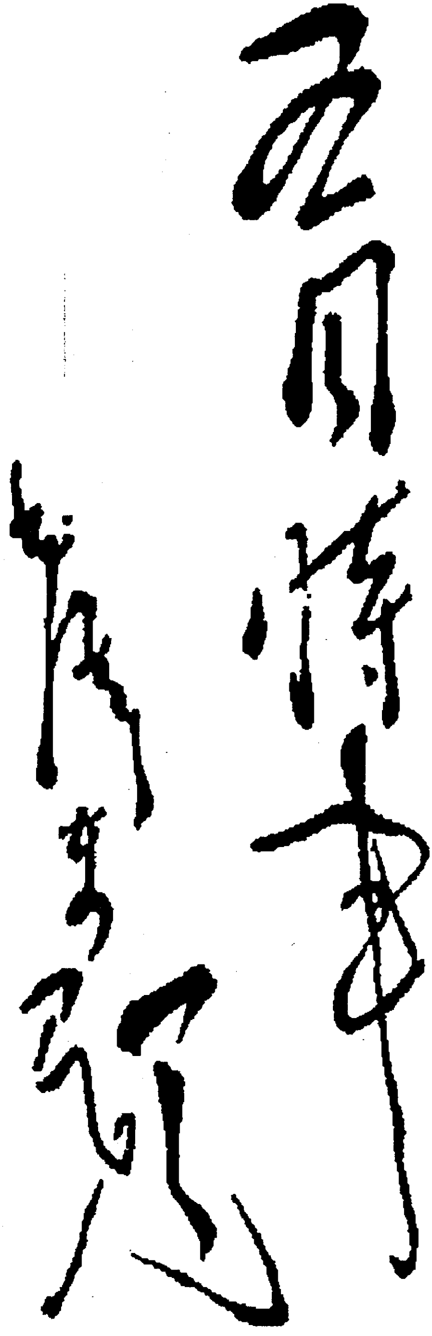
（1938年5月）

五日时事

毛泽东题

---

[1] 《五日时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晋西南区委员会机关报。1938年5月在山西省孝义县阳泉曲附近的张家庄出版发行。为四开油印小报。1940年9月18日《抗战日报》创刊时终止。毛泽东亲自题写了《五日时事》报头。这是全国唯一一份由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并留有落款的抗日根据地出版的报纸。



毛泽东为《五日时事》报题写的报头。

论持久战[1]

（1938年5月）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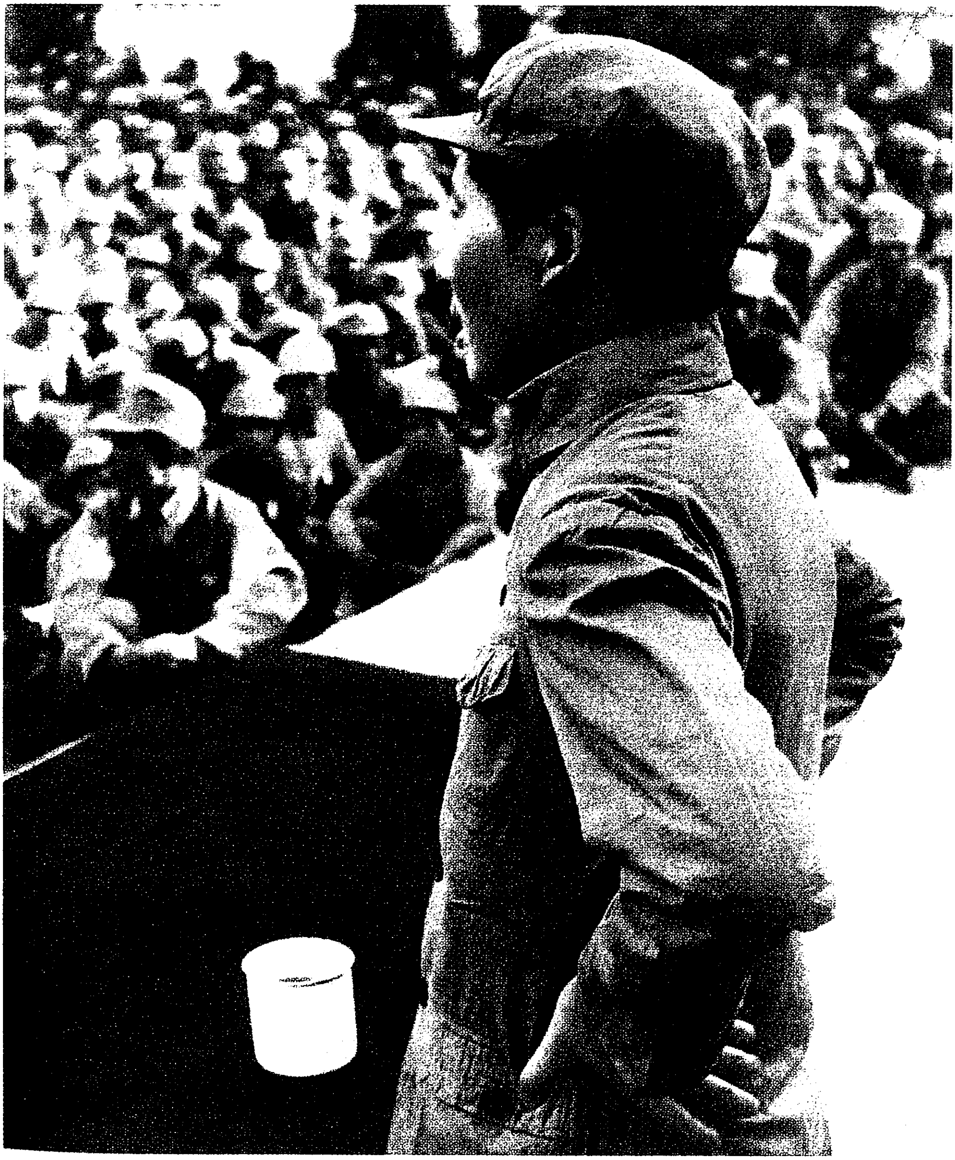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1]。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2]。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

---

[1] 这种亡国论是国民党内部分领导人的意见。他们是不愿意抗日的，后来抗日是被迫的。卢沟桥事变以后，蒋介石一派参加抗日了，汪精卫一派就代表了亡国论，并准备投降日本，后来果然投降了。亡国论思想不但是在国民党内存在着，在某些中层社会中甚至在一部分落后的劳动人民中也曾经发生影响。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抗日战争中节节失败，而日军则长驱直进，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就侵占了华北和华中的大片土地，因而在一部分落后的人民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

[2] 以上这些意见，都是共产党内的。在抗日战争的头半年内，党内存在着一种轻敌的倾向，认为日本不值一打。

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1]。台儿庄胜利[2]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3]。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

---

[1] 这是蒋介石等人的意见。蒋介石国民党既已被迫抗战，他们就一心希望外国的迅速援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更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2]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一带进行过一次会战。在这次会战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会战的胜利。

[3] 这是当时《大公报》在1938年4月25日和26日社评中提出的意见。他们从一种侥幸心理出发，希望用几个台儿庄一类的胜仗就能打败日本，免得在持久战中动员人民力量，危及自己阶级的安全。当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普遍有这种侥幸心理。

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计，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

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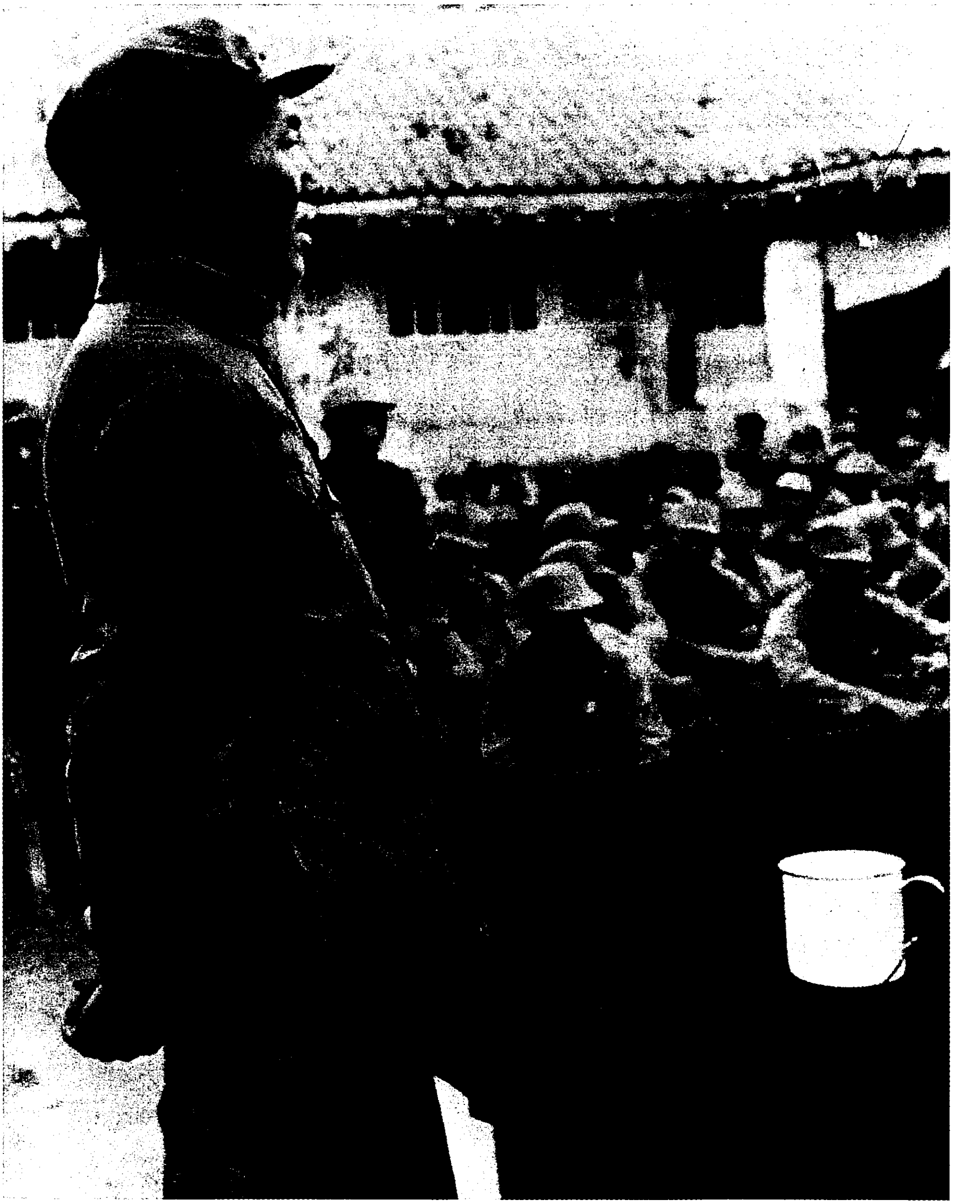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论持久战》报告。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

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

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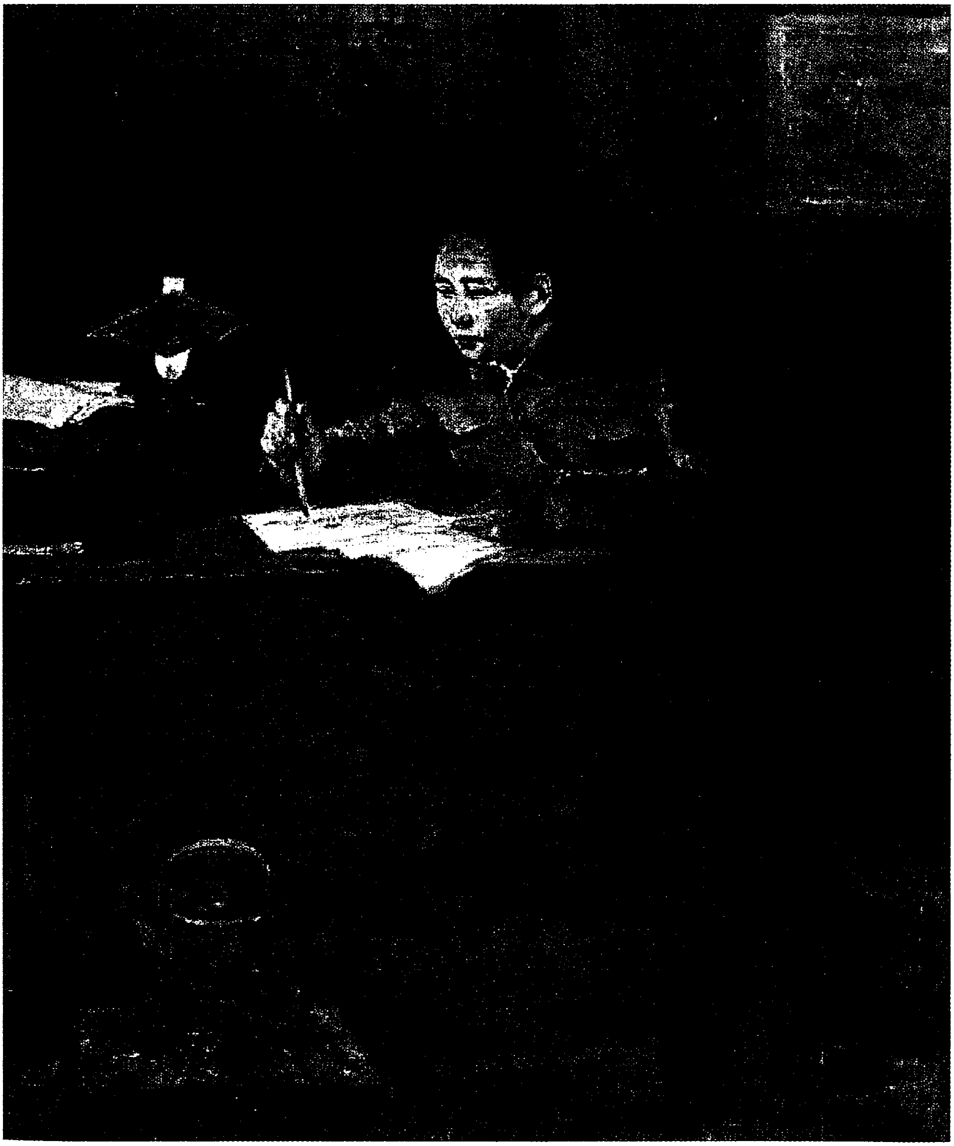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戰久持
毛澤東同志
肖像

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军事论文《论持久战》。图为新中国成立时出版的《论持久战》（部分版本）。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毛主席写〈论持久战〉》（油画）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

的许多特点。

（一〇）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

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1]，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

---

[1] 戊戌维新也称戊戌变法，是1898年（戊戌年）发生的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3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6人，变法遭到失败。

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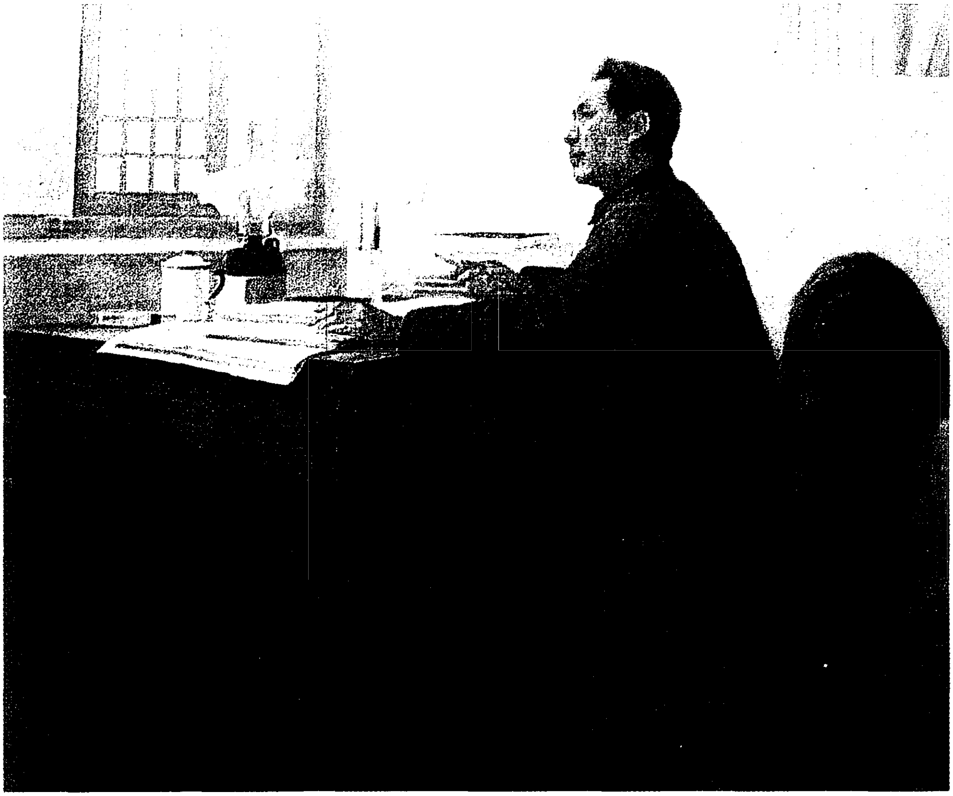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著作》（油画）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

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〇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

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

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

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〇）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

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1]，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

---

[1]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同时宣称由于国民党政府仍在“策划抗战”，日本政府决定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

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

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

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〇）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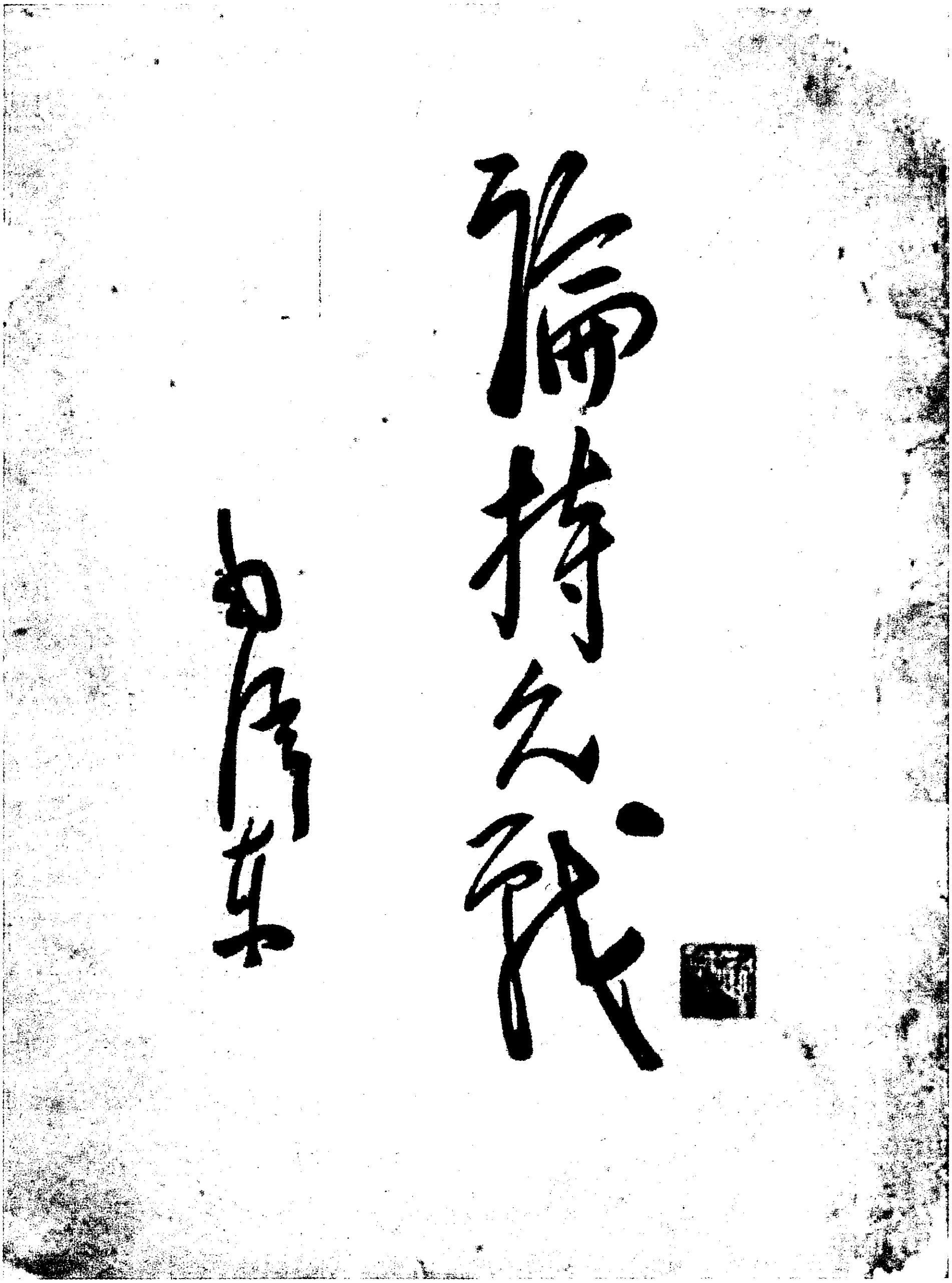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

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

敌败我胜的结果。



论持久战

毛泽东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论持久战》。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1]，他们的政府[2]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

---

[1] 这里主要是指美国。自1937年到1940年，美国每年输入日本的物资占日本全部进口额的1/3以上，其中战争物资占1/2以上。

[2] 指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

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

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

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

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末，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〇）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

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则，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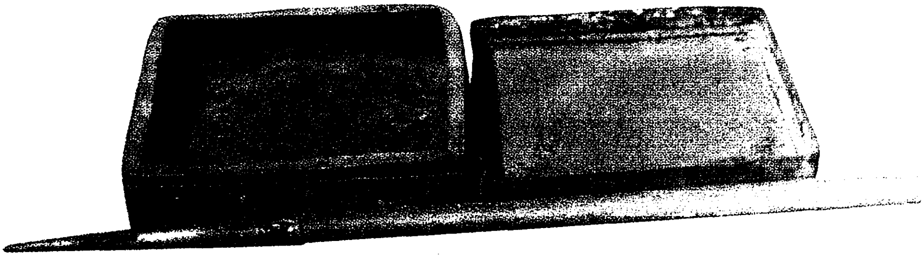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

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1]。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

[1] 毛泽东在这里所预言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中国方面可能的向上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是完全实现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则因为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不但没有向上变化，反而向下变化了。因为这样，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抗和觉悟。



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用过的墨盒和毛笔。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1]，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末，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

---

[1] “唯武器论”是认为中国武器不如日本，所以在战争中中国一定失败的论调。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们（包括蒋介石在内）都有这样的看法。

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末，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末，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〇）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

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

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

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1]。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

---

[1] 这个比喻里所引用的神话故事，参见明朝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第七回。这个神话故事说，孙悟空本是个猴子，他能够一个筋斗翻十万八千里，但是，他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上尽力翻筋斗，总是翻不出去。如来佛翻掌一扑，将五个手指化作五行山，把他压住。

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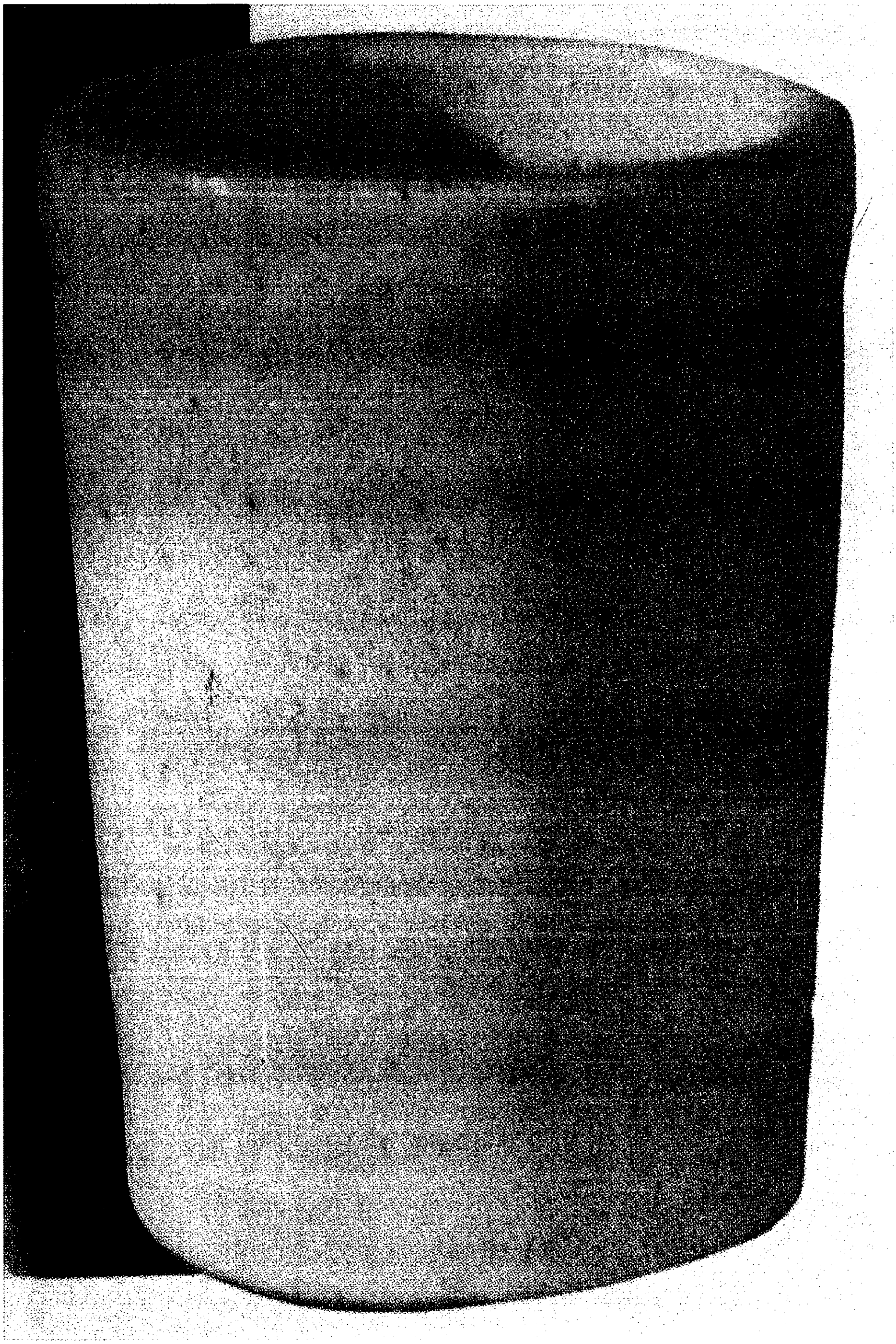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

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1]，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

[1] 1935年8月，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说：“法西斯是肆无忌惮的沙文主义和侵略战争。”1937年7月，他又发表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论文。



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时用的笔筒。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新華日報館印行
毛澤東著

1938年，新华日报馆印行的《论持久战》。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〇）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

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1]。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

---

[1] 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327页）。

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

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争的目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

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〇）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

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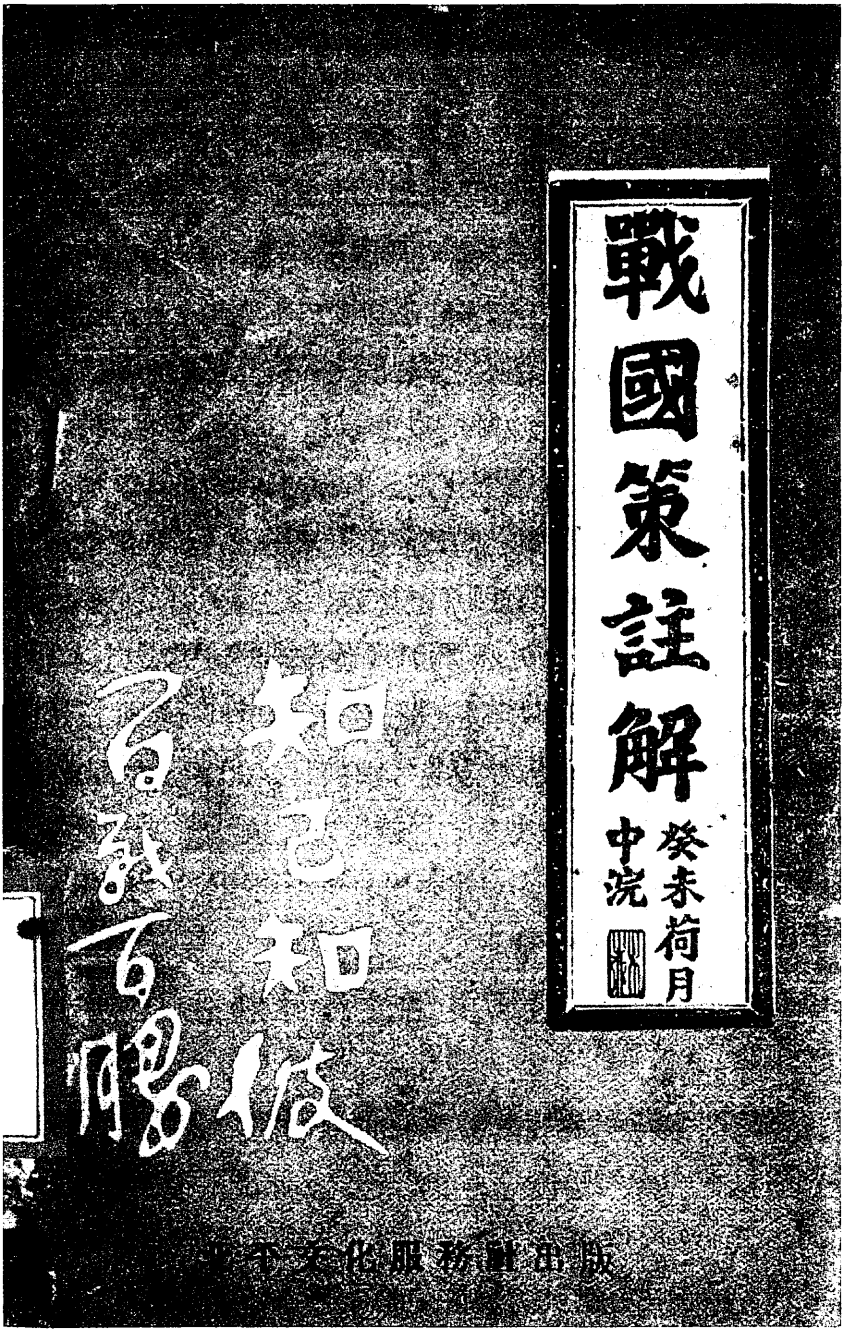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

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戰國策註解
癸未荷月
中浣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北平文化服務社出版

1938年7月，北平文化服务社以《战国策注解》为书名出版的《论持久战》伪装本。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

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〇）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

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他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

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已，百战不殆”[1]，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

[1] 参见《孙子·谋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1]，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2]，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3]，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

---

[1] 城濮，古地名，在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南。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90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的打击。然后，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2] 公元前204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陉（在今河北省井陉县）。赵军号称二十万，数倍于汉军。韩信背水为阵，率军奋战；同时，遣兵袭占赵军防御薄弱的后方，使其腹背受敌，遂大破赵军。

[3]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与英、普、奥、俄以及欧洲其他很多国家作战。在多次战争中，拿破仑的部队在数量上都不如他的敌人，但都得到了胜利。

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1]，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

---

[1] 公元383年，秦王苻坚出兵攻晋。他依仗优势兵力，非常轻视晋军。晋军打败了秦军的前锋，从水陆两路继续前进，隔淝水同秦军对峙。苻坚登寿阳城（今安徽省寿县）瞭望，见晋兵布阵严整，又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都是晋兵，觉得是遇到了劲敌，开始有惧色。随后在淝水决战中，强大的秦军终于被晋军打败。

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1]，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2]。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

---

[1] 蒋介石、汪精卫等在1927年背叛革命以后，进行10年的反人民战争，同时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法西斯统治。这就使得中国人民没有可能广泛地组织起来。这个历史错误是应该由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负责的。

[2] 宋襄公是公元前7世纪春秋时代宋国的国君。公元前638年宋国与强大的楚国作战，宋兵已经排列成阵，楚兵正在渡河。宋国有一个官员认为楚兵多宋兵少，主张利用楚兵渡河未毕的时机出击。但宋襄公说：不可，因为君子不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楚兵渡河以后，还未排列成阵，宋国官员又请求出击。宋襄公又说：不可，因为君子不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一直等到楚兵准备好了以后，宋襄公才下令出击。结果宋国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了伤。

論著選集第一期
論持久戰
毛澤東著
唐縣民眾教育館
1938,11,[illegible]出版

1938年11月，唐县民众教育馆出版的《论持久战》。

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他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他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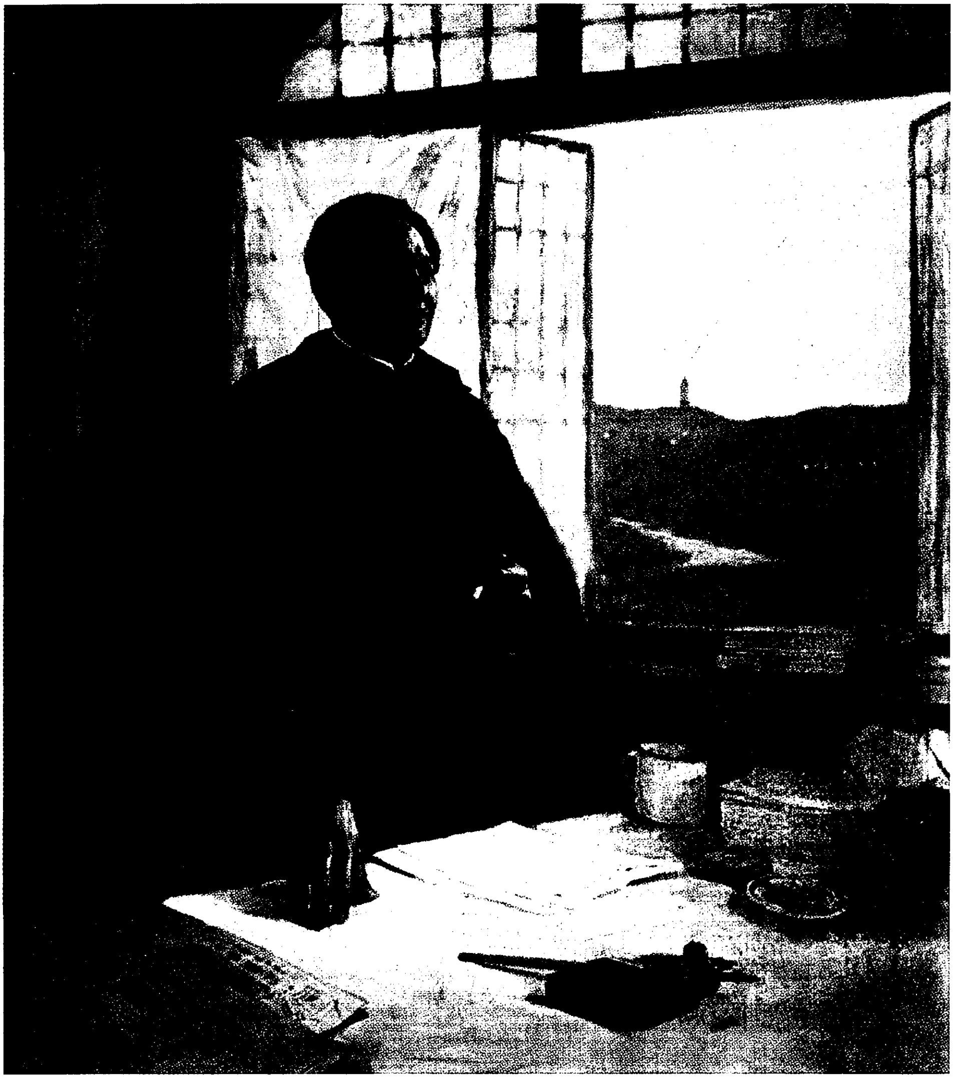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

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



《毛主席在延安窑洞》（油画）

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

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

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〇）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

整个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1]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拼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拼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

---

[1] 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以后，不久即分兵沿津浦铁路南下，进攻山东省。多年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韩复榘不战而逃。在1937年12月下旬至1938年1月上旬的10多天里，他就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的大片国土，从济南一直逃到山东、河南的边境。

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

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呵！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

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〇〇）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〇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〇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〇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〇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

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〇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

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著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

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〇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

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1]。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〇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拼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〇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

---

[1] 1812年，拿破仑以五十万大军进攻俄国。当时俄军只有二十万人左右。为了避免不利于自己的决战，俄军实行战略退却，一直到放弃和焚毁了莫斯科。拿破仑的军队在深入俄国国土以后，遭到了俄国广大军民的坚决反抗，陷于饥寒困苦、后路被切断、四面被包围的绝境，最后不得不从莫斯科撤退。这时，俄军乘机大举反攻，拿破仑军仅剩两万余人逃离俄国国境。

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〇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〇）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

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

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

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1]，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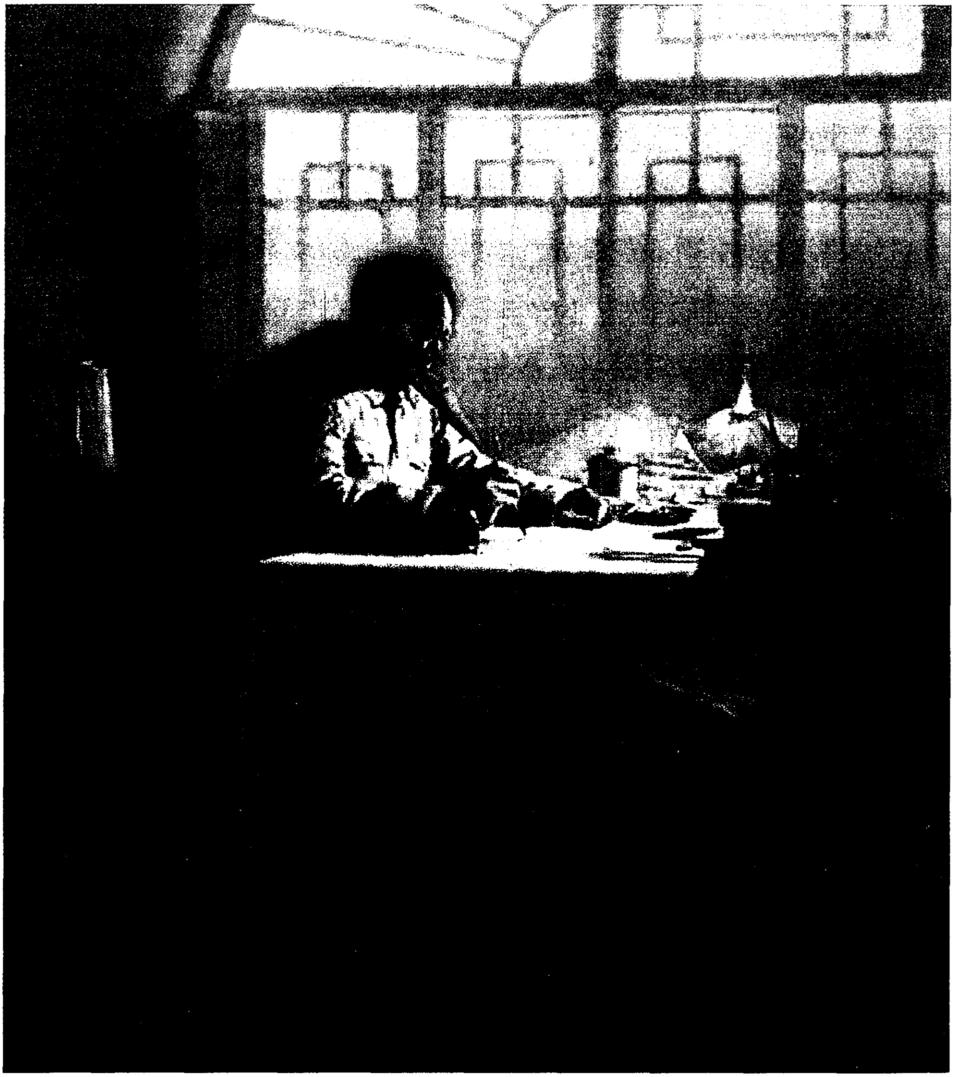
[1] 国民党政府扩军的一种办法，是派军警四处捉拿人民去当兵，捉来的兵用绳捆索绑，形同囚犯。略为有钱的人，就向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行贿，出钱买人代替。

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明灯》（油画）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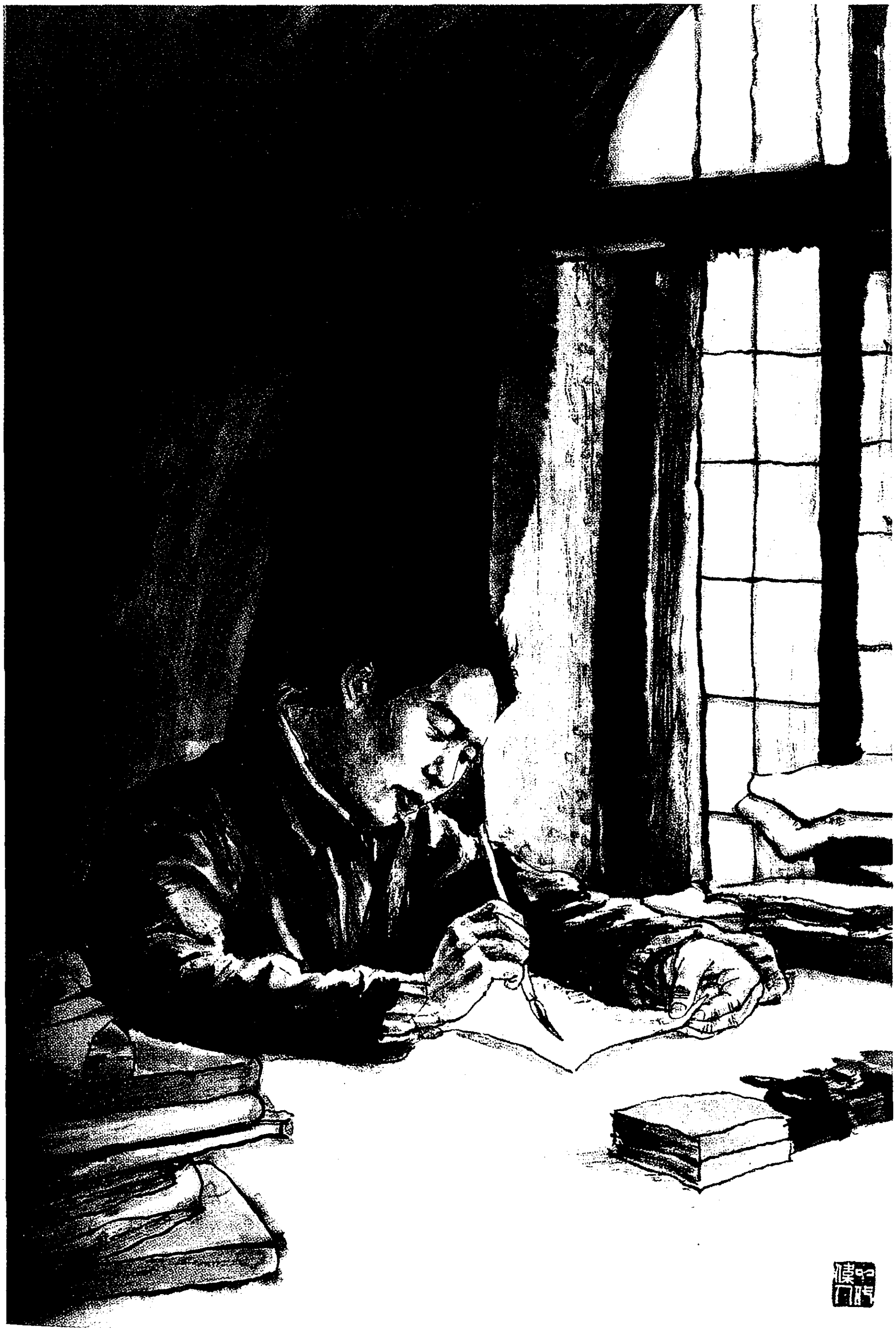
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　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

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〇）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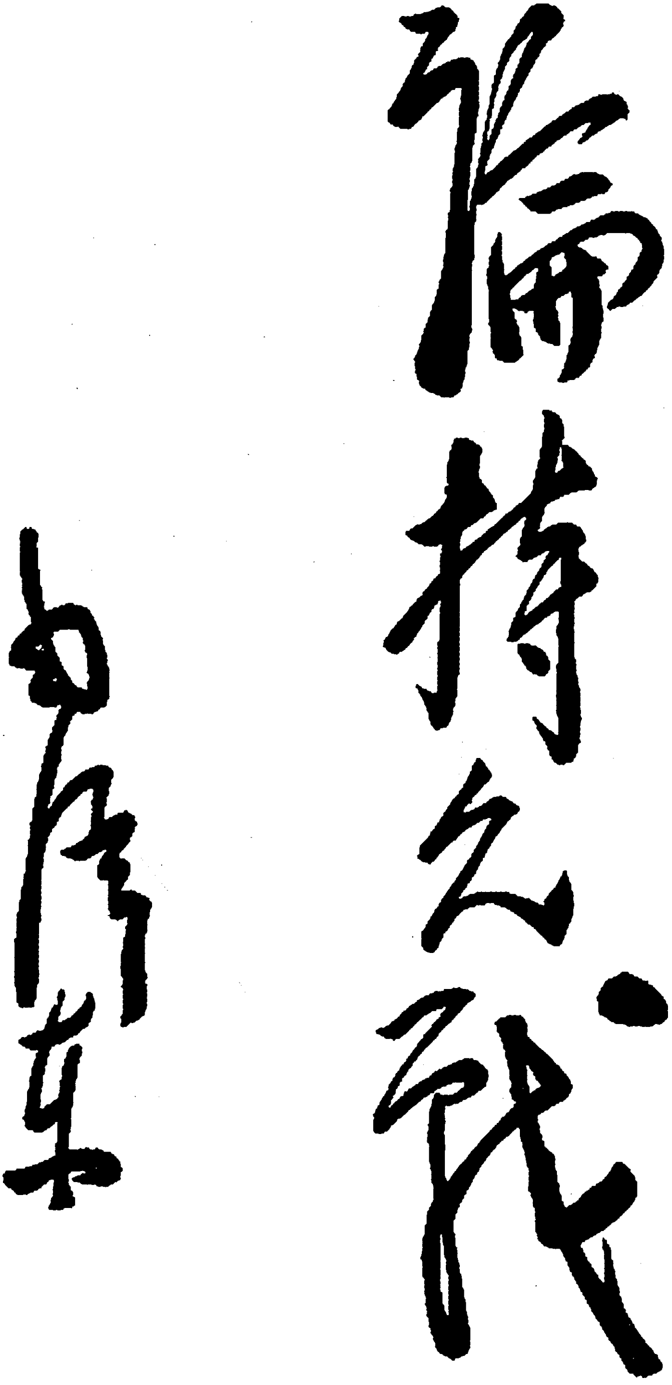


《眼底风云　笔下雷声》（中国画）

为《论持久战》题写书名

（1938年5月）

论持久战



毛泽东为《论持久战》题写的书名。

新四军可放手在敌后活动[1]

（1938年6月2日）

项英同志：

支电[2]悉。

一、顾祝同[3]较开明，望与好好联络。

二、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

三、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四、枪枝可由地方与敌人大批取得，不必多花钱远处购置。

五、加紧教导队训练，扩充名额，以备扩大部队之用。

六、赖传珠[4]可任副旅长，或旅政委，或暂令训练教导队，望考虑。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指1938年5月4日项英给毛泽东等的电报。该电报告了新四军第一支队活动情况和他与顾祝同谈判新四军防区问题的结果。

[3]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4] 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处长。

七、电台员正令三局[1]设法。

八、汉口来件已到。

毛

二日

---

[1] 三局，指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第三局。

紧急声明

（1938年6月3日）

顷闻中央社重庆电，中国国民党监察委员会三日上午八时开十四次常会通过恢复陈其瑗等二十六人党籍一案内列有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七人姓名。按鄙人等系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而对恢复鄙人等国民党党籍，事前更未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鄙人等意见，因特郑重声明：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委此项决议关系鄙人等七人部分，鄙人等实不能承认。

周恩来　林祖涵　吴玉章　毛泽东
董必武　邓颖超　叶剑英同启

同意郭洪涛关于山东四支队恢复用八路军番号的建议[1]

（1938年6月6日）

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有四五个八路军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

---

[1] 这是毛泽东和胡服（刘少奇）致郭洪涛电的主要内容。

在邱琮[1]来信上的批示

（1938年6月6日）

这是邱琮先生的善意的建议书，其中颇多可采，应抄交各有关同志，希着重注意此建议。

---

[1] 邱琮，国民党抗日人士。1938年2月以广州中山大学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的身份到延安。毛泽东曾在延安会见他，同年5月邱琮离开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他根据自己在延安的观感，从根本策略、统一战线、教育、文化、军事、对敌军政治工作、检查行旅、招待外来人员、生产建设九个方面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管窥谨献》，寄给毛泽东等。

致邓小平电[1]

（1938年6月7日）

目前我们在河北应加强武装部队、临时政权及民众组织，并巩固它们在群众中的信仰。这样，对于一切都好应付，可使国民党所委派的人不得不同我们合作。如果他们拒绝与我们合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就应在团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立他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致邓小平并朱瑞、刘伯承、聂荣臻、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1]

（1938年6月8日）

在不致引起国民党误会与磨擦的原则下，河北、山东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和受邻近的友党友军欢迎的游击队，以八路军名义为合宜。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复美共产党全代大会等[1]

（1938年6月8日）

美国纽约工人日报转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鉴：

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全党党员，向美国工人阶级的先锋，努力保卫美国和平、进步及民主的先锋致敬，并感谢贵党及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帮助和同情。

拥护中美兄弟党和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打倒日本侵略者！美国共产党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毛泽东　朱　德　王　明　周恩来
洛　甫　博　古　项　英　陈　云

---

[1] 1938年6月4日，《新华日报》刊载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祝贺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取得的重大胜利，并表示将尽一切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是毛泽东、朱德、陈绍禹（王明）、周恩来、洛甫（张闻天）等联名代表中共中央给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共中央主席福斯特、总书记白劳德的复电，感谢美国共产党和美国人民对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同情和帮助。这个复电发表于1938年6月8日《新中华报》。

复周恩来等电[1]

（1938年6月9日）

同意关于组织新四军委员会的提议，以项英、叶挺、陈毅、张云逸、周子昆[2]、袁国平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博古（秦邦宪）、叶剑英并告项英电的主要内容。陈绍禹、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叶剑英6月7日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说叶挺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2] 张云逸、周子昆，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副参谋长。

拟创造大青山根据地[1]

（1938年6月11日）

朱、彭，贺、萧、关：

大青山脉[2]的重要性如来电所述，该地应派何种部队、何人指挥及如何作法，由你们依据情况处理之。惟开始建立根据地时，敌人知其重要意义，必多方破坏，故部队须选精干者，领导人须政治军事皆能对付，且能机警耐苦，而有决心在该地创立根据地者。陕北骑团现控制河套蒙古广大区域，在定盐[3]以北五百里之杭锦旗[4]一带配合蒙民抗御敌军南下，故不能调动。

毛

六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治委员关向应的电报。

[2] 大青山脉，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川平原以北，属阴山山脉中段。

[3] 定，指定边，县名，位于陕西西北部，洛河上游，邻接甘肃、内蒙古、宁夏等省区。盐，指盐池，县名，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部。

[4] 杭锦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西北。

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等电[1]

（1938年6月12日）

国民党监委会恢复毛、周等党籍的举动，表示国民党在徐州失守武汉紧急的时候，进一步联合我党坚持抗日，将来趋势有恢复十三年办法[2]之可能。但监委会此举尚须执委会通过，并须先征求我们的意见。

---

[1]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十四次常委会通过恢复陈独秀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其中包括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7人。这是毛泽东和谭政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晋察冀边区，新四军军部电的主要内容。在该电报中对恢复国民党党籍一事作了说明。

[2] 指1924年建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确定的组织形式。

和诸述初的谈话[1]

（1938年6月14日）

一

政治是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平教工作的大规模发展，必须有为平民的政治，一切推行的方法，还在其次。政治的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要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

二

农民的性格有两方面。一是黑暗的，如自私自利、愚蠢守旧等，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专写那黑暗面的作品。一是光明的，如急公好义、勇敢牺牲等。他们一生就具备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政治的作用，便在发动他们这光明面的积极性，逐渐克服他们的黑暗面，实现民主的政治。现在边区所实行的，就是这种民主政治。在抗战中我们发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那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钱抗战！

---

[1] 1938年6月14日晚，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初。本篇一是毛泽东从平民教育工作谈到政治问题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农民谈话的一部分。

复林伯渠电[1]

（1938年6月15日）

甲、国民党进步中某些顽固分子的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慌。乙、应该在各地利用机会动员群众，给顽固分子以相当打击，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丙、边区最近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的必要。

---

[1] 1938年6月13日，林伯渠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等，报告西安一些国民党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局面，他建议党似应在陕甘宁边区的某些小问题上作可能的让步，以阻止对日妥协局面的出现。这是毛泽东和张闻天复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致第一二〇师负责人等电[1]

（1938年6月15日）

目前是否可以向傅作义及其他军政首长提议，召集晋西北及绥东各部队首长（连游击队在内）、各政府与民众团体的领袖开一个会议，讨论如何打退日军进攻、保卫晋西北的作战计划，并相机提出建立根据地的某些重要问题。电报指出，只要情况允许，这个会议召集成功，是可能解决许多问题、推进统一战线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日军又向晋西北进攻问题和胡服（刘少奇）致第一二〇师负责人并告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吴亮平[1]的信

（1938年6月15日）

亮平同志：

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何，盼示！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

[1] 吴亮平（1908—1986），浙江奉化人。当时在延安编辑《解放》周刊。

在华北西北放手发展游击战争[1]

（1938年6月15日）

朱、彭、周：

周电[2]悉。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我上月二十六日电已大略指出。目前为配合中原作战，为缩小华北敌之占领地，为发展并巩固华北根据地，都有大举袭敌之必要，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全依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不因人家议论而自乱步骤，这也应该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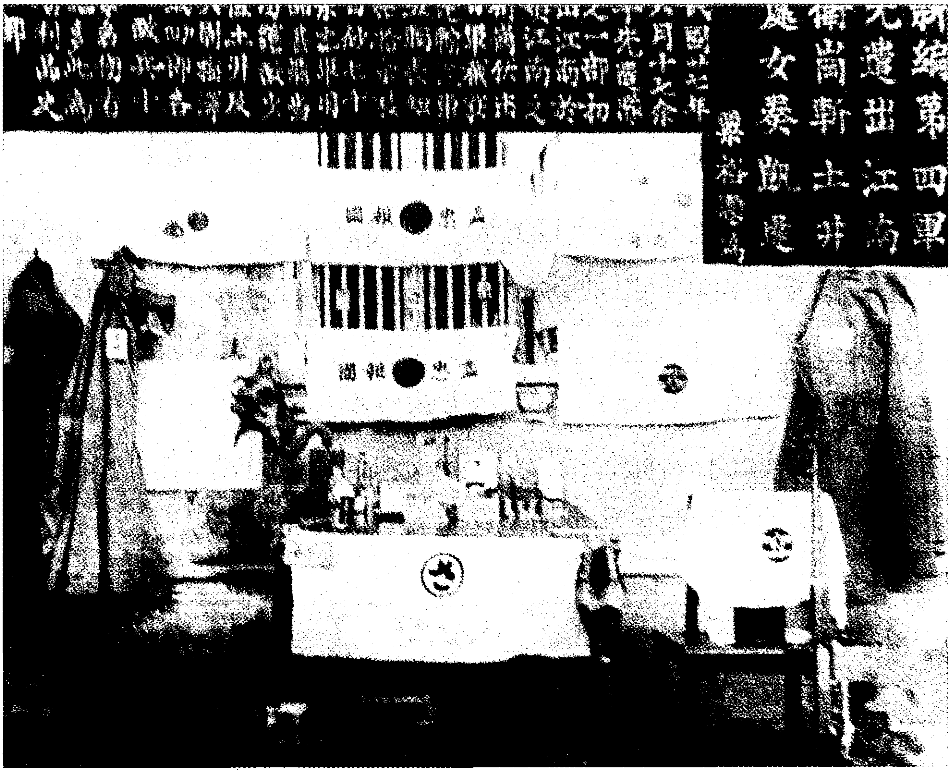
毛

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的电报。

[2] 指1938年6月15日周恩来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电报。该电指出，日军集中主力进攻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均较空虚，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的抗战决心。


新編第四軍
先遣出江南
衛崗斬土井
處女奏凱還

1938年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伏击日军告捷。图为收缴的战利品。

为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七周年题词[1]

（1938年6月30日）

共产党员，应与各党各派各界人士一道坚持抗战，为驱逐日寇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并在斗争中起模范作用，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

[1] 1938年6月，毛泽东为抗日战争一周年和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七周年题词，这个题词发表在《新中华报》上。

为《边区儿童》创刊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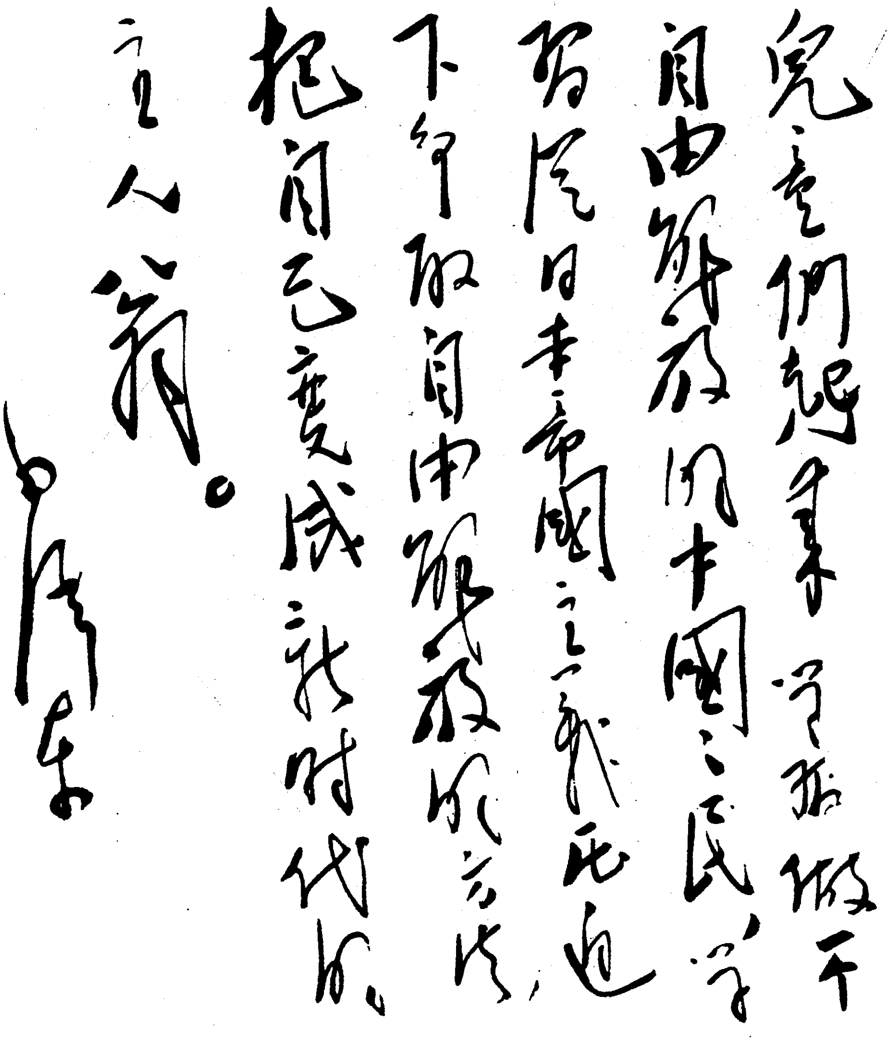
（1938年6月）

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创办的《边区儿童》创刊号所写的题词。



儿童们起来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学习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争取自由解放的方法把自己变成新时代的主人翁。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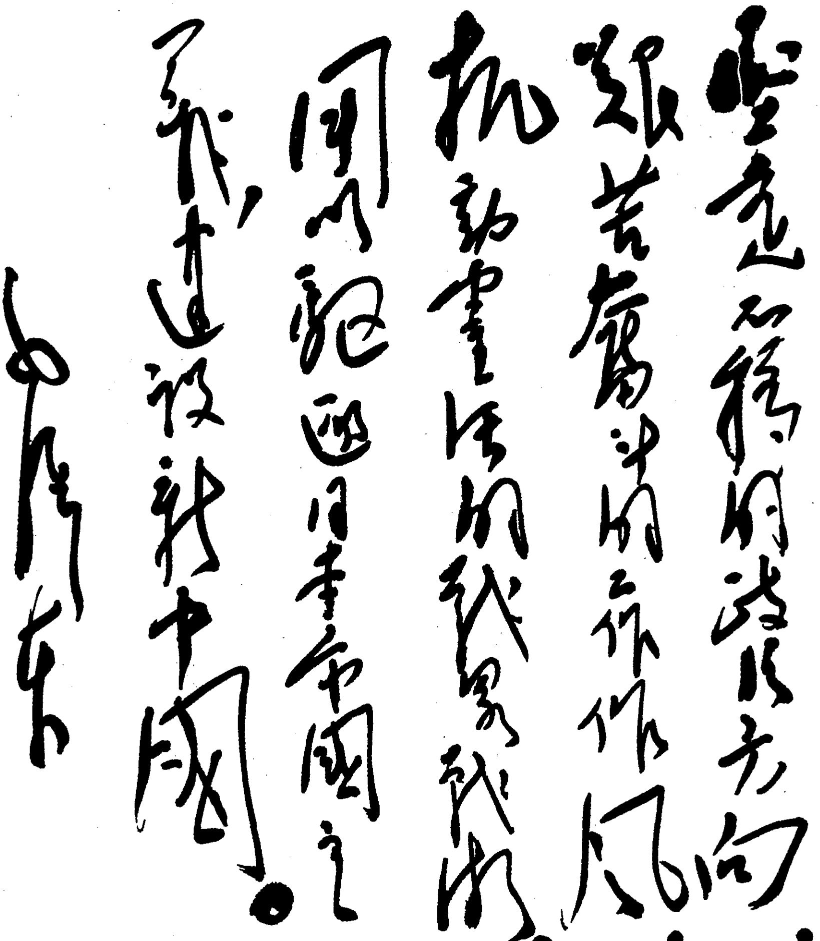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边区儿童》创刊的题词。

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题词

（1938年6月）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
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
义，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

陕甘宁边区政府暨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致全国各界人士公函*

（1938年6月）

敬启者，溯自国内和平实现，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发动以来，我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方部队与人民群众，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各省各县政府地方部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均已日臻友爱与团结。此种现象，不但边区引为欣幸，亦为全国各界所要求所渴望者。盖团结乃能御侮，分歧适足召亡，实乃颠扑不破之真理。敝府敝处本此方针，努力奋斗，期于抗战建国之伟大事业中略尽绵薄诚恐力有未逮识有所不周，不足以上符中央下符人民期望，深望全国党政军民各界，随时予以指导，凡有善意帮助，一律表示欢迎。惟是万恶敌人之日寇深知边区为中华民国之组成部分，积极抗战之有力地方，边区巩固一分，即于日寇有一分不利，因而丧心病狂，除准备派遣飞机散放毒菌外，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利用汉奸托匪大肆活动，而少数不顾大局之顽固分子，未能在大敌当前之时，捐弃成见，复为彼辈汉奸托匪所利用，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在边区交界地域，更以种种诡谲行为，企图造成边区与邻近区域之对立。凡此诸节，言之痛心，客观上无异为日寇张目，实属违反孙中山先生之遗教，违反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精诚团结之意志，违反抗战建国之纲领。若不及时防制，诚恐星

火燎原，势必团结为之破坏，抗战为之障碍，兴言及此可胜慨叹！敝府敝处为巩固统一团结，争取抗战胜利起见，爰本抗战建国纲领之主旨，于五月十五日印发布告，揭举四条，晓谕全区军民人等，目的全在消除隐患，团结人民，使有利抗战建国伟大事业。素仰先生热忱爱国，对于边区维护协助，不遗余力，特为函达，敬恳不吝指教，赐示南针。随付布告一份，用备参考，寇深祸急，团结乃克生存，风雨同舟，和衷方能共济。谨此布臆。

敬颂

公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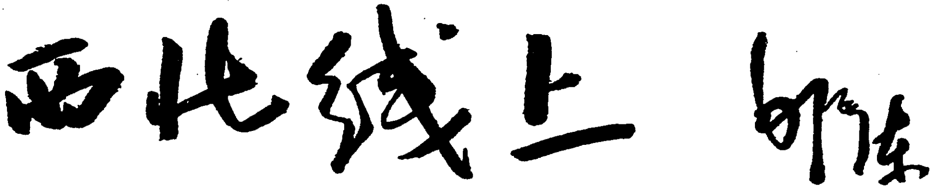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林伯渠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　月　日

为影片《西北线上》题名[1]

（1938年6月）

西北线上

毛泽东



毛泽东为影片《西北线上》题写的片名。

---

[1] 香港一群工作者，组成一个青年摄影团，于1938年保卫大武汉前夕到达延安，将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全部情况，拍摄成一部电影，片名《西北线上》。这部电影的片名是毛泽东亲自题写的。同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为青年摄影团写了题词。

为香港青年摄影团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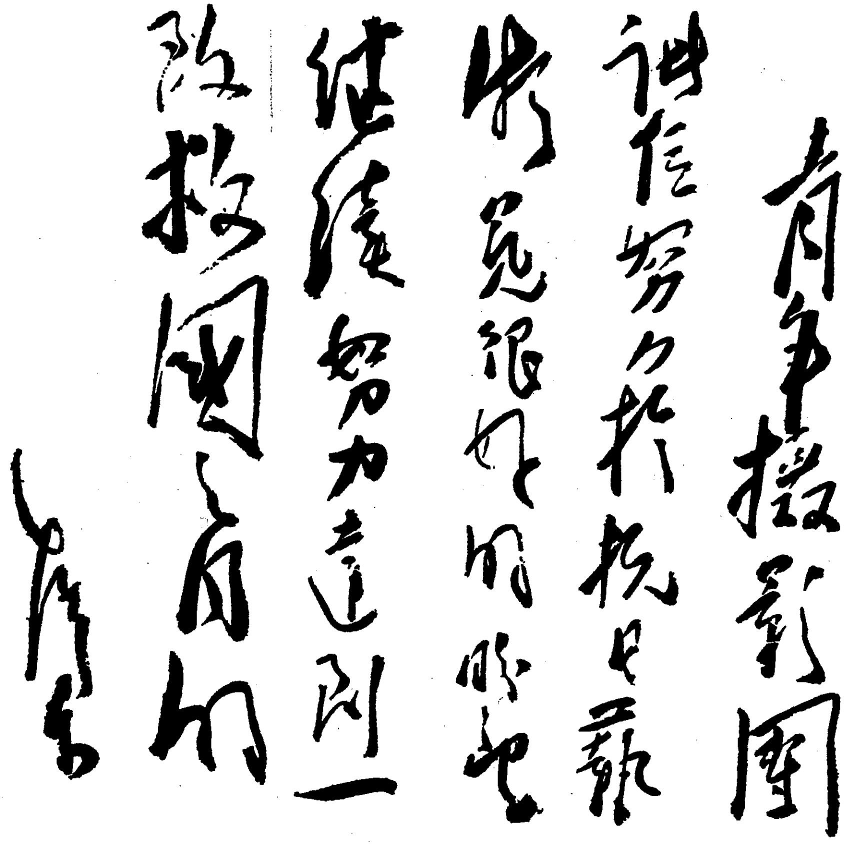
（1938年6月）

青年摄影团诸位努力于抗日艺术是很好的，盼望继续努力达到一致救国之目的。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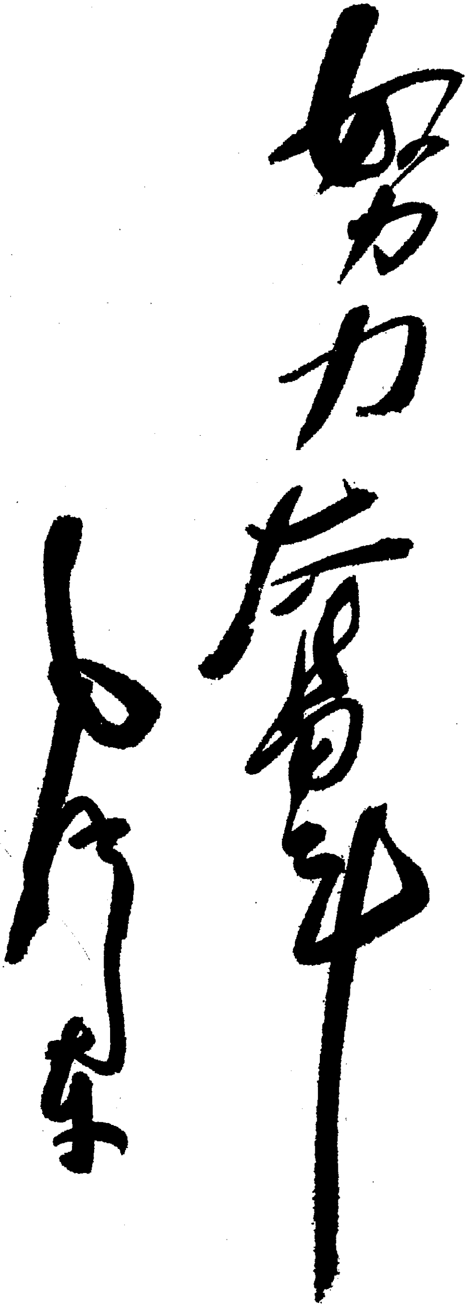
努力奋斗。

毛泽东



青年攝影團
諸位努力於技術與藝
術兩方面的提高
繼續努力達到一
[illegible]國際的
毛澤東

毛泽东为香港青年摄影团的题词。



努力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香港青年摄影团的题词。

为《解放》周刊纪念抗战一周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七周年专刊题词

（1938年7月1日）

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毛泽东

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綫，

堅持持久戰，最後勝利

必然是中國的。

毛澤東

毛泽东为《解放》周刊纪念抗战一周年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上的欢迎词[1]

（1938年7月1日）

中共中央以万分诚意欢迎世界学联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感谢世界学联对中国的衷心援助。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将要开幕的世界青年大会和全世界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在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干部会议上所致欢迎词的主要内容。

和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谈话[1]

（1938年7月2日）

第一个问题：目前陕甘宁边区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很需要明白这点。

答：明白了边区的性质，才能明白它在中国的意义与作用。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首先，在民众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组织。边区人民，只要在抗日原则下，都有他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知识分子、妇女、儿童，以及宗教团体、自由职业者的团体，都有这种自由。共产党与边区政府从而积极地扶植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更普遍地发展下去。这里仅仅限制汉奸的活动，对于汉奸，是不给任何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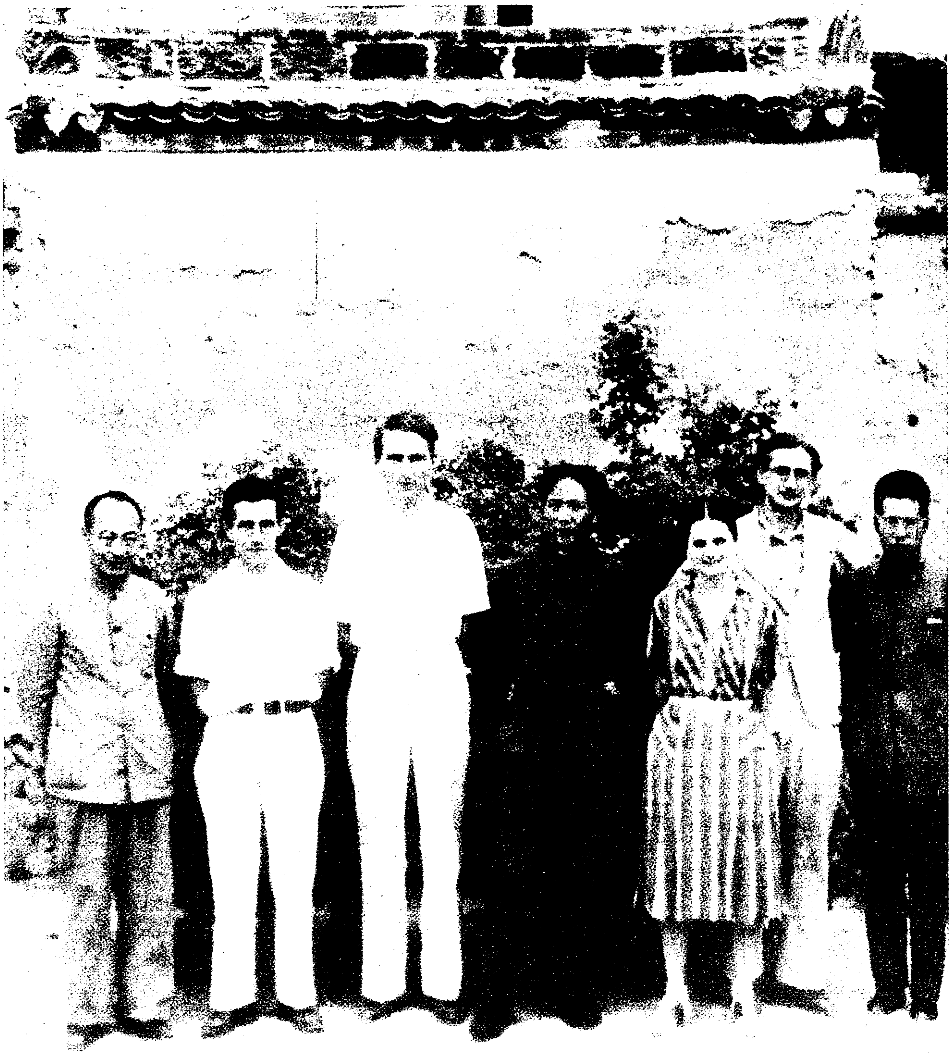
其次，边区已成了直接抗战的区域，这里留了八路军的一部分，还有地方武装部队。这些军队，其内部官长与士兵的关系，其对外与人民的关系，也都有一种民主的精神，能够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使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能被战胜的力量。

其次，边区的教育同样是抗日的与民主的，你们从抗日军政大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和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的谈话。

学与陕北公学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



1938年7月2日，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表示中国抗战虽然要自力更生，但外援也有着重大意义，希望得到国际援助。图为毛泽东和世界学联代表团成员柯乐满、雅德、傅路德、雷克难的合影。

其次，经济方面也是这样，以有利抗战为主旨，而以民主精神经营之。例如这里颇为发达的合作社，得了土地后的农民之于农业，都是按照这种精神，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良，同时又有利于抗日事业。这里是有租税的，但没有苛捐杂税，实行一种统一的累进税，符合于上述的主旨。

还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这里证明一点，就是有些人说“知识落后的工农不能实行选举制度”，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里实行民选的结果并不坏，每个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对于动员人民力量参加抗日战争，特别积极而有效。与过去苏维埃不同的，是扩大了选举与被选举的范围，即不论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学生、商人、有产者，只要不反对抗日而年满十八岁者，都有选举与被选举之权。

以上所述的各方面，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都能收得很大的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

这就是边区的性质，边区的特点。明白了这种性质与特点，就可以明白它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是什么了。全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联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

日可期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形成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这种制度要全国采用，是需经过全国人民切实了解，认为可行，然后才能实行的，所以我们欢迎各党各派与无党无派的人都来看一看。来看的人也不少，青年学生尤多，除了少数人说这种制度不好之外，大多数人都是说好的，这是可以引为庆幸的事。边区是中国之一部分，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与中国其他部分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

现在有些人对于边区有两种不正确的观点：一种说边区什么都不好，有少数顽固分子这样说，这种说法显然不合事实。另一种说这里像个神圣的天堂，什么缺点都没有，这种说法也过分了。正确地说应是这样：这里的民主制度与抗日精神是很好的，值得供全国人民仿效与参考。但这里的工作还受某些条件的限制，例如物质困难即其一例，许多工作也还待继续努力，方能更好，并不是样样都好得了不得不须再求进步了。因此，欢迎外界的批评，加重了这里工作人员的努力，这也是要指出的。承诸位好意来延安参观，我就欢迎诸位的批评，指出这里的缺点，以便加以改正，使之更利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

第二个问题：目前中共在全中国的作用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很简单。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这就是目前中共的基本主张，它在全国的工作与作用也就在这里。

什么叫做坚持抗战？妥协还是坚持抗战，这是存在着的问题。

我们是主张抗战到底，反对任何妥协的。我们愿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一道，坚持抗战，绝不动摇，直至收复失地打到鸭绿江为止。

什么叫做坚持统一战线？就是全国团结到底。只有坚持全国的团结，才能坚持抗战。现在虽然已有了全国的团结，但还要更加团结，不但团结几个党派就行了，还须团结全国的人民。只有全国各界人民都团结在一定的组织之中，都发动了抗战的积极性，才算巩固与扩大了统一战线。

什么叫做坚持持久战？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说，“中国会亡，不能作持久战”；另一种人说，“中国很快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也无需乎持久战”。我们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首先，中国决不会亡。理由是日本虽强，但它先天不足，国内外矛盾很多；中国虽弱，但是大国，又有许多国内外的优良条件。因此，中国虽在战争的一定时期损失了许多地方，但仍能坚持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要很快地打胜日本也困难，因为虽有争取胜利的可能条件，但不能很快地全部地实现，这不论中国的进步也好，日本的内溃也好，国际的援助也好，都非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们应准备长期战争，不能希望即刻胜利。

这样，现在的方针应该是：第一，坚持抗战；第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第三，坚持持久战。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干些什么事情呢？就是干的这些事情。中共愿与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定要把这个方针贯彻下去，这就是中共在全国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中国是否有什么条件可以缩短这一持久战的时间呢？

答：要缩短战争时间，必须加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中国的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这是基本的。在统一战线的方针下，各项工作须大大地发展与进步，这些工作多发展与多进步一分，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第二个条件，是日本国内人民的帮助。现在这种帮助已经开始，譬如他们的士兵不愿意战争，有自杀的，有投降的，有发反战传单的，日本人民反战思想也在发展之中。如果日本的士兵与人民更多地觉悟一分，战争时间也就可以缩短一分。还有一个条件，是世界各国的帮助。我们需要世界学生的帮助，需要世界人民的帮助，也需要各国政府的帮助。如这些帮助更多更快，那末我们的战争也就会缩短。这三个条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中国加快进步，加快团结，就能使日本国内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如果日本及世界各国的助我力量加快发展，也能使我们国内的抗日力量加快地发展与进步。中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更大的打击，也就是给了日本人民的帮助，将使日本人民的解放斗争发展更快。对世界也是一样，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这三个条件多具备一分，则战争时间就能缩短一分。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党派及全体人民的任务，同时也是日本及世界各个先进政党与全体人民的任务。我们的战争是持久战，但我们应极力争取尽可能缩短时间的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则缩短时间只是空想。

第四个问题：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将是什么？

答：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一句话，是建立一个自

由平等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独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个代表人民的国会，有一个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在这个国家内的各个民族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原则下建立联合的关系。在这个国家内，经济是向上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大大地发展，并由国家与人民合作去经营，订定八小时工作制，农民应该有土地，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对外国和平通商，订立互利的协定。在这个国家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种优秀人物的天才都能发展，科学与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国没有文盲。在这个国家内，军队不是与人民对立的而是与人民打成一片的。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共产党愿意联合全国的一切党派与人民，大家努力建立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国家，是全国人民几十年来所希望所力争的，也是孙中山先生所希望所力争的。进行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不是把日本赶到鸭绿江之后的第二天才开始的，抗战过程中的各种工作，就都与建立这样的国家有关联。不过许多重要工作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才能完成，例如基本的经济建设等等。在抗战中，是要准备建立这样一个国家的先决条件，主要的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这样的任务，不但是共产党的，也应该是国民党与其他革命党派的，同时是全国人民的。这是中国的历史任务。

第五个问题：你以为现在中国的学生及青年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世界学生与青年在援华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答：中国青年们的任务，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一般的任务，与前面所讲的相同，就是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任何年龄、任何职业的人民之共同的任务，没有什么分别的。有分别的，是其特殊的任务。中国青年们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就是争取自身的特殊利益，例如改良教育与学习，在学习中有参加救亡运动的权利，有组织学生与青年团体及组织救亡团体的权利，十八岁以上的青年有选举与被选举权，贫苦学生有免费入学之权，青年应大批上前线等等。

说到世界青年们帮助中国抗战的主要任务，我想，首先是经过世界学联，使世界大多数青年与学生了解有共同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并使他们了解，这种工作是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有关系的，因为和平不可分割，法西斯的世界侵略，是世界和平的仇敌。其次，学生是联络人民的桥梁，经过学生，使各个民族的人民懂得反对日本、帮助中国的必要，以及这种工作与他们自身利益的关系。至于具体的帮助方法，例如用口头和文字作宣传，劝告人民与政府给我们以物质上的帮助，不买日本货与不卖货给日本，直至组织国际抗日义勇军，准备于适当时机来华参加战争等等。

诸位代表着广大的国际学生团体来华视察，给我们以广大的同情，全中国人都感谢你们，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希望你们回去之后，把中国伟大抗日战争的真相带给世界学生与人民。我们与你们永远团结起来，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战，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与永久幸福而战！

在抗大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上的欢迎词

（1938年7月3日）

今天我们全校教职学员开这个欢迎会，来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世界学联代表团远涉重洋，不避一切辛苦地到中国来，他们为着同情与援助中国的抗战，为着反对法西斯蒂，为着保卫世界和平。他们这种光明正大的态度值得我们欢迎，我们应该向他们致无限的敬意，我代表全校教职学员向世界学联代表致革命的敬礼！

代表团的诸位先生都是世界学生的领袖，为世界学生的利益，为世界和平的利益而奋斗，世界学联能派出这样好的代表团到中国来，我们应该表示敬意。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全世界学生与青年群众对于我国的同情与热烈援助，这一点我们也应表示无限敬意。

我们欢迎学联代表团，应该对于他们这种不怕艰难而援助中国的伟大精神表示敬佩。他们对于中国有很多的帮助：宣传、募捐、抵制日货、不卖货物给日本，并推动他们的政府帮助中国抗日这样的情意，我们应该大大地感谢！

他们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有了许多经验，这些经验能够运用到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我们欢迎他们，应该接受他们的经验。

代表团这次到中国来，你们可以明显地亲眼看到日寇在中国的行为，是何等野蛮残暴，是何等地失掉人性，代表团可以亲眼明显

地看到：中国无辜的人民何等地受着空前的灾难和看到中国之空前团结与民族生存为世界和平而英勇战斗的情形。

日寇自“九一八”强占了我东北以后，鼓励意大利灭亡阿比西尼亚，及帮助弗朗哥匪徒在西班牙的横行，鼓励了德国法西斯蒂吞并奥国及企图再向捷克伸出魔手，而造成战争危机的紧迫，所以日寇是破坏世界和平的祸首！

日寇在中国不但肆意屠杀中国人民，而且屠杀外国的侨民（如山西许多外围传教徒被炸死了），由此可见日寇是全世界人民的公敌！

世界学联对我国的援助，使得中国人民看清楚我们的奋斗不是孤军的奋斗，更加鼓励了中国人民，加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此次代表团的来华，证明他们对于援助中国及保障世界和平的积极与努力。因此，我们对于他们的欢迎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

我们应该怎样来欢迎他们呢？

第一，他们有很丰富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斗争经验，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着反对日寇的战争，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第二，代表团是世界学联派出来的，世界学联是全世界拥护和平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蒂的组织，第二次世界学联代表大会将要举行，我们相信在大会上，一定可以通过实际援助中国与世界和平的决议与号召，我们应该准备来执行。

第三，把我们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经验贡献给世界学联及全世界的青年。

我们的学生都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大家都下了决心，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不为个人的生活，而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不但为本身的自由解放，而且为世界和平而奋斗！我们的学生

有这样的决心，表示中国有了新的力量，表示我们中国的进步，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世界上无耻造谣与欺骗，我们更相信在持久战中，中国必定可以得到最后胜利！

我们对于代表团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他们考察完毕后，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蛮横种种兽行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形详细地向世界人民报告，号召一切主持正义、爱好和平的人民，不但在精神上道德上对中国的同情，而且要在物质上、军事上给中国更大的援助，抵制日货，不卖军火及原料给日本，推动他们的政府执行条约上的义务，在第二次世界学联代表大会上通过强有力的决议，并把这些议案变为实际的行动，这样来援助中国，保卫世界的和平！

最后，我们希望世界学联能够给予我们帮助，因为我们抗大是在艰苦奋斗中进行培养抗日干部的工作，帮助抗大也就是帮助中国的抗战，也就是为着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伟大事业。

在敌后比较空虚地区发动游击战争[1]

（1938年7月3日）

雪枫、理治同志：

来电已收到。你们对游击战争的布置一般同意，但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对于伏牛山脉[2]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工作基础，干部准备在这期抗大毕业生中派四百人到河南及安徽北部，惟有游击经验的干部甚少，现正物色中，可派数人来。苏鲁边区郭子化[3]已与山东省委郭洪涛[4]接上头。

洪涛现在蒙山[5]建立根据地，以后请将河南游击战争发展情况随时电告。

毛　洛　胡

七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给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的电报。

[2] 伏牛山脉，位于河南西南部，属秦岭东段，西北接熊耳山，东南遥接桐柏山。

[3] 郭子化，当时任中共苏鲁特委书记。

[4] 郭洪涛，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5] 蒙山，位于山东中部，地跨平邑、费县、蒙阴、沂南等县境。

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

（1938年7月5日）

国民参政会将于日内开会。我们七个中国共产党员被选任为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正式决定我们七人接受政府聘请加入国民参政会。因此，许多新闻记者、参政会同人、各地共产党同志及各方好友纷纷垂询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特共同发表如下之申明。

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同时，并认为，积极的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也就是增强保卫武汉及第三期抗战力量的一部分重要工作，也就是促成人民全权代表机关在将来建立的一部分基础。我们代表着中国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各党派以及无

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以便能够有效地打击与战胜日寇，并奠定使中华民国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的基础。

为达到战胜日寇，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国家，那末，首先在军事上必须求得前线作战部队战斗力之加强，敌人占领区域中人民游击战争之大规模的发展及有现代化武装之坚强部队的创立；在政治上，必须改善政治机构，促进省、县、区民意机关之建立，普遍地发动和组织广大民众积极参战；在经济上，必须加紧创建国防工业，调整战时财政金融，提高工、农业生产，而同时采取各种有效办法来保障与改善人民生活。而一切军事、政治、经济的改进均有赖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继续的巩固与扩大。凡此诸项均于中国共产党数年来之文件宣言（如一九三五年八一宣言，去年九月发布之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及本党各领导同志及同人等之言论主张）中反复详述，想已为国人所周知。我们在积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中，当忠诚地执行本党中央的一切指示，继续地为实现本党抗战时期中的各项主张而努力。

国民参政会首届会议开会之际，敌人的铁蹄已走进了中州原野，江淮河汉之间也弥漫着敌人的炮火，皖赣两湖受着敌骑的威胁，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

目前我们认为最紧急而有待于迅速提出方案以求解决的，大约有下列各问题：怎样动员军力、人力、财力、物力来保卫我们军事、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的大武汉及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如何改革目前流弊百出的征兵制度，而代之以广大的政治动员之征募

办法，以期我国军队有充足的民族意识坚定的战士源源补充，同时使创立新军的事业得以迅速而有效地进行；如何采取具体的方法使真正达到“有钱者出钱”的目的；如何保证最低限度人民生活之改善，以期使有力者可以出力；如何普遍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同时，在抗战和民主的一般原则下来统一民众运动和民众组织；如何确保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之自由及保证各抗战党派之合法权利；如何能够真正有效的训练青年，使他们能够担当抗战建国的干部责任，以期克服现在许多青年训练班令青年失望的现状；如何改善各级政治机构，首先是县及其以下的各层机构；如何认真地推行地方自治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措施。我们将在参政会内与各方意见相同之人士共同陈述意见和提供议案。

在敌寇猖狂的今日，我前方将士正为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浴血的奋战着。在伟大壮烈的民族战场上，我们成千上万的将士，不分党派，不分界限，互相帮助，一心一德的把枪口向着敌人，把自己的热血光荣地汇流在一起。我们相信：在国民参政会的议场中，将与我们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一样，所有的参政员绝不会有“在朝党”和“在野党”之分歧，绝不会有党派门户之偏见争执，相反地，将会不分党派，不分地区，泯除一切隔阂，而共同一致地将自己的努力用以帮助抗战最后胜利的争取。因为：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所颁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不仅本党认为其战时施政方针与本党在抗战时期的纲领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其他党派亦曾表示赞同。国民政府及其坚持长期抗战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之国策，亦为全国人士所一致拥护。在这样基础上，我们相信：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当可预期于和睦友谊的空气中获得成功。

最后，我们——共产党员的参政员，并不因为国民参政会之未经人民的普选而丝毫推诿在全中国人民面前应有的责任。我们深切了解，国民参政员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使者，是人民的代表，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工作，我们将确定地为中国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我们确信：巩固民族团结，驱逐日寇出境，是中国人民今天最迫切的要求。我们将不倦怠，不畏难，坚定忠诚地为着完满地实现这个最迫切要求而在国民参政会内及会外去努力奋斗。我们希望着全国人民无论个人或团体给我们以训示，给我们以帮助，如果我们有错失，更希望给我们以批评指责。我们希望我们及全体参政员在全国人民的援助督促鼓励及批评之下，能完成国民参政会及每个参政员所担负的神圣的民意机关和人民代表的职责。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七月五日

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和参加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军政首长会议的同志合影。

1938年，毛泽东等在延安。

致国民参政会的贺电

（1938年7月5日）

武汉国民参政会汪议长精卫先生、张副议长伯苓先生暨全体参政员先生勋鉴：

当此抗战周年，全国上下精诚团结，再接再厉，誓驱强寇，而敌人进攻有加无已之时，国民参政会集会于武汉，开宪政之先河，启民意于初步，凡在国人，庆喜同深。泽东备员一席，猥以琐务羁身，未能亲聆诸公之崇论宏议。然管见所及，凡有利于抗战建国诸大端，已托其他同志并案详陈，效其绵薄。寇深祸极，神州有陆沉之忧，然民意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术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懈，则胜利属我乃决然无疑。值兹本会开幕之日，肃电驰贺，并向诸兄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
微

关于巩固山西统战工作问题致杨尚昆等电

（1938年7月5日）

致前总、北局：

尚昆二十八日电悉。因为党的组织在山西有很大的发展，以及组织方式、工作方式上的缺点，党的秘密已经很难保持，而某些组织关系暴露又必然影响阎、梁对我们的态度和关系。因此，除尚昆电中所提议各项外，还需：

一、党的组织已有相当大量发展的地区、部队和机关中，暂时停止发展党员，特别在牺盟系统中暂停发展，集中注意教育训练和巩固组织。

二、党的发展要注意在组织薄弱的地区、部队和团体中去进行，特别注意建立许多农村支部及旧晋绥军中的支部，以奠定党在山西社会中的深厚基础，不要一般的对下级号召大大发展党员。

三、一切阎之团体及机关、部队的文件、口号，须特别注意形式，多用阎之“按劳分配主义”的术语，少用我们马列主义的术语。

四、朱、彭如有一人能去与阎一谈最好。如必需胡服去，要在月底才能成行。

毛、洛、胡五日致尚昆并致朱、彭转朱瑞

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给蒋委员长及全国抗战将士电*

（1938年7月6日）

蒋委员长勋鉴并转全国抗战将士公鉴：

当此伟大抗战周年纪念之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向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暨全国抗战将士致以无限热诚之慰问与无限崇高之敬礼，并向一切死难烈士致以无限衷心之哀悼。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蒋委员长，统筹全局，前线将士，英勇奋战，各党各派，精诚团结，全国人民，协力救亡，用能前仆后继，屡摧强寇，使我民族精神为之振奋，国际视听为之改观，最后胜利之始基为之奠定。凡此丰功伟烈，实属超越前史，永为国人所矜式。当此寇入日深，国难未已，保卫武汉、保卫华南、保卫西北与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为紧急任务之际，深信蒋委员长及全体将士必能再接再厉，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持久战，本一年之经验，作艰苦之斗争，动员全民力量，一德一心，以争取最后之胜利。同人等，本此信心，号召全党同志，立于抗战之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援助前线，一切服从抗战，为民族国家之最后解放奋斗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谨此电达，诸维共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七月六日

为抗日阵亡将士和死难同胞的题词[1]

（1938年7月7日）

抗战到底，浩气长存。

---

[1] 这是毛泽东为7月7日在延安召开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并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典礼而题写的挽词。

冀东敌情及对该地区工作的要求[1]

（1938年7月8日）

聂、彭：

天津来电，报敌人进攻冀东游击队与他们对冀东工作的要求如下，望注意：

甲、敌人进攻的计划：

一、从漏澄口起，沿长城布防至马兰峪，折回蓟县，采取大包围形势。

二、在密云、昌平、顺义、通县、三河布置重兵，完成包围计划，采取稳扎稳打，以期逐渐缩小包围，压迫我军于蓟县北部聚歼之。

三、现马兰峪驻有望岗村部队四百人，蓟县、通县开来宫崎纵队一部分，密云系由关外开来之一桥纵队约一连及伪满张匹仓骑兵一团、步兵百余，顺义宫崎部队约一连，昌平山下兵团约四百人，宁河一百人。

四、惟日寇兵力单薄，似不足以完成包围任务，故仍在研究更彻底办法。

五、芳东警备队除一中队调防宁河外，余因某种关系未调动，

---

[1] 这是毛泽东、胡服（刘少奇）关于冀东敌情及对该地区工作要求指示给聂荣臻、彭真的电报。

保安队不出县境作战，警队实力单薄。

乙、对冀热边工作要求：

一、冀东我军更须用更敏捷行动向迁安、遵化、卢龙地区扩大活动，因该地区敌人力量较弱，党的力量较大，且能呼应南部暴动，冲破敌人包围线。

二、对敌人之交通等破坏不够，必须多派小部队破坏北宁、平榆等交通及电话、电报的联络，他们现正布置这项工作，要求你们亦同时进行。

三、六支队要在长城口外建立根据地，必须要将长城各口放在我们内外控制之下，同时冀东根据地亦开始能确立，敌人的聚歼计划才不能实现。

四、赵同部须向宛平配合行动，牵制北平日军不能向冀东移动，并相机进攻北平。目前平津敌虽空虚，尚有机可乘，请斟酌处理。

并告朱、彭[1]。

毛　胡

七月八日

---

[1]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致西安等处中共负责人电[1]

（1938年7月8日）

抗大第五期需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六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

---

[1] 这是毛泽东和林彪、罗瑞卿致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

（1938年7月9日）

突击队员是有名英雄，还有许多无名英雄，有名英雄是从无名英雄中产生的，二者不能分离。军队与人民、官长与士兵、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也是如此。

---

[1] 1938年6月，抗大学生在全校发起迎接“七七”抗战一周年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革命竞赛运动，提出“向学习突击，向工作突击，向生活突击”等口号，运动历时一个月，涌现出520名突击队员和一批模范单位。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对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的讲话[1]

（1938年7月16日）

一

在全国是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但在部分时间、地点和军队，如在抗战第一阶段华北的八路军，是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这个方针去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便提出来，“基本上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一年来证明，去年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

二

部队高级干部是发命令的，同时又要团结干部。人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方面，领导主要应当注意和发扬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方面，消极的批评和斗争少一点。发扬人家的长处，不要夸大坏处。这一点，陈云同志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接见八路军留守兵团负责干部时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关于领导方法讲话的一部分。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8年7月17日）

陈长捷[2]军万余人，此次作战大部逃跑，仅余数千毫无战斗力，王靖国[3]军大体相同，要这些军队巩固吕梁山脉各县，完全无望。卫[4]部在乡宁者，亦朝不保夕。我一一五师陈旅[5]顾此失彼东西奔波，亦未打一个好仗。请你们立即考虑徐旅[6]西移归还建制，并朱、彭以一个人西移指挥该师问题，我以为应向蒋、白、阎、卫建议，要巩固吕梁山脉于我手中，保障某些渡口，非徐旅西移及朱、彭以一人去指挥，好好打几个胜仗，不能解决问题，否则将贻误大局。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巩固吕梁山地区问题致朱德、彭德怀并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陈长捷，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六十一军军长。

[3]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十九军军长。

[4] 卫，指卫立煌。

[5] 陈旅，指陈光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

[6] 徐旅，指徐海东任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

致国际和平大会电[1]

（1938 年 7 月 18 日）

谨向先进人类的代表世界和平的战士们致崇高的敬礼！请求你们号召和组织各国人民，给正在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和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以更大的同情和更有力的援助！

---

[1] 这是毛泽东、朱德致国际和平大会电的主要内容。

对苏鲁豫皖边区的工作的指示[1]

（1938年7月22日）

郭洪涛，并告朱、彭并转中党[2]：

鱼电今日收到。

1. 对石友三应继续采取争取的方针，表示接受其指挥，并表示援助他统一鲁南各游击队的指挥，同时要求他划出一定防地给我们作根据地与后方。

2. 省委或八路军支队应派负责代表和石友三恳切谈一次，说明中共与八路军对他的希望并竭诚援助他，同时向他说明并吞各游击队的方针不对，必然要引起许多局部磨擦，除与日本勾结的土匪部队应肃清外，对各抗日游击队应采取容纳与争取的方针。

3. 加强石部中下级党的组织工作，同时经过特别同志张友渔[3]去向石说明你们的意见和〈来〉影响石。

4. 请将山东友军、政权及党组织情况经常电告。

毛　服

养

---

[1] 这是毛泽东和胡服（刘少奇）关于苏鲁豫皖边区的工作的指示给郭洪涛等的电报。

[2] “中党”二字可能有误。

[3] 张友渔，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联络局书记。

复周恩来电[1]

（1938年7月26日）

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发表四五个司令部并规定适合现况之部队数目与经费数目为适宜。

---

[1] 周恩来7月26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前同林伯渠见蒋介石、何应钦，他们借口二百个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我以为可提两个方案：一、仍请编三军六个师或三师九个旅二十七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宋时轮、邓华，津浦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萧劲光以司令名义，并请发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经费。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和毛华初的谈话[1]

（1938年7月）

毛泽东：“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

毛华初：“妈妈讲这里有书读。”

毛泽东：“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跑飞机，要跑路，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你吃得消吗？”

毛华初：“我给地主放过牛，讨过米，跟妈妈坐过牢，吃得消，不怕苦。”

毛泽东：“哟，原来你吃过苦，那就打收条留下吧。”

毛泽东：“不过，要记住，你过去吃过旧社会的苦，吃过地主压迫剥削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胜。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

---

[1] 毛华初，湖南韶山人，族名远怀，字式谷。毛泽民养子。这是毛华初刚到延安去见毛泽东的谈话的一部分。

给李正清题词[1]

（1938年夏）

团结干部，连系民众，是一刻也不应该忘记的。如果这样做，就有了工作胜〔利〕的基础。

毛泽东

---

[1] 1938年，抗大第三期学员即将毕业时，毛泽东到抗大作报告。这是在报告结束时，毛泽东为学员李正清写的题词。

團結幹部，連繫
民衆，無一刻也不忘記
[illegible]他們。如果這樣做，
就證明了工作情形的進步。
毛澤東

毛泽东为李正清的题词。

为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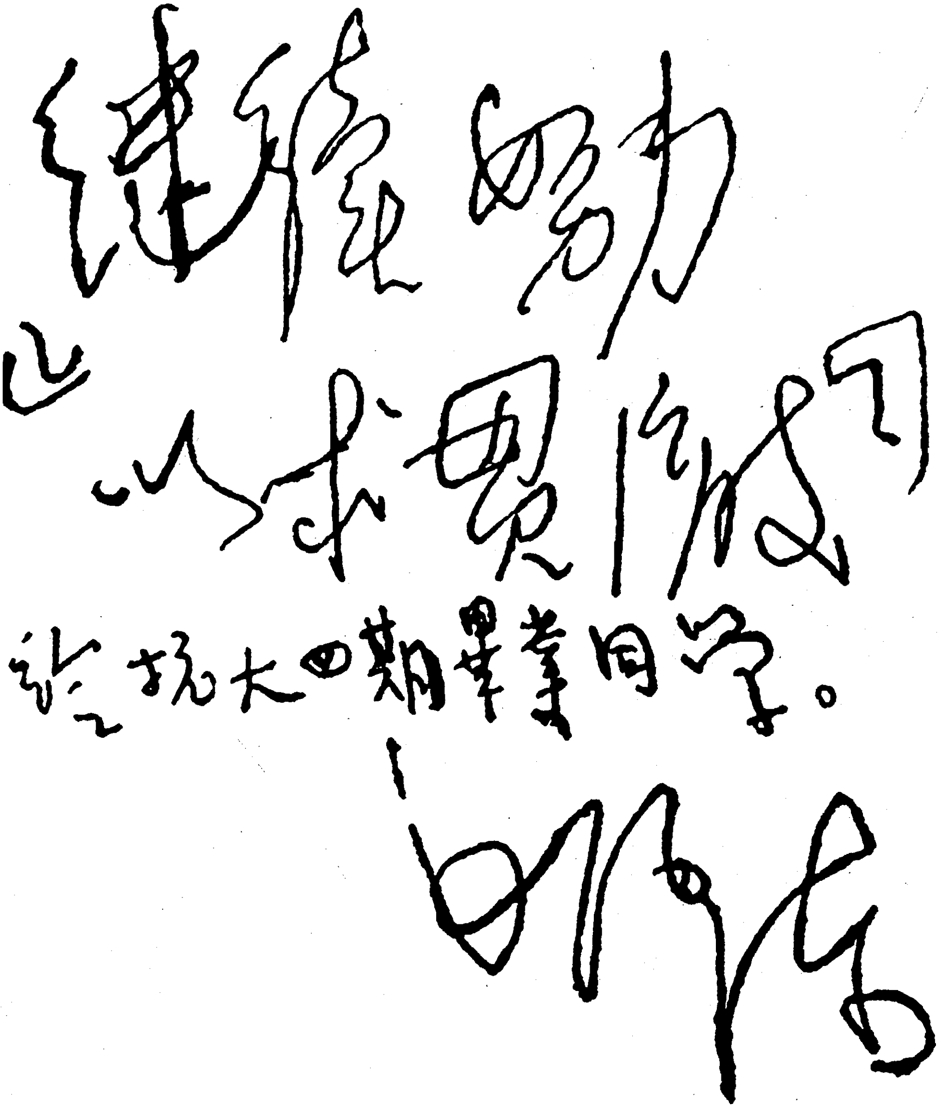
（1938年8月1日）

继续努力，以求贯彻。给抗大四期毕业同学。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一、二、六大队毕业典礼时，为毕业学员的题词。



继续努力

以求贯彻

给抗大四期毕业同学。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的题词。

在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的讲话

（1938年8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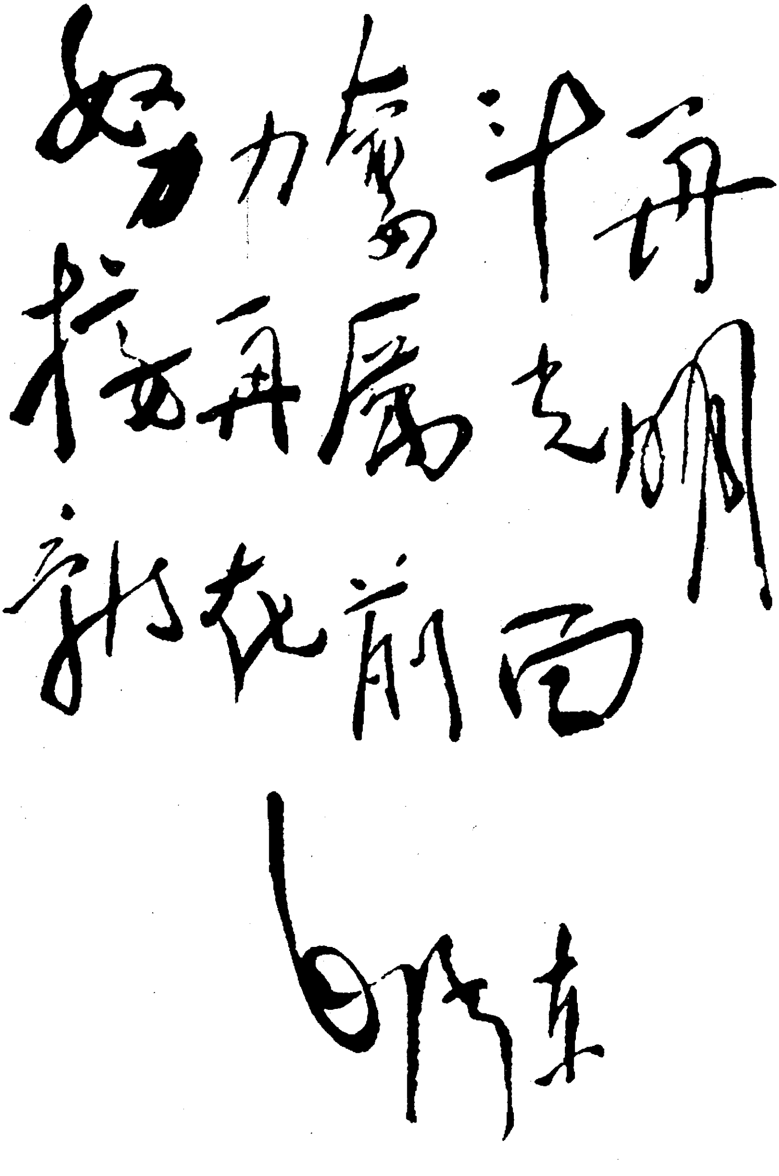
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抗大四期毕业大会上讲话。

在抗大第四期毕业证书上题词

（1938年8月1日）

努力奋斗，再接再厉，光明就在前面



努力奋斗再
接再厉光明
就在前面

毛泽东

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毕业证书上的题词。

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

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1]

（1938年8月2日）

一

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对外不独立，对内不民主。根据这一特点中国革命便是战争第一、军事第一，这是早被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所证明了的。枪杆子里出农会、出工会、出政权、出共产党，枪杆子里出一切，这是真理。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的政治。

二

中国历朝以来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一条是不正当的，明君用人在贤，昏君用人在亲，所以用干部要注意。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老老实实的，所以要讲究老实，有多少讲多少。既反对自大，认为自己盖世无双，又反对自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

---

[1] 这是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第二大队、第六大队毕业学员关于“战争第一”问题和“老老实实”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复朱德、彭德怀电[1]

（1938年8月3日）

集中南面兵力攻正太路有如下缺点：一、不能必胜；二、敌有由道清[2]攻洛阳，由临汾攻潼关之势，我军向北不便策应南边，因此仍以现时部署不大变动为宜。

稼祥同志已回，担任军委工作及总政治部主任，兼代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机关设延安，在前方者改为野战政治部。

---

[1] 这是毛泽东复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道清，即道清路，指河南省滑县道口镇到博爱县清化镇的一段铁路。

抗大同学毕业出去后怎样工作[1]

（1938年8月5日）

抗大的同学毕业出去后，做什么呢？第一，当学生。在学校学的仅仅才开了一道门，还要在学校外面去学。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不管是人是物，都是研究的对象，都是先生。马克思主义也是没有完的，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要学习一辈子。第二，当教员。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学生，要团结他们，组织他们，向他们学习，同时又教育他们。第三，当指挥官。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

---

[1] 这是毛泽东对抗大第四期毕业学员作关于出去后怎样工作的讲话的一部分。

致陈绍禹、凯丰电[1]

（1938年8月6日）

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的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时一致。

---

[1] 这是毛泽东致陈绍禹（王明）、凯丰（何克全）电的主要内容。

我们在抗战过程中的总方针[1]

（1938年8月6日）

陈、周、博、凯、叶：

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2]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洛　陈　康　王　胡　毛
鱼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洛甫（张闻天）、陈云、康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叶剑英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关于目前冀南工作的意见[1]

（1938年8月8日）

我们一般方针应积极参加与掌握河北地方行政机关，不应放松。目前我们要加紧建立与强固各县政府，推选或委派最得力同志去任县长，并可派定临时专员，造成既成事实，再与鹿[2]商讨交涉。为此，有请杨秀林[3]去路东并带干部暂时主持冀南政府工作的必要，请迅速决定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冀南工作的意见和胡服（刘少奇）致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转晋冀豫省委等电的主要内容。

[2] 鹿，指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

[3] 杨秀林，即杨秀峰，在1938年8月1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时被选为主任。

致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电[1]

（1938年8月10日）

我们提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召集中央青委扩大会议或中央青年工作会议，讨论全国青年工作问题，要各地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陈云、康生、胡服（刘少奇）、王稼祥致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电的主要内容。

复贺龙、关向应电[1]

（1938年8月12日）

根据井泉真[2]电及你们来电，去大青山行动以暂缓执行为宜。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2] 真，即十一日。

八路军第四纵队的工作方针[1]

（1938年8月13日）

聂、彭：

八日十九时电悉。

宋邓纵队[2]主力在现地区平谷、蓟县、密云一带加紧工作，站稳脚跟，再逐渐向东南发展的方针是好的。但宋邓有立即派遣一营左右之兵力，并带干部东出玉田、丰润、滦县配合当地暴动起来的游击队行动，并给那些游击队以各种帮助的必要。因为那些游击队如果没有一个基干支队去配合，即有被敌人削弱甚至消灭的危险。至于张高峰事件[3]业已趋向和平解决，并告。

毛　王　胡

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晋察冀代表彭真的电报。

[2] 宋邓纵队，指八路军第四纵队（当时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

[3] 1938年7月底8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朝鲜交界处的张高峰（今称张鼓峰）地方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本失败求和。8月10日，在莫斯科签订张高峰停战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

复林伯渠电[1]

（1938年8月16日）

在谈判中请坚持所提三个条件：一、陕甘宁边区区域为二十三个县；二、人员由国民政府正式委任；三、每月津贴十万元。谈判中心是区域问题，各县都须是完全的。

---

[1] 1938年8月12日，林伯渠在西安致电毛泽东、洛甫（张闻天）、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蒋鼎文今日早上说，行政院认为陕甘宁边区问题可由陕西省就近解决，边区至多只能划十七个县。我拟根据原来所提的三项条件交涉。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复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边区的货币政策

（1938年8月17日）

聂、彭[1]，并告朱、彭[2]：

边区货币政策应根据以下原则：

（一）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之可能。

（三）边区的纸币应该有准备金：第一，货物，特别是工业品；第二，伪币；第三，法币。

（四）日寇占领城市及铁路线，我据有农村。边区工业品之来源是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

（五）边区军费浩大，财政货币政策应着眼于将来军费之来源。

（六）在抗战最后胜利之前，法币一定继续跌价，法币有逐渐在华北灭迹之可能。杂币更会跌落，伪币亦会有一定程度的跌落。边

---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1902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常驻晋察冀边区，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及平津党的工作。

[2]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区纸币如数量过多，亦会跌落。问题中心在于边区纸币应维持不低于伪币之比价。

我们提议下列具体办法：

甲、发行一定数量的边区纸币（此数量由你们考虑决定电告我们），收买法币，保留一部分法币，大部分购买工业品，用一部分法币兑换伪币。

乙、对于杂币应设各种方法使其流到边区以外去。

丙、有无可能送一部分杂币至总部及一二〇师，带一部分法币来延安，请考虑电复。

丁、扩大边区纸币的印刷，因将来印刷一定比现在更困难。

上述各项请考虑研究。待彭真来延时再详细讨论决定。

毛　洛　王　胡[1]

八月十七日

---

[1] 洛，指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胡，指胡服，即刘少奇。

和鹿钟麟谈判时应坚持的原则[1]

（1938年8月18日）

与鹿谈判原则为要求鹿对一切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不妨害华北抗战，军事行政照既定方针进展。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王稼祥、胡服（刘少奇）关于和鹿钟麟谈判晋察冀、冀中、冀南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应坚持的原则致荣臻、彭真、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等电的主要内容。

对河北工作的指示[1]

（1938年8月20日）

应迅速建立和巩固河北的统一军事行政系统，晋察冀边区仍照原来划四个区，每分区由边区政府委在一行政专员；冀中最高行政机关仍为边区政府办事处及其主任；冀南设冀南行政公署正副主任。如果在河北形成整个军事行政系统，将来的困难和磨擦将会减少。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河北目前工作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关于冀南新政府成立后的工作指示[1]

（1938年8月20日）

徐、邓、宋，并省委，并致彭、朱瑞、伯承同志：

甲、冀南新政府成立须即实行几件善政：（一）救济各地广大饥饿的群众，粮款向富人筹集及提出一部分地方公款等。（二）组织秋收运动。（三）规定二五减租办法。（四）发布在敌人进攻时人民自卫与避难办法及空舍清野办法。（五）发布人民防匪自卫办法。（六）组织廉洁政府，规定各级政府人员生活费及公费。

乙、保安队应即改编或改造，土匪应该争取与肃清。

丙、新政府暂时不必向外面发宣言通电，不要对外宣传过甚，以免刺激人家，但新政府在本区内应即发布各种布告法律命令提高自己威信，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

丁、在冀南除使用法币外应给冀察晋边区银行钞票以流通的便利。

毛　洛　王　胡

廿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及省委和彭德怀、朱瑞、刘伯承的指示电。

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1]

（1938年8月22日）

学校以外是一个大学校，那里的东西多得很，学之不尽、取之不竭。孙中山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套，不是从学校里来的，而是在大学校里学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学校里来的，是在大学校里学的。列宁也是在学校外面创造了列宁主义。学校学习是第一章，出去以后是大规模的学习，要不断地学下去，活到老、学到老。在党校学得了一个方法，出了学校还是学习，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关于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三个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对山西新旧势力的冲突问题的指示[1]

（1938年8月22日）

彭、贺、萧、关、甘，并赵、罗、程、杨：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支持发展新势力，但我党我军及战委会公开表态时不要作左右袒护，应号召新旧各派团结起来，设法做到在旧派反对新派时，不反对我党我军，并能同我们在某些地方合作抗日，动员组织群众与改造部队等。

毛　洛　王　胡

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彭德怀、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并赵林、罗贵波、程子华、杨尚昆的指示电。

致彭德怀等电[1]

（1938年8月24日）

彭，并朱、聂、徐、宋、杨及冀中、冀南省委：

彭德怀、朱瑞与鹿钟麟谈判结果一般适当，但请留意询问河北省政府将如何组织，共产党或八路军能否派代表参加省政府，总动员委员会既有国民党游击司令部代表参加，共产党与八路军亦应有代表参加。北方局应有一代表参加河北省政府或战委会。

毛　洛　王　胡

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彭德怀并朱瑞、聂荣臻、徐向前、宋任穷、杨秀峰及冀中、冀南省委的电报。

对晋冀豫党和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1]

（1938年8月24日）

目前晋冀豫全区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晋冀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为此，党和八路军的任务是：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游击兵团和地方游击队，广泛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争取改造友军；逐步改造政权机关，使之成为抗日民主政权，准备将来召集晋冀豫边区政府代表大会；召开全区若干县的群众团体代表会议，动员群众参战，满足人民一些迫切要求；大力发展党，建立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办学校、训练班，培养干部。

毛　洛　胡

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对晋冀豫党和八路军的任务作出的指示。

为欧阳平题词[1]

（1938年8月）

奋斗到底。

毛泽东
一九三八年八月九日

---

[1] 欧阳平，当时任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又名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这是毛泽东在一张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的照片背面的题词，并将照片寄给了欧阳平。

为韦统泰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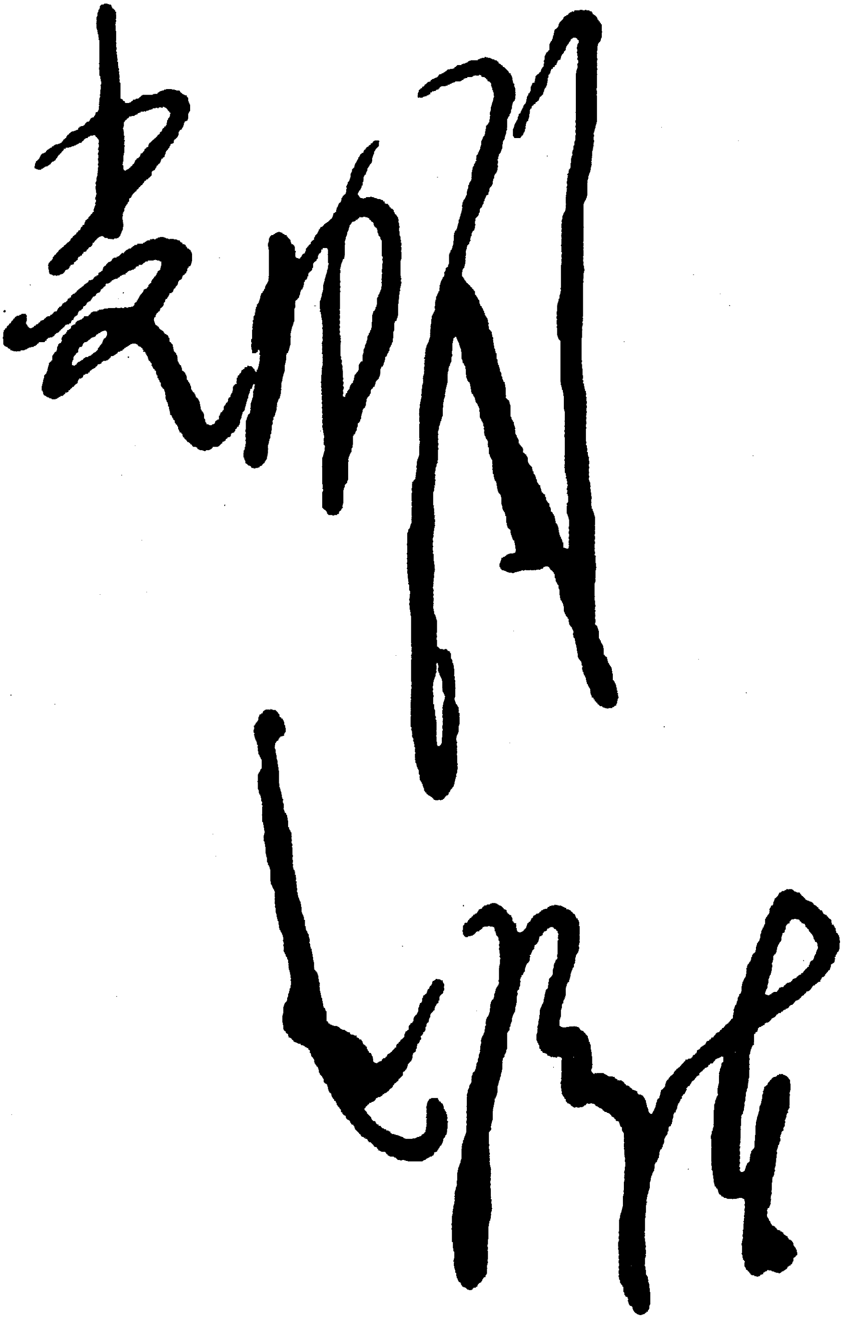
（1938年8月）

光明

毛泽东

---

[1] 1938年8月，在延安时，韦统泰等被分配到“抗大”总校第六分队，前往洛川。毛泽东在他们出发前去看望他们，并为他们题词留念。



毛泽东为韦统泰的题词。

为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题词[1]

（1938年9月5日）

边区儿童保育院成立纪念——儿童万岁。

---

[1] 1938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分会成立边区战时儿童第一保育院，《新中华报》设特刊报道，这是毛泽东为其写的题词。

致郭洪涛电[1]

（1938年9月7日）

郭洪涛同志：

山东各党派军队与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好转，已使我们有可能开始在黄河以东建立大块抗日根据地。望你们根据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敌后战区工作的基本原则与山东的实际情况，和石友三议定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纲领。建立根据地的各方面工作可由石友三公开出面来做。

毛　洛　胡

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胡服（刘少奇）给郭洪涛的电报。

1938年9月，毛泽东、朱德等到机场迎接从武汉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的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等。

1938年9月，延安各界为王明、周恩来、秦邦宪、徐特立从武汉回到延安举行欢迎大会，毛泽东出席会议。前排右二为毛泽东。

对张荫梧有计划的获取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对策[1]

（1938年9月7日）

聂：

在维持边区军事行政统一的原则下，请即通知正太路以北各县党部，发动当地军事行政机关及民众团体，拥护边区政府与军区司令部。

各县军政机关，如无边区政府与司令部的介绍，拒绝服从任何人的命令，并得禁止任何人在其区域内进行边区的军事政治活动，干涉军事行政。

如河北省府与张正式向边区政府交涉派人到正太北活动时，须给以礼遇，并与之正式谈判。

毛　朱　王　胡

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聂荣臻的电报，对张荫梧企图侵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正太路以北地区的平山、行唐、阜平等县的计划，提出对策意见。

给孔祥熙的信[1]

（1938年9月10日）

目前寇患虽深，诚能群策群力，抗战到底，则最后胜利，自属于我。惟战争进至新阶段，困难因之增多。克服困难，鄙意似宜实施新的战时政策，使人力物力能获得广大之发动，则持久作战，庶有巩固之基础。

---

[1] 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派曹仲植、郝瑞珍等到陕甘宁边区赈济灾民。郝瑞珍到延安时带来孔祥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的这封复信也是托郝瑞珍转交给孔祥熙的。这是毛泽东复信的主要内容。孔祥熙，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冀东形势和使冀东游击队迅速正规化

（1938年9月10日）

聂，并宋、邓，并致鸣之：

一、冀东既开过一次军事会议[1]，成立军区并五个军分区，各区负责人均已推定，第四分区正、副司令是CC的，为了使冀东游击队迅速正规化，并转变为八路军作风起见，宋、邓部队似应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区与各游击队合编作为基干，各分区正、副司令亦应以八路军干部及当地干部共同担任为好，各分区完全无八路军基干部队即负责干部似不甚好，请考虑决定。

二、冀东收复各县，应即由司令部委任或由当地推选临时县长，各分区即任命临时专员创立政府，不要等待，至冀热察边区政府则以再待一二月正式成立为好。

三、对于CC分子，如果不能诚意与我们合作，我们不要过高地推举他们，重要位置不要轻易让给他们。

朱　毛　王　胡

九月十日

---

[1] 指1938年8月中旬八路军宋、邓纵队和冀东抗日联军在遵化县铁厂镇会师后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和行政委员会，统一军队指挥和政权工作。

程子华率队进击柳林西北地区[1]

（1938年9月11日）

陈、罗，程，周、甘[2]，并奇涵[3]：

（一）离石步、骑、炮混合之敌人数约四千，确否待证，于今（十一）日下午七时进占柳林、军渡，并向我河防部队射击。原驻柳林之十九军向柳林以南撤退，估计该敌有进扰绥德威胁延安可能。

（二）我七一八团已占领宋家川[4]及其附近渡口阵地对峙中。碛口对岸及其以北由我警备一团守备，枣林坪[5]及其以南由警备三团守备。

（三）望子华同志即率有力支队进击柳林西北地区，扰击敌之侧背，并破坏其后方交通。同时，陈、罗、周、甘亦应派就近部队兼程向该敌侧后相机予以打击，并积极破坏和截断其后方联络线，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等的电报。

[2] 程，指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周、甘，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3] 奇涵，即陈奇涵，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所辖绥德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4] 宋家川，镇名，即今陕西省吴堡县政府所在地。

[5] 枣林坪，村名，位于陕西省吴堡县西南。

配合我河西守备部队阻敌西渡。你们部署情形望电告。

毛　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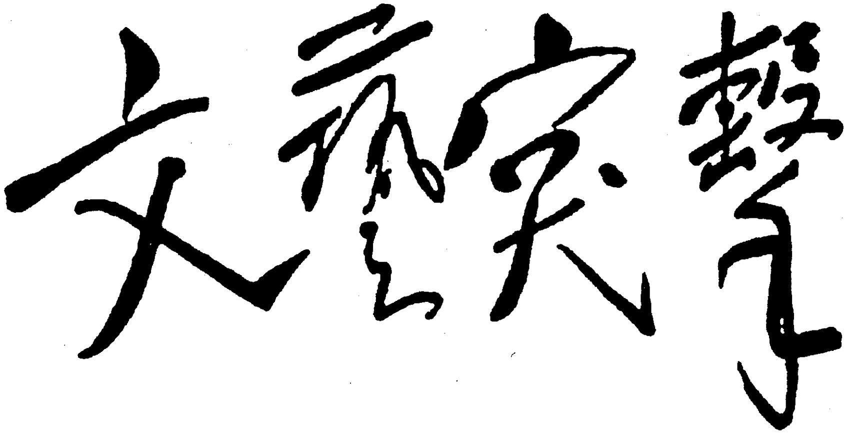
十一日二十四时

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艺突击》杂志[1]题名

（1938年9月17日）

文艺突击

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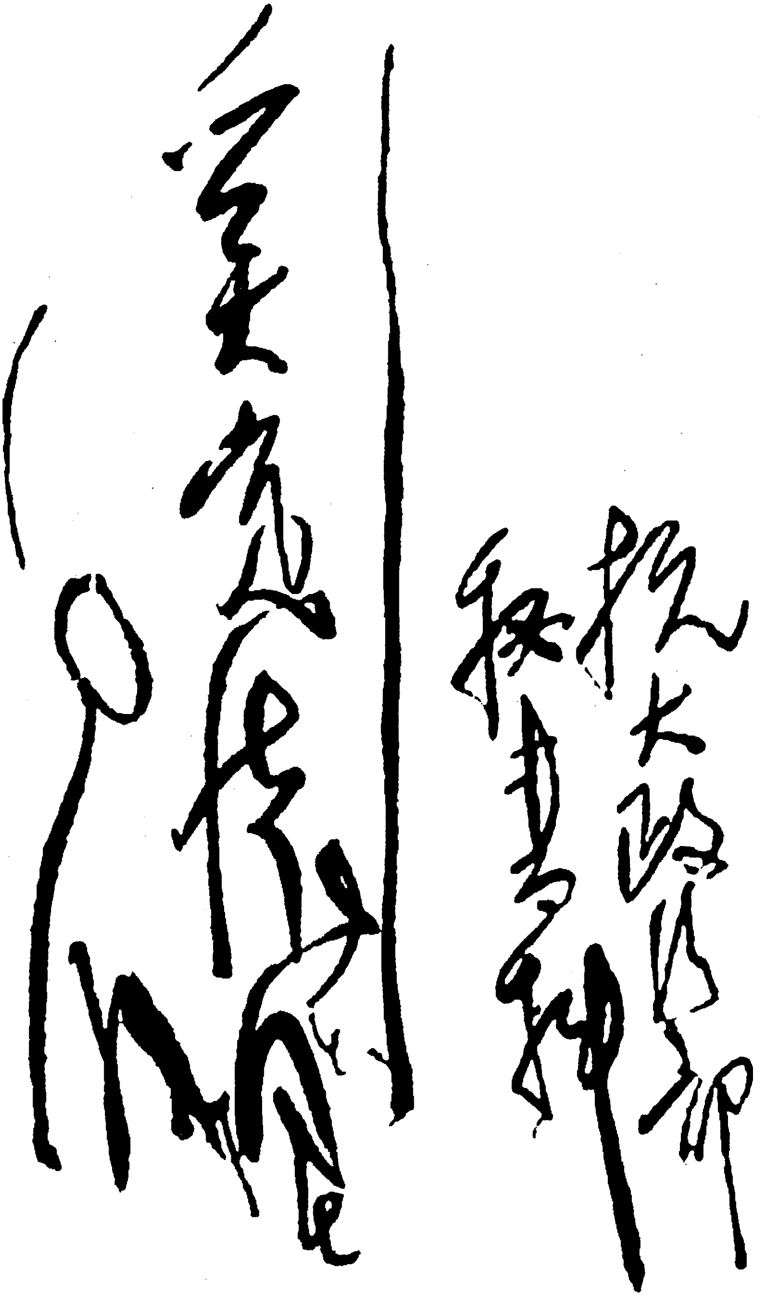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文艺突击》题写的刊名。

---

[1] 《文艺突击》创刊于1938年9月中旬，初以油印本出过2期，后改为铅印本出了6期，至1939年6月止。这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与鼓舞下，在延安最早诞生的一个文学刊物。毛泽东为其题写了刊头。

[2] 奚定怀致信毛泽东，要求毛泽东为《文艺突击》杂志题写报眉。信中说："大家的意思要请你题一个报眉，……希望你马上替我们挥成。"毛泽东回信题写了"文艺突击"四个字。并说："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



抗大政治部
秘书科转
奚定怀同志

毛泽东复奚定怀信的信封。

给前线将士的慰问信

（1938年9月18日）

前线英勇抗战的将士们：

望你们继续发挥你们英勇精神奋战到底，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一切后方的同胞都是援助你们的。

毛泽东

九月十八日

克服困难创建冀热察根据地[1]

（1938年9月26日）

聂转宋、邓及冀东特委各同志：

甲、在全国坚持抗战有利形势与华北普遍的游击战争，加以八路军远近距离的配合，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有雾灵山[2]、燕山、五龙山[3]东西千余里之大山脉便于回旋，冀东地方党有相当基础，根据以上各种条件，创造冀热察[4]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决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起义的新军中不可免的复杂的严重现象。

乙、利用敌人主力进攻武汉及平汉路、同蒲路间的空间，争取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胡服（刘少奇）给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并转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及中共冀东特委的电报。

[2] 雾灵山，位于今河北省兴隆县西北，系燕山山脉主峰。

[3] 五龙山，疑指“五指山”，位于今河北省兴隆县东部。

[4] 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时间用一切努力整顿军队，首先建立政治制度，建立党，严肃纪律，密切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但不应放弃必要的军事教育与游击动作的教育。

丙、在部队中、居民中开展反汉奸的斗争，揭发一切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的阴谋，防止奸细打入军队进行破坏工作，并须有计划地有耐心地清洗部队中极坏的分子。

丁、在整顿队伍与创造根据地的工作上，必须要有计划与工作中心。我们认为目前主要的力量在白河以东之密云、平谷、蓟县、兴隆、遵化，以部分的力量在白河以西创造根据地。在整顿军队方面，目前应注意培养基干兵团与基干游击队，使之成为战斗的纪律的模范，成为领导斗争的核心。

戊、密切军队与地方党的关系，加强党内团结，并由宋邓统一冀东各军指挥。办各级军事政治短期训练班，轮流训练干部。

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胡服
二十六日午

给蒋介石的信

（1938年9月29日）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

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戢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争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

于东亚。此心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和抗大第三期毕业学员的谈话

（1938年9月）

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关于诗歌的指示

（1938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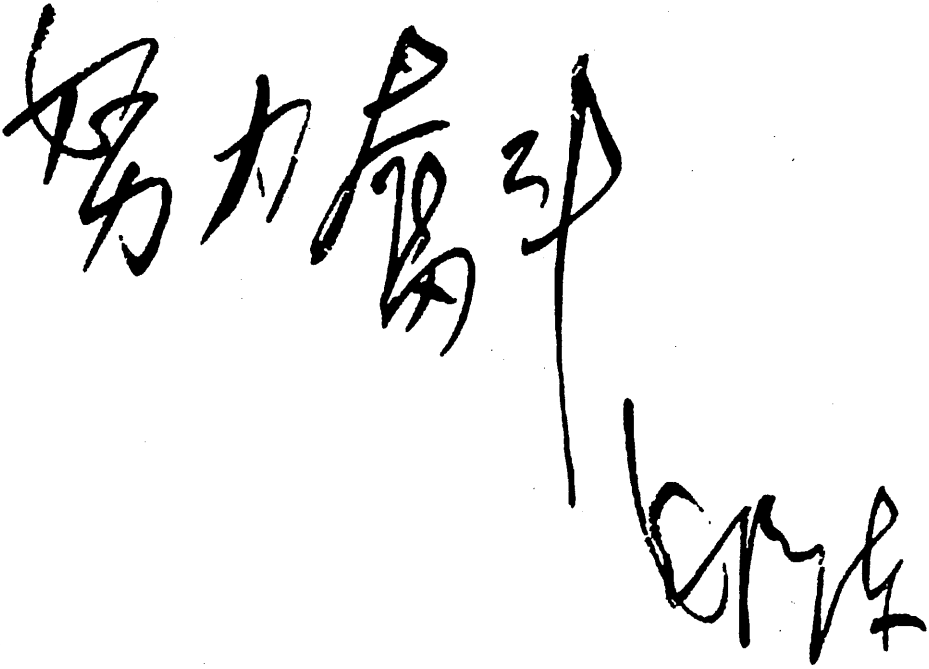
诗歌要反映人民生活，要写抗日的现实斗争，才能完成诗歌的革命任务。因此，诗歌工作者要参加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有，诗歌要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写，群众才喜爱。

为吴伯萧题词[1]

（1938年9月）

努力奋斗。

毛泽东



努力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吴伯萧的题词。

---

[1] 这是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教员、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吴伯萧所写的题词。

在冀热边区创造根据地具有战略意义[1]

（1938年10月2日）

聂，宋、邓，冀热边区委：

一、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当目前敌人主力尚在进攻华中、华南，冀东八路军与全党团结并执行正确的政策与战略战术，创造冀热边区根据地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困难及游击队纪律不好等现象是能够克服的。

二、但游击战在冀热发展对敌人的威胁较大，敌人统治冀热较久，汉奸的培养及组织亦较多，敌人除以武力向游击队严重进攻外，必用汉奸、敌探打入游击队、八路军甚至党内来，进行各种阴谋破坏，因此全党与八路军的团结一致特别重要。如果在党内八路军内发生任何磨擦，有任何不团结的现象，均将被日寇、汉奸、敌探所利用，给我们以最大的损害。为此我们号召：

甲、宋邓二同志必须亲密合作。

乙、八路军干部与地方党及游击队中的同志亲密团结。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胡服（刘少奇），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给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邓华及中共冀热边区委的电报。

丙、军事行动须统一由邓宋指挥。

丁、地方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尽可能最快地编入八路军。

戊、在同志中造成团结和睦的空气，对八路军与地方党领导同志的批评须极端慎重。如有不同意见，只限于在领导机关讨论，或呈报上级解决，不得在领导机关以外去讨论或斗争，共产党员更不得在群众中去批评八路军和党部。

己、提高部队党及地方党内纪律，号召全党团结，进行艰苦斗争。

三、在工作上应即扩大八路军，吸收地方游击队加入八路军，开办短期训练班，改造游击队，提高部队纪律，在部队中建立与发展党，建立政府，恢复秩序。望在党内及部队中进行广泛的动员。

毛　朱　彭　王　胡　杨

二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把主要的力量用以对付敌后抗日根据地。图为被日军破坏的村庄。

各方动员战胜敌人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1]

（1938年10月2日）

聂转省委[2]，左，伯承，周、甘[3]：

甲、晋察冀边区已成为华北根据地之一及沦陷区民众抗日斗争的导标，使伪傀儡政权不易普遍与巩固的建立，在军事上不特威胁平津、张垣[4]重镇，而且危害平汉、正太、平绥[5]、同蒲诸交通要

---

[1] 1938年9月，日军在进攻武汉、广州同时，出动华北方面军5万余人，对晋察冀根据地的五台和冀西地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围攻。这是毛泽东和当时正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朱德、彭德怀、王稼祥、胡服（刘少奇）、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晋察冀代表彭真就反围攻问题给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的电报。

[2] 省委，指中共晋察冀省委。1937年11月成立，1938年4月改为晋察冀区党委。这里沿用旧称。

[3] 左，伯承，周、甘，指左权、刘伯承、周士第和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参谋长、第一二九师师长、第一二〇师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4] 张垣，即今河北张家口。

[5]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正太，即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至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道，因此引起了敌人严重注意与不断进攻，惟此次围攻较前任何一次来得较有计划与持久性。

乙、估计华北游击战的普遍发展，全国抗战配合，目前敌仍不能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进行周密的围攻计划。因此，应以各方动员起来争取战胜敌之围攻，但五台、阜平、灵丘、涞源及某些大乡镇一时期有被敌占去的可能。因此：

1. 在党政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建立起持久抗战胜利信心，争取持久，准备艰苦奋斗，是一切工作的重心。

2. 动员群众参战，反对动摇妥协投降的某些可能现象的发生，肃清奸细，实行清野空舍，埋藏粮食器具。

3. 军队应注意掩护秋收。

丙、根据敌人构筑据点，步步推进，紧缩边区及敌人顽强与敌力不足的优缺点，提出如下作战意见，请相机灵活执行之：

1. 相当地集中主力于我有利的各种条件（敌人弱、地形有利）方面，准备待机。

2. 以小部队与敌进行极不规则的小战，迟阻和疲惫敌人，以相当有力部队转入敌之后方交通线，打击敌之运输。

3. 如敌无弱可乘，不便我主力集中打击或消灭敌时，待敌人进至利害循环变换线，即将主力转至敌后方，仍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待敌转移方向或退却时，给敌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

丁、伯承须令正太路兵团及接近兵团，对正太路有计划地进行破坏，并相机以适当兵力越路北进，分途尾击敌人。周士第应即令雁门关太原线之各兵团，积极地吸引原平、忻口、关城之敌，并相

机越路东，尾击东进之敌。

毛　朱　彭　王　胡　彭

二日

论新阶段[1]

（1938年10月）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扩大的六中全会作报告，我准备说些什么呢？我要说的分为下述几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召集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要说的就是这些问题。

同志们，在全国炮火连天、全世界战争危机紧迫的环境中来开我们的六中全会扩大会，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呢？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克服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实行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也就是我的报告的总方向。

---

[1] 这是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一　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一）扩大的六中全会之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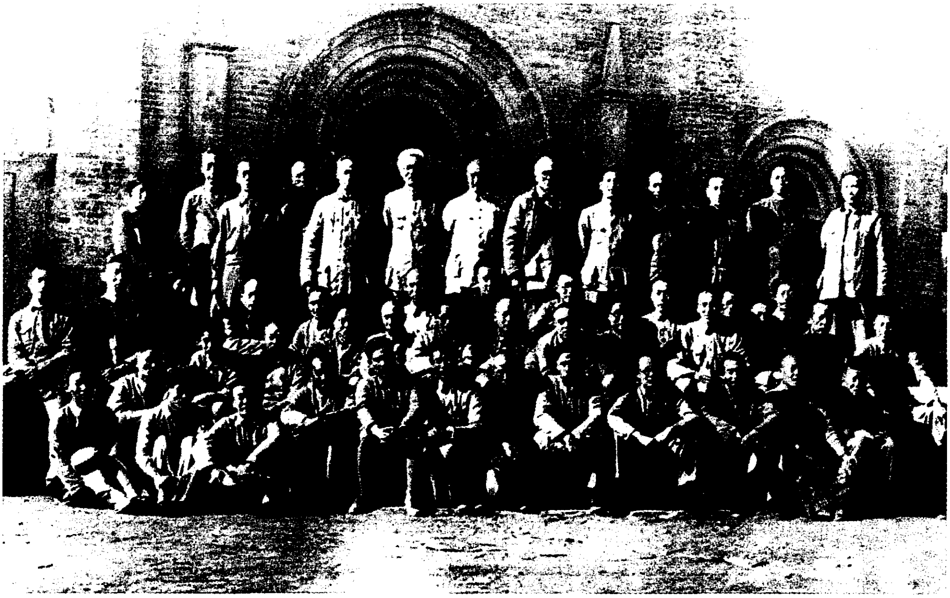
我们党的中央全体会议，自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开过第五次中央全会以来，差不多五个年头了。因为各中央委员分散工作于国内外各种不同的环境，使我们不能聚集在一块。此次则除了几个同志之外，最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到了，而且到了全国各地许多领导工作的同志，使我们的这次中央全会成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人数到得最多的一次。本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本年召集的，因为战争紧张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迟到明年，而当前时局向我们提出了许多的问题，必须作明确的解决，以便争取抗战的胜利，所以召集了这次扩大的中央全会。

（二）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

五年以来，我们党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最大与最主要的是：由国内各党派各阶级互相对立的局面转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国内战争转到了抗日战争。

过去国内战争形成的原因，在于一九二七年不幸破裂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乃是由于新的历史环境。大家都已非常明白，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侵略东四省的第一步骤，进到准备并实行向全中国侵略的第二步骤。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使得国内国际情



1938年9月至11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和会议结论。图为毛泽东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合影。

况都发生了变化。首先变化了与变化着国内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各个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变化了与变化着国际间的相互关系。因而我们的党，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的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

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当时，中国国民党也逐渐改变了它的政策，逐渐转到了团结抗日的立场。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那时，救国团体在许多地方有了组织，其他党派亦有了抗日要求。由于国共两党双方政策的转变，由于蒋介石先生的领导，由于全国军民的拥护，由于其他集团与其他党派的协力，就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步骤，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发出了神圣的正义的炮声，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月，即去年八月，我们党发布了一个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同时，八路军改编完成，开赴华北作战。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发表了公开宣布以三民主义为基础与国民党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宣言。第二日，国民党、国民政府与国民革命军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先生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与之团结救国的谈话。从此以后，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完全建立起来了。十二月，为着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发表了愿与国民党不但合作抗日而且合作建国的宣言。此时未久，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江南作战。从此以后，抗日团结便日益进步了。

同志们，这种由两党十年战争转到两党重新合作，并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执行了这个转变，奠定了两党长期合作的始基，是经过了许多的艰难曲折才完成的。然而由于中央与全党的努力，总算是完成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党的这个新的政治路线（共产国

际决议，九月八日《新华日报》），并为了中华民族的胜利，号召全世界各国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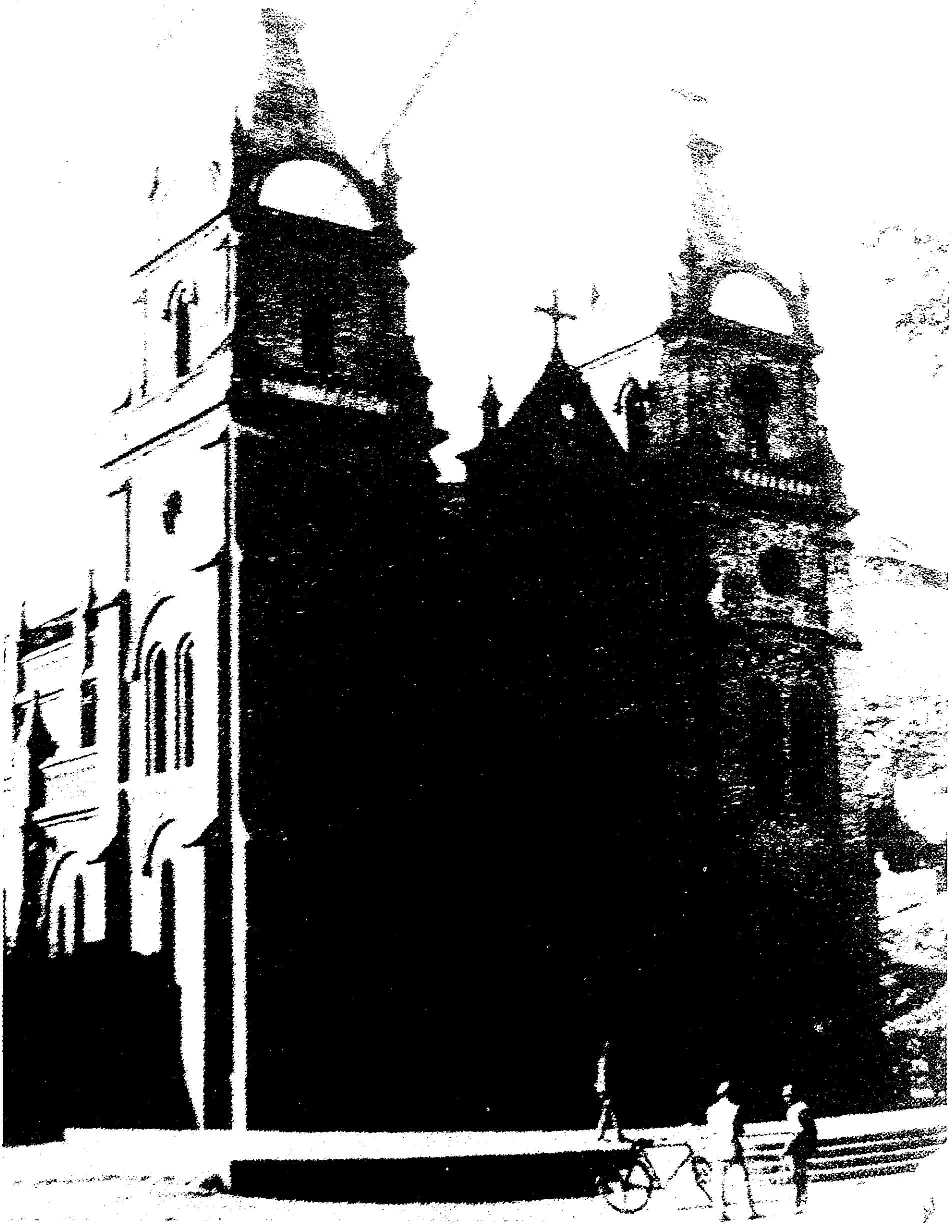
同志们，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现在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明白：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一百年来受人欺凌、侮辱、侵略、压迫，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那种难堪的奴隶地位，是改变过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全中国的最后胜利，即中华民族自由解放的曙光，已经发现了。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一伟大的民族战争，和中国过去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都不相同。因为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进步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自寻死路走向崩溃的时期进行的；同时，又是在全世界先进人类正准备着空前广大与空前深刻的斗争力量，以便抵抗与战胜德、日、意法西斯魔王，争取世界光明前途的时期进行的。这样三方面因素的结合——以中国进步并且继续进步为主要基础的三方面的结合，就保证了我们的抗日战争一定能够最后取得胜利，而自由解放的新中国一定要出现于东亚，并成为未来光明世界中一个极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一个中国，不但将造福于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而且将造福于全人类。

（三）六中全会的任务

这次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处于抗日战争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关头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担负了重大

的历史任务。



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旧址——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

完全不错，抗日战争英勇奋斗了一年多，全国有了伟大的团结与伟大的进步，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虽然失地很多，但同时就有了很多胜利，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战争发展下去，主要的由于中国继续进步，同时配合着日本增加困难，国际助我增强，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也是可以预断的。谁要是看不见过去的伟大成绩与未来的胜利前途，谁就要陷入悲观主义的深坑而不能自拔。然而单看到这一方面，是不够的。抗日战争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它的消极方面，这就是我们面前摆着的许多困难。目前的情况告诉我们，一年多以来中国所有的奋斗、团结、进步、胜利，还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还没有反攻敌人的力量。武汉现正处于敌人的威胁中，敌人还要向广州、长沙及西北等地进攻。因此全国人民都盼望共产党发表意见，新的环境提出了许多问题。同志们，我们必须发表意见，必须解决问题。对的，我们党早已发表了意见，许多根本问题也早已解决了。但新的环境要求我们发布新的意见，解决新的问题。

什么是新的问题呢？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达到驱逐敌人之目的，这就是当前问题的关键。这个问题在全国无数人们中议论着、焦思着。我们应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呢？无疑是应该回答的。

这个问题展开于各方面，发生了许多的问题。

例如，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十五个月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呢？战略方针是持久胜敌，还是速战胜敌呢？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还是敌人的？抗战有出路，还是妥协有出路呢？如果战争是长期的，又用什么方法去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呢？所有这些，是否能在十五个月经验中找到

根据给以明确的回答？并是否可以依据这些过去基础而在抗战的新阶段中起其积极作用，借以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类的问题。

又如，整个抗日战争将怎样发展变化呢？所谓新阶段，究将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阶段呢？假定武汉不守，战争趋势将怎么样呢？今后全国努力的方向，即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是什么呢？有些什么好办法足以渡过战争的难关呢？这些更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国共合作的前途与远景将会怎样呢？共产党有何根据来说长期合作呢？共产党有何办法来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呢？所谓不但合作抗战而且合作建国，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怎么样呢？这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又如，世界风云如此紧急，其趋势将怎样呢？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有何利害关系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1938年9月，毛泽东和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的同志合影。

还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如何呢？共产党员为着其党的政治方针而奋斗时，其工作态度应该怎样呢？共产党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同他党合作，同人民联系，足使艰难的时局走向顺利呢？共产党的内部关系怎样？有些什么好方法团结全党使之在抗日战争中尤其在当前艰难的时局中起其大的作用呢？共产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究将怎样呢？这也是重要的问题，这又是一类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党内党外迫切要求解决的，近几个月来，我们经常遇到要求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们。

同志们，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广大而复杂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现正处于同一个强的帝国主义作决死的斗争，这个斗争现在已接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阶段发展的过渡期间。我们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是在这个时候开会的，扩大的六中全会的责任非常重大，我们要解决许多的问题。

二　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

（一）十五个月经验证明了什么

让我们从十五个月的经验说起吧。

十五个月抗战的经验给了我们以什么呢？我以为主要的有三方面：第一，证明了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因而抗战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第二，证明了中国的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悲观论者之没有根据。第三，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

靠民众，借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

（二）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抗战初起之时，许多人不从敌我力量基本上的对比出发，而从若干一时的与表面的现象出发，设想战争不久就可解决，速胜思想笼罩一时。然而蒋委员长在去年双十节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我们则在很早的时候就指出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决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要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所有这些都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完全证明其正确。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

我们很早就指出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是日本的困难；第三是国际的援助。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条件在抗战十五个月中已经怎样了？一句话回答：已经有了一个基础，但距必要的程度还很远。

拿第一个条件（战胜敌人基本的主要的条件），中国的进步来说，十五个月来确已有了一个基础，但惟有继续进步，才能最后胜敌。所谓中国的进步，包括国内政治、军事、党务、民运、文化教

育等一切方面。这些方面的进步，十五个月来是非常显著的。然而单拿这些已有的东西，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反攻必须有一个准备时期，必须经过全民族的努力，使我们民族中一切生动力量有了一个广大的与深刻的发动，才有反攻胜敌之可能。因此速胜论是没有根据的，他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忘记了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具有很大的潜势力，发动起来足以使自己转败为胜，转弱为强，根本变化敌我形势，然而还待今后的努力，不是现成的事实。

拿第二条件，日本困难来说，也是这样。十五个月中，敌人出兵百万，伤亡数十万，用费数十万万，军队锐气日减，财政经济日形竭蹶，国际舆论纷起谴责，这些都是日本的野蛮侵略与中国的英勇抗战造成的结果。然而敌人这些已存的困难，还不足以停止他的进攻及利于我们的反攻，还须待到敌有更大的困难我有更大的进步之时，才是反攻胜敌之机会。因此，速胜论在敌情方面也没有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拿第三条件，国际助我一点来说，现在也还未至最大有利之时。十五个月来，我们有了国际间广大的舆论声援，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根据国联决议已经给了我们许多帮助，证明了我们不是孤立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国际和平阵线各国有其各不相同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助我，政府则取某种程度的中立态度，其资产阶级则利用战争做生意，还在大量输送军火与军火原料给日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援华问题上已经具体的表现出来；然而国际形势目前还不容许它作超过现时程度的援助。因此，我们对国际援助暂时决不应作过大希望。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

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这点上，过去经验也否定了速胜论。

总起来说，不论中国方面，敌人方面，国际方面，十五个月经验，都证明速胜论主张之毫无根据，相反，显露了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决不能是速决战，而应该是持久战。持久胜敌——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唯一正确方针。过去不相信这种方针的，现在事实给了明白的教训，应该再没有疑问了！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第一个总结。

1938年9月，毛泽东和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的同志合影。

（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悲观论者毫无根据

抗战以前，唯武器论大张旗鼓，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作阿比西尼亚[1]。抗战以后，这种议论表面没有了，但暗中流行着，抗战每至一紧张关头，这种议论必兴风作浪一次，认为中国应该停战议和，不堪再战，再战必亡。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蒋委员长早已明白宣示："战事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一九三七年七月庐山谈话）"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大异其趣。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强不拔之民族意识。"（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作最后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

---

[1]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1936年5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1941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独立。

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共一九三七年八月决定）所有这些，都被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了。悲观论或亡国论者认为敌人强不可抗，中国不堪一战，妥协才是出路等等荒谬说法，已经证明是完全错的了。

理由何在？在于敌强我弱仅是一方面的事实，敌人尚有弱点存在，中国尚有优点存在。

什么是敌人的弱点呢？第一，他是比较小的国家，他的兵力、财力不足，经不起长期的消耗。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在中国的坚强抵抗面前又不得不分散与消耗，使他无法占领全中国。即在其占领地区，由于中国的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亦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与某些平原地带，其他仍然是中国的。第二，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退步的。他的内部矛盾迫使他举行侵略战争，并迫使他采用异常野蛮的掠夺政策。这样，就使他的战争，一方面变为同整个中华民族绝对对立的战争，迫着中国除少数当汉奸者外无论什么阶层，无论什么党派，都不能不团结起来坚决抗战。另一方面，变为同他本国人民大众绝对对立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悉索人财以应战争的结果，已经在他国内人民与前线士兵中间逐渐酝酿了许多的不满，战争发展下去，无疑有迫使他的人民与士兵大众走上用坚决的方法反对战争本身的趋势。这些都在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敌人自己方面而使敌人必归失败的最主要的根据。第三，正是由于敌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换句话说，损人利己的，就不得不把他自己同一切和他利害相反的国家处于对立地位。除了两三个法西斯国家之外，一切国家，尤其是

这些国家的人民大众，都不赞成日本的侵略战争。这样，就使得日本不得不日益缩小其国际活动的范围，日益处于孤立地位。这也是十五个月中已经开始证明了的。

这样，日本国度比较的小，影响到他兵力、财力的不足；日本战争的退步性；日本国际地位的孤立。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成为日本战争中存在着的先天性的弱点与困难，而这些弱点与困难又正在日益发展之中。对于这些，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是瞎子，他们全没有看见，而仅仅看见了敌强我弱这一点。所以亡国论与悲观主义在敌情方面并没有根据，因而他们的妥协政策只能是亡国政策。我们是最后胜利论者，我们的观点则在敌情方面有充足的根据。十五个月经验已经开始证明了。

什么是我们的优点呢？第一，我们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虽然敌人占去了我们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然而我们还有大块土地作为我们长期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的根据地。即在敌占地区我们也还有许多游击战争根据地。这个特点，是和小国如捷克、比利时等根本不同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优点。第二，我们今天的抗日战争不同于中国一切历史时期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不但战争本身的性质是进步的，而且这个战争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进步基础之上进行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不同于一切历史时期的中国，我们有了比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的进步的人民、进步的政党与进步的军队。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它本身包含着可能继续发展进步的伟大力量。这一点，就是存在于我们方面而使我们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主要的根据。十五个月的经验证明，在原有进步基础上进行着的伟大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已经推动了全中国的进步，旧的民族腐败传统是在破坏着，新的民族进步力量是在生长着，一个全民

族统一团结进步发展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完成着。抗战以前的中国不同于抗战以后的中国，这是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的了。而抗战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目前尚未完结）的中国又将不同于抗战尔后阶段的中国，也已经可以预断。还有，第三，我们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的。不管资本主义国家现时还保存其许多矛盾政策，也不管国际局势可能暂时地影响到各国助我的程度，但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斗争，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澳洲人，以及其他亚洲人。十五个月来世界各国的同情与援助，给了我们以这种确信。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的中国，能够同时配合着世界的援助，因为今天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整个世界先进人类已成为休戚相关的一体，敌人要使我们陷于孤立的企图，只会是徒然的。

这样，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我们又有国际的援助，这三者同时结合在一块。这些都是我们的有利条件，不但已经存在，并在日益发展之中。在这里，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同样是瞎子，他们一点也看不见，而只看见我们是弱国，是劣势，是半殖民地这一点，喃喃发出其“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胡说，其中许多坏蛋就根据这种胡说暗地进行其投降妥协的阴谋。我们相反，我们要根据十五个月经验中已经证明了的东西，向全党全国明确地指出我们国家与我们战争的长处与短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指出长处与有利条件在全战争中占居着优势，号召全国努力奋斗，发挥自己的长处，增强自己的有利条件，克服自己的短处与不利条件，为争取最后胜利而斗争。最后胜利将是谁的呢？我们确定地答复：中国的。在这个基础上决定我们的政策：坚决抗战还是动摇妥协呢？我们确定地答复：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妥

协，只有坚决抗战才是出路。东四省[1]之沦亡，奥国之灭亡，捷国之瓜分，都并非因为抗战，这是有目共见的。把丧师失地归罪于抗战的，只是完全的胡说。现在还是一样，在中国的许多优良条件下，抗战必兴，但如走妥协道路，则灭亡无可避免。因此坚决反对妥协论，反对悲观主义，唤起全民奋战到底，乃是唯一无二的方针。

总起来说，敌强我弱这个矛盾着的对比，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决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胜论者。敌小，我大；敌人战争是退步的，我们战争是进步的；敌之国际地位比较孤立，我则比较能得外援。这几个矛盾着的对比，又决定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定属于我，不属于敌。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经验的第二个总结。

（四）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两个基本问题已从十五个月抗战经验中证明了。但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方案如何？则过去国人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照老样下去就可以了，他们不注意团结全国，不注意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改进，甚至还在加重磨擦，阻碍进步。我们则从来不赞成这种意见，认为唯有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力求进步，依

---

[1] 东四省，指当时中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于1955年撤销，原辖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先占领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3年又侵占热河省。

靠民众，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国国民党在其抗战建国纲领[1]中明白指出：“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中国共产党亦早已指出了：“抗战时期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中共一九三七年八月决定）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十五个月经验已经证明了。

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了，抗战十五个月的坚持，没有这个统一团结是不可能的。也只有抗战，才能统一团结各方面。这种统一团结，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十五个月经验又向我们证明：敌人破坏阴谋之严重与内部团结巩固之不足。抗战为什么遭受很多挫折，为什么至今还不能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除了客观原因之外，统一战线力量之不足，统一战线还没有必要的扩大与巩固，是其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可知，只有更加统一团结全民族，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这是第一。第二，十五个月抗战，不但推动了全民族的团结，同时又暴露了这种团结之不足，而且推动了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的

---

[1] 抗战建国纲领，是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一方面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一方面又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

进步，同时又暴露了这种进步之不足。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必须发动全民族各阶层中一切生动力量，而欲达此目的，非从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力求进步不可。没有各方面的更大的进步，就不能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也就不能更进一步的统一团结全民族。第三，十五个月抗战又证明了民众援助抗战力量之伟大，同时也证明了民众力量之仅在开始发动，因而使抗战得不到民众的广大援助而遭受了许多挫折。从此得到教训，国人必须进一步地认识抗战依靠民众这个基本问题。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还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民众力量这一方面。

1938年10月，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在六届六中全会上。

总之，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于巩

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在于力求进步以发动全民族的生动力量，在于依靠民众以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总结。

同志们，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我们是能够战胜敌人的，只要我们与全国坚持这个总方针，并作了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抗日战争正在向着一个新阶段发展，新阶段中有许多新的任务，但这个总方针是不变的。十五个月经验作了我们观察新的形势提出新的任务的基础。

三　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一）认识战争与统一战线的规律性是决定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在我们总结了过去经验之后，重要的问题，在于看一看当前形势发展的趋向。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会怎样从过去基础之上向前变化发展的？这是我们现在要答复的问题，这一点对于我们解决当前的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对于整个抗日战争变化发展的行程没有一个大概的估计，我们就只能跟着战争打圈子，让战争把自己束缚起来，而不能将其放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加之以调节整理，造出为战争所必需的条件，引导战争向我们所要求的方向走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懂得抗日战争的规律性，才能实现对于它的战略指导，才能决定为战争服役的一切战略、战术、政策、计划与方案。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是一样，

只有我们研究了与认识了它的规律性，我们才能有效地推动统一战线使之进入巩固发展之途，而为战争的胜利起其支柱的作用。

我们现在先来说战争问题。

（二）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主观能力的优劣决定战争的发展过程

历史上的战争有一个阶段就完结的，例如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争[1]，只有日军进攻，俄军败退，就结束了。又如意阿战争[2]，也只有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失败，就告结束。中国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3]，也是一样。这是一种情形，这是由于一方面双方强弱不同，又一方面双方指导能力优劣不敌而造成的，这是第一类战争。第二类战争，以两个阶段宣告完结。例如法俄战争，拿破仑从进攻到退却，俄国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中国古代有名的吴魏赤壁之役，秦晋淝水之役，也是这样。虽则两军强弱不同，但弱者善于利用其他优良条件，给以正确指导，故于退却之后，接着反攻，战胜敌人。但是还有第三类战争，例如

---

[1] 日俄战争，指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它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2] 意阿战争，指1935年10月意大利武装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5月完全占领了埃塞俄比亚，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意属东非的一部分。

[3] 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叫北伐战争。

外国的七年战争[1]，八年战争[2]，三十年战争[3]，百年战争[4]，乃至二十年前四年的欧洲大战[5]（特别表现于西战场），都有三个阶段。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退却，为第三阶段。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类的战争。这类战争的特点，在于有一个较长的或很长的相持阶段，这也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

中日战争属于哪一类战争呢？我以为是属于第三类战争的。这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历史条件与不同的战争指导集团之特殊情形而造成的。

（三）中日战争的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

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将表现于在敌则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防御，相持，反攻，这样三个阶段之中。由于敌强我弱（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故出现了敌方进攻，我方防御的第一阶段。不说退却而说防御，是说以战略

---

[1] 七年战争，指1756年至1763年间，以英国、普鲁士、汉诺威为一方，以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瑞典、西班牙为另一方，在欧洲、美洲、印度和海上所进行的战争。

[2] 八年战争，指1775年至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

[3] 三十年战争，指1618年至1648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战场的国际性战争。

[4] 百年战争，指1337年至1453年英法两国间因争夺富饶的佛兰德斯在法国境内的封建领地而引起的战争。

[5] 欧洲大战，即1914年至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两大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第一次世界战争。

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不是一下子干脆退却。但又由于在敌则小国、退步、寡助，在我则大国、进步、多助这些特殊的条件，我之英勇抗战又使敌在进攻中受到分散的困难与消耗的损失，而不得不于一定时机结束其战略上的进攻，转入军事上保守其占领地而从政治上与经济封锁上向我进攻的阶段。此时敌虽消耗，但一时尚未消耗到使之转入失败的程度；我虽坚决抗战与各方面向前进步，但一时也难进步到足以转入反攻驱敌出国的程度。依上诸因，一个双方相持的第二阶段或中间阶段，就形成了。由于第二阶段中敌之困难与我之进步俱日增，又配合着国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形势，就能使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原来状态逐渐发生变化，进到在全局看来日益于敌不利而有利于我之局面，先到敌我平衡，再到我优敌劣，彼时，就可转入我之反攻、敌之退却的第三阶段了。

上述三个阶段的看法，是依据敌我既存的与将来可能发生的双方相反对比之具体条件，而作出的一种对于整个战争过程的估计，现在并不是事实，而是一种可能的趋势。要依我之主观努力，创造出为这种可能趋势所必要的条件，才能使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然而依据既存条件，加上正确指导与全民族广大而坚持的努力，是能够使这种可能趋势变为事实的。

（四）速胜论者与亡国论者都反对这种估计

速胜论者反对三阶段论，认为我能迅速反攻，无需乎要一个中间阶段。这是不对的。抗日战争面前存在着许多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迅速反攻是不可能的。速胜论者的反对三阶

段，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过低估计了敌人力量，一方面又过高估计了自己力量的原故。亡国论者也反对三阶段，认为相持与反攻都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是一个阿比西尼亚。这是不对的。他们与速胜论者相反，过高估计了敌人力量，而过低估计了自己力量。在他们面前只有黑暗，承认敌人能够灭亡全中国，我之抵抗与努力只是徒劳，办到敌我相持亦不可能，更不说什么反攻胜敌了。因此，必须一方面反对速胜论，又一方面反对亡国论，才能坚持我们的三阶段论。而在当前情况下，反对亡国论比之反对速胜论更加重要。另有一些人，口头上赞成持久战，但不赞成三阶段论。这也是不对的。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实际上，这种意见仍属于速胜论，不过穿上“持久战”的外衣罢了。

（五）三阶段论与国际形势的关系

当张高峰事件[1]发生之时，国内一部分舆论兴高采烈，以为日苏战争如果爆发，中国就可以转入反攻，无需乎要持久战了。在这种观点下，三阶段论当然不能成立，我们的估计是错误的了。这是主要依靠外援的思想，是速胜思想之一种。然而国际形势不是照着这些朋友们的主观意愿发展的，而是依照它自己的规律。世界的主

---

[1] 1938年7月底、8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朝鲜交界处的张高峰（今称张鼓峰）地方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本失败求和。8月11日，在莫斯科签订张高峰停战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

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拿这种情况来看中日战争，迅速反攻的两阶段论也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但不怕三阶段，而且正要造成三阶段。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根据。

（六）相持阶段是战争的枢纽

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在于包含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这就是说，第一，我之抗战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停止敌之进攻，假如敌之进攻不能在一定时间与一定地区停止下来，就无所谓性质不同的三个阶段。第二，相持阶段出现了时，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去准备我之反攻所必需的一切条件，设若不然，就不能过渡到反攻阶段里去，而只是永远的相持，也无所谓三阶段。在这里，对于速胜论者，我们肯定地说：必须经过一个准备时期，才能团结全国，克服困难，生长新的力量，同时配合着敌人的困难，国际的援助，然后实行反攻，驱敌出国，否则是不可能的。拿主要依靠自力胜敌的观点来看问题，不可避免的要作出这个结论。对于亡国论者与悲观主义者，我们肯定地说：只有这个过渡阶段，才是全战争的枢纽。中国化为殖民地还是获得解放，不决定于第一阶段中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是可惜的，增加了敌人的力量，减少了自己的力量。然而很

多没有丧失的东西尚可作为制胜敌人的资本，唉声叹气于宝物的丧失是无益的。第一阶段中保存着的领土与各种有生力量，特别是已经获取的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等各方面的进步，是最可宝贵的，这是第二阶段中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然而这仅仅是继续进步与准备反攻的基础，还不能决定反攻，决定反攻的东西是第二阶段中增加上来的力量，没有伟大的新生力量之增加，反攻只是空唤的。

（七）三个阶段的特点，第一阶段

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特点，已经出现了的，尚未出现而可以预计得到的，有概略指明之必要，对于指导战争与决定政策有重要的关系。

第一阶段有些什么特点或重要标志呢?

有如下三方面的东西。

第一，中国方面：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全国军队的参战，抗战的坚决性，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的发布，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取得合法地位，游击战争的创造，全国军队的进步，民众运动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方面表现进步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许多不利事件与不良现象，例如：主要大城市、交通线与主要工商业的丧失，土地与人口的丧失，全国进步的不平衡(有些地方进步得非常之慢)，政治制度之一般还仅在开始走向民主化，顽固分子与腐败现象的存在，妥协倾向的酝酿等等。

第二，敌人方面：军力财力的消耗，世界舆论的责备，军纪的败坏，军队战斗力的相对地减弱，国内人心与前线军心不满的酝

酿，张高峰战争的失败，汉奸军队的难于组成及已经组成者的无能等等，这些都是表现其困难的大事件。但同时却又有表现其能力的东西，那就是：进攻的坚决性，军力的顽强，占领地的扩大，政治组织力的强韧，阴谋机关的有力等等。

第三，国际方面：援华运动的增长，苏联力量的壮大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东西：欧洲大战的酝酿，英日间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各国军火原料的助敌，这些都于中国不利。

以上中国、日本、国际的许多东西，都是抗战第一阶段中十五个月来表现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分别生其影响于新的阶段之中。

（八）第二阶段

在假定武汉不守的情况之下，战争形势又将出现许多新的东西。虽然敌占武汉并不即等于旧阶段的完结，新阶段的开始，由现在敌人尚能继续进攻到他被迫停止进攻之时的这段时间，还是一个由旧阶段转向新阶段去的过渡期间。虽然如此，但武汉不守成为事实之后，就将发生许多新的情况。

武汉不守之后，以及新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可以预计的基本情况，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又一方面则更加进步。这是新阶段中的基本特点。

更加困难将表现于下述各方面：（一）由于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分割了，由此将发生许多新的问题；（二）财政经济之异常困难；（三）英日某种程度的妥协倾向（或相反，在日本坚持独占与威胁南洋的条件下，英日

有进一步冲突的可能)；（四）如果敌攻广州，中国主要的海道交通有被割断之虞，国际援助将暂时的部分的减弱；（五）全国性伪政权有形成的可能及其对于抗日阵线的影响；（六）抗日阵线中部分叛变的可能，妥协空气的增长；（七）悲观情绪的生长，意见分歧现象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发生而将加诸抗日战争身上的新困难事项。估计到这些困难，才便于有准备有计划地克服之。

更加进步将表现在下述各方面：（一）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坚持抗战方针及其在政治上的更加进步；（二）国共关系的改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三）军队改造工作的进步；（四）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坚持；（五）国家民主化的进步；（六）民众运动的更大发展；（七）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的实施；（八）抗战文化教育的提高；（九）苏联援助的继续与可能增加及中苏关系的更加亲密等等。

整个第二阶段即相持阶段，是中国准备反攻的阶段。其时间长短，依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及国际环境如何而定。但我们应该准备长期战争，熬过这一段艰难路程，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第二阶段中虽然敌我在战略上是相持的，但仍有广泛的战争，主要表现于主力军在正面防御，而广大游击战争则发展于敌人的后方。那时，游击战争在许多重要战略地区将变为非常艰苦的战争，现在就应该准备对付这种艰苦。

（九）第三阶段

具体情况不能预计。但彼时必是我之反攻条件业已准备完毕，同时敌之困难程度大大增加起来，国际形势又大大于我有利。彼时

战争形势，不是战略防御或战略相持，而是战略反攻了；不是战略内线，而是战略外线了。彼时国内政治上必须有大的进步，军事上必须有新式技术，否则反攻是不可能的。

（十）保卫武汉是争取时间问题不是死守问题

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战略决战，在一二两阶段中都是不应有的，都足以妨碍抗战的坚持与反攻的准备，因此必须避免。避免战略决战而力争有利条件下的战役与战斗的决战，应是持久战的方针之一。于必要时机与一定条件下放弃某些无可再守的城市，不但是被迫的不得已的，而且是诱敌深入，分散、消耗与疲惫敌人的积极的政策。在坚持抗战而非妥协投降的大前提下，必要时机放弃某些据点，是持久战方针内所许可的，并无为之震惊的必要。

（十一）由目前过渡到相持阶段

只有停止敌之进攻，才有利于我之准备反攻。而要达此目的，还须给一个大的努力。故由目前过渡到敌人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其占领地，出现整个敌我相持的阶段之时，还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须克服许多困难才能达到。因为敌在占领武汉之后，还不会立即结束其进攻，他必定还想向广州、西安、宜昌、长沙、衡

州[1]、梧州、北海、南昌、汕头、福州等地及其附近地区进攻。我要停止敌之进攻，还须针对着敌人这种企图继续执行战略的运动防御战，用极大努力进行坚持的战斗，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而又不为敌人所算，使敌之进攻不得不停止，把战局过渡到敌我相持的有利局面。

（十二）但相持局面快要到来了

敌人占领武汉之后，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将更形暴露了。如果他再要进攻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地并作占领之企图，他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之弱点所给予他的极大困难，必将发展到他的进攻阶段之最高度，这就是我之正面主力军的顽抗与我之敌后庞大领土内游击战争的威胁，所加给敌人兵力不足（他不能足）与兵力分散（他不能不分散）现象上的极大困难。这一形势——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在我则正面防御与敌后威胁，这是敌之极大劣势，我之极大优势。当然，在整个敌我力量对比上说来，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基本形势并未变化，这只有在长期相持阶段内我用全民族的极大努力，并配合国外条件，才能使之变化。然而敌在进攻武汉的战斗中，他之强的力量已经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强的力量之进一步发挥，一方面固然给了我们以损失，然而同时就给了他自己以困难。因为敌之强的力量（同时即是其不足的与分散的力量）在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之后，气力势将衰退下去，就不得不使其总的战略进攻接近了一个顶点。我们承认敌

---

[1] 衡州，旧府名，府治在今湖南省衡阳市。

之进攻还有一点余威，并最好与最恰当的是估计到他的这点余威还相当的大，因此还有充分可能他要攻略广州、西安、宜昌、长沙、南昌、梧州、福州等处及其附近地区，甚至要准备他向着整个粤汉路[1]与西兰公路[2]之进攻。然而这在总的敌人力量上将只是一点余威。在日本的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他只有那么多的力量，可能使用于中国方面的用得差不多了。并且在其正面与占领地内必须对付的广泛战争还依然存在，日苏、日美、日英、日法之间的矛盾在增长着，国内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前线官长与士兵的矛盾，大量支出与财政竭蹶的矛盾在加深着，这些都是使得敌人大大皱眉的地方。我们及全国人民必须看到这些地方，不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之丧失所震惊，赞助政府调整全国之作战，有计划地部署粤汉路、陇海路、西兰公路及其他战略地区之作战，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捉住敌人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给以更多的消耗，促使更大的分散，使战争胜利地与确定地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这是全国当前的紧急任务。

（十三）敌力在逐渐减少我力在逐渐增加中

敌人是否增加了力量呢？就其原有的力量来说，没有什么增加，相反，他的力量大大地减少了。敌人原有的军力与经济力，是大大消耗了。十五个月战争中，他的军力伤亡了数十万人，消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与军用资材，毁灭了数百架飞机与百余艘军舰，

---

[1] 粤汉路，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2] 西兰公路，指西安至兰州的公路。

支出了数十万万元经费，这个消耗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的。直到他被迫停止其战略进攻之时为止，他还要消耗一大批力量。在这点上，他的盟友希特勒[1]早已大大地发起愁来了。然则敌人毫无力量的增加吗？有的，这就是对于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及部分乡村之占领，从各国手里及中国民族资本手里夺取了市场，从中国手里夺取了资源与生产工具，夺取了许多人力，这些是日本战争之唯一目的，他是暂时地增加了这些东西。然而问题是：这些东西能抵偿已有的战争消耗吗？不能，消耗了的全部战争“投资”是已经消耗了，他要取偿还需付以新的生产投资。问题又是：抛开日本生产投资之无能不说，假定他能的话，他能取偿其战争消耗吗？也不能。因为往后依然存在着广大战争，依然每天要消耗。只要有广大的敌后游击战争存在，例如现在华北的游击战争那样，他的取偿是很困难的。由于不断的战争，他将不但不能取偿旧的，而且还须支付新的，只要我们的抗战坚持下去，日本的这条可怜命运是大体确定了的。我们说日本在第二战略阶段即相持阶段中将逐渐化强为弱，化优为劣，这种继续消耗是决定的一方面。现在说到中国方面，中国力量究竟是减少了呢，还是增加了？我们的回答是减少了，又增加了。减少的是原有力量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军队人员武器的消耗，人口、工业、土地与资源的损失等上面，这是使得我们感到困难的重要的一方面。然而不是没有增加的，增加的是新的质与量，这表现在全国的团结，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文化的进

---

[1]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步，人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的提高。主力军虽后退了，游击战争却前进了。一部分地方虽损失了，另一部分地方却进步了。问题是在：增加的程度今天还不够，今天还不够停止敌之进攻，今后更不够实行我之反攻，因此发生了必须用广大持久的努力去增加新的力量的问题。而这种增加，即全民族各个阶层中生动力量之更大发动与党政军民各方面之更大进步，基于今后之广大持久的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在主要的依靠自己生长的力量，再配合之以敌人困难之加重，国际助我之增强，就能使整个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由敌优我劣之现时形势，先走到敌我平衡，再走到我优敌劣，这就是长期相持阶段中必须解决也可能解决的根本问题。

（十四）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于是问题在：敌人占领中国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敌据城市以对我，我据乡村以对敌，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吗？答复：有困难，但是能够的。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不但由于敌是帝国主义国家，我是半殖民地国家，而且由于这个帝国主义又复占据我之城市，我则退至乡村以抗敌，因而造成了长期性，速胜论在此是毫无根据的。然而今天中国的城市乡村问题，与资本主义外国的城市乡村问题有性质上的区别。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

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第二是大国的条件。失去一部，还有一部。敌以少兵临大国，加以我之坚强抵抗，就迫使敌人发生了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困难，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即大后方，例如云、贵、川等地，使敌无法占领；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例如华北、华中、华南等地，使敌无法全占。第三是今日的条件。如果在数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帝国主义国家武装侵占，例如英占印度那样，那是难免亡国的。今天则不同，今天主要的是中国进步了，有了新的政党、军队与人民，这是胜敌的基本力量。其次是敌人退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已临到衰老的境界，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与造成着把他自己送进坟墓的条件。又其次是国际形势变化了，旧的世界接近死灭，新的世界已见曙光。这些道理，我在《论持久战》中已详说过了。总之，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存在着许多优良条件，利于我们组织坚持的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合之以世界的变动，就能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毫无疑义，乡村反对城市就在今天的中国也是困难的，因为城市总是集中的，乡村总是分散的，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我之行政区域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分割，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在内战条件下，极小部分的乡村支持了长期反对城市的战争，还当帝国主义各国一致反共的时期。

谁能说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又当帝国主义阵营分裂之时，中国以极大部分的乡村，不能支持长期战争去反对城市敌人呢？毫无疑义是能够的。并且现在的所谓乡村，与内战时期的乡村有很大不同，不但地域广大，而且在云、贵、川等省大后方中，尚有许多城市与许多工业，尚可与外国联络，尚可建设。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从长时期中生息我之力量，削弱敌之力量，加上将来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蒋委员长在去年十二月告国民书中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这是完全正确的。战争虽困难，胜利前途是存在的。

（十五）妥协危机严重存在，但是能够克服的

我们早就说过，一部分患着恐日病的人们时刻企图动摇政府的抗战决心，主张所谓和平妥协，过去曾见之于南京失守之后，现在又在蠢蠢欲动了，这是敌人阴谋在抗日阵线内部的反映。这种危机是严重存在的，国人必须充分注意，不让亲日派得售其奸。亲日派的企图和敌人的企图是一致的，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假令得售其奸，抗战的前途就成大问题。因此，全国上下憬然觉悟于敌人阴谋与内部反间之可畏，自动自觉地努力反对这种阴谋，一刻也不容放松。这种危机是否能够克服呢？那是能够的。在国共两党及一切爱国志士团结一致并作了必要的努力之后，克服妥协危机，驱除助敌张目的妖魔鬼怪，而把抗战坚持下去，不但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亲日派究竟没有多大的势力，抗日派的势力大于

亲日派。

（十六）相持阶段中游击战争的新形势

新阶段中，正面防御的是主力军，敌后游击战争将暂时变为主要的形式。但敌后游击战争在敌我相持的新阶段中，将采取一种新形势发展着。什么是游击战争的新形势呢？即第一，在广大地区中仍能广泛的发展。这是因为在我则土地广大，在敌则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只要我能坚持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正确地指导之，敌要根本限制我之发展是不可能的。但第二，在某些重要战略地区，例如华北与长江下流一带，势将遇到敌人残酷的进攻，平原地带将难于保存大的兵团，山地将成为主要的根据地，某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可能暂时地缩小其数量，现在就应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在现在，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在将来，为了配合正面防御使主力军得到休息整理机会，为了生长力量准备战略反攻，必须用尽一切努力坚持保卫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长期坚持中，把游击部队锻炼成为一支生力军，拖住敌人，协助正面。一般说来，新阶段中敌后游击战争是比较前一阶段要困难得多的，我们必须预先看到这种困难，承认这种困难，不可因为前一阶段的发展容易而冲昏了头脑，因为敌人一定要转过去进攻游击战争。然而是能够坚持

的，一切敌后工作的领导人们必须要有这种自信心。因为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不论敌人如何的强，总比内战时的条件优良得多。在这里，争取与瓦解伪军以孤立日寇，是非常重要的任务。

（十七）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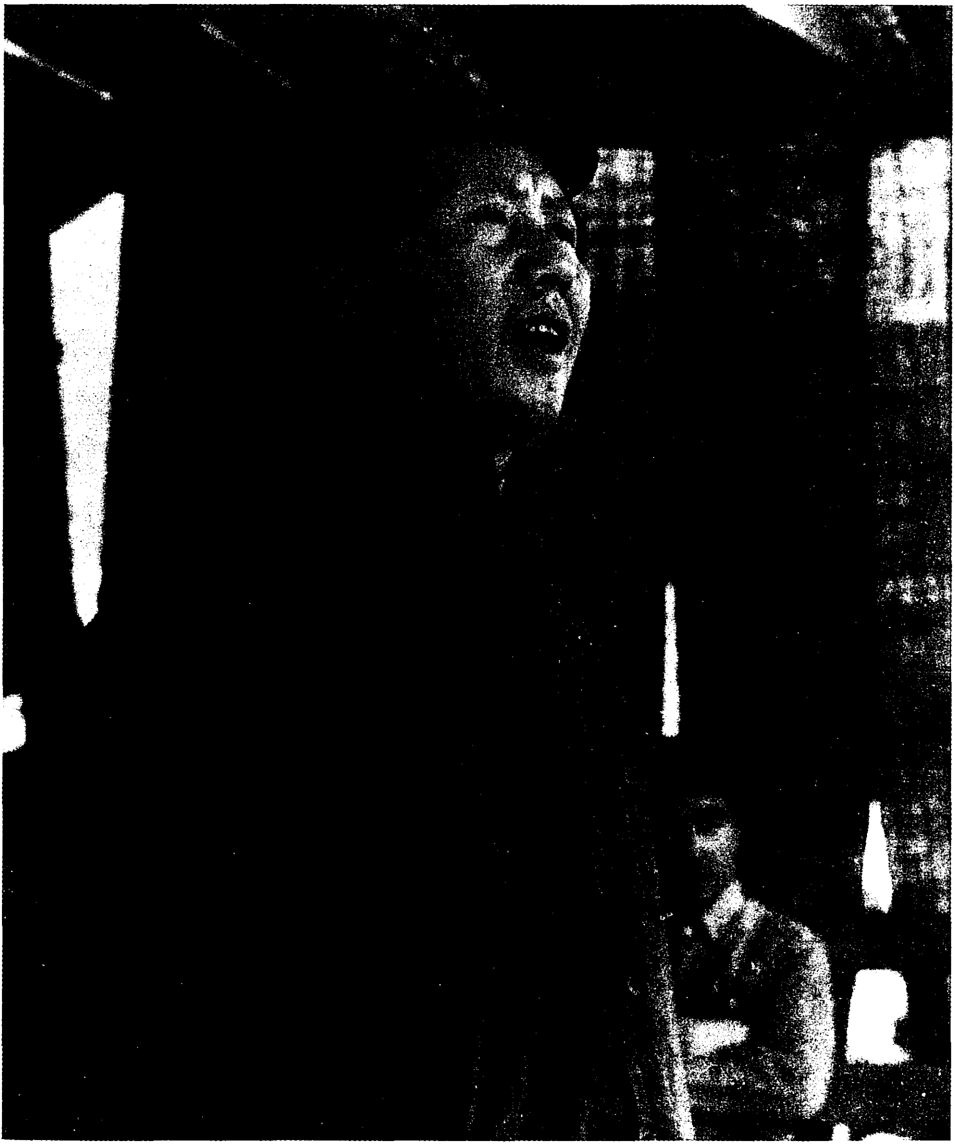
以上说的都是抗日战争的形势问题，以下要说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

抗日战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之时，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之时。由于新阶段中将遇到比前更多的困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应该适应这种情况而表现其向困难斗争并将任何困难战而胜之之伟力。为了在目前过渡期间以及到了将来的新阶段，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表示其对于困难之无能，而是表示其具有克服困难之伟力，就必须认真的巩固统一战线与扩大统一战线。并且应该懂得：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战争的长期性与统一战线的长期性，是不能分离的。

（十八）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而两党中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过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

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忱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话。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存在与共同抗日建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之下，可以预断，国民党的前途是光明的。

然而至今仍有不少的人对于国民党存在着一种不正确的观察，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前途是怀疑的。他们对于国民党怀疑的问题，就是能否继续抗战，能否继续进步，与能否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问题，而这三个问题是互相结合不可分离的。我们的意见怎样呢？我们认为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根据各种主客观条件，它是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与成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的。

由于敌人进攻的坚决性，敌人对于中国各个阶层的严重的打击与掠夺，全国军队对于敌人的愤怒与抗战的英勇，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高涨，国际有利形势之存在等事实，基本上决定了全中国与国民党的政治方向。第一，任何党派，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的政党与团体在内，是非继续抗战下去不可的。谁不继续抗战，谁就只有一条当汉奸的出路，此外没有任何出路。第二，任何党派，只要它是继续抗战的，就非继续进步不可。诚然，国内政治的进步不迅速不普遍，因此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也正因为损失，使得今后不能不在政治、军事、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求进步，以便能够抗拒敌人，恢复失地。这不论是当权的国民党也罢，其他党派也罢，都非继续进步不可。第三，国内进步的重要一环，是国民

党组织形式的民主化，使其本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可能有没有呢？我以为也是有的。抗日战争的大势所趋，国民党如果不向广大民众开门，容纳全国爱国党派与爱国志士于一个强大组织之中，那要担负起继续抗战与战胜敌人的艰难任务是不可能的。在国民党五十多年的历史中，每遇大的革命斗争时，总是把它自己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最显著而最有历史意义的有两次。第一次，从同盟会组成到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为了反对满清建立民国之目的，联合了一切反清的革命党派（从光复会[1]到哥老会[2]），在这个期间，它的党员充满了英勇斗争的事迹，再接再厉，富于朝气，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第二次，一九二四至二七年，为了反帝反军阀之目的，对内联合了工农与共产党，对外联合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了有名的“三大政策”，因而创设了黄埔[3]，建立了党军，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不但表现了国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也表现

---

[1] 光复会，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904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该会以光复汉族，反对清朝封建贵族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国家为革命目标；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手段。1912年年初，光复会完全停止活动。

[2] 哥老会，清代以来的民间秘密组织。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会众多次参加农民起义、反洋教斗争和辛亥革命的武装起义。以后常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

[3]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了三民主义[1]的发展。今天是国民党历史上第三次变为革命民族联盟的时机，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必须也可能把它自己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这一伟大的运动已在开始，承认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合法存在，承认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系统，抗战建国纲领中明白宣布“欲求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固有赖于本党同志之努力，尤须全国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负担”，以及国民参政会的召集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都表示了把它自身变为抗日建国的民族联盟之开始。现在问题是：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这一扩大组织的运动将取何种态度？赞成还是反对？我们说，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赞成国民党把它自己扩大发展成为革命民族联盟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之时，我们就取了赞助政策。今天更当民族危机万分严重之际，我们将尽一切可能赞助之。理由是抗日的友军越大越好，单单一个共产党的发展进步，是不够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处于第二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起了与坚持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并在自己的组织上向着广大革命志士开门，用以力争抗日的胜利，但若处于第一党地位的国民党依然保存过去那样的老状态，那就对于抗战、对于统一战线，都非常不利的。抗战将不能获胜，全民族陷于危险，共产党与无产阶级也逃不脱这种

---

[1] 三民主义，指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旧三民主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1924年1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旧三民主义从此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危险。所以共产党不但不反对，而且十分希望与坚决赞助国民党扩大与巩固其组织，实行党内民主化，并使其本身变为革命的民族联盟，以利继续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

（十九）但在国民党的前途上尚有障碍物，须努力克服才能发展

国民党的光明前途是存在的，其进步与发展是可能的，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的大多数是在领导和推动国民党前进。然而谁都明白，国民党中还存在着一些守旧分子，障碍着国民党进步的速度与程度，由于这些分子的存在，并与社会上许多守旧分子相结合，就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洪流中造成了一股逆流，顽固地抵抗进步之舟，相当有力地阻挠着国家民主化，阻挠着一切为抗战必需的进步事业之推行，阻挠着蒋介石先生在历次宣言、谈话、演说、命令中所说很多很好的方针方法之推行，阻挠着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之实施，阻挠着国民政府救国法令之实施，阻挠着民众运动之发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国民党进步所以不迅速不普遍与抗战所以受到许多不利的重大原因。他们是反对国民党进步，反对国民党发展，甚至主张妥协的，如果这些分子占居优势，那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就要受到极大挫折，所以值得严重注意。然而我们坚决相信，这种守旧势力是不能永久存在的，是没有占优势也难于占优势的，他们是逆流，但并非主流。在蒋委员长的领导、国民党大多数人的努力与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这种守旧倾向是能够克服的。共产党坚决赞助国民党的进步，而对于阻碍进步的守旧分子则希望他们弃旧图新，一同前进。我们希望这些人变一变，“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改变

过来就是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不少守旧的人在抗战过程中进步了，今后必仍有许多人会从抗战教训中发生觉悟而和大众一齐进步起来。这就是抗日战争中守旧分子的可变性。但也可能有少数人变得更坏，甘心被抗战巨涛席卷以去，这也是可变性的一面，对于这种人，就没有什么可惜的了。

（二十）其他党派同样有光明前途

一切加入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派，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发展的前途，我们都愿意与之建立长期合作，并给以尽可能的赞助。这不论对于第三党[1]、国家青年党[2]、国家社会党[3]、救国会[4]派，或其他任何集团，任何党派，都是一样。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也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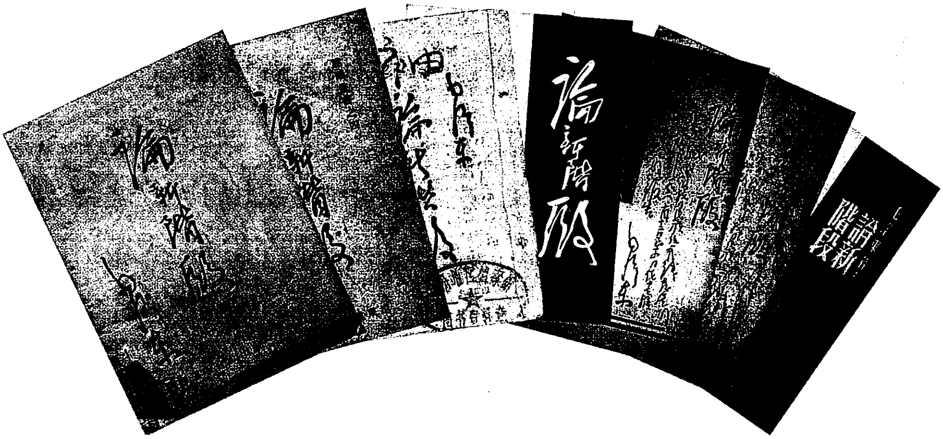
[1] 第三党，即1930年由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2] 国家青年党，即中国青年党。1923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主要发起人为曾琦、李璜等。1929年8月以前，曾长期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字名公开活动。该党鼓吹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3] 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1934年成立。该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改良现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赞成国共合作，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

[4] 救国会，全称为中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性抗日救亡团体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左翼政治团体。1936年5月在上海成立。

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都应充分注意的。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新阶段》(部分版本)。

（二十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使得今天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于任何外国的统一战线，如人民阵线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线，如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有它今天的中国的特点。认识这些特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的。

这些特点是什么呢？归结起来，共有八个，即是：全民族抗日的，长期性的，不平衡的，有军队的，有十五年经验的，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三民主义的，处于新的国际环境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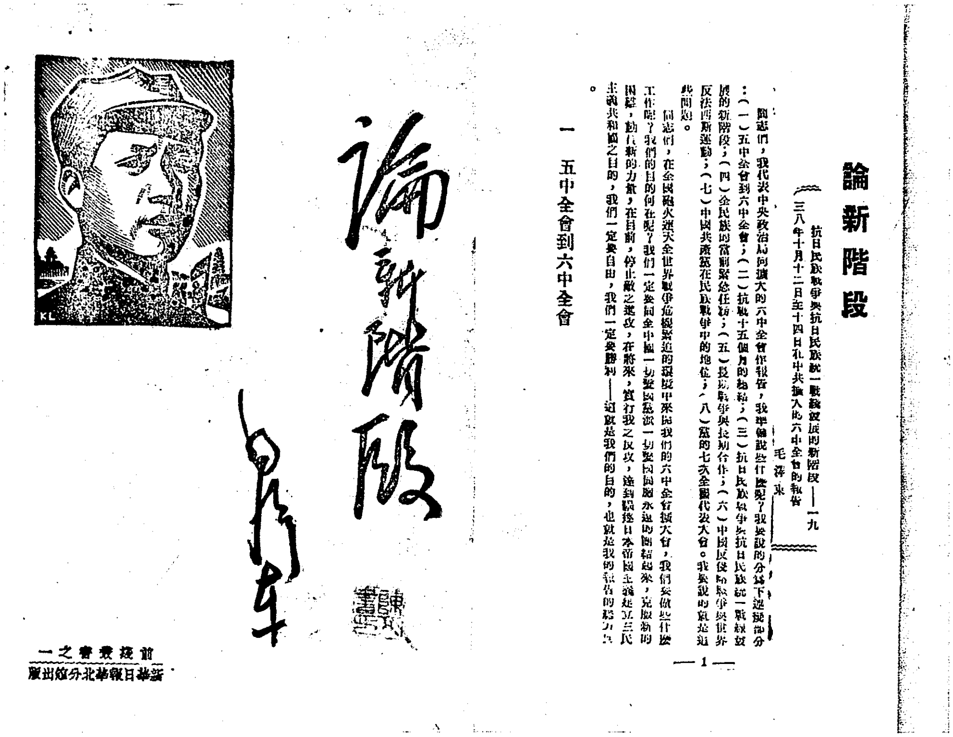
首先是全民族抗日的。这个特点规定了我们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侵入国土的异族日

本帝国主义而建立起来与发展起来的。又一方面，我们统一战线的组成，是包括全民族所有不同党派，不同阶级，不同军队，不同国内民族之一个最广大团体。由于是反对异族侵略的，所以组织成分能够如此之广大。由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所以这个统一战线具有伟大的力量；但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又难免许多相互间的磨擦，而须恰当地调整之，才能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我们统一战线的这种最基本的特点——政治目的之反对异族侵略与组织成分之异常广大，不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也不同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民族阵线（当时的国共合作），使得今天的统一战线产生了许多的特殊内容与特殊结果，这是今天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特点与优点，虽然在其组织复杂一方面不免同时包含着缺点。

第二是长期性的。这个特点是从第一个特点产生的。由于这个统一战线是用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就产生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因而又产生了统一战线的长期性。这一点，我在报告的第五部分还要说到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这一点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不相同。

第三是不平衡的。由于历史原因，造成了各党派各阶层政治力量的不平衡，同时在地域分布上也表现这种不平衡。国民党是第一个具有实力的大党，共产党是第二党，其他又在其次。这一情况，产生了许多特殊的东西。

第四是有军队的。国共两党都有军队——这一个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不是缺点而是优点。由于两党都有军队，使得抗日战争中两党克尽分工合作的最善责任，互相观摩激励的好处也更多了。这一点和西班牙有某些相似，但和法国不同，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也不同，这也是使得两党能够长期合作的因素之一。



論新階段

毛澤東

前綫叢書之一

新華日報華北分館出版

論新階段

——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新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

毛澤東

同志們，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向擴大的六中全會作報告，我準備說些什麽呢？我要說的分爲下述幾部分：（一）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二）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發展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六）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我要說的就是這些問題。

同志們，在全國砲火連天全世界戰爭危機緊迫的環境中來開我們的六中全會擴大會，我們要做些什麽工作呢？我們的目的何在呢？我們一定要同全中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永遠的團結起來，克服新的困難，動員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敵之進攻，在將來，實行我之反攻，達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之目的，我們一定要自由，我們一定要勝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也就是我的報告的總方針。

一　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

—1—

1939年，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出版的《论新阶段》。

第五是有十五年经验的。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四年，一九二七至三六年国共分裂的九年，现在国共重新合作又有了两年，这个十五年中合作——分裂——又合作的经验，最深刻地教育了国共两党、其他党派与全国人民，结论是：只应合作，不应分裂。这也是长期合作的基础之一。这种宝贵经验，世界各国都没有，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也没有的。

第六是大多数民众尚无组织的。这是中国的特点，西洋各国与此不同，所以是一个缺点，使得统一战线缺乏现成有组织的民众基础。但同时，各党之间可以分工地去组织民众，不须挤在一块老是磨擦，因为有的是尚无组织的民众，正待组织起来以应抗战之急需。

第七是三民主义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

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第八是处在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今天的世界政治经济条件，比之第一次合作与两党内战两时期都不同。今天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如日德意等反对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由于他们与日本的矛盾，现时也并不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采取赞助的立场。所有国家的先进人民都是赞助我们的，苏联更是诚挚的赞助。这种新的国际环境，对于我们的长期合作有重大影响。

深刻地研究与认识上述这些特点，才能采取恰当的政治上的政策与工作上的态度。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应付政治问题与工作问题，而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问题，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是需要这种科学基础的。

（二十二）统一战线的新形势

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十五个月团结抗战的教训，将促使各党认识这种发展与巩固之必要。发展方面，是扩大各党的组织与扩大民众的组织。巩固方面，是各党采取新的政策与新的工作，减少相互间的磨擦，做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抗战新阶段中存在着许

多的困难，唯有统一战线各党广大发展其组织与高度巩固各党的内部关系与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有力地执行新的政治任务，战胜新的困难，达到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这就是抗日战争新形势中统一战线的新形势，由于各党的共同努力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这种新形势的到来是完全可能的。

四　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

根据过去抗战的总结与当前抗战及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的估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和过去有些什么不同呢？

总的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力量，实行我之反攻，达到最后驱逐敌人之目的。

分别说来，有如下各方面的具体任务。一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应该赞助政府，并在政府领导之下，动员全民族实行起来，共产党员应成为执行这些任务的模范。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持抗战到底，克服悲观情绪，反对妥协企图

估计到新的抗战形势下，必有一部分人，因为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财政经济的困难，国际援助的不及时，因而发生着与增长着对于抗战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而日寇、汉奸、亲日派，必将利用这种情绪，大放其和平妥协空气，企图动摇我抗战的决心。

因此，全民族的第一任务，在于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克服一部分人的悲观情绪，坚决拥护政府继续抗战的方针，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这一任务，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重要。为此目的，必须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向前线官兵、后方守备部队、沦陷区人民、全国民众，作广大之宣传鼓动，坚定地有计划地执行这一方针，主张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清洗悲观情绪，反复地指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指明妥协就是灭亡，抗战才有出路，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用以达到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目的。

为此目的，一切宣传鼓动应顾到下述各方面。一方面利用已经产生并正在继续产生的民族革命典型（英勇抗战、为国捐躯、平型关[1]、台儿庄[2]、八百壮士[3]、游击战争的前进、慷慨捐输、华侨爱国等等），向前线后方国内国外广为传播。又一方面，揭发、清洗、

---

[1] 指平型关战斗。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邻接灵丘县，是长城要口之一。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这次战斗，歼灭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3000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2] 指台儿庄会战。台儿庄（今属山东省枣庄市），是徐州的门户，在军事上有着重要的地位。1938年3月至4月，中国军队在这里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会战，击败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3] 1937年10月，驻上海的中国军队一个团奉命坚守上海闸北，掩护淞沪守军撤退；26日晚，该团谢晋元团长率领官兵800多人抵达四行仓库，屹立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日军经四昼夜猛攻，未能得逞。八百官兵孤军苦守四行仓库，誓死不退，时称“八百壮士”。

淘汰民族阵线中存在着与增长着的消极性（妥协倾向、悲观情绪、腐败现象等等）。再一方面，将敌人一切残暴兽行的具体实例，向全国公布，向全世界控诉，用以达到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之目的。须知这种觉悟与自信心之不足，是大大妨碍着克服困难与准备反攻的基本任务的。

（二）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

新环境中，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个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

为此目的，必须调节国共两党之关系，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调节抗战各军之关系，调节政府与人民之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提倡公平合理互助互让之精神，减少磨擦，减少意见分歧现象，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为难之行为。号召全国严重注意敌人、汉奸、亲日派在我们内部的挑拨离间，制造不满，制造分歧，鼓励磨擦之阴谋诡计。务使蒋委员长与国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响，务使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日益亲密起来，树立在困难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坚固重心，用以对抗敌人与汉奸政府，克服困难，准备反攻。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针对着敌人现时进攻武汉并继续进攻华南与西北之企图，全民族的第三个任务，在于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整理现有军队，增编新的军队，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停止敌人进攻。为此目的，中国主力军方面，第一，必须发展高度的运动战，同时辅助之以必要的与可能的阵地防御，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之实力。第二，必须在大后方建立可能的军事工厂，并提高制造能力，接济前线的枪械与弹药。第三，必须在军队中认真实施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实施政治文化娱乐等教育，提高全军英勇奋斗持久苦战的精神。第四，就现有物质基础改善士兵生活，在连队中组织经济委员会，由士兵管理伙食。第五，提倡自觉纪律，废止打骂制度，提倡官兵之间的亲爱团结，以改善官兵关系。第六，实行公买公卖，待人和气，不强迫征粮，不强迫拉伕，不强迫当兵，改取政治动员方式解决食粮、伕役与新兵问题，以改善军民关系。第七，在前线各军之间，前线与后方各军之间，提高友爱互助精神，作战则互相策应，工作则互相观摩，消除互相观望互相嫉忌等不良现象，以改善各军之间的关系。第八，整理现有军队，补充缺额，同时增编新的军队，加紧教育训练，以利持久作战。用这一切办法，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为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而战，为停止敌之进攻与准备我之反攻而奋斗。

（四）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

针对着敌之目的在于还要继续向我进攻，又将于一定时机抽兵进攻游击战争，企图巩固其占领地，使中国反攻困难，全民族的第四个任务，就在于广大地发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创立许多根据地，巩固已有的根据地，用以缩小敌之占领地，在目前，配合主力军为停止敌之进攻而战；在将来，配合主力军为实行反攻而战。半殖民地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游击战争的广大性与长期性，没有这种游击战争，便不能牵制大量敌军，有力地配合正面主力军之作战，而停止敌之进攻；便不能使敌人占领地限制于一定地带，使之无法全部占领；便不能在敌人后方建立多数的抗日堡垒，坚持游击战争，并准备将来配合主力军之战略反攻。因此，第一，必须广大地发展一切敌人后方地带的游击战争，并创立多数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根据地。第二，必须依照华北榜样，留置或派遣足够数量之正规军队于敌后各个战略区域，作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的骨干。这些军队应该逐渐学会游击战术，加强政治工作，发展民众运动，创立根据地，并帮助敌后民众游击队与游击战争逐渐提高到正规军与正规战争的道路上去。第三，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必须发动所有男女人民卫国保乡的热忱，除动员他们大批加入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与补充留置敌后的正规军外，把他们组织到半军事性质的抗日人民自卫队中去。抗日人民自卫队的组织，应成为一切战区与敌人后方的普遍与经常的民兵制度，他们是不脱离生产的。第四，必须协助人民组织广泛的游击队。这是脱

离生产的，各县各区都应该有，成为袭击敌人保卫地方的普遍的小队伍。第五，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加强其军事政治文化娱乐的教育，用以提高其战斗力。第六，必须建立游击部队中正确的军事政治制度，实现官兵的平等待遇，经济公开。第七，改造土匪部队，使他们走上抗日；肃清我军后方的及被敌利用的土匪。第八，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第九，依照敌情与我之战略需要，重新划分敌后各地作战区域与行政区域，使之适合新的战争情况。第十，必须依照战略需要，统一敌后各部队与行政区之领导，以便集中抗敌力量，消除内部矛盾；但应反对互相吞并的军阀行为。

（五）提高军事技术，创立机械化兵团，准备反攻实力

敌以不及我数之兵力而能节节深入者，除了我之政治原因外，我之技术落后是主要原因。针对着敌之长处与我之短处，全民族的第五个任务，在于提高军事技术，增加飞机大炮战车等之数量与使用人材，为着实行反攻而准备实力。为此目的，一方面须就现有的及可能继续增加的制造能力从部分制造与修理开始，认真从事这个工作。另一方面，多方设法从外国输入新式武器，用以逐渐改善军队的装备，创立真正现代化的机械兵团。毫无疑义，我们应该从实际看问题，在现在，实际上战斗着的是大数量的低级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号召全国军队与人民武装，相信低级武器也能胜敌，提高政治精神，改善作战方法，发展游击战争，以补新式技术之不足。

不在这方面着重致力，我们就忽视了当前的实际问题，无以克服目前的困难。在将来，为着准备战略反攻，非提高新式技术建设新式军队不可，须知没有现代新式技术装备的足够数量的军队，要实行反攻，收复失地是不可能的。不在这方面提高注意力，并就可能范围内认真开始去做，我们就只看见现在，忘记了将来，无以克服前途的困难。在人力物力丰富的中国，只要政治条件改善，动员方法进步，加之以外国的协助，逐渐改善技术装备，决不是不可能的。

（六）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

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民发生密切的联系。为补救此弱点，全民族的第六个任务，在于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制度，没有这一方面的改进，要最后战胜日寇也是不可能的。民主政治是发动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的推进机，有了这种制度，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将会不可计量地发动起来，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渊源。我全民族彻底地统一团结的伟大过程之完成，也只有依靠民主制度之建立。关于这一点，须从各方面实际有所设施。第一，国民参政会的开会已开始了国家民主化的第一步，尔后应使该会工作公开的顺利的进行，该会议决事项应全部付之实施，并依据该会已经决定的方案认真的建立各省各级地方参政会，推进民主政治。第二，保证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权在全国范围之充分实施。这种自由是在抗战建国范围之内的，只有充分地保证了这种自由，才利于普遍发挥抗日建国的力量。这里问

题是保证中央法令在各地方之实施而不受地方之随意限制。应该限制的只是不利于抗日建国的那种自由，即汉奸、亲日派的自由，其他都不应在限制之列。第三，从战区与敌人后方开始实行多量的民主制。例如：民选各级地方政府再由上级加以委任；战区各级政府采用民主集权的委员制，并设立各级人民代表机关；战区政府增设某些必要的工作部门；改变公文程式；清除贪污腐化无能分子，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减低薪俸，提倡艰苦生活，用以适合战区艰苦、复杂与流动的环境；战区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有颁布地方单行法令之权；战区男女公民，除汉奸外，均有选举被选举权，均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武装抗日之自由；战区一切抗日党派均有公开合法地位，等等。在战区尤其在敌人后方，没有这些政治改革，要支持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的。以上这些办法，都是为着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增加政府的实力，使之能在抗日战争中起其最大的作用。没有问题，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应集中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不应因行政区域在地域上之被敌分割而有任何不尊重中央领导的表现。全国必须是依照中央法令而推行民主制的，但全国必须是统一于中央的。

（七）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

全民族的第七个任务，在于扩大各种民众运动，并使之统一起来，全力援助战争。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取给于民众，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亟须这样做。抗日战争正在遇到新的困难，唯有动员民众，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困难。在全国，尤其在

战区与敌人后方，亟应做到下列各项：第一，保障一切抗日民众团体与抗日民众运动的自由，确立民众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第二，物质上帮助民众团体，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第三，认真建立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商人、自由职业者、文化人与儿童的各种救国会，并使之依照地域与职业两种原则建立联合的组织。第四，发动民众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战工作，积极援助政府与军队，尤其在战区不可或缓。

（八）改良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改良民众生活问题，过去实行的太微弱了，因此不能激发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对于坚持长期战争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今后全民族的第八个任务，在于实行下列各项改良民众生活的政策。第一，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与残废的抗日军人。第二，救济战区灾民难民及失业工人。第三，在战区及敌后开始适当的减租减息。第四，调剂粮食及重要的日常必需品。第五，适当的增加工资，改善工人职员的待遇。第六，承认工人农民对雇主地主的团体契约权。第七，禁止雇主、地主、师父、工头等对工人学徒的虐待打骂。实行这些初步的生活改良办法之后，必能提高工农贫民群众拥护政府、参加战争与参加生产的积极性，不但战争需要的一切动员帮助将大大改观，而且工业农业生产的数量质量与商业的流通也会大大增加与提高起来，国家财政也就在新的农工商业基础之上而得到满意的解决。

（九）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

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之后，国家财政经济必大现困难，没有新的有效的办法，便无以渡过战争的难关。然而只要实行新的政策，动员人民力量，便任何困难也能够克服。因此，全民族的第九个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事项如下：第一，新政策以保障抗日武装部队一切必要供给，满足人民必需品的要求，并和敌人的经济封锁与经济破坏作斗争为目的。第二，有计划的在内地重新建立国防工业，从小规模的急需的部门开始，逐渐发展改进；吸收政府、民间与外国三方面的资力；并从政治上动员工人，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物质待遇，改良工厂管理制度，以提高生产率。这些，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三，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发展全国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组织春耕秋收运动，使全国农业手工业在新的姿态下发展起来。在战区注意保护农具牲畜及手工作坊，保证被隔断区域的经济自给。第四，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同时，注意发展合作事业。第五，在有钱出钱原则下，改订各种旧税为统一的累进税，取消苛杂和摊派制度，以舒民力而利税收。第六，用政治动员与政府法令相配合，征募救国公债、救国公粮，并发动人民自动捐助经费及粮食，供给作战军队，以充实财政收入。第七，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隔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第八，厉行廉洁运动，改订薪饷办法，按照最低生活标准规定大体上平等的薪饷制度。第九，由国家银行办理低利借贷，协助生产事业的发展及商品的流通。第十，恢复与发展战区的邮电交通。以上所指，不过大端，必须有认真改革旧制实行新制的决心，并持之以毅

力，才能消除新的困难，支持长期战争。其重心在于组织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之为着战争供给而效力。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被敌占领，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但须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改革。这里所说各项新政策，就是根据这种特殊情况而提出的。

（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配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

（十一）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当前的第十一个任务在于：第一，坚决反对一部分人所谓走德意路线的主张，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准备对敌投降的步骤。第二，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物质援助之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之决议。第三，设立一定机关，系统的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第四，从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推出代表，组织国际宣传团体，周游列国，唤起各国人民与政府的对我同情，与我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相配合。第五，保护一切同情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及其和平通商传教等事业。第六，注意保护华侨利益，并经过华侨的努力推进各国反日援华运动。一切这些，不管各国助我之程度如何暂时的没有增加或甚至可能部分的减少，国联决议可能依然是一句好听的话，我们都应努力的做。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

（十二）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与朝鲜等被压迫民族的。要使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下去，必须中日两大民族的军民大众及朝鲜等被压迫民族作广大

而坚持的共同努力，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此目的，全民族的第十二个任务在于：第一，向两国人民士兵大众及朝鲜民族提出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他们为此而斗争。第二，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与恰当内容的日本话，由高级政治部准备与派出教日本话的教员到各军队中实行施教，从学几句话起到能够同日军官兵讲一篇道理为止，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向全体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作口头宣传，同时补助之以文字图画宣传，逐渐感化他们，要求他们同意建立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退出中国，推翻日本法西斯。第三，尊重与优待敌军俘虏，给以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为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而努力。第四，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第五，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第六，教育我国军民大众，一方面提高民族自尊心，又一方面则须纠正军队与人民中的一些错误思想，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别敌军军官与士兵，并区别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实行了上述的方针与办法，付以广大而坚持的努力，这个反侵略统一战线是能够建立起来的。中国的胜利，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增加；但同时，敌人的困难与国际的援助，必须争取其配合。在敌人困难方面，除了因我之坚持长期战争给以逐渐的消耗，努力外交活动使敌日陷于孤立而外，和日本兵民大众及朝鲜等民族建立其共同反侵略战线的政策，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

（十三）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内各个党派各个阶级的，而且是国内各个民族的。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等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第三，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赞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言语文字的文化教育。第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与行动。上述政策，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应自己团结起来争取实现，一方面应由政府自动实施，才能彻底改善国内各族的相互关系，真正达到团结对外之目的，怀柔羁縻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了。

（十四）厉行锄奸运动，巩固前线与后方

新的形势下，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必然较前更加猖獗，大肆其造谣、污蔑、分裂、破坏的阴谋，因此当前的第十四个任务，在于实现下列办法，厉行锄奸运动。第一，唤起前线与后方

一切军民人等的警觉性，严密注视汉奸、敌探、托派、亲日派之活动，依照政府法令，毫不容情的镇压之。第二，注意保护国家机密，以叛国罪惩办泄漏机密之叛徒。第三，学校教科书中加进锄奸一课，实施提高警觉性的教育。第四，军队中设置各级管理锄奸工作之部门，民众团体中人民自卫队中设置锄奸小组，国家警察加重锄奸教育，使奸徒在众目集视下无法藏身。抗战以来，吃这些奸徒们的亏真是不可计量的了。前线的将士，惊叹汉奸之多与损害作战利益之大，早已异口同声。即在后方，单是泄漏国家机密与引导敌机惨炸二事亦已人人共愤。长期抗战中如不肃清奸徒，将不能设想战争的胜利。发动广大民众之民族革命的警觉性，厉行上述锄奸办法，并使之成为广泛的运动，是争取胜利不可缺少的严重的任务。应该指出：锄奸运动应注意区别首要与胁从，自觉的与被骗的，坚决分子与动摇分子，分别处理，前者从重，后者从轻，并注意争取后者使之回心向善，决不可一例看待。还须注意确实证据，勿用刑讯，严防诬陷。锄奸目的在肃清真正奸徒，只有用正确政策与正确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十五）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所有前述各项紧急任务，有待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各党派推动全民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之下，坚决的实行起来。而欲达此目的，非发展统一战线中各个党派的组织力量不可。现有力量，无论何党都太小，都需发展，而大大发展国共两党尤为当前的紧急任务。在这个发展的任务中，各党均应互相赞助他党的发展，而不可

互相嫉忌与互相妨碍。须知只要是抗日党派，任何一党的发展，都于抗日有利。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承认与拥护这个主干而又同时发展各党，是互相联系并不互相冲突的。在数量上，我以为国民党应发展至五百万以上，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应发展至一百万以上，在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中，当着伟大抗战时代，吸引数百万优秀分子加入各抗日党派，不但是必需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诚能如此，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扩大了，随之也将更巩固了，执行战胜敌人的一切任务就有了充分的保证，支持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驱除日寇与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目的，就不患不能达到。

五　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

现在，我们专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问题来讨论一番，向着异常关心国共两党关系的人们所已经发生了的许多疑问，作一个全般的答复，这一点，对于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合作，顺利地执行当前紧急任务，渡过战争的难关，是有重要意义的。

问题有如下各点：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民主共和国问题。这些，都是很多人所关心的，我们都得明确的给以答复。

（一）战争的长期性决定合作的长期性

由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其中主要的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须是长期的，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论如何要共同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歧与分裂，方才有利于渡过战争难关，对抗敌人破坏，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并于战后完成建立新中国的任务。这是和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根本不同的，那次是短期的，这次是长期的。

（二）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争后的合作

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继续合作下去，也一定要继续合作下去。这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着战争后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并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不能。战争之后，这样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个党，就造成了继续合作的基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现在想得到的。没有疑义，战争中的合作必有其各个合作阶段的内容，战争后的合作将更有新的内容。然而战争中的合作，将决定着战争后也能够合作，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预断。

（三）长期合作的内容与主要条件

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所有阶级，从资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所有民族，从汉族到苗瑶弱小民族，所有军队，从中央军到八路军，所有政府，从国民政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只有民族叛徒除外，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民族统一战线内，有些人在长期战争中，当着熬不过艰苦斗争、个人利益超过民族利益时，会要变为民族叛徒的，因此民族统一战线是要不断地把这些民族叛徒们除外的。但这些除外，依然是民族统一战线。其理由，即长期合作的主要条件，首先是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由于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严重地危害着全民族各个阶层的生存，这样就迫使上层阶级也不得不与其他阶级一道抗日。上层阶级中一部分是难免退出抗日战线的，但其他部分和其他阶级大体一样，是受压迫的，不反抗便无出路。又由于这种野蛮性的战争是长期的，就决定了合作是长期的。这些是决定长期合作的一方面。但是还有第二方面，要合作中的各党，首先是国共两党，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必要的工作。什么样的政策与工作呢？应该是从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的基点出发而规定出来与实行起来的政策与工作。应该是照顾现在又照顾将来，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照顾这一党派又照顾那一党派，照顾这一军队又照顾那一军队，照顾这一民族又照顾那一民族的政策与工作。否则政策不对，工作不行，自乱步骤，将使合作难于持久。这样，一方面，敌人战争的野蛮性与长期性，又一方面，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与必要工作，就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应该是长期的，而且能够是长期的；是民族战线，不是人民阵线；是包括战争中与战争后的国

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争后又分裂又内战的国共合作。

（四）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但是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如何呢？共产党员对三民主义应取何种态度呢？直至现在还有一些人不清楚，因此有再一次解释的必要。

还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开的我们党的临时性的代表大会上，就通过了如下的关于“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提纲：

“共产党是否同意三民主义？我们的答复是同意的。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同共产党合作与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发动了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胜利的大革命。又曾经因为排斥共产党（清党运动），实行相反的政策，而失去人民的信仰，招致革命的失败。现在则因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极端严重，全国人民与国民党中爱国分子，因而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与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的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共产党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达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有自己的党纲与政纲，其党纲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与三民主义有区别的。其民主革命政纲，亦比国内任何党派为彻底，但对于国民党第一次及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纲领，则是基本上没有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实行三民主义，而且

要求国民党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使国民党、共产党、全国人民，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第十二项）

去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党的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成立的宣言中，又着重地说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党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很明显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正是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段所要求实现的总目标，也是全国人民要求实现的总目标，并非某一党派单独要求的东西。只要看一看从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文献，它的政治纲领，就会明白。因此，在过去，不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期，我们共产党员曾经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就在一九二七年两党合作不幸破裂之后，我们的一切做法，也没有违背三民主义。那时，我们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这是符合于民族主义的；我们实行了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治制度，这是符合于民权主义的；我们又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是符合于民生主义的。那时，我们的一切做法，并未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本范畴的私有财产制。在现在抗战的阶段与战后彻底完成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段。为了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阶段的任务，一切共产党员，毫无疑义，应该依照自己的一贯的革命总方针，自己的决议与宣言，同中国国民党、全国其他党派、全国广大人民一道，诚心诚意地实行三民主义。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任何忠实的

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的。并且应该懂得：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这是人类最美满的社会制度，孙中山先生也曾经认为必要，实行它才能解决将来的社会问题。所谓现在的实际任务，就是三民主义，这是“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现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国共两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因此，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研究如何使三民主义具体地见之实施，研究如何用正确的三民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大众，使之由了解而变为积极行动，为打退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而斗争。

（五）长期合作的组织形式

为了保证长期合作，还要解决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我们曾经批驳了一党主义，不论是对于过去历史上说，对于当前任务上说，对于中国社会性质上说，所谓一党主义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做不到的，行不通的，违背一致团结抗日建国的大目标，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那末，各党共存，而互相结合为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不要一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呢？要的，必要的，没有这种统一的共同的组织，不利于团结抗日，更不利于长期合作。因此，各党应该认真研究，找到一种最适合于长期合作的统一的共同的组织形式。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

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及各党派的历史特点，今天看来，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可能有下述三种组织形式。

第一种，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但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同。如果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员加入，我们将取何种态度呢？首先，我们是赞成这种办法的，因为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好的一种组织形式，有利于抗日建国。不但共产党，任何其他抗日党派都可加入国民党，只要国民党同意，我们是决不反对的。如果这样做，那我们可以实行同一九二四年合作不相同的办法，即第一，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都是公开的，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第二，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有要求加入者，劝他们顾全大局，不要加入。第三，如果我们的青年党员得到国民党同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话，也是一样，不组秘密党团，不收非共产党员入党。用这种办法，可以大家相安，有利无害。这是第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第二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各党共同组织民族联盟，拥戴蒋介石先生作这个联盟的最高领袖，各党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组织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级共同委员会，为着执行共同纲领处理共同事务而努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形式，我们也是赞成的。这种形式，我们很早就提议了，可惜还没有实行。

第三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就是现在的办法，没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协商，解决两党有关之问题。但这种形式太不密切，许多问题不能恰当的及时的得到解决。例如许多大政方针之推行，下级磨擦问题之调整，都因没有一种固定组织，让它延缓下去，所以这种办法对于长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二种办法不行，这种办法暂时也只得仍之。

总之，长期战争中的长期合作，组织形式问题也是一个重要问

题。我们极力赞成有一种统一的形式，使之利于长期合作。

（六）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

长期战争需要长期的统一战线，前已说过，这是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因此，共产党员在其工作中，在其同友党发生关系中，随时随地都要顾到这个长期性。凡于长期合作有利的，应该坚决的勇敢的做；不利的，则决不应做。

这里就发生各党之间互助互让的问题。说互助，例如各党都要发展，都要巩固，任何一党除了发展与巩固自己之外，还应对友党的发展与巩固取赞助态度。国民党的发展与巩固，共产党员应取何种态度呢？一句话，赞助之。其理由是国民党的发展巩固利于抗日战争，利于全民族，因而也利于劳动人民与共产党，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国民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员应取什么态度呢？没有问题，取赞助态度。我们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广大的发展，依照蒋介石先生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做去，该团的发展是有光明前途的。也正是为着赞助，我们对于该团现行办法中之某些事项，希望有所修正，不然，好的动机，将难得好的结果。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成为全国广大青年群众团结救国的统一组织，吸收各党各派各界的青年个人与青年团体加入进去，成为使整个青年一代集体地受到民族革命的教育训练之一个大集团。因此，组织上应该民主化，政治上应该发扬团员的自动自觉精神，发扬青年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我们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态度与意见。

互助就不是互害。损人利己，在个人道德是不对的，在民族道德更加不对。因此，无理的磨擦，甚至捉人杀人等事，无论如何是

要不得的。共产党员决不应该以此对待友党。而如若友党以此对待我们时，我们也决不容置之不理。凡无理的事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之，才是待己待人的正道。互相规过，是朋友间的美德，也是政党间应该提倡的作风。

统一战线中有什么互让呢？有的。我们曾经在政治上作过一些让步，那就是停止没收土地，改编红军，改变苏区制度，这是一种政治上的让步，这是为了建立统一战线团结全民共同对敌的必要步骤。我们的友党也作了让步，那就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等等。这种为了团结抗日，为了长期合作的互让政策，是很好的，很对的。只有政治上糊涂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说：共产党投降了国民党，或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现在我们又主张所有各统一战线中的党派，互不在对方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认为这种政策是必要的。现在当然和过去不同，在过去内战时期，国共两党间除了公开的战争之外，还互相使用秘密手段，进行破坏对方的活动。合作以后，当然不应有互相破坏的动机与行为了，但是互相在对方内部秘密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办法，也应该停止，使彼此安心，才能适合于长期战争中长期合作之目的。我们现在正式向国民党同志申明：我们停止在你们内部作招收党员组织支部的活动，不管统一战线采取何种的共同组织形式，我们都是这样做。但同时，也希望你们这样做。双方约定之后，下级党员如有违背，由违背之一方的上级负责处理。

此外，双方同志接触，应采谦和、尊敬、商量态度，不采傲慢、轻视、独断态度，以改善双方之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一切我们所说的，共产党员应该首先实行，不管对方某些人员

或尚未用同样的政策、方法、态度对待我们，但我们仍然这样做，做的久了，对方某些一时尚未明白的人员也会明白了。

共产党员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不变地向着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的方向走去，谁要违背了这种立场，这个方向，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但共产党员又必须有互助互让的精神，必须有尊重友党及和友党同志用谦和商量态度解决问题的精神，一切有友党同志的地方，都应和他们商量解决有关事项，不应独断。没有这种精神，就不能巩固统一团结，所谓为国为民事业，战胜日寇建立新中国之目的，也就达不到。因此，决不能把必要的互让政策解释为消极行为。不但互助是积极的，互让也是积极的，因为必要的让步，是巩固两党合作求得更好的团结与更大的进步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七）民主共和国问题

虽然我们的党还在一九三六年的九月间，就公布了关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案，虽然中央同志曾经多次的说明过这个问题，但外间对于我们的主张仍有许多不明白的。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问题。抗战的结果将怎么样呢？所谓抗战建国，照共产党的意思，究将建立一个什么国呢？这是存在着的问题。再一次解释这个问题，对于巩固各党各派长期合作的信心，是有利益的。

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

族主义的国家。它是一个独立国，它不受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即是说，改变中国原来的半殖民地地位，它独立起来了；但同时，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第二，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租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做，能够充分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要变为这样一个国家，要同谁作斗争呢？要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剥夺我们的独立，我们就要向他要独立。日本帝国主义把我们当奴隶，我们就要向他要自由。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陷入饥寒交迫，我们就要向他要饭吃。怎样要法？用枪口向他要。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六　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与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一）中国与世界不可分

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联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新的抗战形势中可能暂时地减少一部分外国的援助，加重了中国自力更生的意义，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但中国不是孤立也不能孤立，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的事实，也是我们的立脚点，而且必须成为我们的立脚点。我们不是也不能是闭关主义者，中国早已不能闭关，现在更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用战争闯进全中国来，全中国人都关心世界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关心目前欧洲时局的变动。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有意义的。

（二）重新分割世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

资本帝国主义的本性，不但是和本国人民大众矛盾的，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矛盾的，是和社会主义国家矛盾的，而且是帝国主义诸国之间自相矛盾的。这最后一种矛盾在历史上的最尖锐表现，就是二十年前的世界大战。那次两组帝国主义互战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国际形势。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的发展的结果，使得世界又临到新的大战面前。在东方日寇侵略东四省，西方希特勒登台之后，新的重分世界的战争业已开始了。“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在此情势下，一方面日德意组成了侵略阵线，

实行大规模的侵略。另方面各民主国家却为保守已得利益而在和平的名义之下准备战争；但至今不愿用实力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实际上帮助了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东四省首先被牺牲，接着阿比西尼亚亡于意大利，西班牙则助长了叛军的气焰，中国又受到日寇新的大规模的侵略，到最近，奥国与捷克又先后牺牲于希特勒。全世界已有六万万人口进入了战争，范围普及到亚、非、欧三洲，这就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况。

（三）现时世界战争的特点

由于一方面日德意诸法西斯国家的坚决的侵略意志，又一方面各民主国家不愿实力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使得新的世界战争的现时状态表现了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特点，这就是首先侵略中间国家与采取各种不同的战争形式。中国、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奥大利、捷克等国，都是半独立国家或小国，日德意诸国就拣了这些肥肉先行吞蚀。在侵略这些中间国家中，侵略者采取了三种特殊的战争形式。第一种是日本对中国，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战争，这是公开的直接的大规模的战争，但是在不宣而战的形式下进行的，开了战争史上的新纪元。采取这种不宣而战政策的目的，在于侵略者利用各民主国家的无意制裁，尤其是英国的妥协政策，暂时避免和它们的直接冲突，便利其先夺取中间国家的行动。第二种是意德两国侵略西班牙的方式，采取了援助叛军的办法，这是历史上老办法的重演。历史上这类办法是有过的。第三种是希特勒侵略奥捷两国的方式，这里没有战争的表面（没有打响），但有战争的实际，出动了强大兵力占领奥国

全部与捷克一部，并使捷克余部归属其统制，这是不战而亡人国的最巧妙的办法。这三种战争形式的采用都是由于，一方面侵略国本身力量还不充足，暂时未便和各大国直接作战，因而采取了巧妙的战争方法，企图使自己先行壮大起来，同时即是使各大国削弱起来，再与各大国作战。又一方面，则是各民主国家不愿制裁侵略者，尤其是英国的怯懦妥协政策的结果，这种政策实际上援助了侵略者，便利其侵略各中间国家。

（四）英国妥协政策将引导法西斯各国实行更大规模的战争

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保守党内阁，正在逐步进行其所谓四强合作的政策，慕尼黑协定之后，欧洲政局有暂时逆转的可能。英国大部分保守党的政策，历来是以排斥苏联妥协德意为原则的，由于他们畏惧苏联的强盛，畏惧自己过早卷入战争，畏惧本国人民运动与殖民地独立运动，早已决心牺牲西班牙、奥国、捷克等国，成就其排斥苏联妥协德意的企图。过去因为保守党内部的不统一，法国人民阵线的积极政策，国内国际舆论的责备，而没有成功。现在则利用了英国及全欧人民不愿战争的心理，利用了法国佛兰亭党的右倾，在希特勒威迫之下，订立了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是英国妥协政策的结果，假如英国不改变它的政策，势将引导法西斯各国进行更大规模的冒险战争。各大国间的战争虽暂时还可能不爆发，暂时限制于侵略中间国家的过程虽还在继续着，但最后势必引导各大国卷入空前残酷的战争里去，这是没有疑义的前途。“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

（五）全世界多数人类在逐渐动员中

在资本主义各国方面，由于经济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已走到毫无出路的地步，六万万人口的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新的更大的战争在威胁全人类。在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则一切都是光明的、进步的、强盛的。在这两种相反的对比之下，全世界大多数人类逐渐地找到了如何保卫自己与解放自己的方向，正在用空前的广大性与空前的深刻性逐步地团结自己并准备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盛，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六七年来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国的伟大抗日战争，西班牙的人民战争，乃至张伯伦的妥协政策等等，逐渐地教育了英法等国与全世界的人民，使他们懂得惟有组织与斗争才是出路，惟有团结世界一切自求解放的人类为一体，惟有世界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才有出路。这个全世界人民觉悟、组织、斗争与统一战线的伟大过程，是在向前发展着，但须经过广大而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与张伯伦的妥协政策，最后将遇到伟大的反抗，这也是没有疑义的前途，也是法西斯战争与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的结果。

（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配合

过去的，大家都明白，各民主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援助中国的，主要是其人民的同情中国，苏联的援助则更加积极。现在，由于日寇进攻的深入，又加深了英美法苏对日本的矛盾。虽然英国在西方的妥协政策可能搬用到东方，为了企图多少保存在日本占领地

区的商业，为了幻想减轻日本对南洋的威胁，英国有可能同日本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但根本妥协是困难的，至少暂时有困难，这是日本独占政策的结果。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日本的深入进攻，进一步加深了日美间的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友谊是增长的，中美苏三国有进一步亲近的可能。但是我们第一，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第二，不可忘记资本主义国家之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之人民的区别；第三，更加不可忘记现时与将来的区别。我们对前者不应寄以过高的希望。应该努力争取前者一切可能的援助，在一定程度上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事实，但过高希望则不适宜。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外援的配合，主要的是和先进国家与全世界广大人民反法西斯运动之将来的配合，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松争取外援的方针，应该放在这种基点之上。

七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一）问题的性质

同志们！我们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设新中国，也一定能够达到这些目的。但是由现在到这个光明前途的中间，存在着一段艰难的路程。为着一个光明的中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须有步骤地同日寇作斗争；而要打败它，只有经过长期的战争。关于这个战争的各方面问题，我们已经说得很多。抗战以来的经验，我们也总结了；当前的形势，我们也估计了；全民族的紧急任务，我们也提出了；用长期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的战争的理由和方法，我们也说明了；国际形势，我们也分析了。那末，还有什么问题呢？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问题，这就是共产党员应该怎样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才能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而不致失败的问题。

（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对于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所谓“爱国主义”，共产党员是必须坚决地反对的。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是他们国家的战争的失败主义者。用一切方法使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归于失败，就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的利益；失败得越彻底，就越好。日本共产党人和德国共产党人都应该这样做，他们也正在这样做。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战争，不但是损害世界人民的，也是损害其本国人民的。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是被侵略的国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

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为此理由，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为此理由，我们的党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就提出了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后来又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命令红军改编为抗日的国民革命军开赴前线作战，命令自己的党员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些爱国主义的行动，都是正当的，都正是国际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一点也没有违背国际主义。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

（三）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

根据上述理由，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方面，即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这里，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

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必须懂得，共产党员不过是全民族中的一小部分，党外存在着广大的先进分子和积极分子，我们必须和他们协同工作。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四）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

为要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只有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民族中的一切生动力量，这是唯一无二的方针。但是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是完全错误的。

（五）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在这里，关门主义倾向是不能容许的。但是在同时，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怕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

（六）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关系也是这样。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既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和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

结对敌的要求。只顾一方面，不顾另一方面，都将不利于抗日。

（七）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

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就是照顾多数的观点。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必须善于照顾全局，善于照顾多数，并善于和同盟者一道工作。我们过去在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必须注意改进。

（八）干部政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十七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材，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

族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

不但要关心党的干部，还要关心非党的干部。党外存在着很多的人材，共产党不能把他们置之度外。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

---

[1] 1934年1月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中说：“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以后，组织工作就决定一切，其中也决定政治路线本身的命运，即决定它的实现或失败。”斯大林在这里说到了正确挑选人才的问题。1935年5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和说明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页、371页）

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鉴于张国焘的和类似张国焘的历史教训，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借以巩固党的统一团结，这是中央和各级领导者的重要的责任。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九）党的纪律

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

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十）党的民主

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为此缘故，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

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

在我们军队中的党组织，也须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党员的积极性，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应少于地方党组织的民主。无论在军队或在地方，党内民主都应是为着巩固纪律和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十一）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

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以前[1]，我们党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同志的“左”倾机会主义。由于这两次党内斗争的胜利，使党获得了伟大的进步。五中全会以后，又有过两次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的斗争和开除张国焘出党的斗争。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

---

[1] 指从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前这一段时间。

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1]和延安会议[2]（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这两次党内斗争所得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一）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这种倾向极端地不利于革命战争，同时也不利于任何革命运动。（二）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三）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是军事建设工作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工作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和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的残酷的反对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的原则错误的结果。这些错误，也因遵义会议得到了纠

---

[1] 巴西会议是1935年9月9日由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和王稼祥在巴西（今属四川省若尔盖县）召开的紧急会议。

[2] 延安会议是1937年3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当时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正，使党转到了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组织原则方面来了。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以上这些教训和成功，给了我们今后团结全党，巩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一致，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的前提。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十二）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

在今后的抗日形势中，从政治上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将是头等重要的；但是在同时，反对“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和在民众的组织问题上，则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

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必须切合于具体对象的情况，决不应主观地看问题，决不应使过去那种“乱戴帽子”的坏习惯继续存在。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必须提高干部和党员对于两面派行为的注意力，才能巩固党的纪律。

（十三）学习

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

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

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当前的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十四）团结和胜利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经过了十七年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学到了如何团结自己的许多方法，已经老练得多了。这样，我们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争取抗日的胜利和建设一个新中国。同志们，只要我们能团结，这个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

八　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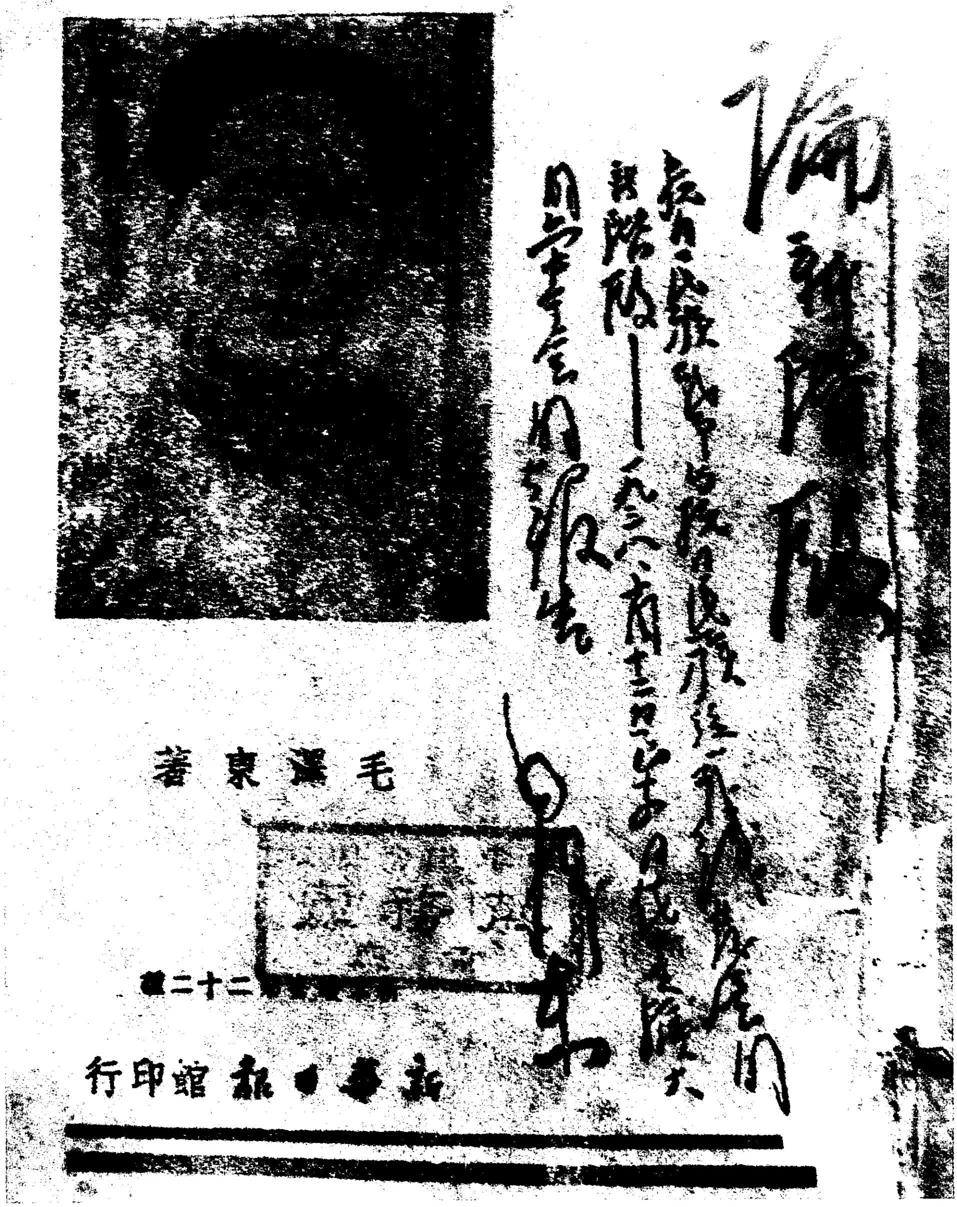
现在我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召集七次大会的问题。

同志们，我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自从一九二八年开过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由于环境的原因，已有十年没有开大会了。去年十

二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准备召集七次代表大会，但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今年尚难召集。此次全会扩大会应该讨论加紧这个准备工作的问题，并决定在不久时间实行召集大会。这次大会的政治意义是重大的，它将总结过去的经验，主要的是全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讨论国内国际的政治形势。讨论如何进一步的团结全民族，团结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进一步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讨论如何在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方法与计划。讨论如何动员全国工人阶级及劳动人民更积极的参加抗战。并应讨论党在新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的团结自己，加强自己，巩固自己与国民党、其他党派及全国人民的联系，以便顺利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除了这些政治的与组织的问题之外，七次大会应该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将全党中最有威信的许多领导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来，加强对于全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这次大会的意义如此重大，因此，扩大的六中全会闭幕之后，诸位同志回到各地工作，便应在努力发展党与巩固党的基础之上，依照民主的方法，适时地进行选举，使那些最优秀的最为党员群众所信托的干部与党员有机会当选为大会的代表，使七次大会能够集全党优秀代表于一堂，保证大会的成功。我们相信，这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能够成功，一定能够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最庄严的最有力量的回答，让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前发起抖来，滚到东洋大海里去，中华民族是一定要胜利的。我的报告就此完结。

建國真旨
南京賓華書店出版

南京宾华书店出版的《论新阶段》伪装本《建国真旨》。



论新阶段

[illegible]

毛泽东

毛澤東著

二十二[illegible]

新華日報館印行

1939年，新华日报馆印行的《论新阶段》。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2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240mm 特16开
页　　面：556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3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长期艰苦奋斗创造冀热察根据地……………………………………………………1
（1938年10月15日）
致周恩来电……………………………………………………………………3
（1938年10月16日）
为延安《山脉文学》杂志题写刊头……………………………………………4
（1938年10月27日）
对鹿钟麟应注意的问题…………………………………………………………6
（1938年10月27日）
给柳夷的信……………………………………………………………………7
（1938年10月30日）
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9
（1938年10月）
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题名　………………………………………………11
（1938年10月）
为杨兰史题词　………………………………………………………………12
（1938年10月）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13
（1938年11月5日）
战争和战略问题　……………………………………………………………19
（1938年11月6日）

张云逸可率两三个营过江活动 ……36
（1938年11月10日）
在抗大女生大队成立典礼上的讲话 ……37
（1938年11月13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38
（1938年11月24日）
在大青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39
（1938年11月24日）
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 ……42
（1938年11月24日）
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 ……43
（1938年11月25日）
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 ……45
（1938年11月25日）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题词 ……49
（1938年11月）
关于坚决拒绝国民党派高桂滋部来陕甘宁边区的指示 ……51
（1938年12月1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 ……52
（1938年12月1日）
给邓宝珊的信 ……53
（1938年12月5日）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报告 ……54
（1938年12月8日）
关于对待土匪的政策问题的指示 ……55
（1938年12月9日）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56
（1938年12月12日）
在抗大的讲话 ………………………………………………………………57
（1938年12月13日）
在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60
（1938年12月13日）
致朱德等电 …………………………………………………………………62
（1938年12月13日）
给杨令德的信 ………………………………………………………………63
（1938年12月14日）
政治上的持久战 ……………………………………………………………65
（1938年12月15日）
复张经武等电 ………………………………………………………………66
（1938年12月2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67
（1938年12月28日）
致彭雪枫电 …………………………………………………………………68
（1938年12月30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 …………………………………………………………69
（1938年12月30日）
为抗大《检查工作特刊》题词 ……………………………………………70
（1938年12月）
为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 ……………………………………………71
（1938年12月）
谈抗大民主问题（摘录） …………………………………………………73
（1938年）

和警卫营二连战士的谈话 ……………………………………75
（1938年）
为抗大学员王承骏题词 ……………………………………76
（1938年）
为艾生题词 ……………………………………………………79
（1938年）
为董柏成题词 …………………………………………………81
（1938年）
励志联 …………………………………………………………83
（1938年）
在延安为井冈山时期的部分同志合影题字 ………………85
（1938年）
为张声良题词 …………………………………………………87
（1938年）
为延安《中国文化》题词 ……………………………………88
（1938年）
为抗大题词 ……………………………………………………90
（1938年）
为于江题词 ……………………………………………………92
（1938年）
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 ……………………………………93
（1938年）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145
（1939年1月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50
（1939年1月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51

（1939年1月12日）

致周恩来等电……………………………………………………………152

（1939年1月13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题词……………………………………153

（1939年1月15日）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的信…………………………………155

（1939年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158

（1939年1月18日）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159

（1939年1月20日）

给鲁迅艺术学院文学团体“路社”的信……………………………161

（1939年1月21日）

给周扬的信……………………………………………………………162

（1939年1月22日）

给杨令德的信…………………………………………………………163

（1939年1月22日）

在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上的讲话………………………………164

（1939年1月2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65

（1939年1月26日）

致周子昆、赖传珠、袁国平电………………………………………166

（1939年1月27日）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讲话…………………167

（1939年1月27日）

致周恩来等电……168
（1939年1月27日）
给炮兵团全体官兵的信……169
（1939年1月28日）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70
（1939年1月28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讲话……178
（1939年1月至2月）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82
（1939年2月1日）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183
（1939年2月1日）
为杨海泉题词……186
（1939年2月2日）
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88
（1939年2月2日）
反对投降主义……190
（1939年2月5日）
又团结，又斗争……192
（1939年2月5日）
为《新中华报》题词……195
（1939年2月7日）
为《新中华报》题词……197
（1939年2月7日）
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
（1939年2月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00
（1939年2月8日）
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 ……………………………201
（1939年2月10日）
为冯福新题词……………………………………………………203
（1939年2月11日）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205
（1939年2月12日）
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206
（1939年2月16日）
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209
（1939年2月18日）
各级政治机关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210
（1939年2月19日）
致各部队电………………………………………………………211
（1939年2月19日）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212
（1939年2月20日、2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18
（1939年2月中旬）
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上的讲话…………………219
（1939年2月25日）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220
（1939年2月28日）
和美国记者罗伯特·马丁的谈话 ………………………………222
（1939年2月）

和鲁艺美术系两个申请入党教师的谈话……………………………223
（1939年2月）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224
（1939年3月1日）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序 ……………………………………226
（1939年3月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28
（1939年3月4日）
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229
（1939年3月6日）
妇女们团结起来…………………………………………………………232
（1939年3月8日）
在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238
（1939年3月12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的谈话…………………………239
（1939年3月15日）
对新四军参谋会议的意见………………………………………………242
（1939年3月16日）
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244
（1939年3月18日）
给聂荣臻的信……………………………………………………………245
（1939年3月18日）
在“三一八”纪念晚会上的演讲………………………………………246
（1939年3月18日）
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247
（1939年3月19日）

为梁毅题词……249
（1939年3月23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50
（1939年3月29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251
（1939年4月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52
（1939年4月5日）
致朱德、彭德怀电……253
（1939年4月8日）
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54
（1939年4月8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55
（1939年4月12日）
为陈醒民题词……256
（1939年4月18日）
继续开办训练班……258
（1939年4月19日）
为消灭文盲运动题词……259
（1939年4月19日）
为抗大题词……261
（1939年4月19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63
（1939年4月19日）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64
（1939年4月24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65
（1939年4月26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266
（1939年4月29日）

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67
（1939年4月29日）

为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题词………………………………268
（1939年4月）

为吕炎同志题词………………………………………………270
（1939年4月）

为陈彪雄题词…………………………………………………272
（1939年4月）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274
（1939年5月1日）

五四运动………………………………………………………283
（1939年5月1日）

青年运动的方向………………………………………………286
（1939年5月4日）

对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的指示………………………295
（1939年5月4日）

和萧三的谈话…………………………………………………296
（1939年5月5日）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的讲话………………………303
（1939年5月5日）

为鲁迅艺术学院建院一周年纪念大会题词…………………304
（1939年5月10日）

给潘梓年的信……………………………………………………305
（1939年5月11日）
关于阎锡山问题的讲话………………………………………306
（1939年5月1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308
（1939年5月17日）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309
（1939年5月20日）
抗大三周年纪念…………………………………………………319
（1939年5月26日）
永久奋斗…………………………………………………………325
（1939年5月30日）
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一书的批注………331
（1938年12月以后至1939年5月以前）
为缪敏题词………………………………………………………336
（1939年春）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批注…………………………338
（1939年5月以后）
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389
（1939年6月1日）
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391
（1939年6月1日）
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394
（1939年6月1日）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396
（1939年6月1日）

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的讲话……………………………………397
（1939年6月6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398
（1939年6月7日）
反投降提纲……………………………………………………………399
（1939年6月）
对八路军参谋会议的意见……………………………………………439
（1939年6月12日）
给萧三的信……………………………………………………………442
（1939年6月17日）
在鲁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444
（1939年6月21日）
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445
（1939年6月24日）
反对投降活动…………………………………………………………446
（1939年6月30日）
为陈黄英题词…………………………………………………………451
（1939年6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53
（1939年7月3日）
关于反“扫荡”等问题给李井泉等的指示…………………………454
（1939年7月3日）
在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455
（1939年7月7日）
为戴镜元题词…………………………………………………………456
（1939年7月7日）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457
（1939年7月9日）
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464
（1939年7月12日）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465
（1939年7月20日）
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466
（1939年7月25日）
就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给林彪校长的信……468
（1939年7月29日）
为蒋灿题词……469
（1939年7月）
四言诗·戏改江淹《别赋》……471
（1939年7月）
挽郭沫若父郭朝沛先生联……472
（1939年7月）
为中国女子大学成立题词……473
（1939年7月）
必须制裁反动派……474
（1939年8月1日）
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479
（1939年8月1日）
代中共中央撰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480
（1939年8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81
（1939年8月2日）

致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电……482
（1939年8月7日）
在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483
（1939年8月13日）
致朱德等电……484
（1939年8月21日）
为谢子长烈士题词及碑文……485
（1939年8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87
（1939年8月24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489
（1939年8月26日）
欢迎尼赫鲁先生来延安……491
（1939年8月27日）
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492
（1939年8月29日）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493
（1939年9月1日）
为延安新华书店题名……500
（1939年9月1日）
给向隅的信……501
（1939年9月5日）
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502
（1939年9月7日）

长期艰苦奋斗创造冀热察根据地[1]

（1938年10月15日）

冀热区委同志，并告宋、邓[2]同志：

甲、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培养基干部队，准备持久，以最大决心克服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为着上述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到底。

乙、巩固部队，用一切有效办法提高部队持久抗战胜利信心，提高政治自觉的纪律，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建立救亡室工作，并加强其领导，吸收连队全体战斗员参加，帮助管理教育，检查纪律，洗刷坏分子等工作。

丙、大量地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

丁、在干部缺乏的目前情况下，可以三分之一以上的新部队转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中共冀热边区委的电报。

[2] 宋、邓，指宋时轮、邓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归晋察冀军区指挥）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移到东西斋[1]、蔚县地域，分归杨成武王震两部[2]负责帮助整理或改编之。在转移时由聂[3]指定杨王两部负责掩护，宋邓派队掩护护送。

戊、宋邓两部及冀东所余留之地方军，统归宋邓指挥统率。按照上述任务及整理原则，坚持冀热察边长期的艰苦奋斗，创造根据地。营团两级干部可派数个，连级可派十个到你处工作。

毛　朱　彭　王　胡

十五日

---

[1] 东西斋，指东斋堂和西斋堂，在今北京市门头沟区境内。

[2] 杨成武、王震两部，指杨成武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和王震任旅长兼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

[3]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致周恩来电[1]

（1938年10月16日）

为着直接有力地配合支持武汉以及武汉失守后滞阻敌人继续前进，以八路军一部进至鄂豫皖地区活动为有利。在朱德到武汉见蒋介石之前，请向陈诚[2]、白崇禧透露此意，让蒋知道。

---

[1] 这是毛泽东和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

为延安《山脉文学》杂志题写刊头[1]

（1938年10月27日）

山脉文学

写下几个字，不知可用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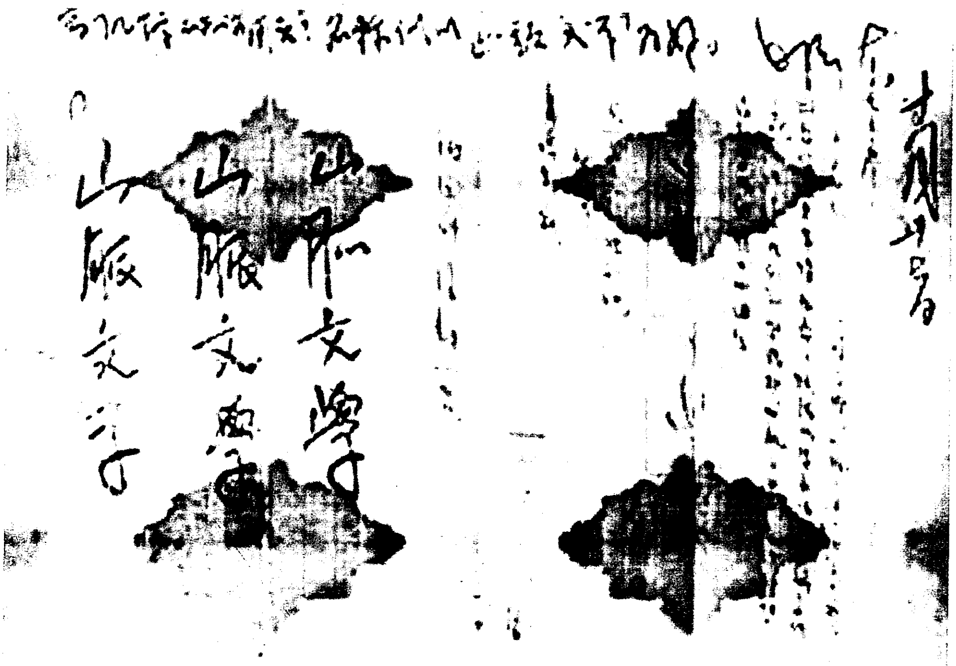
名称似以“山头文学”为好。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七日

---

[1] 1938年10月下旬成立的群众性的“山脉文学社”，提出“十大文艺活动方式”，筹备出版一个以发表青年文艺爱好者诗文习作为主的《山脉文学》不定期刊。奚定怀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报告进一步开展群众性抗战文艺活动的打算，并请他为《山脉文学》题写刊头。毛泽东为其题写了刊头。后来，由于印刷条件未获解决，《山脉文学》未能出版，而是改出了油印的《山脉诗歌》。这样，便出现了“山脉诗歌社”。而山脉文学社的活动则持续到1940年9月。



山脉文学

山脉文学

山脉文学

毛泽东给山脉文学社的复信和为《山脉文学》题写的刊头。

对鹿钟麟应注意的问题[1]

（1938年10月27日）

对鹿钟麟应注意以下几点：坚持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能取消；极力向鹿钟麟说明，目前形势严重，广州失守，武汉不保，敌人已开始实行肃清华北的计划，各方只有依靠已取得的成绩，加紧工作，才能支持困难的局面，否则只有失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南军区，应与鹿钟麟建立密切关系，向其征求意见，并表示凡有利于抗战的工作，一定要努力完成。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等致朱瑞、徐向前、宋任穷电的主要内容。

给柳夷[1]的信

（1938年10月30日）

柳夷同志：

还是八月间的你的信，今天才复你，不知对于你的问题还有帮助否？不知你还在三大队否？我因忙，积累至今才复，对你不起！

你的意思是恳切的，如果陕公抗大党的同志所说，你的表现够上入党资格仅仅过去加入与脱离国民党一点无人证明，是确实的，而你在延又有九月之久，并无其他不能入党的问题存在，我以为是可以入党的。此事解决办法，可持此信与三大队负责同志商酌，你的原信也随同交给他们看，要求他们最后考虑你的问题。如尚不能解决，可持此信到抗大政治部张主任[2]处。你所指出的几个缺点是有理由的，你的信可送给政治部参考。最后告你的，马列学院必须党员并须学养较高者才能进去。此复。并致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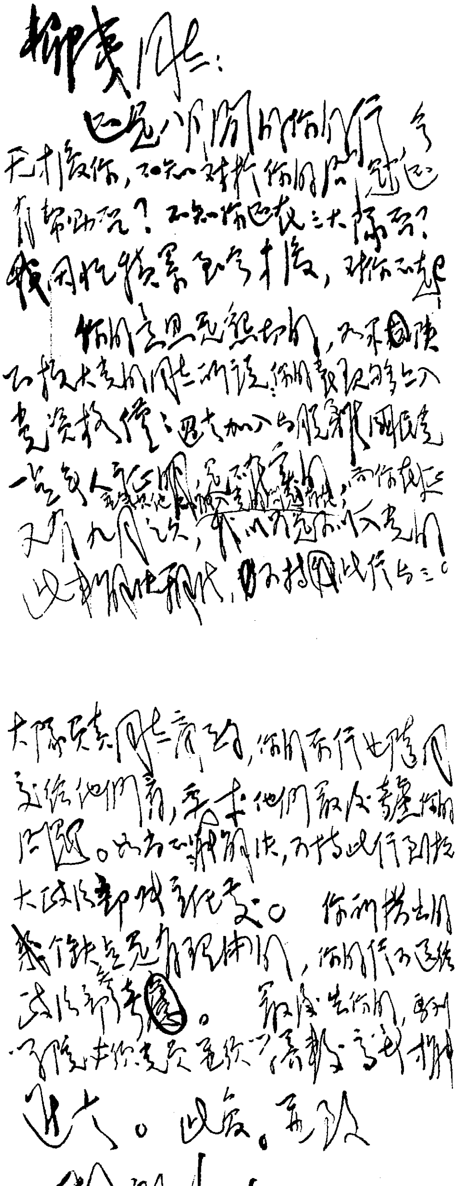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卅日

---

[1] 柳夷（1913—1996），浙江慈溪人。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第一支队政治教育干事。

[2] 指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抗大政治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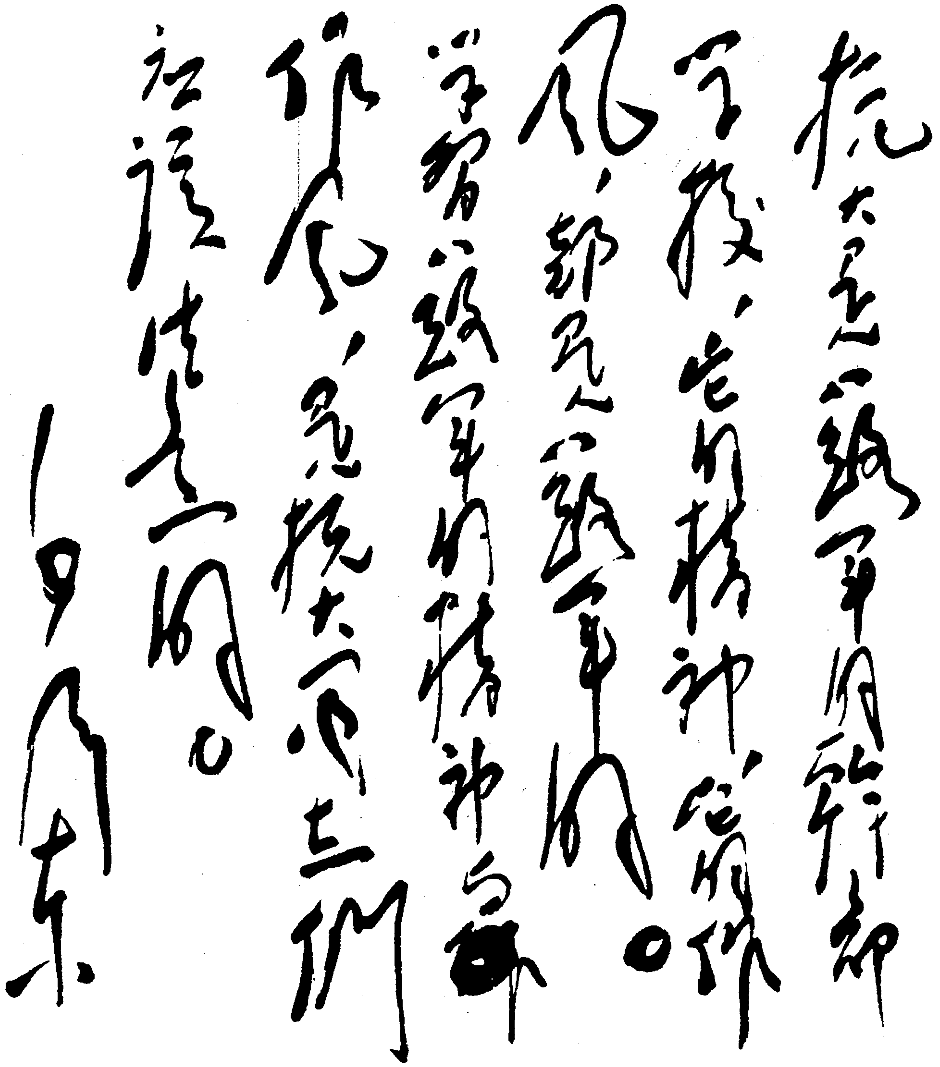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柳夷信的手稿。

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

（1938年10月）

抗大是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它的精神，它的作风，都是八路军的。学习八路军的精神与作风，是抗大同志们应该注意的。



抗大是八路军的干部学校，它的精神，它的作风，都是八路军的。学习八路军的精神与作风，是抗大学生们应该保持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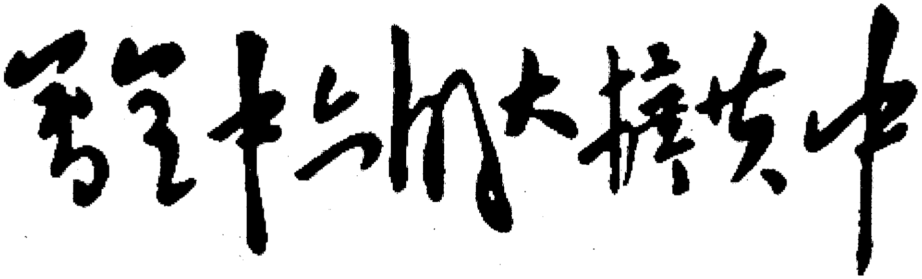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

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题名

（1938年10月）

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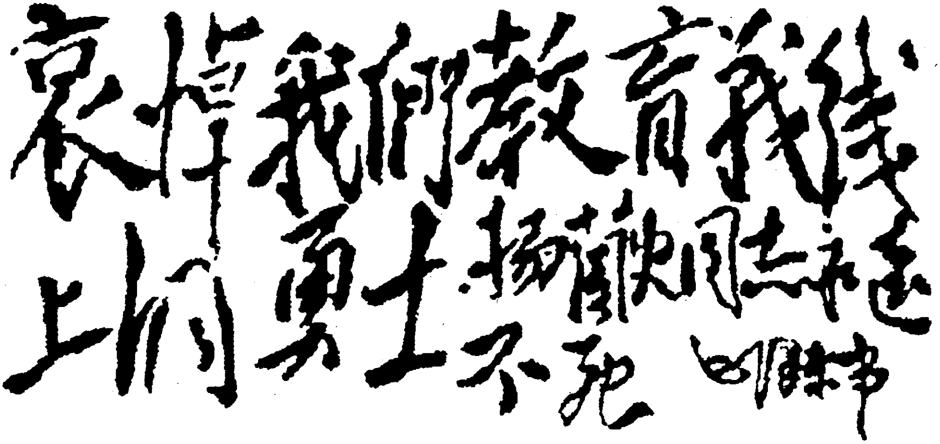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题写的会名。

为杨兰史题词

（1938年10月）

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

毛泽东书



哀悼我們教育戰綫

上的勇士楊蘭史同志永遠

不死 毛澤東書

毛泽东为杨兰史的题词。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1]

（1938年11月5日）

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1938年11月5日和6日作的，这一部分是在5日讲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当时毛泽东同陈绍禹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突出问题之一。这在本质上就是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关于这种意见分歧，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曾作了以下简要的总结：“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工人要求厂主改良待遇，同时积极作工以利抗日；地主应该减租减息，同时农民应该交租交息，团结对外。这些都是互助的原则和方针，是积极的方针，不是消极的片面的方针。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1]，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2]，正是列宁主义。把让步看作纯消极的东西，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许可的。纯消极的让步是有过的，那就是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3]，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中国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

[1] 参见《孟子·离娄下》。原文是：“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2]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

[3] “劳资合作论”，是第二国际主张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反动理论。

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

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听说法国共产党曾经提出过这个口号，那大概是因为法国有了各党的共同委员会，而对于共同决定的纲领，社会党方面不愿照做，依然干他们自己的，故共产党有提此口号以限制社会党之必要，并不是提此

口号以束缚自己。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战争和战略问题[1]

（1938年11月6日）

一　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结论是在1938年11月5日和6日作的，这一部分是6日讲的。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文中，已经解决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问题。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因此对于党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上的方针，也采取了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为着克服党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而使全党更明确地了解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首要地位，并动员全党认真地从事这项工作，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又从中国政治斗争的历史方面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同时说明我们的军事工作的发展和战略方针的具体变化的过程，从而取得了全党在领导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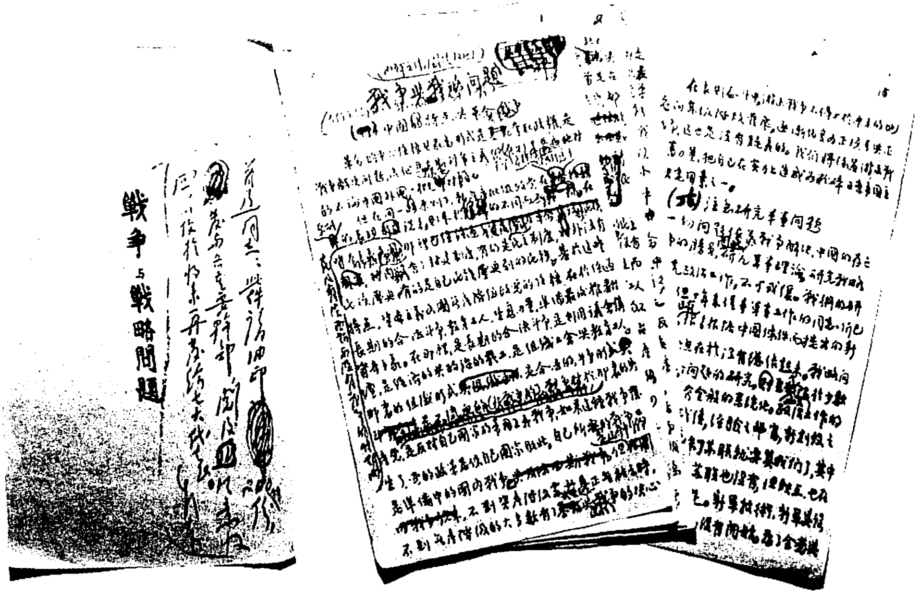
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1]。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

---

[1] 参见列宁《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关于自己的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9、163～169、297～303页）和《俄国的战败和革命危机》（《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5页）。列宁这些著作是在1914年至1915年间针对着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而写的。并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六章第三节《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的理论和策略》（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5～192页）。

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结论的一部分，即《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手稿。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没有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广东战争[1]和北伐战争；或者是联合

---

[1] 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革命军讨伐广东境内军阀买办势力的革命战争。1924年10月，革命军歼灭了勾结英帝国主义在广州发动叛乱的买办豪绅武装——“商团”。1925年2月至3月，革命军从广州东征，打败了盘据东江的军阀陈炯明部队的主力。6月，回师消灭了盘据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部队。10月至11月，举行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同时，革命军分兵南征，讨伐盘据广东西南部的军阀邓本殷。在上述这些战役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都英勇地站在战斗的前列，并且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热烈地支援革命军。这些战役的胜利造成了当时广东统一的局面，为北伐战争建立了后方基地。

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同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国内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帝国主义举行武装进攻的时候，则是联合国内一切反对外国侵略者的阶级和阶层，进行对外的民族战争，例如现在的抗日战争。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例如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那一时期。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例如北伐战争时期，革命军后方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北洋军阀统治区域内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又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区域内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直接地配合战争的，红色区域外部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间接地配合战争的。再如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军后方的和敌军占领地的一切组织和斗争，也同样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斯大林同志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无论是对于北伐战争说来，对于土地革命战争说来，对于今天的抗日战争说来，都是正确的。这些战争都是革命战争，战争所反对的对象都是反革命，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分都是革命的人

---

[1]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民；不同的只在或者是国内战争，或者是民族战争；或者是共产党单独进行的战争，或者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战争。当然，这些区别是重要的。这些表示了战争主体有广狭的区别（工农联合，或工农资产阶级联合），战争对象有内外的区别（反对国内敌人，或反对国外敌人；国内敌人又分北洋军阀或国民党），表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其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中有不相同的内容。然而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战争，都表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革命战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一论断，完全适合于中国的情况。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的和差不多开始就面对着的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的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直至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的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的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之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有些同志仍旧没有如同现在我们这样想。

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我们这次会议又决定党的主要

工作方面是在战区和敌后，更给了一个明确的方针。这对于有些党员愿作党的组织工作，愿作民众运动的工作，而不愿研究战争和参加战争，有些学校没有注意鼓励学生上前线，等等现象，还是一剂对症的良药。大部分中国领土内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工作是直接联系于武装斗争的，没有也不能有单独的孤立的党的工作或民众运动。一部分距离战区较远的后方（如云南、贵州、四川）和一部分敌人控制的地区（如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党的组织工作和民众运动也是配合战争的，只能也只应服从前线的要求。一句话，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

二　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

我们来看一看国民党的历史，看一看它是如何地注意于战争，是有益处的。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1]。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2]，直至辛亥革

---

[1]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小团体，叫做兴中会。1895年清朝政府在中日战争中失败以后，孙中山依靠兴中会联络民间秘密团体会党的力量，在广东组织过两次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即1895年的广州之役和1900年的惠州之役。

[2] 1905年，兴中会同其他的反清团体华兴会等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在同盟会的领导与影响下，革命党人联合会党、新军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其中主要的是：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之役，1907年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州）廉（州）之役和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之役，1908年钦（州）廉（州）上思之役和云南河口之役，1910年的广州之役，1911年的广州之役和武昌起义。

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1]。后来的海军南下[2]，桂林北伐[3]和创设黄埔[4]，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

[1]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同当时北洋军阀袁世凯的统治实行妥协。1913年，袁世凯派军队南下，企图消灭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的国民党势力，孙中山曾经发动武装的反抗，但是不久就失败了。1914年，孙中山鉴于对袁世凯妥协的失策，在日本东京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以表示同当时的国民党相区别。中华革命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积极开展武装的反袁运动，主要的有：1914年湖南郴县、桂阳等地的起义，广东惠州、顺德等地的起义和1915年上海肇和军舰的起义。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蔡锷等反袁势力在云南发动讨袁战争。孙中山是当时武装反袁的积极鼓吹者和活动者，他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又在广东、山东等地发动了反袁的武装起义。

[2] 1917年孙中山和在他影响下的海军由上海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联合当时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西南军阀，组织反段的军政府。

[3] 1921年，孙中山在广西桂林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1922年移驻广东韶关，正式出师北伐。由于部下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举行叛变，这次北伐没有取得成果。

[4]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建立陆军军官学校，1926年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前，这是一所国共合作的革命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以及其他同志，曾经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他工作，以革命精神为当时的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骨干，其中包括不少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

辛亥革命后，一切军阀，都爱兵如命，他们都看重了“有军则有权”的原则。

谭延闿[1]是一个聪明的官僚，他在湖南几起几覆，从来不做寡头省长，要做督军兼省长。他后来做了广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主席，还是兼了第二军军长。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军阀，他们都懂得中国的特点。

中国也有些不要军队的政党，其中主要的一个是进步党[2]，但是它也懂得必须靠一个军阀才有官做。袁世凯、段祺瑞[3]、蒋介石（附蒋的是进步党之一部转变而成的政学系[4]）就成了它的靠山。

历史不长的几个小党，如青年党[5]等，没有军队，因此就闹不出什么名堂来。

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

---

[1] 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清末翰林。原主张君主立宪，后附和辛亥革命。他在1912年参加国民党的阵营，反映了湖南地方势力同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在1911年至1920年期间，他先后当过湖南省的都督，省长兼署督军，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等职。

[2] 进步党是1913年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的政党，当时它在政治上依附当权的袁世凯，曾经组织过内阁。1916年，进步党演变为“研究系”，又依附当权的段祺瑞，在1917年参加了段祺瑞组织的内阁。

[3] 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他是袁世凯的老部下，在袁世凯死后曾经几度把持北洋军阀的中央政权。

[4] 政学系原是对1916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该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

[5] 青年党，即“国家主义派”的中国青年党。

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

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看来，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有人笑我们是"战争万能论"，对，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这不是坏的，是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三　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史

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四年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1]。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即是说，假如共产党采取了陈独秀的取消主义的话，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一九三三年党的中央迁至红色区域以后，情形有了根本的改变，但对于战争问题（以及一切主要问题），又犯了原则性的错误，致使革命战争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

---

[1] 这里主要是指以共产党员叶挺为首的独立团，以贺龙为首的第二十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还只有苏联、中国、西班牙三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三个军队，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方面的，其他各国的党都还没有军事经验，所以我们的军队和军事经验特别值得宝贵。

为了胜利地进行今天的抗日战争，扩大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我党所领导的游击队，是非常重要的。在此原则下，党应派遣最好的和足够数量的党员和干部上前线。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组织任务须服从于政治任务。

四　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

我们党的军事战略的变化问题，值得给以研究。分为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两个过程来说。

国内战争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主要的是正规战争。但所谓正规战争是中国型的，只表现在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和指挥上、组织上的某种程度的集中性和计划性方面，其他则仍是游击性的，低级的，不能和外国军队一概而论，也和国民党的军队有些不同。因此，这种正规战，在某种意义上，是提高了的游击战。

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就我党的军事任务说来，也将大体上分为两个战略时期。在前期（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两个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争；在后期（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将是正规战争。

但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和国内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有许多不同的内容，因为是用正规性（某种程度上）的八路军去分散执行游击任务；抗日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也将不同于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这是设想在装备了新式武器之后，军队和作战将要起一个大的变革而说的。这时的军队将获得高度的集中性和组织性，作战将获得高度的正规性，大大减少其游击性，低级的将变到高级的，中国型的将变到世界型的。这将是战略反攻阶段中的事业。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第二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的，这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卢沟桥事变后）的事情。这时，敌人是新的，即日本帝国主义，友军是过去的敌人国民党（它对我们仍然怀着敌意），战场是地域广大的华北（暂时的我军正面，但不久就会变为长期的敌人后

方）。我们的战略转变，是在这些特殊情况之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时可能发生的，一方面是轻敌倾向，又一方面是恐日病，这些在国民党中都是发生了的。国民党当它从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时，主要由于轻敌，同时也存在着一种恐日病（以韩复榘、刘峙[1]为代表），而遭受了很多不应有的损失。然而我们却相当顺利地执行了这个转变，不但未遭挫败，反而大大地胜利了。这是由于广大的干部适时地接受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灵活地观察情况而获得的，虽然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的争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至于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第三个转变，则属于战争发展的将来，估计那时又将发生新的情况和新的困难，现在可以不去说它。

---

[1] 韩复榘，原来是长期统治山东的国民党军阀，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蒋介石的嫡系，原来在河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防御河北省境内平汉铁路沿线地区。这两人在日本侵略军进攻的时候都不战而逃。韩复榘于1938年1月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处死。

五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就全国来说，在抗日战争全过程的三个战略阶段（防御、相持、反攻）中，首尾两阶段，都是正规战争为主，辅之以游击战争。中间阶段，由于敌人保守占领地、我虽准备反攻但尚不能实行反攻的情况，游击战争将表现为主要形态，而辅之以正规战；但这在全战争中只是三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虽然其时间可能最长。故在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不认识这一情况，不懂得正规战争是解决战争最后命运的关键，不注意正规军的建设和正规战的研究和指导，就不能战胜日本。这是一方面。

但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原因是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假如这些情况出现，而不及时地发展广大的和坚持的游击战争去克服它，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日而忽视游击战争，无疑是非常错误的。这是又一方面。

游击战争的可能，只要具备大国这个条件就存在的，因此古代也有游击战争。但是游击战争的坚持，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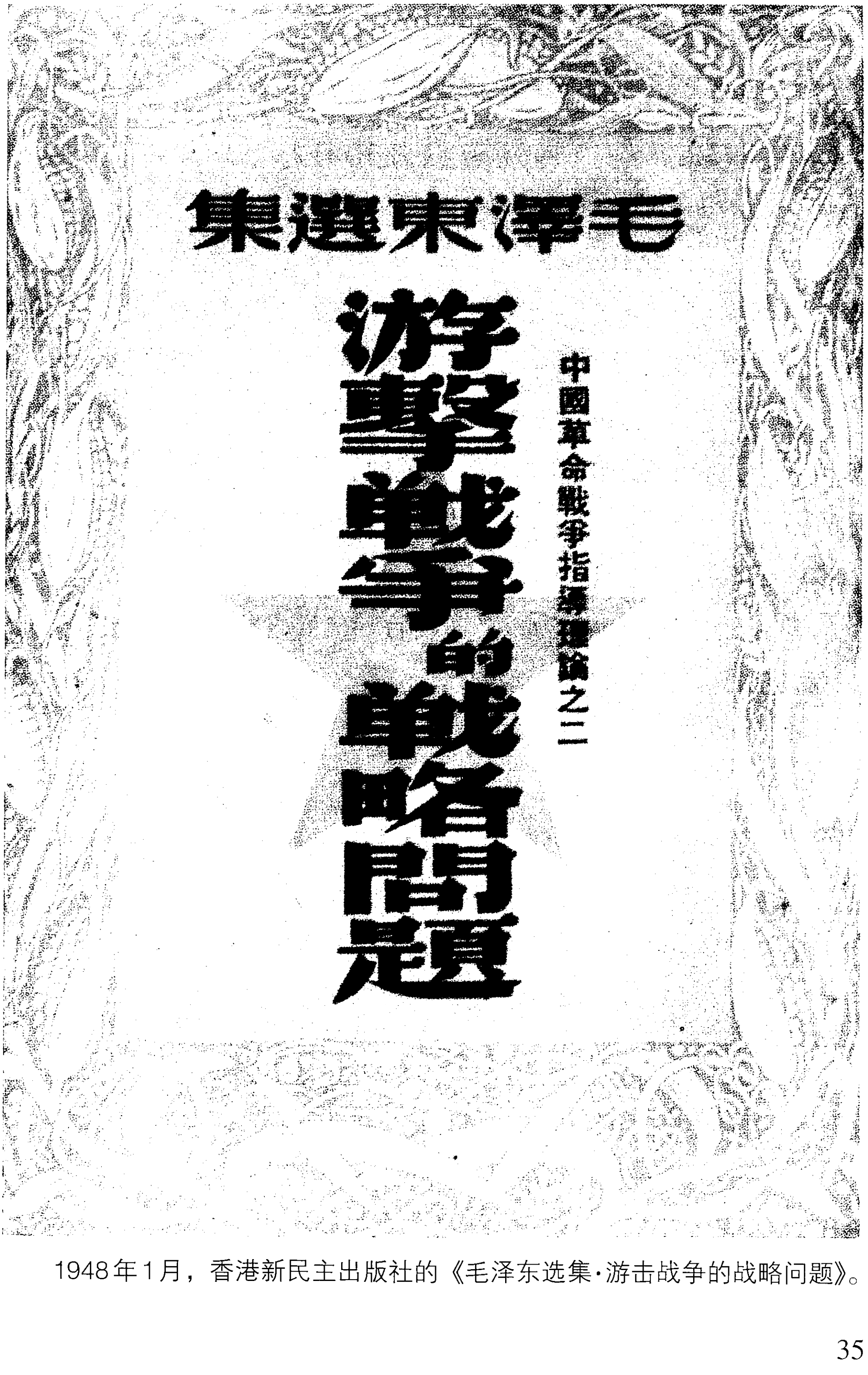
能出现。故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游击战争，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如像内战时期的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

由此可以懂得，我们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重要和必要的了。综合其利，有如下十八项：（一）缩小敌军的占领地；（二）扩大我军的根据地；（三）防御阶段，配合正面作战，拖住敌人；（四）相持阶段，坚持敌后根据地，利于正面整军；（五）反攻阶段，配合正面，恢复失地；（六）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七）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八）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九）最普遍地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十）最普遍地发展抗日的文化教育；（十一）最普遍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十二）最便利于瓦解敌人的军队；（十三）最普遍最持久地影响全国的人心，振奋全国的士气；（十四）最普遍地推动友军友党进步；（十五）适合敌强我弱条件，使自己少受损失，多打胜仗；（十六）适合敌小我大的条件，使敌人多受损失，少打胜仗；（十七）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的领导干部；（十八）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

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

六　注意研究军事问题

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战术的研究虽然不足，但十年来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们已有很多的成绩，已有很多根据中国条件而提出的新东西，缺点在于没有总结起来。战略问题和战争理论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只限于极少数人的工作。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绩，其经验之丰富，新创设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苏联就要算我们了，但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所有这些，今后都应该注意，而战争和战略的理论则是一切的骨干。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于军事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是必要的



毛澤東選集

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指導理論之二

1948年1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的《毛泽东选集·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张云逸可率两三个营过江活动[1]

（1938年11月10日）

项，并转周、叶[2]：

一、白崇禧[3]已允新四军张云逸[4]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

二、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二个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三、四支队及八团队的经费以后归何处发给，如何转交他们，归何处指挥，与中原局[5]关系如何。

以上均望电复。

毛　王　胡
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胡服（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剑英。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4]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5] 中共中央中原局于1938年11月9日组成，刘少奇为书记。

在抗大女生大队成立典礼上的讲话[1]

（1938年11月13日）

妇女同胞所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尤甚，我们反对一切对于妇女的压迫，尤其是仇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妇女的侮辱。我们抗日，不仅为求得民族平等，而且要求得妇女的地位平等。只有中华民族解放，才能有妇女的解放。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女生大队（第八大队）成立典礼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8年11月24日）

应用一切办法团结与巩固范筑先领导的抗日部队，并实际帮助鲁西北地区抗战。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杨尚昆、滕代远关于山东聊城地区抗日领导人范筑先牺牲一事致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徐向前、朱瑞电的主要内容。

在大青山坚持长期游击战争[1]

（1938年11月24日）

周、甘转李井泉：

（一）大青山[2]北靠外蒙，敌正重视，察热[3]游击战争尚未开展，又形孤立，欲在那里建立冀察晋型的根据地，在今天则不可能，但坚持长期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心任务。

（二）故那里一切政策应以长期游击战争性质为出发点。

甲、组织伪军反正应避免过早不必要的零散爆发，惟须估计到反正情绪不可抑制时或已爆发以及军事上必要时，则毅然行之。但一般的工作，应适应长期性这一原则。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转大青山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1938年5月14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7月底第一二〇师以第三五八旅政治委员李井泉率大青山支队由晋西北北进，9月到达大青山地区，开展绥远中部的抗日游击战争。

[2] 大青山，在内蒙古自治区土默川平原以北，属阴山山脉中段。

[3]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乙、反正前后应使其意识到物质条件的困难与斗争的艰苦性。反正后一般地应争取属于八路军指挥的名义，在斗争过程中改造或改编之，最好争取它靠近晋西北或晋察冀边区，但不勉强。为人作嫁，反增以后困难。

丙、对大股土匪或半土匪性质的自发抗日武装，应采取上层联络与影响推动和帮助它进步，勿造成对立以增加我们游击队和地方工作的困难。对零星土匪则可消灭之，仍须对之以礼貌，勿乱杀人。

丁、对于静漪[1]之自卫军估计到与傅[2]的关系，应采取上层联络以及帮助推动它进步，不采取分化瓦解的方针。

（三）绥远[3]问题，须处处照顾到与傅作义的统一战线，对绥远当地上层统一战线与对伪政权等策略，应不违背长期游击战争这一特点。

（四）另一基本任务是：团结蒙汉人民联合抗日，以我们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来改变中国过去传统的错误政策，我们做成模范来推动影响国民党，首先是傅作义的转变。

甲、估计蒙民的民族意识，蒙民对王公的信仰，对德王[4]仍应采取争取的策略，继续执行要求德王回头抗日的口号。

乙、对蒙人要求收回汉人侵占的土地，应使汉人出相当代价立

---

[1] 于静漪，又名于存灏，当时任国民党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副总指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兼第三十五军军长。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白旗人，王公。1936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1937年10月任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兼政务院长，1938年5月任主席。

约收买或作租佃纳租，地方政府应依具体情况分别公正处理，以团结蒙汉联合抗日为原则。

丙、尊重蒙民风俗习惯、宗教并发扬其文化，勿侵犯蒙民利益，特别是收买马匹。必须切实教育部队。

丁、吸收蒙人中知识分子，培养蒙民干部，做蒙民工作。

（五）须向绥察边与铁路以南发展与工作，多繁殖地方游击队，培养地方干部与群众的领袖。

毛　王　杨　贺　关

迥（二十四日）

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1]

（1938年11月24日）

1．估计今后华北形势的进展，冀中区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现有武装部队，依靠群众力量，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2．为完成以上任务，做如下决定：

甲、派程子华[2]同志带一部分干部去冀中，子华任吕纵队[3]政治委员，加强该部之正规化是目前中心任务。

乙、决定贺关率一部去冀中，争取扩大一二〇师。

3．一二〇师一部到冀中可以推动、影响特别是当地部队正规化的过程，而冀中党应以极大力量帮助扩大一二〇师。具体计划由关到五台与聂彭依据实际情况商酌办理。

4．贺关到冀中后，吕部则归其指挥，惟建制系统仍属聂区[4]管辖。

毛　王

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的电报。

[2] 程子华，原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

[3] 吕纵队，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

[4] 聂区，指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1]

（1938年11月25日）

德怀同志：

我们考虑结果，以陈罗[2]率师部及陈旅[3]主力（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晋西南地区暂留陈旅之补充团并集中各游击队编成一团交陈士榘[4]指挥，尔后可从一二九师调一支队接防。陈罗开东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5]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6]东西、胶济南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彭德怀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陈旅，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

[4] 陈士榘，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参谋长。

[5] 老黄河，指国民党政府决黄入淮之前的黄河故道，即今经郑州、开封以北入山东，流向渤海的黄河河道。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沿贾鲁河入安徽颍河及西淝河，在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当时对这一段河道通称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复归故道。

[6]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北在内。尚昆小平[1]认为可行，你意如何，盼告。

毛　王　滕

二十五日

1938年，毛泽东和刘伯承、滕代远在延安机场。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对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1]

（1938年11月25日）

朱、彭、聂，并转宋、邓：

我们对冀热察区工作有如下意见：

一、宋时轮、邓华纵队深入冀东苦战数月，配合并促成地方党所领导的冀东起义，恢复了冀东的中国政权，建立了抗日政权，发动了群众，建立了冀东的游击区，扩大了我军在敌深远后方的政治影响，给敌人以打击，一般说来是获得了成绩的。但是没有尽可能地保持并发展这一胜利，没有很好地团结地方党及军队，没有很镇静地应付那里的局面，以致退出原地区，军队及群众武装受到相当大的损失。

二、估计冀热察区的军事政治环境，认为那地区有许多有利条件，有坚持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可能，但是也有许多困难，要在长期艰苦斗争中才能达到。因此，决定成立第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派萧克同志前往工作，并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及地方党政工作。军政会须有地方党及地方军队的领导者参加，名单待萧克、彭真到晋察冀后由北方分局提出交中央批准。

三、萧克不日将由延安起程，经晋西北到晋察冀指挥机关，由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杨尚昆关于冀热察区工作的意见的要点给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并告宋时轮、邓华的电报。

延安拨出一部干部并由贺龙、萧克、关向应负责成立之。

四、两支队目前应在平绥路南各择适当地点整理训练补充，主要工作于下：

甲、加强政治工作，鼓励士气，根据我们对宋、邓工作估计来检查工作，主要是检查经验教训。

乙、加紧干部教育，集中一部老战士办教导队，部队中的干部则开办流动训练班或临时集合训练。

丙、严密军政组织，整顿纪律，肃清游击习气。

丁、派出政工人员在附近地区进行补充扩大工作，收买武器特别是弹药。

戊、在休整期中，应避免无把握的不必要的战斗。敌如进攻，则利用山地在有利条件下打击之，如十分必要，可靠近晋察冀边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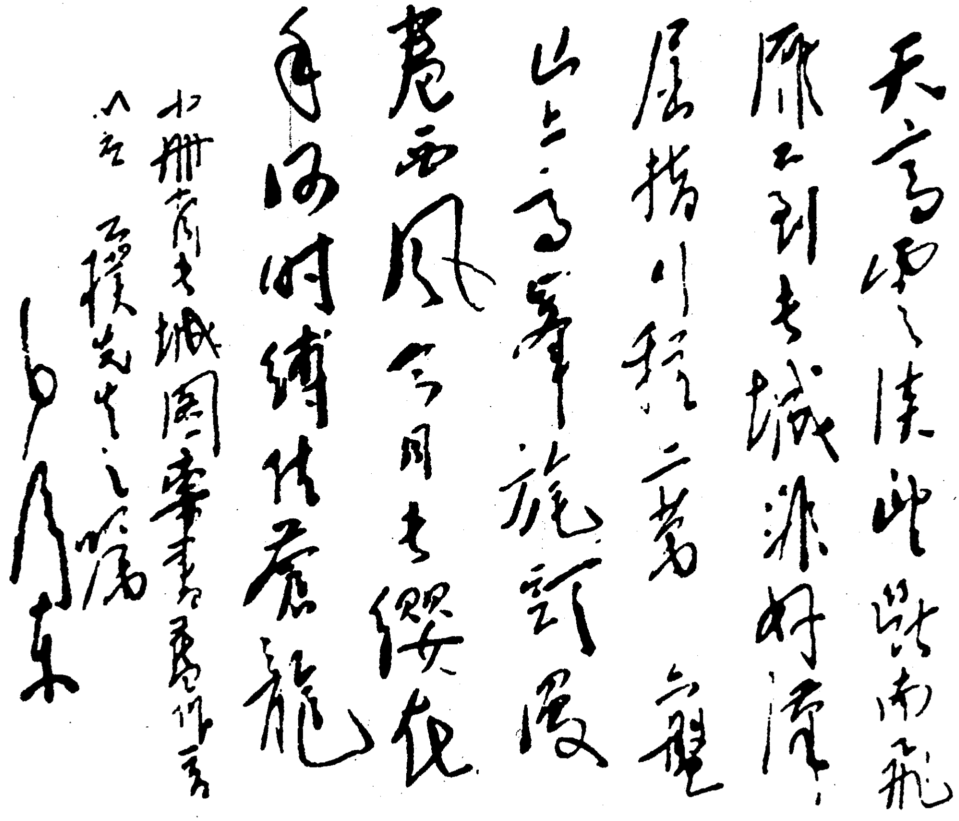
五、两支队须团结一致，靠拢时须集中指挥，建立集体领导，完成休整任务。

六、与冀东须保持联系，冀东地方干部如不能时，须立即派回一部工作。

毛　王　杨

二十五日

1938年冬，毛泽东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李公朴交谈。



天高雲淡望斷南飛雁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六盤山上高峯旄頭漫卷西風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

小冊有長城圖索書舊作書以應
公樸先生之囑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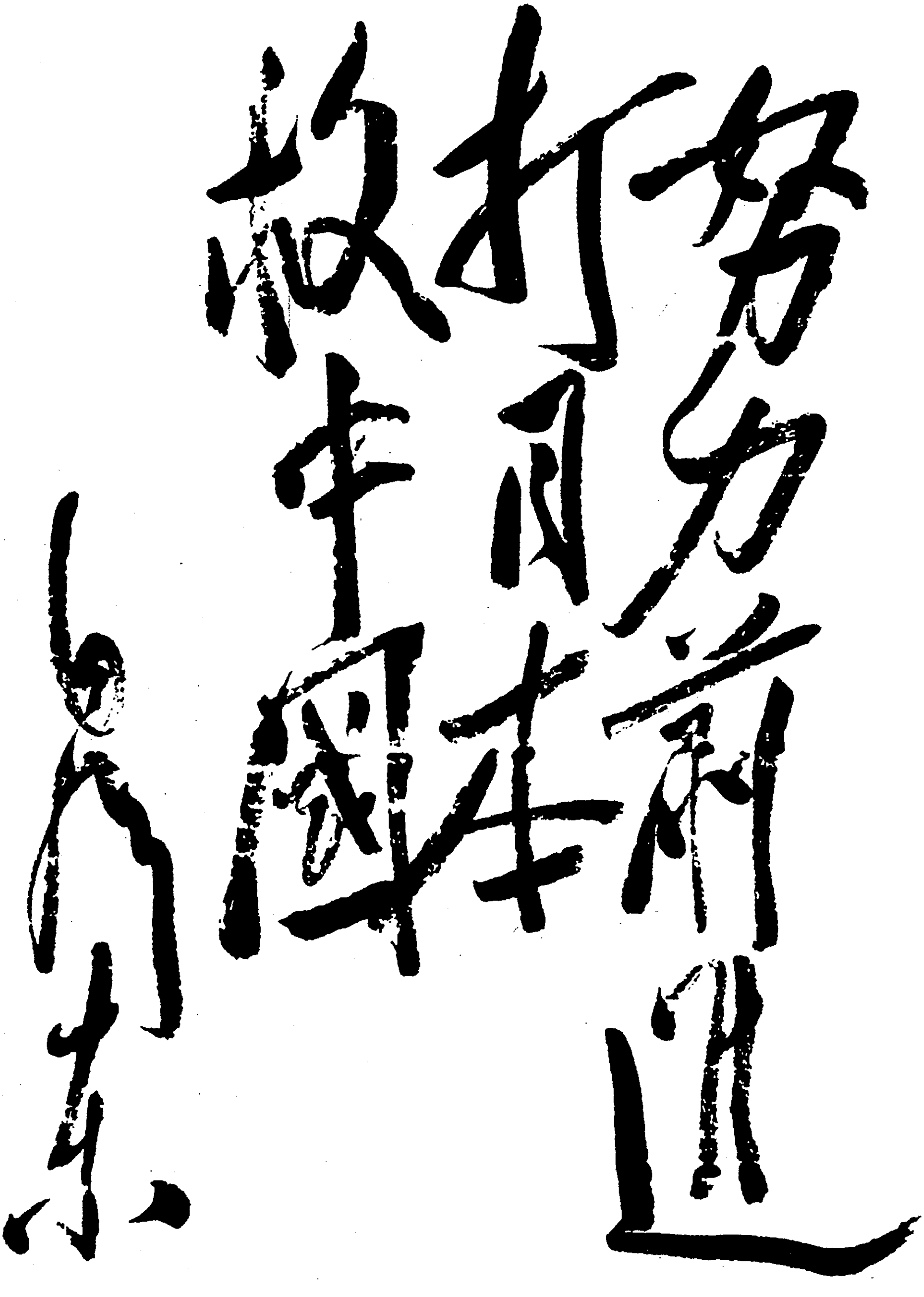
1938年11月，毛泽东为李公朴的《长城》图题《清平乐·六盘山》词的手稿。

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题词

（1938年11月）

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

毛泽东



努力前進

打日本

救中國

毛澤東

毛泽东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题词。

关于坚决拒绝国民党派高桂滋部来陕甘宁边区的指示[1]

（1938年12月1日）

陕甘宁二十三县边区和八路军驻防范围是蒋介石划定的，绝对不许任何部队借口进驻，实行破坏边区的企图。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坚决拒绝国民党派高桂滋部来陕甘宁边区致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朱德、杨尚昆、林伯渠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8年12月1日）

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加以教育，成为我们的干部，意义实大。武汉失守，西北受日军威胁，钱粮两缺，因此中央决定在晋东南和晋察冀设立抗大两个分校，由抗大本校分出干部和学员开赴上述两地。延安抗大本校改为培养八路军比较高级干部的学校。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给邓宝珊[1]的信

（1938年12月5日）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2]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敬颂

戎绥

弟　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五日

---

[1] 邓宝珊（1896—1968），甘肃天水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新一军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1949年年初起义。建国后，曾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

[2] 陈奇涵（1897—1981），江西兴国人。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

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报告[1]

（1938年12月8日）

六中全会指出日军还在进攻，我们有许多困难，我们的力量还不够，但我们能停止日军的进攻。后方工作在六中全会总的指示之下，要克服困难，要增加力量。检查工作，要在五个方面进行检查，即工作、学习、生产、统一战线和党的生活。生产，即生产运动。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作关于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的指示进行检查工作的动员报告的一部分。

关于对待土匪的政策问题的指示[1]

（1938年12月9日）

对土匪政策应当是：1. 我们武装与剿匪安民的责任，首先要恢复政权，委任或必换县长、区长，恢复抗日秩序。2. 在我们力量足够的地方择最坏的土匪消灭之。3. 收编较为弱而力量不大的土匪部队，收编后，或争取之，或收枪解散之。4. 对不能消灭、不能收编的土匪部队，则与之联络，准备实行前两项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土匪政策问题致豫东游击支队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在抗大干部晚会上的讲话[1]

（1938年12月12日）

现在抗大有一万人，陕公有三千人，青训班有二千人，还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党校，共约两万人。我们办了许多学校，训练了许多干部，这个政策是对的。怎样才能使全盘的工作真正推动起来、开展起来，这就是要有干部。我们训练大批干部到前线去，领导游击队，领导军队，组织群众，发展统一战线，等等，这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在工作方面，六中全会一共说了十五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物质的保证。以后我们要自己解决物质上的供给，要自己种地，自己动手。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干部晚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抗大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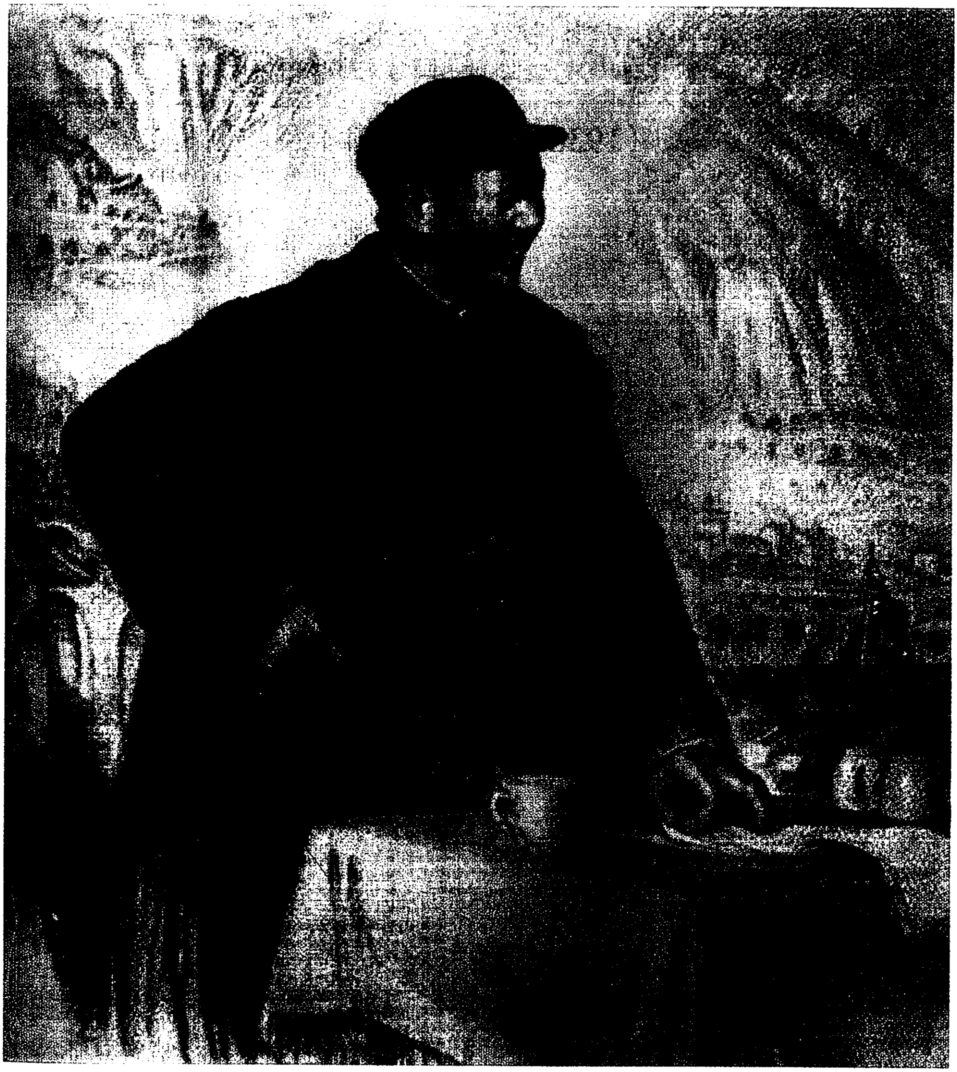
（1938年12月13日）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估计到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战争形势要逐渐进入新阶段，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

这里，最基本的推动全盘工作的正确方针是培植干部。

在今天，广大的敌人占领区域没有普遍的游击队的活动，千百万群众没有人去组织，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战争。这就是说，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共产党，没有抗日武装，没有把这些生动力量统统都发掘和发挥出来，这些工作都要人去做的。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毛主席在抗大》（素描）

在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上的讲话[1]

（1938年12月13日）

一

一、各部门应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担负起本身的职务，把工作精神更加紧张起来。

二、加紧学习，学习马列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的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止。

三、积极推进生产运动，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每一个人均须参加生产运动，以克服当前困难。

四、加强巩固统一战线的工作。

五、健全党内生活。

---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38年12月13日晚召开延安党政军及群众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晚会，毛泽东出席指导，并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报告。号召各机关在抗战新阶段的形势下，克服当前一切困难，增加新的力量，停止敌之进攻，以便准备实施我之反攻。要求后方工作各部门，以战斗的精神，深入检查工作，以担负起各部门的工作任务，并指出我们检查工作的五个方面，即本篇一；并说明检查的目的，即本篇二。

二

一、总结过去工作，发扬过去工作成绩，纠正缺点。

二、规定今后任务。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图中汽车是宋庆龄捐赠的。

致朱德等电[1]

（1938年12月13日）

石友三、高树勋等部正在向河北省南宫县开进中，你们应准备欢迎他们，以真诚态度帮助其发展，并对其作可能之让步，使石高等部能与我军亲密合作。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电的主要内容。

给杨令德[1]的信

（1938年12月14日）

令德先生：

先生两信均收到了，因开六中全会久稽奉复，至以为歉！但袁尘影[2]兄早嘱高岗[3]同志令经手机关释放，谅已获悉。此事不但我不知，高岗仿吾[4]亦均不知，经手机关根据晋西北材料遽尔如彼处置，甚为抱歉！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敬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上

十二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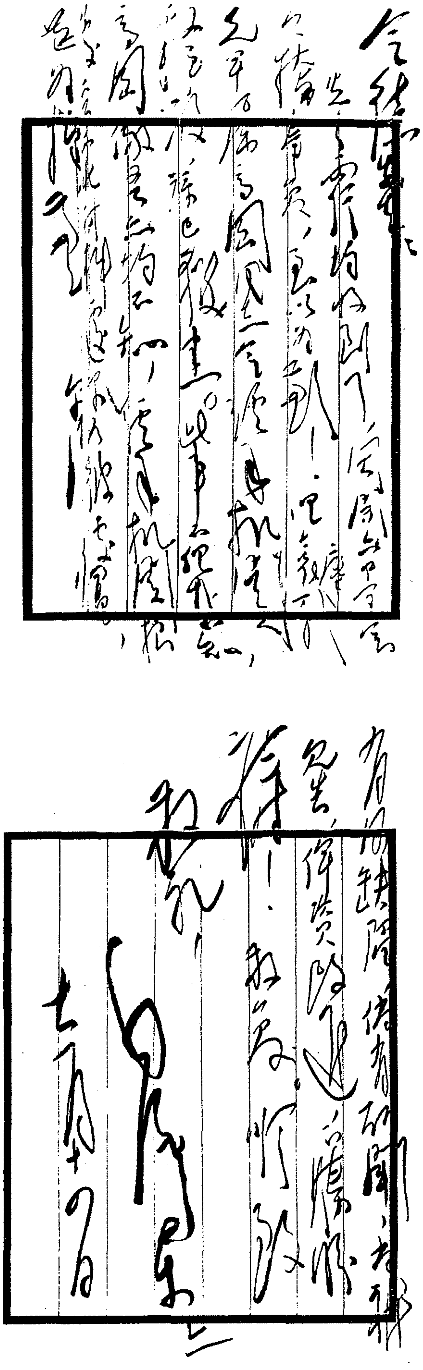
---

[1] 杨令德（1905—1985），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人。当时是大公报派驻陕西榆林的记者。

[2] 袁尘影，杨令德的外甥。1938年年初到陕北公学学习。同年曾误被关押，不久获释。

[3]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是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负责人。

[4] 仿吾，即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当时任陕北公学校长。



毛泽东致杨令德信的手稿。

政治上的持久战[1]

（1938年12月15日）

抗日的持久战需要的时间很长，要经过很多变化，我们打日本必须要有一个政治上的持久战。所以，每个革命者在政治上要有持久性，要准备应付各种曲折，准备克服困难。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曲线，而不是走直线。这个问题也就是走“之”字路还是走“一”字路。无论什么事情都是走“之”字路，而不是走“一”字路，走“之”字路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我们抗日战争要经过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这也是走“之”字路。

---

[1] 这是毛泽东对抗大即将分配工作的八大队（女生大队）学员作关于政治上的持久战的讲话的一部分。

复张经武等电[1]

（1938年12月27日）

张、黎：

你处部队番号，以八路军山东纵队下分支队为宜，指挥部用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部较好。

毛　王

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张经武、黎玉的复电。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8年12月28日）

国民党顽固派侵吞边区的办法有十余种：一、政府，二、税收，三、邮政，四、军队，五、教育，六、党部，七、缩紧、“蚕食”，八、医务，九、保甲，十、实业，十一、农贷，十二、土匪。现在他们又向我们进攻，我们必须采取强硬政策予以抵制。对何绍南[2]要采用较强硬的政策，对其他方面要采用较温和的政策。检查站要重新建立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搞磨擦问题的讲话的一部分。

[2] 何绍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绥德地区专员。

致彭雪枫电[1]

（1938年12月30日）

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2]带六中全会文件及干部、电台等，已去竹沟布置中原局工作。决调第一一五师主力东向，拟分布于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朱、彭已在布置中。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2] 郭述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8年12月30日）

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纵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

中央和军委为了更深刻了解各部队现状、作战经过和执行六中全会决议情形，决定各部队派人到延安来报告工作。

毛　王　滕　谭

三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谭政给八路军总部、各师、陈再道纵队、吕正操纵队、山东部队等的电报。

为抗大《检查工作特刊》题词

（1938 年 1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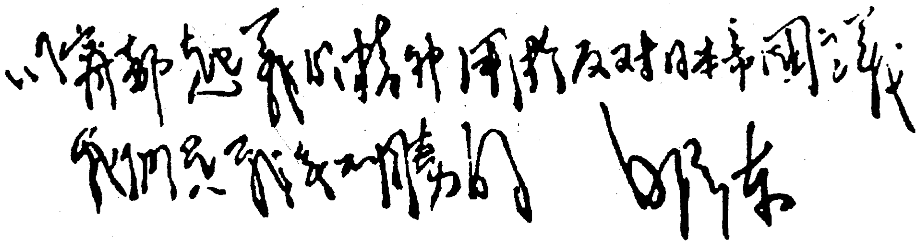
检查越深入，越彻底，越能发挥学校战绩，克服缺点。

为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题词

（1938年12月）

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毛泽东



以寧都起義的精神用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是戰無不勝的 毛澤東

毛泽东为宁都起义部分同志合影的题词。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谈抗大民主问题（摘录）

（1938年）

这里有共产党员，有国民党员，有信基督教的，也有信佛教的，这些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我们不能硬要非共产党员来信仰共产主义，当然共产党员是不信宗教的，并且还要宣传共产党的理论。

这里有思想的自由。所说过墙报里说的只有一套，以后你们有什么都可以写，只要是抗日的。汉奸的说话在这里是没有自由的。写信也自由，过去对于这点，做得不好，以后就要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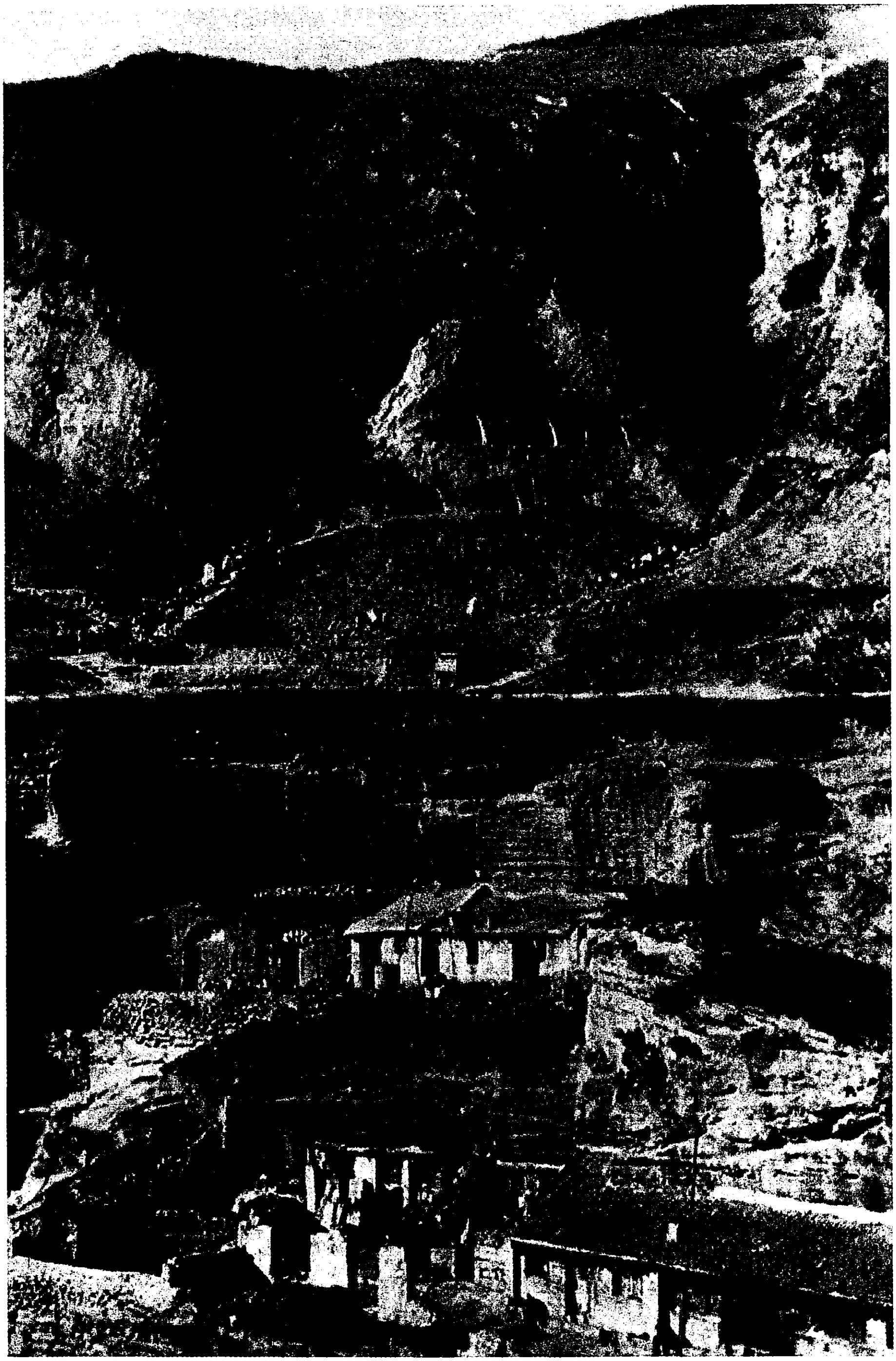
这里政治是民主的。只有汉奸在这里没有走路之权。还有一点，就是要保证军事的集中。班长以后由选举产生，但必须要学校加委，这是军事集中。救亡宣民先队也一律由民主选举产生负责人。

取消斗争会。现在在斗争会里动辄给人家戴上顶大帽子，这是不对的。

这里有意见箱，共产党说话是要做到的，我们要保证，任便你们什么意见，尽管报到意见箱里去，可以不记名字，决不会戴大帽子。

还有告状的办法。你们尽可以由下级告上级，也可以不记名字，并且保证你们的意见达到学校最高当局。

当然诬告不诬告，我们有办法查清楚的。



抗大校舍。

和警卫营二连战士的谈话

（19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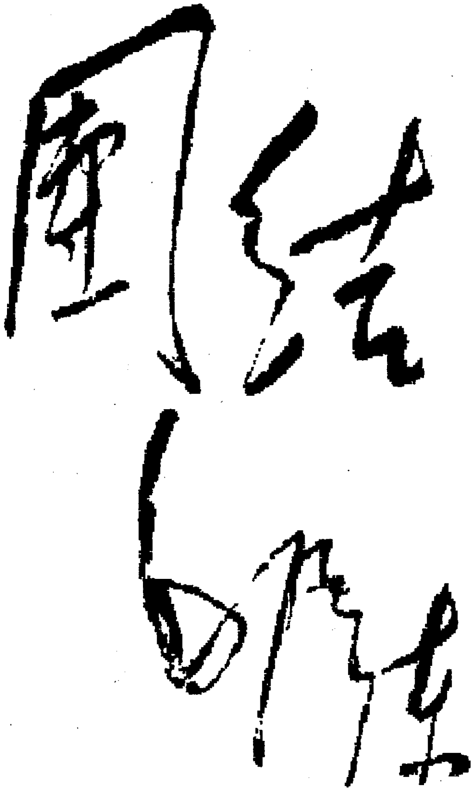
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问题在于学习。……工农分子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和知识分子都要互相学习，搞好团结。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是团结知识分子的。

为抗大学员王承骏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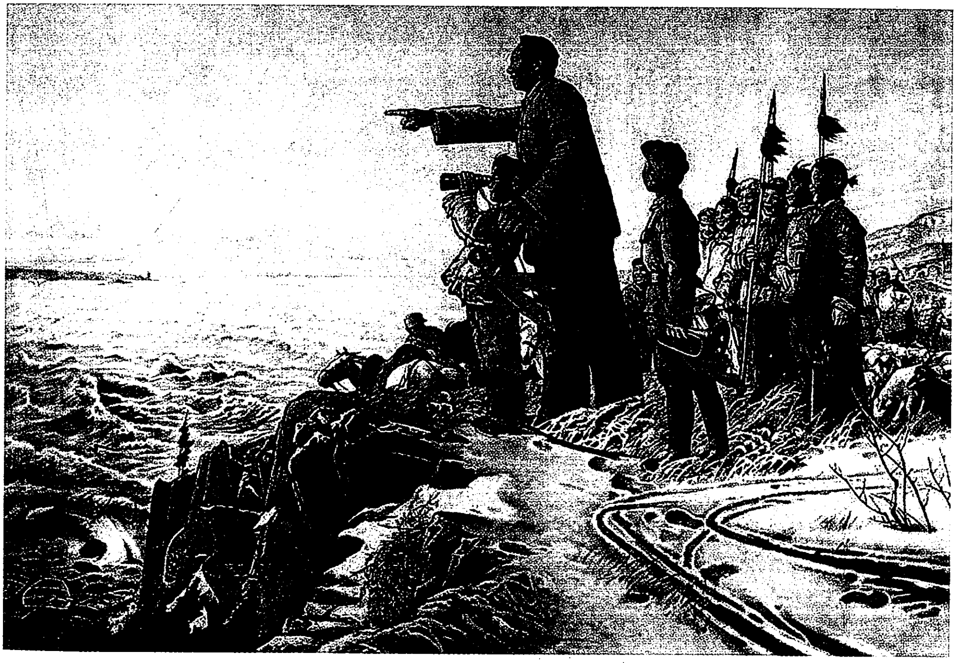
（1938 年）

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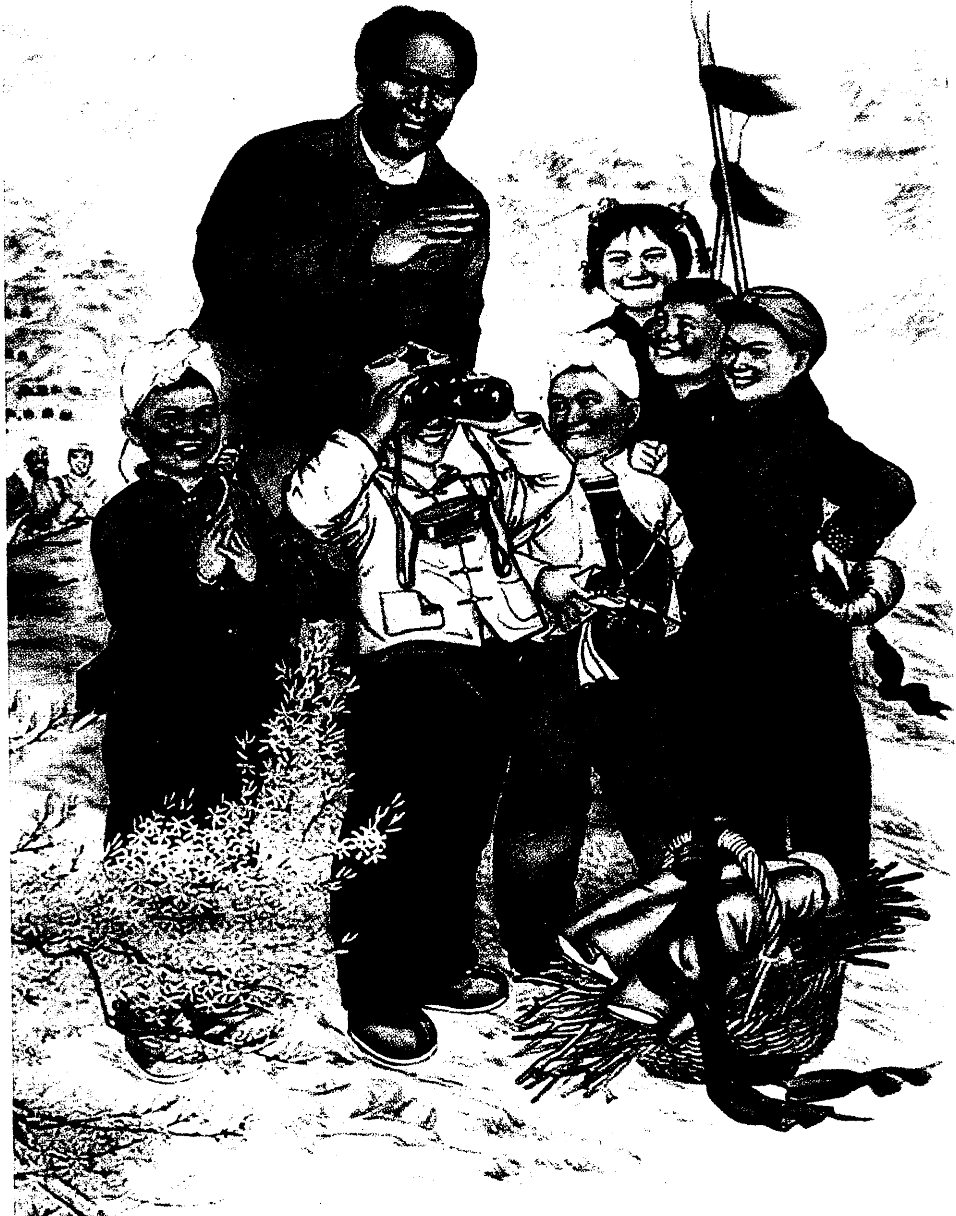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王承骏的题词。



《黄河儿女》(中国画)



《远望》（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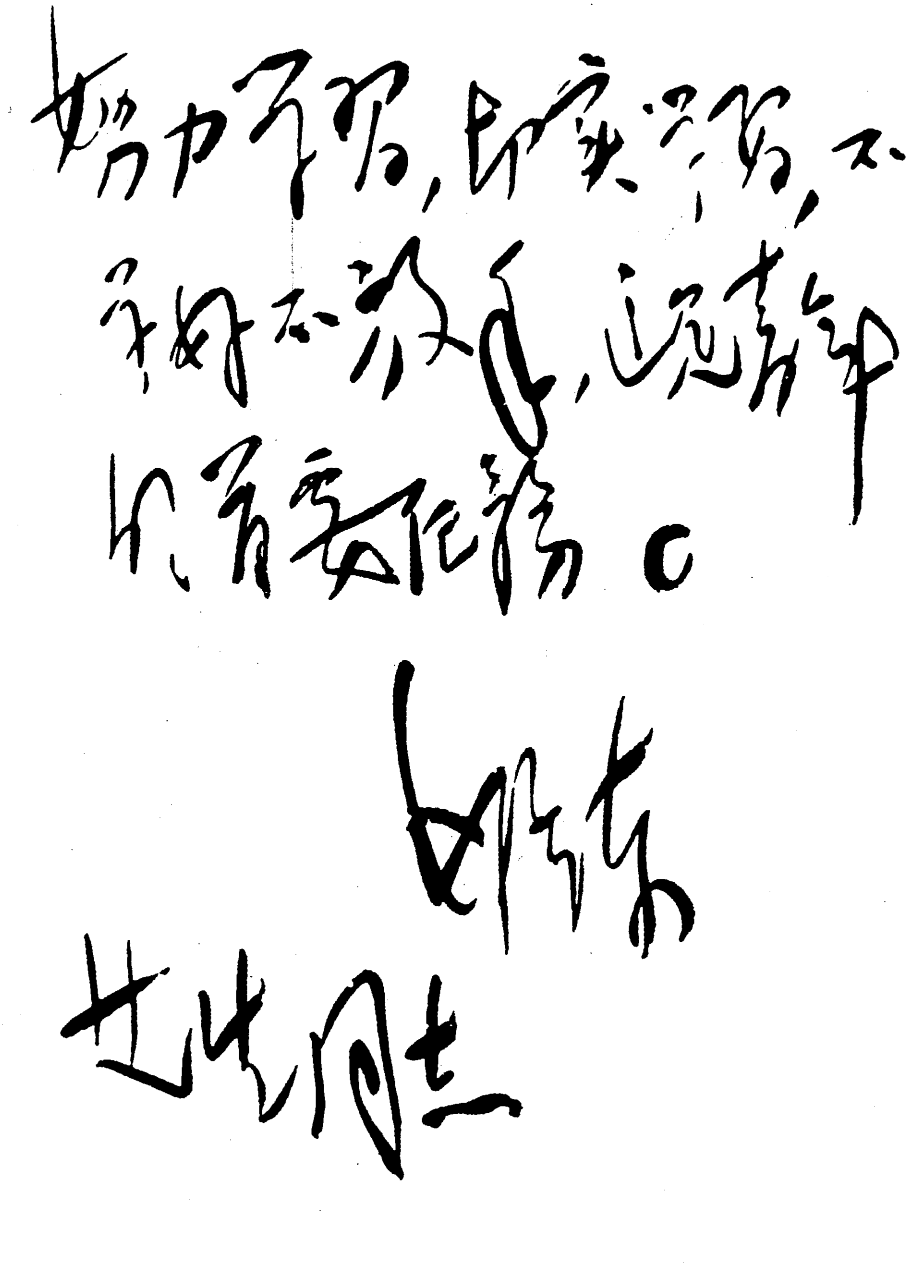
为艾生题词

（1938 年）

努力学习，切实学习，不学好不放手，这是青年的首要任务。

毛泽东

艾生同志



努力学习，切实学习，不
学好不放手，这是青年
人首要任务。

毛泽东

艾生同志

毛泽东为艾生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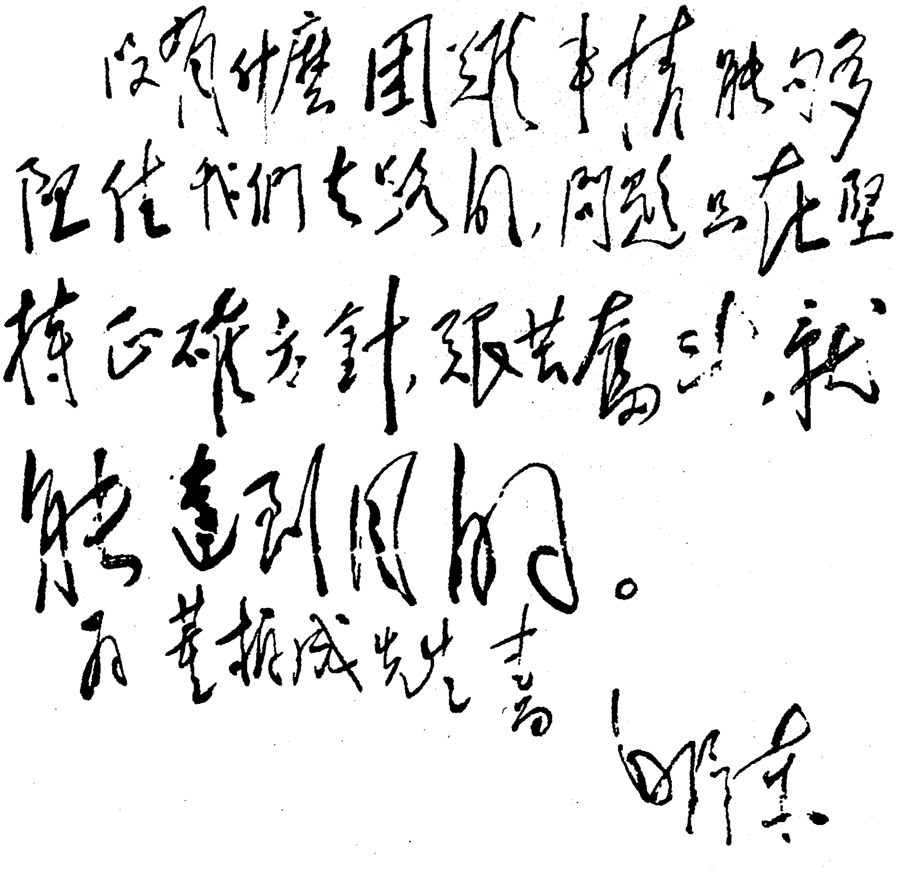
为董柏成题词

（1938年）

没有什么困难事情能够阻住我们去路的，问题只在坚持正确方针，艰苦奋斗，就能达到目的。

为董柏成先生书

毛泽东



沒有什麼困難事情能夠阻住我們前進的，問題只在堅持正確方針，跟著群眾，就能達到目的。

為董柏成先生書

毛澤東

毛泽东为董柏成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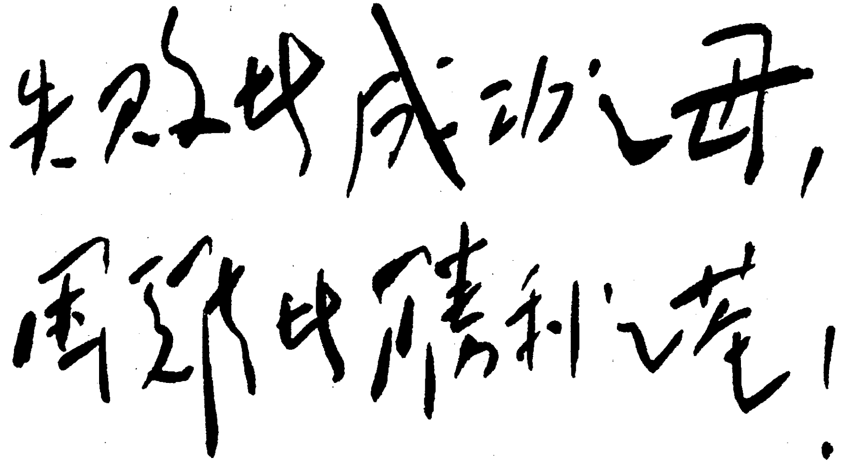
励志联[1]

（1938年）

失败者成功之母，
困难者胜利之基！

---

[1]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当贝特兰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时，毛泽东说：“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这副对联就是对这一段话的精神的高度概括，为鼓舞全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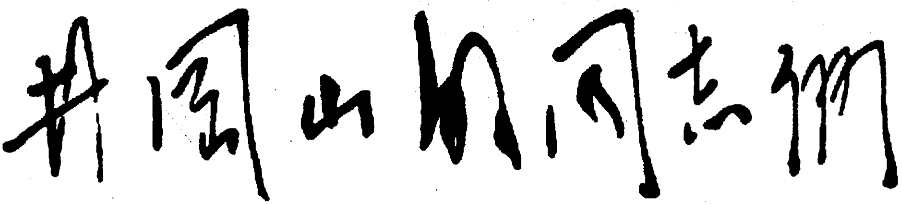
失败是成功之母，
困难是胜利之花！

毛泽东题写的励志联。

在延安为井冈山时期的部分同志合影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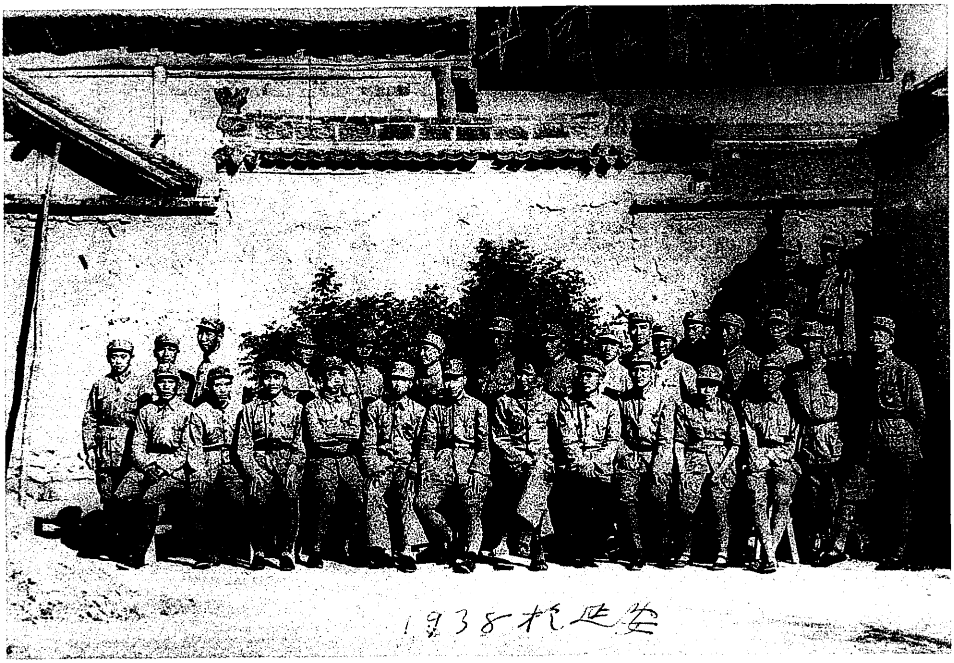
（1938年）

井冈山的同志们



井冈山的同志们

毛泽东为井冈山时期的部分同志合影的题字。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战友们合影。

为张声良题词[1]

（1938年）

努力学习。

毛泽东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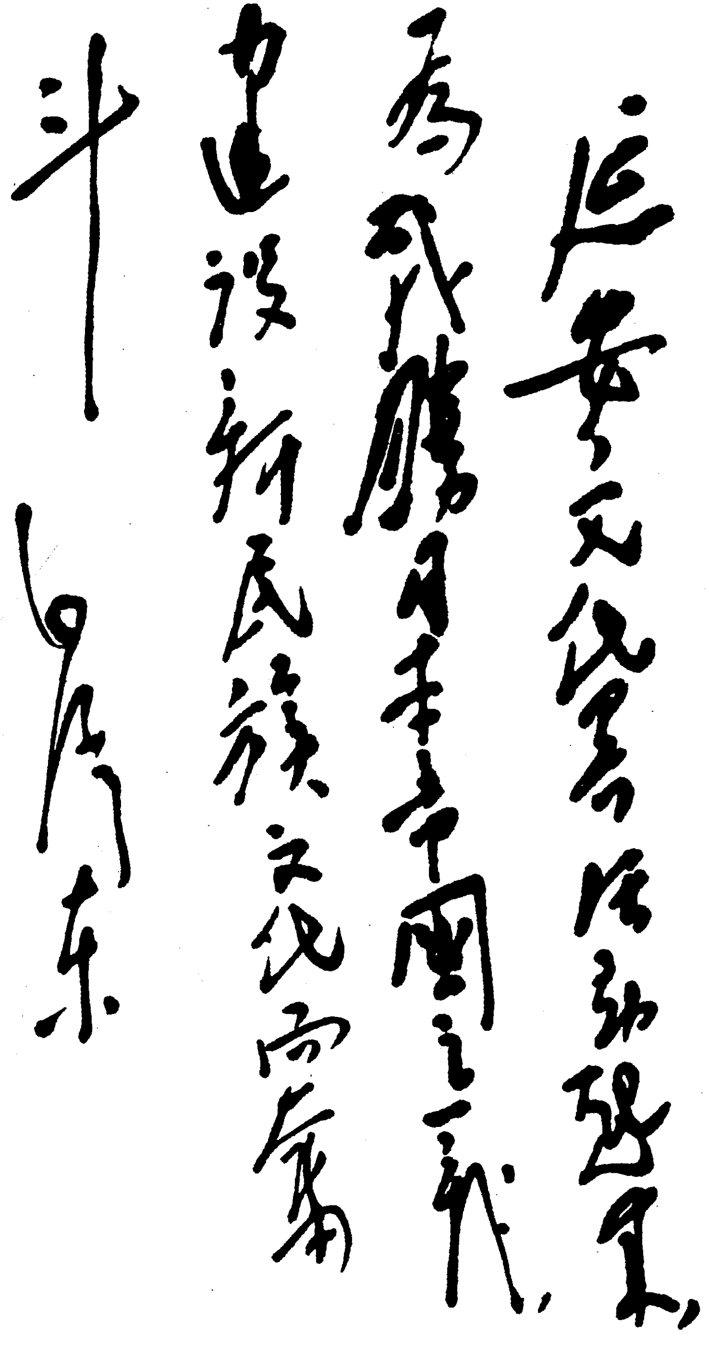
[1] 张声良当时在抗大学习。前一个为毛泽东在张声良的笔记本上写下“努力学习”四个字，并且签了名。后一个为毛泽东在张声良的毕业证书上留下亲笔题词。

为延安《中国文化》题词

（1938 年）

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

毛泽东



延安文化协会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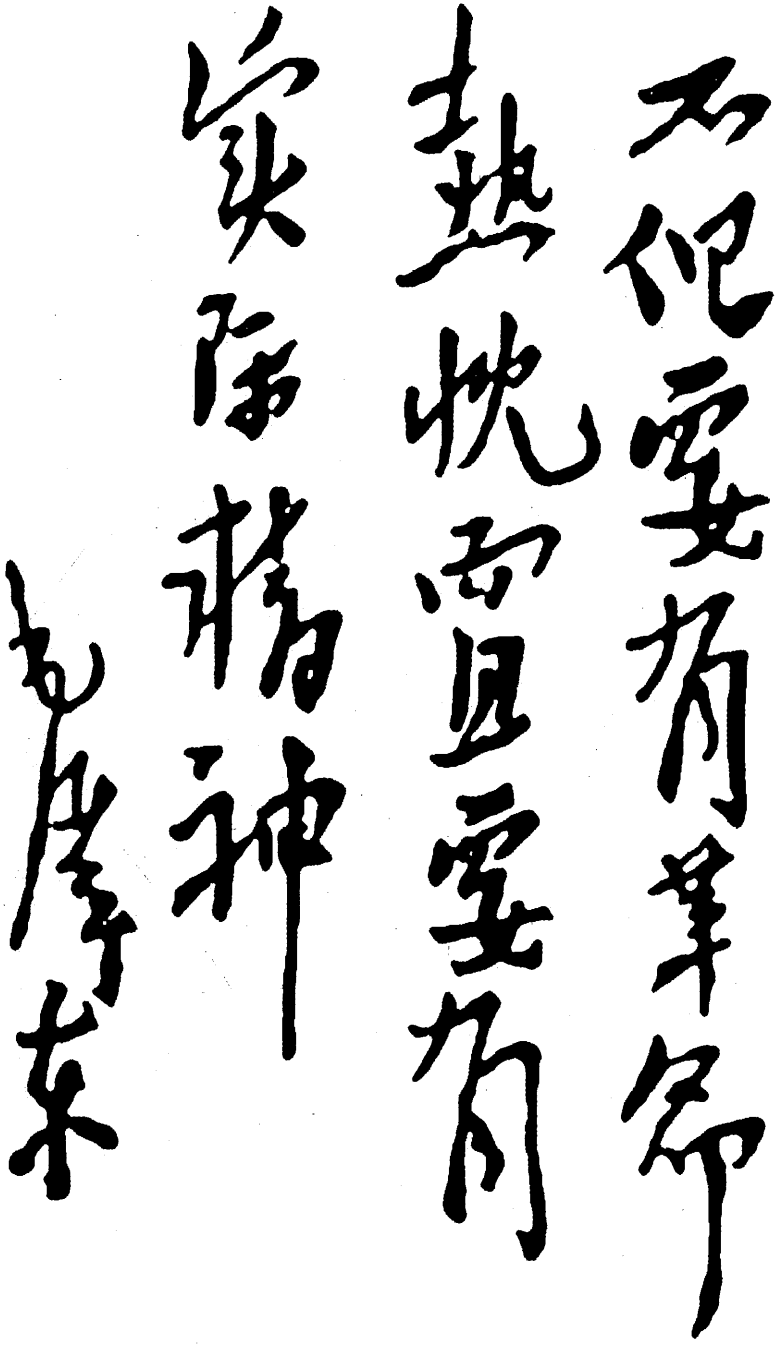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延安《中国文化》的题词。

为抗大题词

（1938 年）

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毛泽东



不但要有革命热忱而且要有实际精神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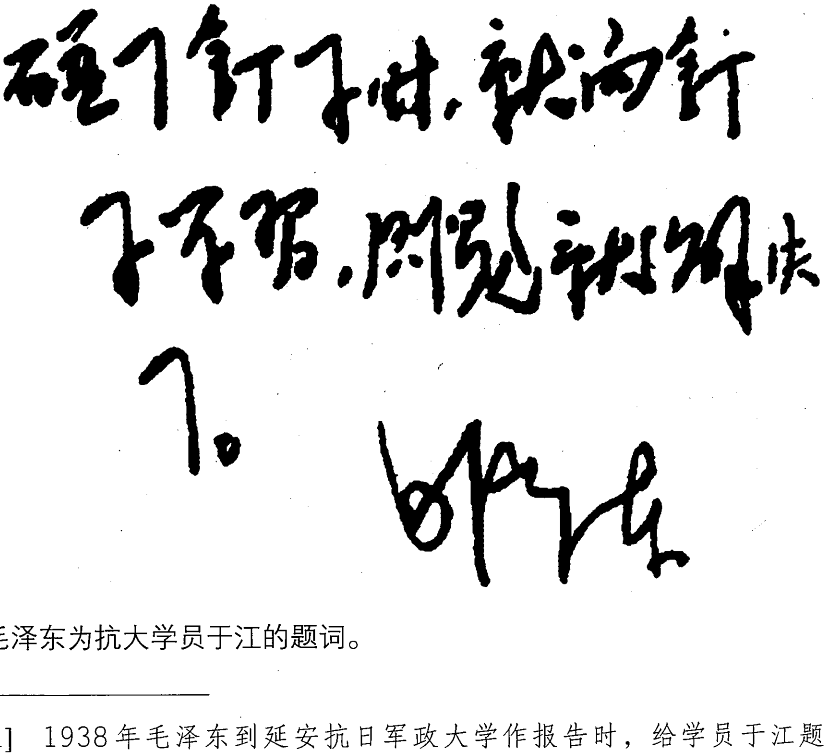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

为于江题词[1]

（1938年）

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



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于江的题词。

---

[1] 1938年毛泽东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给学员于江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题词写在于江烈士生前的一个纪念册内。

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

（1938 年）

第一章　什么是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是一切带革命性的战争之必要的组成部分，尤其在广大领土上作战的民族解放战争，广泛的民众性的游击战争之发展是必要的与必然的。在领土广大、技术贫弱与交通不便的中国现存条件下，战胜强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方针，无疑应该是广泛地发展民众游击战争，使之与主要的正规战争相配合。不这样做，战胜敌人的目的是难于达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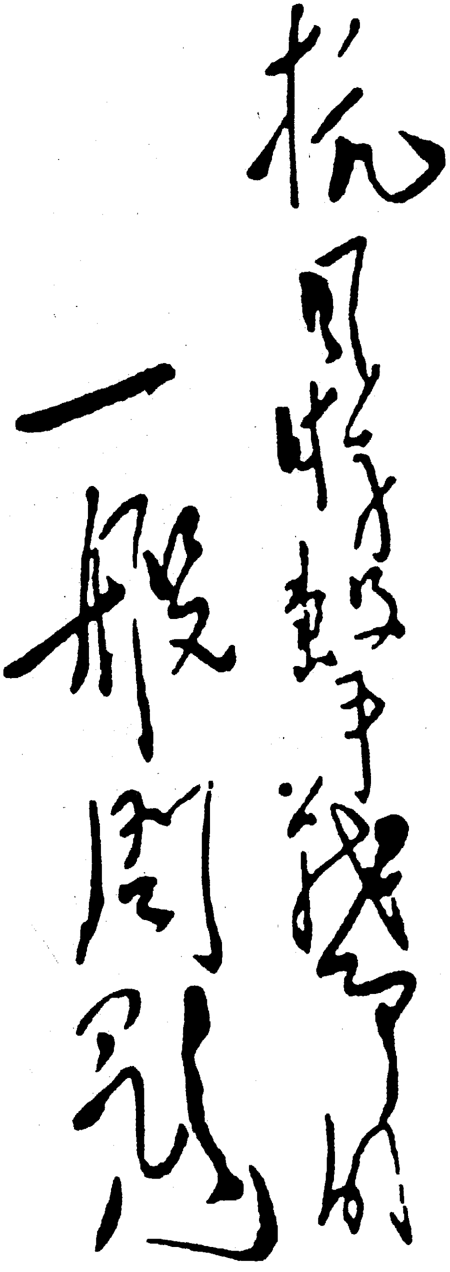
但游击战争不能把它看作独立的战争形式，它是战争中的一个形式与一个阶段，而且从基本上说来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形式与一个阶段。具体地说，游击战争是被压迫的民族或人民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时，不可避免的产物。现在的抗日游击战争，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华民族及其人民到了无可忍受的时候爆发起来的。列宁说：“民族暴动与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当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列宁：《论民族革命战争》）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这种民族革命战争之一形式或一方面，它与其他的形式或其他的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了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样，游击战争没有它的绝对的独立性，它又是战争之一阶段，因

为游击战争本身不能独立地解决整个战争问题，它必须从战争中以其主力逐渐发展与提高成为正规军，以与一切低级阶段的游击队以及既存的与新设的正规军配合作战，才能达到战争之政治目的。

由此可知，游击战争有它客观的规律性，当强大敌人对于弱国实行武装侵略与武装占领的时候，无疑义的，敌人的兵力武器是处在优势地位，被侵略被压迫者的兵力武器，是处在劣势的地位。然而后者不但不甘屈服，而且企图谋自身之解放，游击战争就是以劣势的兵力武器来对抗优势的兵力武器之一种战争形式。另一方面，当侵略的敌人深入国境实行武装占领与残暴压迫的时候，无疑义的，民众、地形、自然、社会诸条件，又多不利于敌而有利于反抗的人民。游击战争正好利用与造成这些有利的条件，以求抵抗与战胜敌人，并从斗争中使之发展成为正规军，与其他既存的及新设的正规军相结合，以进行反抗压迫者的战争。这样，既存的与新设的正规军，由游击队发展而成的正规军，与尚未发展成正规军的广泛的游击队，互相结合起来，形成民族革命战争全部武装力量的整体，便能争取战争之最后的胜利。这样，客观的现实条件，使革命的游击战争，具有它本身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成为游击战争本身存在与发展的法则。

把上述这些基本的意思分析起来，可作如下的观察：

第一，游击战争与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抗日游击战争是抗日战争之一种形式，因之它是半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政治之继续，它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必须坚决执行当前的政治任务，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纲领。它首先必须从政治上发动与团结广大民众，从政治上团结内部，从政治上瓦解敌人与摧毁敌人的政



抗日游击战争的
一般问题

毛泽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一般问题》一书题写的书名。

权，恢复与建立抗日的政权，收复失地，创造抗日的根据地，配合全体的抗日武装，争取最后的政治目的——民族解放之实现。抗日游击战争不但没有丝毫理由能够脱离政治，而且相反的，要一切服从抗日的政治与政策。只有曲解游击战争的人，才以为："游击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纯军事的问题。"（任启珊）这种单纯的军事观点，使游击战争失去政治目标，因而就必然废弃政治工作，丧失民众拥护，必然引导游击战争趋于失败。

第二，游击战争与民众——没有政治目标，必然使游击战争失败，游击战争的政治目标如果不与民众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参加、帮助与配合行动，也就必然失败。这就是游击战争所以只能是革命战争之一形式的基本理由，也就是任何反革命性的战争不能采用游击战争的基本理由。因为游击战争基本上是由民众组成的，又是由民众支持的，脱离民众，或者不发动广大民众的参加与配合，它就绝无生存发展之可能。只有不懂游击战争的人，才否认民众的游击战争，才认为："只有正规军队才能作游击战。"只有不愿游击战争胜利的人，才根本错误地说："游击队只是一种专门作战的小体，用不着民众。"（任启珊）也只有侮辱民众与破坏抗战的人，才狂吠："民众根本没有自动参加抗战的意识。"（叶青）抗日游击战争而离开民众，就必然要离开抗日的胜利。

第三，游击战争的组织性——游击战争是有组织性的。虽然一切民众自发的游击队，在其开始的时候，都不免表现出散漫的现象，但是游击战争本身是应该有组织的。不管游击战争的产生，或由当地民众自己发动，或由正规军部队与民众混合组成，或由正规军派出支队配合民众行动；在数量上或为几个人的游击小组，或为几十人至几百人的游击部队，或为几百人至几千人的游击兵团，都

要使之有坚强的政治与军事的领导，坚强的政治工作，健全忠实的成分，高度的革命觉悟，坚韧不拔的信心与毅力，必要的管理教育，严明的群众纪律，模范的民众工作，坚决的反奸细斗争。并从战斗中逐渐克服散漫现象，克服无纪律状态，才能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以利抗日任务之执行。无纪律的游击队，是不能设想其胜利的。只有那些不懂游击战争的人，才把游击队看作无政府主义的与土匪主义的集团，称之为“失意军人用得着，土劣贪官用得着，流氓土匪用得着”（任启珊），借以污蔑游击战争。我们不否认游击队中难免混入不良分子，也有不良分子借着组织游击队或冒称游击队来胡作乱为，也不否认游击队中存在着散漫现象，甚至严重的散漫现象；但决不能拿这些病态的或一时的现象来责备整个的游击战争，而是要在广泛提倡游击战争的方针下，对于这些散漫与不良现象用耐心的积极的态度提高与改造他们，使他们健全而有战斗力。“这是困难的任务，没有话说，这是不能一下子就解决的，整个民众要在斗争过程中去改造自己。同样，无论如何也应当教育，应该根据当时的经验去改造它。”“恶化的并非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无组织、无秩序、无政派性。”（列宁：《论游击战争》）

第四，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游击战争的战术，应当根据主动、灵活、有计划与进攻的原则，适合当时当地的敌情、地形、交通、气候、兵力、民众诸条件，作战上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能进能退、速战速决的方针，对于较我强大之敌，则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在这样的方针下，向着敌人的后方、侧面、虚处、弱处进行袭击、扰乱、截击、破坏等战斗，达到暴露敌人，迷惑敌人，钳制与分散敌人，停滞与疲惫敌人，打击与消灭敌人的目的。这样来执行单独作战与配合正规军

作战之任务。虽一切条件具备，但如果军事指挥错误，也是没有胜利的。

建筑在上述这些基本原则（政治性、群众性、组织性与战术的灵活性）上的游击战争，在领土广大、技术贫弱、交通不便等条件下进行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无疑地将起着巨大的作用。它是“真正能够成为作战的一方面的东西”，是“不要放过可以打击敌人力量的任何一个机会”（列宁：《论游击战争》）的东西。它是走向大规模战斗的过渡形式，是发展成为正规军的初阶，是正规战争的必要助手，是在敌前尤其在敌后恢复并保卫中国土地、人民、主权的整个抗日武装力量的战略支队，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构成上不可分离的部分。

虽然基本上说来，游击战争只能是革命战争之一形式与一阶段，因为它是不能离开民众的，但不是说反革命战争完全不能组织游击队；因此区别这二者成为必要。例如苏联内战中的红色游击战争，过去中国红军时代的游击战争，三年以来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游击战争，七年以来中国东北三省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及今天中国最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等等，这些都是代表全民族或广大民众利益，有民众力量为基础，它们的存在合乎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只要在政治与军事的指导上不犯原则错误，它们都是能够存在、发展与胜利的。反之，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游击战争”，例如苏联内战中日本、波兰及但尼金、高尔察克等所组织的白色游击队，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所组织的游击队，以及日寇现时所驱使的伪满、蒙“游击队”与正在或将要组织的汉奸“游击队”等等，则都是侵略人民、压迫人民、违反人民利益的东西。这些“游击战争”，因为没有民众的基础，就容易瓦解崩溃或终必瓦解崩溃，也就是我们

应当坚决反对的“游击战争”。如果不把这二者区别开来，就容易模糊游击战争的基本观念，可能误用对方的经验，夸大对方的“游击”效能，或竟作出这样的结论：“侵略者也可以动员民众实行游击战争。”因而减低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忽视历史上革命游击战争的经验的运用。

同样是革命的游击战争，如果不把民族的革命游击战争与阶级的革命游击战争分别开来，也是不妥当的。前者是全民族的人民，不分阶级、党派，在国家政权领导之下，实行反对外族侵略者的游击战争，它的民众基础较之后者要广大得多。“当异域敌人侵占时，全国人民都是同情与帮助游击队的。”（古色夫：《苏联内战教训》）同时，与游击队配合作战的军队，前者较之后者也要广大得多。“在国内战争条件之下，游击队无论怎样巨大的发展，总是不能起异域敌人占领本国时那样巨大的作用。”（同上）但内战时候游击战争的长处，在于内部纯粹，团结较易，争取敌军的工作也较为便利（因言语相通）。民族游击战争在这些方面稍为差些，因此就加重了民族统一战线与对敌宣传的任务。这些是二者之间的差别点。然而二者有其共同点，就是政治上的依靠民众与军事上的采用袭击（攻势），这方面的经验，二者是应该互相采取的。

本质上相同的民族性的游击战争，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之间，因其具体条件不同，又有他们不同的特点。中国鸦片战争中广州平英团的反英民族游击战争，与“九一八”以来的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以及现在内地的抗日游击战争均各有些不同。一九二四年摩洛哥里夫民族反法国与西班牙压迫的游击战争，与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有些不同。这些不同，表现在它们之间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上。看出其本质上的相同点，又看出其形式上的差别

点，是必要的。

克劳斯维茨在其《战争论》中说道：“在每个时代的战争中，都有其各个独立的性质，独自的条件……在各个时代，应有其独立战争的理论。”列宁在《论游击战争》中说道：“对于斗争方式的问题，无条件地要求历史的考察，依据历史的具体的环境在经济进化的各种时机，受着各种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风俗的等等条件所支配……”“无条件的，敌视种种抽象的公式，一切种种教条的药方，要求对于正在进行着的群众斗争要有注意的态度。这种斗争，跟着运动的发展，跟着群众自觉性的生长，跟着政治经济危机的激烈化，尽在产生新的愈来愈复杂的防卫和进攻的方法。”根据列宁的名言，具体研究当时当地游击战争（以及一切战争形式），一切变化发展的主观与客观的条件，找到它们共同的规律性（一般的理论原则），尤其是它们各自的特殊的规律性，是非常必要的。今天的抗日游击战争，如果不善于运用历史上一般革命游击战争的规律，可以发生这样的错误：以为在日寇机械化部队进攻之下，“游击战已失掉了在历史上的作用”（陶希圣），或者说“旧战术时代的游击战，只是一种辅助战术，现在或几乎无采用游击战争的机会”（任启珊），这些都是极端有害的说法。另一方面，如果不估计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特点，来公式化地机械地运用历史上游击战争（以及一切战争形式）的经验，也可以发生另外的错误，把抗日游击战争看成等于其他时代其他民族的游击战争一模一样，就必然在行动上遭到碰壁，同样是不利于抗战以及游击战争本身的。

总体来说：什么是抗日的游击战争呢？它是整个抗日战争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领土广大、技术贫弱、交通不便的中国条件下，对于狂暴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作战，成为广泛发展、

到处袭击、缩小敌人占领地、壮大我军声势、辅助正规军、最后战胜敌人的战略工具。它是执行抗日政治任务的、一刻也不能离开民众的、有组织的、采用灵活战术的民众武装力量。根据中国今日民族战争的特点，它和国内战争与别时别地的民族战争中的游击战争，都有某些不同，它是今日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支伟大的特殊的抗日武装力量，最后战胜日寇是少不了它的。

第二章　游击战争与正规战争的关系

运动战与阵地战都属于正规的作战，游击战则属于非正规的作战，它与运动战、阵地战是本质上有区别的，这不论在作战单位的数量上，在编制上，在装备上，在供给上，在战术上，在指挥关系上，在前后方关系上，在作战任务上，都可以看出来。

首先，游击部队及游击兵团，即使从整个战争的武装数量看来，它们是很多的，然而从其作战单位看来，它们小的是几十人至几百人的游击部队，大的也不过是几百人至几千人的游击兵团，同正规军比较，是大大不同的。

其次，因为游击战争主要的是依靠民众当敌人到来时临时组织而成的小部队与小兵团，因此，其编制必须适合地方性与小单位性，其武器一般是低级的，其给养是就地取给，这些都不同于正规军。

再次，游击战术也表现其非正规性，主要的是灵活与机动，一般没有什么决战。它不如正规军的阵地战，在固定战线上采取阵地防御与阵地攻击那样带硬性的战术，与强大敌人作真面目的战斗；也不如正规军的运动战，在固定或非固定的战线上，采取正规的侦

察、警戒、开进、展开、攻击、防御等那样整齐而有秩序的战术，与强大敌人作真面目的战斗。说到正规军的运动战能够转化为阵地战，游击战更没有这回事。

从指挥关系说来，游击战以独立自主分散指挥为原则，过分的干涉是不应当的。正规战，尤其是运动战，虽也允许而且必须给与战区及下级以机动，然而仍以集中为原则。这是因为正规战之组成，极度要求各部队各兵团各兵种各战区之战斗的、战役的与战略的协同动作，而在游击战，则决不应也不能作这样的要求，它只在邻近部队之间要求战役上之某种程度的互相配合，在战略上大致地与正规战相呼应，以及某些游击队在战斗或战役上之就近配合正规军作战，它本身不能有严格的协同动作，也没有许多不同兵种的协同作战。

在前后方关系上，游击战虽然在其每一根据地上，也有其流动的绝不固定的作战线，但因其主要地是处于敌后，同国家的总后方相隔离，从这点上说，它就根本没有后方。正规军则除特殊的例外（例如过去红军的万里长征，现在山西的各军）之外，一般不能如此。

从作战任务说来，游击战是消灭小敌，削弱大敌，袭击敌之交通道路，从敌后建立起独立作战的根据地，从战略上钳制敌人，策应正规军于遥远的战区与战线上之作战，这些亦与正规军有很大的不同。

所有这些，都说明游击战与正规战之区别，把这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对的。无疑义的，八路军是正规军，然而从其在华北作战之这一阶段说来，由于受领的任务与处于敌后的情况之要求，大体上是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不能否认，平型关及其他许多战斗，属于正

规战中之运动战，也不能否认，该军领袖们常常计划着集中较大兵力期于运动战中消灭更多的敌人，然而必须承认，“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方针之正确性。不但如此，在风陵渡失守之后，华北整个的抗战军（包括中央军、晋绥军在内）在其没有改变任务与转移阵地以前，也都大体上是游击战而不是正规军。不能否认，这些军队都是正规军，也不能否认，即在风陵渡失守之后仍然可能并且必须争取打运动战，然而必须承认蒋委员长“以旅为单位，进行游击战”之作战指导的正确性。由此可知，不但民众武装组成的游击部队与游击兵团执行的作战，因其全般条件与作战任务之特殊，是游击战，即正规部队与正规兵团执行的作战，仅因部分条件与作战任务之改变（分散行动，分散指挥，前后方联络关系之改变），也暂时地转化成了游击战。

毫无疑义的，游击战亦可转化为正规战，这不但分散了的正规军集中起来立即可以改到执行正规战的任务，而且一切民众武装的游击部队与游击兵团，在一定条件具备之时，能够发展为正规军（成为正规军巨大来源之一），因而对于作战也转化成了正规战。当其在游击战时，它们是无数的跳蚤，向着一个巨人东咬一口，西咬一口，把这个所谓巨人也者，弄得疲惫瘦弱起来，不得不承认它们是一些“可恶”“可怕”以至于没有办法对付的“怪物”。及至这些小东西长大起来也化成一个巨人时，前面那个“巨人”就不但疲惫瘦弱，而且简直有生命的危险了。日本帝国主义近已渐渐在中国的游击战争面前表示头痛，就是这个原故。所以不把游击队与正规军、游击战与正规战区别开来是不对的，然而把二者绝对化，认为二者之间有不可跳过的深沟，也是不对的。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承认二者的区别，又承认二者之能够互相转化，方才是正确认识了

二者的关系。

因此，也就非常明白，如果把游击战与正规战混为一谈，或者把游击战与运动战看成一个东西就容易犯出下述的错误：在理论上夸大游击战的作用，轻视正规战的作用。例如说“游击战为一切被压迫民族谋得自由解放的主要战略”（张佐华），或者说“游击战术是中华民族抗战之基本的战术”（赵康），甚至于说“游击战术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唯一战术”（胡天民），这些意见其用意在于提高游击战的地位，反对轻视游击战的倾向，有它的积极方面的作用。但这些热心的朋友们，没有明了：如果不把游击战放在恰当的地位，就不能实际提倡游击战，不但反对者能够利用我们这种过分的估计反转来攻击我们，而且从游击战的行动说来，可以使游击队误认了去执行自己所不能胜任与不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正规战的任务，同时又难免妨害着游击队积极地去配合正规军作战与向正规军发展之固有的重大作用。另一方面：这种“唯游击论”，如果真正把它发挥下去，并实行起来，可以使正规战削弱、解体、向游击战退化，如所谓“把正规军都变为游击战”，失去了主要依靠正规战战胜敌人的必要前提，可以得出“抗日战争失败”的结论。

在相反的方面，则有如下各种不正确的意见：或者把游击战与正规战截然分开，认为游击战终归是游击战。例如说游击战始终只能停在它的原地位，否认游击战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成为正规战。这是承认游击战但把它孤立起来看的一种意见，表现对于游击战估计不足，这种意见无疑地是有害的。或者根本反对游击战，认为正规战外不能有别的战争方式。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游击队中的某些不良现象，例如纪律不良及有人利用游击队营私舞弊等事实，因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根本否认民众武装的游击队，说什么“只

有正规军才能作游击战”，这是对民众游击战的取消主义，无疑地是彻底错误的。

因此，在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正确地估计游击战与正规战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们认为应当这样说：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在某些时候可能暂时地成为主要作战形式，而在敌人后方，则将一般地是主要形式。然而从整个抗日战争说来，无疑正规战是主要的、基本的，它在战略上起决定的作用，而游击战则是正规战的助手。正规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暂时地转化成为游击战，游击战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成为正规战。游击战与正规战二者，应依整个战争的情况与任务之需要，使之各得正确的发展，并正确地互相配合起来，加以必须的其他条件，就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说到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关系，依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特点，又依照技术贫弱的现时条件，一般说来，应以运动战为主体，阵地战有条件地配合之，而以普遍发展的游击战为之辅助。这是明白的，虽然在战场作战上运动战与阵地战可能互相转化，虽然阵地战在一定条件下有配合运动战作战之必要，虽然在技术条件提高之时更增加了阵地战有力地配合运动战之必要与可能，而且从举行大规模战略反攻、夺回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说来，没有阵地战的配合，简直是不可能的；然而革命战争的基本作战方式，还是应该以运动战为主，因此必须大大地提倡运动战，如果否认这一点，将不能解决整个战争的胜负问题。至于游击战，如前所说，是全部正规战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战略助手，它在战略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必须大大地提倡游击战；但不能认为游击战占主要地位，因此不能把游击战代替运动战与阵地战。这样就把运动战、阵地战与游击战三者的关系，建立在利于抗日战争的正确原则

之上。

第三章　历史上的游击战争

游击战争不是今天或中国才有的，它在人类反侵略反压迫的战争史中早就有了，而且由于条件的适合，许多起了伟大的作用。历史上的许多游击战争，虽各有它们的特点，因而演出的作用有大小之别，发展的过程与结局也不一样，然而由前辈人的血肉堆积起来的光荣意义与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尊重与研究的。可惜中国历史上几百次农民战争的宝贵经验，至今没有整理起来，这里引据的，只是外国及帝国主义侵略以来的中国几个轰轰烈烈的战争中所表现的游击战争的经验。然而，对于今天正在斗争中的全国同胞认识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及建立其胜利的信心，仍然是有大的帮助的。

一八一二年九月，法国拿破仑以气吞全欧之势，率领数十万步骑炮的大军，侵入俄国。当时在俄国弱而无备的正规军实行集中之前，主要的是用坚壁清野与哥萨克骑兵及一部分农民自卫的游击队，节节妨碍法军的前进。在鲍诺丁诺之役，俄军战无结果之后，断然放弃莫斯科，重整兵力，而以各五百人的九个游击支队，加上广大的农民自卫游击队，不断扰乱、疲惫与打击法军，使其再不能进展。十月，法军因冻饿受困不得不实行退兵时，沿途的游击队大大地起来，配合正规军的战略反攻，截击与追击敌人，大败法军，使雄绝一时的拿破仑大军几乎全军覆灭，游击队掳获不少的官兵，缴来不少的枪炮，俄军的这一全胜战，虽然有它当时致胜的各种条件，主要的还是依靠俄国的正规军，然而游击战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一个贫弱的管理恶劣的国家，居然击败了和驱逐了大量的为

世界上最强的名将所统率的欧洲军队，它胜利了，虽然它的才能还没有十分展开，因为有名的游击运动还未组织好，甚至集成很大的部队，遭受禁止，游击队的武器供给也极为困难，说俄国话是‘用斧头拳头来作战的。假定有很好的组织，能相信民众，则拿破仑的军队，也许被消灭的还要早些。”（伊凡诺夫）

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俄国苏维埃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干涉与国内白党的战争中，被敌人占领地方的民众都发动起来，编成武装队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进行真正的战争。在西伯利亚、在乌拉山地方，乌克兰但尼金反动将军的后方及波兰人的后方，都有了很多的红色游击队，不仅时常破坏了和停止了敌人的后方交通，并且时常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在白党退却的时候，更将其被正规红军击溃了的正式部队一网打尽。所以高尔察克、但尼金及日本、波兰等等敌人，为要同红色游击队斗争起见，不得不从前线上抽调许多正式部队，去同游击队作战。“这不但减弱了敌人自己战线上的兵力，而且对于这出没无常、游动不定的游击队，很少取得完全的胜利。”（《游击队怎样动作》）当时游击战的发展，某些游击支队，人达数千。少年人壮年人大都加入战斗，老年人也编为后方宣传队，有老年的“银色连”，有壮年的游击队，有少年先锋队，有滑雪板的游击队，有骑兵游击队。游击队中有坚强的共产党领导，有普遍的政治工作，能与民众打成一片。他们反对过于强调游击战，否认组织正规军的“左”的游击主义，同时反对轻视游击战作用的右倾观念。经验又告诉我们：“正规军是基本的主要的力量，游击队是第二类的帮助正规军完成作战任务的力量。”（《苏联内战教训》）他们很多的游击队后来都逐渐变成了正规军，战斗起来能起到和正规军不相上下的作用。有名的加伦将军的军队，就是由游击

队造成的。

一九三五到三六年，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战争，在七个月中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除了主要的政治原因（封建部落制度，没有坚强的政党）之外，在军事上没有坚持运动战，没有将运动战与广泛的游击战及某些可能的阵地战配合起来，最后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阵地战，终于打不过强大的意军。此外阿国的领土不大，人口也不多，也是失败原因之一。可是阿国以落后的军队与武器，同四十万机械化的意军坚持了七个月，中间有一个时期，游击战与运动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几次击溃意军，并收复一部分城市，意军死伤达十四万。假如这样坚持下去，则胜败结局未可预料。现在阿国还有游击战争，如能解决其内部的政治矛盾，则游击战争发展是可能的。

一八四一到四二年的广东抗英战争（广州三元里民众之平英团），一八五〇到六四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一八九九年的义和团战争，游击战都起了伟大的作用。特别是“太平”战争中的游击战，是伟大的战争形式之一，使得清军疲于奔命。这些战争未取得胜利，并不是游击战之过，而是整个的政治军事原因。经验告诉我们，没有优胜于敌的政治军事条件，没有坚持的正规战，则游击战不能解决最后的胜负问题。这些战争中，或则游击战没有向正规军发展，或则正规军没有与游击战适当地配合。一般地都是游击战中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所以都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九二七到三六年，中国红军战斗史中，充满了游击战的伟大作用。它一开始就坚持了正确的政治领导，从不断的失败与胜利中创造了许多的根据地，逐渐从游击队发展了许多的正规军，在有了正规军之后仍然广泛地发展着游击战，许多新的游击队又是积极地广泛地配合正规军作战，因而获得很多的胜利。虽然武器落后，敌

我对比起来游击队的数量很小，但在游击队自己的战斗中，在配合主力军作战的战斗中，有强力的政治工作与紧密地结合民众，因而能够坚持了自己的阵地，保守了主力军与游击队的骨干，组成了今天在抗日战场上出现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尽其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责任。这中间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但主要的是依赖于坚强的政治领导，依赖于自强不息的政治工作，使内部团结一致，与民众打成一片，对敌军关系的正确政策，战略战役上使游击战与运动战适当地配合起来，使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把建立政治军事根据地的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并使游击战积极地向正规战发展，因而坚持了十年的战争，克服了无数的困难，达到了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目的。这种经验，我们再也不希望重复用于内战，中国内部毫无疑义的应该永远团结起来，但用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却是有益的与必需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东北诸省开展了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无论日寇采用如何残暴的与欺骗的政策去宰割东北的同胞，用了许多军队“讨伐”了七年之久，可是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仍然存在与发展着。那里的斗争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九一八到一九三三年一月），东北三个省中都爆发了广大的抗日游击战争，黑龙江有马占山、苏炳文的抗日军，吉林有王德林、李杜的救国军、自卫军，奉天东边各县有唐聚伍等及其他的抗日军，声势浩大，予日寇以很大的扰乱和威胁；但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统一的军事与政治领导，没有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民众工作，以致组织薄弱，力量涣散，行动不一致，被敌人各个击破而失败。但到第二时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到现在），由于广大被压迫人民的不断起来斗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其在义勇军中的艰

苦工作，游击战术的逐渐改善，更好地结合着居民群众，新的民族干部的培养等等，使东北游击战争又成为一个浩大的局面，已经创造了七八个大的游击兵团及许多小的游击部队，因而使日寇不能不分配许多兵力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防范与围攻它们。它们不仅有力地吸引与牵制了日寇侵华的兵力，而且积极地影响着日寇在东北的统治，并影响着韩国的民族运动，这对于今天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实有其伟大的作用。虽然它们中间还存在着许多弱点，例如：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执行与发展还不足够，吸引民众参加还不甚广泛，内部政治与组织工作还嫌薄弱，争取日军尤其是伪军的工作还是很差，然而只要能作不断的努力，这些弱点是能够克服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论日寇如何残暴与如何欺骗了七年之久，不但不能消灭东北的游击战争，而且必然要激起更大的游击战争，与全中国抗战更有力地配合起来。

上述这些外国的中国的游击战争，证明在革命战争中游击战争是可能的，必要的与必然的。要使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得到最后胜利，毫无疑义的应该大大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历史上的明效大验，是铁的证明与血的教训。但是应该指出：今日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是历史上一切游击战争中空前伟大的一幕，不但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显示其伟大的威力，就在世界说来，也将是伟大的东西，这是中日战争的现实条件下的特殊产物。

第四章　抗日游击战争能否胜利

抗日游击战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部分，抗日游击战争能否胜利的问题，要从整个抗日战争敌我力量对比的考察中去解决。这个

力量对比的特点是：

（一）日寇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它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据有比较进步的工业生产与优良技术的海陆空军，这是首先要估计到的。但它虽有进步的工业，却仍是一个先天不足的帝国主义，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充分，不足以支持长期的战争与应付广阔的战场。加之日本人民的反战思想在发展着，这一点影响到侵华军的下级士官与广大兵士逐渐发生不满情绪。还有，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它的力量不能全部用于侵略中国，至多只能出兵一百万左右，此外的力量不得不留以对付其他的国家。基此种种原因，日寇的侵略战争决不利于持久与占领广大的地区，在战略上不得不要求速决战；我们如能坚持三年以上的战争，它就很难支持下去了。在作战上，日寇不得不依赖交通要道与主要城市，以便充分发挥其武器的威力，迅速求我主力决战，决不利于在交通不便的广大乡村作战。为此缘故，它就在占领区内，控制要点，要求后方安稳，交通畅达，以便集中其有限兵力于主要战场，与我正规军作战，决不利于处处分兵，处处作战，它最怕后方动摇与交通阻塞。此外，它极力要求利用被占区域的物力、财力以至人力去弥补它自己力量之不足，决不利于失去这些资源人力，尤其害怕消耗力量于“得不偿失”的战斗场合。因此，在敌占领及所至的一切地区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无疑将给日寇以重大的打击，这种效验，已经在华北五省及江、浙、皖三省中表现出来了。

（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民族解放战争中，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显得落后，这是应该估计到的。然而中国又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国家，这些条件都可以作为持久战的基础。这些条件便利于我们使用

大规模的运动战，发展广泛的游击战，在敌后创设许多抗日根据地，迫使敌人处处作战，前后作战，不停作战，不断消耗。我们则结合军队与民众力量，打击敌人的弱点，在敌人前方、后方、侧方造成全面的战场，在各方面分散敌人的兵力，从各方面消耗敌人的力量，这样来争取时间，逐渐改变敌我总的优劣形势，争取抗战力量逐渐转到优势，到了那时，就是我们最后战胜敌人的日子了。

（三）中国人口虽多，但缺乏组织性，这个弱点是应该估计到的。但是一方面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不仅强占我们的国土，而其穷凶极恶的野蛮政策且欲灭亡我们的种族，这就逼使我全国人民不分党派、阶级，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到底的方针。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今天的中国不但和阿比西尼亚不相同，也和过去中国一切历史时期不相同了，这就是说，今天中国已处于历史上最进步的时代。全国人民的觉悟正在提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巩固与发展起来，政府、军队与民运工作正在加强起来，人力、物力、财力都可以源源发动，无组织的人民可以变得有组织。因此，我们不但以现时力量能够长期支持战争，即令日寇还有可能占去我们一些领土，甚至占去我国大部分领土，我们还是能够争取最后胜利的。中国是全民的抗战，不但内线的人民正在组织起来进行抗战，而且敌军占领区域内的人民也在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战，真正汉奸托派“认贼作父”的人终归只占最少数，誓死不当亡国奴的人无疑地占了绝对大多数，以此抗敌，何敌不摧，最后胜利谁能说不是必然的？

（四）日本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因此不但引起国内的阶级对立，中国的民族对立，而且引起广大的国际集团和它对立。中国的战争则是进步的正义的，因此不但能够团结国内各阶层各党派统一

对敌，而且能够取得敌国人民的同情与广大国际的同情。这又是敌人必败中国必胜的重要条件。

整个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在上述这些条件之下进行的。抗日的游击战争，同样地根据这些条件，能够配合正规军争取自己的胜利，一切从事游击战争热爱祖国的人们，要有这种坚强的自信心。

第五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问题

这里要答复四个问题：游击队如何产生的？如何编制的？如何装备的？成分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游击战争武装部队的组织问题，是没有游击战争经验的人们所不明白而亟待解决的，否则就不知怎样开始干。下面逐一说明这些问题：

游击队如何产生的

游击队的产生，可能有下列许多形式：直接从民众中产生，由正规军派出临时的支队，由正规军派出永久的支队，由正规军的支队与民众的游击队混合编成，由地方民团化为游击队，由敌军叛变过来化为游击队及由土匪队伍化为游击队等等。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成分，无疑地将包括这样许多方面的来源。

第一种形式的游击队，是从民众中直接产生的，这是一种基本的形式。敌军来到，压迫屠杀，民众中的先进分子，就号召民众作抗日斗争，集合其中的积极勇敢分子，找到几支破枪，杂以梭镖鸟铳，就是一支游击队。国家已有法令号召民众组织游击队为保卫家

乡而斗争，地方政府起而提倡，这种组织必甚顺和。就是某些地方政府不争气，首先跑了，民众中的先进分子，凭借其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一声号召，大众响应，仍能组织很多的游击队。这种情况下，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大都落在青年学生们的肩上。若干教职员，乃至大学教授、文化名人、在乡军人、科学家、艺术家、自由职业者，也有挺身而出，愿流自己最后一滴血的。近来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浙江、安徽、江苏等省广泛发展的游击战争，属于民间爱国志士倡导而成的，为数甚多，就是最好的证据。这种游击队，越多越好，每区每乡都可组织许多小游击队，汇合起来，就成了大游击队。有人说，我是老百姓，我是学生，只会咬文，不会讲武，这是不对的。老百姓与军人，其间并无万丈深沟，只要你肯干，你就顷刻之间成了军人。你是老百姓不要紧，会咬文更好，组织起来，就是军队，拿起枪来，就是军人。游击战争就是军事大学，试打几仗，就是能征善战的将军，有些名曰“军人”的，还不及你呢！所以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来源，毫无疑义的是民间直接产生的游击队。

第二种形式的游击队是正规军派出支队临时组成的，例如抗战以来许多军队都有从军或师或旅派出支队临时执行游击任务的。或竟以正规军之整个兵团，应任务与情况之需要，暂时地分散去进行游击战争，例如八路军在华北，除了集中作运动战之时间以外，就都是分散作游击战的。这种形式的游击队是需要的，因为不但在作战任务上为了配合运动战，需要正规军派出支队作游击战；而且由于游击战的风气未开，需要从正规军派出支队，甚或以某些正规兵团整个分散去暂时地进行游击战。这种情况下，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常发生正规军不会打游击战的困难，因此，这种形式的游击队

的领导者们，必须注意改变自己的种种条件，例如官兵的自动性、良好的纪律、学会游击战术等，都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种游击队带着临时性质，故游击队领导者们须注意扶助人民组织地方游击队，使自己走后当地仍能支持游击战争。

第三种形式的游击队，是正规军派出长期性的游击支队，这种派出的支队并不准备归还建制，位于敌人后方之某一地区，成为该区游击战争的领导骨干。例如以五台山为中心之晋、冀、察三省边界地区八路军派出之正规兵团，成为坚持该区游击战争之骨干，以它为中心，繁殖了很多的地方游击队，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一切有与后方隔绝之虞的地区，都应采取此种办法，这是制敌死命的战略计划之一，万万不可忽略。正规军撤退时因某种原因不及随军退出之部队，即留在敌人后方打游击，也属于这一类，淞沪一带颇有这种游击队，他们虽离开了军队主力，仍能独立自主地打游击。

第四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正规军派出小部队，与地方游击队混合编成。例如由正规军派出一班人，或一排人，或一连人，插入于地方游击队起领导作用，使地方游击队迅速地有战斗力；或派出有经验的军事政治干部于地方游击队，成为其领导的骨干，也能起很大的作用。这些办法是很好的，能使游击战争迅速发展，五台山区域的游击队，采用这种办法的很多。

第五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民团、警察与保安队等转化而成的，华北各省，已有许多，任何地方，都应如此。政府已有命令，地方人员不准擅离战区，县长、保安队长、公安局长，都应服从这个命令，不得率队后退，留在当地，坚持抗战。军队长官也不得收编民团、警察与保安队，只图扩充自己，置地方于不顾，韩复榘在山东之所为，应引为深戒。这种民团警察与保安队变成的游击队，

其中有许多往往是没有好的纪律的，必须加以改进；必须吸收民众中间的勇敢积极分子，充实其战斗力；必须吸收爱国青年，充当其干部，才能坚持游击，不致崩溃逃散。红枪会等旧式半军事团体转化而成的游击队，也属于这一类。

第六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敌军叛变过来的部队组织而成，被日寇利用之伪军，常有这种可能，我们应该多方进行宣传接洽工作，组织其叛变，待其实行叛变时，则好好接纳而收编之。在取得其领导者的同意，得到其积极分子的拥护之后，从政治上组织上加以必要的改造。弄得好，能够化为有用的游击队。对于这种部队，加强其政治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七种形式的游击队，是由土匪部队改造而成。这虽是困难的事情，然而必须耐心去做，免为敌军利用。许多土匪常常冒称抗日游击队，只要有可能性就须从政治上改造他们。许多半农民性的匪部，是容易改造的。

各种来源不同的游击队都是需要的，汇合起来就成了游击战争的大海。古人有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注意组成与接纳任何形式、任何来源的游击队，能使抗日游击战争起到它在战略上的伟大作用，这是爱国志士们不应忽略的。

游击队如何编制的

许多人想干游击战争，但不知游击队的组织法，对于没有军事经验的广大民众及青年学生来说，这确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有军事经验的人，也不见得人人懂得游击队的组织法，因为他们没有游

击战争的经验，又因为所谓“游击队的编制”，包括整个游击区的全部军事组织，并非限于单个游击部队的编制。现以处于敌人后方的一个大游击区为例，来说明编制法。小游击区即等于大游击区的一个分区，依其分区的编制法。单个的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则依大小游击区中的某种形式之游击部队或兵团。这是游击战争的整个组织制度，作为我们的意见，提供国人参考。

一个包括多数县的大游击区，应组织成为一个军区，设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为全区游击战争之最高领导首长，在他们领导之下，设各种必需的工作机关，如司令部与政治部，司令部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医等处，以参谋长秉承首长统摄之；政治部下设宣传、组织、敌军、民运、总务等处，以政治部主任秉承政治委员统摄之。全军区内划为若干军分区，依地形、敌情及游击战争发展情况，或二三县，或五六县，划为一个军分区，设军分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指挥全军分区之游击战争；在他们领导之下，设分区司令部与政治部，两部下依游击部队之多寡，设置必要的分工工作，机关名称可全如军区，唯人员则减少，只要能工作就行了。

为了统一各个不同来源的游击部队的指挥，并为了协调军事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军区与军分区均可以组织一个七人至九人的军事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区军事政治的讨论建议机关，委员是从各游击队及地方行政推出，以军区领导者中最有威信的一人为主任。

全军区人民原则上都应武装起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脱离生产的抗日游击队，一种是不脱离生产的半军事性质的抗日自卫军。

脱离生产的抗日游击队，大体上又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相当于一分队（等于排）或一中队（等于连）的小游击队，大体上每

区有一个，每县有三四个或五六个。各区之游击队，依其情况，可以越区乃至越县游击，但基本上属于那一区。

第二种是两中队、三中队或四中队合组的基干游击队，每县有一个，称为某县游击大队，可以越县游击，但基本上属于那一县。游击到某一区时，即与该区之小游击队临时配合行动，不但资其战斗力，还资其敌情、地形、人情、风俗之熟习。

第三种是两个大队或三个大队或多至四个大队组成的游击支队。力量大时，还可以将两个三个至四个游击支队，组成一个游击纵队。这种支队及纵队，其性质为“县游击兵团”，与大队以下之“游击部队”区别开来，属于军分区司令所直辖，人员不足及有其他某种必要时，军分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可以兼任这种游击兵团的首长。军分区游击兵团之主力，依情况之需要受军区首长之调动，临时地离开本分区，与别分区的游击兵团或游击部队协同作战，但基本上是属于本分区的。

编制上，三种形式的游击队，允许各有某些特点。例如一分队一中队的小游击队，可以少至九人、多至十一人为一小队，等于一班，设小队长、小队副，全小队可以只有二三支或四五支步枪，余是土造枪、鸟枪、梭镖、大刀之属。两小队、三小队或四小队为一分队，等于排，设分队长、分队副。独立行动的，设政治指导员，协助分队长做政治工作；非独立的不设。全队可以只有七八支或十几支步枪，余是鸟枪等类。二分队、三分队或四分队为一中队，设中队长、中队副、中队政治指导员。上述这种小游击队，受区的军事机关领导，但同时受县军事机关之指挥调遣。

县之基干游击队之编制，较之区的小游击队应该稍为谨严一些，武器尽可能充实一些，干部应是全县的优秀分子。其编成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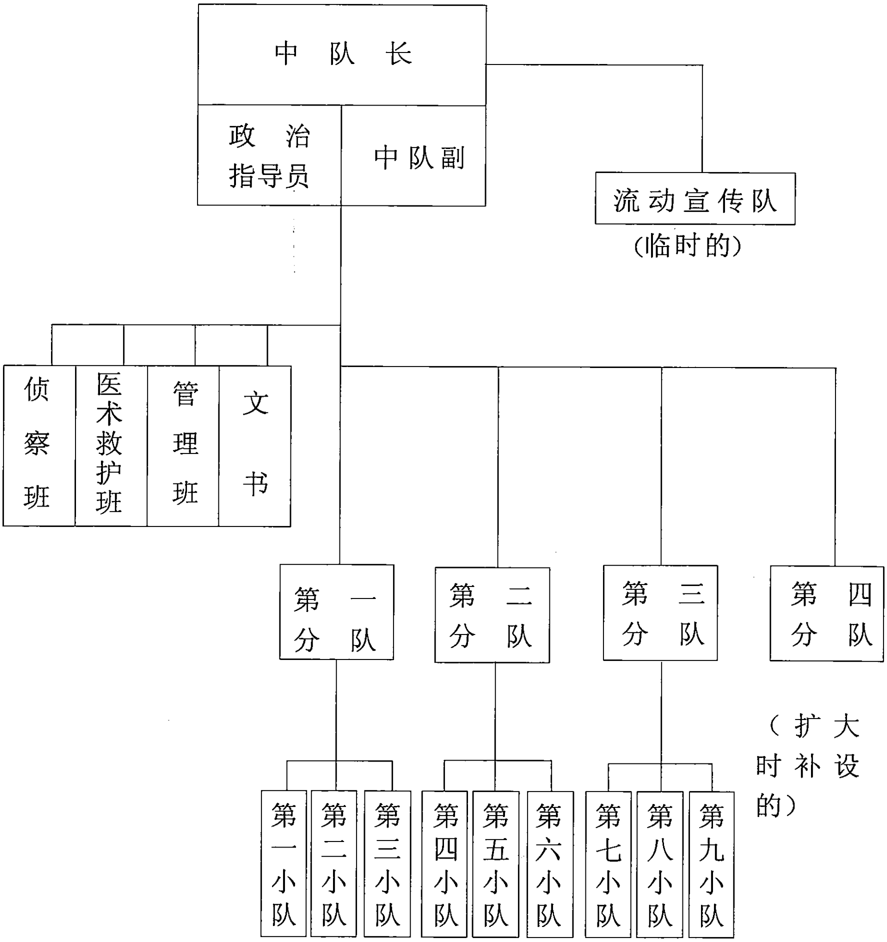
是将各小游击队集中起来的，被集中了的区，应为之留下一部分人枪，使之作为基础发展新的游击队，为保卫该区之用，决不可全部集中，不顾各区。如果县的原有武装部队和保安队、民团、警察之类是存在的，则应以此种队伍为中心去编成，而不应多编各区的游击队，特别是敌情严重之区，不应随便地编掉它的。这种基干游击队约等于营，称为游击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及大队政治委员。

支队以上之游击兵团，其编制更应谨严一些，开始不谨严的状态，应逐渐使之改进，人员武器比起县的基干游击队来也应好些。大体上十人至十三人为一小队，设小队长、小队副。三小队为一分队，设分队长、分队副。三分队为一中队，设中队长、中队副、中队政治指导员。三中队为一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大队政治委员。三大队为一支队，约等于团，设支队长、副支队长、支队政治委员。如有两个以上支队，可编为纵队，设纵队长、副纵队长、纵队政治委员。

在北方，应该组织骑兵游击队，军区有由两个至四个中队组成的骑兵支队，分区有由两个至五个分队组成的骑兵大队，县有骑兵中队（等于步兵排的人枪数加乘马）或分队（等于步兵班的人枪数加乘马），多则不论。

以上从小的游击部队到大的游击兵团，都是脱离生产的，一切给养等事，由公家统筹办理。其详细编制，列表于后。

第一表：一、独立的游击中队（相当于连）的编制系统


中队长
政治指导员
中队副
流动宣传队
(临时的)
侦察班
医术救护班
管理班
文书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第三分队
第四分队
（扩大时补设的）
第一小队
第二小队
第三小队
第四小队
第五小队
第六小队
第七小队
第八小队
第九小队

（每小队九至十一人，如人枪不足时，可不设第三分队，或暂设一直属小队）

二、独立游击中队（相当于连）的人员武器

职　别	人　员	武　器	附　注
中队(连)长	1	1	1

政治指导员		1	1	2
中队（连）副		1	1	2
中队（连）部文书		1	0	
管理班	班长	1	1	
	司号员	1	1	
	通讯员	2～4	1～4	
	勤务员	1～2	0	
	理发员	1～2	0	
	炊事员	10	0	
救护班	医生	1	0	
	看护班长	1	0	
	看护员	3～5	0	
侦察班	班长	1	1	
	侦察员	6～12	6～12	
分队（排）长		3（少至2，多至4）	3	
小队（班）长		9（少至6，多至12）	9	
队员		72（少至48，多至120）	72	
合计		115～128	97～106	

备考：一、流动宣传组从队员中选任，不脱离原职务，在非作战时间内进行民运工作。

二、救护班如无人员可不设，如有较少的二三个看护，则可归在管理班内管理。

三、理发员没有时即缺额，炊事员不足时亦缺之，派队员轮流烧饭。

四、武器每个战斗员都要有一件，每班至少要有二十三支步枪，其余鸟枪长矛大刀都可。枪的分配不要各排各班绝对平均，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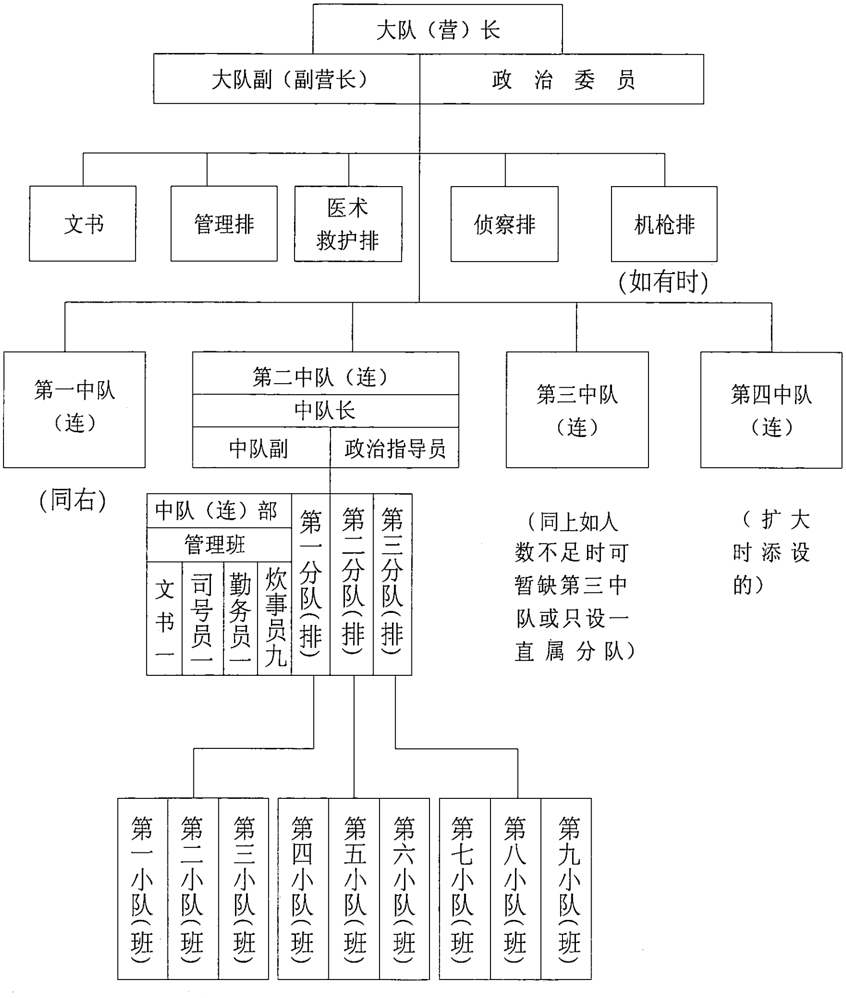
使有一个排枪多些，其余两个排稍微少些，以便分别担任不同的战斗任务。

五、中队人数，多至一百八十人，分十二班，每班十一人；少至八十二人，分为六班，每班九人。

附注：1. 短枪。

2. 最好有短枪。

第二表：一、独立游击大队（相当于营）的编制系统


大队（营）长
大队副（副营长）
政　治　委　员
文书
管理排
医术救护排
侦察排
机枪排
(如有时)
第一中队（连）
(同右)
第二中队（连）
中队长
中队副
政治指导员
第三中队（连）
（同上如人数不足时可暂缺第三中队或只设一直属分队）
第四中队（连）
（扩大时添设的）
中队（连）部
管理班
文书一
司号员一
勤务员一
炊事员九
第一分队(排)
第二分队(排)
第三分队(排)
第一小队(班)
第二小队(班)
第三小队(班)
第四小队(班)
第五小队(班)
第六小队(班)
第七小队(班)
第八小队(班)
第九小队(班)
（每班九人至十二人）

二、独立游击大队（相当于营）的人员武器

职别			人数	武器	附注
大队(营)长			1	1	1
政治委员			1	1	1
大队(营)副			1	1	1
大队（营）部	文书		1～2	0	
	管理排	排长	1	1	
		司号员	1～2	1～2	2
		通讯班	7～13	7～13	2
		勤务员	1～2	0	
		理发员	2～4	0	
		饲养员	1	0	
		炊事员	5～12	0	
	救护排	医生	0～1	0	
		担架员	0～12	0	
		看护员	3～5	0	
	侦察排	排长	1	0	
		侦察员	21～52	21～52	3
	机枪排		?	?	
大部队合计			46～110	33～71	4
第一中队			99～126	88～115	
第二中队			99～126	88～115	
第三中队			99～126	88～115	
全大队合计			343～488	297～416	
两个中队的最小数目			244	209	
四个中队的最大数目			614	531	

备考：一、由二至三个中队编成的游击大队，扩大到四个中队的最多数目时，依据当时情况的要求与许可，即可改变编制，由大队扩大成支队（详见第三表）。

二、侦察排的组织设一排长，排由两个班至四个班编成之。至少要有一个班的便衣队员。能有骑兵时配一班骑兵更好。

三、如有机关枪时，不论哪一种机关枪，都可以成立机枪班或机枪排，更多时则可分到各连上去。一般说来，轻机关枪每挺由五人至七人使用，重机关枪每挺有七人至九人使用。

四、担架队如无人员时，可不设立。作战时可发动各连炊事员临时充当，并请当地人民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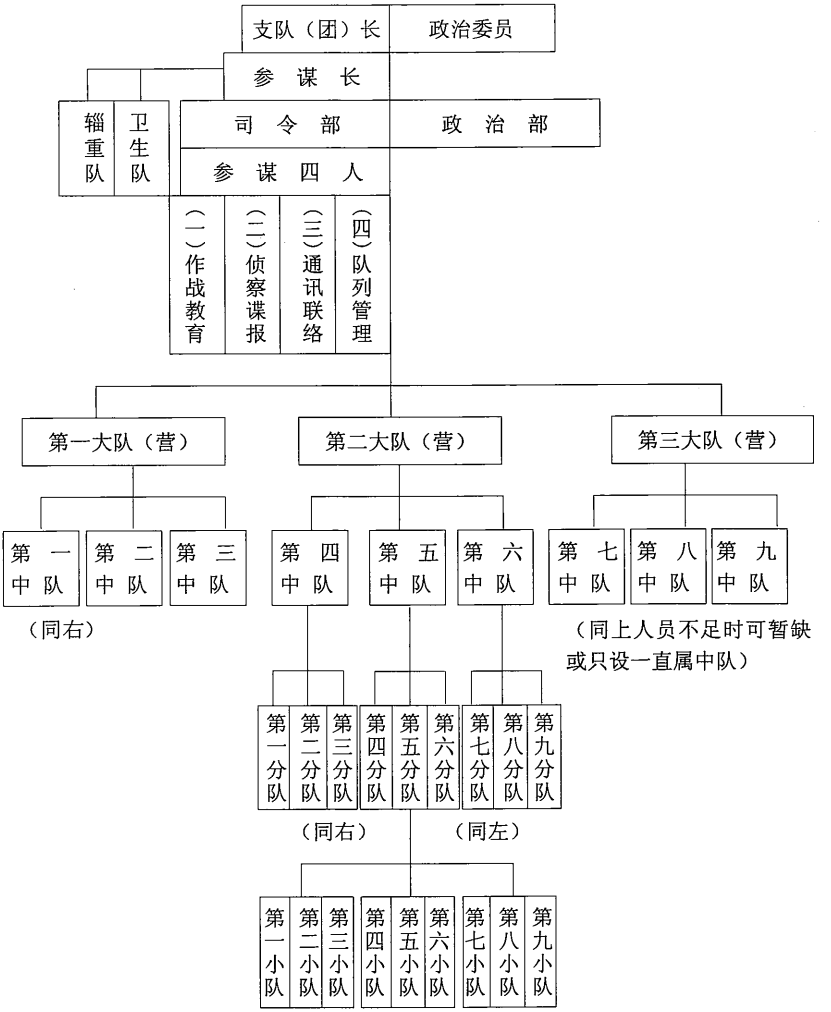
五、武器，每个中队至少要有二三十支步枪，其余则配以鸟枪、梭镖、大刀、土炮。

附注：1. 短枪。

2. 最好是马枪。

3. 应有一些短枪。

第三表：一、独立游击支队（或称独立团）的编制系统


支队（团）长
政治委员
参 谋 长
辎重队
卫生队
司 令 部
政 治 部
参 谋 四 人
（一）作战教育
（二）侦察谍报
（三）通讯联络
（四）队列管理
第一大队（营）
第二大队（营）
第三大队（营）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第四中队
第五中队
第六中队
第七中队
第八中队
第九中队
（同右）
（同上人员不足时可暂缺或只设一直属中队）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第三分队
第四分队
第五分队
第六分队
第七分队
第八分队
第九分队
（同右）
（同左）
第一小队
第二小队
第三小队
第四小队
第五小队
第六小队
第七小队
第八小队
第九小队

二、独立游击支队（或称独立团）的人员武器

职　别	人　数	武　器	附　注
支队长	1	1	1

政治委员			1	1	1
参谋长			1	1	1
司令部	参谋长	第一参谋	1	1	1
		干部训练班	?	0	
		第二参谋	1	1	1
		侦察排	32～42	32～42	2
		第三参谋	1	1	1
		通信排	32～42	32～42	3
		第四参谋	1	1	1
		管理排	13～16	1	1
		文书	1	0	
	辎重队	队长	1	1	1
		会计员	1	0	
		出纳员	1	1	1
		军实员	1	0	
		运输员	4～8	0	
	卫生队	队长	1	0	
		医生	1～2	0	
		看护员	10～18	0	
		担架排	8～20	0	
支队部合计			113～170	74～94	
第一大队			383～473		

第二大队	383～473		
第三大队	383～473		
全支队合计	1262～1589		

备考：一、大队以下的编制，参看第一、二表，但各大队与中队均不设侦察部队与卫生机关，大队设政委。

二、每班人数可由九人到十三人，五响或单响的步马枪，每营最好有一百支以上。

三、钱担子、药担子，可根据实际情形增加。担架员缺少时可不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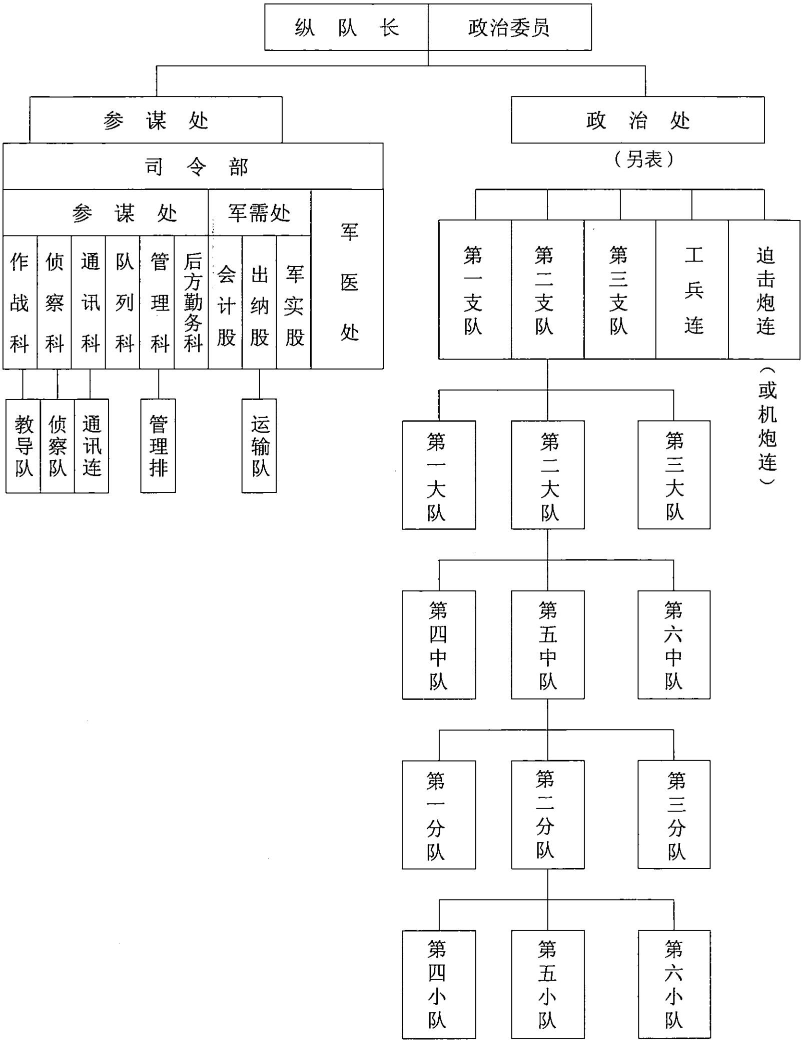
四、表内各大队最少的数（三百八十三）系以每中队一百二十一人、大队部二十一人计算的。最多人数（四百七十三）则是以大队部包有侦察排与救护排计算的。

附注：1. 短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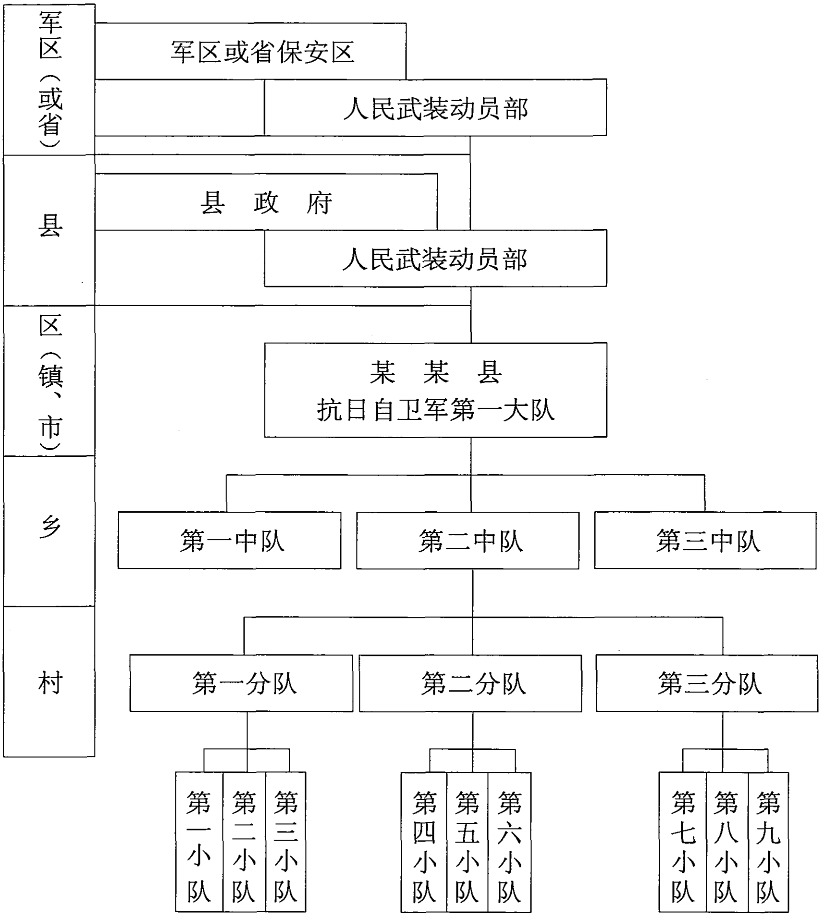
2. 一部短枪与小刀。

3. 马枪，可能时配一支驳壳枪。

第四表：独立游击纵队（或称独立师）编制系统


纵队长
政治委员
参谋处
司令部
参谋处
军需处
军医处
作战科
侦察科
通讯科
队列科
管理科
后方勤务科
会计股
出纳股
军实股
教导队
侦察队
通讯连
管理排
运输队
政治处
（另表）
第一支队
第二支队
第三支队
工兵连
迫击炮连
（或机炮连）
第一大队
第二大队
第三大队
第四中队
第五中队
第六中队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第三分队
第四小队
第五小队
第六小队

第五表：抗日自卫军组织系统


军区（或省）
县
区（镇、市）
乡
村
军区或省保安区
人民武装动员部
县　政　府
人民武装动员部
某　某　县
抗日自卫军第一大队
第一中队
第二中队
第三中队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第三分队
第一小队
第二小队
第三小队
第四小队
第五小队
第六小队
第七小队
第八小队
第九小队

备考：抗日自卫军组织法

一、成分——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青年成年均组织于抗日自卫军内。不分男女性别（但女子单独编成）、阶级成分、宗教信仰，凡属抗日人民，身体健全者，都可参加，但以自愿为原则。

二、任务——担任地方戒严，坚壁清野，侦察敌情，捉拿汉奸，帮助抗日正规军及游击队运输军实，搬送伤兵，打扫战场，以至配合作战等事。

三、编制——分小队、分队、中队、大队四级。村为最低单位，按村内自愿参加之人数多少，设小队及分队，十人至十二人编为一小队。二个以上小队编为一分队。乡设中队，由二个以上分队编成。区设大队，由二个以上中队编成。大队为最高单位。女子在乡之中队内单独编成小队及分队，训练与工作均单独实施。

四、干部——小队设小队长、小队副；分队设分队长、分队副；中队设中队长、中队副；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这些干部，由队员选举，上级加委，不脱离生产。

五、参战组织——以自卫军为基础，依自愿原则，动员人民分别加入下列的参战组织。

（一）运输队——运输军实；

（二）担架队——搬送伤员；

（三）交通队——送信带路；

（四）侦探队——侦探敌情；

（五）慰劳队——慰劳作战部队与伤病人员；

（六）看护队——看护病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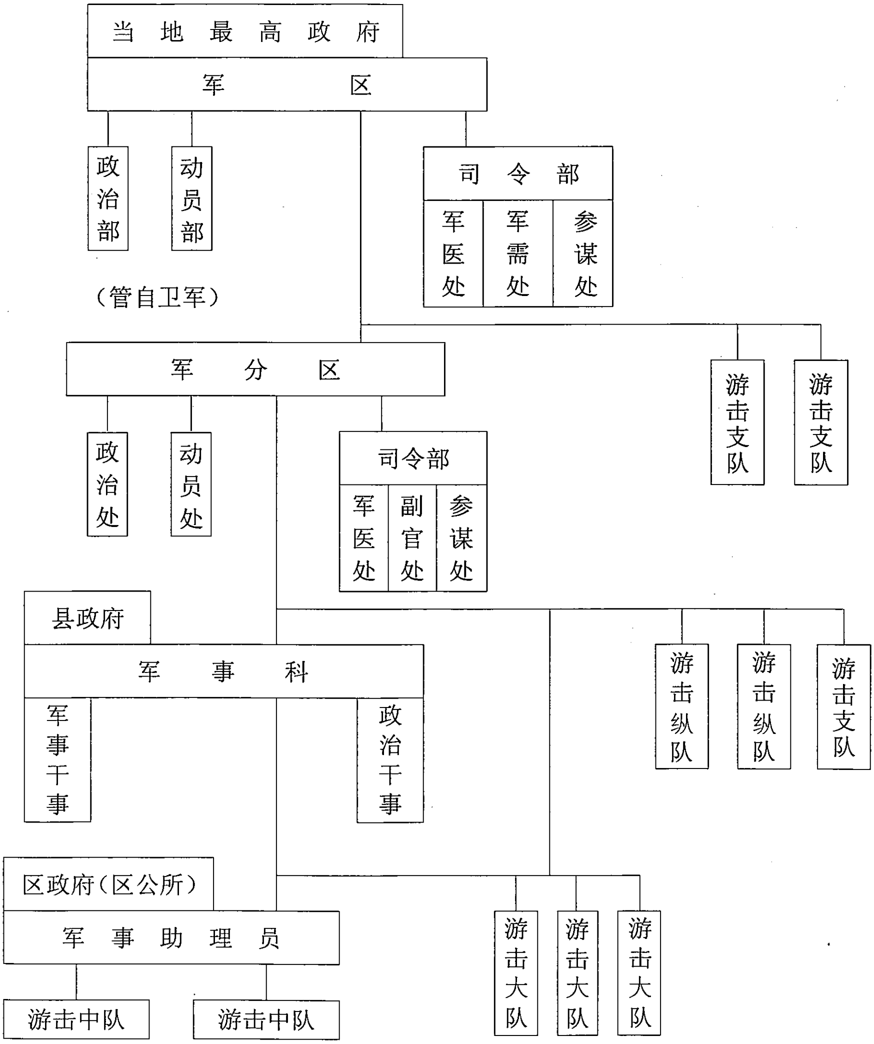
前四种应动员自卫军担任，但十八岁以下的不加入运输队、担架队；后两种妇女儿童老人均可参加。

六、模范自卫军——模范自卫军是由自卫军过渡到游击队或正规军去敌后备军的阶段。编制与自卫军同。经过充分的宣传鼓动之后，依自愿原则，挑选青年壮年男子，身体强壮、觉悟较高者编成，加以较自卫军进一步的军事政治训练。开始可在一个区或一县内号召建立一个中队至一个大队，依其可能及需要逐渐扩大之。一遇需要，就可转变为游击队，或补充正规军。

七、抗日青年队——可以将十六至二十一岁之青年单独编为抗

日青年队，此处系依简便原则统一编制于自卫军之内。

第六表：军区组织编制系统


当地最高政府
军区
政治部
动员部
（管自卫军）
司令部
军医处
军需处
参谋处
游击支队
游击支队
军分区
政治处
动员处
司令部
军医处
副官处
参谋处
游击纵队
游击纵队
游击支队
县政府
军事科
军事干事
政治干事
区政府（区公所）
军事助理员
游击中队
游击中队
游击大队
游击大队
游击大队

抗日自卫军的制度，是抗日战争中使全体人民军事化的一种优良制度，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之青年壮年男女，依自愿原则组织于抗日自卫军之内，受某种程度的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训练，成为半军事性质的人民初级武装组织，担负他们本乡村的放哨警戒、侦

察敌情、捉拿汉奸、坚壁清野、扰乱敌人等任务。敌人进攻时，可以动员他们在适当地点，采用施放土枪土炮、布为疑阵、虚张声势、牵制敌后的办法，以配合游击队作战。同时又可动员其中组织好了的担架队去抬伤兵，运输队去搬粮食，慰劳队去慰问游击队员，送茶水稀饭给游击队员吃。地方有了他们，汉奸不易潜藏，土匪不易扰乱；游击队有了他们，得到了大大的助力；正规军有了他们，得到兵力的补充（自卫军制度是到达征兵制的过渡，模范自卫军的组织则可直接补充正规军），真正是一个顶好的人民抗日制度。陕西、湖南等省，已经开始自卫军的组织，晋、绥两省也有过国民军制度，以及各省原来的壮丁队，均有我们这里所说的半军事组织之意，不过未依自愿原则，没有发动人民的自动性，编制又似乎不大适宜，更没有普遍到一切青年壮年男女人员，故收效不大，自以采用普遍的新编制的自卫军制度为合宜。一切加入自卫军的人员，原则上不脱离生产，在乡村勤务时，亦原则上自己供给，只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例如征调他们担任长途与较长时间的运输工作时，则应由政府供给给养。因此，在训练与动员时，依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发动人民自觉性，决不应该用强力对待，否则不能收效，这是要深切注意的。他们的武器是刀、矛、木棍、土枪、土炮之属，每人都要有一件。

在一切敌到地方或敌可能到之地方，在自卫军中组织游击组，依居住接近，少至三人多至十人，均可为一组，有较好的武器如单响枪、九响枪乃至五响枪，担任袭击敌人，仍不脱离生产。把这个制度说在“游击队的编制”里面仅为叙述便利之故，不是说这个制度只能用于战区或游击区，全国任何一个省内都可以且应该实行这个制度。不过在后方各省组织自卫军，其目的主要为加强人民的军

事政治教育，巩固后方治安，有组织有教育地动员人民补充正规军，而没有侦察敌情、坚壁清野、配合作战等任务罢了。自卫军的编制如第五表。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研究军事理论。

为了统辖整个游击地区的抗日武装组织，不论是脱离生产的游击队，还是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计划并实行全盘的抗日游击战争，我们认为有采用军区制度之必要。军区组织编制的系统如第六表。

游击队如何装备的

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应知游击队是轻装袭击队，因此游击队的装备以“轻便”为原则，累赘是深忌的。第二，游击队的装备须

按游击队的情况与任务而定。例如低级的游击队，装备当然要差些；高级的游击兵团，装备应好些；没有铁道破坏任务的游击队与有此种任务的游击队，所需的装备也不同。第三，游击队的装备不能按照主观之所需，而需按事实的可能，是逐渐补充的，不是一下子整备的。这些都是应该注意的地方。

说到游击队装备的物品，包括武器、弹药、被服、通讯器材、医疗器材、运输工具、宣传器材及其他等项。这些东西都应按照上述的原则去征取、分配与补充。

游击队的武器、弹药，虽然常是困难的问题，特别在开始组织的时候更不容易解决，但总是能够解决的。民众组织的游击队，除了特殊的情形之外，起初多是九响枪、土造枪、鸟枪、梭镖、长矛、大刀、土炮、松树炮、土地雷等低级的武器与部分的新式步枪相结合，要待长期作战中从敌人夺取及从民间收集，逐渐补充自己，并增加其种类，弹药的来源尤须依赖敌人。在这个问题上，袭击敌之运输队是最方便的，因为袭击成功，敌之运输队恰好就做了我之运输队。在分配时，火器（步枪等）与白刃（刀矛等），应在小队里面配合使用。每个游击区，要设一个修械所，除修理武器外，并须逐渐使之具备制造次等步枪、次等子弹、手榴弹、刺刀等类之能力，使游击队得到某些补充。但不可过分依赖此种制造，游击队武器弹药之补充，主要依靠自己的坚决作战，从敌人手中解决问题，这是武器弹药乃至一切装备的最主要的来源。为了破坏敌之铁道、桥梁、车站，必须多方取得爆破的材料与工具，多方征集并训练爆破的人才，并尽可能组织专门的爆破部队，附属于游击兵团之内。

被服问题，每人每年至少要两套夏衣，一套冬衣，两顶帽子，一双裹腿，一条毯子，一个布制的干粮袋，在北方还要一件大衣。

解决的方法，一般不能依赖敌人，除了袭击敌之被服运输队之外，剥取俘虏官兵衣服的事是应该禁止的。为了顾到游击队的纪律，政府与游击区军事领导机关应该统筹发给。可以采用没收汉奸与向富有者募集的方法，但须注意不要弄错与不破坏统一战线政策。低级的游击队，不必有整齐的军服。

电话器材与无线电器材，低级的游击部队可以不要，但高级的游击兵团是应该有的，这些东西之取得，除了缴获敌人的之外，正规兵团应给以帮助。

游击队中，尤其在游击根据地中，较好的医疗设备是不可少的。除了多方征取医务人员之外，药品的取得最为重要，部分的可以取之于敌人，主要的依靠募捐购置。西药难得时，土药也可用。

游击队的运输工具问题，是在北方发生的，这里一般不用肩挑，需要配备最低数目的骡马。小游击队可以减少，甚至不要；游击兵团就需规定一定的骡马数目。干部的乘马，中队（连）长以上凡有重要职务的，应准每人一匹，有时可两人共一匹，无重要职务的不给。

宣传器材是重要的，例如每个较大的游击部队，都应具备油印机、誊写版、纸张等，以便印刷传单布告之类；又要有宣传队员使用的粉罐子、粗笔等，为写大字标语之用。在一个较大与较巩固的游击区内，最好能有石印机，能备简单的铅印机则更好。为了印刷内部的训练教育材料，油印机石印机等也是十分需要的。

此外如军用地图、望远镜、指北针等都是必须之物，一个能干的游击队，最好能有这些东西。

为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意义，国家最高军事机关及各战区司令官，应尽可能地设法补充各个重要游击区中为他们自己

所不能解决而又特别需要的东西。虽然如此，但仍须重复地说，游击队的装备问题主要依靠自己从斗争中解决，依赖上级的心理过重，势将减弱其坚决斗争的精神。

游击队的成分问题

这里讲的成分问题，是说的游击队的干部和兵员。

每个游击队都要同敌人进行长期与残酷的战争，故其干部应是勇敢与积极的分子，十分地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除这个基本条件之外，还须具备：（一）艰苦奋斗的作风，为部属与人民的模范；（二）接近民众，和民众打成一片；（三）善于团结干部和兵员，使内部融洽统一；（四）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游击队的政治路线不弄错；（五）注意战略战术，使游击队多打胜仗。一个游击队能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它便是不能战败的队伍。不是每个干部一开始就要求他们具备一切条件，而是要多找本质上优良的干部，在游击战争中学习，逐渐锻炼起来，使之符合于这些条件。这种优良的本质，就是“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有了这一点，什么条件都可能获得，否则一切无从说起，选择干部时应加注意。此外，游击队的干部必须多数是本地人，因为他们联系民众，情况也较外来人熟悉。开始本地干部不多的状态，必须注意培养，用开训练班等办法使之逐渐增多，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的不融洽现象，必须注意消除之。

游击队员以容纳自愿的抗日分子为原则，强迫加入的办法是错误的。只要自愿抗日，可以不拘其社会成分，但须选择勇敢坚决的分子，方能经得起最大的困难，坚持长期的战争。惯于破坏纪律经

过教育而无改变者，不能长时间保留在部队里面，大量收留流氓兵痞的办法是不对的。有鸦片嗜好的必须戒除，不能戒除者也不应收留。保持队员成分的纯洁是游击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在民族的决死斗争中，民族敌人必然会利用一些民族意识极其薄弱的分子，经过他们的训练，派遣到游击区附近，乘机混入游击队，进行破坏的阴谋。游击队的领导者，应在依靠民众的基础上，从不断的教育中提高全体队员的民族觉悟与民族警觉性，防止破坏分子的混入，将已经混入的破坏者检举出来，这就是肃清汉奸的工作。对于汉奸分子及已经受到汉奸分子影响的队员，必须有分别地给予处置，让他们自由存在是危险的。在处置时，必须发动全体队员对于那些有真凭实据的汉奸分子发生仇视心理，用以提高队员的警觉性。如果在干部中存在着这种分子，对他们的处置更要慎重些与有方法些。在防止与肃清破坏分子时，不能离开在地方人民中的锄奸运动，因为地方上暗藏着汉奸分子，是部队发生汉奸分子的根源。

对于伪军的反正与土匪的投诚者，不论是个别的或整批的，都应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予以优待。但把他们实行收编时，必须加以考察，分清楚其中是有抗日的诚意者，或是别有企图者，以便分别处理之。

第六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问题

颇为繁复的组织问题已在上面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原则与军事原则的问题。

在第一章中已经提起游击战争的几个基本原则，其中说到游击

队须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政治纲领，须依靠民众，须有组织性或纪律性，这些都是游击战争的政治指导原则。这些原则的实行表现于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故政治工作一般被称为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也就是游击队的生命线。

首先，抗日游击队（一切军队皆然）的政治工作须使“抗日”这个政治目的深入与巩固于一切军事政治指挥员之中，经过他们又使深入与巩固于一切战斗员中。不要以为既在抗日又名抗日游击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实则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的。因为敌人的诱惑是存在的，游击队的困难是存在的，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民族觉悟不深刻的分子可能动摇以至叛变。没有普遍深入的民族教育，不使人人懂得“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这个鲜明确定的政治目的，不使人人懂得为什么打仗，是不能使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巩固其抗战到底的决心的。这样鲜明确定的政治目的，须经过游击队教育游击区域的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的民族觉悟程度随战争的持久而日益深刻，游击队的胜利才有保障。

执行对游击队及人民关于政治目的的教育时，达到这个目的的具体的政治纲领之教育，是伴随而来必不可少的。现在中国国民党已发布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亟应在一切游击部队与游击区人民中广为宣传解释，以求“抗战之必胜，建国之必成”。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政治纲领，也就无从更好地团结干部团结队员与团结人民。

这种政治目的与政治纲领之研究与了解，也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目的与纲领的研究与了解，对于游击队（乃至一切军队）的军事干部尤为重要。往往有这样的军事人员，说是“不管政治，只管军事”，对于这些不明政治与军事关系之单纯军事头脑

的军官们，引导其了解二者的正确关系，是十分必要的。一切军事都是达到政治目的之手段，军事本身也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固然军事区别于政治，有它的特殊性，但不能割离于政治，把它孤立化起来。

在今天说来，因为世界已处于进化的新时代，今天的战争已经接近于最后的战争，这一点也是应该明了的。人类大多数（包括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在内）已经从事或正在准备伟大的正义战，反抗世界上的侵略者与压迫者，这个战争不管将延长多少年，但其接近于历史上的最后战争则无疑。经过这一场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之后，人类将出现一个历史上所无的新时代，往后将再不见有战争。我们所从事的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就是这个人类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我们所求的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是这个新时代的新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正确的观点是单纯军事主义者所不能了解的，如果部队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单纯军事主义者或战争绝对论的人员，是必需向之作解释的。

政治工作，除了普遍深入的宣传解释与坚持上述那个总的政治路线，即政治目的与政治纲领，使之贯彻于一切军事政治工作，一切军事政治人员与一切地方民众之外，它本身有三项具体工作：即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对这三项工作的政治指导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与瓦解敌军。三项工作与三项原则之具体实施，详论之于《抗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中，这里只说一点概要。

革命军队是有纪律的，但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民主的。一切军队需要有内部的纪律，即下级服从上级，才能行动与作战，游击队亦然。但这种纪律须建设在一切部队成员的自觉性上，单纯的

强迫纪律是不能持久与有效的。革命军队因有公开的官兵的共同政治目的，也能建设自觉的纪律。游击队之纪律性较之正规军实际上要差些，然其要求自觉的纪律与能够建设自觉的纪律则一。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使一切部队成员自己觉悟为什么要战争与为什么要守纪律，才能把纪律提到高度，才能把纪律变为战斗力之组成部分，才能巩固内部的团结，而不是隔离官兵关系与上下关系的东西，如同强迫纪律实行的结果那样。基此出发，部队中应该废除打人与辱骂人的那种封建主义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是违反自觉纪律，降低战斗力，与破坏内部团结的东西，所谓军队中的民主制度，这是第一点。军队中的民主还表现在政治上的自由与官兵的同甘苦。革命的军队与游击队，给与一切部队成员以政治上的自由，不分官兵，凡关于民族解放的目的与方法，均不但容许而且提倡他们去思想、讨论、宣传、实做。这是军队中民主的第二点。官兵的生活不能太悬隔，尤其是游击队的官长大体上应过和士兵同一水平的生活，才能取得士兵的信仰，支持长期的艰苦的战争。绝对的平均主义是不正确的，但某种程度的生活上的平均，则是艰苦战争所要求的。这是军队中民主的第三点。凡此一切，都为达到“官兵一致”的目的，只有真正官兵一致真正内部团结的军队及游击队，才能具备最大的战斗力。

“官兵一致”的原则系就各个部队与各个兵团的上下关系而言，就许多部队与许多兵团的彼此关系而言，则为“我友一致”的原则。使全国几百万正规军与几千支游击队都能团结一致，在每个军队与每个游击队中间施行我军与友军正确关系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缺少了这种团结，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为达“军民一致”的目的，而施行的对地方居民的政治工

作，八路军有一套有名的办法，表现于他们所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中。三大纪律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人民一点东西，不许怀私害公。”八项注意是：“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坏东西要赔，不当女人洗澡，不搜俘虏腰包。”这些纪律与注意事项，包括了达到官兵一致与瓦解敌军之某些事项在内，不限于为着军民一致，但主要的是解决军民关系，为争取人民与军队的团结一致而设的。过去的红军行了十年，现在的八路军还是这样，颇可为各军所采用，一切游击队更须注意之。有人觉得游击队在敌人后方长期生存是难于设想的，这是不知军民关系的看法。民众如水，军队如鱼，哪有有水鱼难生存之理？纪律不良的军队与民众对立，自己把水弄枯竭了，那就当然不能生存，一切游击队都应切实懂得这个道理。

瓦解敌军之原则须表现之于宣传敌军，优待敌军俘虏，与医治敌军伤员等工作上面，否则事实上巩固了敌军的团结，与瓦解之目的适得其反。游击队与一切抗战军队要争取最后的胜利，这一条原则的实行是不可少的。

第七章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参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

1939

毛泽东在延安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1939年1月2日）

当抗日战争向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八路军同人出版这个《军政杂志》，其意义是明显的：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材料。

八路军在抗战一年半中，在蒋委员长与战区司令长官的领导之下，在朱彭[1]总副司令及各部各级长官与共产党员的领导之下，协同各部友军，进行了英勇的抗战，执行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坚持了与发展了华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许多在敌人后方的抗日根据地，缩小了敌人的占领地，钳制了大量的敌军，配合了正面主力军的抗战，延缓了敌人进攻西北的行动，兴奋了全国的人心，打破了认为“在敌后坚持抗战不可能”的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的错误观点，揭穿了中国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国内某些守旧顽固分子的无耻造谣。此外，八路军的一部——后方留守部队，亦保卫了河防，现正准备配合西北友军，为反对敌人进攻西北而战。八路军的这些成绩，是有目共睹的，除了托洛茨基反动派、汪精卫亲日派与某些守旧顽固分子之外，是一致承认的。这在敌人方面，不但不敢轻视八路军，而且日益增长其畏惧八路军的心理的事实表现上，也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得到充分的反证。八路军为保卫祖国而牺牲奋斗的忠诚与不可战胜的事实，是明显地摆在全国全世界的面前，除了反动派、亲日派与某些顽固分子之外，是无法否认的。中外新闻记者、观察家、旅行家的详尽的或粗略的记载，早已连篇累牍。一切无成见的人，都愿意研究八路军的经验，当然不是偶然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八路军之存在及其发展，对于中华民族是有益的还是无益的？如果有人提出这类问题的话，那我们只有一句话答复：认为“无益”者，必是事实上不愿意抗战胜利者，只是直接帮助敌人的胡说。

八路军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其中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中国军队在民族公敌面前，互相忘记了旧怨，而变为互相援助的亲密的朋友，这是中国决不会亡的基础。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孝。今天我们应该说：凡看见或听见中国军队不记旧怨而互相援助亲密团结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爱国。在这里，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物，应该引起一点反省吧！

八路军有无缺点呢？不但有，而且多。首先是技术装备不如敌人，也不如某些友军，这是八路军的基本缺点，也是中国军队的一般缺点。因此如何加强技术装备以便战胜敌人，成为八路军在抗战新阶段中的严重任务。第二，八路军以善于游击战与运动战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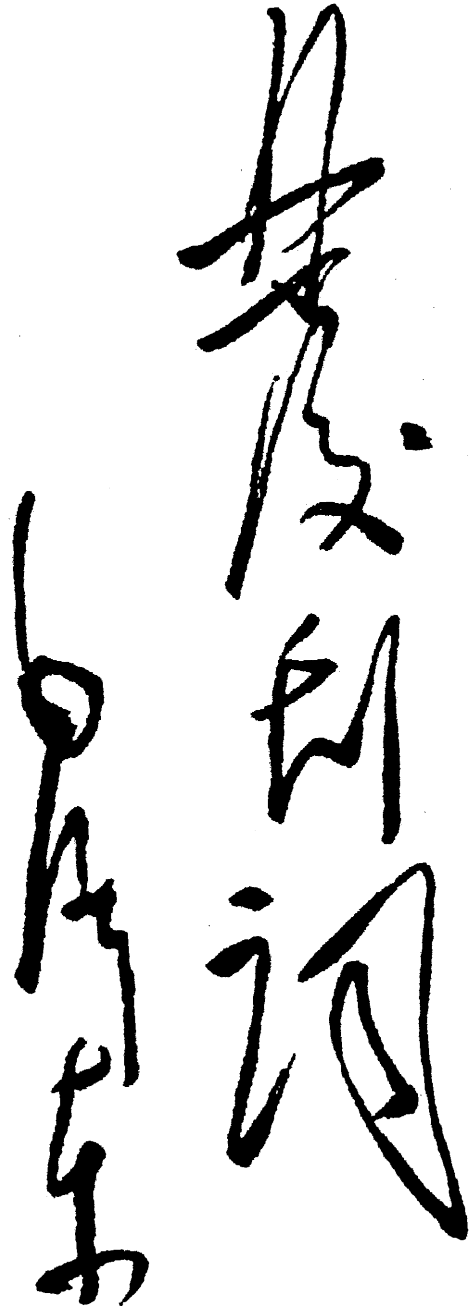
但一部分干部对于抗日的战略战术之了解与应用尚感不足，一般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干部，对于现代新式军队的管理与指挥，至今还缺少初步的研究。若干工农出身的干部，还没有解决提高文化水准至必要程度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八路军当前的第二个任务。第三，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是达到抗战建国胜利的总方针，八路军干部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若干干部尤其是新干部，对于统一战线的了解尚感不足，协同友党友军一道工作与调节社会各阶层的关系，使之利于抗战，在某些地方还做得差。因此加强统一战线教育成为重要的任务。第四，争取敌伪军的工作，久已成为八路军政治工作三个主要方向之一，也得到了许多成绩，但对战士与干部普遍施以日文日语的教授，并研究各种方法使之善于向敌军士兵与下级官长进行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还非常不足。争取蒙伪军的成绩较大，但还须更进一步。在这里，搜集与研究敌伪军的全部情况，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在这方面的成绩，还没有达到需要的程度。第五，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八路军某些部分的注意，但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如何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上，不但注意执行正确的地方财政经济政策，如像过去已经实行了的，而且提出与实行在不妨碍作战条件下，由军队本身亲身参加生产的问题？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战斗部队担任作战，后方机关人员担任生产。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开办合作社更应该做。这样做去，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

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以上增加技术装备，深研战略战术，正确地运用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进行争取敌伪军工作，由军队自身参加生产运动，这是八路军在新阶段中应该加重注意的重要问题，其他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将从这些重要问题上的进步而克服之。

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抗战是长期的与残酷的，发扬八路军的成绩，纠正八路军的缺点，首先对于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是迫切需要的；同时对于以八路军经验贡献抗战人民与抗战友军，也属需要。《八路军军政杂志》应该为此目的而努力。

的标题。



发刊词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致杂志〉发刊词》一文题写的标题。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5日）

日本帝国主义目前的主要目的，第一是消灭国民党的军队与政权，第二是消灭共产党的军队与政权。蒋介石最近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的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又要限制我们。蒋的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须发出一个指示电。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汪精卫叛国投敌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12日）

一

六中全会后边区工作要有一个推动，要从边区议会做起，使边区能应付困难环境，造成对外有好的影响。因此边区议会要开，国民党攻击我们立异，我们为实行民主制度必须立异，否则不能表示我们的进步。议会名称仍用参议会好。边区问题解决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一）边区事情由我们办；（二）保证民主制度。

二

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39年1月13日）

周、秦、何，并告朱、彭：

八路军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不应是东三省、察哈尔、热河、冀东，因为大部队不能去，也无法去上述地区。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发展；但在目前磨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毛　王

十三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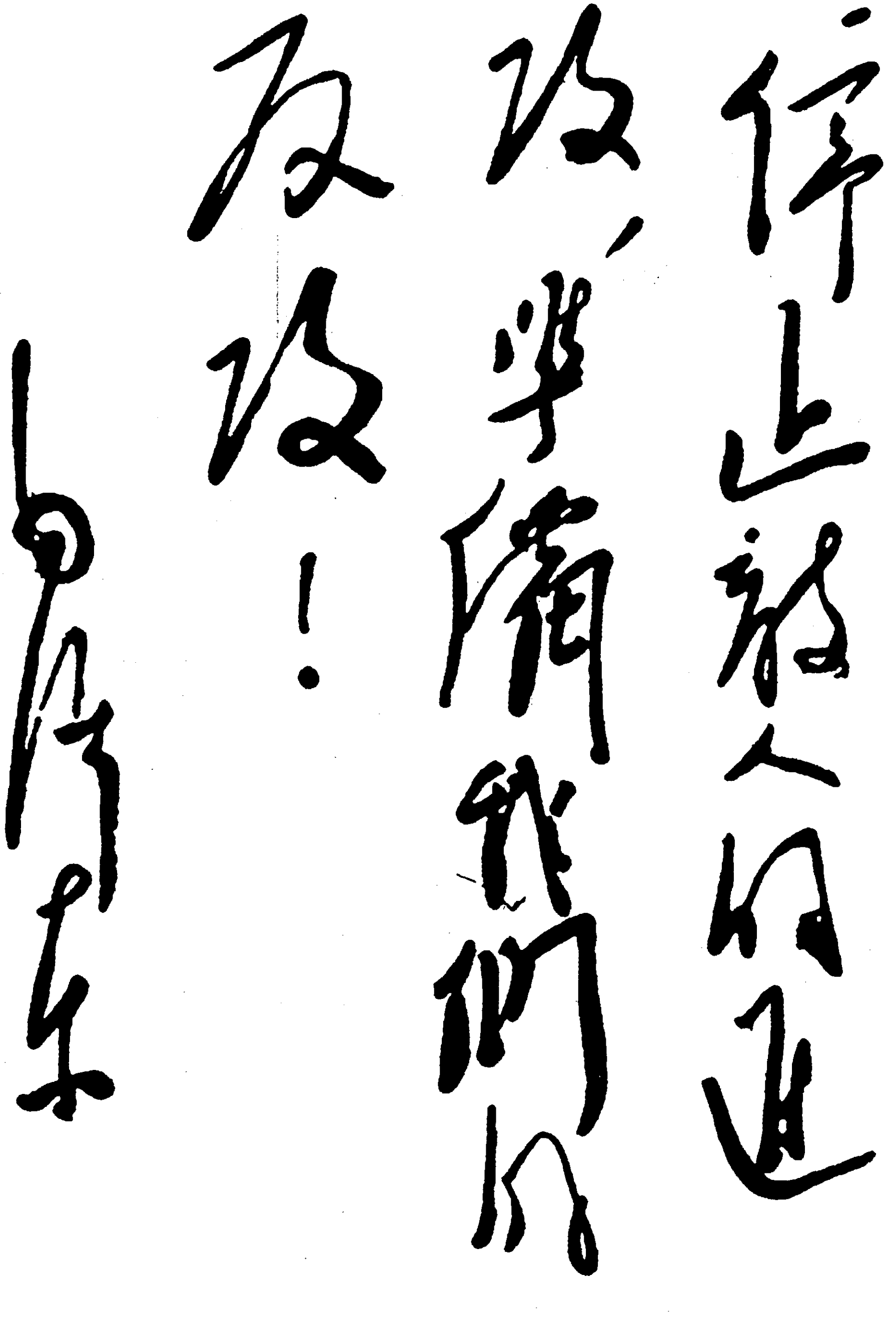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八路军今后发展主要方向问题给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并告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题词

（1939年1月15日）

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毛泽东



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的题词。

关于研究民族史问题给何干之[1]的信

（1939年1月17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般〉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

---

[1] 何干之（1905—1969），广东台山人。当时任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1]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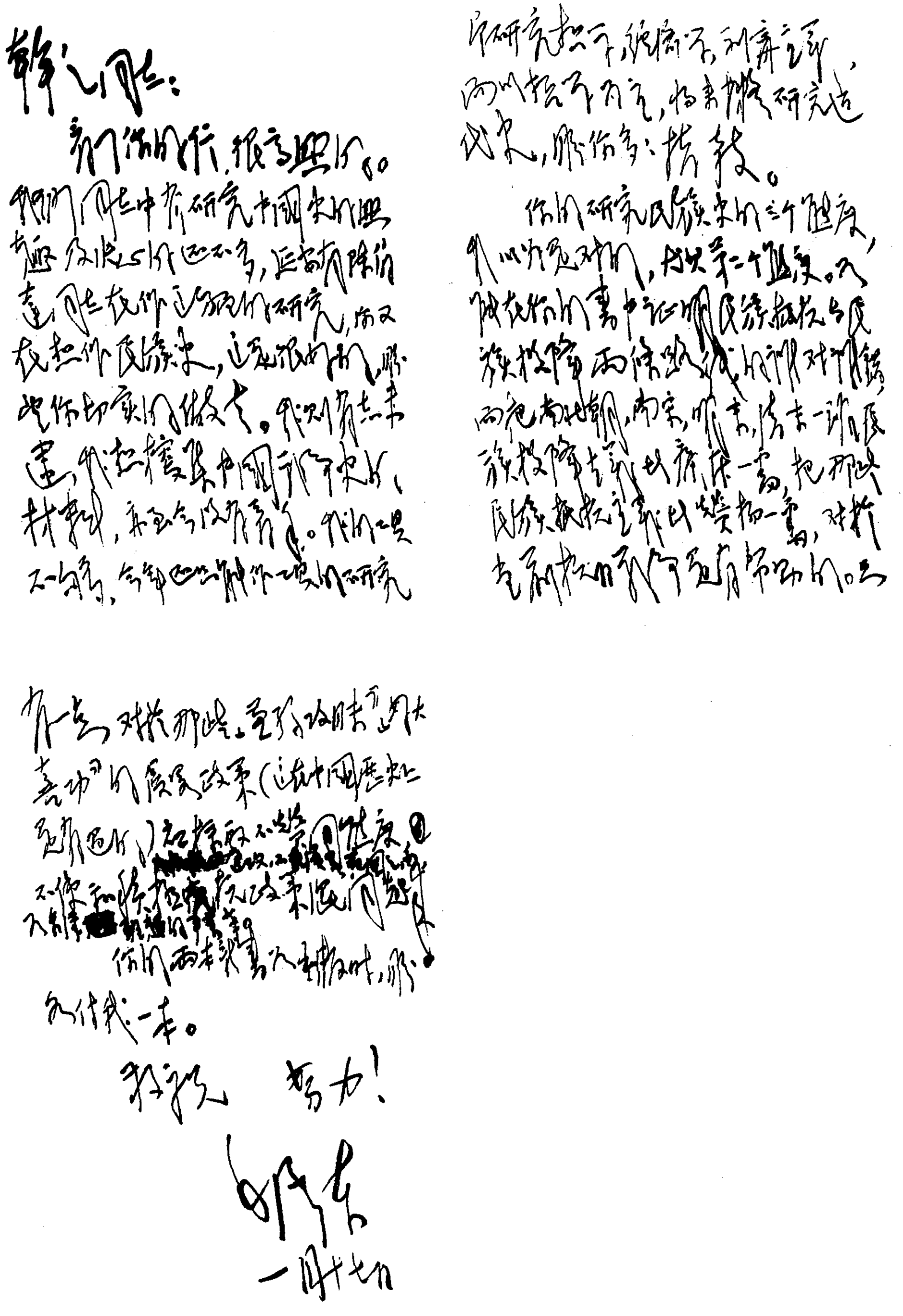
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

[1] 指何干之著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三民主义研究》。前一本书于1939年3月由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后一本书于1940年8月由新中出版社出版。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努力做去。我只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来至今没有着手。我们也是不一会多，今后也可能作些有关的研究，想写[illegible]，而以指导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都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部分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害于对于那些。至于如何团结国内各民族的民族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illegible]政策成问题，[illegible]

你们两本新书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礼 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致何干之信的手稿。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1]

（1939年1月18日）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日本的困难增长；国际上给中国更多的援助。目前军事、经济、国内矛盾、国际环境都使日本更加困难，这就逼使日本不得不在一定时间停止其进攻。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更加困难，一方面更加进步，而进步一定压倒困难。近几个月来的国际形势也对中国有利。

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强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报告的一部分。

抗战与外援的关系

——《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

（1939年1月20日）

上海的朋友在将我的《论持久战》翻成英文本，我听了当然是高兴的，因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民主国家如英、美、法有广大民众，包括各个阶层的一切前进人们，都是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除了一部分顽固党反对中国抗战。关于顽固党，有些是顽固性成一向同情日本军阀的；有些则是不明白中国抗战的必然规律，经过艰难路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必然规律，因而由悲观而失望而不愿意援助中国，这类人，我想也会有的。倘能因我的书给予这类人以明白事情真相的机会，当然是我的希望。至于大多数同情中国抗战的人们，也许至今还有若干人同样不明白中国抗战的真相，虽同情抗战也存在着苦闷，这类同情的苦闷，尤其是我们应该为之解释的。我的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八年五月间作的，因为它是论整个中日战争过程的东西，所以它的时间性是长的。至于书中论点是否正确，有过去全部抗战经验为之证实，今后经验也将为之证实。抗战在武汉、广州失守后正在向着一个新的阶段——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的新的阶段发展，这个阶段就是敌我相持的阶段。敌因被迫结束其战略进攻转入战略保守，我因坚决抗战与力量增加而结束自己

的战略退却（主力军，不是游击队）转入战略相持，这种局面快要到来了。新阶段中，我之全部任务在于准备反攻，这种准备时间也许是长的，但我们有全部勇气与精力来进行这种准备，一定要把也必然能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中国的力量也正在发动，不但将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且将压倒敌人而驱除之，这是没有疑义的。但同时，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在英美诸民主国尚存在有孤立观点，不知道中国如果战败，英美等国将不能安枕，这种错误观点十分不合时宜；援助中国就是援助他们自己，才是当前的具体真理。因此我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中国在困难之中进行战争，但世界各大国间的战争火焰已日益迫近，任何国家欲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意罗斯福[1]总统保卫民主的宣言，但坚决反对张伯伦[2]对于西方法西斯国家的退让政策，张伯伦对于日本也至今还保存着怯懦心理。我希望英美民众积极起来，督责其政府采取反对侵略战争的新的政策，为了中国也为了英美自身。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日

---

[1] 罗斯福（1882—1945），当时任美国总统。

[2] 张伯伦（1869—1940），当时任英国首相。

给鲁迅艺术学院文学团体“路社”的信

（1939年1月21日）

路社常务委员会诸同志：

信件收到了，谢谢你们的好意。

二月四日已约定别的集会，不能来你处，请加原谅。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段的意见来，只有一点，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此常谈很少能做到，我觉这是现在的缺点。这一点是否有考虑的价值，请你们斟酌一番。此复。

敬祝

努力！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给周扬[1]的信

（1939年1月22日）

周扬同志：

此稿[2]李六如、和培元[3]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此致

布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

[1]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2] 指《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的初稿。该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亲自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词："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3] 李六如，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和培元，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给杨令德[1]的信

（1939年1月22日）

令德先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令甥被屈事[2]，能邀先生谅解，为之欣慰。如先生高兴来延安一游，甚表欢迎。

此致

抗战敬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杨令德（1905—1985），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人，当时是大公报派驻陕西榆林的记者。

[2] 指杨令德的外甥袁尘影1938年年初曾误被关押一事。

在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25日）

今天开边区农产品展览大会，意义是很大的。现在跟日本帝国主义打仗，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前方要有将士的英勇抗战，而这些将士们要吃饭，要穿衣，这就要依赖后方努力生产来解决。边区在过去生产运动中已有了一些成绩，这次农展会就是成绩的代表。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打下去，一定可以打垮日本的。在我们边区，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及部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

[1] 1939年1月25日，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农产品展览会并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26日）

一

一、准备工作。现在到春耕还有两个月，要雷厉风行、不失时机地进行准备工作。二、进行生产动员。在二月一、二、三日进行生产动员，分配生产任务，并使各单位有余利以提高其兴味。各机关学校等单位组织生产委员会。三、总的生产运动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四、生产运动的意义，是在长期抗战中实行自给自足等。

二

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

[1] 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问题。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生产运动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子昆、赖传珠、袁国平电[1]

（1939年1月27日）

你们应将新四军一年余作战经过、胜利及艰苦奋斗的材料，整理电告重庆及此间，以便发表，并痛驳四军作战不力之说。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驳斥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作战不力致周子昆、赖传珠、袁国平电的主要内容。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的讲话[1]

（1939年1月27日）

检查工作会议是一种领导方法，是最具体地学习领导的方法。通过检查工作会议，团结了干部，发扬了优点，克服了缺点。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学习的方法是“挤”和“钻”。

---

[1] 这是毛泽东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39年1月27日）

周、秦、何、董：

这是对新四军之可能的新的压迫之准备，望将新四军作战经过及胜利材料广为公布，并痛斥新四军游击不得力之说。

毛　王

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针对国民党对新四军的诬蔑给周恩来、秦邦宪、何克全、董必武的电报。

给炮兵团全体官兵的信

（1939年1月28日）

炮兵团全体官兵同志们：

八路军炮兵团成立已一周年，盼望你们努力政治军事学科术科之学习，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有力兵团，达到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之目的，为民族争光荣，为八路军争模范！

毛泽东

关于目前战争局面和政治形势[1]

（1939年1月28日）

我来讲一讲目前的时局。因为同志们分散在各地，对整个情形不十分清楚，趁此机会，就和同志们谈谈。

我们根据六中全会的报告与决议来看问题。六中全会说："抗战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在去年十月上半月讲的，到现在已经有了三个月，事情怎样呢？去年十月三十日，蒋委员长发表了告国民书，十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驳近卫[2]的文章，驳得很好，又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3]，这些都说明了是要坚持抗战这一条，证明了亲日派力量不能动摇抗战。在过去，第一个问题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在友党里曾有妥协倾向，酝酿着和平，这就很困难。固然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是要打的，不妥协的，然而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在全国算来还是少数，统一战线里是小股东，我们单独打日本，是困难更甚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总结时讲话的一部分。

[2] 近卫，即近卫文麿（1891—1945），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任日本内阁首相。

[3] 汪精卫（1883—1944），浙江绍兴人。曾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12月19日，逃往越南河内，同月29日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现在国民党有了这些行动，确定了坚持抗战的方针，在这个“打”的条件下，什么文章都容易做了，这是好事，是统一战线中进步的东西。

现在讲战争形势。

去年十月我们估计到，武汉、广州失守后我们将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对于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的，由于主要大城市与交通线的丧失，国家政权与作战阵地就在地域上被敌人分割了，财政经济上的困难等等增加了；至于进步，主要的表现在坚持抗战，在两次参政会里克服了主和派。那末进步能不能克服困难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只有我们更加进步，更加努力克服困难，才能使战争转到新阶段。六中全会提出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增加力量，克服困难，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现在已经证明它的正确，以后也将证实这一点。

我们讲敌人进攻还未停止，武汉、广州失守后这三月来，在正面敌人没有大举动，但在侧后敌人是打得很凶的。有人说我们估计不对，敌人进攻已经停止了。我们不这样说，也不这样想，因为敌人还会进攻西安、兰州、长沙、南昌、梧州、衡州等地的，我们一定要准备着。虽然到我讲话这时止，我的话还未证实，不过我们还是准备的好，没有准备就会损失更大。为什么敌人还会进攻呢？第一，他不进攻，法西斯军阀就会马上垮台，而它的野心很大，不但要进攻全中国，还要去打南洋，缅甸、安南[1]、印度也要去打。在中国，它反对蒋委员长，反对共产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它的计划，它是要想达到目的的，但是否可能达到，就要靠我们

---

[1] 安南，今越南。

的努力程度来决定。

我们说敌人进攻会停止，但是否能够停止呢？我们说，一定要停止。日本要灭亡我们，我们要它停止，但究属如何是要根据敌我两方面的情形来说明的。由于敌人国小，人少，兵少，现在战线又是这么长，南至广州，北至包头，它本来就有兵力不足的弱点，再加上这个兵力分散，强兵也便变弱了。它这个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是个不治之症，它的力量不能允许更多出兵中国，因它另外要防强大的苏联，又有英、美、法与它为敌，还要防范国内人民与殖民地人民，至多能拿三分之一的力量用到中国。现在听说已来了一百万，将来至多再来一百万，而不能再多了。这样，我们天天在正面打，在敌后打，主力军打，游击队打，杀伤它的兵员，疲惫它，使它的兵力更减少，更分散，弹药给养消耗更多，力量削弱了，它就不得不停止进攻；另一方面，我们中国更强了，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加上其他各方面的进步，现在虽未能停止日本的进攻，但是一定能够使之停止的，我们要用一切方面的努力去停止它。

至于我们估计，在敌后能大大发展游击战争，并能建立根据地，现在已证明了，以后更将证明。同时，我们又指出，游击战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要看到敌人是要回头进攻的，在那时，游击战争更会困难的，我们要准备着这个困难的到来，以战斗的姿势还击它。一定要准备到这一着，才可避免“措手不及”的遭遇。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说会发展的，但是有困难。国民党是在进步，但在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三月来证明了什么呢？顽固分子的汪精卫已变成了汉奸的汪精卫，当然他此后还会掀风作浪的。国民党已永远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这是好的；现在各地前线将领，陈诚、李宗仁、白崇禧，我们的朱、彭总副司令等，都打

电报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但现在尚未颁布明令。我们认为这个通缉令是必要的，因为他已做了汉奸，和敌人搞在一块了，虽然说现在不一定能捉得到，但到日本帝国主义打败的时候，怕他逃到哪里去？有人说，他会到德国、意大利去，然而这些世界法西斯都入黄土垄中的时候，他还有何处可逃？总之，只要他在地球上，最后一定捉得到的。

我们说，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因这退步，所以有磨擦，不仅有而且比前更厉害些。这退步的力量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主张亲日反蒋反共，以汪精卫为头子的，现在已经走了一些，但还有党羽存在；另一派是顽固分子，主张所谓抗日拥蒋反共，这种人边区周围很多。他们说：现在，先反共后抗日；敌人来时，先抗日后反共。在前方，听说还有所谓抗日与反共两条并进的。这亲日反蒋反共的一派，下述几个大的具体事实是“贯彻”他们的“主张”的：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曾提出有反蒋内容的提案；说长沙大火与蒋委员长有关系，借此以骂蒋委员长；他们又侮蔑游击战争为流寇，他骂共产党同时也骂了蒋委员长，因为蒋委员长与共产党同样主张在长期抗战中须要发展游击战争的；还有汪精卫的应声虫张君劢等，写文章说共产党怎样不好啊！八路军、新四军怎样要不得啊！陕甘宁边区又是如何如何！总之，他对共产党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军、政、人民施行其最卑鄙的侮蔑。至于亲日，在他未有开小差前，不明显地讲，在他的文章和讲话中，隐隐约约地总有些不愿抗日、与日言和的意思。另一派，在西安以及邻近边区等地，更甚于前地进行他们的为敌所欢的工作，这就是不顾大局靠磨擦吃饭的一批家伙。

这股逆流是退步，统一战线的阵营里有进步也有退步，但进步

和退步两个人打架哪个人打得赢呢？我们的回答是进步的趋势能够压服退步。

我们要懂得，统一战线里是一定有磨擦的。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磨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磨擦，但一有两个，两个手掌就拍得响了，磨擦就难免的。统一战线有一万年，磨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磨擦存在。因为有不同，所以有磨擦，不过我们是尽一切力量使磨擦减少。

有人硬要磨擦一下，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呢？在六中全会里我们曾说过，对无理的磨擦我们是决不容忍姑息的，我们要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这后一条原则是很重要的，比方我在这屋子站着，他把我挤一下，我若让他，退一下，这样一步一步会挤得我无容身之地，所以，他挤来，我们反挤一下，挤回他到原来地位，他要磨擦，我们就反磨擦。他们说，陕甘宁边区是伪政府，要取消晋察冀边区，还要取消共产党，要八路军、新四军到沙漠地带去，等等，如此这般花样多得很，对这一切，我们都是反对的。他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大搞其磨擦，占村子，他占一个村子，我们占他两个，他把一个还我们，我们也就原数奉还；他要捉人，他捉二个，我们捉他四个，他把我们关三天，我们就关他六天释放。为什么我们要加倍地对付他呢？就是因为他先犯了我，他理屈，要惩罚惩罚他，这就是反磨擦。要亲爱，要团结，但要站起来，否则就会有“亡党之痛”。现在磨擦增加了，以后统一战线会是怎样呢？我们是一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抗日战争中也是可以坚持的，这在六中全会报告里已经指出了的。亲爱团结是统一战线的原则，然而更要反磨擦这一条，没有这一条就不

行，只有坚持这一条原则，才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现在国民党正在开五中全会，我们估计它的结果不会坏的，但同样不应忽视磨擦还是可能有的。

上面讲的是中国方面的时局，现在讲日本方面的。

日本换了内阁总理，为的是现在要用新办法，就是全国总动员。这事证明了现在它的老办法不足用了，表示着它的困难的显著化；另一方面，又证明着它对中国将会更疯狂地进攻，并准备着进攻世界。它在“骑虎难下”的形势下，不得不来一个全国总动员。

日本的困难：在军事上，表现在它的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经济上更形枯竭，现在出口货少了，因为军事工业增加；相反的，进口货比以前更多了，因为要大批地制造军需品。过去日本货是最便宜的（因为它剥削工农大众是最凶的），可以去换些外国货，现在少了这一条件，向外国买原料就要用现金，而日本的存金不多，况且在一年多的侵华战争中又用去了将近九十万万的战费。在外交上，更表现着孤立，英、美、法曾向日本提出照会，问它为什么破坏九国公约[1]，这件事也是武汉、广州失守后发生的。现在英、美正在商量，要用经济制裁去惩治它一下。过去美国有中立法，这中立法对中国不利，反而对日本有利。现在日美关系搞得不好，因为日本要独吞，英、美在华利益被削弱了；同时，因为英、美与中国重洋相隔，加了很多运费，货价高于日本，就不能与之竞争；而且现在日本借口军事关系，不准英、美商船在长江等地航行，英、美在华

---

[1] 九国公约，是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1937年11月九国公约缔约国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日本拒绝参加。

的商务利益几被尽夺了。现在日本花言巧语地说退回租界，实际上要把英、法的租界变为自己的占领地；它还企图打南洋、安南、澳洲等地。日本帝国主义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它的朋友只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英、美、法等民主国家都不喜欢它，苏联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去年十月说，日本现在尚未停止进攻，但是一定会停止的，并指出使之停止有三个条件，上述日本的困难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国际上对我们怎样呢？在去年我们指出，欧洲问题与亚洲问题有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过去英、法在欧洲向希特勒步步退让，而对中国有些不同，现在已经证明了。英、美借钱给我们，这是好的，开了一道门，将来就更有路可走；但是否能大帮助我们？不会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有限制的，当然我们不是靠国际“吃饭”的，应该把主要点放在中国。

世界上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法西斯国家，另一类则是民主国家，这两类国家的矛盾一天天尖锐化起来。现在西班牙政府军更危险了，德国要求收回旧殖民地，意大利企图夺法国的突尼斯等地，更接近于大国间战争的危机了。现在已经开始了世界大战，过去的与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法西斯国家打弱国小国，将来会和大国打的，但是到底哪一天打，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我们希望早打呢，还是如何？现在打起来，固然在某些方面是好的，譬如打击了西方法西斯，就是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但这是间接的，所以能晚打那更好，英、美等民主国家能更多地直接帮助我们。苏联现在也不愿意打，如果再隔几年，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更强大了，成为一个使法西斯闻之裂胆的国家，那末，这对中国，对世界是更有利的。世界一定会打更大规模的战争，但何日爆发，是无法占卜的。

关于目前的战争局面与政治形势就是如此。

陕甘宁边区的前哨。

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月至2月）

一

边区是全中国的一个部分，但这里有些新的东西，如民权主义，别的地方很少，民生主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这就是边区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现在全国坚持抗战，开参政会等等，在实行着三民主义，我们边区的参议会也是其一。抗战一定要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是相互配合的，没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就不能实行民族主义，抗战就不会胜利。边区的进步，主要的表现在民主，而这民主又是苏维埃在现阶段的发展物，现在各阶级，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可参加参议会。大事一定有人反对的，坏事有人反对，好事也有人反对，那末怎样断定事之好坏呢？看问题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标准就是：凡

---

[1] 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本篇一是1月17日，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1月18日下午，毛泽东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的一部分。本篇三是2月4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驳斥国民党鼓吹的“一个主义”“一个党”的谬论，批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确定的反共、溶共方针的讲话的一部分。

是日本帝国主义、汉奸所反对的，那一定是好事。因之，我们要努力的干。

要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国防教育，大大发展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

二

武汉失守了，但还没有进到敌我相持的新阶段，而是敌攻我守与敌我相持两个阶段中间的过渡时期。完成这个过渡需要三个条件：中国坚持持久抗战并增强抗日力量；敌人困难的增长；国际上更多的援助。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坚持抗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八路军、新四军的任务，主要是在敌后拖“牛尾巴”，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陕甘宁边区要成为抗战的堡垒，民主的模范。

三

“一个主义”论者，现在不对，过去也是不对。过去皇帝时代尚有几种信仰，现在“民国”时代反而没有，那简直是放屁。至于“一个党”，也是不对。有不同阶级，不同主义，当然有各党各派。过去有人唱一个歌，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话说得相当对。所以“一个主义”“一个党”这种话就应该取消，如果他再要讲，我们就要驳他。讲到溶化，应当溶化的是那些顽固分子，那些“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人，为国为民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溶化的！

1939年年初，经人民普选，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毛泽东到会讲话，提出边区建设的方向是要成为“民主模范”“抗战的堡垒”。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合影。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1日）

关于八路军、新四军与陕甘宁边区问题，我们不能让步，我们必须坚持一定的立场，这一点请林老告知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等。军事区域，根据现在情况决不能答应向北发展，向华中发展问题不放弃，但暂不提。陕甘宁边区至少坚持二十二个县，边区政府主席不许派人来担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1]一文给陈伯达[2]的信

（1939年2月1日）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3]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

---

[1] 《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是陈伯达写的，1939年、1940年陆续发表在《解放》第八十二、第一〇二和第一〇四期。

[2] 陈伯达，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列宁曾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月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

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为杨海泉题词[1]

（1939年2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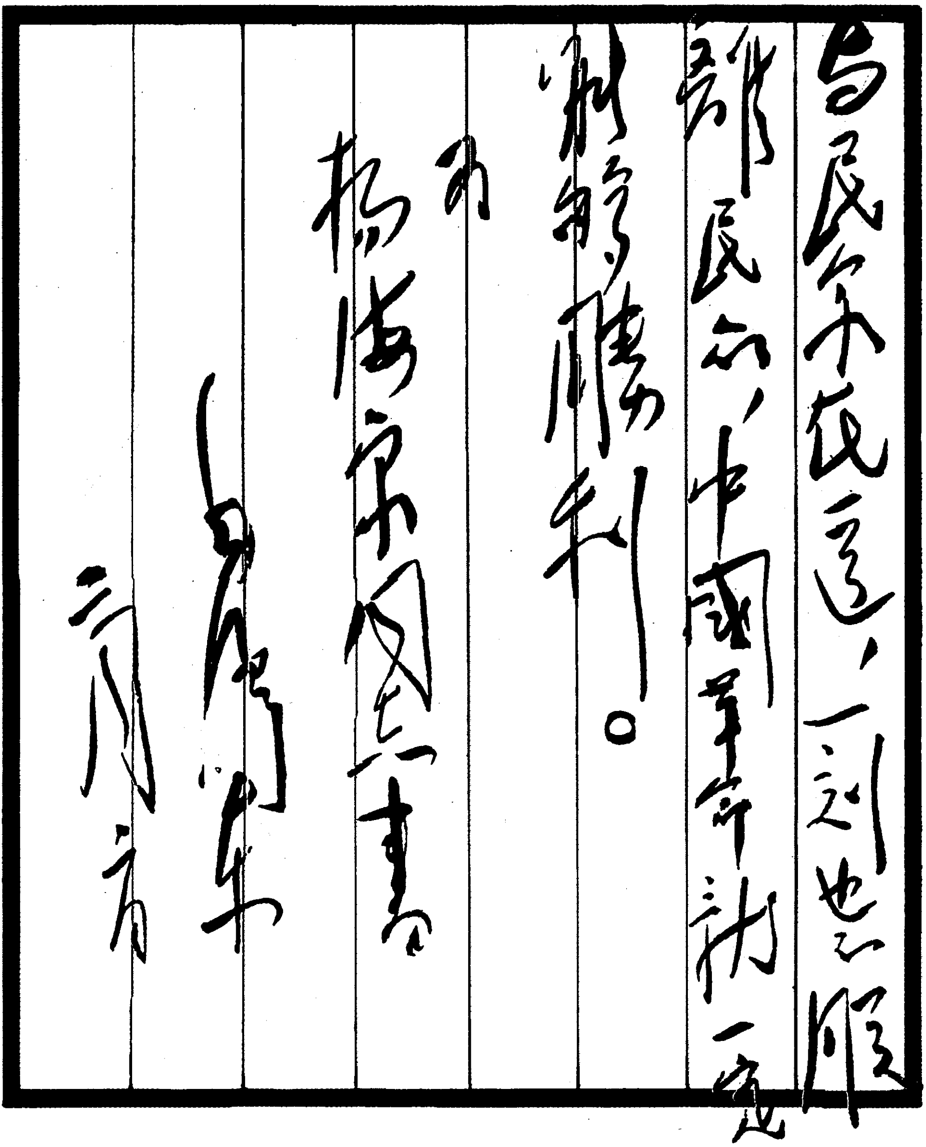
与民众在一道，一刻也不脱离民众，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为杨海泉同志书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抗大第五期学员杨海泉所写的题词。



与群众在一起，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中國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为

杨海泉同志书

毛泽东

二月

毛泽东为杨海泉的题词。

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2日）

在我们面前摆着三条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要继续抗战，就需要动员全中国的人力物力。要发动人力，就要实行民权主义；要动员物力，就要民生主义。今天的生产动员大会，也就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大会。陕甘宁边区有二百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动。这四万人在过去，不知道怎样生产，也没有工夫生产，而事实上也不必要生产。在中央苏区，各机关粮食多得很，因而也不必要工作人员去生产；同时，那时候的环境是非常紧张的，处在包围战争的环境中，各机关工作都很忙，部队在战斗中；再则，那时也没有经验，不知道怎样来生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处在新的抗日战争的环境中，又在历史所造成的落后经济的陕北，显然的，经济是较困难了。因此，就要自己来解决生活问题。现在虽同样是战争的环境，但这与过去是不同的；各机关的工作虽

---

[1] 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作题为“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洛甫（张闻天）、陈绍禹（王明）等出席大会并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然一样很忙，但在新的环境，即在国内和平、对外战争的环境中，工作忙的程度也有些不同。讲到经验，现在也有了。去年留守兵团部分地进行了生产运动，他们日常生活改善了。冬天解决了鞋袜问题，过去有部队的战士们冻足冻手，现在这种现象消失了，这也是进行生产之功。所以无论部队机关，这种生产运动必须开展起来。大家种菜喂猪，办合作社，进行一场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

生产运动，要解决陕甘宁边区二百零四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还包括一个新的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的意义。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也叫做知识与劳动团结起来，消灭了过去劳心与劳力分裂的现象。

反对投降主义[1]

（1939年2月5日）

讲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说要把共产党溶化，共产党方面也有人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没有区别，所以不要共产党，因这两方面的意思有些相近，都不要共产党，所以拿到一块儿讲。要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要巩固统一战线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关门主义与投降主义。国民党要溶化我们，我们就被溶化了吗？不能，绝对不能，那是投降主义。二中全会提出反对关门主义的同时又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原则问题；统一是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不可缺少的原则，这点是不能忘记的。现在国民党采取防共政策，要从政治上组织上瓦解共产党。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记取陈独秀投降主义使大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反对政治上

---

[1]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于1938年12月18日潜逃越南河内。29日，汪精卫发表公开叛国投敌的艳电。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虽然声言仍要“坚持抗战到底”，但确定了“溶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置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的言论与行动。1939年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题为“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的软弱症，使自己的力量增强起来，才能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反对反共
Cyanguo tungbao ging-
dungjyan kilai. Zhzh
Gung neizhan!

1939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图为根据地军民集会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又团结，又斗争[1]

（1939年2月5日）

怎样巩固统一战线来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目的呢？要用两条战线的斗争。

一条是反对关门主义，要跟从前的仇人讲亲爱，跟地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统统团结起来，只要他们愿意的话。我们这里有些人，生怕资产阶级的垃圾沾上身，说他们要不得，跟他们不要讲亲爱，不要讲团结，以为自己关起门来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抗战就可以胜利。这种人的思想是真正地要不得，我们要反对，因为关门主义是妨碍团结、妨碍统一战线的。另外还有些人，思想很糊涂，是“发国难财”“吃磨擦饭”的家伙，这种人我们也要反对。团结的敌人便是破坏团结和不讲团结。斗争好比火线上打仗一样，打击了不讲团结的关门主义，又打击了吃磨擦饭的顽固分子，这是一条战线。

再有一条战线，还要打击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借讲“统一”要把共产党取消，并到国民党里面去，他们常说“纳共产党于国民党之道”。可是，取消共产党，对实行三民主义是有损无益的。我们对于实行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是最坚决的，对民权主义也实行得最彻底。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演讲的一部分。

陕甘宁边区就是一个例子，最近有一个美国记者参加了几天边区的参议会，他说这里的民主比美国高明得多。在全国，就是我们这里实行了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在其他地方，嘴里说要实行三民主义，实际上只有一民主义（抗日），而且实行得还不大好。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我们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要把三民主义实行到底。人家说不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你说可以可以，这就不对，是投降主义；人家说不要共产主义，你就唯唯诺诺，这也是投降主义。在现在，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坚决的实行者；在将来，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无条件的实行者。

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里，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要克服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父子之间、君臣之间的关系也有统一与斗争。一方面，父爱子孝，君明臣贤，这是亲爱、团结，这就是统一；另一方面，子劝父过，臣谏君误，这就是斗争，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说服教育。这一切，都说明了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那他就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统一与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两个基本原则，那末这两者是不是半斤与八两呢？或者说斗争更重于统一呢？回答都是否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便是统一，这就是说要跟朋友讲亲爱、讲团结、互相帮助等等；但还有一个原则是斗争，那就是劝解、说服、教育等等，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原则。那末为什么不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名词里加上“斗争”二字，而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斗争战线”呢？这点我想同志们都知道，有些人不会像我们这样理解“斗争”这两个字的含义，他一见有斗争就会

被吓退了；同时所谓斗争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斗争，绝不是我们一见朋友，第一句讲“我跟你团结”，第二句就讲“我跟你斗争”，事实上这是不必要的。但是无论如何，斗争是一个原则，是谁都不能也不应忘记的。在抗战期间是这样，在抗战后又会是怎样呢？这要看人家怎么样，人家拿了机关枪对准我们，拿了刀架在我们脖子上，我们是不是还要说“我跟你团结”“我跟你亲爱”呢？同志们，在那时我们只有拿起机关枪和刀子去进行斗争，这个斗争绝不是用说服教育就可以担当起来的。在那时，就是斗争第一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一种事物是不包含斗争的，斗争的形式不是仅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

为《新中华报》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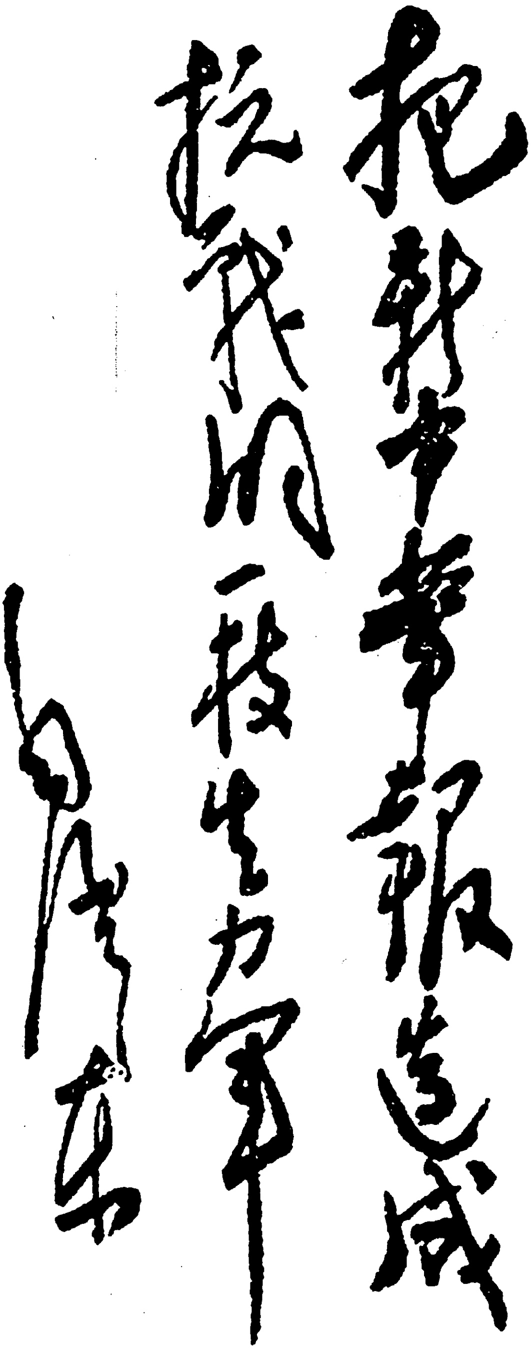
（1939年2月7日）

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枝生力军。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决定将《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际所写的题词。



把新中华报造成
抗战的一枝生力军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的题词。

为《新中华报》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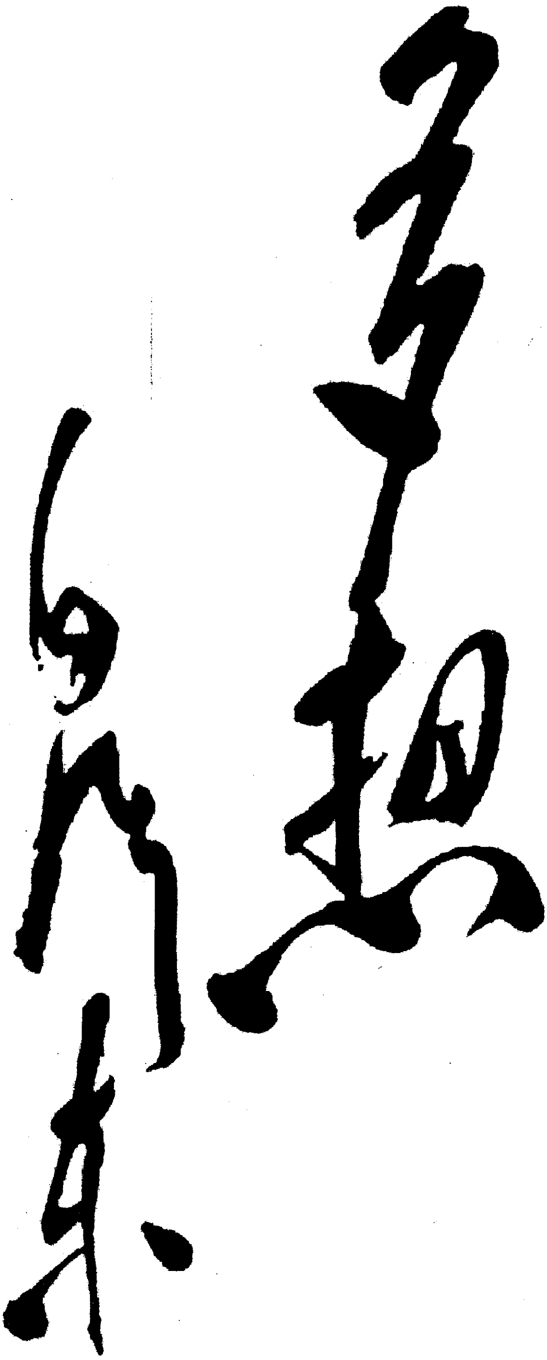
（1939年2月7日）

多想。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华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际所写的另一幅题词。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的题词。

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7日）

一、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斗争历史；二、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历史任务，在目前就是抗日救国；三、中国无产阶级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主义。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职工纪念二七罢工十六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8日）

国民党对我们的磨擦是取消我们已有的力量。现在我们党内许多党员对国共两党的区别存在模糊认识，不懂得我党力量增强才能巩固统一战线。要国民党进步没有斗争是不行的。今天对党内教育，必须注重斗争是不可少的，要教育党员如何团结同盟者及如何与同盟者斗争。

---

[1] 这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王稼祥关于华北华中磨擦问题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

（1939年2月10日）

敌人正在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冀中、冀南、冀察晋、晋东南等区，而我抗战阵线中，又因鹿钟麟、沈鸿烈之极端错误行动，引起严重的磨擦与纠纷，使华北抗战遇到莫大困难与危险。因此，共产党中央及八路军领导者，提出下列主张，一面与蒋及各将领谈判，一面实行坚持自己之立场：

（一）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石友三副之；决不能任鹿胡干，危害抗战。

（二）冀、察、鲁三省，为山西、中原、西北之屏障，若无八路军在三省英勇抗战，收复失地，中原、西北均危，山西现状亦不能保。为发展三省之游击战争，巩固三省之抗日根据地，应将山西八路部队，多开一部分赴三省，两三省八路部队，则决不能减少；否则只于敌利，于我不利。且八路军在三省扫荡伪政权，恢复中国政权，位于抗战之最前线，成绩卓著，功在国家，决不能听鹿钟麟等之昏乱报告，汪精卫之汉奸胡言，而自乱步骤，危害抗战。

（三）敌后抗战形势，证明建立边区是正确的，维持原有省界是

错误的。因此，冀察晋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但决不应取消，相反的，应当在山东及其他地区，依照战略形势划分新的行政区域。

（四）使敌后军、政、党、民不一致，使指挥间不统一，限制排挤八路军等之政策，是错误的，是对抗战有害的，长此下去，势将引导失败。因此必须加以纠正。对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五）当敌人进攻，我军血战之时，忽闻要取消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冀察晋政委会，实使抗战将士，敌后民众闻之愤慨。影响甚大，决不能从。

（六）政府发饷甚少，八路军及游击队不能不就地筹粮。人民拥戴，踊跃输财，有利于国，无害于民。今后仍应如此，决不能枵腹作战。

（七）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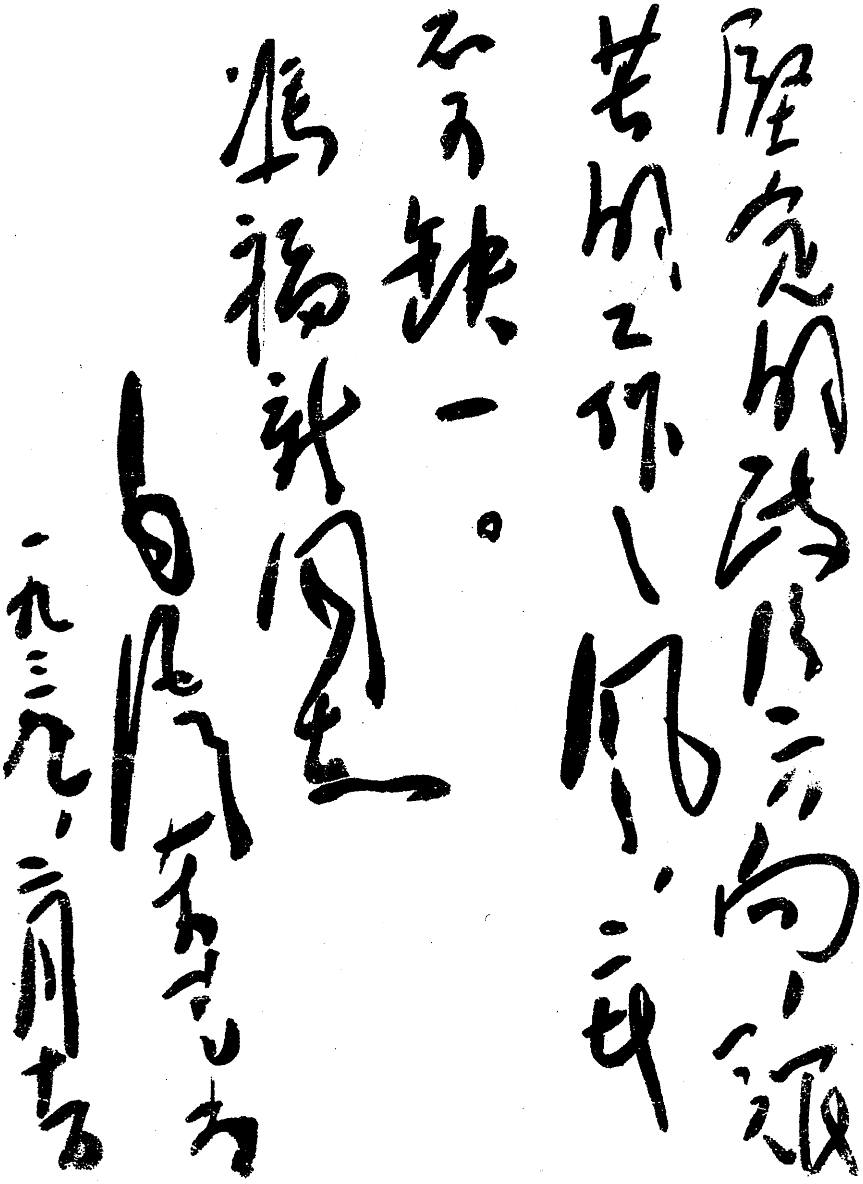
中央书记处

为冯福新题词

（1939年2月11日）

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二者不可缺一。
冯福新同志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一日



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二者不可缺一。

赠福新同志

毛泽东

一九三九、六月书

毛泽东为冯福新的题词。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1]

（1939年2月12日）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议长勋鉴：

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毛泽东
陈绍禹

---

[1] 这是毛泽东和陈绍禹（王明）联名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的电报，表示因事不能前往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

中国军队应当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1]

（1939年2月16日）

当我们听到苏联红军二十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感到有一种伟大力量站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面前，这个伟大力量伸出他的友爱之手，愿为我们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后援，这个伟大力量就是苏联的红军。苏联红军经过二十一年的锻炼，他的陆军、空军，还加上海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在英明领袖斯大林同志与统帅伏罗希洛夫[2]同志领导之下，由于他是工农人民的军队，由于他具有坚强的技术装备，深厚的军事素养，正确的政治工作，不但早已成为保卫社会主义苏联的柱石，而且早已成为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坚力量，成为全世界任何真正愿意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武装部队的模范。在这后一个意义上，我料想苏联红军的每一个指挥员、战斗员，苏联的每一个公民，全都知道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现在进行的战争是什么性质的战争，这个战争是在何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进行的，但这个战争又具有何种的光明前途，他与苏联及全世界又有何种的密切关系。反过来说，在我们中国，不但八路军、新四军，而且全体抗日军人，无不懂得苏联红军是中国的好

---

[1] 2月23日是苏联红军建军纪念日。这是毛泽东为苏联红军建军21周年纪念应苏联《真理报》征文而撰写的文章。

[2] 伏罗希洛夫，苏联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苏联元帅。

朋友，无不知道苏联是最切实地援助中国抗战的，尤其是苏联红军战斗的经验教训足为中国军队与中国军人所取法，使我们懂得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军队也要变为政治上具有正确方向的军队，也要逐渐具备新式的技术装备，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与民族革命的政治工作。中国军队有许多长处，这些长处在十九个月抗战中已逐渐引起了敌人的惊叹，引起了世界的赞美。中国军队必能在长期抗日战争中锻炼自己，成为全世界上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有力的方面军，为了驱逐日寇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为了援助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但一般的中国军队，由于历史原因，至今还保存着许多缺点，重要的是政治素质不完善，新式技术不足，近代化的军事素养不足，尤其是政治工作之不足与缺乏正确方针，这些都是要向苏联红军学习的。谁都知道，中苏两大民族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基础之上，十多年来就结成了密切的关系。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苏联及其红军援助了中国的北伐战争，于今又为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而奋斗。当此抗日战争处于新的困难情况面前的时候，中苏友谊关系是应该更加增进的，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之间的精神联系是应该更加密切的。大敌当前，中苏略同，正是两大民族两大军队共同奋斗的时候了。不管法西斯国家如何地加紧侵略中国，如何地准备进攻苏联，如何地危害西班牙人民[1]，以及如何地企图发动各大

---

[1] 指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1936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同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政府在“不干涉政策”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经过三年苦战，1939年3月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沦陷，共和政府失败，佛朗哥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国之间的再一次惨战，但其前途是可以预断的，最后胜利的决不是侵略者。中国、苏联、西班牙人民，全世界一切被侵略者，将夺取最后的胜利。当此苏联红军二十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以中国人民与中国军队之一员的资格，谨向苏联人民与苏联红军致以反法西斯的友谊的敬礼！

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1]

（1939年2月18日）

一、敌军战斗力较前大为减弱，政治情绪更坏，以后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严禁枪杀及其他侮辱行为，在各后方训练之俘虏可酌情处理，如不妨碍军事秘密亦可释放，借此降低日军之作战决心而动摇其军心，以利于粉碎敌之进攻。

二、据说日军多数部队中国人占三分之二，日本人仅占三分之一，运输队则全属韩人，是否属实请就地调查电告。

毛　王　谭

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联名给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的电报。

各级政治机关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1]

（1939年2月19日）

部队不断扩大，新的杂色部队被收编，可能有许多政治干部不是党员，如此将使八路军优良政治制度的传统难于保持，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的执行更无保证。以后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的组织，其指导员、教导员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接受党的领导，否则宁缺毋滥。

毛　王　谭
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给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各师、军区、山东、河南、第三五八旅、陈士榘支队，各级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电报。

致各部队电[1]

（1939年2月19日）

应严密防范日军奸细和国民党特务混入我党我军。要求各部队审查人员，纯洁内部，加紧保密教育，加强锄奸工作。

毛　王

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就保密工作和锄奸工作给八路军各部队的电报。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1]一文给张闻天的信[2]

（1939年2月20日、22日）

一

伯达[3]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4]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

---

[1] 《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毛泽东在信中将它称为《孔子哲学》，是陈伯达写的，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九期。

[2]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这两封信的手稿，抬头现已缺损。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 参见《论语·子路》。

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济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是对的，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

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2]，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3]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4]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

---

[1] 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2] 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3] 朱熹（1130—1200），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省）人。南宋哲学家，编注有《四书集注》等书。

[4] 参见《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

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1]，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

---

[1] 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夜

二

伯达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达伯达同志考虑。

（一）说孔子教育普及化的功绩时引了郭沫若的话，说孔子的功绩仅在教育普及一点，他则毫无，这不合事实，也与本文冲突，我觉可以不引。

（二）在最末一段前我加了一句，似更醒目。

（三）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1]引了章，梁，胡，冯[2]诸人许

---

[1] 指陈伯达写的《老子的哲学思想》和《墨子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1939年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六十三期、第六十四期合刊。《墨子哲学思想》1939年、1940年陆续发表在延安《解放》第八十二期、第一〇二期和第一〇四期。

[2] 章，指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梁，指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胡，指胡适。冯，指冯友兰（1895—1990），河南唐河人。他们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老子等两篇已发表，可在孔子篇的末尾来一申明（此申明低二格写），说明此篇，前二篇，及尔后发表诸文，凡引他们的话，都是引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说得对的，或大体上说得对的东西，对于他们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则属另一问题，须在另一时间去做。

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夜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中旬）

一

现在日本的企图是在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在军事上截断国际交通。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是只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

二

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负责同志要经常注意妇女工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委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2月25日）

今天开会，就是说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是以政治管理技术，但是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些人轻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一些技术人员自己也轻视自己的工作，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

（1939年2月28日）

（一）和战问题。我们所了解的战争的长期性，包含了不战不和的情况。目前和战问题上战是主要的，因为日本进攻中国是坚决的。战争的发展是曲线的。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个大帝国主义的幻想。最近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

（二）军事问题。日本执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用军事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日本所占领的中国的地区都是军事要点，以压迫中国投降。最近日本扫荡华北，是为肃清共产党的力量，做进攻西北的准备。

（三）政治问题——统一战线。在战争条件下中国是一定要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错综曲折的、不平衡的，表现出进步与不进步的两面性。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国民党中主张联共同时又防共的占多数，我们要增加左翼，争取中间派。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一部分。

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

（四）结论：还是六中全会后的方针，援助蒋介石团结全民族，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们的动摇。只有斗争才能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妥协反共危险是可能克服与阻止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现在敌人要巩固华北，我们也要巩固华北，这是一个大的斗争。目前中心任务仍要宣传六中全会，对内加紧教育。

和美国记者罗伯特·马丁的谈话[1]

（1939年2月）

中国需要民主才能坚持抗战，不单需要一个民选的议会，并且需要一个民选的政府。实行民主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并且必须减轻人民负担，减税减租，减利率，使人民乐业，努力生产。

日本现在有骑虎难下之势，准备继续进攻西安等地。估计抗战第一阶段将结束在西安的失守，第二阶段是日军困驻于城镇的时期，第三阶段是驱逐日军出中国的时期。游击战争将继续发展，为驱逐日寇到城市里去，汉口、上海、南京、北平等地，让他在那里住上三年到七年。他们不得食、不能通商，那时把他们赶回东京去。

共产党今日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纲领的基本异点。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如果那时英、美、法等国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不来打中国的话，那末，中国政府将对外来投资及外人在中国财产给以保障（付以代价）。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

---

[1] 1939年2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谈了两个多小时，当时请抗大校部交际科的吴青做翻译，马丁作了英文记录。事后马丁根据记录用英文写了毛泽东的谈话要点43条，再由吴青译成中文，经毛泽东的秘书和培元交给毛泽东审阅。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和鲁艺美术系
两个申请入党教师的谈话[1]

（1939年2月）

沙皇俄国是压迫革命党人的。列宁就曾充军到西伯利亚。但列宁在西伯利亚还可以读书、写作。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更野蛮更残酷的办法，叫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你们申请加入共产党，要准备过一辈子艰苦奋斗的生活，要准备必要时牺牲自己的生命！

---

[1] 鲁艺美术系两个教师提出入党申请，毛泽东约两个申请入党的教师谈话。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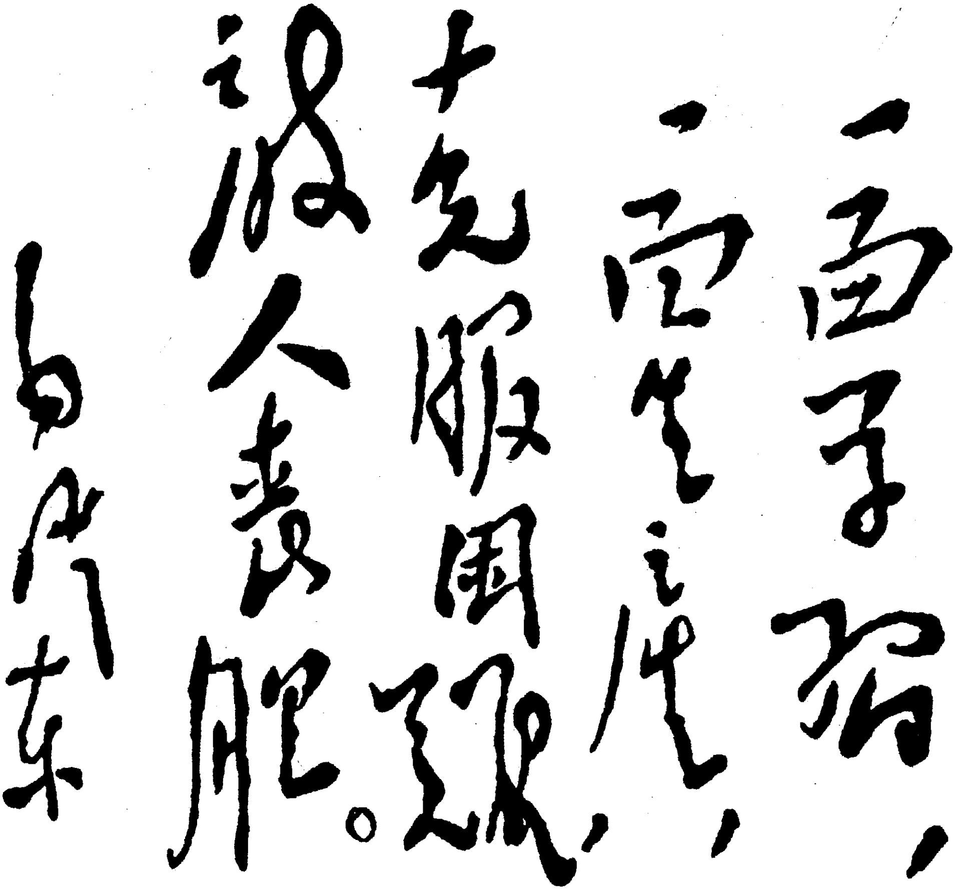
（1939年3月1日）

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泽东

---

[1] 1939年3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延安党政军学生动员大会，号召大家一齐动手，艰苦奋斗，以打破封锁，渡过难关。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开展大生产运动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一面学习，
一面生产，
克服困难，
敌人丧胆。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序[1]

（1939年3月2日）

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单是空唤是不行的，一民主义也是不行的。空唤无裨于实际，敌人已占领了大半个中国，稍有良心者何忍至今徒存空唤？单单军事抗战，算是实行民族主义，但是如果没有决心实行民权民生主义使与抗战相配合，要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遗嘱上面，说他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欲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必须实行两大革命原则。就是：（一）唤起民众，（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岂有国难严重到了今日的程度，还可以不实行孙先生的临终训示？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蒋委员

---

[1] 1939年1月，聂荣臻写了一份关于晋察冀初创时期的情况报告，涉及的内容比较多，约有10万字。其中着重叙述了晋察冀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毛泽东接到这个报告，读后觉得很好，决定把这个报告单独成书出版，亲自为它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3月2日，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长与国民政府号召实行于上，全国民众同声拥护于下，却有不少人员对这个纲领讳莫如深，不但讳言之，而且阻挠之，对于这个纲领中实行民权主义的项目，例如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不是实行者奖，而是实行者罚，这种状态是非常离奇的，是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的。晋察冀边区坚决实行三民主义的精神，是值得钦佩值得奖励的。过去汪精卫辈开口闭口八路军与游击队“游而不击”，或“不游不击”，某些应声虫起而和之，然而汪精卫却“游”到日本怀里去了，应声虫们则在四圈八圈麻将世界里大打其“游击”，真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晋察冀边区里面没有汪精卫党徒，也没有四圈八圈麻将，那里却坚决实行了三民主义，用艰苦奋斗的游击战争创立了华北抗战的堡垒，蒋委员长曾经着重称赞华北的战争，不是没有原因的。聂荣臻同志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谓予不信，视此小册。于其出版之始，乐为序之。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4日）

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职工学校同样要有严肃的政治纪律，防止工人中的帮口观念。职工识字少的要进行文化教育。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时讲话的一部分。

改进抗大分校教育计划的意见[1]

（1939年3月6日）

朱、彭、左、傅[2]，并告一分校何、周[3]：

关于抗大分校之教育计划，应当加强军事教育，强化军事生活，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以及重新配备教学方法，训练教育干部，使之更加适合于新的教育对象。这些改变的意见，我们在原则上均同意，惟在几个具体问题上，再提供下面意见：

（一）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因此，在政治课课程内容上，必须教列宁主义，这是政治上武装他们头脑的很基本的问题。此外，民众运动，共产党问题，八路军问题，亦应当作专门课程教，而统一战线倒可放到中国革命运动史以内教。党的建设，只作党内教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副校长罗瑞卿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敌占区，并号召到敌占区办学校，就地就近培养八路军干部。1938年1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一、第二分校正式成立。1939年2月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在晋东南正式开学。

[2] 左、傅，指左权、傅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政治部副主任。

[3] 何、周，指何长工、周纯全，当时分别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校长和副校长。

育，一般的学生只讲共产党问题。国际现势亦不必教，为着重于临时的时事教育。

（二）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每周上课无论如何不得超过六次。

（三）因此军事教育内容似乎太多，如教育时间仍为八个月，则除以连以下的步兵战术及游击战术为主要内容外，只能教一点战略学（以《论持久战》为教本）及下级干部所必须具备之筑城、兵器、地形的知识。交通、军制、马学、卫生学、典范令，虽亦有其重要性，但以时间所限，恐仍以不教为宜。

（四）学生将来主要在八路军工作，为了加强党的教育起见，党的支部应当公开，并实行党日制。

（五）在八个月的学习期内，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时间约一个月。

上述意见尚希你们再加考虑。

并发聂彭[1]及二分校[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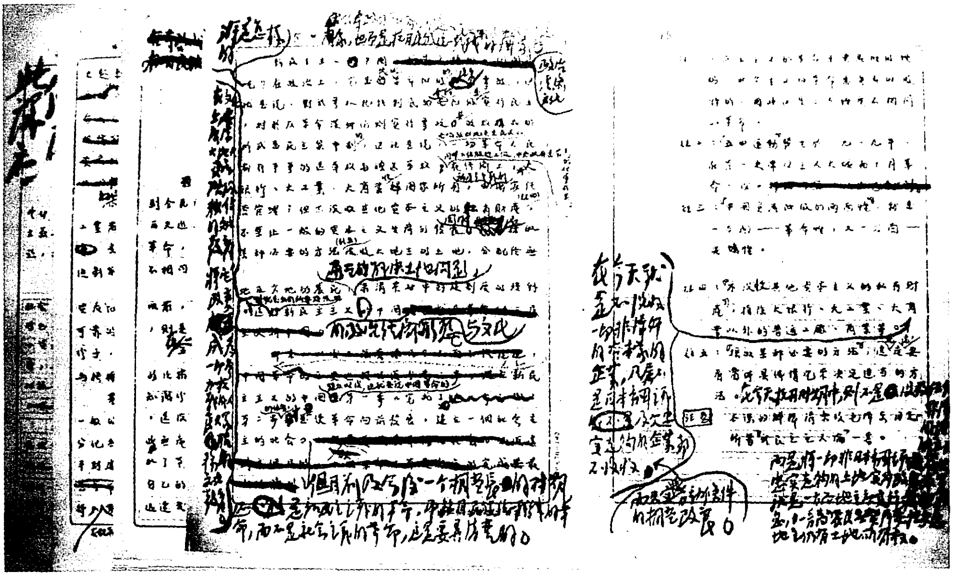
毛　王　滕　罗

三月六日

---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

[2] 二分校，指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当时校址在晋察冀边区，陈伯钧任校长，邵式平任副校长。



毛泽东修改的战士课本。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妇女们团结起来[1]

（1939年3月8日）

同志们：

今天开妇女大会，参加的人很多，有女同志，也有男同志，有老婆婆，也有小娃娃，大家都来纪念“三八”，纪念这个国际妇女节。

纪念“三八”这件事，全世界的妇女，除了那些荒淫无度的女吸血鬼们之外，只要有可能，都在举行，都在开会。我们中国的妇女同胞，除了那些女汉奸们之外，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可能，也都在举行纪念，开大会。

纪念“三八”，开大会，干什么呢？就是要结团体。

妇女同胞结团体，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争取妇女们的自由与平等。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帝国主义的束缚和压迫；中国人民是不自由不平等的，受到封建势力的束缚与压迫。因此，我们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就要打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为争取民族和人民的自由与平等而奋斗。全世界各国，除了苏联以外，所有的老百姓也都是不自由不平等的，他们现在正在英勇的斗争，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自由与平等。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

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男的女的，一共有十几万万，大家在跟压迫者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我们中国，男女同胞，就有四万万五千万，大家在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间，不论在中国，不论在全世界，男子固然有很大的力量，但是女子呢？女子有没有力量呢？有些人说，女子是没有力量的。也有人说，女子有一点力量，不过是很小。在女同胞中间，她们也有表示似乎自己的力量并不大的意思。这种说法，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在一切斗争中，要是说男子的力量是很大，那末，女子的力量也是很大的。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

女子有力量，还要加上一条结团体。没有团体，这种力量是散的、零碎的，人心是各管各的，这叫做心不齐，力不合。有了团体，心就齐了，力量就结合起来了，就能齐心合力干大事。“心一齐，山可移”，这就是讲结团体有力量的道理。现在我们看，全国妇女同胞们有没有结女子团体呢？有是有的，但是很少。在我们边区还算多些，而在全国其他地方则是很少了，有许多地方甚至是根本没有的。因此，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女同胞，在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没有表现出她们应有的力量。我们现在要开大会，做演讲，写文章，做宣传，号召全国妇女同胞，参加男女合起来的团体，组织妇女自己的团体，参加自卫军等等，并且号召一切愿意并坚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妇女们，加入共产党，这样，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比方，边区二百万人民中间，一百万妇女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就大了；全国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同胞，都结成了团体，这个力量更大了；全世界十万万的妇女们，都结成了团体，

大家都懂得了世界上的事情，都懂得了世界上的道理，齐了心，那末，就成了更雄伟的力量，谁敢欺侮，谁就在她们面前毁灭。总之，要结好团体，结好各种各样的团体，从小团体到大团体，以小团体结成大团体，齐整心意，集合力量，来进行伟大的斗争。这种斗争，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那些帮助我们同情我们的，如苏联，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工人农民被压迫者，是好人。那些欺侮我们侵略我们的，如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是坏人。我们中国也有好人和坏人：工人农民，一切进步的抗日分子，都是好人，他们要抗日，要进步；那些汉奸是坏人，他们不要抗日，去降日；还有一些顽固分子，也是坏人，他们不要进步，要压迫进步势力。现在中国人民，不论男人女人，是在被世界的和中国的坏人欺侮着，是在重重的压迫中。首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其次，是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我们的女同胞则有更多一重的压迫，就是受到男子的压迫，比如，男子打老婆的；看不起女子的；说女子没有能力，不让她们管国家事情的；雇佣女工，同男子做一样的工作，而少给工资的。自然，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民，不论男的女的，都要起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汉奸、顽固分子、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而女同胞更应自己站起来，打破那种社会的歧视与社会的压迫。妇女要同男子一样，有自由，有平等。这样的话，在全世界已经讲了几百年了，但是实行的地方有多少呢？全世界除了苏联，还有哪一个国家真正实

行了呢？在中国，要求男女平等的话，也讲了不少年代，但是全国除了边区，还有什么地方实行了呢？很明显的，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地联系着的，妇女解放运动应成为社会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存在着。离开了社会解放运动，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运动，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一开始就是用枪杆子斗的，到现在已经斗了一百年了。但是一百年来，每次革命斗争，七斗八斗，最终都是失败了。那末，这一次是不是又要失败呢？跟日本打，是不是又要打败仗呢？全中国是不是又要遭受痛苦呢？是不是又要继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汉奸的压迫，顽固分子的压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呢？我看，这次革命是不会失败的，打日本是不会失败的。这次的斗争，跟一百年来的斗争是不同的，从前都失败，而这一次一定要胜利。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占领很多土地，我们中国要生存，就一定要把它打出去，就一定要坚持抗战，抗到底。全中国大多数人是赞成抗到底的，而少数动摇分子，他们过去不让广大人民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现在这些分子已逐渐滚出去了。因此，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人也多了，有男女合起来的统一战线，有女子单独的统一战线，有娃娃的统一战线。总之，统一战线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团体一天一天地大起来，人心一天一天地齐起来，力量就一天一天地强起来。这样斗争下去，最后胜利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因为现在世界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向上高涨与资本主义反动势力向下衰落的时代，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很好的条件。所以，这次革命

斗争，决不会像太平天国一样，不会像辛亥革命一样，不会像五四运动一样，也不会像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一样，最后都遭受失败，而是相反，一定可以得到胜利。

在我们边区，不仅男子可以开大会，女子也可以单独开大会。我们共产党号召全中国的男女同胞，统统开会，统统结团体，而现在特别号召女子起来。今天开纪念“三八”的大会，就是一个号召，一个动员，要把全国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把全国男女同胞的大团体结合起来。大家来把中国问题解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打倒顽固派、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使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都有自由与平等；把妇女问题解决，打破轻视妇女侮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使妇女能得到自由与平等。我们要使得男子没有痛苦，女子也没有痛苦，大家都没有痛苦，大家有饭吃，大家有衣穿，大家有工做，把中国革命搞到彻底的胜利。这是共产党中央的号召与主张，我们全国的共产党员，不论男女，都赞成这种主张，拥护这种主张，并为这种主张的实现而奋斗。希望全国男女同胞都要为实现这种主张而奋斗，我们共产党人是永远站在争自由与争平等的人们一起的。

我们边区，全国的老百姓都说是个好地方，这里有自由，有平等。那末，是不是没有缺点呢？缺点自然会有的，但是比起全国来，那要好得多了，比起外国来，除了苏联以外，也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然而，我们并不以此自满，我们还要更求进步，要做一个样子出来，给全世界看，给全国看，给华北华中看，给西安看。在西安，那里是不准老百姓开会的，老百姓没有自由，也没有平等。这件事，我们共产党人是完全不赞成的。今天我们开会，拍电报到全国去，给那里的老百姓看：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是怎

样在管事，妇女们是怎样在办事，老百姓是怎样在过生活。并且还要给那里的坏人看：老百姓结了团体，妇女们结了团体，就有怎样大的力量。坏人们应该苏醒，不要再执迷于“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幻梦，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了。人民是有能力的，他们的力量是最伟大的，他们结成了团体，就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的常胜军。

同志们，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我们共产党是提倡这种权利的，希望同志们大家团结起来，结合在一块儿。陕甘宁边区的妇女先团结起来，先结合起来，再到全国去团结。女大[1]同学，将来到各地方去，就要照延安这样办，照共产党中央的好办法去办。这样办他十年八年，那时候，全中国人民都能得到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的男子得到了解放，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女子也得到了解放。为达此目的，短时间是不可能的，要花上十年八年的工夫；少数人是不行的，应由全国人民大家起来干；不是容易能够达到的，应当加倍努力。边区人民的加倍努力，全国人民的努力，再加上应给予的时间，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自由与平等在我们面前，同志们，大家努力吧！

---

[1] 女大，中国女子大学的简称，是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成立于1939年，1941年与陕北公学等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

在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12日）

总理遗嘱上说，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四十年的经验有两条：（一）唤起民众（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中山先生深知唤起民众的重要，没有民众是打不倒帝国主义的……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的团结，长期合作！

---

[1] 这是对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马克思（3月5日为其逝世纪念日）孙中山（3月12日为其逝世纪念日）纪念晚会上讲话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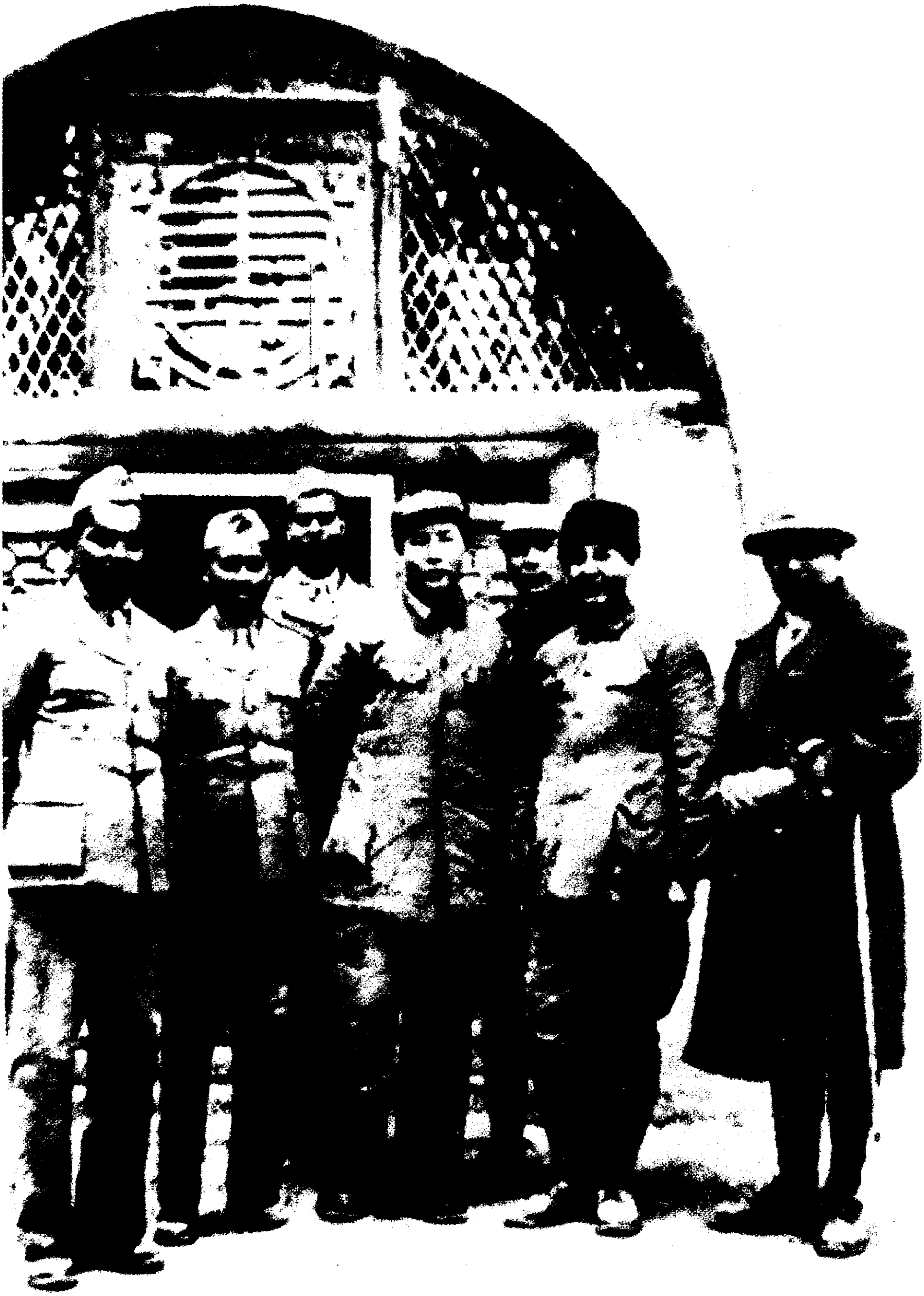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的谈话[1]

（1939年3月15日）

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

[1] 这是毛泽东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和他们进餐时谈话的一部分。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和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人员合影。

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来设宴款待，来到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

对新四军参谋会议的意见[1]

（1939年3月16日）

叶、项、周、赖：

对于参谋会议[2]有如下意见，请考虑。会议的方针应是检讨与总结过去参谋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发扬其成绩，纠正其缺点，建立参谋工作的各种制度，确定参谋工作的主要内容，当要求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把过去部分的技术参谋，提高到战术参谋以及战略参谋的水平，以健全指挥机关的工作，而准备指导新局面下的战争。为此：

（一）会议中除总结过去工作外，应规定以后的工作，规定各级参谋处的任务，各科的分工，各种制度的建立，各种规则的制定与要求一时期的工作中心。

（二）除讨论今后的工作，应讨论对参谋人员的培养与提高参谋人员的教育。应以以上的中心行之。

（三）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地位与信仰。

（四）应先有充分的准备工作，如先开小的会议，分工讨论各部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处长赖传珠的电报。

[2] 参谋会议，指新四军第二届参谋会议，1939年3月18日至24日在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驻地召开。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领导人参加了会议。

门工作及各种制度与规则等。会议结果望电告。

毛　王　滕

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1]

（1939年3月18日）

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

---

[1] 这是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萧劲光致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电的主要内容。

给聂荣臻[1]的信

（1939年3月18日）

荣臻同志：

你著的书[2]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3]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毛泽东

---

[1] 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聂荣臻写的介绍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斗争情况的一本书。毛泽东题写的书名是《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1939年12月由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分别为这本书写了序言。

[3] 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在“三一八”纪念晚会上的演讲[1]

（1939年3月18日）

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要求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并希望每个保卫工作人员要有持久性，坚持到抗战的胜利，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出席陕北公学举行的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起义和中共中央敌军工作委员会慰问保卫工作人员晚会时发表演讲的报道。

巩固着重于华北
发展着重于鲁苏皖豫鄂

（1939年3月19日）

德怀同志，并告朱，杨[1]：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2]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3]可以腾出给你处，

---

[1] 朱，指朱德。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2] 曹菊如（1901—1981），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

[3] 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1]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2]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四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3]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鹿钟麟（1884—1966），河北定县（今定州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

[2] 沈鸿烈（1882—1969），湖北天门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

[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为梁毅题词

（1939 年 3 月 23 日）

中国具备优越的基础，就是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这首先是组织全国的人民，抗战胜利实系于此。

梁毅同志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29日）

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9年4月1日）

关于敌人在占领区的掠夺资财，攫取原料，经营工业，发行纸币，强征壮丁，以充其军实及队伍，其收效的具体程度究竟如何？请收集材料概略电告。并请此后党政军机关尽量注意此项材料，随时供给，以便参考。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收集敌占区材料致八路军总部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5日）

（一）道德教育问题。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二）新老干部问题。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三）抗大的工作。过去对于抗大的招生工作没有很好地组织，今后归干部教育部执行。抗大要组建图书馆，进行捐钱捐书。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朱德、彭德怀电[1]

（1939年4月8日）

同意规定部队干部的等级，后方已设委员会研究此问题，惟规定每个干部之等级必须慎重估计其斗争历史及职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与纠纷。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8日）

现在日本宣言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在亚洲东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独霸东亚，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门户开放。有些人说日本已经没有力量向中国进攻了，这是不正确的。在目前敌人停顿期间，速胜论又在发展起来。有些人以为这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需要长期合作了，所以又跟共产党多搞磨擦，这对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利的。必须认清中国现在还处在劣势地位，日本还要继续进攻我们，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长期合作。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底”是在鸭绿江。抗大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艰苦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时事报告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12日）

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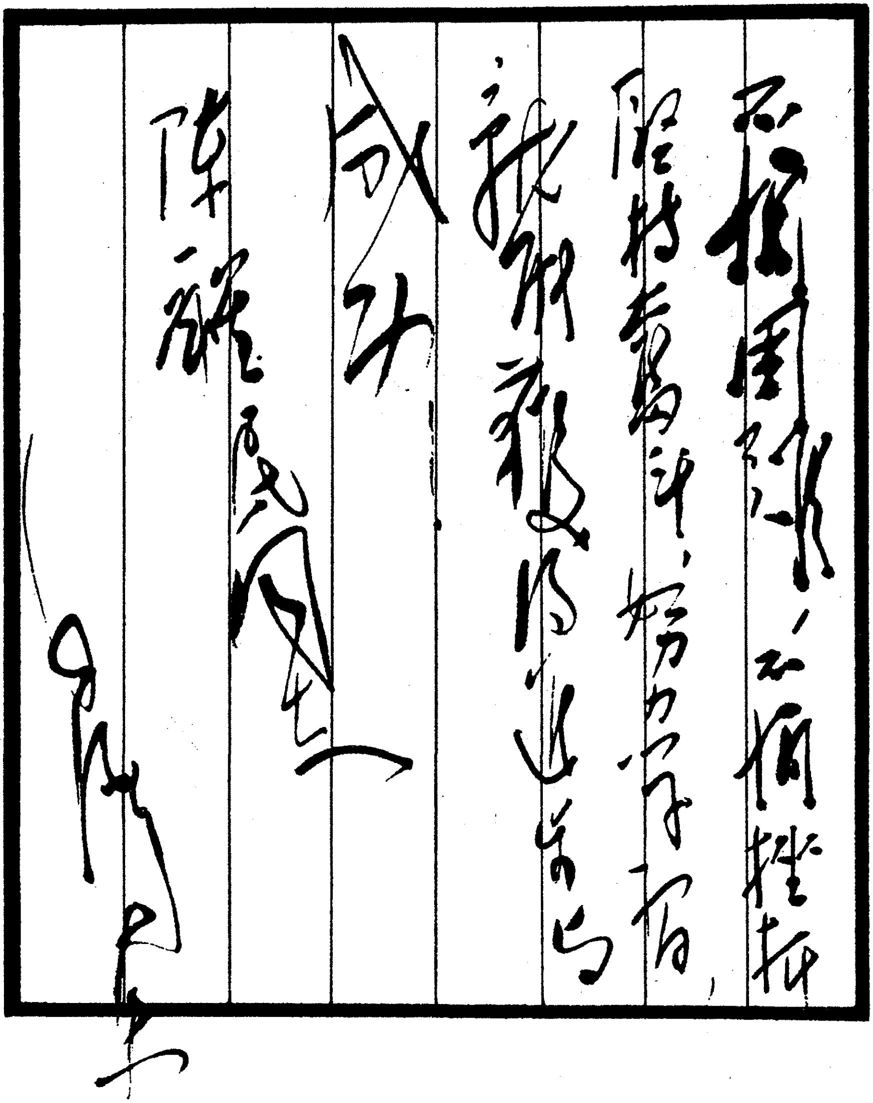
为陈醒民题词

（1939年4月18日）

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坚持奋斗，努力学习，就能获得进步与成功！

陈醒民同志

毛泽东



不怕困难，不怕挫折，
坚持奋斗，努力学习，
就能获得进步与
成功
陈醒民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陈醒民的题词。

继续开办训练班[1]

（1939年4月19日）

日本特务机关正在华北各地大肆活动，开始打入八路军部队，进行收买并组织叛变。只有大批培养锄奸干部，健全和加强各级锄奸部门的领导，才能对付敌人的阴谋破坏。因此，决定在延安继续开办训练班培养较高级的锄奸干部。

毛　王　谭　吴

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吴溉之给八路军总部、各师及有关的纵队、军区等的电报。

为消灭文盲运动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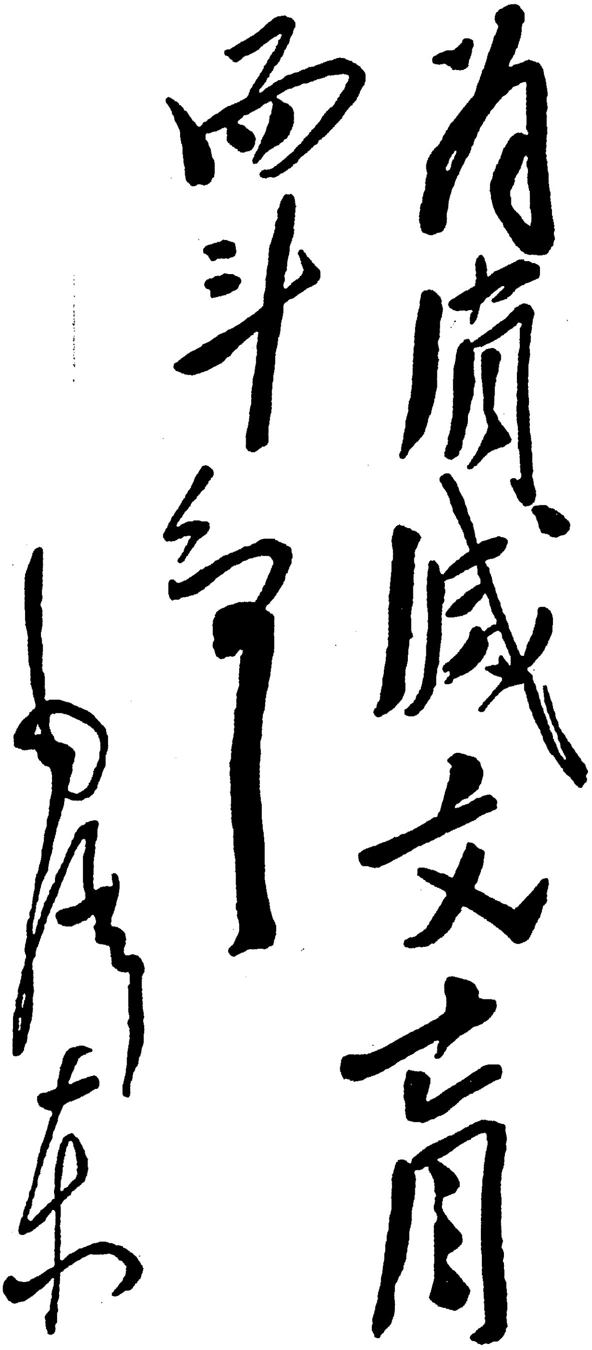
（1939年4月19日）

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支持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关于在1939年内消灭3万文盲的号召而写的题词。



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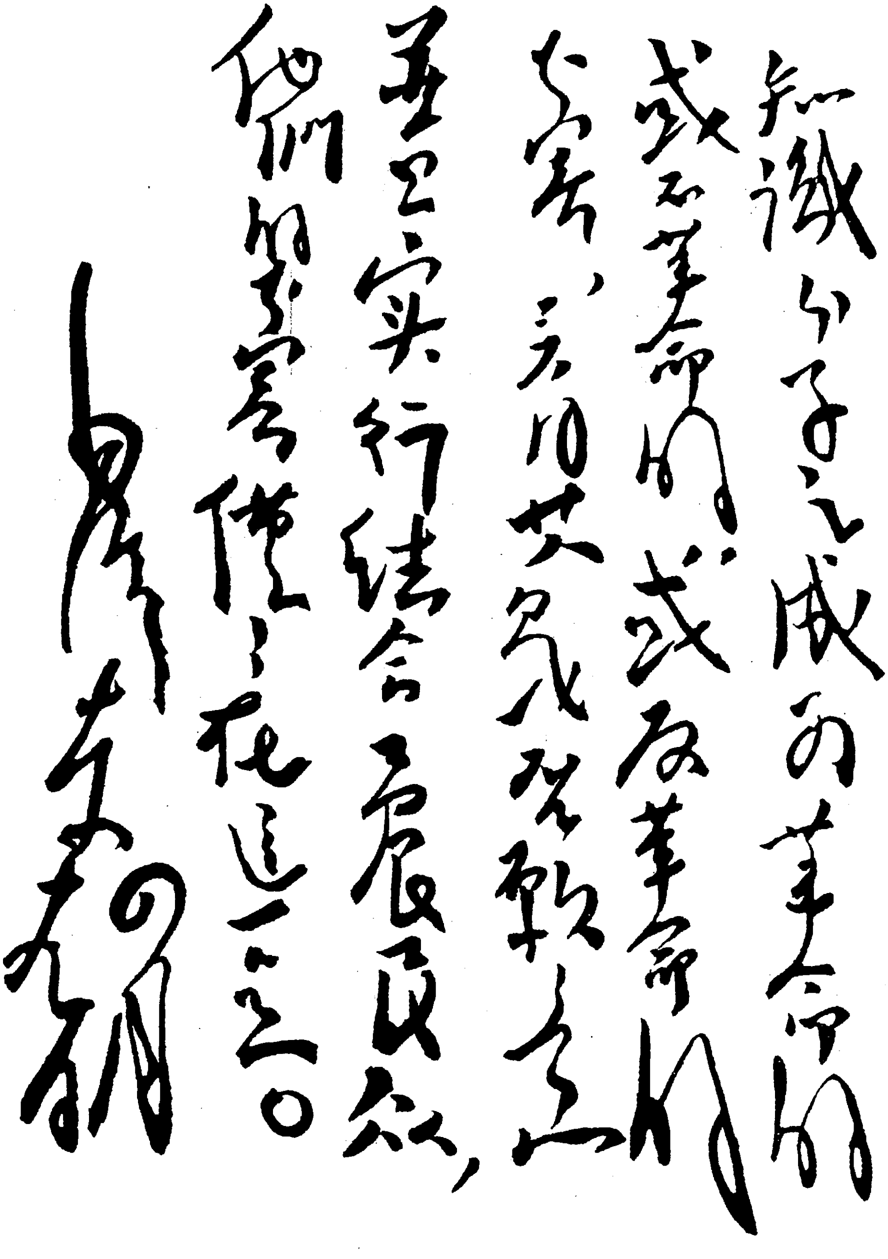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消灭文盲运动的题词。

为抗大题词

（1939年4月19日）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工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知识分子之成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界、只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结合农民众，他们的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毛泽东题

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19日）

自长征时组织部工作是重新建立的。过去组织部工作缺乏长期历史的传统，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仍要注意过去的经验，使党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门的工作都在积累全国性的经验，方法是找人来和派人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4日）

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都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6日）

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分〉歧错杂的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五月一日到三十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9日）

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有它好的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这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

（1939年4月29日）

现在全国的工作是什么？是打日本，建设新中国，所以叫“抗战建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的建设。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搞得很好。这次工业展览中，有重工业、轻工业，有大工业、小工业，在边区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这些成绩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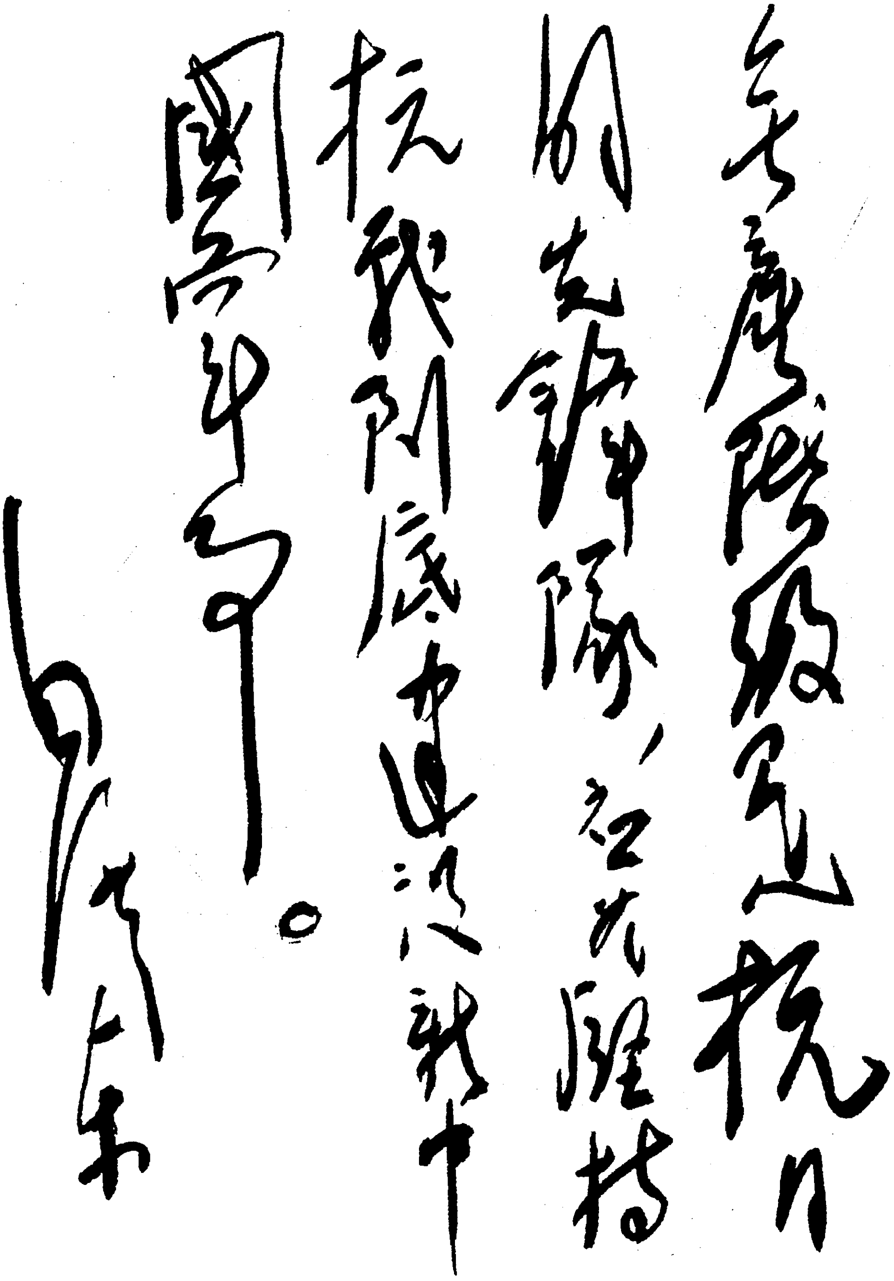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式上讲话的一部分。

为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题词

（1939年4月）

无产阶级是抗日的先锋队，应为坚持抗战到底建设新中国而斗争。



無產階級是抗日的先鋒隊，它是堅持抗戰和民主運動中鬥爭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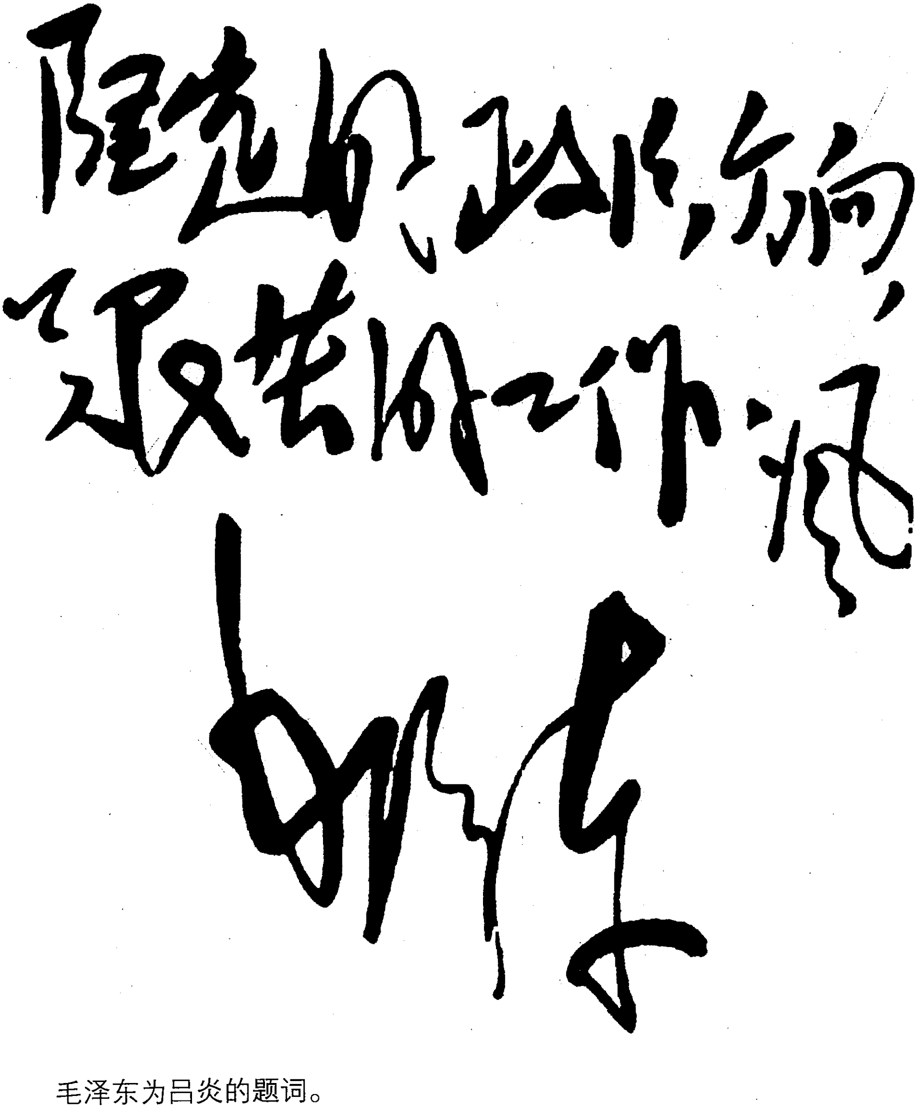
毛澤東

毛泽东为陕甘宁工业展览会的题词。

为吕炎同志题词

（1939年4月）

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的工作作风。



坚定的政治方向，
艰苦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

毛泽东为吕炎的题词。

为陈彪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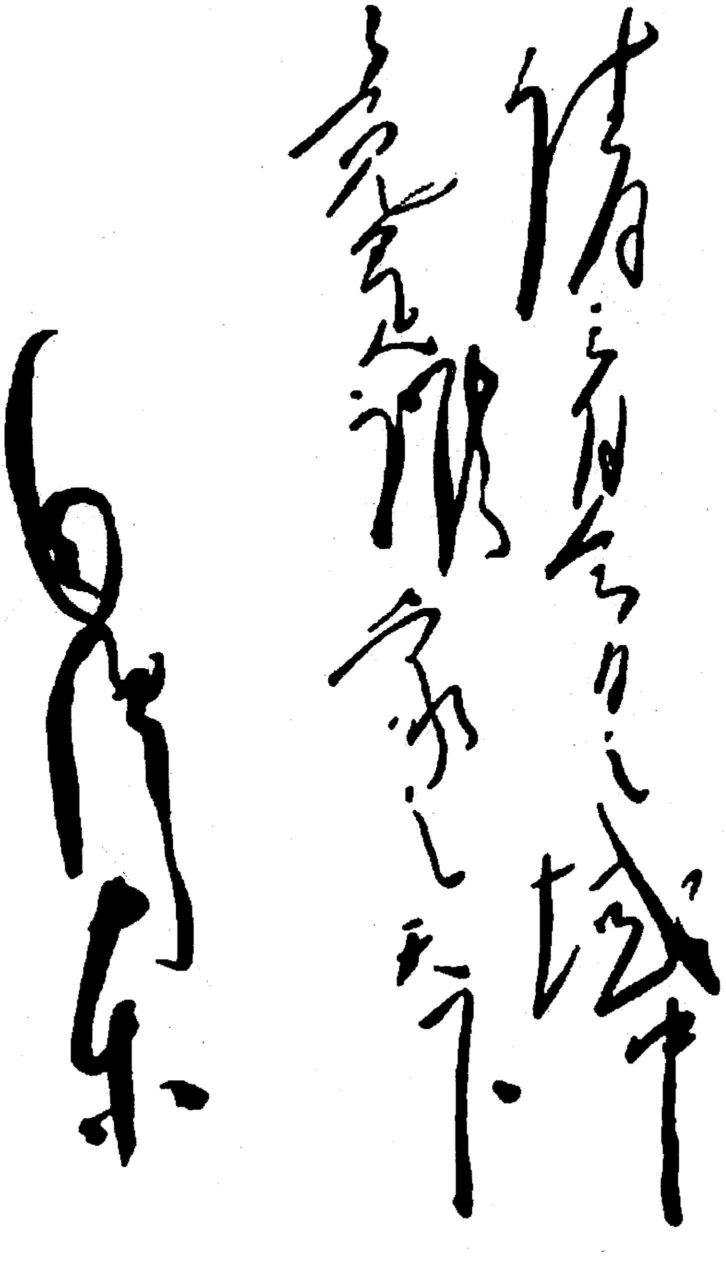
（1939年4月）

请看今日之域中[1]，竟[2]是谁家之天下。

---

[1] 域中，宇内，天下。

[2] 竟，究竟，到底。



请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陈彪雄的题词。

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1]

（1939年5月1日）

同志们：

今天延安各界为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开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会，同时，今天又是“五一”劳动节，我们开了这样伟大的纪念会，这是有重大意义的。

今天是五月一日，在今天，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只要有可能，统统举行示威。同志们：向哪个示威？向法西斯示威！向侵略者示威！在今天，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人民，全世界一切受压迫的民族，在各个地方举行游行示威，开大会，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强盗！

我们中国在今天这一天，所有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只要有可能，都在开纪念“五一”的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在全国各地，全国人民，工、农、商、学、兵，党、政、军、民，各党各派，在蒋委员长号召之下，开始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这就是今天开会的意义，我讲的第一点。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暨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

第二点，为什么要举行全国国民精神总动员呢？蒋委员长为什么要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呢？因为，我们的敌人，要达到他的目的，要贯彻他的主张，他要灭亡全中国，日本法西斯军阀，已在那里进行动员日本全国的力量，来继续进行法西斯的侵略战争，来继续这个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战争。还有，中国的坏蛋，汪精卫，汪精卫的徒子徒孙们，这些坏东西，又正在那里进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国家民族的活动，他们在进行“倒蒋反共”的活动，他们在香港、上海一带，组织什么“反共救国同盟”，汪精卫做头子，并要设立一个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府。因为日本同汉奸这样猖獗，所以我们要在全国进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号召四万万五千万人大家团结起来，振奋抗战到底的精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反对汪精卫，反对托派，反对一切狐群狗党，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要把我们的战争打到底，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所以蒋委员长就发起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国共产党就拥护蒋委员长的号召，拥护国民精神总动员。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第三点，讲到国家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全国工、农、军、学、商，一切爱国人民的国家，不是日寇、汉奸、汪派、托派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是要把汪精卫这一类汉奸除外的。还有一些不明大义之徒，他们准备做汉奸，或者精神上被汉奸俘虏的人，如果他们一定要跟汪精卫跑，也要把他们除外的。我

们的民族，是数千年来独立自尊的民族，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势不两立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民族中，只容许抗日政府存在，决不容许任何的汉奸政府存在。我们要保卫自己的祖国，我们要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日本帝国主义侵犯我们国家的独立，妨害着我们民族的生存，我们要打倒它。一切汉奸卖国贼，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也要打倒他。这就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第四点，为了达到保卫祖国，为了达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就要使抗战得到胜利。中国共产党历来主张“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于抗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打胜仗，这就是我们的唯一标准。凡能使我们打胜仗的，凡有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做，就要拥护；凡属妨碍打胜仗的，妨碍抗战的，就不要做，就要反对。汪派、托派、捣乱分子的活动，顽固分子与阴谋家的活动，我们统统要反对。任何破坏抗战的人，我们统统要打倒！

第五点，要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要达到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的目的，就要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意志、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起来，这就要实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是蒋委员长所号召的“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一切意志都要集中到最后胜利这一点上，能不能够集中到别一点上去呢？能不能够同日本和平妥协呢？决不能够！一定要争取最后胜利，一定要达到这一点！一切力量要集中到抗日阵线这一方面，能不能够集中到别的方面去呢？决不能够！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就把他当汉奸打！

第六点，为了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改造全国国民的精神，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错误的东西统统去掉。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这些东西好不好呢？这些东西要统统去掉。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要把现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的自私自利，贪生怕死，贪污腐化，萎靡不振的风气，根本改变过来。共产党历来更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抗战中间，就是要纠正一切不利于抗战的错误思想。首先是汪派托派的汉奸思想，反国家反民族的思想，一定要纠正。其他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也要纠正，例如有些人说：“马克斯主义不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这种话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孙中山先生明明白白地指示过：“马克斯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现在这些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说两个主义不是好朋友，这是反对统一战线的思想，这是反对全国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动人民的思想，也就是反民族的思想。所有这些错误思想，统统要纠正，统统要取消，才能使我们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七点，最后一点，讲到我们现在的总方针，抗战建国的方针，这就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要在抗日建国的斗争中全部实行的。民族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就是全国人民有自由；民生主义，就要全国人民有

衣穿，有饭吃，有事做。这些都是很好的，必要的，我们要坚决的实行。从今天起，全国国民都要实行三民主义！不但要口里讲，而且要动手做。有许多人，他们口讲信仰三民主义，但是据我看来，他们并没有信仰三民主义。因为信仰民族主义，就要同日本打到底，而他们却准备妥协投降，汪精卫就是已经投降了的一个。信仰民权主义，就不能压迫老百姓，而他们却不愿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利。信仰民生主义，就要照顾老百姓的穿衣吃饭问题，而他们却不愿改良人民的生活。这种人叫不叫做信仰了三民主义呢？这样的人叫不叫做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呢？只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始终不投降，不叛国，才叫做真正的信仰民族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忠实信徒。只有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力，给老百姓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不压迫老百姓，而且遵照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实行“唤起民众”，才叫真正信仰民权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的忠实信徒。只有努力于解除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痛苦，譬如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实行生产运动，使大家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才叫做真正信仰民生主义，才算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忠实信徒。同志们！我们大家要做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要做孙中山先生的好学生，决不可做一个假信徒，决不可做一个坏学生。不要光是嘴上讲三民主义，而要全部的实际的做起来。那些口讲而手不做的叫做什么？我叫他们做假三民主义者。我们号召全国国民大家动手实行三民主义，大家都做真三民主义者。我希望全国国民大家实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大家实行帮助老百姓、唤起老百姓、给老百姓以民主权利的民权主义；大家实行使老百姓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的民生主义。现在全国要求实行的，是这样的三民

主义，是真三民主义，我们要为真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

今天我们开会，就是为了这些事情，全国国民精神动员也是为了这些事情。总而言之，要彻底的实行三民主义！要真正实行三民主义！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最后胜利，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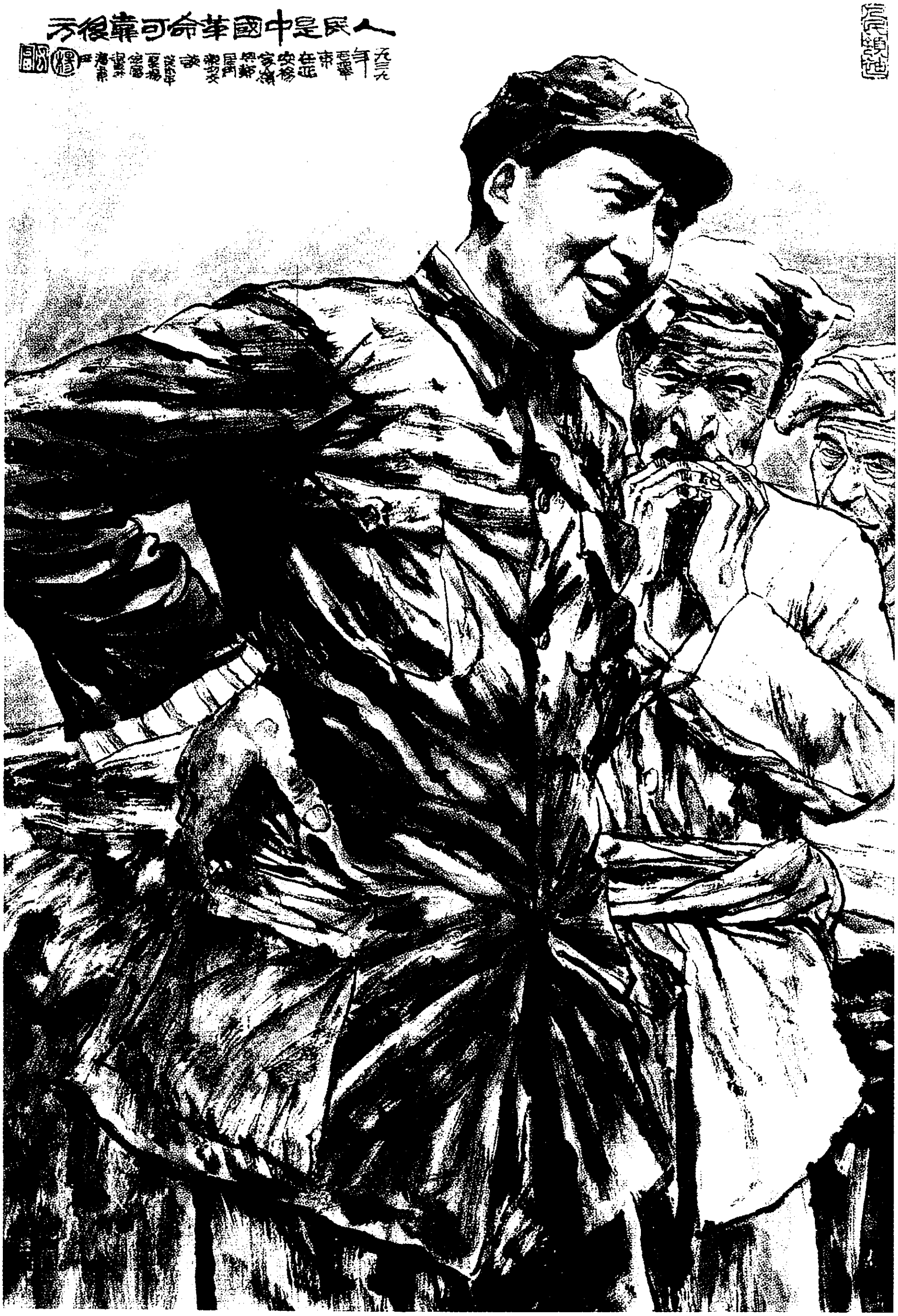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交谈。


人民是中國革命可靠後方

《人民是中国革命可靠后方》(中国画)

五四运动[1]

（1939年5月1日）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如果要从它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它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2]、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

[2] 1894年（甲午年）发生的中日战争，也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蓄意挑起的。日本军队先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继即大举侵入中国的东北。在战争中，中国军队曾经英勇作战，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中国方面遭到了失败。1895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订立了可耻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后来在俄、德、法三国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偿付白银3000万两“赎还”该半岛），赔偿军费银2亿两，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等地为商埠。

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近百年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

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全国青年们，努力啊！

青年运动的方向[1]

（1939年5月4日）

今天是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延安的全体青年在这里开这个纪念大会，我就来讲一讲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几个问题。

第一，现在定了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这是很对的[2]。“五四”至今已有二十年，今年才在全国定为青年节，这件事含着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说，它表示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快要进到一个转变点了。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现在中国的革命正在前进着，正在向着胜利前进。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毛泽东在这个讲演中发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

[2] 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3月29日（1911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来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但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则继续以5月4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那末，现在已经转变了没有呢？没有。这一个转变，现在还没有到来，现在我们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现当全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时候，大家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经验，下决心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并且不容许再有卖国贼，不容许革命再失败。全国的青年除了一部分人之外，大家都觉悟起来，都具备这种必胜的决心，规定“五四”为青年节就表示了这一点，我们正向胜利的路上前进，只要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中国革命一定要在抗日过程中得到胜利。

第二，中国的革命，它反对的是什么东西？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

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现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现在还不应该破坏一般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制，要破坏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就叫做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个革命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中是不要资本家的；在这个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中，还应当容许资本家存在。中国是否永远要资本家呢？不是的，将来一定不要。不但中国如此，全世界也是如此。英国也好，美国也好，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将来都统统不要资本家，中国也不能例外。苏联是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将来全世界统统要跟它走，那是没有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但是我们在目前的阶段上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全国青年应当为此而努力。

第三，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怎么样呢？这也是青年要懂得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

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北伐战争的革命也是一样，它胜利了，但又失败了。国民党反共[1]以来，中国又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天下。于是不得不有十年的红军战争。但是这十年的奋斗，也只完成了局部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全国的胜利。正如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现在要问：中国革命干了几十年，为什么至今尚未达到目的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所谓敌人的力量太强，是说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所谓自己的力量太弱，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表现的弱点，但是主要的是因为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劳动群众还没有动员起来，所以表现了弱，所以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

---

[1] 指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和汪精卫在武汉所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你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全国青年都应该好生研究。青年们一定要知道，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

第四，我再讲到青年运动。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但是光靠这个方面军是不够的，光靠了它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因为它还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谁呢？就是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

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啊！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拿这个观点来看过去的青年运动，就应该指出一种错误的倾向，这就是在过去几十年的青年运动中，有一部分青年，他们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联合，他们反对工农运动，这是青年运动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们实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不联合，并且根本反对工农。这样一个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反对工农，就是反对革命，所以说，它是青年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的青年运动，是没有好结果的。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1]，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讲其信仰三民主义，或者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们看，希特勒不是也讲"信仰社会主义"吗？墨索里尼在二十年前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

---

[1] 指《五四运动》。

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张国焘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他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我希望全国的青年切记不要堕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认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第五，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新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负担了重大的责任的。我们中国几十年来的革命运动，经过了许多的奋斗阶段，但是没有一次像现在的抗日战争这样广大的。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有和过去不同的特点，它将从失败转变到胜利，就是指的中国的广大的人民进步了，青年的进步就是明证。因此，这次抗日战争是一定要胜利的，非胜利不可。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现在中国青年运动的不统一，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你们应该继续要求统一，因为统一才有力量。你们要使全国青年知道现在的形势，实行团结，抗日到底。

最后，第六，我要说到延安的青年运动。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的青年运动

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你们看，在统一方面，延安的青年们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延安的青年们是团结的，是统一的。延安的知识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青年，大家都是团结的。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这还不算全国的模范吗？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

今天的大会很有意思。我要讲的都讲过了。希望大家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发挥起来，把错误去掉，使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结合起来，使革命由失败转变到胜利。到了全国青年和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的一天。每个青年都要担负这个责任。每个青年现在必须和过去不同，一定要下一个大决心，把全国的青年团

结起来，把全国的人民组织起来，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定要把旧中国改造为新中国。这就是我所希望于你们的。

对晋西北工作和河北磨擦问题的指示[1]

（1939年5月4日）

我们在河北的根本方针要达到以八路军为主，使八路军力量扩大，主任公署和县政权无论如何不取消。对最近国民党在瓦窑堡的磨擦，我们采取强硬态度已取得胜利。现在磨擦中心区在庆阳，已发生武装冲突，庆阳附近五县我们坚持不让，如果打起来了，我们便提出与国民党谈判。

---

[1] 这是1939年5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晋西北工作及河北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和萧三的谈话[1]

（1939年5月5日）

《聊斋志异》是封建主义的一种温情主义。作者蒲松龄反对强迫婚姻，反对贪官污吏，但是不反对一夫数妻（妾），赞美女人的小脚，主张自由恋爱，在封建社会不能明讲，即借鬼狐说教。作者写恋爱又都是很艺术的，鬼狐都会作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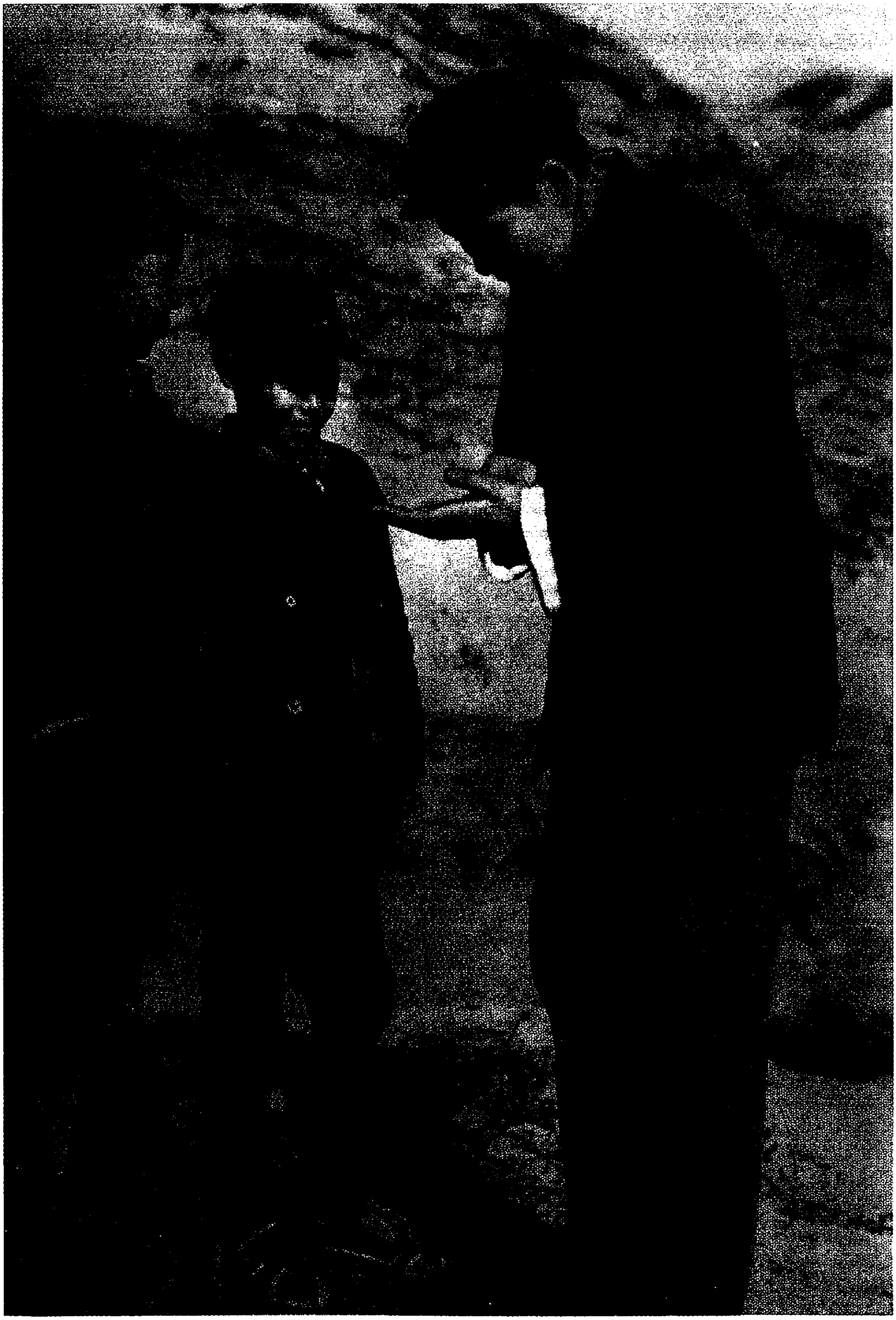
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他泡一大壶茶，坐在集市的人群中间，请人们给他讲自己知道的、流行的鬼狐故事，然后回去加工。不然，他哪能写出四百几十个鬼和狐狸精来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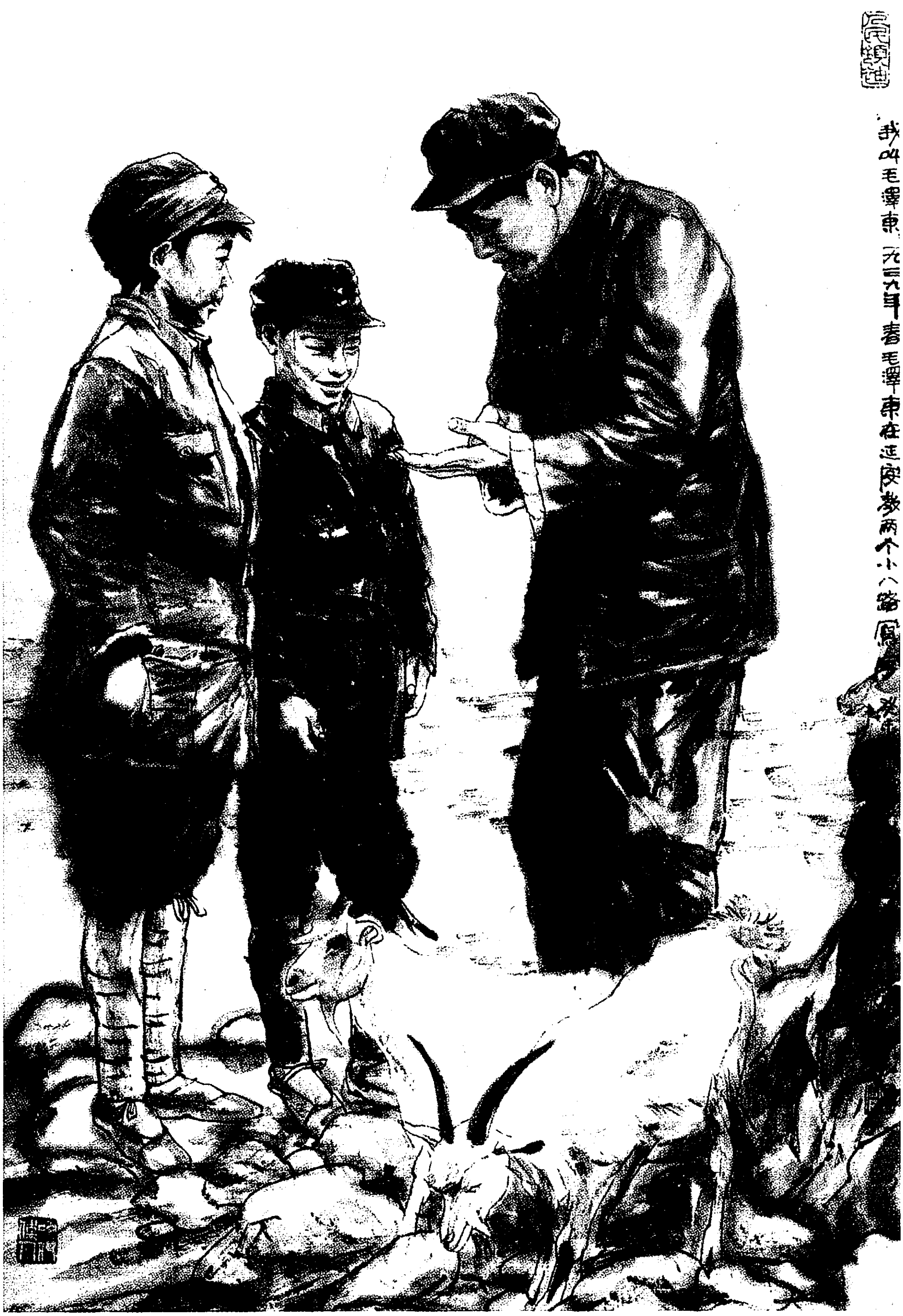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诗人萧三会面时关于《聊斋志异》谈话的一部分。

1939年5月，毛泽东和萧三在延安杨家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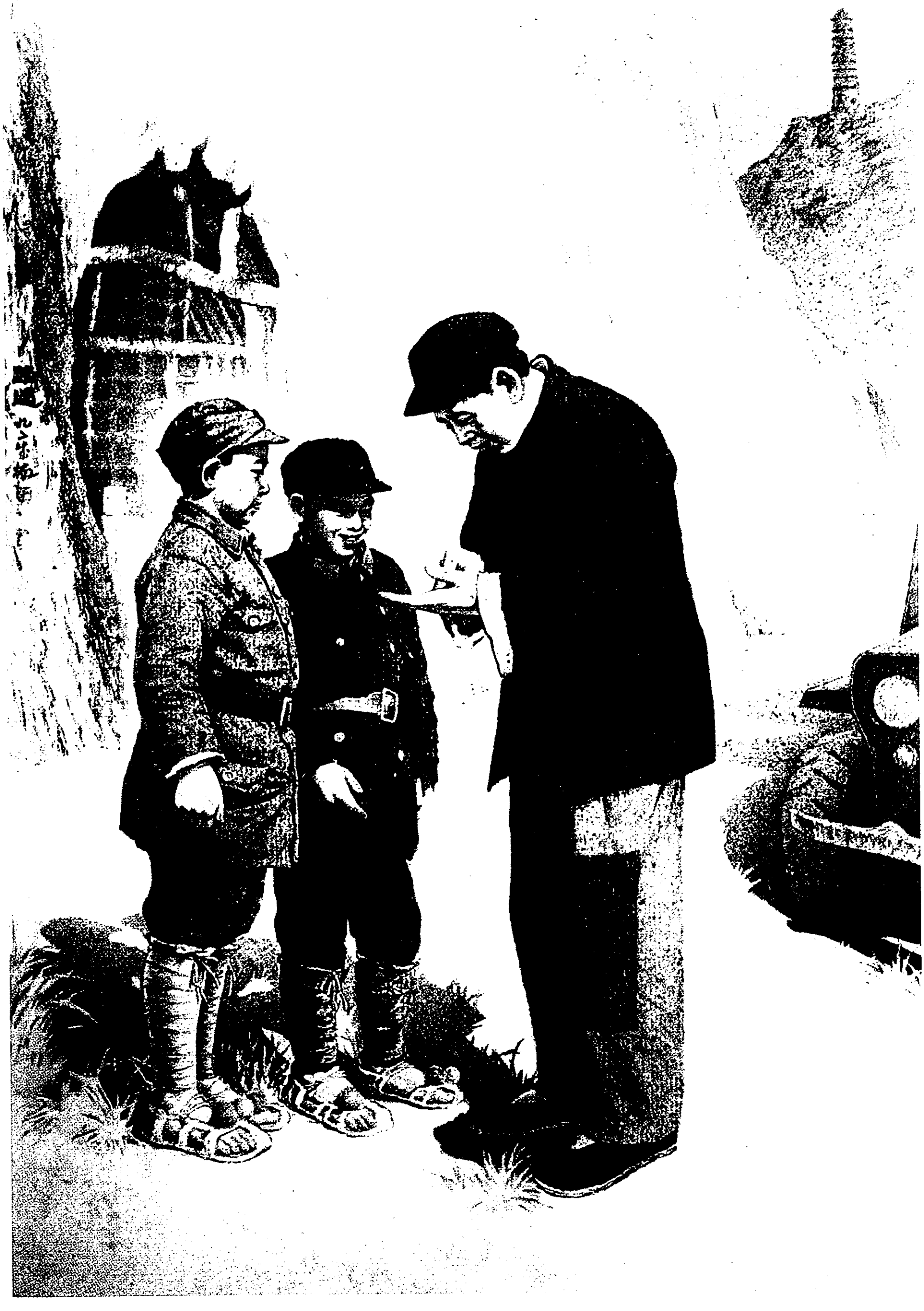
1939年，毛泽东、萧三和小八路在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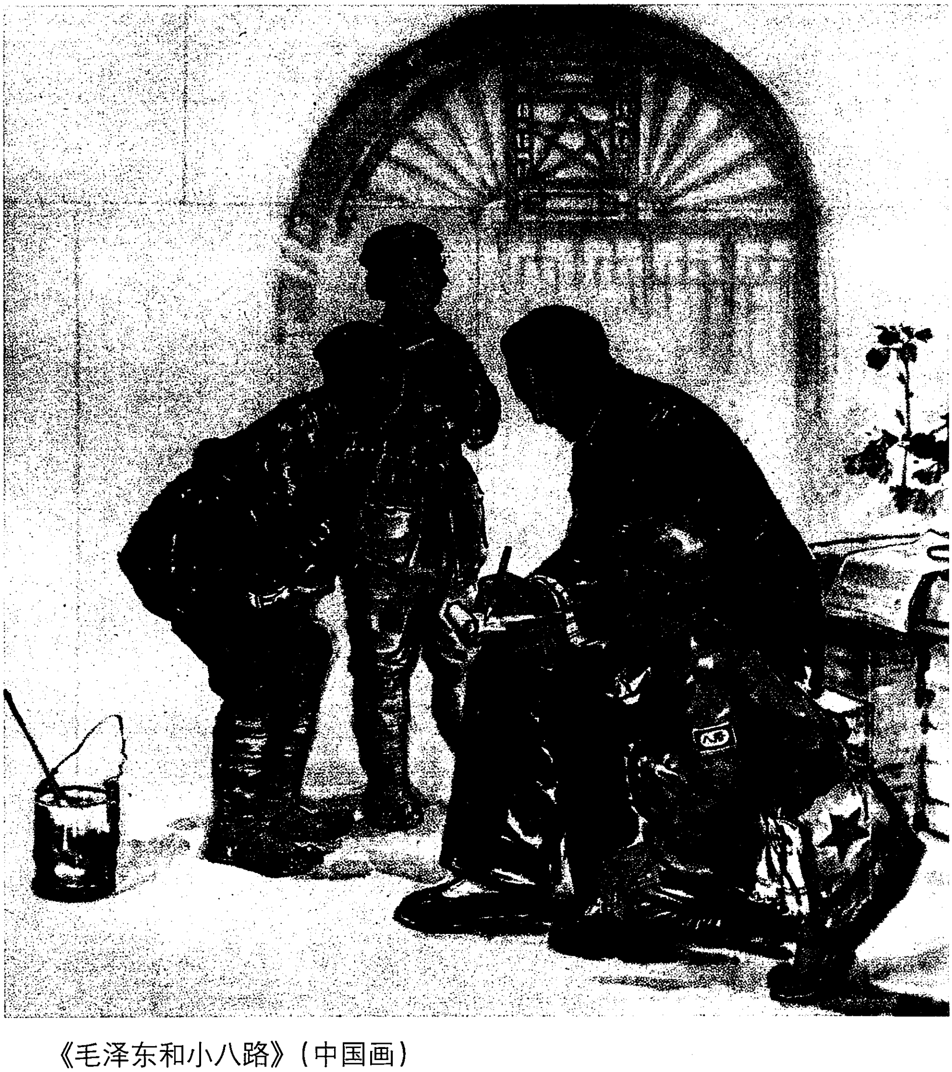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小八路亲切谈话。


我叫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春毛澤東在延安教兩個小八路寫

《“我叫毛泽东”》（中国画）



《路遇——毛主席与小八路》（中国画）



《毛泽东和小八路》（中国画）

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5月5日）

留守兵团的任务，一方面是准备对日作战，一方面是保卫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现在对陕甘宁边区确定了一个方针，叫做“四面包围，中间破坏”，就是在边区四周搞军事进攻，在边区内部派奸细搞破坏。我们巩固陕甘宁边区，有一个方针、两条原则，一个方针就是“一步不让”，两条原则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保卫边区，主要靠武装力量——留守兵团与保安队。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

---

[1] 这是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关于八路军留守兵团的任务等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为鲁迅艺术学院建院一周年纪念大会题词[1]

（1939年5月10日）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

[1] 1939年5月10日，毛泽东参加“鲁艺”成立周年纪念时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要求文艺创作既要反映抗日的现实，又要体现必胜的理想。

给潘梓年[1]的信

（1939年5月11日）

梓年同志：

四月二日信收到，当转交这里的卫生部长姜齐贤同志查明复你。以后关于医药问题，由你，或由陶先生之侄等直接与延安卫生部姜同志函商，他们会回答的。去年接到来示后，曾复了一信，不知收到否？顺祝

健进！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

[1] 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当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

关于阎锡山问题的讲话[1]

（1939年5月11日）

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磨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

---

[1] 193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和讨论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关于阎锡山部情况的报告。王世英说阎锡山最近召开的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即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这是毛泽东关于阎锡山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

1939年，毛泽东和马海德在延安。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5月17日）

中央专门讨论各部门的工作是重要的，今后要两三个月讨论一次。党的大政方针要由宣传部组织具体的宣传工作，宣传部要注意宣传工作的组织与领导，要有领导的艺术；要注意全国各地的刊物，经常收集材料；要注意组织地方党组织的对外宣传；要指示各地方党组织首先建立对外宣传机关，这甚至比建立党部还重要；还要注意国民教育的方针和方法，现在国民教育的方针是民主主义的。过去中央苏区国民教育方针是共产主义的，文艺政策是共产主义的，都不对。王稼祥在会上提出，现在国民党有许多怪论，我们应当答复。会议决定要注意回答国民党宣传中提出的问题，由毛泽东撰文答复坚持抗战三阶段问题、主流与逆流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和讨论洛甫（张闻天）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延安在职干部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5月20日）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筹备了很久，早就要开的，因为生产运动的关系，拖延到今天才开。现在各机关的同志，响应中央关于学习运动的号召，组织了学习小组，有的已经开始学习，而且有了相当的成绩，这是很好的。今天开这个会，把有关学习运动的几个问题来讲一下。

一、学习运动是必要的

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以及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是有普遍的意义和永久的意义的。

大家知道，生产运动是为了搞饭吃，搞衣穿。穿衣吃饭，我们是十分需要的，因此，现在我们的生产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全国都要吃饭穿衣，所以它在全国也是重要的。推而广之，不但全国，全世界也是如此。所以生产运动是有它的普遍性的。吃饭穿衣不但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子、孙子、子子孙孙，也是要吃饭穿衣的。因此生产运动不但过去要，现在要，将来还是要，这是生产运动的永久性的根据。

讲到学习运动。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1]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所以学习运动也有它的普遍性和永久性。

我们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有它的普遍意义和永久意义，这从一般地讲是如此。现在我来讲发起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是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现在虽然有一点，但是将来困难起来，就会不够吃、不够穿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预先准备。这样，穿衣吃饭问题就成了我们发起生产运动的直接原因。

那末，发起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

---

[1] 参见韩愈《符读书城南》诗。

些老干部，他们从前在其他部队里搞过一个时期，一切工作都是靠下命令；但是在我们红军里，单靠发命令就不行了。人家不听你，就打人，结果，工作就领导不起来，战士逃跑的很多。在部队中发命令，这是威风，但光有威风而没有本领是无用的。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所有的干部，在有威风之外，还要有本领，这就要学习。现在我们的有些战士，他们识字比营长识得多，他们从前一个字也不认识，现在能认得五百、一千、二千、三千，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我们的营长、连长，在指导员上课的时候，不去听课，他们以为这课是战斗员听的，他们去听，未免要“失格”了！为了要维持“格”，结果，他们不但文章不会做，许多东西都不知道，战士反而比他们高明。因此，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看到我们的有些教员，他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因为大概他已教过七八十遍了，但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他不知道结合新的形势把书上的东西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在民众团体里，在军队中，在支部中，这种情形也有看

到。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

使学习成为迫切需要的第三点，是我们党的特点。过去我们党的队伍小，只有很少的党员，现在党员的数目也并不多，但现在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过去是小的，现在要大，那末怎么办？现在正处于由小到大的过程中间，我们需要在全国发展党员。可是某些人说“你们何必要大”，他们不要我们大起来。但是我们觉得大一点好，而且依照老百姓的意见，也要我们大，因为他们到处找共产党找不到，我们的党大起来了才好找。这方面，我们要顽固一些，同某些人不同，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这个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时刻注意，我们要率领几万万人革命，现在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我们六中全会关于学习运动的决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党历来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过去是有学习的，但组织得比较差，没有现在这样好。现在是更进一步了，有了组织，不像过去那样无政府状态了。

现在中央设了干部教育部，负责领导全党的学习。同志们不仅看看书就算了，而且要有组织地学习。全国各级党部，边区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都须设立这样的机关，建立这样的制度，来领导并进行学习。在军队里也是一样，要设立教育部，建

立起学习制度。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

同志们：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

二、学习运动是可能的

学习运动必要虽然必要，但是不是可能呢？我们的回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并不多，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家忙得很，一个是看不懂。这两个问题完全是实情。这样忙的工作，外加生产运动，在前方的要作战，不能够学习，不但一般人如此说，甚至高级的干部也是这样说。“没有功夫”，这已成为不要学习的理论、躲懒的根据了。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在忙的中间，想一个法子，叫做“挤”，用“挤”来对付忙。好比开会的时候，人多得很，就要挤进去，才得有座位。又好比木匠师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了，这就是木匠向木头一“挤”，木头让了步，才成功的。自从木头让步以来，多少木头钉上钉子，把看不见的纤维细孔，“挤”出这样大的窟窿来，可见“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陈云[1]同志有

---

[1] 陈云，1905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挤”的经验，他有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来开会。

再一个问题是看不懂。这种情形的确存在，有的同志“宁可挑大粪，不愿学理论”。忙可以“挤”，这是个办法；看不懂也有一个办法，叫做“钻”，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在中国，本来读书就叫攻书，读马克思主义就是攻马克思的道理，你要读通马克思的道理，就非攻不可，读不懂的东西要当仇人一样地攻它。现在有些人是不取攻势只取守势，那就不对，马克思主义决不会让步，所以不攻是得不到结果的。从前人称“校对”为“校仇”，校对确实很难，非以仇人对之是不胜所为的。对于难，我们要像仇人一样地进攻它，对于仇人我们是不讲感情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过去韩文公[1]《祭鳄鱼文》里，有一段是说限它三天走去，三天不走，五天，七天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一刀杀掉。我们要像韩文公祭鳄鱼一样，十天不通，二十天，三十天，九十天……非把这东西搞通不止，这样下去，一定可以把看不懂的东西变成看得懂的。

正面搞不通，可以从旁的方面着手，如打仗一样，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学习也是一样，正面的东西一时看不懂，就从旁的东西看起，先打下基础，就可以一点一点地搞通正面的东西。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

---

[1] 韩文公，即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三、学习运动是会有成绩的

学习运动现在已经看到了成绩，有许多学习小组已经组织起来。在延安已经组织的有哲学小组、读书小组等等，而且已经见了功效，从前不懂哲学的人现在懂了一点，不懂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也懂了一点。在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组织，而且多少也有些成效。在外边许多地方，有读书会的组织，同我们在职干部的教育差不多，这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我们共产党员对学习是热情的。有人告诉我，有许多同志，自从学习运动开始后，非常热情，很高兴，本来要求调动工作的，现在不愿意调动了。这也是学习运动的功效。

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有些学校最初没有注意个人活动，不给他们以自由看书的时间，平常都是紧张得很，在组织活动方面算是不错，但这是一个不好的毛病，个人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关于这点，现在正在想法改正。我们是提倡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配合起来的，对学习既有自觉的热情又有健全的领导，因此我们的学习运动一定会有成绩的。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讲一点，就是我们干部中间，有一些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他们以为年纪大了学习没有希望，我以为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年纪大一点谁说不行呢？有句古话：“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那末，你若是五十四岁的话，还是青年呢，哪有不可学的道理?！这是我附带说到的一点。

现在我们这个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讲到大学，我们这里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女子大学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在外边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在外国有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等，他们都是学习五年、六年

便要毕业，叫做有期大学。而我们这个大学，可算是天下第一，叫做无期大学，年纪大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是活着，都可以进我们的大学。我们这样的大学，是延安独创。不过是任何人都可以进的，不论在什么地方，华北、华中、华南各地，不论什么人，共产党员也好，不是共产党员也好，都可以进这个长期大学的。

在长期大学念书成功的人，我还可以举一些例子来说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孙中山先生也是一样。当他在学校里的时候，并没有三民主义。大家知道他是学医学的，他的三民主义是出了学校之后才有的。而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开始只是一民主义，后来有了二民主义，最后他到欧洲去跑了一次，看见欧洲发生了社会问题，工人要打倒资本家等等情形，他又想了一个民生主义出来，这样才集合成为三民主义的。

至于外国，有马克思，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学的是唯心论。后来他在学校外面学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老师不同的。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所以进学校是可以进，但是这只是进一个门而已，要求得更进一步的学问，一定要在学校外边学习，要长期地研究。现在你若还不认得字，也不要紧，有希望的，只要你努力学习。

四、学习应该学到底

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今天开会后要把它克服下去。

我们学的学问，如罗迈[1]同志所讲，有党的建设，联共党史，这些东西我们要长期地学下去，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是一定可以把这些学问搞好的，但主要的是不要半途而废，如果不是这样，那会一无所成的。

除了这些学问之外，还有时事问题与党的政策。这两项，过去的计划中没有包括进去，但这是十分需要的，因为这是实际的学问，也就是“今”的学问。关于时事问题，中央已在把时事问题的材料摘出来，准备编个综合文摘，可以供给同志们研究与参考。至于党的政策，六中全会的决议，大概大家都已看过一遍，但一看就丢掉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六中全会与七中全会之间，一切会议报告，包括政治局会议的，都要研究。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

现在在职干部教育的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我们的会开了之后，大家都要努力，互相帮助，把从前有书只管自己读不给人家读的作风改正过来，今后要互相帮助学习，互相做先生，互相做学生，做同学。中央的同志，也是一样，跟同志们一道研究。罗迈同志告诉我，底下已在催材料了，同志们已在研究了，这是很好的，充分地表现了同志们的热情。好吧！在座的同志，全党的同

---

[1] 罗迈，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

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学校的领导者，就是中央。各地方党部，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都是这个大学的分校。全党同志以及非党的战士们，都须进这个学校。

我们相信，我们采取学到底的方针，一定可以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我们的学习运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成绩。我们是采取学到底的方针。在干部教育部领导之下，干部学习运动的结果我相信一定很好。我们尝试的这种办法，要推广到全党去，特别是华北的党。

抗大三周年纪念

（1939年5月26日）

抗大[1]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

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一部分人是反对抗大的，就是投降派与顽固派。这一点正是表明抗大是一个最革命最进步的抗大，如若不然，他们就不会反对了。投降派顽固派人们之起劲地反对抗大，证明抗大的革命性进步性，增加了抗大的光荣。抗大之所以是个光荣的军事学校，不但因为大多数人拥护它，称赞它，也还因为投降派顽固派人们在那里起劲地反对它，污蔑它。

抗大三年来有其贡献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成绩，这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青年有为与进步革

---

[1]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成立于1937年1月，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

命的学生。昔日之黄埔[1]，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

抗大在其逐年的改良进步中间，伴来了若干缺点，它发展了，但困难也来了，主要的是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这几项。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大，是不怕困难与一定能够克服困难的。在共产党面前无困难，就是因为它能克服困难。

抗大三周年后，改正其缺点使之更加进步，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国全世界的希望。

抗大的教职员们学生们努力啊！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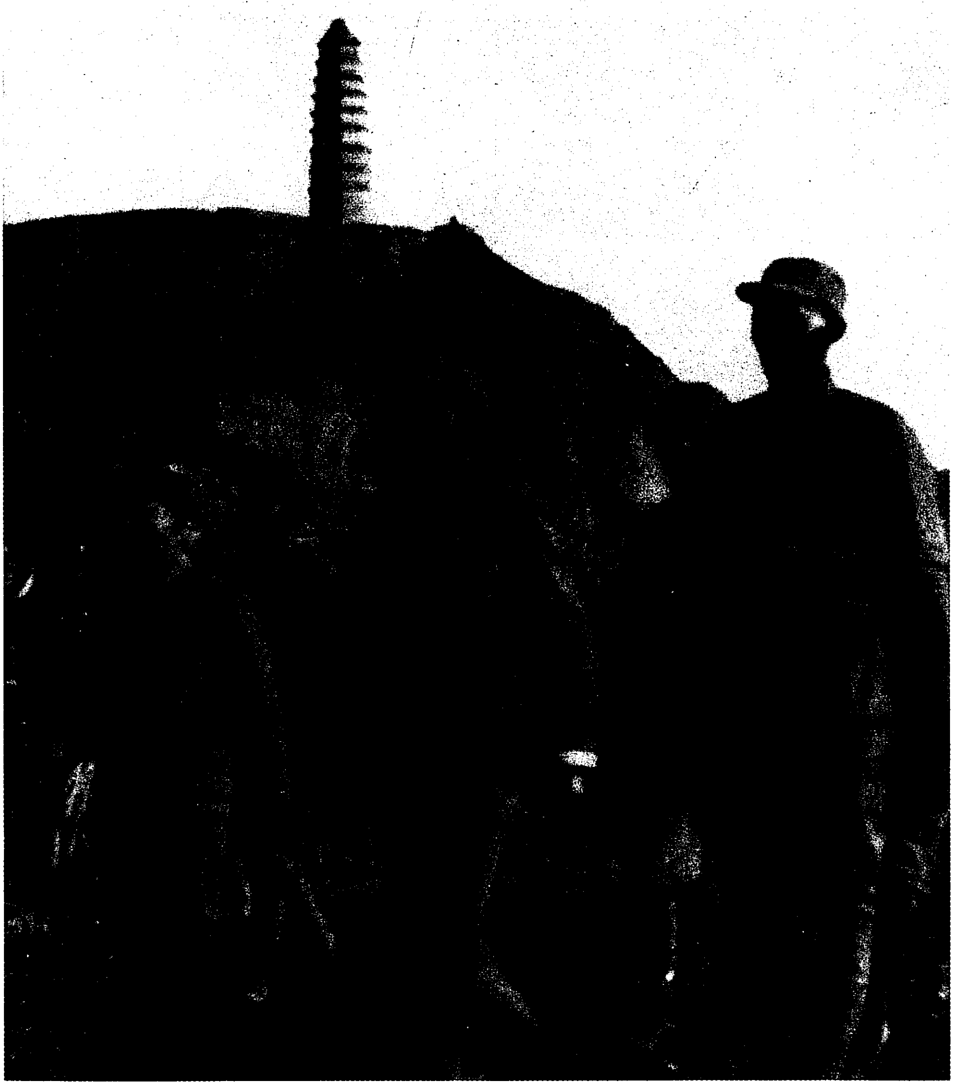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

[1] 黄埔，指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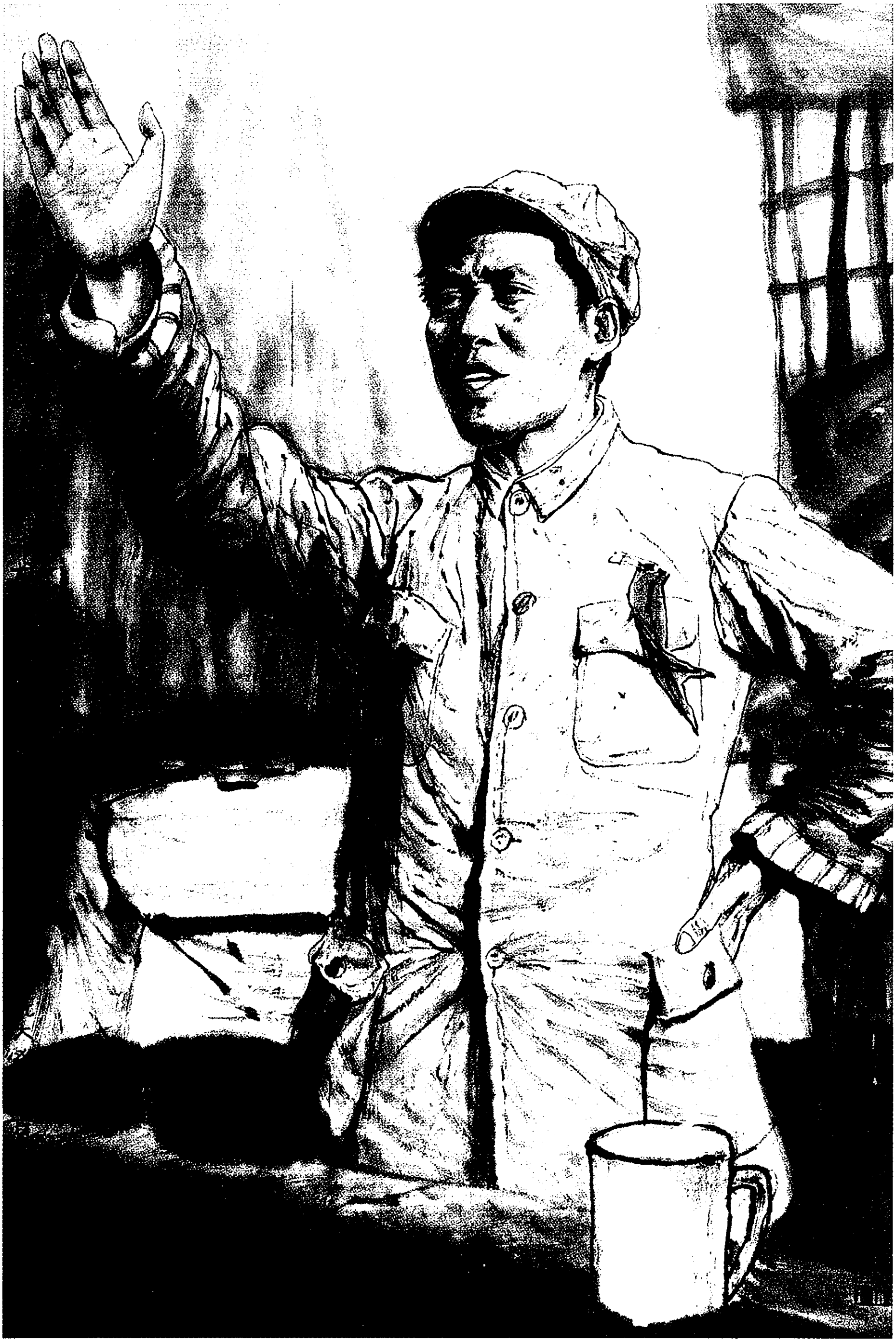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大门，毛泽东曾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亲自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委员会主席。图为毛泽东和抗大校领导林彪、罗瑞卿在一起。



毛泽东在罗瑞卿等的陪同下视察抗大。

毛泽东在检阅抗大学员队伍。



《挟雄风　破雄关　勇往直前》（中国画）

永久奋斗[1]

（1939年5月30日）

同志们：

今天开庆贺模范青年大会，我听了非常高兴，所以也来参加。

刚才冯文彬[2]同志已经讲了很多，而且讲得很好，其中有一句话，是讲“我们要永久奋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点。

从前我读书的时候，没有你们现在这样好的条件。起初读的是孔子的书，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一套。到后来进了洋学堂，受到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在学校里虽也听说过一点孙中山、马克思的话，但是真正的孙中山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出了学校门才学到的。现在你们什么都能够听到，仅仅孔夫子的少一点。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等等，还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等等，很多书都能够看到。这些书，我那时候一本也看不到。十九年前，《共产党宣言》在全国印得很少，哪里去找这样好的理论？哪有现在你们这样幸福？你们生长的时代很好，是幸福的时代，比起我当学生的时代来，是大不相同了。

你们模范青年是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时选举出来的，这个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

[2] 冯文彬，1910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意义非常重大。二十年前，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的青年，是真正的模范青年，因为他们反对卖国政府，在五四运动中流了血，参加了那样的斗争。这些青年是革命的先锋队，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自由、幸福，进行了那样的斗争，英勇得很。到今天留下来的还不少，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西北青年救国会[2]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那时候的革命青年，后来有不少成为共产党员。中国的青年运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永久奋斗”。我们共产党是继承这个传统的，现在传下来了，以后更要继续传下去。但是，也有一些人，五四运动时在北平奋斗得很英勇，后来变了，内中的一个就是张国焘，还有康白情、罗家伦[3]等一些人。他们在五四运动时代都是先锋队，现在呢？变成了逃跑队了。

---

[1]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或“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1936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2] 西北青年救国会，即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成立于1937年4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团结西北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群众组织。

[3] 康白情（1896—1958），四川安岳人。1918年与傅斯年、罗家伦等组织新文学团体新潮社，主张文学革命。同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3月与邓中夏等发起成立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赴美留学。回国后曾在各杂牌军阀的军队和机构里兼任参军、参议等职。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1919年与傅斯年等出版《新潮》月刊，投身新文化运动。5月参加五四运动，曾作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南京、上海等地联络。1920年出国留学，1926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等，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期在国民党党政机关中任职。

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这几天消息不大好，他从河内溜到上海，从上海溜到日本的京城去见日本的天皇，同日本内阁的首相平沼商议事情，讨论“精卫平沼协定”。我们不讲他这个协定里的字有多少，条文有几条，总之，就是“灭亡中国”四个大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什么是模范青年？就是要有永久奋斗这一条。其他的当然也要有，如刚才冯文彬同志讲过的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群育等等，但据我看来，“永久奋斗”才是最主要的一条，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空的。奋斗到什么程度呢？要奋斗到五年，十年，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到六十年，七十年，总之一句话，要奋斗到死，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从前有一首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1]这在我们的历史学家那里叫做“盖棺论定”，就是说，人到死的时候，才能断定他是好是坏。假使周公在那个谣言流传的时候就死了，人家一定会加他一个“奸臣”的头衔；又若王莽在那个谦让卑恭的时候死了，那后世人一定会赞扬他的。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讲历史，那两个人究竟孰好孰坏，我们不论，然而它说明了人只有到死，才可以

---

[1] 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所作《放言》中的诗句。原诗为：“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里的周公，是指周武王之弟周公旦。武王之子周成王继位时，因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

论定他的功罪是非。我们说：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要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模范青年就要在这一条上做模范。其他方面要做模范的是非常多的，例如，在政治上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青年，才是真正的模范青年。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我们对道德是这样的看法。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

我曾经讲过，中国青年运动历来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反动的潮流。在五四运动时代，一股潮流是要求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政治，改良人民生活，跟工人农民站在一块，跟老百姓站在一块，他们的立场是光明的。另外一股潮流则是跟帝国主义妥协，他们也说打倒帝国主义，但只打三天，第四天就不打帝国主义了，跟帝国主义做朋友了。他们说要革命，要民主政治，但也只有三天，第四天就压迫老百姓了。“唤起民众”这是孙中山先生临死时讲的，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但有些人也只唤了三天，第四天就不干了。至于改良民生，那更是影踪全无。这是反动的潮流，我们名之曰“逆流”。

在大革命时代，广东有两个青年团体：一个是青年军人联合

会[1]，另一个是孙文主义学会[2]，这两个团体就是那两股潮流的代表。前一个是革命的，他们是跟全国广大青年在一块的，跟工农劳苦群众在一块的。后一个是反人民的，是反共的。他们曾反了十年的共，其中有些人因反共而发了财，做了官。现在他们还是举起两只手，一只手打日本，一只手打共产党。他们又要抗日，又要反共，这事行不行呢？有些人对历史很少研究，不大知道这些事。从历史上看，汪精卫奋斗来奋斗去，结果奋斗到日本天皇那里吃饭去了，跟全民族作对。现在反共的人相当多，他们一方面说日本帝国主义可恶，要打倒；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也要打倒。你们到延安来，就有人不准，把你们捉起来，你们到这里来是很辛苦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才来到延安的。他们说你们不好，我看蛮好，是呱呱叫的模范青年。他们不准你们到延安来，说延安不好。延安的确不好，树木很少，经费不足；但是延安有民主政治，有政治自由，这在他们看来，当然是不好的。现在他们的一只手抗日，一只手反共，将来有可能两只手搞在一块，统统来打共产党，结果只能是跟日本帝国主义讲亲爱，向敌人投降，变为不抗日的。

“反共就是灭华”，这是蒋委员长讲的。这话要昭告天下，使全国青年都知道，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是反不得的。现在，

---

[1] 青年军人联合会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时领导组织的革命军人团体。成立于1925年2月1日。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的青年军人组成，主要成员有蒋先云、周逸群等。联合会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同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被解散。

[2] 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内一批右派分子为对抗革命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而建立的反动组织。主要头目有戴季陶、王柏龄、陈诚、贺衷寒、缪斌等。

我们共产党吃的是小米、黄米，而且还要自己搞饭吃，进行生产运动，而反共专家吃得又多又好，还尽干坏事。这里就有好的例子，延安县有两个县长，一个是月饷二块钱，一个是月饷一百八十块钱，拿二块钱的是共产党员，拿一百八十块钱的是反共专家。然而反共专家管的地方，只有窑洞一个，做的事情，就是反共，破坏，搞特务工作。他们这样反共下去，一定要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天下没有不走之狗，也没有不降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共专家。模范青年同志们，大家要知道，坚持反共是会变成帝国主义的走狗的。

他们反共，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是因为共产党提倡艰苦奋斗。共产党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能够忍饥挨饿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从前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有五十天没有饭吃，吃树皮，这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共产党员“吃树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则“刮地皮”。所以把共产党搞掉了，中国就不妙。大家要拥护共产党，全国老百姓也要拥护共产党。相反，那些反共的、发国难财的、吃磨擦饭的坏家伙，应该统统清除掉。

今天在座的模范青年，要跟这些反共分子作斗争，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反共。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代表全国大多数的老百姓，代表一切爱国的人，抗日的人，求中国独立、自由、幸福的人，并且是要永远的代表他们。将来你们老了，教育你们的儿子也要代表他们，儿子再告诉儿子，孙子再告诉孙子，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并且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传遍全中国，不达目的不止。我们一定要这样努力去做，长期去做，一定要把革命干成功，干到底。模范青年们，你们要切记这一点——“永久奋斗”。

读博古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一书的批注

（1938年12月以后至1939年5月以前）

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是唯物论的。

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的所以称为辩证唯物论是因为他对自然界现象的态度，他研究自然界现象的方法，他对这些现象的认识的方法是辩证的，而他对自然界现象的解释，他对自然界现象的了解，他的理论是唯物论的。[第1页]

辩证法是根本上和形而上学直接对立的。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以下的基本特点：

甲、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把自然看做互相脱离、互相孤立、互相没有依存的对象和现象之偶然的堆集，——而看做联结的统一的整

---

[1] 本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著。博古据1938年9月12日《真理报》译出。

体，在这里对象、现象有机地相互联结着，互相依存着，互相范围着。

是联结的，非不联结的。

……

乙、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观察自然不把他当做静止和不动，停滞和不变的状态，而看做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不断的更新和发展的状态，在这里永远是某种东西产生着发展着，某种东西破坏着，过完了自己的时代。

是变动的，非不变动的。

……

丙、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观察发展的过程不当做简单的上升的过程，数量变化不引起质量变化的过程，而看做这样的发展。在这里，从小小的隐秘的数量的变化转变到公开的变化，根本的变化，在这里，质量的变化之到来不是逐渐的，而是迅速的，突然的，出之于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跳跃式的转变，质量变化之到来不是偶然的，而是规律性的，是看不见的逐渐的数量变化底积累的结果。

是量变到量〈质〉变的，非仅量变的。

……

丁、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的出发点是自然的对象、自然的现象都固有着内部矛盾，因为所有他们都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自己的过去与将来，自己的衰亡方面与发展方面，而这些对立的斗争，新与旧之间的斗争，衰亡与生长之间的斗争，消灭与发展之间的斗争组成了发展过程底

是内部矛盾

因而变化的，非只外部矛盾的。

内部的内容，从数量到质量转变底内部的内容。

因此，辩证法认为：从低级到高级之发展过程不是在现象的和协的展开上发生的，而是在对象、现象所固有的矛盾的发展上，在根据于这些矛盾而动作的对立倾向之“斗争”上发生的。[第3～9页]

原始生产制度瓦解的条件〔下〕，只能出现奴隶制度。

奴隶制度在现代条件下，是糊涂，是反自然的蠢事。奴隶制度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条件下，是完全可以了解及合规律性的现象，因为他较之原始公社制度是前进一步。

……

在中国，资产阶级还有一段前途，但基本的应该依据无产阶级。

在前世纪八十年时代，在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派斗争的时代，当时无产阶级在俄国较之占居民极大多数的小农乃是很少的少数。但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在发展着，而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在分解着，而正因为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正在发展着，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无产阶级。他们并没有错误，因为大家知道以后无产阶级从很小的力量生长为第一等的历史的与政治的力量。

向后看则反对游击战，反对三阶段。

这就是说：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那么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

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那他根本

地和哲学的唯心论是直接对立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有以下的基本特点：

世界是物质的，不是精神的。

（甲）与唯心论相反，唯心论认为世界是“绝对观念”“世界精神”“意识”之体现——马克思的哲学的唯物论底出发点是：世界按其自然之本质说是物质的；世界各色各样的现象，乃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各种不同的形态；为辩证法所确定的现象底互相联结与互相依存性乃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发展的规律性；世界是按着物质运动底规律而自己发展的，用不着任何“世界精神”。[第10～14页]

……

物质决定精神，不是精神决定物质。

（乙）与唯心论相反，唯心论断言：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的意识；物质世界、存在、自然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感觉、想象、概念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底出发点是：物质、自然、存在乃是客观的真实性，他在意识之外离开意识而存在的；物质是最初的，因为他是感觉、想象、意识底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次的、派生的，因为他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高度发展的物质的产品——即脑子的产品，而脑子是思维的器官，因之如果不想陷入于蠢笨的谬误中就不能够将思维从物质脱离开来。[第15页]

……

物质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不是不可认识的。

（丙）与唯心论相反，唯心论怀疑认识世界及其规律底可能性，不相信我们的智识底可靠性，不承认客观真理，而认为世界上充满着科学所永远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的唯物论底出发点是：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为经验及实际所考验过的我们的智识是可靠的智识，有客观真理的意义；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尚未认识之物，而且这种物件将来亦会被科学及实践的力量所发现和认识的。[第16～18页]

假如自然现象的联结及其互相依存性是自然发展的规律，那么，社会生活现象的联结及其互相依存同样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社会发展的规律。

抗日战争应根据于抗日战争规律性的研究。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不应根据于“杰出人物”之良好的希望之上，不应该根据于“理性”“全部的道德”等等的要求之上，而应该根据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根据这些规律的研究上。

……

不应只看偶然的现象。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行动不应该由任何偶然的理由来领导，而应该以社会发展的规律，以这些规律之实际结论来领导。[第20～21页]

为缪敏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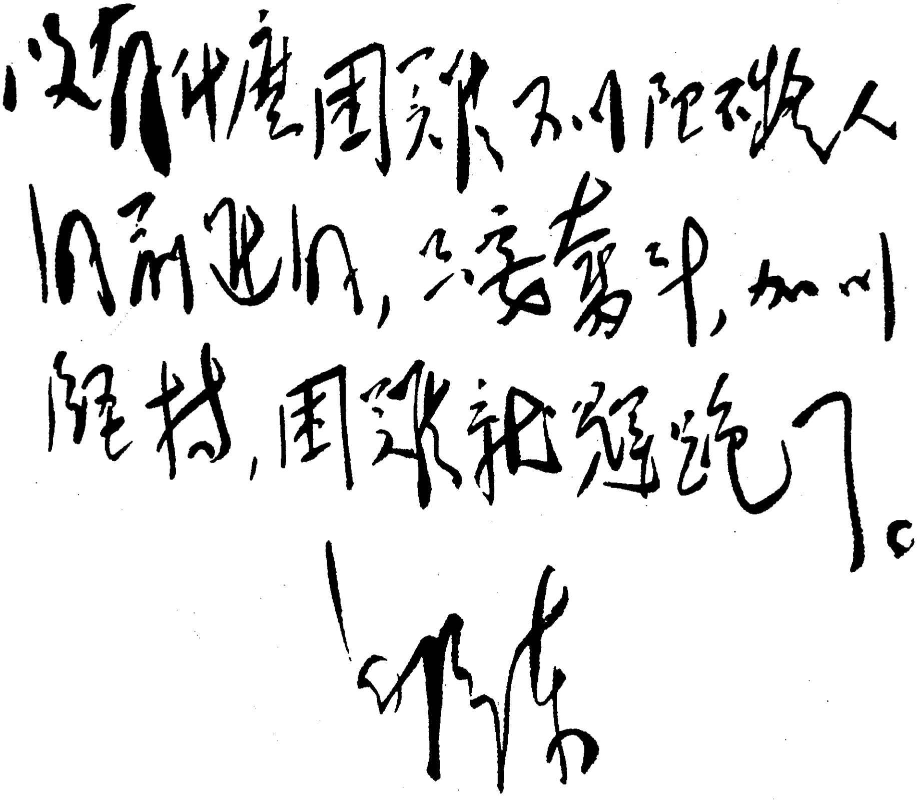
（1939年春）

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的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方志敏烈士的妻子缪敏（原名李祯祥）所写的题词。1939年春，缪敏在中共中央妇训班学习，学习结业时她在政治测验中得奖，毛泽东在其奖品上题词。



没有什么困难不可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解决了。

毛泽东

毛泽东为缪敏的题词。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1]一书批注

（1939年5月以后）

绪论　哲学的党性

二　哲学是党性的科学

……

辩证唯物论就是这两语。

辩证唯物论，从现实出发，在其发展上把捉现实，在现实当中发现某一现象的发生与死灭，所以是最彻底的唯物论。[第7页]

互相斗争的种种哲学体系的多样性，总归著于两个党派、哲学上的两个根本流派。互相斗争的主要阶级之一，如果不站在一派的方面，在政治上就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同样，在哲学上要逃

---

[1] 《哲学选辑》，这是艾思奇从当时苏联和中国出版的几本哲学著作中分别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编辑而成的。“绪论”选自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绪论；第一、二章选自米丁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的第二、三章；第三章选自李达著《社会学大纲》的第三章；第四章选自米丁等著的《新哲学大纲》的第八章。附录的第一部分，选自博古翻译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第二部分《研究提纲》，系艾思奇本人撰写。

出两个党派的阵营，也是不可能的。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指出了：波格达诺夫及其他哲学家想要超越于哲学的根本党派而创造“客观的”哲学的尝试，把他们引到了观念论。波格达诺夫超党派的哲学的说法，只是欺骗，只是背叛了唯物论的党派。“想逃出哲学上这两个根本流派的尝试，不外是想妥协的欺骗。”[1]（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种尝试，实行过毫不假借的斗争。他们能够在一般用学者式的语句所凑合的掩护之中，在用所谓“最新的发见”作招牌的掩护之中，暴露出哲学上主要党派的斗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始终一贯是党的。他们对于一切最新的流派，能够发见其对于唯物论的背叛及其对于观念论和信仰主义的默认[2]。”

凡事应从现象看出本质，从效果看出动机。

学马克斯的精明

在哲学上也和在政治上一样，两个党派互相斗争着。特定的阶级在政治斗争上，或[3]为一定世界观的担负者而出现，这件事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世界观依存于特定阶级的历史地位与那阶级在社会的发展中所演的任务。……[第8～9页]

---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7页）

[2]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6页）

[3] 毛泽东将“或”字改为“成”字。

党的，即谓是革命行动的。

对于在哲学上新的列宁的阶段的理解，特别重要的就是关于当作认识论看的辩证法的学说。列宁在认识论上指明了我们的哲学是党的，指明了我们的哲学之能动的革命的性质。他说：“只有唯物辩证法，对于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之不可分的统一，建立了更高的基础。”

同敌人斗争，敌人就归我们管了；同自然斗争，自然就归我们管了。

特定的阶级知道在其实践的活动上，把周围的现实隶属于自己，而改造周围的现实。唯物论者费尔巴哈以及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们，只是说明了世界，但重要的事情，如马克思所说，是变革这个世界。当作认识论看的唯物辩证法的要点——列宁说——就是革命的变革客观的实在，把必然性转变为自由。用阶级斗争的语句来翻译这句话，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第10页]

世界划分为两个斗争的阵营：社会主义的阵营与资本主义的阵营；两个党派：革命党与反动党，互相对抗着。

哲学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

在任何科学中，都行着两个世界的顽强的斗争。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之哲学，也一样更加显明的反映着这个斗争，所以从无产阶级的阵营退却这件事，总是伴随着对于辩证法唯物论的背叛。第二国际所以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是从修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从修正唯物辩证法

叶青[1]

开始的。伯因斯坦在前世纪九十年代，就使用这种方法，他之背叛马克思主义，是从攻击辩证法开始的。

伯因斯坦，用他自己所创造的资本主义之和平的进化的发展的理论，来对抗辩证法的飞跃说、革命说。

最重要方面是能动性

提高中国人民的能动性、热情，鼓吹变革现实的中国是可能的。

对于唯物辩证法的修正，是向着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方面——能动性、革命性——实行的。这种修正是打破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统一之尝试，而这两者的统一在唯物辩证法上，正是“内部的而且不可分的”被结合着。伯因斯坦不去提高无产阶级斗争中的能动性与热情，反而鼓吹变革资本主义现实之不可能。[第11页]

……

旧唯物论是被动的纯反映的。

普列哈诺夫虽然为唯物论斗争过，但有时却无批判的倚赖于旧唯物论，即马克思曾痛骂过的那种被动的“纯反映的”性质的旧唯物论。……[第12页]

而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暴露了曲解马列主义的两个主要形态，即机械论与少数派的观念论；更指摘了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切尝试，必定要引起

---

[1] 叶青，即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人。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捕后叛变，从事反共宣传活动。1939年年初加入中国国民党。1949年以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政治的错误。

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哲学上的这两个偏向，与离开党的方针的偏向，密切的联系着。哲学上之主要的危险的机械论，同时变成了政治上之主要的危险的右倾派的哲学基础。机械论者的哲学否定了内的矛盾、飞跃、某一发展阶段与另一阶段间之质的差异的辩证法，它与右倾派的见解有很多的照应。右倾派的阶级协调论，豪农平和的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说教、新经济政策各个阶段间的质的差异的抹煞，及其他等等，都在机械论当中找出方法论的基础。[第 14 页]

抽出革命的内容、从具体的现实分离了的那种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之抽象的命题，根本上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话为其特征的。完全无视具体的历史的情势，放出与实在的现实无关的抽象口号，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征。由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实践上就跳过必然的发展阶段（一九〇五年托洛茨基的口号“废止俄皇、劳动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党大会时代的过渡工业化等等），因而在理论上把马列主义原理公式化了（他们不适合于实在的现实的、机械的、全然从外面的去应用马列主义的原理）。[第 15 页]

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斯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斯主义

原理”。

中国的速胜论者不单是主观主义，同时又是片面看问题的机械论。唯武器论与亡国论者不单是机械论，同时又是主观主义。

当然，“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机械论者与右翼派，并不是同一的东西。例如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根本上赞助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的哲学，但同时又是机械论者。和这同样，右翼派也把机械论作基础，在许多问题上，却转入了观念论。……[第16页]

三　为党性的哲学而实行的列宁与少数派的斗争

……

理论是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组成部分。

……列宁严格的批判了机会主义之屈服于自然生长性之前的那件事，并与它相对抗，指出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与理论斗争的三个阶级斗争形态，指出了理论斗争的意义是劳动运动的指针。理论包含于当作计划看的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之中，并隶属于后者，构成后者的重要的因素。[第18页]

实际上，如果主体阶级和党的一切活动，终于只是迎合现存物；那么，对于现实的这样的态度，能够产生出具体的理论来吗？这不是单单自行迎合下去吗？这是在原则上否定，由于阶级

张国焘
陈独秀

（当时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之积极的独立的斗争，在阶级战线上对于现存势力关系造出别种势力关系的可能性。[第18～19页]

在中国，有时以与资产阶级联合，但同时进行独立的宣传组织工作为利益。有时以与资产阶级决裂，以便独立进行斗争为利益。

我们为甚么以打开后一发展方向的策略为利益呢？——列宁这样质问着。为甚么这两个发展方向对于我们没有同等的意义呢？我们为甚么用全力向着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的民主专政的方向进行呢？这是因为劳动者与农民的革命，能够以最大的速度及最少的牺牲，接近于革命的下一个环——社会主义的变革。[第19页]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过少数派的手，从一九〇五年俄国现实基础上实现出来的那种具体条件被割离了。一方面原理变为空虚的一般的命题——公式化；另一方面，离开了原理的新事实的记载，提供了爬行的经验论。就是提供了只记载在一般联结之外的个个散乱的事实就觉得满足的那种理论。[第21页]

中国也有这种人

折衷主义

主观的非唯物论的立场更加是那样，它们偶然的从现实把事实分离出来，往往表面的机械的使它互相统一。在这种情形下建立了孤立的解释那个事实的基础。这叫做折衷主义。在折衷主义之下，丧失一般的基础及个个事件间的联结。联结个个事实个个方面的一般基础，这正是具体的

这种错误很多人犯着

现实，即一定的社会。如果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极抽象的理论的命题出发，在这种情形便丧失一切基础——因为有这个基础，各种事实才不能不在特定方式上被统一起来。在一般的基础丧失时，联结就变成人工的任意的产物，重要的各种事实被放弃了。列宁说：“在社会现象的领域中，最流行的方法，最无益的方法，莫过于分离个个小事实和玩弄实例。为要在事实上奠定基础，就必须无例外的把捉与所考察的问题有关系的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个个的事实。否则就会任意的选择并搜集事实，就会无视整个历史现象之客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注重无意义的事情，而采取‘主观的’处理方法。”

……

类推法的危险，中国人犯的太多了。类推须是真正的同类。若是形同类而实不同类，而妄用类推法，没有不错误的。如拿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比，拿北伐战争与苏维埃战争

列宁分析帝国主义战争的问题，这样说过。一九一四年的战争表现最高发展阶段的资本之内在的矛盾。这个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腐朽时代的必然的产物。战争由于掠夺殖民地与重新分割世界而发生。我们不能拥护这个掠夺战争。我们要用内乱的口号对付这个战争。拥护祖国的人们，却向着列宁一派叫嚣，说这种主张错了。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具有积极的方面。因为这个战争引起了各国国民（巴尔干，比利时）的民族解放。马克思在一八五四年到七六年的战争时代，不是曾经表同情于交战国的一方面吗？——少数派这样

的把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地主斗争时代的民族战争的情势，无条件的移到资本主义的腐朽时代了。

比，拿第一大〈次〉大战与现在的大战比。

列宁这样写着：“这样的论断是诡辩，因为它把老远的过去的历史的时代，代替现在的形势。”[1]一切这些折衷主义，都用马克思的名字掩护了。装作真理曲解事实，被粉饰了的折衷主义辩证[2]论——少数派用这个代替具体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少数派与其他类似者为辩护自己的背叛而树立的防卫祖国的有名的口号，在诡辩中使保护祖国的运动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国际主义与保护祖国运动并不是不能相容的——第二国际阵营中发出了这种话。不但如此，他们又说保护祖国运动，只是听任各国劳动者保守自己的祖国，依照自己的志愿去实行，少数派从整个历史形势的联结，割取个个事实，个个方面，提供了直接拥护资产阶级之“理论的”辩明的断片。

诡辩论即是折衷主义。

但是少数派用一种作招牌看的理论的基础，掩饰了自己的失节。这正是当时第二国际阵营中流行的诡辩论的显著的特殊性之一。诡辩论——掩饰了的失节——往往用说谎的招牌代替现实的

---

[1] 参见列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诡辩》。（《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2页）

[2] 毛泽东将“辩证”一词改为“诡辩”。

现今中国的无数诡辩论

内容。表面上好象伸缩性，实际上却从某一命题逃到别一命题。表面上好象有理论的根据，实际上却是诡辩。诡辩论是虚假，是伪善，即说话与行动完全不同。诡辩论投合于少数派的迎合性，最切合于少数派的精神。列宁说：一切机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他的迎合性。我们必须了解并考虑少数派这种特殊性。

诡辩论是主观观念论之一种。

服役于垂死的资本的政党，也有与他相照应的特别的世界观。不想推测人类的未来，并且害怕未来，使得他们走到卑俗的观念论、迂回的经验论、用主观的诡辩论解释现实的立场。完全背叛劳动阶级就是完全背叛辩证唯物论。[第22～25页]

四　两个战线上的斗争

……

从多数党的斗争分离哲学、分离理论与实践，这是复活了第二国际的最有害的传统与信条之一。所以党的中央，把德波林一派的全部事业，鉴定作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

机械论也同样

观念论是在认识上把现实的诸特征诸方面之一，延长并夸大了的东西——列宁说。[第34页]

只学个别科学，不学基础科

与普列哈诺夫不同，列宁把唯物辩证法当作统一的体系，贯串于政治的，哲学的著作之全体

学（唯物辩证法）是不对的。

中。唯物辩证法，在列宁一方面，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第 36 页]

哲学的党性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列宁关于辩证法的学说之本质的方面——认识在理论与社会的历史的实践之不可分的统一中深化——是德波林一派完全不知道的。关于比较任何哲学都彻底的我们的哲学的党性之列宁的思想，包含着隶属于唯一目的的理论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之不可分的统一——这种思想，被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们所曲解了。从社会主义的实践分离理论，这件事从另一方面到达了与机械论相同的处所。即，实践失掉哲学的基础，变成了服役于阶级的敌人的很卑俗的拜金主义。于是机械论者与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互相接合着，在这一点，再现出与第二国际的意识形态之典型的特征相结合的，即与抽出内容的空虚信条相结合之“事实”的粗杂的经验论。只是理论上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的机会主义的这方面，更加用马列主义的文句来粉饰，来掩蔽。……[第 36～37 页]

第一章　唯物论和唯心论

一　哲学中的两条路线

……

最初的唯心论发生于原〔始〕人的无知，后世的唯心论的发展由于统治阶级的需要。

在全部历史过程中，这两条不可调和的哲学路线底生存底社会根源，是应当从阶级的、矛盾的社会结构中去找出来的。最初唯心论之发生，是原始野蛮人迷盲无知底产物。此后，由于生产力继续不断的发展，促使科学知识也随之而发展；科学既日趋昌明，则唯物论应该是可以达到完满的胜利而把一切唯心思想都消除下去的。然而从原始社会迄今，唯心论不但不曾消灭，而且还在继续地发展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它底基本原因是在：社会有阶级底划分；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所统治，它为着自己的利益而竭力巩固其唯心的理论和学说。

天赋人权论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发生的。

唯心论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代表着剥削者群底意识形态，而往往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底发展，是革命阶级底宇宙观抬头底表现；它在阶级社会内，要从对反动哲学——唯心论——的不断斗争中开拓出自己的道路来。自然这里我们不能规定出呆板的历史图表来，以为革命者一定都相信唯物论，保守者一定都站在唯心论方面。我们知道常有这样的场合，即未成熟的社会阶级往往用唯心论底口吻（例如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唯心论，天赋人权论，以及一部分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其实例），来表达他们新的革命的要求。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战斗唯物论固为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底意识形态；

可是十七世纪的唯物论，照恩格斯底指示，却是贵族“出身”的（……）。同样的在历史发展现阶段上的唯物论，假使它是庸俗唯物论或机械唯物论的话，那末在现今的条件之下，它也可以发生反动的作用。然而一般地讲，唯心论总是为保守的社会阶级所利用的最方便的武器。[第40～41页]

哲学之具体的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内只有阶级的科学。它总是适应着一定的阶级任务和阶级利益以尽其职能。当统治阶级的意识及其利益要求真实地认识现实以达到发展生产力底目的时，科学中就包含着唯物论的原素；……可是当剥削阶级底社会生活条件不让它们忠实地去认识现实时，当它们底生活条件歪曲和限制着它们底见解，当真理底认识足以危害它们底阶级利益的时候，它们的科学就变成唯心的了。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不会了解哲学争斗中的一切。谁不同意科学和哲学底阶级性，就证明他是企图掩盖自己哲学底阶级性。[第41～42页]

之一

唯物论者恰恰相反，他们认定宇宙底一致就在于它底物质性。意识，思惟，是物质的本性之一；这种本性只是当物质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阶段时才发生的。……[第43页]

所以我们反对唯心论的争斗，反对历史上统治得很久的那种神秘理论的斗争，不仅是要我们自己抛弃旧的唯心哲学底全部理论内容，而且还得把唯心论用批判的手段征服下去。我们必须把唯心论底阶级根源揭露出来；同时我们不能撇去唯心哲学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而不加以思索。我们揭露了这种或那种唯心论体系底内部的逻辑，并予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同时阐明了唯心论解答问题的偏面性，它底主观的盲目性以及它对于现象底一片段和一方面之唯心的夸张。[第49页]

这种情形机械论同样

二　机械唯物论

……

旧唯物论底历史的限制性，表现于下列三大基本特点：机械观形而上学性和不会把唯物论应用到社会生活底领域中去。新的唯物论底任务，就在克服这三个缺点；这一新唯物论是在另一个社会关系底阶段上和科学发展底新水准上生长起来的。[第61页]

只有两大特点

……现今的机械唯物论者……他们不能理解物质现实界之复杂的辩证法，不能理解它底矛盾、转变和交流底重要性，它的质的繁杂性及其各个领域底特殊性。他们把高级的、有质的特殊性的法则（例如社会的法则、生物的法则等

交流

等），简化为纯数量的、从机械学里抄袭来的法则，简化为均衡论底原则和两种相反的力底交叉底原则了。他们又把质地不相同的各种运动形式打成一片而都归纳到空间的机械的转移位置底运动体系中去。……[第62～63页]

第二章　辩证法唯物论

二　世界底物质性和物质存在底形式

……

承认相对的均衡

辩证法唯物论不承认有绝对的静止。但是它当然承认有相对的静止、相对的均衡，这是运动底成素之一，是运动底特殊场合。辩证法唯物论承认“物体之相对的静止底可能、暂时的均衡状态底可能，是辨别物质、因而亦即辨别生命的最重要的条件”。[1]（见恩格斯著，《自然底辩证法》，页十三）[第172页]

四　客观的绝对的和相对的真理

……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3页）

德波林本人也说："一切现有的真理，皆非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真理本身，我们却永远不能把握着的。我们只是在我们底认识和行动过程中接近着它"。（见德氏著《思想家的列宁》，页二七）我们只是接近着绝对真理而永远不能把握它——这是德波林底观点，这种观点跟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列宁底见解完全相抵触的。

到达了每一相对真理，就是到达了绝对真理之一部分。除开相〈绝〉对真理，无绝对真理，同样除开绝对真理，就无相对真理。

五　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

……

照列宁底说法，"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有一般性底价值而且还有直接的现实性底意义"。（见《列宁文集》卷九，页二六一）人类关于外界和外界中所发生的过程之理论的认识，揭露了历史发展底规律性和倾向；但是只有社会的实践予理论以彻底的证实，从实物之历史的具体性上去把握实物。列宁说："理论的认识应予吾人以实物之必然性、它底各方面的关系和它底'自在'和'自为'底矛盾的运动。但是只当人类的观念变成'自为的存在'（即在实践中）时，这种观念才能'彻底地'抓住、把握住这一客观的真理。这就是说，人和人类底实践

在理论应用时

是认识底客观性底标度证据。”[1]（见列宁著《再论职工会》）……[第205页]

第三章　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

一　对立统一的法则

……

退步谓旧物死去。

至于辩证法的发展观，却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不同。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承认世界的运动性与可变性。……“所以关于全宇宙及其进化，人类的进化，以及那些进化在人类头脑中的严密的反映，只有依靠辩证法的方法，只有依靠于成长与消灭、进步的变化与退步的变化之普遍的相互关系作不断的考察，才能成就”。辩证法把任何事物或现象的发展，当作由其内的特殊性所规定的、从一种形态到他种形态的转变去考察的。换句话说，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当做事物本身的自发的发展去考察，当做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的运动去考察，当做事物本身的自己运动去考察。[第223页]

运动是矛盾，是矛盾的统一。先就力学的运

---

[1] 所注引文出处有误。这段引文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27页)

动举例说明：力学的运动，是作用与反作用，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的统一。……

精神与物质，内部与外部，现象与本质，质与量，肯定与否定，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现象与本质，[1]根据与条件，内容与形式，目的性与因果性，必然与偶然，必然与自由，可能与现实。

其次，物理学的运动，是阳电气与阴电气，阳磁气与阴磁气的统一；化学的运动，是原子的化合与分解。

再次，就生物学的领域来说。一切生命现象，都是生与死的统一。生命过程，与死的反对过程不可分离的联结着。

……

再次，进而说到社会的领域。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内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社会的发展是阶级的对立的发展。

以上所述，是客观的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物质世界的这个客观的辩证法，反映于人类的思想上，就成为主观的辩证法，成为概念的辩证法。必然与偶然、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等一切概念的矛盾，都是物质世界的客观的矛盾之反映。由概念的矛盾，促进概念的运动。而概念的运动是适应于客观对象的运动的。[第224～225页]

---

[1] 该段批语中出现两处“现象与本质。”

二　由量到质及由质到量的转变的法则

……

但是，我们为要完全的表现事物过程之质的规定性，首先要从最单纯的判断出发。例如，行星是太阳系的要素，资本主义是社会的构成等，都是最单纯的判断。我们从这种最单纯的判断出发，即是从“个别是一般”的判断出发。各种的质，都因其特殊性，因其固有性而成为一般的一部分，并包含着一般。各种事物各有其质的固有性，在其质的固有性之中表现出全体。因而个别包含一般。行星在其特殊运动中，表现出太阳系的一般联系；资本主义在其特殊规定性之中，表现出社会的一般发展法则，表现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统一。[第238页]

个别与一般的相互渗透

个个事物的质，正因其存有矛盾、内在的不完全性，所以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须以别的对立的质的规定性为前提，并在其与对立的统一中才能存在。行星正因为有太阳，才成为行星而存在。猛兽只在草食动物存在的处所才能存在。因此，具有一定的质的个别事物，并不是绝对的孤立存在的。各个事物都和其他一切事物有共通之点，常与别的事物有一定种类的客观的联系。我们当暴露各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之时，必须暴露

肉食动物与草食动物的互相渗透、互相联系，一质与他质相需相成。

一个事物与别的事物的深刻的联系，证明种种质的相对性及其互相渗透。[第239页]

客观世界，处在永久发展的过程中。不但个个事物是变化的，是过渡的，并且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变化，也和它们本身的变化相联系。不但个个动物有生有灭，并且动物一切的种也有生有灭。在社会方面，社会构成的变化，都是通过人类和他们的相互关系的变动而发生的。所以结成新联系的过程，形成新的一般的过程中的个个事物的改造，同时是破坏旧联系的过程，是消灭旧的一般的过程。个别和一般的发展的内在矛盾之理解，是理解质的变化、质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及两者的相互联系的关键。[第240页]

要吗是一系列的新，要吗是一系列的旧。

事物的属性，是在事物的运动中显现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展开的各种属性，表现出事物的各个方面。我们通过事物的属性，去认识事物的质。事物的一切属性，一切方面，我们固然不能无条件的完全都摄取出来，但在我们的感觉之中，可以反映出事物的一定属性和一定方面。我们依据实践，能够认识事物的许多属性，许多方面，暴露它们的内的统一，更深入的认识事物的质的规定性。

不能无条件完全认识属性，感觉只能反映一定属性。

依据实践才能认识许多属性。

质与属性是统一的。但这个统一，是辩证法的统一，是充满矛盾的流动的统一。具有一定的

质也发展，即质之量的发展。

质的事物，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种种不同的阶段。在各个阶段中，展开出种种的属性。这一定的质，必在种种属性中显现，并通过种种属性才能发展。各个阶段上所展开的属性中所显现的这一定的质，具有种种不同的程度，显出种种的差别。但质与事物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结合着。在这事物存在的限度内，在这事物的发展过程未终结的限度内，这一定的质在各个发展阶段上虽显现出种种差别，而该事物仍当作该事物而存在，即一定的质仍是存在。……

在说明了质与属性的关系以后，再说起质的界限的问题。如上面所说，凡是具有一定的质的事物，都具有内的矛盾。从一个方面说来，这事物具有全体事物的性质，即个别中包含着一般；从另一方面说来，这事物在自己的特殊性上是被限制着。正因为有这个矛盾，所以特定事物与其他事物相结合，与其他事物互生关系。但特定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外的联结，并不解决它的内的矛盾。反之，质通过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而发展，因此完全暴露自己的有限性。……[第241～242页]

相需由于不足（有限性）

三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

设定
展开
解决

……所以肯定、否定及否定之否定，必须当作现实过程的矛盾的发展及其解决的形态与阶段去考察。第一阶段，是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设定的阶段，是肯定中孕育着否定的萌芽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事物的矛盾的发展的阶段，是否定肯定而又孕育再否定的阶段；第三阶段，是再扬弃否定的阶段，是由先行诸阶段的发展所准备的矛盾之相对的解决的阶段，是新事物的出现而又成为新事物发展的出发点的阶段。……[第265页]

五　必然性与偶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法则与因果性

原因与结果，在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形成为对立的统一。在相互作用上，原因变为结果，结果又变为原因，两者互相转变，互换地位。例如，我们从任何物质运动过程中抽出任一现象而追溯其因果时，就知道这一现象是先行现象的原因[1]，是后一现象的结果[2]，同时又知道原因的现象更有原因，结果的现象，更生结果。……[第311页]

……

---

[1] 毛泽东将“原因”一词改为“结果”。

[2] 毛泽东将“结果”一词改为“原因”。

某种事物的存在

可能性也是客观的实在。某种事物的存在条件虽然存在着，而它的存在不能当作必然性主张的东西，叫做可能性。……[第316～317页]

第四章　认识的过程

一　经验的认识、感觉

……

那时，人类还只是自然物。后来，生产发达，才加上社会性。

如果说在人类最初的发展阶段上，他们狭小的视野外的自然对于他们一方面是反抗的、没交涉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把自己从自然分离开来，那么，也可以说，物质生产的发展，就是要把自然的这种乖离和人与世界的这种直接的自然联结渐渐废弃。历史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的统一，它的真正的基础，是社会的、物质的、实践的活动（即劳动）。农业、工业、物质生产力的发达，生产的发展和分化，分化了的生产部门的结合，新的生产手段和消费资料的发生——就在这里，有着了人类的感性视野发达的基础。……[第332页]

作始也简，

……旧唯物论把感觉当作认识的出发点，是不错的。唯心论就是“忘却了”这个端初，所以对于“终结”的概念虽然发表了贵重的思想（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论），但它的整个方向，却根

将毕也钜。[1]差之毫厘，谬以千里。[2]

本不正确，根本包含着错误，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僧侣主义的泥沼里。……[第 337～338 页]

如果“之前”发生，就是意识规定存在了。

……人类是实践活动的主体。而人类的社会意识，通常又常是落在人的存在之后，落在人的物质状态之后，落在人的实践之后发生。不是意识规定存在，而是社会的存在规定了社会的意识。……[第 339 页]

三　概念

……

人类有在原则上反映客观实在性（以及客观实在性的运动和矛盾）的能力，实际上也只有把所反映的表象甚至感觉普遍化以后，才能够获得有机体的成长的概念，以及资本主义的榨取的概念，物质的无限性的概念，微分的概念等。人类用感觉或表象的形式去获得客观的实在对象的形象，但还一点也没有透入到它的本质。只有用思惟形式，人类才能在内的、必然的、有规律的联结中去认识对象。……[第 345～346 页]

对，质是看不见的。

在十七、八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中，概

---

[1] 参见《庄子·人间世》。原文是：“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钜”，同“巨”。

[2] 亦说“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或“毫厘千里”。参见《礼记·经解》。原文是：“《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谬）以千里。’”

念已经不是象唯名论的“共通名称”那样主观的空洞的东西了，相反地，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对于普遍概念给与了绝对的、必然的、普遍的、客观的意义。但它的概念也决不是辩证法的。第一，它的概念只是被看做普遍的东西，却决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们把客观实在性里仅只具有片面意义的，或只会在一定部分发生的现象、属性和关系等过度地普遍化起来。象不可入性、机械的惰性、质量——这一切的属性，不过“只是物质的某种状态上固有着的相对的东西而已”[1]。（《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就因为把这一切的属性强压到物质界全总体上，所以就必然地不得不带着纯外在的形式的性质。第二，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概念中反映出来的东西，是（成为十七、八世纪科学中一般周知的通常对象的）物质的属性。因为当时科学还是未发达的，所以不能在这些概念中把客体实在性的更深刻的联结和关系寻找出来。第三，十八世纪大多数的唯物论者们所理解的物质，都只是外的地空间的地相互冲突着的、现成的、完成了的事物的总和。对于事物交互作用的法则，也同样机械地去解释。因此，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的概念，必然只反映着它们的外的联结和关系。……[第

二与一重复

不是寻找，是反映。

---

[1] 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348～350页]

研究提纲（附录二）

第一部分　哲学和政治

三　辩证法唯物论的阶级性和党性

……

三，在中国，无产阶级是属于坚决抗日的党派的，无产阶级的哲学，也是抗日的党性的哲学。

抗日的战争是进步的革命战争，抗日的党派是进步的党派。凡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垒里的阶级党派，都是进步的。

都是进步的，但是有差别的。

凡代表抗日党派的哲学思想，即使不是辩证法唯物论，也是有进步性的。

无产阶级与一切抗日党派联合。

无产阶级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也与一切抗日党派中的哲学联合。

抗日阵营以内有两条政治路线，一条是彻底的，一条是不彻底的。哲学路线也一样，前者对后者必须批评并克服之。

联合的目的是，共同努力完成抗战建国的任

务，用哲学的力量来帮助完成这任务。[第434～435页]

不但是帮助，而且是指导。

四　辩证法唯物论的发生和发展

一，首先，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分的构成部分，是和马克思主义同时诞生的。

不但是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第435页]

十一，在中国研究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要站在民族的基础上的：要综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经验，作为发展辩证法唯物论的基础；……[第438页]

是要站在民族的和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民族的与劳动阶级的利益之一致。

第二部分　唯物论与唯心论

二　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产生基础

……

三，唯物论的进步性也是有例外的：

机械唯物论在近代辩证法唯物论出现以前是进步的，在后者出现以后，却成了反动的逆流。

因为机械唯物论所代表的阶级，这时已不是进步的了。

抗日阵线中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的两面性，在其向日本帝国

主义斗争上与在其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时是进步的，在其向辩证唯物论斗争上与向辩证唯物论斗争时是反动的。这种同时存在的两面性，规定了辩证唯物论应该联合唯心论与机械唯物论，同时又批判之。

四，唯心论一般地是剥削阶级的哲学，所以不是进步的。

它的反动性表现于用主观空想的迷梦掩蔽了客观事实的真理。可以分为三点来讲：

甲，唯心论巧妙地使宗教迷信合理化，精神支配物质的思想，即是神支配世界的信仰在哲学形式上的伪装。

乙，唯心论常把夸大的理想，蒙蔽着人的如实观察事实的眼睛，这样把压迫现状合理化，使人安于被压迫的状态。

丙，唯心论常是利用人类知识不足的地方，用空想来填补它，在科学的有缺点的地方寄生地存在着。[第444～445页]

六　二元论

……

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

七，二元论在中国也有传统，中国的中庸思想常常就被人曲解为折衷主义，或妥协调和主义，张君劢[1]在他代表国社党给蒋委员长的信中说

---

[1] 张君劢（1887—1969），江苏宝山人。1932年4月发起成立中国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鼓吹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1934年4月，被选为国社党中央常务委员兼总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4月代表国社党致函蒋介石，表示愿共赴国难，并称：中国的民族性是“不走极端而好调和”，当时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中庸性之重要文献。”

到中国的民族性是中庸主义时，也就有这样的意味。

想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中间找一条另外的路的企图，在目前的中国可以看见不少例子，然而都是不能不成为二元论性质的东西。

只看见调和的方面，而忘却了斗争的方面，在今日对敌人抗战的中间是有危险性的思想，是在坚决抗战前面的动摇。[第462页]

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他本来是这样的。

七　客观唯心论和黑格尔的思想

……

二，客观唯心论在社会变革的问题上的表现，就是英雄造时势的思想，社会的变化是英雄的目的和意志的实现，而不是依着一定的物质法则的社会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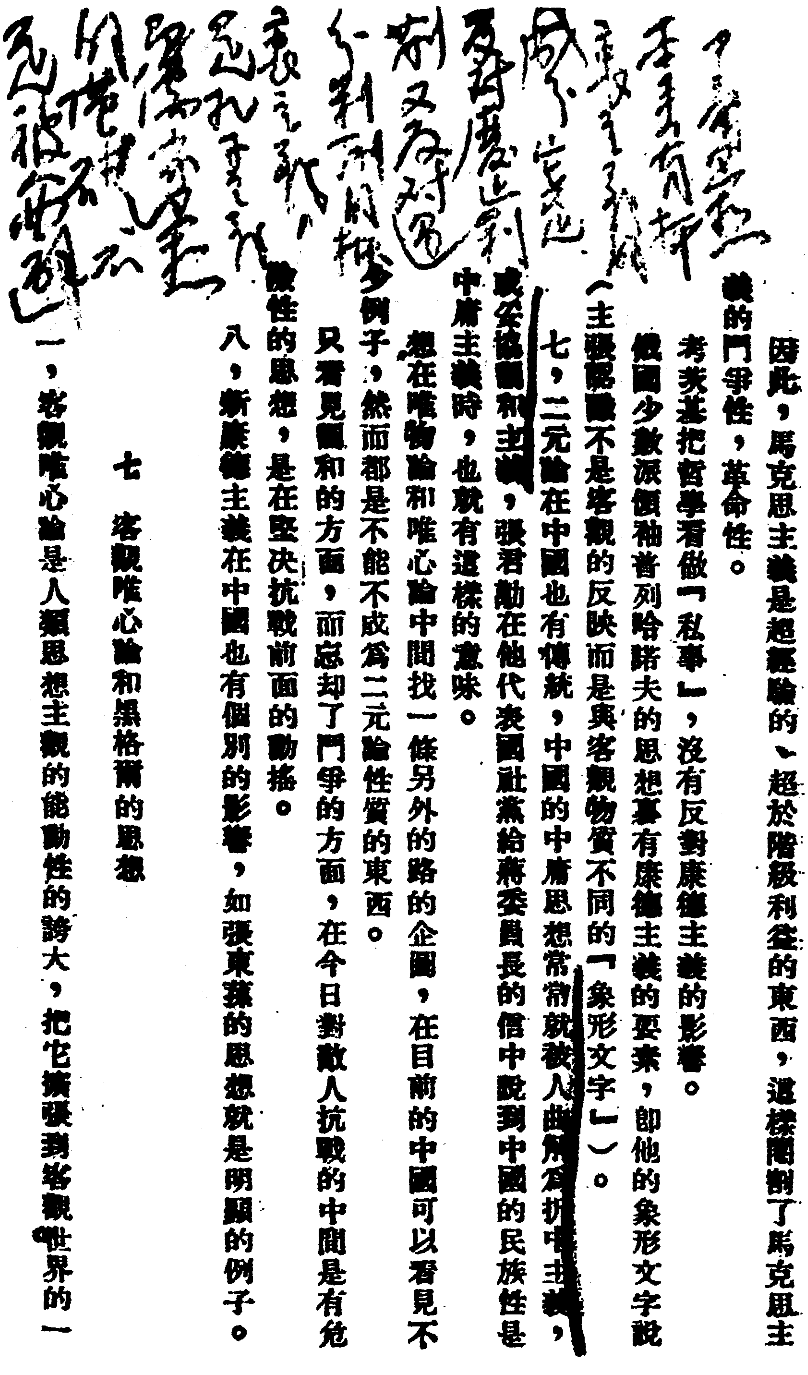
要动员群众作社会变革的运动，也只要完全依据精神上的鼓动，而不必从物质上作丝毫的改善，——这见解也是客观唯心论。中国过去的教育救国的主张也是这一种唯心论。

英雄造时势，主要的是主观唯心论，他并不必承认什么客观的心。教育救国也一样。

三，客观唯心论的反动性：

甲，与宗教上的宿命论观点联系：一切都是神或伟大的精神的目的意识作用，被压迫者的反抗是无用的。

乙，英雄决定一切，故人人的生存只能绝对



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极[illegible]表现[illegible]孔子[illegible]思想[illegible]封建主义[illegible]不反对[illegible]

因此，馬克思主義是超經驗的、超於階級利益的東西，這樣閹割了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性，革命性。

考茨基把哲學看做「私事」，沒有反對康德主義的影響。

俄國少數派領袖普列哈諾夫的思想裏有康德主義的要素，即他的象形文字說（主張認識不是客觀的反映而是與客觀物質不同的「象形文字」）。

七，二元論在中國也有傳統，中國的中庸思想常常就被人曲解為折中主義，或妥協調和主義，張君勱在他代表國社黨給蔣委員長的信中說到中國的民族性是中庸主義時，也就有這樣的意味。

想在唯物論和唯心論中間找一條另外的路的企圖，在目前的中國可以看見不少例子；然而都是不能不成為二元論性質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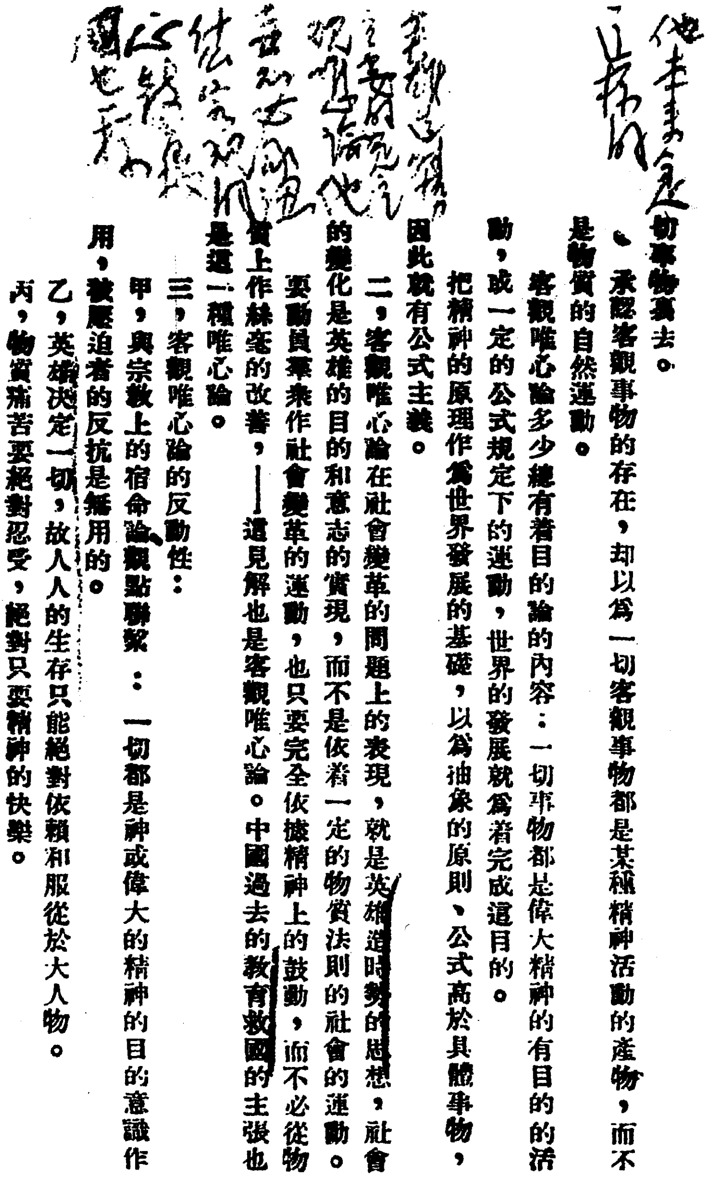
只看見調和的方面，而忘却了鬥爭的方面，在今日對敵人抗戰的中間是有危險性的思想，是在堅決抗戰前面的動搖。

八，新康德主義在中國也有個別的影響，如張東蓀的思想就是明顯的例子。

七　客觀唯心論和黑格爾的思想

一，客觀唯心論是人類思想主觀的能動性的誇大，把它擴張到客觀世界的一

毛泽东读《哲学选辑》批注的手稿。



他未来一定

[illegible]

切事物裏去。

、承認客觀事物的存在，却以為一切客觀事物都是某種精神活動的產物，而不是物質的自然運動。

客觀唯心論多少總有着目的論的內容：一切事物都是偉大精神的有目的的活動，或一定的公式規定下的運動，世界的發展就為着完成這目的。

把精神的原理作為世界發展的基礎，以為抽象的原則、公式高於具體事物，因此就有公式主義。

二，客觀唯心論在社會變革的問題上的表現，就是英雄造時勢的思想，社會的變化是英雄的目的和意志的實現，而不是依着一定的物質法則的社會的運動。要動員羣衆作社會變革的運動，也只要完全依據精神上的鼓動，而不必從物質上作絲毫的改善，——這見解也是客觀唯心論。中國過去的教育救國的主張也是這一種唯心論。

三，客觀唯心論的反動性：

甲，與宗教上的宿命論觀點聯繫：一切都是神或偉大的精神的目的意識作用，被壓迫者的反抗是無用的。

乙，英雄決定一切，故人人的生存只能絕對依賴和服從於大人物。

丙，物質痛苦要絕對忍受，絕對只要精神的快樂。

毛泽东读《哲学选辑》批注的手稿。

依赖和服从于大人物。[第463页]

第四部分　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

一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反映论

……

形而上学唯物论以为真理的认识就是绝对完全的客观反映，以为真理可以一次把握尽净。

辩证法唯物论认为客观的绝对真理不是一次可以把握尽净，真理的认识是不断地更深刻和更完全地反映现实的过程。

因为客观物质是多样性的，有着无限的多方面的内容，有限的认识能力不能一次汲尽。[第478页]

认识能力在各个阶段是有限的，在全历史上是无限的，方能逐渐地把握绝对真理。不承认这个认识能力的历史无限性，就要陷入不可知论。

第五部分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

二　质变量、量变质的法则

……

二，什么是质？质就是一事物本身的规定性，是使此事物与他事物有区别的规定性，……

……

三，质和属性。我们凭什么来把握一事物的

质为主要矛盾所规定，属性为次要矛盾所规定。

质的规定呢？凭属性。

甲，属性就是特点，或特性，又叫做“固有性”，一种质里包含着无数的属性。

乙，属性是一事物在对外的关系中反映出来的质，事物有无数的关联，所以也有无数的属性。

属性的认识，就是要把握“这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的全总体”[1]。

丙，属性有主要的和次要的分别，主要的属性是和一事物的质分不开的，质的规定决定于主要的属性。[第491～492页]

一切属性由质所决定，质为主要矛盾所决定。[2]

这样，质的规定性自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完全把握到的，必须经过各方面的观察和考察，但因为根据这观察、考察所得的感觉经验，就可以作具体的直接的规定，所以费尔巴哈说：“质就是感觉。”

那么，什么是理性？

质是根据感觉经验在理性上把握的，感觉得到的只是规定质的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8页）

[2] 以这样排印的是毛泽东写的批语，下同。

矛盾的物质体。

单只把握属性还没把握质，要根据属性进一层研究才能把握质。

把握了属性，就把握了具体的质，就能够认清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种类的对象有什么不同。[第492页]

六，量变质。……

……

乙，量变质是中国的中庸观念的基础，也是两条战线斗争的理论基础，要维持一定的质，人的行动必须在适当的量的限度内，不能过或不及。

中庸观念是有一定的真理内容的，它的错误不在于了解量变质的道理，而在于从形而上的观点上把这道理绝对化，使它变成死的不变的道德标准。

在于肯定质的安定性

两条战线斗争的标准，因实践的发展而不同，但中庸主义则是不管时代的发展，只定下死的永久的质量的标准。

旧统治阶级的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是反动的方法，用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使旧质绝对化。马克斯〈思〉主义的两条战线方法是革命的，只承认质的相对安定性，没有绝

对主义。

虽然是各方面的量变，但是属于两大主要方面的各方面的量变，这两大主要方面之一方面的量变小了，另一方面则变大了，于是过程的质就变了。

丙，事物的质有各方面的规定，所以量变是各方面的量变，研究量变质的过程，也要从各方面的量变来考察。

质变是各方面量变的互相关系的变化的结果。

质为矛盾的统治方面所规定，质变即矛盾的被统治方面转变为统治方面。

丁，量变的中间，同时就有新质的准备，所以结果才达到质变，新质的出现不是无根据的。

新质就是同旧质的矛盾方面相反对的矛盾方面所规定的质，这种反对方面的量变到了最大限度，就引起整个过程的质变。

七，质变量。

甲，旧质转化为新质，在新质的基础上立刻有新的、更迅速的、更高度的量的发展，这就是质变到量变，或质变量。

乙，质变量表示量的发展[1]不是直线渐进的，而是在一定的阶段上要有突变和飞跃。[第494页]

八，渐进与飞跃。……

……

丙，飞跃有各种形式，因着事物不同而有差异，飞跃也不是毫无时间性。飞跃完成的时间长短，也因事物而不同。[第495页]

这一句是多余的，而且不甚正确。

三　对立统一法则

……

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意义：……

甲，同一性可以从三个意义上来了解：

（一）互相依赖，……

（二）互相渗透的关系上的，即是说，一事物本身，就包含着或者发生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如资本家要发展自己，就不能不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发展的作用。速决战斗发生持久战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就不能不产生唤醒中国的作用。……

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三）互相推移或互相转化，……

乙，斗争性的意义。斗争性表现在互相压

---

[1] 毛泽东将原文“量的发展”改为“质的发展”。

> 抑、互相排斥的作用上，事物必须压抑自己的否定或对立的方面，以显出自己的存在，以保证自己的存在，以维持自己的质的安定性。质的不变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维持的。……

质的暂时不变就是在这样情形下维持的，质的终久必变也是在这样情形下出现的。原文只说了斗争的片面意义，而且是保守的意义。

> 丙，斗争性并不一定表现为对抗。对抗是对立发展到成为物理上的外力冲突的形式时的表现。它只是矛盾的一种形式，矛盾不一定要采取这种形式，没有这种形式也不见得就没有矛盾，没有内的对立和斗争。

> 丁，同一性或统一，也不是均衡。均衡是两种相反的力量互相抵消的状态。这里没有对立的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对立的统一不需要两种相反而又相等的力量，否定的方面在发展的当初可以极小，而在发展中可以壮大起来，原因是正面的东西不能不依赖它。所以，辩证法的信奉者要看重发展的方面，不管这方面

均衡是统一的一种状态，一种暂时的过渡的状态，如凡尔赛条〔约〕[1]后的暂时相对稳定局面；也有互相依

---

[1] 凡尔赛条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日、意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简称《凡尔赛和约》。条约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暂时缓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赖、互相渗透、互相推移的作用。对立统一体对于此种暂时地相反而又相等的力量，不是什么需要不需要的问题，而是此种状态必然成为暂时过渡之一形态的问题。均衡论是均衡绝对主义。承认暂时过渡的均衡，不是均衡论；否认了它，则必变为诡辩论。

的力量是如何小。如果相信均衡论，就会对于发展方面不能自信，而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戊，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

一定条件下的斗争与一定条件下的统一，原文忽略了这种一定条件，说了结果忘了原因。

同一性和斗争性又是互相依赖互相渗透的，而且互相推移的。没有一定的斗争不能有一定的统一，所谓“不打不成相识”。没有一定的同一性也不会有斗争，日本侵略中国就是由于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有同一性的缘故（即前者不能离后者而生存）。

……

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

但这分别也不能太绝对，统一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即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一定的统一形式，但这里也就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即：只要条件具备，只要在这样的意味，即：只要条件具备，只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那统一也是绝对可能的。所以列宁说：“相对的东西中间，也包含着绝对的东西。”[1]（《哲学笔记》）[第497～500页]

依一时说，统一是绝对的，斗争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绝对谓占统治地位。

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这才是列宁“相对中有绝对”之意，不是什么“统一之绝对可能”。我们在一定时期内承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至上），而在整个历史上又否认国家的绝对性（国家是暂时的）。

五，矛盾的特殊性。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是以多种多样的矛盾为其原动力的，运动的特殊性，是由于矛盾的特殊性。

依时间说不是并存的，依空间说是并存的。

甲，矛盾的多样的性质，不是并存的。而是在发展和转化中互相关联的。矛盾的存在，首先用对立的互相刺激、互相促进（由于同一性）而引起事物的量变的发展，量的发展愈前进，对立

矛盾的多样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2页）

性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事物在历史发展中表现的多样；第二，是在空间中各种不同矛盾的并存。

的斗争性愈尖锐，最后不能不形成对抗或破裂的状态，也就不能不要求矛盾的解决。矛盾的解决并不是矛盾的消灭，而是新的运动形态或新质的产生，在这时，就又同时发生新的矛盾，这就是矛盾的发展和转化，是矛盾的多样性的来源。[第501页]

一切皆有消灭。一切具体的矛盾皆要消灭的，这是相对的消灭；但消灭了又发生，这是绝对的保存。

是旧矛盾的消灭，新矛盾的发生。

决定基本性质的是那基本矛盾的基本方面，即占统治地位的方面。

丁，基本矛盾和主导的矛盾，一事物（或过程）虽包含着不同的许多矛盾，然而决定这一事物（或过程）的根本的性质的东西，是那基本的矛盾。例如社会的生产和私人的占有，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的矛盾。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是决定于中国的对内的反封建和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矛盾。

基本、主导，主要意思是一样的，将他们区别起来是不对的。

但一过程的各阶段也有质的变化，其运动形态不同，决定于各阶段的主导的矛盾，例如中国目前的革命采取了抗日的形式，这是由于对日的矛盾在目前阶段上成了主导的东西的缘故。

……

基本的方面不一定就是发展的主导方面。物

质决定精神，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精神的作用有主导地推动发展的力量，如社会运动中的文化运动之类，主导的方面决定一定发展阶段的质，正如主导的矛盾一样。

这是不对的，基本方面就是主导方面。物质对精神主导，他就包括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他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

主导方面的存在，对于事物的发展前途有很大的意义，要看事物从那一个方向发展，就要看那一种矛盾或矛盾的那一方面起主导的作用，因为所谓能起主导作用，就是能够压抑对立的方面而使事物向着自己所向的前途发展的意思。政治上的领导权，战争上的争取主动，都是主导作用在人的努力中的表现。任何事物发展的前途都不会只有一个，这就因为可能成为主导的方面不只一个的缘故。[第502～503页]

可能性基本的只有两个，并没有多个。这是因为一事物在一过程中，只有一个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的两方面各有一种要求，故有两种可能性。但现实性只有一个，则是因为矛盾斗争的一方面被另一方面压倒，破坏了一个可能性，故只

剩下的一个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也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则是因为次要矛盾的存在，如社会中有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之故。然基本上只有两个可能性，因为基本的矛盾方面只有两方面之故。

矛盾的两方面，可能成为主导方面的基本上只有一个。如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只有无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中国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幻〈幼〉稚时代，只有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同盟会）；而在无产阶级政治上觉悟了的时代，他就成了推动中国革命前进的主导方面。

……

（五）这样，辩证法要反对两种对于自己的曲解：诡辩论和折衷主义。

诡辩论就是把否定的方面夸大，把肯定就认作否定，把同一性看成对立性的曲解，……

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

> “模棱两可”的思想，……
>
> 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
>
> 诡辩论是简单地抛弃了形式论理学的同一律，折衷主义是把同一律和矛盾律机械地平列起来，其实两者都是形式论理学的变形，而不是辩证法。[第508页]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四　否定之否定法则

> ……
>
> 一，什么是否定？这里先要了解的，有以下几点：
>
> ……
>
> 乙，否定不是简单的绝对消灭，而是旧质的

发展。……

简单的绝对消灭，是形式论理学的了解，诡辩论把否定片面夸大，也是形式论理学的一种。否定中包含发展的理解，在生活上是很重要的，它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以后退的方式来促成前进运动，军队上的以退为进，中国旧思想中的相反相成（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1]），就是一样的意义。

后退现象，是矛盾双方一方被他方击败而发生的；而且被击败的一方是新质，若击败旧质，则不叫后退，而是前进。因此，后退是过程内部的现象，是量变现象，不是新过程代替旧过程的质变现象。此书弄错了。

丙，因此，否定的范畴，是对立统一法则的展开，这就是说：在发展的否定阶段上，仍有肯定的要素；否定不是怀疑、动摇的否定，而是更进一步的肯定。

这也表现辩证法是大无畏的思想方法，工作中的任何失败、退后，在辩证法看来，都有着进一步地成功和前进的要素，“失败为成功之母”，因此可以再接再励。

丁，发展过程的中断，不是辩证法所要求的否定。是不是一切退后或失败都是前进和成功的基础呢？如果在这中间不能依据失败或退后的经验而继续努力，那就成了单纯的否定，这种单纯的否定，是把发展的进程中断了，所以不是辩证

过程内部新质与旧质斗争，因旧质处于优势，故常能打败新质。然败者继

---

[1] 参见《老子》第四十章。

法所指的否定，因为它没有进一步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在这种意义上，如人吃了鸡蛋，或揉碎任何一朵花，都不是辩证法上所指的否定。因为这不是鸡蛋和花的本身的发展，而是它的生命的中断。[第509～510页]

续积蓄力量（量变），到了自己处于优势时，就能打败旧质，完成一个质变的否定。

二，什么是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法则，在形式上就是把否定的阶段再否定一次，但从内容上来说还有更深刻的意义：

甲，否定之否定是一事物从开始发生直到充分发展（或完成）时所经过的过程的规律。这过程在形式上是经过肯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三个阶段，肯定是事物的萌芽形态，否定是萌芽的展开，它表现为与萌芽形态对立的发展形态，表现为发展的退后或否定的形态，……。如植物是麦子的否定，同时也就是麦子的生命的展开，因此终于发展到生出新的麦子的阶段。私有财产是原始共产的否定，同时也是生产力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也准备了将来共产主义实现的可能性。放弃大城市及抵抗中的一切退却，都是抗战的否定形式，然而这也正准备反攻力量的不可免的发展阶段，到一定的时候，必然可以发展到实际反攻完成抗战的阶段。十年内战否定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然而也并不是白打的战，因为经过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两党都有了必须要长期合作，才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认识，使今天的统一战线

麦苗、私产都不是后退。

战争辩证法是和平——战争——和平，此书也错了。

得到一个有力的保证。

整个宇宙发展即无数过程的继续，是向上的、直线的；每一过程内部是前进与后退交错的、曲线的。

乙，这样，否定之否定法则又表示，发展不是直线，而是螺旋的发展，从出发到完成，中间总要经过一定的退后和挫折阶段，前进运动和后退运动是互相交错的。在革命的斗争中，不单只要懂得前进，而且也要懂得退守，懂得以退为进，和在退后的运动中准备力量。

丙，这样，在否定之否定的阶段上，常常表现着肯定阶段上的许多特征的恢复。……

每一过程对下一过程言是肯定，对上一过程言是否定，对再上一过程言是否定之否定。说一过程内部有质变三阶段是不对的。

丁，否定之否定是不是绝对的完成呢？当然不是。它只是表示发展的一个段落的完成。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是旧的发展段落的结束，同时又是新的发展段落的开始。因此它对于新的发展段落，又是一个肯定，又是一个出发点。然而这出发点是新的发展的出发点，不会再回复到以前的否定阶段。

……

己，三个阶段中间的关系是：否定阶段在否定形式上包容和发展了肯定阶段的积极内容，否定之否定又包容和发展了否定阶段上的积极内容，所以否定之否定不仅外表是肯定的复归，不仅把第二阶段再否定，而且是前两阶段发展成果的综合。所以黑格尔又以正、反、合三个范畴来表示三个阶段的关联。[第511～513页]

> 否定之否定法则只能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向导，而不是绝对的公式。我们根据这公式，要看出每一事物在什么条件之下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展表现为退后的形态，……一切都要作具体的研究。[第513页]

发生、发展、消灭是一个过程的事，不是三个过程。固然发生又表示上一过程的消灭，而消灭又表示一下〈下一〉过程的发生。然而，每个过程都有这三阶段，不是说三个过程，其第一叫作发生，其第二叫作发展，其第三叫作消灭或完成，这是错了的。

第六部分　唯物辩证法的诸范畴

二　本质和现象

> ……

本质即为矛盾所规定的该现象的性质。矛盾体的斗争表现为现象，又规定该现象的性质。不了解矛盾，不能了解本质，也不能了解现象的发

> 一，本质和现象的范畴，是反映一切事物都有“外表形态”和“内部关系”的两个侧面。前者就是现象，后者就是本质。本质常常被现象所掩蔽，认识的任务就是要分析现象，揭发本质。为什么呢?
>
> 甲，要从联系上来看事物时，我们需要揭发本质。直接从外表来看事物时，只看见事物的外部关系，不能了解深刻的联系。例如政治与经济，在外表上是两个东西，而在实际上却是同一

生与变化。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现象上是没有区别的，只在本质上有区别，这就是内部的区别。

社会机构两个方面，而且经济关系是政治的本质。

乙，从发展上来看事物时，也必须揭发本质。因为事物的发展，正是它的本质的发展的表现，不了解本质，即不了解发展的内部的源泉，在这样的意义上，本质就是事物的“内蕴”。

丙，因此，在对立统一法则上来看事物时，首先就要求本质的认识。因为直接的现象中只看见事物的对立或事物的同一性，不能同时看见对立而又同时把握同一性。一事物在直接表面的现象上看起来就是这一事物（即只看它自身的同一），但从本质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事物的同一性，尤其是和它的对立的东西的同一性。要真正深刻的了解事物，必须从它和其他事物的这种同一性上来了解。如从抽象劳动上来了解商品的价值，从经济发展法则上来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等。[第519～520页]

三　根据和条件

……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

一，什么是根据？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应该这样来了解根据：

甲，根据和本质是同列的范畴，本质的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就是根据。

乙，事物的根据在人类思想中的反映，又叫

> 做“理由”，发展以一定的根据为基础，“主张”以一定的理由作基础。理由必须是从本质上去找，以表面现象为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如汪精卫以近卫的声明[1]为理由而主张妥协，就是一例。
>
> 丙，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如中国革命的基本的矛盾就有民族矛盾和民主的与封建的矛盾的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或有了充足理由。[第522～523页]

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提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

[1] 近卫，指近卫文麿（1891—1945）。1937年至1939年、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国首相。1938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声明，逼迫国民党政府投降。同时声称，如果国民党政府仍继续“策动抗战”，日本政府“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在中国扶植新的傀儡政权。同年11月3日和12月22日，近卫又两次发表声明，对蒋介石威胁利诱。早与日本政府进行勾结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近卫声明后，进一步主张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并于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

三，条件：……

甲，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

乙，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丙，本质的条件和非本质的条件，也就是重要条件和次要条件。……

丁，顺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条件不只促进发展，也有阻碍发展的。认识的任务就是要看出这两方面的条件，以便在实践中造成胜利条件，克服困难条件。[第523～524页]

条件不顺利即是条件不具备，也即是敌人的条件是具备的。此一条多余了。

哲學選輯

艾思奇編

1939

毛泽东批阅的《哲学选辑》。

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6月1日）

今天是你们的三周年纪念日。抗大办了三年了，我们的抗战快两年了。抗大是抗日的，抗大的目的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解放中华民族。抗大三年以来创造了很多的坚强的抗日干部，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

今天，我们国内还有很多汪派的人——投降主义者，投降派；他们不赞成抗战到底，他们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讲和，主张妥协投降。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是蒋委员长所号召的，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反对投降，抗战到底”，我们抗大，一致的拥护。我们抗大的人，不能有一人不抗战到底，不能有一人不反对投降，不能有一人赞成和平妥协的；如果有一个，就不是抗大的学生，是抗大的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全国各党派也是一样，不许有一人讲和，要全体一致的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根本主张。过去三年是这样，以后三年，以后很多年也是这样。“反对投降，抗战到底”，这就是抗大的政治方针。……

1939年6月，抗大举行三周年纪念大会。

中英两国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1]

（1939年6月1日）

正当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坚决不挠的抗战到了第二周年的时候，英国的援华委员会在全国各地举行了“中国周”以表示援助我们的抗战。我代表朱德同志与八路军的将士，代表我们前线与后方医院中的士兵，并且我自己也想说一说，这种同情与关切的表示，是多么使我们感到兴奋的鼓励啊。我们向在国际反侵略阵线中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并致热烈的敬礼。

中国两年来的抗战已经证明了民主势力抵抗侵略的力量。这两年来的抗战指出了，甚至一个工业落后的，在民族生活上受着各种各样的压迫与侮辱的国家，也能满怀着胜利的信心抵抗最野蛮最横暴的法西斯进攻。而且还证明了，不仅不能把中国的抗战和全世界反侵略的力量分开，而且我们给侵略者的打击，已使我们的国家，在维护全世界的民主与文明的国际斗争中，在反法西斯的主要阵线中，站到了最前线。

战争一开始，我们就看见英国人民以物质援助我们的抗战，捐给我们医药用品，派送救护队到中国来服务，对我们作了许多实际上同情的表示，这正说明了，虽然我们与英国相隔很远，我们的抗战对于英国人民并不是一件无关轻重的事情。但是由于我们抗战在

---

[1] 这是毛泽东为英国援华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周”写的文章。

全世界反侵略斗争中所处的地位，我们有权利要求得更多一些，要求比以前所给我们的更多的援助。

首先，我们要求你们严格注意你们政府的态度，你们要压迫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不再输出军火给日本。就在几个星期以前，英国在重庆的大使馆与总领事馆，在日本来首都滥肆轰炸的时候受了损害。对于这种侮辱，英国政府却只表示了一种外交上最软弱的姿态，只报以一纸抗议。正是这种态度鼓励日本在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到处扫除英国的利益。英国人民抑制远东强盗并且同时援助中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对他们的政府施以断然的压力，要它立即实施对日制裁。

日本的共谋犯，法西斯的德意两国，在这两年内，与它狼狈为奸地破坏和平，摧毁国际条约，掀起血腥的惨无人道的战争。它们的活动已经形成了对英国安全的一种直接威胁。这里就有了另一个理由，使英国人民一定要强迫他们政府支持中国的抗战，并且自己也要采取与中国对反侵略的阵线所作的贡献相辅的步骤，反对法西斯主义并不需要我们从事于个别的战争。威胁是普遍的，因此现在必须在全世界和它作斗争。

举例说，最近日本在占领区域里加强了反英的宣传。因此，援助中国，援助那跟远东的敌人作战的国家，对于英国人民的自卫也是必须的。

鉴于上述的种种情形，我们向你们建议，请你们采取具体有效的办法，加强英国的政策，使英国政府与人民在遏制日本侵略者的愿望与行动中得以站在一起。

为了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为了全人类的和平与自由，我们已经坚决地斗争了两年了。在这两年中，日本军阀利用了汪精卫之

类的卑鄙无耻的失败主义者，想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破坏我们的抗战。

但是我们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在这过去两年中，中国人民的团结已经成熟，而我们抗战到最后胜利的决心也大为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更坚决地执行着我们共同的决议，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战。像汪精卫之类的失败主义者，以前还能躲在后方阴谋投降的，现在已不能够隐藏他们的真相而被揭穿被赶跑了。

英国与中国地理上是相隔很远的，但两国人民要打倒法西斯侵略的共同愿望却把我们连结在一起了。让我们拉起手来打倒人类的公敌。

中英两国人民联合起来！

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1]

（1939年6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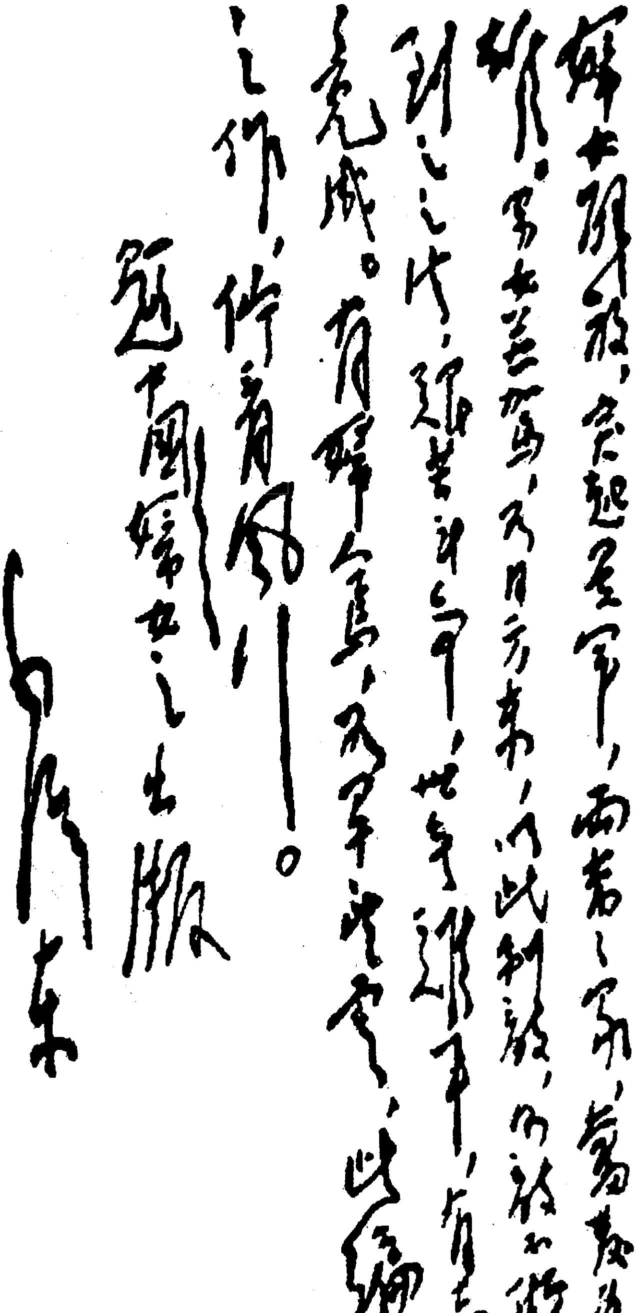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毛泽东

---

[1] 《中国妇女》，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办的刊物，月刊。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所写的题词。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

题中国妇女之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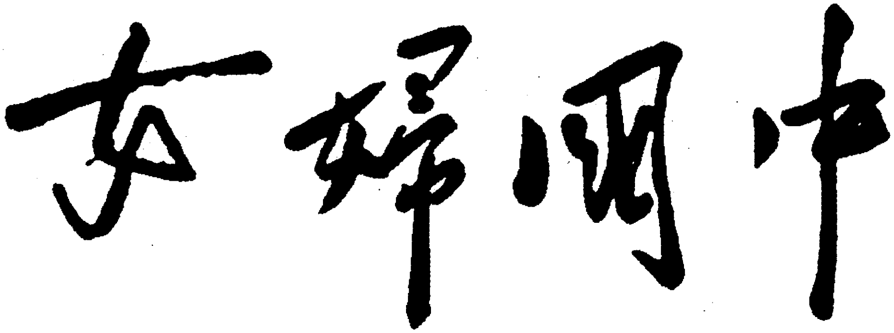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1]

（1939年6月1日）

中国妇女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

---

[1] 《中国妇女》杂志于1939年6月1日在延安诞生。是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本全国性的妇女刊物。毛泽东同志热情关怀和支持《中国妇女》杂志的创刊，为创刊号写下了热情洋溢的题词并为其题写了刊名。

在延安模范青年授奖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6月6日）

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模范青年是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生代表他们。

自己代表还不够，并且还要教训儿子，中国革命没有成功，要长期斗争，永远奋斗。

1939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延安。

---

[1] 1939年6月6日，西北青救会在延安召开模范青年授奖大会，毛泽东为模范青年授奖并讲话。这是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6月7日）

蒋介石有借口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对国民党的态度，须准备在对方态度急转直下时我们的应付，在某些方面可采用较温和的态度。庆阳方面必须守住，那是我们的生命线。延安应召开干部会议，延安机关学校实行必要的军事布置。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河防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反投降提纲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

（1939年6月）

报告

（6月10日）

目前形势的特点

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国民党投降的可能是从抗战开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成为时局的最大危险，则是目前政局中的现象。国民党反共也是从统一战线建立时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发生的，但把反共作为直接准备投降的步骤，则是目前的实际。

目前的这种形势，是由于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即是：一、日本的诱降政策，二、国际的压力，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今分述于后：

一、日本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

（一）日本对华基本方针是灭亡中国，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这是坚定的、不变的，在日本侵略者看来也是变不得的。

今年一月二日东京《国民新闻》（军部机关报）的社论说：“眼前现实的课题，已不容寸尺后退，瞬间踌躇。事变入于收拾期，万一国步的统制有疏漏，则不但将丧失战果，且会影响国家的命运。战争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难好几倍，历史上有过教训，欧洲大战时代德国和俄国不幸的事例，为政者和国民须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识》二月一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话来说，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针非贯彻不可，否则有德、俄革命的危险。由此可知，以为日本可以根本上让步，可以不经长期战争而用英、美压力恢复卢沟桥以前状态（蒋介石，国民党许多人），只是梦想。

（二）它的“灭亡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总路线）是坚定的，不会自己动摇的，但是它执行此基本方针的方法（或策略）是软硬兼施的，有伸缩性的，并可作出某些暂时的、局部的、表面的让步，以求达其根本目的。

大体上：卢沟桥以前——政治诱降为主；卢沟桥至武汉——军事打击为主；武汉到现在——再以政治诱降为主。

（三）为了明白敌人根本方针的坚定不变与其施行策略的软硬兼施，只要看下列各种材料就可知道：

1. 卢沟桥以前——规定硬的方针，并实行占领东三省，对全中国则采取外交诱降办法。

（1）满洲事变前的田中奏折（一九二七年即昭和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函致宫内大臣一木喜法，请代奏明天皇者）有云“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规定了灭亡中国的方针。

（2）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占领满洲。

（3）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七日的天羽[1]声明（天羽代表外务省发出声明）有云：“东方和平日本负责为之，反对中国与东方和平抵触之行为，反对他国任何妨碍东方和平之举动。”公开表示其灭华方针。

（4）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的广田三原则（广田在议会正式宣布三原则），即：第一，对日亲善，第二，承认满洲，第三，共同防共。

（5）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秘密条呈，结论六条，均表示施行方法之软硬兼施。

2. 卢沟桥到武汉——为执行其硬的方针，采取坚决的军事进攻方法为主，辅之以政治诱降。

（6）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的几天，外相广田宣布不扩大主义。我党八月决定[2]曾指出这是“掩护进攻的烟幕弹”，但同时含有“降则免打”之意。

（7）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陆相杉山在特别议会的战争演说，“断然决定膺惩，陆军当局已采取重要措置”。表示方法是硬的，打，为着降。

（8）开战以后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据英国《标准晚报》称，日政府负责人曾以这些条件提交蒋介石，内容凡六条：A. 内蒙独立；B. 华北自治；C. 上海占领地作为日本租界；D. 山海关到安南[3]沿海的捕鱼权；E. 中国退出国联；F. 不得设空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解放报》）表示所要的东西，至今大体上不出这

---

[1] 天羽，即天羽英二（1887—1968），当时任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

[3] 安南，今越南。

个范围。

（9）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后，二十七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凌发表谈话：“日本帝国决不满意于今日的成功，盖距总局之前途尚远，帝国军人基于帝国之总意，为东洋永久之和平，希望达到彻底进步的目的。”表示要继续军事进攻。

（10）广田的除夕（一九三七年）演说：“友邦中国若能了解日本力求东亚和平之重要观点，则能免今日之惨痛。日本政府深愿于一九三八年开始新的和平，解决一切问题。”表示方法是可以用软的，只要降。

（11）有名的一月十六日宣言。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占领前两日）阁议决定，十二日御前会议通过，十三日占领南京，十七日中国蒋委员长发表告国人书，到一月十六日政府就发表此宣言。其大意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与列国在华权益。表示方针是硬的，方法也是硬的。

（12）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驻华大使川越茂对记者发表谈话，谓：“奉令返国，参赞日高留沪，但留沪目的，并非尚欲与中国政府交涉，而是与外国外交人员接洽可能发生之事件。与国民政府重开交涉之门户已经关闭，即使国民政府将来重新考虑其态度，亦仅能与中国新组织交涉，不能以日本为对手。”从一月十六日宣言后，以战为主，以和为辅，打倒蒋介石，建立新政府，此谈话最露骨。

（13）但战中仍有和。一月二十日路透电所传广田在七十三届议会中宣布德国调解的和平条件四条：A. 放弃联共抗日，承认“满洲”；B. 在若干地带成立非战区，在此区内设立管理机关；C. 中、日、满经济合作；D. 中国赔款。此为最低议和条件，即陶德

曼[1]交蒋之条件。蒋曾拟考虑接受，汪精卫的《举一个例》即指此（蒋、二陈、何[2]，还有孙、于、白[3]都参加讨论接受问题）。最后蒋拒绝，广田乃在议会宣布。

（14）一月下旬在七十三届议会中：

近卫[4]的开幕演说——“战争之解决，尚须长久时日”“现政府采取坚决之政策，嗣后不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

广田演说——宣布陶德曼提交之四条件（见前）。

民政党议员——要求政府保证，嗣后决不与国民党政府讨论媾和条件。

议员岛田俊雄——质问为什么不对华宣战？

日本政府宣布对华政策四要点：A. 绝对不与国民政府交涉；B. 为阻止军火运华，仍可对华宣战；C. 对华北新政权居监护人地位；D. 绝对不容第三者调停。

但至一月二十九日那天，近卫又在本届议会表示：“宣战之举仍在考虑中，视中国将来态度为断。”和平之门仍然是开的。

此乃反映日本政府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之斗争，杉山为此曾于此

---

[1] 陶德曼（1877—1950），当时任德国驻中国大使。

[2] 二陈，指陈果夫（1892—1951）、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人，当时均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何，指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3] 孙，指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于，指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4] 近卫，即近卫文麿，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时发表“必须准备长期战争”之文告，与主和派对抗。

（15）日本驻沪大使（维新政府[1]的）谷正之，三月九日发表谈话，谓：“蒋介石政权行将崩溃，但须继续加紧战争促蒋政权倒台，并使第三国放弃援蒋企图。战争以外之法如能使蒋氏议和，则耗费较少，效力更大。”一个人一次谈话中主战又主和。

（16）五月二日近卫演说准备长期战争：“为推翻蒋政权，铲除东亚祸根，虽费数年光阴亦所不惜。同时，全国国民应极力援助华北、华中两亲日防共政权。”

（17）五月九日广田在地方长官会议演说，主张慎重处理事变：“中国事变进到第二阶段，蒋介石政权宣传长期抗战，从事于国内之团结，但未能达到团结之目的。〔其〕他方面，各国军需品之输入及苏联援助中国，这是事实。因此，帝国政府必须顾及此种事实，慎重处理此次事变。津浦线占领之时，临时[2]、维新两政府即刻实行合并，帝国政府对此极力加以支持，使能合并统一，并圆满健全发展。”敌以军部与外务省一个代表硬，一个代表软，但或硬中带软（军部之特务机关），或软中带硬（外务省），装红白脸。

（18）徐州陷后，敌声言打到昆明。五月十九日徐州失陷，二十二日敌前线指挥官发表谈话，谓：“徐州攻陷，战争并未停止，战争步骤有三：第一步即徐州大战，第二步进攻汉口，第三步进攻重庆

---

[1] 指1938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1940年3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

[2] 指1937年12月在北平成立的日本傀儡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它在名义上管辖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日本占领区和北平、天津两市。1940年3月并入汪精卫伪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

或昆明。”不亦硬哉！

（19）六月十七日永井递信大臣发表谈话，谓必须打倒蒋政权：“目前政府之对华政策在于打倒蒋政权，援助新政府，建设新中国，奠定东亚永远之和平。其他政策亦须沿此路线进行。”

（20）张高峰事变[1]时，外传日本向中国提出和平五条件：“日苏边境纠纷日烈，有成为大规模战争可能时，中日和平空气今日（八月五日）又盛传于香港，上午《孖刺西报》首传日本向中国求和五条件，下午各晚报均刊载。五条件是：A. 日军退出占领区，但中国也不得驻军；B. 承认“满洲国”；C. 虹口、闸北、江湾，租给日本，定期九十九年；D. 赔偿此次战争损失；E. 共同防共。”（《星岛日报》二十七年八月五日，香港通讯）

（21）板垣[2]的强硬论。七月一日板垣发表谈话：“在蒋政权依然存在之时，中日间绝无和平可能，今日日本不能再与蒋介石携手开和平谈判。”七月七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板垣发表谈话：“今后战争，无论延长多少年，帝国所走之路只有一条（按：指以武力征服中国），除此以外，不能达到东洋百年之和平。”

（22）设立对华院，总揽对华统治大权——总裁副总裁即五相。不但占领区，而且非占领区，均归其管辖。

（23）九月二十九日军部赶走宇垣[3]。宇垣因对华政策与军部不

---

[1] 张高峰，即张鼓峰。1938年7月底8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区，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战败求和，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议。

[2] 板垣，即板垣征四郎（1885—1948），当时任日本内阁陆军大臣。

[3] 宇垣，即宇垣一成（1868—1956），1938年5月出任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同年9月辞职。

合愤而辞职。

3. 武汉到现在——策略改变，由硬到软。

（24）十月十二日占领广州，二十五日占领武汉，看见三十日蒋介石发表主张长期抗战的告国民书，故日本政府择了十一月三日明治纪念日即所谓天长节这一天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明显地表示改变策略。其要点为：A. “国民政府已为一地方政府，如继续抗日，则该政府歼灭以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B. “日本之目的，在于建设东亚长治久安之新秩序，即日、华、满三国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C. “至于国民政府，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予拒绝。”政策已变，宣布废止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及必须建立伪政权之政策，声明可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须蒋下野。

（25）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声明，即汪精卫通电拥护、蒋介石演说痛驳之声明。其要点：A. “中、日、满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的，互相结合，互相亲善，并实行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B. “因此，中国必须与‘满洲国’树立完全之国交关系”；C. “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军防共，以内蒙作为特殊防共区域”；D. “中日经济提携：帝国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之自由，在华北与内蒙予日本以开发与利用资源之便利”；E. “日本允许考虑交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重申十一月三日宣言的基本政策，加具体内容。只要降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允许蒋存在自此始）均可存在，华中、华南可以退出，华北是要的，但主权名义仍可不要。

（26）平沼[1]内阁继续此方针，至今不变。

---

[1] 平沼，即平沼骐一郎（1867—1952），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27）日本在中国策动广大的“和平运动”，设立所谓“和平息战会”，到处开大会、发传单。设立统一中央政府，很久不提了，虽偶一提及，无外吓蒋，除非蒋抗战到底，它是留以待蒋的。

（28）离间国共合作、利用三民主义的大阴谋。日人松本慎一做了一篇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的文章，其中说：

“帝国行使武力之目的，第一在彻底打击抗日政权及军队，第二在要日支两民族提携、融合及东洋和平之确立，前者乃达成后者之手段。然此二者，证诸支那之现实，实为互相对立之矛盾。试观事变以来之经过，抗日政权之指导原理虽属误谬，但蒋政权已具有民族政权之本质，而有支那民族大多数之支持。现政权所以能得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抗日联合各界以及旧军人之热烈拥护者，即缘于此。今吾人，一方欲击灭蒋政权，他方欲与支那民族相提携，事实上诚不啻缘木求鱼。盖欲倒蒋，愈使支那民族拥蒋。要倒蒋就不能抓住民众，要抓住民众即不能倒蒋，故我国根本困难即在于此。”

“临时、维新两政府，尚无民众基础，有民众基础则南北两政府自不难合流。而新政府之纲领，应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旗帜，新政府之任务应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实现。或曰：敌人之旗帜与我相同，难免混淆不清。但吾人可告以彼等以‘一面抗战，一面实行三民主义’为号召，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

“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干，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

“武汉作战之目的，乃在分散国共合作，故武汉占领好似在国共间插入一个楔子，战略政略双方都在分散国共力量。”

（上文见《大公报》本年一月二十三日）

（29）上海《导报》还在二月十七日就指出了远东慕尼黑的危

险：“一方面，它在实事求是，努力加强地方政权，组织所谓江汉政府之类。别方面，它在进行更大规模含有国际性的阴谋。这阴谋的主要企图是压迫和诱骗英、法两国来用国际会议的形式（公开的或秘密的）强迫中国与日本妥协，虽然日本曾声明不愿第三国参加解决中日冲突。”并且说：“认为汪精卫完事大吉，是不对的，他将来还可起极恶劣的作用。”

以上我举的二十九条材料，说明日本对华诱降政策的历史发展，充分证明下列三点：

第一，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它一定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一定要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

第二，但它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

第三，它还努力策动英、美、法召集远东和平会议，远东慕尼黑的危险就压在中国人的头上。

（四）上说三节，第一节指出它的基本方针坚定不变；第二节指出它的实行方法软硬兼施；第三节从二十九件材料说明其施行方法由硬到软的历史发展，证明投降是当前的最大危险。现在这个第四节从它的财政、经济、军事方面说明其主和的原因。日本已处于财政（三年一百二十亿元，第一年二十五亿五千万元，第二年四十八亿五千万元，第三年四十六亿五千万元）、经济（输入大增，输出大减，军事工业打倒和平工业，物价大涨，人民生活恶化，现金用尽，外汇不稳）、军事（兵力不足，兵力分散）大见困难的境地，它还要准备应付国际战争，故极力策动中国投降，分裂抗日阵线，利用汪精卫劝诱蒋介石，并准备利用三民主义与国民党，它的这个阴

谋是十分恶毒的。敌人战不可怕，和则十分危险，《大公报》曾称为“缢鬼式之和平”，中国将无疾而终。

（五）为表示和之诚意给国民党看，给英、美看，日本用大力“扫荡”八路军（华北十五个师团），现又企图进攻陕北，作为促进国民党降日反共之一步骤。

以上是日本的诱降政策。

二、英、美、法的压力

中国投降危险成为当前最大危险的第二个因素，是英、美、法投降主义者加于中国政府的压力。

英、美、法等非侵略国对于侵略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所取的放任政策，正如斯大林所指，不是由于他们力量不足，也不是单纯的由于他们畏惧革命，而是由于他们“坐山观虎斗”的阴谋计划。

他们开始即鼓励日本进行战争，说什么“三个月就可打败中国”。他们随即让出上海，使战争深入内地去打。他们宁可使香港受包围，让日本占领广州和海南岛。他们大量供给日本以军需品，使日本有可能进行消耗战争。

他们又声言援助中国，并且已实行有所援助，借点小款，供给点军需，使中国有可能与日本进行消耗战争。他们常鼓吹“中国必胜”，使中国在消耗战争中增加勇气。

一切这些，其中心目的，在于消耗战争双方，等到双方精疲力竭时，他们就以“健全的身体”出来喝令双方停战，使双方都听他们的话。

他们纵容德、意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也是这个目的。

他们希望德国和苏联打，而他们从容观战，然后乘其疲惫而掠夺之。

他们始终不赞成苏联所提普遍安全计划者以此。

他们不愿意保障波罗的海三国[1]的安全者以此（开一缺口便于德国进攻苏联）。

战争的片面性（侵略战争是危害英、美、法利益的，但英、美、法却取旁观态度）的原因在此。

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这就是英、美、法帝国主义者的现时政策。

这些非侵略国与侵略国之间是有深刻矛盾的，但不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会放弃其“渔人”政策的。

莫洛托夫[2]谓“英、法有进步，但所谓进步是浮而不实的”，斯大林谓“不要被人利用”，即是说英、法的渔人政策并未放弃，不要上当。

英、法、苏协定有成立可能，但目前尚难乐观，成立了之后又有破裂可能。新慕尼黑危险并未消灭。

六中全会指出英、美、法政府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其人民。英、美、法人民反战反法西斯势力正在逐渐增长，只有这种势力才是最后可靠的。

苏联声明继续援助中国，但决不赞成中国投降。

英、美、法策动的远东慕尼黑，现在接近了一个紧要时节。他们似正在作这种想法：希望中国再打半年，双方都更疲惫一点，那时就到了远东慕尼黑开幕之时了。

中国投降危险的第二个因素，就在这样的国际情况上面。

---

[1] 指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

[2] 莫洛托夫（1890—1986），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三、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

（一）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1. 一九三七年五月苏区代表大会曾经指出：“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

2.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决定上说：“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丧失就是东四省[1]丧失后最严重的教训。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3. 六中全会指出妥协危机的严重存在，把反对投降妥协放在第一条。指出国民党有光明前途，但同时指出其前途尚有障碍物，如不克服，则没有什么光明前途：“很明显的，所谓一切党派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大前提下都有光明前途，是包括了克服各党内部守旧倾向这种努力的。如果存在着不利抗战与统一战线的守旧倾向而任其发展下去，那就有断送其光明前途的危险。这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一样。”国民党是以资产阶级为骨干的党，是在资产阶级指导之下的。

（二）五中全会以后的国民党。

1. 五中全会还是以联共抗日为主要方向，但同时已包含反共降

---

[1] 东四省，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热河省，1955年撤销，原辖地区分别并入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日的因素：（1）决定了依靠国际压力和平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2）决定了防共与反共的方针（但不是战争），设立了“防共委员会”。

2. 主和空气笼罩一时：

禁止反对远东慕尼黑。最近到的一期重庆出版的《文摘》，把一篇题名《英国会在远东来一个慕尼黑吗?》的文章删去了。

许多刊物发表提倡依赖英、美制裁日本的文章，其意即开国际调和会议解决问题。

政府中党部中很多人是主和的，军队中也有这种人。

“国民党投降可能”这一点，历来就存在，但在今天已成了最大的危险，如不克服，中国抗战将受到极大挫折。

3. 国民党已在进行其投降的主要准备工作，即是反共，反共是投降准备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半年以来，华北、华中、南方、西北反共活动特别厉害。在华北：八路军从日本手里收复失地，国民党从共产党手里“收复失地”。在西北：共产党没有超越边区寸土，国民党则用武力侵入边区许多地方（镇宁、宁县、旬邑、靖边、瓦窑堡）。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物，不反共则不能投降。

一切都是借口，进行投降准备工作则是实际。

制造了无数的假文件。

以上三个因素、三种原因，使目前时局处于投降派与抗战派的严重斗争中，投降可能成为当前的最大危险，而反共正是准备投降的一个必然步骤。

三种原因中，以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为主要原因，如不自己动摇，则敌人的诱降政策无所施，国际的劝降压力无所用。

这种情况是与六中全会时不同的。那时，抗战还在高潮，十月

三十日蒋之宣言、十二月二十六日蒋之驳斥近卫演说就是证明。现在，是在敌人以诱降为主并已生效的时候，是在英、美加紧策动投降的时候，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依靠英、美并执行反共政策之后。所以，那时，虽以反投降为第一条，但实际没有现在严重。

八个月以来，时局变到反共、投降最为严重的时候了。所以，现在增加了新的具体的任务，这就是用全力反对投降。

准备投降的各种借口：

第一个借口——共产党捣乱，这是不对的。伪造文件。边区的被攻。八路军的无饷。全国执行良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拥蒋拥政府。全国无土地革命。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作战。

第二个借口——苏联阴谋，这是不对的。一九二七年帮助中国革命。两年来援助中国抗战最大。它没有阴谋侵害过任何一国。各国多与它通好结盟。

第三个借口——财政经济困难，这是不对的。只要采取六中全会的新政策就能克服任何困难。过去红军即现在八路军克服困难的经验是明证。

第四个借口——人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日本正作这种宣传，这样说不啻响应日本宣传。人民不满兵役法，是怨恨方法不对，不是怨恨抗战。又极端地压制民运。

第五个借口——军心厌战，这是不对的。污蔑抗日军。多数官兵的为民族解放而战。多数官兵的厌恶内战。

第六个借口——国际无援，这是不对的。抗战主要靠己不靠人。苏联的有力援助，各国人民的同情。英、美、法政府本不可靠的。

第七个借口——敌人太强，这是不对的。敌人已消耗了很大，三年要用一百二十万万元，兵力不足与分散。我之地形好，士气盛。

还有许多借口。

抗战的前途（大概估计，不能死看）

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国民党投降可能与继续抗战可能是两个可能。有投降者，有抗战者，又是两种状况。

“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这是一方面。“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的前进与发展。”“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这又是一方面。（均见“八月决定”）

抗战可能有两个前途：第一前途——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第二前途——大部投降，小部抗战。

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第一前途，也是长期的曲折的；第二前途，则更是长期的曲折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设想过抗战应该是速胜论、直线论（一字论），而历来主张长期论与曲线论（之字论）。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不发动全国人民，不实行国家民主化，可以克服投降，取得胜利。克服投降，取得胜利是要人民的大多数来干的，是要各党各派的一切爱国进步分子来干的。

不能设想，国民党整整齐齐一人不剩地投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全党投降帝国主义，举行反共

战争。但那时的情况是：（1）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2）所有帝国主义都赞助蒋介石反共，各国在暂时稳定局面之下；（3）国民党没有吃过反共战争的苦，能够动员军队；（4）全国人民没有尝过反共战争的味道，没有受痛苦的教训，也没有被欺骗的经验；（5）共产党没有统一战线失败期间的经验，又没有武装力量（都失败了），主要的没有战争经验；（6）世界不是革命与战争时期，而是反动时期；（7）苏联没有今天强大。

然而还有宋、何、邓演达[1]等坚持革命，没有叛变。

“九一八”以后，有冯玉祥，有蔡廷锴[2]，有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3]有吉鸿昌、任应岐[4]，有张学良、杨虎城，有陈济棠[5]、孙科。

---

[1] 宋，指宋庆龄。何，指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他们都是国民党左派领袖。

[2]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32年指挥十九路军参加淞沪抗战。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3] 赵博生（1897—1933），河北黄骅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1901—1934），河北沧县人，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春，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同年12月，该军1万余人在他们的领导下，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编为红军第五军团。

[4] 任应岐（1892—1934），河南鲁山人，1934年5月与吉鸿昌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任应岐同在北平遇害。

[5]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1936年5月28日，和李宗仁联合其他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

况在今天，有两年抗战历史。

假如有米亚哈[1]，有哈恰[2]——中国也不是西班牙、捷克。

一、有投降者（这是必然的，已有汪精卫，还会有张精卫、李精卫），也会有反对投降者。

二、有坚决投降，一往不返者，也会有一时投降准备再战者。

三、有先降后战者（有些人要当一回汉奸才能变好），也会有先降后战再降者。

四、人民与军官可能初受蒙蔽，后来觉悟反抗。如像“共产党捣乱”“八路军叛变”“国际情况不佳”“财政异常困难”“苏联要赤化中国”“暂时屈服徐图反抗”等欺骗，是必然会到来的。

五、敌人必不让有一个全国统一不受干涉的投降集团存在，它必然采取四分五裂政策。那时，可能有许多傀儡政权同时存在，以便利其统治。各种武装投降者之间可能发生内战——中国是内战最可能（地大，经济分散）与最有经验的国家。

六、敌人可能先让一步，然后干涉。当其让步时——可能投降；当其干涉时——又可能决裂。

七、佛朗哥[3]并没有收容米亚哈，希特勒也没有收容哈恰。日

---

[1] 米亚哈，即何塞·米亚哈，西班牙内战期间任马德里城防司令。1939年3月5日，与卡萨多、贝斯泰罗发动反共和国的军事政变。3月28日，向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所领导的叛军投降。

[2] 哈恰，即埃米尔·哈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38年10月，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接受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逐步置于希特勒德国的控制之下。1939年3月，又被迫将捷克地区改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区”，划入德国版图。

[3] 佛朗哥（1892—1975），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1936年7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1939年4月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统治。

本最后只会收容汪精卫一类。

八、满洲人民与军队的经验，大家知道了。中国军队不能消灭，这是肯定的；缴枪必打，这也是肯定的。

总之，那时必是一个混乱局面，不是一个统一局面。那时，共产党将成为全国人民的救星，全国人民望共如望岁。那时，中国人民对苏联希望必增加。那时，国际必是一个战争与革命局面。那时，日本与英、美、法的冲突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情况出现，正是中国革命长期性、曲折性的实际。

不能设想，不民主的政府如现政府能够抗战到底。不能设想，这种政府能够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一次也未希望过，也未说过。

只有愿意动员全国人民的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政府，才是能够领导抗日胜利的政府。

旧东西的改造，经过叛变与克服过程。

那时，可能出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包括共产党在内的）。

那时，中国可能有三种性质的政府——日本的傀儡政府，半傀儡政府，抗日政府。这几种政府间的斗争，将组成所谓相持阶段的局面。所谓相持阶段，可能正是这样情况的阶段。

不能速胜也因这种情况。

不会亡国也因这种情况。

将来抗战局面不外二途，如前所说：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如果是第二种前途，则其可能情况如上所述。但第一种前途，目前并未绝望。原因在于：

在国内——一、许多军人拥护抗战；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三、共产党的反对投降；四、人民的反对投降。

在国际——一、苏联的援助；二、西班牙、捷克的教训；三、

欧美人民的舆论。

在日本——财政、经济、军事的困难。

但是要巩固扩大统一战线才能办到。

如果出现第二种前途，那就不但是政府的分裂，而且是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分裂：

日本人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在做，经过汪精卫，这是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

中间性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萌芽，正在奔跑，这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

中国人民的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现已发生，正在发展，这是真三民主义与真国民党。

三民主义与国民党是否可以避免上述那样分裂（分裂是必然的），要看国民党、共产党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如何。

因此，相持阶段的可能情况便有几种：

一、大部抗战，小部投降的相持阶段——即克服投降可能，取得大部抗战，打下去，除开破坏日本的政治阴谋之外，还停止它的军事进攻。这是第一种情况的相持阶段，这是最理想最希望的。

二、大部投降，小部抗战的相持阶段（共产党与一切不愿投降的人是要继续抗战的，即使是小部）——即使大部投降了，剩下小部抗战，但只要能巩固小部，巩固抗战根据地，亦能与敌相持，如同过去小部红军在根据地上与敌相持一样。不同的，过去是内战，今后是对日本与对汉奸，而不是内战。

在站住了脚，不是继续后退了这一点上说来，在它是全国唯一的抗日军这一点上说来，这也是一种相持局面。

这是第二种相持局面。

三、由小部再到大部的相持阶段——这是第三种相持阶段。

由于小部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坚持国共合作，坚持三民主义，将投降派所把持的阵地分化过来，再争取大部抗战。那时，如果还不能对敌人反攻，则还是一个相持阶段。

我们力争第一种相持局面。不得已再是第二种，且其前途还有第三种。

危险是存在的。但总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危险环境中表示绝望的人，在黑暗中看不见光明的人，只是懦夫与机会主义者。

还在一九三七年苏区代表大会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叛变的必然性。

还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又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

十一月又指出民族投降主义与阶级投降主义的危险等。

这些，我们都预料到了的，它的发生并不是突然的。

抗战前途，不外好坏二途。我们力争好的前途，同时准备即使很坏，我们也有办法。

总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必然经过长期的斗争与曲折的斗争。短期的与直线的胜利是没有的。我们历来反对速胜论与亡国论，今天仍一样。

以为地主资产阶级叛变就等于亡国，这是没有看到：一、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存在；二、抗日友军中的抗日情绪；三、国民党中的抗战派；四、资产阶级中目前不愿投降者；五、沦陷区仍然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六、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农民；七、苏联的援助。不看见这些正在生长的力量，只看见地主资产阶级投降了，就认为整个世界都黑暗了，于是发生惊慌失措、动摇逃跑等现象，

这是完全不对的。

六中全会说，相持阶段必是“更加困难，同时更加进步”的阶段。更加困难，就是敌人之外，还加上投降叛变。更加进步，就是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包括战争），抗日的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国民党便能更加进步。一部叛变，大部抗日——这种情况是我们希望的，过去这样希望，现仍如此，要力争之。大部叛变（甚至一时表现为全体），一部抗日——这种情况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可能的。如果出现，我们就要把它颠倒过来，这也是可能的，也要力争。

当前的任务

估计到上述好坏两种可能情况，特别是可能的坏的情况，党的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

第二，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

在这里要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与人员。

第三，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基于上述的任务，党应注意对下述各问题了解、解释并进行必要的工作：

一、六中全会的方针与现在的方针之间是否一致问题

六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六中全会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积极团结全国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因为六中全会文件的发布，更加深入人心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因为六中全会的指示在全国更加发展了。

现在，投降危险与反共阴谋成为当前主要危险，故须指出这种新的情况（过去还不是事实，只能一般指出，现在已有成为事实之可能，故须具体指出），才能克服投降危险，并准备如果投降由可能变为事实时及时采取必要的对付政策，但基本方针仍然是六中全会的，并且只要指导适当，可能使抗战的实际内容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

二、为什么此时要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问题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准备在投

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以上，我作了八条比较。虽然如此，仍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以便胜利地克服困难，发展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到一个更高阶段，而避免可能的失败。

三、为什么假如投降成为事实时还要坚持民族战线、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问题

主要理由已在说明抗战前途时说过了。这里只说：

（一）在全部抗日过程中必须都是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由于叛变，许多地主资产阶级都走开了，并变成敌人，但地主资产阶级的叛变是逐渐的，不是同时的，留下的成分必须与之合作。忽视这一点，势将铸成大错。故全部抗日过程中，统一战线依然应该是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各集团、各军队的统一战线。

（二）国共合作也是一样，若干国民党员离开了并成为敌人，但留下的若干仍应是合作的。我们要用真国民党反对假国民党，争取中间性的国民党。国共两党平等联盟的前途还是存在的。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忽视这一点，也将铸成大错。

（三）三民主义也是一样，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即在把三民主义照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那样解释时，二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上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

（四）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在旧式半封建政权没有改变为真正革命民主政权以前，边区与八路军是必须存在的，只有在革命民主政权成立之时，反共危险消失之时，二者才可放弃现在这样的特殊性，否则只是反革命的要求而已。

四、拥蒋问题

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过去是对的，现在是对的，只要蒋领导抗战一天我们还是拥护的（当然以抗战为条件），不应对蒋有不尊重

的表示。

但蒋对抗战在某种情况下不能坚持的可能是存在的。即在那时，我们如何表示，还要慎重考虑。当然，那时不能不有表示，但须是适当的表示，应以有利团结多数抗战、有利国共继续合作为原则，而不能随便地轻率地恢复“反蒋”口号。

蒋对于共产党存在着敌意，这是他自己表示的事实，我们必须严防他及其部下破坏我党，这是毫无疑义的。

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对外不说“国民党投降”，应说“地主资产阶级投降派”。

五、反汪问题

“认为汪已完了是不对的，汪还能起大的作用”，这是完全对的。汪之汉奸系统较之其他汉奸更大地危害中国，没有疑义。汪在政府中、党部中与一部分军队中有其群众与同情者。

反投降必须联系于反汪，是更便利与更实际的。

六、抗日除奸问题

在假如严重叛变事件发生之时，党应极力注意对付的适当，以不脱离国民党多数为原则。

那时，抗日除奸的口号是必须的，抗日除奸的战争（同时抗日又除奸）也是无可避免的，但决不可离开国民党多数而轻举妄动。只有在为多数人所了解与要求时才能（也必须）发动除奸战争。例如现在的反汪，是合乎这个原则的。

七、民主民生问题

没有革命民主政府，要领导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故“争取民主”应在今后“反对投降继续抗战”的运

动中与之联结起来。

“改良民生”的与之联结也是一样。不过，只有抗日才有实行民主可能，只有抗日与民主才有改良民生可能，这是今日政治形势中的实际，应该明白。

八、磨擦问题

国民党五中全会后，在河北、山东，特别在边区所举行的破坏性与准备投降性的磨擦及武装斗争，是必须给以坚决抵抗的。这种抵抗是有用的，但必须严格站在自卫立场上，决不能过此限度，给挑衅者以破裂统一战线之口实。这种自卫的防御的反磨擦斗争之目的，在于巩固国共合作。为此目的，一定条件下缓和、退让也是必要的。

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严防挑衅，不要上当。

九、友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及从某些军队中撤退党的组织问题

半年来经验，在抗日的与我合作的军队中不去发展党，这个六中全会的决定，根本上是对的。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变为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十、援助友党问题

（一）极力援助那些进步分子，但也依进步程度而定援助程度之不同。

（二）拒绝援助那些退步分子、无希望分子，以免其扩充力量之

后反噬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教训。一句话，不作无条件的援助。

（三）极力加强对于一切爱国进步分子的工作，推动他们反对投降，必须要很多有能力的干部去做，一刻不能放松。对中间分子也要加紧工作。

十一、六中全会后中央各部的工作

三年来，特别六中全会以来，逐渐恢复与建立了各个中央工作部门，除军委会、组织部、宣传部、敌区工作部、青委建设较久外，统战部、妇委、工委、财政经济部、干部教育部、总政治部、党报委员会、华北华中委员会、西北委员会、南方委员会都是新建立的，秘书处亦改进了组织，共十六个机关。这些中央工作部门的恢复与建立，是在长征大破坏后的一大成绩，一大令人高兴的事。

十二、中央组织问题

（一）政治局会议以后每周一次。

（二）书记处处理日常事件。

（三）通知，大事用中央名义，小事用书记处。

（四）人员分配，以保证中央领导健全、同时加强地方领导为原则。

（五）中央各部既紧缩又加强。

十三、干部教育

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十八年来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学

生现在还不能看出他们大的工作成绩，但数年以后就可以看见了。

今后仍应继续这个方针。为物质与敌情原因，分在边区、华北两地办。去华北的，指挥管理仍属中央，但委托北方局监督之。

十四、学习运动

（一）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二）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三）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

（四）是一种长期大学校。

（五）每日二小时学习制。

（六）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七）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

（八）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九）各级机关、学校、部队均设干部教育领导机关与人员。

十五、生产运动

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

边区今年的生产运动是认真进行了的。须继续总结经验，达到解决困难之目的。

十六、青年运动

六中全会以来，有成绩。青委与青年联合办事处集中指导青运是对的。

青运方针：坚持青年统一战线，继续采取五四致三青团书的态度，用以争取青年的多数在继续抗战与民主共和国的旗帜之下。

十七、妇女运动

中央发布了妇女运动的方针，开始建立了妇委的工作。地方妇女工作指导机关亦正逐渐建立中。我们历来最缺少的干部是妇女干部，妇女运动经验亦没有总结，这个缺点必须补救。没有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工作干部，要开展妇女运动是不可能的。

十八、工人运动

发布工运工作方针，开始建立了工委，开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工人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是比较薄弱的，党的成分中工人亦太少，今后应该在这两方面有进步。

十九、锄奸工作

新环境下敌人破坏我党我军与边区政府的阴谋，已逐渐显得严重，今后必更严重，大大增加了我们锄奸斗争的重大性。因此全党必须增加这一方面的注意力，必须派出与训练有必要数量的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一部门中去。

凡国民党员因特务工作或武装向我进攻而被逮捕或俘获时，一般以不杀不降为原则（不降，谓不强迫其写自首书，不强迫其声明放弃自己信仰），以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

二十、党的组织问题

（一）精干。现在不是普遍发展的时候了，一般应停止发展，以精干为原则。

（二）严密。

（三）消除破坏分子，保卫党。

（四）阶级教育，马列主义。

（五）严格执行秘密训令。

二十一、自力更生

党，军队，一切。

准备对付最恶劣环境。

二十二、华北问题

华北局面有变到极严重的可能，敌人主力有进攻华北的可能，因此八路军与华北党必须严重注意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而从军事、政治、财政、党的组织、统一战线各方面进行准备，以适合坚持游击战争应付最大困难为原则。

华北的党有责任供给中央必要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政治意义是极大的。

二十三、华中问题

必须大大发展华中的党、游击战争与民众运动的工作，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必须有更好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新四军工作的发展与进步联系起来。边区的干部以主要输送华中为原则。

二十四、保卫边区

（一）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央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

（二）敌人进攻边区是促进中国投降的一步骤；

（三）敌人有进攻延安之可能；

（四）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

（五）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六）学生与工作人员大批上前线；

（七）好好保护与教育青年学生、新干部、新党员；

（八）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

二十五、动员大批学生及工作人员上前线

（一）加强教育，加强前线工作；

（二）毕业后依然上前线，早上前线为强；

（三）因为敌情；

（四）因为经费；

（五）决定去一万人；

（六）政治上、组织上好好动员；

（七）后方便于领导教育与打游击战争，但人员还是不少；

（八）干部须作适当的分配；

（九）学生必须酌量多留一些于后方；

（十）学校名义必须保存，前后方同。

二十六、七次大会[1]

（一）八月一日前选举完毕；

（二）十月开会；

（三）为团结全党反对投降而斗争；

---

[1] 指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7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七大”准备委员会。同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在最近时期内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讨论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正式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加紧完成准备召集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切必要工作”。由于战争和交通等原因，大会迟迟未能召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才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

（四）能够来与能够开的。

二十七、两条战线斗争

（一）反对右的：

看不见投降反共危险；

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

对时局无出路（失却前途）；

没有阶级立场；

在艰苦斗争面前恐惧消沉。

（二）反对“左”的：

黑暗的中国，黑暗的世界，黑暗的边区，黑暗的自己；

准备破坏统一战线，否认国共合作，不要三民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盲干。

（三）老干部应做基干，带领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向抗战的更高阶段前进，向困难阵地攻击。

二十八、团结战胜一切

（一）必须更加团结：

只要中央与高级干部是团结的，全党必能团结。

只要共产党团结，必然无坚不破。全国人民的救星是共产党。

（二）必须更加集中。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三）全国团结一致，集中指挥，战胜一切。

结论

（6月13日）

一、时局问题

（一）投降因素中，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动摇是主要的，这是很对的。

（二）要克服两种可能的投降——1. 克服小部投降。2. 克服大部投降。前者是目前的可能，在大部抗战情况之下的；后者是将来的可能，在假如大部投降了的情况之下的。但做了目前工作即是便利于做将来工作，二者统一不可分。

（三）按照六中全会的定义，敌我力量在某些条件下的平衡才是相持阶段，那末，不但现在不能说相持阶段，如出现李精卫，则是敌人已组成了（它正在努力组织）它的新的战略同盟军，并使用之于作战——迂回我抗战阵地之后方（民族反革命是帝国主义战略同盟军，这是无疑的），这种时候，更不是什么敌我相持，而是我又打了一个大败仗。那时特点，打我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加上李精卫（中国佛朗哥），故较过去的战略退却更加严重，而不是什么相持阶段。

（四）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组织两支新的战略同盟军，一支是国际投降主义者，一支是中国投降主义者，前者用以包围中国外部，后者用以迂回中国内部。我们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动员国际的国内的反投降势力，打退这两支敌人的同盟军。在没有打退以前，没有什么相持阶段。

（五）正面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力）还可能进行军事攻击，说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是不对的。它在财政、经济、人力、军力各方面虽困难，但依实力说，依时间说，都还有军事进攻的可

能。所以，不但一方面须要打败从侧面进攻的新的敌人，一方面还要准备继续打败从正面进攻的旧的敌人，才能取得敌我平衡，取得相持阶段的到来。

（六）但这不是说，要把这些正面的侧面的敌人在实力上打到各方面都与我抗日军相等了，才能出现相持阶段。不是实力相等，而是：我之实力+敌人弱点+国际牵制=相持阶段。

（七）于是，相持阶段能在三种情况下出现：

1. 地域大，人数多，阵线巩固，造成敌我相持。例如，俄国内战的中期，欧战的中期。抗战到现在的中国，地域大，人数多，但阵线不固（政治腐败，投降者捣乱），故还没有相持阶段。如能努力克服投降危险，并在克服过程中改造政治，阵线巩固了，相持阶段就来了。这是第一种。

2. 地域小（谓直接根据地小，但国度大），人数少，但阵线巩固，也能相持。例如，十年红军战争，某种程度上说来一个时期内的东北义勇军。将来假定有大部叛变之事，留下的小部亦可造成相持，只要能不断打破“围剿”，这种相持形势就有了。目前的华北局势，可以说是暂时的、小部的相持，把华北局势延长下去，就变成长期小部相持了。

3. 由上述小部相持再变到大部相持，经过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达到。如果那时还不能举行战略反攻（还是战役反攻期间），仍然是相持阶段。

（八）假如大部叛变之事不可免地要在抗战行程中出现的话，那末抗战的过程也许就要以下述的公式组织成整个相持阶段：武汉以后的暂时大部相持（目前局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相持，但因阵线不固，故此时还只能说是暂时的）——某时以后的小部相持——

某时以后再来一个大部相持。

这种变化的主要特点，就是由阵线不巩固到阵线巩固。要长期相持，就要阵线巩固，有此条件，虽小亦能相持，无之虽大也不能。所以应力争数量之大（人多、地大），但主要的还在质量之强。所谓阵线巩固，就是抗日根据地之巩固加统一战线之巩固。

（九）华北确有相持形势，但这还是暂时的，我们提出“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是想把暂时变为长期。如果别处都黑暗了，剩下华北（同样，新四军，陕甘宁边区），那它虽在地域上人数上是局部的，但因已没有别的抗日军了，它成了唯一的抗日军，也就取得了战略相持的意义。这是困难局面，但我们也应准备。大半边天都黑了，剩下共产党抗日，我们也要干下去，也能干下去的。这样干个三年五年，唤醒人民，吸引友军，又逐渐形成新而大的抗日阵线，那时，我们就成了抗日救国的核心与领导力量。

所以，不论如何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虽然道路是艰难的。

（十）目前，正是敌我关系（敌我力量）重新改组的时候，看谁争取多数，更看谁的质量较好，以决胜负之谁属。谁胜谁败，这问题目前未决，双方正重新准备条件。

阵线是必然会改组，也必然要改组的。我之同盟军的一部（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可能改变为敌人的同盟军，但我决不让其全调去，我必须争取其另一部，也可能争取其另一部。我还有广大同盟军没有动员，中国农民，日本工农兵，国际无产阶级，苏联的力量，动员起来，便能制敌死命。

敌是反革命的，我是革命的，这个质的不同，决定最后胜利之属谁。但指挥战争的策略，尤其决定胜负之谁属。没有后者，单靠本质优良，胜利仍然没有的。

二、转变问题

（一）我们说准备自己，应付新的可能情况，应付可能的米亚哈，是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之下的。在六中全会总路线下，准备对付可能的米亚哈（或哈恰），与准备在可能的米亚哈占领地区采取暂时的退却政策。到此为止，不能设想对六中全会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是说，如果有转变的话，不是路线的转变，而是战术或策略之局部的暂时的转变，以防意外的袭击，这一点要首先弄清楚。我们要坚持过去的总路线。

（二）目前要极力争取的，用党的全力去争取的，是克服投降可能，争取多数抗日，拥护并帮助并监督并批评国民党与蒋，使之能够从反汪斗争中、从今后发展中克服投降倾向，这是目前的中心任务。

（三）因此应强调团结，强调统一，强调国共长期合作，而不是强调其他东西。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克服投降危机，也只有强调这些才能更好地准备自己，应付可能的事变。一切为了孤立投降派而不是使自己孤立。

三、几个策略问题

（一）巩固党问题（组织上的紧缩政策）。去年三月会议[1]决定大大发展党之后，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故须暂时地一般地停止发展。当然不是一个也不准入党，有些地方还是应发展。停止发展为的是便于清理、除奸和教育，将来还是要再发展的。

（二）党应好好保护新党员新干部，主要责任在老党员老干部身上。新老党员新老干部之间，一定要弄好，如弄不好，老党员老干

---

[1] 指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部负其主责。有完全的理由给新党员新干部以原谅，而对老党员老干部则没有这种理由。此问题过去存在着某些不正确观点。这事，与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部队的关系大略相同。

要从新党员中提拔大批的干部。

（三）要加紧党内教育。阶级教育与民族教育的统一。但目前应着重阶级教育，同时不忽略统一战线教育。

要编制中级课本，哲学问题上要着重唯物史观。

（四）要提拔地方干部。没有地方干部——中级的，高级的，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反对“钦差大臣”的倾向，反对轻视“土包子”，取消“土包子”这个称呼。

（五）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要说服工农干部，吃得下，不怕他们。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

（六）友党友军中停止发展党并撤退党问题。从大局看，停止与撤退是有益的，否则将因此一事妨碍大局，破裂统一战线。不争取中国军队，革命不能胜利，而争取目前主要的是从政治上，若组织党则妨碍政治争取。

靠嘴巴不靠组织，靠上层不靠下层（暂时情况下）。

一面撤退党，一面加强联络，同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某种独立性。

一般只在真投降者的军队中、政府中、政党中，取组织上的破坏政策，其余，一般只取政治上的争取政策。某些特殊部门不执行撤退办法。

（七）不杀国民党员，有重要意义。不是不杀汉奸，不是不杀某些叛徒，也不是不杀紧急时机的革命危害者。

（八）不应过分强调民主民生。不适当的。目前应强调反投降（强调抗战），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是联系不是强调。

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征兵、捐税、生产等问题，取赞成而又批评的态度，不能取根本反对态度。

（九）地方策略。要有明确的适合当地情形与各种情形的地方策略。中央以后要注意指导。

（十）要加强群众运动。所谓准备群众即指此。不是降低阶级斗争就能够克服投降，只有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以与统一战线相配合，才能克服投降。单有统一而无斗争是非常危险的。群众是我们的最后依靠，也是抗战的最后依靠。

（十一）回民问题。

（十二）开办党内刊物。立即就开始办，地方上也要办。

（十三）其他。

总的结论就是这样：团结战胜一切。

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对八路军参谋会议的意见[1]

（1939年6月12日）

左：

抗战快届两周年，集总[2]召开参谋会议是有强大意义的，我们对此有如下意见希考虑：

（一）会议方针应是总结两年来抗战中我军参谋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确定参谋工作的总方向与目前急需进行的具体工作，提高参谋人员的政治素质与工作能力。望技术参谋达到战术、战略的参谋的水平。健全指挥机关，不仅特别善于进行游击战争中的参谋工作，并能准备为转入现代正规战中的参谋工作。

（二）会议在检查过去工作中优缺点，寻找其原因以求纠正缺点发扬优点时，应联系到过去红军时代的优良传统的发扬，特别是各种制度法规的审定（此间寄上的机要规则与作战科机密规则，可作讨论基础。已否收到，望告）。

（三）为适应目前整军时期的需要，应健全各级参谋处教育科。必要时，以参谋长兼科长，设副科长，主要任务在供给教材，指导与检查教育的实施。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给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电报。

[2] 集总，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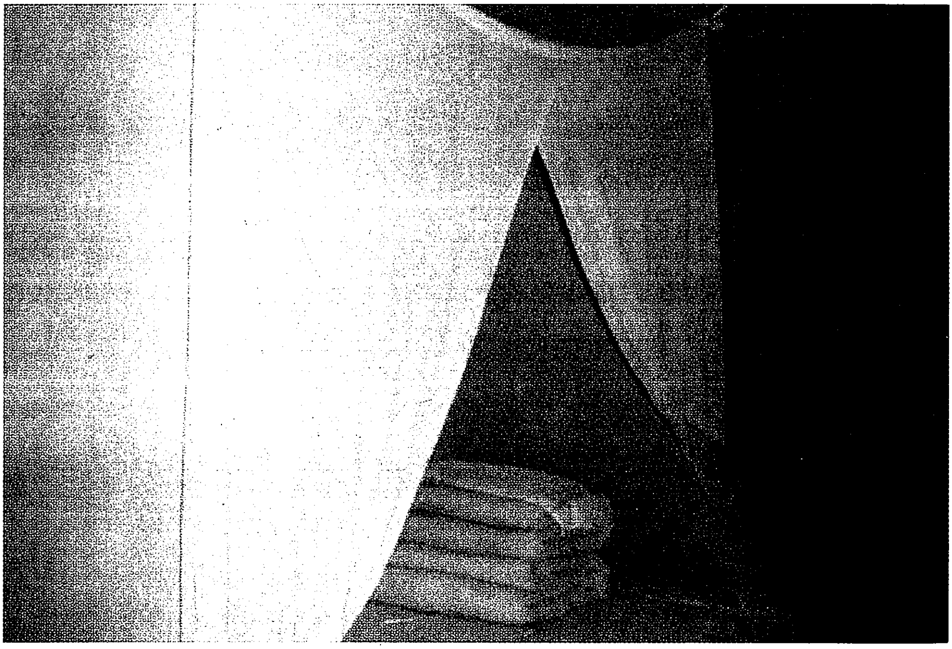
（四）尽可能设法减少人员，在集总参谋处直接领导下办参谋人员训练班，以应各级参谋处的要求。

（五）在职参谋人员的军政教育，应视为整军训练中的必要前提。

（六）参谋人员政治条件、工作能力、政治地位与信仰的提高，是和提高参谋工作的效能不可分离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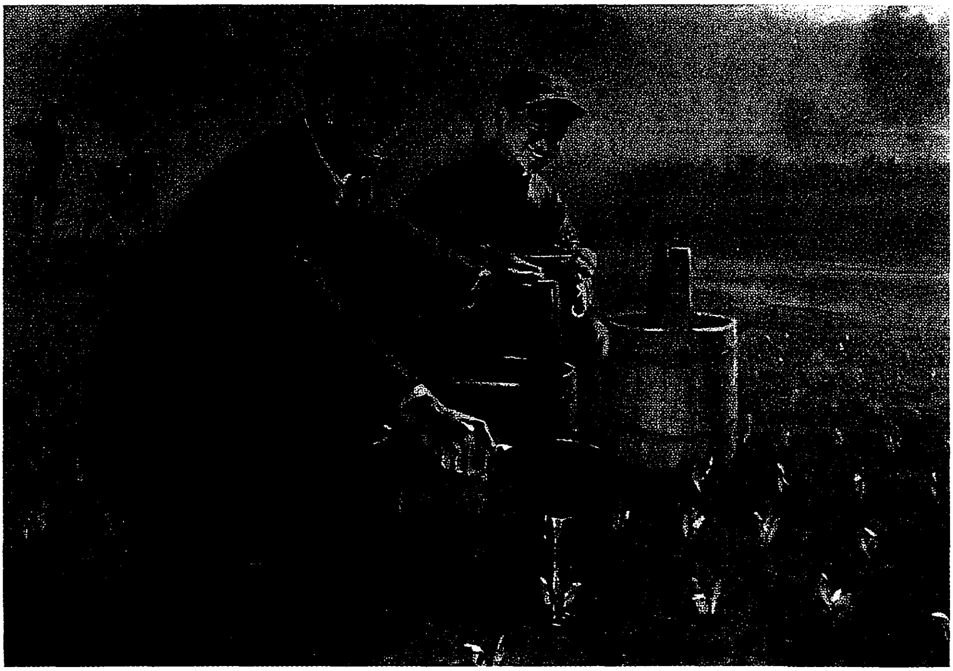
（七）为使会议能顺利进行并获得完满结果，应作充分的准备，各个问题应分小组事先讨论，排除空洞的意见与琐碎的争论，要求有明确的方向与实际的具体的办法。

毛　王　滕



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故居中，彭德怀用降落伞为毛泽东制作的蚊帐。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故居。



《杨家岭的早晨》（油画）

给萧三[1]的信

（1939年6月17日）

子暲同志：

（一）大作[2]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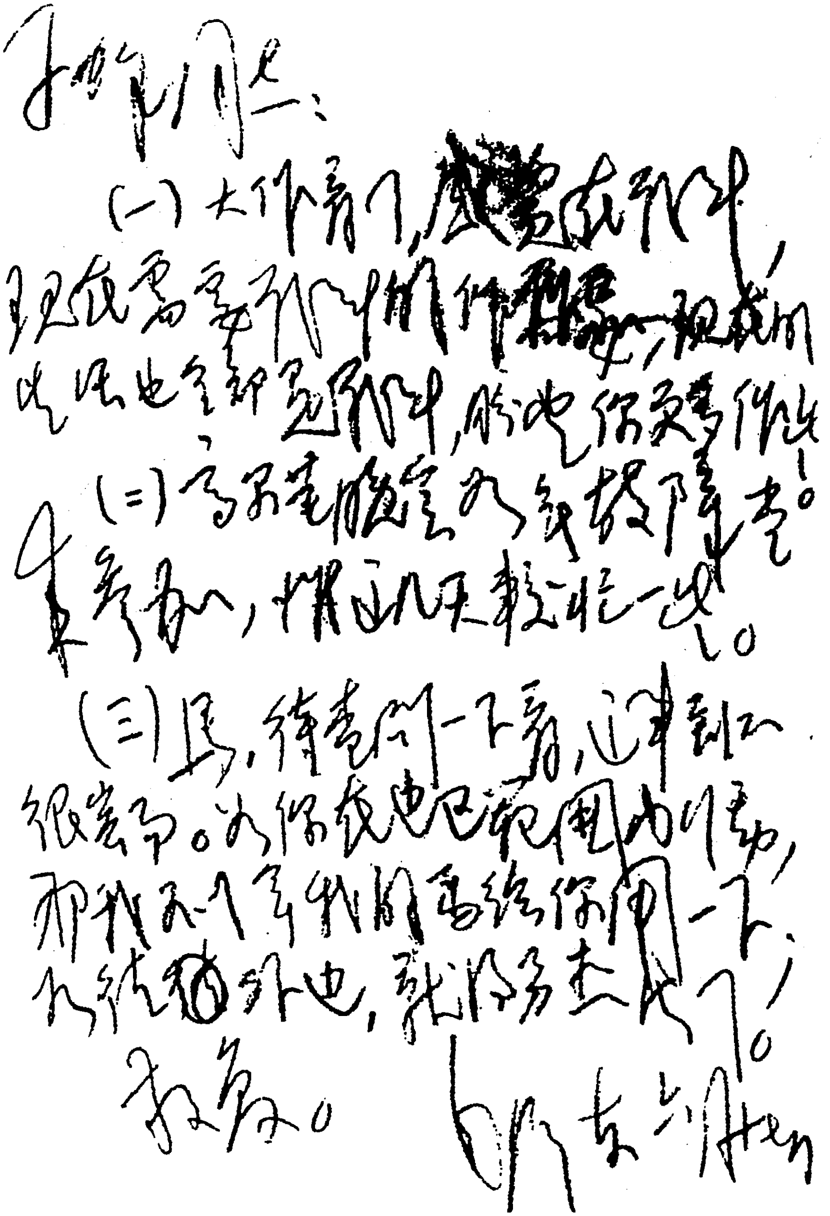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

[1] 萧三（1896—1983），原名萧子暲，湖南湘乡人，诗人。当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部主任。

[2] 指萧三写的一本诗稿。其中一部分诗后来收入他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萧三诗选》。



子暲同志：

（一）大作看了，[illegible]我们现在需要这种作品，[illegible]，但我们生活也会需要这种作品，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的入场券接到了，未去参加，因近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仍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就不必了，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经常外出，就须另去找了。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廿四

毛泽东致萧三信的手稿。

在鲁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

（1939年6月21日）

在敌人“扫荡”后，鲁南局面混乱。我应趁此机会，将第一一五师师部、第六八六团及萧华部队之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派得力的党政军干部任专员、县长、区长，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巩固鲁南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1]

（1939年6月24日）

在目前形势下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对我军的破坏工作一定积极化，并且他们可能相互结合。因此锄奸工作的重要性大为增加，我们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新的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对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发出的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

反对投降活动

（1939年6月30日）

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卢沟桥抗战的炮声，把这个争论暂时地解决了。它宣告：第一个结论是对的，第二个结论是错了。但是卢沟桥的炮声，为什么仅仅暂时地解决这个问题而没有最后地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由于国际投降主义者[1]的妥协企图，由于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动摇性。现时人们就把这个问题改变了一点词句，变为所谓“和战问题”，又提出来了。在中国内部，因而就掀起了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他们的论点依然是一样，“战则存，和则亡”——主战派的结论；“和则存，战则亡”——主和派的结论。但是，主战派，乃是包括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全民族的大多数；主和派，即投降派，按其人数说来，则仅仅是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的动摇分子。因此，所谓主和派，就不得不进行其欺骗宣传，而第一就是反共。于是雪片一样地制造所谓“共产党捣

---

[1] 国际投降主义者，指当时阴谋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英美帝国主义者。

乱”“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陕甘宁边区实行割据，向外扩展”“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乃至“苏联阴谋侵略中国”等等的假消息、假报告、假文件、假决议，用以蒙蔽事实的真相，企图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主和派即投降派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坚持者，不反对它，就不能破坏国共合作，就不能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投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让步。他们认为日本已经不行了，它将改变其根本政策，自动地退出华中、华南甚至华北，中国可以不要再打而取得胜利。再其次，就是寄其希望于国际的压力。许多所谓主和派分子，他们不但希望各大国出来对日本压一压，迫使日本让步，以便讲和，而且还希望各国向中国政府的头上压一压，以便向主战派说：“你们看，国际空气如此，只得和吧！”“太平洋国际会议[1]是有益于中国的，这不是什么慕尼黑[2]，这是复兴中国的步骤！”这些，就是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

---

[1] 当时，英、美、法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主和派阴谋召开所谓太平洋国际会议，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出卖中国。这一阴谋被称为“远东慕尼黑”或者“东方慕尼黑”。毛泽东在本文中所斥责的那种认为太平洋国际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说法。

[2]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德国的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在1938年和1939年间，英美帝国主义曾经几次酝酿出卖中国来换取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1939年6月，即毛泽东作此文时，英日正在进行谈判，重新酝酿这种阴谋。这种阴谋同英、法、德、意在慕尼黑制造的阴谋类似，所以人们把它叫作“东方慕尼黑”。

整套做法，整套阴谋！[1]。这一套，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2]，有些装红白脸[3]。

我们共产党人公开宣称：我们是始终站在主战派方面的，我们坚决地反对那些主和派。我们仅仅愿意和全国一切爱国党派、爱国同胞一道，巩固团结，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合作，实行三民主义，抗战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4]，而不知其他。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磨擦[5]、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内战的阴谋。我们向他们说：你们这种分裂阴谋的实质，不过是你们实行投降的准备步骤，而你们的投降政策和分裂政策不过是出卖民族利益、图谋少数人私利的整个计划的表现；每个人民都有眼睛，你们的阴谋会被人民揭穿的。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太平洋会议并非东方慕尼黑的无稽之谈。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

---

[1]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中国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观点，整套做法，整套阴谋”，就是指当时蒋介石的观点、做法和阴谋。当时汪精卫是公开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蒋介石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

[2] 毛泽东这里指蒋介石和汪精卫彼此间的活动有如唱双簧的关系。

[3]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采取两面派的活动，一面还装着抗战的样子，另一面又用各种形式去进行投降的活动，就好像中国古典戏剧中的演员，有的化装红脸，有的化装白脸一样。

[4] 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出他的所谓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因此特别提出抗战到底的界说，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以对抗蒋介石的投降政策。

[5] “磨擦”是当时流行的一个名词，指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各种反动行为。

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我们坚决地斥责那些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能够觉悟、能够让步的空谈。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根本方针是决不会变的。武汉失陷后日本的甜言蜜语，例如放弃其所谓“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1]，转而承认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例如所谓华中、华南撤兵的条件，乃是诱鱼上钓取而烹之的阴险政策，谁要上钓谁就准备受烹。国际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投降，同样是他们的阴险政策。他们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借收渔人之利。如果寄希望于这些阴谋家，同样将大上其当。

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半年以来，由于日本诱降政策的加紧执行，国际投降主义者的积极活动，主要地还是在中国抗日阵线中一部分人的更加动摇，所谓和战问题竟闹得甚嚣尘上，投降的可能就成了当前政治形势中的主要危险；而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在这种情形下，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的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用全民族的血肉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两个周年的战

---

[1]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称“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真正与帝国合作的新兴中国政权的成立和发展”。同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对于抗战的动摇，改取诱蒋投降为主的方针，在11月3日又发表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往的指导方针，更换人事，改弦易辙，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亦不拒绝”。

争，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动摇和叛卖。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不容许一部分人的破坏和分裂。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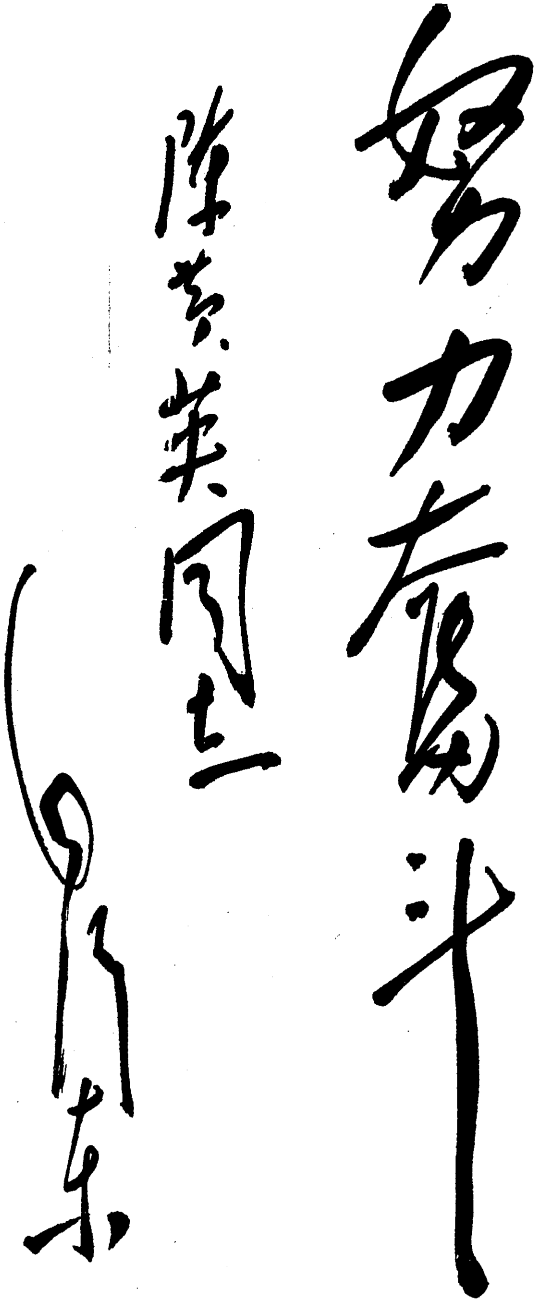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啊！

为陈黄英题词

（1939年6月）

努力奋斗。

陈黄英同志



努力奋斗

陈黄英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陈黄英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7月3日）

这些文件指出反共、防共、限共，我认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要强调反对内战危险，指出反共危险便是内战。这些文件中，都要强调反对内战。宣言中的文字要简洁些，纲领每条只要一两句话。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和致国民党书等文件时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反“扫荡”等问题
给李井泉等的指示[1]

（1939年7月3日）

中国抗战已进入第二阶段，目前敌人在其占领区内的“扫荡”必较前加紧，我们在敌后反“扫荡”的任务也必然更加繁重和困难。因此必须加强我军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巩固党的组织，巩固部队的组织，加强部队的战斗力，并乘绥东专员已逃的时机，大力建立当地抗日政权的工作，争取自卫军配合我军坚持抗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关于反“扫荡”等问题给李井泉、姚喆等的指示。

在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

（1939年7月7日）

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第一个法宝是统一战线。现在时局的特点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第二个法宝是游击战争。这是我们从十八年艰苦奋斗中得来的法宝。中国现在的革命，要把日本打出去，没有武装斗争，其他就没有办法。第三个法宝是革命中心的团结。这是指共产党要与共产党的同情者好好地团结起来。没有革命中心的团结，别的法宝就不能使用。

同志们，你们出发到前方去工作，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我们既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又要打汉奸，又要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你们看多麻烦呀！

你们到前方去工作，要有远大的眼光，不但要争取民族解放，还要争取社会解放。

---

[1] 1939年夏，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组成华北联合大学。在华北联合大学举行的正式开学典礼上，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为戴镜元题词[1]

（1939年7月7日）

步步前进，就步步胜利！

毛泽东

---

[1] 1939年夏，经过一年多的日夜奋战，戴镜元他们解读了敌军的“天书”。这是我军的一项重大胜利，它的成功对于前方作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同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副参谋长滕代远的陪同下，召见了戴镜元等同志，称他们为“无名英雄”，并挥笔为戴镜元写了这个题词。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1]

（1939年7月9日）

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我想同志们讲得很多，听得很多，看得很多，做得也很多了。今天同志们临别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个问题呢？同志们要知道，今天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克服困难，夺取抗战胜利，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一切等等，都得依靠统一战线这个法宝。

统一战线是什么？是抗战的团结，是各个党派、各个阶级、各个军队、各个民族抗日的大团结，这个大团结就叫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抗日的统一战线不但要是中国的，而且要是全世界的，只有中国的是不够的。世界凡是能够反对日本侵略的，不管他反对的程度如何，我们要统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抗日统一战线。我们这个统一战线有中国的力量，又有世界的力量，是一个伟大的团体。总而言之，现在中国的统一战线已经组织起来了，已经成为一个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

但是，在抗战的过程中，在统一战线的发展过程中，在这个大团体中，许多人在打日本这条路上走着，有一部分人是会变的，现在已经有变的了，将来还会有变的。走打日本的路，好像你们到华北去一样，你们在路上日晒雨淋脸皮多少要变一点颜色，也可能跌

---

[1] 这是毛泽东对陕北公学赴前线同学演讲的一部分。

一跤脚上会掉一块皮，也许还有肚子痛等等，这些都是小变。还有大一点的变化，就是在路上也会有人开小差，不干了，就“逃之夭夭，溜之乎也”。同志们，你们这次到华北仅仅是一条短路，而我今天所讲的不是一条短路，而是一条长路，是要一直打到鸭绿江边的一条长路。在这条长路上，在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开小差的是一定会有的，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汪精卫。他一跑跑到越南，又一跑跑到香港，再一跑跑到上海。他说我们八路军“游而不击”，我看他倒是游而不击。他一游游到日本去见日本的天皇，再游游到北平，三游游到南京，但是他对日本侵略军从未击过，汪精卫才是真正的游而不击。现在外边来的人说，在内地还有很多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总之，有许多汪精卫一类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暗藏的汪精卫。他们要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三国时代有一个张松，把西川的地图献给了刘备，因此刘备就入川建立了蜀国。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汪精卫第一个献了地图，还有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他们也准备要献地图，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华民国的地图献给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日本统治下的“中国”。所以我们说，现在有很大的危险，就是投降的危险，中途妥协的危险。他们要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就是造谣，企图以此达到分裂的目的，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大团体破裂，使国民党分裂。汪精卫在上海也组织了一个“国民党”，他的主义也叫做“三民主义”，所以现在有两个国民党、两个三民主义，一个是汪精卫的，另一个是蒋介石的。实际上，现在有三种三民主义：一种是假三民主义，汪精卫的就属于这一类；一种是半真半假的三民主义；一种是真三民主义。我们首先是反对假三民主义，反对公开汪精卫与暗藏汪精卫的假三民主义、假国民党。汪精卫之流

分裂国民党，分裂三民主义，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整个的抗战阵线，他们的这种阴谋计划，一句话，就是企图以搞分裂达到投降的目的。这是当前时局的最大的危险、可能的趋向与重要的特点。这需要全国人民大家起来，首先是革命的青年，先进的各阶级，尤其是同志们，去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分裂、投降、妥协是退步的、倒退的，团结、抗战是进步的、前进的。投降分子反对进步，他们是向后倒退的。全国现在就有这种干倒退事情的人，干反共事情的人，干反科学事情的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的，他们说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讲这个话的人就是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等等。我们问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他们又回答不出来。什么是中国的国情呢？中国的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问起中国国情是什么？回答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几个字。这是经过中外许多社会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所得出的结论。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是病症，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两种病：一种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种是封建势力的压迫。马克思主义是诊治这种疾病的最有效的良药，说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真是岂有此理！他们想用这一套反对进步的、倒退的、反科学的谬论来迷惑中国的青年，但是革命的进步的青年是不会上他们的当的。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在这条一直要打到鸭绿江边的长路上，有许多人会开小差的，汪精卫先开了小差，还有准备开小差的也相当不少，将来还会有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在半路上吃不了苦，也会开小差跑到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去的。但是，在他们没有跑出去的时候还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跟他们讲亲爱，讲团结，大家共同抗日；要是他们跑出去了，那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他们就不客气了。在国际营垒里也是一样，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是

别的什么样的政府，只要是帮我们打日本的，我们都愿意跟他们做朋友。这就是我们的统一战线。地主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他们只要是打日本的，我们就跟他们统统团结起来。但是，这里面有些人不想干了，要走，那就只好由他去吧！“阎王注定三更死，断不留人到五更。”现在的阎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他要请这些人去，被他请去的已经有汪精卫，还有张精卫、李精卫等等也准备要请去，这种事情在抗日过程中已经有过了，而且将来还会有的，这个道理我们大家一定要懂得。有人认为：这样，我们抗日战线的队伍不是缩小了吗？怎么办呢？我们看问题应当这样看：汪精卫当他还在抗日战线内的时候，他总是设法限制抗日群众运动的发展，限制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组织的扩大；他跑掉之后，我们陕公、抗大可以多招收些学生，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也可以多组织一些。抗战是长时期的，这些人出去的多一点，他们在统一战线中占的数量就减少，好的人进来的就越多。还有一个问题要说一下，就是现在看见汪精卫已经出去了，张精卫、李精卫也要准备出去，这样一来是不是地主资产阶级会全部出去呢？不会的，我们知道，地主资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是要抗日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不要以为汪精卫开了小差，张精卫、李精卫也准备要开小差，恐怕就不是民族统一战线了，而变成人民阵线了，只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不包括地主资产阶级了，恐怕又要搞过去那一套，打土豪分田地了。现在有些人感到不痛快，土豪不能打，土地又不分。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我们要知道，革命不是图痛快的事情，而是要艰苦奋斗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尽力做到：凡是可以多留他一天的，我们就多留他一天，能够争取多留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走也是好的。这一

点大家要懂得，就是要坚持统一战线。现在的时局有这个特点，就是妥协投降分子要闹分裂，我们就以抗战的进步、全国的团结、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一定不要把统一战线这个旗帜放下，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再讲长期合作的问题。现在开了小差的和准备开小差的相当的多，国共两党还有没有可能长期合作呢？我们回答说：有！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等等毕竟是少数人，留在抗日营垒里的人还是多数，我们把这个多数组织在统一战线里。这个统一战线依旧包括各党各派，各个阶级，各个民族，各个军队，仍然是一个抗日的大团结。长期合作依然存在，因为我们是跟抗日分子始终站在一起的。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合作，不然中国抗战是一定要吃大亏的。今天在同志们临别的时候，我送给你们“统一战线”这个法宝，我认为它就是姜子牙的“打神鞭”，专打妖魔鬼怪。我们有了这个“打神鞭”，就什么都不怕，可以打冒失鬼——日本帝国主义，也可以打怕死鬼——汉奸。同志们！历尽艰苦得来的经验，一定要好好地珍视它。孙中山先生积四十年革命的经验，在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就是要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积十八年的革命经验，对于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有很深的体会的。

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有了合作、分裂、合作三个阶段。十年的内战，大家都取得了经验，朋友们也有，我们也有，大家冷静地想一想，抗战胜利后两党还打不打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许多国民党的同志跟我谈这个事，抗战以后到底再打不打？我说：从前你们要“剿共”，所谓“剿匪”，我是土匪头，你们非“剿”不可，奇怪得很，越“剿”越多了。我们的党过去只是小指头那般大，多承

“围剿”，就大了起来，变成大拇指了。我们的枪是哪里来的？都是你们送来的。所有红军都是你们打出来的，红军的枪都是由你们送来的。所以，请朋友们想一想：到底打欤？不打欤？我们也想了一下，还是大家讲和吧！

但是，现在有些顽固分子总想反共，还想再打内战。我们说：我们是不想打的。从前我住在汉口，你们要打，没有法子，我就上了井冈山。现在你们要是再搞反共，又要打我们，我们就马上上山，但是我想还是大家都住在城里比较好。从前黎元洪说“有饭大家吃”，我们说再加一条“有敌大家抗”，吃饭、抗敌是大家都有份的，假使只是资产阶级地主有饭吃，工人农民没有饭吃，这就太不公平了。大家吃的粮食，住的房子，穿的衣服，是从哪里来的？饮水思源，这些都是由工人农民做出来的，但是工人农民倒没有吃，没有穿，这岂不太不公平了吗？我们主张大家都有吃有穿，就是说不要破裂统一战线。我们是可以长期合作的，虽然有开小差的，但长期合作还是存在的。你们上前线，一定要牢记这一点：坚持国共长期合作。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陕公同志们写信来提出过，学校方面间接地也向我提出过，这就是“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底是战略还是策略？”他们开讨论会，争论得非常热烈，大家弄不清楚。我想了几天，同志们不必争论了，把你们两方面的意见结合起来，也来一个“统一战线”，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从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的主要打击方向，从制定革命力量的相应布置计划来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它规定战略任务，确定和调动同盟军，这是整个战略计划。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作为骨干的无产阶级，它的同盟军在国内有农民群众、小

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及其他一切抗日分子，都组织起来共同抗战；在国外，美、英、法、苏等国是我们的同盟军，大家联合一起打日本。这样，在国内在国外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所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至于如何进行抗日，具体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这是策略的。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例如抗大、联合大学，工会、农会、青年救国会，等等。将工农群众、小资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都组织起来开参政会，这也是一种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对于现在的参政会，我们本来是不赞成的，但现在开一下也好，因为这比没有总强一些。将来开参政会就不够了，要由老百姓自己选举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至于组织中央军、八路军等等在前线打仗，这也是一种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虽然形式繁多，各色不一，但都是执行战略的任务。所以，我们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战略的，又是策略的。

我们要紧紧地把握住统一战线，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困难都可以打破。这个“打神鞭”——统一战线，是我今天送给你们的第一法宝，希望同志们用它去打尽一切妖魔鬼怪。

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7月12日）

创造边区是你们第一个功劳，现在保卫边区也一样要你们来建立丰功。我们反磨擦的目的在于讲和，为了把统一战线搞得更好，巩固团结，反磨擦是达到讲和的最好办法。边区的县长、区长、乡长，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都要提高文化程度、政治水平和办事能力。我们的口号是：工作！学习！生产！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又要生产。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长、区长联席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39 年 7 月 20 日）

同志们！今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高兴。……

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妇女在抗战中是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教育子女，鼓励丈夫，教育群众，均须要通过妇女；只有妇女都动员起来，全中国人民也必然会动员起来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女大现在办起来，将来还要维持下去，要维持下去，就要经过更大的持久的奋斗。我们办女大，有些人不赞成，首先就是那些“顽固分子”。他们不赞成，他们设关卡，阻止各地学生到延安来学习，不愿妇女得到彻底解放。

其次，还须要与轻视妇女运动的观念作斗争，因为他们看不出妇女的作用，忽视妇女在革命中的伟大力量。只有克服这些阻碍，才能使现在的女大发展起来。

我希望女大教职员同志们，要安心工作，准备长期工作的决心，我们党应该有很多专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

（1939年7月25日）

罗、王、张、朱、彭、杨，并转何、周、聂、彭、舒，并转陈、邵[1]：

抗大以致一切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针，应当如下：

（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太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

1. 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2. 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

---

[1] 指罗瑞卿、王智涛、张际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何长工、周纯全、聂荣臻、彭真、舒同、陈伯钧、邵式平。

3. 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

4. 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

（四）因过去公开招生，特务人员混进不少，现在必须立即提高政治警惕性，三个分校立即进行全体干部的审查，洗刷有特务嫌疑的分子，学生党员应重新登记，弄清每个学生的政治面目是最重要的工作。抗大领导者应认识这不仅关系抗大，而且关系八路军，因为特务人员经过抗大打入八路军，希望你们严重注意，但此工作必须很好的领导，避免及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

（五）请北局前总领导一分校，分局与军区领导二分校，作深入的讨论与检查，定出今后具体计划电告我们。彭真所提意见我们都同意，分校必须在当地最高党及军事机关领导之下进行工作，不宜所谓独立自由及各自为政，而党军机关亦必须对分校工作负完全责任，抗大本校在到达目的地进行深入的讨论彻底转变工作。

就学习六届六中全会文件给林彪校长的信

（1939年7月29日）

此次毕业生必须发给《解放》五十七期，六中文件，并须加以讨论之后，才走为好。需要多少，速去□□处交涉领取，先取少数每队发二三本也好。三十号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一号下午的军事会我准备到，二号可以来讲六中全会总结。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夜十时

为蒋灿题词[1]

（1939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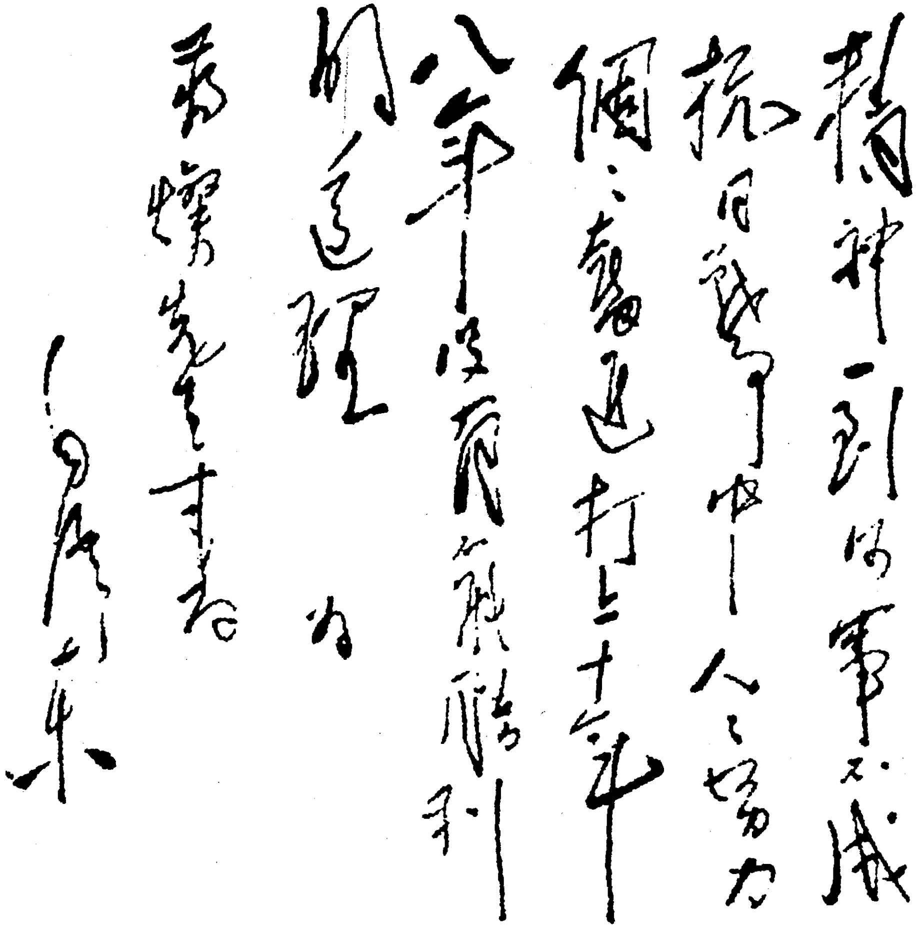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

为蒋灿先生书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受国际联盟防疫团派遣到延安做防疫工作的蒋灿所写的题词。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抗日戰爭中人人努力
個個奮起打上十年
八年沒有不勝利
的道理　為
蔣燦先生書
毛澤東

毛泽东为蒋灿的题词。

四言诗·戏改江淹[1]《别赋》

（1939年7月）

春草碧[2]色，
春水绿波。
送君延安，[3]
快如之何！[4]

---

[1] 江淹（444—505），南朝梁代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历仕宋、齐、梁三代。梁代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少孤贫好学，早年即以文章著名，晚年才思衰退，所作诗文不如前期，人谓“江郎才尽”。诗歌多拟古之作。赋以《恨赋》《别赋》最为有名。原有集，已散佚，后人辑有《江文通集》。

[2] 碧，青绿色。

[3] 君，你。延安，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送君延安，在延安送别奔赴抗日前线或赴全国各地从事革命工作的同志。

[4] 快，快活，舒畅。之，这里是语助词，无实义。如之何，即如何，怎么样。快如之何，快活得怎么样。犹言快活极了！

挽郭沫若父郭朝沛先生联[1]

（1939年7月）

先生[2]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3]，克享遐龄[4]，明德[5]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6]，戎幕奋飞[7]，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8]。

---

[1] 1939年7月3日，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在四川乐山老家病逝，享年86岁。郭沫若当时在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他闻讯后，偕夫人于立群星夜奔回原籍治丧。由于郭朝沛在当地声望很高，加之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而治丧期间收到挽联近300副。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以“世侄”的名义联名送了这副挽联。郭朝沛（1853—1939），字膏如，四川乐山人。早年失学，自十三四岁开始从事酿酒、兑换银钱、粜纳五谷等生意，终生为家业奔走于四方，饥渴无常，寒暑不避。在儿辈的教育问题上煞费苦心，为人乐善好施，除行医治病外，乡中公益事如兴学校，设义渡，造桥梁，辟道路等都率首倡成，在当地声望很高。

[2] 先生，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

[3] 衡门，横木为门，指简陋的房屋。潜隐，潜藏隐状。

[4] 克，能够。享，享有。遐龄，高龄，长寿。

[5] 明德，完美的德性。

[6] 宗匠，大师，指学问技艺为众所推崇的人。这里指郭沫若。

[7] 戎幕，军府。奋飞，鸟类振翼飞翔，这里是高举远引的意思。

[8] 勒，雕刻。勒石，刻文于石。来兹，来年。

为中国女子大学成立题词[1]

（1939年7月）

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

[1] 1937年1月，党中央进入延安城以后，就创立了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旧址，位于延安市王家坪市委党校后的山坡上。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正式开学典礼，王明担任校长，中央领导全部出席并讲话。毛泽东为其题词：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时。

必须制裁反动派[1]

（1939年8月1日）

今天是八月一日，我们在这里开追悼大会。为什么要开这样的追悼会呢？因为反动派杀死了革命的同志，杀死了抗日的战士。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什么人杀死的？军队杀死的。军队为什么杀死了抗日战士？军队是执行命令，有人指使军队去杀的。什么人指使军队去杀？反动派在那里指使[2]。同志们！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人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这些反动派，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人民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上的演说。

[2] 1939年6月12日，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派兵包围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6人。这个惨杀事件，激起了各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正义人士的公愤。毛泽东在这篇演说中所抨击的反动派，就是指的这次惨杀事件的指使者蒋介石和他的党徒。

他们是准备投降的，所以恭恭敬敬地执行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命令，先把最坚决的抗日分子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

现在全国抗日，全国人民在抗日的目标之下结成一个大团结。在这个大团结里面，有一部分人是反动派，是投降派。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

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自从六月十二日下午三时杀了人之后，到今天是八月一日了，我们看见有人出来过问没有呢？没有。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应该由中国的法律出来过问，由法官出来过问。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但是，平江惨案快两个月了，法律和法官并没有出来过问。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一[1]。

中国应该统一，不统一就不能胜利。但是什么叫统一呢？统一就是要大家抗日，要大家团结，要大家进步，要有赏有罚。应该赏什么人呢？应该赏抗日的人，赏团结的人，赏进步的人。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现在统一了没有呢？没有。平江惨案就是证据。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应

---

[1] 毛泽东在这里所解释的“统一”，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统一”的名义，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阴谋而提出的。自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日起，国民党在政治上用以打击共产党的主要武器就是“统一”这个口号，他们诬蔑共产党标新立异，妨碍统一，不利抗日。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原则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这种反动叫嚣就更加猖狂了。毛泽东在这里把“统一”这个口号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夺取过来，变为革命的口号，用以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反民族的分裂行动。

该统一的没有统一。我们早就要求全国统一。第一个，统一于抗战。现在涂正坤、罗梓铭等抗日同志不但没有受赏，反被惨杀了；而那些坏蛋，他们反对抗战，准备投降，实行杀人，却没有受处罚。这就是不统一。我们要反对这些坏蛋，反对这些投降分子，捉拿这些杀人凶手。第二个，统一于团结。赞成团结的应该受赏，破坏团结的应该受罚。但是现在赞成团结的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他们倒受了处罚，被人惨杀了；而那些破坏团结的坏人却没有受到一点处罚。这就是不统一。第三个，统一于进步。要全国进步，要落后的人向进步的人看齐，决不能拉进步的人向落后的人看齐。平江惨案的那些刽子手，他们把进步分子杀了。抗战以来，被暗杀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已经不下几十几百，平江惨案不过是最近的一件事。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所以这件事是全国的事，是很大的事，我们必须要求国民政府严办那些反动派。

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1]，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

---

[1] 参见《反对投降活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英美等帝国主义也不断劝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议和”。1938年11月，英国首相张伯伦表示愿意实行英日经济合作，共同参加所谓“远东建设”。1939年，英美帝国主义企图牺牲中国以便同日本侵略者妥协的阴谋活动更加露骨。这一年的4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往返于蒋介石和日本之间，企图拉拢中日“议和”。6月，美国示意国民党政府外交官员，要中国出面提议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中日问题。7月，英日达成协议，英国完全承认日本侵略中国所造成的“实际局势”。

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1]，其内容全部是反动的，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是不利于抗战，不利于团结，不利于进步的。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党派，一致团结抗日，这是“异党”吗？现在偏偏有那些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在抗战的队伍中闹磨擦，闹分裂，这种行为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全场鼓掌）“限制”，现在要限制什么人？要限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限制汪精卫，要限制反动派，要限制投降分子。（全场鼓掌）为什么要限制最抗日最革命最进步的共产党呢？这是完全不对的。我们延安的人民表示坚决的反对，坚决的抗议。（全场鼓掌）我们要反对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热烈鼓掌高呼口号）

---

[1]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加紧反共活动。1939年春，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后又秘密颁布《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在这些反动的文件里，规定采用法西斯统治的方法，限制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一切抗日的群众组织；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认为的“异党活动最烈之区域”，实行“联保连坐法”，在保甲组织中建立“通讯网”，即建立反革命的特务组织，以便随时监视和限制人民的活动；在华中、华北各地，布置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

1939年，毛泽东在全军“八一”体育运动会上讲话。

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1]

（1939年8月1日）

日寇凭陵[2]，国难方殷[3]，枪口应当向外；
吾人主战，民气[4]可用，意志必须集中。

---

[1]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平江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于8月1日在延安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并送了这副挽联。其他领导人也送了挽联。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驻湖南平江的杨森奉蒋介石密令，勾结地方反动势力，派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包围新四军驻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假借“商谈抗日紧急事宜”，将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引出办事处。涂正坤刚出大门，即遭枪杀。随后，敌人冲入留守处，逮捕了抗日干部20余人，并且当即杀害了特委秘书吴渊、罗梓铭等5人。

[2] 凭陵，同冯陵，侵扰之意。

[3] 方，正在。殷，深重。

[4] 民，人民。气，气势。

代中共中央撰挽平江惨案死难烈士联

（1939年8月）

顽固分子，罪不容诛，挟成见，作内奸，专以残害爱国英雄为能事；

共产党员，应该警惕，既坚决，又灵活，乃是对付民族败类之方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8月2日）

对此次参政会采取积极方针是对的，因为现在是处在和战问题的重要关头。对上次参政会采取消极态度也是必要的。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目的，在于暴露坏分子的阴谋，暴露汪精卫派等的阴谋。要注意反对暗藏的汪精卫派及准备投降的某些银行家及军人派，使国民党政府抗战的基础转到中产阶级方面来继续抗战，现在有分化大资本家的可能。对党派问题及团结问题，我认为在国民参政会上要提出来，不提出反易于处于防御地位。保障民权、保证团结、保证在敌后的发展、保障财政问题、反对投降分子等提案都是必要的。会议还讨论对英外交政策问题，决定反对英日共同声明[2]，反对张伯伦的妥协政策。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态度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2] 指《有田—克莱琪协定》。

致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电[1]

（1939年8月7日）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反动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和加强河防，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我之戒备兵力应有必要的调动。除三五九旅即由恒山地区开回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地区，加强绥德警备区外，第一二〇师在冀中之部队移至第三五九旅现在位置，并视情况再移至晋西北地区，以利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我军调动部署致八路军总部和一二〇师电的主要内容。

在陕甘宁边区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8月13日）

我们很高兴，因为同志们非常热烈地在这里开会，同志们开会的目的没有问你们，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我们中国开会有两种：一种就是防止中国独立自由的会，是汉奸他们开的，顽固分子开的；另一种是要求中国独立自由的会，共产党的会也好，抗日分子开的也好，都是要求中国的自由独立……没有民主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最后胜利是不能够的。亡国好还是不亡国好，我们说不要亡国好，但是要民主，没有民主一定要亡国。民主是什么东西呢？民主就是走路的自由权，有了这一条就够了，有了这一条我们可以随便走到什么地方，可以去反对法西斯，反对汉奸托派，所以这两个字一定要。

孙中山有一个主义，叫民权主义，现在有些人不记得了，他偏偏说是孙中山忠实的信徒，信徒还不够，还是忠实的信徒。

致朱德等电[1]

（1939年8月21日）

朱、彭、杨：

第三五九旅以调两个充实团到陕北为宜，其余可后调。第一二〇师师部暂在平西，准备将来必要时转移到晋西北。

毛　王

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为谢子长[1]烈士题词及碑文

（1939年8月23日）

民族英雄，虽死犹生。

民族英雄谢子长同志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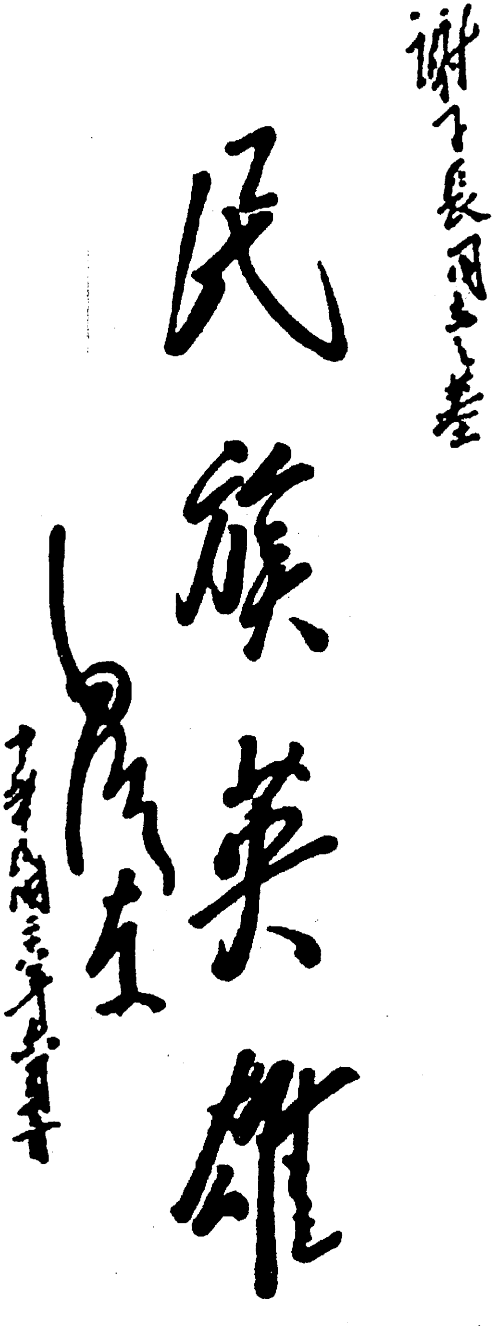
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一九二五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运动讲习班，组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因有谢青天之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继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九一八事变后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即是红二十六军之前身。一九三三年赴察哈尔参加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二十七军，协同刘志丹诸同志建造了陕甘宁边区。一九三四年于河口之役负伤，一九三五年春因伤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志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之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

[1] 谢子长（1897—1935），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人。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伤重与世长辞，时年38岁。



謝子長同志之墓

民族英雄

毛澤東

廿八年四月三日書

毛泽东为谢子长烈士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8月24日）

一、南方工作，是广大的地方工作与统战工作，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这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南方工作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一战线中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三民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政纲与我党相同，但整个革命全部政纲与我党纲领则不相同。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态度，一是理论上承认它，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二是实践上实行它，八路军、新四军、边区和党的工作，都是执行三民主义这一共同纲领。要公开号召、宣传解释三民主义，否则不能扶持左派与争取群众。一切策略的出发点不要脱离国民党的大多数。三民主义本身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叶青[2]的三民主义和平转变论是错误的。是否要公开宣传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认为是必要的。在国民党退步、妨碍统一战线开展时的危险，是怕反磨擦破坏统一战线，不知道反磨擦的必要，忘记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周恩来的报告和博古（秦邦宪）的报告时讲话的一部分。

[2] 叶青，原名任卓宣，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叛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区别性；在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1939年8月26日）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1]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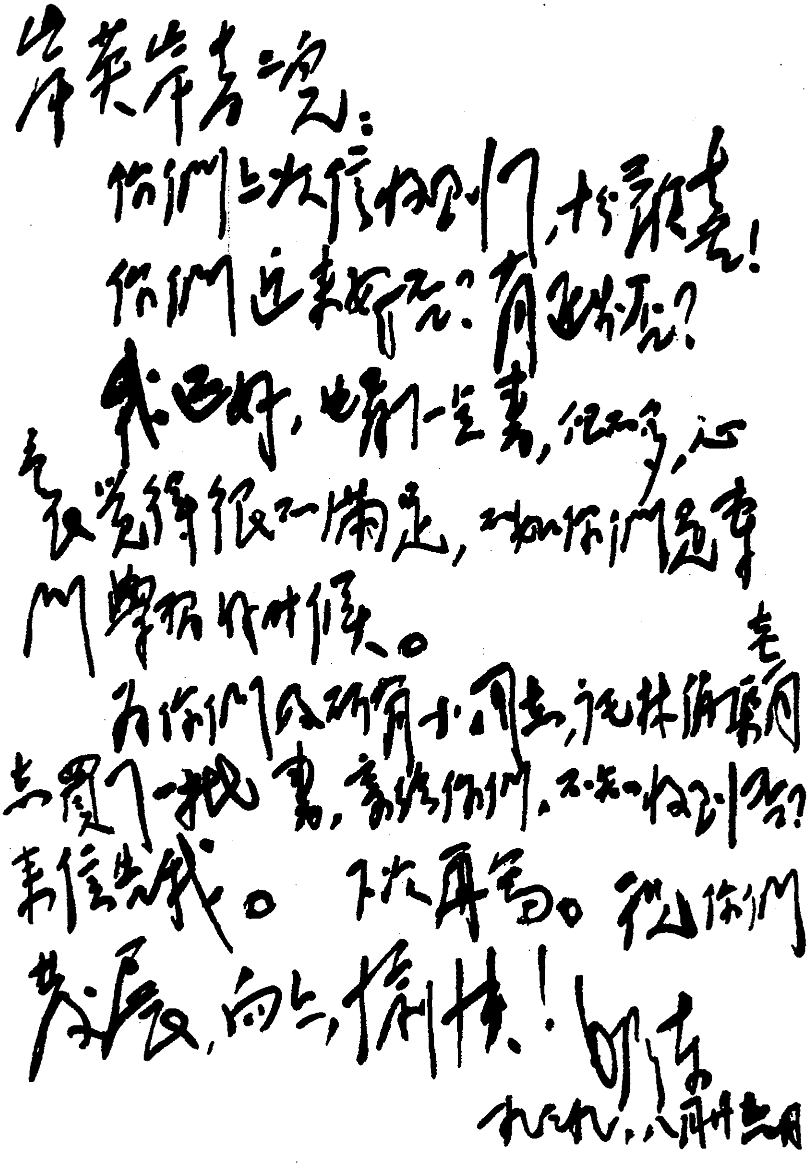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

[1] 林伯渠，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毛泽东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给在莫斯科学习的孩子们，可惜这批书在邮途中丢失了。



岸英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些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泽东

一九三九，八月廿六日

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信的手稿。

欢迎尼赫鲁先生来延安[1]

（1939年8月27日）

重庆新华日报转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先生：

闻先生到重庆，中印两大民族从此更加亲密团结，为争取两大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斗争。鄙人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向先生致欢迎与慰问之忱，并欢迎先生来延安一行，以便亲聆伟论。贵会所派援华抗日之医疗队，现在八路军服务，全军感奋，并致谢忱。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

[1] 1939年8月尼赫鲁访华。这是毛泽东邀请尼赫鲁去延安访问的电报。

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

（1939年8月29日）

目前全中华民族的任务是，第一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要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抗战教育在抗战中占着一个重要的地位。抗战教育，一是办学校，办小学、中学、大学；二是社会教育，设立夜校，推行识字运动等。教员应当在工作中学习，应当向学生学习，向老百姓学习。在抗战教育中，知行合一是一件大事。陶行知[2]主张知行合一，提倡生活教育，把教的、学的、做的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主义说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还缺少一部分，就是生活教育。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训练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2] 陶行知，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

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

（1939年9月1日）

记者问：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1]，其意义如何？*

毛泽东答： 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增长和苏联政府坚持和平政策的结果。这个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问： *人们还不明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反而以为英法苏谈判的破裂是苏德协定的结果。请你说明一下英法苏谈判为什么没有成功。*

答： 英法苏三国谈判所以没有成功，完全由于英法政府没有诚意。近年来，世界反动资产阶级首先是英法的反动资产阶级，对于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一贯地执行了一种反动的政策，即所谓“不

---

[1]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于1939年8月23日。

干涉”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在于纵容侵略战争，自己从中取利。因此，英法根本拒绝苏联历来提出的组织真正的反侵略阵线的建议，而采取“不干涉”的立场，纵容德意日侵略，自己站在一边看。其目的在于使战争的双方互相消耗，然后自己出台干涉。在执行这个反动政策的过程中，曾经牺牲了半个中国给日本，牺牲了整个阿比西尼亚、整个西班牙、整个奥国、整个捷克给德意[1]。这一次又想牺牲苏联。这种阴谋，在这次英法苏三国的谈判中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这个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英法则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它们的安全，它们却不肯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这就是谈判破裂的原因。在这个期间，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愿意放弃所谓《防共协定》[2]，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就订立了。国际反动派，首先是英法反动派的这种“不干涉”政策，乃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是完全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它从张

---

[1] 1935年10月，意大利开始武装侵略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于1936年5月将埃塞俄比亚占领。1936年7月，德国和意大利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支持佛朗哥法西斯势力反叛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人民阵线政府领导西班牙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抗战，于1939年3月失败。1938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同年10月又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于1939年3月完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德意法西斯这些疯狂的侵略行动，都是在当时英法政府“不干涉”政策的纵容和鼓励之下进行并且获得成功的。

[2] 1936年11月，德日订立《反共产国际协定》和《反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同时还制定了一个直接反对苏联的秘密附件。1937年11月，意大利也参加了这个协定。

伯伦上台开始，到去年九月慕尼黑协定发展到了顶点，到此次英法苏谈判就最后破产。往后的时间，就不得不变成英法和德意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直接冲突的局面。我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曾经说过：“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就是张伯伦政策的必然结果。”张伯伦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

问：据你看，目前的时局将要如何发展？

答：目前的国际时局已处在新的形势中。早已开始了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状态，即是说，由于“不干涉”政策而发生的一方进攻、一方坐视的局面，就欧洲方面说来，今后势必由全面性的战争起而代之。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已进到新的阶段。

在欧洲方面，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之间，为了争夺对殖民地人民统治权的帝国主义大战，是迫在眉睫了。在战争中，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战争的双方都将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双方的目的都是帝国主义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统治权，都是掠夺性的战争。在目前，就是为了争夺波兰，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沿岸。这样的战争完全不是正义的。世界上只有非掠夺性的谋解放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共产党决不赞助任何掠夺战争。共产党对于一切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则将挺身出而赞助，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正在发生分化，一部分上层反动分子正在蹈袭第一次大战时的覆辙，准备赞助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但另一部分，则将和共产党一道建立反战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目前张伯伦、达拉第正在模仿德意，一步一步地反动化，正在利用战争动员将国家组织法西斯化，将经济组

织战争化。总之，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狂热地准备战争，大屠杀的危险临到千百万人民的头上。这种情形，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抗运动。无论在德意，无论在英法，无论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如果不愿充当帝国主义的炮灰，他们就一定会起来用各种方式去反对帝国主义战争。

在资本主义世界，除了上述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个集团，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包括中美洲南美洲许多国家在内的集团。这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暂时还不至于转入战争。美国帝国主义想在中立的名义之下，暂时不参加战争的任何一方，以便在将来出台活动，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地位。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准备在国内取消民主政治和平时的经济生活，这一点对于世界的和平运动是有利益的。

日本帝国主义受了苏德协定的严重打击，它的前途将更加困难。它的外交政策，正在两派斗争中。军阀想和德意建立联盟，达到独占中国，侵略南洋，排斥英美法出东方的目的；但一部分资产阶级则主张对英美法让步，把目标集中于掠夺中国。目前和英国妥协的趋势甚大。英国反动派将以共同瓜分中国和在财政上经济上帮助日本为条件，换得日本充当英国利益的东方警犬，镇压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牵制苏联。因此，不管怎样，日本灭亡中国的根本目的是决不会变更的。日本对中国正面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可能性，或者不很大了；但是，它将更厉害地进行其“以华制华”[1]的政治进

---

[1] “以华制华”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阴谋毒计。向来，日本帝国主义总是在中国培植可以供它利用的力量，以便分裂中国内部而达到它的侵略目的。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它不仅利用国民党中汪精卫派公开的亲日分子，而且利用蒋介石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从1939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军队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着重从政治上鼓励他进行反共活动，正是这种“以华制华”政策的实施。

攻和“以战养战”[1]的经济侵略，而在其占领地则将继续疯狂的军事“扫荡”[2]；并想经过英国压迫中国投降。在某种适合于日本的时机，日本将发起东方慕尼黑，以某种较大的让步为钓饵，诱胁中国订立城下之盟，用以达其灭亡中国的目的。日本的这种帝国主义的目的，在日本人民革命没有起来之前，不管日本统治阶级掉换什么内阁，都是不会变更的。

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之外，另一个光明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苏德协定增加了苏联帮助世界和平运动的可能，增加了它援助中国抗日的可能。

这些就是我对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将如何？

答：中国的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前途，这就是复兴的前途。一个是实行妥协、实行分裂、实行倒退的前途，这就是亡国的前途。

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难和我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我国的战略退却阶段便已完结，而战略相持阶段便已到来。所谓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的阶段。

但是，正面相持和敌后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局面出现，敌后斗争的局面就要紧张。所以，从武汉失守后开始的敌人在沦陷区（主要是在华北）举行的大规模的军事“扫荡”，今后不但还

---

[1]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占领区内实行残暴的经济掠夺，用以供给它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军阀把这种政策叫作“以战养战”。

[2]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集中主要兵力进犯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所到之处，极其野蛮地实行烧光、杀光和抢光的政策。敌人把这种疯狂的军事进犯叫作“扫荡”。

会继续，而且还会加紧起来。更因敌人目前的主要政策是“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英国的东方政策是远东慕尼黑，这就极大地加重了中国大部投降和内部分裂的危险。至于我国国力和敌人对比，还是相差很远，要准备实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国一致，艰苦奋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国持抗战的任务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任务，千万不要丝毫大意。

因此，毫无疑义，中国万万不可放弃现在的时机，万万不可打错主意，而应该采取坚定的政治立场。

这就是：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不论是日本的引诱和英国的引诱，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拒绝，中国决不能参加东方慕尼黑。

第二，坚持团结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分裂运动。也不论是从日本帝国主义方面来的，从其他外国方面来的，从国内投降派方面来的，都应该充分警戒。任何不利于抗战的内部磨擦，都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加以制止。

第三，坚持进步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倒退运动。不论是军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财政经济方面的、党务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和民众运动方面的，一切不利于抗战的思想、制度和办法，都要来一个重新考虑和切实改进，以利抗战。

果能如此，中国就能好好地准备反攻的力量。

从现时起，全国应以“准备反攻”为抗战的总任务。

在现时，一方面，应当严正地支持正面的防御，有力地援助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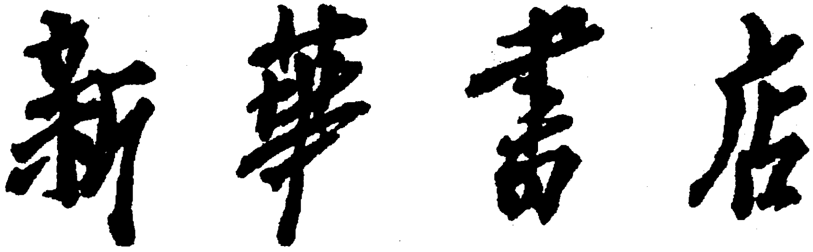
后的战争；另一方面，应当实行政治、军事等各种改革，聚积巨大的力量，以便等候时机一到，就倾注全力，大举反攻，收复失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为延安新华书店题名[1]

（1939年9月1日）

新华书店



毛泽东为新华书店题写的店名。

---

[1] 1939年9月1日，新华书店门市部在延安凤凰山麓的平房里正式开业。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中宣部、边区政府的领导和部队以及各界代表前往祝贺。毛泽东得知新华书店在新的地点开业的消息后，挥毫题写了新华书店4个大字，并派秘书送到新华书店。

给向隅的信[1]

（1939年9月5日）

取名延生如何？如以为不妥，请你们自己拟出两三个，我替你们选择一个。因忙迟复，是以为歉！此复向、唐二同志并庆祝你们的小孩。

毛泽东

九月五日

---

[1] 1939年7月1日，音乐家向隅、唐荣枚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想请毛泽东给孩子取个名字，但考虑到毛泽东那么忙，难以启齿。8月18日，孩子的舅舅柯蓝，当时是鲁迅文学院的学生，知道这件事后，自告奋勇，从练习本上撕下一页纸，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我们的小孩——一个男孩——是七月一日生下来的，因为他刚巧在伟大的日子里进入了这伟大的时代，我们都希望得到你的光荣给他取一个名字……"18天后，他们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国式的信封上竖写着"鲁艺文学艺术研究院向隅同志收"。打开一看，毛泽东在他们的去信上作了批示。

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1]

（1939年9月7日）

从德国法西斯开始对波兰的军事行动后，就使欧洲已陷入严重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火焰中，而昨日电讯所传，英法已开始进攻德国，英空军前日飞赴威廉港轰炸德舰队，法军开始向德边移动，并突破德防线某处，而其他各国，或者是准备加入战争，或者是暂时宣布中立，这些事实，就说明实际上早已开始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现在是更加扩大了。因为欧洲主要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如德英法等已卷入战争的漩涡，而其他帝国主义如意大利等亦正重整旗鼓，枕戈待发，而社会主义的苏联，却竟不动摇的稳如泰山，仍坚持其一贯的和平政策。这些事实，就说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正以突飞的速度为战争的全面性所代替着。

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底扩大，是由于帝国主义集团间的矛盾到不得不采用扩大战争办法来解决，是由于法西斯的德国，不顾一切地贯彻其侵略战争，是由于英法等国采取不干涉的妥协政策，拒绝与苏联订立互助公约。而波兰虽然为首先发难的德国所侵略，虽然现在波兰人民参加抵抗法西斯的侵略，然而波兰在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紧急关头，无自主的原则立场，拒绝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一任英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日报》撰写的社论。毛泽东撰写此文的时间不详，这里采用的是《新华日报》发表此社论的时间，即1939年9月7日。

法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摆布，这就使波兰等国，成为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间争夺的目标，这就使战争的性质，虽然在波兰人民方面充满民族的义愤，虽然在英法人民方面，充满反法西斯的正义愤怒，然而从“任何战争，只是一定阶级‘用另种方法’来继续其政策”这一观点来看，从战争双方所代表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这一观点来看，这次战争的性质，在基本上是帝国主义的战争。

中国人民与日本法西斯军阀进行抗战，已经两年多了。中国的抗战，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民族解放而战，另一方面也是为世界和平正义而战，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同情任何国家里的劳动人民反对法西斯，反对帝国主义大战的革命运动，可是我们反对任何国家的反动资产阶级，牺牲劳动人民利益来重新瓜分世界的掠夺战争。同时，我们正在进行抗战，我们的外交路线，也是很容易了解的，“凡助我者友之，凡助敌者敌之，这是确实不移的原则”。我们过去是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可是，中国人民必须了解，中国的抗战，不能无视于世界事变，尤其是不能无视于正在进行的欧洲战争。在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中，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可能的两个方面：

第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防共协定”破产了，在远东方面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更陷于孤立。德波战争爆发，英法卷入战争漩涡，过去日本从这些国家所得到的帮助基本是不可能继续了，这也打击了日本。这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灭华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根据历来屡试不爽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惯于利用欧洲紧张形势，尤其是欧洲战争形势，来灭亡中国，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

战，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提出了二十一条的亡国条件。九一八以来，每次欧洲多事之秋，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每次进攻中国的步骤。现在欧洲大战既起，敌酋阿部已声明：日本当集中全力，解决“中国事件”，这就是说要利用欧战形势，集中全力，进攻中国。这就造成日本法西斯军阀不顾一切的更加紧对我国进攻的危险。而在远东有利益的英国，因参加欧洲战争而无暇东顾，可能与日本帝国主义在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上与日本作某种的让步妥协，以保全在中国及其南洋一带的利益，这就造成东方慕尼黑可能的严重危机。

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么，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因此，中国人民要密切注视欧战的情形，注视欧战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同时，中国人民在坚定自己的正确的立场上，来分析目前抗战的形势，显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政治状况，是不能顺利应付新的环境的，这就是妥协投降的危险依然存在，而反共正是这种妥协投降的具体准备底说明。而政治上的不进步和开倒车，又正是障碍民族团结，障碍新的有战斗能力的军队的继续产生，障碍人民新的有生力量的增长。所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全国人民应该在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化，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动员一切力量，为准备反攻而奋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1

（1939年9月8日）

同意抗大第一分校迁往山东………………………………………10

（1939年9月9日）

在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11

（1939年9月10日）

共产党参政员捐款援助香港反汪工友……………………………14

（1939年9月12日）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5

（1939年9月14日）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谈话…………………………31

（1939年9月16日）

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36

（1939年9月18日）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42

（1939年9月24日）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61

（1939年9月25日）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62

（1939年9月28日）

复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电……71
（1939年9月29日）
在欢迎中外朋友晚会上的致辞……72
（1939年9月）
为杨十三题写挽联……74
（1939年9月）
在抗大四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75
（1939年9月）
为韩忠良题词……76
（1939年9月）
为八路军三五九旅题词……78
（1939年9月）
研究沦陷区……79
（1939年10月1日）
《共产党人》发刊词……83
（1939年10月4日）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的题词……96
（1939年10月5日）
给吕超的信……97
（1939年10月7日）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99
（1939年10月10日）
复朱德、彭德怀等电……102
（1939年10月17日）
为《共产党人》杂志题名……103
（1939年10月20日）

为《冀中导报》题写报头……………………………………………106
（1939年秋）
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107
（1939年11月1日）
复陈毅电……………………………………………………………108
（1939年11月1日）
给林中鹤的信………………………………………………………109
（1939年11月5日）
给周扬的信…………………………………………………………110
（1939年11月7日）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12
（1939年11月1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13
（1939年11月中旬）
致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等电…………………………………114
（1939年11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15
（1939年11月下旬）
为刘岘题词…………………………………………………………116
（1939年11月）
给马相伯家属的唁电………………………………………………118
（1939年11月）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19
（1939年12月1日）
为白求恩题写挽联…………………………………………………122
（1939年12月1日）

为白求恩题写挽词……………………………………………………123
（1939年12月1日）
致郭洪涛等电…………………………………………………………124
（1939年12月4日）
为《拂晓报》题词……………………………………………………125
（1939年12月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27
（1939年12月5日）
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的方针……………………………………128
（1939年12月6日）
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130
（1939年12月6日）
致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电………………………………………132
（1939年12月9日）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33
（1939年12月9日）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展览会题词………………………………………134
（1939年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 ……………………………………………136
（1939年12月9日）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44
（1939年12月9日）
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146
（1939年12月9日）
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149
（1939年12月9日）

复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等电……150
（1939年12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51
（1939年12月13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52
（1939年12月15日）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87
（1939年12月20日）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89
（1939年12月21日）
纪念白求恩……192
（1939年12月21日）
在欢迎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晚会上的讲话……198
（1939年12月22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99
（1939年12月23日）
致彭德怀等电……200
（1939年12月23日）
致朱德、彭德怀电……201
（1939年12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02
（1939年12月23日）
致中共晋西北区委等电……203
（1939年12月23日）
致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电……204
（1939年12月26日）

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205
（1939年12月27日）
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206
（1939年12月28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电……207
（1939年12月28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208
（1939年12月30日）
晋西目前形势及我军事部署……209
（1939年12月31日）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211
（1939年12月）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题名、题词……213
（1939年12月）
为悼念白求恩题词……216
（1939年12月）
诗歌以押韵为宜……218
（1939年12月）
为新华社业务刊物《通讯》题写刊头……219
（1939年12月）
给吴玉章的信……220
（1939年12月）
谈抗大农庄……222
（1939年）
题延安新市场联……223
（1939年）

谈爬山……224
（1939年）
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一书题名……225
（1939年）
为《中国青年》题名……227
（1939年）
为延安《团结》杂志题词……228
（1939年）
读河上肇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一书的批注…230
（1939年）
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247
（1940年1月1日）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名……249
（1940年1月1日）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词……250
（1940年1月1日）
准备应付华中急变……252
（1940年1月5日）
致聂荣臻、彭真电……253
（1940年1月5日）
关于陇东问题谈判的条件给谢觉哉的信……254
（1940年1月8日）
关于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的讲话……255
（1940年1月10日）
致王世英电……256
（1940年1月10日）

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257
（1940年1月11日）
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的方针……258
（1940年1月11日）
吴玉章寿辰祝词……260
（1940年1月15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262
（1940年1月16日）
致王世英电……264
（1940年1月16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265
（1940年1月16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266
（1940年1月1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67
（1940年1月18日）
新民主主义论……268
（1940年1月）
致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电……321
（1940年1月20日）
给周扬的信……322
（1940年1月21日）
给周扬的信……323
（1940年1月23日）
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两周年题词……324
（1940年1月23日）

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题词……326
（1940年1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328
（1940年1月24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题词……329
（1940年1月25日）
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朱德等电……331
（1940年1月27日）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333
（1940年1月28日）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335
（1940年1月28日）
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338
（1940年1月29日）
在自卫原则下给进攻者以彻底打击……339
（1940年1月30日）
关于扩军问题的指示……341
（1940年1月30日）
关于山西新旧军冲突我之工作方针问题致朱德等电……342
（1940年1月31日）
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344
（1940年1月）
为《中国文化》题词……345
（1940年1月）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347
（1940年2月1日）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354
（1940年2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359
（1940年2月1日）
复王世英电……………………………………………363
（1940年2月2日）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364
（1940年2月3日）
致叶挺、项英电………………………………………366
（1940年2月3日）
给陈云的信……………………………………………367
（1940年2月3日）
坚决彻底消灭石友三部………………………………368
（1940年2月3日）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369
（1940年2月5日）
为《中国工人》出版题词……………………………371
（1940年2月7日）
为《中国工人》题写刊名……………………………373
（1940年2月7日）
《中国工人》发刊词 ………………………………374
（1940年2月7日）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376
（1940年2月7日）
为《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题词……………………379
（1940年2月7日）

复南方局电……381
（1940年2月9日）
挺进军的战略任务……382
（1940年2月11日）
彻底消灭顽固派，极力争取有希望之人……384
（1939年2月11日）
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指示……385
（1940年2月12日）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与口号致朱德、彭德怀电……387
（1940年2月14日）
为应云卫题词……388
（1940年2月15日）
为吴茵题词……389
（1940年2月15日）
为《中国文化》题名……390
（1940年2月15日）
致高双成电……392
（1940年2月16日）
在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393
（1940年2月19日）
致程潜电……394
（1940年2月19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395
（1940年2月20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399
（1940年2月20日）

反磨擦斗争的形势……………………………………………408
（1940年2月20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409
（1940年2月21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410
（1940年2月23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411
（1940年2月24日）
对新军工作问题的指示……………………………………………412
（1940年2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13
（1940年2月2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14
（1940年2月）
帮助萧克挺进军巩固平西根据地……………………………………………416
（1940年3月3日）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418
（1940年3月4日）
致八路军、北方局等电……………………………………………420
（1940年3月5日）
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421
（1940年3月5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424
（1940年3月5日）
致王震电……………………………………………425
（1940年3月5日）

致项英等电……426
（1940年3月5日）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427
（1940年3月6日）
对上海工作的指示……430
（1940年3月6日）
给蔡元培家属的唁电……431
（1940年3月7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432
（1940年3月7日）
致聂荣臻等电……433
（1940年3月8日）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434
（1940年3月9日）
给王枚的信……435
（1940年3月10日）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36
（1940年3月11日）
致琼崖部队领导人电……445
（1940年3月11日）
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446
（1940年3月14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447
（1940年3月14日）
广泛印发讨汪救国通电……448
（1940年3月15日）

考虑作必要让步，避免破裂两党团结……450
（1940年3月15日）
坚决阻止李文军渡河……451
（1940年3月15日）
致卫立煌电……452
（1940年3月15日）
给全国各台电的指示……453
（1940年3月15日）
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454
（1940年3月16日）
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456
（1940年3月16日）
复朱德等电……457
（1940年3月19日）
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458
（1940年3月19日）
巩固中央与晋东南及晋察冀之联络……460
（1940年3月19日）
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任务……461
（1940年3月19日）
关于晋冀两省磨擦终止后团结友军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462
（1940年3月20日）
援助新四军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463
（1940年3月2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468
（1939年3月21日）

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469
（1940年3月2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470
（1940年3月23日）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471
（1940年3月25日）
为《边区群众报》题名……472
（1940年3月25日）
目前华中的军事策略……474
（1940年3月29日）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题词……476
（1940年3月）
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477
（1940年3月）
对蒋介石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讲话的批语……479
（1940年3月）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480
（1940年4月1日）
给萧劲光的信……483
（1940年4月1日）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484
（1940年4月1日）
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485
（1940年4月1日）
致彭德怀电……486
（1940年4月2日）

新四军能否应付国民党的袭击……………………………………487
（1940年4月3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488
（1940年4月3日）
致彭德怀电……………………………………………………………489
（1940年4月4日）
为儿童节题词…………………………………………………………490
（1940年4月4日）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492
（1940年4月5日）
致贺龙等电……………………………………………………………495
（1940年4月6日）
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重新题写校名和校训……………………………496
（1940年4月10日）
致彭德怀电……………………………………………………………498
（1940年4月11日）
复朱德、彭德怀电……………………………………………………499
（1940年4月12日）
致朱德电………………………………………………………………500
（1940年4月12日）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501
（1940年4月12日）
致彭德怀电……………………………………………………………503
（1940年4月13日）
给新疆督办盛世才的贺电……………………………………………504
（1940年4月15日）

关于对付韩德勤部问题致刘少奇等电……………………………505
（1940年4月15日）
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大众文艺》题名…………506
（1940年4月15日）
致贺龙等电………………………………………………………………507
（1940年4月16日）
致项英电…………………………………………………………………508
（1940年4月18日）
致刘少奇等电……………………………………………………………509
（1940年4月21日）
复贺龙、关向应电………………………………………………………510
（1940年4月21日）
致彭德怀电………………………………………………………………511
（1940年4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512
（1940年4月29日）

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

（1939年9月8日）

国民参政会成立于抗战周年纪念之日，迄今已逾一年。

当我们接受聘请而加入参政会时，曾经发表了“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声明。我们指出“在目前抗战剧烈的环境中，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虽然，在其产生的方法上，在其职权的规定上，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国民参政会在今天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团结全国各种力量为抗战救国而努力的作用，企图使全国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开端的意义。所以我们共产党人除继续地努力于促进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能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

一年来，国民参政会已经集会三次，总观国民参政会既往之工作，其最大之成就，就在于今日中国的最迫切的最中心的政治问题上——在坚持民族自卫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及打击各种中途妥协的倾向与罪恶活动上——能够真实地反映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要求。第一次大会宣言中，曾经郑重地宣告：“本会兹特代表全体国民庄严宣

布：中国民族必以坚持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最后胜利之日为止。”第二次大会又一致决议“拥护蒋委员长所宣示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之政府既定方针”，并号召全国国民“坚决抗战，决不屈服，共守勿渝，以完成抗战建国之任务”。第三次大会又决议“抗战既定国策必须坚持到底”，号召国民“坚其信心，齐其步伐，一心一德，彻始彻终，以复我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而完成抗战建国之大业”。除此以外，三次大会对于抗战建国之各种具体问题，参政会同人曾有提案达三百余件，虽容或事有缓急之分，案有精疏之别，但莫不竭其思虑，以期有益于抗战建国。值得惋惜的是，政府对参政会之决议，绝大多数尚不能确切与有效地见诸实施，以致减少了参政会工作应有之成效，同时也就不能满足全国同胞对参政会之热切希望。

我们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参政会的一年工作中，根据着去年七月五日我们声明之立场，遵循中共中央之“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诚挚的团结精神”的指示，在全国先进人士之指教和督励之下，与参政会同人共同地为着中国人民意志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我们确信：今日人民之最高愿望意志和要求，是争取抗战的胜利，以及巩固和扩大为达到和保障抗战胜利所必需的全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因之，在过去三次参政会中，我们曾再三提出“拥护政府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案”“拥护蒋委员长及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案”“拥护蒋委员长严斥近卫声明并以此作为今后抗战国策之唯一标准案”。幸获全体同人之赞助，通过专案。此外对于抗战有关之各项基本问题如建军，征兵，发展敌后游击战，实施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等，我们均以专案提供意见。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们坚定地遵守着我们的立场：“我们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

会，诚恳地愿意在参政会内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关系的国民参政员同志们，亲密的携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而同时对于一切有害抗战及主和投降谬论，我们曾坚决地加以揭露和无情地加以抨击。在一二两次大会中，汪逆及其党羽李圣五等的卖国狂论，虽在隐秘的形式之中，就受到了我们及大多数参政员同人的打击和驳斥。一年以来，我们在国民参政会内之工作，虽自愧无多建树，但所敢自信者，乃是我们谨守着明确的团结抗战的原则立场，遵循着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而未尝稍有逾越。

现在政府已明令延长参政员之任期一年，我们愿就参政员地位将我们对目前时局之观感及今后抗战如何争取胜利之方针，向参政会同人及全国人民申述之。

目前抗战形势的特点，一方面是敌人经过两年的侵略战争之后，困难日益增长，我们抗战前途日益呈现出胜利的远景。但是另一方面，日寇非但没有改变其亡华灭华的方针，而且更加阴险，更加凶残，更加恶辣地实行它的一贯的灭亡我国的既定方针，更加狡诈地实行着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在军事上，正面停顿着大举进攻而集其全力扫荡敌后游击区战，借以一方面麻痹我们抗战的意志，另一方面巩固其在占领区域之根基；在政治上，则努力扶助和利用汪逆，大唱其反蒋反共降日之谬论，加紧进行制造伪党伪府伪军的活动，同时更嗾使汪逆余党及其他心怀贰志之分子，在抗战营垒内来阴谋挑拨离间进行反蒋反共活动，企图造成迫使中国投降之局势；在经济上，则实行掠夺榨取倾销开发，以实现以战养战用中国之资源屠杀中国人民之毒计。同时，在抗战营垒之内，又确有一部分人对于时局作不正确之认识：或以为敌寇已和缓灭华政策，或

以为用某种国际会议方式即可解决中日问题，于是放弃自力更生之正确信念，不作准备反攻之实际工作，甚至有人居然忽视亡国危险，以为主要精力应用以对内，对反共及破坏国共团结阴谋，尽力策动，对一切进步力量，时加打击，对许多有为青年，横施压迫。煮豆兴燃萁之痛，阋墙当御侮之时。影响所及，不仅动摇举国同胞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而且降低国际舆论对中华民族之同情。而兵役困难，法币跌价等困难增加，尤使一部分人士发生抗战有心胜敌乏术之感。凡此种种，均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刻与严重。而目前国际形势之发展，对我国抗战环境发生极大之变化。由于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之签订，使防共轴心消散，使日寇在外交上更加孤立，在内政上引起震动，这一点当对我国抗战局面发生有利之影响。同时，因欧洲大战的爆发，使日寇将利用欧洲紧张局势以加紧进行全力灭亡中国的政策，使英国妥协派更加企图在牺牲中国的条件下求得英日等国妥协的可能，这一切对我国抗战局面将增加许多新的困难。因之，目前我国抗战的国内外环境，均是处在一个新的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新的国内外局面之下，全中国人民的当前严重任务，就是明确认清新的国内外情势之各种特点及其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妥协危险，力求全国团结加强，反对各种分裂阴谋，力求全国向前进步，反对一切反动倒退现象。同时，努力争取剧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每一有利于我的事变和因素，以增强我国的外援，以便克服一切危险，冲破一切困难，增加力量，准备反攻。

为克服目前的困难与危险，为认真准备我国反攻的力量，我们认为目前应从下列各方面努力：

甲　在政治方面

一、动员全国力量反对妥协投降，扩大反汪运动，肃清抗战营垒中的暗藏汪系余孽及一切妥协投降分子；

二、加强战时政府，统一军政领导，容纳各党各派人材，提高战时行政机构效能；

三、实行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敌之权利；

四、认真惩撤贪官污吏，实行地方自治；

五、成立各地方劳资与佃主纠纷仲裁机关，使贫苦工农生活得到相当改善，以增加民众抗战热忱和便利兵役动员。

乙　在军事方面

一、发展敌后游击战争——要做到变敌后为前线，积小胜成大胜。为此必须：

（一）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原则及当地特殊情况，规定和实行游击根据地的施政纲领；

（二）将游击根据地的军政权统一于该地区抗战勋劳卓著经验丰富之主力部队指挥之下；

（三）由中央政府经常给游击根据地抗战部队以必要的武装补充和必需的经济帮助；

（四）派有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的决心与能力且具备坚强政治工作与良好纪律的部队到敌后去扩展游击战争；

（五）一切派往敌后之人员部队，均能以团结胜敌为重，均能忠

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去制造内部磨擦以害己助敌；

（六）派往敌后之人员部队，能实行民主政策，建立真正人民自己选举而由上级政府批准之抗战政权；同时实行改善民生政策，以团结广大人民借以摧毁伪政权，瓦解伪军，使我之人力物力不为敌用而为我用。

二、培养新的国防军——为的坚持抗战，特别是为的准备在有利形势下，真能实行反攻以驱逐敌寇出境，必须培养新的国防军，作为将来反攻的中坚。为此必须：

（一）从前线选拔有历史有战功的部队□□师，不分党派畛域，作为建军基础；

（二）规定国防师的统一的编制；

（三）国防师的干部应依照各该挑选部队的原有系统，给以近代化的军事训练与坚强的政治教育，同时并使之仍保存各该部队的优良传统；

（四）国防师的一切装备待遇和补给应一律平等，而较普通部队为高；

（五）国防师之训练，有一定的时期和一定计划，由有战功有能力之大员担任，分区实行，集团训练；

（六）建立国防工业，加紧对外购置，期于两年内完成□□个国防师的现代化装备。

丙　在经济方面

要破坏敌之建设和开发而实现我之生产和节约。为此必须：

一、破坏敌在占领区域之经济建设和物质开发，发动民众彻底

抵制仇货，禁止可资敌用的土产资敌，如某些特殊军需品，必须利用仇货者由国家统制购置；

二、由国家资助并奖励私人投资以扩大工农业合作运动，广泛地发展各种实用工业，尽力提高农业生产；

三、励行军政机关和私人节约运动。

丁　在财政方面

坚决改变以前的作风，彻底实行战时财政政策。为此必须：

一、法币的发行与资本的流通必须有适当的配合，使之避免法币在沿海与内地价格不平衡的现象；

二、严格彻底统制外汇并由国民参政会成立外汇委员会按期审查财政部对于外汇批准与使用是否适当，以杜绝一切舞弊营私；

三、严格检查和禁止私人操纵金融，捣乱法币，特别是居官者之营利图私投机操纵，犯者重惩；

四、在战区，尤其是沦陷区的省份允其发行一定额数的地方纸币和流通券；

五、国家的金公债，必须在海外侨胞国内银行界中广为劝募，并给以确实基金的保障，与国内投资的便利；

六、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依照各地的环境可能分别实行营业税、所得税、遗产税之累进率，并渐改良田赋，豁免苛杂；

七、汉奸的财产必须严格实行没收，逃亡到敌区的地主，国家应代其征收较原来为少之钱粮，暂作国家的直接收入；

八、国家预算，由中央到地方均应重新规定，与抗战有关者应按需要增加，与抗战无关者，应尽量减少，可省者应削除；

九、国家行政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吏之待遇，应一律减低，并须低于同级军官的待遇，取消特费与兼薪，废除公家借款或购置中的回扣。

戊　在外交方面

要尽量孤立日寇和努力增强外援。为此必须：

一、认真联合一切援助和同情我国抗战之人民和政府，力求其对我增加物质上和精神上之援助；

二、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政府牺牲中国以与日寇妥协的阴谋，坚持外交独立自主之方针；

三、协助国民参政会，各党各派及各界群众团体派遣各种代表团赴各国进行广大国民外交活动，以增强民主及和平力量对我之援助。

己　在党派合作方面

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尤其是国共两党之友爱合作，实为实施上述各项办法，克服时局危险，战胜日寇汪逆的基本保证。为此必须：

一、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认真取消各种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二、严令禁止对共产党及其他抗战党派之歧视压迫行为，严禁因所谓党籍及思想问题而妨害到工、农、军、学、商各界人民及青年之职业及人格之保障，以便造成举国一致精诚团结现象；

三、在抗战各种工作中，广泛地容纳各党派人材参加，不以党

派私见摒弃国家有用人材。

当此寇深祸急、世界风云急剧演变之时，坚持抗战到底，巩固国内团结，力求全国进步，以便切实增加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作为人民代表和人民使者的国民参政员的我们，谨于四次大会之前，作此共同之声明，希望全国人民及参政员同人能给予指教鼓励督促和批评，同时作为同人等在会内外与全国同胞共同奋斗的方向。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九月八日

同意抗大第一分校迁往山东[1]

（1939年9月9日）

朱、彭、杨：

同意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往山东。罗瑞卿率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全体干部及部分学员在到达晋察冀军区后，选适当时机转往晋东南。

毛　王　滕

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关于抗大第一分校迁移一事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

在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9月10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很高兴很诚意地开这个晚会，来欢迎来延安的许多同志们。首先，我代表全体同志，向国民政府林主席致敬，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致敬。

团结抗战已经两年了，这样的情形，是打破了两年前的情状。两年前，那时候是没有抗战没有团结的，现在是团结抗战了，这是新现象，是新气象。这个新气象已到第三个年头了，这是堪以欣慰的。可是，在两年的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有些小冲突小磨擦，因此，国共两党中间的同志，他们挂念、关切着，关于两党关系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人人注意的问题，这不仅两党中间的同志是这样，在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也是非常关切着，期待着完满的答复。其实这件事也并不是怎样难了解的，大家应该知道：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两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统一战线是一个大的团体，它包括有各党各派，各界各

---

[1] 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于9月9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毛泽东到招待处拜访慰劳团，并设宴招待他们。当天晚上，毛泽东陪同慰劳团出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有10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并致欢迎词。

军，一切的人——除了汉奸——都在内的。当然，在国共两党中间共产党是承认国民党是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大党。两党之外，虽然有其他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总是基础，如果国共两党不团结的话，这个统一战线是不能设想的了。所以我们说：国共两党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抗战两年来，国共两党是以团结为中心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抗战二年后的问题了，但其基本方针是没有变化，也不应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团结”二字。团结是总方针。团结就要团结在进步基础之上。

现在两党中间，在部分的地方，有部分人员，发生一些磨擦，这种现象是不好的；但是，大家知道，在大局上，全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在各界人士互相关心，互相督促之下，我们团结抗战是靠得住的。我们一定要团结，不论怎么样，除了团结，没有别的方针。……

因为，敌人要“反蒋”，我们全国人民，就要大家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敌人要打倒国民政府，我们全国人民就要拥护国民政府；敌人和汉奸汪精卫等要破坏国共合作，我们全国人民就要拥护国共合作；敌人要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全国人民就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敌人要我们内部打仗，我们一定不打内战。我们要做亲者快仇者所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我们要站定自己的立场，决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们的口号是要处处与敌人对立，决不能有丝毫与敌人混同，一切与敌人混同的口号，都是媚敌降敌的幌子，一切与敌相同的言论，都是助敌张目的滥调，任何人要是想肩起敌人的口号而又言抗敌，那只是欺人之谈，残酷的历史将给以严厉的证明。

在今天，我们只有全国一致，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

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才能打胜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能出现。

今天我们欢迎革命前辈张溥泉先生，他是中国革命的老辈，又尽力于团结抗战的事业非常之大，今天要他老先生给我们以指教。同时欢迎各位慰劳的同志们，也要请他们指教。

共产党参政员捐款援助香港反汪工友[1]

（1939年9月12日）

新华日报转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反汪罢工的工友们：

你们为进行反汪派汉奸斗争而宣布罢工离职，很明显的你们是给了全中国人民一个模范的好榜样，而且更说明了工人阶级在抗战中的先锋作用和坚决不屈的积极斗争精神。这一运动的继续开展与扩大，正是给予日寇和汉奸的最严重的一击。

我们特以最大的热诚向你们致诚恳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并每人捐资五十元（合计共三百五十元），交付新华日报代转，以表微忱。

此致

民族解放敬礼！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九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陈绍禹、秦邦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参政员，就香港《南华》《天演》《自由》三报工人为进行反对汪精卫派汉奸斗争宣布罢工离职一事，通过《新华日报》转赠捐款，并联名发表的慰问信。

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1]

（1939年9月14日）

一　战争的新阶段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早已开始了，已经打了好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从一九三一年开始的，它首先占领东三省，然后又于一九三七年大规模侵略中国[2]。意大利帝国主义则于一九三五年侵略阿比西尼亚[3]。一九三六年德意两国联合侵略西班牙[4]。一九

---

[1] 这是毛泽东1939年9月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讲演的提纲。

[2]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今北京）西南门户卢沟桥向中国驻军进攻，然后占领平津。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人民开始了英勇的八年抗战。

[3]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1936年5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1941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 1936年2月西班牙共和国进行国会选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成立共和政府。同年7月西班牙将军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了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同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英、法政府在“不干涉政策”名义下对西班牙共和国实行封锁。经过两年多苦战，1939年3月首都马德里沦陷，共和政府失败。佛朗哥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三八年德国占领奥捷两国[1]。在这一时期中，东方与西方，共有五万万以上人口卷入了战争，而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却没有参加。因此，我们称这一时期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一阶段。而从现在开始，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参加战争的现在开始，则称之为第二阶段，因为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如果过去还不能称为世界大战，他还没有世界规模，那末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已是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

二　战争的原因

根据历史事实与列宁的学说，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端不平衡的，因此，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重分世界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之后，不到二十年工夫，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又爆发了，帝国主义各国又来了一次重分世界的战争。这个新的战争的开始阶段，他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上一次全世界经济危机之上的。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过去之后，接着的不是繁荣而是特种的萧条。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或者认为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赃过少的国家，如像日本与意大利，或者认为自己在上次战争中是损失了赃物的国家，如像德国，就全副武装跑上了战争的舞台，企图用战争来脱离经济危机，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爆发，并形成了他的第一阶段。

---

[1] 1938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奥地利。同年10月，德国又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次年3月完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第二阶段，德英法波等国发动了大规模战争，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均将直接间接地卷入战争，这是建立于新的经济危机之上的。从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新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几年来是浸淫于英法美这些所谓“和平”国家之内的，并且正向德日意发展。在经济危机之上，又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人民不满意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不论在早已法西斯化了的国家或现正借手于战争以实行法西斯化的国家，这种政治危机，这种人民不满，都日益尖锐化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又强大到不可侵犯。在这种情势下，一切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就认为除了扩大战争，除了把片面性的战争扩大为全面性的战争，除了打坏他们的帝国主义朋友，不能逃脱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不能避免自己的死亡。

所有这一切，就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他临死前夜的打算。至于这种打算——用重分世界的战争来逃脱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避免自己死亡的打算，是一定要造成更大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一定要加速自己死亡的日子，他们就不能设想了。他们像疯狗一样，已经疯了，被资本主义制度把他们弄得完全疯了，他们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敌人，向世界的壁墙，乱撞乱碰，这就是今天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一群疯狗打架——这就是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

三　战争的目的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的本性是掠夺，帝国主义国家在“和平”时代的政策也无时不是为了掠夺。但如果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掠夺政策遇到了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阻碍而不能用和平方法冲破这种阻碍时，就使用战争方法去冲破这种阻碍，以便继续其

掠夺政策。所以，掠夺——这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的政治目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重分世界，就是说，为了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为了掠夺世界人民，为了争夺对世界人民的统治权。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这种目的，过去阶段与现在阶段，是完全一样的。除了这种目的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目的没有呢？还有什么善良的目的没有呢？一点也没有。不论是德意日，不论是英美法，一切直接间接参加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一个反革命的目的，掠夺人民的目的，帝国主义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永久和平”，希特勒的“民族自决”，张伯伦[1]的“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2]的“援助波兰”，其实都是“掠夺”二字。不过为了说得好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罢了。

四　战争的性质

战争的性质是根据于战争的政治目的而定的。一切战争分为两类，照斯大林同志的说法，战争分为：（一）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二）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是属于第二类性质的战争。因为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丝毫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丝毫不利于其本国

---

[1] 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对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侵略，实行妥协政策。

[2] 达拉第，法国激进社会党领袖。1933年、1934年和1938年至1940年，三度出任法国总理。1938年9月代表法国签署《慕尼黑协定》。

与他国的人民。这就是战争的掠夺性，非正义性与帝国主义性。现在战争的双方，为了欺骗人民，为了动员舆论，都不顾羞耻地宣称自己是正义的，而称对方是非正义的。其实，这只是一种滑稽，一种欺骗。只有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援助这两种战争而战的战争，才是正义的战争。这一次，许多人又弄糊涂了，他们以为德国固然是非正义的，英法却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国家，波兰则是民族自卫战争，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这种糊涂，是由于没有弄清战争的目的而来的，也由于没有弄清战争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不同特点而来。

五　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

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于：（一）就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说来，是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举行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侵犯各弱小民族的利益，侵犯各民主国的利益，并在各民主国内部，策动法西斯威胁。于是全世界人民都有反对侵略保卫民主的要求，都要求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即所谓英美法民主国家，出来干涉侵略战争，并允许人民保存一点仅剩的民主。苏联则屡次提议愿意与各个所谓民主国家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如果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在当时出来干涉侵略者，如果在当时发生了干涉侵略者的战争，例如能与苏联一道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制止德意的侵略，援助中国制止日本的侵略，那末这种行动，这种战争，就是正义的，就有进步性。可是，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却并不出来干涉，他们采取了“不干涉”政策。他们的目的，

在于使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双方都在战争中消耗起来，然后自己出来干涉，借收渔人之利。至于英法把奥捷两国奉送给德国，这是作为交换条件，就是说，作为交换德国向苏联进攻的条件的。英法美想使苏德两国冲突起来，借刀杀人，两败俱伤，然后他们就好独霸世界。由于他们的这种“不干涉”政策，在战争中，就表现为只有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出面打仗，而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国家却“坐山观虎斗”，表现为战争的片面性，不普遍性，不干涉性。民主国家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革命的“不干涉”政策，没有能够被人民力量的逼迫而废除掉，因而出现了这种片面性，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第一个特点。（二）但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德意日帝国主义举行了非正义的掠夺的战争，而所谓民主国家却纵容这种战争这一种情况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况，还有民族解放战争，这就是阿比西尼亚的抗意战争，西班牙共和国的抗德意战争，与强大的中国抗日战争，而全世界人民与社会主义的苏联都真诚地援助了这种战争。这后一种战争，乃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这就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第二个特点。

帝国主义战争的片面性与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存在——这就是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第一阶段的两个特点。

六　我们在战争第一阶段中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争第一阶段的特点，这个阶段的革命政策，毫无疑义的，是组织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以抵抗侵略者的进攻；组织各民主国家内人民群众高涨着的反法西斯斗争，以保卫民主；同时还不放弃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之间制止侵略进一步发展的

斗争。在这最后的一点上，在组织苏联与各民主国政府间的反侵略统一战线这一点上，就是在慕尼黑[1]之后，由于西班牙失败与捷克灭亡所引起的在英法两国内部广大人民中甚至资产阶级左派分子中的愤怒情绪，还有逼迫张伯伦、达拉第政府放弃不干涉政策而与苏联缔结反侵略统一战线之可能。这种可能性，在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总之，这一时期内，革命的总任务，是把全世界一切可能的力量都组织到反法西斯反侵略的统一战线内，用以抵抗三个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与各国内部法西斯的袭击。因此，在当时这个统一战线，有下列四个可能的组成部分：甲、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人民统一战线，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乙、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是民族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丙、社会主义的苏联；丁、各个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这第四个组成部分，在当时之所以还有可能性，是因为这些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所谓民主政府，同他们本国人民之间，同他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之间，同苏联之间，在各法西斯国家的疯狂侵略之下，在各国内部法西斯势力威胁之下，以及存在着的反苏危险之下，是有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这些成分中主要的力量是苏联，如果苏联同各个所谓民主国政府能够组成真正有效的统一战线，配合着各国的人民统一战线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制止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进一步侵略，延缓大战爆发的日子的；如果发生战争，是能够战胜各个法西斯国家的。而如果这样做，那是真正有利于世界人民，有益于侵略者以外的世界各国，而

---

[1] 慕尼黑，德国南部的一个城市。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慕尼黑举行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英法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作为德国向苏联进攻的交换条件。

为国际无产阶级所赞助的。因此，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1]，缔结了苏法苏捷两个互助条约[2]，最后还进行了英法苏三国的谈判[3]，这种革命政策，是适合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是必要的，是正确的，是只能这样做而不能有其他做法的。

七　英法苏谈判的破裂与战争第二阶段的开始

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面怕法西斯国家侵害他们的利益，一面更怕革命势力的发展。他们怕苏联，怕自己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他们拒绝了苏联参加在内的真正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与真正反侵略的战争，而自己单独组成了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单独进行了掠夺的强盗战争。

英法苏谈判从四月十五日到八月二十三日，进行了四个多月，在苏联方面已经尽到了一切的忍耐，而英法始终不赞成平等互惠的

---

[1]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1920年1月正式成立。先后参加的有60多个国家。国际联盟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无形瓦解，1946年4月正式宣布解散。

[2] 为了反对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威胁，苏联于1935年5月2日同法国订立了互助条约；5月16日，又同捷克斯洛伐克订立了互助条约。两个条约都规定：当签约两国成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无端侵略的对象时，彼此应即给以支援和协助。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这两个条约实际上均未被执行。

[3] 1939年春，以英法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就缔结反对法西斯国家的集体安全条约问题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持续4个月之久，最终因英法缺乏诚意而失败。

原则，只要求苏联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他们却不保证苏联的安全，不肯保证波罗的海诸小国[1]的安全，以便开一个缺口让德国进兵，并且不让苏联军队通过波兰去反对侵略者。英法提议的这样一种丝毫不适合于革命目的，而仅仅适合于反革命目的的条约，苏联当然不愿意订。而苏联愿意订立的，根据平等互惠原则，而真正有益于制止侵略者的发展，真正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的条约，英法却死也不愿意订。这就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时间中，德国放弃了反苏立场，他愿意实际上放弃所谓“防共协定”，承认了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于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2]就订立了。英法在与苏联谈判中的毫无诚意，毫无真正制止侵略的诚意，决心破裂三国谈判，不是证明别的，只是证明张伯伦已经决心作战了。所以大战的爆发，不但是希特勒要打的，而且是张伯伦要打的，因为如果真要避免战争，就一定要苏联参加才行。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3]，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懂得的。可是一些傻子却至今不懂得，还以为张伯伦的作战不是事先准备好了的。不懂得张伯伦之所以参加三国谈判，仅仅是为着便于动员舆论，便于向民众说：我

---

[1] 波罗的海诸小国，指当时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1940年并入苏联，成为三个加盟共和国）及芬兰等国家。

[2]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德国同苏联于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它规定缔约双方互不使用武力，不参加直接或间接反对他方的国家集团，在一方遭到第三国进攻时，另一方不给第三方任何支持，以和平方法解决缔约国的一切争端等。1941年6月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撕毁了这个条约，发动了侵苏战争。

[3] 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英国资产阶级自由党领袖之一。1938年冬，英法政府准备同德意法西斯政府举行协商，11月9日，劳合·乔治在议会中说：拒绝苏联参加协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们英法政府是仁至义尽了，三国联合既不成功，就只好向德国开火了。

在这种情形下，九月初旬，德国与英法波三国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于是开始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新阶段——第二阶段。

八　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

在现时，在大战爆发之后，情况已经根本改变了，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在现时，按照性质来划分，只能是：（一）进行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诸国家，以及实际赞助这种战争的诸国家，这是第一类。（二）进行正义的非掠夺的民族解放战争与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援助这种战争的国家，这是第二类。现在应从新的情况作新的划分，抛弃过去的那种划分法，因为情况已经变化了，各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最后地拒绝与人民妥协，拒绝与苏联妥协，并且举行掠夺战争了。现在世界上最反动的国家，已经转到英国方面，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反弱小民族的第一名魁首，已经是张伯伦了。

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共产党员应该懂得，争取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同各国人民，同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一道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这种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而现在唯一可能的，就是苏联同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同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一道，建立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现在是少了一个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这一成分之由动摇而最后转到敌人营垒，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两个营垒中的一个营垒，乃是一大变化。因而新的统一战线之可能的组织成分，就由

四个变为三个了。这种变化，第一，就使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由片面变为全面（由反动的片面变为反动的全面）；第二，就使新的反战争反侵略的统一战线之组织成分由复杂变为单纯——这就是战争第二阶段的两个特点。

许多同志不去注意情况的变化，不去注意新事变的特点，以为事情还是和过去一样，把自己的思想停留在过去阶段，拿过去的观点来看新的事变，遗弃了新事变中所包藏的性质上的变化，因而不自觉地陷入了完全错误的境地，陷入了社会民主党的境地。我希望犯了这种错误的同志很快地改变过来，我也相信，只要一经提醒，就能改变过来。

九　我们在战争第二阶段的革命政策

根据战争第二阶段的特点，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应该是怎样呢？

我以为应该是下面这样的：

甲、在各帝国主义交战国，是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揭穿这种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不管是战争的甲方或乙方，把他们看做一样的强盗，特别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个强盗魁首，唤醒人民不要上帝国主义强盗的当，向人民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

在各个交战国内，如果有共产党议员的地方，都要对于战争预算投反对票，如像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德国无产阶级的领袖李

卜克内西[1]同志在德国议会中所做的英勇坚决的斗争那样，而决不应该投票拥护战争，决不应该使自己的面目同社会民主党混同起来。因为这些国家内的社会民主党，正在踏袭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的覆辙，在所谓“保卫祖国”（资产阶级强盗集团的祖国）的口号之下，无耻地拥护战争。日本社会民主党，即所谓社会大众党，早已叛卖了无产阶级，拥护了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英法社会民主党，现在又正在张伯伦、达拉第的威迫利诱之下，叛卖英法无产阶级，拥护英法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波兰社会民主党则拥护被张伯伦收买的走狗——波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叛卖波兰的民族利益。在波兰，毫无疑义，是应当动员全民并联合苏联抵抗德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保卫波兰与解放波兰民族而战。但是波兰法西斯政府则压制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拒绝了苏联的援助，甘愿带领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把波兰变成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问题，我们同情波兰人民，但我们绝不同情波兰反动政府，波兰社会民主党拥护这样的政府，同样是不能容许的。因此，不论在德日意，不论在英法波，凡属交战国内的共产党，只有揭露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叛卖性，才能争取群众，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准备用革命战争打倒反革命战争。

乙、在各中立国内，如像在美国，共产党员应当在人民面前，

---

[1] 卡尔·李卜克内西，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91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不顾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以一票的少数反对政府的战争预算。1916年因组织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游行示威，被判处苦役。释放后，积极领导了德国十一月革命并从事建立德国共产党工作。1919年1月15日与卢森堡等一同被害。

揭穿资产阶级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名义上中立，实际上赞助战争，并图在战争中大发其洋财的那种政策。美国帝国主义在两年的中日战争中，在中立的假面具之下，已经发了一笔洋财，现在他又想在新的战争中大发其洋财。我在两个星期之前，在九月一日的谈话中，还以为美国资产阶级暂时还不至于在国内放弃民主政治，与平时的经济生活，哪知它就在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宣布了所谓“局部紧急状态”[1]，这样一来，它已经在步英法的后尘，一步一步地走向反动化与战争化了。共产党必须反对这种实际上援助帝国主义战争的假中立，反对这些国家政治上的法西斯化，反对这些国家中的社会民主党的叛卖行动，反对这些国家卷入战争，使战争区域不至无限制的扩大。

丙、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则是民族统一战线，或者抵抗侵略者（如在中国），或者反对宗主国（如在印度），用以达到民族独立之目的。要反对这些国内的民族叛徒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才能发展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敌人。在各交战国的殖民地内，必须反对民族叛徒们拥护宗主国战争的叛卖行动，反对动员殖民地人民参加宗主国的战线，要把参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痛苦经验告诉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如果不反对民族叛徒，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希望的。

---

[1] 1939年9月8日，美国总统罗斯福鉴于欧洲战争形势的发展，宣布美国进入“局部紧急状态”（或称“国家有限紧急状态”），表示要在加强国家防御方面承担一定的责任，包括采取增加海陆军员额，召集特别会议讨论取消军火出口禁令等措施。

十　战争的前途

这次战争是持久的战争。我很赞同伏罗希洛夫[1]同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他说："现代的战争，将来一定是持久的，绵延不绝的，消耗的战争。"他又说："无疑问的，在必不可避免的总的军事冲突中，要来一个破天荒的与你死我活的关头"。他的估计是很对的。这种持久性，是包括帝国主义战争与反帝国主义战争，包括反革命战争与革命战争，包括战争的继续与暂时的局部的停顿，包括参战阵线的改组变化，参战国家的灭亡与新建种种情况在内的，这样种种错综复杂曲折变化的情况，就组成了战争的持久性。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灾难，死亡、疾病、饥饿、失业、失学，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各种悲惨现象将充满于全世界。在这种情形之下，毫无疑义的，将激起所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被压迫人民，所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组织革命战争。其规模将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要大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除俄国外，各国都没有共产党。现在已经不同了，共产党已经在几十个国家内分布着，并且在政治上组织上强健起来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已经不同了，苏联不但存在，而且成了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他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坚决援助人民解放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他将在这个战争中起其维护人类利益干涉帝国主义的强大作用。现在世界上已经分得清清楚楚，一切直

---

[1] 伏罗希洛夫，苏联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苏联元帅。1934年至1940年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接间接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资产阶级都是反动派，组成反动营垒，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派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反动营垒里面两大反动派的冲突，并不妨碍他们将来会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反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对世界革命。如果以为他们会永远打下去，很容易地就被革命人民推翻，那是幼稚的见解。这是一方面——世界反动战线方面。另一方面，则有苏联，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解放运动，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有这些，组成革命的战线，革命的营垒，其目的，就是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从资本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帝国主义战争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强大的斗争过程，艰难的持久作战的过程，教育人民，唤醒人民，组织人民，并领导人民向资产阶级战斗的过程。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在的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把黑暗世界整个儿地改造为光明世界的时代，我们是正处在这个时代中。

进行了两年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是属于世界革命营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有力的组成部分。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一定会在世界改造过程中起其强大的作用。帝国主义战争对于世界对于中国都是不利的，但是苏联的存在与发展，全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解放运动的存在与发展，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中国的好朋友，都是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援助者。中国，苏联，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该组成坚固的统一战线。这是革命的统一战线，用以对抗反革命的统一战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

削弱，在这一点上说来，对于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对于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中国的抗战，对于苏联的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又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这样说来，世界的黑暗是暂时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帝国主义一定会死灭下去，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是没有疑义的。中国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只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巩固起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之下，努力奋斗，我们的敌人也一定会死灭下去，一个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就要出来了。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1]记者的谈话

（1939年9月16日）

记者问：有几个问题请教。今天在《新中华报》上看了毛先生九月一日的谈话，有些问题已经说到了，有些尚请毛先生补充。问题分三部分，就是写在纸上的，请逐一赐教。

毛泽东答：可以根据先生们的问题表，分别来讲。

先生们提到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的问题。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就是说，在国际新形势之下，在日本更加困难和中国绝不妥协的条件之下，可以说已经到来了。这里并不否认敌人还可能有比较大的战役进攻，例如进攻北海、长沙，甚至进攻西安，都是可能的。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至于新阶段的具体内容，就是准备反攻，一切都可以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这就是说，中国要在相持阶段中准备一切力量，以备将来的反攻。说准备反攻，并不是立即反攻，条件不够是不能反攻的。而且这讲的是战略的反攻，不是战役的反攻。战役上的反攻，例如对付敌人在晋东南的军事“扫荡”，我们把他打退，这样的战役反

---

[1] 中央社是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扫荡报》是国民党政府军事系统的报纸。《新民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一种报纸。

攻不但会有，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战略上的大举反攻时期，现在还没有到，现在是对于这种大举反攻作积极准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要打退正面敌人一些可能的战役进攻。

如果把新阶段的任务分别来讲，那末，在敌人后方，一定要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经济侵略；在正面，一定要巩固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战役进攻；在大后方，主要的是积极改革政治。这许多，都是准备反攻的具体内容。

改革国内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敌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进攻，我们就要特别加强政治抵抗。这就是说，民主政治的问题，应当快点解决，才能加强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准备军事力量。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政治。

问：刚才毛先生说，为了自力更生达到抗战胜利，民主政治是必要的，那末，在现在的环境下，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个制度？

答：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划分[1]，原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但孙先生在逝世前的《北上宣言》[2]里，就没有讲三个时期了，那里讲到中国要立即召开国民会议。可见孙先生的主张，在他

---

[1]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经将“建国”程序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利用“军政”“训政”的说法，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和剥夺人民一切自由权利的借口。

[2]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它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垮台，冯玉祥等北方实力派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1月13日应邀北上。在离开广州前，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号召召集国民会议。这个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自己，早就依据情势，有了变动。现在在抗战这种严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国惨祸，并把敌人打出去，必须快些召集国民大会，实行民主政治。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议论。有些人说：老百姓没有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不对的。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出让大家讨论。

先生们提出的第二部分问题里，有关于所谓“限制异党”的问题，就是说，关于各地磨擦的问题。先生们关心这件事是很对的。关于这件事，近来情况虽然比较好一点，但是根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问：共产党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曾向中央政府表示过没有？

答：我们已经提出抗议。

问：用什么方式提出的？

答：还是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了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地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问：中央政府有无答复？

答：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末，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

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口号只能是这样提。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共产党却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我们的口号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有区别，一定要和汪精卫的口号对立起来，而决不能和他相混同。他要反蒋，我们就要拥蒋；他要反共，我们就要联共；他要亲日，我们就要抗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许多人的文章上常常有一句话，说是“无使亲痛仇快”。这句话出于东汉时刘秀的一位将军叫朱浮的写给渔阳太守彭宠的一封信，那信上说：“凡举事无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朱浮这句话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原则，我们千万不可忘记。

先生们的问题表中还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问：华北的磨擦问题怎样？

答：那里的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磨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秦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有许多铁的证据，如像张荫梧给其部下进攻八路军的命令等，我们已送给蒋委员长了。

问：新四军方面有无磨擦？

答：也是有的，平江惨案就是惊动全国的大事件。

问：有些人说，统一战线是重要的，但是按照统一，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关于这，先生以为如何？

答：各种胡言乱语到处都有，如所谓取消边区，即是一例。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何况边区是蒋委员长早已承认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也早在民国二十六年冬天就正式通过了。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

问：由于对于统一的了解不同，国共是否有分裂的可能？

答：如果只说到可能性的话，那末，团结和分裂两种可能性都有，要看国共两党的态度如何，尤其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如何来决定。我们共产党方面，关于合作的方针，早经讲过，我们不但希望长期合作，而且努力争取这种合作。听说蒋委员长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也说过，国内问题不能用武力来解决。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又都有了过去的经验，大家一定要长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给长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证，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彻底避免，这就是坚持抗战到底和实行民主政治。如果能这样做，那末，就能继续团结而避免分裂，这是要靠两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也是一定要这样努力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党在今年的《七七宣言》里提出来的三大政治口号。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避免亡国，并把敌人打出去，除此没有第二条路好走。

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1]

（1939年9月18日）

同志们：

今天是开“九一八”纪念大会，九一八事变已经八周年了。“九一八”这一天，是我们一个痛苦的纪念日；“九一八”这一天，是亡东三省开始的一天；“九一八”这一天，是全国亡国危险开始的一天。关于这一点，从前我们这样讲过，但是有许多人不相信，他们以为九一八事变只会亡东三省，不会亡全中国的。他们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为的是它要同苏联开战，不是要同中国打仗，占领东三省是暂时的，等到他们两家打起来了，我们就没有事了，东三省可以很容易地收回来，或者说日本会送还给我们。这样想的人，直到现在还有。昨天苏联同日本订了一个停战协议，就是关于外蒙与伪满的边境冲突，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再打下去，向苏联屈服了，所以就成立了这个和议。可是，有许多人他们就是不加自问，而怨天尤人地责怪苏联不该与日本成立和议，巴不得人家大打起来。这种观念是张伯伦的观念，是坐山观虎斗借收渔人之利的观念，是损人利己的观念。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九一八”大会上的讲话。

法就跟他们不同。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们就说：日本帝国主义亡东三省，是灭亡中国的第一步，第二步它就要灭亡我们全中国了。现在铁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证明了到底哪一种估计是正确的。

“九一八”到今天已有八年了，卢沟桥事变开始的全国抗战也打了两年了，可是，现在中国还是在两条道路上徘徊着：一条是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的道路，这就是亡国的道路；一条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道路，这就是民族复兴的道路。只有走后一条道路，一切沦陷区才可以收复，东三省也可以收复，才能实现我们的口号：“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如果是走相反的道路，不坚持抗战、要投降，不坚持团结、要分裂，不坚持进步、要倒退，那要打到鸭绿江边是不可能的，一切失地是收复不了的，就连卢沟桥、山海关也是打不到的。我们的口号只有一个，就是“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东三省要收复。现在，有一部分人不赞成收复东三省，他们只要收复山海关或者收复卢沟桥就够了，并且讲这个话的人，他们并不准备用自己的力量去收复，而是希望依靠外国，希望九国公约签约国来开一个会议，逼迫日本归还我们被占领的土地，只要归还到卢沟桥就可以，卢沟桥以北就可以不还了。这个主张对不对呢？完全不对。我们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靠自己努力，决不是专靠人家。同志们！现在有些国家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去帮助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了，这样的国家现在已经表面化了的就是英国。英国同日本密谋搞“东方慕尼黑”，正在讨价还价，要瓜分中国。

现在，面对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发动的侵略，英、法两国已经向德国宣战，美国还在观望着。但是，在将来，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

是会停止下来的，他们会联合起来，进攻苏联，进攻中国的民族革命，进攻全世界的人民解放运动，进攻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现在的世界已经起了大变化了，这半个月来世界形势已经大大地变化了。这就是全世界的反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已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对付世界革命了。虽然他们之间是有问题、有矛盾的，现在的欧洲大战就是德国同英、美、法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要知道，不管是他们哪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反动的。所以，他们之间虽然矛盾很多，但是在对付革命这一点上他们往往是能取得反革命的一致的。

我们要收复失地，收复东三省，东北的同志首先要团结起来。东北的同志不要分哪一个省、哪一个县的，不要分哪一个先干革命、哪一个后干革命，大家要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东北的同志们，不论是共产党员，还是其他党派的同志，都要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在一切沦陷区里的人民，也是一样，大家不要闹意见，大敌当前，有亡国之危，还要闹什么意见冲突？我们只有一个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收复一切失地。东北的同志们，首先要同东北的老百姓很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东北三千万同胞的统一战线，再跟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结成全国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个口号是对症的三味药，因为现在中国有一些人害了很危险的病，他们害了三种重病，叫做投降病、分裂病、倒退病。我们就给他们配了三味药：第一味，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第二味，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第三味，便是“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同志们赞成这三个口号，那很好。你们到全国各地

去，要向老百姓、向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讲这三个口号，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一直传下去，使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全国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大家都了解和拥护这三个口号，大家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巩固的统一战线。所有的老百姓，所有一切抗战的爱国分子，统统组织到这个巩固的统一战线中来，这是基本的力量。所以，没有统一战线，也就没有收复一切失地的希望；要收复一切失地，就一定要组成统一战线。

同志们！你们出去，都要去组织小统一战线。比方，你去当一个教师，就要把你的学生和学生的家属搞一个统一战线；你做一个连长，就搞他一连人的统一战线；你当一个新闻记者，就把你周围左右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在内搞一个统一战线。有多少人就搞多少人的统一战线，这种统统叫做小统一战线。这样的小统一战线愈多愈好，许许多多的小统一战线作为基础，组成大统一战线。小统一战线好比人身上的细胞一样，造房子的砖头一样，正像没有细胞就没有人，没有砖头就没有房子一样，没有小统一战线也就没有大统一战线，正是由这样无数个的小统一战线，结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统一战线。我们这个大统一战线，还要参加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结成世界规模的最大的统一战线。

现在是世界的大革命时代。全世界人口一共有二十万万，而反动派只有两三万万而已，剩下的十七八万万，便可以组成统一战线，同那两三万万人作斗争。两三万万人的反动派，他们手里有军队，有政权，有报纸，有政党，他们用来消灭我们的武器很多，而我们的武器就很少。然而，我们有一件东西可以战胜他们的，就是齐心协力。但现在我们心还不齐，因此要组织一个大统一战线，反对那些反动政府，反对他们进行的强盗战争。现在全世界的统一战

线是在组织过程中，全世界的老百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专政。这次大战的爆发，更促进了全世界统一战线的加速组成。全世界的老百姓、弱小民族和苏联，这三种力量联合起来，同反革命作对，这就是全世界的革命统一战线。

我们要收复一切失地，没有全世界的统一战线的帮助是不行的，绝不能成功的。中国是世界的一环，绝不能脱离世界而生活。当然，我们不是绝对地依靠外国，依靠人家，而不要自力更生了，我们主要的还是依靠自己，还是要自己努力。我们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外国，而中国自己的伟大力量都看不到了。他们天天在读总理遗嘱，“必须唤起民众”，但是，他们并不唤起民众，相反地还在压迫民众。他们只在嘴上讲，而行动上就不执行。是不是全国人民起来了，统一战线组成了，外交就不需要了呢？那也并不是这样。当然，如果外交是联络帝国主义，参加帝国主义的战争，这种外交是有害于中国的，这就要不得。总之，在外交上凡是有害于中国的我们就反对，有利于中国的我们就赞成，这就是说，凡助我者则友之，凡助敌者则敌之。

在组织这个伟大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东北的同志们，你们已经努力八年了，今后还要继续努力下去。要像大禹那样，他为了公益的事，“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你们现在已经是八年于外，没有回一次家了。同志们，你们还要准备在几年中也回不去，你们要准备敌寇不灭，誓不还乡！你们要有牺牲的精神，牺牲自己，为了公益。到底哪年哪月回家呢？现在还说不定。今年是一九三九年，我们要搞他一个持久战，一定要打下去，大家要下决心，一定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我们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统一战线，东北的、所有沦陷区的、全中国的以至全世界的统一战线。同志

们，只要有决心这样搞，一定会有收获，东北一定可以收复，一定可以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那时候，我们的力量准备好了，就打回东北。斯大林同志已经准备了一个锤子，要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头上打一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时候，我们可以开一个庆祝大会，不开纪念会了。那时候，我们中国得到解放，就开一个全国解放庆祝大会。现在，每个同志都要努力，大家努力学习和研究，努力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一日不胜利，我们一日不休息！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

（1939年9月24日）

一　统一战线和政策问题

斯诺： 国共两党关于抗战政治基础的解释，似乎存在着一些差别。共产党一再着重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参看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但是，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上和言论中却没有什么地位。国民党以为抗战的政治基础，就是共产党和其他政治集团对于国民党独裁的屈服。

我在重庆曾访问过张群[1]将军，询问他对这一点的意见。他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久必被取消。蒋鼎文[2]将军在西安告诉我同样的话。他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虽然从前的共产党员作为国民党军队一部时也可以负责官职或军职。去年陈立夫也说了实际上同样的一套。

---

[1] 张群（1889—1991），四川华阳（今属双流）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2] 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政府主席。

蒋委员长自己最近告诉一位德国记者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剩下来了”，这显然是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的观念。

你对于这些言论有什么意见？统一战线的法律基础究竟在哪里？共产党的法律地位究竟有没有？当着一个党否认另外一个党的存在时，能不能有一个两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与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在他们的口头上与文字上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我们从前对于这些人的这样一种态度，称之为阿Q主义，因为在鲁迅先生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阿Q，就是天天说自己对、自己胜利，而人家则总是不对、总是失败的。在阿Q主义者看来，似乎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你不信，可以去看看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

中国有一小部分人，历来很愿意学习希特勒。大家知道，希特勒曾经有一个时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苏联只是一个名称，世界上实际没有这个国家。”可是，希特勒也有因为受了教育而发生某种觉悟的时候，就是当着今年八月二十三日的那一天，他忽然发现不但名义上有了苏联，而且实际上有了苏联了。中国的若干阿Q主义者中间，我想很有一些可能进步的人，如果说，他们现在还不承认有所谓统一战线甚至于有所谓共产党存在的话，那末，谁也不能排除，于将来的某年某月某日，他们也能在名义上、实际上都承认共产党与统一战线的存在。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做孟子，他曾

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1]。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说到对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屈服，也许某些人确实在那里这样想与这样讲，但我认为这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既然吃了饭，睡了觉，而且口舌是他们固有的，又具有高等动物所特具的所谓脑筋，他们既然具备了这许多条件，因而也就有这种自由，这种胡说八道的自由。我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原则的，我决不去干涉他们这种自由，我也颇为忙碌，没有工夫去干涉他们。所谓屈服，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所有你说的那些，我相信大多数有良心有诚意的国民党员都不会那样说的，因为他们都是懂得抗战第一、团结第一的人。

至于蒋介石先生说了什么共产党不存在的话，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因为：第一，蒋先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但有政治常识，而且懂得更多的东西。第二，蒋先生是抗战领袖，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第三，他如果说这样的话，岂不是与他从前的话相矛盾吗？因为他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过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所以，我相信，这种毫无常识的话，这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话，这种与蒋先生过去所说互相冲突的话，他应该是不会说的。而如果果然说了的话，那我们就有权利请他更正。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2]蒋先生

---

[1] 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2] 参见《论语·子张篇》。

如果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实在是他的过错，是一个全体共产党员皆不能忍受的过错，我们一定要请他更正。

说到共产党的法律地位，的确是没有的。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执行蒋先生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谈话，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对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同样也没有给予合法地位。这就是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也还不是一个有法律的国家的明证。现在全国人民都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说到陕甘宁边区，这还是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以及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蒋先生几次当着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的面亲口承认了的。在一九三七年的冬天，又经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正式通过了。至于到现在还没有发表，还没有委任边区的官吏，这只是证明行政院办事未免太迟缓，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作风实在太严重，无怪乎全国人民要求行政机构的彻底改革了。要改变一下才好。

斯：中国的外交政策强调说，中国的斗争是站在民主的一方面，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中国是属于诸民主大国之列。说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什么是它的根据？自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向民主方面有什么进步吗？民众获得任何政治力量吗？（这里我指的不是边区或游击区的情形，指的是那些在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

毛：根据是有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名称，你看，各国人不是叫我们中华民国吗？我想，这就是它唯一的根据。至于说实际根据，那是没有的。现在的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原则，虽然已经讲了有几十年了，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兑现，现在全国几万万人都要求兑现，大概有可能兑现的吧！到那时，那末就多了一个根据。我希望添上这个根据，因为这不但便利

于在外交上说话，而主要地还是便利于抗战。

斯：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央政府在性质上有任何变化吗？它是否仍然主要是国民党独裁的政府？

毛：在某些政策上有变化，它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这就是一个政策上的变化。而其他政策上，如民主民生这一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所以现在全国热烈要求实行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至于政府的组织上，那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这一次，重庆开参政会，蒋先生在开幕词中讲，要集中各方人才，参政会通过了决议，要求结束训政，实现宪政。这是一个好消息。现在全中国人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

斯：政府的阶级基础，是否由于战争的缘故，而发生了什么变化？

毛：据我看，是部分地发生了变化。沿海沿江一带的大阔老，大多做了汉奸或准汉奸，这就是汪精卫代表的那一群，这些阶层，政府已不能靠了。抗战的政府，它的基础主要地应该放在，也将不能不放在中产阶级与广大的农民阶级之上，因为只有这些阶级，才是支持抗战的伟大力量。

斯：政府的阶级基础变化了，你说政府应该依靠于中产阶级及农民阶级身上，这是不是说，这两个阶级的代表现在已经在政府里增加了，而资本家的代表减少了？

毛：我是说应该放在这两个阶级上面，而并不是说已经放在这些阶级上面，我是说政府的前途，而不是说现状。

斯：是不是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有了变化？

毛：还没有。

斯：现在的政府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吗？

毛：是的。现在的政府，主要地还是地主与资本家的代表，可是，这些阶级的代表，很多都已逃跑出去了。

斯：那末，现在还代表什么？

毛：在抗日政策上讲，主要地已放在中产阶级及广大的农民阶级基础之上，已代表了这些阶级，但在民主民生政策方面，到现在还没有。

斯：因为共产党放弃了强调阶级矛盾冲突的宣传，取消了苏维埃，服从于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领导，采行了三民主义，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以及停止在国民党区域的组织活动和宣传工作，许多人在说，中国共产党人已不是社会革命者，而仅仅是改良主义者——目的和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了。你对这种攻击如何答复？你是否还主张中国革命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在一定阶段上，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而共产党的责任就是领导这个社会主义革命？

毛：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

斯：在反帝反封建的前面或后头，中国也有向法西斯独裁发展的可能吗？现在中国的法西斯组织的力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弱了？

毛：在中国，法西斯专政是没有发展的可能。因为，中国的一半，已经变成了殖民地，其他的一半也还没有脱离殖民地的危险，中国的经济，也还是半封建经济占主要地位。就是因为这些理由，使得中国那一些法西斯空想家失掉了前途。至于说过去中国政治组织中有某种组织也勉强地不适当地说它是法西斯力量的话，那末，这种力量，现在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很明显的，在中国这种国度内，要来闹所谓法西斯，是一定要碰破他自己的头的。

1939年，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延安。

斯：共产党认为自己是居于中国工人农民的主要领导地位的。除开对边区农民的领导，以及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红军的领导，共产党在实际上如何确定其对于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产业无产阶级现在是在日军占领区内）？

共产党如何教育工人农民使之认清现在革命的反日反封建目的?

毛:所谓共产党对工农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的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在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凡是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已经组织起来了,那末,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

教育工农,是用共产党员的口,用文章,主要的还是用党的抗日的行动,使工农懂得要抗日要反对汉奸势力的目的。

斯:抗战是削弱还是加强了中国的封建因素?在今天,共产党的纲领中哪些是革命的反封建的纲领?边区以外任何地方,曾经认识到它吗?除非同时在全国范围实现革命的反封建的一面,抗战能够获胜吗?当农民甚至为了抵抗日本来组织自己都不可能——更不必提农村改革的要求——在战争当中能实现革命的反封建任务吗?

毛:这里,首先要说的,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的首要问题是抵抗日本,反封建的任务要服从于第一位的目的——抗日。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改良人民生活,这些都是反封建的纲领。现在全国各地,不但工人农民,而且在小资产阶级,如广大的知识分子、学生青年、文化人,前进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军人中间,酝酿着一个很大的民主运动,问题是由于受国家的旧的政治机构所束缚,因而没有发展生长,所以,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毫无疑义,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有一些人,赞成抗日,而反对民主,这种人,实际上是不愿意抗日胜利的,是要引导抗日到失败的人。

斯：中国有的资本家跑了，到汪精卫那儿去了，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不再成为政府的主要部分了。这种情形之下，政府已失掉了依靠力量，为什么现在还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代表了这些阶级，而没有提高工农的组织地位？

毛：这就是顽固性，阶级基础变了，而政府组织还没有变。因为这些人霸住在那里吃饭，而不让人家进去，所以要改变政府组织，是要经过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霎时的事情。

二　国际问题

斯：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重庆有人担心接着会有一个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一阵苏联确实曾劝日本签订这样一个条约。你认为这在现在有可能吗？如果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毛：如果这样一个条约会妨碍苏联支援中国，那它就不会签订。然而，如果不妨碍这种支援，那就可以签订而不致产生有害的后果。苏联和世界解放运动的利益是一致的，和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民族革命的利益也是一致的。苏联不会签订一个对这些运动不利的条约。

斯：我读了你对签订德苏条约一事的评论。你似乎认为苏联不大会卷入欧洲的战争……你是否认为，苏联只要不遭受进攻，即使纳粹德国看来接近胜利，苏联也仍会保持中立？

毛：苏联不会参加这个战争，因为双方都是帝国主义，而这只是一场双方都没有正义的强盗之间的战争。双方都在争夺力量优势和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统治。双方都没有公理；苏联不会卷入这种战争，而会保持中立。

但是苏联并不是在所有战争中都采取中立政策。对于正义的解放战争，苏联不会保持中立。二十年来，这是苏联一贯的政策。例如，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苏联支持了中国革命。一九三六年到三八年，苏联支持了西班牙的共和军。从一九三七年至今，苏联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九月十七日苏军进驻波兰，也是为了解放白俄罗斯人民和乌克兰人民。

苏联会支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它会支持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的人民（社会革命）运动。苏联会支持革命战争，但在纯粹反革命的战争中保持中立。

至于现在这场欧洲战争的结果，苏联不会被战胜国，不论是英国或者德国，对它自己的威胁所吓倒。苏联一旦遭到进攻，它将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得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少数民族的支持。

今天反苏运动的中心已经不再是纳粹德国。它在于以英国为首的各民主国家。在张伯伦的领导下，各所谓民主国家的政府正在组织广大的战线，企图把意大利和日本也拉进去。它们企图借此先打败德国，然后进攻苏联。国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

斯：*据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你看不出法西斯主义和英法等民主国家的事业有什么区别？*

毛：从它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来看，没有什么区别。张伯伦正在组织世界战线，用以包围苏联、抗日的中国以及德国。他的目的是结束在中国的战争，推翻希特勒，孤立苏联，以便日后组织反苏的运动。张伯伦作为国际反动资本主义的领袖，懂得如果他不这样做，抗日战争就会胜利，德国就能收复它的殖民地，印度就会赢得独立，而张伯伦及其同僚的统治就会垮台。

斯：*张伯伦先生的胃口恐怕没有那么大吧？难道你认为，张伯*

伦在打德国的同时，他的真正目的是在于灭亡俄国？在我看来，张伯伦现在对付希特勒就够忙的了，还能准备对俄国打一场更大的仗？如果可能的话，他想争取俄国的友谊，以便打败希特勒，这样做对他来说不是更合乎逻辑吗？即使他确实有在将来搞斯大林的打算。你的意思是说，张伯伦过去曾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东引，还是说他现在积极地这样计划，还是说他希望通过现在这场战争搞成这样一条战线？

毛：他过去就想，现在正在计划，而且希望以后能实现这样一条战线。为什么？因为张伯伦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希特勒，还有印度造反的问题，和他本国人民中有人造反的问题，而苏联却支持殖民地的革命和资本主义宗主国里的人民（革命）运动。因此罗斯福也同情张伯伦。

斯：欧洲战场对日本在远东的战略和日本的外交政策会产生什么影响？

毛：日本会利用欧洲战争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加紧侵略中国，第二个目的是把它的侵略扩大到南洋。然而首先它必须征服中国，它现在主要的注意力就放在这点上。日本不会参加欧洲战争。由于避免参加，它可以继续同法、英、美做生意，而且也许还可以从它们那里借钱。日本要是没有对外贸易和外国贷款，将难于征服中国。

德国现在正忙于自己在欧洲的事，不再能照顾日本。苏联同日本没有多少贸易关系，而且不会借一个铜板给日本。问题在于英、法、美会不会帮助日本灭亡中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欧战期间日本的第二个目的确是野心很大。但是不论英、法、美在欧洲是否被打败，日本总会把它的舰队集中在南方使用。那时

日本就可能进攻荷属东印度群岛，因为这个群岛是日英正面冲突的中间站，它是英国重要的势力范围，但却不是英国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荷属东印度群岛很垂涎，因为那里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如果英、法、美采取帮助日本的政策，使日本能打败中国，它们等于是武装起日本，让日本将来进攻它们自己。

日本希望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富强起来。罗斯福也想发战争财。罗斯福想赢得资本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他要张伯伦做他的秘书，日本做他的一个卫士——他的后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他的前卫。但是他对斯大林直摇头，说斯大林对他毫无用处。

斯：那么，你是否认为欧洲战争可能对中日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毛：如果英、法、美采取给日本以物质帮助的政策，则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不然的话，中国依靠自力更生，能够而且应该会在这个世界战争和混乱的时期中战胜日本。

斯：显然欧战一定会大大削弱英法在中国的地位。这可能既意味着削弱英法对日本的抵抗力，也削弱英法对中国的抵抗力。因此，就中国对列强的依赖关系来说，苏联援助的作用极大地增加了，特别是西北的供应线更加重要了。同样，苏联在西伯利亚和外蒙对日本的政策也更重要了。苏联的对华援助会不会增加到足以弥补英法援助的削弱呢？

毛：如果中国继续坚定地抗战，而且和苏联密切合作，苏联的援助不仅会弥补英法协助的减少，而且会远远超过后者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英法其实并没有“帮助”中国。它们至今采取的不过是不干涉中日战争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协助中国的政策。

斯：在这方面，苏联对中国解放运动的增强援助是否可能采取

一种有些类似你所说的苏联对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解放运动的援助的形式？例如，在满洲有一个强大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在内蒙和新疆也有类似的解放运动。苏联是否可能派遣抗日的武装远征队来帮助这些解放运动？

毛：按照列宁主义，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自己打不打。

斯：苏联同纳粹德国达成协议，占领了波兰，这使苏联看起来好像和极权主义的轴心国进行合作来瓜分弱小国家。肯定许多人会这样认为。不论怎样，新的苏联政策意味着所谓民主国家（包括苏联）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垮台。这一点将如何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口号？中国至今一直呼吁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给予支持，以反对极权主义的日本。中国过去的外交口号现在是否已经失效？

毛：随着欧洲战争的爆发，世界政治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德国放弃了它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原话如此！）的政策。另一方面，所谓的民主国家开始利用战争来结束民主制度。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成了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的运动的中心，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运动的敌人。

德国和英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法西斯国家和所谓民主国家的英国都是帝国主义强盗。它们之间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这场战争是强加在它们本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头上的。

现在英国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张伯伦是世界的头号公敌。以前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作了很大努力想争取张伯伦，让他和苏联合作抵抗法西斯主义。但是以张伯伦为首的所谓民主国家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最后拒绝了这一建议，拒绝和苏联合作，结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范围扩大了。

张伯伦在英苏谈判中从来没有诚意。他决心不使谈判有什么结果。这样他就选择了战争而不是和平，因为显然如果把苏联排除在合作关系之外，和平就不可能有保证。这一点连资产阶级的重要发言人劳埃德·乔冶也承认的。

同时，德国利用了张伯伦的政策，它声明放弃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纳粹的反苏和反共产国际政策放弃以后，以前在法西斯国家和民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划分的界限就失去了意义，不再是一种政治衡量的尺度了。努力争取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同苏联成立统一战线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从新的情况出发，应该有一个区分各国的新的标准。我们该怎样划分国家的类别呢？

一类是进行或帮助进行非正义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国家，以及公开、积极支持这种战争的国家。另一类是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国家。各国共产党的政策必须作相应的改变，因为迄今执行的政策已经不合适了。

在新的形势下，可以参加世界革命统一战线的国家已经不再包括所谓民主国家里的资产阶级了。这个阶级已经成为被压迫民族的敌人。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现在应包括以下的成分，（1）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2）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里的反帝力量，包括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3）苏联。

我在九月十四日的讲话中说过，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有两个特点：第一，片面战争已经变为全面战争。（这是指斯大林对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说法，见三月份他对苏共中央全会的讲话。——斯诺注）其次，世界革命战线的组成已经从复杂变为简单了。现在，世界革命的口号已变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用革命战争击败反革命战争；用革命战争支援人民革命战

争；支援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革命战争。这些口号同样适用于所有国家，包括法西斯国家以及利用战争作为实现法西斯主义的手段的所谓民主国家。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革命战线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阵线；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都有助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人民阵线；而且这种帮助是相互的。

在这个世界革命战线里，苏联帮助所有的参加者，而后者也支援苏联。这种支援是相互的。用这种方法，我们能够对抗各国反动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

这里我插话问毛泽东，既然德国也是帝国主义，和英法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苏联竟向德国提供苏联的大量小麦、石油和其他战争物资，从而参与了德国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动。顺便也问一下，苏联为什么继续向日本出租库页岛的油田，或者给日本以捕鱼权。后者价值很大，因为它使日本能输出大量的鱼，从而取得外国信贷，用以购买军火，进行针对“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

毛回答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要看到政策的结果才能加以回答。苏联向日本出售石油的条件，他不清楚。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向德国或日本提供任何军火，而维持通常的贸易不等于参战。

我问，在现代战争中，向参战者提供坦克、飞机，跟为坦克、飞机本身提供燃料，这中间有什么大区别？为什么说美国卖给日本战争原料就是参加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而苏联卖给德日同样的原料，却不是参加德国帝国主义在欧洲的战争和日本在亚洲的战争呢？

毛笑了一下，承认说战争原料买卖和战争工具买卖之间的区别

不大。他说，关键是有关国家的政策是不是真的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支持革命的解放战争。按这点判断，苏联的立场是毫无疑问的。苏联积极支持过中国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战争，支持了西班牙革命战争，现在又支持中国的革命战争。苏联一贯站在正义的革命战争方面，而不会站在帝国主义战争的任何一方，虽然它可能维持同交战双方的通常贸易关系。

我说，既然这是一个“记录之外”的问题，我将不发表他的评论。他答称他不在乎；既然他自己的秘书已经全记下来了，对他来说已经“记录在案”。因此我在此包括了谈话的要点。——斯诺注

至于波兰问题，需要从几方面看问题：从德、英、法、波政府的观点；从波兰人民的观点；最后从苏联的观点。

德国对波兰进行的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其目的是掠夺波兰人民。波兰是英法的战略阵线，希特勒打击波兰就是摧毁英法战线的一翼。这个战争自然是我们所反对的。

对英法来说，波兰是它们金融资本掠夺的对象。英法鼓励波兰作为它们帝国主义战线的一部分，是为了利用波兰来抵制希特勒重新瓜分帝国主义赃物的企图。既然这是英法参加有关波兰的战争的客观条件，那是一种帝国主义立场，不应给予支持。

波兰本身有一个半法西斯的政府，为反动的波兰资产阶级所统治。它残酷剥削波兰人民中间的工农。它无情镇压波兰民主人士和进步分子。同时，它的泛波兰政策压迫了波兰境内的广大少数民族，包括八百万白俄罗斯人、三百万乌克兰人和五十万日耳曼人。它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帝国主义政策。

波兰政府在英国金融资本的指使下，自愿地动员了人民做炮灰。它甘心成为国际金融资本反动阵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并不

符合波兰人民的利益。

波兰政府二十年来一贯敌视苏联。在英苏会谈期间，它拒绝了苏联的援助。只经过两个星期，它就屈服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从而暴露了它的无能。一百五十万波兰军队不堪一击，把波兰人民让给纳粹分子去迫害。在马德里，装备很差的西班牙民兵还能守两年，波兰政府的军队却在两星期内就被消灭了！在中国，八路军守卫了晋察冀战区两年，顶住了日本，而波兰却没有五台山根据地，也没有八路军。所有这些弱点清楚说明波兰政府的邪恶与无能。我们不应为帝国主义波兰浪费我们的眼泪。

最后，说到苏联。纳粹入侵波兰使苏联面对这个问题：是让全体波兰人民沦于纳粹迫害之下，还是解放波兰东部的少数民族。苏联选择了第二种做法。

波兰东部大片领土上住着八百万白俄罗斯人和三百万乌克兰人。这片领土是作为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的代价，从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里夺走，而落在反动的波兰政府统治之下的。今天，苏联不再软弱和年经，只是把它自己的土地收回，加以解放而已。

来自前线的新闻报道描述了波兰少数民族欢迎红军的情况。人民把饮食送给红军战士，和他们拥抱，欢呼他们是救星。德军和法军占领的地方就没有这类新闻。这说明，苏联这次的战争是正义战争，有利于解放少数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斯：但是《读卖新闻》报道说，日军在东亚推广新秩序所到之处，也遇到类似的热烈欢迎。我敢说，德国报界也在告诉德国公众，波兰人热烈欢迎德国的炸弹。这些日子，被征服的人民不仅屈服，而且向征服者祝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毛：（大笑）谁也不相信《读卖新闻》的报道。虽然我没有见过德国人自称在波兰受到欢迎，我相信，要是他们这样自称，谁也不会信的。至于苏军受到欢迎的报道，有一些独立的观察家在现场，他们能亲自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最后，应该指出，苏联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张伯伦试图实现他的老政策。一方面，他封锁德国，在德国的西线施加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企图收买意大利和日本，并且安抚德国。他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送给希特勒，以换取废除苏德条约，企图借此把德国的枪口调向东方。

张伯伦主义的这些目的不仅现在有，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存在。苏联占领波兰是为了解放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收复苏联的领土，同时这也是巩固苏德条约、挫败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方法。最近的新闻表明，这个政策已取得很大的成功。

另一次，我问毛泽东，在他看来，苏联占领波兰主要是出于军事战略需要，还是出于政治需要。

毛泽东似乎认为，主要因素是战略上的需要，但是这个行动有军事目的也有政治目的。政治方面不是直接联系革命运动的世界条件，而是联系苏联同波兰东部的历史关系。另一方面，苏德条约不是政治的，而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斯大林要这个条约，为了阻止张伯伦建立反苏联盟的努力。毛声称，张伯伦已向希特勒清楚表明，他必须在打俄国和打英国之间作出抉择。如果希特勒打俄国，张伯伦准备容忍他占领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国。如果不然，他将用波兰反对希特勒。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被迫寻求自己同希特勒的协议。

我向毛指出，苏联的政策必然会引起自己辩证的反作用，很可

能会把希特勒加强到某种程度，以致对苏联构成真的威胁。苏联政策的短期效果将是大为削弱在英、法、美的共产党，特别是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赶跑，并使工人阶级队伍本身陷入极大的混乱。如果共产党反对战争，它将遭到镇压，例如在法国已经遭到镇压。所有左翼外围团体如果积极反对战争，也会遭到取缔。这样一种发展将会增强反动和保守势力的力量。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假借战争动员的需要，会迅速扩张。先锋力量的瘫痪会大大削弱反对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绥靖和做交易的势力，大大增加未来反苏联盟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设想，现在的苏德条约可能促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改变为帝国主义联合进攻苏联的战争。

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苏德条约为苏联保证了它防备德国人进攻而需要的安全。他说：“希特勒是装在斯大林的口袋里。”

那么，一切都会很好的——除非后来发现，斯大林的口袋里有一个洞。

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9月25日）

今年四万人生产了三万担粮食，自己解决了一年所需的一半，这不是小事。这次生产运动证明了什么呢？第一，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第二，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第三，团结可以战胜一切。消灭坏事物，靠人民的团结；发展好事物，也靠人民的团结。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机关、学校、部队秋收动员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

（1939年9月28日）

当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纪念快要到来的时候，中苏文化协会要我写一篇文章。我想根据我的观察，说明几个和苏联和中国都有关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目前正在中国广大人民中间议论着，似乎还没有得到确定的结论。我想乘此时机，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点意见，贡献给关心欧洲大战和中苏关系的人们，作为参考，或者不是无益的。

有些人说：苏联利于爆发世界大战，而不要求世界和平的继续；这次大战的爆发，就是由苏联不同英法订立互助条约而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所促成的。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因为在过去很长的时期中，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和平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就是以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联系着的。在过去，苏联不但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和平，需要巩固苏联和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关系，不使发生反苏战争；而且需要制止各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制止各所谓民主国家挑拨战争的行为，需要尽量地延缓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范围内的和平。多年以来，苏联对于世界的和平事业，尽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同法国同捷克都订立了互助协定[1]，竭力想同英国及一

---

[1] 苏法和苏捷两个互助条约都是在1935年5月订立的。

切愿意和平的国家订立保障安全的条约。当德意联合侵略西班牙，而英美法采取名义上“不干涉”实际上放任德意侵略的政策的时候，苏联就积极地援助西班牙政府军反抗德意，而反对英美法的“不干涉”政策。当日本侵略中国，英美法采取同样的“不干涉”政策的时候，苏联就不但同中国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而且积极地援助了中国的抗日。当英法两国牺牲奥国和捷克纵容希特勒侵略的时候，苏联就竭力揭穿慕尼黑政策的黑幕，向英法提议制止侵略的进一步的发展。当今年春夏波兰问题紧张、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不管张伯伦、达拉第如何没有诚意，苏联还是同英法进行了四个多月的谈判，企图订立一个英法苏互助条约，制止大战的爆发。无如这一切，都被英法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纵容战争、挑拨战争、扩大战争的政策所障碍，世界和平事业就遭受了最后的挫折，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英、美、法各国政府，并无诚意制止大战的爆发；相反，它们是促成了大战的爆发。因为它们拒绝同苏联妥协，拒绝同苏联订立真正有效的建立在平等互惠基础之上的互助条约，这就证明它们只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谁也知道，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拒绝了苏联，就是拒绝了和平。这一点，就是英国的路易乔治，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知道的[1]。在这种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德国愿意停止反苏，放弃《防共协定》，承认苏联边疆的不可侵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订立了。英美法的计划是：推动德国进攻苏联，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让苏、德打得精疲力竭之后，它们出来收拾时局。这种阴谋，被苏德互不侵犯条

---

[1] 路易乔治，即劳合·乔治，英国资产阶级自由党领袖之一。1938年冬，英法政府准备同德意法西斯政府举行协商，11月9日劳合·乔治在议会中说：“拒绝苏联参加协商，就不可能取得和平。”

约击破了。国人不去注意此种阴谋，不去注意英法帝国主义的纵容战争、挑拨战争和促进世界大战爆发的阴谋，实在是上了这些阴谋家的甜蜜宣传的当。这些阴谋家，在西班牙问题上，在中国问题上，在奥地利和捷克的问题上，不但并无丝毫制止侵略的意思，而且相反，纵容侵略，挑拨战争，使人为鹬蚌，己为渔人，美其名曰“不干涉”，实则是“坐山观虎斗”。世界上多少人被张伯伦及其伙伴的甜蜜演说所蒙蔽，而不知道他们笑里藏刀的可怕，而不知道在张伯伦、达拉第决心拒绝苏联，决心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苏德才订立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这些人应该觉悟过来了。苏联这样地维持世界和平到最后的一刻，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的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既然爆发了，苏联或者会参加战争的一方，就是说，苏联红军似乎即将参加德国帝国主义的战线。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现在爆发的战争，无论在英法方面，或德国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应该起来反对这种战争，都应该揭穿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即仅仅有害于世界人民而丝毫也不利于世界人民的这种性质，都应该揭穿社会民主党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罪恶的行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共产党当权的国家，它对于战争的态度必然是鲜明的两种态度：（1）坚决地不参加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对于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因此，苏联红军决不会无原则地参加帝国主义战线。（2）积极地援助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例如，十三年以前，援助中国人民的北伐战争；一年以前，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反抗德意的战争；两年以来，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几个月以来，援助蒙古人民的抗日战争；以及还必然地会援助将来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中间可能发生的人民解放的战争和民族解放的战争，还必然地会援助有利于保卫和平的战争。关于这一点，苏联过去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有些人把苏联根据苏德商务协定同德国做生意一件事，看作是苏联参加德国战线的行动，这种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这是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的缘故。不但不能把通商和参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通商和援助混为一谈。例如在西班牙战争中，苏联是同德、意两国通商的，但世人不说苏联援助德意侵略西班牙，而说苏联援助西班牙反抗德意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西班牙的缘故。又如在中日战争中，苏联也是同日本通商的，世人也不说苏联援助日本侵略中国，而说它援助中国反抗日本的侵略，这是因为苏联确实地援助了中国的缘故。现在世界大战的双方都和苏联有通商关系，这种事实，对于双方都说不到援助，更说不到参战。除非战争的性质有了变化，某一国或某几国的战争经过一定的必要的变化之后，对于苏联和世界人民有利的时候，那时才有援助或参战的可能，否则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至于依据交战各国对苏联的态度是亲苏或反苏的分别，使苏联对它们的通商不得不有多有少，有厚有薄，这是各交战国自己态度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但是即使某一国家或某些国家采取了反苏态度，只要它们还愿维持外交关系，订立通商条约，而不向苏联宣战，例如八月二十三日以前的德国那样，苏联也不会同它们断绝通商关系的。这种通商关系，不是援助，更不是参战，这是应该认识清楚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1]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在德国方面，它是为了掠夺波兰人民而进行战争的，是为了击破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而进行战争的。这种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英法方面，是把波兰作为英法财政资本掠夺的对象之一，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拒绝德国帝国主义重分它们的赃物而去利用波兰的，是把波兰当做自己帝国主义战线的一翼来看待的，所以英法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英法的所谓援助波兰不过是同德国争夺对波兰的统治权，同样是不能同情的，是应当反对的。在波兰政府方面，它是一个法西斯政府，是波兰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它残酷地剥削工农，压迫波兰的民主主义者；它又是一个大波兰主义的政府，因为它在波兰民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中，即在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等一千余万人口的非波兰民族中，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的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波兰反动政府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二十年来，波兰政府一贯地反对苏联，在英法苏谈判中，坚决地拒绝苏联军队的援助。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

---

[1] 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兵侵入波兰，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17日波兰政府逃亡国外。苏联为了防止德国法西斯的东侵，于9月17日进兵波兰东部。

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在苏联方面，则是采取了完全正义的行动。当时摆在苏联面前的问题有下面的两个。第一个问题是：让整个波兰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下面呢，还是让东部波兰少数民族得到解放呢？在这个问题上，苏联选择了第二条路。在那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居住的一大块土地，还是在一九一八年订立布列斯特条约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德国帝国主义从幼年的苏联手里强迫地割去，而后来又被凡尔赛条约强迫地放到波兰反动政府的统治下面。苏联现在不过是把过去失掉的土地收回来，把被压迫的白俄罗斯民族和乌克兰民族解放出来，并使免受德国的压迫。这几天的电讯，指明这些少数民族是怎样地箪食壶浆以迎红军，把红军看做他们的救星；而在德军占领的西部波兰地方，法军占领的西部德国地方，则丝毫也没有这种消息。这就是表明，苏联的战争是正义的、非掠夺的、谋解放的战争，是援助弱小民族解放、援助人民解放的战争。而德国的战争，英法的战争，则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压迫他国民族、压迫他国人民的战争。除此以外，在苏联面前，还有第二个问题，这就是张伯伦企图继续他的反对苏联的老政策。张伯伦的政策是：一方面大举封锁德国的西面，压迫德国的西部；一方面企图联合美国，收买意大利，收买日本，收买北欧各国，使它们站在自己方面，以孤立德国；再一方面，则拿波兰，甚至还准备拿匈牙利，拿罗马尼亚，作为礼物，以引诱德国。总之，用威迫利诱种种办法，推动德国放弃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之倒转枪口，进攻苏联。这种阴谋，不但过去和现在是存在着，而且将来也还会继续的。苏

联大军进入波兰东部，是为了收复自己国土，解放弱小民族，同时也是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击破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步骤。从这几天的消息看来，苏联的这一方针，是极大地成功了。这就是苏联的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的利益互相一致，和波兰反动统治下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互相一致的具体表现。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订立之后的整个形势，大大地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加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投降派。中国人民，对于这个协定表示欢迎，是很正确的。但当诺蒙坎停战协定[1]订立之后，英、美通讯社纷传日苏互不侵犯协定行将订立的消息，中国人民中间就发生一种忧虑，有些人认为苏联或者将不援助中国了。这种观察，我以为是不正确的。诺蒙坎停战协定的性质，和过去张高峰停战协定[2]是一样的，就是说，在日本屈膝之下，日本军阀承认了苏蒙边疆的不可侵犯。这种停战协定，将使苏联增加对于中国援助的可能，而不是减少其援助。至于所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在过去多年之前，苏联就要求日本签订，日本始终拒绝。现在日本

---

[1] 自1939年5月开始，日“满”（伪满洲国）军在“满”蒙边境诺蒙坎地方，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攻。在苏蒙军的自卫反击下，日“满”军遭到惨败，向苏联要求停战。9月16日，诺蒙坎停战协定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是：一、双方立即停战；二、苏蒙和日“满”双方各派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以勘定“满”蒙发生冲突地带的界线。

[2] 张高峰，即张鼓峰。1938年7月底8月初，日军在中国、苏联交界处的张鼓峰地方，向苏军挑衅。在苏军的有力回击下，日军失败求和。8月10日，苏日在莫斯科订立张鼓峰停战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战，发生冲突地带的双方界线的最后标定，由苏联代表2人、日“满”代表2人组织混合委员会调查处理。

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派，要求苏联订立这种条约，而苏联是否愿意订立，须看这个条约是否合乎苏联利益和世界人类大多数利益这一个基本原则而定。具体地说，就是要看这个条约是否不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利益相冲突。据我看，根据斯大林今年三月十日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根据莫洛托夫今年五月三十日在苏联最高议会上的演说，苏联是不会变更这个基本原则的。即使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有订立的可能，苏联也决不会在条约中限制自己援助中国的行动。苏联的利益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决不会互相冲突，而将是永久互相一致。这一点，我认为绝对没有疑义。那些有反苏成见的人，借着诺蒙坎停战协定的订立和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传闻，掀风鼓浪，挑拨中苏两大民族间的感情。这种情形，在英美法的阴谋家中，在中国的投降派中，都是存在的，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彻底地揭穿其黑幕。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而所谓外援，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的情况之下，主要地是在下列的三方面：（1）社会主义的苏联；（2）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3）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只有这些才是可靠的援助者。此外的所谓外援，即使还有可能，也只能看作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当然，这些部分的暂时的外援，也是应该争取的，但决不可过于依赖，不可看作可靠的援助。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交战各国，中国应该严守中立，不参加任何的一方。那种主张中国应该参加英法帝国主义战线的意见，乃是投降派的意见，不利于抗日和不利于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意见，是应该根本拒绝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四个问题。

上述的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国人议论纷纷的问题。国人注意国

际问题的研究，注意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注意苏联和中国的关系，而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抗日的胜利，这是很好的现象。我现在提出我对于上述各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否有当，希望读者不吝指教。

1939年，毛泽东和苏联记者卡尔曼在一起。

复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电

（1939年9月29日）

陕西省政府蒋铭三先生：

敬电诵悉，陕北旱灾，中央拨款，关中输粟，仁声仁闻，万众腾欢。边区亦有旱灾，仅次绥榆一等，勉为升斗之助，略尽邻里之心，辱承言谢，愧不敢当，特电奉复，并颂勋绥。

弟　毛泽东
艳

在欢迎中外朋友晚会上的致辞

（1939年9月）

今天开这样盛大的一个晚会，欢迎中国的外国的很多朋友和来宾，首先是二年多来在前线英勇抗战劳苦功高的何柱国将军。何柱国将军这次率领部队从大后方开赴前线，道经边区，我们开会热烈欢迎，——并同来的骑兵军的许多同志。

另外我们欢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参谋魏先生和蔡先生。八路军是在第二战区作战，是属于阎司令长官指挥的。我们欢迎第二战区的同志们到来。

我们还欢迎外国的来宾，这里有三部分朋友，一是大家久已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民国二十五年斯诺先生第一个首先到陕北苏区来。这次重来边区，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晚会有印度医疗队的同志参加。印度是一个有三万万二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这次英国迫使印度参战，印度国民大众代表全体人民发表宣言反对打仗，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印度国民大会的领袖就是不久前到过重庆的尼赫鲁先生。尼赫鲁先生派遣印度医疗队来华援助，中印两大民族团结起来，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

今天晚会上更欢迎苏联的朋友，苏联对中国抗战的帮助，将使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最后胜利。

我们今天欢迎在抗战中劳苦功高的诸同志，是全中国的团结；欢迎国际的朋友，要一切帮助我们的各大民族，美国的人民，印度的被压迫民众和苏联团结起来。国内的团结，更加上国际的团结，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倒的。

为杨十三题写挽联[1]

（1939年9月）

国家在风雨飘摇[2]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3]，于先生犹见典型。

---

[1] 1939年7月21日，原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总部干部杨裕民，因长期转战，积劳成疾，不幸逝世。9月，八路军总部召开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写了这副挽联。杨裕民（1889—1939），原名彦伦，字灿如，又名裕民，排行十三。河北省迁安县人。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毕业，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河北省工业学院任教授多年。结交爱国革命人士，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策划冀东抗日工作。1938年被推为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1939年7月21日因病逝世。

[2] 风雨飘摇，比喻国家动荡不安。

[3]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语出唐代韩愈《送董邵南序》：“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意思是说，燕赵一带古时候就以有许多慷慨激昂见义勇为的豪杰义士著称。

在抗大四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39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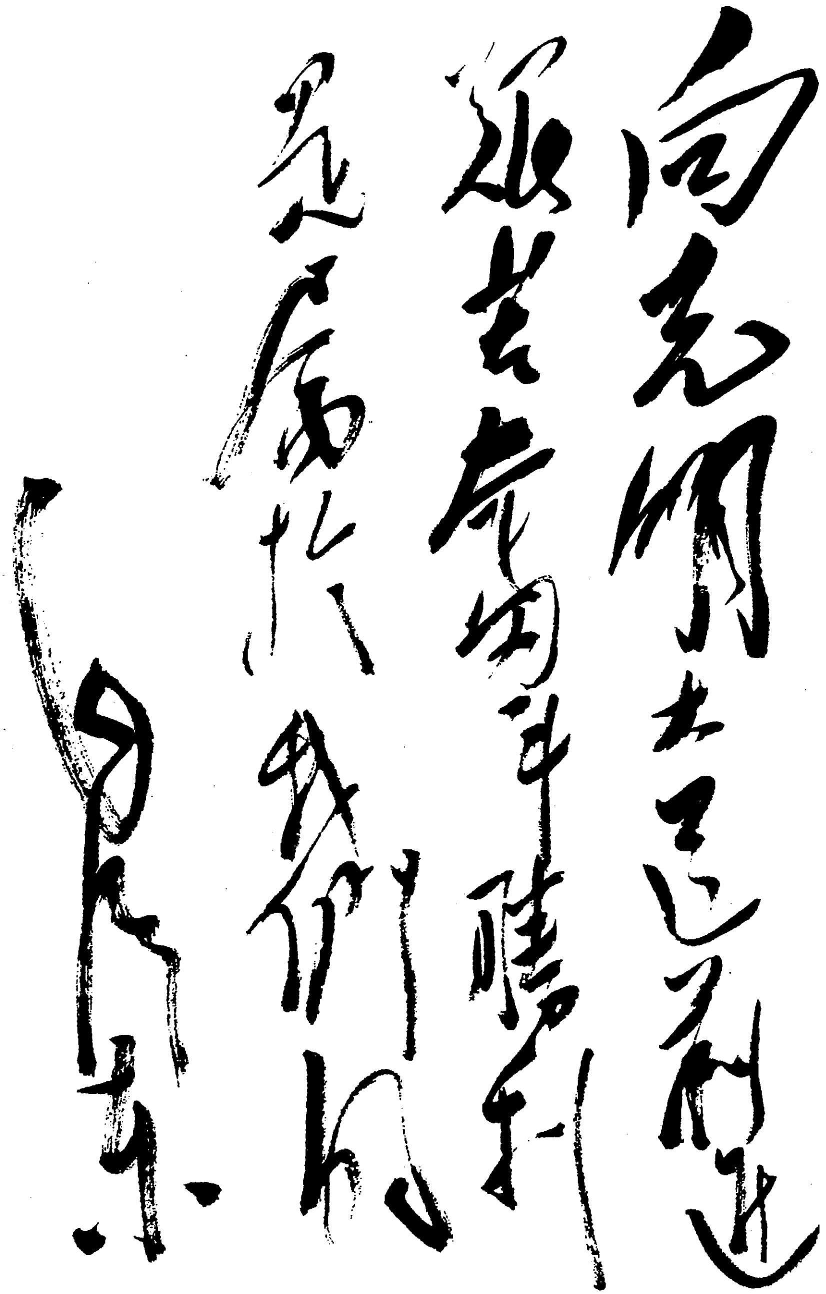
我们要全国民众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力量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用团结的力量去建立一个新中国。然而这不是一件短时期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为韩忠良题词

（1939年9月）

向光明大道前进，艰苦奋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



向光明大道前进
跟共产党走胜利
是属於我们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韩忠良的题词。

为八路军三五九旅题词[1]

（1939年9月）

不但要勇敢，而且要明智，二者缺一不可。

---

[1] 三五九旅是八路军一二〇师所辖的一支劲旅，由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陕北红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合编而成，于1937年8月下旬成立。1939年8月被调回陕甘宁边区担任保卫党中央的任务。1939年9月，为了表示对三五九旅这支英雄部队的嘉奖和鼓励，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他们指明了进一步前进的方向。

研究沦陷区[1]

（1939年10月1日）

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在目前阶段内，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定政策。

在目前阶段内，敌人侵略中国的方式，正面的军事进攻，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某种程度的战役进攻不在内），如同大举进攻武汉那样的行动，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磨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

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

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

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时事问题丛书》第二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一书写的序言。

件。我们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沦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地支持游击战争，改革国内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两个大政方针。

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了。

为了研究一切重要的时事问题，延安组织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同志们除了研究讨论外，还着手编辑《时事问题丛书》，分为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抗战的中国问题这样四个问题来研究，分别搜集材料，用综合文摘体裁出版参考书。本年七月间出版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算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本国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一集。现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简称《日本在沦陷区》），则作为研究沦陷区情况的第一本书，亦即是《时事问题丛书》的第二集。其余两个问题，亦将接续出书。

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

么“狭隘经验论”。

最后要指明的，这一类的时事问题丛书，仅仅是材料书，它是重要的材料，但仅仅是材料，而且还是不完全的材料，问题是没有解决的。要解决问题就须要研究，须要从材料中引出结论，这是另外一种工作，而在这类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共产党人》发刊词

（1939年10月4日）

中央很早就计划出版一个党内的刊物，现在算是实现了。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刊物是必要的。在当前的时机中，这种必要性更加明显。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又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在这种时机，这样一个党内刊物的出版，实在是十分必要了。

这个党内刊物定名为《共产党人》。它的任务是什么呢？它将写些什么东西呢？它和别的党报有些什么不同呢？

它的任务就是：帮助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帮助进行这件伟大的工程，不是一般党报所能胜任的，必须有专门的党报，这就是《共产党人》出版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那末，现在提出新的任务的理由何在呢？

理由就在：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党所处的环境，党所负的任务，现在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的环境是复杂得多，现在的任务是艰巨得多了。

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我们现在要建设这样一个党，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同我们党的历史，是同我们党的十八年斗争史，不能分离的。

我们党的历史，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八年了。十八年中，党经历了许多伟大的斗争。党员、党的干部、党的组织，在这些伟大斗争中，锻炼了自己。他们经历过伟大的革命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革命失败。同资

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最近三年，则又处于同资产阶级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这样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走过的。这是一个历史的特点，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过程中的特点，而为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则，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半封建经济占优势而又土地广大的国家，这就不但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基本的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参加，并且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斯大林同志说过：“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这样：（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建立或被迫分裂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二）主要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就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没有把党同农民阶级和党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作为基本特点，这是因为：第一，这种关系，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原则上都是一样的；第二，在中国，只要一提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

---

[1]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由于这两个基本特点，恰是由于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末，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会要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这一论断，很明显地，已经被十八年党的历史所证明了。倒转来说，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这一论断，也是很明显地被十八年来的党的历史所证明了。

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在十八年党的历史中，凭借我们丰富的经验，失败和成功、后退和前进、缩小和发展的深刻的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已经能够对这三个问题做出正确的结论来了。就是说，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也就是说，十

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在这里，让我们对于这三个法宝，三个问题，分别地大略地说一下吧。

十八年中，中国无产阶级同中国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三个不同的阶段中间发展着的，这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大革命的阶段，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和今天的抗日战争的阶段。三个阶段的历史，证明了下列的规律：（一）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的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因此，无产阶级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应该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地保持之。（二）又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它就会动摇变节。因此，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内容不能始终一致，而是要发生变化的。在某一时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在内，而在另一时期则民族资产阶级并不参加在内。（三）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的阶级。因此，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是以不同的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在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一定的时期内，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

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四）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而要加以限制，而要采取欺骗、诱惑、“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并以这些政策作为它投降敌人和分裂统一战线的准备。（五）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者。这些规律的正确性，不但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证明了，而且在目前的抗日战争中也在证明着。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中国资产阶

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这种二重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二重性，就不能了解中国共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政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过去十八年的历史中证明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它的历史，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加北伐战争。这时，我们党虽已开始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没有彻底了解其重要性，还没有了解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第二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这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武装队伍，已经学会了独立的战争艺术，已经建立了人民政权和根据地。我们党已经能够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许多的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合起来，就是说，把武装斗争同工人的斗争，同农民的斗争（这是主要的），同青年的、妇女的、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的斗争，同经济战线上的斗争，锄奸战线上的斗

争，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等等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配合起来。而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能够运用过去第一阶段中尤其是第二阶段中的武装斗争的经验，能够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互相配合的经验。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1]。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是密切地联系于这一斗争形式的。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

---

[1] 毛泽东在这里说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是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初期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都是游击战争。这个时期的后一阶段，随着红军力量的成长，游击战曾经转变为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这种运动战，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争）。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根据敌情的变化，这种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又基本上转变为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党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轻视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而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毛泽东曾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驳斥了这种观点，并在本文中把长时期内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采取游击战争形式的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特别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革命力量的新成长和敌情的新变化，战争的主要形式就由游击战争转变为正规战争；而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更发展为使用大量重武器并包括攻坚战的大兵团作战了。

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

党的建设的过程，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也同样是有三个阶段的特点的。第一阶段是党的幼年时期。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因此获得了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然而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一阶段的紧要关头中，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而使革命遭到失败。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就是党的建设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即

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资产阶级虽然叛变了，但是党能够紧紧地依靠着农民。党的组织不但重新发展了，而且得到了巩固。敌人虽然天天在暗害我们的党，但是党驱逐了暗害分子。大批干部重新在党内涌出，而且变成了党的中心骨干。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所有这些，都是党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然而，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因此，党的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在这一整个阶段中掌握住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革命在一个时期遭受过李立三同志“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而在另一个时期，又遭受过革命战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和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这就是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党的发展过程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阶段。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三年的斗争，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的。党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党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

凭借着党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很高的政治信仰，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在过去发展党的组织的工作中，虽然中央着重地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口号，但实际上是混进了许多投机分子和敌人的暗害分子。统一战线虽然建立了并坚持了三年之久，可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却时时刻刻在企图破坏我们的党，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所指挥的严重的磨擦斗争在全国进行着，反共之声喧嚣不已。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和顽固派，并想以此作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统一战线和拉了中国向后倒退的准备。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溶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党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任务，无疑是克服这种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尽可能地保持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国共合作，而争取继续抗日、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同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意外的损失。为达此目的，就要巩固党的组织，巩固党的武装力量，并动员全国人民，进行反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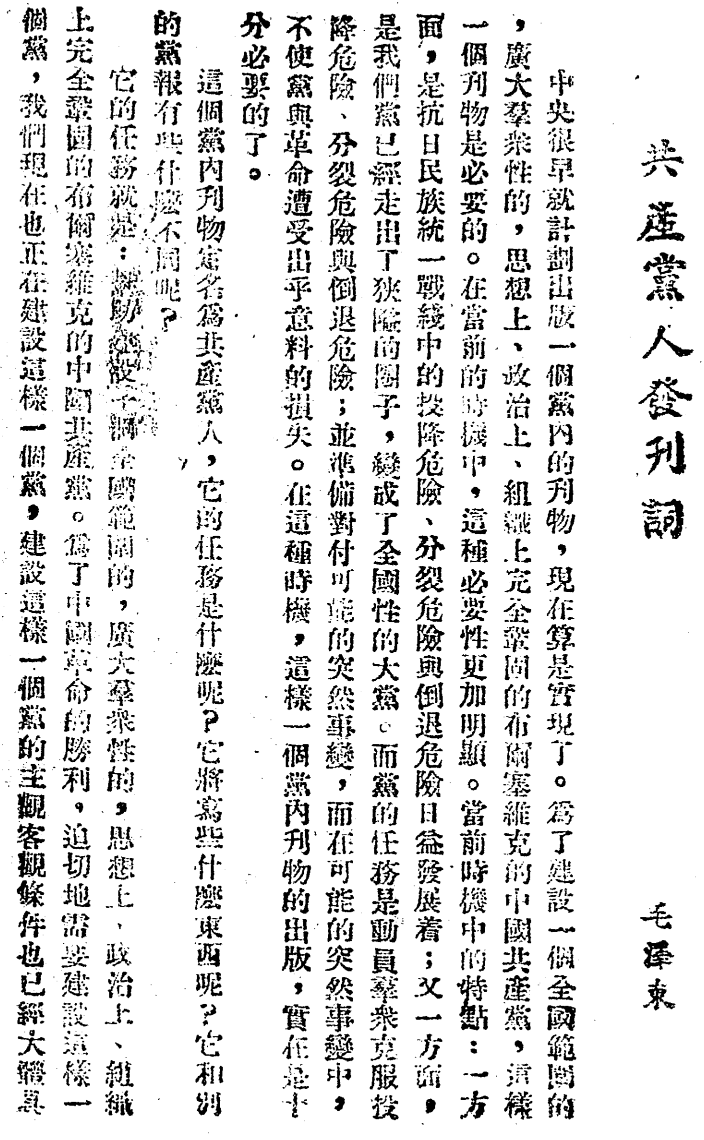
降、反分裂、反倒退的坚决的斗争。这种任务的完成，依靠全党的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党的干部、党的各地各级组织实行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斗争。我们相信，有了十八年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有经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带着新鲜血液富有朝气的新党员、新干部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经历过风浪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互协力的情况下，在它的坚强的武装力量和进步的人民群众相互协力的情况下，是可能达到这些目的的。

这就是我们党在十八个年头中的主要的经历和主要的问题。

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

我们今天要怎样建设我们的党？要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考察一下我们党的历史，就会懂得；把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同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把党的建设问题同联合资产阶级又同它作斗争的问题、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联系起来看一下，就会懂得。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共產黨人發刊詞

毛澤東

中央很早就計劃出版一個黨內的刊物，現在算是實現了。爲了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刊物是必要的。在當前的時機中，這種必要性更加明顯。當前時機中的特點：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中的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日益發展着；又一方面，是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性的大黨。而黨的任務是動員羣衆克服投降危險、分裂危險與倒退危險；並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而在可能的突然事變中，不使黨與革命遭受出乎意料的損失。在這種時機，這樣一個黨內刊物的出版，實在是十分必要的了。

這個黨內刊物定名爲共產黨人，它的任務是什麼呢？它將寫些什麼東西呢？它和別的黨報有些什麼不同呢？

它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範圍的，廣大羣衆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共產黨。爲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黨，我們現在也正在建設這樣一個黨，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觀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

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刊物《共产党人》撰写的发刊词。

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的题词[1]

（1939年10月5日）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要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以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此致

青训班二周年纪念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

---

[1] 安吴青训班，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为适应抗战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要求，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陕西泾阳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1939年10月5日，毛泽东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

给吕超[1]的信

（1939年10月7日）

汉群先生左右：

王右瑜[2]先生到延安，接谈甚快。奉读大示，向往尤深。先生翊赞中枢，功高望重，下风引领，敢不拜嘉。国难当前，团结为第一义，此物此志，当与先生同之也。敬复。即颂

勋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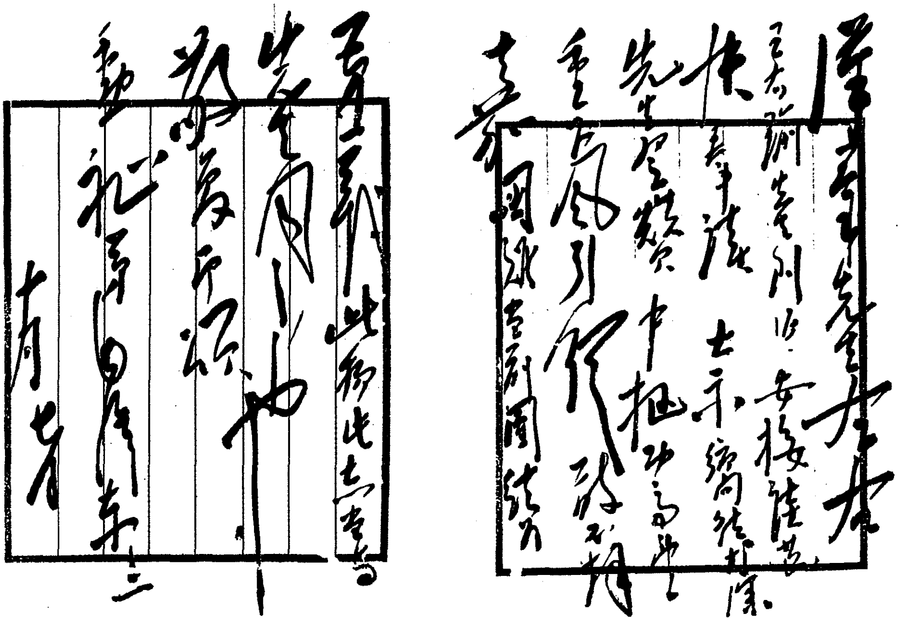
弟　毛泽东上

十月七日

---

[1] 吕超（1890—1951），字汉群，四川宜宾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长。

[2] 王右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处参军。



毛泽东致吕超信的手稿。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

（1939年10月10日）

（一）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是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解脱新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战争的性质，无论在德国或英法方面，都是非正义的掠夺的帝国主义战争。全世界共产党都应该坚决反对这种战争，反对社会民主党拥护这种战争叛卖无产阶级的罪恶行为。社会主义的苏联依然坚持其和平政策，对战争的双方严守中立，用出兵波兰的行动制止德国侵略势力向东扩展，巩固东欧和平，解放被波兰统治者所压迫的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兄弟民族。苏联和其周围各国订立了各种条约，以预防国际反动势力的可能的袭击，并为世界和平的恢复而奋斗。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新形势下的政策是专力进攻中国，企图解决中国问题，以准备将来扩大其对国际的冒险行动。其企图用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方针是：

一、对于占领区域，是加以确保，作为灭亡全中国的准备。为达此目的，它需要“扫荡”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进行经济开发和建立伪政权，需要消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二、对于我后方，是以政治进攻为主，而以军事进攻为辅。所谓政治进攻，就是着重于分化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引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国民党政府投降，而不是着重于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在现在时期，敌人如同过去进攻武汉那样的大规模战略进攻行动，由于他所受中国过去二年余的英勇抗战的打击，由于他的兵力不足和财力不足，其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在这种意义上，抗战的战略相持阶段基本上已经到来。这种战略相持阶段，即是准备反攻阶段。但是第一，我们说相持局面基本上已经到来，并不否认敌人还有某些战役进攻的可能；敌人现在正在进攻长沙，将来还可能进攻其他若干地区。第二，随着正面相持的可能之增多，敌人将加重其对于我游击根据地的“扫荡”战争。第三，如果中国不能破坏敌人占领地，让其达到确保占领地、经营占领地的目的；又如果中国不能打退敌人的政治进攻，不能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以准备反攻力量，或者国民党政府竟自动投降；那末，在将来，敌人就仍有大举进攻的可能。就是说，已经到来的相持局面仍有被敌人和投降派破坏的可能。

（三）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仍然是当前时局中的最大危险，目前的反共现象和倒退现象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分子，动员群众，切实执行我党《七七宣言》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以准备反攻力量。为达此目的，在敌后方，必须坚持游击战争，战胜敌人的“扫荡”，破坏敌人的占领地，实行激进的有利于广大抗日民众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在正面，必须支持军事防御，打退敌人可能的任何战役进攻。在我后方，必须迅速地认真地实行政治改革，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任何的动摇和懈怠，任何与此相反

的方针，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时，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同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觉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

复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9年10月17日）

一二〇师如何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两个月前我们谓该师师部将来准备移晋西北，系指国民党反共之时，现未到此时候，故不应来晋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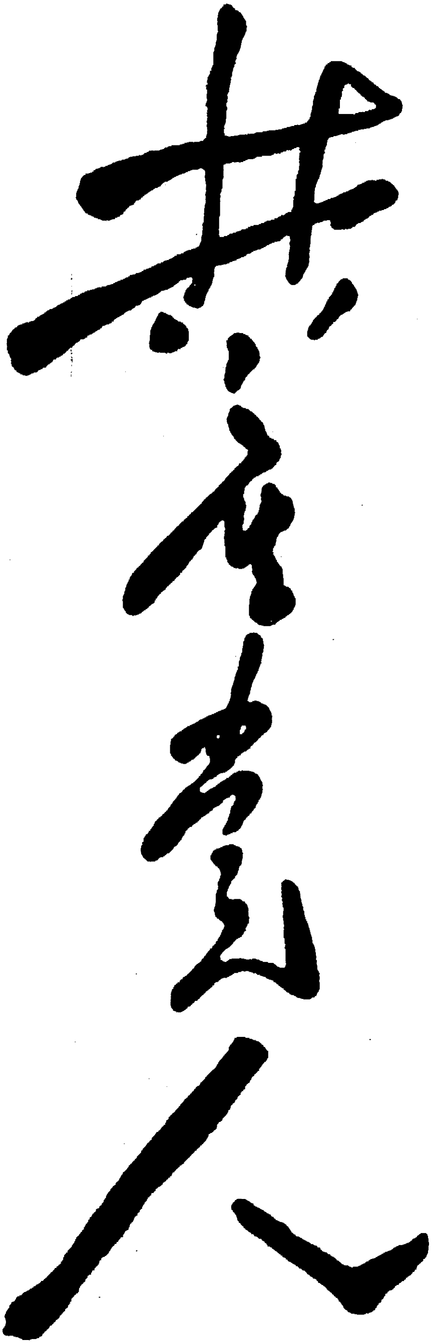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朱德、彭德怀并告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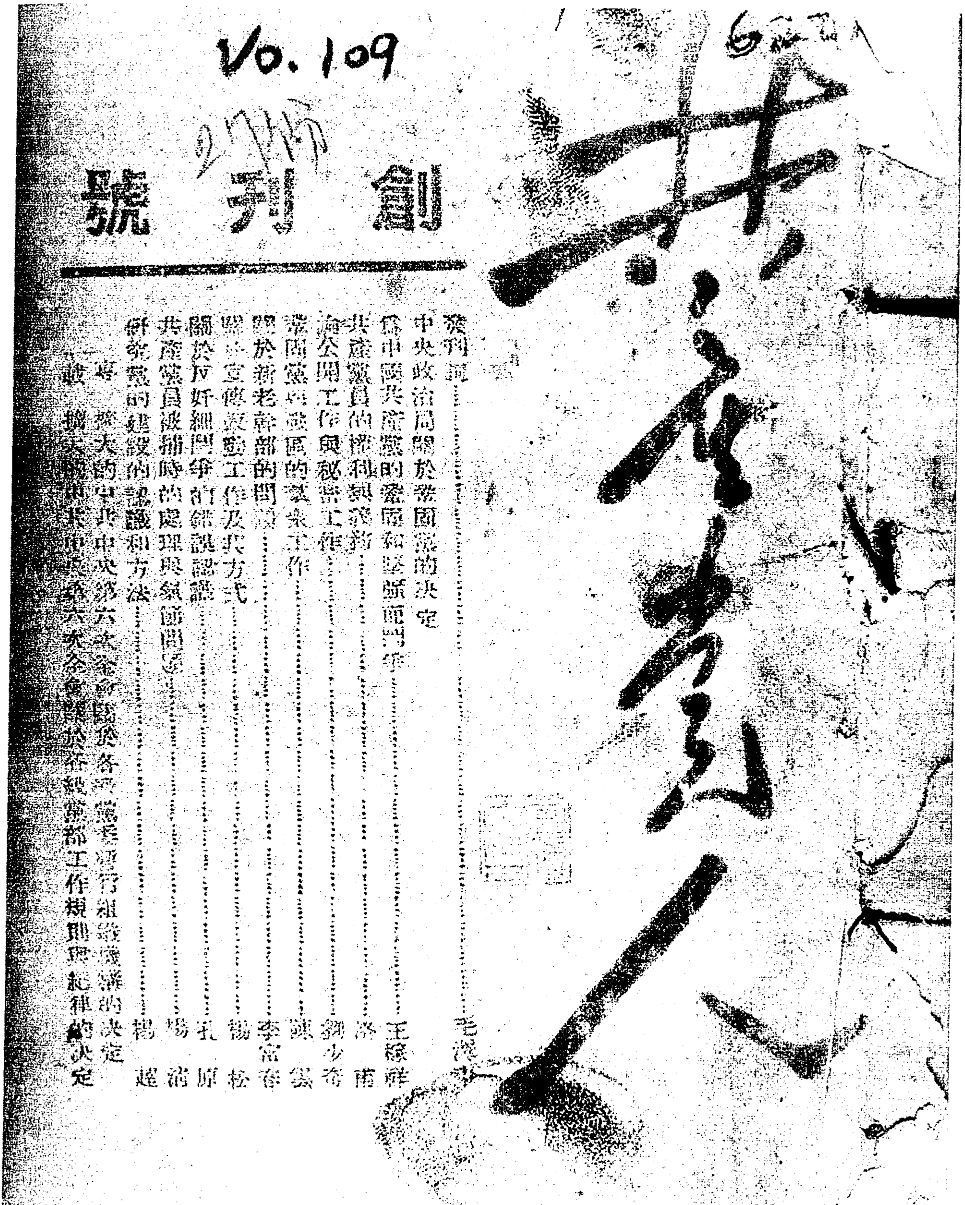
为《共产党人》杂志题名

（1939年10月20日）

共产党人



毛泽东为《共产党人》题写的刊名。



Vo. 109

共產黨人

創刊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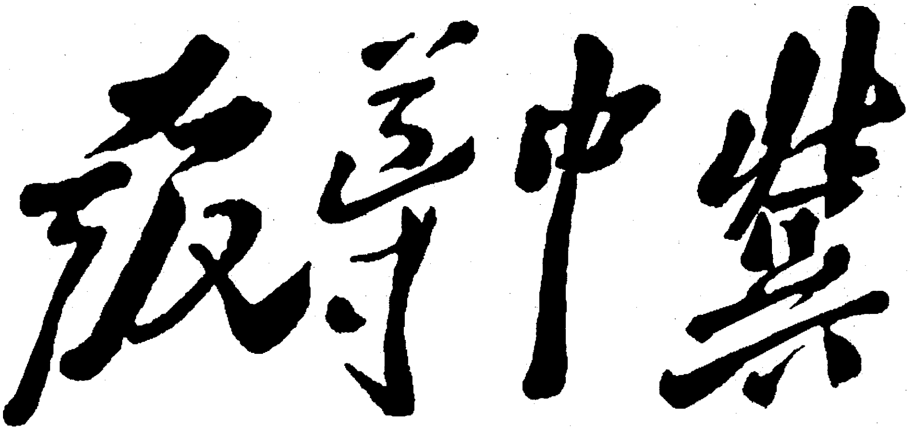
發刊詞……毛澤東
中央政治局關於鞏固黨的決定
爲中國共產黨的鞏固和堅強而鬥爭……王稼祥
共產黨員的權利與義務……洛甫
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劉少奇
鞏固黨與戰區的群衆工作……陳雲
關於新老幹部的問題……李富春
關於宣傳鼓動工作及其方式……楊松
關於反奸細鬥爭的錯誤認識……孔原
共產黨員被捕時的處理與氣節問題……楊諳
研究黨的建設的認識和方法……楊超
專載
一 擴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會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
一 擴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會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

1939年10月20日出版的《共产党人》创刊号。

为《冀中导报》题写报头[1]

（1939年秋）

冀中导报



毛泽东为《冀中导报》题写的报头。

---

[1] 《冀中导报》是冀中区党委机关报，1938年9月10日，在任邱县唐玉庄创刊。当时叫《导报》，1939年秋，更名为《冀中导报》。应周小舟之请，毛泽东为《冀中导报》题写了报头，并致信周小舟：“小舟兄：遵嘱写了，未知能用否。毛泽东”，但此时《冀中导报》已被迫停刊，直到1945年6月15日，《冀中导报》复刊时，采用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这个报头一直用到冀中区党委机关报《河北日报》创刊为止。

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1]

（1939年11月1日）

党有很大的发展，党与群众有好的联系，但党内也有脱离群众的现象。许多共产党员不知道脱离群众是一种罪恶。决定必须阐明：一、党要进一步地依靠群众。当前克服投降危险更需要发动群众。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工作，要与国民党左派人士联合，要有步骤并要有长期深远的计划。要以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党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条件。三、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的群众工作，要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废除高利贷；群众团体要坚持照顾最大多数及发扬民主的原则；军队的政委和政治机关要帮助地方群众工作。四、群众工作是克服投降危险的决定性条件。

---

[1]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通过《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这是毛泽东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言的一部分。

复陈毅电[1]

（1939年11月1日）

凡不积极反共之国党、国府、省府人员及地方绅士，均应采取协作政策，望通知部队及地方党实行。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同意陈毅来电提出的对盐务局、电报局及学校等的方针复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给林中鹤[1]的信

（1939年11月5日）

若虚学长吾兄左右：

顷接八月一日大示，如见故人！前信未到，非敢慢也。寄奉百元，聊佐薪水，为数甚微，将意而已。尚祈努力奋斗，为乡里启新知，为抗战培实力，不胜祷企。南天在望，延企为劳。肃此。敬颂

学安

弟　毛泽东上

十一月五日

---

[1] 林中鹤，字若虚，湖南宁乡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给周扬[1]的信

（1939年11月7日）

周扬同志：

文章[2]看了，写得很好，必有大影响。某些小的地方，我认为不太妥当的，已率直批在纸上。其中关于“老中国”一点，我觉得有把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混同，把现代中国的旧因素与新因素混同之嫌，值得再加考虑一番。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一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为旧，就政治因素说，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

---

[1] 周扬，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

[2] 指周扬撰写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一文。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该文发表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

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是否有当，还请斟酌。

作文[1]当遵命办。

有暇请来谈。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

[1] 指毛泽东准备撰写《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1940年1月，毛泽东就此题目在大会上作了演讲。这篇演讲登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期、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1月14日）

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陕甘宁边区应该成为全国的一个民主的样本。中国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一是封建势力。现在陕甘宁边区存在着四种矛盾。外部的有两种，一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二是同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内部的也有两种，一是资本主义的生长，二是封建残余的存在。这四种矛盾内外相通，以外部为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1月中旬）

目前时局可能好，可能坏，现在看好的可能更大，抗战两年后要投降是困难的。国民党还没有下最后决心坚决反共，即所谓“反共好，反不了”。中产阶级活跃起来，现在敢于讲话。在目前时局下，我们的统战工作要有新姿态，提议对统战工作发一指示。要告诉全党克服投降是可能的，不要等待投降的到来。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中央文委扩大，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出版《中国文化》。最近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提议组织一个招生委员会，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关于宪政问题，我们要研究。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王明关于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等电[1]

（1939年11月24日）

此消息总部应向各方公布，广为宣传。

重庆及各方应在报纸上作文，鼓吹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威力，粉碎游而不击之诬言。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就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在河北省黄土岭被八路军击毙一事，致八路军总部，新四军军部，晋察冀军区，中共驻重庆、西安、桂林办事处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1月下旬）

华北党的工作，在朱德、彭德怀领导下是有成绩的，是我们党的政权的军队的工作基础。华北有六十万党员、二十余万军队，是全党中最大的部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组织中产阶级，因大资产阶级已处于动摇麻痹状态中，联共又反共，联苏又反苏。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要组织中产阶级，组织工农民众，组织武装力量和政权，这是我们克服投降危险的内部条件。现在我们要大用知识分子，过去十年内战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扩编军队问题，如蒋介石承认八路军扩编为三个军九个师，我们应争取二十二万人的经费。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彭德怀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为刘岘[1]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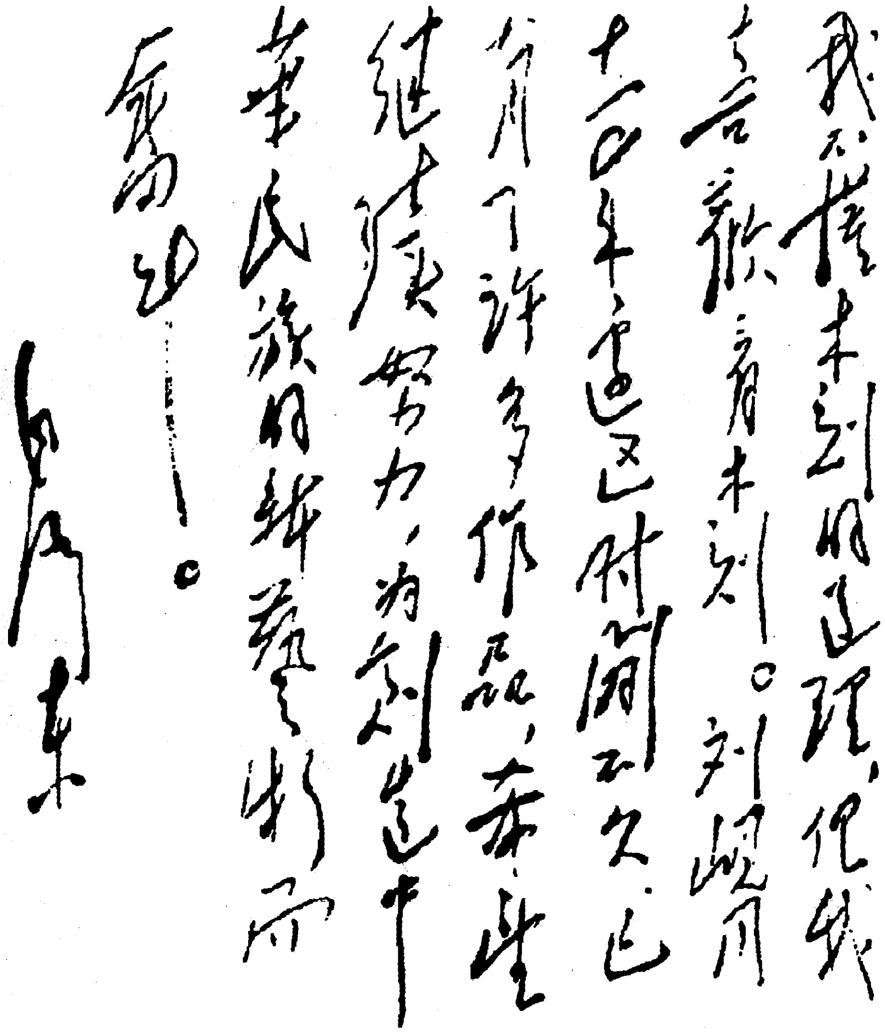
（1939年11月）

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毛泽东

---

[1] 刘岘（1915—1991），河南兰考人，木刻家。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教授木刻。当时他把到延安后创作的几十幅木刻作品手拓装订成册，分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



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岘同志在延安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刘岘的题词。

给马相伯家属的唁电[1]

（1939年11月）

马相伯先生家属礼鉴：

马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毛泽东
朱　德
彭德怀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联名为救国会领袖、教育家马相伯逝世，给其家属的唁电。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

（1939年12月1日）

一、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二、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许多我们办的学校，还不敢放手地大量地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部，还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知识分子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和为工农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的区别，不懂得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性，尤其不懂得我们的党和军队已经造成了中坚骨干，有了掌握知识分子的能力这种有利的条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

三、因此，今后应该注意：（1）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对于不能入党或不愿入党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应该同他们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带领他们一道工作。（2）在这种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无疑义应该充分注意拒绝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遣进来的分子，拒绝不忠实的分子。对于这类分子的拒绝，应取严肃的态度。这类分子已经混进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者，则应依靠真凭实据，坚决地有分别地洗刷出去。但不要因此而怀疑那些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要严防反革命分子陷害好人。（3）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4）对于一部分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干部，尤其是主力部队中的某些干部，则应该切实地说服他们，使他们懂得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工作的必要。同时切实地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5）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寇占领区，基本上适用上述原则，但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时，应更多注意其忠实的程度，以保证党的组织更加严密。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四、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为白求恩题写挽联[1]

（1939年12月1日）

万里跋涉，树立国际和平，堪称共产党员模范；
一腔热血，壮我抗战阵垒，应作医界北斗泰山。

---

[1] 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安大略省人，1916年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1935年加入加拿大共产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领一支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中国。1939年因抢救伤员感染中毒，医治无效，同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这是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会时题写的挽联。

为白求恩题写挽词[1]

（1939年12月1日）

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

[1] 这是毛泽东在参加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会时题写的挽词。

致郭洪涛等电[1]

（1939年12月4日）

郭、张、黎：

请你们向石友三、高树勋示意，河北地形较山东为差，高部以留山东与我们亲密合作为好，这于鲁于冀于他们本身均较有利。

毛　王

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的电报。

为《拂晓报》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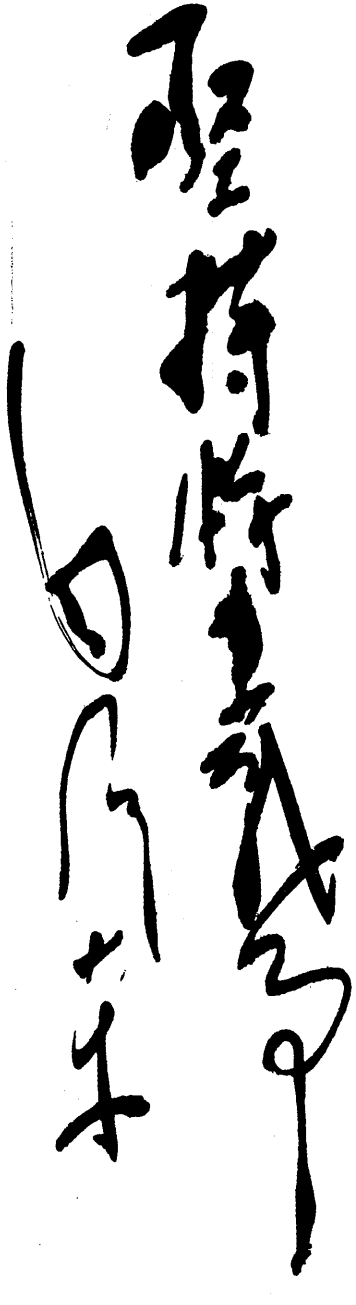
（1939年12月5日）

坚持游击战争。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第四师前身）创办的《拂晓报》出刊百期纪念写的题词。



堅持游擊戰爭

毛泽东

毛泽东为《拂晓报》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5日）

现在华北的财政经济尚未统一，要做到统一须有统一的组织。中央财经部要成为全国性的组织，要统一收支、计划等。现在要收集材料，准备在七大作一报告。陕甘宁边区必须增加农业税，否则边区不能存在。建议由李富春作报告，向民众说明这主要是为了保卫边区，为了供给军队与干部的给养，否则不能争取全国的胜利。商业税应规定一定的标准。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应当开展党内反腐化的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财政、经济和生产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晋西南新旧军冲突和我们的方针[1]

（1939年12月6日）

朱、左、彭，陈、林，彭、罗，赵[2]，并告刘、邓，聂，彭[3]：

甲、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4]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晋西南新旧两军冲突又称晋西事变或十二月事变，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一次严重事件。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调集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12月8日至26日，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向活动在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余人，逮捕千余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叛乱。山西新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给旧军以坚决还击，粉碎了他们的进攻。

[2] 陈、林，指陈士榘、林枫，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和政治委员。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和政治委员。赵，指赵林，当时任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

[4] 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

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其详情如下：

1. 日寇占领隰县、大宁、蒲县后忽自动退出。

2. 正于此时，旧军六十一军、十九军、七十三军突然联合，由午城、蒲县、隰县、永和、石楼包围六区新军一九六旅部。旅部三日在永和城附近被解决。在其他区域，旧军亦在积极调动，准备消灭新军及进步政权与进步群众团体。

3. 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

乙、我们方针：

1. 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2. 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防止惊慌失措，一切新军准备与叛军打游击战。

3. 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在形式上应以调解方式出现，阻止旧军对新军进攻。八路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口号。

4. 如叛军进攻八路时，应联合新军消灭之。

5. 晋西南晋西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绝不能放弃。

军委　毛　王

十二月六日

对山东军事工作的意见[1]

（1939年12月6日）

徐、朱，黎、江，并告陈、罗，黄，朱、彭，杨，左，傅、陆[2]：

关于山东工作，除中央电示外，特提供下列意见：

（1）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已经单独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

（2）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地正规化。用军队掩护、协同地方党，广泛地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钳制敌人。逐步补充主力，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以便应付较大战斗。

（3）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临时食之于民的办法不能持久，而且影响部队的作战及正规化。胶东银行可发纸币，兑成其他的纸币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给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朱瑞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江华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黄，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政治委员。朱、彭，指朱德、彭德怀。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左，指左权，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傅、陆，指傅钟、陆定一，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和副主任。

供给鲁南及其他地区之用。在取得政权后发行流通券及收粮、收税，以便有解决军队给养的长远计划。

（4）健全政治机关的工作，加强其与各支队的联系，明确军队的组织原则（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的又是中国人民的武装，不是统一战线的武装），一切最重要的干部，应当由党员充当。纠正军队中不正当的民主作风及地方党工作作风。

（5）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支部不但是发展党员教育党员的学校，而尤其应当成为连队的坚强堡垒。每个党员不仅是模范战士，而同时是非党群众的领导者。

（6）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的干部很多，应当好好地教育这些干部，纠正其弱点，坚定其革命立场。我们提议山东纵队应当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拨给一一五师，而一一五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这对双方工作都有很大益处。

（7）与一一五师靠近的部队，可与一一五师建立联系，组织干部参观团，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一一五师对于拨二千五百人给山东纵队，应当郑重其事地组织。对所拨干部与战士，应当给以很好的教育与解说工作。

（8）对于已编入八路军的过去佛教会的武装之工作，应加以研究。一般地说，应当同化它，把宗教的武装变成进步的武装，建立这些武装中的党的组织，但应慎重和有步骤，以免引起反叛。

毛　王　滕　谭

十二月六日

致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电[1]

（1939年12月9日）

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

（1939年12月9日）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

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致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电的主要内容。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展览会题词[1]

（1939年12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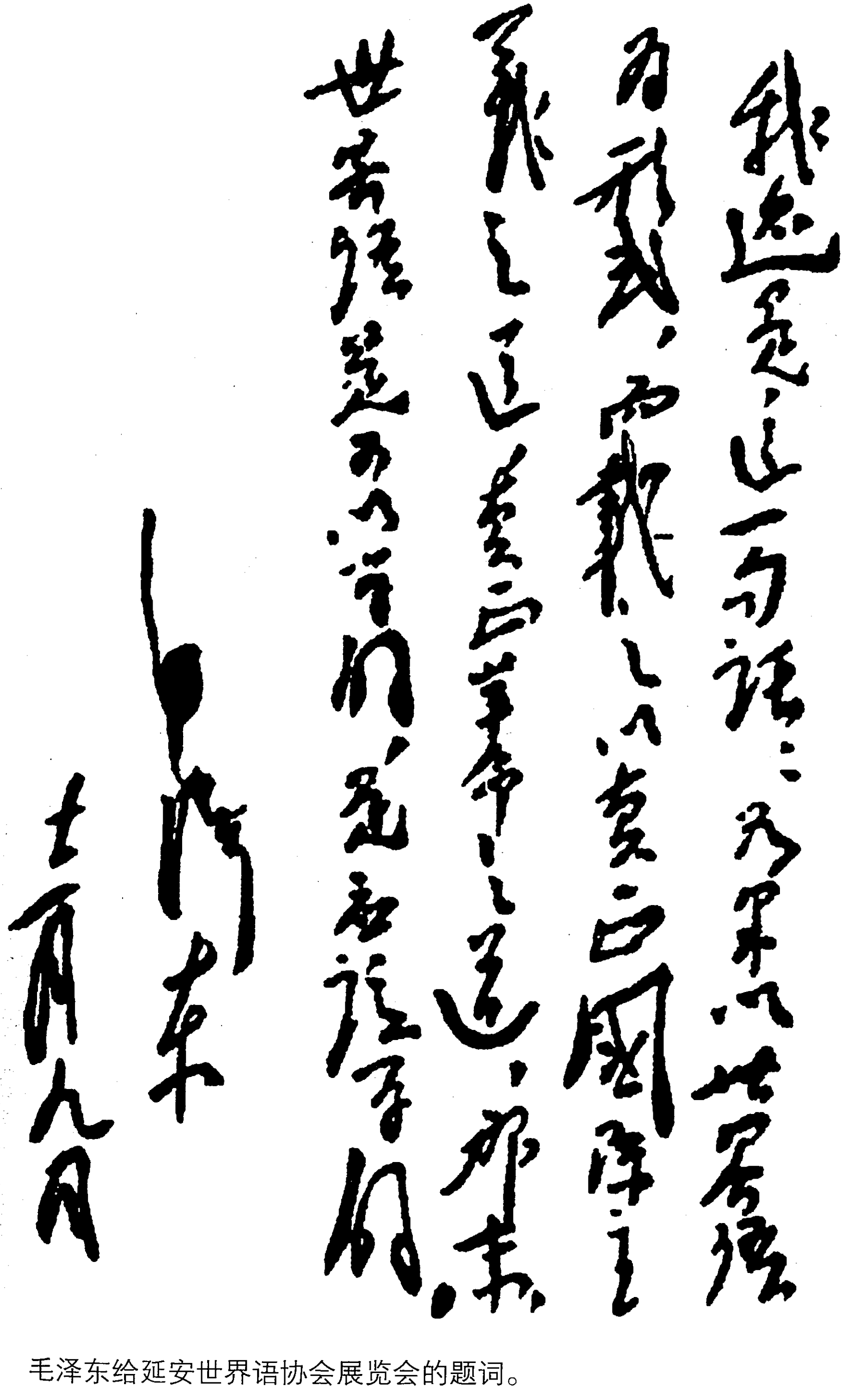
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成立于1938年5月的延安世界语协会举办的展览会所写的题词。



我還是這句話，如果以世界語為形式，而載之以真正國際主義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語是可以學的，也是應該學的。

毛澤東

十月九日

毛泽东给延安世界语协会展览会的题词。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

（1939年12月9日）

同志们：

今天开“一二·九”四周年纪念大会，满堂青年，朝气蓬勃。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活泼的集会！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过去几次我都没有能参加，今天我是非常兴奋地来参加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事情更好办了。中国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反帝反黑暗势力两件事。帝国主义和黑暗势力，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反起，到现在已反了一百年了。时间很长，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这件事情是好办多了。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大大加强了反共活动，打击进步的文化界，现在有些人就说：中国的事情难办了。他们是为进步而努力的，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的，他们满腔热情，怀着好心肠，要把国家民族弄好。但是，正在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他们在周围却见到顽固势力所布下的投降、分裂、倒退的黑影，他们的努力受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不免觉得事情难办了。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我们当然坚决反对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但就全局来说，却认为比之过去，现在中国的事情不仅不难办，而且是更好办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呢？这就得从我们今天纪念的一二·九运动说起。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1]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明白了这些问题，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

---

[1] 李昌，1914年生，湖南永顺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

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

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1]，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

[1]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5年8月1日发布的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呼吁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你们看，从前有些人是不承认五四运动的，但是到了今天都承认了；现在也有些人不承认一二·九运动，不过，根据“五四”的经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也将不得不承认“一二·九”。如果坚持不承认，那就请他们在三十六计中选上计，简单些说，请他们滚蛋！因为世界是向前进的，要向后倒退是不成的；中国人的辫子没有了，他们想拖也拖不住了；旧的落后的东西只好倒下来，让新的进步的东西接替它。在进步的潮流中，他们要是还不承认进步的一二·九运动，还想鄙视这个运动，那末，他们将要倒霉还有什么话说？

现在的青年学生，懂得的道理更多了，比我当青年学生的时候

聪敏得多了。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心里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人个个是好的。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现在你们不仅懂得这些东西，而且还懂得马克思主义哩！我那时，就不懂得什么马克思。这就是现在比过去进步的一个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层的人们是主张参加协约国英、法方面去打德、奥的，他们的言论讲得头头是道，确实欺蒙了一些人。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在北京也开了会，还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公理战胜”四个字[1]，更是煊赫一时，弄昏了当时一些人的头脑。但是，现在不同了。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世界大事，懂得了革命道理。这种道理是一步一步懂得的，从前懂得少，现在懂得多了。大家懂得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掠夺性的，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懂得了投降派、顽固派的阴险狠毒，懂得了民主宪政。他们认识清楚，要进步，要民主，要参政，而这民主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只有全国青年学生、工人、农民一同起来作斗争，才能把这个事情搞成功。现在的人是聪明了，不容易被欺骗了。大家都光起[2]眼睛看着：什么人不开放民主？什么人要分裂？什么人要投降？什么人要倒退？《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

---

[1] 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1900年6月在义和团运动中于北京遭枪杀。1901年清政府根据《辛丑条约》，向德国赔礼道歉，并为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边立碑。1918年11月，北京人民将该碑改建为“公理战胜”碑，并迁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建国后改为“保卫和平”牌坊。

[2] 光起，方言，瞪大的意思。

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

军新四军结合。一切共产党员要向所有非党的同情者说清楚，我们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知识分子的，是团结知识分子的。自然，我们要反对那少数破坏革命的坏知识分子，汉奸知识分子，“申公豹”式的知识分子。不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罪恶；反对这种知识分子，是对民族对人民都有利的。

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例如从西安到延安的这一条路上，遍设关防，进步的知识青年要通过是困难的。因为他们既没有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又没有过五关斩六将[1]的本领，那只有被赶到集中营“训练团”里去。这件事情似乎有些难办。但是，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有了这，这些狗子敢来咬一口吗？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已有了一百年的反帝反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再加上共产党十八年的斗争经验，什么事情还会办不到呢？这样看来，中国的事情比以前是更加好办了。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现在虽然还有帝国主义者和“申公豹”们不断地阻碍我们这样做，但是不要紧的，我们现在是聪明了，是有力量了，我们已不是昨天的我们，而是今天的我们了。帝国主义者、“申公豹”们，是你们滚蛋的时候了！

---

[1] 青龙偃月刀、嘶风赤兔马、过五关斩六将，分别是《三国演义》中所说的蜀汉著名将领关羽的兵器、坐骑和战斗故事。

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一九二五至二七的大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的团结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中国是永远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懂得了很多道理，

他们认识清楚，他们要进步，他们要民主，要参政；这民主和宪政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大家起来奋斗。现在抗战中有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这叫做压迫自由。然而全国青年全中国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压迫的自由，他们不准倒退，他们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自五四运动起，共产党就与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这些说明知识分子要与共产党结合，要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与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与八路军、新四军结合。共产党非常欢迎知识分子，反对的是那少数坏知识分子。现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没有自由，没有走路之权，知识分子一定要与革命队伍结合起来，笔与枪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出来！

关于晋西南事件与我们方针的补充指示[1]

（1939年12月9日）

为补充我们六日电提出如下之估计与方针：

A. 对晋西南事件之估计：

（1）阎[2]乘德怀同志去宜川谈判时机，发动进攻晋西新军，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

（2）旧派与日本人之关系是联络好的，阎本人对投降与反共也是确定了的。但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而其部下王靖国、陈长捷、邱仰睿、薄右丞、赵承绶等最反动分子则非常积极，有计划的造成投降反共局面，迫阎下决心。

（3）阎与重庆某些投降分子是有联系的。

（4）阎与汪精卫是有联系的。

（5）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时期，未至实行投降时期。

（6）晋东南晋东北两区抗战派比投降派的实力大，晋西南晋西北两区投降派比抗战派实力大。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在这两区是可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朱德、左权、彭德怀、陈士榘、林枫、彭绍辉、罗贵波、赵林、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的指示。

[2] 阎，即阎锡山。

能把抗战派压服的，但其实新军民众八路三者合计抗战派力量并不小，旧派与旧军内部均有矛盾，只要政策适当，抗战派是能够胜利的。

（7）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

B. 我们方针：

（1）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2）各有关方而，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中杨爱源赵戴文等与王靖国陈长捷等之间尚有若干矛盾，集中注意反对王陈，各地新派应该搜集王陈等罪状向阎告状，并设法拉拢杨赵。

（3）坚决保卫抗日进步力量，原则上决不让步，仅在与阎谈判时，可表示某些具体问题上让步。

（4）对投降派军事进攻，新军应在防卫姿态下，即旧军攻击新军时，采用运动战给以有力与有利的反攻而消灭之；必要时八路军应以适当力量支持新军打退旧军（最好用决死队名义）。

（5）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即使如此，也不要怕，只要每区有三四千可靠兵力作核心，并掌握在忠实而能干的将领手里，采用运动战与游击战术，配合八路之援助与民众之援助，是能够打胜投降派的。

（6）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7）口号应该是：

（一）请求阎司令长官惩办晋西事变的祸首。

（二）抗日第一，团结第一，反对分裂，反对内战。

（三）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打倒摧残抗日力量的汉奸。

（四）一切晋绥军团结起来，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五）摧残抗日的就是汉奸。

（六）山西军民团结起来，严防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

（七）山西军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

以上口号应由新派公开宣传，但暂时不要写王靖国、陈长捷的名字，指出他们名字时，只用口头宣传。

（8）八路军表面上应取调停态度，实际上积极支持新军。

（9）为巩固晋西南阵地，总部除调还陈[1]支队一个团外，还应准备调一个团去。

（10）为巩固晋西北阵地，一二〇师应准备在适当时机，调一个团增强彭绍辉。

毛　王

十二月九日

---

[1] 陈，即陈士榘。

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1]

（1939年12月9日）

贺、关、李：

晋西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毛　王

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加强晋西北作战的指挥给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的电报。

复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等电[1]

（1939年12月12日）

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

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

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2]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方针给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等电的主要内容。

[2] 雷任民（1909—2005），山西平遥人，当时任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续范亭，当时任山西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13日）

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介绍后讲话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

（1939年12月15日）

第一章　中国社会

第一节　中华民族

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

现在中国的国境：在东北、西北和西方的一部，和苏维埃社会

---

[1]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是1939年冬季，由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的一个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的。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为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但是这两章，特别是第二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仍然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毛泽东在这个小册子的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1940年1月他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主义共和国联盟接壤。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西方的一部和西南方，和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尔接壤。南方，和缅甸、越南接壤。东方，和朝鲜接壤，和日本、菲律宾邻近。这个地理上的国际环境，给予中国人民革命造成了外部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有利的是：和苏联接壤，和欧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隔离较远，在其周围的国家中有许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困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着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而从原始公社崩溃，社会生活转入阶级生活那个时代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现在，已有了大约四千年之久。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1]。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

---

[1] 根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公元2世纪初，东汉宦官蔡伦集中前人的经验，用树皮、麻头、破布和破鱼网造纸。此后，这种造纸法便在全国逐步推广开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

刻版印刷[1]。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2]。火药的应用[3]，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

第二节　古代的封建社会

中国虽然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虽然是一个地广人众、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可是，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

---

[1] 中国的刻版印刷术，约创始于公元7世纪，即唐初年间。

[2] 宋仁宗庆历（1041—1048）年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

[3] 中国火药的发明，大约在公元9世纪。到了宋朝初年，即公元10世纪后半期至11世纪初，中国已经使用火药制造火炮、火箭等武器，供战争之用。

千年左右。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并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之用的军队。

四、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的穷苦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

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而在这样的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1]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2]和黄巾，隋朝

---

[1] 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公元前209年，即秦二世元年，陈胜、吴广往戍地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东南）率领同行戍卒900人起义，反抗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在吴（今江苏省吴县）起兵，刘邦在沛（今江苏省沛县）起兵。陈胜、吴广起义失败以后，项羽、刘邦两军成了当时反秦的主要力量。项军消灭了秦军的主力，刘军攻占了关中和秦的都城咸阳。秦朝灭亡后，刘项双方相争数年，项羽败死，刘邦做了皇帝，建立了汉朝。

[2] 新市、平林、赤眉、铜马都是王莽时代农民起义军的名称。西汉末年，各地农民不断进行反抗活动和武装起义。公元8年，王莽代汉以后，实行“改制”，企图缓和农民的反抗。但是，由于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加之天灾频繁，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终于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公元17年，新市（今湖北省京山县东北）人王匡、王凤领导饥民起义，以绿林山为基地，称为“绿林军”。后绿林军一部在王匡、王凤率领下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另一部由王常等率领进入南郡（今湖北省江陵县），称“下江兵”。新市兵进入随县，平林（今湖北省随县东北）人陈牧等千余人起义响应，号称“平林兵”。公元18年，山东琅琊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省莒县）领导农民起义。起义军用红色涂眉，号称“赤眉军”，主要活动于山东、江苏、河南、陕西等地，是当时最大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同时，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还有大小数十支农民起义军，铜马是其中较大的一支，主要活动于河北、山东交界地区。

的李密、窦建德[1]，唐朝的王仙芝、黄巢[2]，宋朝的宋江、方腊[3]，元朝的朱元璋[4]，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这种情况，直至近百年来，才发生新的变化。

---

[1] 公元7世纪初，即隋朝末年，农民纷纷起义。李密、窦建德是当时两支主要起义军的首领。李密领导的河南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在推翻隋朝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2] 王仙芝、黄巢是唐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公元874年（唐僖宗乾符元年），王仙芝在山东起义，次年黄巢聚众响应。

[3] 宋江和方腊分别是公元12世纪初即北宋末年北方和南方农民起义的有名首领。宋江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山东、河北、河南、江苏一带；方腊率领的起义队伍，主要活动于浙江、安徽一带。

[4] 公元1351年，即元顺帝至正11年，各地人民纷纷起义。1352年，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入北方红巾军郭子兴部起义军。郭死，朱元璋成为该军的首领。1368年，他领导的部队推翻了在各地人民起义的打击下已经摇摇欲坠的元朝的统治，成为明朝的开国皇帝。

第三节　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

中国过去三千年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前面已经说明了。那末，中国现在的社会是否还是完全的封建社会呢？不是，中国已经变化了。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1]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这种变化的过程。

如第二节所述，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情形，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

---

[1] 1840年至1842年，英国因中国反对输入鸦片，就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下曾经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地组织武装抗英团体，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福建、浙江、江苏等地人民也自发地掀起了抗英斗争。1842年英国军队侵入长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大量赔款，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议定。

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因为自然经济的破坏，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又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

事实上，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还在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还在六十年前，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到了同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到了四十年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了初步的发展。到了二十年前，即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时期，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如果一部分的商人、地主和官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那末，一部分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两个特殊的社会阶级来看，它们是新产生的，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阶级。它们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构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又互相对立的阶级，它们是中国旧社会（封建社会）产出的双生子。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可是，上面所述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新变化，只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一个方面。还有和这个变化同时存在而阻碍这个变化的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一八四〇年的英国鸦片战争，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战争[2]，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八国联军战争[3]。用战争打败

---

[1] 1857年的英法联军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英国侵略军在广州向中国方面挑衅。1857年英法两国组成联合侵略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美国和沙俄不仅积极帮助他们，而且直接插手，乘机攫取中国的权利。当时清朝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对外国侵略者采取消极抵抗政策。1857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城市，劫掠并焚毁北京圆明园，迫使清朝政府订立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这些条约主要规定将天津、牛庄（后改为营口）、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处开辟为商埠；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从此，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了内地。

[2] 1882年至1883年，法国侵略者侵犯越南北部。1884年至1885年，又把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广西、台湾、福建、浙江等地。中国军队在冯子材等率领下，奋起抵抗，并且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天津条约》，允许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使法国侵略势力得以伸入中国西南地区。

[3] 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8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运动，联合出兵进攻中国，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大沽、天津、北京等地。清政府接受了帝国主义的条件，于1901年9月7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

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著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産党
毛澤東著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党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部分版本)。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1]，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2]。

---

[1]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开始于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

[2] 从19世纪末起，侵略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按照他们各自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势力，曾经将中国的某些地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例如，当时长江流域各省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广西、广东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山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三省原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三省南部又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1]。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

---

[1] 帝国主义国家在强迫清朝政府开放了沿江沿海的许多地方为通商口岸后，于1845年开始在这些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租界”。最初，租界是外国人居留、贸易的特定地区。中国政府对租界内的行政、司法等有干预权，并保有租界内的领土主权。后来，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内，逐渐实行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一套殖民地统治制度。它们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1924年至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曾进行收回租界的斗争，并于1927年1月，一度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但是，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地的租界仍然被保留下来。

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1]“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2]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

---

[1] 参见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提纲》。

[2] 参见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页)。

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将这两个方面的情形综合起来说，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

三、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在沦陷区，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

四、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在沦陷区，则一切被日本帝国主义所独占。

五、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六、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

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这些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

决定这种情况的，主要地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势力，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别的矛盾，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章　中国革命

第一节　百年来的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现在，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竭其全力大举进攻中国，虽然中国有许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例如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之

流，已经投降敌人或者准备投降敌人，但是英勇的中国人民必然还要奋战下去。不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这个奋战是决不会停止的。

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斗争，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有了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了；从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三十年的历史了。这个革命的过程，现在还未完结，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显著的成就，还要求全国人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

那末，这个革命的对象究竟是谁？这个革命的任务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革命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革命的前途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在下面要来说明的。

第二节　中国革命的对象

依照第一章第三节的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那末，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究竟是谁呢？

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因为，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压迫和阻止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它们二者。

二者互相勾结以压迫中国人民，而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

中国资产阶级本来也是受着帝国主义压迫的，它也曾经领导过革命斗争，起过主要的领导作用，例如辛亥革命；也曾经参加过革命斗争，例如北伐战争和当前的抗日战争。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即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那个阶层，它曾经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时期内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曾经援助过它的朋友——共产党、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

由此也可以明白，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因此，那种轻视中国革命人民的敌人的力量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革命的镇压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练和发挥自已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

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因此，那种以为中国革命力量瞬间就可以组成，中国革命斗争顷刻就可以胜利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也就决定了。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这是完全正确的规定。因此，那种轻视武装斗争，轻视革命战争，轻视游击战争，轻视军队工作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在这种情形下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由于中国土地的广大（革命势力有回旋的余地），由于中国的反革命营垒内部的不统一和充满着各种矛盾，由于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的斗争是在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样，就使得在一方面，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而在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了革命的不平衡状态，给争取革命全部胜利的事业带

---

[1]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来了长期性和艰苦性。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这种革命根据地上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主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因此，忽视以农村区域作革命根据地的观点，忽视对农民进行艰苦工作的观点，忽视游击战争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要使革命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胜利，不破坏敌人用以向人民作斗争的主要的工具，即敌人的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战争中消灭敌军以外，瓦解敌军的工作也就成为重要的工作。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取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必须采取荫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其领导人民对敌斗争的策略，必须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一步一步地和稳扎稳打地去进行，决不是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的办法所能成功的。

第三节　中国革命的任务

既然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

级，那末，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呢?

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那种把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革命阶段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四节　中国革命的动力

根据现阶段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的分析和规定，中国革命的动力是什么呢?

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所反对的对象主要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和内部的封建主义，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这两个压迫者，那末，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

命的动力问题。认清这个革命的动力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基本策略问题。

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里，有些什么阶级呢？有地主阶级，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上层部分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又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有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这三个阶级，在今天中国的最广大的领土上，还是被统治阶级。

所有这些阶级，它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如何，全依它们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所以，社会经济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又规定了革命的动力。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社会的各阶级。

一　地主阶级

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因此，作为阶级来说，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

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

二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

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但是，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在抗日战争中，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或准备投降了。欧美派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尚留在抗日营垒内，也是非常动摇，他们就是一面抗日一面反共的两面派人物。我们对于大资产阶级投降派的政策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坚决地打倒他们。而对于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则是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去对待，即：一方面是联合他们，因为他们还在抗日，还应该利用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又一方面是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因为他们执行着破坏抗日和团结的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没有斗争就会危害抗日和团结。

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

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所以，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从这一方面说来，

他们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在中国革命史上，他们也曾经表现过一定的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积极性。

但是又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这种情形，特别是在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的时候，表现得最为明显。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

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的是中等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在一九二七年以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跟随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对过革命，但是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掌握过政权，而受当政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所限制。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的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　农民以外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

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

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

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这些小资产阶级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各种类型的没有把农民包括在内的小资产阶级。

第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

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

第二是小商人。他们一般不雇店员，或者只雇少数店员，开设小规模的商店。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的剥削，使他们处在破产的威胁中。

第三是手工业者。这是一个广大的群众。他们自有生产手段，不雇工，或者只雇一二个学徒或助手。他们的地位类似中农。

第四是自由职业者。有各种业务的自由职业者，医生即是其中之一。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他们的地位类似手工业者。

上述各项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广大的人群，他们一般地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的很好的同盟者，故必须争取和保护之。其缺点是有些人容易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故必须注意在他们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

四　农民阶级

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

农民的内部是在激烈地分化的过程中。

第一是富农。富农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连地主一起共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左右），被称为农村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富农大多有一部分土地出租，又放高利贷，对于雇农的剥削也很残酷，带有半封建性。但富农一般都自己参加劳动，在这点上它又是农民的一部分。富农的生产在一定时期中还是有益的。富农一般地在农

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可能参加一分力量，在反对地主的土地革命斗争中也可能保持中立。因此，我们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第二是中农。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但在年成丰收时能有些许盈余，有时也利用一点雇佣劳动或放一点小债），而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中农都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一部分中农土地不足，只有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土地略有多余。中农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中农态度的向背是决定革命胜负的一个因素，尤其在土地革命之后，中农成了农村中的大多数的时候是如此。

第三是贫农。中国的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

五　无产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中，现代产业工人约有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约有一千二百万，农村的无产阶级（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

中国无产阶级有哪些特出的优点呢?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因此，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例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近的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以来，因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对于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所以团结了全民族，发动了和坚持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

六　游　民

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中国革命动力的分析。

第五节　中国革命的性质

我们已经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

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我们又明白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些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发生的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明白了所有这些之后，那末，我们就可以明白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另一个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了。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1]。

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

---

[1] 参见列宁《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

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因此，这种新式的民主革命，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过程。这个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发生的，在中国则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只要是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不问属于何党何派，都有参加这个政权的资格。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革命在基本上是一致的。孙中山在这一年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

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又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孙中山又在其遗嘱上指出“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关于内政外交的根本原则。所有这些，就把适应于旧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改造成了适应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宣言，声明“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就是指的这种三民主义，而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即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离开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就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只是在基本的民主革命政纲上相同，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则均不相同，这一问题，这里不来说它）。

这样，就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论就其斗争阵线（统一战线）来说，就其国家组成来说，均不能忽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地位。谁要是想撇开中国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就一定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命运，一定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第六节　中国革命的前途

在将现阶段上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这些基本问题弄清楚了之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的现在阶段和将来阶段的关系问题，也就容易明白了。

因为既然在现阶段上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一般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又是处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即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革命的时代，那末，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也就没有疑义了。

没有问题，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既然是为了变更现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即为了完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而奋斗，那末，在革命胜利之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中国革命的全部结果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

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

第七节　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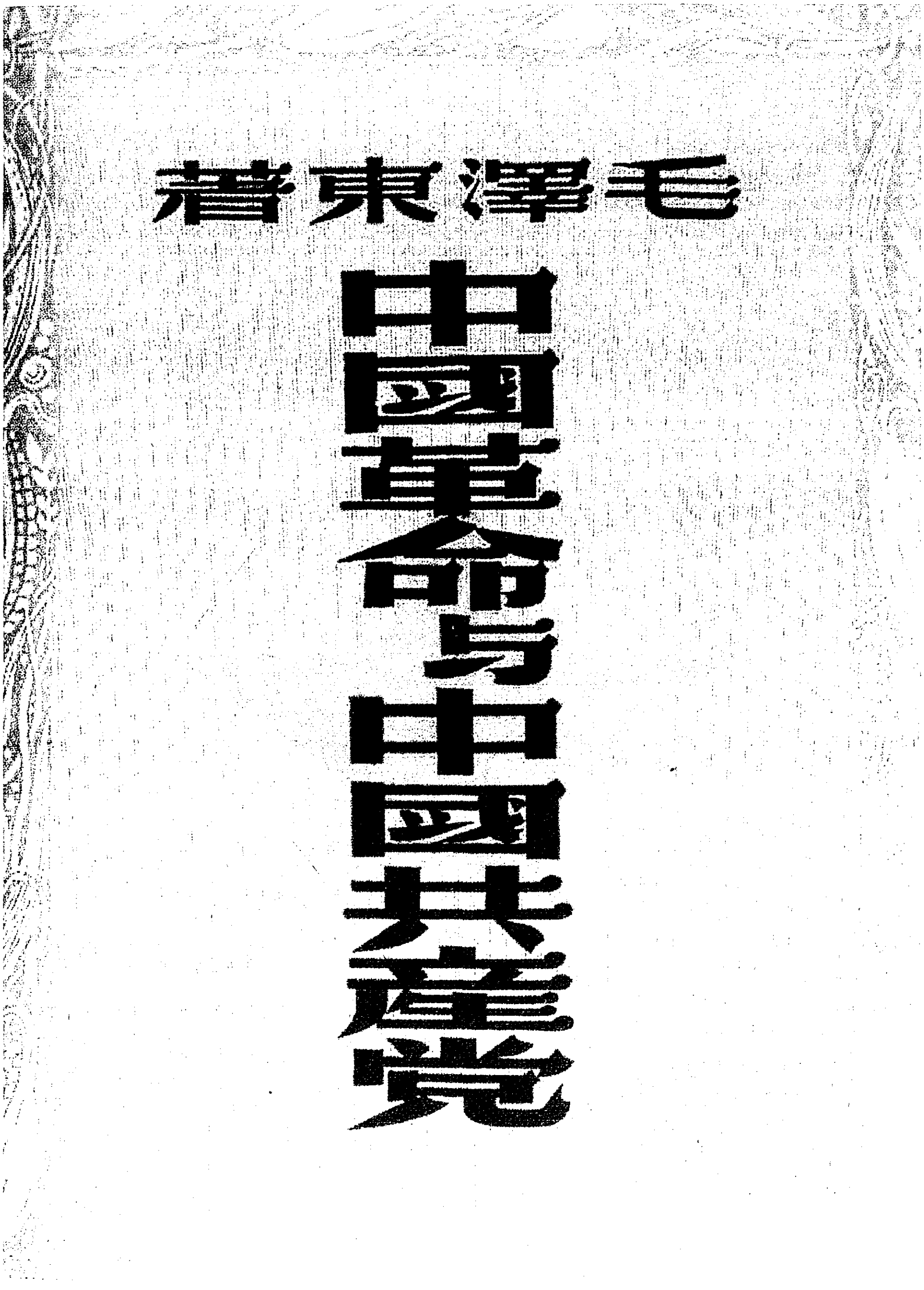
总结本章各节所述，我们可以明白，整个中国革命是包含着两重任务的。这就是说，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有些幼稚的共产党员，以为我们只有在现在阶段的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没有在将来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或者以为现在的革命或土地革命即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着重指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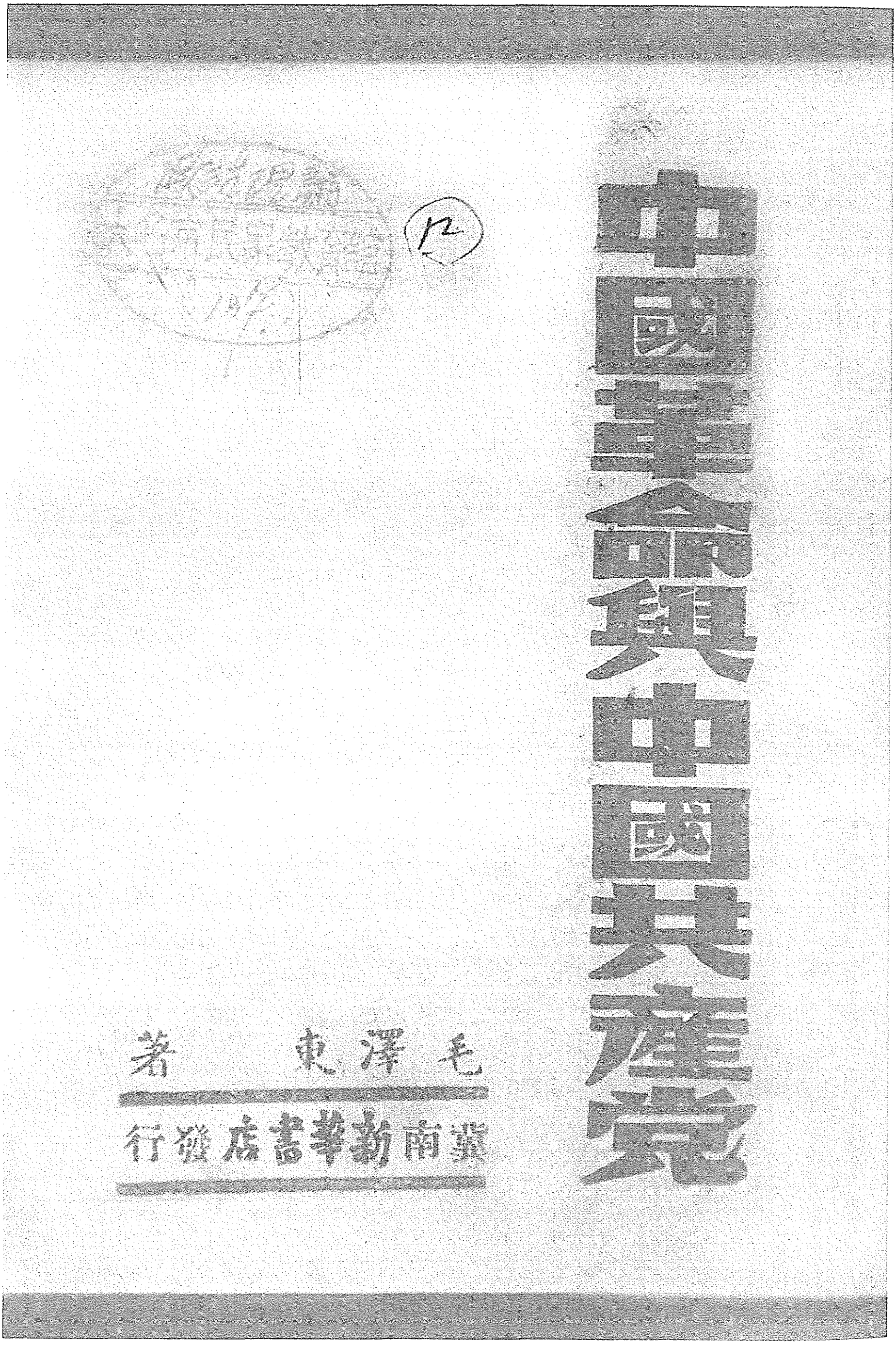
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但同时也是非常艰巨的。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毛澤東著

中國革命与中國共產党

1949年6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⑫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党

毛澤東　著

冀南新華書店發行

1939年冀南新华书店发行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1939年12月20日）

今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岁生日。这个生日，在全世界上，在只要是知道的又是革命的人们的心中，可以料得到，都会引起亲切的热烈的庆祝。

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拥护自己的亲切的朋友。因为现在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受难者，只有斯大林指示的方向，只有斯大林的援助，才能解脱人类的灾难。

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

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

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加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1]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

---

[1] 李林甫，公元8世纪人，唐玄宗时的一个宰相。《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在中国的特权废除过，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

抗日战争以来，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真正援助我们，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这还不够明白吗？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12月21日）

今天开大会，庆祝斯大林同志的六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世间六十岁也是难得的。但是我们为什么单单庆祝斯大林呢？而且这样的庆祝不仅在延安，而且在全国，而且在全世界，只要晓得他今天生日的人，只要懂得他为人的，只要是受压迫的，都会庆祝他。原因就在于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哪些人是反对庆祝他、不喜欢庆祝他的呢？那就是自己不受压迫单单压迫他人的人，首先是帝国主义者。同志们，一个外国人，相隔万余里，大家庆祝他的生日，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回呢。

这就是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因为他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因为他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帮助中国打日本。

现在世界上分为两条斗争的阵线。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这是压迫人民的阵线；一方面是社会主义，这是反抗压迫的阵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阵线，有些人觉得好象是站在中间，但是它的对头，是帝国主义，它就不能不引社会主义为朋友，不能不属于反抗压迫者的革命阵营的一面。中国的顽固分子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一只手反共，一只手抗日，自称是中间派，但他们终究不成功的，如果不悔过，最后必要走向反革命方面去。革命与反革命的

两个阵线，都要有一个做主的，都要有一个指挥官。反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帝国主义，就是张伯伦。革命阵线中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全人类中间，出了这位斯大林，这是一件大事；有了他，事情就好办了。你们知道，马克思是死了，恩格斯也死了，列宁也死了，如果没有一个斯大林，哪一个来发号施令呢？这真是幸事，现在世界上有了一个苏联，有了一个共产党，又有了一个斯大林，这世界上的事就好办了。革命指挥官干些什么事？使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书读。而要这样，就要领导十几万万人向压迫者作斗争，而使之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斯大林要办的事。既然这样，那么，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要不要庆祝他呢？我想是要的，是应该的。我们要庆祝他、拥护他，还要学习他。

我们要学习他的两个方面，一个是道理方面，一个是事业方面。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作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斯大林同志有什么功劳呢？他发挥了这个道理，发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弄出一篇很清楚很具体很生动的道理来，这就是建立革命阵线，推翻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理论。

事业方面，是把道理见之于实际。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完成，而斯大林把他完成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苏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各国资产阶级的报

纸，天天说苏联不得了，社会主义是靠不住的，但是在今天怎样呢？把张伯伦的口都封住了，把中国那些顽固派的口也封住了，他们也都承认苏联是胜利了。

斯大林除在道理方面帮助了我们的抗日战争外，他还给了我们事业上即物质上的帮助。由于斯大林事业的胜利，他帮助了我们很多的飞机、大炮、航空员，各战区里的军事顾问，还有借款。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这样地帮助我们？世界上还有哪一个阶级哪一个党哪一个人所领导的国家，这样帮助我们呢？除了苏联，除了无产阶级，除了共产党，除了斯大林，还有谁呢？

现在有些人，他们自称是我们的朋友，但他们只能是属于唐朝李林甫一类的人物。这位李林甫先生，是个“口蜜腹剑”的人，帝国主义者都是口蜜腹剑的，张伯伦就是现在的李林甫，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驻军权、领导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哪一个帝国主义废除了呢？只有一个，只有苏联是废除了。

在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理论上指导世界革命，现在加了一点东西，可以在物质上帮助世界革命了。这就是斯大林的大功劳。

我们庆祝斯大林同志的生日之后，还应该把这件事向全国宣传，向四万万五千万人讲清楚，使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纪念白求恩

（1939年12月21日）

白求恩[1]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2]。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

---

[1]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曾经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2] 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9～166、229～2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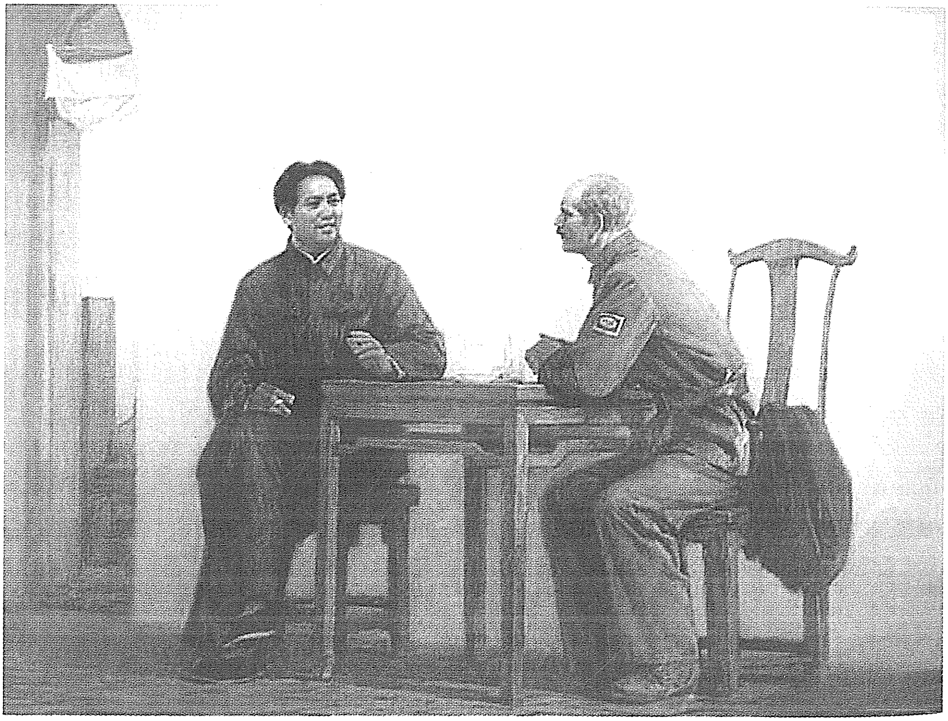
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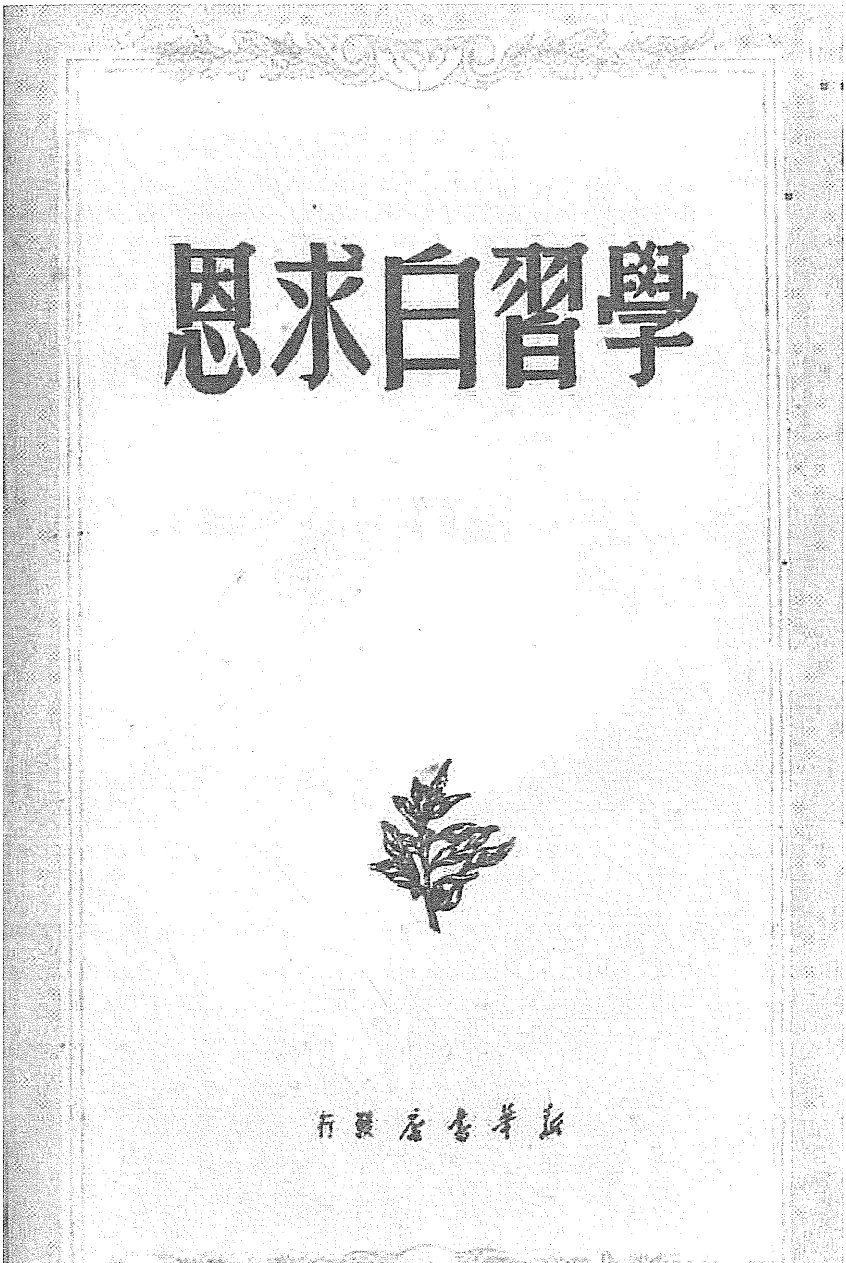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

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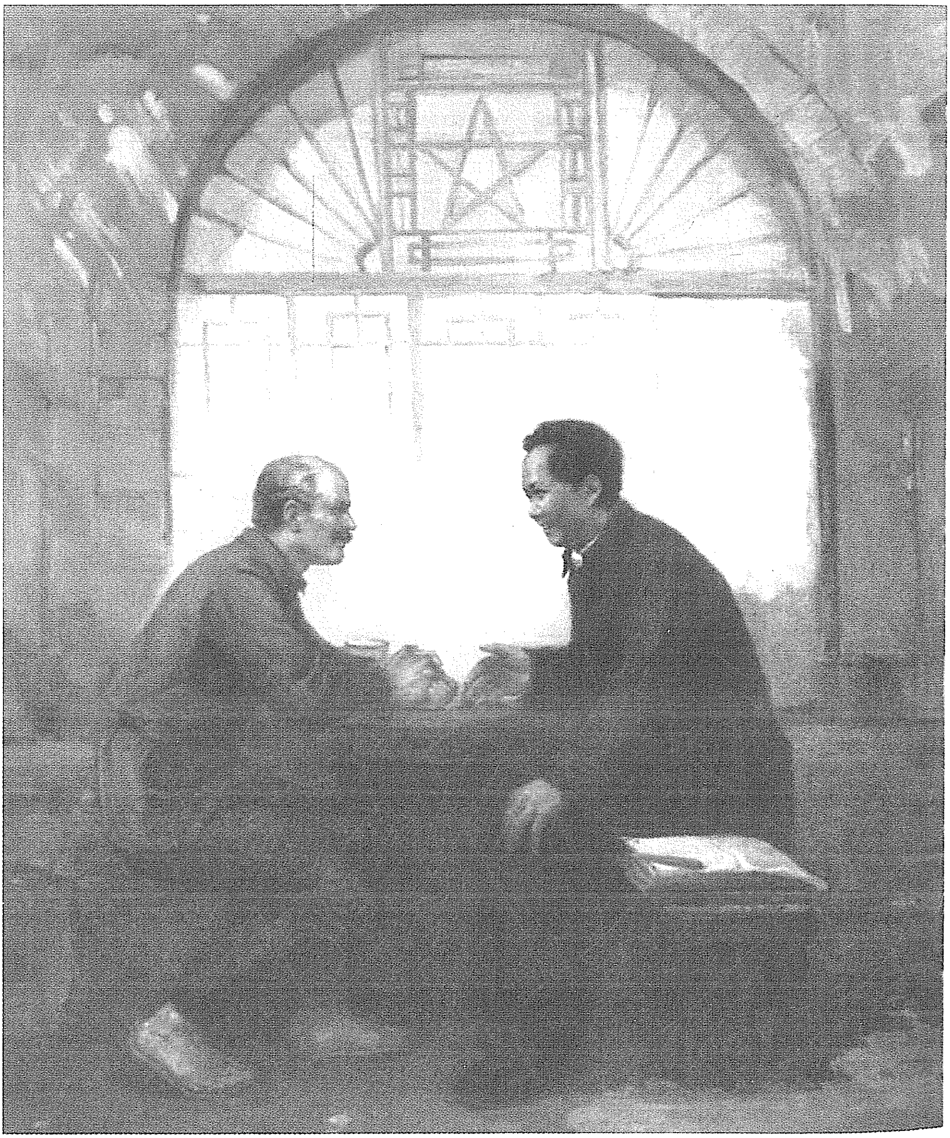
《会见白求恩》（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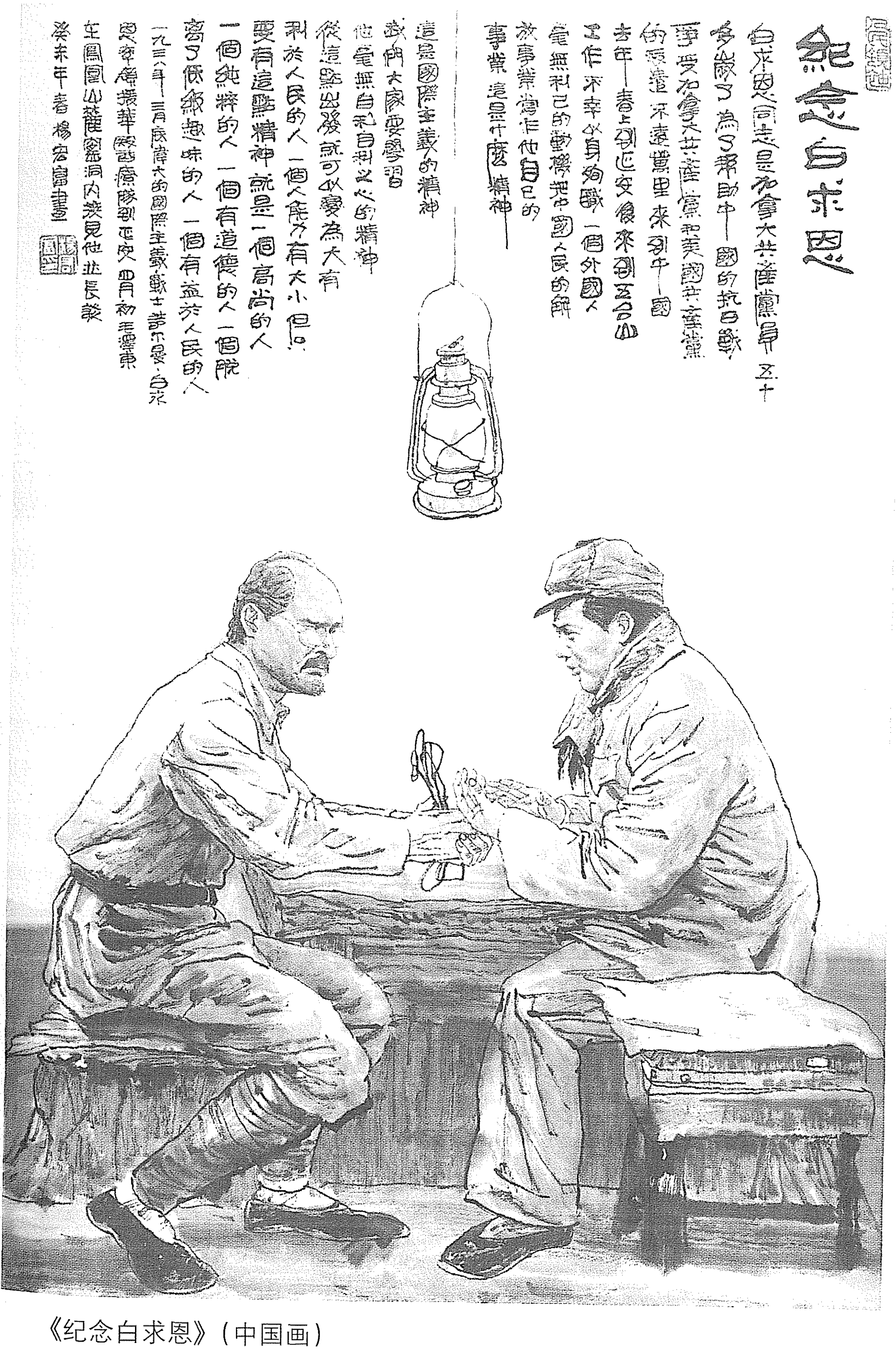
學習白求恩

新華書店發行

1949年11月，新华书店发行的《学习白求恩》，该文在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纪念白求恩》。



《会见白求恩》（油画）


紀念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產黨員 五十
多歲了 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
爭 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
的派遣 不遠萬里 來到中國
去年春上到延安 後來到五台山
工作 不幸以身殉職 一個外國人
毫無利己的動機 把中國人民的解
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
事業 這是什麼精神
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
我們大家要學習
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
從這點出發 就可以變為大有
利於人民的人 一個人能力有大小 但只
要有這點精神 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一個純粹的人 一個有道德的人 一個脫
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一九三八年三月底 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 諾爾曼·白求
恩率領援華醫療隊到延安 四月初毛澤東
在鳳凰山麓窯洞內接見他 並長談
癸未年春 楊宏富書

《纪念白求恩》（中国画）

在欢迎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晚会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22日）

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我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到底。马将军八年前在黑龙江首先抗日，那时红军在南方即致电热烈欢迎，八年之前红军与马将军则已成为抗日同志，我们相信马将军一定抗战到底的。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妥协，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我们真诚的欢迎那些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民族英雄，他们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我们就欢迎到底。马将军年逾半百，仍在抗战的最前线与敌周旋，这种精神值得全国钦佩。

---

[1] 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于1939年冬离重庆返回防地。途经延安，毛泽东设宴欢迎。这是毛泽东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39年12月23日）

晋西南拥阎讨逆战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旧军主力在晋西南还有颇大力量，这是阎锡山决死之争，他必以全力对付；请你们注意其严重性。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晋西事变问题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39年12月23日）

晋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已调兵进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四纵队，晋西北武装冲突势不可免。我应采取下述方针：当山西旧军一开战，新军应集中全力采取主动的运动战，首先消灭其一路，然后各个击破。新军反攻的口号应是拥阎讨逆，打倒汉奸。八路军必须坚决支持及帮助新军。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晋西南事件应采取的方针问题致彭德怀、彭绍辉、罗贵波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电[1]

（1939年12月23日）

新四军甚危急。如第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不能马上前往增援，请由该师在山东的部队中抽调一部兵力开过陇海铁路以南增援。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增援新四军问题致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12月23日）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新军主要力量在晋东南，旧军主力在晋西南、晋西北。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国内中产阶级更积极，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反磨擦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中共晋西北区委等电[1]

（1939年12月23日）

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应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2]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第一二〇师师部现在还不宜立刻到晋西北，但应立即准备于必要时转移。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晋西事变致中共晋西北区委，第一二〇师，八路军总部，彭绍辉、罗贵波等电的主要内容。

[2]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致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电[1]

（1939年12月26日）

据王世英电告，阎锡山拟过黄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杨尚昆及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驳斥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造谣[1]

（1939 年 12 月 27 日）

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我又“由新疆返延安”了，可是我还没有准备去新疆。关于李立三，他到苏联后，早已因他加入托派反动集团被苏联逮捕，不知他如何又能回来？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如果也有人相信，那其为人也拙劣得可以。“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边区总共只有二十三县，现在剩下了二十县，通通夺取干净也抵不上被日本人夺去的几千万分之一，然而总可谓勇敢矣。你们报馆里应作点文章，劝劝那些勇敢的先生们，叫他们稍为收敛一点，不要太横行霸道了，有勇敢到日本人面前献去，在内窝子里显劲，过去已有经验，到底显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

[1] 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华报》记者发表的谈话的一部分。

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1]

（1939 年 12 月 28 日）

朱、彭、贺、关、彭、罗：

据德怀同志电示，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二团已叛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希望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北方局及三个区党委应尽量设法抽调自己的委员和派干部去新军帮助做政治巩固工作。应坚决撤换新军中反动军官，军事能力固属重要，然政治上可靠为第一要义，否则背叛事件必再发生。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毛　王

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给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彭绍辉、罗贵波等的电报。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电[1]

（1939年12月28日）

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39 年 12 月 30 日）

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立即来晋西北。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晋西目前形势及我军事部署[1]

（1939年12月31日）

1. 晋西南新旧军对战结果，我陈支[2]及决二纵共五个团已于二十七日离开晋西南到达汾离封锁线[3]以北之招贤镇，留保安旅及我之游击三团及游击四个大队于晋西南。

2. 目前整个形势，阎[4]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战争，胡宗南[5]一个师已到宜川东南，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

3. 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为此：

甲、三五八旅及晋西北之新军，立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准备战斗。

乙、由一二〇师派出两个到三个团到晋西北，贺关[6]立即出发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的电报。

[2] 陈支，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

[3] 指阎锡山在山西汾（阳）离（石）公路沿途建立的封锁线。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6] 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因指挥问题关系战斗胜负，望勿延迟。

丙、一二〇师在军区防地由聂[1]从冀中调部队填防，原在军区周围所有阎之旧势力，均由聂即行计划扫光。

丁、陈支及所率之新军，须严防旧军袭击，彭罗[2]须策应之。

戊、晋西南方面另由朱彭[3]重部署。

毛　王

三十一日

---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和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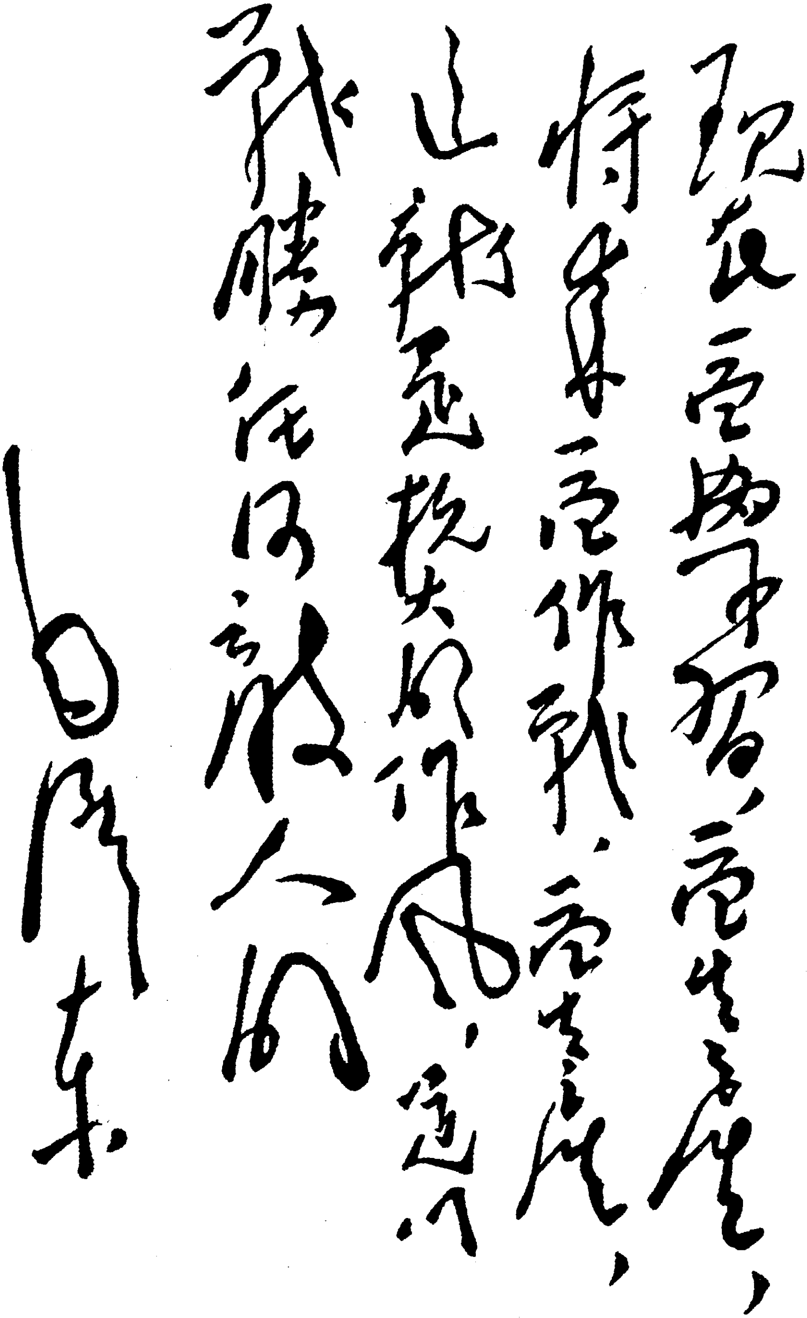
[3]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题词

（1939年12月）

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毛泽东



现在学习，学生产，
将来学作战，学生产，
这种学校作风，这个
战胜任何敌人的

毛泽东

毛泽东第二次为抗大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

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题名、题词[1]

（1939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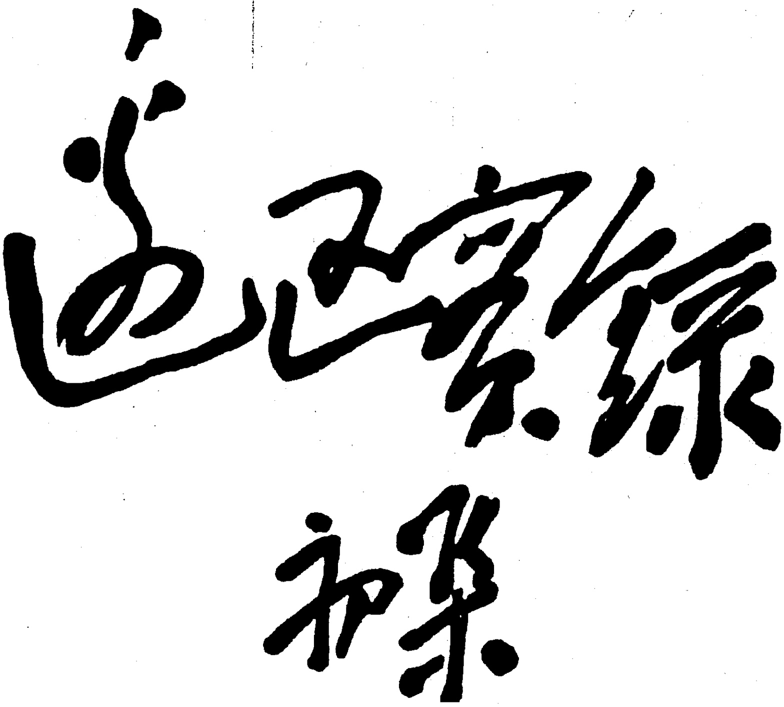
边区实录初集

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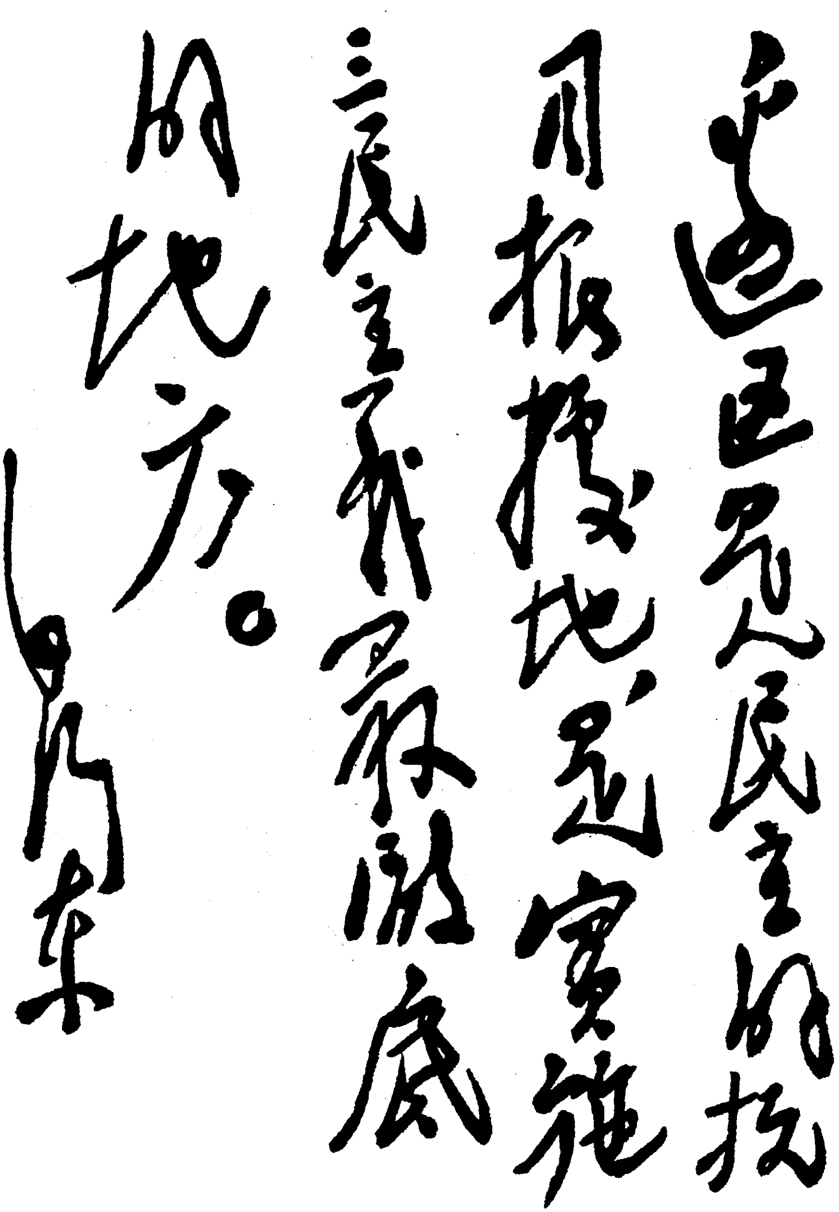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社1939年12月出版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所写的书名和题词。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题写的书名。



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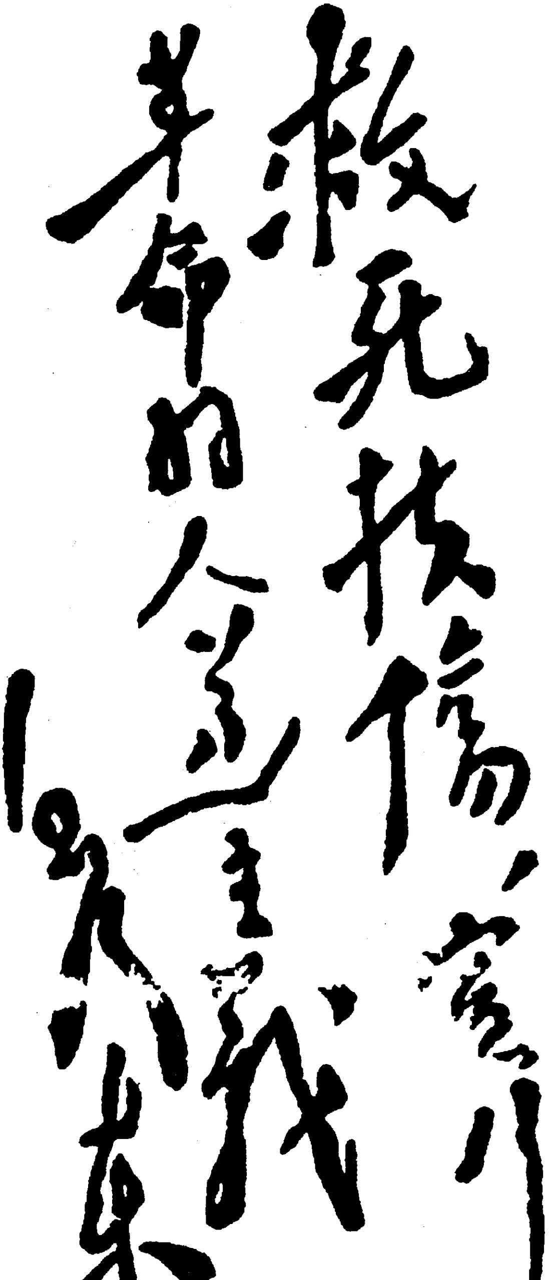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的题词。

为悼念白求恩题词

（1939年12月）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

毛泽东为悼念白求恩的题词。

诗歌以押韵为宜[1]

（1939年12月）

信和习作均收到，迟复为歉。你的努力，很好很对。优秀的民族，大抵是千百年来群众的集体创作。多中要有些好的。诗歌以押韵为宜，无韵的诗歌，难于行运。抗战是大同，形式上风格上的差别是小异，凡小异而大同者均应兼容并包。

---

[1] 1939年12月，诗人刘御给毛泽东写信，说“您在六届六次会上所倡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虽然是针对马列主义的学习与宣传而提出的，但我觉得，在文艺创作上也完全适用。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而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的，不知道我这样的看法和做法是否得当”。为了便于毛泽东了解情况，刘御还把他当时写的诗寄给毛泽东看。这是毛泽东复刘御信的主要内容。

为新华社业务刊物《通讯》题写刊头[1]

（1939年12月）

通讯

---

[1] 1939年12月1日，《通讯》创刊号出版，这是延安时期出版的第一个新闻业务刊物，它的读者是陕甘宁边区的通讯员。在《通讯》创刊之前，通讯科以新华社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请毛泽东题写刊头。毛泽东很快就用宣纸写了“通讯”两个大字一式三份供挑选使用。

给吴玉章[1]的信

（1939年12月）

吴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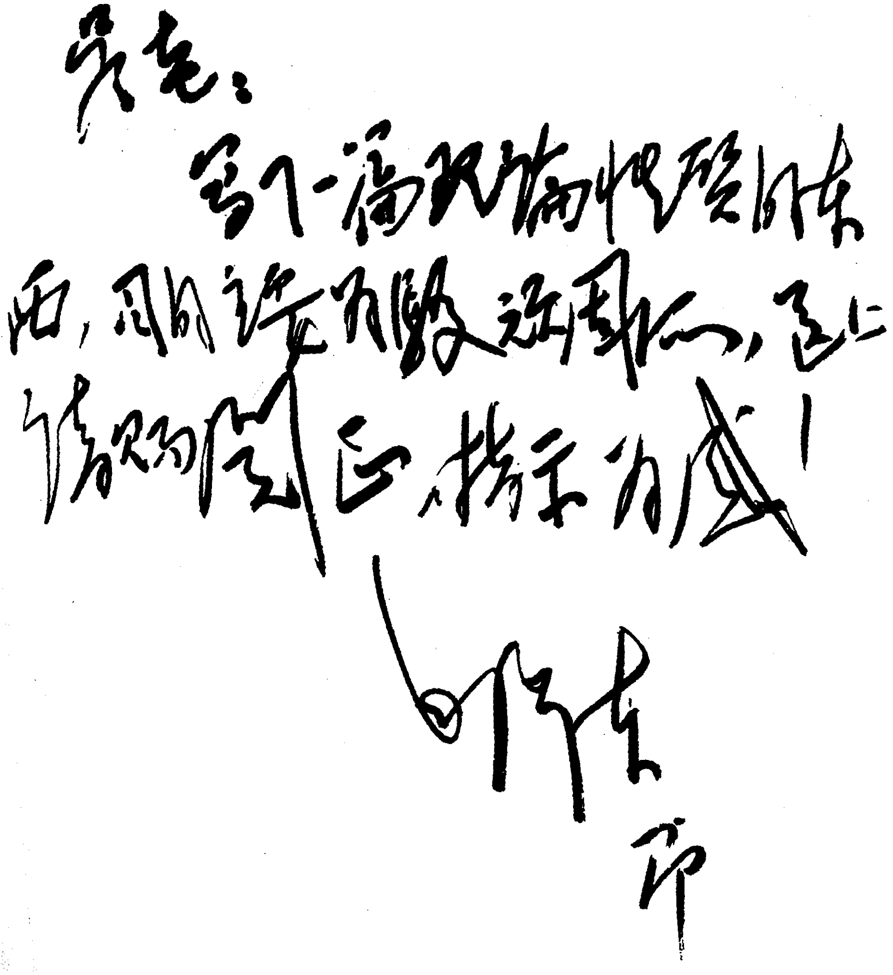
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2]，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毛泽东　即

---

[1]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2] 指毛泽东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1940年2月发表于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这篇文章的题目后来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吴老：

写了一篇祝词性质的东西，用的语句有些颂扬的，还请你为阅正，指示为感！

毛泽东

即

毛泽东致吴玉章信的手稿。

谈抗大农庄

（1939年）

抗大农庄一个一百几十个人担任了六千个人全年四分之一的粮食，四百个人便可以生产六千人全年的粮食（还是用落后的生产工具来耕种）。如果按照抗大农庄的办法，那末中国只要三千万人生产，就可以养活四万万五千万人。全国都这样做，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成什么问题？所以抗大农庄的路线是最好的；全国都应该学习抗大农庄的办法，人人要劳动，人人有衣穿，有饭吃，三民主义新中国就是这样！

题延安新市场联[1]

（1939年）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人民有充分的救国自由权。

---

[1]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毛泽东将其镶嵌于联语中，写了这副对联。延安新市场，1938年10月，延安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旧市场成为废墟。1939年在南郊建立新市场。

谈爬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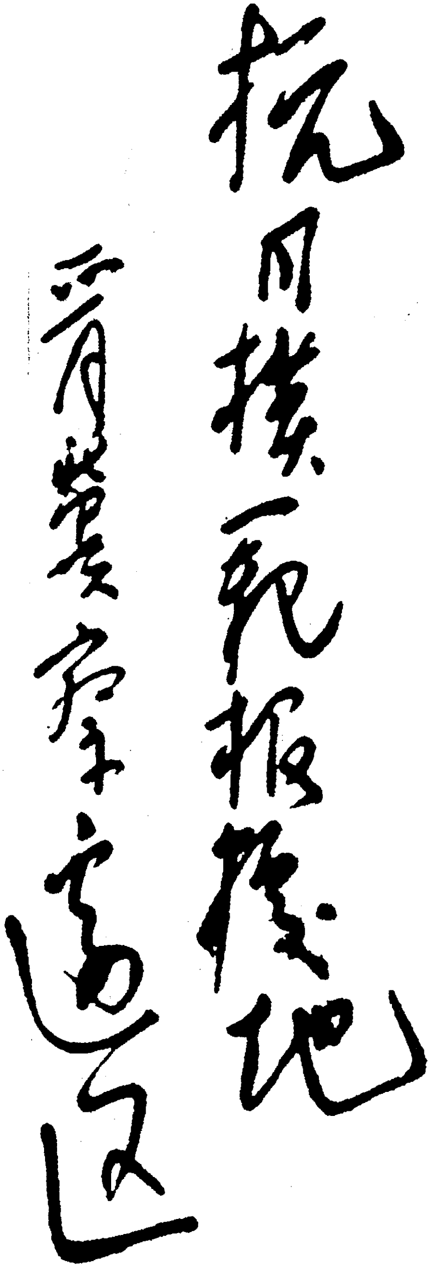
（1939年）

爬山是抗大课程表外的必修科目，在锻炼抗日的干部上，有着很大的意义。锻炼了每个青年的体力，锻炼出民族战士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是直接联系到战场的实践教育。

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一书题名

（1939年）

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



抗日模范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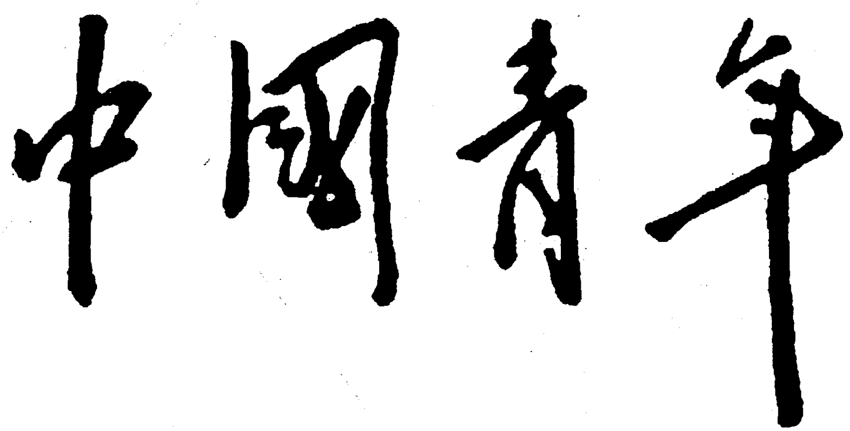
晋察冀边区

毛泽东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冀察边区》题写的书名。

为《中国青年》题名

（1939年）

中国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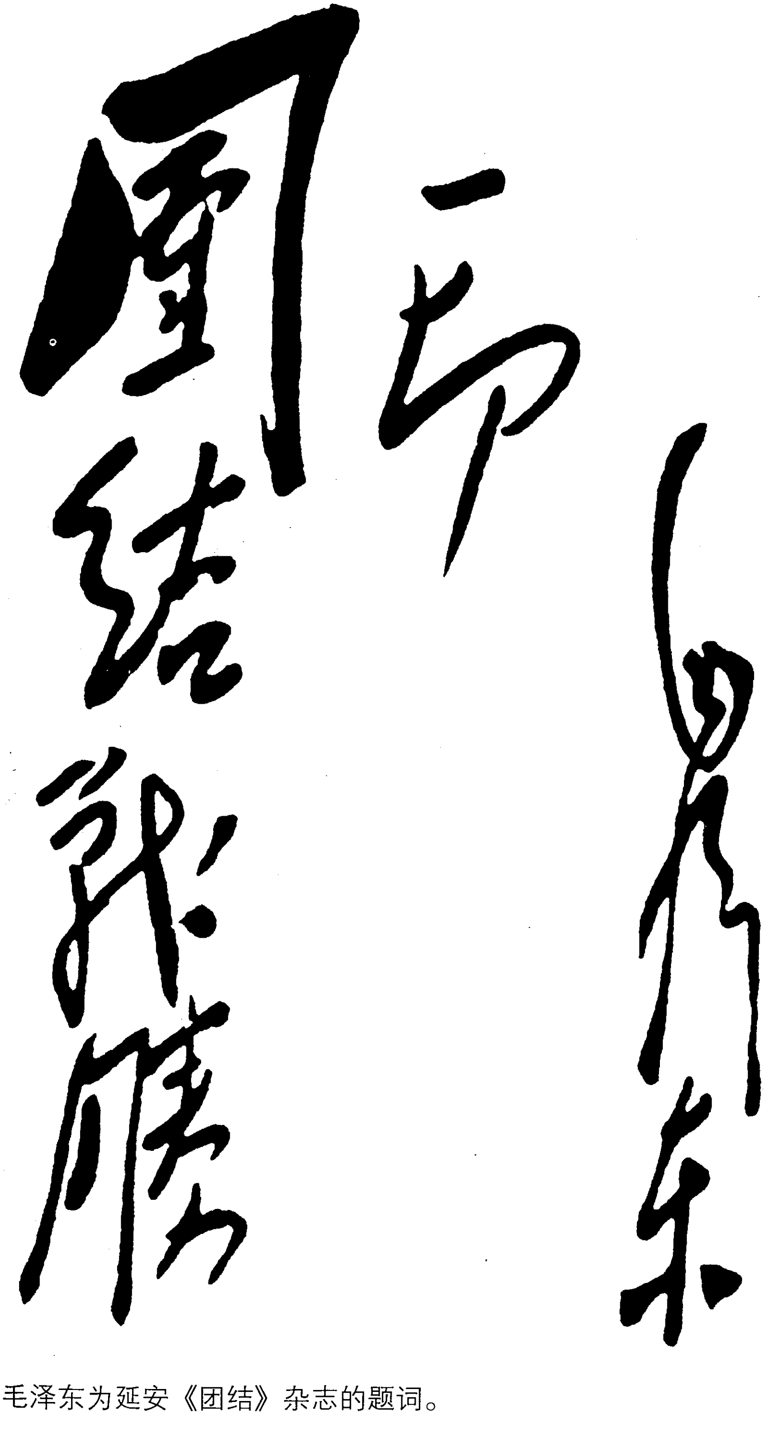
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题写的刊名。

为延安《团结》杂志题词

（1939年）

团结战胜一切。

毛泽东



团结战胜一切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团结》杂志的题词。

读河上肇[1]著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一书的批注

（1939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上篇

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第一章　唯物论

二　为压迫阶级的哲学的唯物论和无神论

……

但是，在另一方面，从来被压迫阶级对支配阶级实行抗争获得了新的势力，到了这个时代，观念论以及和观念论结了不解之缘的宗教，便会在某种程度以内，由利用它们作为精神羁轭的阶

---

[1] 河上肇（1879—1946），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学大纲》等。

政治的原因

级的手中，被颠仆下来。到了那时，破坏那种旧信仰的有用的精神的武器，当然是唯物论。所以从来当被压迫阶级将要获得新势力的“变革时代”，唯物论总是勃兴起来。——大凡从来的历史（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唯物论的消长，只有由这种见地才可以理解，决不是由唯物论本身可以理解的。那种把有名的哲学家们的大体的思想，从社会的根源分离起来，而只是编年的叙述了的哲学史，一般的对于唯物论和观念论的消长，所以不能说明它的必然性的原因，就在这里。不过关于这事，在这里是无须作进一步的讨论的。[第9页]

四　十八世纪中法国的唯物论与无神论

（一）麦里亚[1]

德波林曾就英国[2]神论[3]这样说过：“理神论的性质，那怕是过于微温，而且含有内在的矛盾，但对于主张人类的思考与科学的研究的自由一点，总算是有过大贡献。可是对于为了这种科

---

[1] 麦里亚（1664—1729），现译梅叶。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空想共产主义者。

[2]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理”字。

[3] 理神论即自然神论。英国自然神论的主要代表有多德威尔、考尔德、柯林斯等。

学世界观而行的斗争，而在自己著述中把持着并宣传着这种世界观的人们，却常常会惹起大的危险。这是我们不能不说明的。‘战斗的教会’不止是用言语去庇护有害的学说的，它还采用了现实的手段，这就是说，它们要拔去那些敢于批评宗教教理的人们的舌根，或者把他们投在薪材上，用火烧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无怪大多数自由思想家，都把他们真正的见解隐蔽起来了。”[第21页]

（二）杜尔巴克[1]

……

……现在，法国的布尔乔亚，已成为世界反动的支柱。唯物论与无神论旗帜下的革命传统，早经移到交[2]普罗列达里亚了。正如，普罗列达里亚之旗帜的解放，有着阶级社会之完全的扬弃的意义一样，他们之精神的解放，和宗教的及观念论的偏见之完全的清算，是有着联络的。[第33～34页]

……

---

[1] 杜尔巴克（1723—1789），现译霍尔巴赫。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2] 毛泽东将“到交”二字互换了位置。

一〇　相对的真理与绝对的真理

……

最近看到的鲁波尔的列宁与哲学一哲[1]中，对于同一问题的说法，是下面这样。

……

……一切东西是相对的，因而相对性的本身也是相对的，所以相对与绝对之间的关系或区别，也只是相对的，决不是绝对的。结果，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也能说到绝对。真正把相对性的见地彻底贯彻的时候，那就不可避的引导到这种见地的否定……[第91～92页]

……

二　辩证法的思惟之本质

……

……总而言之，所谓辩证法的全面性的要求，不外就是对于现实的事物之真实性的要求。“真理（真实常是具体的）”[2]这个命题，就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

---

[1] 毛泽东将“哲”字改为“书”字。

[2] 原引文为：“真理（真实）常是具体的”，但“（真实）”二字右边的圆括号印刷模糊，毛泽东认为此句不通，将它改成：“真理（真理常是具体的）”……。

……所谓 in　Detail（详细地，）毕竟就是“全面的”的意义。固然我们只是抽出对象之某一方面，或某一属性，或某一特征，我们也可以作出某种结论来。但是在实际上，和这种结论正相反对的方面（有时这种事实很多）的存在，也是能够有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靠着一方面的观察，是极其危险的。由一方面的观察所生出的结论，只不过表示真理的一方面而已。所以“探究须详细地占有材料，”马克思这一句话，毕竟不外就是用不同的语句，拿来表示辩证法之全面的探究的要求。[第 118 页]

?

……

五　在发展过程上（在运动之流上）把握事物

（四）　由量到质的转化

……

……所谓单纯的分量上的变化，含着具有同一的品质的事物之量的变化的意义，但是由单纯的分量上的变化，既然可以生出品质的差异，这件事实，毕竟不外是具有同一的品质的事物，在某种条件之下，复生出品质相异的方面这个意义而已。单纯的货币与资本，是一种对立物，但是生出剩余价值的货币，就成为资本。单就这一点而论，货币与资本，又可说是同一

质变由矛盾变，未说。

物了。[第 199 页]

（五）否定之否定

……

……这种生产方法，以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之分散为前提。正如它排斥这些生产手段之集积一样，在这种生产方法之下，对于协业，同一生产行程之内部的分业和对于自然之社会的支配与制御，以及社会的生产力之自由的发展，也是被排斥的。它只有与生产及社会之狭隘的原生的限界，才是两立的。……[第 201 页]

反倾向斗争

此外恩格斯在《反杜林格论》里面所引证的麦粒的例子，曾为许多著作家所引用。我在这里，也把这个例子，引用在下面。

"……无数的麦粒，是可拿来磨碎的，可以煮熟的，可以酿造的，可以消费的。但是这样的一个麦粒，如果找着了正常的诸条件，落在适当的土壤之上，在这个时候，它因为受了热度与湿气的影响，便发生了一种特有的变化，它发芽。麦粒自身消灭，即是被否定了，从它发生出来的植物——麦粒之否定——便取而代之。然则这种植物的正常的生涯，是怎样的呢？这种植物成长，开花，结实，最后再生产很多的麦粒。这些麦粒，一旦到了成熟的时候，茎即枯死，茎自身又被否定。由这种否定之否定所生出的结果，我

要说量变

们所再得到的最初的麦粒，但不是单一的麦粒，而是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的麦粒。谷物的种类，所发生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所以今日的麦粒和百年以前的麦粒，差不多是依然同一的。……”（《反杜林格论》，德文本，一三八页。）[第205～206页]

?

还有一层，在许多事例中，由否定之否定所生的结果，每每和最初的事物生出显著的差异，这种事实，是应该依次一为论及的。例如在商品流通的发展过程中，单纯的商品，否定它自己便成为货币，而单纯的货币又否定它自己，便成为资本。在这个时候，资本原来不是复归到单纯的商品的东西。又例如在温度次第上升的状态之下，冰被否定变而为水，水更被否定[1]为蒸气，在这个时候，否定之否定的产物，即蒸气，也是和最初化[2]的出发点即冰，在品质上是极不相同的东西。要之，一切都必须就事实去学习。[第211页]

为什么?

第三章　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

三　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之辩证法的关系

---

[1]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变”字。

[2] 毛泽东把“化”字圈掉了。

……“蜘蛛与织工从事类似的作业；蜜蜂在蜂窝的建筑上，会叫人类的许多建筑师觉得惭愧，然而最拙劣的建筑师，起首便胜过最巧妙的蜜蜂的，就是因为他于用蜂蜡建筑蜂窝而外[1]，已在他的头脑中建筑着。……”（资本论，第一卷，考茨基版，333～334页）……[第240页]

……

五　社会的阶级差别及其政治的构造（政治的及法律的上层建筑）

……

“……，——在科学的立场上研究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不忘却根本的历史的关系，就是要把一切问题，从某种现象如何在历史上发生，那一现象在其发展上经过了什么主要阶段的这种见地去观察，更从这发展的见地，去观察那东西，现在究竟怎样。……”[第271页]

中日战争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统一战线形式即国民党民族联盟问题，八路军战略问题，党的发展中新旧党员各种倾向、干部政策等问题。

---

[1] 毛泽东将“而外”改写为“以前”。

六　观念的上层建筑——社会的意识反映社会的存在

安朵拉托斯基[1]在他所著的“列宁主义之理论与实践”的里面关于这一点，曾有所论及，他说：“思维为存在所决定。……我们所应特别留意的，就是我们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可和人类头脑中所想象的社会关系（即人类的观念），拿来相混同，应该就社会关系的真实方面，加以究明。这两种事实的差异，我们试从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一步一步看去的时候，那怕特定的社会关系是成熟而且实在的，而人类对于那种关系的意识却仍旧缺乏；而且我们就各个人自己所做的一切还不会详细的理解这件事说来，也就不难明白。最初，是关系成熟，然后意识发生，然后人类才理解关系。……”

先行后知
知难行易

七　社会变革的总过程——阶级斗争——经济与权力——从必然的王国飞跃到自由的王国

……

---

[1] 安朵拉托斯基（1878—1945），现译阿多拉茨基。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曾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1932年起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到了这个时代，所有一切生产手段，都移在社会的共同管理之下，关于社会的生产，本着人类的计划去统制，关于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本着人类的意识去调节，遂成为必要而且可能了。但是生产手段，一旦移在社会的共同管理之下，榨取他人的阶级，便不能存在，固而被他人榨取的阶级，也不存在，而阶级与阶级之一般的对立，遂被废止了。不仅如此，并且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一旦本着人类的意识去调节，那由两者间的矛盾冲突所引起的“自己运动”之自然史的过程，便被扬弃。一言以蔽之，在一切从来的历史上，成了动力的生产诸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以及成为人的表现的支配阶级与抑压阶级之间的斗争，都绝迹了。“于是人类社会的历[1]史，便以资本家的社会形态而告终”。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开始描写人类的真正历史——如果对前史而言，可称为本史——的第一页前夜。……[第301页] ?

---

[1] 毛泽东将“历”字改为“前”字。

下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

第一章　商品

第一　为研究出发点的商品

六　出发点和到着点之间的辩证法的循环

……

……到了各个商品已不是表现为各个商品，而是“表现为全生产的观念部分”的时候，那当做最舍象的范畴之商品才产生。惟其是那样，所以那成为舍象的范畴之商品或商品交换，除了成为已经完成十分发展的资本家社会的一种“具象的活[1]全体之舍象的一面关系外，绝不能存在”。……不但集合拢来，各个商品是社会全体之富，并且各个商品，无论和构成社会全体之富的分子中的任何一个都能交换，在这一点上，各个商品，也具有代表社会全体之富的资格。实在，在具有那种资格的一点上，劳动生产物才变成商品，因此，它“不但表现为全生产的现实部

---

[1]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的”字。

分，并且还表现为全生产的观念部分”。换言之，就是各个商品中潜在着货币。……

……我们不是由于用思惟去分析鸡而发见卵的，可说最初就把鸡和卵都当做确定了的东西在探究，同样，最[1]舍象的终点和最舍象的始点，都成为直接的东西现实地表现出来，而舍象的东西，就成为那具有丰富的多面性的具象物自身的某一面现实地表现出来，由于这一点，这两个东西，最初就是同时替我们确定了的。在两个都是直接的确定了的一点上，便两个都不是依存于他方的东西。[第87～89页]

……

第二　分析商品而得的商品两个要素——使用价值及价值

一　引言

……

所谓分析，用列宁的话说，便是为了“认识统一物中充满了矛盾的构成分子”，“把统一物分解出来的事情”。但是，这却和分析自然现象不同，“当分析经济的诸状态时，显微镜和化学的

不能用肉眼

---

[1] 毛泽东在这里加写了一个“具”字。

看见，必须用抽象力。

试验，都不中用，必须抽象力来代替这两者”。……[第9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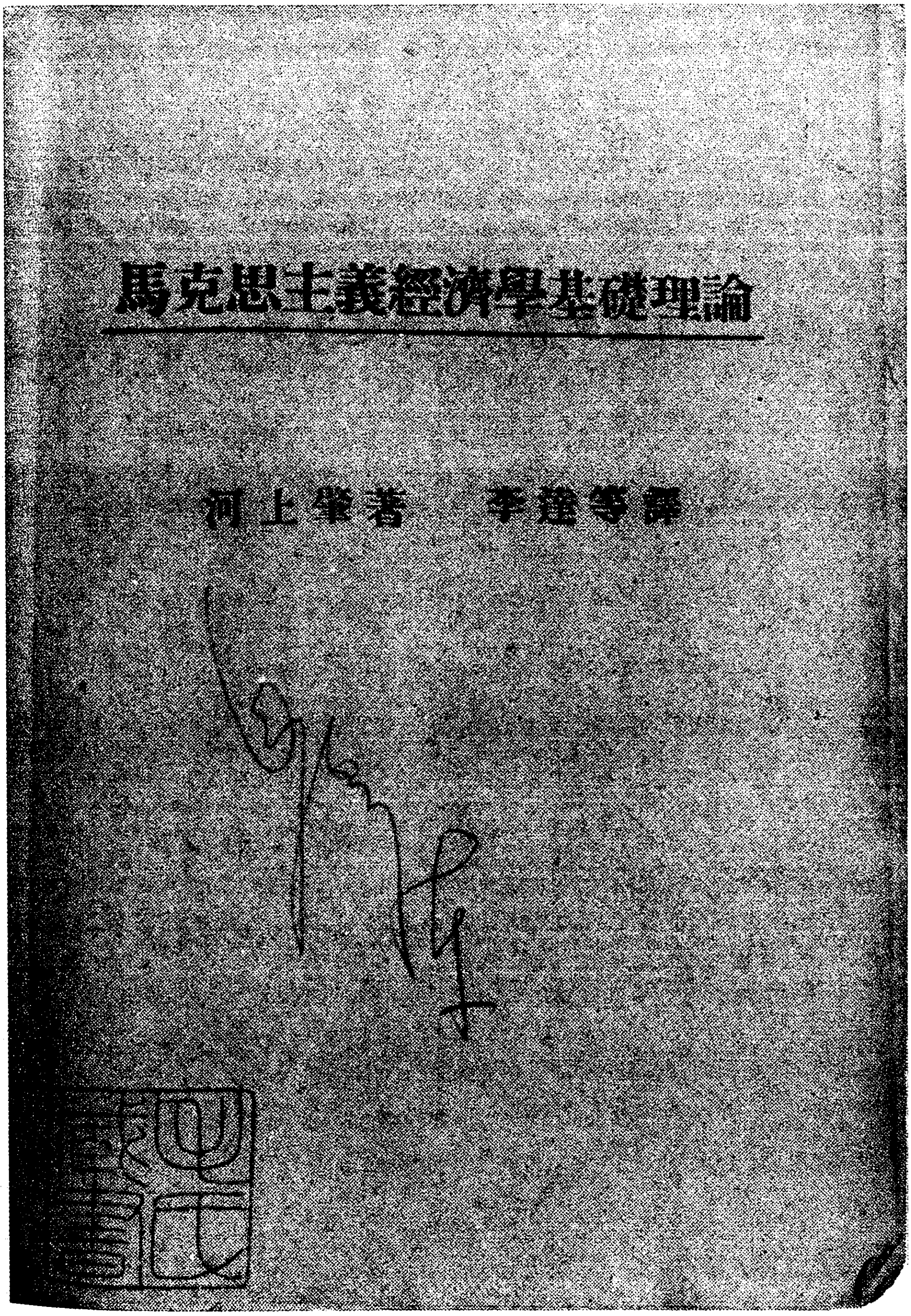
四　成为价值的商品——其二，价值的分量

……

资本家社会的生产诸关系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资本家阶级和工钱劳动者阶级的关系，它在经济上——以后我们或许还详晰的观察——依存于劳动作力的买卖，所以又是依存于劳动作力的价值，仍是依存于劳动作生产力的。[1][第148页]

---

[1] 毛泽东将原文中“劳动作力”和“劳动作生产力”中的“作”字均删掉。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

河上肇著　李達等譯

毛泽东阅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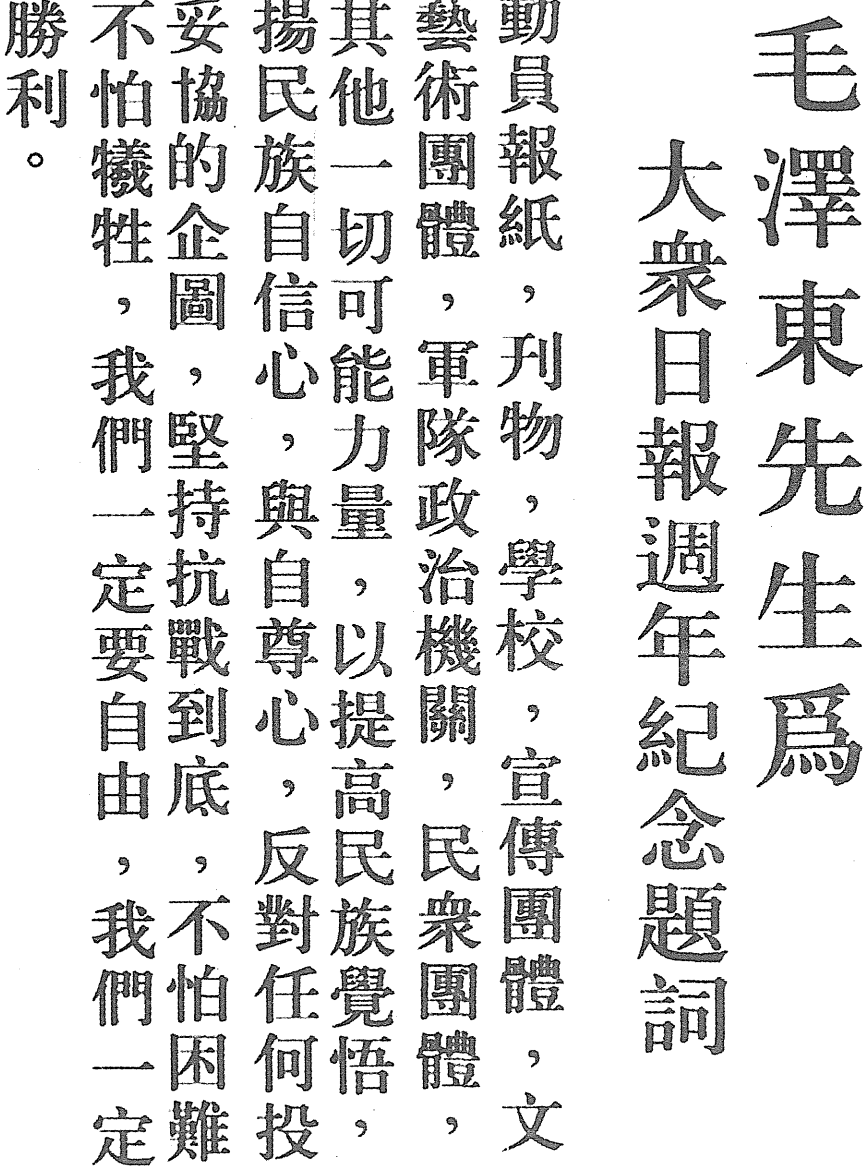
1940

1940年的毛泽东。

为《大众日报》周年纪念题词

（1940年1月1日）

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毛澤東先生爲

大衆日報週年紀念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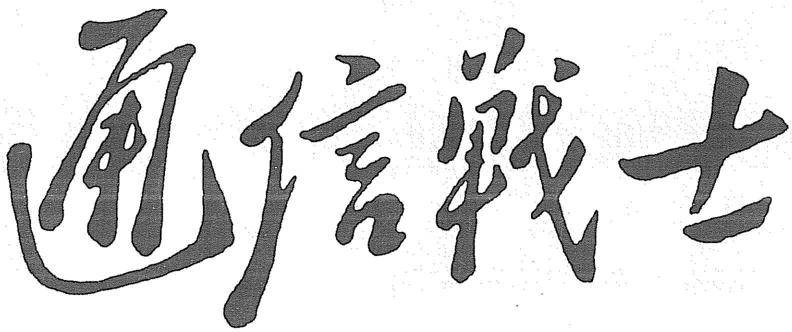
動員報紙，刊物，學校，宣傳團體，文化藝術團體，軍隊政治機關，民衆團體，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覺悟，發揚民族自信心，與自尊心，反對任何投降妥協的企圖，堅持抗戰到底，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我們一定要自由，我們一定要勝利。

毛泽东为《大众日报》创刊一周年的题词。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名[1]

（1940年1月1日）

通信战士



毛泽东为《通信战士》杂志题写的刊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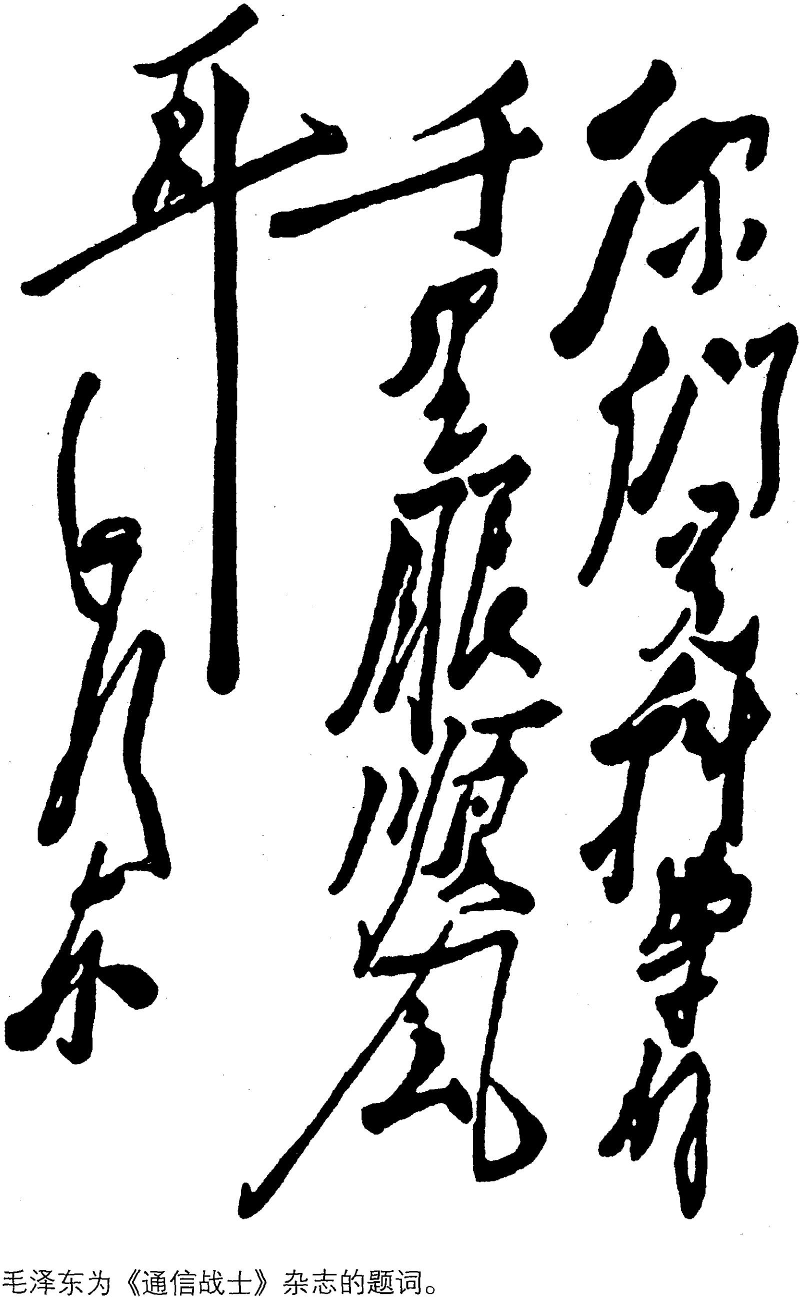
[1] 1940年1月1日，《通信战士》杂志诞生在革命圣地延安，是我军创办最早的军事专业刊物。毛泽东亲自为杂志题写刊名。

为《通信战士》杂志题词

（1940年1月1日）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

毛泽东



你们是我党的千里眼顺风耳

毛泽东

毛泽东为《通信战士》杂志的题词。

准备应付华中急变[1]

（1940年1月5日）

项英同志：

甲、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乙、陈毅[2]仍应力争江北。丙、蒋介石投降还不是马上的事，你们还来得及准备，但是内部秘密准备，不要露形迹。丁、努力争取一切军队的同情者。戊、一切自力更生，不要靠任何外援。

中央书记处

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致聂荣臻、彭真电[1]

（1940年1月5日）

贺、关即赴晋西北指挥，晋西北关系全局，吕梁山已失，靠夺取晋西北作战略枢纽。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聂荣臻、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陇东问题谈判的条件给谢觉哉的信[1]

（1940年1月8日）

觉哉同志：

（甲）陇东六县（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镇原）属边区二十三县范围，地方行政应即全部移交边区管辖，杜绝一切纠纷之源；（乙）边区及八路军保证不向六县境外越出一步；（丙）在上列两条基本原则下具体解决彼方从六县撤退军队保安队行政机关及此次纠纷中双方交换俘虏等事；（丁）如彼方不愿照此解决，则我只能承认双方停止冲突，暂维现状，交换俘虏，其他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

毛　王　萧

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萧劲光关于陇东六县问题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中央代表谢觉哉的信。

关于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的讲话[1]

（1940年1月10日）

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的方针是对的。我们反磨擦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我军占优势的区域要取攻势，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也要采取攻势，使顽固派孤立。

---

[1] 这是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山西新旧军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1月10日）

（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

---

[1] 这是毛泽东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不可能实行征兵制

（1940年1月11日）

德怀同志：

征兵在现时条件下不可能。如果是到军队中训练，办理二万四千人的征兵、粮食、被服等项，至少需六十万元，目前无此财力。只能加重自卫军训练，以老百姓吃自己的饭，穿自己的衣为原则。现在是经过自卫军，准备将来实行征兵制的过渡期。如同中央苏区那样的办法，五台山、太行山、陕甘宁边区都是这样。此复。

泽东

十一日

目前政治形势及对阎锡山[1]的方针

（1940年1月11日）

德怀[2]同志：

你陷日[3]来电，书记处已有复电，谅收到。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4]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5]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边区问题有好转倾向，

---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3] 陷日，即30日。

[4] 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5] 指陈士榘任支队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

陇东九十七师已撤走，程潜、朱绍良[1]在蒋[2]命令下已表示和平，我们正派谢老[3]赴甘为谈判代表。日本决定扶助汪精卫，日本在华军人的政策还是硬的，此事不能不影响国民党的态度，故好转可能还未断绝。现时日本内部的斗争，还是日本独占中国或者分出一部分权利给英、美这样一种斗争，军人的独占政策似乎占优势，日本正发生倒阁风潮，等几天就可见分晓。

泽东

十一日

---

[1]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朱绍良（1891—1963），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2] 蒋，指蒋介石。

[3] 谢老，指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曾任中共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代表。

吴玉章[1]寿辰祝词

（1940年1月15日）

今天大家欢聚一堂，为吴老祝寿。想起我在三年前为徐老祝寿时的感想，我那时就说过，我们替他祝寿，不是无原因的。[2]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3]，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党外也有很多受青年尊敬的老人，例如马相伯[4]就是一个，

---

[1]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当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2] 见毛泽东1937年1月30日为徐特立60岁生日写的贺信。

[3] 林老，指林伯渠（1886—1960），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徐老，指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董老，指董必武（1886—1975），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谢老，指谢觉哉（1884—1971），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4]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曾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组织文化界救国会，被誉为爱国老人。

他做寿时我们共产党还打了贺电去，因为他主张抗日与民主政治。人总是要老的，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如果老就可贵，那末可贵的人太多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我们今天大家欢欢喜喜地庆祝他的六十生日，我想主要的意义是在这里。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

（1940年1月16日）

同志们：

这个农展会，我还没去看，好不好还不知道，但我听到说还好，比去年的好。去年我是看过的，今年比去年更是好，这是老百姓同志的努力，是政府工作人员努力的结果。政府的人如不同老百姓结合，事情就办不好。有两种政府，一种只知道刮刮刮，另一种则帮老百姓的忙——边区政府就是这种帮忙政府。老百姓从几百里拿来一包两包面送来展览，这对打日本有大道理，这是老百姓同志的热心。边区政府受老百姓的拥护，作出许多好事，这也是热心作出来的，我们要发展这个热心。但还有一条，只有热心还不行，还要力求进步，今年的展览会就有进步。我们要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们，因为他们不但热心，而且求进步。这是有八路军，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在座有许多八路军同志，你们要向老百姓敬礼，不要骂人。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因为我们的饭是他们做的，房子是他们做的，我们要军民合作。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我们边区有二十三个县，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但有些磨

擦分子，派了兵来一打，打过我们几个县，这是不行的。你们到外面去的同志更要同他们讲一讲，我们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吃了磨擦饭肚子痛，要死人，还要亡国的。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有许多同志，还有张先生及蒙古同志，我们大家要吃团结饭，不要吃磨擦饭。磨擦要同日本帝国主义磨擦，将他磨入海中去，不要在自己内窝子磨擦。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1月16日）

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1]

（1940年1月16日）

晋西北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已大体上胜利了。[2]阎锡山可能同国民党中央军进一步结合起来，夺取晋东南。因此，对庞炳勋、朱怀冰[3]的进犯不能不采取武装的抵抗，否则将丧失晋东南。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月11日至13日，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在临县地区击溃阎军赵承绶部，迫使阎军于13日夜放弃临县县城退向晋西南地区，至此晋西北八路军和新军反顽作战取得胜利。

[3]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月17日）

晋西北须立即建立新的政权，采用原来赵承绶的山西省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形式较好，迅速用民选办法推举续范亭为主任，各县的反动县长、专员应迅速全部撤换，委任新人。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月18日）

在山西的反磨擦斗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现在阎锡山有三万余旧军在吕梁山脉，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现在正准备派人去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但我们也准备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山西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

一　中国向何处去

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因此，趁着《中国文化》[1]的出版，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或者也是有益的。对于文化问题，我是门外汉，想研究一下，也方在开始。好在延安许多同志已有详尽的文章，我的粗枝大叶的东西，就当作一番开台锣鼓好了。对于全国先进的文化工作者，我们的东西，只当作引玉之砖，千虑之一得，希望共同讨论，得出正确结论，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我想，这可以算作《中

---

[1] 《中国文化》是1940年2月在延安创刊的杂志，1941年8月终刊。

国文化》出版的态度。

新民主主義論
山東省立農學院印
東北人民革命大學教務處印
CHINA'S NEW DEMOCRACY
By MAO TSE-TUNG
Introduction by EARL BROWDER
米国下院外交委員会
附. 毛沢東
新民主主義論

1940年1月9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后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部分版本)。

二　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

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三　中国的历史特点

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但是这种新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文化呢？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1]。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那末，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

---

[1] "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一语，参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2页）。

[2]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1]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

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

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是什么？而所谓中华民族的旧文化又是什么？

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

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地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日本占领区，是殖民地社会；在国民党统治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作为统治的东西来说，这种社会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殖民地、

---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的译文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和经济之反映的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

那末，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又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呢？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一切党派，一切人们，谁不懂得这个历史特点，谁就不能指导这个革命和进行这个革命到胜利，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

四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那末，这个历史特点是怎样形成

的呢？它是一百年来就有了的，还是后来才发生的呢？

只要研究一下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发展，就知道这个历史特点，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以来就有了的，而是在后来，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形成的。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个形成过程。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

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

在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在地球的一角（这一角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崩溃，而在其余的角上又已经充分显露其腐朽性的时代，在这些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扶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面解放出来并宣布他们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第一步，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这种革命，在其进行中，因为敌情和同盟军的变化，又分为若干的阶段，然而其基本性质是没有变化的。

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因此，这种革命，就不能不变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而为当时一切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们所赞成的。不过那时这一理论的意义还没有发挥，以致人们还只是模糊地认识这个问题。

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斯大林还在一九一八年所作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的论文时，就说道：

“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

从这篇文章以后，斯大林曾经多次地发挥了关于论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脱离了旧范畴，改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理论。解释得最清楚明确的，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发表的同当时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争论的文章。这篇文章载在张仲实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上面，题目叫做《再论民族问题》。其中有这么一段：

“舍米契引证了斯大林在一九一二年年底所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那里曾说：‘在上升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民族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斗争。’显然，他企图以此来暗示他给当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运动的社会意义所下的定义是正确的。然而，斯大林那本小册子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写的，那时候民族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不是一个具有全世界意

---

[1] 参见斯大林《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义的问题，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要求不是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当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自那时候起，国际形势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变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要是看不清这一点，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列宁还在一九一六年十月间，就在他的《民族自决权讨论的总结》一文中说过，民族问题中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点，已不再是一般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变成一般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构成部分了。列宁以及俄国共产主义的其他代表者关于民族问题的以后的一些著作，我就不用讲了。现在，当我们由于新的历史环境而进入于一个新的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舍米契在这一切以后却引证斯大林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所写的那本小册子中的一个地方，这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这样一个意义，就是舍米契是离开时间和空间，不顾到活的历史环境来引证的，因而违反了辩证法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考虑到在某一个历史环境下是正确的东西在另一个历史环境下就可以成为不正确的。”

由此可见，有两种世界革命，第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这种世界革命的时期早已过去了，还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时，就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种革命，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不管被压迫民族中间参加革命的阶级、党派或个人，是何种的阶级、党派或个人，又不管他们意识着这一点与否，他们主观上了解了这一点与否，只要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的革命，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就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

命的同盟军。

中国革命到了今天，它的意义更加增大了。在今天，是在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已经一天一天把世界拖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在苏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有能力领导和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战争，打击资本主义反动的时候；是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正在准备打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时候；是在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时候。在今天，我们是处在这种时候，那末，应该不应该估计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是更加增大了呢？我想是应该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

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同盟军。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特点，这就是二十年来（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的革命过程，这就是现时中国革命的生动的具体的内容。

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

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这个新的特点具体地表现在中国内部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上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就来说明这种情形。

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前（五四运动发生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知识分子）。这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例如辛亥革命时的无产阶级，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这时，中国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而土地革命的实行，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因为它是殖民地半

殖民地，是被人侵略的，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但同时，也即是由于他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他们又保存了另一种性质，即对于革命敌人的妥协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代表，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这一个长的时期内，一直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反对革命人民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在一九二七年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内一度附和过反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又已投降敌人，表示了大资产阶级的新的叛变。这又是中国资产阶级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欧美各国，特别在法国，当它们还在革命时代，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在中国，资产阶级则连这点彻底性都没有。

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就是欧美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也是同具的。大敌当前，他们要联合工农反对敌人；工农觉悟，他们又联合敌人反对工农。这是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的一般规律，不过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更加突出罢了。

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施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并且还要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

因此，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地不外乎这三种：（甲）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乙）

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丙）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

第一种，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在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之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了。某些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可以附在这一类。

第二种，除苏联外，正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酝酿着。将来要成为一定时期中的世界统治形式。

第三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必然会有某些不同特点，但这是大同中的小异。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几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今天的中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式，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又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统一战线的。但可惜，抗战许久了，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日本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最根本的弱点，大踏步地打了进来；再不变计，民族的命运是非常危险的。

这里所谈的是“国体”问题。这个国体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闹清楚。其实，它只是指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达到其一阶级专政的实际。这种隐瞒，对于革命的人民，毫无利益，应该为之清楚地指明。“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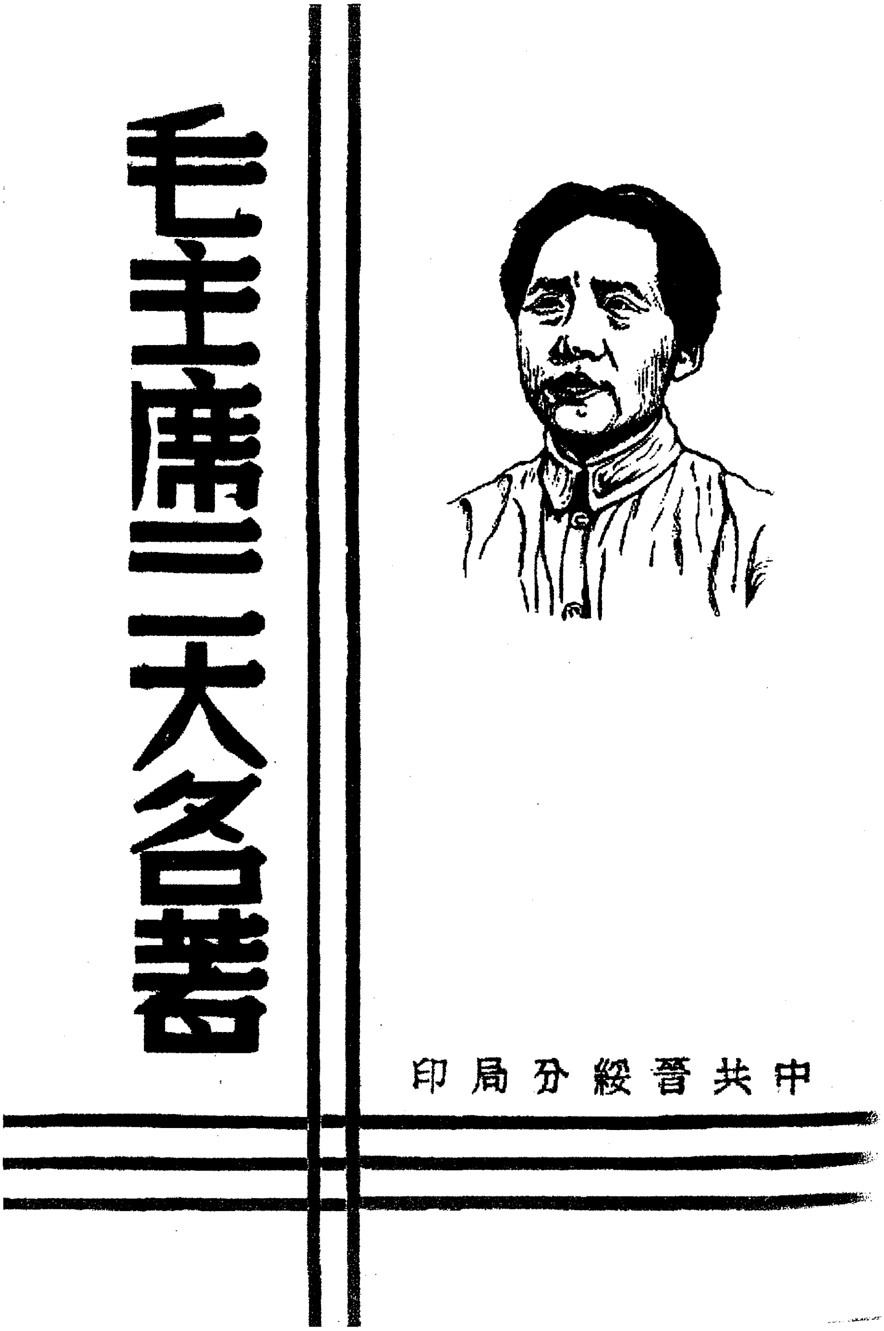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

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一九二四年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十六年来，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以致造成今天这样国难深重的局面。这是国民党一个绝大的错误，我们希望它在抗日的洗礼中改正这个错误。

至于还有所谓“政体”问题，那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

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和国，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所应该建立和决不可不建立的内部政治关系，这就是今天“建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向。



毛主席三大名著

中共晉綏分局印

1943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出版的《毛主席三大名著》（《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

六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

自己要碰破头的。

这就是革命的中国、抗日的中国应该建立和必然要建立的内部经济关系。

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的表现。

七　驳资产阶级专政

这种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共和国，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都赞成的，舍此没有第二条路走。

走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之路吗？诚然，这是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老路，但无如国际国内的环境，都不容许中国这样做。

依国际环境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的近代史。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1]。但

---

[1] 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

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日本帝国主义陷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深坑之中，就是说，它快要死了，它就一定要打中国，一定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它就断绝了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

其次，是社会主义不容许。这个世界上，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要独立，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这就是说，不能离开苏联的援助，不能离开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无产阶级在其本国进行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援助。虽然不能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在日本和英、美、法、德、意各国或其中一二国的革命胜利之后，但须加上它们的力量才能胜利，这是没有疑义的。尤其是苏联的援助，是抗战最后胜利决不可少的条件。拒绝苏联的援助，革命就要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反苏运动[1]的教训，不是异常明显的吗？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在这种情形下，要在中国反帝反封建胜利之后，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岂非是完全的梦呓？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

---

[1] 指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的反苏运动：1927年12月13日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广州苏联副领事；同月14日南京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不承认各省苏联领事，勒令各省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1929年7月蒋介石又受帝国主义的唆使，在东北向苏联挑衅，不久引起军事冲突。

一个基马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1]，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由于中国的特殊条件（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无产阶级的强大和革命彻底性），中国从来也没有过土耳其的那种便宜事情。一九二七年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不是曾经高唱过什么基马尔主义吗？然而中国的基马尔在何处？中国的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社会又在何处呢？何况所谓基马尔的土耳其，最后也不能不投入英法帝国主义的怀抱，一天一天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依国内环境说，中国资产阶级应该获得了必要的教训。中国资产阶级，以大资产阶级为首，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刚刚由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力量而得到胜利之际，他们就一脚踢开了这些人民大众，独占革命的果实，而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结成了反革命联盟，并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举行了十年的“剿共”战争。然而结果又怎么样呢？现在是当一个强大敌人深入国土、抗日战争已打了两年之后，难道还想抄袭欧美资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的老章程吗？过去的“剿共十年”并没有“剿”出什么资产阶级专政

---

[1] 基马尔，又译凯末尔（1881—193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指使希腊对土耳其进行武装侵略，土耳其人民得到苏俄的援助，于1922年战胜了希腊军队。1923年土耳其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基马尔被选为总统。

的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还想再来试一次吗？不错，“剿共十年”“剿”出了一个“一党专政”，但这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专政。而在“剿共”四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之后，就已经“剿”出了一个“满洲国”；再加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就把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剿”进中国本部来了。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谁要加进他那一伙去，那是行的，但是什么资产阶级专政呀，资本主义社会呀，基马尔主义呀，现代国家呀，一党专政呀，一个主义呀，等等花腔，岂非更加不好意思唱了吗？如果不入汪精卫一伙，要入抗日一伙，又想于抗日胜利之后，一脚踢开抗日人民，自己独占抗日成果，来一个“一党专政万岁”，又岂非近于做梦么？抗日，抗日，是谁之力？离了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你就不能走动一步。谁还敢于去踢他们，谁就要变为粉碎，这又岂非成了常识范围里的东西了吗？但是中国资产阶级顽固派（我说的是顽固派），二十年来，似乎并没有得到什么教训。不见他们还在那里高叫什么“限共”“溶共”“反共”吗？不见他们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再来一个《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再来一个《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吗？好家伙，这样地“限制”和“处理”下去，不知他们准备置民族命运于何地，也不知他们准备置其自身于何地？我们诚心诚意地奉劝这些先生们，你们也应该睁开眼睛看一看中国和世界，看一看国内和国外，看一看现在是什么样子，不要再重复你们的错误了。再错下去，民族命运固然遭殃，我看你们自己的事情也不大好办。这是断然的，一定的，确实的，中国资产

阶级顽固派如不觉悟，他们的事情是并不美妙的，他们将得到一个自寻死路的前途。所以我们希望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坚持下去，不是一家独霸而是大家合作，把抗日的事业弄个胜利，才是上策，否则一概是下策。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衷心劝告，“勿谓言之不预也”。

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革命的人们，是决不排斥的，我们将和所有愿意抗日到底的阶级、阶层、政党、政团以及个人，坚持统一战线，实行长期合作。但人家要排斥共产党，那是不行的；人家要分裂统一战线，那是不行的。中国必须抗战下去，团结下去，进步下去；谁要投降，要分裂，要倒退，我们是不能容忍的。

八　驳“左”倾空谈主义

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路，是否就可以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路呢？

也不可能。

没有问题，现在的革命是第一步，将来要发展到第二步，发展到社会主义。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但是现在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

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就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这种情形，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地造成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在抗日阵线中诱惑动摇分子，分裂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办实业”。在华中华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五十一，日资占百分之四十九；在华北，日寇允许中国资本家投资百分之四十九，日资占百分之五十一。日寇并允许将各中国资本家原有产业，发还他们，折合计算，充作资本。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于是打伙儿地开了个会，决议：事先要在文化界舆论界准备一下。计策已定，事不宜迟，于是雇上几个玄学鬼[1]，再加几名托洛茨基，摇动笔杆枪，就乱唤乱叫、乱打乱刺了一顿。于是什

---

[1] 毛泽东在这里是指张君劢及其一伙。张君劢在五四运动后宣扬一种自称为“新玄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提倡自孔孟以至宋明理学的所谓“精神文明”，同时又鼓吹“自由意志”，1923年引起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争论，当时张君劢被称为“玄学鬼”。1938年12月，他经蒋介石授意，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及陕甘宁边区，要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为蒋介石张目。

么“一次革命论”呀，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呀，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之必要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游而不击呀，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呀，共产党不听话、不统一、有阴谋、要捣乱呀，来这么一套，骗那些不知世事的人，以便时机一到，资本家们就很有理由地去拿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而把全民族的利益一概卖给敌人。这个叫做偷梁换柱，实行投降之前的思想准备或舆论准备。这班先生们，像煞有介事地提倡“一次革命论”，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却原来不为别的，专为百分之四十九或五十一，其用心亦良苦矣。“一次革命论”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九　驳顽固派

于是资产阶级顽固派就跑出来说：好，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

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1]，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这种议论，在所谓“一个主义”的标题之下，已经变成了狂妄的叫嚣。这种叫嚣，其本质就是顽固分子们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但为了客气一点，叫它作毫无常识，也是可以的。

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其实，这是“收起”不得的，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

谁人不知，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因为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

---

[1] 参见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则基本上相同，就狂叫“收起”共产主义，岂非荒谬绝伦之至？在共产党人，正因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有和自己的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之点，所以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才有可能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否则就没有这种可能了。这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上的统一战线，孙中山所谓“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1]，也正是指的这种统一战线。否认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否认统一战线。顽固派也正是要奉行其一党主义，否认统一战线，才造出那些否认共产主义的荒谬说法来。

“一个主义”也不通。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现在封建阶级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有资本主义，佛教徒有佛教主义，基督徒有基督主义，农民有多神主义，近年还有人提倡什么基马尔主义，法西斯主义，唯生主义[2]，“按劳分配主义”[3]，为什么无产阶级不可以有一个共产主义呢？既然是数不清的主义，为什么见了共产主义就高叫“收起”呢？讲实在话，“收起”是不行的，还是比赛吧。

---

[1] 参见1924年孙中山《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6页）。

[2] 1933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宇宙的实质是“生命之流”，万物的根本问题在于“求生”，用来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并认为宇宙万物各有一个重心，以人类社会现象来说，就是只能有一个领袖，否则就无法维持其均衡和生存。这种唯生主义的理论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法西斯专政服务的。

[3] 山西军阀阎锡山曾标榜过“按劳分配”的口号。其主要内容是：用军事方法强迫劳动人民在村公所控制的固定份地上，或官办的工厂、商店里，从事农奴式的劳动，只将很小一部分劳动果实，按劳动情况分配给劳动者。

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我们共产党人自认晦气。如若不然，那所谓“一个主义”的反民权主义的作风，还是早些“收起”吧!

为了免除误会，并使顽固派开开眼界起见，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有清楚指明之必要。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

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

一〇　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

资产阶级顽固派完全不知道历史的变化，其知识的贫乏几等于零。他们既不知道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也不知道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的区别。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

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

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第一，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现在的事情非常明白，如果没有联俄政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必然同帝国主义联合。不见一九二七年之后，就已经有过这种情形吗？社会主义的苏联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一经进一步尖锐化，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全地球都要卷进这两个战线中去，在今后的世界中，“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何况中国是在同一个深入国土的帝国主义奋斗，没有苏联帮助，就休想最后胜利。如果舍联俄而联帝，那就必须将“革命”二字取消，变成反动的三民主义。归根结底，没有“中立”的三民主义，只有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三民主义。如果照汪精卫从前的话，来一个“夹攻中的奋斗”[1]，来一个“夹攻中奋斗”的三民主义，岂不勇矣哉？但可惜连发明人汪精卫也放弃（或“收起”）

---

[1] 汪精卫在1927年叛变革命之后不久写过一篇东西，题为《夹攻之奋斗》（载1927年7月25日《汉口民国日报》）。

了这种三民主义，他现在改取了联帝的三民主义。如果说帝亦有东帝西帝之分，他联的是东帝，我和他相反，联一批西帝，东向而击，又岂不革命矣哉？但无如西帝们要反苏反共，你联它们，它们就要请你北向而击，你革命也革不成。所有这些情形，就规定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俄的三民主义，决不能是同帝国主义联合反俄的三民主义。

第二，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如不联共，就要反共。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疑吗？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昔日差不多动员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气力反了十年之久还没有反了的共，今日忽能“独立”反之吗？听说外边某些人有这么一句话：“反共好，反不了。”如果传言非虚，那末，这句话只有一半是错的，“反共”有什么“好”呢？却有一半是对的，“反共”真是“反不了”。其原因，基本上不在于“共”而在于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欢喜“共”，却不欢喜“反”。老百姓是决不容情的，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你要反共，他们就要了你的命。这是一定的，谁要反共谁就要准备变成齑粉。如果没有决心准备变自己为齑粉的话，那就确实以不反为妙。这是我们向一切反共英雄们的诚恳的劝告。因之清楚而又清楚，今日的三民主义，必须是联共的三民主义，否则，三民主义就要灭亡。这是三民主义的存亡问题。联共则三民主义存，反共则三民主义亡，谁能证明其不然呢？

第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须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不要农工政策，不真心实意地扶助农工，不实行《总理遗嘱》上的“唤起民众”，那就是准备革命失败，也就是准备自己失败。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1]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2]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之外，中国人口中第二个部分就是工人。中国有产业工人数百万，有手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数千万。没有各种工业工人，中国就不能生活，因为他们是工业经济的生产者。没有近代工业工人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因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们最富于革命性。在这种情

---

[1] 1925年3月30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讲《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中说：“……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页）

[2]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是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

形下，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必然是农工政策的三民主义。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是没有农工政策的，它是并不真心实意扶助农工，并不实行“唤起民众”的，那就一定会灭亡。

由此可知，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一切有良心的三民主义者，必须认真地考虑到这点。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相同。

至于旧三民主义，那是中国革命旧时期的产物。那时的俄国是帝国主义的俄国，当然不能有联俄政策；那时国内也没有共产党，当然不能有联共政策；那时工农运动也没有充分显露自己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尚不为人们所注意，当然就没有联合工农的政策。因此，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以前的三民主义，乃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乃是过时了的三民主义。如不把它发展到新三民主义，国民党就不能前进。聪明的孙中山看到了这一点，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但如果在新时期内，在新三民主义已经建立之后，还要翻那老

套；在有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后，要反对联俄；在有了共产党之后，要反对联共；在工农已经觉悟并显示了自己的政治威力之后，要反对农工政策；那末，它就是不识时务的反动的东西了。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反动，就是这种不识时务的结果。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

如果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那就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什么基本上相同之点，因为它是旧时期的，是过时了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和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一切都谈不上。这也是三民主义者应该慎重地考虑一番的。

但是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放弃它的只是那些汪精卫、李精卫之流。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成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

一一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

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

争[1]，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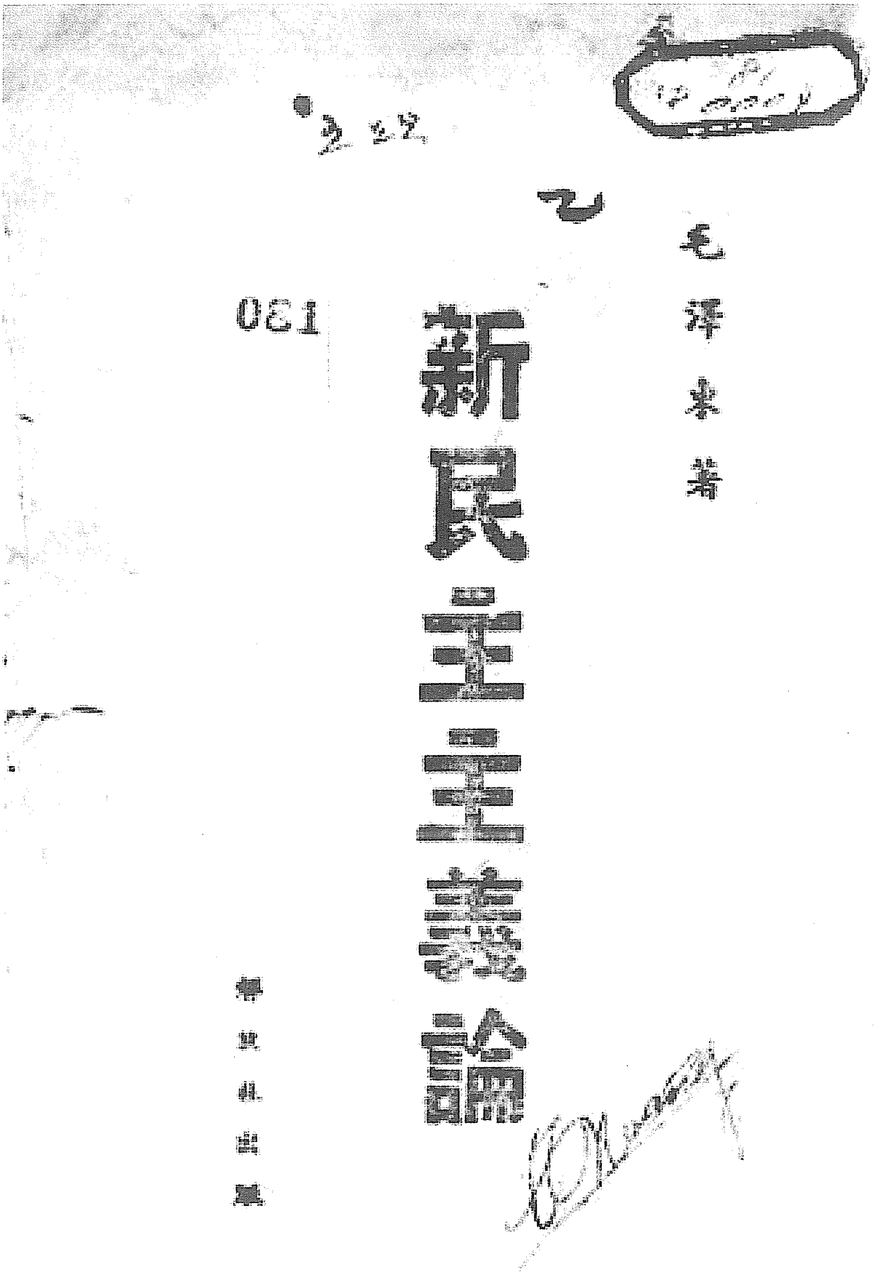
[1] “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19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毛澤東著

新民主主義論

解放社出版

1940年3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最早的《新民主主义论》单行本。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

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1]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

---

[1] 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6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6月3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

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农人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面，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

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劢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

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1]（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

---

[1]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1]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

---

[1]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达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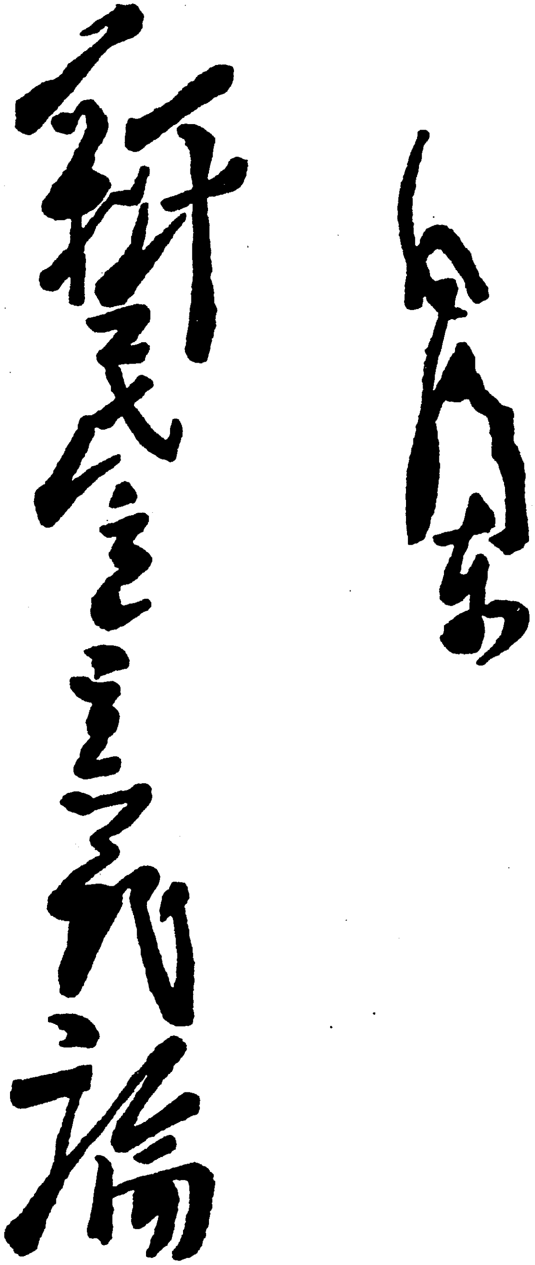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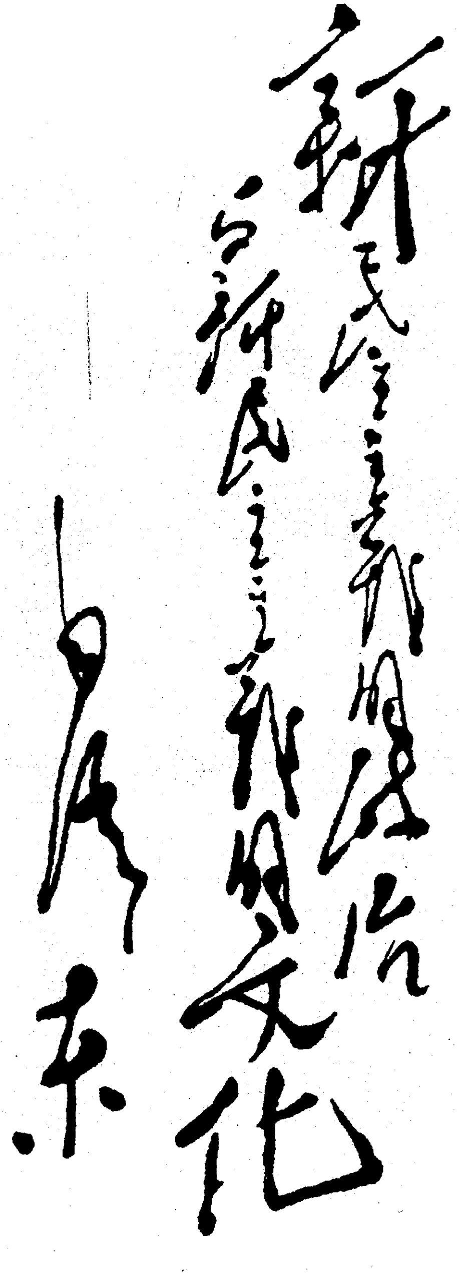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新民主主義論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民主主义论》题写的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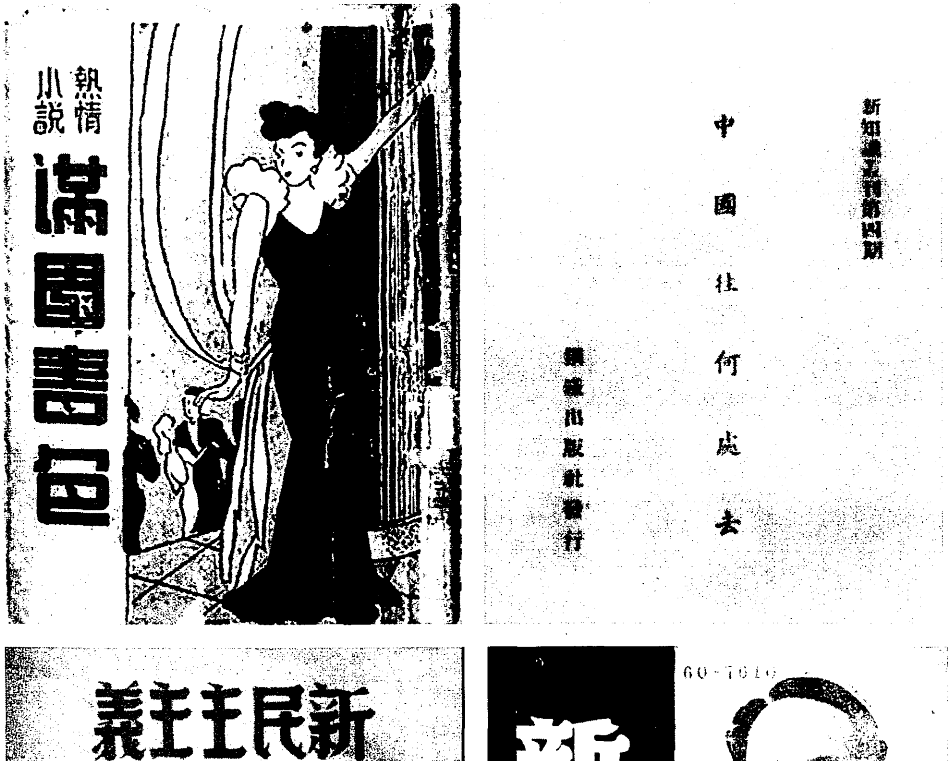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毛泽东

毛泽东题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熱情小說
滿園春色
新知識叢刊第四期
中國往何處去
觀察出版社發行
新民主主義
北平文化服務社出版
新民主主義論
60-1010
新中國現勢叢書
叶　平　若
新潮出版社印行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本）。

毛澤東選集

新民主主義論

4·24

1949年2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新民主主义论》。

致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电[1]

（1940年1月20日）

旧派在晋西北失败后，有可能再调兵反攻晋西北或由日寇进攻晋西北，而旧军则袭击后方。同时阎必与中央更加勾结，以谋夺取晋东南。因此晋西北必以突击方式，抓紧目前有利时机，进行一切工作。一切应当快做，迟缓就会失掉时机。晋西北新政权总机关，应当立即成立，愈快愈好。晋西北新政权的各种政策仿效晋察冀边区。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等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扬[1]的信

（1940年1月21日）

周扬同志：

文章虽算写好了，但还待汇集意见加以最后修改，还得两三天才能将最后修正稿交你付印，累你等得太久了！现送上初稿一份，请加审阅、指正、批示，并退我为盼！

毛泽东

二十一日

---

[1]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1937年9月赴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文艺战线》主编等职。

给周扬的信

（1940年1月23日）

周扬同志：

我的感冒还未好，字还要等两天才能写好送来。兹先将文章送上，请付印，清样打好后，请给我自己校对一次。你对此有何意见，仍请阅示，以便校对时修改。前送上的那一份，仍请退还。

毛泽东

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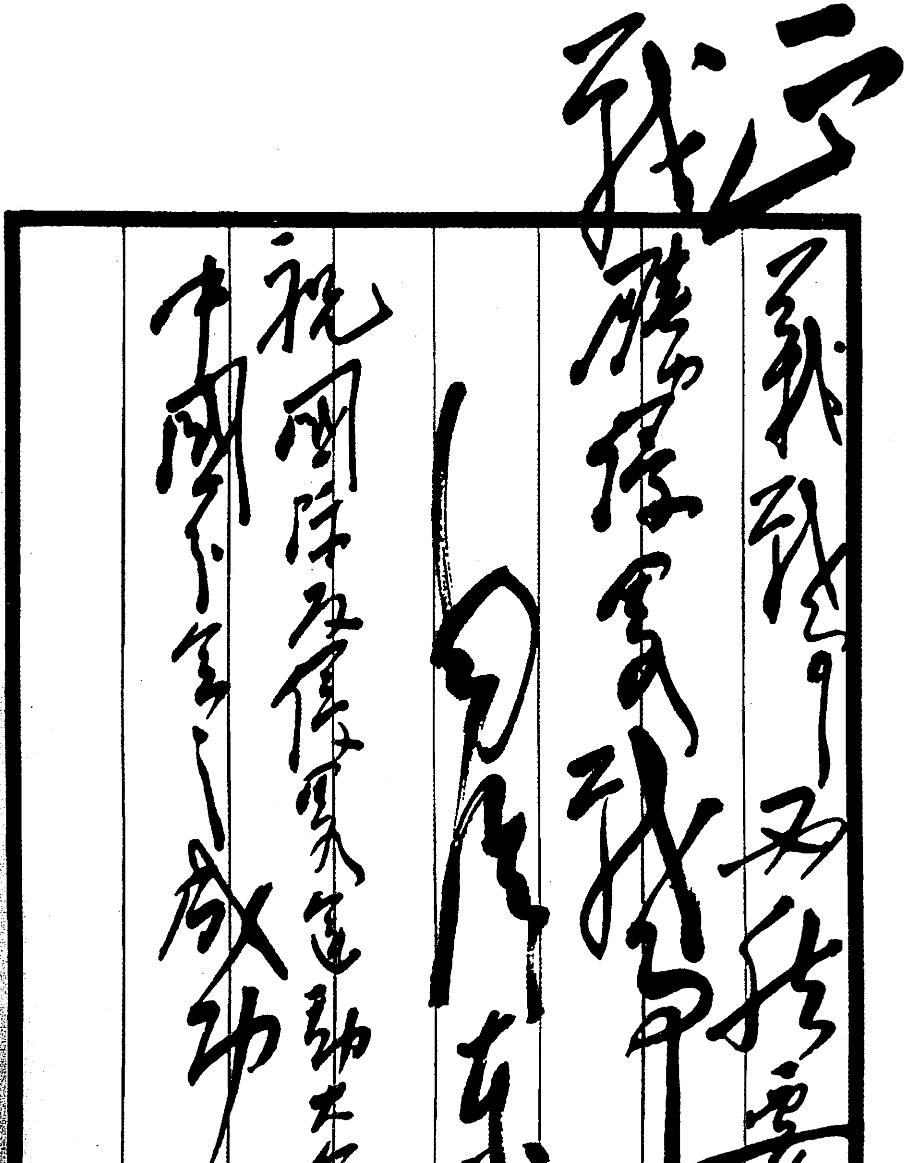
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两周年题词

（1940年1月23日）

正义战争必然要战胜侵略战争。

毛泽东

祝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之成功。



正义战争一定要战胜侵略战争

毛泽东

祝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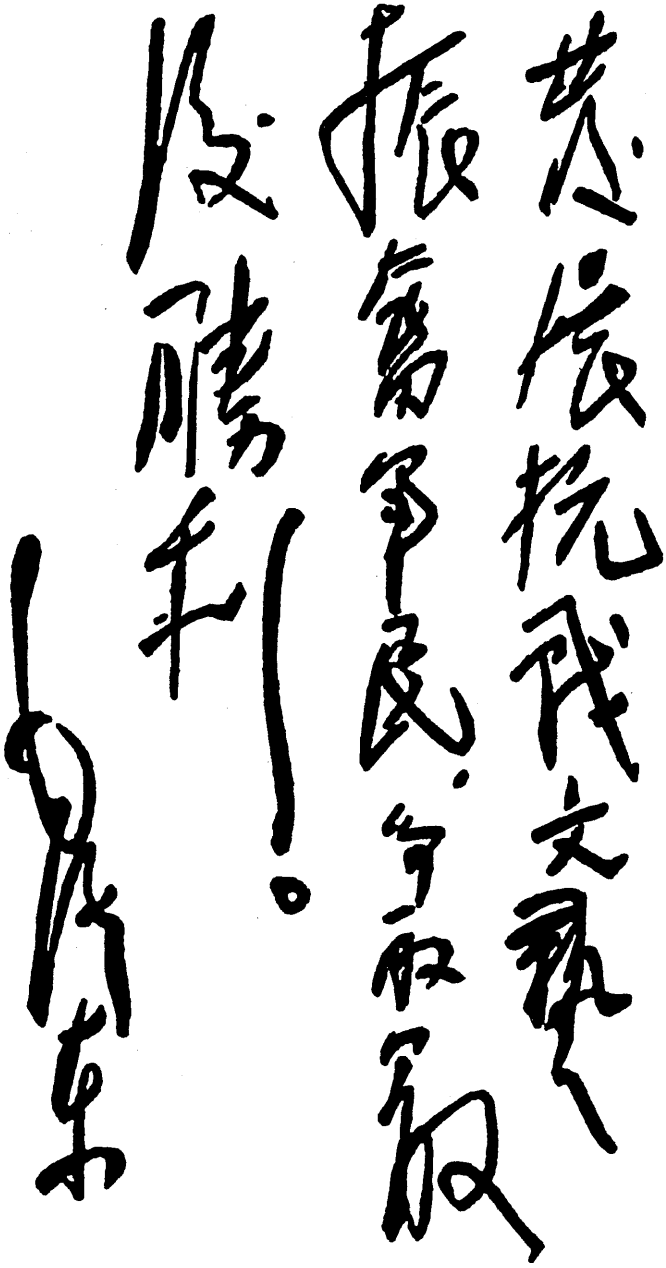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两周年的题词。

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题词

（1940 年 1 月 24 日）

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毛泽东



发展抗战文藝，振奮軍民，争取最後勝利。

毛泽东

毛泽东为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月24日）

一

我党过去的财政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中央苏区，没有财政经济工作所造成的物质基础，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经济工作人员便没有饭吃，所以总务处长是第一个英雄。对边区的公粮征收，要注意积蓄力量，不要一次征光了。羊毛不能一次搞光了，动员人力也是如此。

二

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让步，而是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还是坚持三军九师、二十三县，不能再让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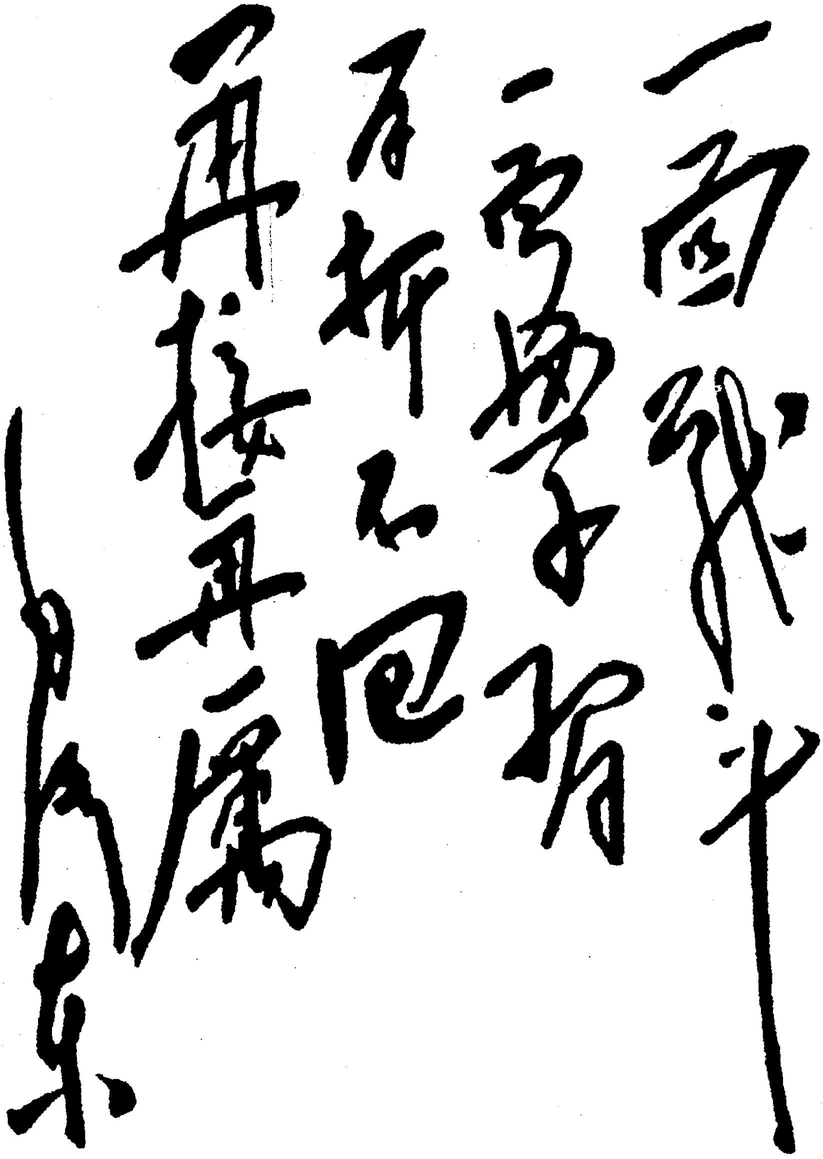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1940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题词

（1940年1月25日）

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

毛泽东



一面战斗
一面学习
百折不回
再接再厉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一周年的题词。

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朱德等电[1]

（1940年1月27日）

朱、彭、杨，贺，关，聂，彭[2]：

（甲）薄一波，戎子和，续范亭，任雷民[3]，宋劭文，张文昂，韩钧及各地牺盟民青应继续不断打电给阎、梁、杨痛陈王陈孙赵[4]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惨杀抗日人员的罪恶，并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愿在阎领导下团结抗日决无他求，以示仁至义尽。（乙）此间已用萧劲光名义向阎提议调停并指明陈支队被攻，吕梁山八路兵站线被消灭，八路伤兵被惨杀，晋东南七县八路人员被惨杀者七十余人，引起八路深为不安，但八路愿意继续团结在阎领导下抗战，如阎愿意谈判则准备派人去谈。

毛　王

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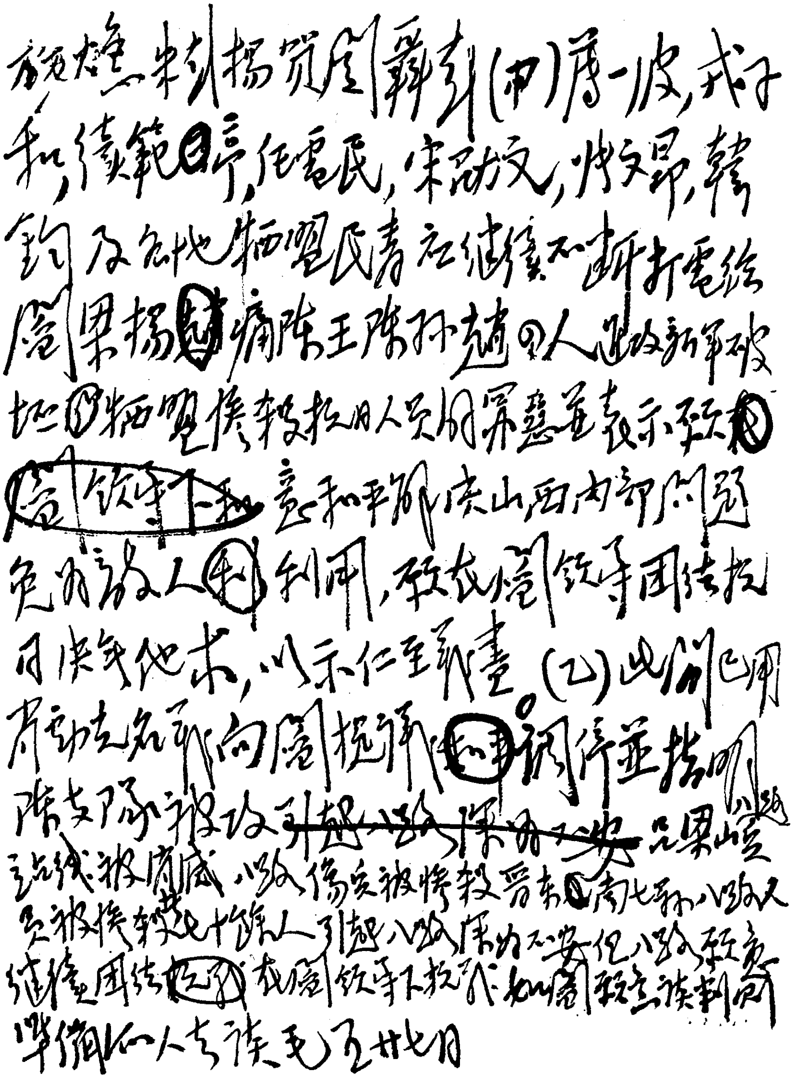
---

[1] 原件无年、月，本文日期是根据内容判定的。

[2] 姓名全称是：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

[3] 任雷民，应为雷任民。

[4] 姓名全称是：阎锡山、梁化之、杨爱源、王靖国、陈长捷、孙楚、赵承绶。



[illegible]朱彭杨贺阎锡山（甲）薄一波、戎子和、续范亭、任雷民、宋劭文、[illegible]、韩钧及各地牺盟、民青、决死纵队不断打电给阎，[illegible]痛陈王陈孙赵四人进攻新军破坏牺盟惨杀抗日人员的罪恶，并表示愿~~阎领导下和~~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免为敌人利用，致使阎领导团结抗日决策化术，以示仁至义尽。（乙）此间已用肖劲光名义向阎提议调停并指明陈支队部被攻~~引起八路深为不安~~八路吕梁山区交通线被截断，八路伤兵被惨杀，晋东南七千八路人员被惨杀七十余人，引起八路深为不安，但八路仍愿继续团结在阎领导下抗战，如阎愿意谈判，此间准备派人去谈。毛王　廿七日

1939年底至1940年初，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发动军事进攻，掀起反共高潮。图为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和平解决晋西事变致朱德、彭德怀等电的手稿。

集中力量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年1月28日）

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并告中原局，彭雪枫、项英、陈毅[1]：

甲、十二月九日中央曾有长电，要你们在山东全境及华中发展数十万军队，组织数百万自卫军。中原局方面已经了解正在进行，山东及一一五师方面尚无复电，不知你们同意否？能够办到否？

乙、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局好转。而现时能够发展武装的地区，主要的只有山东与华中。

丙、因此请你们严重注意此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在今年一年内，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包括游击队）到十五万人枪（一一五师应分配干部与兵力到山东全境去），中原局至少发展到十万人枪，按此大概目标，具体分期实现。据山东来人说山东民枪甚多，应能实现此数，据胡服[2]电告，中原方面半年可发展到十万，但具体计划，由你们决定之。

丁、没有自卫军的广大发展，即无法广大发展军队，无法建立

---

[1] 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2] 胡服，即刘少奇。

巩固根据地。因此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有十五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有十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自卫军。现在你们的自卫军还太少。

戊、要建立这样大的武装力量，没有政权是不行的。因此必须以坚决与逐步的计划，极力争取山东、豫东、皖北、苏北的大部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己、争取这样的军队、自卫军与政权，是一个严重斗争过程，因此不能避免有理又有利的磨擦。凡阻碍抗日进步势力发展并向我攻击之反动势力与顽固派，我必须坚决反击之，对于这种人，原则上决不能丝毫让步。而我应极力争取并与之共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乃是一切进步的与比较进步的势力。对于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1]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

庚、国民党有加派军队进入鲁苏战区的计划，因此你们应加速自己的布置，要在他们未到以前，你们的阵地已经大体上巩固了。

辛、要使全党干部明白这个正确的发展路线，才能造成猛力向前的作风，才能实现这个计划。集中一切力量为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乃是你们最主要最主要的任务。要使干部明白，没有伟大革命武装与伟大革命根据地，抗日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央书记处

一月二十八日

---

[1] 于学忠（1890—1964），山东蓬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李明扬（1890—1978），江苏萧县（今属安徽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

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1]

（1940年1月28日）

目前时局发展的情况，证明中央的历次估计是正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和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的抗战方向，是对立的，双方在斗争中。目前是两种方向同时存在，两种前途都有可能。在这里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必须认清目前国内国际尚存在着许多利于我们争取继续抗战、继续团结和继续进步的客观条件。例如，日本对华方针依然是非常强硬的；英美法和日本之间的矛盾虽已部分缩小，但并未真正协调，而且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又被欧战削弱，因而所谓远东慕尼黑会议很难召集；苏联积极援助中国，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际条件。又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反对投降，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中间阶级也反对投降；国民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内部投降派和顽固派虽然握有权力，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这些都是使国民党不易投降妥协和不易举行全国反共战争的国内条件。在上述情况下，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

汪精卫公布卖国协定[1]和蒋介石发表告国人书之后，一方面，和平空气必受一个打击，抗战势力必有一个发展；又一方面，则“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还会继续，地方事变还会发生，国民党有强调所谓“统一对外”以进攻我们之可能。这是因为在最近时期内，抗战和进步势力还不可能发展到足以全部压服投降和倒退势力的缘故。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

---

[1] 指1939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交付汪精卫集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该“要纲”由脱离汪精卫集团的高宗武、陶希圣1940年1月在香港公布。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与日方秘密签订了这个卖国协定，其内容有所修改。

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蒋的宣言表示了他要继续抗战，但是他没有强调全国必须加强团结，没有提到任何坚持抗战和进步的方针；而没有这种方针，便无法坚持抗战。因此，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五）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六）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民主政治；（七）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各地应大量发表文章、宣言、传单、演说和小册子，并增加适合地方情况的口号。

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

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1]

（1940年1月29日）

项、叶同志：

甲、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乙、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丙、经费绝无他项出路，全党均须自力更生。

毛　王

一月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

在自卫原则下给进攻者以彻底打击[1]

（1940年1月30日）

朱、彭，杨，刘、邓[2]，并告朱、徐，陈、罗[3]：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4]，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应号召我八路全体军队，号召两省全

---

[1] 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他们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磨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封锁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先后袭占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数个县城。阎锡山积极策划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制造了晋西事变（又称十二月事变）。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则于1939年12月初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磨擦。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也在冀南加紧向八路军进攻。这是毛泽东就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3] 朱、徐，指朱瑞、徐向前，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和司令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

[4]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六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游击总司令。

体人民，坚决打击一切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者，应公开普遍宣传“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的就是汉奸”“打倒进攻八路军的汉奸”“打倒进攻决死队[1]的汉奸”“打倒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作有效的配合。此方针同样适用于山东，望山东亦坚决这样做。

中央书记处
一月三十日

---

[1] 决死队，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实际领导的属第二战区晋绥军建制的一支抗日武装，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蒋介石、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但未能得逞。

关于扩军问题的指示[1]

（1940年1月30日）

今年扩军三十万原则很对，但具体分配主要部分应放在有枪区域，我们意见在老黄河以北，以供消耗及收集残枪为原则。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扩军问题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山西新旧军冲突我之工作方针问题致朱德等电[1]

（1940年1月31日）

朱、彭，杨，贺、关：

甲、据王世英处消息，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因此山西及反新派斗争可能一时期中处于麻痹状态中。

乙、我们应利用这种状态，进行下列工作：

（1）巩固晋西北，把它五台区化。巩固新军，扩大我们的力量。

（2）新军领袖应发起一个和平攻势，向阎梁通电，痛切陈词，拥阎抗战，说明过去冲突是由通敌的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的。新军新派是完全防守的，现在新军愿和平解决，条件是：（一）惩办祸首。（二）划分新旧军驻防区域。（三）抚恤新派死难人员及家属。（四）坚决实行阎先生十大纲领，由晋东南、晋西北新派领袖分别出面。除通电外，还可向群众及各界人士发表宣言。（五）停止屠杀新派人员并保证以后不发生同样事件。

（3）八路军可向阎表示愿为和平解决而效力，此间已用萧劲光名义致电楚参谋长表示此意（此电已转你们）。我们意见，朱彭贺关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的电报。

亦可致电阎先生，贺关在晋西北应公开，师部回来理由是巩固山西抗战，调解新旧冲突，不愿坐视本师所创造出的晋西北根据地被瓦解。

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在和平无望，武装冲突又起时，我们取得政治上有利地位。因为社会人士更易了解冲突责任是在旧派身上，更对我会更表同情。

毛　王

一月三十一日

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1]

（1940年1月）

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奋斗。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

[1]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40年1月4日在延安召开，12日闭幕。这是毛泽东为大会写的两则题词。

为《中国文化》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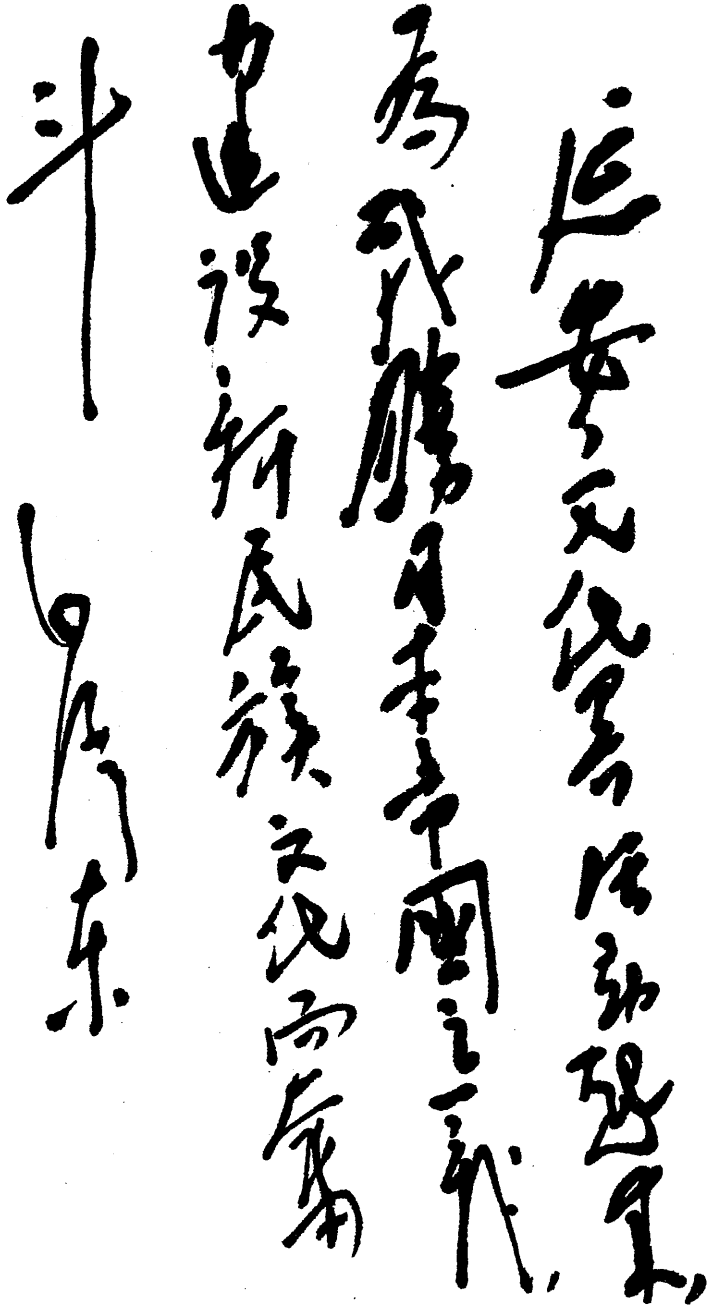
（1940年1月）

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办的《中国文化》创刊号所写的题词。



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國主义，为建设新民族文化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文化》创刊号的题词。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1]

（1940年2月1日）

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在湖南就闹平江惨案[2]，在河南就闹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所作的讲演。

[2]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6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惨杀新四军留守处十几个干部，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千余人。

确山惨案[1]，在山西就闹旧军打新军[2]，在河北就闹张荫梧打八路军[3]，在山东就闹秦启荣打游击队[4]，在鄂东就闹程汝怀杀死五六百个共产党员[5]，在陕甘宁边区就闹内部的“点线工作”[6]、外部的

---

[1] 确山惨案，也称竹沟惨案、竹沟事变。1939年11月11日，河南省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国民党反动武装1800余人，围攻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留守处，惨杀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当地群众共200余人。

[2] 旧军，指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指挥的晋绥军。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1939年12月，阎锡山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与日本侵略军相勾结，集中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新军奋起反击，在八路军的支援下，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同时，在山西的东南部，旧军又同国民党中央军中的顽固派相配合进攻新军，摧毁沁水、阳城、晋城、高平、长治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3] 张荫梧，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从1938年以来，他就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令下，不断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1939年6月，他率部袭击河北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惨杀八路军干部和战士400余人。

[4]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在国民党当局的指使下，他不断地制造同八路军的磨擦。1939年3月30日，他的部队在山东博山太河镇伏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南下受训干部及护送部队，逮捕和杀害团级以下干部200余人。到1940年春，他已经残杀了八路军在山东的游击队和地方工作人员700余人。

[5] 程汝怀，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鄂东行署主任、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从1939年6月至9月，他先后多次调集部队，围攻新四军在鄂东的游击部队和后方机关，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人。

[6] 1939年后，国民党派遣特务间谍进入陕甘宁边区，发展秘密党员、特务，建立据点，设置情报网，并通过若干秘密交通线进行联系。这种反革命的特务活动，他们自称为“点线工作”。

“封锁工作”，并且还准备着军事进攻[1]。此外，又逮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2]；又雇请玄学鬼张君劢提出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主张，雇请托洛茨基分子叶青等人做文章骂共产党。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3]。

这样，汪精卫派和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两家里应外合，把时局闹得乌烟瘴气了。

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当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了这些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

---

[1] 在1939年初至1940年6月，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了边区所属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5座县城。

[2] 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办法，从中国西北的兰州、西安至东南的赣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很多集中营，用以囚禁大批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

[3]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的反共活动逐渐积极。1939年2月，蒋介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华中、华北各地，对于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日益加强。这种压迫和进攻，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达到了高潮，被称为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举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在陕西、甘肃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在山西西部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就是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大的军事进攻。在此以后，在1940年的二、三月间，蒋介石又指令国民党反动派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匪部，三路进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这次进攻被八路军彻底击败，国民党军的3个师被消灭，而蒋介石所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就此被完全打退了。

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向八路军新四军阵地后面打枪的人，对于那些敢于闹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的人，对于那些敢于破坏边区的人，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要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谁也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这就是我们党的两条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我们决不悲观失望，我们是乐观的。我们不怕任何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我们一定要粉碎他们，我们也一定能够粉碎他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一定的，中国决不会亡国。中国的进步是一定的，倒退只是暂时的现象。

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有些人单单强调了抗日，但不愿意强调团结和进步，甚至完全不提团结和进步，这是不对的。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强调统一，但是他们的所谓“统一”，乃是假统一，不是真统一；乃是不合理的统一，不是合理的统一；乃是形式主义的统一，不是实际的统一。他们高唤统一，却原来是要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说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存在，中国就不统一，他们要把全国一切都化为国民党；不但继续他们的一党专政，而且还要扩大他们的一党专政。如果是这样，那还有什么统一呢？老实说，过去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真心实意地出来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那就无人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人领导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那就无从实行抗日。今天如果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真心实意地出来维持抗日的大局，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倾向，那就会弄得一团糟。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人挡住了五分之二的敌人，和四十个日本师团中的十七个师团打[1]，为什么要取消他们呢？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

---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抗击的日本侵略军的数目，在后来有了变动。到1943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人民武装抗击了侵华日军总数的64%和全部伪军的95%。

饭[1]，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同志们，当然不能是这样的。不是取消边区，而是全国要学习边区；不是取消八路军、新四军，而是全国要学习八路军、新四军；不是取消共产党，而是全国要学习共产党；不是要进步的人们向落后的人们看齐，而是要落后的人们向进步的人们看齐。我们共产党是最主张统一的人，我们发起了统一战线，我们坚持了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了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谁人能够提出这些呢？谁人能够实行这些呢？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2]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统一，统一，投降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投降；反共顽固派有一套统一论，要我们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我们能够信这些道理吗？不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统一，算得真统一吗？算得合理的统一吗？算得实际的统一吗？真是做梦！我们今天开大会，就是要提出我们的统一论。我们的统一论，就是全国人民的统一论，就是一切有良心的人的统一论。这种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只有进步才能团结，只有团结才能抗日，只有进步、团结、抗日才能统一。这就是我们的统一论，这就是真统一论，这就是合理的统一论，这就是实际的统一论。那种假统一论，不合理的统一论，形式主义的统一论，乃是亡国的统一论，乃是丧尽天良的统一论。他们要把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消灭，要把一切地方的抗日力量消灭，以便统一于国民党。这是阴谋，这是借统一之名，

---

[1] “吃磨擦饭”，即是说有些国民党人以反共为专门职业。

[2] 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每人每月的伙食费和津贴费平均为银币5元。

行专制之实，挂了统一这个羊头，卖他们的一党专制的狗肉，死皮赖脸，乱吹一顿，不识人间有羞耻事。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

（1940年2月1日）

二月一日延安举行讨汪大会，全场义愤激昂，一致决议声讨汪精卫之卖国投降，拥护抗战到底。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起见，谨陈救国大计十端，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

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奉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

二曰加紧团结。今之论者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其意盖谓惟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不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乃全国主张统一之最力者。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者，非共产党、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

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建立统一民主共和国而身体力行之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立于国防之最前线抗御敌军十七个师团，屏障中原、西北，保卫华北、江南，坚决实行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者，非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乎？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若夫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边区，则坚决提倡真统一，反对假统一；提倡合理的统一，反对不合理的统一；提倡实际上的统一，反对形式上的统一。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以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为基础之统一乃真统一，乃合理统一，乃实际统一。舍此而求统一，无论出何花样，弄何玄虚，均为南辕北辙，实属未敢苟同。至于各地方抗日力量，则宜一体爱护，不宜厚此薄彼；信任之，接济之，扶掖之，奖励之。待人以诚而去其诈，待人以宽而去其隘。诚能如此，则苟非别有用心之徒，未有不团结一致而纳于统一国家之轨道者。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二。

三曰厉行宪政。“训政”多年，毫无结果。物极必反，宪政为先。然而言论不自由，党禁未开放，一切犹是反宪政之行为。以此制宪，何殊官样文章。以此行宪，何异一党专制。当此国难深重之秋，若犹不思变计，则日汪肆扰于外，奸徒破坏于内，国脉民命，岌岌可危矣。政府宜即开放党禁，扶植舆论，以为诚意推行宪政之表示。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诚未有急于此者。此应请采

纳实行者三。

四曰制止磨擦。自去年三月倡导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限共、溶共、反共之声遍于全国，惨案迭起，血花乱飞。犹以为未足，去年十月复有所谓《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其在西北、华北、华中区域，复有所谓《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论者谓已由“政治限共”进入“军事限共”之期，言之有据，何莫不然。盖所谓限共者，反共也。反共者，日汪之诡计，亡华之毒策也。于是群情惊疑，奔走相告，以为又将重演十年前之惨剧。演变所极，湖南则有平江惨案，河南则有确山惨案，河北则有张荫梧进攻八路军，山东则有秦启荣消灭游击队，鄂东有程汝怀惨杀共产党员五六百之众，陇东有中央军大举进攻八路驻防军之举，而最近山西境内复演出旧军攻击新军并连带侵犯八路军阵地之惨剧。此等现象，不速制止，势将同归于尽，抗战胜利云乎哉？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四。

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六曰援助前线。最前线之抗日有功军队，例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军队，待遇最为菲薄，衣单食薄，弹药不继，医疗不备。而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

欲聋。有功不赏，有劳不录，而构搆愈急，毒谋愈肆。此皆将士寒心、敌人拊掌之怪现象，断乎不能容许者也。宜由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搆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六。

七曰取缔特务机关。特务机关之横行，时人比诸唐之周兴、来俊臣[1]，明之魏忠贤、刘瑾[2]。彼辈不注意敌人而以对内为能事，杀人如麻，贪贿无艺，实谣言之大本营，奸邪之制造所。使通国之人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者，无过于此辈穷凶极恶之特务人员。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七。

八曰取缔贪官污吏。抗战以来，有发国难财至一万万元之多者，有讨小老婆至八九个之多者[3]。举凡兵役也，公债也，经济之统制也，灾民难民之救济也，无不为贪官污吏借以发财之机会。国家有此一群虎狼，无怪乎国事不可收拾。人民怨愤已达极点，而无人敢暴露其凶残。为挽救国家崩溃之危机起见，亟宜断行有效办法，彻底取缔一切贪官污吏。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八。

九曰实行《总理遗嘱》。《总理遗嘱》有云："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

---

[1] 周兴、来俊臣，公元7世纪末唐武则天时的酷吏。他们实行广泛的秘密侦察，任意用伪造的罪名逮捕他们所不喜欢的人，并且使用各种酷刑，加以残杀。

[2] 刘瑾，公元16世纪明武宗时的宦官；魏忠贤，公元17世纪明熹宗时的宦官。他们掌握大权，运用名为"厂卫"的庞大的特务组织，控制人民的言论和行动，并且用各种酷刑迫害和虐杀反对他们的人。

[3] 这里是指当时驻西安的国民党反动军事首领蒋鼎文。

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我四亿五千万人民实闻之矣。顾诵读遗嘱者多，遵循遗嘱者少。背弃遗嘱者奖，实行遗嘱者罚。事之可怪，宁有逾此？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九。

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所奉行之主义。顾无数以反共为第一任务之人，放弃抗战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则多方压迫制止，此放弃民族主义也；官吏不给予人民以丝毫民主权利，此放弃民权主义也；视人民之痛苦若无睹，此放弃民生主义也。在此辈人员眼中，三民主义不过口头禅，而有真正实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严刑。由此怪象丛生，信仰扫地。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则三民主义庶乎有实行之日，而抗日事业乃能立胜利之基。此应请采纳实行者十。

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

（1940年2月1日）

目前国内时局的特点是在敌我战略相持阶段中，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方向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抗战方向两方面展开日益明显日益严重的斗争。由于国内抗日进步势力克服投降倒退的力量还不足，就使得投降与倒退的危险依然严重地存在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但由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阻力，国民党中大多数人的阻力，全国人民的阻力，日本灭华的坚决方针，英美法与日本之间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欧战削弱了英法在远东的地位，因而很难迅速召集远东慕尼黑会议，苏联的强大及其积极援华的方针等国内国际的条件，就使得投降与举行全国的反共战争甚为困难。由于这两方面的情况，就使目前抗日进步势力和投降倒退势力形成了一个严重斗争的局面。双方斗争的结果，或者是时局的好转，或者是时局的逆转。但好转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如有正确方针，加上全国的努力，是能够改变目前局面，争取时局好转的。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如果以为时局好转的可能性已

---

[1] 这个决定是由毛泽东起草的。

经丧失，只是一个逆转的前途，因而不去力争好转，只是消极地准备对付全国性的突然事变，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最近日汪协定的披露，伪中央政府的准备成立，与蒋介石反汪宣言的发表，给了国内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一个新的打击，又给了抗战派联共派与进步派一个新的推动，这是对于争取时局好转有利益的。但是目前投降倒退势力不但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且有更加猖獗的可能，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还会继续发生。这是由于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国内投降倒退势力相呼应，而抗日进步势力一时还不可能迅速团结起来去克服投降倒退势力的缘故。蒋介石宣言强调了抗战，但没有强调团结与进步，而没有全国的团结与进步，则坚持抗战与争取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克服逆转可能，争取时局好转，还是一个艰苦斗争的过程。而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事变），仍应提起高度的警觉性。

为了力争时局好转，克服逆转危险，必须强调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坚决执行下列的十大任务：第一便要普遍扩大反汪反汉奸的宣传，坚决揭穿一切投降分裂的阴谋，从思想上政治上打击投降派与反共派，坚决明确与具体地证明反共是投降派准备投降的反革命步骤。第二便要猛力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组织进步势力，同国民党的大多数亲密地合作，用以对抗投降派与反共派。第三便要广泛开展宪政运动，力争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第四便要抵抗一切投降反共势力的进攻，对任何投降派、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均须在自卫原则下，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下坚决反抗之，否则任其猖獗，统一战线就会破裂，

抗日战争就要失败。第五便要大大发展抗日的民众运动，团结一切抗日的知识分子，并使知识分子与抗日民众运动抗日游击战争相结合，否则就没有力量打击投降派、反共派与顽固派。第六便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第七便要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上建设完全民选的没有任何投降反共分子参加的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政权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而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对一切破坏抗日根据地的阴谋，必须加以坚决的打击。对一切暗藏在抗日武装、抗日政权、抗日团体中的汉奸反共分子，必须加以肃清。第八便要巩固与扩大进步的军队，没有这种军队，中国就会亡国。第九便要广泛发展抗日的文化运动，提高抗日人民抗日军队与抗日干部的文化水平与理论水平。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第十便要巩固共产党的组织，在无党和党弱的地方要发展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就不能解决抗日救国的任何重要问题。如果能坚决地并具体正确地执行上述十大任务，就一定能够强固抗日进步力量，克服投降倒退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击破大资产阶级分子破坏抗战与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

目前宣传鼓动的口号是：

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

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汉奸汪精卫；

三、拥护国民政府，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

四、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

五、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一切反共的

汉奸；

六、加紧全国团结，消灭内部磨擦；

七、革新内政，开展宪政运动，树立抗日民主政权；

八、开放党禁，允许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

九、人民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权；

十、发展民众运动，实行减租、减息、减税，改良工人生活；

十一、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汉奸、反共派、顽固派的阴谋破坏；

十二、拥护抗日有功的军队，充分接济前线；

十三、发展抗日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

十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复王世英电[1]

（1940年2月2日）

世英同志：

来电意见甚对，我们极力调解山西新军与旧军的冲突。谅新军会赞同的，惟旧军需停止进攻，阎锡山对新军须有安慰，否则冲突不已，妨碍团结抗战，望向阎锡山表示此意。

毛　王

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新旧军冲突问题给王世英的复电。

致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电[1]

（1940年2月3日）

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诸先生勋鉴：

近顷以来，此间迭据报告，陕甘晋冀豫等省特务机关，通令所属，略谓国民参政会华北视察团行将莅临，主要任务在于搜集材料，证明此数省磨擦事件之发生，其咎均在于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然后携返后方，向当局建议处理办法。并在下届参政会中提出议案，实行取消边区与八路军之特殊化，并乘机打击共产党。着各地特工人员，注意搜集材料，并配合党、政、军各机关，准备欢迎视察团，务达上项目的等情。鄙人等以事属离奇，未敢置信。顷接尊处电示，始知果有视察团之组织。复查此视察团之团长团员，不仅无一共产党参政员被邀参加，且连第四次参政会中提出组织此类视察团之原提案人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诸先生，以及素以老成硕望公正无私著称之张一麟、黄任之、江恒源、张表芳等诸先生，亦无一参加，在全体团长团员中，除在二届参政会中，因发拥汪主和谬论而与共产党参政员及坚主抗战诸参政员发生剧烈冲突之国社党员梁实秋及国家青年党员余家菊两君外，余皆国民党一党之参政员同志。由此等人选所组成之视察团，对于视察事项所收材料

---

[1] 这是毛泽东和陈绍禹（王明）、林祖涵、吴玉章关于“华北视察团”事给国民参政会的电报。

及所作结论，必属偏私害公殆无疑义。该团之与特务机关配合行动，尤属事有必至。犹忆前年十二月间，张君劢即曾著论主张取消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特殊化及取消共产主义。未几，汪精卫发表艳电，竟倡言反共。设该视察团之目的与汪、张无殊，尽可以汪张文件为蓝本，在渝作出大文，撰成提案，何必当此朔风凛冽之际，冒此严寒，多劳往返。如以为非有实地视察之名，不足以收牢笼社会视听之效，则以此等有特殊关系之人物从特务机关手里收集向壁虚造之材料，写成一本二三十万字之视察报告书，痛骂共产党一顿，谓即足为反共限共溶共之法律根据，则亦仍属可笑之事。盖国内政治问题，原只能从合理之政治原则获得解决，岂有卖弄玄虚，而能真正解决问题者乎。或曰，你们共产党所云，未免估计不当，该视察团此行，盖十分正大光明，毫无腌臜龌龊之心理，其任务在于维系两党合作，立于团结与进步基础上，共谋边区等事之合理解决也。若然，则鄙人等所言幸而不中，而国事实获进步之益，鄙人等当于该团来延安时，准备以陕北特产之小米饭、高粱酒，接待诸参政员同人，与之对雪举杯，畅论团结救国之大计，决不至慢待嘉宾也。敬祈贵处代为转达为荷。

此致

敬颂勋祺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林祖涵　吴玉章

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2月3日）

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决心从左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皖南部队准备在国民党许可下移至皖东。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下新四军行动方针问题致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给陈云的信

（1940年2月3日）

文章有用，并可在军政杂志上发表。文字上与某些观点上我认为不妥的，改了，是否妥当，请你自己酌定。题目不恰当，游击区的重心还是游击队，不是游击小组，没有游击队，游击小组是不能存在的。不宜太夸大游击小组的作用。

坚决彻底消灭石友三部[1]

（1940年2月3日）

对石友三部应采取坚决彻底消灭政策，争取方针已不适用了[2]。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月下旬，国民党军石友三部在河北南部的南宫、威县、枣强、清河等地，先后将八路军东进纵队二个连和青年纵队一个排包围缴械，接着又围攻东进纵队第二团和清河县大队等部，并准备夺占冀南抗日根据地。

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0年2月5日）

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的改造，改变了生产关系，因此就有了改造自然的先决条件，生产力也就日渐发展了，这从边区的生产运动和农工业展览可以表现出来，所以边区现在的社会制度是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

边区经济是落后的，但是干起来也更有意义，只要大家努力，

一定可以改造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为《中国工人》出版题词[1]

（1940年2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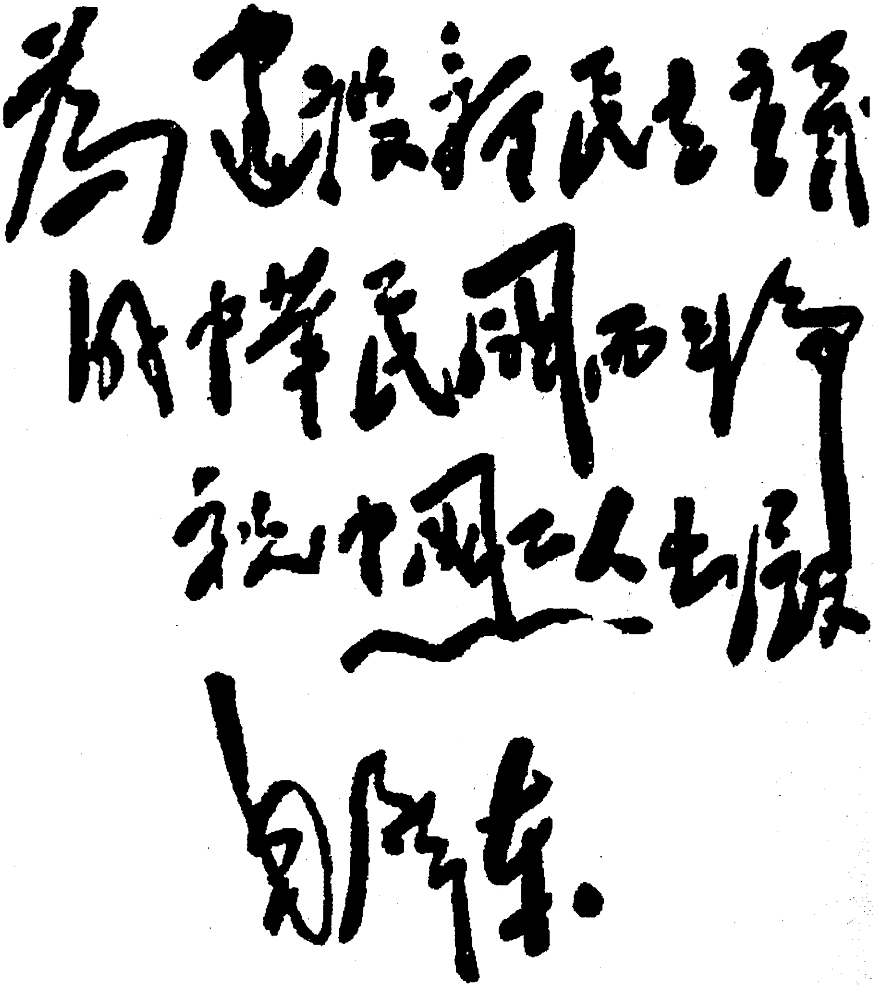
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而斗争。

祝中国工人出版。

毛泽东

---

[1] 《中国工人》杂志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的一份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刊物。1940年在延安出版时，毛泽东同志曾亲自为《中国工人》杂志撰写发刊词并题词。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工人》创刊所写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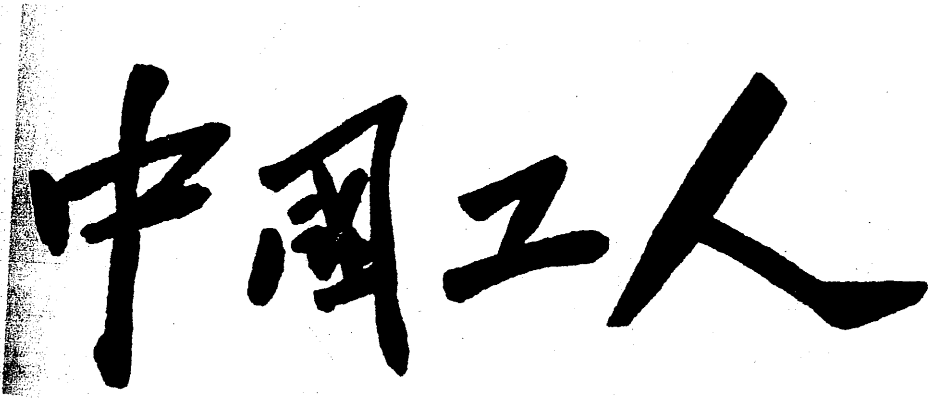
为建设新民主主义
的中華民國而斗争
祝中國工人出版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出版的题词。

为《中国工人》题名

（1940年2月7日）

中国工人



毛泽东为《中国工人》题写的刊名。

《中国工人》[1]发刊词

（1940年2月7日）

《中国工人》的出版是必要的。中国工人阶级，二十年来，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成了全国人民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联合农民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斗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这个功劳是非常之大的。但是中国革命尚未成功，还须付出很大的气力，团结自己，团结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团结知识分子，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这是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最后解放，只能在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中国工人阶级必须为此最后目的而奋斗。但是必须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阶段，才能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团结自己和团结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当前的任务。《中国工人》的出版，就是为了这一个任务。

《中国工人》将以通俗的言语解释许多道理给工人群众听，报道

---

[1] 《中国工人》月刊，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1940年2月在延安创刊，1941年3月终刊。

工人阶级抗日斗争的实际，总结其经验，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而努力。

《中国工人》应该成为教育工人、训练工人干部的学校，读《中国工人》的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工人中间应该教育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应该有知识，有能力，不务空名，会干实事。没有一大批这样的干部，工人阶级要求得解放是不可能的。

工人阶级应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决不可拒绝他们的帮助。因为没有他们的帮助，自己就不能进步，革命也不能成功。

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

以上，是我的希望，就当作发刊词。

纪念《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1]

（1940年2月7日）

延安《新中华报》自改为共产党机关报以来，已一年了。这个小型报，依我看，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没有这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要办得这样好，是不可能的。报馆诸同志的直接努力，亦是一个重要条件，没有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办好也是不可能的。但“好”是没有止境的，今年是第二年，我希望这个报纸进一步地好起来。

抗战、团结、进步，这是共产党在去年“七七”纪念时提出的三大方针。这是三位一体的方针，三者不可缺一。如果单单强调抗战而不强调团结和进步，那末，所谓“抗战”是靠不住的，是不能持久的。缺乏团结和进步纲领的抗战，终久会有一天要改为投降，或者归于失败。我们共产党认为一定要三者合一。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为了团结，就要反对分裂运动，反对内部磨擦，反对从抗日阵线后面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一

---

[1] 本篇是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一周年而写的纪念文章，原题为《强调团结与进步》，其中第二段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

切进步势力，反对破坏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反对破坏八路军的后方陕甘宁边区，反对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反对雪片一样的“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为了进步，就要反对倒退，反对把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纲领》束之高阁，反对不实行《总理遗嘱》上“唤起民众”的指示，反对把进步青年送进集中营，反对把抗战初期仅有的一点言论出版自由取消干净，反对把宪政运动变为少数人包办的官僚事业，反对在山西进攻新军[1]、摧残牺盟[2]和惨杀进步人员，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咸榆公路、陇海铁路一带拦路劫人[3]，反对讨九个小老婆和发一万万元国难财的无耻勾当，反对贪官污吏的横行和土豪劣绅的猖獗。不这样做，没有团结和进步，所谓抗战只是空唤，抗日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新中华报》第二年的政治方向是什么？就是强调团结和进步，以反对一切危害抗战的乌烟瘴气，以期抗日事业有进一步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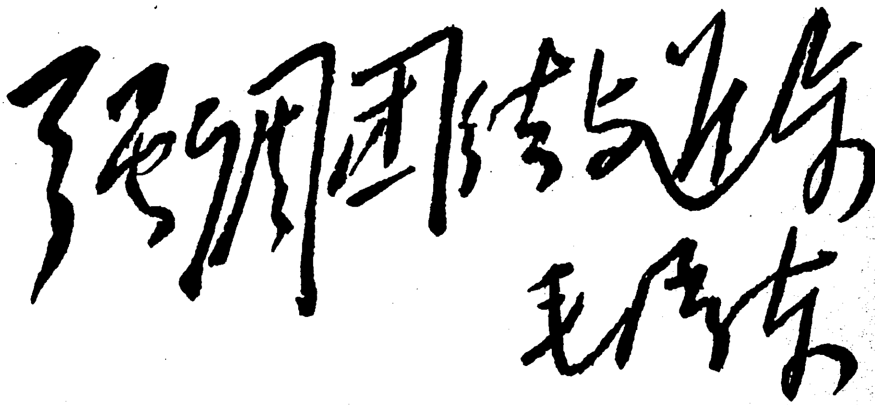
于《新中华报》新刊一周年纪念之时，书此致其希望之忱，并望与全国同胞共勉之。

---

[1] 在山西进攻新军的事件。

[2] “牺盟”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9月成立。它是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的抗日斗争中曾起了重大的作用。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并在晋东南等地的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下，公开摧残牺盟会，许多共产党员、牺盟会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进步分子，遭到残酷的杀害。

[3] 从1939年起，国民党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招待所”的名义，派遣特务，配合军队，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上设立许多封锁站口，截留出入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把他们送往集中营监禁残杀，或者强迫他们充当特务。


强调团结与进步
毛泽东

毛泽东题写的“强调团结与进步”。

为《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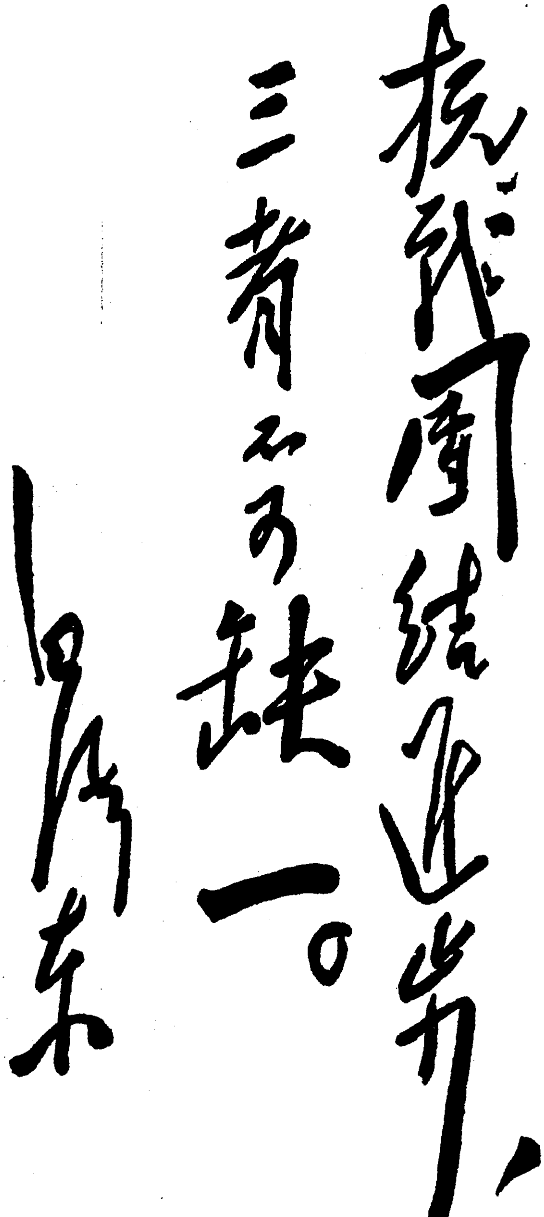
（1940年2月7日）

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中华报》由陕甘宁政府机关报改成中共中央机关报一周年而写的题词。



抗战团结进步，
三者不可缺一。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的题词。

复南方局电[1]

（1940年2月9日）

中央同意南方局所说现在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心，已不是边区应为二十三个县、军队扩编为九个师的问题，而是全国磨擦的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南方局电的部分内容。

挺进军的战略任务[1]

（1940年2月11日）

萧克同志及挺进军[2]军政委员会诸同志，并告朱、彭，杨，贺、关，聂，彭[3]：

中央规定你们的战略任务是确保平西[4]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直至热河[5]、山海关，并准备将来再向辽宁前进。这同你们所提的“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发展平北”，这些目前的任务是一致的。

因为你们区域敌情特别严重些，你们扩大军队的方针，仍应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和挺进军军政委员会诸同志并告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挺进军，指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1939年2月在北平（今北京）西部以八路军第四纵队为基础组成。其任务是在冀热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

[3] 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

[4] 平西，指北平（今北京）以西地区。

[5]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在巩固基础上，力求一步一步地扩大。如同你们发展根据地的方针是在巩固基础上一步一步扩大是一样的。

你们要注意扩大随营学校（或办抗大[1]分校），分为两部分学生，一部分是老兵、老干部，尽量抽调来训练，一部分是青年学生，大量地放手地从平、津、冀东各地招收革命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只有自力更生地大量创造干部，才能担负创造冀热察[2]三省伟大根据地的任务。

十分注意财政工作与经济建设工作，在抗大分校内设立行政工作班，教授政权工作及财政经济工作，这于支持长期战争是基本决定条件之一。

中央及军委
二月十一日

---

[1] 抗大，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简称。1936年6月1日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初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迁延安。抗大共举办八期，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学校宣告结束。

[2]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彻底消灭顽固派，极力争取有希望之人[1]

（1939年2月11日）

我们的政策分两方面，对反共派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对一切尚有希望之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沈鸿烈[2]属于顽固派，对我百端磨擦，故须在自卫原则下坚决消灭之。在打击沈鸿烈（秦启荣[3]是其最坏之一部）的斗争中要注意分化其部下，争取其尚有希望分子。于学忠[4]与沈鸿烈不同，他是尚有希望的，除对其反共政训人员应加以坚决打击外，对东北军应极力争取，至少使之取中立态度。河北磨擦事件望刘、邓[5]亦照此办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徐向前、朱瑞、陈光、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2]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

[3] 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鲁南办事处主任兼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4]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5]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关于处理晋西事变的指示

（1940年2月12日）

朱、彭，贺、关，滕[1]：

甲、据南方局电，叶剑英见程潜，程表示如下：关于山西问题，阎对新军认为是纪纲问题，不能不讨伐。但中央对新军不能照阎的办法解决（即进剿），只能把新军调开山西使之立功，将功赎罪。由中央给经费，不归八路军，因八路军亦无经费。已电朱德转告新军，嘱其派人来行营商议等语。

乙、此间用萧劲光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斗争，并愿派人见阎，〔阎〕回电辩护其讨伐新军及攻击陈支队之不得已，但无坚决不能调解之语气，对八路军亦无强硬语气，对派人见闻谈判则之〈云〉，我并不拒绝，如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等语。

丙、我们意见：

1. 阎在中央分化政策下，可能与新〔军〕成立妥协。新军亦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中央指挥，因为这些都是不利的。

2. 如朱彭接到行营电报，即转告新军领袖，要他们把行营的电报通知阎，表示新军仍归〈旧〉拥阎，不超过阎而与中央联络，新

---

[1] 指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滕代远。

军绝不宜派代表到行营或重庆去商议。

3．与阎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书〈式〉〔出〕面进行，而新军领袖则用电报与阎联络，表示希望新旧军恢复团结，共在阎领导下一致抗日。电报中只提此种愿望，不提处罚陈长捷等条件，语气须和缓些，放诚恳些，使阎面子上过得去，方有转弯余地，使阎与旧军觉得有希望，以利萧劲光前去谈判。

4．于涛可留他在行西北住两星期，那时如有用他之处，再决定要他去秋林。

5．新军内部之团结，特别重要，梁化之屡次放出空气，新军三月内必有分化。此事请你们严重注意，新军应当独立自主求生存，求发展，八路军应多给以帮助。

毛　王

二月十二日

关于对阎锡山的态度与口号致朱德、彭德怀电

（1940年2月14日）

朱、彭：

（甲）你们八日电悉，你们的决心与部署是很对的，望坚决实行。（乙）在实行时我仍取自卫立场。（丙）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枪口对外消灭磨擦”“进攻八路军的就是汉奸”“打倒从八路阵线后面进攻的汉奸”“中央军八路军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山西新旧两军团结起来停止内争一致对敌”“拥护蒋委员长阎长官卫长官抗日到底”等口号，再加上中央昨电之五个基本口号（此五个基本口号应到处发布）。（丁）将发现打倒八路军等汉奸口号事件电告蒋卫。

毛　王

十四日廿二时

为应云卫题词[1]

（1940年2月15日）

抗战、团结、进步。

---

[1] 应云卫（1904—1967），戏剧、电影导演，曾导演抗战时期第一个表现各民族团结抗日的电影《塞上风云》。该片公映时，毛泽东为之题词“抗战、团结、进步”。

为吴茵题词[1]

（1940年2月15日）

前进。

---

[1] 吴茵（1909—1991），原名杨瑛，中国著名电影演员。这是毛泽东给吴茵写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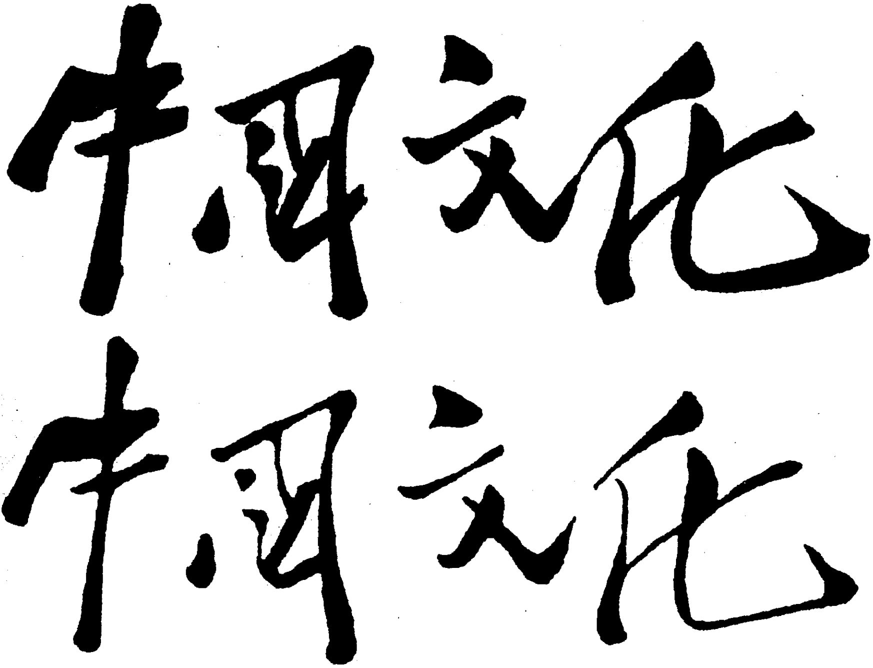
为《中国文化》题名[1]

（1940年2月15日）

中国文化

---

[1] 《中国文化》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1940年2月15日创刊。毛泽东对这个大型综合性刊物格外关心，他不仅题写刊名，还为它题词祝贺："延安文化界活动起来，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而奋斗！"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更名为《新民主主义论》）也交给《中国文化》，在创刊号上发表。



毛泽东为《中国文化》题写的刊名。

致高双成电[1]

（1940年2月16日）

转告续范亭来电称：已决定继续保证每月过河粮食六百大石[2]，敬希查照。

---

[1] 这是毛泽东致驻榆林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电的主要内容。

[2] 此前，高双成曾致电续范亭请开粮禁。

在延安青年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40年2月19日）

现在顽固分子要倒退，全国宪政运动就要促进，使其短期实现。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中国人民大众的宪政。

打日本要青年，参政也需要青年，青年不但做事，而且应该打头，青年是宪政运动的先锋队，国民大会中要有青年才好，延安青年开的会，是全国青年正确的方向，延安青年要推动全国青年起来为促进宪政运动而奋斗。

致程潜电[1]

（1940年2月19日）

国共合作已历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一县而有两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专以制造磨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在彼辈益肆无忌惮。

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旨，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府自动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2]

---

[1] 这是毛泽东为萧劲光起草的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电的主要内容，电报中要求通知陕西省政府速将陕甘宁边区境内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撤走。

[2] 后来程潜回电，同意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应由边区政府委派。这样，国民党政府任命的那些县长，便一个一个离开了边区。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1]

（1940年2月20日）

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中国国民党，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军队，各抗日民众团体，各报馆公鉴：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于二月二十日举行成立大会，谨将本会对于宪改之意见，宣言于次，敬祈政府采纳实行，并希各界人士共同促进，俾真正之民主政治得以实现，抗战前途，实利赖之。

一曰今日实施宪政之意义，在于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溯自民国成立，至今二十九年矣，然民国其名，专制其实。袁、冯、段、曹诸辈无论矣，国民党当政以来，因循故辙，亦无改进。所以然者，训政之空言高唱入云，而未以发扬民意反抗帝国主义为唯一方针也。民国十三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有云：“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盖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善哉言乎，设此宣言见诸实行，则内战之惨祸可以不作，外患亦无自而入矣。不幸此等至理名言，竟被束之高阁，而一党专政之厉行，反美其名曰训政。实则中国境内，自南至北，自通都大邑至穷乡僻壤，几曾见训正一人，训好一事。而多年训政之

---

[1] 这是毛泽东和吴玉章等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

结果，则徒见贪官污吏，恣意横行，土豪劣绅，作恶无尽，国家之纪纲，民族之元气，几为之斫丧殆尽，而外患乃得乘隙而入。抗战以来，全国奋起，为救亡而战斗，当前之绝大问题，为如何发扬民意，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论者乃欲将宪政之实施与发扬民意驱除日寇之民族存亡大问题，划然隔绝，不视宪政为救亡图存之工具，而视宪政为涂饰耳目之巧计。于是人民之宪政运动被禁止矣，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被钳制矣，国人皆曰可废之训政被宣布继续实行矣，抗战以前举办之国民大会代表选举被认为不须改选矣，不满人意之国民大会组织法被认为有效矣。凡此诸端，均属违背人民之公意，不合抗战之需要，本会同人特表示坚决之反对。本会同人敢断言，以此等办法实施宪政，决不能解决对内对外之任何问题。自非根据民意，加以彻底改变，不足以回人心而利抗战。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一也。

二曰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必须彻底修正，其代表必须重新选举。抗战以前举办之国大代表选举，虽亦不无公正之士，然所谓选举者，大多属于伪造，盖当时指导选举者为今之汉奸褚民谊，而党部则暗中包庇一切，黑幕重重，贻笑中外。其中汉奸敌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一而足。以此等代表集会制宪，必为一篇毫无用处之官样文章，以此等代表集会行宪，必为一次换汤不换药之一党专政。夫欲为所欲为，则亦为之已耳，何必多此一举，以宪政之招牌为掩饰乎？本会同人对此特表示坚决之反对。同时建议政府，彻底修正国大代表选举法，重新选举代表。盖必如此，方与团结抗战之需要相适合。否则南辕北辙，贻笑大方，断非民族国家之福。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二也。

三曰国民大会组织法必须彻底修正，国民大会应成为国家最高

权力机关。按原组织法规定国民大会职权仅为制定宪法及决定宪法施行之日期，会毕即任务终了。此其用意，在于不欲宪政之真正见诸实行，不欲国民大会成为救亡图存之权力机关，仍属一党专政之欲念作祟耳。本会同人对于此种不合抗战需要之国民大会组织法，坚决不能同意，主张彻底加以修改，主张国民大会应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第一，国民大会于制定宪法决定宪法施行日期外，应为执行宪法之机关。第二，国民大会有决定内政外交基本方针之权。第三，国民大会有选举政府监督政府与罢免政府人员之权。第四，国民大会有制定国家法律之权。第五，国民大会应设常驻机关，执行大会闭会期间之职务。盖必如此，方与目前危险时局之需要相适应，而使国民大会不变为敷衍门面之装饰品。如谓宪法由何项机关执行尚待宪法规定，国民大会组织法不能预先赋予国民大会以行宪之权力，此自欺欺人之谈也。盖国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孙中山先生所规定。孙先生尝云：“宪法颁布之后，中央统治权则归于国民大会行使之。国民大会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国民大会而非行宪之机关，试问尚有何种机关足当行宪机关之任乎？凡事之成，待于诚意，宪政而无诚意，不如不谈为佳，而诚意开放政权，诚意实行民主，诚意唤起人民管理自救救国之事业，而不作敷衍一时之计，乃为召集国民大会之根本前提。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三也。

四曰全国应发起普遍深入之宪政运动，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之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宪政而无民众运动，民众而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抗日党派而无合法存在与合法活动之权利，则一切所谓宪政，不过空谈一阵，毫无实际成效可言，有断然者。循此不变，则不论宪法条

文如何美备，亦不过一堆毫无意义之黑字。不论宪政名词如何夸张为自己早亦已提倡，亦不过一党一派独占政权之掩饰。而如有改弦更张之诚意，与民更始之决心，则必自允许人民及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有自由讨论宪政，自由选举国大代表始。此本会所欲宣告于国人者四也。

凡此四端，为本会之主张，亦即全国人民之公意，本会同人深信，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虽有种种阻碍，终必达此目的。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秋，国家民主化，实为救亡图存之至计，而国共两党及全国抗日党派抗日人民之共同努力，必能逐渐达到民主宪政之途，此又本会同人所深信不疑而愿为我全国同胞掬诚相告者也。兹当本会成立之始，敢竭所怀，质之当世，有志之士，盍兴乎来！

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吴玉章
理事　毛泽东　陈绍禹　张闻天　王稼祥　康　生
陈　云　邓　发　林伯渠　李富春　高　岗
高自立　罗　迈　萧劲光　谭　政　张邦英
谢觉哉　柯庆施　滕代远　张　浩　孟庆树
冯文彬　张琴秋　丁　玲　曹一鸥　艾思奇
周　扬　王学文　许光达　吴亮平　陈伯达
南汉宸　李初梨　扬　松　何思敬　赵毅敏
陈康白　傅连璋　高朗亭　曹菊如　饶正锡
王　林　叶季壮　雷经天　白振邦　高述先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1]

（1940年2月20日）

今天延安各界人民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开宪政促进会的成立大会，大家关心宪政，这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的这个会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发扬民意，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

抗日，大家赞成，这件事已经做了，问题只在于坚持。但是，还有一件事，叫做民主，这件事现在还没有做。这两件事，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由于多了这两件东西，所以中国就变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在我们全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主要的是独立和民主，因此，我们要破坏帝国主义，要破坏封建主义。要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些东西，而决不能丝毫留情。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这时，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或者真会实行宪政。毛泽东在这个演说里揭露了蒋介石这种欺骗行为，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刚才吴老同志[1]的话，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

那种旧式的民主，在外国行过，现在已经没落，变成反动的东西了。这种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中国的顽固派所说的宪政，就是外国的旧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他们实际上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确实想要这种宪政，想要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的专政，但是他们是要不来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要这种东西，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中国的事情是一定要由中国的大多数人作主，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包办政治，是断乎不许可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怎么样呢？这自然是很好的，全世界将来都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在现在的中国，还行不通，因此我们也只得暂时不要它。到了将来，有了一定的条件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现在，我

---

[1] 吴老，指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长。

们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从前有人说过一句话，说是“有饭大家吃”。我想这可以比喻新民主主义。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讲得最好的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的话。那个宣言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同志们，我们研究宪政，各种书都要看，但尤其要看的，是这篇宣言，这篇宣言中的上述几句话，应该熟读而牢记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具体内容，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的宪政。这样的宪政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宪政。

我们今天开的这个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进”呢？如果大家都在进，就用不着促了。我们辛辛苦苦地来开会，是为了什么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他们不进，躺着不动，不肯进步。他们不但不进，而且要向后倒退。你叫他进，他就死也不肯进，这些人叫做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这个“嘱”不是普通

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现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会进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还不觉悟，所以要“促”。

因为不进，就要促。因为进得慢，就要促。于是乎我们就大开促进会。青年宪政促进会呀，妇女宪政促进会呀，工人宪政促进会呀，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的宪政促进会呀，蓬蓬勃勃，办得很好。今天我们再开一个总促进会，群起而促之，为的是要使宪政快些实行，为的是要快些实行孙先生的遗教。

有人说，他们在各地，你们在延安，你们要促，他们不听，有什么作用呢？有作用的。因为事情在发展，他们不得不听。我们多开会，多写文章，多做演说，多打电报，人家不听也不行。我以为我们延安的许多促进会，有两个意义。一是研究，二是推动。为什么要研究呢？他们不进，你就促他，他若问你：为什么促我呀？这样，我们就得答复问题。为了答复问题，就得好好研究一下宪政的道理。刚才吴老同志讲了许多，这些就是道理。各学校，各机关，各部队，各界人民，都要研究当前的宪政问题。

我们有了研究，就好推动人家。推动就是“促进”，向各方面都推他一下，各方面就会逐渐地动起来。然后汇合很多小流，成一条大河，把一切腐朽黑暗的东西都冲洗干净，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出来了。这种推动作用，将是很大的。延安的举动，不能不影响全国。

同志们，你们以为会一开，电报一打，顽固分子就不得了了吗？他们就向前进步了吗？他们就服从我们的命令了吗？不，他们不会那么容易听话的。有很多的顽固分子，他们是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他们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还是顽固。什么叫顽固？固者硬也，顽者，今天、明天、后天都不进步之谓也。这样的人，就叫做顽固分子。要使这样的顽固分子听我们的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决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现在有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1]，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而且他们还提高嗓子在叫：“我们是一贯主张宪政的呀！”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多年以前，我们就听到过宪政的名词，但是至今不见宪政的影子。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这个叫做宪政的两面派。这种两面派，就是所谓“一贯主张”的真面目。现在的顽固分子，就是这种两面派。他们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

---

[1]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

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宪法，中国已有过了，曹锟不是颁布过宪法吗[1]？但是民主自由在何处呢？大总统，那就更多，第一个是孙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凯取消了。第二个是袁世凯，第三个是黎元洪[2]，第四个是冯国璋[3]，第五个是徐世昌[4]，可谓多矣，但是他们和专制皇帝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这样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国家都挂起了共和国的招牌，实际上却是一点民主也没有。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同志们，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因此，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

---

[1] 1923年10月，北洋军阀曹锟用5000银元1票的价格贿买国会议员而被选为“大总统”，接着又颁布了由这些议员所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当时被人们叫做“曹锟宪法”或者“贿选宪法”。

[2]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黄陂人。原来担任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后来的旅长）。1911年武昌起义时，被迫站在革命方面，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副总统和总统。

[3] 冯国璋（1859—1919），直隶（今河北省）河间人。他是袁世凯的部下，袁世凯死后，成为北洋军阀直系的首领。1917年黎元洪下台以后，他当了北洋军阀政府的代理总统。

[4] 徐世昌（1855—1939），原籍天津，生于河南省汲县，清朝末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官僚。1918年由段祺瑞的御用国会选为总统。

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1]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2]，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这样讲来，岂不是“呜呼哀哉”了吗？事情是这样的困难，宪政是没有希望的了。那也不然。宪政仍然是有希望的，而且大有希望，中国一定要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什么？宪政的困难，就是因为顽固分子作怪；但是顽固分子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的，所以我们还是大有希望。天下的顽固分子，他们虽然今天顽固，明天顽固，后天也顽固，但是不能永远地顽固下去，到了后来，他们就要变了。比方汪精卫，他顽固了许多时候，就不能再在抗日地盘上逞顽固，只好跑到日本怀里去了。比方张国焘，他也顽固了许多时候，我们就开了几次斗争会，七斗八斗，他也溜了。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斗，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总

---

[1]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权力。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政府指定的，虽也包含了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代表，但是国民党党员占大多数，而且国民党政府不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也不让它们的代表以党派代表的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2]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民主人士的提议，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议。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国民党曾经借此大作欺骗宣传。后来，这些决议都没有实行。

之顽固派是要起变化的。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从来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曾说张伯伦“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现在已经应验了。张伯伦过去一心一意想的是搬起希特勒这块石头，去打苏联人民的脚，但是，从去年九月德国和英法的战争爆发的一天起，张伯伦手上的石头却打到张伯伦自己的脚上了。一直到现在，这块石头，还是继续在打张伯伦哩。中国的故事也很多。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1]。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吴佩孚等等，他们都想镇压人民，但是结果都被人民推翻。凡有损人利己之心的人，其结果都不妙。

现在的反共顽固派，如果他们不进步，我看也不能逃此公例。他们想借统一的美名，取消进步的陕甘宁边区，取消进步的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进步的共产党，取消进步的人民团体。这一大套计划，都是有的。但是我看将来的结果，决不是顽固取消进步，倒是进步要取消顽固。顽固分子要不被取消，除非他们自己进步才行。所以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上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顽固分子的“剿共”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如果他们现在又想“剿共”，那也有他们的自由。因为他们吃了自己的饭，又睡足了觉，他们要“剿”，那也只好随他们的便。不过，他们就得准备实行这样的决议，这是不

---

[1] 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称自己为皇帝，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皇帝称号，同年6月6日死于北京。

可移易的。过去的十年“剿共”，都是照此决议行事的。今后如再要“剿”，又得重复这个决议。因此，我劝他们还是不“剿”为妙。因为全国人民所要的是抗日，是团结，是进步，不是“剿共”。因此，凡“剿共”的，就一定失败。

总之，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现在的宪政，也是这样。要是顽固派仍然反对宪政，那结果一定和他们的愿望相反。这个宪政运动的方向，决不会依照顽固派所规定的路线走去，一定和他们的愿望背道而驰，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规定的路线走去的。这是一定的，因为全国人民要这样做，中国的历史发展要这样做，整个世界的趋势要我们这样做，谁能违拗这个方向呢？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但是，这件事要办好，却需要时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随随便便所能办到；需要动员人民大众，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很好，会后还要写文章，发通电，并且要在五台山、太行山、华北、华中、全国各地，到处去开这样的会。这样地做下去，做他几年，也就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如果不是这样做，照顽固的做法，那就会亡国。为了避免亡国，就一定要这样做。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还要懂得，顽固派到底是少数，大多数人都不是顽固派，他们是可以进步的。以多数对少数，再加上努力，这种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说，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反磨擦斗争的形势[1]

（1940年2月20日）

德怀同志：

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边区二十三县已逐渐统一，华北（新黄河以北整个华北）我们已占领了优势，中原我们也发展了。蒋现已整个处在防御地位。

泽东

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反磨擦斗争的形势问题给彭德怀的电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0年2月21日）

注意吸收一批不左不右之中间派人士参加政府与文化经济工作，以便争取他们，任何党外机关只要保证我们及左派的领导就行了。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2月23日）

贺龙致阎锡山电，用语太硬，我们已加修改。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但晋西游击战争仍应积极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40年2月24日）

华中应立即成立抗大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华中大批青年学生。

由晋东南开抗大分校一部到华中，以作华中学校之基础，已开拔否，望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华中建立学校问题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对新军工作问题的指示[1]

（1940年2月24日）

新军部队绝对不应该编入八路军，应注意巩固新军干部的团结。

晋西北施政大纲六项，没有提到坚决实行阎锡山的十大纲领，是一个大缺点。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新军工作问题致贺龙、关向应、林枫、赵林并告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2月28日）

上海党的方针，第一是乡村工作，并建立政权及军队，要组织十万军队；第二是上海城市工作，城市工作应非常谨慎，乡村工作要放手大干。应组织上海市委及外县工作委员会。要江苏省委副书记刘长胜到政治局报告一次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2月）

一

过去参政会只是请客，决议不能实行，反共的决议便实行了。如果不出席，我主张一个也不去，董老也只去一次，首先将我们各种提案送去。我们不怕决裂就不会决裂，要决裂我们怕也会决裂，这是一个两大力量斗争的问题，社会物质的问题。我们对参政会要提以下几个提案：（一）反汪，（二）宪政，（三）团结，（四）参政会决议要实行等。

二

现在山西的形势是八路军、阎锡山、中央军三大力量的斗争。我们的方针以保持原有力量为好，维持三角鼎立的形势为好。新旧军已经不能再打了，今后是僵局或是和平，我看僵局是过渡的阶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是否出席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山西问题讲话的一部分。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于1940年4月1日至10日在重庆举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出席。

段，和是确定了的。我们去谈判的方针，是新旧军互不处罚为好，去谈判的人以萧劲光、王若飞[1]二人为好。

---

[1]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

帮助萧克挺进军巩固平西根据地[1]

（1940年3月3日）

贺、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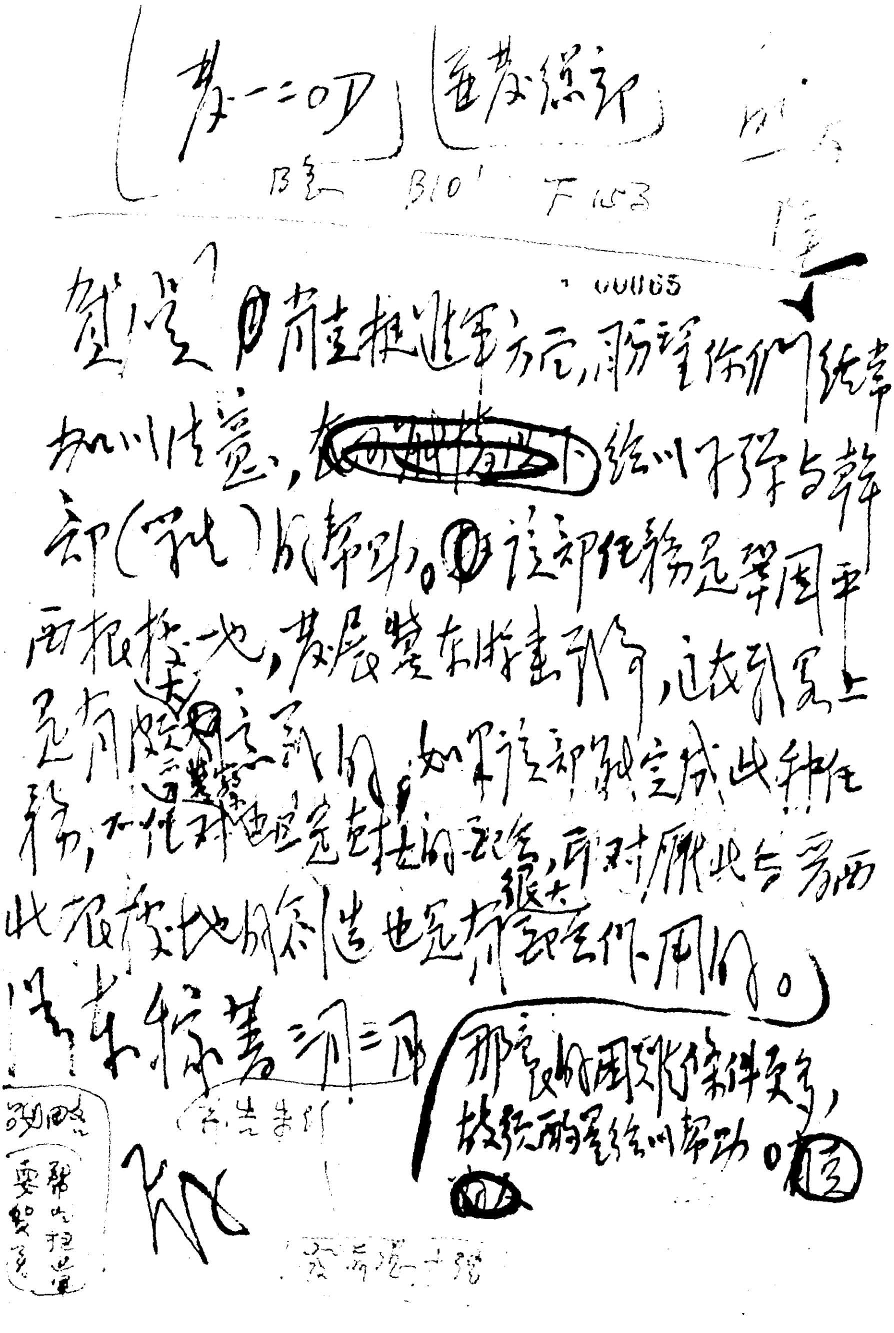
萧克挺进军方面，盼望你们经常加以注意，给以子弹与干部（学生）的帮助。该部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这在战略上是有颇大意义的。如果该部能完成此种任务，不但对晋冀察边区是直接的配合，即对雁北与晋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也是有很大配合作用的。那里的困难条件更多，故须酌量给以帮助。

泽东　稼蔷

三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贺龙、关向应并告朱德等的电报。



发一二〇师　并告总部

B急　B10'　F153

00065

贺关：（一）萧克挺进军方面，盼望你们经常加以注意，~~在可能情况下~~给以子弹与干部（军械）的帮助。（二）该部任务是巩固平西根据地，发展冀东游击战争，这在战略上是有很大意义的。如果该部能完成此种任务，不仅对冀察边区是直接的意义，而对于此后之察西北根据地的创造也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三）那里的困难条件更多，故须确实给以帮助。（完）

毛　东　稼祥　[illegible]三日

战略

要點　帮助挺进

發[illegible]號

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的手稿。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3月4日）

一

民主主义有三种，英、美、法是老民主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苏联是新新民主主义，即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

二

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边区有十大好处，即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发国难财的、没有吃磨擦饭的等，是全国的模范，是取消不了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边区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宪政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关于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三

要揭破国民党顽固分子搞假宪政的阴谋，我们要搞真宪政、真民主。

四

共产党对任何国民党军队不放第一枪，但你放第一枪，我就放第二枪。现在国共之间是大和小打、大团结小磨擦，还不是放着日本不打到处反共的那个时候。

致八路军、北方局等电[1]

（1940年3月5日）

目前尊重阎锡山的一定地盘，保存这个国共之间的中间力量，对于抗战与国共合作是有大利益的。我们及新军应乘此次同阎锡山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极力争取阎系一切人员，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中间单位，彻底打击蒋介石企图消灭阎系取而代之以便直接反共的恶毒政策。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对阎锡山发函电及宣传联络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致八路军、北方局、第一二〇师的负责人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对内和平，巩固已得阵地

（1940年3月5日）

德怀[1]同志：

甲、反磨擦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华北的主要的地区，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与可能。因蒋之军事攻势[2]已基本上被我击溃，而蒋现时实无法大举“剿共”。我在山西、在河北、在边区均有极大胜利。我在华北占优势问题已基本上解决。蒋、程、阎、卫[3]等不能不顾及此种事实，因而有使彼方之武装攻势暂时告一段落求得暂时协调之可能。最近两星期来，蒋、程、阎、卫四人及陕蒋[4]、甘朱[5]均或多或少都表露了这种意向。

乙、我们方面目前任务是在主要地区求得对内和平，以便在半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2] 指国民党统治集团1939年年底开始在河北、山西发动的大规模军事磨擦，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3] 程，指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陕蒋，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蒋鼎文。

[5] 甘朱，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甘肃、青海、宁夏及绥远的一部分）司令长官的朱绍良。

年之内集中力量巩固已得阵地，这个任务的意义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能在半年之内，在边区巩固二十三县使其全部边区化，在晋绥地区巩固晋西北和绥远[1]东部，在晋东南地区、河北等区域巩固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以北及山东一部分，在直[2]、鲁、豫、皖四省边境地区巩固津浦路以西、开封以东、老黄河以南、新黄河以北，那时统一战线就有某种好转的可能（当然顽固派也必然更加恨我）。再则如果我们军事反攻在主要地区没有一时期的停止，虽然我们军事行动的性质仍是自卫性质，但在中间派看来，会觉得我们过激过分，而有可能失去中间派的同情。所以不论对巩固自己力量说来，在对争取中间派同情说来，都有使双方军事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之必要。

丙、既然双方军事斗争有使告一段落之可能与必要，我们具体的步骤就应该：（一）认真恢复我们与阎锡山的关系，寻找具体办法，建立新旧军的妥协，使新军、牺盟[3]重归阎锡山指挥。（二）争取使蒋、阎、卫承认军渡、汾阳、临汾、屯留、壶关、林县、漳河、大名之线为双方作战地界，在此线以北之彼军如朱怀冰[4]向南调，在此线以南之我军向北调。我们只保留垣曲通太行山及永和通灵石两条兵站线。在此两条兵站线上，驻少数护卫部队，此部队任

---

[1] 绥远，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区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2] 直，指直隶省，1928年改名河北省。

[3] 新军，指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主力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牺盟，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1936年9月18日成立。它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在山西抗日战争中发挥过重大的作用。

[4]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务纯为护卫交通，不做地方工作。如果彼方能保证不向此线以北攻击，彼军即使石友三、高树勋、丁树本、朱怀冰、庞炳勋、范汉杰、王靖国[1]在此线以南构筑防御堡垒线，我们也只得听之。仅在彼军越过此线向北进攻时，我则坚决反击之。（三）上述两条中目前的重心在第二条，其重心之重心又在朱怀冰退出磁、武、涉[2]三县及承认壶关、林县为我驻军地区。请你考虑，如彼方只承认平顺、磁县之线为两军境界，要求我退出壶关、林县地区时，我是否可以承认退出此两县。再则，请你考虑把反攻朱怀冰之步骤推缓若干天，以看谈判之成功与否。袁晓轩[3]应在洛阳继续谈判，暂不离开为宜。对大名以南之石、高、丁三部，我们不加攻击。兄意如何，请考虑见告为盼。

泽东　稼蔷[4]
三月五日

---

[1]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九军军长、冀察战区察哈尔游击总司令。高树勋（1898—1972），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新编第八军军长。丁树本，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庞炳勋（1879—1963），河北新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范汉杰（1895—1976），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王靖国（1891—1952），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2] 磁、武、涉，指河北磁县、武安和涉县。

[3]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4] 稼蔷，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1]

（1940年3月5日）

萧劲光、王若飞在秋林镇住四天，受到极大欢迎，谈判是成功的。

今后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的抗战。

为保证此种政策的实现，双方商定划区作战的条件是：在晋西以汾离公路[2]为界，在公路以南，准备停止游击战争；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3]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并告新军各领导人电的主要内容，电报通报萧劲光、王若飞同阎锡山谈判的经过和今后对阎的革命政策。

[2] 即汾阳到离石的这段公路。

[3] 即临汾到屯留的这段公路。

致王震电[1]

（1940年3月5日）

靠近榆林的米脂及佳县许多中间势力的集中地暂时不要边区化，应维持现状。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绥德、吴堡、清涧、安塞四县也应是逐渐大体上的边区化，不是说和老边区一模一样。对友军、对绅士和对顽固派完全不同，你们须注意研究这些态度问题。在何绍南走后，你的态度要放和缓些，十分注意不要失去中间派绅士的同情。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项英等电[1]

（1940年3月5日）

对于蒋介石令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南开之类的无理命令，应一概置之不理。

在目前阶段内，两党斗争问题即反磨擦问题上的战术，就是攻势防御，而决不可采取单纯防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项英等电的主要内容。

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

（1940年3月6日）

（一）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我们和反共顽固派为政权问题在华北、华中和西北的斗争，带着推动全国建立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为全国观感之所系，因此，必须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

（二）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过左和过右，均将给予全国人民以极坏的影响。

（三）目前正在开始的召集河北参议会和选举河北行政委员会，是一件具有严重意义的事。同样，在晋西北，在山东，在淮河以北，在绥德、富县、陇东等地建立新的政权，也具有严重的意义。必须依照上述原则进行，力避过右和过左的倾向。目前更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

（四）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

（五）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六）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

（七）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这些阶层的争取，是孤立顽固派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

（八）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

（九）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着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因而不注意去努力说服非党人士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心悦诚服地执行。

（十）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不是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最下层政权的成份可以酌量变通，防止地主豪绅钻进政权机关。政权建立已久的晋察冀边区、冀中区、太行山区和冀南区，应照此原则重新审查自己的方针。在建立新的政权时，一概照此原则。

（十一）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

（十二）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

（十三）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

（十四）责成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各军队首长，对党内作明确的说明，使此指示充分地实现于政权工作中。

对上海工作的指示[1]

（1940年3月6日）

上海工作，城市工作较好，乡村工作对国民党过于让步，没有积极建立政权与军队。东南局工作同志没有大大发展政权、军队的决心，现在应采取华北路线，大大地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刘长胜报告上海工作后对上海工作作出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给蔡元培家属的唁电[1]

（1940年3月7日）

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

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

毛泽东叩
阳

---

[1]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这是毛泽东给其家属的唁电。

致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1]

（1940年3月7日）

朱、彭、杨：

此时应对卫立煌[2]有所让步。在此次反磨擦斗争中，我们能够巩固山西之临汾、屯留、平顺及漳河、河北大名之线，已算很大胜利，在此线以南应与国民党休战，维持卫之地位。在汾离公路[3]以南则与阎锡山休战，维持阎之地位。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2]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汾离公路，即汾阳到离石这段公路。

致聂荣臻等电[1]

（1940年3月8日）

聂、彭、舒：

同意成立以邓华为司令员的第五军分区，开展察南、雁北工作，同意陈漫远[2]去平西，任冀热察挺进军政治部主任。

毛　王　谭

三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谭政给聂荣臻、彭真、舒同等的电报。

[2] 陈漫远（1911—1986），广西蒙山人，曾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坚持国共长期合作[1]

（1940年3月9日）

伍、李转洛阳刘、袁二同志：

（甲）各电均悉。目前并不是什么由小决裂到大决裂，你们在外商谈要沉着、坚定，静待指示。关于晋东南问题，由朱、彭答复你们以归统一。关于整个方针问题，子久可于本月十八日到西安与林老见面，接受指示。林老约一星期后由延动身去西安。（乙）袁见卫先生时，可告他中共中央坚持国共长期合作，始终不变。对蒋（介石）、程（潜）、卫（立煌）、阎（锡山）诸先生领导抗战，深表敬意。惟对一部分不讲合作、专讲磨擦的人极为不满。对八路军待遇不公，对边区不加承认，对华北不承认抗日政权，对全国不承认党派自由，对宪政采取压制政策，对舆论剥夺一切自由，深表不满。希望卫先生转达蒋先生公平处理，合理解决，是所盼望。

毛泽东

九日午

并告朱、彭、杨

---

[1] 这是毛泽东给伍云甫、李涛转洛阳刘子久、袁晓轩的电文。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办事处处长。

给王枚的信[1]

（1940年3月10日）

王枚同志：

来信及代耕粮款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及援助。我不缺少物资，我决定把你送给我的三千五百元转送给你，作为我对你致谢的礼物，希望你接受。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日

---

[1] 从1939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军民每人都要参加种粮纺棉工作。毛泽东也分得一块土地进行耕种，一有时间，他就拿起锄头干起来。后来，由于毛泽东工作太忙，延安农民王枚主动替毛泽东代耕，并把代耕所得交给毛泽东。这是毛泽东给王枚的复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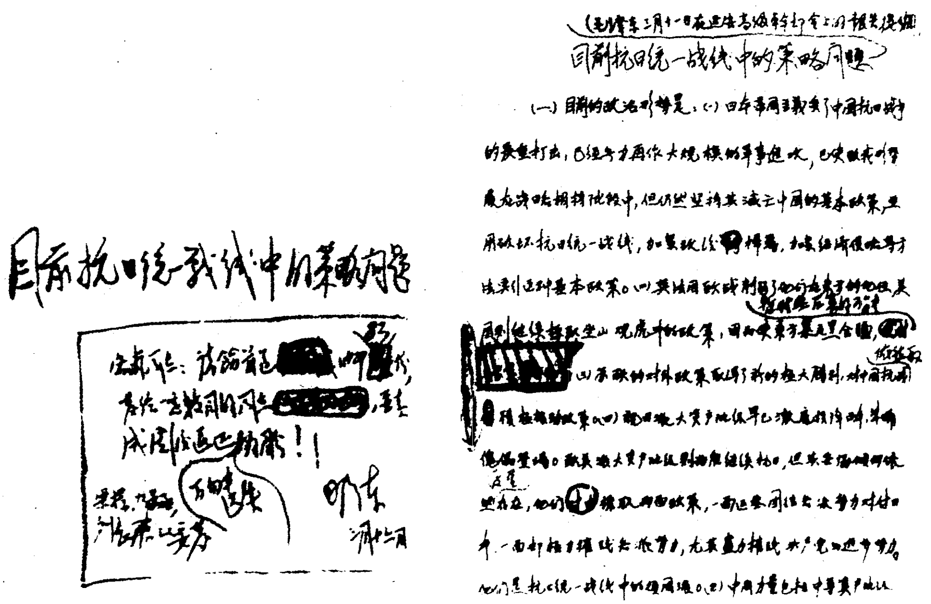
（1940年3月11日）

（一）目前的政治形势是：（1）日本帝国主义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严重打击，已经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敌人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实行这种政策。（2）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3）苏联的对外政策取得了新的胜利，对中国抗战依然取积极援助政策。（4）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5）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6）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地。他们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间势力中亦有相当影响。在抗日战场上，共产党所抗击的日寇兵力，同国民党比较起来，几乎占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图为报告的修改稿（部分）。

以上就是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央二月一日的决定[1]是完全正确的。

（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

---

[1] 指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针对当时国民党投降与倒退的倾向，提出了发展抗日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时局逆转所必须执行的10项任务。

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三）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因为对于发展进步势力，顽固派是反对的，中间派是怀疑的。如不同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收到确实的成效，就不能抵抗顽固派的压迫，也不能消释中间派的怀疑，进步势力就无从发展。

（四）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同工人有阶级矛盾，不赞成工人阶级的独立性；但他们在沦陷区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则受大地

主大资产阶级的限制，因此他们还要抗日，并要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力。在抗日问题上，他们赞成团结抗战；在争取政治权力问题上，他们赞成宪政运动，并企图利用进步派和顽固派之间的矛盾以达其目的。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开明绅士是地主阶级的左翼，即一部分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同中等资产阶级大略相同。他们虽然同农民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亦有矛盾。他们不赞成顽固派，他们也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决不可忽视，必须采取争取政策。地方实力派，包括有地盘的实力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在内。他们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也多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因此他们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时表现进步，不久仍然反动起来；但又因为他们同国民党中央势力有矛盾，所以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他们是可能在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采取中立态度。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但这种争取政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对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中间势力中的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可以同我们共同抗日，也可以同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但他们害怕土地革命。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其中有些人还可以在一定限度内参加，有些则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有些则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地方实力派，则除共同抗日外，只能在对顽固派斗争时采取暂时的中立立场；他们是不愿同我们一道建立民主政权的，因为他们也是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

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或竟变为顽固派向我进攻的同盟军；因为顽固派也正在极力争取中间派，以便使我们陷于孤立。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五）顽固势力，目前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这些阶级，现在分为降日派和抗日派，以后还要逐渐分化。目前的大资产阶级抗日派，是和降日派有区别的。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作为准备将来投降的步骤。因为他们还愿团结抗日，所以我们还有可能争取他们留在抗日统一战线里面，这种时间越长久越好。忽视这种争取政策，忽视同他们合作的政策，认为他们已经是事实上的投降派，已经就要举行反共战争了，这种意见是错误的。但又因为他们在全国普遍地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反动政策，不实行革命三民主义这个共同纲领，还坚决反对我们实行这个纲领，坚决反对我们超越他们所许可的范围，即只让我们同他们一样实行消极抗战，并且企图同化我们，否则就加以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压迫，所以我们又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

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如果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提出正确的革命理论，对于他们的反革命理论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在政治上采取适合时宜的策略步骤，对于他们的反共反进步政策给以坚决的打击；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军事步骤，对于他们的军事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那末，就有可能限制他们实施反动政策的范围，就有可能逼迫他们承认进步势力的地位，就有可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而使他们陷于孤立。同时，也就有可能争取还愿抗日的顽固派，延长其留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时间，就有可能避免如同过去那样的大内战。所以，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如果没有斗争，进步势力就会被顽固势力消灭，统一战线就不能存在，顽固派对敌投降就会没有阻力，内战也就会发生了。所以，同顽固派斗争，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避免大规模内战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

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

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

（六）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分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因为国民党中央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等反革命磨擦法令，并实行动员他们一切力量进行普遍全国的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反革命磨擦，有些人就以为整个国民党都是顽固派，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现在的国民党中，顽固派还站在支配其党的政策的地位，但在数量上只占少数，它的大多数党员（很多是挂名党员）并不一定是顽固派。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才能利用他们的矛盾，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用极大力量去团结国民党中的中间派和进步派。

（七）在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政权的问题上，必须确定这种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则还没有这种政权。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

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这是大体的规定，应依具体情况适当地施行，不能机械地求凑数目字。这种规定，在最下级政权中可能须作某种变动，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但基本精神是不能违背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中，对于共产党员以外的人员，应该不问他们有无党派关系及属于何种党派。在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统治的区域，只要是不反对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的党派，不问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别的党，应该允许他们有合法存在的权利。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该是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该由人民选举，然后陈请国民政府加委。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因此应为全党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坚决执行。

（八）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顽固派又正在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因此，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

（九）在宣传问题上，应该掌握下列的纲领：（1）实行《总理遗嘱》，唤起民众，一致抗日。（2）实行民族主义，坚决反抗日本帝国

主义，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3）实行民权主义，人民有抗日救国的绝对自由，民选各级政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革命民主政权。（4）实行民生主义，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5）实行蒋介石的“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这些都是国民党自己宣布的纲领，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纲领。但是除了抗日一点外，现在的国民党都不能实行，只有共产党和进步派才能实行。这些是已经普及于人民中的最简单的纲领，但是许多共产党员还不知利用它们作为动员民众孤立顽固派的武器。今后应该随时把握这五条纲领，用布告、宣言、传单、论文、演说、谈话等等形式发布之。这在国民党区域还是宣传纲领，但在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地则是行动的纲领。根据这些纲领去做，我们是合法的，顽固派反对我们实行这些纲领，他们就是非法的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国民党的这些纲领，同我们的纲领是基本上相同的；但国民党的思想体系，则和共产党的思想体系绝不相同。我们所应该实行的，仅仅是这些民主革命的共同纲领，而绝不是国民党的思想体系。

致琼崖部队领导人电[1]

（1940年3月11日）

应坚决改变过去依赖国民党的方针，不依靠国民党发饷，要自力更生，使部队尽量扩大。并依靠群众，建立游击根据地，打击敌伪。

---

[1] 这是毛泽东致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领导人电的主要内容。琼崖部队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南岛领导的，以1927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当时叫做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独立队总队。1947年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

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1]

（1940年3月14日）

朱、彭、杨，刘、邓，左、黄，陈、罗，徐、朱：

（甲）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乙）目前山西、河北的反磨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不应再行发展。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三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左权、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徐向前、朱瑞的电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0年3月14日）

在新旧军斗争停止后，新军、新政权、牺盟对阎应有一定程度的服从命令和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我党在新军、新政权、牺盟中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不应当什么都同八路军一样，对其中的党员亦不能一开始要求过高，而是逐渐引导向坚定的党员方向走。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广泛印发讨汪救国通电[1]

（1940年3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2]，于删日[3]发表。各地接到后，立即多印多发。凡各机关、学校、军队、报馆、民众团体、社会闻人每处每人寄发一份，在友军中尤应多寄，凡军师旅团长均须多方寄送。一切公开刊物，均须登载，勿误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秘书处起草的发给各地的电报。

[2] 汪，指汪精卫。汪于1938年12月离开重庆，发表“艳（9日）电”，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1939年年底和日寇签订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汪伪傀儡政权。1940年3月15日，我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率所属全体将士发出了讨汪救国通电。通电说：汪逆登场，全国震忿。德等率部深入敌后，为保卫祖国而战，已历三年，深知敌伪阴谋，在于分裂我内部团结，以求倾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宰割我人民。近日以来，敌伪所至各地，竟敢高揭伪青天白日旗，遍设伪军伪党，号召和平反共。夫所谓和平即投降也，反共即灭华也，固已昭然若揭。然一部分丧心病狂之人，随声附和，亦复所在多有。欧战扩大，国际阴谋分子与敌伪沆瀣一气，企图建立东方所谓反共阵线，抗战危机，千钧一发。当此之时，国内少数不明大义之徒，或策动投降，或实行反共，而以反共为投降之准备步骤，盖反共之极，势必至于投降，而投降之前，尤必倡言反共，汪精卫之覆辙，其明证也。故

居今日而言，抗战之危机，实不在敌伪之猖狂，而在我抗战阵线内部投降反共分子之存在。敌人近在中条山脉附近，设置无线电广播，倡言国共即将分裂，中国即将内战，呜呼！是何言欤！！夫敌之厚者我之薄，亲所痛者仇所快，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惟求全国继续团结，不中敌人奸计，消弭磨擦，反对内战，合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心为一心，坚持抗战局面，争取最后胜利。以我中华土地之大，人口之众，乘敌寇衰竭之时，遇欧战方酣之会，如能加紧团结而不自坏其长城，再接再厉而不自丧其勇气，则抗战未有不胜，建国未有不成者。德等不敏，誓率全军为祖国流最后一滴血，驱除敌伪，还我河山，虽赴汤蹈火所不敢辞。尚祈各界先进，全国同胞，群策群力，共救危亡，临电不胜屏营企祷之至！

[3] 删日，即十五日。当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十五韵的“删”字来代替十五日，称删日。

考虑作必要让步，避免破裂两党团结[1]

（1940年3月15日）

朱、彭二同志：

蒋、卫[2]已下令庞炳勋、范汉杰、刘戡、陈铁各部主力集中于太南周围，并有从陇海路加调六个师渡河讯，请兄等密切注意此事之严重性，考虑对蒋、卫作必要让步，避免因此破裂两党团结。请你们考虑让出陵川、合涧、林县一线的问题。

毛　王

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保护两党团结，作出必要让步问题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2] 指蒋介石、卫立煌。

坚决阻止李文军渡河[1]

（1940年3月15日）

胡宗南之中央军第九十军三个师，由李文率领已全部进到大宁之井沟镇及蒲县、乡宁之线。该军有秘密绕进大宁、永和、石楼一带，偷渡黄河，进攻陕北之企图，我河防部队有坚决阻击该师渡河之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萧劲光致王震、郭鹏等并告贺龙、关向应、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卫立煌电[1]

（1940年3月15日）

目前抗日局面必须维持，国共合作必须巩固，此为国人所期望，亦先生与弟之素志，延安面叙之意，固始终如一也。惟地方磨擦事件日益加多，如不加以调整，实于抗战不利，除电八路军诸同志注意外，请先生亦作合理之处置，俾一切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致卫立煌电的主要内容。3月15日毛泽东将此电报发给伍云甫，嘱其转袁晓轩面交卫立煌。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给全国各台电的指示[1]

（1940年3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于十五日发表，各地接到后，立即多印多发，在友军中尤应多寄，一切公开刊物均须登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秘书处起草的给全国各台电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华北应在军事上立即转为守势

（1940年3月16日）

德怀同志：

元电[1]今日阅悉。从大的方面看，须避免在陵川、林县地域再与中央军冲突，如彼进迫，我应北退，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后我军加以还击，其曲在彼，否则政治上对我甚为不利。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因李品仙[2]现正派军队向雪枫、胡服两区[3]压迫，蒋介石已注意该地，企图切断我军与新四军联系。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此时不争，将来更难了。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这种行动，也即是把一个新问题摆在东边，使蒋、卫[4]注意力不得不转向东边，减轻其对

---

[1] 指彭德怀1940年3月13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蒋介石、卫立煌节节向林县压迫，我军准备以防御姿态还击，再消灭其一两个军，“如此，前途可能争取好转，同时亦可能扩大武装斗争的危险，但扩大并不会到全国性的反共战争”。

[2] 李品仙（1892—1987），广西苍梧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3] 指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六支队活动的豫皖苏边区和胡服（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4] 蒋，指蒋介石。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华北的注意，华北方能确实巩固。目前华北斗争，亟应自动告一结束，否则有转入被动危险。我军政治上一经转入被动，蒋介石即会在政治上向我反攻，大肆宣传，说我无理，那时我们将处于极大不利，过去的有理地位反而丧失了。朱怀冰事件[1]，蒋亦将借题发挥。何应钦[2]已在参政会[3]常驻会议报告了一次。下月参政会开五次大会，彼现派在洛阳等处之视察团回川，必将大做文章。我们现在就应准备在政治上迎接蒋之新进攻，因此军事上必须立即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服从命令，才能造成政治上有理有利地位。请考虑见复为盼。

泽东

十六日

---

[1]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1940年二三月间，蒋介石指令其集合庞炳勋、张荫梧、侯如墉等部，三路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被八路军击败。

[2]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3] 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咨询性机关。为团结抗日，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参政会。

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1]

（1940年3月16日）

今天开这样的大会，很高兴。

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我们女同胞，现在不但受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顽固分子土豪劣绅的欺侮，而且还受着那个不开明的男人的欺侮……现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讲话，不准妇女自由平等，不准妇女办事，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妇女要开会、要讲话、要办事，妇女要自由、平等，全国妇女就要加强团结起来，几万万妇女结成一个团体，这力量就要大得多，大家应当齐心合力，为争取全国妇女的自由平等而奋斗。我们要准备干他十年八年，要求得一切问题的解决，求得一切痛苦的解决。妇女解放一定会胜利的。

延安的妇女今天有这样的自由平等，能开会、能讲话，必须要全国妇女都能这样做，延安妇女应当推动全国妇女起来共同奋斗、努力……

---

[1] 《新中华报》的报道特别注明，因天气和防空的原因，纪念大会推迟至3月16日举行。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复朱德等电[1]

（1940年3月19日）

今后八路军坚守平顺、漳河线，不再退让；卫立煌[2]表示希望与朱、彭会谈，请考虑择地与卫会谈。如决定，请将陕甘宁边区、扩军补充、增饷、新军、河北及操之过急东进攻新四军各问题全盘提出，托他转告蒋介石。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

[2]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巩固华北发展鲁苏皖豫鄂五省

（1940年3月19日）

德怀同志，并告朱、杨[1]：

电悉，复电如下：

甲、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你们的计划都看过，都对。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但缺一个领导骨干，当敌人新进攻到来时，请考虑解决这个领导骨干问题。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乙、延安干部今后一时期主要当供给华中，并准备一部为西北用，一部为南方用，一部为东北用，对华北则以供给教员与教材为主。

丙、兵工厂人才求助友人一事或者有可能，但要看交涉如何，恐不一定可靠，主要靠在国内找。

丁、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曹菊如[2]现在中央财政经济部负责，不能动。李六如[3]可以腾出给你处，

---

[1] 朱、杨，指朱德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

[2] 曹菊如，当时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

[3] 李六如，曾任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等职。

惟他身体有病，养息一下才能来。同时正在物色他人，结果后告。

戊、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后方已有相当经验，当供给你们作参考。

己、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应使之成为运动（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下），应有管理学习的机关与办法，在比较安定的机关中应实行两小时学习制。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后方的经验亦可供给前方。

庚、回避与鹿钟麟[1]见面很对，对付此种人只有坚持立场，给以坚决的绝不姑息的反攻才能有效力。山东之沈鸿烈[2]亦应此法对付之，目前沈正厉行对我进攻，请注意坚决给以回击。

辛、中央政治局会议定四月底开，讨论许多重要问题。总部及北局已定派朱瑞[3]出席，现距开会还有一个多月，请你考虑届时能否来延一次。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曾和八路军有过磨擦。

[2]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

[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巩固中央与晋东南及晋察冀之联络[1]

（1940年3月19日）

朱、彭，滕，贺、关，聂[2]：

为巩固中央与晋东南及冀察晋之联络：

（一）请贺关、聂荣臻同志负责保证晋西北与军区之交通。由军区指定部队向西行动，直达同蒲路，由贺关指定部队向东行动，且与聂军区向西行动之部取得联络。如此路不巩固，有使整个华北与延安后方隔断的危险。如何布置，望电告。

（二）中央与晋东南联络，因垣曲被阻，而晋西南之兵站线（原因中央系九十军到达该区）一时无法建立，因此发生重大困难。请彭、贺关派队侦察向北开展，建立晋西北直达晋东南的交通线，由榆次、平遥间通过同蒲路。如何望告。

军委　毛　王

皓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

[2] 滕，指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以中央军委代表的身份，在晋西北指挥反顽斗争。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四军的政治工作任务[1]

（1940年3月19日）

国平同志：

甲、十日电悉，甚慰。以后望多打电报，告诉我们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乙、关于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一、二、三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十万左右人枪，使四、五、六及李支队[2]在一年之内扩大至十五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各派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发展破坏敌军工作，积极瓦解敌伪军。以上这些积极方面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如何保证实行，均望逐一见告。

王　谭

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的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

[2] 李支队，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

关于晋冀两省磨擦终止后团结友军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1]

（1940年3月20日）

朱、彭，杨，刘、邓、左、黄，陈、罗，朱、徐，程、宋：

甲、蒋、卫调丁树本渡河，应让其渡河，不加阻碍，不可向他打一枪。

乙、对庞炳勋、于学忠及其他各中间派应以尊重，并加紧连络。

丙、对朱怀冰俘虏应加优待，特别优待其官长和眷属，同时注意收集国民党下达该军的各种反共命令计划文件。从石友三部俘虏官中，亦应收集此种材料，此项材料十分重要，将来大有用处。

丁、对中央军进行有系统的团结，联络争取说服工作，表示我们愿与他们团结抗战到底，拥护蒋委员长与卫长官，此次对朱、石还击完全是迫不得已。

戊、山西、河北两省，反磨擦行动全部告一段落，在此期间内偃旗息鼓一枪不打，向一切国民党军队表示友谊，求得恢复感情，推动时局好转。

毛　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刘伯承、邓小平、左权、黄克诚、陈光、罗荣桓、朱瑞、徐向前、程子华、宋任穷的电报。

援助新四军创立
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根据地[1]

（1940年3月21日）

朱、彭，杨，并告陈、罗，徐、朱，刘、邓，彭，胡，项[2]：

关于援助新四军。

甲、安徽主席李品仙[3]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4]、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我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在此种情况下，我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彭，指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指胡服，即刘少奇。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4] 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

乙、除具体部署请朱彭速作决定外，兹将该地情况综告于下：

（一）李品仙被某方收买，此次赴皖，某方给以全权，嘱其实行全部反共政策。（二）李到皖后，立即改组省府，解散一切进步团体。受训学生三千余人不甘压迫，纷纷跑到新四军，各县捉人杀人之事无地无之，安徽政权现已极端反共化。（三）李品仙为武力解决新四军，除调两个师至皖东、淮北外，又从鄂北再调一个军，其第一七二师由鄂西向皖西移动中。（四）三月四日至七日，皖北行署主任李本一奉李品仙令，率二千余人，分三路进攻我驻在定远南部之新四军及江北指挥部，目的在消灭该指挥部，屠杀胡服、张云逸诸同志。经我各路坚决反攻，将其击溃，获枪数百枝，俘虏数百人。（五）桂军一部及其他杂军共六个团，现已到皖东某地。其第一八三师之一个旅本向淮北进攻者，现有折向皖东讯。（六）我在皖东之新四军现已有九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左右。由于该部过去忽视建立根据地任务，以致大江以北，淮河以南，淮南路以东，运河以西我军活动之十余县中，依然是顽固派反共政权及其反共地方武装盘据未去。但近两星期来，即从打退李本一三路进攻之后，我已开始坚决肃清反共派，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缴获许多反共地方武装，以便坚决迎击李品仙之大举进攻。（七）淮河以北地区，自李品仙派队进攻中间派专员盛天瑾[1]之后，现又加派桂军一部正开进中。我彭雪枫部已有十四个团，正准备自卫中，该区我已有一部分抗日民主政权，较皖东为巩固。（八）皖东淮北一带民众抗日反顽固派的情

---

[1] 盛天瑾，应为盛子瑾，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第六专署专员兼泗县县长。

绪很高，李品仙之进攻部队不论是桂军及地方武装均不甚巩固，但新四军亦是新创，故须八路加以援助，才能彻底战胜进攻军队，巩固这个极端重要的抗日战略地区。

军　委

二十一日

1940年3月，毛泽东和李富春在延安。

1940年3月，毛泽东在机场迎接从共产国际归来的周恩来、任弼时。

1940年3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延安。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39年3月21日）

山西新旧军的斗争，我们失去十一个县，但得到晋西北及新军全部，并使阎锡山中立。要巩固晋西北还是一项大的工作。现在各处磨擦已处在一种新的形势，我们要采用和缓些的政策，军事上实行休战，政治上实行和平攻势。只要我们要发展就还会有磨擦，休战也不过是暂时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采取和平攻势策略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1]

（1940年3月21日）

迭电均悉。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盱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2]。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现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及江北新四军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2] 指1940年上半年建立的皖东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3月23日）

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八路军、新四军讨汪救国通电的作法较好，我们应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秦邦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对顽固派的斗争策略[1]

（1940年3月25日）

在反对顽固派向我进攻的斗争中，在该顽固分子没有转变为公开伪军与公开当汉奸时，具体指出某人投降日寇或指某人是汉奸并且向外宣传及陈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这样做不但社会上不了解，失去中间派同情，及引起国民党的愤激，而且妨碍我们在反磨擦告一段落时又同顽固派讲团结的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以后除公开转变为伪军及公开降敌者外，不得公开具体指某人为汉奸。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磨擦者，只应搜集其磨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磨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三月二十五日

---

[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八路军总部，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聂荣臻、彭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吕正操、程子华，王震，林枫，程子华、宋任穷，左权、黄克诚，彭雪枫，刘少奇，项英等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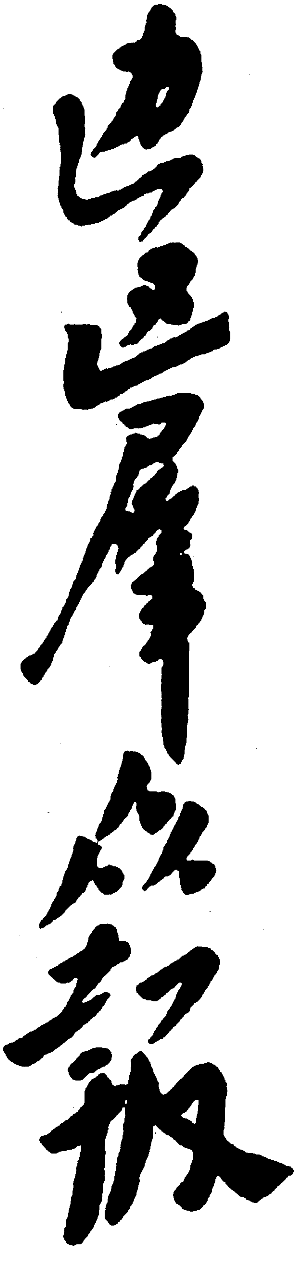
为《边区群众报》题名[1]

（1940年3月25日）

边区群众报

---

[1] 《边区群众报》是《陕西日报》的前身，1940年3月25日创办于延安，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名，曾先后是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



边区群众报

毛泽东为《边区群众报》题写的刊名。

目前华中的军事策略[1]

（1940年3月29日）

朱、彭，胡服，项英同志：

（一）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络，陷新四军于危境。

（二）我们完全同意朱彭之决心，将三四四旅调陇海路南增援华中，陈支队[2]调胶东。三四四旅应速开动，其电台即与胡服联络。

（三）顽方在华北磨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

（四）在华中武装磨擦中，我军事策略应当如下：

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3]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进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朱德、彭德怀、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胡服（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陈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

[3]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五）在华中与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受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1]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军委　毛　王
艳

---

[1] 苏南陈支队，指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江南指挥部指挥。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题词[1]

（1940年3月）

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之胜利品。

---

[1] 1940年3月在延安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工业产业展览会上，由于三五九旅的突出表现，毛泽东欣然为他们的产品题词：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之胜利品。

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1]

（1940年3月）

贵军乃抗日军队，其任务应为抗日，而绝不应是进攻边区。敝军担任河防，与日寇隔河对战，久面时日，虽无奇功，幸告无过。函愿与贵军团结一致，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共歼敌伪，复兴我中华民族，绝不愿与贵军乃任何友军进行内战。盖当此时之时，凡枪口对内者，为民族罪人，国人绝不同情，贵我两军均是明白的。

---

[1] 1940年3月，国民党九十军突然在黄河东岸、山西境内的大宁、蒲县一带集中。我军得到的情报证明，对方大军压境，不怀好意，形势非常紧张。毛泽东审时度势，以“八路军河防兵团政治部”的名义起草的《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这是该信的主要内容。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阅读斯大林著作。

对蒋介石在三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讲话的批语[1]

（1940年3月）

全部讲话表现三点：（一）军队是暮气沉沉；（二）国民党是靠法令吃饭[2]；（三）讲的还是抗战。

---

[1] 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在3月召开的全国参谋长会议上讲话的批语。

[2] 蒋介石在1940年3月9日的讲话中指责说，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说晋省友军私通敌寇，像这种说法是不应该的；并要叶剑英转告朱、彭："革命军人一切要照中央法令"。毛泽东对这段话写了"靠法令吃饭"的批语。

目前八路军在华北华中的方针

（1940年4月1日）

朱、彭，杨，刘、邓，徐、朱，陈、罗，雪枫，胡服，项英，陈毅[1]：

目前我在华北、华中之方针：

（一）某方[2]现在黄河以北及吕梁山脉集中大军，我之任务在于极力缓和之，避免一切刺激某方之言论行动。我军则谨守防线，深沟高垒，以备不虞，对其军事挑衅极力忍耐，不还一枪，多写诚恳坚定而无刺激性的函件、传单、标语，达到缓和其情绪，稳定我防线，使山西、河北两省归于平静局面之目的。非得中央同意，不得发生军事冲突。

（二）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力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2] 指国民党当局。

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三）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打退反动进攻，消灭投降反共势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其指挥人员与兵力配备由朱、彭统筹之。其到达时间，分为三期：第一期须有一个主力团，以急行军于一个月内外到达皖东；第二期为三四四旅，须于两个月内到达淮河附近；第三期须有相当大的兵力（不少于一万五千人），于三个月内外到达苏北扬州附近。一、二、三期兵力总数，共须四万至五万人，方能完成此紧急伟大任务。

（四）我鲁南、胶东部队，须积极行动，消灭一切最反动的投降反共势力，扩大抗日根据地。惟须极力争取中间势力，对一切尚能与我合作抗日之部队及虽然不好但尚未向我进攻之部队，均须极力联络，不得侵犯其一人一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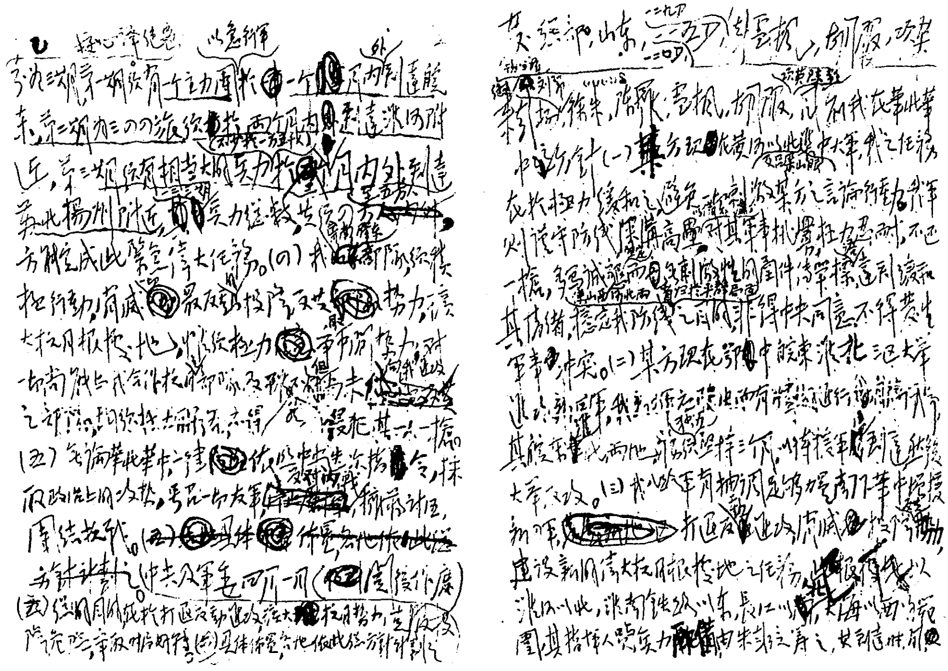
（五）无论华北、华中，一律依照中央迭次指令，采取政治上的攻势，号召一切友军反对内战，拥蒋讨汪，团结抗战。

（六）总的目的，在于打退反动进攻，扩大抗日势力，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

（七）具体布置，各地依此总方针计划之。

中央及军委

四月一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朱德、彭德怀等电的手稿。

给萧劲光的信

（1940年4月1日）

萧主任：

（一）此件[1]即铅印五百份。（二）印出后，以一份邮寄山西蒲县九十军李军长，以三份分寄山西蒲县探投九十军六十一师、五十三师、一〇九师师长，以一份寄延安国民党县党部，以五十份寄富县，嘱于[2]散发于向洛川行走之商人及富县商人，以二百份寄两延河防部队，嘱其分送吉县、大宁、永和之商人、农民、晋军及大宁一带之中央军，以二十份寄秋林王英英[3]，嘱其散发，以一份交新中华报登报并发广播，以一份交我，其余概寄王震散发于警备区及分区寄石楼、中阳一带。速办为要!

毛泽东

四月一日

---

[1] 即《八路军致友军九十军书》。

[2] 疑为“其”字之误。

[3] 当为王世英。

致朱德、彭德怀等电[1]

（1940年4月1日）

华中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军队进攻新四军，形势非常严重。八路军有迅速增援新四军之责任。请朱德、彭德怀考虑由第一一五师在山东地区之部队中抽调一个主力团立即南下增援；第三四四旅亦应于10日内休整完毕迅速开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国民党进攻新四军以及对新四军的增援问题致朱德、彭德怀并告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1]

（1940年4月1日）

确息中央军九十军李文部三个师已集中大宁。估计有该军偷渡黄河进占绥德警备区的可能，企图隔断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联系和进攻边区。因此请贺、关统筹我军的河防布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九十军越过黄河，这是关系八路军整个生命的问题。王震旅应加强黄河西岸之阵地，萧劲光负责巩固两延段之河防。有贺、关调集主力部队二至三个团集结于碛口附近待机，一二〇师平汉路东的军队是否需调若干至路西，望速决定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为严防国民党军越过黄河进占绥德地区致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并转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2日）

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已下了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对我威胁最大的是绥德、皖东两点。蒋九十军的目的在强渡黄河攻取绥德。如河防不守，则前后方联络隔断，延安在危险中。如皖东不守，则皖南部队被隔断，八路军出鄂豫皖边及豫鄂西的道路也被隔断。所以，对李文第九十军的行动和李品仙部的进攻，值得严重注意。贺、关须准备以主力对付李文军，同时钳制高双成可能之南下，并抗御同蒲、汾离两线日军乘虚袭击。现颇感兵力不足，陈士榘支队恐不能东调。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密切注意国民党的行军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能否应付国民党的袭击[1]

（1940年4月3日）

项英同志：

请以你对下列各项的意见电告：（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2]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3]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雄[4]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积蓄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泽东

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

[3]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

[4] 黄绍雄，即黄绍竑，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4月3日）

李文九十军主要阴谋是渡河袭取绥德，威胁延安，切断西北、华北交通。估计该军实行渡河时，高双成可能南下袭击绥德、米脂，日寇亦必乘虚攻击晋西北。因此请考虑：（一）拒李防高抗日三方面如何布置兵力。（二）现有兵力总数是否足够应付严重局面。（三）陈士榘支队如东调是否不感兵力不足。（四）王震旅无机动兵力如何解决。（五）王震河防部署及作战指挥统属你们负责。（六）为解决兵力不足是否有从路东调回若干部队之必要。请周详考虑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致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4日）

李文第九十军三个师有偷渡黄河进占绥德警备区的可能，企图隔断陕甘宁边区与华北的联系和进攻边区。因此请贺、关统筹我军的河防布置，无论如何不能让九十军越过黄河，这是关系八路军整个生命的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召朱周谈判问题以及我军部署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为儿童节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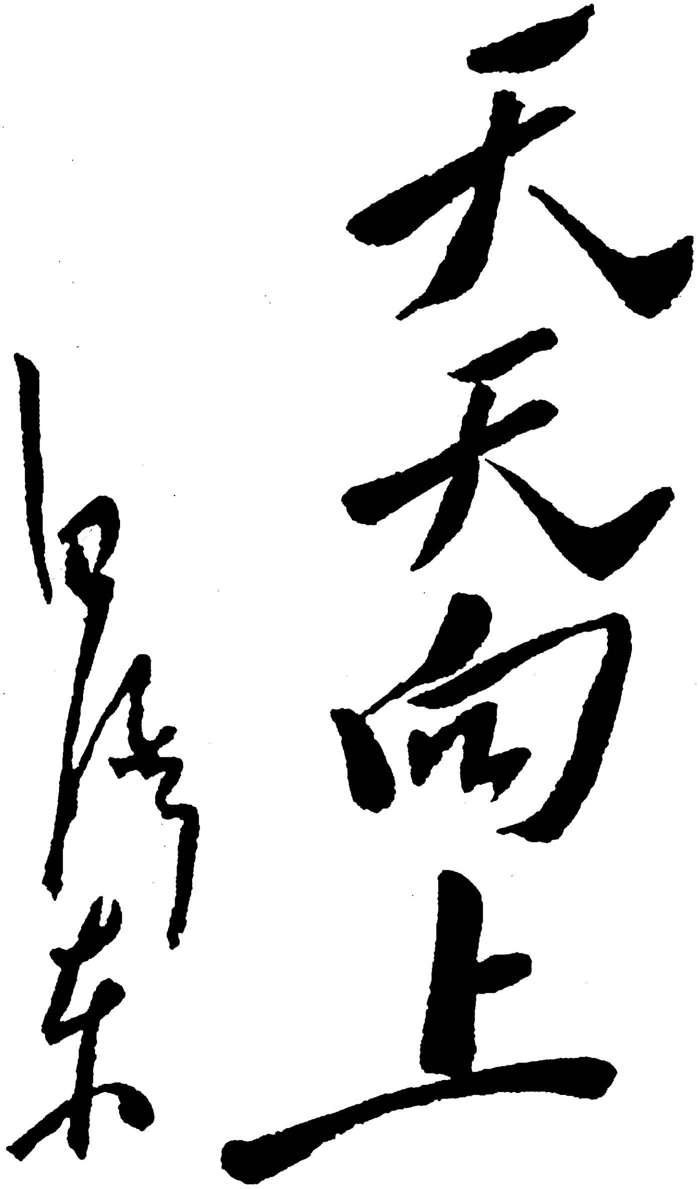
（1940年4月4日）

天天向上。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儿童节之际为儿童们所写的题词。当时的儿童节是4月4日。



天天向上

毛泽东

毛泽东为儿童节的题词。

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

（1940年4月5日）

德怀，克诚，陈、罗，雪枫，胡服[1]：

韩德勤[2]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3]受我李先念[4]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克诚，即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由第三四四旅和新一旅等组成）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2] 韩德勤（1891–1988），江苏泗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

[3]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4] 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仙、李宗仁、卫立煌[1]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2]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先至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3]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部队，并恢复驻立煌办事处[4]，释放张夫人[5]及一切被捕党员，退回军款，则我军暂时可不开入淮南，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6]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如彭吴兵力不足，则三四四旅协助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

---

[1] 李宗仁（1891—1969），广西临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朱、彭，指朱德、彭德怀。

[3] 彭吴支队，指彭明治任支队长、吴文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4] 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

[5] 张夫人，指张云逸的夫人韩碧。1940年2月，她在携幼子由皖南新四军军部渡江前往江北指挥部的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被李品仙所属国民党军安徽保安第八团扣留。同时被扣的还有指挥部干部及所携军款七万元、重要文件和一批武器。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于同年9月获释。

[6] 韩、李，指韩德勤和李品仙。

队，罗戴支队[1]，陈毅之叶飞部[2]，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毛　王[3]

微酉

---

[1] 罗戴支队，指罗炳辉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五支队和戴季英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第四支队。

[2] 陈毅之叶飞部，指陈毅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辖的叶飞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3] 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致贺龙等电[1]

（1940年4月6日）

李文第九十军原定渡河进攻陕甘宁边区，知我方有准备，故已改变行动。现判断李文部进攻的危险暂时已经过去。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国民党李文军改变行动问题致贺龙、关向应、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重新题写校名和校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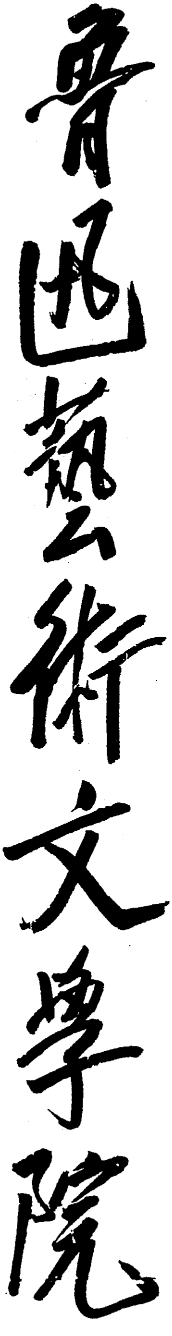
（1940年4月10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

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

[1] 1940年4月10日，毛泽东题写了“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新校名和“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八字校训。



毛泽东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题写的院名。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11日）

全国十八个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还指出：“因内外迫逼国民党投降与抗战两派正在激烈斗争与分化过程中，国民党（蒋介石）亲苏、和共及初步政治改良这三个方向，似已不可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已不可能，我们正在力促这三件事的实现。”今后统一战线应有更广泛开展，而中心点是争取国民党政府的二百万军队。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及国民党目前态度等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1940年4月11日至26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太行、太岳、冀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彭德怀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复朱德、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12日）

同意武安、涉县由卫立煌派县长，自卫再让一步，但对庞炳勋军队进驻这两县应坚决拒绝。目前应力争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和好团结，朱总能否与卫立煌一晤[2]。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朱德、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5月上旬，朱德到洛阳同卫立煌会晤。

致朱德电[1]

（1940年4月12日）

请你于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来延安。见卫立煌谈话中心，在于强调团结抗战，缓和中央军中一部分顽固派的反共空气，向他们声明，只要中央军不打八路军，八路军决不打中央军，决不越过汾离、临屯[2]、漳河之线以南，要求他们也不越过该线以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朱德电的主要内容。

[2] 汾离，指汾阳、离石。临屯，指临汾、屯留。

对中间派应采取的方针

（1940年4月12日）

陈、罗，雪枫，胡服[1]，并告朱、彭（转左、黄），徐、朱，刘、邓，项英[2]：

某方[3]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我们对于陈、罗附近之于学忠[4]，雪枫附近之何柱国、孙桐萱[5]，先念[6]附近之川军、桂

---

[1]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雪枫，指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六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胡服，即刘少奇。

[2]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左，指左权（1905—1942），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总参谋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徐、朱，指徐向前、朱瑞，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指国民党当局。

[4]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5]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孙桐萱（1895—1978），河北交河（今属泊头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二军军长。

[6]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

军、西北军，胡服附近之桂军，必须采取如下方针：

（一）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磨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

（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

（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

（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1]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磨擦。

以上方针的具体执行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之，中央军对我进攻时亦须同样采取此方针。因为中央军各级官长中只有一部分军官及政训系统是顽固派，其他多是中间派，也有一部分进步派，决不能把中央军看成都是顽固派。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
四月十二日

---

[1] 鹿钟麟，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总司令。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13日）

时局正在发展，可能日益坏下去，最后变为降日“剿共”的极坏局面，然亦可能拖一个时期。如能拖到一年，那时国际国内条件均将变化，某方[2]要降要“剿”都困难，时局便有确定好转希望。我们方针是力争把目前局面拖下去，同时准备对付最坏局面。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国民党方面。

给新疆督办盛世才的贺电

（1940年4月15日）

迪化盛晋庸先生勋鉴：

齐电诵悉，军民兼领，望实□□□□□政之宏模，树百年之大计，下风逖听，祝贺弥深。

毛泽东叩
删

关于对付韩德勤部问题致刘少奇等电

（1940年4月15日）

刘、项：

为对付韩德勤部，第一一五师彭吴[1]支队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部。韩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颇有对皖南、江南新四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英准备应付办法。惟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左权、黄克诚率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已从太行山出动，不日到冀鲁边界，随时可调至陇海路南与彭雪枫配合作战。

毛　王

四月十五日

---

[1] 彭吴，即彭明治，当时任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吴法宪，当时任苏鲁豫支队政委。

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大众文艺》题名[1]

（1940年4月15日）

大众文艺

---

[1]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毛泽东题写刊名，萧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

致贺龙等电[1]

（1940年4月16日）

贺、关、王：

彭绍辉旅七一四团从黑峪口渡河后，应位置于葭县沿河一线，切勿开到米脂及义合镇大路，以资隐蔽。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和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项英电[1]

（1940年4月18日）

关于江南、皖南部队应如何适当部署，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叶、张两团[2]以留在江北发展为适宜，你们将来的主要阵地有移至江北之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叶飞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原第六团和张道庸（陶勇）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原第四团。

致刘少奇等电[1]

（1940年4月21日）

你们不要提反对李品仙的口号，也不要提反对桂军的口号，对桂军进攻应取劝告及争取的态度，不到必要时机与必胜地点，不要轻易同桂军作战。目前中心是在淮南铁路以东，肃清地方反共武装，广泛发动民众，建立以各县抗日联防办事处为名义的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广泛小资产分子及开明绅士加入政权，切不可由我一党包办。对淮南铁路以西地方不可发动游击战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并告项英电的主要内容。张云逸、邓子恢，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复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4月21日）

国民党李文之九十军尚在大宁一带未动，该军见我有备，可能停止前进，但尚不能断定。因此你们准备之打击兵力以位置于兴、临、岚三县适当地点，随时准备集结为适宜。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4月25日）

一、时局一方面加重了投降危险，另一方面仍未丧失克服此种危险的可能性。二、国民党的限共与磨擦政策不会改变，但目前还没有与我党立即分裂的意图。三、李品仙部仍在进攻新四军，请令彭吴支队速向苏北前进，第三四四旅速向淮北前进。苏北、淮北、皖东是八路、新四两军最重要的生命线，彼既向我进攻，我自不能坐视。四、蒋邀周去颇迫切。邵力子使苏，似尚有赖苏救急之意。彼方财政经济问题甚严重，军队战斗力大减，人民离心力日增，蒋的文章并不好做。周去将给以团结抗战之助力。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时局等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4月29日）

广东省委过去的工作成绩是，发展了进步势力，即发展了党；争取了中间势力，主要在军队方面；同顽固势力的斗争也有成绩。但没有大力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是一个缺点。今后工作方针，应把发展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作为发展进步势力的中心，应将工作重心放在武装工作和战区工作。现在应上山还是下水呢？现在一切偏僻的地方都成为国民党的地区，我们不要上山，而要下水，深入敌后活动。对于时局估计，要准备最坏局面，要在最坏一点上来布置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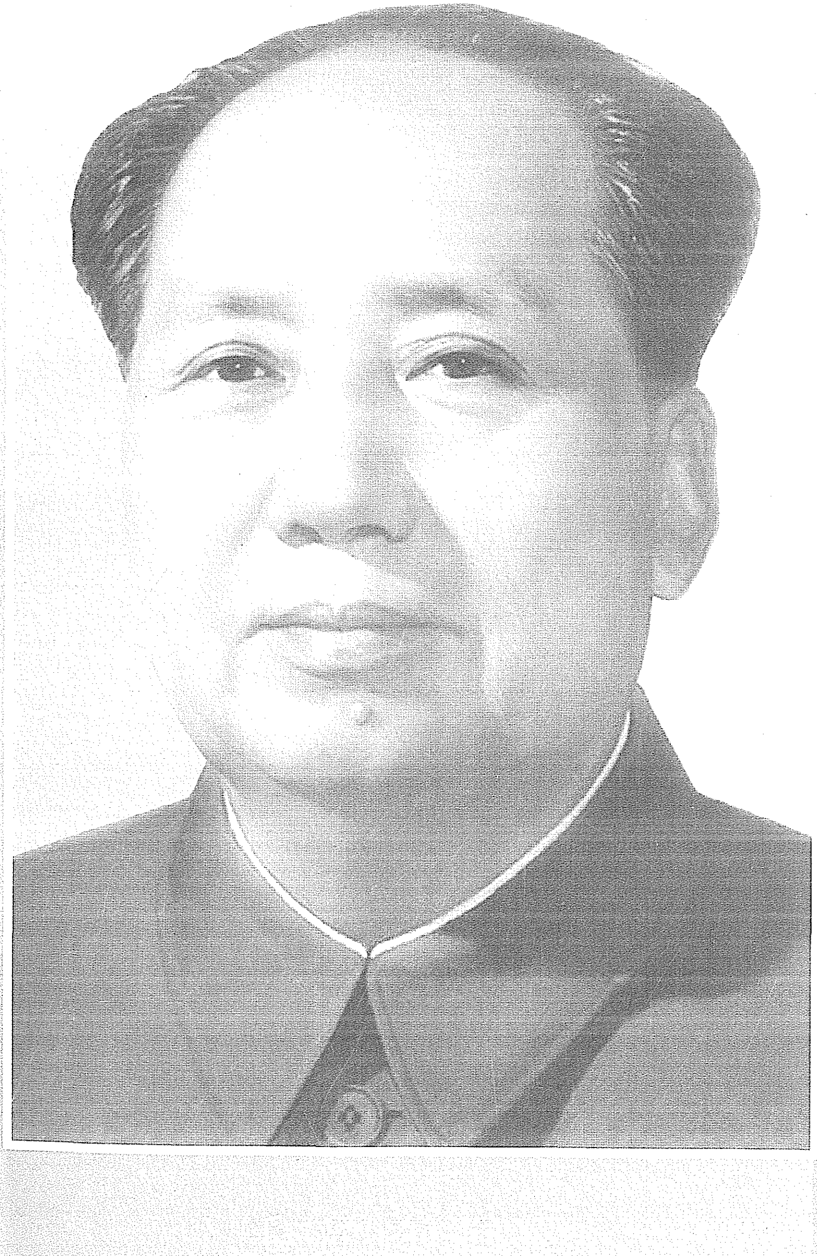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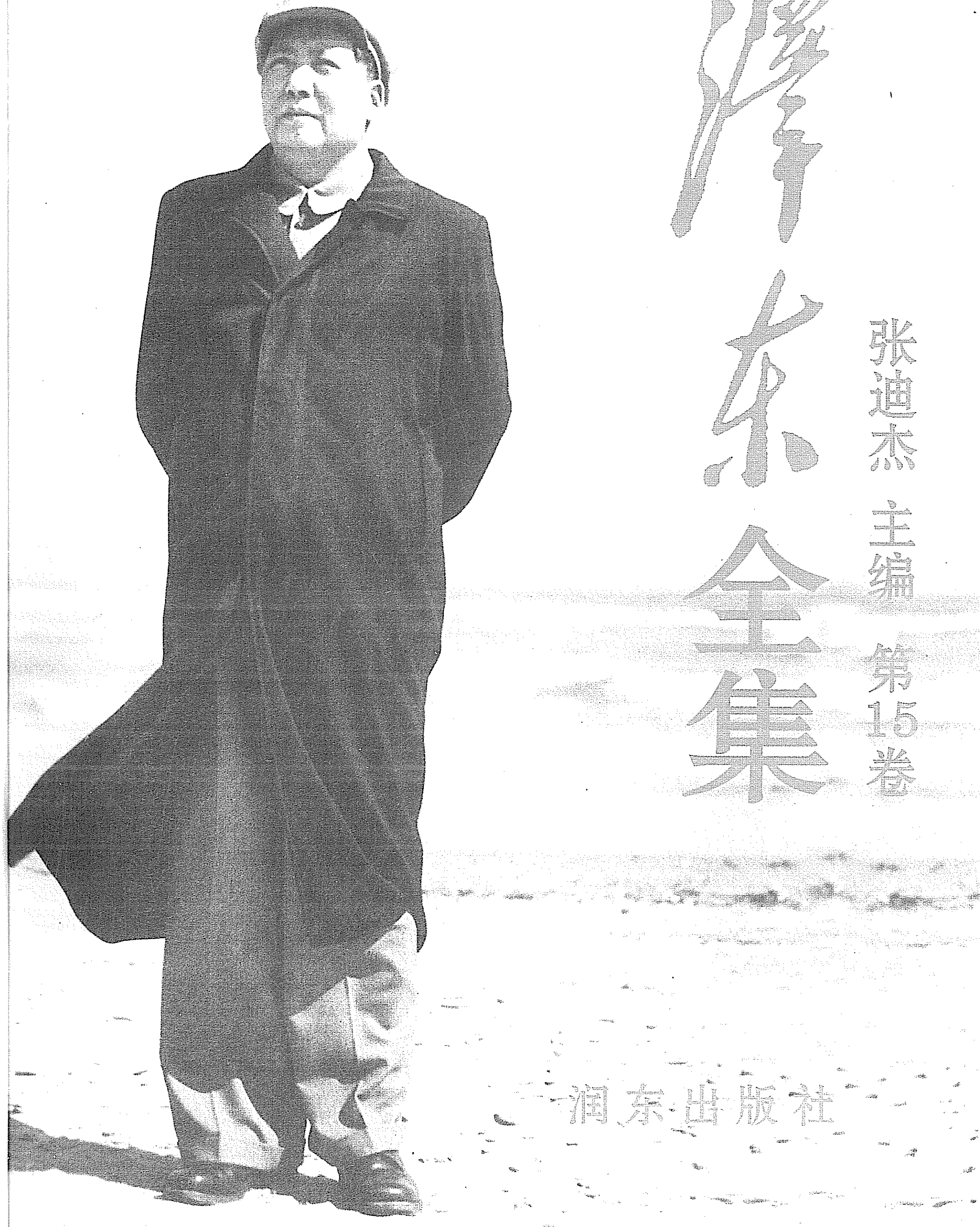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起
伊
泽
颐
帅
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为八路军制药厂制药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生题词……………………1
（1940年4月）
为马进题词…………………………………………………3
（1940年春）
为“五四”青年节题词……………………………………5
（1940年5月4日）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7
（1940年5月4日）
致刘少奇电 ………………………………………………13
（1940年5月4日）
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广大地区 ………………14
（1940年5月5日）
对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发展中原根据地的指示 …………17
（1940年5月5日）
致刘少奇电 ………………………………………………19
（1940年5月1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0
（1940年5月22日）
对巩固发展苏北根据地及扩大整训武装的指示 ……………21
（1940年5月23日）

我们要争取中间派 ……23
（1940年5月29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 ……24
（1940年5月30日）
对华北华中的战略部署 ……25
（1940年6月1日）
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 ……27
（1940年6月1日）
和陈嘉庚的谈话 ……28
（1940年6月1日）
同意中原局的建议 ……29
（1940年6月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30
（1940年6月10日）
致王震电 ……31
（1940年6月11日）
争取东北军工作是党争取全国友军工作的重要环节 ……32
（1940年6月13日）
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 ……33
（1940年6月21日）
关于部队合编问题给八路军总部的信 ……34
（1940年6月27日）
为叶志强题词 ……35
（1940年7月1日）
团结到底 ……37
（1940年7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40
（1940年7月7日）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45
（1940年7月7日）
目前华中应切实发展苏北 ……………………………………………53
（1940年7月12日）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55
（1940年7月13日）
改编反正军的方针问题 ………………………………………………62
（1940年7月16日）
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 …………………………………………63
（1940年7月20日）
没收汉奸及参加暴动首领土地财产问题的指示 ……………………64
（1940年7月20日）
致刘少奇、陈毅电 ……………………………………………………65
（1940年7月30日）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 ………………………………………66
（1940年7月）
为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题词 ……………………………………67
（1940年7月）
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题词 …………………………………69
（1940年7月）
为《大众习作》题名 …………………………………………………71
（1940年8月1日）
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 ………72
（1940年8月1日）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73
（1940年8月13日）
为追悼张自忠大会题词 ……………………………………………76
（1940年8月1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8
（1940年8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9
（1940年8月18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 …………………………………………………80
（1940年8月19日）
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 ……………………………………………81
（1940年8月28日）
为陇东中学题名 ……………………………………………………83
（1940年9月）
集中全力整训部队 …………………………………………………84
（1940年9月2日）
关于目前时局致周恩来电 …………………………………………85
（1940年9月5日）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 ………………………………………86
（1940年9月5日）
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90
（1940年9月6日）
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 ………………………………………………92
（1940年9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93
（1940年9月11日）

复叶挺、项英电 ……………………………………………………94
（1940年9月11日）
为《抗战日报》题写报头 …………………………………………95
（1940年9月18日）
关于蒋桂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致彭德怀等电 ……97
（1940年9月19日）
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之部署致叶挺等电 ………………………98
（1940年9月2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99
（1940年9月25日）
致刘少奇电……………………………………………………………100
（1940年9月30日）
挽徐谦先生联…………………………………………………………101
（1940年9月）
为延安清真寺题名……………………………………………………102
（1940年9月）
致周恩来电……………………………………………………………103
（1940年10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04
（1940年10月5日）
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105
（1940年10月8日）
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106
（1940年10月9日）
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107
（1940年10月11日）

关于留用俘虏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给陈毅等的指示…………108
（1940年10月12日）
新四军的行动方针……………………………………………………109
（1940年10月12日）
致叶挺、项英等电……………………………………………………111
（1940年10月13日）
致陈毅电………………………………………………………………112
（1940年10月14日）
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113
（1940年10月14日）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114
（1940年10月14日）
关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16
（1940年10月14日）
致陈毅、刘少奇等电…………………………………………………117
（1940年10月15日）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118
（1940年10月18日）
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120
（1940年10月18日）
致北方局等电…………………………………………………………121
（1940年10月18日）
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122
（1940年10月18日）
致刘少奇电……………………………………………………………123
（1940年10月20日）

与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124
（1940年10月23日）
致陈毅、粟裕电……125
（1940年10月24日）
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126
（1940年10月25日）
关于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来电……129
（1940年10月25日）
为《新文字报》题词……130
（1940年11月1日）
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31
（1940年11月1日）
致周恩来电……134
（1940年11月1日）
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135
（1940年11月1日）
致叶挺、项英电……136
（1940年11月1日）
致项英电……137
（1940年11月1日）
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电……138
（1940年11月1日）
致项英电……139
（1940年11月1日）
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及我之部署致周恩来电……140
（1940年11月2日）

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电……………142
（1940年11月3日）
关于反对蒋介石投降致李克农等电………………………………145
（1940年11月3日）
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　…………………………………146
（1940年11月3日）
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致叶挺、项英电……………………………148
（1940年11月3日）
复周恩来电…………………………………………………………149
（1940年11月3日)
致刘少奇电…………………………………………………………150
（1940年11月3日）
复周恩来电…………………………………………………………151
（1940年11月3日）
原地等候，以便指挥部队…………………………………………152
（1940年11月4日）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153
（1940年11月4日）
致周恩来电…………………………………………………………157
（1940年11月5日）
关于复何白电内容要点致周恩来电………………………………158
（1940年11月6日）
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160
（1940年11月6日）
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161
（1940年11月6日）

军政委员会条例（草案）……162
（1940年11月7日）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164
（1940年11月7日）
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68
（1940年11月9日）
关于“佳电”发出后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致周恩来电……174
（1940年11月9日）
关于在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停止汤、覃两军东进问题致叶挺、项英电……176
（1940年11月10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77
（1940年11月12日）
致周恩来等电……178
（1940年11月12日）
致周恩来等电……179
（1940年11月12日）
致刘少奇等电……180
（1940年11月13日）
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工作部署致彭德怀电……181
（1940年11月13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82
（1940年11月13日）
目前只能做自卫的防御战……183
（1940年11月13日）
复周恩来电……184
（1940年11月14日）

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185
（1940年11月15日）
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187
（1940年11月16日）
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意义重大……189
（1940年11月16日）
致彭德怀电……190
（1940年11月16日）
关于巩固两李反正部队建立外围军致陈毅、刘少奇电……191
（1940年11月16日）
致陈毅电……193
（1940年11月17日）
批转陈毅关于统战工作报告的指示……194
（1940年11月18日）
对苏北的作战部署……195
（1940年11月19日）
致董必武电……197
（1940年11月19日）
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198
（1940年11月21日）
认真准备北移……200
（1940年11月21日）
致冯白驹电……201
（1940年11月23日）
致萧克电……202
（1940年11月24日）

皖南部队必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203
（1940年11月24日）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204
（1940年11月24日）
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205
（1940年11月25日）
为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206
（1940年11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07
（1940年11月27日）
致王世英电……208
（1940年11月28日）
致董必武电……209
（1940年11月28日）
复叶挺、项英电……210
（1940年11月29日）
致董必武等电……211
（1940年11月29日）
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之方针……212
（1940年11月30日）
给周文的信……215
（1940年11月30日）
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电……216
（1940年11月30日）
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217
（1940年11月30日）

给萧向荣的信……218

（1940年11月）

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谈判条件……220

（1940年12月1日）

在边区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22

（1940年12月3日）

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致项英电……223

（1940年12月3日）

致刘少奇等电……224

（1940年12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25

（1940年12月4日）

致周恩来电……228

（1940年12月5日）

致周恩来等电……229

（1940年12月6日）

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230

（1940年12月6日）

致彭德怀等电……231

（1940年12月10日）

致聂荣臻等电……232

（1940年1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33

（1940年12月13日）

致周恩来等电……234

（1940年12月13日）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235
（1940年12月13日）
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237
（1940年12月14日）
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238
（1940年12月15日）
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239
（1940年12月16日）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曾山暂勿离开军队……………………240
（1940年12月18日）
致叶挺、项英电……………………………………………241
（1940年12月18日）
致彭德怀等电………………………………………………242
（1940年12月19日）
致彭德怀等电………………………………………………243
（1940年12月19日）
叶挺应迅速过江……………………………………………244
（1940年12月20日）
关于布置接叶挺过江………………………………………245
（1940年12月20日）
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246
（1940年12月23日）
复周恩来电…………………………………………………248
（1940年12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49
（1940年12月25日）

组织机动突击兵团应付华中紧急局面……250
（1940年12月25日）
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252
（1940年12月25日）
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254
（1940年12月25日）
论政策……255
（1940年12月25日）
要有决心有办法达到北移之目的……263
（1940年12月26日）
必须销毁一切机密文件……265
（1940年12月26日）
新四军渡江仍应戒备……266
（1940年12月27日）
致李宗仁等电……267
（1940年12月27日）
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268
（1940年12月29日）
关于缓复刘为章电等问题致周恩来电……269
（1940年12月30日）
江南部队分批走苏南为好……270
（1940年12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71
（1940年12月30日）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272
（1940年12月31日）

和程悦长的谈话……………………………………………275
（1940年）
为魏一斋大夫题词…………………………………………276
（1940年）
为金德崇题词……………………………………………281
（1941年1月1日）
叶挺宜于两周内渡过江北…………………………………282
（1941年1月2日）
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283
（1941年1月3日）
新四军不宜在茂林久留……………………………………284
（1941年1月7日）
致刘少奇、陈毅电…………………………………………285
（1941年1月7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286
（1941年1月7日）
致刘少奇电………………………………………………287
（1941年1月9日）
致彭雪枫等电……………………………………………288
（1941年1月10日）
和巴苏华的谈话……………………………………………289
（1941年1月上旬）
关于新四军领导问题………………………………………290
（1941年1月11日）
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291
（1941年1月11日）

关于新四军突围中项英等离队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292
（1941年1月11日）
皖南部队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293
（1941年1月12日）
新四军由叶挺负责……………………………………………………294
（1941年1月12日）
给英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295
（1941年1月12日）
注意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的进攻 ………………………………296
（1941年1月13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297
（1941年1月13日）
向叶挺等询问突围情况………………………………………………298
（1941年1月13日）
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299
（1941年1月13日）
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300
（1941年1月13日）
包围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301
（1941年1月13日）
向叶挺等询问蒋方是否停战撤围及皖南新四军情况………………303
（1941年1月14日）
关于同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叶挺等的通报……………………………304
（1941年1月14日）
关于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刘少奇、叶挺等的通报…………………305
（1941年1月14日）

关于国民党军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306
（1941年1月14日）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致周恩来、叶剑英电……………307
（1941年1月14日）
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308
（1941年1月14日）
关于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指示……………………………310
（1941年1月14日）
关于皖南事变的讲话……………………………………………………311
（1941年1月15日）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312
（1941年1月15日）
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内容的通报…………………………315
（1941年1月15日）
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电…………316
（1941年1月15日）
向刘少奇、陈毅询问皖南新四军人枪数目……………………………317
（1941年1月17日）
关于蒋介石已令各战区向我进攻情况的通报…………………………318
（1941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319
（1941年1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讲话…………………………………323
（1941年1月18日）
致周恩来电………………………………………………………………324
（1941年1月18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325
（1941年1月18日）
致徐海东电……326
（1941年1月18日）
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327
（1941年1月19日）
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的指示……330
（1941年1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331
（1941年1月20日）
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332
（1941年1月20日）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333
（1941年1月20日）
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340
（1941年1月23日）
对《解放日报》一篇社论的批示……341
（1941年1月23日）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342
（1941年1月25日）
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344
（1941年1月25日）
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致周恩来电……346
（1941年1月27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348
（1941年1月28日）

致廖承志电……350

（1941年1月28日）

给萧三的信……351

（1941年1月29日）

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352

（1941年1月30日）

对《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的说明……354

（1941年1月30日）

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电……355

（1941年1月30日）

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电……356

（1941年1月30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357

（1941年1月31日）

为严正岗题词……361

（1941年1月）

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363

（1941年2月1日）

复彭德怀电……367

（1941年2月1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368

（1941年2月2日）

致周恩来电……369

（1941年2月2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370

（1941年2月2日）

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371
（1941年2月2日）
日军进攻态势及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376
（1941年2月2日）
致廖承志电……………………………………………378
（1941年2月5日）
设立炮兵司令部直属军委………………………………379
（1941年2月7日）
对日军进攻形势和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380
（1941年2月7日）
皖南事变后的各方动态…………………………………383
（1941年2月7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387
（1941年2月7日）
前定会议决定缓开………………………………………389
（1941年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390
（1941年2月11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391
（1941年2月12日）
致刘少奇电……………………………………………392
（1941年2月12日）
致彭雪枫电……………………………………………393
（1941年2月13日）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394
（1941年2月14日）

复周恩来电……………………………………………………397
（1941年2月14日）
致国民参政会公函………………………………………………398
（1941年2月15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399
（1941年2月17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401
（1941年2月17日）
致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电……………………………………402
（1941年2月18日）
致彭德怀、罗瑞卿电……………………………………………403
（1941年2月20日）
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405
（1941年2月20日）
致周恩来电……………………………………………………406
（1941年2月21日）
请张冲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意见…………………………407
（1941年2月22日）
复周恩来电……………………………………………………408
（1941年2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09
（1941年2月23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 …………………………410
（1941年2月23日）
致周恩来电……………………………………………………411
（1941年2月24日）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412
（1941年2月25日）
为《中国文艺》题名……………………………………………413
（1941年2月25日）
关于蒋介石反共情况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414
（1941年2月26日）
复周恩来电……………………………………………………415
（1941年2月26日）
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416
（1941年2月27日）
复周恩来电……………………………………………………417
（1941年2月28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418
（1941年2月28日）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419
（1941年2月）
为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几位青年题词………………420
（1941年2月）
给周恩来、董必武的信………………………………………422
（1941年3月1日）
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423
（1941年3月1日）
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电……………………424
（1941年3月2日）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电………………………………425
（1941年3月4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426
（1941年3月4日）
致廖承志电……427
（1941年3月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28
（1941年3月5日）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理由……430
（1941年3月8日）
抗议美国大理院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432
（1941年3月10日）
致福斯特贺电……433
（1941年3月10日）
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434
（1941年3月12日）
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436
（1941年3月12日）
对重庆参政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437
（1941年3月12日）
给司徒美堂等的信……438
（1941年3月14日）
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440
（1941年3月15日）
复周恩来电……441
（1941年3月15日）
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共关系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442
（1941年3月17日）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443
（1941年3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46
（1941年3月19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447
（1941年3月19日）
关于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问题致周恩来电……448
（1941年3月2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49
（1941年3月26日）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450
（1941年3月、4月）
给周恩来、董必武的信……457
（1941年3月）
给董必武的信……458
（1941年3月）
读西洛克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的批注……459
（1941年3月至9月）
致周恩来电……498
（1941年4月1日）
为第十届儿童节大会题词……499
（1941年4月4日）
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501
（1941年4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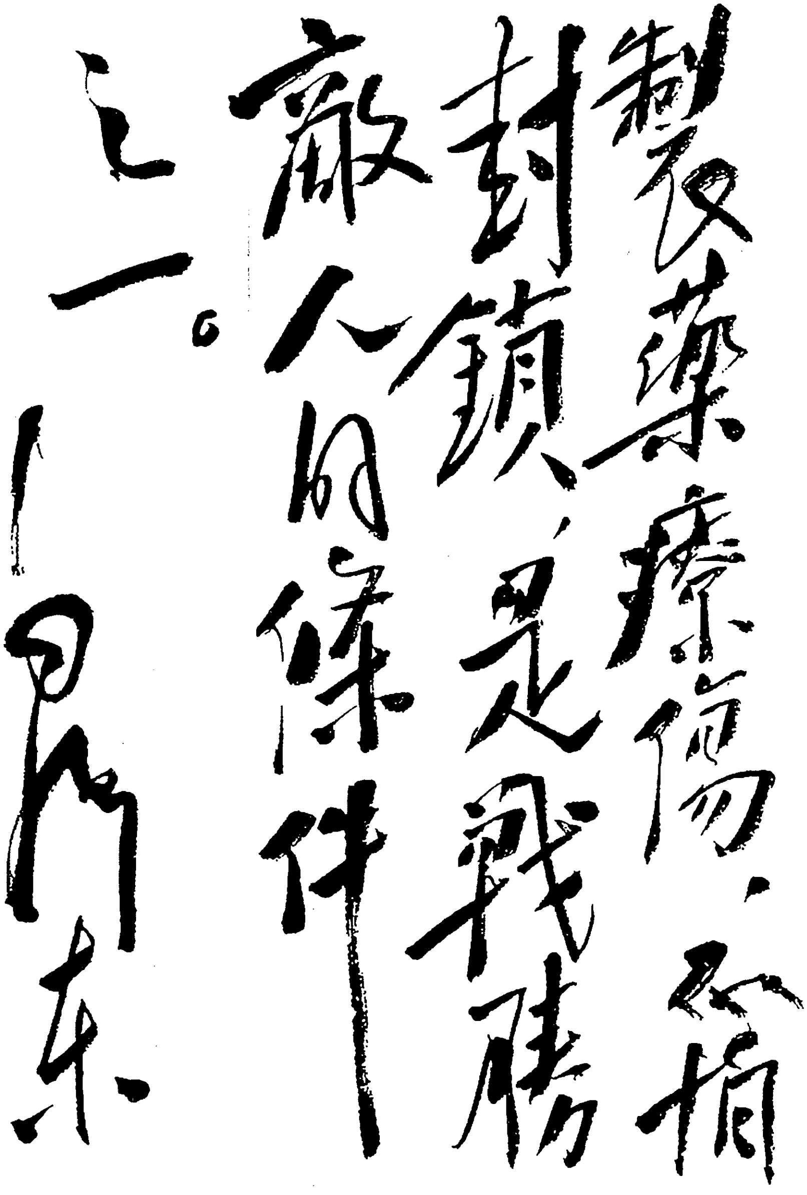
共产党对国民党八中全会宣言及蒋介石演词发表意见……………503
（1941年4月5日）
致周恩来电……………………………………………………………505
（1941年4月8日）
致周恩来电……………………………………………………………506
（1941年4月9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507
（1941年4月9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508
（1941年4月10日）
致周恩来电……………………………………………………………509
（1941年4月10日）
致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电……………………………………………510
(1941年4月11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511
（1941年4月12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512
（1941年4月13日）
致周恩来电……………………………………………………………513
（1941年4月1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514
（1941年4月16日）

为八路军制药厂制药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生题词

（1940年4月）

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

毛泽东



製藥療傷、不怕封鎖、是戰勝敵人的條件之一。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制药厂制药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生的题词。

为马进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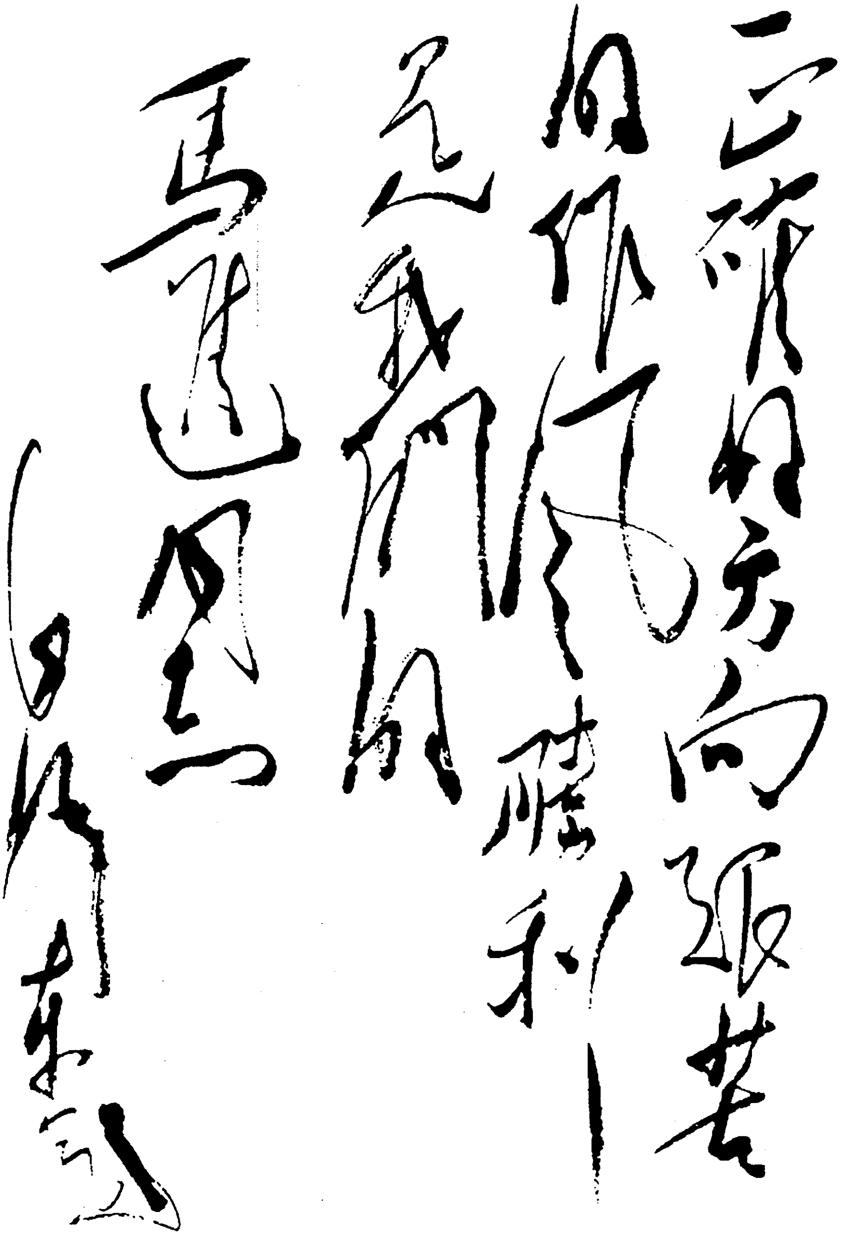
（1940年春）

正确的方向，艰苦的作风，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给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员马进（后曾任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的题词。



正確的方向
艱苦的作風
勝利是我們的

馬進同志

毛澤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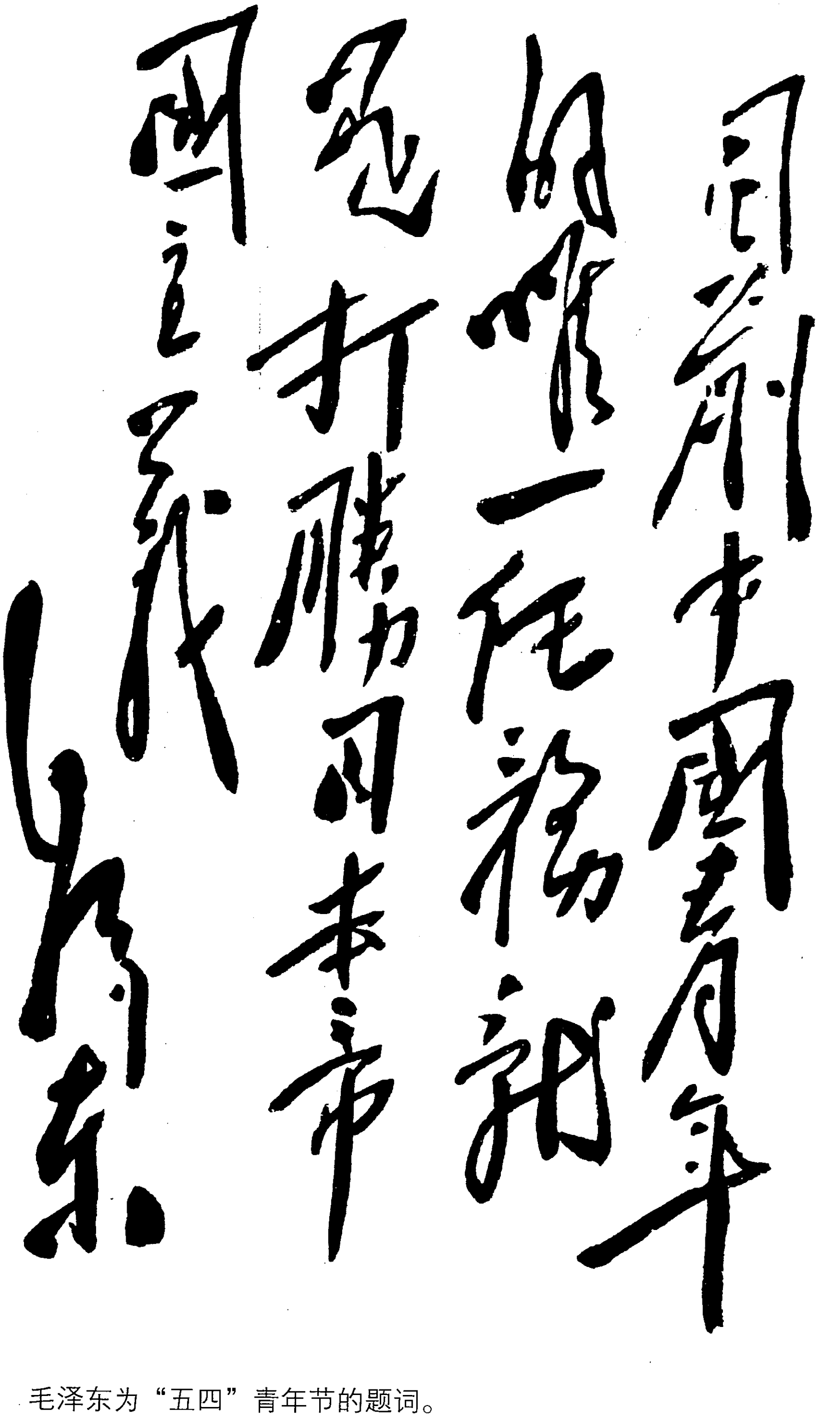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马进的题词。

为“五四”青年节题词

（1940年5月4日）

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



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

毛泽东为“五四”青年节的题词。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

（1940年5月4日）

（一）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2]，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立即执行了；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他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9000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2] 华南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时广东省几支抗日游击队的总称。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1]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

---

[1] 顾祝同，当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浙江、福建、苏南、皖南、赣东。冷欣，当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辖区包括苏北、皖北以及鲁南的小块地方。

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1]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2]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3]，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

---

[1] 四、五支队，即新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是张云逸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力。当时他们正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2] 叶、张两部，这里指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和张道庸（即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当时他们在江苏中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3] 1940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均属桂系），派军队向在安徽、湖北抗日的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都曾经强硬地抗议他们破坏抗日的行为，并且在军事上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斗争。

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1]。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2]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3]，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

---

[1] 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2]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

[3] 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为增援新四军在淮北、皖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打退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的进攻，命令八路军调遣部队南下。同年夏，南下部队2万余人到达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等会合，先后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开辟了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

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1]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

---

[1] “中央军”主要指蒋介石集团的部队。“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杂牌军”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他们的待遇与蒋介石集团的部队不同。

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1]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

[1] 东南局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东南地区工作的代表机关。这个地区包括浙江、福建两省的全部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部分地方。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5月4日）

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广大地区[1]

（1940年5月5日）

项英、陈毅二同志：

甲、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乙、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部署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在郎、广、两溧只应配置一部分兵力及一部分人员机关，并须在适当时机取得该地政权。

丙、在吴淞口、镇江之间，镇江、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之沿江南北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立地方游击部队，务不使敌人切断渡江交通。应责成四、五支队恢复无为县。

丁、速令叶飞[2]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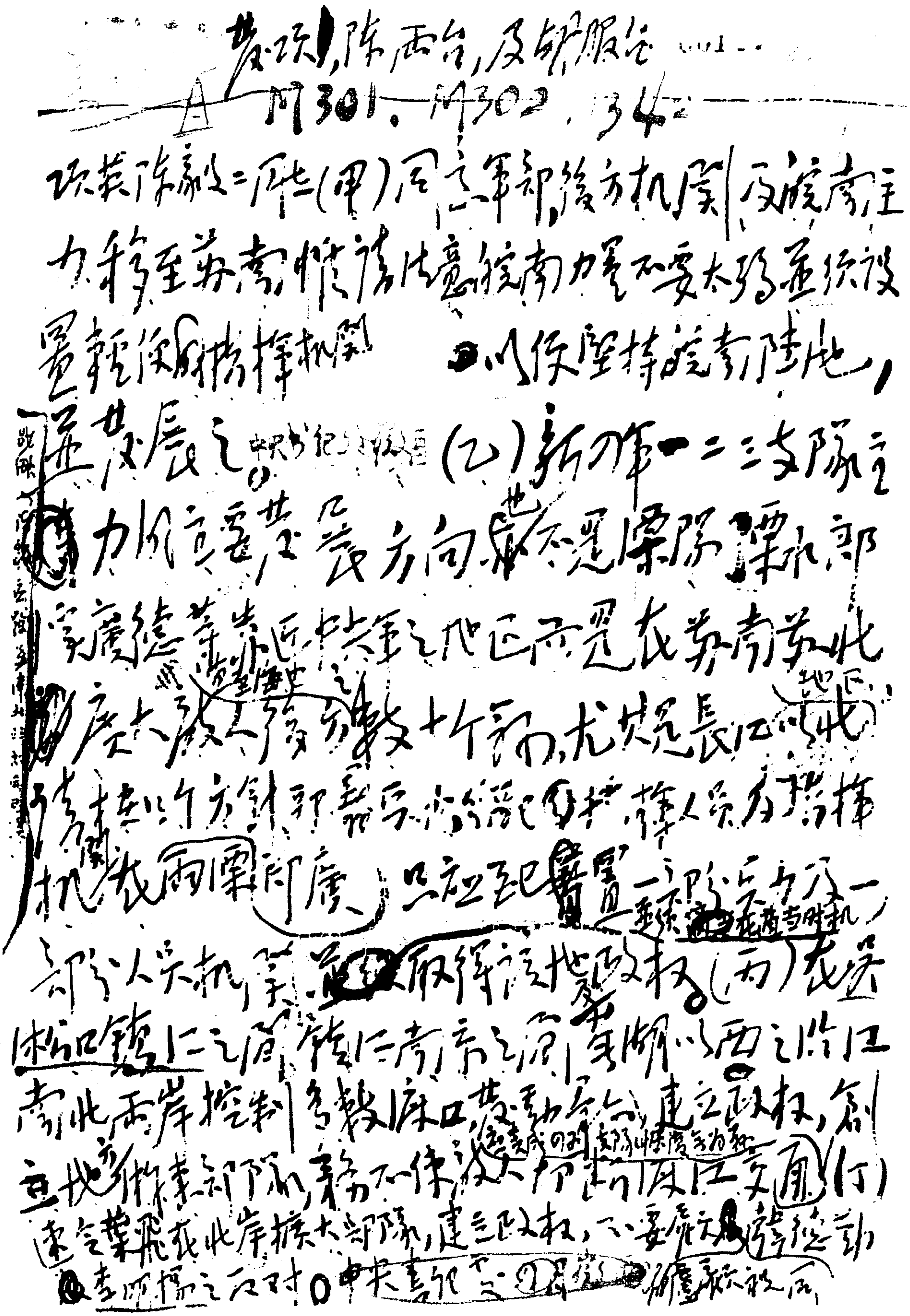
[2] 叶飞，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辖之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员。

韩德勤李明扬[1]之反对。

中央书记处
微酉

---

[1]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



叶项，陈两台，及胡服台

川301、川302、346

项英陈毅二同志（甲）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须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较强的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中央书记处[illegible]）（乙）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则应迅速向苏北发展，[illegible]不是[illegible]

[illegible]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illegible]干部、人员及指挥机关在两个月内只应配置一部分在[illegible]

部分人员机关[illegible]取得该地政权。（丙）在吴淞口镇江之间，镇江南京之间，芜湖以西之沿江南北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立地方游击部队，务于一个[illegible]打通长江交通。（丁）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illegible]

[illegible]李明扬之反对。中央书记处[illegible]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陈毅电的手稿。

对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发展中原根据地的指示[1]

（1940年5月5日）

德怀、克诚、陈、罗、雪枫、胡服：

韩德勤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受我李先念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已先到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部队，并恢复立煌办事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胡服（刘少奇）的指示。

处，释放张夫人（张云逸的夫人韩碧）及一切被捕党员，退回军款，则我军暂时可不开入淮南，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如彭吴兵力不足，则三四四旅协助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支队，陈毅之叶飞部，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毛　王
微酉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5月11日）

武汉敌人分三路向鄂豫进攻，已占确山、竹沟、泌阳。豫南宜发展，请令李先念路西部队派部队及干部向北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5月22日）

青年工作是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部分，各种民众工作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与整个工作联系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对巩固发展苏北根据地及扩大整训武装的指示[1]

（1940 年 5 月 23 日）

胡服、陈毅、克诚、雪枫、云逸：

（一）胡服、雪枫两号电均悉。

（二）目前重点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三）目前淮北与皖东须由雪枫与云逸所部独立支持之，无论敌人或顽军进攻，均用游击战争与之周旋，不要希望任何增援，华北增援不可能，也不适当。

（四）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能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要积极准备一切，包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

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

（五）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六）目前敌人正向涡河以西进攻，正是雪枫区域扩大整训军队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皖东区域，除以有力一部对付莫德宏部的侵入并派得力人去指挥外，亦应照此方针布置。

（七）要扩兵与巩固根据地，就要发动基本群众，而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给群众以利益，必须镇压反动分子。在这里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顾到党派的与社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预防过左倾向，另方面对于妨碍我们发动基本群众的反动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镇压（当然不是每个都杀死），否则发动群众与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对于土匪必须加以剿除。

毛　朱　王
漾辰　延安

我们要争取中间派[1]

（1940年5月29日）

目前时局有拖与好转的可能，当然也要警惕有逆转与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朱总司令说得对[2]，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要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要争取中间势力，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朱德报告国共磨擦问题后讲话的一部分。

[2] 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5月30日）

战地写生队沈逸千等拟由榆林转赴晋西北工作，请加以保护。

---

[1] 这是毛泽东致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对华北华中的战略部署[1]

（1940年6月1日）

彭，杨，左，并告陈、罗，克诚[2]：

甲、确占华北为敌人之已定方针。敌之“扫荡”使我部队困难增加，扩大不易，而部队之财政、粮食、枪枝、弹药等亦日见困难。

乙、国民党政策是把我们封锁在敌后方与敌拼消耗，防止我部队南移，隔断我部队可能进入我后方地区的道路。

丙、因此在战略布置上，我们有下列意见：

（1）在北线即冀中、冀察晋、晋西北等区，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而不是扩大部队。因部队扩大，给养、枪枝均无着，反而使斗争的坚持发生困难，所以这些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部应向南移动，而地方武装则应大大加强，游击战争应大大发展。在这些地区的主力军队，应确保六成枪枝的限制，力戒人多枪少的现象。

（2）在南线即晋东南、冀南、山东等地区，除山东外，很大的扩大亦是困难的。克诚纵队及彭朱支队[3]应立即转往华中，其原防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3] 彭朱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

由一二九师及北线南移部队接替。

（3）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现在情况虽然不十分紧张，然而目前是我们部队南移的最好时机。如谈判略有结果，则不好南移了。彭朱支队及黄克诚纵队应立即出发。黄应亲率全部或至少两个旅南下。在华北略有损失可以补充，而华中如失时机，将来全部困难很大。以上请德怀考虑电复。

毛　朱　王

东日

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1]

（1940年6月1日）

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2]，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3]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朱德致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电的主要内容。

[2] 指6月1日给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并告陈光、罗荣桓、黄克诚的电报。

[3] 彭，指彭明治，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司令员；朱，指朱涤新，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政治委员。

和陈嘉庚的谈话[1]

（1940年6月1日）

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

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组织基础就是国共两党，二者失去了任何一方，统一战线都不能设想。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

[1] 5月31日下午5点多钟，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5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陈嘉庚，并与他亲切交谈。陈嘉庚首先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他对共产党进行反磨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这是毛泽东关于此问题和陈嘉庚谈话的一部分。

同意中原局的建议[1]

（1940年6月5日）

你们的战略部署须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的建议，陇海铁路以北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仍归还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陇海路以南则归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等关于中原局的意见问题致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6月10日）

目前形势，欧战将扩大，形成英、法、美对德、意、日的对抗。欧战已影响到中国，最近国民党搞磨擦也减少了。写“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我们在党内要紧，但党的政策要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捐；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对党外干部不接近、不信任。

致王震电[1]

（1940年6月11日）

涧峪岔高双成部队决不能打，此间即派南汉宸[2]去榆林交涉。顽固派正挑拨高双成向我磨擦，我们决不可中计。绥德、清涧、安塞、吴堡等四县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县政府及专员公署人员分配实行“三三制”。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2] 南汉宸，当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争取东北军工作是党争取全国友军工作的重要环节[1]

（1940年6月13日）

东北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较可靠的友军，在国共斗争中基本上是一种中间势力，且有可能为我争取。我们对东北军的关系好坏，对于我们争取广大友军工作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把争取东北军工作看成党争取全国友军工作的重要环节。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关于争取东北军工作致中原局、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1]

（1940年6月21日）

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然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

[1] 延安新哲学会，是在毛泽东倡导下于1938年夏秋之际成立的。1940年6月21日下午，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等50余人参加。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部队合编问题
给八路军总部的信[1]

（1940年6月27日）

彭、刘，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等：

同意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彭雪枫部，对外仍旧保存新四军第六支队名义，黄克诚部不必改新四军。请陈光、罗荣桓令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到徐州以东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彭雪枫、黄克诚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俟彭朱支队到达后，苏北部队再行合编，成立一八路军纵队。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现在华中部队统归刘少奇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雪枫、黄克诚指挥。

毛　朱　王

二十七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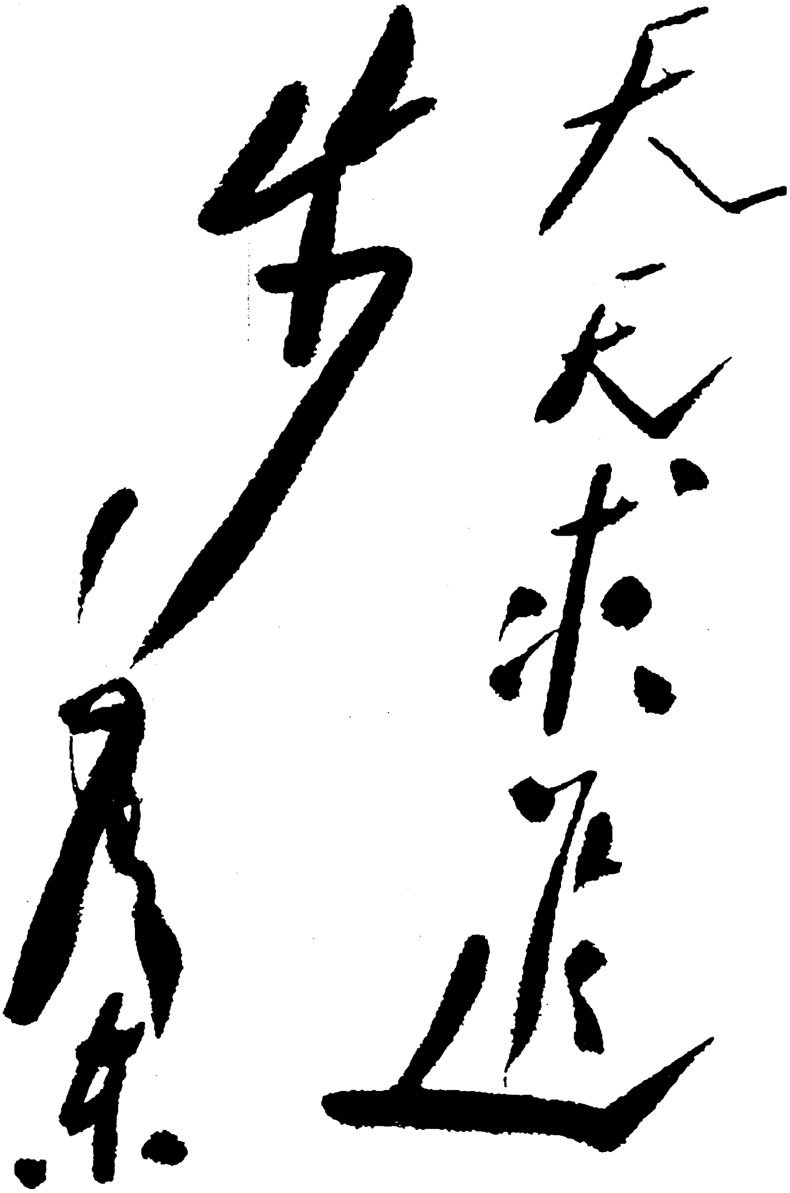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八路军各部队合编问题给彭雪枫、刘少奇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荣桓等的电报。

为叶志强题词

（1940年7月1日）

天天求进步。

毛泽东



天天求进步

毛泽东

毛泽东为叶志强的题词。

团结到底[1]

（1940年7月5日）

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地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而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我调查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成分，在那里办事的有一千三百人，其中坚决反共的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即是说，不足百分之四，其余都是希望团结抗战的。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

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但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其中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为此目的，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在军队问题上，我党宣言中已表明：继续执行“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某些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的，应即加以纠正。凡不向八路军新四军举行军事磨擦的军队，应一律

采取友好态度。即对某些举行过磨擦的军队，在其停止了磨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这就是在军队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其他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各方面的政策，为着抗日的需要，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均必须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势将勾引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对其投降，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1940年7月7日）

全中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

当此伟大抗战的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最诚恳最热烈的心怀向我全国同胞，前线将士，各党各派抗日同志致民族革命的敬礼，向我三年以来的殉国烈士致无限的哀悼，向我负伤将士与被难同胞致深切的慰问。

英勇抗战的三周年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要崩溃的，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我三年英勇抗战中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已凝结于全民族的心目中，而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国的。

但是抗战的空前困难时期也到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向中国进攻，并宣布了他的东方门罗主义。中国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发生动摇，而从国际方面袭来的阴谋，则有由德意的劝和政策代替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飞机大炮互相呼应，企图借此达到他们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重新分配世界与奴役世界人民。而英美法帝国主义则在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与对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下，使法国遭受了亡国惨祸，使英国遭受

了严重失败，而在美国则使其太平洋大西洋上的利益同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帝国主义大战现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而由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正在袭击全人类的生存，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革命危机正在一切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中间深刻的酝酿起来，我们是处在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惟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

在目前的国际新形势下，被内外危机重重压迫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其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加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之下，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这些人头脑昏聩，意志薄弱，熬不住艰难困苦，看不清抗战前途，一遇危难，就想动摇，这些人是抗日阵线中最危险的人物。

全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并指出：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

汪精卫的投降是破产了，他同他的党徒现在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手中最下贱的玩具。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是把全法国人民变成了希特勒的奴隶，投降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法国人民的境遇。中国共产党坚信，在法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法国人民的斗争将与中国人民的

斗争配合起来，战胜外来的压迫者。

全中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任何敌人的进攻必须抵抗，任何困难必须克服，任何投降阴谋必须反对，任何投降分子必须同他奋斗到底，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磨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全国人民必须在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抗战到底，各党各派的诺言必须实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同胞及友党同志声明：我们是始终实践自己的诺言的。我们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等项，我们都已认真执行，从来没有违背。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内，在敌人后方各抗日根据地内所执行的政策，完全是符合于三民主义的政策，没有任何一项超出了三民主义的范围。我们现在重复声明：在整个抗日战争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期内，我们将始终执行三民主义的政策。一切责备共产党违背诺言的，完全是恶意的诬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亦尊重他自己的诺言，认真实践其允许过人民与允许过我党的一切政治上与具体问题上的条件，以利团结与抗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在团结抗战与国共合作期间，采取任何对内的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是绝不许可的。我们始终拥护蒋介石先生及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始终执行不暴动不破坏的诺言，一切关于共产党又将采取过去内战时期的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的流言，完全是奸人的造谣。同时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亦应放弃对于共产党的破坏政策，以保证两党的团结一致与长期合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

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其他地方作任何足以引起友军冲突的行动，而在战区及敌人后方则与一切抗日友军协同作战。但要求各抗日友军对其部下亦应加以约束，勿向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足以引起冲突的任何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极力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游击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游击队乃是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军队，而在三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大小一万余次的英勇战斗，坚持了广大敌后地区的抗战，钳制了全国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而其处境则是最险恶的，其生活则是最困苦的，其弹药则是最缺乏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继续执行本党六中全会在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所作“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一部分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者应即加以纠正。本党对待一切抗日友军的政策是团结与巩固他们，而不是分裂与破坏他们。但是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及各抗日友军亦以同样政策对待八路军与新四军，以求泯去猜疑，齐心抗战，而使一切军队同在最高统帅指挥之下担负杀敌救国之任务。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即将到来的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中已经产生了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须知抗战决不能采取既要对外又要对内的两面作战政策，这样政策实无异于自杀，法国达拉第政府的反共覆辙，中国应该引为深戒。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改变在抗战中的许多作法，必须实行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必须释放一切被捕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分子，必须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必须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必须废止有害的特务作风，必须改变不适时宜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与兵役政策，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面，而不应依赖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全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是到来了，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这些危险与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中国存在着克服任何危险与困难的一切必要条件，只须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善于去利用。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如德国。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为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整一百年中，经历了无数的危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孙中山先生的英勇奋斗，尤足为我全民族的模范。当此民族危难深重之秋，我们一定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遗教，执行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执行他的临终遗嘱，打破一切悲观动摇与没有出路的情绪，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到底！

团结到底！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

（1940年7月7日）

目前形势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表示出我们是处在新的巨大变化的时期中。

（一）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两大帝国主义阵线的多数国家为着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生死斗争阶段，而苏联领导的和平阵线，则因苏联的强大国力与正确政策，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而超脱于战争之外，这是目前形势的最基本特点。

（二）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由于德国进攻，意国参战，法国投降，英国已退出欧洲大陆的结果，陷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中，目前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准备进行新的巨大冲突。德意准备向英国进攻，英国收集法国殖民地准备抵抗德意，日本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战线，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

（三）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则正在进一步解决其在

波罗的海方面、在巴尔干方面、在近东方面的安全巩固问题，正在准备着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为应付世界巨大事变与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

（四）空前激烈的搅乱整个世界秩序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大众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迅速革命化，革命正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与印度深刻的酝酿起来，第二国际正迅速破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正迅速增加，苏联在全世界人民中的信仰正迅速高涨。

（五）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来了。但同时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六）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现在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又大大的削弱了自己，因此，国民党内部的再分裂，新的汪精卫派的产生，已经不可避免，全国人民中无出路的情绪必然会增加。

（七）但国际国内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便于我们去执行克服投降争取好转的任务。这些条件是：1. 英美法已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2. 日本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困难，其力量已在我们三年抗战中大大削弱了。3. 苏联的无比强大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中国抗战的可靠朋友（以上是三个外部条件）。4. 我党抗战中的力量是大大增加了，这是克服投降争取〔时局〕好

转的主要决定因素。5. 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抗战的积极性（这些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6.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使其无法统一地进行投降与统一地进行“剿共”（以上是三个内部条件）。所有这些条件，给了我们以充分可能性，去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的危险，而使时局逐渐走向好转。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情绪必须在认识这些条件上加以克服。

（八）增加了的投降危险与增加了的好转可能性，将表现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分化。首先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分化，一部分人因为日本的压力、抗战的困难与对于共产党及民众的恐惧，必然分裂出去变为投降派，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我们的政策）实行好转，变为较前积极些的抗日派。这种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好转，虽然只能是在不损害其根本阶级利益条件下的好转，不能有彻底的好转，但延长合作抗日的时间是可能的。其次是中间势力中也会发生分化。我们的任务，在于争取一切可能好转的部分，争取国民党的主体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

（九）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全党必须紧张起来，把自己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核心，认真的明确的执行中央的政策，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党的政策

根据上述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全党应当执行下列各项党的

政策：

（一）主要的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行投降的危险性。不是如同国民党某些人一样蒙蔽事实真相，说什么“一切皆于中国有利”，而是指出抗战困难与投降危险空前严重，号召人民为克服这种困难与危险而斗争。

（二）指出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反共，指出法国投降的悲惨教训，今后中国如欲反苏反共，必然重蹈法国的覆辙。过去的反共政策已使抗战力量大为削弱，如不改变这个政策，抗战胜利是无望的。

（三）强调抗战的有利条件。特别强调苏联的强大，强调世界革命形势的有利，强调中国抗战力量远非法国可比，宣传中国人民在三年中英勇奋斗的成绩，以打击悲观情绪，孤立投降派。

（四）强调自力更生。为此必须要求国民党改变其在抗战中的作法，例如应即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取消反共政策，改变特务作风，改变错误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及兵役政策等，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依靠民众自力更生的模范实例。

（五）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在过去一时期内强调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当时的反共高潮，促成顽固派的重新觉悟。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必须使党员懂得：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但现在我们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在反共高潮已经降低，某些顽固派初步表示某些好转之时，我们应对他们强调团结，以便争取合作时

间的延长。

（六）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某些部队不愿深入敌后，而在时局严重时便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便想恢复内战时期的游击生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七）在一切友军中（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无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以便建立党的信誉，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

（八）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我们没有违背自己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坚决执行自己这个诺言的。而国民党则违背了它的诺言，例如对于党派的合法存在权问题，承认边区问题，实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等等，都与其诺言相违反，我们应要求国民党实践其诺言，而打破“共产党违背诺言”的欺骗宣传。

（九）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政经济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滥捐等的过“左”政策；不执行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对中央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指示怠工；对根据地不作长期打算，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对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表示怀疑与不执行；对待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把国民党看成都是顽

政策：

（一）主要的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行投降的危险性。不是如同国民党某些人一样蒙蔽事实真相，说什么“一切皆于中国有利”，而是指出抗战困难与投降危险空前严重，号召人民为克服这种困难与危险而斗争。

（二）指出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反共，指出法国投降的悲惨教训，今后中国如欲反苏反共，必然重蹈法国的覆辙。过去的反共政策已使抗战力量大为削弱，如不改变这个政策，抗战胜利是无望的。

（三）强调抗战的有利条件。特别强调苏联的强大，强调世界革命形势的有利，强调中国抗战力量远非法国可比，宣传中国人民在三年中英勇奋斗的成绩，以打击悲观情绪，孤立投降派。

（四）强调自力更生。为此必须要求国民党改变其在抗战中的作法，例如应即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取消反共政策，改变特务作风，改变错误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及兵役政策等，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依靠民众自力更生的模范实例。

（五）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在过去一时期内强调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当时的反共高潮，促成顽固派的重新觉悟。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必须使党员懂得：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但现在我们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在反共高潮已经降低，某些顽固派初步表示某些好转之时，我们应对他们强调团结，以便争取合作时

间的延长。

（六）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某些部队不愿深入敌后，而在时局严重时便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便想恢复内战时期的游击生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七）在一切友军中（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无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以便建立党的信誉，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

（八）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我们没有违背自己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坚决执行自己这个诺言的。而国民党则违背了它的诺言，例如对于党派的合法存在权问题，承认边区问题，实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等等，都与其诺言相违反，我们应要求国民党实践其诺言，而打破“共产党违背诺言”的欺骗宣传。

（九）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政经济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滥捐等的过“左”政策；不执行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对中央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指示怠工；对根据地不作长期打算，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对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表示怀疑与不执行；对待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把国民党看成都是顽

固派，而不懂得国民党多数党员都是中间派并有许多进步分子，顽固分子只占极少数，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要求中间分子有进步分子一样的表现，不承认中间分子的地位；对非党干部表示不信任，不接近，没有同非党干部共同工作的习惯，以及杀戮被捕的顽固分子、杀戮侦探等等。这些都是从狭隘思想出发的“左”倾错误表现，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但同时，对右倾错误亦不应放松。例如对时局的悲观情绪，无原则的迁就国民党，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发展抗日力量取消极态度，对国民党内奸政策无警觉性，混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原则差别，干部的发财思想，贪污腐化，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与事务主义，以及惧怕自我批评等，如不纠正，便将丧失党的独立性与革命的前途。

（十）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必须使党员懂得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既须使党员明白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又须使党员明白无产阶级如何同其他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二者是党的教育不可分离的两方面，决不能随便放弃一方面。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单纯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应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作为成绩考成的重要标准。

（十一）继续巩固党的工作。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必须严格审查干部，肃清内奸，以便有效地防止国民党的内奸政策。必须从党内将内奸分子（敌人及国民党派来的与收买的分子）、投机分子（为个人利益混进党内表现严重的贪污腐化与脱离群众的分子）与太落后分子（不到

会、不缴党费、又不做任何工作的挂名党员）这三种人洗刷出去，而对于其他分子则加强教育。必须使党员懂得“党内要严党外要宽”两个不同的原则，而这样两个不同原则正是相辅为用的。目前则存在着相反的现象：党内反而是宽的，党外反而是严的，这种现象必须纠正。

（十二）加强各个根据地内的组织工作。现在有些根据地内如晋察冀边区等有了好的组织工作，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上了轨道。而在另外许多区域，则由于对支持长期斗争认识不足，还存在着很大弱点。必须认识今后的斗争是异常艰苦的，而要长期支持就必须改变过去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代之以有计划的细心的组织工作，并在各方面执行党的正确政策，否则必然要失败。

（十三）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在人力物力已经发生困难的区域主要的方针是巩固，而在其他区域则主要的方针是扩大，并于扩大中巩固之。

（十四）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作战地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瓦解敌军与伪军的指示，必须在今后一年中表现瓦解敌伪军的成绩，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

（十五）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而对党外则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以便揭穿与孤立投降派。

（十六）在日本占领区域则须认真建立党的组织，并须同样执行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对党外则在于谨慎的组织群众，加强工人运动，积极瓦解敌伪军，争取两面派汉奸，以便孤立日寇汉奸而最后驱逐之。

（十七）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它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

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执行上述各项政策而斗争，果能如此，则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是有保证的。

目前华中应切实发展苏北[1]

（1940年7月12日）

恩来，胡服，项英，陈毅，雪枫、克诚[2]：

恩来电悉，我们均同意。

一、叶管部[3]已将顽军击溃，陈毅已抵苏北，并令粟裕[4]率江南指挥部及二六两团过江，津浦路[5]东淮北部队亦正往援中。

二、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6]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7]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孔道。并请雪枫保护于学忠[8]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周恩来、胡服（刘少奇）等的电报。

[2] 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雪枫、克诚，即彭雪枫、黄克诚，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叶管部，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辖之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纵队司令员叶飞、副司令员管文蔚。

[4] 粟裕，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

[5]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6]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7]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8]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运饷弹道路，不要禁止通过，如通知我们时，我军应负责保护。

三、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毛　朱　王

十二日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

（1940年7月13日）

一　战争与革命问题

（一）关于苏联不加入战争

两派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阻止不了时，人民就起来反对战争，而苏联就不加入。这一不加入计划的实现，是苏联二十年来斗争的结果，是世界人民拥护苏联的结果，是苏联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世界战略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但保护了苏联，而且保证了世界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完成于德苏、苏芬两个协定[2]，以后的任务则是巩固之。

（二）关于帝国主义两大阵线

所谓帝国主义两大阵线，两大统一战线，不是说双方同盟诸国间没有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例如英、美、法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是有矛盾与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要点。

[2] 指1939年8月23日和1940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芬和平条约》。

的。又如德、意、日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也是有矛盾与斗争的。

也不是说各个阵线是固定的，不生变化的。相反，它们是不固定的，要生变化，而且已经生了变化。

一方面，有北欧、荷、比、巴尔干的变化，有法国的大变化，表现了阵线的减弱，这就是英美法阵线。

一方面，则表现了阵线的增强，这就是德意日阵线。

于是造成了目前的不平衡状态。

日本一会儿亲英、美，现在又有亲德、意之势，这是由于日本内部法西斯派将代替英美派之故。

双方都没有完全固定的同盟条约，例如美之与英、法，英、法之与北欧，及荷、比，德、意之与日本。

这就是所谓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与变化。今后还会有矛盾与斗争，也还会有变化。

如果不管这一切，则一方面德、意、日欲打破现状，一方面所谓民主国（包括荷、比）则欲维持现状，双方各有利害共同点，因而可以结成一种统一战线，则是实际上已经有了的，双方都有几十个或十几个国家。目前以地域、经济力与海军而论，仍以英、美为强，而德、意、日则因德国战争胜利与占领地区之广，表现其强。

无论东方与西方，现在两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主要已不在大陆上，而移到海洋上，在这方面尚未决战，因此尚有巨大的冲突。

假令英国屈服，亦尚有美国的海上霸权。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德、意都是海军较弱的，加上法国投降，也未改变这种状态。

德、意与日本，不破坏英、美的海军，是无法管理英、法、荷、比的殖民地的。

一方面，凡尔赛与华盛顿体系，又一方面，反对这个体系而企图建立新凡尔赛与新太平洋体系。这个斗争现在尚未完结。

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

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化时代，不是什么“和平”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已完结，以后也永远不能建立。

如果看不见这一点，就因为对下列诸点估计不正确：

1. 对反革命估计过高。（1）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由于战争而展开了，不是缩小了；（2）各国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民中失去信任；（3）社会民主党失去信任；（4）战争的破坏性等。

2. 对于革命力量估计不足。（1）苏联的存在；（2）中国革命的存在；（3）印度革命运动的高涨；（4）欧洲及各国共产党的存在。

（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1. 德、意战胜英、法，等于打断两条帝国主义锁链，而新的帝国主义锁链，则可能在刚刚套上或来不及套上就被打断。资本主义战线可能在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与中国，这就等于基本上冲破整个资本主义战线。

2. 在欧洲，单纯的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了，在那里，只能是十月革命加苏联红军。而这样的时机，目前还未到来。

3. 目前是苏联的八小时工作制与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而不是世界革命。目前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前夜。

二　中国问题

（一）好转问题

1．初步好转——两党两军的外部合作，目的在唤醒广大民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2．彻底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

3．除去悲观——初步好转与彻底好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的同盟军是广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

4．除去幻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好转。

（二）后退问题

目前是战略进攻中部分的策略后退（隐蔽政策）。但在战略上，在总的方面，仍然是进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三）民族与民主革命问题

1．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

2．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也有一致的。大体上可分为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然而都在抗战过程中。目前是抗日除奸的整个革命阶段，没有另外单纯的土地革命阶段。是抗日除奸问题，不是单纯的土地革命问题。

3．“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抗战建国”。

战略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有四种形式的统一战线——（1）在国民党区域：在野的与在朝

的统一战线。（2）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区域：我们与其他党派、阶级在政权内的统一战线。（3）国民党政权与我们政权之间的统一战线。（4）在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下层统一战线。

4. 目前是部分的统一战线政权，将来应该是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没有这种政权，就没有抗日胜利。

5. 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

五台山[1]一类——在抗日的前期与中期。

全国——在抗日的后期。

反磨擦——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

（四）中间派问题

1. 就世界范围分：被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派，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盟军。

2. 就抗战营垒（与敌人营垒区别）分：顽固派或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统治的阶级，动摇的阶级，不是中间派，把它们当做中间派，混淆了人民的视听。

中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派。

下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步派。

（五）强调团结与斗争问题

1. 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

2. 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

---

[1] 这里的五台山，指在五台山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

3. 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

4. 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

5. 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

6. 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有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7. 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

（六）倾向来源问题

右倾——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左”倾——从农民小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客观的——上列二种。

主观的——教育不足（自我批评不足）。

（七）边区问题

两个上了轨道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与晋冀察边区。因为党、政府、军队的努力。

缺点：革命秩序不足；统一战线太少；官僚主义太多。

加强：中央、边区，大家的努力。

（八）学习问题

1. 我们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

2. 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主义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3. 例如此次决定，即有许多新东西，这不是说过去不对，而是

说客观变了，主观要适应此种变化：国际，德、意、日的优势，苏联在战外，革命的酝酿；国内，新的困难，新的投降危险，初步好转的可能性，反共高潮的下降（已有三个月），“左”倾危险的发展等。

4. 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

前两期都有成绩，但都有错误——陈独秀的绝对主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与内战后期的绝对主义（一切打倒，对某些可能部分没有正确策略）。现在应扩大成绩，避免错误。

加紧争取同盟军又不失自己立场的策略教育是必要的，老大与形式主义都是无用的。

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改编反正军的方针问题[1]

（1940年7月16日）

我们对于这些大批反正过来的军队，应该把他看作一种八路军、新四军的外围军方式去处理。这一创造外围军的工作，是和更加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本身的工作分不开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改编反正部队方针问题致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1]

（1940 年 7 月 20 日）

一、与李品仙力求缓冲突；韩德勤部南下进攻可能性很大，我华中部队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北。

二、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的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但应极谨慎，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均没收其土地财产，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

三、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致中原局、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没收汉奸及参加暴动首领土地财产问题的指示[1]

（1940年7月20日）

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之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交民主政权，具体处理。但应极谨慎，仅仅对付极少数个别的汉奸首领及发动暴动首领，且应经过当地革命政权之正式判定和群众之拥护，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均没收其财产土地，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又指出，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某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没收汉奸及参加暴动首领土地财产问题发出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陈毅电[1]

（1940年7月30日）

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韩德勤部南下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还指出：同意陈毅意见，对两李[2]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李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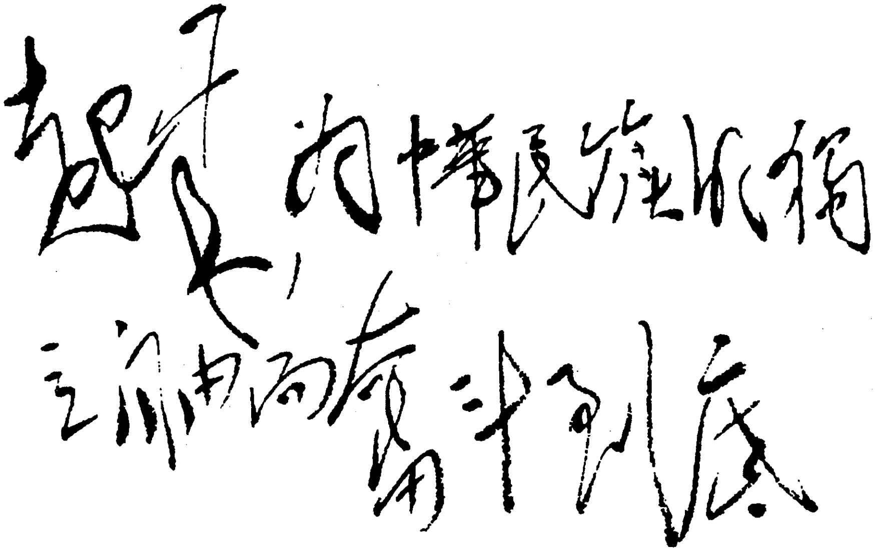
[2] 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李长江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

（1940年7月）

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



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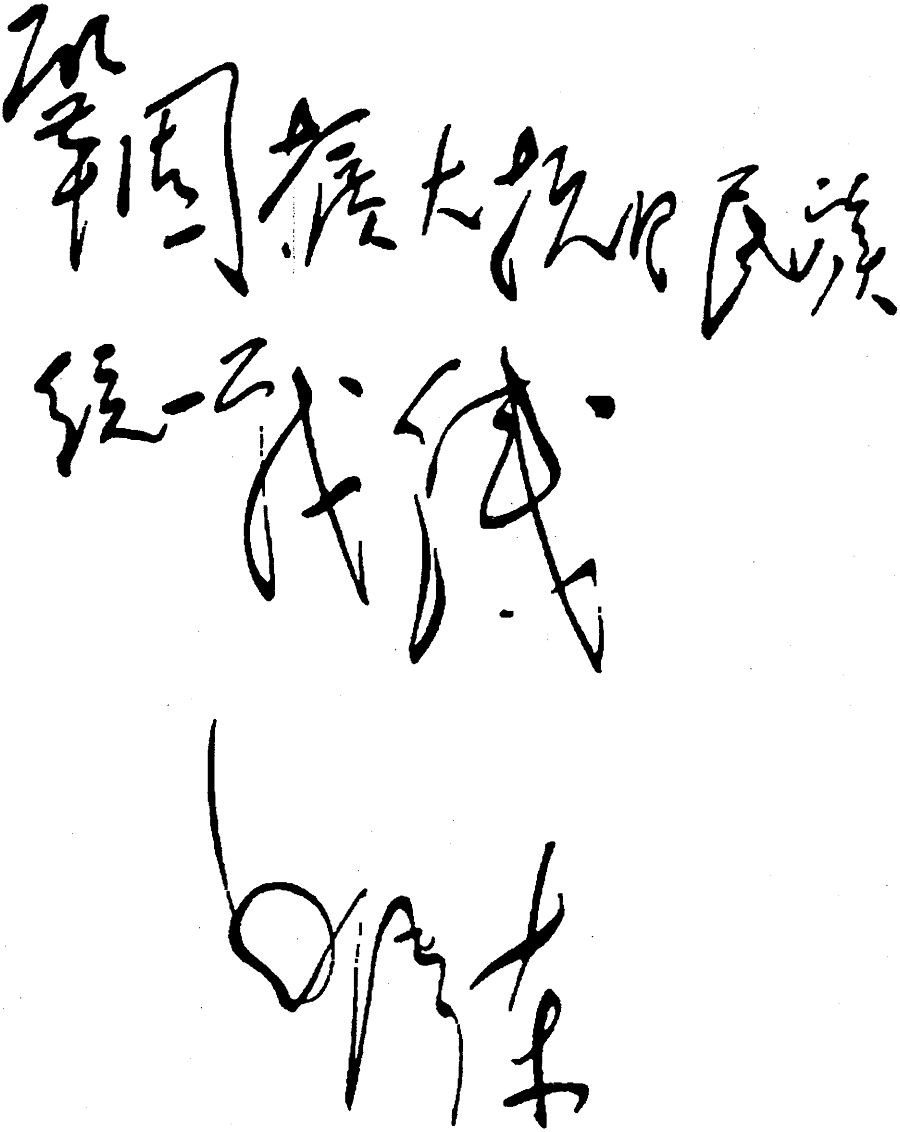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的题词。

为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题词

（1940年7月）

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



鞏固擴大民族
統一戰綫

毛澤東

毛泽东为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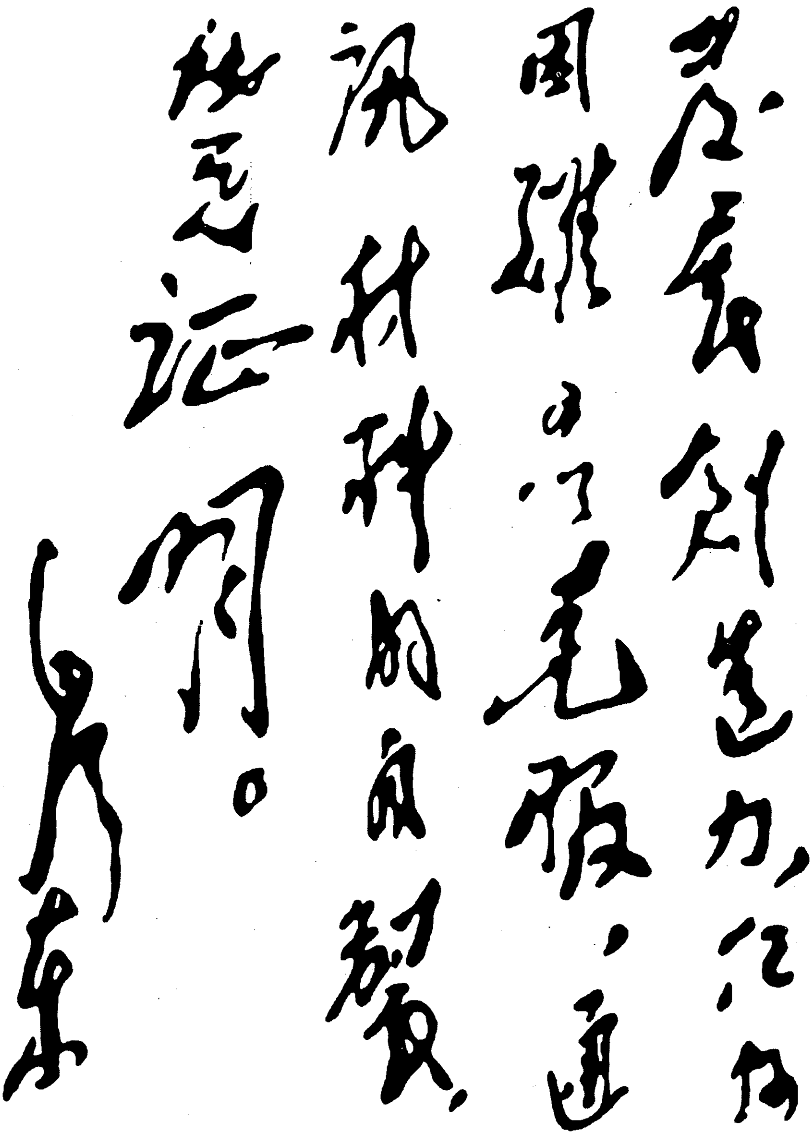
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题词[1]

（1940年7月）

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

[1] 1940年7月，在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之际，正是陕甘宁边区的极度困难时期，为了鼓励工人们克服困难努力生产，毛泽东亲笔为通信材料厂题词一幅。



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给，就是胜利。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的题词。

为《大众习作》题名[1]

（1940年8月1日）

大众习作

---

[1]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

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1]

（1940年8月1日）

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而且现在各部队也可能抽出少数人员受训，故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的主要内容。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1940年8月13日）

彭，杨，罗、陆，聂，彭，朱[1]：

你们会议[2]应详细讨论中央七七决定[3]及最近中央与总政各种指示以外，我们还有下列意见：

（一）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罗，指罗瑞卿，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陆，指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朱，指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 指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会议。

[3] 指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十七条重要政策。

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军队对居民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地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

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地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

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

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老干部。

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和老部队。

（四）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甲、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

乙、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丙、复杂性，多样性。反对遇事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丁、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躁盲动乱来一顿。

戊、统一性。以使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己、实际性。反对不着重实际，铺张夸功。

庚、精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顾表面。

辛、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于战斗环境。

（五）敌伪军锄奸工作，总政已有电示。

（六）关于干部工作、民运、宣传教育等，总政当陆续有电示。

毛　朱　王　谭[1]

八月十三日

---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二）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军队对居民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三）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地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

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地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

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

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老干部。

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和老部队。

（四）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甲、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

乙、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丙、复杂性，多样性。反对遇事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丁、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躁盲动乱来一顿。

戊、统一性。以使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己、实际性。反对不着重实际，铺张夸功。

庚、精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顾表面。

辛、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于战斗环境。

（五）敌伪军锄奸工作，总政已有电示。

（六）关于干部工作、民运、宣传教育等，总政当陆续有电示。

毛　朱　王　谭[1]

八月十三日

---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为追悼张自忠大会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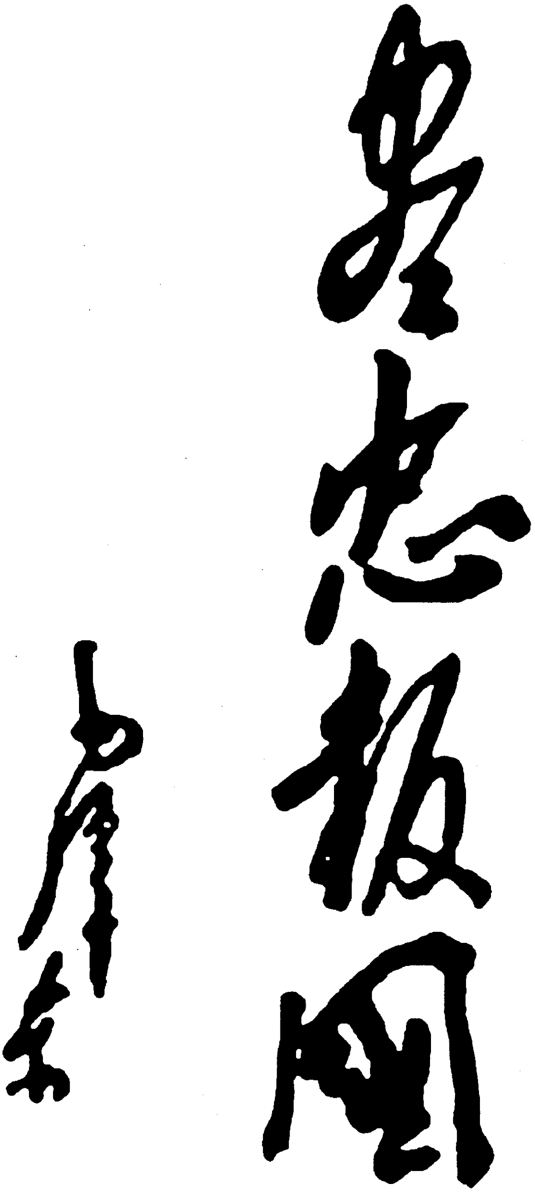
（1940年8月15日）

尽忠报国。

毛泽东

---

[1]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延安各界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



盡忠報國

毛澤東

毛泽东为张自忠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8月16日）

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

[1] 这是毛泽东参考莫洛托夫报告、日本松冈报告、蒋介石告沦陷区民众书等材料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时讲话的一部分。松冈，即松冈洋右，当时任日本外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8月18日）

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关于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8月19日）

一

晋西北在新旧军斗争之后，由于未能妥当地实施政策，一部分地主出现对立现象，一般民众也动摇、彷徨，应引起严重警惕与注意。你们应与区党委共同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七七决定，着重指出世界大事变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并在会议中根据中央决定严格检讨自己的政策，号召干部从全局着眼认真研究党的政策。目前部队应以全力进行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达到安定秩序，巩固民心。

二

要解决粮食、经费的困难，部队应积极向敌占区扩张。同时，必须停止扩大，把中心力量集中在巩固部队，提高现有质量，不可只求数量的扩充。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关于一二〇师的工作致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电的主要内容；本篇二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关于晋西北财政困难问题致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电的主要内容。

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1]

（1940年8月28日）

朱瑞，陈、罗，并告彭，杨，黎玉[2]：

（一）一一五师、山纵及山东地方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二）我们认为山东今后应努力的是：

甲、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因此极力加强山纵，提拔山东本地干部，使山纵正规化是你们的共同任务。

乙、对山东抗战作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山东虽已提出了统筹统支，然据军政学院[3]山东学生说（虽然他们离开了六个月不知近状），各部队仍多自筹自支，民众负担颇重，且无严格规定，民众有逃亡敌占区的，部队还有浪费的（如四支队）。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各地区党政军亦应组织同样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黎玉，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

[3] 军政学院，指八路军军政学院。正式成立于1941年1月1日，院长王稼祥，教育长张如心。

的委员会。政策应当是集中的统一的，办理应当是分散的。

丙、开展山东统一战线，采取纯粹自卫原则，减少军事磨擦。但这不是要我们停止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而是要我们更努力地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

丁、对敌人的行动应积极化，与敌人挤地盘，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

戊、对石友三、沈鸿烈、缪澂流[1]等投降派部队，应取分化瓦解方针。惟分化部分仍以左翼军队面目出现，不属于八路，而是八路之外围军。

（三）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请商决具体地点。

毛　朱　王

八月二十八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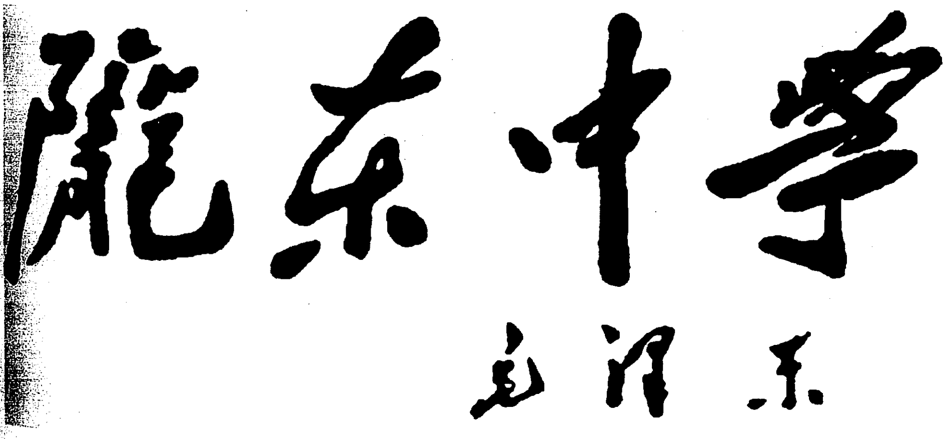
[1]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缪澂流，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第五十七军军长。

为陇东中学题名[1]

（1940年9月）

陇东中学

毛泽东



陇东中学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陇东中学题写的校名。

---

[1] 1940年9月陇东中学成立时，毛泽东亲自为其题写校名。

集中全力整训部队[1]

（1940年9月2日）

应集中全力整训部队。准备好独立打击进攻者的条件。而整训部队是第一个条件。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整训部队问题致刘少奇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目前时局致周恩来电[1]

（1940年9月5日）

目前时局甚为紧急，我党应有保卫重庆、保卫西南和西北的积极主张。军事上，应摆出八路军以三分之一开赴湖北担负保卫重庆的任务，新四军不能北移。此不仅是抵制蒋介石对我之压迫，而主要是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

---

[1] 这是毛泽东致已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1]的信

（1940年9月5日）

文澜同志：

提纲[2]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3]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4]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

[1]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2] 指范文澜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3] 康、梁、章、胡，指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4]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吴虞（1871—1949），四川新繁（今属新都）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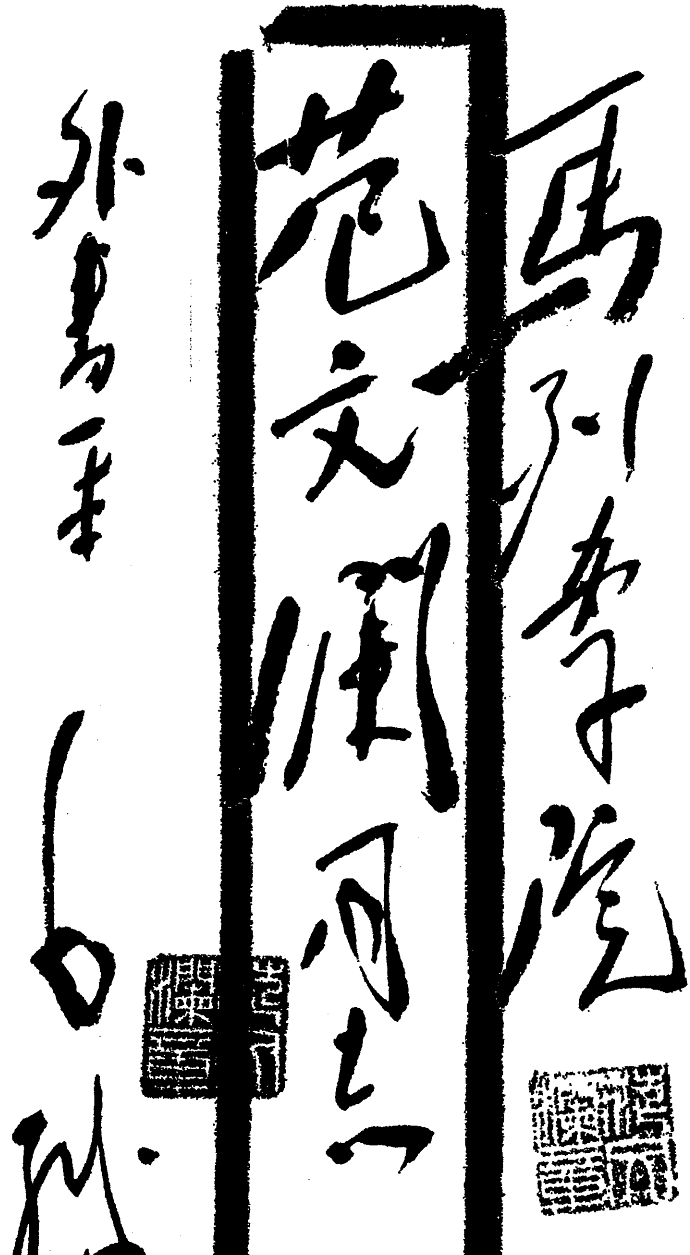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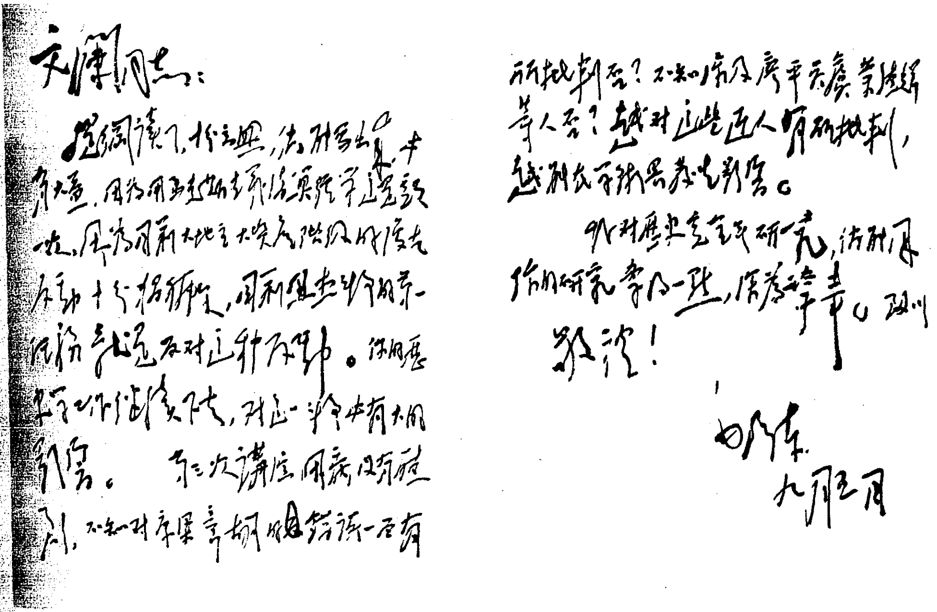


马列学院

范文澜同志

外书一本

毛泽东致范文澜信的信封。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兴奋，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第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　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毛泽东致范文澜信的手稿。

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1940年9月6日）

恩来、剑英、克农、漱石[1]：

甲、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乙、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是。

丙、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是。

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亦以人为单位每类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戊、分省调查，请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小姚负责调

---

[1]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克农，即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当时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漱石，即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克农、小姚的材料限于十二月一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给七大用。

己、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庚、关于军官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四项，每人立一小传，传内亦有履历、派别、资产活动、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辛、以上调查统称名人录，先从经济、军事两方着手，将来可发展到政治、文化方面。

毛

九月六日

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1]

（1940年9月10日）

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国内方面，是三种势力及三种可能性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期，顽固派要求维持现状，投降派准备组织贝当政府，进步派与中间派则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第三种可能性的实现，即是中国时局的初步好转。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9月11日）

应补充现在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目前时局趋势有三个方向，一是维持现状，使抗战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二是进步，在不损害大资产阶级利益前提下，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部分的让步；三是投降，在重庆失守后中国将变为南北朝，会产生中国的贝当式的投降政府与汪精卫合流。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与争取进步派、中间派，分化顽固派，争取可能变化的顽固派，反对投降派，以争取时局的初步好转，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的实现，再争取时局的彻底好转，即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同时，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我们在任何可能变化条件下都能应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复叶挺、项英电[1]

（1940年9月11日）

在苏北防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八路军苏北各部，既分散又复杂，不宜变动指挥关系，皖东亦归中原局指挥为宜，陈毅可改归你们直接指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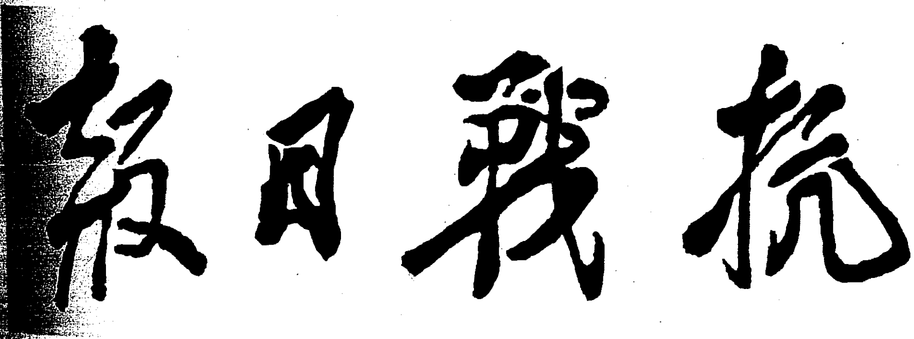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叶、项9月9日来电中提出的目前在苏北的新四军各部及八路军一部在军事行动上暂时统一于新四军军部指挥的问题复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为《抗战日报》题写报头[1]

（1940年9月18日）

抗战日报



毛泽东为《抗战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抗战日报》是抗战时期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办的一份“忠实地负责指导与记录鲁西北的抗日战史”的报纸。毛泽东曾为该报题写报头。该于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石楞子村正式创刊，这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1946年7月1日改名为《晋绥日报》。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百团大战，给侵华日军极大的打击。图为彭德怀在前线指挥。

关于蒋桂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致彭德怀等电

（1940年9月19日）

（一）据西安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韩，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桂军攻皖东者除一三八师及李本一部共七个团外，又增加一七二师，汤恩伯大概是总预备队，现派三个团组成三个侦察支队，下月初向豫东皖西之太和、阜阳、潢城前进，主力在豫西整训，准备东进，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

（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之部署致叶挺等电

（1940年9月22日）

（一）桂军五个师，李仙洲三个师，周岩三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一个师已越过淮南路东，汤恩伯九个师连日由鄂开豫，已在南阳集中，不日东进，估计各军全部开至新黄河淮南路一带进攻出发地，并开始向我彭雪枫、张云逸攻击之时间约在下月中旬左右，那时我除令彭雪枫、张云逸以游击战争暂时支持皖东与淮北两地外，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

（二）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9月25日）

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9月30日）

陈毅、黄克诚部在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扩大主力，并应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这样才能击破韩德勤。同时对韩德勤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挽徐谦先生联[1]

（1940年9月）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
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抄旧文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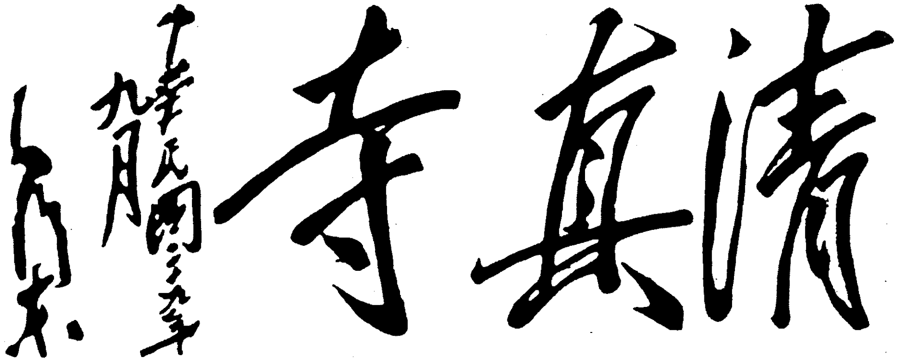
[1] 1940年9月26日，主张抗战与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徐谦在香港病逝。毛泽东送了这副挽联。徐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清末进士，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主张国共合作。抗战期间，曾到南洋宣传抗日。

为延安清真寺题名[1]

（1940年9月）

清真寺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题写的寺名。

---

[1] 1940年2月26日，延安回民救国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在延安建立清真寺，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同年3月，清真寺顺利竣工。1940年9月毛泽东应邀为延安清真寺题写了寺名。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0月3日）

韩德勤现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们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进攻韩德勤援助陈毅部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1940年10月4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6日战斗结束，此役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0月5日）

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战争会扩大。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不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我们应加紧反对德意日同盟的宣传。关于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发言指出，现在的国民参政会，是在大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多请一些客罢了，只有建议权、调查权、询问权，没有决议权，人员也增加很少。我们的态度仍是主张召集有全权的国民大会。

---

[1]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事作分析时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

（1940年10月8日）

一、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二千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增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可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

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决心移皖北，则四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

三、苏北以全力击退韩之进攻，解决韩部。对顽方之李品仙、何柱国等力求和缓，惟同时应注意日寇之扫荡，日寇有可能配合此磨擦，四处扫荡我华中地区。

四、苏南新四军部队，应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区。

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1]

（1940年10月9日）

胡服，陈毅，并告叶、项：

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你们的部署与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他。陈部大胜[2]振我士气，寒彼贼胆。惟韩冷[3]尚有余力，我须集结力量沉着作战。黄克诚南下[4]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毛　朱　王

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并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指黄桥战役。1940年10月初，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26个团3万余兵力向驻泰兴县黄桥镇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新四军7000余人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奋起还击，激战4天，把韩部击溃。此役共歼国民党顽军11000余人。

[3] 韩，指韩德勤。冷，指冷欣，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兼第六十三师师长。

[4]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里的南下，指黄克诚纵队由苏北淮海区南下阜宁、盐城，增援陈毅的行动。

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1]

（1940年10月11日）

德怀，朱瑞，陈、罗：

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除电胡服叶项[2]缓和对韩李[3]关系外，山东方面亦应对沈秦[4]缓和一下。只要沈秦各部没有向我进攻，我即不向彼等行动，双方维持现状，各守现有防地，仅在彼方进击时，我才反击之。请考虑电复。

毛　朱　王
十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

[2] 胡服，即刘少奇。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李，指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4] 沈，指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秦，指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关于留用俘虏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给陈毅等的指示

（1940年10月12日）

陈毅，并告叶、项、胡服、黄克诚：

（甲）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加部队战斗力，下级俘虏军官亦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长一概优待释放，不杀一人（不论如何反动）。

（乙）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开办大规模抗大分校，如有学生可收容四五千人，并从上海招收学生开办财政经济人员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开办普通中学及师范学校（收容积极性不足而愿作教育工作之青年），开办党的训练班，为建设广大根据地之用。

（丙）始终不提反韩口号，始终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停止磨擦。

毛　朱　王

新四军的行动方针[1]

（1940年10月12日）

叶、项、胡服，陈毅，黄克诚[2]：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

甲、蒋[3]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4]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乙、省韩大败乞和[5]，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理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部会合，而以主力占领兴化以北以东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等人的电报。

[2] 胡服，即刘少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蒋，指蒋介石。

[4] 1940年3月8日，中共领导的第四战区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大队长曾生）和第二大队（大队长王作尧）近700人，被国民党军第一八六师围于广东惠州坪山圩和乌石岩。被围部队秘密跳出包围圈后，分路向海丰、陆丰地区转移，途中又遭顽军堵截，部队损失很大。4月，部队转移到海陆丰的高潭、蓝门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国民党的后方，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分散在丛林、山洞中，给养困难，医药缺乏。到七八月，部队减员至百余人。

[5] 黄桥战役后韩德勤委托开明士绅韩国钧等向新四军求和。

之广大地区（东台河以北归八路负责），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停止皖西进攻之师。而陈毅则不拒绝和议，一面整理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示我全为自卫不为已甚。我皖东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一面向桂军呼吁，反对内战，强调团结对敌。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毛　朱　王

文申

致叶挺、项英等电[1]

（1940年10月13日）

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苏北韩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系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韩德勤进攻失败后华中的工作方针致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电[1]

（1940年10月14日）

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杨、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建设苏北根据地等问题致陈毅并告刘少奇等电的主要内容。

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1]

（1940年10月14日）

与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应再具体提出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下令：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的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的包围。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和国民党韩德勤部谈判条件问题致陈毅等电的主要内容。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1940年10月14日）

胡服，陈毅，克诚[1]，并告叶、项，雪枫[2]：

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亦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有关的各方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同时，你们应经过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3]及地方绅士、文化界等，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

---

[1] 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韩国钧（1857—1942），江苏泰县海安镇（今属海安县）人，开明绅士，曾多次参与调解国民党顽军同新四军苏北部队磨擦事件。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1890—1956），江苏南京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

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1]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我们已电周、叶[2]与他们联络，如以后他们介绍人到苏北来时，须加以接纳，与之做事业上的合作，以为拉拢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例证，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
十四日

---

[1] 1940年10月初，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重兵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黄桥地区部队发动进攻，新四军一方面争取一部分友军保持中立，一方面实行自卫还击，歼灭韩部11000余人，这就是黄桥战役，也称苏北事件。

[2] 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

关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1940年10月14日）

恩来、剑英同志：

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麐、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毛泽东

致陈毅、刘少奇等电[1]

（1940年10月15日）

同意周恩来当日致毛泽东电提出在苏北发展宜取自卫战的方针。不是彻底驱韩，只迫其放弃反共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致陈毅、刘少奇转黄克诚、罗炳辉并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1940年10月18日）

叶、项，胡服，陈毅，克诚（胡服转），雪枫，先念，并告彭，杨，刘、邓，杨、宋，陈、罗，朱瑞[1]：

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

---

[1]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杨，指杨秀峰（1897—1983），河北迁安人，当时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宋，指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执行政策时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中央书记处
十月十八日

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1]

（1940 年 10 月 18 日）

关于对待反共派俘虏问题，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及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的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如有关系紧要必须处决之个别分子，则须经过军中师以上及相当于师之机关，党内分局及区党委以上或各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之批准，旅以下、地委以下、专员以下没有批准杀人之权。关于此事之详细规定，中央另有通知，各地先照此一般规定通令实行。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发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地电台的电报。

致北方局等电[1]

（1940年10月18日）

根据九月十五日彭真电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我们认为是过左的，是违反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业已造成了严重结果。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望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察分局、第一二九师并告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1]

（1940年10月18日）

国民党有抄袭我办事处之可能，为慎防起见，望将一切秘密文件烧毁并随时准备对付抄袭，而以沉着态度出之，任何时候不要惊慌散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10月20日）

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否则我重庆办事处有被攻击危险。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谈判。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减少我重庆办事处被攻击危险问题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与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1]

（1940年10月23日）

目前我军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集中整训扩大与巩固苏北根据地致新四军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粟裕电[1]

（1940年10月24日）

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
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1]

（1940年10月25日）

周：

甲、德意日不久必有大规模行动，德不攻英伦，即向非洲、印度，英国快到手忙脚乱之时。日本将取先占南洋[2]后扫中国政策，香港、新加坡、仰光、荷印[3]四地一旦落于日本之手，中国英美派又将手忙脚乱。美国准备未周，不一定很快作战，如德攻英伦，美海军便要同时对付大西洋，不能集中对付太平洋。日本进攻南洋各地时不一定便发生日美战争。那时重庆英美派将望着发干急，他们现在的兴高采烈，带着单相思性质。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是重庆英美派的志愿，但他们也怕英美不可靠。如日占南洋而日美战争又迟迟不爆发，英国又被德意日三国打得七零八落，他们仍有走贝当[4]路线可能，故他们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大资

---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2] 南洋，即东南亚。

[3] 荷印，指当时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印度尼西亚，又称“荷属东印度”。

[4] 贝当，1940年6月任法国总理。他的政府对德国法西斯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签订了《德法停战协定》，随后在维希组织傀儡政府，出任“元首”。

产阶级既是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许多中间派也是动摇的。如果是这一种情况，我们大有文章可做。

乙、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中国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危险就加大了，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的危险也更大了。还须假定这种情况，即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不怕的，原因是我党已经锻炼了，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百出，困难重重，世界革命必然会爆发，苏联是援助世界革命的。

丙、有一种中间情况，即日美相持不下，中日相持不下，国共相持不下，欧洲英德也相持不下，全世界全中国都是不痛不痒的。我们也要准备对付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够对付这种情况。

丁、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目前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说明目前的反共反苏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实行全部的完全的退却下来，各根据地上实行完全的自足自给（边区已有准备），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

期。（此电再发德怀、胡服、项英[1]）

毛泽东
有子

---

[1] 德怀，即彭德怀。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关于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0月25日）

一、德国仍在准备攻英伦，即使不攻英伦，但埃及、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必落入德军之手，日本必攻香港、新加坡、仰光及荷印，总之英国倒霉时期快到了，不论美国是否迅速参战，英国倒霉是定了的，美国迅速参战也无救于英国倒霉，因此中国英美派也是要倒霉的。

二、在日美战争紧张时，日本有放弃宜昌、武汉，让国共两党冲突对消对日力量之可能。

三、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其目的在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

四、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次致周恩来并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为《新文字报》题词[1]

（1940年11月1日）

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

[1] 《新文字报》是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刊，后归边区政府教育厅领导，1940年11月在延安创刊。这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报》写的题词。

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

（1940年11月1日）

贺、关，聂、彭，吕、程，刘、邓，陈、罗，黎、罗，陈毅，克诚，雪枫，先念，萧克，云逸：

关于目前时局：

（一）一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中日战争加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已到白热化，蒋介石态度也因之大变。

（二）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与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到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

（三）运城、鄂北两飞机场的停闭，阿部的回国，南宁龙州的撤兵，海通讯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与德国劝和的开端，这种趋势有急转直下可能。

（四）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联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联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给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萧克、张云逸的电报。

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一个月来他已用日德意同盟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

（五）如果带决战性质的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日意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可能性最大。

（六）目前的反苏反共新高潮，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意日同盟的准备，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的联合英美是宣传，投降日本则是实际。

（七）因为要日本让步须用威迫利诱两个政策，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装腔作势地要加入英美同盟，以威迫之；一面又发动反共高潮以利诱之。蒋介石知道日本南进须要一个巩固的后方，一个“太平”的中国，而共产党今天已成了破坏日本这个后方的最严重的因素，于是蒋介石表示愿意替日本担负巩固后方的职务，以求得日本对他的让步。同时欧洲德意需要交换亚洲的资源，蒋介石反共于德意也有利益。故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准备投降日本与德意的步骤。

（八）在七八月间蒋介石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日意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

（九）但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

（十）但无论那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不论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给我党以大的打击，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迅速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十一）但不管怎样严重局面，我们是能够冲破的，这种信心应在全党建设起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的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东亥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1日）

对何白“皓电”则尚须迟几天拟复，因“皓电”是哀的美敦书，我们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1]

（1940年11月1日）

（甲）蒋介石已通知我们应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日蒋又令汤恩伯、李品仙各率部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华中进攻，皖南、鄂中亦必有进攻布置。（乙）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材，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

[1]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发出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的指示。这是该指示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1日）

叶、项：

（甲）三十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毛　朱　王

二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叶挺、项英的复电。

致项英电[1]

（1940年11月1日）

叶挺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电[1]

（1940年11月1日）

据重庆确息，蒋介石已在积极准备十一月中旬开始“剿共”。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电的主要内容。

致项英电[1]

（1940年11月1日）

（一）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及我之部署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2日）

恩来：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会议讨论你一日建议，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让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2]与美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以及我军的军事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

[2] 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时局处理要纲》，欲乘纳粹德国横扫欧洲，英、法败退之机，武力南进，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苏联为加强西线战备，也希望改善日苏关系。1940年12月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苏联表明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图，但苏联只同意订立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4月归国途经莫斯科，7日与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展开缔约谈判。13日双方订立《日苏中立条约》。

国大选[1]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关于南方布置及宣传反驳诸项，各同志均同意你及南局意见，毫无异议。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不日开始调动，大的（准备调十五万）正在与老彭协商，亦宜慢慢办，不甚性急。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得开局面的。关于汤、李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一致意见，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二日

---

[1] 11月5日，美国大选即将开始，决定掌握美国今后4年政权的白宫主人。就目前国际的形势来说，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人物，他象征着今天美国的全部外交政策，他竞选的成功和失败，多少足以反映美国统治层对于干预欧洲战争的新意向——前进一步或后退一步。英国要求罗斯福总统连任，轴心国家反对罗斯福。

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3日）

潘友新[2]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惟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小，靠德日的可能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压力是断血管，打重庆，引力是交还失地，在大战中发财与联合剿共。而英美在两年内是无能为力，蒋是等不到两年的。两年外英美亦无绝对胜利把握，有可能双方成相持局面，打上两三年没有最后胜负，待革命出来结果他们。也有可能英帝国相当迅速的被打败，旧大陆尽被德意日占领，美感孤立，望洋兴叹，要待旧大陆革命起来时，美以干涉革命的姿态向欧亚进攻。总之一二年内蒋介石是无法依靠英美胜利的。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包括各中间派及陈诚、汤恩伯等）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如果这三种压力配合得好，这种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还有这种时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国内形势、如何应付投降以及如何力争时局好转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2] 潘友新，当时任苏联驻华大使。

共”。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以三十万支持各根据地），抄到他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继续抗战国策，恢复国内和平，实行三民主义，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抗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召集国民大会等条件（大体如张、杨之八条[1]）。如果那时日本已经南进，美日关系紧张，日本自顾不暇，如果那时国内各中间派及国民党中的中间势力出来加以赞助（组织劝和团、隔断火线等）。如果那时国内及蒋集团内某些人乘机造反，非不利于蒋之活动（这些人现在是劝蒋反共，其目的在造出乱子，置蒋于炉火之上，以图乘机取蒋自代，如何、白皆是）。如果那时苏联又出来调整一番，这种好转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国的真正好转要在那时也说不定，这是生产经过阵痛的道理。但那时也有蒋介石做贝当并最后做汪精卫之可能，那就是最后大决裂，此种可能性也许还要大些也难说。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海滨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故在“剿共军”前进时，我们势必打出去，以期转变局势，争取好转。如果那时蒋做了贝当，便证明我们正是打得对，我们便把清君侧（或兵谏）的旗帜改换为打汉奸的旗帜，一直打到底，这就是取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过去与现在的反磨擦战争也是这种性

---

[1]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条要求。这八条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质）。惟我们应做得仁至义尽，目前极力延缓汤恩伯、李品仙的行动，答应皖南部队北开，答应和平解决，呼吁避免内战，采取缓和态度，都是对的，必要的。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但炸弹宣言与兵谏出师两件事的时机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地应付之。略陈管见，请加考虑。

关于反对蒋介石投降致李克农等电[1]

（1940年11月3日）

反对蒋介石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加强反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给舆论，呼吁停止内战；加紧统战工作，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东南方面也要这样办。

---

[1] 这是毛泽东致李克农、项英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1]

（1940年11月3日）

德怀同志：

甲、目前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介石的烟幕弹。蒋已令汤恩伯[2]率十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3]率五万人向皖东进攻。判断其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纵深封锁线（边区周围的封锁线是五道），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中日妥协与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是严重存在着。虽然还有其他可能性，但投降可能是主要的，目前作此种估计，甚为必要。

乙、目前中心问题是反对投降反共的具体策略问题。现有两个方案：第一、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对反共军进攻只在我之根据地附近加以反击，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蒋投降面目为全国了解时，再向彼后方反攻。如采此方案，则目前我调五万人南下即够，我主力仍坚持各抗日阵地。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的一个方面是有利的，即可以剥夺蒋的政治借口。但在政治的另一个方面是不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的电报。

[2]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3]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利的，即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在军事上是不利的，因为待蒋纵深重层封锁线完全成功后，我军必遭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第二、政治上进攻，军事也是进攻。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的一个方面是不利的，因为给蒋以政治资本。在政治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有利，因为可能制止投降（但不一定）。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机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夹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性可减少）。

丙、不论目前采何方案，如投降实现，最后亦是严重的内战（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故整个军事部署，目前即须考虑。拟将全军区分为三个纵队，以老黄河以南各军为左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鄂豫陕边。以汾离路、正太路[1]、沧石路以北各军为右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陕甘川边。以两地之间各军为中央纵队，其精锐约五万，或出左纵队方向，或出右纵队方向，依将来情况决定。

丁、此时我们具体策略适当与否，关系将来前途甚大，故有周密考虑必要。望以你的意见见告，以便讨论（朱总[2]近日去绥德）。

毛　王

江辰

---

[1]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2] 朱总，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3日）

叶、项：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毛　朱　王

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3日）

（甲）冬酉电[2]悉，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乙）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待时机成熟时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复何、白电，亦推至十号左右，惟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丙）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1月2日，周恩来、秦邦宪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东电刚到，根据中央判断，决策既定，我们即遵照电示，向一切紧张布置。惟既准备决裂，即需顾及外间疏散隐蔽需时，中央宣言及回何、白复电，均请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能避免的袭击，同时我们并争取最后可能。先派博古、凯丰乘飞机到兰州转延安，一切如何，请立复。"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11月3日）

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

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

惟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3日）

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2]，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

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踏陈独秀的覆辙了。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

原地等候，以便指挥部队[1]

（1940年11月4日）

彭德怀已令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三个团）即日南下，又令第三四四旅（三个团）克服困难，迅速通过陇海路。要你仍在原地等候，以便指挥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1940年11月4日）

叶、项，胡服，云逸，陈毅，克诚，雪枫，先念[1]：

甲、根据华北（朱怀冰[2]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3]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4]（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5]及陈泰运[6]严守中立）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

[1]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云逸，即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3] 预三师，指陈鞠旅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预备第三师。

[4] 指黄桥战役，又称苏北事件。

[5] 两李，指李明扬和李长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6] 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

乙、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如果由于我们努力争取友军工作的结果，使在汤恩伯、李品仙[1]等部向我进攻时，不仅有许多杂牌军采取中立或发生对我同情的实际举动，而且即在汤、李所部中亦发生一部分人反对内战同情我军的运动，则不仅对我华中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将给予全国反共投降阴谋以严重的打击，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

丙、立即选派得力代表携带毛、朱[2]（有些对象亦可用周、彭[3]等名义）恳切函件，加上你们自己的联络信件，向周围各友军进行交友工作。如我们直接派代表不便的地方，可请托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以及一切与各友军有亲友、同乡、同学、同宗关系的人等，代我们去疏通联络，向各友军详细解释苏北事件之真相及新四军、八路军不能开赴老黄河以北的苦衷和理由，向他们诚恳说明大敌当前团结御侮之必要，以及分裂、内战足以招致亡国之危险，求得他们不参加反共战争，或他们为敷衍命令计而打仗朝天放枪等。同时，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战团结大道理外，必须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害的问题。例如：对川军须特别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与川军之友谊，强调蒋介石侵占四川和消灭川军之阴谋；对东北军强调八路军与东北军之传统友好关系，强调对张汉卿及东北军

---

[1]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2] 毛，指毛泽东。朱，指朱德。

[3] 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处境的同情，强调对某方[1]承认伪满作为投降的第一个条件的愤激情绪；对冯治安、孙连仲[2]等强调我们与他们团结抗战，共患难同祸福的必要等等。总而言之，使地方军、杂牌军为本身利益打算，懂得不上蒋[3]的当，而避免与我们作鹬蚌之争。对李品仙及其部队亦须强调八路与五路[4]之多年友谊，不应受人挑拨而互相敌视，致为蒋造成打击五路与八路之机会。对汤恩伯及其部下亦须采友好争取态度，以促使其内部分化。

丁、根据各方面经验，“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一切中国的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仍是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对我同情的有力武器。如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扎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经过的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当汤、李部队开近我防区周围时，发动大规模的联欢运动，即在战斗行动开始后，亦不要放松火线上呼团结抗日口号及部分谈判妥协的工作。同时，对汉奸部队或顽军等，这类口号切忌乱用，根据过去经验，乱用这类口号，反足增加反共军之反感和团结。

---

[1] 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2]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3] 蒋，指蒋介石。

[4]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桂系李宗仁的第五路军组成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属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曾驻守大别山。同年新四军第四支队（其中不少干部是从华北八路军调入的）进抵皖中后，曾与李品仙部建立过友好的关系。因此这里把这段友好关系称作八路军与五路军的友谊。

戊、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以期各部分均能得到争取友军工作之最大成绩，过去许多部队对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之不够。

毛　朱　王[1]

支日

---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5日）

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等事，请向何、白及各方表示，我方为避免内战，顾全大局，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但在未渡江以前尚有许多事要办，桂林办事处尚须保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复何白电内容要点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6日）

复何白电稿已拟好。首言“皓电”奉悉，以事关重大，处于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为顾全大局挽救危机起见，经德等往返电商，已获一致意见，兹特呈复，并求转呈统帅，核示祗遵。以下分为：（甲）关于行动者；（乙）关于防地者；（丙）关于编制者；（丁）关于补给者；（戊）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共五项。在甲项中说明本军一贯以遵从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略述过去经历。末述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发生龃龉事件，如尊电所指者，亦属事实，言之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曾经历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已有马电详陈，鲁南事件，原因复杂深堪注意，除令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请求派员彻查。在乙项中略谓中央意旨，惟有服从，但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保卫家乡而组织者，欲其远离，甚难说服，故请恩来转呈中央，可否以主力北移，而置地方部队于原地。兹奉电示，限期移动，仍请中央于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二者略为兼顾，除原有主力外，再将地方部队之较为集中者，苦心说服遵令北移，仍请宽以期限，以期说服生效，不致激生他故。在丙项中，说明敌后抗战不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文内容要点给周恩来的电报。

得已而扩大部队之原因，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一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请求扩充编制，中央亦已顾事实于提示案内允予扩编，惟求早日实现，以安军心。在丁项中，略述已十四个月未领子弹医药，请求补给等事。最后在戊项中，略述现当太平洋战机日紧，正抗战千载一时之机，惟闻日本诱降，德国劝和，甚为迫切，国内一部人士又复策动反共高潮，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德等效命疆场，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惟求抗战团结，不招投降分裂之祸，请求转陈采纳等语。有何意见，请速示知，以便修改于日内拍发。

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1940年11月6日）

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

目前日、德与亲日、亲德派包围蒋，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投降日寇，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应动员党内外多数人员出马作上述积极、热烈的活动。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问题。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只要不剿共、不投降，等到因剿共、投降而闹到亡党亡国之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要告诉党员与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各地情形望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鱼辰

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

（1940年11月6日）

恩来同志：

江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根据三日来电，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向各方活动，应动员多数人员出马（党的、非党的）。蒋夫人处的活动值得注意，桂林方面请告克农亦如此办。

毛泽东

鱼辰

军政委员会条例（草案）[1]

（1940年11月7日）

彭，杨，罗、陆、左：

下列文件请你们讨论提出意见，以便最后宣布。

（一）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有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体指挥。

（二）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的机关。

（三）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主任、参谋长及次一级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之，人数不超过九人至十人，由每级提出意见而经上级指定之。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般地由政委担任之。

（四）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商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但军政委员会并非执行机关，其决定应交各部门执行之。例如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应交司令部执行，关于政治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电报。《军政委员会条例》于1941年2月7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

工作的决定，应交政治部执行等。军政委员会亦应讨论比较重大问题，把一切琐碎细小问题提交军政委员会讨论是错误的。

（五）军政委员会应批准干部之升迁与调动，但关于党员的处分与入党批准等等事宜，仍由党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之。

（六）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用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下达，而应根据决定之性质分别由司令机关、政治机关用命令下达之。下级对上级报告亦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而应由各部门分别向上报告。

（七）军政委员会在讨论问题时，如遇争论而不能解决，应呈报上级决定之。但关于紧急问题，司令员及政委仍有独断专行之权，但应将各种不同意见报告上级。

（八）各级军政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至多二次，不得无故不召集开会。

（九）应向干部解说军政委员会之设立，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以收集体领导团结干部之效能，但军队仍是集中的组织，上级司令员、政委及各部之命令，下级应绝对执行，下级军政委员会无权讨论拒绝命令之执行，即同级各部门亦应执行首长之命令，认为一切均应经过军政委员会的虚伪的民主情绪是错误的，应当防止与纠正。军政委员会之设立并不减弱个人负责制。

（十）本条例解说及修改之权，属于中央军委。

（十一）本条例经中央书记处之批准。

毛　朱　王
虞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1940年11月7日）

（一）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德使陶德曼已有电报致中国当局实行劝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二）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治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这些正是日本的诡计。正是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的诡计，我们万万不要中此诡计。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我们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爱护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员。所要求者只是坚持抗战团结，不投降，不分裂，不内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行我党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的一切宣示及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愿与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到底。如果他们一时不慎，陷入敌人圈套，闹到亡党亡国，我们就爱莫能助了。对于亲日

派与内战挑拨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一切抗日朋友，则始终爱护。今当存亡危机之时，我们不得不尽忠告之道。同时，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积极注意最近河南方面有二十万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前进，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应要求政府制止这些军事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三）党内外积极分子作宣传时，应当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与复兴社，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投降制止内战，驱逐亲日派的口号。我们态度要诚恳积极热烈，尽一切可能，到处奔走呼号，不惜舌敝唇焦，表现自己是一个团结全民捍卫民族的爱国志士与忠心朋友。当此紧张时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如果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被击破，顽固派要投降就比较困难了。

（四）谁是具体的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应依据各地具体证据去决定。而其全国性的领袖，就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这一集团与日本及汪精卫秘密联系着，目前正在包围蒋介石，劝诱蒋介石下剿共命令与调动剿共军队。这一集团的目的，是在执行日本命令，挑起国共战争，使日本军队能从中国泥潭中拔出，好去对付英美。而中国一经内战，势必实行投降。但要全国投降，必须拖蒋下水。于是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

共。他们以为反共战争一经爆发，便把蒋置于炉火之上，下不得台，投降就可实现。然后要求日本把蒋踢开，自己充当中国的贝当。这就是何应钦等的全部阴谋。因此也就可知蒋及蒋系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极大危险性。这是蒋的主要危险，我们应当十分警戒，绝对不可疏忽，以免上他的当。但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国际三大阵线中国三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未下作贝当的决心，因此我们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时间，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目前最危险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及内战挑拨者。全党应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从口头上揭穿何应钦等的巨大阴谋，用各种方法宣布何应钦等的罪状，俾众周知，深恶痛绝，仅仅暂时避免在公开文字上提出何应钦的名字。

（五）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要进到更加具体化，不失一个机会去联络每一个可能的具体对象。要研究如何接近与如何同每一个具体对象协同进行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要求不要过高，那怕只有一二点微小的口头协定都是有用的。要每日每时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要精密分析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漆黑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六）对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七）关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

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八）又须告诉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与抗日人员，只要大家起来进行坚决的恰当的斗争，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有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因此我党及全国人民必须为制止投降与制止内战而奋斗。今天我党及全国人民多作一分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即是明天多得一分胜利。时局的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党的政策与工作来决定。

（九）不管时局的发展如何，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我党有五十万军队，有六十万党员，有全国人民广大的同情，有很多中间派还可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守中立，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有世界革命的酝酿，有帝国主义间空前紧张的矛盾，有敌人内部的严重困难，有亲日派与顽固派，顽固派与中间派，以及各派内部的严重矛盾，一切这些，都是我们有把握的来说，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与中国人民。不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战胜这些黑暗的。全世界与全中国的任何黑暗都是暂时的，只有依靠着自己坚决斗争与坚固团结的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信心，要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巩固地建设起来。党内外必然发生的一切悲观动摇情绪，必须予以坚决的克服。

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

（1940年11月9日）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两公皓（十月十九日）电[2]，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重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祗遵。

甲、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自八月号日[3]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勖勉备至，全军感奋。又如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亦属最近期间之事。凡此所陈，非敢自矜劳绩，实欲以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

---

[1] 这份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2] 指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1940年10月19日（皓）发出的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精神，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3] 号日，即20日。

心，实贯彻于全军之上下，而未敢有丝毫之乖离也。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龃龉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德等已有马[1]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2]，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况在艰苦异常之敌后抗战，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难，自非不顾大局专以磨擦为能事之人，未有不愿消弭纷争团结对敌者。故德等主张彻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倘承俯允，乞赐施行。

乙、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案[3]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4]及告

---

[1] 马，即21日。

[2] 鲁南事件，指1940年夏顽军沈鸿烈部在山东莱芜、沂源、蒙阴一带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根据地黄庄、基山，被八路军击退的事件。

[3] 指国民党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4]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其中声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沦陷区同胞书[1]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案、确山惨案[2]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殣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

---

[1] 指蒋介石1938年8月13日发表的《告沦陷区同胞书》。其中说，抗战13个月来，已取得战略上、政略上、精神上和外交上四个方面的胜利，要求沦陷区同胞坚守信念，不动摇，不畏怯，奋斗到最后一息。

[2] 平江惨案，指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将副官罗梓铭等6人的事件。确山惨案，指1939年4月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山东游击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指使游击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部，在博山、太和地区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包括团政治部主任鲍潭在内的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的事件。

远瞩，必不河汉斯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两公虚怀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维持调护，挽此艰难之时局，固不待德等多言也。

丙、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中央亦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予酌为扩编，如提示案内所示，职军闻之，实深庆幸。兹所求者，则请早日实行，并请对编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非第楚弓楚得，无庸怀轩轾之虑，实以卫国卫家，正赖此干城之选。

丁、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或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难，不得不上达聪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

项，均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戊、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案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理合恳请中央，对于悬案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

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　叶　挺
副军长　项　英同叩
佳

关于“佳电”发出后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9日）

（甲）“佳电”今日最后确定文字，已付译，明日可用战报台与有线电同时发你处，由你处转交何白，此间未直发，收到请校正错字。

（乙）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电内已列举，祖宗坟墓一也，遵守蒋《告沦陷区同胞书》并无错误二也，家属无保障三也，华北五灾四也）。又“佳电”所你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丙）叶希夷十日去上饶见顾，拟谈开拔费，军需补给，保证通过安全及到苏南稍作停留等条件。

（丁）李宗仁有将由桂赴立煌开会讯，如过重庆，请与开诚一谈。汤恩伯究否移动，正向洛阳方面调查，尚未得复，请在重庆调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佳电，即1940年11月9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答复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皓电”的电报。

查见告。汤之是否移动，乃蒋是否有决心进攻之表现，判断在我尚未复电表示态度前，汤或只作移动准备，尚未实行移动，故我应设法活动使其不动，请考虑可否对张冲表示，如汤东进则战事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可否以利害告二马等人，托其设法缓和汤、覃二军东开（覃连芳两师到商城、固始已半月，尚在休整，覃及张、林两师长均赴立煌开会）。

（戊）胡服已到盐城，正与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覃进攻。他们计划，如汤、覃进攻，即将动手解决韩德勤，此亦蒋、顾利害问题，请考虑作适当表示，或亦可延缓其进攻。

关于在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停止汤、覃两军东进问题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10日）

希夷见顾时，请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覃军两师已到商城、固始，覃及各师长均集立煌，计划攻皖东。汤军九个师在南阳准备东开，形势紧急。请质问顾，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1940年11月11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去上饶和顾祝同谈判，商谈北撤事宜。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0年11月12日）

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反投降制止内战等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1月12日）

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三十万大军（二十九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彼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陈毅、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1月12日）

你们应得蒋介石调动二十九个师进攻新四军的事实公开宣布，不应秘密。你们应向各方宣传上述军队准备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如果打响，就是大规模内战，鹬蚌相争，只使日本人渔人得利。目前苏北业已和平，如又发生战争，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衅由彼启，我们不能负责。你们应向各方奔走呼号，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而奋斗。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
董必武、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等电[1]

（1940年11月13日）

目前正从重庆设法，缓和汤、李[2]进攻，朱、彭、叶、项联名致何、白“佳电”已发出，周、叶正在谈判，做到仁至义尽。如彼最后决心进攻，毫无转圜余地，我们方可动手打韩，故目前只能作打韩准备，不能马上动手，至必须动手时，我们当有命令。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2] 汤、李，指汤恩伯、李品仙。

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工作部署致彭德怀电[1]

（1940年11月13日）

根据中央十一月七日指示及朱、彭、叶、项联名复何白“佳电”（此电不日拍你处）所取政治立场，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兵力上除陈、罗[2]调动一部外，华北各部暂不调动，另在重庆及各方进行统战活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地位，并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这种可能性还未丧失。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即陈光、罗荣桓。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0年11月13日）

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由鲁南进至沭阳压迫黄克诚，桂军一三八师莫德宏部越过淮南路，向皖东进，情况甚为紧急。请向何应钦和白崇禧交涉，撤退霍、莫两师，并停止他部行动，否则我军将实行自卫，届时责由彼负。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只能做自卫的防御战[1]

（1940年11月13日）

（一）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二）只能依靠现有兵力，不能希望华北增援。（三）目前在重庆办交涉，须做到仁至义尽，不能马上动手。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如何面对国民党的磨擦问题致彭雪枫并告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14日）

根据七日中央指示[2]及朱彭叶项“佳电”所取政治立场，军事上亦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

已令苏北取拉韩政策，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得解决韩，与重庆活动配合一致。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

（1940年11月15日）

一、根据中央十一月七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二、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但蒋进攻亦有几种困难：

第一，是我取缓和态度，何应钦缺少了挑拨的借口（虽然还有可借口者），蒋介石、白崇禧要顾虑中间派态度，故我应广泛宣传佳电内容，剥夺蒋、何、白之政治资本。

第二，蒋介石很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安突出。故我应宣传彼方如果打新四军，则八路军不能坐观不救，请求彼方停止二十九个师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听新四军挨打，到处适当地散布这种空气，向顽固派做大力攻势，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胡干。

第三，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

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第四，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汤、李、霍（守义）、莫（德宏）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此空气尤应直接从韩本人及顾祝同方面着手，表示我可继续保全韩德勤，但必须停止汤、李、霍、莫进攻作交换条件。

第五，蒋介石进攻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他未同日本人真正讲好条件之前（如条件讲好则全局大变）他的剿共战场是不方便的，他的东进大军不易通过淮南路、津浦路两道日本封锁线，其北进大军亦难通过涡河敌垒及以北敌据点，如彼仅使用霍、莫等小部，则我游击队即足以对付之，故我对霍、莫、何（柱国）、孙（桐轩）、马（彪）等一切接近之部队，应强调大敌当前不应内战之宣传，并加强统战工作，在彼等小部进攻时（如霍、莫）只用众多之游击队缠绕之（此等游击队主要作用是宣传队），而避免与之作真面目战斗，不损伤桂系与东北军之感情，预留尔后讲价还价余地。同时在皖东则说明该地是廖故主席划给新四军之防地，在皖东北则说明该地是卫长官承认给彭支部队的游击区，总之在这些区域要使我全体军民振振有词，使进攻者词穷理绌。

三、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这是决不会的），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局面。以上意见请考虑酌行之。

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1940年11月16日）

华北及山东各部队：

在目前形势下，国内重大事变行将到来，而敌人今年冬季“扫荡”将更残酷。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

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

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补足现有编制的兵数，如能设立补充营之类则更好。但扩兵工作应注意根据地之人力，多在边境及人口众多的区域进行扩兵。

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一面作战，一面整军，及在反“扫荡”间隙中全部或大部得到休整。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坚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四、强化政治工作，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各方面的政策。务使全体官兵团结一致，防止因敌后抗战困难之增加及国共关系之紧张，而发生悲观失望、无前途等等情绪，同时防止可能的日寇奸细及国特奸细在我军中乘机捣乱，防止过“左”错误的重复。

五、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illegible]正确关系。有确实不负责因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当然应当加以指[illegible]与处分；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就不应当

加以打击。要确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毛　朱　王　谭[1]
铣

---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黄埔系军人
进行统战工作意义重大[1]

（1940年11月16日）

这次苏北事件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2]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办事处[3]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毛　朱　王
铣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的关于对黄埔系军人做统战工作的电报。

[2]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3] 指八路军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办事处，当时设陕西宜川县秋林镇。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11月16日）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蒋介石企图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进至陇海铁路与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建抗日根据地，并策应刘少奇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斗争中心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巩固两李[1]反正部队建立外围军致陈毅、刘少奇电

（1940年11月16日）

陈毅、胡服：

（一）由两李处反正过来的千余人，他们是怎样过来的，事前我曾作过什么工作，是否这是两李失败的主要原因。反正过来后，对于原来领导反正的官长怎样处理，望电告。

（二）如果是原来军官带领过来的，必须考虑到如何能扩大这次争取顽军的影响，使以后许多反对“剿共”、愿意抗日的友军，敢于整营、整团、整师的转到我们领导下面来。我们对于这些大批反正过来的军队，应该把他看作一种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外围军方式去处理，只要他不反对我们，服从我们的指挥调动，可以不改变他原有军官的领导，可以不立即实行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制度（如派政委、设政治部、发展党的组织等），甚至可以不改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仍用他原来的番号，但需要用一切力量去帮助他巩固起来。我们的方针是要能争取更多的军队，团结在我党周围，是要用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工作去改造反正过来的友军，是要表示我党能伟大包容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而不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面前的几

---

[1] 两李，指李明扬和李长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支人枪，而使许多可以争取的力量畏我吞并，不敢过来。

（三）这一创造外围军的工作，是和更加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本身的工作分不开的，必须把主力骨干（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党的组织提到更高度，把主力更加增强，才更易去争取与团结外围军。

毛　朱　王

致陈毅电[1]

（1940年11月17日）

你的统战方针与统战工作是正确的，以后盼将这类材料随时电告我们，同时告新四军各部，使他们都照这样办。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批转陈毅关于统战工作报告的指示[1]

（1940年11月18日）

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的报告转发全军学习。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批转陈毅10月28日关于苏北统战工报告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对苏北的作战部署[1]

（1940年11月19日）

胡、陈，黄，并告叶、项[2]：

巧电悉。（一）大局有变动可能，我们正争取停止汤李[3]进攻。（二）你们目前一个短时间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三）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霍两军[4]之间，隔断其联络，万万不可听其打成一片，能办到这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四）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五纵队主力从东沟、益林出发，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黄浦、安丰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毅、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的电报。

[2]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指李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4] 韩霍两军，指国民党军鲁苏战区第一游击区总指挥韩德勤所部第八军和霍守义任师长的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

毕，待命攻击。现胡宗南[1]集中四个师准备向我关中边区进攻，待胡发动后，我即有理由进攻上述地区了。霍师南下，莫师[2]东进，则是你们的直接理由，你们尤其克诚应集中精力进行这个战斗。（五）根本方针仍是拉韩拒汤李，上述战斗胜利后，韩有就范可能。（六）津浦路[3]西应发动坚决的游击战争拒止莫德宏的扩展，应有得力人去指挥，罗炳辉[4]速回皖东。

毛　朱　王

皓亥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莫师，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3]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4] 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

致董必武电[1]

（1940年11月19日）

董老：

说贺龙师三千人南下，完全是造谣。据关中报告，胡宗南各部以贺师南下为借口，纷纷向关中地区开进，即将大举进攻。请你速见熊斌、胡宗南、蒋鼎文，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否则引起大冲突双方都不利。

毛　朱　王

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问题致董必武[illegible]的主要内容。

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1]

（1940年11月21日）

（一）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2]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当然进攻张云逸、彭雪枫是可能的），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

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待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目前我们的一切宣传文章，都是为了成熟这个政治条件。

（二）除何应钦另有阴谋外（挑拨内战），蒋介石必把他的法宝（吓共让步）密告了白崇禧，故白如此像煞有介事，实际白是不想打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指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的，他很怕真打起来，我们却应利用这个弱点去吓白，除白以外一切吓我之人，我应以我之法宝转吓之，这些法宝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下级官兵如何愤激，他们请求南调，我们已十四个月未发子弹，华北没有饭吃，汤、李东进必引起大冲突，苏北和平也必破裂，陕北今年灾荒甚重，饥民要求迁地就食等等。

这些全都是政治攻势，也应向着那些天真烂漫的中间派，引起他们着急，去影响蒋介石那个死流氓。

（三）胡宗南已对二十八师、二十四师、预三师、第八师下准备进攻宜君、淳化、正宁三点间葫芦地带的命令，大概一二星期内会有一个突然进攻，朱总已电胡宗南叫他制止，一面准备一部分兵力打击之。只待胡发动，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为隔断韩、霍打通皖苏之目的，突然攻占淮阴、宝应间之一块地方，如得手，霍必好转，韩必就范。其直接的理由是霍守义[1]打我彭明治，莫德宏[2]打我张云逸，目前就要宣扬这个理由。

（四）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

[1]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师长。

[2] 莫德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

认真准备北移[1]

（1940年11月21日）

叶、项：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认真准备北移给叶挺、项英的指示。

致冯白驹电[1]

（1940年11月23日）

顽军有向你们进攻可能，你们应从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准备粉碎其进攻，其方法是待其进攻时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冯白驹电的主要内容。冯白驹，当时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致萧克电[1]

（1940年11月24日）

目前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聂、彭打成一片。

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独立支持之。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萧克电的主要内容。

皖南部队必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

（1940年11月24日）

叶、项：

（一）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毛　朱　王

敬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希夷）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1]

（1940年11月24日）

叶、项：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毛　朱　王

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指示。

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1]

（1940年11月25日）

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对于学忠部进行的小磨擦，在行动上应稍加忍让。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致徐向前、朱瑞、陈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为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1]

（1940年11月27日）

为应付突然事变起见，须准备七万精锐部队，待命行动。从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一二九师和留守兵团抽选精锐组成，一切准备工作限二月一日前完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吕正操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1月27日）

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国民党统治总的特点是不巩固。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外部阵地与内部阵地都不巩固，即中日间、国共间的阵地是不巩固的，内部各派之间的阵地也不巩固。因此，蒋介石要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两面战争，既要抗日，又要反共。只要蒋介石不投降，就仍处在日军的进攻中，这是一条严重的战线。所以，目前蒋介石的反共只能实行攻势防御，即军事攻势、政治攻势、思想攻势。目前主要的还不是军事攻势。军事上可能采用战役的攻势。要打破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须要三个条件，即日本的进攻，德国的积极行动，共产党积极地打破反共统一战线，而主要的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正确政策的实行。共产党打破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11月28日）

六十一师钟师长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处加以危害。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克难坡附近。向阎锡山、杨爱源[2]、赵承绶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致董必武电[1]

（1940年11月28日）

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复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29日）

叶、项：

感酉电悉。（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毛　朱　王

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叶挺、项英的复电。

致董必武等电[1]

（1940年11月29日）

董老，并告恩来、胡服、项英、德怀、克农：

“佳电”在各方面起了很好影响，我们应乘此时机更将“佳电”广泛散播。朱总号日致胡宗南电，胡感日有回电，态度颇好。我们决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们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否则仍是危险的。

毛泽东

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董必武并告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彭德怀、李克农电报。

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之方针

（1940年11月30日）

周，叶[1]，并告德怀，胡服，项英[2]：

二十九日电悉。此次拟发两俭电：一致何应钦[3]，专质问停发军饷理由，此电昨日已直发何，同时发你处及通电全国，收到盼告；一致蒋，犹豫了两天，得你们电后决定今日拍发，亦是直发蒋，并发你处，稍等再发通电。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4]、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李任潮[5]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还是我们历来

---

[1] 周，即周恩来。叶，即叶剑英，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

[2] 德怀，即彭德怀。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4] 指1940年10月19日（皓）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给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该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强迫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5] 李任潮，即李济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

说过的话，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1]（大资产阶级的反共统一战线，而何、白却另有目的），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一切对我恐吓手段及可能的局部进攻，都是攻势，而以沿泾水、渭水、黄河、淮河、淮南路筑封锁线达其巩固外部防线之目的，以造成反共空气，缩小我之活动，组织反共联盟（以蒋桂何联盟为基础），达其巩固内部防线之目的。这两件事是他能够办到的，总之是达到防御目的。本质上蒋与过去一样，依然未变，仍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而其对日则是绝对防御（毫无攻势），对我则是攻势防御。所以（一）不稳固；（二）两面政策；（三）攻势防御。这三点就是蒋目前的全般实质。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吓。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一一五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地仍须积极准备，除对付局部进攻外，随时可以调动七万以上精给敢于大举进犯者以猛重的打击，因我愈有准备，彼愈不敢进这是有备无患道理。至于在实际上，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此点不向下面传

---

[1] 蒋桂何联盟，指蒋介石的嫡系力量，同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的军队以及亲日的何应钦势力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联合。

达，以免引起下面松懈。冯玉祥[1]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毛　泽　东

三十丑

---

[1] 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任国民党军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冬被蒋介石解除指挥军队作战的职务。

给周文[1]的信

（1940年11月30日）

周文同志：

群众报[2]及《大众习作》[3]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三十日

---

[1] 周文（1907—1952），四川荥经人。当时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

[2] 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它是延安大众读物社1940年3月创办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3] 《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社1940年8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30日）

叶、项：

（一）你们二十九日的布置[2]很对。

（二）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三）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毛　朱

三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新四军行动问题给叶挺、项英的电报。

[2] 指29日进行的曹甸战役。

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1]

（1940年11月30日）

汪精卫任正式主席，不要林森[2]了，日汪条约快签订（有本日签订说），同时日军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

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日本承认汪精卫后（二十七日汪有致蒋最后忠告电），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压下去。

---

[1] 这是毛泽东获悉同盟社关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息后，致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林森，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给萧向荣[1]的信

（1940年11月）

向荣同志：

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望送来看，须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2]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

毛泽东

第二十五课，等几天再给你看。

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

---

[1] 萧向荣（1910—1976），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2]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谈判条件[1]

（1940年12月1日）

周、叶：

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二）苏、鲁、皖三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2]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五）彼方释放罗世文[3]，我方释放孙启仁[4]。（六）停止陇海、咸渝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七）如张国焘、叶青[5]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2]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师长。莫德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

[3] 罗世文，四川威远人，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4] 孙启仁，国民党韩德勤军团三十三师师长，1940年10月4日至6日，黄桥战役中被我军俘获。

[5] 叶青（1896—1990），四川南充人。1928年8月，他在长沙被捕，叛变革命，从此由一名共产党员蜕变为反革命的“理论家”。

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余欠；（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以上十二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中央书记处

一日

在边区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3日）

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

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

[1] 1940年12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德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致项英电

（1940年12月3日）

请以你对下列各项的意见告知：

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

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

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绍雄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致刘少奇等电[1]

（1940年12月3日）

（甲）黄克诚部主力不少于一万二千人，待命开皖东，立即调查由现地至皖东、淮南路之路程及沿途情形电告；（乙）罗炳辉[2]部待命开回皖东，受黄克诚指挥，准备协同黄部达成一定战略任务；（丙）陈毅部协同黄纵队留苏部分，巩固苏北根据地，以为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打破汤恩伯、李品仙进攻的作战署致刘少奇、黄克诚、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4日）

一

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英、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illegible]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illegible]日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在蒋统治[illegible]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讲话[illegible]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完陈绍禹、秦邦宪、[illegible]、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

二

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这一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开始下降（以后反共还会来的），宋子文[1]可能上台，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

---

[1] 宋子文，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2月5日）

对张国焘态度是原则问题，须对彼方严正提出，如彼方令张国焘出席，是表示彼方愿以同张国焘合作代替同我党合作，我们即不能参加参政会，此点绝对不能让步。如彼方不顾抗议，我们决定真正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顾全国共合作，自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2月6日）

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以便黄克诚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新四军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苏北新四军各部正与韩部在曹甸、安丰激战，韩部已被截断，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浦、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他处不打，保存韩德勤。此缺口打通后，黄克诚主力即可向皖东增援。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叶挺、项英、彭[illegible]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1]

（1940年12月6日）

徐、朱、黎[2]：

山东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要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的正规化，用军队掩护协同地方党，广泛地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钳制敌人，逐渐补充主力，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以便应付较大战斗。同时提出要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健全政治机关工作，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好好教育知识分子干部，多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

毛 王 滕

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等发出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

[2] 即徐向前、朱瑞、黎玉。

致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2月10日）

为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及教育能力。各地任意抽调分校干部是不对的，已有另电纠正。总校机构宜小，而苏北局面扩大，望再分出一个分校的干部，派去苏北。此分校要比山东分校还要强些，因为苏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抗大问题致彭德怀、左权并告滕代远电的主要内容。

致聂荣臻等电[1]

（1940年12月10日）

为重视学校，保证学校的教育能力，使教育干部及学校工作干部，不致任意调散，以后关于抗大各分校干部的调遣与改换工作谨慎从事，以增强而不削弱学校教育能力为原则。总校对分校有调剂之权。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聂荣臻、彭真、朱瑞、彭雪枫等电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13日）

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 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 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2月13日）

石友三通敌叛国，被其部下高树勋[2]逮捕枪毙，大快人心，证明八路军反对石友三是完全正确的。卫立煌通电亦系宣布其通敌卖国状，惟国民党不宣布其汉奸罪状，谓其自由扩军不服调遣，杀鸡给猴看，又一对我之恐吓伎俩，望向各方面揭穿之。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董必武、李克农、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2]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1940年12月13日）

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1]：

（一）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同意胡服[2]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五）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

---

[1] 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2] 胡服，即刘少奇。

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1]、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十三日

---

[1] 此处及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1]

（1940年12月14日）

叶、项：

（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四）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五）关于小姚行动，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省为断，如有此条件，以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六）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机关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中央

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给叶挺、项英的电报。

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1]

（1940年12月15日）

南方局、东南局应分别向顾祝同何应钦[2]及参政会特种委员会提出：江北苏皖鄂三省已在大举进攻新四军，皖南、苏南之新四军军部及其三个支队亦已被中央军重重包围，有准备攻击讯，请其制止江北之进攻，撤退皖南、苏南之包围。此种提出目的在使某方知我有备，缓和其在皖南、苏南之发动，特别在八路南下增援时，须缓和顾祝同在皖南之发动。

中央书记处

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东南局的电报。

[2]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1]

（1940年12月16日）

胡、陈，并告叶、项[2]：

（一）各电均悉。即照胡服删电[3]部署。（二）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三）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四）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五）一一五师之两个团催其从速南下。

毛　朱　王

十六日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陈毅的电报。

[2]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指1940年12月15日刘少奇（胡服）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等的电报。电报提议：（1）四、五支队主力阻止桂军东进，至适当时机，转移至津浦路东，留一部在路西游击；（2）八路五纵一、二支队五个主力团即进至皖东盱眙地区整训；（3）再调两个团到苏北，控制黄桥、海安、丁堰；（4）陈毅部一、二、三纵队，控制于盐城至平桥、岔河镇一带；（5）八路五纵三支两个团，控制于凤谷村、益林地区。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曾山暂勿离开军队[1]

（1940年12月18日）

叶、项：

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2]二人暂勿离开军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毛　朱　王

十八日

---

[1]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强令江南新四军全部限期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12月10日，蒋介石又密电江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如江南新四军在31日以前没有遵命北渡，就立即消灭之。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2月18日）

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2月19日）

（一）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蒋桂军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等问题致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2月19日）

在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地强调反投降了，否则不但国民党起反感，人民亦不了解。至日本诱降不会梦弃，国内亲日派仍有乘机活动可能，那是必然的。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的形势问题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等电的主要内容。

叶挺应迅速过江[1]

（1940年12月20日）

叶、项：

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2]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3]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毛　朱　王
号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字希夷）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胡服，即刘少奇。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

关于布置接叶挺过江[1]

（1940年12月20日）

甲、据叶、项报告：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

乙、交通断绝，延安有人也派不来，待七大后，方能派一批人从华北绕道来，中央已告北局抽派干部南下。

丙、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须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以外地区，苏北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布置接叶挺过江等问题给刘少奇、毅的电报。

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1]

（1940年12月23日）

胡服、陈毅、克诚、雪枫、云逸[2]：

一、胡服、雪枫两号电均悉。

二、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3]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4]（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三、目前淮北与皖东须由雪枫与云逸所部独立支持之，无论敌人或顽军进攻，均用游击战争与之周旋，不要希望任何增援，华北增援不可能，也不适当。

四、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等的电报。

[2] 陈毅，当时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

[3] 陈黄，指陈毅和黄克诚。

[4]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

五、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六、目前敌人正向涡河以西进攻，正是雪枫区域扩大整训军队、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皖东区域，除以有力一部对付莫德宏部[1]的侵入，并派得力人去指挥外，亦应照此方针布置。

七、要扩兵与巩固根据地，就要发动基本群众，而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给群众以利益，必须镇压反动分子。在这里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顾到党派的与社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预防过左倾向，另方面对于妨碍我们发动基本群众的反动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镇压（当然不是每个都杀死），否则发动群众与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对于土匪必须加以剿除。

毛　朱　王
漾辰延安

---

[1] 莫德宏部，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2月24日）

同意你见蒋时的交换条件[2]，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2月24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他拟于25日会见蒋介石，向蒋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决定过江，江北部队缓调黄河以北，交换条件是：速给新四军补充弹饷，停止国民党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25日）

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汤恩伯领特费准备反共，各方面都实行反共的高压政策，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国民党认为英、美借款等国际形势对他很有利，想利用目前形势给我以打击，我们的方针是新四军是不能走的，他要打也由他。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组织机动突击兵团应付华中紧急局面[1]

（1940年12月25日）

胡、陈，彭、左，陈、罗，叶、项[2]：

华中局面紧急，非组织机动突击兵团，不足应付大规模战斗。因此同意胡陈二十一日电，将苏北各部统一编为两个纵队。以黄克诚[3]部、彭朱支队[4]、一一五师五旅两团及田守尧支队[5]编一个纵队，以陈毅兼司令员，黄克诚为政委，赖传珠为副司令员。以苏北新四军合编为一个纵队，以粟裕为司令员，刘炎为政委。四个军区之划分及张爱萍、常玉清、叶飞、韦国清分任军区司令，均照所拟办理。望陈罗即通知五旅遵照编制服从陈黄指挥。部队编制后即行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陈毅等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左，指左权，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彭朱支队，指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

[5] 田守尧支队，指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田守尧。

加紧整训一个月至两个月，充分准备一切对付蒋桂两军[1]之进攻。

毛　朱　王

有辰

---

[1] 这里指蒋介石嫡系汤恩伯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和桂李宗仁所部李品仙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

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1]

（1940年12月25日）

（一）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二）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白崇禧亦软下来，彼方非自己转弯不可。

（三）何应钦系统与西西系统是想打的，都是亲日派，但中央军与桂军如不愿打，则亲日派亦无能为力，望多方设法将亲日派唯恐天下不乱之阴谋告知中央军与桂军将领。

（四）南汉宸在西安已做了一些工作，胡及其部下曾四次宴南，迎送尽礼，当面说不愿打。

（五）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亦很少打的兴趣，桂军至今只一三八师四个团在淮南路东，分散得一塌糊涂，一七二师尚停止于寿县附近，其他四个师则分在霍邱、六安、商城、固始，毫无东进消息。李仙洲虽准备向砀山进，但何日开动尚无确息。

（六）现苏北战事已停，望向刘为章说明，要求停止李仙洲、莫德宏东进，否则难免大冲突。

（七）我一一五师三四五旅已到苏北，现正连同黄克诚、陈毅各部集中整训，统一编制，俟一两个月后战斗力必大提高，然后以主

---

[1] 这是毛泽东发给党内的通报。

力西进，对桂军施以教训，望示意白崇禧，如欲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师撤退。

（八）杨得志旅一个月后可到淮北，皖南三个团又北上，足以对付蒋桂进攻。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九）王世英由阎处返延。据称，中央军所捕办事处人员及电台已释，移往河东，与阎一起，密码亦未失。此事起因于所谓我军攻击太泉村。实则上月二十七日傍晚该村农家有牛四头，放牧还家，昏黑莫辨，六十一师防军误为我临真镇骑兵进攻，一时全线射击，牛亦奔进，云岩、太泉一线守碉部队一团以上纷纷向宜川城溃退，闹得满城风雨，钟师长情急将我办事处人员扣押，王世英适在阎处未被捕，该师以事出误会，关了四天释放，声明误会。似此中央军已无魂魄，何能作战，此事一直闹到西安、重庆，实不过四头黄牛之进攻而已。

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1]

（1940年12月25日）

周、叶：

据项英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返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速告结果：

（1）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

（2）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

（3）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

（4）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

（5）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

（6）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毛　朱

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向蒋介石交涉北移路线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论政策[1]

（1940年12月25日）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术），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illegible]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illegible]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illegible]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illegible]，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本农民以外)，实为代表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

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1]、石友三[2]等，加以区别。

（九）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

---

[1] 王揖唐（1878—1948），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汉[illegible]。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1940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2] 石友三（1891—1940），吉林长春人，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之[illegible]。1939年后，他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illegible]分子。

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

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1]，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订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对、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

---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

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要有决心有办法达到北移之目的[1]

（1940年12月26日）

项、周、袁：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2]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

[2]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39年3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抵达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中央书记处
宥

必须销毁一切机密文件[1]

（1940 年 12 月 26 日）

关于销毁机密文件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到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稿件随看随毁，或者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渡江仍应戒备[1]

（1940年12月27日）

漾日区寿年致莫德宏称“为欢送江南之新四军开黄河北抗战复土起见，兹指定经过路线为平汉线南段，沿长江北岸某某路之线，除呈报中央及长官外，请各转令知照。一面务使豫南、鄂东所部官兵与各地民众周知为要，等因，仰各遵照”等语。但新四军渡江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一面请周、叶向蒋交涉，下令李品仙不得在巢、无、和、含地区妨新四军北移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叶挺等人电的主要内容。

致李宗仁等电[1]

（1940年12月27日）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

[1] 这是毛泽东为朱德、叶挺起草的致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1]

（1940年12月29日）

（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

（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缓复刘为章电等问题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2月30日）

（一）复刘为章电，前稿既不发，大家意见以拖一下为好。他们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率性不着急。

（二）“齐电”是要驳的，也待明年一月或二月再驳。

（三）“齐电”文字错得一塌糊涂，一面请用战报台再发一次，一面请告刘为章要他用官电发来，因电报局捣乱，由他们自己发或错得少些。

（四）皖北互让可不提，提了使桂系轻视我们，待我主力休整好后是要给以打击的。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江南部队分批走苏南为好[1]

（1940年12月30日）

叶、项：

据恩来[2]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3]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四县恐不易，李品仙[5]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毛　朱

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恩来，即周恩来。

[3] 蒋，指蒋介石。

[4] 巢、无、和、含，指安徽的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四县。

[5]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30日）

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没有发出文件。现在国民党各报纸动员舆论反共，华中有十二个师进攻我们。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1940年12月31日）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1]，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2]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四）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

---

[1] 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2] 李仙洲（1894—1988），山东齐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

（六）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是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为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

令[1]，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2]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世

---

[1] 指蒋介石1940年12月9日电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2] 佳电，指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1940年11月9日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即《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和程悦长的谈话[1]

（1940年）

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土窑洞。

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

[1]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了十六团团长程悦长。他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不安心到党校学习，想回前线去的错误想法。这是毛泽东和程悦长谈话的一部分。

为魏一斋大夫题词[1]

（194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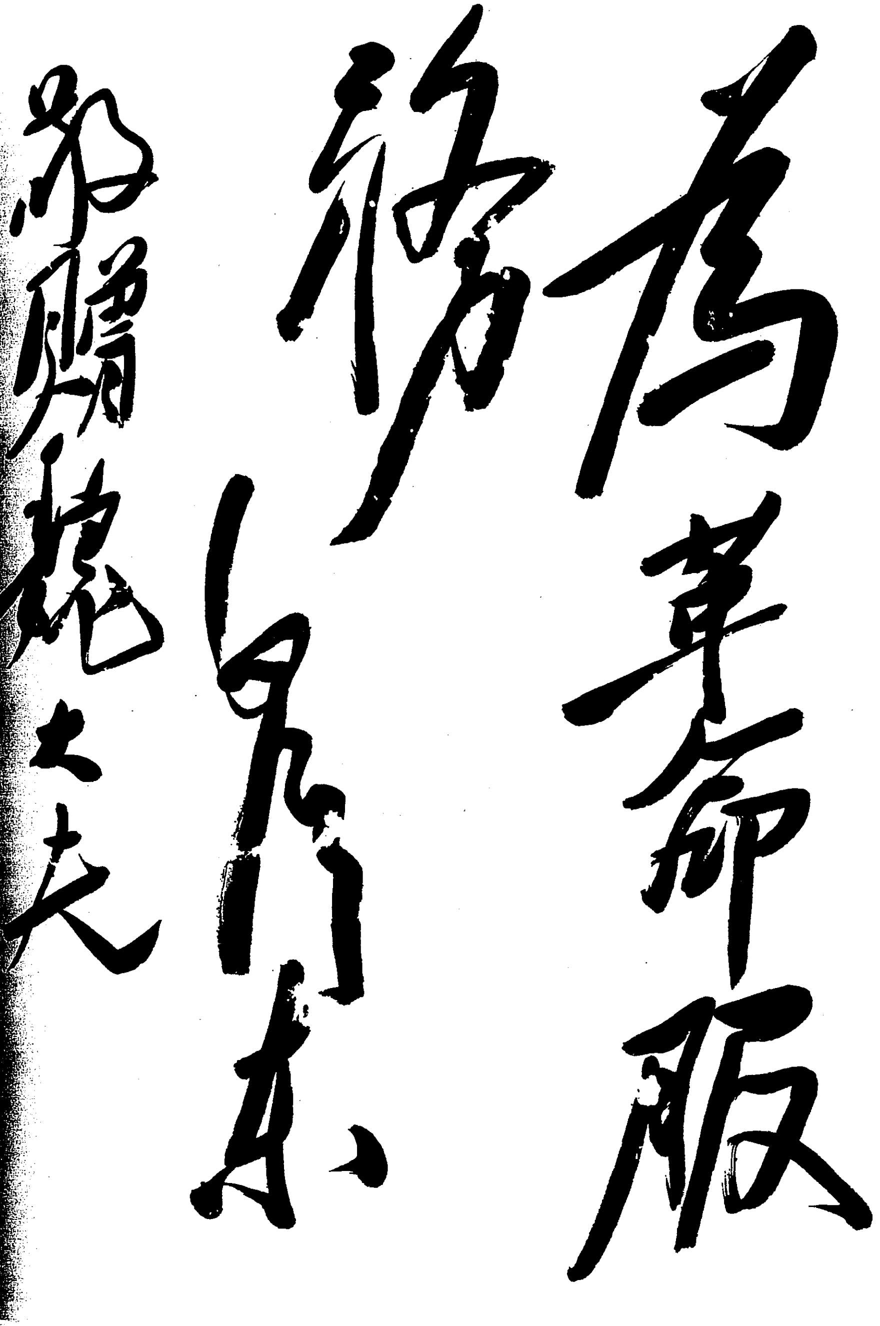
为革命服务。

敬赠魏大夫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保健大夫魏一斋的题词。



為革命服務

毛澤東

[illegible]贈魏大夫

毛泽东为魏一斋大夫的题词。

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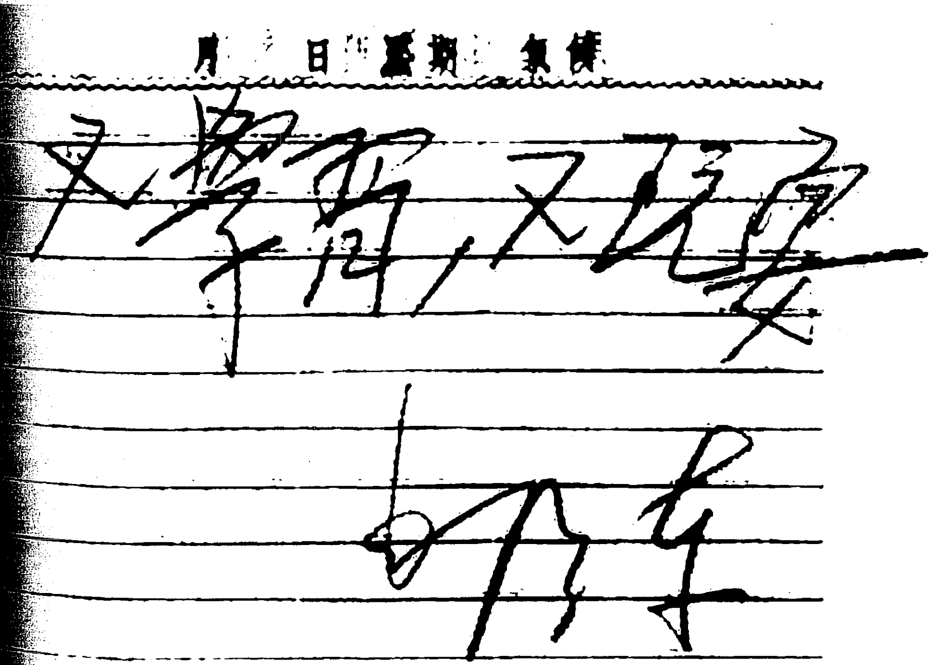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讲话。

为金德崇题词[1]

（1941年1月1日）

又学习，又玩耍。

毛泽东



又学习，又玩耍

毛泽东

毛泽东为金德崇的题词。

---

[1] 这是毛泽东1941年元旦给当时延安保育院小学学生金德崇的题词。

叶挺宜于两周内渡过江北

（1941年1月2日）

叶、项[1]：

东亥电谅达。希夷宜于两星期内渡过江北，以便与胡服[2]一道统一指挥各军，打破即将到来的反共进攻，如何盼复。

毛泽东
冬子

---

[1]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

[2] 胡服，即刘少奇。

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1]

（1941年1月3日）

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

[1] 新四军军部，1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这是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立即开苏南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不宜在茂林久留[1]

（1941年1月7日）

叶、项：

微晨电悉。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毛　朱

虞辰

---

[1] 新四军皖南部队经国民党当局同意，于1941年1月4日由安徽泾云岭出发，拟绕道茂林经旌德、宁国、郎溪各县转移至苏南根据地。1月5下午各部队先后到达泾县西南茂林地区，陷入国民党顽军重围。这是毛泽和朱德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致刘少奇、陈毅电[1]

（1941 年 1 月 7 日）

在游击战的总方针下，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地区（即路东）均不应放弃。谭希林、罗炳辉两部仍应以游击战坚持于津浦、淮南之间，力戒浪战，战则必胜。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虽然华中的斗争是长时间斗争，不到蒋介石遇了更多更大困难他是决不放手的，但我们奠定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1月7日）

中央十一月准备七万机动兵力的指示，仍然有效，惟把准备时间延长至六月底，望从兵力及经费两方面加紧准备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左权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电[1]

（1941年1月9日）

九日电悉。你说项、袁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2]辰电，他们支[3]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查询项英等情况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微，即五日。

[3] 支，即四日。

致彭雪枫等电[1]

（1941 年 1 月 10 日）

你们应根据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之十大理由，公开宣传，并发反共军。你们应公开写信给反共军首长如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将此类信件公开印刷分寄反共各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劝告他们停止反共。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你们的宣传对任何部队都取争取政策，不要伤其官长，对他们过去抗日成绩应加赞语。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词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加强对反共军的宣传工作致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等电的主要内容。

和巴苏华的谈话[1]

（1941年1月上旬）

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

---

[1] 1941年1月上旬，毛泽东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毛泽东用炭在地上画出日军、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位置，说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的严重局势。这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新四军领导问题[1]

（1941年1月11日）

你们转来叶、姚报告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另指示即转叶、姚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领导问题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1]

（1941年1月11日）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姚）指挥致刘少奇、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新四军突围中项英等离队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1]

（1941年1月11日）

据叶挺、小姚九日报告称“今九日北进，又受包围，现集全力与敌激战，分批突围北进。项、袁今晨率一部不告而别，去向不明。我为全军安全计，决维持到底”等语。除告叶挺、姚潄石负责领导全党全军坚决执行北移任务外，特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突围中项英等离队情况致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

皖南部队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1]

（1941年1月12日）

叶、姚（胡、陈[2]即转）：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并盼将情形电告。

毛　朱　王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姚）的电报。

[2] 胡，指胡服，即刘少奇。陈，指陈毅，当时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

新四军由叶挺负责[1]

（1941年1月12日）

你们率主力已突围出来，甚慰，望鼓励士气，坚持到底。迅达苏南，军中一切由希夷作主，小姚辅之，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由叶挺负责等问题致刘少奇、陈毅、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给英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1]

（1941年1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向在欧战日益扩大与残酷中，为民主与和平而奋斗之英国人民代表大会谨致兄弟的热烈的敬礼并祝贺成功。伟大的中华民族，进行抗日战争已三年半。它将以更加团结之力量，为民族之彻底解放而抗战到底。希望更加强与巩固中英两民族间的国际团结。

---

[1] 这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在英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发出的贺电的主要内容。

注意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的进攻[1]

（1941年1月13日）

有情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正准备通过晋城、长治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1年1月13日）

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向叶挺等询问突围情况[1]

（1941年1月13日）

（甲）闻你们率傅秋涛部两团突围，甚为喜慰，望速赴苏南。

（乙）你们突围者人枪多少，现至何地，情况如何。在茂林被围者人枪多少，何人指挥。望即告，以便交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向叶挺等询问突围情况致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1]

（1941年1月13日）

希夷军部率六个团仍在泾县以南茂林地区围困中，并没有出来，现粮尽弹绝，处境极危，有全军覆没之可能。虽有傅秋涛[2]两个团突出至宁国山地，亦未突出大包围线外，请严重向重庆提出交涉，并向全国呼吁求援等语，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傅秋涛，当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新四军转移时，临时编队，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1]

（1941年1月13日）

（甲）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能撤围，破裂之责在彼。

（乙）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

（丙）立告叶、项、姚诸同志，如能突围则没法突围，如不能突围则坚守下去便有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包围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1]

（1941年1月13日）

胡、陈，彭、左，朱，陈、罗，叶、项、姚（胡、陈转），周、叶[2]：

甲、同意胡陈十二日电[3]，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4]，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5]，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陈毅等的电报。

[2] 彭、左，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叶、项、姚，指叶挺、项英、饶漱石（姚），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叶剑英。

[3] 指1941年1月12日胡服（刘少奇）、陈毅给毛泽东等的电报。电报[illegible]出：由于新四军约九个团的兵力被顾祝同数个师包围于茂林附近，激战六[illegible]夜，已至绝境，望中央速向重庆方面严重交涉。同时，提出请山东我军包[illegible]沈鸿烈，新四军其他部队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4]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5]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乙、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1]，望叶项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十天可能有办法。丙、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丁、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戊、为应付严重事变，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己、对皖南事变[2]应公开宣传，对消灭韩沈部署，应绝对秘密。

毛　朱　王

元申

---

[1] 指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联名于1941年1月13日发出的抗议国民党军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通电。

[2]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1941年1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向叶挺等询问蒋方是否停战撤围及皖南新四军情况[1]

（1941年1月14日）

（一）蒋介石已令皖南停战撤围，究竟是否停战，望即告。

（二）如未停战，望鼓动全军坚持，定有办法。

（三）我军死伤多少，被俘多少，死伤及被俘干部姓名、官级，望查明速报，以便向蒋交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向叶挺等询问蒋方是否停战撤围及南新四军情况致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同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叶挺等的通报[1]

（1941年1月14日）

接恩来报告称“蒋十二日、十三日两次电令顾祝同撤围，并允走苏南”等语。特达。望你们再坚持二三天就有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叶挺等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刘少奇、叶挺等的通报[1]

（1941年1月14日）

周、叶报告称“张冲昨天用电话向蒋报我们对围攻新四军的抗议。蒋说：‘（一）新四军北开中央决不留难，此次冲突，听说是新四军先开枪。（二）希望新四军继续向北开。（三）如此路不通，转向皖北开亦可，命令李品仙勿留难。（四）我已下令新四军过江后发弹十万并饷。（五）望你转告周、叶转前方，勿将事件扩大。’我现直函蒋抗议，并坚说非经苏南过江不可。请中央询问叶、项，究竟他们采取那条道路折进苏南，以便作更具体的交涉”等语。特达你们，坚持数日，便有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刘少奇、叶挺等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民党军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1]

（1941 年 1 月 14 日）

确息：上官云相十三日未时解决我七千余人，另有千余人已命坚决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国民党军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致恩来等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1年1月14日）

（一）十三日报告悉，已转叶、项。

（二）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三）项因走不脱已归队，并决与全军共存亡。

（四）突围者是傅秋涛两个团，亦尚未脱离大包围，叶、项、姚主力尚在茂林原地，被数万大军围攻，现已血战八天，十分危险。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内容。

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1]

（1941年1月14日）

彭、左，贺、关，聂、彭，刘、邓，吕、程，朱，陈、罗，胡、陈，周、叶[2]：

（一）叶项[3]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七万余人包围于泾县以南之茂林一带，自鱼至元已血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夜虽有傅秋涛[4]一部突小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军覆灭危险。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

[2] 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彭，指聂荣臻、彭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朱，指朱瑞，当时任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胡、陈，指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指挥部代总指挥陈毅。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叶剑英。

[3]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4] 傅秋涛，当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新编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二）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三）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1]，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2]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毛泽东　朱德　王稼祥

寒

---

[1]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2] 指《包围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中
项。

关于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指示

（1941年1月14日）

恩来、剑英同志：

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麐、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毛泽东

十四日

关于皖南事变的讲话[1]

（1941年1月15日）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皖南事变讲话的一部分。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

（1941年1月15日）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

---

[1] 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起草的。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个决议，并发给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一月五日开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及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贯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illegible]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illegible]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illegible]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

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够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内容的通报[1]

（1941年1月15日）

何应钦致各部队急电称“连日来各战区进剿匪军颇为顺利。匪首叶挺、项英均先后被擒。兹为预防其报复计，各部队须严为戒备，勿为匪乘”等语。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内容的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1年1月15日）

（一）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

（二）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

（三）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地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四）顾祝同称“新四军在各地之办事处、通迅处、留守处、仓库、修械所及一切非法组织一律封闭，武装解除，人员扣留”等语，令上官云相执行，上官此次消灭叶、项是很坚决的。

（五）上官云相元未称：“鹿角山、东流山、凤里溪、李村一带之匪，元日被我击毙俘虏者共七千余人，残匪千余仍在原地挣扎，限于十四日午后一时前，彻底肃清。”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向刘少奇、陈毅询问皖南新四军人枪数目[1]

（1941年1月17日）

皖南部队究竟有多少人枪？你们说有九个团，张鼎丞说只有三个团，上官云相称俘我七千，尚有一部（似即傅秋涛）在外，是否属实，盼即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向刘少奇、陈毅询问皖南新四军人枪数目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蒋介石已令各战区向我进攻情况的通报[1]

（1941年1月18日）

（一）蒋介石称“朱、叶各部迄未遵命移动，我应以党政军结合力量迫其就范，惟须防止该部向大别山、豫西流窜，影响大局，我应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相机消灭”等语。

（二）何应钦称“江南新四军抗命不向北移，已饬顾长官派队将其完全消灭，计死亡万余，俘二千余，该军军长叶挺负伤，副军长项英阵亡，为防异军在陕晋方面有报复行动，应饬严防”等语。

（三）蒋已令各战区进剿，李宗仁已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开始进攻，限二月完成。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蒋介石已令各战区向我进攻情况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941年1月18日）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三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在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病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人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为是，去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illegible]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

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之答复。至十二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四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五十二师唐云山、一〇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新七师田种毅、第十师王劲修等七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围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七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十三日，激战已八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地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十七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十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十四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

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残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竟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存？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

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二十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二十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 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之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七）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月18日）

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皓电”“齐电”是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我们去“佳电”也还不转变态度，这就证明下了决心反共。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在各处大捕共产党员，因此我各办事处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

---

[1]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这是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月18日）

立即转告克农，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1]

（1941年1月18日）

前因援救皖南，同意胡、陈建议包围韩、沈。现皖南已失败，华中汤恩伯（淮北区）、李品仙（淮南区）、王仲廉（鄂中区）、冯治安（襄西区）已开始向我进攻，因此我华中、山东各部须为适应反共军进攻而分别作具体之部署，统由刘、陈规定指挥之。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改变包围韩德勤、沈鸿烈的作战计划致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徐海东电[1]

（1941年1月18日）

闻病沉重，非常惦念，当此紧张时局，我们无限关怀你早愈、健康，特电慰问，希安心休养。

---

[1] 1941年1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慰问患病的徐海东。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徐海东，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1]

（1941年1月19日）

元日朱彭叶项抗议包围皖南新四军通电称：“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电讯传来，闻者心惊，读者发指。此等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相鱼肉，自损国力之举，实可谓无法无天之至！

溯自新四军奉令成立以来，以新组之师，武器服装极其残缺；即奉令开赴前线，抗御劲敌，屡建战功。论功行赏，对此抗战有功之部队，理应予以补给扩充，使成抗日卫国之精锐部队，保卫东南半壁。不意补充既不可得，当时〈局〉竟一再下令，强使北移。朱总司令等前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苦心说服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并遵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所谓命令移防者，竟是诱我聚歼之计，据朱彭等元电所称：“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项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同时，全国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在西北则筑万里长城之封锁线，在华中则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实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对制造皖南事变的辩词而写的一篇社论。

大举进攻。”由此可见：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分子，正实行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之滔天罪行！

何应钦、白崇禧等曾以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之资格，发出皓齐两电，要求皖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北撤，不料遵令北移之日，即阴谋进袭之时！既下命令强人以撤退，又下命令进攻遵令撤退之国军，出尔反尔，命令之尊严何在？总长之人格何存？

军委及第三战区顾祝同等，既再三下令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撤，又指定苏南为移防路线，乃遵令向苏南移动之日，即七万大军乘机包围之时！手段毒辣如此，何白所称中央之仁义道德何在？

当新四军军部及江南部队被诱被围之时，军事当局一方面下“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命令，另一方面又作沿途驻军绝不留难之诺言，口是心非，惨无人道，国家之法纪何在？当局之信用何存？

呜呼！命令！命令！军纪！军纪！天下无穷罪恶，均假汝之名以行！

由此可见：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而今而后，全国军民当更能洞悉此辈平日高唱军令森严国法神圣之论调，无非借作损人利己祸国殃民之遁词！

当德意日批评罗斯福援英为违反国际法时，罗斯福在其致七十七届国会咨文中公开宣称：“独裁者们所说的国际法，只是片面的东西，它缺乏互相遵守该法之精神，而仅仅成为压迫之工具。”罗斯福的这种说法，我们也可借用来赠给我国平日最敬佩罗斯福的那些独裁者和阴谋家们，也就是说：“这些口是心非之徒所说的军令国法，只是片面的任意杜撰的东西，它们缺乏互相遵守该等法令之精神，而仅仅成为压迫摧残异己之工具。”

言行不符，损人利己，本是此等人所代表的阶级之天性，对根

本没有仁义道德之人，本不应责备他们不仁不义不道德。中国古谚所说的“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男盗女娼”，恰可作为此辈人的写照。此等人之所言所行，正如鲁迅所说：“有背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但是，此等人今日之所为，非仅关他们个人的道德信誉问题，而实关整个国家民族命运问题。他们以分裂代团结之阴谋，以内战代抗战之罪行，实为帮助敌伪和危害民国之大不韪！对此辈此等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绝不能容忍，即全国爱真理论公道之大多数军民同胞亦绝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和号召全国军民同胞和全世界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

为惩办阴谋祸首而奋斗！

为解放皖南新四军部队而奋斗！

为撤退华中剿共军而奋斗！

为平毁西北反共封锁线而奋斗！

为停止全国大屠杀惨变而奋斗！

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

我们深信：正义一定战胜罪恶！光明一定战胜黑暗！

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的指示[1]

（1941年1月19日）

（一）中央方针见另示。（二）边区粮食正在筹备。（三）兵工厂依现有条件很难扩充，三酸厂在商讨建立中。（四）蒋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后打八路，目前西北还不会进攻，我亦不宜引起胡宗南之注意，故边区军事不作新的调动。（五）华北方面请照原计划按步做去，惟增加紧张性。（六）华中准备打长期的游击战，以有利我军不利反共军为原则。（七）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将叶挺付审判，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其背景似以日德为多，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惟仍取防御姿态，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必要时打出手，打到甘川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illegible]骤致彭德怀、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月20日）

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1]

（1941年1月20日）

（一）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

（二）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

（三）延安军委已经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

（四）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

（五）问题是□□□□□□□□□□□□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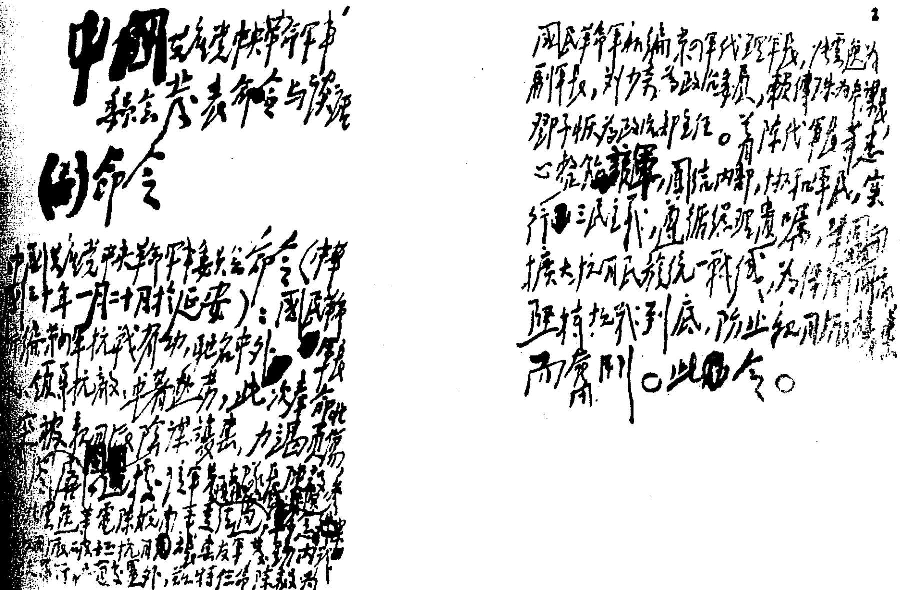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1]

（1941年1月2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1年1月20日，于延安）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命令和以中国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通讯社记者发表的谈话。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轸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此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1941年1月22日）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1]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

---

[1] 指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1]，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

---

[1] “皓”“齐”两电，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在1940年10月19日（皓）和12月8日齐）发出的两个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11月9日（佳）电复何、白，除据驳斥《皓电》的造谣外，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齐电》是对朱、彭、叶、项的《佳电》而发，为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舆论上的动员。

（九）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十五）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

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懔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

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1]；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2]，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

---

[1] 西北封锁线，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在皖南事变前夜，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已经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同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增加到20余万人。

[2] 参见《论语·季氏》。季孙，鲁国大夫。颛臾，春秋时小国。萧墙是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季孙将伐颛臾，孔子以为季孙之忧不在外而在内。

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们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来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是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个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1]

（1941年1月23日）

一、(略)。[2]

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国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2] 原件无第一段。

对《解放日报》一篇社论[1]的批示

（1941年1月23日）

请门教员[2]把这个社论向战士宣读。

毛泽东

元月二十三日

---

[1] 指1941年1月23日《解放日报》上的《皖南事变真相》一文。

[2] 即门书明。当时任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的文化教员。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1941年1月25日）

恩来：

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1]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2]，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3]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

---

[1] 延安命令及谈话，指1941年1月20日为皖南事变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2] 十二条，指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941年1月20日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即：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3]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余详书记处电。

毛泽东
有申

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1]

（1941年1月25日）

彭、朱、周：

（一）我们对于皖南事变及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处置，见一月二十日延安军委命令及谈话。我们须一口咬定这是日寇与亲日派（不说蒋）的计划。关于所谓军纪军令迫我北移及各地捉人杀人一切反革命行为，我们均咬定是亲日派承日寇命令所为。这样一来，使我政治上处于优势，使蒋介石及国民党不得不转入辩护地位，并不是蒋与日本业已讲和了，关于蒋日间矛盾，即使很小，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

（二）我们一月二十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三）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佳电”及皖南撤兵），取得了中间派的好感，但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应立即结束，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

（四）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是蒋一大失策，我们须紧紧捉住，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

（五）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作其他必要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的策略问题给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

（六）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他看成全国性事件。

（七）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

（八）但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九）不出三个月德必攻英，日亦还有可能攻华，世界局势必有变化，蒋介石的气焰可能减低。但如英国根本失败，罗斯福应付不来，蒋的投降可能就大了。

（十）中间派话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只有我们取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真正争取中间派，否则，中间派的动摇立场客观上是于蒋有利的。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致周恩来电

（1941年1月27日）

（一）同意逐步撤退办法。

（二）但须估计到蒋全部逮捕我们的人，须准备应付全部逮捕。

（三）西安撤退的二十五人，由李华率领，有完全合法护照，行至潼关被十六军扣留，朱总已电熊、胡，请饬放行，未知结果如何。

（四）如不实行十二条，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五）日蒋矛盾尚可利用，李宗仁以信阳、应山敌北进至新安店集中者达两万余，炮百门，战车三十辆，飞机二十架，并仍续有增加，有向豫北进犯企图，令各集团军部署对敌。汤恩伯主力正在确山以北布防中。莫德宏以华中敌军乘我清剿匪军之际，集结主力于信阳附近，令其商城各部布置对敌等情。敌如大举进攻，必是日寇配合亲日派之行动，目的在威胁蒋介石妥协，亦是将蒋毁掉之步骤。

（六）我之方针是捉住江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死也不放，破裂是蒋发动的，蒋把我们推到不能不和他对立的地位，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他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我们没有和他谈判的余地，这种余地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办事处人员要打要杀权在他们，我们是每人都准备杀头的。如他们亦认为两军相交不斩来使，

则放我们的人回延，否则由他们自便。在他们没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番号、宣布中共叛变），我们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以待他们之觉悟。这些都应公开向张冲等说明。

（七）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通电即日发你处。

（八）延安一切这类文件如不便于由办事处发出，则用间接方法秘密散发，以保办事处安全。

关于皖南事变后
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

（1941年1月28日）

（一）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望广为散发。

（二）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军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但对实行三三制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项政策均不变，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

（三）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2]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展，扰乱国民党后方。

（四）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在皖西之城、舒城、潜山一带，张、邓负责加强游击纵队的力量，以便不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2] 张、邓，即张云逸、邓子恢。

能向大别山前进。在鄂东之浠水、黄梅一带，在豫西现时敌人进攻地区（敌已占领泌阳），由先念负责布置。雪枫应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以便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苏南方面望胡、陈速[1]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

毛　朱　王

俭申

---

[1] 胡、陈，即胡服（刘少奇）、陈毅。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1月28日）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望广为散播。并指出：你处宣传活动，即根据这些文件，并望将这些文件寄给刘晓[2]和英、美共产党。

---

[1] 这是毛泽东致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2] 刘晓，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给萧三的信

（1941年1月29日）

萧三同志：

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有暇望来谈。

此致

敬礼！

原件还你。

毛泽东

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1月30日）

（一）中央谈话与军委谈话原则上无分别，只是中央谈话是十八日发表的，主要只说明皖南事变；军委命令及谈话是二十日发表的，提出了全部问题，并尖锐地表明是与重庆军委会十七日命令谈话对抗的。如觉得在重庆一同发表无碍则一同发表，否则只发表军委命令谈话亦可。

（二）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他快，但要准备他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的，□□□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

（三）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

（四）同盟社广播日军占领泌阳，似有攻南阳讯，汤恩伯已将新蔡部队撤至上蔡集中，准备对敌。

（五）西安讯，胡宗南答应电潼关放行李华等二十几人，看后如何。

（六）边区正在加强军事与经济上的准备。

（七）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如

移、扩军、边区等)。

(八) 蒋二十七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今日决定由我作一讲演以对抗之。

对《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的说明[1]

（1941年1月30日）

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是全面破裂的开始，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破裂的责任在蒋介石，一切理由都在我们这边。前年七七宣言斗争性多，去年七七宣言团结性多。蒋介石认为我们去年的七七宣言及“佳电”能得到中间派的同情，便抓住我们。我党只有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抵制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这种破裂不应说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我们要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公开批评蒋介石。对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是十二条。

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说明《中央关于目前的决定》的讲话的一部分。

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电[1]

（1941年1月30日）

感电[2]悉，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电的主要容。

[2]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电[1]

（1941年1月30日）

我们须利用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之间的一段过渡时间，因此中央决定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而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驳斥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命令及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演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及各师各军区政治部、新四军各级政治部电的主要内容。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1941年1月31日）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1]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

[1] 林伯渠，1939年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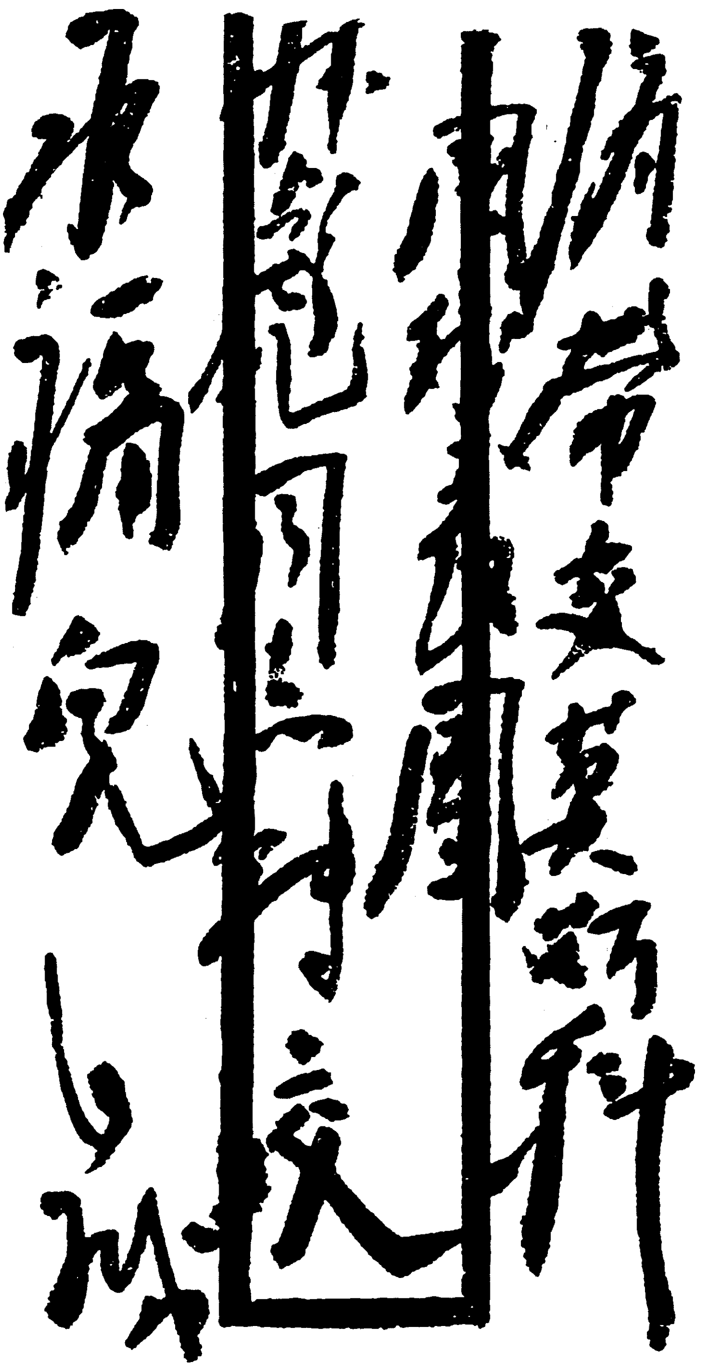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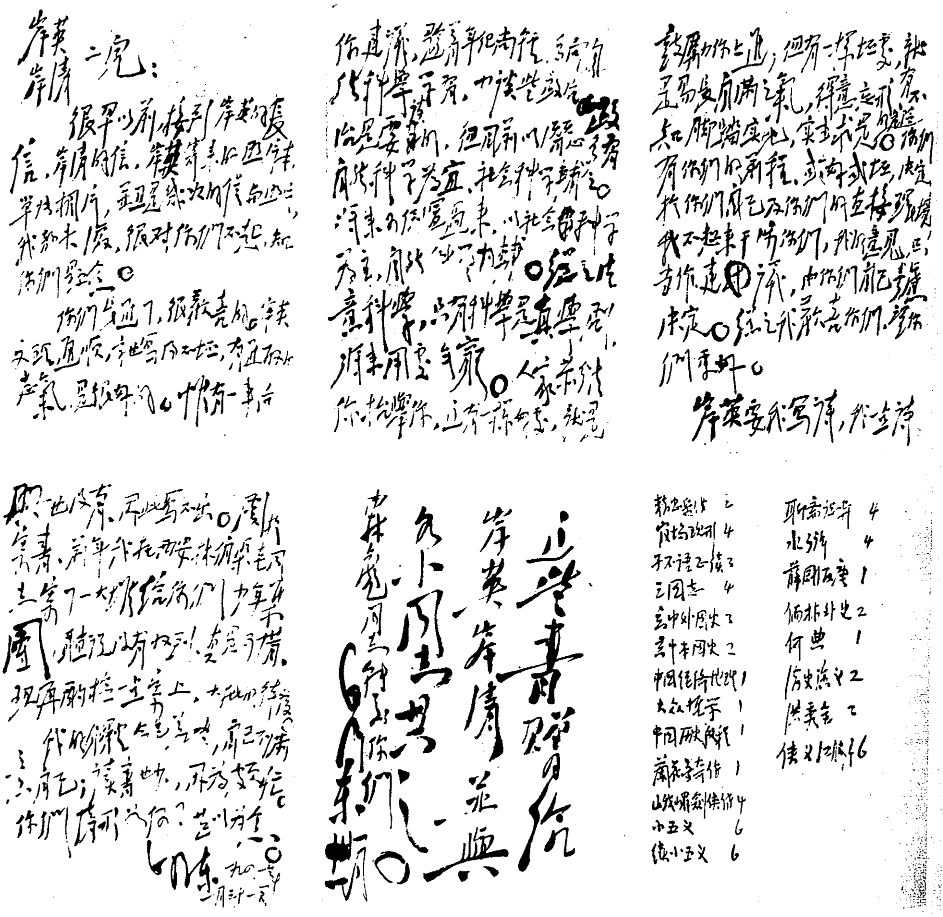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

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请带交莫斯科
国际儿童院
林彪同志转交
岸英岸青兒收

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信的信封。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不知脚踏实地，实在[illegible]。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首诗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岸青，前年我在西安交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批书给你们少年图书馆，[illegible]有收到否？[illegible]现再寄[illegible]一些书上，大批的待后。

代我问候[illegible]，[illegible]读书也，[illegible]你们[illegible]何如？望[illegible]。

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送书附信
岸英、岸青[illegible]
[illegible]
由林伯渠同志转交你们
[illegible]

精忠岳传	2
官场现形记	4
子不语正续	3
三国志	4
高中外国史	3
高中本国史	2
中国经济地理	1
大众哲学	1
中国历史教程	1
兰花梦奇传	1
峨嵋剑侠传	4
小五义	6
续小五义	6
聊斋志异	4
水浒	4
薛刚反唐	1
儒林外史	2
何典	1
清史演义	2
洪秀全	2
侠义江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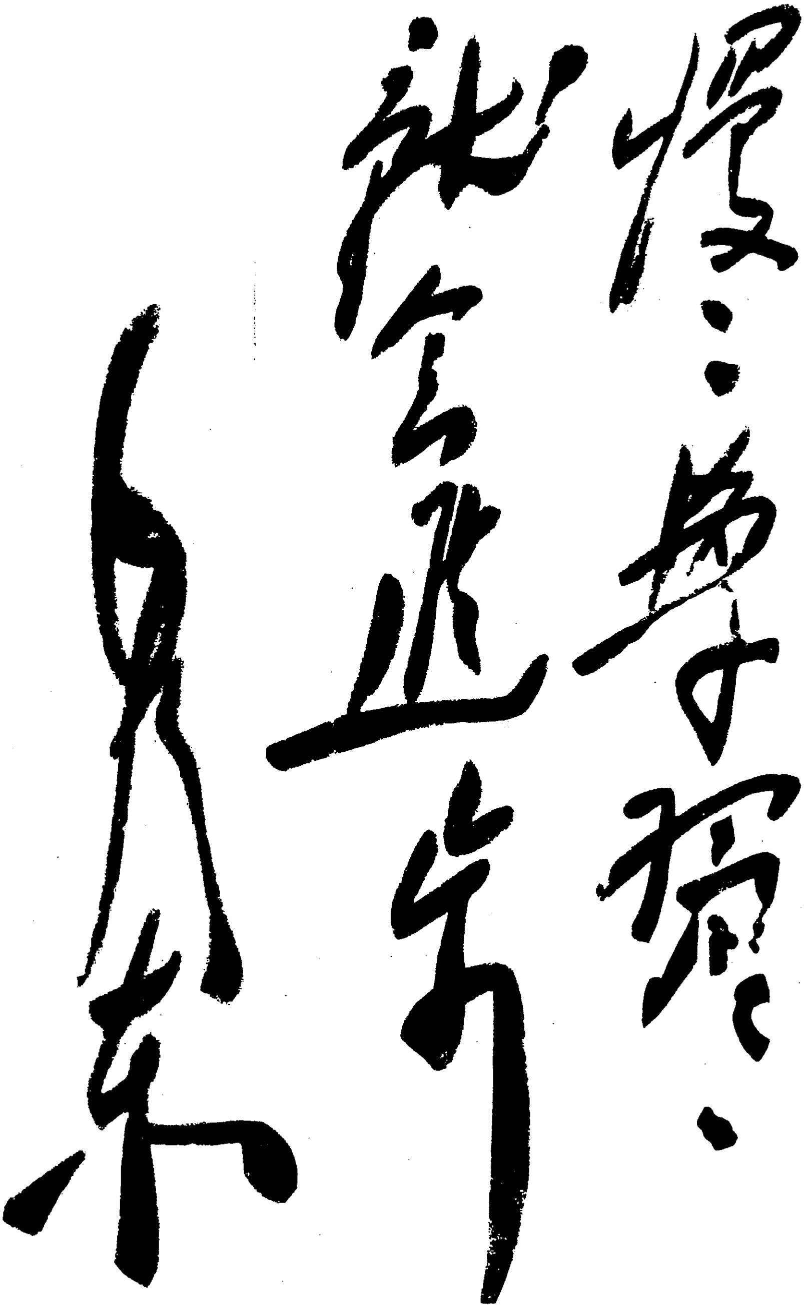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信的手稿。

为严正岗题词

（1941年1月）

慢慢学习，就会进步。

毛泽东



慢慢学习、认真进步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严正岗的题词。

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1]

（1941年2月1日）

胡、陈，并告德怀：

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2]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在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利用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机会（日寇此次东从涡阳南从信阳作包围汤李何桂[3]之战役攻击，汤李何有受极大损失可能）。你们第一，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4]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出路。彭雪枫部应恢复新四军番号，如将来华北部队南进，亦用新四军番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2] 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

[3]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指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桂，指国民党军的桂系部队。

[4]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号。新四军现在是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了，他可不受任何法律拘束（国民党元老中有忧虑浙赣皖豫将遍地皆匪者）。如此着成功，黄克诚[1]应准备向河南发展。第二，你们应令张云逸、邓子恢[2]向皖西发展，应使他知道打破桂军进攻主要是取外线发展的方针，桐城根据地是绝好战略基地。此次敌军进攻，莫树杰[3]已令其商城部队应战，如敌军打汤李何后移向在大别山集中的桂军主力进攻，张邓就可将主要发展方向移至皖西。去年十月你们复电谓巢湖、瓦隔湖间不过百里，通过甚难，但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第三，李先念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三方面，鄂东即令现有之浠水、黄冈支队及路东支队[4]担任，加强其政治领导能力。鄂西、豫西均随着日寇的进展向前推进。以上彭张李三区均能很好利用日蒋矛盾，实施我之战略发展。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苏南是江南聚集力量的中心，应用大力经营之。该方情况我们不甚明了，望作一详报来。该方将来应准备出天目山。皖南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在一年内逐渐聚集一个二三千人枪的支队，联系地方党，准备将来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不要全部过江，已过江的待生息一时期后仍可考虑派他们回到芜湖一带去。自一月十七日后形势

---

[1]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子恢，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3] 莫树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军军长。

[4] 浠水、黄冈支队及路东支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东地方抗日游击武装。浠水黄冈两县游击大队分别成立于1940年8月和1940年1月。鄂东游击总队于1940年1月成立，熊作芳任队长，程理任政治委员。

大部改变了，过去项英[1]错误的南进政策，用在今后就是正确的。皖南损失，据国民党报道亦只伤亡二千余，俘虏三千余。项部原有万人似尚有三千左右已突出或被击散，你们应注意派人指导收集，其往苏南者即在苏南行动，不要过江了。苏南应加强无线电通讯，该方至少要有五个电台。皖南应立即着手建立一个电台。曾希圣[2]愿打游击不愿做老工作，可以就令他带领现到无为的部队，将来可令他回到皖南去。如可能并必要时，你们亦可考虑派孙仲德[3]随曾希圣过江。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4]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江南第四个战略基地是闽浙赣边。该方有三个藏有少数武装与民众甚好的小根据地，你们目前应开始了解该方情况，小姚[5]曾有详报，如你处没有可转给你们。该地目前是加强地下工作，准备将来武装起义，恢复过去公开根据地。以上是江南四个战略基地的指导任务。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反共军聚集大量武装力量的地方，但你们应把这地方看作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他在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好像汉高祖的关

---

[1] 项英，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牺牲。

[2] 曾希圣，原任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局长，1940年调新四军军部工作，同年秋率军部部分干部到达皖中无为，负责组织皖南独立支队和收容皖南事变中失散人员。

[3] 孙仲德，当时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副旅长。

[4] 总指挥部，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1940年11月成立。

[5] 小姚，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中。我们现在有华北、苏鲁及南方（闽粤）三个大的战略根据地。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你们的任务是出鄂豫陕边与闽浙赣边，南方的任务是经营五岭南北。为适应蒋介石暂时只打击新四军的情况（各个击破策略），除你们提议的编四个师外应加黄克诚彭雪枫两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共有六个正规师。时局虽变化甚大，但日蒋矛盾仍可利用，仍是目前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中之最基本矛盾。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中央关于一月十七日以后新时局的决定，不日可以发给你们。

毛　朱　王
东

复彭德怀电[1]

（1941 年 2 月 1 日）

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目前政治上我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估计此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才能完全到我手中。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国际条件今年夏秋必有一个变化，明春又会有一个条件。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日蒋矛盾等问题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2月2日）

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解决以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彭德怀、左权、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日）

（一）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2]亦看到，为之神往。（二）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1]

（1941年2月2日）

彭雪枫部和黄克诚部均须用新四军番号。刘、陈应速将苏南、苏北、皖东、鄂中、淮北及克诚六部编为六个师，将各师师长、政委名单立即电告，以便军委立即发表委任令，广播全国。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彭雪枫、黄克诚
的主要内容。

只有恢复国内团结
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1]

（1941年2月2日）

周、董（重庆），廖、潘（香港），刘晓（上海），潭秋（迪化），胡、陈，先念，云逸，雪枫，朱瑞，罗、陈，黎、罗，彭、左，刘、邓，任穷，聂、彭，吕、程，贺、关，萧克，高、萧[2]（抄送）：

（一）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数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3]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信阳一路为敌之主力，连日向北急进，正与汤恩伯主力激战中，已占领泌阳、舞阳、西平、上蔡各县，叶县电讯已不通，卫立煌[4]仓卒赴叶县督师，洛阳政府机关向卢氏迁移。同时宿县之敌渡过淮河占领蒙城、涡阳，正与何柱国、李仙洲激战中。开封之敌，亦有由尉氏南下讯。潼关一带之中央军星夜向前线增援，敌另在荆当[5]一带作小出击，牵制川军、西北军不能北援。

（二）此次河南战役[6]是宜昌战役[7]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自三国同盟成立、日美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采烈，轻视日本，集中其力拼命反共。乃蒋介石一手造成国共裂痕之后（皖南事变解决新军，一月十七日下令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后），敌即于一月下旬发动

大举进攻，蒋介石反共结果已如此明显。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强调地提出我党中央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只有蒋介石立即悔祸，实行我党中央所提办法，才能使已被蒋介石开始破裂了的国内团结重新恢复，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

（三）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最后派遣叶剑英[8]同志回延商洽，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各地应将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广为传播，使社会各界人人知道，造成有利于解决的社会舆论，是为至要。

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中央书记处

东[9]（剑英已于二月二日上午抵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分局、工委和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的电报。

[2] 周、董，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廖、潘，指廖承志、潘汉年，当时均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刘晓，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潭秋，即陈潭秋，当时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胡、陈，指胡服（刘少奇）、陈毅，当时分别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代军长。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陈，指罗荣桓、陈光，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和代师长。黎、罗，指黎玉、罗舜初，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彭、左，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穷，即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聂、彭，指聂荣臻、彭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萧克，当时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高、萧，指高岗、萧劲光，当时分别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当时任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李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4]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 荆，指荆州，镇名，位于湖北江陵县中部。当，即今湖北当阳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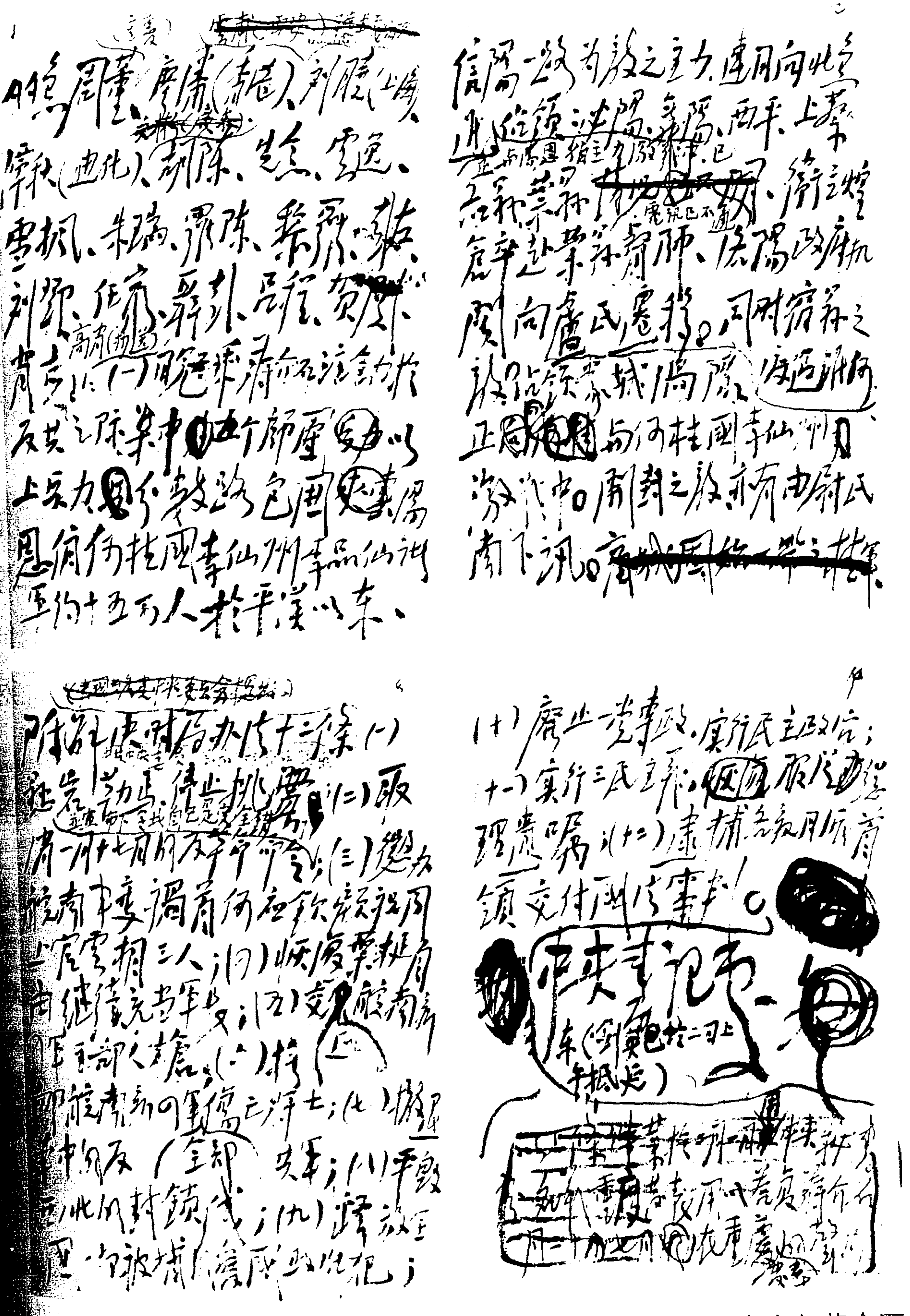
[6] 河南战役，又称豫南战役。1941年1月24日，日军分三路向豫南举进犯。国民党军采取了避免正面作战，主力机动转移的方针，使日军无找到汤恩伯部主力作战。日军处处扑空，遂改变作战计划，中国军队则乘

机反攻，逐步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豫南战役自1月24日起，至2月10日止，前后共进行了18天。

[7] 1940年6月，日本侵略军进攻宜昌地区，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作战失利，宜昌于6月14日失陷。

[8]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

[9] “东”为韵目，代1日。此电于1日起草，2日完成并发出。



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新时局的指示及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提出的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的手稿。

日军进攻态势及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1]

（1941年2月2日）

彭、左，刘、邓，胡、陈，雪枫，克诚，云逸，朱瑞，陈、罗，黎、罗，先念，周、董[2]（重庆）：

甲、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3]主力有被击溃可能，中条山胡卫两军、大别山桂军[4]均有处于狼狈地位可能，西北胡军有一部援豫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乙、我之方针：（一）政治方面，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十二条，对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胡、陈，指新四军政治委员胡服（刘少奇）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黎、罗，指黎玉、罗舜初，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周、董，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

[3]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指驻守在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部队。

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1]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此条由周董负责）。（二）军事方面，八路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克诚即改新四番号，新四已成全国人民中极荣誉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丙、统战方面，彭左、刘邓注意中条各军，雪枫注意河南各军，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丁、苏鲁两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歼灭之。

毛　朱　王
冬亥

---

[1] 指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通。这个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新四军番号撤销，叶革职交军法审判。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2月5日）

同意用毛、朱、周名义致电陈嘉庚、柳亚子、张一麐等，对他们为全国团结抗战仗义执言表示敬佩与鼓励。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设立炮兵司令部直属军委[1]

（1941年2月7日）

彭、左：

关于炮兵问题，为保存与训练我们的炮兵，总部之炮兵团（前方又留一部），聂军区[2]、贺师[3]之山炮兵，应集中延安附近训练，设立炮兵司令部直属军委。否则将来日寇封锁线加密，前方炮兵团有不能通过之可能。但在国共未全部破裂之前，我又才[4]能打出去，大概今年是[5]可能出去的，炮兵西开，华北又没有炮用。

毛　朱　王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和八路军参谋长左权的电报。

[2] 聂军区，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3]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4] 才，似为“不”字之误。

[5] 此处似漏一“不”字。

对日军进攻形势和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

（1941年2月7日）

恩来[1]同志：

（一）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2]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3]召来的。

（二）汤集团[4]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四日失陷。李仙洲[5]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6]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系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7]将来亦有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8]已

---

[1] 恩来，即周恩来。

[2] 1940年6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湖北宜昌地区，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作战失利，宜昌于6月14日失陷。

[3] 蒋何白反共计划，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1940年11月14日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

[4] 汤集团，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5]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

[6] 指驻守在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部队。

[7] 莫德宏部，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8] 范汉杰军，即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

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1]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2]已星夜东调，第八师从正宁撤至邠州[3]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4]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吧，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倒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三十日东条[5]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赖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意我们

---

[1]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胡部李铁军军，指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第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

[3] 邠州，旧县名，即今陕西彬县。

[4] 指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通令。这个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新四军番号撤销，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

[5] 东条，即东条英机，日本战犯。九一八事变后，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的战争。

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一百零二个字[1]）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虞酉

---

[1] "佳电"指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同年10月19日（皓）电的电报。其中"肺腑之言"一段文字为："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

皖南事变后的各方动态

（1941年2月7日）

自蒋介石、何应钦等一月十三日歼灭新四军皖南部数千人及重庆国民政府军委员会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的反革命命令后，影响中国政局变化极大，特综合各方情况如下：

（一）重庆国民党中央方面：极力动员反共舆论，强迫全国报纸登载污害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向中外宣传这只是军纪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谈话，同样企图用执行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意义，麻痹中外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大批逮捕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实行阴谋陷害，制造自首运动，监视与扣留各办事处人员；在军事上集中汤恩伯、李品仙二十万大军进攻华中新四军，并密令把华中八路军当作新四军来打，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加紧建筑封锁线并举行局部进攻。他们这些做法都是想用压力把我们一下压服下来。但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何应钦、白崇禧主张痛快地干一下，何、白曾用电报征求前方将领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陈诚电复主张全面进攻，传何、白电令傅作义布置进攻八路军的军事，何健、陈济棠主张杀叶挺，冯玉祥大骂何应钦，说何是阴谋，但未及蒋，孙科表示忧虑，于右任愤慨地说何骗了他，张冲（国民党中委

与我们办交涉者）表示无办法，没有脸见人。国民党员有担心破裂者，老党员甚至说出这样做恐至自取灭亡，国民党人员亦多忧虑愤慨，表示此事做得过火，亦有表示恐慌者。

（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孙夫人、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中委及名人联名致蒋书，指出何应钦亲日派阴谋，深望蒋勿为奸小所惑，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如黄炎培等，一方面对被难新四军表示同情，一方面对抗战前途表示失望；黄炎培拟见蒋陈述三点：（甲）望蒋适可而止；（乙）军纪固重要，但亦须注意收集民心；（丙）请蒋把眼光向外。他向人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中间势力中有希望中共表示强硬态度者，亦有表示悲观动摇者。杂牌军及地方实力派中多数感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他们说：“以杂牌消灭杂牌，中央则不许杂牌存在。”因而表现恐慌与对我同情。

（三）金融界自事变发生后，各种物价更形高涨，外汇跌落，各银行无行市，汇丰银行停止挂牌，陈光甫等银行家停止向内地投资。

（四）广大民众及进步势力表示对国民党愤恨，对共产党同情，认为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中国内战就要亡国，许多青年学生、工人、职员看到这个消息时，有流泪的，有苦闷的，有愤怒的，有许多学校进步分子逃走。

（五）中共方面的整个立场见于一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条要求，全党一致拥护，情绪

异常兴奋。党外人士例如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参政员张一麐等看了，异常高兴，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蒋、何、白原估计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与周恩来商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

（六）英美方面，除少数（如美大使及其海军武官及秘书三人均听何的话，说新四军抗日不是真的）及有些反动记者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局部问题，同英美无关外，大多数外人认为此事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与英美利益，他们发表文电，要求英美当局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不使事变扩大，某美记者在香港发出之消息谓：新四军并非违抗命令，在重庆与各要人谈话，深感中国形势之严重，希英美注意，中共军队全部开河北之后，国民党军队定会与日军划缓冲区，如此日军易于南进，望英美注意。重庆某外人称，外人连教会老太婆在内都愤慨说，无论理由如何，新四军是抗战的。香港英文《南华日报》社论指出：

甲、新四军之撤退区域闻已被汪精卫军队所占领。

乙、中共的力量已经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抗战力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丙、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观察，中共对于中国的基本要求与希望及其远见，要比保有封建的民族领袖强得多。

丁、国民党还是要整顿自己内部的纪律才行。

英大使曾见蒋劝告停止国内冲突，闻英美方面对国民党表示说，共党虽反对资本主义，但中国为了大局，中央（国民党）处理问题，勿操之过急，以免迫成事变。美国居利来华，闻与考查新四

军问题有关，美借款事及中印通航事闻均因新四军事件发生障碍。德国通讯社通讯说：新四军是抗日最好部队，当他们遵令移动时为大军袭击，恐与英美有关，目前中国内部矛盾尖锐，前途恐有蒋汪合作，他估计美德如战，日本必退盟，届时日美联合牺牲中国。韩国人闻叶挺被俘甚不平，说中国一内战，韩国人解放希望就完了。

（七）日寇方面，表示兴高采烈。南京开庆祝大会，汪精卫演说，谓蒋介石近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很不错。日本乘着重庆方面集中力量反共，特别是一月十七日命令发表后，十八日便开始调动七个师团，二十四日便大举向河南进攻，现国军仓促应战，许多将领感觉到上了亲日派何应钦的大当。

（八）综合各方面情况，截至今日，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1年2月7日）

兹颁布八路军新四军之军政委员会的条例望各级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军政委员会条例

（一）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

（二）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

（三）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主任、参谋长等重要负责人组成之。人数不超过五人至七人，由每级提出名单，经上级决定之。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的由政委担任。

（四）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但军政委员会并非执行机关，其决定应交各部门执行之。例如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应交司令部执行，关于

政治工作的决定，应交政治部执行等。军政委员会，只应讨论比较重大问题，把一切琐碎细小问题提交军政委员会，是错误的。

（五）军政委员会，应批准干部之升任与调动，但关于党员的处分与入党批准等等事宜，仍由党务委员会决定。

（六）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下达，而应根据决定之性质，分别由司令机关、政治机关用命令下达之。下级对上级报告，也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由各部门分别的向上级报告。

（七）军政委员会在讨论问题时，如遇争论不能解决，应呈报上级决定之。关于紧急问题，司令员与政委仍有独断专行之权，但应将各种不同意见报告上级。

（八）各级军政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至多两次，不得无故不召集开会。

（九）应向干部解说军政委员会之设立，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以收集体领导团结干部之效能。但军队仍是集中的组织，上级司令员、政委及各部之命令，下级应绝对执行，下级军政委员会无权讨论拒绝命令之执行，即同级各部门亦应执行首长之命令，因为一切均应经过军政委员会的虚伪的民主情绪是错误的、应当防止与纠正。军政委员会之设立，并不削弱个人负责制。

（十）本条例解说及修改之权，属于中央军委。

（十一）本条例经中央书记处批准。

前定会议决定缓开[1]

（1941年2月10日）

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死难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后数日内开会，兹决定缓开，待时局明朗后再通知开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的主要内容。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大会停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2月11日）

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中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发动舆论逼使八路军、新四军退到老黄河以北，现在积极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军有三师两旅，看来反共高潮仍未降低。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1]

（1941年2月12日）

此次敌寇发动华中攻势，其行动如山洪暴发，忽涨忽退，蒋此次反共计划一般地已被捣乱。目前整个形势在变化中。华中军事除李仙洲及王仲廉指挥之新二军仍继续执行原来反共任务外，汤军[2]主力正在进行休整。你们目前任务是求得巩固现地区，与李仙洲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汤军，指汤恩伯部。

致刘少奇电[1]

（1941年2月12日）

望令克诚部向西推进，求得与雪枫区域联成一片，以巩固华中阵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电[1]

（1941年2月13日）

李仙洲部两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主力先应向北退却，然后相机反击消灭之，一切靠自己解决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1941年2月14日）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敌必向蒋[1]进攻，某君[2]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不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

---

[1] 蒋，指蒋介石。

[2] 某君，指崔可夫（1900—1982），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1]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2]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

[1] 指汤恩伯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

[2] 皓电，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1940年10月19日（皓）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这个电报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11月9日（佳）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齐电，是何应钦、白崇禧12月8日（齐）对朱、彭、叶、项佳电的复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十四）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14日）

（一）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二）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2]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2月10日在重庆玉皇观同参政员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谈对国民党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中共七参政员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出席；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也提出“十二条”进行讨论。

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1941年2月15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钧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

（一）制止挑衅；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

（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

（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十）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函达，敬希鉴察。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伯渠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1]

（1941年2月17日）

彭、左，刘、邓，贺、关，聂、彭，吕、程，朱瑞，陈、罗，陈、胡：

（一）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

（二）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三）八路军尤应利用蒋差别对待政策（新四问题不牵涉八路），除中下级可以声援新四外，总部应取沉默态度（此种态度一方表示留余地，一方亦是示威），军事上则取防御姿态。

（四）新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不使日蒋矛盾缩小，相反应使之扩大，故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

（五）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给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illegible]平、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陈瑞、陈光、罗荣[illegible]、陈毅、刘少奇的电报。

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最有利条件，因此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六）因此在目前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才是适合上述要求的。战略的军事攻势只在必要条件成熟时才是正确的。所谓必要条件，第一是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并且投降时（他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第二是国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只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我们才有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陷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地位。这种主动权我们必须拿在自己的手中。

（七）请你们根据上述方针部署军事，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

毛　朱　王　叶
十七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2月17日）

卫立煌是可与合作人物，对他的政策应十分谨慎，应向着争取他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方向去做。日蒋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入进攻可能。蒋介石强迫我华中部队集中华北的政策，日本认为是对它不利的（破坏它华北的根本利益），这亦是日蒋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很可利用。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这一估计已经证实，故华中我军应加紧对付他的小进攻（如李仙洲、莫德宏、陈大庆[2]之类），但不怕他的大进攻。目前蒋、桂、何都陷于僵局，我再忍耐一下，时局于我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致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电[1]

（1941年2月18日）

顽军虽有重新进攻华中我军之可能，然经日军“扫荡”后整训须时，故雪枫部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得已时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可由黄克诚酌派一部分部队进至原雪枫地区。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电
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罗瑞卿电[1]

（1941年2月20日）

前总在二月九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当的。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在统一战线教育以外另有所谓与统一战线教育相对立的阶级教育，在现时应该强调起来，而不知道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即是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对现时还在抗日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以外，并无所谓另外单独的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地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而二月九日训令势必助长“左”倾危险的发展。二月九日训令包含着脱离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各项基本原则的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致彭德怀、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向，我们明白这是由于皖南事变的刺激而发生的。须知皖南事变也罢，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与全面破裂也罢，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化的。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觉得在皖南事变后，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已经不适用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

（1941年2月20日）

（一）关于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是否已经办了，如已办了，请将文件告知，以便公开发表。

（二）关于委任新四军七个师长的命令，收到后请在重庆散布。

（三）拟用剑英名义复张冲一电，是否有此必要。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1日）

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2]，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

---

[1] 这是毛泽东和任弼时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未能如期在5月1日举行。

请张冲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意见[1]

（1941年2月22日）

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命令是国民党方面表示开始破裂国共合作的行动。

本党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而此种破裂危机如不挽救，则民族危亡之大祸将随之而至。截至本日为止，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之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加无已[2]。

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

---

[1] 1941年2月22日，毛泽东将其起草的叶剑英23日致张冲电，发给周恩来转交张冲。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

[2] 关于政治压迫，例如：对《新华日报》之种种压迫，对八路军办事处之种种压迫，各地继续不断地逮捕与暗杀共产党员，各地报纸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各地强迫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关于军事进攻，例如：庞炳勋向冀南进攻，李仙洲向淮北进攻，李品仙向皖东进攻，陈大庆向鄂中进攻，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3日）

同意你的根本立场，但不拒绝谈判。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须广泛发布。应告张冲如下各点：自一月二十五日将十二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即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这个电报在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2月23日）

目前时局仍无大变，周恩来已将十二条要求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国民党非常着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非常强硬。到蒋发表谈话[2]后，缩小范围，逐渐软下来，因为他们怕中间派同情我们，又怕军人动摇，胡宗南、陈诚[3]、卫立煌等都表示不愿马上内战，更怕国际压力。所以在周将公函交王世杰时，王要求收回缓发两天。宋美龄说蒋吃软不吃硬，实际上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我党目前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敷衍，另一种是采用政治攻势，像我起草的复周恩来电和叶剑英复张冲电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电的说明的主要内容。

[2] 指蒋介石1月27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的讲话。

[3]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

（1941年2月23日）

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留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藉供党内同志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4日）

（一）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2]，二十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二）李仙洲向新四军进攻，陷涡阳、蒙城，彭雪枫部化整为零仍在涡河、新黄河间坚持游击战争。（三）七参政员公函明日可发表，并电香港。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于1941年2月13日公投敌，新四军第一师于2月18日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的战役。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1年2月25日）

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压力，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为《中国文艺》题名

（1941年2月25日）

中国文艺

关于蒋介石反共情况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2月26日）

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及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苏北方面韩德勤完了，王懋功、冷欣等决不能去，我打李长江后有发展。皖西方面，我挺进团已到桐城、潜山。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淮北方面，李仙洲亦绝不能深入。皖南方面，我正派曾希圣过江收容，再在芜湖一带创立根据地，项英一部在浙境孝丰活动。三四月间德必攻英，英必被打得七零八落，那时蒋必大慌。故国内外形势日益于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6日）

有电[2]悉。（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2月25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当日与张冲谈判情况。电报说："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张冲提出具体办法三条请他电告中共中央：（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发生新事件。张冲的唯一要求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并望明早答他。

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1]

（1941年2月27日）

现在国民党与英美方面都怕国共分裂，蒋介石企图拉拢我党及各小党派参加参政会。我们的对策是蒋如果不答应我们提出的十二条，我们就不出席参政会。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8日）

（一）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二）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三）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四）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五）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

（1941年2月28日）

兹委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所属各师之军政负责人如下：

1. 粟裕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

2. 张云逸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

3. 黄克诚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

4. 彭雪枫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

5. 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

6. 谭震林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

7. 张鼎丞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

（1941年2月）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食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它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为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几位青年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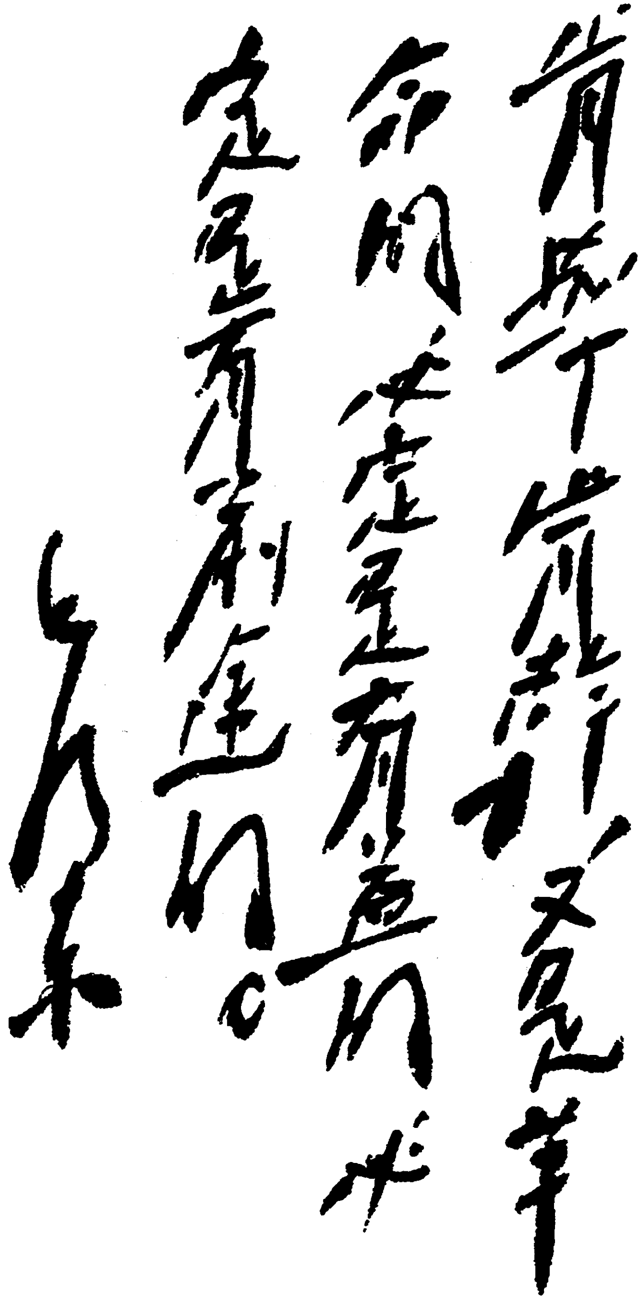
（1941年2月）

肯学肯干，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于1941年春节为前来拜年的王仲方等几位青年所写的题词。



青年干部能干，又要革命的，这就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王仲方等几位青年的题词。

给周恩来、董必武[1]的信

（1941年3月1日）

周、董：

自三月一日起，请代订下列日报各一份：《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及云南各种报纸。并请即向重庆中四路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代购下列书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〇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

以上书刊请妥托该所直寄。又前托购商务版《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亦请挂号邮寄。

毛泽东

三月一日

---

[1]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在重庆协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1]

（1941年3月1日）

（一）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二）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三）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四）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3月2日）

（一）三月一日指示谅已送达。

（二）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问题，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三）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1. 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2. 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3. 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十七日命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4. 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5. 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四）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五）目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许多小党派已经转到蒋介石方面，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之空气，但这是一时的，过一会即将起变化，故小党派的话不可听信，他们的话是使我们上当的。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3月4日）

（一）（略）

（二）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

（三）蒋演词强调日本南进对中国的严重性，大概中英要订作战协定了，国民党牵入英国圈子后，投降越困难，剿共也越困难，故对我有利。

（四）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只待欧战大打，国民党气焰就会降低。

（五）宜川增兵尚无所闻，但有可能的。华中则绝无办法，九十二军侯、马两师占涡阳、蒙城后，敌隔河炮轰，侯、马又走，我彭部三四四旅仍在涡河、新黄河间，请告刘兄。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3月4日）

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及耗费太多之经费，因此应该以准备兵力与现款二事为宜，其他如船只、粮食、草料等项不特别增加经费，凡须特增经费者，须从缓办。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彭真、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3月4日）

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

[1] 这是毛泽东致廖承志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3月5日）

一

过去我们的“佳电”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抓住我们怕破裂，更加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时，蒋表示着慌。我们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因此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的十二条办法。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这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党此次坚定的立场是对的，给了国民党以坚决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我党外交政策并不反对英、美援华，但反对参加英美集团。我们不反对参加中缅联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赞成中缅联防，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二

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六百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理由

（1941年3月8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先生公鉴：

鱼电诵悉，诸先生关怀团结，感佩同深。四年以来，中共同人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惟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一·一七命令之后，敌伪抚掌，国人愤激，友邦惊疑，莫不谓国共破裂之将至。中共中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迁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耿耿此心，曾有删电致参政会秘书处，略述梗概，当蒙洞察。嗣后

参政员同人中颇多从中奔走以图转圜者，泽东等感此拳拳之意，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同时，即以此意通知参政会秘书处，亦未蒙政府置答。泽东等所提善后办法与临时办法诸条件，乃向聘请泽东等为参政员之政府当局提出请求解决，以为泽东等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之标准，政府固有予以解决与否之自由，泽东等亦有出席与否之自由。泽东等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如能在此次会期内由于诸先生之努力促成，与政府诸公之当机立断，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为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泽东等目前所处环境与诸先生不能尽同者，其故即在此。谨布区区，尚希谅察。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齐

抗议美国大理院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

（1941 年 3 月 10 日）

致白劳德：

美国大理院之决定，显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对国内之残暴。我们与美国与世界的无产阶级及进步人士抗议这个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我们确信共产党与美国人民将团结在“释放白劳德”的口号的周围，为和平与民主而斗争。在我们为抗战胜利、团结、进步的斗争中，我们将加强我们与美国共产党与人民的战斗团结。

毛泽东

致福斯特贺电[1]

（1941年3月10日）

致福斯特：

值你六十寿辰向你致贺。你对美国共产党及劳工运动的领导使美国无产阶级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当战争与华尔街的反动计划残暴的破坏着和平的生活，并猛烈地打击着美国人民的公民利益时，工人阶级与所有进步人士将更加团结在你所领导的美国共产党的周围，进行着为和平与民主的胜利斗争。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给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六十寿辰的贺电。

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3月12日）

（一）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

（二）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续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

（三）六日蒋演说，似有去年四月程潜在西安报纸上发表谈话宣布我十大罪状相似的用意，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四）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

（五）对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拟不作防御式的答辩，置之不理，而利用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由中央去一电，重申双十二条的必要，给他正面一攻，你以为如何。

（六）小党派中国社党与青年党已暂时变成蒋介石工具，但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黄炎培、张表方等派依然是中间派。

（七）胡宗南对关中进攻已停止，我反扩大了一个区的地盘，边区四周已平静，皖东桂军被日寇打得七零八落，李先念在鄂东有发展，莫树杰之八十四军忙于应付。陈大庆在鄂中，李仙洲在淮北，亦无能为力，各方面有皆顿之势，再过两个月欧战大打，南洋紧急，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

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1]

（1941年3月12日）

此次参政会，中共不出席，邹韬奋等退出，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报告，说对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一条也不能答应。现在不理他，待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给以政治上的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对重庆参政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1]

（1941 年 3 月 12 日）

各根据地对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不要发表，也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给司徒美堂等的信[1]

（1941年3月14日）

美国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阮本万先生、部长吕超然三先生勋鉴并转全美洲侨胞公鉴：

奉读一月八日来电，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一月十七日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抗战以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

---

[1] 这是毛泽东给美国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信。

团结幸甚，抗战幸甚。

毛泽东
寒

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

（1941年3月15日）

恩来：

（一）同意你的意见。由你处写一回答六号演讲的东西，中央对八中全会不再发表文件。

（二）延安《新中华报》已有一篇社论泛评参政会及当局反动政策，未提蒋演说。

（三）你处发表文件，似亦以泛论为宜（如申明十二条的必要性等），不提蒋演说，不作防御式的答辩。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3月15日）

删未电[2]悉。（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3月15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他14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

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共关系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3月17日）

（一）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

（二）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

（三）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则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四）（略）。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

（1941年3月18日）

（一）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2]，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之间，CC系和复兴系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大弹“政令”“军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等等。同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辩护，对共产党参政员因抗议皖南事变拒不出席参政会一事，大肆攻击。

（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1]，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

---

[1] 第一个“十二条”，即本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谈话》部分中提出的十二条，在1941年2月15日又用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名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第二个“十二条”，是1941年3月2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支；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的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1]，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

[1] 参见《论政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3月19日）

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2]，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上。会议决定合并刊物后，暂时只出版《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四种刊物。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版发行工作时讲话的一部分。

[2] 中共中央3月26日发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四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在停刊期内，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其他有关刊物上。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1年3月19日）

蒋介石组织党派委员会有何用意？蒋是否同意党派委员会只能是商谈接洽机关，不是决定机关，一切有关某一党派的问题非经该党派同意不生效力？蒋是否想借此站在各党派之上，以便统驭全国？以上各点请立复。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20日，周恩来、董必武复电毛泽东，为了对付蒋介石拉拢各党派而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党派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各党派必须平等。

关于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3月21日）

（一）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

（二）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3月26日）

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增强党性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1941年3月、4月）

序

（1941年3月17日）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1]，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

[1] 1940年7月7日的中央指示，是指当时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12月25日的中央指示。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直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

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毛澤東著
農村調查
農村調查
毛澤東著
新華書店印行
農村調查
毛澤東著
農村調查
毛澤東著
農村調查
中原新華書店印行
毛澤東
農村調查
解放社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农村调查》(部分版本)。

跋

（1941年4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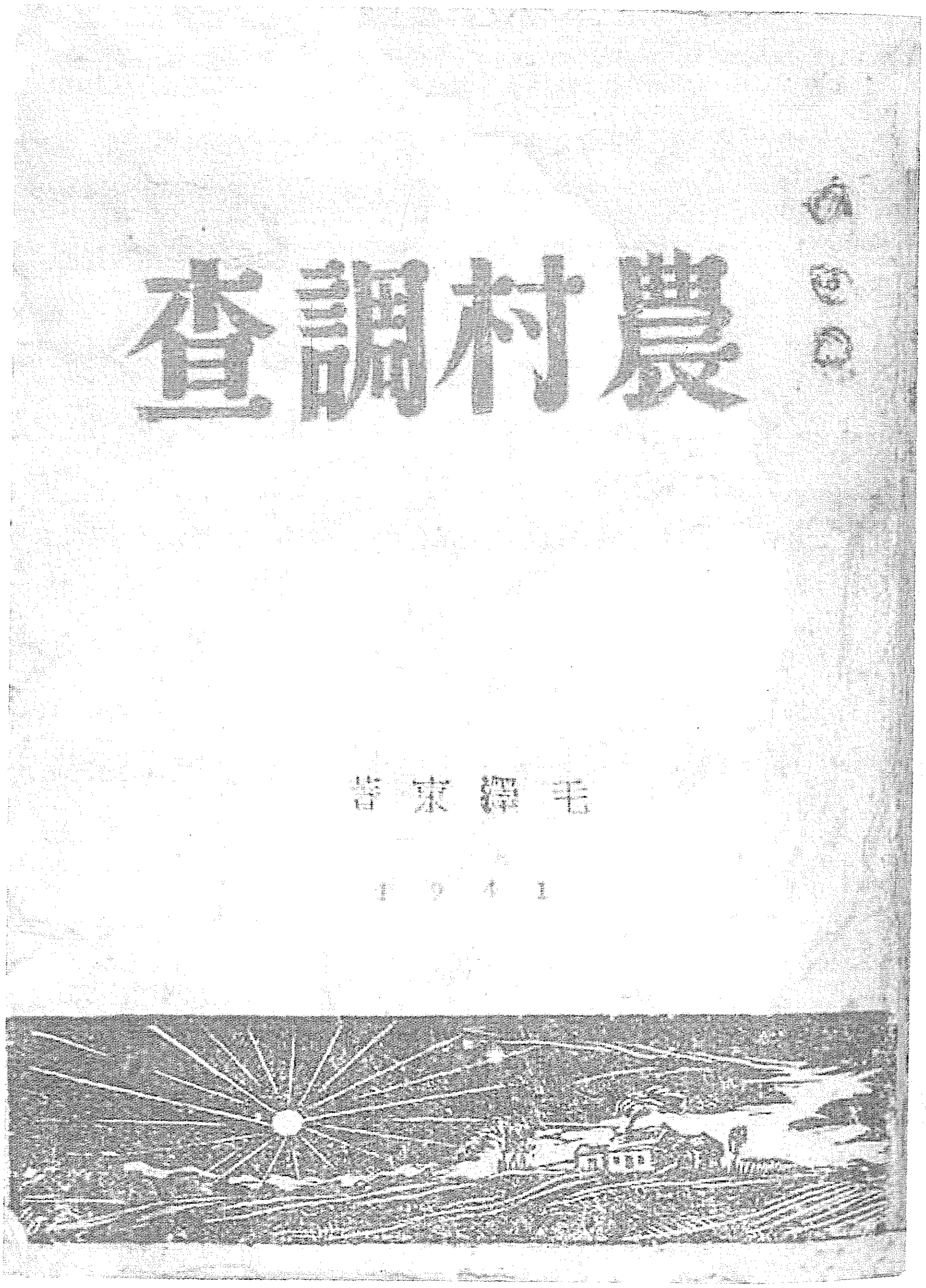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

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1]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

---

[1] 这里所说的十年内战前期，是指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底的时期，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井冈山时期；中期是指1929年年初至1931年秋的时期，即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上文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1931年年底至1934年年底的时期，即自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至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期。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1931年至1934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農村調查

毛澤東著

1941

1941年3月，毛泽东将他1927年至1934年期间所撰写的一部分农村调查材料编辑成《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出版，并写了序言和跋。图为延安出版的最早版本的《农村调查》。

给周恩来、董必武的信

（1941年3月）

周、董：

请嘱人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即由邮挂号寄来，如能运来更好。至于普通小册子及延安出版之书可勿寄来。

毛[1]

---

[1] 原抄件未署时间。

给董必武的信

（1941年3月）

董老：

所购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书籍，请办交涉是否可先运来，左翼书可暂不运，以免被阻。再者请托人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可先付五百元订一年。通讯处：肤施新市场中山商店图书部。

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报纸、杂志，亦望即代订，时间至少一年。

毛[1]

---

[1] 原抄件未署时间。

读西洛克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四版）一书的批注

（1941年3月至9月）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第一章　唯物论与观念论

一　唯物论及观念论的本质及根源

……

中国主观主义

……对于社会现象的同样的观念论的立场，在托罗斯基方面，无论在朴列斯特议和条约缔结时，或在关于劳动组合[1]的讨论时，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他同样的不从客观的现实的分析出发，而是从预先准备的公式，从操切从事的意志出发。……同样的事情，对于托罗斯基反对派也可以说；他们在一九二三年，提出了牺牲农

---

[1] 劳动组合，这里指工会。

民，即不但牺牲豪农并且牺牲中农，而立刻把国内工业化的普罗列达里亚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托罗斯基也不考虑客观的条件，而跳过革命的阶段，用观念论者的头脑去思考，并不想到产业复兴的前提是否存在与大众的有无准备等等，而只是受自己意志与希望所支配。[第74页]

二　机械唯物论

……

……他们不理解，所谓物质界反映于意识的事实，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被给与于人类的；而是在斗争之中，在人类的实践中，在社会对于自然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在阶级斗争中，被人类获得的东西。人类的能动性，在社会的实践之历史过程上，使其意识发展，这种思想，是法国唯物论者所不了解的。[第86页]

注意

……法国唯物论者们，因其哲学之形而上学的性质，在社会观上，终于变成了他们自身所抗战的的观念论的俘虏。因为所谓统治者的意识能够变更社会制度的“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是观念论的。机械唯物论之不彻底的事实，以及说明社会过程时不可避免的陷入于观念论的事实，已被法国唯物论者们本身的经验所证明了。[第88页]

注意

三　现代机械唯物论

……

未可同日而语（比较）

……机械唯物论把俄国革命的现实一切现象，终止于与布尔乔亚革命已经历过的阶段相提并论（比较）。在布尔乔亚革命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到了某一定的瞬间，已在封建制度的胎内成长；所以就布尔乔亚说，获得政权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革命完成了的瞬间。但在普罗列达里亚革命一方面、社会主义关系存在权力获得之后才开始生长，所以权力的获得是转换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通过这种转换期，在与其他社会经济形式相斗争之中，变成强固。[第89～90页]

所谓特点

即特有的矛盾

……依辩证唯物论的见地去说明某种现象，不是把那个现象还元于力学的运动，而是要暴露那个现象中特殊的规律性，即把具体现象中所固有的并制约其发展的内部矛盾，明现出来。不论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社会现象，及其他任何现象，都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都具有特殊的运动形态。……在一定现象中规定其运动的规律性的，不是力学的运动形态，乃是这一定现象中所特有的运动形态。机械论者所以想把一切都还元于力学，是因为他们把力学看做辩证法。[第91～92页]

新属性

……意识是在物质的某个发展阶段上，在一

定条件下发生的物质的新属性；而在此以前，意识是不存在。……[第97页]

盲目科学

然而，没有哲学的自然科学是盲目的，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哲学就不能前进，这一层，恩格斯早已指摘出来了。[第98页]

四　主观的观念论

……

反映论

……如果说客观的实在没有被给与着，你与马赫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主观论及不可知论，如果说客观的实在是被给与着，那末，为这个客观的实在的哲学概念就有必要，而且这个概念在古昔就已作成了。这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是表示在感觉上被给与于人类的，离我们感觉独立存在而又为我们感觉所复写所摄影所映像的那个客观的实在之哲学的范畴。……[第109页]

左派

……波格达诺夫之反动的观念论哲学，使得他在理解阶级斗争的战术时，犯了许多错误；那些错误终于使得他被排除于党外了。他在反动时代曾经与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组织一个团体，那个团体为了要求撤回第三次国会[1]的议员，被称

---

[1] 第三次国会，指沙皇政府在1907年11月召开的第三次国家杜马（杜马即议会、国会，俄文的音译）。

为“撤回派”[1]；又因为他们所发行的论文集的书名，得到了“前进派”[2]的名称。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把与革命时代相同的战术，应用于反动时代，以为在合法的劳动团体中活动，就是背叛革命。……诚然，客观的条件变了，革命失败了，党被破坏了；至于客观的现实，波格达诺夫却以为只是“组织了的经验”。“左翼的”言辞、机械的思维，观念论——这是撤回派战术基础的原理。[第118页]

注意

五　康德及马克思主义之新康德主义的修正

……

……我们的认识形式，在经验以前存在，或如康德所说，它是先验的；我们的知识就依存于它的活动，它的动作。照这样，我们的知识可以说是感觉与构成感觉的认识形式的结合。……[第122～123页]

二元论

---

[1] “撤回派”亦称“召回派”，1908年在俄国工人运动中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召回派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在工会及其他劳动者的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190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召回派清除出党。

[2] “前进派”，亦称“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去的一个机会主义集团。它是在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于1909年在国外成立的，因曾出版《前进》文集而得名。它实行的政策倾向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实际上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取消派。

……

不是将二者联结，而是并非二个东西，只是一个东西。

他们不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相联结，而独立的去研究，因此，他们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关系如何的问题，在形而上学的精神上解决了。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中有些人落入于照应论，有些人甚至于到达了含有不可知论的要素的结论。[第128页]

第四章　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谷

一　本质与现象

……

注意

这些理论的缺点，就在于从社会诸关系的其余的体系，尤其是从经济诸关系的体系，分离出政治的上部构造。然而还不止此。这些理论的又一缺点，就是把全体社会中的仅仅一方面之政治的及法律的诸关系，拿来与社会诸关系的全体系同一看待，与社会的自身同一看待。社会与国家的混同，在长期间内，障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因为把这两者同一看待的结果，在长久的期间内，不能发见两者的矛盾。[第352页]

注意

照上述那样，科学的认识，在其发展上，从外的关联推进到内的关联。它不断的越发突入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深处，并在其中取出本质的诸

矛盾、本质的诸关系。本质的的诸关系的这种分离、其内的诸关系的这种分析，同时决定了具体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发现了这过程的规律性。

科学的认识，正确来说，其起点是在于从诸现象的无数相互作用中，探求出我们所称为本质、本质的矛盾之相对安定的基础。

注意：本质与现象的矛盾

但是，我们的认识，如以在外的诸关系中发现其内的根据为自己的任务时，就遇着若干的矛盾。我们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本质在其直接的形态上，并不出现于现象的表面。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在使用价值中，显现为交换关系；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诸关系，显现于商品的诸关系之中。工钱，在现象的表面上，不显现为劳动力的价格，而显观为劳动的价格；阶级，不显现为生产手段的所有者，而显现为收益源泉的占有者。所以单只认识在孤立状态中被观察了的个个事实的那种现象，还不能在存在的转变之流的背后，去发现自然及社会的发展之推进的发条。在另一方面，想要发现根据时，如果轻视现象，本质就转化为不能反映客观现实的诸法则之运动的单纯抽象。

主观唯心论的经验论

……经验论把现实的一切归结于现象，把认识过程归结于现象的知觉。因此，休谟与巴克列，从现象与本质的关联分离出现象而加以观

察，把现象只归着于现实的假象。他们把现实与主观知觉的总体，同一看待，因此从假象本身夺去了客观的实存性。……

机械唯物论的唯理论

唯理论，由于从现象分离[1]本质，把本质转化为不变的、不动的东西。本质被解释为最单纯的关系，为最单纯的不变的根据。所以全部物理的世界，没有发生，也没有消灭，它被还原为只变化位置的、无色、无特性的分子之世界。在法律学方面，科学从唯理论的原理出发，在不变的现实的法之后，去探求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所谓“不变的自然法”。在经济学方面，亚丹斯密探求了适用于一切买卖场合的不变的价值尺度；李嘉图探求了资本主义之不变的法则。在一切科学上，唯理论从现象分离本质，把本质转化为不变的根据，其结果，不能发现其研究对象的具体过程之矛盾。法、国家、宗教及资本主义等的永久性，也和原子的永久性同样，都是从抽象的不变的本质引出来的。[第354～356页]

形而上学者，分离本质与现象，使两者互相对立，其结果必然是只能认识现实的一方面。形而上学者，或者无视现实的多样性，提供着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的无内容的法则；要不然，便是拘泥于现象，不暴露它的本质，而崇奉

---

[1] 毛泽东在“分离”二字后补加一个“出”字。

本质变化其形态

这些现象为过程全体的发展法则。这两种倾向，在分析近代资本主义时，都表露了自己的错误，即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的变形，不理解资本主义向着次一阶段的推移，无视资本主义的旧阶段与新阶段的关联，离开与全过程的推进的根据的关联，一面的强调新的现象。……[第357～358页]

……随着推进到改造期，机会主义最危险的形态，是否定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可能性的左翼偏向。党只有打破这种偏向，才能够保证苏联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反之，在改造期本身与进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的完成期，机会主义最危险的现象形态，是否定党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转化于现实的手段及方法的右翼偏向。左翼偏向，在这个时代，已不是主要的危险。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正在完成的时机，那种怀疑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的议论，完全是笑话。……[第361页]

苏联仍有主要危险

“本质现象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伊里奇在注释黑格尔的质论时这样写着。在一切现象中，没有同一的抽象的本质。本质随其现象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因而现象本来是靠自己表现本质的。本质在单独的现象中，并不完全的表现出来。因而现象比较它当中所表现的本质，更为丰富而完全。[第362页]

注意

……在现象分析上暴露本质，暴露过程之

注意

推进的根据，即本质的矛盾，不单要在现象中指示这本质的表现，并且要在假象中指示它。[第364页]

二　本质的发展，经验论及图式主义之批判

……

……他说："……机会主义的要点，是阶级妥协的思想。战争把这种思想推进到极处。不单如此，并且把许多异常的要素与动因，结合于通常的要素与动因，使得因特殊的威胁与强制而分裂了庸俗的大众，至于与布尔乔亚相合作"[1]。照这样，新的倾向，在其根底上，具有机会主义，它只是机会主义的单纯的一个变种，伊里奇在许多现象中，对我们指示了本质的发展，这[2]种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抽象的本质，是相反对的。……[第366页]

三月参政会[3]

如果把个个的现象，提高为一般的发展法

---

[1] 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8～649页)

[2] 毛泽东将"这"改为"与那"。

[3] 三月参政会，指1941年3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这年1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受到国内外进步舆论的谴责。为摆脱政治孤立的局面，国民党召开了这次会议。会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

张国焘

则，客观的现实就被曲解。把自然发生的经济的罢工，提高为阶级斗争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经济主义者，不曾理解阶级斗争的本质。……[第372页]

……普列哈诺夫，并不曾研究自己的所列举的新事实的根底中究竟横有什么本质的矛盾，他把这个正确的命题变为诡辩的工具了。这样，普列哈诺夫，在一定的事情之下，并没有把可以拥护祖国那件事，联系于普罗列达里亚革命与革命的过程。一方面当作图式主义者行动了的普列哈诺夫，同时又暴露了他自己是狭隘的经验论者。他离开帝国主义时代全体的本质矛盾的分析，去观察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事实。

注意

公式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摘了那种从布尔乔亚企业家的狭隘的实际主义发生出来的经验的思惟方法。……实际主义，对于布尔乔亚科学的各种根本倾向，也变成了特征的东西。否定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过程的本质，逃避到狭隘的经验的世界的所谓俗流的经验论，具有过阶级的意义，在现在也是有的。……[第375～376页]

实际主义

……布尔乔亚科学中的法则，表现为不变的本质；科学那东西，转化为过程之抽象的图式的描写。超越时间空间而都妥适的那种超历史的法则，曾被马克思讥评过，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伊里奇在其革命活动的第一期，就已经嘲笑了人民

注意

主义[1]的社会学的无用和无生命。伊里奇反对波格达诺夫和马赫主义者，攻击他们的图式主义，攻击他们的错乱的设立法则，指摘了他们很容易的造作那种失掉一切具体内容的“普遍法则”。[第377页]

在另一方面，伊里奇怎样批判了布哈林的许多理论的著作，这是我们很知道的事情。他对于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指摘了布哈林在其著作中提起了把狭隘的经验论（不必要的细目之搜集）与图式主义（在各个现象上贴上纸条）并列的布尔乔亚社会学者斯宾塞式的社会学“一般”。布哈林混同了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布尔乔亚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注意

党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势之下，以克服困难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新的事实之前，并不茫然自失。党发现这些困难与各种事实总体的关联，藉以发现它的发展倾向，把其他的发展倾向与它对置。简单的说，党能够发现现象的法则，因而又探出本质的发展中的新动因，指示经过矛盾的阶段的本质的发展。伊里奇能够用他固有的天才在那个“无廉耻”的布列斯特媾和的背后，追踪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发展倾向，它的必然的胜利；在对中农让步的背后，追踪其共同化——农

注意

---

[1]　人民主义，旧的译法。现译民粹主义。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

抗战初期

业的集体化——；在俄国的贫困与技术的落后性的背后，追踪苏联转化为先进国的现实的可能性。……党裁判了他们的错误是：对于没有看见过的新事实的出现，张皇失措，不能发现这些现象的根据，本质、及其发展法则；无原则的拘泥于任意的现象；对于阶级的敌人让步，甚至不惜弄坏其他更重要的阶级斗争战线上的立场，急于尽可能的早早脱出穷境。

主观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注意

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

上面所说的两个偏向，都暴露了对于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没有理解。他们不能在现象之中看出本质的发展，所以转到了本体之抽象的同一性或现象之抽象的区别的立场。规律性之形而上学的理解的这两个变种的根底中，横亘着同一的机械论的方法论。布哈林与这种场合中的托罗斯基都包括在内的机械论者们，不能理解苏联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诸过程的特殊性。诸过程的本质，在他们看来，常常表现为不变的东西。[第378～381页]

注意

……某种过程之本质的矛盾之发展。同时使科学的认识能够发现许多矛盾的现象中的这过程的运动，从比较不深刻的本质透入于更深刻的本质，“譬如说，从第一次的本质到第二次的本质那种无限的”[1]（伊里奇）推移。[第384页]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三　形式与内容

……

分类要依客观存在的固有顺序。

注意

△

恩格斯说到科学分类的原则，力说着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中形式的妥当性。“科学的分类，就是说各种科学分析各个的运动形式或互相关联互相推移的一列的运动形式，它把这些运动形式，依照其固有的顺序，加以分类，加以配列。在这里，就存有分类的意义”[1]。（自然辩证法）。……社会的运动，在种种形态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过程上，在分配、交换、资本的运动、社会的阶级的运动、诸政党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文学运动、宗教运动上，显现出来。这一切，是当作全体看的社会之具体的运动形态。各种运动形态，各有其内容的连结的特殊类型，即各有其特殊的形式，这是当然的。……[第390～391页]

四　过程的形式与内容之发展

……

……伊里奇说：“右翼空论主义，其立脚点只承认旧形式，并不注意于新内容，所以它完全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3页）

破产了”。我们把这一点应用于俄国的右翼，就可以说：他们不注意于新经济政策的改造期的新内容之成长，即不注意于保证社会主义要素对于资本主义要素的胜利、并引起了自己的新发展形式的新内容之成长。……总之，他们忽视了新经济政策是保证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胜利的形式。

三三制[1]

新土地政策

伊里奇又说：“左翼空论主义，其立脚点是无条件的否认一定的旧形式，不理解新内容通过一切形式而实现自己。他们不知道学习共产主义者的我们的任务要支配一切的形式；不知道学习很迅速的用别种形式补足这种形式，用别种形式代替这种形式，使我们的战术适合于一切的转变——由我们的阶级及我们的努力的以外的东西唤起的转变”[2]。……他们在新经济政策中，只看到那资本主义的形式。但是他们不理解新内容是怎样通过这些形式而发展的，不能够利用旧形式去发展新内容，跳过了旧形式所能被利用的许多发展阶段。[第412～413页]

---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于1940年开始实行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故谓三三制。

[2]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第五章　可能性及现实性、偶然性及必然性

一　诸现象的相互作用，原因和结果

从联系入手

我们在实践的活动上，认识环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认识包含着一般互相联结的诸要素。我们的认识，首先是抓住诸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恩格斯说："相互作用——这是我们所观察的初的东西"[1]。例如，我们在某种企业之中，发见其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在技术的装置和劳动组织之间，在劳动大众和技术职员之间，在职业组织和管理部之间，在管理部和党委员会之间，发现其相互作用。我们又承认企业和其外围之间的相互作用。企业的生活依存于资金的准备、原料的供给等等；企业本身又供给生产物于一般人。在我们所住居的都市中，可以看见种种社会团体、种种职业之间的种种相互作用。又，我们在都市和其周围农村之间，看见相互作用。总之，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内的一切现象之间，我们承认其相互作用。[第424页]

前线和后方，上级和下级。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4页)

科学反对所谓合目的性的见地，对自然及社会的一切过程，都由因果性的原则去说明。达尔文说明了，动植物的构造单只看起来像是合目的的，他指示了现在存在的动植物的种类，乃是不适于生存的亘几万年淘汰下来的结果。科学并且阐明了：人类行为之合目的性也可由因果性去说明。即，人类的目的，是作为其社会的活动之结果而生起的。例如，普罗列达里亚所树立推翻阶级社会的目的，是被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榨取——的解决之必然性所唤起的。[第429～430页]

不能胡乱定目的

二　根据和条件

……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和黑格尔不同，他们不是在“概念”之中，而在对象之本质的矛盾之中，发见了根据。例如，依马克思看来，在阶级斗争之中出现的、生产诸力和生产诸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当作全体的运动之社会的一切形态的发展的根据。这个根据、基础的运动，决定道德、法律、科学、艺术及其他的上层建筑。……[第434～435页]

本质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据。

发展的源泉是根据。可是，根据在辩证法上，和条件结合着。所以当观察发展之时，不能

蔑视条件，特别是不能蔑视本质的条件之意义。然而，人们往往把它忘却了。例如，在一九〇五年揭出“沙皇废止，建立劳动政府”口号的托罗斯基，就蔑视了俄国劳动运动在其中发展着的本质条件。托罗斯基蔑视了几千万俄国农民的作用及意义。同样，在一九二六年，托罗斯基和季诺维夫[1]相提携，提倡过度工业化理论——这种理论的目标，在于依着增大农民的课税，使工业发达并提高输出工业品的价格——，这时，他仍然蔑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农民之作用及意义。对于本质的条件之蔑视，也是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之特征。德波林及其他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只说及发展之内的根据；但是他们和托罗斯基完全一样，非常错误地理解了这个根据、即本质的矛盾。这种情形，我们在检讨对立之统一的法则时，已经看出了。……[第437～438页]

国共、地理、资源、外助。

……我们知道根据在现实中造出新条件。但是，根据不单是造出新条件，而且克服旧条件。俄国的农民不是俄国的社会变革之本质的条件。但是，资本主义诸关系的发达，最初促成了普罗列达里亚在俄国劳动运动中的领导；其后，促成了立脚于劳动者及农民的同盟之上的普罗列达里

克服

---

[1] 原文为“季维诺夫”，毛泽东将其改为“季诺维夫”。

亚革命之实现。苏联中的农民，曾经是决定社会主义的直接转变之不可能性的本质的条件。但是，通过“新经济政策”，农民被引入社会主义的建设；于是在一九三〇年，苏联就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了。[第439～440页]

三　可能性和现实性

……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布尔乔亚革命向着普罗列达里亚革命之连续的转化，没有实现。可是，马克思的分析，在历史上，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伊里奇体会了这种分析，完成了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伟大的理论。……[第447～448页]

注意

……斯丹林说：“俄国呈现着矛盾的两个集团。矛盾之一个集团，是存在于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之间的内地矛盾。矛盾之另一个集团，是存在于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及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余一切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一个集团的矛盾能够由一国的诸条件所完全克服，第二个集团的矛盾在矛盾在其解决上却有赖于二三其他国家的，普罗列达里亚的努力之必要——把这两个集体的矛盾混同起来的人，是对于伊里奇主义冒犯了最大错误的人。这样的人们是昏乱者，否则是

注意

不可测的机会主义者”[1]。[第451～452页]

由于矛盾，具有积极性。

不单只社会主义，任何历史的现象，都是当作人类之积极活动的结果而到来的。马克思说：人类自己制造其历史[2]。可能性之通过活动而转化为现实性。不单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即自然的发展也是如此。物质具有积极性与自己活动。这自己运动，规定物质所具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一切转化。物质，依着积极性，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其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第455页]

没有具体解决

……恩格斯说：“在物质的本性之中，包含着物质发达而成为思维的存在物之事情。所以，在适当的条件存在时，这种发达常是必然的进行”[3]。这是对于意识发生的问题之唯一正确的答复。自然，这种回答，单只是最初的方法论的回答。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学问，是特殊科学。但是，特殊科学，只有从正确的方法论的规定，即从唯物辩证法所给与的规定出发的场合中，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

[1] 参见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第四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6～343页）

[2]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3]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0～551页）

以上，我们阐明了实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问题。可是，在现实上，还有新的实在的可能性发生的事实。这些新的、实在的可能性，不是如机械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以为从最初起就在物质之中被包含着。新的可能性，乃是在一定的阶段中之一定的条件下，由于物质之具体的发展被造出的。例如，无机物，只有在其发展之一定的阶段上，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作出生命之实在的可能性。进到社会主义时代这件事，造出许多新的实在的可能性，即工业发展之新的未曾有的速度，大众文化发展之新的未曾有的展开，科学及技术发达之新的可能性等等。

卵巢、卵子、胚胎，是否可能性？

注意

……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关于可能性及现实性的问题之深刻的贵重的思想，被德波林学派所蔑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这些思想，在党大会的决议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发展了，被具体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之历史的展开，精当的指示出：在我们哲学发展之过去的阶段上，把唯物辩证法发展了的是谁呢？破产了的哲学的指导呢？抑是党的指导呢？这个历史又指示出：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第456～458页］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四　偶然性与必然性

……

注意

……伊里奇说：“要真实的知道对象，就必须把捉并研究其一切方面、一切的观念与‘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做到这一层的罢，但全面的要求警戒我们避免错误与硬化”[1]。[第470页]

第六章　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二　形式论理学之根本法则

……

……伊里奇批判那些固执同一见解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时，美满的说明了：在概念论的物理学者及形而上学者认定物质消灭的处所，实际上存有辩证唯物论之辉煌的确证；原子对于各个化学原素，当作特殊的实在的固定的构造物存在着，

一方面

同时是“可以分割”，在其内的电气的构造上是复

又一方面

杂的东西。[第490～491页]

---

[1] 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此节好

三　普列哈诺夫的形式论理学之批判

辩证唯物论的反对论者，在对抗当作存在与思维的根本法则看的对立物之统一的法则时，所常常提出来的东西，就是形式论理学的矛盾律。国际修正主义者创始人伯伦斯泰因，和前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动的人民派领袖之一密海洛夫斯基，把辩证法，尤其是把对立物统一的法则，当作死板的非科学的“黑格尔主义”看待，使得他们的全部批判，都站在形式论理学的矛盾律的立场。[第494页]

与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及机机〈械〉论者一模一样

矛盾是运动的性质

“物质的运动横亘在自然的一切现象的根底中。运动明明是矛盾着。关于运动，必须根据如伯伦斯泰因所指摘的‘是——否，否——是’的公式作辩证法的判断……但是一旦物质的一定的一时的结合当作永久运动的结果而发生，直到它当作同样永久运动的结果而消灭，关于它的存在的问题，不能不在肯定的意义上去解释……当各个对象成为问题时，在我们关于它们的判断中，不能不由思维的‘根本法则’所领导。在这个领域中，伯伦斯泰因所喜欢的‘是——是，否——否’的公式支配着”[1]。

---

[1]　参见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版序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2～83页）

……

普列哈诺夫的批判，显然是不圆满的东西。他调停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论理学，并没有把前者“扬弃”于后者。……[第498～500页]

六　当作认识的一个动因看的抽象

……

县志、新花样、本本

若把社会或自然的发展之低级的未发达的阶段上之本质的矛盾，移到高级的阶段，那就会只是缓和矛盾，把新东西解消于旧东西，把现在和未来解消于过去。那样的方法，只对于反动的社会阶级与社会群及其思想家，才是有效的。……[第521页]

七　辩证法唯物论的概念论

……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

在形式论理学说来，对象是其标识的总计。这些标识对于对象是外面的东西，一个标识对别个标识对别个标识独立着。研究对象这件事，就是把对象分解为属于它的种种的标识。规定对象这件事，不外就是举出那根本的标识。……[第523页]

辩证法唯物论的论理学，对于普遍与个别的

相互关系的问题，给与唯一正确的解说。概念是外界在人类思维上的直接反映的构成的形式，是它的结果，这种构成是从不断的具体的实践之下实行的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所以个别的概念与一般的概念，都反映这个世界。这些概念，因为个别与普遍都实在的存在于客观世界，所以是实在的。个别与普遍、特殊与普遍，不像形式论理学所要求的那样，它们不是当作具有自己的存在的独立的对象而在外面互相对立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人类头脑中，只有在其统一上，才能存在并被反映出来。离开个别没有普遍，离开普遍没有个别。

谁是决定的东西？

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

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

伊里奇对于那种在观念论上从社会的死的形式的抽象、引出具体的社会诸现象的规律性的事情，曾经斗争过。他说，“社会是什么，进步是什么，从这样的问题出发，就等于从终点到始点。在你们还没有特别研究一种社会的构成，不能确立这个概念，不能研究真实的事实，不能在客观上分析任何社会诸关系的时候，你们从什么地方取出社会和进步一般的概念呢”[1]。社会是当作一定的社会经济的构造而存在的，它不是与那种构造并立，而是在那种构造之中并且通过那种构造才存在的。在另一方面，个个社会经济构

优势、决战、革命危机成熟、机会主义、进攻，总崩溃、对革命的一致。

---

[1]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造的发达及其相互推移的法则，是社会发展的一般法则之特殊的——就那种构造每一个说的——阶段。并且采取发展了分化了的姿态的社会规律性本身，在社会的发展最高阶段上展开出来。资本主义规律性的研究，是更深刻的理解先行的社会经济构造的一般规律性的关键，其原因就在这里。

一般之辩证法的理解，不是对象之停滞的本质，而表现其本质的推进的矛盾，同时又指示到达个别的道路。机械论者企图证明机械的运动是运动的一般形态之时，他们造出形式的一般的抽象。那样的抽象，不能表现物质运动，例如，不能表现生命、社会的一切具体形态。

还有自然

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的。因为它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上因而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上，论理的反映出对象。

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相反

伊里奇说：“个别，如排除那引导到一般的关联，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个别中，并且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一切个别，在某种方法上是一般。一切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个别的对象。一切个别不完全的进到一般之中，等等。”[1][第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

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

---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与个别联系。	530～532页]
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衷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	斯丹林在新经济政策的规定中，把过渡期的各个阶段中，新经济政策的一切个别的现象中所表现的那种一般的本质的矛盾及指导的方面暴露出来了。
中国主观主义者也带着形式主义性质 与中国何其神似	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之形式主义的性质，在他们的概念论的叙述中，特别显著地表现着。德波林派，一面引用伊里奇的关于辩证法的概念的具体性的言辞，而在其理论的实践上，却往往“完全反对的”行动了。他们在许多的机会，从关于自然与社会的部分科学之发展过程，分离了个个运动形态的部分的规律性之具体的多样性，因而从空虚而无内容的物质一般的抽象概念，由论理的方法引出来[1]——这件事当作他们的纲领揭示了。德波林派向着理性的观念论、黑格尔主义、概念的自己发展——不是发展着的世界在概念中的反映——这种方向倒退。这种倒退的征候，在他们的几个代表者为着认识具体的社会构造而要求从抽象的社会规律性出发那件事当中，也表现出来。[第533～534页]

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

---

[1] 在“来”字和批语“与中国何其神似”的“与”字之间，原有一道斜线相连。

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

中国正是如此

在形式上构成一般的概念，并把普遍与个别对置这一点，右翼与左翼机会主义者，与他们的方法论者——机械论者与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相一致。……[第534页]

中国主观主义者正是这样

德波林派暴露了他们自己不能理解普遍与个别之辩证法的统一，也不能在实际上应用它。他们把普遍当作独立的自己发展的本质，与个别对置了。他们不能在革命运动的各个片断中，看出全体运动的根本矛盾之个别的具体的形态。

我们必须能看出

中国正是如此

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

概念之形式主义的构成及运动的个个形态与阶段之具体的特殊性之蔑视。是反革命的托罗斯基的特征。托罗斯基，把他的“永久革命论”，看作是通用于一切国民的理论，至于那国民所到达的发展阶段及其国内国际的状态之特殊性，是毫不介意的。……

中国的反列宁主义的活动是可惊的。

伊里奇对于外国的党所给予的多数派战术战略上的教训，有系统的这样说着：“共产主义的劳动运动的国际战术之统一性，并不要求排除多样性……只是必要的事情，就是在适用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时，要按照国民的及国民=国家的差异，正确的变化这些原则来使用。各个国家对于统一的国际的任务之解决，对于机会主义与劳动运动中的左翼空论主义之克服，而具体的进行之时，要把国民的特异性，国际的特殊性，实行调查，研究，探求，考察，把捉。……在这里，存有现在的历史的瞬间之主要任务”[1]。[第535～536页]

托罗斯基的“永久革命”是形式的抽象，
中国正是如此
蔑视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民主革命转变为国民的及国际的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革命过程，不考虑这个转变之具体的特殊性、个个一定的国家中革命的特殊过程及其种种方面的关联。

不是客观实在性本身的东西

在托罗斯基一方面，辩证法唯物论，被那种臆造的一般公式之观念论所置换，这些公式，在阶级斗争的具体过程上，是从外部引进来的东西。[第537页]

---

[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

八　判断与推理

……

……

这样的人类的本质之理解，在那些把个个人类的“本性”与社会诸关系相对立的狭隘的布尔乔亚的思维看来，是不能理解的。马克思对于人类的本质的这样理解，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发展中的新阶段——有组织的普罗列达里亚的成熟。普罗列达里亚，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所刺戟[1]，在自己与敌人之间，看出了一定的社会诸关系之担当者及拥护者。

我们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属性问题、军事问题〔认识〕的发展，由于实践的发展。

……

有史以前的人类，他们——或许在十万年以前——发见了摩擦取火的方法之时，在实践上已经知道摩擦生热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以前，早已知道摩擦身体的寒冷的部分借以取暖了。但从那个时代起，到发见摩擦一般是热的源泉这件事为止，不知道经过了几千年。但无论怎样，人类的头脑发达到表明摩擦是热的源泉的判断……的时代到来了。以后更经过数千年，在一八四二年……把这个特殊问题（摩擦生热），与以前所发现的其他类似诸关系，关联起来，实行研究

由实践到理论

---

[1] 刺戟，即刺激。

又由实践到高级的理论

最高级

了，于是形成了“一切机械的运动，得因摩擦之助而变为热”的判断。最后，三年后，迈尔[1]作出了关于一切运动形态的如下的判断。即“任意的运动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直接或间接的能够而且必须转化为任意的运动形态”[2]。[第539～541页]

……

恩格斯说：“思维的法则与自然的法则，在它们正确的被认识之时，就不能不互相一致”[3]。这些法则的认识，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这是由社会的实践所决定、所试验的。[第544页]

主观主义者不知此理

这种道理，主观主义者没有梦想过的。

……“论理的形象，并不是当作自己的他在而具有人类的实践（绝对的观念论）。反之，人类的实践，是几十亿次被反复着，而在人类意识中当着论理的形象被固定的。这些形象因为几十亿次被反复着（只因为这样），具有偏见的永续性、公理的性质”（伊里奇）。所以，永久的思维

---

[1] 迈尔（1814—1878），德国自然科学家，最先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科学家之一。

[2]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7～568页）

[3]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8页）

法则那东西，是不应有的。……[第545—546页]

只有在苏联，只有在今日，唯物辩证法，才越发广泛越发深刻的破坏劳动阶级及劳苦农民的广大群众之形式论理的思维方法。这只是因为俄国几百万劳动群众，接受党的指导，参加着生产关系之革命的、计划的及组织的改造。这只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实践，要求各个参加者理解他所实行的个别的小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之辩证法的关联。……

非常对的。列宁所说小学生用的着的形式论理，也是对旧社会说的。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却用之于政治的指导。

新的实践，在诸现象之间，发现新的关联形式，在大众之中，产生对于一切问题的新态度、新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正被几百万社会主义建设者当作“常识”。[第547～548页]

对我们亦然

三三制、新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锄奸政策与干部政策，都是新的实践中所发现的诸现象间的新的关联形式。

九　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

……

布尔乔亚经济学者，在历史上的一列的产业恐慌中，看到产业循环的衰落期以后有复活的时期，即好景气的时期到来。它从这里、就引出了

一种“归纳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恐慌，必须以新的一般的产业兴旺而告终。它把恐慌作为不可避免的东西，它不深刻的研究决定其种种阶段的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各个新的恐慌，表现资本主义的矛盾中的新阶段，因而有其特殊的性质：例如这次的世界恐慌，是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恐慌，不是它的新的兴旺，而是孕育着革命的变革——这些是布尔乔亚经济学者所不过问的。经验论的归纳，不进到现象的表面以上，而停止在其外面的标识之分解与一般化。[第554页]

延安的形式主义者亦然

我们的认识，不能离开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上，我们不单是把事物分解为它的构成部分，并且综合这些部分，在其中确立新关系，构成新事物。例如我们当着分解矿石为许多构成部分时，不单是分析它，同时又造出具有为从前矿石所无的新属性的新金属。如果这个综合不是分析的前提，没有伴随于这个分析，科学的分析本身，将是不可能的。

有的放矢在自然科学

伊里奇在普罗列达里亚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伊里奇对于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之分析，只有根据于普罗列达里亚对于帝国主义展开了的斗争，才做成功了。但普罗列达里亚对于帝国主义的一般的阶级斗争，其任务不是绝灭帝国主义的个个方面及其

表现，而是要把整个资本主义秩序实行社会主义化。所以伊里奇并不随便的引出帝国主义的个个表现。他在这个分析中，探求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的方面——对于普罗列达里亚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之出发点的方面。当着实行帝国主义之理论的分析时，指导了伊里奇的东西，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概念、以及由普罗列达里亚实行的那个革命的变革之必要。[558～559页]

有的放矢在社会科学

指导分析的是综合

我们的思维如果只限于追求对象的运动与发展的踪迹，规定这个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诸方面，它是分析的起着作用。但我们的思维是积极的，它规定对象的种种方面，同时在其与物质的全体性的关联上观察那些方面，在思想上，在其发展的必然性上，再生产这个具体的全体性。因而我们的思维是综合的。[第560～561页]

注意

……任何对象的历史，比较种种的偶整，是无限的丰富。按照一切细目追求对象的经验的历史，这就是意味着不立脚于历史过程之指导的根据而在论理上说明它，反而是为混乱的历史过程所支配。……[第561～562页]

注意

一〇　认识中的经验与实验之作用

……

然则实验在我们的认识上有怎样的意义？经验论者指出实验在自然认识的发达上所演的很大的作用，自称他们所谓研究家的唯一任务单是记述各种现象，不是发现那内规律性那种主张巧妙的由实验证明着。

反理论倾向的错误

“物理学害怕形而上学”[1]——这是反对理论的认识的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的呼声。他们不把实验看作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不努力确立过程之内在的必然性。

爬行经验家与辩证法家的原则的区别

实际上，在科学的事业之实践中，彻底贯彻经验论的立场的自然科学家，一个也没有。建筑家在实际上建立建筑物以前，先在头脑中建筑它[2]，——马克思这句话，也适用于实验家。实验家并不是像盲目的小狗那样，从现象

---

[1]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写道：“一直到现在，我已将天体现象及海洋运动用重力来说明了，但重力来源如何，却没有说过。”他列举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继续说：“我还没有方法由此项现象以推及重力之根源，我亦不想立一假说。凡非由现象中推论得者，均是假说，凡是假说，不问其为玄学的，物理学的或力学的等等，均不能用入实验物理学内，在实验物理学上，一切定理均由现象推得，用归纳法推广之。”（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56页）黑格尔注意到牛顿的这种看法，在《小逻辑》中写道：“牛顿……曾经明白地警告物理学，切勿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5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要注意牛顿的“‘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这个警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66页）。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消极与积极的区别

到现象、从实验到实验的乱碰。他并不偶然的结合他的经验的种种要素。在着手新实验的那种场合，他是由一定的推测——根据于已经实践所暴露的对象的属性及其规律性的东西——所引导。[第564～565页]

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在脱离实践的提倡社会科学理论之重要性。

当着认识基于实验而发达而丰富之时，理论的思维是必要的。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实验是自己发展的理论之受动的附属品，或是外面的补充物。一面的，唯理论的夸张理论对于实验的意义，这是错误的，是观念论的，正与经验论者奴隶的，盲目的随从于实验一样。理论的自然科学，尤其理论物理学的进步，在最近五十年之间，在实验的自然科学家与理论家之间，确立分工；把实验的材料的构成上的复杂的数学的分析之意义增大了。其结果，在许多学者的观念中，自然科学的理论，就离开了实验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为布尔乔亚思想家的一般观念论的性质所固定了，这是不待言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家，就把他的理论，当作对实验独立的东西去观察了。

中国的教条主义正有这种曲解

那样的唯理主义，曲解了科学的历史中理论与实验之实际的关联。唯理论忘记了：理论相互的交替是由实验所决定的；实验结局是由社会的实践之全体发展——由于生产力与阶级斗争的发达，首先是由支配阶级的利害所准备的。……

注意

……法则不是在学者的头脑中完成了的姿态上表现的。它是从根据于“被限定了的数量之事实与观察”[1]的假设成长起来的。但这种假设，是到达于法则的必然的路程，如果没有假设，就不会有法则即理论。……[第566～567页]

注意：庞大资料。二十五年。

假设之必要性

……马克思根据于向着阶级斗争的直接的积极的参加，根据于黑格尔哲学之唯物论的改造，根据于英国的经济学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批判，造出了这个假设。马克思为这个假设所引导，“采取社会经济的构造之一——商品经济的体系——，根据庞大的资料（他把它研究了二十五年多）很详细的分析了这构造机能及发展的法则”[2]（伊里奇）。伊里奇接着说：“现在，资本论出现以后，唯物史观早已不是假设，变为科学上已被证明的命题了”[3]。这个科学的命题，由数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证明了。马克思许多理论的预见，被这资本主义的发展巧妙的实现了。如果马克思关于历史之唯物论的说明的程度（恩格斯），就是等待到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研

---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2]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3]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究终结，而没有提出那个假设，那么，人们将不能从马克思知道那个法则。如没有这个假设，资本主义的研究就会是不可能。

实验是实践的一个要素。在实验上，实践与理论的统一被实现；在实验上，思维积极的暴露物质的对象之规律性。但实验也暴露理论的缺陷。理论在认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不是完全反映绝对真理的东西。理论的这种缺陷，在实验上，更正确的说，在许多的实验上，被克服了。同时，关于科学的认识之发展的指导方面，是决定科学的思想方向与实验的客观可能性及条件的实践，这是明白的。[第568～569页]

相反，中国主观主义者说，指导方面不是实践，而是理论。

在苏联，实验越发失掉其实验室的规模，与“纯粹”科学的性质。实验越发带有半工场的及工场的性质，与工业及农业的实践，直接一致。并且，稀有的高等工业学校——工场，实验——研究工场及国营农场，是近的将来的科学的实验的事业之“中坚”。

他们是如何的联系，我们是如何的脱离！

我们对于应用于自然科学，关于狭义的自然的科学的实验及经验，上面已经说过了。但实验与经验，在社会的发展上，也以特有的形态显现着。巴黎公社是最大的经验。从此，马克思、恩格斯与伊里奇，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革命的辩证法论者马克思，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看做是有历史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是世界普罗列达里亚革命莫大的前进，是比较几百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践的行动。“分析这种经验，从此引出战术的教训，由于这种经验，再检讨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正是这样的树立了自己的理论。”（伊里奇）[第 570～571 页]

一一　科学的预见

……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如果忘记了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的研究上，由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可避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所引导的那件事，就不能正确的理解并估价。……[第 580～581 页]

有的放矢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日）

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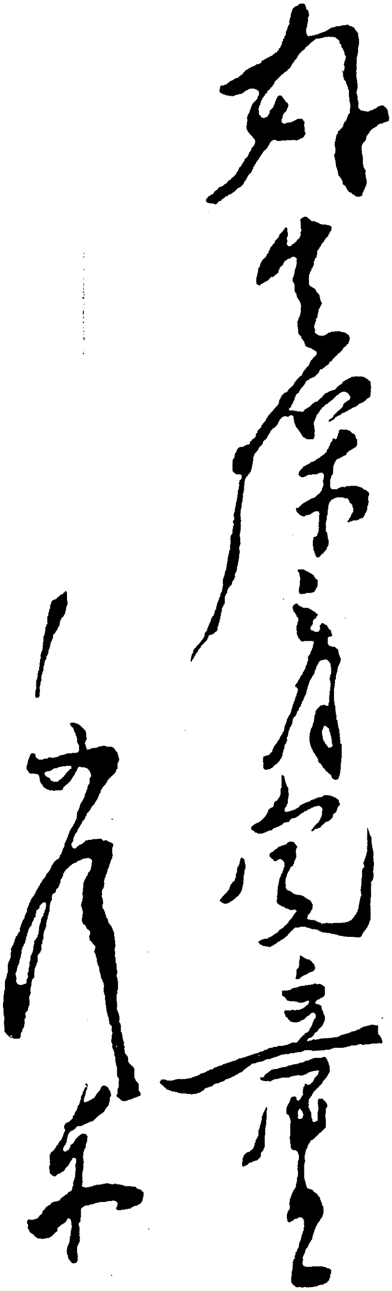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第十届儿童节大会题词

（1941年4月4日）

好生保育儿童。

毛泽东



好生保育儿童

毛泽东

毛泽东为第十届儿童节大会的题词。

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1]

（1941年4月5日）

朱，陈、罗，并告彭、左，陈、刘：

（一）朱陈罗二十五日电悉。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二）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三）蒋介石虽已派李仙洲之侯镜如[2]第二十一师（不是派何柱国[3]）进至陇海路北，策应鲁于苏韩[4]，该部亦正在设法推进（现仍在涡河以南）但困难甚多，既阻于彭部[5]，复阻于日寇，不易达其目的。庞炳勋[6]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朱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刘少奇的电报。

[2]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3]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

[4] 鲁于，指驻守山东的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苏韩，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

[5] 彭部，指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

[6]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冀及韩霍[1]入鲁之企图与此相同（庞及韩霍均仍在原地）。（四）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五）彭雪枫任务是阻止反共军北上，你们应令鲁西南部队努力削弱冯子固[2]等反共力量，并整训扩大自己，建设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至其他部队西调南调须加慎重，以免顾此失彼。（六）中央已同意中原局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与军队之领导，仍归还北方局与八路总部，陇海以南则归中原局与新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毛　朱　王　叶

微亥

---

[1] 韩，指韩德勤。霍，指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师长。

[2] 冯子固，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沛县县长。

共产党对国民党八中全会宣言及蒋介石演词发表意见

（1941年4月5日）

蒋介石氏这次在会上的演词，说到了这样的话：“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讥笑我们说，本党的工作，不紧张，太懈怠，甚至说我们是腐败了，衰老了，这种种批评，我们都要承认，都要接受。我们观察过去三年八个月以来，尤其是最近半年之间，我们奋斗的精神，确是一天不如一天，从党到政府，从我们中央到党务、政治、军事、经济各种事业，都没有新的精神，缺乏新的生力，我以为这一点，就是绝大的危机，值得我们惊心动魄。”蒋介石氏这些话，说明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及海内外同胞历来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各种批评意见，完全是对的。然而，应该承认：谁如说出关于这一切问题的真话，历来都是被认为有罪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真理，并不为现在国民党统治当局所了解。一直到现在，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差不多已被剥夺净尽，并且还有变本加厉之势。但是，国民党统治当局所打的算盘及其种种做法都错了，人民的愤懑是随着大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一天一天地在增加起来，而袭击新四军的罪行所引起的分裂危机，更加深着人民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这就使得蒋氏此次不能不道出自己统治危机的真相来。蒋氏要国民党人自己反省，但是并

不想解除这个危机的真正症结。这症结为何？一句话，就是：没有民主。国民党统治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的事实一日存在，则危机亦将一日存在，而欲使国民党与民众接近，除民主外，更无别路，蒋氏演词对民主政治一字未提，所谓“与民众打成一片”，只是一句空话，或者是要在民众中加强统治的特务工作而已。至于全会宣言则更明白宣告宪政施行推到“战事结束之日”，两年来全国人民和各党派所呼吁的宪政，企图以此加强全国团结抗战的，又已被弃置一边了。其次我国以被压迫民族起而抵抗强敌，舍普遍武装民众，就不能争得最后之胜利，现在国民党当局借口所谓“军令军纪”，以求消灭真正民众之武装，把军令军纪当作排除异己的工具，如袭击和取消新四军之行为，对于抗战实为犯罪，全会宣言对此未加纠正，反而将这种阴谋消灭抗战部队的无原则的所谓“军令军纪”加以强调，不能不谓为认识之错误。全会宣言关于“经济建设”方面，一方面否认改善人民生活，对此加以所谓“扇动阶级之斗争”之罪名，另一方面又继续一小部分大资产阶级分子巧取豪夺弊病丛生的所谓经济统治，否认经济的自由发展，以打击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广大小资产阶级，此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如不改变，则今日所发展着的经济危机即无法克服，那是很明显的。然而，要改变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有可能。总之，我们是希望国民党向好的，因为国民党向好是民族抗战的福利，但如国民党统治人物对于自己的错误，对于国民党衰老腐败的真正症结，不从根本上加以检讨，而只为枝节是求，那是决然没有结果的。国民党要真正有所改进，惟有接受共产党所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并认真实行之，没有根本政策的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8日）

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其中一师系新编第三十四师马志超部已到宁夏。蒋派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剿匪”总司令，日内率直属队经陕、甘、宁夏似赴榆林。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9日）

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9日）

蒋有加强北面兵力攻取盐池并南攻绥德可能，你们应准备抽调有力部队准备于必要时西渡增援，暂在原地待命。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续范亭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 年 4 月 10 日）

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李文部分驻宜川、洛川、宜君、耀县的四个师似有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如其进攻则可能是突然袭击延安、富县两点。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0日）

蒋介石似有袭击延安的企图，望立即揭穿，并告知友人。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电[1]

(1941年4月11日)

据息，何应钦此次来西安是主持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已于十日在临潼开会，讨论中心问题为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部署，进攻边区总指挥已决定为胡宗南，在一个月后开始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12日）

准备机动部队集结集训，布置甚妥。惟集结位置须选在行止两用之处，庶依情况须行则行，须止则止，可以活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13日）

如果蒋介石冒险打延安，我们现时还只能决定内线作战，不是打出去，一二〇师兵力须在保卫边区同时又相当兼顾晋西北之两点上。

蒋介石是否决心打延安主要决定于蒋对苏联态度，日苏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但我现应放在蒋决心打延安一点上来布置。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4日）

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对蒋进攻延安阴谋准备公开揭破，但还拟看一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局面。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苏日中立条约和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等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4月16日）

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难，即财政、外交与中间派问题，中间派对投降与反共都不积极，财政困难更大。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苏日中立条约时讲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5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52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6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

（1941年4月16日）

致周恩来电……………………………………………………3

（1941年4月17日）

致彭雪枫电……………………………………………………4

（1941年4月17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5

（1941年4月17日）

致彭雪枫等电…………………………………………………6

（1941年4月20日）

致彭雪枫等电…………………………………………………7

（1941年4月20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8

（1941年4月20日）

致周恩来电……………………………………………………9

（1941年4月20日）

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10

（1941年4月20日）

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电 ………………………12

（1941年4月26日）

给任弼时的信 ……………………………………………………13

（1941年4月28日）

发展上海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 ……………………15

（1941年4月30日）

为金茂岳题词 ……………………………………………………16

（1941年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8

（1941年5月1日）

致周恩来电 ………………………………………………………23

（1941年5月2日）

致陈毅等电 ………………………………………………………24

（1941年5月5日）

给周恩来的信 ……………………………………………………25

（1941年5月5日）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26

（1941年5月8日）

复周恩来电 ………………………………………………………31

（1941年5月8日）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32

（1941年5月9日）

致周恩来电 ………………………………………………………34

（1941年5月10日）

致陈毅、刘少奇电 ……………………………………………35

（1941年5月12日）

为护士节题词 ……………………………………………………36

（1941年5月12日）

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 ……………………………………38

（1941年5月14日）

关于华北我军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等问题的指示 ………………39

（1941年5月14日）

致廖承志电 ……………………………………………………………41

（1941年5月14日）

致彭德怀电 ……………………………………………………………42

（1941年5月14日）

致彭德怀、左权电 ……………………………………………………43

（1941年5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 ……………………………………44

（1941年5月15日）

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 ………………45

（1941年5月15日）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47

（1941年5月16日）

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头 ……………………………………………49

（1941年5月16日）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50

（1941年5月18日）

改造我们的学习 ………………………………………………………55

（1941年5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67

（1941年5月20日）

谨防扒手*………………………………………………………………68

（1941年5月23日）

延安评论家对时局之评论*……………………………………………………71
（1941年5月24日）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72
（1941年5月25日）
关于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电 ………73
（1941年5月25日）
给王履孚、甄玉莹等的信 …………………………………………………74
（1941年5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5
（1941年5月26日）
致卫立煌电 …………………………………………………………………76
（1941年5月26日）
复周恩来电 …………………………………………………………………77
（1941年5月26日）
致彭德怀电 …………………………………………………………………78
（1941年5月26日）
谣言与烟幕*…………………………………………………………………79
（1941年5月28日）
致周恩来电 …………………………………………………………………83
（1941年5月30日）
延安评论家称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84
（1941年5月30日）
致周恩来电 …………………………………………………………………86
（1941年5月31日）
为“抗大五周年纪念特刊”题词 …………………………………………87
（1941年5月）

为陈叔亮《解放区速写》画册题字……88

（1941年5月）

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90

（1941年5月）

延安评论家之评论……92

（1941年6月2日）

致周恩来电……93

（1941年6月6日）

给凯丰、胡乔木的批语……94

（1941年6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95

（1941年6月7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96

（1941年6月7日）

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97

（1941年6月9日）

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100

（1941年6月9日）

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102

（1941年6月12日）

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103

（1941年6月13日）

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的信……104

（1941年6月13日、15日）

国民党缺少什么……106

（1941年6月17日）

致周恩来电……110
（1941年6月17日）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11
（1941年6月23日）
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112
（1941年6月23日）
当前时局与我们的方针……113
（1941年6月26日）
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114
（1941年6月28日）
复彭雪枫电……115
（1941年6月28日）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116
（1941年6月）
给周恩来的信……118
（1941年6月）
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119
（1941年7月1日）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21
（1941年7月1日）
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124
（1941年7月2日）
给续范亭的信……125
（1941年7月2日）
致周恩来电……126
（1941年7月5日）

致周恩来电……127

（1941年7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128

（1941年7月7日）

为“七七”事变四周年题词……134

（1941年7月7日）

致周恩来、廖承志电……135

（1941年7月8日）

驳斥何应钦* ……136

（1941年7月9日）

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长期斗争方针……137

（1941年7月15日）

给刘雪苇的信……140

（1941年7月15日）

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题词……142

（1941年7月15日）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144

（1941年7月18日）

复周恩来、董必武电……146

（1941年7月22日）

致彭德怀电……147

（1941年7月24日）

给各兵团首长的指示……148

（1941年7月30日）

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149

（1941年7月30日）

给林伯渠、谢觉哉的信……151
（1941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52
（1941年8月1日）
给萧军的信……156
（1941年8月2日）
军渡碛口线之河防应该加强……158
（1941年8月3日）
给谢觉哉的信……159
（1941年8月5日）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160
（1941年8月6日）
给谢觉哉的信……163
（1941年8月9日）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165
（1941年8月9日）
给萧军的信……166
（1941年8月10日）
给谢觉哉的信……167
（1941年8月12日）
给萧军的信……168
（1941年8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69
（1941年8月13日）
给张冲家属的唁电……170
（1941年8月13日）

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时的讲话……171
（1941年8月14日）

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中条山的游击战争……172
（1941年8月17日）

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的处理意见……173
（1941年8月17日）

复陈毅、刘少奇电……175
（1941年8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76
（1941年8月18日）

致彭德怀电……177
（1941年8月18日）

给陈正人的信……178
（1941年8月19日）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179
（1941年8月19日）

征求华北各战略单位对军区建设的意见……182
（1941年8月21日）

致彭德怀电……184
（1941年8月22日）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第二期工作报告上的批示……185
（1941年8月22日）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186
（1941年8月22日）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189
（1941年8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0
（1941年8月27日）
致周恩来电……………………………………………………………191
（1941年8月30日）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等的谈话…………………………………192
（1941年9月1日）
致周恩来电……………………………………………………………193
（1941年9月1日）
致周恩来电……………………………………………………………194
（1941年9月8日）
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195
（1941年9月9日）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96
（1941年9月10日）
关于农村调查…………………………………………………………201
（1941年9月13日）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208
（1941年9月16日）
关于张季鸾逝世给国民参政会的唁电………………………………209
（1941年9月18日）
给续范亭的信…………………………………………………………210
（1941年9月22日）
致周恩来电……………………………………………………………211
（1941年9月24日）
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212
（1941年9月26日）

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电……214
（1941年9月29日）
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时的谈话……223
（1941年9月）
致刘少奇电……224
（1941年10月3日）
复刘少奇电……225
（1941年10月11日）
给周恩来的信……226
（1941年10月15日）
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228
（1941年10月18日）
致周恩来电……229
（1941年10月18日）
致刘少奇、陈毅电……230
（1941年10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31
（1941年10月20日）
致周恩来等电……232
（1941年10月20日）
致贺龙、周士第等电……233
（1941年10月20日）
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234
（1941年10月23日）
致周恩来电……235
（1941年10月29日）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236
（1941年10月30日）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238
（1941年10月30日）

致周恩来电……246
（1941年11月1日）

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247
（1941年11月1日）

本年内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249
（1941年11月4日）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251
（1941年11月6日）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等的谈话……258
（1941年11月6日）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播讲演……259
（1941年11月7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261
（1941年11月7日）

致周恩来电……269
（1941年11月10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270
（1941年11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71
（1941年11月12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272
（1941年11月14日）

致周恩来电……………………………………………………273
（1941年11月16日）
致周恩来电……………………………………………………274
（1941年11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75
（1941年11月17日）
关于发理论材料目录等问题………………………………276
（1941年11月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的讲话……………277
（1941年11月21日）
各地高级学习组应根据组织条例实施……………………278
（1941年11月26日）
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致刘少奇电………………279
（1941年11月26日）
致周恩来电……………………………………………………281
（1941年11月30日）
挽张冲先生联…………………………………………………282
（1941年11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83
（1941年12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284
（1941年12月9日）
对国际战争形势的估计………………………………………287
（1941年12月12日）
关于敌后各根据地领导方法的指示…………………………289
（1941年12月12日）

致周恩来电……………………………………………………………290
（1941 年 12 月 13 日）
给蔡畅的信……………………………………………………………291
（1941 年 12 月 16 日）
为王观澜题词…………………………………………………………293
（1941 年 12 月 16 日）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295
（1941 年 12 月 17 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99
（1941 年 12 月 18 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301
（1941 年 12 月 20 日）
给续范亭的信…………………………………………………………302
（1941 年 12 月 23 日）
给任弼时的信…………………………………………………………303
（1941 年 12 月 25 日）
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304
（1941 年 12 月 28 日）
关于中共党史学习问题致周恩来电…………………………………306
（1941 年 12 月 30 日）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308
（1941 年）
为中央党校的题词……………………………………………………317
（1941 年冬）
为军委机要工作题词…………………………………………………319
（1941 年）

为王履丰题词……………………………………………………321
（1941年）
为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的青运工作展览会题词…………322
（1941年）
为门书明题词……………………………………………………324
（1941年冬）
致周恩来等电……………………………………………………327
（1942年1月7日）
复周恩来电………………………………………………………328
（1942年1月8日）
在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情况的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329
（1942年1月10日）
致彭德怀等电……………………………………………………330
（1942年1月12日）
《文化课本》序言 ………………………………………………331
（1942年1月17日）
为瞿宪文题词……………………………………………………332
（1942年1月18日）
在审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的一段话…………………………334
（1942年1月20日）
致彭德怀等电……………………………………………………335
（1942年1月21日）
致朱瑞等电………………………………………………………336
（1942年1月21日）
在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337
（1942年1月22日）

在欢迎七一七团晚会上的讲话……………………………………338
（1942年1月22日）
印发和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339
（1942年1月23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341
（1942年1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342
（1942年1月24日）
中宣部宣传要点…………………………………………………344
（1942年1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347
（1942年1月28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题词……………………………352
（1942年1月）
整顿党的作风……………………………………………………354
（1942年2月1日）
给周文的信………………………………………………………373
（1942年2月1日）
给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374
(1942年2月2日)
复彭德怀电………………………………………………………375
(1942年2月3日)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376
（1942年2月4日）
以集资料写名人列传………………………………………………381
（1942年2月4日）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 ……………………383
（1942年2月6日）

延安观察家之评论* ………………………………………………388
（1942年2月6日）

延安评论家称两年内击溃日寇* …………………………………389
（1942年2月6日）

反对党八股……………………………………………………………390
（1942年2月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13
（1942年2月11日）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的批示………………415
（1942年2月11日）

复陈毅、刘少奇电……………………………………………………416
（1942年2月13日）

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417
（1942年2月18日）

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419
（1942年2月20日）

关于时局估计、干部教育、财政经济等问题的指示………………421
（1942年2月20日）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一段话……………………………………423
（1942年2月20日）

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424
（1942年2月20日）

讨论过去路线问题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425
（1942年2月21日）
致彭德怀等电……………………………………………………427
（1942年2月21日）
致陈毅等电………………………………………………………428
（1942年2月23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429
（1942年2月28日）
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上的一段讲话……………………435
（1942年3月2日）
给谢觉哉的信……………………………………………………436
（1942年3月2日）
增长力量，准备反攻………………………………………………437
（1942年3月4日）
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题词……………………………………440
（1942年3月8日）
为张浩题挽词……………………………………………………442
（1942年3月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45
（1942年3月11日）
复彭德怀电………………………………………………………446
（1942年3月12日）
致王世英电………………………………………………………447
（1940年3月13日）
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448
（1942年3月14日）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450
（1942年3月19日）
致刘少奇电……455
（1942年3月21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456
（1942年3月24日）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457
（1942年3月24日）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458
（1942年3月30日）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471
（1942年3月3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73
（1942年4月2日）
为儿童节题词……474
（1942年4月4日）
给萧军的信……476
（1942年4月4日）
为《八路军抗战烈士纪念册》题词……477
（1942年4月5日）
给欧阳山的信……478
（1942年4月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79
（1942年4月11日）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480
（1942年4月13日）

关于时局的报告……482
（1942年4月13日）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483
（1942年4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85
（1942年4月17日）
致陈毅电……486
（1942年4月19日）
关于整顿三风……487
（1942年4月20日）
准备应付反共高潮继续抓紧党内教育……500
（1942年4月21日）
给萧军的信……501
（1942年4月27日）
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502
（1942年4月27日）
复周恩来电……504
（1942年5月7日）

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1]

（1941年4月16日）

（一）苏联根据其一贯和平中立政策，于四月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这个条约的意义，首先在于巩固了苏联东面的和平，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发展。而苏联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也即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利益。

（二）苏日条约使苏联的国际地位极大的提高了，苏联无论在东方在西方都增大了他的发言权，这对于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利的，而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与被压迫民族则都是有利的。

（三）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只要中国政府的方针是坚持民族解放的独立战争，只要中国政府对于苏联的援助是用以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是用以反对国内同胞，例如今年一月，在皖南消灭新四军及目前在安徽湖北等省大举进攻新四军之所为，只要不是这样，我们根据苏联的国策，深信苏联是会继续援助中国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决不为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束缚自己援助被压迫民族的正义行动的手足。日本此次对于限制苏联援华的目的没有达到，是表示失望的！中国人民的希望，只要说到外援，便是首先寄托在苏联身上

---

[1] 这个意见是毛泽东起草的。

的，而苏联在这次条约上并没有使中国失望，也永远不会使中国失望。

（四）至于苏日声明互不侵犯满洲与外蒙，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所谓满洲国者，早为日本用为扰乱苏联与外蒙边疆的工具，张高峰、诺蒙坎两次战争，便是明证，苏联既与日本订立和平中立条约，便不能不把这一问题同时加以解决。在苏联，根据其和平中立政策，无论与日本订约与否，都是不准备侵入东四省的，而日本却屡图侵犯外蒙，而外蒙是与苏联订了互助条约的，现在苏日声明，却保证了外蒙不受侵犯，这不但对外蒙有利，即对全中国争取解放也是有利的。说到东四省的收复，原是我们自己的事，绝不能像有些投机家，总是希望苏联同日本打起来，以便坐收渔人之利，及见苏联声明不打满洲，他就认为苏联不对，这种人至少也是毫无志气的家伙。我们必须收复全国一切失地，必须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这是中国全民族的神圣事业，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必是赞助我们这种事业的。

（五）在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第一，任何对抗战的动摇是不许可的。第二，国共合作必须继续，解散新四军一类的分裂行动必须取消，以后再不可发生此类行动。第三，各种反动的对内政策必须停止。循此以行，外援方有所附丽，抗战才可期胜利。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至众叛亲离，危亡可立而待。我们共产党深望国民党当局实行深切的反省，善处当前的时局，则非仅国民党之利，民族解放事业实利赖之。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7日）

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摆在蒋面前的是外交、财政、中间派三大困难问题，关于外交者是第一日本威胁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对德，第三苏联获得自由；关于财政者是收入不足十五分之一（五万万对七十五万万）；关于中间派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地方实力派并不热心反共也不赞成投降。在日苏条约订立、苏联获得自由之后，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苏日中立条约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电[1]

（1941 年 4 月 17 日）

陈锐霆[2]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起义，起义后照外围军待遇。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2] 陈锐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团长，1941 年 4 月 19 日率部起义。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17日）

你们部队主力择适当地点集中整训，不要妨碍生产建设，以便坚持根据地。延安亦是这个方针（准备应付蒋之万一进攻，但不妨碍生产）。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等电[1]

（1941年4月20日）

陈锐霆团起义后不要改为八路军或新四军番号，可称九十二军独立旅，陈任旅长，保存外围军形式，归彭雪枫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等电[1]

（1941年4月20日）

如昨电所说陈团起义后仍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的旗帜。对陈团内部须坚决执行一个路线的转变，使全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军职以党员与可靠分子充之，但须团结一切不反共的中间分子。惟有实行这种革命的两重性政策，才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队，也才有利于团结陈团中的中间分子。我对陈团的政策和对山西新军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和山东对一一一师的政策不同，山东没有采取内部坚决转变的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4月20日）

无论蒋介石是否马上进攻延安或增兵榆林，从聂荣臻处调两个旅至晋西北机动位置是必要的。两旅到后主要集结整训，并从事生产。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20日）

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食丁二十盒航快寄来为盼。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为续范亭购买药品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日苏缔约后英美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态度的分析

（1941年4月20日）

周[1]：

（一）皓亥电[2]悉，分析很对。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惟顽固派中之死硬分子有被亲日派拉向投降的危险，这是很可注意的，不过目前还不会。（二）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将荷印[3]让给日本，甚至停止援华，都是可能的。只要德国占领苏伊士和轰炸伦敦袭击大西洋进一步加紧，真正威胁英国生存时，只要日本同意不向英国开战，就有这种可能。在这一情状出现时，你所指的英美派，顽固派，中间

---

[1] 周，指周恩来。

[2] 周恩来1941年4月19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日苏缔约后重庆方面各派政治力量的态度作了分析，指出中间派悲观，进步派中一部分人发生动摇，“看起来他们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一时的冲动表现，而顽固派则利用之以反苏，亲日派利用之以悲观，英美派利用之以亲美，虽然这都是一时现象”。

[3] 荷印，即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

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就将发生大混乱，大分化，大动摇，他们将成为亲日派与共产派二者猛力争夺的对象，其时间或者在今年秋冬之间。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那时英苏、美苏之间可能成立互不侵犯协定（也许英苏协定不久就可签订）。（三）准备在日内发一次政治情报，当将你所说的解释狭隘民族观点说进去。（四）陈锐霆团[1]决于日内起义，仍打九十二军旗子（称为九十二军独立旅），开到张爱萍[2]区域整训。请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询问，答以这是九十二军自己的事，凡对我攻击者我反击之，凡对我取友好态度者我以友好态度对待之，陈团对我友好，故我理应加以协助，但仍是九十二军，并非八路军。（五）请问国民党，对八路是否还准备发饷，如发则已，否则我们将向全国全世界（包括苏联在内）募捐，发起普遍的募捐运动（我们真正准备这样做），学叫化子讨饭吃的办法，因为国民党迫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将要饿死了。

毛泽东
号亥

---

[1] 陈锐霆团，指陈锐霆任团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

[2]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

关于国共继续团结抗日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4月26日）

（一）见蒋时可以提出你回延参加大会的要求，要他派机送你，并问他对我们大会有何意见。

（二）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给任弼时的信[1]

（1941 年 4 月 2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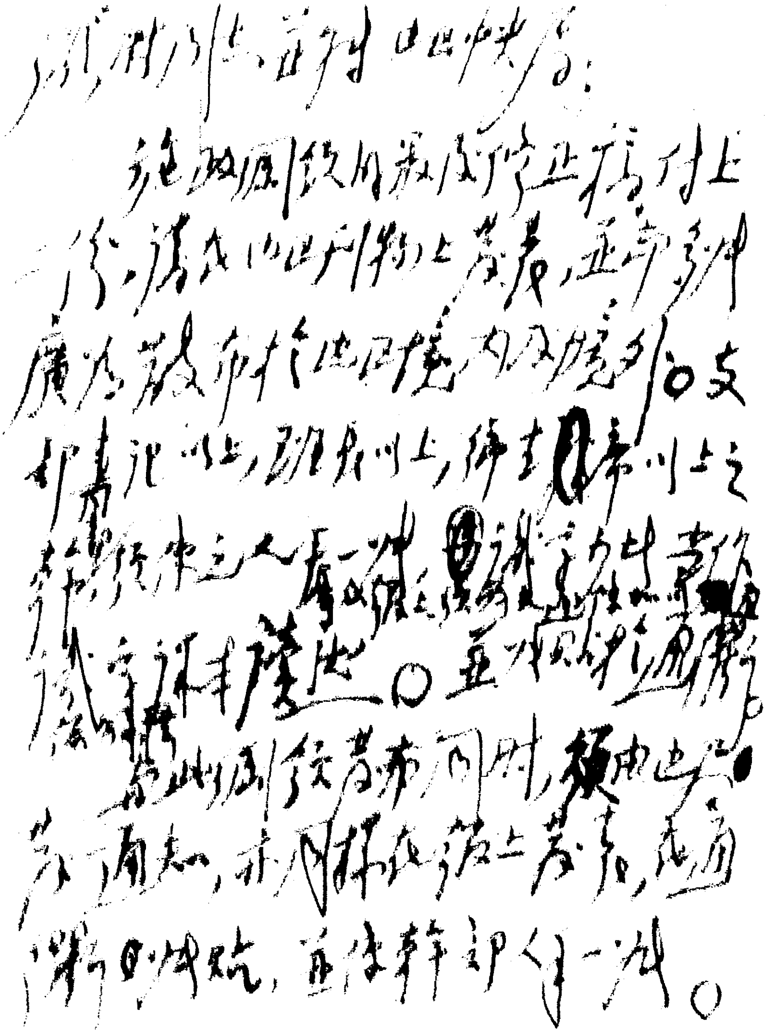
弼时同志，并转边区中央局：

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支部书记以上，班长以上，乡主席以上之干部须使之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识字少些当作识字课本读熟。并张贴于通衢。

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

---

[1] 1941 年 4 月 27 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按照毛泽东的修改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这是 4 月 28 日，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的信。5 月 1 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陕甘宁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



毛泽东致任弼时信的手稿。

发展上海到福州广大地区的游击战争[1]

（1941年4月30日）

少奇、陈毅、小姚：

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之游击战争。有地方党者指导地方党组织之，你们派少数人帮助之，无地方党者由你们派人组织之。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不可仅委托谭震林[2]，他一人管不到许多，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3]区域。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组织，请考虑电告。

毛　朱　王　叶

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给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代主任饶漱石（小姚）的电报。

[2] 谭震林，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3] 当时新四军序列只有七个师，即第一至第七师，后来没有成立第八师。

为金茂岳题词[1]

(1941年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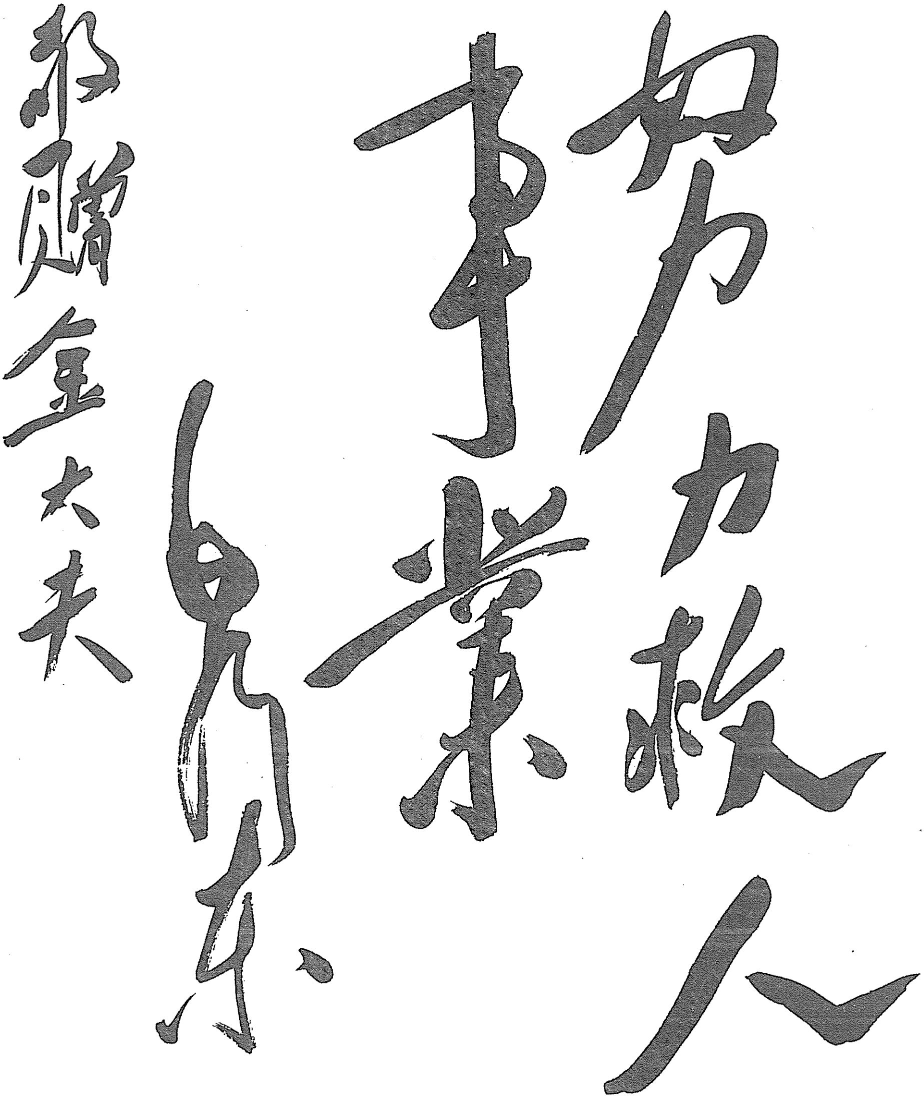
努力救人事业。

毛泽东

1941年，毛泽东在中央医院看望伤员。

---

[1] 这是毛泽东为1940年由国民党统治区到延安任中央医院妇产科主任的金茂岳所写的题词。



努力救人
事業

毛澤東

題贈金大夫

毛泽东为金茂岳的题词。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

（1941年5月1日）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二百万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边区境外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强抗日自卫军、少先队的组织与训练，健全其领导系统。

---

[1] 这个文件的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他还为这个文件改拟了题目《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题下注“（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四）加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工作，彻底实施优抗条例，务使八路军及一切友军在边区的家属得到物质上的保障与精神上的安慰。

（五）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六）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1]、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系统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

（七）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的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

（八）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

（九）发展农业生产，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解决贫苦农民耕牛、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今年开荒六十万亩，增加粮食产

---

[1] 这里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量四十万担，奖励外来移民。

（十）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与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

（十一）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同时发展人民的合作事业，扶助手工业的发展。

（十二）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增强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纪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十三）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居民中除极贫者应予免税外，均须按照财产等第或所得多寡，实施程度不同的累进税制，使大多数人民均能负担抗日经费。同时健全财政机构，调整金融关系，维护法币，巩固边币，以利经济之发展与财政之充裕。

（十四）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

（十五）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

（十六）依据男女平等原则，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发挥妇女在经济上的积极性，保护女工、产妇、儿童，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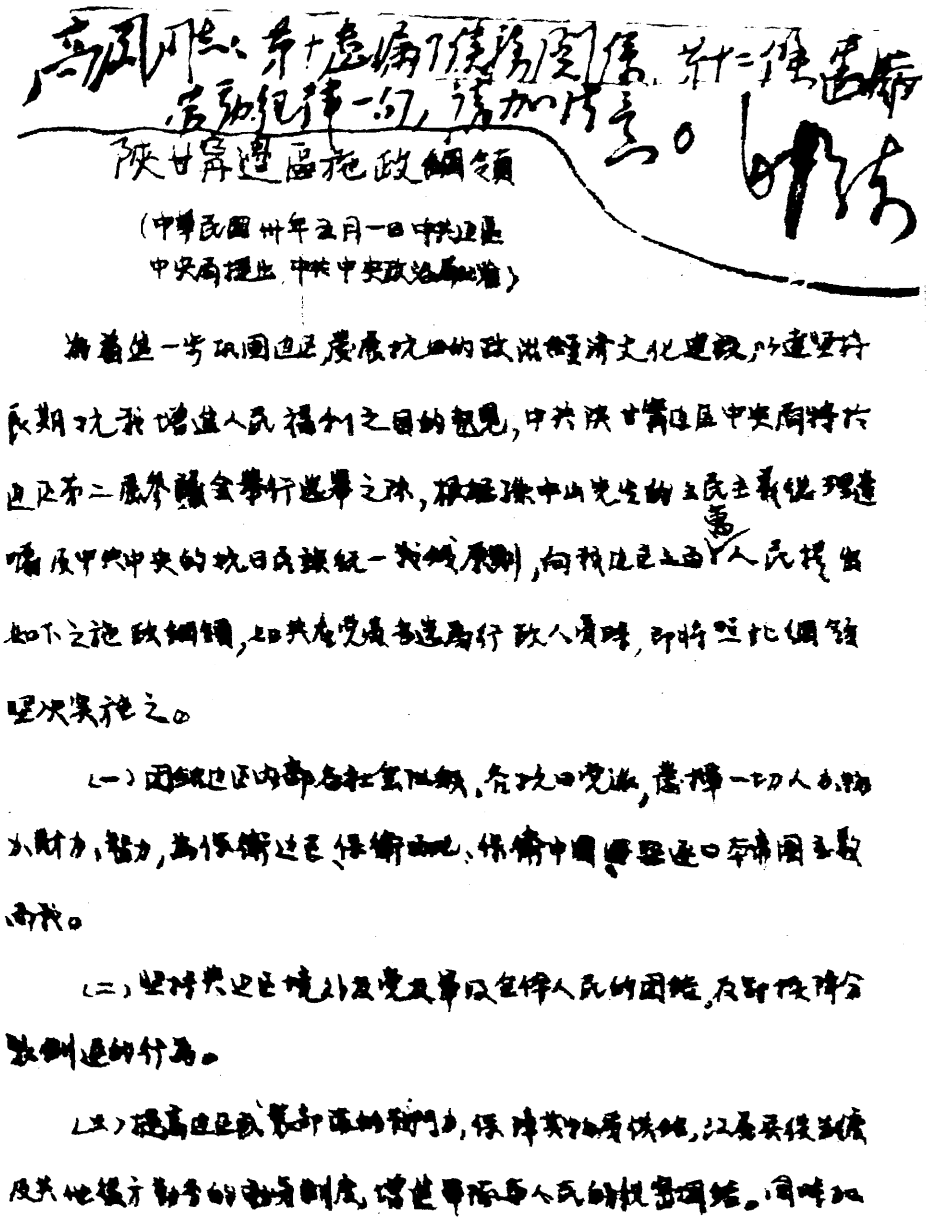
（十七）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十八）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

（十九）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民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对会门组织实行争取、团结与教育的政策。

（二十）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二十一）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



高岗同志：第十条应删债务关系，第廿二条最后应加纪律一句，请加修正。毛泽东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中华民国卅年五月一日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

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见，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特于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之际，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总理遗嘱及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向我边区之全体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纲领，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时，即将此纲领坚决实施之。

（一）团结边区内部各社会阶级、各抗日党派，发挥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战。

（二）坚持与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的团结，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

（三）提高边区武装部队的战斗力，保障其物质供给，改善兵役制度及其他后方勤务的动员制度，增进军队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同时加

毛泽东审阅修改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2日）

如陈[2]至榆及向榆林增兵势必引起重大纠纷，如保持榆林现状，我可保证不向榆林、宁夏、内蒙作任何行动，否则引起纠纷责在彼方。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陈，指陈长捷，当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致陈毅等电[1]

（1941年5月5日）

蒋、桂在华中的防区方面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据汤恩伯称，已奉蒋令，该集团负责区域划定为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地区，亦可见蒋攻我之心未死，没有敌人大举“扫荡”，他是不会放手的。自苏日条约签订后，国民党苦闷彷徨，桂系亦感无出路，据重庆消息，白崇禧很苦闷，说蒋介石“反共无决心，和共亦无决心”，近日白、蒋间颇有隔阂。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国民党军在华中的动态及蒋介石同桂系的矛盾问题，致陈毅、刘少奇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恩来的信

（1941年5月5日）

恩来同志：

现急切需要下列各书报：

（一）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重庆中四路九八号，附二号）出版的，有《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

（二）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

（三）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请即妥人购买，运寄费都交各书店，由书店直接挂号寄来。如能一种购买两部或三部，可将一部托人带来，《西南实业通讯》已久未到，请订两份。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请就便购两三部。商务出版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前托购尚未收到，请查是否购得。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又云南出版的书报及桂版《大公报》，这里亦缺，请订购。各种书报订购至少一年为限。通讯处：延安新市场中山商店图书部。

毛泽东　陈伯达[1]

微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

（1941年5月8日）

这一次的反共高潮，正如三月十八日中央的指示所说，是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在国际国内的新环境中继续抗战的局面。在这个新环境中所增加的因素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涨，苏日的中立条约[2]，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击退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党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政治地位的提高，再加上最近日本准备新的对华大举进攻。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并继续有效地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和反共逆流起见，研究和学习我党在英勇地胜利地反对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所获得的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一）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指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的中立条约。

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二）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英美派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既然还在抗日，其对我党既然还在一打一拉，则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三）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2]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

---

[1] 这是宋朝的著名学者、理学家朱熹（1130—1200）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2] 参见《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一文的题解。

者缺一，就要吃亏。

（四）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这是去年三月以来中央就屡次指出了的。这次反共高潮再一次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1]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地方实力派的领导成分虽然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和统制中央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有矛盾，故一般地亦须以中间派看待之。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而上次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这一次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其他各地方实力派更不待论。我们同志中却有许多人至今还把各派地主阶级各派资产阶级混为一谈，似乎在皖南事变之后整个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叛变了，这是把复杂的中国政治简单化。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看法，将一切地主

---

[1] 《佳电》是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这个电报，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驳斥了何、白强迫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的荒谬命令；同时，为了照顾团结抗日的大局，委曲求全，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这个电报，曾经取得当时中间派的同情，孤立了蒋介石。

资产阶级都看成和国民党顽固派一样，其结果将使我们自陷于孤立。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1]，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五）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这些同志在皖南事变后，从其“四一二”和马日事变的估计出发，似乎感觉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的原则指示，已不适用，或不大适用了。他们认为现在需要的已不是包含一切主张抗日和民主的人们的政权，而只是所谓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权了；已不是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策，而是像过去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的政策了。党的正确的政策，在这些同志的心目中，至少是暂时地模糊起来了。

（六）这些同志，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他们不了解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

（七）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他们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

---

[1]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是指领导革命的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和反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都只占少数，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阶级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占了绝大多数。

育以外的阶级教育。他们至今还不明白：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对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必须采取坚决的打倒政策外，对其余的分子也是这种两面性的政策。我党对党内对人民所施行的教育，也是包括这两方面性质的教育，就是教导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如何和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各个不同的阶层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联合抗日，又和他们的各种不同程度的妥协性、动摇性、反共性作各种不同程度的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

（八）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有些人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现在各根据地的政治，是一切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民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其经济是基本上排除了半殖民地因素和半封建因素的经济，其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此，无论就政治、经济或文化来看，只实行减租减息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的陕甘宁边区，同样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8日）

（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当前形势与我们的方针

（1941年5月9日）

彭、左，陈、刘、赖，贺、关，荣臻，萧克，吕、程，刘、邓，任穷，朱、陈、罗，黎、罗，粟、刘，克诚，张、邓，雪枫，先念，震林[1]：

（一）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对豫、陕两方，闻调动兵力在四个

---

[1] 彭、左，指彭德怀、左权，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和副参谋长。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刘，指刘少奇。赖，指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克，当时任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吕，指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程，指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穷，指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黎，指黎玉，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罗，指罗舜初，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粟，指粟裕，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刘，指刘炎，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委员兼苏中军区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邓，指邓子恢，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师团以上，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

（二）判断经此战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苏联援华不变，近到飞机百余架，炮二百门，中苏关系亦有改善可能。汤恩伯、胡宗南均准备对敌。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

（三）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对韩、沈、于、高[1]各部亦暂时停止攻击。在战事发生时，应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

（四）中央已电恩来同志，对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时提出（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等项。

（五）我八路、新四两军望按上述方针沉着地部署一切。

毛　朱　王　叶[2]
佳

---

[1] 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指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于，指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高，指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八军军长。

[2]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10日）

已电总部拟具体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刘少奇电[1]

（1941年5月12日）

敌占领郑州后意图不明，蒋令何柱国[2]袭击陇海线，扰敌后路，兼有防我意。为减轻蒋对我恐惧起见，彭、邓[3]所部，不应越过津浦线以西，仍在原地不动为要，张、罗[4]亦不可扰击李品仙。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3] 彭、邓，指彭雪枫、邓子恢。

[4] 张、罗，指张云逸、罗炳辉。

为护士节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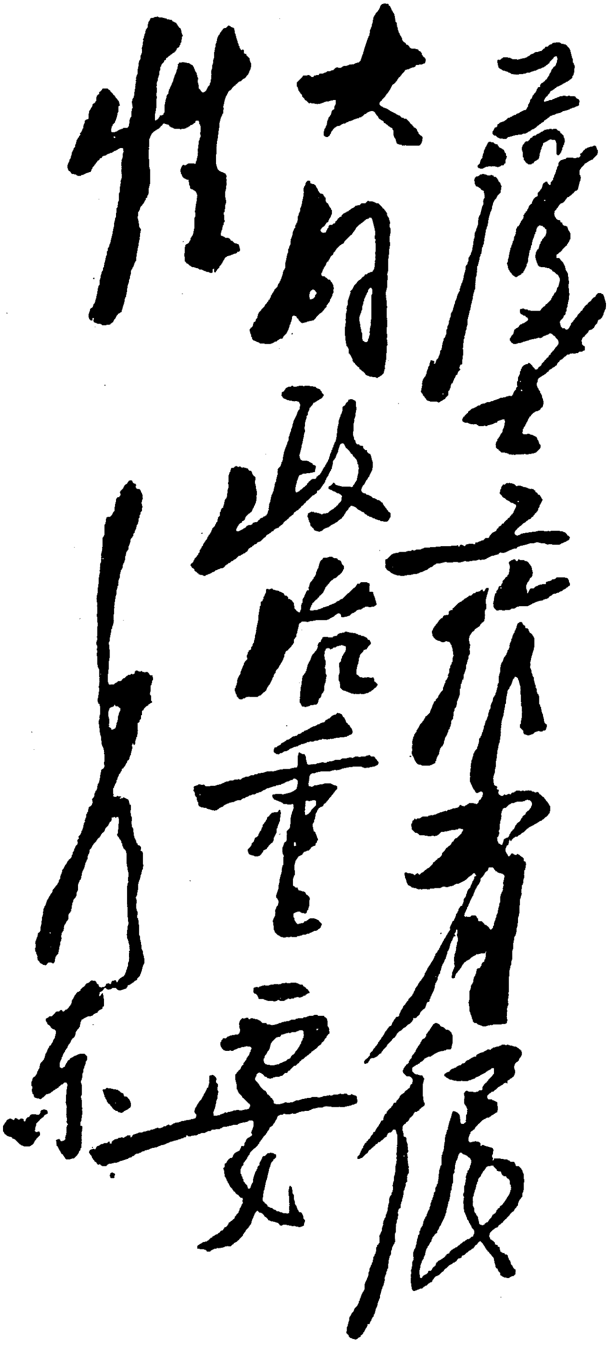
（1941 年 5 月 12 日）

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

毛泽东

---

[1] 1941年4月，延安中央医院护士发起成立护士学会，并于5月12日召开护士节纪念大会。这是毛泽东为护士节写的题词。



护士工作有很
大的政治重要
性
毛泽东

毛泽东为护士节的题词。

团结对敌有计划地配合友军作战

（1941年5月14日）

德怀[1]同志：

前电谅达。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2]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地配合。恩来[3]要求将晋东南、晋西北、五台、冀中、冀南、山东都包括在配合范围之内，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请加考虑作出一具体计划告我，以便转告恩来及总顾问[4]。盼复。（一切战报多发西安、重庆、延安）

毛泽东

寒酉

---

[1] 德怀，即彭德怀。

[2] 指1941年5月7日日军向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动的进攻。

[3] 恩来，即周恩来。

[4] 总顾问，指崔可夫。1940年12月后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和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关于华北我军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等问题的指示

（1941年5月14日）

恩来同志，并告德怀：

（一）各电均悉。

（二）已迭电前方配合作战。

（三）朱总已电熊彬，卫立煌，表示团结对敌，我已电伍永福[1]、袁晓轩向各方表示此意。

（四）判断国民党在此次打击后，不能不向我们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

（五）要告诉总顾问[2]及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他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东条陆相在今年一月议会中声明，重庆政府自前年冬季攻势以来没有打什么仗，只有共产军作了有力反攻，就是证据。

（六）已电德怀，要他周密考虑情况，采取主动地有计划地配合

---

[1] 伍永福，即伍云甫。

[2] 总顾问，即苏联顾问崔可夫。

行动，但决不为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冲动，此点亦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他将来还是要说的，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我们总是主动的，坚定的，有步骤的作战。

（七）李品仙的根据地立煌县[1]已搬空，洛阳西安纷纷搬家，恐慌万状，令人可恨可笑。

毛泽东
寒酉

---

[1] 立煌县，县名，今为金寨县。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5月14日）

（一）日寇准备大举进攻，我军决配合国民党作战。（二）对鲁斯[2]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表示我党坚决抗日到底，武汉失守后主要抗战的是我党，国民党打得很少。我党对内要求，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英、美联系的。

---

[1] 这是毛泽东致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2] 鲁斯，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作家和记者，1941年5月8日到达重庆。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5月14日）

据报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日军于日前由平民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如何望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电[1]

（1941年5月15日）

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

（1941年5月15日）

伍处长、袁处长[1]：

（一）敌军万一渡河时，你们须准备迁移，除笨重物件迁到适当地点外，云甫须同办公厅熊主任[2]一起，随时向他请示，并要求他保护。晓轩须同卫长官[3]一起。（二）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边区周围友军开至河防御敌后，边区八路留守部队坚持团结，仍守原防。（三）随时将国民党动向电告。

毛泽东

删午

---

[1] 伍处长、袁处长，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

[2] 熊主任，指熊斌，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办公厅主任。

[3] 卫长官，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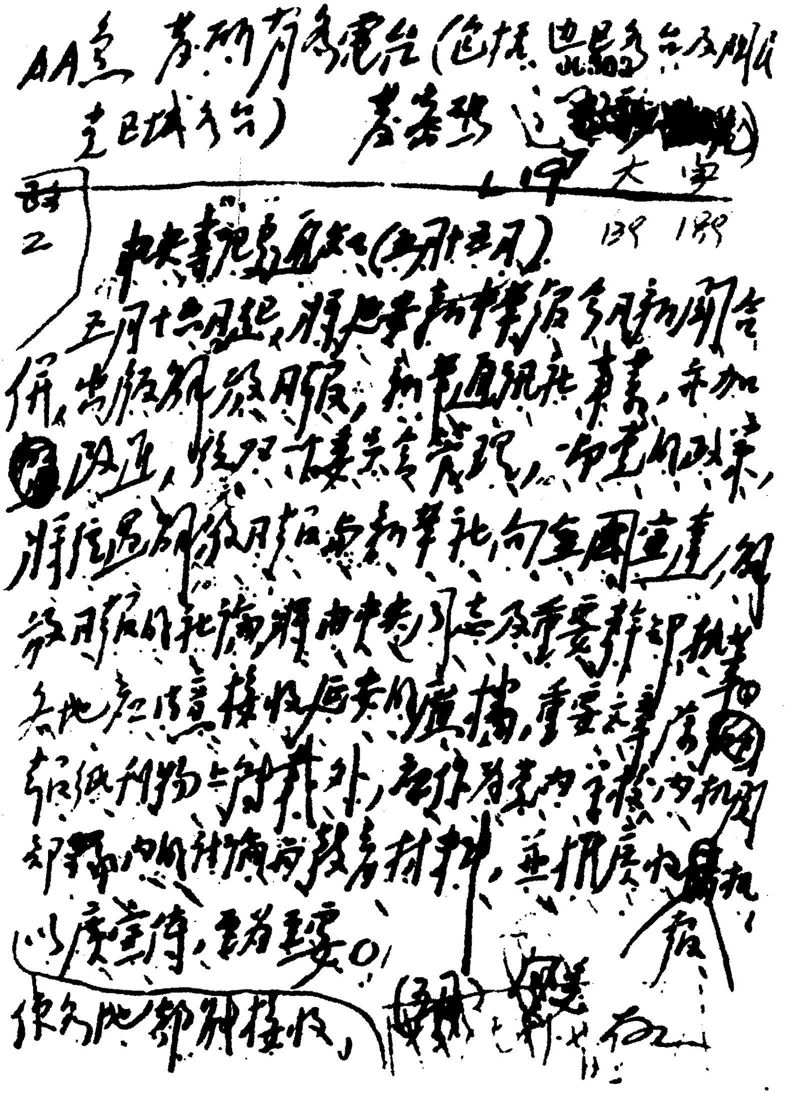
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1]

（1941年5月15日）

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

[1] 本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通知。



毛泽东起草的《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通知〉》的手稿。

延安《解放日报》发刊词

（1941年5月16日）

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

现在的问题是：世界是帝国主义强盗互相屠杀的世界，还是世界人民和平的世界？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中国？这些问题，在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世界范围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最后灭亡中国之时，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不卷入战争（美国实际上已经参战），战争已以全球为屠场，全世界人民如不奋起反对战争力争人民的和平，则世界有陆沉之忧，人类有毁灭之祸。现在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战的斗争已经发展起来，这是世界真正光明的所在，各国共产党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这一斗争将援助着中国人民的斗争，中国人民有与世界人民相联系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四年战争中不能解决的中国问题，它现在企图来“最后解决”了，一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加以轻视的意见是不对的，在这种意见之下，就是国共磨擦，就是反共高潮，就是两个战争。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磨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

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中国的外交政策必须是亲苏政策，虽然同时不放弃对英对美的外交。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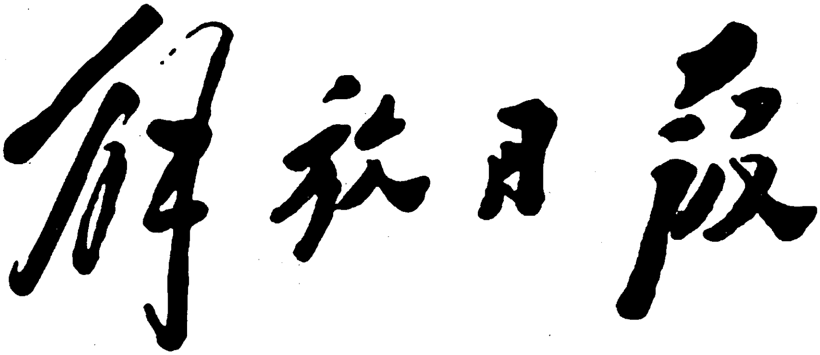
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是与人为善的，一切在抗日战争中犯过错误的人，中国共产党与以反省改悔的机会，仅仅对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人，方才与以坚决的打击。而这乃是完全必要的，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与以坚决的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头[1]

（1941年5月16日）

解放日报



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出版《解放日报》，并任命博古为报社社长兼主笔。《解放日报》报头4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当时他大大小小共写了7份，供报社选用。图为《解放日报》后来选用的报头。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1]

（1941年5月18日）

估计日本帝国主义动向的人，往往单从日对美急进派即法西斯派的主观需要出发，而忘记客观存在着的并且是主要决定日本动向的因素。三国同盟后，国民党人是这样的，其他人员也有是这样的。

目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样三个特点。对于这三大特点熟视无睹的人，或过低估计它们的重要性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

德国帝国主义已征服了苏联除外的整个欧洲，又向非洲近东发展，又在英伦三岛继续大规模的轰炸，又向大西洋发展其潜艇战争，这就表示着德国帝国主义有夺取世界霸权的趋势，同他争夺这个霸权的英美，不能不起而拼命，美国的迅速准备参战，就是这一形势的结果。在此形势下，英美的帝国主义计划，是集中力量对德。他们估计，只要英伦三岛站得住脚，他们就可以利用其海上优势，并恢复制空权，迫令希特勒的火头向东边烧，使之与苏联相摩相荡，天从人愿，有一天挑动了德国内部的反苏派，爆发了德苏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

争，他们的“计划”就“成功”了。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这就是他们的总方针。在远东，则利用三国同盟的内部矛盾，拆散东京柏林轴心，贿买日本，把日本拉到自己怀里来，再一次施行远东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与苏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配合其迫德向东的西方政策。所有这一切，就是英美帝国主义者的“锦囊妙计”。德国愈胜利，愈引起英美绅士们苦心焦思寻找德国弱点与日本弱点的努力，而一切文章，都想做到苏联身上去，每一次英美绅士们的危机，总是想从苏联身上打主意以求解脱，这是他们早已发明了的规律。对于日本，德国胜利给日本统治阶级全体以乘机图利的鼓励，因为他吸引着英美的精力日益向着大西洋而不是向太平洋。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统治者的三派（亲德意的法西斯派，亲英美的现状维持派，介乎二者间的中间派），虽则在政权分配上，各欲利用国际变动中每一不利于对方的形势，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在利用西方矛盾（英德、美德、苏德矛盾）以达日本扩展目的一点上，则是一致的，他们又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让希特勒去担负英美那一堆重担，让希特勒把苏联的注意力引到西方去，自己坐山观虎斗，然后乘机以图大利，他们认为是较有益的。日本在三国同盟中，和意大利之完全充当希特勒走卒不同，他具有着半独立的性质，仅仅与希特勒愿望相一致而与日本愿望相违反的命令，例如立即爆发太平洋战争之类，日本是不能服从的，日本的对华战争，日本的国力，日本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都不许可他这样做。这件事就产生最近数月特别是最近一星期来日本与英美间互相勾搭的若干喜剧。对于这类喜剧，只能从英美与日本双方都愿意暂时（不是说永久）避开太平洋战争一点来解释，不过一方是为着集中对德，一方是为着集中对华并对西方坐山观虎斗以

便将来乘机图利，这个区别而已。但这件事对于中国国民党的若干统治人物则是一瓢冷水，因为他们在三国同盟后是每天盼望着日美战争来救命的，他们的罗斯福不愿鉴怜他们的哀乞，日本的意图也和他们的愿望相别扭。围绕着德国胜利一事而产生的国际情况之变化，我们认为是应该这样来看的。

对于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很多人是估计过低的，有些人甚至这样觉得，似乎日本可以撇开中国不顾，一意南进，爆发日美战争。殊不知恰好相反，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正是这个巍然站在日本面前、日益觉醒、日益强大的抗战的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一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日本统治者在武汉占领后，两年半以来，实行着集中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的政策，但这个政策是失败了，共既越打越巩固，国亦投降而未降。所可惜的，是我们友党中的统治人士们，不于此时期内修明政治，加强团结，却于此两年半中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抄袭日本人的做法，来一个集中反共，放松对日。其意若曰：我用全力反共了，你们日本人可以放手去同美国开战，不要向我再进攻吧。但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听这些话的，他要的是全中国，他不但要“反共”，而且要“灭党”。日本人说：要我不进，除非投降，除非爆发全面的国共战争，单单一个皖南事变是不够的。真的，皖南事变后，日本人确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挑拨国共战争。但由于共产党中央的力维大局，加上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物也不愿上日本的当，日本的挑拨伎俩是破产了，迫得他调动军力来作他所不愿意的冒险的进攻，这就是近日突然紧张的战争形势之由来。我们可以断定地说：由于国共团结与日益发展着的人民抗日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火焰，只会越烧越高，日本

帝国主义将葬身于中国大火之中。自然，这件事帮了英美一个大忙，替他们牵制了日本的南进，便利于他们集中对德。但他们是并不爱惜中国的，他们是损人利己的帝国主义者，只要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他是愿意给与日本很多东西的，橡皮呀，油呀，棉花呀，机器呀，应有尽有，还在其次，甚至牺牲中国与荷印，也是放在罗斯福丘吉尔之锦囊里面的，远东慕尼黑的新危险，决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神经过敏之谈。可是只要中国争气，撑持下去，日本的旄头尽管西向，我们的火炬却大堆东抛，来一场伟大的决斗，战胜日本是完全有办法的。伟大的中国缠住了日本，使他只有暂时避开太平洋战争。基本上决定着日本动向的是中国，就正如基本上决定着中国动向的是日本，不过是一件事的两方面。

说到苏联的和平政策，那可以说，这是整个世界的制动机，他的力量将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阴谋。英美幻想的希特勒烽火东烧也好，其他任何反苏阴谋也好，都将有一天被人看得见是一堆被打得粉碎的破铜烂铁。赫斯出奔，证明英美最近一次大阴谋又已失败，德苏新谅解又已成立，欧洲新慕尼黑危险又被打破，这是斯大林祭起了“东风”的胜利。西方如此，东方亦然。尽管英美又弄什么新的远东慕尼黑，把他们在日本的在中国的一切徒子徒孙们通通调动起来，也是无济于事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去。英美要拆抗日战争的台也是不行的，中国的抗日火炬自有斯大林来加油，并且是靠得住来加的。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冒冒失失地向中国西境乱撞乱碰，便将靠得住得一个焦头烂额，因为中国不但有一个并未被破裂的国共合作，还有一个日益增长的中苏合作。对于苏联的和平政策熟视无睹，或估价过低，也是确定地不正确的。

日本就不南进了吗？他是要南进的。但目前他第一要西进，他

妄想先解决中国问题。他想利用目前的时间，让希特勒向英美猛打，他却向中国猛打。他企图割断中国西北西南两条交通路，并打通平汉线。一阵猛打之后，他必又来一阵软攻，策动他的第五纵队（何应钦之类），大施拉拢手段，以达诱降目的，一打一拉，仍是日本的两大法宝。估计到某种时机，又有可能来一个投降危机，我们现在就应该警惕。日本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这样的：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解决或大体解决中国问题，等到英美更加无法顾及东方了，要就是你们爽快地将太平洋交给我，要就是我向你们动刀枪，总之那时我是“如意”的。对于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主观算盘，都不可看成为结果，他们的主观算盘与最后结果之间，或者是根本相反的，或者是相差甚远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算盘也当作如是观。他又要“先解决”我们了，让他再来一次吧。他对中国的所谓“计划”，不知失败了多少次，让他再失败一次吧。这是完全可能的，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世界究竟是谁人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说一定是他们的世界，而人民则说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他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对的，正确的，只会是人民，只会是我们，而决不是敌人，决不是他们。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是有一切胜利把握的。

改造我们的学习[1]

（1941年5月19日）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这篇报告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很快地在中国共产党内和党外引起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1931年年初至1934年年底这段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日战争以来，我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日战争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进一步了，研究中国历史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

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和国际的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精神的作

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认真地研究情况，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一真理。

其次来说研究历史。虽则有少数党员和少数党的同情者曾经进行了这一工作，但是不曾有组织地进行过。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其次说到学习国际的革命经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

上面我说了三方面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地周密地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

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1]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2]，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

---

[1] 富县在延安南面约80公里。

[2] 边币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是1935年以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四大银行（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依靠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所发行的纸币。毛泽东在本文中所说的，是指当时边币和法币之间所发生的兑换比价变化问题。

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当然，上面我所说的是我们党里的极坏的典型，不是说普遍如此。但是确实存在着这种典型，而且为数相当地多，为害相当地大，不可等闲视之的。

三

为了反复地说明这个意思，我想将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对照地讲一下。

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

综合的研究[1]。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有一副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

---

[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在这篇跋中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副对子记下来；或者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壁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

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

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地周密地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1]。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

---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九部分《工作作风》(《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275页)。

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如果有了这种态度，那就既不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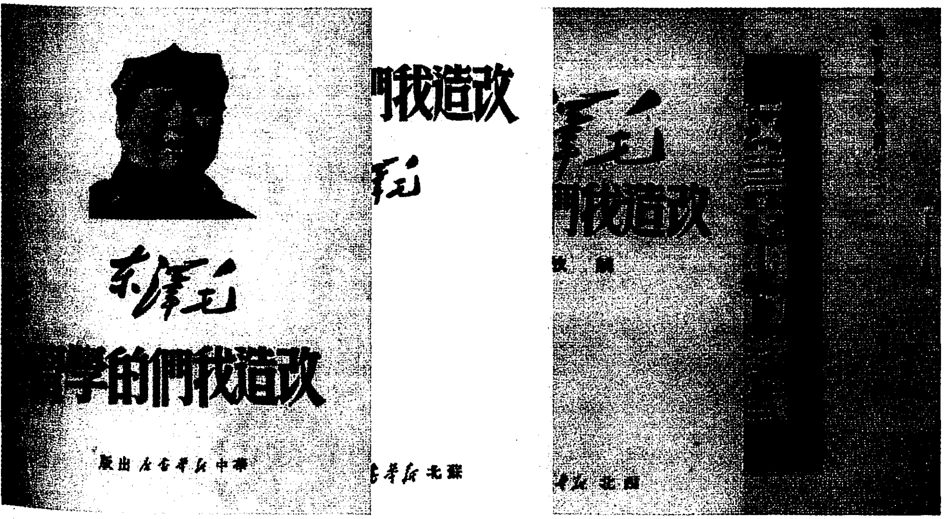
依据上述意见，我有下列提议：

（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例如关于宣传工作，如果不了解敌友我三方的宣传状况，我们就无法正确地决定我们的宣传政策。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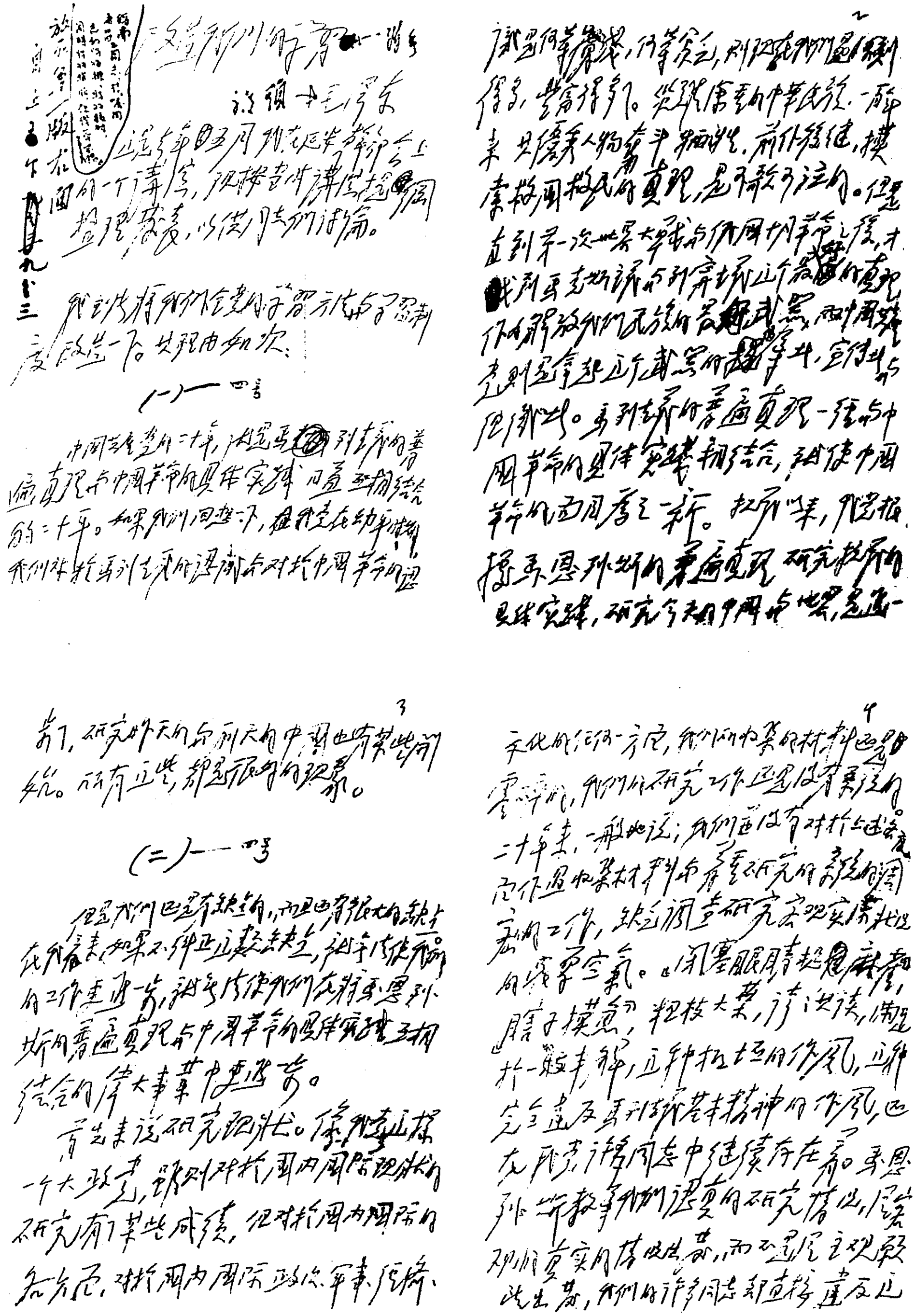
（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在如此生动丰富的中国革命环境和世界革命环境中，我们在学习问题上的这一改造，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结果的。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部分版本）。



[illegible]

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话

讲稿　毛泽东

这是去年五月间我在延安干部会上的一个讲演，现按当时讲演提纲整理发表，以供同志们讨论。

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四号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列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

2

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来，先进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列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抗战以来，我党根据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战的具体实践，研究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是进一

3

步了，研究昨天的和前天的中国也有某些开始。所有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

（二）——四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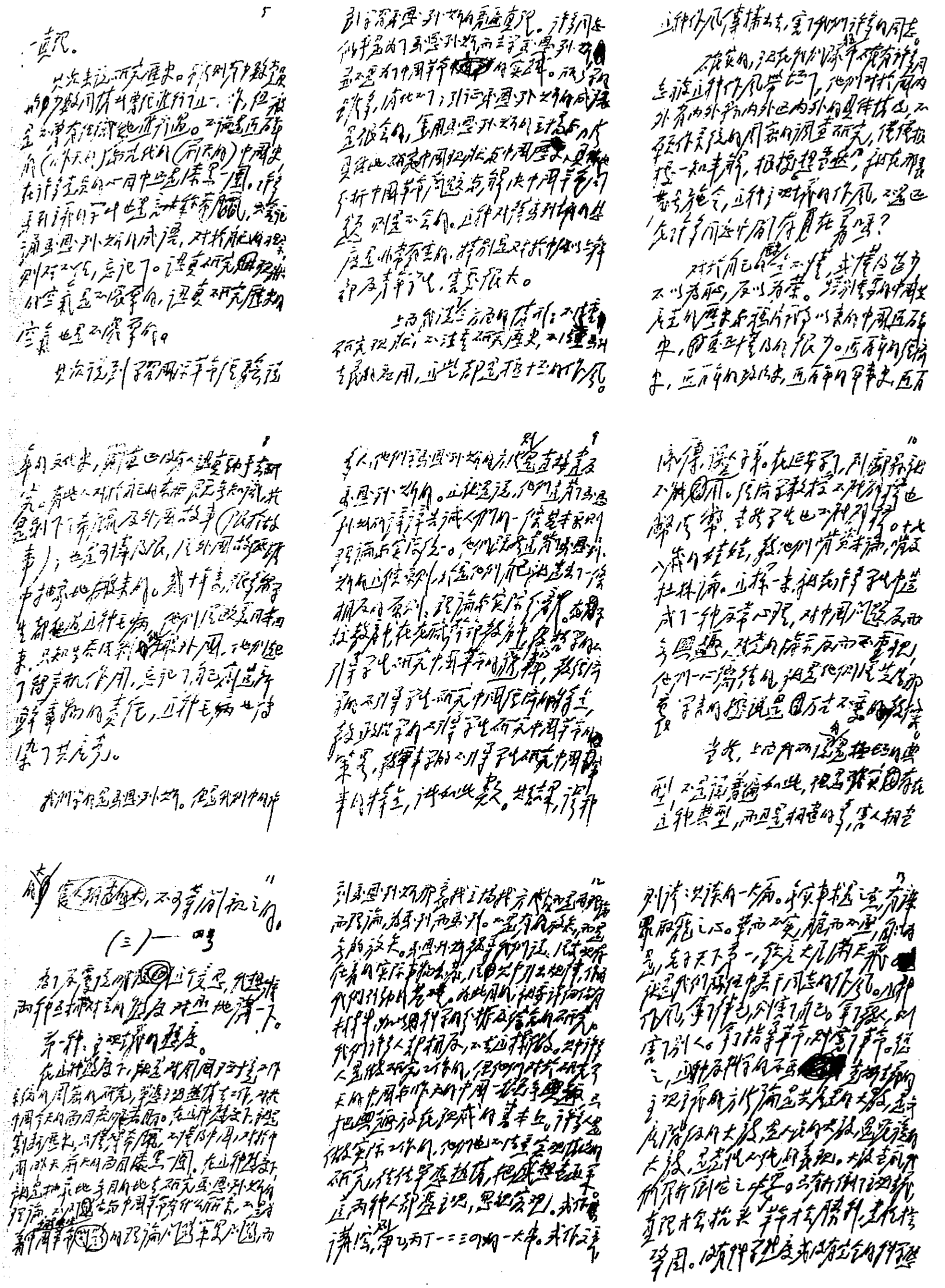
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在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些缺点，就不能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不能使我们在将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

首先来说研究现状。像我党这样一个大政党，虽则对于国内国际现状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绩，但对于国内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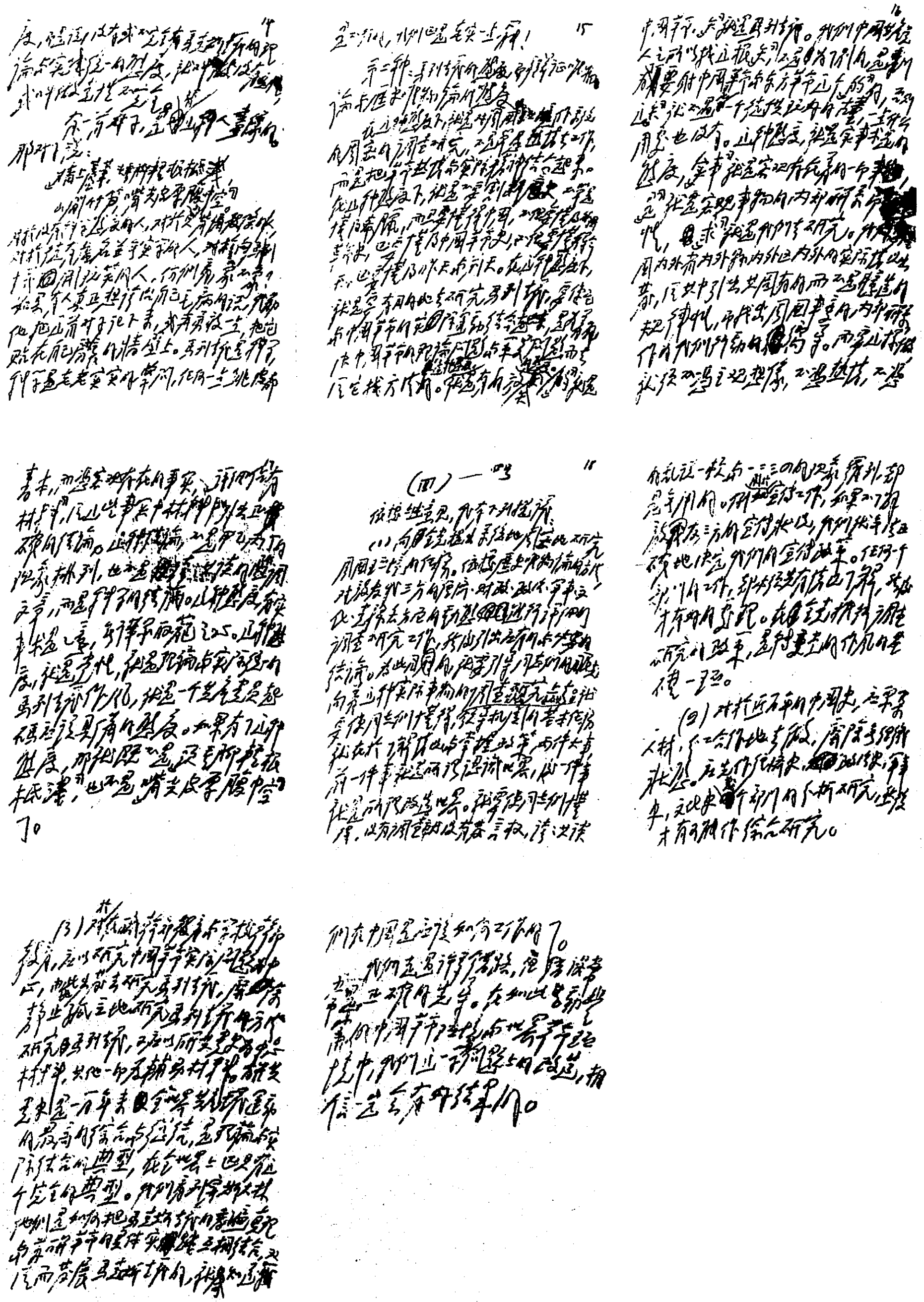
4

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风，这种完全违反马列主义基本精神的作风，还在我党许多同志中继续存在着。马恩列斯教导我们认真的研究情况，从客观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的许多同志却直接违反这

毛泽东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手稿。



毛泽东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手稿。



毛泽东撰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5月20日）

大革命时期恽代英领导青年团是搞广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狭小的组织是错误的第二党方针。抗战时期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组织问题上有缺点。现在群众运动发展了，我们的观点还落在后面。群众生活是广大的，我们了解的很少，主要错误是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我们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中央青委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过去对掌握政策注意不够，而且要注意了解群众要什么政策。青年工作要提高一步，不是要搞基干组织，这次讨论否决了基干组织，而是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把落后群众提高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何凯丰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谨防扒手*

（1941年5月23日）

自从晋南战局紧张，全国军民，固无不淬砺奋发，若干幻想日寇侵华战争可以照原状不了了之的人们，也颇有如梦初醒模样。忧时之士，群以为中国的抗战大业或者会由此一变已往长时期的龟步，而得至到迅速地开展了。

但是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关系，还不容许我们立刻如此乐观。在我们的面前还存在着一大串问题，要求我们严重地警戒和密切地注视。其中尤其耐人寻味的，就是：在英美对德手忙脚乱的今天，其拍卖中国以换取日本让步的远东慕尼黑阴谋已经最后放弃了吗？在日本最近对中国的新进攻与大轰炸的合奏里，会不会有出卖中国人民的“绥靖”乐曲在旧调重弹呢？不估计到这些问题就一味乐观起来，是危险的。

如同□□□所说，英美对于中国，一向就缺乏援助的诚意。英国对日妥协的危机，就是平素与英国来往还最密切的人物现在也不能不承认了，但是美国这位朋友的真面目，可惜许多人还是茫然。特别是在三国同盟以后，美国援华似乎起劲了些，虽然这种援助较之中国的需要是杯水车薪，较之苏联则望尘莫及，而朝野亲美援美之声，却颇已洋洋盈耳。这些先生们的眼睛自然是看到了他们所愿意看到的东西，但是却决没有看尽了他们所应该看到的。美国对日

本取消锌与橡皮的输出限制，在美国影响下的荷印与日本缔结煤油协定，日本国内英美派的暗中活跃，在表示美日当局双方的激烈词令，只是词令，“政策”还是政策。如果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实际大于其对中国的支持，则美国的援华姿态谁敢断定不是和日本的南进姿态一样，只是觅寻美日妥协的一种必要的手腕？谁敢断定，在远东慕尼黑阴谋的死灰再燃时，我们的全国拜物教的教徒们能逃脱兔死狗烹的悲剧？

美联社十一日透露的中国当局关于日本也欲和平必须经由美国提出条件的声明，以及苏联报纸十八日所揭发的日本正在“经由美国”调解中日战争的消息，十九日松冈招待美驻日大使格鲁于私邸，日情报局发言人并称格鲁极为仁爱，不幸证实了这种危机的存在。我们相信，已经英勇抗战了四年，拥有如此强大的抗日人民、抗日政党和抗日军队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出卖，不允许被出卖的，中华民族任何有骨气有自尊心的领导人物，即令在美日妥协实现时，也是不甘心做汪精卫第二，躬蹈身败名裂、众叛亲离的覆辙的。但是我们愈有击破这种阴谋的信心，就愈有击破这种阴谋的必要。我们提醒全国的军民说：在我们走向胜利的路上，不仅荆棘丛生，而且路旁随时有扒手在窥伺着，想乘我们的不备，窃取我们奋斗的果实而去。对于戴着朋友的面具的扒手，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警惕！

我们更要正告美国当局和国民党中一部分惟美国马首是瞻的先生们说：中国人民毫不迟疑地欢迎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种援助愈多愈快愈实在愈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民从来就是懂得以朋友之道对待朋友的。但是他们同样懂得怎样去对待扒手及其同谋者的。这岂不合于你们所最爱鼓吹的“公道”（Fair

PIay）吗？其中国人民是已经长成磐石了，但你们却硬说还是皮球，你们一定要踢开就请踢踢看吧。可是，留心你们自己的高贵的足趾。中国人民是要顽强地战斗下去的——直到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日！

延安评论家对时局之评论*

（1941年5月24日）

（一）最近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调动兵力企图对我作重大新进攻，但另方面却在策动诱降的新阴谋。军事在前方紧急，而和谣又盛于港沪之间。日寇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在同时双管齐下。（二）某些帝国主义当局也还是两面政策：一方面给我一些微弱的援助，另方面则继续进行对日妥协谋我投降的勾当，关于远东慕尼黑的新阴谋已从纽约交易所泄露到全世界。松冈格鲁的会谈不为无因。（三）重庆若干当局也仍是两面政策：一方面继续抗战局面，另方面却还没有阻塞妥协的门路；一方面愿与八路军配合作战，另方面又还不放弃反共政策，不肯给八路军接济，并继续制造反共谣言。此种两面政策遂致对于抗战没有办法，并容易发生悲观情绪，助长混乱局面。最近合众社、海通社及其他通讯社所散布关于远东“和平”的消息，均未被中美日有关当局所否认，所以时局亟需国人注意，而克服各种可能危险的关键，固不在外而在内，即在国民党当局能毅然放弃有害抗战团结的两面政策是也。

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1]

（1941年5月25日）

（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二）日本帝国主义以迫蒋投降为目的的军事进攻，现已告一段落，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活动。这是敌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政策的重演。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三）日本和军事进攻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例如所谓“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八路军乘机扩大地盘”“打通国际路线”“另立中央政府”等等。这是日本挑拨国共关系以利诱降的诡计。国民党中央社和国民党报纸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传互相呼应，其用意所在，甚为可疑。我们也应揭穿它，反对它。

（四）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关于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电[1]

（1941年5月25日）

日军发动此次小规模战争，现华中、华南已退返原防，晋南亦无大战，证明其目的仅在吓蒋，此次进攻似已至结束期。

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涨，日、美、华妥协反共反苏反德的阴谋正在东京与华盛顿交换意见，国民党两星期来对国际局势一言不发，而只宣传共产党如何不配合作战，可见其正在沉机观变中。

在此时局动荡之秋，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因此我军各首长必须严格遵照中央二月一日指示[2]不得随便发表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中央1941年2月1日关于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的规定。内容如下：一、凡无中央及军委及总政治部之指示，各将领各政治部一概不发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二、各地各军上级机关在未得中央及军委同意前，不要命令各部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三、以后各将领、各中央局发有全国意义之通电、宣言及对内指示，须先得中央及军委同意。

给王履孚、甄玉莹等的信[1]

（1941年5月25日）

比接正月十二日大札，具见关怀祖国，力主团结抗战，钦佩良深。

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

所可告者，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

---

[1] 这是毛泽东复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信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5月26日）

一

目前西方慕尼黑阴谋，已经暂时被打破。由于德国对英战争的不断胜利，使英、美对日将有更大的让步，以便集中力量应付欧洲，因而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仍然存在。蒋介石在今年四月以前是以皖南事变来缓和日本的进攻，当时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企图以向我进攻来取得日本的停止进攻。最近日军对华的进攻是“游击战”，目的在于逼蒋投降，没有准备进攻洛阳与西安。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问题的办法尚未完全确定，国民党的态度也还未决定，最近三个星期没有发表谈话。我党应积极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

二

过去习惯对外宣传不统一，表现在各根据地宣传政策不统一，今后要统一起来。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统由秦邦宪负责。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关于党的对外宣传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卫立煌电[1]

（1941年5月26日）

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美国是靠不住的，日、美、华妥协阴谋必须拒绝。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

赞同卫长官与胡宗南先生会见，时间约定后，我们即派南汉宸来洛，共商团结对敌大计。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卫立煌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26日）

对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暂时应置之不理，你意与我们一致。

卫立煌对我积极配合作战甚为兴奋，他提议约胡宗南在洛阳会见，并派车接南汉宸去，共商团结抗战大计，我们已复电同意。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5月26日）

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

为答复国民党造谣污蔑，新华社已予以反击（反将一军），待国民党语调好转我亦放缓和此。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谣言与烟幕*

（1941年5月28日）

造谣惑众是市井无赖的惯技，而政治流氓就把这种卑劣的手段用之于政治斗争中，竟自称曰：“散布合理的流言。”

在社会政治斗争中，先进的阶级和先进的政党，它们手中握着正义和真理之旗，不害怕公开和坦白的向着广大的群众宣布自己的政纲、目的，表明自己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行动的方向，进行公开和严肃的斗争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他们用不着玩阴谋、耍手段、造谣言之类的下流无耻的办法，因为他们有自信：真理是在他们方面的，它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所以，它们的行动，光明磊落、坦白严肃。而那些政治流氓们，因为要维护其违反真理和正义的私利，而自知他们的主张、纲领、政治任务和政治目的是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欢迎的，所以不敢堂堂正正地行动，只能鼠窃狗偷，鬼鬼祟祟，因而玩阴谋、耍手腕、造谣言之类，就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造谣言——或者“散布合理的流言”，就为他们所癖爱，因为在公开坦白的政治斗争中既斗不过对手们，那么只好乞援于造谣了。何况，古书上说过，“曾参杀人，慈母投杼”，诗人亦唱过，“三人成市虎，浸渍能胶漆”，其效力不是很大吗？

不仅如此，谣言也还有别的作用，就是遮眼罩和烟幕弹的作用。不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吗？当一个小偷偷了东西之后，被人发

觉，大呼捉贼。此君急中生智，亦高叫“贼在那边，在那边！”竟得脱身。政治上的没落人物在做亏心事的时候，亦常常借谣言来转移视线，来隐身的。

这种“造谣术”的最近例子，就是所谓：“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不与友军协同作战”的广泛地有计划地发布的流言。这个谣言的最初散布者乃是专长此道的个中老手——同盟社。日寇于本月初发动了一个小规模的军事攻势，而同时却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谣言攻势。同盟社的广播连篇累牍地散布各种谣言，尤以八路军决不与中央军协同作战，八路军集中陕北准备乘机向西安出动，八路军乘机扩张势力收缴中央军枪械之类为特多。日寇这种军事攻势和谣言攻势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一个字足以尽之，曰：吓！或者说吓降，军事攻势在炫耀其兵力，其意若曰：你若不降，我将占你的故乡，占你的一切海口，歼灭你在中条山的几十万军队，进占你的洛阳、西安、昆明、重庆，你怎么办？谣言攻势在挑拨国共关系，描画一幅黯淡的画图来吓你说，你看国共关系恶劣至此，自力更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快降吧！“八路军不打日本”之类的谣言是烟幕，吓降诱降是目的。其技至浅，其理至明。

奇怪的是某些中国人，不是汪精卫之类双料的汉奸，而是抗战营垒中统治阶层里的某些风云人物，竟然亦一字一句地抄写同盟社的广播来替它作一次义务的传播。像大公报和中央社这类新闻机关，居然一方面说：“敌方所传大部出乎捏造自不能信，”另一方面又重复着“敌方所传”，称“十八集团军集中晋北迄今尚未与友军协同作战则为事实”。日本人一个钱不花，就有中国人义务地替他的谣言当留声机和见证人，宁非怪事！

可是“怪事”实际上是没有的。只要懂得我们上述故事中的贼

的急智，就可以理解这次谣言唱和中的“机”了。重庆军委发言人在本月二十三号就多少泄露了这个“机”的一部分，他说：“上周寇军全面发动，总计达三十万人之多，其结果不过如此，以此种方式而侈谈解决‘中国事变’，不但世无相信之人，即敌寇亦自知其不可能也。”这不就是说，此种（军事进攻）方式是不能解决的，换种方式吧！果然，同盟社接着就纷纷报告曰各战线军事当局均称第一期作战已结束。谣言唱和，这次竟完成了红叶题诗式的媒介作用。可惜的是，香港的一部分参政员竟为这个小小手法所迷惑。

我们认为在这里无须再事“辟谣”了，因为八路军共产党人对于抗战的坚持，对民族的忠忱，是决非谣言所能摇撼的事实，是不怕火烧的真金。尽管新四军被宣布为叛军，八路军两年没有领到一颗子弹，五个月没有领到半文制钱的饷项，然而新四军、八路军的将士们，没有一分钟停止过和敌人苦战，而为着策应晋南作战，八路军在华北正在全线出动浴血酣战。这是连造谣的人和传布谣言的人心里都深知的事。其所以造谣和传谣，都是别有怀抱的。

其怀疑为何？在造谣言者为诱降，在传谣言者为投降，而都想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共产党成了他们题诗的红叶。日本人当春兴大发时，题诗一首于其上，从长江漂将下来，这边的人儿得了诗，果然打动春心，跃跃欲试，拾起红叶，转题一首，又从长江漂将下去，这就是同盟社与中央社近日抓着共产党问题一唱一和的由来。还有德国的海通社、美国的合众社、英国的路透社，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将双方的情报到处传播，其目的均在“催装”，不过英美是为着反共反苏反德，德国是为着反英美，这个不同而已。“你们赶快结婚吧，好去发动太平洋战争”——这就是德国的目的。“你们赶快结婚吧，好造成反共反苏反德的东方慕尼黑”——这就是英美的目

的。我们不能不忠告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员们，这种结婚乃是“劫婚”，将来是不好过日子的，理应拒婚为上。从共产党身上做文章，也是做不出好文章的。不信，你们瞧吧！

全中国的同胞们！注意在这种谣言烟幕遮盖下的投降危机呀！远东新慕尼黑的极大危险在一天天的增长。以“吓蒋投降”为目的的这次“军事攻势”，现在是暂时的过去了，继之而来的必然是诱降。这虽是日本人“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老把戏，但却包含着新意义，因为正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月的时机中。全国同胞起来揭破他、粉碎他，乃是民族生命所关的巨大任务！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30日）

二十七日罗斯福炉边谈话[2]仍具两面性，即迫德妥协与准备参战。对东方仍含日、美妥协阴谋。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炉边谈话，也称炉边闲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当时发表施政演说的一种方式。1941年5月27日，罗斯福发表炉边闲话说："美国之国策首先就是当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威胁西半球时，美国必须在任何地区积极反攻之"。又说："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同时亦不能容忍上次世界大战后即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的世界"。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

延安评论家称炉边闲话具有两面性*

（1941年5月30日）

此谈话具有两面性，即迫德妥协与准备参战是也。目前的帝国主义战争已发展至一历史上之重要关节，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面前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或者是长期战争，则其结果有摧毁资本主义，引起世界革命的可能，或者是帝国主义和平，则可能将目前的战争转变为反苏战争。自赫斯出奔，德国内部的反苏派失败后，英美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受一重大挫折。但此阴谋并未死灭，英美目的仍在巩固制海权，恢复制空权，压迫希特勒火头向东边烧。他们知道希特勒所畏唯美，故罗斯福发表此次谈话，并宣布非常状态以吓之。谈话中有“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亦不能容忍二十年代之世界”一语，就是表示只要希特勒不攻英伦，不要制海权，可以容许他支配欧洲，取消凡尔赛束缚，求得帝国主义和平，以便进攻苏联，否则便将向德宣战，这就是迫德妥协的作用。但希特勒不但畏美，尤其畏苏，赫斯出奔后，德苏间已有新谅解存在，地中海战争异常激烈，英伦有入侵可能，丘吉尔告急之电必如雪片，美国统治者不得不计划在迫和不成后准备实行参战之一着，故罗氏谈话又有准备参战作用。罗氏谈话还包藏了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据同盟社称：罗斯福在谈话中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又称：“谈话范围意外狭小，乃为集中对德”等语，均是为日本留余地，实

包含着日美妥协牺牲中国的极大阴谋在内，深堪注意。我国王外长二十八日所发之声明中，口口声声“感激”罗斯福，全无警惕之意，实属不妥。在美国没有最后证明放弃远东慕尼黑阴谋以前，吾人之任务乃在提防被人出卖，至于“感激”，尽可不忙云。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5月31日）

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赫斯走后[2]略见好转，且看下文。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赫斯，德国国社党副领袖，于1941年5月只身一人驾驶一架战斗机自德国出奔英国。赫斯素与德国的倾向西方的路线有关，反对与苏联谅解。

为“抗大五周年纪念特刊”题词

（1941年5月）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为陈叔亮《解放区速写》画册题字[1]

（1941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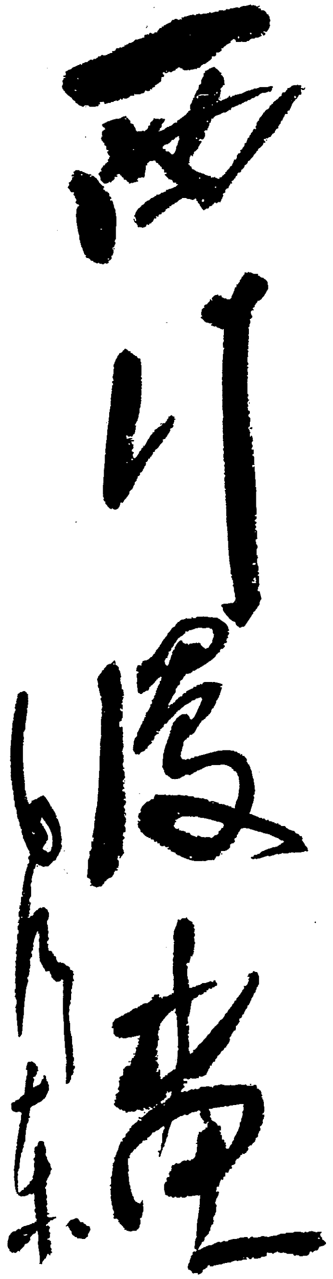
西行漫画

五里烟村雾里滩，看山容易画山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

毛泽东

---

[1] 陈叔亮（1901年—1991年），原黄岩上陈村人（现属路桥区），当代著名书画家、艺术家。1938年秋，他离妻别子带着青年学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校进行美术教育达八年之久。其间，他以革命斗争生活内容为题材所创作的《解放区速写》漫画册，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为画册题字“西行漫画”，并题词转录宋代画家李唐题画绝句：“五里烟村雾里滩，看山容易画山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赠予陈叔亮。



面向群众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陈叔亮的《解放区速写》画册的题字。

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

（1941年5月）

一、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着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进行，克服违反经济政策的行为与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本位主义，并以此教育各兵团及机关学校连队做到先公后私。

二、提倡现品自给，并立即采取下列方法以增加必需品的产量：

A. 各机关部队均应将日常工作与生产劳动分开实行部分的兵工政策。

B. 各机关部队均需就驻地附近（留守兵团则在直罗镇，三五九旅及直属队则在南泥湾及延安附近）立即加紧夏耕工作，积极经营农业生产，多种秋菜，多饲牲畜，保证全年的全部蔬菜油料及肉食自给。

C. 为了压低草料价格降低运输费用，各机关部队必须立即准备秋初的割草运动，保证马草自给，并进一步地做到有剩余的草料出卖，每人割干草五十斤，惟不可侵犯人民的私草。

D. 为了保证办公纸张的现品供给，各机关部队必须善用一切

闲散劳动力，立即从事收割马兰草、芦草、蒲草，和收集废纸破布烂麻绳汇交各造纸厂（直属队则交经济建设部纸厂），并酌给现品或现金为酬，一并责成经济建设部拟定具体办法另行公布。

E. 盐及油墨墨汁概由供给部发现品。施行日期另行公布。

三、加强后勤所属各工厂的生产：

A. 由各部队抽调战士参加后勤供给兵站各工厂生产运输业，以增加其生产量及运输力。

B. 立即登记各种技术人材，汇报经建部，并不得隐瞒不报。

四、彻底实行贸易政策：

A. 一切公营商店必须一律加入公营商店联合会并接受贸易局的领导。

B. 严厉取缔一切公营商店投机操纵黑市取利的行为。

C. 整理公营商店。

甲、军事系统所属的公营商店统限于六月底以前重新向建设部登记。

乙、采取自愿原则的合作联营，减少门市单位。

丙、商业资本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超过此限资本必须转到手工业农业方面去。

丁、如有愿意迁到保安定边沿途开设的公营商店由后勤给以运输上的便利。

五、各机关部队必须随时将执行情形报告本会。

军委　毛　朱　王　叶[1]

---

[1] 指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延安评论家之评论

（1941年6月2日）

此为在远东慕尼黑阴谋酝酿中之一件有趣的插曲，其目的在以远期的空头支票来模糊中国人民对当前被人出卖的现实之危险认识与警觉。可是此种把戏也许会引起某些中国的金元拜物教徒之感激或拜服，然而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只会更增厌恶之感。他们将对山姆大叔说，与其你开这类远期空头支票，毋宁立即停止以石油钢铁及其他武器输日，不作日寇屠杀中国人之帮凶为愈。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6月6日）

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给凯丰、胡乔木的批语[1]

（1941年6月6日）

关于过去青年团，将白区、苏区加以区别，似更好些，如同意，请给洛、弼一阅。此决议抄正后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发广播，个别地方（包括重庆、香港）还发战报台。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草案给凯丰、胡乔木的批语，这个草案曾经在6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6月7日）

目前大局，可能德国继续反英反美，美国参战，造成长期战争；中国则继续国共合作，造成长期战争，长期磨擦。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准备继续四年的长期战争。现在华北、华中要支持长期战争，就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七分政治，加紧敌伪军工作，不要像百团大战那样硬打。现在国民党的方针，也不是大打，桂系将采取守势，日军将继续进攻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 年 6 月 7 日）

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暂勿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1]

（1941年6月9日）

德怀同志：

（一）拟了给卫[2]一电，如同意，请拍给袁晓轩[3]。

（二）袁处长转呈卫长官钧鉴：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西安可能。八路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友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4]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5]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然此建议，在不谅解德等苦心之人，或以为出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彭德怀的电报。

[2]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袁晓轩，当时任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

[4] 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即今北京至武汉、北京至天津、天津至浦口、北京至沈阳、北京至包头、正定至太原、山西祁县白圭至晋城（当时未完成）的铁路。

[5] 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于乘机扩大地盘之目的，实则真欲保卫郑、洛、西安。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1]，其明证也。德等对于两党两军关系，实望有所改善，而绝对不愿增加故障，故对胡宗南[2]兄所部从宜川、洛川一线撤往河防，即已谆嘱边区留守部队不得侵越原防一步。而对中条及三角地区方面明知有利于制敌，亦不许敝部自由行动，皆所以免误会，图合作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可否恳兄予以考虑并转呈委座予以鉴核之处，出自钧裁。抑犹有须声明者，在委座及吾兄批准上述建议之场合下，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在上述建议不蒙批准之场合下，敝军仍然担任远后方之配合，亦决不有所推诿。谨此奉陈，敬祈裁示。弟朱德彭德怀佳。

（三）估计到上述建议可能不同意，我军仍须在不可不打（即必须打）又不可打得太凶（如百团大战[3]那样）的原则下部署远后方

---

[1] 中条山战役，1941年5月，日军在山西省西南部中条山地区发动进攻，后国民党军溃退，日军随即占领中条山地区。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3]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出动100多个团，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攻克敌人据点2900多个，歼灭日、伪军4.6万多人。

及近后方之配合。

毛　朱
佳午

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1]

（1941年6月9日）

刘、邓，并彭、左、罗：

（一）敌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立足困难。

（二）击破这种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

（三）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荫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动，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我党我军应帮助民众想出这些办法应付敌人，只有如此才不致使群众脱离我们，打破敌人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

（四）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

（五）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派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并告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电报。

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荫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荫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总之，愈能保存自己，团结人民，孤立日寇，就愈能长久坚持。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道转弯的办法都是有害的。

（六）健强由当地干部率领与地方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地方武装是坚持平原的基本条件，特别是这种三角地带其作用更为重大。若无此种地方武装，单靠把主力分散去进行游击是困难的。

（七）你们灰电的精神应该改变，同时希望你们严格检查在平原地区内这方面的政策，我们觉得在平原某些部队中最近发生的不断叛变情形与此是有关系的，必须引起你们的严重的注意。

毛　朱　王　叶

九日

目前我党方针是拉蒋抗战[1]

（1941年6月12日）

朱，陈、罗，黎、罗：

据报：我一一五D六八六R[2]及东进队一部曾于号日向仁和庄一带之张师王团进攻，我某某二团及沂蒙支队约二千，皓日向青沙湖唐家林一带常师蒙旅进攻，又一部约三千敬日向陈庄某家城新三十六D[3]进攻，我许、鱼、彭[4]等部约五千分向开城某山屋基一带赵师进攻等情。是否有此等事，请查复。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此种进攻行动，希即停止。并告彭、左，陈，刘[5]。

毛　朱　王　叶

六月文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给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的电报。

[2] 即一一五师六八六团。

[3] 指新三十六师。

[4] 许，指许世友。鱼，不知是指谁，疑原抄件有误。彭，指彭嘉庆。

[5] 指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

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1]

（1941年6月13日）

抗大总校在目前各分校极端分散而又遥远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领导，事实上各分校在各地区兵团的直接领导下仍可进行教育工作，教育方针与教材等归军委第四局负责，因此我们意见取消总校，将总校改为一个分校。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征求对取消抗大总校的意见致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财政预算问题给林伯渠[1]的信

（1941年6月13日、15日）

林老：

预决算看了，今付还。

此类情况，以后请随时通知我，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

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

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概允，使受者得所。将来要塌台，让他塌去（实际上不会塌的），此时不与断断计较。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此次预算内无军队部分，以后请添进去。是否有当，还请卓酌。

并致谢老[2]。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夜

---

[1]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2] 谢老，指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又陈者：（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出报前没有人能预计者。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例如康生处[1]月用57,000元，只支12,000元，自筹45,000元，要把此数也打进去。大概公支只三分之一，自筹占三分之二。预计算中遗落此种部分是不合实际的。因此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以上各点，就感想所及，书备考虑。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

[1] 指当时康生任部长的中共中央社会部。

国民党缺少什么

（1941年6月17日）

国民党缺少什么？飞机大炮吗？干部人才吗？抗日办法吗？是的，这些都不算顶多，但是最缺少的，却是民族的信心。

国民党的有些先生们，常常骂旁人（尤其是骂共产党）没有国家民族观念，但是共产党和人民既然对于抗战和民族解放从来没有消极过，这些骂人的文献无论花样怎样新奇，篇幅怎样浩瀚，也就徒然使人惊叹于这种纸张的浪费，与蒋介石先生所号召的节约运动是如何的不相符合罢了。但是这些先生们自己的国家民族观念的仓库里究竟还剩下基金几许，却是很值得怀疑的。我们不敢幸灾乐祸，只能够很严肃地忠告这些先生们说：请自己珍重，在这上面多加些砝码吧！这将于你们和我们，于你们和我们的最钟爱的国家民族，都有益的。

你们请平心静气想一想，你们如今对于美国的捧场和依赖已经到了什么田地？我们不要求你们放弃对美国的幻想，这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是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过犹不及。你们硬要说中国和英国乃是美国的左右翼，说汉水和英伦海峡同是美国的边界，这又何苦来呢？你们又说美国和中国已超过了盟邦的关系。请问有史以来，美国对中国曾负过什么盟约的义务呢？而且还要超过，那该是种什么甜蜜的关系呢？未必小罗斯福大尉到中国来拜了几个干

兄义弟？你们把人家高捧入云，但是人家和日本的军用品贸易发展的曲线却在万耸入云；你们把赫尔的一纸空文当做观世音菩萨的灵符，人家却在和野村谈判如何命令中国停战。好像什么时候中国已经一股脑儿投奔到美国的荷包里一样！这才叫真正超过了盟邦的关系，真正把汉水当做密西西比呢。

不能不依赖美国吗？至少也不要依赖火星上的美国呀！地球上的美国，无论申包胥们怎样痛哭流涕，在美国国务院门口站他几十个七天七夜，目前也是只有把太平洋的舰队开往大西洋，但是你们过去曾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日苏战争，现在又托之于日美战争，全不管上穷碧落下黄泉，今天的议事日程上并无日美战争的踪迹。请问万一不幸，美国妥协竟成事实，你们这一幕喜剧将如何收场？人民责备你们今天所进行的乃是有计划的欺骗，你们如何能够否认？退一步说，即令美日妥协不成，美国对我又有何皇恩浩荡之处，使我堂堂奋斗中的伟大民族必须肉麻当有趣，自丧国格，自毁人格，至于斯极？你们的这一切宣传，究竟有多少民族观念？它们究竟出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何章何页？出于蒋介石先生自力更生口号的哪一种字典的注解？

你们请再平心静气想一想，你们对于共产党和人民的摧残压制，造谣诬蔑，又已经到了一步什么田地？为了对付共产党和人民，你们建筑了一个何等庞大的机构！这个机构愈积愈大，现在是早已像寓言里的骆驼对待可怜的阿拉伯人一样，把一个抗战政府的其他作用都挤到帐篷外面去了。在强敌压境之际而采取这种政策，无论在古今中外，都绝对说不上兴国建国，而只能祸国亡国，这一点浅显的道理，你们岂能不明白？但是你们既然把异胞看做同胞，醉心于在纽约交易所建立你们的民族中心，就自然要把同胞看做异

胞，就自然不能从人民身上看出民族的无限力量和无限前途，而且不但如此而已，“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你们还要把自己的同胞看成不共戴天的寇仇！你们在皖南事变和各种反共活动中是何等的勇敢！你们在制造谣言和各种反共舆论中是表现了何等的创造性、积极性！你们既然毫不迟疑地把人民和人民的先锋队都描写做奸匪叛贼，你们对于民族还能有什么信心呢？虽然受到一切不能忍受的敌视，但是只要你们继续抗战，共产党和人民还是爱护你们，还是愿意和你们合作的，不幸你们连这种信心似乎也很贫乏。你们这样的既不信任旁人，又不信任自己，究竟又有多少民族观念？这又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民族主义的何章何页，出于蒋介石先生自力更生口号的哪一种字典的注解？

“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他也必移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在民族信心横遭蹂躏的今天，我们不能不借耶稣的这几句话来奉赠国民党。国民党里有许多人近来很悲观，甚至也知道依赖美国并不是出路。他们很奇怪为什么共产党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却得到更大的胜利。无论国内国际的环境如何险恶，共产党确然总是风雨不动安如泰山地屹立着而且前进着。共产党究竟有什么秘密呢？共产党的全部秘密，就在于相信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因此始终和全民族的伟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奋斗，而不去依赖任何外国尤其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但是国民党有什么理由一定不能提高自己的民族信心，不能信任人民和信任自己，而非去膜拜那些心怀叵测的帝国主义阴谋家不可呢？国民党的许多“理论家”说，三民主义目前最需要的唯有一个民族主义，这大概也就是所谓一个主义了，国民党有什么理由连这一个主义也不全力加以坚

持呢？只要国民党能够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国民党的一切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国民党还是有光明前途的。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6月17日）

你的一文一信[2]，《大公报》的复文[3]（《大公报》此文很有意思，很可注意）都看了，你的信与文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依你观察，此刻是否到了蒋转弯的时机，可否找张季鸾、王芸生开一次谈判。向他们申明只要不妥协不反共，我们是拥蒋（所谓国家中心）到底的，否则是蒋拒绝人家拥他，解散新四军，对八路不发饷弹，公开的普遍的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叫人如何拥法？问他们有无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一文”，指周恩来为1941年5月25日《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同年6月14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代论。“一信”，指周恩来1941年5月21日写给张季鸾（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重庆《大公报》主笔）的致《大公报》的信，这封信在同年5月23日《大公报》发表，6月13日《解放日报》作为代论转载。

[3] 指《大公报》1941年5月23日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1]

（1941年6月23日）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是：

（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1]

（1941年6月23日）

同意陈赓、薄一波[2]统一太岳军队的指挥，同意组织太岳纵队。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谭政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2] 陈赓、薄一波，此后分别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当前时局与我们的方针[1]

（1941年6月26日）

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一份电报的主要内容。

抗战中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一拉一打政策

（1941年6月28日）

少奇同志：

文日电悉，都是对的，都同意。惟在二段甲项内似有与乙项不调和的地方，请再检阅考虑一下。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这一点与你在二段乙项中的意见是一致的，但与甲项似有些不调和，望加考虑为盼（在中国孤立大资产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对彭雪枫五月三日电的错误，我有一复电同时发给你，收到请告你的意见。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

复彭雪枫电[1]

（1941年6月28日）

你五月三日电的观点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六月十五日电亦还未改变。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罢工罢课的策略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八路南下的策略也只能加深国共裂痕，与中央缩小裂痕的方针是不合的。我们对付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针只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政策，你的意见却超越这个方针。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1]

（1941年6月）

（一）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二）宣传要点：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他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要表扬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抗战的战绩，与各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成绩，并着重宣传我们的施政纲领，是能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办法，同时也是全国人民能够走向光明胜利的道路。

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

[1] 这个指示是有毛泽东起草的。

（三）中央准备在“七七”发表宣言与文章，尽可能于“七一”前拍出，在全国各地刊物同时发表。因此各地方纪念文章，应侧重说明与当地具体任务有关联的问题。

中央书记处

给周恩来的信

（1941年6月）

恩来同志：

请即代购《西南实业通讯》一卷二期、三期、六期及二卷一期，并代订该通讯全年二份、《中行月刊》全年二份，《银行通报》全年二份，《农村报告》二份（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外经济拔萃》二份，及其他时事经济各种刊物各一年。

毛泽东[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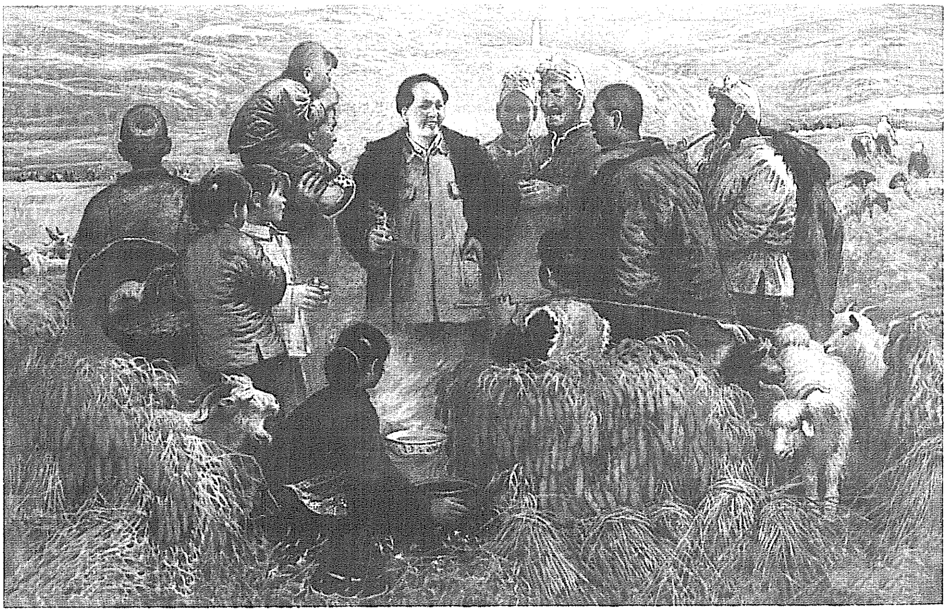
---

[1] 原抄件未署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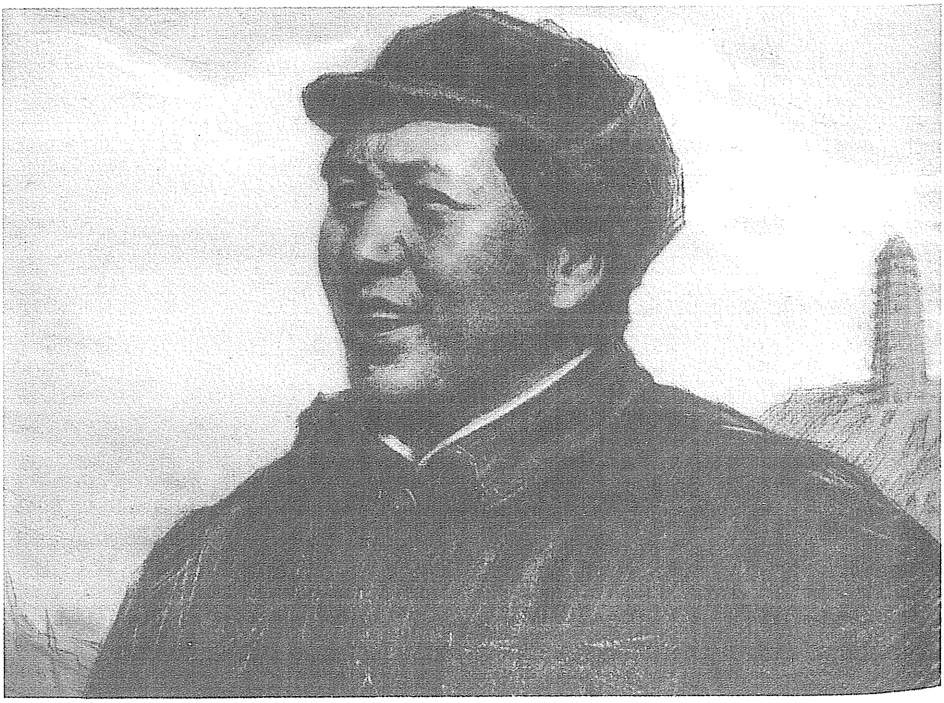
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的讲话

（1941年7月1日）

现在工人有地位了，农民也有地位了，你们参加了参议会，参加了政府。今天的政府是民主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以后你们还要给更多的人办事。以后的胜利是天天大，工作是天天广，需要人才也天天多，所以你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时，要加紧学习政治，还要加紧学习业务，工人同志和农民同志更要大大的努一把力。



《宝塔山下》（油画）



《毛泽东在宝塔山下》（素描）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1941年7月1日）

（甲）中国共产党经过二十年的革命锻炼，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决定的因素，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仍然是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这样，就要求我们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织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没有这样坚强的统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因此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乙）我们的党，虽然已有二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虽然已经是和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但是必须指出：我们的环境，是广大农村的环境，是长期分散的独立活动的游击战争的环境，党内小生产者及知识分子的成分占据很大的比重，因此，容易产生某些党员的“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这些倾向，假如听其发展，便会破坏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可能

发展到小组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使党与革命受到极大损害。而有这些倾向的个人如不改正，亦会身败名裂。叛徒张国焘的结局，便是明显的历史教训。这些缺乏党性的倾向，今天在党内虽然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但在某些个别部分中，在某些同志中确实存在着的。上述的这些倾向，具体地表现在下列各方面：

（1）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脱，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2）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时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3）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丙）为了纠正上述违反党性的倾向，必须采取以下办法：

（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不允许任何党员与任何地方党部，有标新立异、自成系统及对全国性问题任意对外发表主张的现象。要求各个独立工作区域领导人员，特别注意在今天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相信与服从中央

的领导。应当在党内开展反对“分散主义”“独立主义”“个人主义”的斗争。

（2）更严格地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

（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才更能挽救干部，和不使工作受到损失，反对当面客气，背后指斥，一切批评应当是正面坦白诚恳地提出，目的是为了挽救，而不是为了打击。应当强调党内团结互助，爱护干部，帮助干部在政治上进步。但对于屡说不改者，必须及时预防，加以纪律制裁。

（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因为统一纪律，是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要严格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基本原则。无论是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都必须如此。

（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要提倡大公无私、忠实朴素、埋头苦干、眼睛向下、实事求是、力戒骄傲、力戒肤浅的作风。要改造那些把理论与实践、学习与工作完全脱节的现象，这样来更加坚定自己的阶级立场、党的立场与党性。

（6）最后，决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

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1]

（1941年7月2日）

德怀同志：

（一）前电谅达，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中苏关系将好转。（二）如日本攻苏，敌军肃清后方计，将在华北加强镇压。（三）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目前作此准备，以待时机成熟，即可行动，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毛　朱　王　叶
冬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彭德怀的电报。

给续范亭的信[1]

（1941年7月2日）

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

[1] 这是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7月5日）

一、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脱稿，明（六日）上午开始广播。二、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三、你可将我党力主团结之方针告张冲，以影响他们的宣言。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7月5日）

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1941年7月7日）

全国同胞们，抗战将士们！

我伟大中华民族为抵抗日寇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已经整整四年了。当此抗战第五年到来之时，正值国际形势发生严重的变化，疯狂的德国法西斯罪魁希特勒已经大举进攻苏联，苏联政府正在统率二万万人民与数百万红军举行粉碎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争。

同胞们，将士们！苏联这一反法西斯的战争，完全是和我们的抗日战争属于同一性质的，都是保卫独立、保卫自由、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而在德国法西斯方面，则与日本法西斯进攻中国完全相同，乃是侵略的、奴役的、非正义的。因此，我们与苏联是完全站在同一战线上，成败与共，休戚相关。

自苏德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苏联的同情，迅速散布于全世界。而在我国人民，则关切之情，尤为深至。一则因为苏联是扶助被压迫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四年抗战，助我最多最力者唯有苏联；再则因为苏德战争直接影响我国的抗战，希特勒如在苏联得逞，则中国即将遇到严重的危机。故我国人民，咸知苏联人民所进行的战争，不但是保卫苏联的，而且是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之自由独立的。苏联的成败，即是中国的成败，即是一切民族之民主与自

由、独立与解放、公理与正义、科学与光明的成败。而希特勒则不但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一切自由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敌人，因而打倒希特勒，不但是苏联人民与各国人民的任务，而且也是中国人民的任务。毫无疑义，法西斯希特勒的疯狂进攻，适足以加速其死亡，法西斯的敌人已遍布于全世界。一个强大的反法西斯侵略的阵线，正在全世界树立起来。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

欧洲的法西斯国家，为着拉拢日本，巩固法西斯同盟，反对中、苏、英、美之目的，不惜明目张胆，承认中国叛逆汪精卫，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魔爪现已伸向太平洋，其为我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与全人类的公敌，实已暴露无余。而法西斯日本西陷中国泥淖，南与英美抗争，经济衰颓，民心怨愤，如又欲撕毁日苏中立协定，树敌于伟大之苏联，则其死亡崩溃之日，必愈益临近。惟其情况愈危迫，财横决以求一逞之心，必愈难阻遏，反苏之危险固已增长，灭华之方针则决不放弃，南进以侵犯英、美、荷、澳之野心，亦依然存在。法西斯同盟对于全世界的威胁，西方与东方同时增长。惟有建立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基础之上的坚决的斗争，方能制凶焰于已燃，挽狂澜于既倒。一切幸灾乐祸侥幸取巧的心理，均属浅薄无识之表现。至于张伯伦覆辙的重寻，汪精卫后尘的学步，所谓绥靖政策与投降路线者，尤为愚不可及之下策，宜为中国与欧美民主国家所不取。中国人民对于远东慕尼黑的危险，是永远坚持反对的。

我伟大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不独为了挽救自己祖国的危亡，亦且有助于国际反抗侵略的奋斗。四年以来，全国军民奋起抗战，不顾牺牲，不怕困难，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渡过了许多的难关，卒能使敌寇胆寒，环球心折，奠

定了民族复兴的基础，产生了新生中国的雏形。此皆我上下同心，军民协力，党派合作，友邦增援之所致，值得我们欢欣庆祝，大书特书。

然而敌人之进攻方兴未艾，协以谋我者，且有凶恶的法西斯同盟，南京之傀儡既为虎作伥，内部的亲日分子复侜张为幻，政治犹未澄清，民生愈见凋敝，党派仍有磨擦，民意尚未伸张，各种惊心怵目之暗影，竟有越来越大愈闹愈凶之势。尤可异者，反共成为政策，“异党”见于文书，军纪军令之美名，却假以打击抗日部队之最积极者，于是皖南事变发生了，新四军被解散了，特务横行，非法逮捕之事层出不穷了，抗战之元气为之斫丧，抗战初期之新气象因而挫折了。凡此阴暗方面，如不加以消除，则抗战四年的成绩有中堕之忧，全国军民有无所适从之感，而国际同情亦将失所附丽，这是国人应该深切警惕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当此抗战第五年开始，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时，正我除旧布新的良好机会，全国人民必须执行许多重大的战斗的任务，从外交以至内政，皆宜有新的改革与建树，方足以适应目前形势，一新国人耳目，达成抗战建国之目的。本党不敏，谨陈如下各端：

（一）拥护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促进中、苏、英、美及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国家民族一致联合，反对德、意、日法西斯同盟，拥护国民政府对德、意绝交的正确行动，并准备采取新的步骤。

（二）加强反对汪逆傀儡政府的斗争，肃清汪逆余党，巩固抗日阵营。

（三）加紧全部国军的整理训练，加强前线各军的配合作战，接济敌后各抗日部队军饷弹药，积极反攻敌人。

（四）加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设施，由政府予以援助，俾能长期坚持于敌后，使敌人无法抽调兵力西进、北进、南进。

（五）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合作，调整国共关系，解决新四军问题，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活动，停止逮捕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消弭内部磨擦，培养抗战实力。

（六）给一切爱国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发动民智民力，反抗敌寇。

（七）改革政治机构，罢免贪官污吏，引用开明人员，从政府机关中淘汰暗藏的亲日分子，肃清敌人的第五纵队。

（八）禁止贪官污吏、奸商劣绅囤积居奇，操纵国民经济，实行调剂粮食，平抑物价，以苏民困。

（九）改革兵役动员制度，禁止敲诈、贿买、强迫、虐待，代以鼓励人民上前线的政治动员，以利抗战。

（十）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信用本地人才，团结少数民族，以固后方。

本党认为上述各项，实为今日内政外交之基本方针，如能见之施行，则全国之气象必焕然一新，一切困难皆可克服，抗战建国之胜利便有了坚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声明：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对于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本党实为最忠实最坚决的执行者。本党对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实践到底，决无丝毫违误之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国军的一部分，最忠实最勇敢地执行抗战任务，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敌人，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建立了敌后的许多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

据地上，一步一步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各党派、各阶层合作的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保证一切抗日阶层（包括地主、资本家在内）的人权、政权、财权，实行了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农村政策，实行了一方面改良工人生活，一方面加强劳动纪律的劳动政策，实行了发展农工商业、改良人民生活的经济政策，实行了消灭文盲愚昧、提高民族精神的文化政策。凡此一切，无一不在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保卫祖国的先锋队，是言行一致的革命政党，是团结抗战的模范，是艰苦奋斗的典型。而敌人汪逆与亲日派则集矢于本党，务欲破坏之消灭之而后快，盖彼等深知本党之存在，实为其灭华计划之最大障碍，如不灭共，则断断不能灭华。所可怪者，一部分尚在抗战的国内人士，其污蔑陷害与破坏本党之心，竟与敌人如出一辙，称之为匪军，谥之为奸党，摧残镇压，不遗余力，大敌当前，相煎何急，诚有令人百思不解者。所望此等现象，迅速加以消除，回复抗战初期之状态，化戾气为祥和，易相克为相助，共以国家民族为重，则抗战前途，光明立见，抗战第五年的局面，必可变为团结进步胜利的局面，这就是本党所馨香祷祝的。

同胞们，将士们！抗战的第五年是决定世界命运的一年，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年，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完全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努力，不犯错误，我们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最后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法西斯奴役！

援助苏联！

抗战胜利万岁！

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

为“七七”事变四周年题词

（1941年7月7日）

团结。

致周恩来、廖承志电[1]

（1941年7月8日）

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购买药品致周恩来、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驳斥何应钦*

（1941年7月9日）

何应钦为暗藏的亲日派首领，实制造解散新四军事件的祸首，中共中央曾经请求国民政府予以惩办者。皖南事变之前，举世均知新四军为忠勇抗战之军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之十万健儿仍与敌人奋战于大江南北，亦为举世所熟知。而皖南事变之所以出现，正因该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二氏遵令北移，道经茂林地区所发生者。故一月十三日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行为与乎一月十七日军事委员会解散新四军之命令，均属颠倒是非违反抗战利益之反动的反革命的举措，千秋万世，难逃公论。皖南民谣有云："军纪军纪，排除异己，命令命令，日本高兴"，可谓一针见血。当此抗战第五年开始之际，全国军民均要求加强民族团结，蒋委员长亦有"精诚团结"之宣示，何应钦卖国成性恬不知耻，复敢为此挑拨团结有利日寇之谗言，诚所谓陈叔宝全无心肝矣。所谓"破坏抗战局面，破坏抗日阵线"者，通国皆知并非他人，实系亲日派何应钦。朝有秦桧，岳飞不得不死，抗日阵线内部而有何应钦，忠勇之新四军乃不得不被解散。何应钦而仍继续窃据要津，抗战局面与抗日阵线势必被其破坏。故我们甚望国民政府站在抗战立场，罢免何应钦，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以利团结抗战，则不胜盼祷云。

帮助苏联红军我们决取广泛游击战的长期斗争方针

（1941年7月15日）

恩来[1]同志：

（一）中央讨论了你的来电[2]，关于军事准备，决定从学俄文，学自然科学及准备东北干部三点着手。（二）关于香港，认为确实重要，准备派人，惟人选尚须斟酌，富春[3]去尚觉不够，博古[4]去如何？（三）关于军事行动，自苏德战起，我们即刻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

---

[1] 恩来，即周恩来。

[2] 指1941年7月3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该电估计美以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经济特权等为条件使日本不用武力南进的政策不易成功，“拖”的可能更大，压迫中国仍是主要的。提出我们的对策是：在军事上提高接受新武器的条件，学自然科学，学俄文和近代军事知识等；在大后方更严密地下党组织；在海外要加强党的领导，以开展对各方面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扩大民主运动等。

[3]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4]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和新华通讯社社长。

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垮，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如果我们能加强弹药、机关枪、大炮和炸药的装备，我们的行动效力就当更大些。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此条请告崔兄[1]并请他转告远方[2]朋友。（四）关于文电所述洛阳中条山二事已转知彭总[3]注意。（五）关于见蒋[4]，张冲[5]既两次来催，似可一见，看他说些什么，如能释放叶挺[6]及发八路几个月饷，国共关系即可开始转圜。但仍不可求之过急，急则反为无效，你的不急是有理由的。（六）英苏协定[7]将成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七）第三个星期的苏德战

---

[1] 崔兄，指崔可夫。1940年12月后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和国民党政府军事总顾问。

[2] 远方，指苏联。

[3] 彭总，指彭德怀，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副总司令。

[4] 蒋，指蒋介石。

[5] 张冲，当时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

[6] 叶挺，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蒋介石无理扣押。

[7] 苏英协定，1941年7月12日，英国和苏联的全权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联合王国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为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双方约定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中彼此给予援助和支持；不与敌单独媾和或停战。

争[1]已成对峙局面，但决战尚在后头，危险尚未过去。如正面打不进，希特勒将向土耳其、伊拉克、高加索出击，这将是英苏海陆空三军主要配合作战的地区。（八）日本集中船只于太平洋，任板垣为朝鲜司令官，从中国调动部分兵力去满洲[2]，似在准备反苏，但主要仍看德苏战争结果，目前似尚在观望中。

毛泽东

删午

---

[1] 苏德战争，1941年6月22日，德国纠集其附庸国突然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此后苏联人民开始了卫国战争。1941年10月，德军大举进犯莫斯科，苏军开展积极防御，并于12月发动反攻。1944年，苏军发起总反攻，全部收复沦陷的土地，并把军事行动转入敌人领土上进行。1945年年初苏军展开强大攻势，5月，苏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

[2] 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占中国东北地区，1934年3月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帝国”。1945年8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而被取消。

给刘雪苇[1]的信

（1941年7月15日）

雪苇同志：

来信及提纲[2]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此复。致以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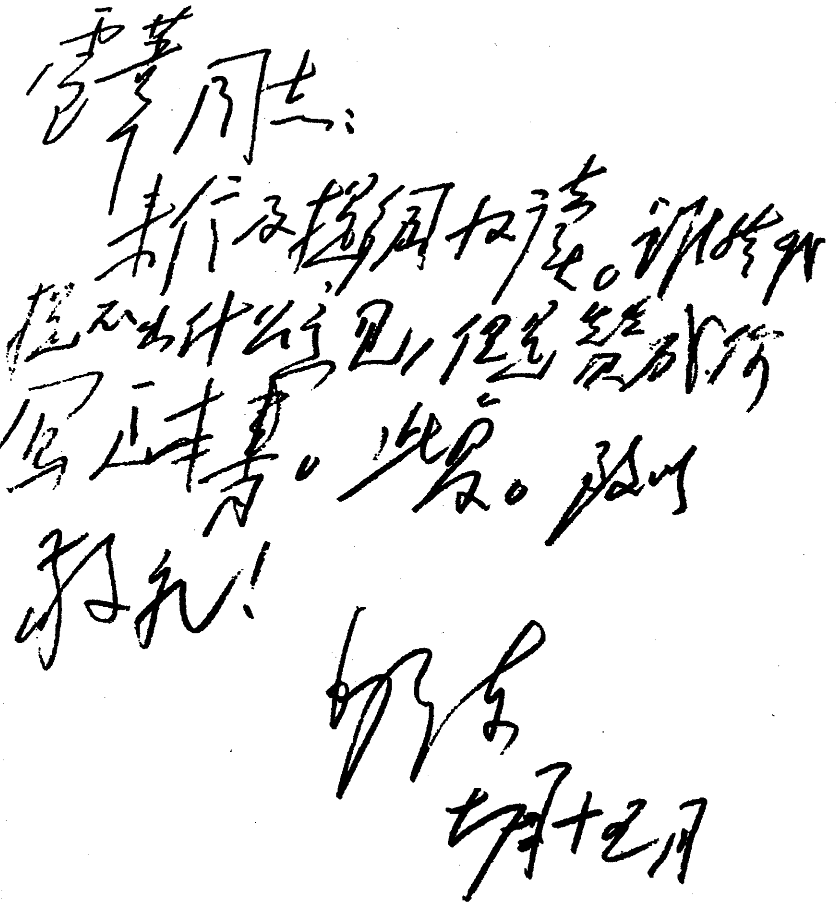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

[1] 刘雪苇（1912—1998），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2] 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第一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雪苇同志：

来信及稿均收读。谢谢你。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总觉得可行，写正书。此复。致以

敬礼！

泽东

七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刘雪苇的信的手稿。

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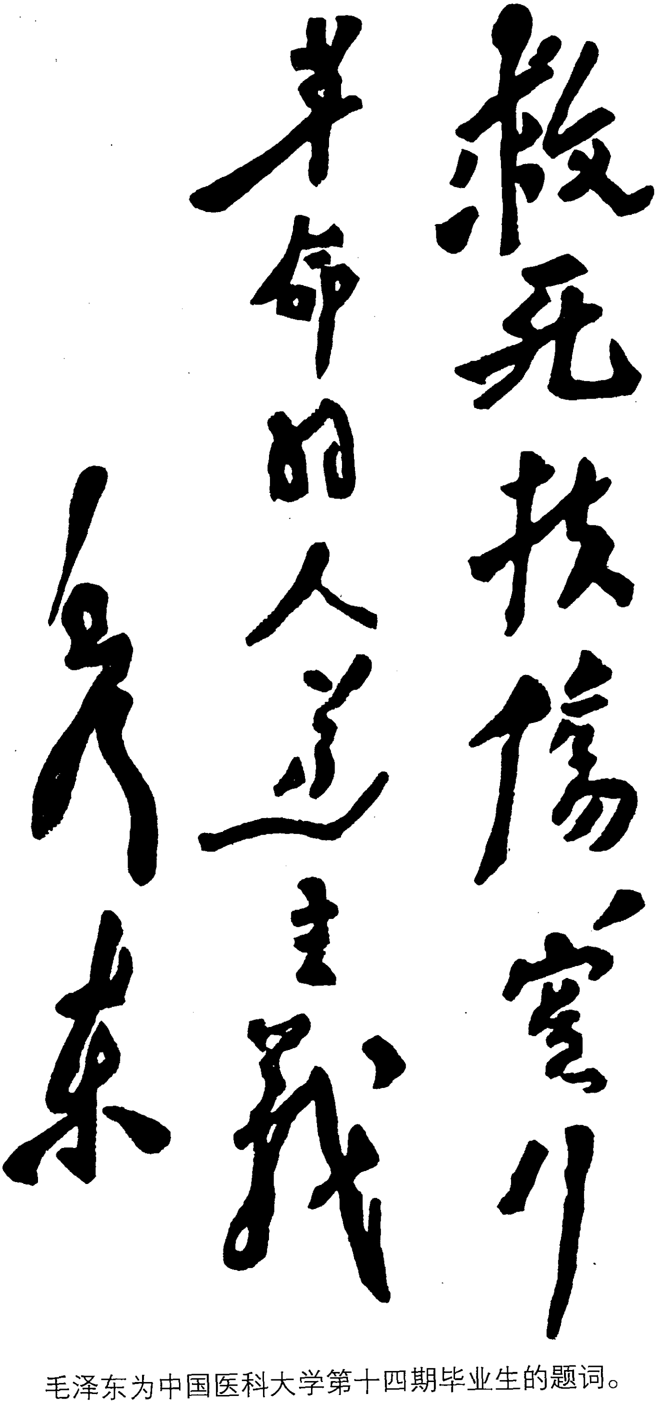
（1941 年 7 月 15 日）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柳村店中国医科大学即将毕业的第十四期学员的题词。



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第十四期毕业生的题词。

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

（1941年7月18日）

少奇同志：

文[1]电悉。（一）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2]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二）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三）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苏之数百万后备军目前刚刚用上，或在数日内有一决战，制止德军攻势，则大局最有利。如列宁格勒、莫斯科两城不守，则日必攻苏，苏之困难加重，将变为长期战争，但英苏协定已奠定最后胜利基础，美德、美日冲突均不可免，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四）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3]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五）你前电所提以《共产党宣言》《新民主主义论》两书作老干部文化课本，似不适宜，因太深读不懂。还宜重新编课本，中宣部在着手。（六）你的两篇文章望从香

---

[1] 文，即十二日。

[2] 七七宣言，指1941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

[3] 蒋，指蒋介石。

港寄来，以资快睹。

毛泽东

巧

复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1年7月22日）

（一）我们决赞助他们的民主运动；（二）国民党正在发动反共宣传，目的在杀鸡给猴看，打击各小党派，目前还谈不到对十二条的让步问题，仅在国民党真有好转诚意时，我们才准备谈判具体条文（对某几条可以商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7月24日）

此次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全由何应钦一手主持，得蒋默认，但为英美派郭泰祺[2]、王世杰等所反对！自我们联络英、美在华人员与英美派，集中揭露亲日派阴谋后，据恩来二十三日电告，彼方[3]业已失败。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3] 指国民党。

给各兵团首长的指示[1]

（1941年7月30日）

医务人材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材。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尽量吸收医务人才的问题向各兵团首长发出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1941年7月30日）

克诚[1]，并告胡服[2]：

两电均悉。此次反共宣传是蒋[3]密使何应钦[4]干的，但为郭泰祺王世杰[5]等英美派所反对，经恩来[6]反击后已暂停止。蒋、何用意不外准备舆论，便于日攻苏时有理由迫我开黄河以北。但只要苏能胜德（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英苏已订同盟，美苏日益接近），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每一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对蒋、何是何反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

[2] 胡服，即刘少奇。

[3] 蒋，指蒋介石。

[4]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5] 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6] 恩来，即周恩来。

一事所冲动，望注意为盼。

毛泽东
七月三十日

给林伯渠、谢觉哉的信[1]

（1941年7月31日）

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

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林伯渠、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

（1941年8月1日）

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到延安来报告工作的同志，其中的多数，对于他们自己从事工作区域的内外环境，不论在社会阶级关系方面，在敌伪方面，在友党友军方面，在自己工作方面，均缺乏系统地周密地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地周密地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

---

[1] 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为此目的，特决定办法如下：

（一）中央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

（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三）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举例如下：第一，收集敌、友、我三方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的各种报纸、刊物、书籍，加以采录、编辑与研究。第二，邀集有经验的人开调查会，每次三五人至七八人，调查一乡、一区、一县、一城、一镇、一军、一师、一工厂、一商店、一学校、一问题（例如土地问题、劳动问题、游民问题、会门问题）的典型。从研究典型着手是最切实的办法，由一典型再及另一典型。第三，在农村中，应着重对于地主、富农、商人、中农、贫农、雇农、手工工人、游民等各阶层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在城市中，应着重对于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贫民群众、游民群众及无

产阶级的生活情况及其相互关系的详细调查。第四，利用各种干部会、代表会收集材料。第五，写名人列传。凡地主、资本家财产五万元以上者，敌军、伪军、友军团长以上的军官，敌区、友区县长以上的官长，敌党、伪党、友党县以上的负责人，名流、学者、文化人、新闻记者在一县内外闻名者，会门首领、教派首领、流氓头、土匪头、名优、名娼，以及在华外人活动分子，替他们每人写一数百字到数千字的传记。此种传记，要责成地委及县委同志分负责任，传记内容须切合本人实际。同时注意收集各种人员的照片。第六，个别口头询问。或派人去问，或调人来问，问干部、问工人、问农民、问文化人、问商人、问官吏、问流氓、问俘虏、问同情者，均属之。第七，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四）除中央及各地的调查研究机关外，必须动员全党、全军及政府之各级机关及全体同志，着重对于敌友我各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并供给上级调查研究机关以材料。

（五）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友、我三方）的教育。鼓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要提倡干部与学生看报，指导看报方法，指导他们分析时局的每一变动。要供给干部与学生关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各种情况的实际材料，把讲授与研究这些材料及其结论当作正式课程，给与必要时间，并实行考绩。

（六）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给萧军[1]的信

（1941年8月2日）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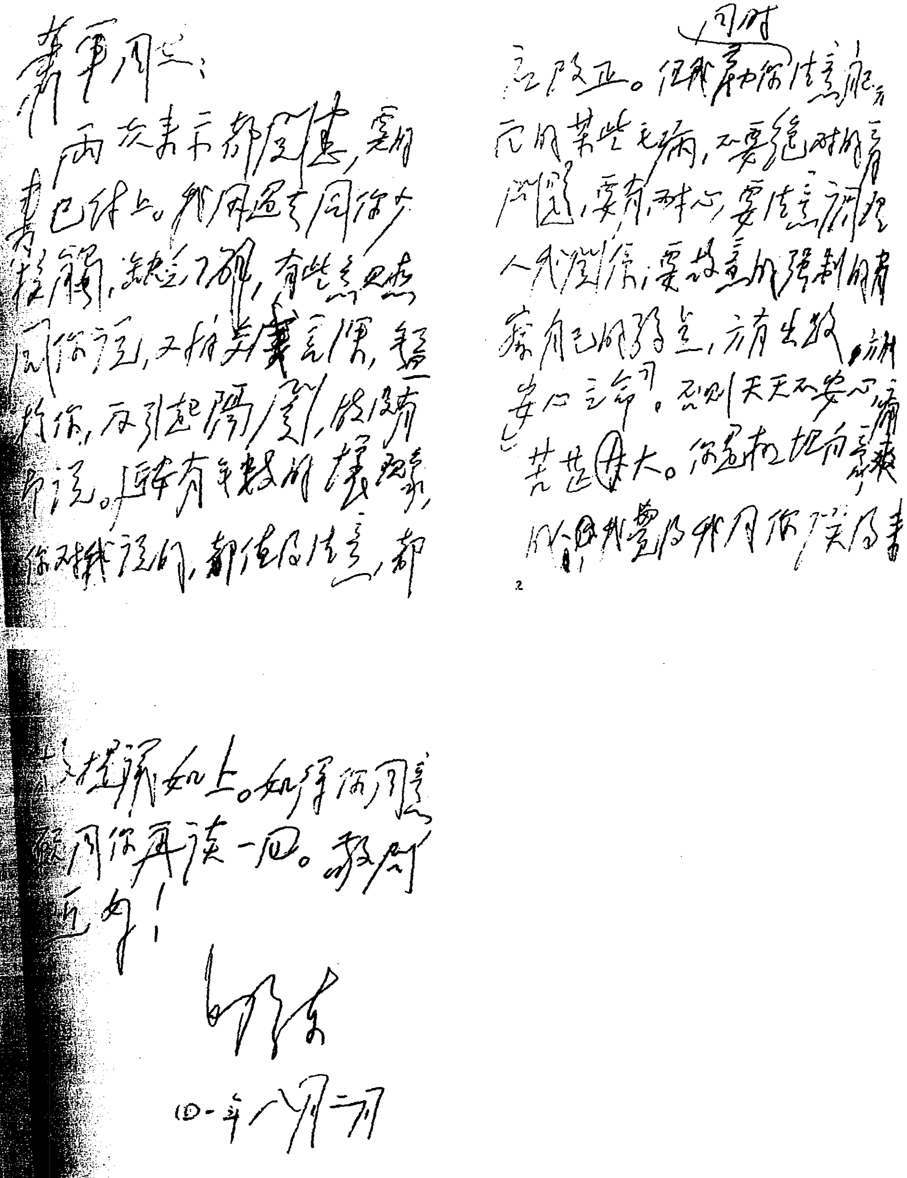
近好！

毛泽东

四一年八月二日

---

[1] 萧军（1907—1988），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收到，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只应同你谈，又怕关系不便，致未告你，反引起隔阂，没有多谈。上次有争执的诸点，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同时劝你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同你谈得来，

2

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四一年八月二日

毛泽东致萧军信的手稿。

军渡碛口线之河防应该加强[1]

（1941年8月3日）

贺、周，并告彭、左[2]：

据报，军渡、碛口线集敌四千余准备渡河，查王旅[3]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4]，河防空虚，日寇极有可能乘虚渡犯，如河防不守影响极大。望贺周迅速布置，加强河防兵力，准备打击渡犯之敌，另以一部从侧面威胁，务使敌不得逞。如何布置，速告。应否派士第至佳县指挥，亦望酌告。

毛　朱　王　叶

江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

[2] 彭、左，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3] 王旅，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王震。

[4]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新编第二十六师师长。

给谢觉哉的信[1]

（1941年8月5日）

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

[1]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财经建设的基本方针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6日）

觉哉同志：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工作，则：（一）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

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或尚可向绥、榆[1]输出数万担。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但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至收六百万至八百万元盐税以补一部分财政之不足，尚是第二个好处，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是否能销出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尚不可必，然舍此并无解决出入口问题之其他办法，因而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盐的问题上，今年是不能行的，原因是粮贵、草贵与国民党限制，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

我前信未蒙林老[2]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

---

[1] 绥、榆，指陕西的绥德县和榆林县。

[2]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

敬候

日安！

毛泽东

八月六日

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9日）

谢老：

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今年如何办，明年如何办，均列入之，拟好时请交我，以便先加研究，交换意见，然后讨论。林老前有三年计划，亟欲一阅，林老昨示谓待增修重拟，不知在十天左右能脱稿否？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而此行动纲领，非根据一方案交换意见，过细研究，无法讨论与确定。我是毫无研究的人，为欲开此会，故愿加以了解，你的各信我都过细地读了。在不妨碍你健康条件之下，如能草一条文式的方案，或即就林老三年计划，根据新近经验与研究加以增饰，那是最好的。我此刻尚未睡，上午如能睡好，下午或派车去接你来谈，那时再定。即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九日早

富春正人[1]各有一意见书，前时粗看未经意，亦想细看，你看过此两件否？

---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正人，即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1]

（1941年8月9日）

谢老八日信及所附从安塞来的报告，均附上，请察阅。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

---

[1] 这是毛泽东致高岗、陈正人信的主要内容。

给萧军的信[1]

（1941年8月10日）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

《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

[1] 这是毛泽东致萧军信的主要内容。

给谢觉哉的信

（1941年8月12日）

谢老：

十一日信悉。

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

边府党团[1]不应与政府委员会混同，党团只须三、五人，任务是掌握政策，有事即谈，谈通了，或拟成了计划，商得西北局同意（或常委通过）就提在政府委员会上通过。党团会由你召集，也不必各厅都有人，以能考虑政策的人为限。此事请考虑。

副主席问题可考虑。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给萧军的信

（1941年8月12日）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1]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2]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

[1] 罗，指罗烽（1909—1991），原名傅乃琦，辽宁沈阳人，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舒，指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黑龙江哈尔滨人，作家。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2] 艾青（1910—1996），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8月13日）

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万要供给八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给张冲家属的唁电

（1941年8月13日）

张淮南先生家属礼鉴：

惊闻淮南先生逝世，至深哀悼，特电致唁。

毛泽东
元

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时的讲话[1]

（1941 年 8 月 14 日）

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干好，这和你们的希望是一样的，盼你们回去后，把这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姊妹们，并努力学习，帮助改进当地工作。

---

[1] 1941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是毛泽东对他们讲话的一部分。

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中条山的游击战争

（1941年8月17日）

德怀[1]同志：

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以不使卫[2]感到威胁为度。阎锡山[3]与蒋[4]矛盾甚大，向我们拉拢，王靖国[5]部队东进，目的在占地盘吃饭，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磨擦。

毛泽东

十七

---

[1] 德怀，即彭德怀。

[2]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蒋，指蒋介石。

[5] 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的处理意见[1]

（1941年8月17日）

陈、刘：

关于鱼电[2]对伪军的政策及对伪官兵之处理，有以下意见：

一、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

二、伪军中两面派分子事实上是存在的，也是必然会有的。我们应当承认两面派的地位，控制他使他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这是很必要的认识。

三、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释放俘虏一律不要取保，也不要他们发誓说以后不当伪军，但可要他们发誓以后不真正帮助日本人来反对新四军。即使他们违背誓言助日本打我，则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傅钟给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治委员刘少奇的电报。

[2] 似指陈毅、刘少奇和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1941年8月6日（或7日）给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饶漱石、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并转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的电报。电报提出处理新四军第一师新近俘获大批伪军李长江部官兵的各项原则。

获[1]政策。

四、对李长江[2]部队的俘虏应多进行工作，并从中争取一批去瓦解分化李之内部。

毛　王　谭　傅
篠

---

[1] 三国时，诸葛亮为巩固蜀汉后方，平定南中（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等地），曾七次生擒孟获，又七次释放，使孟获心悦诚服。事见《三国志·蜀·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2] 李长江，曾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第一路游击军指挥官，1941年2月13日率其七个纵队投降日军，编为伪第一集团军。

复陈毅、刘少奇电[1]

（1941年8月17日）

十日电[2]悉，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陈毅、刘少奇8月10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敌伪如再‘扫荡’，我主力在苏北即甚难活动。因此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8月18日）

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这一宣言对德国没有和平的余地，但对日本留有妥协的余地。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8月14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讲话的一部分。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又称“大西洋宪章”。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8月18日）

王世英回延，称阎已允与陕甘宁边区通商（已开始运盐），又允我再设电台，声称华北仅余我们两家，宜好好合作等语。阎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东占一地盘而我不打他。判断阎现时不会投敌。我应利用阎蒋矛盾，给阎以生存余地，请善处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利用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矛盾的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陈正人[1]的信

（1941年8月19日）

正人同志：

我要朱理治[2]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不知他抄了一份给高岗[3]和你没有？如未，请向他索一份，以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在起草此文件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4]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2] 朱理治，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行长。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4] 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高自立（1900—1950），江西萍乡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当时任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1941年8月19日）

关于罗斯福丘吉尔宣言及行将召集的莫斯科会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如下：

八月十四日美国大总统罗斯福及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联合宣言及提议在莫斯科召集三国会议，乃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此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阶段。罗丘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表示了英美打倒法西斯主义的决心，这种决心是完全有利于苏联，有利于英美，有利于中国，有利于世界的。因为过去与现在的最大危险，是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企图违背人民意志，接受法西斯和平，但是宣言拒绝了这种和平。或者主张隔岸观火，让苏联独负消耗法西斯的重担，以便将来乘机取利，但罗丘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以便具体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之行动，则打击了这种消极的企图。只要英美承认“解除各侵略国武装是必要的”，主张“纳粹的最后崩溃”，同意分配战争任务与战争资材，便保证了苏联与英美的胜利，保证了中国与全世界的胜利。斯大林在其七月三日的著名演说中所谓苏联信守条约、德国毁约攻苏之事实，造成了一个长期政治因素，这种因素实为军事胜利的基础，这一真理，在此次罗丘宣言中及召集莫斯科会议的提议中，完全证明了。罗丘宣言及其提议召集莫斯科会议，特别表明了美国对于参加

反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已经下了决心。而美国的这种决心，即是表明了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阵线已经在政治上完成，而莫斯科会议则将在组织上完成之。法西斯侵略阵线，已经处于孤立状态中，法西斯失败的前途已经确定。目前的这一形势，在一九三九年秋季欧战爆发之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虽然力主组织保障国际安全的反法西斯阵线，但当时英美方面还存在着害人害己的慕尼黑政策，只在残酷战争的教训之后，这一错误政策才改变过来。从直接的因素说来，这是苏联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红军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使得罗斯福丘吉尔有勇气举行了此次会议，发表了此次宣言。这又是英美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这种斗争打击了英美内部一部分亲法西斯的反动派，使得罗斯福丘吉尔敢于拒绝法西斯和平的引诱，发表了此次伸张人类正义的宣言，决定了英美苏三大强国坚固联合这种具有政治远见的政策。这又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结果，中国阻止了日本法西斯匪军的进攻，使得英美有勇气声明解除一切侵略国的武装。宣言未提日本之名，宣言的第四条暗示可与日本通商及供给原料，第七条暗示允许日本移民，仍在企图拉拢日本现状维持派，表示其愿与日本妥协的一面，但宣言的第二条反对强制变更领土，第三条主张恢复被剥夺权利的国家，特别是第八条承认解除一切侵略国武装的必要性，这些都是积极反日的。总之，全中国人民都欢迎英美宣言，欢迎行将在莫斯科召集的英美苏三国会议。中国人民相信，这不但是英美苏三国人民从法西斯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全世界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而且是我们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坚持团结与抗战，克服抗日阵线内部企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因素，积极组织对日寇的反攻。中国内部存在着敌

人的第五纵队，这就是亲日派及亲德派，他们违背民族利益与人类利益，在国内倡言反共，完全是响应希特勒的“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为日本法西斯肃清道路。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大团结实行建立之时，此辈第五纵队如尚毫无觉悟，继续其反共反人民反民族反人类的罪恶行为，必为全国全世界所不齿。我们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增强努力，肃清第五纵队，则团结便能巩固，抗战便能坚持，反攻便能实现，中国是有资格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而成为一个有力的方面军的。全中国与全人类的命运关系于这一向法西斯主义的决斗，中国各党派应该善处此种千载难逢的时机，团结全国人民，一致向好的进步的方向努力，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所深切期望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

征求华北各战略单位对军区建设的意见[1]

（1941年8月21日）

华北各台：

在抗战现阶段，为了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准备主力军的新的机动，军区建设工作更为重要。同时由于平原与山地军区建设的条件有种种不同，为了研究军区工作起见，特将下列问题，征求各战略单位首脑机关的意见，望研究并电复我们。

（一）正规军与地方军互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二）已无可能进行运动战的若干平原地区，是否需要有正规军？尚在该地区之正规军应怎样办？

（三）军区与正规军的指挥机关应如何（兼或不兼）？

（四）军区武装（除正规军外）的建制与指挥关系应如何？

（五）在平原地区的军分区是否有必要指挥两种部队（正规军与军分区武装）？

（六）在平原地区的县区游击队，在军事行动的指挥上应归军分区或归本县区的党政机关？

（七）平原地区的部队编制，大团制和小团制，何者为好？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华北各战略区的电报。

（八）地方部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应有些什么特点?

（九）地方部队政工机关的编制应当怎样?

（十）对于实行征兵制的意见如何?

毛　朱　王　叶

（八月）

致彭德怀电[1]

（1941年8月22日）

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其目的似准备舆论，以便在日本攻苏时迫我北上；再则民族资本家对我同情，我党政治影响扩大；拉铁摩尔[2]新来，有加以压抑之必要。我们将驳复国民党反共宣传。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拉铁摩尔，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41年7月到达重庆。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1]第二期工作报告上的批示

（1941年8月22日）

很好的一个报告。各同志阅后保存于秘书处。

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

[1] 日本工农学校，是八路军政治部1940年8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日本士兵学校。学生大部分是战场上被俘的日本士兵，一部分是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

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1]的信

（1941 年 8 月 22 日）

谢老：

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2]令财建两厅起草的，不是另要别的计划。你说有了今年经验，计划会要实际些，是对的。今年有很丰富的经验，为此前所未有。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至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缺点（边币中，盐的产运销中，粮食中，税收中，公营工商业中），都由于缺少经验之故，今后应该着大力于纠正。今年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做。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富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

---

[1]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这些意见，未加深究，提出作为你的参考。高岗[1]同志送来一个材料，值得注意，阅后请退还高岗同志。徐老[2]生活的叙述看过，已交组织部，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

此问

日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周文[3]可加入党团[4]，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农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

---

[1]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 徐老，指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3] 周文（1907—1952），四川荥经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4] 这里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又及。

《鲁忠才长征记》一文按语[1]

（1941年8月26日）

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

[1] 这是毛泽东看了《鲁忠才长征记》调查报告后写的按语。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鲁忠才带领运输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情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8月27日）

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党内教育方针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8月30日）

太平洋局面似还是拖，日本和战皆难，你的观察如何？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9月3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关于太平洋局势，认为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哄与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国仍是拖的局面。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等的谈话[1]

（1941年9月1日）

（一）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

---

[1] 1941年9月1日，毛泽东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谈话4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在国共关系上均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这是毛泽东和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9月1日）

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的交换条件及你回延开会事。

---

[1] 这是毛泽东9月1日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9月8日）

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香港甚重要，但目前派不出大员，还是由廖、潘维持，待七大后再讲吧。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争取时局好转[1]

（1941年9月9日）

彭、左、罗，陈、刘，陈、罗[2]：

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毛　朱　王　叶

九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等的电报。

[2] 陈、刘，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刘少奇。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

（1941年9月10日）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2]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3]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在军事上，立三路线尚未完全影响苏区，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影响苏区，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

在组织上，苏维埃运动后期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比立三路线更厉害。

主观主义者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指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3] 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1]，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2]“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3]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4]，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的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 取消反帝运动，(二) 放弃苏区，(三) 富农路线，(四) 官僚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

---

[1] 指《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2] 邓，指邓小平，1932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3月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1931年6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3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1908—1935），湖南耒阳人，1933年3月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1906—1935），江西寻乌人，1933年3月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裁判部长和党团书记。1933年3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后受到撤职等处分。

[3] 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1933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4] 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宁、泰宁和江西的黎川。当时在这里建有中共中心县委。

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1]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2]等人的影响。

（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

（一）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

（二）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五）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

[1] 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2] 布哈林（1888—1938）、季诺维也夫（1883—1936），曾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自1913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至1926年11月，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11月至1929年4月，布哈林接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六）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过去卫生部门一个负责人违反对专家的政策，本位主义，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被撤职。

（七）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

（八）报纸上要多登文章，奖励辩证唯物论的文章，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

（九）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2]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

政治要注意时局动向，中央委员必须增加政治知识。

军事是目前战时必须研究的业务。

---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

[2] 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十）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

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十二）教育委员会（以洛甫[1]为首）的工作，先进行调查，再进行改革。

（十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十四）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十五）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十六）实行全党动员，除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2]外，再写些文章。

---

[1]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关于农村调查[1]

（1941年9月13日）

一　情况是逐渐了解的，需要继续不断的努力

认识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列宁、斯大林也同样作了许多调查。

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

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我们的调查工作，是要有耐心地、有步骤地去作，不要性急。我自己认识农村，就是经过好几年的工夫的。

记得我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

争》[1]，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2]，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过火”，骂我们是“游民行动”，骂农民把大地主小姐的床滚脏了是“过火”。其实，以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是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因为农民太痛苦了。我看受几千年压迫的农民，翻过身来，有点“过火”是不可免的，在小姐的床上多滚几下子也不妨哩！

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当然，今天是抗日民

---

[1] 指德国考茨基著的《〈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恽代英翻译，书名译为《阶级争斗》，1921年1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2] 指英国克卡朴（今译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李季翻译，1920年10月新青年出版社出版。

族统一战线，不是剥夺地主、富农的所有权，而是减租减息。否则，是不能团结他们抗日的。

贫农与雇农的问题，是在兴国调查之后才弄清楚的，那时才使我知道贫农团在分配土地过程中的重要性。

所以，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现在你们有了过去同志们的经验，都可以走直路了，可以把六七年的工作，在几个月内完成。今天同志们的任务是脚踏实地去钻，去努力，只要不整天睡觉，一天就六小时的工作，也是可以获得很多成绩的，但需继续不断的努力。

二　方法

1．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当我们观察一件事物时，第一步的观察只能看到这件事物的大体轮廓，形成一般概念。好比一个初来延安的人，开始他对延安的认识只是一般的、笼统的。可是当他参观了抗大、女大以及延安的各机关学校之后，他采取了第二个步骤，用分析方法把延安的各部分有秩序地加以细细的研究和分析。然后第三步再用综合法把对各部分的分析加以综合，得出整体的延安。这时认识的延安就与初来时认识的延安不同，他开始看见的是整个的延安，现在看见的也是整个的延安，但与开始的了解不同了，现在他对延安就有了科学的认识和具体的了解。观察一个农村，也同样是如此。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分析。应该是分析而又综合，就是在第二

步骤的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如果我们观察问题是走马看花的，各样都弄一点，这只是空花费了时间，一事无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方面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对立统一和阶级斗争。像我上面刚才讲的分析法和综合法，就是用这观点。假如同志们把这观点用去分析农村，你就可以知道农村有些什么阶级，它们主要的特点是什么，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怎样。同志们给我的问题中，有问到什么是富农。我以为地主是以收租为主；富农是以雇工为主，自己参加劳动；中农是以不出卖劳动力为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贫农是一定要出卖劳动力，靠自己的土地不够生活；雇农完全出卖劳动力，没有土地。当然，这是指它们的主要标志。

这样分析了农村中的各个阶级、阶层及其生活概况，然后才能对农村有正确的全面的了解。

我们要用钻研的方法来分析客观，分析阶级。对实际问题不应当熟视无睹，应当捣毁“牛皮公司”，应当经过自己头脑深思熟虑，应当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一九〇五年，列宁说推翻沙皇政府，俄国要组织工农政府，而托洛茨基则认为只能组织工人政府。这就是托洛茨基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真正地结合起来。我们应当从实践中找出事物运动的规律来，产生新的理论。如中国抗战的持久性，长期性，就是抗战的规律。

今天同志们下乡去调查，就应该以这种观点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实践，另方面又从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理论。

2. 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就有同志要问：“十样事物，我调查了九样，只有一样没有调查，有没有发言权？”我以为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今天中国主要的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次要的。西安事变前主要矛盾在国共两党之间，而西安事变后，主要矛盾则在中日之间。因此，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

所以，我们做综合工作时，不要陷于狭隘的经验论。

三　答复几个问题

同志们提了很多问题，只能答复一部分。有些问题也不能答复，因为要全部答复了，同志们便可以不必下乡。而这许多问题又必须亲自下乡调查后才能了解，依据不同的具体对象和情况，而有不同的解决。

怎样开调查会？一个调查会不仅提出问题，而且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参加调查会最好有三五人。我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

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土地[1]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

怎样找调查的典型？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一、先进的，二、中间的，三、落后的。如果能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

如何收集和整理材料？都必须自己亲身去做，在做的过程中找出经验来，用这些经验再随时去改进以后的调查和整理材料的工作。

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我在兴国调查中，请了几个农民来谈话。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

---

[1] 公堂土地，指各种祠、庙、会、社占有的土地。这些土地主要掌握在地主、富农手里。

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其他问题也不必多谈，还是让你们早日下去亲自调查为好。

给高岗、陈正人的信[1]

（1941 年 9 月 16 日）

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致高岗、陈正人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张季鸾逝世给国民参政会的唁电

（1941年9月18日）

张季鸾先生追悼会：

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悼念同深。肃电致悼，借达哀忱。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吴玉章　林祖涵

巧

给续范亭[1]的信

（1941年9月22日）

范亭同志：

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覆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

敬问

健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1] 续范亭（1893—1947），名培模，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县）人。1947年9月12日逝世。临终前，遗书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中共中央批准，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遗著有《续范亭诗文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9月24日）

我又找陈宏谟等谈了一次，欢迎他们去华北视察，看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看一看没有八路军全国是否能继续抗战（他们要求去晋西北与晋东南，还未下决心），同时向他们证明我并未去苏联。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

（1941 年 9 月 26 日）

（甲）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内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

（乙）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

（丙）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

---

[1] 毛泽东在本篇卷首批示："首道：印300份发学习组之100人及其他200个干部。毛泽东。"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丁）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的条件下进行此种学习。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致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1]电

（1941年9月29日）

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

（一）《左派幼稚病》[2]（用1939年解放社版）；

（二）艾译《新哲学大纲》[3]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4]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

---

[1] 中央研究组、高级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高级学习组，是中共中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于1941年8月和9月决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的学习组；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指导。

[2] 《左派幼稚病》，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至5月）。

[3] 指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的苏联米定、拉里察维基等所著《新哲学大纲》。

[4] 指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理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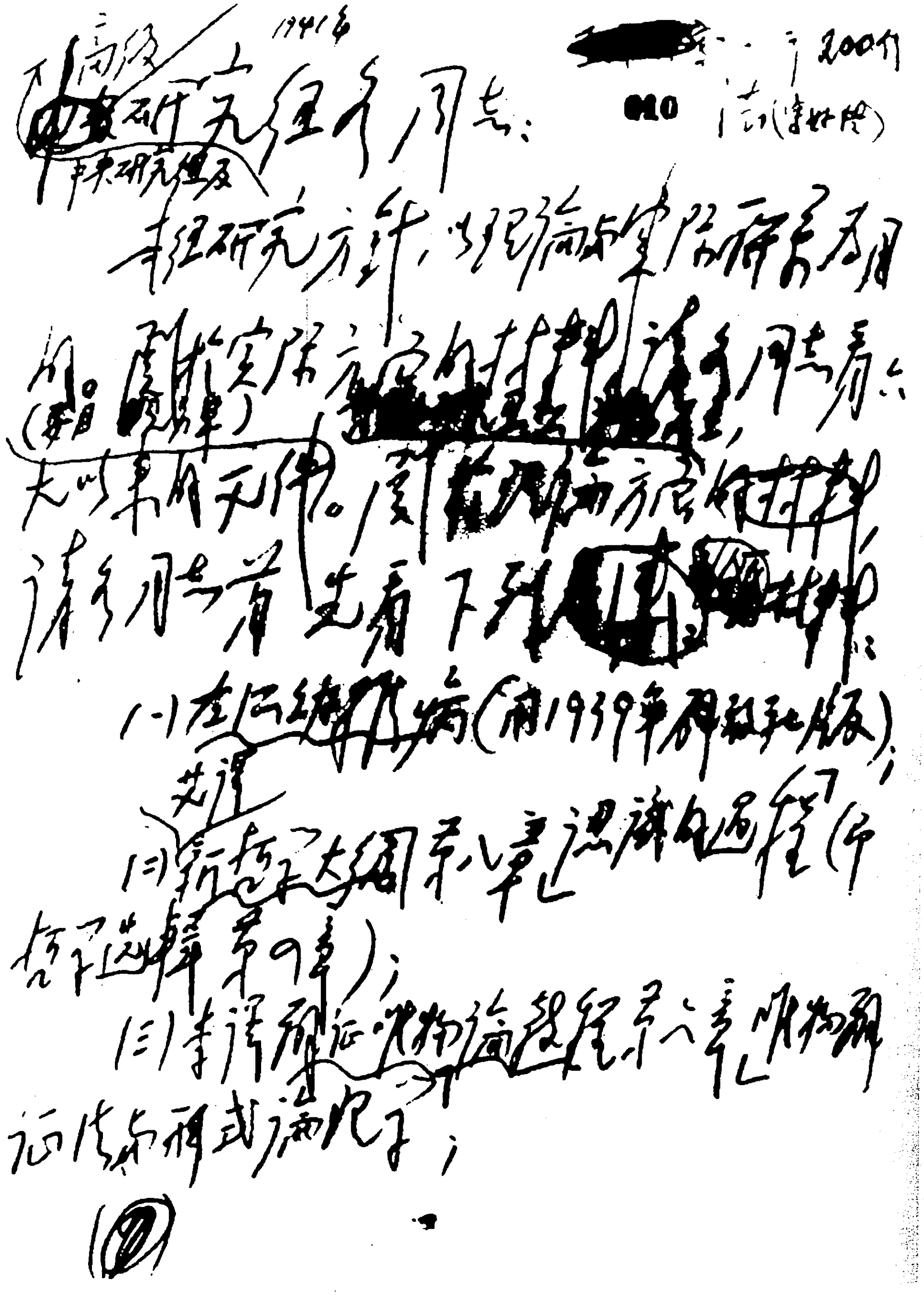
（四）河上肇[1]《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中央研究组组长　毛泽东
副组长　王稼蔷[2]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

[1]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2] 王稼蔷，即王稼祥。



1941.6

[redacted] 二 200份

010 （请速付印）

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研究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研究理论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先看下列各书：

（一）左派幼稚病（用1939年解放社版）；

（二）先读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四）

毛泽东起草的《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的手稿。

附：六大以来文件选读以下各篇（加〇者为最低限度）

〇　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六大，二八年七月　文件集3～21）

〇　湘赣边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井冈山决议[1]，二八年十月，在印）

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二八年十一月，在印）

〇　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古田会议，二九年十二月，77～101）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三〇年一月，在印）

〇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立三路线，三〇年六月，102～110）

〇　四中全会决议（四中全会，三〇年十二月，111～115）

目前的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三一年五月，125～128）

〇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急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三一年九月，136～141）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三一年九月，142～145）

〇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三二年一月，168～171）

〇　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上海斗争，三二年二月，172）

〇　在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中中共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三二年四月，在印）

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三

---

[1] 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年四月）

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三二年五月，130～134）

○　革命危机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北方会议，三二年六月，在印，已油印）

开展游击战争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北方会议，三二年六月，在印）

关于帝国主义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三二年六月，192～199）

○　苏维埃经济政策（王明，三三年　月[1]，在印）

○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罗迈，三三年五月，在印）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三三年七月，253～258）

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福建事变，三三年十二月，297～299）

○　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三四年一月，304～315）

○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中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十三次全会，王明，三四年　月[2]，347～379）

关于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三四年四月，391～392）

○　四川省委接受十三次全会提纲与五中全会决议的决定（四

---

[1] 原文如此。这篇文献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时未标明具体月份。

[2] 原文如此。这篇文献收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书时未标明具体月份。1982年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的《王明言论选辑》收入该篇时标明时间为1933年12月。

川，三四年六月，在印，已油印）

○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和将做些什么？（博古，三四年七月，在印）

○ 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西北，三四年 月[1]，在印，已油印）

陕甘边委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西北，三四年七月，在印，已油印）

○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三五年一月，410～419）

○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三五年八月，420～423）

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三五年十二月，在印）

○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三五年十二月，467～478）

○ 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 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刘少奇，三六年四月，在印）

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三六年七月，在印）

致中国国民党书（三六年八月，462～466）

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毛泽东，三六年秋，在印，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三章）

○ 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九月决议，三六年九月，479～482）

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三六年十二月，

---

[1] 原文此处空一格。

485～486）

○　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三七年二月，488）

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三七年三月）

○　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刘少奇，三七年三月，在印）

○　苏区党大会报告及结论（党大会，三七年五月，505～518）

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三七年七月，520～521）

○　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洛川会议，三七年八月，533～534）

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刘少奇，三七年十月，544～558）

○　上海太原沦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三七年十一月，559～564）

○　对时局宣言（十二月宣言，三七年十二月，565～566）

○　目前抗战形势与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彭德怀，三八年春，567～573）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刘少奇，三八年二月，583～588）

关于徐州失守候华中工作的指示（三八年五月，在印）

○　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599～605）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在印，即论新阶段第七节）

战争与战略问题（六中全会，三八年十一月，606～612）

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三九年六月，在印）

抗战两周年对时局宣言（反投降，三九年七月，622～624）

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定（三九年十月，648～649）

○ 八路军致林主席蒋委员长电（四〇年一月，659～660）

○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第一次反共高潮总结，四〇年三月，677～681）

○ 关于策略问题对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四〇年五月，683～685）

○ 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七七决定，四〇年七月，686～690）

抗战三周年对时局宣言（四〇年七月，691～693）

○ 为挽救危亡顾全大局致何白佳电（第二次反共高潮，四〇年十一月，702～704）

○ 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十二月指示，四〇年十二月，708～712）

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四〇〈一〉年一月，在印）

○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四〇〈一〉年五月，736～738）

○ 第二次反共高潮经验教训（四〇〈一〉年五月，739～741）

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四〇〈一〉年七月，744～7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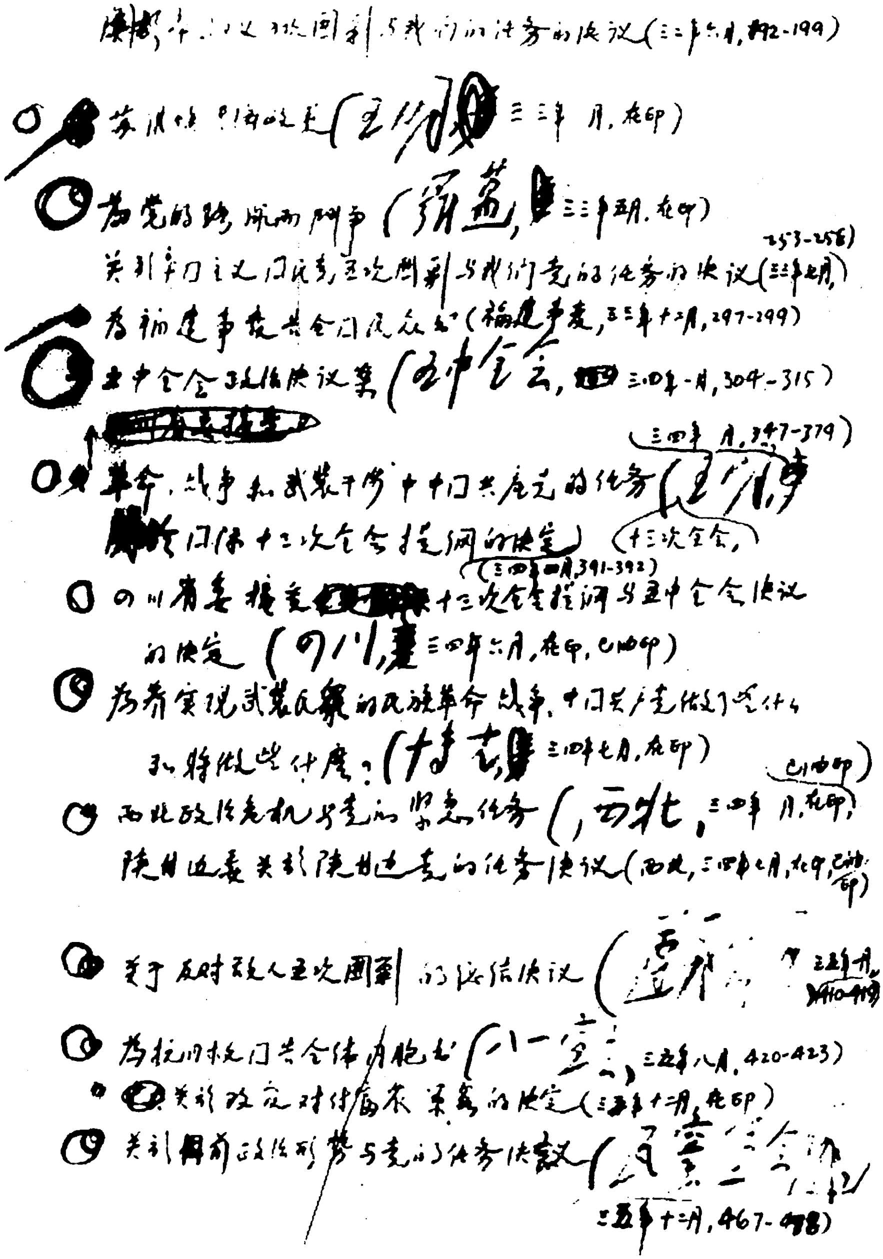
○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四〇〈一〉年七月，在印）

○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四〇〈一〉年八月，在印）

中央研究组组长　毛泽东

副组长　王稼祥

一九四一年十月



[illegible]第十二次全会总结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三二年六月，192-199）

苏维埃[illegible]的宪法（王明，三三年 月，石印）

为党的路线而斗争（洛甫，三三年五月，石印）

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三三年七月，253-258）

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福建事变，三三年十二月，297-299）

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三四年一月，304-315）

[illegible]

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中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王明，三四年 月，347-379）

[illegible]国际十三次全会提纲的决定（十三次全会，三四年 月，391-392）

四川省委接受[illegible]十三次全会提纲与五中全会决议的决定（四川，三四年六月，石印，已油印）

为着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和将做些什么？（博古，三四年七月，石印）

西北政治危机与党的紧急任务（西北，三四年 月，石印，已油印）

陕甘边委关于陕甘边党的任务决议（西北，三四年七月，石印，已油印）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illegible]，三五年一月，410-419）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三五年八月，420-423）

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三五年十二月，石印）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illegible]会议，三五年十二月，467-478）

毛泽东修改的《六大以来文件选读以下各篇》的手稿。

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时的谈话[1]

（1941年9月）

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时关于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问题谈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电[1]

（1941年10月3日）

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并告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复刘少奇电[1]

（1941年10月11日）

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2]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

[1] 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陈、姚，指陈毅、饶漱石（小姚）。

给周恩来的信

（1941年10月15日）

周：

（一）你处邮寄叶子龙[1]、《解放日报》等处报纸、刊物、航空社论多数能收到。

（二）各种报纸，除同意你寄送调查研究局三全份，毛主席、前总、解放日报、中组部、统战部、青委、军委、康生[2]处、边区政府各一份外，并请为中宣部、中财部、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西北中央局、马列研究院各增订一全份，其他延大、鲁艺、科学院等选订《大公报》等二三份。

（三）各种杂志除为调查研究局订一全份外，请选择有实际材料如《时与潮文摘》等，及对中央各部委、各学校有关系的，按性质购订十余份，分赠各机关学校（请全部送新华书店转邓洁收，由书记处办公厅统一分配）。

（四）调查研究局需要中外各地各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的书报，此项工作希望重庆方面有专人负责搜集。经济的杂志现很缺少，如《中央银行月报》《金融周刊》等都没有，希望负责购买书报的同志注意财政评论后面的论文索引及西南实业协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出

---

[1] 叶子龙，当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版的书籍。关于新近出版的各种国际问题和中国经济政治的书籍，此地已很久未买到，亦请注意代买。是否可以推动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延安办一分社，请考虑。

毛　任[1]

十月十五日

---

[1] 任，指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指示

（1941年10月18日）

北方局、及军分会、华中局及军分会、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晋西北区党委、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聂区、吕、程[1]：

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中央书记处
四一年十月十八日

---

[1] 聂，指聂荣臻。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0月18日）

本定今天讨论，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阁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改于后天（号日）交换意见，请将你的观察见告。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征询对时局的看法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陈毅电[1]

（1941年10月18日）

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即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初步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材更好。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问题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 年 10 月 20 日）

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渡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的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只在文章中说要独立性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主义混同于三民主义，使我们失去独立性，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41年10月20日）

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反对对目前时局的悲观情绪致周恩来并告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周士第等电[1]

（1941年10月20日）

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部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归王震、贺晋年指挥，阻止何师南下，一二〇师驻佳县之五团亦归王震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关于为阻击何文鼎师南下致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1]

（1941年10月23日）

彭、左，陈、罗，贺、关，聂、唐，陈、刘、赖，吕、程[2]：

（一）军委拟号召敌后各根据地普遍设立炸弹制造厂，以为武装敌后民众的主要武器。请将你处关于创办炸弹厂的经验及其意义作用，电告我们参考。

（二）请于日内将你处手榴弹最近制造情形，每月平均产量，按何比例分配给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使用及现有工具、工人数目等一并详细电告军委。

毛　朱　王　叶

一九四一，十，梗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唐，指聂荣臻、唐延杰，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陈、刘、赖，指陈毅、刘少奇、赖传珠，当时分别任新四军代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0月29日）

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决定调何文鼎师进驻安边，则定边、盐池将不保，经济来源将断绝，我们决定用武力自卫，请向军委会交涉停止调动，否则引起冲突责在彼方。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的讲话

（1941年10月30日）

这个会一定开得很好，今天报告和讨论一定有很大的收获，各民族都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很好的现象。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日本和希特勒之所以能小丑跳梁，猖獗一时，就是因为他们抓住我们的弱点。这弱点就是不团结，在中国，在东亚，在全世界都有过这个弱点。

现在中国就因为是团结的，所以才能抗战，但是还团结得不够，因为有一部分人表面打日本，暗中破坏团结；另一种人，一面抗战，一面磨擦。这两种人是不同的，前一种人是汉奸，后一种人是不懂得大势。延安是专讲团结的地方，这里有清真寺，有蒙古文化促进会，有民族学院……这里能够举行反法西斯的民族大会。

今后还有更大的仗要打，法西斯野心很大，力量还有，还要疯狂地侵略；希特勒在英美苏的大团结中到处乱打，自然在战争中，都有困难存在，所以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这个会议有意义。莫斯科和远东都在开会。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而法西斯正利用这些困难。我的看法，法西斯占地越多，危险也越大，如拿破仑，如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如蒙古，……。现在只要我们团

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地撕碎是不难的，日本正要向南北侵略，大体上是要来的。……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我们要了解情况，克服困难，不要害怕，要有信心，革命的人民是活的，在历史上是有生命的，法西斯是会死亡的，人民大众的斗争，必须经过困难，才能走向胜利。

法西斯快要死了，我们人民正在青春少壮时代，今天全世界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法西斯是没有灵魂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我们紧拉着手，团结起来，亲爱互助，那么就会把法西斯活活挤死了。我庆祝大会成功，讲平等，讲亲爱团结。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分析新事物，解决新问题[1]

（1941年10月30日）

我是来作个报告，也是讲一点意见。

最近中央有两个决定，一个是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是调查研究的决定。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我们的敌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但敌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恐怕还不知道，不知道敌人是什么样子，敌人就打不倒。

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从大革命时就喊起，经过十年苏维埃运动，以至抗战，帝国主义一个还没有打倒。

有人说，亡国亡家，我说还要亡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敌人，闭着眼睛捉麻雀，不但要亡党亡国，而且要亡头，连自己的脑壳都会亡掉！

一

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这叫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做唯物论，这是马克思主义起码的一条。理论正确不正确，要拿到实践中去，看是否行得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这是大家知道的，但碰到实际，就把这一条忘了。不从客观现实出发，从主观幻想出来的“理论”是会弄出好多乱子来的。如过去有人说，中国有两个前途，一个是苏维埃，一个是殖民地，除此而外其他是没有的。要在上海建立苏维埃，而看到某一地方的工人运动就作出中国的“统治阶级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被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套列宁的话）的结论。还有的想把全国的苏区都连在一起。从马恩列斯的书本里找出些道理，把外国的东西生硬地搬过来当现成用，不加以研究消化。发的许多决议指示，印的许多标语口号，不管行得通行不通，只从书本出发，从主观幻想出发，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现实，这就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小孩子看到麻雀在天上飞，他自己也想飞，但人没有翅膀，一件事情没有一定的条件是做不到的。许多人未经调查研究，未经分析，个把星期就发一个命令、决议，经常有指示，指示信长得连篇累牍，夸夸其谈，结果都是一纸空文。二十年来许多人都在幻想着革命明天就会胜利，但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样的人和小孩子急得想飞上天去一样的幼稚可笑！

一切都要从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懂得了这一点，便不会再发空洞的决议、写长篇的文章，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调查、分析与研究了客观情况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原理，那还不一定就是真理，还要在实践中行得通，才是真理。马恩的学说是真理，不但因为它是根据实际斗争从客观情况的研究中产生的东西，还因为它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实践的考验，证明了它是真理，它在实践中行得通，用得着。

对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并不是叫同志们闭着眼睛去执行，而是要根据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去执行。如中央取消青委的决议是正确的，但在冀中不取消青委又是正确的。举一个例子：如军队侦察了敌人的据点，发现有敌人，应当进攻，发这个攻击令是正确的；但我们的部队赶到以后，敌人已经走了，这个徒劳往返、耗费力量的责任不应该由这个发命令的人来负。这是说上级的决议应该执行，但要根据实际情形，不能机械地执行。

理论（真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懂得了这两条，便不会再做空洞的决议，讲空话，做错事，说错话。

二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唯物主义，从客观的物质条件出发，看现实的各方面，不能只看一面当成全面，把局部当成整体。比如看干部，一个干部有他的过去，有他的现在，而现在又有变化发展；他的思想有这一部分、又有那一部分，不能拿住一部分，做出整个的结论。又如我们现在延安机关、学校的许多支部书记，大概都很懂得辩证法，开个支部会报告工作，一是优点，二是缺点，但只是主观地套公式，而对于支部的实际客观环境，却不深加研究。

对一切都要加以分析，这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现在的世界可分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反法西斯阵线内，又可分为进步的与不进步的。中国，整个说来是个统一体，但又可分为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党与国民党都是抗日的，这是共同点；有民主与不民主，这又是区别点。边区延安和陕西西

安，同是抗日的根据地，这是共同点；一个是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个是抗日封建根据地，这是区别点。边区人口中有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而这些非党员中又可以分为工人、农民、地主、商业资本家，而农民中又有富农、中农、贫农、雇农之分，而每一种农民中又是可以分的，这个老百姓的情形是这样，那个老百姓的情形又是那样。又如讲一段话中，有中心的，有次要的，有讲错的，有讲对的。

矛盾和统一，分析和综合，这叫做方法论，也叫做辩证法。说起来大家都晓得，但到实际使用的时候就忘掉了。我们同志在观察与处理问题上，常容易只强调一面，只看到一面，而把其他多方面丢掉了，犯了片面看问题的毛病。边区是全国的一部分，和全国是统一的，但又是对立的，与蒋介石是对立的，他讨厌这个边区，但在抗日方面却又是统一的，我们对日本不骂蒋介石。如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好的方面他还是同志，坏的方面是他的错误。如边区的反官僚主义，也要加以分析。有些人，人是很好的，忠实为党为国的，但工作方法不好；有一种人不仅工作方法不好，连人也是坏人。有些人好议论别人的长短，这也是分析，因他有长有短，但轮到自己就不分析了。清朝的乾隆皇帝说，他是“十全老人”，“十全”是没有的。任何人都有优点、缺点这两方面，运用不好，会使用错干部，打击错干部。

找出矛盾的对立，这叫做分析。年岁小时长住在乡村，看见人都是人，不知道有阶级。看了《共产党宣言》，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回去，乡村就变了样，才知道农村有地主与农民、城市有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地主有大地主、小地主，资产阶级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共同点，就是它

也剥削人，剥削的多少也有差别；和劳动群众的共同点，则是都受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摇摆于革命与反动营垒之间；中国革命如果忽视团结小资产阶级，照顾中间阶层，不把中间分子同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就不能胜利，就是极大的危险。大资产阶级则有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亲英美派要抗日，又要反共，如蒋介石这个大资产阶级的头子，对反共又是一打一拉，不是光打，也不是光拉，这叫做两面政策。我们可不可以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呢？当然是可以的。我们拥护他抗日，这就是拉，反对他反共，这就是打，这是一种矛盾。有人说，共产党为什么这样矛盾呢？不矛盾，共产党就不得了啊！这是说地主与资产阶级及我党对他们的政策。再说农民有贫农、雇农，工人有贵族工人、产业工人、手工工人，国际有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把代表贵族工人的机会主义的第二国际与代表广大阶级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第三国际不加以分析区别，就是策略路线上的错误。

三

怎样做调查研究？理论是唯物的，方法是辩证的。矛盾的统一与阶级斗争，一是辩证唯物论，一是历史唯物论。矛盾的统一就是辩证法，辩证法运用在社会方面就是历史唯物论。

譬如要分析延安的社会，首先应分做自然的与社会的两方面。自然界包括地理、山水、植物、矿产，连野草、沙子、石头都在内。社会方面就是各阶级及其政治组织，延安主要可分党政军三大系统。得了这个大概分析后，又可以专拿一个部门来加以研究，如

研究军事系统，从留守处着手。留守处可分为军事部门与政治部门，政治部门又可以分成组织、宣传等四部。丢开各部专找一部，一部又分几科，如锄奸部中有侦察、逮捕、审讯、处罚等四个部分。分析研究了这四个部分，再把锄奸部综合起来。研究了锄奸部后，再研究其他部，然后再把整个留守处综合起来。研究了留守处，再研究边区政府、西北局，然后再把延安的社会综合为统一的整体，得出它的结论。又如研究边区，首先要从老百姓、乡政府、区政府，一步一步研究起，然后你才知道边区确是抗日的民主的根据地。这样的结论是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是有根据的。一样一样地分析，搞了这样，再搞那样，样样都弄清楚了，然后再加以综合，得出结论。前面说过的，真理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你不把客观实践分析清楚，真理从哪儿来呢？

有个旅长对我说：八路军到了某地后，把一切苛捐杂税免除了。我问他，原先都有些什么苛捐杂税？收多少？怎么收的？他却连一样都不知道。

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中国共产党搞了二十年，当然有成绩，但对敌人从来缺乏调查、研究、分析。打帝国主义打了二十年，打国民党也打了好久，却连对方究竟有多大、多强都不知道。近来专门设了一个机关，叫做敌伪研究会，收集资料，专门研究敌伪方面情形，如日本人物、各地情况、阶级关系等。我们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那样的神气，打了它几年还不知道它，还要喊打倒人家，但人家对我们的调查是无所不至的。这种不调查、不分析、不研究，不知道敌人和自己，就叫做粗枝大叶，这是一种危险。

分析一件事物的特性、特征、特点，它与别的事物的共同点与

区别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光做大文章、发空议论是不行的。

四

上面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说我们光做实际调查，把书本完全丢开，不要理论了，理论还是要学的，而是要把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如果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就够了，列宁为什么还要写《帝国主义论》[1]呢？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与方法，到处都用得着。我们要根据实际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不问实际情况套马克思主义的公式。列宁曾根据马克思主义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世界，现在的《联共（布）党史》[2]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了俄国的实际，这叫做布尔什维主义。我们中国却一样都没有。中国近百年来革命发展的历史是很丰富的，但这种事情还没有人来做，对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没有很好地有系统地研究与著作。

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认得字、读得书本就可以。但只会读不会用，就是把它读个千八百遍，背个烂熟，那连一文钱都不值。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为的是要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学而不

---

[1] 《帝国主义论》，即列宁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发表于1917年4月。

[2] 《联共（布）党史》，即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1938年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用就叫做“无的放矢”，我们要做到“有的放矢”，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

和培元[1]读了三个月的陕公，写了《边区实录》《日本在沦陷区》等好几本书，称为青年哲学家。有些人读了三年马克思主义，还是一事不识，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不知道调查研究，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做青年“无用家”！

不论年岁好大，如林老、谢老[2]，研究精神都是很好的。

留守处政治部最近开了个宣传会议，把宣传工作分为一条一条分组讨论，这都是很好的办法。

---

[1] 和培元，当时是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林老，指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府主席。谢老，指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日）

何文鼎如不停止南下，我们决心消灭之，请告蒋介石、刘斐立即制止。如何师不停止南下，我们必须向边区增兵。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理论研究阅读材料目录

（1941年11月1日）

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

兹规定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材料如下：

（一）季米特洛夫之国际七次大会报告、结论及闭幕词（解放社季氏文选一至一百六十五页）

（二）《联共党史》的结束语

（三）法英美德意五国共产党史的传播与研究及对马列主义的宣传所作的决议（《解放》一百〇五期）[1]

（四）联共中央关于《联共党史》出版后应如何进行宣传的决议（《解放》七十九期）[2]

（五）《斯大林与〈联共党史〉》（《解放》一百廿八期）[3]

（六）《左派幼稚病》（解放社版）[4]

---

[1] 即《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底传播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景林译自1939年8月12日德文《国际通讯》第八卷第四十五期，载《解放》第一〇五期。

[2] 即《联共（布）中央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载《解放》第七十九期。

[3] 即《斯大林同志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载《解放》第一二八期。

[4] 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的幼稚病》。

以上各件请先看，最好背精读一部至两遍[1]，由组长或副组长对于每一件材料提出要点加以讨论。

（七）艾译的《哲学大纲》[2]第八章“认识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八）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3]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九）河上肇《经济学大纲》[4]序说（陈豹隐译）

以上□□[5]可后看。

（十）《联共党史》全书

以上一部可后看，看及讨论办法同前。

毛泽东　王稼祥

十一月一日

---

[1] 抄件原文如此，可能是：“最好能精读一遍至两遍”。

[2] 即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的苏联米丁、拉里察维基等所著《新哲学大纲》。

[3] 即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4] 河上肇（1879—1946），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学大纲》是他1928年发表的著作。

[5] 电文有脱漏，可能是“三件”二字。

本年内的学习任务及学习方法

（1941年11月4日）

各地高级学习组组长、副组长：

（一）中央学习组及各地高级研究组第一步均以列宁主义的政治理论与我党六大以来的政治实践为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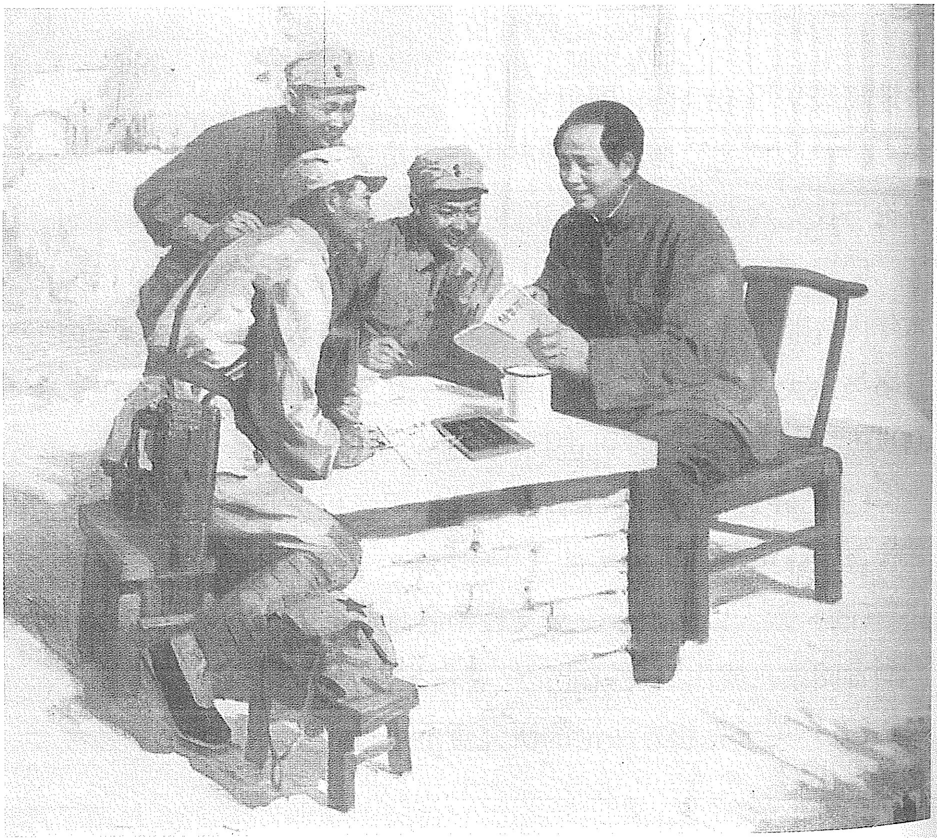
（二）学习材料已由党务广播台电告（是否收到请告）。现定在本年内先将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列宁《左派幼稚病》二书与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通读一遍。这种通读，目的在于获得初步概念，以便在明春可进到深入研究阶段。

（三）在通读期间不求详细讨论，但各组长必须负责采取适当办法检查全体组员是否确实读过指定材料，解答阅读中的疑难。

（四）六大以来八十三个文件中各地必有许多找不到者，可先将找到者阅读，或由组长就能记忆者作报告。

（五）关于思想方法论的研究暂不进行。

中央学习组　毛泽东　王稼祥
支



《在毛主席身边成长》（油画）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1941年11月6日）

各位参议员先生，各位同志：

今天边区参议会开幕，是有重大意义的。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现在的中国不能有别的目的，只能有这个目的。因为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国内的，而是日本和德意法西斯主义。现在苏联红军正在为苏联和全人类的命运奋斗，我们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已有四年多，这个抗战是由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合作来支持的。但是还没有胜利，还要继续奋斗，还要使革命的三民主义见之实行，才能胜利。

为什么我们要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因为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直到现在还没有在全中国实现。为什么我们在现在不要求实行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一个更好的制度，这个制度在苏联早已实行了，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实行它的条件。陕甘宁边区所实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实际问题的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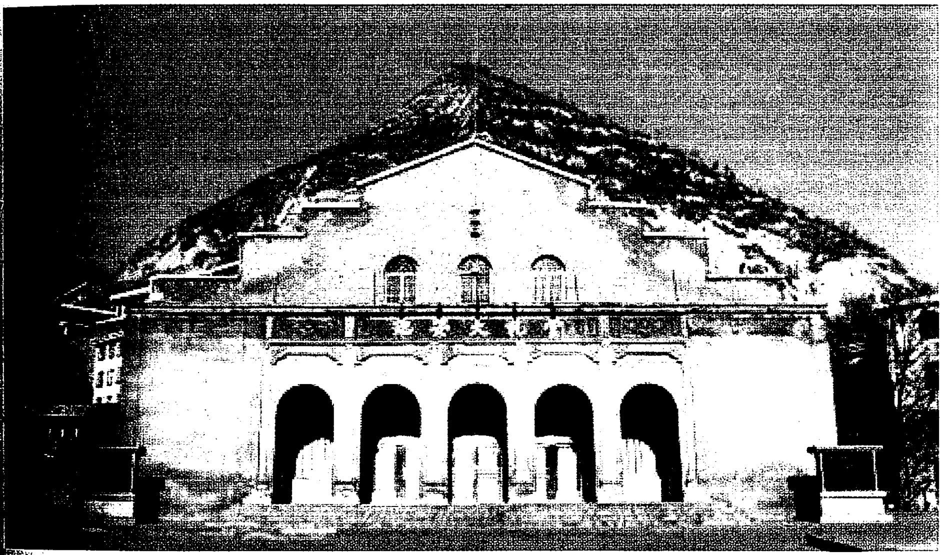
决，都没有超过革命的三民主义的范围。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我们希望不但在陕甘宁边区实行，不但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并且在全国也实行起来。

我们实行这种政策是有成绩的，是得到全国人民赞成的。但是也有缺点。一部分共产党员，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还保存一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或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还不明白共产党员有义务同抗日的党外人士合作，无权利排斥这些党外人士的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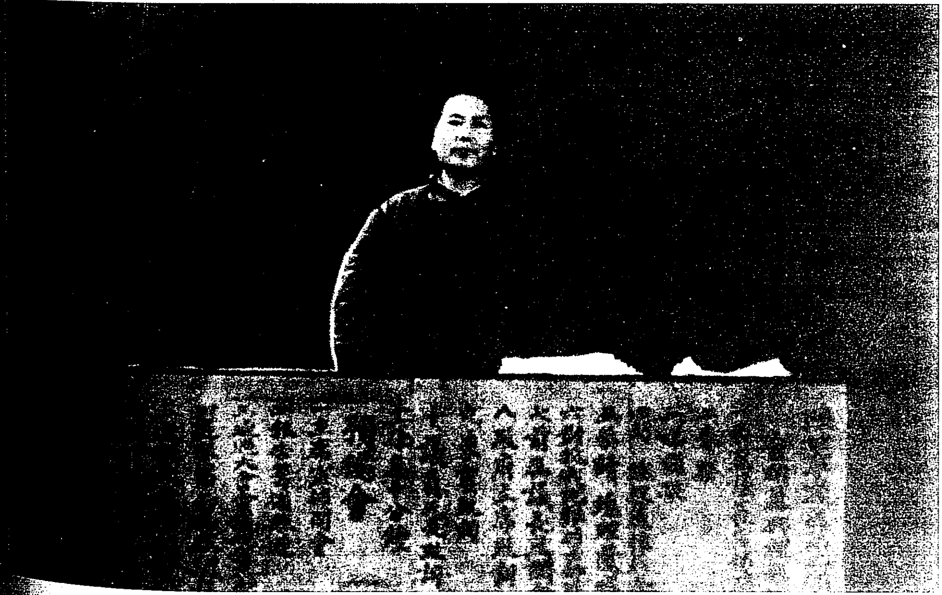
理。这就是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的道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有一条，规定共产党员应当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就是针对着这一部分还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同志而说的。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同志们，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现在就应在参议会中好好实行起来。我想，我们共产党的参议员，在我们这样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参议会中受到很好的锻炼，克服自己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宗派，我们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善于同别人商量问题。也许到今天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他们说，如果要和别人合作，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人是极少的。我向各位保证，我

党绝大多数的党员是一定能够执行我党中央的路线的。同时也要请各位党外同志了解我们的主张，了解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只图私利的小宗派、小团体。不是的，共产党是真心实意想把国事办好的。但是我们的毛病还很多。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

各位参议员先生不辞辛勤，来此开会，我很高兴地庆祝这个盛会，庆祝这个盛会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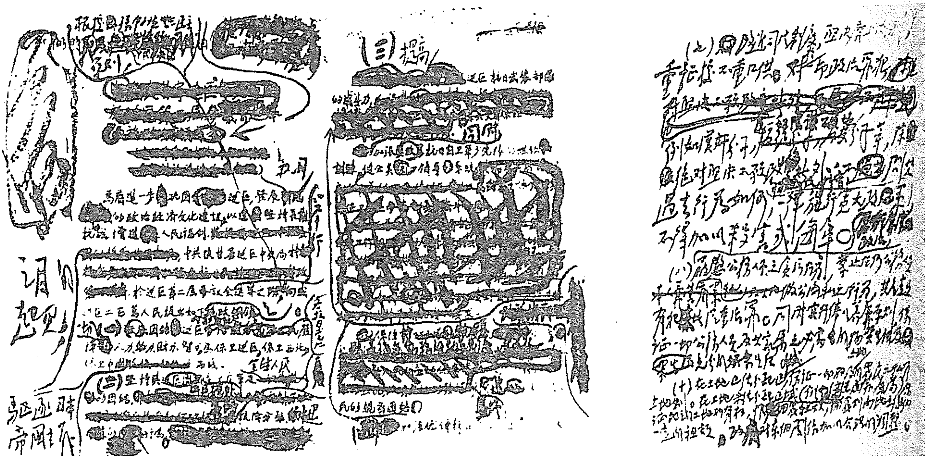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新落成的参议会礼堂举行。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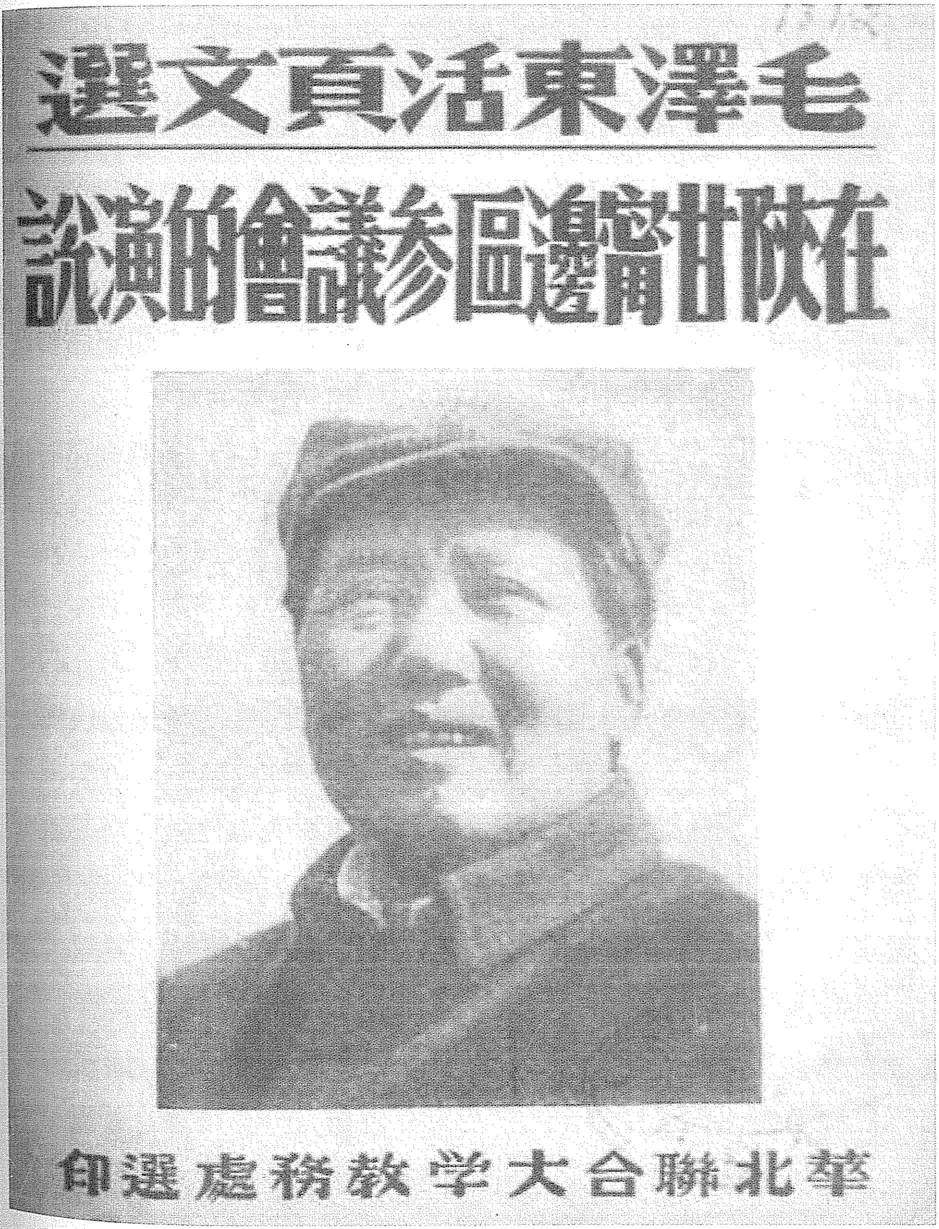


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讲话。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图为中央领导人在延安。



1941年11月，毛泽东高度评价了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图为1941年12月，毛泽东关于精兵简政指示的修改稿。



毛澤東活頁文選

在陝甘甯邊區参議會的演說

華北聯合大学教務處選印

华北联合大学教务处选印的毛泽东活页文选《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等的谈话[1]

（1941年11月6日）

（一）何来必打；（二）放人、发饷二事做一，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作别的表示，以示不与国民党为难。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困难在后头，我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危险困难，共产党决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出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时，和应邀出席开幕会的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周励武、郭亚生关于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二事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播讲演[1]

（1941年11月7日）

如同中国共产党所曾再三指出的，目前全世界人类的任务是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则是团结起来反对日本的进攻。现在这两种团结都有大大加强的必要。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我们以为英国和美国应该用一切方法拿更多的飞机、坦克来供给苏联，拿更多经费和武器来援助中国，拿更大的力量来援助在德、意蹂躏之下的各国人民的起义。美国应该毫不踌躇地向德国宣战，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步骤，实现得愈迟就只有让德国炸沉更多的美国船。同时，美国绝不应听信日本的阴谋，与日本订立任何的妥协，美国应和中国及英国一道，以实力制裁日本法西斯。很显然的，我们的这种希望是和英国、美国大多数人民的希望相符合的，可惜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和国会方面，都还有一部分不明大义的人，阻挠着人民的意志的实现。因此，英、美的人民现在必须努力去战胜这种时代的障碍，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

中国的情形，同样处在向前更进一步的转折点。日本法西斯虽

---

[1] 这是毛泽东1941年11月7日在延安发表的广播讲演。

然同时在准备着南进和北进[1]，但是无论他们采取哪一条冒险的道路，西进以求消灭中国是必然的。日本在晋察冀边区和长沙、郑州等地遭遇失败[2]以后，现在正准备着对中国的新的进攻。我们全国的人民和全国的军队，一定要保卫我们每一个抗日阵地，一定要打碎敌人的进攻阴谋。全国人民一定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拥护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准备一切反攻的条件，以便及时地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呼吁加强团结的，处在这个敌人新进攻的前夜，改善抗战营垒中各方面的相互关系，更为迫切的需要。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迅速地当机立断，为了这个目的迅速地采取各种必要的措置。我们相信，只要全国真正地团结一致，日本的进攻必能阻止，反攻的准备必能办到，驱逐敌人的目的是必能实现的。

---

[1] 向南扩大侵略，与英美争夺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各国的霸权，同时，伺机向北进攻苏联，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长期战争目标。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日军大本营在《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中确定，继续向南扩展，并“根据形势演变解决北方问题”。同年8月初，日军大本营宣布，放弃“北进”企图，专心向南扩展，加紧了对英美作战的准备。

[2] 1941年8月至10月，敌后抗日军民顽强抵抗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平西地区进行的疯狂“扫荡”，共歼敌5000余人，敌被迫撤退。9月下旬和10月初，日军曾一度进攻长沙、株洲和郑州几个城市，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占而复退。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

（1941年11月7日）

一　一般问题

（一）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

（二）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因此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对敌屈服的右倾观点；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空喊决战，急躁盲动，缺乏忍耐持久的韧性的“左”倾观点。

（三）在这一新阶段中，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甲）主力军，（乙）地方军，（丙）人民武装（即不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及民兵）。在据地建立时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军之扩大与巩固是正确

的；然而最近敌我形势改变了，因此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而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我们的观点还停留在前一阶段上（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项英在前一阶段就主张精兵主义是错误的，但如我们在现在阶段还不提出主力的精兵主义，也将犯错误。

（四）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如冀东、大青山、苏南），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至于人民武装（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应当包括人民的最大多数，其中之骨干（即民兵、模范自卫队及青抗先或青年自卫队）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之全部数量。而每个根据地脱离生产者全部数目（包括党、政、军、民、学），仍只能占我统治区全人口百分之三左右。当然这些比率是大概的，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而具体化。为坚持对敌斗争，我根据地之党、政、军、民、学各种组织，必须一致努力，来进行上述的军事建设。

二　地方军及军区问题

（一）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虽有区别，但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一般的说，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区别，在于前者是精干的正规部队，担任较大的战斗任务；后者是游击性极大的地方部队，担任分散游

击的任务。前者是统一指挥的，不限于地区的部队。后者是分散指挥的，限于一定地区的部队。

（二）在根据地创立与扩大的阶段，集中全力扩大主力，主力兼军区地方军之指挥，建制亦属主力军，是必要的；但现在情况已变，故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关系也要改变。地方军应有独立的建制及指挥机关，即军区与军分区。但主力帮助地方武装之责任，不但仍旧不变，且应较前加重。主力军在缩编（不是扩编而是缩编）与充实自己的编制时，应依照前面“一般问题”中所说的比率，以相当部分部队划归地方军建制（但部队名义不一定要改），主力军应给地方军以许多的干部、枪械、弹药等等。在作战时，主力军应规定地方军的一般作战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军是受主力军指挥的。主力军应帮助地方军训练部队。但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建制又是彼此独立的，主力军绝对不应该吞并地方军。至于主力军按照比率，遇有损失应加补充时，须由自卫队、民兵、地方三方面酌量动员抽补，以维持相互间应有之比率为原则。

（三）地方军之数量，按照前述比率建设之，但一般最低数目，仍有特别指示之必要。兹规定区应有约五十人枪的区游击队，县应有约二百人枪的县游击营，分区应有约二千人枪的独立营团。区游击队归区的党政机关指挥；县游击营归县的党政机关指挥；分区则应成立指挥部，不由主力兼，地委书记应兼分区政委；军区则由主力兼，或单独成立指挥，但无论主力是否兼任军区一级，主力军与地方军之建制仍是各自独立的。在战争频繁地区，区武装应坚持本区，县武装坚持本县，分区武装坚持本分区，反对逃跑主义（因真正情况不利，暂时移动者，不在此例）及随便调跑。在根据地腹地，区县游击队应同时受分区指挥，到游击区去活动，以锻炼自己

和准备将来。在山岳中心地区，过去敌人少到的，应估计到今后必到，迅速建立区县武装，不可再缓，但其人员武装数量，可较少于平原地区及边境地区。

（四）地方军必须真正地方化，其主要成分尤其主要干部应是本地的，故培养本地干部，由地方党输送优秀的本地干部到地方军去，乃是头一等的重要任务。地方军之斗争方法、政治工作、服装等等，均应适合本地情况（即尊重地方性、游击性）。故空喊正规化，机械地将主力的一套搬运到地方军中去的办法，是不妥当的；限制地方军之独立活动，授以不能胜任的作战任务的指挥方法，亦是不妥当的。

三　自卫队及民兵问题

（一）为加强各根据地广大民众的自卫武力，以适应新的战争形势，必须更加认真地建立自卫队和民兵，这是目前敌后根据地军事建设上一个极大的问题。但迄今各根据地（除晋察冀外）在这一工作上尚未收到应有的成绩。今后务须加紧努力来完成这一任务，否则各根据地必将遭受莫大的损害。

（二）自卫队和民兵（包括模范自卫队和青抗先）都是广大民众保卫家乡、保卫抗日根据地、不脱离生产的武装自卫组织，但二者的范围与任务却互有不同。在根据地内凡年在十六岁至五十五岁者，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宗教、信仰，均应登记，编为一般自卫队队员或妇女自卫队队员（当然要注意政治动员，不能单靠强制）。此种自卫队之基本任务是进行群众游击战争，维持根据地内的治安，担任抗战勤务（如运输、担架、送信、封锁消息、坚壁清

野等）。

（三）民兵则是自卫队的骨干，它是下层人民武装中的高级组织，是由模范自卫队与青年抗敌先锋队两种群众性的组织，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所有身强力壮、愿意武装杀敌的男子，均可按自愿原则加入。其任务是侦察敌情，独立自主作战，及配合主力作战，袭扰敌人，封锁与围困敌人的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打击少数敌人与武装汉奸之活动，在敌人进攻时领导自卫队掩护群众转移等。

（四）自卫队是全民的群众组织，应按队员居住地区编队，分为中队、分队、小队，人数可不划一。而民兵的编制，则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各单位有比较整齐的人数，以便于作战与训练。

（五）自卫队与民兵应由各级（由边区到县）人民武装委员会统一领导。这种委员会是由各级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民主集中的组织，不应采取委派办法。在边区范围内，在武委会的统一领导下，民兵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县区村各级应分设队部，内部生活应悉依民主原则，各级负责人员均应由选举产生，切勿委派。

（六）整个下层人民武装均应有其独立的组织系统与内部生活的民主制度，军政机关不得干涉与代替。但在执行各项基本任务时，应由政府经过同级队部指挥之。民兵平时在总的意图下，应受政府指挥，进行独立自主的活动；在配合主力作战时，应接受正规军或游击队的指挥。各级武委会也不能干涉各种人民武装组织的独立性，其权力只在于统一指挥、武器分配、统一经费与统一教育。

（七）自卫队的武器主要的是大刀与梭镖。民兵的武器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新旧枪械（快枪、鸟枪）、手榴弹（各根据地甚至各县均应设手榴弹厂，大量制造手榴弹，分配民兵每人二个至四个）、地

雷、土炮、挨丝炮等。同时在民兵中应专门进行对敌铁道、矿山、火车、公路、工厂的破坏技术训练，以便开展群众性破坏工作。主力军务须有计划地拨出一批枪支武装民兵，千万不可吝惜。手榴弹与地雷这两种主要武器尤应大量制造，普遍发给。

（八）自卫队和民兵的干部，应该是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各地区应从地方上有计划地抽调大批干部，给以专门训练。各地抗大分校或其他军事学校，应负起这个责任来。

（九）最后，中央军委特再重复指出，民兵建设与自卫队建设的中心一环，在于民主集中制度的建立，任何官办委派，都会妨害其发展，妨害其自动性、积极性的发扬。同时应指出，在分配任务时，应估计到民兵是人民武装的基干部分，应使用于对敌斗争方面，而一般的抗战勤务，则应多由自卫队担任之。

四　关于军队与民兵的武器问题

（一）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小；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且日寇“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根据地财力亦日见涸竭，故兵工生产日益不易。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

（二）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们的兵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欲求山地敌我装备平等，大规模建设军事工业及希望新式武器之生产等，都是无实现可能的空想。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

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假若对于大量生产这种群众性的，较低级、较落后的武装忽视，而集中力量于制造步枪、机枪、炮等进步武器，则将来一定会吃大亏的。

（三）在大量制造手榴弹、地雷等的方针下，必须：

1. 不仅主力军应设炸弹厂以供主力需要，地方军及民兵指挥机关亦应在分区及各县设立炸弹厂，以供自己的需要。这些炸弹厂规模应小，应分散办理，分别隶属于地方军及民兵的各级指挥机关或各级政府，但主力军的兵工厂应在技术上给各地方军及民兵的炸弹厂以各种帮助。

2. 不惜重价延聘制造手榴弹的工人技师，并开办炸弹工人技师训练班，以培养此种专门人才。

3. 搜集铁与硫磺等制造炸弹的原料。

4. 炸弹之生产要力求充足，除供给主力及地方武装外，特别要做到民兵每人两个手榴弹。

5. 民兵中应普及使用手榴弹之教育，主力军及地方军应随时随地派出干部以此教练民兵及居民。

6. 多造各式地雷专给民兵使用。

（四）此外民兵及居民并应尽量采用一切其他落后的武器如梭镖、土炮、土枪等等，并设法制造之。

（五）主力军除炸弹厂外并应努力解决翻造子弹的问题，即采取黑色火药亦可。延安三酸厂，可给附近根据地以无烟火药的帮助。

（六）中央军委特再重复地强调群众性、落后性武器——手榴弹、地雷、土炮等——之重要性。我们一无飞机、大炮、坦克，再则我们的步枪、机枪质量也差，子弹也日益困难；想要单靠我们自己力量办到有极优良的步枪、机枪，有极充足的子弹，在目前条件

下，已是完全的空谈，更不必说飞机、大炮、坦克了。因此，只有下决心依靠群众、民兵及部队之抗日坚决性、积极性，依靠全民皆兵，依靠群众性的落后武器，依靠这些武器的数量，使敌人到处因我们的手榴弹、地雷、土枪、土炮而疲于奔命，同时主力军除炸弹外并积极设法修理枪械与充实自己的子弹。只有这样，才是在今天坚持敌后艰苦卓绝的斗争之唯一道路。

1942年11月，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进一步规定了根据地内实行主力军、地方军和人民武装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图为毛泽东和民兵在一起。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0日）

连日侦察，何文鼎尚在桃力民未动，王震、贺晋年已集中了约六千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吓住何文鼎不来。你处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彼方说减少兵力[2]，决不要答应他。至于蒋以破裂吓人，只是瞎吹牛皮，他决不敢的。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1月9日致电毛泽东、朱德，告以刘斐向他转达的蒋介石的两点意见：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变；二、何文鼎部决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如我向他进攻，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1年11月11日）

放叶、发饷，必作一件，方能出席。否则请假。空言不算数。坚持不变。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周恩来直接和蒋介石谈判出席参政会的条件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1月12日）

提议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由李富春负责，彭真为顾问，限三天写出边区一九四二年度财政经济计划，交政治局通过。实行半统筹统支，统筹的主要项目是粮食、草料、被服、食盐、药材、纸张六项，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实行。一九四二年动员运输公盐十二万驮。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1]

（1941年11月14日）

寒午电[2]悉。我们是被聘的参政员，蒋介石决无强迫我们出席之理，我们绝对不能在蒋介石压迫下出席参政会。请以下函即刻送达参政会。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王秘书长勋鉴：同人等因事不克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敬希谅察。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董必武、邓颖超十一月十五日。因事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1月14日致电毛泽东，转达崔可夫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的意见。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6日)

接共产国际来电，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要王世杰担保放叶、发饷，则在渝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2]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董必武11月16日致电毛泽东，说张治中、王世杰已担保在参政会后释放叶挺，故决定董必武、邓颖超向参政会报到。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16日）

三个联络参谋确做了许多有利团结的工作，周、郭到渝时望接待之。八路军已切断何师到安边通路，这是彼方决定何师缓调的主因。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1月17日）

财政经济方针须实行下列两大原则：一、精兵简政，调整人员。裁减的人员须使之各得其所。二、扩大收支，发展事业。扩大必要事业如文化事业等的经费。这次会议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计划草案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发理论材料目录等问题

（1941年11月17日）

周、董[1]：

佳、文[2]电均悉。我们并未发出辩证法提纲，只发了一个理论材料的目录，其中包括政治理论及思想方法论两部分。中共党史提纲容考虑，现已印了一本中共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有便人即可寄上。七大报告即季米特洛夫报告。此复。

中央学习组　毛　王[3]

篠[4]

---

[1] 即周恩来、董必武。

[2] 韵目代日，指9日、12日。

[3] 即毛泽东、王稼祥。

[4] 韵目代日，指17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

（1941年11月21日）

本届参议会的胜利成功，除通过了很好的决议外，第一是暴露了我们很多东西，暴露了我们的好东西，同时也暴露了我们许多缺点。第二，这次参议会是个很大的学习，在乡、县、边区三级参议会中，党内外人士亲密合作，可以克服我们许多同志的关门主义弱点。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闭幕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各地高级学习组应根据组织条例实施[1]

（1941年11月26日）

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军分会、各军政委员会：

近因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或宽或严，未能一致，由中央逐一审查批准，势不可能，特制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2]。各地收到后，即根据此条例加以审查，决定去取，除组长、副组长、秘书三人须向中央报告其姓名、业务[3]外，其余可只报人数。关于学习经过，则须由组长、副组长负责，随时报告。

中央书记处

十一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

[2] 指中央书记处1941年11月25日制定的《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

[3] 抄件原文如此，疑为“职务”之误。

关于实施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致刘少奇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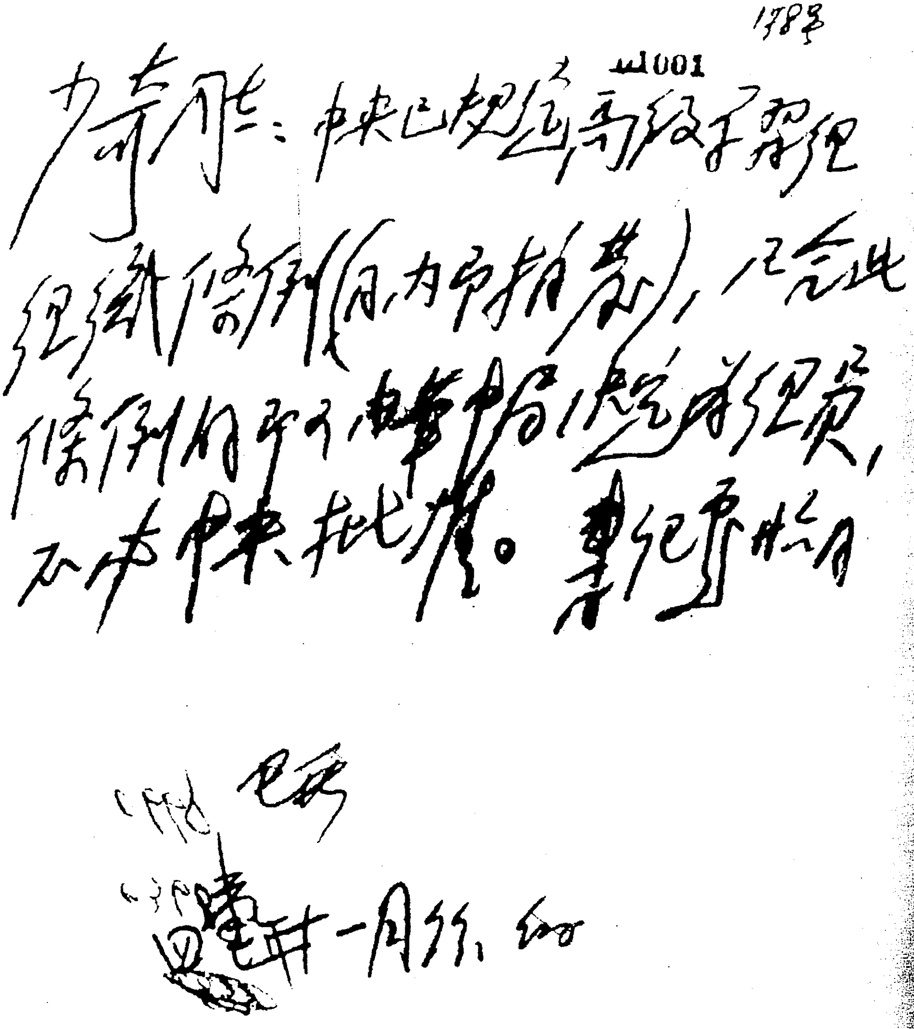
（1941年11月26日）

少奇同志：

中央已规定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日内即拍发），凡合此条例的即可由华中局决定为组员，不必中央批准。

书记处

廿六日



178号

少奇同志：中央已规定高级干部组织条例（另有电报告），凡合此条例的可以由中局选为委员，不由中央批准。书记处卅日

电稿

十一月卅日

毛泽东为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电的手稿。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1月30日）

据陈长捷二十六日致朱绍良电称，已令何文鼎师向安边开动。请质问刘为章所谓何师缓调是否缓兵之计，我军直至今天未放一枪，如何师一定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彼方负之。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挽张冲先生联[1]

（1941年11月）

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
斯人独憔悴[2]，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

---

[1] 1941年8月11日，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代表张冲病逝。8月13日，毛泽东为张冲逝世发给其家属唁电，电文是：“惊闻淮南先生逝世，至深哀悼，特电致唁。”同年11月9日在重庆夫子池新生活运动服务所礼堂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和吴玉章、陈绍禹、邓颖超等7名中共参政员联名送了这副挽联。张冲（1902—1941），字淮南，浙江乐清人，国民党员。早年专攻俄文，并赴苏联考察，曾与冯玉祥等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推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任大本营第六部主任秘书，后任军委办公厅顾问处处长。1941年3月兼国民党中组部副部长。1941年8月11日病故于重庆。

[2] 斯人，此人。憔悴，困顿萎靡的样子。斯人独憔悴，语出唐代杜甫《梦李白之二》：“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这里指张冲积劳成疾。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2月1日）

这个草案很好，但有缺点，只强调研究实际，未说明研究理论的重要，只说要有的放矢，没有强调矢的重要。过去的教育，主要缺点是只教学没有注意教人家去用。最容易的是只教学，最难的是教用。要教会人分析问题，研究中国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如学木匠，要学三年才能用，如果只教规矩、绳墨只要三个钟点就教好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对于各种问题要先做分析工作，准备若干年做过分析工作之后再作综合的理论工作。要将这个草案写成两个决议，一个是延安适用的，一个是给全国用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illegible]定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
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

（1941年12月9日）

（一）如同本党中央对太平洋战争的宣言所说，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的战争，英美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因此，我全国人民，全体海外侨胞，及南洋各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与开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应当包括反对日本侵略的一切民族的政府、党派及一切阶层的人民，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朝鲜、台湾、越南的人民在内。这个统一战线，应当是上层的，同时又是下层的，是政府的，同时又是民众的联盟。应当实现中英美及其他太平洋各国的反日军事同盟，应当建立宗主国政府与土著民族的亲密合作，同时应当改善各土著民族的政治、经济地位，组织其民众，提高其积极性，并开展一切日本占领区内的游击战争。没有这些，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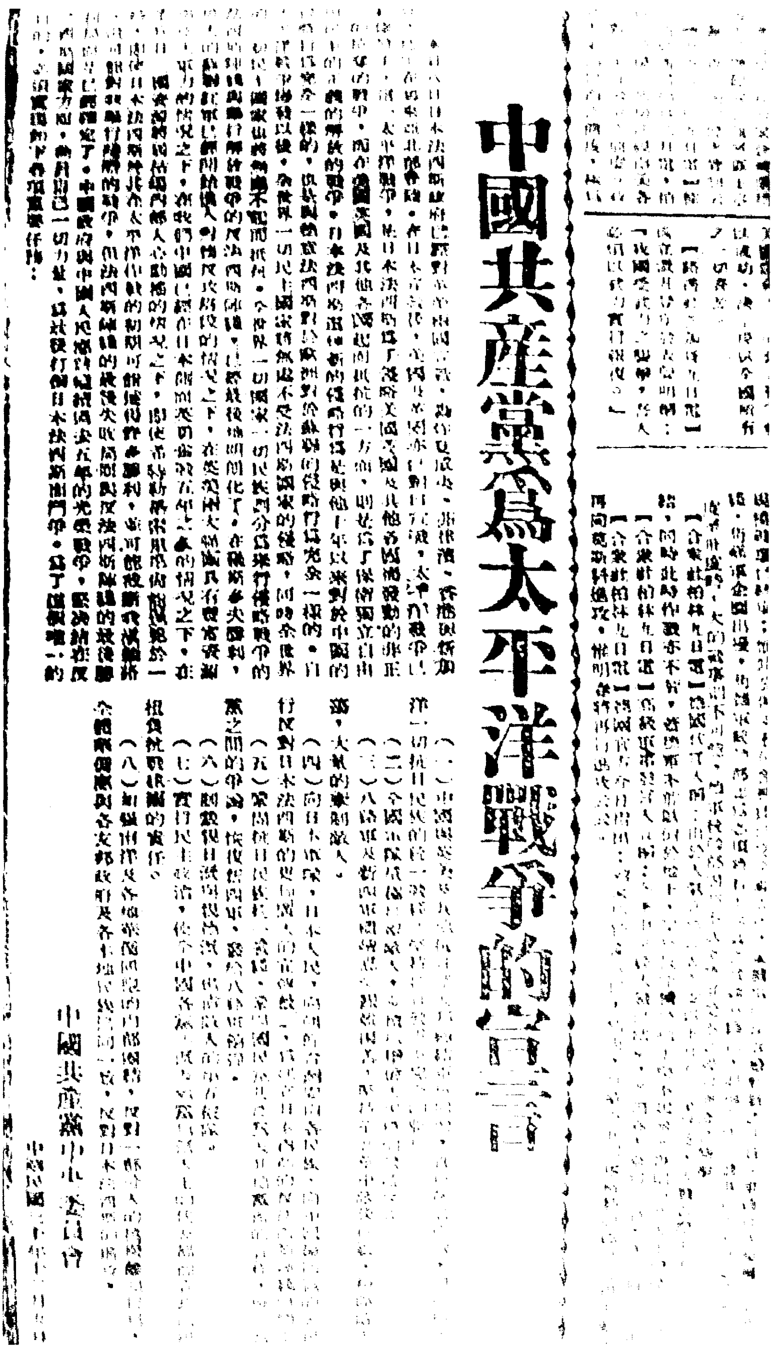
（二）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在与英美合作之下，消灭日寇是中国民族解放的必要前提；他方面，中国内部团结一致，改革政治军事，积极牵制打击敌人，积极准备战略反攻，又是英美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

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三）必须大大地开展南洋与英美各地的华侨工作。华侨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团结全体华侨，团结其各阶层各党派，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赞助并参加当地政府一切抗日的设施与行动。应该纠正侨胞中及一部分共产党员中的过“左”倾向，要求他们与当地中国使馆、领事馆及国民党部合作。但对亲日、亲德分子分裂侨胞团结、妨害抗日工作的行为，必须坚决地但是适当地反对之。

（四）必须努力开展华南敌占区、海南岛、越南及日本在南洋一切占领区域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应尽可能与各抗日友军及英美等抗日友邦的军事行动协同一致，及取得他们在各方面的赞助。游击队所实施的各种政策应该符合于反日统一战线的要求，应该注意防止并纠正各种“左”的倾向。

（五）在南洋各地的工作，应与当地民族的共产党取得联系，并帮助他们纠正存在着的“左”的倾向，广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中國共產黨爲太平洋戰爭的宣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41年12月，毛泽东主持讨论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

对国际战争形势的估计

（1941年12月12日）

周[1]：

（一）香港、泰国、马来、缅甸、菲律宾、关岛、中途岛、婆罗洲[2]、荷印[3]、澳洲[4]、新西兰均有被日军在冬季内占领之可能，在半年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得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二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以待日军之敝，然后举行反攻。（二）英美的总方针可能是对日取守，而对德取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解决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解决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决定力量。如若在数月后欧洲出现第二条战线，便可较快解决德国，这是真正有利的方针，但不知惰性甚深的英美军政人员有此毅力否？（三）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歧途，但东线[5]既已无路可走，便有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取守势，在南线或西线[6]取

---

[1] 周，指周恩来。

[2] 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岛，位于东南亚，是世界第三大岛。

[3] 荷印，指当时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印度尼西亚，又称“荷属东印度”。

[4] 澳洲，指澳大利亚大陆及附近的塔斯马尼亚岛等。

[5] 东线，指当时的苏德战场，北起列宁格勒（芬兰湾），南至黑海边的联刻赤。

[6] 南线，指当时德意联军与英军争夺北非和地中海控制权的战线。西指当时德军与美英军队争夺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战线。

攻势的可能，如此则是希特勒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也就有了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英是海陆空主力，美是空军与资源主力）打德之可能性。（四）太平洋战争[1]对中苏两国其利有六：第一，华北华中的敌军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进攻边区的可能性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个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迅速造成第二条战线之可能。以上是在八号政治局会议上的一种估计（内部的，不发表的），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

[1] 太平洋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1941年1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12月8日，美英对日宣战，德意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

关于敌后各根据地领导方法的指示[1]

（1941年12月12日）

德怀、瑞卿同志：

估计到敌后各根据地间交通已经很困难，今后更加难于通过，来往费时间，因此要求我们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方法上注意下列各点：（一）详细研究各地之书面报告及电报。（二）与各地来往人（不管其职务如何）详细谈话及调次要负责人受训，利用机会收集材料。（三）派人及组织巡视团，到各地检查工作搜集材料。（四）全华北的高干会议、政治工作会议不宜召集，因主要负责人来往费时，得不偿失。（五）召集晋东南、冀南的各种会议（如锄奸、敌伪等会议），做出结论，介绍给其他根据地。领导方法之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毛　朱　王　谭　傅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傅钟联名给彭德怀、罗瑞卿的电报。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2月13日）

英大使等既要我们派人去新加坡，正宜利用此机会派人去，请你考虑派必武或其他适当人去的问题。去人目的不但在新加坡并在指导整个南洋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给蔡畅[1]的信

（1941年12月16日）

蔡畅同志：

李六如[2]同志入党时间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九二一年入团的。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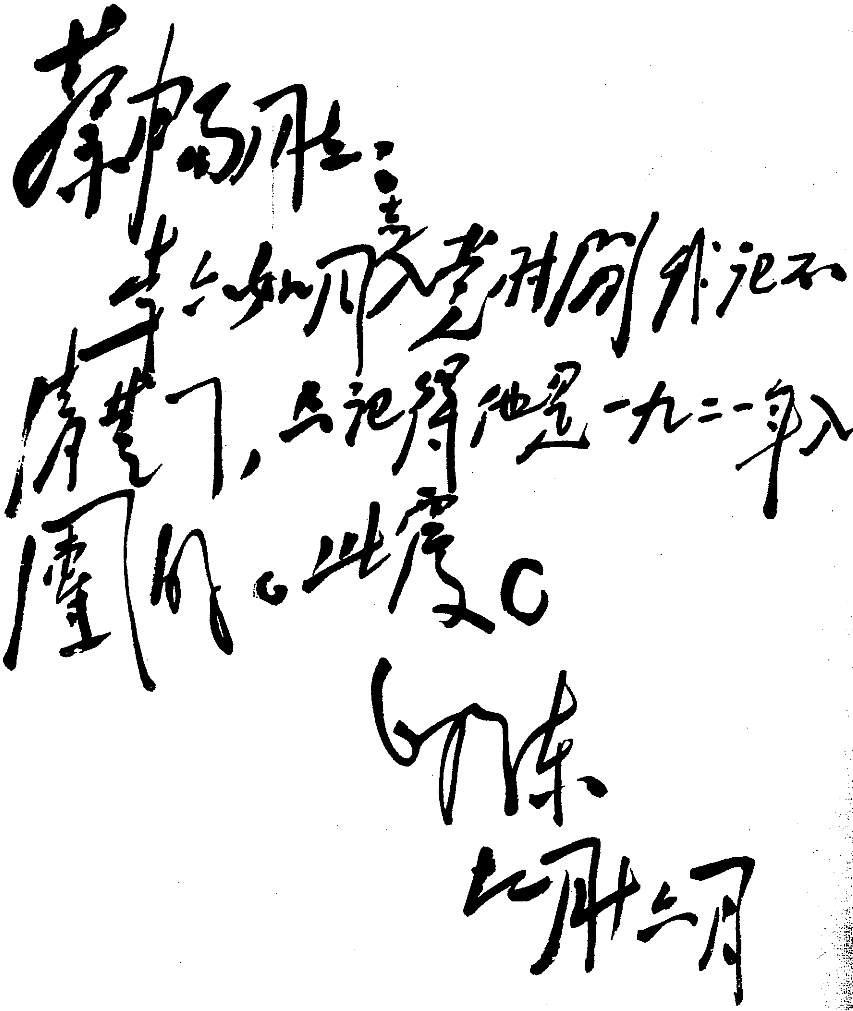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工作。

[2] 李六如，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



蔡畅同志：

寄上如所示考用阅，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九二一年入团的。此覆。

泽东

七月六日

毛泽东致蔡畅信的手稿。

为王观澜[1]题词

（1941 年 12 月 1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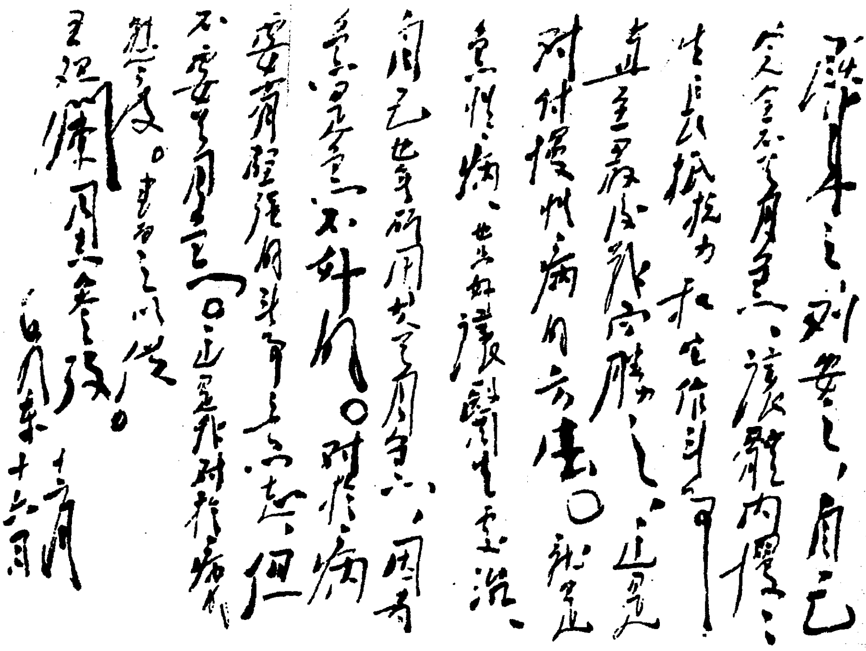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原名金水，字克洪。1925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土地部副长。后任中共中央农委主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陕甘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着急是不中用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此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毛泽东为王观澜的题词。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

（1941年12月17日）

（一）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于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观点（不是其大堆的抽象原则）的学习，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

（二）各学校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具体目的，亦是缺点之一。为

此特规定：

（甲）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

（乙）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丙）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

（丁）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

上述各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

（三）为加强各校的具体领导及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决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

（四）为实现各校具体目的，使党的有限精力财力收到最大效果，各校对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各校及其主管机关应重新审查学生成分，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以分配工作或转学他处为原则。

（五）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身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中宣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

（六）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是不可能的。

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之多少，而应包含阅读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文化班编制的标准，应依照学生的文化水平，而不依照其工作职位。

（七）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例如军事的、政治法律的、财政经济的、自然科学的、文艺的、师范教育的、医学的等等），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的理论与实际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百分之五十（不须补习文化之学校，则专门课应占百分之八十），文化课应占百分之三十，政治课应占百分之二十。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不正常现象。

（八）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地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在教学中，陕甘宁边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实际材料，应经过各种调查研究的方式充分地利用之。

（九）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

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

（十）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材料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地编印或翻印。中央宣传部应协同出版机关及财政机关制定一九四二年有关教育的出版计划及经费预算，交中央批准实行。

（十一）各校学生生活及教育设备，应按现有条件作必要的改善。

（十二）学校行政组织以短小精干为原则。学校内党支部的任务，是在保证学校教育计划的完成，纠正支部与行政并立的不正确现象。支部对学校行政的建议，可经党的路线提出，但不能出于干涉。在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内，应纠正党员包办一切的党化作风。

（十三）应在学校内养成学生自由思想、实事求是、埋头苦干、遵守纪律、自动自治、团结互助的学风，而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好高骛远、武断盲从、夸夸其谈、自以为是及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恶习。关于这种学风的养成，教职员应该以身作则。

（十四）本决定适用于延安。但本决定中的一切基本原则，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2月18日）

过去情况尚未弄清楚，因莫斯科危险未过去，日苏战争、国共关系也未明朗化。现在已明朗化了。自罗斯托夫胜利开始，苏德战争的好转已确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解除日苏战争的危险。过去蒋介石估计是三北政策，现在是三南政策了，对蒋不利。日军可能截断滇缅路，使蒋向南。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两国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一致命打击，我们使国民党既不投降又不能“剿共”的可能性更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途，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二三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今后将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要一打一拉，有硬有软。过去有人认为对国民党硬会坏事，这是不对的。当硬时应该硬，使它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例如打败了阎锡山的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军，因此阎对我们代表客气。关于工作布置，提议由中央发一指示。要加强南洋华侨工作，廖承志应大胆地在香港与英国建立关系。要加紧训练干部，经华北调一批高级干部来训练，两年内培养出四五万个高级干部。在谈“三三制”时，他说：过去并没有做好，没有使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一是分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扩大其矛盾；二是打破共产党的关门主义，集中民众的意见，要与非党干部接近才能感觉新的问题。对地主的政策，不要说削弱大地主的话，现在不应削弱。说削弱富农更是错误的，要让富农发展，不能削弱。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 年 12 月 20 日）

国民党反共后，我们提出荫蔽精干的政策，精干是小而精，荫蔽是要求公开合法，但都做得不好。过去我们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口号是提出了，但没有具体的组织方法。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主要是秘密问题、公开合法问题与领导方法问题。决定草案认为过去组织不巩固，这种估计不好。过去发展党的组织是对的，不能说庞大无力。我们不可能设想绝对巩固的党，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巩固的东西，而只是我党工作做得好些，能适应社会环境，就会巩固些。党的组织要达到精干的目的，不完全在于党员的社会地位的高低，党的组织只是上层不见得是精的。我们在国民党区域战略上是退却，总方针是保护自己，但在战术上要有进有退。关于领导方式，对下层组织我们应少管，应指示他们要保存力量，少死人，多交友，发挥其独立性和创造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陕西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问题及陕西省党的工作决定草案讲话的一部分。

给续范亭的信[1]

（1941年12月23日）

两示敬悉。电已照发，所见很对。承馈酒蜜，即与若飞分尝。我臂部十愈五六，是洗澡晒太阳之功，再过一时，或可全愈。尊恙有起色，大家欢喜。惟不宜急于求愈，不宜即准备行动，我看你的身体至少再休养一年，以为如何？住地以适为主，中央医院如有房子自好，否则即住现处，有林、谢、高、南[2]诸人谈谈可慰寂寞。元旦此间有一小晚会，如有兴致可来看看，我派车子接你。

---

[1] 这是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主要内容。

[2] 林、谢、高、南，指林伯渠、谢觉哉、高岗、南汉宸。

给任弼时的信[1]

（1941年12月25日）

土地指示我改造了，改成能够公开发表的，请你审阅付缮交各同志去看。原文提得不清楚不明确，又有许多重复及遗漏之处，改造后似乎好些。参考意见三件亦有些问题，待修改后再交你。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指示第一号》草案，致任弼时信的主要内容。

一九四二年的中心工作任务

（1941年12月28日）

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主要负责同志：

太平洋战争是长期战争，日寇将在南太平洋愈陷愈深，目前正从华北、华中抽兵南进，将来还有抽调一部可能。重庆政策是仅用游击队对敌，不用主力与敌对峙，让敌撤走，我军亦应取此政策。一九四一年我根据地受了很大损害，应乘一九四二年敌人忙于太平洋对中国采取战略守势之际，集中精力恢复元气。坚决执行中央十二月十三日指示[1]，精兵简政，发展经济，发展民运，发展敌占区工作，发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有计划地训练干部。在军事上是粉碎敌人可能的“扫荡”（任何“扫荡”必须坚决粉碎之），收复敌人撤退地区；对深入我区之据点，尽可能使之陷于孤立，自动撤去；对某些最必要的地方，可以个别地采取强攻收复手段，但不可采取大规模攻势，反而抑留敌人，引起报复“扫荡”，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部队中及地方上可能发生的冒险精神，务须防止。世界大势及国内大势迫得国民党要作某种政治上的转变，但其过程仍是慢的。我党我军的宣传，务须避免刺激国民党，静观变化，少作批评，极力忍耐，不要躁急。总之，明年的中心任务在于积蓄力量，恢复元

---

[1] 从文内所述的指示内容看，应是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

气，巩固内部，巩固党政军民。对敌伪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对国民党以疏通团结为主，以防制其反共为辅。如敌人不攻苏联，我们即取此政策以待敌军之弊。如敌攻苏联或苏联攻敌，我们即有充分精力配合苏军作战。务望各同志研究实行之。

中央书记处
中央军委
十二月二十八日

关于中共党史学习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12月30日）

恩来：

中共党史的学习请先从讨论六大以来的文件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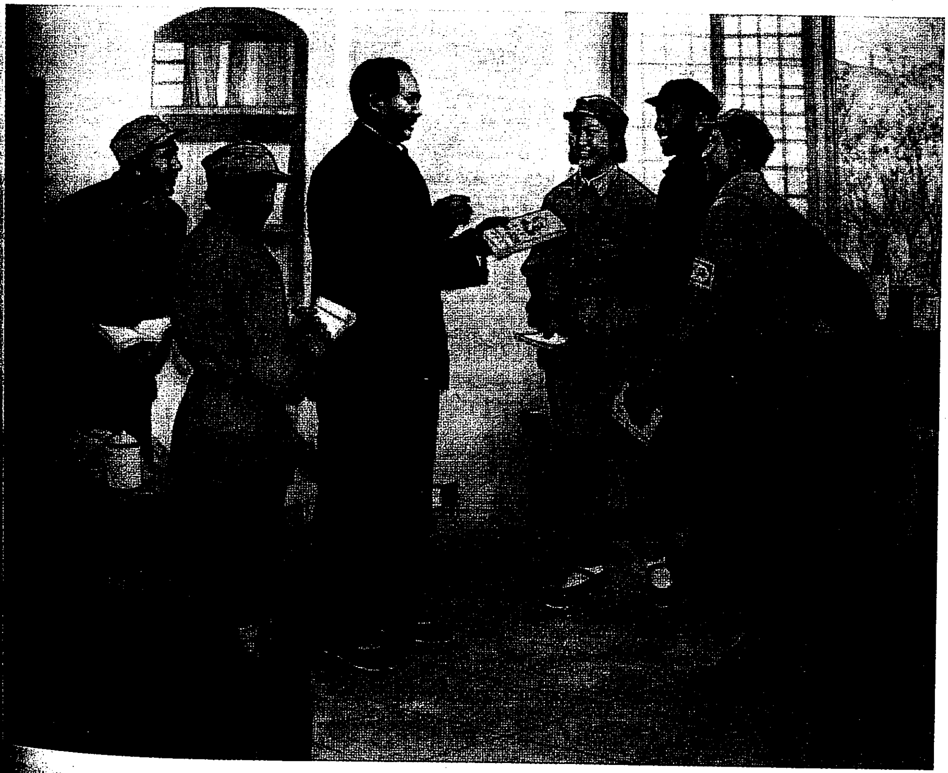
毛　王[1]

陷[2]

---

[1] 即毛泽东、王稼祥。

[2] 韵目代日，指30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学理论》（中国画）

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

（1941年）

一

据我们历来的想法，所谓对于情况的估计，就是根据我们对于客观地存在着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查研究，而后反映于我们脑子中的关于客观情况的内部联系，这种内部联系是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之外而不能由我们随意承认或否认的。它有利于我们也好，不利于我们也好，能够动员群众也好，不能动员也好，我们都不得不调查它，考虑它，注意它。如果我们还想改变客观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根据这种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内部联系的估计，规定行动方针，转过去影响客观情况，把它加以改造。这时，如果客观情况是有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前进吧！如果是不利于我们前进的，我们就向群众说：你们暂停吧（近乎“等待主义”），或说：你们退却吧（大有“机会主义”嫌疑）！据我想，这就叫做马克思主义的起码观点呢！

二

必须明白，在日本人与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一切地方（这种地

方占全国十分之九以上的区域），绝对不能采取流血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只能采用不流血的和平斗争形式。

和平斗争也有两种，一种是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又一种是非法的秘密的斗争，但都是不流血的、不暴动的、非武装的斗争形式，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在敌人统治区域的策略路线。

一切日本人及国民党有巩固统治的区域都必须采取合法的公开的斗争形式。中国虽然不是民主的法治的国家，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尤其在日本统治区域对人民压迫得更厉害；但是政府的法律、社会的习惯，依然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有很多矛盾、间隙、漏洞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必须采取合法的能够公开的各种各色的斗争形式，才有人来，才能一般地避免政府的逮捕与解散，才能保全力量与积蓄力量。临时中央[1]却是拼命反对这种形式。有许多本来是非法的斗争，也要采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才有胜利可能。例如罢工，是非法的，如果我们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就必须利用当时当地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条件，可罢则罢之，不可罢则已之，罢而不胜则停之。做得入情入理，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才能存在与胜利。而临时中央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

公开工作之外，还要有秘密工作与之相配合，这就是党的秘密组织工作，群众的秘密组织工作（作为群众公开组织的核心），党派的秘密联合行动，秘密的情报工作，公开组织与公开斗争的事先秘

---

[1] 指1931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

密准备等。没有这一方面的工作，是不能存在于敌人统治区域的，公开工作也失了灵魂。临时中央则不但不愿意进行公开合法工作，也不愿意认真进行秘密工作，凡事爱暴露，爱显劲，爱称英雄，爱在明天早上胜利，结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在敌人统治区域把党闹个精光，一点群众力量也闹个精光。

由此看来，临时中央的所谓“各种形式”，只是一句空话，其实他们只有一种形式，就是打、闹、叫，此外一点也没有。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的统一，在和平斗争方面，又是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的统一。这是极复杂的政治科学的一整套，中国共产党人如不学会这一整套政治科学，是无法胜利的。照临时中央的单纯的片面的冒险的干法，怎么能够“使工人阶级成为反日运动的骨干”“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呢？不，是使工人阶级成为无用的长物，使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族解放的空唤者与束手无策者。为什么有些同志连民族二字都不敢提呢？老爷[1]们既然提倡打倒一切，采取极端狭隘的关门主义与极端冒险的盲动主义，还吹什么民族呢？提了民族二字又有什么用处呢？

三

请问老爷们：为什么分配一切土地给一切人，就叫做“十足机会主义的观点”，叫做“完全忽视无产阶级领导权”呢？咳，我倒要叫老爷们听训了！你们一点什么都不懂，根本脱离农民群众，硬把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路线强迫推行于苏区，自

---

[1] 指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

封为“明确的阶级路线”，而把南方如像江西等地的农民群众所赞成所拥护的“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分配法，名之曰“富农路线”，“十足机会主义”，强迫取消，是何道理呢？你们也知道吗？地主不分田者，肉体上消灭地主之谓也，这是出于哪一条马列主义的？你们在理论上，既不主张破坏地主们的消化器，就得让他们吃饭。听说十月革命后，列宁曾把一些地主送到西伯利亚搬木头，给他们以劳动与吃饭的机会，这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我们的“列宁主义者”则不然，既无木头叫地主搬，又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民主革命还未胜利时期，在强大敌人进攻、革命谁胜谁负还未决定时期，就要用不分田、分坏田的政策对待地主富农，这是属于哪一条列宁主义的呢？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

在土地问题上，六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在有很多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这些话大部分是正确的，因为它适合中国这类地少人多的情况（在北方每人平均只有三亩地，在南方每人平均只有一亩地）。这一段话里，只有最后一句不妥当，因为“平分土地”的结果，并没有动摇全部私有制，只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私有制，使之变为农民的私有制，而且在农村中仍然摆着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走社会主义道路两个前途，更不要说没有动摇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制了。六大

决议又说，要向农民说明在现时条件下没有实行真正平等的可能，因此不要把农民引向绝对平均主义（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分田后不允许土地买卖，即不允许新富农产生）。临时中央违反六次大会，发明一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连同政治、军事、组织路线的错误，结果闹出一场革命的失败，其亦可谓“完全正确”也已矣。

四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与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2]，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3]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

---

[1] 参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1页）。

[2] 指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

[3]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9页）和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一节《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4页）。

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1]。我们要建筑中国革命这个房屋，也须先有中国革命的图样。不但须有一个大图样，总图样，还须有许多小图样，分图样。而这些图样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得来的关于客观实际情况的能动的反映（关于国内阶级关系，关于国内民族关系，关于国际各国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国际各国与中国相互间的关系等等情况的能动的反映）。我们的老爷之所以是主观主义者，就是因为他们的一切革命图样，不论是大的和小的，总的和分的，都不根据于客观实际和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他们只有一个改造世界或改造中国或改造华北或改造城市的主观愿望，而没有一个像样的图样，他们的图样不是科学的，而是主观随意的，是一塌胡涂的。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

[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原文是：“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五

从“九一八”至遵义会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拿了衡量一切的他们自己的路线，是不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胡乱制造出来的。以机会主义的思想去衡量别人的思想，于是到处都发现“机会主义”，正如有鬼论者到处见鬼一样。第二，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既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主观主义的政治路线，又用这种方法造出了他们自己的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于是对于凡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对于事既不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对于人自然也不用这种方法。而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如果离开了唯物的辩证的方法，就会只是胡闹一顿，决无好结果可言。第三，他们连什么叫做“两条战线斗争”也是一点不懂得。他们不知道两条战线斗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对于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着的一定事物的过去与现在的发展状态加以分析与综合，因而可以肯定它的暂时安定性（即该事物的本质及其属性）的一种方法。例如为要认识中国现存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的过去状况与现在状况加以科学的具体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独立的封建社会（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它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半封建的社会。又如要认识现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就必须从中国社会是特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点出发，加以科学的分析，懂得它既不同于没有民族压迫只有封建压迫而无产阶级又未觉悟的国家，如像二百年前的法兰西那样，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推翻封

建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一条战线上的斗争），也不同于由于无产阶级觉悟而在推翻封建阶级之后社会条件与政治条件容许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如像十月革命时的俄国那样，是由无产阶级领导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第二条战线上的斗争），然后才可作出综合的结论，说现时的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对于每一件具体的事，每一个具体的人，如果要认识它的性质，就必须使用这种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加以具体的分析与综合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肯定的结论。稍一离开这种方法，稍一不合该事该人的实际，就没有法子做出正确的结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者们主观地狂妄地采取所谓两条战线的方法，完全离开了具体的科学的研究工作，故其结论不能不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把党内对于这个方法的思想弄得极其混乱与模糊起来了。许多人都晓得要作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究竟如何做法，成了一句不值钱的口头禅。第四，“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们的主观主义的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亦即他们的乱斗法，自然就不能如《联共党史》[1]在其结束语中所说的，既要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将他们加以粉碎（结束语第四条）；又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党与党员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结束语第五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乱斗法，没有可能将这二者（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而把用于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了同

---

[1] 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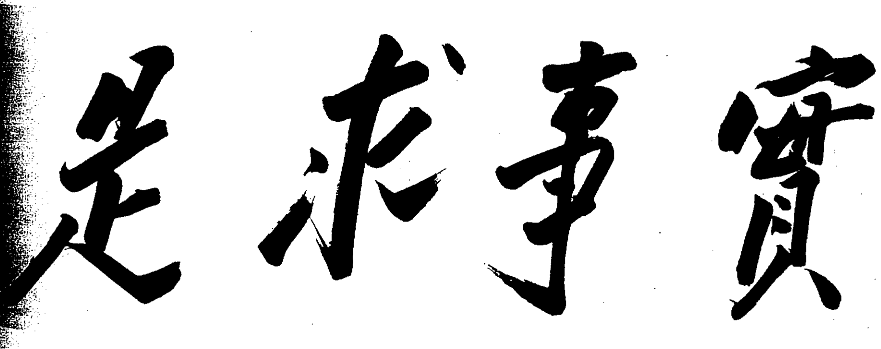
志，在党内造成了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到处都是“仇恨”与“斗争的积极性”，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这种反科学的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的乱斗法，如果不肃清，党要达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是不可能的。

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1941 年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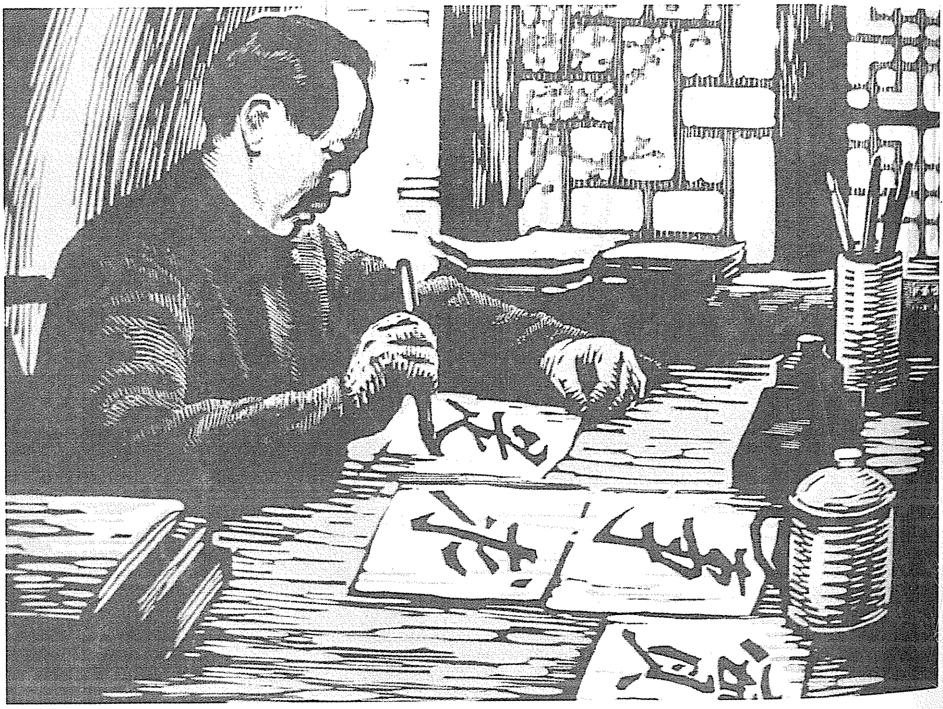
实事求是。

毛泽东



實事求是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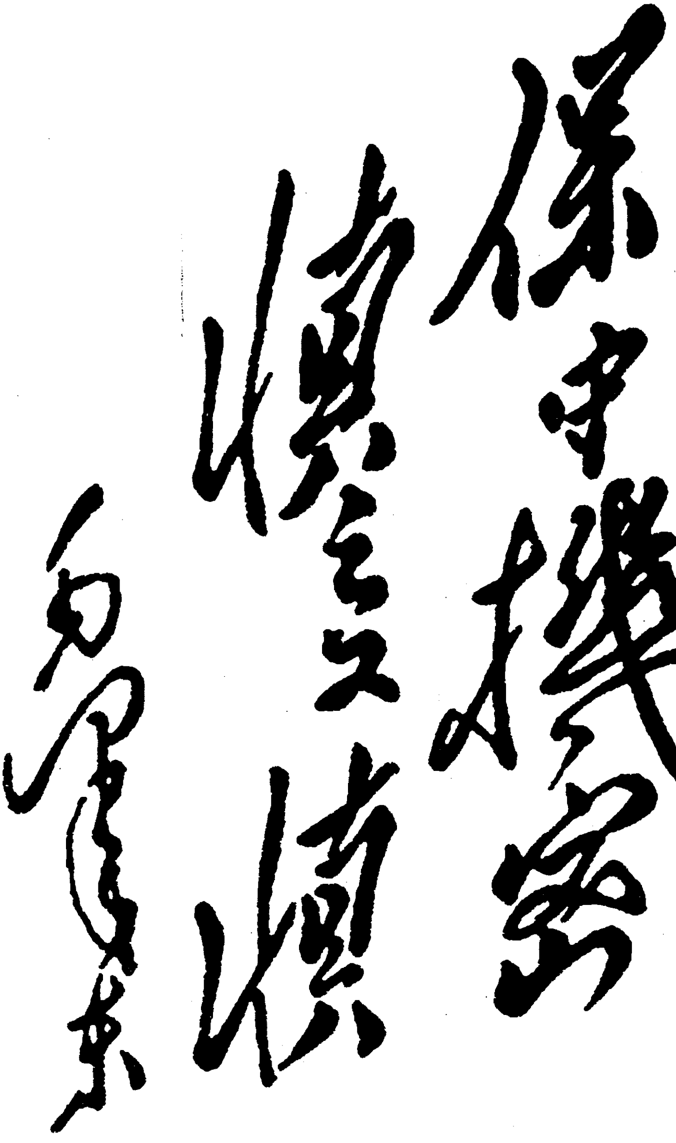
《光辉的题词》（版画）

为军委机要工作题词

（1941年）

保守机密，慎之又慎。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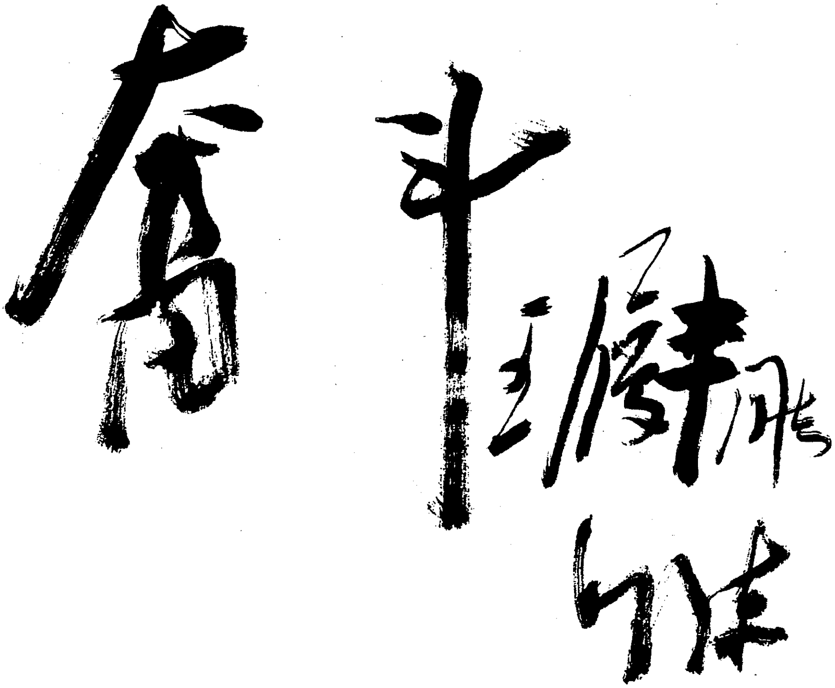
保守机密
慎之又慎
毛泽东

毛泽东为军委机要工作的题词。

为王履丰题词[1]

（1941 年）

奋斗。



奋斗

王履丰同志

毛泽东为王履丰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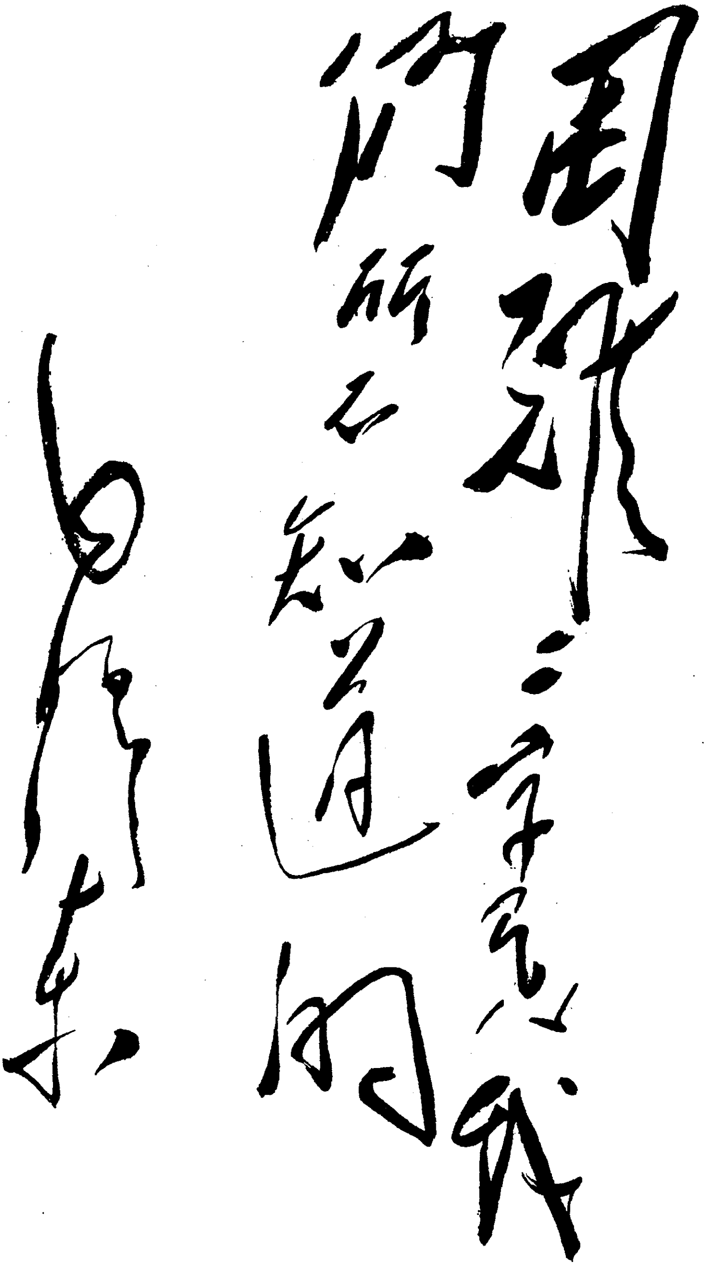
---

[1] 在1941年暑假，王履丰等代表陕北爱国知识青年到延安参观学习，在中央西北招待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为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的青运工作展览会题词

（1941 年）

困难二字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团结二字是我们所知道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主办的青运工作展览会的题词。

为门书明题词[1]

（1941年冬）

学习一番再工作。

---

[1] 门书明，曾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机关工作，后调到毛泽东身边任警卫人员的文化教员。194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调到甘肃省庆阳县地方工作。1941年冬，门书明前往中央党校学习，毛泽东为其题词：学习一番再工作。

1942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致周恩来等电[1]

（1942年1月7日）

关于大后方党的工作，中央拟作一决定，特征求二兄意见，请将政治、组织两方面意见见示为盼。

---

[1] 这是毛泽东和陈云致周恩来、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月8日）

我们方针是巩固自己，沉机观变。

今年内德、意会向下，日本还会向上，英、美会削弱，国民党会分化。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情况的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1]

（1942年1月10日）

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摇，似要待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情况的材料上加写的话。

致彭德怀等电[1]

（1942年1月12日）

敌后各根据地要注意领导方法。领导方法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利用一切可能进行调查收集材料，对敌后抗战的各个具体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傅钟致彭德怀、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文化课本》序言

（1942年1月17日）

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有大批精明忠实但缺乏文化基础的干部，将来也必然还会有大批这类干部，他们急切需要解决文化基础问题，但课本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现在文化课本出版了，这是一大胜利，这是凯丰、徐特立、范文澜[1]诸同志的功劳。不管课本内容还须随时改正缺点，推陈出新，但有了这个课本，就打开了学习文化的大门。文化课本的出版，是广大干部的福音，我相信，我们大群的干部会以极大的热忱来欢迎这个课本的。

---

[1] 凯丰，即名何克全（1906—1955），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

为瞿宪文题词[1]

（1942年1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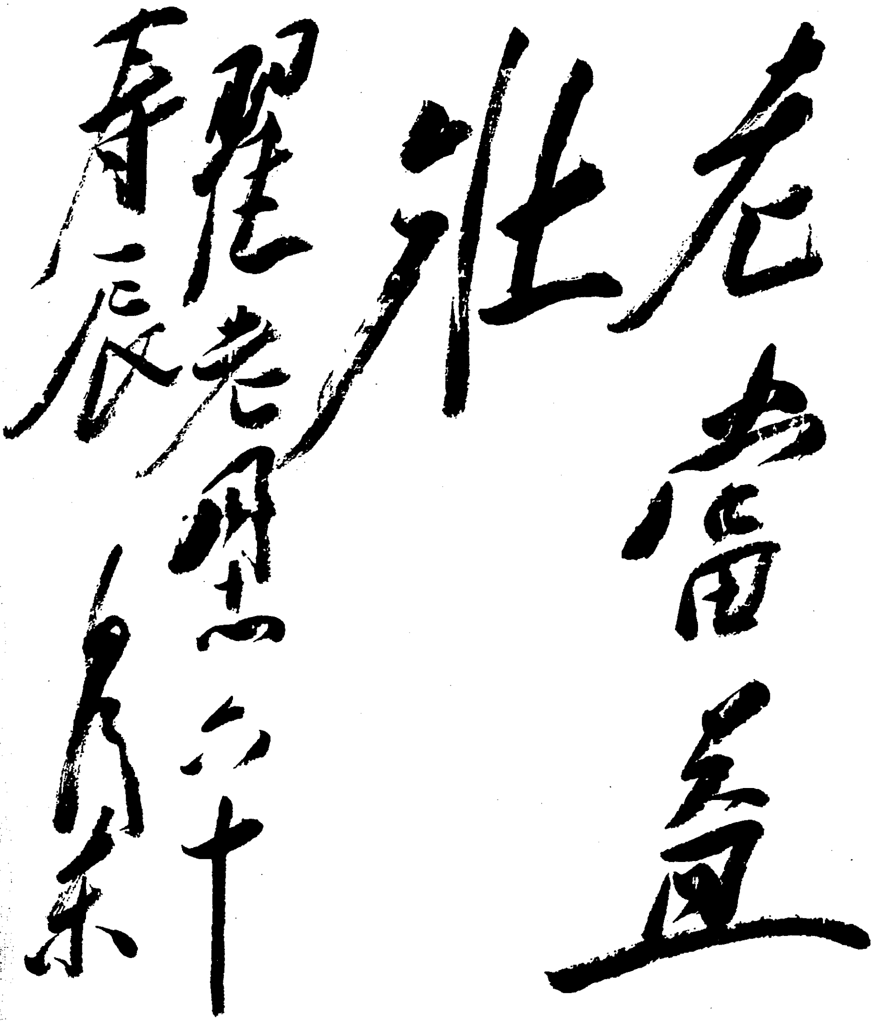
老当益壮。

瞿老同志六十寿辰。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管理局为抗战爆发后来延安行医的瞿宪文六十寿辰举办的茶话会上所写题词。



老当益壮

瞿老同志六十寿辰

毛泽东

毛泽东为瞿宪文的题词。

在审改的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2年1月20日）

由于我集中兵力于定边、安边、靖边，并占领蒙边军事据点，迫得重庆取消何文鼎师进驻安边之命令，边区北部暂告平静，我增防部队已返原防。

致彭德怀等电[1]

（1942年1月21日）

日本在满洲放出北进空气，如新加坡不守，日军与希特勒配合进攻苏联的危险是存在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左权、聂荣臻、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瑞等电[1]

（1942年1月21日）

中央派刘少奇去山东解决存在的问题，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在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2年1月22日）

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

在欢迎七一七团晚会上的讲话[1]

（1942年1月22日）

你们这次在三边，完成了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了那里，顽固分子就不敢来了，你们没有打仗，就赢了一个大胜仗。边区是个好地方，顽固分子可不喜欢这个地方，所以才把你们从前方调回来，有事就打仗，没事就生产和学习。

---

[1] 这是毛泽东在欢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晚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印发和学习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

（1942年1月23日）

谭政、莫文骅[1]二同志：

将四军九次大会决议[2]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3]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4]，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

[1] 谭政、莫文骅，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

[2] 四军九次大会决议，指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

[3] 留守部队，指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所辖之部队。

[4] 1942年4月6日，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向各部队发布训令，训令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军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对今天

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我后方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在工作中所以尚存在不少缺点，党内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与错误倾向尚有某些残余存在等等，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彻底执行这个决议。因此，留守兵团及保安部队，要把这个决议当作今后改进工作的指南，无论是高级指挥员还是一般干部都要熟读与灵活运用这个决议于工作之中，用它来检查我们过去工作的优缺点。训令还对教育方法和检查方法作了若干具体的规定。

1942年，毛泽东和贺龙在延安。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

（1942年1月23日）

周、董：

（一）全国各地日报暂订二份，一寄乔木[1]，一寄陈伯达，均由延安新华书店转；（二）各种书籍刊物（不论普通的、专门的）请各买三份，寄新华书店转乔木或富春[2]、首道[3]收，次间收到后统筹分配；（三）其他需要的特别书籍，均由书记处办公厅电告，以兹统一；（四）经费请你筹拨支付，每年即超过一百元亦所不惜。

毛　任　李[4]

一月廿三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3] 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4] 指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1月24日）

一

社论、新闻、广播三者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穿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广播比三千份报纸更重要，要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党务广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条。

二

中宣部要利用一切宣传工具，熟悉宣传干部，这是宣传指导的中心问题。干部教育，主要是指导与编印课本。延安高级学习组约三百人，认真地教育这三百个高级干部，是政治局与中宣部的责任。国民教育，应研究和指导根据地的国民教育，包括四千万人，

---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关于《解放日报》工作的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讲话的一部分。

还要研究全国的国民教育。中宣部的业务之一是指导文学革命，六中全会指出党八股必须废除，空洞抽象的言论必须纠正，教条主义必须休息。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中宣部宣传要点[1]

（1942年1月26日）

（一）本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

（二）鉴于遵义会议以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错误给予党与革命的损失异常之大，鉴于遵义会议以后党的路线虽然是正确的，但在全党内，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区与特殊部门内，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并没有肃清，或者还很严重地存在着，故在去年内，中央政治局多次地着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开展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与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此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的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反对宗派主义的演说。这些决定及演说，已在全党起了指导的作用，已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已在具体纠正至今尚存在着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残余，这是好的现象，这是一方面的现象。但在另一方面，中央的决定及中央同志的演说，在另外许多同志中，并没有引起深刻的注意。其原因，或则是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的严重，一时尚没有深刻认识自

---

[1] 这是毛泽东在全党即将开展普遍整风之前起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传要点。接着，毛泽东于1942年2月1日作了《整顿党的作风》讲演，2月8日作了《反对党八股》讲演。

己的错误，不愿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愿意迅速地改正自己的错误；或则是有些同志自以为过去并没有犯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路线错误，因此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不知在他们自己过去与现在的思想中行动中，也曾有过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因素，也曾犯过某些错误。例如容易冲动，以感想代政策，对于敌、友、我三方情况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精神，而有自以为是的精神，这些便都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素。再则，例如在党内闹独立性，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上，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上，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的关系上，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注意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在这里，没有加重外来干部、军队干部、本军干部及老干部的责任，而对本地干部、地方干部、友军干部及新干部则没有多加原谅，多加帮助，以期团结他们提拔他们，在斗争过程中克服各种弱点。许多地方既尚存在着各种不正常的内部关系，这些便都是宗派主义残余在党内的表现。至于党员与非党员，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存在着非常之大的隔阂，不了解，不关心与轻视，而其责任则主要应由党员及党的干部担负之，“三三制”[1]在各根据地并没有完满地彻底地十分认真地实行，就是这种宗派主

---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这一政策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义存在的表现。在党内与党外的关系上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一点，并未为一切或大多数同志所深刻注意，这是真确的事实。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因此希望全党全军的各级领导机关与各级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加以注意，进行宣传，进行工作。本部对这个问题将陆续给以上述材料，以为同志工作的参考。

中共中央关于
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1942年1月28日）

抗战以来，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行以后，曾经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而且能够保持工作的经常状态，安定社会的生活秩序，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在有些根据地内，还只在一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而在另一部分地方，或则还只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即未发布法令，更未动手实行。或则虽已由政府发布了法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了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在这些地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也就不能真正将群众组织起来，造成热烈抗日的基础。在这些地方，抗日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但是在另外若干地方，则又犯了某些“左”的错误，虽然这种错误只发生在一部分地方，并且经过中央指示后已经大体上纠正了，但是还有引起各地同志加以注意之必要。

当此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一总结的决定。另有关于执行土地政策的具体办法，作为附件，随此决定一并发下，以供各地采用。务望各地同志加以研究，认真执行。

（一）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的与生产的积极性。

（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并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故于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于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

（三）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富农，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要求。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但富农有其一部分封建性质的剥削，为中农贫农所不满，故在农村中

实行减租减息时，对富农的租息也须照减。在对富农减租减息后，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一部分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地主（所谓经营地主），其待遇与富农同。

（四）上述三条基本原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四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而使日寇完全陷于孤立。一切过“左”过右的偏向，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

（五）在农村统一战线中，地主与农民间的矛盾，例如地主反对或妨碍农民关于民主民生的要求等，必须按照上述原则作适当的处理。双方的合理要求必须满足，但双方都应服从于整个民族抗战的利益。在处理农村纠纷中，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的某一方面，而是根据上述基本原则，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

（六）“三三制”政权，就是调节各抗日阶级内部关系的合理的政治形式。这一制度，必须在参议会系统中与政府系统中坚决的认真的普遍的实行。认为这一制度不过是一种敷衍党外人士的办法的那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七）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一方面，要规定地主应该普遍的减租减息，不得抗不实行。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的义务，不得抗不缴纳。一方面要规定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地主依法有对自己土地出卖、出典、抵押，及作其他处置之权。另一方面，又要规定当地主作这些处置之时，必须顾及农民的生活。一切有关土地及债务的契约的

缔结，须依双方自愿，契约期满，任何一方有解约之自由。

（八）抗日经费，除赤贫者外，一切阶级的人民均须按照累进的原则向政府交纳，不得畸轻畸重，不得抗拒不交。

（九）减租减息实行之后，给予了提高农业生产的必要的前提，而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的生产，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用最大力量推动发展之。政府应举行大量的农业贷款，以解决农民借贷的困难。

（十）农救会的任务，在减租减息之前，主要的是协助政府实行减租减息的法令。在减租减息之后，主要的是协助政府调解农村纠纷与发展农业生产，而不是以自己的决定代替政府的法令，不是以农救代替政府。在调解农村纠纷的任务上，应取仲裁的方式，而不是专断的方式。在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上，应动员所有农救会员起模范的领导的作用。

（十一）既然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一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尚有许多地方并未普遍的认真的彻底的实行减租减息，而其原因，不是地主抗不实行，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因此，各根据地内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对自己工作加以严格的检查，派员下乡分途巡视各地实行的程度，加以周密的调查研究，全盘的总结各地经验，发扬正确实行的例子，批评官僚主义的例子。须知发布口号、发布法令与实行口号、实行法令之间，是常常存在着很大的距离的，如不严惩官僚主义，反对右倾观点，就无法使口号法令见之实行。

（十二）既然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是我党土地政策的第二个方面，既然各根据地内曾经发生过忽视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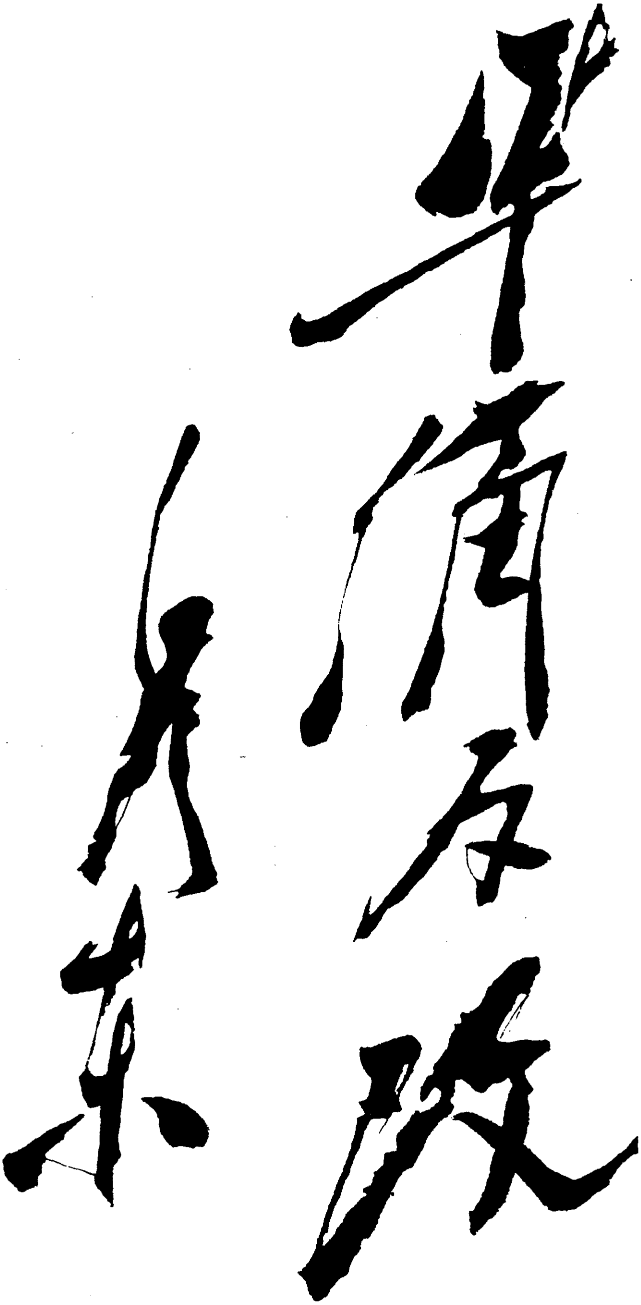
一方面的“左”倾错误，而其原因，不是农民不了解我党的土地政策，就是党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我党的政策。为着防止今后重复这种错误，就必须在党内、在农民群众中明确的解释党的政策，使他们明白现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与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使他们不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应把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联系起来，把局部利益与全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必须劝告农民，在实行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正如在减租减息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的问题上，必须劝告地主不应该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要顾及将来与全民族的利益，是一样的。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题词

（1942年1月）

准备反攻。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的题词。

整顿党的作风[1]

（1942 年 2 月 1 日）

党校今天开学，我庆祝这个学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讲一点关于我们的党的作风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革命党？因为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人民要推翻敌人的压迫，所以要有革命党。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说来，就需要一个如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

现在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

那末，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

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

这就是说，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

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1]的毛病。这些作风不正，并不像冬天刮的北风那样，满天都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笑声）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一种风，是不好的。我们要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全党都要来做这个塞洞工作，我们党校也要做这个工作。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

[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在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也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

现在我来讲一讲主观主义。

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开展起来。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图为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印行的单行本。

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我们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念。

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已经是提得很高了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你们看，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

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我们要的是这样的理论家。假如要做这样的理论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领会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学说，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

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其次讲一讲所谓“知识分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1]，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于是有人说：“哈！你弄颠倒了，乱说一顿。”（笑声）但是，同志，你别着急，我讲的多少有点道理。

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此外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

---

[1] 指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即《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我这样说，难免有些人要发脾气。他们说：“照你这样解释，那末，马克思也算不得知识分子了。”我说：不对。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

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我们党内需要许多同志学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党内现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学习从事于这样的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大都是聪明有为的人，我们要看重他们。但是他们的方针要对，过去犯过的错误他们不应重复。他们必须抛弃教条主义，必须不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

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斯大林曾经说过，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对于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许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错，这样的人往往经验很多，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地不完全。而要把革

---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命事业做好，没有比较完全的知识是不行的。

这样看来，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

但是，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何况现在不是学的孔夫子，学的是新鲜的国语、历史、地理和自然常识，这些文化课学好了，到处有用。我们党中央现在着重要求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哪一门都可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学习理论的可能。

由此看来，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

所以，我们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他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

---

[1] 这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语录《论语》的开头一句话。

道路。

但是在这两种主观主义中，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书本知识的干部，愿意和有经验的干部相结合，愿意从事实际事物的研究，可以产生许多理论和经验结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产生一些真正的理论家。我们如果把教条主义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经验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他们的经验上升成为理论，而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

除了对于“理论家”和“知识分子”存在着糊涂观念而外，还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也是一个糊涂观念。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

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我们反对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必须攻破教条主义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关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全党的学风的问题，今天讲的就是这些。

现在我来讲一讲宗派主义的问题。

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

什么是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呢？主要的有下面几种：

首先就是闹独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

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

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他们在个人和党的关系问题上，往往是不正确的。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也说尊重党，但他们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刘少奇同志曾经说过，有一种人的手特别长，很会替自己个人打算，至于别人的利益和全党的利益，那是不大关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大笑）这种人闹什么东西呢？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在他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我想，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的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们党校的学生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

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一定要反对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因为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必须加以很好的注意。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我们到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比较先进区域的干部到比较落后的区域去，对于当地，也是一种外来干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干部的问题。就一般情形说来，凡属外来干部负领导责任的地方，如果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这个责任主要地应该放在外来干部的身上。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其责任就更大些。现在各地对这个问题的注意还很不够，有些人轻视本地干部，讥笑本地干部，他们说：“本地人懂得什么，土包子！”这种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干部的重要性，他们既不了解本地干部的长处，也不了解自己的短处，采取了不正确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

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关系也是如此。两者必须完全团结一致，必须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军队干部必须帮助地方干部，地方干部也必须帮助军队干部。如有纠纷，应该双方互相原谅，而各对自己作正确的自我批评。在军队干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在一般的情形之下，如果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责任应该放在军队干部的身上。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

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之间、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必须反对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本位主义的倾向。谁要是对别人的困难不管，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不顾大局，对别部、别地、别人漠不关心，就是这种本位主义者的特点。对于这样的人，必须加重教育，使他们懂得这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倾向，如果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问题。抗战以来，我党有广大的发展，大批新干部产生了，这是很好的现象。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老干部通常总是不多，比所需要的数量少，而且由于宇宙自然法则的关系，他们已部分地开始衰老死亡下去。”他在这里讲了干部状况，又讲了自然科学。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关心新干部。

不错，新干部是有缺点的，他们参加革命还不久，还缺乏经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不免带来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这就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残余。但是这些缺点是可以从教育中从革命锻炼中逐渐地去掉的。他们的长处，正如斯大林说过的，是对于新鲜事物有锐敏的感觉，因而有高度的热情和积极性，而在这一点上，有些老干部则正是缺乏的[1]。新老干部应该是彼此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便团结一致，进行共同的事业，而防止宗派主义的倾向。在老干部负主要领导责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弄得不好，那末，老干部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以上所讲的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都是党内的相互关系。在这种种方面，都应该提高共产主义精神，防止宗派主义倾向，使我们的党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以利战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必须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不要主观主义，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必须扫除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以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局部的利益为出发点，使党达到完全团结统一的地步。

宗派主义的残余，在党内关系上是应该消灭的，在党外关系上也是应该消灭的。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全国人民

---

[1] 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第3部分第2节。（《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

的事业上，二十年来做了艰苦的伟大的工作；抗战以来，这个工作的成绩更加伟大。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志对待人民群众都有了正确的作风，都没有了宗派主义的倾向。不是的。在一部分同志中，确实还有宗派主义的倾向，有些人并且很严重。我们的许多同志，喜欢对党外人员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藐视人家，而不愿尊重人家，不愿了解人家的长处。这就是宗派主义的倾向。这些同志，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之后，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了，总是说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实在是一知半解。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假定一百个人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就有四百五十万共产党员。即使达到这样大的数目，共产党员也还是只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党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和非党人员合作呢？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一部分党员却不懂得这个道理，看不起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人，甚至排斥他们。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给了我们这样的根据吗？没有。相反地，他们总是谆谆告诫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中央给了我们这个根据吗？没有。中央的一切决议案中，没有一个决议说是我们可以脱离群众使自己孤立起来。相反地，中央总是叫我们密切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所以，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一部分同志自己造出来的宗派主义思想在那里作怪。因为这种宗派主义在一部分同志中还很严重，还在障碍党的路线的实行，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在党内进行广大的教育。首先要使我们的干部真正懂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使他们懂得共产党员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

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一切宗派主义思想都是主观主义的，都和革命的实际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应当同时并进。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今天不能讲了，准备在另外一个会议上来讨论。党八股是藏垢纳污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

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许多同志蒙受了主观主义思想的毒害，发生麻木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这些东西好像日货，因为只有我们的敌人愿意我们保存这些坏东西，使我们继续受蒙蔽，所以我们应该提倡抵制，就像抵制日货[1]一样。一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货色，我们都要抵制，使它们在市场上销售困难，不要让它们利用党内理论水平低，出卖自己那一套。为此目的，就要同志们提高嗅觉，就要同志们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

---

[1] 抵制日货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上半叶所常常采取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斗争方法。例如，在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民都曾经进行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最后，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趁着今天党校开学的机会，我讲了这许多话，希望同志们加以考虑。（热烈的鼓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给周文[1]的信

（1942年2月1日）

周文同志：

来信收到，并已转中宣部、解放报[2]各同志阅。你的意见[3]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

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

---

[1] 周文，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 指延安《解放日报》。

[3] 可能是指周文关于改革文风的建议。

给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1]

(1942年2月2日)

中央现对若干重要问题正在研究，准备在二、三两个月内作成决定或指示发到各地，以便各地同志对于讨论与传达有所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地党部及军队负责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复彭德怀电[1]

(1942年2月3日)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关学校的劳动，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的条件下不需外援。八路军前方拟支援边区的布匹、火柴等，可不必送来。银行较去年为好，边币已稳定，二元二角合一元法币，此间不能禁止法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

（1942年2月4日）

（一）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是综合五年来各地经验而得的结论。他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说起。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在政治上，则实行三三制，使地主资产阶级觉得还有前途。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可以争取回来。

（二）联合地主抗日，是我党的战略方针。但在实行这个战略方针时，必须采取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策略方针。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一般地主阶级是坚决反对减租减息与民主政治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

优势，才能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这种广大群众的热烈斗争中，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过左行动，而这些过左行动，如果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脱离群众蛮干的（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原则问题），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因为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发动群众之目的。在这种时候，畏首畏尾，束缚群众手足，就是右倾错误，这是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打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应被联合抗日的战略方针所限制，不能拖得过长，不能听其自然发展下去，以致迫使地主阶级跑到敌顽方面坚决反对我们，或跑去了也不愿回来，妨害抗日战争与妨害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党的策略，不是在事先限制这些过左行动不发生，以致妨害群众之充分发动与充分起来，而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充分起来之后，能够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的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战之战略目的，这就是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拉的阶段）。在策略斗争的第一阶段中，也不是一切打倒，而是争取一部分倾向我们的地主（打中有拉），中立（麻痹）一部分动摇不定的地主，集中火力打击一部分最顽固的地主（但与内战时期打击地主的内容与形式都不相同）。在策略斗争的第二阶段中，我们必须极力表示宽大，认真实行三三制与交租交息，认真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公开批评自己内部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纠正过火行动。在这种时候，如不着重说服党员，说服农民，争取地主，就不能拆散地主与敌顽的联合，就有使我党与农民陷于孤立以至失败的危险。但在纠正过火行动与作自我批评中，必须同时注意到保护干部与群众的积极性、热烈情绪或热气，须知我们正确地批

评过火行动与宗派主义，决不是向这种热气泼冷水，以致造成干部消极，群众失望，地主反攻的局面。在正常的斗争过程中，应该有一个酝酿斗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主过〈还〉是优势，农民还正在准备斗争。如果把这个作为第一阶段，则实行斗争（打）为第二阶段，团结抗日（拉）为第三阶段。在晋察冀区域，除了雁北及平西两区尚未普遍与彻底按照党的政策解决土地问题以外，其他基本区域是都经过了酝酿、斗争、团结这样三个阶段的，这是最正常的策略模范。在其他若干根据地中，也有这种模范。所有这些，都是为着执行联合抗日这个战略方针的总过程中，应该极力注意的策略阶段。

（三）各地过去在执行土地政策中所发生的过左错误，大体已经纠正。在今天，一切为广大群众所拥护，而地主又已不生严重争议的事件，应作为已经解决，不再变动，维持良好的抗日秩序。但对三三制之没有彻底实行及地主农民间尚有重大争议的事件，仍须着重纠正错误。

（四）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许多地区并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的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是严重的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因此，目前应当强调反对这种右倾，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群众热情的地区，在广大农民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热情发动起来。各地党部必须检查这一问题，对此问题如有某些人采取漠不关心与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须向他指明加以纠正。

（五）在农民已经充分发动彻底执行了减租减息，经过了打的阶

段，因而进入了拉的阶段的地区，由于我们开展自我批评，纠正过火行动，彻底实行三三制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地主阶级必然要抓住新政策之有利于己的方面，加以扩大，和农民作斗争。由于今天根据地内部在此阶段（拉的阶段）内，各阶级的争议只能采取民主的合法的说理的方式去进行，而文化落后的农民群众甚至区村干部，遂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地主所欺骗，或被地主收买操纵区村政权，或被地主打击而不敢回击。因此必须教育县区村三级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习政府的法令，熟习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六）减租是减今后的，不是减过去的，减息则是减过去的，不是减今后的，大体上以抗战前后为界限。在减息问题上，第一，应当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与算私账），以此作为发动群众的手段。到了群众已经充分发动，才把双方争论加以调停，使归平息。第二，抗战以后，是借不到钱的问题，不是限制息额的问题。各根据地，都未认清这个道理，强制规定今天息额不得超过一分或一分半，这是害自己的政策。今后应该听任农村自由处理、不应规定息额。目前农村只要有借贷，即使利息是三分四分，明知其属于高利贷性质，亦于农民有济急之益。同时政府每年的建设费中，应以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投于农村，作为对农民的低利贷款（包括合作社贷款在内），以发展各根据地的基本的农业经济。而只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投于公营工商业及私人商业。须知发展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利益，而且就是扩大政府税收的最大与最可靠的来源，就是解决财政问题基本政策。

（七）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及其三个附件，都已公开发表，各地应即公布，广为宣传，认真实行。这是我党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时期的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实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的。至于本指示，则是专门对党内的，不得公开发表。每一根据地内，应利用会议党校及文电，使党的基本干部懂得中央的战略与策略方针，然后经过他们，使下级干部懂得，使这种具体的策略教育确实收到成效。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毛泽东和徐特立。

以集资料写名人列传[1]

（1942年2月4日）

周：

（一）黄炎培[2]传写得很好，很有用处。（二）望推动研究局收集材料写名人列传，如能对党、政、军、学、财、经、报、教各界深入调查，写一千个名人列传，必有大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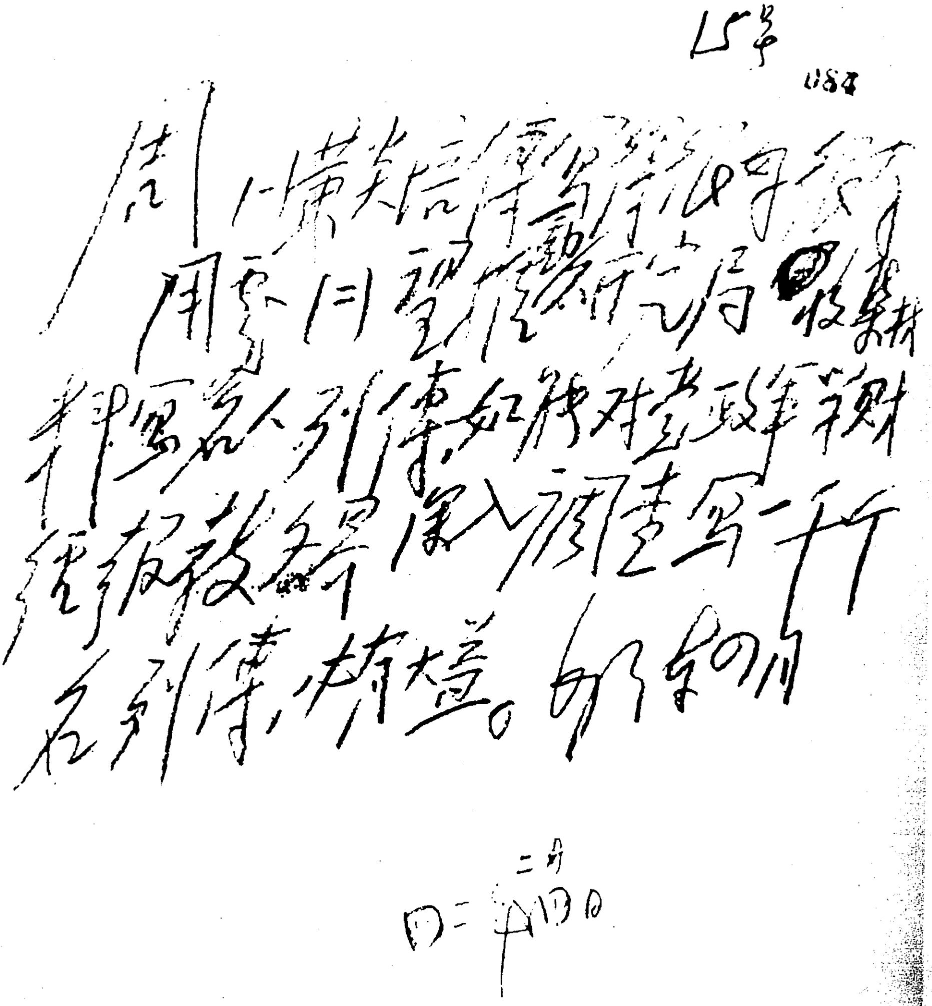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写名人列传事致周恩来的电报。

[2] 黄炎培，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被推选为主席，同年10月辞去主席职务。



15号

084

周：（一）荣英信件[illegible]
用费同意。望[illegible]后搜集材
料写名人列传，如能对党政军干
部及各界名人写一千
名列传，大有益。毛泽东 四月

二月
四二十四日

2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
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的附件*

（1942年2月6日）

由于各根据地情况不同及在一根据地内情况亦有不同者，故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不能统一施行整齐划一的制度。中央在关于土地政策决定内规定了统一施行的原则，而在本附件内则根据此种原则提出具体办法，以供各地采用。本附件内所列各项，凡与各地实际情况相合者，均应坚决执行之。其有不合情况而须变通办理者，各地得加以变通，惟须将变通之点报告中央，并取得中央之批准。

附件一　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

（一）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以减租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不论公地、私地、佃租地、伙种地，也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各种不同形式的伙种地，不宜一律规定为依地主所得不超过十分之四，或十分之六，应依业佃双方所出劳动力、牛力、农具、肥料、种子及食粮之多寡，按原来租额比例，减低百分之二十五。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比二五减租还少一

点。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相当发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

（二）地租一律于产物收获后交纳，出租人不得向承租人预收地租。并不得索取额外报酬。

（三）定租（铁租），因天灾人祸，其收成之全部或大部被毁时，得停付或减付地租。

（四）多年欠租，应予免交。

（五）公粮公款，按累进原则，由业佃双方负担。土地税，由土地所有者负担之。

（六）地租原约定以货币支付者，因纸币跌价而发生争议时，政府应召集业佃双方协议调解，并得将货币地租之一部或全部，改为实物地租。

（七）如设有评租委员会等调解机关的地方，须有农民地主政府三方代表参加，但政府有最后决定权。

（八）在租佃契约上及习惯上有永佃权者，应保留之。无永佃权者，不应强迫规定。但可奖励双方订立较长期的契约，例如五年以上，俾农民得安心发展生产。

（九）无永佃权之地及契约期满之地，出租人有依约处置之自由，包括转让、出典、出卖、自耕，及雇人耕种等项在内。但在抗战期间，地主收地，应顾及农民生活，并须于收获前三个月通知承佃人。原承佃人太穷苦者，应由政府召集双方加以调剂，或延长佃期，或只退佃一部。

（十）出租人于契约期满，招人承佃或出典出卖时，原承租人依同等条件有承佃承典承买之优先权。

（十一）出租人出卖有永佃权或契约期限未满之地，原承租人有

继续佃耕之权，非原约期满，新主不得另佃他人。

（十二）承租人在二年内无故不耕，或力能付租而故意不付者，出租人有收回土地之权。

附件二　关于债务问题

（一）减息是对于抗战前成立的借贷关系，为适应债务人的要求，并为团结债权人一致抗日起见，而实行的一个必要政策，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至于抗战后的息额，应以当地社会经济关系，听任民间自行处理，政府不应规定过低息额，致使借贷停滞，不利民生。

（二）债权人不得因减息而解除借贷契约，债务人亦不得在减息后拒不交息，债权人有依法诉追债务之权。

（三）凡抗战后新成立的借贷关系，债务人到期不能付息还本，债权人有依约处理抵押品之权。如有争议，由政府判处。同一抵押品而担保数债权者，其卖得之价格，按各债权契约先后，依次并比例清偿之。抵押品如为土地（押地），照此办理。

（四）凡典地尚未转成买卖关系者，出典人随时可用原典价依约赎回土地，不得用抽地换约的办法。如已转成买卖关系者，不得赎回。因纸币跌价而在赎回典地时所生之争议，由政府调处之。

（五）凡抗战后成立的借贷关系，因天灾人祸及其他不可抗之原因，债务人无力履行债约时，得请求政府调处，酌量减息，或免息还本。

（六）因纸币跌价，债务人用纸币还债而生之争议，由政府适当

调处之。

附件三　关于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

（一）凡罪大恶极之汉奸的土地，应予没收，归政府管理，租给农民耕种，以示惩罚。其家属如未参加此种汉奸活动，或其情节较轻者，不在此例。

（二）被迫汉奸的土地不应没收，以示宽大，争取其悔过自新。无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租给农民耕种，俟其回家抗日，即发还之。

（三）凡逃亡地主，不论其逃至何处，其土地不得没收。无人管理者，由政府代管，招人耕种，并保存其应得地租，代交田赋公粮。原主回家时，将其土地及应得地租一并发还之。

（四）凡没有税过契或没有纳过税的黑地，不许没收，而限期责令业主税契纳粮。如逾期仍不税契不纳粮时，由政府给予相当的处罚。

（五）族地、社地，由本族本社人员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之，以其收入作为本族本社或本地公益事业之用。

（六）学地留作教育经费，由政府或本地人员组织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之。

（七）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的土地），均不变动。

（八）公荒，由政府分配给抗属、难民、贫农开垦，并归其所有。在一定期限内，免除或减少其税收。

（九）私荒，不论生荒熟荒，应先尽业主开垦。如业主无力开垦

任其荒芜时，政府得招人开垦，并在一定期限内，免除或减少其租税。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原主，但开垦者有永佃权。

延安观察家之评论[*]

（1942年2月6日）

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新民主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具体化；而且是孙中山先生的土地政策、农民政策，在如此广阔地区上的首先实现。重庆各大报纸、杂志现正连篇累牍讨论土地问题，去年十二月国民党九中全会，并决定成立土地政会。中共中央适于此时公布这个文件，将给他们作一个很好的参考。特别有兴趣的一点，就是中共中央在其决定的附件中，规定减租，依照抗战前原定减去百分之二十五为原则，此与大多数国民党人所主张的二五减租，并无二致。按国民政府于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所公布的减去谷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并规定于二十五年三月一日施行；二十一年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保障佃农办法原则，又重申此义。这些法令，虽为广大的农民与公正人士及很多三民主义信徒所拥护，可惜直到抗战以后，还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决加以执行。中共中央方面认为欲求团结全国各阶级，举行战略反攻，彻底战胜日寇，除军事上、政治上加以改革外，惟有采取合理的土地政策，取得农民群众的赞助，才能达到此目的云。

延安评论家称两年内击溃日寇*

（1942年2月6日）

中国人民除汉奸外，莫不认抗战为上策，当今惟有抗战一途挽救中国出于危亡。日本法西斯亦知中国已有共产党，但彼等应知明末还没有共产党，其时并且还没有国民党，还没有苏联，还没有丘吉尔、罗斯福，故明末满洲可以亡明，当今之日寇决不能亡中国。有一中国共产党存在，即决不许日寇逞其阴谋，何况还有全中国爱国人民与爱国党派，还有无敌的苏联与强大的英美。日寇在南太平洋的胜利，正是日寇崩溃的前奏，盖伴随其胜利而来者，乃是其力量的分散与消耗。日寇的短脚已经拉长了，并且还要拉长，愈长则愈瘦，只须两个年头，日寇就会被击溃。全中国人民正在警戒日寇的诱降阴谋，无论如何要坚持两年的抗战，两年内不但日本，整个法西斯都要塌台的。

反对党八股[1]

（1942年2月8日）

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2]，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讲演。

[2] “将一军”是中国象棋中的术语。中国象棋采取两军对战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对方堡垒捉住“将军”（主帅）作为赢棋。凡是一方走了一着棋，使对方的将军有立即被捉的危险时，就叫做向对方“将军”。

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没有呢？这就是一个！（大笑）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

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

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那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

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在战争的时期，我们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么？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1]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

---

[1] 这是鲁迅《南腔北调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1932年作。(《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页)

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

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𢀳”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𠆲”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和无论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1]。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

---

[1] 解放以前，上海人称城市中无正当职业而以乞讨为生的游民为瘪三，他们通常是极瘦的。

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

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

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地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倒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

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申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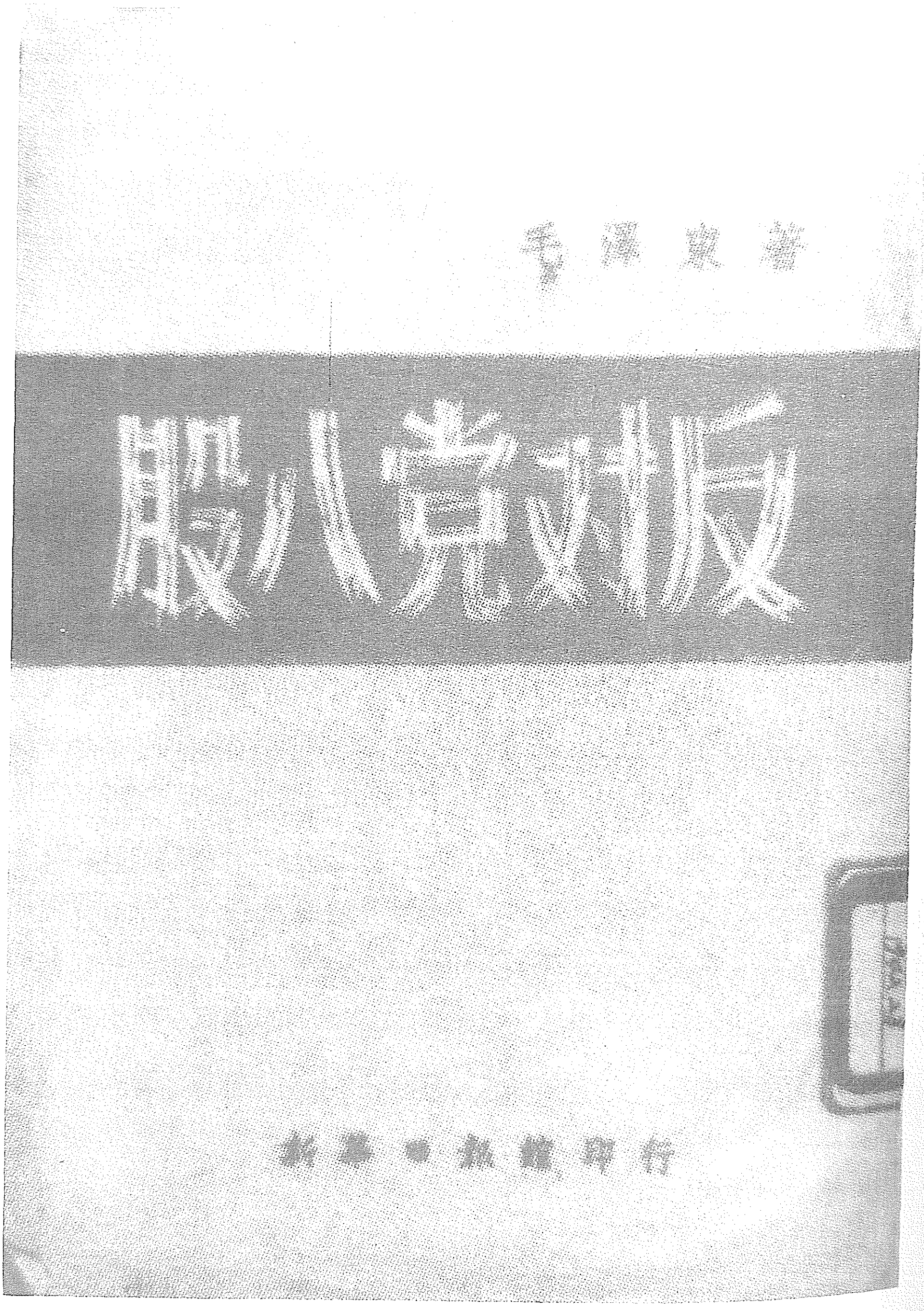
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所以我劝这些同志先办“少许”，再去办“化”，不然，仍旧脱离不了教条主义和党八股，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没有结果的。例如那些口讲大众化而实是小众化的人，就很要当心，如果有一天大众中间有一个什么人在路上碰到他，对他说：“先生，请你化一下给我看。”就会将起军的。如果是不但口头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

今天会场上散发了一个题名《宣传指南》的小册子，里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劝同志们多看几遍。

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其中讲到列宁写传单的情形：“在列宁领导下，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把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某一个工厂里爆发罢工时，‘斗争协会’因为经过自己小组中的参加者而很熟悉各企业中的情形，立刻就印发传单、印发社会主义的宣言来响应。在这些传单里，揭露出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奋斗，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这些传单把资本主义机体上的痈疽，工人的穷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的过度沉重的劳动，工人之毫无权利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在这些传单里，又提出了相当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无余”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宁在工人巴布石金参加下，写了第一个这样的鼓动传单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厂罢工工人书。”



毛泽东著

反对党八股

新华日报馆印行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召集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图为新华日报馆印行的单行本。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工人们看见了，社会主义者是帮助他们、保护他们的。”[1]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季米特洛夫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我们还没有能够抛弃背得烂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实上，你们只要瞧一瞧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常常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写得这样地艰深，甚至于我们党的干部都难于懂得，更用不着说普通工人了。”

怎么样？这不是把我们的毛病讲得一针见血吗？不错，党八股中国有，外国也有，可见是通病。（笑）但是我们总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们自己的毛病赶快治好才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切实领会下面这条起码的规则，把它当作定律，当作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当你写东西或讲话的时候，始终

---

[1] 以上三段引文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章第3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页）。

要想到使每个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号召，都决心跟着你走。要想到你究竟为什么人写东西，向什么人讲话。”[1]

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2]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吗？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

[1] 以上三段引文参见季米特洛夫1935年8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序言和第六部分《仅仅只有正确的路线还是不够的》。

[2] 《北斗》杂志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1931年至1932年间出版的文艺月刊。《答北斗杂志社问》载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页）

孔夫子提倡“再思”[1]，韩愈也说“行成于思”[2]，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六届六中全会是一九三八年开的，我们那时曾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必须反对空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活的共产党员，必须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这里叫洋八股废止，有些同志却实际上还在提倡。这里叫空洞

---

[1] 参见《论语·公冶长》。

[2] 韩愈（768—824），中国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进学解》一文中说：“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做事成功由于思考，失败由于不思考。

抽象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总之，有许多人把六中全会通过的报告当做耳边风，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对似的。

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所以我来讲了许多。希望同志们把我所讲的加以考虑，加以分析，同时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应该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并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知心的朋友们商量一下，跟周围的同志们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实改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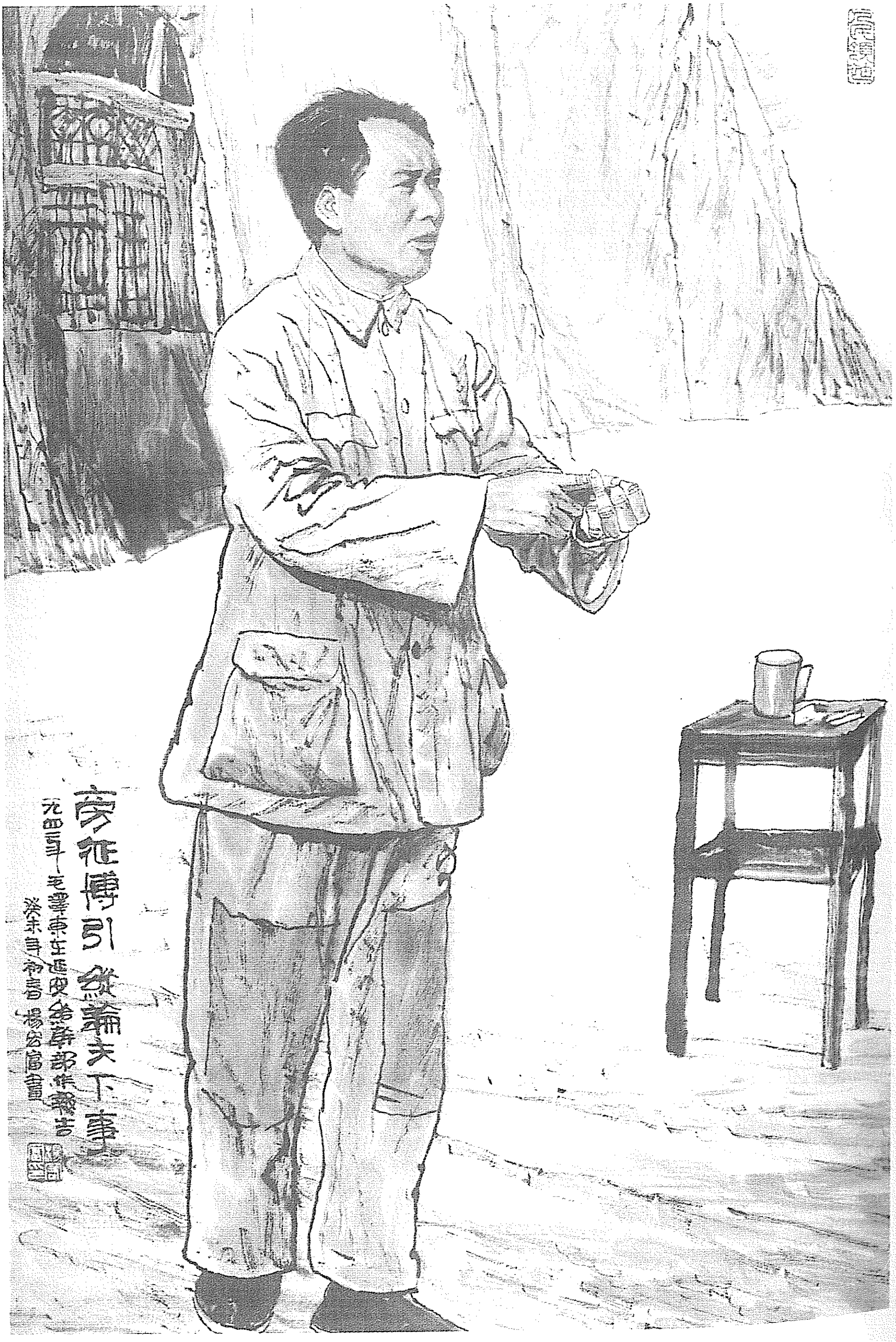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


旁征博引　纵论天下事
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癸未年初春　杨必富画

《旁征博引，纵论天下事》（中国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2月11日）

一

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过去《红色中华》是以苏区建设为中心，《新华日报》受了限制。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二

过去的在职干部教育存在以下四个缺点，应加以改正。一、没

---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讨论《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时讲话的一部分。

有着重本身业务的学习，今后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二、对政治教育的忽视，今后应注重时事与政策的教育，对下级干部特别要着重当地政治情况及具体政策的教育；三、对文化水平低的工农老干部没有以文化教育为主，今后应强调文化教育；四、无组织无目的地进行理论学习，今后应学习实用的革命理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

在《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上的批示

（1942年2月11日）

很好。发广播。登党的资料。抄给西北局宣传部、总政宣传部。

复陈毅、刘少奇电[1]

（1942年2月13日）

少奇返延，须带电台，并带一部分得力武装沿途保卫。

---

[1] 这是毛泽东复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1]

（1942年2月18日）

今年二月二十三日是苏联红军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当这个日子到来时，特别使人回想起红军诞生的时候，红军是在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对列宁格勒的进攻中间诞生的。而今天的红军又正在与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着决死的斗争。但也正是今年，红军的力量不但比它刚刚诞生的时候不知强大到若干倍，就是比它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以前，也是更加强大了。现在的红军，在它自己的历史上是最强大的，经过了八个月战斗的锻炼，又已经被证实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了。当此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今年的红军纪念日，乃是全人类共同庆祝的节日。我们中国人民将更加热烈的庆祝这个节日，则是因为红军还在一九二五年的时候就是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忠实援助者，在五年的抗日战争中，红军又给了我们以最大的鼓励和援助，而中国最后战胜日本的主要援助者，又将期寄于红军。红军目前正发展着胜利的反攻以打击希特勒，希特勒军队虽还没有退出苏联领土，但是离它崩溃之日已不远了。日本法西斯在不久的将来有进攻苏联的危险，红军须准备对付两面的敌人，

注[1]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红军成立二十四周年（2月23日）前夕撰写的一[illegible]文章。

但是我们完全相信，日本法西斯如果敢于冒险，它是一定要失败的。有种种因素可以预断，一年之内会把希特勒打败，两年之内会把日本法西斯打败。这种种因素，便是苏联、英国、美国、中国和其他一切反对法西斯的人民，而苏联便是这一切国家的模范。红军的历史说明了一个无可置辩的真理：只有与人民群众相联系的武力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宣扬和学习这个真理，依照这个真理来加强反法西斯的战斗，使反法西斯的胜利快一些到来，这便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在庆祝红军二十四周年中的任务。

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

（1942年2月20日）

恩来同志：

（一）对时局估计电悉，与我们估计略同。柏林协定似以苏联为第一对象，春季后德、日各以陆空主力向北，而各以海军主力、陆空一部及意国海陆空主力向南。即使是这一局面，仍是有利的，因为德、日各有三条战线，意有两条战线，兵力太分散了。如日攻印，则更分散。整个轴心[1]将失败在分散与消耗中。如日侵苏，蒋将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他的压力。但滇缅路断，英、美接济须走苏联，对内必不敢与我决裂的。（二）我们已定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已将党校改组，中央同志实行教课。已公布改造干部学校决定，不知你处收到否？在职干部教育决定日内亦可公布。高级学习组各地均已举办，此是极重要的关键。近来已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口号，延安在动员中。（三）财政经济今年亦有

---

[1] 指柏林—罗马—东京轴心。为争霸世界、发动战争，德、意、日三国于1937年11月正式结成反共同盟。1940年9月又在柏林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结成公开的军事同盟。

办法，边区现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已走上轨道，不怕封锁了，各根据地尚未至十分叫苦程度，亦有办法。边区“三三制”大得周围各地好评，区内则团结了各阶级。精兵简政方针正在各地实行。（四）总之，目前是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基本中心，抓紧此点以准备应付时局的变化。（五）今年二月统计党员数目为八十万，去年九月统计军队数目为五十七万（包括游击队），对外守秘。（六）林彪[1]返延身体好了许多，惟尚须休养。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2]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开展，要我告你注意。

毛泽东
号

---

[1] 林彪，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38年冬去苏联治病，1942年初回国，途经新疆、兰州、西安，于2月回到延安。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关于时局估计、干部教育、财政经济等问题的指示

（1942年2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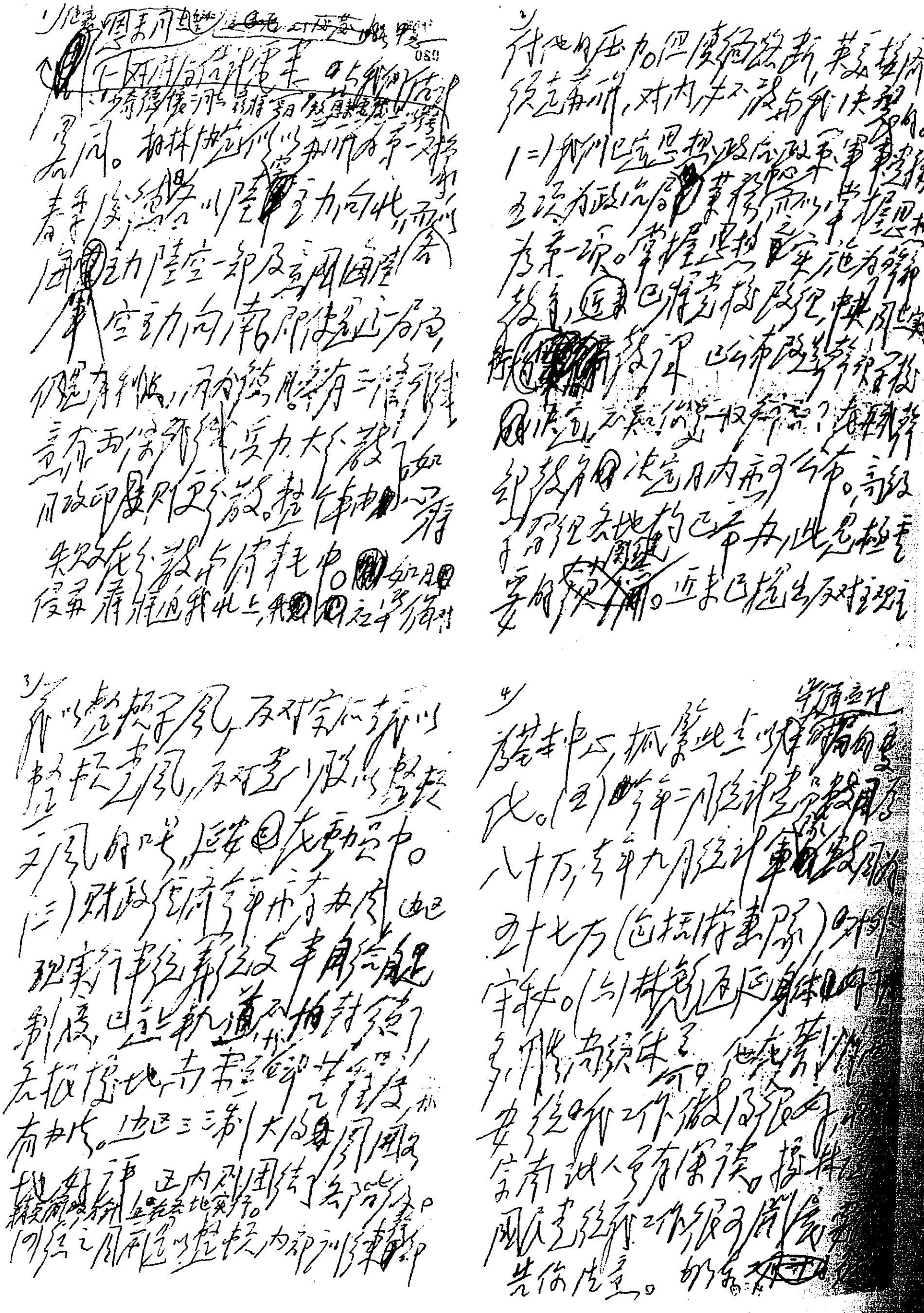
少奇、德怀二同志：

兹将号日致恩来电发上以参考，原文如下。

（致周恩来电内容参见《目前应以整顿内部训练干部为工作中心》一文。）

毛泽东

号



毛泽东致刘少奇、彭德怀电的手稿。

在一份情况通报上加写一段话

（1942年2月20日）

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且有谓二月底即将发动者。我各地负责人应有精神上之准备，设想到日苏战争发生后的各种情势及我党任务，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迫我北上，我应准备对付此种局面。但滇缅路不久将断，英、美援华物资必经苏联，国民党亦更困难，对我决裂是不会的。

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1]

（1942年2月20日）

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调抽一批带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成就较大。

护卫少奇的手枪班须是强有力的，须有得力干部为骨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刘少奇及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讨论过去路线问题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2年2月21日）

恩来同志：

（一）铣[1]电悉。五中及遵义文件[2]当电告。（二）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3]，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4]。“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5]及少奇、德怀

---

[1] 铣，指16日。

[2] 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和遵义会议文件。

[3]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

[4] 这个提法应以后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决议》指出：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九一八”以后，“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5] 即周恩来。

回来方能讨论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现在高级学习组中可以讨论过去问题，但不牵涉人的问题。研究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请加注意。

毛　王[1]

马[2]日

---

[1] 即毛泽东、王稼祥。

[2] 马，指21日。

致彭德怀等电[1]

（1942年2月21日）

从员生中选择可任高级军政教育之教员及可资深造之学生共约二百名左右，由代远率领回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滕代远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等电[1]

（1942年2月23日）

训练干部是当前大事，请你们考虑在不严重减弱斗争力量条件下，从华中及山东军队中地方上抽调一批高级干部来延安进中央党校与抗大总校的问题，如何抽调及抽调多少望电告。并望少奇加以组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陈毅、刘少奇、饶漱石、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1]

（1942年2月28日）

（一）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也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同时，着重的认真的办理干部学校，抽调许多干部，进入各种干部学校，施以系统的教育，当然是很重要的任务，对此决不应该稍有忽视。但最广大数量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还是在工作中，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需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传教育部门的充分注意。游击战争的特点，不但允许我们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

（二）在职干部教育，自六中全会以来，已经引起党内相当的注意，在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的在职干部中引起了学习的热潮，这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2月28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极好的现象。但忽视的现象还是存在着。在有些地方与有些部门中，甚至还没有开始，没有强调业务教育。而大多数在职干部要求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热情则是很高的。政治教育虽一般地注意了，但或者不得其法，或者轻重不分，或者没有经常性。文化教育，是我党多数工农出身的干部所迫切需要的，但也没有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充分注意。高级干部的理论教育，或者至今没有引起注意，或者脱离实用，成了教条主义的东西；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所有这些，都是必须改革，或必须加强的。

（三）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甲、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并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地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教育部门则负总领导的责任。其学习范围，包括以下五项：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例如军事部门精细调查敌我友三方情况，加以分析研究，择其要点，编成教材，用以教育军事干部；其余类推。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例如财政工作人员应熟悉财政政策与财政法令；锄奸工作人员应熟悉锄奸政策与锄奸法令；其余类推。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例如党的组织部门研究党的组织工作与干部工作的经验，加以分析和综合，抽出要点，写成文

件，教育所属干部；其余类推。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例如党的宣传部门将我党二十年宣传鼓动工作及其政策的变化发展，加以叙述与总结，编成教材，教育宣传工作干部；其余类推。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例如军事干部研究军事学、医务干部研究医学等，每一部门均须研究自己的理论。对于上列各项业务学习，各部门领导机关负有供给教材、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绩的责任，务使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务之目的。轻视学习业务与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错误的。

乙、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项。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或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纲领等，督促干部阅读，加以解释或讨论等；或为虽与本部门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有使所属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军事指挥员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顾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空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又须指出，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习，但其分量轻重应依各部门工作性质而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艺术家等，其分量应该减轻，而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等，则其分量应该加重。关于政治教育缺乏经常性的毛

病，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应有计划地克服之。

丙、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宣传教育部门应负责解决课本问题。其教育与学习办法，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好的。在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专任的教职员，辅之以兼任的教职员。在环境不许可的地方，则用小组学习制，以该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减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员，亦可专用教员。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的及中级的两种。初级班为不识字及粗识文字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高小程度为合格；中级班为已有相当于高小程度的人而设，以学至大体相当于中学程度为合格。干部分班应以文化程度为标准，不以职位为标准。此外，某些从事宣传教育工作的干部，虽属知识分子，但尚有补习国文及文法之必要者，则用小组学习制或其他办法补习之。为着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军机关内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员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员应受到奖励。

丁、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例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

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其具体进行，应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

（四）四种教育的时间分配及课程分配，使之互相联系而不互相冲突与脱节，由党政军宣传教育部门负责调理之。

（五）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一切材料均须由领导机关加以审查，任何包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毒素的东西，均须严格地加以清除或批判。

（六）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以发展其业务而不妨碍其业务并不妨碍干部健康为原则，在前方尤其不应妨碍战争。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不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七）实行对于在职干部教育的考核、测验与赏罚制度，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八）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应以极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干部学校教育）上面。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人员（教员与职员）应加以严格的审查，并应首先调给之。各级领导人员有参加教课的责任。为着干部教育而需用的经费，应最大量地供给之。

（九）对于从事干部教育的人员，尤其是教员，应加以教育。其办法由中央宣传部订定之。

1942年的毛泽东。

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上的一段讲话

（1942年3月2日）

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犯了洋教条的毛病，现在开展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同样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许多干部中毒很深，需要做启蒙工作。

给谢觉哉的信[1]

（1942年3月2日）

县参议会的确宜改选，不必做成全边区普遍改选运动，而在今年秋收后先择若干县改选，其余则待明春，以便一县一县地指导改选工作，造成真正“三三制”的。

林老宜即休养两三个月，劝他不要急工作，要有放得开不怕塌台的精神，请告他下决心，不可大意。你亦宜带半休养性质，只抓大者要者，小而次者出入可也，保存精力长期斗争为上策。

---

[1] 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

增长力量，准备反攻[1]

（1942年3月4日）

亲爱的同志们：

首先我们向你们全体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们致最亲热的慰问。回想从抗战开始，我八路军主力开往华北前线以后，四年以来，你们留守边区是有很大成绩的。你们曾经胜利地保卫了我全军后方，巩固了边区治安，屏障了整个西北。在四年当中，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军事技术、政治、文化的学习以及内部的工作上，都有了进步。你们并且辛勤劳苦，普遍地进行了生产运动，克服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这些成绩，首先应当归功于你们大家全体的团结努力。

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苏联的工农红军要在今年打败希特勒匪军，全世界民主国家的人民都在为了打倒德、意、日法西斯匪军而紧张刻苦地工作着。我们则为配合全世界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准备反攻，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今天我们的面前还有种种困难。我们双肩上的担子还是很重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安部队即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1938年4月，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指挥）的慰问信。

的。敌人虽然已经被削弱了，但是还相当强大，并且非常狡猾狠毒；国内的亲日派还未肃清，时刻都在想破坏抗战，破坏我军，破坏边区。因此决不容许空洞的乐观与粗心大意。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坚守自己的岗位，严防敌寇汉奸的破坏扰乱行动，加强和友军的团结，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使边区更加巩固坚强。

其次，我们的军事技术和文化水平还须大大提高。全体战士和指挥员们，必须好好锻炼身体，加紧练习瞄准，投手榴弹，劈刺，各种武器的使用，学习各种战斗动作，提高战术水平。要以大力来组织文化教育，努力克服文盲，克服我军特别是干部中文化水平低下的弱点。

我们还须要加倍努力生产运动，这是我们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资困难，改善部队供给的最有力的方法。要多多种菜、养猪、养羊，发展棉毛纺织，组织运输工作，我们的口号是大家动手，解决吃穿问题，达到完全自足自给的目的。

亲爱的同志们，摆在我们肩头的任务是很重大的。完成这些任务，必须要依靠我们全体更加百倍的团结和发扬忍苦耐劳，永不疲倦的战斗意志。我们应当在上下级间，在指挥员与战士间，在全体人员相互间，认真加强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的关系，克服其间的任何冷酷无情、不知友爱和隔阂与不团结现象，在这种钢铁般的团结与艰苦奋斗的努力下面，便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战胜，没有什么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全体战士、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全体同志们！今年是我们增长力量、准备反攻的一年。我们希望由于我们大家的积极努力，能够早日举行反攻，到那时我们将把丑恶的敌人从我们祖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把我们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旗帜插遍全国，胜利的光

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我们在此伟大的年初，向你们大家致同志的慰问。希望你们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奋发努力。预祝你们今年在战斗、学习、生产和全部工作中，将得到新的巨大的胜利和进步。

谨致

敬礼！

毛泽东　朱德　王稼祥

民国三十一年三月四日

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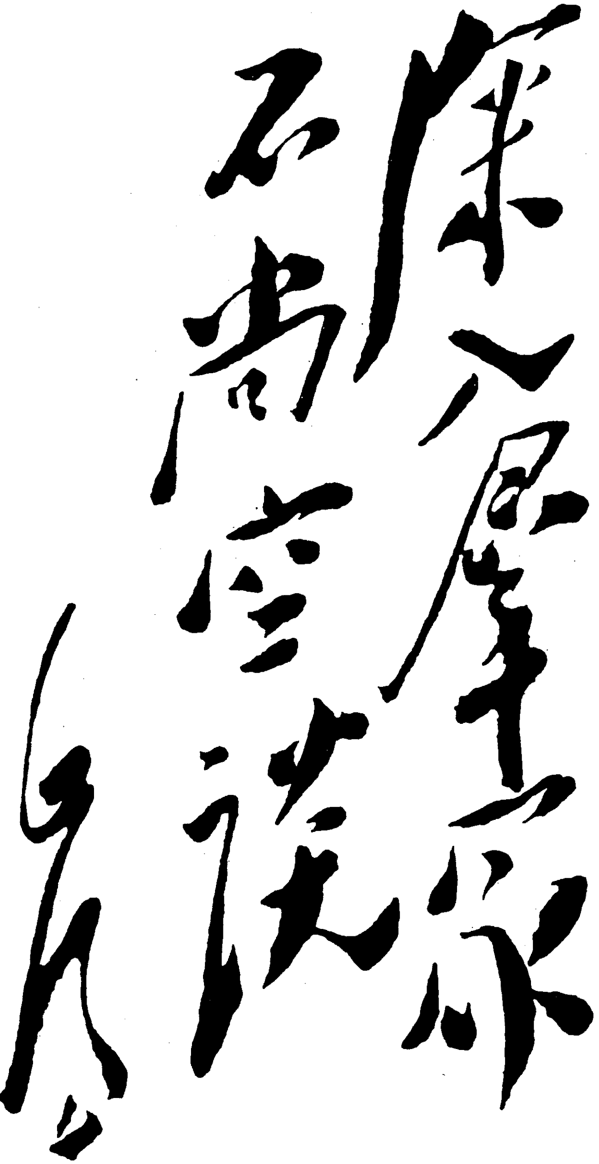
（1942年3月8日）

深入群众，不尚空谈。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1942年3月8日为《解放日报》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刊所写的题词。



深入群众

不尚空谈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的题词。

为张浩题挽词[1]

（1942年3月9日）

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1942年3月9日，中共领导人集体为张浩抬棺送殡。

---

[1] 张浩，即林育英，是林彪表兄。1942年3月6日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次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中共中央委员张浩同志积劳成疾病逝》的消息。毛泽东为林育英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3月9日，在林育英下葬时，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亲自把林育英的棺柩抬到安葬地。毛泽东还为他的墓碑题写“张浩同志之墓”。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和朱德、陈云等在延安参加张浩的安葬仪式。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为张浩葬礼执绋。

1942年3月9日，毛泽东和陈云、李富春等参加延安各界公祭张浩大会。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3月11日）

我党现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我们自去年八月起已开始改造党的工作，但党报尚未实现彻底的改造。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报社的同志要了解经过党报来改造党的方针，现在报社的同志没有了解这个方针。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复彭德怀电[1]

（1942年3月12日）

六十一军横行，势必还击，但目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战事，致招决裂，而应组织若干突击队坚决打击其个别出犯部队，以警戒其行动，以后再观其态度，决定对策。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阎锡山部梁培璜六十一军配合日军“扫荡”八路军太岳区，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事件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3月13日）

请向阎锡山交涉，要求阎令六十一军撤回原防区，制止杀人掠地行动，以固团结。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党报应吸收党外人员发表言论[1]

（1942年3月14日）

周：

（一）关于韩国临时政府情形请于日内电告。（二）张申府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2]表示对我党满腔热情，已在解放转载[3]。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4]、解放都应实行。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央已准备了一个决定草案，下周可通过，党报应容纳党外人员说话亦包括在内。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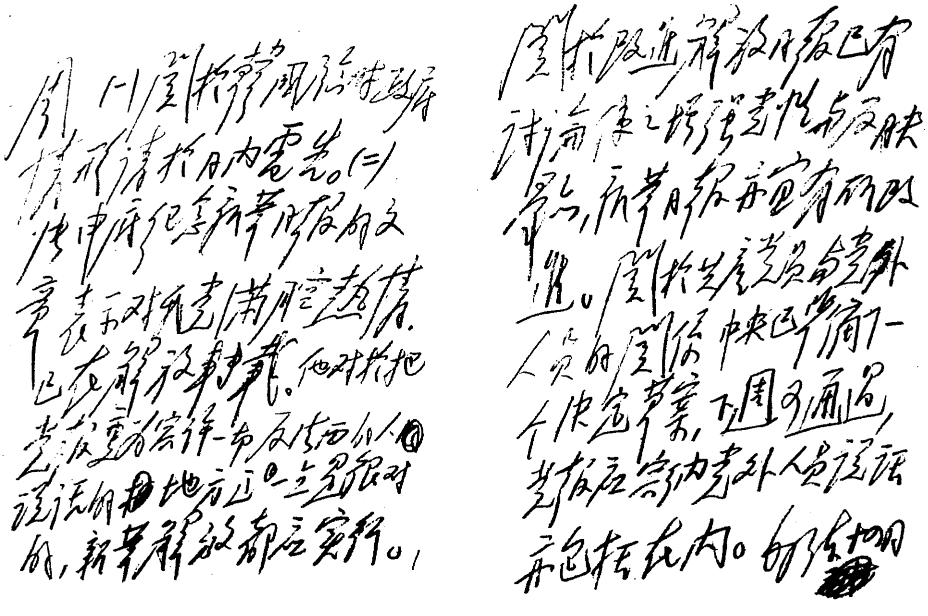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2] 张申府，是大学教授，民主人士。他的文章载于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1月11日第三版，题目是《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

[3] 解放，指延安《解放日报》。该报于1942年3月9日转载了张申府的文章。

[4] 新华，指重庆《新华日报》。



周：（一）关于[illegible]国民党政府情形请于日内电告。（二）请中原局纪念新华社所发的文章，责成对于[illegible]已在解放报载。他对于把党政军[illegible]一齐反对[illegible]说话的地方上[illegible]处置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

关于改造解放日报已有讨论，康生提议党报应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三）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央正写一个决定草案，下周可通过，党报应容纳党外人员说话亦包括在内。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手稿。

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1]

（1942年3月19日）

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任务是：除了汉奸及决心破坏抗战团结者外，一切阶层的抗日人民，不论是有党有派，或者无党无派，不论是同情我党的，或者只在一部分纲领上愿与我党合作的，也不论是已经与我党共事的，或者尚未与我党共事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和他们一致合作，共同为抗战建国的总目标而奋斗。我党长期地坚决地实行这一正确政策，是有了伟大成绩的，全民族的抗战赖以支持，全国的统一赖以实现。这些都是很好的情形。但在另一方面，不论是抗日根据地的党在政府、军队、党务、民运、文化教育部门内或者是秘密党内，都存在着一部分党员及一部分党组织与党外人员之间的严重的隔离现象，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作风并未完全扫除。这些党员与党组织，至今还不懂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与意义。他们违背我党密切联系民众的原则。他们不是密切联系民众，而是孤立于民众之外；不是站在民众之中，虚心体会民众的心理，而是站在民众之上，自以为是，称王称霸。他们不愿意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把党外人员看作无足轻重。他们不愿向党外人员学习，反以领导者自居。他们对于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或漠不关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责备。他们对于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后来没有发出。

权的“三三制”不愿坚决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仍取包办态度。他们至今还不明白，国事是国家的公事，并非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的唯一任务，就在团结全体人民，奋不顾身地向前战斗，推翻民族敌人，为民族与人民谋利益，绝无任何私利可言。而共产党员自始至终都只是人民中的极少数，没有绝大多数人民了解我党主张，真心实意地愿与我党合作，我党主张便无从实现。因此，对于一切忠诚抗日的人员，共产党员只有与他们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为了认真地彻底地纠正各种不良现象，改造党的作风，必须在党内展开反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的斗争，在一切地方与一切部门中展开自我批评，并将这种自我批评公开于党外人员之前，毫不姑息，毫不掩饰，以收彻底揭发与彻底纠正之效。同时，规定下列具体办法，要求一切党员与一切党组织认真地坚决地实行之。

（一）必须将关心和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及向党外人员学习，作为每个共产党员的严重责任。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

（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政府系统、参议会系统及民众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中，均应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人数不足三分之一时，党组织不得指派未当选的党员去凑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在这些机关中，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

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

（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民众团体及其他机关中，凡须经过人民民主选出的工作人员，其任免办法均按前条“三三制”的规定。其他不需经过民主选举的工作人员的任免，亦不应以是否党员为标准，而应以是否赞成抗战团结及本人能力、经验、学识与工作积极性等为标准，实行用人唯贤的正确方针。

（四）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政府、参议会及一切已有或应有党外人员工作的部门中，党支部的任务是：对于党员进行党的教育，领导党员成为工作的模范，团结党外人员，保证该部门工作任务的完成。支部不得直接干预行政领导，更不得代替行政领导。在行政关系上，党员必须服从行政的领导。在党外人员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应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某些地方党政不分的现象，应该纠正。党员如有违犯行政法规者，应受行政的处分；其错误涉及党纪者，同时须受党纪的制裁。但在行政关系上，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党外人员，亦须服从上级行政的领导。

（五）党员及党组织不得任意地无根据地怀疑党外人员，必须从友谊中细心了解自己周围的每个党外人员的历史和特性，细心了解他们对人民、对我党及对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于他们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及生活习惯，必须加以尊重。须知党外人员的愿与我党合作与我党的尊重党外人员，是彼此合作中不可缺一的条件。

（六）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员，对我党和我党党员及干部都有批评的权利。除破坏抗战团结者的恶意攻击以外，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

倾听。正确的批评，应加接受，即使其批评有不确当者，亦只可在其批评完毕，并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加以公平的与善意的解释。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党外人员对于违犯政府法令或党的政策的党员及干部，除得向法庭或行政机关依法控诉外，并有权向各级党委控告，直到党的中央。

（七）《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员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党报工作者必须学会善于吸引党外人员在党报上写文章、写通讯的方式和方法。某些党报工作者的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态度，须受到批评。

（八）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他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决不可采取缄默不言、听其积累或当面不说、背后议论的态度，须知这种态度是只会妨碍合作与不利于党外人员的。

（九）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凡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法律上是与共产党员完全平等的。在工作上，应给以必需和可能的工作条件。在学习上，凡在一切有党外人员的机关、学校中，无论在职干部教育或学校教育，党外人员均与共产党员有同样的学习权利。在物质上，不是空唤优待，而是按工作情况、工作需要及现有物质条件给以真正必需的帮助，并须使党员了解这种帮助是应该的。

（十）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机关、部队及学校中，党的一般支

部大会及小组会，允许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党外同情分子到会旁听，并得发表意见。

（十一）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

（十二）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在党的组织部或管理干部的部门内，设置管理非党干部的专门机关，担负对党外干部的接洽、登记、了解及照顾的责任。在党的各级保护健康委员会内，设置党外干部科，管理党外干部的保健工作。

致刘少奇电[1]

（1942年3月21日）

必须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启程。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2年3月24日）

敌攻乡宁、吉县甚急，阎正坚决抵抗，要求我们援助。望令我军及时予以必要援助，以争取晋绥军之抗战，是为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2年3月24日）

中央正在编印中共党史资料选录，请用一切方法找到下列各文件邮寄或送延安：（一）汪陈[2]联合宣言。（二）彭述之著《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三）瞿秋白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四）五次大会决议。

---

[1] 这是毛泽东和任弼时致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汪陈，指汪精卫、陈独秀。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

（1942年3月30日）

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个工作我们过去没有做过，现在正在开始做。从《六大以来》发出到现在，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已经读了半年，别的单位现在也已经开始读。这是一件好事，今天已开始看到了好的结果。同志们读了之后恍然大悟，发生了启发思想的作用。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去年八九月中央经过讨论，印了《六大以来》这本书，在中央高级学习组里研究。我们怎样研究呢？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

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

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第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第二个阶段；抗日时期是第三个阶段。这个分法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我只是作为一个意见提出的，不是中央的决议。如果有更适合党的历史过程的分法更好。

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联合的群众，第一个阶段是全国各民主阶级，是国共合作；第二个阶段是缩小了的统一战线，国共分裂，全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一部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互相对垒，进行内战；第三个阶段是全民族抗日，恢复国共合作的形式。

革命所打击的目标，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北洋军阀，我们的政策是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反对国民党，我们的政策是狭小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和农民、下层小资产阶级联合。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政策，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是我们的打击目标。革命的阵线是国共合作，全国各爱国力量。这是我们的路线。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讲话。

第一个阶段内我们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正确的地方是实现了国共合作，打击目标是对的，革命队伍的组织是对的。后来发生了陈独秀路线，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党的路线就不对了。当国民党准备实行叛变革命，要把无产阶级和农民丢了，要把我们和革命群众丢了的时候，我们还和它联合，这是右的机会主义。情况变化了，我们的政策路线没有跟着变。右的倾向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陈独秀路线的根本特点，便是一切联合反对斗争，就是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叛变了的时候，还要同它联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策变了，而我们的政策不变。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打击革命了，我们的政策也还是不变。这就犯了右的错误。在联合中应该一方面与它联合，一方面与它斗争。第二个阶段中全国分为两个营垒。马日

事变以后，有过一种盲动主义，说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接着的立三路线是在不应该全国暴动时要暴动。“九一八”到遵义会议，当一个民族敌人打进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已经变化了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没有跟着变，还是过去的一套，这就发生了“左”的东西。那时的领导路线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九一八”以后情况变化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公开倾向我们，如孙科、黄炎培等。但是我们说他们是改良主义，说他们是我们的主要打击对象。把这些人当作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不对的。还有当时提出消灭富农，也是过左的。第三阶段既不是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也不是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而是联合与斗争的综合，联合是主，斗争是辅，要求统一下的独立性。统一就是联合，独立就是斗争。什么叫独立性呢？你站在这里，没有人叫你站开，这就不发生独立性的问题；在你站的位置上别人也想站，要赶你走，这就发生独立性的问题了。斗争、磨擦是为了统一，是统一的手段，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有理、有利、有节。在不妨碍统一下的独立自主，也就是希望团结得更好。

中共党史分成这三个阶段，就斗争目标、打击对象、党的政治路线讲，都合乎事实，都说得通。

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之前，还有一个准备阶段。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是大革命的直接准备，可以和一九二五年开始的大革命合成一个阶段。“七七”以前，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国共合作的局面大体上已经形成，这可以考虑合并于第三个阶段，也不必再分。

说到革命的准备，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特别是五四运动，大革命的思想、干

部、群众、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开始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而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的号召之下组织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人来帮助组织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国际代表到会。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现在有很多东西直接联系到那时候，比如反对党八股，如不联系“五四”时反对老八股、老教条、孔夫子的教条、文言文，恐怕就不能把问题弄清楚。

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估价，需要研究。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呢，还是有些胜利？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

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讲话。

在说到辛亥革命时，如不说到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就不能说明革命的发生。同样，不说明“五四”时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说明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的发生。所以当时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袁世凯、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这时期的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北洋军阀。如不说明那时候地主怎样压迫农民，资本家怎样

压迫工人，帝国主义怎样分裂中国，北洋军阀怎样对付革命，那就很难了解当时的斗争。要研究当时的国共合作，如果只看共产党的宣言而不看国民党的宣言还不够。共产党那时是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的，国民党是一个大团体，如果不把这个大团体搞清楚，就不能了解当时的情形和后来陈独秀犯错误的要不得。关于“四一二”、马日事变的材料也要看。内战时，我们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如不讲国民党如何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同国民党一起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就看不到内战的必要。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和牛这些东西是在谁的手里，不把地主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关系搞清楚，就不会知道土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把国民党在“九一八”以后还是继续打共产党不去打日本这些情形讲一讲，我们反对国民党就显得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抗战是国共合作大家抗日，国民党发表了许多文件，共产党也发表了许多文件。国民党的抗日文件有些是好的，但是它又要反共。我们自己的文件要看，国民党的文件也要看。国民党的好的文件要看，反共的文件也要看。如果不看这些材料，就不了解反对国民党反共的根据。因为他们先发表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些东西，闹磨擦，我们在不妨害团结、不致引起分裂的条件下强调斗争是有必要的，如果不强调斗争，那就会又来一个陈独秀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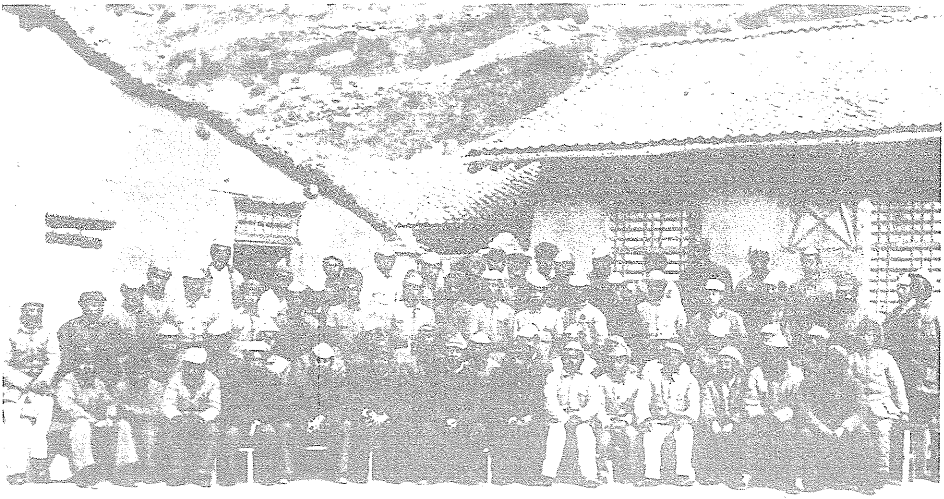
谈到中国的反帝斗争，就要讲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如何凶恶地侵略中国。讲到中国无产阶级，就要讲到世界无产阶级，讲到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斗争，就要讲到马、恩、列、斯他们怎样领导国际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就叫“中外法”。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

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如果不把“外”弄清楚，对于“中”也就不容易弄清楚。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我想，为了有系统地研究中共党史，将来需要编两种材料，一种是党内的，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种是党外的，包括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等。两种材料都按照年月先后编排。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我们研究党史，必须全面看，这样研究党史，才是科学的。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现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在研究历史时也应该注意历史上有没有这些东西。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学得一种科学的方法。这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也不是党八股。我们要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我们党在各个时期的策略路线，研究各个个别的问题，如军事问题、肃反问题、农民土地问题等。

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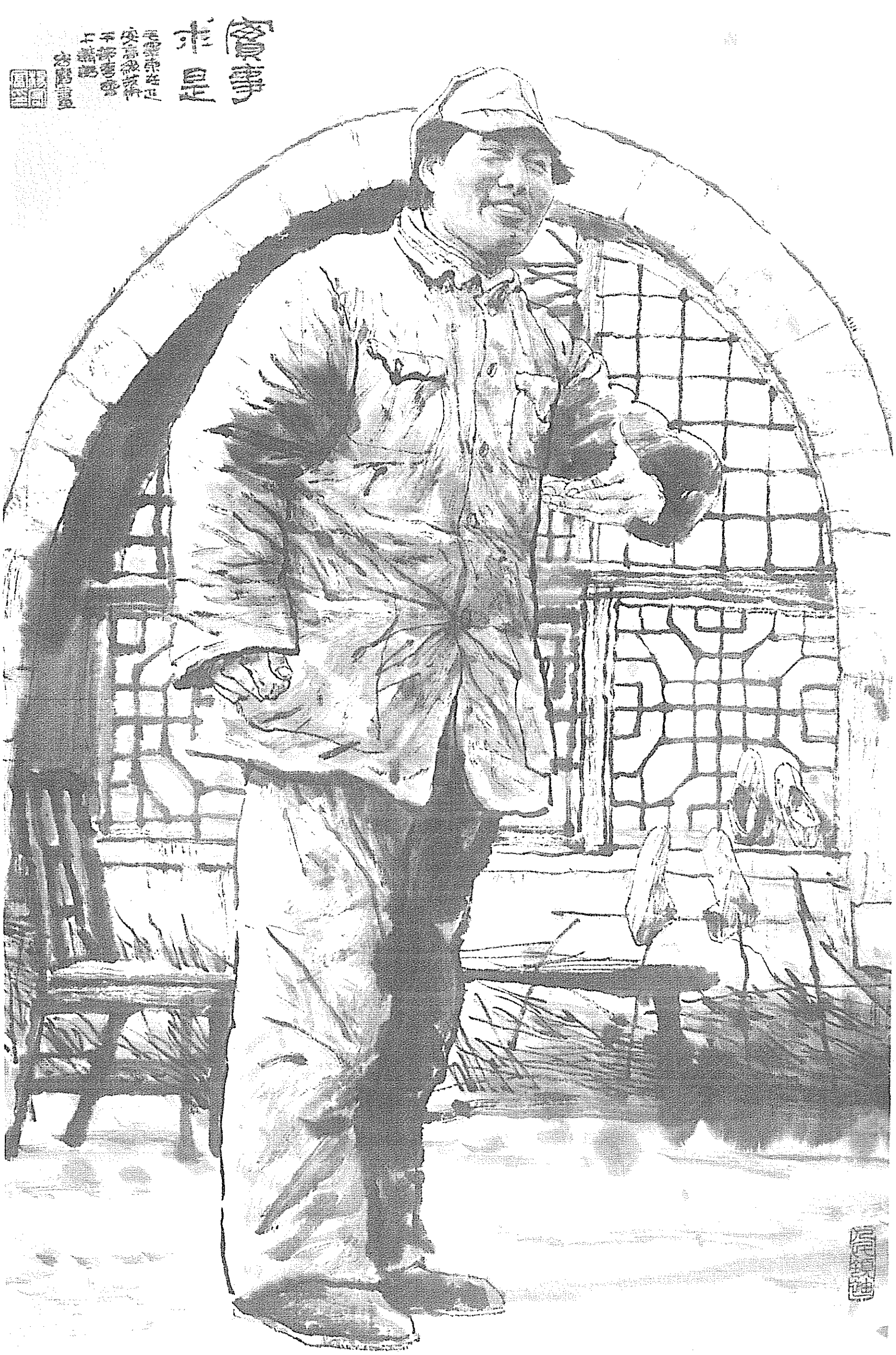
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比如说，我们党在大炮没有、飞机毫无的条件下创造了八路军、新四军，这就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



1942年3月，毛泽东和参加高级技术干部会议的成员合影。

1942年3月，毛泽东和参加高级技术干部会议的成员合影。

1942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会议上讲话。



《实事求是》（中国画）

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1]

（1942年3月31日）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

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

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

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

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4月2日）

讨论整顿三风报告与检查工作，开展自我批评，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不应放任。思想斗争的火力，不是只对着老干部，而应对着新老干部双方的毛病，使新老干部相互批评之后，更进一步地相互了解与团结。态度一定要好，态度不好，就会引存人家不满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热骂还好，冷嘲就不好，因为它会搞得疑神疑鬼。这种空气不要在共产党里面增长，它不利于大家，它使党不团结，使党分裂。不要暗箭，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上下夹攻。我们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机关学校里面要开展民主，但还须有领导，使这个运动发展到正确的方向去。对于我们各部门的工作，这一次要来一个彻底的检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方法时讲话的一部分。中央决定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8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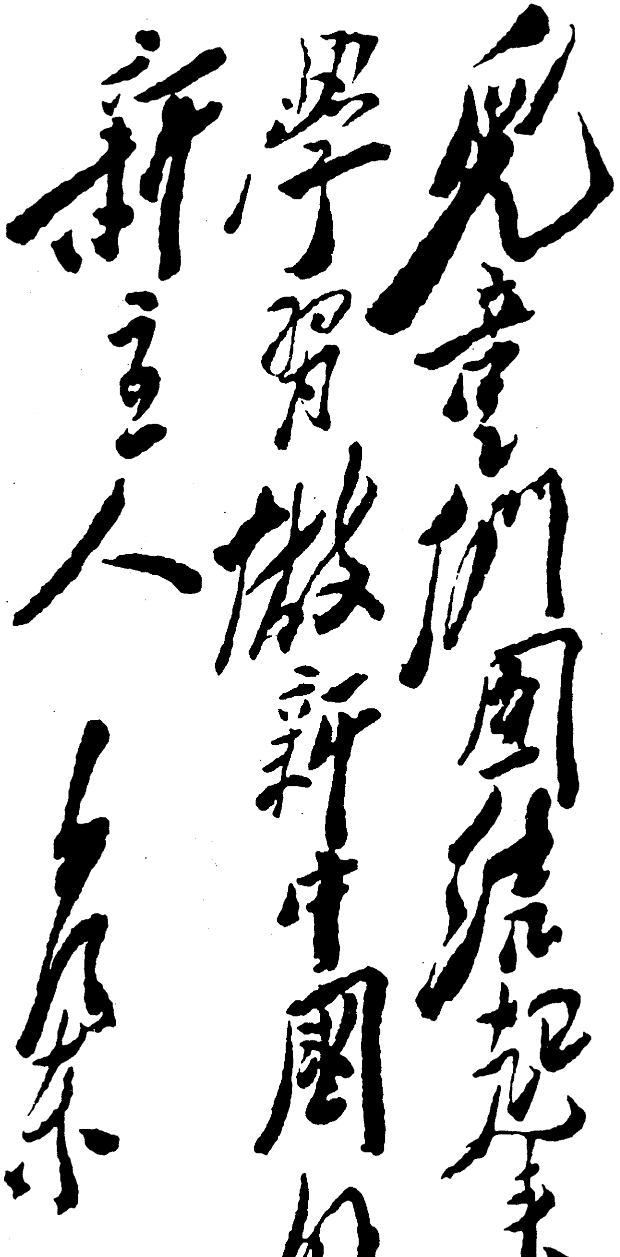
为儿童节题词[1]

（1942年4月4日）

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

[1] 这是毛泽东为儿童节所写的题词。当时的儿童节为4月4日。



儿童们团结起来

学习做新中国的

新主人

毛泽东

毛泽东为儿童节的题词。

给萧军的信[1]

（1942年4月4日）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

---

[1] 这是毛泽东致萧军信的主要内容。

为《八路军抗战烈士纪念册》题词[1]

（1942年4月5日）

他们是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而死的。

---

[1] 1942年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出版了《八路军抗战烈士纪念册》。这是毛泽东为该纪念册的题词。

给欧阳山[1]的信

（1942年4月9日）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2]同志偕来。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欧阳山（1908—2000），原名杨凤岐，湖北江陵人，作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

[2] 草明（1913—2002），原名吴绚文，广东顺德人，作家。当时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4月11日）

中国局面恩来估计正确。蒋介石的政策是外宽内紧，积极准备太平洋战争后的行动，现蒋经国[2]已到西北。蒋介石对我们现已组织政治攻势与军事攻势，我们准备对付蒋的进攻。今后两年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下星期一他在中央学习组讲时局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蒋经国，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赣州专员公署专员兼赣州地区保安司令等职。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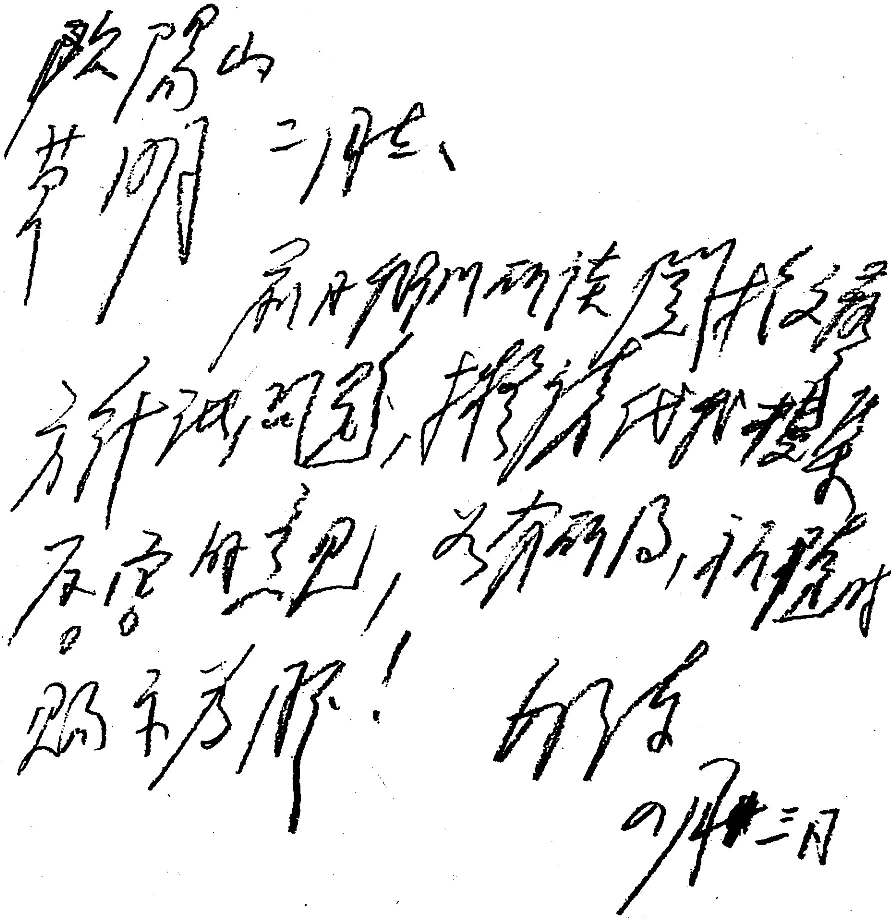
（1942年4月13日）

欧阳山、草明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欧阳山
草明 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你们帮助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乞随时示知为盼！

毛泽东
四月九日

毛泽东致欧阳山、草明信的手稿。

关于时局的报告[1]

（1942年4月13日）

去年冬季国际形势有两件大事，一件是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主动权；再一件就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美国参战。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他们布置很久了。今明两年是我党最困难的两年，我们准备在这两年中间地方缩小，人口减少，军队缩小，党员减少，财政经济缩小。我们的困难有两种，一种是反共高潮的困难，另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困难。今天的困难，是黎明之前的黑暗，是胜利前夜的困难。在没有反共高潮时，要工作照常，加强干部教育。反共高潮来了，要应付反共高潮，但也不放弃教育。我们的干部在现在的状态下，是相当狭窄的，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的局面，所以为了将来要加强教育，为了现在也必须加强教育。再就是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是为了克服困难。中央指定了一个裁总委员会，要考虑如何达到精兵简政之目的，如何各得其所，还要同检查工作结合起来。

---

[1] 这是毛泽东根据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中央学习组作关于时局的报告的一部分。

给欧阳山、草明的信

（1942年4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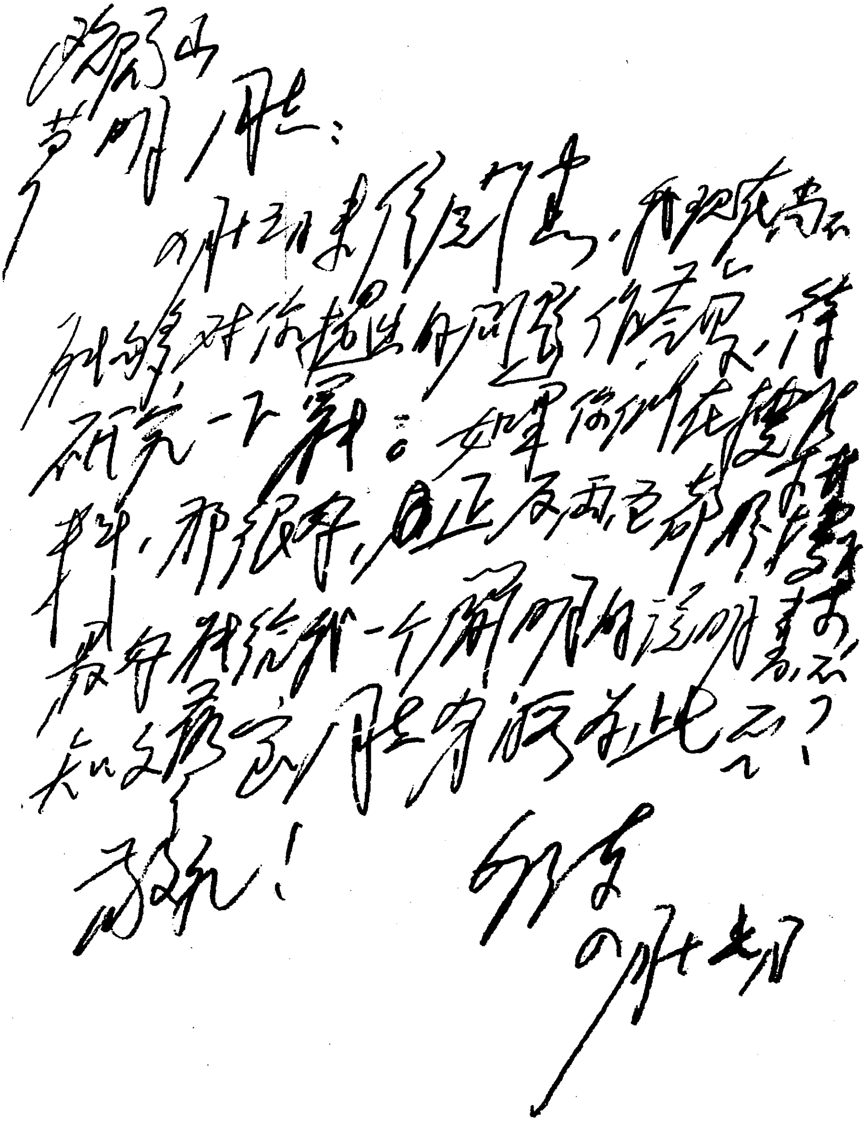
欧阳山、草明同志：

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吧。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同志有暇为此否？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欧阳山
草明同志：

四月廿三日来信收到，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再说：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自正反两面都作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家同志有兴于此否？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欧阳山、草明信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4月17日）

（一）在学习与检查工作中，要对干部的思想与组织观念（即言行）进行审查与鉴定工作。对各机关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与落后分子不要平均看待，要使积极分子起模范作用。（二）在检查工作与审查干部中发现反革命分子，应加以清除，以巩固组织。这次高级组学习计划的改变，由研究历史到注意十八个文件的学习，到现在审查干部，是很有益处，很有必要的。现在先研究现实的文件二十二件，研究党的历史的学习计划暂停一个时期。在整风运动中，表现有老三风不正与新三风不正，现在须要纠正平均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延安的学习与检查工作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陈毅电[1]

（1942年4月19日）

关于韩德勤的军力与地区，以能维持韩生存又对我无危害为原则。因此，地区可划给一个适当的立足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整顿三风[1]

（1942年4月20日）

上次讲了时局的问题，今天讲讲延安现在所进行的教育工作的问题。现在教育工作的意义很大，为了对付目前的时局也好，为了迎接将来的时局也好，都必须加强教育。现在的时局是一个国民党反共高潮可能到来的时局。反共高潮来了，我们的困难更大；反共高潮不来，我们也是很困难的。今年明年，是最困难的两年，所以要加强我们内部的教育。国民党说我们在转变作风，整顿内部，巩固内部，这是说得完全正确的。为了现在，我们必须这样；为了将来，我们也必须这样。时局的黑暗只是暂时的，是要变化的。整个世界，整个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变化的，法西斯就要倒的。为了迎接光明，要加强我们的教育，要做思想的准备。报告时局，估计时局，这是思想准备的一种。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扳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要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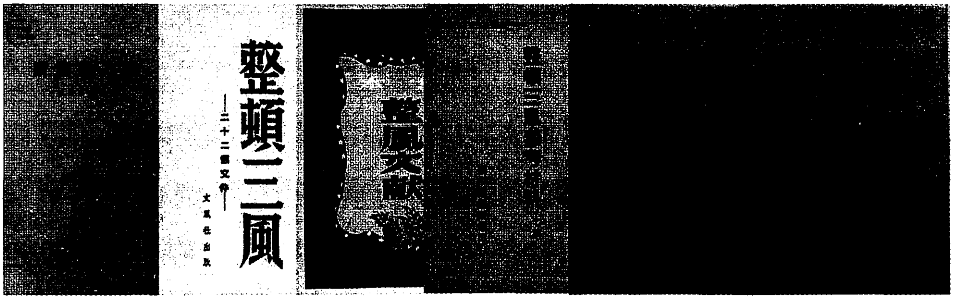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的报告。

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全面的、全党的、由中央领导进行的干部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从去年七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开始，我们才全体地、从上而下地、一致地注意了这个问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现在延安所进行的教育和学习，是有全国意义的。中央学习组[1]在座的同志们，整个延安的工作干部，进行学习，这个意义不是局部的。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机关是中央直属的，这里——陕甘宁边区是所有边区中政治意义最大的，这里的很多干部是做全国性的工作的。二来是全国许多地方的干部到这里来了，这些干部本来是全国各地的，他们之所以到延安来，或者是因为在原来地方立不住脚了，或者是因为有事情要到延安来办，或者是到延安来学习的。延安这个地方集中了全国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工作有全国性的意义。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还有，延安这样一搞，搞得很好，消息传出去了，传到了各个根据地，传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各地的党组织都会跟着我们干。现在我们还只是在这里干，我们要经过《解放日报》，经过新华通讯社把一些东西传播出去。现在新华社应该主要是广播教育材料，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广播斯大林的十二条[2]、斯大林论检查、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这些

---

[1] 中央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是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决定成立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目的在于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

[2] 指斯大林1925年2月同德国共产党党员赫尔措格谈话中阐述的各国共产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的12个基本条件。（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313页）



整风运动期间出版的整风文献和编印的历史文献集。

文件。当然，现在世界处于战争形势下，战争消息不能没有，但可以少播一些，比如印度打仗的消息可以少播一点，苏联打仗的消息也可以少播一点，而教育材料要多播一点，延安整顿三风的报道也可以多播一些。华北送来了整顿三风的报告，可以由延安转播出去。可以多做一些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

现在，国民党也利用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来骂我们，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但我们还要继续反下去，当然我们所反对的主观主义等与他们所骂的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使在座的同志，还要经过在座的同志使延安所有的干部都懂得，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件有全国性意义的工作，做一件建设党的事，使我们党的工作更完善更健全。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要把我们的学风、党风、文风改变，扩大正风，缩小和消灭歪风。中央各个部委除了一些日常的必要的工作外，其余的全部精力就是做这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是否能做好，当然现在还不能断定。现在各机关各学校也还有一些同志没有认识清楚这一点，没有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重要事情，没有把这个工作当成一项中心工作。我们说在最近三个月内要把它当作一项主要的工作，其他工作是不是停止呢？日常

的、必要的工作那是不停止的，要在日常的必要的工作不停止的条件下把它当做一项主要的工作。不紧要的工作怎么办？不紧要的工作就把它暂时停止。学校里面有许多课程，那些不紧要的也可以停止。比如在中央党校，就是把全部精力来搞这个事情，十八个文件[1]，加上四个[2]，共二十二个文件，要学两个半月。中央研究院也要停止其他课程学这些文件。其他学校，按照不同情况，或多或少都可以停止一些课程。各个机关也可以或多或少按照情况停止一些不紧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外，要把二十二个文件的讨论、研究，以及工作检查、思想检查，放在第一位。学校规定用两个月，机关规定用三个月。学校两个月如果不够，延长半个月，半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机关三个月不够，延长半个月，半

---

[1] 指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的整风学习的18个文件：一、毛泽东2月1日在党校的报告；二、毛泽东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三、康生两次报告；四、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五、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六、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七、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八、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九、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十、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十一、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十二、《联共党史》结束语6条；十三、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十四、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节；十五、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十六、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十七、宣传指南小册；十八、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4月16日《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增加的4个整风学习文件：一、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二、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三、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四、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个月不够，延长一个月。总而言之，要把反对主观主义这件事搞得彻底，一定要搞好，我们必须要下这样一个决心。如果搞得不好就再搞，再搞没有搞好还得重搞，要搞彻底。有人反对就要说服，说了不服，还要再说，一定要使其心悦诚服。总而言之，一定要干到底，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转变已经准备很久了，从遵义会议以来就在准备，特别是去年七月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颁布以后，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月了，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现在再来一个三个月的突击，在突击以后，就要转为经常的工作了。在突击之中，除了一些必要的工作外，统统停止。必须使高级领导干部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也要使所有的同志有这个认识，有这个决心，做到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得很。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干部教育中是有很大毛病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中把方针完全搞到另外一边去了，研究马列主义搞到违反马列主义方面去了，方法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方法，这个毒害相当深。现在的主观主义的毒害是有历史的，也有最近这个时期产生的，都相当深。历史的毒害是遗留下来的。最近教育方面又有许多东西搞得不好。因为思想庞杂，思想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所以这个人这样想问题，那个人那样想问题，这个人这样看马列主义，那个人那样看马列主义。一件事情，这个人说是黑的，那个人则说是白的，一人一说，十人十说，百人百说，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这样，自由主义的思想相当浓厚，也可以说在某些部门中间非常浓厚。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共产党员是不应该有的。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呢？没有人指破这一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各种干部，新干部，老干部，男干

部，女干部，文化人，各个地方来的干部，从事各种不同的工作的人在一起，就有了毛病。这毛病，如果不经过这几个月的工夫，将指定的这二十二个文件研究好，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间去，是很难克服的。要把理论和实际行动联系起来，把文件上讲的东西和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什么是实际？个人的历史实际，机关工作的历史实际，各个同志所想的、做的都是实际。对它们可以先来一个研究，在研究中、在检查中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够达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就是说，现在有许多违反马列主义的东西，要在这次教育中、检查中去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用主要的精力去做，否则，这个目的也就达不到，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打起仗来，把延安失掉，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那就不得了，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更会想到这个时候吊儿郎当不注意学习是不应该的，那时候就会后悔的。延安失掉了还没有什么，张家也要独立，王家也要独立，那就不得了。所以就是延安失掉了，反主观主义也要搞，作战也要搞。总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巴烂也要搞。要能对付以后的困难就得赶快搞，我们现在就要读这些文件。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

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上就有。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就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斯大林的十二条，不写一点笔记就研究不清楚。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都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看文件一定要动手写笔记，现在已经有许多同志动手写了笔记，有许多在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写了笔记。我们说犯了错误不要紧，只要认识自己犯的错误，并且能改正，这就很好，就是很好的同志。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太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不要把功劳变成一个包袱背在背上，一切都不在乎，这样，只会把功劳变成一种很重的负担。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也许又有人说，我天文地理都懂得，三角几何都晓得，看这么几个文件还用得了三个月，我三天就看完了。还有的人说，这算什么，我不用看也可以考。能够这样当然是很有成绩的，但我说不然。为什么说不然？二十二个文件是何等之文件，是世界革命一百多年的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革命二十年经验的总结。斯大林的十二条是十七年前写的，没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斯大林能不能够写出十二条呢？不能的，不然为什么马克思的时候就没有写出十二条呢？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也是积近百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革命的目的，就必须实行这个报告所讲的，必须实行干部政策的四条。世界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时算起，中国革命是从共产党产生的那一年算起，五四运动就没有算进来，只讲二

十年。中国共产党这一点经验也是经过艰难困苦得来的，不要看得那样容易，没有二十年的曲折，没有二十年的斗争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中央今天的这些决定，也不可能产生中央宣传部四月三日的那个决定。有同志说，这些决定好得很，早五年出来就好了。我说，你的话不错，早二十年出来就更好。如果中国共产党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主观主义，没有宗派主义，没有党八股，那岂不是更好，那岂不是上策。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上策？没有的！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刚刚读了几年书的青年，就神气成那样，说什么三天可以读完，不看也可以考，不需要学两个月三个月。又有人说什么自己走过了二万五千里三万五千里，还学什么，我说走得再多也不行。水手是世界上游历最广的人，天天都在走，周游全球，但单是走不写笔记，经验就总结不起来。中央制定一个文件有时要搞六七个月，至少也得几个星期，好像我们这些人总是蠢些，人家总是聪明一些，我们写起决议来总是不能很快搞出来。所以不要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许多同志轻视斯大林的十二条，轻视中央的决议，轻视马列主义，这一点一定要讲清楚，不要轻视它，要写笔记，要讨论，要反省。康生[1]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干工作要有一个重心，今天我们教育工作的重心，在自己考虑一下、研究一下，自己反省一下，重心在自己，自己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扩大，不正确的东西便把它清除、取消。要使我们所有的学生、干部都了解，在整顿三风时重心在自己。要帮助

---

[1]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县（今胶州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学委副主任。

别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进步，要帮助别人是难的，这一点要讲清楚。我们在座的同志要以身作则，自己进步，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要做模范。一定要这样做。无论什么人都要这样做，都要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要熟读，要搞通。我们对这些东西要表示态度，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如果以为这些文件不合马列主义原则，那就应该提出意见。如果以为没有违反马列主义而是站在马列主义立场，没有违反党的政策、党的原则而是合乎党的政策、党的原则的，便应表示拥护，表示赞成。要把中央的决心、高级干部的决心、中央学习组同志的决心带到下面去。一定要这样做，并且要进一步实行好。反对自由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不要像在江西时反对“机会主义”那样，说什么吃辣椒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而要反得正确，反得彻底。我们中央的同志商量，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帮助整个延安整顿三风，许多干部去帮助各机关各学校。除了日常必要的工作不停止外，中央机关全部动员起来整顿三风。中央机关如此，各机关学校更应该如此。三个月研究文件，一个月检查工作，开他几次会议，如组织会议、宣传会议、其他会议等。这次整顿三风，由中央的同志分头领导，边区一级由任弼时同志负责指导，军委系统由王稼祥、陈云[1]同志负责，中央直属各机关由康生、李富春[2]同志负责，学校（党校除外）由凯丰[3]同志负责，党校由我负责。在这次学习

---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

[2] 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凯丰，即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检查中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改变作风，团结内部，就是决定上写的改变观点，改变思想方法，改变作风，团结干部，团结全党。

在研究、讨论文件和检查工作中，会有许多干部表现积极、热忱，会有那么一些人也热心，也搞，但和平常差不多，也会有少数人比较更差，叫做落后的。大多数地方大体上都有这三种人，积极热心而又正确的，平常的，落后的。这些人我们不能平均看待。在干部中间实行平均主义是不好的，平均主义是使积极分子、平常分子向落后分子看齐。我们要使落后分子、平常分子向积极前进分子看齐，要使落后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比较差的、不正确的同志向正确的积极的同志看齐，使平常状态的同志向积极的同志看齐。没有这样的引导，使积极的和落后的混同在一起，对积极的没有鼓励，和落后分子一样看待，这是错误的。那谁愿意积极呢？那便没有斯达汉诺夫[1]了。苏联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斯达汉诺夫？因为他积极，要使别人向他看齐。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号召所有的人向积极分子看齐。当然在做的时候也要注意不要夸奖得太厉害、不适当，使人以为某些人领导特别喜欢，某些人领导特别不喜欢，那就搞不好。要使全体都向前，向积极的看齐，要有团结干部、团结全党的精神。

还有搜集问题、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和检查工作的问题。各机关学校自己开会讨论，解答问题，同时把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来。我

---

[1] 斯达汉诺夫（1906—1977），苏联顿巴斯的采煤工人，煤炭工业中的著名革新者。由于他运用新技术和改进劳动组织，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在5小时45分钟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纪录，相当于当时生产定额的十四倍。这一先进事例很快得到广泛传播，并发展成为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称斯达汉诺夫运动。

们希望有两种典型，一是最好的，一是最坏的。把这两种意见两种情况报告中央。学习中发生的问题各单位自己解答，解答不了的开会讨论，再解决不了交与中央答复。关于搜集问题回答问题便是这样。要把干部中的积极分子、平常分子、落后分子分开，对思想有问题的、党性有问题的人要特别加以注意，采取和他们个别谈话的方法。这个方法西北局实行过，还有许多机关实行过，产生很好的效果。再一种方法是开干部会。进行个别谈话，开干部会，用这两种方法来做工作。干部会怎样开呢？我昨天和王首道[1]同志谈了，他所在的机关中，小组长、科长等有二十多人，其他干部有六十多人，一共八十多人。我以为可以两星期开一次二十多人的会，一个月开一次八十多人的会。在二十多人的会上，把中央学习组的精神、要讨论的内容系统地告诉他们，可以展开讨论，大家发表意见，按机关的情形也可以十多人或八九人来开这样的会，一星期一次最好，不能的话便两星期一次，这些人是其他人的直接领袖。其他的人一月一次会，这样的会人太多，讨论恐怕很难，可以报告一下，把二十多人的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们说明，须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开会。同干部发生联系，一种是和干部谈话，一种是开会。用这两种方法我们可以知道各个同志想的是什么，有什么问题，什么事他们不满意，什么事他们满意。现在还没有到检查工作的时候，有些事到那时才能讨论，比如讲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样的方式方法问题。上次邓发[2]同志报告职工会的经验，先批评领导者的缺点，大家肯讲话，如先批评被领导者，便把大家吓倒了，不

---

[1] 王首道（1906—199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2] 邓发（1906—1946），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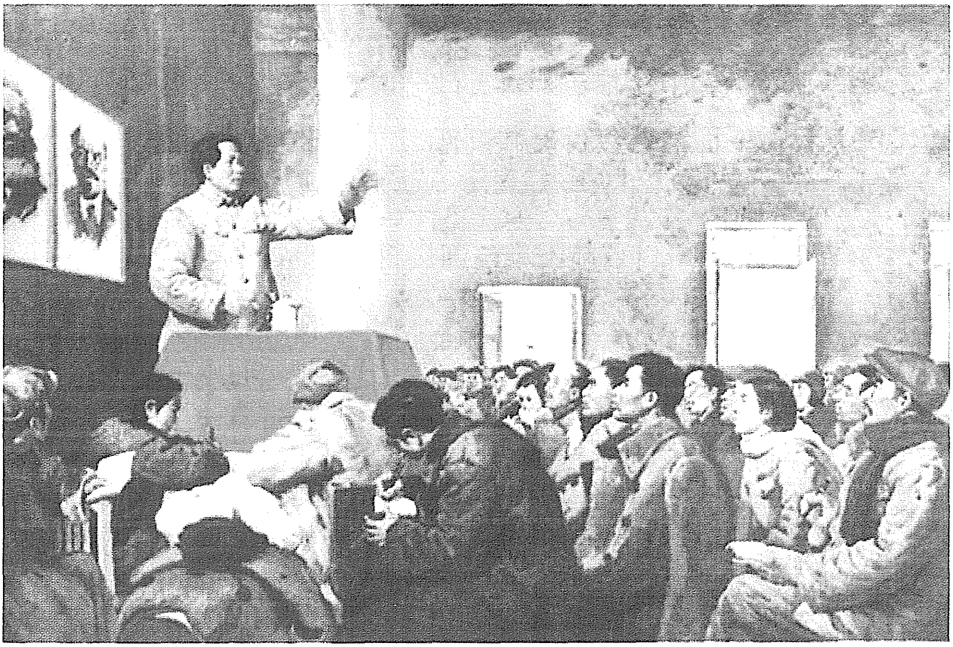
敢说话了。检查工作要鼓励大家发言，如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1]讲的，大胆说话，有的放矢，只要不违犯法律，又是在规定的范围以内的，说话是许可的。正确不正确是指说话的内容，有的对，有的不对。说得不对，是在说的过程中发生的，应该允许，说错了的，以后可以纠正。在讨论中发生了问题，要先批评领导者，后批评被领导者，这个方式比较好，像职工会的办法。总的责任，这次搞得好不好，整个归中央负责，搞好了算一功，搞不好有过。各部门搞得好不好，行政首长负主要责任，不是按照过去办法由党支部负责，这次规定行政上负责。个别谈话解决了问题没有，干部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写了笔记没有，检查工作没有，作风改变没有，讨论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成绩少或者没有成绩，这责任归行政首长负。今天在座的同志都要负责任，希望好好考虑一下，研究一下，同自己领导的部门的干部好好商量一下，交换意见，达到整顿三风的目的。别人整三风，我一风也不整，如果党员是这样，那是不好的。你是共产党员，便应服从党的决定，你一风不整，行吗？整两风也不成，我们讲是一定要整顿三风。要整顿三风，一些偏风也不让有的，整了两风半，还剩半风，行不行？不行！一定要整三风，这叫搞到底。我们要担负这个责任。这里方法是重要的，首先要宣传，宣传部的决定提供了方法，即研究二十二个文件，讨论二十二个文件，检查工作，这样才能搞好。这不是容易的事。

听说有个别机关学校安排得很紧，一个文件研究两天就过去了，这是走马看花。许多文件须要一条一条加以分析研究，一个搞完再搞第二个，这时候别的先不要看，专讨论这一个。有些可以两

---

[1] 指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的范文澜。

三个合起来研究，但也要先一个一个地研究。斯大林的十二条搞通了很不容易，许多人想一把抓，结果没有抓到。要一条一条地搞，要用分析的方法，搞了一条，再搞第二条，这样搞下去，先剩下十条，再剩下八条，最后全部“消灭”。先逐条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全部才能明白。这次我们要搞出些名堂，使全党面目为之一新，这就须要在座的同志负起责来。整顿三风搞得好不好，对目前，对将来，对领导整个革命，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把这样的事做好。



《毛泽东作整风报告》（油画）

准备应付反共高潮
继续抓紧党内教育

（1942年4月21日）

周：

一百零九条[1]已收到。中央已根据你的材料及估计发了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同时将你的材料通知远方[2]及各地干部，并在延安干部中作报告。日苏战争时机当在五月至八月内。在爆发前，我们一面准备应付反共高潮，同时继续抓紧党内教育，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中心，认真进行改造作风、巩固内部的工作，这无论是为着应付目前困难与迎接将来光明都是必要的。

毛泽东

四月廿一日

---

[1] 1942年4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对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进行了分析，并对时局作出估计，列举了近三个月以来国民党领导的反动事件109条。

[2] 指共产国际。

给萧军的信[1]

（1942年4月27日）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2]，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3]1—14期收到，谢谢你！

---

[1] 这是毛泽东致萧军信的主要内容。

[2] 指1942年5月2日开始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3] 指《文艺月报》。

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1]

（1942年4月27日）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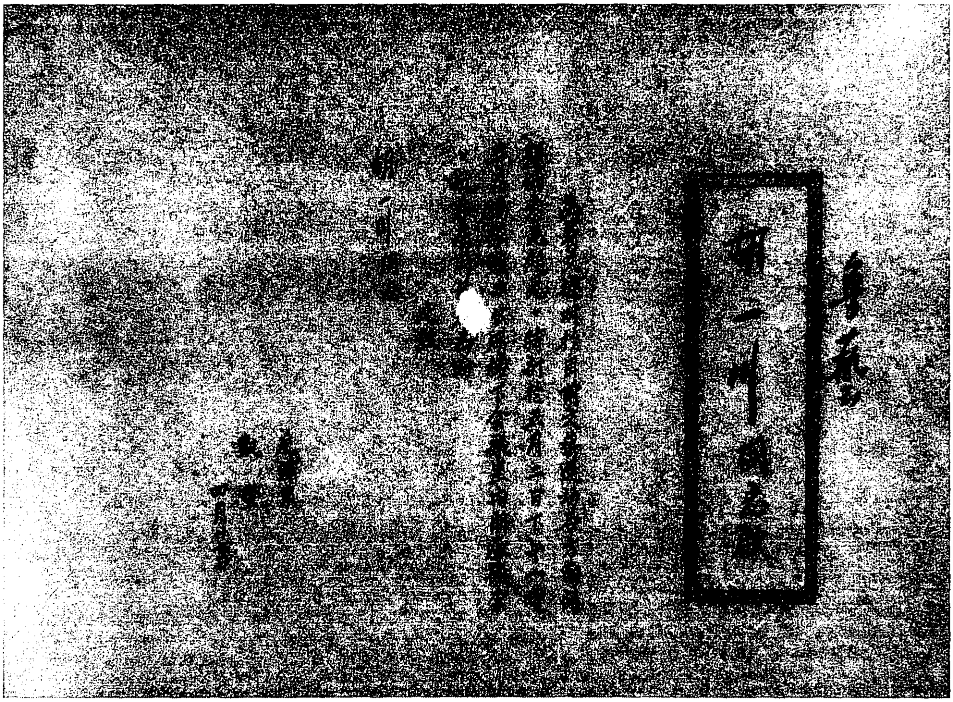
胡一川同志[2]

毛泽东
凯　丰
四月廿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凯丰发出的邀请100多位作家参加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2] 胡一川（1910—2000），原名胡以撰，版画家，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任教。当时受邀参加文艺座谈会。



胡一川同志

1942年4月27日，毛泽东和凯丰联名发出的邀请胡一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5月7日）

我们正从军事、财政各方面准备对敢于进攻者施以痛击，已组成联防军司令部，统筹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处军事。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36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

（1942年5月）

为护士节题词 ……………………………………………………37

（1942年5月12日）

给续范亭的信 ……………………………………………………39

（1942年5月14日）

致张闻天电 ………………………………………………………40

（1942年5月14日）

致胡宗南电 ………………………………………………………41

（1942年5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2

（1942年5月21日）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43

（1942年5月27日）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44

（1942年5月28日）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话 …………………………………………53

（1942年5月30日）

复艾青信 …………………………………………………………54

（1942年5月）

复刘少奇电 ……………………………………………………55
（1942年6月1日）
给罗烽的信 ……………………………………………………56
（1942年6月12日）
致周恩来电 ……………………………………………………57
（1942年6月13日）
复周恩来电 ……………………………………………………58
（1942年6月1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59
（1942年6月19日）
复陈潭秋电 ……………………………………………………60
（1942年6月22日）
致周恩来电 ……………………………………………………61
（1942年6月23日）
复陈毅电 ………………………………………………………62
（1942年6月24日）
给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封信 …………………………63
（1942年6月25日）
致周恩来电 ……………………………………………………65
（1942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66
（1942年7月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68
（1942年7月2日）
复董必武电 ……………………………………………………70
（1942年7月2日）

整风的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 ……………………………………71
（1942年7月4日）
新四军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 ………………72
（1942年7月6日）
复董必武电 ………………………………………………………73
（1942年7月6日）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74
（1942年7月9日）
答晋西北士绅问 …………………………………………………76
（1942年7月9日）
复盛世才电 ………………………………………………………78
（1942年7月13日）
致彭德怀电 ………………………………………………………79
（1942年7月15日）
给周恩来的信 ……………………………………………………80
（1942年7月17日）
复陈毅电 …………………………………………………………82
（1942年7月20日）
复王世英电 ………………………………………………………83
（1942年7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84
（1942年7月2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85
（1942年7月30日）
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 ……………………………………………87
（1942年7月31日）

毛泽东为《陇东报》题写报头 ……………………………………89
（1942年7月）
对华中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 ………………………………………90
（1942年8月4日）
致华中局电 ……………………………………………………………91
（1942年8月9日）
给谢觉哉的信 …………………………………………………………92
（1942年8月15日）
给谢觉哉的信 …………………………………………………………93
（1942年8月17日）
复周恩来电 ……………………………………………………………94
（1942年8月17日）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给谢觉哉、陈正人的信 ……………………95
（1942年8月19日）
复周恩来电 ……………………………………………………………96
（1942年8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97
（1942年8月22日）
精兵简政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98
（1942年8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03
（1942年8月29日）
致周恩来电……………………………………………………………104
（1942年8月29日）
中共中央电贺英《工人日报》复刊…………………………………105
（1942年8月31日）

和漫画家的谈话 ……………………………………………………106
（1942年8月）
接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谟、郭卫生和周励武时的谈话…108
（1942年9月1日）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09
（1942年9月1日）
复周恩来电……………………………………………………………118
（1942年9月3日）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19
（1942年9月7日）
关于国共合作中我之斗争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22
（1942年9月8日）
纪念体育节题词………………………………………………………123
（1942年9月9日）
给谢觉哉的信…………………………………………………………125
（1942年9月15日）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凯丰的信………………………………127
（1942年9月15日）
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130
（1942年9月15日）
给周恩来的指示………………………………………………………131
（1942年9月15日）
报刊宣传服务于党的当前政策………………………………………133
（1942年9月15日）
致朱瑞电………………………………………………………………135
（1942年9月15日）

复张闻天电……136
（1942年9月15日）
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137
（1942年9月15日）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138
（1942年9月20日）
致刘少奇电……140
（1942年9月21日）
给续范亭的信……141
（1942年9月22日）
在“枣园之宴”上的讲话……143
（1942年9月）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46
（1942年9月、10月）
复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150
（1942年10月6日）
延安观察家评斯大林谈话*……151
（1942年10月8日）
为《论党内斗争》起草的按语……152
（1942年10月9日）
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词……153
（1942年10月10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55
（1942年10月12日）
历史教训……160
（1942年10月14日）

评柏林声明……164
（1942年10月16日）
致彭德怀电……169
（1942年10月17日）
致王世杰电……170
（1942年10月18日）
复周恩来电……171
（1942年10月18日）
复周恩来电……172
（1942年10月21日）
致李先念等电……173
（1942年10月24日）
致周恩来电……174
（1942年10月25日）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结合的军队……175
（1942年10月25日）
对顽军以斗争求团结……177
（1942年10月25日）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178
（1942年10月28日）
复周恩来电……179
（1942年10月28日）
致彭德怀电……180
（1942年10月30日）
晋西北要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81
（1942年10月31日）

和谭政的谈话……182
（1942年10月）
给贾拓夫的复信……183
（1942年11月2日）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184
（1942年11月6日）
致林枫电……185
（1942年11月16日）
致彭德怀电……186
（1942年11月17日）
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187
（1942年11月21日）
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的信……259
（1942年11月23日）
为杨松题写挽词……260
（1942年11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261
（1942年11月29日）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263
（1942年11月29日）
致李先念等电……269
（1942年11月30日）
给蒋介石的信……270
（1942年12月1日）
给南汉宸的信……272
（1942年12月8日）

致周恩来、林彪电……273
（1942年12月11日）
给南汉宸的信……274
（1942年12月13日）
复周恩来、林彪电……275
（1942年12月18日）
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的信……276
（1942年12月20日）
给续范亭的复信……277
（1942年12月25日）
为柯棣华题写挽词……278
（1942年12月29日）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280
（1942年12月）
和张稼夫的谈话……440
（1942年12月）
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的谈话……441
（1942年12月）
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442
（1942年）
致周恩来、林彪电……453
（1943年1月1日）
新四军工作的总方针……454
（1943年1月5日）
致彭德怀等电……456
（1943年1月6日）

给王中的信……………………………………………457
（1943年1月10日）
对晋察冀分局发布新施政纲领的意见…………………458
（1943年1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61
（1943年1月12日）
为西北局奖励的二十二位生产英雄题词………………462
（1943年1月14日）
复周恩来、林彪电………………………………………467
（1943年1月16日）
复李先念、任质斌电……………………………………468
（1943年1月16日）
给钟敬之的信……………………………………………469
（1943年1月23日）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471
（1943年1月25日）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474
（1943年1月25日）
在谢觉哉、贾拓夫的报告上的批示……………………480
（1943年2月1日）
关于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481
（1943年2月7日）
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483
（1943年2月9日）
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485
（1943年2月10日）

复林彪等电……487
（1943年2月12日）
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488
（1943年2月21日）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490
（1943年2月24日）
致彭德怀电……491
（1943年2月28日）
给林哲的信……492
（1943年3月15日）
复彭德怀电……493
（1943年3月15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494
（1943年3月16日）
复彭德怀电……499
（1943年3月27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500
（1943年3月30日）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501
（1943年3月）
给印度国民大会的信……503
（1943年4月5日）
复周恩来电……504
（1943年4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505
（1943年4月13日）

给凯丰的信……507
（1943年4月22日）
致英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电……508
（1943年4月23日）
对王若飞来信的批复……509
（1943年4月25日）
复周恩来等电……510
（1943年4月27日）
复周恩来电……511
（1943年4月30日）
致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电……512
（1943年4月30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5月）

引言

（1942年5月2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

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

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

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

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

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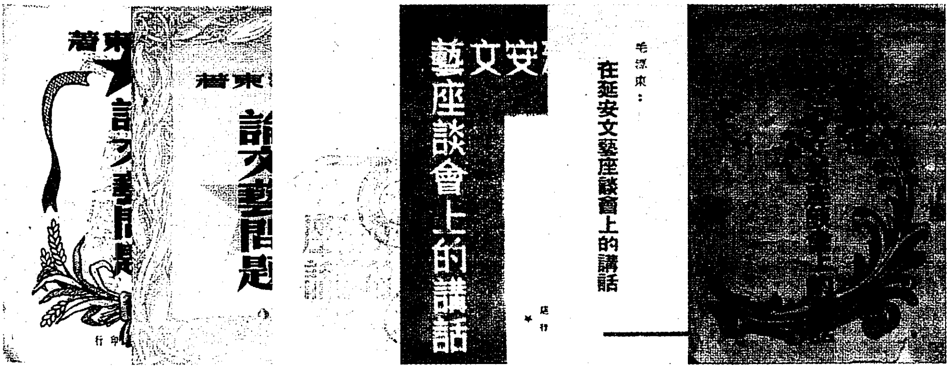
1942年5月，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结　论

（1942年5月23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部分版本)。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

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

---

[1] 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1]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

---

[1] 梁实秋（1903—1987），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参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1]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

[1]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1893—1959），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

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1]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

---

[1] 参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

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1]。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

---

[1]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

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1]，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2]，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

---

[1]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2]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

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1]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

---

[1]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3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

---

[1] 参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

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

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

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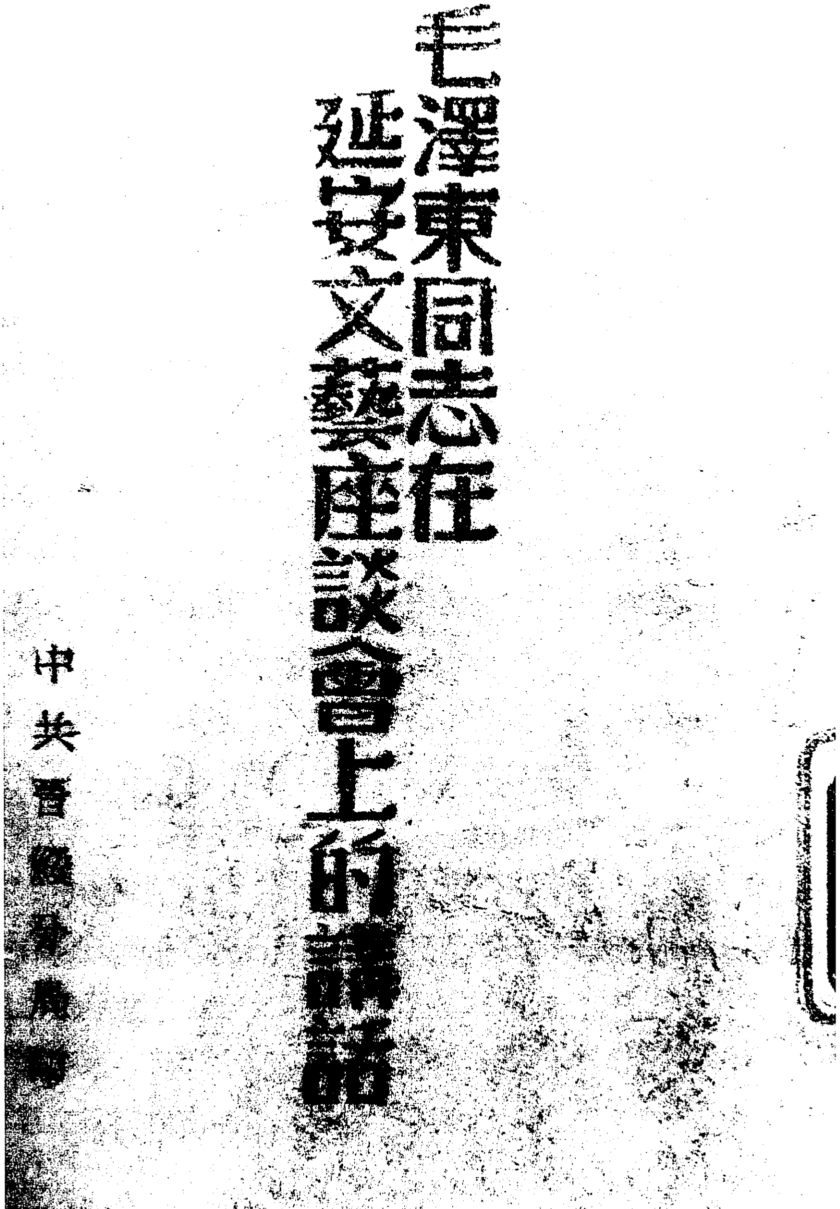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

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



毛澤東同志在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中共晉綏分局印

中共晋绥分局刊印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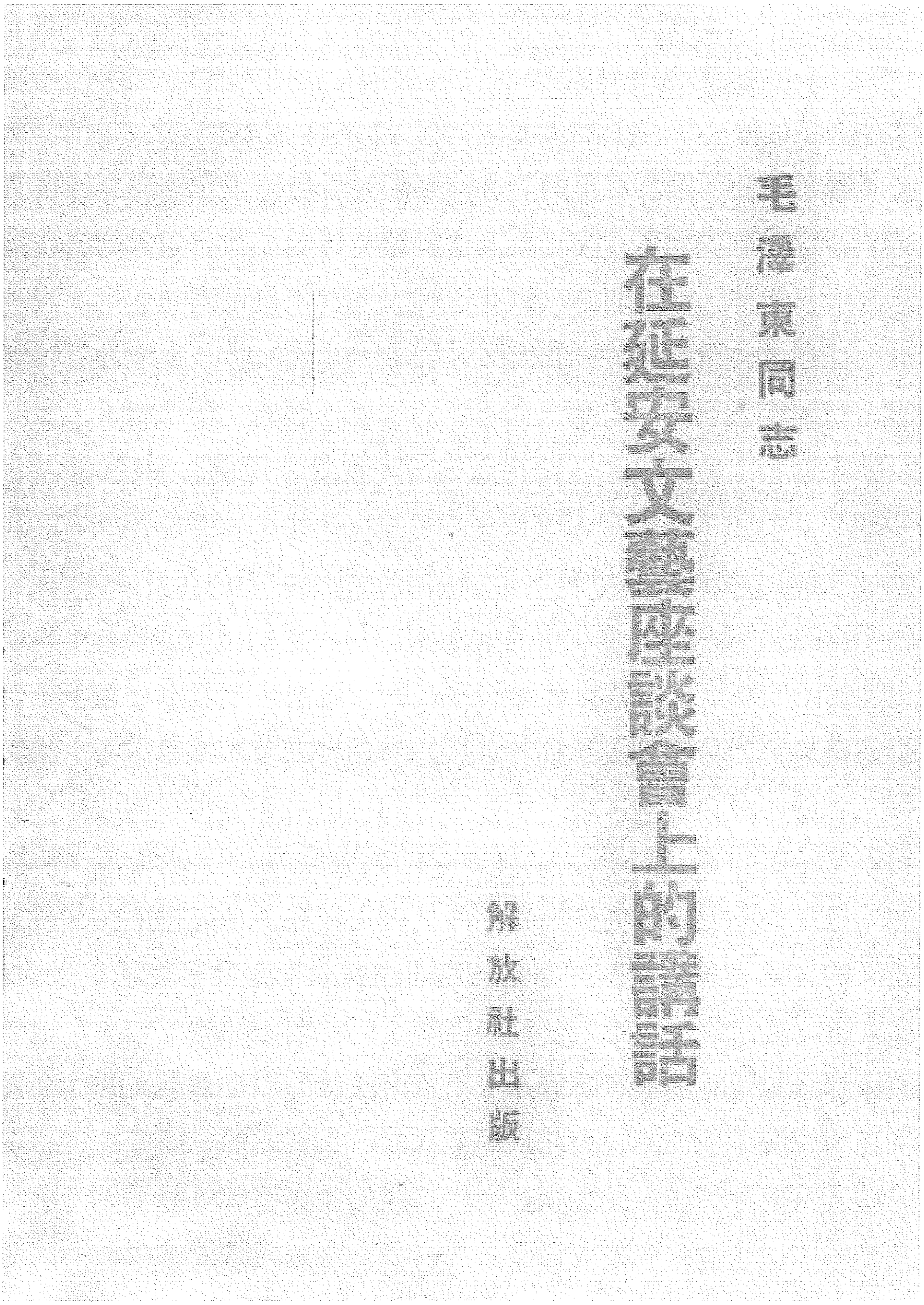
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

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毛澤東同志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解放社出版

1943年10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单行本。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

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

---

[1] 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2] 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土地为“大后方”。

灭》[1]，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2]，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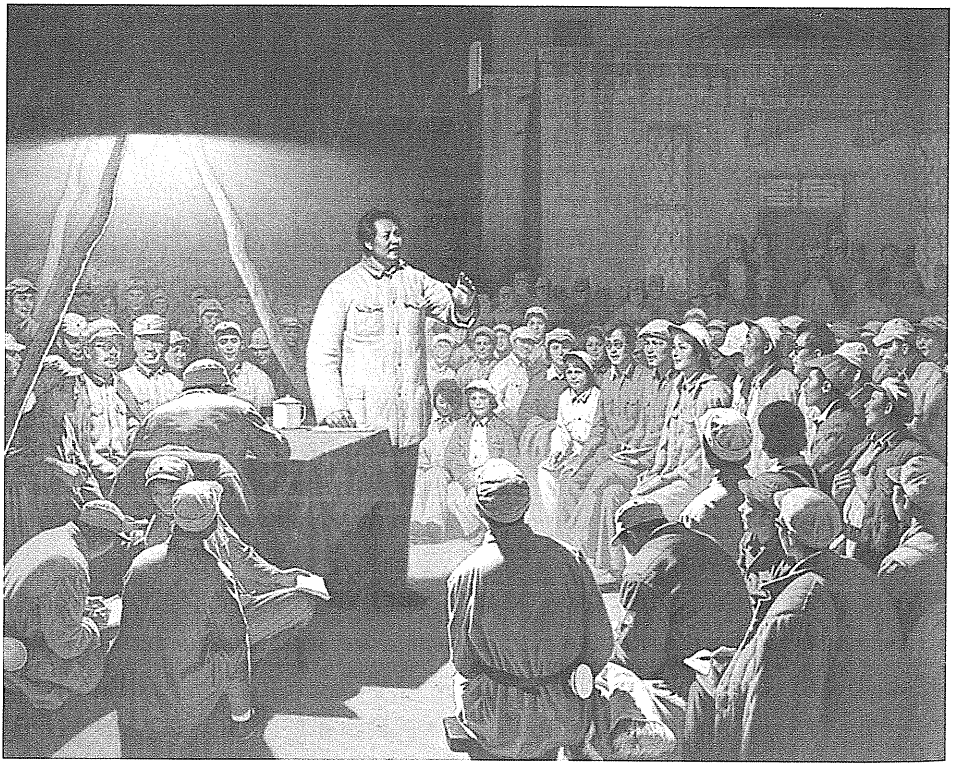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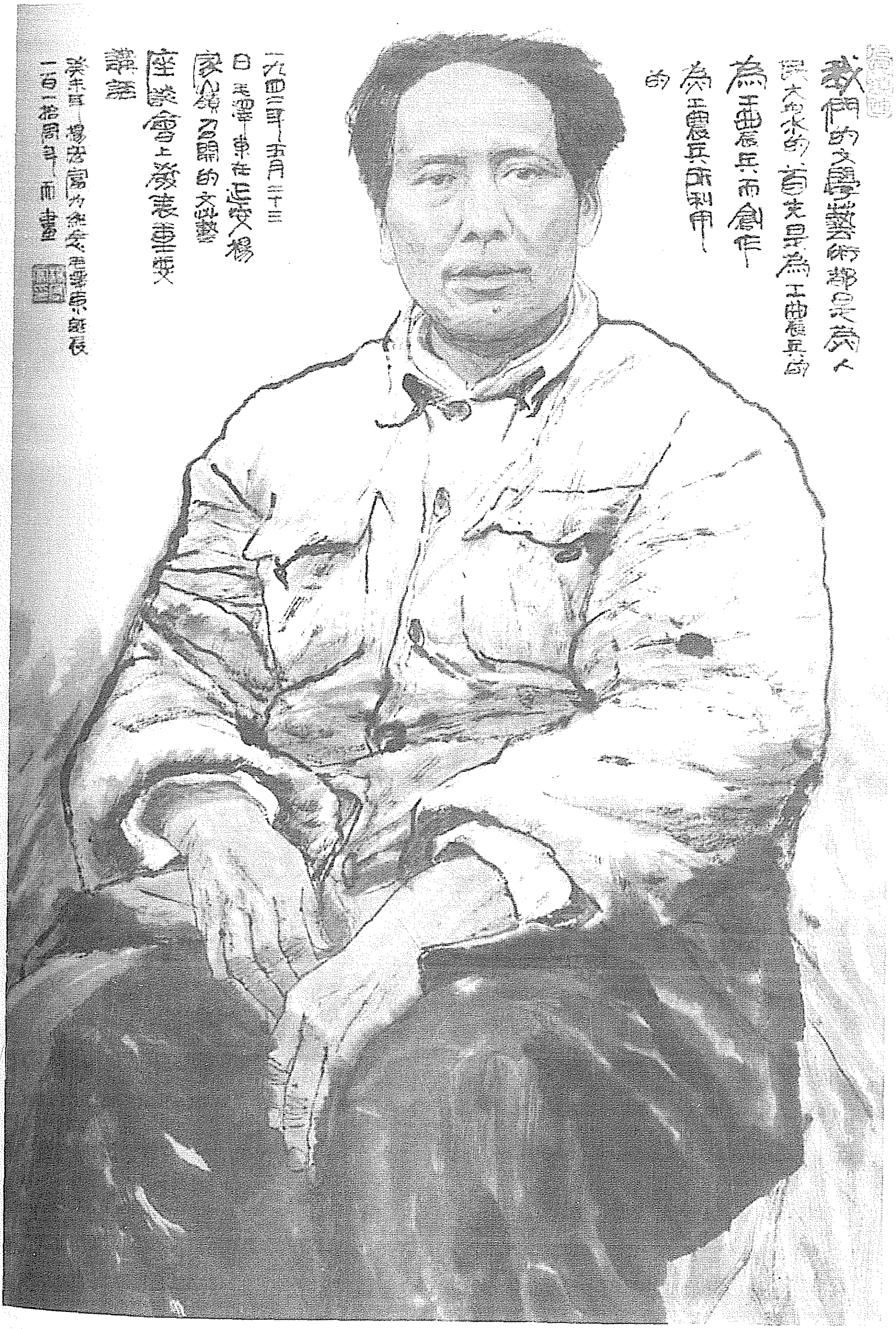
[1] 法捷耶夫（1901—1956），苏联著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1927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2] 参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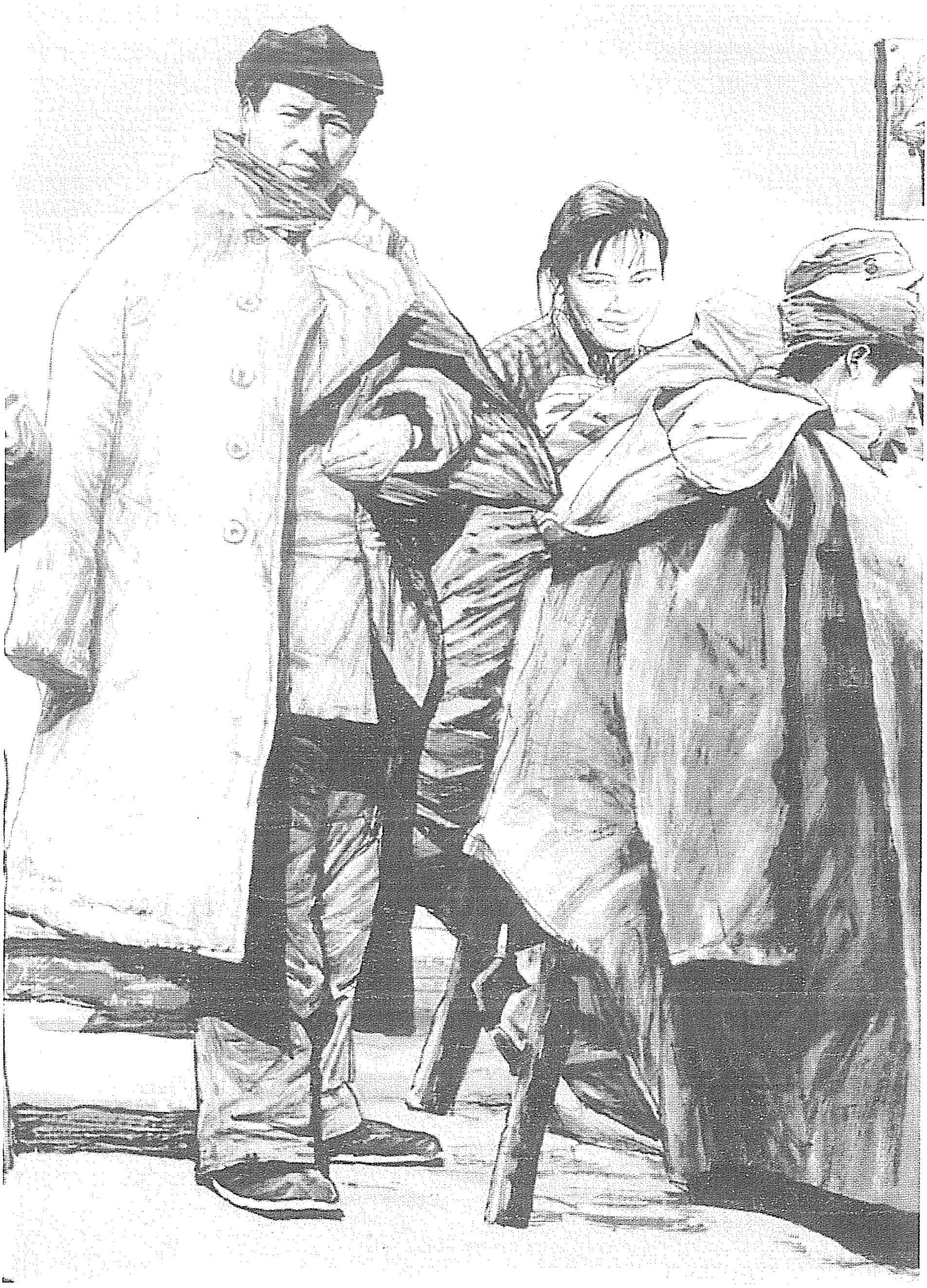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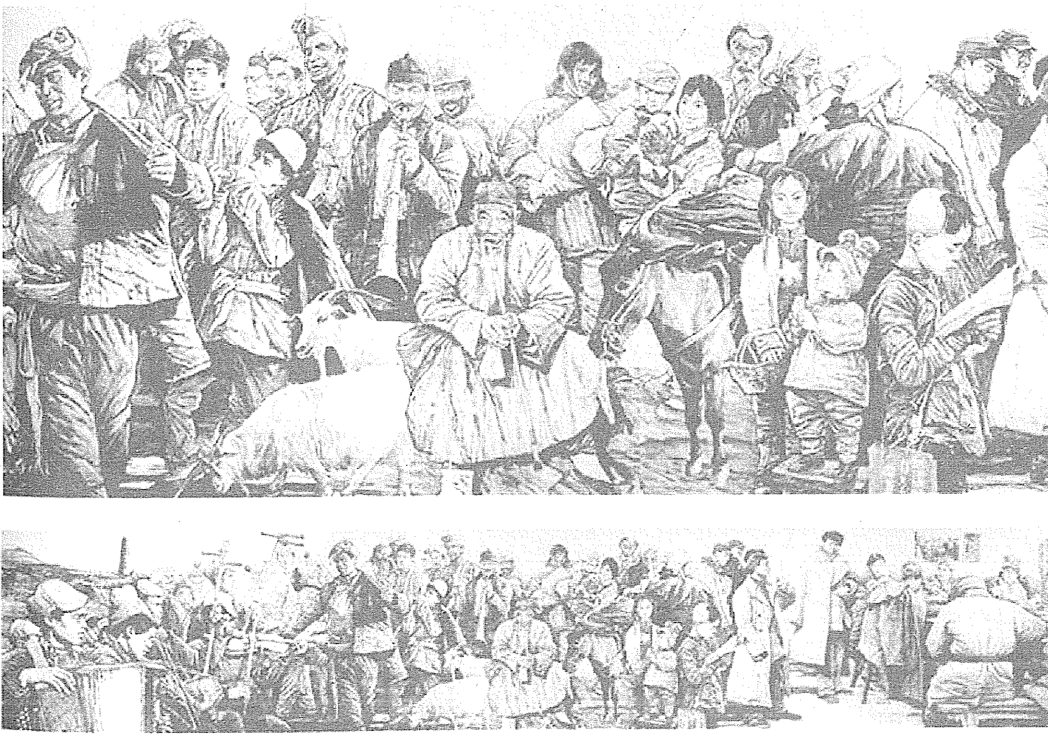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油画）


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在延安楊家嶺召開的文藝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癸未年楊力舟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拾周年而畫

《“我们的文学艺术……”》（中国画）



《源泉》（局部）（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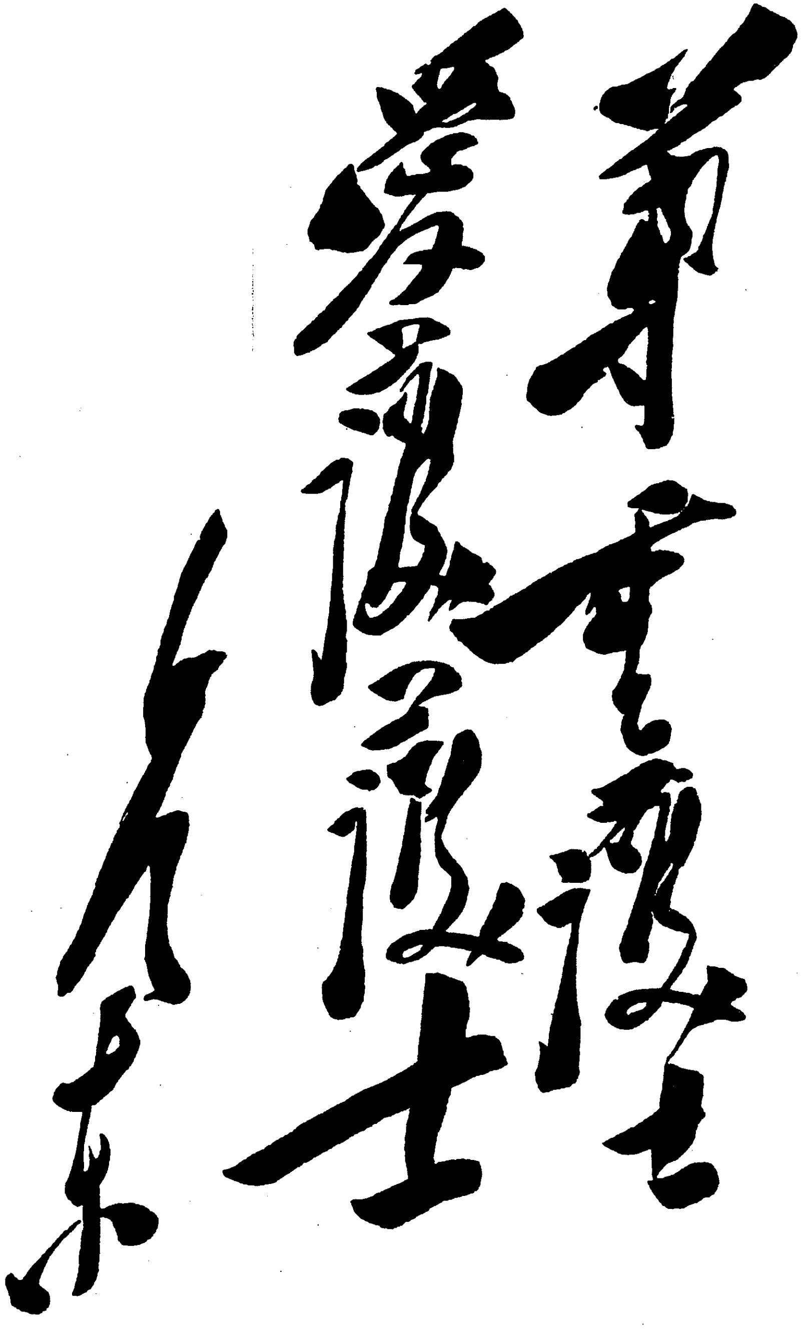
《源泉》(中国画)

为护士节题词

（1942年5月12日）

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毛泽东



尊重護士
愛護護士
毛澤東

毛泽东为护士节的题词。

给续范亭的信

（1942年5月14日）

范亭先生：

你三月间的漫谈，到今日才复你，可见我的不对。我把你的漫谈当作修省录，但不同意你的夸赞，因为夸得过高过实了。因此我也不把这漫谈退还你，目的是使你不能发表，我觉得发表不好，如你尚有副本，也务请不要发表，就你的地位说，发表也有妨碍的。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

即致

敬礼！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致张闻天电[1]

（1942年5月14日）

（一）贺、林[2]带来的信及五月一日的信均收到，后一信对我们很有益处，请继续写。（二）现在延安展开了广大的学习运动，三个月后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致张闻天电的主要内容。当时，张闻天率调查团在晋西北进行社会调查。

[2] 贺、林，指贺龙、林枫。

致胡宗南电[1]

（1942年5月19日）

据报贵部正在积极动员进攻边区，采取袭击办法，一举夺取延安，此种军事行动归陶峙岳[2]指挥，总兵力为五个军等语。事属骇人听闻，大敌当前，岂堪有此，敢电奉询，即祈示复。

---

[1] 这是毛泽东为朱德起草的致胡宗南电的主要内容。

[2] 陶峙岳，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5月21日）

一

国民党企图发动进攻边区的反共战争计划，由于日军尚未发动反苏战争而进攻云南、浙江以及国民党内部问题的严重，有暂时延缓的趋向，但我们仍应根据精兵简政、迁移多余资材、不误整风学习、不误农民生产等原则，进行必要的战争准备工作。

二

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同情。鲁迅的《阿Q正传》是同情工农的，与延安文艺界不同。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并以普及为基本的。同时，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结论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2年5月27日）

感日[2]五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3]，殊深哀悼。瑞卿、立三[4]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感日，即27日。

[3] 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总部突围转移时，不幸中弹牺牲。

[4] 瑞卿、立三，即罗瑞卿、杨立三，当时分别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部长。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1]

（1942年5月28日）

文艺界的同志最近开了几次会，座谈怎么样使文艺界的同志与我们在座的同志、与我们领导下各方面工作的同志相结合的问题。我想在座的同志也应该了解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当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们要了解党对待这个问题的政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十年内战时期，也就是在红军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点文艺，比如写一写小说，搞个剧团，那是比较普遍的，此外也有歌咏，有宣传画、漫画。这些东西同现在的比较起来那是差得多，现在我们八路军所吸收的人才，种类要丰富得多，文艺工作也普遍得多。那个时候，我们根据地与广大的知识分子隔绝了，与中心城市的人隔绝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又犯过错误，轻视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似乎没有好多用处，要是不犯这些错误，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种“围剿”，即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军事的“围剿”就是反对红军；文化的“围剿”就是反对新文化，反对包含着革命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反对以鲁迅为首的在白区的革命的文化艺术。西安事变之后，我们建立了统一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

线，这种“围剿”被打破了，文化人、知识分子大批地到根据地里面来。所以，现在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延安，有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有已经成了专门家的，还有许多没有成专门家，是做普通文化工作、艺术工作的，这种人更多。这种现象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对我们根据地，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现象呢？是一种很好的现象，绝不是坏现象。这个情况，在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颁布之后，要更加好。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正式表明我们党欢迎并吸收大批的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抗日的就应该吸收。但在事实上，和我们合作的知识分子不但是抗日的，而且是有民主思想、倾向于民主的。没有民主思想，他们根本就不会来。而且在和我们合作的人中，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变成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变成了党员，他们的思想不但是抗日的、民主的，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

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现在我们准备作这样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召集了三次座谈会[1]，有一百多同志到了，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这次会开得还算好，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刚才讲的相结合的问题，即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和我们党的干部相结合，和工人农民相结合，以及和军队官兵相结合的问题。

如何结合呢？分两个方面，要向两方面的人做工作。对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要与军队工作的同志、党务工作的同志、政治工作的同志、经济工作的同志接触，要与这些同志

---

[1] 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在5月2日、16日、23日举行的三次会议。

结合；对其他方面的人，则告诉他们要与文学家、艺术家接触、结合。总之，要向两方面做工作，要告诉双方各应采取什么态度。

关于文艺工作者方面的问题，我们也应该了解。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想不想结合和如何结合的问题。首先是要结合还是不要结合，回答是要结合；那末接下来就是如何结合法，即怎么样结合的问题。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解决了这个思想上的问题，才能够在思想上与无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在行动上和工农兵、和我们党相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总是要格格不入的。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如果时间很长了，一定会发生很多习惯，一定会发生许多偏向。许多文艺工作者生长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或封建社会，旧社会的影响有的受得多，有的受得少，有的根底浅，有的根底深，有着程度的不同。这些东西如果不加以指明，如果不使他们把这些东西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阻碍他们这个结合的过程的速度，阻碍他们自己的进步。所以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同志对一些事情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问题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这些问题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现在

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这是一种。

再一种就是问题严重的。他们离彻底地运用马列主义的思想，达到革命性、党性与艺术工作的完全的统一还差得很远，就是说，头脑中间还保存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东西，如果不破除，让它发展下去，那是相当危险的。这个东西，在文艺界的同志中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新党员当中有，老党员当中也有。当然，这种缺点严重的也只是一部分同志。他们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文学艺术要不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于工农大众，向工农大众普及，再从向他们普及中间来提高等还没有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也都是可以解决的。此外也还有像这样的问题，在对作品的评价上，有的同志说是抹杀了艺术性，也有的说是抹杀了革命性。所谓抹杀革命性，就是说，只要是艺术的东西，只要是艺术水平高的文学艺术作品，就认为是好的。他们特别强调这一方面，而对立场问题、观点问题、马列主义基本观点问题、向工农兵取材问题、给谁读的问题、与工农兵密切结合或完全为工农兵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如果对这方面轻视，不看重，那是一个偏向，就是比较地忽视

革命性（当然忽视的程度也有轻重的不同）。如果说有偏向的话，这就是一个严重些的偏向。当然也不是说个个都有这个偏向，但是有许多人都有忽视革命性这一个偏向。他们忽视学习马列主义，忽视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来破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头脑中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思想和行动不统一，想是这样想，做却是那样做，做的事和想的东西不相符合。这是理论和实践的分离。想的是为工农，做的事不为工农；想的是为工农做事，在工农中间的朋友却很少；想的是为工农，对工农干部却不了解。这种“想”，实际上是不彻底的，就是说，对革命性没有强调得好。这种偏向在文学艺术界的同志中很多，应该很好地检讨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偏向呢？有的，这就是太强调革命性而忽视艺术性，认为只要是革命的东西，标语口号式的也好，艺术上不像样子的东西也行。这就把文学艺术降低到和普通东西一样没有区别了，因为别的东西是不采取文学艺术这种艺术形态的。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我们只是强调文学艺术的革命性，而不强调文学艺术的艺术性，够不够呢？那也是不够的，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这个偏向在俄国曾经发生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听说也有过，似乎只要讲几句马列主义，只要讲几句无产阶级，就是好东西。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须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

那末，我们主张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认为革命性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艺术性也是从低级的到高级的。革命性怎样从低级的到高级的呢？对大地主，你跟他讲马列主义他不来，讲民主他也不

来，地主是要租子、要封建制度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他也要抗日，只要不破坏他的封建制度，即使破坏也不要破坏得太彻底，抗日他就会来的。他来就好，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是取他们抗日这一点，不能够取到他们别的东西，只要他们抗日就好。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一样，他们需要民主，但他们所需要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至于人民大众这个最主要的部分，即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资产阶级的民主则又有区别。

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完全取得政权，或者没有主要取得政权的现在，他们至少有这样的想法：他们要搞民主，讲马列主义是不来的。就小资产阶级整个阶级来说，他们不是搞马列主义的，只有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其他阶层的知识分子，才真正相信马列主义，实行马列主义。讲革命性是从抗日到马列主义，即从低级到高级。在艺术上，我们采取的政策和革命性一样，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即是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艺术性高的我们要，低的我们也要。像墙报、娃娃画娃娃，我们也要，那是萌芽，有发展的可能性，有根在那里。老百姓唱的歌，民间故事，机关里的墙报，战士吹牛拉故事，里面都有艺术。一字不识的人可以讲出美丽的故事，连说的话也是艺术性的，我便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忽视了这些，眼睛只看到高的，看不到低的，说老百姓粗手粗脚算得什么，轻视那些东西，甚至看不起普通的艺术工作者，看不起墙报、农村通讯，不懂得士兵、农民能动手写几百字的墙报具有很大意义，这是不对的。专门家中有这种观点的多。胡适之的书，我们看看是需要的，不看也可以。墙报、民歌、民间故事，我们也需要看看。多少年受压迫刚翻了身的人居然能写出几百字的墙报，是了不起的大事；不这样看，那就是

他的立场明显地没站稳，因此对群众的东西不喜欢看。我们主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工农兵。要不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文艺家呢？需要的，但是主要的基础是在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是能够帮助我们的，其中一部分有决心工农化的，他们脱胎换骨，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这样来写工农，也就能教育工农，并提高成为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有文人，在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将来大批的作家将从工人农民中产生。现在是过渡时期，我看这一时期在中国要五十年，这五十年是很麻烦的，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家和工人农民结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有点麻烦，出点乱子，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专门家有责任指导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是不是只有指导的责任呢？不是的，还要学习，要从普通的文艺工作者那里，从人民身上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这是非常危险的。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

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我们要使文艺工作者了解这些问题，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一两个月内了解更好，一两个月不能了解来他半年，半年不行来他一年。我们要特别注意让那些成名的、有成绩的作家了解，来推动整个文艺工作朝这个方向进行，以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工农兵。这对作家本身也是有利的。“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死的时候如果作祭文也是这样作就好了，当然不是专门为了作祭文。张浩[1]去世，我们就作了祭文，名为对死人，实则对活人，就是告诉人们，你们不要自私自利吧！张浩革命一生，难道是为了作祭文吗？我相信不是的！所以文艺家要懂得这样的政策，其他同志也要懂得这样的政策，这是一个结合的过程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结合的问题。我们要求我们的同志，在军队、政府、教育、民运、党务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学艺术工作者，不论是低级的还是高级的，要采取欢迎的态度，恰当的态度，对他们的缺点要采取原谅的态度；而在文艺家方面，对于工农兵的缺点也是要采取原谅的态度。有缺点，不原谅是不行的，将来一定还要有问题。一些知识分子、文艺家不和我们做朋友，这不只是知识分子、文艺家这一面有缺点，一些部门一定也有缺点，也有问题。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发表以后，还有好些问题没有

---

[1] 张浩，即林育英，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42年3月6日在延安病逝。

解决，所以需要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天天讲，使得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斯大林在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讲的。任何一个阶级都要用这样的一批文化人来做事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一样，要有为他们使用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这个阶级完全知识化以前，还要利用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慢慢地来，要进行宣传解释，光是写几篇文章作几次演说办不了事，一定要具体地一步一步地来，没有一次就成功那样容易的事。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讲话[1]

（1942年5月30日）

提高要以普及为基础，不要瞧不起普及的东西，大树也是从像豆芽菜一样小的树苗长起来的。那些瞧不起普及的人，他们在豆芽菜面前熟视无睹，结果把豆芽菜随便踩掉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

---

[1] 这是毛泽东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对学员讲话的一部分。

复艾青信[1]

（1942年5月）

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走得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蹲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义，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到前方，切实研究一下农村阶级关系，不然对中国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

---

[1]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艾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前线去。这是毛泽东复艾青信的主要内容。

复刘少奇电[1]

（1942年6月1日）

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似较适宜，如同意，中央即下正式通知。盼复。

---

[1] 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给罗烽[1]的信

（1942年6月12日）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

[1] 罗烽（1909—1991），辽宁沈阳人，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13日）

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五十七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八十万）的一半，便是胜利。大后方党宜将省委、特委一概取消，只留县委、区委，必要时连县、区委也取消，只留支部，便可大量保存，否则是无法保存的。省、特、县、区四级干部均转入支部工作，可以开辟很多新支部，其任务是勤学、勤业、交朋友三项，以待时机，除有据点者外（如方方）请下决心办理。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17日）

除布置侦察及作军事准备外，请你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准备发动反共内战问题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6月19日）

一

纪念“七七”五周年宣言的内容，应拥护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条战线，提出应有信心明年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并提出战后建国的主张。

二

现在的学习运动，已在中央研究院发现王实味托派[2]。我们要发现坏人，拯救好人，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坏人。要区别坏人及犯错误的同志，要做细密的观察、调查工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抗战五周年纪念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整风学习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

复陈潭秋电[1]

（1942年6月22日）

（一）目前学习以三风文件为主，党史之研究暂停。（二）各种材料有便时当寄你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复陈潭秋电的主要内容。陈潭秋，当时任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23日）

明日拍发中共中央关于纪念“七七”五周年决定，收到后请在《新华日报》公布。延安决定举行盛大纪念“七七”的大会，另有宣言和通电，强调团结抗战及战后建设三民主义国家。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复陈毅电[1]

（1942年6月24日）

马[2]电悉，所见甚是。皖南、浙西只可发展游击，我主力不应南进。

---

[1] 这是毛泽东复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马，即21日。

给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的一封信

（1942年6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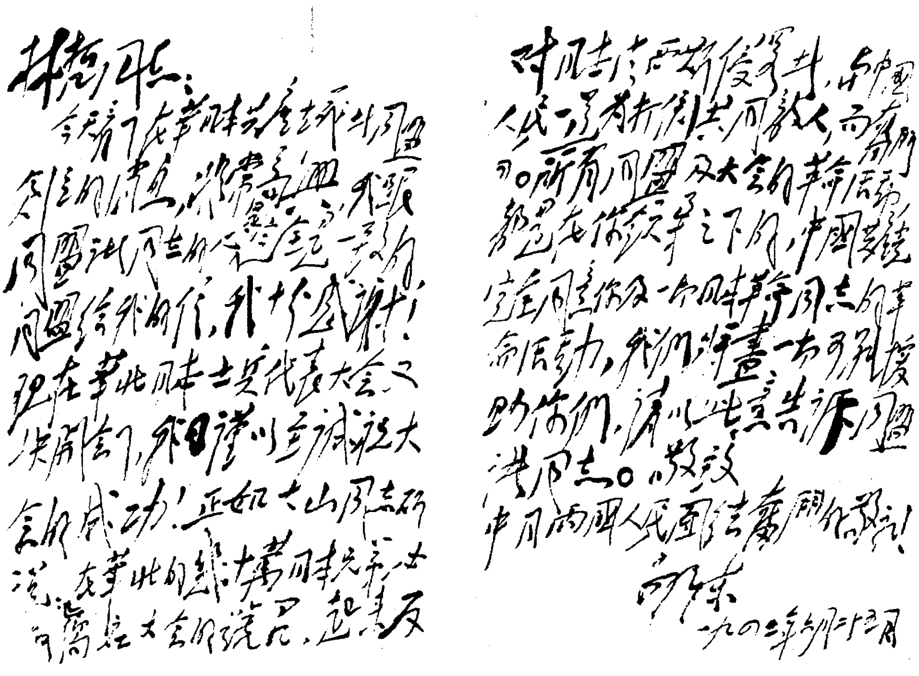
林哲同志：

今天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创立的消息，非常高兴。我跟同盟诸同志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同盟给我的信，我十分感谢！现在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又快开了，我谨以至诚祝大会的成功。正如大山同志说：“在华北的几十万日本兄弟必能响应大会的号召，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人民一道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所有同盟及大会的革命活动，都是在你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你及一切日本革命同志的革命活动，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援助你们，请以此意告诉同盟诸同志。敬致

中日两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致林哲信的手稿。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6月26日）

国共一时不会好转，也不会决裂，是拖的局面。但到希特勒倒后，国际局面变化，势必影响中国，国共好转与民主共和国前途还是有的，我们好好做下去，争取此局面。目前四个月国际国内都是关键。延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有一万个干部参加此种学习。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共关系及延安整风学习情况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1942年7月2日）

（一）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二）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期，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三）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四）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五）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已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已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六）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七）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7月2日）

一

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有一个新内容，就是战后的建国方针和强调团结的问题。中国民族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国民党五十年来都抓住民族这个口号，所以在人民中间有很大的影响。我们提出战后办法是有策略意义的。现在我们的政策，在形式上是改良的，实际上是革命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是时局转变的关键，主要是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第二条战线是否建立，德国进攻高加索是否得手，过三个月后今年的局面就定了。国共关系也决定于这三个月。我对联络参谋说，谁打西安谁是汉奸，谁打延安也是汉奸。对何应钦，我们只是反对他的反共，何反共我反何，何不反共我也不反何。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没有过去的斗争是不能存在的，在斗争之后又要团结。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草案）和《中共中央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二

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1]等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

---

[1] 何畏，曾是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

复董必武电[1]

（1942年7月2日）

恩来须静养[2]，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恩来现在病中不应走动，拟请你找王世杰一谈，要求陈宏谟、郭亚生返延安，询问可否释放叶挺，申述我党中央“七七”宣言大意，请王介绍见蒋介石。

---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942年6月下旬在重庆患病住院。

整风的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

（1942年7月4日）

荣臻同志：

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着，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即如党八股，就是包含着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在内的，如果不包含这些，就不叫做党八股了。如果县以上还有党八股残余存在，即是证明还有主观宗派的残余存在。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所谓各部门，就是不但有地方，还有军队，所谓各级，就是不但有下级，而且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在一个根据地内，主要应着重教育边区与地委两级，其次是县一级，只要他们有了正确方向，区村干部的毛病就易纠正。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已发现许多同志的毛病，正在纠正中，你们那里可作参考。

毛泽东

支

新四军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

（1942年7月6日）

曾、赖，并告陈、刘[1]：

篠电悉。（一）七七宣言[2]已广播，谅收到。（二）浙江战局不久将告一段落，日寇新的步骤现尚难断定，但你们须准备应付敌之“扫荡”。我们军队的任务不是向南发展，而是支持现有根据地，前已于复陈毅同志电中说明了。

毛泽东

鱼

---

[1] 曾、赖，指曾山、赖传珠，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和新四军参谋长。陈、刘，指陈毅、刘少奇，当时分别任新四军代军长和政治委员。

[2] 七七宣言，指1942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发表的宣言，7月6日晚已由新华社对外广播。

复董必武电[1]

（1942 年 7 月 6 日）

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恩来病状如何？甚念。

---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1942年7月9日）

胡服[1]同志：

（一）六月九日电早已收到，书记处各同志都看了，因在考虑，故迟复。（二）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三）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四）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

---

[1] 胡服，即刘少奇。

可能，如蒋[1]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五）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六）日寇正积极准备攻苏，时间有在本月底说，你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七）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2]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八）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毛泽东

七月九日

---

[1] 蒋，指蒋介石。

[2] 1942年5月，日军向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扫荡”。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指挥突围战斗中牺牲。

答晋西北士绅问[1]

（1942年7月9日）

问： 抗战何时能够胜利？

答： ……此次反侵略战争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在欧洲战场，因为苏英美等国的亲密团结，今年可能打垮德国，在太平洋战场上，有中英美的团结，明年可望击溃日本。

问： 抗战胜利后，国内团结问题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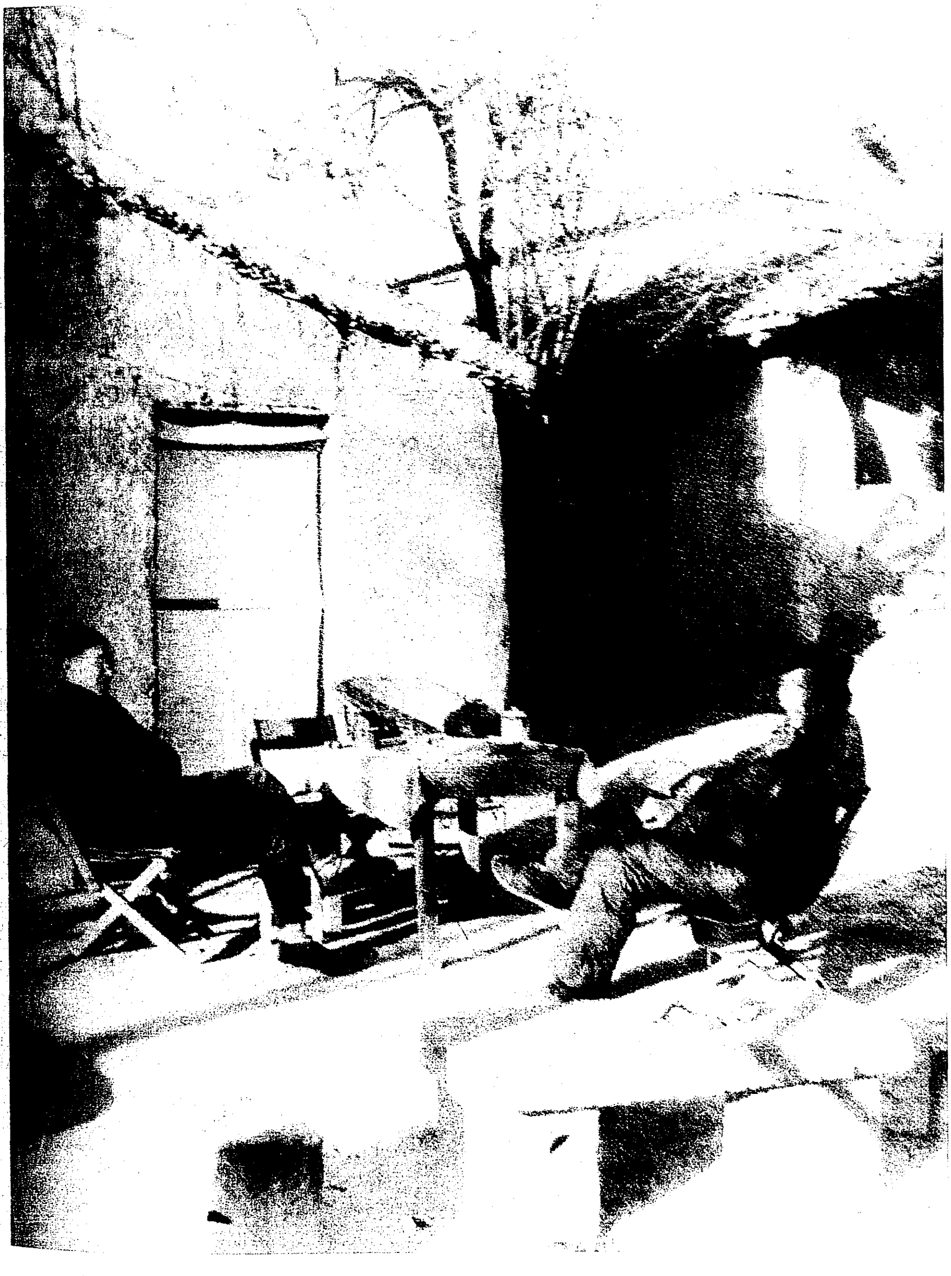
答：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中坚持团结抗日，在胜利之后，也是要坚持团结建国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例，人民普选的参议会，与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乃团结各个阶级共同抗日最好的政治形式，战后自然更须贯彻这种精神，团结各个阶级的人民，共同建设民主共和的新中国。

共产党只有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绝没有排挤别人的权利。

战后中国，必定是民主的中国，农工商学兵各界，都要继续团结，方能达此目的。

---

[1] 晋西北士绅参观团是由兴县著名士绅牛友兰先生发起的。1942年牛友兰等一行16人组成参观团到延安进行参观，7月9日毛泽东会见参观团，这是毛泽东和参观团成员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延安和一位开明绅士交谈。

复盛世才电[1]

（1942年7月13日）

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中国抗日胜利在望之际，深望彼此团结一致，共济时艰。

---

[1] 这是毛泽东复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7月15日）

中央三日给你的电收到否，此电主张总部迁晋西北，北局机构改为太行分局，以小平为书记，华北各分局归中央直接指导，你的意见如何，盼复。十六日，彭德怀复电毛泽东，主张八路军总部仍驻晋东南。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恩来的信

（1942年7月17日）

恩来同志：

十七日电悉。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毛泽东

十七日二十四时

194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一起。

复陈毅电[1]

（1942年7月20日）

军委给五师指示方针电已告，你谅收到，与来电所述意见[2]是相同的。但目前不宜公开宣传顽军罪恶，因我方正和国民党重开谈判，不宜刺激它。

---

[1] 这是毛泽东复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陈毅7月18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四军第五师因国民党军进攻情况紧急曾要求派部向西援助，他认为这一做法不妥，主张第五师以分散独立活动作战为主。并说衅端由国民党军方面开始，新四军军部拟公开宣传此事，以揭破顽军诡计，但等中央决定态度后再办。

复王世英电[1]

（1942年7月24日）

已令前方援助晋绥军之英勇抗战，请告阎长官。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7月25日）

精兵简政适合于目前需要，但做得还不彻底。明年陕甘宁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要减至六万人，晋西北减至五万人。边区主要是两项工作：教育工作和经济工作。晋西北加上打仗一项。要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少而精，能学习的学习，能生产的生产。军队不继续补充，按现有实际人数充实连队，可以实行小团制。至于敌后，要准备很大的缩小。搞一个统筹统支与自给自足相配合的很好的经济制度，以七分统筹、三分自给为主旨。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精兵简政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7月30日）

在关于参议会、“三三制”问题之后应加一句话：“九月份进行的参议会，要使之成为团结各阶级建设根据地支持抗战的机关。”他还在会上发言指出，敌后有两件工作未深入，一是整顿三风，二是精兵简政。在敌后根据地困难日益增长的环境下，必须使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深刻认识精兵简政与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中央应发出指示性的电报。整顿三风必须从上至下地在党内有计划地认真进行。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法西斯国家将被打败。只有美国恐怕是个大家伙，战后法西斯国家都要依赖它，它可能支配世界。今年打败希特勒的问题还要看一看，恐怕对冬季反攻、对德国的弱点估计过大了。战后中国的前途有两种可能，我们在宣传上应以争取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晋西北工作决定草案时讲话的一部分。

转的前途为前提。争取同大多数人一道，是我们策略的出发点，而不是孤立自己。

关于国共关系的估计[1]

（1942年7月31日）

胡服同志：

已有电午养收到[2]，兹复于下：

（一）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称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近日态度好转，这是一原因。此种好转还会发展，我正极力争取。但国共关系是中国内政问题，英、美、苏均不会公开出面调解，只会暗中劝告及在公开舆论上表示希望中国团结。这些将来还会有的，我亦正在争取（二）我们现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在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可能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待国民党好转更确定时，我再要求他通令山东华中部队，停止向我摩擦，这种可能也是有的。（三）国共关系，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最近恩来见蒋谈的还好，蒋已重新指定张治中、刘为章和我们谈判，另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蒋之联络参谋继续来延安，都是好转征兆，但不能求之过急。（四）我党七七宣言及整顿三风运动，在各方有很大好

---

[1] 这是毛泽东给胡服（刘少奇）的电报。

[2] 指6月25日电7月22日收到。

感。（五）七月六日复你一电收到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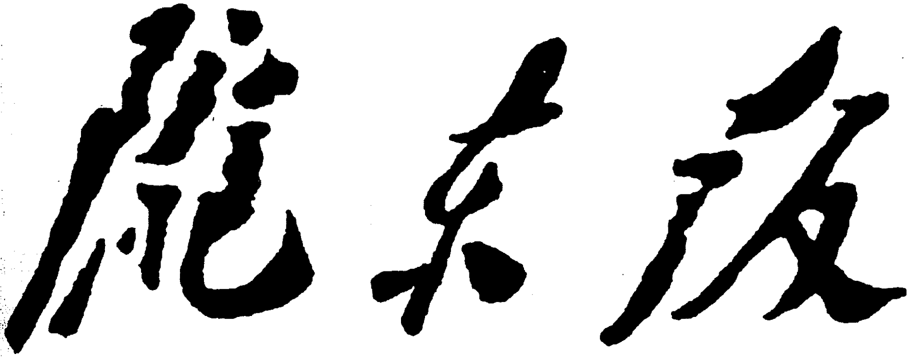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为《陇东报》[1]题写报头

（1942年7月）

陇东报



毛泽东为《陇东报》题写的报头。

---

[1] 《陇东报》是中共庆阳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37年，时名《救亡日报》，1938年改为《救亡报》，1942年7月改为《陇东报》，毛泽东题写了报头。

对华中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

（1942年8月4日）

陈毅同志：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面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致华中局电[1]

（1942年8月9日）

新四军恢复番号或编入八路为一军，目前尚未至与国民党具体谈判的时机，你们目前尚不必提出要求。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给谢觉哉的信[1]

（1942年8月15日）

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记得对你说过了。早几天解放报社论[2]末带有“官方干部”“纯老百姓代表”的话，也有不妥处，不知此文是否你写的？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为“官方”“非官方”。那天社论的意思并不坏，是说要让新选代表多说话，只是不宜将“官方”“纯老百姓”这样对称起来。请加考虑。

---

[1] 这是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主要内容。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1942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迎接第二届第二次边区参议员大会》。

给谢觉哉的信

（1942年8月17日）

谢老：

来信读悉。我对一得书[1]感到兴趣，是有益的；虽间有一二点觉说得不甚恰当，但不要紧。

边区参议会似宜改至明春开，那时时局更开展，便于对外表示意见，不要把这里的参议会看成只是本区的参议会，而要把它看成所有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参议会的领袖。又经过今年一年，本区的工作经验也更好总结，故此事值得再考虑。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

[1] 一得书，是1942年4月至11月延安《解放日报》陆续发表谢觉哉所写随笔的栏题，取意于“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语。这些随笔多数是针对边区工作中的问题和干部的思想状况而写的，发表时署名焕南。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8月17日）

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周恩来8月14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测”。周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借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同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关于精兵简政问题
给谢觉哉、陈正人[1]的信

（1942年8月19日）

觉哉、正人二同志：

今天所谈二届参议会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开会以后应检查（点验）精简，而精简包括精少、效能、统一诸方面。今看本日（十九日）报纸《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所包事项尤多，尚有节省、反官僚主义诸项，此文我看很好，请你们也看一看，是否我们这里可以完全仿效？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像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8月19日）

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8月22日）

总的目标是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办法是五整[2]。中央和军委要以工作和教育作为两个标准来进行大整。工作按现状条件布置，过去要四五个人的，现在只要半个人。教育是专门学习，储备力量，扩大学校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要加强，抓住中心，掌握政策。可考虑李维汉到边区政府任秘书长，完全服从西北局的领导。边区参议会停开，主要实行精兵简政，然后再开。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五整，指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

精兵简政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

（1942年8月23日）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以来，在时间上说，已经是相当长久了，如果我们把各抗日根据地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程度检查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地区是在认真地执行，且已有显著的收获，事实证明了党中央这一政策是切合于各根据地的实际，能够做到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还有某些地区或工作部门，对于这一政策的执行，是很勉强的，被动的，因而也就不能贯彻。甚至还有很少数的地方不管中央如何决定，仍然是“原封不动”，“我行我素”，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产生这种不能贯彻执行精兵简政和把自己看成“例外”的原因，我们认为是一个认识问题，是由于对党中央所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意义认识不够。因此，为着彻底执行精兵简政，有重新阐明其重大意义之必要。

党中央为什么提出精兵简政呢？

第一，五年来敌后抗战的结果，使我各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域犬牙交错地存在着，敌寇依据着铁道、公路、据点，包围着我们，我则依靠广大的农村包围着敌人，形成彼此包围的相峙局面，进行着拉锯式的反复战争，抗战初期那种游击战争向敌后进军的蓬勃发展形势，已经是过去了。今后的问题，在于保持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难，熬过最后的艰难。谁能熬过这种严重的难关，胜利就是谁

的！在目前敌寇正进行着残酷扫荡与逐步地蚕食，根据地的缩小，人力财力的减退，是不免的。因此，我们必须紧缩自己，使自己能够适应于这种情况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下去。这种必要的紧缩，在目前是为着保持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同时也是准备将来的反攻。目前的紧缩正是为着将来的更大发展。

第二，敌后战争频繁，战线不固定，部队机关的流动性都很大，不仅庞大的机关为情况所不许，就是在军队中间如果非战斗人员多了，行动笨重也为战争环境所不容，所以必须紧缩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必须了解：我们机关和部队的组织，是为着执行一定的任务而规定的，不是为机关而机关，为部队而部队。如果在发展时一般是注意数量“搭架子”以便开展工作，那么，在紧缩时，就应该注重质量，贵精干而不贵繁多，如果情况变了，而我们仍然墨守成规，不愿有所改变，那就是地道的教条主义者！

第三，由于根据地在残酷战争中地区上的缩小，人力物力的困难增加，而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人民的财富又比较有限，所以在每个根据地内脱离生产的人数，只能有一定的比例，即使超过也不能过大，否则将会发生“塘小鱼大”的矛盾。敌寇对我基本根据地所采取的“三光政策”，其目的就在于摧毁我“生存条件”，是企图“竭泽而渔”的办法。紧缩正是针对着敌人这一毒辣政策而来的。

由于从对上述三个主要方面的认识出发，党中央很早以前就提出了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不能超过当地居民百分之三的决定，在提出精兵简政之后，又曾具体规定主力军应停止发展，而将今后军事建设的重心放在强化地方军与发展不脱离生产的民兵上面。这是一贯的方针，是切合敌后需要的方针，各根据地一定要彻底执行。

对着上述精兵简政的意义与党中央对于这一政策一贯的主张，

直到今天还不是各根据地的同志们都了解了的，因此，产生了对精兵简政执行不彻底的事实，同时在少数同志中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意见，片面的了解，也有碍于精兵简政的实行，必须加以解释：

有人说：虽然我的部队或机关今天有些“头重脚轻”、上层庞大下层不充实的现象，但是你应该看到将来呀！将来它是要发展的！

这种意见，我们认为是不对的。将来是将来的事，而我们确应该着重在解决今天的问题呵！今天的困难，如果不想法去克服，渡过这个难关，也就说不上将来。只知昂头天外，幻想着将来如何如何，而对于现在的具体情形熟视无睹，看不见摆在自己眼前的现实，这种“远视眼”的想法，是任何现实问题也不能解决的！

有人说：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问题很对，但我这里情况还不如你们所估计的那样严重，还可以过去，照旧维持吧，环境严重时再说，何必着急呢？

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因为近两年来敌后形势发展的趋势，已明白告诉我们，严重环境是一定要到来的，而且有的地区已经到来了。今天来说敌后的变化，已经不是什么一般估计问题，而早已是活生生的事实了！如果我们不警惕这种形势的变化，主动地采取适当的办法，那么事到临头，将措手不及！这种预见将来，定出对策，使自己时常处于主动，使革命力量少受损失，正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如果不加以主观地努力，听其自流，这种政治上的“近视眼”的看法，也是不对的。

有人认为：在敌我抗战中，我们应该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才好，哪能实行“精兵”呢！固然，在一定的时候兵是要多，兵多将广，才可以制服敌人，但所谓多，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能无限制的多。问题的关键是在于能否养活，物力财力是否足以维

持！如果不注意这一生存的起码问题，盲目地要多，那么兵少、兵不够自然不足以保卫根据地，但兵太多了，“坐吃山空”，其结果将使根据地的人力财力物力濒于枯竭，难于保卫！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精兵论”，而不是“多兵论”，“多兵论”是我们要反对的！

有人认为：根据地工作纷繁，要机关大，干部多，才能把事情办好，我们现在不是处处都觉得干部不够吗？怎样好再说要“简政”呢！是的，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工作部门，确实是还缺少应有的干部，这是需要加强的。但另一方面，不是一般地还存在着机关林立、系统纷繁、“人浮于事”的现象吗？所以简政的中心问题，是在于调整组织，调整干部，裁并机关，缩减冗员，以提高工作效能，增进解决问题的速度。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是“简政论”，而不是“繁政论”，“繁政论”是我们应当反对的！

上述这些看法，都带有片面性的老病，如果只是执其一端，不作全盘考虑，何尝不可以言之成理，娓娓动听，然而如果仔细去作一番全面的考虑，则很显然地，这些说法就都不妥当了。

只有精兵简政，才是根据全面考虑得出来的一个切合于敌后今天的实际状况，而又照顾到将来发展的政策，我们是马列主义者，一切必须从现实出发去解决问题，对于任何问题片面的看法都将不免会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对于精兵简政政策的执行，首先，就要求我们有清楚透彻的认识，足够地了解其意义。也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认真地、主动地、愉快地去彻底执行，才能真正执行得好。

精兵简政实为目前各根据地整个工作的中心一环，必须把这一任务的实现，贯彻到各方面的工作中去。举凡政权工作，军事工作，财政经济工作等等的进行，都应当在这一政策之下，加以新的

考虑，贯彻这一政策。同时精兵简政的实行又必须与爱惜民力，培养民力，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具体工作联系起来。

敌后是一种残酷的战争环境，形势的变化是很快的，常常是带有突然性的，如果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能预见到发展的趋势，“当机立断”，主动地变化我们的政策，那么，一旦恶劣的形势到来，就会发生“措手不及”，甚至遭受到意外的损失！

最后，必须再重复地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政策，是为着克服目前困难，争取将来更大发展的正确政策，是既照顾到现在又照顾到将来的政策，是积极的政策而不是消极的政策！要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是定了的，将来的发展也是定了的，在由现在到反攻这一段艰苦路程中，把我们的队伍整顿得整齐些，锻炼得更精干些，则胜利与发展就会更有保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2年8月29日）

财政比例，要保证军事第一，党、政、军按比例支钱，根据人数、工作、生产能力三个条件确定财政比例。精兵简政，除包括精简、效能、统一外，加上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两项。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到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中央和军委共有二万四千余人，应减为五六千人。中央工作的原则是指导工作和教育干部。西北局高干会十月开会，讨论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解放日报》今年四月改版后是有进步的，要执行党的日常政策。《解放日报》社论及广播消息，是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发表的文章也有很大的影响。今后日常政策问题报社应请示中央。要使《解放日报》成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由秦邦宪、陆定一[2]起草一个党报工作条例。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陆定一，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8月29日）

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电贺英《工人日报》复刊

（1942年8月31日）

英国工人日报：

我们热烈庆贺工人日报的启封，并坚信复刊后的工人日报将继续是团结动员英国一切力量，战胜纳粹主义的号角。工人日报的复刊，不仅是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且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有力因素。

我们庆祝你们的成功和日益接近的反法西斯事业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和漫画家的谈话[1]

（1942年8月）

有一幅画，叫《一九三九植的树》。那是延安的植树吗？我看是清凉山的植树[2]。

延安植的树许多地方是长得好的，也有长得不好的。你这幅画，把延安的植树都说成是不好的，这就把局部的东西画成全局的东西，个别的东西画成全体的东西了。

漫画是不是也可以画对比画呢？比方植树，一幅画画长得好的，欣欣向荣的，叫人学的；另一幅画画长得不好的，树枝被啃光了，或者甚至枯死了，叫人不要做的。把两幅画画在一起，或者是左右，或者是上下。这样画，是不是使你们画家为难呢？

在鲁艺内部可以画，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更尖锐些。如果要发表在边区报上，那要慎重，因为从整个边区来看，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是好的。如果发表在全国性报上，那就更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

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

---

[1] 1942年8月，毛泽东通过舒群邀请华君武、蔡若虹和张谔三人到枣园谈话。这是毛泽东和四人谈话的一部分。

[2] 这幅画画的是在延河旁荒地上，有一棵1939年植的树，树枝还被马啃光了。清凉山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意思是说不是劳动人民植的树。

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

接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谨、郭卫生和周励武时的谈话[1]

（1942年9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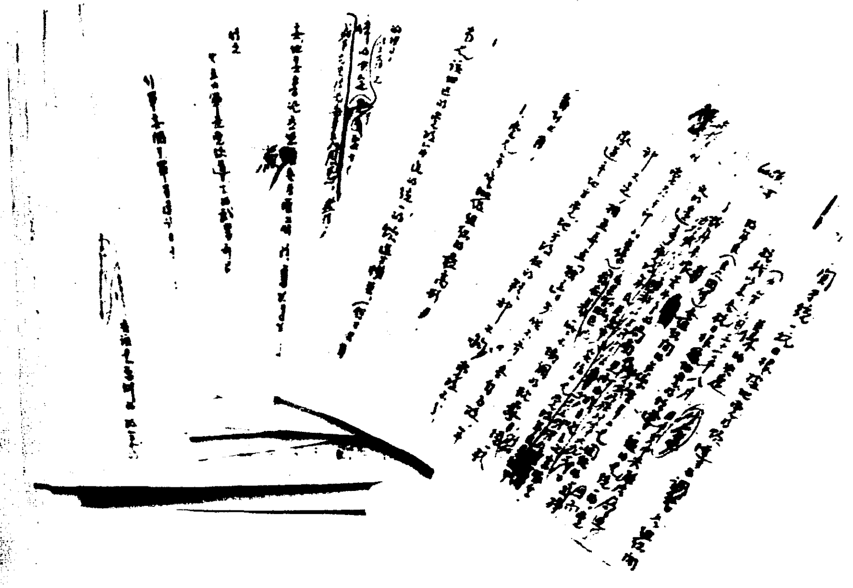
（一）彼方释放叶挺，我方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我方决不推翻国民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彼方承认我方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即何应钦）停止反共，我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若再反共，我必再反何。

---

[1] 这是毛泽东接见国民党驻延安联络参谋陈宏谨、郭卫生和周励武时谈话的一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1]

（1942年9月1日）



为克服困难，坚持敌后艰苦抗战，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图为毛泽东起草并修改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的手稿。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个决定。

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党政军民（民众团体）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然而由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由于对某些政治观点与组织关系还缺乏明确的了解与恰当的解决，党政军民关系中（实际上是军政军民系统中党员干部的关系），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例如：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这些不协调的现象，妨害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与建设，妨害我党进一步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据地的建设与民主制度的实行，要求每个根据地的领导一元化。加以日寇“扫荡”的残酷、封锁线与据点增强，上下级联系很困难，抗战的地区性与游击性的增大，要求各系统上下级隶属关系更加灵活，每一地区（军区、分区）活动的独立性以及活动各方面的领导统一性更加扩大与增强，要求各地区的各种组织更加密切的配合，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为此目的，中央特作如下之决定：

（一）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委会、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区党政军委员会（党政军委员会的设立，在根据地创立时期是必要的正确的）。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

(但不是联席会议)，因此它的成分，必须包括党委、政府、军队中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党委之常委亦应包括党务、政府及军队三方面的负责干部)，而不应全部或绝大多数委员都是党务工作者。各级党委的工作应该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不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

（二）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的系统与上下级隶属关系仍旧存在。上级政府的决定、命令、法令，上级军事领导的命令、训令，上级民众团体的决定（以上文件之重要者必须经过各该机关党员负责人交同级党委批准，或事先商得党委负责人同意，然后颁发，但不是一切都要批准)，不仅下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必须无条件执行，下级党委也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假借无上级党委指示而违抗或搁置。下级党委对上级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之决定如有不同意见，可报告上级党委。在遵照各组织上级的决议解决具体问题而党委内部发生争论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解决之。政府、军队、民众团体负责人即使不同意多数意见，亦必须执行同级党委之决定，但可将自己的意见报告上级有关机关。

（三）中央局与中央分局为中央代表机关，由中央指定之。区党委、地委，由军队与地方的党组织的统一的代表大会选出，经上级批准之。区党委、地委，应包含地方党的组织，军队党的干部与政府党团的负责人，主力军是否参加县委，由各地按具体情况决定，县委（无主力军参加之县委）及区委，只包括地方党、地方军及政府的党的负责人。各级党委书记，应选择能掌握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的同志担任之。因此，党委书记不仅须懂得党务，还必须懂得战

争和政权工作。区党委书记人选，由中央局分局议定，经中央批准之。地委书记人选，由区党委议定，经分局中央局批准之。为统一地方党与军队党的领导，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兼任军区、分区（师或旅）政委，另设副书记，管理党务工作。如军区、分区政委被选为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则可设副政委，专管军队工作。分局、区党委、地委书记应照顾各方面工作，除兼政委外，再不宜兼任其他具体工作。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党委书记不必兼政委或政委不必兼党委书记时，须得上级党委或中央批准，军队中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成为同级党委（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的一个部门，与其他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平等权利和义务，不隶属其他部门或委员会，但与其他委员会和其他部门不同，仍保持其上下级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军事政策（如扩兵建军原则、政治工作等等）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如反扫荡的战略战役计划及总结等），须交党委会讨论，但具体军事行动由司令员政治委员（即党委书记）决定之（司令员与政委对军事行动之最后决定权依照政治工作条例），无限制的民主讨论只会引导军事的失败。军队主要人员的任免，仍须经过军事机关依照已定规则进行之。

（四）主力军是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是建设根据地与支持斗争的有力柱石。主力军应以巩固和坚持各所在根据地为其第一等任务。主力军固有全国性，但同时具有地方性。过去有些根据地领导不统一，主要的是由于该地主力军某些领导同志对于该根据地之建立与坚持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而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如军事建设中之地方武装问题、扩兵问题，财政经济政策问题中之统筹统支等）只注意了主力军，而忽视了根据地整个工作的配合，因而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发生争执。同时有些地区，党政领导机关对于一

切服从战争的认识不深刻，对主力军之人员补充，粮食及物质保证，优抗及反逃亡斗争，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因而使军队与地方党政间的关系不协调。今后为了实现根据地领导一元化，除实现以党委为各地统一的党的领导机关外，还必须纠正某些地方主力军，某些地方党政机关领导人思想上政治上的一些错误，实现中央关于根据地的各种政策。实行军委关于军事建设的几号指示。今后主力军必须执行各级党委的决议、决定与各级政府的法令。主力军对于驻扎所在地的下级党委与下级政府（如县、区、乡）的决定，亦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处，可报告上级党委与上级政府。并应当经常的彼此联系，彼此帮助。主力军的军事措施如军事行动，布置及戒严令等等，地方党政民机关必须遵照执行。主力军应当负有保护党政民机关的责任，凡因军队之疏忽与漠不关心，因而使军政民机关受到不应有的损失时，军队负责人应当受到处分。今后，如有争执，首先应当就地协同解决，并将争论及解决经过报告上级，反对各个组织只是向上告状，而不在本地当面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政权系统（参议会及政府）是权力机关，他们的法令带有强制的性质。军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不遵守党委决定，违反党纪的行为，都必须纠正。为了实行三三制，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下级党委无权改变或不执行上级参议会及政府的决定与法令，党的机关与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应进行政治工作以提高参议会及政府的威信，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参议会及政府法令时，党的组织应给予严厉的处分。党对参议会及政府工作的领导，只能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党委及党的

机关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党团必须服从同级党委，但党团的工作作风必须刷新，不是强制党外人士服从，而是经过自己的说服与政治工作。在党团万一没有说服参议会及政府的大多数因而党团意见未被参议会及政府通过时，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不得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假如党团同志因为自己的意见与同级党委有分歧因而不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这是党团同志违反党纪的行为，应该受到指斥与处分。党必须派遣得力的干部到参议会及政府中工作，一切忽视政权工作，把干部堆在党的机关中的现象，必须纠正。在实行三三制时，党员在政权系统中的数量减少，但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质量必须大大提高，在政权系统中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服从党委与党团的决议、决定与纪律，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自由行动。在这里，应特别提出，党对三三制政权之领导的实现，有赖于政权系统中党员干部之言论行动的一致及其对党的决定的绝对服从，所以严整政权系统中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党纪是有严重意义的。党委在调动政权系统中的党员时要慎重，还必须经过党员实行向政权机关辞职的手续。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必须改善；军队中应进行拥护政府的教育；政府应保证军队的给养与运输；军队的首长应被选为政府委员及参议员。军队应成为尊重政权执行法令的模范，军人的违法行为，军事机关必须严格处分。军人除以公民及政府委员、参议员资格对参议会及政府发表意见外，一切军事机关无权干涉参议会及政府内部工作。但军队政治机关，必须尽可能的帮助政府工作。

（六）民众团体是民众自己的自愿组织的团体，党、政府、军队不应直接干涉民众团体内部的生活，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及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青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

民众团体的各级委员会须尽可能有半数以上的非党员。民众团体中的党团问题与政府中党团同。政府应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给民众团体以必要的帮助，要求民众团体执行政府的法令。民众团体应依法向政府请求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如民众团体违反政府法令时，政府可加以处分，甚至解散，此外一律不干涉民众团体的生活与工作。民众团体应号召民众，拥护政府和军队，帮助抗战动员工作。但民众团体并非政权机关，不得代替政府行政及对人民执行逮捕、审讯、判决等事宜。军队与民众团体应相互帮助，但不应相互干涉。

（七）在游击区，因为它的特殊性，领导的一元化不仅是在相互关系上应有所确定，而且在党政军民的机构上在必要时亦须一元化。党委、政府、民众团体的机关，可与军队指挥机关政治机关合并。党政民干部在军队或游击队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如正副军事指挥员、政委及政治部各种工作），战时参加军队与游击队工作，战斗空隙时则仍执行其原来的党政民的职务（如党委书记、县长、工会主席）。

（八）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在实行政策及制度时，必须依照中央的指示。在决定含有全国全党全军普遍性的新问题时，必须请示中央，不得标新立异，自作决定，危害全党领导的统一（凡带地方性质的不违反上级及中央决定的不在此例）。下级党政军民组织对上级及中央之决议、决定、命令、指示，不坚决执行，阳奉阴违，或在解决新的原则问题及按其性质不应独断的问题时，不向上级和中央

请示，都是党性不纯与破坏统一的表现。

在这里，应当再一次的提醒各根据地党政军民领导同志的注意，各级党委及政府军队民众团体中的党员负责同志，不得中央许可，不得发表带有全国意义和全党全军意义的宣言、谈话及广播，各级领导同志的文章应经过同级党委或党团适当人员的审阅。分局委员以上、师以上负责人的文章，凡带有全国及全党意义的，应事先将主要内容报告或电告中央。各地不应再直接对外广播，应统一于延安新华社。应当深刻认识，一个党的负责高级干部，不经过同级或上级一定组织的同意，而擅自发表政见，是何等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何等妨碍党的统一的恶劣行为！

（九）为统一根据地的领导，为改进党政军民关系，必须在党政军民各系统党员干部中进行思想教育，整顿三风，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遗毒。在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央决定与毛泽东同志报告，教育干部识大体，顾全局，号召干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干部懂得全局，不陷于局部和本位的偏向，而懂得全体与局部、上级与下级，这一局部与那一局部间的正确关系。要加强党政军民各组织中的教育工作，使全体同志认识领导一元化及根据地革命秩序与革命法令的重要性。在这里，应特别警惕军队干部，党政军民关系不协调，在一般情况之下，军队干部应负担较大的责任，军队手中有枪，容易独断独行，轻视党政，不守纪律。自由行动，破坏群众利益。因此，军队中军政干部必须特别约束部下，检点自己。必须号召自己的部下，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政府，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与政府的法令，同时，又应纠正某些党员和干部中不合事实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党委及党的机关中工作才叫党的工作，其实一切党员和党的干部不管其执行的是政府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经济工

作、技术工作、文化工作等等，都是党的工作，在党的机关的工作，只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务工作）。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某些党员空喊或曲解服从党的领导，而对于党的路线、政策、决议、决定、指示与纪律，则不认真研究，不认真执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十）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的进行反对日寇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要在全党中说明，假若军队削弱，假若战争失败，则根据地无法存在，党政军民都会塌台，因此，党委、政府、民众团体以及全体人民，都有巩固军队，加强其战斗力的义务。军队的人员补充，粮食、服装、弹药的供给与运输，营舍的让予，伤病残废人员的输送、看护与保养，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等等，党委及政府、民众团体，应有随时加以解决的责任，一切漠不关心的现象，都是极端错误的有害的。在军队本身，则都深深了解，没有党、政府、民众团体的配合，光杆军队是一天也不能支持抗战的。因此，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教育，做到能爱惜根据地，爱惜人力物力，尊重党政，加强军纪，给党政民以必要的帮助。军队的人员物资补充、运输、优抗等等，必须依照政府的法令、规章去做，乱来一顿，只会损害抗战，于军队本身是不利的。

（十一）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决定的原则，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制定与此有关的各种细则，以政府法令、军队条例，党团规则、民众团体章程等等方式规定之，以解决统一领导的许多具体问题。制定后须报告中央。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9月3日）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

[1] 这是毛泽东为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

（1942年9月7日）

自从党中央提出精兵简政这个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的党，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做出了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的同志们因为认识不够，没有认真地进行。这些地方的同志们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关于这件事，《解放日报》曾多次讨论，今愿更有所说明。

党的一切政策，都是为着战胜日寇。而第五年以后的抗战形势，实处于争取胜利的最后阶段。这个阶段，不但和抗日的第一第二年不相同，也和抗日的第三第四年不相同。抗日的第五第六年，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接近着胜利，但又有极端的困难，也就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情况。这种情况，整个反法西斯各国在目前阶段上都是有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的，不独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根据地为然，但是尤以我军的各个根据地表现得特别尖锐。我们要争取两年打败日寇。这两年将是极端困难的两年，它同抗日的开头两年和中间两年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特点，革命政党和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事先看到。如果他们不能事先看到，那他们就只会跟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着时间迁流，虽然也在努力工作，却不能取得胜利，反而有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的危险。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党中央指出了这个困难，叫我们提起注意绕过这个暗礁。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懂得了，但是还有若干同志不懂得，这就是必须首先克服的障碍。抗战要有一个团结，在团结中有各种的困难。这个困难是政治上的困难，过去有，今后还可能有。五年以来，我党用了极大的力量逐步地克服着这个困难，我们的口号是增强团结，今后还要增强它。但是还有一个困难，就是物质方面的困难。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何以是克服物质困难的一个重要的政策呢？很显然，目前的尤其是今后的根据地的战争情况，不容许我们停留在过去的观点上。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

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庞大的机构是由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想不到又要由自己的手将它缩小，实行缩小时就感到很勉强，很困难。敌人以庞大的机构向我们压迫，难道我们还可以缩小吗？实行缩小就感到兵少不足以应敌。这些就是所谓为现状和习惯所束缚。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服，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1]。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

[1] 铁扇公主又名罗刹。孙行者变为小虫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参见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59回。

关于国共合作中我之斗争方针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

（1942年9月8日）

十九日电昨日阅悉，又接五日电，兹复于下：

（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不确定时间。如张文白愿来延则先欢迎他来延一叙，如此较妥。

（二）我们与民主政团及地方军人的合作，应服从于国共合作，国共合作是第一位的，决定性质的，其他合作是第二位的，次要性质的，如果二者发生矛盾，应使第二位服从第一位，这是基本原则，必须坚持。

（三）目前似已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并请注意。

（四）我西安办事处已于三日接办公厅通知，四日接三十四集团军通知邀林彪前往，现正交涉飞机，准备日内动身。

毛泽东

纪念体育节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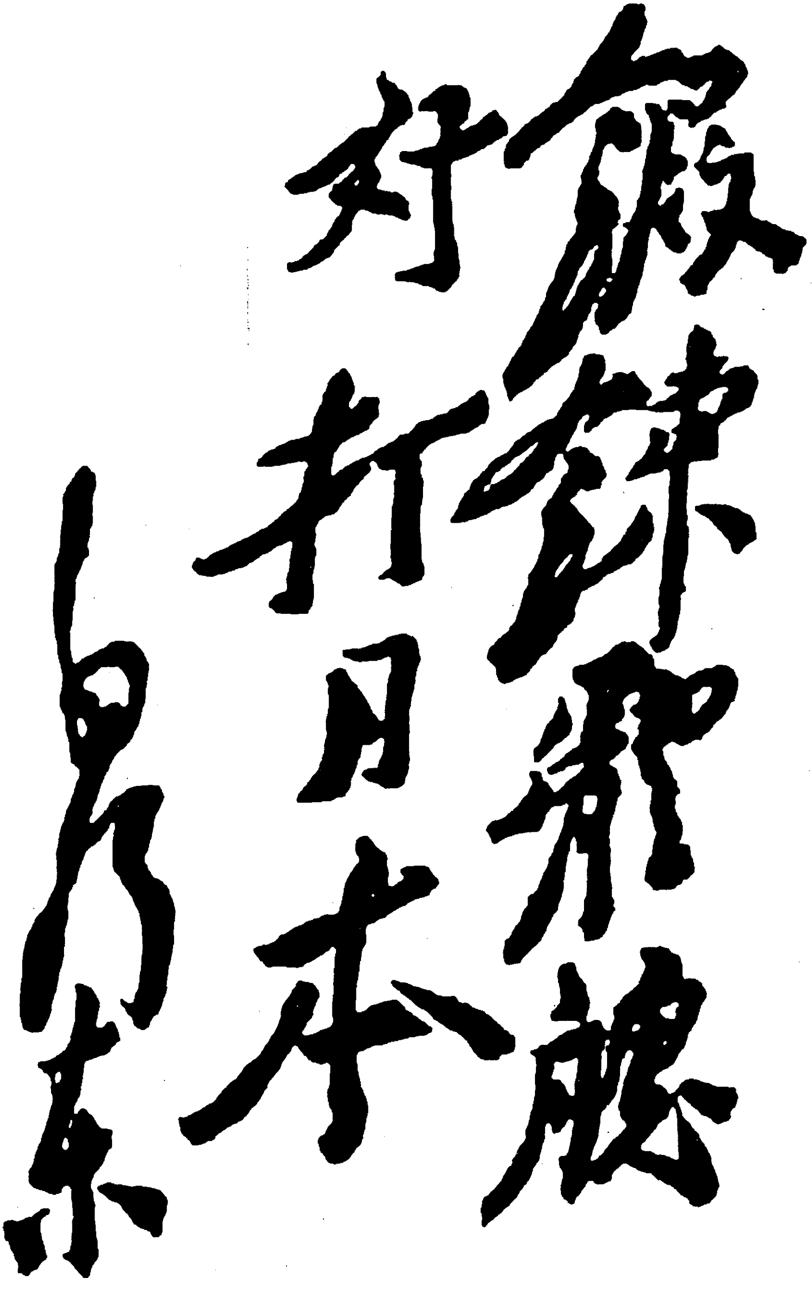
（1942年9月9日）

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毛泽东

---

[1] 1942年9月1日至6日，为纪念体育节，延安举行“九一扩大运动会”，这是毛泽东为体育节所写的题词，题词时间不详，发表于1942年9月9日的《新华日报》，这里采用其发表的时间。



锻炼身体

好打日本

毛泽东

毛泽东为纪念体育节的题词。

给谢觉哉[1]的信

（1942年9月15日）

谢老：

六日函悉。死者[2]已矣，生者务宜注意。关于你及林老[3]的工作及生活，亟宜有所调节，务不过劳，文章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罗迈[4]到政府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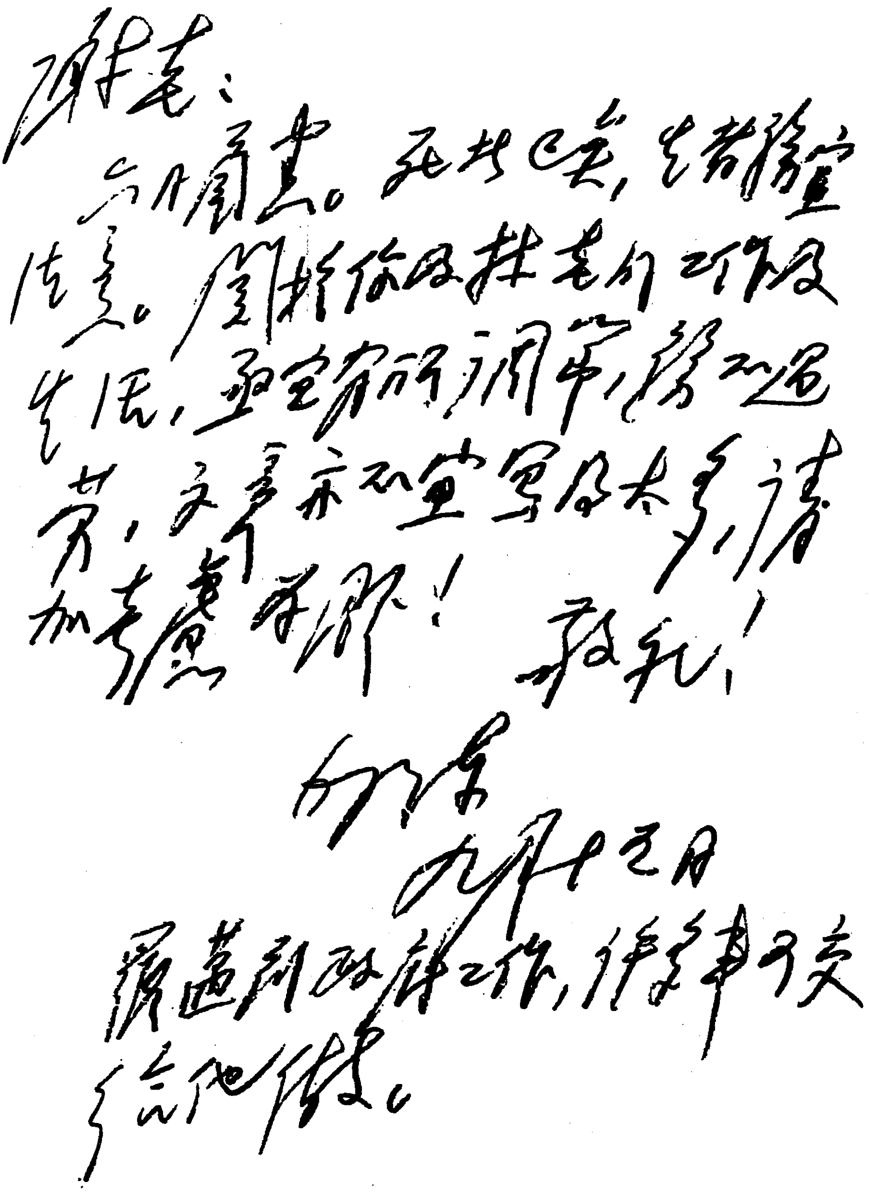
---

[1] 谢觉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王凌波。他是谢觉哉的同乡和好友，生前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

[3] 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4] 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2年9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谢老：

六月间书悉。死者已矣，生者务宜达观。闻知你及林老们工作很紧张，望宜有所调节，劳逸适当，文字亦不宜写得太多，请加考虑为盼！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罗迈到政府工作，许多事可交给他做。

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手稿。

关于报纸和翻译工作问题给凯丰[1]的信

（1942年9月15日）

凯丰同志：

今日与博古[2]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3]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4]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

---

[1] 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2]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3] 舒群（1913—1989），黑龙江哈尔滨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

[4] 亮平，即吴亮平（1908—1986），浙江奉化人。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曾在延安编辑《解放》周刊。

学个唐三藏[1]及鲁迅[2]，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3]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指导。

解放[4]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5]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6]，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

[1] 唐三藏，即玄奘（约600—664），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唐代高僧，佛经翻译家。曾主持翻译经、论70余部，共1300多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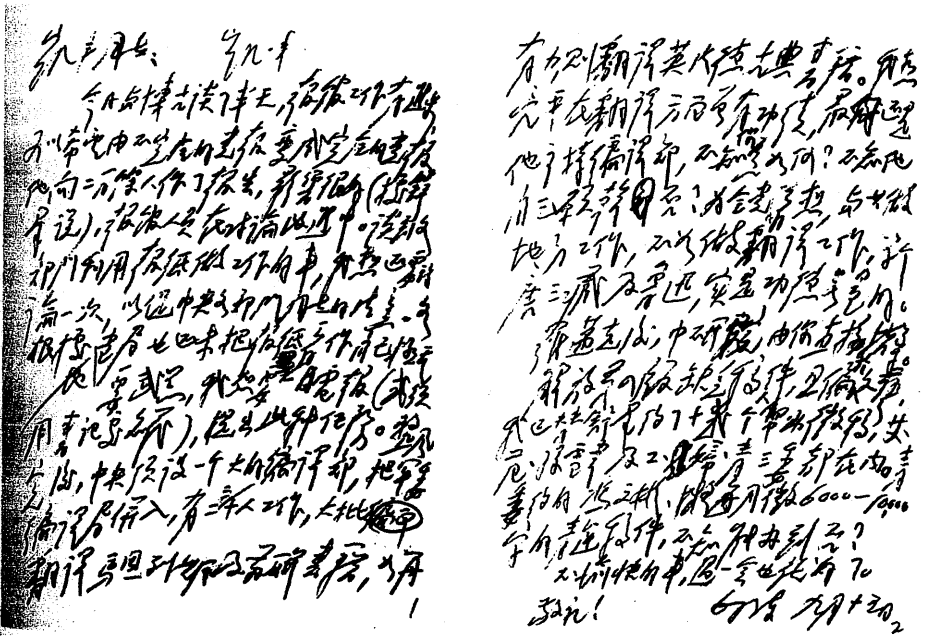
[2] 鲁迅，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多种，编为《鲁迅译文集》，共10卷。

[3] 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1年7月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1942年9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4] 指《解放日报》。

[5] 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范，指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孙雪苇，又名刘雪苇。1912年生，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

[6] 冯文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毛泽东致凯丰信的手稿。

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

（1942年9月15日）

先念同志：

目前是极力争取国共[1]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取得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你们在这次行动以后，望极力避免打磨擦仗，并设法与周围国军取得和解为要。

毛泽东

十五日

---

[1] 手稿如此，疑漏写“关系”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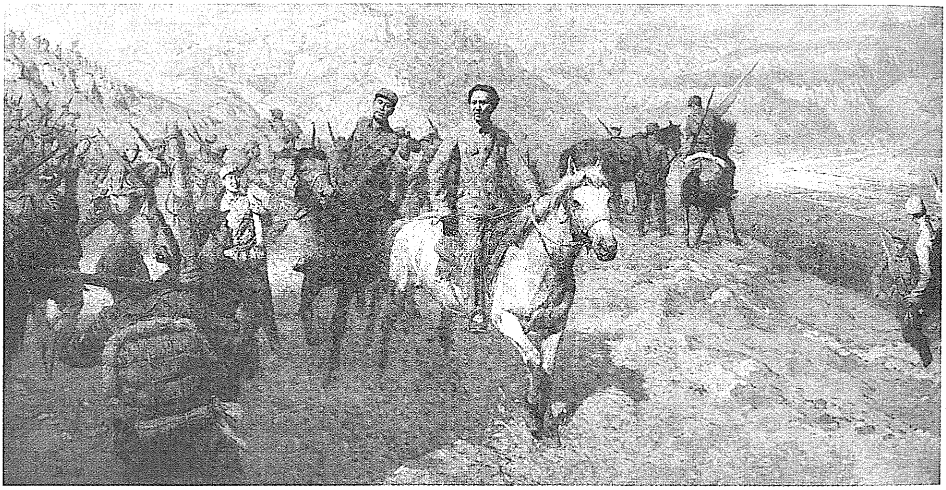
给周恩来的指示[1]

（1942年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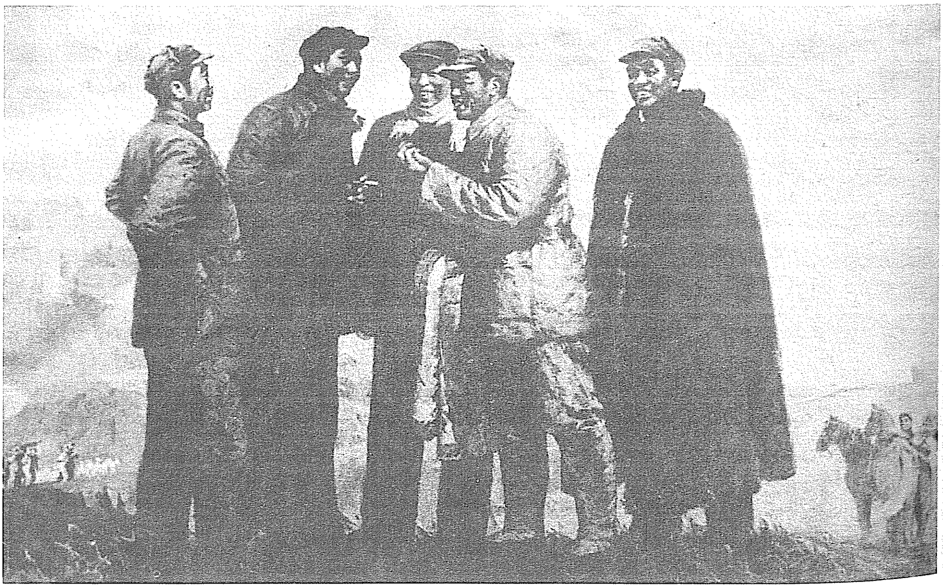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蒋介石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关系好转，至于今天，国共两党间即没有大的冲突。我们目前任务，是促成两党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听说蒋介石已回重庆，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要求赴重庆，以期打开谈判门路。

---

[1] 14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说，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是国共合作为主，地[illegible]实力与小党派为辅。但在武汉时期，太重视国共合作，甚至幻想有些成[illegible]，以致完全冷落了各小党派及地方势力，且为国民党所吓住，反令其易于操纵，这不能不是一个教训。重庆时期，在毛泽东确定的斗争三原则和革命的[illegible]面政策指导下，国内外统战工作都得到了新的发展。这是15日毛泽东给周[illegible]来的指示。



《抗战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油画）



《战争年代》（油画）

报刊宣传服务于党的当前政策[1]

（1942年9月15日）

陈毅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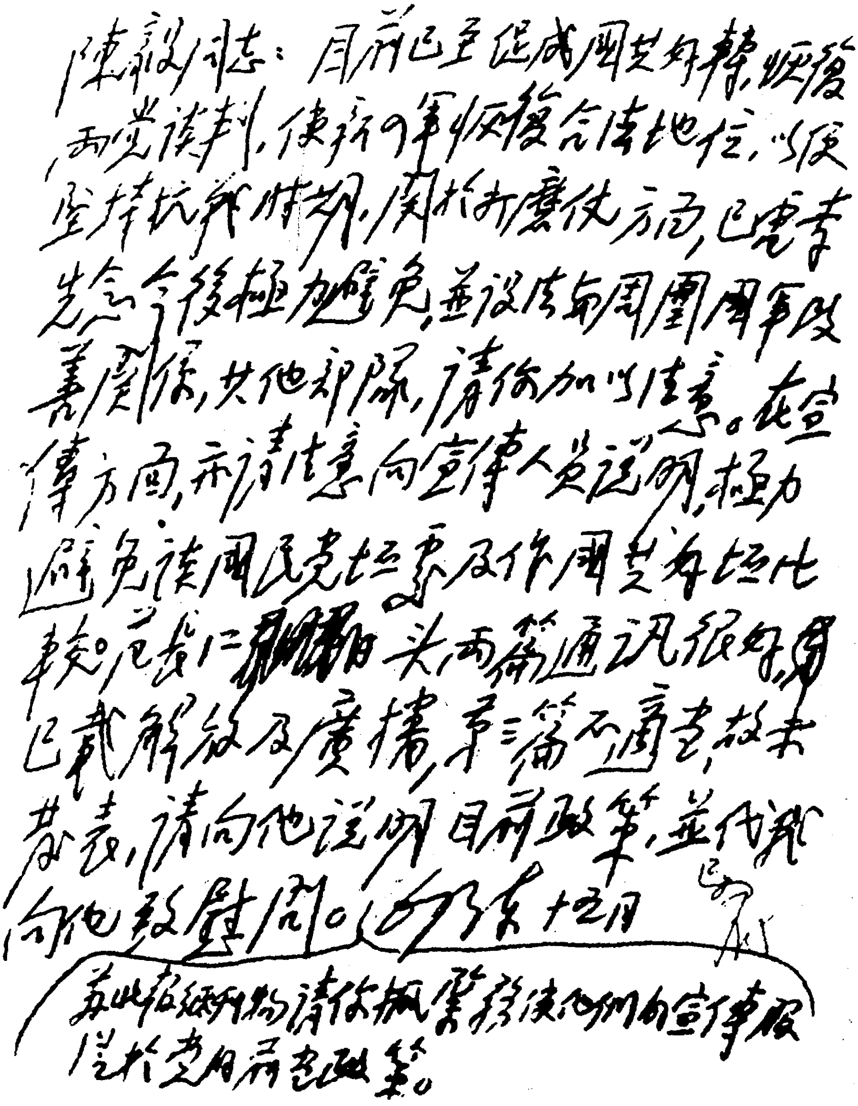
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他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毛泽东

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陈毅的电报。



陳毅同志：目前已至促成國共兩黨接近，恢復兩黨談判，使我們軍恢復合法地位，以便堅持抗戰時期。關於打磨仗方面，已電李先念今後極力避免，並設法向周圍國軍改善關係，其他部隊，請你加以注意。在宣傳方面，亦請注意向宣傳人員說明，極力避免談國民黨壞事及作國共兩黨比較。已看仁[redacted]白頭兩篇通訊很好，[illegible]已載解放及廣播，第三篇不適宜，故未發表，請向他說明目前政策，並代我向他致慰問。毛澤東 十七日

已[illegible]

並此後級刊物請你嚴督促使他們的宣傳服從於黨目前總政策。

毛泽东致陈毅电的手稿。

致朱瑞电[1]

（1942年9月15日）

目前已至恢复国共谈判时期，山东方面凡可避免的国共磨擦，均须避免。一切报纸刊物宣传，分局均须抓紧，使不违背党的政策。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瑞电的主要内容。

复张闻天电[1]

（1942年9月15日）

考察敌我斗争情况时，如有可能请择敌军一个具体部分，例如一个大队，加以详细调查（编成、装备、作战及政治工作等）。如有时间还望择我军一个营加以具体调查。这样使调查不致偏于农村。关于商业不知有调查否？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复张闻天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1]

（1942年9月15日）

为贯彻精兵简政，为统一军事指挥，着令将联防军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除指挥晋西北部队外，直接指挥陕甘宁边区各部队，但留守处及留守兵团司令部名义保留，联防司令部名义对外一律免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高岗为副政治委员（在关向应患病期中代理政治委员），张经武为参谋长。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发布的关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及干部任命的命令的主要内容。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1]

（1942年9月20日）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2]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

[1] 这个征稿办法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拟订的。

[2] 荒煤，即陈荒煤。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吴老[1]：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

[1] 吴老，指吴玉章。

致刘少奇电[1]

（1942年9月21日）

安抵一二九师无限欣慰，望休息短期然后来延，并对华北工作加以考察。关于最近时局情况我有电至总部，可索阅。来延路上安全保障，请商刘、邓作周密布置。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给续范亭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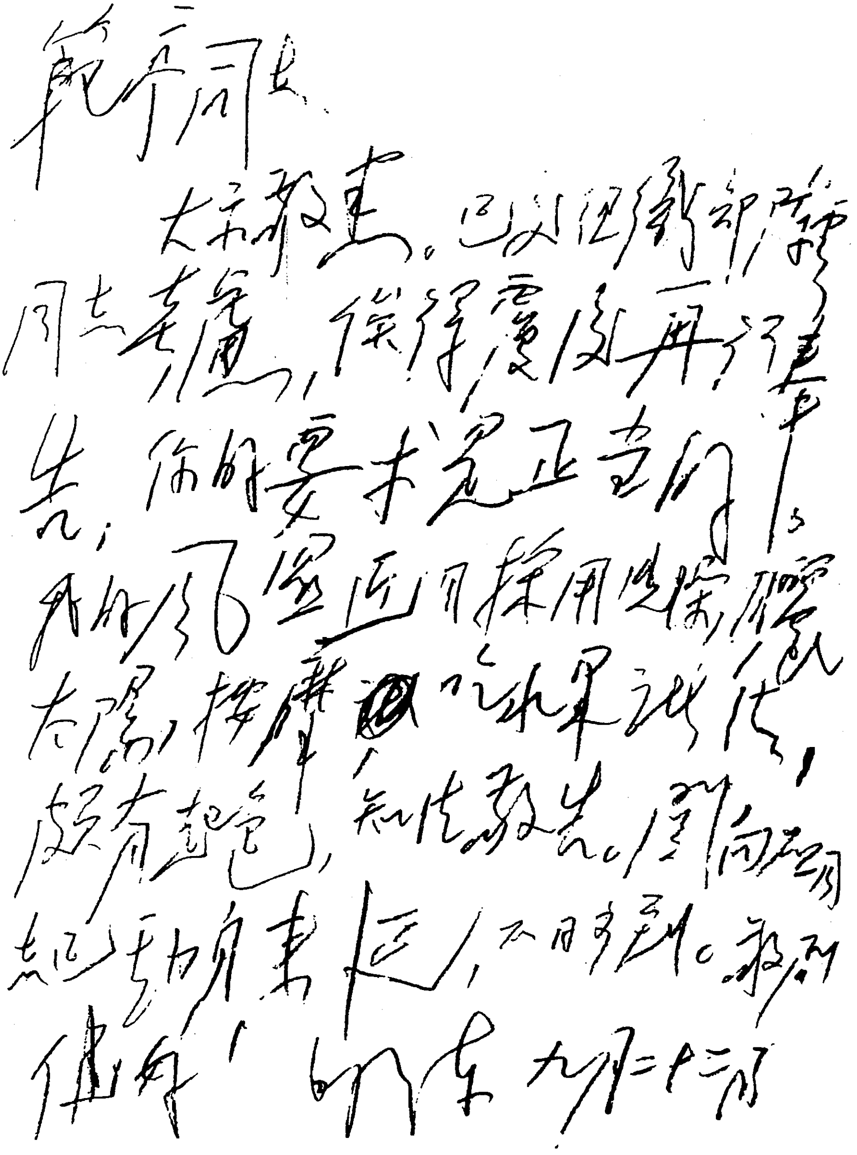
（1942年9月22日）

范亭同志：

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复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敬问健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范亭同志：

大示敬悉。已以[illegible]衛部傅同志来看，俟得覆後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们[illegible]医所可採用之[illegible]，太陽、按摩、[illegible]如果[illegible]，[illegible]有起色，[illegible]。[illegible]不时[illegible]。敬祝

健康！

毛澤東 九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手稿。

在“枣园之宴”上的讲话[1]

（1942年9月）

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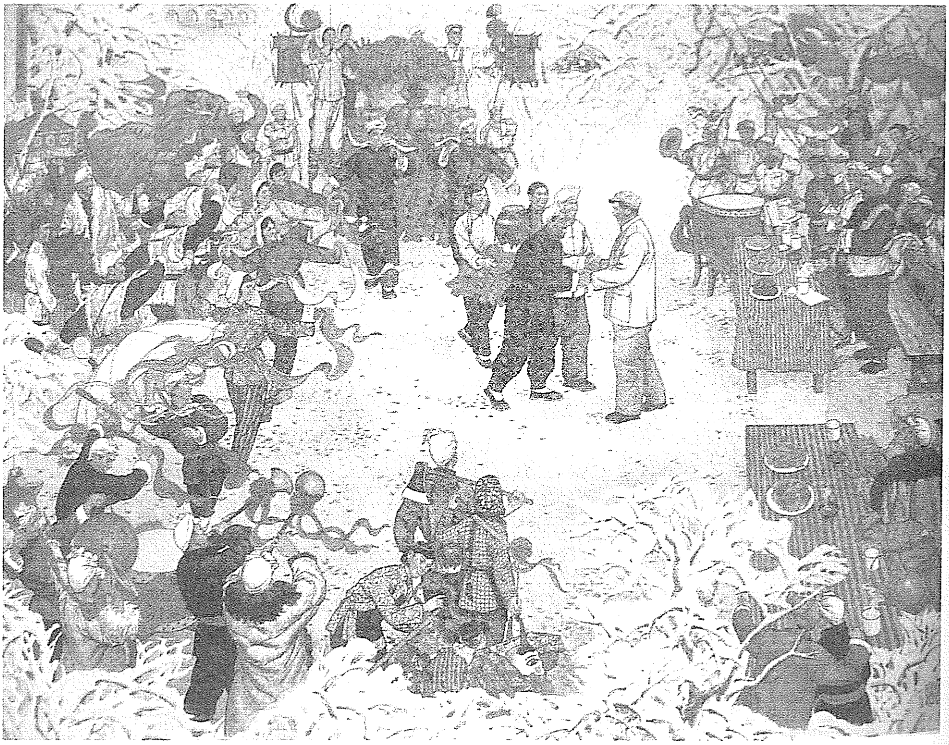
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老柯[2]，你带个剧团，常年在外，奔波他乡，辛苦了。喝吧，这是慰劳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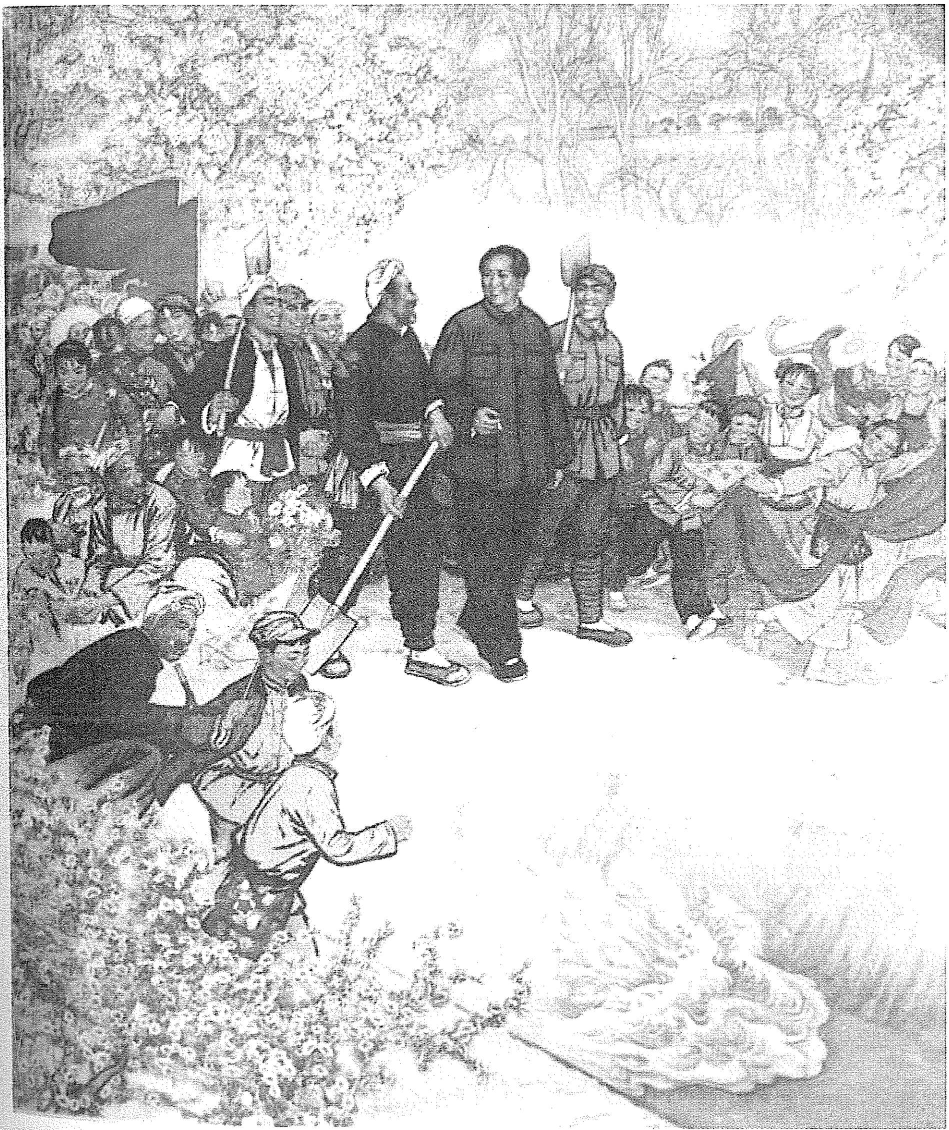
---

[1] 毛泽东为办好《解放日报》的副刊，于1942年9月下旬，特地邀请了范文澜、柯仲平、邓发等十多位学者，参加“枣园之宴”。这是毛泽东在宴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老柯，即柯仲平（1902—1964），原名柯维翰，云南宝宁（今南广）人。1942年9月15日被毛泽东亲自提名为《解放日报》第四版特邀撰稿人。



《枣园里来了秧歌队》（中国画）



《幸福渠》（中国画）

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1]

（1942年9月、10月）

一　务使报刊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

目前已至促成国共好转，恢复两党谈判，使新四军恢复合法地位，以便坚持抗战时期。关于打磨〔擦〕仗方面，已电李先念今后极力避免，并设法与周围国军改善关系。其他部队，请你加以注意。在宣传方面，亦请注意向宣传人员说明，极力避免谈国民党坏处及作国共好坏比较。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2]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苏北报纸刊物请你抓紧，务使它们的宣传服从于党的当前政策。

（九月十五日）

---

[1]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给陈毅的电报；第二部分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第三部分是毛泽东给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林枫的电报。

[2] 指延安《解放日报》。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

二　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倾向

最近一个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十月二十八日）

三　经常注意掌握新闻政策和社论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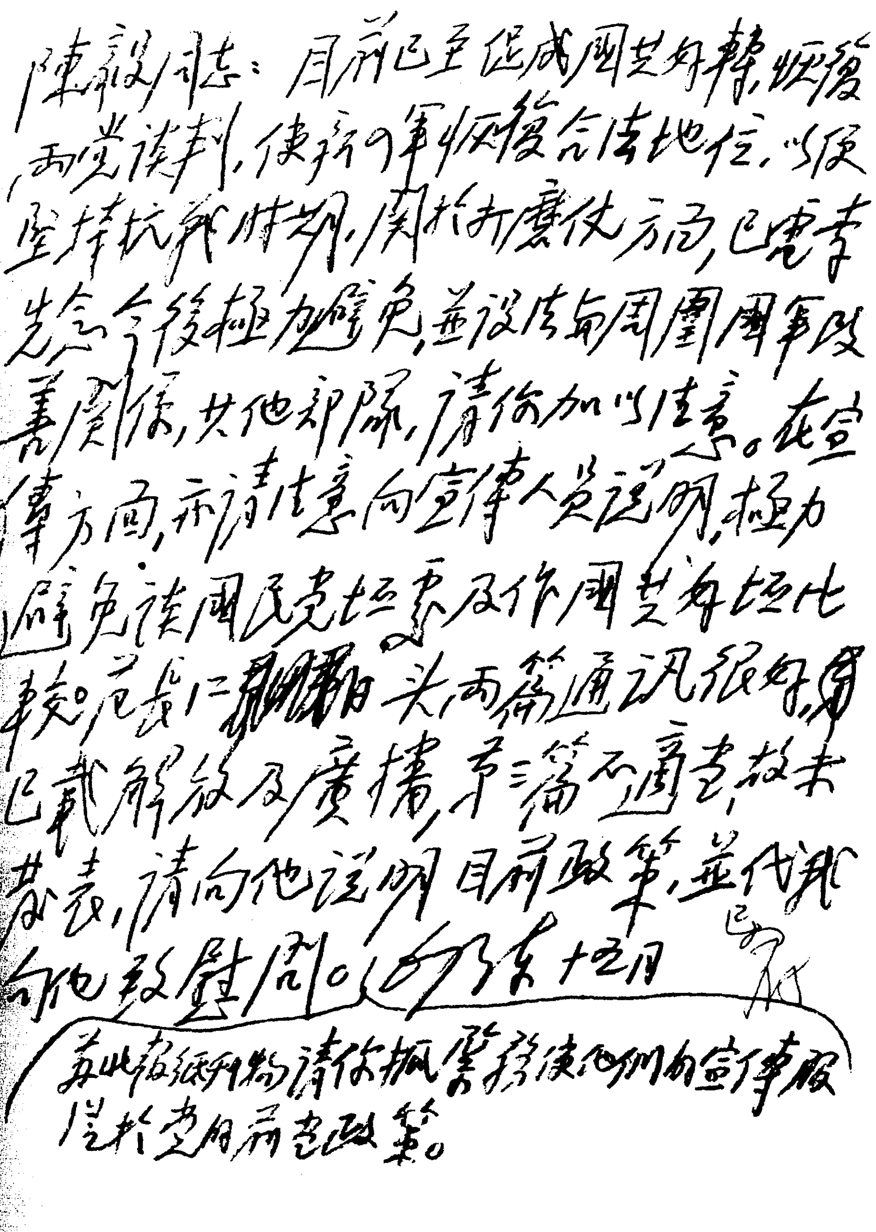
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十八日将邓宝珊[1]对新军[2]五周年纪念贺电播来延安。除令延安总社不要发表外，请你对晋西北分社及《晋西日报》加以指导。此类电报只能口传，不能发表，以免影响邓宝珊之地位。此外，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十月二十八日）

---

[1]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所部驻陕西榆林。

[2] 新军，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



陳毅同志：目前已至促成國共好轉，恢復兩黨談判，使我軍恢復合法地位，以便堅持抗戰時期。關於打磨擦仗方面，已電李先念今後極力避免，並設法向周圍國軍改善關係，其他部隊，請你加以注意。在宣傳方面，亦請注意向宣傳人員說明，極力避免說國民黨壞事及作國共好壞比較之長文。[illegible]頭兩篇通訊很好，但已載解放及廣播，第三篇不適當，故未發表，請向他說明目前政策，並代我向他致慰問。毛澤東 十三日

要此報紙刊物請你抓緊務使他們的宣傳服從於黨目前總政策。

毛泽东致陈毅电的手稿。

复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1]

（1942年10月6日）

在顽军继续进攻时应坚决打击之，以求生存，在获得胜利后应表示愿与他们恢复和平，以求好转，望本此原则实施。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电的主要内容。任质斌，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代政治委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代理书记。

延安观察家评斯大林谈话[1]*

（1942年10月8日）

一

斯大林此项谈话，其意义甚为巨大，不仅足以坚定同盟国人士胜利的信念，且对于同盟国的团结与战胜法西斯的伟大事业极有裨益。

二

开辟真正的第二条战线，就等于宣布希特勒的死刑，这是同盟国义不容辞的义务，而且比起物资援苏来说是更加重要的第一等的义务。以时机而言，现在正是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最好时机，此种时机如果错过，或者将是同盟国战略上的最重大的失着。同盟国及时开辟第二战场，乃是胜利的关键。

---

[1] 本篇一是对斯大林4日对美国记者谈话的评价；本篇二是论及第二条战线问题时的谈话。

为《论党内斗争》起草的按语[1]

（1942年10月9日）

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讲演，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时期。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

[1] 《论党内斗争》一文是刘少奇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演讲。发表在1942年10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编者起草的按语。

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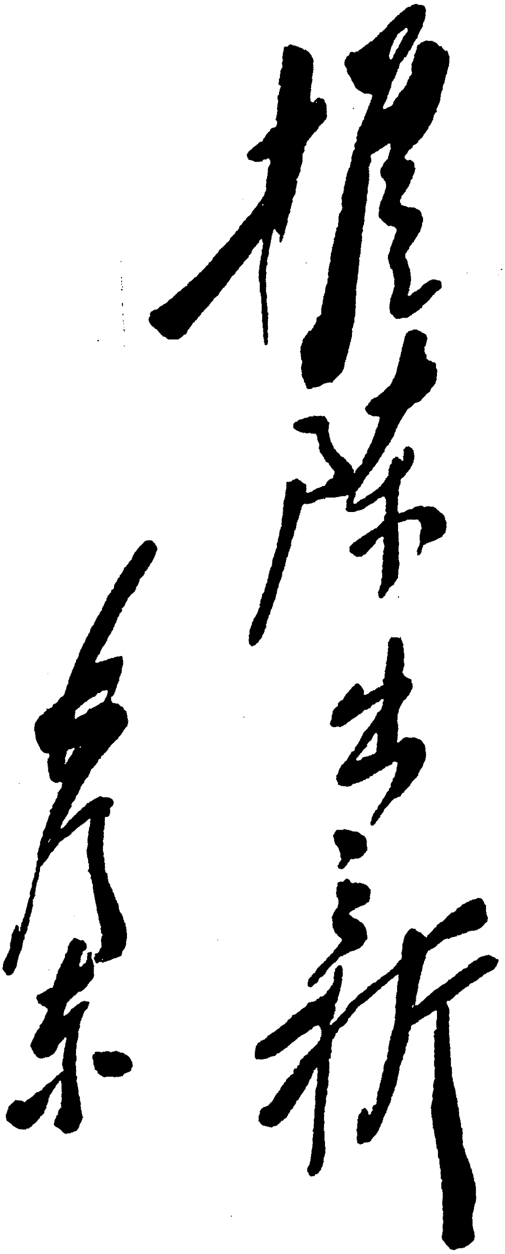
（1942年10月10日）

推陈出新。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10月10日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由鲁迅艺术学院平剧团和一二〇师平剧社合并）所写的题词。



推陈出新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题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

（1942年10月12日）

斯大林格勒之战，英美报纸比之为凡尔登战役，“红色凡尔登”之名已传遍于世界。这个比拟并不适当。今天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凡尔登来，有性质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有许多人在这种时候还被德国的攻势所迷惑，以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冬，在一九一六年，德军曾向法国要塞凡尔登举行数度的进攻。当时德军的战役统帅是德国皇太子，投入战斗的力量是德军的最精锐部分。当时的战斗是带决战性的。德军猛攻不克，整个德奥土保阵线再也找不到出路，从此日益困难，众叛亲离，土崩瓦解，走到了最后的崩溃。然而当时英美法阵线方面，还没有看出这种情况，以为德军仍极强大，不知道自己的胜利已经快到面前。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迷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希特勒在西线胜利以前，他似乎是谨慎的。攻波兰，攻挪威，攻荷、比、法，攻巴尔干，都是注全力于一处，不敢旁骛。西线胜利后，他就冲昏了头脑，企图在三个月内打败苏联。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向这个庞大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举行了全面的进攻，这样就分散了他的兵力。去年十月向莫斯科进攻的失败，结束了苏德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特勒第一个战略计划破产了。红军制止了德军去年的进攻，并在冬季举行了全线的反攻，是为苏德战争的第二阶段；希特勒转到了退却和防御的地位。在此期间，希特勒撤消了他的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自己充任总司令，决定放弃全面的进攻计划，搜索欧洲全力，准备向南线作局部的但被认为是打击苏联要害的最后进攻。因为这一进攻带着最后一次的性质，关系法西斯的存亡，希特勒就集中了极大的兵力，连在北非作战中的一部分飞机坦克都抽调过来了。从今年五月进攻刻赤和塞瓦斯托波尔起，进入战争的第三阶段。希特勒调动了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兵力，附以飞机坦克的主力，向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作空前剧烈的进攻。

他企图迅速攻下两处，达到切断伏尔加和夺取巴库两个目的，然后北攻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并令日本法西斯集中兵力于满洲，准备在斯大林格勒攻下后进攻西伯利亚。希特勒妄想把苏联力量削弱到足以使德军主力从苏联战场上解脱出来，以便移到西线对付英美的进攻，并可掠取近东资源，打通德日联系，同时，日军主力也可从北面解脱出来，以便西进南进对付我国和英美，而无后顾之忧，这样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但是这个阶段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希特勒遇到了苏联制其死命的策略。苏联采取了先则诱敌深入、继则顽强抵抗的方针。五个月的战争，使德军既没有打进高加索油田，也没有打下斯大林格勒，迫使希特勒顿兵于高山与坚城之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损失甚大，陷于僵局。现在已是十月，冬季就要到来，战争的第三阶段快要结束，第四阶段快要开始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

拿希特勒在第一阶段上的情况和第三阶段作比较，就可知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目前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方面，实际上均已停止了德军的进攻，希特勒已到再衰三竭之时，他对斯大林格勒、高加索两处的进攻已经失败。他在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整个冬季中所整备的一点兵力，已经耗竭了。在苏德战线，距冬季不到一个月了，他须赶快转入防御。整个顿河的以西以南是

他的最危险的地带，红军将在这一带转入反攻。今年冬季，希特勒因被死亡所驱迫，将再一次整备他的军队。他或者还可能搜索他的一点残余力量装备出几个新的师团，此外则乞援于意、罗、匈三国法西斯伙伴，向他们勒索一些炮灰，以应付东西两线的危局。但是，他在东线须应付冬季战争的极大消耗，他在西线须准备对付第二条战线，而意、罗、匈等国则将在希特勒大势已去的这种悲观情绪中，一天一天变成离心离德。总之，十月九日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

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的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的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1]。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

[1] 1815年6月，拿破仑的军队同英普联军激战于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战败，被流放于大西洋南部的圣赫勒拿岛，至1821年死于该岛。拿破仑一生征服过欧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在1812年进攻俄国的战争中，在莫斯科遭到极大的失败，他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被消灭。拿破仑受到了这次打击，从此便一蹶不振。

历史教训[1]

（1942年10月14日）

十月四日，斯大林在答复美国新闻记者关于“苏联所存的抵抗力量如何”的询问时称：“我认为苏联抵抗德国匪徒的能力，如果不是较大的话，也不小于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任何追求世界统治权的侵略国。”十月五日莫斯科《真理报》社论称：“斯大林格勒的抗战，粉碎了希特勒的巨大计划。该计划原定在迅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后，即向莫斯科、巴库前进。”这些话到十月八、九两日就证明了。十月八日，德军发言人宣布：“不再使用炮兵与工兵强袭斯大林格勒。”原因之一，是如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所宣布的：“苏军业已突破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包围线，并据守新阵地。”原因之二，是如十月十日路透电所称：“昨日德军被迫转调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分兵力至西北区，因该处正遭苏联解救军的不断攻击。”所有这些，就是说，红军由城内正面与北部侧面两方的夹击，迫使希特勒绝望于该城的进攻，而不得不在事实上一天一天把自己转入防御地位。还在一个多月前，一些人们就在匆匆忙忙地讨论高加索失守后的局势，他们对于苏、德两军的力量都是判断错了的。希特勒的“巨大计划”是有的，但这个计划正如《真理报》所说，被斯大林格勒的抗战所粉碎了。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希特勒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个矛盾，表现在他采取避实击虚政策上面。列宁格勒、莫斯科是被认为应该避开的，他就集中力量向着南线一隅。七月间他曾拼命争夺沃罗涅日，打不开，又避开它。拼命争夺克列茨基，又打不开，又避开它。于是攻击点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北麓了，这是无可避开的了，又是打不开，又是要避开了。但这是最后的避开，就是说，被迫放弃攻势，转入防御地位，希特勒现在就是处在这样情况中。希特勒今天还没有发出停止进攻的一般声明，他也许还想最后挣扎一下，但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一切他所避开的地点，都成了红军向他进攻的出发点，目前红军就是从克列茨基到斯城北角一线向德军进攻的。这样将迫使希特勒最后地放弃他的一切战略进攻。

保卫斯城的直接战斗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过顿河河曲开始，但河曲战斗对保卫斯城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整个七月份，德军由哈尔科夫打到顿河。这个期间，红军采取战略退却，德军毫无所得。七月三十日，柏林宣布德军在齐姆良斯克至罗斯托夫二百五十公里战线及顿河下游渡过顿河。不知是德军原先计划的，还是因渡河胜利冲昏了德将波克的头脑，他就从整个野战军中分出二十个师，向高加索方向猛追退却中的红军，八月中旬即达到库班河流域，但出于德军意外地遇到了红军的顽强抵抗。直到今天（十月十四日）德军只得到迈科普一个小油田。高加索北麓还有一个较大的油田叫格罗兹内的，同盟社还在八月十三日就说：“通至格罗兹内的进路非常平坦，目前所关心的问题，只是德军的进攻能否给予红军以充分时间彻底破坏该处油田。”可是从说这话到今天已整整两个月，希特勒对这个油田还是可望而不可即。至于为着想达到巴库一

带吃这块最肥的天鹅肉，德军确曾冤枉地爬过高加索山隘。八月二十三日海通社宣称，“八月二十一日晨十时，德山岳部队在高达五千六百三十公尺的厄尔布鲁士山升起德国战旗”，表示法西斯吸血鬼们的狂喜。可是这面战旗，不知是送给红军了，还是法西斯们自己拖着溜下山去的，总之是一场空欢喜。听说波克现在被希特勒撤职了（十月九日路透电），那末，他的错误在哪里呢？或者第一条就是这个向高加索分兵吧。红军一方面坚决扼守顿河河曲，一方面却诱使波克祸水分一股流向库班河去，因此就减轻了对斯大林格勒的压力。

河曲战斗是从七、八月之交打起的，红军以极其英勇的奋战，直打到八月二十三日才放弃顿河东岸刻赤一带阵地。如果没有这一战，如果德军没有河曲二十三天的阻碍与极大的消耗，则斯城的直接保卫将是困难的。

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渡河至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斯城工业区，红军又在顿河与斯城间纵深五十至六十公里地带消磨了德军二十三天。没有这第二个二十三天的消磨，斯城的保卫也是困难的。

从九月十五日德军打入工业区，至十月九日红军路丁什夫部队突破该区德军阵线，二十四天中，是极端猛烈的巷战时期，红军以城内的巷战与北部的压力粉碎了德军的进攻。

从此希特勒整个地转入被动地位，他的实力与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最后地暴露出来，他将被这个矛盾所压碎。

九月三十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宫演说中说到红军时，他只好这样说，“那是一个不知道慈悲的敌人，他们不是人类而是野兽”，表示他似乎曾经希望过红军向他讲慈悲似的。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日本法西斯看了希特勒的惨败，将做什么感想呢？还是要到海参崴一带去碰一碰吗？那里靠得住又是不讲慈悲的。日本的实力与它的野心之间的矛盾，也是一定要把日本法西斯压得粉碎。

评柏林声明[1]

（1942年10月16日）

柏林发言人已于十月十二日正式发表声明。该声明说：“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该声明又说：“此不应被视为吾人未来的作战计划，亦非谓三国公约中的任何一国业已决定或被迫将主动地位给予敌方，此不过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的地位，而以镇静态度及必胜信心以观变化。”

这后一段话是说谎的。但这个说谎对于目前法西斯的地位极其必要，这是因为今年希特勒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和去年他的由攻势转入守势大不相同的原故。

在去年，因为德国尚有余力，可以准备在今年再取一个攻势；因为日本法西斯和希特勒约好了不久就要爆发太平洋战争，而这就被认为是一则足以麻醉人民，二则足以牵制美国、削弱英国，而不致有第二条战线；此外还因为日本法西斯答应希特勒，在某种条件下（例如德国第二个夏季攻势达到了战略目的等）它可以进攻西伯利亚，和德国合力打击苏联：这三个条件，在那时都是存在的，或是可能的，所以希特勒在进攻莫斯科失败转入守势之时，他就不需要说出如像现时这类可怜的谎言，他就可以拿撤销前线总司令勃鲁齐区给他的军民人等看，说战争是由勃鲁齐区弄坏的，他自己当了

---

[1]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总司令就自然有办法。

果然，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英、美受了很大损失，日本闹得声势煊赫，这件事立即在德国及欧洲人民中起了麻醉作用，希特勒所遭受的夏季攻势失败与冬季红军反攻两个创伤，就被这副麻醉剂把他的痛楚减轻了许多。今年希特勒实施夏季攻势时，又果然没有发生第二条战线。

在去年，希特勒一面应付红军的冬季攻势，一面还补充了旧部队的兵力，重新装备了新的兵力，又从意、罗、匈等国拉来了几十师军队，所有这些，是被希特勒及其一切法西斯伙伴们认为是自己还有前途的最主要的基础，他们感觉自己还有实力。在此基础上，希特勒果然举行了今年的攻势，虽然不如去年那样煊赫，但在七、八、九三个月间也颇迷惑了一时，使得人们似乎觉得希特勒还有很大气力似的。

只有第三个条件至今没有动静。要说还有可能的话，那末，似乎只有一种时机，就是说，当英、美实行对德进攻或接近这种进攻时，法西斯们为了死里逃生起见，或者日本军阀们还会干一下。但是拿这个条件来配合希特勒今年攻势的预定计划是破产了。

在去年至今年，三个条件实现了两个，这就是德国法西斯们一年结账时他们还可以自鸣得意的一面。

但是还有另一面，就是说，三个条件一齐破产了。第一个，今年的攻势完全破产了。去年还有这个法宝，可以安慰自己，安慰人们，今年没有了。所谓“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似乎还有第三个攻势的希望似的，但这只是完全的谎言。希特勒的旧军队是疲敝不堪了，精锐部分已经耗完。他的人力资源与军备资源即使[illegible]搜括，也不能组成一个像样的攻势了。过去所借以维系人心与借

以延续法西斯生命的基础条件——德国的进攻实力，现在转到了它的反面，这个条件是基本上破坏了。就在这种时候，法西斯们需要以完全的撒谎来维系人心，但是世界上没有不拿实力而拿撒谎可以维系人心的。斯大林谦虚地说：“苏联力量不说较大，也不小于法西斯。”在希特勒攻势破产后，红军的力量是强大于法西斯的。在这种情况下，法西斯内部将发生分裂的危机，过去那样的团结不可能了。法西斯与人民间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民心军心都很难维系了。德国与意、罗、匈、芬以至日本间的关系有大闹别扭的趋势，意大利甚至有倒戈的危险。欧洲几个中立国的态度也将起变化，某些国家或有加入同盟国之可能。

讲到第二个条件，今年也是去年的反面。日本的胜利促起了美国的整军，美国以一年时间不但补偿了夏威夷一役的损失，而且正在积极准备进攻。和柏林宣布守势的同一天，罗斯福[1]说道：“关于开辟第二战场，吾人对于战略已有若干重大决定。其中之一，为吾人所共表同意者，即须要向德、日发动新攻势，以分散苏联与中国境内的一部敌人至其他战场。”日本是畏美如虎的。八月二十八日，日本海军情报部发言人说道：“自英国威尔斯太子号沉没后，美国即追加空军预算四十万万元，将战舰改造为航空母舰或改变其设计者共十四艘，又改造商船二十艘及设计中之商船七十艘，均改为航空母舰，这说明美国多么重视航空母舰。我国不能坐视美国建舰，要在美国建舰未成前采先发制人办法击灭之。”九月二十六日，东条[2]说道：“英国逐渐整备了战略路线，美国反攻企图日益明显，两国依靠其丰富资源，急速增强其战斗力，待时进行总反攻，大东亚战争

---

[1] 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

[2]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的正规发展还在今后。”总之，日本在美国面前，吓得全身发抖了。德国呢？也是一样，十月十二日柏林发言人也说到：“美国业已开始大规模的军备计划。但无论其如何强大，若欲谋收复欧洲、非洲及亚洲，则非其力之所能及。”这后一句也是撒谎。实际上，法西斯们清楚地觉到，第二战场的魔影已一天一天地接近了他们的后门。八月二十八日，法西斯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机关报，竟至于借了红军的威风去恐吓英、美，鼓舞军心。这个报纸说：“曾在东线举行空前剧烈战争的人员与武器，将予英国以最后的清算。我们应该问一问在东线战争严格考验后调至西方应付第二条战线的德国武装人员，他们之中每一人都迫切希望向英国，或者还可说向美国这两个敌人，试验他们在东线‘无限壮大’的力量。当英国一九三九年宣战时，他就不知道战争是什么，而我们更好地知道战争是什么，而现在我们完全知道战争是什么。”这就是向英、美说，我们是红军的学生，你们敢来吗！这就是向德国士兵说，我们是和红军交过手的，还怕第二条战线吗！法西斯们知道战争是什么呢？他们知道战争就是失败。十月四日，戈林[1]恐吓人民说：“如果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失败，则德国的命运将是悲惨的，德国人民将被国际犹太人的毒牙咬碎，并被消灭，德国将在地图上被抹掉。”总之，法西斯们现在是专靠撒谎与恐吓吃饭，而不能靠实力吃饭了。他们的进攻实力已经完[illegible]他们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日本的情况稍有不同，他的实力还可以举行一个进攻，这是因[illegible]过去的战争还没有动用他的主力的原故。故日本是否还要向北或[illegible]南举行一个大的冒险，此时还不能作断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了

---

[1] 戈林（1893—1946），德国元帅。1939年被希特勒立为继承人。

的，日本面前摆着一个美国反攻的大危险。拿日本现存实力和这个将来危险作比较，那简直是不能设想的。日本军部对于美国飞机、军舰的生产，表示那样彻骨的惊慌，就是从这件事实发生的。日本目前是站在这样的分歧点面前：还是照德国今年攻势那样来一个一定失败的冒险进攻呢？还是以德国作殷鉴保存这点力量以期在防御战中侥幸取胜呢？假定日本法西斯采取第一条路，那在德国说来，其意义是为了援助德国防御而使用日本的进攻，就是说，为了牵制美国与苏联在欧洲的攻势而使用日本的进攻，这和今年为了援助德国的进攻而使用日本的太平洋战争及希望日本进攻西伯利亚，大不相同。假定日本采取第二条路，那对日本当然有利些，但对德国就完全不利，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东西两个法西斯国家要闹起别扭来。德国在今天以前利用了日本的进攻英、美，但没有能够利用日本进攻苏联。今后呢？德、日情况都有了很大不同，日本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还要等一下才能看清楚。

但是不论怎么样，世界形势已起了根本的变化，一切法西斯国家实际上都已丧失了主动地位，不管德国或日本，都是如此，也不管日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政策，都是如此。

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10月17日）

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并询问刘少奇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王世杰电[1]

（1942年10月18日）

闻参政会定本月二十二日开会[2]，弟等因事不克到会，特此请假。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在延安的4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林伯渠、秦邦宪致重庆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国民参政会三届一次大会。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18日）

董必武、邓颖超出席参政会应采取今年“七七”宣言所表示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为告知在延安的4位参政员已于今日致电参政会秘书处假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21日）

如彼方提周为主席团[2]，可予同意，不必以毛代，因毛不能经常出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国民党方面可能提周恩来为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

致李先念等电[1]

（1942年10月24日）

李宗仁铣[2]令该战区于明二十五日起，限期两个月彻底肃清我军（其部署另告）。在此情况下，你们可本自卫图存原则，进行武装反磨擦，但总方针仍应按六日电示（以斗争求团结）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并告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的主要内容。

[2] 铣，即16日。

致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25日）

第一次见蒋[2]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转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于1942年10月7日到达重庆，10月13日在张治中陪同下会见蒋介石。10月16日，周恩来和林彪会晤张治中，林向张提出停止全国军事进攻等项要求。

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结合的军队[1]

（1942年10月25日）

一

此件[2]很好。讲前即印发到会者，讲后还要印发全军干部，到营级止，当作干部教育材料。但不对外发表，要注意保存。讲时，可考虑要李鼎铭[3]等人来听。

二

对政府与人民中的缺点，即使怎样的严重，亦应该善意的提议，而不能恶意的报复与攻击，才是一个革命军人对待革命政府与革命人民的正当态度，不然就是军阀的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在贺龙《整军报告提纲》上写的批语和在提纲第三部分（怎样来进行整军）上加写的三段话。

[2] 指贺龙1942年11月4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整军报告提纲》。

[3]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三

凡此所讲[1]，我们相信是一定能够在全军执行的。因为我们八路军有很好的品质，我们是全国最好的军队，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与人民结合一起的军队，是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军队。我们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克服自己的弱点，完成整军的任务。

毛泽东深入部队调查研究。

---

[1] 指贺龙《整军报告提纲》第三部分提出的怎样进行整军的十点要求。

对顽军以斗争求团结[1]

（1942年10月25日）

陈少敏同志：

西元[2]电悉，除对国民党中央目前不要批评外，对顽军破坏团结，进攻边区，仍应号召民众予以抵抗，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

书记处

西有[3]

---

[1] 这份电报的原抄件上注有“毛稿”（即毛泽东拟稿）二字。

[2] 指10月13日。

[3] 指10月25日。

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应符合党的政策[1]

（1942年10月28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

最近一时期内各地宣传曾发生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例如，新华社太行分社发表参政会通电主张召集国是会议，山东分社发表东北军一一一师反对国民党人员的通电，苏北分社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晋西北分社发表某友军致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均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西北中央局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报纸工作的决定，各地亦应仿此办理，改正过去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中央书记处

十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各分局的指示。

复周恩来电[1]

（1942年10月28日）

（一）二十七日两电收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二）边区正开高干会议，实行整党、整军、整政、整财、整民、整学、整关系，大整顿，大检查，可减缩万余人，经济问题有办法，困难可克服。敌后亦大施精简，统一领导，亦可克服困难。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10月30日）

关于从华北抽出五千至一万干部到后方保存教育，我们正作接收准备，请你订出一个分批派送计划，作八九批陆续送来，免人注意。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2]来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郑延卓，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粮食部参事，受行政院赈委会派遣携款30万元到陕甘宁边区赈灾。

晋西北要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1942年10月31日）

林枫[1]同志：

阅二十五日电，晋西北只有人口七十万至一百万，望检查如此迅速缩小的原因，与周甘[2]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即具体的积极的全面的反“蚕食”斗争）。必须振奋军心民心，向敌取积极政策，否则地区再缩前途甚坏。

毛泽东

三十一日

---

[1]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

[2] 周甘，指周士第、甘泗淇，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和谭政的谈话[1]

（1942年10月）

你在高干会上检讨军队方面关于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我看过了，提出了纠正的方针和要求，这都很好。那恐怕只是军队问题的一个方面。我的想法，要把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错误的思想倾向，还有会议中提出批评的在军队和党的关系、军队和政府的关系、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及军队本身内部关系上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各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的问题，凡是存在的缺点，都应该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通过民主检查大会加以揭露，从而纠正不良现象，平复不满心理，造成军队内部亲切友好团结的空气，激发官兵的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迎接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高潮！

---

[1]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谭政就军队中的军阀主义倾向作了检讨。之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进行了交谈。这是毛泽东和谭政谈话的一部分。

给贾拓夫的复信[1]

（1942年11月2日）

大约可在十号左右讲，那时再商量确定日子。请你将布化十二条及结束语第四第五条按听众之数铅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发与他们研究。十二条译文要用最近一次师哲[2]译出的，请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复贾拓夫信的主要内容。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2] 师哲，当时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1]

（1942年11月6日）

我们以最大的乐观来庆祝今年的十月革命节。我坚信，今年的十月革命节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战胜法西斯阵线的转折点。

在过去时期内，因为红军单独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苏联的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壮大起来了，希特勒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从此以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

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做出了有关全人类命运的英雄事业。他们是十月革命的儿女。十月革命的旗帜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法西斯势力则必归于消灭。

我们中国人民庆祝红军的胜利，同时也即是庆祝自己的胜利。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一切努力集中于打击日本法西斯，这就是中国人民的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五周年撰写的文章。

致林枫电[1]

（1942年11月16日）

少奇同志过路，你们派人接护时须非常小心机密，不要张扬，但要谨慎敏捷。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枫、周士第、甘泗淇电的主要内容。林枫，当时任路军第一二〇师暨晋绥军区副政治委员。

致彭德怀电[1]

（1942年11月17日）

德怀同志：

（一）送大批干部回后方保存甚为必要，后方经济虽困难，但可组织干部团，实行屯田政策及分散到后方部队中担任副职，一部分则进军事学校或党校。

（二）胡服[2]同志现到何处，是否还在总部，过封锁线有困难否，望告。

毛泽东
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北方局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电报。

[2] 胡服，即刘少奇。

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毛泽东在西北高干会议上的报告

（1942年11月21日）

同志们：

这次高干会议开得很好，已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开了十一天会议，这个问题解决得很恰当，很多同志都讲话了，据我听见的，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讲得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批评错误路线，所有的这些批评，绝大多数的同志，我看是很好，只有个别同志差一点。这中间有□□同志的结论，□□同志的发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在批评朱理治、郭洪涛他们两个人历史路线上的错误，在这次斗争中间教育了我们大家，也使得中央更加明了了情况，懂得了历史。在这次会议中间，暴露了这样的事实：就是创造边区的以及后来参加边区工作的同志，这中间绝大多数都是好的同志，而且进步很快。各个根据地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根据地的党更强一些？哪个根据地的干部比较起来更好一些？当然各个根据地的党，都是执行党中央路线的党，各根据地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比较起来，边区的党、边区的干部有更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边区是曾经经过内战，经过土地革命。西北同边区是经过了这三个时期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时期。而别的根据地的党，拿每一个根据地的全党来

说，那么他们的党龄，大多数同志的党龄要短一些；干部中间有一部分是新来的，外面来的，是新提拔的。而我们这个根据地则不同。这个根据地是经过三个时期。大革命时期，虽然那时还没有根据地，可是有工作；因为有工作，所以后来能创造这个根据地，比方那时学校有支部，有的城市如绥德、延安等地都有支部，乡下也许有个别知识分子在工作。就由于他们，所以后来建立了根据地。他们和群众农民结合起来了，有兵营，有国民革命军，这是好的。后来国民革命军有一小部分就变成了红军。这时我们开始有了武装部队，这是地方和军民结合起来了，因此就创造了根据地。拿同志们的表现来说，在这次会议中表现出进步很快。在这一点上，我们后来许多参加工作的同志，外来的同志，应该向本地同志学习，特别向本地同志学习。我想实实在在是这样的情形。因为本地同志，特别是其中大部分同志是经过了三个时期，他们亲身经历了这样长期的三个时期的斗争。因此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有经验，比较更好一些，比较那些只做部分工作而没有这样地独立创造出一个根据地，没有经过长久的历史，没有这样丰富的经验，自己应该懂得，我们是差一点。这些同志应该向本地同志学习。事实证明他们是比我们强，甚至某些职位高的同志，也要向现在职位低的同志学习。事实上在许多问题上，这些同志比我们强一些，更正规一些，这些同志更原则些，这些同志比我们更马列主义一些，更布尔什维克化一些。所以那些轻视本地干部，有这种观念的，当然口里不说，他口里绝不会说："我轻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但是心里有着看人家所谓"土包子"。人家没有走那样远的路，而自己走了若干路就成了洋包子。比方拿那两个根据地来说，这个是根据地，那个也是根据地，他们在这个根据地没有走一段路，是土包子；洋包子是

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来工作，所不同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和没有走那一段路。像从那个房子走到这个房子，你就洋起来了，你多走了一段路，所差就是这一段路，如果说两个根据地所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那个根据地到这个根据地，就是一段路，一个走了一段路，一个没走一段路。这一段路算不算经验？算经验。因为多走一段路，两万五千里或几千里。从上海、天津来的，但是有一个缺点，一个什么缺点呢？就是这个根据地现在还在，你们那个上海、天津，现在呢？现在垮光了，全国白区十分之十，全国白区的百分之九十九都光了，全国苏区百分之九十都垮了，只剩下这一个，你那样高明，又是你那里垮了。是不是每个同志都要负责？都不高明？所有万里长征或走几万里来的都要负责呢？那不是这样说，但是从那里走来的同志应该懂得，自己比本地同志所差别的，就是多走了一段路，从那里走到这里。你那里失败的责任谁负责？上海、天津垮了谁负责？大多数同志要负责，尤其是领导同志要负这个责任，但我们在那里工作也是土包子，土包子与土包子，这里头，没有理由产生轻视人家，因为你那里领导不好，再加上客观的原因，敌人的压力很大，主观领导的错误，所以白区弄得差不多完了，各个根据地都失败了。所以我想许多新同志以及老干部，到边区工作的同志，应该诚心地向本地干部学习，这样大家绝不会嘴里讲，轻视他们土包子。口里没有哪个可能讲，讲出来那不像样子。在心里没有一个，就有十个这样，但有若干是这样想的，这是毫无根据的。在这次会议中清楚地表现这一点。有些外来的同志，甚至职位高一些的，比起本地同志来要差一些，他们不及本地干部。应该使他们懂得，本地干部更原则一些，他们的工作更有经验一些，工作更有办法一些。关于这一点，我想在这个会议中，应讲清楚

的。因为这个会里有两部分同志，要很好地结合起来。本地同志很进步，进步很快，掌握政策很好，那么就没有缺点了吗？不要向外来同志学习？他们就不能当我们的先生？那可不然，无论任何同志与同志间大家相互都是先生，就是中央和地方，和边区同志，相互间都是先生。中央不向你们学习，中央从哪里做起？中央不拿你们作先生，事情是办不了的。比方这次解决历史问题，没有这十一天的会议，没有你们贡献的材料，暴露了这样的事实，要中央同志完全了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参加，你们不讲，他们怎么能知道呢？所以中央同志要以你们为先生，要以他领导的同志为先生，要向他们学习。同样他们也应该这样向中央同志学习，也要向外来的干部学习，哪怕他就是一个新来的，新加入党不久的，因他总有多少长处。比方一个新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请他当教员上文化课，这不是先生吗？这些本地同志应了解，自己还有缺点，我们要提高文化，提高理论，□□同志讲：“要提高我们的理论，补足我们的缺点。”这样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不是相互轻视，相互排斥，这样来解决问题就好了，问题就能好好解决。我想这次会议，不但解决历史问题，而且解决将来团结问题。将来团结问题，这里面有一部分本地同志，另外还有一部分外来同志，这两部分同志必须很好地合作。很好合作必须除掉轻视的观念，尤其不应轻视本地的同志，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次会议已经过去的一个段落，我讲是这样一点意见。

今天我想讲斯大林同志这十二条，讲十二条与刚才讲的全党路线搞清楚，全党团结起来，在这个基础上讲这十二条的。

斯大林同志说：“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至少必须具备若干基本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各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本是不可

能的。”

现在我们同志互相敬礼时，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致“布礼”的敬礼。就是好像大家都说，你也是布尔什维克，我也是布尔什维克，他写信给我，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我写信给你，也是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但我们是不是空的？这个布尔什维克敬礼是不是空谈呢？我说要看是否空谈，就要按照斯大林同志所说的具备了条件没有。具备了必要的条件就不是空谈；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如果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或者具备不完全，那么我们就不是叫布化，只是向着布化。“化”是不容易的。斯大林讲十二条，布尔什维克有二三个条件，还有些条件不合，那么你还能算布化吗？不能够。是向着布化，但是没有“化”。

现在拿我们全党来说，是怎样的情况呢？拿我们全党来说，我想应当是这样看，我们还是向着布化。要讲布化我党实在有多少条件？具备了多少条件呢？一般地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从它的路线，从它的工作说起来，从这个党的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关系说起来，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但是要讲到化，什么叫“化”呢？就是彻底完全得很，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在我们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说，完全布化，我看我们还差，还是许多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我们来看这些条件，像斯大林所讲的。

第一条：“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品，像社会民主党在实际上把自己看成的那样；必须使党不把自己看成工会的免费附加品，像某些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有时翻来覆去所说的那样；而必须使党把自己看成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负责领导无产阶级组织的其他一切形式（从工会到国会党团）的使命和形式。”

这一条对我们党怎么样呢？我们来检查一下。这一条在我们党许多地方、许多部门没有实行，或者没有能够完全实行。这个里头，现在我们是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是不是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斯大林举的例子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不是国会党团的问题，不是工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问题。因为我们的国会党团——我们重庆参政会有党团，边区参政会有党团，这个党团没有像斯大林所讲的脱离党，把党看成附属品，而拿那个东西作为主体——以国会党团为主体，实际就是中央。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党团就是党中央，那一种现象我们没有。我们许多同志说：这一条是不是可以要？我们许多同志读了这一条说：这一条和我们不适合，我们没有这一条。那么我们就讲到别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看“党是一切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这个“最高”是领导一切形式的组织。一般组织形式，在这里所谓职工会、国会党团，这个问题是有别的例子。现在的事实来说，我们有政府、我们有军队、我们有民众团体，党领导什么东西呢？现在拿我们各个根据地来说，党就是领导政府，领导军队，领导民众团体。除了这三个工作以外，我们还领导什么东西呢？我们不领导别的什么东西，因为除了这三个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除了这三种以外，我们还有党务工作，整理党的组织。那么整理党务工作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为了整理党务工作而整理党务工作是不是可以呢？我们说可以的。为什么呢？完全不为别的，就是为着要把军队搞好、政府搞好、民众团体搞好，所以我们要搞党务工作。党务工作里头包括干部工作，为什么要把干部搞好呢？因为这些干部，不是军队干部就是政府干部，很大多数干部，除了少数党务工作干部以外，十分之九是军队的干部，政府工作的、民众团体工作的干部，民众团体工作里头，有工会、农

会、青年、妇女、合作社、文化团体。文化团体中间又有各种团体，有文学会、哲学会、戏剧会。戏剧里面又有新戏旧戏，有木刻等等，这一套都是民众团体，这一套可多得很，你这党不管军队、政府、民众团体的事，你管什么？你这个党的干部，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所以党务工作的目的，完全不是为别的，搞这么许多人，给你小米吃，吃得你发胀，（笑声）就要做工作。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党务工作，做这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搞军队，搞政府，搞群众团体，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把这些搞好，才好跟敌人作斗争。

但是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实实在在存在着这一观念，你这个党部就管你的党务工作，我的政府你少管点，我的军队你少管点，我的民众团体你少管点。这种情形是想象中的呢，还是事实上就有呢？少管到不管，不管到反对。反对的是什么人呢？是张国焘，他就是反对我们，他不要我们管，他自己搞一个中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闹独立性，自己有军队，反对中央管他，而他要推翻这个中央。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抗战中间还有这样的同志，中央的命令他不执行，就是皖南事变以前有这样的事，其他的军队像这样严重的事是没有的，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像张国焘是最标准的，突出的。第二个是项英，是比较次一点，是没有公开暴露这些事情来。再有的是服从一部分，不服从一部分，这些在军队里有没有？军队里面也有过，合我脾气的就服从，不合我脾气的我不服从，口里没有公开讲不服从，但心里却这样想，做起来是这样做。在边区党政军民关系上，就有这样的现象，党的意志、决议案不能执行。比如党政军民关系上，军民合作不能够执行吗？相当长期不能执行。这个不执行是不是原则问题，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够执行，没有法

子贯彻执行，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性问题。政府的工作，我们实际的政策，政府执行的政策，应该是很符合党的政策的，这方面我们有没有缺点？有缺点的，步调不一，政府内部步调不一，政府与党，政府里头工作的党员与政府党领导步调不一。

群众团体，群众团体有没有这种事呢？也有过这样的事情，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过去群众团体之间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如青年工作，所谓闹独立性，闹什么东西，我不太清楚，反正跟党的政策不相合，随便搞一套。文化团体中的党员对党的政策、对党的领导这个关系在过去也是有过许多毛病的。比如《解放日报》第四版，那时有一个时期是一个独立国，什么人也不能干涉，这一版和别的版甚至变成这样的事：如像大英帝国各个殖民地和英国差不多。在某一点上甚至有过之。实际上这一版是闹独立性。报馆的意志不能在这一版实行。现在我们无论哪一版，哪一篇文章里哪一个字假使要干涉也可以。一共有四万字，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都是服从的，只有一个字不服从有什么关系呢？不提出时不是原则，不提出时不关大局，如果他一个字不准报馆编辑干涉，如此下去四万字都要闹独立性。讲出来党一个字也要管，好像说你这个党挖苦得很，一个字都要管，一个字不要管怎么样？允许他订一个条约，说：你可以闹独立性。那么第二个字、第三个字都来了，他可以闹独立性，为什么我又不可以闹独立性呢？不可以的。党是管一切的，他如果要管一切都是可以的。什么叫党？现在我们在“九一”决定中已经搞清楚了。好像政府工作就不算党，西北局不算党，木刻、戏剧就不算党，只是群众团体，那么这个党还很小，只有这底下几个房子才叫党，这样的观念是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谓党是一切党员，党是党员组成的，……旧戏里头有党，新戏里头有党，工

会、农会、青年、妇女中都有党。比方除了军队、政府、民众团体、工人团体、农民团体、文化团体以外，还有什么呢？一个党也没有了，就完了。假使这样尊重党的领导，可是我们这里不能叫党，我叫军队，我叫民众团体，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要这个党，因此就没有党了。西北局不过是几间房子住在那里，有几个人在那里。

所以关于这一条，我们现在的例子，现在要执行斯大林这一条，就是领导一元化，要承认中央的“九一”决定，要承认这一次大会整个关系的决议案。承认党是一切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一切无产阶级党以外的组织，通过他的党员，一定要归党领导。这种闹独立性差不多自有红军起就有了，在根据地中特别发生这些事情，在根据地以外这个问题少些。

根据这种情况看来，我们说比较布化，当我们写这个字时，我们就想想我们“化”的程度，我们布化的程度还是差一点，拿全党来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拿部分的干部，甚至相当一些同志来说，布尔什维克化还没有，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

第二条：第二讲理论，“必须使得党，特别是他的领导者，完全地精通与革命实践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第二就是说要精通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是不可脱离实际的，跟实际是联系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关于这一条，在我们党来说，我们党是有过历史的。我们的历史怎样呢？第一个时期，很高的热情接受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干了一次革命，叫做第一次大革命。从有党到一九二七年，前一段是准备大革命，后一段执行大革命。这是在什么原则之下？这是在什么思想之[illegible]？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这条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因为中国的党是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是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那时不但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列宁主义在中国有很大的传播。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广泛的传播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有所谓马克思主义，还有所谓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不大知道的，差不多一般说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国落后得很，发生了这样大的事变，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这样久，无产阶级运动有了这样长的时间，现在列宁主义在俄国有一个胜利，有过几次革命，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不大知道的，有某一些人，有某一些翻译印刷，但是一般的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个时期，十月革命本身对中国是有很大宣传，十月革命本身影响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以后，有很多东西流传到中国来，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有很大的事变，在这个情况下中国产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在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就更多起来了。就有一些知识分子，中国自己产生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以李大钊为首的，就产生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始自觉地研究，所以能够在一九二一年成立中国共产党。不然，一九二一年可不可能建立中国共产党呢？这个可能是没有的。因为在一九二一年以前，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宣传，经过几年的酝酿，又产生了五四运动。没有十月革命，五四运动的产生都是难的。有十月革命，又有了五四运动，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所以能在一九二一年开始建设了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这六七年当中，我们党是个幼年的党，幼年的党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大革命。像这样一种历史，在外国都不很多，只有六七年的工夫，干出这样一个大革命来。国共

合作，在这中间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大革命这个运动的本身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的，那时候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以及全党的活动，都是以马列主义做基础，同时按中国党的实际情况提出纲领进行活动。有些人似乎觉得中国党开始没有理论的，特别是靠后一个时期，有那么一些同志感觉只有自己是有理论的。我们就讲五四以前，就讲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这四年中，马列主义在中国已经有相当普遍的宣传。那时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有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本身就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产生的。不然怎样设想呢？怎么忽然产生了一个共产党呢？这个共产党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呢？是基督教主义呢，还是孔教主义呢？（笑声）后来有些同志觉得从前那一套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有自己才是马列主义，这个我看是不对的。另外还有些同志也觉得我们从前那一套不是马列主义，而只有新翻来的才是马列主义。哪有这个事？不是这样说的，事实就不是这样，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了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那时李大钊他们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四年间李大钊就宣传共产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主义？又不是基督教主义，也不是孔教主义，是马列主义，实[illegible]在在有书为证。所以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是在马列主义指[illegible]之下的。以后还有一个内战阶段，一个是抗日阶段，就是两个东[illegible]的斗争，一个是马列主义，一个是反马列主义；一个是真马列主[illegible]；一个是假马列主义。这个会开了十一天，□□同志也这样讲，[illegible]边的口号是“为马列主义而斗争”，朱理治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illegible]两万多字；这一边便叫做“右倾机会主义”，也算一个主义，不过

是个“机会主义”。（笑声）历史现在证明，这个现在不要书上找证明，书上也有证明而且有人证明，究竟哪一个正确呢？就是叫做“右倾机会主义”的那个正确，被杀的那些人正确。杀了二百四十个，杀的是什么人呢？杀的是马列主义者，杀了二百四十个马列主义者，坚决的马列主义者，很好的马列主义者被杀掉了。再有一批因为中央来了，没有杀得及，大呼一声“刀下留人”。（笑声）这个情形只有一个苏区吗？不只一个苏区有，特别严重的有三个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和这里。中央苏区，赣东北，四川苏区也有，不过没这里严重。这是一个错误的路线。一闹，这个错误的路线就损害整个的革命，对中国革命有损害，这中间包括了一部分共产党员，马列主义者，把共产党员与马列主义者屠杀了，这是一个结果。此外，就是搞光十分之十、十分之九的苏区工作，全国十分之十的白区工作就是这样搞掉的。第一阶段中间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革命，到了后期分裂了，陈独秀也自称是马列主义者，但是那时候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那时候的马列主义，他后期的马列主义是什么马列主义呢？是假马列主义。结果怎样呢？结果被正确的马列主义克服了。

“八七”会议把他清除了。清算了大革命的失败，反对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合不合乎马列主义？不合乎。是真的马列主义还是假的马列主义？是假的马列主义。什么人把假的马列主义陈独秀这部分人清除出去和他作了斗争？党里面正确的马列主义，后来也向立三路线作过斗争，向右倾机会主义作过斗争。李立三也是假借马列主义之名，所办的事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后头就是“九八”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所以我们党第一次大革命开始有向陈独秀机会主义的

争，后来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的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个时期整个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左”的机会主义。整个内战时期，就有这样三个斗争。这三个斗争是什么对什么？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对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向这样的几个路线作斗争，向立三路线、苏维埃后期的路线、张国焘路线，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作结论。我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关于全党的结论，是不是这样呢？是这样一个性质的，不过那是全党的，你们是西北的。这样一个结论要不要作呢？要的，“七六”就要作这个结论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办的事是一种什么路线呢？现在同志们都讲了，现在的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合乎实际的。这是不是事实呢？我想这个是事实。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党的领导思想，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比较好的。因为鉴于大革命那个时期的胜利，那个时期的失败，又鉴于陈独秀机会主义，又鉴于内战时期我们有很大胜利，可是我们也有失败，我们犯了立三路线，我们中间那个路线和张国焘的路线，有[illegible]这一连串的历史。这两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第二次国共分[illegible]。这样的经验就能够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得比较正[illegible]一点。全党的觉悟在这三个阶段里也比较过去要提高一些。但是[illegible]没有缺点呢？我想还有很大的缺点。在开幕那天我曾经说过，我[illegible]党内，现在有一种自由主义。像中央所提出来的一样，我们反对[illegible]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不是统治的路线，但是在全党[illegible]残余。这种残余合不合乎马列主义原则？不合的，对于这种不[illegible]列主义的残余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illegible]自由主义的态度，隐瞒包庇，不注意；一种是向它作斗争，肃

清这种残余。为什么要提出整顿三风？从去年七月一日起，中央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调查研究的决定，今年二月中央又提出了整顿三风。现在差不多一年工夫了。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的工作，进行了这样大的一个学习，进行了工作检查。这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对不正确的残余，对这个歪风的残余，不应该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纠正的态度。在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后自由主义这种态度就产生了。遵义会议以前是一种“左”倾的错误，对马列主义的态度来说，拿政治斗争，党内关系来说，是一种“左”倾的错误；遵义会议以后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党内是不是还存在毛病呢？毛病是有的，就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的坏倾向。在这时期的主要偏向，我们党内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坏现象，而不是一种过火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这几年来，我们党内的主要坏现象是过火斗争呢，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火斗争有没有？还是有的。在某些地方斗争还是大的，但不是主要的坏倾向。遵义会议以来，党内主要的坏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在过去犯这种“左”倾错误的同志，在遵义会议以后，就容易犯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你们这次十一天的会议，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过去是过火的“左”倾斗争，“左”的错误。抗战以来他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是“左”倾为主还是自由主义？朱理治在银行工作，就闹独立性。郭洪涛散布谣言，挑拨离间，这是“左”还是自由主义呢？是自由主义，过去“左”的转成了右的态度。

现在我们讲到第二条，我们把中国党分为三个时期，北伐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这三个时期从开始就是在马列主义之下建设的，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分这样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

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革命；后来产生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来了一次斗争。第二个时期，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指导中国的内战——国内战争，但是偏向又产生了，李立三路线，中间这样一个路线，张国焘路线，不过这三个路线都被我党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哪个路线是正确的，哪个路线是不正确的？那几个不正确路线已把它克服了，现在是正确的路线，而拿这个正确的路线克服了不正确的路线，所以这个路线是比较正确的，是正确的路线。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如果说过去是“左”，在这个时期，党内到处表现了右的倾向。教条主义是什么呢？就是拿了马列主义，却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以马列主义作招牌。马列主义自以为懂了，你就要去做，但是不做。我们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咬文嚼字，做也做，做的时候他就做错了，他乱搬公式。还有一种不做事，只读书。读了好多“箭”不放出去；一种是无的放矢；一种是有箭不放，当作宝贝古董。在延安近来发生的哪一种呢？是后一种。他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连边币跌价都不能解释，这种读书是脱离现状的。这种偏向要不要改革呢？要改革。能不能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应该，特别是在宣传教育机关中，这个现象不能容忍了，再不能够发展了，所以要整顿三风。边区党员是三千，二千，是二千九百呢？总之有一部分党员，名为党员，实际上于党不利，是反党的，是党棍，我们党内包括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他们以党员招牌进行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一个人，吴奚如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级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这里来闹乱子，现在向新四军打电报，证明他是被俘过，他也承认怎样当特务，怎样订条件，怎样放他的。王实味最近也发现了，怎样发现的呢？他是以共产党员的资

格，在这里讲话，他们组织了五个人的反党集团。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一共有一百几十个人，他们五个人就组织了一个反党的集团，这些人就是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苏、宗真。什么人知道呢？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哪晓得他们反党呢？读他们的文章还说很好。整顿三风时，他们就先要来整顿三风，（台下哄动）我们现在有许多党员在这个时期麻木了，不自觉了，许多党员马列主义的作风看不见，容忍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现在暴露了，这样的人他终久要说话做事，在他的说话做事的表现中间，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以为这样也算个共产党员，而不把共产党员和这些人加以区别，许多人没有嗅觉，没有警觉性，这都是麻木现象。这次会议我希望同志们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党要来一个清理。这算什么呢？是不是自由主义呢？他们是自由主义态度。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残余不说话、不斗争是自由主义的态度。郭洪涛的破坏党、朱理治闹独立性，以前不讲，这次会上讲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自由主义。过去有些同志不报告，听了他的造谣不反映，这次会议反映了很多关于过去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我们在这里谈了一点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斯大林告诉我们，把它列作第二条，要我们注意理论。我与党校的同志们商量了一下，我们党校准备要读几十本书。中央的理论学习计划在整风以后，还要继续执行。我们党里有相当多的干部，每人要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有经验的同志们，不久我们要读起来，以前我们读了一些，没有这样多。从前党内有这样的两千多人，高级的同志每人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恐怕我们就要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在明年就要开始做这个工作。三四十本读得了读不了呢？读得了。在党校有

一年半。就很好了，没有一年半也差不多。有许多书一个星期就可以读完一本，像《共产党宣言》那样薄的小本，不做别的事，一个星期读完一本，一个月读四本，十个月就四十本，读了四十本就差不多了，眼睛就打开了。在座的同志们，工作的同志们，假如有计划，三年的工夫可读四十本。从《共产党宣言》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可以选三四十本，有些可以读二十几本，有些甚至读几本，主要的读几本，最高的要读完三四十本，在座的同志有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党校的同志有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这样实行，这样计划，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三个历史，再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这样就把我们的党大大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要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化就能化得更好。现在我们很弱，马列主义的战士很少，理论方面很弱。因为很弱，所以□□同志也讲到，为什么朱理治那一套在这里能出卖呢？居然还有人信他的。有些人不信他，又不能很好提出意见说服他。为什么许多人信他的呢？为什么许多人不能拿很好的武器和他作斗争呢？这就是因为我们很弱，在理论上很弱。现在我们要增强理论。增强理论办得到办不到呢？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觉得自己对于很多马、恩、列、斯的书很难清楚，很难读懂，自己没有信心。关于这个问题，这几个月的整风学习是解决了的。我看见许多以前认为自己对马列主义没有可能学到的这些人，现在有转变了。以前他们认为读马列主义大概就是些专门读马列主义的人才能读通，这件事是他们的事，至于自己虽然很想读，但是没有可能读的。最近在二十二个文件学习中间，引起了他们的信心，建立了他学习马列主义可以学到的信心，一点点地、慢慢地学是可以学到大大地引起他们读书的兴趣。因此在这次高干会议以后，我们

应该有一个学习运动，看书能看进去的同志，能看懂的同志，我们要有这样的目的，一个人选择几十本书，认真地天天读，一遍一遍地读，在职的三年为限，学校的十个月为期，一定要实行斯大林讲的第二条。实行这第二条，使我们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如果不然，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是不能那样讲的，不能讲我们就是布尔什维克化了。

第三条：“必须使他在制定口号和指示的时候，不是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和历史的比拟，而是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仔细分析的结果，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

我们做决议案，提出口号，向全党，向下面以及向各地作出指示的时候，根据什么呢？斯大林同志讲不应该根据一些东西，而应该根据另一些东西，即不应该根据背熟了的公式、历史的比拟，而应该根据什么呢？根据革命运动中的具体条件，这一条拿我们前一年的历史来说很清楚，斯大林这一条我们很容易理解，首先应该根据这样的东西，有两样东西都可以根据：一样就是公式，历史的比拟；另外一样就是根据革命运动的历史条件。过去我们所犯的错误、所发生的毛病就是根据了第一样那个东西，如果实行他这一条就没有这种错误与毛病。过去我们在历史上犯的几次错误，恰好就是没有依照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如你们这次会议中，像朱理治、郭洪涛他们那些“指示”，他们根据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讲“优势劣势问题”，国民党加日本他们说敌人处于劣势，而我们则变成优势，那时全国红军有多少呢？在提出这种优势劣势的时候，全国红军不到十万，后来也只有十几万人，具体的条件很清楚：一个是多数，多数多到哪个程度，少数少到哪个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在口号中间还有一个“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讲过，把这三千人一个

一个地摆起来，也不能打通国际路线。（笑声）你只三千人怎么能打通国际路线呢？还有“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的口号，这也差之不多。（笑声）但三千人从洛川到鹿县的六十里恐怕也摆不够，三千人可以摆多长呢？一个人也只能有这样宽，再有一个胖子也不过这样宽。（笑声）况且还有小鬼。要从具体条件出发。这是根据具体条件吗？不要在稍山里边建立工会，工人根本没有，可是一定要建立工会。还有一个口号是要“打中心城市”，还有一个口号叫做“决战”，朱理治的文章里就有决战这个口号，提出决战那个口号时，还要打中心城市，拒绝做会门工作，拒绝做土匪工作，他们发出的就是这样的指示。恰好另外一些同志和他相反，如□□□、□□他们制定的口号，他们制定的指示，他们要做会门工作、土匪工作，把会门工作、会门斗争的形式，变成对我们有利的形式，把土匪工作、土匪的斗争形式变成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形式，如和军阀联络一下，朱理治说这就是和军阀勾结，我们不是和军阀勾结，而是利用他们。那时全国积极要求抗日，我们要打击在野的党派，在朝的打不倒就要打倒在野的，人家已经在野了，你还要打倒他？（笑声）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世界上哪里能找出这样的文件，这样的指示？（笑声）为什么这样？这也因为外国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引用历史上的比拟，所以也要写一下。我们也要搞一个集体农场，因为过去苏联有过。要打中心城市，或许是因为在北伐的时候打过武[illegible]，外国——现苏联也打过彼得格勒，于是我们也可以打中心城市[illegible]？这是不是周密分析的结果呢？这种口号、这种指示是不是对中[illegible]革命的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呢？关于那个时候对国际、[illegible]内的革命具体条件，并没有作过分析，或者作过分析，但这个分[illegible]完全是不合实际情况的。因此造成许多笑话，造成大错。另外斯

大林还讲到，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各国的革命经验。他这里把国际、国内的具体条件作周密的分析放在第一位，而要不要考虑国际经验呢？他讲必须要考虑，不考虑国际经验不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广大的经验，苏联是革命已经胜利了的国家，这样好的经验你不要，完全靠自己搞，完全要自己来，对不对？不对的。但应当把这一部分放在后面，把那一部分放在前面。以前有一种译本是把后一半放在前面的，现在有正确的译本，首先要照顾到国内国外的当前的具体情况，并加周密的分析。我们制定的各种口号、指示，就应该是依据这些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的结果，应是根据这种周密分析的结果来制定口号、指示，同时必须考虑到外国的经验，但对外国的经验要恰当地估计，不是硬搬。

从前在这一点上的缺点就是硬搬。要知道外国经验是在外国当时当地，所谓它的时间、地点、条件的东西。我们中国应当考虑到人家这种经验，而且必须要考虑，但是必须要估计到两种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外国反对自由主义，外国反对德波林，我们也反对自由主义，我们也应该反对中国的“德波林”。但是，是不是一样呢？不消说，自然不能一模一样。苏联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现在也要肃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我们要不要采取那个经验呢？当然要采取的，但是一模一样的搬取就不行。在外国，在苏联有过清党运动，我们现在也要把党来一个洗刷。要不要采取外国的苏联的经验？要采取外国的经验，但主要应从我们国内的具体情况加以周密的研究分析。比如王实味确确实实是个托派，吴奚如确确实实是个特务，边区里也确实有一部分党员是党棍，是坏人。我们对这些人，对我们党员，要一个一个具体来看，要按照具体条件来处理，同样也要考虑到外国的经验，正如上

面所讲的，制定口号这些东西都必须注意。比如我们刚才讲过的历史上有许多缺点，许多口号制定得不确当，糊里糊涂制定口号，像朱理治、郭洪涛制定的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今天有些什么口号，有抗日统一战线，抗日的口号制定了没有？制定了，是怎样制定的？是从当前具体情况出发制定的。像国共合作，各阶级合作。又比如，从前我们有一个八小时工作的口号，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口号，但八小时工作制在中国现有条件下，是一个宣传口号，不是一个行动口号，而不是像过去某些人所认识的那样，在农村里马上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朱理治、郭洪涛就要在稍山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我们现在还是十小时工作制，……八小时工作制只当作一个目标。将来全国工业发展了，到那个时候一定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苏联现在工业发展的结果，实行了七小时工作制，比八小时还减了一个小时，所以，八小时工作制度只是一个目标。另外，过去还提出了不分富农、中农的田的口号，今天我们提出了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以及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所提出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国内外的具体情况加以很周密的分析呢？是不是根据这些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而制定的呢？是根据周密的分析，周密的研究。如减租减息、缴租缴息的口号在今天是适用的，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是有效的。又比如三三制的口号，是不是根据当前国内具体条件周密分析的结果呢？是的，我们周密分析各种经验，认为要实行三三制，所以我们开参议会，我们和各党派人士合作。我们今天实行三[illegible]制是糊里糊涂制定的呢，还是周密分析以后制定的呢？是周密分[illegible]以后制定的。十小时工作制度、减租减息、缴租缴息、三三制、[illegible]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总口号）都是这样制定的。今天整顿三风、精兵简政这样的口号提出来了，如整顿三风这个口号，是糊里

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呢？回答说，我们现在确有需要。精兵简政是糊里糊涂提出来的呢，还是确有需要？项英同志很早以前即提出了精兵主义，这在当时是不恰当的，只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才恰当。这是在现在这样具体条件下我们加以具体分析的结果而提出的口号，各地方要实行，就要讨论，我们边区一定要实行精兵简政。有些同志在去年参加过参议会，在参议会通过精兵简政以后，并没有加以周密具体的分析，因此不能够进行彻底。精兵简政过去不止进行过一次，为什么会进行得不彻底呢？就是因为没加以周密分析，没有把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比如我们边区有多少人，要穿多少衣服？这中间是有矛盾的，老百姓少，公家人多，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发展生产，一方面要精兵简政。究竟在今天能够简多少？政府系统、党的系统、民众团体系统，执行这个精兵简政政策的时候，也应该有一个精密的分析；像现在西北局、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他们所做的那些工作，是先加以具体的周密的分析，然后再加以具体的规定，这个工作作风是对的，不是那样糊里糊涂地说现在要精兵简政了。以前简过好几次都说没有简彻底，那就带了一点糊里糊涂，几次精兵简政都没有实行好，没有彻底。糊里糊涂，没有加以周密的分析。所以斯大林讲的这一条要不要注意呢？我看斯大林讲的这一条很重要。我们要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就要注意这一条。如果没有这一条行不行呢？如果没有这一条就不行，就要以洛川为中心向三边发展，就要打通国际路线，在稍山里建立工会，搞集体农场，打大城市，再搞肃反把马列主义者肃掉，这些经过具体分析没有？没有，就是糊里糊涂乱杀一顿。斯大林讲这一条，就是讲我们要具体分析，所以这一条就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思想方法，是两个看问题的方法。我们拿前一年的历史反省一

下，过去凡是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同时顾及外国经验，那工作就做得好，反之，不注意对具体条件加以周密分析研究，工作就做不好，结果制定的口号、政策就不合实际。不合实际的口号、指示就一定行不通，做不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论，这是第三条。

第四条：“必须使党在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

这里有个第四条，后面有个第十二条，都是讲检查，但这两条的意思是不同的，这条里的“检查”指什么？主要讲检查口号、指示、实行原则的路线；后面是讲检查工作作风，这个路线的实行，口号的执行，具体的工作。第三条说，要根据对革命运动所处的国内外的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来制定口号和指示。这是一个方法论。但是单有这一部分够不够呢？不够的，因为你说是根据具体条件的仔细分析所制定的口号、指示，方法论还没有完。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所制定的指示要在实践中间得到证明。理论从实践中抽出来又在客观实践中得到证明。第三条讲的这个从实际调查中抽出来就是讲所谓调查研究。口号、指示、决定、决议案，就像你们现在所做的讨论的东西，从实际反映，成为口号、指示，这是方法论的，第一条。还有一条，你们说正确吗？那么那时他们也讲根据实际呢？[illegible]理治也讲的，他也是根据国际形势有两个世界的对立，国内形势有两个政权的对立等。要在实践中考验，结果是白区十分之十、苏区十分之九搞掉了，在革命烈火中检查这个口号，检查结果怎样呢？烈火中那个可谓烈矣，国共两党十年内战可谓烈矣，检查的结果，那时的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呢？不正确的。像打中心城市、[illegible]山里建立工会、打通国际路线、肃反这些东西，无论哪个都是不

正确的；而另外一些东西是正确的，□□、□□□倒是正确的，岂不是革命烈火斗争检查正确不正确呢？朱理治、郭洪涛不信我们试试看，使得使不得，不然就转弯。现在我们的指示，我们刚才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三制，减租减息，缴租缴息，十小时工作制，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等等。像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政策，这些口号，这些指示，究竟跟实际合不合？我们要来检查。比如我们过去党内的教育制度，学校的教育制度，我们检查这个制度合不合教学的方法？我们检查结果是教条主义的教育方法。那么怎样？就要改。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马列学院，党校也算火焰，教育了一两年检查一下，检查里头有教条、里头有三风。过去我们边区有两次作了精兵简政的决定，现在实行了几次，在今年春上，检查的结果，还不彻底。今年我们这个高干会，决定了许多，这次高干会以什么为准呢？开这个会是不是正确？我们承认是正确的。如果不承认正确，那我们就不要作决议，既然作了决议，就要承认是正确的，是根据具体条件周密分析，这样作出来的。但是是否正确？不在于嘴上讲的，究竟怎样？最后的证明要在你去做，做对了就是对。但在做的过程中，不对的还要修改，你这决定的许多东西中是不是每条完全对？如果每条完全对，那是你周密的分析很恰当；如果还有一二条不对，那就是周密的分析还差。一切中央的指示、口号、决定都是这样，不能糊里糊涂地讲中央一切都对。这样讲的人是盲目的，是一个没有觉悟的人，我们说现在中央的都对，这是因为中央过去有这样多的经验，有这样大的胜利，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现在是比较慎重地解决问题，是来一个周密的分析。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正确？只有在实行以后，证明这个东西以后，才能说正确，不然是不能说的。中央不能说自己提出来的口号、指示一经

提出，不要证明，就是正确的，不能这样说的。如果可以这样说，斯大林的第四条提出来做什么呢？岂不是多余了吗？理论是从客观实践中抽出来的，又从客观实践得到证明，这是第四条。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一讲出，那就完全正确，这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是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考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是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可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宣言，而在他的行动。朱理治、郭洪涛他们的宣言，我看也差不多，他隐瞒党，单把他所说的所讲的一点和过去比，有进步，但我们相信不相信呢？在他作出以后，过去他隐瞒党，以后不隐瞒党了，过去胡乱搞，今后不乱搞了，过去犯错误，以后不犯错误了，过去破坏党，以后不破坏党了……那时我们就信了。马、恩、列、斯告诉我们说：宣言、决议案这些东西，不是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检查一个党、一个干部、一个同志的主要标准是在他实行的结果。所以第四条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主要的。一个人做事是有计划的，他要做决议、口号，没有第四条是不行的。单有第三条，没有第四条是不行的。

第五条：“必须按照新的革命的方式来改组党的全部工作，特别是当社会民主党的流毒在党内还没有清除的时候。这样党的每个步骤和每个行动就能自然而然地使群众革命化，使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受到革命的训练和教育。”

这一条讲什么东西呢？这一条就是讲工作作风，他这里的原意是不要社会民主党的作风，要有布尔什维克的作风；不要有改良的作风，要有革命的作风。因为社会民主党那时就没有革命的作风，而是一种改良的作风，所以应当把党的作风改造过来，放在新的革

命的基础上，新的革命的步调上，新的革命的精神上。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第二国际是改良主义统治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是从那种改良主义中分裂出来的。第三国际是从第二国际分裂出来的，因为它不革命。条件变化了，今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民主党呢？它是改良的作风，它没有办法领导无产阶级去革命。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党，列宁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新的党。各国按照布尔什维克作风建立了共产党，如法国、俄国、英国、美国和我们中国。这样的作风，他这指示、口号、政策、作风实行以后，自然而然地使群众一天天革命化，使工人农民就不再那样想改良，不再妄想第二国际想的那一套，使他们一天天革命化，教育广大的群众，他讲的本意就是这个。这对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没有。□□□同志的文章讲得很好：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中国党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左”，犯过许多大的错误。一个是右，我们今天讲这一条，应该讲什么呢？就应讲反对自由主义。现在我们党内自由主义相当浓厚，同时我们当然还要反对过“左”的，比如征粮工作，不调查乱派一顿，命令主义。这样实行能不能让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呢？这是已经革命的地方，还可以使他们更革命，还需要他们更革命。比如，当兵打日本，要出公粮，就是革命工作，命令主义能不能使边区农民自然而然地出公粮、当兵呢？不能的。同时我们有自由主义，就是刚才讲的。党内有很多的坏蛋，有王实味，有吴奚如，我们中央研究院，过去的马列学院，这具体的例子，是不是一种新的作风？那里头缺乏新的革命的作风。我们鲁艺，在报纸上看到，在□□同志领导下，现在转向新的革命作风。你说过去就不革命吗？不对的，过去也是革命的。那里有很好的新的革命作风，使得群众

自然而然革命化，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鲁艺的学生，这都是群众。怎么样使他们自然而然革命化？我想具体的步骤就是整顿三风的办法。在这个月中间，你们看中央研究院，在范□□同志的领导下，整顿三风是在新的革命步调下实行的。这些步骤，使中央研究院的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使得鲁艺的群众，在□□同志的领导下自然而然地革命化。现在每一个机关，比如解放日报社，五湖四海，集合了许多人，要特别注意自由主义。我们边区这地方有党校，有边区师范，有财政系统，有银行，有各种机关，从各方面来的人都有，大家不熟悉，不了解，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倾向，我们就实行这种步骤，叫做整顿三风，实行这一种比过去更进一步的新的革命作风，使这些人自然而然革命化。比如什么笔记啊，漫谈会啊，大座谈会啊，小座谈会啊，传观笔记啊，开展批评啊，实行这样的步骤，使得这些人自然而然地革命化。全边区要实行这个步骤？你们回去也要实行这一条。我们过去的作风，有许多不健全与不正确的地方，那是改良呢，还是革命化呢？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传统，我们拿每一个口号、每一个指示、每一个动作，使干部、使群众有新的革命作风，这样使学生自然而然地进步，使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效率自然而然地提高。过去，不安心工作的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是存在着实际问题，很多的人，天天想调动工作，是不是事[illegible]呢？是的。有多少呢？不止一两个，有好几百、好几千个在工作[illegible]位上不安心，因此我们就来一个适当的解决，就是整顿三风，自[illegible]批评，这样一来，他们就安心了。他们调动工作也愿意了，从前调动工作哭哭啼啼，讲价钱，现在觉悟了，已革命化了，已进步[illegible]。斯大林讲“改良与革命”对我们有没有用呢？有用的。但是对社会民主党问题，我们是没有的。我们有的问题，命令主义，自

由主义。这些东西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新的革命作风。我想这样来解决，这样来实行这一条，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党内的广大干部，党内的广大群众，这样来培养教育广大青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培养和教育边区这一百四十万人民，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三四十个工厂里的工人和工作人员，这样来培养和教育各个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这样来培养和教育我们军队里的干部和士兵。是不是应该这样做？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我想是应该的。这第五条对我们是有用的。

第六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最高的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混为一谈）和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混为一谈）结合起来。不然，党不但不可能教导群众，而且也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不但不可能引导群众并把他们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能倾听群众的呼声和预料到他们的迫切需要。”

这里讲这一条要把原则性，要把革命的原则性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不然，党就不可能教育群众，而且不可能向群众学习。你要讲要教育他们，要向群众学习，要倾听他们的呼声，我们对群众的关系是：一方面要教育群众；一方面要向群众学习。如果不是这样，想把革命的原则同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不联系群众就不能教育群众，就不能向群众学习。你只讲党的最高原则是不行的，党员的作用是指导群众，联系群众，教育群众。不联系群众，你有什么办法教育群众？有什么办法向群众学习呢？你不联系嘛，教育个屁。教育不了，学习不了的。你不联系就脱离，你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不仅不可能引导群众和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而且也不可能倾听群众的呼声，以及推知群众的迫切需要。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群众脱离了关系你怎么提高他呢？要把群众提高到党

的水平，先锋队的水平，将来，几十年、几百年以后，逐渐地提高到了党的水平，那时共产党就不要了，全世界的阶级都废除了。阶级废除了以后，群众的文化发展了，教育发展了，群众跟党差不多了，那时候党就不要了。我们现在在革命的过程中，就要这样逐渐地教育群众，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如果不联系不接触群众，那怎样去提高他们呢？而且也不可能倾听到群众的呼声，你怎样知道人家的迫切需要呢？人家的迫切需要是要打游击，他们迫切需要的是农民的事，而你在这里要在稍山里建立工会；人家需要的是分土地，你需要搞集体农庄；人家需要十小时工作制，你要搞八小时工作。

这第六条是讲群众工作问题。斯大林告诉我们对于群众工作要“把群众的日常生活上的需求同基本要求联系起来”，基本要求就是最高原则。但是用什么方法去搞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呢？这就要依据具体的条件，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环境，要求低一些，比如破除迷信是最高原则，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话一说出来，就到处破除迷信，到处打庙，就发生了问题。比如在×县有一个庙打了，老百姓就不高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是先锋队，我们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我们主张破除迷信，知道没有什么神与佛，我们是不要庙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呢？不知道他们现在还要是有原因的，是因为生活条件、经济条件的限制。比如，外国人开洋船，我们中国人是开木船，开木船就要信龙王菩萨，开洋船就不必信了。木船不信龙王菩萨翻了不得了，洋船翻得很少，很大的风浪也不怕。乡下信观音菩萨，所谓送子观音。破除迷信是最高的原则，如果今天破除了迷信，同志，他们没有中央医院，人家生娃娃生不出来怎么办？生死了怎么办？（笑声）我们有中央医院可进，中

央医院有金大夫，有外国医生，如果生不出，他可以开刀破肚，如果生不出可以挖出来。那就是灵得很，这就不要迷信了。迷信是有原则的，是受生产条件、经济条件限制的。比如我们是反对求菩萨吃药的，但有人要求神，因为这个有两个好处：第一吃了不会死人；第二比较便宜。要是请医生，还要给他吃猪肉，这就要好几元钱，还要送“色对”。医生的药有时还要吃死人的，其实如果到处有西医，如果中医进步的话，那么求菩萨也会减少。我们这破除迷信是个最高的原则，但我们现在应该迁就他们。比如婚姻自由是我们的一个最高原则，现在《解放日报》写了一篇文章，相当地鼓励了这点，而“统统是乱七八糟”（此处未听清楚）。我们说不要破除迷信吧，这就是忘记了最高原则。中国讲民主，但在重庆、西安去讲是不行的，我们现在忍耐一下。所以要把最高的原则性同群众当前的日常要求联系起来。不要忘记了最高的原则性，破除迷信、婚姻自由、民主集中制、社会主义、集体农场、打大城市……最高原则不要忘记，这个原则是我们建立党的最高目标，忘记了就不算共产党。可是还有一条，一定要按照群众的要求。今天能够办到的，可能做到的，就这样来做，这样才算与群众密切联系，才算与群众接触了。彭湃同志在海陆丰，他在那里自己也去敬菩萨。彭湃同志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他是一个大学生，又是一个留学生，他是一个地主，又是全国农民运动的大王，是个共产党员，是中央委员。他怎样做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是二月十九日拜观音菩萨，你也去，他们就说你好。如果不去，他们就说你不大好。为什么不相信菩萨呢？我看你这个人不大正派吧，菩萨不可信，我说我们就来信一下吧，你说我相信菩萨，人家看到你是大学生，又是留学生，看到你相信菩萨，人家说，你是个好同志，群众见了你就请你

坐下来，就请你吃茶，这就是联系了群众。还应该穿群众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如果戴这样高的拿破仑的帽子，穿一双皮鞋，手里拿着司的克，这样就不行，一定要穿农民的衣服，要同群众打成一片，要迁就他们的落后，要接近他们，同他们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这样就可以教育他们，也就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就可以懂得他们的迫切要求。我们懂得了以后就要慢慢来，把土豪打了，田地一分，菩萨就少了。在中央苏区就只有老太婆还相信菩萨，特别是有儿子在军队里当兵的老太婆，她们还相信菩萨，她求菩萨保佑她的儿子打胜仗，如果她有几个儿子在军队中，或者死了儿子的，她就更相信菩萨了。而在一般的群众中就不相信，特别是青年人不相信菩萨，因为他们是身强力壮的，靠自己，所以他们不相信菩萨。老太婆相信菩萨，她们是有各种原因的。这是一条，就是群众工作的原则，要把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一个是最高的原则，一个是联系群众，最高原则不要变成了关门主义，郭洪涛、朱理治他们搞的是关门主义；联系群众不要变成了尾巴主义。敬观音菩萨敬一次还可以，如果天天敬，这样就把共产党混同于老百姓一样了，就变成了老百姓的尾巴。人家天天敬观音菩萨，如果你也天天敬观音菩萨，这样地相信观音菩萨，你就放弃了最高原则性，相信菩萨要能把握住最高原则性。苏联还有教堂，但是现在全国的教堂已经没有用处了。现在只有几个老太婆还相信，在高加索有几个地方的老头子、老太婆，他们还相信，他们相信也就让他们相信，但是不要跟他们做尾巴。苏联天天反对信宗教，信宗教有信的自由，反宗教有反的自由；信宗教的宣传宗教，反对宗教的也宣传反对宗教。信[illegible]教的，他们天天喊上帝万岁，如果取消了反对宗教，专门宣传宗[illegible]也天天喊上帝万岁，那就变成了尾巴主义。这一条是群众工作

的原则，应该不是关门主义，又不是尾巴主义，要作两条路线的斗争。

第七条：“必须使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善于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革命的冒险主义混为一谈）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混为一谈）结合起来。”这就是要把革命性与机动性、灵活性这两个东西相配合，如果不然，党怎么样呢？那么党就不可能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可能把无产阶级的日常利益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配合起来。

有些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一条特别提出，第六条着重于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原则，讲统一战线的战略战术，讲斗争的战略战术。斗争的形式，组织的形式，这就是战略战术问题。这一条可以成为一大本书，斯大林每一条都可写成一大本书，第二条是理论，第三、第四条是唯物主义，每一条都可成为一本很大的书，第六条讲群众工作，第七条讲统一战线，斗争形式，因为我们不但有部分基本群众，而且有一部分别的阶级、别的集团。我们革命要按照可能性，可能与他们联合就同他们联合，这里有一个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比如我们的三三制，这个三三制是最大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我们要把不调和的革命性同灵活性配合起来，我们曾经打倒过地主，现在要联合地主，实行三三制。过去曾经没收过地主的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与缴租缴息。这个办法叫什么呢？叫灵活性、机动性，这是不是丧失了革命性呢？托派这样讲我们，也说我们投降了资产阶级，投降了国民党。过去我们同国民党作战十年，今天日本人打来了，又同他联合，这叫做灵活性、机动性。而托派说我们反革命，投降了国民党。我们说相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他们说我们投降了资本家。所以“左”倾的人就拿这些话来骂共产党，说共产党是右倾。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做《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讲的就是这个第七条，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那时候欧洲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的共产党中有些人提出反对打迂回，想在一个早上革命成功。莫斯科的革命成功了，我们还做什么国会工作，他们反对做国会工作，也反对利用国会做讲台，他们反对同社会民主党左派联合。列宁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作了这本书，过去不大注意它，郭洪涛、朱理治过去就没有看过这本书，也不忠实这本书，看，也是眼花了没有看进去，而这上面许多东西都讲了，第三条上面的东西大概那上面也讲了，那本书上主要讲了统一战线问题，讲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如果不讲灵活性，只讲革命性，那么有没有可能来掌握各种斗争形式、各种组织形式呢？没有可能的。

要只讲打仗这一种斗争形式，这种斗争形式是主要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形式。八路军、新四军要不要灵活性呢？我们去开参议会。去开国民参议会，这个要不要呢？我们还是要的。我们还是要到重庆去开国民参议会。就拿日本占领区、沦陷区来说，八路军在华北打，新四军在华中打，天津、北平、上海、冀中现在是日本占领了，我们岂不是束手无策吗？人家占领了，我们打不出，我们有没有办法？我们有种办法，叫做合法斗争。伪军是合法的，人家承认的，我们可以利用伪军，在伪军中做点工作，比如像怠工，这不是很大的违法，如今天推托出发，修路推迟两个钟头到工也不算很大违法，这就是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过路，晋西北老百姓在沦陷用怠工的方式不去修沟，有几个区的老百姓就不去修沟，这是合的，是在合法形式下进行的。八路军、共产党提出这样的口号，

但沦陷区老百姓要提出这样的口号，头就会不见了，那一个区域的老百姓，李四张三跑出来说："日本人，我们打倒你。"那他的头就保不住了。要搞合法斗争，你老爷叫我修路，好吧，回去后就可以少修一点，可以不修一点。现在日本士兵开了代表大会，有很多条要求，在《解放日报》上登了，在各个地方都做了。那些要求是什么呢？要日本人发手巾，要日本人允许炒菜馆子存在。这是什么斗争形式呢？这是合法斗争。因为炒菜馆子是日本人承认的，因为法律上有，后来不承认了，发手巾法律上也有，现在不承认了，可是没有手巾就不能洗脸。这是合法斗争，这个如果实行了，手巾发了，炒菜馆子也能存在了，也就满足士兵群众之意了，那么这个合法斗争就胜利了。没有手巾就发动斗争，这就慢慢把觉悟程度提高了，变成为群众运动，这样的一次、二次、三次就慢慢地把群众的革命性、积极性、觉悟程度提高了，这就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讲："布尔什维克三次革命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国都是最丰富的。"的确，是最丰富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十五年中（一九〇三——一九一七年）经过三次革命，有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流血斗争与不流血斗争。这一方面，中国的经验也许还要丰富些，因为我们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是同时存在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〇五年以前没有苏维埃，只可以作些合作斗争。我们不然，我们过去十年内战是非法，可是在白区我们可以作些合法斗争是他们许可的，如搞合作社、黄色工会。那时□□同志搞黄色工会、合作社，讲他是机会主义，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在国民党区内可以作两种斗争：一种是利用合作社、黄色工会、学校等等作合法斗争；另外还可以搞非法斗争，白区也有暴动示威，只要条件可能，虽然法律不允许，我们还可以做。在

日本人区域也是一样，在日本人区域作非法斗争，有时还不适宜，有时还是要的。现在法国、德国立刻准备推翻希特勒的斗争是必要的。我们演过一个新木马计的戏，它所写的斗争是什么性质呢？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两种，像神秘的不能使人知道的那一部分是非法的，像可以同人家合作的，如要求加工资。章程上有的他不做，我们就要求，这是合法的斗争。新木马计描写了这两种斗争，比如《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做了新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帮助我们打宋江的那就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就是合法的，但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中国的三打祝家庄，外国的新木马计都是这样。单单有一种斗争形式，只有合法斗争，没有非法斗争也不行，如社会民主党。单有非法斗争，没有合法斗争是“左”倾。列宁曾批评过“左派”幼稚病，要把这两个东西配合起来，要有灵活性。现在联合整个世界反对法西斯，这个阵线包括罗斯福、丘吉尔，还有我们中国的国民党，包括范围这样广大，苏德协定并没有放弃和英美的关系，苏联的大使还在英美，而苏德协定破裂的时候，英美苏协定便建立起来。英美苏合作不成功，因为张伯伦反对，要搞慕尼黑。张伯伦要联合希特勒[illegible]苏联，我们让他们打张伯伦，我们要和德国合作，因为他要联合[illegible]国打我们，德苏协定，德国和我们订条约。张伯伦到了胜利就变了。实现公开化就是去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的苏德战[illegible]。英美苏等国的联合，灵活得很，如果没有这样的策略，不采取[illegible]样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就不行。有哪些组织形式呢？英美协[illegible]工会、青年大会，美国也有个青年大会，援军青年大会，有中[illegible]表，有美国代表，这是组织形式。要灵活地运用各种组织形式

来达到革命的目的，只有一种死板的固定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是不好的，斯大林专门一条讲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的问题，要有最高的革命性，同时要有灵活性。从前是打倒国民党，西安事变的时候我们变化了，我们联合国民党。人家进行反共高潮和我们斗争，我们只好斗争，等到形势能够转变的时候，我们立刻放弃斗争。阎锡山搞新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援助新军。当那时候我们能够搞好，我们便和他搞好。斗争的手段是为了达到团结，我们要有理有利有节。今天只讲这一点，下次再讲。（鼓掌）

今天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关于第六条、第七条还有些同志不大清楚，为什么原则性不能和关门主义相混淆？为什么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不能和尾巴主义相混淆？底下又说，为什么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能和冒险主义相混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不能和迁就行为相混淆？关于这一点，这个原则性，他是说与群众最广泛的联系及接触的最高原则性，这是讲我们做群众工作，我们对基本群众，比如讲群众里面有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要把落后的提到先进地位，要把群众提高到党的水平，提到先进的党的水平，这就是最高的原则性和最高的觉悟性，但是不要离开群众，这里头不要有关门主义，所以讲不要与关门主义相混淆。如果讲原则性，比如拿党内来讲，经常有许多同志所谓提高到原则的高度。比如在中央苏区，有一个学校里头，就是关于吃辣椒的问题也开展斗争，把吃辣椒提高到原则高度，说不准吃辣椒，如果吃就没有原则，提高到原则的很高程度，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这哪里是原则性呢？这种东西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是乱用原则。这叫做原则？这个不叫原则，这叫做关门主义。这样只能搞一个不吃辣椒的党那么吃辣椒的人都不能进来。所以有许多关门主义假借着原则性

他们的口号是原则性，实际上不是原则性而是关门主义。我们要善于区别，不要把原则性同关门主义相混淆。原则性是广大群众他们所适合的，广大群众今天不适合，将来也是适合的。比如前天讲破除迷信，这一点要破除，但今天广大群众信迷信立即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是不行的。我们怎样把广大群众的信迷信提高到先锋队的不信迷信？这就要和广大群众接触，逐渐地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工作。在这个陕北，你来破除迷信，你来提倡婚姻自由都要注意这一条。所谓原则性，我们要善于区别。有些人假借原则这个名词而实际上是关门主义，那是实际上不要原则性。至于联系广大群众时又不要忘记了这个原则性，最高的原则性不要忘记了。如果忘记了，比如迷信的破除，今天老百姓是信迷信的，因此我们就不做破除迷信的宣传工作，一切信迷信的可进工会、农会。你讲在我们党内也有少数人信迷信，也有的，我们陕甘宁边区三万个党员，你说一个也不迷信吗？信迷信的还是有的，还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赞成婚姻自由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能拿信不信迷信，拿赞成不赞成婚姻自由来作为检查党员的标准，要拿另外几条作为标准。我们跟群众最广泛地联系，但不要做群众的尾巴，不然就做了群众的尾巴。这叫做最广泛地联系但不能做群众的尾巴。最广泛地联系是一回事，做尾巴又是另一件事，因此我们讲最广泛地联系不能与做尾巴相混淆。我们讲最高原则并不是脱离群众，但我们要向着最高原则性走去。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绝不是关门主义，关门主义是一种东西，原则性是另一种东西。这是讲原则性和落后性，怎么把群众的落后性提高，但不是尾巴主义？我们要经常记得，最高原则性绝不是关门主义。

至于第七条“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

性”，这是讲革命与妥协的关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已经讲了，因为西欧的共产党，他们提出这样的口号：“不作任何妥协。”列宁批评这个口号是要不得的，是错误的。但是当西欧的共产党提出那样的口号的时候，他们自命为“很革命”，自命为“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作任何妥协是革命性。但是他们是不是革命性呢？不是革命性，这是冒险主义，他们不作任何妥协，可是群众的觉悟是这样，他们不利用国会，不利用合法斗争，不看群众的觉悟程度，他们不作国会斗争，不利用其他的合法斗争，就是进攻，这就叫做冒险主义。这个时候要迂回，要妥协，列宁讲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的时候，他说：在党的历史中曾经作过许多妥协，这一妥协要有最大限制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这不是迁就行为，第二国际的行为才是迁就行为。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要和别的阶级、别的成分进行妥协，进行合作，甚至利用敌人。例如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了沙皇的国会，这个国会是敌人的，不是同盟者，但是因为法律上有这样规定：共产党员可以进去当议员，共产党可以以若干票当议员。这时候全国没有大革命，像这样的当然可以利用，如果不利用，这不是革命，实际上是冒险主义，是冒险的进攻。所以需要灵活性，这个灵活性是最大限度的灵活性，比方讲这样的例子，苏联跟德国法西斯妥协过，就是在去年六月以前的德国，曾经订过德苏协定。我们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在十年前就和资产阶级妥协过，在全世界上恐怕中国第一次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共同进行反帝反军阀斗争。甚至现在全世界共产党，除了法西斯国家的资产阶级外统统同他们进行妥协的。在中国是同国民党、同地主，在我们边区是同地主。所以那样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它，至

于资产阶级那是不能的。现在我们不但同资产阶级合作，而且同地主合作，各个根据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抗日。英国资产阶级的保守党，美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中国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祖国苏联都同他们进行妥协，这个妥协不同于迁就行为。这个妥协是迁就行为吗？这不叫迁就行为，这是把不可调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及机动性结合起来了。我们和他们进行妥协，是不是忘了革命，就一直妥协下去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这样想，这样希望，但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妥协不忘革命，革命不忘妥协。（笑声）现在需要妥协，因为妥协有很大利益，而且要同全世界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妥协起来。比如波斯同苏联订条约，波斯的皇帝向苏联妥协了，但这不叫迁就行为，完全丧失立场。革命完全不管，比如张国焘就是这样，张国焘跑出去以后到了汉口，在《大公报》上落了宣言，发表他的意见（这个宣言现在还可以找到），他讲的妥协就是迁就行为，就是完全不要原则性，完全不要革命性，革命与妥协的关系他只要妥协不要革命；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那些冒险主义——九一八以后的冒险主义，在这里开会，你们清算了朱理治、郭洪涛两位冒险主义，他们是“左”倾机会主义，是清算什么东西？他们是不是革命性？他们不是革命性是冒险主义。

这种冒险主义绝不能与革命性相混淆。革命中间的冒险主义，他们的这种冒险主义，他们自称为革命性，自称为是革命理论，自称为是革命的政策，所以有些人也觉得他也有革命理论，也有革命的政策，这是不懂得什么叫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策的人，就糊里糊涂地无疑问地相信他这种宣传，以为这是革命的理论、革命的政

策。但是这不是你搞错了，这是冒险主义。我们讲不可调和的革命性不是和冒险主义相混淆，不可调和的革命性是一个东西，冒险主义又是一个东西，这是两个东西。斯大林讲了，在统一战线中右倾的东西可能增长，所以我们要防止那种借口最高限度的灵活性，实际上变成了迁就行为。典型的是张国焘，口头上是灵活，实际上是迁就。斯大林讲了要我们注意，这是第六条、第七条的补充。

第八条：“必须使党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使他不怕批评，使他善于用自己的错误来提高和教育自己的干部。”

第九条：“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

这两条在《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也分作两条：关于反对机会主义，关于我们自己队伍中间有错误应该批评，这两条分开。在这里第十条的范围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所讲的那个似乎多少有些出入，有些不同，但是大体上意思差不多。现在我们在这里就把《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四条来看看。《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一共有六条：第一条讲党，要有一个革命的党，同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的第一条一样，基本点是一样的；第二条要精通马列主义理论，要有革命的理论，跟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第二条一样；第三条讲工人阶级的统一；第四条讲共产党的统一；第五条讲自我批评；第六条讲群众工作。关于工人阶级统一，第三条就是讲工人阶级统一，工人阶级队伍中间应该是统一的，那些欺骗工人阶级的政党，实际上是反革命政党，应该和他们斗争。要有革命的党，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共产党，列宁式的党，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这样的党，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武器的共产党。工人阶级要清洗自己的队伍中那些反革命分子，要

与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使工人阶级统一，还有就是使党统一起来。

第四条就是讲党的统一，我们就是讲党的一元化。

其次，党史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革命斗争，如果不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投降主义者，就不能有自己队伍的统一和纪律，就不能实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使命，就不能实现其为新社会即社会主义建设的使命。

“我们党内生活发展的历史，乃是在反对党的机会主义集团——‘经济主义者’，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同布哈林分子反民族主义倾向者作斗争并把他们粉碎的历史。”而斯大林分析了这种东西，说应该粉碎，并且说：“也许有人以为布尔什维克为了与党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而耗费的时间未免太多，以为我们把这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义未免看得太高。但这种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决不能容忍自己队伍中间有机会主义存在，正如不能容忍健全身体上有毒疮生长一样。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部队，工人阶级的先头堡垒，工人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决不容许有缺乏信心者、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和叛徒之足。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在己的堡垒中留有投降主义者和叛徒而不同资产阶级作殊死的斗，就会陷于腹背受击的地位。不难了解，这样的斗争只会受到失的结局。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洗出去。”《联共（布）党史》四三三页第八行至第十五行）

这里讲了几种人，讲了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叛徒。比方会主义者，如果他不是叛徒，那就是机会主义者。但是党除了

对机会主义者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还有叛徒，比如王实味、吴奚如。前天讲了吴奚如表面是共产党，实际上给国民党做事，这叫机会主义者嘛！王实味是个托派，他在这里组织五人反党集团。这叫什么？这类叫叛徒。机会主义者就是在政治上，比方讲，这一次你们开了十一天会，清算了过去的历史，朱理治、郭洪涛过去那一套搞在陕甘宁边区来损害党，损害革命。这样的前方堡垒——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内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么在进行斗争的时候是什么呢？前面是敌人，后面也是敌人，堡垒中也有敌人，参谋部内也有敌人，结果捉了许多人，把□□同志、□□□同志也捉起来了，杀了二百四十个干部，几乎把领导人都杀了，把大批共产党员都杀了，□□、□□□也几乎杀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的。这叫三打祝家庄。一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二打祝家庄打不进去，三打祝家庄打进去了，为什么打了进去呢？小说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不但正面进攻打进去，而且那堡垒是从内部夺取的。新木马计告诉我们，要我们从内部夺取。我们对敌人的态度如此，敌人对我们的态度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自己，我们堡垒里面，我们党里，特别是我们领导机关，这个危险在什么地方呢？危险性就是在最高领导机关，像中央、中央局、中央代表团、大代表团、小代表团等这样的权力机关里头有机会主义者。朱理治究竟是不是叛徒？现在要查，查出来是叛徒的话，就是以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叛徒的实质。我们同意一个同志的分析，同意张秀山同志的分析，张秀山同志讲得对，他说他的前途有三个：第一个前途，反对党，退出共产党，走到反革命方面去；第二个前途，继续两面派；第三个前途，改正错误。这三种都有可能。这种分析我认为是很恰当的，这三种是讲现在，将来总有一条，要就是反党

闹事；要就是继续两面派，隐瞒党，欺骗党；要就是改正错误。至于这三种可能哪一种可能性大？现在难以分析，我看我们现在的政策，还是允许他们在党内，使他们进步，这是我们的。但还有他们自己，要他们自己觉悟。如果他们自己觉悟了，可能走第三条路——改正错误，不然就是第一条或第二条。

《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讲什么呢？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到工作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

这里讲到应该看到缺点，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不要骄傲，应该看到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要害怕，应该承认错误，不要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这些错误，要公开地承认，并且要诚恳地纠正，要公开地讲，不要关在小屋子里几个人讲一讲。既然认为是错误，就应该公开地纠正错误，公开地承认，诚恳地纠正这些错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党就不能成领导者。

“如果党不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他就会是不可能战胜的。”

这里《联共（布）党史》告诉我们要在犯错误中间来教育自己，教育干部。如果隐瞒错误又怎样呢？这里讲了，第一，讲应该怎样；第二，讲如果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就会很好，这样党就是不能被战胜的，如果总隐瞒不纠正又怎么样呢？“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用百事大吉的粉饰词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他就会必遭灭亡。”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不是路线问题，所谓机会主义路线问题，也不是什么叛徒、奸细的问题，而是我们工作中个别错误的问题。（这样的）这次这个会，过去十一天是清算过去历史上的问题，以后若干天还有讨论，这个性质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又反对闹独立性反对自由主义的错误，我们要讨论闹独立性的问题，自由主义错误的问题，我们要精兵简政，我们要整顿三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的基本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说要纠正自由主义的错误，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错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犯了独立性、犯了自由主义错误的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隐瞒错误的态度吗？不应该的。对党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应该隐瞒这些事情吗？高干会是党的，西北局是党的一个组织，高干会是整个边区党的高级人员的会议，应该隐瞒自己的错误吗？如果隐瞒这个错误，如果隐瞒这个迫切的困难，精兵简政是不是迫切的困难？整顿三风是不是迫切的困难？如果百事大吉的虚夸来隐瞒自己的缺点，我们边区党的系统，政府系统，军事系统，民众团体中有妇女、工人、农民、文化人等，应该不应该用百事大吉的虚夸来隐瞒自己的缺点？不应该！应该承认错误，应该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人家对我们批评，我们自己也应该作批评。如果党开始骄傲起来，不看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害怕及时地公开地承认、纠正这些缺点，那么党就可能免于灭亡。所以这里讲的，党史教导我们说，我们应该承认错误，应该看到错误，应该及时地公开地和诚恳地纠正错误。

第二，如果是这样地公开纠正错误，承认错误，那么党是不可战胜的。党史再告诉我们，我们党如果不是这样，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百事大吉，隐瞒错误，抹杀迫切困难的问题，一味自高自

大。《联共（布）党史》讲到自高自大，在我们延安也有自高自大，不好！老子天下第一，不好！这里没有讲老子天下第一，你加上一句也差不多，这里讲自高自大要不得，把枕头枕得高高的睡觉，那就要灭亡。

我们讲，如果不纠正错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就要发展，就要亡党亡国亡头，你这个头也要亡掉，二百四十个干部的头亡掉了，□□、□□□的头几乎亡掉了，“刀下留情”恐怕党就不免灭亡。《联共（布）党史》在这里首先引了列宁下一段话：“政党对于本身错误所持的态度，就是表明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在真正执行自己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之一。”对于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考查这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党，是不是认真办事的党，是不是在真正执行他的义务。这个党对于无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义务，这就是讲要公开地承认错误，揭露产生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执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自己的阶级，以至于群众。这种错误是不是包括路线错误？我想也可以包括路线的错误。在一些时，以及不久以前的时候，党的领导机关犯路线错误，因此我们应该公开承认路线的错误。因路线的错误而一直走下去，像孟什维克路线、托洛茨基路线的错误，后面没有做反革命的事，还是革命的时候，那是路线错误，但是不包括成为一种派别的继续的斗争，同党对立起来，以至于走到反革命，这是属于哪一条呢？这是属于第四条。我想这个也可以包括犯大的错误，也可以包括犯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至于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个思想斗争是属于哪一条呢？是属于第五条的，《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告诉我们，要我们有这个区别，要把这第四条和第五条加以区

别。成为党内一种派别，小组织派别，继续他一贯的路线错误，这是属于第四条的。这些应该给以无情打击。在第三条里头引了列宁的话，他说："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极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统一。"对于第四条，要清除出去，要像割我们身上毒疮一样割掉；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至于第五条，就是一个教育态度，就是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对于第三条、第四条，党外反革命的派别，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不能用的。因为小组，小派别，一贯地反党，那不能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对王实味、吴奚如也用治病救人的方法吗？这个不是的。他们可不可以觉悟呢？当然他们也可能觉悟。我们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上写：对于反革命分子或者特务分子，我们给他回头，给他们活路。但是这些人能不能当党员了？不能当党员。过去我们把这个东西，（现在已需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党内长期没有这个区别，没有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区别，把第四条和第五条混合起来。现在我们根据《联共（布）党史》结束语，要加以区别。假如真正是一个共产党员，他们想做好，现在我们能采取第五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之，没有希望了的，暗中采取两面派，继续第二条，第三条，继续破坏党的行为，像第四条中所列举的，像俄国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等等这样一些，没有问题？这些人后期当了敌人的侦探，而他们前期因为一贯错误路线，这些人应该用第四条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去，给他们以无情的打击。甚至还可以救药的，还有希望的，用第五条的态度。我想以后应该这样地分别第四条和第五条。我们的党，现在正需要这样的分别，过去是没有这个分别的，长期在我们党内，对于

这两条是分不清的，差不多犯了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跟反革命没有区别，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

第八条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必须使党不害怕批评自我批评，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能根据自己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里我们解释一下宽大政策，党内的宽大政策和党外的宽大政策不同，这两种宽大政策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内有宽大政策，对外也有宽大政策，但是这个宽大政策不同的，和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的宽大政策是不相同的。譬如像发展党员的决定，一九三八年三月中央有个决定，要发展党员，那个上面说要大批发展共产党员，同时说不要使一个坏分子混进来，这叫做开门政策，大开门，但他同时又关了一扇门，对坏分子是关了门的。你说要宽大政策，是的，我们要大批吸收共产党员，革命的积极分子可以进来，但对于坏分子要关门，对于不是坏分子是革命的要开门。我们的施政纲领是对外的，对外要采取宽大政策。敌人分子，俘虏，特务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他回心向善，不坚决做坏事，愿意改正错误的，应该采取宽大政策，这是不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对愿意改正错误的是宽大政策，但是没讲对任何反革命统统宽大，这样日本人也可以来开会，日本飞机可以降下来在这里添了油再飞上去，（笑声）这是不行的。中央的宽大政策——对党内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是不是像一些同志所想的那样？这不行。我们的宽大政策在实行中有了毛病，有了自由主义，把宽大政策变为自由主义，在各方面生长了自由主义，我们的党务工作有自由主义，

政权工作有自由主义，军队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财政经济工作有自由主义，锄奸工作有自由主义，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有自由主义，以致我们一些部门，有相当多的人，眼睛看不清，像吴奚知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像王实味这样的人也不去看一看。吴奚如、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在我们的党报上，我们的党报会发表不正确的文章。我们党报上的文章是不是统统都是革命的人写的？现在证明有两个反革命的人：一个叫吴奚如，一个叫王实味，在延安反革命，以共产党员的招牌在共产党的党报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其余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吴奚如，第四个王实味呢？这是应该审查的。我们各部门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所谓宽大政策，麻痹了、误解了，解释不正确，而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很多问题不加解释，没有斗争，对于干部保持一团和气，有了斗争是不是原则性地展开批评自我批评呢？很多地方没有。说这是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像这样的执行，不是正确地执行中央的干部政策。有些部门，有些干部没有严肃的态度，强调一方面，缺乏一方面。团结教育，强调了这方面，缺乏另一方面，批评，对错误的斗争。经常教育、斗争性这方面是缺乏的。如果缺乏这方面，这样的政策叫不叫干部政策？至少不能讲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错误的，是有错误的干部政策。干部之间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原则：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有了错误要斗争，要有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化的第八条，也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

我们是不是完全执行了这第八条？我们是不是完全实现了《联共（布）党史》结束语教导的第五条？我们的干部政策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我们党内关系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化了吗？拿斯大林讲

的十二条的第八条和党史的第五条来看，有许多部门，过去如中央研究院、鲁艺，从前的马列学院，那样的自由主义作风，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付马列主义，对付党。我昨天讲过这两个学校改造得很好。从前那种作风——延安许多机关学校的作风，那叫正确的关系吗？那叫正确的制度和干部政策吗？不能的。在那些严重的地方，完全是不正确的；在那些不十分严重的地方，是不十分正确的。我们有些同志不善于发现错误，不愿意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承认这个错误的严重性。所以列宁告诉我们要“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办了没有？没有办。我们就有错误，我们就是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

最近中央关于对党外的宽大政策，有了一个解释，再过几天请博古同志印些单张，在会场上发一发，大家讨论下这个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反革命分子、奸细藏在我们党内，藏在党的环节中，我们不懂得，因此忽视了，好像不大要紧。抗战以来大批人进党，其中混进一些坏人来，他们藏在共产党里，我们不知道，对于这样一些人也采取宽大政策吗？我们现在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是两种斗争，一种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党员是这样性质的斗争；但还有第二种，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这就是对于吴奚如、王实味这样的人，现在我们开始在几个机关里审查，发现这样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座的同志都是高级领导同志，在各个机关里，领导部门里，要非常仔细地注意这个问题，要分别这样的两种斗争：一个是第四条，一个是第五条。第四条是一贯反党的错误路线，后来一直走到反党的那样派别，那样的思想，要无情地打击，清刷除去；第五条

就是讲犯错误，共产党员犯错误，有大的，有小的，要自我批评，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应该区别这两种。当前整顿三风的时期，也正是有这两种：一种是对我们大多数同志，拿中央研究院来讲，一百二十多个人，反革命的只有几个人，那么他们一百一十多个着重自我批评，着重自我教育，是无产阶级思想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对五人反党集团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我们现在有两种斗争，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没有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反对就查不出来，最近两个月，大家学习，整风，发现了这两种斗争，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一个是少数，一个是多数，少数是领导人，多数是群众，多数人要和少数人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们整顿三风也只有少数的领导和多数的群众相配合，我们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两个斗争要少数和多数的配合，一定要有少数人的领导，但只有少数人是不行的。

怎样使我们党完全统一，达到高度的一元性，使我们的心成为一条心，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你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怎样像法？人有男的女的，不一样，老头子和十七八岁的娃娃不一样，高的矮的不一样，我们是讲我们的心一样，不是讲别的一样。我们要一条心，但我们党内有一种人只有半条心，（笑声）完全是无产阶级思想的人是一条心，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它，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是半条心，他要革命，但有许多东西是妨碍革命的。再有一种人是两条心，就是王实味、吴奚如。朱理治到底是半条心还是两条心？这是路线的不同，郭洪涛和朱理治他们是两条心，□□、□□□他们是一条心，这两种人是两条路线的

不同。那么吴奚如、王实味他们也是两条心，他们不但是两条路线的不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在革命队伍中有路线的不同，这是两条心；革命与反革命也是两条心，路线不同实际上是反革命，但他们自己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犯错误，假如朱理治不是反革命故意混进党内，那么是共产党员犯了错误。现在我们要把这两条心分别清楚，路线不对就是要把路线的错误克服。是反革命，革命要把反革命清除出去，要把半条心用教育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过来。陕甘宁边区没有半条心？闹独立性是一条心还是半条心？闹得轻的就是半条心，闹得重的就是两条心，张国焘他闹得重了，就是两条心，在边区大体上说还是半条心。现在党、政、军、民、学，有闹独立性的不是一条心，这样是不行的，我们要步伐整齐。

在这里我们还要讲一下关于批评错误的提法。这一个问题有的同志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有没有这样的同志呢？有。这样的同志不止一二个，有相当的一部分，深怕抹杀了他的成绩。抹杀成绩，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本来有成绩，为什么要抹杀呢？但是问题要看怎样的提法。王实味他有一个提法，我们又有一个提法。王实味他是不讲成绩的，抹杀成绩，只暴露黑暗，他是反革命的，他要达到他的目的。我们自我批评，现在这里有两个文件可以作证明，我在党校二月一号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我们全党成绩的问题，这个报告一共有一万多字，二月八号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也有一万多言，两个文章合起来有两万多字，但是讲成绩的只有一百多字。那么，是不是我把成绩抹杀了呢？我没有抹杀，这里有这样一段：“我们党还有什么问题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我们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和人民一道，在领导人民，向民族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种英勇牺牲的精神，

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成绩，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我在这里讲的只有一百多个字，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一百零一个少一个，（笑声）那就对不起。（此段是按照《整顿党的作风》一文排印，字数比原稿略有减少）

关于我们全党的成绩，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二十一年全党的成绩，我只讲了这一百个字，全文有多少字呢？全文共有二万多字。但是讲成绩我只讲到这一百个字。那么是不是可以讲我抹杀成绩了呢？我不能这样讲，我这里并没有抹杀。我们的成绩只有一百个字，其他都是讲缺点和我们的错误。至于这个错误放在什么位置呢？就是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假如还要多讲的话，还可以讲一点，扯它一长篇，要这样做是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是我们现在是做的什么呢？我们做的是自我批评，不是吹成绩，我们只有这样一句话：“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在已不是占统治地位的作风了。”谁敢驳我们说，现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完全是占统治地位呢？我讲不是占统治地位，这个是上了书的。（笑声）关于理论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我们党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高了些”。再下面讲的就是我们的理论还是不够。你说我统统都讲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吗？和过去一样吗？我没有这样讲，我讲的是比较过去高了些。如果再要多讲的话，也还可以扯它一长篇，但是我们现在是做什么呢？我们是要把缺点指出，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就差不多了。（笑声）

关于知识分子，我们批评知识分子的缺点，骄傲自大，脱离实际。关于知识分子的长处，“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唉呀！那么我们革命知识分子

就了不起！再下面都是讲知识分子的缺点。关于中央“九一”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关系的决定”。怎样估计我们党的成绩呢？我们的统一，我们的团结，估计了没有呢？我们估计了，就是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的统一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团结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配合了全国的抗战。这有什么证据呢？这是有证据的。假如没有统一、团结，乱七八糟的话，那么抗战怎么能打了这么久呢？所以关于自我批评的提法，据我所知道的，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懂得这个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怕抹杀他的成绩，在会议上非要摆成绩不可，那么我们可以雇上一个人，吃饱了饭，一天到晚地说：成绩，成绩，成绩！成绩！……（笑声）这样地讲上一个钟头。如果还不嫌少的话，我们还可以再讲，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开的是什么会？如果是驳王实味，那就不同了，因为他是否认成绩，我们就摆一大堆成绩给他看，他否认成绩，我们就是要成绩。我们有一百个字和这七十个字是讲好的，我们不否认成绩。我们的目的就是讲：我们已经有了这些成绩，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还有毛病，闹独立性，还有自由主义，这有其他一些具体的毛病，因此，有那三两句话来讲成绩就差不多了。再下面就是分析缺点和错误。列宁曾经说过：要我们“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产生错误的条件，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办法”。但是我们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东西，他们不愿意公开地承认他们的错误，不愿意分析错误的原因，不愿意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条件，他们过去不愿意这样，也不会这样搞的。

现在讲第九条：第九条讲什么呢？“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

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

这一条斯大林已作为布尔什维克一个条件，要有这个条件才能是布尔什维克。没有这条就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条讲什么事情呢？对我们现在有没有意思呢？这条很值得我们注意，而且过去我们对这条很有收获。但在许多地方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完全不懂得这条，这一条的重要性他们完全不懂。这里形成领导核心的问题，有中央领导核心，有地方领导核心。中央的领导核心是经过大会选举出来的。斯大林告诉我们，在我们中央领导机关建立的时候要注意地方领导核心，机关、学校、团体的领导核心要不要呢？也要的。没有领导核心，事情办不好。现在我们特别是在一些地方的机关团体中不注意，完全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得很不够。这就是讲如果没有领导核心，真正要办好那里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学校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要办好一个团体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比如说文化团体，没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把文化工作搞好，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青年工作亦是一样。边区应该有一个领导核心。过去在边区工作的同志，相当多的人不懂这一条，似乎不要领导核心可以，似乎我自己就是一个领导核心。（笑）

他觉得，他是一个领导核心，他亦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我也觉得我是一个领导核心，这样就是三个领导核心了。（大笑）因为各人都以自己为核心，那么就是有了好多核心了，但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一个桃子剖开来有几个核心吗？不，只有一个核心。领导的一元化，还是两元化，三元化？什么叫闹独立性？独立性实际上就是多元论，个人自以为是领导核心，（笑）你要附属于我，我是核心，（笑）你们都是我的附属品我便舒服了，这不是实事求是。“九

一”决定便讲这个问题。“九一”决定这里有两种领导核心。边区已经开始实行了，以西北局为领导核心，所有党、政、军、民、学的领导同志都要参加西北局，但是要集中在西北局，不能各人搞一样，在一个床上睡觉，做的梦各不相同，在关中、三边、直属县，陇东、绥德，要建立五个领导核心。别的根据地也是一样，建立两种领导核心。关中党、政、军、民、学没有一个集中领导机关，怎样进行斗争呢？怎样搞经济，怎样搞财政，怎样搞干部教育，怎样和特务作斗争呢？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只有统一才好进行斗争，才便于和敌人斗争。在机关学校中，还有好多同志，不运用这一条。现在中央研究院很好了，过去那种状态好不好？不好！过去那种状态，一百二十个人，像一百二十块砖头，在这里没有分别，没有形成领导核心。那时，王实味他们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即五人反党集团。我们共产党没有形成这样的领导核心。王实味利用整风，墙报一出来，那时便是王实味的天下了，许多人被拉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有讨论，他们有汇报，他们有研究。你文章不会做，我王实味写一篇，用你的名字。他们用多种策略、汇报制度、研究政策研究如何斗争，你写的文章我怎样驳都研究一下。他们有领导核心，但我们没有，所以在前一时期，我们打了败仗。尔后，我们便集合部队，批评我们的缺点，好多已经跑到王实味那边去了的人，由于我们的部队开会检讨了一番，又一个一个地回来了，反过来打王实味了。（笑）中央研究院最近大半年是很可以研究的，是一个很大的教育。现在形成了领导核心，是怎样形成的？是不是随便搞三四五六块砖，便成为领导核心呢？在一百二十块砖中，随便找几块出来，便是机械的凑合，不是有机的配合，这样是不行的。是要从斗争中产生出群众的领导分子，积极的活动的最先进的分子。

现在中央研究院不同了，不仅一百二十人觉悟了，特别有几个人，他们会鉴别王实味、李实味，他们有办法，他们是在斗争中形成的干部，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形成干部。但是现在有的机关、学校，没有注意这一条。平均主义，大家都是干部，不是在同志中，在干部中，依照干部的实际来分析。天天讲分析，自己不作分析。假如分析，总是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的、中间的、落后的三种，只要上了一百个人，便有这样的情况。这次分析边区三万党员，有多少积极的，多少中间的不是很坏的，多少很坏的？我们作了任务。讲党内政策，对于积极分子要团结，在积极分子里，要由一少部分人组成为领导核心。另外还有许多积极分子，仍可吸收他们中有威信有办法的。通过他们去教育很多人，教育不很积极又不很坏的，教育他们联系群众，你也联系一个群众，他也联系一个群众，（笑）这就联系了广大群众，于是乎，大家进步，对少数落后分子进行教育。领导核心自己要教育自己，要进步。很多人进步了，少数落后分子也落后不起来，也不大像样子了。你们联系群众我看就不大像样子。反革命王实味，现在住在窑洞里怕得很，过去王实味谁也去看他，你的《野百合花》写得好呀！（笑）现在是臭狗屎了。我们的鲁艺、延大、党校、解放日报社、军事学院，哪一个部门，哪一个机关，哪一个地方，都要依照这个办法。这是斯大林同志讲的第九条，搞个领导核心。

这个领导核心，究竟有什么条件呢？斯大林讲两个条件，就是“这些优秀分子十分忠诚，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意向的真正表达者；他们有丰富的经验，足以成为能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人家讲是十分忠诚，不是九分，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这里讲的主要是全国全党的领导核心。每一个学

校，每一个机关要十分忠诚。人家说要十分忠诚，你只有九分忠诚，那这个领导核心就建立不起来，就不合斯大林的条件？那也不是的。那也要按照你的情形，要把一百二十个人中间，最积极、最原则的分子团结起来。

十分忠诚，十分有经验，什么叫做忠诚？斯大林同志讲：所谓十分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所谓十分有经验，是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简单地讲就是这样。原文是这样：“这些优秀分子是十分忠实的，足以成为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的真正的表达者，并且他们是十分有经验的，足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真正领袖，善于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和战略的领袖。”他的忠诚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他的经验足以成为领导阶级斗争的领袖。领导阶级斗争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所以他底下讲，要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策略和战略。就是阶级的代表，不是说个人的代表，小集团的代表；来一个宗派主义好不好？来一个派别代表、个人代表、个人野心家好不好？那可不行。斯大林说，这可不行，而是要足以成为无产阶级的代表，阶级意向的真正的表达者。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所办的事，是不是真正的“代表”？“真正的”三个字不要，“革命无产阶级之意向”那几个字也不要，他是朱理治、郭洪涛的代表，是一部分人的小集团的野心家，或者是一个人的代表，他个人的代表，代表他自己。闹独立性，这个独立性到底代表谁呢？代表无产阶级吧！但无产阶级已经讲好啦！无产阶级的总代表是斯大林，（笑声）他在第一条中就讲好了，我们是不要独立性的。而他们呢？又要闹独立性，你们就不能代表，没有资格，资格取消了。这样，领导核心的人，第一条是忠诚，第二条是有经验；忠诚足以成为阶级的代表，不是小集团、个人野心家，闹独立性。在今天，他们足以对付

王实味，足以教育同志。比方在一个学校里，善于拿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又善于拿革命去克服反革命。在各县的同志又善于做别的一些事，要善于财政经济，善于征收救国公粮，还善于一些别的事，要做这样的领导核心。

第十条：“必须使得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高限度的一致性。”

这一条，上面已经讲过了。他指示要经常改善自己的社会成分。怎样叫做改善？比方说我们边区有三万党员，要洗刷一部分，现在听说有三千个党棍、极坏的分子。其他的要教育，那么现在在边区三万党员中，清洗那些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党棍是不是叫腐化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叫做。在延安也清洗了一部分。比方讲，如果把王实味这一套包括在内，要洗刷的还有与王实味不同的，没有组织五人反党集团的，就是那些很坏的，完全不够党员资格的，也要清洗他们。要经常清洗，要经常吸收。现在边区就有许多在党外的比在党内的还好，党员比他们差。要把那些好的吸收进来，要把那些差的清洗出去，这样叫做经常改善自己组织的社会成分。我想这一条在边区党可以做，在延安完全可以实行。

第十一条：“必须使得党建立起铁的无产阶级的纪律。”要制定这样一种纪律。这样一条，不但在别的条件上区别于社会民主党，而且在这一条上也区别于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他们不要这种纪律，不要这种铁的纪律。消极的自由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存在着，在边区存在着，在延安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因为这种自由主义是破坏党的纪律的。自由主义的发展，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就没有纪律，闹独立性，小广播，讲价钱，调工作不动，不服从决议案，讲了不做，见了坏分子不批评，见了不好的思想不作斗

争。这种自由主义发展了，那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就不能创立起来了。斯大林是要我们创立铁的纪律，而这种自由主义的发展能不能使这种铁的纪律创立起来呢？是不能的。底下讲到，这样的纪律，建立这样铁的纪律，要有什么条件，斯大林严正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之目的之明确性。”要整顿三风，要开高干会，是基于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的之明确性。运动目标是要明确，我们边区的党还有不明确的，“要打出去”。但现在我们运动的目标是为了团结抗战，一部分人想打出去，就跟这个运动的目标相反。整顿三风也算是一个目标，整顿三风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个是要克服暗藏的反革命，运动目标要搞明确，如果不搞明确，如在整顿三风开始时有些同志不明确，认为这个运动的目标是整一部分人，而我是不在内的，是整某一部分人，不是整所有的人。后来把这个目标讲清楚了，整顿三风是整顿全党，拿边区来说，拿延安来说，我们党主要是干部，所以我们干部要参加这个整顿三风的运动。不认识字的要听讲，认识字的要学文件；这时整顿三风的目标明确了，因而现在有了大的发展，在延安有中央研究院、鲁艺、延大、自然科学院以及各部门，各机关，中央各部门，军委各系统，那些部门都统统要进行整顿三风，同时学习检查工作，每人有份，整顿每个人，那时目标就明确了，这样就可以建立起纪律来。有些人躲风，我有病了！哎呀！肚子痛！要门诊部给我看病，出去门诊，却不看病，而到山上去打扑克，（笑声）这样就躲了风，没有整了，这样有没有纪律？这样就没有纪律。现在有不少人躲风，现在整风一来，他的歪风就躲了，于是就找门诊部，哎呀！肚子痛！各种办法都来了，这时要实行纪律。运动目标明确了，少数人的纪律就好执行。如果运

动目标大家都不明确，那就没有法子整风。

精兵简政也算是一个运动，这个运动的目标，要明确它是实行在困难时期，我们的政府、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太多，要精简。我们的干部有很多缺点，如官僚主义等。有这样情形，所以我们定了几项，要精兵简政，官僚主义要打倒，精简节约，统一效能，反对官僚主义，要简政，要精兵简政，人要减少，因此一定要统一思想，不要闹独立性，要使每个机关、每个工作人员能发挥很大效能，不要马马虎虎，要节约，现在是困难，要反对官僚主义。这样一来，把精兵简政这个目标就明确了，这个运动的目标就明确了。全国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现在唯一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一切的目的，一切的势力就是为了打倒法西斯阵线。这问题，在前年参议会上讲过，这样的目标我们经常提出。参议会为了什么？是什么目标？没有别的，专门为了打倒日本，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任何别的目标。现在我们当前的运动，这样明确的目标，可是虽然这样讲，又发了“七七”宣言，我们还有一部分同志，他们还不懂得，所以我们还要研究，这次会议还要讲的，要使运动的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思想统一，运动的目标统一明确，实际行动要统一，不是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什么地方看出思想统一与运动目标明确呢？要看实际行动，实际行动的统一，就证明你的思想统一。

运动的目标要看清楚，还有党内广大群众，对党的任务要自觉。这个担子我不愿担，勉勉强强地担负起，如果这样的党员多了，纪律就建立不起来。许多党员对于党所提出的任务，他还不懂得，完全是被动的，你要我担我就不担，没有自觉性。要使党内广大群众懂得党所提出的任务。党的任务是抗日的任务，团结的任

务，我们反对自由主义的任务，要精兵简政，要整顿三风，大的小的这些任务，每个任务要党员去做的时候，要使党员清楚，要他有自觉性，要使他真正了解。现在我们边区有三万多党员，在做工作的时候，有很多党员，对他们的任务还不明确。比如讲征收救国公粮，过去曾经发生过许多毛病。由于党员对于这个任务不自觉，党员对于征收救国公粮的这个任务不自觉。有那么一些党员，在征收救国公粮时发生了毛病，就不能执行纪律。

斯大林讲，纪律的基础是基于什么？斯大林说：“这种纪律是基于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的目的之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及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之自觉态度而成长起来的。”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纪律。纪律是逐渐成长起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马克思发了一个命令，要我们搞纪律我们就搞纪律，不是这样的。因此这样纪律就搞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呢？不是的。这样的教条是不是可以建立？也不可以！马、恩、列、斯指导我们一个方向，纪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好办了，纪律是创造出来的，不是现成的东西，我们有工作做，纪律就有了，思想的统一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行动的统一性，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任务要有自觉的态度。现在我们自觉的态度与作风很多党员是不够的，那么我们铁的纪律怎样？不够！那么布尔什维克化，化得怎样？化得不够。不要以为我们党一化就化得很好，如果化得很好，还有什么事做？没有化得好。我来讲这十二条，我向同志们说明。就是要同志们懂得，我们现在的毛病很多，不要自以为了不起，我们的党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党要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化得彻底，现在还没有那样地好。拿纪律一条来讲，好容易一个纪律，思想统一，运动目标明确，实际行动统一，党内广大

党员群众对于任务要有自觉性，做到了这些，就有铁的纪律，就是像钢，做不到这些，某些地方像豆腐，某些地方像水一样，离铁就很远，那么铁的纪律就没有。

第十二条：“必须使得党有系统地检查自己的决定和指示之执行，不然，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对于党的信任。”

要检查决议案的执行，看怎样行的，一个是决，一个是行。决而不行就要检查，决而行，决而不行，决而行了一半，那有什么办法知道？就是检查，如果不然，那么这些决定和指示，就有变成空文的危险，这只能破坏广大的无产阶级的群众对党的信任。

搞了一个决议案又不执行，搞了一个土地政策，我们就要执行，我们决定了要行，要在陕甘宁边区行，陕甘宁边区要按照具体情形，还要决一下，中央决一下，他们还要决一下，所以现在边区还要搞一个土地政策、减租减息缴租缴息决定，这很多决定，还是一个决，还是不行，什么时候行？就要在乡下行，现在有多少村多少乡？要在乡下村子里办到减租减息，缴租缴息，那叫做行。怎么晓得行？要检查！这是斯大林告诉我们的话。

所以这十二条，斯大林讲：“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布尔什维克化便是空想。”

如果没有这些和类似这些的条件，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是什么东西？没有这些条件，布尔什维克化，化得了化不了？化不了！那就困难，斯大林把检查工作放在最后一条，就是告诉我们要经常检查工作。

整顿三风以后，我们要有一次大的检查，这次大会也算一次检查，首先是作了历史的检查，再还要讨论许多的问题，你们下去实

行去，做了将来还要检查。

这是十二条，比较明显扼要！这一共大概一千多字，在所有的文件里头，恐怕是最短的一个文件，有一千四五百字。只有一千五百字，就把我们整个党一切重要的原则问题都提到了。这十二条，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百年的经验的总结，从一八四三年到明年就是一百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一百年了。现在我们整顿三风，这些文件，不但总结了中国二十一年的经验，而且总结了全世界一百年的经验。这个文件是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写的。一九二五年，一九四二年，十七八年了，差不多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今天看，对于我们中国党是完全适合的。将来，有党存在的一天，都是适用的。斯大林写的文章又不是马克思写的文章，怎么叫一百年？没有一百年的经验，斯大林是写不出来？马克思就写不了这样具体。在马克思那时候，不能写得这样具体？能不能写出这十二条呢？很难？没有这些经验！《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三、四、五条，没有后来的经验，就很难写，就是第二条，他写得那样具体，那样明确，不但可以而且一定要以新的结论，这种思想，马克思早已有了。马克思他自己讲他的东西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有总结这一百年的经验，才能写出。那些个结论原则是被新的结论原则代替了，列宁的那一条去代替了马克思的那一条，以前能不能写？没有经验怎么能写出！这是告诉了我们以后怎样做，写得这样具体了！

第一条：要有革命的党，要有领导一切的革命的党。这一条相当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一条。我们有“九一”决定，我们有党的统一领导，还有一个“增强党性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讲：“不要闹独立性。”这一次高干会，又整顿各组织间关系，叫作

整顿关系，这是我们对于第一条这样的实行。

第二条：我们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精通要联系实际，不脱离实际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相当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二条。第二条就讲得很详细，在这里他只讲一两句话。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在这里，讲到教育政策时，告诉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他说有两种教育方法：一种是教条式的，一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六中全会我们也讲过这个东西，六中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决定”，有“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决定，都提到怎样学习马列主义，至于其他的就不讲了。这是如何精通马列主义的问题。

第三条：就是我们的口号、指示，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分析，再照顾国际的经验。这我们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反对根据公式，那种公式主义，根据历史的类比来制定口号、政策。而要根据客观实际，具体地调查分析，来制定口号、政策。

关于第三条、第四条是讲方法的问题，制定口号、指示的方法论如何指示，如何检查。第三条制定，第四条就是证明。证明这个口号、指示正确不正确？要在实际中间，在群众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证明。这是第三条、第四条。

第五条：关于要有新的革命作风，使群众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地革命化。我们有“宣传指南”，就不要搞教条式的，采取革命的步骤使得群众自然而然地革命化。而不要那一种跟“宣传指南”相反的那一种宣传，那一种态度。我们说反对党八股，我们还有一个“四三”决定，在“四三”决定上有许多步骤，“四三”决定上讲的，在各机关、学校已经实行了，在中央研究院实行的有很大成

绩；在开始，有的同志站的是反革命立场，而现在这些同志逐渐转过来了，站在我们这方面了；后来使反革命分子统统孤立，使过去不觉悟的分子也没受到损失；这一次搞好了，有很好的经验，在前两个星期，在《解放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央研究院总结六、七月的学习，那个东西很可以看，那个东西不是党八股，那是按照实际的过程写出来的。

第六条：讲群众工作，讲群众工作中的原则性同群众的落后怎样适应。群众落后，我们要讲原则，就是这个原则性跟广大群众不要脱离，即不要关门主义，讲原则不是关门主义，讲接近（联系）群众不是尾巴主义。这个中央以前有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也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六条，即是最后一条，专门讲党与群众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边区，比如像在绥德、陇东那些区，怎样使我们又能坚持原则性，高度的原则性，但是又不要变成关门主义。要跟群众密切地接近，又不是跟着落后群众的尾巴走，而且把他提高一步。怎样实行？我们有经验。

第七条：不要冒险主义，又不要迁就行为。这是讲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是讲统一战线中的问题。这个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有季米特洛夫在七次大会上的报告，有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各种文件，从“八一”宣言起，在反摩擦中，在反反共”高潮中，反摩擦斗争中，我们有许多斗争经验。我们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关系，对于土地关系的处理，对于劳资关系的处理，我们的锄奸政策等等各种政策，我们的施政纲领，这些东西，都是跟斯大林讲的这一条，是一类的性质。不要冒险主义，但也不要迁就行为。冒险主义不等于高度的革命性，不可调和的革命性。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也绝不是尾巴主义。而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的

工作，自己的历史。关于国共合作的时期，关于国共合作以前，关于国共合作的中期，抗战的初期，关于最近二三年，关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我们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锄奸政策审查一下，在有些同志他所想象的宽大政策，在这个会中间，小组讨论中间，有许多同志不满意，我们应该杀的不杀，应该捉的不捉，土匪闹到那样程度，还要宽大政策，斯大林的十二条中是没有的。土匪天天打，打到瓦窑堡、延安附近，还要讲宽大政策?！他那种宽大政策是从哪里来的?！人家打得你要死，群众在到处叫，你还在说施政纲领的宽大政策?！施政施纲的宽大政策那么好！这样一来，日本的飞机也来加油，你还要宽大，你说可以吗？就讲这样的政策？就是检查这样的问题。

第八条：要讲自我批评，要改正错误。就有列宁、斯大林论自我批评。二十个文件中有的，这里引列宁论自我批评，有《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有“四三”决定，“四三”决定中告诉我们怎么作自我批评，有这样一些问题，有《反对自由主义》，有《反对党内几种不良倾向》。这样一些文件，都是关于第八条的。我们所办的，我们所实行的这些文件，过去的不讲，讲现在的，我们的整顿三风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我们的所谓正确的干部政策究竟是什么东西？这要搞清楚，糊里糊涂的团结，缺乏原则性的团结，团结得了团结不了呢？团结不了的。这样党内的宽大政策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宽大政策？缺乏批评性的，缺乏斗争性的，这样的干部政策是不正确的。

第九条：必须使党善于把先进战士中的优秀分子选拔到基本的领导核心中去。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教育政策中有四个干部标准，四个标准也可以说是干部的四个条件（无限忠诚、联系群众、有

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第一条要忠诚。刚才讲的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第九条中讲的二条：一个是忠诚，一个是经验。这两条在季米特洛夫的四条标准中有，斯大林时是第一条，季米特洛夫的也是第一条，这个忠诚要经过考验，你自己讲那不行，要在法庭上、战斗中、艰苦工作中证明了的。第二条要跟群众联系，密切地联系，要有证据，你说你跟群众联系了，我说我跟群众联系了，那个不行，要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要群众觉得你行。他不觉得你是他的领袖，那就不行，那不是季米特洛夫讲的要使群众自己觉得你是他的领袖。现在有那么一部分人，跟群众没有联系，而自称为领袖，站在领袖的职位上，自称为群众的领袖，而实际上，群众并不承认他是领袖。郭洪涛、朱理治，那时候在陕北，自以为也是领袖，而群众不承认他们是领袖。……群众、老百姓不证明、不了解你，他决不承认你是他的领袖的。所谓联系群众，什么标准呢？就是群众赞成你。所以有些同志出去到一个地方，我就和他讲，开头不要夸夸其谈大讲一顿，你不跟群众、干部联系，就没有办法知道群众与干部的情形。你讲的话一定会错，不是二定会错，(笑)这是一定的，你没有联系，没有工作，干部就不认识你，你怎么工作呢？如果在这里不夸夸其谈，只有跟干部联系，眼睛多看一些，耳多听一些，然后再讲，那么，夸夸其谈一定会少了，人家就信不然人家戴上耳套、戴上眼镜来听、来看，你讲的不大切合实人家相信不相信呢？有原则一条——不相信你，你讲得不像，吃了小米饭来听你那个“不像”。因此，这样的同志，站在领导地就要很好地注意。

季米特洛夫讲的干部四个标准的第三条，是讲独立工作能力，林的两个标准讲了。他讲的两个标准：一条是忠诚，是足以成

为无产阶级的代表。一条就是要有经验，足以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季米特洛夫讲的第三个标准就是讲的这个，要我们鉴别干部的时候，能够独立处理问题。第四条就是联系群众。

所以这个第九条，要形成领导核心，我们党要有领导核心，不要是平均主义，中央、地方、西北局以及各个警备区、我们的学校、机关，我们现在把这些发展起来，扩大起来，都要做领导的骨干，领导的核心，这些骨干分子有什么条件？斯大林讲有两个条件，因为他在这样短的文章内，不能把所有的条件列举出来，我们照季米特洛夫讲的有四个条件：领导骨干要十分忠诚，经过考验；同群众联系，使群众承认你同他们有联系；要有独立工作能力；要守纪律。所以关于第九条，我们可以参照季米特洛夫给干部的四个标准。这里，平均主义是不对的，对干部、党员平均主义的一种看法，没有分析，没有积极分子同坏分子的区别，这也是不对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不对，搞领导骨干就要进行教育，对不好的倾向，就要进行斗争。

第十条：就是讲“必须使党经常地改善自己的组织的社会成分，清除那些腐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便达到最大限度的团结一致”。这就是《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这个结束语的第四条与第十条相关，虽然内容不同，但大体相当《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的第四条。……巩固党必须要清洗坏分子，经常地改善党的组织，那么党的组织应该是什么人呢？应该有个标准，怎么样做个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如何……中央有巩固党的决定，《联共（布）党史》第四条讲了这个问题。对坏人要怎么样同他斗争，要把他清洗出去。

第十一条：就是讲纪律，要建立纪律，革命的党没有纪律不

成。斯大林讲思想的一致性，运动目标的明确性，实际工作的统一性，党员的自觉性，这样就生长起来了纪律。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我们选有这样的文章，是列在二十二个文件之内。

第十二条：最后一条是讲检查。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他那样的文章，在马克思那时候讲是没有可能的。在马克思那个时候没有可能讲民主与检查那样的文章。比如，什么是检查？在这次边区高干会议以及你们回去进行精兵简政、整党、整政、整军、整财、整民、整关系，是有系统的，而且是有威信的人，而不是普通的人。……现在延安各机关也要检查，延安有的机关现在已经检查了，整顿三风有部分的检查，跟着有大的检查，要哪一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者去检查，在“四三”决定上面讲了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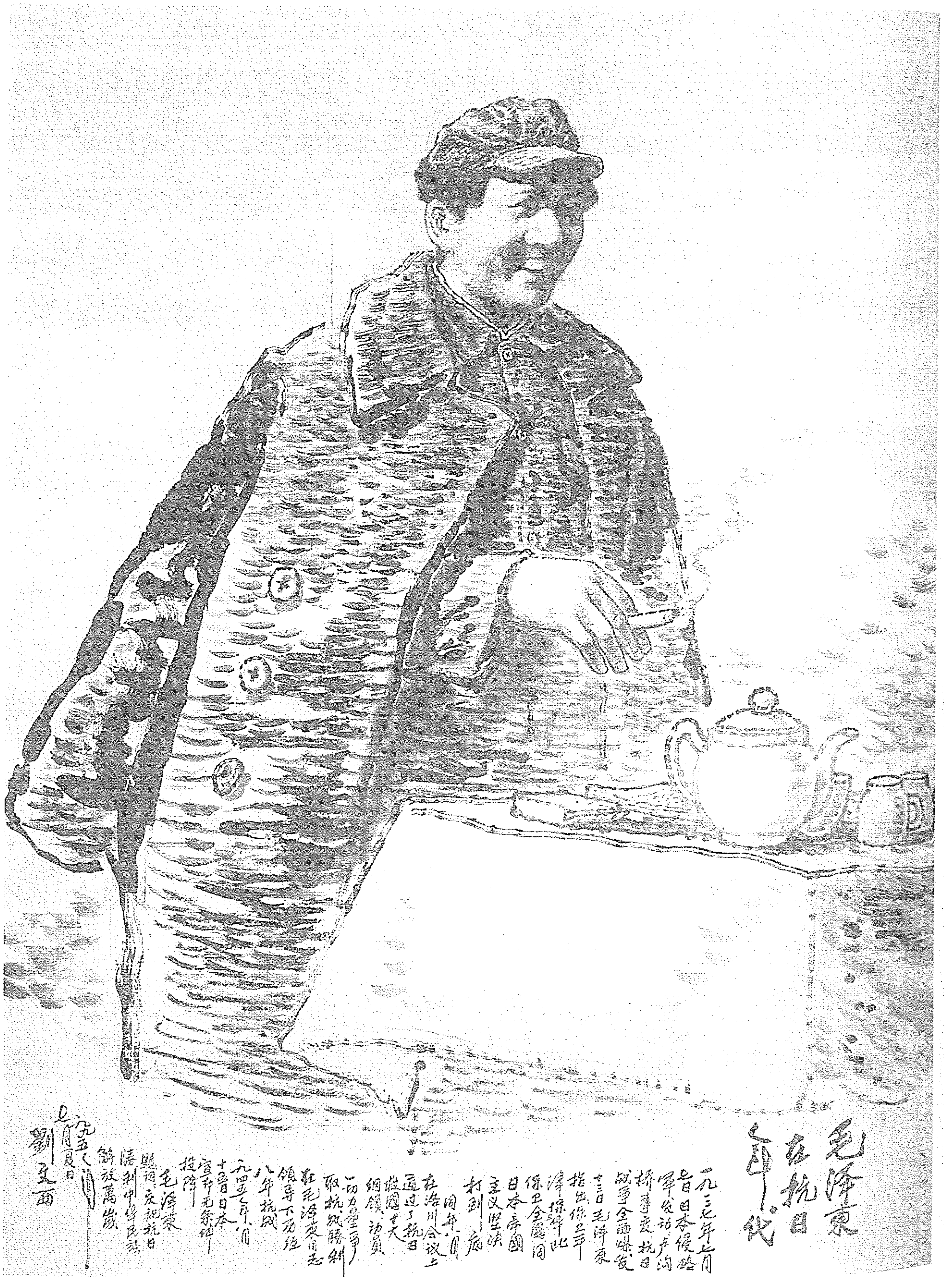
所以，关于这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我想很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一下，因为它的字很少，只有一千五百字。这是我们全党的圣经，这就是经，是圣经，而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现在我们能不能使用呢？我想每一条都能使用。可是有些情况，像社会民主党，我们中国没有社会民主党。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条，使用这一条。如果我们这样做下去，那么布尔什维克化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说我们会比现在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呢？要向那个方向去化他一步呢？我们在今年这一年，整顿三风、精兵简政，在边区高干会是要化一部分，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个“化”，我们是要自觉的，我们要很清楚，我来讲这个十二条，斯大林也讲了，而且是在多年前讲的，在一九二五年就是这样讲的。而这十二条，对我们恰好是适用的，我们要自觉地去做这工作。

我们对马列主义要学习，前天我所讲的，我们要学习，干部要

有计划地读书，读三四十本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不读则已，一读就读通了，就可以读进去。（笑）“马列主义呀！我们是土包子，我们怎能读得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读马列主义呢？你们是讥笑我吧！”而恰恰是土包子，就容易读得通，而有些人倒不容易读通。像外面来的，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读了，也只是书面上的。而土包子就容易读通，一读就容易读懂。这次整顿三风的文件，就是一部经书，二十二个文件，再加上三个，一共二十五个文件，全部只有十二万九千字，不到十三万字，我们读八个月，这样读下去。在这里，分两种人，一种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一种是知识分子。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就容易读懂，没有工作经验的同志，就要钻牛角尖。比如：为什么叫“四三”决定？为什么不叫“四二”决定？（笑）又，什么是精神实质？又是精神又是实质，你讲给我听听。他们钻得不得了，搞不清楚。这些同志，要他们先读，然后再让他们到工作中去，然后过了一二年，再叫他读，那就有味道了。所以读马列主义，精通这本书是完全可以的，特别是有工作经验的同志，一读就有效力。朱理治、郭洪涛过去没有工作经验，他们过去大概读过几本书，他到这里就大摇大摆地为列宁主义而斗争，（笑）写了文章也是一二万字。他的列宁主义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哪一个国家的？他的列宁主义一定不是苏联的。哪个列宁主义这次会证明了的，他的列宁是哪国的列宁呢？是他的列宁。这就等于没有读书，如真读几本书，也就没有那个。我们有工作经验的同志，读了，是不是像他们那样呢？一定不会的。我们读几本马、恩、列、斯的书，就够了。我们不要装腔作势，借以吓人，不会这样的。我们读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我们的工作，是会做得更加好。因为马、恩、列、斯都是很好

的人，他们不是像朱理治那样的人，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也没有看见过，认识是在照片上看见过。那个是不相同的，样子也不相同，那个真是革命的圣人，他们是精通得很，他们的态度也是好得很，他们和我们一样，同我们很接近，不是和我们离得很远，他们很好，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就愈要同群众接近，如果不接近群众，那就是与群众离得很远，那就是愈读得多，就越是没有读进去。列宁就不是这样的。他们根本搞错了，那是反对了列宁，反对了马、恩、列、斯。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我们党一定会搞得好，要布尔什维克化，一定会化的，我们已经有了进步，整顿三风，高干会，精兵简政……这些同志们做下去，要有信心搞下去，一定会搞好，一定会更进一步地布尔什维克化。要我们全党，我们实际工作的同志能够这样去做，慢慢地来，一年搞一本，搞三四十年就可以搞三四十本。有些人是走马观花，一走就过去了。还有一种是下马看花，要仔仔细细地看。（笑）今天是要下马看花，要慢慢地看，我们读他三四十本书，一年读一本要三四十年，今年已经六七十岁了，还能读几本书？我们要读三四十本书，有的一星期可以读他一二本，甚至几本，比如像党校，我们规定党校，计划八个月读三四十本书，我们有一个大概，把三四十本书看一下，将来做工作，一二年以后再来翻一翻。如果说早把字典所有的字完全读了，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把字典所有的字都读了，这样的人，在全天下都难找。连马克思在内，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今天翻一下，明天翻一下，慢慢地来。我们的工农干部、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完全可以这样，达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请同志们考虑一下，我讲的话完了。（全场热烈鼓掌）


毛泽东在抗日年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廿三日毛泽东指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
同年八月在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历经八年抗战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一九九五年七月夏日
刘文画

《毛泽东在抗日年代》（中国画）

给欧阳山尊、朱丹、成荫[1]的信

（1942年11月23日）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2]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

[1] 欧阳山尊（1914—2009），湖南浏阳人。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朱丹（1913—1978），后改名朱丹西，北京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副社长。成荫（1917—1984），上海松江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政治指导员。

[2] 指成荫等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1942年冬，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过这些剧。

为杨松题写挽词[1]

（1942年11月25日）

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

---

[1] 1942年11月23日，曾任《解放时报》总编辑的杨松在延安逝世，年仅35岁。杨松去世后，毛泽东亲笔为其题写挽词。

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十中全会

（1942年11月29日）

全会坚持抗战、加强团结之意图，吾人深具同感。如宣言称：“最后胜利达成以前，必须经过最艰苦最猛烈之大决战，方能消灭敌寇，永绝祸根，守定自力更生之要义，作最艰苦之打算”，“吾人今日尤应尽忠尽勇急起直追，集中四万万五千万人之全力于战斗”。“对外必须互助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并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之决心”，“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这些都是很对的，由此足证在对外对内的最重要政策上，国共两党之见地，基本上并无二致。十中全会这一表示，实足庆幸。抗战以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即始终站在祖国战争的最前线，虽孤悬敌后，饷械弹药，异常缺乏，饥寒交迫，困难万分，犹始终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坚持阵地，未尝后退一步。蒋委员长曾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共产党员及敌后人民，本此训示，组成游击队，与主力军配合一致，抗拒敌军，用能坚持五年有半，至今尤屹若长城，抗击敌军十五个师团，占在华敌军之半数，其所以能够如此，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其在各抗日根据地之设施，悉本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蒋委员长之抗战纲领，暨国民政府之各种基本法令，参照地方民意，定出许多具体办法，致使民情悦服，协助抗战，达成长期支

持之目的。本党曾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其中列举如下四端：“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凡此所陈，五年以来，吾人未敢稍有逾越，并且不但在抗战期间吾人是竭力遵行的，而且准备在抗战完结之后继续遵行。凡此均所以求得与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各党派各阶层达到精诚团结，完成抗战建国之时代使命。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中所列各项，与中共上述宣言所列四端，其基本精神，亦并无歧异之处。至对待共产党之态度，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在标举各项要求之后，宣称：“政府当一视同仁，不特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此种表示，实为吾人多年以来之竭诚要求，今获此种明确之宣告，庆幸尤深。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一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凡合乎团结抗战之利益者，无不诚意实行，这是坚持不变的。深望中国国民党人士谅解吾人此种为国为民之诚意，达到进一步之合作，则敌寇虽强，终当被我驱除出境，一个强盛独立之中华民国，是不久就可以建设成功的。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1942年11月29日）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我党的决议案，略谓：总裁旰衡时局，对内对外作政策上的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分裂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宣言[1]，服从政府法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晚集会，详细研究，一致认为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敬谨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之制裁，务望均能彻底觉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精诚奉行三民主义。果能如此，则不问其过去之思想与行动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或为个人，政府当一视同仁，不但不予歧视，而且保障其公民应得之权利与自由等语。同时，十中全会发表宣言，其中关于对待我党者有云：对外必须互相合作，实现人类平等之公理，对内必须共同团结，共示精诚无间

---

[1] 共赴国难宣言，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言。此宣言起草于1937年7月4日。7月15日，中共中央交付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才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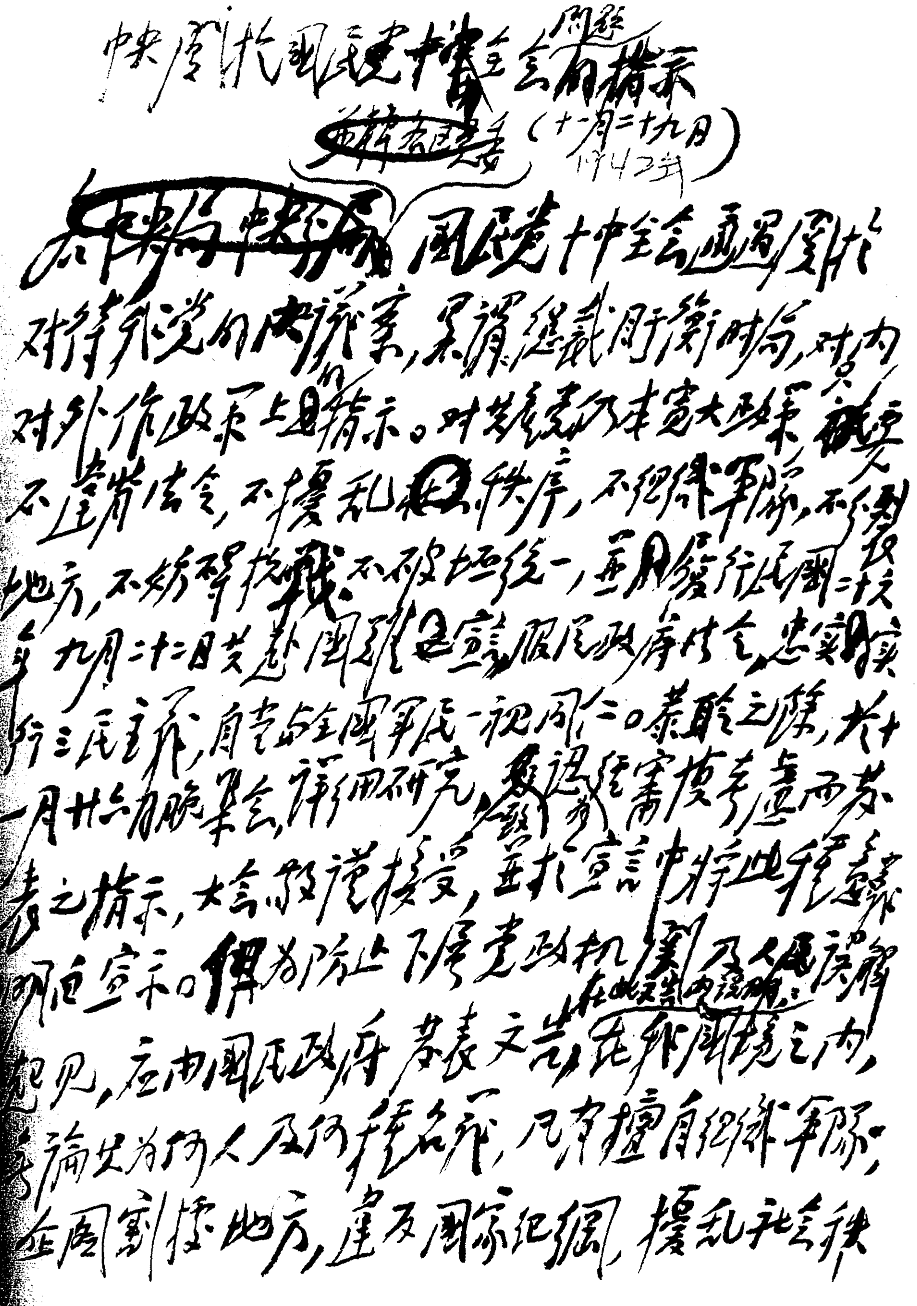
之决心。又云：三民主义非但国民党所信仰，实为全民必循之途径，顺此者昌，逆此者败。时至今日，不应再有所谓政见之异，亦不容再有互相猜疑，互相排拒，互相牵制妨碍之现象。吾人愿提示全国，凡能诚意信仰三民主义，不危害抗战之进行，不违背国家之法令，无扰乱社会秩序之企图与武装割据之事实者，我政府与社会应不问其过去思想之如何，亦不问其为团体为个人，一体尊重其贡献能力效忠国家之机会。必有举国一致之真诚团结，而后乃能负起空前艰苦之使命。凡此尤愿特为标举，以冀引起全国有识人士之共鸣者。等语。

国民党从一九三九年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中间经过一九四〇年一月及其前后一段时间的第一次反共大磨擦（苏德条约订立及苏芬战争时期），一九四一年一月解放新四军事件的第二次反共大磨擦（德意日三国同盟订立及日苏中立条约订立之后），这两次磨擦均有国际的与国内的因素为背景。自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德战争及跟着苏英美订立同盟以后，国共关系即有某些改变，停止了大的冲突。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发生，滇缅路被切断及英苏订立二十年同盟条约之后，更有好转。最近苏联在斯城的伟大胜利及英美在北非与在太平洋的胜利，增强了国民党对于抗战胜利的信心，对国共关系好转，亦有促进的影响。在国内，一九三七年以来，我党我军的极大发展，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但至今年，我党我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损失及根据地的缩小，减轻了国民党的恐惧心理。他们估计，我党我军在今后抗日期间，还会有大的损失（这种估计是适当的）。同时，在日寇侵苏危险减少以后（过去国民党长期地寄希望于日苏战争），日寇必然要加重对中国的压迫，国民党需要利用我党的抗日力量（日寇在华三十一个师，我党担负了十五个师）。再则，自从远

东慕尼黑危险消失之后，我党停止了反对投降危险的宣传。而从去年四月直到现在，我党对国民党批评甚少，坚持地求得和他们改善关系。虽则国民党在这一期间内，仍然对我们进行了很多的压迫(在大后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出版大批反共刊物，在湖北、安徽攻击新四军，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广大的特务破坏活动与经济封锁)，我们亦忍耐下去，力求不刺激国民党。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取得了国民党广大人士的同情。再则，国民党自己有很多的极端严重的困难存在着。其中，特别是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及农民的骚动，他们需要集中精力去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并企图经过缓和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去缓和他们和农民的关系，这里特别有严重意义的是河南六百万灾民的自发斗争，某些部分已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最后，一九四〇年与一九四一年两次反共大磨擦，国民党企图利用武力压迫把我们屈服，但遇着了我们的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又企图动员舆论赞助他们的反共，但多数舆论的同情却站在我们方面。由于上述这种种原因，促成国民党不得不对国共关系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表示了这种解决的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求我们不超出他们所设定的严格的范围，他们则答应和我们合作。十中全会的这一处置，是我们和他们长期接洽及他们经过许多的动摇犹豫之后才决定的。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一九三九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于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十中全会的决议，在某一点上和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国民党三中全会关于所谓“根绝赤

祸”的那个决议案有些类似，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的。各地对于十中全会的决议，应本解放日报发表之态度进行解释。根据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所列四条（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停止土地革命；苏维埃改为民主政府，以期政权统一；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委会的统辖），与国民党十中全会向我党要求的各点相比较，在基本精神上没有互相纷〈分〉歧之处，我们不但过去遵守自己的诺言，而且在将来也准备遵守这一诺言。关于组织军队一点，过去是为了抗日的需要而组织游击队，并且是遵照二十六年蒋介石“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卫国之责任”这一宣言的。至于今后不允许我们再组织军队，我们可以这样做。关于国民党允许给我们以公民应得的权利及自由，我们应表示欢迎，要求实现。在十中全会后，国民党会放弃军事压迫而加强政治斗争，磨擦还会有的，但方式会缓和一点。各地对于国民党人员应继续采取诚恳协商，实事求是，有理有节的态度，力戒骄傲夸大有害无益的态度，借以争取更进的好转。

中共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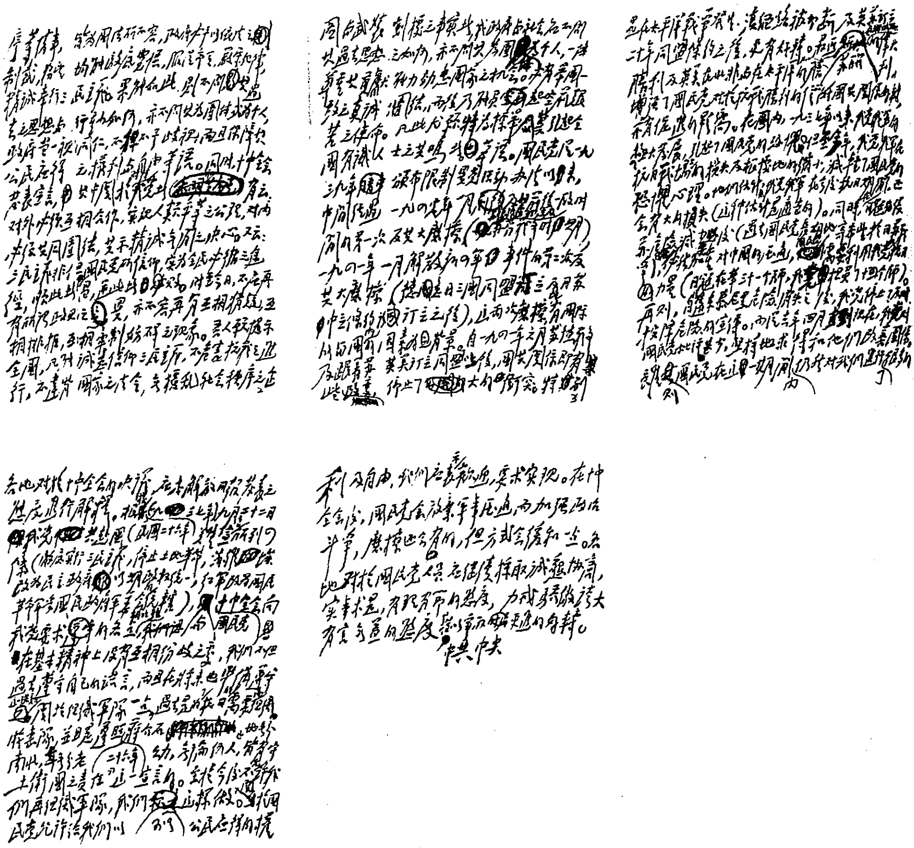


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十一月二十九日 1942年）

国民党十中全会通过关于对待共党的决议案，蒋总裁开会时有对内对外的政策上之指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不违背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不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实行三民主义，自当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恭聆之余，于十一月廿六日晚集会，详细研究，认为经审慎考虑而蒋委员长之指示，大会决议，均应接受，并于宣言中将此种意义明白宣示。但为防止下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此文告内说明：在我国境之内，无论其为何人及何种名义，凡有擅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致李先念等电[1]

（1942年11月30日）

你们干部缺乏，因交通阻绝，无法派来。抗战趋势，全军将大幅减小，你处亦应准备在明年秋冬及后年春夏缩小到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那时量小质精，干部就够用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李先念并告陈毅、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

给蒋介石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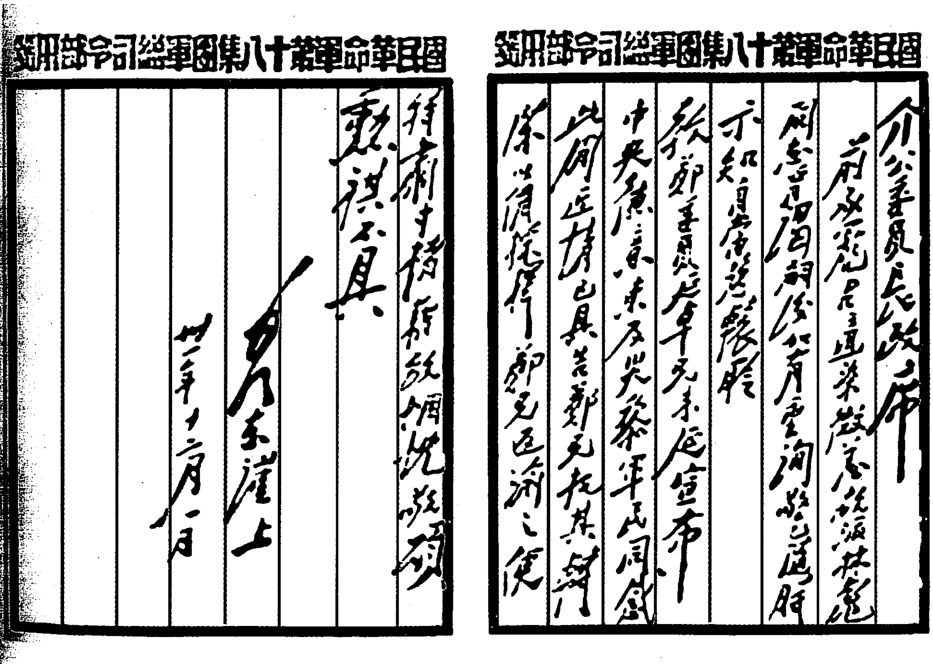
（1942年12月1日）

介公委员长政席：

前承电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请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未及兴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借致悃忱。敬颂

勋祺不具

毛泽东谨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用箋

介公委员長政席：

前承寵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謁。嗣後如有垂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郭參謀長寄嶠兄來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郭兄，托其转陈。兹以信托郭兄返渝之便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用箋

敬肃寸楮，藉致悃忱，敬頌

勋祺。不具。

毛泽东謹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致蒋介石信的手稿。

给南汉宸的信[1]

（1942年12月8日）

各件均收，写得很好，大有益处。现我还急需贸易、金融、工业三部分，并须在三天至多四天要，请你日夜赶办，于本星期五交我。金融过去原不归你经手，但现已归你；工业你也管了一部分，由你将你管的、建厅管的、军队管的综合起来写成一件，最为适当。

---

[1] 这是毛泽东为写《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收集整理材料一事，致南汉宸信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林彪电[1]

（1942年12月11日）

徐海东同志卧病皖东三年未愈，现敌“扫荡”形势恶劣，不便休养，拟经大别山送大后方调治。请与蒋交涉，可否速告。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给南汉宸[1]的信

（1942年12月13日）

汉宸同志：

后送各件收到，甚慰。拟再请你对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项干部在自己工作中应注意之点（应兴应革），每项写一千至一千五百字左右给我，以插入报告[2]中教育干部，对于你今后的工作有大助益。此次高干会[3]主要需要教育材料。在三至四天内送我即可。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夜

每项能写二三千字更好。

如何使他们不扰民、不贪污、不浪费而又能完成任务。每个问题分列若干条应注意之事项。

---

[1] 南汉宸（1895—1967），山西洪洞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2] 指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3] 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复周恩来、林彪电[1]

（1942年12月18日）

（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工作，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起草财经问题报告给南汉宸的信

（1942年12月20日）

汉宸同志：

请你写的东西不知着手否？我要的是关于粮草、税收、金融、贸易四部分，每样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请你从今天至星期四四天之内下一番苦功赶一下，于星期五日交我就好了，或在星期二三先将粮草一件交我，余在星期四五交我。金融、贸易二件请找银行与贸易局的人研究一下，粮、税你是熟的。你前交报告很好，只是向少数人说的，不是向广大干部说的，故须重写。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日夜

你写的被服部分我已采入工业问题里去了。[1]

---

[1] 指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中，采用了南汉宸此前写的报告中关于被服问题的内容。

给续范亭的复信[1]

（1942年12月25日）

大示敬悉。我近日忙着，你又有病，迟一下我们再谈更好。你身体差些，望维持。我右臂比上半年好一点，中医似乎有效。又是一年了，真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吧！其余不尽。

---

[1] 这是毛泽东复续范亭信的主要内容。

为柯棣华题写挽词[1]

（1942年12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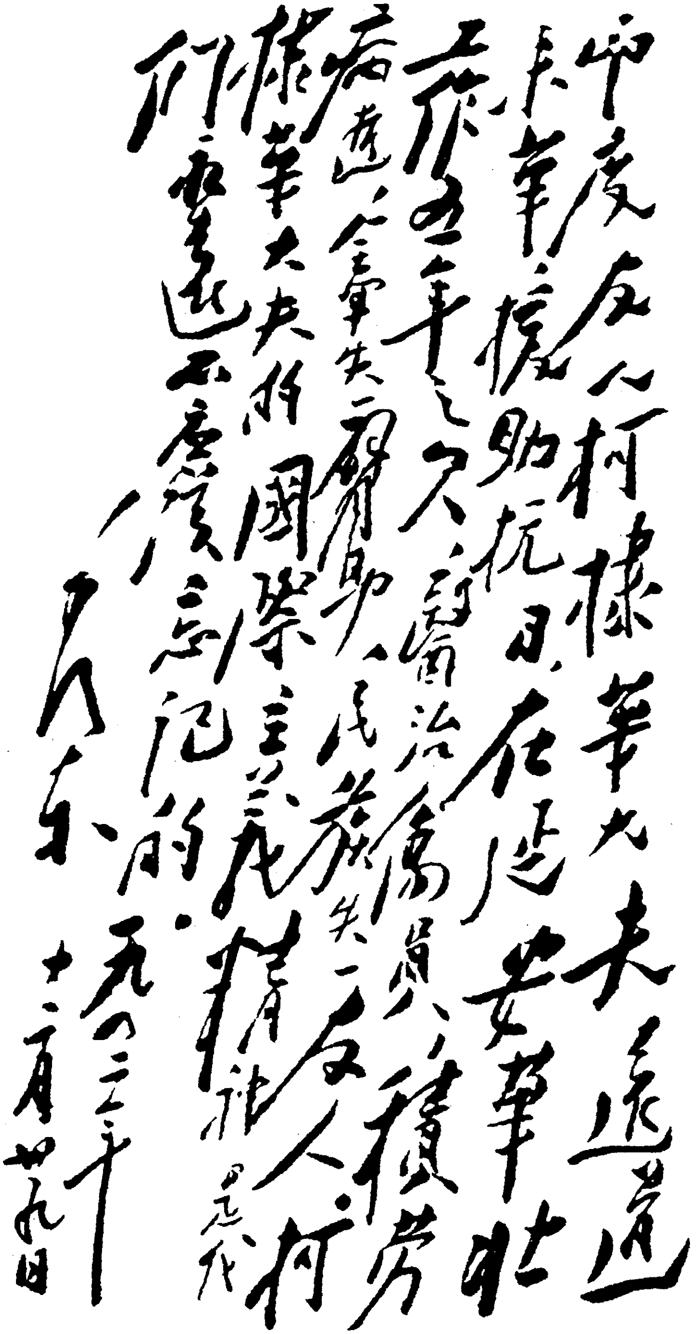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廿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大夫柯棣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题写的挽词。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
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
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
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
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
们永远不应忘记的。

毛泽东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卅日

毛泽东为柯棣华题写的挽词。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

（1942年12月）

一　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种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在这些同志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根据地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以及《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里，毛泽东着重地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得到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根据地军民胜利地渡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头脑中作怪的缘故。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这些经费，都是由人民的赋税及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自己的生产来解决的。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五年以来，我们经过了几个阶段。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我们渡过了困难。这不但是由于边区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尤其是由于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了自己的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的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工商业；几万机关学校人员，也发展了同样的自给经济。军队和机关学校所发展的这种自给经济是目前这种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其他历史条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却是完全合理并且完全必要的。我们就用这些办法战胜了困难。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这一真理，不是被明白无疑的历史事实给我们证明了吗？到了现在，我们虽则还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公营经济的基础，已经打下了。一九四三年再来一年，我们的基础就更加稳

固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

我们要发展公营经济，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人民给我们帮助的重要性。人民给了我们粮食吃：一九四〇年的九万担，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一九四二年的十六万担，保证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食粮。截至一九四一年，我们公营农业中的粮食生产一项，还是很微弱的，我们在粮食方面还是依靠老百姓。今后虽然一定要加重军队的粮食生产，但是暂时也还只能主要地依靠老百姓。陕甘宁边区虽然是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破坏的后方环境，但是地广人稀，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这样多的粮食，是不容易的。老百姓为我们运公盐和出公盐代金，一九四一年还买了五百万元公债，也是不小的负担。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但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这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

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另外的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时候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是我们立即动手建设了公营经济。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的第一个阶段中，我们取之于民是很少的；在这一阶段内，大大地休养了民力。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人民负担加重了。一九四三年以后，可以走上第三阶段。如果我们的公营经济在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两年内是继续发展的，如果我们在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在这两年内获得全部或大部屯田的机会，那末，在两年以后，人民负担又可减轻了，民力又可得到休养了。这个趋势是可能实现的，我们应该准备这样做。

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口号，才是正确的口号。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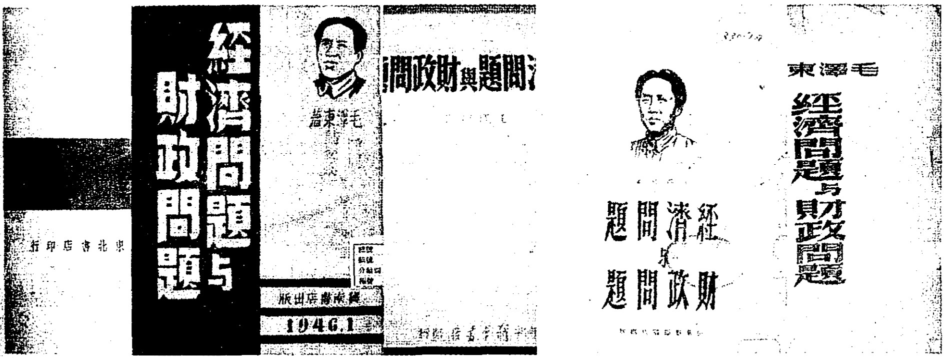
国民党的顽固分子觉得边区的建设是无希望的，边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每天都在等待着边区“塌台”。对于这种人，我们用不着和他们辩论，他们是永远也看不到我们“塌台”的日子

的，我们只会兴盛起来。他们不知道在共产党和边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人民群众总是拥护党和政府的。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任何严重的困难。我们现在的困难，有的已经渡过，有的快要渡过。我们曾经历过比现在还要困难到多少倍的时候，那样的困难我们也渡过了。现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的困难，比陕甘宁边区要大得多，那里天天有严重的战争，那里已经支持了五年半，那里也一定能够继续支持，直到胜利。在我们面前是没有悲观的，我们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

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这五项，对于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关系极大。精简之后，减少了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生产的收入，不但直接给予财政以好影响，而且可以减少人民的负担，影响人民的经济。经济和财政工作机构中的不统一、闹独立性、各自为政等恶劣现象，必须克服，而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这种统一的系统建立后，工作效能就可以增加。节约是一切工作机关都要注意的，经济和财政工作机关尤其要注意。实行节约的结果，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其数目可以达到几千万元。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还必须克服存在着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

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下面，我们就来分述经济与财政的各项工作，具体地总结过去各项工作的经验，并提出一九四三年应该实施的工作方针。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部分版本）。

二　关于发展农业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既是边区经济与财政的总方针，那么，在经济方面过去是如何做的，有些什么成绩，有些什么缺点，今后应取什么方针，就是首先重要的问题了。

边区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方面。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公营经济，就是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两方面的作用与关系：民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的生活，同时以租税的形式援助政府与军队，支持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数万党政军的生活费与事业费的主要部分，以便减少取之于民，休养民力，便于将来紧急需要时的取给。在这里适用的原则，就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

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

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所以党与政府用极大力量注意人民经济的建设，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任务。

但是单靠人民交纳租税，还是不能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特别是在边区地广人稀的条件下，人民的租税与政府的支出之间，长期地存在着一个大矛盾。所以，我们又必须用极大注意力去经营公营经济，这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与我们的一切机关学校在自己肩上担负着的一个极大的任务。数年来在这方面我们有了很大的成绩，一九四三年我们还要造出更大的成绩，以便直接解决抗战建国的需要。公营经济愈发展，则人民负担就可愈减少，这又是培养民力的一个方法。而联合与通融民营与公营经济这两方面的工具，则是金融。

民营经济有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事业、盐业与商业。这里先说农业。

边区的农业，在土地革命时期是下降的。那时的延安、安塞、保安、甘泉、华池以及东三县等，均有许多荒地。华池、保安两县交界地方有个长约二百余里的二家川，只住有二三十户人家。保安的乌鸦寺、张家岔，在同治年间已无人烟。甘泉的傅村川、延安的金盆湾及马市川一大半，皆成荒地。边区棉花完全停止了种植。牲口破坏更大：羊子只剩四五十万头，牛、驴只剩十余万头。纺织、驮盐等副业，亦同样被破坏了，尤其纺织几乎完全停顿了。食盐的输出，到一九三八年才有七万驮。由此可见，边区的农业在那个时期是衰落的时期。只在中央红军来到边区，内战停止；土匪肃清，使农民得以安居乐业；“左”的经济政策被纠正；休养生息的税收政策被提出；以及党政号召发展农业的影响，使农民的生产情绪大大

地提高，才使农业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

下面是近四年来开荒、植棉与牲畜发展的统计：

年　别	开荒亩数	植棉亩数	牲　　畜		
			牛	驴	羊
一九三九	1002774	3767	150892	124935	1171366
一九四〇	698989	15177	193238	135054	1723037
一九四一	390087	39087	202914	137001	1724203
一九四二	281413	94405			
合　　计	2373263				

（说明：1. 牲口的统计，葭、米二县未计入；一九三九年的牲口数，清涧等七县是将一九四〇年的数目加在里面的。2. 开荒是逐年所开数目。植棉与牲口是逐年统计之全边区所有数。）

这个统计指明：边区的耕地是逐年扩大，植棉亩数是逐年加多，牲畜是逐年发展，并且实际有的数目比统计表上的数目还要多些。因此，从前许多荒地，现在变成了熟地。如二家川现有一百余户居民，全川荒地都变成了熟地。乌鸦寺、张家岔现在也住满了。延安县过去十一个区均有荒地，现在只有金盆、柳林两个区，中区半个区，姚店区一个乡有荒地。延安在一九三九年还只有耕地三十万亩左右，一九四二年就有耕地六十九万九千五百三十六亩。安塞、安定、延川、延长等县过去均有许多荒地，现在很少了。一九四〇年以前，边区还从洛川及河东买粮。现在则不但不要从外边买粮，且有部分余粮向榆林一带输出。一部分人口从外地移来，牲畜也增加了，并不感到粮缺。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边区粮食已能自给，是无疑问的了。

植棉不但恢复了革命前的最盛时期，而且发展了。例如：延川的永坪、永胜、禹居等区，从前是不种棉的，现在均种起来了。延安从前不种棉，现在也种起来了。因为种棉比种粮利大，一亩地的棉花，平均收成可值七百元以上，如种粮食则只值二百余元，是三与一之比。一九三九年种棉面积还仅三千七百余亩，至一九四二年就有九万四千余亩，产量已达一百四十万斤，这个成绩是很大的。但全边区需要量是三百万斤，这就是今后的任务。

牲畜的发展也很快。例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八千多，现有六万以上。华池在一九三七年只有羊七万左右，现有十二万多。延川东阳区三乡张家河，在土地革命前只有羊五群（那里没有牧场，每群只能有三五十头），现有十三群。牛驴的发展比内战时差不多增加了三分之二。因此，一九四〇及一九四一两年能输出食盐五十万驮。假如没有牛驴的增加，这项食盐是很难运出的。

但农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发展较普遍、成绩较多的要算直属各县及陇东，特别是延安、安塞、甘泉、华池、曲子和东三县。因为这里土地多，人口少，气候也不错。以运盐为副业也是这些县份多。同时，公家消费最多的也在这一带。没有发展的要算警备区，因为那里人口多、土地少，扩大耕地不可能。那里多少有些成绩的，是逐渐恢复了家庭纺织业；并向延安一带有些移民，相当地调剂了人口与土地的配备。

另一方面，发展的速度也不同。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发展是快些，特别是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有很大发展。例如：开荒在这两年有一百七十万亩。一九四〇年，羊增加近六十万，牛驴增加五万多。但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的开荒，只有六十余万亩，仅及前两年的三分之一强。一九四一年的羊比一九四〇年还减少了

牛驴只增加一万余头（实际是减少了）。但在这两年，棉花和纺织又往前发展了。

以上是边区农业发展的概况。下面讲一讲边区农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在国内和平未建立前，农业是衰落的，以后是发展的。这样发展是怎样得来的呢？除了中央红军到达，土匪肃清，和平实现，农民能安居乐业外，还有以下的原因：

第一是纠正了经济政策上的“左”的错误，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因为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因经济政策的“左”，怕发展生产。另方面，因为农业经过革命前后的破坏，基础很弱，妨碍发展。中央实行纠正“左”的政策，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的倾向，农民愿意增加耕具，富农敢于安伙子，雇长工。休养生息政策恢复了元气，便利了农民的再生产；同时粮价高，副业利大，也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热忱，使农业迅速发展，并打下了一九四一年征收公粮二十万担与公草二千六百万斤的基础。

第二是发展生产的号召。例如：一九三九年中央召开的干部生产动员大会，第二次边区党代表大会，第一次参议会，第一次农展会，均有发展生产的号召，这些号召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为首先推动了干部，经过干部深入了群众，动员了男、女、老、幼以及流子均参加生产，增加了劳动力，最后地打破了农民怕发展生产心理。因此一九三九年的开荒数达到一百万亩以上，真正向外边进牲口来，也是那一年为最多。

第三是移民政策。最近四年中耕地扩大二百三十五万亩，一个要的原因是在于土地多的区域大批地吸收了移民，增加了人口。如：延安在一九三七年只有人口三万四千，现有人口七万左右

（延市在内）。因此该县的耕地，由三十万亩左右，增至七十万亩左右。安塞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人口二万左右，现有人口四万以上。甘泉原只有八千余人，现有一万四千余人。延长在一九三九年只有人口二万五千，现有三万二千余。延川荒地最少，但从一九三八年到现在，也增加人口一万余。华池在一九三八年只有三万五千人，现有四万余人。其他如保安、安定、靖边、陇东、关中各县的人口均有增加。这些增来的人口，以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为多，其次是警备区，均是自动移来的，不是由政府组织来的。他们之所以自愿来，是因为有土地，有优待；各县又组织老户在粮食、工具、窑洞上的帮助等；同时又有富农接纳安伙子，也便利了移民。移民增加，不但耕地面积扩大了，也发展了牲畜，繁荣了商业。所以移民是发展农业的条件之一。

第四是奖励政策。移民三年不收公粮，并减少其他义务负担。棉农中有种棉利益不及种粮利益的，由政府赔偿。从边区外面买进来的牲口，第一年减少一定数量的公粮。还有两次农展会对于劳动英雄的奖励，也发生了很大效果。例如：延安的吴满有、卯克呼，甘泉的杜发福，都是经过第一次农展会奖励过的，他们现在都成了很好的富农，交公粮均在五担以上（边区一担三百斤），并在农村中推动了其他农户发展生产。所有这些，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粮食与棉花的发展。

第五是减少劳动力的浪费与调剂劳动力。内战时，因忙于战争，无暇生产，土地荒芜。和平实现后，又有自卫军经常的训练与放哨，还有各种会议，故每个壮丁一个月至少要耽误三个工。后来将这种误工减少了。同时，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公粮收的少，义务运输公粮也不多，误工较少。最近几年中农村中的札工（有工头，

集体为人家做临时工)、变工(群众互助性质，也是集体做工)发展了，调剂了劳动力。又动员了二流子参加生产，妇女参加生产的也多了。所有这些，就帮助了边区农业的发展。

第六是农贷政策。以前没有农贷，但有休养生息政策的帮助。现在公粮加重了，特别是百分之八十的农户都要交公粮，一部分(大致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和食粮的农户，必须有贷款的帮助。并且为了在某种必须发展的农业(如植棉)、农村副业(如纺织)与某些必须更多发展的地区，给以农贷尤为必要。一九四二年农贷虽然只放出四百余万，其中耕牛贷款只有一百五十余万，但在此项贷款帮助下，买了耕牛二千六百余头，又买了近五千个农具，又发展了植棉，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帮助。但因财力有限，只能按照政府的财力来贷款，还不能按照农户的需要来贷款，但少有比没有总要好些，总有些调剂的作用。

上面讲的是农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原因。下面再讲到我们工作中的几个主要教训。

第一，要因地因时制宜。农业的地区与时间不同，发展的方法也不同。例如警备区没有荒地(除清涧有少数)，耕地不能扩大；羊子为牧地限制，发展有限；运盐又缺乏驮牲；减租政策又未彻底；因此，那里的粮食没有增产，副业除纺织外亦未发展。但是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的深耕(改良作法)办法，虽在那里早已实行，也还应该根据现状作进一步的研究，以期尽可能地增产。但是这种办法，若拿在土地多、人口少、作法粗的区域去用，便少实效，因为这些办法都要增加劳动力。在后一种地区的农民看来，深耕不如多种地，多施肥不如多开荒；尤其在雨水少的区域，多种地[illegible]较强的。所以改良农作法的口号，现时在后一种区域一般是少实

效的。在这些区域，目前真正增加产量，最主要的还是靠开荒。如果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六年间，增加的耕地约有三百万亩，则一九四二年的收获量比一九三六年至少增加了粗粮五十万担，合细粮二十五万担（每担三百斤）。如果一九四二年边区的粮食产量估计为一百五十万担细粮，则六年来因耕地增加而增产的粮食，就占了总数的六分之一。此项增加的耕地，部分属于移民的开荒，部分属于老户扩大的耕地。由此可知，我们指导农业，要依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要有分别：在有荒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就是在一县、一区，有时甚至在一乡之内，也要有这种分别。例如一乡之中，某几村荒地多，就应鼓励开荒，某几村荒地少或无荒地，就应鼓励深耕。在时间上，尚有荒地时，该乡就应鼓励开荒，荒地开完，该乡就应鼓励深耕。但是我们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虽然一方面是有成绩的，在另一方面，却又有许多工作是空洞的，一般化的。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知道周密研究客观情况，根据不同地方与不同时间，提出确定的要求，解决增产的条件。过去曾一般地提出深耕、开荒、修水利及增产四十万担或二十万担的口号，实际则包含着许多的主观主义，许多农民对于这些口号是没有兴趣与影响的。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工作要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解决问题。

第二，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农民至今还是重租重息，减租减息的政策没有彻底执行。农民一面要向地主负担租息，一面要向政府负担公粮公款，自己所得太少，提不起生产的积极性，也就不可能增加生产量。从此得出结论：我们要认真执行减租减息的法令。

第三，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例如：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二两年农民所出公粮公草公盐甚大，而两年农民所扩大的耕地就只有六十余万亩，仅占一九三九年的十分之六。牲口在一九四一年实际上没有增加，羊子反而减少了（当然瘟疫有关系）。移民也减少了，一九四二年移民只有四千八百四十三户，并有三千五百二十七户老户发生迁徙，原因主要是怕负担。还有一个原因：在公粮征收方法上，是按实物收获而不是按地亩多寡累进，这种办法，在平均负担上来说是合理的，但对促进农业投资是有妨碍的。因为同样的土地，收成多，要多出，收成少，可少出，甚至不出，这样就会降低农民在土地上投资的积极性。如按地亩征收，这点便可纠正，中、富农的积极性更会提高，对于贫农也无妨害。从此得出结论：公粮公草要有限度，同时要改善征税标准，方能促进农业生产。

第四，政策应贯彻执行。例如：移民与植棉，规定三年免收公粮，但实际又向移民“欢迎”公粮，棉地也征收公粮一半；从外地买进的牲口，原规定第一年减少一定数目的公粮，也未实行；还有奖励生产条例也未完全实行。所有这些，不但影响政府威信，而且会降低农民的积极性。从此得出结论：今后凡属政府颁布的法令，必须坚决实行。

第五，调剂劳动力及其他许多帮助农民的办法，如变工、札工等关系增进农业甚大，但是除一部分地方如延安等县外，我们还[illegible]有去加以组织和发扬。各县干部，固然有许多同志是在那里积极[illegible]力地替人民打主意，创造了许多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的好办法，造[illegible]了许多的模范例子，但在另外许多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缺乏实[illegible]求是与积极努力的精神，他们缺乏创造性，他们觉得农业上没有

什么工作可做，或者不知从何着手，于是只提出“春耕”“秋收”等空洞口号，自己采取消极态度，让农民自流地去干，政府只是事后登记一下。但实际上要做的事很多，很多好办法都可以想出来。例如：延安县在一九四二年春耕时，一部分农民情绪很低，发生了移走或者分家、卖牲口准备缩小生产的现象。这些现象，在缺乏积极精神与缺乏创造性的同志看来，是没有办法的，只好听天由命，让其坏下去。但延安县的同志们却不是这样，他们没有消极态度，也没有官僚主义。他们能够抓住问题的要点，采取积极的办法，克服了困难。当时党与政府做了在宣传上、在粮食调剂上、在窑洞和农具调剂上的许多工作。后来，不但生产没有缩小，反而增加了八万余亩耕地。这一实例证明：我们的地方党与地方政府在农业上有很多的工作可做与应做，而且只要扼要、得法，一做就会生效。从此得出结论：干部要有克服困难的积极精神，要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根据群众的需要，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群众的问题，决不可有消极态度与官僚主义。

为了使我们的同志对于这一个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困难的极重要问题获得一个明确的观点，特将延安县同志关于他们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的报告，揭载于此，以供众览。

下面就是报告的原文：

延安县一九四二年八万亩的开荒计划是怎样完成的？

（一）依靠移来难民的劳动力来开荒。

一九四〇——一九四二年的难民有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八人，

个人一个劳动力，有五千零八十六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一年开十亩荒，计五万零八百六十亩（开十亩是三年来难民开荒的平均数。一九四二年每个劳动力开的比这还多）。

（二）依靠老户的劳动力、畜力来开荒，计二万九千三百九十九亩。

老户的劳动力有一万零六百一十六个，平均一个劳动力开不上三分地就可以完成。

（三）但组织劳动力是一件大工作。本年采取集体工方式进行集体劳动，如札工、变工。又组织妇女、二流子参加生产。

共组织札工四百八十七个。另外吸收四千九百三十九个好劳动力参加集体劳动（变工），几占总劳动力三分之一（今春统计全县劳动力一万五千七百零二个），即三个人中有一人参加集体劳动。

札工就是由农村中好劳动力八至十个一组，设工头一人，开荒时给人家或自己开荒，锄地时给人家或自己锄地。工头有时参加劳动，就拿两个劳动日的工资；不劳动，拿一个劳动日的工资。参加札工的有全为本村人，也有外来人或外村人与本村农民共同组织的。

组织二流子参加生产，农民十分高兴，可以鼓励农民劳动热忱提高。

妇女参加生产，一年比一年多。特别是难民妇女，开荒有她锄草的更多。柳林区本年有三十九人。川口区三乡难民妇女没镢头，跑到山里等别人累了休息的时候，拿了镢头开荒，人家休息了把镢头还回，又等着。

（四）依靠于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一九四二年本县着重每一农户生产计划的制订，由本人家中商量好，本人同意订出的。政府印一的表格，里面包括开荒锄草等。计划订好，贴在每户的窑

里，以后政府检查每户的生产计划时，即按此表进行。农户计划的制订，应按：（1）去年生产情形；（2）今年可能扩大生产的条件；（3）劳动力（人力牛力）多少；（4）得本人同意；（5）要有经常的检查督促工作。

（五）农贷的结果，特别是对难民十万元的农具贷款。难民来时什么没有，开荒却先要用“梢镢”刨去“梢”，才能用镢头开荒。农具贷款发给后解决了农具，难民开荒的热忱很高，六天可以开一垧。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注意：勿违农时）。

（六）春耕时，动员工作应尽量减少，让农民有时间去开荒，去生产。

（七）政府对开荒工作抓得紧。开荒时间仅三个月，以一百天计，一天要开八百亩，需要一千六百个劳动力，占去全县劳动力十分之一。在四月十九日前还只开了一万五千亩，距完成任务尚短得多，而时间已去了三分之二，所以下雨后从四月二十日起突击开荒二十天，在二十天中完成总任务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三月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前：开荒一万五千亩，占总任务的百分之十八点七；突击二十天：开荒四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亩，占总任务的百分之五八。

在突击中最好的为下列各区：

柳林区，突击时与十九日前开荒数之比，为一千二百九十四点四比一百。

姚店区，突击时与十九日前开荒数之比，为一千一百八十四点四比一百。

川口区，突击时与十九日前开荒数之比，为四百三十二点一比一百。

县府对于开荒工作，前后开区长会二次检查，发了三次指示信，县府干部下区乡达三次之多。

区对乡工作的检查有的达七八次，至少有三次。乡对村的检查次数也不少。

领导上的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如何解决难民参加生产问题

（一）历年来延安难民增加统计表（数目字是每年增加的，延安市不在内）：

年份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共计
户数	249	533	1137	5040	1050	8009
人口	1200	1976	6090	14207	6231	29704

与一九三七年人口比较：

	户　数	人　口
一九三七年	7703	32705
五年增	8009	29704
百分比	103.9%	90.8%

换句话说，户数增一倍以上，人数将增一倍。

移来难民主要住在川口区、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这些地方荒地很多。

（二）难民来后，政府替他们解决生产困难的统计：

年　份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共　计
调剂土地（亩）	10220	3451	6335	20006
粮食（担）	669.9	495	458.48	1623.38
籽种（担）	40.18	8.2	47.37	95.75
农具（件）	424	2133	427	2984
耕牛（头）	979	82	212	1273

（注：1. 一九四二年还给难民调剂洋芋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五斤，调剂牛工二百七十三个。2. 农具是铧、镢、锄三种。）

（三）解决难民生产困难的办法：

第一，土地是很多的，我们提出公荒谁开归谁，私荒本人不开，让难民开。三年不出租子，以资鼓励。

第二，住窑的问题：开始是住旧窑破窑。以后再有人来，因为多是找亲戚朋友、社会关系来的，来时住在亲友窑中，住下就打窑。还有是头一年先来一人，把窑打下，第二年搬家眷来住。

第三，吃粮在农民中进行调剂。今年提出春前借一斗，秋后还一斗三升，有三分的利，鼓励老户借粮，政府保证归还。另一办法是：发动老户与难民调分子、安庄稼、揽工，条件由双方自愿定，让老户主家剥削一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难民初来什么也没有，虽然被剥削，但不会使他们饿肚子。

本年统计：

调分子	三百五十九户
安庄稼	四百六十六户
揽　工	一百八十四户

共　计　　一千零九户

这些户的吃粮，依靠主家解决。但调分子只能解决自己吃粮。安庄稼的、揽工的，则除自己外，还可解决家人吃粮，这样的有六百五十户，一户以三人计，共一千九百五十人。加上调分子三百五十九人，共二千三百零九人，都是依靠主家解决吃粮的。假如要政府救济的话，一人一年五斗，需粮一千五百四十点五担，是多大的数目！所以安庄稼、调分子、揽工，条件由主伙双方自由决定，可以解决多大的问题。不但吃粮问题解决，扩大生产增加了粮食，每户以一个劳动力计，共有一千零九个劳动力，一个劳动力打二担粮，可以增粮二千零一十八担之巨，除消费外，尚可余八百六十三点五担，到第二年，这些人就可以自己从事生产了。

第四，籽种、土地，都是发动农民给难民调剂。籽种秋后归还，土地出租子，政府保证。

第五，举办难民农具贷款，解决开荒工具，收效很大。假使各方面问题（吃粮、农具等）配合不好，会耽误开荒。所以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

第六，对难民的负担问题，坚决执行边府优待难民的决定，三年中没有负担，相反地，政府还给解决各种困难。今年县、区、乡政府干部节省粮十担，用以拨给难民。中区三乡解决难民吃粮，各种动员工作尽可能少负担。

（四）难民为什么要来延安？

1. 我们真正解决了难民的困难。特别是一九四〇年解决难民的吃粮，把影响扩大了。单是川口一区，就给难民调剂了三百担粮，这样难民在一九四一年就来得多了。

2. 政府的号召力固然大，但是难民自己将所得实惠告诉自己亲

友及其他社会关系，来得更大。我们在来的难民中找拿有绥德分区所发难民证的很少，原因是怕在那里拿了安家钱、证明书，下来不自由，或变成公家人，宁愿自己找关系找钱来。

（五）对今后移来难民的意见：

1. 发动难民利用社会关系去找人来。

2. 县、区政府认真替他们解决困难。

3. 边区政府拨一部分粮款帮助他们，秋后归还。

4. 坚决执行优待难民决定。

如何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

（一）统计表：

年　份	原有二流子数	参加生产人数	未参加生产人数
一九三七	1629	299	1330
一九三八	1243	578	665
一九三九	543	120	423
一九四〇	359	175	184
一九四一	184	126	58
一九四二	145	40	105

说明：

1. 盘龙区某巫神，将三山刀打成镢头，向群众说：再不骗人，从此努力下苦。

2. 川口区三乡李家渠惠三、高武二人，今春每人分配开荒六亩，完成，而且超过二亩。四乡田家圪塄杨应成，分配开荒六亩，

完成九亩。

3. 柳林区今年纠正七人参加生产。乌羊区查出十二人，斗争后，有九人参加生产。丰富区八人。姚店区甘谷驿八人组成两个组，到张家沟开荒。

4. 丰富区三乡南义沟白粉玉，一九三六年前是神官，一九四一年有一头牛，雇一人，有羊二百只，当村长，出公粮十点二担，公盐二百斤，公草五百斤。今年增加一头牛，一个调分子，扩大生产，现在光景好了。

5. 盘龙区二流子，因政府动员他们参加生产，他们说：今年事情不对，公家将咱这批人抓得太紧了。如四乡李家砭李德金，过去吃洋烟，今年开荒六亩，烟也丢掉。全区有二十七个二流子，写保条好好生产，结果有二十个很好。

6. 牡丹区刘家坪某（忘记名字），政府动员他参加生产后，光景过好了。以后遇见工作人员去，他就好好招待，说：政府叫咱好好生产是对的。该区曹玉成，过去是个二流子，不种地，也不砍柴。不管冬夏，披着个捉襟见肘的烂棉袄，卷缩在冷炕上，每天吃上二钱洋烟，婆姨娃在饥寒交迫中啼哭着。革命后，在政府的教育下，现在他是四乡的生产主任，人人称赞他工作有办法，劳动英雄，并且他对二流子抓得很紧，逼着他们做生产计划，五天上山检查一次。刘拐、阎凤和在他督促下，今年每人种了八垧多地。

（注：一九四二年二流子增加的原因，是一九四一年金盆湾从固临县划归本县管理，该区统计有四十三个二流子，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

（二）我们动员的办法：

第一，是宣传教育说服，叫他们好好生产，粮食打下，光景好。

第二，由政府给以一定的生产任务，如开荒（上面的例子），按时检查，并在农村中指定专人监督他们生产。

第三，发动群众向他们作斗争，迫得他们参加生产。今年盘龙三乡金盆河与云山寺两庄，发动生产竞赛。在这个情形下，金盆河庄的二流子常德功，被全庄人斗争得上山开荒，开了三亩荒地，正准备种地十五亩。

第四，组织在集体劳动中。将二流子集中区上，组成开荒组，烟戒掉了回去。开的荒、种的地，谁的归谁。

第五，政府给二流子解决了生产方面的一些困难。

（三）结果：

群众是非常欢迎政府叫二流子生产。因为二流子成天不劳动，不出公粮，每逢有动员工作还说怪话，群众死反对。在二流子本身来说，在生产有实际成效后，他们知道政府是为了他们好的，上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个别顽固不改的，也有政府动员时跑走了，又回来的，仍然参加一些轻便的生产。本县没有二流子变成土匪的。

我们引了延安县党政领导同志们的这个报告，不是偶然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我们看，延安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一九四二年农具贷款放迟了一个时期，早一天早开多少荒地！”“抓紧时间，迅速解决各种问题是必要的，迟一天少开多少荒地！”“制订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

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这种情形，对于那些处理问题不根据群众要求而根据主观想象的主观主义者，对于那些完全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三年五载，下情一点不知的官僚主义者，又是怎么样呢？岂不又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吗？我们希望全边区的同志都有延安同志这样的精神，这样的工作态度，这样地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地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也学会领导群众克服困难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使我们的工作无往而不胜利。边区各县同志中像延安同志这样或差不多这样的人是不少的，我们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县、区、乡里去。

以上是过去边区农业的总结，以下来说一九四三年的任务。

农业方面的主要要求是增产粮食和棉花（副业另说）。按照目前粮食与棉花的需要，并为争取部分粮食棉花出口，还要求我们动员农民群众增产二十万担细粮及增产一百六十万斤棉花。这个要求究竟有无希望呢？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六年之间，估计约开荒三百万亩，增产粗粮五十万担，那么，可否在今后数年内，再从开荒及其他方法上增产粗粮四十万担或细粮二十万担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之间，棉地已达九万余亩，棉花已达一百四十万斤，那么，可否于今后数年内增加棉地十余万亩，增产棉花一百六十万斤呢？

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

农民如能增产细粮二十万担，那么，即使如一九四一年那样交出二十万担公粮，农民还是只以增产部分交给公家，自己可保有相等于原来的全部收获量。至于棉花，即使将来要酌量收税，农民也

可保有绝大部分的收获量，解决边区的纱布问题。

应该实行一些什么切实有效而不是空洞夸张的政策才可达到上述要求呢？根据过去经验，下列八项政策是必须执行的：（一）减租减息；（二）增开荒地；（三）推广植棉；（四）不违农时；（五）调剂劳动力；（六）增加农贷；（七）提高技术；（八）实行累进税。下面我们就来逐项加以申述。

我们的第一项农业政策就是减租减息。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中，约有一半是分过土地的，其余一半则未分过，如绥米警备区、陇东、鄜县及三边的许多地方都是。在这些地区，应依政府法令实行减租减息，这是增加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极其重要的方针。在减租减息后，农民对地主负担减轻，自己的保有量增加，生产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加，生产量也可增加了。关于这一项，西北局与边府已有具体决定，这里就不多说。

我们的第二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开荒地。根据荒地多的地方农民认为深耕不如开荒的要求，我们应在一切有荒地的县、区、乡组织农民多开荒地，以期增产粮食。开荒除老户抛熟垦新所开者外，主要靠招集移民来开，移民条件现在是有的，各县应做很大的组织工作。各县应根据可能条件分别新户老户，规定具体任务。照延安县的办法，订立每家耕种计划。这种计划，应将开荒地、种熟地一概包括在内。一九四三年全边区增产粮食数目拟定为细粮八万担，从人民与军队、开荒与改良农作法各方面来完成它。

我们的第三项农业政策就是推广植棉。全边区需棉三百万斤，如果平均每亩能收净花二十斤，只需棉地十五万亩。如果每亩只能收净花十五斤，或者还要少，便需棉地二十万亩。我们可照后一种估计准备棉地。但因新棉户缺乏经验与信心，纵然扩大植棉面积，

收成必不见佳，故不宜在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完成全部需棉数目，而以一九四三年增辟棉地五万六千亩，连前九万四千亩，共计十五万亩，以期产花二百二十五万斤为适宜。种植此项面积的棉籽、棉地均无问题，但轧花设备很不够。以每架轧花机平均每日轧花六十斤计，需轧花机三百架，方能在半年内将三百万斤花轧出来。一九四三年有二百二十五万斤花要轧，需机二百余架。但现在只有破旧轧花机约一百架，每日能用的还不过五十架。如以五十架轧二百万斤，需要两个整年。故解决轧花问题，是推广植棉政策中包含着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再则，目前边区农民尚不会榨棉油。二百万斤棉花便有四百万斤棉籽，每百斤可榨油十二斤。如榨油能解决，则棉农收益增加，植棉积极性亦可增加了。根据如上要求，一九四三年政府关于推广植棉应做的工作有如下列：（一）实地分配有棉地的农户种足十五万亩棉地，并帮助棉户准备棉种、肥料及种棉经验，有耕牛农具困难的给予贷款。（二）制造轧花机及轧花机零件，供给棉农，并帮助棉农修理旧机。同时组织棉农向外地购买轧花机，政府酌予贷款帮助。用这些办法解决轧花问题。（三）研究棉油榨法，使棉农能将四百万斤棉籽榨出四十八万斤油来（每斤十五元，值一千零八十万元）。（四）组织公私合办的棉业合作社，经营轧花、打包、销售及榨油等事业。（五）奖励优秀棉农，介绍种棉、轧花等优良经验，借以增进棉农的积极性，提高棉产的数量与质量。

我们的第四项农业政策就是不违农时，即在农忙时允许农民停止一切无关农业的开会与动员。在陕甘宁边区环境内，农忙时期应该停止农民群众除农业以外的任何开会与动员，借以节省人力畜力，使之全部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必要的开会与动员，应当利用农隙。过去那种开会太多与动员太多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我们的第五项农业政策是调剂劳动力。这里有奖励移民、劳动互助、动员妇女、动员二流子、着重优抗、生产给假、军队帮助等项办法，都是有助于劳动力的调剂的。

关于奖励移民，要靠政府和人民配合来做。其办法是：（一）由绥米警备区党政负责组织五千个劳动力的移民向直属各县开荒；但须在自愿原则下，并进行各方面的宣传组织工作。（二）政府准备部分粮食借给必须帮助的移民，另外酌予农具贷款，并切实实行免征三年公粮的优待办法。（三）发动老户帮助新户，如借粮、让熟地、借窑洞等；但此项借助应允许出借人享受利息，利率由双方自由决定。（四）组织基础好的农户吸收最穷苦的移民伙种。租率亦不应过于低抑，使老户乐于接纳。（五）对外地移民，应经过和外地有关系的老户去号召。边境各县应有专人负责接待，替他们介绍至有荒地的地区去安插。例如近日有河南灾民六百至陇东，即应好生接待他们。

关于劳动互助。这就是说，在一村之内，或几村之间，不但每一农家孤立地自己替自己耕种土地，而且于农忙时实行相互帮助。例如以自愿的五家六家或七家八家为一组，有劳动力的出劳动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出多，少的出少，轮流地并集体地替本组各家耕种、锄草、收割，秋后结账，一工抵一工，半工抵半工，多出的由少出的按农村工价补给工钱。这个办法叫做劳动互助，从前江西苏区普遍实行的劳动互助社或耕田队，就是用这个办法组织起来的。人口密集的乡村，还可集合多少互助组为一互助社，组有组长副组长，社有社长副社长，组与组之间还可互相调剂。在必要与可能时，社与社之间亦可有些调剂。这就是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

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边区有些地方已经实行的变工，就是这种办法。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社，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此外还有一种札工，也为边区农民所欢迎，其法不是劳动互助，而是一种赶农忙的雇工组织，也是几个人或更多人为一组，向需要的人家受雇而集体地做工，一家做完再往他家，亦能调剂劳动力。各地对外来札工应予以帮助，例如帮助找工作等。

关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边区妇女虽多小脚，但仍然是仅次于男子的广大的劳动力，她们可以参加各种辅助的农业劳动，如种菜、播种、锄草、喂牲、送饭、挑水、收割等，有些还能做主要劳动。她们过去已经相当普遍地参加了，今后还应广为宣传、劝告，发动她们的劳动热忱，借以增加农产。边区党的与群众的妇女组织领导机关的同志们，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工作方向，感觉无事可做。其实她们的第一个任务就应是研究与帮助边区妇女群众广大地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一同解决增加生产的大问题。边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放脚，大大妨碍劳动生产，应用宣传与强制两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使她们放脚。今后无论何人，不许再为幼女包脚。

关于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此事在过去数年已有显著成绩，各县在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后，二流子人数大大减少了。但是一切尚有二流子的地方，必须在一九四三年用说服与强制两种方法全部动员他们加入生产战线。延安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是布尔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

关于着重优抗。过去事实上是优工第一，优抗第二，这是很不正确的现象。现应倒过来，优抗变为第一，把人民的代耕制，首先认真地替那些缺乏劳动力的抗日军人家属（不分我友）耕种土地，其次才是替那些真正缺乏劳动力的党政工作人员的家属耕种土地。在劳动互助社（变工）组织成功的地方，可以委托互助社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生产放假。这就是说，当农忙时，边区某些家境困难的党政工作人员，应每年允许他们回家二次，每次若干天，从事家庭生产。边区的小学、中学，农忙时必须停课，让学生及本地教员回家帮助生产，这也是调剂劳动力之一法。

关于军队帮助。当农忙时，边区军队一律就驻地附近替农民耕种若干天，锄草若干天，收割若干天，而不收受任何的报酬（吃自己饭），一则可以调剂劳动力，二则可以借此密切军民关系。军队的政治工作部门，应当计划这一工作。

所有上述七项调剂劳动力的办法，如果实行得好，对边区的农业生产是有很大帮助的。其中特别是劳动互助社的办法最为重要，应在全边区普遍实行起来。

我们的第六项农业政策，就是增加农贷。一九四二年政府放了耕牛、植棉、水利等几种贷款，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困难。边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使农业获得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一九四二年由边区银行主持在延安、甘泉、鄜县、安塞、子长、固临、志丹等七县共计八千零二十五户农家中，放了一百五十八万元关于耕牛与农具的贷款，加上农民自己集合的资金一百零

三万余元，共买耕牛二千六百七十二头，农具四千九百八十件，增开荒地十万余亩，估计可增产粗粮二万六千余担。另外在延长、延川、固临三县，放了植棉及棉花青苗贷款一百五十三万元，扩大了植棉面积五万一千余亩，估计可增产棉花八十七万斤。根据一九四二年农贷的成绩，除本年已放收回的三百一十一万元应继续贷与农民外，一九四三年还应增加一千七百万元，连前共计二千零十一万元。其中以一千四百万元办理农具耕牛贷款，以三百万元办理植棉贷款。根据一九四二年放款的经验，一九四三年的农贷实施，应注意下列各项：（一）贷款应放给荒地多的区域内有劳动力而缺乏耕牛农具或缺乏粮食接济的新旧移民及老户贫农以及土地种的多而无钱雇人锄草的农家。（二）经过物资局试办从外地买部分耕牛及适用的镢、铧，或帮助农民自己去买，举行实物借款。这样才是真正增加了边区的耕牛农具；否则，农民拿了边钞只能从边区富农地主手中购买耕牛农具，还只是从边区内部起了调剂耕牛农具的作用，没有起增加耕牛农具的作用。（三）明年农贷既已增加，应相当地改变今年集中延安周围数县放款的方针，而以适当部分发到绥米、陇东、三边、关中各地去。但亦不应取平均主义，而要有计划地放在荒地多、需款迫切而又能生产获利的那些县区与农家。（四）放款的组织要改善，即应经过当地区乡政府及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合作社去放款。因此，要使区乡干部认识农贷对于发展农业的重大意义，不要将农贷看作赈灾救济，不可采取平均分配政策及不负责任的态度。（五）放款的手续要简单，要用当地农民已经习惯的借贷办法，不用“借款申请书”等手续。（六）在农贷的总数二千零十一万元中，划出三百万元，专作棉花与麦子的青苗贷款，借户在棉麦收获后以实物还款。这种贷款虽指定为棉麦青苗贷款，但农民可自由使用。这

种贷款公私两利，政府可以收回实物，农民可以减少高利贷的剥削。（七）放款要不违农时。财厅及银行应即速筹划，以便在今年阴历年底以前发放贷款总数之半，即一千万元。

我们的第七项农业政策就是提高农业技术。这里说的提高技术，是说从边区现有的农业技术与农民生产知识出发，依可能办到的事项从事研究，以便帮助农民对于粮棉各项主要生产事业有所改良，达到增产目的。某些改良是完全可能的，我们已有了相当的经验，对这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热情是不对的。但夸大改良可能性，以为边区可以实行现代化的大规模农业技术，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这方面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做的呢？我们认为下列各项是应该做的：（一）兴修有效的水利。举靖边为例。靖边只长城区杨桥畔一地即有二万五千亩地可以修成水地，他们已修五千亩，一九四三年还要再修。据靖边同志说：旱地一亩只能收一斗细粮。但水地一亩年种庄稼三次：先种春麦，收八斗，合细粮四斗；次种黑豆，收四斗，合细粮二斗；次种萝卜，收二千斤，每斤价三毛，值六百元，按每斗细粮价一百五十元计，合细粮四斗。三项共合细粮一担，正当旱地收获的十倍。故靖边农民常常自豪地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林里带萝卜。”修水地的重要问题是地权分配问题、动员民力问题、组织领导问题与壕坝工程问题，四者有一不当，即不能成功。一九四二年靖边同志领导农民在把兔湾、杨桥畔等地方打了六个坝，依坝作壕，引水灌地。他们事先替地主与农民按三七分地、四六分地或对半分地解决了地权问题，发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据靖边同志说：“只要解决地权问题，农民是容易号召的。如我们修十处水地，除原有农民二百余户外，新号召来的有百余户，其中有从友区来的三十多户。”又说：“修水地，政府贷款固然重要，但主

要地要靠组织民力，吸收游资。靖边一九四二年兴修五千亩水地，共用工二万八千五百六十个，平均每亩地用工五点七个；共用款八十五万八千元，其中公家贷款二十一万元，吸收游资六十四万八千元。当然这个游资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以工代款的。”关于组织领导，靖边同志说：“我们对兴修水地的领导，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种是就地物色好的农民三人至五人组织水利委员会，负责调剂劳动力与调剂劳动工具等。但其中常因地权问题、水利使用问题等难解决，障碍水利工程之进行，故尚须有第二种办法，即政府派干部协助领导，解决群众中的争执问题。县府除水利局外，另外派了三个干部分管十处工程的领导。”靖边同志们还决定于一九四三年继续在杨桥畔修四千亩水地。但因该地原来只有居民六十户，一九四二年移来四十余户，共计百余户，劳动力还成大问题。故决定于一九四三年招来移民一百户，现已开始打窑洞，准备住的地方。“对于处理这一百户移民是一个大工作，因为他们多是从横山来的，多是难民，故还需相当的代价，才可完成。若移民到达，加上当地人力，一九四三年再修四千亩是不成问题的。”此外，靖边同志还修了一种水漫地。所谓水漫地，“就是处在三面高山一面天沟之间的大块平地，有的二三千亩，有的二三百亩。此种土地，土质很好，但上面堆着砂砾，妨碍禾苗，并使土质变坏”。修这种水漫地的办法，“就是沿天沟一面畔上打起很坚固的坝，栽上沙柳与宁条子（冬天可供羊吃），使常年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水，不叫从天沟流去，全漫在地上，泥质既厚，肥料又多，又富水分，极宜庄稼；并使地面年年扩大，把山沟都漫成平滩，生产面积也扩大了”。这种水漫地比旱地收成多到一倍以上，“如旱地一垧（边区延安一带每垧三亩，靖边一带每垧五亩）打粗粮一担，水漫地就可打二担或三担”。这种水漫地的修筑，

是靖边同志在一九四二年春耕动员时才发现的，故还只在两处地方试修，修了一千亩。他们准备于一九四三年在好几处地方同时修筑，共计面积一万三千余亩。据说“全县共可修筑水漫地五万至六万亩”。我们详举靖边这一实例，证明兴修水利并不是没有希望，在有些地方是有修水利的条件的，特别是靖边同志这种认真努力实事求是的精神，值得各县效法。各县水利情况虽不会与靖边相同，但依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与人民的努力，在真正有利的条件下，也可开发若干水利事业。政府于一九四三年应拨出二百万元，在靖边之杨桥畔、鄜县之葫芦河等处进行水利贷款。（二）推广优良品种。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例如光华农场已经试验成功了的狼尾谷，产量高，不怕虫蚀、鸟啄，随地可种，他们的洋芋产量也较普通为高，应向农民提倡种植。先在每县各择一二个区令一部分农民试种，如觉土壤、气候适宜，即可普遍推广，以期增产。（三）鼓励从事秋开荒、秋翻地。因为秋开荒、秋翻地，可以减少虫害，可以促使土壤风化，又可保持水分，增加来年的收成。（四）在劳动互助社组织推广之后，鼓励农民多锄一二次草。锄草的作用不但在于去草助苗，而且在于蓄水耐旱。如多锄一二次，即使施肥不多，亦可增加收获量。（五）由建厅及五个专署筹划，在一九四三年夏冬两季，五区分别举行五个展览会。根据边区两次农展经验，改善农展布置，介绍与奖励农民模范成绩，推广吴满有式的勤劳与得法的农业生产运动。一九四三年各区农展，要有军队及机关学校农业生产成绩的参加，借以鼓励军队及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并达军民联合之目的。（六）《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一九四三年应大大提倡吴满有式的生产运动，使在五个区域内产生很多的吴满有。（七）边区的

小学及中学应设农业常识课，并应编制包含边区实际农业常识的冬学课本，以达改良农业增加农产的目的。（八）建厅应召集专家，着手研究从梢山流出的柳根水，加以科学的处理，以免人民吃了成“拐子”。这个问题如能解决，则靠近梢山的许多沃野可以诱人耕种，变成大量的良田。

我们的第八项农业政策是实行农业累进税。过去的农业税是采取救国公粮的形式，虽然也是按累进原则征收的，但是每年征收总数多少不一，每年每家征粮数自然也就多少不一。一九四一年发生摊派现象。一九四二年虽改取评议制较为公平，但不公平的现象还是有的。主要缺点是税率不确定，损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议政府于一九四三年进行人民土地的调查与登记，依此制定一种简明的农业累进税则，依一定土地量按质分等计算税率，使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与质计算交税数目。农民有了这个计算，就可计算他全年全家收支的比例，就可放手进行生产，而增加生产积极性，保证粮食的增产；政府征税时也就不发生不公平的问题了。一九四三年这个准备工作完成后，一九四四年就可实行征收累进税。有些准备工作完成得早的县，可于一九四三年先行试办。

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与准备实行累进税——这八项，就是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可以做、必须做并会切实有效的农业政策。除累进税一项一九四三年是做准备工作或只在几县试办外，其余七项，应即全部实施。其中有许多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就要动手做，否则时间误过，就会变成空话。

上面这些，就是我们对于过去民营农业工作的总结与一九四三

年的农业工作方针。下面再说与农业密切联系着的农村副业，如畜牧业、手工业等。

三　关于发展畜牧业

畜牧、运盐、纺织是边区农民的三宗主要副业。而牛与驴的繁殖，对农业与运盐业有决定的作用，这是大家知道的。羊的繁殖，对被服有很大关系；去年一年边区农民收入羊毛羊绒一百余万斤，加上羊的出口，估计约值二千余万元，就是明证。牲畜的最大敌人是病多与草缺，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发展是不可能的。首先，疾病的破坏力很大。例如一九四一年春靖边因羊瘟而死的羊就有二万余头，一九四二年定边羊瘟死羊一万六千余头；一九四一年夏，延安牛瘟死牛五百余头；一九四二年志丹夏秋牛瘟死牛五百七十四头；可见疾病是边区牲畜的大敌。再则，牧草不足，又极大地阻碍牲畜的繁殖。一九四一年春靖边死大羊二万余头，羔羊三万头也大部死去，除上述羊瘟关系外，缺草是一个重要原因：靖边同时还饿死牛马二千余头。因盐运道上缺乏积草，大大妨碍盐运，这又是近年极感困难的事。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牲畜与增殖牲畜。而要达此目的，就须实行如下各项办法：

（一）防疫。这里主要是由县区政府召集本地兽医及老农，研究防止兽瘟与医治兽瘟的简单办法，向牲畜较多的农家劝导实行，这是普遍易行的。其次，建厅应令农场增加兽医设备，研究边区兽瘟，制造大量的血清与疫苗，倡导并实行有效的防瘟与治疗办法。

（二）推广牧草种植。边区牲畜大多数是放牧，牧草不佳，容易

生病，因此应该普遍推广苜蓿的种植。特别在盐运路上及其附近多种，不但便利盐运，且可发展牲畜。一九四二年政府原计划推广苜蓿种植三万亩，结果只得二万三千余亩，因为种子不足。一九四三年各县政府应从关中多运种子，发给计划种植区域的农民，并鼓励农民自购。此外应动员农民，秋季大量割野草，储备冬用，不但可免牲畜因吃冷草生病，而且可免农民因无冬草卖掉牲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看靖边的经验。靖边同志鉴于一九四一年春季牲口大批死亡，在两年中做了许多工作，他们是用种苜蓿、修草园、割秋草、栽柳树、挖草根五种办法号召农民解决牧草的。第一，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叫农民种了二千多亩苜蓿，大部分种子由政府发给，农民情绪很高。一九四三年，他们准备再办一部分种子贷给农民，特别号召农民自备种子，对成绩优良的给以奖励，激励他们大量种苜蓿。第二，他们在一九四二年修了四千余亩草园。这种草园里的草都是芦苇，在靠蒙古边界沙漠中的海子与大草滩上长得很茂盛，每亩能割五百余斤。革命前原有草园，后来破坏了，牛羊随便践踏。现在发动群众修复，不费多少人工，秋后割草，以备冬用。第三，靖边山地有芦苇、白草、兵草、沙竹、沙蓬等野草很多，秋季收割，大有助于牲畜。一九四一年发动群众割了五百万斤，一九四二年又动员每人割一百斤，现还未作总结。第四，是发动群众种柳树、沙柳、宁条，其枝叶可供骆驼及羊子吃，亦是解决牧草一法。同时可供燃料，群众是欢迎的。政府的任务是调剂树种，劝令种植。第五，靖边的白草、兵草，牲口不但吃其草叶，而且吃其草根。靖边春耕时，壮年上午耕地，下午挖草根，晚上喂牲口，女子儿童则整天去挖，每人可挖百余斤，对畜草起很大作用。但因挖的人多，发生地权争执，灾民难民无地者更加不利，故政府须予以调

剂。据靖边同志说："我们在这几种办法下给人民解决了不少的问题。一九四二年固然因为雨水多，草长得好，但也因上述五种解决牧草的办法，使畜牧发展了。如一九四二年全县下的六万余羔羊都活了，死的很少。大羊与牛驴马等，除个别地方病死一部分外，一般的死亡率减少很大。全靖边牲口除羊外，每年要用三千万斤草，而用上述五种办法，至少可补助一千万斤草。"牧草是牲畜的生死问题，我们希望各县同志都做出一个一九四三年的牧草计划来。

（三）禁杀母牲，并禁母牲出口。牛则一律禁杀，老牛可杀者须经检验。

（四）改良畜种。研究已有"输种站"的经验，选择好的驴种、羊种，劝令民间推行。先从甘泉、延安二县做起，再及他县。此外应由政府从盐池买一批"滩羊"，发给羊多农家配种，每一头公滩羊可配二十只母羊。这种羊毛很细软，且能每羊年产二斤。

我们如能认真实行以上各项办法，边区的牲畜会有更大的发展，希望建设厅及各县同志加以注意。

四　关于发展手工业

手工业在边区是作为大量家庭副业与一部分独立手工业而存在的，其中以妇女的纺土纱织土布为大宗。但是多年以来，这种土纱土布的大部分已被洋纱洋布打败了，最近几年由于我们的提倡，才又有些恢复。但是边区农民还是要拿了自己的剩余农产品、皮毛及运盐业去外边交换大量的洋纱洋布进来，自己的纺织业还远不够供

给自己的需要。这里论述的民间手工业，也就以纺织业为主，兼及蚕丝与棉油，其他暂不论及。

甲　纺织业

老百姓及军队与公务人员，年需布二十五万匹（每匹宽二尺四寸长十丈的大布），其中军队及公务人员占五万匹，老百姓约占二十万匹。现在的供给量呢？七个公营纺织厂年产布约一万一千余匹，大小七个民间纺织合作社，年产布约一万八千匹，民间妇女织土布无统计，估计约有三万匹，公私合计年产量已有十万匹，距需要量尚差十五万匹。即是说，我们已可供给百分之四十，这是很大成绩。但尚差百分之六十，这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很大的，须要几年才能解决；但是依靠现有的公营纺织与民间纺织，加以改良与推广，是有解决的可能的。我们有了棉花，可以有计划地发动民间妇女纺纱，与民间纺织，加以改良与推广，是有解决的可能的。我们有了棉花，可以有计划地发动民间妇女纺纱，织半土半洋布，逐渐减少洋纱的进口，并逐渐做到完全用自己的纱织布，就可解决这个问题。织布的任务：第一，依靠公营工业。一九四二年公营布厂已能产布一万一千匹，差不多可以供给军队及公务人员需要之半数；再过几年，就可完全自给。第二，提倡民间妇女织布。绥德一带妇女已能年产三万余匹，只是尺寸不一，人民不乐购用，仍然欢迎外布，如能加以改良，增加布产是有希望的。第三，民间合作社已能年产一万八千匹，还可发展。全边区的布，必须依靠这三方面协力，才能解决。但首先与最大的问题是纱。二十五万匹大布如全用土纱织，以每匹十二斤纱计，需三百万斤纱。如用土纱洋

纱各半合织，则需一百五十万斤土纱，十五万捆洋纱；目前公营布厂及民间合作社织的就是这种半土半洋布。但土纱还是不够，还需大量推广民间纺纱，并改良纱质。因此，逐步发展民间手工纺织业，扩大其数量，改善其质量，就是边区的极重要任务。

如何逐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过去经验，我们提出下列办法：

（一）首先是整理与发展绥德警备区各县的民间纺织。办法是：由警区专署主持，联合物资局及三五九旅大光纱厂协助，发棉花给妇女，令其多纺土纱，供给公营布厂的纱的需要。这个办法一九四二年行之有效，一九四三年应继续，并扩大之。警区民间土纱除供给公营布厂之外，还可自己织布，由物资局规定布的尺寸与质量，并保障其销路，即由物资局收买，或自己用，或转卖民间。其次，为增产土纱计，应由政府投资一百万元，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组织妇纺八百家的经验，贷与延安、安塞两县三千家，一九四三年在两县扩大纺纱机三千架。再在庆阳、曲子一带组织一千家妇纺，扩大纺纱机一千架。这种贷款由物资局经办，发给棉花与纺机，而收买其土纱，借以供给公营布厂的需要。其次，为增加布产，应由政府再出一百万元，取借贷或合股方式，投入现有的民间织布合作社，推广民间织布事业。

这里应举出延安县的计划。据延安同志在其《一九四三年生产建设计划》中说：“一九四三年发展会纺织妇女四千名，一人一年估计纺纱十八斤（一月一斤半），可纺七万二千斤；加上一九四二年度已有会纺妇女一千斤，可纺二万斤；两共可纺九万二千斤纱，可织八千三百六十三点六匹布。但距需要尚短四千八百八十六点四匹布，准备在二三年内解决，达到完全自给。本县人口六万四千（延

安市不在内），大人约四万二千名，一人年需四分之一匹大布（单衣一套一点一丈，棉衣半套一点四丈，共二点五丈，每匹大布计十丈），共需大布一万零五百匹。小人二万二千名，用布约为大人之半，八人一匹布，计二千七百五十匹。全县年需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匹。一九四三年纺成的九万二千斤纱，织成八千三百六十三点六匹大布，需要五十六架织布机（一架年织大布一百五十匹）；一九四二年本县农村及工厂已有织布机十二架，一九四三年应在农村中以合作方式发展四十四架。其办法如下：第一，妇纺推广奖励费五万元；棉花资本以五千斤周转计，每斤一百元，五十万元；纺织工具费，纺车一千架，每架一百元，十万元；织布机四十四架，每架一千元，四万四千元。四项共需资本六十九万四千元。第二，农村织布机，由农民自己集股建立，政府帮助解决其困难，如训练技术工人等，或作部分投资，如机子投资等。第三，发花二斤，收纱一斤。农村织的布，农民自己用。高峁纺纱厂应起推动妇纺、训练工人的领导作用。”延安同志这一计划是很可注意的，如果素少纺织经验的延安人民，能由党政推动于二三年内全部解决纱布自给问题，则其他无经验各县当然也可在相同时间或较多时间内解决，我们希望各县同志都有一个计划。至于有经验各县如警区一带，当更易解决。根据延安同志的推算方法，大人占三分之二，小人占三分之一，大人四人一匹布，小人八人一匹布，则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年需布不是二十万匹，而是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匹。即使这样大的数目，根据延安同志的意见，也可在二三年内解决。总之，依靠人民动手与党政领导，是什么困难也可克服的。

（二）由建设厅研究民间纺纱经验，改良土纱质量，准备使边区布产全用土纱，逐渐减少以至最后停止洋纱的入口。如纱质不能改

良，洋纱是无法杜绝的。

（三）改良公营工厂的毛织物，用毛织物代替一部分军用棉织被服，借以减少棉布的消费。

（四）一九四三年公务人员以身作则，一律着土布。同时劝告人民多用土布，少用洋布。由物资局根据土布发展情况，逐渐限制外布入口。

用了上面这些办法，就可帮助我们逐步解决纱布自给的大问题。虽则这只能是逐步去做，但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要坚决实行各项解决纱布自给的办法。

乙　棉油业

因为植棉各县的农民，一九四二年已能收棉籽约三百万斤，可榨油约三十六万斤；明年扩大植棉，可得棉籽五六百万斤，又可增加榨油量，我们不应让其抛置。棉油是可供食用的，但边区农民还无此习惯，如无政府提倡，他们不会榨油。因此应由边区政府投资三十万元，经过植棉各县政府劝告农民试办棉籽榨油业。试验成功后，再行推广。油归政府收买，这不仅可以解决吃油问题，而且按照现在油价（每斤三十元），如能产油三十六万斤，农民则可收入一千零八十万元。

丙　蚕丝业

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固临等县，很多农民养蚕，是一项相当大的副业。如安定一县一九四二年养蚕的就有三千五百

八十五户，得茧二万三千六百六十二斤，值洋六十万元。

我们的缝纫工业需要丝线，我们的毛毯工业需要丝边，我们还可用丝作纬织布借以减少洋纱入口，故应发展边区丝产。其办法是由政府支出三十万元，贷给农家，发动养蚕，特别贷给那些养蚕成绩好的农民。并由物资局，经过当地合作社，收买农民的丝及向农民定制丝织品，促进丝业的发展。

上述纺织业、棉油业、蚕丝业三项，共计投资二百六十万元（纺纱一百万，织布一百万，榨油三十万，蚕丝三十万），款虽不多，却可推动人民发展一步，解决当前的迫切需要。在一九四三年我们更有经验之后，应该考虑增加资金。特别是纺织业，非有民间动手，公家帮助，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

我们只在这里提到纺织、棉油、蚕丝三项，其他均未提到。各县可按具体情况，将有关人民经济又须党政推动的手工业，加以研究，做出自己的计划。

五　关于发展合作社

边区在内战时期，就有合作社。抗战以来，边区政府继续提倡，又经过五年半的磨炼，逐渐发展了边区合作社。

就消费合作社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四年中，由一百三十社增到一百五十五社；社员由五万七千八百四十七人增到十四万零二百一十八人；股金由五万五千五百二十五元增到六十九万三千零七十一元；销贷额由二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十九元增到六百万八千余元；红利由四千八百元增到一百零二万余元；公积金由三千五百余元增到十七万三千余元。

一九四二年十月底止，十九个县市的统计，与一九四一年比较，社员由九万七千二百九十七人增至十一万五千八百九十九人，股金则由七十一万二千九百余元突增至六百余万元，红利亦由八十五万八千余元增至三百三十九万八千余元。

消费合作社社员的股金，最高的达到一万元，最少的每人四元、五元不等。

消费合作社的分布：到一九四一年底，计延安二十八个，安塞十二个，延长八个，固临八个，定边八个，庆阳、华池、曲子、延川各七个，安定、鄜县、吴起各六个，甘泉、靖边、合水各五个，延市、米脂各四个，绥德二个，其余各县尚无统计。

就生产合作社说，一九三九年起，经过政府的提倡与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办事处的帮助，建立了十个生产合作社。继而有一些资本较大的消费合作社也兼营生产合作社业务。到一九四二年十月止，由十个生产合作社增至五十个；从事生产的员工，由一百九十九人增至五百六十三人；股金由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元增至二百四十九万一千六百元；每月生产总值，由六万元增至二百三十余万元。

生产合作社的分布：据今年统计，绥德十六个，延安七个，固临五个，延长五个，延川五个，甘泉三个，安塞三个，靖边二个，庆阳一个，葭县一个，米脂一个，安定一个。

五十个生产合作社中，有纺织合作社大小二十七个。计绥德十三个，延安四个，固临二个，甘泉、鄜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葭县、米脂各一个，共员工四百九十七人，股金一百七十万元。其中有二十五个员工以上的有六个，其余十余人、三五人不等。此二十七社，如果全部开工，年可产布三万匹（十丈一匹），现只产二万二千匹左右，织线毯六千条，织毛巾四千一百五十二打，

织袜八千四百打。

染色社五个：计延川二个、绥德二个、延长一个，员工共十三人，股金十二万八千元，年可染布七千余匹。榨棉花籽油的生产合作社五个：计固临二个、靖边二个、延长一个，员工共十九人，股金二十四万五千元，年可榨棉油一万斤。粉房九个：计安塞、甘泉、延长、延川各二个，固临一个，员工共二十四人，股金二十六万二千元。制毯合作社四个：计延安二个、庆阳一个、绥德一个，员工共四十二名，股金十五万二千元，年可制毯七千六百条。瓷窑社：延安县一个，员工七人，股金三千元，年出瓷器六窑。

从上面的统计来看，消费和生产两种合作社，不论社员、股金、红利与事业各方面，在数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发展，五年来经过了三个阶段；而质的发展，则直到一九四二年才迅速前进。在一九三九年以前，各地合作社以公家的股金为基础，再加上向群众摊派而得的股金，这时候是带着公营性质的，多成为县、区政府的公营商店。合作社的事业不是面向群众，而主要地是面向政府，替政府解决经费，一切问题由政府解决。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三九年后，提出了“合作社群众化”的口号；但各地仍多用旧方式在群众中去扩大摊派的股金，来推行其所谓“群众化”。因此，合作社仍被群众认为是摊派负担，而不被认为是群众自己的。合作社的人员，仍然是和公务人员一样，要群众优工代耕，群众看不到合作社对自己有多大利益，反而增加了群众的劳力负担。由于一九四○年以后各地政府生产自给任务的增加，于是有许多合作社的大股社员不是人民，而是政府机关；合作社对群众利益自然更加无法多去照顾了。这是第二阶段。只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建设厅根据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

行民办官助”的方针，各地合作社才从实现这一方针中，取消了摊派入股的方式，摸索地创造着和群众密切联系，和群众利害相关的经验。这样，仅仅在十个月中，股金即突增五百余万，事业也发展了。在组织人民的经济力量、减免中间剥削与发展人民经济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是第三阶段。只有到了这个阶段，边区合作社事业才一般地开始走上了正轨。

以上是说一般合作社的发展道路，但中间也有例外，例如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就是较早走上正轨的。南区合作社在几年的锻炼中，成了真正被群众所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一九四二年，在绥德、安定、安塞、甘泉、延长、吴起等县的个别合作社，也正在学习这个模范合作社而前进。

南区合作社究竟有哪些特点呢？它有下列各项优良特点。

第一，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项事业。它组织了纺织、榨油、制毡等六个生产合作社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它不斤斤于合作社本身的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的多少，而尽量将赢利分给社员；它不限制股份的红利，不论社员股金多少，一律照股分红；它不限制社员对股金处理的权利，每个社员都有随时退股的自由；也不限制社员资格，各阶层人民都可加入（因为延安是经过土地革命的区域，各阶级入股并不妨碍共产党对合作社的领导），机关社团也可加入。也不一定要用现金入股，当它还未在群众中有完全信仰时，它允许人民用公债券、储蓄票入股，以扩大股金。当它在群众中已有信仰，而群众要求入股无钱时，它号召群众可用一切有

价实物入股，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等等。因此，一切人民称便。

第二，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它逐渐被群众所爱戴。如每年春耕时，事先从韩城等地运铧，以比市价要贱的价格卖给农民。组织各种生产事业，不仅吸收了失业工人，招收了学徒，安置了工作人员的家属，而且扩大了事业的赢利，保障当地人民日用必需品的供给，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比如南区合作社组织八百多妇女纺纱，每月可纺一千四百斤，每月增加收入七万元。它的消费合作社的营业方针完全为保障老百姓的必需品，不仅使老百姓少走路，而且比大城市商店的东西还要便宜。

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经过合作社，一方面贯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一方面又调剂人民的负担使其更加合理化，增加了人民的收入，提高了人民的积极性。比如一九四一年政府动员驮公盐时，南区合作社要南区人民交纳代金给合作社，而由合作社的运输队代替人民驮盐交政府。比如在政府收公粮以前，合作社动员老百姓先交照上年应交的公粮给合作社，合作社不仅保障替社员代交本年应出的公粮，而且承认所交公粮的数目即作为老百姓所入之股份。因此，一方面，合作社可以向政府交涉，替政府保管公粮一方，在政府未支用以前，合作社可以将公粮周转赢利；一方面，老百姓不仅交了公粮，而且入了股。所以有些老百姓家有余粮的，甚至愿交二年的公粮给合作社，不管下年增加公粮多少，由合作社负责代交，南区有四十余户农民就是这样做的。这样就固定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就提高了。比如县、区政府要人民出教育经费与

自卫军放哨费，亦由合作社从红利中替人民支付，既可免政府收费之烦，又可减人民支付之苦。比如政府奖励移民、救济难民的政策，合作社亦可实行（它可以给难民、移民以贷款等等）。如此种种，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四，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不开社员全体大会，而由社员按村举代表到会。不采取摊派入股的方式，而是团结社员的积极分子去劝导人民入股。不限制社员入股数量而照股分红，但在解决合作社的一切问题上，不管股份的多少，每一社员都有平等权利。

以上就是南区合作社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消费合作社方面，并未违背消费合作社事业的基本精神，而且正是根据边区人民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特点而产生的。在生产合作社方面，虽不是生产者本身的合作事业，而是合股雇佣企业；但在手工业不发展、手工业工人不多的边区，为着吸收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现在的生产合作社方式，也就成为适合现地现时条件的产物了。

南区合作社，从一九三六年起，经过六七年的摸索与艰苦奋斗，到现在，已由一百六十个社员发展到包括南区户数百分之九十以上，自愿入股的一千一百一十二个社员，股本由一百五十九元发展到二百万元，由一个社发展到十六个社，净利由数十元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十个月统计的一百六十二万元。它发展了南区人民的农工商业，照顾了南区人民经济利益的各方面，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

地广人稀，几乎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

起纽带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

因此，一九四三年，党与政府在全边区合作事业上，应该进行下列工作：

（一）由建厅负责调查研究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写成小册子，作为各县政府第四科及各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教材；并利用在延安开会的机会，引导边区各地工作干部去参观南区合作社。

（二）物资局所属各地的企业，对于消费与生产合作社之有成绩者，必须帮助其供销：对消费合作社批发货物，对生产合作社供给其原料与保障其生产品的销售。政府应于一九四三年拨出三百万元交物资局，以为调剂合作社供销之用。

（三）政府为着奖励合作事业，必须明文规定与认真执行减免合作社租税负担。

（四）边区政府及各县政府，应征求高小以上程度的学生，训练会计人材与经理人材，帮助各地合作社解决会计与经理的困难。

（五）合作社工作人员，必须实行群众化，实行薪水制，取消对合作社人员的代耕制；改良合作社的组织，实行精简，使之企业化，克服机关化；减少工作人员，减少开支。

为了使同志们明了南区合作社的发展史，我们特请该社主任刘建章同志写了一个报告，今载于下：

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历史

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号开始对人民宣传入股，当时苏维埃票每

股三毛，二十天就有社员一百六十名，收了五百三十三股，合苏票一百五十九元九毛。

当时推选王天金为主任，刘建章为会计，李生章为采买。

三个月为一期分红利，第一期长毛利一百九十九元四毛四分。

开支：工作人员三个津贴九元，伙食四十五元，纸笔墨费三元五毛，慰劳前方毛袜、手套十三元，优待抗属十五元，优待小学校八元，公益金十元。除费用外，每股红利一毛八分，共分洋九十五元九毛四分。

此次分红，召开了社员大会，所有社员全数到会。在大会上报告了合作社做过的事业，分了红利，又请社员吃了饭。这次会后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当时社员自己提出：合作社替他们优待了抗属，帮助了小学校，优待了前方军人毛袜、手套等，大家应当多入股。这是第一期。

第二期

王生明任保管员。我计划扩大股金。王主任提出不满意，说扩大股金就要应付地做。我要向县政府讨论，以后就到了县府国民经济部长刘世昌那里，刘部长允许扩大股金。那时王天金和大家弄得意见不投，因此县府就将王天金调换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推选刘建章为主任，王生明为会计，李生章仍为采买，又成了三人。我们一方面营业，一方面扩大股金。至一九三七年六月初二日为第二期分红日期，结算新增二千六百九十七股，新旧股共三千二百三十股，合洋九百六十九元，仍是三毛一股，三个月营业过流水三千六百五十七元，长毛利二百七十六元。又帮助小学校六元，优待抗属十二元，募捐帮助前方军人二十元，公益金十元，三个月伙食五十三元，津贴十三元五毛，办公三元五

毛。除费用外，每股分红利五分，共洋一百六十一元五毛。分红时，照前召集社员大会，到会社员三分之二，报告了合作社所做的事情，那时替军队买三十担粮，又凡西北军委招待处所用的木炭柴火均由合作社代买。这笔生意，那时收的完全是苏票，老百姓不同意，要合作社要求以货物为凭代购，一方面给些货物，一方面可收苏票。在这一个时期，社内干部非常吃苦耐心地接洽人民和军队，从此就建立了军民两方面的关系。如果老百姓有的苏票到别处买不到东西，合作社可以买到。发表了这些情形，社员更对合作社有了认识，自己提出说：合作社是能替他们做事的。

第三期

自一九三七年六月开始，又计划增加干部，新提拔来孙生花担任采买。他工作了一个月，每天给军队代买东西，使得孙生花嫌麻烦，提出不工作，再三说服教育，死也不愿做合作社的事，因此就出去了。又来了李生彩担任采买。计划在沟门上开一处柴草店，合作社出资二百元，作为一个单位，李生章担负店内的主任，他的老婆任伙夫，李生彩当槽店，三个月长毛利四百元。

营业部和店过流水七千一百七十五元六毛，长毛利五百三十八元七毛。苏票买货三元折白票一元，苏票变成白票，合算赔洋一百七十五元。社员入股，苏票一元顶白票一元。捐前方军人二十五元，帮助小学校十元，区妇女主任被土匪抢了，补充被褥四元五毛，公益金十二元，假票亏损洋八元五毛，津贴费四十五元，伙食九十元，办公七元五毛。新增加二千一百三十股，新旧共股数五千三百六十股，共洋一千五百九十六元，每股分红利二分，共分洋一百六十一元二毛。

这一期内，有安塞、保安和本区的长脚户组织运盐合作社，佃

本合伙，成立一运输队，共有驴马骡十二头，连同私的牲口一百余头，经常不断地到盐池运盐，由合作社代卖。尤其拉扯外县的脚户向店内加入股金三百二十元。在这一期过程中，所集股的苏票完全变成白票了。

九月间社员大会作了报告。大家发表意见说，三毛洋的苏票成了一元白票，更提高社员的信心，提出计划扩大股金，统计人口，了解人民的经济状况。全区三个乡，共住四百三十二户，人口一千七百三十三名，有牛具二百二十二具；牛三百二十三头，驴一百二十五头，羊二百七十头，全区人民经济总共合计二十二万元，牲畜土地房产一切在内。人民平均每人每年衣服、农具、食盐、洋火等合计费用四十元，共计六万九千三百二十元，食粮在外。我们向大会提出：每人加到二十元股金，就可解决人民的日常需用品。社员同意发展股金，将三个月一期延长为六个月一期。

第四期

从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为第四期。将原有三毛一股提成五毛一股，共股数五千三百六十股，合洋二千六百八十元，过流水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五元，长毛利一千七百三十二元三毛。去公积金一百一十元，公益金六十八元，慰劳前方毛袜、手套二百四十五元，优待抗属十八元，优待小学校十二元，社内工作人员及雇工共津贴三百一十元零五毛，伙食九十元，招待费三十八元五毛，办公费六十一元五毛，奖励工作人员六十元，去修理费二百八十五元。除开支外，每股分红利八分，共分红利四百二十八元八毛。但虽是上期社员大会计划每人入股二十元，因人民经济困难，未曾实现，只是完成了一部分。此次社员大会又计划成立信用社，扩大股金一千元，如人民有婚姻葬埋之事，可来合作社临时借用，不出利

息。这一口号一出，社员即提出保证全数完成入股任务，内容是调剂的性质，并计划在柳林开一处饭馆。

第五期

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八月。首先增加了干部王耀明、茆克业、李生海、黄保中等数人，三个月内将信用股金完成一千零六十元。除信用股外，又扩大了股金一百一十元。新旧股金洋三千八百九十元。六个月营业四万二千五百元，长毛利三千六百三十三元。慰劳前方军人毛袜洋一百八十五元，救济募捐洋二十二元，奖励金八十元，修理费二百三十元，开会费招待费八十五元六毛，办公费一百八十九元，津贴工资费（二十四人）八百六十四元，又加伙食九百元。除支使外，每股分红利一毛，共分洋七百七十八元。在分红时，召集社员组长大会，计划集股买铧五百元，每叶铧二毛五分，买二千叶犁铧；扩大油房一处，粉房一处，为了在延安市建立商人关系成立公益心一处：当时社员组长无不同意的。

第六期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一九三九年二月。将五毛一股转变成为一元一股，又扩大了股金四千五百一十元，新旧共股金八千二百元。六个月营业四万九千八百六十元，长毛利四千一百一十八元。优待抗属三十四元，公积金六百五十四元，公益金一百元，奖励一百三十一元，招待费一百八十元，杂费一百一十六元，工作人员工资津贴费（三十人）八百六十七元，伙食洋一千一百一十六元。在这个时期，将原先计划完全实现了。到韩城买了二千叶铧，每叶铧价洋五毛，市价卖九毛，卖社员每叶铧六毛，节省三毛，共节省六百元。油粉房完全完成了。这期分红利仍以半年为一期。总共有社员八百五十名。

第七期

一九三九年三月至八月。开始计划与私人合伙做生意。当地有些人要做生意，恐怕政府多要负担，将洋入到合作社，半公半私地做，人作分股（以人身入股）。首先到三十里铺，与私人合伙成立了一处营业部带店挂面部饭馆，合作社入本二百元，人民入洋八百元，共一千元。在这个合伙生意中，给人民解决了许多困难。定出章程，股本入社或出社自由。做到年底，政府为了把握合作社原则，指出合作社发展了私人经济，不允许私人发展，就将这个生意打折了。

同年扩大股金八百六十元，新旧股金九千零一十六元。社员九百六十名。

总共营业五万七千六百元，长毛利四千七百七十八元六毛。

除公积公益及其他支费，净利每股分一毛，共分洋九百零一元六毛。

在这次分红利中间，产生了许多的困难。一方面发展股金慢，各货高涨，使合作社无法经营；一方面看到人民的意见为没有个人发展的利益，不愿多入股。再三宣传说服，他们总是不多加的。我个人估计，不与私人合伙，合作社无法开展。未经过政府同意，就与私人合伙做生意。在理事会上提出和大家商讨，理事会的人同意合伙。

第八期

一九三九年九月，又在三十里铺与私人合伙成立兴华分社，沟门上成立民合社，柳林开民生公店药铺，南庄河立和合社，都以半公半私的名目发展了私人入股十万余元，在分社内工作的人打股份资本，写了合同，仍是自由入退，合作社不限制的。嗣后县政府知

道了，要看合同，看了合同以后，他同意我们合伙做。将原有的合作社作为区总社，各乡建立分社。除分社外，总社又扩大股金二千六百二十九元，新旧共合股洋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五元。总分社共营业过流水十五万八千三百五十元，长毛利一万八千二百五十元，费用八千八百九十五元一毛三分，净利九千三百五十四元七分。每股分红利一毛，分社在内。有了分社合作，总社就有了力量成立生产事业。一九四〇年与光华商店合伙买骡子，成立运输队，利用私人合作。运输队原有资本五千元，到年底发展到一百六十头骡子，经常运盐运货。又成立一处纺纱织布工厂，皮房，西区合作社，杜甫川新民社，七里铺集成过载栈一处，毡房两处。从前入股以个人为单位，比如一个家里的人有几个社员。后来嫌麻烦，合并了，以户为单位，一家只有一个社员，共有社员八百五十三名。

这个时期社员合并后，每户人有入三五百元至一千元的。同时有外县的小商人脚户也加到各分社，股金一万元。特别是洛川、鄜县、安塞、保安、三边等处的脚户，来往最多，向合作社入股。到了九个月分红利时，召开社员代表大会，报告了合作社的开展原因。经过检讨，又提出以后工作方针：一、扩股三万元，要代表保证完成。二、收土产品，代替人民出售；供给人民一切需用品，由合作社负责向外购买货品。三、全区人民食盐、洋火、犁铧，不向外买，完全由合作社供给。计算全区人民七千一百三十五名，每人每天食盐二钱，全年食四斤半，共合盐三万二千一百零七斤半，每斤盐比市价低一元，共节省洋三万二千一百余元。洋火每年每户用五包，共用八千六百七十五包，每包比市价低五元，共节省洋四万三千三百七十五元。全区用犁铧一千五百叶，每叶比市价低十五元，节省洋二万二千五百元。三宗共节省洋九万八千零五元，全区

人民一年穿衣用老布七千匹，每匹棉花二斤半，共棉花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五斤，值价三百五十万元，给人民纺成纱，赚一半，计一百七十五万元。在这个大会上给社员报告了工作计划，经过社员同意，就发展了农村妇女纺纱织布机子。

第九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进行扩大股金，以救国公债入股。政府动员人民买救国公债票，将人民所出的公债数加成股金，股金所分之红利付于公债三万三千元。由这种人民困难情形之下，帮助人民解决了负担，使人民更相信合作社是能解决困难的。

新增股三万三千零七十元。新旧股金四万四千七百一十五元，是总社的。各分社股金十二万。运输队八万元。总共股金二十四万四千七百一十五元，社员一千零一十八名。总分社营业流水一百一十六万一千八百四十元七毛。长毛利二十八万四千三百一十七元四毛。开支费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九元三毛，净利十四万五千四百六十九元，每股一元分红利七毛。在分红利时提出：红利七毛作为一元入股，提高社员的信心，将分到的红利大数的加成股金。人民余外入股，以土产物品草料粮食作钱，比市价高，如每一斤草比市价高二毛。凡人民入股给物品，总比市价高，又提高人民的信心。

第十期

一九四二年成立织袜工厂一处，开始宣传入股，二十元为一股，送社员袜子一双。此后棉花高涨，乃增至四十元一股，共入股洋三万元，开办了织袜工厂，现有袜机六架。延安市开运合过载栈一处，集股四十二万元。松树林成立分社一处，扩股三十四万元。运输队所长的盈余，扩大成本为七十五万元。总分社扩股一百二十三万二千元。新旧股本二百五十二万元，社员一千一百一十二名

(每名代表一户)，其中最多入股金五千元。在本区境内合作社共有十九个单位（生产、运输、消费均在内)，除合作社外再没有私人商业。南区面积长六十里，阔四十里，内有住户一千五百四十四户，七千一百二十八人，共有牛一千四百六十九头，驴六百三十五头，马六十匹，骡子二十二头，羊四千四百四十五只。种地一万八千二百二十六垧，收麦子八百七十二担五斗，收获粗粮九千零八十四点一六担，折细粮五千六百六十二担四斗三升，副业进益折细粮三万三千四百二十五担（十八桶斗)，共合米六千八百六十九担一斗八升。一九四二年出公粮二千四百八十担，除出下剩米四千三百八十九担一斗八升，每人平均占六斗米，牲口料一千五百担。

今春政府动员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三万四千元。高峁湾生产股金八千元，银行储蓄券三万元，共六万二千元，分三次来的。每次每户开会收集，要误工一个，三次误工三个，共计误工一千五百个，每个民工三十元，工资合计要误十三万五千元，又加上六万二千元，总共负担十九万七千元。所以合作社替人民交纳了六万二千元，节省了人民的误工十三万五千元。尤其在农忙时间，帮助了人民的生产。又替人民代交公盐一千零五十驮，每驮二百四十元，共交二十五万二千元。减少人民的误工，影响了人民对合作社的认识，又发展了股金四十二万元。计划代交下年的公盐。

组织农村妇纺六百个，每人每天纺纱二两，每天共纺七十五斤棉花，人民应赚一半。每斤纱以一百五十元计算，一天得利五千二百五十元，全年进利一百八十九万元。今年纺了五千斤棉花，前半年棉花价小，前后合起每斤以七十元计，人民赚花二千五百斤，合洋十七万五千元。合作社做车子垫办二万元，除二万元外，人民实赚到十五万五千元。现正在发展妇纺中。过去南区没有妇纺，现在

大批地增加妇纺，就是原料资本困难。其次，今年代人民代卖木炭二十万斤，每斤二元，人民得洋四十万元。

以上事实是合作社做过的。今年的红利未分，原因是遭水灾，合作社损失房子五十八间，值洋四十万元，器具三十万元，货物四十万元，复成栈店一处值洋二十万元，共计损失一百三十万元。以后政府帮助借贷洋五十万元，去定边买货三次，长利三十万元。现在又修理费洋二十四万元，正在发展股金中。

合作社的组织，农村每村选代表一人至二人。合作社务有理事会十一人参加，每月六号召开理事会一次。一切营业及干部问题，在理事会上解决与布置。

附注：

（一）合作社现有房子二百三十五间，石窑五十五孔，按现在折价值洋二百八十九万元；流动金一百五十万；器具牲畜值洋一百零二万；共计洋五百五十万元。（房产、器具、牲口、流动现金一切在内。）

（二）合作社的经验教训，在延安经济建设材料关于南区合作社一页内说明。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因上文第八期至第九期时间相距两年之久，似有脱漏，托人询问。据复如下：

关于南区合作社划分时期的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开始创办，三个月后开第一次全体社员大会，以后每隔三个月召集一次全体大会，如此，共召集了三次。以

后六个月召集一次，也共召集了三次。第六次大会以后过了八个月，就召集第一次代表大会（三九年底）；以后一九四〇年七月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四一年八月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今年七月打算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因遭水灾，不易结账，故而延期。一九三九年以前开会的期间距离短，并且是开全体会，因为范围小，社员少；以后一年才召集一次，而且是代表大会，因为社员太多，事业扩大，结账不易。

上次报告材料，将一九四〇年七月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写漏，故而第八期长至两年。

原报告材料，手头无底稿，此一材料如还有问题，请示知，以便再报告。

王丕年　刘建章

十二月十五日

以下是延安县委同志关于南区合作社的报告，并列于此，以供研究。

柳林区（即延安南区）合作社的经验

从柳林区合作社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合作社的业务，不仅限于消费，同时将生产、信用、运输联系在一起，成为合作社业务的一个整体。本社及分社共有十六社。

属于生产的，有纺织工厂一，皮房一，毡房一，油房一，粉

房一。

属于运输的，有运输队百余头牲口，合作社投资达五十万元。

因为柳林合作社将几种经济事业合在一起经营，所以营业范围大，资金多，活动大，发展快，给人民解决日常必需品也多。本县其他合作社只限于消费的，比兼营生产、运输的合作社资金少，活动范围小，发展迟缓。

第二，合作社民办政策，是采取柳林的经验而提出的。该社股金扩大，吸收小商人资本，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举凡合作社的工作，都由社员来讨论，来决定。人民对合作社是非常关心，并不认为是官办的，而认为是自己的。

第三，给群众解决日常必需品，并比市价低，如布匹、食盐、火柴、铧等。单就火柴、食盐二项，每年就给人民节省下八万余元，人民当然是愿意在合作社买东西。该社在布匹、食盐、火柴、铧四样必需品方面，可以供给柳林区人民的全部需要。

第四，给群众解决紧急的困难。例如有婚丧大事，可以暂时在合作社借款，或拉欠布匹，或抵押东西，约好期限归还，即是带着信用合作社的作用，这样就给人民解决偌大的困难。因为急事一时钱不凑手，东告西借，无法解决，而合作社给以解决，所以更给人民以信仰，认为合作社真正解决了他们的困难。

第五，扩大股金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

（一）现金入股。

（二）实物入股：一只鸡，一双鞋，几张羊皮，几根麻绳头，都可以折价入股。

（三）吸收小商人资本。

（四）给群众解决负担，即当入股。政府的负担下来后，合作社

即号召入股，负担由合作社出。

例如一九四二年该区人民应缴与政府的公盐代金二十五万元，由人民作为股金交与合作社，而由合作社运缴公盐给政府，借以周转营利，人民还可分红。用这种方式，如公债、教育经费、哨站经费等，都由合作社一收一缴，这样政府的负担出了，合作社的股金扩大了，营业扩大了，人民得了利，少麻烦，又能以社员资格分红。

（五）利用人民当时的要求，适时地提出扩大股金的口号。例如要发展纺织，就提出发展纺织股金的口号。该社一九四一年试办代人民出公粮，每担先一年由人民折钱入股，合作社得钱扩大营业，到第二年公粮分配给人民时，由合作社以营利所得代缴。代办四十来户，这四十来户出了公粮差不多等于未出，他们变成合作社的股东，年年可以分红，他们高兴得很，生产热忱大大提高，粮食打得更多了。

（六）入股时发给红利。如入股四十元发给袜子一双，值二十元，这样来鼓励人民入股。

第六，合作社地点的条件很好。因为该社在柳林区，一个靠近延安新市场大商业的地方。柳林区森林多，人民卖木料木炭的多，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因而在农村中的流动资金多，可以吸收入股。同时靠近市场，资金的周转也迅速。这是客观条件。

第七，合作社的活动范围大。该社在边区银行、光华商店以及延安各机关，都建立了关系，资金有时可以拉借，可以代各机关做许多工作，互相帮助，合作社也得了发展。

第八，干部的少调动与注意调查研究。该社刘主任从任合作社主任以来，从未调动工作，能专心一意去想工作，研究工作，

想办法。同时，他对于客观情况的调查，也很注意，如每个人一年的布匹、食盐、火柴等要消耗多少，经常研究，以便解决人民生活困难。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证明该社和人民的关系。柳林区驴风坡农民白大，一九四一年须交救国公粮六十元，先行交给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届时向政府代交。以后此六十元分的红利又加在股本六十元内，变成了二百元。他在合作社买铧四叶，每叶代他节省十五元（比市价低十五元），共节省六十元。买火柴五包，每包节省五元，共节省二十五元。一九四一年腊月底，他在合作社买货一千元，当时只付五百元，还有五百元未付，而这些货物按后来市价，涨了五百五十元。连前面买铧、买火柴两项，共替他节省六百三十五元。本来是交公粮六十元，现在变成股金二百元，又加买货节省六百三十五元，正做到了合作社是人民的，便利人民交换，为人民谋利益的地步。

这样的例子很多。

全县合作社情形

第一，社数（一九四二年七月）：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分社	18	30
区社	8	8
合计	26	38

第二，股金：

	一九四一年（元）	一九四二年（元）	（半年的材料）
区社	264207.56	312207.56	
分社	193340.00	978507.14	
合计	457547.56	1290714.70	

半年中股金扩大833167.14元。

股金发展快的是分社。分社是直接由人民组织的，在区合作社协助下成立起来，所以人民入股很踊跃。

一百二十九万元股金，平均全县每人二十元，不能做什么事，所以合作社的作用在全县来说还小。

主要的经验

第一，坚决执行民办政策，政府不干涉。本年七月检查合作社一次，号召扩大股金，要雄厚的资金掌握在合作社手中。

第二，对合作社干部不轻易调动，使能安于其位，专心工作，生活上给以保障，在合作社采取打身分办法，按合作社人员的能力和职务，每人当作若干元入股，例如某人当作五千元入股（打身分），即按五千元的红利率结账时按股分得红利，作为他的薪水，此外不支薪水。

第三，合作社的业务范围扩大，不应只限于消费，应该同时做生产、运输、信用等，这是今后合作社业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即是说，要办综合性合作社。

第四，抓紧办好一二个合作社，取得经验，逐渐扩大到其他地方，例如我们准备将金盆区松树林合作社办成第二柳林区合作社。

这些也就是今后工作的意见。

六　关于发展盐业

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我们边区的盐也就占了一个重要地位，运销逐年增多。一九三八年，我们出口的盐还只有七万驮（每驮一百五十斤，每斤二十四两）；一九三九年，突增至十九万驮；一九四〇年，二十三万驮；一九四一年，又来一个突增，达到二十九万九千零六十八驮；一九四二年，至九月止，十五万五千七百九十驮，估计最后三个月还可销七八万驮，共约二十三四万驮。这个统计，表示了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外面的需要，二是我们的努力。有些同志看不见外边的需要是由抗战决定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盐是有销路的，因而主张听其自然，党政无须加以干涉。另外有些同志，则把盐的逐年增销仅仅归因于外面的需要，而不知道党政的领导干涉是增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们之注意盐业，是从一九四〇年秋季开始的。一九四一年之所以由一九四〇年的二十三万驮突增至二十九万九千余驮，除了因为一九四〇年外边盐荒、存盐抛空，故一九四一年盐销特别旺盛这一个客观因素外，还有我们在这一年实行了督运政策这一个主观的因素包

含在内。一九四二年，忽由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九万九千余驮降至二十三四万驮，除了外边的需要不如一九四一年那样紧急外，也还有我们自己放弃了督运政策（把组织起来了的许多民间运盐计划停止）这一原因在内。我们如不从此得出教训，则对今后工作又将重复过去的错误。固然，一九四一年的盐业工作是有毛病的。原拟运销六十万驮的计划是太大了，边区在这一年还不可能解决这样大的运输力；产盐有七十万驮的成绩是好的，但盐质又太坏；督运是正确的，但不应普遍动员到一切地区的一切人；动员的组织与方式也有许多不合实际情况的弊病。所有这些，都是一九四一年我们工作的缺点或错误。但是无论如何，对于盐业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一点的忽视，不了解，甚至妨碍，是完全不对的。

一九四三年应该怎样呢？首先要确定积极发展的方针。边区目前情况，对于作为一个极大的因素借以解决财政困难（公营盐业及盐税）的盐与作为一个主要的因素借以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与物价的盐，决不能采取消极态度。因此，必须扩大已经设立的盐业公司，作为联结公私盐业、扩大公私产运销的主力军；提高盐产质量，以利广销；恢复督运工作，组织民间一切可能的运输力，扩大运盐；吸收外来脚户多运多销；修筑道路，配置店栈草料，以利盐运；由盐业公司逐渐统制外销，避免公私交病的无政府状态。这些就是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内关于积极发展盐业的总方针。

其次，我们的具体布置应如下：

（一）扩大盐业公司，增加其资本，在物资局的指导下，吸收各机关部队及私人入股，发展盐的运输，扩大盐的销路，调节盐的价格。保障在一九四三年内自己运盐四万驮，即以这批盐为基础，尽可能地收买民盐，实行部分的对外统销；然后依据情况，逐渐做到

完全统销，借以抵制外边的操纵，保障公家利益与人民利益。

（二）一九四三年应计划产盐四十万驮，运盐三十万至三十六万驮，并争取超过。关于产盐，仍继续官督民产政策，保障盐的质量大部至全部为上盐，不许再产下盐。关于运盐，拟定盐业公司系统运四万驮，吸引外来脚户运五万驮，组织边区人力畜力运二十一万至二十六万驮，共运三十万至三十六万驮。

（三）组织边区内部运二十一万至二十六万驮盐的人力畜力，是一个很巨大、很艰苦、很细密的组织工作与群众工作，应由建厅主持，各级政府负责督运，各级党委则任检查、帮助之责。运盐的动员，一面要带某些强制性，但一定要避免有害的命令主义，主要应取宣传说服的方针。运盐的组织，要采用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的方式，宣传群众自愿入股，有的出人，有的出牲口，有的出人又出牲口，有的出经费，有些特殊情况的人则许其不出；而以赶过长脚富有经验的人及必要的牲口组织成运输队；县区乡各级的党与政府应积极指导这种运输队的合理、公平与健全的组织；顺利地出发，在路上要进行必要工作，保障人员与牲口的安全；归来要注意合作社利益的分配，保障经手人及全体社员的利益。运盐必须不违农时；必须加强劳动互助社（变工）的组织，使运输队出发后一切社员不因缺乏人力畜力而损害农业生产。绥米警备区及东三县的运盐组织（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应允许群众有更大的自由，更少带强制性。任何地方的运输合作社与运输队，必须使其建筑在为社员谋利益的基础上，党与政府的任务在于使这种利益日益增大，否则是一定要失败的。建厅、各分区及各县，应将民众运盐最有成绩的实例教导人民，广为宣传，仿照办理，务使一九四三年的运盐事业能完成计划，而又大大地直接有利于人民。

（四）物资局各地企业及各地人民合作社，要与人民运输合作社及运输队密切配合，尽可能使人民运盐牲口能驮回来货，才能使人民运盐事业获得发展，整个运盐计划才能完成。

（五）发展盐业的中心环节是运，运的重要条件是交通。一九四三年政府应拨二百万元，由建厅主持，修通延定、定庆两条大车路，整理延鄜路。并由物资局沿诸运盐大路开设骡马店、转运栈，缺水处开挖贮水窑。由建厅协同物资局在沿途广植苜蓿，并用其他办法配备草料。只要有路、有店、有草、有水，运费即可大省，运量即可大增，外来脚户、本地人民、盐业公司三项运输，都会发达起来。为改良运输工具计，另由建厅主持，按道路条件制造大车小车，增加盐运。只要路修得好，公家多用大车，民间推运小车，较之驮运是好得多的。

（六）一九四三年公盐定为十万驮，近运远代，半运半代。但公盐与发展盐业是两件事，只要确定地能运输三十至三十六万驮出口，公盐或收实盐，或收代金，随便哪样都是可以的。

一九四三年我们的植棉计划与纺织计划如能完成，我们的棉花、棉纱、棉布入口就可减少。如果我们在一九四三年能运三十至三十六万驮盐出口，按平均边币十元一斤的盐价计算（驴驮每驮一百五十斤），就有四万万五千万至五万万四千万元的收入。这样一减一增，边区的平衡出入口问题就又完全解决了。

一九四一年人民运盐经验，可看下列材料：

鲁忠才长征记

——鄜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经过，鄜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

谈话，王毓贤、孔照庆补充，高克林笔记，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

（一）城关区第一次应出驮盐牲口五十头，实去二十八头，未完成计划的原因是牲口少（最多能动员四十多头），当时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区政府抓得不紧，因忙于借粮、公债。

（二）阳历七月十八日起身，八月十一日回到家，往来二十五天，由鄜县至定边共十二天，到盐池装盐一天，回来十二天。最大的站是九十里。路程、站名及各站概况如下：

1. 鄜县至张村驿五十里，有五条沟，路难走，水草好。2. 张村驿至烂泥坡，共五站，每站七十里，路好走，割草喂牲口。3. 烂泥坡至李家砭，有二十里山，四十里沟，路难走，草不好。4. 李家砭至芦家角，有三十里沟，五里山，最难走，草不好。5. 芦家角至乱石头川，在沟里走，有兵站，买草（每百斤山草三十元，谷草五十元，麦草四十元）。6. 乱石头川至三里庙八十里，有兵站，干草每百斤五十元。7. 三里庙至梁庄，八十里，有四十里山路，很陡，难走，水难（苦水，也没有喝的），曾看见一个盐脚户把骡跌死。8. 梁庄至定边九十里，有兵站，草每百斤五十至一百元，没水。9. 定边至盐池四十里，往返一天，沙路难走。

（三）沿途的困难：

1. 张村驿至烂泥坡，五站中有一二站有蚱蜢咬，最好晚上走，对牲口对人都好。

2. 三里庙、梁庄至定边两站，没水，人与牲口容易受渴。

3. 定边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

4. 乱石头川以上，因各县驮盐牲口容易会合，常有数千百牲口一起走，因之住店、草、水——尤其放牲口，有困难，易走失弄

乱子。

（四）一路生活情形：

鄜县城关区去牲口二十八个，人十四个，沿路自做自吃，每顿共需米七升，约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觉“出了门吃得多”。给店里柴钱多则八元，少则三元，完全看你和掌柜的关系弄得好或弄不好来决定。走路时唱戏，说古今，说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兴，满不觉苦痛，牲口的草是偷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众都很好，寄粮寄草没问题，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会骂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庄稼。只有一个地方的店掌柜把寄的小米换成坏的。

（五）路上所发生的问题：

好的例子：

1. 牲口没有出毛病，一乡和三乡的牲口去时瘦，回来肥了，原因脚户负责，当心喂。

2. 脚夫没有病的和出毛病的，大家身体都很好，情绪高，没有一个瘦了，就是晒黑了些。

3. 沿途没有遗东西，牲口没有吃人庄稼。主要的是鲁副区长是个老脚户，有经验，又负责又细心，人也灵活，所以成绩很好。

坏的例子：

1. 第三乡一行政村村会长杜海，卖了好驴，买条坏驴去，结果驴乏了，没有驮盐，白费了一百六十五元的路费。另外第三乡派去了一个坏驴子（腰坏了），四乡监军台村去了一个坏腿驴，都没有驮盐，都白费了一百六十五元路费。另外该村一个驴被着烂鞍子，结果压坏了脊梁。第二乡乡长有两条驴，去了一条坏驴，鞍架都不好，在路上捣麻烦。这些事事先区级政府没有详细检查，有些像已知道，也未纠正，结果二十八条驴子，只有二十五条驮盐，其余三

条空走一趟，盐价分文无着，白赔了五百到六百元路费，里外损失共在一千五百元以上，此事值得区乡干部警惕。

2. 四乡监军台村村会长不听鲁副区长指示，不给牲口带好料（玉麦、蚕豆），而将高粱等坏料充数，结果该乡牲口因没好料吃，在路上发生卧下的事。准备向该村会长作斗争，处罚他。

3. 四乡脚户杨万保，在路上“耍死狗”，装病，偷跑回来，乱造谣言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一个姓王的。路上没饭吃，驴脊梁都压烂了，店里不能寄粮……”使得城内好多人不安心。区长对这件事注意不够，以后要警惕。

4. 有几家去坏驴，结果驮得少，每驴只驮一百一十多斤。还有四乡监军台村，一家打发驴走时，把笼头都换成坏的，准备驴死，率性一切都不要了。二乡乡长的驴子，这次回来，离家只有十多里就卧下了，他也不肯派好驴去接，打烂账，以为驴一定会死，一定不会回来的，所以不接。

5. 有一二个驴子驮得太多，分给另一空驴驮了四五十斤，到孙克要检税局检查，因无票，被没收盐五十斤，口袋一条（值洋二十元）。

（六）用费和赔赚问题：

1. 每一个驴平均的用费——料二斗，共洋六十元；粮每人一斗五，一人赶两驴，每驴摊七升五，价洋三十五元；路费七十元；合共一百六十五元。外加盐本二十元。平均每驴费洋一百八十五元。

2. 平均一乡每驴驮一百三十斤，二、三、四乡每驴驮一百一十斤，按现在交通镇盐价，每百斤二百元，每驮可卖盐价二百二十元至二百六十元。

3. 就现有每驮盐价，扣去用费，最少可赚三十五至七十五元。

附注：

一、若每驴能驮一百五十斤盐，按现在的盐价每驴保证赚一百元以上。

二、说二、三、四乡每驴只驮一百一十斤，一乡驴驮一百三十斤，是脚夫说的，一定“打埋伏”，因这里一般驴子可驮一百五十斤。

三、同时说明了一个道理：只有好驴，才能更多地赚钱，驴愈坏愈少赚，以至亏本。

四、经验教训：

经验：

1. 鄜县城关区这次驮盐胜利回来，证明党和政府的运盐计划、估计、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同志的怀疑，没有信心，认为是负担……都是不正确的肤浅的看法。

2. 打破部分干部及群众对于去三边驮盐的恐怖观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来”。正相反，驮盐回来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强壮了，就是晒黑了些。

3. 证明驮盐可以赚钱，打破那些“一定赔本”“每驴要赔本百元”“是边区最大的一次负担”一类不合事实的瞎说。

4. 证明区乡级特别是乡级某些干部，工作不负责任（没有细心检查），包庇（村会长、乡长可以去坏牲口而不追究），舞弊（把坏高梁充好料），成为落后群众的尾巴。

5. 干部的决定作用。城关区因副区长鲁忠才有经验、灵活、负责，每到一地，遇一事，即开脚户大会讨论——连每个驴应驮多少盐都讨论过。结果，人与牲口不但没有损失，反而比去时强壮了，情绪高了。

教训：

1. 四乡杨万保“耍死狗”，偷跑回来，造谣，我们区乡同志没

有及时注意检查，没有和他谈话，也不及时向上级报告，以致城关区人民传说死了两个人——鲁副区长和王某，死了三个驴，弄得人心惶惶不安。

2. 路上困难是有（有几站路难走，有一两站蚱蜢多，两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坏路多小心，有蚱蜢的地方晚上走，水少的地方起身时多喝，带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难就都可以克服了。

3. 驴子越好赚钱越多。例如这次驮了一百三十斤的可赚七十五元，若驮一百五十斤则可赚一百五十元。驴子愈坏赚钱愈少，甚至赔本。如城关区去了三条坏驴子（一条坏腰，一条坏腿，一条乏驴），结果没驮盐，每一驴白费路费一百六十五元，每人往返共损失一千元以上。同时也说明工作要细心，不能马虎。这次去的驴若乡区干部细心检查，认真去做，不讲情面，也不至发生这种损失，因为坏驴大家都是晓得的。

4. 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买草，则每头驴可省五十元以上，节省下的就是赚的。

5. 对国家法律要多多注意，这次因不小心被税局没收了一条口袋，这是不该有的损失。（此文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四、十五日《解放日报》）

七　关于发展自给工业

前面所说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与盐业，都是人民的经济事业，党与政府就其可能与必需的范围内给以指导与帮助，使其有所发展，解决人民的需要；同时，即由人民以租税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保障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公粮、公盐及其他税

收)；又以买卖的形式交出一部分给政府，保障又一部分政府的需要(如棉花、棉纱、棉布、羊毛等)；其基本性质是属于人民经营的。只有盐业一项，因有政府盐业公司经营的四万驮盐的运销及直接解决公用食盐约五千驮，故有一部分（约当全部盐业七分之一）是属于公营的。

全部公营经济事业包括下列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这些就都是直接保障党政军人员的生活资料及其事业经费的供给的。这一部分的供给量，依一九四二年的计算及一九四三年的预算看来，超过了人民以租税形式交纳政府的供给量（包括公粮在内)。故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的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有其历史的与现时的原因。还在内战时，中共中央曾经为了战争需要而在江西苏区设立了一部分公营工商业。那时，为了补助伙食之不足，也曾经发动过各机关学校种菜养猪的事。那时，只有军队还无生产的经验。那时，因为江西农民比较富庶的条件，还不需要我们自己动手解决粮食。这是历史的原因。抗战以来，我们是处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对于我们的军队，初则只给很少一点饷，继则完全断绝，边区也被封锁，迫得我们不得不从事生产自给，维持抗战的需要。这是现时的原因。

抗战以来，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那时，在军队方面，由于经费不足，开始了生产运动。但在那时，我们还只是令一部分部队试作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其目的只是借以改良战士们的生活，还没有企图借以解决一般

的财政供给。后来看见试办的战士们在做这些工作中生了成效，他们果然能于教育之暇做出许多生产工作来了，他们的生活果然改良了，他们因生活改良，逃亡现象也减少了；由于看见这些成效，我们就把这个经验普遍地应用到那时留守边区的部队，由留守处下命令叫各部队都学着这样做。但也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那时政府方面，开始注意建立了几个小的工厂；但对机关学校，则连种菜、养猪我们也还没有叫他们做。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间的关系不如从前了；边区的机关学校也增多，虽有外来的一点经费补助，已经分配不过来，我们处在财政供给问题的严重威胁下。由于这个原因，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全体动员从事经济自给的运动。那时，我们在干部动员大会上曾经这样提出问题：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还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的衣食住用问题？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我们再来考察一下

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两只手，我们也可以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这个考察很重要，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这时，我们提出的任务比一九三八年不同了，不是仅仅为了改良生活，而是解决一般需要的一部分。动员的范围也不限于军队，而是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这一号召，不仅动员了几万党政军学人员，也动员了边区的老百姓，这年老百姓开荒达一百万亩之多。这一号召又传播到了华北，在战场上作战的八路军也有许多在战斗间隙中从事生产的。这是我们的生产自给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及一九四〇三个整年。在这一阶段中，政府的工业建设发展了一步，军队与机关学校发展了农业生产。

一九四一年至此次高干会（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为第二阶段，生产自给的基础已经巩固地打下了。在这两年中，人员增多了，许多人因外边顿不住来到边区要吃饭，为了增强河防三五九旅也来了，军队增加了，而外援全断，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而在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产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古话，对于我们，是完全自觉地被理解的。

已经过去了的两个阶段中，第一阶段，部队、机关、学校着重于农业，政府则发展了工业。第二阶段则着重了商业，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除一部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坚持了农业为主的方针外，其余都讲究做生意，没有像在第一阶段那样地重视农业了；但政府、部队与机关学校都发展了工业与手工业。此次高干会后将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阶段上，我们的经济基础已较巩固，我们的经验也较多了，应确定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因为商业只可救急，要建立永久基础于商业之上，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

关于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三部分公营经济的分类，仅就主管经营一点而言，不是指经济性质而言；故我们在下面讲到自给工业时，准备将政府、军队与机关学校所经营的工业统一地讲在一起；而在论述军队与机关学校的自给经济时，再将个别的工业生产加以说明。但因全部公营工业中，政府经营的占着主要部分（政府纺织厂占全部公营纺织年产二万二千余匹布的百分之五十六，政府纸厂出品占全部公营纸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政府肥皂厂出品则占全部边区肥皂产量的百分之七十），故将自给工业归入政府部分来讲，也是合理的。

同一自给工业，为什么要这样地分散经营呢？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都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又原料分散，交通不便，也是分散经营的重要原因。例如被服工业，为解决关中、陇

东、三边、绥德各地党政军人员的被服需要，自以就地产布（或买布）就地缝制为有利，决不应集中在延安一处缝制。由于这些原故，我们利用各部门为着解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地集中起来，无限制地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目前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例如中央管理局的团结纺织厂，后勤的交通纺织厂，已经拨交政府管理，就是一例。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分散所以利用各部门的积极性使之建立起来，集中所以使各部门得到更好的供给。但尤其重要的，是分散经营不应该忘记集中领导，这就是使计划统一，供销衔接，经营合理与分配恰当之必不可少的步骤，我们过去在这一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今后必须加以调整。总起来说，我们的方针就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不但工业是这样，农业商业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对于所有的公营农工商业，都要区别两种形式：一种是大的，一种是小的，大的应该集中，小的应该分散。例如由各伙食单位，或几个伙食单位联合，为着解决自己日常伙食费、被服费、办公费之不足，而进行种菜、喂猪、打柴、烧炭等农作事业，做鞋、打毛线衣、开小磨坊等手工业；与为着消费目的及为着赚点小利解决公费之目的而进行的合作社事业及小贩商业，所有这些，就都是应该奖励其分散经营的。这些都必须分散，到处进行，到处发展。这些都是不可能集中，因此也就不应该集中的。这是一种形式。但是还有另一种形式。例如：为着解决军队全旅全团一定数额的粮食而进行的大农业计划，即屯田计划，为着解决多数机关的粮菜需要而经营的大农场；为着解决全旅全团或多数机关的被服需要

与日用品需要而经营的大作坊、大工厂；为着解决全旅全团或多数机关的事业经费而经营的大商业，所有这些，就必须有统一的计划，集中的管理，严格的节制，不能听凭他们各自为政、毫无拘束地去干。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由这样的一个机关（现在是边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办事处），根据全体及各部分的需要与经营的可能条件，做出统一的计划，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在党政军的每一大系统里，又有统一计划与分别经营的事。所有这些，就是边区公营经济中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全貌。

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过去五年的公营经济事业，有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这个成绩，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民族，都是值得宝贵的，这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士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的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

又我们所谓公营自给工业，在目前还未达到自给的全部需要量，还谈不到以其余力解决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还只能由党政予以组织推动，由人民自己动手去解决。目前我们的一切努力，只是争取在二三年内完全满足自给的需要，特别是布匹的需要，不要妄想在目前条件下可以有什么了不起的发展，这样想是要害事的。

下面，我们就来分别论述五年来我们的公营经济事业，先说自给工业。

我们之注意公营工业的建设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在这一年，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难民纺织工厂、造纸工厂、被服工厂、农具工厂及八路军制药厂。这些工厂到后来，大部分都起了很大的倡

导作用。这时，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十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本人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材，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

一九三九年边区经济开始被封锁，工业品的输入受到限制，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政府于是年一月举行了农业展览会之后，又于五一劳动节举行了工业展览会，激起了发展工业的热忱。政府与后勤部先后派人到西安采买机器材料，又在延安、安塞两处组织纺织合作社及榨油、瓷窑等生产合作社。从西安买来的机器材料虽不充足，但已成了数年来发展边区工业的主要物资力量之一。这一年又建立了新华化学工厂、光华制药厂，在延安十里铺开始探采厚层煤矿。

一九四〇年的工业发展是在生产上达到“半自给”的政策下进行的，确定以发展轻工业为主。一月间举行了第二次工业展览会，检阅了我们工厂的力量。银行借款一百万元扩大工厂资金，建立正规厂址，继续购买材料。二月间，中央提出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九月间，朱总司令提倡纺毛运动，发展了一部分毛纺织事业。许多大的机关学校部队都积极筹设工厂，派人到原有工厂学习技术，研究管理办法，奠定了一九四一年猛进发展工业的基础。

一九四一年中央提出“由半自给过渡到全自给”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下，银行增借三百万元，政府亦投资五十万元于各公营工厂；许多机关、部队亦均筹款设厂。三八节曾举行生产展览。十二月银行大楼落成，由银行主持又办了一次工业展览。兹列举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二年所设各厂，以见此时各单位对于发展工业之努力，虽则这些工业都是规模不大的手工工厂及规模很小的手

工业：

1. 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开办新中国纺织厂、实验工厂、木器制造厂、木工厂、第一炭厂、第二炭厂、瓷窑、被服厂，资金总数二十余万元，人员二百二十余人；

2. 中央组织部开办胜利毛厂、胜利木工厂；

3. 中央宣传部开办七一磨房；

4. 马列学院开办团结纺织厂；

5. 中央党校开办中山纺织厂；

6. 自然科学院开办毡房、磨房、酒精厂、玻璃厂、机械厂；

7. 鲁艺、陕公、青干、女大均办有工厂；

8. 中央出版发行部办有新华木工厂、被服厂；

9. 教导大队办有延园纸厂。

上述中央直属系统即办有工厂二十七处，全部人员四百七十七人，资金总额四十余万元，大都是为着经济自给的目的而进行的。

此外，经建部、留守处、保安司令部、边区财政经济处、三五八旅、各专署，均办有若干单位的小工厂。三五九旅所办大光纺织厂产量较大。三五九旅各团，亦均自行办有棉或毛的小型纺织厂。

从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的工业建设，是在发展着；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给一九四二年的巩固工作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整个时期的建设是带着盲目性的，在许多人员的头脑中缺乏清醒的了解，只知道现在，不知道将来，只知道分散经营，不知道统一领导，充分地表现了一种无政府状态。由于这种情况，致使各工厂有的只建筑了房屋便完事，有的开工不久便告结束，有的合并于其他工厂，继续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分。至一九四二年，就延安附近的纺织业来说，只有难民、交通、团结三大厂及

兴华、公益两小厂保存下来。这一段“之”字路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大家只能从自己走过的路上得到经验。但在有了这一段经验之后，重新从事工业建设的，就应避免再走这一类“之”字路才好。

一九四二年，建设厅确定“巩固现有公营工厂，发展农村手工业”的方针；政府对工业的投资达一百七十万元。农村民间手工业至本年已很发达，如绥德手拉织布机达六七百架；其他地区如制毡、硝皮、打铁等也有发展。特别是公私纺织业发展得快，其困难也特别多。为了保护纺织业的发展，减低棉花、洋纱进口税至百分之一，增加布匹进口税至百分之十五。银行在绥德组织“永昌土布产销公司”，投资二百万元，发棉花，收纱布，奖励农妇纺纱织布。由于民间家庭织布有了发展，私营的小型资本主义式的纺织生产合作社的布多无销路，土纱供给也感困难，这些纺织生产合作社遂不得不缩小经营范围或化整为零，将机件分散民间，改为家庭副业。公营纺织厂因主要是供给公用，自能维持，但棉花与纱的供给亦感困难。公营造纸业振华总分两厂，本年完成了供给出版局三千令马兰纸的任务。利华第一第二厂，原定二千五百令，计划未完成，本年产量不超过五百令。其他公营纸厂，则因纸无销路，颇感困难。公营毛织厂出品如毛毡，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政府自己不用，部分输出，部分卖给部队；其精制毛线特别受人欢迎，且有厚利。自九月起，交通、兴华、团结三纺织厂，利华一二纸厂，都由中央及后勤系统移交边区政府管理。为保证一九四三年纺织原料，本年已开始向东三县收买棉花，计划收买量为七十五万斤。为保证造纸原料，向甘泉、延安、安塞、安定等县征收马兰草七十三万斤。各厂人员补充，须待精简工作实行时才能解决。

一九四二年，特别是此次高干会，是边区一切公营经济，就中也是公营工业，开始清除盲目性，清除无政府状态，而增加自觉性，实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经营之重要时期。虽然中央还在一九四〇年二月间就已指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但直到一九四二年才引起同志们的注意，直到此次高干会才得到全体一致的承认。五年的实践经验，使我们大进一步了。高干会后，各种公营经济均将加以调整，使之达到比较健全的发展，工业也是如此。

以上，我们将边区五年工业历史作了一个简略的说明。截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们已有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石炭等七类工业。其中，纺织工厂七个，资金二千六百九十万元，职工一千四百二十七人；被服及制鞋工厂八个，资金一百万一千一百元，职工四百零五人；造纸工厂十二个，资金四百一十万元，职工四百三十七人；印刷工厂三个，资金五百二十万元，职工一百七十九人；化学工厂（制药、肥皂、皮革、陶瓷、石油等）十二个，资金一千七百零三万元，职工六百七十四人；工具制造工厂九个，资金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七百九十二元，职工二百三十七人；煤炭厂十二个，资金一百七十七万七千零七十元，职工四百三十二人；以上七类共计工厂六十三个，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九百六十二元，职工三千七百九十一人。我们的这一点工业虽然还是小小的，大部分又还是手工工场业，机器工业只占着一个小部分，但已费了整个五年的努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起了保障供给、调节物价的作用。从这个基础上往前发展，是一定可以起更大作用的。

我们的最主要的自给工业是纺织工业与被服工业，这是几万军队与机关学校人员每年布匹被服赖以自给的地方，否则我们就要受冻。我们的纺织厂一九四二年已能产布二万二千余匹，但我们的需

要量是四万至五万匹，尚须作极大努力才能达到自给目的。但要发展纺织工业，必须实行如下的政策：（一）提高布匹进口税，保护土布；同时，部队及机关学校要一律采用边区出产的土布。（二）普遍倡导民间妇女纺纱或纺毛，保证工厂纱线原料的供给，同时即增加群众的收入。（三）解决供给问题。无论公营、私营或家庭副业之能否发展，主要系于供销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在原料方面，目前棉花棉纱还不能自给，来源不经常；又因交通不便，分配上有困难；须要解决到使纺纱生产者随时可以买得棉花，使布匹生产者随时可以买得棉纱。成品方面：布匹和毛织品销路不经常，需要使生产者能在适当市价下随时推销其成品。这个问题必须集合财政机关、商业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的协同力量，才能解决。（四）关于被服供给问题，须照财政厅在一九四二年所实行的办法，既能节省经费，又能及时有衣穿。

我们的造纸工业现在已能年产五千多令马兰纸，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七千令，已够全部印刷之用。但须：（一）统一纸的生产与供给。马兰纸除供印刷外，尚不适于普遍使用，印刷部门若不要，即售不出。目下即有这种现象：印刷纸不够用，纸厂则成品堆积售不出，资金周转不灵，影响生产。一九四三年应统一收买与供给，由固定机关与纸厂发生经济关系，以解决此种供求不协调的矛盾。（二）提高纸的质量。依据现有的生产设备与技术条件，纸的质量还可提高，但要多费人工与原料。就其作用与意义上说，费用略大也是值得的。另一方面，应研究改进造纸工具，以提高生产效能。

我们的印刷工业是现代化的文化工具，大量书报赖其供给。一九四二年，中央、八路、西北三厂生产五千一百六十万字，一九四三年可增至五千三百六十万字。但须添置器材，保障纸的供给。

我们的化学工业就是药品、肥皂、皮革、陶瓷、玻璃、酒精、火柴、石油等业。药品有八路军制药厂及光华制药厂，能供军用及公用中西两类药品之一部分，尚不能完全自给。一九四三年应研究边区出产之药材，并设法购买原料，以期增产必需药品。肥皂有新华、大光两厂，出品日增，质量亦好，除自用外，还可外销。新华一厂，一九四三年可产价值七百万元之肥皂四十二万条，有发展前途。制革厂规模不大，材料昂贵，不能多发展。如能采取边区出产之植物材料制造军用皮革，便有发展前途。陶瓷有三个小窑，制造日用与工业用之瓷器。玻璃已试验成功，决定设厂制造。酒精也能自造，供工业及医务之用。火柴尚未能解决磷的问题，正在研究从兽骨取磷。此外，尚有延长石油，亦能年产少许，以供军用，其中白蜡油可供日用。总之，化学工业须择其可供急需或有利可图者扩充之或兴办之，其他则不必办。

我们的工具制造业是为着制造纺纱机、织布机、弹花机、轧花机、造纸机件、大车、木工工具及农具等而设的，多属手工工具，但是十分需要，应研究改良，予以发展。

我们的石炭业集中于延安、关中等处，多为日用目的，规模虽小，但属必需。

边区缺铁，妨碍工具及农具之制造与改良。近在关中试验，有成功希望，如能制铁，则解决边区一大问题。

边区全部公营自给工业略如上述。不论纺织、造纸、被服、印刷、化学、工具、煤业均有相当的发展前途，先求完全解决军需公需，进求供给一部分民需。为此目的，我们在一九四三年应有如下的改革计划：

（一）增加资本（数目另定），由各有关机关拟具具体计划，经

财经办事处审定，分别投放于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工具业、煤铁业、石油业、某些部分化学工业及某些调查研究事项，有计划地促进自给工业的发展。

（二）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过去提出的“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因没有切实执行，致使建厅管的财厅管的军队管的机关管的各部分工业之间，缺乏计划性，生产过于分散，又缺乏工作检查，浪费人力物力。一九四三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首先要使所有公营工业，不论是属于哪一部门管理的，均须有一个统一的计划。在这个统一计划上，统一地筹划原料与粮草的供给，产量的定数，销路的衔接。在原料供给上，要解决由于地区分散、原料不集中和有些原料仰给外来，而使许多工厂随时都闹原料恐慌的现象。在粮草供给上，应由财厅经过一定的核算办法，供给各厂以所需的食粮及草料，以免各厂负责人分散其管理生产的注意力。在产量与销路问题上，应由财厅及各有关机关，在财经办事处统一计划下，给予各厂以一定数额的生产任务，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需要多少就生产多少，成品有一定机关按时接收，解决产销之间的矛盾现象。在这个统一的计划性上，要实行各业间的互相协助，消灭互相孤立甚或互相妨碍的本位主义。在这个统一的计划上，要实行统一的检查，对各业各厂有奖励，有批评，使工作差的赶上好的。总之，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必须彻底地努力地解决之。

（三）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为此必须：第一，每一工厂单位应有相当独立的资金（流动的和固定的），使它可以自己周转，而不致经常因资金困难，妨碍生产。第二，每

一工厂单位的收入和支出，应有一定的制度和手续，结束收支不清、手续不备的糊涂现象。第三，依照各厂具体情况，使有些采取成本会计制，有些则暂不采取，但一切工厂必须有成本的计算。第四，每一工厂的生产，应有按年按月生产计划完成程度的检查制度，不得听其自流，很久不去检查。第五，每一工厂应有节省原料与保护工具的制度，养成节省原料与爱护工具的习惯。所有这些就是经济核算制的主要内容。有了严格的核算制度之后，才能彻底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是否是有利的。

（四）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首先应该改革的是工厂机关化的不合理现象。目前我们有许多工厂在组织上非常不合理，人员众多，组织庞大，管理人员和直接生产人员的分配不适当，以及将管理大工厂的制度应用到我们的小工厂上面，这些现象必须迅速改变，使一切工厂实行企业化。一切工厂，应依自己经济的盈亏以为事业的消长。一切从业员的薪给，应由工厂自己的盈利解决，而不支领公粮、公衣与公家的津贴费。其次是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及计件累进工资制，借以提高劳动热忱，增加生产。八小时工作制，是将来大工业发展时应该实行的，目前则应一律实行十小时制，应使职工们了解这是抗战的需要。平均主义的薪给制抹杀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也抹杀了勤惰之间的差别，因而降低劳动积极性，必须代以计件累进工资制，方能鼓励劳动积极性，增加生产的数量与质量。军工生产暂时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制，亦应有计件奖励制度。再其次，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厂。职工会工作有不适合于提高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必须加以改造。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与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共同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

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与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快与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各顾各地把三方面工作分裂起来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三方面要组织统一的委员会，首先使行政人员、行政工作、生产计划走上正轨，而党与工会的任务就是保障生产计划的完成。再其次，工厂应奖励最有成绩的工人与职员，批评或处罚犯错误的工人与职员。没有适当的奖惩制度，是不能保证劳动纪律与劳动积极性的提高的。

（五）充实与扩大纺织厂，增加布匹产量，争取在一九四四年公用布匹的完全自给。改善毛织品，除供军用外，扩大出口量。制定关于被服的布匹与缝制的标准，保证棉衣与被褥能用二年。

（六）整理造纸厂，改善纸质，使能完全适用于印刷与办公，做到在一九四四年印刷与办公纸张的完全自给。

（七）增加煤油出产，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设法造磷或买磷，使火柴厂有一部分开工。其他工业，择急需者或有利可图者继续进行，或予扩充。凡不适合保障供给原则及无利可图的企业，实行合并或关闭。

八　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

政府、军队、机关三部分公营经济中，从直接解决需要的最迅速与最大量说来，究竟哪一部分是最主要的呢？依几年的经验看来，军队是最主要的。因为军队是比较更有组织性与比较具有更多劳动力的集团，他们只要没有直接的作战任务，就可以将他们除教

育时间以外的一切时间从事劳动，而在我们目前技术落后的条件下，劳动力是经济事业中的决定的条件，所以军队的生产事业，成了三部分公营经济中的最主要的部分。

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的生产运动，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比之机关学校要早一年。一九三九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同进行了生产运动。一九四〇年，三五九旅担任河防，参加了这个生产运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军队与机关学校一样，增加了生产自给的任务，而军队担负的责任是更大的，在生产自给的总量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这几年军队的生活资料及事业经费主要地不是由他们自己解决，而要仰给政府，那是不能设想的。他们在党中央及西北局的“生产自给”的号召之下，在战斗、警戒与训练的紧张任务之中，完成了他们的生产自给任务。虽然各部分军队所处的客观条件有好有坏，担负的勤务有多有少，努力的程度有高有低，从事生产的方法有优有劣，因之所得的成绩也有大有小，但是一般地说来，都是完成了任务的。他们都以极少的资本，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与商业，有些还开设了规模较大的纺织及造纸工厂。在这两年中，政府向军队的生产事业上的投资，一共不过六七百万元；但是他们在两年中，不但保障了价值三万万元以上的供给，还在他们所经营的农工商业中积蓄了约八千万元的资本，开辟了几万亩的土地，提供了在整个生产建设中的丰富的经验。他们不仅起了保卫边区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作用，而且起了直接解决大数量的财政供给与帮助着发展边区经济的作用。

让我们来看一看某团一个连的生产自给情形。这个连在一九四一年的收入与支出如下表：

一九四一年的收入（元）		一九四一年的支出（元）	
驮石炭	698.20	杂支	1312.00
驮盐	772.45	骡二头	2850.00
锯木板	3256.40	驴一头	574.00
砍木椽	630.00	汗衣六百套	600.00
贩猪	738.02	鞋面每人两双	405.50
骡马店	2256.00	毛巾八十七条	128.00
贩玉米	998.20	草烟	179.00
出口生意	935.60	盆	90.00
杂货生意	481.25	生产工具	181.00
油（840斤）	16800.00	油	16880.00
肉（1610斤）	16100.00	肉	16100.00
菜（4690斤）	4690.00	菜	4690.00
木炭（5000斤）	500.00	木炭	500.00
柴（25550斤）	2555.00	柴	2555.00
领生产资本	750.00	伙食补助	3771.00
领办公杂支	360.00	五个月津贴	567.50
领生产补助费	2855.00	擦枪费	22.00
领伙食补助费	3771.00	缴单衣费	100.00
		发过年费	146.00
		办公	339.00
		马干	620.00

总计	59147.12	总计	52610.00
收支相抵净存：6537.12元			

上表支出数五万二千六百一十元中，除去上级所发生产资本七百五十元，办公杂支三百六十元，生产补助费二千八百五十五元，团供给处补助伙食三千七百七十一元，共七千七百三十六元，该连自己由生产解决之数达四万四千八百七十四元，而所存资金可继续为下年生产之用者尚未计算在内。

依此计算，每团以十个连计，即自给经费四十四万零四百四十元。

尚有团部、团直属队及三个营部所经营之生产自给，如下表：

团部	197425
团直属队	27149
一营	18629
二营	12777
三营	7408
合计	263388元

上述连、营、团生产自给合计七十万三千八百二十八元，该团全年总支出（粮食及一部分被服在外）为八十九万六千八百三十八元，尚差十九万三千零一十元，由上级补足，故该团自给数占百分之七十八，上级补足数只占百分之二十二。若加上旅部的很大数量的生产自给，则全旅自给数当超过百分之八十远甚。

下列材料是留守处对于留守兵团的五年生产总结，可以看出军队生产自给的一般情形。

留守兵团五年生产总结

甲　五年生产自给概况

留守兵团，由于抗战以来的新的困难环境，在毛主席生产号召之下，从一九三八年秋季开始进行生产运动。这时候生产还不是担任自给的任务，仅仅是补助生活必需上的不够。当时我们只能给部队每人每天发菜钱五分，粮食一斤半，以当时市价每元能买蔬菜三四十斤，清油二斤，柴火一百斤计算，如以每连一百人计，每天共只有五元菜钱，买到蔬菜就买不到油盐柴火，买到油盐柴火就买不到蔬菜，猪肉更加吃不上了。在被服方面，当时很少见到一个衣裳不打补钉的战士。子弹袋破烂得不能装子弹，装在挂包里。有的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有的雪地打赤脚下操，有的连破烂的皮带裹腿也找不到。这些就是当时军队的物质生活情形。

这时生产运动的办法是：（一）开合作社；（二）大量种菜；（三）开磨坊，喂猪，养羊，做豆腐，生豆芽；（四）发动各个战士学会做鞋；（五）打毛衣、毛袜、毛鞋、手套；（六）提倡节约，防止浪费。一九三八年半年生产结果，超过了计划，战士生活大加改善。例如保证了蔬菜的自给；每周可吃两餐猪肉；部分地解决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补充了挂包、子弹袋、皮带、裹腿等。

由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所得到的很有意义的生产成绩，提高了部队的生产热忱和信心，故能于一九三九年提出更大的生产自给任务，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一九三九年规定部队在农业上，除种菜外，还要种粮食，要完成四千七百担粮食生产的任务。一九三九年的生产主要是农业，全年开垦了二万五千一百三十六亩荒地。起初

估计一亩能收二斗细粮，共可收四千九百八十六担细粮。但由于荒地初垦，农具不足，领导的经验不一致，部分地方又遭受天灾，结果只收到二千五百九十担细粮。此时部队尚无大的资金，商业还未开始。

一九四〇年，规定部队的生产任务是要各部解决一个半月的粮食，计三千四百担，是年部队开地二万零六百七十九亩七分，应得细粮四千一百三十六担。由于收成不佳，只收二千四百担。各部为完成任务计，加上打盐、挖甘草、伐树（关中），并经营商业。从这些辅助生产中，全留守兵团获利共二百二十三万六千五百一十六元一角六分，加上农业的收获，仍然解决了一个半月粮食的任务，并且还解决了部分的装备补充。

一九四一年，全体部队经费预算为四百四十七万九千五百三十六元四角，规定负担生产任务四十万元。但结果完全与此不同，经费需要是增多了，生产自给任务更超过远甚。是年生产，主要在朱总司令号召下抽出六个营打盐，共打了五万六千九百六十六驮，值二十三万六千四百零八元九角。农业生产：开地一万四千七百九十四亩六分，收获杂粮一千一百七十担。商业生产：合计赢利一千二百零一万九千五百九十二元七毛二分。由于物价高涨，纸币跌落，全年所有经常费与被服费，共支出七百八十八万一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一团和关中部队的收支均未列入）。全年伙食费，平均以每人每天五角计，除公家发给一角外，自行解决四角，共计二百五十九万二千元。以上经常费、被服费和伙食费三项，合计一千零四十七万三千七百五十七元一角七分，较原定预算超过五百六十七万三千八百零四元三角五分。除以生产所得支给外，尚有盈余。

一九四二年，经费预算（粮食、被服在外）为五百八十三万三

千六百三十六元，担任帮助中央经费二百五十万元。本年生产计划为一千二百四十万元。到八月止（八月以后尚未统计），商业获利三千八百九十六万九千二百三十元二角，工业获利四十三万一千七百七十三元四角，总共获利三千九百四十万一千零三元六角。

到六月止，领到经常费一百四十四万零五十八元六角，领第一套单衣补助费二十万六千八百二十五元。实际开支：经常费七百七十五万零五百九十八元八角五分，被服补助费三百零六万七千七百三十元六角，伙食补助费（公家每人每日发七角，实支三元）半年九百一十八万元。下半年冬季被服，各旅团大部分由自己解决，计有第二套单衣，半数棉衣，百分之四十的棉被及绑带、子弹袋、炸弹包、棉鞋、单鞋等八项，共计一千二百六十四万一千二百元。其他如冬季烤火木炭，均由各单位自行解决。牲口草料，一九四一年度自己解决马干费两月，一九四二年财厅发马草平均八个月，放青两月，一般地自己割马草两月，约可节省一百二十万元，又如一九四二年马料预算是一万一千担，按财厅规定一斗细粮作二斗马料计算，不够，全年须添补二千七百五十担，按每担五百元计，须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元。

五年中从事生产的结果，除解决每年的经常费、被服费与伙食费外，现在所存的财产计有：商业基金二千四百万元；运输牲口五百五十六头（耕牛在外，警一团五团亦未统计）值一千七百二十三万二千元；工厂资本七十一万二千元；总计四千一百九十四万四千元。

（注：以上总结，未包括三五九旅及保安部队在内。）

乙　几点经验教训

（一）几年来边区部队之所以能够实行生产自给，解决很大的问

题，是由于部队的庞大的劳动力和更好的组织力，以及边区内具有丰富的物力可资开发的原故。这一经验，证明了部队充分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又由于几年来部队自给问题的解决，生产信心的提高，使部队认识了生产自给为建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认识了生产自给是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最好办法。

（二）部队的生产建设，就是边区整个经济建设之一部分。过去部队虽在生产事业上努力地完成了任务，这是很好的，但在思想上没有强调与建设边区的联系，因此对于发展农工业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建家立业的精神还差，统一建设的思想也就模糊，甚至各自为政、破坏法令纪律的现象严重地发生了。这些缺点，今后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加以纠正。

（三）在生产方法落后的条件下，生产基础主要应建立在各个单位的劳动力和各个单位的经济基础上。因此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应当是保护这些单位的生产事业，在政府的统一政策之下，准其充分发展，并有利可图。因为这样，才对于生产事业的发展更有组织，更有力量，更能团结和合理，更能统一地和封锁作斗争。我们部队在生产上的重大缺点是注重了商业而忽视了农业，今后应该提高和奖励农业方面的生产。

（四）在部队生产事业中，应抓紧思想领导，建立和健全生产中的各项制度及领导机关，纠正并防止干部各自为政、贪污腐化、大吃大用、铺张扬厉、不讲节省、不求实效等等极坏的弊病。

以上就是我们的意见。

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首先，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利用了勤务较少的条

件，又利用了南泥洼适合农业、绥德警备区适合轻工业的环境，动员了广大的人力，在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大的经济自给任务，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的一系列的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农业为主这一点，使得他们的经济基础建设在稳固的地盘之上。其次，三五九旅进行了如下各项具体的经济建设活动：（一）他们在一九四〇年经营的粮食生产是失败了，但他们并不灰心，一九四一年继续经营，就获得很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就更有基础了。他们开辟了二万五千亩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种粮食、种菜、种麻、种旱烟，解决了部队的蔬菜、灯油、打草鞋的麻，战士们吃的旱烟，又补足了粮食、菜油、马料、马草之一部分。这样，只要两年工夫，就可打下全旅所有各连队的农业经济的基础。而且官兵全体进行劳作的时间，一年中不过两个月，尚有十个月时间进行部队的训练，并不妨碍操课。如果照该旅现在想出的新办法，即每连建立一个六至七人的专门的农业劳动小组，战士大众只在农忙期间突击帮助，则训练时间更多。（二）利用农场发展畜牧事业。一九四二年全旅经常养猪约二千头，可以解决部队食用的肉与油，因战士们食肉较多，又节省了粮食。另外，组织一批人去采柴、烧炭、锯木板，不但解决了自用的燃料及建筑材料，且可以其剩余出卖。（三）他们又建设了工业及手工业。一九四一年，他们从部队中抽出一批战士及勤务员建立了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供自用外，还有“大光”出品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又在绥德及南泥洼等地开创了盐井十个，炭井一个，木厂二个，铁厂三个，磨房六所，粉房八所，榨油房一所。又利用战士们操余课后的时间动员他们纺毛线，用柳条榆条编织各种用具，用桦树皮做写字板，做菜盒，做点灯器。这些战士们的劳

作，不但是为着全体的，而且也是于他们个人有利的。该旅规定：凡动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劳动，以其结果的五分之四归公，五分之一归私；凡不动用公家工具的，则以三分之二归公，三分之一归私。这种办法，一方面解决了公用物品的需要，一方面不啻增加了战士们的津贴。（四）他们又建立了有力的运输业。现在他们有一个拥有六百头驮骡的运输队，完全从事运盐运货。在绥德、三边、延安之间沿途建立了十个骡马店，安置了一批老弱人员。（五）他们的商业机关是大光商店，本店外有十个分店，一九四二年九个月获利六百余万元。但这种商业在该旅总生产量六千万元（延安市价）中只占百分之十强的数目。（六）该旅实行了统一的生产计划、生产制度与供给制度。全旅的生产计划由旅部制订。有的由旅部直接经营，例如较大规模的工业、运输业与商业；有的由各团直至连队经营，例如农业、畜牧业、小的工商业。由旅至连，按级检查。生产制度亦由旅部规定，上述战士纺毛线的办法，即是一例。供给制度亦保持统一，农工运商各业虽由各部分分别经营，但凡属一定数目以上的开支，必须呈报上级批准，下级不得自由支用，这样就免除了因自由支用生产结果而发生的苦乐不均的现象与浪费现象，保障全旅的团结。（七）他们不但发展了大量的生产，而且厉行了节约政策。例如：规定两年发三套单衣，三年发两套棉衣，一切被服，发新的交旧的，不交不发。又发针线给战士，衣服破了，自己缝补。这样一来，被服大为耐用，战士们更加爱惜自己的被服，大大地节省了被服费。又如前面说的令战士用桦树皮做写字板、做菜盒、做点灯器，发羊毛给战士打毛袜、手套等事，不但增加了日用品，同时即节省了关于这些物品的购买费。全旅一切房屋建筑及器具修理，均由部队中人自己动手，不向外面请工。所有这些，不但节省了大批

经费的开支，而且在全体官兵中养成一种爱惜公物、注意实效、反对浪费、不讲铺张的朴素的作风。

下列材料，是三五九旅领导同志对于该旅的三年生产总结，可以看出该旅在农工商业各方面的具体情形。

三五九旅三年以来在生产建设方面的总结

自本旅回防边区以来，三年中所执行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是我们建军上的新创造。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中，除向政府领食粮外，做到了其他一切经费百分之八十二的自给，由此克服了物质资材的困难，改善了部队的给养，巩固了部队，增进了军人体质的强健，巩固了军队的纪律，密切了军民关系。现将三年以来我们在农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的经验，概述于后。

甲　农业方面

在生产运动的号召之下，本旅从一九四〇年开始了农业生产，计划耕种土地，自给两个月粮食；从夏季起，自给全部蔬菜；喂猪，解决年节的肉食。但因绥、米、吴驻地人稠地少，须要跑到百余里以外的地方（九里山、清涧）开荒种地，来往耗费工夫，虽积极苦心进行，然未曾细心调查研究，筹划不当，故收获所得，不敷购买工具和种籽资金。但在驻地附近所种的蔬菜，到夏季后，足够自给了。各个伙食单位每人每日发一毛钱伙食费，只勉强够买油盐之用。部队须到百余里路以外去背炭出卖，赚了炭烧，并获得余钱买猪来喂。从这些生产活动中，奠下了连队生产改善给养的基础。除在驻防之绥、米、葭、吴、清各城镇及河防驻地所有公共荒地（公坟地、庙宇附近，城周围碎块土地，废弛不通行的片断公路，旧

的军事防御建筑等）都被开垦外，并向当地居民租地种菜。军中指战员们这种艰苦勤劳的精神，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广大同情。租佃的菜地，有的佃主（如义合镇的地主富农）谢绝我们支付租价，贫苦农民有些自愿让给暂时的租佃权，这是出于人民对军队的衷心的同情与爱护。在驻扎于农产不丰的地区，特别是在气候只宜夏秋作物的地区，农业生产不但是为解决经费困难所必需，且在维持和人民的正确关系上更有必要。一九三九年底和一九四〇年春，部队伙食费不够，冬春蔬菜缺乏，出外采买人员有强买及发价不公平的严重行为。部队在进行农业生产中，除县城极少几家专靠种菜为生的人有感这个穷军队驻防无利可图而生怨言者外，在广大人民中间，我们是保有良好的政治影响的。

一九四〇年从生产中解决的问题：（1）自夏五月起，蔬菜自给了。（2）由蔬菜自给，增加了喂猪，下半年改善了伙食，每人每月能吃一斤肉。（3）各个伙食单位，自制了部分农具，每伙食单位都有大小猪十余个。（4）证明了俗话说的："有菜半年粮，无菜半年荒。"部队粮食吃得饱了。（5）种粮食是开荒地，头一年不长粮食，且离驻地过远，锄草不及时，往返费工太多，由于这种种原因，本年粮食收获计划流产了。

一九四一年部队找到可以屯田的地点，执行总司令亲身指导的屯田政策，每人平均约种六亩地。每一亩地从开荒、播种、锄草到收割，须费工七天；六亩地计费工四十二天，约得细粮小米三斗（下中收成），谷草合价亦能值细粮三斗，粮草两宗约可换棉衣一套。如能获得上中收成，则可增加四分之一。各种副作物如包谷、花麻、油麻之类，亦与种小米收获相等。在这六亩地的边沿，可种许多附带作物，如大麻子、南瓜、豆角等，收获很多。除此而外，

每人再各种菜地半亩，则可有足供一年吃用的蔬菜。调和——辣椒、大蒜、葱，以及灯油、草烟、打草鞋用的绳索等等都有了。因为有了田园产物，故饲养家畜猪、牛、羊、鸡、鸭、兔等副业，大为方便有利，其中喂猪的利益最大，这应该是主要的副业。如平均以五人养一个猪计算，每百人可养二十个猪。外加三个母猪，每一母猪年产二次，平均最少每次不少于四个小猪，在不闹猪瘟，不发生意外的正常状态下，每年共生小猪二十四个。如每月杀二个猪，则每年须杀二十四个猪，猪的繁殖率与供给肉食的屠宰率相抵。还有多余小猪，自离奶到宰杀，平均每日可长肉五两。实际则每年平均经常保持五人养一个猪。由于有了农业生产，就有许多剩余蔬菜，及因磨面、碾米而得的糠渣头子，因造豆腐而得的豆腐渣等等，可以养猪，实为废物利用，利益极大。现在本旅已完全照此做到，每一伙食单位由农产、牲畜所得财富是在增加着。这些财富均由党支部领导、全体军人监督和依据上级规定的制度，合理地享用。一九四二年尚未作总结，但一切收获，大体上不会比去年减少。

检讨过去农业生产运动，总结其优缺点如下：

优点是：

（一）部队进行了执行这个任务的政治动员，使全体人员认识了毛主席提出的生产自给口号有坚持团结抗战、渡过经济难关的重大意义；总司令回边区后亲身指导，更加鼓励了军人的积极性和刻苦耐劳的精神。

（二）在实际生活中，感到生产运动的好处，改善了生活。

（三）旅与团都订定了每年度的整个的生产计划，规定了连队的生产任务的负担，认真地督促了团对连队生产的指导与督促。

（四）连队组织生产委员会，讨论布置生产任务的执行、监督与

审查经济（连队经济完全公开）并保障供给制度的执行。

（五）现在各连队均因有农产品而享受了自给自足的富裕的农家生活。

缺点是：

（一）没有充分注意生产工具，没有组织与使用耕牛，没有选定几个战士（伙夫）专门（撑犁手）长年累月地从事耕作，经常采取全体动员，浪费了时间，妨害了部队的操课。

（二）一部分干部对农业耕作还采取消极态度，不力求增加耕地的收获量。

（三）肥料收集没有更认真。

（四）没有专门指导生产的干部。

根据过去经验，采用牛耕地和利用牛上粪与收割（牛车搬送），置备足够的农具，配备专门负责的指导干部（生产副营长和连的特务长），配备长年成日从事农作生产劳动的战士（伙夫抽出），在播种、锄耘、收割时动员全体官兵参加，规定生产日，花费一定数量的工夫，这样，每人每年种六亩地，并砍伐全年柴火，共计只不过费工两个月，不但有了粮食，所有日常菜蔬、肉食及草鞋、柴火、鞋袜概可完全自给。单这后面几项，即占全部经费三分之一，怎么可说是小问题呢？至于粮食收获，则可养活二千人。

以上就是本旅农业生产的简单总结。

下面的附表是指出一个百人的伙食单位，如不自己种菜，而去六十里以外的地点买菜所费人工及时间（还不去说金钱的耗费）：

每月蔬菜消费量（每人每日以一斤计）：三千斤。

每月采买次数（每次以采买百斤为标准）：三十次。

每次采买所耗人工（每次以二人为标准）：四工。

每次采买所耗时间（每次以往返二日计）：二天。

每月采买所耗人工：一百二十工。

每月采买所耗时间：六十天。

每年采买所耗人工：一千四百四十工。

每年采买所耗时间：七百二十天。

仅仅依据此表，就可以驳倒所谓“农业生产无利，妨碍训练”的谬论。

乙　工业方面

大光纺织厂建立与发展的经验及其他各手工业的总结：

一、动机和打算：

部队衣服年年穿，被毯每年需要补充，被服原料的购置是供给工作上的首要问题。一九三九年冬，部队回防边区后，被服原料采买困难，又无钱买。在毛主席提出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克服困难、建设边区的号召之下，作长久之计，办纺织厂。

二、从试办中搞起来。

一九四〇年九月间，即已想办纺织厂。这时供给部开的短期训练班中，有一个河北人会织布，于是搞了一个小木机子，买了一块洋纱，试试看，十天内纱织完，织出的布还好，一天能织十丈。成本计算比买布便宜三分之一。

因部队里有织布工人就决定建厂，进行了下列事项：（1）买木料由自己的修械所造小木机十九架，又从山西买了四架铁机；（2）纱是向当地商人赊来的；（3）从部队中抽调河北高阳等地的技术工人二十余名。

布厂便这样初步地搞起来，不仅有利、方便，且解决了采买布匹的困难。

为了做到全旅布匹自给，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决定把布厂扩大。

一九四一年初，取消全旅各级勤务员，集中了一百多青年做学徒，学习织布。

又从晋西北买了两架铁机，由自己修械所添做了十一架大木机。二三月间，又自造了十六架大木机。三月下旬，又自造了十四架大木机。这时大小木机铁机共有六十六架。同时，添做了纺车等等必要的零星工具。

原料问题：一九四一年政府发给我旅生产基金四十万元，其中二十五万元分给了各团；余十五万元中，以十万元买纱三百多块（七斤十四两一块，每块二百八九十元）及一些必须购买的用品（如织机上的钢丝，不能自制，须购外货）。

工人由供给部会计员管理，分为浆纱、织布、络线、打线四组，一组二三十人，十多个熟练工人当师傅，并负责浆纱、轮纱等技术工作，聪明的青年学织布，笨些和年小些的青年打线、络线。

织机动作起来之后，马上感到劳动力不够。于是用大光纺织厂名义在绥德一带招收青年男女学徒五十名，并从军法处调出犯错误的犯人和俘获的土匪，集中劳动。这时工人共有二百余人，由供给部军实科负责管理，分为四个排，十二个组（其中有一女工排；一排分三组，每组十余人）。

工厂初具规模了。这时有两个困难问题须要解决：第一，资金与原料的供给问题；第二，工人的管理、教育与训练问题。

1. 资金与原料的供给问题

一九四一年五月间，借边区银行二十万元，仍不能长期支持。以后只好交朋友，拉拢关系，联络富商大贾，采取赊借原料、定期付款办法。

一九四一年五月以前，洋纱多从山西买来。后因来源断绝，只得从西安、延安购置（申新和黄鹤牌），棉花也是从西安、延安购买的。

土纱的供给，由政府发动当地妇女纺纱。最初，纺一斤纱，工费三元到七元（棉花价每斤四元），分上中下三等。到七八月间，改为纺一斤纱给熟花一斤半。到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又改为纺一斤纱给熟花二斤二两或二斤。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间，因民众纺纱供应不及，且质量不良，自办纺纱厂，有弹花机四架，纺纱机四十余架。到一九四二年七月，因无熟练工人，又因弹出来的花不能完全在机子上使用（棉花不好），现在只留四架机子继续弹花，纺纱机已停。

2. 对工人的管理、教育与训练问题

工人数量增多了，但分子复杂，管理不易。特别是青年勤务员，过去自由惯了，在家时也未劳动过，所以初来时，每天打的打，骂的骂，闹个不停，张口就说：“大官见过，小官也见过。”不受管理。

从农村来的妇女多是因婚姻不满出来的，经妇救会或政府介绍来工厂，相互谈到婚姻问题时，有的哭，有的笑，并常要求组织替她们解决婚姻问题。

俘虏来的土匪，让他做工，对他是件苦事情。

犯错误受处罚的人，许多是部队中的连排干部，摆老资格，不愿做工，调皮捣蛋。

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三月间，供给部长用了大力来整顿，立见成效。

这时期中，由那二十多名熟练工人当师傅，教织布组的青年，

先登小机（用力小，容易织），由师傅把一切手续办好，告诉他们如何登机子；断线时，如何穿线接头；如何手牵梭子，手脚相应。开始每天只织两三个钟头。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批学会了，转到大木机上去，再来一批。这样一批一批地训练，一九四一年三月轮训完毕。

打线络线工作容易学，只要细心耐烦，会接线头就行。但也需要熟练，不熟练时，打出来的“夫子”和络出来的线，织布不好使用。

开始做工，青年学徒坐在机子上，或打“夫子”络线，时间稍久，屁股痛，纱易断，脾气躁，不耐烦，浪费了许多线子，损坏了一些器具。所以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前，从产品方面计算，是没有收到成绩的。

当时的出路是：除了加强技术教育、提高技术之外，主要地是要政治鼓动，并给以革命劳动纪律的教育，使工人们自觉地认识从事生产的重要意义，安心工作，提高他们对于生产的热情和劳动纪律。

教育的方法：采取个别教育，实行军事纪律。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同志和军实科长、分支书记，每天亲身指导，说明前方打仗，在后方生产等于打仗，要服从组织，做工是光荣的，是工人阶级。提出竞赛，学徒与学徒比赛，女工和男工比赛。实行奖惩制度，建立请假制度。同时，每人每月发一些纸笔墨文具，并买了些娱乐器具。

从此工人们都感到做工是光荣的，并愿工余学习文化政治，过军事生活，生活军队化。这样，逐渐建立了兵工制度，工厂走上了正轨。早饭前早操跑步，早饭后上工，冬春季每天十小时。

这时又遇到了新的困难。

厂址原是租借的民房，因工作不便，自开了十几个窑洞，供工人居住，不料新窑潮湿，工人发生疥疮，数十人不能工作。遂将新窑改为储存室，工人移住民房。从六月间开始另打五眼石窑，安放织机，到十月底才落成。这期间，机子没有屋子安放，只好放在院内露天之下，搭起帐篷工作。五六月间早晨有露，且时时下雨，线打湿，不好织。到七月间，天气热，太阳大，线子晒干，也不好织。当时，只好把军毯以水浸湿，盖在机子上，地下泼水。但这办法，只能保持两三个钟头，其麻烦困难，可想而知。

经过六、七、八、九四个月，到十月间新窑洞落成，并盖平房二十七间，供工人住宿，才消除了这个困难。

在工人技术提高方面，从六月以后，青年学徒逐渐成了熟练工人，有的甚至超过了师傅。

在学徒期间，一般地在最初一个星期内，一天只做二三个钟头的工，织四五尺布。两三个星期以后，一天做七八个钟头的工，织布一丈到四丈。四个月之后，一天可织四五丈。到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每天可织六七丈。六月以后，都成了熟练工人，最好的每天可织十二三丈，在这当中，质量上也不断提高。

可以说，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后，工厂从种种困难的克服中，建立与发展起来了。

三、确立了兵工制度。

工厂扩大，需要正规化，军实科管理诸多不便。遂在供给部之下，专设厂长政委负责领导，订定纺织厂行政草案。

在厂长政委领导下，分工务、业务、会计、总务四股，分工合作，各有专责。规定了各种制度——会议、汇报、报告、检查、生活、津贴（按技术高低，规定最高的十元）与惩罚制度，具体分配

了工作、学习、休息、娱乐的时间，订立了民主生活的范围和各种原则——工室、寝室、饭厅、请假、外出等。

到一九四一年十月间，一切走上正轨了。

十月以后，感到木机不如铁机好——铁机织出的布，质量好而且省工。计划把木机逐渐完全改成铁机。从一九四二年一月到十月间，自造铁机四十一架。但因织铁机，须身强力壮，技术稍高，这样的工人不够，不能全部改用铁机，遂不再添造。计铁机四十五架，木机六十二架；此外，连买得龙湾工厂织毛毯毛织品的木机十三架（一九四二年春），自造木机十三架，共计织机一百三十三架，平均月出宽面大布千匹左右，毛巾约五百打，毛毯约百床。

从一九四二年五月后，把津贴制改为按件给资制，最高每月七八十元（这相当于私营工厂工资十分之一），最低的二三十元，更加提高了工人们的生产情绪。当时有些工人，午睡不睡，到下工时不下工，埋头工作。经过说服教育，才克服了这些过度积极的现象。

我们是坚持兵工制度的经营。工厂亦自种蔬菜、喂猪，供给蔬菜肉食。

一九四二年冬，因制棉衣，停工一月。

一九四一年，该厂除一切开支外，实得红利三百九十万元。一九四二年十个月，实得红利八百万元，现厂址工具及所存纱花，可值五百万元（纱花约值一百万元）。拟再投资数百万元，坚持再生产。

总结我们从事工业的经验教训，有如下列各端：

1. 各工业利润的比例，以纺织业的兵工即旅供领导的大光厂，利润最大。计该厂全体人员，一九四一年为二百五十人，一九四二年为二百二十五人；除工厂一切开支外，一九四一年获利三百九十

万元，等于该年底四千担小米价（每担三百斤）。一九四二年十个月获利八百万元，以绥德现时小米价，八百万元也是折合小米四千担，厂中每人平均纯利约十八担。

根据两年来的经验及现时的环境，大光厂二百二十五人，一九四三年，除厂址工具外，向该厂投入资本按每人二万五千元计，共计五百六十二万五千元，军服所需布，用款向该厂购买，如此，则一九四三年的生产，每人可获纯利小米二十担（因物价高涨，只好以米作标准）。

各团均有织布厂，可整理为一百人的织布生产。

其他，除制鞋、缝衣、皮革，纯为制造部队的装具服装外，本旅尚有铁匠、木匠等约二百人，根据二三年的经验及边区经济继续发展的情况，这种铁木工人平均有一千元资本，每人每年获利率约合六担小米。

尚有纸厂、榨油房，可利用部队从农业所得麻子及稻草以及兵工割马兰草，廉价收买，作为原料。此项工业约六十人，每人每年平均纯利可得六担粮。

2. 除农业外，兴办兵工制度，实为解决自给之本，它是同时解决物资与财政两方面的。商业决不如农工两业之可靠，商业不是靠己而是靠人，故不宜多做。

3. 缺点方面是：大工厂经营，成本消耗繁重，没有固定资本，影响再生产，因此今后必须竭力筹得固定资本。

4. 我们过去既没有对于边区全盘经济的打算，对于部队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也没有统一的计划，不能使农业、工业、运输业、商业四项互相统筹配合起来干，这是很大的缺点，今后应有统一的计划，配合地经营。

以上就是我们的总结意见。

丙　商业方面

我们的商业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从合作社到大商业，经过了六个年头。

还在一九三七年，本旅改编东渡，开赴崞县一带与敌作战。时值太原失守，商人惊散，城市货物不能运往乡村，老百姓亦不敢外出贸贩，致使日用品甚为缺乏，即油盐也都一时断绝，军队乡民，多有淡食者。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老百姓的请求，我们便办了合作社，抽调牲口到宁武等地驮运食盐。供给部拿出白洋三百元，在崞县一带收买商人寄存在乡下的货品，聘请阳武商人李茂林任经理，在阳武开张营业，定名为“三五九旅军民合作社”。当时目的，只是为了解决食盐油类等的困难，并贩运一些其他必需品。那时候票子还未跌价，所以资金虽然不多，而生意着实兴旺。一九三七年十月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四月部队东移，短短的半年得到了崞县人民很大的好感，成千的老百姓都在传颂着：假如不是合作社，不被敌人杀死，也会要困死的。因为当时的宗旨，不是为了赚钱谋利，所以生意虽好，没有赚到钱。四月结束时，本利共合白洋四百九十元，交给部队用掉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合作社人员随同部队转移晋察冀，到了灵丘，又是缺乏日用品，军民都苦。欲继续办合作社，没有本钱，无法可想。到八月间，合作社人员去涞源县城找商人拉关系，用交朋友的办法，赊到了三千零四十二元货物，主要是布匹、文具、纸张、香皂等，共计十一驮子，运回灵丘东河南镇，设店销售，货主也同来。五天的时间，将这批货完全销尽，除本钱外，实得利润八百元。这次现付货主二千零四十二元，送了一千元给前方接济伙食

钱。余八百元，又随货主去涞源再办货。这样贩运数次，到十二月底，才把货主的账交清。合作社营业由八月至十二月，便利了灵丘一带人民所需油盐布匹的供给，并在数次贩运中赚了二千八百元，弥补了部队的经费，还剩余一千五百元的货。

一九三九年一月，将一千五百元货移驻下关镇，主要是贩运油盐，一方供给部队的吃油，同时便利老百姓的需要。这时因部队时该和敌人作战，伤兵一千多，西药营养品等采买不易，合作社遂与各方面商人建立了友好关系，经过他们从天津北平保定等处收买西药、牛奶、藕粉等物，保证了伤兵的需用。同年九月本旅接到担负晋陕河防的命令，合作社即行结束，九个月营业实得利九千四百元。当时部队出发无钱，即以五千四百元现金开支经费，余下了四千元的货，计五个驮子，随同部队西行。十月到了绥德五里湾，即以这四千元货开张营业，因边区货价高，卖了二万元。又派人到娄烦、文水、交城等处，贩来一些文具布匹。年底总结，现金带货共值三万一千元。

一九四〇年一月，合作社移到绥德南关营业。这时部队经济陷于极端困难中，不得不靠合作社赚一部分钱补助开支，所以“军民合作社”的名字，便觉有些不合用，改名为“大光商店”，转变为以营利为宗旨。一年中又交了一些商人朋友，或以现款买货，或作暂时赊欠，购进了文具、布匹、纸张、鞋袜、毛巾等货，并在市上倒货。一年努力，年终总结，共赚十九万一千七百元，抽调十万一千七百元补助部队开支，确定一九四一年的生产基金为九万元。

一九四一年，为解决部队的迫切需要，本旅除以农业工业运输业为主体外，决定扩大经营商业，以为辅助。除原有九万元资金外，又从财厅发给本旅的四十万生产基金中提出二十五万元，又将

各团所有的零星小商店取消，集得资金六万元，共有资金四十万元。从一九四一年一月起，设了十个分店，经营一年，实得利润二百九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七元，抽调九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七元补助部队开支，实余二百万元作为商店的资金。

一九四二年，本店及十个分店在春夏秋三季的经营中，共得利润六百七十二万零八十元，补充部队经费二百万元，尚余四百七十二万零八十元继续营业。

经验教训：

1. 便利了老百姓购买布匹、纸张、油、盐等日用品，密切了军民关系。

2. 便利了军队购买日用品，在经济困难的八路军，能够使一元津贴买到香皂、毛巾、牙刷、牙膏等东西。另一方面，战士们把钱都正当地买了日用品，可以减少部队中不正当的浪费行为。

3. 交朋友的重要性。假如我们不同涞源商人拉好关系，便无法买进货物。

4. 收入盈余，补助了部队经费的开支。

5. 推销土产，抵制外货。可是有一部分商店因为我们检查不严与领导不够，尚不能有计划地联合一致进行抵制外货推销土产的工作，只顾到狭隘的本位主义，忽视了整个的经济建设。

6. 一九四〇年以前，不知道建立商业情报网，只晓得苦干硬干。结果，因行情涨跌，吃了不少的亏。一九四一年建立了商业情报网，各地行情，随时报导，并和大商家取得了联系，货价涨跌，能及时知道。故将一九四二年与一九四一年比较，就没有吃到行情不明的亏了。

7. 与当地有经验而且能在边区外区活动的商人联络和营业，遇

有纺织原料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但也遇到了一些流氓商人，他们利用我们做了他们自己的事业，使我们的营业受到损失。

8．商店里有的人数太多，吃闲饭，增加了商店的开支。

9．经常与外区商人往来，彼此了解政策与态度，减少误会，成为朋友。

10．也考验了干部的党性、思想与能力。

11．商店中管理严密，制度健全，才能减少消耗。

12．帮助稳定金融。大光商店在一九四〇年兑换光华票。

13．周密筹备，正确地灵活地运用贸易政策，在非禁止品的范围内，使土产运出，兑进必需品，一面是解决军需品的困难，又可获得利润。

14．为了赚钱起见，自一九四一年一月将所有旅团的合作社一律改名为大光商店。商店组织是以绥德为中心，在绥、米、葭、吴、清、安定、延川、延长均设有分店。旅为大光商店，团为分店。

15．各商店人员大多是军人，按职别发津贴，但雇请者则按能力与工作之强弱发薪资。

16．货物来源，一九四一年大部是从晋西北一带买回来的。后因敌人“扫荡”，封锁经济（降低法币，使用伪票），物价昂贵，又因我们资金困难，拿钱买货亦不能多，因此我们就在抵制外货、推广土货的口号下，推销自己织的布匹，卖了自己制的皮鞋、毛巾、布鞋，更大量地推销了大光肥皂。在防止奸商抬高市价与推行边币的原则下，兑换光华票，抑抵高涨着的市价。例如我们自己熬的盐，市上每元一斤四两，我们则卖二斤四两，这样使老百姓每元中便宜一斤。所以说我们在某一时期中，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在平衡物价，安定民生。

17. “早知三天事，富贵几千年”。似乎做生意是瞎碰的，碰的机会好，就可赚到钱。其实不然，做生意完全靠估计正确，了解当地及各地之情况，进出口的对比，方能预计货价之涨跌，确定某个时期的注意方针。

18. 稳定币制，巩固金融，是生意发达的先决条件。三年来由于边区的币制忽涨忽跌，金融紊乱，影响了买卖货物，感到诸多不便。另一方面，却使投机商人贩运票币，赚了很多的钱，影响了边区的经济。

19. 各团商店，对集中领导，实际上没有彻底地执行，表现了互相竞争、各自为政的不良倾向。

20. 各团都建立了会计制度，由专人负责，登记账目。但因经手者大多是过去商人，没有用新式簿记，仍用旧式簿记。（本总结完）

三五九旅还有一个关于一九四三年该旅在农业方面的具体生产计划，切实明确，可供各部参考。原文如下：

三五九旅一九四三年的农业生产计划

驻屯边区军队的屯田制度，乃是我军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任务之一。这个任务的坚决执行，使我们能够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中，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军队质量，并求得与人民的亲密团结。因此，本旅根据三年来在执行上级生产号召中所得的成绩与经验，为着加强与贯彻这一政策的执行，扩大一九四三年的生产率，特拟定如下计划。

（一）怎样组织部队的农业生产？

1. 本旅各团各部队驻防区域，均有可耕土地。因此，规定每个伙食单位，按劳动力与土地情况，经营农业生产。

2. 每个伙食单位，在驻军环境中，百人上下的只需三个炊事员，故每个伙食单位能从炊事员中抽出六至七个身强力壮兼有农作经验的同志，来专门从事耕种劳作。

3. 各营生产副营长，各连特务长，旅团生产副官，负筹划监督之责，在春耕、夏耘、秋收之际，组织与指导全体人员参加。

4. 每一个战斗连队的伙食单位，规定除解决自己全部蔬菜外，应种粮地六百亩。

今按各部能担任生产任务的，规定如下表：

队　数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生产单位数	5	2	1	17	16	13	6	5	65
应种地亩	3000	1200	600	10200	9600	7800	3600	3000	39000
炊事员中应抽专门从事农业生产人数	30	12	6	102	96	96	78	30	450

（二）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冬就要准备来春事。

1. 每一个伙食单位，种哪些土地，山地多少，川地多少，熟地多少，荒地多少，要登记清楚。并要调查研究种什么东西，下种、锄草、收割时间需多少工、多少种子等。

2. 种地需要牛、犁，还需要其他农具，如锄、镐、筐、镰等

等，冬季要完全准备好。其具体要求如下：每一个伙食生产单位，必须准备耕牛三头，耕犁三犋，其他农具（如锄、镰等）共六十件。

3．不上粪，庄稼长不好，各单位务必收集粪。所有人粪、牲畜屎尿、柴灰、草灰都要收集，要注意厕所、猪圈、羊圈、牛马厩之管理。要求每亩地至少要上四担肥料。许多地方有水冲草根、树叶，均可搬至耕地烧灰。

以上所提应准备的东西，各部需要多少，全旅共需多少，可看下表：

队别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生产单位数	5	1	1	17	16	13	6	5	64
须备耕牛数	15	6	3	51	48	39	18	15	195
须备耕犁数	15	6	3	51	48	39	18	15	195
须备其他农具数	300	120	60	1020	960	780	360	300	3900
须备肥料担数	12000	4800	2400	40800	38400	31200	14400	12000	156000

（三）要多少钱？要多少工作日？

1．牛、犁和其他农具都要花钱买，或者花钱去做，这就是本钱。此外还有肥料、种子，六百亩地至少得用八百元钱。总计六百

亩地得用本钱多少，全旅全部耕地得用本钱多少，请看下列二表：

表一　六百亩地需用本钱概算表：

耕牛费	耕犁费	其他农具费	肥料种子费	耕牛饲料费	合计
12000	600	6000	800	2700	22100

附注：（一）耕牛每头系按四千元计算；（二）耕犁每犋按二百元计算；（三）其他农具平均每件按一百元计算；（四）耕牛饲料费按每头牛九百元计算。

表二　全旅全部耕地需要本钱总值概算表：

项别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己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耕牛	60000	24000	12000	204000	192000	156000	72000	60000	780000
耕犁	3000	1200	600	10200	9600	7800	3600	3000	39000
其他农具设备	50000	1000	6000	122000	96000	78000	36000	30000	419000
肥料种子	4000	1600	800	13600	12800	10400	4800	4000	52000
耕牛饲料费	13500	5400	2700	46900	43200	35100	16200	13500	176500
合计	130500	33200	22100	396700	353600	287300	132600	110500	1466500

2. 从开荒播种，到收打完毕，种六百亩地，得用多少工作日？估计开荒播种需工五百个，制肥及施肥需工八百个，锄草三次需工一千八百个，收、打需工四百五十个，那么，总计起来，共需三千五百五十个工作日。请看下表：

耕地播种	制肥及施肥	锄草三次	收、打	合　计
500	800	1800	450	3550

附注：种六百亩地，六个炊事员专门从事生产一年，至少可以做一千个工；三千五百五十个工除去一千个经常工，还有二千五百五十个工。每个伙食生产单位，按一百人计算，那么每个人在一年中，须支付二十五个工作日，从事农业生产。

（四）耕作物的种类，各类的收获量：

1. 按土地状况，研究哪里适合种什么粮食。一般应种谷、粟、高粱、包谷、豆类、稻子等。此外还必须估计到部队本身的需要，种大小麻，可解决打草鞋、做鞋的麻及灯油、食油。但在某些部队可种棉花。

甲、七团可植棉二百亩，估计每亩收花三十斤，总计可收花六千斤。按每斤五十元折价，总可折款三十万元。

乙、特务营每个连除种六百亩粮食外，还须种八十亩棉花，估计可收花二千四百斤，折款十二万元。营部种棉二十亩，可收花六百斤，折款三万元。

2. 按每垧地（三亩）平均产细粮四斗计算，六百亩地可产细粮八十担，全旅三万九千亩地可产细粮五千二百担，每担细粮按一千二百五十元折价，则六百亩地产粮折款为十万元，全旅三万九千亩地产粮折款为六百五十万元。

3. 在六百亩地当中，估计半数（三百亩）是种谷子，每亩地产草按三百斤计算，则总可产草九万斤。每斤草按一元折价，则六百亩地产草折款为九万元，全旅耕地产草折款为五百八十五万元。请看下面两个收入概算表：

表一　六百亩地收入概算表：

可收细粮	粮价每担	粮价合计	可收谷草	草价百斤	草价合计	粮草总值
80石	1250元	100000元	90000斤	100元	90000元	190000元

表二　全旅耕地收入概算表：

项别	甲部	乙部	丙部	丁部	戊部	已部	庚部	辛部	合计
耕地亩数	3000	1200	600	10200	9600	7800	3600	3000	39000
可收细粮（担）	400	160	80	1560	1280	1040	480	400	5400
可收谷草（万斤）	45	18	9	153	144	117	54	45	585
产粮折款（万元）	50	20	10	170	160	130	60	50	650
产草折款（万元）	45	18	9	150	144	117	54	45	582
折款合计（万元）	95	38	19	323	304	247	114	95	1235

各团各部接此计划后，立即召开生产干部会议，讨论执行办法，将团或部的总计划及各个伙食单位的计划（根据三年自给菜蔬以及吃油、灯油、做草鞋用的麻等等材料，加在自己的计划中）做出，限十一月底呈报上来，望遵照执行为要！（本计划完）

从上列种种材料看来，即可知道我们军队的生产自给，毫无疑义地是有巨大成绩的。这种成绩是依靠了什么才达到的呢？是依靠了干部们的积极领导与战士们的劳动热忱才达到的。干部们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积极地指导生产运动的，战士们

也是自觉地为了克服革命过程中的困难而去参加生产劳动的。没有这两种人的自觉性，没有他们感觉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事业，而是为了神圣的革命需要，假如他们没有这种感觉，那么，是无法完成这种艰苦的生产任务的。假如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雇佣的一分子，假如他们感觉从事生产是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无关的，是与共同的革命事业无关的，那末，这种生产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以上讲过了我们军队在生产自给方面的极好的经验与极大的成绩。以下再讲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不但是军队的，也是机关学校的。这些缺点中，有些在过去时期是难于避免的，但在有了五年经验之后，就应该有所改变了。有些则已成了严重的弊病，如不改变，则将转过来妨碍党与革命的利益。

这些缺点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缺点，就是一部分军队及一部分机关学校，为了要迅速解决迫切的自给问题，比较地或特别地重视了商业，轻视了农业与工业。他们不知道只有农业与工业是产生价值的，商业不过是流通过程，它本身不能产生任何的价值。鉴于过去的教训，一九四三年的生产任务，一切部队、一切机关学校都要将重点逐渐转到农业、工业与运输业上去；而在我们的条件下，特别重要的是农业。因为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大部分需要的东西是农产品（正粮、杂粮、蔬菜、麻、肉食、植物油、动物油、棉花、马草、木料、柴火等）；农产品又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如果我们再从事一部分可能与必要的手工业（纺纱、纺毛、做鞋、织毛线衣、挖炭、锯木头、榨油等）及较大的轻工业（纺织业、造纸业等），则可以很大部分地解决我们

的日常需要，并可争取出卖。

第二个缺点，就是缺乏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下面多少单位各自为政，上面没有或缺少在政策原则上与工作内容上的统一的指导、统一的计划与统一的检查，致使各部分不知道什么事是不应该做的，或者明知故犯。于是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的事也发生了；破坏政策原则，破坏政府法令的事也发生了；侵害人民利益的事也发生了；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不但没有协助，反而互相斗争，互相妨碍的事也发生了；瞒上不瞒下，瞒上又瞒下，打埋伏，说谎话的现象也发生了；极端浪费，一掷千金，但求铺张，不求实效的现象也发生了；尤其严重的，是在一部分干部之间发生了贪污赌博等极端恶劣的现象。有个别的干部是被物质所诱惑，因而不愿忠实于共产主义的神圣事业，完全腐化了；另有若干干部则起了霉，要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才能恢复健康。所有这些坏事，所有这些弊端，在一部分军队与一部分机关学校的干部中，都是或多或少地发生过的。今后所有军队与机关学校的一切上级领导机关，必须着重于照顾全局，掌握政策，对所属各单位的生产活动一定要有统一的计划，统一的检查，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浪费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这就是经济工作中的整顿三风，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

第三个缺点，就是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或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者中了董仲舒们所

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者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理论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技术教育，业务教育，国民教育均在内）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究竟还有什么工作是更革命的呢？不错，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我们如果认真地做好了这两项工作，我们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前方的战争，我们也就算很好地援助了大后方的人民。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不适合我们此时此地的条件的。我们必须重新分工。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职业革命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

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第四个缺点，就是过去有些部队或机关在生产任务的分配上，没有上下级的分工，从旅部到连队，从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都允许经营商业，毫无限制，因而发生许多毛病。今后一般的商业、工业与运输业应集中在旅部、独立工作区域的团部及上级机关，并按正确原则去做，对外贸易还必须统一于物资局的指导之下。集中工作区域的团以下，任何部队的营以下，以及一般的下级机关，应指定他们从事农业，战士们与杂务工作人员们可做的手工业，以及消费合作性质的生意或小贩生意，其余均不许他们做。

根据五年来成绩与缺点的总结，一九四三年军队各部应执行如下各项的具体任务：

（一）除大部分粮食与一部分被服由政府供给以外，大多数部队应完成一切供给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则应完成百分之百，只有某些特殊情况的部队（如骑兵部队）才允许他们只担负较轻一点的生产任务，但也要想办法在一九四四年能够完成较大的任务。一切部队应准备于一九四四年更多地增加粮食与被服的自给额，以便减轻民负，休养民力。

（二）除三五九旅已经全部从事屯田及骑兵部队因特殊条件难于立即实行屯田外，其余各部，除负担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

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

（三）各部由上至下应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从事生产，从旅到连按级建立生产委员会，按级举行生产与供给的集体计划与集体检查，并研究生产技术的改进，以期增进生产，改善供给，纠正一切不正常的现象。

（四）选择政治上与工作能力上比较更强的干部去管理各部门的生产与供给工作。现有的经济干部须加以审查，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各部一律增设生产副营长及连的生产管理员，专门管理全营全连的生产与分配事务。旅部团部设生产副官，管理本单位的生产工作。各级主官必须亲自计划与检查经济工作。

（五）各分区党部、政府与军队的一切经济与财政工作，在分区财经分会的领导下实行统筹统支。为着鼓励各部分生产人员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起见，应允许从他们的生产结果中支出相当部分去改善他们的生活。除此以外，一律应做到统筹分配，免除苦乐不均的弊病。统筹分配，有在全边区范围内统筹的，有在各分区范围内统筹的，有在各系统范围内统筹的，有在一单位内统筹的，依生产性质及经营情况来决定。

（六）厉行“军民兼顾”的原则，军队、党部、政府的经济活动应与人民的经济活动取得协调，一切损害人民利益引起人民不满的事均不许做。

（七）生产与教育不可偏废，各部必须精密地计划二者的工作及其相互间的配合，恰当地分配二者的时间，使一九四三年的生产与教育均多于与好于一九四二年的生产与教育。我们有了五年的经验，一九四三年达到这个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八）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就是保障部队生产计划与教育计划的完成及在实施这两项计划时保障自己部队与党政民发生正确的关系，保障自己部队上下级的正确关系，保障经济干部的纯洁。政治工作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么，这种政治工作就是失败的。

九　关于发展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

三部分公营经济中，军队及机关学校的生产，是直接为着自己解决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的，政府机关经营的也在内。例如边区政府各厅处的工作人员，有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的经营，这是直接为着补充自己机关办公费被服费之不足及工作人员伙食费之不足的。但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则不是直接为着自己机关，而是为着党政军全体的。

延安及边区的党部机关、政府机关、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以及许多学校，他们在整个“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下，从事农工商业的经营，是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运动，解决了财政供给上的很大问题，仅仅次于军队，值得我们慎重地总结其经验，指出其成绩及缺点，并规定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方针。

军队的生产运动从一九三八年开始，有了经验，一九三九年我们就将这种经验推行于一切机关学校。一九三九年二月，开了生产动员大会，组织生产委员会为生产运动的指导机关，按各机关学校的工作或学习的不同情形，人员劳动力的强弱，规定不同的生产任务。例如：那时规定区乡工作人员的粮食须完全自给；其他机关，从中央至县，则按劳动力多少强弱，多的强的自给粮食二分之一，

少的弱的自给三分之一；共要他们开荒十万零二百亩，冀收细粮一万三千担。此外，规定一切机关学校的蔬菜全部自给，喂猪解决肉食，种粮有草又可解决一部分马草。当时全边区机关学校共约二万人，平均每人发生产费二元六角，共四万九千余元，作为购买耕牛农具的资金。在他们找得了土地、买到了耕牛农具之后，即全体动员从事春耕。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来没有劳动过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连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及勤务员、伙夫、马夫一起，组织在生产小组中，从事开荒种地。那时延安附近一切有荒地的山头，布满了开荒的男女，他们自动地宣布劳动纪律，提出开荒竞赛，体力强的都拿起锄头开荒，体力弱的则种菜养猪，或送饭送水。

这次生产运动的收获是：（一）全边区机关学校，共计开荒十一万三千四百十四亩，收获粗粮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五担六斗三升（合细粮五千八百三十担零一斗七升）；收获菜蔬约一百二十万斤，两项照当时市价值洋三十六万八千余元（一九四二年市价则值一千零十七万九千余元），解决了二万人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马草的二分之一及一部分蔬菜与肉食。（二）使一万多个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第一次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什么是劳动，锻炼了他们。（三）边区老百姓看见或听见所有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及青年学生——从共产党中央委员至小勤务员，一律上山种地，感动了他们，大家热心开荒，成为历年开荒之冠。

另一方面，这年并没有完成粮食生产的规定任务，由于劳作缺乏经验，施肥、播种、锄草有的不及时以及有些地区遇着旱灾等原因，致使开荒虽多，收获不大，只完成原定一万三千担细粮的百分之四十五。再则这时在领导上与组织上犯了平均主义的毛病，没有考虑到各工作机关各学校的不同性质。有的是给予任务太大，例如要区乡

工作干部完全自给粮食，结果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有的是因为从事生产延误了工作和学习，反而不经济。有的是某些体弱的男女同志本来不能做重劳动的，也勉强劳动，身体吃亏。有的是原可从事工商业的，但当时没有指出，只单纯地全体一致地注意了农业。

一九四〇年，改正了这些缺点。首先将农业的生产任务减少了，除菜蔬肉食自给外，粮食生产则按各机关学校的不同情况，只规定自给七分之一、六分之一与四分之一。体弱的男同志及一切女同志，不要他们参加重劳动，五十岁以上的老人与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则完全不参加生产，允许雇有经验的农民参加生产并做生产的指导者。此外，由财政厅发五万元给各机关学校作资金，允许各机关学校进行工商业，并发展畜牧生产，喂猪养羊。因此一九四〇年的农业生产，除原耕土地外，没有增加。有的因劳动力不够，采取与老百姓伙种的办法；有的将一部分粮地分给别人，自己着重于种菜、喂猪；又加有些学校已迁往华北；故一九四〇年粮食收获只有细粮三千担，菜蔬九十余万斤，照当时市价估计约值三百万元。

我们的经营商业是从合作社开始的。一九三九年各机关学校就有消费合作社，并有开饮食店的。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共有三十个合作社及食堂，资金共约六万余元。其中大的一万元，小的不过数百元，目的在于供给本机关学校的日用品，同时卖给外面谋些微之利，借以改善生活，还未担负借商业解决一般需要的任务。但是它却初步地锻炼了从事商业的干部，积累了一些经商的经验与小量的资金。

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两年中，机关学校还没有一般从事工业生产，只建立了一些为着自己磨面粉的磨坊，还有后勤的交通商店附设了一个打马掌的铁店，可算是机关学校手工业生产的开端。

以上算是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的第一时期。以下是第二时期。

一九四〇年冬，由于边区经济被封锁，外援断绝，财政困难达于极点，整个财政供给不能不从半自给急速地转到完全自给，因此机关学校的生产任务也迅速地起了变化。

这时党政军民各机关及各学校的人员（部队在外）既不能全部从事农业，而生产自给的任务又是极端艰巨的，一方面要靠发展生产保障每天每月的供给，同时又要积累资金，建立将来自给的基础。

为了渡过这一严重的难关，党与政府采取了必要的步骤。首先是刷新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先后成立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后勤经济建设处，边区一级的财经处，各分区各县亦令其成立生产委员会。其次，从一九四〇年冬到一九四一年春，先后由政府支付七十万元，银行借出三百万元作为各部门增加的生产资金，交给各生产自给的领导机关转发下去，加上第一时期各机关自己所积累的资金，于是大家从新布置，纷纷抽调人员，选择业务，决定以工商业为主要经营方向，农业则放在辅助地位。

下面，我们就来将这一时期内各机关学校从事工业、商业及农业的经验加以论述。

各机关学校的工业是从纺织业开始。初因边区有羊毛，一九四〇年冬，各机关学校人员在其工作或学习之余，就有手摇纺毛，一时成了运动，大家纺起来。但因原料不够，纺毛技术又不熟练，毛线不匀，费工太多，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以后，就逐渐停止，而着手于建立手工纺织厂。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各个大的机关学校，均纷纷抽出勤务员通讯员到政府的难民纺织工厂学习纺纱织布，一时如雨后春笋，办了十多个纺织工厂。缺点在没有计划性，到了下半年，这些工厂，或因原料供给与纱布销售无保障，或因流动资金不

够，或因管理不善，有的停工，有的合并，有的时开时歇。例如：中央直属财经处的新中国纺织厂，先与中央组织部的胜利纺织厂合并，后与马列学院的团结纺织厂合并，仍名团结纺织厂，使经营集中起来，更有利些。鲁艺及女大的纺毛厂则实行停工，将资金移作别的事业。中财的团结纺织厂，后勤的交通纺织厂，均因种种困难，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生产力，而时开时歇，直到后来才走上轨道。这样看来，由成千成万人的手摇纺毛到建立手工工厂，由建立十多个很小的纺织厂纺毛厂到最后合并为交通、团结两厂，中间经过不断地摸索研究、改善技术与改善管理方法，这是一个从盲目性到自觉性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说明了各机关学校的苦干精神，另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我们对于工业经营的毫无经验。到一九四二年，交通产布三千三百三十六匹，团结产布二千七百三十六匹，成了边区的大工厂，就是这一苦干与摸索过程的宝贵的产物。

纺织厂以外，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又陆续开办了被服厂、制鞋厂、煤炭厂、木工厂、造纸厂、陶瓷厂、磨粉厂、榨油厂、丝织厂及铁器店等许多手工工厂，求达自给目的。这些工厂的资金，或是从商业资金中抽出来的，或是从银行借来的，或是从停闭自己的纺毛厂移来的。并鉴于纺织业的经验，不是那样毫无组织地干了，而是或由几个机关学校合办，或与老百姓合办，或与银行合办的，比较地有了一点秩序。但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大都经过开始亏本，继能维持，最后才能获利的曲折过程，才立定了自己的基础。

一九四一年与一九四二年两年中，中财系统共计建立了大小手工工厂二十七个，共有资金四十余万元，员工四百七十七人。其中计有纺织与纺毛厂八个，资金二十一万七千元，员工一百六十一人；煤炭厂三个，资金七万元，员工六十八人；磨坊三个，资金一

万五千元，员工二十一人；被服厂二个，员工四十八人（资金不详）：木厂三个，资金三万五千元，员工七十六人；制鞋厂一个，资金一万元，员工三十八人；造纸厂一个，资金二万元，员工二十九人；此外还有小的机器厂、玻璃厂、酒精厂、陶瓷厂、油灯厂、制毡厂各一个（此六厂资金人员无统计，前三厂附属在自然科学院，是实验性质）。所有上述各厂，到一九四一年九月中央直属机关学校实行第一次精兵简政时，重新作了调整，统归中央管理局直接管理（中央直属财政经济处取消，设立中央管理局，隶属于中央办公厅），由二十七厂裁减合并为十九厂。特别是将八个纺织厂并为团结、实验两厂，使经营集中，业务改善，就由八厂分立时或亏本或仅能维持的状态，过渡到了在一九四二年十个月中获利一百六十万元的好现象。

后勤系统下的自给工业，也是和中财系统一样，从一九四〇年冬季开始的。经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的经营，计有纺织厂一个，纸厂二个，炭厂三个，木工厂二个，丝织厂二个，石炭厂、精盐厂、陶瓷厂、被服厂、毛笔厂、铁厂、面粉厂、鞋厂、麻织厂各一个，共十九个。这些工厂的资金员工及产量尚无统计。这些工厂虽赢利不多（一九四二年十个月赢利二十万元），但有其极好的优点，即是：（一）他们是由后勤集中经营的，不是由各机关学校自由分散经营的，因此领导与检查都较深入，缺点改进也快。（二）经营的部门广，不像中财系统在开始时集中注意于纺织工业，建立了纺织厂八个之多，后勤则始终只办一个交通纺织厂，因此有余力多做别事。（三）完全是保证供给的性质，虽不赚钱，却解决了许多必需品的供给。

一九四二年十月，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中管后勤两系统合并

为一，工业亦统一管理，并作新的调整，交通、团结两厂即被服厂拨归财政厅；制药厂、酒精厂、制铁厂、玻璃厂拨归留守处；自然科学院亦随该院一起拨交政府。其余各厂则实行裁减合并，统归中央管理局管理。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计有木工厂三个，纸厂二个，炭厂五个，鞋厂一个，油厂一个，粉厂一个，磨坊三个，大车制造厂一个，制酒厂一个，赶毡作坊三个，共大小手工业工厂作坊二十一个，可以保证中管系统全部石炭、鞋子、面粉的供给，全部木器洋铁器具的制造与修理，保障纸张与食油的一部分，被服则由政府负责供给。这就是中管（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前是中财）后勤两系统两年来在工业生产方面的积极结果。

上述经验指明：在目前条件下，机关学校经营手工业是必要的，其目的不在赚钱，而在保障必需品的供给。但工厂不是任何机关任何学校都可样样去办的，应是有计划地按工业的性质与机关学校的情况分别地择要地去办，减少盲目摸索的毛病。已有工厂须按地区按机关系统，采取裁减合并及转移等步骤，戒免浪费，并使其能够发扬更大的供给作用。

前面说了，我们的同志对于商业，也是同工业一样，没有经验的，只办过一些合作社。现在要转到依靠商业获利来解决一个很大部分的供给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办才好呢？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的过程。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两年中的经营商业，是从要迅速解决困难的目的出发的，因此就不能不以各机关学校所有资金的大部分去做能图速利的生意。

一九四〇年秋到一九四一年秋这一年中，主要的是经营百货商业。有些机关学校利用他们原有的本小利微的合作社、商店或小货

摊，加以扩大，增加资金，补充人员，加入商会，正式经营商业。例如兵站的交通商店，最初只是在延安七里铺兵站门口附设的一个小纸烟店。一九三九年八月，移到延安新市场，贩卖百货外，还附设了一个中药房，一个马掌店，资金由数百元增至二万元。又如合作商店，是由抗大合作社改变的，一九四〇年六月搬到新市场，并在抗大三分校附设支店，资金由八十元增到一万九千元。后勤的百货商店，开始不过是一个资金三十元的小货摊，到一九四〇年九月，予以扩充，资金增至二万元，除做百货生意外，附设了一个染坊。许多机关学校原来没有商店的，此时亦集资调人，或独立经营，或与人合股，做起生意来了。这时各公营商店的营业主要是从绥德、定边、鄜县贩卖百货，特别是机关学校部队自己需要的布匹、纸张、文具及老百姓需要的火柴、棉花等。这一时期内，延安、绥德、定边一带，我们机关学校设立的大小商店共有六十余家之多，军队的还不在内。另有许多不设门面，靠着一二个人带二三个四五个牲口贩运货物，沿途流动出卖，叫做“走水生意”。据一九四一年十月统计，后勤商店管理委员会所辖，就有西北商店、西北菜社、兴华、合作、交通、新新、兴民、民兴、百货、军民及贩卖部等大小十四个商店，中管系统则有二十个。

这一年的商业，确实靠了它渡过了严重难关，解决了很大的供给问题。例如中央直属财经处与各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的商业中，依靠一百一十三个员工所开共有资金二十九万六千八百元的大小二十个商店，获得了二十五万六千元的利钱，供给了各机关学校日常经费的百分之四十八。后勤系统以七十万六千元资金在同一时期得了八十一万元的利钱，供给了他们日常经费的百分之四十五。

但是这一时期的商业有一个很大的弊病。这就是由于过分分散，没有集中领导，又差不多都是做的百货生意，急于要解决每一机关学校的经费困难，因而产生出来的弊病：各自为政，互相竞争，甚至违反党的政策，影响物价与金融。同时，物价高涨，边钞跌落，外边封锁加紧，经营出入口的百货生意，顿然显出不景气，各机关学校靠此维持经费亦发生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急需将机关学校的商业与军队的商业加以改造，一九四一年下半年，这个改造就已开始。一九四二年春，边区初步地实行了精兵简政，遂决定将商业完全企业化；各系统一方面整理原有商店，组织公营商店联合会，统一对于公营商店的领导，严格地贯彻法令政策；另方面扩大商业范围，进行多样营业，例如盐店、骡马店、过载行、客栈、屠宰等。经营的方式亦有改变，或几个商店合并经营；或向私人商业及合作社投资，而自己不做生意；或向政府的盐业公司、光华商店入股。这样一来，商店林立、互相竞争的弊病既可免除，维持机关学校经费的作用亦可恢复。例如：中管与后勤两系统照此方针整理的结果，从原有商店三十八个，员工一百九十六人，至一九四二年十月只存商店二十五个，员工一百零五人。十个月中，两系统以八百万元资金，获得一千六百四十四万元的利钱，占了全部生产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八。又如边区政府各厅处的生产委员会，一九四二年农商两业的收入为六十万元，其中商业三十五万元，亦占百分之五十八。又如分区及县级机关原是以农业为主的，但至一九四二年商业亦占了重要部分。

一九四三年财政经济的领导实行一元化，对外贸易统一于物资局，各机关学校要彻底实行精简，因此，各机关学校的商业必须在物资局的调节之下，分工经营土产与盐的运输，并以一部分资金与

物资局合作，使公营商业更加合理化。

各机关学校的农业生产，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亦有进步。两年中，在粮食、蔬菜、牲畜、木炭及业余劳动等方面都有大的成绩。

在粮食生产方面，一九四一年，各机关学校有些还是完全自营，有些已改为和老百姓伙种，有些则经营了农场（其中亦有自营、伙种两种）。自营的方式也有所改变，不是全部工作人员上山种地了，而是以杂务人员为基础，配合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作人员组织生产队。例如后勤系统各机关的生产队，一九四一年共种了五千二百亩粮食，中央党校则种了八百亩。和老百姓伙种的，如中组伙种二百四十亩，二八分粮，公二私八，三七分草，公七私三。经营农场的，有边府秘书处的两个农场，是采伙种办法；又有由机关学校抽出杂务人员，配备耕牛耕具，在南泥洼自己建立农场的，计后勤二，中财、中组、青干各一。各分区及各县的机关，则采取了自种、伙种并用的办法。

一九四二年，精简实施，延安许多机关学校实行合并，因此，除菜蔬自给外，粮食只取农场与伙种两法。

伙种虽带剥削性质，但老百姓特别是移民难民十分愿意，因为公家供给了种子、耕牛、农具，租率又不算重。这种办法对于奖励移民，调剂劳动力，是有作用的。举党校为例：“党校总务处与四个移民合伙种一百垧地，老百姓四个劳动力都很强，党校出一人负领导检查之责。其办法是由党校供给农具，每人一锄一镢一镰，借牛两头，并给种子。另借食粮，每垧细粮四升，百垧四担，言明秋后归还。收获粮草，规定谷子二八分，公二私八；糜子三七分，公三私七；杂粮四六分，公四私六；草则全归党校。是年党校计收草一

万零五百斤；谷子八担三斗七升，糜子十担一斗七升，黑豆六斗九升，小麻子四斗二升，老麻子一斗，小豆二斗。共合边钞三万一千九百二十五元。四个老百姓则收谷子三十三担四斗八升，糜子二十二担四斗，黑豆七斗五升五，小麻子六斗三，老麻子一斗五，小豆三斗，共合四万六千八百零五元。这是公私兼顾的好办法。”

建立农场亦有新经验。因为机关学校抽出的人员劳动力不强，工作时间有限制，农业技术又不熟练，如专事种地，反而亏本。一九四二年采取下列两法：一是自营，除种粮外，兼营副业，如养牲畜、制木板等，正和三五九旅所采办法相同。一是伙种，将已有基础的农场和老百姓伙种，自己另辟新场。新场第一年无利得，第二年就有了基础，又可和人伙种。举边府秘书处为例。据边府秘书处同志称：“我们有东南两农场，地亩、经营法、收获量都大致相同。一九四二年南场种川地九十六垧，熟山地一百零八垧，新开荒一百三十六垧。共收粗粮二百四十四担，因是豆子玉米居多，折成细粮一百四十六担四斗，每担以一千三百元计，折钞十九万零三百二十元。又收干草一万四千斤，值一万四千元。又收菜二万斤，值二万元。三项共计二十二万四千三百二十元。原有羊一百二十八只，一九四二年新下羔羊长成八十一只，值一万元。喂猪卖了三千四百八十二元，还有十三个猪，每个以四百元计，值五千二百元。以上各项共计二十四万三千零二元。支出方面：我们是采取安伙子办法，所以一切开支，均从收获量分配，连我们派去的四个人的一切开支也包括在内。安伙子十二户，共四十五人，内全劳动力十九，半劳动力十三，无劳动力的小孩十三。共分去粗粮六十八担，折细粮四十担零八斗，每担一千三百元，共五万三千零四十元。又分去草七千斤，计七千元，二项共计六万零四十元。自己五个人（一个是残

废管总，两个做饭、种菜带种庄稼，两个揽羊、打杂），四个牛，一个驴，五个狗，共支食用粮三十担，折细粮十八担，计二万三千四百元。食用油五十斤，每斤二十六元，计一千三百元。此外，农具修理、犁、服装、津贴等计二万元。以上共计十万四千七百四十元。南场共收二十四万三千零二元，共支十万四千七百四十元，两抵余十三万八千二百六十二元。加上东场约十一万余元，两场共收约二十五万元。这两个农场，名义上是秘书处与民、财、教、建四厅合办的，实际上只拿出十个人，其中两个是雇工，一个是残废，七个是编余人员。政府有个生产委员会，管理两农场，实际也只有一人经常办事。本年因遇水灾、风灾，少收粮食约一百五十担，值十一万七千元。还有买来的萝卜、白菜种子受了骗，是假的，损失约三万元。二项共计十四万七千元，两场合计损失约二十万元。这就是说，如果不遭天灾，不买假菜种，还可多得二十万元。民、财、教、建、秘五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对于二十五万元收入，平均每人有六百二十五元。若以秘书处一百人来说，则平均每人有二千五百元。农场今年收成虽差，但打下了明年的基础，又解决了十二户移民的生活。同时依靠这个基础，明年准备在南场扩大耕地三百垧，借以安插编余人员。原两农场仍取安伙子办法。”

各县机关粮食生产的方法，也是自种伙种两种。例如延安县一级机关共种地二百一十垧，其中九十余垧招了两户安伙子的，有五个劳动力，县委只拿出二人在农场工作。其余百余垧地，则由犯人耕种。一九四二年除安伙子分出者外，共收粗粮七十五担，合细粮四十五担，值五万八千五百元，加上草值三千元，共计六万一千五百元。

以上各例证明，自营、伙种二法兼用是正确的，一九四三年的

粮食生产任务，应注意此项经验。

农业经营中，极大一项任务是种菜，因为食粮还有公粮可领，菜如不种，则二万余人将处于半饥饿状态；“无菜半年荒”，是确确实实的。

过去两年的菜蔬生产方式，是配备专门种菜人员，再配合机关学校中一部分辅助劳动。过去每年平均自给了三个月到半年的菜蔬。据后勤统计，他们各机关学校，在一九四一年共种菜地一千八百零一亩，计洋芋地一千零三十亩，白菜豆角萝卜杂菜地七百七十一亩，此七百七十一亩地到秋天又种秋白菜、秋萝卜，全年收获各种菜蔬八十七万九千斤，平均约供给全年菜蔬的三分之一。据中管统计，一九四二年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配备了种菜人员四十名，所种菜地，计有川地三百八十八亩，山地一千九百四十一亩，共收各种菜蔬七十四万五千斤，平均自给了五个月的菜。其中管理局本身自给了九个月，延大及自然科学院均自给了八个月，中央研究院及文抗均自给了七个月。各个机关人员的菜蔬生产，各有不同情况。如关中因气候关系种得很少，平均只能自给菜蔬三个月。警备区因土地缺乏，也只能自给二三个月。有些则因有地，且可和人伙种，如华池、志丹等县，则可做到自给半年以上。全边区机关学校的菜蔬自给，估计当在六百万元左右。

这里的问题是：机关学校在编制之外，另外配备生产人员种菜的办法究竟是否合算呢？根据中央直属各处的经验，证明是合算的。种菜最好是川地，各种青菜均可种，山地只能种洋芋豆角。川地一亩种菜，可供五个人全年食用，即每人只须年种菜地二分。山地却需一亩半，才能供一人一年之用。而一个专门种菜的人，只要施肥时有些辅助劳动，可种川地六亩。这就是说，一个专门种菜的

人，配合一部分辅助劳动，可供三十个人的全年菜蔬。以每人每天需菜十二两计，每年需三百斤，三十人需九千斤，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延安市价每斤三元，共值二万七千元，而一个专门种菜的人年支约六千元，可余二万一千元。加上必要的奖励费，至少可获二万元。因此今后各机关学校在彻底精简后，应注意调剂川地种菜，配备种菜人员，加上辅助劳动，保证自给蔬菜一半以上，乃至完全自给。

农业方面，除粮、菜外，饲养猪羊，解决肉食，也是很要紧的。

有些人以为喂猪浪费粮食，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不是喂猪浪费粮食，而是不喂猪浪费粮食。一则无猪必抛弃剩饭剩菜，而这项剩饭剩菜，在大的机关及连队里是相当多的。二则吃肉少则吃饭多，吃肉多则吃饭少。故喂猪增加肉食，不但为保持健康所必需，且在经济上亦是合算的。各机关学校过去创造了许多喂猪办法，例如中央党校指定杀猪房每天派专人到厨房来收集淘米水及菜屑喂猪；中央总务处指定专人收集碾米留下来的米屑，收集菜园收菜时抛弃下来的菜叶菜根以供猪食等。据后勤统计，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后勤各机关喂猪得肉五万六千八百十四斤，照当时市价值十七万零四百四十元，平均每人每月多吃了一斤猪肉。加上下半年，全年约值三十五万余元。据中管统计，中央直属各机关学校，一九四二年至十月止，平均每月养猪二百六十五头，十个月共赚二万三千三百三十余斤大称的猪肉，合边钞七十万元。又如延安县一级机关，一九四二年十个月喂猪，赚了一万元。全边区机关学校饲养牲畜一项生产，照此计算，总值当在四百万元以上。

喂猪之外，如有牧地，养羊也是有利的。

一九四三年彻底精简后，可酌采三五九旅每四十人配备一个伙夫及节减勤务员的办法，将编余伙夫勤务员配备到生产战线上去

可做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等许多事情。办大牧场从事大的畜牧事业，应于一九四三年提到重要地位。

粮、菜、畜三项之外，还有烧炭与业余劳动二项，也是值得注意的经验。例如一九四二年冬用木炭，在延安各机关学校中，完全是从本机关本学校抽出人员组织烧炭队上山烧炭来解决的，如用钱买，则所费又是一个很大数目。如中央总务处，九月间即抽勤务、伙夫、马夫四十二人，组成烧炭队，上山伐木烧炭三个月，共烧木炭一百四十五窑，完成了十四万斤木炭的任务，每斤以一元二角计，值十六万八千元。如以全边区机关学校三万人，冬春四个月，平均每日每人烧木炭一斤计，共需木炭三百六十万斤，值三百六十万元，如不自己烧炭，哪里去找这一大笔经费?

还有各大机关学校杂务人员的业余劳动，也很值得注意。例如中央总务处，今年动员杂务人员修理房屋、建造围墙、架桥、修路、割马草等，共替公家节省了十一万余元。中央党校杂务人员的业余劳动，替公家节省了十三万九千余元。三五九旅一切修造都不请工，各机关学校亦应尽可能照办。一切本机关本学校的人能做的，均应动员他们去做。单以杂务人员从事业余劳动一项来说，若全边区机关学校都实行起来，就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对一切生产有成绩的人都应给予奖励，对业余劳动者也是如此。

以上就是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四个年头边区各机关学校生产自给经验的总结。

据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称：中管后勤两方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两年中，从事农工商各业的资金由一百二十八万一千九百一十七元增至一千一百六十九万元（此数中包括由货币跌值的增加数很大，非尽由于生产增值）。一九四二年一年的生产盈余共计二千三百八十

一万元，此数除以二百三十三万元扩大一九四三年生产资金外，其余二千一百四十八万元完全用之于弥补各机关学校的伙食费、被服费与办公费。就企业分别说，农业占百分之十七，工业占百分之八，盐业占百分之七，商业占百分之六十八。就机关分别说，后勤直辖各业所得八百四十万元，中管直辖各业所得三百五十一万元，后勤与中管合并后所得八十万元，各机关学校自己生产所得一千一百一十万元。若将生产自给数与人民供给数相比，则前者占百分之五十七点五，后者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五。又据边区县级同志称：县级党政经费每月约一万元，自己生产自给约九千元，上级只发约一千元，前者占百分之九十，后者只占百分之十，则是更大的成绩。总之，所有延安及全边区各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不但供给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切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公营经济的基础，使我们能够依据这个基础继续发展生产，解决今后的问题。

特别重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这是不能拿数目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惟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

根据五年来特别是最近两年的经验，今后机关学校的生产必须加以改进，发扬其成绩，克服其弱点，向着健全的道路上发展，完成更大的生产自给任务。一九四三年应采取如下各项方针：

（一）实行以农业为主。

甲、按照各系统各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形，采取下列办法，经营农业：（1）无农场基础的，应马上动手置备耕牛、农具，或自耕

或与人民伙种，收取粮食与蔬菜。(2）有农场基础的，除继续农场生产外，应扩大经营范围，安置编余人员，多营副业，如养猪羊、喂鸡鸭、锯木板等。并同老百姓合伙，增辟新的农场。在这种种办法之下，务使一九四三年的粮食生产比之上年又多又好，不得以为农业迂缓采取忽视态度。

乙、一切大小机关学校均应配备必要的专门从事种菜的人员，辅以工作人员及学生的轻劳动，按不同地区，不同气候，自给蔬菜六个月以上，并极力争取完全自给，这是改善生活的重要步骤之一。

（二）调整与发展各种手工业。按地区，按系统，按精简原则，将各部分已有相同的手工业，改为合股经营。同时根据各地区各系统的需要，建立新的手工作坊，如榨油房、酱园、炭窑等。经营这些手工业的原则：第一必须工场本身能自给；第二必须能获利。

（三）发展畜牧业。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都应养猪，尽可能做到按三五九旅平均每五人养一个猪的办法，增加肉食，要把增加肉食、改善生活、增进健康看成是极重要的事。此外，各大机关学校，尤其是军队，应抽出资金，在三边、陇东、金盆湾等地，选择不妨碍人民利益的地点，经营牧场，大批地畜养牛羊驴马，准备于抗战胜利边区盐业衰落时以牲畜出口代替之。

（四）发展运输业。彻底精简后，只留少数牲口保障各机关学校自已所需粮草的运输，一切多余牲口，加上可能置备的牲口，一律组织运输队，从事运盐运货。此项运输业，以能按地区按系统统筹办理，借以减少浪费为最好。

（五）整理商业。在商业为辅的方针下，按照不违反贸易政策、不做投机生意的原则，按照各系统各单位精简后的情形，实行商店

的合股经营和分散经营，取缔违反政策的商业，关闭无利可图的商店。各系统应从商业资金中抽出必要部分转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与运输业诸方面，着实打下从农工畜运各业解决自给任务的基础，不得犹豫。

（六）应将改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及学生们的生活看作重要的事情，各机关学校负责人为此应想种种办法。应提倡与指导杂务人员、工作人员、有孩子的母亲，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身体条件下，在自愿原则下，进行某些手工及农作的生产劳动，但不得从事商业。此项生产劳作方式，依其自愿，或组织大的生产合作社进行之，或组织生产小组进行之，或个别地进行之；公家应酌予贷款作资金，其收获均归参加劳作的人所有。凡对此事办理最好、成绩最优的负责人，均应得到奖励。凡对本机关本学校经理不善，因而使本机关本学校的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学生、母亲、孩子、病员、休养员生活太苦的那些负责人，或虽改善了生活，而其方法不正当，妨碍了工作学习，破坏了政策法令的那些负责人，均应受到批评与责备。

（七）实行统一领导。切实执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所有中央一级，边区一级，专区一级，县署一级，均应建立关于统一一切生产事业的强有力的领导机关，按系统按级统一企业经营方针，统一调整各企业相互间的关系，统一检查各企业的经营方法，并在允许以相当收益归各生产单位所有的条件下，在各相当范围内，按照生产性质与经营情形，统一支配生产赢利，务必免除各自为政、盈亏不一、苦乐不均的弊病。

（八）一切农工畜运商业实行企业化，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各企业工作人员及雇员的伙食被服薪津由各企业自给，不得再由公家

担负。

（九）一切生产机关（工厂商店等），不论是政府的、军队的或机关学校的，均应实行群众化。除生产任务的分配，生产的管理与检查，生产结果的处理等以外，一切均受地方党政领导，连支部生活在内。一切生产机关的人员，要执行政策，守法纳税，脱掉军衣，穿上便服，参加地方群众活动，做边区的模范公民。

（十）由财经办事处及分区财经委，按各县系统下各机关学校的具体情况，给各系统下各机关学校以一九四三年的具体生产任务，审核与检查其生产计划，将所有各系统下各生产单位一切列在计划内责其完成的生产结果，列入财政收支，计划以外的多余生产则归各生产单位所有，作为改善生活之用。对于生产不足的单位上级应予补给。一九四二年有亏空的，应速审查，予以填补。

（十一）本书第八章《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中所指出的四个缺点，均适用于机关学校，一切犯有相同弊病的机关学校，必须注意纠正。

（十二）要向一切在农业、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商业以及业余劳动中的劳作人员（包括雇工及伙种的老百姓）说明：他们的劳动都是为着革命的，他们做了十分光荣的事业。从他们劳动所得中分出一部分来交给公家，完全是帮助我们自己的光荣的神圣的革命事业，并不是为着任何个人增值私产。凡在公营经济中做事的公务人员，如果他为他自己个人图谋特殊利得，在我们队伍中就叫做丧失道德的行为，在法律上就叫做犯了贪污罪。而一切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就算是有很高尚道德的人，应受到党与政府的称赞及奖励。在军队中，应将这点向战士说明。

（十三）一切做经济工作、财政工作、供给工作、总务工作的

人，只要他们是不贪污、不浪费、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均应受到尊敬。而一切对于他们的工作采取轻视或鄙视态度的人，应当受到批评与责备。

一〇　关于粮食工作

我们已将我们的经济工作论述完毕了。我们的经济分为民营公营两大部门，民营经济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事业与盐业，公营经济包括政府的、军队的、机关学校的三类，所有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了。没有讲到民营经济的商业方面，这是因为这一方面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材料根据，只好暂时不去讲它。现在要讲的是财政问题。我们也不准备讲有关财政的一切问题，只讲其中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粮食问题；（二）税收问题；（三）节约问题。

我们的财政供给是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来解决的。取之于己这一方面的财政工作，就是三部分公营经济在其生产过程完毕之后转到分配过程时的分配工作即供给工作。我们的公营经济既是我们的财政供给的第一个基础，它在我们整个财政供给方面，依一九四二年的情形看来占着五分之三的地位，那么，我们的第一个财政工作就是对于公营经济生产结果适当地进行分配的工作，这个问题，我们已在论述公营经济时附带地说过许多了，其未详部分，现在也无暇多说，留待将来再研究。现在要讲的是我们财政供给上的第二个基础——取之于民这一方面，这就是粮食与税收。还有一个节约问题，则是关系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方面的，是关于整个已经取得的生活资料与事业经费如何适当分配与适当使用的

问题，故是一个重要的财政问题。这里讲的粮食问题也不是指全部粮食问题，仅是指的粮食税。它也是税收的一种，因其关系整个军需与公需，关系全边区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之间的相互态度，故值得从税收问题中特别提出来，并且首先来讲它。

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地主与商人不到百分之十的数目。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约有一半以上是分过土地的，一半则未分过。我们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其目的究竟何在呢？第一个目的是使农民富裕起来，改善他们的生活；第二个目的，是使农民有力交付粮食税，帮助抗战的需要；还有第三个目的，是使农民在取得减租利益之后，发展农业生产，能够以一部分交给地主作地租，因而便于团结地主和我们一同抗战。要达到这三个目的，只是做一件事，就是用尽力量使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愈发展，农民每年收获农产品及其副产品的数量愈增多，则其交给政府的粮食税的数量在其收获总量上说来就可愈减少。我们提议从一九四三年起，每年征收公粮十八万担。以后若干年内即固定在这个数目上，不仅在目前全边区粮食总产量约一百五十万担时是收这个数目，就是由于生产发展，总产量增至更大的数目时（据许多同志估计，就现有劳动力加以调剂，能使边区粮食总产量达到二百万担），我们也只收这个数目，这个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穿暖吃饱。

我们全边区的同志必须学习延安县同志们那样用尽全力替农民谋利益，使农民很快地富足起来。农民愈富足，则其交纳一个固定数目的公粮也就愈觉得不在意下，愈觉得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

府是和他们完全一致，分离不开的，延安县的农民吴满有就是明显的证据。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载了一篇关于延安县农民吴满有的新闻，这篇新闻是这样讲的：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

（本报特讯）在春耕运动中，农村劳动英雄不断出现，他们为着热爱边区、巩固边区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表现着高度的劳动精神。其中尤以延安县柳林区吴满有，最为一般农民所钦佩。他每年的收获量，要超过其他农民六分之一。全家两个劳动力，种地四十余垧，今年开荒三十五亩，现已为该乡农民公认为模范的劳动英雄。据昨晚最后获悉，边区政府建设厅已决定予以嘉奖。

（本报延安通讯）延安县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农民吴满有，连年春耕积极，庄稼得法，人家平常每垧地打粮平均五斗，他种的地每垧却打粮六斗。今年在政府努力春耕的号召下，他说：“我受过革命的好处，我忘不了革命，我真心爱着边区，同时为了自己更过好日子。”因此就加倍努力开荒，并且影响了群众，造成该村热烈的春耕运动。延安县的农民谁都知道，今年种得最好的，就是吴满有的一乡。吴满有今年原计划开荒三十五亩，在没有下雨之前，已经开完十五亩地，雨后更是积极。他说：“十天之后，就可垦完，如时间来得及，还可超过。”另外百来亩熟地，有的已经下了种，有的已经翻了地。吴家枣园所有居民以及该村村长，该乡乡长，该区区长，都一致称誉他是“模范春耕英雄”。现该区区政府已呈请上级奖励，边区政府闻亦拟即切实调查，予以适当的嘉奖，以资鼓励。

（本报延安县讯）春耕运动期间，劳动英雄出现了很多；但究竟谁做庄稼最好，记者为明白这个问题，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亲至各地农村访问，现在已找到众所公认的标准劳动英雄。这位劳动英雄姓吴，名唤满有，今年四十九岁，生就一个大个子，精强力壮。土地革命前是一佃农，那时吃树叶，吞糠麸，砍柴“受苦”（给人家做工），把赚来的钱，向当地的豪官富绅缴付捐租，自己却常常饿肚皮。土地革命后，就参加革命，分得山地一架，约四十余垧，合一百二十余亩。从此自由种地，连年积极垦荒播种，畜牛哺羊，现在全架山地，都已经变成了熟地；并且还有两条犍牛，三条母牛，一百多只羊。光景越过越好，娶媳嫁女，衣暖食饱。去年已由政府鉴定，家庭成分已从贫农上升到中农了。他常常说：“想想当初，再想想现在，我怎能忘记革命的好处，忘记边区的好处呢?”

（本报延安县讯）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他和一般农民一样种庄稼，为什么收粮比人家要多呢？据他庄子上的农民说：第一，起身比谁都早，睡眠比谁都迟；天还没有亮，他就喂牛上山；天已黑了，才从地里回来，真能受苦。第二，冬天没有啥事做的时候，勤于拾粪，自己又会养羊养牛，肥料比人家多，他每垧地平均要上七驮粪。第三，庄稼出了苗的时候，有的农人怕上山，不锄草，或者最多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谷子自然就长得旺。第四，地耕得深。别个农户一般地都是掘土五寸深，他却至少七寸深。第五，打土的时候，一定打得很碎，不马糊。第六，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因为他有这些优点，所以每垧地最高收获量老斗一石二斗（市斗等于一石八斗），最低收获量也有老斗四斗（等于六市斗），平均扯每垧地要打粮老斗六斗（等于九市斗），别个农民每垧地平均只收粮老斗五斗（等于市斗七斗半）。从平均的收获量看来，

他就是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

（本报延安县讯）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不仅是种庄稼的模范，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去年他收小麦十八市担，粗粮二十七市担（合细粮十六担二斗），却缴了公粮十四担三斗，公草一千斤，公债二次一百五十元，公盐代金六百六十五元。庄上的人对他说：“老吴哥，你出的太重了，减掉些吧！”他却说：“革命时期，八路军保卫咱们的边区，人家在前方流血，我们不过只多流些汗，亏你还好说重？”于是大家就佩服他的见识，踊跃向公家送粮了。今年从上面移了些难民在他庄子上住，他借粮借镢头给他们，帮助他们找得荒地，并且经常在物质上精神上鼓励他们开荒种地。平常在庄子上也是最公正的人士，在老百姓中间的威信很大，大家都相信他。去年五月被选做乡参议员，又被选做乡上的优抗主任。他有一个兄弟在八路军里做战士，他原来也是抗属，但他谢辞了公家的优待。他说：“打仗是中国人的责任，没啥稀罕。我有的吃，还要什么优待？”但他对于优待乡上的其他抗属，却做得非常周到。同时，他分配的动员任务又很公平。全乡有抗属十二家，今年代耕土地就分配了二百二十亩，家家都感激他。全乡的人没有一个不说他好。

（本报延安县讯）吴家枣园，一共有十四户农家，十四户家长，讲到吴满有是不是称得起一位模范的劳动英雄的时候，大家一致都跷起了大拇指：“老吴哥，还有啥话说的，受苦第一，他不当英雄谁配当英雄？”

六月二日《解放日报》又有一条新闻：

由于劳动英雄吴满有所起的影响，吴家枣园原计划开荒四十九垧，现在已完成七十五垧，吴满有本人又增开了荒地五垧。全乡（柳林区第二乡）在奖励吴满有之后，增开荒地一百八十垧。

十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又有这样的新闻：

> 今年糜子最算丰稔，吴满有村子上一般每垧约打五斗至六斗，但是他却打到八斗（均四十五斤大斗）。一般农民每担粗粮碾成三斗或四斗，他的粗粮却始终保持对折细粮的记录。吴满有也时常学着宣传的口吻对人说："你们要想庄稼和我的一样好，大家就向我学吧——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

吴满有已是一个富裕农民了，他因为得了过去苏维埃政府与现在边区政府的利益，他已把他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还有许多同志的头脑没有变成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的头脑，他们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即是只知向人民要这样那样的东西，粮呀，草呀，税呀，这样那样的动员工作呀；而不知道做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即是用尽力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文化。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我们同志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算是做了他们应做的革命工作，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

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每个在农村工作的共产党员的第一位工作。只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他们才会说我们要东西是应该的，是正当的，他们才会懂得他们如不送出粮草等等东西给政府，则他们的生活就不会好，就不会更好。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这就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每个同志（军队的同志也在内）都要好好去研究。只在我们的同志懂得并且实行了这样两方面工作的配合时，我们方能算得上称为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否则我们虽也在做革命工作，虽也是一个革命家，却还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家。而且，对于某些同志说来，他们还是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因为他们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却不知道或不愿意给群众一点东西，引起群众讨厌他们。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十分注意，并向全党宣传这个道理。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我们过去粮食工作的经验，并指出一九四三年的方针。

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边区所征公粮只负一部分的供给任务。每年不足之数，都靠政府拨款采购。四年当中，除了个别地区，或在某一个时间内，粮食上曾有过困难外，整个粮食供给，还没有感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四年中，确实休养了民力。那时公粮偏重于富农地主的负担，中农很轻，一般贫农则完全无负担。一九四○年外援断绝，政府已无力购粮，必须转为全部征税。但因当时“量入为出”的原则未变，一九四○年公粮任务还只提高到九万担，征收政策亦未变，对于下年（一九四一年）的供给则提出了

“加强粮食管理，保证粮食自足”政策。因一九四〇年征粮不多，全部供给实不可能。再加上一九四一年经费自给的关系，各部队机关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都向粮食上打主意。另一方面，又因粮食工作部门的组织机构还不健全，干部质量差，各种制度未很好建立，亦不可能掌握各地粮食收支。当时浮报冒领现象非常严重，人员增减无常，各种临时额外开支过大。一九四〇年征的公粮，供给到一九四一年三月，部分地区已无粮吃。不久，各地粮食普遍发生恐慌，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支持到十一月。如要保证一九四二年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借粮，估计非有二十万担不能渡过难关。此时粮食问题已成为财政上的最严重问题。经过党与政府的再三研究，根据当时已转变的“量出为入为主，量入为出为辅”的新的收支原则，决定征粮二十万担，征草二千六百万斤，以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并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此时在征收政策上，为了保证完成二十万担公粮的任务，并照顾各阶层的利益，扩大了征收面，中农负担提高，贫农亦开始有了负担，纠正了过去偏重少数富有者的现象。供给政策，则因过去各县仓库粮账从未清算，一九四一年买粮借粮手续极为混乱，增加了清算粮账的困难，粮食局深恐因旧粮不清影响新粮，乃确定以“掌握新粮，保证供给”为一九四二年的工作方针。根据一年来的事实证明，虽然我们在执行中还有些不够，但政策本身是完全正确的。一九四二年的公粮减为十六万担，公草减为一千六百万斤；征收政策上亦稍减轻了贫农的负担；并准备于一九四三年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代替公粮方式。同时，为了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一九四二年并借给农民一部分公粮公草，帮助他们解决春耕困难。供给上主要是掌握粮草保证供给。

在征收工作方面：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每年只征公粮一

万担，群众负担极轻，均愿踊跃缴纳。一九三九年，公粮任务提高到五万担，政府颁布了新的征粮条例，派工作团下乡进行调查，按条例征收。但在实际上，五万担公粮，群众负担仍是极轻，干部又习惯于民主摊派一法，调查工作极其马糊，所谓按条例征收，仍是一种形式。一九四〇年，仍复如此。一九四一年公粮任务突然提高到二十万担，政府才又慎重修改了条例，财厅派了大批工作团去各县，配合县区政府，进行比较深入的调查，使群众负担合理。此次征粮，强调了“深入调查”与“执行条例”。在一九四一年征粮总结中，完全得到证明。调查工作做得好，执行条例便容易。例如甘泉县对调查工作认真，他们便执行了条例和征收率。曲子县进行了三次调查工作，他们便能使负担公平合理。又如华池县白马区二次分配没有完成任务，后来征粮工作团团长王同志，亲身调查了一个乡作经验，结果全区超过几十担。调查工作不好的，如警备区，便不能按条例执行。一般地说来，各县干部对于调查工作仍很轻视。一九四一年征粮做到深入调查的只少数县份，大部分仍是采取民主摊派的老方式。一九四二年征粮又接受了一九四一年经验，将条例重新加以修改，使它更能切合实际，并以一九四一年的调查材料作根据，进行更深入的调查。财厅指示征粮干部必须按条例执行，如果有些地方按条例执行确实不能完成任务时，再配合使用民主摊派方法。同时，在此次征粮中，从思想上教育干部，克服了过去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和干部本身要私情、打埋伏等落后行为。根据最近陇东报告，又一次证明深入调查对于执行条例的重要性。庆阳县有一个区经过深入调查，因本年开荒很多，农产增加，按条例执行可超过几百担。

其次，历年征粮，在征收数字上都完成了任务，而且都是超

过。可是入仓工作做得太马糊。许多征粮干部以为只要数目字完成，不问质量，不查尾欠。因此一则质量太差，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谷皮者；二则造成群众拖欠公粮的现象，征收数和入仓数之间有了一个距离。一九四一年征粮，质量虽有所提高，但夹带谷皮之米仍属不少。又提出了“粒米入仓，根草入窑”的口号来克服拖欠现象，但仍是做得不够；再加上一九四一年公粮比过去任何一年为多，增加了入仓阶段的困难；因此一九四一年公粮没有入仓的还有三千九百余担，将近于全部征收数的百分之二。一九四二年征粮时，特别强调了抓紧入仓的问题。根据最近检查，本年入仓工作比上年做得好些，但能否全部入仓，还须等将来总结后才能回答。

再其次，历年征粮，都由财厅派工作团去帮助县区政府工作。这种办法，在县区干部太弱的条件之下，是有很大作用的。缺点是容易养成下级政府的倚赖性。而且每次动员工作，都须上面派人，干部往返，在路途奔跑，亦造成了人力与时间的浪费。一九四二年征粮，因为有一九四一年比较好的工作基础，在派遣工作团方面，财厅采取了少而精的原则，各县少派干部，加重了县区政府的责任。一九四一年派下去一百五十人，调查工作有点基础。一九四二年所派还不到四分之一。准备由此过渡到不再派人，完全交给县区政府去征收。

在供给工作方面：一九四一年的粮食供给，由于没有掌握总的收支，以致两次借粮，一次买粮，动员频繁，近于苛扰，引起群众不满，这是一大缺点。一九四二年已能掌握收支，并有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万担公粮作保证，本可供给到十二月。但由于精简不彻底，预决算不能严格执行，各种临时支出连同未收齐的公粮尾欠，共达一万八千余担；再加上部队移动，影响到各地供需关系；一九四二

年上半年粮食调剂，又未能完成任务；因此，七月以后，延安、南泥洼、临镇各地，即已陆续缺粮。后来，一面由财厅拨款二百万元补助购买，一面采取夏征的办法来补救，才避免了一九四二年的粮荒，对群众尚无不良影响。其次，一九四一年公粮采取整拨分管的办法，虽然节省了往返运输的麻烦与浪费，但另方面造成了乱卖粮食的现象，这里面浪费很大。还有征收与供给的脱节，亦发生了许多缺点。例如一九四一年分配给各县的公粮公草，偏重了收成情况，忽视了供需情况。三边全年需粮一万多担，一九四一年只征粮一千六百担，有九千担粮要从陇东、安塞、子长、志丹等县转运补充。一年来不但运粮各县群众反映过重，即三边群众亦因转运繁忙，喊出“这样办法还不如向我们多征些好”。现在计算，只陇东运三边的四千担粮，即需脚费七百万元，比在三边买粮花钱还要多。又如延川征的粮，本应供给延安；可是一九四一年延川东阳区的粮，集中到相反方面的靠近黄河的马家畔仓库，使延安运粮要多走三天路。其他各县类似情形，亦不在少。又如一九四一年征收公草，没有周密的研究计划，决定公草普遍随粮征收，没有注意到供需，因而使得地方存草没有用处，任其损耗霉烂，引起群众不满。另方面，需草多的地方，却又异常缺草，只供给到八个月。又如一九四一年关中征粮，不以麦子为本位，硬要小米，群众只好到边区外面粜麦买米交公粮，结果收米太多，部队吃不惯，常起纠纷；入夏以后，小米又易霉烂，更加麻烦。又如一九四一年的正杂折合率，也因不估计各地产粮情形与供需关系，把它一般化，使得有些地方（如警备区）征收杂粮很多，发不出去。有些地方（如延安）需要马料，却又找不到杂粮，各机关不得不降低折合率，用细粮去换，倒转过来造成了粮食的浪费。以上这些缺点，说明了粮食工作

是很具体很细密的实际工作。如离开实际粗枝大叶地去做，不但扰民，而且误公。一九四二年征粮工作交给粮食局主办后，已将征收与供给统一起来。同时根据各地不同的供需情况，酌收公草代金，以资调剂。至于折合率，亦由过去的一般化，转变为根据各地具体情况来决定，克服了以往的缺点。

其次，从一九四一年冬天到现在，粮食供给，在建立与健全制度方面，曾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例如在预决算制度上，一九四二年，大部分机关已能按时编造，废除了大部分浮报多领与吃双份粮的陋习，纠正了各县随便批准预算、乱支公粮的现象。特别是把握“决算不超过预算”，一九四二年一年认真核减了各种不合理的开支，共节省粮食一万九千余担。在支粮制度上，一九四二年，绝大多数部队机关已经遵守没有支粮证不能支粮的制度。各县负责同志也已注意这一制度，不乱批借公粮。同时，一九四二年各县已能做到统一地使用公斗，这也减少了许多纠纷。在仓库制度和会计制度上：由于干部条件的限制，仓库制度只能先从加强中心仓库做起，由此逐渐普及到各个仓库。会计制度，则由财厅制定了两种标准账簿（一新式较精细，一中式很简单），由干部根据自己能力采用。一九四二年大部分仓库，好歹都有了账簿，已能逐渐达到仓库粮食收支、存粮数目和种类随时得出统计的目的。在粮票制度上：因为一九四一年发行大批粮票，发生很多流弊，一九四二年废止旧粮票，重新发行三种小型饭票，只供机关人员往来吃饭流通，也是一个进步。

但在粮食供给方面，仍有许多缺点。例如：少数大单位还不能按规定时间编造预决算；各大单位实有人数和所编预算作比，还有不少空额；部分吃双份粮的现象，仍然存在；牲口比额没有明确规

定，其中浪费亦颇大；个别部队因为粮食浪费超支，向仓库强迫借粮的事情，仍不能尽免。又如：仓库制度，大部分还只做到了粮食收支和管理工作，关于督收、保管、报销等责任，还做得很差。又如：小型饭票不能在民间流通，使出差人员吃饭困难，这也是一个缺点。最后，在建立与健全制度中，还有一个大的缺点，便是粮食局只强调了本身制度和困难，还不能更全面地具体地照顾各机关困难问题的解决。

再其次，一九四二年粮食机关在清算仓库旧粮账上，亦获得很大成绩。数年以来，各县粮账向没有清查结算过，使粮局的账据失去效用。如一九四一年冬天按粮局账上算，安塞应存粮二千九百余担，实际则所存不到一百担。再如疗养院向仓库领粮，五年没算账，一九四二年才查出它多领了一百多担粮。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加上一九四一年买粮借粮的混淆，许多县份无账可查。因此粮局分别派遣干部下去算账，并采取各种各样的算账办法，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才将仓库旧账算清。目前粮局已能具体了解仓库存粮，掌握粮食收支。同时过去各县对粮食管理，亦做得很差，鼠咬、虫伤、腐烂等等损耗，不一而足。而且干部犯贪污的现象，亦十分严重。一九四一年征粮中，发现此类案件将近十件之多。甚至于个别特务分子亦混入仓库工作。如鄜县太乐区仓库主任张秉权，便是特务分子，一九四二年二月间，贪污公粮十几担，逃出边区。这件事说明了粮局过去对于仓库干部考查不严和检查工作的太少。一九四二年，由于清算仓库粮账，并加强县五科对仓库的领导，贪污损耗已减少，并发现了其中亦有不少积极苦干的干部。

在执行征收政策方面：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两年的征粮条例，规定起征点为一担二斗（即农户全家每人收获量在一担二斗以

下者免征公粮），累进最高额为百分之三十六（即累进至征收收获量百分之三十六为止，以上不再增高税率）。其缺点是公粮负担偏重在少数富有者身上。同时，在征收方法上，又是采取民主摊派办法，并未按照条例执行，因而发生“抓大户”“瞅目标”等现象，也是征收政策有些过“左”的影响。一九四一年修改了征粮条例，规定起征点为五斗（例如某家五口全年正粮收获量在二担五斗以下者免征），累进最高额为百分之三十。执行结果，在扩大征收方面，除环县因灾荒影响外，其他各县负担人员数，均超过百分之八十以上，延安县更扩大到百分之九十五。在照顾各阶级各阶层利益方面，除延安、延长、安塞外，其他各县负担额均未超过收获量百分之三十。但缺点仍是有的。例如各县公粮总数字的分配，没有做到完全合理。警备区降低起征点为三斗，同时缩短了累进率的中间距离，使得贫农中农吃亏，富裕中农以上太占便宜。又如一九四一年征粮中，我们只注意征粮，不注意与减租减息配合进行；新来移民不应当负担公粮的，有些负担了公粮；抗属应当受优待的，有些被取消了优待；以及棉花不应征粮也算在征收之内等等；这些都是违犯政府政策的。其他如照顾各阶层利益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等政策，也只是做到了一般的号召，具体执行还很不够。有了一九四一年的经验，一九四二年征粮就有了进步。但在植棉政策上，仍注意不够。例如对东三县产棉区域的公粮，也和其他各县一样分配，到了征收阶段，下面发生问题，不征棉田公粮任务不能完成，要征又与政府法令抵触，最后只得依变通办法减半征收，这仍是于政府威信有碍的。

任何工作，于政策之外，就决定于干部的好坏，粮食工作也是如此。粮食工作中最艰苦的是仓库干部，最易犯贪污的亦是仓库干部。因此，在这里特提出几个比较典型的好的与坏的仓库干部来讲

一讲，使每个同志都跟好的去学习，并拿坏的警惕自己。

好的例子：

甲、蟠龙仓库主任何纯高同志，是五十二岁的老汉，不多说话，很细心沉着，积极苦干。从一九三九年就分配在粮食局真武洞仓库工作。一九四〇年调任蟠龙仓库主任，兼负调剂站、运输站的责任，三个人的工作由他一人兼负。他过去当过区委书记，在边区党校受过训练。当初由边校一齐派来做粮食工作的还有贾志才、任生彪等七人，坚持到今天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文化程度在仓库主任里面不算低，能写简单的信，记账也清楚，学习会计上新采用的簿册很认真，学得快。一九四一年给仓库分发“每月报告表”，有些仓库主任费了三天时间还说不清楚，他听过一次之后就能提问题，提意见：“这一格填什么？那一格这样填行不行？”以后他就可以按期填寄“每月报告表”。他在工作上表现出的优点：沉着细心——收公粮时能从容写收据，每晚上结账。支粮时，算盘总打两遍。刻苦负责——对仓库很关心。有一个窑稍为湿些，他就特别注意，经常翻晒，支粮先支这一窑。后来他在窑后掘一道渠，把窑外地面挖得比窑里低，仓库就干了一些。仓库小修工程，或者雇不下工人，他自己动手去背砖、抹泥（在他影响下过斗员也努力帮忙）。兼管运输站，每次运输队来到时，要帮忙铡草、挑水、烧饭。待人和气——支粮时，有些领导机关人员闹脾气，他能忍让委屈地把事办好，从不与人起冲突。送粮时，群众送坏粮，他只劝回去。做调剂工作买粮，也会商量，与群众亲近，却又有主见。有一次下雨，集上粮卖不出去，他就乘机收买，价格较低，群众还高兴。因此何站长在蟠龙街上群众中间，是有威信的。一九四一年收公粮，延川永坪区一个农民向他纳贿，他当时反脸，人赃一起送区政府。生活朴素——

对个人生活很少提出意见，领保健费他都表现心里不安。一九四二年他负责收公粮四千担，大家都关心他年纪大，人少，忙不过来。但他每次给粮局来信，总说他是有办法的。

乙、绥德田庄仓库主任白合明同志，高小毕业，在旧日联保处办过事。他的优点：刻苦负责——收粮时，每晚一定把收据和飞条对照，检查有无错误。他也一定将欠粮户列出清单，督促区乡送粮。收粮之前，为了防湿，他亲自动手在仓窑里铺石板，垫干草，草上再铺席。公粮入了仓，不急开支的仓窑，他都自己动手用砖垒住，用泥抹涂，通风洞上找破席子挡住。待人和气——收粮时对粮食质量认真检查。但对送了坏粮的，他只是劝说："大家看，这样的粮送给军队，心里过得去吗?"从来没有大声嚷过。军队不按手续领粮的，他总是和蔼耐心地向来人解释，一面借给一些粮食，不使缺粮；一面叫他们补办手续。日子久了，绥德的驻军如果到老白仓库支粮，一定要办手续，不然老白作难，他们不好意思。生活刻苦——自己拾柴、挑水。经费伙食，开支不马糊。超支数目，都报五科，不随便拉公粮卖钱补助。现在白合明同志已被升为绥德县政府第五科科长。

坏的例子：

甲、新宁四区仓库主任胡典长。一九四一年冬收粮期间，私卖公粮三担，驮回家一担三斗，又私下借给亲友麦子三担九斗二升。本人与亲友胡典功、胡清荣、刘子孝等三家应出公粮七担，颗粒未交，就扯给公粮收据。收粮时不许群众扫收地下的粮食，却由他扫集，和帮助收粮的人员分用。公粮寄存民家，支完实短粮二斗，却向五科谎报为一担。经五科查出，送裁判所究办，判处徒刑，并追回贪污的粮食。

乙、华池水泛区仓库，一九三九年九月，卖粮之后，公粮短欠十四担七斗。仓库主任王文斌，向上级呈报是老鼠吃了十二担七斗，霉坏了二担。一九四一年征粮工作团去调查，发觉在卖粮期间，王文斌曾到县上开会，由区书毛羽鹏代替将粮卖完。就在卖粮期内，毛羽鹏生活格外阔绰，买了一群羊，两件皮袄，又买布，有很大贪污嫌疑。但县政府当时没有查究。后来毛羽鹏调到别处工作，这件事也就拖下去了。

上面，我们已总结了过去五年粮食工作的经验。下面，我们再来指出一九四三年的工作方针。

（一）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我们过去采用征收救国公粮这一形式，是一种不完善的税收办法，做得好，只能达到人民负担公平合理的目的，对于农民生产情绪，不能予以有力的刺激。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准备实行统一的农业累进税政策。这一准备工作如何进行呢？（1）在财政厅领导下，设立专门研究组，抽调有政权工作经验，了解土地财政问题的好的干部五人至七人，组织研究组，专门搜集、研究、整理有关累进税的材料，并计划推进工作。另由边区政府指定有关机关负责同志，以财政厅长为首，组织筹备委员会，负责掌握政策，解决较大问题，并经常领导研究组的工作。（2）进行调查工作。一九四二年征粮工作的详细总结，应以供给累进税研究组以具体材料为目的。研究组应当首先研究几个情况不同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征粮工作较好的县份，拟定初步的调查计划，先行试验调查。然后修正计划，制定表式，实行普遍调查。根据调查材料，制定条例办法。成绩好完成早的县份，一九四三年就可先行试办。（3）实行土地登记，和调查工作配合进行。（4）加强乡政府组织，健全文书，深入调查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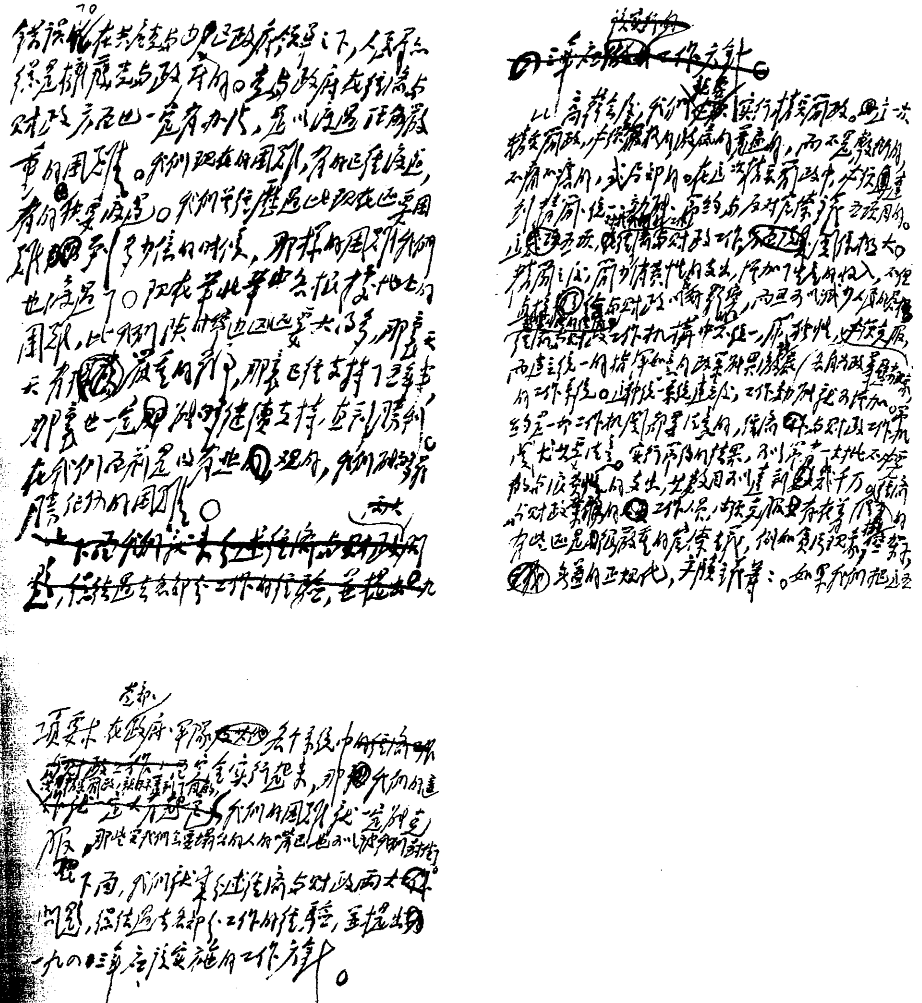
（二）掌握粮草，保障供给。粮草供给是一件复杂细密的工作。粮草分散，掌握不易。如果不能随时注意，适当地调整供需关系，工作就难做好。要能掌握粮草，保障供给，必须做到下列各点：（1）在掌握粮草上，须先保证十六万担公粮全部入仓，并提高质量到百分之百的米，不许掺糠，同时号召各县消灭尾欠。在管理粮草上，必须健全各种制度，注意仓库的管理和检查，建立中心仓库，逐渐改善设备，防止粮食霉烂损耗及贪污盗窃等现象发生。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彻底废除浮报冒领及吃双份粮的现象。按照各地干部的文化程度，建立粮食会计，不讲形式，但求粮草收支存余，计算分明。其次，支粮制度更加重要，务必坚持执行。但建立制度为的是保障供给，防止贪污浪费；一切不遵守纪律的现象固然应当严格纠正，但不顾及具体事实，只强调制度，那种机械的观点亦须防止。（2）保证供给，必先解决粮草供需关系。粮草缺乏地区，应以运输、调剂各种办法，筹备补给。一九四三年我们应当组织机关空闲牲口驮运粮草，提高每个运输队的工作效能（我们的牲口现比老百姓的牲口平均每头少驮一斗，老百姓两天走的路我们要走三天），规定一定的运粮任务，以节省人力畜力，使之用到生产上去。必须依靠人民运输的粮食，应早计划，利用农暇或空脚牲口运输。非特殊情形，不准在农忙时间运员运输。长距离的运输，也应当尽量避免。粮食可能调剂的地区，由粮食局统筹计划，适当地利用时间，把粮食卖出或买回，补助供给，以节省运输，避免损耗。机关学校过于集中的地区，如延安等地，应当斟酌情形，实行人马疏散，以便调剂粮草。

（三）精兵简政，储粮备荒。边区公粮连年透支，毫无准备，倘遇灾荒，军民食粮必成为极严重问题，大家皆应以此警惕。为此应

当：（1）坚决执行党和政府新的整编计划，贯彻精兵简政。以精简节约的精神，保障一九四三年的粮食收支做到平衡。（2）一九四三年应征公粮十八万担，以便我们有可能节余一部分作为准备粮，以备不虞之需。（3）一九四三年军队与机关学校应以发展农业为第一位，其中种粮应占一个相当数目，使一九四四年余粮更多，有备无患。各部队机关学校决不可因一九四三年准备征粮十八万担，松懈自己的粮食生产。

（四）厉行节约，严禁浪费粮食。我们机关部队在粮食方面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因之号召实行节约运动，应为我们一九四三年的中心工作之一。近来延安有些机关学校检查浪费，实行节约，已经获得很大成绩。例如：留守兵团供给部工训班的管理员，勤俭负责，发米发面，亲自过秤，因而他们的伙食相当好，经常能吃馍吃面；中央党校大灶，近来伙食管理严格，伙夫下米，有人监督，保存剩饭，下顿和起来吃。这样实行以后，他们每天每人只吃小米一斤，不到一月，节余小米五担之多。又如保育院实行集体吃饭。过去保育院在分散吃饭的时候，全院每顿吃面一百五十斤。实行集体吃饭后，每顿只吃面一百斤，省了三分之一。同志们看，这是一个何等惊人的数目！又如中央各部委实行集体饭堂制，亦已收得很好的成绩。又如中央党校上半年全校统计养鸡二千只，每天需要小米三百碗，浪费很大。后来大家发起杀鸡，结果只剩六十只，节省粮食不少。此外，养成使用饭票的习惯，也非常必要，可以少领大批粮食。总之，我们要一方面征粮产粮，一方面力求节省，来保证粮食的完全无虞。这是领导同志的工作，又是一个群众运动，务望大家注意，完成党所给的任务。

本书原计划的税收、节约两章，因高干会闭会，没有时间写了，只好暂付阙如。——著者



毛泽东撰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手稿（部分）。

和张稼夫的谈话[1]

（1942年12月）

你要回晋绥去了，晋绥的情况有变化，全国的情况也有变化。我们的解放区，也就是敌后根据地，开始的时候是很小的，后来发展得很大，现在又缩小了。全国各地的根据地都是这种形势，晋绥根据地更严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和阎锡山暗暗地勾结起来，搞了许多名堂，什么百分之四十九和百分之五十一的诱降计划，对地主阶级颇起作用。现在敌人把你们的地盘挤得很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会把敌人挤出去呢？敌人的社会基础无非是地主阶级，你们应该针锋相对，发动农民群众，武装农民群众。

对于地主阶级，如果他是抗日的，那就做他的工作，对他的生命财产加以保护，还可以请他们代表人物当参议员；对于那些反动地主，死心塌地跟日本人跑的，就坚决地把他当汉奸除掉，为民除害。

要提纲挈领，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边去办，发动群众解决具体问题；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

---

[1] 晋绥分局成立以后，中央调张稼夫去晋绥分局工作。临行前毛泽东和张稼夫有一次长谈，从8点一直谈到12点。这是毛泽东和张稼夫谈话的一部分。

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的谈话[1]

（1942年12月）

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

（当毛泽东听他们说陕甘宁边区一家老百姓给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时）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时谈话的一部分。

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1]

（1942年）

自己动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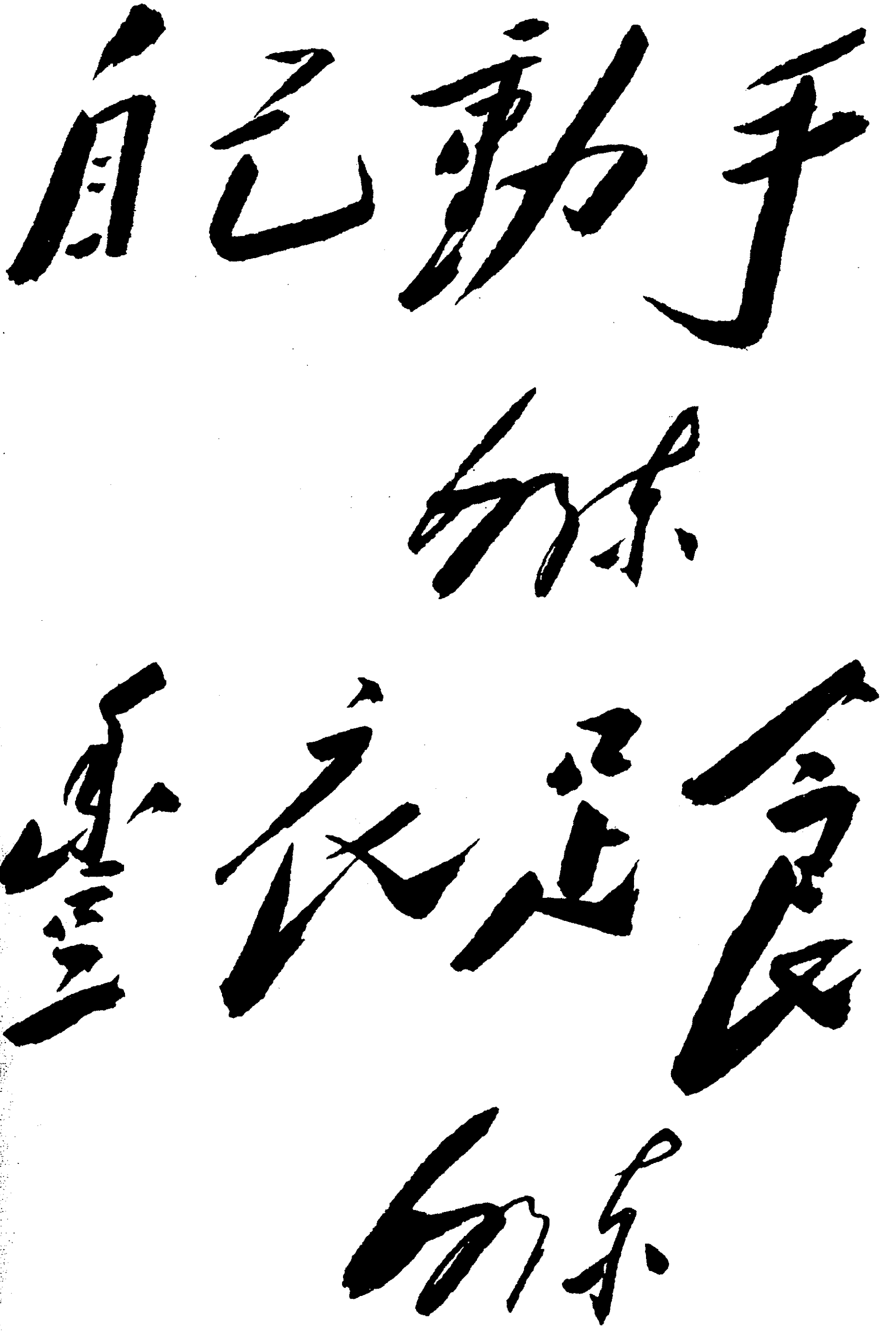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丰衣足食。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成立于1942年9月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拍摄反映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情况的影片所写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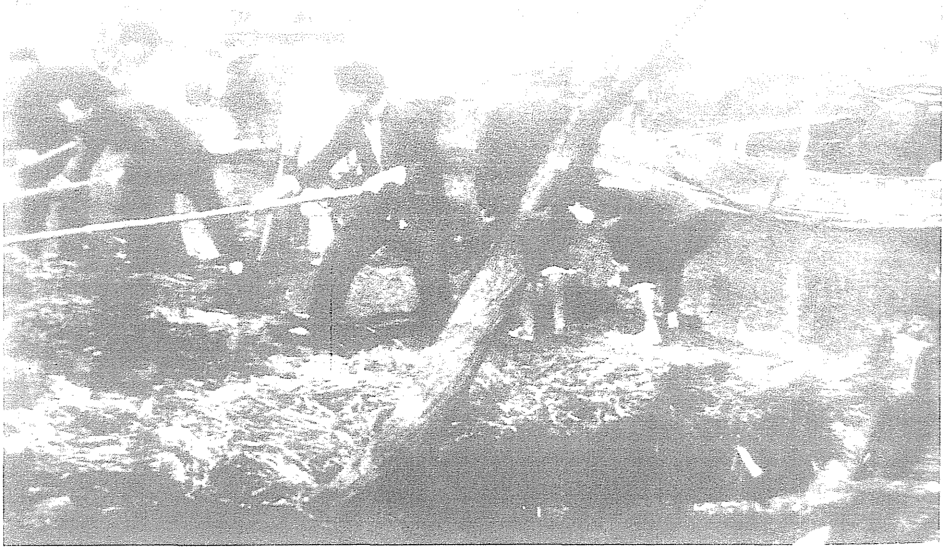
自己动手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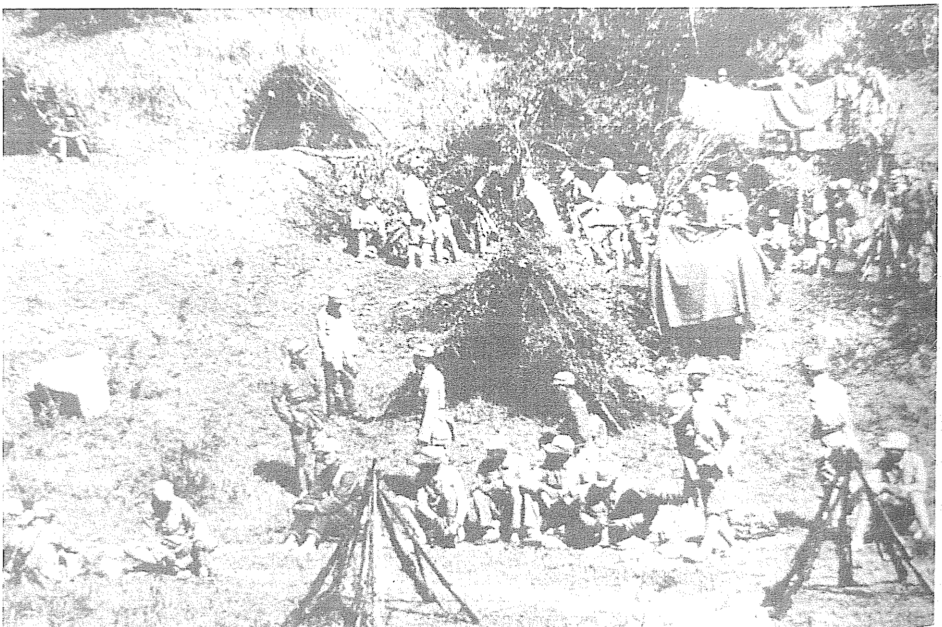
丰衣足食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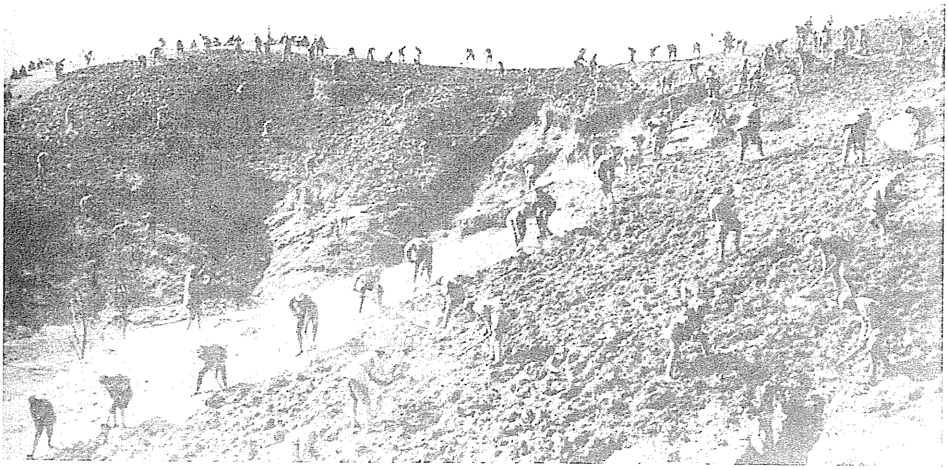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拍摄影片《南泥湾》写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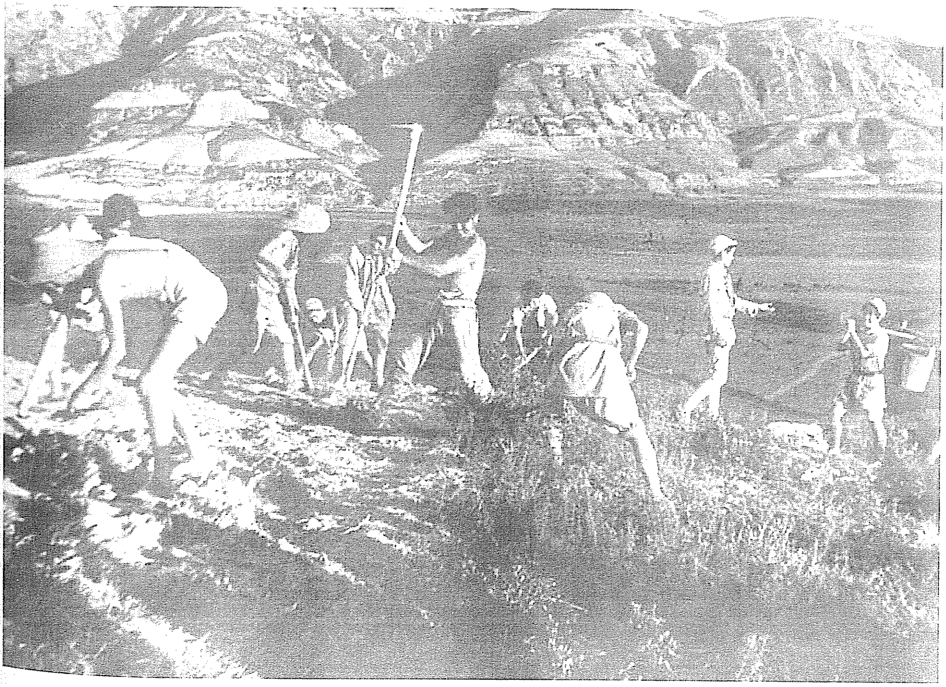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亲自开荒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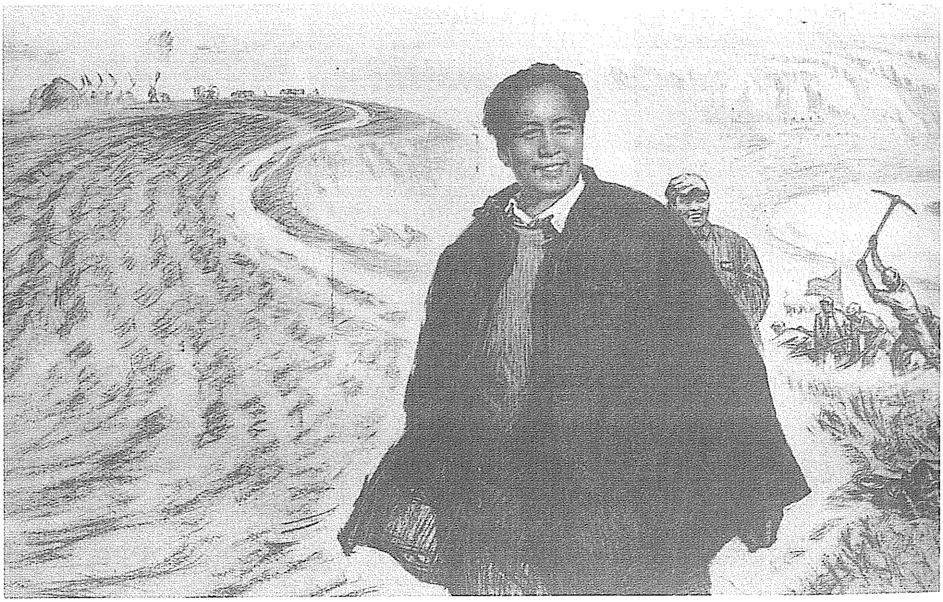
三五九旅干部和战士在南泥湾开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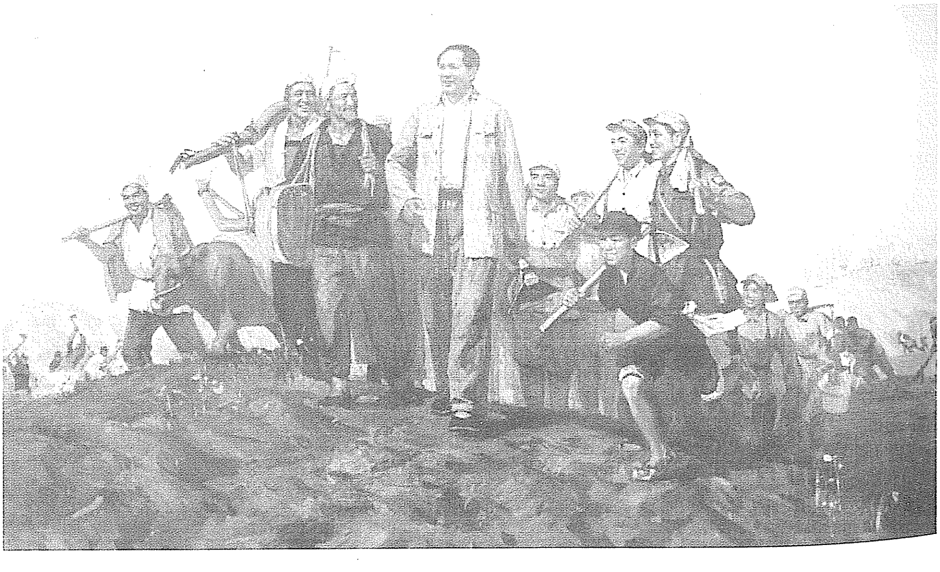
延安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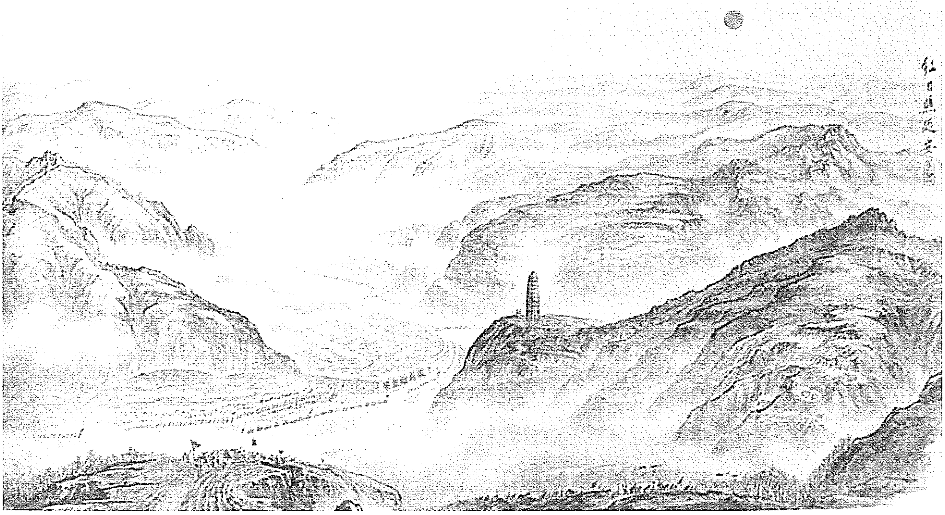
延河开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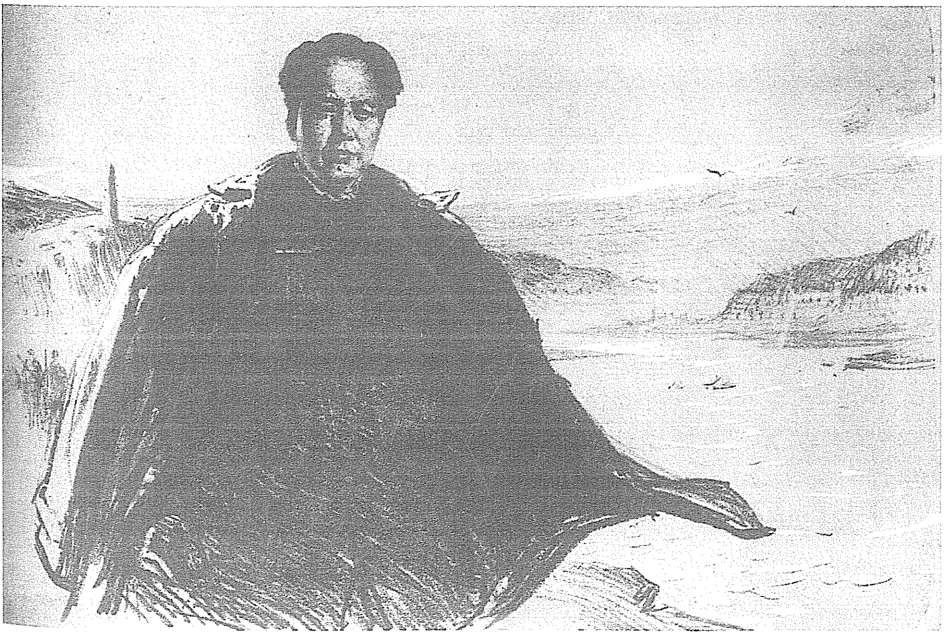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大生产中》（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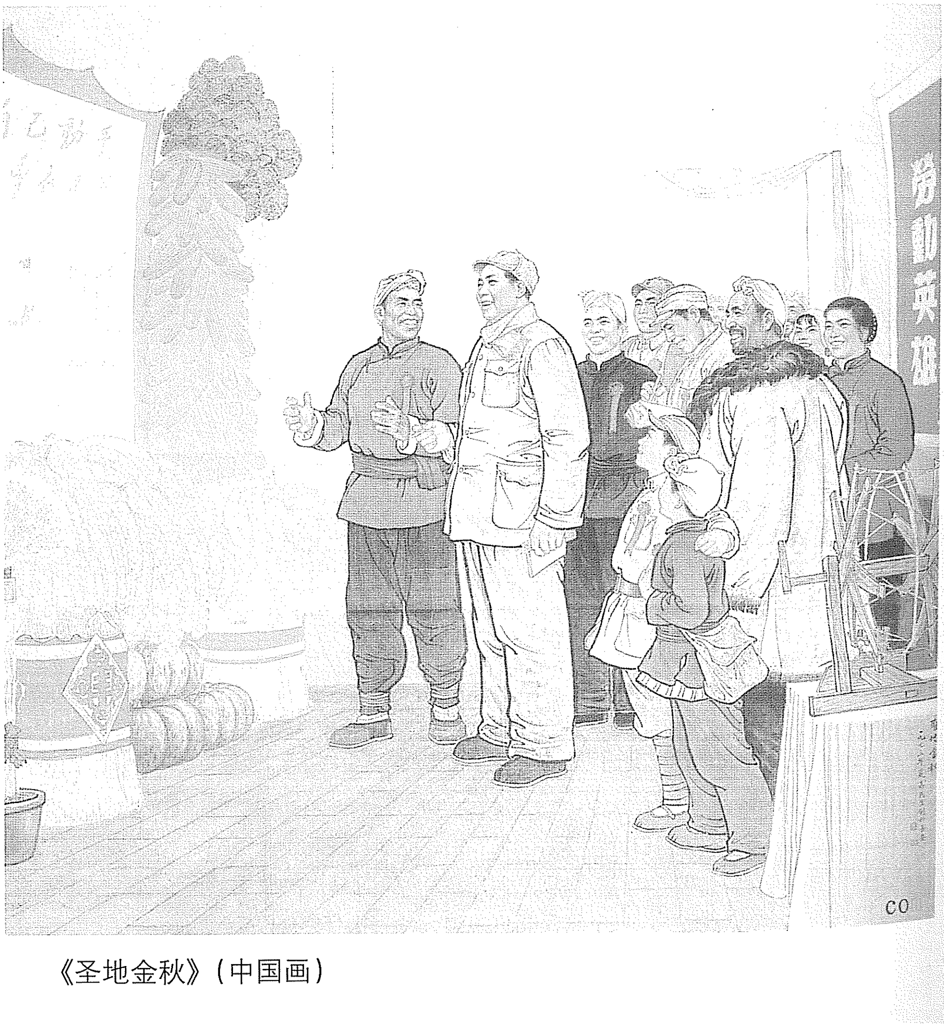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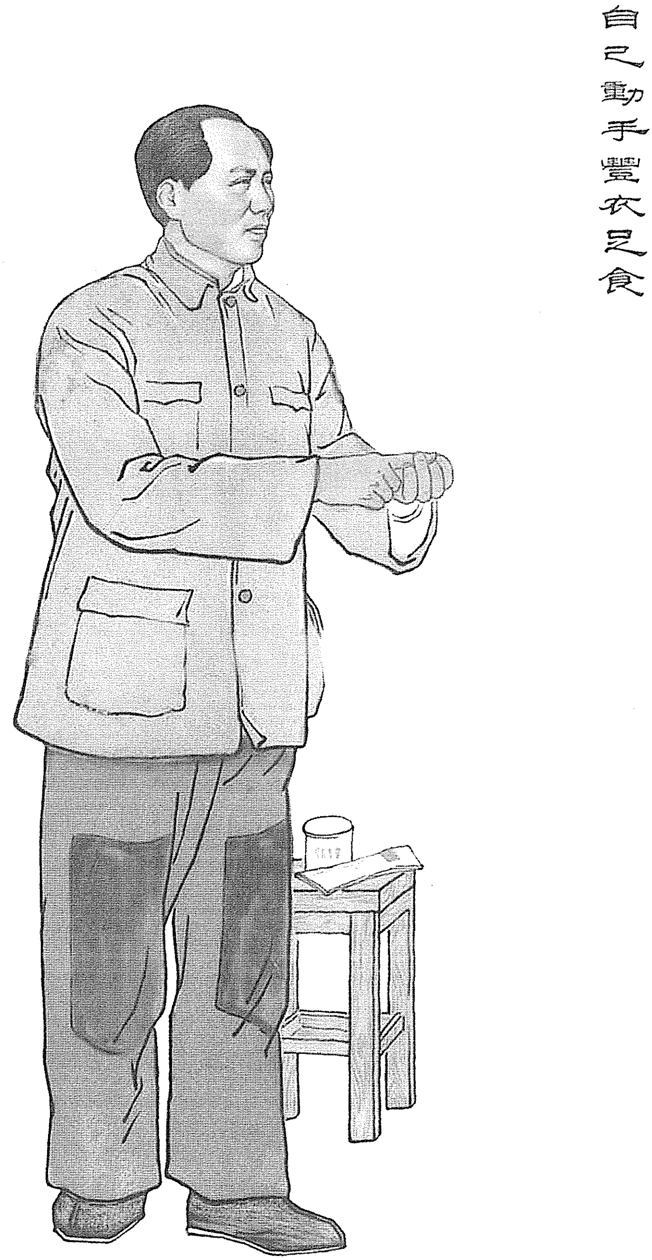
《红日照延安》（中国画）



《毛泽东在延安》（石版画套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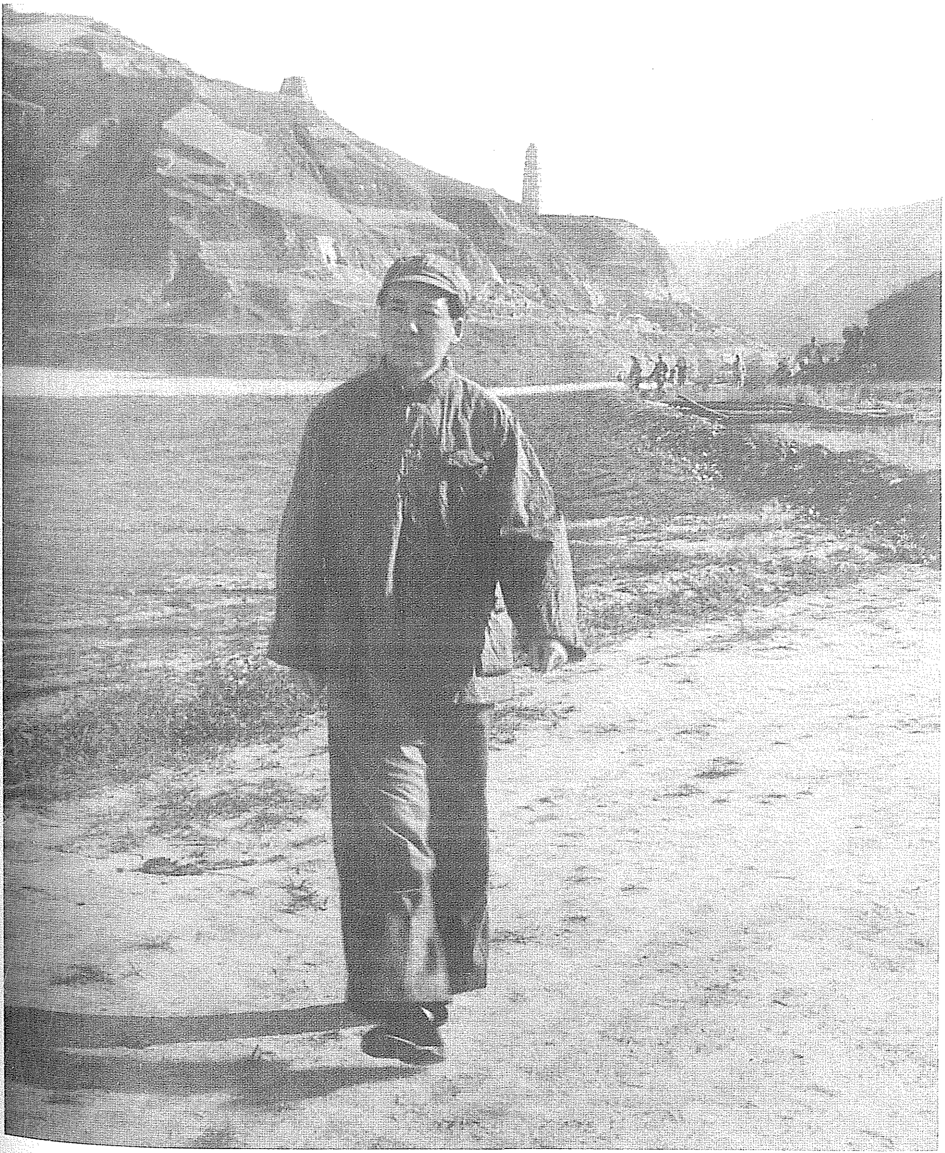


《圣地金秋》（中国画）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宣传画）

1943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致周恩来、林彪电[1]

（1943年1月1日）

郑延卓在延两星期，明日返渝。我同他谈了两次，表现尚好。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谈到边区，我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谈到三民主义，我说现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谈到社会主义，我说将来要实行的，现在无条件。他要求我给蒋一信，我答应了。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和郑延卓谈话的情况致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工作的总方针

（1943年1月5日）

陈、饶[1]：

来电[2]悉。同意你们分散计划。惟浙东方面不宜去人，恐抗战胜利时被国民党消灭，收不回来。整个抗战，尚须准备两年。你们须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不怕数量减少，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我们正与国民党谈判，将新四军编为八路一个军，取得合法地位，并答应国民党于胜利后开至黄河以北，以期继续合作，共同建国。目前国共已接近一步，但要具体解决悬案，恐尚须拖一时期。在远东慕尼黑[3]危险即国民党投降危险存在时期，我们向江南浙东发展是必要的。在此种危险已不存在，我们须准备在战后与国民党继续合作时，我们即须准备于战后开至黄河以

---

[1]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新四军代军长和代政治委员。

[2] 指1942年12月23日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和曾山关于对付敌寇“扫荡”华中的方针及部署给毛泽东并报中央的电报。

[3] 远东慕尼黑，指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几年中，美英帝国主义曾多次酝酿牺牲中国以取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妥协。这个阴谋同1938年英法两国通过与德意法西斯签订“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德国的阴谋类似，所以叫作“远东慕尼黑”。

北，这是总方针。苏联冬季反攻胜利极大，仅斯城战区[1]即击溃德意罗军四十余师，包围德军二十二个师，已无逃路，俘虏及击毙敌军达三十一万人。希特勒总崩溃为期不远。战胜希特勒后，中国时局将好转，日寇亦将夺气，有利我军抗战。我们应利用这种形势，鼓励军心民心，达到坚持目的。少奇[2]同志已安抵延安，并告。

毛泽东

一月五日

---

[1] 斯城战区，指苏联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城区及其以西顿河中游苏军与德军会战的地区。

[2] 少奇，即刘少奇。

致彭德怀等电[1]

（1943年1月6日）

同意北局决定及际春亥马[2]电意见，抗大总校应即结束，除连排级以下学员及陆中[3]编为抗大六分校，徐深吉任校长，袁子钦任政委，归刘、邓领导外，其余营级以上学员，总校在职干部及图书（带重要的）材料，一部基金，应统由际春负责带来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并转张际春电的主要内容。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

[2] 亥马，即12月21日。

[3] 陆中，即抗大总校附设陆军中学，1942年5月在河北省邢台县成立。

给王中[1]的信

（1943年1月10日）

王中同志：

你送来的材料很有用。这是小集体生产与个人生产，我还要整个敌工委[2]的“一九四二年的生产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生产计划”，以便看出全般情形，请通知有关同志在十天内外做好交我。做这个总结与计划时，应包括（一）全机关生产，（二）小集体生产，（三）个人生产，当然主要的是全机关生产。其中要指出成绩，又要指出缺点，要有自我批评。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日

你的意见，希望以后对我谈一下。

---

[1] 王中（1906—1981），浙江余姚人，当时在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负责行政管理工作。

[2] 敌工委，即中共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

对晋察冀分局发布新施政纲领的意见

（1943年1月11日）

晋察冀分局：

（甲）二十九年发布之施政纲领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并且直至现在还是适用的。目前不但不应发布和旧纲领并无多大区别的新纲领，而且不应对旧纲领条文有所修改，致影响旧纲领在群众中的威信。此次参议会可发一宣言，此宣言由参议会中共产党员发起，邀党外人士联署向参议会提出通过然后发表。宣言中拥护二十九年之施政纲领，同时对二十九年纲领中未包括之事项加以叙述。

（乙）你们所提新纲领草案中有些提得不适当的地方，指出如下：

一、目前晋察冀边区形势的特点是边区极大部分地区日益游击化，根据地日益缩小，处境日益困难，而严重的困难则还在今后，因此除说明有利形势外，应将此点补充进去。而对基本根据地区与已经变为游击区之地区，我们的政策应有不同的提法。

二、应着重提出调整边区各阶级关系，以巩固边区党政军民及各阶层间的团结。

三、应着重提出认真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便渡过黎明前的黑暗，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军民公私必须积极协力发展生产，发展

贸易，以开财源，以裕民生。

四、在冀中冀东等广大的游击区中，不仅汉奸之依照法定手续处理，严格的法制制度之建立，财政税收之严格统一与正规化等，均难实行，即对于敌伪政权，敌伪组织及敌伪之各种设施，必要时亦不得不采取两面政策应付，因此虽应对之分别进行瓦解、分化、争取、打击或相机抵制，却难一律摧毁或坚决反对，在纲领中应同时照顾这些情况。

五、在环境日益困难，游击区日益扩大的条件下，应争取先机，积极缩编，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和训练，并由政府和主力军尽量供给民兵以武器弹药，方能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及游击队打击敌人的蚕食政策与扫荡，以达缩小敌区扩大或保持我区之目的，不必提出实施志愿义务兵役制问题，因实际上今天很困难实行，反可给敌利用来欺骗群众。

六、在目前边区斗争条件下，不仅要教育民众尊敬爱护与帮助军队，更应教育部队爱护尊敬并帮助老百姓，使军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这点在今后极端困难的环境下有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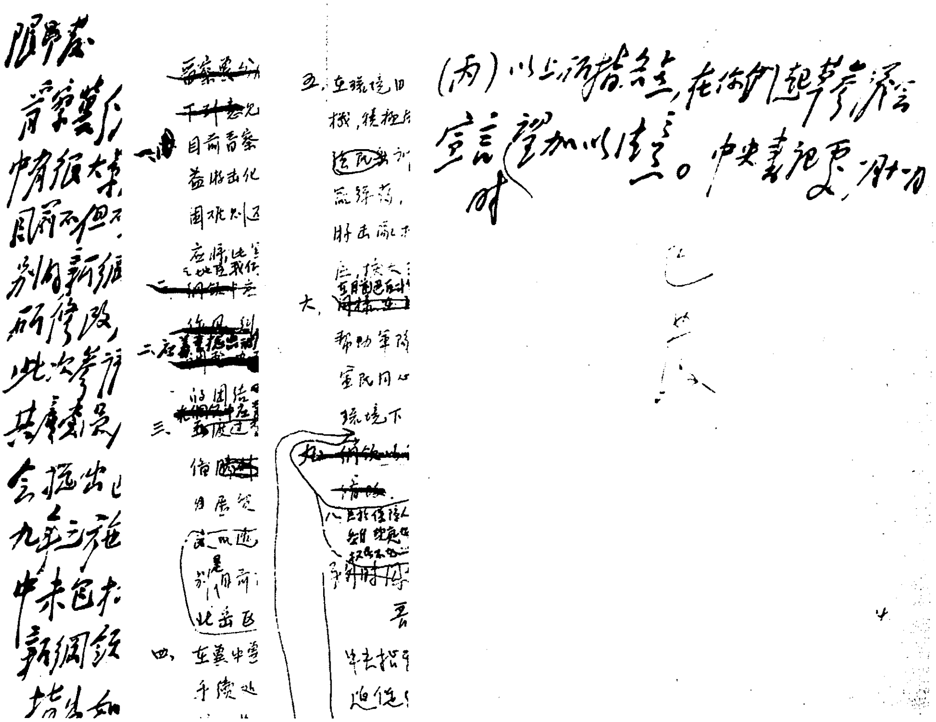
七、有些过高而难实现的办法不应提出，如允许战后实行薪俸制及减轻人民负担等，这在将来是无把握的。

八、关于保障人权中之逮捕拘讯处罚问题，在今天敌后斗争形势下，除第六条所规定者外，应加上在敌人扫荡时及游击区等特殊情形之下，经政府授权者不在此例的意思。

（丙）以上所指各点，在你们起草参议会宣言时望加以注意。

中央书记处

一月十一日



（丙）以上所指各点，在你们起草宣言时望加以注意。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对晋察冀分局发布施政新纲领的意见》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1月12日）

（一）是否答应以何白皓电及国民党中央提示案作为谈判的基础。（二）是否答应以李先念部调江北作为于学忠部移出山东的交换条件。会议认为调防事实上难以办到，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给周恩来、林彪的复电，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

去年中央工作改变为以全国工作为主，少管延安的日常工作，并开始经过报纸来指导工作，今年中央各部委更要重视利用报纸来指导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共谈判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为西北局奖励的二十二位生产英雄题词[1]

（1943 年 1 月 14 日）

有创造精神。（王震，时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

切实朴素，大公无私。（何维忠，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长）

坚决执行屯田政策。（晏福生，时任三五九旅副政委）

以身作则。（罗章，时任三五九旅供给部政委）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黄静波）

善于领导群众。（刘秉温与王丕年）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惠中权，时任靖边县委书记）

合作社的模范。（刘建章）

忠实，努力，不夸不骄。（王世泰）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杨林，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长）

机关生产的模范。（范子文）

无限忠心。（胡起林）

密切联系群众。（马文瑞）

一刻也不离开群众。（马锡五）

---

[1] 这是毛泽东分别为中共中央西北局奖励的22位生产英雄的题词。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王维舟）

面向群众。（李丕福，时任华池县县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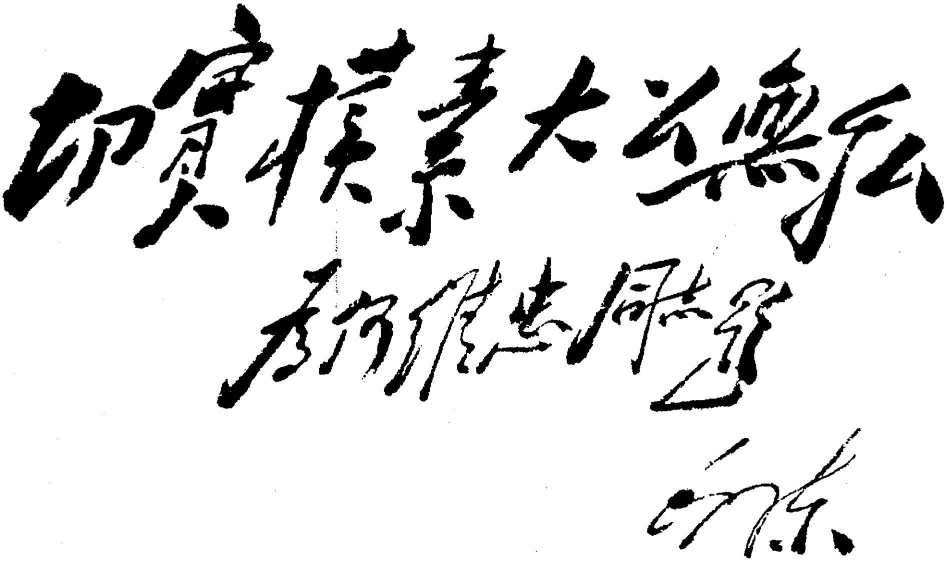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习仲勋）

生产教育，两者兼顾。（文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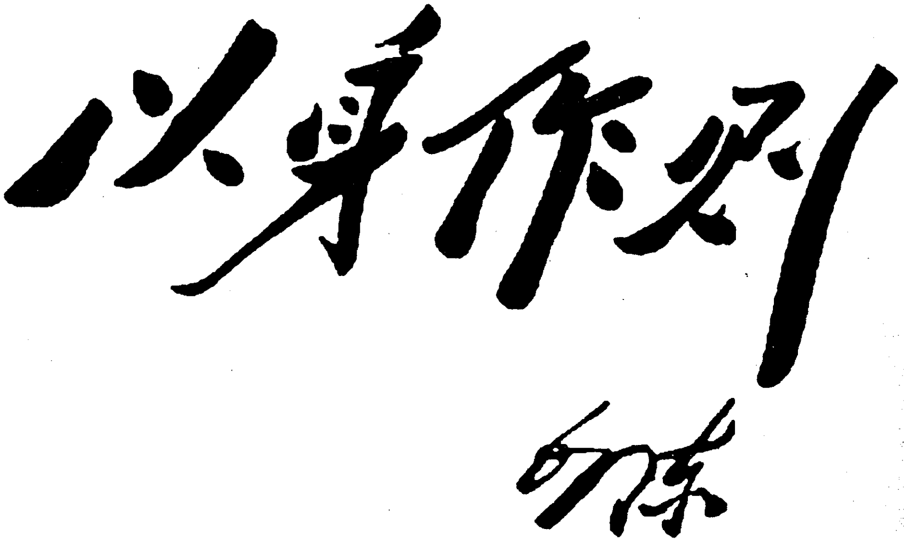
为群众谋福利。（任成玉）

艰苦奋斗，不屈不挠。（贺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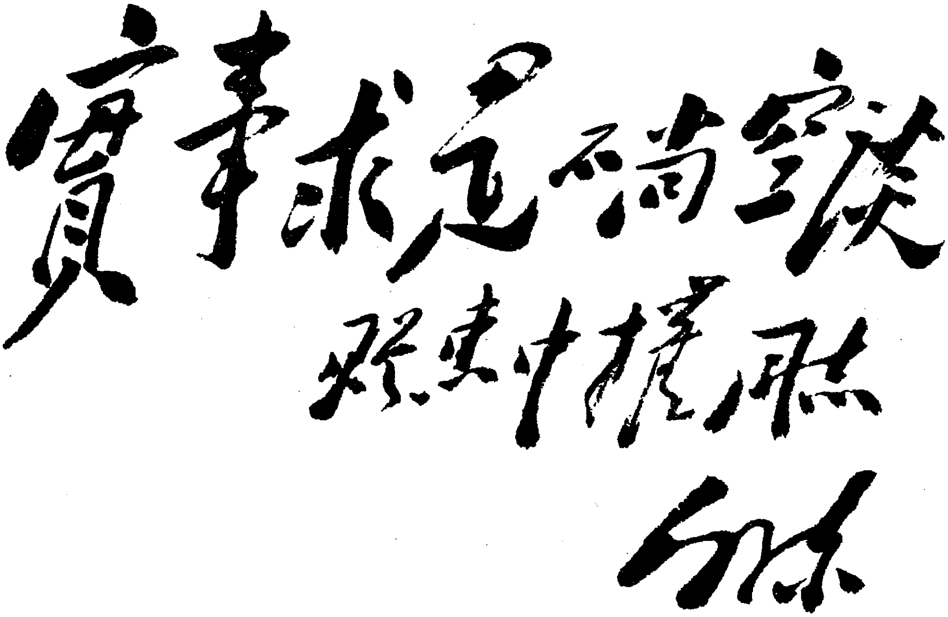
不怕困难。（罗成德，时任“三边”分区专员）


切实模范大公无私
何维忠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何维忠的题词。



毛泽东为罗章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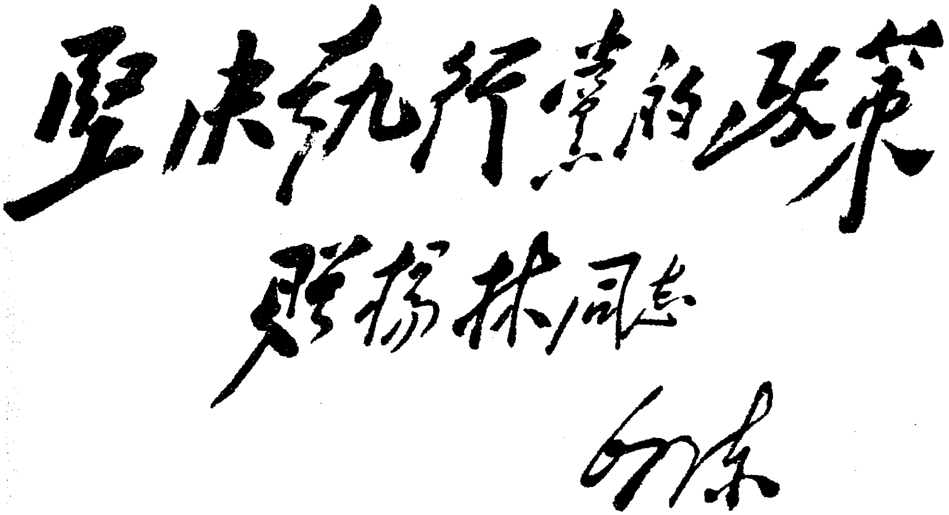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赠惠中权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惠中权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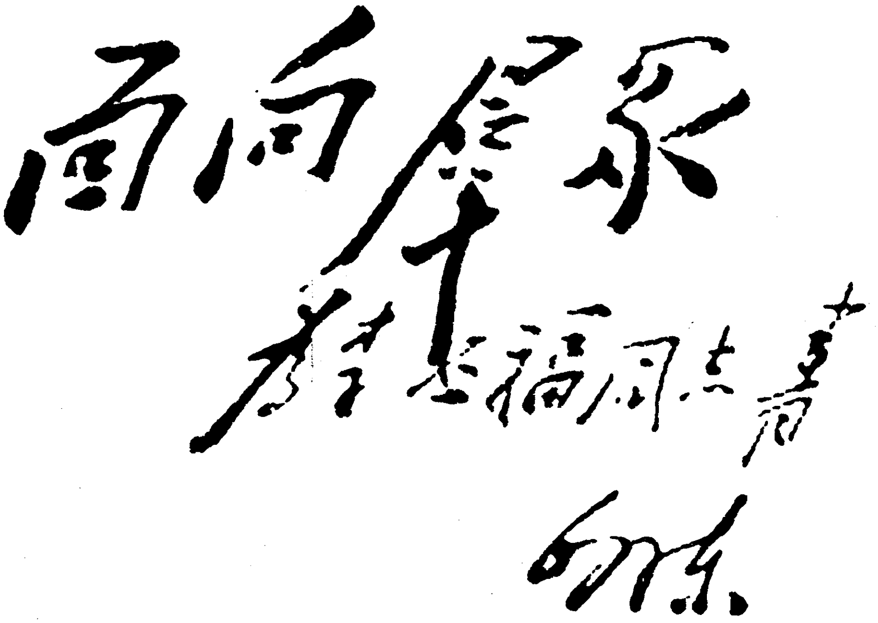


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赠杨林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杨林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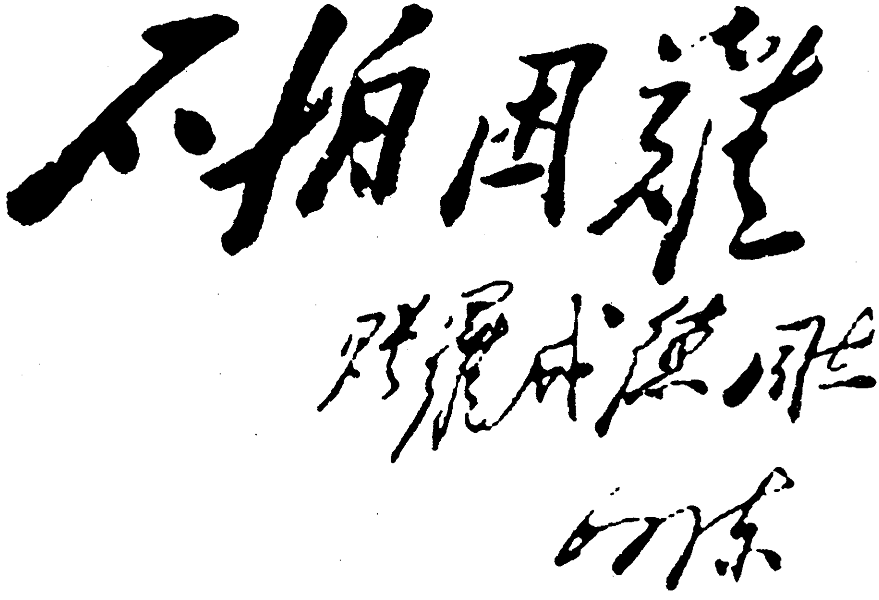


面向群众

李丕福同志[illegible]

毛泽东

毛泽东为李丕福的题词。



不怕困难

赠罗成德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罗成德的题词。

复周恩来、林彪电[1]

（1943年1月16日）

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陈宏谟向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目前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似宜一口咬定铁一般事实，暂时不动将来必动为有理有利。具体解决问题的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再等一下（苏联更胜利，国党抗敌更需要我们）较为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根据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意见，提出有关与国民党谈判的几个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复李先念、任质斌电[1]

（1943年1月16日）

敌对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利，只应收回被侵占地方，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复李先念、任质斌电的主要内容。任质斌，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给钟敬之的信

（1943年1月23日）

钟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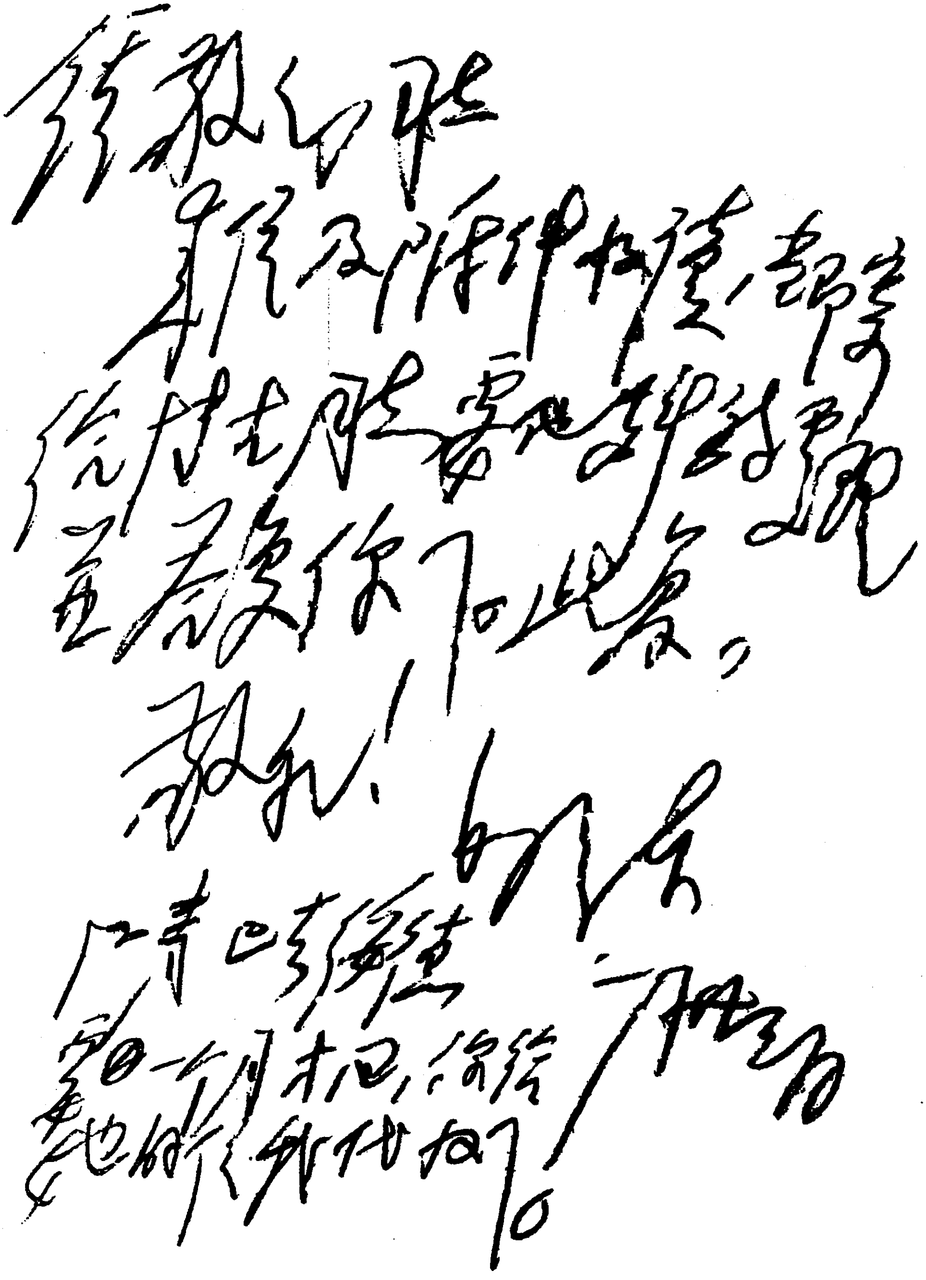
来信及附件收读，当即寄给博古同志要他斟酌处理并答复你了。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三日

江青已去绥德，要一个月才回，你给她的信我代收了。



钟敬之同志：

来信及陈伊范信、书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你们[illegible]。

敬礼！

毛泽东

二月[illegible]日

[illegible]他们，我代收了。

毛泽东致钟敬之信的手稿。

争取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

（1943年1月25日）

德怀[1]同志：

你十二月十八日电[2]最近才看到，兹复于下：

（一）在德、意、日打倒后，国际国内形势均会发生根本变化，这一形势是利于人民不利于独裁的。但蒋[3]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去年七七宣言[4]是在这个基点上发的。争取边区与新四军合法化，并答应国民党在战后将黄河以南部队集中到黄河以北；两年来《解放日报》及新华社，根据和国方针，尽量避免刺激国民党；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5]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所有这

---

[1] 德怀，即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2] 指彭德怀1942年12月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3] 蒋，指蒋介石。

[4] 指1942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5] 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42年9月作为中共谈判代表赴重庆，1943年7月回到延安。

些也都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就是精兵简政，除当前作用外，也有这个作用。我们既不准备打内战，无须多兵，兵少又可减轻国民党的畏惧心理，求得和平，以待全国人民的觉悟。如果人家要打，我们也有恃无恐。

（二）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战。改善生活的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即实行减租减息；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即实行精兵简政与发展一部分公营经济；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及副业生产，增加农民的粮食收入及副业收入。各根据地上对这几件事都有很多工作可做。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

（三）教育以对象分，有干部教育、国民教育等项，目前重点应放在干部教育上，而不应放在国民教育上（不是不要国民教育）。以内容分，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等项，而对于干部，特别就目前时期说来，应着重思想教育，其办法就是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这是建党的基本政策。延安去年四月起学了八个月，今年三月底可学完，收效极大。审查干部亦已开始（并有成绩），准备以今年一年审查完毕。延安以外陕甘宁边区各地党、政、军、民干部今年仍是整风学习，并进行审查干部。敌后各根据地对整风学习均未深入，审查干部还未认真着手，望加注意。整风，主要是整高级干部（犯思想病最顽固的也是这些干部中的人），将他们的思想打通，一个根据地大约有一百至二百人（包括各中央局、分局委员在内）；其次是中级干部，每一根据地有数百至数千人；再次才是下级干部。有些根据地把这个方向弄颠倒了。只有在认真的深刻的整风学习与展开自我批评的热潮中，审查干部才会彻底。过去

对于审查干部，不论延安与外地，大都是形式的。如果能在今明两年（抗战胜利前），经过整风与审查，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保存骨干与教育骨干，这是今明两年的两个严重任务，高级负责人必须抓住这个方针。为这两件事必须进行各种对外对内的严重斗争。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

（1943年1月25日）

生产是目前边区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生产更是全盘生产工作的中心。要完成这任务，首先要依靠边区农村中的三十多万个全劳动力和三十多万个半劳动力。这六七十万人，只要组织起来，便是一支雄健的生产大军，便能发生雄厚无比的力量。

可是要把边区农村的几十万劳动力更好地组织起来，必须采取许多有效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实行劳动互助。

在边区农村中，历来就存在着各种各式的调剂劳动力的方式，如“变工”和“扎工”，就是流行较广的方式。自发的“变工”和“扎工”，其范围虽然狭小，仅限于亲戚、朋友、邻舍等关系，可是它是适合于边区农村的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因势利导，有计划地组织领导，便可以使它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生产的组织。为了证明这一点，延安县的宝贵经验，是值得称述的。去年延安县共组织“扎工”四百八十七个，另外吸收好劳动力四千九百三十九个参加集体劳动，几乎占总劳动力三分之一，即三个人中有一人参加集体劳动。在开荒的时候，集体劳动就显出很大的力量，去年延安县要在一百天中开荒八万亩，每天要开八百亩，自三月十日到四月十九日前，还只开了一万五千亩，只占总任务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尚差六万五千亩，但时间已去了三分之二。所以十九日下雨后，采取开荒

突击二十天，在二十天中，竟完成了四万六千四百四十二亩，占总任务百分之五十八。假若延安县没有把劳动力及时组织起来，那么便没有办法抓住雨后的绝好时机进行突击，而八万亩的开荒计划也没有办法完成了。

我们知道，做庄稼最要紧的，是“不违农时”。早晚下种，会有不同的结果，迟早收割，也会有不同的收获。要做到“不违农时”，只依靠单独的和分散的劳动，是难乎其难的。假若采取劳动互助，情形就大不同了。把三五户七八家的人力畜力，组织在一起，今天大家一齐帮你耕，明天大家给我种；哪一块地草多，就给哪家先锄；哪家庄稼早熟，就助哪家先收。在“变工”中，不仅有人工换人工，而且三个人工还可以换到一犋牛工，办到有人力的出人力，有畜力的出畜力，多的多出，少的少出，使人力畜力得到调剂。这样，才能做到不违农时，才能做到及时翻地，及时下种，及时锄草和及时收割。

经验证明：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可以节省劳动力，集体劳动强过单枚劳动。如：一个劳动力一年可以耕种十五垧地，但若三个劳动力一齐干，一年就可以耕种七十垧地，四个劳动力更可以耕种一百垧地。两个人力一犋牛力，三天可以做完的工，如果用三个人力一犋牛力，两天就可以做完。不仅如此，互助的集体的生产组织形式，还可以大大发挥劳动热忱，增强生产效率，因为大家一起工作，生活活泼，情绪紧张，互相鼓励，互相竞赛，谁也不肯落在人后，工作进行的紧张程度，正像群众说的：“工变工，挣断筋！”最后，互助的集体的劳动组织，是真正群众的组织，便于我们党的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同志，进行教育群众，增进群众团结互助的精神。

正因为这种互助的集体的劳动组织，能使庄稼不违农时，调剂和节省人力畜力，提高生产热忱，增进劳动效率，发挥群众的团结互助精神，所以它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

流行民间的劳动互助组织，主要是“变工”和“扎工”，但是也并不仅仅限于这两种。如像劳动英雄吴满有，既不“扎工”，也很少“变工”，他在平常帮助本庄的移难民，一遇农忙，那些移难民也就自愿地帮他做工。再像“伙牛”、“伙种地”等等，那是带有互助性质的。这些流行民间的劳动互助组织，内容是非常生动、具体和切合实际的，都应当及时倡导和推广。

我们必须学习延安县的模范，对于组织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放弃消极的自流现象，采取积极的领导提倡。不仅仅鼓励组织“扎工”，而且要更多更普遍地组织“变工”；由旧的比较狭小范围内的组织，转到有组织的新的“变工队”。我们首先要在今年春耕中，大大推广这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一切具有劳动力的——身体强壮的、老弱的、儿童与妇女等，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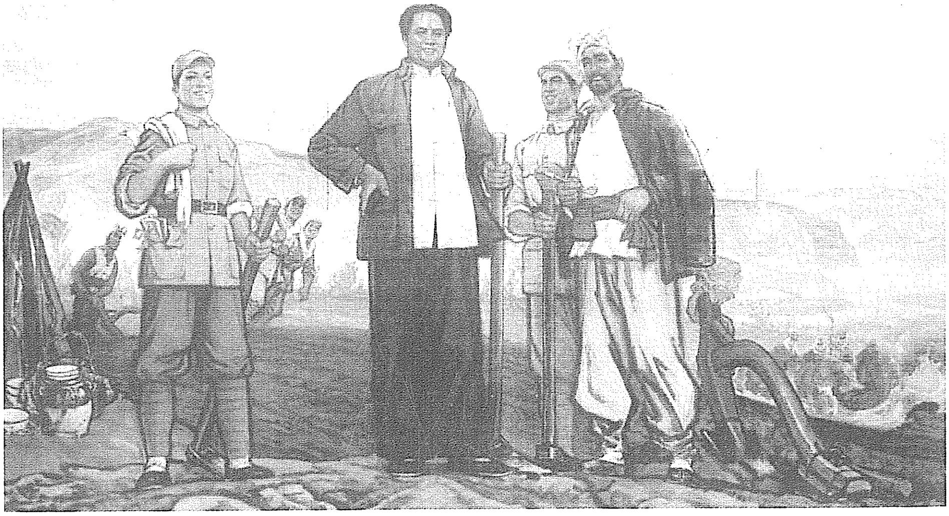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劳动互助的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我们若果硬要把某些没有明白互助好处的人，勉强组织在一个“变工”或“扎工”队里，或者造了名单，以为“万事大吉”，那么，生产效率和劳动情绪不但不会提高，而且反会降低。

再则，组织劳动互助，是最生动具体的事情，绝不能够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去对待。比如我们今天要努力扩大那种民间劳动互助组织，所组织的“变工”队不应过大，不应以乡或以行政村为生产单位，因为组织广大了，会浪费人力、浪费时间。最好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对于那些人口多、更多需要互助的村庄先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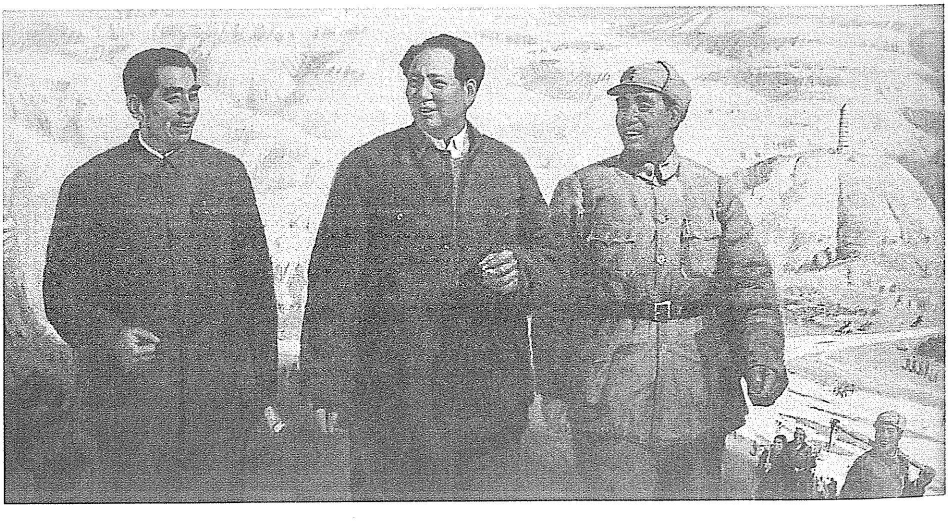
手，不仅只组织一个，而且可以组织几个、几十个，也不仅限制在一村的范围内，还可以超出自然村的范围，实行村与村的互助。

对于劳动互助的领导，必须经过群众慎重选择，公举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生产积极、有办法的人出头领导。我们的乡村干部和党员，要首先参加进去，或者就以党的小组为骨干，组织成“扎工”队，起模范推动作用，并可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群众教育、团结群众。我们的农村支部、乡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同志，一定要把组织群众生产看作是自己的工作，是自己工作中最重要的工作。某些同志以为“这些事群众自己会搞，用不着咱们担心”，这种不正确的观点，一定要严格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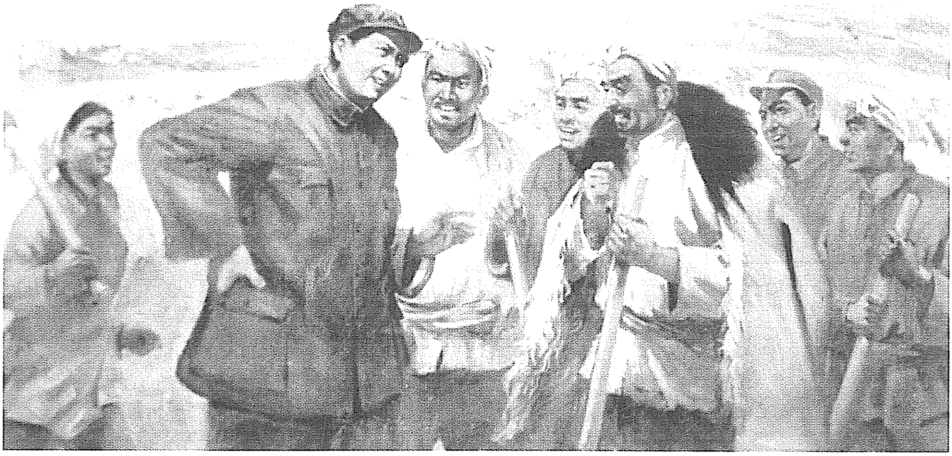
今天，已是四九将完，人们常说：“春打六九头，犁牛遍地走”，让我们迅速把这一支生产大军组织起来，掌握春耕，不失农时，完成农业生产的重大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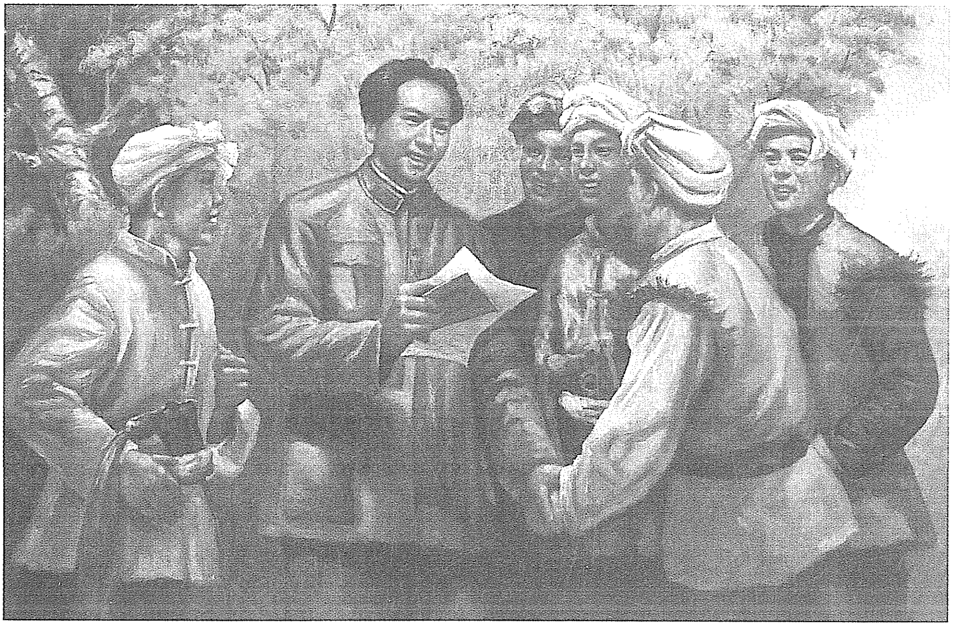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中国画）



《艰难的岁月　伟大的友谊》（油画）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



《毛泽东在陕北》（油画）

在谢觉哉、贾拓夫的报告上的批示[1]

（1943年2月1日）

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

---

[1] 这是毛泽东在谢觉哉、贾拓夫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1月29日召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党人士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的主要内容。

关于主动加强统战工作的指示[1]

（1943年2月7日）

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好转，国方上层虽仍采拖的办法，而其局部与下层已发现迫切需要与我党我军调整关系的现象；我们应不放松每一机会和每一小的事件，主动地加强局部统战工作，改善关系，以求更加促进国内整个形势的好转。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如有磨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

毛　朱　王　叶

丑虞

---

[1] 这是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为主动加强统战工作致各战略区域的指示电。

1943年，毛泽东和王稼祥在延安。

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1]

（1943年2月9日）

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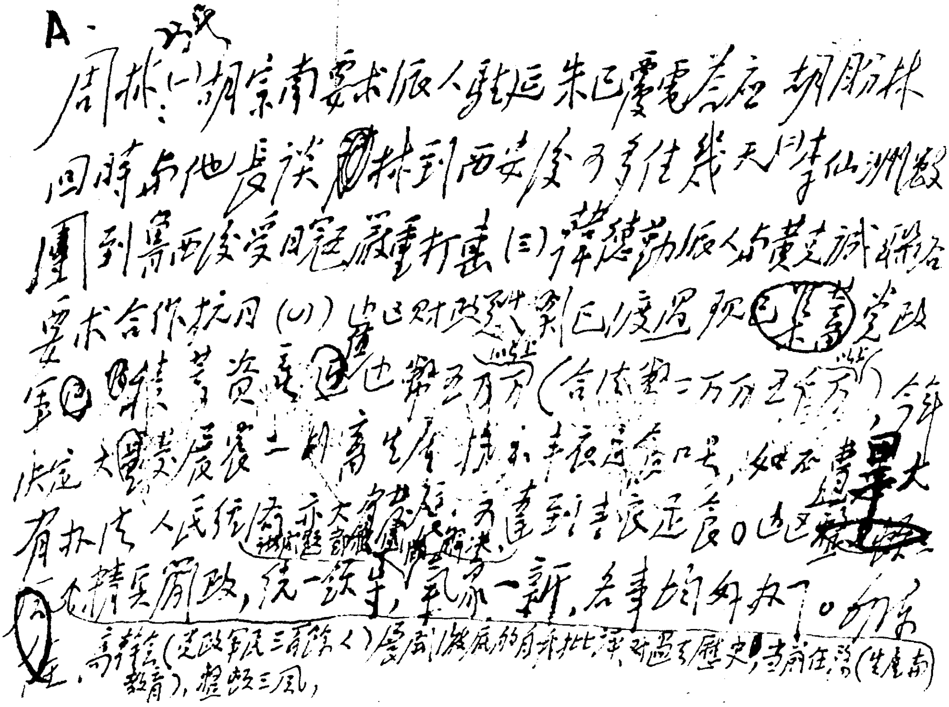
（一）胡宗南要求派人驻延，朱已复电答应。胡盼林回时与他长谈，林到西安后可多住几天。（二）李仙洲数团到鲁西后受日寇严重打击。（三）韩德勤派人与黄克诚联络，要求合作抗日。（四）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现党政军积蓄资产值边币五万万以上（合法币二万万五千万以上），今年决定大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如不遭旱大有办法，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

毛泽东

佳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边区财政难关已渡过等问题给周恩来、林彪的电报。



A

周林：（一）胡宗南要求派人联络，朱已覆电答应，胡盼林回时与他长谈，林到西安后可多住几天。（二）李仙洲数团到鄂西后受日寇严重打击。（三）薛德勤派人与黄克诚联络要求合作抗日。（四）边区财政经济已渡过难关，党政军已积蓄资金超过五万万（合法币二万万至三万万），今年决定大量发展农业，二年后生产[illegible]丰衣足食，如不遇大灾，有把握。人民经济亦大有发展，[illegible]可达到丰衣足食。边区[illegible]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气象一新，各事好办了。高干会（党政军民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讨论边区历史，尚在进行（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的手稿。

请各地总结整风学习的经验

（1943年2月10日）

恩来、德怀、小平、荣臻、林枫、朱瑞、荣桓、漱石[1]同志：

为了总结去年整风学习，确定今年学习计划起见，请你将你处去年学习经验扼要电告我们，特别是下面几项：

（一）大多数同志对于整风学习是否有正确的认识，有无偏向和误解？

（二）在哪些干部中收效最大？有无把整风对象轻重倒置，只整下级不整高级？

（三）是否根据具体环境及各种不同干部订立学习计划，有无不顾战争环境、不管干部程度的毛病？

（四）学习方法，是否能使整风学习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是否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小平，即邓小平，1904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枫（1906—1977），黑龙江望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朱瑞（1905—1948），江苏宿迁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荣桓，即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学用一致，有无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

（五）各级负责同志是否以身作则，亲身负责领导学习，有无放弃职责，将学习领导交给秘书或他人管理之事?

以上问题望予速复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日

复林彪等电[1]

（1943年2月12日）

谈判方针昨已电告。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国共谈判成功大概要等到实行反攻前夜，不到反攻，彼方认为是不需要和我妥协的。彼方目前正在注视日、苏变化，以为日、苏开战彼可渔人得利。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彪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祝贺苏联红军成立二十五周年[1]的电报

（1943年2月21日）

斯大林同志、联共中央和红军的将士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同志与中国人民热烈地庆祝红军成立的二十五周年与红军反攻的伟大胜利。

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奋斗，特别是经过了二十个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奋斗，红军节已经由国际劳动群众的“狂欢节”发展为全人类的“狂欢节”。五大洲一切民族爱好自由的人民，都已由亲身的经验，一致公认红军和苏联人民是抵抗法西斯暴力的中流砥柱，是创造新的和平世界的急先锋。红军近三个月来的攻势，在全世界到处都引起欢呼和赞美。全世界到处都在研究着红军胜利的军事和政治教训。红军的攻势，无疑是历史上空前的，并且其规模和速度还在不断加大。红军从十一月十九日在伏尔加河上的危城[2]发动反攻，三个月后就一跃而至六百多公里以西的第聂伯河附近。红军将希特勒匪徒完全驱出国境，只是时间问题了。自从红军开始对德战争，世界形势就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现在由于红军的胜利，新世界的未来面目也更加明朗，更加确定了。一切形式的法西斯制度和法西斯思想，已经在全世界永远失去存在的余地。民族的自由、政治

---

[1] 苏联红军是1918年2月23日建立的。

[2] 指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的民主已经成为新世界的确定不移的原则，我们中国人民欢迎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欢迎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为争取这个新时代的团结和努力。与红军的胜利同时，英、美在北非，美国在太平洋，也都得到了重要的胜利。英、美正在积极准备实践欧陆第二条战线[1]的诺言。对于中国，美、英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对于这个新时代的首要任务就是更加团结自己，准备像红军驱逐德国侵略者一样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我们相信，由于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由于苏联、英、美的胜利和对于中国的援助，我们也一定能够转入反攻并取得最后胜利的。

红军和红军的最高统帅斯大林万岁！

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万岁！

中、苏、英、美的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

[1] 欧陆第二条战线，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在欧洲大陆开辟反法西斯德国的战场。1941年7月1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正式提出在欧洲大陆的西部或北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后经苏、英、美三国政府多次协商，于1942年6月达成协议，英、美两国同意在1942年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此后，由于英、美两国的一再拖延，直到1944年6月，英、美军队才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登陆，正式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

妇女工作者应参加经济工作[1]

（1943年2月24日）

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习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许多有能力的女同志必须到合作社去工作。再则许多女党员、女干部必须到公营经济机关中去工作，使公营经济发展起来。那些浮在上层、空闲无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致彭德怀电[1]

（1943年2月28日）

拟以黎玉为第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员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合并后的人事安排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给林哲的信[1]

（1943年3月15日）

林哲同志：

今天，读了你纪念“三一五”的文章[2]，颇受感动。我对日本革命史不甚清楚，但非常想了解。而且，对于中国党的干部和党员们，也有必要教他们一些日本革命的史实。所以，我建议你多写一点日本革命的史料，在《解放》[3]上发表。希望你能考虑一下。

我喜欢看你的所有文章。同时，我也劝同志们学习你对事物进行客观分析的态度。在我们当中，能够分析文章的人太少了，到处都泛滥着主观主义的豪言壮语。我们现在正在批判这样的由来已久的恶劣作风。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

---

[1] 这封信是用铅笔写在一种很薄的信笺上的。林哲，是野坂参三刚到延安时所用的化名。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后，野坂参三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名为“冈野进”。此信中所说的批判主观主义的恶劣作风，指的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的党内整风运动。

[2] 指《解放日报》1943年3月19日发表的野坂参三的文章《在日本工农学校纪念三一五》。

[3] 原文如此。

复彭德怀电[1]

（1943年3月15日）

同意你对今年华北整风学习的计划。对于三月间召开的地委级以上干部会议，应采取从检查实际工作到领会文件精神的方式，在讨论中要注重反对自由主义，深入地开展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一切缺点错误，把问题提到思想原则上去，才能达到上下贯通，干部团结，改造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1943年3月16日）

一　时局

日本最近从满洲[1]调兵入关，对华采取攻势。最近国民党电台与延安联络，这是国共关系好转的表示。国民党在去年冬天估计日本一定会进攻苏联，但今年二月后认为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由于日本新的进攻，国民党因外援不到，就想到内援。现在谈判仍然未停，说谈判要以何、白皓电[2]为基础。如果日本继续进攻，国民党政府可能迁都成都，还不会投降。在日本新的进攻中投汪[3]的增多，日本已决定扶汪打蒋[4]的方针，现将华北、华中等伪政权统一起来。

---

[1] 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2] 皓电，指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1940年10月19日（皓）发出的给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同年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

[3] 汪，指汪精卫（1883—1944），浙江绍兴人，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4] 蒋，指蒋介石。

德国是今年被打坍还是明年？首先是第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今年不能打坍，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等）也要估计到。这两种可能性中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种。

总的估计：日本是扶汪打蒋的方针。国民党在日本进攻下，外援不至，要求内援。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中国抗战有打七八年的可能。我们仍要坚持两年到两年半。

整个世界形势和历史的发展对国民党不利，而对我们有利，但要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才能战胜国民党。

二　工作方针

中央的工作方针，是研究与指导，要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之目的。

研究问题：

（一）国际

英、美、苏、德、意、日六大国，主要是研究六大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项。

去年对日本的研究最有成绩，其他无成绩，今年要有成绩。

（二）国内

国民党统治区，主要是研究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根据地，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教。政治主要是政权，军事是军事建设、民兵建设，经济是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

去年研究成绩最好的是中央研究院与政治研究室。

（三）历史

中国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政治（范文澜），军事（总参谋部、总

政治部），经济（陈伯达），文化（艾思奇[1]作哲学史，周扬[2]作文学史）。

中共党史开始研究：二十二年的路线问题；政治局同志座谈；在一年内应有确定的收获。

（四）对干部要保存他教育他。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理论、思想教育，后一种教育今年要继续努力。

中央直属机关干部要进行理论、思想教育，读马、恩、列、斯的四十本书。干部各种教育中主要是整风教育与思想教育，在各种干部中主要是高级干部的教育。

指导问题：

方式——报纸、电报、党务广播、口头报告。

报纸是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解放日报》自去年四月改版后有进步，摸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报纸材料的来源就无穷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本质），是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

党务广播，是党内教育干部的一种方式。

去年工作有成绩，今年要有更大的成绩，经过报纸与党务广播传到全国去。

今年要准备开第七次代表大会[3]。

方针中还要增加一条：我们的领导要联系群众。现在财经、妇委、职委、文委的工作方针都在转变。审查干部也要领导与群众相

---

[1] 艾思奇，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部主任。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结合。方法是要从下层总结经验，然后再加以指导，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或者说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唯一的来源、唯一的出路是群众。

我去年与许多部门工作同志很少接触，今年要多接触，多接触才能有知识。

三　工作任务

中央机关的任务是工作、生产与教育；前方是战争、生产与教育；后方是生产与教育。这种方针要向全体同志说明。公开说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但在我党高级干部中要说明保存骨干，积蓄力量。现在华北正送大批干部到陕甘宁边区学习。保存骨干不仅保存地方干部，而且要保存军队的骨干。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为了保存骨干必须坚决实行精简政策，反对敌人的“蚕食”政策。这就是战争的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就是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是第一，过去干部进步很慢，而战士进步很大，陇东马夫中还出了一个木刻家。过去干部学习没有时间，没有经费和课本。中央对干部教育的决定[1]要切实实行。

第三就是生产的任务。

用这些方法来达到保存骨干，准备将来。

---

[1] 指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博古在延安。

复彭德怀电[1]

（1943年3月27日）

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策，因坏人故意寻衅，此时引起较大冲突，对我极为不利。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在严格自卫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鼎文命令庞炳勋部向八路军进攻一事，和朱德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蒋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3月30日）

一

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

二

无论华北、华中、边区，中央都曾几次下令禁止磨擦，我军亦无任何侵犯友区行动。但彼方进攻之事则屡起，请交涉制止。

---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关于制止磨擦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五律·挽戴安澜[1]将军

（1943年3月）

外侮需人御，
将军赋采薇。[2]
师称机械化，
勇夺虎罴[3]威。
浴血东瓜[4]守，
驱倭棠吉[5]归。
沙场竟殒命，
壮志也无违。

---

[1]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黄埔军校毕业后，曾参加北伐。在抗击日本侵华战争中，战功卓著。1939年任国民党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被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42年3月，率第二〇〇师出师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同年5月，在率师返国途中，遭日军伏击，不幸牺牲。不久，被国民党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1985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革命烈士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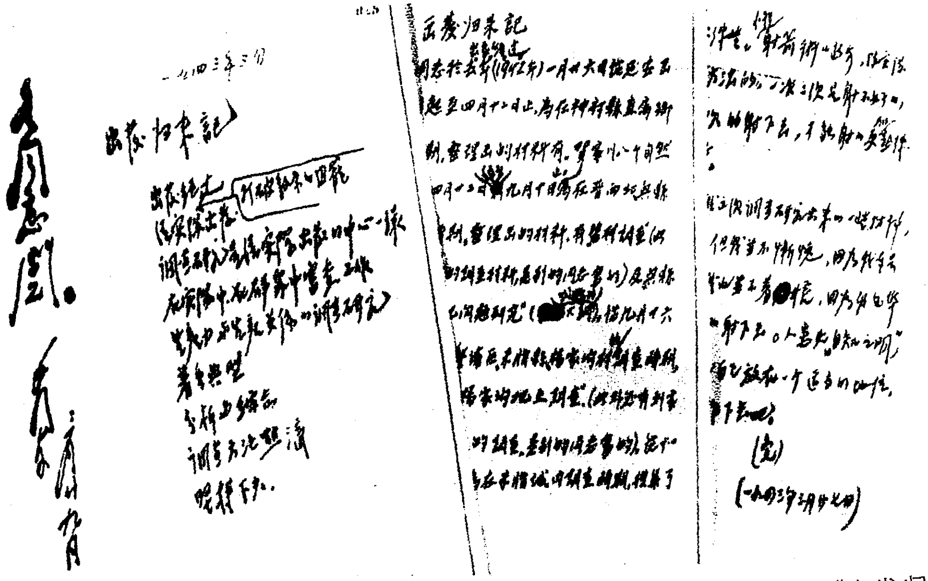
[2] 将军赋采薇，赋，朗诵。采薇，《诗·小雅》中有《采薇》篇，其诗描写戍边抗击外族入侵的兵士久历艰苦，在回乡的路上又饱受饥寒。

[3] 虎罴，这里比喻凶猛的敌人。

[4] 东瓜，即同古，缅甸南部重镇。

[5] 棠吉，缅甸中部地名。

张闻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各同志阅。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三月

出发归来记

出发归来记

（完）

1943年3月27日，毛泽东在张闻天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写的《出发归来记》上批示“各同志阅”。

给印度国民大会的信[1]

（1943年4月5日）

印度国民大会诸先生：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后，贵会派遣了一个援华医疗队来华参加中国的抗战，表示对华的极大友谊。这个医疗队五人均在八路军工作，四年以来，医疗队诸同志不避艰险，辗转北方战地，他们的艰苦努力和极有价值的工作，使无数中国军民亲睹印度人民的援华热忱。医疗队五人中除已先后返印的三人外，柯棣华大夫因病逝世于晋察冀边区，我国军民失一良友，印度人民失一优秀战士，至堪悼惜。现巴思华大夫返印，特向贵会及印度人民敬致谢意！当此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之际，我们希望印、华两大民族团结得更加坚固，以便与其他一切反法西斯国家配合作战，借以达到打倒法西斯，解放一切被法西斯压迫的人民，同时即借以解放印、华两大民族，获得两大民族的独立。

谨致

热烈的敬礼!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三年四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为感谢印度医疗队援华给印度国民大会的信。

复周恩来电[1]

（1943年4月6日）

此间日内即拟具给何应钦复电[2]，你收到后即转交何，但暂不公开发表，俟彼方有进一步反共表示时（例如由中央社发表反共广播），即将此电公开发表。此次我方应取守势，待彼方进攻再行反驳，而不应事先公开发表文件。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中共中央书记处4月5日会议决定由叶剑英起草给何应钦的复电，答复何应钦关于国共磨擦向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4月13日）

党内与党外的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进步的。思想自由与自由主义应有区别，党内有思想自由，但不能有自由主义。立场上的坚定性与策略上的灵活性要有区别。党内斗争也应有策略，过去反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模范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一号、第二号（关于领导方法）、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时讲话的一部分。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给凯丰的信

（1943年4月22日）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二日

致英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电[1]

（1943年4月23日）

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庆祝英共第十六次大会的胜利。我们认为这次大会，是英国人民在反法西斯奋斗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并相信它在加强英国工人阶级与英国民族的团结上，在加强英国与苏联、美国、印度、中国的团结上，在促进欧陆第二战场的实行上，都是能够收到成效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

[1] 这是英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给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贺电。

对王若飞来信的批复[1]

（1943年4月25日）

这些党播[2]，都写得很好，又简短，又具体，又生动，请送少奇、弼时、凯丰三人阅后发出。惟延安学习最好的是中直、军直，请你选择三五个典型，每个写成三五件党播（例如中央党校，不是一件党播能写得好的）。

---

[1] 这是毛泽东对王若飞22日关于送阅陕甘宁边区政府整风总结广播稿的来信批复的主要内容。

[2] 指党务广播稿。

复周恩来等电[1]

（1943年4月27日）

陇南、伊盟两处事件，事前我们毫不知情，事后未有任何一人参与，刘为章所称一切，全是诬词。现闻陇南事变扩大，叛民武装达二万人，伊盟七旗拥护沙王反对陈长捷、何文鼎杀人夺地、夺牛夺马等虐政。太行山战事，我一二九师亦是被“扫荡”者，蒋、庞[2]事前一意对我，现被敌攻，我军决不记前仇乘机图利。至于所谓横山事件，乃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遣所谓反共同盟军二百余人装作土匪分股侵入边区，我军只在境内剿匪，绝无一兵一卒跨越边境，刘为章所说完全违反事实。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答复刘斐所提的几个问题复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蒋、庞，指蒋鼎文、庞炳勋。

复周恩来电[1]

（1943年4月30日）

在国际酝酿反苏暗流下，国民党有发动反共宣传可能，你处准备答复是必要的，材料已要剑英即办。望向各方先作口头解释，并要求见何见张[2]见蒋，加以解释。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4月28日来电的主要内容。周恩来4月28日致电毛泽东、朱德，指出根据各方情况和刘斐的信，估计国民党有在报上公开反共的可能，请即将最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配合友军的情况以及他们进攻我军情况电告，以便将前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并向外国记者宣传我们的战绩。

[2] 何，指何应钦。张，指张治中。

致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电[1]

（1943年4月30日）

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解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问题致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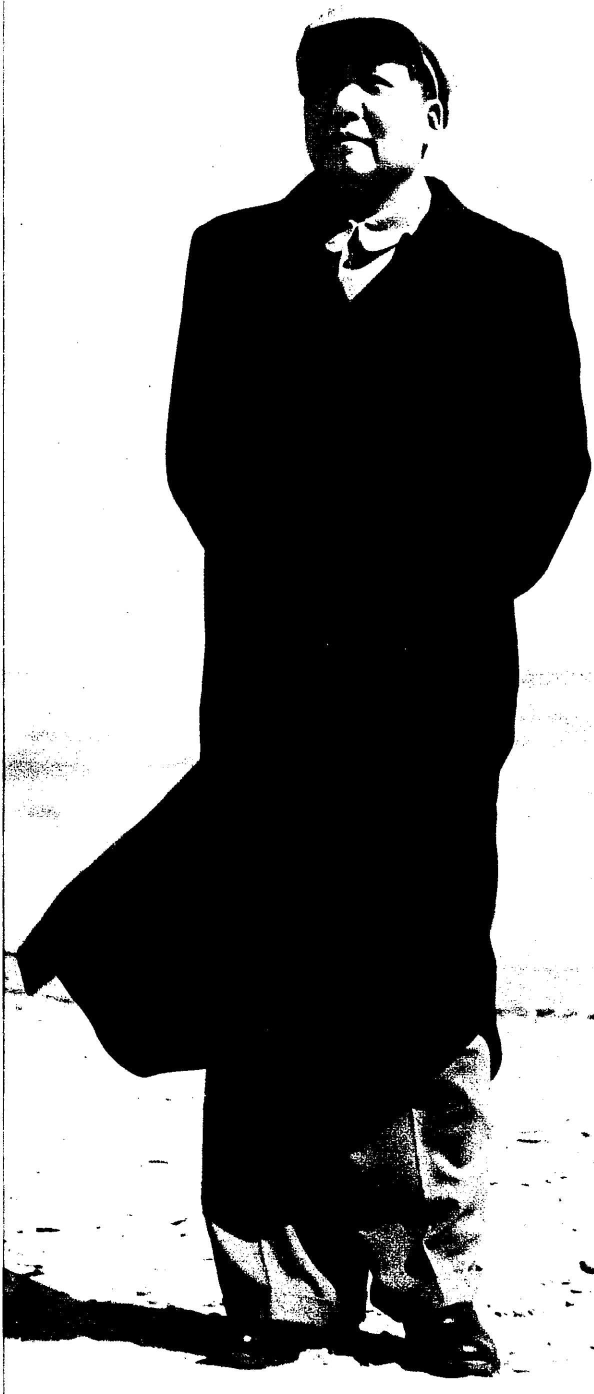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7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2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8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1

（1943年5月1日）

在志丹陵园红星纪念塔上的题词………………………………………3

（1943年5月2日）

给贾拓夫的信……………………………………………………………5

（1943年5月4日）

复周恩来等电……………………………………………………………6

（1943年5月8日）

致彭德怀电………………………………………………………………7

（1943年5月18日）

复周恩来电………………………………………………………………8

（1943年5月19日）

致周恩来电………………………………………………………………9

（1943年5月21日）

致周恩来电 ……………………………………………………………10

（1943年5月24日）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11

（1943年5月26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16

（1943年5月26日）

致周恩来电 ……………………………………………………20
（1943年5月26日）
在今后三年中应力求巩固，屹立不败 ……………………………21
（1943年6月1日）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23
（1943年6月1日）
为抗大七周年题词 ……………………………………………29
（1943年6月1日）
给周小舟的信 …………………………………………………31
（1943年6月1日）
复周恩来电 ……………………………………………………32
（1943年6月4日）
给彭德怀的信 …………………………………………………33
（1943年6月6日）
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 ………………………………………35
（1943年6月6日）
致周恩来电 ……………………………………………………37
（1943年6月9日）
致周恩来、林彪电 ……………………………………………38
（1943年6月1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9
（1943年6月16日）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 …………………………………………41
（1943年7月1日）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48
（1943年7月1日）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 ……………………………………49

（1943年7月2日）

致周子健电 ……………………………………………………………61

（1943年7月3日）

立即行动，制止内战 …………………………………………………62

（1943年7月4日）

致周子健电 ……………………………………………………………63

（1943年7月4日）

致董必武电 ……………………………………………………………64

（1943年7月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65

（1943年7月7日）

致周子健电 ……………………………………………………………66

（1943年7月7日）

致彭德怀电 ……………………………………………………………67

（1943年7月7日）

准备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 ………………………………68

（1943年7月9日）

复周恩来、林彪电 ……………………………………………………69

（1943年7月9日）

致周恩来、林彪电 ……………………………………………………70

（1943年7月10日）

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 ………………………………………71

（1943年7月11日）

质问国民党 ……………………………………………………………74

（1943年7月12日）

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 ……81
（1943年7月12日）

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的指示 ……84
（1943年7月12日）

复彭德怀电 ……85
（1943年7月12日）

致聂荣臻等电 ……86
（1943年7月1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87
（1943年7月13日）

致董必武电 ……89
（1943年7月13日）

致周子健电 ……90
（1943年7月13日）

复山东分局电 ……91
（1943年7月15日）

致朱瑞电 ……92
（1943年7月15日）

给博古、陆定一的信 ……93
（1943年7月19日）

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94
（1943年7月21日）

给林伯渠的信 ……96
（1943年7月24日）

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 ……97
（1943年7月30日）

和袁任远的谈话……100

（1943年7月）

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101

（1943年7月至10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06

（1943年8月2日）

给林森治丧机关的唁电……107

（1943年8月4日）

晋察冀应下决心实行精简……108

（1943年8月5日）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09

（1943年8月8日）

一面支持斗争一面保存干部……117

（1943年8月11日）

致聂荣臻电……118

（1943年8月12日）

致晋察冀分局电……119

（1943年8月12日）

对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的指示…120

（1943年8月13日）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22

（1943年8月15日）

给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128

（1943年8月16日）

对周恩来关于揭破国民党参政会的阴谋问题给毛泽东的信的批语…129

（1943年8月19日）

给胡乔木的信……131
（1943年8月20日）
致贺龙电……132
（1943年8月22日）
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133
（1943年8月22日）
给各负责同志的指示……134
（1943年8月25日）
致董必武电……135
（1943年8月27日）
在胡宗南等对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的情况反映上的批语…136
（1943年8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37
（1944年8月30日、9月1日）
复山东临时参议会电……139
（1943年9月1日）
对出版发行工作的指示……140
（1943年9月2日）
致陈毅等电……141
（1943年9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142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
给博古的信……144
（1943年9月11日）
复董必武电……146
（1943年9月26日）

复董必武电……147

（1943年9月28日）

致董必武电……148

（1943年9月29日）

对董必武来电的批语……149

（1943年9月底）

致董必武电……150

（1943年9月）

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51

（1943年10月1日）

宣传学习《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通知……158

（1943年10月）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60

（1943年10月5日）

关于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致董必武电……173

（1943年10月5日）

复董必武电……174

（1943年10月5日）

致晋绥分局电……175

（1943年10月9日）

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176

（1943年10月9日）

复董必武电……177

（1943年10月10日）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78

（1943年10月14日）

论合作社……187
（1943年10月14日）
致董必武电……191
（1943年10月17日）
给侯健存的信……192
（1943年10月21日）
致邓小平等电……193
（1943年10月21日）
视察南泥湾时的讲话……194
（1943年10月）
在致朱德电上的批示……196
（1943年10月）
宣传要点……197
（1943年11月4日）
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198
（1943年11月5日）
庆祝十月革命节给斯大林的贺电……200
（1943年11月5日）
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201
（1943年11月6日）
致邓小平等电……204
（1943年11月11日）
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205
（1943年11月13日）
在董必武来电上的批示……206
（1943年11月1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07
（1943年11月13日至27日）
复董必武电……………………………………………………………209
（1943年11月15日）
组织起来………………………………………………………………210
（1943年11月29日）
为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生产展览会题词……………………………225
（1943年11月29日）
为刘刚题词……………………………………………………………227
（1943年11月）
和邓宝珊、续范亭的谈话……………………………………………228
（1943年11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29
（1943年12月1日）
给续范亭的信…………………………………………………………230
（1943年12月4日）
致各中央局等电………………………………………………………231
（1943年12月10日）
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232
（1943年12月16日）
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234
（1943年12月17日）
给胡乔木的信…………………………………………………………249
（1943年12月20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50
（1943年12月22日）

致邓小平等电……251
（1943年12月22日）
给刘少奇的信……252
（1943年12月24日）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253
（1943年12月27日）
研究党的路线问题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255
（1943年12月28日）
在参观工农业展览会上的讲话……257
（1943年12月）
接见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的讲话……260
（1943年）
挽蔡和森、蔡畅母葛太夫人联……261
（1943年）
为严炳武题词……262
（1943年）
为王明祥题词……264
（1943年）
为王燮权题词……266
（1943年）
为延安枣园中央俱乐部题词……268
（1943年）
为中央印刷厂全体劳动模范题词……270
（1943年）
题写“光明在前”……272
（1943年）

给郭沫若的信……………………………………………………277
（1944年1月9日）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278
（1944年1月9日）
给彭德怀的信……………………………………………………280
（1944年1月10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281
（1944年1月10日、11日）
复张云逸、饶漱石电………………………………………………283
（1944年1月12日）
致山西省沁源县电…………………………………………………284
（1944年1月17日）
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应执行自卫原则………………………………285
（1944年1月18日）
给林伯渠的信……………………………………………………286
（1944年1月19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致邓小平等电上加写的话……………………………………………………288
（1944年1月24日）
和郭仲容的谈话……………………………………………………289
（1944年1月）
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290
（1944年2月4日）
对延安市民众代表的讲话…………………………………………291
（1944年2月7日）
给罗荣桓的信……………………………………………………294
（1944年2月8日）

应付阎锡山部六十一军东进的方针……295
（1944年2月8日）
复山东省文协电……297
（1944年2月8日）
在金城六日关于“抢救运动”冲击到钱拯及其子女的一份报告上的批示……298
（1944年2月8日）
致阎锡山电……299
（1944年2月8日）
致邓小平等电……300
（1944年2月9日）
复张云逸、饶漱石电……301
（1944年2月14日）
复邓小平等电……302
（1944年2月22日）
复邓小平、滕代远电……303
（1944年2月26日）
关于宪政问题……305
（1944年3月1日）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306
（1944年3月5日）
复黎玉等电……317
（1944年3月5日）
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318
（1944年3月15日）
给罗荣桓等的指示……321
（1944年3月16日）

为马本斋题写挽词……322
（1944年3月17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324
（1944年3月22日）
关于对国民党顽军应采取自卫原则的指示……340
（1944年3月27日）
给周扬的信……342
（1944年4月2日）
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344
（1944年4月3日）
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等电……346
（1944年4月3日）
致罗荣桓等电……347
（1944年4月5日）
给陈毅的信……348
（1944年4月9日）
挽钟太夫人联……349
（1944年4月10日）
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上加写的一段话……350
（1944年4月11日）
学习和时局……352
（1944年4月12日）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365
（1945年4月20日）
在林伯渠报告上加写的一段话……411
（1944年4月14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412
（1944年4月15日）
致滕代远、邓小平等电……………………………………………………413
（1944年4月22日）
给李鼎铭的信………………………………………………………………414
（1944年4月29日）
致董必武等电………………………………………………………………416
（1944年4月30日）
和续范亭的谈话……………………………………………………………417
(1944年4月30日)
复林伯渠电…………………………………………………………………418
（1944年5月11日）
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419
（1944年5月1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425
（1944年5月19日）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426
（1944年5月20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427
（1944年5月21日）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436
（1944年5月22日）
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438
（1944年5月24日）
延安大学教育方针…………………………………………………………448
（1944年5月24日）

给胡乔木的信……451
（1944年5月27日）
为中央直属机关个人生产展览会题词……452
（1944年5月28日）
致林伯渠电……454
（1944年5月31日）
为特等劳动英雄李强题词……455
（1944年5月）
为特等劳动英雄钱志道题词……457
（1944年5月）
为特等劳动英雄陈振夏题词……459
（1944年5月）
对中共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的讲话……461
（1944年5月）
复林伯渠等电……462
（1944年6月3日）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463
（1944年6月5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471
（1944年6月12日）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479
（1944年6月14日）
致晋察冀分局电……484
（1944年6月14日）
致中共各中央局等电……485
（1944年6月18日）

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上加写的一段话……………………486
（1944年6月22日）
长沙失陷后的危机* ……………………………………………………487
（1944年6月24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491
（1944年6月28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492
（1944年6月30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493
（1944年6月30日）
为延安卫生展览会题词………………………………………………494
（1944年6月）
中共中央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496
（1944年7月1日）
给丁玲、欧阳山的信…………………………………………………501
（1944年7月1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503
（1944年7月2日）
发展边区经济文化……………………………………………………504
（1944年7月3日）
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506
（1944年7月5日）
在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上加写的一段话…………………512
（1944年7月5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513
（1944年7月7日）

中共中央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的宣传工作的指示[1]

（1943年5月1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

关于何时打败日本问题：

（一）当苏联提出一九四二年打败德国时，是以英、美约定于一九四二年建立第二条战线为根据的，在当时不但可以而且应该提出此种口号以为动员努力之目标。但当英、美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又无新的约定时，就没有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这是情况变化宣传必须随之变化的实例。

（二）当苏联根据英、美约定提出上述口号时，我党亦提出一九四三年打败日本的口号，这也是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的。但当英、美没有履行诺言因而去年打败德国没有实现时，我党即不应继续宣传此种口号，而应向群众解释今年所以还不能打败日本的原因，鼓励群众坚持努力争取胜利。关于此点，中宣部过去宣传要点曾有解释，去秋以来的《解放日报》亦已改变论调。

（三）但有个别根据地上的领导同志至今还不了解此种意义，不但不去作正当解释，反而机械地继续宣传今年打败日本的口号，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党内指示。

致引起人们怀疑、提出询问，仍然不知道如何解释，屡电中央询问。这是不知道宣传应随情况变化而改变的原故。

（四）今年英、美是否开辟第二条战线，或苏联是否能于今年独立打败希特勒，此时都还不能断定。苏联现在已提出准备决战口号，红军实力已极大增加，故今年打败希特勒有极大的可能性，但也有要待明年才能打败的可能性。如果今年能打败德国，则明年自有可能打败日本，否则还要推迟时间。各地宣传，在目前几个月内不要去强调打败日本的时间，等到欧洲形势充分明朗时，中央及《解放日报》自有指示。

（五）对于过去口号，在疑问者多、需要公开解释地方则公开解释之，仅有个别同志询问者则个别答复之，无疑问地方则不作解释。

（六）各中央局及分局须作长期坚持打算，准备再作两年至三年的极端艰苦斗争，并须准备或有的意外变化。如胜利早临，我们并不吃亏；如胜利延迟，我们早有精神准备及工作准备。

中央书记处

五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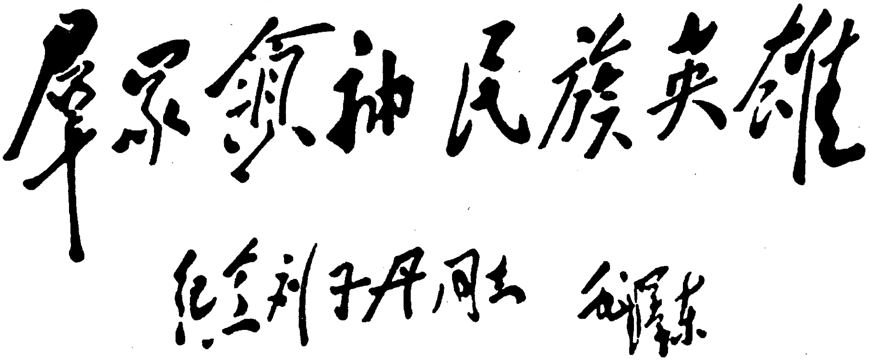
在志丹陵园红星纪念塔上的题词

（1943年5月2日）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纪念刘子丹[1]同志。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是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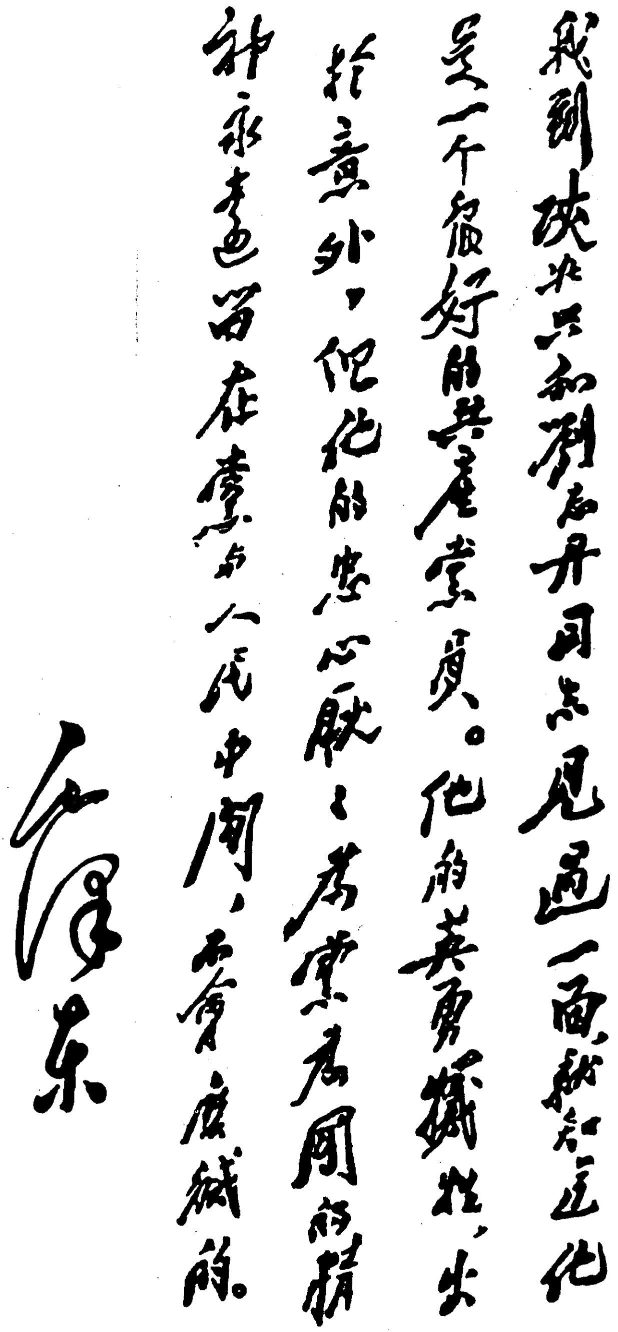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纪念刘子丹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志丹陵园红星纪念塔的题词。

---

[1] 原名子丹，后改为志丹。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和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刘志丹纪念塔的题词。

给贾拓夫的信[1]

（1943年5月4日）

彭德怀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在边区是否可行？应否与如何改变现在公营商店的方针、性质？请你研究一下，并和高、贺[2]、陈云诸同志谈论一番，以其意见写出交我为盼！贸易公司就是公营商店，在此次高干会上是实现了彭文所指的方针的；其他机关、部队的商店，实是私营商店，不过以公营为名而已，要使这类商店实行彭文方针，似是不可能的，因它们是以为本机关、部队营利为目的，而真正的公营商店，是不以为自己营利为目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研究彭德怀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给贾拓夫的信的主要内容。1943年5月1日，彭德怀关于他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致信毛泽东："最近与华北来延某些干部谈及公营商店未得到解决，特别冀鲁豫、山东、太岳问题更多些，即延安最近会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金融政策及公营商店似还欠明确方向，我写了一个《论公营商店》，请审阅，如无多毛病，请加以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2] 高、贺，指高岗、贺龙。

复周恩来等电[1]

（1943年5月8日）

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已到延安[2]。斯大林“五一”声明后国际形势将好转，第二条战线今年可能开辟，今冬明春可能击败德国，国民党可能对我好一点，目前彼方可能不发动宣传攻势，故我们不应先作公开声明，只作文电声明及口头解释。《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等问题复周恩来并告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1943年2月从延安撤回重庆，由徐佛观、郭仲容接替他们的工作。

致彭德怀电[1]

（1943年5月18日）

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因此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该地敌、我、友三方情况如何望即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在陵川、林县一带避免和国民党军发生冲突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3年5月19日）

太南作战，日军先攻孙殿英[2]、庞炳勋，后攻我第一二九师，孙、庞大败，第一二九师奋战半月，已获胜利。我已电告彭德怀，该地配合作战之我军部队即速北撤（该地似已无国军），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孙殿英，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

致周恩来电[1]

（1943年5月21日）

政治局会议于二十一日决定，完全同意此种提议。俟收到国际主席团正式提议后，当即发表中央的正式决定。你处收到国际主席团文件后应与各报同时在《新华日报》发表，但不作评论，俟收到中央决定后即公布中央决定，并发表拥护之社论。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3年5月24日）

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

（1943年5月26日）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吗？

是的，它是这样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会议主要是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2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5月22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5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提议。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6月10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只有二十二年的历史，但却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

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和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四天来各国对于解散共产国际的舆论，综合起来看是：反法西斯同盟各国的一切正义人士，对此举动都交口称誉。但法西斯国家却不同，一切血腥的侵略者，过去曾经订立过反对共产国际协定的，现在却似乎不愿意共产国际的解散，你们看奇怪不奇怪呢？他们都异常狼狈地在拼命指责共产国际的解散。在同盟国[1]中，例如斯德哥尔摩与伦敦两地社会民主党中的顽固派分子，从前以“受共产国际指令”为理由，拒绝本国共产党加入该党，现在却又不欢迎共产国际的解散，也算一件小小的怪事。

现在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国家的任务，在于使工人运动归于统

---

[1]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一，以便有力地迅速地打败法西斯。此种工人运动中的顽固派，因为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他们失去了借口，他们就很不高兴，甚至说各国共产党也应该解散。中国也许会有这一类毫无常识的议论出现，我们且看一看吧。但是我相信：全中国大多数正义人士是不会附和这种议论的，其理由就是因为这种议论缺乏任何起码的常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1]，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现在共产国际没有了，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担负了极大的责任。从这种责任心出发，就要发挥共产党人的创造力。我们正处在艰难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人后方抗拒着极其强大的敌人，我们的环境很艰苦，战争的时间还很长。但是这种长期的艰苦的斗争，正好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用心地想一想，绝不粗枝大叶，自以为是；使我们认真去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老一套的党八股作风，而拿出完全的负责的态度与高度的创造力来。

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第一，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任何破

---

[1] 1943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坏团结的行为都是罪恶，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被我们战胜的。第二，全党同志都要善于团结人民群众，这里我想要请同志们学习近日《解放日报》报道的陈宗尧、左齐两位同志的榜样。陈宗尧同志是八路军第七一八团的团长，他率领全团走几百里路去背米，他不骑马，自己背米，马也驮米，全团指战员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人人精神百倍，无一个开小差。左齐同志是该团的政治委员，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开荒时他拿不了锄头，就在营里替战士们做饭，挑上山去给战士们吃，使战士们感动得不可名状。我们全体党的干部，都要学习这两位同志的精神，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1943年5月26日）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

（二）共产国际曾完成了它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不仅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保护了那被机会主义者所糟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帮助了先进工人团结成为真正的工人政党；支持了社会主义的苏联；百折不挠地反对了法西斯主义与法西斯战争；而且用了它的一切可能帮助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帮助了被压迫民族的先进工人组成自己的政党，成为站在一切解放运动最前头的人民先锋队。特别使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是它用了一切可能的力量，在一九二四年，当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帮助了国共合作的形成，随后又帮助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再则，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期间，中国革命处于最困难地位的时候，它又声援了中国革命的人民。最后，在一九三七年以来的六年抗日战争中，它又号召各国支部及各国劳动人民，帮助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总之，在共产国际存在的一切时期中，对于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是尽了它一切可

能的力量来给予援助的。但时至今日，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的提议书上所说，因为各国内部和国际间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这个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各国工人运动的继续增长；因为在当前的反法西斯主义同盟的解放战争中，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争取更加广泛与更加迅速的民族高潮和群众动员，借以达到彻底的完全的胜利；因为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干部的成长和政治上的成熟；由于这种种理由，故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由于目前战争情况，不允许召集国际代表大会来讨论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故由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向各国共产党作出此种提议。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一提议书上所说的理由，批准共产国际之解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指出：在马克思解散第一国际之后，各国工人运动是更加发展了。现在第三国际之宣布解散，无疑将使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全人类的解放更加迅速地到来。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凡是那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中国共产党从创立时起，即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为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道路，而且全党同志以身作则，忠心不贰，为自己民族的一切解放事业而奋斗，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

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自一九三五年八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不干涉各国共产党组织事宜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遵照此种决定，没有干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事宜。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各种革命力量，是中国一切进步方面的支柱，而自抗战以来，即在敌后进行历史上空前艰苦的斗争，这些革命力量完全是中国共产党赤手空拳，不假借任何外力，而独立创造起来的，可以说，在最近数十年的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革命不能输出，亦不能输入，而只能由每个民族内部的发展所引起。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所阐发的真理，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完全把这个真理证明了。在此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他们将继续英勇地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和国民党及一切抗日党派、无党无派人士合作，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措施，战胜日寇及其同盟者——德意法西斯，完成独立民主新中国的大业。

（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运动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的创造才

能，一如他们在革命实践上的创造才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完成中国人民所赋予的各种历史大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深信我党同志必能完全一致地团结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果能如此，那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还很强大，我们前进路上的困难虽然还很多，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致周恩来电[1]

（1943年5月26日）

中央对国际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作出决定，即日由战报发来，你收到后，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外，并请即交塔斯社驻渝代表，请他们全文发莫斯科，此间不再发去。《解放日报》另有社论一篇，亦将发给你。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今后三年中应力求巩固，屹立不败

（1943年6月1日）

德怀[1]同志：

（一）有电[2]悉，同意对太南处置办法。（二）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西西[3]与复兴）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彼方对东条[4]扶汪[5]倒蒋[6]新政策毫无对策，投降者增多，战力大损。英、美仍是集中对德，援华甚少，口惠实不至，彼方无丝毫办法。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天天宣传我党“罪状”，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此外亦无办法。甘、黔、川、陕民变四起，规模甚大，除镇压外，无他办法。党内纷争不绝，有增长趋势。凡此均使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2] 指彭德怀1943年5月2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对太南的处置办法是：一、对归马法五指挥的庞炳勋残部，争取其坚持抗战，以免为敌利用。其放弃之安阳、林县地区，我应去建立政权。二、刘进派特务与我谈判，我采取共同合作，逐步取得优势而巩固之。三、对孙殿英及其残部，目前不宜正面利用他，但可经过他去做伪军工作。

[3] 西西，即“CC”，是国民党内的法西斯组织中央俱乐部的简称，其首领是陈果夫、陈立夫。

[4] 东条，即东条英机（1884—1948），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5] 汪，指汪精卫，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6] 蒋，指蒋介石。

抗战局势，处于日益困难地位。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三）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1]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

六月一日

---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这一政策规定，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

（1943年6月1日）

（一）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二）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一九四三年的整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和地委，除提出一般号召（全年整风计划）外，必须在自己机关中和附近机关、学校、部队中，选择二、三单位（不要很多），深入研究，详细了解整风学习在这些单位的发展过程，详细了解这些单位中若干个（也不要很多）有代表性的工作人员的政治经历、思想特点、学习勤惰和工作优劣，并亲自指导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具体地解决各该单位的实际问题，借以取得经验。一机关、一学校、一部队内部也有若干单位，该机关、该学校、该部队的领导人员也须这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

去做。这又是领导人员指导和学习相结合的方法。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这一方法必须普遍地提倡，使各级领导干部都能学会使用。

（三）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凡属真正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领导骨干，必须是从群众斗争中逐渐形成，而不是脱离群众斗争所能形成的。在多数情形下，一个伟大的斗争过程，其开始阶段、中间阶段和最后阶段的领导骨干，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许多地方和许多机关工作推不动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缺乏这样一个团结一致、联系群众的经常健全的领导骨干。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

建立领导核心问题[1]，我们应该应用到一切大小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和农村中去。这种领导骨干的标准，应当是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中所举的四条干部标准（无限忠心，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无论是执行战争、生产、教育（包括整风）等中心任务，或是执行检查工作、审查干部和其他工作，除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以外，都须采取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四）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五）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在组织中在斗争行动中发生正确关系的思想，正确的领导意见只能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思想，在领导意见见之实行时要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互相结合的思想，都必须在这次整风中普遍地加以宣传，借以纠正干部中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

---

[1] 参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3页）。

[2] 参见季米特洛夫1935年8月13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结论《为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斗争》的第七部分《干部问题》。

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领导。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而欢喜主观主义地自作聪明地发表许多意见，因而使自己的意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论。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这次整风，必须纠正这些缺点，在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中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并在以后应用此种方法于一切工作。

（六）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告诉别人也这样做），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比较好的领导，就是从比较善于这样去做而得到的。

（七）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

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审查干部，如果仅仅由组织部这个领导机关的少数人孤立地去做，必不可能做好；如果通过某一机关或某一学校的行政负责人，推动该机关该学校的许多人员、许多学生，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全体学生都参加审查，而上级组织部的领导人员则正确地指导这种审查，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审查干部的目的就一定能完满地达到。

（八）在任何一个地区内，不能同时有许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个地区的总负责人，必须考虑到该处的斗争历史和斗争环境，将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无计划，只按上级指示来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的“中心工作”和凌乱无秩序的状态。上级机关也不要不分轻重缓急地没有中心地同时指定下级机关做很多项工作，以致引起下级在工作步骤上的凌乱，而得不到确定的结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这也是在运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这些原则时，必须注意解决的领导方法问题。

（九）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各个细节问题，这里不一一说到，希望各地同志根据这里所说的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斗争愈是艰苦，就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要

求密切地相结合，愈是需要共产党人的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密切地相结合，而彻底粉碎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为抗大七周年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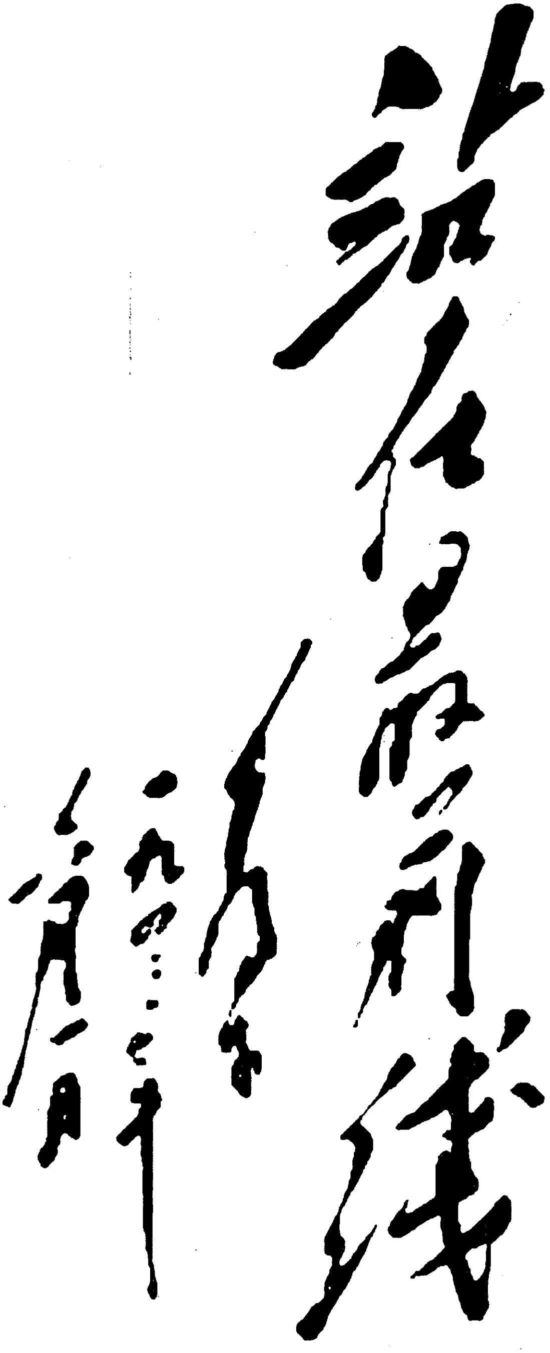
（1943年6月1日）

站在最前线。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抗大成立七周年（自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开学算起）的题词。


站在最前线
毛泽东
一九四三年
六月一日

毛泽东为抗大成立七周年的题词。

给周小舟[1]的信

（1943年6月1日）

小舟同志：

一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所见很对，循此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去年的信也收到，曾复一信，恐已遗失。一个人只要无限忠心，什么缺点也易于纠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毛泽东

六月一日

---

[1] 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任中共冀中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

复周恩来电[1]

（1943年6月4日）

陕甘宁边区今年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私生活已大改善。参加“三三制”之党外人士情绪很好，认为只有我党有办法，边区为全国唯一乐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诸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大为克服，六月一日中央又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当使全党领导方面有一进步。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5月30日来电并告林彪、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给彭德怀[1]的信

（1943年6月6日）

德怀同志：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于某部分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策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之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上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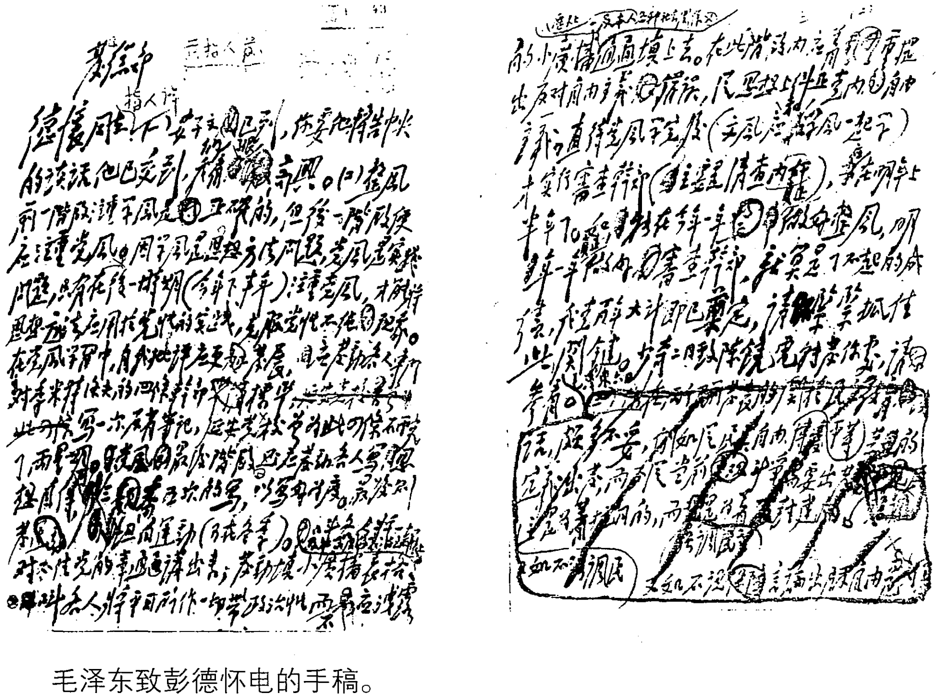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亦不合事实等。你前说的《党内生活》[1]已收到，俟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泽东

六月六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手稿。

---

[1] 《党内生活》，是中共中央北方局1939年11月15日出版的党内刊物。

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1]

（1943年6月6日）

德怀同志：

（一）安子文已到。你要他转告中央的谈话他已交到，我们看了很高兴。（二）整风前一阶段注意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发动各人专门对季米特洛夫的四条干部标准，写一次反省笔记，延安党校曾为此四条研究了两星期。党风最后阶段还应发动各人写思想自传，可三番五次地写，以写好为度。最后则发动坦白运动（可在冬季），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发动填“小广播”表格及社会关系表，在这个两个表上，叫各人将平日所作一切带政治性而不应泄露的“小广播”及本人历史上各种社会关系通通填上去。在此阶段内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应在明年上半年了。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

---

[1] 这是毛泽东1943年6月6日关于如何抓好整风问题给彭德怀的信。

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少奇二日致陈、饶[1]电转发你处，请参看。

毛泽东

六日

---

[1] 即陈毅、饶漱石。

致周恩来电[1]

（1943年6月9日）

（一）回延宜速勿耽搁；（二）望带孔原[2]回延，留少文[3]为董[4]助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孔原，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3] 少文，即刘少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部长。

[4] 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在周恩来回延期间任代理书记）兼宣传部和统战部的部长。

致周恩来、林彪电[1]

（1943年6月15日）

何时动身，盼于七月一号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6月16日）

一

现在苏联的力量增加，有可能在今年冬季把德军打出去。关于国共关系，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不刺激国民党，也没有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去年我们估计国民党在五月会有一次反共高潮，但没有来，只搞了两次反共宣传。最近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时，蒋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国民党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

二

我看日本的崩溃是必然的，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形势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态度。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边区现在进行生产建设、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做得很好。我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整风一年，读马列主义一年，读中国问题一年。我们的对敌政策是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对国民党是避免公开武装冲突，把同盟者国民党的力量用去对付日本；对民政策是拥政爱民，发展生产，使我党与农民关系弄好；对党内是保存干部，教育干部，进行整风。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1]

（1943年7月1日）

今天是纪念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周年和抗日战争的六周年。现在，全世界全中国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任务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打败人类公敌——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

中国的抗战已经六年，就时间来说比别国都更长些。一年以来，世界战争的形势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过去是全世界各国被法西斯进攻，法西斯主动地进攻世界的一切国家，并且在进攻中打胜仗和压迫反法西斯国家。这就是过去的情况，就是说是一种不利的、艰难困苦的情况。现在的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起了根本的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苏联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太平洋上英、美的胜利，和中国抗战的坚持六年，就是造成这个根本变化的原因。其中特别是斯大林格勒的大胜利[2]，起了转变形势的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和抗战六周年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2] 1942年7月17日，德国侵略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前后共使用150万以上的兵力，企图占领该城。苏军先后以3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了大量的敌人，11月19日转入反攻，23日包围了33万德军，1943年2月2日将被包围的德军全部歼灭。从此，迫使德军停止了战略进攻，苏军转入战略反攻。

要决定作用。过去，法西斯侵略者非常猖獗，主动权握在他们手里；现在，法西斯侵略者已经丧失了主动权，主动权转到了同盟国[1]的手里了。今后的问题，是要彻底打败法西斯侵略者。这要分为两步，首先打败德国，然后打败日本。今后的一年，很可能是欧洲决战的一年。去年我们曾经说过，欧洲在一九四二年即可进行决战，但是后来因为欧陆第二条战线没有开辟，因此没有实现。今年的关键还是这个欧陆第二条战线，它愈早建立起来，胜利也就愈早到来。

我们共产党过去时时指出趋势，指出可能性，为的是使大家在困难中看到光明的前途。现在同盟国的被动状况已经结束，转到了主动，所以过去只是可能性的东西，今天就要转变为现实的东西了。今天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条战线，但此事成为现实，一定是不会很久的了，这是今天全世界人类努力的目标。

对于中国战场，如果打倒了大头子希特勒，那末二头子日本法西斯也一定被打倒。大后方有一部分人弄不清楚这一点，不赞成先打倒希特勒，这是不对的。现在全世界结成了整个的反法西斯战线，任何国家都不是孤立地作战，所以在决定战略的时候，不应只从一个国家的眼前利益来看，而要看先打败哪一个法西斯国家对于整个反法西斯阵线最为有利。这样来看，就可以知道，打倒了希特勒，解决日本便会是很顺利的了。

这样比较了过去六年抗战与目前形势之后，可以断定，过去我们所指出的光明前途，现在接近实现了。

总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可以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

---

[1]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世界作一比较，把二十二年前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作一比较。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的结论，就会使我们对光明的新世界和光明的新中国增强信心，我们就知道世界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中国将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否世界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世界，中国将很快成为光明的中国。

首先比较两次世界大战。三十年来世界上爆发了两次空前规模的战争，这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列宁正确地预见了，而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斯大林，他们的正确预见，证明马列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真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那时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别国的很少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那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是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其党员则绝大多数是还不觉悟的。这是三十年前的情形。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的面貌全变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

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三年，才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相隔不过二十多年，现在它变成了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没有苏联红军、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者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格勒一战，人类的命运就还在不可知之数。有了一个列宁、斯大林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旧的俄国经过革命变成社会主义的苏联。世界上有了这一块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就影响整个世界，以至现在成为全世界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

再就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之

后，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成立，于是在东方，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一年成立，日本共产党于一九二二年成立，印度共产党于一九二〇年成立。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前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却已经成了这样的大政党。

中国共产党在其自己经历的二十二年中，进行了三次大的革命运动，其中第三次就是联合全国人民组织统一战线，集中力量对付日寇。我们现在绝非只是孤立的一个党，而是有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和我们一起反对法西斯，有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日寇匪首东条[1]爱说什么“十亿民众”，但这十亿民众即中国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印度的四万万人，南洋的一万万人，日本、朝鲜以及台湾[2]的一万万人，实际上都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

现在的中国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国相比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时的中国没有共产党，人民不觉悟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外国人有好坏两种还分不清，不知道将外国人区分为帝国主义者与善良的工农大众。那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了七十年，但中国一般人还不知道它，学校里教员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时，往往连马克思的名字也不知道。那时中国已经有了旧民主主义的文化，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则还没有，那时甚至还不承认白话

---

[1]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2]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4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强占了台湾及澎湖列岛。1945年日本投降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于10月25日在台北举行接受驻台日军投降仪式，宣布“从今日起，台湾以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

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也是参战国之一，可是只替帝国主义者帮了忙，自己的半殖民地地位却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深了。

现在的中国则是抗战的中国，人民觉悟到参加反法西斯的国际阵线来同法西斯作战。有了共产党，文化方面也进步了。我们常常把眼前的许多进步事情当作家常便饭，其实比起从前来，乃是改朝换代似的大变化。

由此可见，不仅在抗战的问题上，六年来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就三十年前后的世界与中国来说，也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情景，那是翻天覆地的大进步。这种进步，是人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这一次的反法西斯战争，必然要创造出一个更加进步的世界、一个更加进步的中国来。法西斯想拉着世界往后退，那是不行的。向前进步，这就是我们的大方向。

有了大方向还需要有政策。我们的政策可分全国的和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两部分。关于全国的政策，即将发表的我党中央纪念抗战六周年的宣言[1]中，提出了向政府的四条建议，这就是“加强作战”“加强团结”“改良政治”“发展生产”。至于抗战胜利之后怎么办，我党中央去年发表的“七七”宣言[2]中已经说得很清楚，在战后我们希望与各党各派继续合作，共同建国。

我国的抗战，现在有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敌后战场的斗争非常残酷，我们共产党在那里做了很大的努力，几年以来，我们创造了许多新东西，例如反“扫荡”、反“蚕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拥护军队、生产运动、整顿三风等等。对于别的地区，我们看

---

[1]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于1943年7月2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2] 指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

见什么缺点，只有提建议，但在边区与敌后则不然，我们可以自己动手来改正，所以我们应当把工作做得更好些。

抗战六年来我党在敌后与边区的政策，可以分做两个时期来总结，第一个时期是抗战开始后的四年半（到一九四一年底为止），第二个时期是最近的一年半。

在第一个时期中，党的注意力放在下列问题上：如何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发动群众，如何与友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进攻，如何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制定各种政策如土地政策、劳动政策、“三三制”政策等等。这些都是那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四年半的靠后的一年半中，还曾被迫去对付反共分子所发动的两次大磨擦。

在第二个时期即最近的一年半中，除了继续进行上述各项工作而外，又进行了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军运动。整顿三风这件事保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和党的组织成分的纯洁。这些工作仍须继续不懈地进行下去，借以保证抗战的胜利。一切为了战胜敌人，为了克服现在的困难，迎接将来的光明。

毛泽东接受群众献旗。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1]

（1943年7月1日）

康生同志：

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请登载下列数语为盼！

毛泽东

七月一日

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

错误路线是：“逼，供，信。”

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

---

[1] 这是毛泽东给康生的信，要其将这段文字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登载。

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1]

（1943年7月2日）

我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反对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年了，当此抗战六周年纪念的伟大节日，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与法西斯侵略同盟两大阵线发生了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愿向我全国同胞全体将士发表自己的意见。

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2]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

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现在是处在空前有利的形势中。这

---

[1] 这个宣言是毛泽东起草的。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就是：

第一，苏、英、美三国的团结，由于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与英、美在北非的第一个有计划的联合作战，而更加巩固了，法西斯侵略国想用和平诡计离间苏、英、美团结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这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具有历史意义与最值得庆幸的。

第二，苏、英、美战胜德、意法西斯的决战，将在今后一年中展开起来。这个决战，本来在过去一年中就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英、美未能实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决定，所以推迟了一年。目前则是在苏、英、美三国第一个联合作战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候，在苏、英、美三国的陆军空军与英、美两国的海军已经发展成为无敌力量的时候，苏联从东线、英美从西线举行第二个第三个更伟大的联合作战，给予德、意法西斯以最后决定性的打击的时机，是已经成熟了。只要欧洲大陆上能够迅速开辟第二战场，则在今后一年中打败德、意法西斯是毫无疑义的。过去一年中已经建立了打败德、意法西斯的一切先决条件，今后的一年就将是一个决战的年头了。

第三，苏、英、美团结的巩固与对德、意法西斯决战的实现，将不但是德、意法西斯的失败，也是日本法西斯的失败。因为侵略国的首领是希特勒，希特勒的失败就是一切法西斯的失败。有些中国人不希望同盟国先打败希特勒，或者是因为头脑不清醒，或者是因为不愿意希特勒法西斯制度归于失败，也就是不愿意日本法西斯失败，否则是不能解释的。

第四，太平洋上的形势，也因美国力量的增强，英、美联军的几次作战胜利与中国的坚持作战，而转变为对同盟国有利，对日本法西斯不利。美国力量还在猛烈地增长着，日本法西斯虽然企图用其短腿和美国赛跑，但无论如何是要被打倒的。日本法西斯对于美

国在一年中制造飞机十二万五千架，坦克十二万辆，大小军舰二千艘与船舶二千万吨的生产计划，表示极大的恐慌，正是很自然的道理。

在法西斯侵略国方面，则有如下的显著的变化：

第一，是法西斯侵略国已经陷入国际上完全孤立的地位。过去一年中，由于苏、英、美三国对于德、意匪军的第一个胜利的联合打击，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对于日寇的威胁与中、英、美三国在太平洋上及中国战场上对于日本匪军的打击与合围，使得所有这些法西斯国家均感到死亡的威胁。于是他们就施行和平诡计，企图离间英美与苏联的神圣的同盟关系，妄想有一方能够和他们订立苟且的和平，以便他们先击破另一方，达到挽救他们自己，并整个灭亡全世界的目的。但是，此种诡计已经遭到英美与苏联一致的坚决的打击，于是不论德、意法西斯，或日本法西斯，就均只剩下“无条件投降”一条死路了。法西斯国家又企图拉拢现在尚未加入战争的各中立国家。但是某些被希特勒们原来希望拉入侵略集团的中立国，现在看见侵略国大势已去，不愿加入了。某些原来倾向同盟国，但因畏惧侵略国的攻势而表现犹疑与动摇的中立国，现在也已经结束或正在结束这种犹疑与动摇。和平诡计既已破产，拉拢中立国的阴谋又不成功，这样就使一切法西斯侵略国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第二，是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团结亦已发生危机。在反侵略同盟国的军事胜利与外交胜利的打击下，就使法西斯侵略国内部的不和生长起来，并已造成了危机。这个危机，不但生长在德、意两国之间，也不但生长在德国与其各附庸国之间，而且也生长在德、日两国之间。由于希特勒的战争失败与外交失败，希特勒维系意大

利、日本及各附庸国的威信已经突然下降。意大利内部正在生长着一种要求退出战争的力量。日本内部的极端亲德派亦已受到其他派别的排挤，只要希特勒再遭遇一二个如同斯大林格勒与北非那样的打击，日本统治阵营内的任何派别都将不敢再依靠希特勒，不敢再依靠法西斯同盟了。到了这种时候，法西斯侵略同盟不但在其外部处于完全的孤立地位，即在其内部亦将处于各个孤立的地位。这种对于日本法西斯在国际上陷入完全孤立地位的威胁，使得日本法西斯匪首东条[1]在过去一年中，不得不向中国沦陷区及南洋各占领地的民族叛徒们提出了一种所谓“新政策”的无耻诡计，给这些叛徒们挂上“独立”的假面具，以壮自己的声势，并妄想欺骗坚决抗日的中国人民与印度人民。匪首东条的所谓“新政策”，不是任何什么有利于日本法西斯的情况的反映，而仅仅是日本法西斯在国际地位上已陷入完全孤立状态这一种情况的反映。

第三，过去一年反法西斯同盟的伟大胜利，又造成了法西斯侵略国家的军事危机。不管希特勒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再一次向苏联进攻的冒险计划，也不管日本参谋部中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放弃向苏联进攻或向其他方面进攻的冒险计划，但是“大势已去”的感觉是笼罩着一切法西斯国家的军队与人民，总的主动权是已经落入同盟国之手而离开了侵略国之手，这是毫无疑义的了。成为战争基础的物质力量，例如人力资源、军备资源与生活资源，同盟国方面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极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对于侵略国已经占了优势；加上今后一年的动员，毫无疑义，同盟国将占到压倒的优势。而在侵略国方面，则德、意的资源已经变到接近枯竭的阶

---

[1]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段，日本在生产上亦快要达到它的顶点，这样就更加造成了一切侵略国的严重的军事危机。

第四，一切法西斯侵略国，由于它们的国际孤立、内部不和、军事危机这样许多的因素，再因为它们的残酷的惨无人道的统治，就造成了在它们国内与在它们占领区内的政治危机。一切侵略国家，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将军与士兵之间的裂口，正像火山的裂口一样，一天一天地扩大起来，酝酿着巨大的爆炸。这是一支从法西斯脚底下轰掉法西斯的大军，其爆炸的时间，必然在法西斯的内外危机达到其顶点的时候，突然地轰发开来。我们只要回想一下一九一八年德、奥帝国主义所处的情境，就会相信这一点。我们也只要看一看过去一年中国沦陷区的民心与日寇军队的兵心曾经发生何等样的变化，就可以推断，这样继续下去，日寇的政治危机的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了。日寇的本国人民是一座火山，日寇所统治的中国人民、南洋各地人民、朝鲜人民与台湾人民，又是许多的火山，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国在内）给予日寇几个严重的军事打击，这些火山是会爆发起来的。

同胞们！将士们！中国抗战已经六年了，我们的抗战是在极端艰苦的情境中实行的。我们与苏、英、美诸同盟国是不同的，他们是先进的工业国家，我们是落后的农业国家。但是我们仍然艰苦地进行了整整六年的抗战，超过任何国家的抗战时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与全军将士的努力。在抗战第六年中，我们遇到了同盟国与侵略国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变到于我们及同盟国极端有利、于侵略国极端不利的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的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到

了那时，东方法西斯的失败与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也就接着会要实现了。

毫无疑义，不论西方与东方，战胜敌人与实现解放还须给出绝大的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努力，胜利与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是反对法西斯同盟的一员，处在现在这样极端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怎样努力呢？我们是一个农业国，比不上工业的先进国，但是我们有广土众民的优点，我们的人民又是富于斗争的坚忍性的，六年的抗战就是明显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努力才算是很好地配合苏、英、美各同盟国的作战，尽到我们应尽的职责呢？六年抗战中我们积累了许多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经验，求得比较过去更多的成绩，借以克服现有的许多困难，并在将来对敌反攻时准备好我们的力量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

应该加强作战。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特别是因为处在敌后战场上的抗日军民，他们抗击了日本匪军的半数以上，而其处境则较之正面战场要困难百倍，因此加强对于他们的援助是义不容辞的。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这两个战场的互相援助与特别加强对于敌后抗战军民的援助，才是加强整个中国战场作战努力的具体办法。而在过去数年中，对于敌后战场上的绝对大多数抗战军民是没有什么援助的，正面战场作战的积极性也是很不够的，我

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改进。在日寇与汪[1]逆的阴谋勾引之下，最近数年中，高级将领率部投敌叛卖祖国者，竟达三十三人之多，未闻政府通令讨伐，由是伪军突增，日汪所谓“新政策”的欺骗，得以到处宣传，肆无忌惮。我们希望政府对于这种现象，能够有所处置，以振军心而利抗战。为了加强作战，兵役制度的改革是急不容缓的。现行兵役制度中存在着的许多严重缺点，例如捉人、捆绑、贿买与完全缺乏政治动员等，极大地妨碍着动员广大人民上前线的要求，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迅速加以改革。

应该加强团结。我们现在不来详说过去数年中以及最近时期中在中国抗日阵线内部曾经发生的许多不应有的磨擦、冲突、妨碍、限制等等不良现象，而只希望政府能够于今后改革这些现象。我们共产党人是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支持政府抗战的，为了克服今后抗战中的更大困难与准备配合同盟国实行对敌反攻起见，我们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如何加强这个基础，巩固这个基础，以利抗日，以利配合各同盟国打倒整个法西斯，实在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

应该改良政治。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中国政治应该如何改良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曾经发表过许多次的意见了，现在来说这个问题，也还是和过去一样，认为唯一的方针是实际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日本侵华军队总共不过三十几个师团，何以我们以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国还不能战胜它或取得更大的胜利呢？难道工业不

---

[1] 汪，指汪精卫，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发达是唯一的理由吗？不是唯一的理由，也不是主要的理由，而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因而没有发动全国人民的抗战积极性。中国和苏、英、美各国是不同的，苏、英、美各国是抗战时间愈长久，人民的抗战积极性愈增长，中国则反之，大部分地方人民的抗战积极性受到了完全不应该的打击与限制，大大低落了，抗战第一二年中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在后来的四年中逐渐看不见了。这种政治上壅蔽抑塞的情形，如不实行必要的改革，则其对于抗战的妨碍将是不可计量的。这种情形，就产生国内各阶级间、各党派间、各民族间的许多不和睦现象，而抗战是极端需要这种和睦的。我们希望政府能于抗战第七年中，按照三民主义原则，实行若干必要的政治上的改革，借以达到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间较之现状进一步的和睦关系，能够为准备反攻发动人民的积极性。

应该发展生产。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说过多次了。现在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发生，如果没有适合时宜的改革，要应付今后愈加困难的抗战与准备有力的反攻将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节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而应该改革的事情是很多的，我们现在只指出上述四项，以供政府的采择。至于战后合作建国的主张，本党在

去年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宣言中已经明白申述，并已获得各界同胞的赞成，这里就不多说了。

抗战愈益接近胜利，困难将愈益严重，这就愈益加重了政府与人民的责任，也愈益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敌后战场上作战的共产党员，他们的责任是超越寻常地加重了。

在六年抗战中，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是无限忠诚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人民的艰苦奋斗是史无前例的。侵华敌军的半数是由他们之手抗击了六年，并且还要继续抗击下去，直至驱逐敌军出中国。他们是没有任何弹药与军饷的援助，但凭自己的忠诚与创造力达到了这样的奇迹。他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土地，建立了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坚决地实行了三民主义，实行了联合各抗日阶层的“三三制”政策，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实行了奖励生产同时又保护工人的劳动政策，实行了鼓励人民爱国心与发扬人民抗战积极性的文化政策。因此引起了日寇与汪逆汉奸群的深仇大恨，誓死要消灭他们。残酷的“扫荡”，阴险的“蚕食”，堡垒如林，沟墙遍地，“三光”政策与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无止息的推行，“剿共委员会”的普遍设立，都是为了要消灭他们的。敌后战场上的斗争是如此的残酷，大后方同胞或尚有不明此种情形者。

共产党员们！八路军、新四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们！敌后的男女同胞们！加强你们的团结，团结得如像一个人一样吧！残酷的战争只会把你们锻炼得特别勇敢、特别坚强，敌人要想把你们屈服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护军队的政策，彻底地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目的。

更好地将敌后战场上的一切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配合作战组织起来，加强对于主力军、游击队与民兵的技术训练、战术训练与政治工作训练，加紧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发展武装工作队，加强反“蚕食”斗争，使一切军事干部与政治工作干部学会善于总结战争经验，把反“扫荡”、反“蚕食”的艺术提到更高级的程度上来。你们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的能手，你们在六年爱国战争中表现了令人钦佩的成绩，全国人民都是关心你们与寄托极大希望于你们的，因此你们要更加努力提高你们的军事艺术与政治工作艺术，以便配合正面战场上的作战，驱逐敌人出中国。

十分注意争取日军的士兵与伪军，协同日本共产党进行破坏敌伪军的工作，使这个工作极大地加强起来。组织日本工农学校，发展日人反战同盟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发展朝鲜人民的抗日武装队伍及抗日团体，使这一切力量变成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的强有力的友军。

发展公营生产，一切军队，一切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都要进行生产自给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改善自己生活、减轻民众负担的目的。发展民营生产，共产党员深入农村，学会帮助农民做按家计划，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劳动互助团体，学会帮助农民组织合作社，达到改善群众生活的目的。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许多根据地上卓著成效的公私生产运动，应该不疲倦地坚持发展下去。奖励劳动英雄，发展生产竞赛，反对贪污浪费，惩治懒惰分子，克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一切为着战胜敌人而努力。

共产党员还要虚心学习文化，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理

论。继续整风学习运动，发展自我批评，坚决地、彻底地、毫不客气与毫不容情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任何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工作，不应该放松你们的学习，你们应该在艰苦的长期的战争中学出超人的本领来。

敌人总是每时每刻地、千方百计地想要从你们的外部与内部破坏你们、消灭你们的，你们要十倍、百倍、千倍地提高你们的警觉性，你们要学会同敌人特务机关作斗争的一切新办法。

抗战的第六周年，同时即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第二十二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之时，即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并根据此种纲领在各个时期规定了各种具体实施的政策。二十二年中，全体党员和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一道，为着实现此种纲领与政策，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为着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举行了轰轰烈烈英勇顽强的斗争。不管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难，他们总是坚决前进，绝不徘徊，绝不畏缩，终于使全国人民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从绝路中找到生路。二十二年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党奋斗的方向，是使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完全正确的方向，并将在今后的历史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直到完全胜利而后已。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当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到决定胜负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相信，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中央的周围，坚决地认真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加强自己的责任心，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与一切努力和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团结一致，支持国民政府与蒋委员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致周子健电[1]

（1943年7月3日）

胡部五十三师到洛川接替马禄防务后，已有一部侵入边区地境，修筑工事，似有逐步侵占企图。兹将富甘[2]、陇东、关中三方面情形电达，请就近向胡提出交涉，退出侵占地区。

数月以来，迭据西安情报，蒋严令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巳巧[3]胡曾到洛川召集军官会议，部署军事，此事请在西安加以探询，并向胡商谈军事冲突对抗战团结之利害。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富、甘，指富县、甘泉。

[3] 巳巧，即6月18日。

立即行动，制止内战[1]

（1943年7月4日）

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愈快愈好。

---

[1]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使蒋介石认为反共的时机到来了，于是迫不及待地制造反共宣传攻势，企图取消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增兵陕甘宁边区周围，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是毛泽东获悉情况后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子健电[1]

（1943年7月4日）

近日边区周围国方部队纷纷调动增加，准备进攻，有数日内爆发战争可能，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请向胡交涉，一切问题均可于你们回延时讨论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致董必武电[1]

（1943年7月6日）

你们应将“七一”纪念论文立即设法单印传播出去，又朱德同志给蒋、胡电亦应速即向外传布。办事处一切秘密文件速即烧毁，以防突然查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当局禁止《新华日报》刊登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社论，并派人来报馆监视一事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7月7日）

此次蒋介石、胡宗南调集河防兵力积极准备进攻边区，国民党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制造反共舆论的举动，是他们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子健电[1]

（1943年7月7日）

胡宗南进攻部署已完成，请你们努力在西安设法转圜，力求避免战事。并告必武。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子健转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3 年 7 月 7 日）

蒋、胡乘第三国际解散有进攻边区部署，我方正力求避免，不得已时恐须一战。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准备对付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军事部署[1]

（1943年7月9日）

德怀同志：

蒋胡[2]尽撤河防兵力开到洛川、中部、邠州[3]线，密令积极准备待命攻击。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请你在日内加以考虑，提出意见电告。目前此间除作军事准备外，极力进行政治动员，展开宣传战斗，并将此种宣传散播至西安、重庆各地及英、美、苏各国，动员国内外舆论打击蒋之反革命企图。

毛泽东

午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对付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军事准备问题给彭德怀的指示。

[2] 蒋胡，指蒋介石和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

[3]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县。邠州，旧县名，即今陕西彬县。

复周恩来、林彪电[1]

（1943年7月9日）

请与胡谈后速来延，胡提意见勿与争辩，只说回延会商，一切可以和平解决。判断彼方计划是陈兵边境，迫我作城下之盟，否则进击。我已进行全边区党政军民总动员，准备自卫。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林彪电[1]

（1943年7月10日）

江[2]电所提都是小事。从江日晚上我们发觉胡奉蒋令限灰日[3]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听候蒋之手令即行进攻，并继续调动第一军至邠州、淳化，调动第八师至中部之后，我们即于支日[4]起提出反对内战危机与保卫边区的任务，并向蒋、胡呼吁团结，请其撤兵与制止内战。因此，江电所说诸小节，你们不要再提，应从制止内战着眼。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江，即3日。

[3] 灰日，即10日。

[4] 支日，即4日。

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1]

（1943年7月11日）

【新华社延安十一日电】重庆息，《新华日报》七月一日纪念中共二十二周年社论，力持团结抗战，但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扣留，不准发表。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于四日送检，五日去取，亦被扣留。六日报馆派人找检查所负责人谈判，结果准许登载，被删去三千多字。但到晚上，新闻检查所突然通知，又不准登，报馆交涉无效。不但如此，当局又令化龙桥特务宪兵警察，全体出动，如临大敌，从新华日报馆门口直至化龙桥，设立三道检查哨，再在两路口设一道检查哨，据称：其任务是查看报纸上是否还有“七七”宣言。但查验没有宣言，亦不准发行。《新华日报》于七日六时已全份印出，报馆方面几次向检查所交涉，直到八时半，才将特务宪兵警察撤去。当日国民党中宣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纽约时报记者询问周恩来氏回延安之任务。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发出挑拨性的回答，诬称：“共产党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与政府合作，一派反对。”关于此事，日本法西斯通讯机关同盟社，立即于八日将张道藩之挑拨的诬蔑的声明给予传播，帮助张道藩鼓吹。在七日的外国记者席上，合众社记者又问：听说最近陕北形势很紧张，中央派遣大军包围八路军，是否确实？张道藩态度甚窘，只得用中国话小声地说了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一句："没有的事。"另一美国记者问：每年"七七"共产党都发宣言，何以今年七月七日的《新华日报》没有看见宣言？张答："这是新闻检查所的事，待我去查查看。"关于撤退河防，包围边区，准备进攻一事，原来是秘密进行的。但因调兵遣将，运输络绎，造成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形势，已经闹得中外皆知，国民党宣传机关虽然还是讳莫如深，但是已经无法掩盖云。

1943年，毛泽东和杨尚昆在延安。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质问国民党[1]

（1943年7月12日）

近月以来，中国抗日阵营内部，发生了一个很不经常很可骇怪的事实，这就是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许多党政军机关发动了一个破坏团结抗战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以反对共产党的姿态出现，而其实际，则是反对中华民族和反对中国人民的。

首先看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领导的全国军队中，位置在西北方面的主力就有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等三个集团军，都受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指挥。其中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段黄河沿岸，对付日寇。这种事实，已经是四年多了，只要不发生军事冲突，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不料近日却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担任河防的第一、第十六、第九十等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

这不能不使人们发生这样的疑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许多国民党人肆无忌惮地天天宣传共产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难道尽撤河防主力，倒叫做增强抗战吗？难道进攻边区，倒叫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做增强团结吗?

请问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你们拿背对着日本人，日本人却拿面对着你们，如果日本人向你们的背前进，那时你们怎么办呢?

如果你们将大段的河防丢弃不管，而日本人却仍然静悄悄地在对岸望着不动，只是拿着望远镜兴高采烈地注视着你们愈走愈远的背影，那末，这其中又是一种什么缘故呢?为什么日本人这样欢喜你们的背，而你们丢了河防不管，让它大段地空着，你们的心就那么放得下去呢?

在私有财产社会里，夜间睡觉总是要关门的。大家知道，这不是为了多事，而是为了防贼。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

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

照你们的说法，“破坏团结”的也是共产党，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精诚团结”主义者，那末，你们以三个集团军（缺一个军）的大兵，手持刺刀，配以重炮，向着边区人民前进，这也可以算作“精诚团结”吗?

或者照你们的另一种说法，你们并不爱好什么团结，而却十分爱好“统一”，因此就要荡平边区，消灭你们所说的“封建割据”，杀尽共产党。那末，好吧，为什么你们不怕日本人把中华民族“统一”了去，并且也把你们混在一起“统一”了去呢?

如果事变的结果，只是你们旗开得胜地“统一”了边区，削平了共产党，而日本人却被你们的什么“蒙汗药”蒙住了，或被什么“定身法”定住了，动弹不得，因此民族以及你们都不曾被他们“统一”了去，那末，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可否把你们的这种

什么“蒙汗药”或“定身法”给我们宣示一二呢？

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

其次看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为了反对共产党，办了几百个特务大队，其中什么乌龟忘八也收了进去。即如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亦即公历一九四三年，七月六日，抗战六周年纪念的前夕，中国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发出了这样一个消息，说是陕西省的西安地方，有些什么“文化团体”开了一个会，决定打电报给毛泽东，叫他趁着第三国际解散的时机，将中国共产党也“解散”，还有一条是“取消边区割据”。读者定会觉得这是一条“新闻”吧，其实却是一条旧闻。

原来这件事出于几百个特务大队中的一个大队。它受了特务总队部（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指令，叫一个以在国民党出钱的汉奸刊物《抗战与文化》上写反共文章出名、现充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的托派汉奸张涤非，于六月十二日那天，就是说还在中央社发表消息这天以前二十五天，就召集了九个人开了十分钟的会，“通过”了一纸所谓电文。

这个电文，延安到今天还没有收到，但其内容已经明白，据说

是第三国际既已解散，中国共产党也应“解散”，还有“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云云。

这也是国民党人说的话儿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

现在中国境内党派甚多，单单国民党就有两个。其中有一个叫汪记国民党[1]的，立在南京以及各地，打的也是青天白日旗，也有一个什么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有一批特务大队。此外，还有日本法西斯党遍于沦陷区。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

难道你们以为共产党太多了吗？全中国境内共产党只有一个，国民党却有两个，究竟谁是多了的呢？

国民党先生们，你们也曾想一想这件事吗？为什么除了你们之外，还有日本人和汪精卫，一致下死劲地要打倒共产党，一致地宣称只有共产党是太多了，因此要打倒；而国民党呢，却总是不觉得多，只觉得少，到处扶植养育着汪记国民党，这是什么缘故呢？

国民党先生们，让我们不厌麻烦地告诉你们吧：日本人和汪精卫之所以特别爱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者，就是因为这个党这个主义

---

[1] 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于次年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推选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0年，汪精卫伪国民党中央移驻南京。

当中有可以给他们利用的地方。这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有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时期，孙中山先生把它改组了，把共产党人接受进去，形成了国共合作式的民族联盟，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这个主义，也只有在同一时期，经过孙中山的手加以改造，成为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除此而外，这个党，这个主义，在排除了共产党、排除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条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的爱好，因此日本法西斯和汉奸汪精卫也爱好起来，如获至宝地加以养育，加以扶植。从前汪记国民党的旗子左角上还有一块黄色符号，以示区别，于今索性不要这个区别了，一切改成一样，以免碍眼。其爱好之程度为何如?

不但在沦陷区，而且在大后方，汪记国民党也是林立的。有些是秘密的，这就是敌人的第五纵队。有些是公开的，这就是那些吃党饭，吃特务饭，但是毫不抗日，专门反共的人们。这些人，表皮上没有标出汪记，实际上是汪记。这些人也是敌人的第五纵队，不过比前一种稍具形式上的区别，借以伪装自己，迷人眼目而已。

至此，问题就完全明白了。当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所以绝对不肯在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日本党和汉奸党也值得解散者，是由于不论在思想上，在政策上，在组织上，你们和他们之间，都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其中最基本的共同思想，就是反共反人民。

还有一条要质问国民党人的，世界上以及中国境内，“破产”的只有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别的都是好家伙么?汪精卫的三民主义

前面已经说过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法西斯主义怎么样呢？张涤非的托洛茨基主义又怎么样呢？中国境内不论张记李记的反革命特务机关的反革命主义又怎么样呢？

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指示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对于这样许多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所谓“主义”，连一个附笔或一个但书也没有呢？难道在你们看来，一切这些反革命的东西，都是完好无缺，十全十美，惟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破产”干净了的吗？

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你们就解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共产党，你们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你们也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你们保卫河防，你们就丢弃河防；敌人汉奸攻打边区（六年以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线对岸的敌军，炮击八路军所守河防阵地没有断过），你们也想攻打边区；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你们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1]；敌人汉奸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你们也是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敌人汉奸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你们也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何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至于此极

---

[1] 毛泽东这里是指蒋介石在1943年3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大肆攻击共产党、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竭力宣扬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

呢？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提出抗议：撤退河防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发动内战，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中央社于七月六日发出破坏团结、侮辱共产党的消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言论，也是不能容许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质，都是和敌人汉奸毫无区别的，你们必须纠正这些错误。

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

我们向一切不愿撤离河防进攻边区和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完全正当的。

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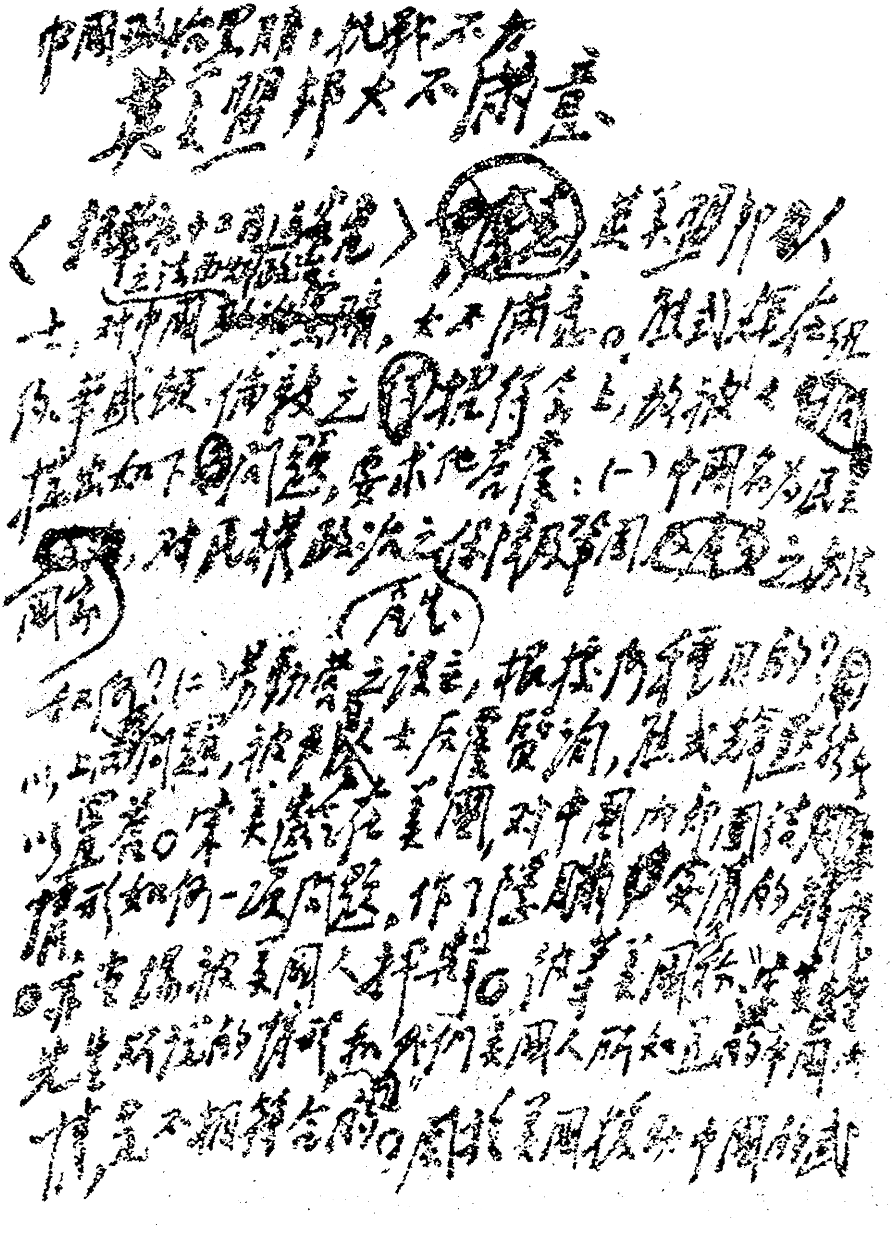
（1943年7月12日）

【新华社延安十二日电】英美盟邦人士，对中国之法西斯政治，大不满意。熊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之招待会上，均被人提出如下问题，要求他答复：（一）中国名为民主国家，对民权政治之产生、保障及巩固之方法如何？（二）劳动营之设立，根据何种目的？以上两项问题，被到会人士反复质询，熊式辉默然无以置答。宋美龄在美国，对中国内部团结情形如何一项问题，作了隐瞒实情的解释，亦当场被美国人抨击。彼等美国人称："宋美龄先生所说的情形，和我们美国人所知道的中国内情，是不相符合的。"关于美国援助中国的武器，不用到前线打日本，却大量武装后方部队，例如胡宗南之三十余万人，专门用以对付共产党，亦很不满意。闻英美曾向熊式辉公开表示：中国以前获得之援助，如果全部用在前线，当可打几仗，但中国皆补充后方，英美自不能以大量之武器，继续供给不去打轴心国之国家。因此，熊式辉返国后，对英美甚感失望。国民党中之许多人，亦仍不愿从改良政治，加强国内团结，加强对敌作战上用功夫，而只怨恨英美不给更多的帮助。近日国民党发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之叛卖性的运动，同时撤出河防兵力，准备进攻边区，此等消息传至英美，不知英美人士又当作何感想云。



中國政治黑暗，抗戰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滿意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手稿（部分）。

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的指示[1]

（1943年7月12日）

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迫我作城下之盟，又见我两年缄默，以为可以压服。殊不知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无隙可乘。敌后亦请你们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在群众中所提经常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这个电报还发给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在敌后抓紧实行六大政策给彭德怀及各中央分局发出的指示。

复彭德怀电[1]

（1943年7月12日）

决从五台区先调六个团至晋西北待命，由吕正操[2]率领，可将晋西北工作交他管理。如榆林方面有事，又可要吕担任北线。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吕正操，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到晋绥军区后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致聂荣臻等电[1]

（1943年7月12日）

蒋介石、胡宗南有以董钊[2]驻榆林从北面压我之势。决从五台区调六个团由吕正操率领西进，至晋西北待命。不论蒋、胡此次是否实行进攻，此六个团西调计划不变更。

---

[1] 这是毛泽东致聂荣臻、萧克并转吕正操、程子华等电的主要内容。萧克，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

[2]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7月13日）

由于近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苏联打退德国攻势，重庆各国大使的干涉，而主要是我党动员广大群众对蒋介石、胡宗南调兵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取消边区”表示坚决的反抗，使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和缓进攻边区的形势。但在新调来进攻边区的军队尚未完全撤走时，不能认为已经停止了这次进攻。中央在发表今年“七七”宣言时，对国民党采取了比较和缓的态度。而发现国民党积极布置进攻边区与公开宣传取消中共后，我们采用“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并动员群众准备力量，表示坚决反抗，是非常必要的。延安民众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的态度，也是完全正确的。过去两年来采取不刺激国民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取得了比较平静的环境来进行各种建设。中央今后除继续在全国贯彻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大政策外，并须利用这次事件迅速进行下列各项工作：（一）实行政治攻势，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二）在军事上实行必要的准备，调若干兵力来边区及晋西北，加强军事技术训练，组织机关自卫军及加强民兵工作。（三）加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国民党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中共的对策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紧进行清查特务奸细的普遍突击运动与反特务的宣传教育工作。（四）加强党内与人民中的阶级教育。（五）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

致董必武电[1]

（1943年7月13日）

你的工作很得力。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在七月十日不得不电胡宗南改变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决心，现在内战危机或可避免。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已于九日用万万火急电发蒋、胡及各方要人，故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

---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子健电[1]

（1943年7月13日）

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现经我们揭穿，已引起各国大使干涉，我们又积极准备应战，故迫得蒋不得不于十日改变计划。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子健电的主要内容。

复山东分局电[1]

（1943年7月15日）

（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磨擦仗均须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绝其借口及诬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瑞电[1]

（1943年7月15日）

看你最近一时期所写整风通令及其他电报，比较从前切实了，进步了，希望从此更切实更进步。力求了解实情，从具体实情的分析出发，言语、文字、电报力求简短明确，内容充实，不讲浮泛话。

---

[1] 这是毛泽东致朱瑞电的主要内容。

给博古、陆定一的信[1]

（1943年7月19日）

陈伯达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接登第四版，一天登完。以两天或三天广播之，并请广播两次。另印一小册子，亦请在日内印出，印1.5万份，以此作一次大宣传。印时请定一亲校一次，使无错字。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发表、广播、复印陈伯达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致博古（秦邦宪）、陆定一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公布《评〈中国之命运〉》一文

（1943年7月21日）

必武[1]：

此次反共高潮之近因，一由于国际解散，二由于相信日将攻苏，故蒋[2]企图以宣传攻势动摇我党，以军事压迫逼我就范。乃事机不密，为我党揭穿，通电全国，迎头痛击，于是不能不竭力否认（如胡、徐[3]等复电），尽量敷衍（如对周、林），并稍示和缓（边境已有两个师后撤）。但实际上目前军事准备决不会放松，政治压迫亦必会加紧（如七七封锁新华[4]，日前检查渝办）。我为彻底揭穿其阴谋并回答其自皖变来的宣传攻势计，除已发之通电及解放社论[5]

---

[1] 必武，即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 蒋，指蒋介石。

[3] 胡，指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徐，指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

[4] 1943年7月6日晚至7日上午，国民党当局为禁止《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派军警包围了报馆。

[5] 通电，指1943年7月9日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发出的《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社论，指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外，并于本日公布陈伯达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1]一书，以便在中国人民面前从思想上理论上揭露蒋之封建的买办的中国法西斯体系，巩固我党自己和影响美英各国、各小党派、各地方乃至文化各方面。为此目的，望注意执行下列数事：

一、收到此文广播后，设法秘密印译成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

二、在渝办、报馆[2]中，以此文作为课本，进行解释讨论。

三、搜集此文发表后的各方面影响，并将国民党回驳此文的文章择要电告，并全部寄来。

四、新华尤其群众[3]可用其他迂回办法揭露中国法西斯的罪恶（思想、制度、特点和行为）。

五、其他技术问题由恩来电告。

毛泽东
马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于1943年7月21日在《解放日报》上刊出。

[2] 指新华日报社。

[3] 指《群众》杂志。

给林伯渠[1]的信

（1943年7月24日）

林主席：

兹有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石家畔劳动英雄杨步浩及其戚李志明二位，由延安县曹扶县长介绍来谈，获知乡村情形，很有兴趣。兹转介至尊处，倘有时间，乞为接谈，他们极愿晋谒领教。并望招待他们住一晚，第二天回家，因他们离此七十里之远。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四日

罗迈[2]同志同此。

---

[1]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2]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关于审干的九条方针和在敌后的八项政策

（1943年7月30日）

德怀[1]同志：

（一）周、林[2]返延，七大准备开会，请你及罗、薄、聂、吕[3]来延参加大会，希预为布置。太行、太岳、北岳各区须重选代表若干，中央另有通知。

（二）敌后整风有进步，可于七月九日北局关于整风经验及关于思想意识二文[4]见之（已交广播）。敌后整风请督促务于今年切实办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

[2] 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42年9月作为中共谈判代表动身赴重庆。1943年7月16日，周恩来、林彪一行回到延安。

[3] 罗，指罗荣桓，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薄，指薄一波，1908年生，山西定襄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吕，指吕正操，1905年生，辽宁海城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

[4] 指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整风经验的介绍》和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直属机关学习委员会《关于思想意识问题》两文，分别发表在1943年8月2日和4日《解放日报》上。

完，以便从明春起开始全面审查干部，明年一年办完。

（三）审查干部之方针为：一、首长负责；二、自己动手；三、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四、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五、调查研究；六、分清是非轻重；七、争取失足者；八、培养干部；九、教育群众。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其详另有说明。

（四）蒋、胡[1]进攻边区计划，被我及时揭破，见我有备，被迫暂时停止，争取一年和平已有希望，但我军事防御准备绝不松懈。

（五）望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解放报社论，及陈伯达、范文澜评《中国之命运》等文[2]多印广发，借此作一次广大深入的有计划的阶级教育，彻底揭破国民党的欺骗影响，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国民党思想在我们党内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的。

（六）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其次序是；一、对敌斗争；二、整顿三风；三、精兵简政；四、统一领导；五、拥政爱民；六、发展生产；七、审查干部；八、阶级教育（在陕甘宁边区，对敌斗争改称军事教育作为第八项）。

（七）在群众中普遍的经常的任务则是战争、生产、教育三项。

---

[1] 蒋，指蒋介石。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载于1943年7月21日《解放日报》。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写的评《中国之命运》的文章题为《谁革命？革谁的命?》，发表在1943年8月1日《解放日报》上。

（八）阶级教育，即是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教育，不是离开统一战线的孤立的阶级教育，对外不提“阶级教育”名称。

此电并告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几个区党委负责同志。

毛泽东
午三十

和袁任远的谈话[1]

（1943年7月）

不要搞逼供信，你逼他，他没有办法，就乱讲，讲了你就信。然后，你又去逼他所供出的人，那些人又讲，结果越搞越大。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没有物证，也要有人证。不要听人家一说，你就信以为真，要具体分析，不要轻信口供。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杀人一定要慎重，你把人杀了，将来如有证据确实是搞错了，你虽然可以纠正，但人已死了，死者不能复生，只能恢复名誉。另外，也不要随便捉人，你捉他干什么，他能跑到哪里去。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绥德搞“抢救运动”的情况和袁任远谈话的一部分。

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进攻[1]

（1943年7月至10月）

一　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

（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2]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迫我就范。同时发动宣传攻击，以造成反共舆论。

（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进攻。

（三）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会议，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来新华总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气焰之热潮，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

---

[1] 1943年7月，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胡宗南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进行宣传反击，同时在军事上作好充分准备。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组织了这次宣传反击，以闪击之势出其不意，给以打击，使蒋、胡不得不改变计划，声明“误会”，下令撤退，迅速地克服了内战危机。这里选编的六份电报都是毛泽东起草的。本篇一是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本篇二、五是发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董必武的电报；本篇三是发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周子健的电报；本篇四是发给八路军山西前线彭德怀的电报；本篇六是发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的电报。

[2]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1943年6月解散。

内容与口号。

（四）为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给予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

（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及各县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

（七月八日）

二　速将“七七”宣言等分发各报馆各界人士

各电均悉。速将“七七”宣言，朱总[1]致蒋、胡[2]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今日发出）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是为至要。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则愈于我方有利，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并很机密地进行之。

（七月九日）

三　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等密发社会各界

速将朱总、萧主任[3]致蒋、胡等电报，新华社揭发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本日延安民众大会通电，设法密印数十至数百份，密发社会各界。此种工作甚为重要。

（七月九日）

---

[1] 朱总，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

[2] 蒋，指蒋介石。胡，指胡宗南，当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3] 萧主任，指萧劲光，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留守处主任。

四　我闪击宣传已收效

我宣传闪击已收效，不但七日外国记者纷纷质问张道藩[1]，而且引起英、美、苏各大使开会，根据朱致蒋、胡电警告蒋，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更因延安紧急动员，使蒋害怕，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令胡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致朱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第一军及九十军），内战危机似可克服。此次蒋之阴谋迅速破产，是我抓紧时机捉住反对内战、反对侮辱共产党两个要点，出其不意，给以打击。重庆外国人是与蒋、胡同时（五日）得到朱总电，故能于“七七”纪念日引起质问及各大使干涉。太南打击刘进[2]尚非其时，望用一切方法克服困难，保持国共一年和平，我党即可能取得极有利地位。

（七月十三日）

五　多登反法西斯的文章

甲、边区军事虽稍缓和，但国民党的武装准备并未放松，其宣传斗争则更加紧，各地参议会、新闻、文化、妇女等团体请解散中共电，已有十多处，中央社更发反共社论专电动员舆论。不知重庆月来舆论如何，望电告。

乙、此间除继续广播《评〈中国之命运〉》各文外，拟于八、

---

[1] 张道藩，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刘进，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当时驻太行山南部山西省陵川县一带。

九两月发动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运动，通电全国，主张取消各种特务组织，严禁传播法西斯主义思想，以揭穿蒋记国民党实质，并教育自己。不久将有通电文章广播，请预为准备。

丙、渝、桂文化界反压迫抗议事可行，惟望注意：一、除少数知名之士外，不要暴露隐藏的文化人。二、发表的形式可采取多样的。三、尽量争取中间人，在中间刊物发表抗议。四、译成英文向美英出版界揭露。五、新华、群众[1]多登载反法西斯主义文章，以开展思想斗争。

（八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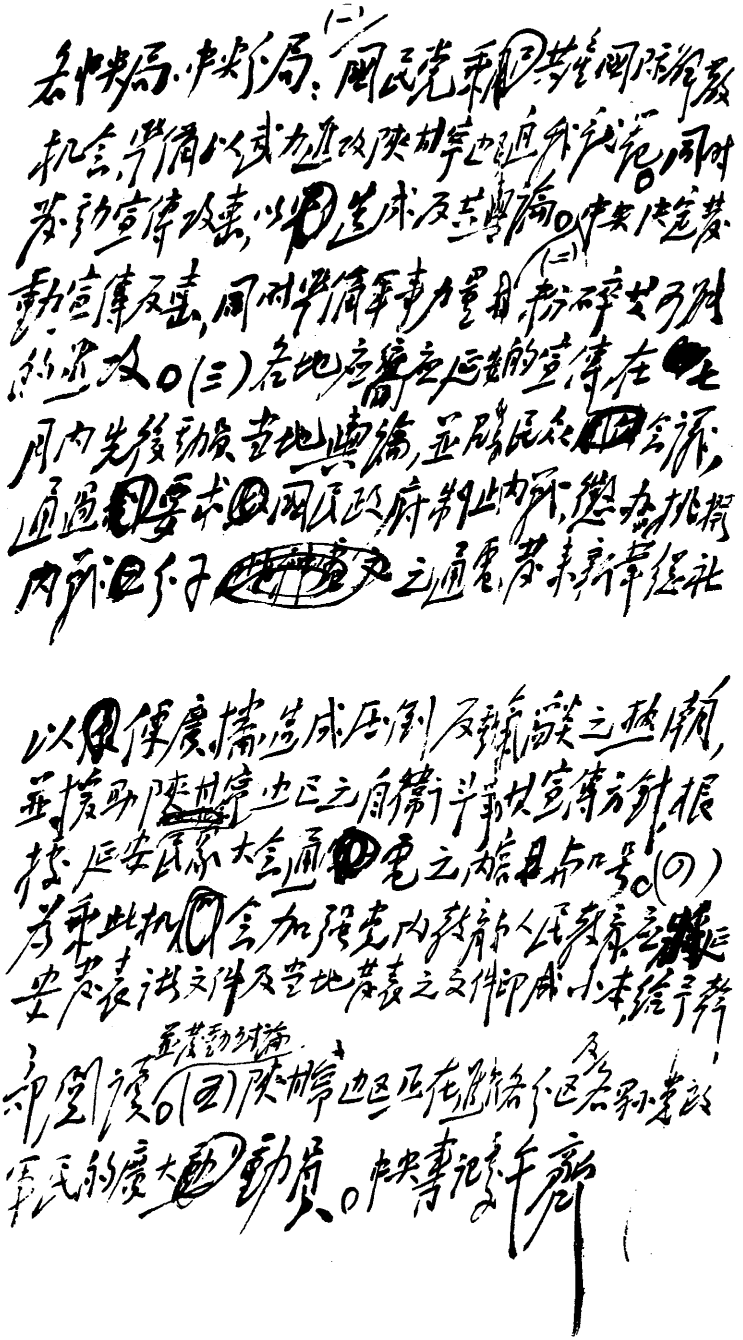
六　各地应广泛散发《解放日报》十月五日评论

（一）十月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你们收到后，除登报外，应大量印成小册，广为散发，除教育干部外，应发到国民党区域各大城市及沦陷区人民中去。这个文件就是党的方针，就是对于时局的总结。（二）《解放日报》从十月六日起，暂时停止登载揭露国民党的言论，以示缓和，看一看国民党是否有政治解决及缓和时局的趋向。十月六日起，新华总社及各地分社相应停发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但各地报纸仍应继续揭露国民党，特别是反特务斗争消息应不断在报上登载。陕甘宁边区则用地方小报登载此种消息。党内阶级教育，继续进行，绝不停止。

（十月五日）

---

[1] 新华，指重庆《新华日报》。群众，指《群众》杂志。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一）国民党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准备以武力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应同时发动宣传攻势，以制止其反共舆论。（二）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同时准备军事力量，以粉碎其可能的进攻。（三）各地应接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并召集民众大会，通过要求国民政府制止内战、惩办挑拨内战分子之通电，发表新华社以便广播造成压倒反动派之声势，并援助陕甘宁边区之自卫斗争。其宣传方针根据延安民众大会通电之精神与口号。（四）应乘此机会加强党内教育与人民教育，应将延安发表诸文件及当地发表之文件印成小本，发给干部阅读，并发动讨论。（五）陕甘宁边区正在进行各分区各界党政军民的广大动员。中央书记处 午齐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发动宣传反击的指示》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8月2日）

墨索里尼倒台后，意大利新首相虽然宣称要继续打下去，但现在的局面是不利于打而利于讲和，英、美也要求意大利无条件投降。墨索里尼倒台，日本十分重视，加强对国民党的诱降政策，国民党最近到处发动舆论，鼓吹取消边区、取消中共。国民党为进攻陕甘宁边区新调来的六个师，现已撤回四个师，此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攻势的回答，是到处宣传取消中共。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欧洲、日本与中国的时局时讲话的一部分。

给林森治丧机关的唁电[1]

（1943年8月4日）

重庆国民政府林主席治丧机关公鉴：

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兹闻溘世，痛悼同深。谨此致唁。

中共中央

八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森治丧机关的唁电。

晋察冀应下决心实行精简[1]

（1943年8月5日）

冀察晋分局：

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已悉。毫无疑义，你们应实行精简，在这个政策上迟疑不决，就将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现在只有九十万人口的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其他能收公粮的九十万人口是处在游击区中，而你们连马匹折合计算，尚有八万多人脱离生产，这是决不能持久的。目前你们应即下决心减去三万，只留五万，其中文武比例，应是文一武四。减去三万人中除吕部[2]六千西移外，另调聂部[3]四千西移，共计一万人西移，其余两万在本地安插。如果明年更困难，再准备从五万中减一万。

中央书记处
未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冀察晋分局的电报。

[2] 吕部，指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吕正操。

[3] 聂部，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43年8月8日）

中央党校第二部今天开学。同志们大多是从前方来的，从战场上回来的；一部分是从边区各地来的，从工作中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在延安的，离开工作来学习的。现在大家在一个学校里学习，要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统一的思想，要达到一个统一的目的。否则，有人要学经济学，有人要学哲学，有人想看小说，有人想学外国文，那末，我们的学校就不好办，也办不好。我们全党要统一，学校里的学习和各种活动也要统一，要有一致的意见。今天开学，我主要地来做这样一个宣传。

我们要执行什么统一的意见，达到什么统一的目的呢？就是刚才彭真[1]同志说的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讲的关于干部标准的四条：无限忠心，联系群众，独立工作能力，遵守纪律。[2]我们要按着这四条来学习，学校里的学生、工作人员统统

---

[1] 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935年8月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反对法西斯（对大会讨论的答复）》中提出正确选择干部的4项条件：第一，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第二，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第三，要能独立地自觉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第四，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

要为达到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你们各位很长的时间都在工作中，没有机会学习和研究，身体有的还不大好。这次到党校来，不仅得到学习和研究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长期工作疲劳的同志有一个休养的机会。休养好了，学习好了，将来出去做事情。

在你们现在学习的时候，正是世界处在很大变动的时候。世界的变动各个时期都有。中国的社会已经有过几次大的变动，由原始社会进到奴隶社会，再由奴隶社会进到封建社会，又由封建社会进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的社会的性质已经改变了三次，现在要改变第四次。

中国革命要完成什么任务呢？中国共产党到底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这同过去法国、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苏联的二月革命除外）由封建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相同的。以前各国的那种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发动群众不彻底，生怕群众觉悟起来，超出资产阶级控制的范围。我们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它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破坏了封建秩序，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而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人民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

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已经有三千多年了。直到现在，我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封建关系仍占统治地位。现在我们要把这个社会改变成民主主义社会。在完成这一转变的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无论如何不要放弃领导权。

我们的党校里也有争夺领导权的一种斗争，就是用无产阶级思

想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散漫性、自发性这样一些东西。党校第一部的同志从去年一直学到现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整顿三风，接受路线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这是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阶级在思想上争领导权。

最近国民党出了一本书，是蒋介石著的，名叫《中国之命运》。他在这本书中说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不知他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各位有看过历史书和小说的，《三国志》《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上都没有国民党，还不是照样有中国。国民党有五十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做过一些好事，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它并没有完成。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意见。那时国民党中的一些人赞成国共合作，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便要打击共产党，打击群众。果然，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逐渐掌了权，一九二七年他一到南京就明令“清党”，镇压共产党，打击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抗战时期是在国民党反动十年之后，打内战十年之后。抗战是不是革命呢？抗战是革命。可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又搞法西斯。中国的法西斯同外国的法西斯不同，外国的法西斯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中国的法西斯是买办的、封建的，它没有力量向外侵略，所以没有侵略的性质，但它是反对人民的。抗战一开始，国民党就不愿意人民起来抗战，奉行片面抗战的方针。他们认为抗战是政府的事，老百姓只要出兵出钱就行了。中国共产党奉行的是全面抗战的方针，认为只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才能取得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我们同他们斗

争。你不要老百姓起来，我们要他们起来，一个要，一个不要，便有斗争。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的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使人民团结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国民党是对立的，一个要人民，一个脱离人民。

中国的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我们讲的人民主要就是农民。我们是要农民还是不要农民？如果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方向一致，就是说完全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俘虏，把老百姓当牛去挤奶汁，有这样的共产党吗？可能有，但不应当有。那末，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的。在我们党内就曾经有一部分人离开过农民，牺牲农民群众的利益去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不仅脱离了农民，甚至连中等资产阶级也脱离了，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我们当前的敌人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它妨害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我们主要的口号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同时，国民党天天反对我们动员人民，它还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对这些我们就要斗就要争，其中就包含着争夺领导权。中国几万万农民到底跟谁走？如果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中国仍是一个存在剥削和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跟无产阶级、跟共产党走，就可以由半封建社会进入民主主义社会，由半殖民地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办党校也是为了要换这个朝。

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

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有些同志，包括有些老干部，只知道头一个换朝，不知道第二个换朝。头一个换朝他们有经验，叫做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赞成；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赞成；反特务斗争，他们赞成；不让胡宗南[1]进攻边区，他们赞成。但这些都是属于刚才讲的那个头一个换朝。中国革命已经经过了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十年内战和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革命都属于头一个换朝。头一个换朝在抗战胜利以后是不是马上就完成了呢？还不会。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出去了，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还没有完成，就是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实施也还是不充分的。

中国的民主革命是艰难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孙中山搞了四十年，没有成功。后来我们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艰难曲折的。国共合作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搞了三年多；接着是国民党的十年反革命；现在抗战，国民党搞两面政策，一面抗战，一面反共。所以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什么叫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是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全国广大人民参加的，基本上不破坏私有财产制度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我们现在干的头一步的革命。

但是，只有这一步是不够的。我们的干部还必须懂得将来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那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有经济的条件，有政治的条件，包括全国大多数人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当然，我们共产党也要进行宣传，要根据群众的实际情况去讲，不要犯教条主义，这样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说的两个革命。

干这两个革命，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反对胡宗南进攻、六年抗战以及十年内战都是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也是斗争，就是要从这些斗争中来考验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1]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群众领袖是群众封的呢？还是我

---

[1] 刘志丹（1903—1936），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四五月，同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1932年至1933年，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和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职。1936年3月东渡黄河参加东征，4月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

们自己封的呢？季米特洛夫说，是要群众封的，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经验来确认的。

刚才讲了两个革命，而要完成这两个革命，就要造就一个真正符合这四条标准的革命政党。我们党成立二十二年了，经历了三个革命时期，但还没有造就好，我们党还不统一，水平也还低。如果我们的党更统一了，水平更高了，那末可以断定，中国革命就不是像今天这个样子。二十二年的历史已经过去了，我们要从今天做起。我们办党校，就是要使我们同志的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一步，使我们党更加统一。中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使得我们党里有很多的“剧团”，说得粗一点就是有好多“戏班子”。在一个班子里，不论是唱主角的，唱配角的，跑龙套的，他们都是很亲热的，并且有个原则：我这个班子可以批评你那个班子，但是你那个班子不可以批评我这个班子。这就叫宗派主义。我们党内有两种宗派主义，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我们在山头上斗争的时间很长了，十年内战时期共患难，现在又有六年抗战，这便结成了班子，各个班子的活动是不统一的，而且水平较低。但是我们的任务很艰巨，要进行两个革命，都要在我们手里完成。我们要把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提高，使我们党更统一，不结班子，结成一个大党。每一个人都能够不怕牺牲，能够无限忠心，能够联系群众，能够独立工作，能够遵守纪律，团结一致地坚决地向敌人斗争。我们这一辈子就干这两个革命。

同志们！完成这两次革命不是像煮一顿饭或造一所房子那样简单，而是要推翻我们的阶级敌人。外国的帝国主义，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要压迫我们，我们就非推翻他们不可。但是今天我们主要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是推翻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因为他们今天还在抗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我们也不愿意同他们打仗。但是，看样子国民党是下决心要同我们打了，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想要消灭我们。因此我们要警惕，不要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上了他们的大当。在座的很多人都是经历过那一次的，不仅有我，还有周恩来同志和别的一些同志。我们都和国民党人在广州开过会，那时候他们对革命的道理不懂得，什么力量也没有，是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他们搞起来的。搞起来以后，就一脚把我们踢开了。在一九四三年三月，蒋介石的那本书上还在骂共产党。这次国共合作，我们可不要再上当了。

在党校的两年中，你们要参加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马、恩、列、斯的著作。此外，军事班还要学军事课，文化班还要学文化课。一共是六门课。今天开学以后，你们就要开始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有的人已在前方参加过整风了，但是还没有在延安参加过整风。你们参加整风以后，一只眼睛就亮了；参加审查干部以后，另一只眼睛也亮了。两只眼睛都亮了，还有什么革命不可能胜利呢？另外，还要学党的历史，党的二十二年的历史都要学习，进行分析和研究。关于学习的方法，季米特洛夫讲过，在党校中有两种培养教育干部的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抽象学习理论的方法，另一种是联系斗争实际学习理论的方法。过去的方法属于第一种，把人都学笨了。我们现在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能使你们把问题搞通，可以保证你们在两年之内提高一步。

今天开学，我就是讲清楚这个方向，使同志们可以安心，这样学下去对你们有帮助，对全党有帮助。我们要干两个革命，要使两个革命在我们手里取得胜利。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心，并且要学好本领，为劳苦大众办好这两件事。

一面支持斗争一面保存干部

（1943年8月11日）

德怀同志：

关于一面支持斗争，一面大批保存干部的观念，除你以外，大都是不正确的。聂区所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中央已去电要他们从直属机关、学校（党校、抗大）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可有一部分最好的中级干部）。请你和刘、邓、杨、黄等说通，从直属机关、学校，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好的真正可造的高级上级干部五百左右送延学习，其他大批中级干部及犯错误有嫌疑而前方不好处的人亦可送延，但不在此数目内。边区物资条件增加二三万兵、一二万干部，不成问题。边区今年雨量充足，可望丰收。

毛泽东

未真

致聂荣臻电[1]

（1943年8月12日）

拥政爱民是红军以来优良传统，任何区域均须执行。你们正须彻底执行拥政爱民政策，特别是军队干部对于党政民的一种骄气、傲气必须深刻检讨，开展自我批评，才能使军队与党政民打成一片更好地对付敌人。

---

[1] 这是毛泽东致聂荣臻及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各同志电的主要内容。

致晋察冀分局电[1]

（1943年8月12日）

支持斗争与保存干部均属重要，如对保存干部认识不足，将犯严重错误。你处前送干部好的重要的甚少，兹决定由你们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及北岳、冀中、平北各区抽调好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安学习，最好的中级干部亦可选一部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晋察冀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对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党的政策的指示[1]

（1943年8月13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告吕正操、李先念、黄敬：

蒋介石及国民党进攻边区的阴谋，虽因我们的揭穿、有准备、及外国人的干涉而暂时停止，但他们的阴谋并未放弃；同时在全国广泛发动要求解散共产党的舆论，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很多这样的电文，同时在华中与山东继续坚决地进行不声不响的对于我军的军事进攻；对于日军及伪军则采取消极态度，同时蒋之代表张治中在周恩来林彪两同志离渝前非正式地告诉他们，说国民党在国际解散后，拟有两个方案：一是要中共交出军权政权，以取得党的合法化；一是国共两党合一。据今年七月统计，全部在华日军卅六个师六十万人，国民党只抗击廿五万人，共产党抗击了卅五万人；全部汪精卫王克敏的伪军六十二万人（大部分是蒋介石军队投敌伪化的），国民党只牵制了广东方面的六万人（但并不攻击他们），在华北华中五十六万伪军均为共产党所抗击，国民党对之一枪不打。日本政府公开发表诱降声明，蒋介石连一个文字的驳斥也没有。蒋的部下大批地和日本特务人员及汪精卫的人员互相勾结，达到了惊人

---

[1] 这是毛泽东为击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形势的分析和党的政策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吕正操、李先念、黄敬的指示。

程度，降敌者日益增多。英美两国舆论对于国民党抗战不力与政治黑暗日益不满。国内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和我们同样受压迫，同情我党的倾向在增长中。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大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卫实力。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

（1943年8月15日）

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在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并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一九二七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设立了庞大的特务系统。抗战期间，虽则一面利用共产党抗日，但是一面又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特务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不认识此点，就不能采取正确方针。

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离开了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农村的广大群众及其各级联系群众的强有力的干部，就无法最妥善地最彻底地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

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这个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逼的办法；然后被审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然后审讯人员及负责人不假思索地相信这种绝对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办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特别是在保卫工作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最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就是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列，对于这些部门，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进行这个工作的。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校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八十；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百分之十；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逮捕审讯）的约占百分之十。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互相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改悔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人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就是从当地最高负责同志至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就是从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的乃是广大的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的质问、劝说、斗争及展开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就是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地给以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耐烦耐劳，审查工作才能彻底收效，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调查研究，就是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拟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在慎重考虑后的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就是用调查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之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

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收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情形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对于过左偏向，纠正太早与纠正太迟都不好，太早则无的放矢，妨碍运动的开展，太迟则造成错误，损伤元气；故以精密注意，适时纠正为原则。

争取失足者，就是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二千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应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的，许多人转变得很好。整风的任务就是将半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至全

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干部，就是应该从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全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四千至八千人善于这一套。从一九四三年四月起至八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二千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能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能为将来准备大批的锄奸干部，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这当然是主要的），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这个政策日本及国民党也是很早就采取了，用以对付共产党，并且收到了成效。延安几个月来已经争取一大批特务分子很好地转变过来为我党服务，便利了我们的清查工作。

教育群众，就是此次在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核心骨干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积极性发扬了，眼睛打开了，觉悟性提高了，党才真正巩固了。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脱离群众，少数人冷冷清清

地审查干部，也一定是达不到目的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代替下级，此地不可代替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例如代替下级审查大部分干部），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区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被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内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但一般地代替下级，代替他处则是错误的。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并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密切注意，毫不放松，就可以解决偏向的问题。

以上指出了主要的方针与经验，希望各地同志研究采用，并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创造你们自己的经验。

根据各地材料，各地整风须延长至一九四四年，审查干部可在整风中掺杂着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他部门及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决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准备审查干部的必要条件。

给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1]

（1943年8月16日）

小平同志转太行分局各同志：

中央给冀察晋分局关于保存干部电转给你处，谅已收阅。希望你处照此电意旨同样正确地处理此问题。即是将全部干部分为支持斗争与保存学习两部分，而从直属机关、学校（抗大、党校等）及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抽调好的有造就前途的高级上级干部四百至五百人送延学习，提拔中下级上来代替他们的职位。你处中级干部及犯错误难处理的干部亦可送来，但不应放在上述数目之内。

中央书记处
八月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太行分局书记邓小平转太行分局各同志的电报。

对周恩来关于揭破国民党参政会的阴谋问题给毛泽东的信的批语

（1943年8月19日）

同意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附原信：

毛主席：

董老电中，有可注意事数起：

一、国民党有在参政会开会前先开十一中全会，宣布召开国民大会的意思，或后开，先由参政会提议，全会接受；

二、参政会原定反共，故开会不通知董老，后又改变计划，故示和缓；

三、参政会常会已停，九月半开会，大约将不改动；

四、各小党派尚未定出席与否，惟原则上要有举动；

五、蒋在特种会报上指示，反共暂不以党出面（中宣通报）；

六、近日渝市各报反共消息暂停。

似此，估计蒋有由一般的反共宣传进入与我们争民主口号的可

能（带防御性，但仍会转成攻势）。开国民大会，宣布宪法，当然都是骗局，但形式上不会毫无影响，我们在揭穿他的假民主的工作上，要有准备，提议：一、先给董老一电，要其侦察情况并与小党派商出席事；二、在反法西斯特务政治运动中，要揭穿他的假民主的任何欺骗以与揭穿他的消极抗战平行；三、我们的对外宣传（包括作战、民主、生产、学习等等），要建立专门对重庆及大后方的广播（已与王局长谈过，可以做到每日四小时），指定专人收编每日广播电文（具体办法另提），不知对否？

配合这一政治可能，估计蒋在军事上必仍采取对边区的待机准备。

致董老电稿附上，请核！

敬礼！

周恩来

给胡乔木的信[1]

（1943年8月20日）

一九四二年四三决定宜选入党史文件，《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由康生交你。

党书[2]请于九月五日前印出，以便交去华北干部带去敌后。

---

[1] 这是毛泽东给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2] 指在毛泽东主持下编辑的《两条路线》。

致贺龙电[1]

（1943年8月22日）

（一）吕正操部于二十五日前后分南北两纵队过同蒲路，吕正操与聂荣臻同来，请准备一切；（二）南线平静，目前不至有战事；（三）为准备应付明年的战事及可能的旱灾（太行区今年旱灾甚重），陕甘宁、晋绥两边区粮食及财政须作妥善筹备。

---

[1] 这是毛泽东致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

（1943年8月22日）

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给各负责同志的指示[1]

（1943年8月25日）

为彻底消灭党内党外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各种错误思想，应根据《解放日报》发表的各种文章、文件，在党内及群众中专门进行两个月的学习讨论，并争取各中间阶层。某些重要文章，应各印成单行本，向我区、敌区人民广为散发。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消灭党内外对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各种错误思想给各区负责同志发出的指示。

致董必武电[1]

（1943年8月27日）

如无突变，你可准备出席此届参政会[2]，并争取民主同盟对抗战、民主问题取一致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指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1943年9月18日至27日在重庆召开。

在胡宗南等对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的情况[1]反映上的批语

（1943年8月30日）

请博古加印《评〈中国之命运〉》及愚民哲学[2]各一本，专发西安及沿途驻军，并召集有关同志讨论发散方法。

---

[1] 指胡宗南等对《解放日报》发表的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争相阅读、读后表现沉默的情况。

[2] 指艾思奇写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943年8月11日《解放日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8月30日、9月1日）

国民党这次对我们的军事进攻确实打下去了。现在他们准备下次进攻的部署。国民党对我们的政治进攻，由于苏联罗果夫[2]发表文章反对国民党要求取消中共，英、美也表示不满，我们的坚决抗议和公开批评蒋介石及国民党，现在蒋介石下令停止取消中共的宣传。这次我们提出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这是被侵略国半殖民地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同国民党合作，是同被侵略国的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主义合作。同时这种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它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与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王明同志抹杀国民党内部的区别，反对抗日阵线中有左、中、右之分，只分抗日阵线和非抗日阵线。他认为中国是被侵略国就没有法西斯主义。现在证明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更加反动了，如出版《中国之命运》，调兵进攻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更软弱了。

王明同志一九四一年进中央医院前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中央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2] 罗果夫，当时是苏联塔斯社中国公社社长。

路线是错误的，《新民主主义论》要修改；两年来他还向人宣传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复山东临时参议会电

（1943年9月1日）

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诸先生：

寝电敬悉。贵会坚持敌后，艰苦奋斗，不屈不挠，为民族伸正气，为全国作榜样，凡属国人，莫不钦佩，当此中国抗战阵营内部一部分“绥靖主义者”、失败主义者、投降主义者企图对敌妥协，制造内战，危机严重之际，尚望贵会及敌后全体爱国军民，团结一致，再接再厉，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而奋斗。全国爱国同胞，都是愿意援助你们的。目前世界局势，极端不利于德意日法西斯强盗与中国叛卖民族及准备叛卖民族的无耻的反动的投降派。苏联红军的铁拳，即将打断希特勒野兽的脊骨。英美盟邦的爱国军民，亦正为最后打倒法西斯而努力。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获得自由解放的伟大目标，是日益接近了。

毛泽东

九月一日

对出版发行工作的指示[1]

（1943年9月2日）

责成出版局与中宣部开会研究出版发行事宜，检查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开展广大有力的出版发行工作，废除官僚主义与被动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中共的宣传攻势（发表《评〈中国之命运〉》《质问国民党》等文和揭露国民党将领投敌之材料等）在国民党一部分党政军高级人员中引起的反响的情报上的批示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等电[1]

（1943年9月3日）

于学忠退出山东后，我山东工作大开展，鲁中南主要山地均为我控制。这对华中及山东今后斗争极关重要。但山东目前兵力不够分配，新发展地区不能迅速巩固。望速从华中一、二、三、四师每师抽调一个小团到山东，归山东分局及山东军区指挥，协助山东开辟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关于从华中抽调兵力协助山东开辟工作致陈毅、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系列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

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一九三七年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有人是不同意的，在形势估计、国共关系、战略方针这三个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是闹独立性，我们要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2]，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是一个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作整风报告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另一个关键就是今年中央的九月会议与高级干部现在的学习。中央检讨党的路线的会议开了很久，现在提议把会议暂停，等前方负责同志回到延安再开。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时间定为三个月。这次的九月会议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例如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系列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指《六大以来》。

而斗争》一书。现在有几位同志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

我们是要团结的，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在中国有四个范畴：无产阶级与地主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求团结；无产阶级本身的团结；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团结。整风就是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结果是更加团结了。党内斗争的方法，要避免党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斗争的方法，那样的方法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直到前年九月会议和整风，才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给博古的信

（1943年9月11日）

博古同志：

罗果夫文后段甚为重要，请登明日新闻[1]，并发广播。后日请将罗文前后两段全文重登于社论地位[2]，题为《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下署罗果夫名，旁列小注：“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八月八日在莫斯科出版之《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上所著严正批评中国政府之论文，本报曾分两次登载，为便读者通览全文起见，特再发表于此。罗果夫此文曾被美国及英国报纸广泛登载，引起世界人士的注意，在重庆亦曾博得中国真正爱国人士的广大欢迎，实为我六年抗战中苏联人士第一次对于中国政府有系统的批评。此种批评，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一切真正爱国人士的见解完全一致，但望国民党当局对于国际国内的公正舆论，勿加漠视，认真纠正自己的错误，抗战前途，庶有裨益。罗果夫全文如次。”题目用

---

[1] 罗果夫，即符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果夫（1909－1985），俄罗斯人，苏联共产党员，从1937年起任塔斯社驻中国记者，曾热心中国的文化事业，一直致力于中苏文学的交流工作，当时任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文后段刊于1943年9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其前段刊于1943年8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2] 罗果夫《对于中国政府之批评》全文刊于1943年9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特别大字，小注及全文均用四号字。并再发广播一次至二次，特别注意使必武[1]收到，要他在重庆多印广发（我去电）。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

[1] 必武，即董必武。

复董必武电[1]

（1943年9月26日）

你在参政会的行动是正确的。蒋介石调动兵力到陕甘宁边区周围，都是针对我们的。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

---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复董必武电[1]

（1943年9月28日）

双十社论[2]可说团结抗敌是第一义，希望蒋制止内战危机，实现民主。如你当选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可不出席，将来如情况略好仍可出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新华日报》将在1943年10月10日发表的社论。

致董必武电[1]

（1943 年 9 月 29 日）

《解放日报》日内发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社论，当作我党的表示。告小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不要上当。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请假不去，以示对参政会通过反共决议之抗议。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对董必武来电的批语[1]

（1943年9月底）

蒋利用邵[2]达其欺骗目的，仍要董但置末位，以示一拉一打，反映国民党不敢破裂，但反共是继续的。

---

[1] 这是毛泽东对董必武关于国民参政会内部斗争情况以及将董的名字放在驻会委员末位的来电的批语的主要内容。

[2] 邵，指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致董必武电[1]

（1943年9月）

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三游击纵队司令秦启荣乃国民党派在山东的主要反共健将，一九三九年以来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之事层出不穷，完全执行由重庆委托勾结日军进攻八路军之任务。最近事件，发生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秦启荣亲率特务大队及其所属各支队，配合伪军张步云部向八路军鲁中部队大举进攻。激战十余日，始将该部击退，战后传闻秦启荣于此役阵亡。中央社所谓八路军袭击山东友军云云，乃颠倒是非，恶意污蔑，应予驳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关于山东方面查复秦启荣事件的情况致董必武请他依此实情答复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1]

（1943年10月1日）

（一）秋收已到，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党委应即根据中央土地政策和当地情况发出指示，并亲手检查几个乡村，发现模范，推动他处。同时，应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减租的社论和关于减租的模范经验的报道。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在减租斗争中应当成立农民团体，或改造农民团体。政府应当站在执行减租法令和调节东佃利益的立场上。现在根据地已经缩小，我党在根据地内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同生死共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今秋如能检查减租政策的实施程度，并实行彻底减租，就能发扬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加强明年的对敌斗争，推动明年的生产运动。

（二）敌后各根据地的大多数干部，还没有学会推动党政机关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员、军队人员和人民群众（一切公私军民男女老少，绝无例外）实行大规模的生产。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陕北称变工队，过去江西红色区域称耕田队或劳动互助社），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县区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对前者用了苦功，对后者便轻而易举。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各地应开办七天至十天为期的种菜训练班、养猪训练班和为着改善伙食的炊事人员训练班。在一切党政军机关中讲究节省，反对浪费，禁止贪污。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在生产运动中，不注重发展经济，只片面地在开支问题上打算盘的保守的单纯的财政观点，是错误的。不注重组织党政军群众和人民群众的广大劳动力，以开展群众生产运动，只片面地注意少数政府人员忙于收粮收税弄钱弄饭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知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的观点（国民党观点），是错误的。不注意全面地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只注

意片面地以少数经济机关组织少数人从事生产的观点，是错误的。把共产党员为着供给家庭生活（农村党员）和改善自己生活（机关学校党员）以利革命事业，而从事家庭生产和个人业余生产，认为不光荣不道德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合作社看作为群众服务的经济团体，而把合作社看作为少数工作人员赚钱牟利，或看作政府公营商店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把陕甘宁边区一些农业劳动英雄的模范劳动方法（劳动互助，多犁多锄多上粪）推行于各地，而说这些方法不能在某些根据地推行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在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别缓急轻重，争取男女老幼和游民分子一律参加生产，培养干部，教育群众，只知把生产任务推给建设厅长、供给部长、总务处长的观点，是错误的。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每一根据地，组织几万党政军的劳动力和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取按家计划、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合作社等形式，在自愿和等价的原则下，把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以从事生产，即在现时战争情况下，都是可能的和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今年全部根据地的一律彻底减租，将是明年大规模发展生产的一个刺激。而明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否则便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三）为了使党政军和人民打成一片，以利于开展明年的对敌斗争和生产运动，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准备于明年阴历

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1]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军队方面，重新宣布拥政爱民公约，自己开检讨会，召集居民开联欢会（当地党政参加），有损害群众利益者，实行赔偿、道歉。群众方面，由当地党政和群众团体领导，重新宣布拥军优抗公约，举行热烈的劳军运动。在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运动中，彻底检查军队方面和党政方面各自在一九四三年的缺点错误，而于一九四四年坚决改正之。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抗公约，再三再四地将各根据地曾经发生的军队欺压党政民和党政民关心军队不足的缺点错误，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各方面只批评自己，不批评对方），而彻底改正之。

（四）此指示主要地说明今年减租、明年生产及明春举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性。其他各项政策，迭有指示，现不重述。但应知道：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第一，对敌斗争；第二，精兵简政；第三，统一领导；第四，拥政爱民；第五，发展生产；第六，整顿三风；第七，审查干部；第八，时事教育；第九，“三三制”；第十，减租减息。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地而不是残缺不全地（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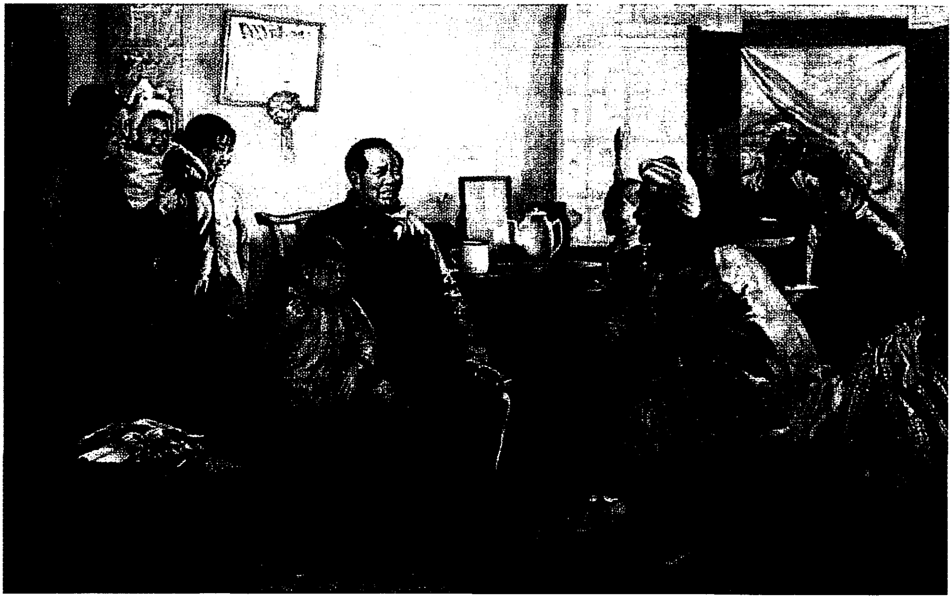
[1] 拥政爱民，是抗日根据地的军队人员“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是抗日根据地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口号的简称。

爱民及吴满有[1]生产方法等)、认真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但是只要全党同志认真地实行了十大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造成许多有利条件，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我们是有一切把握克服困难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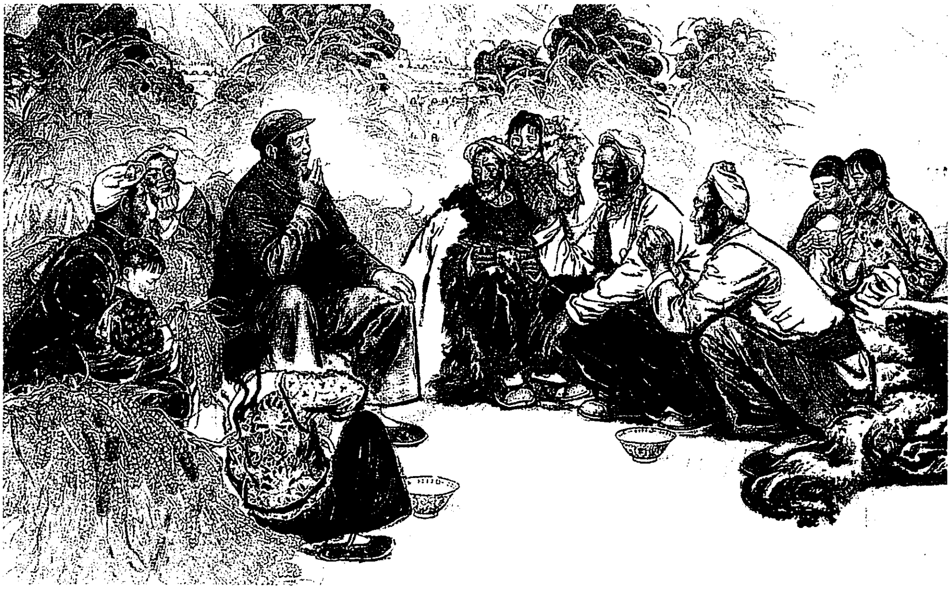
《贴心人》(油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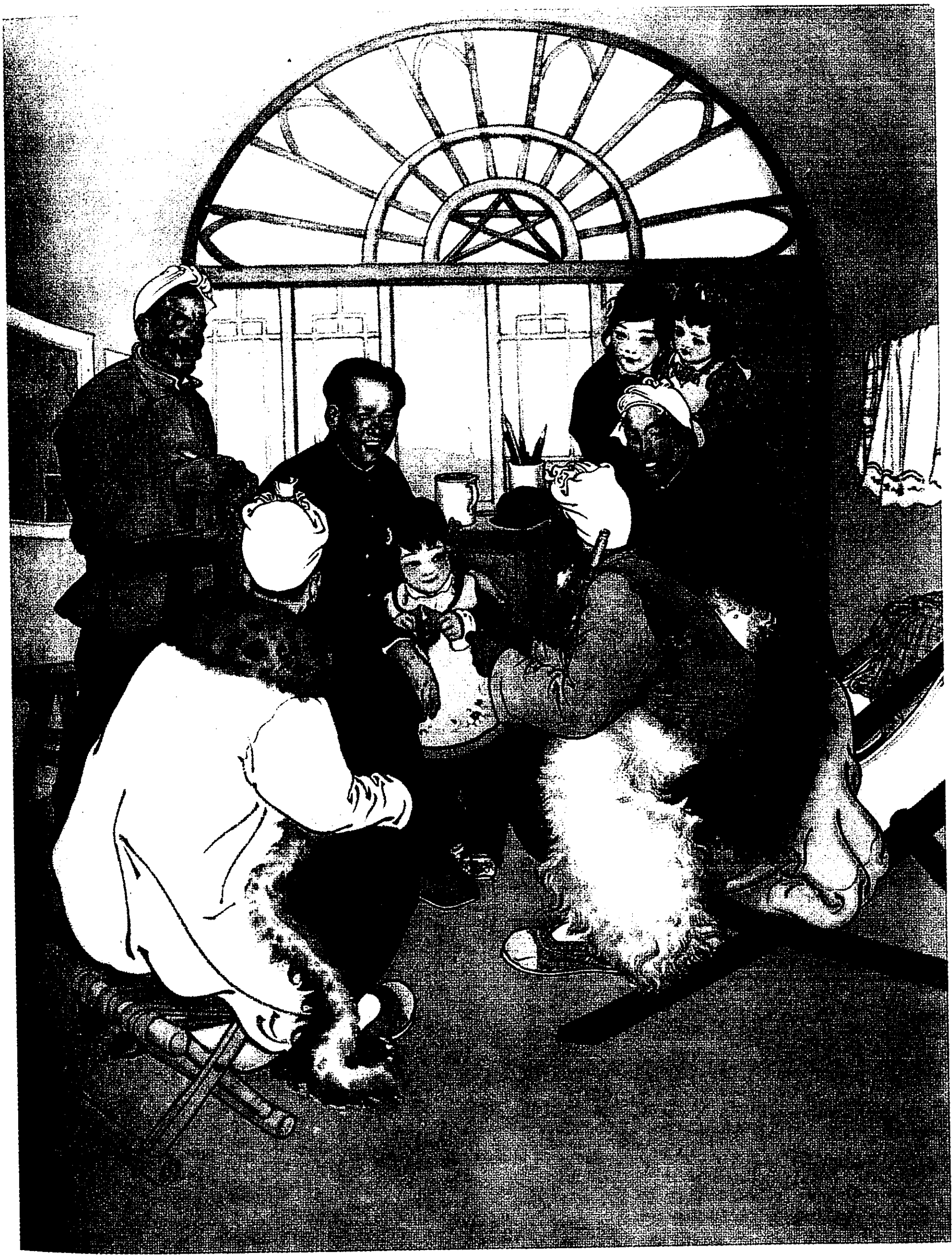
[1]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逃荒到延安务农，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毛主席在陕北》（油画）



《知心话》（中国画）



《拉家常》（中国画）

宣传学习《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通知[1]

（1943年10月）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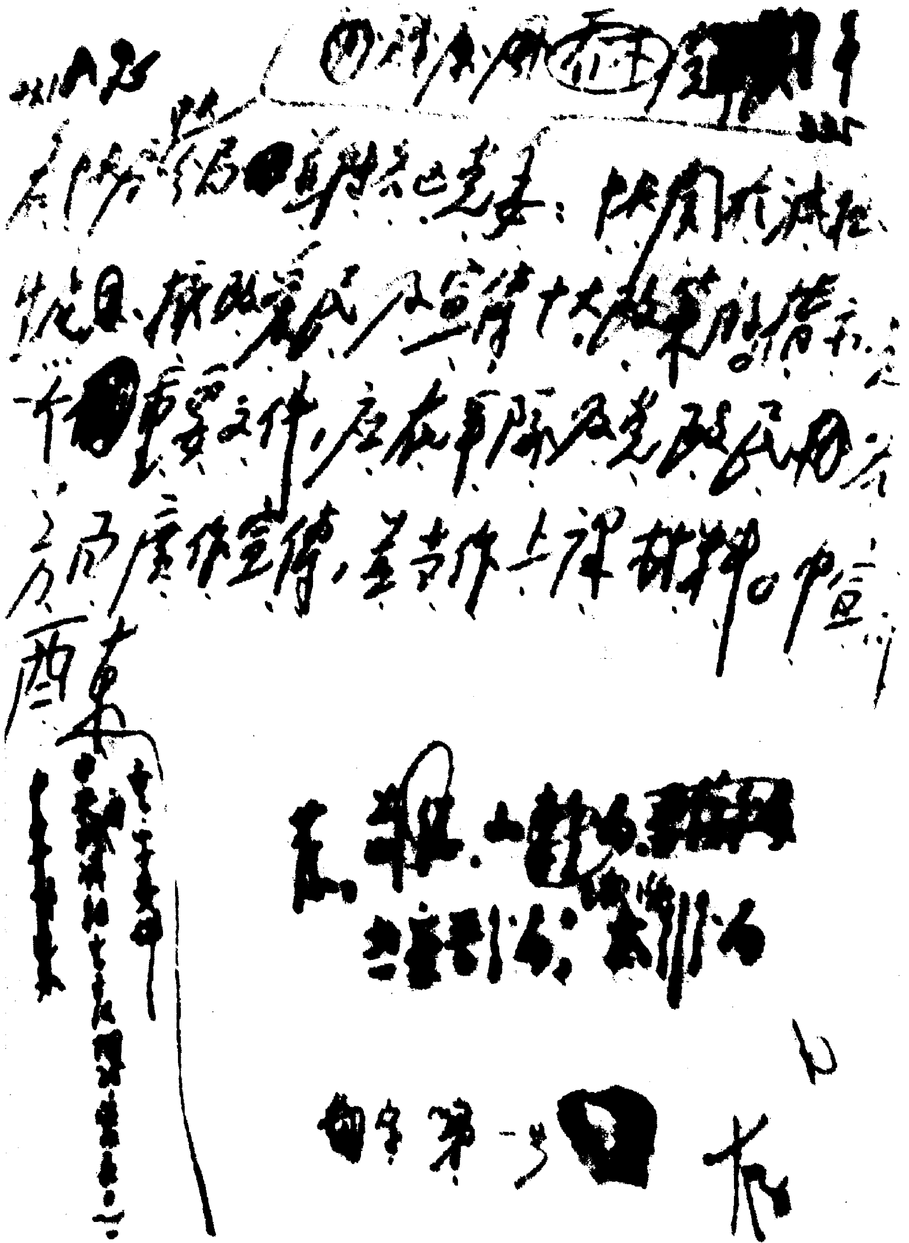
中央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是一个重要文件，应在军队及党政民各方面广作宣传，并当作上课材料。

中宣部

酉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宣传和学习《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通知。



1943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减租，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图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宣传和学习《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的通知的手稿。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

（1943年10月5日）

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集了十一中全会，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国民党政府召集了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两个会议的全部材料现已收齐，我们可以作一总评。

国际局势已到了大变化的前夜，现在无论何方均已感到了这一变化。欧洲轴心国是感到了这一变化的；希特勒采取了最后挣扎的政策。这一变化主要地是苏联造成的。苏联正在利用这一变化：红军已经用席卷之势打到了第聂伯河；再一个冬季攻势，不打到新国界，也要打到旧国界。英美也正在利用这个变化：罗斯福、丘吉尔正在等待希特勒摇摇欲坠时打进法国去。总之，德国法西斯战争机构快要土崩瓦解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已处在总解决的前夜，而消灭法西斯的主力军是苏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问题的枢纽在欧洲；欧洲问题解决，就决定了世界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命运。日本帝国主义者已感到走投无路，它的政策也只能是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作最后挣扎。它对于中国，则是对共产党“扫荡”，对国民党诱降。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国民党人亦感到了这个变化。他们在这一形势面前，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他们以为欧洲解决，英美可以腾出手来替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三个法西斯国家一齐垮台，世界成了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解放时代，国民党的买办封建法西斯独裁政治，成了世界自由民主汪洋大海中一个渺小的孤岛，他们惧怕自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本来，国民党人的主意是叫苏联独力去拼希特勒，并挑起日寇去攻苏联，把个社会主义国家拼死或拼坏，叫英美不要在欧洲闹什么第二第三战场，而把全力搬到东方先把日本打垮，再把中国共产党打掉，然后再说其他。国民党人起初大嚷“先亚后欧论”，后来又嚷“欧亚平分论”，就是为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今年八月魁北克会议的末尾，罗斯福和丘吉尔叫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去，讲了几句话，国民党人又嚷“罗丘视线移到东方了，先欧后亚计划改变了”，以及“魁北克会议是英美中三强会议”之类，还要自卖自夸地乐一阵。但这已是国民党人的最后一乐。自此以后，他们的情绪就有些变化了，“先亚后欧”或“欧亚平分”从此送入历史博物馆，他们可能要另打主意了。国民党的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党操纵的这次参政会，可能就是这种另打主意的起点。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污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同时又声言“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大多数国民党员把持操纵之下，通过了和十一中全会大体相同的对共决议案。此外，十一中全会还“选举”了蒋介石作国民党政府的主席，加强独裁机构。

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人可能打什么主意呢？不外三种：（一）投

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

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党打，对国民党拉”的要求，是一路来主张投降的。他们时刻企图策动反共内战，只要内战一开，抗日自然就不可能，只有投降一条路走。国民党在西北集中了四十至五十万大军，现在还在由其他战场把军队偷偷地集中到西北。据说将军们的胆气是很豪的，他们说：“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他们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听了蒋介石先生所谓共产党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的演说，和全会作了与蒋所说大体相同的决议之后说的话。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亦作了与此相同的决议，可是墨汁未干，将军们即奉命作成消灭边区的军事计划；今年六、七两月实行调兵遣将，准备对边区发动闪击战，仅因国内外舆论的反对，才把这一阴谋暂时搁下。现在十一中全会决议的墨汁刚刚洒在白纸上，将军们的豪语和兵力的调动又见告了。“打下延安是不成问题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决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一切赞成“打延安”的国民党人，不一定都是主观上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许是这样想：我们一面反共，一面还是要抗日的。许多黄埔系军人[1]可能就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要向这些先生们发出一些问题：你们忘了十年内战的经验吗？内战一开，那些打定了主意的投降主义者们容许你们再抗日吗？日本人和汪精卫容许你们再抗日吗？你们自己究有多大本领，能够对内对外两面作战吗？你们现在名曰有三百万兵，实际上士气颓丧已极，有人比做一担鸡蛋，碰一下就要垮。所有中条山战役，太行山战役，浙赣战

---

[1] 这里是指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和军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曾经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也包括一部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官的人。

役，鄂西战役，大别山战役，无不如此。其所以然，就是因为你们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两个要命的政策而来的。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你们越是积极反共和消极抗日，你们的士气就越发颓丧。你们对外敌如此，难道你们对共产党对人民就能忽然凶起来吗？不能的。只要你们内战一开，你们就只能一心一意打内战，什么“一面抗战”必然抛到九霄云外，结果必然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无条件投降的条约，只能有一个“降”字方针。国民党中一切不愿意真正投降的人们，只要你们积极地发动了或参加了内战，你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变为投降主义者。如果你们听信投降派的策动，把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当作动员舆论、准备发动反共内战的工具，其结果必然要走到此种地步。即使自己本来不愿意投降，但若听信了投降派的策动，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结果就只好跟着投降派投降。这是十一中全会后国民党的第一种可能的方向，这个危机极端严重地存在着。在投降派看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正是准备内战亦即准备投降的最好的掩眼法，一切共产党人、爱国的国民党人、各个抗日党派和一切抗日同胞，都要睁起眼睛注视这个极端严重的时局，不要被投降派的掩眼法弄昏了头脑。须知正是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之后，内战危机是空前未有的。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参政会的决议可以向另一个方向发展，这就是“暂时拖，将来打”。这个方向和投降派的方向有多少的差别，这是在表面上还要维持抗日的局面、但又绝对不愿放弃反共和独裁的人们的方向。这些人们是可能采取此种方向的，那是因为他们看见国际大变化不可避免，看见日本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看见内战就是投降，看见国内人心拥护抗日、反对内战，看见国民党

脱离群众、丧失人心、自己已处于从来未有的孤立地位这种严重的危机，看见美国、英国、苏联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发动内战，因此迫得他们把内战阴谋推迟下去，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空话，作为拖下去的工具。这些人们历来的手段就是善于“骗”和“拖”。这些人们之想“打下延安”和“消灭共产党”是做梦也不会忘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投降派毫无二致。只是他们还想打着抗日的招牌，还不愿丧失国民党的国际地位，有时也还顾虑到国际国内的舆论指摘，所以他们可能暂时地拖一下，而以“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的有利条件。他们并无真正“政治解决”和“实行宪政”的诚意，至少现时他们绝无此种诚意。去年国民党十中全会前，共产党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会见蒋介石先生，在重庆等候了十个月之久，但是蒋先生和国民党中央连一个具体问题也不愿意谈。今年三月，蒋先生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强调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把十年内战的责任推在共产党身上，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新式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解决共产党。今年六月二十八日，蒋先生允许周恩来、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这时下令调动河防兵力向边区前进，下令叫全国各地以“民众团体”之名，乘第三国际解散机会，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共产党人乃不得不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不得不将国民党各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阴谋黑幕加以揭发。我们已忍耐到了极点，有历史事实为证。武汉失守以来，华北华中的大小反共战斗没有断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亦已两年，国民党即在华中华北打了共产党两年，除原有国民党军队外，又复派遣王仲廉、李仙洲两个集团军到江苏、山东打共产党。太行山庞炳勋集团军是受命

专门反共的，安徽和湖北的国民党军队亦是受命反共的。所有这些，我们过去长期内连事实都有公布。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我们在长期内一个字也没有回答。国民党毫无理由地解散了英勇抗日的新四军，歼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逮捕叶挺，打死项英，囚系新四军干部数百人，这是背叛人民、背叛民族的滔天罪行，我们除向国民党提出抗议和善后条件外，仍然相忍为国。陕甘宁边区是一九三七年六、七月间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同志和蒋介石先生在庐山会见时，经蒋先生允许发布命令、委任官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行政区域的。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而且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至于断绝八路军接济，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等事实，更是尽人皆知。总之，凡干这些事的国民党人，是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的。在国民党看来，共产党是比日本人更加十倍百倍地可恨的。国民党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共产党；对于日本人，如果说还有仇恨，也只剩下极小的一部分。这和日本法西斯对待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是一致的。日本法西斯把最大的仇恨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则一天一天地心平气和了，“反共”“灭党”两个口号，于今只剩下一个“反共”了。一切日本的和汪精卫的报纸刊物，再也不提“打倒国民党”“推翻蒋介石”这类口号了。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向共产党说出半句诱降的话，对于国民党则敢于连篇累牍，呶呶不休，劝其降顺。国民党只在共产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一股凶气，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

不起来了。不但在行动上早已由抗战改为观战，就是在言论上也不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和各种侮辱言论做出一点两点稍为尖锐的驳斥。日本人说：“蒋介石所著《中国之命运》的论述方向是没有错误的。”蒋先生及其党人曾经对这话提出过任何驳斥吗？没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国主义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只对共产党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但对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愿也不敢提出军令政令和纪律问题，这叫日本帝国主义如何不轻视国民党呢！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见蒋先生和国民党解散新四军，进攻八路军，包围边区，诬之为“奸党”“奸军”“新式军阀”“新式割据”，诬之为“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经常不断地提出所谓“军令政令”和“纪律”，而对于二十个投敌的国民党中委，五十八个投敌的国民党将领，却不执行任何的军令政令，不执行任何的纪律处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也是依然只有对付共产党的决议，没有任何一件对付国民党自己大批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和大批叛国投敌的军事将领的决议，这叫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国民党呢！十一中全会果然又有“政治解决”和“准备实行宪政”的话头了，好得很，我们是欢迎这些话头的。但据国民党多年来一贯的政治路线看来，我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堆骗人的空话，而其实是为着准备打内战和永不放弃反人民的独裁政治这一目的，争取其所必要的时间。

时局的发展是否还可以有第三种方向呢？可以有的，这在一部分国民党员、全国人民和我们共产党人，都是希望如此的。什么是第三种方向？那就是公平合理地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并在抗战期内召集真正民意选举的国民大

会。我们共产党人是自始至终主张这个方针的。一部分国民党人也会同意这个方针。就连蒋介石先生及其嫡系国民党，我们过去长期地也总是希望他们实行这个方针。但是依据几年的实际情形看来，依据目前事实看来，蒋先生和大部分当权的国民党人都没有任何事实表示他们愿意实行这种方针。

实行这种方针，要有国际国内许多条件。目前国际条件（欧洲法西斯总崩溃的前夜）是有利于中国抗日的，但投降派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便投降，日本人和汪精卫却更想在这时策动内战以利招降。汪精卫说："最亲善的兄弟终久还是兄弟，重庆将来一定和我们走同一道路，但我们希望这一日期愈快愈好。"（十月一日同盟社消息）何其亲昵、肯定和迫切乃尔！所以，目前的时局，最佳不过是拖一下，而突然恶化的危险是很严重的。第三个方向的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各党各派的爱国分子和全国人民进行各方面的努力，才能争取到。

蒋介石先生在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上宣称："应宣明中央对于共产党并无其他任何要求，只望其放弃武装割据及停止其过去各地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并望其实践二十六年共赴国难之宣言，履行诺言中所举之四点。"

蒋先生所谓"袭击国军破坏抗战之行为"，应该是讲的国民党，可惜他偏心地和忍心地污蔑了共产党。因为自武汉失守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仅为自卫而作战。第二次是在一九

四一年一月。先是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他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第三次，是从本年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请问这不是“破坏抗战之行为”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发表共赴国难宣言。该宣言称：“为着取消敌人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停止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和以暴力

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改组现在的红色政府为特区民主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改变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所有这四条诺言，我们是完全实践了的，蒋介石先生和任何国民党人也不能举出任何一条是我们没有实践的。第一，所有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所施行的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绝对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违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在国民党不投降民族敌人、不破裂国共合作、不发动反共内战的条件之下，我们始终遵守不以暴力政策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诺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准备如此。这就是说，仅仅在国民党投降敌人、破裂合作、举行内战的条件下，我们才被迫着无法继续实践自己的诺言，因而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才失去继续实践诺言的可能性。第三，原来的红色政权还在抗战第一年就改组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也早已实现了，只是国民党至今没有实践他们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诺言，并且还骂我们做“封建割据”。蒋介石先生及国民党人须知，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种不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状态，这种你们所谓“割据”，不是我们所愿意的，完全是你们迫得我们这样做的。你们食言而肥，不承认这个原来答应承认了的区域，不承认这个民主政治，反而骂我们做“割据”，请问这是一种什么道理？我们天天请求你们承认，你们却老是不承认，这个责任究竟应该谁负呢？蒋介石先生以国民党总裁和国民党政府负责人的身份，在其自己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也是这样乱骂“割据”，自己不负一点责任，这有什么道理呢？现在乘着蒋先生又在十一中全会上要求我们实践诺言的机会，我们就要求蒋先

生实践这个诺言：采取法令手续，承认早已实现民权主义的陕甘宁边区，并承认敌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若是你们依然采取不承认主义，那就是你们叫我们继续“割据”下去，其责任和过去一样，完全在你们而不在我们。第四，“红军名义及番号”早已改变了，早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了，早已“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了，这条诺言早已实践了。只有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现在是直接受共产党中央统辖，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这是因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七日发表了一个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反革命命令，宣布该军为“叛军”而“解散”之，并使该军天天挨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但是该军不但始终在华中抗日，而且始终实践四条诺言中第一至第三条诺言，并且愿意复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要求蒋先生取消解散命令，恢复该军番号，使该军获得实践第四条诺言之可能性。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共产党问题的文件除上述各点外，又称：“至于其他问题，本会议已决议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尽可于国民大会中提出讨论解决。”所谓“其他问题”，就是取消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取消法西斯特务机关，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政治，取消妨碍民生的经济统制和苛捐杂税，实行全国范围内的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和扶助中小工业、改善工人生活的经济政策。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我党共赴国难宣言中曾称：“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订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蒋介石先生既于这个宣言发表之第二日（九月二十三日）发表谈话，承认这个宣言的全部，就应该不但要求共产党实践这个宣言中的四条诺言，也应该

要求蒋先生自己及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实践上述条文。蒋先生现在不但是国民党的总裁，又当了国民党政府（这个政府以“国民政府”为表面名称）的主席，应该把上述民主民生的条文和一切蒋先生自己许给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无数诺言，认真地实践起来，不要还是把任何诺言都抛到九霄云外，只是一味高压，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要看事实，不愿再听骗人的空话。如有事实，我们是欢迎的；如无事实，则空话是不能长久骗人的。抗战到底，制止投降危险，继续合作，制止内战危机，承认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恢复新四军，制止反共运动，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四五十万军队，不要再把国民参政会当作国民党制造反共舆论的御用机关，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减租减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业，取消特务机关，取消特务教育，实行民主教育，这就是我们对蒋先生和国民党的要求。其中大多数，正是你们自己的诺言。你们如能实行这些要求和诺言，则我们向你们保证继续实践我们自己的诺言。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

总之，在国民党可能采取的三个方向中，第一个，投降和内战的方向，对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是死路。第二个，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对蒋先生和国民党也不是生路。只有第三个方向，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蒋先生和国民党的生路。但是走这个方向，在蒋先生和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的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应该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

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变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来了，我们希望蒋介石先生和国民党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我们希望一切爱国党派和爱国人民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节有以善处。

关于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以示缓和致董必武电

（1943年10月5日）

董：

二日电悉。

一、五日《解放日报》发表评十一中全会与三届二次参政会长文，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五日文内并指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

二、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时除申述上述态度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延安所得情况，胡宗南声言打下延安不成问题，第一军第七十八师又由渭南开至邠州，三十六军由甘肃南开至平凉西峰镇线，伊盟大筑飞机场，董钊赴榆林指挥反共，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

三、见王世杰或邵力子时除申述上述意旨外，还应说：内战必投降是死路愿彼方善处，我党准备对付任何险恶局面，但首先愿意继续合作，着重指出董钊赴榆林威胁甚大，刺激最深，延安不能不准备自卫。

毛泽东

复董必武电[1]

（1943年10月5日）

六日起解放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五日文[2]内并指出愿意恢复两党谈判。以后谈判由你担任，见蒋介石时除表示欢迎政治解决外，应指明整个西北国民党军队备战甚急，延安不相信政治解决具有诚意，但延安欢迎政治解决不愿破裂，如继续合作，则延安保证继续实践四条诺言，要求撤退若干军队。

---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指《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及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

致晋绥分局电[1]

（1943年10月9日）

晋绥分局范围内增加七大代表二十人，明年二月到达延安；中央十一月一日起开会，望贺龙于本月半动身，月底到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晋绥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1]

（1943年10月9日）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

[1] 在延安整风运动审查干部工作开始以后，由于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并使用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经过许多努力，才制止了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这是毛泽东10月9日发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

复董必武电[1]

（1943年10月10日）

你应出席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第一次会议。

---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15日，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

切实执行十大政策[1]

（1943年10月14日）

我们党在抗战中提出的各种政策，都是行之有效的，都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切要的有十条政策，这十条政策要联系起来执行。

一、对敌斗争。陕甘宁边区要准备对胡宗南、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蒋介石的磨擦进行斗争，即军事上要作准备，使军队在政治上更巩固，在军事上更提高。今年冬季要开展大练兵，全体官兵都要紧张地转到大训练的运动中去，训练得一个人能打两个敌人。边区现有五万军队，都训练好了，还不能打仗吗？须知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红军改编时只有四万五千人，现在边区有了五万兵而且训练精了，还不好办事吗？大练兵要认真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士兵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高干会议以后，就是各旅的团长、政委的责任了。要学习六旅的一个连长关心士兵半夜查寝室查岗哨的办法，学习陈宗尧团长与士兵一同背米、开荒的精神。我们的同志，不管有什么毛病，只要肯改，只要有马列主义精神，就好办事。凡是能同群众打成一片的即是马列主义者，即能成为群众的领袖，要在军队中努力提倡这种作风。过去一个时期，部队中的有些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采取霸道、蛮横的态度是不好的。用霸道对敌人是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正确的，对敌人就是要狠，但用霸道对人民、对党、对政府则是错误的，对人民对群众应讲王道。我们要有两种态度，对敌人用霸道，对人民用王道。这一条要记得非常牢固。今年阴历过年要再开展一次拥政爱民运动，再颁布一次公约，首先从军队做起，然后是党政，双方都作自我批评。要把军队同人民打成一片的作风传开来、传下去，这是无产阶级军队同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区别。我们拥护人民，为人民打敌人，对人民讲王道，采取自我批评态度，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我们的武器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间，官兵间，军民间，将问题摆出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把错误的东西清除掉，就能真正地团结了。

二、精兵简政。这是重要的一条，已在实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1]。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凡是对这一条执行得还不够的，应当立即搞好。

四、拥政爱民。每年来一次，检查一年的缺点、错误，向人民作自我批评，要每年颁布公约。中央准备颁布一个统一的各地都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的各十条的公约。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才能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府和人民是会爱护军队的。

---

[1] “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士蔿）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三公，指春秋时晋献公和公子重耳、夷吾。毛泽东在这里引用这一典故，强调当时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三方面应当有统一的领导，不要政出多门，工作上应当互相协调、配合。

我们的军队和军队中的干部是“闯州过府”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是见闻广博而有经验的。我们的军队是中国人民的组织者与宣传者，是最有觉悟的。军队中的党是最先进的，它应创造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地方的党和政府，爱护人民。只要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好，人民的态度是没有不好的。过去留守兵团有的负责人，总是说边区人民不好，不爱护军队。但是我们要问问我们军队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替人民干了些什么事？首先应当检查自己，责备自己，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我们就是要实行这种方法。

五、发展生产。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1]，备战，备荒。

我要特别讲讲组织劳动力的问题。边区今年来了一个革命，全区三十五万个全劳动力，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变工队、扎工队[2]中的有三万余人，即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临时性组织的，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一年还会有所发展和提高。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应向延安县看齐，要将劳动力组织在集体劳动的形式中，其中临时组织的占大多数，经常组织的要根据各县情况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达到十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半劳动力，

---

[1] 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余一年粮食。《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中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号召农民积极生产，厉行节约，做到每家一年有四个月的余粮。

[2] 变工队、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的。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受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这也是一支劳动大军。

边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去的封建剥削关系，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在有一半的地方经过土地革命已经完全破坏，另一半的地方经过减租减息也受到打击。这就是土地革命，是第一个革命。但是，如果不进行从个体劳动转到集体劳动的第二个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进一步发展。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加以发展，生产就可以大大提高，增加一倍或一倍以上。如果全边区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的劳动组织之中，全边区一千四百万亩耕地的收获就会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方法将来可推行到全国，在中国的经济史上也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变化了。从土地改革到发展劳动互助组织两次变化，这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

部队、机关、学校要大力提倡合作社，提倡合作的生产方式，例如一个连队就可以作为一个合作社的形式。根据杨家岭的经验，将运输队改为合作社，采取二八入股、二八分红制，即公家以八辆大车，二十二个驮骡和全部用具，作为八十股，二十二个运输队员作为二十股，按斤由公家发运输费。其结果是运输力由每月只运十九万斤提高到三十八万九千余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而且工具节省了，牲口受到爱护，替公家节约了大量经费。这个办法在中直军直各机关学校中普遍运用，都收到很大效果。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一百头牲口二十辆大车，在未组成合作社以前每月运输一百二十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力提高到一百八十五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工

厂、农场。我们的农场按伙种[1]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合作社性质的办法，当然不按伙种而用自种的办法也可以采取。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整顿三风。边区做得有成绩，还要继续做。

七、审查干部。反特务斗争要继续开展。

八、阶级教育。阶级教育即时事教育，这次大规模地进行了三个月，还要继续做，灭他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

九、减租减息。许多根据地开展得不彻底，边区有些地方也没有做好，还要继续搞。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我们还是实行减租减息，不实行土地革命。

十、“三三制”。要认真实行，如果国共关系破裂了，十大政策不变，“三三制”政策也不变。

以上十大政策，坚持贯彻下去，就能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能对付国共关系可能的破裂。当前各根据地最重要的任务是四项：第一，对敌斗争，即打敌人，挤地方；第二，发展生产，即弄饭吃；第三，整顿三风，即整歪风；第四，审查干部，即反特务

---

[1] 伙种，或称朋伙种庄稼，是一种变工形式。参加伙种的一般是人力、畜力、土地等生产条件相差不多的具有亲族或亲戚关系的两家农户，他们把全部人力、畜力、农具、土地合作起来，统一耕作，收成平均分配。有的伙种是共同开荒，收成平均分配。还有的伙种是共同租佃地主的土地，一同耕作，收成在完租后平均分配。

斗争。这四件做好了，党就可以巩固，现在还只是相当巩固，而不是十分巩固。

对敌斗争，挤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据聂荣臻[1]同志回来说，晋察冀挤了一些地方回来，晋东南挤了一百四十万人口的地方回来。六年的抗战，在敌后我们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些才行。蒋介石如果要挤我们，要挤边区，我们就准备非同他挤不可。

讲到生产，弄饭吃，全党干部非学会这一套不可，只要半年就可以学会。过去这是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的事，现在各部队首长、各机关负责同志、各学校校长都非学会不可，连文人学士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2]等也都学会了。

部队生产，今年二月王震[3]同志订计划时，计划每人开荒六亩，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但实际发展的结果，平均每人开荒十八亩。这种群众的创造，解决了革命的大问题。军队自己可以发饷，我们养千万的军队都有办法了。

每一个旅应当建立一个后方。国民党以前不是常说我们“窜回老巢”吗，过去我们并没有“巢”。在陕北这个地方，靠着桥山山脉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 王震（1908—1992），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的确可以建立一个又深又好的“巢”，敌人进不来，里面有工农商业，有牛羊鸡犬，有女子和娃娃，有生产班。这要好好计划一下，要像朱总司令所讲的好好地搞一个革命家务。

抗战以来，国民党用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们，我们的反特务斗争，破坏了国民党的这一计。

要实施对敌斗争、发展生产与审查干部这三项工作，就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整顿三风的方法。去年的高干会议[1]分清楚了两条路线，克服了干部中存在的思想错误，但对我们的工作也有两种态度要分清。要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些同志自以为马列主义很多，其实一接触到实际工作，可以说连马列主义的气味都未闻到一点。马列主义的方法，基本的是分析的方法，要讲老实话，才能纠正错误，求得进步。如果自以为是，对整个工作不加分析，只讲成绩，怕讲缺点、错误，就无法使工作进步。工作是一个整体，如加以分析，指出其成绩和缺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分析的方法。对工作还要做结论，即是说要综合。不作分析就无法综合，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对事物要有解剖，才能总结。有些犯主观主义的同志，就不懂得分析的方法。去年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和一二〇师小干部会等，都是实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正确的分析，把统一的东西加以解剖，研究了各个侧面，才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又如财经问题，不作分析工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要做详细占有材料与详细分析的工作，何况我们呢？

对工作要有谦逊的态度，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肿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病，不要以为自己是首长就了不得，要自觉不足。要同他人交换意见，诚意地听取对方的意见。要经常想到自己有缺点，有错误，有不足，这样才能有进步。

语言、文字、思想是反映客观实际的，但是，客观实际的规律要反映成观念形态的规律，需要有千百次的反复，才能比较正确。要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妄自尊大。我们看同志有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有无谦逊的态度。

马列主义的方法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条，反对自发论的思想是又一条。在去年高干会议以前，自发论的思想是很流行的，例如财政经济非常困难，就是不去想办法解决，而是让各种学说自流，让工作自流。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也很多，不作批评，不作斗争，对工作不加严厉的督促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要运用到四个范畴。第一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从斗争中把资产阶级提高到赞同抗日纲领的地位，无产阶级是可以领导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按实际办事，不是按书本办事，而王明[1]则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说列宁没有讲过。第

---

[1] 王明，即陈绍禹（1904—1974），安徽金寨人，自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代表。1931年11月，他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11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

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第三是在无产阶级自己队伍内。以斗争求团结，反对一切分裂无产阶级的落后思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孟什维克思想。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马列主义的方法有三条，一是理论同实际相联系，二是反对自发论，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批评，结果是使党团结；一种是不正确的批评，如四中全会[1]、五中全会[2]的那种批评，结果是使党分裂。我们要发扬正确的批评，反对不正确的批评，这就是整风。要继续将歪风整掉，我相信，大家一定能团结一致地干，并且一定能干得好。

---

[1] 四中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2] 五中全会，指1934年1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论合作社

（1943年10月14日）

今年边区在发展生产上，又来了一个革命，这就是合作社方式。把公社劳动力组织起来，发动了群众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劳动效率，大大发展了生产。

在过去，束缚边区生产力使之不能发展的，是边区的封建剥削关系。一半地区经过土地革命，把这种封建束缚打破了，一半地区经过减租减息以后，封建束缚削弱了。这样合起来，整个边区就破坏封建剥削关系的一大半，这是第一个革命。

但是，如果不从个体劳动转移到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的改革，则生产力还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建设在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不破坏个体的私有财产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非常需要了，只有这样，生产力才可以大大提高。现在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如果全体农民的劳动力都组织在集体互助劳动之中，那么，现有全边区的生产力就可以提高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这办法，可行之于各抗日根据地，将来可以行之于全国，这在中国经济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这样的改革，生产工具根本没有变化，生产的成果也不是归公而是归私的，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变化了，这就是生产制度上的

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

全边区现有全劳动力三十五万个，今年经常组织在集体劳动中的变工队扎工队的已有三万余人，占全劳动力总数的十分之一，而临时性的劳动互助，就延安县说，有百分之七十，明年还可发展。如果各县经常的集体劳动组织能由十分之一提高到十分之二三，可达十万人左右，再加上临时性的劳动互助组织能向延安看齐，还有半劳动力也参加组织，这将是一支很大的劳动军。

我们的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也带着合作社的性质，比如一个连，就是一个小合作社，一个旅就是一个大合作社。在各种部队、机关、学校合作生产之中，杨家岭运输队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杨家岭运输队在改组前，有大车八辆，驮骡十六头，照普通情形，每日最低限度应运输物品二十七万斤，但实际运输的只有十九万斤。经费开支，则除照一般的供给标准外，每月还要贴六万元。今年在公私两利的原则下，把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公家以大车八辆、驮骡十六头（后增为二十头）及全部用具作为八十股，运输员二十名以身份股名义作为二十股，共一百股，每月按股数二八分红，一切人员、牲口、装置等费用开支，概由合作社自行解决；替公家运输物品依照里程远近按斤给运费；运输员的生活由运输合作社适当改善。这办法，经过解释后，全体运输员一致赞成。执行结果，运输量由每个月十九万斤，增为三十八万九千斤，增加了百分之百，超过了普通的运输力量百分之三十。同时，大大提高了运输员对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节省了许多经费和工具，又更加爱护牲口。比方，过去装粉的口袋破了碗大的洞无人管，现在运输员随身带着针线，缝补口袋；过去贪污马料是公开的秘密，现在却没有这种贪污了；过去车马用具稍一损坏，就要求公家补充新的，现在

只要能凑合着用，就对付着用下去；对牲口，过去是粗心大意的，现在也逐渐喂好了；运费开支，改组后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过去除照供给标准外，每年还要贴六万元，现在不用半文津贴，还每月获利数万元。

各机关采用这种办法后，也得到很大效果。管理局运输营一百三十头牲口，二十辆大车，在未组织合作社之前，每月运输量只有一百二十万斤，改组为合作社后，每月运输量提高到一百八十五万斤，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此，请大家考虑这种合作办法，是否可以广泛运用于我们的公营工厂及公营农场。

这一套办法，资本主义国家及国民党是不能做的，只有我们才能做。因为我们不以剥削人民为目的，我们贯彻公私兼顾的方针。

军队中如三五九旅战士纺毛线，用柳榆树条编成各种用具，规定：凡动用公家工具的手工劳动，以其结果五分之四归公，五分之一归私；凡不动用公家工具的，则以三分之二归公，三分之一归私。这种办法，一方面解决了公用品的需要，同时无疑增加了战士的津贴，也含有合作社的因素。

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而又以群众为归宿，那就什么都能好办。因此，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替人民着想，部队的负责同志要替战士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这种群众观点的生产学说，打破了过去各种不正确的“学说”，也只有这种为群众的学说，才能把生产搞得好。

我愿各地同志注意提倡合作社的生产，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是

一种合作社，农村的集体互助劳动又是一种合作社，此外还有包含各种业务在内的综合性合作社，被称为运盐队的运输合作社，工人们集体互助的手工业合作社，把这许多样式的合作社都发展起来，全体公私群众就会变为富裕的了。在敌后各根据地的目前困难状况，也就能够克服了。

致董必武电[1]

（1943年10月17日）

对蒙特巴顿[2]所询各项，除你处已有材料可告他外，军队五十万数目及活动地区与我党外交政策及对教会态度均可告他。

---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蒙特巴顿，即蒙巴顿，英国勋爵，当时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

给侯健存[1]的信

（1943年10月21日）

侯大夫：

在边区政府工作的吴吉清同志（他过去是我的特务员）的小孩患病甚重，群医束手，拟请费神为他检查一下，看是否还有希望，未知可否？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一日

---

[1] 侯健存，当时是延安中央医院小儿科主任。

致邓小平等电[1]

（1943 年 10 月 21 日）

（一）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军事布置仍在积极准备中。（二）决由冀鲁豫边区调三个大团，保证每团二千五百人，到达陕北，今年年底补充准备完毕，明年二月底到达陕北绥德待命。无论情况如何变化，此计划决不改变。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致邓小平、滕代远等电的主要内容。

视察南泥湾时的讲话[1]

（1943年10月）

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我们不能像国民党，他们连棉布都要靠外国人。

---

[1] 毛泽东对三五九旅的生产情况非常重视，并于1943年10月亲临南泥湾进行视察。这是毛泽东在南泥湾视察时讲话的一部分。

八路军三五九旅指战员在南泥湾垦荒，使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1943年10月26日，毛泽东视察南泥湾。

在致朱德电上的批示[1]

（1943年10月）

危机并未过去，不要听信甘言。

---

[1] 这是毛泽东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声称胡宗南部绝无进攻陕甘宁边区之意致朱德电上的批示。

宣传要点[1]

（1943年11月4日）

（一）斯大林“五一”命令中及中央“七七”宣言中所称今年打败希特勒一节应作如下的解释。打败希特勒不但需要苏联的努力，而且需要英、美的努力，但在过去时期内，因为只有苏联单独抵抗希特勒及其欧洲伙伴，英、美两国没有执行他们在一九四二年开辟第二条战线的诺言，故使得希特勒还能继续进攻，使得希特勒还没有被打败。现在希特勒对苏联的第二个夏季攻势已经破产了，这是苏联单独作战的结果。今后世界反法西斯的任务，就是发动对法西斯阵线的进攻，最后地打败法西斯。今年十月革命节乃是整个反法西斯阵线由防御到进攻的转折点，是特别值得庆祝的。（二）日寇为了破坏我们的秋收正在整个华北进行它的秋季大“扫荡”，我八路军及华北人民正在作英勇的反“扫荡”战斗，一定要粉碎日寇的计划。各根据地目前时期的宣传应集中于鼓励人民配合军队粉碎敌人的进攻，保卫秋收，打击敌伪的“蚕食”政策，扩大我们的根据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的主要内容。

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指示[1]

（1943年11月5日）

据彭、罗[2]诸同志说，太行、太岳两区反特务斗争中在许多地点捉了并杀了许多人。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引起你们严重注意的，你们必须立即检查此种现象。在基本根据地内，你们必须认真研究与坚决执行中央八月十五日关于反特务斗争指示（原名审查干部指示），密切地指导各级干部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正确路线，废止历史上传来的多捉多杀及逼供信的错误路线。你们在基本根据地内在反特务问题上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的特殊性，不应过分强调前方环境与延安环境的区别。如果要强调的话，则应懂得正是在前方战争环境中，更应执行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的方针，才能在严酷环境下正确地保证反特务胜利。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百分之五（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

---

[1] 这是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北方局各同志并转太行、太岳、冀南各区党委电的主要内容。

[2] 彭、罗，即彭德怀、罗瑞卿。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

释放。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不用公审大会，而用调查、研究、解释、劝说、斗争、开坦白大会的方法，弄清一切暗藏的特务分子；用极大的热忱、很多的方法（千方百计），争取他们转变为好人。即使是最大最坏的特务头子，亦须争取为我们服务。群众不了解此种宽大政策的作用时，须向群众作明确解释。

庆祝十月革命节给斯大林的贺电

（1943年11月5日）

斯大林同志、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全体军民：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二十六周年，庆祝红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议及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的伟大成功。二十六年来为你们的胜利所鼓舞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和你们携手并进，团结一致，取得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

在庆祝十月革命节干部晚会上的讲话

（1943年11月6日）

今天延安开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二十六周年。我们去年开庆祝会时，红军还正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而奋斗，但在一年之中，红军的胜利就转变了战争的全局，由伏尔加河打到了德涅伯河，即将到来的冬季攻势，又将取得更大的胜利。没有红军，战争的局面是不能设想的。红军的胜利，关系于整个人类的命运，这个真理，早已是明明白白的了。同时，这一年中，英美法联军肃清了北非、西西里及意大利南部的敌人，空军采取了攻势，配合了红军的作战。在东方，中国的军队与英美的军队也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一星期前，英美苏三国在莫斯科所开的会议，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这也是值得大大庆祝的。这次会议解决了许多军事政治问题，于十一月一日发表了三国联合公报，签订了几个有历史重要性的宣言。这次会议所讨论与解决的问题中，据联合公报所说，首先最重要的，是为着缩短战争时间，决定了确切的军事行动计划，关于此种行动，已经有所准备。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不久的时间内，我们将看得见第二战场的实行开辟，从东西两面夹击希特勒而打败他，决定地解决欧洲问题。欧洲问题解决，就是折断了整个法西斯的脊骨与右手，剩下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左手，也就不难打断了。

莫斯科会议的决议中，有中国参加的四国宣言，在抗战到底的

决心下，全面地规定了保障战后和平与安全的整个重要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规定四国在战争中的合作，将使之在战争之后也继续实行，这样就打破了德日法西斯及各国内部的投降主义者离间英美苏中的阴谋，四国是更加密切地团结起来了，战后的和平与安全有了保障了。宣言中又规定战后将组织包括一切大小国家在内而以主权平等为原则的新的国际联盟，作为保障和平安全的组织形式。我们可以想到，这种新的国际联盟，将和战前的老的国际联盟（虽然在其后期有苏联参加在内，但那时不容许苏联起重要作用）大不相同，它将是真能保障和平安全的联合机构。

莫斯科会议决定了对意大利的基本原则与具体政策。其基本原则是："法西斯主义及其所有恶势力与其所产生的事物应予完全消灭，而予意大利人民以每一机会，建立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政府机构及其他机构。"其具体政策的第一条是："意大利政府应容纳始终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人民团体的代表，使其更加民主化。"第二条是："意大利人民应完全恢复言论、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与公共集会的自由，意大利人民并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团体。"此外有几条是关于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残余的，有一条是关于建立地方民主政府的。根据这些条文，消灭一切法西斯遗迹与建立有共产党参加的广泛的新民主主义意大利的方针是确定了。对意大利宣言的末尾还作了一个声明，这声明说："本决议的内容，决非付诸实行以反对意大利人民最后选择其政治制度的权利。"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声明，这就是说，将来意大利人民选择民主制度，还是选择其他更进步的制度，他们是有权利的。莫斯科会议对意大利宣言是一个范例，将来将以此对待一切法西斯国家。这是完全区别于第一次大战的东西，历史上凡尔赛的帝国主义精神被扫除了，给了战败国人民

以自由解放的光明道路，这是苏联人民、英美人民及各国人民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的集中表现。

莫斯科会议宣布了奥地利脱离德国，同时责成奥国人民要为反希特勒战争而努力。这也是一个范例，一切被法西斯吞并的国家或地方，均将获得解放。

在三国会议上宣布了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与斯大林委员长三人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规定了彻底惩办法西斯凶手的原则，一切法西斯刽子手将不能幸免。同时，宣言号召“目前尚未沾染无辜人民的血迹的人们，切勿和那些凶手们同流合污，盖三国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借以瓦解法西斯营垒。像这样的带着深刻革命意义的宣言，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不能有的。

总之，三国会议的成功，确实是划时代的，它将深刻地影响到战争及战后的人类生活，人类解放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那些对中国人民前途及世界人民前途抱悲观见解的人们，那些抱投降思想，抱无原则妥协思想的人们，已经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了。

我们庆祝苏联诞生的二十六周年，我们庆祝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我们庆祝斯大林元帅的英明领导，我们庆祝莫斯科三国会议的划时代的成就，我们庆祝中国参加了伟大的四国宣言！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我们全国爱国的军民同胞，应该一齐努力，坚决拥护四国宣言，制止仍然存在的投降危险与内战危险，团结全中国一切爱国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并以这种新国家的资格参加到新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建设中去，这就是我们的期望。

致邓小平等电[1]

（1943年11月11日）

敌正在加紧对华诱降，蒋仍未放松对边区军事准备，我为推迟内战，坚持敌后抗战，尽可能屯兵陕北，是十分必要的。望以六团单位补足七千五百人，由杨得志[2]率主力五千人，年底或明年正月初出动来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致邓小平、滕代远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杨得志，当时任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为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题词[1]

（1943 年 11 月 13 日）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时刻注意的。庆祝今年生产的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1943年11月13日开幕的中直军直生产展览会写的题词，该题词张贴在展览会现场。

在董必武来电上的批示[1]

（1943年11月13日）

拟答：周三年在渝无事可做，在国民党未真想合理解决问题以前，不拟出来，各事可经董谈判，如至真能合理解决问题时，周可以出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董必武12日关于蒋介石等一再询问周恩来是否以及何时从延安出来到重庆的来电上的批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11月13日至27日）

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只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六届六中全会，我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是作了否定的结论的，但当时没有发表。六中全会的很好的条件是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时讲话的一部分。

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列主义的灵魂。有许多同志喜欢作总结，而不喜欢分析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革命中，资产阶级采取暴力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左”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采取改良政策，革命队伍容易出右倾机会主义。蒋介石在他的阶级敌人面前是警觉、坚定、明确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一点，他是阶级政治家。大革命时，我们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

复董必武电[1]

（1943年11月15日）

可告国民党，周在渝三年无事可做，暂时不拟出来，董被委以全权与彼方谈判一切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复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组织起来[1]

（1943年11月29日）

今天共产党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从农民群众中、工厂中、部队中、机关学校中选举出来的男女劳动英雄，以及在生产中的模范工作者，我代表中央来讲几句话。我想讲的意思，拿几个字来概括，就是“组织起来”。边区的农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工厂中的群众，根据去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所召集的高级干部会议的决议，今年进行了一年的生产运动。这一年的生产，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和很大的进步，边区的面目为之一新。事实已经完全证明：高级干部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高级干部会议方针的主要点，就是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如果边区去年以前的生产运动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够显著，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这一点，那末今年的成绩，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大家亲眼看见了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

边区的军队，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个战士平均种地十八亩，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袜，住的窑洞、房屋，开会的大小礼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纸张笔墨，烧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办。我们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每个战士，一年中只需花三个月工夫从事生产，其余九个月时间都可以从事训练和作战。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抗日战争六年半中，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实行烧、杀、抢的“三光”政策，陕甘宁边区则遭受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财政上经济上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我们的军队如果只会打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现在我们边区的军队已经学会了生产；前方的军队，一部分也学会了，其他部分正在开始学习。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1]我们的机关学校，今年也大进了一步，向政府领款只占经费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产解决的占了绝大部分；去年还只自给蔬菜百分之五十，今年就自给了百分之一百；喂猪养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开设了许多作坊生产日用品。部队机关学校既然自己解决了全部或大部的物质问题，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还有我们的工厂，发展了生产，清查了特务，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了。整个边

---

[1] 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

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陕甘宁边区过去是存在过这种方针的，经过历年的指正，特别是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今年的群众运动，大概现在还作这样错误想法的人是少了。华北华中各个根据地，因为战争紧张，也因为领导机关注意不够，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广大的开展。但是在中央今年十月一号的指示以后，各个地方也都在准备发动明年的生产运动了。前方的条件，比陕甘宁边区更困难，不但有严重的战争，有些地方还有严重的灾荒。但是为了支持战争，为了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为了救济灾荒，就不能不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前方的生产，过去几年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加上今年冬天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物质准备，明年可能造成广大的运动，并且必须造成广大的运动。前方处于战争环境，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但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则是完全可以做到，并且必须做到的。

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部队机关学校的群众生产，虽不要硬安上合作社的名目，但是这种在集中领导下用互相帮助共同劳动的方法来解决各部门各单位各个

人物质需要的群众的生产活动，是带有合作社性质的。这是一种合作社。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

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运盐队）以及手工业合作社。

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只要有决心，半年一年工夫就可以学好的。他们可以帮助群众组织生产，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我们的同志学会了组织群众的劳动，学会了帮助农民做按家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运盐队，组织综合性合作社，组织军队的生产，组织机关学校的生产，组织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加上旁的各项本领，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一定可以协同全国人民，把一个新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

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我觉得，在无论哪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地方工作中，都存在有这种官僚主义的作风，都有一部分缺乏群众观点因而脱离群众的工作同志。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

此外，在我们的军队工作中，还存在有一种军阀主义作风，这也是一种国民党的作风，因为国民党军队是脱离群众的。我们的军队必须在军民关系上、军政关系上、军党关系上、官兵关系上、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遵守正确的原则，决不可犯军阀主义的毛病。官长必须爱护士兵，不能漠不关心，不能采取肉刑；军队必须爱护人民，不能损害人民利益；军队必须尊重政府，尊重党，不能闹独立性。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历来是好的，现在也是好的，是全国军队中一支最好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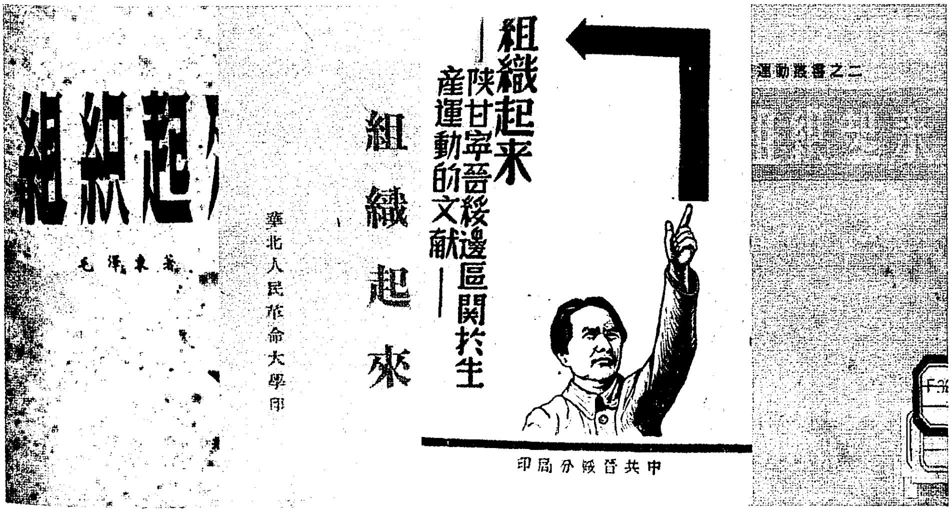
但是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经过去年的高级干部会议和军政干部会，又经过今年春节的拥政爱民运动和拥军运动，这个倾向是根本地克服下去了，还有一些残余，还必须继续去克服。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内，这种毛病都是有的，那里的党和军队必须注意克服这种毛病。

无论在地方工作中，在军队工作中，无论是官僚主义倾向或军阀主义倾向，其毛病的性质都是一样，就是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但是必须开展自我批评，正视错误倾向，认真实行改正。如果在地方工作中不批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不批评军阀主义倾向，那就是愿意保存国民党作风，愿意保存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在自己清洁的脸上，那就不是一个好党员。如果我们在地方工作中去掉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去掉军阀主义倾向，那就一切工作都会顺利地开展，生产运动当然也是这样。

我们边区的生产，无论在农民群众方面、机关学校方面、军队方面、工厂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成绩，在军民关系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边区的面目，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同志的群众观点已经加强，同群众的结合大进一步的表现。但是我们不应该自满，我们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我们的生产也要继续求进步。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

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是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的层层包围之中，我们是处在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因此，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象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


組織起
毛澤東著
組織起來
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印
組織起来
—陝甘寧晉綏邊區關於生產運動的文獻—
中共晉綏分局印
運動叢書之二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组织起来》(部分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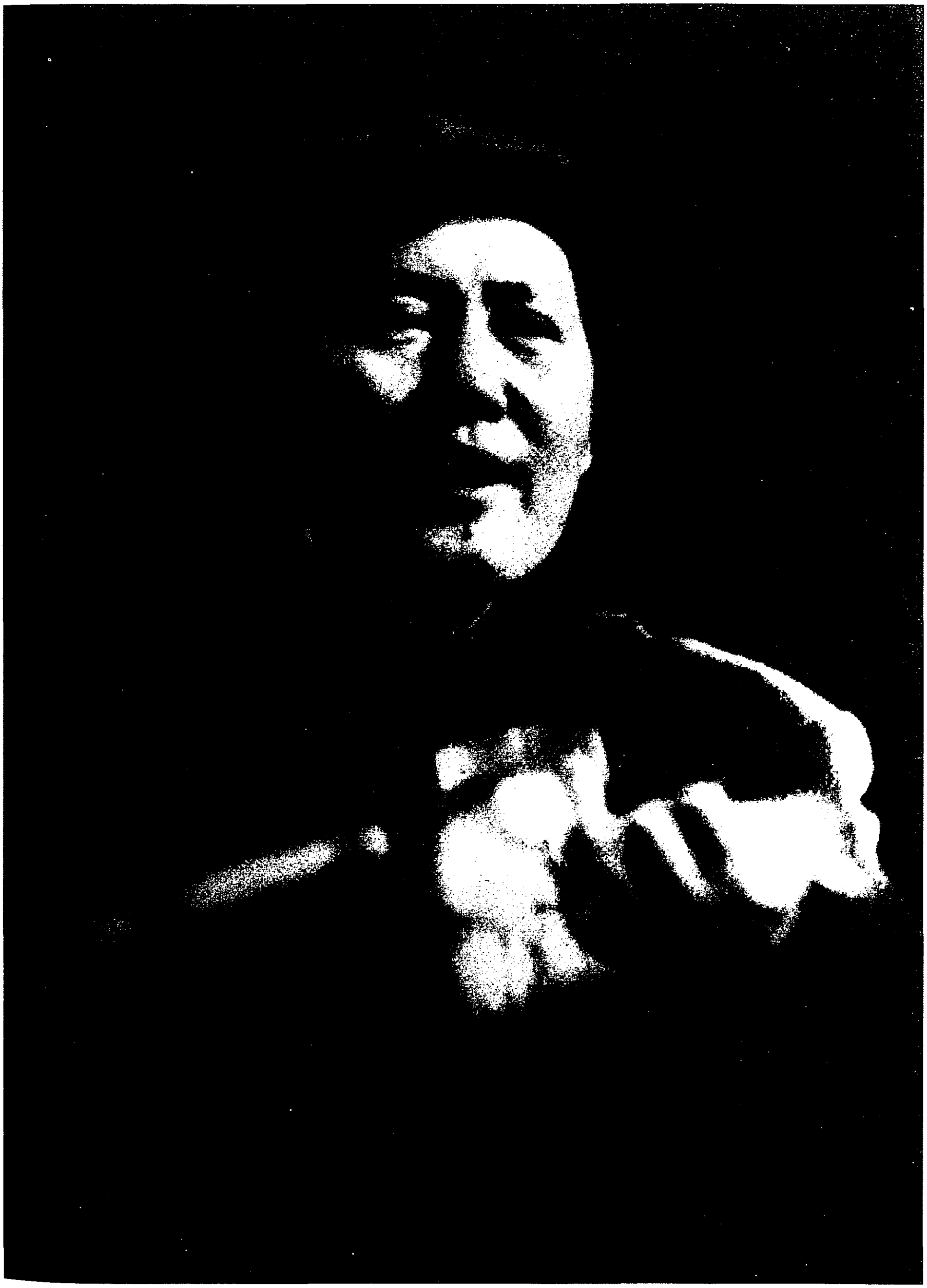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讲话。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一）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二）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三）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之四）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之五）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之六）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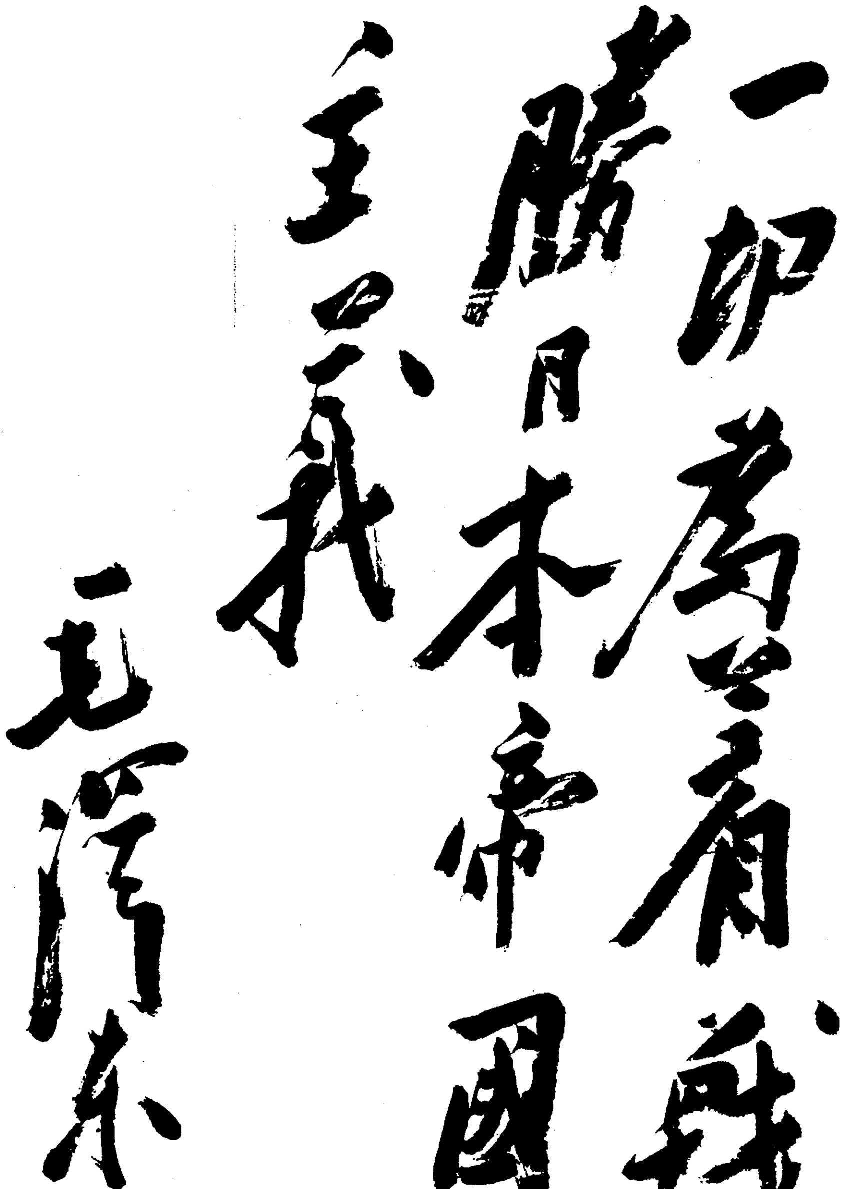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之八）

为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生产展览会题词

（1943年11月29日）

一切为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



一切為着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毛澤東

毛泽东为八路军留守兵团部队生产展览会的题词。

为刘刚题词[1]

（1943年11月）

努力奋斗。

---

[1] 这是毛泽东为“抗大”七分校学员，被评为学习模范、生产突击手和先进工作者的刘刚的题词。

和邓宝珊、续范亭的谈话[1]

（1943年11月下旬）

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直接投降和内战方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个是一面假装抗日，一面积极反共，这条路最终也是行不通的；第三个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一条生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三民主义必须通过三大政策来实现。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只须国共两党继续努力了。

---

[1] 1943年11月下旬，毛泽东派人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接邓宝珊、续范亭到自己住处谈话，这是谈话的一部分。邓宝珊从西安返榆林途中于11月下旬到达延安，停留半个月。当时邓宝珊偶感风寒而患病，毛泽东着人送去狐皮10件给他做大衣料。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12月1日）

我们现在的纲领很简单，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是如此。这里面有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人民大众很多，首先是几万万农民，其次是几千万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参加，抗日时期地主也参加，但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许多同志如王明同志就不了解这一点。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给续范亭的信

（1943年12月4日）

范亭同志：

大示及诗拜读，洋粉拜领，江青当遵示照服。贵体虽有起色，但看东西仍不宜太多，请加注意。邓先生[1]西北人望，调护国共关系，出力甚多，此次南行，讲了许多好话，我们心中感谢他。惟此次见面，似不满足，因我们未谈具体办法。其实我们毫无具体办法，例如撤消封锁，承认边区，恢复新四[2]等等，除听候国民党解决外，我们方面是毫无办法的。边区周围情况仍紧，惟国际环境日好，日寇又有进攻之势，时局或可不走向决裂。明年春夏尚有一关，过了此关，或有好转之望。我如常，一年未生大感冒，算一幸事。敬颂起居安畅！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

[1] 指邓宝珊，当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2] 即新四军。

致各中央局等电[1]

（1943年12月10日）

明年军队的拥政爱民运动及民众的拥军运动应规定于旧历正月举行，不应在阳历一月举行，以便利用群众过旧历新年的习惯。应规定明年旧历正月全月为拥政爱民月及拥军月，以便各地各部在这一个月内选择一周或两周举行这个运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各军政治部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时局的影响

（1943年12月16日）

小平[1]同志：

甲、亥江电[2]悉。努力生产，注意积蓄，准备迎接更加艰苦局势之到来，这是完全对的，请你坚持此方针。山东、华中应如何注意，待朱瑞、陈毅[3]到延了解情况后再告。

乙、太平洋战争两年，中日战争六年余，日本实力仍相当强大，且据太平洋之险，英、美反攻非易事。反之，国民党机构腐化，特务横行，在长期战略相持阶段中，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2] 指邓小平1943年12月3日给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电报中说：华北各区因敌人破坏、战争影响、普遍灾荒及我们的生产工作很差等原因，经济上大都已接近枯竭。“我们各区过去对生产领导不够，没有注意积蓄问题，无论军民都经不住灾荒、敌人的严重打击。今后必须注意生产，讲求积蓄，不仅在人民中提倡耕三余一，军、政方面也要切实注意粮食、资财的积蓄”。电报还建议中央指示华中和山东注意积蓄物资或现金，以备不时之需。

[3] 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3年8月动身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3年末到达延安。陈毅（1910—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1943年11月动身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4年3月到达延安。

弱。开罗会议[1]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德黑兰会议[2]肯定开辟欧陆第二战场，与蒋希望快在太平洋反攻相违背。故蒋此次由开罗飞返重庆，不及前次废约[3]之大吹大擂、兴高采烈了。时局于抗日、革命是极为有利的，但困难仍在增加（如开罗会议可能促使日本财阀间、军阀间各派别之矛盾减少，而较前更妥协团结，坚持持久战争等），特别处于敌后之华北须有充分准备，再坚持三五年，防止在德黑兰、开罗会议及苏联不断胜利下，引起轻敌，放松长期准备。请随时注意各区实际情形予以纠正。

丙、太岳、中条，整风、生产全无反映，望注意检查督促。

毛泽东　彭德怀[4]

十二月十六日

---

[1] 开罗会议是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一次会议，共商进一步联合对日作战问题。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并将它侵占的中国领土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2] 德黑兰会议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德联合作战问题，签署了德黑兰总协定和德黑兰宣言，总协定规定美、英等国应于1944年5月发动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3] 指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分别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

[4] 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上的批语[1]

（1943年12月17日）

大概如我们到了四十岁以上的人，对于各种哲理问题是特别感觉兴趣的，因此，这也可以当作一种游戏。【这样说不妥。】

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何谓人生？

所谓人生，应该也是和一切物质的属性一样，即是人这种东西的属性。【应从分析社会关系出发，不应从哲学定义出发。】

一切事物，均具有一定的实质，【即该物之特性。】而与其他事物区别。一切物质的属性，均是从各该事物的实质中发生出来的。当这个事物不与其他事物接触时，它的属性是蕴藏着，并不外现出

---

[1] 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给续范亭的一封信，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人性”问题。毛泽东对信稿加了很多批语，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人性问题的一系列历史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二元论的错误观点，并就此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中的文字是毛泽东写的批语和加写的文字。

来，这个事物的实质即不能被认识。但这个事物一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时，它的属性就表现出来，人们就可从它表现的属性去认识它的实质（如真金有不怕火烧的属性，用金与火接触之后，人们就可认识金的实质）。当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了全面的（全过程的）深刻的接触时，就要暴露它全部的实质，【事物的历史是无穷的，事物与事物的相互关系是无穷的，因而其属性是无穷的，普通所谓“全面暴露”，实只其有限的一些部分、一些片断。】并也暴露它最深刻的最基本【比较深刻。】的实质，即暴露它的本性与本质。人们就可深刻地认识【认识也是无穷的。】到这个事物的本质。这是一个普遍的原理。这对于人也是适用的。

人这种东西，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物质性（或称物性，即来信所说的“宇宙的共性”，宇宙万物的共同性，即万物的物质性）。人这种东西，又是动物的一部分，所以人也具有一般的动物性（或称兽性，即来信所说的“动物的共性”）。

但人这种东西，又是一种特殊的最高等的动物，一种发展到了最高形态的动物，不独可以与其他物质区别开来，而且与其他一切动物也有显然的一定实质上的区别。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与动物性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为其他一切物质一切动物所没有的人性。所以一般地说来，人性也是一种物质性、一种动物性；但是特殊地来说，即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一般的动物性又应该也可以区别开来。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绝对区别开来的人性哲学（如许多宗教家及绝对的唯心论者）都是错误的；但一切把人性与物质性、动物性不加区别的哲学，也是错误的。

人与其他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

人与其他动物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最基本区

别是人的社会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从事社会生产的动物，人是阶级斗争的动物（一定历史时期），一句话，人是社会的动物，不是有无思想。一切动物都有精神现象，高等动物有感情、记忆，还有推理能力，人不过有高级精神现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人的脑筋及其全部神经系统特别发达（这是长期劳动长期斗争的结果），所以人能理解自然界各种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之发展过程，能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相互的内部联系；因而人就有可能按照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去改造客观事物，去进行劳动生产，去制造工具，去改造世界。这是一切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其他动物至多只有思想的萌芽，而无完备的思想而不能制造工具）。这是只有人才特具的。这就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他一切的区别都是形式上的，不是本质的）。【这是进化了的人，不是原始人，原始人与猴子的区别只在能否制造工具一点上。自从人能制造石枪、木棒以从事生产，人才第一次与猴子及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不是因有较猴子高明的思想才与它们区别开来，这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水岭。】

因为人是最高等的有完备思想的动物，【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不是一开始就完备的，也永远不能完备。】所以人除开具有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之外，人还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即灵性【动物亦有。】、理性等。即人能够思想，能够用思想去把握各个客观事物和各个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在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之后使自己的行动去适合这种规律，使自己的行动具有意识性、计划性，自觉地不逾越客观规律之外。即是人的思想行动之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亦即孔子所说的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在人类是历史地进化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地进化的，小孩子不懂得

规律性，孔子七十才不逾矩。阶级社会内没落阶级不懂得规律性。】所以“人为万物之灵”，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是唯心论的社会观，人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不是最终形态，它将来还要发展，不是什么万物之灵。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资产阶级总是强调人的理性（精神），我们不应如此。】

人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区别开来，并利用自然界去改造自然界（相对的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这也是历史地进化的，不是一下子如此的。人最初是不能将自己同外界区别的，是一个统一的宇宙观，随着人能制造较进步工具而有较进步生产，人才能逐渐使自己区别于自然界，并建立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而又统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也是历史的，将来的对立统一观的内容与现在又将不同。】

但是人所特具的这种主观能动性、灵性、理性等，即人的思想，也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也是一种特殊的物性——人脑的属性。这种属性也和其他物质的属性一样，要人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通常要在六七岁以后），并须要与其他事物有一定程度的接触（经过五官的感觉）之后，它才能产生，才能表现出来，否则人就不能有思想。

人的思想，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产生，独立存在。因为人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物质的属性，就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

所以人不论是怎样的“为万物之灵”，但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主观能动性永远不能超越客观的限制性，思想永远不能离开外界的物质而独自产生与独立存在，完全不是如佛家（其他宗教家本质上是相同的）所说的那样，“无声无色，湛然寂然”，

“无论用什么方法也不起波动”（来信用语），完全解脱红尘，【红尘即社会。】往天上去，去到空虚，而又似乎是存在。所以人不能有神性，【人不能离社会而为神。】人性不是神性、鬼性。人没有神性、鬼性。思想在根本上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主观在根本上不能离开客观而独立存在。【这是两个问题，思想不能离开物质，精神现象是人脑的属性，讲的是脑子与脑子的属性的关系，一种物质运动形态与别一种物质运动形态（精神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的关系，这是一个问题。主观反映客观，讲的是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内心与外物的关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这里把它们混同了。】

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1]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即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孟子说“食色性也”，王阳明强调“好好色，恶恶嗅”的“人性”。但孟子与王阳明在这里所说的人性，不独是没有说出人的社会性，就是人的自然性，也没有说出来。因为食色之性，好好色、恶恶

---

[1]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200万年。

嗅之性，不独是人有，其他许多动物也是有的【人的食色是社会的，与动物的食色根本区别。】（其他许多动物都好吃好的东西，甚至比人还长得更美色，都有恶恶嗅的嗅觉）。【这是两种不同范畴的好恶；把它们等同起来，就是庸俗唯物论。】他们在这里只说出人的动物性的一部分。【人的食色并非动物性而是社会性。】如果把这当作人性，就是片面的说法，就是偏向，就不能把人性与兽性区别开来。【人的一切都与兽性区别开来，没有不区别的。】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程颢程颐与朱熹则是相反的，他们抓住人的理性这一面，故意强调起来，主观地机械地制作许多规律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行动，来摧残人们的自然性。【应说来摧残人们的社会性，程朱把人们当作非人所谓“圣贤”来处理，所以是错的。】（程朱已经察觉到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把性分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正是错误的二元论，实即唯心论。】但他们认为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能克制气质之性，发扬义理之性，就成为圣贤，并以克制气质之性的多少为标准，认为学道功夫就在这里。如是就主张尽量的去故意摧残人的自然性。）【摧残正当社会性。】这也是一种偏向。【是完全错的，不止偏向。】因此我希望你在摘引他们的话时，应该注意。

因为人有思想，而思想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的统一，所以人就有犯错误甚至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之可能（只有人才可能犯错误，其他一切动物差不多都无犯错误的可能，【不妥，竞争生存的学说，说生物由竞争而遗传而择种留良，避免淘汰，就是避免犯错误的要求，只有矿物才无此种要求。】尤其无犯系统严重错误之可能），人也一定要犯错误（因主观与客观矛盾，可以说完全不犯错误

的就不是人)。人是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虽然人可以避免犯系统的严重的错误)。所以人在看自己的时候，常常忽视自己主观的能动性，把人降低与普通动物平列，或者又常常夸大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人说成神仙那样。这是人在看自己的时候的两种偏向。

以上是说人的自然性。【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但是人的自然性，只是人的一种本性，人还有另一种本性，即是人的社会性【二元论。】。人的社会性与人的自然性有区别、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护着（人类共同的）自然性的。二者互相限制，也互相推移。【这个观点不妥，当作人，它只是社会的动物，人分成阶级后，只是阶级的人，再也不能多一点，无所谓人类共同的自然性，更无所谓以社会性去保护自然性，人的生命及种族存续，它就是当作社会的人的存续，再无别的。】

何谓人的社会性?

因为人的生活，是社会的生活，必须有维持社会一切人们共同生活的社会规律，这种社会规律，限制着人们的自然性、自然欲望【不妥。】只能在一定限度之内发展。

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思想行动能够自觉的规律化，【人的自觉是历史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人也就最容易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之下而引起自身的变化，与一切其他“冥顽不灵”的东西不同。【人同冥顽不灵的猴子的最初区别，仅仅在于用工具劳动。】人们在不断的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改造着自然界，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本质与本性。【改变着人们自己的手、脑、五官和思想等等，由各种不同社会结构，改变为各种不同的社会性，只应这样

来解释人的性质的改变，否则就是唯心论。】人们的思想形态，是由这些人们经常接触的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来决定的。一定形态的人们的思想，又指挥着人们在一定形态上去行动，并逐渐改变客观环境的形态与劳动形态。

人们的生产劳动，永远是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们相互间在一定的劳动样式的基础上，发生一定样式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等（即人们共同生活的规律），这些一定的关系就决定着人们一定的社会观念形态，即决定着人们一定样式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心理、道德等。长期的一定的人们的生产样式与生活样式，养成人们在思想行动上的一种特性，这就是人们的社会性。【这些是对的。】

人们长期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去劳动，去生活，【但是长久地不自觉的，自觉是一个历史过程。】如是也就使人们的思想行动按照这种规律相对的定形化。一定的经济性质，一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的性质与伦理道德的性质。一切人们的理性，是自然的，同时也是社会的。【只是社会的。】

人的自然性，是先天的，是从人这种东西的根据中产生出来的。如人的体质、聪明、本能等（这些东西受后天的影响，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被后天所根本改变）是先天生成的。人的社会性，是后天的，是从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养成的，如人的思想、意识、观点、习惯等，是人在生产中斗争中养成的，学会的【但前面又把思想意识归入自然范畴，又把聪明归于自然（先天）范畴。】（如驯养很小的野兽，也可使野兽具有某种驯性）。

【自从人脱离猴子那一天起，一切都是社会的，体质、聪明、本能一概是社会的，不能以在母腹中为先天，出生后才算后天。要说

先天，那么，猴子是先天，整个人的历史都是后天。拿体质说，现在的脑、手、五官，完全是在几十万年的劳动中改造过来了，带上社会性了，人的聪明与动物的聪明，人的本能与动物的本能，也完全两样了。人的五官百体聪明能力本于遗传，人们往往把这叫作先天，以便与出生后的社会熏陶相区别，但人的一切遗传都是社会的，是在几十万年中社会生产的结果，不指明这一点，就要堕人唯心论。】

但是自从人类社会发展成为阶级社会以后，人就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人们的社会性，就被各人在生产斗争中所占的完全不同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人们的社会性，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以至相反的人们的阶级性。特定阶级人们的阶级性，分裂了掩盖了人们共同的社会性。【是分裂了，不是掩盖了。】比如现今社会中各阶级人们所特具的各种不同的特性（如封建地主的等级性、神秘性、残酷性，资本家的垄断性、竞争性、自私性，农民的分散性、落后性、反抗性，工人的进步性、组织性、集中性等）是表现得很明显的。人们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成为人们的党派性，特定阶级人们的这种阶级性党派性，就贯穿在这些人们一切具体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中，以致使各种军事、政治、学说、艺术和道德等等，都表现着一定的阶级性与党派性。

过去历史上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把自己的阶级性，看作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人性，并且看作是最善良的人性、自然的人性。而把其他阶级人们的阶级性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例外的恶劣的表现。把他们看作是无人性的人，把他们看作是不够人格的人。过去一切统治阶级都讳言人们的阶级性，并且讳言人们的社会性，【实在也由于不知道，连最好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也不知道。】都把人们的阶级性

社会性看作是人们先天的自然性，因为这样，才能巩固统治阶级的阶级地位。所以在过去各种人性学说上，都明显的表现其阶级性。所以有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有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也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论。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人，具体的人又是社会的一分子（在阶级社会中还是一定阶级的一分子），人又是社会人（或阶级人）。所以人同时具备着自然性与社会性，这就是人性的两个基本方面，这就是人这种东西所有的两种基本属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对的，但这就是说，它是社会人，不是所谓自然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特殊的部分——社会人。】

何谓善恶？人们的善恶观念是由什么决定的？

人们的善恶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一切对于人们有利的事物，人们就认为善；一切对于人们有害的事物，人们就认为恶。（这是以人类为本位来说的。但有些中国佛教家的善恶观念还把动物界包括在内来说，所以他们戒杀生，认为杀害动物也是恶）。【佛戒杀生，恐有其社会的原因，如英国戒捕鸟，中国农民戒杀牛，是因为鸟少牛少的原故。】

但人是具体的人，人的利害也都是具体的。如是个人的利害、部分的利害与整体的利害、暂时的利害与长远的利害之间，就时常是发生矛盾的。特别在阶级社会中，各阶级的利害就常常是相反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人们彼此之间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中就成了不同的善恶观念。比如剥削阶级认为善的，被剥削阶级就认为恶；被剥削阶级认为善的，剥削阶级又认为恶。如果在无阶级的社会中人们的不同利害关系，还可以用部分服从整体，暂时服从长远的办法，把它们调和起来的话，还有人类社会全

体共同的利害关系的话，【“人类”这个概念，其实产生于阶级分化以后，原始人是不可能有现时我们这个概念的。至于“人类共同利害”，从来就没有过，只待将来阶级消灭后才会发生。】那么，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就在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在阶级社会中，即使人们真的能够好善恶恶（而不是好恶恶善），那末，各阶级人们之间的善恶观念及其好恶也是不能一致的。孟子与王阳明只在人们的食色之间，好好色、恶恶嗅之间，去找人类共同的好恶及人类的共同性。除此以外，大概他们也很难找到人类的共同善恶及好恶了。（当孟子说到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等等人类共同心理时，只能举出一个孺子将入于井的例子。但孺子是还没有思想的，【不是有无思想的问题。希特勒的小哥儿跌下井去，也只有他的共同利害者才去搭救。】无善恶之可分的。【否。】如果说到成人的话，那孔子对少正卯，孟子对杨朱、墨翟、盗跖诸人将入于井，是否还有那为仁之端的恻隐之心，那就很难说了。

在【将来】无阶级的社会中，人类社会全体是还有共同的善恶观念的，是还有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与辞让之心的。因为在这时候有社会全体的共同利害。但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不能一致了，就各有各的善恶标准，共同的是非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也没有了（比如今天希特勒的是非与我们的是非，是相反的，今天希特勒横死，我们也并不会有恻隐之心）。故关于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的争论，【是抽象争论。】是不能得到一致的答复的。因为没有一致的善恶标准。至于说人性无善恶，那也只能是抽象的，并且只是就人的自然性来说才可以。【否，所谓是非善恶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地发展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统一，不同阶级的不同真理观，这就是我们的是

非论。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的善恶论。把人性分为自然性社会性两个侧面，并承认自然性是无善无恶的，就给唯心论开了后门。】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人们的一种社会观念，说到人性的善恶，只能是就人的社会性来说，而人的社会性又是后天的，因此，具体的人来看具体的社会的后天的人性，那就总是有善有恶的，因为这是由具体的人所处具体社会环境的善恶（对于一定的人们来说）来决定的，比如我们今天站在一定的立场，对于一切具体的人都能确定他本质上的好坏，就是因为我们站在具体的立场，有具体的善恶标准，能测量一切相当成熟【不成熟也一样。】的具体人们的好坏。所以人性无善恶的说法，还是抽象的说法，唯心的说法。如果具体的来说，不独是人的自然实质有好坏（体质禀赋有强弱）【秉赋也是社会的。】就是人的社会实质也有善恶，不过各阶级之间所认为的善恶不一样就是了，在告子与孟子的争论中，告子的缺点就在这里（自然告子的意见比孟子是要正确多了）。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似乎这是人类普遍共同的德性。是的，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也自然就爱好真理。真理也有吸引人来爱好的力量。但是对于一切剥削阶级来说，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常常是无情的与他们的利害相反。在这种时候，一切剥削阶级就都不爱好真理，不爱好进步了，都爱好自己的利益，爱好反动，都是按照自己的利害来处理事物，都不是按照客观是非来处理事物，都要故意来歪曲是非，歪曲真理，欺骗群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是剥削阶级主观上的是非，与客观是非又常常是不能一致的（他们常常是把自己的利益当作绝对真理）。【这些都说得好。】因此，对于剥削阶级来说，他们的是非与他们的好恶、与他们的善恶

观念，都不能是一致的。【这一点不妥，虽有明知故昧的事，但剥削者的善恶总是以他们所谓是非为标准的，二者大体是一致的。】是者，他们常常不好，不认为是善，非者，他们倒常常好，不认为是恶。是是非非，善善恶恶，好好恶恶，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做不到的。【他们是是其所谓是，非其所谓非，善其所谓善，恶其所谓恶。】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他们统一其所统一的东西。】而况一切剥削阶级都不能彻底认识客观真理。所以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1]、苏格拉底[2]、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你企图把王阳明的四句话改成真理，我看是很难做到的。【王阳明[3]也有一些真理。】来信所改四句，也还有可议之处。

中国的封建制度一直存在了二千年，所以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阶级的伦理哲学，也是世界上最完备的封建伦理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封建的，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三纲五常，而三纲五常同时又是封建阶级的政治纲领与封建国家的宪法。因此，在今天任何拥护这种哲学的言论行动，都在实际上是拥护了中国的封建残余，阻碍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

---

[1]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2]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3] 王阳明（1472—1528），原名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明代唯心主义哲学家。

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孔孟[1]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中国现在有人著了一本书，名《中国之命运》，在这本书上全部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封建阶级的“固有道德”及其伦理哲学，坚决的反对现代思想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又在大大反对什么“封建割据”（如果是民主割据，他们就不反对吗？）对于这些人，你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他们是不是还有是非之心呢？

人们的道德观念，就是反映客观实际上人们的利害关系。这在中国的墨子早就看清楚了。墨子说“义，利也”，利是义之实，又说“忠，利君也”“孝，利亲也”“功，利民也”。墨子是主张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社会全人类的共同的利益为其道德的标准的。墨子是第一个把道德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伟大的哲学家。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就是这些剥削阶级的利益的反映。中国的封建道德，封建的伦理哲学，就是以封建君主（父、兄、夫在内）利益为中心的道德。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受苦的基础上，建立在使大多数人受苦的基础上，这就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天性及其道德的标准。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使别人同享幸福的基础上，建立在全人类共同幸福的基础上，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天性及我们的道德的标准。

一切剥削者的特性，都是最恶劣的人性，【当着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还在破坏旧制度建设新制度时，他们是有其历史作用的。】他们都是在牺牲大多数人的基础上去求得自己兽性高度的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发泄（如三宫六院、酒池肉林等），一切劳动的被压迫阶级的特性，都是当时社会上最善良的人性，他们是最有理性的，是舍己为人的。

---

[1] 孟，指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

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将来的人类，】才能深刻的认识客观真理，【这是对的，但与篇首论人为万物之灵一节矛盾。】才能有最高的理性，使自己的思想行动按照认识了的客观真理自觉的规律化，方能有最高的自觉的纪律性与原则性，才能把是非、善恶、好恶完全统一起来，才能完全做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善者善之，恶者恶之，好者好之，恶者恶之，才能具有人类中最优良的德性（但不是封建的“固有德性”，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德性”），才能创造最优良的社会秩序。也才能把人类特殊的理性、人类的天才发展到最高限度，才能具有最优良的人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及将来的人类】，它的利害与客观的是非（客观真理）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以全体人类解放的利益，整个人类社会进化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所以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坦率地爱好真理，【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的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能知道的真理，例如民约论与进化论。】爱好全人类共同的利益，爱好社会进化的利益，如好好色那样自然；恶恨邪说，恶恨人类共同利益的破坏者，恶恨反动，如恶恶嗅那样自然。也只有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正确地解释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并把这种哲学提高到最高的程度。

【总评：缺乏唯物的历史的观点。】

给胡乔木[1]的信

（1943年12月20日）

乔木：

请你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听说有个什么苏联作家写了一本猴子变人的小说[2]，我曾看过的一本赖也夫的社会学[3]，张伯简[4]也翻过（或是他写的）一本《社会进化简史》，诸如此类，均请收集。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日

---

[1] 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苏联科普文学作家伊林和他的夫人谢加尔合著的《人怎样变成巨人》一书。

[3] 指赖也夫斯基著、陆一远翻译的《唯物的社会学》一书，1929年8月上海新宇宙书店出版。

[4] 张伯简（1898—1926），云南剑川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曾编纂《社会进化简史》（1925年11月出版，国光书店发行）一书。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3年12月22日）

对特务分子也要分清重要的与普通的，自觉的与被迫的，首要的与胁从的。有许多青年在抗战初期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抗日，不是错误，他们的错误是没有向党报告。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邓小平等电[1]

（1943年12月22日）

边区生产运动已普遍展开，农业（牲畜、粮、棉）手工业特别毛棉织物均有显著增加，变工扎工、劳动英雄起组织增产的重大作用。在贸易上出入口可平衡，经济上已开始建立了自给基础。惟财政开支过大，尚未做到收支平衡，因此本币仍低于法币，中央已在注意调节开支中。太行最主要入口是盐，出口是核桃、花椒。在敌人加紧经济封锁情形下，必须用一切办法开发冀南及南乐、清丰一带之小盐，经过群众及伪组织关系运太行。政府并须确实掌握调济市场，稳定粟价，推销花椒出口（怕封锁），换取必需物资入口（主要是盐）。至于核桃自己可以榨油，不怕封锁。胡麻是敌必需品，封锁与敌不利，目前封锁是表面现象。并请注意克服政府中某些同志手工业生产上的垄断思想。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关于陕甘宁边区生产与财政情况及对太行区发展生产与贸易的意见致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电的主要内容。

给刘少奇的信

（1943年12月24日）

少奇同志：

此书[1]有恩格斯两篇短文，十分精彩，可以看。郭烈夫[2]的一篇亦可一阅。郭烈夫的《唯物论》，瞿秋白曾有译本[3]，我看过，还好，后来听说他犯有错误，我还不知其错误究在何处。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你。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

[1] 指《从猿到人》一书，成嵩翻译，1930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书中包括恩格斯的《劳动在由猿进化到人的过程中的作用》《人类进化的过程》(《〈自然辩证法〉导言》中的一段）两篇和哥列夫（即郭烈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达尔文主义》一篇。

[2] 郭烈夫（1874—1937)，即波里斯·伊萨科维奇·戈尔德曼，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唯物主义纲要》《唯物主义——无产阶级的哲学》等。

[3]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郭烈夫的这部著作，1927年新青年社出版，书名为《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1930年明日书店出版时，书名改为《唯物史观的哲学》，译者署名改为屈章。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1]

（1943 年 12 月 27 日）

华中局，并转一、二、三、四师，山东分局，五师：

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才能保证彻底肃清特务及虽有弄错及诬陷（可能有大部被弄错，可能有一部被诬陷）亦留有最后挽救之余地。所谓少捉，即除直接危害抗日之军事间谍及汉奸现行犯外，对一切特务嫌疑分子为着弄清线索而逮捕者，不得超过嫌疑分子总数百分之五。此点须通知下级注意，以免逮捕过多，难于处理。所谓少杀及不杀，即除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得经县以上机关批准处以死刑，及汉奸现行犯而有武装拒捕行为者得就地格杀外，一切特务分子虽已证据确实亦应不杀一人，争取转变为我所用。此即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延安、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今年反特务运动中清出大批特务，没有杀一人，故虽有许多被弄错的、被诬陷的，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作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此种经验，值得注意。关于直接危害抗日的军事间谍及

---

[1] 这是毛泽东和康生为在反特斗争中的方针给华中局并转一、二、三、四师，山东分局、五师的指示。

汉奸现行犯之处理，有太行军区命令一件，发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康生[1]
亥感

---

[1]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

研究党的路线问题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1]

（1943年12月28日）

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同志：

政治局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电[2]，日内即可发给你们。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宽，每一分局所属地域内约在一百人至二百人左右为适宜，名单应由中央局或分局决定。不要专为此事召集全根据地的高干会，可以先在你们附近组织若干人研究，然后就讨论别的工作的机会在全区高干会上传达及讨论。因中央所编《两条路线》[3]一书来不及送给你们，可就你处找得到的关于内战与抗战时期表现两条路线（正反两面）的文件选出若干篇（不要多）给干部看。在干部研究前，中央局及分局委员须作讨论，在思想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电报。

[2] 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研究总结王明、博古在内战和抗战时期的“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以便提高认识、增进统一团结，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3] 中共中央书记处1943年10月编，收入1922年5月至1943年10月间党的文件135件。

酝酿成熟，然后领导干部研究。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中央书记处
亥俭

在参观工农业展览会上的讲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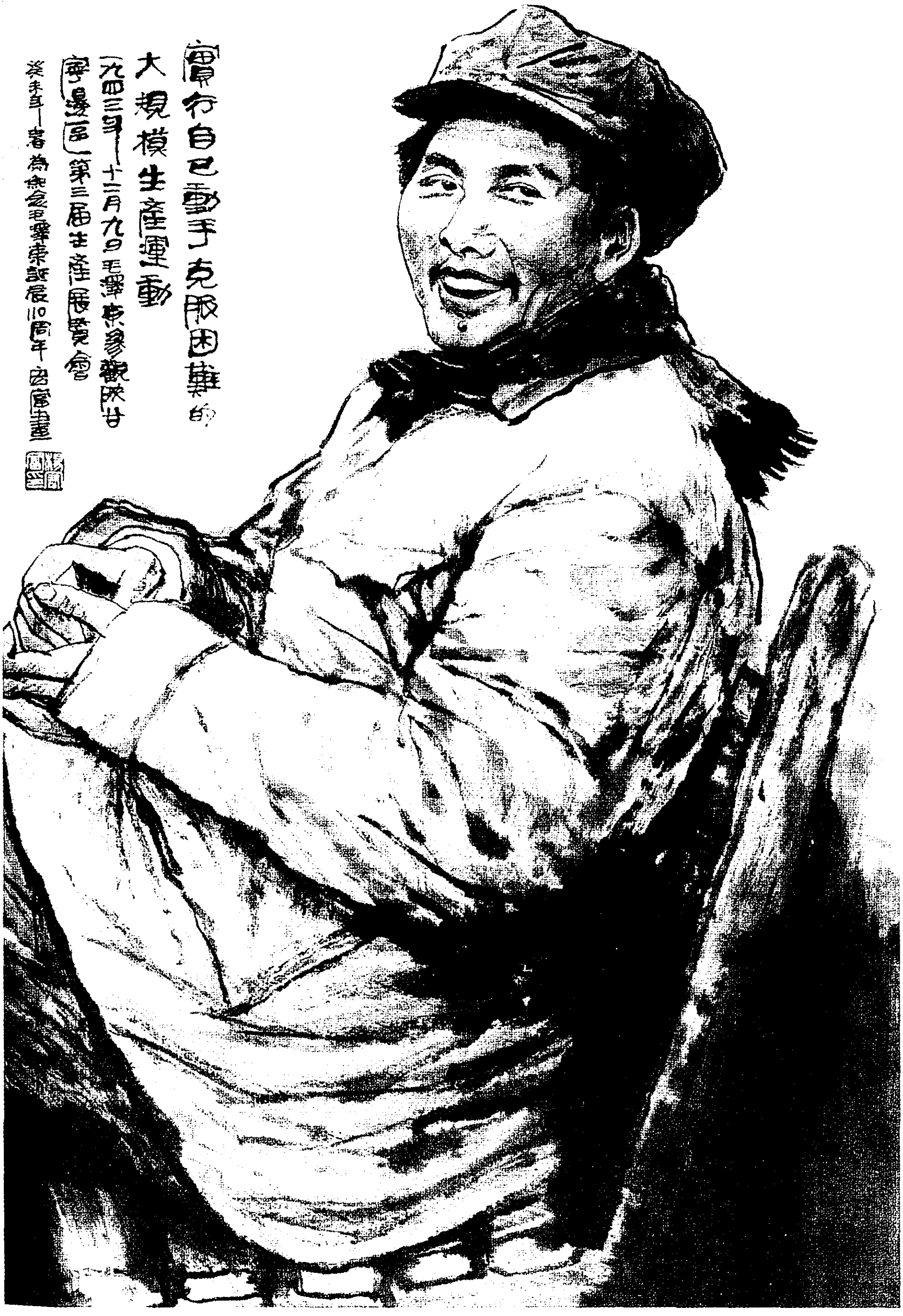
（1943年12月）

只要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农业也好，工业也好，打仗也好，新的胜利是能常取得的。因为有一条，天下穷人要闹革命，这就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

[1] 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是为检阅军民大生产由边区政府主办的。毛泽东连续3天参观工农业展览会。这是毛泽东在参观工业部分的展览时，看到陕甘宁边区各地各级生产合作社生产的毛绒毯、毛巾，尤其是丰足牌火柴、新华肥皂、马兰纸这3种凝聚着陕甘宁边区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的产品时讲话的一部分。

1943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上。


實行自己動手克服困難的
大規模生產運動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毛澤東參觀陝甘
寧邊區第三屆生產展覽會
癸未年一書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 國富畫

《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中国画）

接见外地来延安的工作干部时的讲话[1]

（1943年）

你们都是从外地来延安的，首先要习惯住延安的窑洞，也要学会住延安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够指挥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现在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也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所以你们要看得起延安的土窑洞，要学会住延安的窑洞。

---

[1] 1943年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邓小平的电报中要他们选一批干部来延安学习。这是毛泽东在接见来延安学习的干部时讲话的一部分。

挽蔡和森、蔡畅母葛太夫人联[1]

（1943年）

老妇人，新妇道；
儿英烈，女英雄。

---

[1] 葛健豪太夫人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向警予的婆婆。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永丰（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同学，并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广州牺牲。蔡畅（1900—1990），湖南湘乡永丰（今属双峰县）人。蔡和森之妹，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90年9月在北京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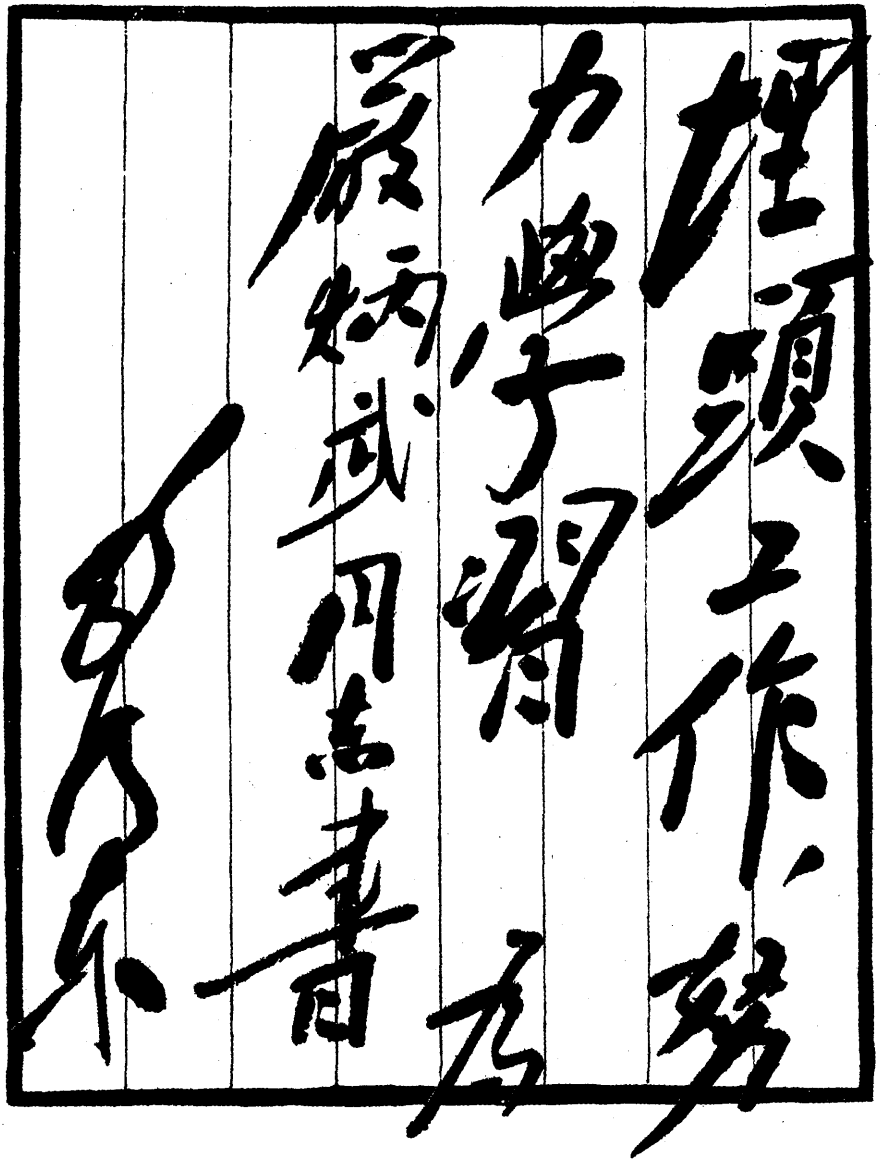
为严炳武题词

（1943年）

埋头工作，努力学习。

为严炳武同志书

毛泽东



埋頭工作、努力學習

為嚴炳武同志書

毛澤東

毛泽东为严炳武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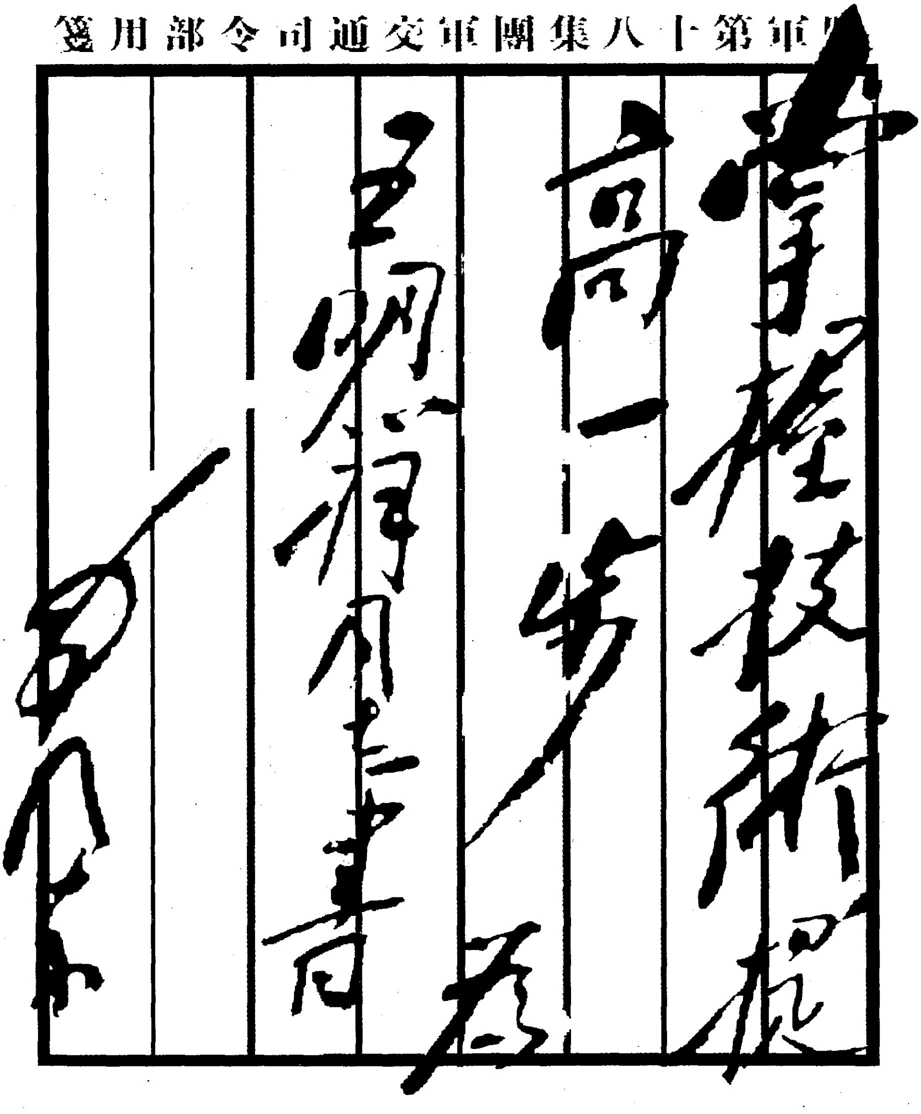
为王明祥题词

（1943年）

掌握技术，提高一步。

为王明祥同志书

毛泽东



軍第十八集團軍交通司令部用箋

学习技术提
高一步
为
王明祥同志书
毛泽东

毛泽东为王明祥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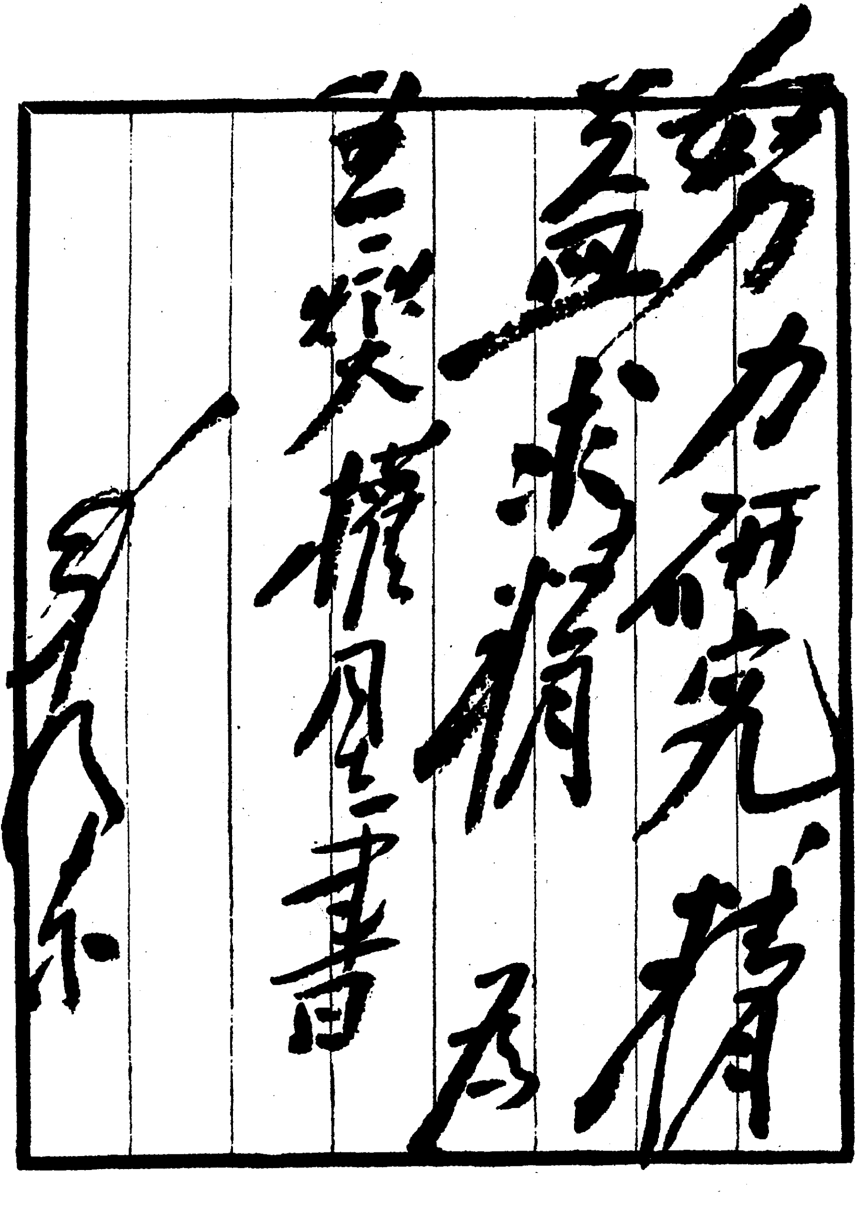
为王燮权题词

（1943 年）

努力研究，精益求精。

为王燮权同志书

毛泽东



努力研究精
益求精為
王夔權同志書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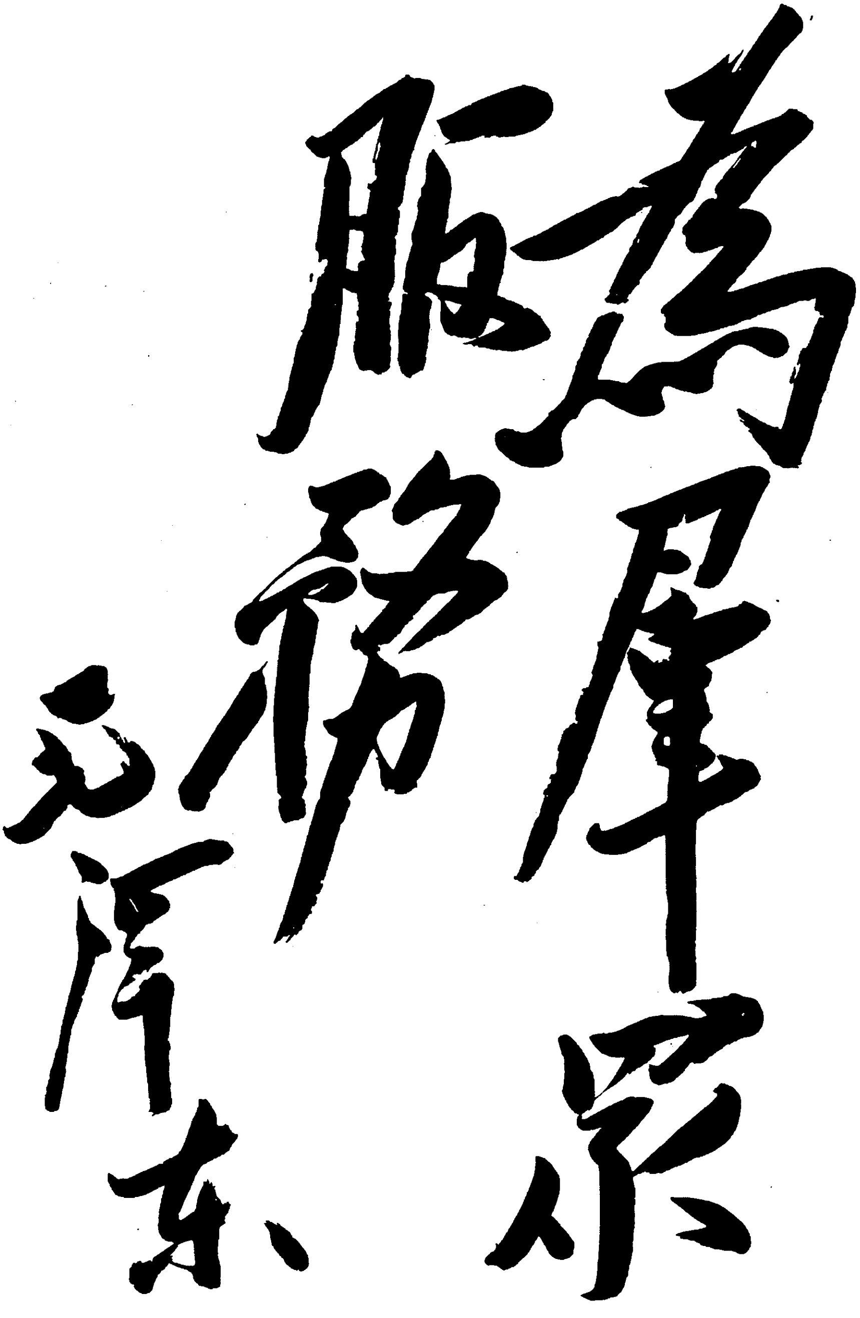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王夔权的题词。

为延安枣园中央俱乐部题词

（1943 年）

为群众服务。

毛泽东



為群衆

服務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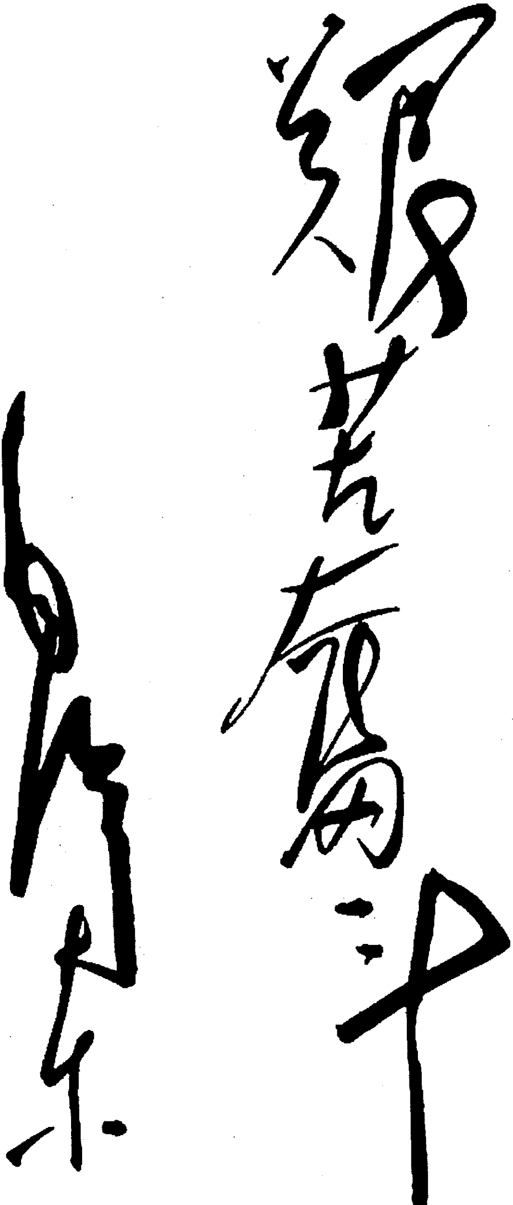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延安枣园中央俱乐部的题词。

为中央印刷厂全体劳动模范题词

（1943年）

艰苦奋斗。

毛泽东



努力奋斗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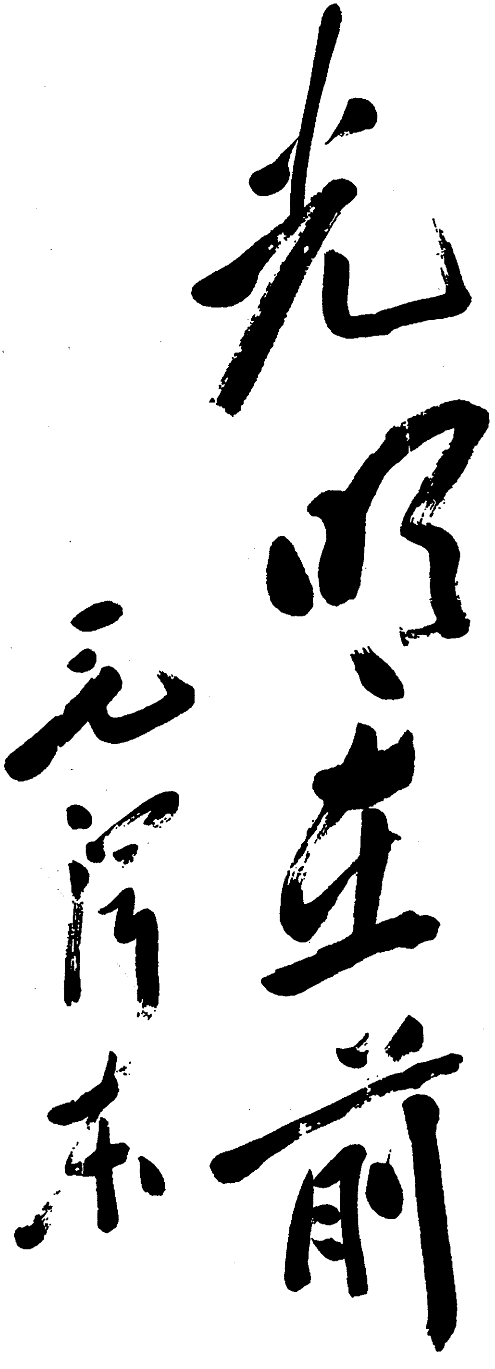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中央印刷厂全体劳动模范的题词。

题写“光明在前”

（1943年）

光明在前。

毛泽东



毛泽东题写的“光明在前”。

1944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

给郭沫若[1]的信

（1944年1月9日）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2]，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泽东
一月九日延安

---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2] 《虎符》，是郭沫若1942年2月写的一部历史话剧。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釐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1]

（1944年1月9日）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2]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3]，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

---

[1] 这是毛泽东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写给编导者的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信曾在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被说成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1982年5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了此信的全文。杨绍萱（1893—1971），河北滦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齐燕铭（1907—1978），北京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

[2]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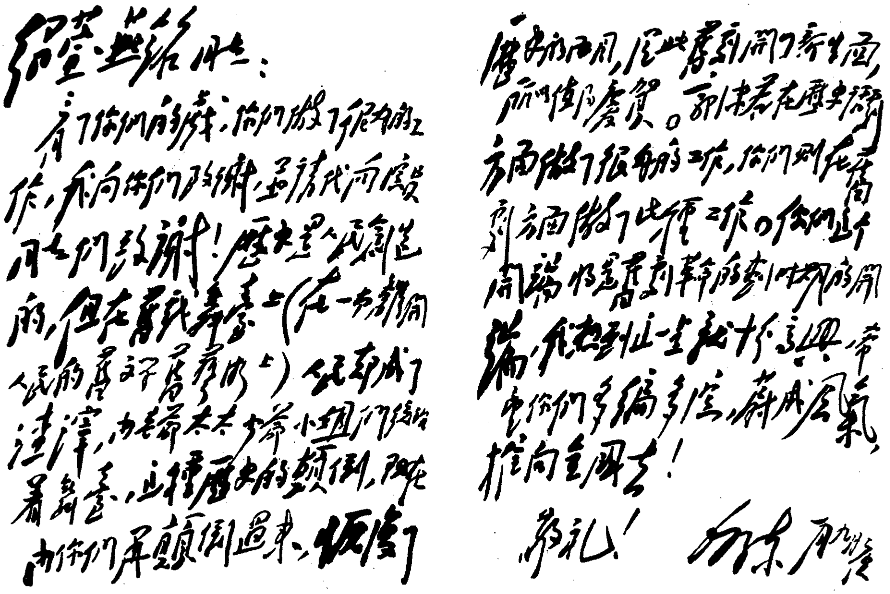
[3] 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

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夜

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信的手稿。

给彭德怀的信

（1944年1月10日）

德怀同志：

看了十二条的分析[1]，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2]。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指彭德怀1943年6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题为《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

[2]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发言记录稿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记录稿的“必须使得党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的“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的“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加上客观原因”。在记录稿的“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创造了红军的基础”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创造了红军”。在记录稿的“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工作”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地方要去掉官僚主义作风，军队要去掉军阀主义作风，全党要去掉教条主义作风”。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月10日、11日）

一

用组织起来的办法，可以克服缺乏劳动力、缺乏肥料等困难。

二

在群众中应该说打得好，在高级干部中也要说明百团大战是英勇的，只能在战术上加以说明。

三

虽然非党人士比党员少，但能吸收中间人士，有很大的影响，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农业生产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百团大战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政权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整风审干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五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整风审干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使我党有所顾虑，不致变成清一色。现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只有几个非党人士，有很大的影响，能进行合法斗争，这种法治的斗争能够教育我们。

四

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

五

除非国民党下决心跟我们破裂，否则我们不应与它破裂。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

复张云逸、饶漱石电[1]

（1944年1月12日）

如果敌军放弃无为，顽军向无为大举进攻时，同意你们的意见，七师主力转到含、和[2]地区，而以一部留巢、无[3]坚持游击。又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复张云逸、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

[2] 含、和，指含山、和县。

[3] 巢、无，指巢县、无为。

致山西省沁源县电[1]

（1944年1月17日）

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

[1] 1944年1月17日，毛泽东致电祝贺山西省沁源县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所取得的胜利。这是该电的主要内容。

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应执行自卫原则[1]

（1944年1月18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

为保持国共间之平静，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见，请你们通饬有关各部队，对于国民党军队，我军谨守防地，不得发生由我启衅之任何事件。仅在彼方进攻时，我应执行自卫原则。如发生大的事件，须先行报告，待命处理。

中央书记处
子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有关区党委的电报。

给林伯渠[1]的信

（1944年1月19日）

林老：

来示诵悉，生产节约今年必比去年有更好成效，你个人的计划能实行，必有好的影响。我也定了一点计划，准备实行。敬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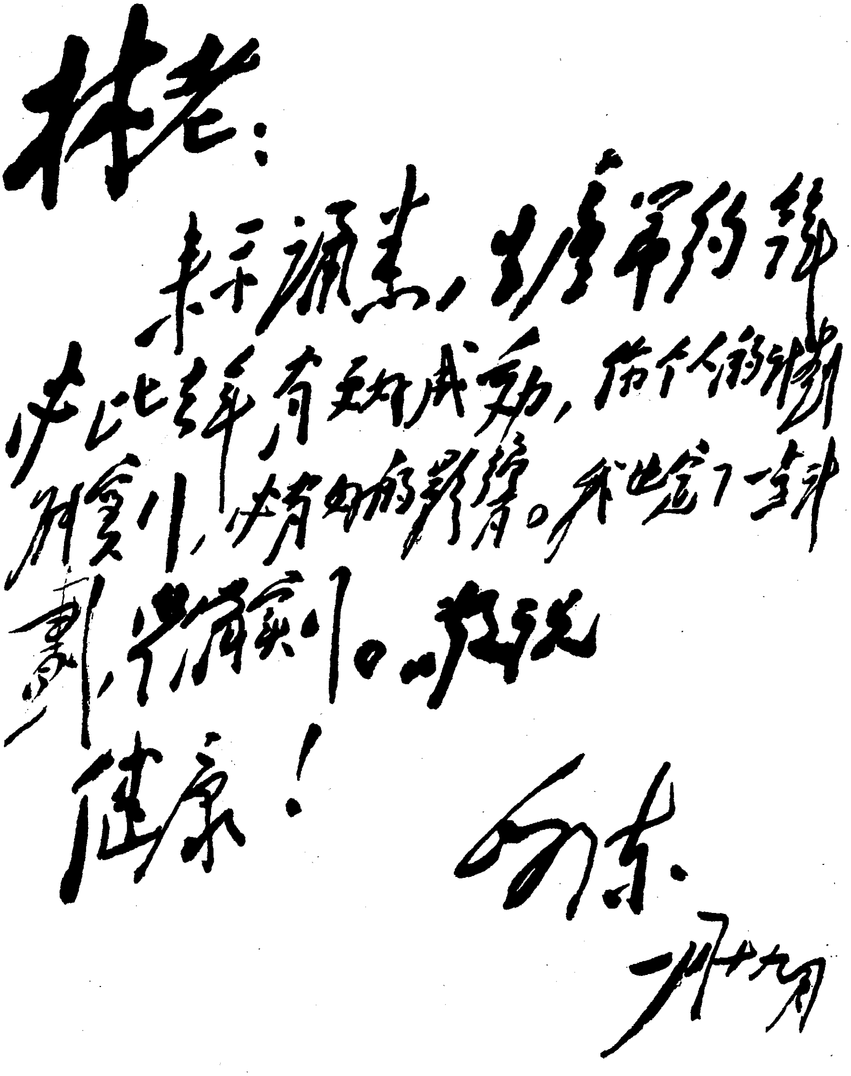
健康！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

[1] 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林老：

来示诵悉，出席军的纺织大比赛有重大成功，你个人的出席会议，尤有好的影响。我也写了一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到了。敬祝

健康！

泽东

一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林伯渠信的手稿。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致邓小平等电上加写的话[1]

（1944年1月24日）

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2]

将弄错了的人平反同样是成绩，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这种平反，不是在反特务斗争正在高潮之时，而是在高潮过去，特务已经清出之后，由领导同志先向高级干部解释明白，对于所有坦白分子进行复查，根据复查结果而加以平反。[3]

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4]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给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时加写的3段话。

[2] 这是毛泽东在电报的“有党派问题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及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占绝大多数，这种估计大致合乎事实”之后加写的一段话。

[3] 这是毛泽东在电报的“要教育同志认清：从党内清出特务固然是成绩，从坦白分子中”之后加写的一段话。

[4] 这是毛泽东在电报第三个问题的末尾加写的一段话。

和郭仲容的谈话

（1944年1月）

中国共产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1]

林、周或可先后赴渝。[2]

谈判可以何白皓电[3]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

---

[1] 这是毛泽东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询问关于两党合作的意见时谈话的一部分。

[2] 这是毛泽东在郭仲容要求林伯渠、朱德、周恩来赴渝谈话的一部分。

[3] 这是毛泽东在郭仲容提及何白皓电和西北军事二点时谈话的一部分。

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1944年2月4日）

必武同志：

世[1]电悉。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并通令各根据地采谨慎步骤，力避由我启衅外，拟先派伯渠于春夏之交赴渝一行，恩来则准备于下半年赴渝。上月郭参谋见我，要求林、朱、周赴渝，我即以林、周或可先后赴渝答之，郭又提及何白皓电[2]、西北军事二点，我则答以谈判可以何白皓电为基础，反攻时胡宗南部与边区部队，可按比例开赴前方。我并告郭：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另据探悉，调统局以已得延安同意派中央社分社驻延并有不日来延之说，此事全属片面意旨，如有人询你时，你可否认之。关于伯渠赴渝事，今日另有有线电复你。

毛泽东

丑支午

---

[1] 指31日。

[2] 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在1940年10月19日给八路军和新四军领导人发的电报，后称为何白皓电。

对延安市民众代表的讲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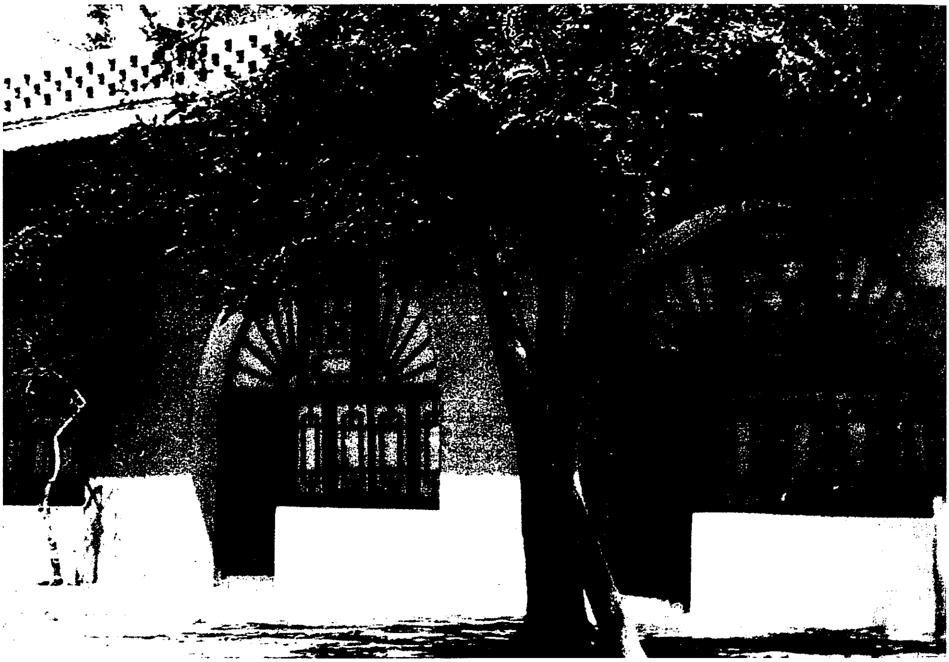
（1944年2月7日）

今天本市人民秧歌队、市政府、市商会、市群众团体，来这杨家岭——中共中央所在地献旗，这个意思很好，我代表中共中央表示欢迎。刚才诸位送来旗子，又讲了许多好话，这个意思很好，我们共产党人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把工作做得比过去更好些，来回答你们。

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团结一致打法西斯，我们边区党政军民已经团结一致，今年更要团结一致，为增加生产，巩固后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努力。边区已有进步，今年还要进步，共产党人愿意和边区人民打成一片，听取人民的意见，使工作做得更好些。

---

[1] 这是毛泽东对延安民众代表讲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在枣园的旧居。

1944年2月，毛泽东和江青、李讷在延安枣园。

毛泽东和江青、李讷在延安窑洞前。

毛泽东和江青、李讷在延安。

给罗荣桓[1]的信

（1944年2月8日）

荣桓同志：

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理师长。

应付阎锡山部六十一军东进的方针[1]

（1944年2月8日）

滕、邓：

鱼电悉。（一）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2]，可能是蒋阎[3]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二）应付方针，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他冲突，去信六十一军交涉撤回，顾全大局；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防御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反攻姿态打击之，但非至最后不得已时，不要发生冲突。（三）一切交涉及军事行动，均以决死队面目出之，不用八路军出面。（四）该地情况随时电告。

毛　朱　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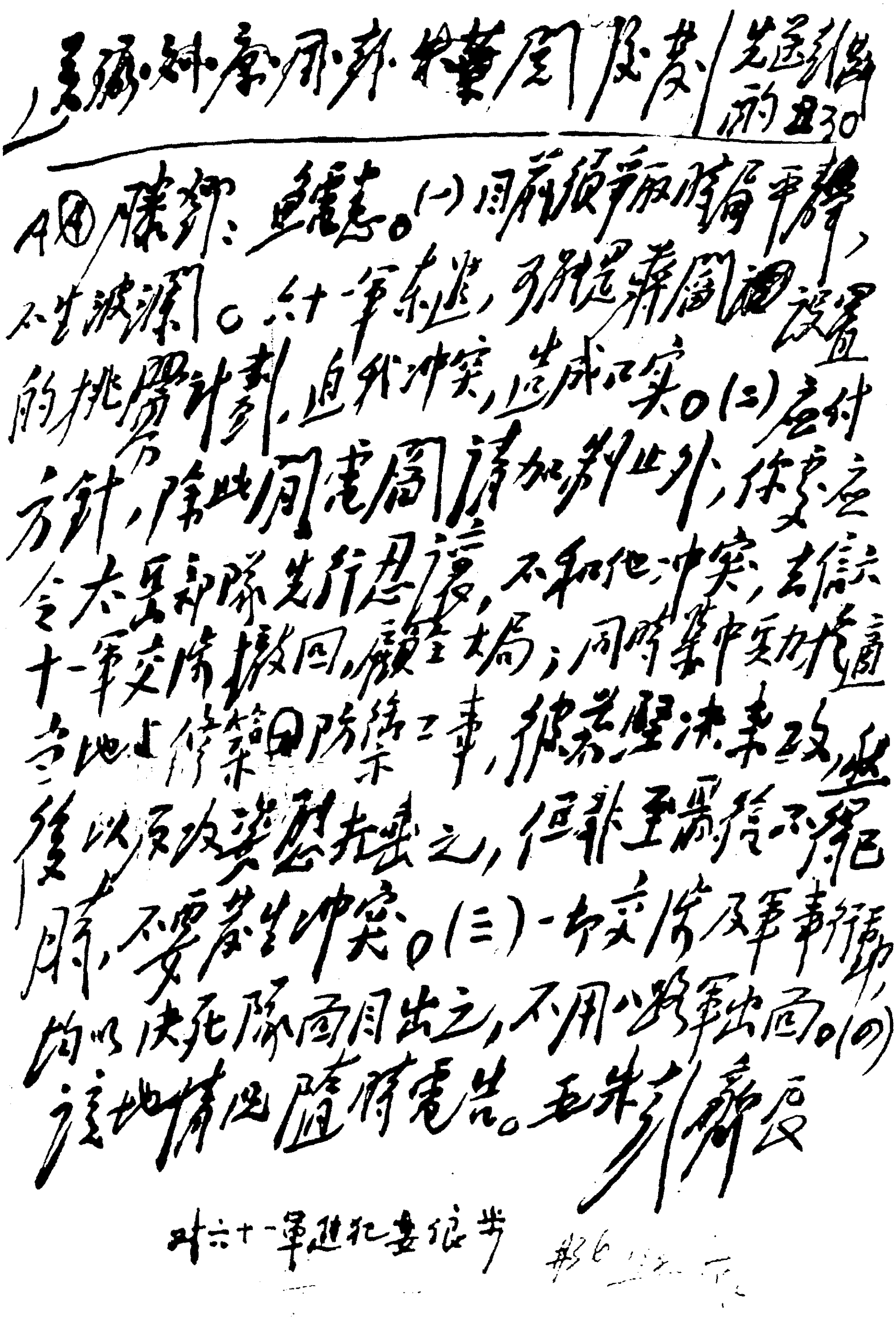
齐辰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给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1944年1月底，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指挥第四十八师、六十九师、七十二师东渡汾河，向太岳根据地浮山地区进攻，以实现其所谓“开展汾东”“收复失地”的预谋。

[3] 蒋阎，指蒋介石和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illegible]｜先送[illegible]阅 丑30

A 滕邓：并告[illegible]。(一)目前须争取时局平静，不生波澜。六十一军东进，可能是蒋阎预设置的挑衅计划，迫我冲突，造成口实。(二)应付方针，除此间电阎请加制止外，你处应令太岳部队先行忍让，不和他冲突，并请六十一军交涉撤回原驻；同时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修筑国防工事，彼若坚决来攻，然后以反攻姿态击退之，但非至万不得已不能，不要发生冲突。(三)一切交涉及军事行动均以决死队名义出之，不用八路军出面。(四)该地情况随时电告。毛朱彭 齐辰

对六十一军进犯要忍让

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电的手稿。

复山东省文协电[1]

（1944年2月8日）

鲁迅虽借用“千夫指”古典的字面，但含义完全变了，你们的解释[2]是不适当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总学委起草的复山东省文协要求解释鲁迅诗中“千夫指”的含义电的主要内容。

[2] 山东省文协1月24日致中央总学委的电报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鲁迅两句诗，第一句‘横眉冷对千夫指’，解‘千夫’为敌人。惟细读原诗所用‘千夫指’典故，似即‘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若然，则千夫是大众，而千夫所指的家伙是敌人。这样的解释，虽不违背毛主席的精神，但千夫的解释恰恰相反，请问明毛主席电示为盼。”

在金城六日关于“抢救运动”冲击到钱拯及其子女的一份报告上的批示[1]

（1944年2月8日）

钱拯应优待他，他可能不是汉奸，他的子婿是否是特务也还是疑问，如不是，应平反的。

---

[1] 金城，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钱拯，同盟会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1943年到延安，1945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毛泽东批示后不久，钱拯及其子婿得到平反。

致阎锡山电[1]

（1944年2月8日）

目前抗战阵营亟需要团结，六十一军行动，请予制止，免起冲突。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军第六十一军节节迫近薄一波部一事起草的，以朱德名义致阎锡山电的主要内容。薄一波，当时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太岳军区政治委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等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指挥所部3个师，于1944年1月底东渡汾河，向八路军太岳根据地浮山地区进攻。

致邓小平等电[1]

（1944年2月9日）

日寇有进攻西北企图，阎部东进目的在挑起国内冲突缓和日寇进攻，我们万万不可中计。阎部东进无论多少，我军应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至少六个月内不得发生冲突。特达，望遵照勿误。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致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等电的主要内容。杨立三，当时任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副参谋长。

复张云逸、饶漱石电[1]

（1944年2月14日）

你们取自卫立场是必要的。为着打击进攻的顽军采取迂回动作也是必要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浙东新四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问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张云逸、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

复邓小平等电[1]

（1944年2月22日）

杨得志部既到太行，休息数日后，即率部及新兵经晋西北来边区，赶上春耕生产。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邓小平、滕代远、杨立三电的主要内容。

复邓小平、滕代远电[1]

（1944年2月26日）

你们的审查干部工作，已进入坦白运动，并收到一些成绩，这是很好的。为使今后工作更能顺利正确进行，必须认识反奸斗争是一种隐蔽的尖锐的斗争。因为敌人是隐蔽的，所以在未发现特务之前，党内一般的倾向，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又因为斗争是尖锐的，所以在已发现特务之后，特别是进入坦白运动之时，党内倾向就容易转入“特务如麻”“草木皆兵”。这种先右后“左”，常常是反奸偏向的一般规律，而且从右到“左”，时间可能是很快的。在没有开展反奸斗争的地方，应纠正右的倾向，在已开始发动群众反奸斗争的地方，应防止“左”的偏向。

特别是在进入坦白运动的地方，应注意下列问题：（一）要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运延安各机关的经验。（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等，一切犯过错误的半条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三）在坦白运动中，要不断教育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工

---

[1] 这是毛泽东和康生关于在审干坦白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复邓小平、滕代远电的主要内容。

作，搜集真凭实据，不要轻信口供，使所有干部懂得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真凭实据，要判别一个人的是非轻重是很困难的。（四）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不超过可疑分子的百分之五）的原则，不要在坦白大会上把不坦白的人就实行逮捕。在已经发动坦白运动的地方，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详细地讨论中央的各种指示，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危险，绝大害处，不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会中特务的诬害阴谋。因此你们要不倦地进行教育，订出一定的条例，宣布一定的纪律，而且要随时进行检查工作，时时地反对逼供信的错误。以上几点，我们不是说你们已经犯了这些偏向，而是根据各地经验告诉你们，提起你们注意。

关于宪政问题

（1944年3月1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

关于宪政问题：（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1]允许于抗战结束后一年内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

中央政治局

三月一日

---

[1] 指1943年9月6日至13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1]

（1944年3月5日）

一　关于路线学习

（一）党内与党外问题。

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对王明、博古同志的错误怀疑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

（二）合法与非法问题。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2]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3]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 临时中央，指1931年9月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于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主要领导干部从上海撤离，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同年9月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6人组成，博古负总责。

[3] 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这样，在政治上便于弄清是非，在党内便于团结。

（三）弄清思想与结论宽大问题。

我们自整风以来就是治病救人的，在清查党内历史问题中有人怀疑好像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在思想上要清算彻底，作组织结论要慎重和适当。

过去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除反张国焘[1]错误路线的斗争外，有两次大的斗争，即反陈独秀[2]错误路线与反李立三[3]错误路线的斗

---

[1]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中担任过领导职务。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2]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3]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接受了党对其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

争。那时在思想上没有进行很彻底的讨论，但结论作得严重，因此未能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前车之覆并没有成为后车之鉴。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在思想上弄清楚。现在中央指定读五本理论书[1]，是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过去没有做过认真研究理论和研究历史的工作，对犯错误的人只是惩罚。没有认清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中国社会最基本特点是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党对这个问题要慎重处理。反映到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及由于这种思想而产生的错误，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内战时期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过去在国际上也有这种现象，例如在巴黎公社时期犯“左”的布朗基主义[2]错误，后来又犯第二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规律是由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采

---

[1] 指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2] 布朗基主义，指以法国布朗基（1805—1881）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用的政策会反映到无产阶级党内来。例如，中国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时期采用联共政策时，我们党内容易产生右倾错误；在皖南事变时，便产生“左”倾错误，有人认为是又一次“马日事变”[1]，主张举行全国暴动等等，资产阶级一触，我们即跳。

在四中全会后到中央工作的同志，有一些没有参加过大革命，却认为自己似乎是很高明的。这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问题，因此我们的组织结论可以宽大些。这个方针现在就要宣传解释，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后党内斗争的错误方针，因此要采用宽大政策，否则便成了四中全会的学生，便不能弄清思想问题，吸取经验教训。

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2]一段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应着重于取得经验教训，要照顾到以后，不重视惩办，只作政治结论，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四）不要否定一切。

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一切否定。当时我和博古、洛甫同志在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

---

[1] 马日事变，又称许克祥叛变。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月21日（马），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该军军长何键策动下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

[2]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是如何打蒋介石，是策略上的分歧。在土地问题上，对六大决议中关于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是没有争论的。争论是在没收后博、洛等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而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那就是一种偏向。我们对问题要分析，不要笼统地一概否定。我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也说到要保留好的东西，这才是实事求是。

（五）对六大的估计。

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1]，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2]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六）党内的宗派现在是否还有？

我认为经过几次分化是没有了。经过遵义会议的分化、抗战初

---

[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 蒋冯阎战争，指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5月正式开始，至10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30万人以上。

期的分化，又经过这次分化，现在是没有这个宗派了。这样的估计才符合事实，利于全党的团结。

现在比较严重的是山头主义。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1）小资产阶级的广大；（2）长期被分割的农村革命根据地；（3）思想教育的缺乏。这种东西相当妨碍我们内部的合作，在党、政、军、民关系上表现还很严重。长征过的老干部容易强调从军队来的力量，这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没有红军北上是不可能有现在这样大的力量，而只能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点，本地负责同志应向本地干部作解释。而南方来的负责同志也要向外来干部解释清楚，如果没有本地的干部和党组织及群众的基础，工作也是不能搞好的。全部北上的红军到陕北时只有二万五千人。现在我们有了近百万党员，只有少数是老党员。延属地委除王震[1]同志外，主要是本地干部，西北局及华北、华中各地区，主要也是北方干部多，因此外来干部要了解这一点，要重视这个问题。头一条，要说明红军干部有成绩。最初本地干部把八路军当作“神”，后来又认为一钱不值，现在要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就是说不是“神”，或者说是有缺点的“神”。第二，外来干部同本地干部要多交谈，要了解当地历史，要与本地干部合作，在这方面要有自觉性。现在基础是本地同志，老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一点。山头主义是目前党内最主要的具体的问题，历史上的问题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

[1] 王震，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旅长、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共延属地委书记。

二　工作作风问题

最近有些领导同志的工作作风有进步，这种进步是在经过整顿三风、审查干部和路线学习之后得来的。拿我们的机关工作来说，工作不仅在机关中，而且许多工作要跑出机关去做。过去我们中央许多机关同地方民众没有联系，他们是没有“国籍”的；其次有些同志认为大材小用，对于现任工作不安心。现在情况有些改变，如妇委表示要同本地群众多联系，原来认为大材小用的，现在思想上也改变了。还有些同志过去不用脑子，不会分析具体问题，只会大喊大叫，做大块文章。脑子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不用脑子是一个大毛病，近来情况有些改变，特别是最近有进步。但从全党来说，工作作风问题还相当严重，在某些环节中还有相当多的人脱离群众和不想问题。

最近在文艺工作、宣传工作方面接近了群众，报纸上也有了有分析的文章，与群众有联系了，党校工作和某些机关工作有进步，国民教育也正在改进中。

组织部门的工作过去有形式主义，在运用了群众路线后，有很大的进步。锄奸工作也改变了过去只靠少数专职工作者来做的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有了新的成绩。

职工运动，过去是照例到纪念节发文件，以应付纪念节完事。现在职工委员会已深入工厂作调查研究，切实参加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会有成绩的。

军队中过去军民关系很差，高干会[1]以后作风改变了，已有很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大进步。

现在各方面的工作都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特别是在整风、审干、生产等方面成绩更大。主要是由于实行了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等等方法。我们要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信心，凡是作风不好的犯错误的同志，都可以改变，都是有光明前途的。

有什么好的工作方法呢？我看最近开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劳动英雄与战斗英雄大会，就是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内战时期有些脱离群众的强迫的办法是不好的。现在的英雄模范大会有新的内容，真正做到了群众化、具体化。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是群众中的模范，开这样的大会，就使首长、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同群众联系起来了。过去是首长同群众相隔离，没有去团结积极分子使群众同首长结合起来。模范工作者的标准要在群众中讨论，现在要先在几个机关中进行选举，这样就使领导同群众联系起来了。我们的机关中有些首长还不如群众，也有好的首长，如马专员[1]会审官司，老百姓说他是“青天”。今年边区还要开劳动英雄大会，有各区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各方面的模范工作者参加。这是群众创造出来的好方法，这样的方法是一种好的竞赛方法，可以提高干部，联系群众，推进工作。对于模范工作者要加以培养和教育，不要使他们骄傲或落后。在部队的连队中，在一切大小机关中，都要选举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这种方法对各级首长是一种“将军”，使干部能得到学习。例如，在军事教育中，从连队选出会

---

[1] 马专员，指马锡五（1889—1962），陕西保安（今志丹）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陇东专员公署专员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

投手榴弹、会刺枪的人来教大家，这就逼使我们的干部从机关中走出来。当干部的首先要放下架子，打破个人英雄主义，忘记自己是什么“长”，忘记自己是中央委员，而到群众中去学习。今年部队中有一个人种了三四十亩地的（去年只有十八亩），能产六石粮食，四石归公，二石归个人。杨家岭的个人生产平均每人是一石五斗。现在实行的公私兼顾的分红制，是一个新的原则问题，是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我们要建立好的工作作风，就是要放下架子，打开脑筋多想问题。

三　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我们的方针是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打内战。我们是不愿意打内战的。去年下半年对国民党实行的政治攻势，逼出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关于对共产党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的声明，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内战了。今年这一年很重要，我们要开七大[1]，要搞生产，要继续整风、反特务，这些都要今年完成。现在我们还是处在困难的地位，还有很多困难，例如经济困难，党内整风和反特务斗争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要有一年的和平环境才能完成上述工作。今年和去年相比较，形势有所不同：（1）今年有了莫斯科会议[2]

---

[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推迟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

[2] 莫斯科会议，指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加速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和建立战后和平的问题，结束时通过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等文件。

和德黑兰会议的成果，现在苏、美合作得很好、很积极，苏、英好像有些矛盾。英国内部有一派人认为英国没有独立的外交，如对波兰问题，对南斯拉夫问题。但英、美都声明不会影响开辟第二战场。现在国际关系中虽然有些别扭，但对德黑兰会议的基础无妨碍。（2）日本已经决定不向苏联进攻，这种国际局面影响到中国，使内战减少了可能性。我们的政策是采取防御，实行“后发制人”。（3）最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计划改变了，近日有四个主力师离开了边区周围。（4）我们的情况也在改变，军队进行了冬训运动，生产有了成绩，军民关系比较改善了。去年我们进行了时事教育（即阶级教育），团结了内部；兵工生产发展了，现在已能炼钢；训练了自卫军，兵力增加了两个旅。在上述国际国内四个条件之下，避免内战的可能性增加了。最近国民党要周恩来、林伯渠[1]同志到重庆去谈判，我们回答林老可以先去，他们说甚表欢迎。我们的方针是避免内战，集中抗战。对北面高双成[2]更要注意联络，对联络参谋更要改善关系。最近外国记者要到延安来，我们要准备让他们看。我们要采取同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方针，即是实行“孔夫子打麻将——和为贵”。

辩证法是从过程中来规定的。我们在去年对国民党实行政治攻势时，主要是强调批评国民党的一面，现在主要是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这两方面不能同时强调提出，否则就是形式逻辑。

国民党提出同我党谈判的条件是以皓电为基础，要按比例裁

---

[1] 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

[2] 高双成（1882—1945），陕西渭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军长。

兵，我们提出我军编为四军十二个师。我们的原则是三民主义与四项诺言[1]，七大也要抓住三民主义和四项诺言，强调避免内战，集中力量抗日，强调战后和平。现在我们要答应以皓电为基础（不是完全实行皓电），才能重开谈判之门。我们的步骤是派林老先去，打开谈判之门，但具体谈判恐怕要到下半年。

对宪政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参加宪政运动。在“三一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恩来、林老都要发表演说，要强调地方自治、民权自由与开放党禁。

---

[1] 四项诺言，指1937年9月2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向全国宣告的以下四项：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复黎玉等电[1]

（1944年3月5日）

鉴于过去湖西锄奸错误的影响，至今在党内党外尚未完全消灭，因此山东分局对审干及反特工作，必须十分细心，正确掌握中央审查干部的九条方针，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坚决反对逼、供、信路线，有准备有步骤地慎重进行，今年不要普遍举行。再则审干反特，你们二人均须亲自参加，取得经验。

---

[1] 这是毛泽东和康生、彭真复黎玉、萧华并告中共中央北方局电的主要内容。

陈毅[1]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

（1944年3月15日）

漱石[2]同志，并转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

陈毅同志抵延，知悉华中工作发展情况，甚以为慰。关于陈、饶二同志间的争论问题，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在陈动身前两同志已当面谈清，现已不成问题。中央完全相信，在陈、饶二同志及华中局、军分委各同志的领导下必能协和一致，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胜利。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3]关于抗战时

---

[1]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1944年3月7日到达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

[3] 1929年6月22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陈毅主持会议。会议在党对红军的领导、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重要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被会议接受。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同年9月，中共中央根据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情况的汇报，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恢复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

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1]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如有同志对以上两点不明了时，请漱石同志加以解释。

毛泽东
寅删

---

[1] 项英（1898—1941），湖北武昌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他在主持新四军工作期间，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种进攻的准备，以致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使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他本人也被反动分子杀害。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

给罗荣桓等的指示[1]

（1944年3月16日）

争取国内和平，团结抗战，坚持敌后斗争是我党一贯方针。对顽军斗争坚持自卫原则，以保持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鲁南、鲁中、滨海三区，从去年夏秋后，地区扩大一倍以上，应利用时机，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并加强游击队与民兵。在老区，继续发动群众，发展生产，准备坚持今后更艰苦的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给罗荣桓、黎玉、萧华、滕代远、邓小平的指示。

为马本斋题写挽词[1]

（1944年3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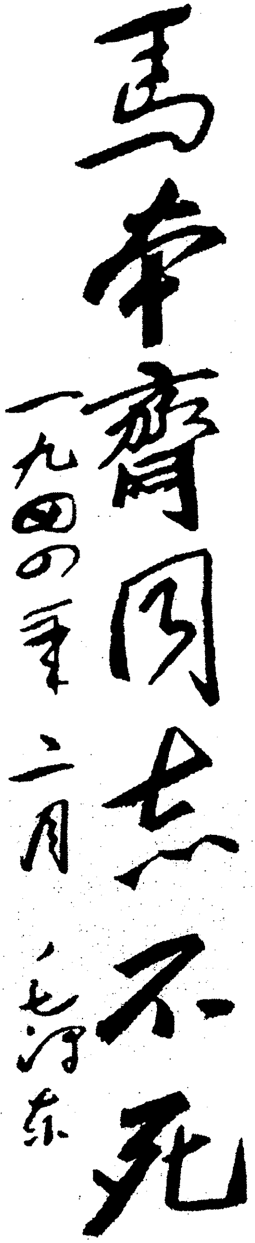
马本斋同志不死。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二月

---

[1] 八路军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于1944年2月7日病逝，延安各界为其举行追悼大会。这是毛泽东为马本斋题写的挽词。



馬本齋同志不死

一九四四年二月 毛泽东

毛泽东为马本斋题写的挽词。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

（1944年3月22日）

今天想把文化教育问题和同志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深入研究，只是听到一些不多的材料先来讲一讲，开一个头。这次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讨论的问题有好几个，文化教育问题虽然没有列入议事日程，但是我想今年冬季再开高干会议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一项议程，而且应该作为一项重要的议程。

最近这几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去年一年边区的生产更有成绩。今年如果老天下雨，具备了自然条件，再有这次高干会议作了思想准备，工作更会做好。拿环境来说，今年比去年好，磨擦仗大概是不会打了。罗斯福[2]不赞成我们中国打磨擦仗，那位蒋委员长也不想打，我们更不想打，大家都不想打，自然就打不起来，所谓“和为贵”。边区现在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面。我们的口号老早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战争、生产、教育。在敌后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时还可以进行建设，进行生产，也可以办教育。边区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直接的任务就是生产和教育两项。军队也有教育，有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化教育，今年冬季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 罗斯福（1882—1945），当时任美国总统。

要来一个大练兵。早几年，陈学昭[1]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产成绩在哪里？如果生产搞得好，《野百合花》[2]也许不会写出来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3]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

我们党在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学会了打仗，学会了战争。在政治、军事这两门上我们比较会，当然还有毛病，但对这两门比较熟习一些。至于对经济、文化这两门，就不大熟习。我们也搞过经济，因为不搞经济，仗也没有办法打。要能够打仗，首先要有饭吃，过去能够打仗，也是因为搞过一点经济。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说到老百姓，现在陕北还有一部分人吃得很差，还有许多人粮食不够，丰衣足食在边区还是一个目标，只有一部分人达到了。但是去年这一年，生产走上了轨道，经济走上了轨道，这是大前提、新的

---

[1] 陈学昭（1906—1991），浙江海宁人，曾任天津《大公报》驻欧特派记者、上海《生活周报》特约撰稿人。1940年11月到延安后，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四部教员。

[2] 《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研究员）写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1942年3月13日、23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3] 鲁艺，鲁迅艺术文学院的简称。鲁迅艺术学院于1938年4月在延安成立，1939年5月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并入延安大学。

东西。今年高干会议的议事日程中有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因为经济虽然走上了轨道，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还要继续学。

这次会议文化问题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我们边区的党部、政府甚至某些管理机关，如某些宣传机关，在议事日程上还没有把文化教育问题提出来，还有同志不晓得在这些方面要做什么事情。比如县和区一级的宣传部，听说有的知道了，做得还好，有些就不晓得如何做。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对军事、政治比较会，对经济、文化不大会。经济、文化如果不会搞，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不会搞，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多大用处。用处也有一点，就是善于破坏旧的东西，善于打击敌人，能够把敌人打败，但是很大的用处就没有。因为你不学会经济、文化，就不能使人人吃饱小米饭，老百姓就会没有猪肉吃，又不识字，又不会闹秧歌。现在秧歌也有一点，但如何普及还是一个问题。在文化方面还有很多事要做，要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等。因此，经济、文化这两门不学会就不好。

在内战时期、抗战初期，甚至于现在，在我们一些同志中间还有一种思想，就是认为政治、军事是第一的，经济、文化是次要的。这样一种看法有没有理由呢？的确，政治、军事是第一的，你不把敌人打掉，搞什么小米、大米，搞什么秧歌，都不成，因为还有敌人在压迫。在敌人压迫下，你还能搞什么学校，搞什么生产呢？所以打敌人当然是第一的。这样一来，做打敌人工作的人就有名誉，就吃得开，搞小米的人、搞秧歌的人就吃不大开，开会不会坐首席，选举主席团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把敌人打掉，搞小米、搞生产搞不起来，因此把打敌人的工作放在第一是应该的。但我们应该知道，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

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事，而我们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都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政治和军事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也主要是讲的这件事，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至于文化，它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指导政治、经济；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还有一个秧歌叫《张治国》，听说在吴起镇演出后，警三旅有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跑到连长那里请求处罚。为什么要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想开小差，还想组织别人开小差”，还讲出在他棉衣里缝了多少法币。他要求处罚。他自己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的力量。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它没有反映边区的政治、经济。过去，成百成千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脱离群众。开了文艺座谈会以后，去年搞了一年，他们慢慢地摸到了边，一经摸到了边，就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所谓摸到了边，就是反映了群众的生活，真正地反映了边区的政治、经济，这就能够起指导作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

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经济是政治、军事的基础，政治、军事是上层建筑。地基是经济，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为如果没有它们，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封建社会有封建文化，封建文化是宣传封建主义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资本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如果没有文化，也没法建立起来。现在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不占优势，所以中国的文化也是很弱的。在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提高了生产技术。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这个社会没有文化也不行。比如组织了变工队需要记账，组织合作社也需要记账，这就需要文化。一个村里组织变工队，至少要有人能写村里人的名字。总之没有文化就不行。过去北伐时期，新军队比旧军队好，同建立黄埔军校[1]就有关系。当时黄埔学生大部分是青年学生，这些青年有革命热情，又有知识，他们有了文化，其他军队就比不上。革命军队除了要有革命精神，没有知识也不行。如果军队没有知识，文化、政治水平不提高，那末这个军队的质量也不可能提高。

现在我们的边区发展到怎样的情况呢？我看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现在我们是被拖住了脚，落后的东西拖住了好的东西，比如不识字、不会算账，妨碍了我们

---

[1] 黄埔军校，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简称，是孙中山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在广州黄埔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在该校任职，学员中也有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发展。假如我们都能识字，文化高一点，那我们就会更快地前进。所以我提议，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提出发展文化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考虑，调查研究一下。到今年冬天，我们开一个会展开讨论，搞他十天八天，明年就会搞得好些。我们来一个五年计划，去年算一年，今年是第二年，在这五年中间，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看这里面大致有四个问题：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现在分别来说一说。

第一，关于报纸。

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不好办事。饭来了，报来了，他们有些人是先看报，后吃饭。有一位本地工农出身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先看报的。假使每个县上这样的工作同志增加到十五人至二十人，那我们的工作就会做得更好。《解放日报》在边区已成为一个组织者。没有《解放日报》，在这样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在全中国算是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地区工作，是很困难的。有一个《解放日报》，就可以组织起整个边区的政治、文化生活。还有《边区群众报》，发行更广，看的人更多。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地方报纸，是各地委办的，我看到的有关中、绥德的报纸，陇东、三边[1]听说也有。关中、绥德两个地区的报纸似乎还不错，新闻编写得都很好。这些地方报纸之所以需要，就是因为仅仅有一个《解放日报》、一个《边区群众报》还不够，他们那里出一个报纸，反映情况可以更直接、更快些。我想这是好

---

[1] 三边，原是陕西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统称，这里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分区，当时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县。

的。我们地委的同志，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经济并且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要以很大的精力来注意这个工作，使它一年比一年进步。我们的各旅是不是都有报纸？我知道关中的那个旅[1]有，三五九旅也有，听说有些团也有。各县还没有。可不可以在各县也办一些报纸？这点还毫无经验，究竟需要不需要？有些地方我看不需要，比如延安，因为《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就在它这里出版。有些离延安远的县份是不是需要？比如有些县委可以出一个油印报纸，请一位知识分子负责，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从编辑到发行，包括刻钢板，一个人就差不多了。各县的报纸登些什么呢？比如我们这里出了一个申长林[2]，就把他的事迹登上，有一个陈德发[3]也可以写进去，不必专等延安的《解放日报》。这个事情同志们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也不要以为这是杨家岭开了会的，于是就发命令要大家都办，如果不需要就不办，也可以先从一两个县办起来试一试。

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如果你们再把办报这种工作方式采用起来，那末许多道理和典型就可以经过报纸去宣

---

[1] 指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

[2] 申长林，陕西米脂人，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1944年1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申长林同志》一文，介绍了他的事迹。

[3] 陈德发，陕西安塞人，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1944年1月2日《解放日报》发表《马家沟和陈德发》一文，介绍了他的经验。

传。现在我们要学会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报纸发出去就可以省得开许多会。我们可以把许多问题拿到报纸上讨论，就等于开会、开训练班了，许多指示信可以用新闻来代替，所以报纸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墙报也算是一种报，办墙报也可以当做重要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还不会使用它，还拿不出一种轰动全城的革命墙报，吸引全延安的人来看。我想一个伙食单位，比如说有一百个人，就可以出墙报一张。这里总有一个首长，他就要把墙报当做自己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自己写社论。现在有些墙报办得不好，只有写文章的人才看。可不可以开个墙报会议？假如现在有两百个机关有墙报，每一个墙报来一个编辑，来一个首长，开一个四百多人的会议。这个会一定要首长参加。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墙报才能办得好。要把墙报办得又有革命的内容，又生动活泼，成为组织各机关工作的一种工作方式。

这样来办报，全边区可以有千把种报纸，这叫做全党办报。一个机关也可以办报，党员非党员都可以参加，这叫做党与非党联盟。这样一来，我们的报纸可以起很大的作用。过去在这一点上注意不够，现在要各机关首长负责，把报纸当做自己很好的工作方式。我们有很多的政治、经济工作，如果办好报纸，就可以使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关于学校。

昨天报上登了一个消息，是关于延安市完小的消息[1]。这是一

---

[1] 指1944年3月21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报道《延市完小面貌一新》。完小，是完全小学的简称。当时延安的小学分为普小和完小两种，普小为初级小学三年义务教育，完小为初小三年义务教育和高小两年教育。

条很好的新闻，有这样一条新闻，比我们讲好多话还起作用。因为这个完小已经做出了实际成绩，应该把它传播到全国去。这个小学办得很好，过去我们有许多小学办得不好，群众不欢迎，我们硬要办，这是命令主义。从前我们杨家岭有一个教员，教了年把，我问他你讲的课人家懂不懂，他说听是听不大懂，但是还要讲。我说，我们共产党要学会一个办法，就是人家不听就不讲了。教育厅开了会，说学校要归民办，我想这样很好。乔木[1]同志对我讲，学校要村办才好。听说陈德发那个乡有二十五个自然村，一个乡只办一个小学，学生读书要走几十里路，很不方便。昨天报上还有一条消息，说锁家崖村要办一所小学，采取一年三学期制，农忙时放假，学生帮助家里耕作。这样，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家里做事，同时也就没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是比较方便的。如果一个乡办一个小学，娃娃读书要寄宿，寄宿要交粮食，在家里吃饭六七斗便够了，交学校要一石三斗，学的尽是些九州万国，不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又有变成公家人的危险，这是不妥当的。变成参加革命的公家人，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好比民兵变成游击队、游击队变成正规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样。现在有些不自然，参加工作，脱离生产，好像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很突然。关于教员问题，我们也可以想法子解决。可以组织识字组。边区过去也搞过识字组，但是失败了，我想实际上是没有做。好像从前提出要增加四十万石细粮一样，高干会议以前提出的，但究竟如何增加，没有哪个管。而前年高干会议[2]提出增加八万石细粮，结果增

---

[1] 乔木，即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2]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加了十六万石，因为去年一月初报纸上出现吴满有的按家计划，建设厅把他找到，开了三天会，搞清楚了一个吴满有，才晓得边区能增加多少万石，用什么办法增加。组织识字组，从前所以失败我看是因为没有具体领导，也因为群众的生产运动还没有发展。现在情况不同了，群众有了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方法也有了进步，我们来一个号召，就可以逐步推广。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一天识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识三百六十五个字，十年识三千六百五十个字。十年又可以分作两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识两千字左右，如果能够识两千字，就接近消灭文盲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一百四十万人在五年之内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即使再推延五年，十年之内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也可以。我们共产党是以有雄心著名的，在十年之内，我们要使老百姓人人都可以看《边区群众报》，有三分之一的人能看《解放日报》。一百四十万人的三分之一能够看《解放日报》，《解放日报》就要印得很多，到那时候恐怕要办很多造纸厂。过去吃的是窝窝头，穿的是破烂，冷得要死，哪里还能搞什么识字组？现在不同了，我们生产有了进步，今年再搞上一年，文化工作就应该提出来了。我想今年冬季要搞他一下，因为现在群众要求这样做，比如可以来一个三四个月的冬学。春季夏季是不容易搞的，因为人家忙得要死，要上山种地。今年冬天来一个发动，打下一个基础，明年就会有更大的发展。提高文化，消灭文盲，要靠识字组。当然这也要以自愿为原则。开始不妨组织一两个组，约一些人识字，识字当然比不识字好，于是识字的人就神气。再评选几个模范出来，奖给他们几块手巾，字也识了，手巾也有了，搞他两年就可以搞成一个风气。

什么人教呢？就是老百姓教老百姓。现在我们的部队是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去年一些干部在延安训练了五天就回去练兵，一个连有一百多人，其中总会有一个好汉，干部和他比一比，不一定比得过他，就可以让他出来教。识字组也可以民教民，认识十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一百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

我们还要编一些书，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这样他家里的人一看，到完小读了几天书回来，什么都行了，很好。这比从前的学生好，我们那个时候从学校里一出来，就自以为是，个人突出，神气十足。

另外，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今年庆祝三八妇女节，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小学现在决定民办的方针，这很好，此外还有公家办的。由政府办的高级一些的中学、师范学校现在有六个，边区一百四十万人口有六个师范学校和中学，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情，是在共产党的时代才发展的。绥德、米脂一带，历来教育就发展，现在比过去也许还差一点。至于三边、陇东就大不相同，三边有了师范学校，这是一大进步。现在把权交给专员公署和地委，你们就要管，而且还要管得很好。

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

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听说去年延安办了个把月的训练班，把各乡乡长、支部书记集中起来训练，教什么呢？教去年《解放日报》七、八、九三个月登载的一些材料，以及《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教这些东西要得要不得？要得，特别是《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更有教育意义。但是，仅仅是这几条就还不够，到农村里只会讲抗战成绩的比较是办不了事的。应该教给他们工作的方法，使他们懂得一个支部书记、一个乡长应该如何工作，使他们晓得工作的方式方法不能总是老一套，而是根据当前的情况如何做工作，如何当乡长，如何当支部书记。至于延安的学校，如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也要着重联系实际。从中央党校、延安大学、行政学院一直到每一个村小学，都要做到这一点。听说两个宣传部都注意了这个问题，那很好。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只要好好搞，五年到十年就可以搞得很好，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会有很大的发展，这绝不是空话。

第三，关于艺术。

秧歌是一项，还有春联、歌曲、年画。

杨家岭的秧歌队去安塞演出几天，解决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前外来知识分子和本地老百姓有隔膜，这次杨家岭的秧歌队在安塞演出时，有几个劳动英雄也参加进来，和秧歌队一起跳起来了。我看这就很好，劳动英雄们感觉到你们秧歌队是歌颂他们的，消除了隔膜。《解放日报》昨天登了周扬的文章[1]，这篇文章是谈秧歌的，值得一看。秧歌现在还没有普遍化。延安今年看秧歌看腻了，但全边区的老百姓还没有看够，一个秧歌剧他们要求演三次。所以我看秧歌队可以多组织一些，这个新秧歌队一个乡可以搞他一个，搞新的内容，一个区搞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加限制，今年冬天就要这样搞。这是我的设想，不是规定了的，同志们可以考虑。我想延安的知识分子在今年农历十月，应该纷纷开会研究怎样下去调查和工作。杨家岭妇委的同志学纺纱，只学了两个星期，到了乡下妇女就欢迎得很。你不学这个本领，想要组织妇女，怎么行呢？你说你革命，那就要学本领。今年冬天，延安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都下去，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演秧歌、办冬学、办训练班、订按户计划等等，做三个月工作，真正学习本领。我看这些人要解放一下，每年都可以实行这个制度。这既可以作为放假旅行，又可以作为上边区课。这里有一个条件，就是去了是要帮助群众，不要去妨碍群众。过去我们做了很多蠢事，就是妨碍人家纺纱，妨碍人家带娃娃。你们这回下去，就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边区有三十五万户，每家都挂起有新内容的春联，也会使边区面貌为之一新。两个宣传部的同志要把这个问题研究一下。写春联就要编几个本子，要搞新的春联。新春联是群众的识字课本和政治

---

[1] 指1944年3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一文。

课本。三十五万副春联，内容大体相同，文字可以不同，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不是也搞几个歌子来唱一唱呢？比如说搞他三五个歌子，使得一百四十万人民都能够唱，并且懂得它的意思，我看这也是一种学习，也是一种消灭文盲的办法，和春联的道理一样。此外还可以搞年画。

总之，我们的艺术要搞几样确实为老百姓所欢迎的东西。现在老百姓连好的春联都没有，我们还只是谈提高，这只能是空谈。现在边区的主要问题，还是一个普及问题。群众艺术生活太贫乏了，我们做文艺工作的同志要从多方面努力。

第四，关于卫生。

卫生问题是边区群众生活中一个极严重的问题，现在也把它放在文化问题里面讲一讲。今年的春节宣传，包括总卫生处在安塞演出的秧歌，证明老百姓是欢迎新文化的。边区群众中的迷信现象，现在比从前少多了，但是还不能消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药卫生工作还不普及。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死亡的威胁，只有相信神仙。现在延安只有三个医院，而延安有多少人呢？党政军三万人，老百姓一万四千人，享卫生医疗之福的人还不多。至于边区其他一百三十多万老百姓，则根本没有人管。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或者是各分区送人来延安学习，或者是延安派人去训练，我看都可以。这件事情，各个地委、各个专员公署、各个分区都可以订一个计划，在五年到十年内，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普通的疾病。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我们的经济发展了，争取出超就

可以到外边去买。宣传卫生，就应该给群众治病。在五年到十年之内，我们要求得在科学知识普及方面的进步，医药卫生应该放在我们的计划里，和生产计划同时并进。

我们希望人口发展，科学进步。这个问题在早两年讲，也是办不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这种可能了。当然党也要注意，有这个可能条件，就要把问题解决了，这样可以破除迷信，使老百姓不敬菩萨。从前我从长沙到上海，乘的船有两种，一种是洋船，一种是木船。洋船他们不敬龙王菩萨，坐洋船的人也没有关心敬龙王菩萨的。但是木船他们就要敬龙王菩萨，龙王菩萨是他们的“保险公司”，木船是容易翻船的，为了避免翻船，他们不得不投一笔钱到龙王菩萨这个“保险公司”里去。所以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如果多有几个阿洛夫[1]这样的人物，当然就没有人再敬送子观音了。有了科学知识，迷信自然就可以打破，没有这一着，他还是要迷信的。

我今天就讲这几件事。如果共产党在边区把这几件事办到，各个系统都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进步，如果在五年到十年内，我们办起了很多种报纸，组织许多识字组，扫除了文盲，把艺术再来一个普及，并且注意到医药卫生，改善医疗条件，那就差不多了。共产党是不是有用，也就是说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叶青[2]写文章说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

---

[1] 阿洛夫，苏联外科医生，当时在延安中央医院工作。

[2] 叶青，又名任卓宣（1896—1990），四川南充人。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要，我们说有存在之必要，我们会用事实来证明。

二十多年以来，我们党首先学会了政治，后来又学会了军事，去年学会了经济建设，今年要学会文化建设。如果文化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那我们就又学会了一项很大的本领，陕甘宁边区就可以在全国成为更好的模范！

关于对国民党顽军应采取自卫原则的指示[1]

（1944年3月27日）

黎、肖，并告滕、邓：

（一）华北敌三师以上，向黄河北岸集中，长江敌一部向信阳集中，有打通平汉路模样，英美记者团有于近日来延讯，因此反顽斗争，更须严格坚持自卫原则，不应见小忘大，衅自我开。寅巧电计达，望认真执行。

（二）李仙洲离鲁时，给地方顽军以坚决反共迷惑敌人之阴谋方针，我欲破其阴谋，必须利用与扩大敌顽间，伪顽间，顽军相互间之各种矛盾，加以具体研究，灵活执行一打一拉，在自卫原则下，有理有利地打，能造成更多拉的条件，能和缓磨擦，达到争取与中立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无理无利地乱打，不仅消失拉的条件，反而促使顽方团结与日妥协制我。

（三）最近已给赵保元重大打击后，赵、王可能妥协，我应主动拉王孤赵。对赵部俘虏亦应优待，首长分别接近，用小组座谈办法，耐心答复一切对我怀疑问题，启发其本身困难与痛苦，尽可能帮助其解决，启发其了解赵通敌反共阴谋，告以根据地减租减息，

---

[1] 这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给黎玉、肖华并告滕代远、邓小平的电报。

民主及八路军制度，征求对我批评，愿留者欢迎，不愿留者欢送，改变过去夸张自己，打击别人的工作方式。并公开告赵，如能停止反共，团结抗日见诸事实，允予退还所俘人枪。

毛　朱　彭

给周扬[1]的信

（1944年4月2日）

周扬同志：

此篇[2]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3]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4]，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

---

[1] 周扬，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2] 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后来发表在1944年4月8日《解放日报》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

[3] 指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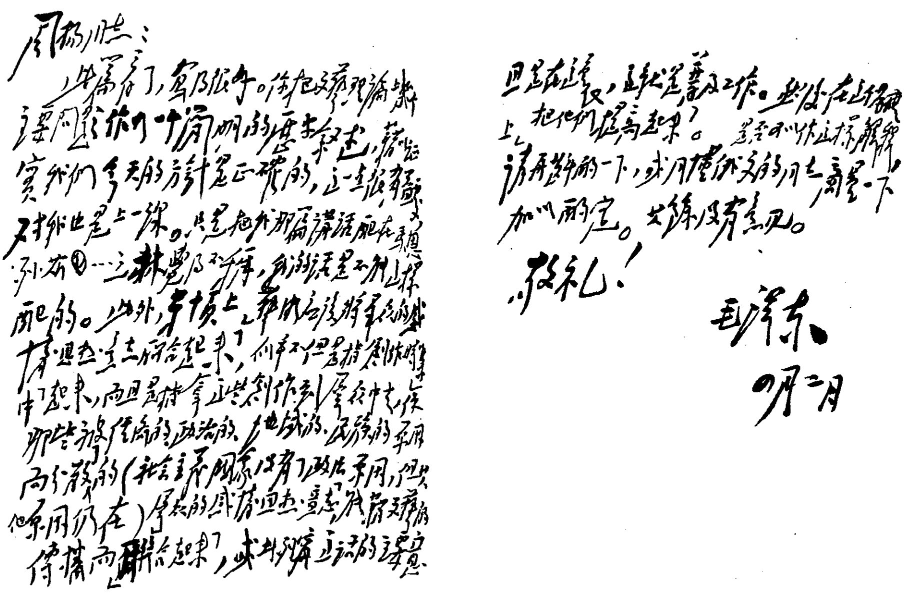
[4] 这是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讲的一段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中文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毛泽东致周扬信的手稿。

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1]

（1944年4月3日）

一

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上的需要，一方面为着人民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性而拥护我们，而参加革命奋斗，需要我们拿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作得到。

二

认识贸易、金融、财政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任弼时1944年写的《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讲演稿上加写的两段话和批语。本篇一写在讲演稿“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它是为着经济发展的，而且经济发展了才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之后；本篇二写在讲演稿“在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来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之后；本篇三是毛泽东写在讲演稿上的批语。

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

三

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另在党校第一部讲一次。在十天内印出。印五千本，发到五千个干部阅读。

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等电[1]

（1944年4月3日）

中原大战，国共有重新协调之望，已派林伯渠同志艳日[2]由延赴渝谈判。我华中、山东各部务遵前令集中注意于对付敌伪，整训部队，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及谨慎地清查特务，切勿刺激国民党，望通令所属知之。

---

[1] 这是毛泽东致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山东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2] 艳日，即29日。

致罗荣桓等电[1]

（1944年4月5日）

近日，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2]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致罗荣桓、黎玉、萧华、李作鹏并告滕代远、邓小平等电的主要内容。李作鹏，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兼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

[2] 东条，即东条英机，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给陈毅[1]的信

（1944年4月9日）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正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挽钟太夫人联[1]

（1944年4月10日）

一

八路功勋，大孝为国；
一生劳动，吾党光荣。

二

为母当学民族英雄贤母；
斯人无愧劳动阶级完人。

---

[1] 1944年2月15日，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逝世，享年86岁。在延安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蔡畅宣布了这一消息，号召妇女学习钟太夫人劳动终身和勤俭持家的精神。1944年4月10日，延安各界1000多人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追悼大会。本文一为毛泽东代表中央题写的挽联；本文二是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写的挽联。

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上加写的一段话[1]

（1944年4月11日）

中国共产党从它参加与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以来，从它参加与领导为这个民族民主革命而战的革命军队以来，就创设了并发展了军队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种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群众，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

---

[1] 这是毛泽东在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上加写的一段话。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学习和时局[1]

（1944年4月12日）

一

去年冬季开始，我党高级干部学习了党史中的两条路线问题。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在1941年到1944年间，对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年初到1934年年底这个时期的历史所进行的讨论，大大地帮助了党内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城所召集的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虽然纠正了从1931年年初到1934年年底的“左”倾错误路线，改变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的成分，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但是在党的很多干部中间，对于过去的错误路线的性质却没有作过彻底的清算。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41年到1943年这个时间内，曾经几次进行了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随后又在1943年到1944年这个时间内，领导全党高级干部进行同样的讨论。这个讨论为1945年召集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重要的准备，使那次大会达到了中国共产党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学习和时局》就是毛泽东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对于这个讨论所作的讲演。关于中共中央对于1931年年初到1934年年底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所作的详细结论，参看本篇附录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次学习使广大高级干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这次学习中，同志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央政治局曾对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结论。这些结论是：

（一）关于研究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问题。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二）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1]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

---

[1] 四中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三）关于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的讨论。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四）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1]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

---

[1] 五中全会指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五）关于党内历史上的宗派问题。应该指出，我党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经过遵义会议以来的几次变化，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党内两条路线的学习，指出这种宗派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并起了不良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为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四二年的全党整风和一九四三年冬季开始的对于党内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学习，这样许多次党内斗争的变化之后，还有具备原来的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存在，则是不对的。过去的宗派现在已经没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形态的残余，我们继续深入地进行整风学习，就可以将它们克服过来。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1]。例如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这一根据地和那一根据地的不同，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这一部分军队和那一部分军队的不同，这一种工作和那一种工作的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

---

[1] 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小团体主义的倾向，主要是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分散和彼此间不相接触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些根据地开始多半是建立在山岳地区，一个集团好像一个山头，所以这种错误倾向被称为山头主义。

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

以上所说的问题，如能在全党获得明确的理解，则不但可以保证这次党内学习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将保证中国革命一定得到胜利。

二

目前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前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容易被人们看见。希特勒不久就会被打败，日寇也已处在衰败过程中。后一个特点，比较地还不明显，还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见，但是它已在欧洲、在英美、在中国一天一天显露出来。

中国人民势力的增强，要以我党为中心来说明。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头两年内，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军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国民党战线进攻，对它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而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不重视，以为不过是少数共产党人在那里打些游击仗罢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他们即已开始改变这个政策，改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去对付国民党，而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因为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感觉国民党已不可怕，共产党则是可怕的了。国民党在一九三七

年和一九三八年内，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对于人民抗日运动虽有许多限制，但也允许有较多的自由。自从武汉失守以后，由于战争失败和仇视共产党这种情绪的发展，国民党就逐渐反动，反共活动逐渐积极，对日抗战逐渐消极。共产党在一九三七年，因为在内战时期受了挫折的结果，仅有四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四万多人的军队，因此为日本军阀所轻视。但到一九四〇年，党员已发展到八十万，军队已发展到近五十万，根据地人口包括一面负担粮税和两面负担粮税的[1]，约达一万万。几年内，我党开辟了一个广大的解放区战场，以至于能够停止日寇主力向国民党战场作战略进攻至五年半之久，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但在此阶段内，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依赖国民党，缺乏清醒的头脑和缺乏独立的政策（因此产生对国民党的投降主义，对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大量扩大我党领导的军队等项政策，发生了动摇）。同时，我党吸收了广大数目的新党员，他们还没有经验；一切敌后根据地也都是新创的，还没有巩固起来。这一阶段内，由于时局开展和党与军队的发展，党内又生长了一种骄气，许多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了。在这一阶段内，我们曾经克服了党内的右倾偏向，执行了独立政策，不但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创立了根据地，发展了八路军新

---

[1] 这里所说的一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比较巩固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只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两面负担粮税的地区，是指根据地的边缘地区和游击区，在那些地区因为敌人可以经常来骚扰，人民除向抗日民主政府负担粮税外，还经常被迫向敌伪政权缴纳一些粮税。

四军，而且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为第二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准备和执行反英美的战争，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强调起来，更加集中其主力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这一阶段内，我党根据地缩小了，人口降到五千万以下，八路军也缩小到三十多万，干部损失很多，财政经济极端困难。同时，国民党又认为他们已经闲出手来，千方百计地反对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国主义配合着进攻我们。但是这种困难地位教育了共产党人，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学会了如何反对敌人的“扫荡”战争、“蚕食”政策[1]、“治安强化”运动[2]、“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们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统一战线政权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等项工作，克服了许多缺点，并且把第一阶段内许多人自以为了不得的那股骄气也克服下去了。这一阶段内，我们虽然

---

[1] 日本侵略军在其妄想迅速“鲸吞”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破产后，于1941年初开始实行“蚕食”政策，即依托其所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从抗日根据地边缘逐渐向内推进；或以“扫荡”为先导，深入抗日根据地内建立据点，并由这些据点逐步向外扩张。日本侵略军企图以长期的、逐步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达到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的目的。

[2] 自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在游击区建立伪军，加强控制；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进行奴化教育，以镇压抗日力量。

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站住脚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进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和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自卫斗争的这些情况，党内又生长了一种过左的偏向，例如以为国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过分地打击地主，不注意团结党外人士等。但是这些过左偏向，也被我们克服过来了。我们指出了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指出了在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必要，保持了国内和根据地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九四三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我们的各项政策更为见效，特别是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此外，我们又在去年学会了或开始学会了审查干部和反对特务的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根据地的面积又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万，军队又有了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二十七万，党员发展到了九十多万。

一九四三年，日本军阀对中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以打击共产党为主。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从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时间，日本军阀没有举行过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只有几次较大的战役行动（浙赣、长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归，

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国民党采取上山政策和观战政策，敌人来了招架一下，敌人退了袖手旁观。一九四三年国民党的国内政策更加反动，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们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美国的反攻增强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苏联红军严重打击之下有摇摇欲倒之势。为救死计，日本帝国主义想到要打通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又以其对重庆国民党的诱降政策还没有得到结果，有给它以再一次打击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举进攻国民党战线的计划。河南战役[1]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这种情况，完全是几年来国民党厉行反动政策的结果。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必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同志们可以看见，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现在止，这七年时间

---

[1] 1944年4月至5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以10余万人的兵力，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约40万人，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38个县市相继陷落，汤恩伯部损失了20多万人。

内，在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经历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种情况。我党抗击了日寇的残酷进攻，建立了广大的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发展了党和军队，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党内发生的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全党学得了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就是我们七年工作的总结。

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关于根据地工作，第一阶段内有大的发展，但是不巩固，因此在第二阶段内一受到敌人的严重打击，就缩小了。在第二阶段内，一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受到了严格的锻炼，比起第一阶段来好得多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进一步，没有学会的东西，学会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学习还需要时间，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学会的东西。我党力量还不够强大，党内还不够统一，还不够巩固，因此还不能担负比较目前更为巨大的责任。今后的问题就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这就是为着将来担负巨大工作的第一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关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们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现在我们还不争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千百万劳动群众和市民群众围绕在我党的周围，并准备群众的武装起义，我们的军队和农村根据地就会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种种困

难。我们十多年来是处在农村中，提倡熟悉农村和建设农村根据地，这是必要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准备城市起义的任务，没有也不可能在这十多年中间去实行。但是现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要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实行了。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

这几天陕甘宁边区召开工业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一九三七年边区还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二千人。切不可轻视这样的数目字。我们要在根据地内学习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业和交通机关，否则到了那时将无所措手足。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这是第二个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

三

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例如：犯过错误，可以使人觉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错误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错误，也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未犯过错误的，从此骄傲起来。工作无成绩，可以使人悲观丧气；工作有成绩，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扬。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负责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

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识傲视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轻视旁人的资本。甚至年龄也可以成为骄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经验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觉性，那它们就会成为负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屡犯错误，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1]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

---

[1] 蒋冯阎大战指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大规模军阀战争。这次战争从5月正式开始，至10月基本上结束，历时半年，战区在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陇海、津浦、平汉各铁路沿线，双方共死伤30万人以上。

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1]，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列宁斯大林经常劝人要善于思索，我们也要这样劝人。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2]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我们党内是太不够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

---

[1] 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该文作于1944年，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它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1645年陷于失败。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转载，并且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

[2] 参见《孟子·告子上》。

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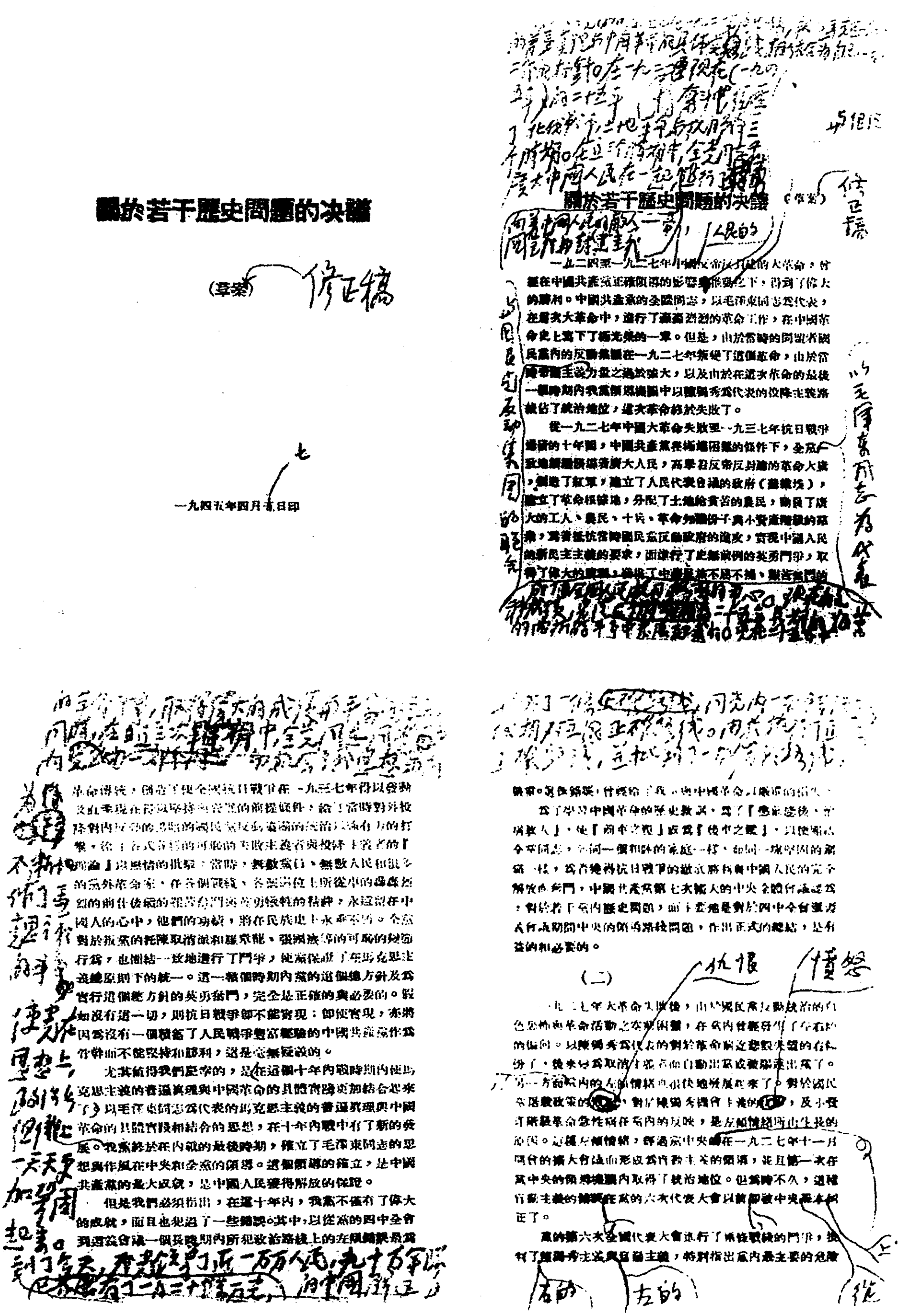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

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草案）修正稿

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印

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部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1]、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

---

[1] 罗章龙，1896年生，湖南浏阳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

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

“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

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是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

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1]，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

---

[1] 1930年8、9月间，红军第一方面军进攻长沙。当时因国民党军筑垒死守，又有飞机和军舰的援助，红军久攻不克，而敌人的援军已日渐集中，形成不利形势。毛泽东说服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撤退围攻长沙的部队，接着又说服了干部放弃夺取中心城市九江和攻打其他大城市的意见，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使红一方面军获得很大的发展。

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

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

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而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

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1]、李求实[2]、何孟雄[3]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

---

[1] 林育南（1898—1931），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2] 李求实（1903—1931），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1923年和1927年青年团的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等职。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创办党报《上海报》。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3] 何孟雄（1898—1931），湖南酃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北方职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曾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以后，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等职。1931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区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路线的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

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1]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2]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

---

[1] 秦邦宪（1907—1946），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1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这期间，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4月8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2] 指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

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外，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

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1]，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

---

[1] 1935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10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1]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

---

[1] 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95页）。

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1]。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2]；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3]；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

---

[1] 参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2] 参见《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质问题》部分。

[3] 参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1]。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

---

[1] 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八”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1]，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

---

[1]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2]。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3]。他又指出这种根据

---

[1] 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2] 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

---

[1] 参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

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地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此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同盟者"[1]；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

---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页）和《时事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1]。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2]。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3]。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4]的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5]“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6]。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7]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

---

[1] 参见《井冈山的斗争》。

[2] 参见《井冈山的斗争》。

[3] 参见《井冈山的斗争》。

[4] 参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6页）。

[6] 参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7] 参见《论政策》。

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1]；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的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2]。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一二九运动的成

---

[1] 参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2] 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 以上三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8、30页）。

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

线”[1]。他们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成立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他们在革命已转入低潮而反革命的统治力量极为强大的城市，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

---

[1] 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1933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时，曾经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夸大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而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

---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1]“诱敌深入”[2]“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3]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的盲动主义，使红军脱离人民群众；第二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实行冒险的进攻。但是这两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

---

[1] 参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参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3] 参见1935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1]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

---

[1] 参见《论持久战》。

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为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

---

[1] 即古田会议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消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

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的“理论”和实际脱离，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的批评和

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地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2]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

---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2] 参见1928年4月1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页）。

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的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分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1]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

---

[1] 参见《学习和时局》一文。

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

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着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上，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由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

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1]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

---

[1] 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1805—1881）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

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1]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

---

[1] 参见《学习和时局》一文。

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

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在林伯渠报告上加写的一段话[1]

（1944年4月14日）

县以上参议会中，可以吸收这种政治态度较右但不是坚决反共分子的少数人（用聘请方法），这对于影响外面的地主资本家与安定本地富有阶层，都有作用。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团结和斗争并重，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可使其服从大局。应该给以适当的礼貌与尊重，团结他们，并利用其一技之长，但不可任以要职，更不可假以大权。

---

[1] 这是毛泽东在林伯渠报告谈到中间分子的右翼处加写的一段话。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4月15日）

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滕代远、邓小平等电[1]

（1944年4月22日）

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二部已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侵犯。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

---

[1] 这是毛泽东致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电的主要内容。

给李鼎铭[1]的信

（1944年4月29日）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2]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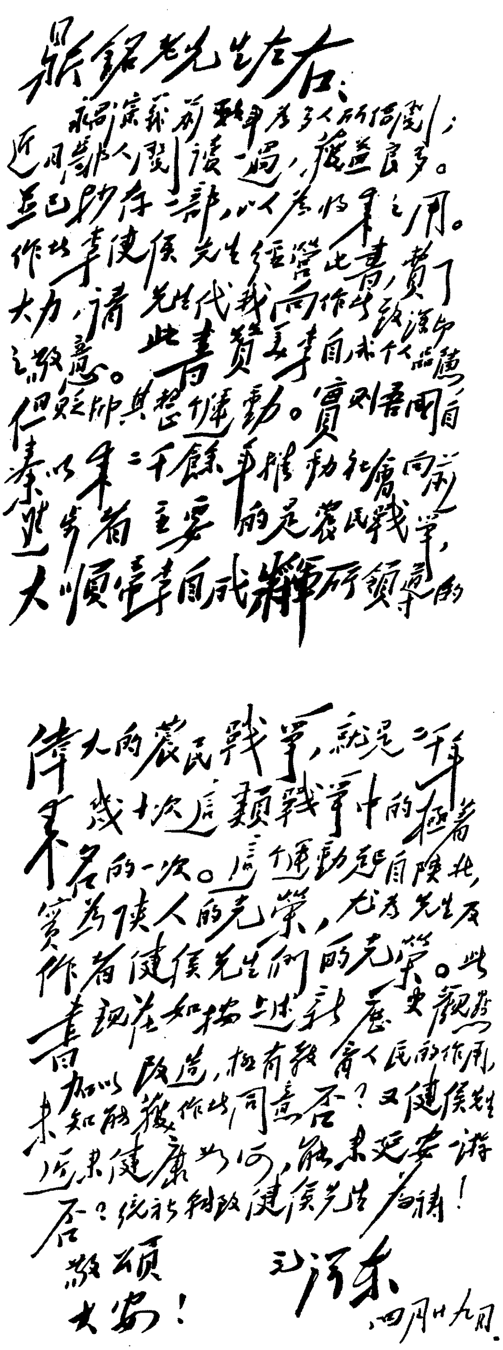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

[1]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 李健侯，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鼎銘先生左右：

承寄演義前數年即已收閱；近日邊區人們讀一過，獲益良多。並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經營此書，費了大力，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餘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陝北，實為陝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書現在如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來健康如何，能來延安一遊否？統祈轉致健侯先生為禱！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四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李鼎铭信的手稿。

致董必武等电[1]

（1944年4月30日）

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

---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并转11位外国记者电的主要内容。

和续范亭的谈话[1]

(1944年4月30日)

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朱总司令自述他初做军官就充当司务长，旧日司务长正是管连队生活，并负训练与作战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将们都研究粮食问题，全体指战员都亲自动手，建立各单位的大小家务。各部首长、干部不但都能管理军队生活，而且都能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全世界军队没有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大改革，这对革命是一件很大的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粮食对战争的重要性和续范亭谈话的一部分。续范亭，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休养治病。

复林伯渠电[1]

（1944年5月11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林彪前提四点[2]，当时何应钦回说时期不同，要另行考虑，故今年恩来提出五点[3]（即在孙中山纪念会演说之最后五点），现张、王[4]既要我们先提主张，可即以此五点及你带去六点为谈判内容，并要求至渝后，先恢复渝办、西办[5]两电台及人员自由来往，以便利谈判。

---

[1] 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复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2]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中，林彪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4点：（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4个军12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3] 指周恩来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4] 张、王，指张治中、王世杰。

[5] 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驻西安办事处。

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

（1944年5月15日）

一

必武[1]转伯渠[2]同志：

支、灰、文各电均悉，兹复如下：

（一）王、张[3]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

（二）为顾全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

（三）为避免刺激，王、张所指恢复新四番号及抗敌百分之五十八均未提出。

---

[1] 必武，即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 伯渠，即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3] 王，指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指张治中，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当时他们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二）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

（三）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

（四）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自一九四〇年以来，政府即无颗弹、片药、文钱、粒米之接济，此种状况请予改变。

（五）同盟国[1]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应请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国各军，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

（六）请政府饬令军政机关撤销对于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与经济封锁。

（七）请政府饬令军事机关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

（八）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此等诬蔑与侮辱的称号，过去还是暗中流行，近更公开见诸报纸。

（九）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此种活动，变本加厉，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停止，妨碍团结实重且大。

（十）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

---

[1]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杰[1]、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等，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赵祥等。此等人员，均属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

（十一）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装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广告与追悼新闻，实则王实味等绝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饬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事情发生。

（十二）又据确息，西安一带特务机关，准备于外国记者团到西北时，沿途伪装各种人物与伪造各种证件向外国人告状，借达破坏中共信誉之目的，闻彼辈所捏造之中共罪状共达十余项之多。似此不但妨碍团结，而且有辱国体，请政府予以制止。彼等伪装伪造，发踪指示，奔走布置，中共获有充分证据，如不制止，难免引起不快之后果。

（十三）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

（十四）请政府停止对重庆中共《新华日报》之无理检查（例如禁登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的作战消息，禁登中共文件等），破坏发行，威胁订户，扣压邮寄等情事。

（十五）请政府发还在三原被政府军队扣留之英、美援助十八集团军的药品一百零一箱。

（十六）请政府允许恢复重庆、西安两处电台，以利通讯。

---

[1] 徐杰，陈潭秋的化名。

（十七）请政府允许中共代表及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人员有往来于渝、延间及西、延间之自由，及允许西、渝两办事处人员有在该两地居住与购买生活物品之自由。”

以上各条，由你用中共中央代表名义签名，并书明年月日，以书面正式交给王、张。

毛泽东

辰删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5月19日）

经过生产与锄奸运动，证明有许多原来准备洗刷的党员是好的。陕甘宁边区工人有很大发展，过去只有七百人，现在发展到一万二千人。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刘少奇报告党章草案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1]

（1944年5月20日）

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来说是胜利快要到来，就中国来说也是胜利快要到来。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因此要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骄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要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随时学习。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如果大家放下了骄傲这个包袱，能接近群众，可是不能替群众解决问题，还是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的一部分。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

（1944年5月21日）

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能向全会作简单的工作报告，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是否还需要，请大家考虑。我觉得不必作详细报告了，因为最近这个时期中央的工作，中央同志都知道，参加全会的同志也大体知道。至于是否要向七大作从六大到现在的详细的中央工作报告呢？我觉得从六大到现在有十六年，中央主要负责人换了几次，这个详细报告也很难作，对于过去工作的检查，准备放到历史总结中去。过去联共中央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报告，我们只准备对七大作政治报告，不另作工作报告，工作的总结也可以在这个报告中提到，只解决已经成熟了的中心问题。

我今天只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在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后的民主共和国决议（一九三六年九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三七年五月）、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六中全会（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直到现在，都是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的。我们在执行这个方针中，对于如何发展自己与团结友军，对于日本、国民党与我党的看法，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与具体政策，是有争论的。我今天

讲话的目的，就是要为中央的政策作辩护。

这里有国民党河南调统室给其中央调统局的一个关于河南战争[1]的报告，是最近时期抗战情况的典型材料之一，请王首道[2]同志宣读一下。这个材料表明，蒋介石的三个主力之一汤恩伯[3]如何完全无能，日寇乱冲一顿，他们就乱跑一顿，胡宗南[4]有两个师在河南也只剩下一个团。这证明抗战中的两个方针带来的不同结果：不民主的方针必然使抗战失败，只有民主的方针才能战胜敌人。蒋介石的中央军没有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只有法西斯的教育，因而战斗力完全瓦解，一击即溃。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实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教育，我们充分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在敌后建立了十几个根据地，曾经停止了敌人在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达五年半之久。现在日本进攻河南，是因为日本要救死，国民党太不行，而共产党的力量又还没有达到保护汤恩伯的程度。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蒋介石的三个主力就塌掉两个，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将来在英、美准备反攻的条件下，日本的军心民心和中国敌占区民心大大动摇时，日本力量和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对比也就会起变化。实行民主则胜，不实行民主则败，以前这还只是我们的一种理想，现在开始变为现实了。去年我们发

---

[1] 指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于1944年4月中旬发起至5月下旬结束的河南战役。国民党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败退，郑州、洛阳等38个县市相继陷落。

[2] 王首道，1906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3] 汤恩伯（1900—1954），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使外国人注意共产党的抗战力量。英、美从来没有像现在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作过这样露骨的批评的。胡政之[1]访问英、美回国后，请董必武、潘梓年[2]同志吃饭，说他在外国讲中国共产党有前途，他又说国民党十二中全会无希望。最近孙科[3]说要辞职，于右任[4]不愿参加十二中全会。这些人都是寒暑表，表明情况要有变化。

关于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寇的中心力量，这个问题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同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作斗争。华中与山东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曾经表现得最严重，差不多花了一九三九年一整年才纠正过来，但后来还是出了皖南事变，到皖南事变后才彻底纠正过来。当日军占领江、浙，国民党逃走一空时，我们的同志不敢当县长，说是没有人委任。当山西新旧军冲突[5]时，旧军向新军开枪，新军要不要还枪也成为问题。这些就是在民族战争中不敢实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具体表现。问题就是要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上，苏联的政策是最独立自主的，美国次之，英

---

[1] 胡政之（1889—1949），四川成都人，当时任《大公报》总经理。

[2]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潘梓年（1893—1972），江苏宜兴人，当时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3]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4]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5] 山西新军，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是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山西人民抗日武装。山西旧军，指阎锡山的军队。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山西新军同八路军一起进行了坚决反击，重创顽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此后，山西新军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

国犹豫，在法国、意大利、波兰等问题上，英国都徘徊于两可之间。蒋介石也是这样，对共产党及其他许多政策都表现出徘徊犹豫，表里不一。汤、胡均以反共的《剿匪手本》为教材教育其军队，这样的军队对日一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我们就不同，始终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大举进攻共产党，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一个目标上去。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我们对于三次反共高潮[1]都是如此。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四万五千人），发展到现在的近百万的党员和近五十万的军队。当一九三五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人，成了“皮包骨”。我们当时说长征是胜利了，长征是播种机和宣传队，留下的这点力量，不要看轻了它，它的发展前途是很大的。当时有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其实是很不符合实际的。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九年，我

---

[1] 1939年至1943年国民党蒋介石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是在1939年冬季至1940年春季，国民党军队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宁县、镇原等县城；阎锡山发动了晋西事变，进攻决死队等山西新军；石友三、朱怀冰等部进攻冀南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二次是在1940年秋季至1941年春季，在这期间，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了从皖南北移的新四军部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从1943年春季至秋季，蒋介石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又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冒民众团体叫嚣“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调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

们曾经希望改造国民党，所根据的是张学良[1]进步的先例与国民党丧失了江、浙的地盘。但是这个希望落空了，不过我们并没有亏本。归根结底，主要是靠了八路军、新四军，才挽救了民族的危亡，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与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

我党在抗日时期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这一阶段的头两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国民党，国民党也比较有朝气，国共关系比较好，我们采取了游击战争的方针，发展了军队，建立了根据地，开办了干部学校。对运动战还是游击战的问题，我们内部也发生过争论，但是还是执行了以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战略方针。统一战线政策在一九三八年受过一次挫折，后来被六中全会纠正了。在第一阶段，我们队伍中生长了一股骄气，有些同志过于轻视日本，过于相信国民党，自以为万事大吉，骄傲得很，这一点是吃了亏的。

第二阶段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日本以主力对付共产党，举行了无数次的残酷“扫荡”，实行“蚕食”政策与“三光”政策，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都缩小了。但是这种困难教育了我们的同志，我们采取了适宜的政策，例如对敌斗争、整顿三风、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发展生产、统一领导、“三三制”、减租减息等，都有成绩，因此我们在敌后站稳了脚。我们虽然受了损失，但

---

[1] 张学良，1901年生，辽宁海城人，1936年12月12日，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是得了经验，渡过了困难。这一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这个政策还是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的，到一九四一年汪精卫[1]成立傀儡政府而更露骨，日本对国民党差不多没有大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则日趋反动，对日本的进攻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发动进攻则是积极的。

第三阶段，从去年开始。我们的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上升了。军队现在有四十七万人，战斗力提高了；党员发展到九十余万；根据地人口，在第一阶段直接、间接负担粮税的近一万万，第二阶段降到不满五千万，一九四三年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各种政策更有进步，特别是整顿三风与发展经济。整风是为着弄通思想，团结全党。我们党基本上是团结的，但在各种政策问题上有许多不同意见，有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而在纠正之后又团结了。统一是我党第一个侧面，不统一是第二个侧面，这两个侧面都要看到。历史上的曾经起过不良作用的宗派，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已不存在了，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思想的残余还是有的。现在还严重存在着带有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这是由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广大、长期被分割的农村根据地与我党教育工作的不足而产生的，必须加以克服。经济工作是我们在长时期内缺乏经验的，现在我们要大大地注意。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

---

[1] 汪精卫，当时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针。一九二七年我们曾经配合薛岳[1]占领了上海，但是随即受到国民党的袭击。现在我们要将薛岳进上海变为陈毅[2]进上海，而且我们有了几十个“薛岳”。六大至七大我们实际上走了根据地路线，现在也必须坚持根据地。在根据地上，我们必须发展经济。一九三九年陕甘宁边区只有七百个工厂工人，一九四二年即有四千个，今年有了一万二千个。如果边区有三万个工厂工人，边区工人同边区人口的比例即超过全国工人同全国人口的比例。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到农村，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将来由农村转到城市，又会发生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做城市工作。将来农村是供给军队粮食和干部的地方，没有我们，没有八路军、新四军，是不可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大城市的。

我们党要准备应付将来的大事变。七大要选出比过去二十三年更强的更有能力的中央。

关于国共谈判，林伯渠[3]同志这次出去，国民党派文武两大员[4]迎接，每天谈四小时，沿途招待，空前未有。原来我们的估计很低，以为这次不能解决问题，故要林伯渠同志只提出一些小事。彼方提出根据林彪去年提的四点来谈判，林老答以根据恩来今年提的

---

[1] 薛岳，1896年生，广东乐昌人，1927年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2]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3] 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4] 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当时他们是参加国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

五点[1]来谈判，彼方又不赞成，故党中央提出了二十条。前途不外两个：一仍是拖；一是解决部分问题，如军队问题、边区问题、防地问题、在个别地点办党办报问题。他们如决心解决这四个问题，我们应准备接受，向全国表示我们愿意搞好国共关系。

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准备驱逐日寇出中国。

---

[1] 指周恩来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抗日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杨家岭。

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1]

（1944年5月22日）

现在无论中国和外国都为了同一的目标而奋斗，那就是打倒法西斯。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建设，也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目的一样，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边区在五年前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产业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个工人，到了今年就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这次开大会的目标，就是在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首先是布的自给与铁的自给。假如我们做到了全部自给，我们工人的数目还会大大地增加。全体工程师、厂长、工人们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都要向这方面努力。像沈鸿[2]同志、陈振夏[3]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的摘要。

[2] 沈鸿（1906—1998），浙江海宁人，早年在上海与人合伙经营上海利用五金厂。1938年携机床赴延安，曾任陕甘宁机器厂、晋察冀兵工局的工程师。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3] 陈振夏（1904—1981），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1937年到延安，后任延长炼油厂厂长，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需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对于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我们边区是个大学校，其中有一门课叫做工业，这次职工代表大会便是一个工业的短期训练班。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得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于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在延安大学[1]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944年5月24日）

同志们！今天延安大学开学。我们这个学校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课程的学校，你们要学政治、经济、文化，准备将来去做这些方面的工作。这个学校，过去有些部分是分开办的，现在合起来了。像周扬[2]同志所讲的我们的工作中间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缺点错误是暂时的。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再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过去办学校办了多年没有搞好，现在有了进步，方针、办法上了轨道，这是同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晋西北等各个根据地整个工作的进步相联系的。

我们的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深入中国国土，每一个中国人的任务就是打日本。有些人反对共产党，和我们闹别

---

[1]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一所综合性干部大学，1941年9月22日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而成。1943年4月后，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行政学院相继并入。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

扭，这些人就违背了这个方针。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两条心。我们是一条心，开大会是一条心，开小会也是一条心，公开的、秘密的都是一条心，就是要把日本打出去。要把日本打出去，就要建立根据地。整个中国凡是没有沦陷的地方都是抗日的根据地，大后方是根据地，华北、华中是根据地，广东、海南岛是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根据地，我们共产党在许多地方创造了抗日的根据地。有人说根据地不好，不应该有根据地，这个话不妥当。没有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饭吃，没有地方出发去打敌人。什么人最恨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它不喜欢我们的根据地，因为根据地在它后方把它挤出去。我们有了根据地，就要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工作。党校是学习搞党务的，也有政治、经济、文化课程，还有一些军事课，但是比较偏重讲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和作风。抗大[1]也学政治，也搞生产，也讲经济。现在我们的军队都讲经济，三五九旅搞生产，今年要求每个战士、干部都要生产六石一斗细粮，这不是经济吗？所有我们的军队，搞饭吃，做衣服，修房子，盖大礼堂、小礼堂，做桌椅板凳，一概都是自己动手，这都是经济。延大的学习偏重政治、经济、文化这三门，各个根据地都搞这些工作。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刚才周扬同志说要为边区服务，要为这个根据地服务。可不可以有一个两个，两百个，两千个，到晋西北、太行山、泰山、五台山的根据地去服务？那里也叫边区，大体上我们的根据地都叫边区。我们是为根据地服务，为什么不说为全国服务呢？因为你总要落一个地方，像飞机飞上天总得飞回来要落

---

[1] 抗大，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于1937年1月，前身是抗日红军大学。

在一个地方，不能到处飞不落地。教条主义是不落地的，它是挂在空中的。我们不要搞教条主义，要脚踏实地地为实际服务。

日本是实在的东西，它落在中国有几十万军队打我们。现在我们各个根据地负担的敌人很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的伪军。有些人看不见这个事实，诬蔑我们好像一个日军也没有打，一个伪军也没有打。去年《解放日报》发表了我们的一篇文章，叫做《国共两党抗战成绩之比较》，那里头就有数字，有百分之五十八、百分之九十等。现在我们有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其他党政机关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大概有二十五万，四十七万加二十五万就是七十多万。现在各抗日根据地直接和间接交公粮的人口一共有八千多万。过去有一万万，后来日军“扫荡”，把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调回来，对正面战场采取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集中力量要把我们搞垮，要把我们摧毁，实行“扫荡”“蚕食”“治安强化”“三光”政策。“三光”，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我们也要有一套去对付它，这就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战争最残酷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这两年，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解放日报》写了一篇社论叫《破晓前的黑暗》，号召大家努力来战胜这个困难。各个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全体努力，实行十大政策，熬过难关。敌后的困难很多，延安也有很多困难，例如《野百合花》问题，只有小米没有猪肉问题。延大发展生产很好，还要继续发展，猪肉还要吃得多一点。那天我同周扬同志谈，你们大家纺纱，还有各种专门生产，都很好，但我看现在还不够，还要努力发展。敌后的情况更困难，大体上各个根据地都很困难，因为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敌后是非常艰苦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我们站住了脚，坚持抗战七年之久。这个残酷的

战争经过最困难的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今年我们又向上发展了。中国所以有今天，就是因为有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当然，如果说大后方这个大根据地一点不救中国，这个话也不妥当。有的人说只有他那个大后方根据地救中国，边区和敌后根据地不救中国，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你那里是怎样救中国的？你们三百万军队只负担日军的百分之四十二、伪军的百分之十，我们四十七万军队负担却那样重。我们的根据地比较小，但是担子很重，没有任何接济，就靠我们党政军和老百姓结合起来，一齐努力奋斗。这次河南战役，日军十余万，国民党军队约四十万，就不挑担子，一听枪响就“向后转，开步走”。现在许多事情难办，所以要搞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个办法有的人不赞成。还有一条就是团结，有的人也不搞，他那里发小册子，开大会小会，骂共产党为“奸党”，八路军为“奸军”，边区为“奸区”，很不讲团结。

总之，延安大学要为各个抗日根据地服务。根据地的工作上了轨道，我们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党务各项工作上了轨道，就使得我们的学校也上了轨道。但是过去的缺点一定要克服，教条主义一定要去掉。

政治上你们要学习党的方针和政策，如统一战线、“三三制”、精兵简政等。工业、农业、商业、运输、财政，你们都要学习，现在的方针是要全面自给。“三三制”的执行，前年开高干会[1]以前右了一点，去年又“左”了一点。我们的方针是非常清楚的、确定的，就是打日本，中国的一切党派，一切阶级，一切政治的、非政治的团体，只要是赞成打日本、同共产党合作的，不是破坏共产党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的，我们都要团结。这个方针是始终不变的。同志们学政治，就要坚持这样的方针，团结全国人民，达到打败日本的目的。

经济上要做到全面自给，几年以来，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的经济有很大发展。全面自给，除了搞饭吃，还要生产各种用的东西。现在边区政府发了指示，要求边区人民的所有家庭，一百四十万人口，三十五万家，每家有一年余粮。不仅要防备天旱，还要准备反攻。这个目标去年没有达到，要在今后两三年以内实现。我们在延安、在边区做工作，办延大，如果使得三十五万家农民都有一年余粮，那末我们共产党就了不得。还有陕北的山头都是光的，像个和尚头，我们要种树，使它长上头发。种树要订一个计划，如果每家种一百棵树，三十五万家就种三千五百万棵树。搞他个十年八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此外，还有工业，现在开工厂代表大会[1]，提出日用工业品要全面自给。边区工、农、商、学、兵一百五十万人口，一年需要三十一万匹布，可是我们现在每年只能生产十万匹，还差二十一万匹。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完全解决衣服的全部自给，根据过去经验，这是有把握的。边区过去的棉花、棉纱、布，都要从外面买，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血向外流。如果我们棉花自己种，棉纱自己纺，布自己织，一百五十万人大家动手，血就不流出去了，我们的经济就更坚实。每年公家和老百姓需要四百七十万斤铁，大部分不能自己生产，又要花几十万万元边币从外面买，血又要向外流。现在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做到四百七十万斤铁完全自给，自己采矿，自己冶炼，并制造必需的机器和农具。我们的工业生产有各个种类，主要的是纺织和炼铁这两项。这两项主要的

---

[1] 指1944年5月1日至25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

要做到自给，其他各项也都要自给，这是全面自给。

关于文化教育问题，也有很多工作。我们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党、政、军，一共一百五十万人，都要识字。我们要有文化，才能学习政治，将来当乡长、区长、县长都要有文化。边区的经济发展了，农民也要求有文化。我们要使边区所有的老百姓，每人识一千字，搞他十年八年。如果能识一千五百字、两千字、三千字，那更好。我们至少要做到识一千字，每村要有一个冬学。识字要成为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单靠我们下去教“一、二、三、四”“人、手、刀、牛、羊”，那是不行的，老百姓里头有识一百字的就可以教别人。

还有卫生工作。周扬同志说了，要开一个卫生班，学一点东西。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边区一共一千个乡，一百五十万人里头找出一千个人来学医，学他四个月、一年也好，然后到医务所当医生。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讲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文化上你们还要学会演戏，扭秧歌，还要学会唱歌，唱黄河大合唱、小合唱，等等。政治、经济、文化，是我们延大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学好，要会做这方面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搞教条主义，不脱离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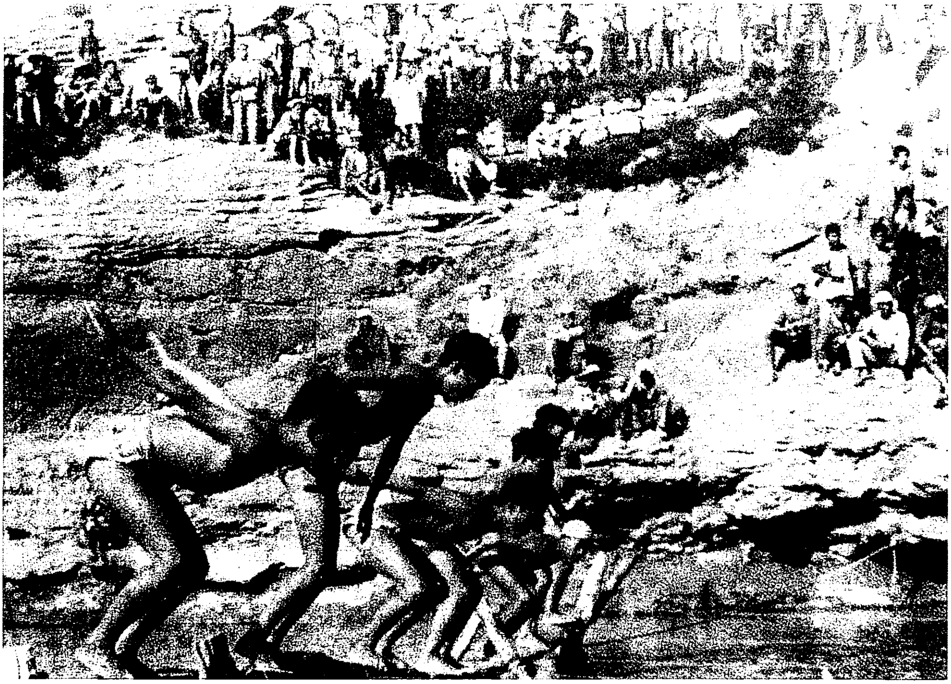
周扬同志刚才说到了整风和审干，这两件工作有很大的意义，改造了人，改造了思想。同时也犯了错误，正在纠正。除了周扬同志讲的以外，我再讲几句。我们有一条方针，叫“一个不杀”。有人还不相信，说不晓得政府哪一天会要杀。真正是特务，过去做了破坏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搞了情报，只要交待清楚，我们一个不杀。从去年四月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杀。这有没有害处？没有害处。对于真正的特务，过去真正的坏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改造好。我们的方针是教育人，这个方针是确定了的，我现在再一次向你们宣布。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信不信由你。《论语》上说“言可复也”，意思是说过的话是要实行的。中央决定的方针，既然宣布了，就要实行，大家可以看。一个不杀，这个意义大得很。不管有多大的罪，既然不杀，就可以教育，教育好了，还能做点事情。过去做了坏事的真正的特务，我们希望他自己觉悟，跟我们一道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一百个人中，有一两个人硬不觉悟，硬不合作，怎么办？有办法，让他自己搞小米吃，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丰衣足食，那有什么坏处？他不觉悟，不同我们合作，顽固得很，我们刀下还留不留人？我们刀下还要留人。为什么要留？为了稳定多数人，因为杀了他，其他有类似问题的人便要恐慌。你顽固十年，就让你劳动十年，你顽固二十年，就让你劳动二十年，你顽固，我们也顽固，就这样顽固下去。这叫做是则是，非则非。是特务就是特务，要搞清楚，使他们不再做特务的工作，能同共产党合作打日本。非则非，本来不是特务，搞错了，给他戴上了特务帽子，我们就要把帽子取下来，要分清是非轻重。“抢救运

动”[1]那时候，空气紧张得很，“抢救”了好些人，许多是搞错了的，非则非，今天要行脱帽礼，脱去给人戴错的帽子。共产党办事，不明白的时候是会犯错误的，明白了以后错误就要改正，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搞错了是坏事，但可以变成好事。比如我冤枉了你，现在经过我的手取下给你戴错的帽子，从这里我们得到了经验，以后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于被冤枉的人来说，他们心里不舒服，很痛苦，但是也受到了锻炼，得到了经验，以后他们审查别人的时候就会谨慎一些。关于审查干部，我们实行九条方针：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现在延安审查干部，就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则是，非则非，实行宽大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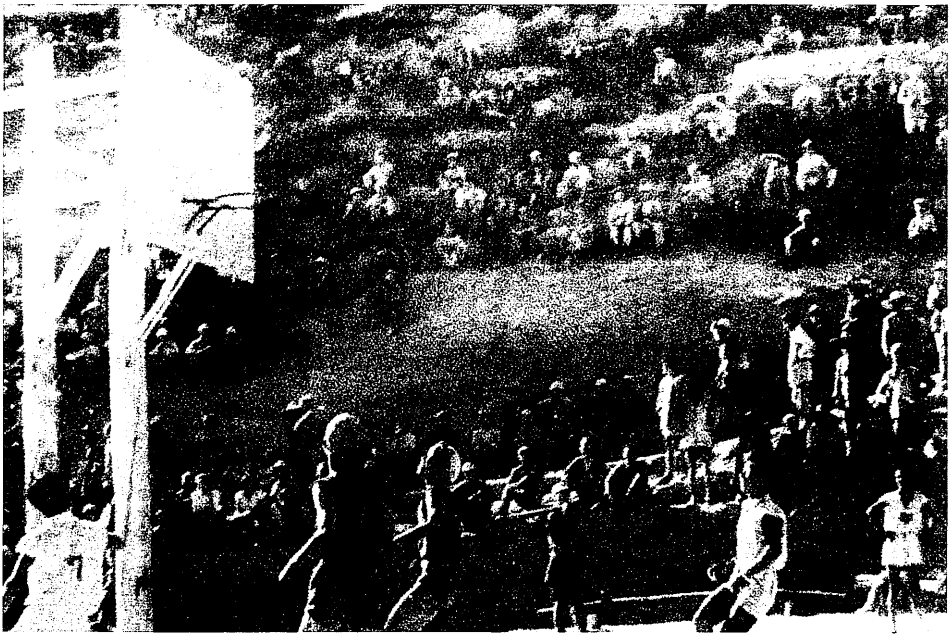
今天开学，还有一件事说一下，你们的一些课是由边区政府各厅的负责同志来教的，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你们是学习的，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自己来教课，这很好。同时，你们也要经常去请教，走上门去，也可以打电话。如果哪一天没有来教课，便将他们的军，请他们一定来讲。

---

[1] “抢救运动”，又称“抢救失足者运动”。1942年年底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审查干部工作以后，由于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并使用了“逼、供、信”的错误方法，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其间，毛泽东曾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九条方针，反对错误路线——逼、供、信。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审干工作中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许多错案。7月3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经过许多努力，才制止了审干工作中的错误，随后，对错案进行了甄别平反，对受冤屈的人赔礼道歉。



延河里的游泳比赛。



延安女子大学的篮球赛。

毛泽东和李讷在延安。

毛泽东和李讷在延安。

延安大学教育方针

（1944年5月24日）

一、本校以适应抗战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与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

二、本校进行中国革命历史与现状的教育，以增进学员革命理论的知识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思想，并进行人生观与思想方法的教育，以培养学员的革命立场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三、本校教育通过以下各种方式和边区各实际工作部门及实际活动相结合，以期实际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与用的一致：

1. 与边区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建立一定组织上或工作上的联系，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负责人，依具体情形，直接参加本校有关院系的教育工作之领导。

2. 边区建设各方面政策方针与经验总结，为本校教学之主要内容，技术课以适应边区建设当前需要为度。

3. 本校研究人员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边区建设各方面实际问题之研究，并依具体情形定期地参加各有关实际工作部门的工作。

4. 本校学员在修业期间，定期地分派到各实际工作部门进行实习。

四、本校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以有组织的劳动，培养学员的

建设精神，劳动习惯与劳动观点。

五、本校在教学上实行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教员与学员互相学习，并使教学员中书本知识与实际经验互相交流，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难，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立思想与批判的能力。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

给胡乔木的信

（1944年5月27日）

乔木：

此文[1]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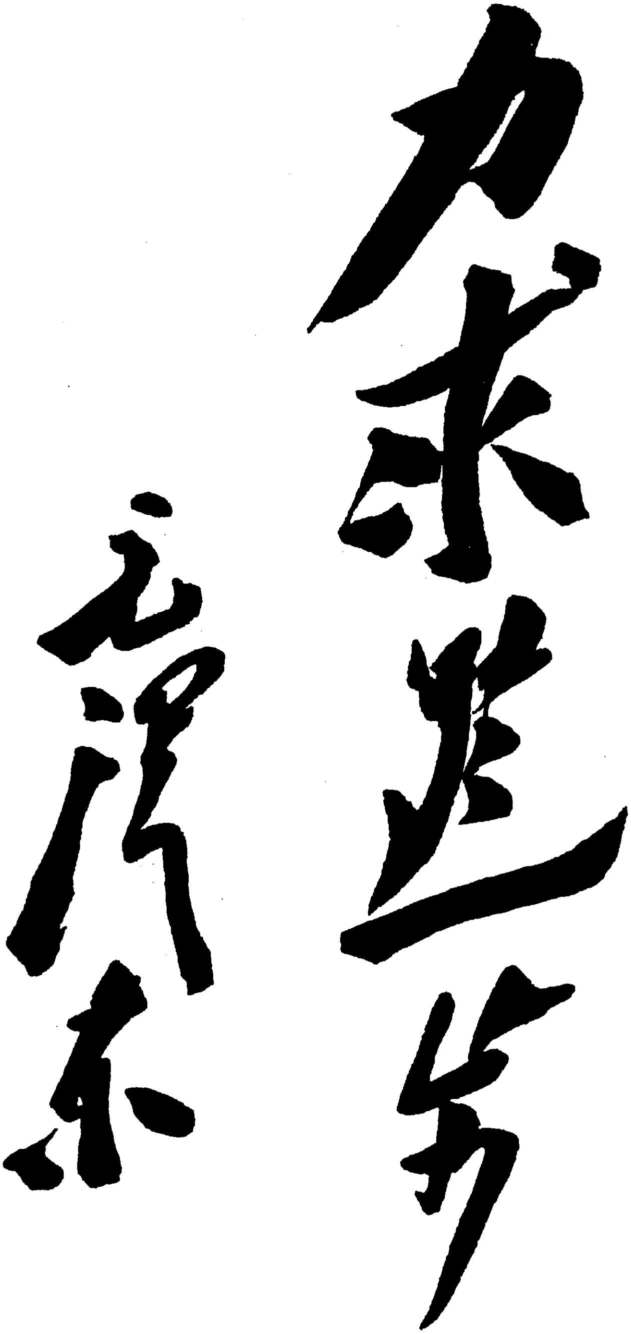
[1] 指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后来发表于1944年6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为中央直属机关个人生产展览会题词

（1944年5月28日）

力求进步。

毛泽东



力求进步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央直属机关个人生产展览会的题词。

致林伯渠电[1]

（1944年5月31日）

（一）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二）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三）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致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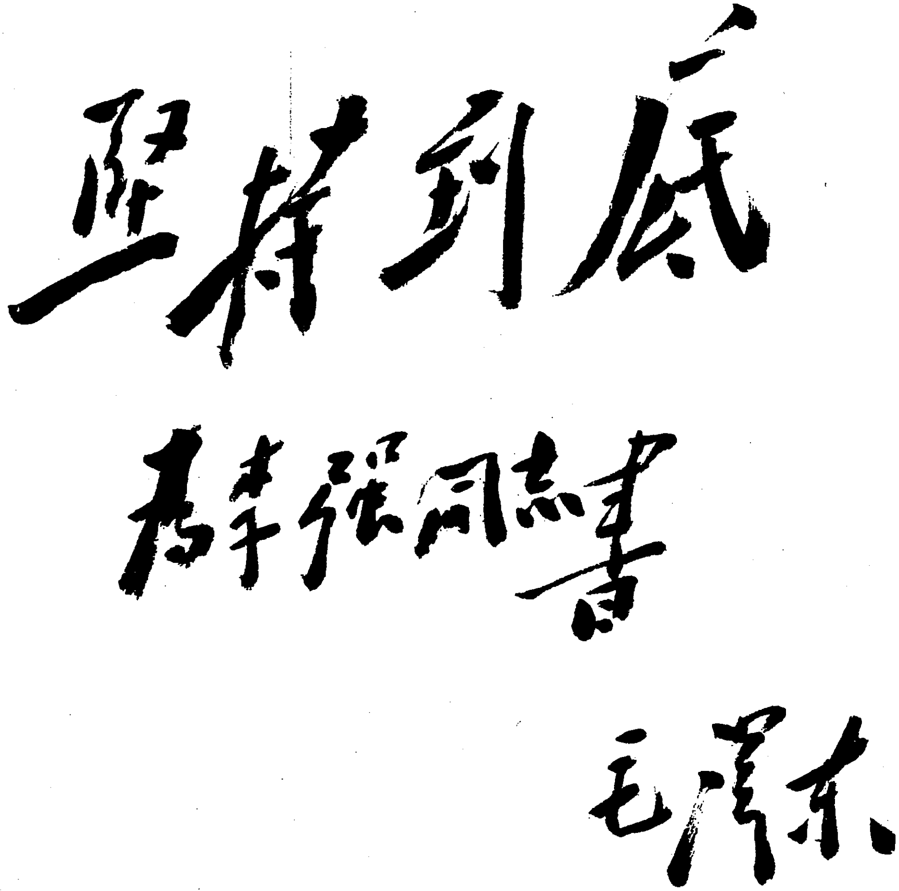
为特等劳动英雄李强题词

（1944年5月）

坚持到底。

为李强同志书

毛泽东



坚持到底

为李强同志书

毛泽东

毛泽东为特等劳动英雄李强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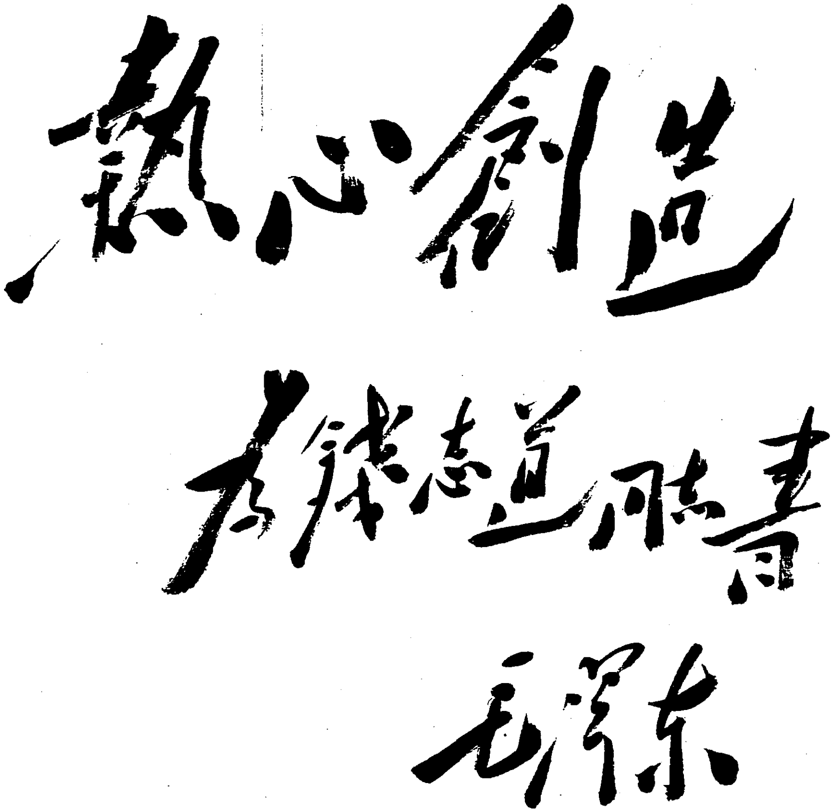
为特等劳动英雄钱志道题词

（1944年5月）

热心创造。

为钱志道同志书

毛泽东



熱心創造

為錢志道同志書

毛澤東

毛泽东为特等劳动英雄钱志道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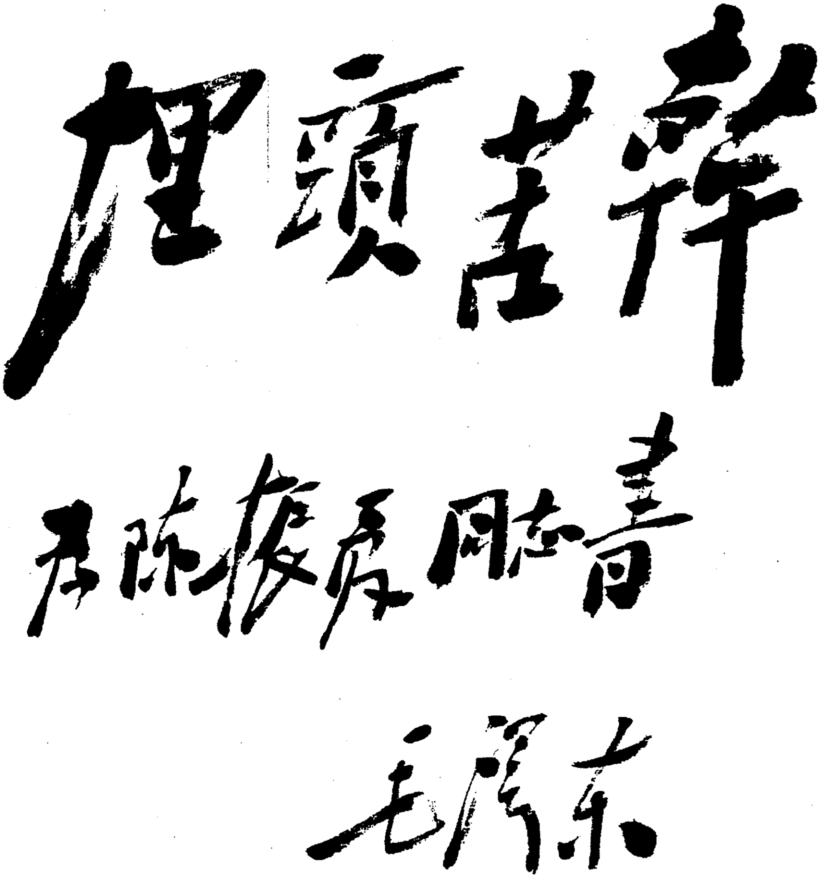
为特等劳动英雄陈振夏题词

（1944年5月）

埋头苦干。

为陈振夏同志书

毛泽东



埋頭苦幹

为陈振夏同志書

毛泽东

毛泽东为特等劳动英雄陈振夏的题词。

对中共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的讲话

（1944年5月）

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

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

复林伯渠等电[1]

（1944年6月3日）

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会见华莱士[2]及拉铁摩尔[3]时可以新十二条及口头提议八条均告知他们。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5月23日来电的主要内容。王若飞，当时是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2] 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20日到达重庆访问。

[3] 拉铁摩尔，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随同华莱士访华。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1]

（1944年6月5日）

一、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就是明证。仅在没有我党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的地方，我党才不能负此责任。

二、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场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有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以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相互配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三、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到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四、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下列诸项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

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一九二七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地或者过早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第二，关于计划与组织。各局各委应依据自己所属地区内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与伪军伪警的具体情况，拟定一个大体计划，例如如何分工负责，如何组织机关，如何配备干部与训练干部等。应该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一段铁路、公路，每一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大城市与大部队还可组织几个委员会，分头分区去工作。此种委员会不作根据地工作，专门负责组织与指导各该城市要道与伪军中的工作。此种委员会目前可设在根据地内

或游击区内，如有安全条件，则设在城内。各局各区党委，对所属大城市、中等城市及重要铁路，应委托在自己直接指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各敌占县城及小城市，则在各地委或县委指导下组织委员会去工作。对于经常调动的伪军中的每一个军或师，应在适当党委指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去工作。但是同时，这种工作还应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多头地与分路地去进行，从支部到中央局各级组织，只要它对城市与交通要道及伪军伪警有办法去进行工作者，均应直接派人去工作，暂时不必统一，关系亦不必交代。如各种关系在工作中群众中碰头时，则应彼此关照协助，不应彼此争夺和抱怨。这种工作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但为管理方便起见，在各局及区党委之下，可成立城市工作部门。这种部门除指导和组织城市与交通要道秘密工作外，还应指导敌区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小型便衣游击队，借此给城市工作以便利。这种部门应驻在根据地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与根据地党、政、军混在一块。

第三，关于工作方向。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是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

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同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出路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第四，关于工作方法。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成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点、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的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

式。在敌占区，党和抗日团体的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资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做作，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地有限度地去利用。在目前，城市和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与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同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刊物和书籍，并利用各种合法口号去进行。各种非法宣传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

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蔽，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形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形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第五，关于干部。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做工、谋事，特别是在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洲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士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

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地与分路地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第六，关于经费。必须有大批经费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只要不引起干部的浪费及城市工作人员的雇佣观念，一切必须的经费，是应该充分付给的。各根据地各种组织，为了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必需开支，应准予报销。在各根据地预算中，应准备一笔充足的城市工作经费。发给资本到城市与要道去做生意，以其盈利充工作经费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五、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中共中央
六月五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1]的讲话

（1944年6月12日）

一　致辞

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与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我们表示极大的庆祝。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我们谨祝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斯大林元帅的健康！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

---

[1]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其成员有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等的外国记者，《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新民晚报》等的中国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共20余人。该团于1944年6月9日到达延安，在延安参观访问一个月左右。7月12日中国记者离开延安回重庆，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

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关于中国国内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历次文告及其报纸。今乘诸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合作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

但是，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二　答记者问

诸位的问题可综合为三个：

第一个问题，关于国共谈判。谈判已进行了许久，但是今天还在谈判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其他今天还无可奉告。

第二个问题，关于第二战场。日前《解放日报》社论已说明是一个新阶段，我们不准备再发表宣言。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1]

---

[1]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战争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为了打倒共同敌人以及为了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亦快要到来了，但是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这是苏联、美国、英国的经验都证明了的，中国几十年以来以及抗战七年以来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统一在军事上尤为需要，但是军事的统一，亦应建筑在

民主基础上，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互相之间，如果没有一种民主生活、民主关系，这种军队是不能统一作战的。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进其发展。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我们赞成大西洋宪章[1]及莫斯科、开罗、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就是基于这个观点的。我们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主要的就是这些。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先生们来到边区已有十几天，今后还将有若干时日留在边区。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其有不足的，必须继续做。如果有缺点，必须克服这种缺点。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对于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在法西斯被打倒以后，我们所希望于他们的，也

---

[1] 大西洋宪章，也称《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是罗斯福同丘吉尔1941年8月9日至12日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举行会谈后，于14日正式发表的。宣言指出：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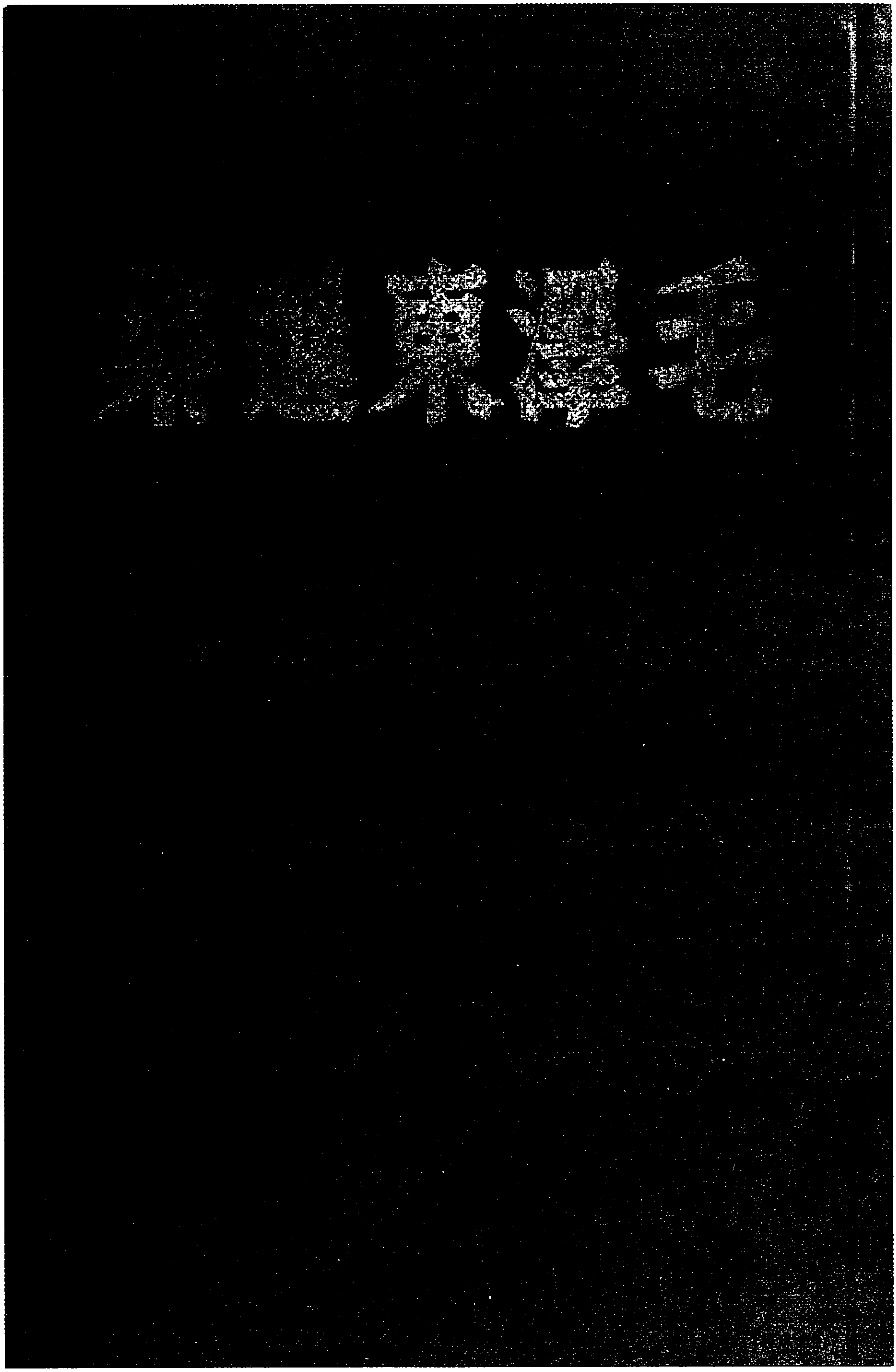
是如此。持此观点来看许多问题，没有不可以说通与做通的。今天时间已晚，今后还可互相交换意见。我要说的，就是如此。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等会见冲破国民党政府阻挠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等。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和外国记者合影。

1944年6月，毛泽东设宴招待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毛泽东向外国记者发表讲话，介绍八路军抗战的情况。



1944年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1]

（1944年6月14日）

今天是第三次联合国日，延安有热烈的民众大会，这个大会不但是一个庆祝大会，又是一个动员民众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的大会。

一九四二年罗斯福总统发起以每年今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各国都在这天作纪念，今年是第三次了。过去的两年，是世界形势起巨大变化的两年，包括两个巨大的事变。第一个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2]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3]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第二个是本月六日英、美联军开辟了第二战场，使进攻转到了决战阶段，英勇的盟军正在法境作艰苦的但是胜利的战斗，它的影响将及于全世界。我们在中国纪念联合国日，不要忘了苏、美、英人民的艰苦奋斗，不要忘了斯大林元帅、罗斯福总统与丘吉尔首相的英明领导和他们所指道路之正确。

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2] 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3] 这里指同盟国。

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从四月十八日开始，日寇相继发动向河南、湖南与广东的进攻，洛阳失陷，长沙岌岌可危，其中最严重的是河南战事。在这个战场上，洛阳失守以前，敌以攻击第一战区蒋鼎文[1]将军及汤恩伯[2]将军统率下的三十余万军队为主要目的，以洛阳失陷而告一段落。本月初旬，又开始第二个战役，敌以向部署在灵宝、虢略、官道口线的第八战区胡宗南[3]将军统率下的军队进攻为主要目的。截至本日为止所获情况，该线业已不守，敌向潼关前进，显有攻陕目的。据闻西安已下令疏散，西北处在极大的威胁中。中国纪念联合国日，却和欧洲及太平洋处于相反的情况，那边在进攻，这边在退却。

中国境内也有两种情况，敌后战场在进攻，正面战场在退却。中国从抗战开始，即形成了两个战场，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敌主力向正面战场进攻，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却向敌后前进，开辟了几个广大的敌后战场。武汉失守后，敌人开始改变其战争政策，对国民党正面战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而逐渐移转其主力于敌后对付共产党，直至今年三月，整整五年半时间，主要的打击力量都落在共产党及敌后人民身上。最高峰时，六十万日军及九十万伪军的总数中，共产党担负的几达四分之三。然而我们是没有任何接济的，各抗日根据地又是被敌人分割了的。五年半中，敌对正面战场只作过

---

[1] 蒋鼎文（1895—1974），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几次战役性质的作战，都是早去晚归，并无战略的与占领性质的进攻。国民党统治人士在此期间的政策，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顽固执着，不愿稍变，以迄今日。

但是敌情起了变化，四月十八日以后，过去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改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政策。敌人所以出此，全为救死，但是敌人今天并未丧失战斗力。可是我们的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却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军队官兵脱节，军民之间又脱节，作战五十余日而退入潼关，西安震动，又在准备退却。

敌后战场以一九四一及一九四二两年为最困难时期，在敌人主力重击之下，根据地人口由一万万下落到五千万，军队缩小了，土地也缩小了。但是我们坚持奋斗，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各项适宜的政策，打退了敌人一切进攻，终于站稳了脚。一九四三年及今年则举行广泛的进攻，又从敌人魔手下夺回了大批的土地，解放了广大的人民，根据地人口又上升到八千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恢复元气，并且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合计，共有正规军与游击队四十七万，民兵二百万，主要的是经验丰富了，质量提高了。敌人原欲摧毁敌后战场，再攻正面战场，但是不可能了，为救死计，被迫着同时挑起这两个战场在肩上。

这本是极好的形势，只要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愿意修改自己的政策，就能振奋士气，击退敌人进攻。有如此坚强与如此广大的敌后战场存在，只要正面稍作有力的回击，即足退敌。敌人并不多，截至目前止，豫、湘、粤三处进攻部队合计不过十几个师

团，难道以倾国之力还不能给它打回去吗？而无如至今还只看到自己的退却。

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够站住，能够进攻（虽然现在尚不是战略性的进攻，尚不能攻破大城市），国民党反而不能站住，不能进攻呢？

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坚持团结与民主，共产党团结了华北、华中、华南一切敌后战场的各界人民，实行民主，依靠人民，在那里充满抗敌卫国的爱国精神与再接再厉的朝气，对于全国则力求团结，无论国民党的政策如何反动，总是愿意和它改善关系。国民党不然，就其统治人士来说，今天为止，尚毫无反省与择善的意图，没有团结与民主方针，反而天天诬蔑共产党为“奸党”，诬蔑八路军、新四军为“奸军”，诬蔑抗日民主地区为“奸区”，自大骄傲，不可一世，已属中外皆知。只知伸手向同盟国[1]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

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这是今天一条唯一的国际通道，此处若失，则威胁四川。我们共产党人始终希望国民党作好，我们及全国人民均希望国共两党改善关系，解决悬案，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不要再使人民失望了。这种希

---

[1]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望，美、英、苏各国同样迫切。记者团诸君已经来延安，华莱士[1]副总统即将到中国，我们希望他们能起促进的作用，帮助中国人民解决团结与民主的问题，借以克服中国正面战场存在的危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乘此联合国日纪念，谨致我们共产党人的热望。

1944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和留守兵团学习代表、战斗英雄会餐。

---

[1] 华莱士（1888—1965），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20日抵重庆，进行“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

致晋察冀分局电[1]

（1944年6月14日）

嗣后动员补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为口号，不再宣传义务兵役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兵役制度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共各中央局等电[1]

（1944年6月18日）

国民党拼命在外国人及中国人面前，抹杀或隐蔽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成绩、力量和作用。此次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我们除正面答复外，并用敌伪文件给予反证。望各局各委及军事机关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

---

[1] 这是毛泽东致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军区并转各区党委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1]上加写的一段话[2]

（1944年6月22日）

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

[1] 指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的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

[2]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上讲到伪军处加写的一段话。

长沙失陷后的危机*

（1944年6月24日）

长沙于十八日失守。据军委会宣布，“我军已达成消灭敌人之任务，即按预定计划作战略上之转进”。不论如何，继洛阳之后，不及一月又一个省城失陷了。形势之严重，为抗战七年来所未有。

日寇进攻湖南开始于上月底。五月二十七日敌由岳阳渡新墙河南犯，十日内即窜抵长沙近郊，敌寇暂置城垣不顾，续追南退之国军，相继占领平江、浏阳、宁乡、湘潭、株洲、醴陵、湘乡诸城镇，然后于十七日攻击长沙城，第二日即被占领。就正面战场而论，这一次湖南战役和武汉失守以来的历次战役不同。过去几次战役，日本人称之为“活塞”战法，早去晚归，打一下又缩回。这一次湖南战役和河南战役一样，目的在消灭我野战军，占领交通要道，并进而压迫中国政府投降。所以，中国正面战场作战决不能仍和武汉失守后五年半以来，一切应付敌人“活塞”战法一样，只用招架政策，望其活塞之自拔。这一次敌人的目的是塞死这个抗战的瓶子。死塞来了，必须有打出一条活路的政策、计划与勇气，必须抛弃军事上的招架政策与唯武器论，必须改变政治上的独裁政策与反民主论，一句话，必须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否则是危险的。

但是中国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军事政治政策仍原封不动。对于军事的失败，他们说：是因为我军

缺乏现代装备所致。政府发言人张平群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声明：“我们决易地而战，以待盟国能予我更多人力及武器之援助……”这些人在敌人进攻任何一处之初即高呼要新式武器，要飞机，而在任何一处溃败之后，亦将一切责任推之于盟国供应中国新式武器的不足。可是河南与湖南作战却最雄辩地驳倒了这套议论。在河南，我军以四十万兵力，对抗不足七万的敌军（一说只有四万）。汤恩伯的装备是超过一切所谓杂牌军的，可是只有武器较差的杂牌军（刘茂恩、孙慰如、马法五等）坚决抵抗了敌人，汤恩伯统率的几个集团军都是不战而溃，损失二十余万，这里原因究竟在武器还是在什么呢？汤恩伯根本与河南人民对立，河南人说：“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河南人把汤恩伯和蝗虫并列。汤恩伯的军队内部，官兵完全脱节，兵是捉来的，平素挨打受骂，饥疲不堪，面无人色，临战一哄而散，全无斗志。请问这样的军队拿了新式武器有什么用处呢？

讲到敌人的新式武器，在河南还有一个第三战车师团，在湖南则并未使用这种师团。在湖南是水田交错、山岭重叠，在湘北还有湖川纵横，使用不上装甲武器，中央社报道也从未提及敌方坦克或装甲部队之活动。而我六、九两战区的国军，素称精锐，装备优良。敌人有大炮机枪，我军也有大炮机枪，敌人偶有飞机配合，我军也有盟军第十四机队之全力支持。在盟机积极活动下，敌寇完全谈不上有什么制空权。在武器方面，敌我无所轩轾；然而在兵力对比上，则我军有数倍于敌军的绝对优势；此外三湘人民素富爱国的战斗传统，正如河南一样，如果在正确的发动人民依靠人民的政策下，其力量是无穷尽的。然而我们的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人士不愿这样做，不愿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去加强战争，却一口推在缺乏新式武器上面。这种唯武器论继续提倡下去，中国正面战场，只会继续

糟糕。

很可痛心的是国民党军队的大部分：主要是中央军，差不多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是国民党统治人士在五年半长时期内所主持的招架政策与反民主政策造成的恶果。现在，我们的军委会还在提倡“消耗”战略，这只会引起战斗意志之更加丧失。有眼睛的人都已看到，无论在豫在湘，所见的只是我军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消耗敌人是谈不上的，消耗自己倒是实在的。

国民党统治人士的这种消耗战略，似乎是在说欲以空间换时间。在抗战初期，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点尚有理由可说，但是现在完全不同了。幅员辽阔虽然是我国抗战的有利条件之一，但毕竟是有其限度的。如果按照现在豫湘战役这样“日蹙国百里”的纪录，则全部国土所能换到的时间，将并不会有很多。根本的问题是时间对于国民党究竟有何用处？抗战以来，国民党以我国宝贵的国土连同这国土上的国民作赌注换来的时间也不少了，单从武汉失守算起，国民党所负担的正面战场进入相持状态不是已经五年半了吗？请问这样长的时间究竟作了什么用途？不是好事一样未做，坏事则做了一大堆吗？你们现在又要换时间，人民要问你们又将预备作什么用呢？

唯武器论也罢，消耗论也罢，一切都是空话，现在的危机，决不是这些遁辞可以推得掉的，其中的真正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党统治人士的错误政策。这个政策，正如我们所屡次说过的是“招架与观战的政策，敌来招架，敌去袖手，而注其全力于防制人民、压迫民主与反对共产党”。这个政策，在漫长的五年半中顽固执着，贯彻于其一切党政军机构中。时至今日，敌人为了救死，改变其活塞战法为死塞战法，向中国正面战场稍作有力的进攻，国民党

的党政军各种机构就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国民党政策若无根本改变，则前途的危险可以预见，战争必继续失败，野战军必更受损失，平汉粤汉两路必被敌人打通，苏皖浙闽粤赣诸省必将为敌切断，大后方的抗战基地必将大大缩小，兵源财源必将愈益困难，国际地位必将日益低落，各种危机必将日趋尖锐。

是时候了，国民党统治人士，应该想一想自己的根本政策，中国人民有权督促你们从速改弦更张，与民更始。

目前的危机完全是在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方面，其他一切都是有利的：盟军在西欧登陆，东西南三面夹击希特勒之势已成，德寇覆亡在即；远东方面，盟军不仅突破了日寇在太平洋之外防线，且已进占其内防线中马里亚纳群岛之塞班岛；在中国则有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二百万民兵的英勇奋战，雄峙屹立，敌寇无可奈何，且正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拖住绝大多数敌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诚恳地希望改善国共关系。在这种种有利条件之下，万事齐备，只缺一个国民党政策的改变。我们希望国民党有一个改变，并且要快。如何改变法？改消极抗战为积极抗战，改唯武器论为武器与人民相结合，改防制人民为依靠人民，改压迫民主为实行民主，改反对共产党为加强国共团结，改依赖外力打日本为以自己动手为主配合同盟国打日本。只有如此，才算从豫湘作战中取得了教训，才能打退敌人的新进攻，才能克服单单从国民党错误政策中产生的种种危机，才有配合盟国反攻的希望。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6月28日）

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6月30日）

现梁寒操[2]已发表谈话，应以林伯渠、周恩来名义分别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表公开谈话以答复之，文稿另电告。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机来延安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张、王均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致林伯渠、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梁寒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6月30日）

谈话稿如次，请在《新华日报》发表（不论通过检查与否）：“《新华日报》记者顷以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先生关于国共问题的谈话就询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承其答复如次：‘国共谈判尚在继续商讨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当局，嗣得国民政府提案，虽其距离尚远，但已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或将亲回延安报告，以便商得具体答复。至具体解决，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无不乐于商讨。’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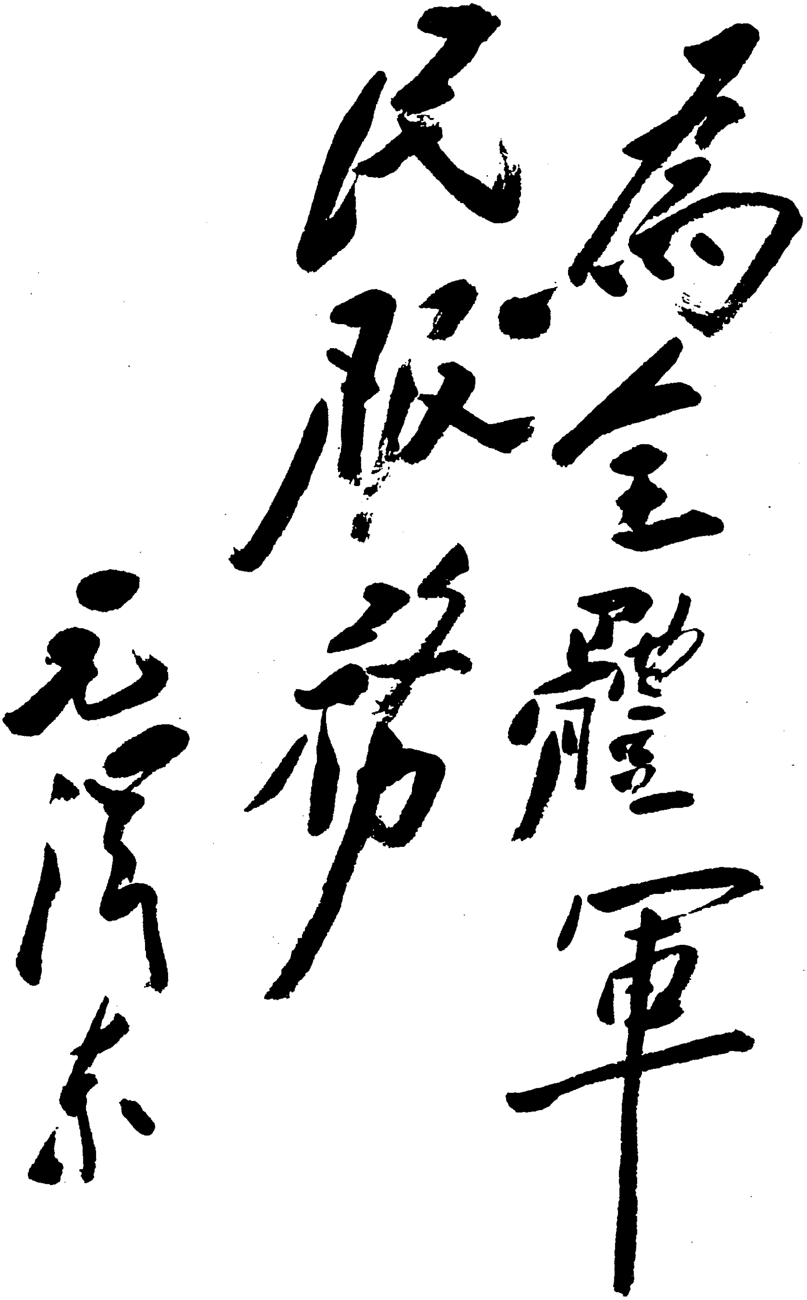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以林伯渠名义在重庆发表谈话的稿子致林伯渠、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为延安卫生展览会题词

（1944年6月）

为全体军民服务。

毛泽东



为全體軍
民服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卫生展览会的题词。

中共中央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1]

（1944年7月1日）

（一）全军目前四十七万，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从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用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敌人现在正大举向正面战线进攻，若干根据地当面敌情有某些暂时的变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的捷讯，又可长抗战之志气，灭敌伪之威风。这些条件，均使我们可能与应该在敌后扩大根据地与扩大军事力量。但是，一则目前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严格地限制我们；二则敌人从正面回师“扫荡”及从满洲抽兵入关，都有可能；三则我军多年分散游击，极少训练，尚不巩固。因此，目前尚不可能与不宜于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应抓住目前时机，除对付敌伪“扫荡”“蚕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展游击战争与尽可能发展部队，扩大与巩固根据地，并以大力争取伪军伪警及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上之广大群众之外，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部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目前的中心任务一般是提高，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修改的党内指示。

条件。如果我们不能完成此种任务，则我们将来的大发展与我们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任务，将要受到妨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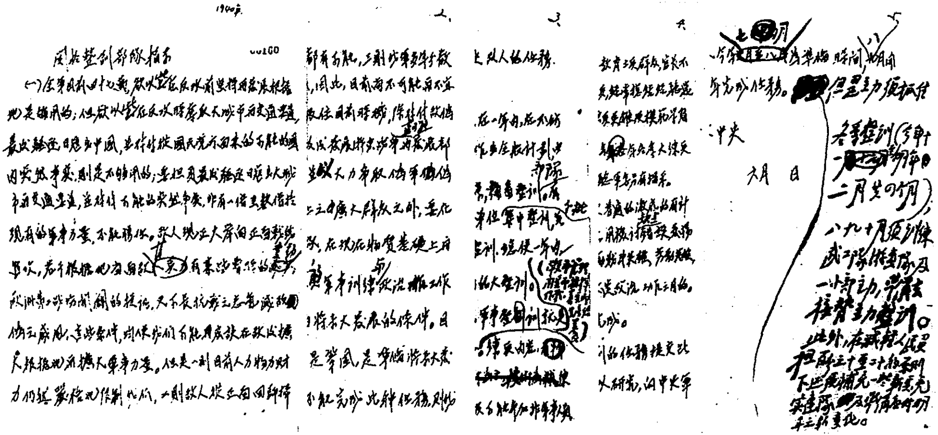
（二）因此，我们向你们提议，在一年内，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的条件下，由各局各委作出全般计划，由军区军分区负责执行，利用一切可能间隙，轮番整训部队。有特别便利条件者，以几个团或一个团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无此种条件者，以营以连为单位分批集中整训。总使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得到一次有效的大整训。

（三）整训内容分军事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带兵即管理，用兵即指挥作战，养兵即生产给养）。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方法，实行群众运动，不论官兵伕及可能参加的非军事人员一律参加；从士兵中发现能手（练兵英雄），教育士兵群众，官长不如士兵者先向练兵英雄学习，然后教育士兵。经常总结经验，选举模范学习者，以分区或以团为单位开练兵英雄及模范学习者大会。打破老一套的练兵法。陕甘宁边区去年冬季大练兵采用此种方法，收到极大成效。此种经验军委另有指示。

（四）一年整训期内，政治工作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根据古田决议及谭政报告，用检讨缺点错误，发扬优良成绩，发扬模范连队的经验，奖励战斗英雄、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与模范学习者的方法，达到改造政治工作之目的。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

（五）请你们将关于一年大整训的任务提交所属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加以研究，向中央军委提出意见。以今年七月为准备时间，八月开始，分期整训，一年完成任务。但是主力须抓住冬季整

训（今年十一月至明年二月共四个月），八、九、十月须训练武工队、游击队及一小部主力，准备去接替主力整训。此外，在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二十的原则下，还须补充一些新兵，充实连队及准备应付明年之新变化。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整训部队指示》的手稿。

（六）为着准备在将来条件成熟时，扩大我军一倍至数倍，对于大批训练干部，应引起各级党委及各级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的极大注意，现在不论主力军、游击队或是民兵自卫军，我们的干部对于技术与战术程度，对于练兵、带兵、用兵、养兵的能力，一般都不很高，有些则是很低的；对于政治认识与政治工作，一般都有缺点，有些则是很差的。如果还不及时加以整训，势将妨碍将来重大任务的执行。但是同时，不论在我们的主力军与游击队中，或是在民兵与自卫军中，都包藏着广大勇敢聪明与有极大发展前途的干部与士兵。我们的干部与整个军队有极大的成绩，干部水平的不高及某种落后是可以克服的。在一年整训期内，各局各委及各军区军分区应有一个训练干部的切实计划，分别在各军区军分区及县级实

行。在军区者，有抗大分校，轮训当地连长连政指以上军政干部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连级以上工作之干部。再则，普通中等以上学校亦须加入军事教育课程。在军分区者，应办教导队，以训练军队班长排长与民兵自卫军排长两类干部为目的。前者应包括轮训主力与游击队中的排长班长及训练由当地党政民工作准备转入军队担任班长排长工作的干部，其期限由各地酌定。后者时间一月至二月，派回本地工作。在县级者应办民兵自卫军班长一级的教导队，轮训一月即归本乡，造成广大群众武装的干部。各地应自己创造多种训练方法，利用战斗与生产间隙去进行。

（七）请你们将关于一年大整训的任务，提交所属军事机关与政治工作机关，加以研究，定出计划，开始执行。为着使这个一年大整训的计划变为群众热烈参加的运动并获得实效，必须在一次包括全根据地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会上讲通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及其实践的方针方法，会毕并应仿照去冬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例子，所有高级干部，不分文武，一律参加，下操五天至七天（身体太差者在操场旁观），造成大整训的决心与热潮。还须注意者，时间虽定一年，但是主要应抓住今冬十一月至明春二月共四个月为整训中心关节。今秋八九十三个月则须训练好一部分武工队、一部分游击队及一部分主力，准备到冬季去接替其他部队，分期集中整训。民兵自卫军的分期轮训计划，由你们酌定之。

（八）此外，在发展军政党公营生产，减轻人民负担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以一九四三年负担作标准），并十分注意保护壮丁，休养民力的原则下，应按照各地需要情形，酌量吸收若干新兵，补充连队之消耗，保持各战略区军队之总数量。如果我军在一年整训期满时能够保持全军四十七万至五十万，又获得一次大整训，那就算

是很大的成功。再则，本指示所提出之整训与提高部队质量之方针，不能误解为放松上中层机构的精简，也不能误解为要改变目前部队的分散游击性，须知精简政策与分散游击政策在目前时期仍是完全需要的。

中共中央
七月一日

给丁玲、欧阳山[1]的信

（1944年7月1日）

丁　玲
　　二同志：
欧阳山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2]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3]，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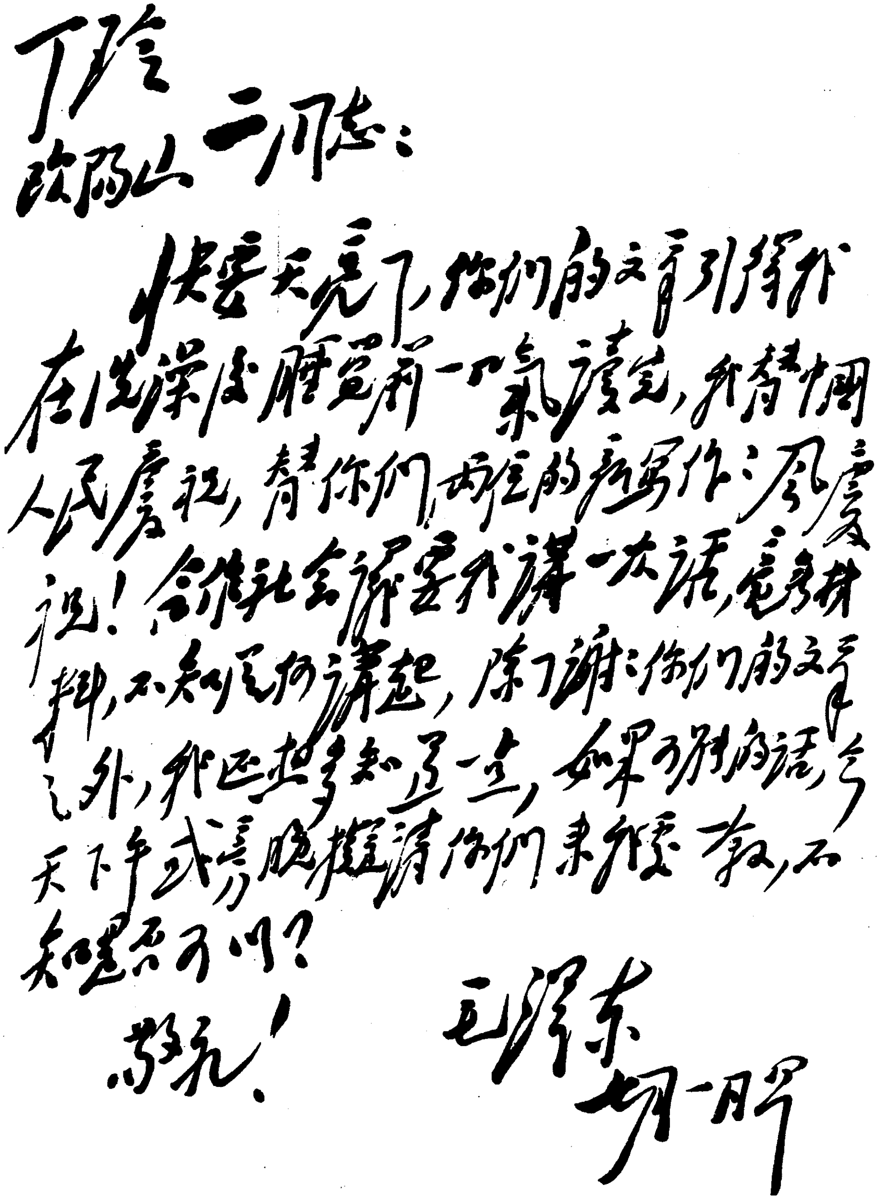
七月一日早

---

[1] 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欧阳山（1908—2000），湖北江陵人，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室主任。

[2] 指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于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

[3] 1944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



丁玲
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氣讀完，我替中国人民慶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寫作〻風慶祝！合作社会議要我講一次話，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講起，除了謝〻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話，今天下午或者晚上請你们来我处談〻，不知是否可以？

敬禮！

毛澤东
七月一日早

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信的手稿。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7月2日）

三十日电悉。提示案、张王来信及你们巧[2]电（三十日才收）均收到。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接收提示案[3]而准备提出一个复案。”周恩来已于一日发表声明。故现在已不是退回问题，而是研究复案问题。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如两人均不愿来，则林偕美军事人员回延，以便中央能听取详细报告，研究复案。如外人飞机容不下则乘车回延。此外，请董将双方提案原文在便谈时交各小党派朋友阅看，但不发表。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2] 巧，即18日。

[3] 毛泽东在获悉张治中、王世杰6月15日致林伯渠信以前，鉴于张、王6月5日向林伯渠声称不能将中共中央意见书转报国民党政府，故曾于6月17日电示林伯渠将国民党政府提示案退还张、王。

发展边区经济文化[1]

（1944年7月3日）

自四二年边区高干会后，一年半中间，合作社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整个工作走上了轨道，出现了大批的模范合作社。每一个模范的合作社，都是一本活的教科书。

第一，合作社是为什么人办的？边区的合作社是为着广大人民而办的，为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十万部队和学校人员，一切经济文化事业，都必须通过合作社才能完成。这个方针在前年冬天高干会议上就已确定，这就是刘建章的方针。一年半以来很多合作社都朝着这个方向走，都有很大成绩，但是还有些合作社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这次合作社会议要重新宣布这一条方针。第二，合作社办些什么事？合作社的业务主要有十项：工业、农业、运输、畜牧、供销、卫生、信用、教育、植树、公益。通过合作社把全边区人民组织起来。第三，合作社是统一战线的性质，所有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加合作社，它是政府领导，各阶层人民联合经营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第四，所有做政府工作与党务工作的同志们都应该认清合作社事业的重要性，不应该有丝毫轻视的心理。边区的任何经济、文化事业都必须通过合作社才能完成，因此要鼓励更多的同志去参加合作社事业。

---

[1] 这是毛泽东在招待合作社会议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

今天中共中央欢迎各位同志，对大家热心办合作社表示关切，希望大家回去好好办。

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的决定[1]

（1944年7月5日）

日寇临死挣扎，进攻河南、湖南，正面战场后退，全国危极，西北危极。但是八路军、新四军作战的敌后战场则捷报频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成为全国人民希望之重心。为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准备对敌反攻，决定本年十一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2]。

在这次大会上，主要地将讨论下列各项问题：

（一）团结与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今年的参议会应检讨已有好的和不够的经验，反映各方意见，给团结与民主以更充实的内容，使各界人民，男女老少，一齐动员，增加力量。且要以边区的模范推动全国人民一齐努力，从速终止一切分裂与反民主的现象。

（二）军事问题。过去拥军优抗工作与组织民众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还有缺点。今后两项均应加强，务以军民一体与全民皆兵之阵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今年参议会应该检讨此种工作。

（三）边区经济文化建设问题。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

---

[1] 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起草的。

[2] 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于1944年12月4日至19日召开。

愚昧与疾病。多年以来全体人民在政府领导下，与贫穷现象斗争，这种现象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已经减轻，人民的生活已有很大改善，丰衣足食的新现象已日渐推广。但是还没有普遍，更因抗战与备荒的需要，必须增加生产，因此必须号召人民于两年至三年内普遍做到每户至少有一年余粮。为改变边区童山太多现象，应号召人民植树，在五年至十年内每户至少植活一百株树。边区各项工业品年有增加，但还不能自给，特别是布、铁等项，要办到三年内完全自给，并且不仅求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好。在与愚昧斗争的事业上，年来虽有进步，但文盲还未消灭，要用一切有效方法，使男女老少在数年内至少都能认到一千字。在与疾病斗争的事业上，更须作极大努力，方能克服“财旺人不旺”的现象，应在数年内做到每乡至少有一个医生，每区至少有一个药店。总之，应使现在已经蓬勃发展或已开始发展的经济运动、文化运动、卫生运动，更加向前大踏步发展。其办法：一是公营，一是民营。而主要的方法是民办公助，号召人民组织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只有公私合作、公私兼顾与在自愿原则下（禁止任何强迫摊派），把绝大多数人民都组织到经济的文化的卫生的合作运动中去，才能完成上述任务，今年参议会应具体检讨这些工作。

（四）选举问题。边区参议会议员应于明年改选。为使人民更能把自己爱戴的人选到参议会去，使这些新的参议员更能反映人民利益与决定抗战建国大计，关于选举条例及选举方式应在今年参议会中提出讨论。

上述四项，为今年参议会必须讨论之主要问题，本联席会议责成各级政府，各参议员及各级参议会，各抗日团体，各劳动英雄，在事先发动热烈的讨论，准备意见，以便届时反映于参议会，作出

有利于增强团结抗战与发展边区各项建设之决议，至为至要！

1944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在陕甘宁边区练兵比赛大会上。

1944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陕甘宁边区练兵比赛大会上。

1944年7月，毛泽东和陈毅在陕甘宁边区练兵比赛大会上。

1944年7月，毛泽东和朱德、吴玉章在陕甘宁边区练兵比赛大会上。

1944年7月，毛泽东等在陕甘宁边区练兵比赛大会上。

1944年7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练兵比赛大会上。

在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4年7月5日）

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7月7日）

关于国共谈判，现在应是要求和张、王见面，在见面时声明提示案已转交中央，中央来电认为双方意见相距尚远，为求进一步商谈计，邀请张、王偕林来延一行。如张、王拒绝来延则林回延报告谈判经过，以便讨论对提示案之复案。如彼方既不派张、王来延，又不让林回延作详细报告，则继续商谈无法进行，对于提示案之复案亦无从作出，谈判拖延之责全在彼方，我方不任其责。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8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
（1944年7月14日）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3
（1944年7月15日）
和武道的谈话……16
（1944年7月18日）
致各战略区电……18
（1944年7月22日）
在《德国的内战》上加写的一段话……19
（1944年7月24日）
给谢觉哉的信……20
（1944年7月28日）
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22
（1944年7月28日）
和王震谈组织南下支队问题……25
（1944年7月）
发展沪杭周围及沪宁路沪杭路两侧的游击战争……28
（1944年8月3日）
致林伯渠电……29
（1944年8月6日）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30
（1944年8月12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 ……33
（1944年8月12日）
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 ……34
（1944年8月13日）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39
（1944年8月15日）
在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电上的批语 ……54
（1944年8月17日）
致董必武、林伯渠电 ……55
（1944年8月18日）
复李先念等电 ……56
（1944年8月21日）
复张云逸等电 ……57
（1944年8月21日）
给陈毅的信 ……58
（1944年8月21日）
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 ……59
（1944年8月22日）
复林伯渠等电 ……62
（1944年8月22日）
给续范亭的信 ……63
（1944年8月22日）
和谢伟思的谈话 ……64
（1944年8月23日）

致董必武电 ……………………………………………………………77

（1944年8月29日）

给秦邦宪的信 …………………………………………………………78

（1944年8月31日）

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81

（1944年9月5日）

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 …………86

（1944年9月6日）

致张云逸、饶漱石等电 ………………………………………………91

（1944年9月7日）

致晋西北、晋察冀电 …………………………………………………92

（1944年9月7日）

为人民服务 ……………………………………………………………93

（1944年9月8日）

为张思德题写挽词 ……………………………………………………97

（1944年9月8日）

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电 …………………………………………98

（1944年9月9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 ………………………………………99

（1944年9月11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00

（1944年9月12日）

复罗荣桓、黎玉、萧华电……………………………………………101

（1944年9月14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02

（1944年9月15日）

坚持为人民服务……103
（1944年9月18日）
为张侠题词……105
（1944年9月18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106
（1944年9月18日）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07
（1944年9月18日）
驳国民党政府提示案……108
（1944年9月19日）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111
（1944年9月21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14
（1944年9月22日）
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18
（1944年9月27日）
致吕正操、林枫电……123
（1944年9月30日）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124
（1944年10月1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29
（1944年10月7日）
张平群发言错误，人民要求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130
（1944年10月8日）
对《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抨击英首相丘吉尔演说》的批语……132
（1944年10月8日）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34
（1944年10月11日）
关于建立豫西根据地的部署…………………………………138
（1944年10月14日）
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致邓小平、滕代远等电…140
（1944年10月14日）
在董必武、林伯渠来电上的批语……………………………142
（1944年10月19日）
对即将去前线干部的讲话……………………………………143
（1944年10月25日）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47
（1944年10月30日）
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150
（1944年11月1日）
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55
（1944年11月2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57
（1944年11月6日）
和赫尔利的谈话………………………………………………158
（1944年11月8日）
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166
（1944年11月10日）
延安协定草案…………………………………………………167
（1944年11月10日）
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169
（1944年11月10日）

华南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广西与南路……171
（1944年11月14日）
为悼念邹韬奋逝世题词……173
（1944年11月15日）
在一份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情况通报上加写的一段话……175
（1944年11月15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76
（1944年11月19日）
给郭沫若的信……177
（1944年11月21日）
给柳亚子的信……179
（1944年11月21日）
给沈雁冰的信……181
（1944年11月21日）
在周恩来同赫尔利会见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83
（1944年11月21日）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民党党政人事调动* ……184
（1944年11月22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86
（1944年11月23日）
复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电……187
（1944年11月24日）
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188
（1944年11月24日）
致周恩来电……189
（1944年11月25日）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190

（1944年11月）

给陈毅的信……191

（1944年12月1日）

给谢觉哉的信……194

（1944年12月1日）

复周恩来电……196

（1944年12月1日）

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197

（1944年12月4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198

（1944年12月4日）

和包瑞德的谈话……199

（1944年12月8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6

（1944年12月9日）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207

（1944年12月12日）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209

（1944年12月15日）

给赫尔利的信……219

（1944年12月16日）

晋察冀部队应努力向日军占领区发展……220

（1944年12月18日）

在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的批示……221

（1944年12月19日）

怎样办地方报纸……222
（1944年12月20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223
（1944年12月20日）
给邓宝珊的信……224
（1944年12月22日）
复赫尔利电……226
（1944年12月22日）
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227
（1944年12月24日）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228
（1944年12月25日）
复邓小平电……229
（1944年12月25日）
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电……230
（1944年12月25日）
致王震、王首道电……231
（1944年12月30日）
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232
（1944年冬）
两次为中央直属机关群众代表大会奖状题词……234
（1944年12月）
对薄一波一份自我检查的批示……236
（1944年）
和王树声的谈话……237
（1944年）

和G·斯坦因的谈话 ……………………………………238

（1944年）

新年献词——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241

（1945年1月1日）

在延安干部新年晚会上的讲话……………………………245

（1945年1月1日）

和郭述申等的谈话……………………………………………246

（1945年1月1日）

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247

（1945年1月3日）

复太岳区党委电…………………………………………………250

（1945年1月5日）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251

（1945年1月10日）

给刘昆林的信……………………………………………………259

（1945年1月11日）

关于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给赫尔利的信……………261

（1945年1月11日）

给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的指示…………………………262

（1945年1月24日）

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致周恩来电……263

（1945年1月28日）

和林伯渠等的谈话……………………………………………265

（1945年1月30日）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266

（1945年1月31日）

关于劳动英雄的讲话……269
（1945年1月）
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271
（1945年2月3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272
（1945年2月3日）
延安权威人士驳斥魏道明谎言*……273
（1945年2月4日）
复周恩来电……275
（1945年2月5日）
挽彭雪枫联……276
（1945年2月7日）
为彭雪枫题写挽词……277
（1945年2月7日）
给孙毅的信……278
（1945年2月7日）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280
（1945年2月11日）
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巩固根据地……281
（1945年2月11日）
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电……282
（1945年2月11日）
复周恩来电……283
（1945年2月11日）
给秦邦宪的信……284
（1945年2月12日）

接见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局春节拜年同志的谈话……………………287
（1945年2月13日）

对延安地区拜年团的讲话………………………………………289
（1945年2月14日）

时局问题及其他…………………………………………………290
（1945年2月15日）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311
（1945年2月17日）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315
（1945年2月18日）

给萧三的信………………………………………………………316
（1945年2月22日）

为苏联红军纪念日致斯大林元帅的贺电…………………………319
（1945年2月22日）

复河南区党委电…………………………………………………320
（1945年3月1日）

给王梓木的信……………………………………………………321
（1945年3月2日）

在王若飞三日来电上批注的一些意见……………………………322
（1945年3月5日）

电唁A·托尔斯泰之丧　………………………………………324
（1945年3月6日）

在王若飞六日来电上的批示……………………………………325
（1945年3月7日）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326
（1945年3月8日）

给王枚的信……329
（1945年3月10日）
和谢伟思的谈话……330
（1945年3月13日）
给任弼时的信……337
（1945年3月24日）
给李富春的信……338
（1945年3月29日）
对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复示……339
（1945年3月30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342
（1945年3月30日）
建立湘北根据地然后南进……343
（1945年3月31日）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344
（1945年3月31日）
关于布置接收第一架起义飞机致华中局电……351
（1945年3月）
和谢伟思的谈话……353
（1945年4月4日）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354
（1945年4月9日）
对《新华日报》五日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的批语……357
（1945年4月9日）

关于太岳四四年生产情况与四五年生产计划的报告给太岳区党委的复示……358
（1945年4月12日）

关于罗斯福逝世的唁电……359
（1945年4月13日）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360
（1945年4月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367
（1945年4月21日）

两个中国之命运……382
（1945年4月23日）

论联合政府……385
（1945年4月24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454
（1945年4月24日）

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1]

（1944年7月14日）

斯坦因（以下简称斯）：你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共产党”这个名称？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同我们实际采用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加以区别。在

---

[1] 这个谈话原载斯坦因所著《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1946年7月曾由晨社译成中文出版。这次收入本文集，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按英文原版重新翻译。斯坦因（1900—1960），出生于德国柏林，1941年加入英国国籍。1944年，作为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关于毛泽东同斯坦因的这次谈话，斯坦因曾将谈话记录送毛泽东过目。斯坦因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说：“我的访谈笔记翻成中文送给他看，以确保笔记的准确无误。几乎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没有把笔记还我。一天，我偶然遇到了他，他抱歉说，‘我必须把我告诉你的一切，征求朱德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意见。他们同意了’。我的访谈笔记还回来了，未作任何修改。”“我把有关的访谈要点发表如下，不加一点我个人的评论，以确保其文献性。”

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

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

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确切地说，目前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主制度，使人民获得一切现代自由，以真正自由的普选方式选举中央及地方政府，这些在我们管辖的区域内都已经实现了；（三）解决土地问题，使具有某种进步性的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发展，并通过引进现代生产方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这些就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前谈论实现社会主义，只能是空谈。这就是一九四〇年在我的那本《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告诉我们党员的观点。那时我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决不是短暂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比起你们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很可能要晚相当长的时间。

斯：你所考虑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毛：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特征是土地革命。即使是现在抗日是我们的主要任务的时期，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者，他们不仅受中国反动派的剥削，在敌占区还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剥削。正是由于在我们作战的区域实行了新民主主义，我们

才从一开始就在各地成功地抵抗了日本军队，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改革符合农民大众的利益，而农民大众构成了我们作战力量的基础。

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

因此，工业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国家许多年前的发展已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我国到一九三七年为止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其性质与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过去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基本上相同，土地革命扫除了封建障碍，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你们在内战时所采取的从地主那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的激进政策是否还将实行?

毛：在内战时期我们没有理由阻止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地主阶级不仅压迫他们，而且在实际上领导着反对农民的斗争。我们的党只是满足了农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愿，把他们的要求变成口号，并作为政策来实行。根据中国的条件，这种没收土地的做法是一项正确的政策。农村广大群众的基本要求始终集中在对土地所有权的渴求上。已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他解决民生问题纲领中的要点之一。

在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民族战争阶段，情况当然有所不同。民族

战争可以说服农民群众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群众也认识到，当地主也愿意抵抗外敌的时候，没收土地的政策可能会驱使地主跑向日本人控制的城市，然后再同日本兵一起打回来重新夺走土地。

于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农民很快就了解到我们用减租的新政策代替过去没收土地的做法，具有两大好处：一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二是吸引了地主留在乡村参加抗日。实行有利于佃农的普遍减租以及我们保证向地主交租的政策，使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从而使日本侵略者在我们区域内简直找不到合作者了。

斯：共产党对土地政策的改变，在当时是如何决定的？

毛：这是我们党用民主方法制定政策的一个典型例子。从没收土地到普遍减租和向地主交租这一根本性的政策转变，最初是由党的下级组织的同志建议的，我们党中央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因为很明显这一建议是符合群众的愿望的。我们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研究，根据这些要求制定政策，并普遍加以实施。

假如整个中国在一切党派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那就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们的减租政策。尽管它还比不上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这是土地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但它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伟大的改革。只要真正的民主政府制度在各地建立起来，就可能把现在处于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一切土地逐步地和平地转移给耕种者。

实行一切土地逐步转移给耕种者的方法，将会鼓励地主的资本投向工业，同时还要制定出其他的有利于地主、佃农，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办法。

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法取决于真正的国内和平和真正的民主的

实现。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将来全部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分给佃农的必要性，因为如果战后国民党坚持进攻我们的话，就可能再次爆发内战。

但是，不管将来国内是和平还是内战，我们宁愿不实行没收土地的政策，而是继续实行目前的减租和交租的政策，因为总的说来这将减少前进和改革道路上的障碍。

我想提醒你一下，一九三〇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曾经颁布了一个土地法，规定地租的最高限额为佃农主要作物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对次要作物不得收取地租。但是事实证明，国民党不能够、也不愿意将土地法付诸实施，这项法律从未实行过。因此，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能够真正实现土地改革，即使它采取的仅是减租的方式。

斯：中国共产党在战后对中国工商资本采取何种态度?

毛：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我们要以同一切国家进行自由平等贸易的政策，来代替日本把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政策。在国内，我们要以在解放区已经实行的促进人民生产力发展、提高购买力、尽快为现代工业稳定发展创造先决条件的政策，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阻碍国内工业发展的政策。

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实现工业化有三种方式，就中国的一般条件来说，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凡是能够操纵国民生计的关键产业如铁路、矿山等，最好由国家开发经营，其他产业可以让私人资本来发展。为了开发利用手工业及农村小工厂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依靠强大的用民主方式管理的合作社。

斯：共产党打算在战后的中国起什么政治作用呢？

毛：我们的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

今天，共产党不仅反映了农民和工人的意见，也反映了许多抗日的地主、商人、知识分子等的意见，也就是说反映了我们区域内一切抗日的人们的意见。共产党愿意并且时刻准备同所有愿意与共产党合作的中国人密切合作。这种愿望表现在我们的民主代表制性质的“三三制”中，在一切民选机构中，共产党员的席位不超过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席位给予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

斯：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

毛：我们愿意同国民党合作，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假使国民党让我们这样做的话。而且，我们将会像今天一样，继续履行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对国民党许下的四项诺言。

斯：关于四项保证，在重庆时我常听到人们笼统地提到它及其附带的条件，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毛：我们允诺：（一）不继续实行我们过去实行的那种土地革命政策；（二）停止用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三）把边区苏维埃政府改组为地方民主政府；（四）将我们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1]

---

[1] 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保证实行以下四项：（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我们那时说过，我们将履行自己所声明的诺言，但要求国民党方面做到：（一）停止内战；（二）对日作战；（三）推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四）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的生活。[1]

斯：对目前的政策，或对你所阐述的中国远期目标，中国共产党内部有没有反对意见？

毛：没有，现在我们党内没有反对意见。在以前的时候有过两种偏向。一种是托洛茨基主义性质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的反对意见早已毫无影响。陈独秀在一九四二年死了。另一种是张国焘的偏向，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对抗党的正确路线，最后孤身一人离党而去。现在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工作。这两种偏向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团结，而且没有留下影响团结的痕迹。

斯：你是说你的政策从来没有被怀疑过或被反对过吗？

毛：我们党内自然也时常会发生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都能通过讨论和分析这种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决议的正确性仍然不信服，那末，在党的会议上经过彻底辩论以后，他们就会服从决议了。在我们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我们经常去了解我们哪些政策为群众所接受，哪些政策受到群众的批评或拒绝。只有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才能成为我们党继续实行的政策。

每当采取一项新的措施时，党内和党外总会有一些人不大理

---

[1] 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10日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要求国民党实行下列各项：（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解。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共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我们的党始终在注视着党内外的普遍反应，而且还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

我们任何一项政策的正确性都必须由群众来检验，而且事实上一直是这样做的。我们自己也不断检查我们自己的决定和政策，一旦发现错误就加以改正。我们从所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并尽可能广泛地加以实施。通过这些方法，共产党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就能不断得到改善。

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实际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在一切活动中找出几个令人满意的和令人不满意的典型例子，经过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这种观察实际情况，研究好的和坏的典型例子所用的时间，有时是几个星期，有时是几个月，有时甚至是几年。虽然用的时间比较多，但这种方法却使我们能同现实发展情况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能了解人民的愿望和需要，能向党内外工作出色的人学习。

我们有些同志有时可能没有透彻理解我们的政策，在执行政策

过程中犯了错误，对这样的同志必须进行批评和教育。为了达到教育目的，透彻地研究和分析一个工作中好的例子也是很重要的。就拿今天的《解放日报》来说吧，有一篇长文章[1]占了整整一个版面，它详细讲述了八路军的一个连如何改正缺点成为一个最好的连队。我们军队的每个连的干部和战士都要阅读、研究和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做法，利用一个连队的好经验对五千个连队进行政策教育。今后你还会看到有关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所学校、一家医院或一个地方行政单位的类似的文章。

我们再来谈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相互理解、密切合作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吧。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很坚决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一些同志依然在犯错误，纠纷和误解仍然不断发生，到处还有我们的一些党员在包办一切。因此我们一直要求大家注意，在民主的“三三制”之下，使非党人士有实际权力的重要性。在我们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要向所有同志具体讲明，我们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真诚合作，不仅帮助了群众，也帮助了我们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党和非党人士的相互信任，在他们必须通力合作的实际工作中增长了。

斯：你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曾在政策上犯过重大的错误？

毛：在所有基本点上，我们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首先，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策是正确的。这个基本政策是让人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为建立民主制度，为在私有制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进行革命。只是在把这些基本政策应用于具体情况时，有时才容易出现某种偏向，有“左”的，有右

---

[1] 指1944年7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军委总政治部写的《警七团的第七连》一文。

的。然而，这些偏向并不是全党性的，也不是党内某个派别的，而是党内某些人的。从这些错误中，全党都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某些时期，我们党内曾有几个人相信共产主义现在就可以在中国实行了。但是，我们的党从来没有这样的观点。由于中国的具体条件使共产主义在很长时期内不能在中国实现，因此，在我们党内不可能有一个主张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小集团存在。

国民党断言在我们党内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这是毫无根据的。国民党自身被派别搞得四分五裂，因而不能设想会有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政党，也许这就是这样的谣言在重庆能有人相信的原因吧。

斯：你是否有曾因处于少数地位而使你对某个问题的主张得不到实行的情况？

毛：是的。我自己曾经有过处于少数地位的情况。在这种时候，我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但在近些年，这种情况就非常少了。

斯：我在重庆的时候，一些中国朋友要我来观察一下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请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你还不如这样提问题，是先有孩子还是先有父母？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这就像在国民党区域人们向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一样，问我们是在为我们的党工作，还是为人民工作？去问我们的人民吧，去哪儿问都行。他们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他们服务的，他们有在最艰难的时期同我们共患难的经验。

至于我们的思想方法，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们像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人们问我们是“共产党至上”还是“中国至上”时，可能指的就是这一点。可是，我们信奉

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

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

外国文化也一样，其中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如法西斯主义。

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今天中国需要的是什么。中国需要国内和平和民主。没有国内的和平，中国既不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赢得和平。我们在抗日战争之后若不能取得国内和平，这可能会影响国际间的和平关系。因为，如果在中国再爆发内战，那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别的国家。

外国仍然有许多人不十分明白，过去二十三年的中国政治进程中的关键问题，一直是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将来依然如此。

在这重要的二十三年里，其第一个阶段中，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假如没有国共的合作，在中国就不会有国民革命。在第二阶段后期，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不能抵抗日本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倾其全力，其中包括利用外国贷款、外国军

事顾问以及其他形式的外援，进行“剿共”战争。在第三阶段，从一九三七年至今，如果没有国共合作，我们就不可能进行抗日战争，至少不会坚持这么长久。再说，如果国民党继续同共产党合作，至少像战争初期那样的合作，中国的作战能力比现在就不知要强大多少了。

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

（1944年7月15日）

各同志：

兹将时局近况通知你们。

（一）蒋[2]之军队由于其士兵是捆绑与购买来的，军官极其腐败与根本没有民族民主教育，提倡反共教育，因而大部分军队充满失败情绪，失去战斗意志。蒋军在河南、湖南作战中，绝大多数均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损失在四十万以上。进攻河南敌军不过四个师团，蒋军近四十万，除少数武器较差、待遇较坏的杂牌军比较能作战外，几乎无不望风而逃。胡宗南[3]有十个师由陕、甘开入豫西参战，但是只有一二个师能打一下，其余都是一触即溃。河南人民，在蒋军残酷压迫下引起他们普遍地与军队对立，群众暴动围缴军队枪械。这些地方的共产党，早已被国民党摧残，但是这些地方的人民在对国民党失望后，希望中共军队到临抵抗敌军之心甚为强烈。

（二）胡宗南已调动十个师入豫参战，对边区威胁减轻，但直接

---

[1] 这份电报的发出时间是1944年7月19日，发给李先念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分局、北方局、晋察冀分局、晋绥分局。

[2] 蒋，指蒋介石。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包围边区军队并未减少，封锁依然存在，一切反共行为依然继续。

（三）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是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但是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

（四）罗斯福[1]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2]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日可到延安。

（五）国共谈判无进展。关于党的问题，国民党虽在形式上说可以照抗战建国纲领办理，但是实际上仍不承认我党合法地位；关于军队问题，仅承认十个师即十万人的名义，其余三十七万军队、二百万民兵，均要解散；关于政权问题，只承认陕甘宁边区一处，对华北、华中、华南各敌后根据地代表八千六百万人民的民主政权，概不承认；我党被捕人员不肯释放；其他要求条件都不答应。林伯渠[3]同志尚在重庆，但是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及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

（六）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机构，腐化达于极点，酝

---

[1] 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

[2] 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20日到达重庆，进行“调解”国共关系的活动。

[3] 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酿着极大危机。孙科、宋子文、于右任[1]及许多国民党党员均不满蒋及其集团的死硬政策，各中间党派及川、滇等省地方实力派更加不满。如果日本继续向内地作深入进攻，重庆可能发生重大事变。

（七）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近几个月有新发展，消灭了许多敌伪军，夺回了许多土地。为克服物质困难，发展了广大的生产运动，今年天雨及时，粮食可望丰收。在人民面前，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与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了。一个在进攻，在发展，在巩固；一个在退却，在萎缩，在充满着危机。在敌人继续进攻情况下，这种区别会更显露出来。但是我党困难仍是很多的，日寇将向我们施行残酷进攻，经济困难依然极大，决不可粗心大意，失去警惕性。

（八）对国民党问题，我们将继续谨慎处理方针，谈判虽无结果，但仍在进行中。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

[1] 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于右任，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

和武道的谈话[1]

（1944年7月18日）

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我们曾经接受了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和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例如法西斯主义。一九四三年七月以前，我们在一段长时间内克制对国民党的批评，因为我们期待着国共两党关系会得到改善。然而发生了国民党进行军事威胁的七月事件，我们在七、八、九三个月进行了十分广泛的批评。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在十一中全会上提出和共产党的分歧应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从那时到今年五月，我们没有进行批评。最近提出的批评是由于以下的原因造成的：第一，国民党军队没打好，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第二，来自华盛顿和伦敦的批评比我们尖锐激烈得多，并指出中国有不抵抗的危险。鉴于全国局势的严重性，我们才提出批评。为了改变局势，国民党必须改变它的根本政策，它必须在政治和经济领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政治、科学、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武道的谈话的一部分。

域采取同人民团结的政策。只有这样，军事形势才能得到改观。我诚恳地盼望你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

致各战略区电[1]

（1944年7月22日）

据云单是天主教全国有教徒四百万，华北有一百五十万，绥远有二十二万。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及国民党均在争取教民，必须引起我党注意，争取教民是我党不可疏忽的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要求调查并电告天主教、耶稣教的教徒在抗日根据地及游击区分布的情况，以及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和对中共的态度等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电的主要内容。

在《德国的内战》上加写的一段话[1]

（1944年7月24日）

现在不单是外国人反对希特勒，而且德国人——希特勒的同僚们反对希特勒了。希特勒政策走到了它的反面，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

目前阶段的德国内战，还只表现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还不是从人民方面发动的。但是国防军的叛变，是站立在德国人民反希特勒情绪日益高涨的基础上面的。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德国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经他审阅修改的时评《德国的内战》上加写的一段话。这里所说的德国的内战，指1944年7月20日由国防军领袖组织的发生在元首大本营的企图暗杀希特勒的爆炸事件和国防军在柏林等地发动的兵变。

给谢觉哉[1]的信

（1944 年 7 月 28 日）

觉哉同志：

《明季南北略》[2]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3]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容斋随笔》[4]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如需要，可寄送。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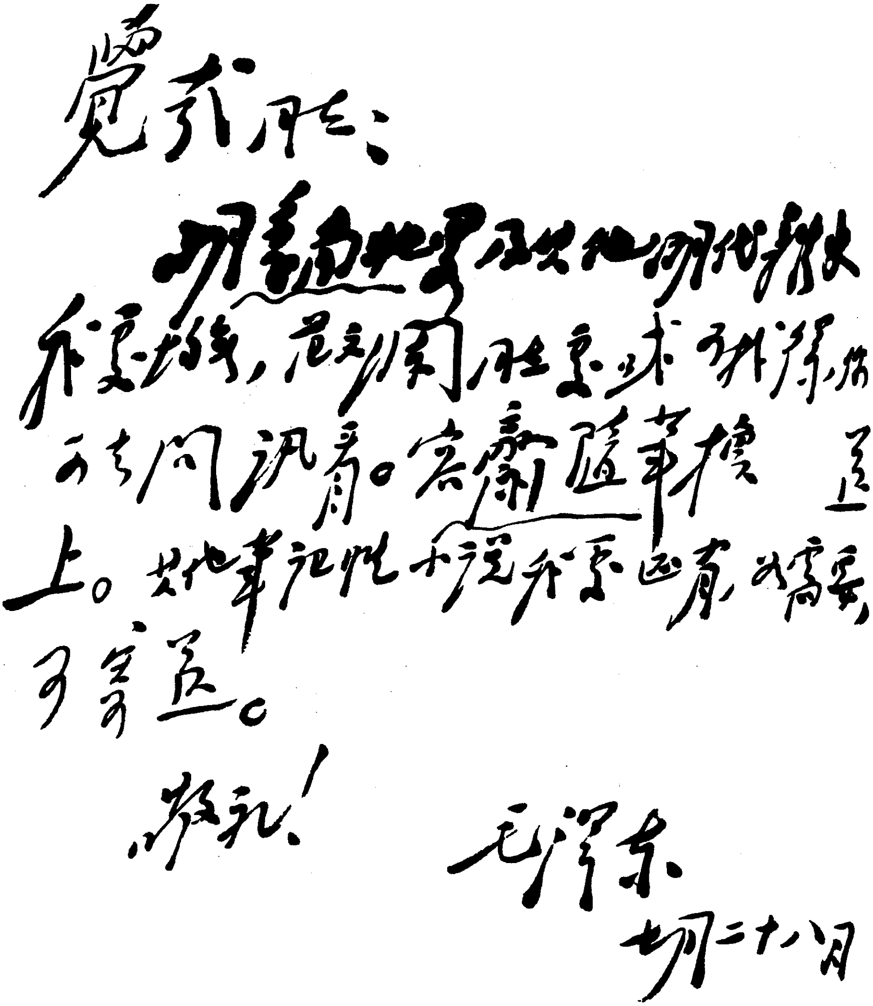
---

[1] 谢觉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清初计六奇编撰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前者记述晚明史事，后者记述南明史事。

[3] 范文澜，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主要从事著述。

[4]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撰写的关于经史百家、文学艺术及宋代掌故、人物等的笔记。



觉哉同志：

[illegible]

呈上。[illegible]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致谢觉哉信的手稿。

请各地调查和答复十项问题

（1944年7月28日）

先念、漱石、荣桓、黄敬、小平、子华、林枫[1]同志：

下列问题，请予电复。

（一）经过时事教育、整风、反特、减租之后，对于党外人士的团结、“三三制”的推行是否生长了一种“左”的现象？党外人士是否对我们发生不满，其不满之点主要是什么？他们是否感到有职无权，如何使他们有职有权？如何使他们经过参议会、座谈会、参加政府工作与社会事业，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同时，右的现象是些什么？

（二）减租中的偏向，明减暗不减是否还存在，减租是否还应定为今年的任务？同时，减租中的过左现象是些什么？

---

[1]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荣桓，即罗荣桓，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和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敬，当时任中共中央平原分局书记、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子华，即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今属运城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三）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是否较前进步，两项工作的缺点各是什么？

（四）据你们看，秋冬军队轮番大整训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事？现在军队军事与政治工作两方面的主要缺点是些什么？

（五）民兵工作的缺点是什么？是否还有大量发展的可能性？如何使民兵及地雷战普遍大量发展？并如何使战斗与生产相结合在民兵运动中完全实现？

（六）沦陷区、接敌区合法与非法工作相配合的工作是否有更大发展？赤白对立现象是否发生过及如何克服的？

（七）据你们看，中央对城市工作指示[1]其实现的可能性如何？你们是否已在着手研究此项工作？

（八）经过今年大生产运动后，是否可以酌量减轻人民负担？例如减轻百分之十至二十，是否不至损害财政支出？

（九）在今年部队、机关生产发展基础上，是否已经看得见战士及工作人员的生活有了相当改善？或者还是很苦的？同时，在我们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方面，是否已经看得见农民收益的增长？农民对于按家计划、互助组织及合作社的态度如何？在这些工作中存在的命令主义是否很严重？全根据地粮食、棉花及各项工业品其自给程度及可能性如何？

（十）对于将民众团体的工作在减租减息后转到领导各界人民发展生产、文化、卫生方面，你们意见如何？据你们看，是否只在作了这种转变后，民众团体（各救）的工作人员才有事做，才不是空

---

[1]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一文。

架子？各地是否正在作这种转变？

以上十项问题，请作一次或分作几次答复（每项不必太详，以能扼要说明问题为限），以便中央在今秋能对其中几项工作作恰当的指示。

毛泽东
午俭

和王震谈组织南下支队问题[1]

（1944年7月）

王震：今年我部开荒种地三十五万亩，可以达到“耕二余一”，争取上缴公粮一万担。最近，贺龙、林伯渠、徐向前、萧劲光同志，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同志，都先后去视察部队，并作了指示。叶剑英同志还亲自指导团对抗演习。根据中央指示，我们一边生产，一边整训，政治工作和军事练兵都有了明显进步，士气高昂，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毛泽东：你们是兵强马壮嘛！要告诉同志们，仗是有的打的，还有艰苦任务。今天找你来，就是谈这个问题。

当前不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中国革命空前有利。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和中国的敌后战场都取得了胜利，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只有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处处失败，中原沦陷，长沙弃守，大片华南国土沦于敌手。这说明，国民党没有希望了，它正在一天天垮下去。国共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对组织南下支队问题和王震谈话的一部分。王震，当时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南下支队由三五九旅抽一部分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由王震担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于1944年11月9日告别延安南征。

要胜利，中国人民要解放，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目前，我们就是准备如何迎接胜利。

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两年前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那篇文章里也说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希特勒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日本法西斯也将一天一天更加困难。但是，战争还要打下去，战区还可能扩大。美国的强大海军可能在菲律宾登陆，切断日本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队就只有打通大陆交通线。现在粤汉路日军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的企图，下一步还可能进攻贵州、四川、云南，把蒋委员长从峨眉山上赶下来。这样，战争也可能还要打两三年。一旦美军逼进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就可能从印度支那、暹罗、缅甸后撤，从华南收缩兵力，退守上海、山东和辽宁。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也会下山，内战危险也将十分严重。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所以，中央的部署：一是，由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五师抽七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四师西进豫皖苏地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二是，由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三是，由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前发展，琼崖纵队力争占领海南全岛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

系。四是，由你们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却到山东等沿海地区集结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翼，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南征前途的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我们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王震：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

发展沪杭周围及沪宁路沪杭路两侧的游击战争[1]

（1944年8月3日）

华中局：

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再则如何使沿海的水手、从吴淞至沙市的长江水手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尽可能组织起来，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以上两项工作请你们加以研究，分段分区给各地党与军队以一定的任务，努力争取完成。

毛　刘　陈
未江

---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陈毅关于在上海、杭州周围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和组织水手工作给华中局的电报。

致林伯渠电[1]

（1944年8月6日）

（一）梁寒操对外记者所谈，我们决定暂时不理，俟九月底外记者从晋西北返延时将向他们发表谈判经过。（二）国民党将阎锡山与外记者所谈诬蔑我党的全部谬论在西安报上发表，我们决定日内将叶剑英六月二十二日与记者团谈话登报并广播，同时发表文章、消息揭穿阎锡山。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1]

（1944年8月12日）

一

守衡阳的战士们是英勇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人支援，因为我们政府和我们统帅部的不要民众与自愿放弃主动权的消极战略不能支援他们，人民虽然焦急万分，也无法自动去支援。

二

政府的措施中，没有一件是号召和组织民众起来参加保卫衡阳、保卫西南与西北的。西安国民党人竟在报纸上批评延安在联合国日纪念大会上数万到会民众所表示的保卫西安与西北的坚强意志，认为是“共产党的阴谋”。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据说这是“磁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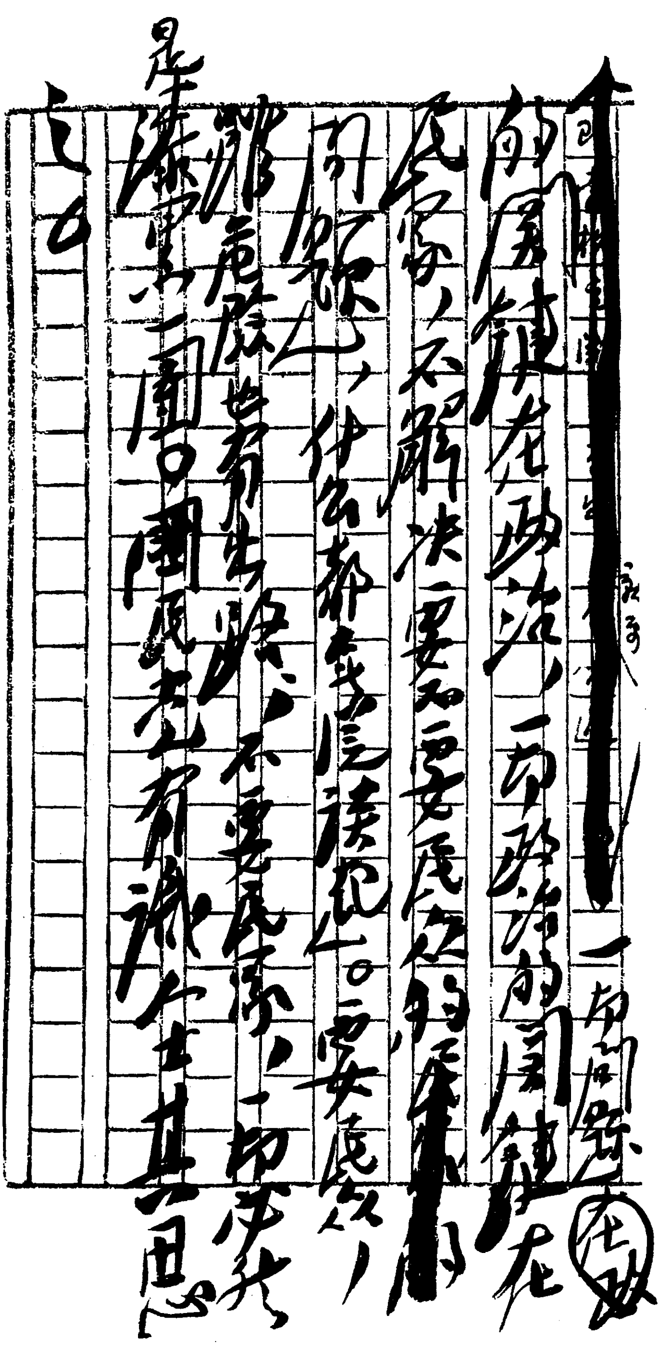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解放日报》社论稿《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时加写的三段文字。

战术”，实际则是永远抛弃主动权，永远不要人民的战术，人民已经看穿你们这个“西洋景”了。

三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其思之。



一切關鍵在政的關鍵在政治，而政治的關鍵在民主，不解決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什么都無從談起；而要民主，雖危險也有出路，不要民主，一切完[illegible]是[illegible]不一團糟。國民黨有識之士其思之。

毛泽东修改《解放日报》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加写的一段话的手稿。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8月12日）

（一）你们所拟谈话稿甚好，略加修改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你处收到后速在重庆及各处散布，并立即设法送往外国。（二）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三）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甚感兴趣。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韩钧谈晋西事变真相[1]

（1944年8月13日）

【新华社延安十三日电】西安《西京日报》所载阎锡山对中外记者团谈话中，有阎锡山在一九三九年准备冬季攻势时，新军二纵队负责人韩钧率部叛变等语。本社记者为使国人了解此亲痛仇快事件的真相，特访问当时亲历艰危的韩钧同志。韩钧同志首告记者，晋西事变的惨毒真相，过去因为希望阎氏觉悟，一直隐忍下来，从未发表过，此次阎锡山颠倒是非，公然向中外人民淆乱真相，实令人不能再保守缄默。韩钧同志随将事变经过情形详述如下：

阎锡山仇视人民

太原沦陷后，阎锡山即开始动摇，准备投降妥协。汪精卫投敌后，阎锡山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试探和平，他说："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当时薄一波同志说："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内来，要求民族独立，只有抗战到底。和平妥协就是投降，就是汉奸。"阎默然。阎锡山此种论调谈过不止

---

[1] 这是新华社的访问记。导语和第一节《阎锡山仇视人民》的改稿原件已散佚。第二节小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反共军与日寇夹击决死队》。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次，均为牺盟、新军所揭穿、所反对。但阎锡山投降准备，始终未停止过。牺盟、新军主张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只有实行民主，发动群众。阎锡山反对实行民主，取消民选县长、区长、村长及各县民意机关。他说：“政权是个刀把子，拿到我们手里可以统治人，拿到人民手里就会危害我们，所以不能实行民主。”他又反对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自卫军等（然而这是中国抗战力量的基础）。他说：“农民是个老虎，发动起来，是个乱子（怕他们抗战到底，不听指挥），不发动是个空子（又怕共产党来发动），现在不是发动不发动的问题，而是掌握电鞭的问题（电鞭是管制老虎的鞭子）。”他之反对民主，反对发动群众，都是为投降妥协着想。他又说：“生存就是一切，抗战只是手段。”“七七”事变时为了生存，他需要抗几天战，以后感到抗战是长期的，困难的，就想投降，这也是为了生存，正义公理、国家民族观念，在他的字典里头是没有的。他在作这些准备的时候，表面上装作抗战的样子，而暗中早已在通敌反共了，与敌开过刘村会议，安平会议。通敌使节，不绝于兴集太原道上。决死队的负责同志曾经一再表示：“我们来与你合作，是为了抗战到底，并不是为了投降妥协，任何人要投降妥协，我们就要反对。”阎锡山因此视新军为投降妥协之最大障碍，用说服及其他方法都不能把决死队屈服，乃大施其“锦囊妙计”，于“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新军为“叛军”，实行“讨伐”，晋西事变的真正内容就是如此。

阎日两军夹击决死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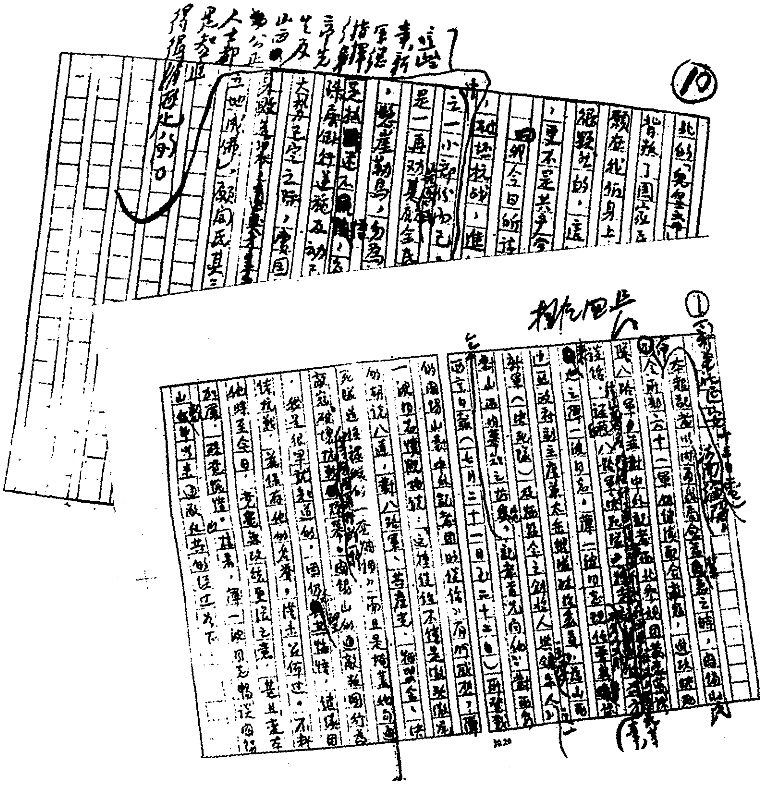
即就晋西事件本身而论，也是阎锡山首先背信弃义发动内

战。阎锡山企图解决新军，蓄谋已久，至一九三九年十月间，乃授权王靖国、陈长捷等准备进攻新军。并找反共将领一个一个地向他们说，共产党八路军势力日益壮大，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与之合作，我晋绥军将无立足之地，现在我们只有解决新军、牺盟，援用日本所提中日提携办法，达到生存之目的。有一个反动军官（刘武铭）问，如何解决？王、陈答以先改组决死四纵队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再集中晋西六个军配合日寇解决决死二纵队，然后协同日军解决一、三纵队。果然不久，阎锡山即委任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即晋西事变前第九天）发出密令：分三路向新军进攻，计南路纵队为六十一军、八十三军及警备军之七十三师等，司令由陈自兼，进攻隰县属之义泉、黄土（决死二纵队司令部所在地）；北路纵队司令为梁培璜，率十九军及三十三军之一部，进攻隰县孝义边之水头、石口、大麦郊一带（当时八路军晋西支队所在地）；右路纵队为新一旅等，司令崔道修，进攻隰县之泉子坪一带。同时，敌人亦集中临汾至平遥间驻防之敌五千余人于韩信岭一带。于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下令决死二纵队，要准于五日向同蒲线大举破击，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我正在动员部队执行破击命令时，阎军与日军同时开始向我进攻，我们二纵队处于日阎两军包围夹击之中，情势至为险恶，有全部被歼危险，不实行自卫，就要死亡。我们只得一面对敌进行肉搏，一面又被迫不得不进行自卫以抵抗旧军，苦战兼旬，始突破日寇和旧军包围，转入晋西北。此即所谓“决死队之叛变”。从此以后，决死队就被称为“叛军”了。

究竟谁是叛军？

究竟谁是叛军呢？是谁勾通敌寇反对人民，破坏抗战，背叛民族？是新军呢，还是阎锡山？新军既未反对人民，视人民为猛虎，亦未参加过通敌叛国的临汾会议，安平会议，亦未派赵承绶、梁延武、王乾元或其他任何人到太原、北平、南京晋谒敌人和汪逆精卫，亦未与敌订立“现地协定”，而做这些事情的，恰恰是阎锡山自己。问题非常明白，即阎锡山自己也知道决死队并非叛军。一九三九年以前，他对决死队备加赞扬，说是革命青年，一切办法都是革命的，自愧他的旧军都是昏聩糊涂、落后、不进步，不能向决死队看齐，这且不用说。即在晋西事变以后，他也曾在他的“忠实同志”少数人圈子内说过：“决死队是革命的，抗战最坚决的”，“薄一波不是军人，但他们练下的军队能与敌人打，这就是因为他们的办法是革命的，进步的”。然而他为什么还说决死队为叛军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是在藉此以掩饰他自己通敌反人民反共的丑事和汉奸或准汉奸的原形，并不是什么“韩钧叛变”或“新军旧军冲突”，而是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分裂与团结及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事实胜于雄辩，阎锡山纵有百口亦难狡辩。

对这件事，不独薄一波、韩钧及其他在决死队、牺盟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能够以我们的亲身经验去证明，还有国民党老前辈续范亭先生（他是阎氏任命的暂一师师长，后为新军总指挥）也能以亲身经验作证明。更重要的是山西全省的老百姓，他们能够将阎氏罪恶如数家珍地告诉人们的。



毛泽东修改的薄一波揭露阎锡山在抗日战争中通敌反共的新闻稿的手稿。

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1]

（1944年8月15日）

1944年8月，毛泽东和朱德等在机场欢迎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

美国驻中缅印军总司令部（即史迪威将军总部）所派遣的美军观察组，现在到达了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

---

[1] 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事。我们谨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

我们欢迎美军观察组诸位战友，不能不想到美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成绩，和美国人民见义勇为、不怕牺牲的伟大精神。不论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现在都有英勇的美国将士效命疆场，为解放法西斯铁蹄下的人民而流血战斗。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44年8月，毛泽东、朱德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机场。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的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

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

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

1944年8月，毛泽东、朱德和美军观察组人员在一起。

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

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则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地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丑诋、恶骂、造谣、诬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目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

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

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原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延，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由于来延外籍记者的报道，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及其对于协助盟国抗战事业的重要地位，将逐渐为外国人所明了。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

七月一日的《纽约时报》，在其《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中说："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这篇文章是根据外国记者的报道而写的。

早在一月七日的《美亚杂志》，在其《作为反攻基地的中国游击区》一文中说："许多军事当局的意见，认为如果边区的部队能得到充分的援助，这些区域可以成为缩短对日战争的有力的反攻基地。"

六月十日的美国《星期六晚报》杂志，登载了美国名记者史诺一篇题名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中，对于中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意义，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说："二月间，尼米兹上将宣布美海军拟在中国海岸上建立基地，以便从那里攻击台湾和日本。香港或广州或将首先为美军攻取。但是轰炸机由这些城市起飞到日本去，仍是遥长的距离。只是在更北面的地方，中国才是最接近日本。因此在那里的中国游击队，对我们有很大的潜在重要性。"

这些是从国民党遮天手掌的指缝中间透露出去的关于中共情况的反映。

现在不但外国记者团到了延安，而且美军观察组也到了延安。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

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我们预祝美军观察组的工作的成功。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我们希望这一成功，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

1944年，毛泽东等和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合影。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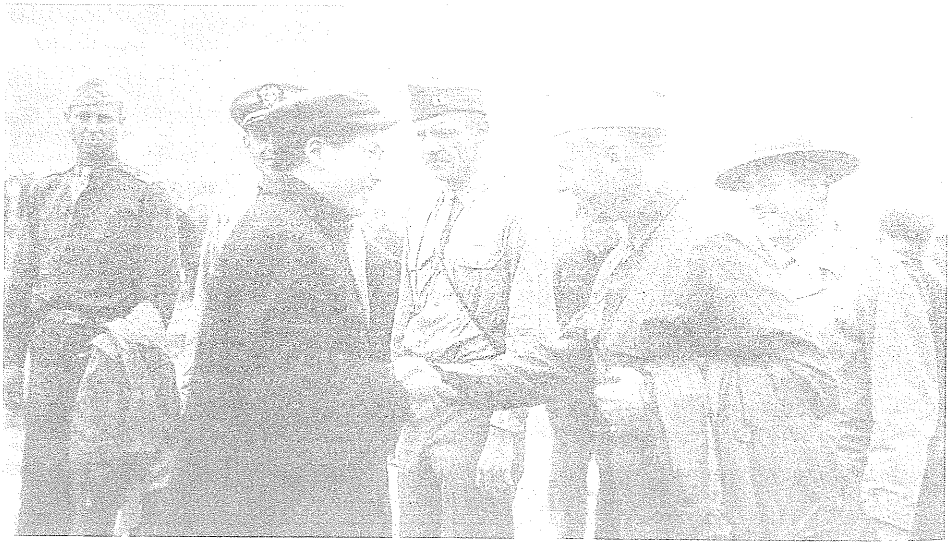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朱德设宴招待驻延美军观察组克里福德·杨少校、罗伯特·佩思等。

1944年，毛泽东接见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在一起。

1944年，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在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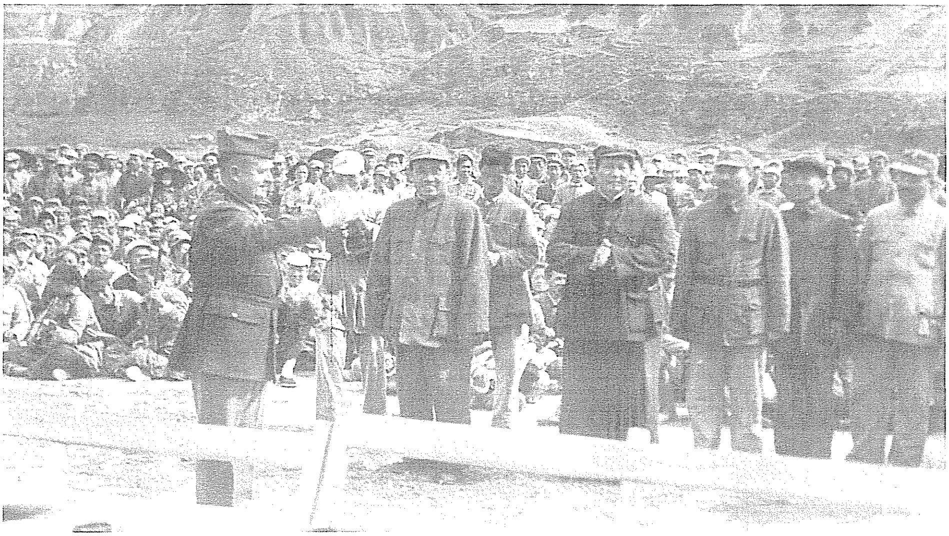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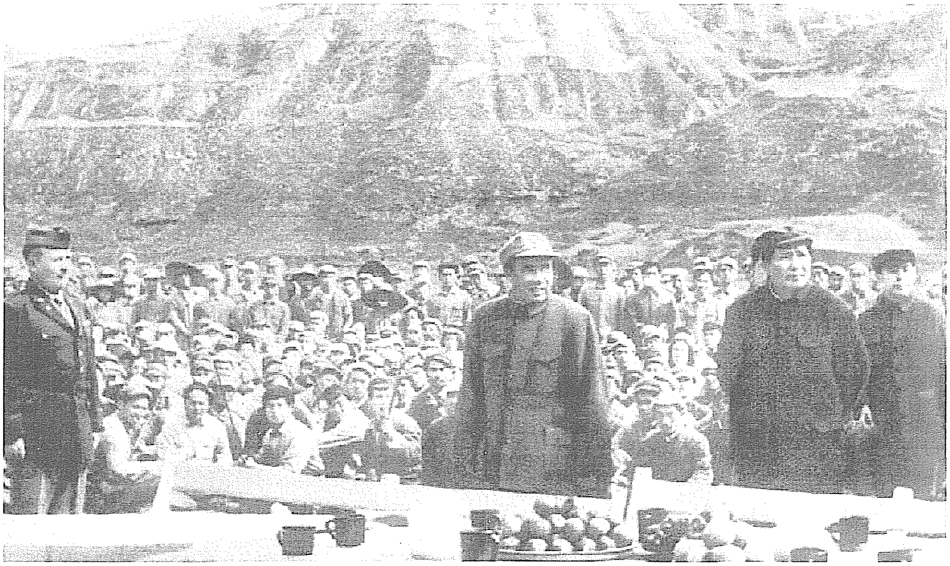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会见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技术表演的美军观察组成员。

1944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延安八路军总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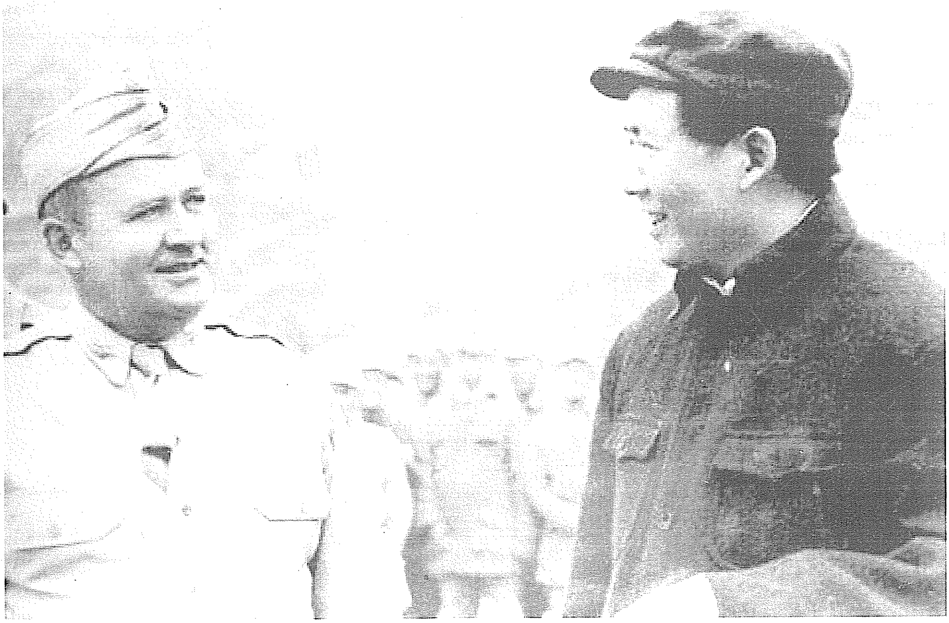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彭德怀和美观察组工作人员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等出席美军中缅印战区统帅部授予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勋章的仪式。前排左起：包瑞德、朱德、毛泽东、叶剑英、杨尚昆、贺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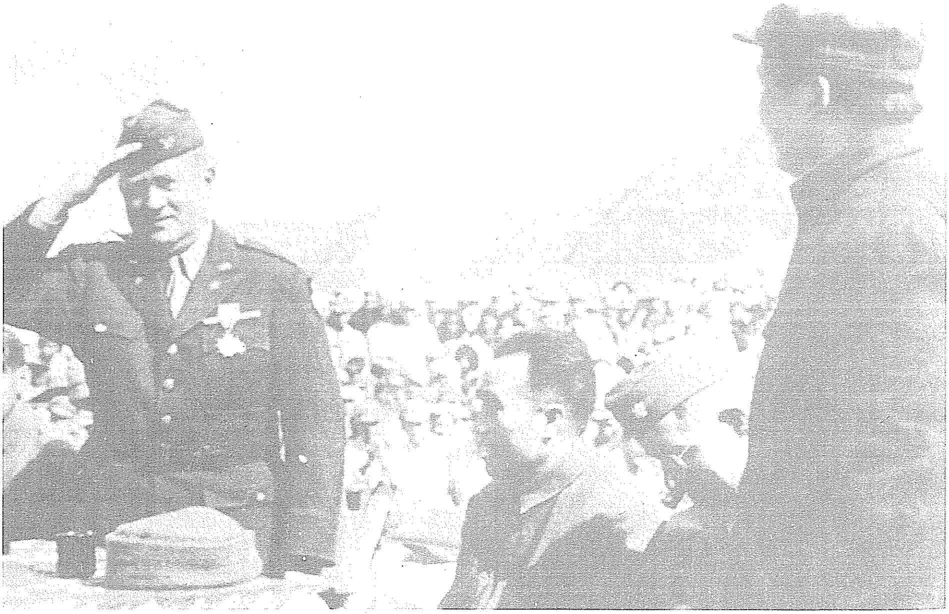
1944年，毛泽东、朱德等参加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授勋仪式。



1944年，毛泽东和包瑞德在授勋仪式上。

1944年，毛泽东参加美军为包瑞德授勋仪式。

1944年，毛泽东和朱德在包瑞德上校的授勋仪式上。



1944年，毛泽东参加包瑞德上校的授勋仪式。

1944年，毛泽东和朱德等在授勋仪式上。

1944年11月，海军上尉赫伯特·希契携带中共致美国海军司令部信函离开延安赴华盛顿。图为毛泽东和朱德为其送行。

在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电上的批语[1]

（1944年8月17日）

应与张、左[2]商各党派联合政府。参政会可同意增人，取积极态度，但是第二位的。以上请周考虑拟复。

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即使召集，也是假的。我们如此提议，蒋必不从，将来他召集假国大，我有理由说话。此意我党七大应作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电上的批语。

[2] 张、左，指张澜、左舜生。

致董必武、林伯渠电[1]

（1944年8月18日）

参政会开会，你们可仍持去年出席的态度。小党派如有民主提案，我们可副署，但不单独提案，表示在政治解决未达到目的前，一切提案都无从说起。如林伯渠未离渝可出席。何应钦、俞鸿钧[2]等如向我进攻，我取针锋相对态度还击之，并对外发表抗议。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三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问题致董必武、林伯渠电的主要内容。

[2] 俞鸿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政务次长（1944年11月任财政部部长）。

复李先念等电[1]

（1944年8月21日）

可告欧高士[2]少校，彼所提三项问题，已得延安批准，均可合作办理：第一，可先在五师范围设无线电网，将来再在长江下游及广州附近设置，惟均须得到延安批准；第二，可供给敌军情报；第三，美海陆军登陆时协同作战问题，我们正与驻延美军观察组人员协商，准备一切。

你们可在合作过程中将国民党进攻破坏情形告知，请其反映到上面去。

---

[1] 这是毛泽东复李先念、郑位三、任质斌、陈少敏并告张云逸、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郑位三，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

[2] 欧高士，美军炮兵少校，受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派遣，于1944年8月14日到达新四军第五师。

复张云逸等电[1]

（1944年8月21日）

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五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许其设无线电网并供给情报，不久他们即将派人来军部并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在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很大责任。

---

[1] 这是毛泽东复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的主要内容。

给陈毅的信[1]

（1944年8月21日）

各件均好。略有增改，请再酌。各件重抄送去后，请留副本交李富春转秘书处保存，将来有用。

我们曾于某部分友军处获悉，蒋介石于一九三九年[2]十二月初即已下令各军，叫他们不要截击新四军首批通过的辎重行李，让其安全通过，以便待新四军军部及主力通过时，各军合击，一网打尽。当时许多人不相信，直至袭击事变发生，方才证实。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陈毅所写《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后致陈毅信的主要内容。《皖南事变的真相》和《苏北事件的真相》，是陈毅应包瑞德的约请而写的。

[2] 应为1940年。

对华中部队整训的意见[1]

（1944年8月22日）

饶、张、赖[2]：

十四日电悉。

（一）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可参考张宗逊[3]关于冬季练兵的总结报告。其中经验，打破陈规，采用兵教兵、官教兵、兵教官群众运动的练兵办法，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华中各地，应令在职的团级及团级以上干部，有十天左右时间讨论这种练兵新法，使他们学会练兵，保证

---

[1] 由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署名的这份电报的原稿是由当时在延安的陈毅起草的。毛泽东在审阅时作了修改。修改后他写信给陈毅，谈了几点意见："中央整训指示中有用兵一项，今年当然不能强调，应以练兵为主，但应提及。整训指示又规定一年整训主要靠今冬完成，因不但明春春耕到来后练不成，且恐时局变动得快，故团级以上干部讨论练兵办法不宜过久，去冬边区只用五天讨论五天下操，即完成了练兵动员。又高级训练班时间亦不宜太长，以便应付时局。"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理书记、新四军代理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赖，指赖传珠（1910—1965），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3] 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旅长。

获得优异的练兵成绩。练兵内容，着重提高战斗技术，着重把投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四大基本技术练好。同时，在干部中还应讨论带兵，去创造新的管理方法；讨论养兵，去保证增加生产，改善待遇，增强体力；讨论用兵，去增强作战指挥方法。这四样是当务之急，能在一年内解决得好，我军战斗力可提高数倍，便利去应付战局变化的需要。开这种练兵会，或在军部开会，或在各地分组开，应就便去做，负责师、旅干部应亲自主持。

（二）关于培养团级干部，军部可办团级训练队，或称军事整风班亦可，吸收离职的旅、团级干部，并选一部优秀营级干部参加，时间不宜太长，课程可定为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管理教育（带兵、练兵、养兵等军事行政事项）五大项，以提高干部的指挥艺术为中心。关于战术学习，最好采用总结过去战例的互相批评的整风座谈办法，就是要学生报告自己的作战经验，或提出若干问题让学生发表意见，举行辩论之后，然后加以总结。这种根据实践的启发式的具体学习，最合我军干部的需要。以前照本宣科的办法，既不易注入，且难切合实际。延安抗大，正准备冬季开办抗大教员训练班，先教好教员，四个月后再回去教学生，其课程也是上述几项。教员，此间无人派来，应由你们自己负责作教员，或在学生中培养和选拔教员，或即用学生教学生、发挥特长、学习特长的新办法，或就华中现有旧军人材，加以改造，作为教学助手。延安军教人材亦感缺乏，因此全靠你们自己负责去解决。

（三）关于特种兵人员，如工兵之类，可在各抗大开办训练班。关于使用新武器、掌握新技术等教育，目前暂不强调，如果我们把练兵、带兵、养兵以及战术基础，做得很深入巩固，到了有新兵器之时，再来学习使用，也来得及的。

以上提议，请你们按实况实施之。

毛　刘　陈[1]
未养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已到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委托与刘少奇共同指导华中地区新四军的工作。

复林伯渠等电[1]

（1944年8月22日）

应作如下措词：为了准备配合盟国反攻，敌后四十七万军队，不仅不能减少，而且应奖励它，装备它，增强它，政府首先应全部承认它的合法地位，承认其一部取消其大部的想法是违反抗战需要的，而且是办不到的。我们在建议书[2]中是请求政府给予四十七个师的番号，所谓五军十六师是暂时至少数目，其余三十一个师仍请政府继续给予番号，决不是可以取消这些军队，也决不是不再请求给予番号。盟国援华物资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这样说，和建议书原意是适合的。

---

[1] 8月16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来电提出了在两党谈判中，关于军队数目应如何措词的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此问题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中央1944年6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

给续范亭的信

（1944年8月22日）

范亭同志：

你的檄文式的文章（寄阎信）看到，即可发表，并广播出去，廉顽立懦[1]，振奋人心。听王彬同志说才知你已入医院，写此等文章当然会加重你的病。但是听说休养方法已改为静卧，是很好的。凯丰同志用此法已痊愈。江青用此法也好得多了。希望你用此法完全治好。

近日国际国内对我们同情的日多，过去被封锁、打击、辱骂的孤立状态可能起一大变化。这个消息或者也可帮助你治病。希望坚持卧治政策。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

[1] 参见《孟子·万章下》："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谓感化力量之大，使贪得无厌的人变得廉洁，使懦弱的人能够自立。

和谢伟思的谈话[1]

（1944年8月23日）

在简短的一般性谈话之后，毛泽东说，他要谈谈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以下是他谈话的要点。

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1922年至1927年为第一阶段，双方是合作的。这使北伐的成功和国民党的当权成为可能。但是，一俟国民党获得政权，就进行垄断，转而反对我们，并试图消灭我们。其结果是进入1927年至1937年十年内战的第二个阶段。迫于日本侵略的燃眉之急，第三阶段又重新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是不稳定的，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国民党并不是那么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参加第三阶段的合作的，它从来没有诚心诚意地接受过合作。迫使国民党接受这种合作的有五个因素：

1. 日本的进攻。
2. 外国舆论的压力。
3. 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表现的克制。
4. 中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

[1] 谢伟思（John S·Service）在抗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兼史迪威司令部顾问。本文是谢伟思整理的和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5. 国民党内部的弱点，这使它无法打败我们。

战争结束时（甚至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这些力量将发生变化。

日本战败，上述那些因素中最强有力和最积极的因素也将随之消除。

共产党是比过去强大了，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争取团结、反对内战的影响也更大了。但是只要国民党的领导还是目前这个样子，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只会使国民党更加坚决地想要消灭共产党。不过，这种做法也只能达到一定限度，如果共产党很强大，国民党就不敢攻打我们了。可是，国民党的领袖们是如此地迷恋权力，他们总是要伺机以逞的。

中国人民一直不敢说话，政治上受压迫，这是国民党造成的。自由主义者、学生、知识分子、政治家、新闻界、少数党、地方集团和现代实业家（他们对国民党官僚主义的工业化感到幻灭，看不到自己的前途），这些人为数众多。然而他们没有组织，不统一，也没有权力。蒋介石使用武力和特务来对付他们。

国民党是一个没有明确特征或纲领的无定形团体。其中的自由主义集团缺乏有力的领袖，缺乏共同奋斗的目标，也缺乏积极的纲领。在目前的状况下，即使他们有了这些，他们也没有办法和人民接近。国民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领袖们，虽然分裂为互相猜忌的集团，但都是反共和反民主的。他们为自私自利的目的纠集在一起，以便永远保持自己的权力。

仅就这些因素而言，这个国家如果再徘徊于目前这种领导之下，由国民党挑起的内战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共产党人从惨痛的经验中对内战深有感触。我们知道它将意味着中国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在远东保持稳

定的影响，它的经济发展，都要被耽搁。不但中国人受影响，而且所有在远东拥有利益的国家都会蒙受影响。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国际问题。这对美国来说也是关系重大的。

有件事非常明显，我们共产党人担心内战，我们厌恶它，我们是不会先动手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我们懂得国民党如果没有外国的帮助，我们最终将赢得胜利，然而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避免它。因为，共产党是属于人民的，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的利益。人民不甘长期忍受专横的法西斯主义，这种法西斯主义目前在重庆和西安是显而易见的，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类书中，更进一步预示了这种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性。如果人民要战斗，共产党人一定同他们一起战斗。

因此，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的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国民党处在今天的地位，它必须重视美国。

所以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不单是美国人自己关心的事情，同样也是民主的中国人民所最关心的问题。中国人民一般关心三个问题。

第一，美国是否有可能回到孤立主义去，从而对中国缺乏兴趣？美国人对于外国的问题，真要闭眼不管，让中国“自作自受”吗？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如果罗斯福再度当选，恐怕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和关于美国的其他问题是直接向我谈的。因此我以最明确的措词声明，我没有公职上的权力，我的回答纯系出自私人和完全非正式的意见。

关于上述诸点，我提到美国在中国的长期和特殊的利益；事实

上，我们并不存在由战争破坏所引起的国内重建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巨大发展的经济和我们愈加广阔的国际视野，将迫使我们超越国界去寻求贸易和投资，所以，我们将不至于变成孤立主义者，或者不关心中国；无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掌管国家，我不相信他们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对华政策。

第二，美国政府是否真正关心民主和世界上民主的前途？例如，它是否认为民主在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是重要的？它是否要使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它是否担心它所承认的、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确认其合法地位的中国现政府并不能真正地代表中国人民？蒋介石是被单一的政党即国民党的仅仅九十个人选为主席的，而且他们本身甚至还不能确有根据地宣称自己能代表这个党的有限成员！连希特勒也夸耀自己是民主政权，说他是被人民选举的，他还拥有一个众议院！美国是否领会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即国民党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虽然，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美国政府是否领会这一事实，而在于它是否愿意设法帮助中国实现民主来改善这种局面。

我提到了美国的许多官方声明，其中谈到中国的统一问题和我们对所有国家发展民主的总的愿望。我说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的美国舆论，它的明显倾向已见之于近来美国报刊的评论。

显而易见，国民党必须改造它自己和改组它的政府。在现有的基础上，不能指望它有效地进行战争。即使美国为它赢得战争，随之而来的也必然是混乱。

政府必须扩大它的基础，吸收所有重要的人民团体。我们并不要求完全的和直接的代议制民主，它是不切合实际的。并且，在国民党发起和控制之下，它将是一种无益的骗局。然而，马上就能够

做的和应当做的，是召集一个临时性的（或过渡性的）全国代表大会，邀请所有团体派出代表。这些代表一定不要像过去那样由国民党选拔和指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代表——最有资格的领袖。他们应当包括共产党、所有少数党、知识分子团体、新闻界、学生、职业团体、合作团体的中央机构、工人和其他群众组织。

分配代表名额切实可行的折中方案是国民党占半数，其他的合在一起占半数。考虑到实际的政党关系，应在事先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认可委员长为临时主席。

这个临时代表大会，必须拥有充分权力改组政府和制定新的法律，新法律的有效实施保留到通过宪法为止。政府应当直接向代表大会负责，它的作用和权力类似英国的众议院。

临时代表大会应同时对完全民主政体和立宪制度的准备工作负有全责。它应监督选举和召开国民大会，然后转交它的权力并宣告结束。

美国政府愿意发挥它的影响以迫使国民党实行这种建议吗？美国政府愿意提出这种建议并加以积极支持吗？

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情既然如此重要，就值得我跑一趟重庆，把它提交大使。我说，我会全部报告大使的。我还提到，我早已从重庆的其他方面听到这个建议的要点。

后来，我在8月26日同周恩来的一次谈话中获悉，共产党政治局正在考虑把这一建议提交国民党。或许他们是根据最近谈判中国民党拒绝讨论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要求而提出的，国民党曾以“过于抽象”为理由拒绝讨论共产党关于民主的要求。

第三，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政策是什么？它是否承认共产党是抗日的一种积极的战斗力量？它是否承认共产党对于中

国的民主政治是一种有影响的力量？是否存在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任何可能性？如果在中国发生内战，美国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抱什么态度？美国为了保证国民党不使用它的新式美制武器来打内战，又在做些什么？

这些问题，特别是第二和第三所提各点，确定了我们进一步交谈的范围，我对其中的若干要点作了回答，以便进一步详谈和讨论。

关于“支持”共产党的问题，我指出，因为共产党本身是公开支持中央政府和蒋介石的，所以这个问题使人费解，而且无论如何时机也未成熟。

因为外来的日本侵略威胁着国家，我们共产党人在1936年至1937年接受了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条件。首先由于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了对日本作战，为期十年毫无结果和互相毁灭的内战被制止了。虽然内战不是我们先动手的，然而我们带头制止了内战。还有，外国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他们却不支持我们。但是统一战线全然不是单方面的。国民党还答应过政治改革，却未实行。

我们支持蒋介石并不意味着支持专制制度，我们支持他打日本。

过去我们不可能提出这个承认问题，从合法的意义来看，它仍为时过早。现在我们只要求美国的政策说服国民党进行自我改造。这是第一阶段。这大概是不可缺少的一步，如果此事大功告成，就不存在内战的危险了。

但是，假定国民党不愿改革的话，美国的政策就应当有其第二阶段，那时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问题就应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会冒同美国冲突的危险的。

我们现在可以先不过问美国武器的供应问题，这些美国供应的武器是可以被国民党用于未来的内战的。但难道我们还期望过去的

历史重演吗？在民国初期，列强只承认北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广东政府才可以自称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南京在它完成北伐和取得成功之前是未被承认的。现在中国内部的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方向尚不明朗，但某些类似的情况可能发生。美国是否继续承认和支持一个缺乏效率的、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同旧北京政府差不多的政府呢？

我提出，在外交上撤销对一个未犯有直接不友好行为的政府的承认是不可能的，更不便于在所承认政府的背后支持一个反对党。最后，整个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干涉另一个国家的事务。

美国已经干涉了有它的军队和物资运入的每一个国家。这种干涉不一定是有意的，也不一定是直接的。但是只要有美国的影响存在，干涉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假如美国坚持把那些武器给予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把武器给国民党，实际上就是干涉，因为它使国民党有可能继续反对中国人民的意志。“干涉”，（毛泽东指出，他对这个词是有异议的，因为这个词用在下面这种情况下已失去它的原意。）以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不是干涉，它将为中国广大群众所欢迎，因为他们需要民主，只有国民党才反对它。

我们并不要求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所有援助，其结果对战争不利，国民党将会垮台，美国在中国的登陆也会增加困难。

周恩来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循着上述各节，把下列话题展开了：1. 美国武器只给国民党必然意味着内战；2. 我们不应忽视日本想要“投降”蒋介石以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对其他盟国是一种诡计，实际上这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妥协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希望在中国维持一个软弱的国民党，而不希望在中国有一个强大的、统一

的和民主的政府；3. 在中国，要保证决定性地赢得战争和避免内战的唯一方法，就是把武器给予国共双方。

我提到美国的影响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题，对于能否“支配”蒋介石表示怀疑。毛泽东激烈地反对我的看法。

蒋介石是处在他必须听命于美国的地位。看一看河南发生的事情和湖南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再看一看广西表现出来的每一种迹象吧！或许下一步就轮到云南了。看一看经济形势吧！蒋介石已经走投无路了。

蒋介石是顽固的，但他基本上是一个坏蛋。要跟他打交道，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我们不得不从经验中学会这一点。对付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毫不留情。你们不要对他的威胁和恐吓让步，不要让他觉得你们害怕了，否则他就会敲诈勒索。过去美国对付蒋介石的办法非常笨拙，让他用讹诈手段取得了成功。例如：他说什么现在无法维持抗战哪，什么不得不讲和哪，而他的策略在于获得五亿借款。现在孔祥熙出使美国，还要求提供布匹。布匹！我们是不是在同日本打仗呢？难道布匹比子弹更重要吗？我们边区这儿没有棉花，国民党的封锁使我们无法从中国其他有棉花的地方搞到任何棉花。但是我们努了一把力，我们很快地就做到自给自足了。对国民党来说，解决布匹问题要容易百倍。如果他们这个政府有它自己的经济政策，他们早就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了。

你们只能根据你们自己的要求同蒋介石讲友好，必须把他置于经常的、有力的和一致的压力之下。决不要放松你们的目标，要经常敲打敲打他。

美国现在的地位完全不同于珍珠港事变刚发生的时候，不再有任何需要或任何理由去栽培、哺育或抚慰蒋介石。美国可以告诉蒋

介石，为战争计，他应当做些什么。美国只能在蒋介石顺从美国要求的条件下帮助他。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类似华莱士的访问就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机会应当更多一些。不要错过孔祥熙在美国的机会。

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我提出，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了。昆明是一个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美国刊物对国民党提出批评是很好的，它的效果不可能马上就看得出来，甚至看来常常会暂时产生不良反应。但只要它是光明正

大的（如果它是光明正大的话，国民党就会辨别出来），就会引起国民党的犹豫考虑，因为国民党需要美国的支持。

最后，你们美国人同我们共产党人的任何接触都是好事。观察组到这儿来，我们自然是高兴的，因为它有助于打日本。但是把你们到这儿来的主要意义说成是对国民党施加政治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么说的），这是不需要的。

我注意到他强调的是美国在中国登陆，我暗示战争可能采取其他方法打赢，登陆并不是非登不可的。

我们认为美国人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它取决于日本人的力量和战争的发展。但是，日本人的主力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且不说满洲。

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那对中国来说是十分不幸的。国民党会继续当政，但它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

如果要进行一次登陆，就必须有美军同国共双方军队合作。现在，我们的军队包围了汉口、上海、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处于内圈，而国民党则靠后一点。

如果需要同国共双方军队进行这种合作的话，重要的事情是允许我们在独立的一些防区内进行工作。国民党太害怕同我们一道工作了，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要把我们置之死地。当我们处在独立的防区进行工作时，美国军队就可以看到我们同国民党不同之处：我们拥有群众的支持，我们能打仗。

我问，正如他们所提示的，如果国民党不受约束，或不诱导它进行改革的话，公开内战是否不可避免。

我们可以说内战“不可避免，但也不是确定无疑的”。主观上，现在国民党领袖下定决心要消灭共产党，他们害怕我们，正如他们

害怕人民一样。其原因也是一样的。客观上，有许多因素（谈话开头时所谈到的五种因素）限制了国民党。这些因素中，最有力的日本人的因素将不存在了。另外一个因素是外国舆论，这个因素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外国的，独立于国民党之外。但是，这种因素现在还无法预料，因为国民党仍然希望外国的势力可能会站在它那一边。

国民党已经在为内战忙于寻找借口了。你们了解我们和我们地区的情况越多，那么那些借口的价值就越小。

因此，国民党也可能采取间接的方法来攻击，对于它的挑衅是很难确定范围或建立一道防线的。

但是，如果国民党想阻止在我们地区已经取得的进步，如果他们企图夺走人民新的民主权利，人民就要反抗并要求我们的援助。

国民党的另一条行动方针是通过伪军。伪军将转回到国民党内——宣称他们一向是“爱国的”，然后国民党就利用伪军来占据城市和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将煽动伪军攻击我们和制造磨擦。

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这一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这是可能出现的、带有欺骗性的日本投降蒋介石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日本人在扑灭共产党人的条件下，把他们的武器转交给伪军或国民党。这一点乍看起来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卷入这一局势的这些势力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他们之间的怨恨是如此的强烈，因此几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即使对国民党来说，事实也很清楚，中国的政治潮流是倾向于我们的。我们坚持了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一个真正伟大而又民主的文献。孙中山不是共产党人，宣言仍然是有效的，它不会很快过时。即使国民党崩溃，我们也会坚持这个宣言，因为

它的总政策是好的和适用于中国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纲领的每一项条款，都可以从这个文献中找到。

当然，我们并不假装自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也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问题。但是，我们正视它们，我们正在克服它们。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任何其他人的监督和批评。我们经常自我批评和修订政策，朝着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的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地区里看到这种不同之处——人民是生机勃勃、富有兴趣和十分友好的。他们具有人类抒发情感和精力的机会，他们已经从沉重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了。

我对他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忽视苏联，提出了疑问。

苏联参加远东战争或中国战后的建设，这将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情况。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

再进一步说，国民党由于患有反共的恐惧病，所以它也是反苏的。因而国民党同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至于我们去寻求同苏联的合作，那只会造成中国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因为中国已经是够不统一的了！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国民党需要苏联的帮助，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苏联却不会反对美国人对中国的关心，如果这种关心是建设性的和民主的。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冲突的地方。苏联只需要一个友好的和民主的中国。美国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对有关各方面都将是有益的和符合要求的。

我开玩笑地说，“共产主义者”的名称可能使某些美国实业家不放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他们考虑过换一换名称，但是如果人们了解他们，就不会感到害怕。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全然是没有偏见的。我们的减租是从过去的百分之八十、七十、六十降到法定的（根据未付实施的一项国民党法律）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过想要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我们不需要赶走地主。我们对利息的限定是年利百分之十，考虑到这比流行的利息低得多，所以它并不是绝对的。

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

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我们既没有只吸收西方机械技术的天真想法，也不对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感兴趣。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请看我们这儿以有限的资源已经做了些什么）。其次，我们才能谈到“国防工业”，像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中所谈论的。我们将关心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会不合作。我们应该合作。我们必须得到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们美国人的想法和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

致董必武电[1]

（1944年8月29日）

八月二十日美国空军第二十航空队的一架重轰炸机在苏北盐城、阜宁上空爆炸起火，坠落在新四军建阳金家桥根据地内，新四军第三师和该地游击队立即出动营救。该机飞行员十二名，其中一名毙命，我救出五名已抵第三师师部，其余六名正寻找中。以上情况望即转告有关方面。

---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给秦邦宪[1]的信

（1944年8月31日）

博古同志：

此文[2]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3]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4]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

---

[1] 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

[2] 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3] 指解放日报社。

[4] 指1944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1]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

[1] 艾，指艾思奇（1910—1966），当时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部长。陆，指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余，指余光生（1906—1978），浙江镇海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

（1944年9月5日）

昨天本报公布边区政府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选举与奖励办法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指出选举与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重要意义，对选举奖励的办法也有详尽和具体的规定，在今年冬天全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及今后边区全面建设事业中，必将起重大作用。这是一项新的组织形式与新的工作方法的定型化、合法化，值得引起大家注意。

陕甘宁边区自从党政号召生产运动及各种建设事业以来，随着这些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不断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从群众运动中产生，又站在运动前列，把运动推向前进，成为边区各种建设事业向前发展的动力。可是过去我们对此还缺乏自觉的认识，甚至是盲目的，因此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缺少注意和发现，任其自生自长，无声无名，不能发挥其应有作用。自从发现了吴满有和赵占魁并进行吴满有与赵占魁运动以后，经过去年冬天的劳动英雄大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才被我们逐渐认识，而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拔，也逐渐推广。一年多的经验向我们证明：在各种生产建设事业发展中，到处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存在着和生长着，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去发现，发现后加以奖

励，广为宣传，使其影响深入群众，号召群众向其学习，则其在群众生产建设运动中就可发生很大的作用，从而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奖励，是目前边区全面建设事业中一项极重要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这种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是由群众创造的，现在我们把它接受起来，定为今后发展生产建设运动的重要方法。

选举和奖励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首先是为了推动和改进工作。因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创造了超出一般人的劳动标准和工作标准，这种标准，既然在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是可能的，则对于所有的劳动人民与工作人员，在相同的条件下，也应当是可能的，而他们所以还未能达到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必然在其生产或工作中还存在着缺点。如果我们能把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及其条件和办法，在一般群众及工作人员中加以宣传和表扬，则不但可以刺激其积极性，而且可以在互相对照之下，发现其缺点，并进一步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标准作为自己努力的标准，以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经验，作为自己改进工作的办法，使其生产或工作提高一步，使更多的人向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看齐，使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更加普遍化。一年以来，不论是在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只要那里在群众中产生了一个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经过我们发现，把他奖励宣传，号召大家学习，则那里的生产和工作，就会得到改进提高和发展，证明这是推动和改进工作普遍可以采用并且是最好的办法。

其次，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和奖励，又是出产和培养干部的一种好方法。因为他们真正是从群众中和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来的，并在事实上证明了是群众中的优秀分子，他们努力生产或工

作，在生产或工作中获得了成绩，表现出他们的创造才能，并且这些人大都为人正派，又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对政治也有较高的认识，这些都是作为一个干部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下一番功夫去培养他们，提高其文化，加强其教育，则他们的优良品质和创造才能，将会更大更快地发扬。现在有些地方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已开始被引进到各种工作部门中来，逐渐成为各种事业中的重要干部了。过去我们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干部，这些干部至今还是我们边区的骨干，但在今天边区长期的全面的建设环境中，仅仅是这些老干部就非常不够的了，如果我们不能引进一批新的干部到我们的各项建设和各种组织中来，则我们的建设事业，就不会顺利完成，而这一批新的干部的增进，不在别的地方，恰好就在这些建设事业的本身，就在广大的群众当中，就是由各种建设事业的群众运动中产生的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党政军民各种组织的领导者，必须深刻了解这点，并对此进行必要的组织工作。

再次，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党政军民一体来进行边区全面建设的事业中，还有一种巨大的作用，就是他们能成为党政领导与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桥梁。这些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散布在各个角落和各个部门，他们和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着，但他们不是普通的群众，而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自然在一定范围内成为群众的领袖。党和政府经过他们，可以把群众的意见集中，来改善自己的领导，又可以经过他们，把党政的方针指示在群众中传开，并推进其实现，这样使党政与群众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在今年的生产运动及其他建设工作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了这点，许多劳动英雄回到他们的乡村，宣传党政军生产建设方针，积极推动和组织群众生

产，很自然地成为党、政府和军队各种政策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据说凡是有了劳动英雄的乡村，乡村党政的工作，就好像增加了许多力量，比过去好做得多了。

以上三点是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客观上所起的主要作用，这些客观作用一旦被我们自觉地认识并掌握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最好的方法，就成为我们当前各种工作中可以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而我们只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才能把今年全边区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选举奖励工作做得更好，因此这是首先应在全体党政军民干部中进行广泛宣传和教育的。

要把选举和奖励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工作做好，除了上述思想认识问题外，还必须进行很繁杂的组织工作，在组织工作上主要地应保证实现下列三条：

第一，是认真领导。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有些地方是不认真办的，事前毫无准备，临时随便指定劳动英雄，未经群众讨论和选举，今年选举则必须完全纠正这种缺点。所有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和工作部门从现在起就要很好地讨论边府决定，并在所属范围内开始布置工作，包括关于这一工作的传达和宣传，关于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各地区各部门具体标准的讨论和规定，关于劳动成绩调查和工作考绩，以及在选举工作中各种工作的筹备与分工等，并于适当时候进行检查，发现缺点，即时纠正，防止对此事采取应付马虎态度。

第二，是发动群众。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许多地方没有经过群众讨论选举，而是单纯由上面发现后指定的，今年则必须按照政府决定认真地由群众民主选举，必须及早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酝

酿，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选举，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选举真正成为群众自觉运动，防止发生形式主义的毛病。

第三，是慎选好人。去年劳动英雄的选拔，有些人是不合标准的，结果非但不能起劳动英雄的积极作用，反而在群众中产生不良影响，失掉选举劳动英雄的意义，这是在今年选举中应加严重注意的。为防止这种缺点，必须把边府规定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的标准广为宣传，由党政协同群众共同提出候选人，每一候选人都应根据标准由群众加以审查，并应经过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只有经过群众认真的民主的选举，才能是真正好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也只有真正好的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才能在群众中发生积极作用，达到改进工作、培养干部及联系群众的目的。

以上所述各点，不但适用于陕甘宁边区，也适用于敌后各根据地。但敌后必须以战斗英雄、民兵英雄与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并重，并且战斗英雄与民兵英雄还应放在前列，这是自明的道理。在敌后的中心口号是战斗与生产相配合，部队中的战斗英雄与民兵中的民兵英雄之选举与奖励，是应和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的选举与奖励同时进行的。敌后各地对此种组织形式与工作方式，有些经验还不多，有些还没有经验，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迅速采用，以利发展战斗与发展各项建设工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1]

（1944年9月6日）

【新华社延安六日电】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于五日上午在重庆开幕，报到参政员一百六十四人，较历届历次大会为少。蒋介石氏莅会致辞，首述最近中国战场军事演进情形：“吾人决不否认这半年以来军事的失利，更不能否认中国抗战这一时期是特别困苦艰辛。”继即声称：“（一）中国战场的最后决战今方开始……（二）日寇无论如何决不能在整个反侵略战争一片光明中侥幸逃其覆灭的悲运……他妄想在中国战场侥幸求逞，实无可能。（三）……我可以保证在军事根本上决没有危险，因为危险早已过去了。”关于目前军事失利与经济困难之原因，蒋氏称：“今天军事上或经济上的困难，实在是我们农业国家在七年长期抗战的必然之势，因为我们国家一向无基础，这种现象实不足奇。就军事上来说，我们在抗战开始以来，每年都有这种失利的事实，而且其失利程度或有较今日为甚的。”从此种“必然之势，实不足奇”、抗战败仗年年有、往年还比今年多的政治哲学中，蒋氏所得

---

[1] 这是新华社的述评。标题是毛泽东加的。原稿最后部分（从“林虎氏说”开始）已散佚，现据报载补齐。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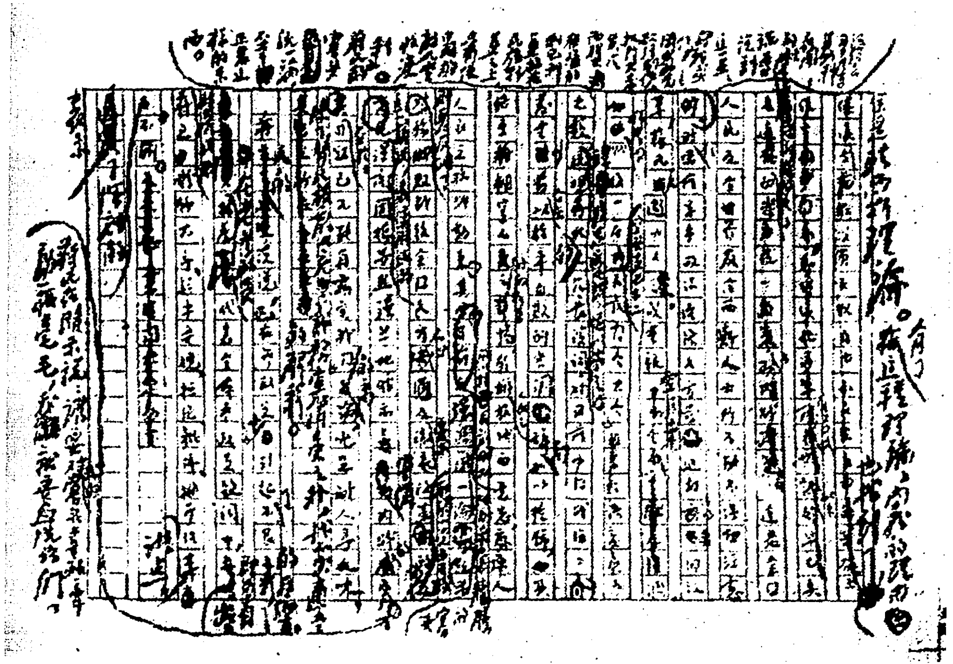
之结论为："要知道敌寇今后无论如何疯狂挣扎，断不能象过去七年那样再有为害于我们国家的危险，敌人所加于我们的危险，到今天实在已成过去。"用武断的词令，想将目前的军事危机掩饰过去。掌国柄者居然发出此种言论，实堪惊异。蒋氏又称："我们国家今后安危成败所系的一点，这无论对抗战，对建国都有极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国家绝对需要统一。"接着即大唱其无条件的统一论，甚至说，孙中山"革命数十年，毕生奋斗目的是为了国家统一。"按中山先生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蒋氏对这个遗嘱是忘记了。蒋氏并且说，"今日对日抗战也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而不是民族的解放。这种将一切都统一于国民党、统一于寡头政治的统一论，是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在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的民主统一论针锋相对的，其中包含了阴风惨惨的杀机。蒋氏又称，"有了国家的统一，才有国家的独立；有了国家的独立，才有国家的自由；有了国家的自由，才能谈到民权自由和民生自由"，倒果为因，完全是法西斯理论。有了这种理论，内战的理由也找到了，这是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所不能不深切注意的。记得去年十月十日《莫斯科新闻》的社论曾说到这一点："内战，或任何一集团或政党欲强制他人执行其意旨，从而将其狭隘的利己利益放在民族利益之上，只有使中国的敌人坐收渔利。"蒋氏的寡头统一论，不幸正是这样的东西。对于当前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迫切需要的改革，蒋氏或避而不谈，或重复空洞老调，如所谓"战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之类，讳疾忌医、空头支票二语，足以当之。统观蒋氏的冗长演词，对目前中国战场上的严重形势企图以轻率自欺的空洞辞句加以掩饰，其结果将模糊人民之对敌警

惕，松懈人民之抗战意志，麻痹人民之抗战动员。其所以于目前时机强调他的杀气腾腾的寡头统一论，则是反映了豫湘败战后全国各方人心愤懑及要求彻底改革政治、取消一党专政这一情况，表示蒋氏的深闭固拒，并且强烈地暗示着准备内战的威胁。蒋氏在暗示说：谁要对我的寡头专政牵动一根毫毛，我就要血洗你们。至于“日寇已不能再为害我国”的高论，尤足耐人寻味，除了替民族敌人充当义务宣传员之外，找不出适当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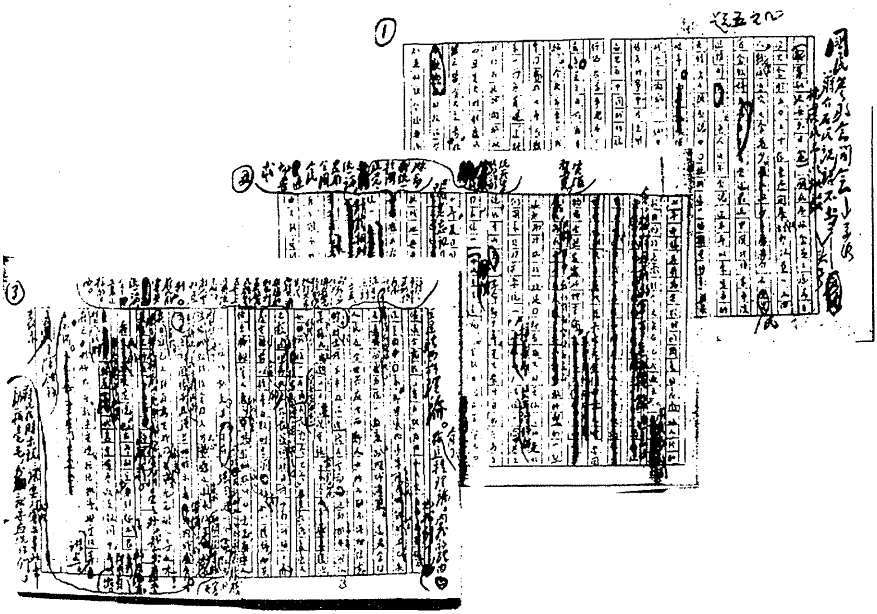
蒋氏的演说，已在参政员中引起了不良的反响。在老参政员林虎氏代表全体参政员的答词中，即可看出。林虎氏对蒋之粉饰太平、轻率乐观、拒绝批评、排斥改革诸点，表示了深刻的不满。

林虎氏说：“我们回顾国内，瞻念前途，不但不敢稍有乐观，而且抱有杞人的忧虑。因为当这个国家兴衰存亡的关头，如果我们能发奋振作，痛涤旧污，革除积弊，即是兴国之机。不然，若将现状拖延下去，前途是不堪设想的。这并非我们故示危言耸听，种种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为大家所共见共闻的，这也用不着隐讳，也用不着一一列举。试请大家想一想，现在国内各战场作战的部队，能服从命令、忠勇杀敌的固然是多，而有些坏的是糟到怎么样？各级政府之用人行政，能尽职能合理的固然多，而那些渎职的颟顸的是闹成怎么样？这些情况都是使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前途发生隐忧的。我们参政会自二七年到今天所开的已是第十次大会了。检讨过去我们对于政府抗战建国诸端固曾有些贡献。但当盟军在欧洲与太平洋着着的胜利，欧洲战事或可望于今年结束，太平洋方面的盟军正在准备展开强大的攻势，整个战局的胜利已在目前。然而我们抗战八年，人力物力的牺牲已是不可胜计。在这整个战局胜利之中，我们应格外努力来争取主角之一

的地位，然后能收得一切牺牲的代价，万不可专靠同盟各国的胜利做胜利，致贻我们中华民族之羞。”一针见血，林虎氏将蒋介石的错误观点统统批驳了。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述评《国民党参政会，蒋介石氏说话不当，林虎氏予以批驳》的手稿（部分）。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评述蒋介石在三届三次参政会上开幕词的新闻稿的手稿。

致张云逸、饶漱石等电[1]

（1944年9月7日）

第三党张云川等已离渝赴北平，准备到各根据地访问，望妥为招待，给以参观访问之便利。

---

[1] 这是毛泽东致张云逸、饶漱石、罗荣桓、黎玉、邓小平、滕代远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晋西北、晋察冀电[1]

（1944年9月7日）

美军观察组上尉考林、中尉琼思二人将于最近分赴晋绥边区及晋察冀边区，考察地形、建立情报网和了解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等。

---

[1] 这是毛泽东致晋西北、晋察冀电的主要内容。

为人民服务[1]

（1944年9月8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2]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3]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大会上的讲演。

[2] 张思德，四川仪陇人，中共中央警备团的战士。他在1933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3] 司马迁，中国西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史记》130篇。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1]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2]，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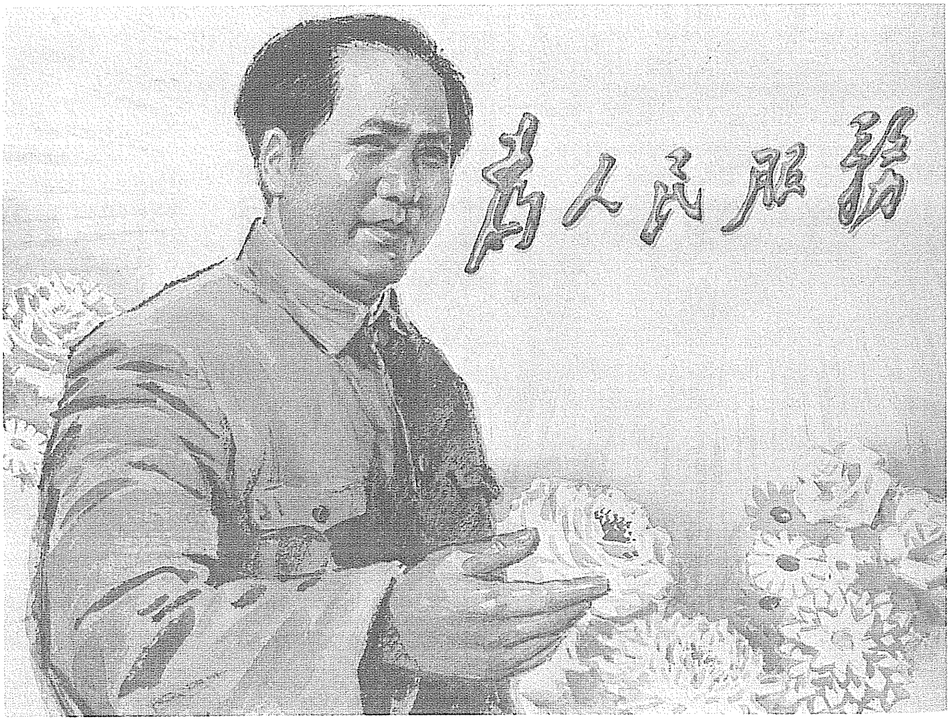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

[1]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他在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 这是指当时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各抗日根据地所拥有的人口的总数。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说。图为张思德在山中烧炭。



为人民服务（宣传画）

为张思德题写挽词[1]

（1944年9月8日）

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

[1] 1944年9月8日下午2时，张思德烈士的追悼大会在延安枣园后沟西山脚下的操场上举行，中央警备团全体指战员、中央社会部及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等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毛泽东在花圈上题写的挽词是：“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电[1]

（1944年9月9日）

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复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

（1944年9月11日）

参政会报告两党谈判[2]时，林准备根据周谈话[3]及复张、王信，对国民党反动意见加以驳斥，并宣传我抗战成绩、力量与合理要求，是对的，国民党提示案根本不提抗战需要，我党合理要求则全是根据抗战需要，这是双方根本不同点。根据来电，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拟和我党联合提出改组政府，请你们考虑现在我党中央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是否合宜。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准备在国民参政会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

[3] 指周恩来1944年8月12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关于国共谈判的谈话。

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

（1944年9月12日）

如与纳尔逊[2]、赫尔利见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国援华军火至少应以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亦即国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共都优于国也。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纳尔逊，当时任美国国务院战时生产局局长，随赫尔利来中国。

复罗荣桓、黎玉、萧华电[1]

（1944年9月14日）

延安审查干部经验中，在初期有许多是过“左”的，后来已纠正，你们不要重复，山东应该稳重谨慎地去做，凡无充分可靠证据，不要轻信某人为特务，要把特务、叛变、自首、党派及犯错误等项分别看待，严重嫌疑分子（有证据者）可以暂时逮捕候讯，但为数应极少，尤要坚持一个不杀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山东审干问题复罗荣桓、黎玉、萧华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1]

（1944年9月15日）

（一）关于美国物资分配，不管将来事实上之结果如何，我们应在原则上主张按照抗战成绩（我军打击敌伪六分之五）为标准，不应按照现有两党军队数量为标准，因此我们应主张至少两党平分援助物资，前电所说至少三分之一不恰当，请改正。（二）小党派既不赞成我党单独向参政会提出改组政府，即请作罢。至于林报告谈判经过时是否应当顺便提到此点则请你们酌情决定，但在再复张治中、王世杰的信中则必须正面提出。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坚持为人民服务[1]

（1944年9月18日）

同志们！你们是从部队里选举出来的，你们代表了八路军、新四军，同时你们还代表了我们抗日根据地的九千万人民，也代表了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来开会。虽然你们不是全国人民直接选举的，但实际上你们所执行的纲领和工作任务，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武汉失守以来，特别是最近二年以来，中国抗战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巨大的变化。现在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人民抗日部队抗击了在华敌伪军的六分之五，国民党只抗击了六分之一。豫湘战役[2]，敌人如入无人之境，情形极为严重。中国不亡，是由于有了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地是由我们支持了抗战局面。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抗战形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举办的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 豫湘战役，指日本侵略军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第二阶段。1944年4月中旬，日军以14万兵力首先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守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在日军进攻面前不断败退，至5月25日，郑州、洛阳等38个县市相继陷落。5月27日，日军又发动湘北作战，6月18日侵占长沙。6月22日，开始对军事要地衡阳发动攻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经47天激战，大部守军伤亡，8月8日日军占领衡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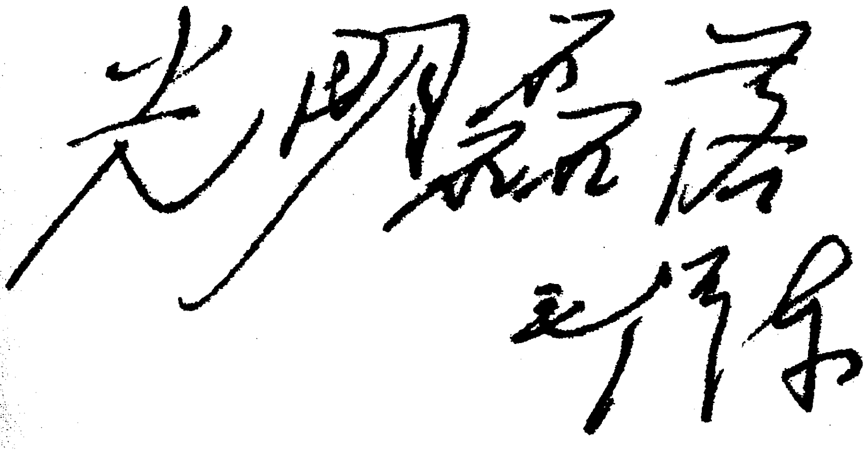
我们的部队，不论在前方打敌人或在后方保卫陕甘宁边区，不论生产或练兵，不论军民关系、官兵关系，都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有缺点，我们要改正缺点，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去年拥政爱民运动中，我们运用了自我批评的方法，我们有缺点还可以互相批评。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正确的自我批评，对于领导和纪律，不但不会削弱它，而且只会增强它。当然，这种自我批评只有在我们的部队里才有，在国民党军队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们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这是党中央和西北局的方针，也是全体人民所要求的方针。我们的心和全中国人民的心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中华民族！

为张侠题词

（1944年9月18日）

光明磊落。

毛泽东



光明磊落

毛泽东

毛泽东为张侠的题词。

复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 年 9 月 18 日）

严肃批评，并指蒋名，甚为必要。如五参政员决定来延安[2]，最尖锐的批评可以暂停，但决不可作为条件，只可说如五参政员去延安及国民党态度改善，延安批评自然会和缓。

---

[1] 这是毛泽东对林伯渠、董必武16日关于国民参政会开会情况的来电的复电的主要内容。

[2] 1944年9月15日，国民参政会决议，由参政员冷遹、胡政之、王云五、傅斯年、陶孟和5人组成延安视察团，赴延安视察，并于返渝后向政府提出关于加强全国统一团结之建议。后来，1945年7月到延安与中共会谈的参政员是6位，即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

致林伯渠、董必武电[1]

（1944年9月18日）

闻五先生决定来延，甚表欢迎，敬祈早日命驾为祷。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转胡政之、王云五、冷遹、傅斯年、陶孟和5参政员电的主要内容。

驳国民党政府提示案[1]

（1944 年 9 月 19 日）

一看六月五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没有一个字提到抗战（这是最值得注意的），没有一个字提到当前的艰危之局，没有一点表示改弦更张放弃误国政策之意。该提示案要把敌后抗战卓著功勋、抗击了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武装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即是说，该案允编十个师，依国民党编制每师约一万人，不过十万人，其余三十七万正规军都要“取消”，而且要快快“取消”，试问这不是日本人的腔调吗？日本强盗千方百计用残酷的战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现在经过国民党政府诸公一纸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岂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头等奖赏吗？该提示案又要把由中国解放区人民民主选举出来的，与敌后人民血肉相关、甘苦与共，坚决领导抗战的民主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但是这些所谓“省政府”也者，究在何处呢？谁也不知道它们逃在什么角落里去了。它们究竟与人民及其艰苦卓绝的斗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一天查明了它们的所在地，这些所谓省政府的老爷们，只应该给他们一种公平的待遇，就是“撤职查办”四个大字。何况还有许多卖国贼暗藏在这些所谓省政府里面呢！卖国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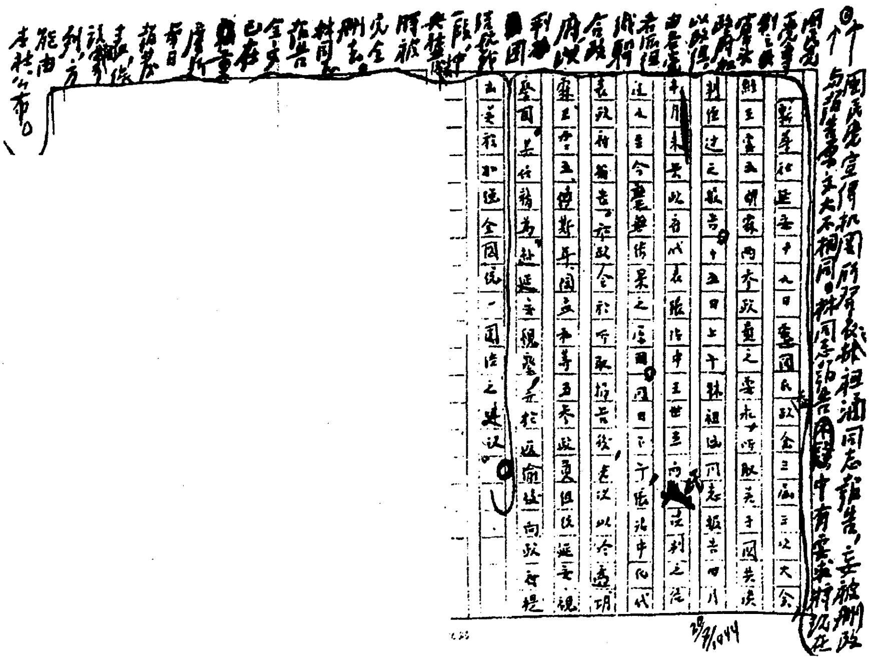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新华社 9 月 19 日电讯稿《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时作了大量重要改写的一段话。

庞炳勋、石友三[1]不都是过去这类省政府的主席吗？至于委员们之投敌叛国者更不可胜计了。总之，这个提示案只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只是那些为着私利而忘掉国家民族的人们之意旨的反映。说得明白一点，所谓提示案，正是今天一小群只图私党利益、不知民族大义的国民党法西斯分子之卑鄙意识的结晶，是每一个真正爱国者所不可能与不应该接受的，因为谁要接受这种提示案，就无异于帮助日本侵略者。

---

[1] 庞炳勋（1879—1963），河北新河人，1940年后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1943年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石友三（1891—1940），吉林长春人，曾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西南部专门联合日军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1940年6月，与日本驻军签订“防共协定”，准备公开投敌。后被处死。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电讯《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听取关于国共谈判之报告》的手稿。

延安观察家评国内战局*

（1944年9月21日）

最近中国两个战场的军事情势，尖锐地揭破了国民党当局所谓“军令统一”的实质是什么。在完全由国民党统帅部所指挥的正面战场，自本月二日湘敌进陷常宁后之十二日间，先后失去湘桂路沿线的祁阳、零陵、东安、新宁、道县、资源、全县七城，湘桂路正面的桂林与侧翼的邵阳，均已岌岌可危。同时期中，广东敌自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侵陷高明、四会、肇庆、开平、新兴、廉江六城。目前自道县南犯之敌，已窜抵湖南最南部之江华、永明。由西江北犯之敌，则已进陷广西之怀集、信都。两线相距已不满一百二十里。此种日丧一城之可耻失败，即今日所谓“服从军令”之代价。当盟国在海上竭力准备进攻菲律宾与中国海岸，在陆空竭力加强滇缅运输与轰炸日寇占领区及其本土之际，重庆腐败无能的统帅部乃竭力造成自己的危险与盟军的困难，而给予日寇以重要的有利阵地与拖延失败的机会。盖西南战场失败的严重性，首先尚不在丧师失地之巨之速，而在其战略之结果。广西的危急，意味着日寇可能由此而敲昆明甚至重庆之大门。另一方面，日寇所最畏忌的盟国空军，亦因湘桂形势的急速恶化而丧失了重要的阵地，且继续感受国民党恶劣军事指挥的危害。退一步说，敌人即使仅仅打通其横贯中国之交通线，并将中国切为两半，此对反攻日寇所造成的不利，亦即不可

胜计。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两次演说，没有一个字道及如何挽救当前的危机，或如何改变造成此危机之统帅部的方针与成分，徒然一再强调其阻碍抗战胜利的所谓军令统一。殊不知所谓军令统一一语，诚如参政员王云五、胡霖两氏所说，“原是不成问题的”，成问题的只是用什么军令去统一。如必以今日失败主义的军令来统一全国，则无非欲全国军队均向过去的河南战事与现在的湘桂战事看齐，同归于尽，而后甘心。这种亡国心理除了帮助敌人、阻碍胜利与引向失败之外，不能有任何别的东西。

试一返观被国民党诬为“不服从军令”的敌后战场，则情形完全相反。这个战场的人民军队，在八、九两月中，连续获得了重要胜利。山东的八路军，在八月下半月与九月上半月中，连克五城，即旧黄河口的利津、乐陵、临邑，胶东半岛尖端的文登和山东东南部的沂水，山东西南部的郓城战役，解放村镇六百余，山东东南滨海区的反“扫荡”战役，歼灭伪军陈三坎一旅，尤与正面战场的日失一城成一极鲜明的对照。此外，沿海各省亦均有许多胜利，如河北八路军攻克北平城北十六里的高丽营，攻入北平东南的青云店与西南的长辛店，以及沧州、雄县、深泽的县城和易县、徐水的城关；活动于南京、上海、宁波三角地带的新四军，攻克南京西南十六里的六郎桥，长江北岸的石庄、张黄港、新生港，攻入太湖西南岸的长兴及南京长兴间的溧水、溧阳三城与宁波的近郊，广州附近的东江纵队，亦攻入广州市郊的龙眼洞。仅就沂水、文登、郓城、长兴四次胜利统计，解放的国土即达一万四千方里，或约一千五百方哩。由于敌后最近的连续胜利，中国解放区的人口总数已由八千六百万增至九千万以上。如果所谓军令，是要抗日，要胜利，则敌后战场实为执行抗战军令的模范。但是若国民党所提议的必须将这

种有效抗日力量取消五分之四，亦即将收复的失地、解放的人民和俘获的人枪送还敌伪五分之四，才叫做“服从军令”，则这种所谓军令也只不过是天皇陛下的走狗们所发的叛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军令，中国人民将起而惩治这些实际上的卖国贼，决不许其逍遥法外。

综观中国两个战场的最近情形，可以清楚看出，正面战场的中心问题是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人民团体、各地方抗日力量的紧急国事会议，立即废除国民党的寡头统治，彻底改组国民政府及统帅部，立即将一切卖国贼、投降派、失败主义者、专制主义与法西斯分子全部驱逐出去，并交付人民惩办，由代表抗战利益与人民意志的人们去掌握政令、军令，才能阻止敌人前进，挽救国家危局。至于敌后战场的中心问题则是加强武装。在这里，完全应该按照共产党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而且天天打胜仗，国民党仅仅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一，而且天天打败仗这种事实，共产党应得盟国援助品的六分之五以上，国民党最多只能得六分之一。而且不能由国民党分配，因为它已无资格做这些事了。如果政府与统帅部不改组，则六分之一的物资交给国民党亦应考虑，因为国民党应负丧师失地与阻碍同盟国胜利之责，把任何一件武器交给它，适以资敌。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9月22日）

现在重心有逐渐转移的趋势，我们自己常常估计不足。这次参政会公开，对我们是有利的，逼得蒋介石发表双方的文件。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十二条原则上提得对，但未想到改组政府。现在时机成熟，时局变化得很快。这次参政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已不敢提了。中共威信在大后方之高，是全国、全世界注意的问题，现在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审查干部问题，结论不忙作，待整个甄别工作告一段落后，再由中央讨论一次。因为搞错了许多人，所以对于“抢救”我有些怀疑，乱子就出在这里，以后“抢救”二字不能用。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谈论形势、国共关系、审干等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1944年9月26日，毛泽东等观看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技术表演。

1944年9月，毛泽东和叶剑英、陆定一在交谈。

1944年9月，毛泽东和吴玉章、陈毅在延安。

1944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何长工在延安。

1944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陆定一、邓发、叶剑英在一起。

为林伯渠[1]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2]的信

（1944年9月27日）

雪艇、文白两先生大鉴：

九月十日两先生来函，及在这次参政会[3]上双方关于谈判经过的报告，和蒋主席在参政会上对于本问题的表示，均已报告我党中央。兹将复示以下几点，奉告两先生，并请转达国民政府蒋主席及贵党中央。

（一）我们对于蒋主席在参政会上表示继续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一点，表示欣慰。因为国内一部分强有力的人士，对于内战的准

---

[1] 林伯渠，名祖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这时正在重庆进行谈判。

[2]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曾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湖人。两人均为国民党同中共谈判的代表。

[3] 参政会，指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31日决议成立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其中国民党人占大多数。中国共产党参政员为毛泽东、秦邦宪、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7人。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1947年5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备，并未放松，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并且愈到反攻之时，危机将愈严重。按照他们的计划，是要把反攻与反共合并举行，以达其所谓一举两得之目的的。但是蒋主席在参政会上有此表示，足使我们及国人暂时放心。对于参政会所组织的延安视察团，我们表示欢迎。对于两先生延安之行，仍盼命驾。至于两先生问是否能派负责代表偕返重庆一节，要看延安谈判结果如何而定。但可确告者，只要国民政府与国民党方面不拒绝继续谈判，又能保障来往自由（至今天为止是没有这种自由的），即使无人立即出来，不久一定会有人出来。虽然周恩来、董必武[1]二同志在渝多年，前年林彪[2]师长来渝，祖涵此次来渝又已五月，无一人获有谈判结果；但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总是有人来谈判的。

（二）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不论在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到处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政府与人民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军官与兵士之间、军官与军官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无一不发生异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全国人民皇皇不可终日，烦闷、苦恼与怨恨的情绪与日俱增，大家感觉没有出路，在此种种情况下，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因此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动员与团结全国抗战力量，不能巩固军心民心，不能使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设施符合抗战、民主与团结的需要。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

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如果一党专制的局面继续不变，则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各种危机只会增大，人民不能动员，抗战不能胜利，离心离德的危险现象无法克服，国家统一断乎不能实现。我们这个建议，实是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即贵党中亦有不少人士同具此心。这个建议，祖涵已在此次参政会内正式提出，兹特重申此意。两先生历次谈话与函件，对于实行民主，全属敷衍之词，使人感觉不到任何诚意。即九月十日来信，仍是如此。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

（三）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中有“要求与时俱增”一项责备之词，不能不予以辨正。林彪师长所提四项，时在一年半之前，当时已为政府拒绝，林师长空劳往返。五月间祖涵在西安与两先生所谈，约定各呈报自己中央请求指示，祖涵与两先生均无权作最后决定，故只有六月四日（于六月五日由祖涵面交两先生的）敝党中央

所提正式十二条与委托祖涵所提口头八条[1]，才是敝党中央的意见。且西安所谈，原约定双方签字呈报双方中央，但祖涵签字后，两先生不愿签字，应即不能成立，何得事后又引为根据？两先生此种作法，说得客气一点，叫做不友好态度；说得正确一点，叫做玩弄无谓的手腕，是只会影响问题的解决的。至于“华中华南”四字，明是电文脱落，后经校正，故即补上。华中、华南广大解放区人民抗日政权之存在，已历多年，岂有不要政府承认之理？

（四）综观两先生九月十日来信，仍如政府提示案及两先生前次来信一样，不从抗战利益出发，故总是不着边际，毫无结果。除前述实行民主一项关系国家兴亡之大问题外，关于广大中国解放区军、政两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问题，亦复如此。现在再一次明告两先生：全部敌后解放区的军队与政权是一定要请国民政府承认的，而且一定会“与时俱增”。因为整个敌后战场的战争情况，与正面战场恰成相反的对照，在正面是节节败退，在敌后是节节胜利。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收复的国土、解放的人民与民选的政府，也是在一天一天地增多，这些难道

---

[1] 1944年5月22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以书面形式送交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王、张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5月31日，毛泽东就修改中共提出的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修正后的十二条为原二十条中关于全国政治方面的三条，关于两党悬案方面的第一至第七条和第十、第十三条。原二十条意见中的其他八条即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二十条，参见《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

国民政府与国民党都不喜欢吗？难道蒋主席也不喜欢吗？不见得吧！不管国民政府、国民党承认与否，万恶的日本强盗总是要打的，而且是要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国土的。我们所以请求承认，是要求统一，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及全国一切抗战力量，都在民主基础之上，而不是在独裁基础之上，统一团结起来，好配合盟国早日把日本强盗打倒。如果你们坚持不承认主义，或少承认主义，祖涵以为是不妥当的。为什么打胜仗的军事力量你们不要，打败仗的军事力量你们尽要呢？为什么收复的国土你们不要，反加责备，而几个月之内从郑州到桂林丧失如此广大国土，你们反而不可惜，不加责备呢？我现在敬告两先生，并请转告国民政府与蒋主席，请你们嗣后再也不要讨厌我们共产党人请求你们承认打胜仗的军队与收复的国土了，因为这种嫌恶情绪是很不合于民族利益的。率直之言，尚乞鉴谅！

林祖涵

致吕正操、林枫电[1]

（1944年9月30日）

请你们考虑，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但在每一处打胜仗后应叫那里提高防备敌人报复的警惕性。

---

[1] 这是毛泽东致吕正操、林枫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1]

（1944年10月1日）

三年半前被蒋介石以所谓“破坏军令军纪”名义宣布为“叛军”的新四军，不仅一直坚持着华中的抗战，而且最近半年来屡次出击，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新四军的节节胜利，对于半年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所口口声声强调的失败主义的有利于日寇不利于民族的“军令军纪”，则是一个严正的揭露，事实的讽刺。对于中国人民，则足以提高胜利信心。对于盟国击败日寇的战略，则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们，不必说了。至于蒋介石，他有两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欢迎：一件是反共活动，一件是《中国之命运》。蒋介石的千万件反共活动中，尤以阴谋袭击新四军，逮捕叶挺[2]将军与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最受日本人欢迎。当一九四一年春，蒋介石干出此种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背叛民族的罪恶事件时，日本同盟通讯社曾嘉奖说：“蒋介石几年来未作什么好事，但解

---

[1] 这是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新四军胜利出击》，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1937年10月起任新四军军长，1941年1月在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扣押。

散新四军一事算是作得好。”

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

新四军军部公布今年一月至六月的战绩，作战一千余次，俘敌伪一万余人，缴枪一万一千余枝，伪军反正四十二次，六千余人，粉碎敌伪“扫荡”三千人以上者十二次，五千人以上者四次，七千人以上者二十次，攻克敌伪据点四百二十座，华中敌伪据点去年冬总数为二千九百七十二座，今年六月底连新增者在内只有二千六百九十三座。

我们再看今年华中新四军所进行的大战役。三月四日苏中的车桥战役，攻破五十三座碉堡，歼灭敌军一个大队约八百人，生俘敌官兵四十余人。三月下旬至五月间，淮北我军在三百里战线上进攻伪军，攻克归仁集、新集、魏集等据点五十一处，俘伪军一千三百人。四月十九日淮海区攻克高沟、杨口据点。四月二十七日我军进袭巢县、无为城郊。五月三日滨海我军攻克灌河下游敌人用以控制淮盐的主要港口陈家港，生俘敌伪四百余名。五月十三日我军进袭芜湖近郊。六月中旬，湖北我军南渡长江，攻克横堤。七月十二日至十七日，苏中我军攻克长江北岸之天生港、张黄港等五个港口。七月以来，浙东我军连续粉碎敌伪对四明山的三次“扫荡”。七月二十六日，苏南我军袭击南京外围地区，攻克薛镇、桑园等据点，打开秣陵关至横山一带的游击局面。八月二十三日起，我军在京杭国道上展开攻势，攻占长兴城，捣毁合溪煤矿，并攻入溧水、溧阳。以上共计，三月来我新四军进行的大战役凡十三次。

在政治攻势的成绩方面，我淮北区于六月间，继军事攻势之后，发动了政治攻势，驻泗阳之伪第二十八师，原有千余人，逃亡

得只剩三百多人。不少据点，经过喊话，不费一弹，即为我收复。

在破袭方面，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日，南通、海门、启东、如皋地区举行大破袭运动，参加者五万人，破路七百里，毁桥梁五十座。

以上总计起来，今年新四军的胜利出击，解放国土十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五百万以上。苏中敌人所占领的地区，被我军挤缩得只剩百分之十六。斗争最残酷的苏南，我军也开辟了新的地区。夏初麦收前后反“扫荡”的胜利，使敌伪原定的抢粮计划，完全失败。敌华中派遣军编制的调整，及企图加强控制各部伪军，都表现出敌寇在我军的进攻下，不得不讲求新的对策。

新四军胜利出击的意义，还不止此。我们还应该指出下列的几点：

第一，今年新四军的出击中，许多是攻坚的战斗。这些攻坚战斗的胜利，证明新四军在整训之后，军事技术更加加强了。新四军现已拥有主力十八万，以五十万民兵游击队为其后备。它是坚持华中敌后战场的唯一力量。过去人们有一种想法，以为新四军只是游击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把新四军的力量过低估计了的。新四军今年出击的胜利，是以事实批驳了这种错误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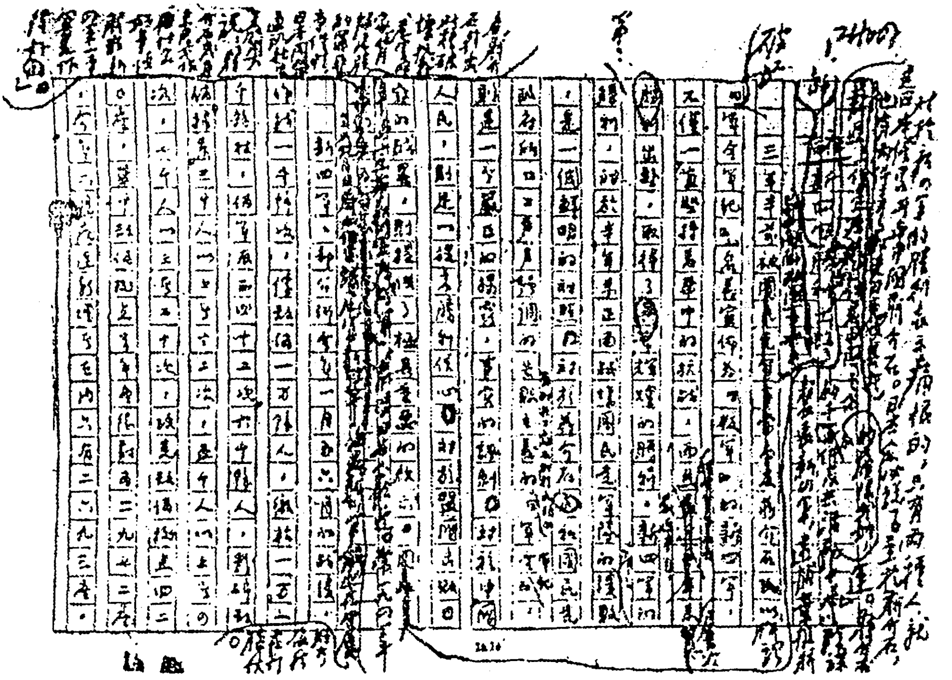
第二，新四军和八路军一样，不仅军队本身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还有最大的长处，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它与人民打成一片，而且敌伪军工作做得很好。新四军的作战和行动，经常得到人民的拥护与协助。车桥战斗生俘敌官兵四十名，这在抗战中是新的纪录。华中的伪军士兵，呼新四军为“四老爷”，比之为赵子龙，他们常常对着自己的枪说：“枪呀，我是替四老爷保存的。”半年来，伪军反正四十二次，六千余人，足见新四军影响之大。

第三，新四军所居的地理地位，更是异常重要。它控制整个华中海岸线，和最富饶的长江流域。这个地区，如果给日寇完全统治了，则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于我国与盟国，都将是最大的不利。

国民党在敌人进攻华中的面前，弃甲曳兵，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只有新四军，一直坚持着这个地区的神圣抗战，为将来盟国的反攻准备了前进基地。国民党的投降派、失败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把新四军看作眼中钉，藉着所谓“军令军纪”，必要把新四军消灭以为快。皖南事变，千古奇冤，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居心，已经暴露无遗。时至今日，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师其故智，天天在强调其所谓“军令政令之统一”，而这所谓“统一”者，不是别的，就是要把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谁也明白，这样的“统一”，也并非“统一”到蒋介石手里，而是实实在在地“统一”到日本人手里。因为五分之四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来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国国土，不就“统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吗？真是替日本人帮忙的好计策！天皇陛下之传令嘉奖是毫无疑义的了。

但是中国人民是决不准许这样的叛卖阴谋的，八路军新四军也决不准许这样的阴谋。单拿新四军来说罢，它现在已经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

我们庆祝新四军的胜利。我们怀念身在囹圄的叶挺军长与许多忠勇将士。我们还要勉励新四军的将士，加强自己，扩大自己的队伍，密切部队内部的联系，密切部队与人民的联系，准备在与盟国联合对日反攻的事业中，大显你们英雄的身手罢！



毛泽东修改社论《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的手稿（部分）。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0月7日）

一

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

二

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的时代，对革命是有功绩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不是群众与广大干部的问题。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延安及各地同四方面军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主要由一方面军干部负责。对红七军也应承认是有功劳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能消灭山头主义。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今后作战方向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张平群发言错误，人民要求立即改组政府与统帅部[1]

（1944年10月8日）

【新华社延安八日电】据中央社重庆四日电，是日下午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某记者询问政府当局对于组织联合政府的意见，政府发言人张平群答称：“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延安评论家称：自从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同志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召集紧急国事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来，为时已历三周。随着正面战场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国民党独裁统治腐朽无能的日益暴露，立即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已成为我国一切爱国同胞（包括许多国民党员在内）和盟邦友人的一致呼声。不料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一呼声，竟采取蔑视态度。张平群是国民党当局的发言人，他的话暴露了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顽固不化、毫无民主气息的狰狞面目。目前寇患日深，敌骑迫近桂林，大后方门户洞开，民族危难急于燃眉，只有立即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和统帅部，才能挽救这一危机。中国抗战事业必须胜利，同盟国共同事业必须胜利；废止国民党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已成为全国人民和友邦人士的一致要求。但是按照国民党老爷们的意见，则是“不值讨

---

[1] 这是毛泽东修改过的新华社述评。标题是毛泽东加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论”，也“不拟讨论”的。果真“不值讨论”吗？整个大后方人民或者已受或者要受敌骑蹂躏了，人民要求立刻追问国民党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值得讨论的。果真“不拟讨论”吗？你们尽管“不拟”，人民的死活、国家的存亡，是不能不讨论的。**不管国民党当局“讨论”与否**，废止寡头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这个要求是无法抗拒的**。

对《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抨击英首相丘吉尔演说》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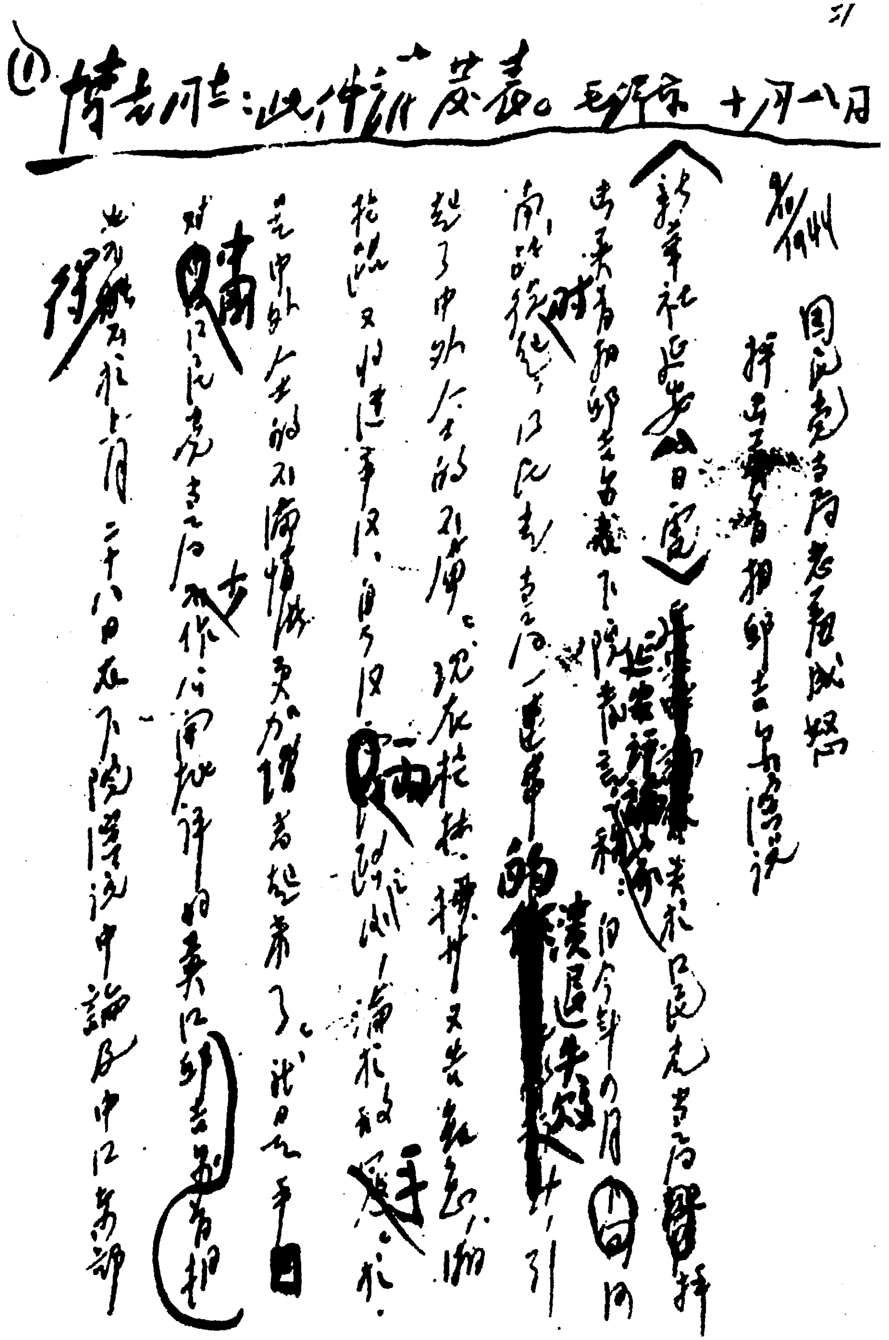
（1944年10月8日）

博古同志：

此件请发表。

毛泽东

十月八日



21

① 博古同志：此件可发表。毛泽东 十月八日

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

抨击英首相丘吉尔演说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电讯《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抨击英首相丘吉尔演说》的手稿。

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1]

（1944年10月11日）

空洞无物，没有答复人民所关切的任何一个问题，是蒋介石双十演说的特色之一。蒋介石说，大后方尚有广大土地，不怕敌人。寡头专政的国民党领导者们，至今看不见他们有什么改革政治抗住敌人的意图和本领，只有“土地”一项现成资本可资抵挡。但是谁也明白，仅有这项资本是不够的，没有正确的政策和人的努力，日本帝国主义是天天在威胁这块剩余土地的。蒋介石大概是强烈地感到了敌人的这种威胁，只要看他向人民反复申述没有威胁，甚至说，“我自黄埔建军以来，二十年间，革命形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坚固”，就是他感到了这种威胁的反映。他又反复地说不要“丧失我们的自信”，就是在国民党队伍中，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人士中，已有很多人丧失了信心的反映。蒋介石在寻找方法，以期重振这种信心。但是他不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个政策或工作方面去找振作的方法，他找到了拒谏饰非的方法。他说，“国际观察家”都是“莫明其妙”的，“外国舆论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都是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缘故。说也奇怪，罗斯福一类的外国人，也和宋庆龄一类的国民党人、国民参政会的许多参政员以及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一样，都不相信蒋介石及其亲信们的好听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的申辩，都“对我们军事政治纷纷议论”。蒋介石对于此种现象感到烦恼，一向没有找出一个在他认为理直气壮的论据，直到今年双十节才找到了，原来却是他们相信了“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于是蒋介石在其演说中，用了极长的篇幅，痛骂这种所谓“敌寇汉奸造谣作祟”。他以为经他这一骂，一切中国人、外国人的嘴巴可被封住了。对于我的军事政治，有谁再来“纷纷议论”的么，谁就是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我们认为蒋介石的这种指摘，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于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奸说过半句话，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共”，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寇汉奸保存得好好的。敌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蒋介石的祖坟。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由此看来，对于蒋介石及其一群的军事政治发生“纷纷议论”的人们，究竟是“莫明其妙”呢，还是已明其妙呢？这个“妙”的出处，究竟是“敌寇汉奸造谣作祟”呢，还是在

蒋介石自己及其一群的身上呢？

在蒋介石的演说中，还有一项声明，就是他否认中国将有内战。但是他又说：“决没有人再敢背叛民国，破坏抗战，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在这里寻找内战的根据，并且他是找着了。有记性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一九四一年，正当中国叛卖者们宣布解散新四军，中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的时候，在蒋介石的一次演说中，曾说：将来决不会有“剿共”战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讨伐叛逆的战争。读过《中国之命运》的人们也会记得，蒋介石在那里曾说：中共在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勾结”过汪精卫。一九四三年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上，又给中共安上了“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八字由头。现在又读了蒋介石这篇演说，就使人们感觉内战危险不但存在，而且在发展着。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1]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2]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他已

---

[1] 庞炳勋，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良诚，曾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陈孝强，曾任国民党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他们于1942年、1943年间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

[2] 山西的决死队，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抗日战争初期，由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组建和领导的山西人民的抗日武装。

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

蒋介石的演说在积极方面空洞无物，他没有替中国人民所热望的改善抗日阵线找出任何答案。在消极方面，这篇演说却充满了危险性。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我们诚恳地希望他改变作法，因为他现在的作法是绝对地行不通的。他已宣布“放宽言论尺度”[1]，就不应该以相信“敌寇汉奸造谣作祟”的污蔑之词来威胁和封闭人们“纷纷议论”之口。他已宣布“缩短训政时期”，就不应该拒绝人们改组政府和改组统帅部的要求。他已宣布“用政治方法解决共党问题”，就不应该又来寻找准备内战的理由。

---

[1] 1944年以来，要求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保障言论自由，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的普遍呼声。国民党为了搪塞人民的迫切要求，1944年4月，宣布所谓“放宽言论尺度”；5月，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又宣言“保障言论自由”。但是国民党被迫所作的这些表示，事后一点也没有兑现，其压制人民言论的措施，随着人民民主运动的高涨而层出不穷。

关于建立豫西根据地的部署[1]

（1944年10月14日）

郑、李、任、陈：

申艳电悉。（一）八路军第一批南下部队两个团[2]在皮定均（司令）、徐子荣（政委）率领下，已于一个月前在新安以北渡过黄河，申陷进至登封、临汝、禹县地区大峪店东西箕山一带。现正从事建立根据地，并分向各地活动中。尚有后续部队正从新安以北渡河南下。洛阳、伊川、宜阳一带已有地方党员所组织的游击队进行活动。群众对我军进入河南极为欢迎。敌情与顽情亦不十分严重。（二）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刘子久、陈先瑞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3]，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郑位三、师长李先念、副政治委员任质斌和中共鄂豫边区委副书记陈少敏的电报。

[2]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太行军区第三团和新编的第三十五团，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1944年9月初，该支队在皮定均、徐子荣率领下挺进豫西，在箕山与嵩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3] 为增强豫西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第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和警备第一旅第二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1944年10月底，组建河南军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戴季英任政治委员，刘子久任副政治委员。陈先瑞当时任豫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王、戴、刘、陈等在一个月内可从延安起身。中央派到五师的部队及大批干部亦可同时起身。（三）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

军委
酉寒

军委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致邓小平、滕代远等电[1]

（1944年10月14日）

邓、滕同志，并告山东、平原及五台：

申感电悉。华北有纵横六条大铁路，有连云、青岛、塘沽三个军商港，有公路如网，有冀鲁大平原（利于大兵战场），有东北依靠，有日本本土屏障，交通便利，空海易与陆军配合，在苏联不出兵满洲条件下，是日本陆军在大陆决战最理想战场，在华南因日之海空均劣势，运输困难，内地交通仅粤汉路而被破坏，将来盟国在粤闽登陆，日军可能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抵抗，以拖延时间，华北可能成为主要的决战战场，然而使敌最感头痛的，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民兵游击队，这些抗日力量，不仅直接危害日军作战，而且是英美在华北登陆最好帮手，因此在决战开始前，可能在华北还有一时期最严重的扫荡与摧毁，我们应有此准备。但目前日寇忙于准备美在菲岛登陆，隔断南洋，力求迅速打通安桂交通，华北敌军减弱，伪军动摇，我在可能条件下，应乘虚尽量消减伸入根据地内之伪军、顽军及敌军小据点，扩大根据地，但一般的暂时不打交通要道及较大城市（敌人扫荡时破袭交通要道与袭击较大城市在外）。充实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准备对付决战前敌人严重扫荡给邓小平、滕代远并告山东、平原及五台的电报。

现有小团，健全游击队，加强民兵组织，利用冬寒认真练兵。新发展区域及减租减息未深入地区，继续深入减租息斗争。减租减息已深入地区，注重各种生产，改善军民生活，巩固军民团结与社会团结。在太行北岳山区努力增加子弹、炮弹、手榴弹、地雷、无烟抛身〈射〉药及炸药生产，隐蔽储存，以为将来严重不能生产时用。对伪军上下层工作均须加紧。这些工作做好，就是预见困难，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条件。以上意见，望斟酌实施。

军委　毛　朱

酉寒

在董必武、林伯渠来电上的批语

（1944年10月19日）

九月下半月至十月上旬，蒋对罗、丘压力，硬抗了几个星期。在此期间，对我方亦表示硬性。但在双十演说出了一通气之后，又软下来。对美国软，对我方亦随着软些。邵力子召集的国、共及中间三方会议，决定派五参政员来延及要求延安停止骂蒋等，即其表现。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许蒋存在条件下，可以作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对即将去前线干部的讲话[1]

（1944年10月25日）

一

中国的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今年四五月间到现在变化就更大。国民党反共，抗战不积极，贪污腐化，没有一点希望了，政治、军事、经济都没有希望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人民都仰望着我们。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就是改良方针，不是打倒它，因为日本人还在我们面前。现在的口号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中央就是这个政策。从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地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讲团结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关于审干、反特务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毛泽东总结讲话的一部分。

二

共产党要团结各阶层人士。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党内也要加强团结。山头主义在今天才指出来，没有早些指出来，这是我的责任。

三

审干、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抢救运动”有错误，错误是夸大了问题方面，但不能说是路线错了。

四

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困难。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上我讲的，就是一个原则，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解放！

1944年，毛泽东和杨尚昆（中）、陆定一（左）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和聂荣臻、李富春、彭德怀、陈毅、刘少奇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和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和博古在延安。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

（1944年10月30日）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2]和秧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

[2] 秦腔，又名梆子腔，是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戏曲。

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1]，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

---

[1] 参见《论语·子路》。

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对随军南下干部的讲话[1]

（1944年11月1日）

要学会两种本领，头一个是松树的本领，第二个是柳树的本领。松树发育成长，不怕刮风下雪，严寒之下也能巍然屹立。松树有“原则性”。柳树插到哪里都能活，一到春天，枝长叶茂，随风飘荡，十分可爱。柳树有“灵活性”。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松树的“原则性”和柳树的“灵活性”，缺一不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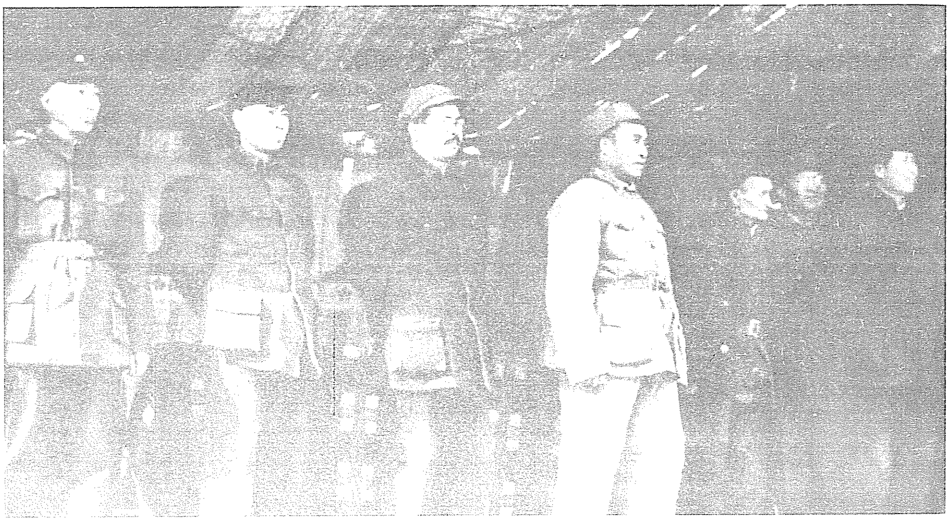
[1] 南下支队由三五九旅抽一部分主力部队，由中组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由王震担任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全支队分编为六个大队，其中第五、六大队由随军南下干部组成，于1944年11月9日告别延安南征。这是毛泽东对随军南下干部的一次讲话的一部分。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上讲话。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上讲话。

1944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聂荣臻等出席八路军南下支队誓师大会。

1944年11月，毛泽东和陈毅在一起。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等检阅八路军南下支队。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检阅八路军南下支队。

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

（1944年11月2日）

饶、张、赖：

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2]，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3]带两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

（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4]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

（二）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三、二、四各师调五至六个团南进。

（三）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

（四）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具体布置。

（五）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

---

[1] 这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给新四军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的电报。

[2] 1944年夏，美军为抗击日军，准备在中国杭州湾附近登陆，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配合。但到日本投降为止，美军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

[3] 粟裕，当时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4] 谭震林，当时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委员。

区、苏南各区）作具体布置。

以上各项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哪些应急，哪些应缓，请提出意见。

毛　刘
戌冬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1月6日）

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他给以小的东西，加以限制，而得救命的大益。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赫尔利来延安谈判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和赫尔利的谈话[1]

（1944年11月8日）

我们欢迎赫尔利将军到延安，并感谢赫尔利将军帮助中国团结抗战之热忱。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2]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但是要团结必须有民主，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现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打得很好，唯有中国正面战场上打得不像样子，这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现在赫尔利将军到来，帮助中国人民一手，促进中国民主团结，我们极表欢迎。尤其是在今天，日寇

---

[1] 赫尔利（1883—1963），美国陆军少将。1944年9月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同年11月7日带着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题为《协议的基础》的文件飞抵延安，在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进行了3天的会谈后，表示赞同中共关于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双方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但是，蒋介石拒绝这个“协定”，赫尔利即跟着变卦，支持蒋介石的意见，背弃他在延安的诺言。以后，赫尔利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在国共两党多次接触和谈判中，他总是企图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并于1945年4月2日发表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只同国民党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本篇是毛泽东和赫尔利第二次谈话的一部分。

[2] 包，指包瑞德（1892—1970），美国陆军上校。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美军观察组组长。

向中国西南进攻，美军打到菲律宾需要中国配合，但国民党当局所负责的正面战场却天天打败仗。中国人民和盟国朋友都非常着急，希望经过赫尔利将军的努力帮助，中国局势能有一个转机，就是从破坏团结、破坏战斗力、破坏民主、和同盟国[1]关系搞不好的方向，转变到加强团结、加强战斗力、加强民主、和同盟国关系搞好的方向。经过赫尔利将军帮忙，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全中国人民都会感谢的。

今天上午赫尔利将军说要自由的、公开的、坦白的谈话，现在我就按照你所提的方法来谈一谈。

1944年11月7日，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欢迎赫尔利。

直到现在国民党还是一个大政党，拥有庞大的军队，这个军队

---

[1]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在抗战头两年打仗打得比较好，现在总算也还在打日本，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最后破裂民族团结，这是蒋介石先生所领导的党和政府好的一方面。因此，我们一向愿与蒋先生合作打日本，我们从未放弃过这一条。但是，还应当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中国的困难、缺点与严重危机。如果不看到这方面，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直到现在还是如此，希望有所改变）是不利于全中国人民的团结的，是妨碍全国人民起来打日本的。

中国现在分为三个区域：敌占区，中国共产党人与非党人士所领导的解放区，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

对于第一种区域，即敌占区，国民党当局是不管的；对于如何在这个地区内组织地下军以期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国民党当局也是不管的。

对于第二种区域，即解放区，国民党当局则是拼命妨碍、限制、缩小、消灭的，但是解放区还是天天生长。你看解放区为什么这样广大，这就是八年来广大人民艰苦战斗的结果。他们前面要打日本，同时后面又有国民党破坏，他们是处于被前后夹击的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关于国民党如何对解放区施行包围、进攻和派遣特务捣鬼等等，可以说是千方百计，一言难尽。

在第三种区域，即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尤以军事危机为甚。自今年四月起，在日寇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已由二三百万减至一百九十五万。大部分国民党军队是打不得仗、一触即溃的。在大后方，民不聊生，土匪横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从未有像今天这样低，各界人民包括大学教授、学生、小党派人士以及国民党员，都对当局不满和怨恨。

以上就是中国三个地区的概况，希望盟国朋友能了解真相。

现在日寇进攻中国西南，美军打到菲律宾急需中国配合，我们怎样才能很快解决问题，来团结全中国一切力量，配合盟国迅速打败日本，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国？上午赫尔利将军说，美国要增加一点力量，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中国人民对此非常高兴。

关于如何解决，赫尔利将军曾提出几个要点[1]，希望作为形成协定的基础。我们感觉还有这样一些问题，虽然还没有形成条文，值得提出来谈一谈。

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政府。同时，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必须有所改变，而代之以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政策。

这一改革之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挽救国民党直接统治的区域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严重危机。解放区虽然非常困难，但是没有危机。如果不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就无法振作大后

---

[1] 赫尔利带来的《协议的基础》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

方军队的士气，就无法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总是埋怨盟国军火接济不够，可是如果政府不改组，老的政策不改变，虽有大量坦克、飞机等新式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国民党统治的各种机构，腐败达于极点，改组政府，首先是为挽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如果国民党自以为大权在握，不肯改变，人家有什么办法？可是它自己的危机，便会无法挽救。

关于“政府民主程序”一点，我感觉似乎首先应当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改变政策。可是蒋先生历次所表示的，却是想拖，拖到战争结束后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有人向他提出改组政府和成立联合政府，他便一巴掌打回去。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使国民政府有崩溃之危险。对于这一危险，不只我们共产党人，就是外国朋友，如许多外国记者，都是感觉到的。

因此，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

现在看一看我们共产党人如何工作。

在沦陷区，我们组织地下军，准备配合盟军作战。

在解放区，我们进行公开工作，组织人民，实行民主，坚持抗战。我们从不妨碍国民党，而国民党却来妨碍我们的抗日民主活动，在一百九十五万国民党大军里面，有七十七万五千人被用来包围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在进攻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用一切力量对日作战。

在国民党区域，当局见到共产党人，非捉即杀。从一九三九年起，我们在那里的党便被迫成为地下党。只有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少数共产党人还被允许公开工作，在西安也只有少数共产党人可以公开活动；在大后方其他各地，我们的党都被迫

在地下工作。虽然如此，我们一不罢工，二不罢市，三不罢课，我们还是拥护国民政府打日本。

因此，我愿重说一遍：国民党统治区域危机的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共产党的存在。

相反的，我们在敌后战斗的六十三万军队和九千万人民，拖住了日寇的“牛尾巴”，这样保护了大后方；假若没有这个力量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国民党早被日寇打垮了。今年六月间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取消我们军队百分之八十，还要取消解放区的民选政府，这方案如果实行，就没有人拖住日寇的“牛尾巴”，就只有害他国民党自己。

上午赫尔利将军所提的要点中，有一条说改组我们的军队，说在改组后我们的军官和战士将获得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和津贴。这一条主要地恐怕是蒋先生自己写的。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1]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美军观察组[2]，在参观陕甘宁边区、晋西北、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我们在敌后有几十个根据地，大的有十七个。我们愿意你们组织几百个人的观察组，到各根据地去看看来做出结论，应当改组的究竟是哪一种军队。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关于薪饷待遇，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饥寒交迫，走路都走不动，士兵月薪五

---

[1] 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区总司令。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驻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政治、经济、军事情况的调查组，该组的第一批人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于1944年7月到达延安。

十元，只够买一包纸烟。我们的军队，吃得饱，穿得暖，走起路来蛮有劲。现在要我们拿同国民党军队一样的薪俸，那不是要我们军队也和他们一样吃不饱、穿不暖，走路都没有力吗？这如何使得呢？

我们的意见大要如此。对赫尔利将军为了帮助中国而不辞劳瘁长途跋涉的热忱，我们在延安的人们深表感谢。关于中国三个区域的实况，我们感觉到有告诉你的必要。

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的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

我很愿意和蒋介石先生见面，过去有困难，没有机会，今天有赫尔利将军帮助，在适当时机我愿意和蒋先生见面。

1944年11月，毛泽东、朱德在延安会见赫尔利。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

电贺罗斯福当选连任

（1944年11月10日）

罗斯福总统阁下：

获悉阁下连任总统，谨致祝贺之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延安协定草案

——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1]

（1944年11月10日）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

---

[1] 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和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于1944年11月10日12时45分在延安王家坪签定的协定草案。

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中国国民政府主席　蒋中正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代表　赫尔利
（见证人）　（签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　日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二时四十五分毛、赫双方在延安王家坪签字）

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1]

（1944 年 11 月 10 日）

罗斯福总统阁下：

我很荣幸地接待你的代表赫尔利将军。在三天之内，我们融洽地商讨一切有关团结全中国人民和一切军事力量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的大计。为此，我提出了一个协定。

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我们一向愿意和蒋主席取得用以促进中国人民福利的协定。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

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一致通过这一协定的全文，并准备全力支持这一协定而使其实现。我党中央委员会授权我签字于这一协定之上，并得到赫尔利将军的见证。

我现托赫尔利将军以我党、我军及中国人民的名义将此协定转达于你。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

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

---

[1] 这是毛泽东就《延安协定草案》的签订和感谢罗斯福及其代表赫尔利为中国的团结统一作出的努力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写给罗斯福的信。

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于延安

1944年，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右起：马海德、博古、朱德、毛泽东、任弼时、李富春、张闻天、聂荣臻。

华南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广西与南路[1]

（1944年11月14日）

林平同志：

（一）同意戌真电[2]所述各项。（二）特别注意西江，迅速向桂林、柳州发展，以便明年能和湖南部队（对外守秘）向桂林南进部分取得联系，好输送干部给你们，因此派往西江的部队及干部能多一点为好。你们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向广西与南路[3]。（三）嘱咐去琼崖的人将中央对冯白驹[4]同志及其整个部队致慰问之意带去，并告诉他们的任务有二：第一，派得力部队向南路发展，和你们取得联系；第二，占领整个琼崖。（四）你们须办一大的训练军事、政治与地方工作干部的学校，短的几星期，长的三四月毕业，分批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的电报。

[2] 指1944年11月11日林平给周恩来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该电汇报了广东军政委员会和中共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情况，决定派干部到中区、南路、西江工作，成立珠江三角洲指挥部，成立中区军分委，派人与琼崖纵队联系等事项。

[3] 南路，指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部队是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

[4] 冯白驹，当时任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训，主要向广西方向派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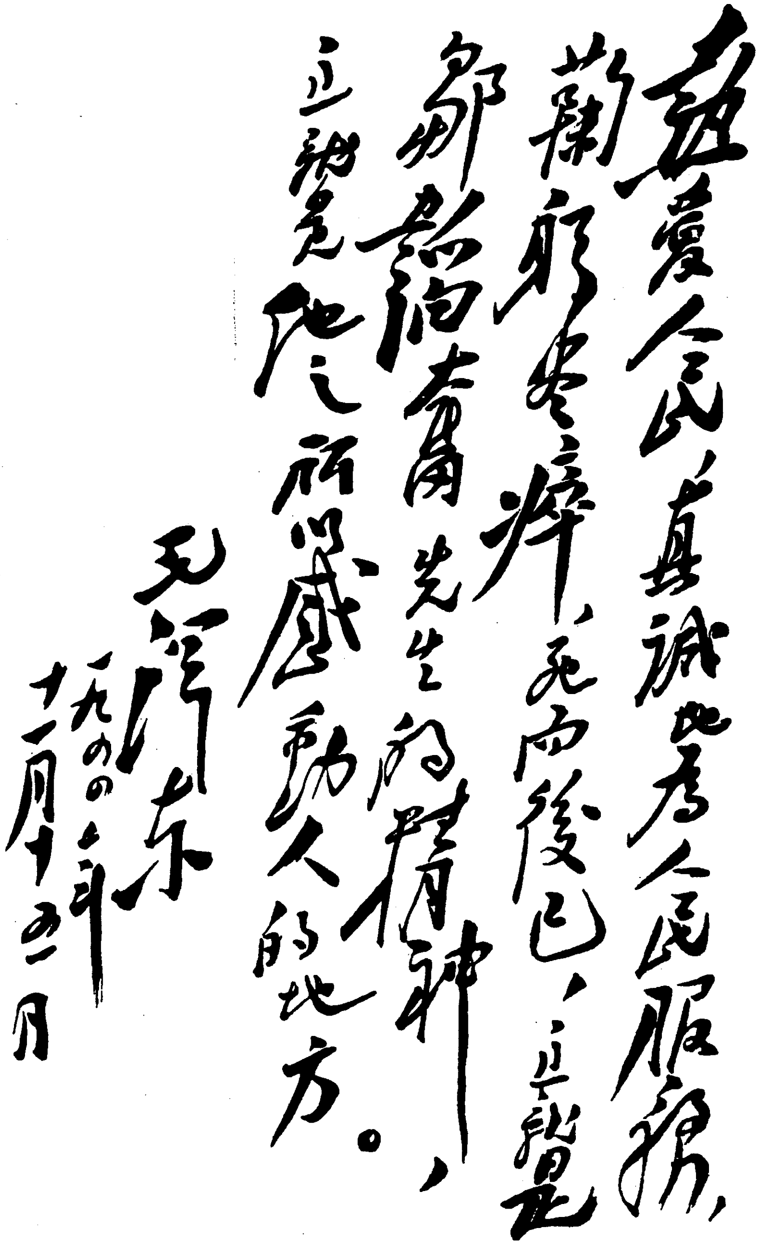
中央
戌寒

为悼念邹韬奋逝世题词

（1944年11月15日）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後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

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为悼念邹韬奋逝世的题词。

在一份关于反奸斗争的政策情况通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4年11月15日）

我们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及九条方针的原则，不警惕不严肃的右倾思想是不对的，不谨慎不精细的“左”倾思想也是不对的。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1月19日）

我们总的方针是抗日统一战线，军事战略以抗日为主。统一战线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是自卫原则，有利是局部原则，有节是暂时原则。关于干部问题，城市工作干部原则上要派，但主要的还是从本地找。整个大后方的绝大多数党员是可靠的，要破除认为很多党员是不可靠的“左”的观点。有少数不可靠的，还要加以分析，要在斗争中进行考验。总之，需要有两种态度：一是严肃态度，二是谨慎态度，防止“左”的或右的观点。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取戴季英、王树声的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给郭沫若的信

（1944年11月21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1]，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2]，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

---

[1]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2]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己1910年至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1929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反正"，指辛亥革命。

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给柳亚子[1]的信

（1944年11月21日）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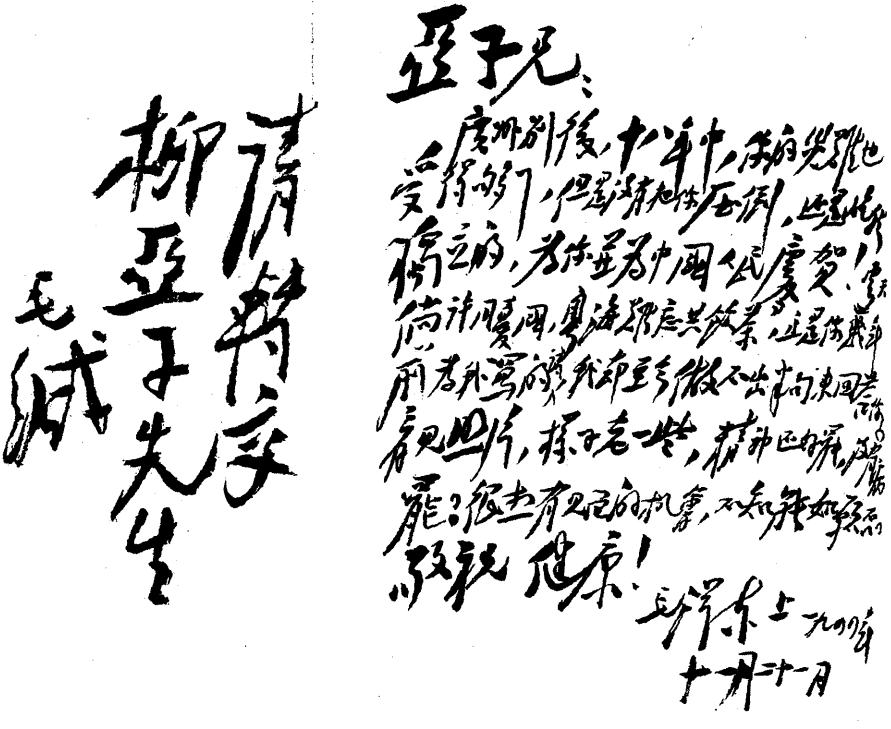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1]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1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请转交
柳亚子先生
毛缄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的诗。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的手稿。

给沈雁冰[1]的信

（1944年11月21日）

雁冰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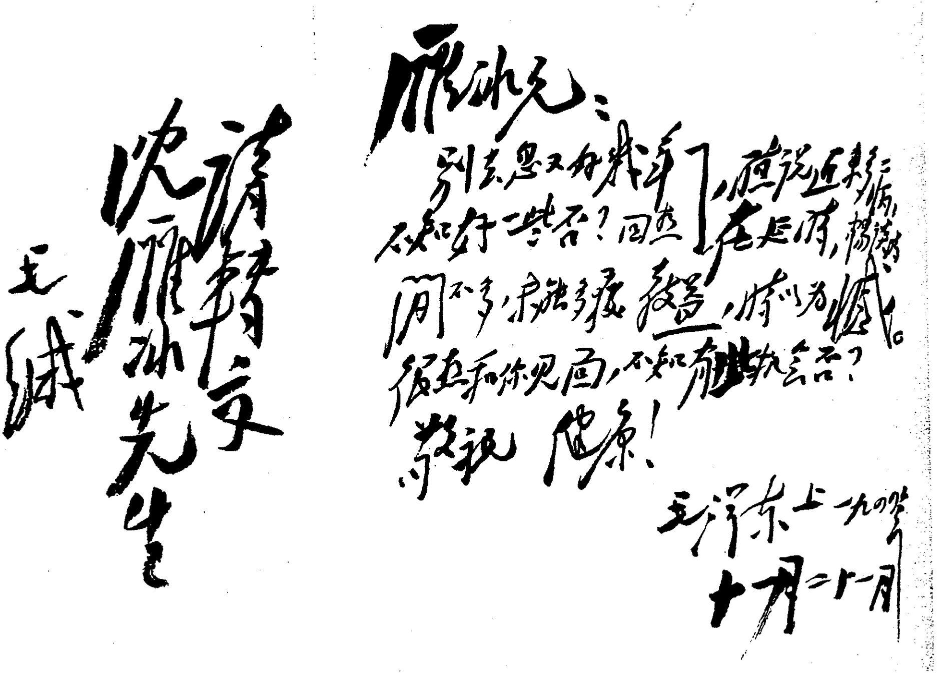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1] 沈雁冰（1896—1981），又名茅盾，浙江桐乡人，文学家。1940年5月曾到延安，并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忆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一九四五年
十月二十一日

请转交
沈雁冰先生
毛缄

毛泽东致沈雁冰信的手稿。

在周恩来同赫尔利会见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44年11月21日）

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民党党政人事调动*

（1944年11月22日）

桂林、柳州失陷之后，日寇继续向黔边窜犯，正面战场的军事危机愈益严重，而政治经济种种方面的危机亦随军事的挫败而更加深刻化；国内广大人民及盟邦舆论不断严厉批评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并一致要求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成立包括各抗日党派军队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作为挽救危局加强抗战争取胜利的起码步骤。国民党当局此次局部地更动政府人员，乃是今日国民党统治方面危机深刻化的反映。时至今日，国民党当局不能不顾及国内人民的愤懑及盟邦舆论的指责而撤换众矢之的的何应钦、孔祥熙、陈立夫，以图缓和各方面的批评。但是，就是到了局势如此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仍未能下彻底改弦更张的决心，依旧想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的寡头统治。因之，此次更调不能不是表面的，不彻底的，用以敷衍一时的。何、孔、陈虽然失去了军政、财政、教育各部部长的职位，但是依旧在国民党党政军中央机构中占领着枢要地位：何应钦依然还是职掌军令大权的参谋总长；孔祥熙依然是行政院副院长，他对财政部的影响依然存在着；陈立夫转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依然控制着国民党庞大的党务机构。继任人选，并没有脱离国民党右翼集团的圈子，不特国民党外的其他党派没有加入政府，即国民党内较有自由主义色彩之孙科、宋子文等，亦没有增

加其在政府中的作用。这样，这次人事更动只是国民党当权集团内的职位更调，而这种更调是不可能真正有助于克服当前的严重危机的。要克服日益严重的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种种方面的危机和加强抗战争取胜利，只有一种方法，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所早已主张的彻底改组政府和统帅部，将一切反民主派、失败主义者、法西斯分子，从政府与统帅部中肃清，吸收真正能够代表人民利益与抗战利益的各党派、各军队的人物，组织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且一定要彻底改变政府的各方面的政策。只有这一办法，才有可能挽救大后方的危机。但是很可惜，国民党当局至今还没有这种决心。显然，这次政府人事更调，离全国人民这一要求，还相距十万八千里。如果国民党当局再欲拖延时日，不愿服从人民向它指出的正确道路，那么，危机只会一天一天地更加严重起来，甚至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这已经是十分明白的趋势。或者让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者彻底改变错误方针，这就是摆在国民党面前的两个方向，何去何从，惟国民党自择之。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1月23日）

来一个协定，去一个协定，现在又来一个协定，我们坚持同赫尔利在延安签订的协定是有道理的，现在蒋介石不同意，要发动一个尖锐的批评。我们开七大宣布组织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是一个步骤；另外一个步骤是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时不搞，还是提成立联合政府。可调一些人到广西、广东去，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华中来电决定向南发展基本上可同意。还要准备几千干部到满洲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国共两党谈判、国内形势等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复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电[1]

（1944年11月24日）

张、饶、赖[2]转浙东纵队诸同志：

代表大会来电阅悉。望努力杀敌，发展武装部队。扩大解放区，改善解放区军队与人民的生活，准备配合盟军驱逐日寇。

---

[1] 1944年9月25日至11月5日，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在慈溪洪魏（后在余姚袁马）召开。会议听取了谭启龙关于《目前形势与我军今后的任务》的报告和何克希关于第二次自卫战争的总结。大会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致敬电。1944年11月24日，毛泽东给浙东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复电。

[2] 张、饶、赖，指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

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1]

（1944年11月24日）

宣言草稿及八月决议均阅悉，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宣言在加上几句桂、柳[2]失陷情况及号召广西人民起来斗争之后，即可发表。八月决议应在干部中进行讨论，求得大家了解，坚决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江军政委员会诸同志电的主要内容。

[2] 桂、柳，指桂林、柳州。

致周恩来电[1]

（1944年11月25日）

请与有关朋友商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事，并考虑有无办法来延，你回延后准备即开七大，并接着不很久即开解联。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讲话

（1944年11月）

有的同志脑袋像个西瓜一样，西瓜表面是绿的，很纯净没有什么，但是切开一看，都是旁的颜色，红瓤黑籽，啥都有。有人表面看挺好，脑袋里装着自私自利，有封建迷信……这些复杂的观念是我们的包袱，就是敌人。

给陈毅[1]的信

（1944年12月1日）

陈毅同志：

来示[2]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3]，周、董[4]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

[1]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 1944年11月21日，蒋介石在拒绝赫尔利同毛泽东11月10日在延安签署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后，提出另一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允许中共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草拟了一个复案，毛泽东将此复案批送中央负责人和陈毅等阅看，征求意见。陈毅在看了复案和研究了有关材料后，于12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分析了国共谈判的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蒋介石不会走真正同共产党合作的这条路，而是要照他提出的协定办，因此建议中央暂不交复案，拖一段时间，等待蒋介石集团力量的削弱，同时在此期间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3] 复案，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蒋介石1944年11月21日提出的国共之间的协定草案的答复。

[4] 周，指周恩来。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周恩来、董必武在收到毛泽东1944年12月1日关于暂不交复案，“请周、董同时回延”的电报后，于12月7日回到延安。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1]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2]公开后，伯承[3]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4]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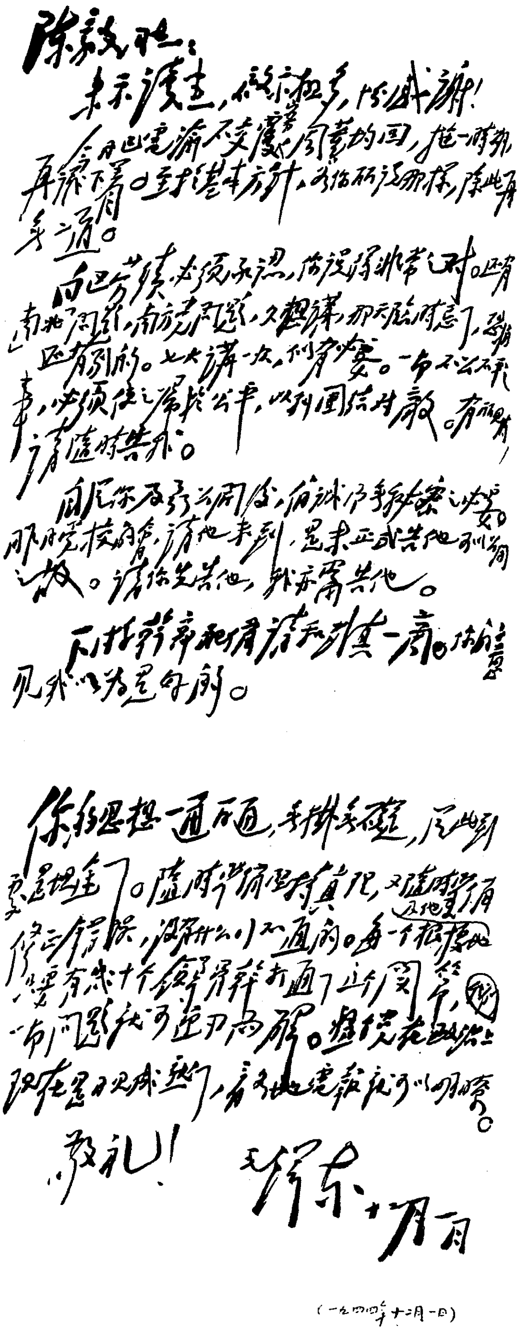
---

[1] 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中，特意补充讲了南方、北方问题，大后方党的问题和白区工作问题。参见《时局问题及其他》中后半部分内容。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3]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4]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陈毅同志：

来示读悉，启示极多，深感谢！

今日已电饶不交党（会）同意的回电，推一时期再谈下着。至于将来方针，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它道。

前已答复，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关系，南方党问题，又想讲，那天临时忘了，说明区有别的。七大讲一次，仍有必要。一切不公不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有所闻，请随时告我。

周恩来及所有同志，何必你每次会议必到。那时党校的会，请他来到，要求正式告他列问之故。请你先告他，然后再告他。

下指新章和信，请再阅一遍。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可用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学得坚持真理，又随时学得修正错误，没有什么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风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有了这些继续发展可以明瞭。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毛泽东致陈毅信的手稿。

给谢觉哉[1]的信

（1944年12月1日）

觉哉同志：

此件[2]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

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3]，我想对内对外都是会有好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这一点以及此次参议会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请告高、林、罗[4]诸同志。

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

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

---

[1] 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 指谢觉哉起草的他准备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参议会常驻会工作报告。这次参议会在1944年12月4日至19日举行。

[3] 毛泽东1944年12月2日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

[4] 高，指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林，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罗，指罗迈，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在我们的这类文件上，不宜提及苏联宪法，免人误会。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复周恩来电[1]

（1944年12月1日）

复案已到，目前不宜交去，应坚持五条协定，俟七大开后再议复案，如交复案过早是不利的。因此，请周、董同时回延，并告赫尔利周不能原机返渝。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1]

（1944年12月4日）

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分局等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4年12月4日）

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王震、王首道2日关于“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的请示的电报的主要内容。

和包瑞德的谈话[1]

（1944年12月8日）

委员长向我们提出的那三条建议的主要点是，共产党的部队必须服从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改编”。这意味着把我们的军队完全置于委员长的控制之下，其结果将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我们的军队裁减到任何数目。此后，我们就将处于听任他摆布的地位。

这不啻是完全投降的交换条件，总共才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名额，但是这个委员职位是毫无意义的。冯玉祥将军和李济深将军当年都是显赫的将领，他们也是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但他们对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毫无影响可言。实际上，整个军事委员会已经长期没有开过会了。

赫尔利将军说，如果我们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这个席位，我们将能看到一切军事报告，从而可以获悉政府的各项措施，而且我们亦将处于影响政府决策的地位。我们谨此表示难于苟同赫尔利将军的意见。我们明确告诉他，虽有一位共产党人参与全国军事委

---

[1] 1944年7月22日，首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在组长大卫·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一架美国空军的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1944年12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同包瑞德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包瑞德（1892—1977），美军观察组组长，1917年包瑞德加入美国陆军。1924年，包瑞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助理武官，同时学习汉语，成为美国军队的“中国通”。

员会，但他对该会的工作的了解绝不会比局外人多，而且他在该会也不可能有比局外人更多的发言权，我们深知我们谈到的那种情况。

赫尔利将军还说，接受了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席位，将使我们“有一只脚进了大门”，以此作为起点，将使我们的地位的重要性扩大，从而加强我们的影响，以达到如下之程度：最终我们将控制整个政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根本错误的概念。但是，我们未能说服赫尔利将军相信这是错误概念。我们所能说的一切乃是，如果双手被反捆着，“有一只脚进了大门”是毫无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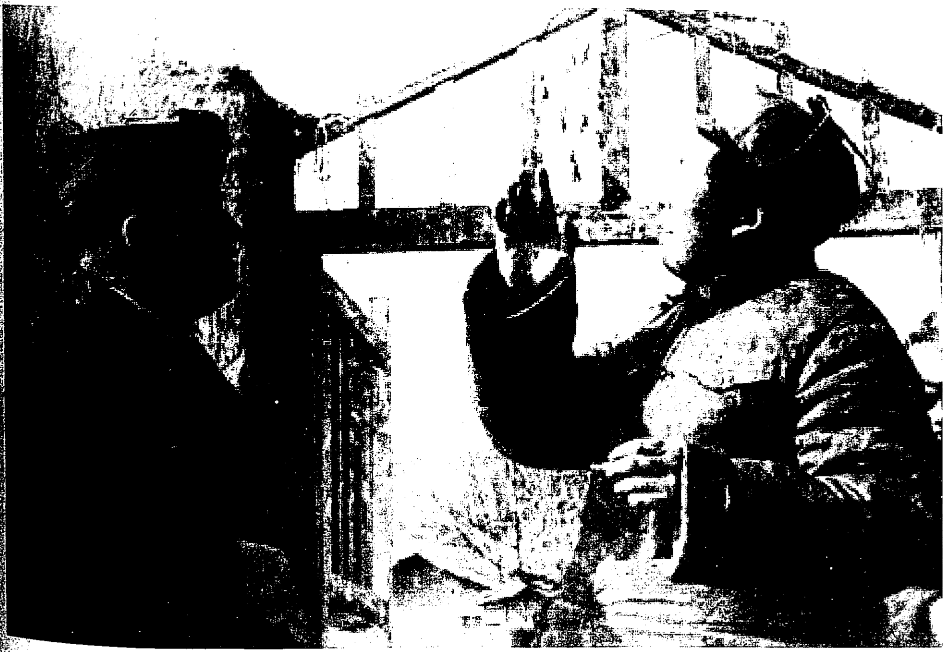
赫尔利将军、魏德迈将军以及麦克卢尔将军曾对周恩来将军说，美国渴望在军事上同我们合作，但是，在我们能够给予这一合作——这是我们非常乐于提供的——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委员长的条件。然而，美国并没有向我们提供在这些条件下有关我们安全的绝对保证。我们感到我们不能合乎体统地要求美国给予任何这类保证。实实在在说，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不能相信美国能够对我们的安全给予保证，不论它可能是何等诚挚地渴望这样做。我们不可能信任这位委员长具有良好的信义。任何人只要没有偏见地研究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历史，都会通情达理地想到我们不会对他寄予任何信任。

我们发现美国的态度有点令人迷惑不解。赫尔利将军来延安时询问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于是，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建立联合政府。赫尔利将军也同意那些条件显然是很公平的，而且，事实上五点建议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他的建议下提出的，但那个委员长却拒绝了这些条件。现在美国又那么认真地要求我们接受需要我们牺牲我们自由的反建议，这是我们难于理解的。

我们还被告知说，我们牺牲自己以挽救局势，那是高尚的事

情。但我们看不出，我们把自己置于听任蒋介石摆布的境地时，又何以能有助于挽救当前的危机。赫尔利将军还说，如果我们让步了，我们将赢得世界上的赞扬。但是，如果我们听任这个委员长捆住我们的手脚，世界上的赞扬是帮不了我们什么忙的。

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们同委员长达成协议，他就能给我们武器，他就能派美军军官来帮助我们练兵，并同我们一起工作。我们衷心欢迎这类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如下代价，即委员长要求我们接受这种援助时，须经他点头批准。我们认为，美国应该充分认识下列事实：如果我们放弃了我们唯一的自卫手段——我们的军队，我们就不得不屈从那位委员长所能够并将要强加给我们的各种限制；如果到了这个田地，我们简直就没有什么可以同你们合作的手段了。



1944年，毛泽东和包瑞德在一起。

毫无疑义，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愿意参加政府。但事实上向我们提出的条件就不给我们参加政府的机会。我们重复说一遍，如果双手被反捆着，一只脚进了大门是没有用处的。

要求我们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而在很大程度上应对当前危机负责的那个委员长却不被要求做点牺牲，这看来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承认我党的合法性没有任何牺牲可言，我们也不能认为那无济于事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给我们一个席位是一种牺牲。

无论魏德迈将军可能是何等真诚地渴望给我们援助，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委员长的条件，他就不能够援助我们了。我们希望在同日本人作战中和美国合作，我们希望在当前危急的形势下也伸出我们援助的手，而我们也需要美国所能给予我们的一切援助。但是，全盘工作都被这个委员长所妨碍了。我们已经提出了一项合理的解决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我们接受美国的援助当不会成为问题。但是，我们的条件竟被这个委员长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而且他还妄图要把责任推到我们肩上。

美国认为蒋介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保留其执政，我们并不反对这一政策。只要他同日本作战，我们就完全乐于赞成他继续当领导。然而，我们也并不打算放弃在全国军事委员会应分配给我们的那个席位的权利。

如果看看蒋介石的过去，美国希望继续支撑那腐朽的框架——蒋介石，那是美国自己的权利。但是，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够做它所要做的一切事情，蒋介石是注定要失败的。难道魏德迈将军认为在实现他的各项建议时蒋介石将会给予全心全意的合作吗？当然他是办不到的。史迪威将军已经知道在军事行动中可以依靠蒋介石的程度有多大。且看美国继续支持蒋介石吧，直到他把昆明、贵

阳、重庆、西安、成都等都丢光，到那时也许它才会认清，支持他是完全无用的。

我们不像蒋介石，并不是必需其他国家的支持才活得下去。我们能够顶天立地，像一切自由的人民一样行动自如。

虽然这个委员长有许多缺点和短处，我们认为他还没有同日本人谈和，我们对此深表感谢。不过话得说回来，唯有乌龟王八蛋才会拒绝同日本作战的。

根据五点建议，我们相信，在美国的帮助下，对于挽救当前的形势，我们还能做出一定的贡献。我们愿意在同日本的战斗中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相信，魏德迈将军知道我们能够做出什么帮助，如果我们得到允许的话。但是，我们不能被捆着手去打仗。我们完全愿意服从以蒋介石为领导的政府的指挥，如果我们在这个政府内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全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席位将不会让我们有发言权的。

如果美国同我们分手，我们固然感到很遗憾，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你们的友好情谊。我们将在任何时候，在目前或在将来，抱着感谢的心情接受你们的援助。我们将不附带任何条件，同美国将领的指挥合作，万众一心，尽自己的责任。这就是我们对你们所怀有的情谊。如果你们在中国的海岸登陆，我们就将在那里接应你们，并且同你们的指挥合作。

我们已经迎来了美国陆军观察组，而且我们已经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同他们合作。如果这个组继续留在延安，我们将感到高兴；如果撤离，我们将感到惋惜。如果他们撤离之后再回来，我们将再次欢迎他们。如果美国不给我们一支枪，一发子弹，我们仍将继续打击日本人，而且我们也仍然是美国的朋友。

我们在没有任何外来的援助下已经同日本人战斗了七年，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将继续战斗下去。如果美国不援助我们，还有英国和苏联会援助我们。（包瑞德按：我说明，根据我个人的意见，他们不可能指望英国会给他们很大的援助；他们对此没有作答。我没有就苏联的情况发表我的意见。）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并没有向赫尔利将军交代清楚，那五点建议就是我们的最后答复。上校又说，他认为赫尔利将军把那五点看作是我们的“讨价”。而那五点就是我们的最后条件，其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所要作的一切让步。我们在同意接受那个委员长为领袖时作了让步；我们在同意让我们的军队接受统一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时作了让步；我们还在美援助物资分配方面让了步，我们只是要求获得公平的份额，不能一无所得；此外我们并没有要求别的东西。我们不能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了。

我们完全知道，赫尔利将军不能担保那个委员长会接受五点建议。我们知道，他仅说过以下的话，那些条件是公平的，他将尽他最大的努力使那个委员长接受那些条件。但是，蒋介石拒绝了这些公平的条件后，我们并不期望赫尔利将军再来延安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同意需要我们作牺牲的反建议。

如果美国不能理解我们就一旦接受了蒋介石的绝对控制时我们将遭到的处境的预料，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全都白费力气了。周恩来将军在重庆时，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向赫尔利将军说明这一点。如果赫尔利将军到现在还不理解，恐怕他永远不会理解了。周将军再去重庆把这些问题同他重谈一遍也将不会起作用的。

由于蒋介石已经拒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而我们又决心不再让步，所以我们也已经下决心采取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我们正向我们

控制下的各地区的国民参政会建议，组织代表各该地区的联合委员会，我们将寻求国民政府承认这个团体，不过我们也不指望将会获准。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将是组织另一个政府的初步措施。

周将军在重庆的时候，没有把拟议组织这种联合委员会的计划告知赫尔利将军。这一措施经过长时期的考虑，不过在周将军返回延安之前，他没有获悉这一措施已经肯定下来了。

包瑞德上校说，我们现在采取的立场是把谈判的大门关住。是的，我们已经把门关上了，但我们让窗户开得大大的。那五点建议就是窗户。我们将乐于在今天、明天甚至后天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但是，到了大后天，等到重庆、昆明、贵阳、成都、西安都丢光了，我们就将不会按照我们早些时候提出的那些条件去参加了。

上校，你大概还记得，十一月十日在赫尔利将军即将动身离开延安之前，他和我在那份由我们起草并按他的建议作了某些修改的条款上签了字，在那份条款上我们愿意同国民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是他建议我们签字以示我们经考虑认为这些条款是公平的。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份文件连同签字向中外报纸公布的时机总会到来的，虽然我们非常不高兴这样做。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2月9日）

一、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有四个目的：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这四个目的要鲜明地提出。二、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三、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1]

（1944年12月12日）

若飞同志：

（一）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恩来）致赫（尔利）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尔利）在五条上签字及赫（尔利）毛（泽东）交换信件，我们自始无发表之意。我们所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建议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无法实现中国人民一致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开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点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

（二）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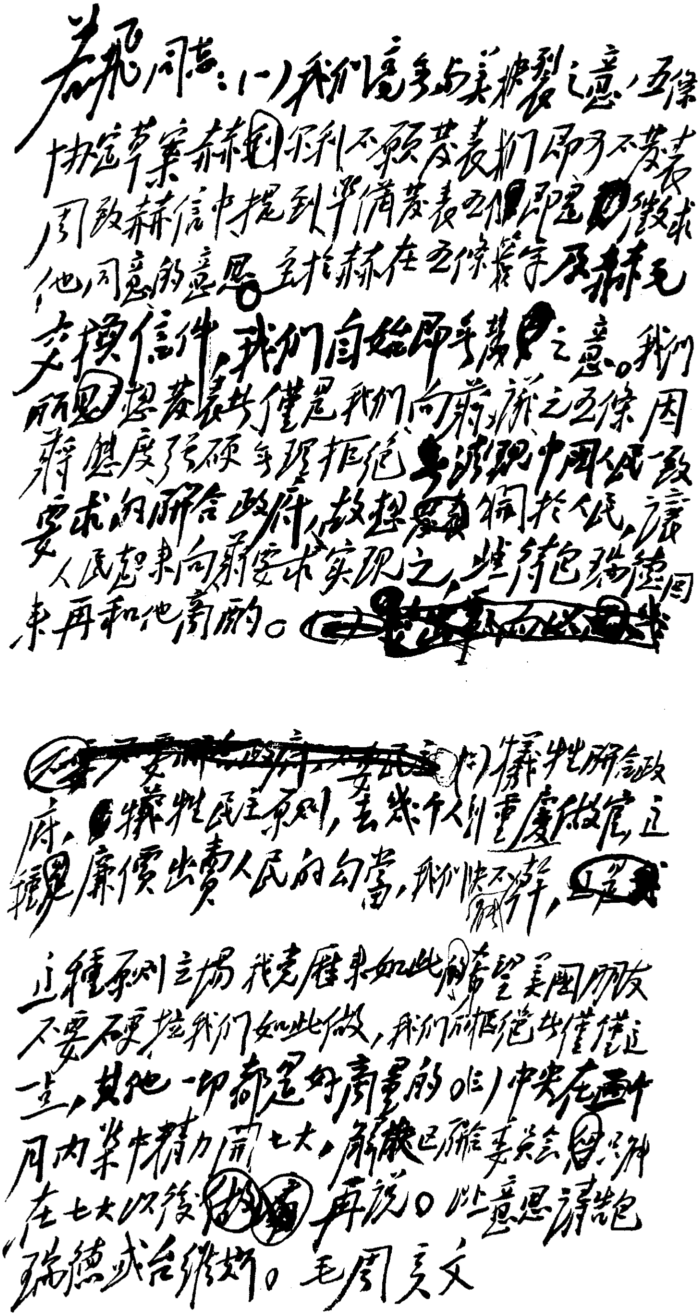
（三）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以上意思请告包瑞德或台维斯。

毛　周

亥文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给王若飞的指示。



若飞同志：（一）我们毫无与美破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赫尔利不愿发表，我们即可不发表，周致赫信中提到准备发表五条，即是征求他同意的意思。至于赫在五条签字及赫毛交换信件，我们自始即无发表之意。我们所以想发表者，仅是我们向蒋所提之五条，因蒋态度强硬无理拒绝我们代表中国人民要求的联合政府，故想公之于人民，让人民起来向蒋要求实现之，此待包瑞德回来再和他商酌。

（二）联合政府，是真民主原则，去做个别重要职位来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干，（三）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四）中央在两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亦须在七大以后再说。此意思请告包瑞德或台维斯。毛周灰文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立场的指示》的手稿。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

（1944年12月15日）

一九四四年快要完结了，我们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什么工作在明年要特别注意去做呢？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2]打倒日本侵略者。现在美国已打到莱特岛[3]，并可能在中国登陆。同时，日本侵略者已打通了由东京到新加坡的大陆交通线，中国的沦陷区更加扩大了。敌人是否会停止它的进攻呢？我看还不会停止，它还有可能再向我国西南部及西北部进攻。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必定又要玩弄诡计，企图通过中国的投降主义者，引诱中国政府投降。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被中国反动派人工地分裂着。正面战场的战事，节节失败，国民党当局仍然固执其为全国人民所不满意的一党专政及其失败主义的政策，拒绝一切有利于抗战、团结与民主的建议。只有艰难缔造的广大的中国解放区，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3] 莱特岛，菲律宾中部米沙鄢群岛之一。1944年10月20日美军开始在莱特岛登陆，同年12月下旬完全占领该岛。

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团结各界人民，建立了英勇的军队，粉碎了一切敌人的进攻，并能发动攻势，收复了广大的失地。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必须使全国人民明白，用人民的力量，促成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在民主基础上召集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才能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并配合同盟国，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我们经过林祖涵[1]同志曾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向国民党当局用书面提出了，最近周恩来同志又专为此事去重庆谈判一次，但是依然没有结果。在目前，很清楚的，单是谈判是不能成功的，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只要中国有一个真正实行民主政策的、能够动员与统一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的联合的中央政府出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就会很快了。为了这个目的，大家应该想出许多办法来。

在大后方，我们必须援助被反动当局压迫的民主爱国运动，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抵抗敌人的进攻，必须警惕投降主义者背叛民族投降敌人的阴谋活动。青年们及其他各界，应该有许多人到敌人占领的地方去打游击，广大群众则应当准备在一切敌人可能到的地方就地抵抗。同时，解放区则以自己的英勇作战行动及发动新地区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援助大后方。大后方的一切人民，一切爱国党派，

---

[1] 林祖涵，即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1938年6月被国民党政府聘请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5月至10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都有责任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努力。大后方已经有许多党派，许多工业家、教授们、学生们，甚至许多国民党人，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目前抗日救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现在的力量还不够，应该号召广大的人民起来为此而奋斗。

在沦陷区，广大人民遭受敌人的残酷压迫，渴望解放。我们必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准备在时机成熟时，举行武装起义，配合军队的进攻，里应外合地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我们的兄弟姊妹们。这一任务，现在必须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是十分迫切的工作，不管如何困难都要去做。在这个工作中，法国共产党与法国人民有了光荣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法国的经验。在沦陷区人民中，应解释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必要，使他们知道只有这个政府出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解放就快了，号召他们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在解放区，这里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截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止，有了六十五万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军队，有了二百多万民兵，有了九千万被解放的人民。一九四四年一年中，我们不论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在一九四五年有些什么工作值得特别指出的呢？

我认为，一九四五年，中国解放区应该注意如下各项：

（一）扩大解放区。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这种进

攻，是完全必要的与可能的，我们的军队已经举行了很多这样的攻势，特别是今年有很大的成绩，明年应该继续这样做。在一切新被敌人占领、尚未建立解放区的地方，例如河南等处，必须号召人民组织武装队伍，反对侵略者，建立新的解放区。几年的经验证明，组织众多的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各方面任务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去袭击敌伪，组织人民，以配合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有很大的效力，各地都应该这样做。

（二）敌人的进攻（“扫荡”）是不会停止的，我们应该经常警惕，随时准备用反“扫荡”粉碎敌人的进攻，没有这种警惕是不对的。不要以为我们强了，敌人弱了，敌我力量对比形势现在已经改变了，须知敌人还是强的，它决不会忘记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比敌人弱，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并执行正确的军事政策及其他政策，才能改变这种形势。只有到了我们占优势的时候，敌人进攻这回事才会成为不可能了。

（三）整训现有的自卫军与民兵，增强他们的战斗力。自卫军与民兵数目还不够，各地除某些个别地方不可能再扩大者外，均应尽量地扩大。九千万人民中，除老幼及患病者以外，一切男女公民，均应组织在自卫军中，在不脱离生产原则下，轮流担任保卫家乡与协助军队的任务。从自卫军中挑选精干分子组织民兵或基干自卫军，在“战斗与生产结合”的原则下，协同军队作战，或者独立自主地作战。九千万人民中，至少应该有百分之五即四百五十万人当民兵，即是说，比现有民兵数目扩大一倍。有些地方，还没有十分重视这个工作。在这些地方，民兵的数量太少了，又缺乏整训，质量也不高，一九四五年必须改变此种情况。自卫军与民兵，均必须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不妨碍生产。在这里，变工的方法是必要

的，战斗的民兵组织与生产的变工组织，往往可以互相结合。自卫军与民兵的领导机关，必须是民主选举的。只有这样，自卫军与民兵才能扩大，也才能提高战斗力。民兵的重要战斗方法是地雷爆炸，地雷运动应使之普及于一切乡村中。普遍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成为十分必要。

（四）整训正规军与游击队。一九四五年，应将全部军队轮番整训一次。按照新方法进行整训，举行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五）在老区域，补充原有军队的消耗数额。在新发展区域，在经济条件许可下，应该扩大军队。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这一点必须谨记。如果违背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要失败的。

（六）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目前开始的一年整训计划，军事整训与政治整训应该并重，并使二者互相结合。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

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七）加强拥政爱民与拥军优抗两项工作，进一步地改善军民关系。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和我们解放区人民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好的，因此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巩固与发展解放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同样会传染给我们的，军民关系中的不良现象，例如军队态度蛮横，损害人民利益，纪律不好，不尊重政府等事，也就时常发生。同时，地方对军队帮助不够，优待抗属工作做得不好等等现象，也就存在着。一九四三年，我们曾经指出了这些工作的重要性，但是许多地方还未重视。一九四五年旧历正月，一切解放区应普遍举行拥政爱民运动与拥军优抗运动，一定要做出显著成绩来。已经有了成绩的，必须继续做，必须检查此两项工作的结果。如果我们的全部军队，官兵上下团结一致，从政治上铁一般地巩固起来了，加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训练，又加上人民的拥护，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事业，就有了坚强的保障了。

（八）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路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这一方面的工作，各地有做得好的，有做得差的，各地均应总结经验。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

（九）减租，各地均有成绩。但是有些地方成绩少些，明减暗不减及恩赐观点仍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有减得太多，或在减租之后不注意交租等现象。这两种偏向都应纠正。减租之后租约满期

的，除在照顾双方利益原则下可由地主收回自种者外，应该重订新约，使农民有地可种。老区域减租未彻底的，应该查租。新区域尚未减租的，应该发动减租。租不减是不对的，减得太过火也是不对的。凡地主因被敌人摧残或其他原因而生活困难的，政府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给以从事农工商业或参加其他工作之方便。要把这件事当做政府工作之一，借以团结他们反对共同敌人。我们现在是处在农村中，土地问题的正确解决，是支持长期战争的重大关节，希望大家十分注意。

（十）今年绝大多数地方都进行了生产运动，有了显著的成绩，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件大事。但是也有一部分地方还未着手进行，另有一部分地方成绩不大，再有一部分地方军队方面有成绩，人民方面缺乏成绩。一九四五年，必须绝无例外地普遍举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军队于作战、训练之外，必须从事生产自给，机关学校也是如此。只有特殊情形者，可以允许减少或免除生产。必须动员人民，在自愿原则下，组织生产互助团体，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等。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必须用绝大精力去帮助人民，组织这种互助团体，以便大规模地恢复生产与发展生产，不但应该使人民够穿够吃，而且应该使人民逐渐地有盈余。“耕三余一”的口号，除被敌人摧残厉害的地方外，就是在敌后解放区，也是可能实现的。我们解放区的工业品，必须力求自给，必须争取于数年内达到全部或大部自给之目的。由公营、私营与合作社经营这样三方面的努力，达到这个目的是可能的。和生产相辅的是节约，必须尽可能地减少浪费。“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确定不移的财政方针。如果我们不去从根本上发展经济，而去枝枝节节地解决财政问题，就是错误的方针。如果我们努力地发展了公私经济，我们就能

支持不论时间多久的战争，而使精力不至于枯竭。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使一切工作人员及全体军民透彻地认识清楚，以便组织他们从事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公营经济中，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是在很多部门内可以实行，并应该实行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两个原则，必须注意不要违背。

（十一）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十二）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机关中，用群众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提高农业及工业的生产力，提高政府机关及一切其他机关的工作能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

（十三）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需要广大的有能力的干部。我们现有的干部，比较从前增加很多，但是仍感不足。干部的能力也提高了，但是仍很不够。特别是下级与初级干部，不论是军队的或地方的，他们的文化程度，他们对于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工作

技术的程度，一般地是不高的，有些则是很低的。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他们忙于工作，领受教育的机会太少。一九四五年，各地干部教育，应该着重于训练军队的（连至班）与地方的（区、乡）下级及初级干部。在职的用轮训办法，不在职的用学校办法，有计划地将他们提高一步。

（十四）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当然，这是拿我们解放区的这种作风与那种作风作比较，而不是拿我们解放区与国民党区域作比较。我们解放区是民主的地方，国民党那里是封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原则上有区别的。但是，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人尚未学会运用民主作风，旧社会传染来的官僚主义作风，依然存在。别人提不得不同的意见，提了就不高兴。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为怕碰钉子，受打击，遭报复，人们不敢大胆提意见。这是一种很不好的作风，这种作风阻塞着我们事业的进步，也阻塞着工作人员的进步。我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不论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不是恶意攻击，允许大家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自从整风以来，我们的工作作风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受到了一切善良人民的称赞的，这是很光荣的。但是我们仍有严重缺点，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

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十五）除了上述种种以外，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继续和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谈判是一种办法，全体人民起来呼吁要求是一种办法，还可能有其他的办法。总之，我们一定要多方努力，将这个适合全民族抗战要求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

我们解放区已做的和要做的工作，当然还有许多，但我以为目前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上述十五项，其他就从略了。各个解放区的情况与工作步骤，在许多点上互不相同，各地应按照自己的特点布置工作，以便适当地完成各项任务。

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

给赫尔利的信[1]

（1944 年 12 月 16 日）

十一月间，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请你转达给罗斯福总统，我对于他的这个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向他致谢！

请包瑞德上校带此信给你。我希望包上校能够早日回延工作。

其他要说的，均见于周恩来将军给你的信上。

---

[1] 这是毛泽东致赫尔利信的主要内容。

晋察冀部队应努力向日军占领区发展

（1944年12月18日）

子华[1]同志：

亥文电悉。（一）敌对蒋[2]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二）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三）沦陷区扩大，如我党能执行正确政策，便可使现有军队获得巩固，并可在新发展地方扩大军队。（四）豫湘粤浙四省明年可能大发展，陕甘宁边区已抽出六千军队及干部分赴豫湘。（五）河南发展，胡宗南汤恩伯[3]两部又南调十余师，此间已不感威胁，不须再增兵。（六）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毛泽东

亥巧

---

[1] 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蒋，指蒋介石。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曾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因在河南作战中溃败，当时贬任国民党军黔桂湘边总司令。

在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的批示

（1944年12月19日）

高岗、陈云同志：

王震来电，太岳大雪，多人受冻，脚部冻伤成残废者三十多人，要王戴部备足鞋袜。今阅此电，又缺少放哨大衣。请急为处置为盼。

怎样办地方报纸[1]

（1944年12月20日）

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

[1] 这是毛泽东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抗战日报》是《晋绥日报》的前身。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4年12月20日）

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沦陷区扩大了，沦陷区的工作很重要，应提到与解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扩大解放区，组织沦陷区，援助大后方，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五门搞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给邓宝珊[1]的信

（1944年12月22日）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2]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

敬祝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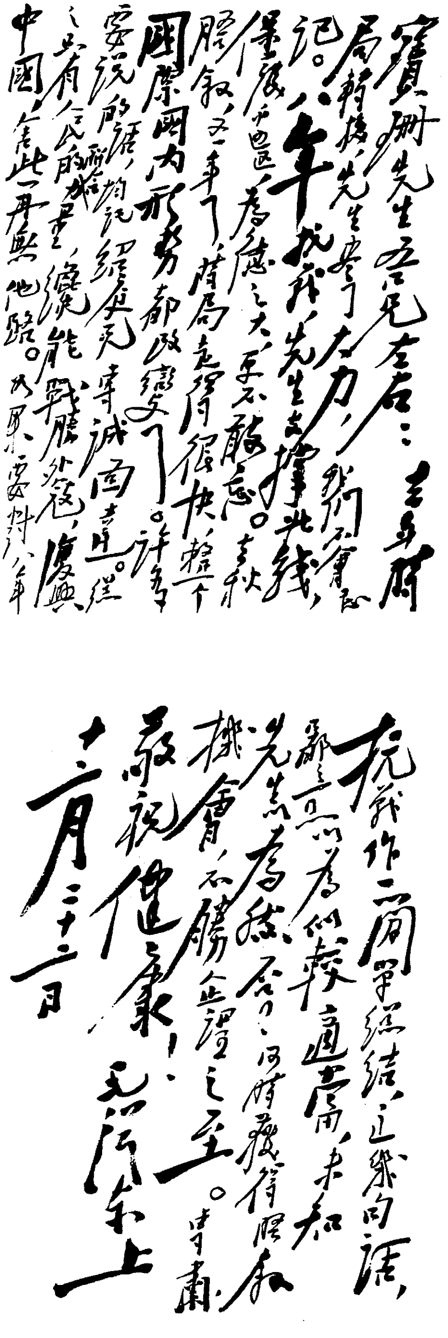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

[1] 邓宝珊（1896—1968），甘肃天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2] 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寶珊先生吾兄左右：去年時局轉換，先生出了大力，我們不曾忘記。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綫，保陝甘邊區，為德之大，是不能忘。去秋晤敘，又一年了，時局走得很快，整個國際國內形勢都改變了。許多要說的話，均托紹庭兄專誠面達。從這只有人民的聯合力量，纔能戰勝外寇，復興中國，舍此再無他路。我們要對八年抗戰作一個總結，正[illegible]的話，鄙意以為似較適當，未知先生以為然否？同時獲得晤敘機會，不勝企禱之至。專肅

敬祝健康！

毛澤東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致邓宝珊信的手稿。

复赫尔利电[1]

（1944年12月22日）

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

[1] 12月21日，赫尔利来电，希望周恩来再去重庆商谈。这是毛泽东复赫尔利电的主要内容。

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

（1944年12月24日）

子华[1]同志：

关于李勇的落选[2]，你们的处理是对的。值得注意者，是李勇的骄傲，主要的由于我们未能向他多作教育，使他不要骄傲。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毛泽东

亥敬

---

[1] 子华，即程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代理书记、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理政治委员。

[2] 指各抗日根据地准备出席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英模大会的代表选举中，晋察冀根据地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

关于山东工作的指示[1]

（1944年12月25日）

罗、黎：

（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

（二）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澈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

（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

（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

（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

（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毛泽东

亥有

---

[1] 这是毛泽东给罗荣桓、黎玉的电报。

复邓小平电[1]

（1944年12月25日）

关于十个问题[2]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

[1] 这是毛泽东复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毛泽东7月28日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电报中，要求各地答复的10个问题。

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电[1]

（1944年12月25日）

美军极注意国共磨擦，闻蒋令李宗仁发动对我进攻，他们即令欧高士等来你处进行考察，究竟谁进攻谁。望将国民党一切无理进攻情形随时告知欧高士，同时望通令各部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不给国民党以借口。

---

[1] 这是毛泽东复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电的主要内容。

致王震、王首道电[1]

（1944年12月30日）

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据环境决定。并请告皮定均、徐子荣，中央对他们的努力，甚为满意，并问候他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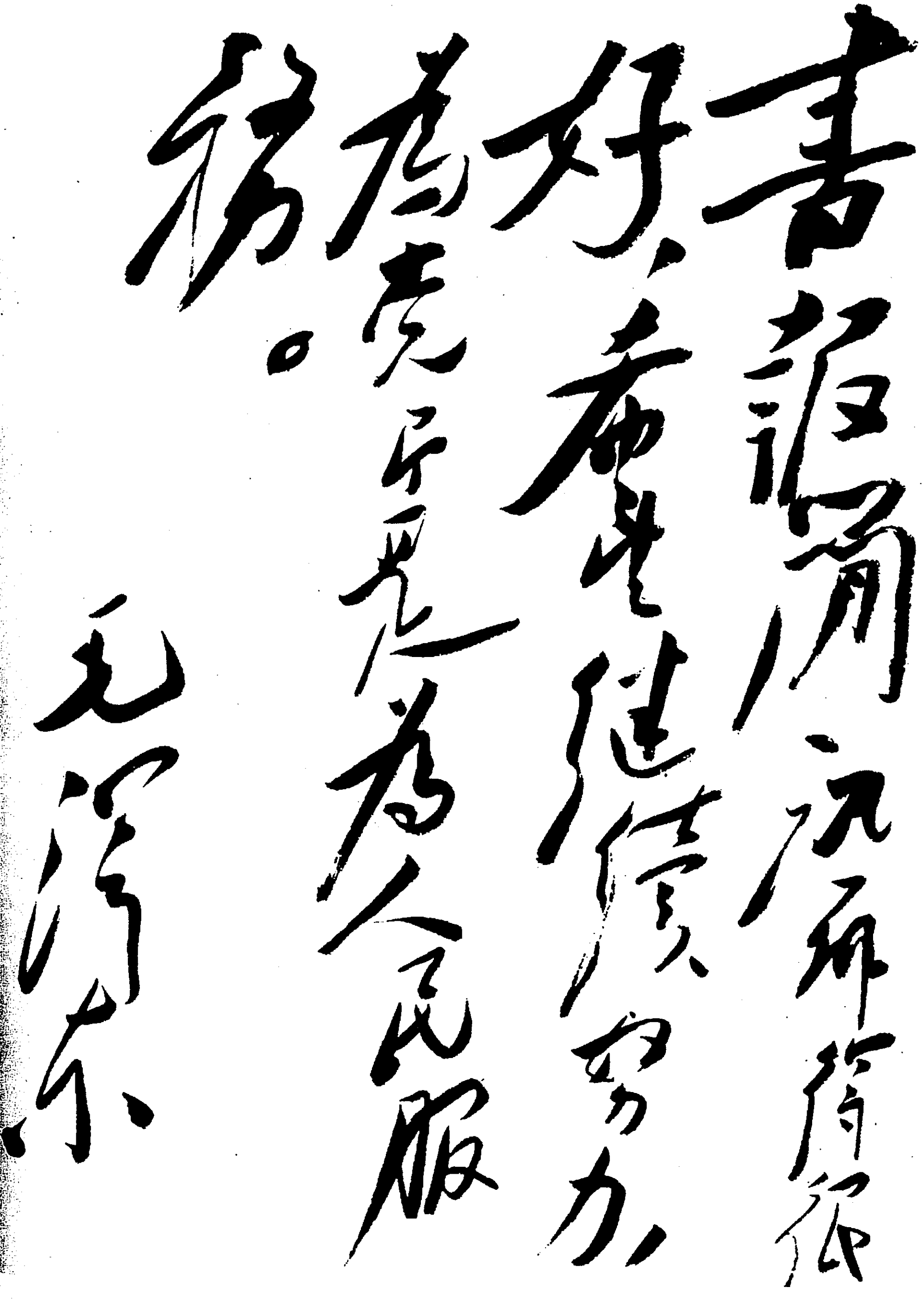
[1] 1944年12月27日，南下支队经过50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这是毛泽东致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

（1944年冬）

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书报简讯办得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员更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的题词。

两次为中央直属机关群众代表大会奖状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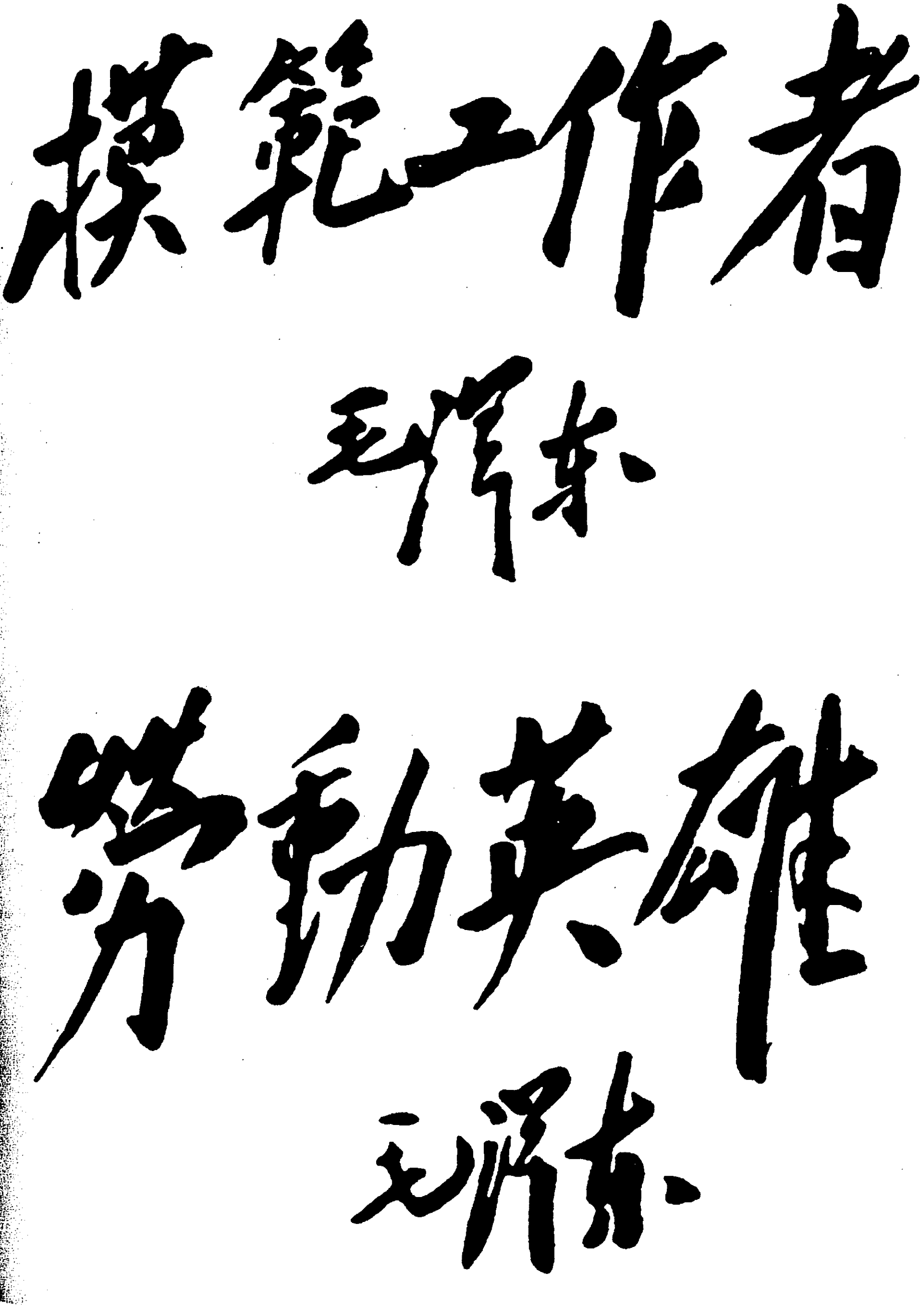
（1944年12月）

模范工作者。

毛泽东

劳动英雄。

毛泽东



模範工作者

毛泽东

勞動英雄

毛泽东

毛泽东两次为中央直属机关群众代表大会奖状的题词。

对薄一波一份自我检查的批示

（1944年）

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

和王树声的谈话[1]

（1944年）

你分析得很精辟。中央也考虑，想派徐向前、戴季英、刘子久等同志和你一道，带一支生力军，速往中原，跟先期活动在那里的皮定均、徐子荣部会合，组成河南军区，发动群众，把汤恩伯丢下的大批武器捡起来，搞好根据地，抗战到底，夺取最后胜利。

---

[1] 时值抗日战争已进入决战决胜的阶段，王树声一心想要上前线。这是毛泽东听他分析了中原战局后和他谈话的一部分。1944年9月，王树声率部进入豫西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组建了河南军区，任司令员。

和G·斯坦因的谈话[1]

（1944年）

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一个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与和平的话，则群众的观念和经验，必须成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老百姓可以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的任务则是倾听他们的意见，学习他们的经验，洞悉他们的愿望和批评，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的总体规定下来，并把它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

你们不要打击一个害病的人，必须打击这个人的疾病。

所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只有一样是共同的，他们所共同的是他们的政治思想方法，全遵循马列主义的道路的。每个地方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区别开这种思想方法与另一种全然两样的事，作为思想方法的最终政治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制度。特别在中国的我们，一定要严格地分别清楚，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观察、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另一方面是实际的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这种政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一定要作为我们的最近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我们就无法指导目前我们社会革命的民主阶段。而没有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也无法将我们共产主义的哲学正确地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上面。

---

[1] 这是毛泽东和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G·斯坦因谈话的一部分。

1945

1945年，毛泽东乘飞机赴重庆谈判。

新年献词——争取胜利早日实现*

(1945年1月1日)

一九四四年过去了。这一年是反法西斯战争有决定意义的转变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以这样的辉煌的业绩标志着：苏联领土的全部光复，盟军在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芬保罗轴心附庸的投降，法、比、南、希、波人民解放运动的巨大增长及这些国家领土的全部或大部解放。一九四四年完成了从东西南三面围攻德寇的战略计划，战争现在已经进行于纳粹帝国本土的边境上。苏维埃大炮轰击着东普鲁士的防线，美英大军攻打着德寇的西墙。无论德寇还怎样在竭力挣扎，甚至局部地还企图反扑，但是战争对希特勒是输定了。德寇的一切挣扎，至多只能苟延若干时日，但是绝没有可能抵御一九四五年的盟国的最后联合攻势。一九四五年将是纳粹德国最后覆灭的一年。

在太平洋上，一九四四年美军展开了对日寇规模宏大的攻势，相继攻破日寇的内外防线，从马绍尔、新几内亚经马里亚纳、帛琉而抵菲岛，并将日本本土放在美空军的战略轰炸之下。一年来日寇在海上丧土失地损兵折将，完全处于防御地位。但是日寇依然保持着它的海军主力，陆军尤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且在中国国民党战线上得到巨大的进展。因之，一九四五年在远东战场上将必然会有比一九四四年更残酷激烈的战斗。远东战争的胜利的迟速，在很大

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战争努力，取决于同盟国在远东海上与陆上的联合反攻。要增强中国的战争努力，准备与实施中国战场上的反攻，就要克服由国民党执政者的法西斯主义失败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危机。而克服这种危机的道路，只有废除国民党腐朽的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与统帅部，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

一九四四年是中国战场上重大变化的一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这五年零四个月，在中国战场上来说，形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日寇在中国战场上，停止正面进攻，集中进攻敌后解放区。国民党统治者，对于抗战则文恬武嬉，对于反共反人民则非常积极。因此敌后解放区的军民，就处在严重的困难情况中，肩负着坚持中国战场抗战的全部重大责任。这五年余的时间中，在敌后解放区的城市村庄，经过敌寇十余次烧杀的，只算是普通现象，毫不稀奇，而在边缘地区，甚至有经敌寇烧杀六七十次者。在这样闻所未闻的严重摧残之下，人民旧日的积蓄，荡然无存，然而由于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十大政策，团结更加巩固了，战斗更加强韧了，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起，解放区由缩小的状态又一天天地扩大了，我们打败了冈村宁次，也打破了国民党内反动派的三次反共高潮，创造了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在国民党战场上，敌人五年半中没有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采取敌来我去的消极避战政策，驯致士气丧尽，见敌即溃。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专制独裁，贪污横行，党政军民离心离德，官僚机构腐败不堪。日寇把中国人民看作“猛虎”，而把国民党政府看作“猛虎的囚笼”，以至声明不以重庆军为敌。但是从去年四月以来，敌人由于美军在太平洋反攻所造成的战略形势的不利，无可奈何，不得不除了在敌后依然控制庞大兵力

以外，以一部兵力向这“不以为敌”的“猛虎的囚笼”进攻，以求得贯通大陆交通线及驱逐美军在陆上的空军基地。自从去年四月日寇恢复对国民党战场的攻势以来，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豫湘桂诸省相继沦陷，不到半年而达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目的。而在同一时期中国解放区却节节胜利，解放了八万方公里国土，一千二百万同胞。一年来中国战场上的变化，鲜明地反映了抗战中两种方针、两条路线、两套办法的对比：消极抗战、坐待胜利、保持实力、排斥异己的政策，引导到溃败与危机；而新民主主义的积极抗战的政策，则引导抗战走向巨大的胜利。

由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军事失败，国民党战线处于严重的局势中。如果继续让日寇深入国土，那么，日寇是能够相对地暂时地挽回其颓势，使战争延长，使中国人民与同盟国人民的痛苦和牺牲增大。不承认这一点，或者不强调这一点的严重性，那就是对于我国人民，对于我们盟国不负责任。事实上，国民党战线的溃败，已经使日寇能够多少挽回其战略颓势，已经延长了战争，和增大了人民的痛苦与牺牲了。这个责任，是应由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担负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全国同胞的任务，就是一方面在可以反攻的地方要进行反攻，在应该准备反攻的地方要准备反攻，而另一方面则必须努力停止敌寇对大后方的前进。我们的任务，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概括为四个口号，这就是：“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在这四个口号中，最中心的一个是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处于三种不同条件下（解放区、大后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所应

一致努力的任务。因为，一九四四年的经验，已经明白地指出了，如果不彻底革除国民党统治者的错误政策，采取新的抗战民主团结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政策，不驱逐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说不上配合盟国实行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联合攻势。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挽救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只有民主的联合政府才能缩短战争，争取抗战的早日胜利！

今天抗战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了。在这悠长的岁月中，我全国同胞备尝了战争的种种痛苦，我们渴望着战争的迅速胜利。而日寇则希望着拖延战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则以其错误政策来帮助日寇延缓中国的胜利，加深人民的痛苦。际此新岁，我们希望全国同胞，以严肃的态度，切实的工作，来争取抗战的迅速胜利。尤其是在今年之内，要争取到这一迅速胜利的先决条件——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实现。

在延安干部新年晚会上的讲话

（1945年1月1日）

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过去我们早就实现了这个方针，今后更要加强它。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则对于敌人的打击也越有力量。

和郭述申等的谈话[1]

（1945年1月1日）

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去年各根据地生产搞得好，部队每人每日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倒还是晚倒，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

[1] 这是毛泽东和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等谈话的一部分。郭述申，1941年1月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同年秋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该校第三部主任。

延安权威人士评蒋介石元旦广播*

（1945年1月3日）

蒋介石在其广播中开始说：抗战八年以来，要以去年这一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一年。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由于国民党失败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的危机之深刻性。对于陷国家于如此危境的原因，蒋氏要求“全国上下彻底地反省和一致地觉悟”。可是蒋氏本人却既无反省，又不觉悟。蒋氏说：“过去这种弱点和错误的存在，政府与社会都有其责任。就政府来说，一方面是战时行政不够积极，不能彻底。另一方面是顾恤人民的困难，不愿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影响了战斗精神，影响了军纪、风纪，最后影响了军事。”在蒋氏统治的区域内，人民负担占收入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时候，蒋氏竟说什么“不愿增加人民负担”，确实要有很厚的脸皮才说得出口。蒋氏不但不肯指出蒋氏自己及其一群的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为一切战争失败与国事败坏的总根源，反而将责任推诿给“社会”。就这一点来说，这是由于全国人民痛恨蒋氏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寡头专政，达到了空前高度，怒骂指责，无日无之。为了平抑众怒，蒋氏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于他的政府工作，说了“不够”二字。但随即抬出一个“社会”，说什么“社会”也“有其责任”，借以欺骗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们。但是“社会”里一切被蒋氏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人民，已经逐渐清醒起来，他们知道受

压迫的人民是不能担负这种责任的，唯一应负责任的是蒋氏及其一群的寡头专政、法西斯主义与失败主义的路线。既然政府的责任只是一个工作做得“不够”，而且还有“顾恤人民困难”的深恩厚泽，那么这个政府，就应该万岁万万岁。可是蒋氏觉得不然，他又在其广播中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我现在准备建议中央，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归政于全国的国民。”岂不有些奇怪？但是一点也没有什么奇怪。最近几个月来形成的极其紧张的政治形势，迫着蒋氏将其早已发出的不兑现纸币，填上一个似乎不很久就有希望的实无日期的日期。可是蒋氏这一声明，决不会有什么积极影响，因为他的这种声明，仅仅将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毫无记性这一点上。可是中国人民是有记性的，他们记得国民党政府开过很多支票。请看：“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为宪政开始日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开国民大会，开始宪政”“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国民大会”“至迟要在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限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抗战结束后一年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蒋介石先生，我们要问你：你的票子不是早已填上了许多确定兑现的日期吗？第一张，“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十日”，第二张，“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三张，“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均在“七七”抗战以前，那时并无“军事紧张，国民大会的召集，事实上陷于困难”的情形，何以一次也不兑现？抗战七年半，不论哪一年均比现在的“军事紧张”情形要好些，何以不兑现？你现在开的一张，又答应在“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的时候”，请问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不改变，你的“军事形势”能够稳定吗？“俟我们反攻基础确立的时

候”，请问在你的寡头专制与失败主义路线之下，你的反攻基础能够确立吗？“俟我们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请问何时“更有把握”？你不是历来都说“绝对有把握”吗？何以现在忽然觉得缺少把握了呢？你一向压迫人民，垄断抗战，妄自尊大，为所欲为，到了一九四五年元旦，忽以缺乏把握宣告于世，请问你及你的一群，该当何罪？还有什么资格来谈国民大会？孙中山还在一九二五年的临终遗嘱上就主张“召开国民大会”，你违背孙中山，从人民手里篡夺政权，建立你的血腥寡头专政，人民不赞成，基础不稳，你就三番五次以召开国民大会空言骗人，过去还有确定日期，现在日期也没有了，抗战胜利的把握也没有了，请问该当何罪？就拿你的话来说吧，在抗战期内召开国民大会，请问是战前贿选出来而在战后大部投汪附逆了的那个“国民大会”，还是重新选举的呢？如果是前者，谁要那个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而且烂了的“国民大会”呢？如果是后者，如何选法？谁来执行？谁来监督？不先消灭寡头专制，彻底改组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代之以民主的联合政府，消灭特务机关，给予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请问有什么民选的国民大会可言？袁世凯开过洪宪国会，曹锟开过猪仔国会，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什么独夫民贼胆敢召开什么蒋家国民大会或猪仔国民大会吗？延安权威人士于揭破蒋氏召开国民大会的无耻欺骗之后，结语称：为了抵制全国人民所属望的立即建立联合政府，蒋氏搬出了挡箭牌。可是蒋氏及其一群的所谓“国民大会”，早已臭名远播，不搬还可藏拙，搬出一次就会臭气大发一次。孟子说道：“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西子是个美人，蒙了不洁，人皆掩鼻。一个独夫浑身浸在粪缸里，怎能叫中国人民不掩着鼻子开跑呢！若欲人不掩鼻，除非洗掉大粪。

复太岳区党委电[1]

（1945 年 1 月 5 日）

二日电悉。不是两年胜利，而是两年准备胜利。我们至少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对于争取胜利方有较大把握。

---

[1] 这是毛泽东复太岳区党委电的主要内容。

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

（1945年1月10日）

各位劳动英雄，各位模范工作者！

你们开了会，总结了经验，大家欢迎你们，尊敬你们。你们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第一个，带头作用。这就是因为你们特别努力，有许多创造，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第二个，骨干作用。你们的大多数现在还不是干部，但是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到了将来，你们可能成为干部，你们现在是干部的后备军。第三个，桥梁作用。你们是上面的领导人员和下面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你们的经验，这次会议做了总结。这个总结文件说得很好，不但这里适用，各地也可以适用，我就不讲这些了。我想讲一点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的经济工作。

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都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

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他们就在政治问题上，军事问题上，经济问题上，文化问题上，党务问题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项的问题上，常常处理得不适当，或不大适当。他们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主观地作出许多不适当的计划，强制施行，常常碰了壁。近几年来，由于整风，由于在工作中碰了钉子，我们的同志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还须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

是从这一点出发，看起来收效很慢，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在实际上，比较那种不从这一点出发而从别一点出发，例如说，从城市观点出发，其工作效果会怎么样呢？那就决不是很慢，反而是很快的。因为，如果我们从后一点出发，脱离今天的实际情况，做起来不是效率快慢的问题，而是老碰钉子，根本没有效果的问题。

比如我们提倡采取现有样式的军民生产运动，发生了很大的效果，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并且还要准备攻入城市，收复失地。然而我们是处在个体经济的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怎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那末，有些什么办法呢？我们就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

由于是农村，人力物力都是分散的，我们的生产和供给就采取“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

由于是农村，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而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就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我已得了华北华中各地的材料，这些材料都说：减租之后，农民生产兴趣大增，愿意组织如同我们这里的变工队一样的互助团体，三个人的劳动效率抵过四个人。如果是这样，九千万人就可以抵过一亿二千万人。还有两个人抵过三个人的。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

说服、典型示范的方针，那末，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都组织在农业生产的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这种生产团体，一经成为习惯，不但生产量大增，各种创造都出来了，政治也会进步，文化也会提高，卫生也会讲究，流氓也会改造，风俗也会改变；不要很久，生产工具也会有所改良。到了那时，我们的农村社会，就会一步一步地建立在新的基础的上面了。

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用心地研究这项工作，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人民展开生产运动，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不但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不但要组织农民生产，而且要组织部队和机关一齐生产。

由于是农村，由于是经常被敌人摧残的农村，由于是长期战争的农村，部队和机关就必须生产。由于是分散的游击战争，部队和机关也可能生产。在我们陕甘宁边区，则更由于部队和机关的人数和边区人口比较，所占比例数太大，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因此，我们决定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拿陕甘宁边区说，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粮（小米）二十六万担（每担三百斤），取之于民的占十六万担，自己生产的占十万担，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军民两方势必有一方要饿饭。由于展开了生产运动，现在我们不但不饿饭，而且军民两方面都吃得很好。

我们边区的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其他用费，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则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并且自给一部分粮食，一部分被服。

边区部队的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

自给，即自给百分之一百，不领政府一点东西。这是最高的标准，这是第一个标准，是在几年之内逐渐达到的。

前方要作战，不能采取这个标准。前方可以设立第二、第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是除粮食被服两项由政府供给之外，其他如油（每人每日五钱）、盐（每人每日五钱）、菜（每人每日一斤至一斤半）、肉（每人每月一斤至二斤）、柴炭费、办公费、杂支费、教育费、保健费、擦枪费、旱烟、鞋子、袜子、手套、毛巾、牙刷等，一概生产自给，约占全部用费的百分之五十，可以在两年至三年内逐渐地做到。现在已有做到了的。这个标准，在巩固区内可以实行。

第三个标准，是在边沿区和游击区内实行的，他们不可能自给百分之五十，但是可能自给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五。能够这样，也就很好。

总之，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部队和机关，除利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间隙，集体参加生产之外，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在目前条件下，为着渡过困难，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不愿建立家务的二流子习气，是可耻的。还应规定按质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能够分得红利，借以刺激生产的发展。又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实行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的办法，才能有效地推进生产工作。

有人说：部队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生产，就不能工作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

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在前方，去年一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可是去年一年作战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并且普遍地开始了练兵运动。机关因为生产，工作人员生活改善了，工作更安心、更有效率，边区和前方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机关和部队，如果有了生产自给运动，他们的战斗、训练和工作，就更加有劲，更加活跃了；他们的纪律，他们的内部的团结和外部的团结，也就更好了。这是我们中国长期游击战争的产物，这是我们的光荣。我们学会了这一条，我们就对一切物质困难都不怕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只有我们去压倒敌人，决不怕敌人来压倒我们。

在这里，有一点还须引起我们前方同志的注意。我们有些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

关于工业品，陕甘宁边区决定在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原来根本没有或者出产很少的，要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完全不靠外面。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任务。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

求质量好，耐穿耐用。边区政府、八路军联防司令部、党中央西北局，对于这些抓得很紧，这是非常之对的。希望前方各地也是这样做。有许多地方已是这样做了，希望他们得到成功。

我们边区和整个解放区，还要有两年至三年工夫，才能学会全部的经济工作。我们到了粮食和工业品全部或大部自种自造自给并有盈余的日子，就是我们全部学会在农村中如何做经济工作的日子。将来从城市赶跑敌人，我们也会做新的经济工作了。中国靠我们来建设，我们必须努力学习。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给刘昆林[1]的信

（1945年1月11日）

昆林同志：

来信收到。此信及以前各信均已转给中组部，并请他们找你一谈。

你长期不被信任，难怪你不满意。但真金不怕火烧，还是应该有耐心，等候同志们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出路。看你此次的信，你的问题似乎可以获得解决了，更希望你耐心等候。

这一向颇忙，我们暂时不谈。你在延安有一个停留，将来再谈吧。

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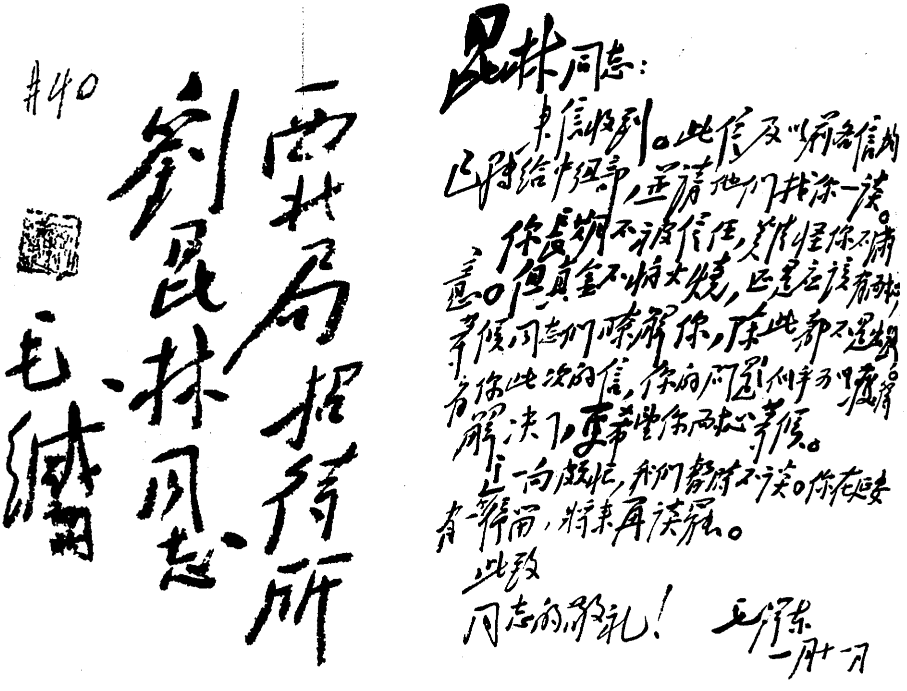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

---

[1] 刘昆林（1898—1980），湖南桃江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曾因1928年脱党等问题受到审查。



#40

西北局招待所

刘昆林同志

毛缄

昆林同志：

来信收到。此信及以前各信均已转给中组部，并请他们找你一谈。

你长期不被信任，难怪你不满意。但真金不怕火烧，还是应该有耐心，等候同志们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好办法。看你此次的信，你的问题似乎已某种程度解决了，更希望你再耐心等候。

近一向颇忙，我们暂时不谈。你在延安有一时间，将来再谈罢。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日

毛泽东致刘昆林信的手稿。

关于召开国事会议预备会议给赫尔利的信

（1945年1月11日）

赫尔利将军阁下：

一九四五年一月七日来信敬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间敝党方面所提五条已为国民政府所拒绝。国民政府所提三条，敝党方面又万难同意，因有先由国民政府自动实行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之请求，借以证明国民政府是否有诚意在民主基础上解决国事问题。今接阁下来信，提议在延安开两党会议，并有阁下参加，盛意可感。但是鄙人仍恐此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徒劳阁下等之往返。八年来一切两党秘密会议，均证明国民党方面毫无诚意。鄙人现请阁下向国民政府转达敝党方面之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事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上述提议，如荷国民政府同意，则周恩来将军可到重庆磋商。如何？敬请见复。顺颂

时祺

毛泽东

给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的指示[1]

（1945年1月24日）

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

[1] 22日毛泽东复电赫尔利，告知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24日周恩来飞抵重庆前毛泽东的指示。

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致周恩来电[1]

（1945年1月28日）

周：

敬、感两电悉。甚为欣慰。

（一）王世杰说五条中无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可反问他：国共两党能包办国事吗？如果你们同意五条，请问不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如何产生联合政府？没有写进五条中的东西还很多，例如各党加入联合政府的比例，取消特务，撤退包围，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等等，难道都不成问题了吗？

（二）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开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

---

[1] 周恩来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5、26两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情况。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复电。

国大把戏。

（三）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

毛

和林伯渠等的谈话[1]

（1945年1月30日）

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

---

[1] 1945年1月30日，毛泽东和朱德、任弼时听取林伯渠、李维汉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有些党外人士认为他们有职无权，非党员受歧视。这是毛泽东在听汇报后和林伯渠、李维汉谈话的一部分。

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1]

（1945年1月31日）

我们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能够和必须发动军民的生产运动的问题，早已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但是在游击区中，在敌后之敌后，是否也能够这样，在过去，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是没有解决的，这是因为还缺少证明的缘故。

可是现在有了证据了。根据一月二十八日《解放日报》所载张平凯同志关于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的报道，晋察冀边区的许多游击区内，已于一九四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收到了极好的成绩。张同志报道中所提到的区域和部队，有冀中的第六分区，第二分区的第四区队，第四分区的第八区队，徐定支队，保满支队，云彪支队，有山西的代县和崞县的部队。那些区域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公路如网，敌人利用它的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处地转移。”然而他们仍然能够于战争的间隙，进行了生产。其结果：“使得大家的给养有了改善，每人每日增加到五钱油和盐，一斤菜，每月斤半肉。而且几年没有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本，现在也都齐全了。”大家看，谁说游击区不能生产呢！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首先在农业为主的方针下，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共有九种办法：第一，平毁封锁墙沟；第二，平毁可被敌人利用的汽车路，在其两旁种上庄稼；第三，利用小块荒地；第四，协助民兵，用武装掩护，月夜强种敌人堡垒底下的土地；第五，与缺乏劳动力的农民伙耕；第六，部队化装，用半公开的形式，耕种敌人据点碉堡旁边的土地；第七，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第八，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第九，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

农业生产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他生产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吗？请看晋察冀：“沟线外部队的生产，不限于农业，而且也和巩固区一样，开展了手工业和运输业。第四区队开设了一个毡帽坊，一个油坊，一个面坊，七个月中盈利五十万元本币。不仅解决了本身困难，而且游击区群众的需要也解决了。毛衣毛袜等，战士们已能全部自给。”

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吧？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实现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原则，把战斗任务和生产任务同样看重。”“以第二分区第四区队为例。当春耕开始时，就派有专门的部队去打击敌人，并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正因为这样，军事动作也积极了，部队战斗力也提高了。这个小部队从二月至九月初，作了七十一次战斗，攻下了朱东社、上庄、野庄、凤家寨、崖头等据点，毙伤敌伪一百六十五名，俘伪军九十一名，缴了三挺轻机枪，一百零一支长短枪。”“把军事动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配合起来，马上进行政治攻势：‘谁要破坏大生产运动就打击谁。’代、崞等县城内敌人问老百姓：‘为什么八路军近来这么厉害？’老百姓说：‘因为你们破坏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伪军在下面

纷纷议论：‘人家搞大生产运动，可不要出去。’”

游击区人民群众是否也可以发动生产运动呢？那些地方，也许是还没有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农民是否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呢？这一点，晋察冀那边也肯定地答复了。“沟线外部队生产运动的开展，还给了当地群众以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用武力掩护了群众的生产；另一方面，又用劳力进行了普遍的帮助。有的部队，规定了农忙时期以百分之五十的力量，无代价地帮助群众生产。群众生产情绪因此大大提高，军民关系更为融洽，群众都有了饭吃。游击区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同情和拥护，从此更增高一步。”

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们要求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完全认识这一点，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可以普遍地办起来。晋察冀边区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在沟线外部队的生产运动中，由于干部的思想转变，重视生产，重视劳力和武力相结合，培养了群众中的英雄模范（初步总结中，有六十六个英雄模范），仅仅五个月中，我们沟线外的部队，不仅在生产任务上按时完成了计划，而且特别有了许多实事求是的新创造。”

一九四五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到今年冬季，我们来比较各区的成绩。

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是中共中央所殷殷盼望于整个解放区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我们希望这一计划能够完成。

关于劳动英雄的讲话

（1945年1月）

劳动英雄三大作用

（一）带头作用，把生产和工作标准提高了，做出一个榜样，群众向你们看齐。（二）骨干作用，人常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你们团结了群众，开展生产和各种工作。（三）劳动英雄是桥梁，起带上来、传下去的作用。群众的经验和意见，你们带上来；你们又到上面来开会，大会讨论的东西，如果你们认为对，就带回去告诉群众。

不要骄傲，改掉毛病

但是，有一条要注意，就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在去年的劳动英雄大会上，曾经讲过“洗脸”和“扫地”，劳动英雄最好天天打扫灰尘，灰尘就是毛病，希望大家都注意改毛病，努力学习自己没有学到的东西，年年当劳动英雄。

1945年，毛泽东和劳动英雄杨步浩交谈。

关于目前形势及参加政府的条件致周恩来电

（1945年2月3日）

周：

（一）子卅两电及丑冬电均收。

（二）敌有准备攻滇样、高平、老开，已增兵一师团，似尚有后续；赣州、南雄可能失守。敌正扫荡沿海，使美军登陆时无法接济国民党。罗、邱、斯三人已在开会，数日后即可见结果。红军迫近柏林，各国人民及进步党派声势大振。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

（三）请明白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除非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明令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合法，明令取消特务机关及特务活动，准许人民有真正自由，释放政治犯，撤销封锁，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是万难参加政府的（此点是用口讲，不作任何文字声明）。至于会议名称、成分及方式，可以从长考虑。

（四）接电后，请即回延，有新意见待面谈。

毛泽东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2月3日）

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一种条件。为着大局，可能还要忍耐一点。如何避免缴枪，要采取慎重步骤。但要注意前途是流血斗争，绝不能剥笋，无法剥笋，要反对右的危险。党派会议是预备会议性质，是圆桌会议，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国民党要先实行几条才能召开国事会议。蒋介石如提出召开国民大会，我们要抵制。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周恩来1月31日和2月2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及党派会议问题的来电时讲话的一部分。

延安权威人士驳斥魏道明谎言*

（1945年2月4日）

魏氏关于租借物资分配的说法，乃是蓄意造谣，无耻撒谎。魏氏说“运交中央政府作抗日之用的租借供应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共产党，以便用于同一事业”，这实在是一个漫天大谎。除非在魏氏特有数学上，零等于“相当大的一部分”，否则这种说法是完全抹煞事实的无耻造谣。从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完全断绝了八路军的一切接济，非特没有分配给共产党以支枪、粒弹、颗药、分文，而且以数十万大军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解放区，没收了一切进入边区的物资，包括中国保卫大同盟向英美募捐来的数吨药品在内。此种情况，迄今仍未稍变。中国共产党与租借供应品的关系，仅仅是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反共军队确实是以“相当大的一部分”租借供应品武装着。因此，魏氏的话，应改为“运交中央政府作抗日之用的租借供应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反共产党的军队，用于另一用途”，才合乎事实。

至于魏氏所以要这么无耻撒谎，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美英舆论界以及政府负责人士对国共关系及对国民党政府如何使用租借物资，均表重大的关心。最近美副国务卿格鲁、英上院议长自治领大臣克兰波恩均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团结及“不管其有分歧，而帮助

中国政府及在延安之共产党政府”（克氏语）。国民党专制主义者惶急之余，遂不惜令驻外大使当众撒谎，说什么“国民政府已对共产党作了好多让步”，什么“相当大的一部分已分配给共产党”之类，其目的想欺弄国际视听，以利其继续保持一党独裁的法西斯统治。但是，国际舆论和外国政治家，是和国内人民一样，不会轻易被谎言所愚弄的。我们奉劝国民党当局多少珍重一些国格，勿使驻外使节永远被人目为骗子与说谎者。

复周恩来电[1]

（1945年2月5日）

狄巴斯[2]带来信件已悉，同意你的做法，但请注意：（一）对王世杰提案[3]不完全拒绝，只说可回延商讨；（二）不要强调国事会议；（三）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狄巴斯，当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

[3] 指王世杰提出的政治咨询会议草案。

挽彭雪枫联[1]

（1945年2月7日）

一

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垂，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

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二

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
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

---

[1] 1944年9月11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在河南夏邑与日伪军作战中牺牲。1945年2月7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彭雪枫大会。本文一是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联名送的挽联。毛泽东还写了挽词。本文二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写的挽联。

为彭雪枫题写挽词[1]

（1945年2月7日）

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

[1] 1945年2月7日，延安各界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举行追悼大会。这是毛泽东为彭雪枫题写的挽词。

给孙毅[1]的信

（1945年2月7日）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问边章五[2]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至今天才复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与学习快要完毕时，我希望和你晤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

同志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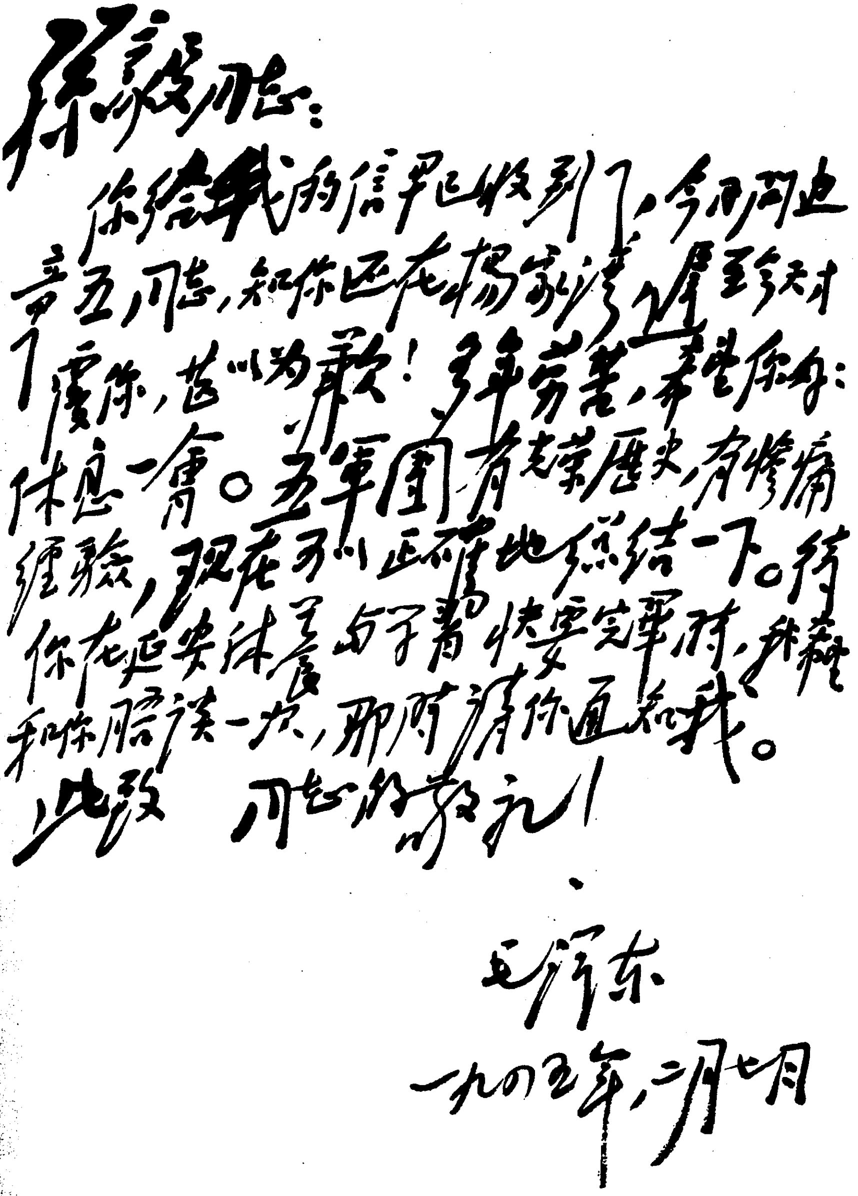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

[1] 孙毅（1904—2003），河北大城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后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一师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2] 边章五（1900—1954），河北束鹿人。1931年12月参加宁都暴动。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四十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共中央军委任局长。



孙毅同志：

你给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同边章五同志，知你还在杨家湾，迟到今天才看你，甚以为歉！多年劳苦，希望你好好休息一会。五军团有光荣历史，有惨痛经验，现在可以正确地总结一下。待你在延安休养好了，当手头快要完毕时，我想和你详谈一次，那时请你通知我。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毛泽东致孙毅信的手稿。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1]

（1945年2月11日）

坚决打击反动者，争取较好者。在打击时，先打一部，再打他部。在作战时，集中全力包围歼灭之。此种方针，在豫西已见效，豫中宜仿行之。此报转皮徐、王戴[2]参考。

军委
丑真

---

[1] 1945年2月7日中共河南区委副书记、八路军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子久和八路军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韩钧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过黄河以来在豫西发展的情形。这是毛泽东转发刘韩的电报时写的一段批语。此件还转发给中共中央北方局。

[2] 皮徐、王戴，指皮定均、徐子荣，王树声、戴季英。1944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以太行军区两个主力团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即第一支队），皮定均、徐子荣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45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豫西抗日游击第三、第四支队，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2月底正式成立八路军河南军区，王树声、戴季英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巩固根据地[1]

（1945年2月11日）

上件[2]转给你们参阅。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加以兵力不够分配，胡宗南计划未必能充分实现。但我王戴、皮徐、刘韩[3]三部，在王戴统一指挥下应在豫西豫中两区，于最近数月内，扫清顽伪，发动民众，建立比较巩固之根据地，然后相机南进，打通五师联系，以防胡军之进攻。

军委

丑真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就转发胡宗南致蒋介石密电给新四军第五师、北方局、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八路军太岳军区等写的批语。

[2] 指1945年2月初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胡宗南致蒋介石的密电。电报说：去年8月以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向黄河南岸“窜扰”，再过两月豫、鲁、皖、冀将均非我有。建议“清剿”，提出：一、派新一军以两个师分两个纵队以伏牛山为根据地，向渑池、新安、洛阳、临汝、登封、鲁山、叶县、漯河跃进，另以周贵昌部编成六个纵队，向太行山、中条山前进以为策应。二、在灵宝、郑州等11个地方各设战地学校一所，收容高中以上学生，训练两个月，分配各地区，秘密使用，组织民众。三、大量发展河南地方团队，以团队阻止“奸军”发展。

[3] 王戴，即王树声、戴季英。皮徐，即皮定均、徐子荣。刘韩，指刘子久、韩钧，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和河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电[1]

（1945年2月11日）

豫中局面尚未广大打开，王树声、戴季英进到豫南尚需时日，五师在豫南部队应维持现状。为加强河南，已令太行再出一部（两千人）渡河南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王震、王首道、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5年2月11日）

断然拒绝赫尔利[2]，完全正确。我们必须坚持八条，并先做四条，否则将长独裁之志气，灭民主之威风。《民主同盟宣言》卖到二百元一份，可见民意所在。今日美新闻处广播美洲十家华侨报纸要求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可见我党主张已得海外拥护，外国多数舆论亦是拥护此项主张的。美政府扶蒋主张可能被迫放弃，我党必须攻掉此项主张。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2月11日致电毛泽东，报告2月10日同赫尔利、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情况。会谈中，周恩来强调在召开党派会议之前，国民党政府必须实现中共提出的释放政治犯等四条主张。赫尔利敷衍其事，提出发表由他和宋子文起草、有利于国民党的共同声明，当场遭到周恩来断然拒绝。后赫尔利又提出要周恩来起草共同声明，周恩来提出如要发表声明，必须说明中共方面的要求以及国共双方主张的不同之点，以明真相。

给秦邦宪[1]的信

（1945年2月12日）

博古同志：

今天报载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2]，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贯彻减租》社论[3]及路家口村新闻[4]，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民主同盟宣言》[5]请予发表，广播。当《新华》[6]发表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发出去了；最后没有了，卖

---

[1] 秦邦宪（1907—1946），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2] 张平凯，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生产民运部部长。他写的这篇文章载于1945年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二版。

[3] 这篇社论载于1945年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一版。

[4] 指《太行平顺路家口检查减租的经验》一文，载于1945年2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第三版。

[5] 《民主同盟宣言》，指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月15日的对时局宣言。宣言向国民党提出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废除法西斯特务机关、立即停止党化教育等十项要求（即信中所说的“十项主张”）。

[6] 《新华》即重庆《新华日报》。该报1945年1月26日全文发表了《民主同盟宣言》。

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十项主张上打的红圈是若飞[1]标出叫我们注意的，请不要刊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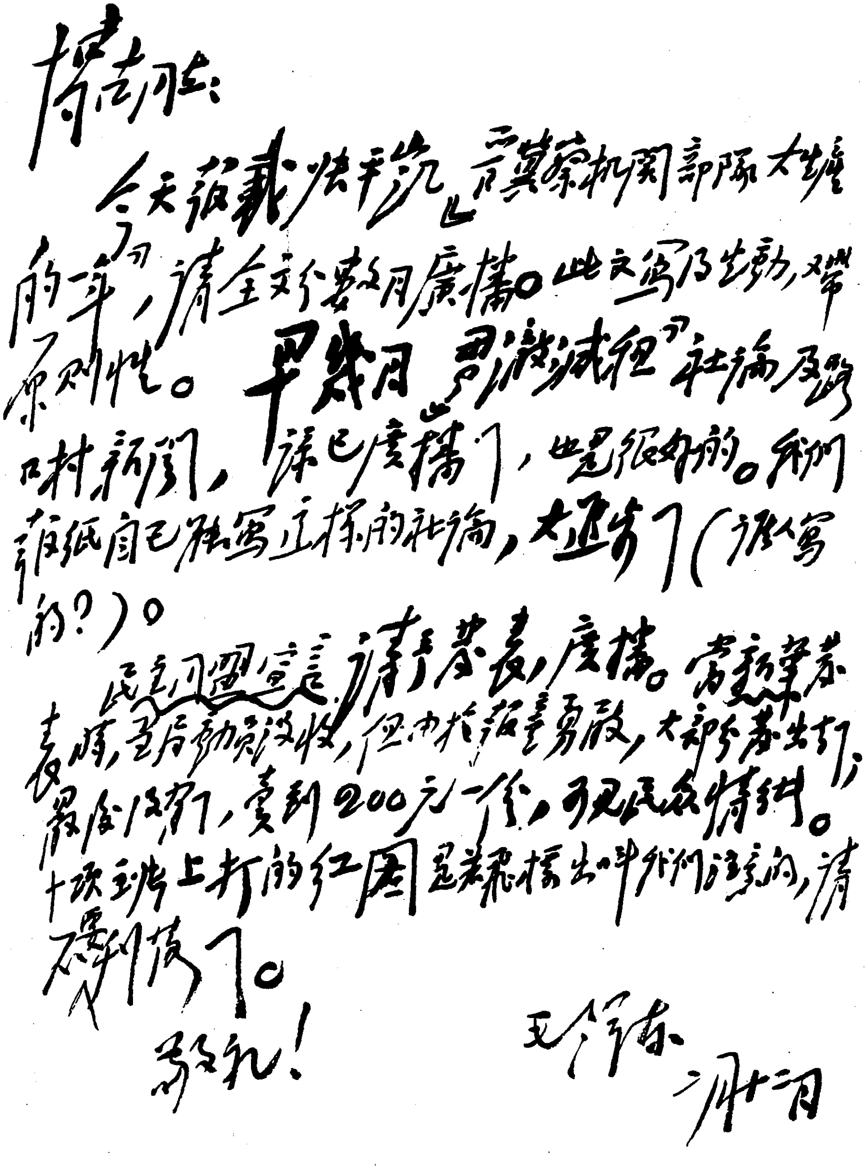
敬礼！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

[1] 若飞，即王若飞（1886—1945），贵州安顺人。当时是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



博古同志：

今天发表张平凯“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一年”，请全文分数日广播。此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早几日“彻底减租”社论及路口村新闻，谅已广播了，也是很好的。我们报纸自己能写这样的社论，大进步了（谁人写的？）。

民主同盟宣言请予发表，广播。当新华春节时，当局动员没收，但由于报童勇敢，大部分卖出了；最后没有了，卖到200元一份，可见民众情绪。十项纲领上打的红圈是我想标出叫我们注意的，请不要刊登了。

敬礼！

毛泽东

二月十日

毛泽东致秦邦宪信的手稿。

接见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局春节拜年同志的谈话[1]

（1945年2月13日）

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了你！”

这个错误的责任在哪个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在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鞠躬礼。）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拜年的同志不约而同地说：“请主席复帽。”）

我们在整风审干中，得到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就是取得了成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中共中央军委通讯局春节拜年同志时关于抢救失足者运动的谈话的一部分。

绩，另一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错戴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

对延安地区拜年团的讲话[1]

（1945年2月14日）

去年一年当中，靠大家努力，做出不少成绩。今年大家要更加团结，要多生产粮食，要多纺纱织布，要讲卫生。

---

[1] 农历正月初二，延安市西区群众、警备团、枣园机关的代表和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200余人，齐聚在俱乐部，给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拜年。毛泽东向大家表示感谢。这是毛泽东对拜年团讲话的一部分。

时局问题及其他[1]

（1945年2月15日）

同志们：

今天这个报告会是中央党校五部、六部发起的。五部、六部的同志们以及许多别的同志到延安很久了，我一次话也没有来讲过。今天就是专为五部、六部的同志们开这样的会，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同志参加。

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同志们给我出的：一个时局问题，一个山头主义问题，一个审查干部问题。此外，我还想讲一点其他的问题。

一　时局问题

大家关心时局，这很好。所谓时局，有全世界的时局，有我们中国的时局。今天全世界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几个大国能不能团结到底消灭法西斯。中国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中国能不能团结起来消灭日本帝国主义。

关于时局问题，有些报纸特别是敌人方面经常散布谣言，说英国、美国、苏联这三个大国是不能够团结的，说他们的团结是要破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

裂的，说他们中间有纠纷，有矛盾，有斗争。他们中间有没有纠纷？有纠纷。从前就有过纠纷，现在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正在开会讨论，将来也还会有。但是在所有的问题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能够取得相互一致的，能够和气解决的；当然也有一部分问题有些争论，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解决。法西斯主义者就希望三个大国不团结。还有一部分人（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人）是反苏反共的，他们早就希望英、美两国有一天去打苏联。这样的人还不少，英、美两国里头也有许多人是反苏反共的，反对他们那个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也反对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和革命。那末，三个大国的情形到底怎么样呢？可以这样说，磨擦是有的，但是团结占主要地位，占统治地位。这几个大国自从订立了条约共同反对法西斯以来，大部分问题都能解决，现在又在黑海开会[1]，我们估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们能够团结，并且我们估计不但在战争时期而且在战争以后也是能够团结的，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和平。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有一个共同敌人，打倒这个敌人是要各国人民都来参加的。苏联是大指头，是主力。你们看欧洲打法西斯，英、美两国只出了八十个师，苏联出了二百多个师。苏联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苏联就不能够胜利。没有英、美能不能胜利？当然也不能够胜利，但是没有苏联那就更不能胜利。所以苏联是很大的力量，是决定的力量，是少不了的。

---

[1] 指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并发表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

英、美两国人民比过去也不同了，现在觉悟起来了。现在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那个时候的政府——北洋政府，就参加了战争。那个时候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怎么样？比现在就差得多，英、美两国人民的觉悟，欧洲人民的觉悟，中国人民的觉悟都是如此。那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的战争。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反对那一次战争，而第二国际领导下的一些国家的工人政党却拥护参加那次战争的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怎么样，应当说觉悟程度很低。无产阶级尚且如此，其他劳动人民或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中国那时候怎么样呢？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帝国主义，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听到过。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十月革命头一天爆发，第二天中国人民就知道了。同志们，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当然，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七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主义的政党才诞生，现在已经发展到一百多万党员。从一九二一年到今年二十四年了，这二十四年中，中国起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这二十四年的变化，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二千四百年，甚至超过了三千年、四千年。现在，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我看这是很好的。这几年来法西斯到处在侵略，到处在杀人，欧洲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觉悟、英国人民的觉悟也提高了。现在的一个月抵得历史上的很多年。过几个月之后，比如打到柏林，把德国法西斯打倒了，那对全世界的影响会更大的。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到。由于这个原

因，英、美的人民觉悟了，欧洲人民觉悟了，我们东方中国人民也觉悟起来了。因为人民一致要求打倒法西斯，结果使得各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打倒法西斯的政策。那一班反动派，英国、美国、中国都有，他们反对联合苏联，但是广大人民不赞成，他们就没有办法。比如美国的选举，孤立派就吃了亏，因为孤立派分子反对同苏联合作，美国工人反对他们，所以他们就倒下来了。同样，我们中国人民的觉悟使得蒋介石国民党反苏反共的阴谋不能得逞。比如前年七、八、九三个月中，国民党宣传要解散共产党，他们说共产国际都解散了，你们为什么不解散？又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等。老百姓的态度怎么样呢？没有一个拍掌的，延安的群众开大会，发通电进行声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是这样打平下去的。

这就是说，大家都拥护英、美、苏三个国家团结，三个国家也会团结。为什么会团结？因为全世界人民觉悟了，因为这一团结现在能够保证打败法西斯，将来能够保证世界的进步。

打日本要打到哪一年终止呢？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在美国把菲律宾占领了，会不会在中国海岸登陆？日本是不是在几个月之后就会倒？看样子几个月它还不会倒，因为日本法西斯手里现在还有东西，它不和美国人打硬仗，留下本钱慢慢打，它就是这么一个计策。

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要靠我们把它打出去，要靠我们党校的同志们毕业之后到华北、华中、华南各个根据地坚持工作，把它打出去。我们现在小米不足，步枪不足，机关枪也不足，军队还不够，根据地还不大，我们还要增加小米、大米，增加步枪、机关枪，增加军队，扩大解放区。同志们都要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世

界上的东西，你不去搬它，它就不动。比如这张桌子，我不搬它，它不走，这把茶壶我不拿它，它不起来。日本人也是这样，要我们“请”他走，他才走的。现在我们的军队发展了，我们的解放区也扩大得很快，生产运动在各个根据地也都发展了，但是还不够，城市工作尤其不够。正是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小，日本人他才不走，所以我们要准备力量。

国民党和共产党能不能够团结起来？能不能团结一致打日本呢？我们天天要求团结起来。国民党现在口里也讲要团结起来，因为他们不讲不行，但是他们心里恨我们恨得要死。我这个话是有根据的，不是乱讲的。蒋介石亲自讲过：“共产党如果不解散，我死了的时候眼睛还是睁着的。”死后眼睛还不闭，一句古话就叫做“死不瞑目”。现在周恩来同志又到重庆去了，同他们再谈判。看样子国民党是不准备真正解决问题的，说要解决问题就要照他们的办法，我们提的事情他们一样也不办，只是要我们加进他们那个政府里头去，去一两个人到重庆吃大米。我们说，委员长请你办几样事：第一条，废止一党专政。他说此事难办。第二条，成立联合政府。他说那也不行。第三条，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他说这个可以。我们说这要看是怎样的合法，在特务制度底下说合法是合特务制度的法。第四条，我们说你那个特务机关都要不得，要取消。他说那不行，特务机关好得很。第五条，我们说有些东西要取消，就是那些压迫人民自由的命令、法律要取消。这个他也不干。第六条，我们要他释放政治犯。我们说，把张学良放出来吧！把杨虎城放出来吧！把叶挺放出来吧！把几百几千的共产党员放出来吧！然而他有宗旨一条，叫做一个也不放。还有一条，我们说你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撤走吧，包围我们边区，老百姓不高兴，你打日本没有兵

力，就把你在华北、华中打我们的军队开去打日本吧！他也不干。最后一条，我们说我们这个解放区你赞成不赞成？要求你承认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这一条也是谈不好的，去年就谈过。他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解散五分之四，也就是说，留下四个师，其他的统统解散。我们提出了八条，他一条都不办。我们说，你先办两三条或者先办三四条吧！他说一条也不办。谈判情形就是这样。

总而言之，同志们，赶走日本侵略者，要靠我们在座的同志，靠我们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工作的同志们，靠中国人民多搞小米、大米，多搞步枪、机关枪，多搞军队，扩大解放区，在日本占领区组织游击队，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展民主运动。做这些事就靠得住，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英、美、苏三国的团结等，都只是条件。

时局问题就讲这些。

二　山头主义问题

大家正在讨论山头主义问题，这是一个事实上存在的问题。我们这个党是由很多部分结合起来的。所谓山头，这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的产物。中国这个社会，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因为受压迫就要革命。中国又是一个农业国家，交通很不方便。内战时期，党以及革命队伍被敌人割开了，分为一个白区、一个苏区。白区有这个省那个省，苏区有这个苏区那个苏区，时间很长，达十年之久。抗战时期也是这样，时间很长，有八年之久，也是这个根据地那个根据地。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方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党校，内战时期没有办过。现在西北、华

北、华中、华南、东北，全国各处大概都有在我们这里学习的。但是，我们的根据地还是被敌人分割的，不是连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地方的革命党、革命军队起来打敌人，就很自然地形成各个集团、各个山头。所以我说山头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殊情形的产物，应该承认这个东西。要消灭这个东西，需要我们开办党校来分析，来讲清楚。但是，只有在将来全国胜利了，有了大城市，到处交通很便利，报纸能够销到全国，电讯能够通到各地，开会也很方便，那个时候才会彻底消灭山头主义。现在不仅我们党校讨论山头主义，延安各个机关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提倡各个机关开会，曾经在各个根据地奋斗的人、各部分军队的人开会，检讨历史，进行自我批评加以分析，其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消灭山头，使它溶化，全党都变成一个整体。而各个部分检讨历史，要在一个前提下，就是指导思想必须是正确的，这样检讨才会有益处，才会有益无害。

什么是正确的指导思想呢？我提出几点意见，请大家讨论。

首先是从团结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一百万党员出发，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以及讨论其他任何别的问题，就是这个出发点，或者叫做立场。还有什么别的出发点、别的立场没有？没有了。为了全党与全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的立场。

第二是要分析。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对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历史加以分析，这是自我批评；对别人进行分析，就是批评别人。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有些不舒服和

难过，这是正常的。现在中央有决议案，提倡大家讲话，无论是什么时候，你们凡是看到工作中间有缺点，有毛病，你们就讲。我们工作中间一定会有些毛病，要加以分析，做得正确的就要承认它正确，做得不正确的就要修正，也就是我上次在这里讲过的两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的东西就是真理。所谓真理就是在我们斗争实践中被证明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它适合人民的要求，使我们取得斗争的胜利。已经被客观事实证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认，而且要坚持；如果有人反对这样的真理，我们就要解释，就要批评。认识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坚持，如果不坚持会怎么样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烂就是把中国人民打烂，把中国无产阶级打烂，把共产党打烂，革命就会失败。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体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应该坚持。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错误，这就是在人民斗争中间不适合的，在斗争中间讲的话不对的，做的事跌了跤子的，写的决议案或者全部不对或者部分不对的。错误的东西应该丢掉，人民不需要的东西应该丢掉，没有理由保持下来。在实际工作中行不通的，话讲错了，事做错了，决议案写错了，就应该修正。如决议案有十条，九条不错，一条错了，那错的一条就要修改，这叫做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不要采取这种态度？要的。一个共产党员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在党校学习要不要这样呢？要这样的。这就叫做公道。坚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错误也是公道。这就是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一条叫做矛盾的统一，一个统一的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比如对的和不对的，不承认这一条，就是不承认辩证法。如果有人认为他是不能分析的，那他就没有作自我批评的精神准备。许多同志因为没有这种准备，毫无主动性，经常是被动的。我

们要提倡主动性，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事、所说的话、所写的决议，把自己做的工作加以分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正确的要坚持，错误的要改正。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办好事。我们党校就提倡这一条。党校出去的同志，都采取一致的态度，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且到处宣传，对你前后左右的人宣传，到哪里就跟哪里的人宣传。这样，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自己看不到的缺点、错误还很多，那就要准备请人家讲。缺点错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有则说之，无则不说；讲对了很好，讲出了真理；讲的不对也不要紧，言者无罪。

同志们！我们奋斗了二十四年，革命还没有胜利，这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国家太大就出现一个革命的长期性。国家太大了敌人太多了，三次革命都没有胜利，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国内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也还没有胜利。现在到了这样的时候，就是有可能胜利。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有一百多万党员，这就是要胜利的条件。从客观条件（国际条件、国内条件）来说，有胜利的可能，但是还要有主观的条件。主观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不要胜利，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这两个时期留下了宝贝，这个宝贝就是人。第一个时期留下的人很少了，是不是还有一两千人，要调查一下。人虽然很少，但这是一堆宝贝，一不是金，二不是银，比金银还贵重。第二个时期的人便多一些了，有多少呢？现在还保存下来的党

员有两万左右。第二个时期包括第一个时期有两万人或者两万人多一点，这一批人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有一百多万党员，是哪里来的？是土里长出来的，种子就是那两万多人。前两个时期我们做了正确的事，也做了不正确的事，叫做跌跤子。我们把内战时期的历史检讨了一下，有些同志还检讨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这是很好的事情。检讨的目的在于得出经验教训，不在于把责任加在个别同志身上，因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没有好结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头磨成粉，有什么好处呢？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经过多年的实践，学会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从团结全党出发。从团结全党出发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评是第二，然后再来一个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如果事情没有搞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没有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1]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你们各部分开会，检讨历史，大革命时期也好，内战时期也好，抗战时期也好，那部分也好，这部分也好，第一个出发点就是团结。讲团结那就一团和气吧，开会喊一声“团结”，再喊一声“团结”，不就完了吗？照辩证法办事就还没有完，要分析，要批评，要搞清问题，分清是非轻重。讲团结就要加上分析，并且是精密的分析，这一面看一下，那一面看一下，反复地看，思想酝酿成熟。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人为什么要长两个耳朵，长一个岂不好吗？这很可以研究一下，我看长两个耳朵的好处是：这个耳朵听这一面，那一个耳朵听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那一面。团结加上分析，对各种矛盾的意见、不对头的意见，对每个人的意见，都加以分析：或者全部是对的，只是句把话不好；或者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不对的；或者全部是不对的。分清是非，然后落在一个地方，就是团结。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如果不谨慎，头一步走得就不对，就不是为了团结，第二步分析工作、批评工作也不很妥当，那末，落下去的地方就必然是不团结。这种情况，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了解这些历史很有好处，它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觉悟了，盲目性逐渐减少了、去掉了。我们有了现在这样一套正确的方法，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中国的胜利，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学习和研究，会不会达到胜利呢？会要达到胜利的。这几年全党的工作中有一个整风，就是要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很快我们党要开七大，也是在思想上准备胜利，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客观条件有了胜利的可能性，我们现在要加紧主观条件的准备。

在山头主义问题上，各位同志还要注意一点，就是你们毕业以后到每一个地方都要估计到各种情况。王震[1]同志率部南下出发时，我对他讲：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又是光明又是困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呢？讲光明就讲光明嘛，又讲什么困难？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只讲光明，讲不得黑暗，这不是辩证法，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我们讲光明，同时一定要讲困难。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

---

[1] 1944年11月上旬，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王震任司令员。

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1]、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叫不叫光明？叫光明，十分光明，不是九分光明。但是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以后开了文艺座谈会，这个问题讲通了。那末，怎样看延安，怎样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呢？照辩证法的方法，从整体出发。陕甘宁边区是什么地方？边区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之一也。之二晋西北，之三五台山，之四太行山，之五……，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华中、华南，都有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这样的定义对不对？当然对。在这样的定义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任何一个根据地采取什么态度呢？首先是万岁！就是一个万岁吗？万岁之外，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任何一个根据地还有它的缺点。陕甘宁边区十年之后

---

[1] 绥远，即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还会有缺点，就是全中国革命胜利了，这里还会有缺点。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已经二十多年了，三个五年计划也完成了，红军相当强大，打仗的时候希特勒都怕得很，但是他们还出了戈尔洛夫[1]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准备。你们出发到各地去，到每一个地方要喊万岁，九千岁都不行，因为那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根据地，做的是艰苦奋斗的英雄事业。但是同时，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准备那里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人多了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小米、大米没有那样多。还有，那里不晓得你是团长、旅长，只晓得你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没有说一声“团长同志请坐呀”，不很尊重，也没有开欢迎大会，让你坐冷板凳，或者你小有缺点人家话就来了。这样，你心里就容易产生一个东西，叫做气。所以同志们都要有思想准备，准备各种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封锁线，有敌人袭击，不开欢迎会，开了欢迎会掌声不够，稀稀拉拉的几个巴掌。要讲这些丧气话，但是不是只讲丧气话？不是。我讲的头一条，就是壮气话，没有专讲丧气话。但是如果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缺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每一个地方都有缺点、困难，我们要事先估计到那里的缺点、那里的困难。到一个地方不要去批评人家，要采取学习的态度，在那里落下来，工作搞熟了，那里的人了解你了，然后再讲有什么缺点，这样人家就能听进去了，人家就会赞成，也会改的。要采取这样的态度，采取谦虚的态度。现在各个部分开会，领导骨干要经常商量，指导要恰

---

[1] 戈尔洛夫，是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在话剧《前线》中塑造的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个前线总指挥，他脱离实际，不肯学习新知识，又好摆老资格。

当，作风要好。这一点很重要。指导恰当，运动就能胜利，会就可以开好；指导不恰当，会就开不好。

三　审查干部问题

上次我在这里讲过一次，有很多的同志没有听到，我再讲一下。

前年和去年我们进行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进行过，但没有像整风以后的最近两年这样认真来做。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犯了许多错误，这是两条经验。

第一条经验，成绩是伟大的，这对于我们党、对于中国人民准备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的方针有两条，即采取严肃的态度和谨慎的态度。为什么说在组织问题上我们的党区别于资产阶级的政党，也区别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因为像共产党这样的严肃性和纪律性，是任何其他阶级的政党所没有的。无产阶级是被压迫的阶级、手里没有权力的阶级，要从被压迫的地位、没有权力的地位求得解放，取得权力，非有严肃的纪律不可，必须坚持集中统一、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的党，是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过的模范党派。在整风以前，同志们都知道，我们党在思想上并不纯洁，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并且相当浓厚。现在怎么样？大有进步了。肃清了没有？还没有，还要做工作，所以党校还要办。办党校或其他干部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是纯洁的，是马列主义的；在组织上也要是纯洁的，我们审查干部就是要在组织上使我们党纯洁。这样一种严肃态度非有不可，但讲起来容易，具体采取怎样的态度时却经常会忘记

这一点，似乎不大严肃也不要紧。农业社会的人在观念上反映农业社会的散漫状态，自由主义是小生产的反映。同志们，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几万人发展到一百多万人，思想不纯洁，组织不纯洁，有些坏人混进来了，不纯洁的分子混进来了。怎么办？我们在组织上应该纯洁，应该搞清楚。这两年的运动怎么样？我讲有很大的功劳，我们学会了整风、审干、审查党员，这方面有很大的成绩。有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只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举了几十件几百件，可我知道的有几千件，拿件数来算还不能否定我们运动的性质。这个运动的性质根本上是正确的，它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巩固，有益于中国人民的胜利。我们把许多问题搞出来了，这是一条经验，有了这条经验，将来我们出去，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建设党的工作，去整理我们党的组织使它纯洁，整理我们同志的思想使它纯洁。一百多万党员中，抗战爆发以后加入的占九十多万。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胜利，要不要在全国胜利？如果要的话，就要有一个有纪律的、思想上纯洁的、组织上纯洁的党，合乎统一的标准的党。《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一条讲要有一个党，要有什么样的党呢？不是社会民主党，而是有革命作风的共产党。我们要看到成绩，这一条经验对于我们全党的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拿件数来算就很多。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但是，同志们，对这条错误的本身要加以分析：一个叫做坏处，一个叫做好处，坏处是犯了错误，好处也是犯了错误。在审查干部中，搞清了一些人是同志，或者是特务、叛徒，或者是自首分子，或者是其他

党派分子，这些人搞清了，很好。我们对这些人要和气，和他们团结，他们自动讲出的也好，被逼出来的也好，只要讲出来，我们就欢迎，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我讲的话是算数的，发出去的支票是要兑现的。一个支票——一个不杀，这一条兑现没有？还不是兑现了！现在如果口头讲一个不杀，结果杀了两个，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确我们是一个也没有杀。要分清是非轻重。是则是，是特务、叛徒、自首分子、其他党派分子，怎么办呢？团结他抗战。人家现在愿意抗战，过去走错了路，现在不再走，就算了。我们宣布这一条，主要是帮助这些走错了路的同志。因为党过去有很多缺点，人家害怕，不敢讲，就没有讲，现在讲出来就很好。对于戴错了帽子的，把非当做是的，怎么办？非则非，取掉帽子，赔一个不是。党校也搞错了一些同志，如果在座的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那末，被戴错帽子的人应取何种态度呢？当着我们给他戴帽子的时候，他应该生气吧！他想我不是特务、叛徒为什么给我戴上这种帽子？乱戴一顿，这样对不对？这样不对。现在我把帽子给你拿下来，赔一个不是，你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呢？你应该还我一个礼吧！现在我向你敬礼，你不还礼，我的手放不下来。同志，过去把你当特务、叛徒，不是当同志，我们搞错了。本来这种愤怒之火要向着敌人而不是向着同志，可是结果是向着了同志，这叫做错了。但是，开始的动机、目的是向着敌人，整个运动的方向是向着敌人，不是向着同志，因此凡是戴错帽子的都取下来。所有这些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你手中有理，你有道理，我们没有道理，所以你在这点上应该把心安下来。同志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给人戴错帽子取下来的事有没有？有。但是像我们去年采取的那样的态度，过去就很少，过去搞错了把帽子取下来就不理了。所以我说，在审

查干部工作中，对被搞错了的人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我们对人民讲的话，作出的决议案，制定的这样那样的政策，都是这样，凡是搞错了的，都要修正错误，赔一个不是，老老实实地赔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这叫做什么态度？自我批评的态度。斯大林写了一本书叫《列宁主义概论》，讲列宁主义的方法论有四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自我批评。我前面讲的山头主义问题，讲来讲去就是讲自我批评这个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第二个步骤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国革命要胜利，我们就要采取这种态度。犯错误本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犯了错误，不好。第二是犯了错误之后又会变成经验，比如以后再来审查干部，双方都有了经验。给别人戴错帽子的同志，因为犯过错误，以后再给别人戴帽子时，就会比过去谨慎。被戴错帽子的同志，以后给别人戴帽子时，也会谨慎，因为他吃过亏。将来我们到北平、上海、南京再去审查干部，做反奸工作时，就会好得多。所以，我说是两条经验：一个是成绩，一个是缺点，这两条都有用处，成绩要发扬，错误要修正。我们采取严肃态度和谨慎态度，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严肃态度是反对右倾，不严肃就是右倾、自由主义；谨慎态度是反对“左”倾，不谨慎就出乱子。

我要讲的主要问题讲完了。

上次我在这里讲到各部分革命团体，讲到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每一方面军里头又有各个部分，其中讲得不完全，还有一个十五军团讲漏了。在我报告以后，有一个同志写信给我，说十五军团从前有过很大的牺牲，应该讲到它。今天我想补充讲讲那天没有提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南方、北方问题。这个问题我早已注意到

了，那天忘记提了。现在在西北、华北、华中这三个地方工作的同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外面来的南方人，一部分是本地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因为要使得我们的同志注意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在抗战时期发生乱子和磨擦的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想外来同志首先要有一种认识，要认识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地的本地同志们的功劳和他们的长处。我过去没有讲清这点，没有很好分析，也不怪那些同志。整风后我才讲这个问题，综合了好多经验。南方的同志，在西北，在华北、华中，现在还活着的不到二万人，他们有很大的功劳，北方的同志、本地的同志应该感谢他们，西北的人民，华北、华中的人民，应该感谢那些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又有光荣，又有困难，还是讲两方面。南方有老布尔什维克，北方也有老布尔什维克，并且也不很少，陕甘宁边区就有，华北也有一大批，陈毅[1]同志讲华中也有。南方的老布尔什维克，不要以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的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

---

[1]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正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你们等两天就要走，将来中央也要走。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最近王震又是从这里出发的，戴季英[1]也是从这里出发的，北方的队伍都是从这里出发的。在北方，在华北，也有革命好多年的党员，像彭真、薄一波[2]，当然还有很多，他们在班房里头同敌人斗争了许多年。在北方、在华北的地方党也发动过一些暴动，虽然是失败了。许多同志经历过三个时期，即北伐战争、国内战争、抗日战争。听陈毅同志讲，华中也发现当地有这样的同志，特别是苏北、苏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提一下？就是我们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个问题，外来的同志应该看到这一点。不但南方是光荣的，我自己是光荣的，华北也是光荣的，华中也是光荣的；不但一方面军是光荣的，二方面军是光荣的，四方面军是光荣的，陕北红军也是光荣的。各部分里头的每一部分都是光荣的，是不是有一部分就高一等，有一部分就矮一等，我看不高不矮都光荣。南方、北方也不高不矮都光荣。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九十几万人，这应当引起几万外来

---

[1] 戴季英（1907—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44年10月被任命为八路军河南军区政治委员，同司令员王树声从陕北率两个团及大批干部进入河南，建立河南人民抗日军。

[2]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顺直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6月被捕，1935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等职。薄一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太原地委组织部部长，1929年被捕，1936年出狱。抗日战争时期，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政治委员、中共太岳区委书记、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副书记等职。

干部的注意和重视；同时，这九十几万人应该感激这几万人，因为他们教会了我们关于战争这一套经验。

第二个问题，关于大后方党的问题。大后方党大概有十万人，是周恩来同志、董必武[1]同志还有在座的许多同志他们负责领导的。在前年审查干部的时候，有的同志觉得那些地方的党不大靠得住，“红旗政策”[2]很多。根据去年甄别的结果，事实上证明也应该是两条：首先应该采取严肃态度，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坏人混进来破坏我们，一些坏人混进来了，一些不纯洁的人混进来了，我们今天应该承认这一条。第二条不可夸大，切记不可以为多得了不得。究竟有多少？现在还无法计算，等将来全国胜利后才能搞清楚，但是估计可以作，十万人里头大多数应该说是好的，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那里大批的是农民同志，国民党就是在被它破坏了的地方，对他们也不大注意，我们又采取疏散的方针，到处散了，一盘散沙，所以就能隐蔽下来，就可以不被破坏或者少被破坏。此外，还要估计到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不要把国民党看得神乎其神。我们对自己内部要搞清楚，大体上是这样两条：一条承认地方党有问题；一条承认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是纯洁的，少部分是不纯洁的，有问题的。这样的估计应该作出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充当内奸，同时又派遣干探，以“左”的面目混入共产党机关内潜伏，伺机破坏。国民党的这种反共策略被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

来。应该讲南方工作的同志有成绩，总的说来在抗战期间有成绩。在战略方面来说，只有根据地也不行，要有三个方面——解放区、沦陷区、大后方，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最后，关于白区工作问题。这个问题我从前没有想到，那天陈毅同志告诉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他提得很对。从前我们批评内战时期白区工作的领导路线有问题，有某些时候应该说是有错误，因而使白区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过去说损失百分之百，现在看没有到那样的程度，还剩下一些，大部分是损失了。领导路线是错误的，应该受批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今后好好地工作，不要再犯那样的错误，并不是说所有在白区工作的同志、干部没有功劳。这就像南方根据地丢掉了，并不等于说红军战士和干部、地方同志和干部他们没有功劳，没有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一样。白区工作的同志中，没有坐过班房还活着的、没有坐过班房牺牲了的、坐过班房还活着的、坐过班房牺牲了的这几部分人，他们为党为无产阶级作了英勇斗争，他们拿着命去拼，因为这样才坐了班房，少数侥幸逃脱的没有坐班房，应该估计到他们斗争的成绩。

这三个问题，因为上次没有讲今天补充一下，我想讲的问题就是这些，完了。

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1]

（1945年2月17日）

【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一月二十四日由延安飞赴重庆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留了三个星期，和国民党政府方面举行了多次商谈。由于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反对人民与民主，并企图吞并八路军、新四军，以致仍如过去谈判一样，未能成立任何协议，恩来同志乃于十六日上午十二时飞返延安。谈判内容，恩来同志于十五日发表之声明内有明确之叙述，此声明登载于十六日重庆《新华日报》，并将译文交付外国报纸驻重庆之记者。该声明全文如下：

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为他只说了在国共谈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谓让步，而并没有说明在什么条件或前提下，才有这些所谓的让步。第一，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将其所领导的一切军队移交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辖，即是说，移交于国民党领导，因为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第二，在谈判中，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不能结束。由于有这两个条件或前提，这一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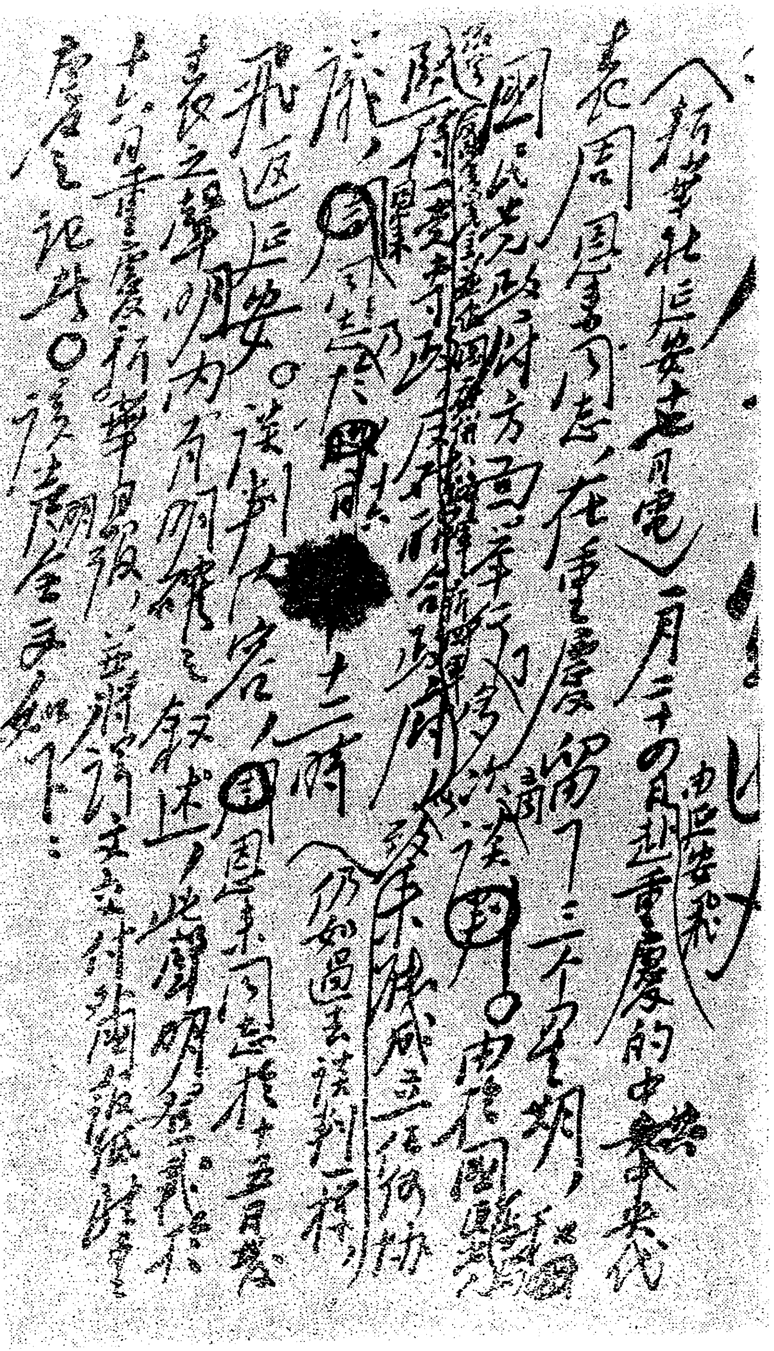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编辑的消息，导语部分是毛泽东写的。

所谓的让步，不是落空，便是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不是让步而是束缚或破坏抗战的力量。具体说来，第一，不把军队移交给国民党政府，便没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从来就不开会，也没有任何权力。第三，在党治下的行政院内设置所谓战时内阁，并无最后决定政策之权。第四，不取消党治和不改变排除异己的军事政策，三人委员会改编中共军队仍等于将中共军队移交于国民党政府。而且照打敌人的成绩看来，应该改编的不是中共军队，而是国民党军队。说明了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为什么拒绝了国民政府整个的提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国民政府拒绝了我们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以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改革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议。我们又曾向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中国民主同盟提议：由国民政府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使之成为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以便在取得一致同意后，好实现联合政府的方针。国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种咨询性质的会议，而会议中预定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因此，我必须回延向我党中央报告。至于我们希望国民政府首先释放爱国政治犯，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撤退一切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等项，政府当局并未接受。这就是数月来两党谈判的主要内容。数月来两党谈判承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热忱相助，不断努力，吾人在此表示感谢。

以下是外国记者对于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二月十四日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明的记录译文，可供参考：

半个月以来，政府代表（我是其中之一）曾与共产党代表周恩

来先生在重庆会谈。政府方面曾提出若干重要的让步，下列各项亦在其内：（一）承认共产党为合法的政党；（二）在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容纳共产党高级人员；（三）为构成一种战时的内阁起见，在行政院内容纳共产党及其他政党代表；（四）组织一个三个人的联合委员会，以考虑改组共产军及他们给养的问题——在该委员会内，政府及共产党代表有同等地位而可能由美军官任主席。但共产党觉得这些提议并不是他们所能接受的，他们拒绝了。共产党提出召开一个各党派的会议。政府之所以允许再次召开一个国共代表及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领袖会议，以考虑国民大会以前关于政治及军事团结的过渡办法，就是接受这个提议的一般的意见。周先生已带了这个提议返延，征求他的党的意见，至于结果如何，则非我所能预料了。过去数月中，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对两党谈判，努力相助，吾人表示感谢。



毛泽东为新华社消息《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写的导语的手稿。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2月18日）

自去年九月以来，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特别是这一次，因为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国民党军队现在情况与以前不同了，不但杂牌军而且中央军也开始变化了。谈判的方针我看是对的，赫尔利来时我们开了中央会议，现在还是那五条方针。国民党和赫尔利都是要我们廉价或无代价下水，我们抵制了这些东西，现在又要套我们的军队，我们也抵制了。我们提出八条和党派会议，这是有原则的妥协，“左”一点、右一点（不妥协或无原则的妥协）都是危险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听取周恩来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情况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给萧三[1]的信

（1945年2月22日）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2]，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3]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

---

[1] 萧三（1896—1983），湖南湘乡人。1939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

[2] 指萧三在1945年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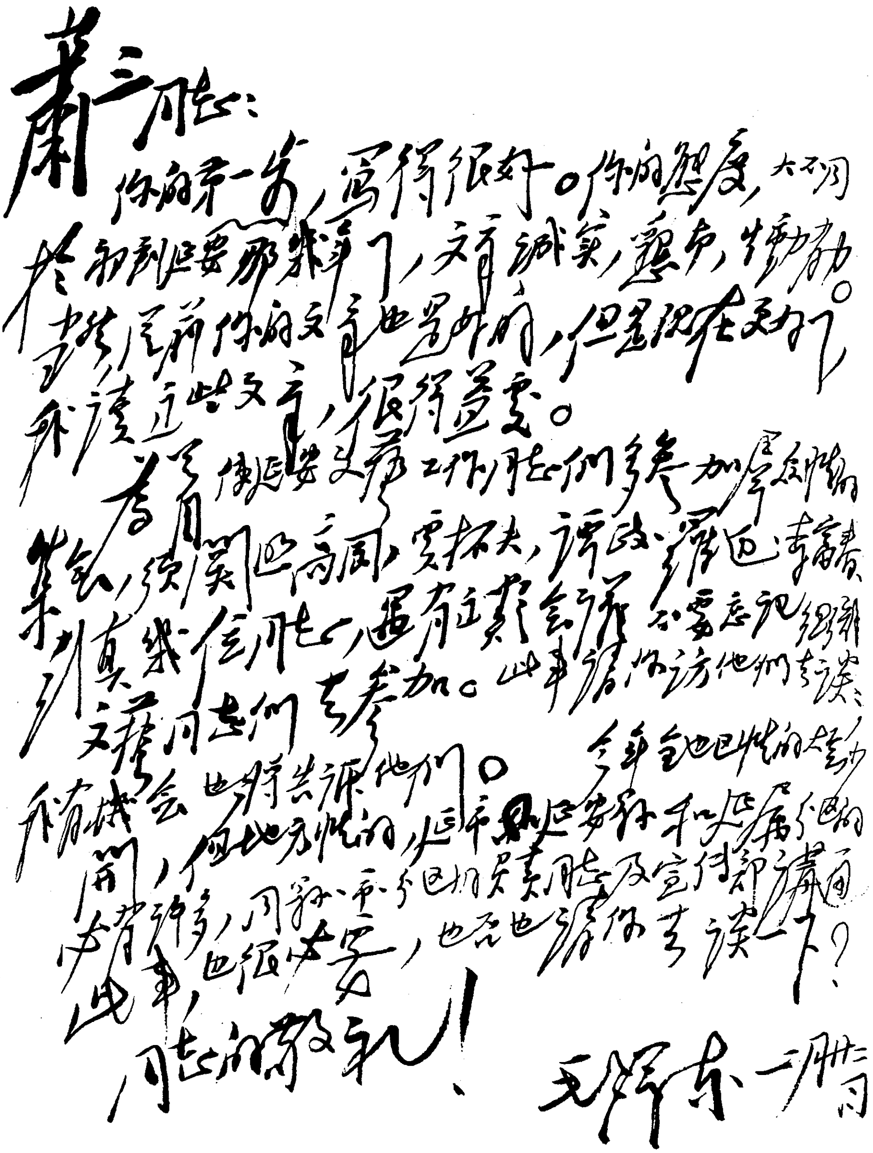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贾拓夫（1912—1967），陕西神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篇，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我想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希望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的集会，[illegible]、高岗、贾拓夫、[illegible]、罗迈、李富春、[illegible]同志，还有[illegible]会议，都要[illegible]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illegible]的劳动[illegible]，[illegible]，延市[illegible]和延属分区的[illegible]及宣传部[illegible]，也很重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月[illegible]

毛泽东致萧三信的手稿。

为苏联红军纪念日致斯大林元帅的贺电

（1945年2月22日）

斯大林元帅：

红军在你的领导下所获得的伟大胜利，鼓舞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欣逢红军二十七周年纪念日，谨致祝贺之忱！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复河南区党委电[1]

（1945年3月1日）

华北各根据地因长期战争，连年旱灾，财政均感困难，你们必须确定与坚持自力更生的财政原则，不要希望外援。但中央仍决定由华北各根据地共帮助你们伪联币一千万元作资本，嗣后即须全部自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河南区党委电的主要内容。

给王梓木[1]的信

（1945年3月2日）

梓木同志：

来信看到了。欢迎你回来。你过去做了许多有益于党与人民的工作，今后望你继续做下去。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么，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三月二日

---

[1] 王梓木（1895—1969），黑龙江木兰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被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武汉、重庆等地做统战工作。1945年2月回延安，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

在王若飞三日来电上批注的一些意见[1]

（1945年3月5日）

一

根本谈不到成熟。

二

王提议应拒绝。

三

看见了一方面利益，但马上出去，政治上不利。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目前逼蒋让步条件的批注；本篇二是关于王世杰的提议的批注；本篇三是关于来电所述周恩来再去重庆可以推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意见的批注；本篇四是关于下届国民参政会的批注。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批注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

四

不争议席，听其委派，但均可参加。

电唁A·托尔斯泰之丧

（1945年3月6日）

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同志：

惊闻苏联著名作家，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不幸逝世，谨致哀唁。

毛泽东

三月六日

在王若飞六日来电上的批示[1]

（1945年3月7日）

似须电若飞，向王世杰提出我方出席人选，免蒋随意委派。

---

[1] 这是毛泽东在王若飞6日关于有消息传出蒋介石可能指派中共方面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的来电上的批示。

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1]

（1945年3月8日）

【新华社延安八日电】国民党宣传部长王世杰氏七日答外国记者称："现在政府决将关于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提付国民参政会[2]审议。"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博士据说在英国学过法律的，现在看来并未学通。所谓国民参政会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是独夫蒋介石所委派的一个无聊机关吗？把所谓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交给这样一个机关去"审议"，"审议"的结果说可以召集，根据王博士的法律，难道就可以召集吗？国民参政会的大多数参政员，都是我们的独夫及我们的博士那一党的"同志"，开国民党大会去决定召集好了，何必要这个机关去"审议"？自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以来，根据它的组织法，根据历来的事实，任何决定问题的权力也没有，现在叫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2]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被迫成立的一个仅属咨询性质的机关，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约束的权力。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都是由国民党指定的，形式上包容了各抗日党派的代表，但国民党员占大多数。由于蒋介石国民党的日益反动，国民党反动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在参政员的成分中更增加，民主分子更减少，而且民主分子的言论更受束缚，该会就日益表现出是国民党反动派用来粉饰独裁统治和制造反共舆论的单纯御用工具。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曾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的反动措施的抗议。

它“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应否召集来，按照王博士的法律，它说“应”也没有用，它说“否”也没有用。假如忽然有用起来，岂非犯法乱纪，参政员们不是有被居觉生先生[1]的司法院拿去办罪的危险吗？最使人们吃惊的，是王世杰博士的记忆力竟然差到如此程度：你的“领袖”蒋介石不是在三月一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吗？六天之后，你就忘记了，似乎有了一个什么“负责团体”，而且敢于“审议”起国民大会的召集问题了。据说是“政府决定”的，这个政府不知是世界上哪一个国里的？但是一定不是中国蒋介石那个政府，因为蒋介石刚在三月一日说过：“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这是一个疑案，有请王博士答复之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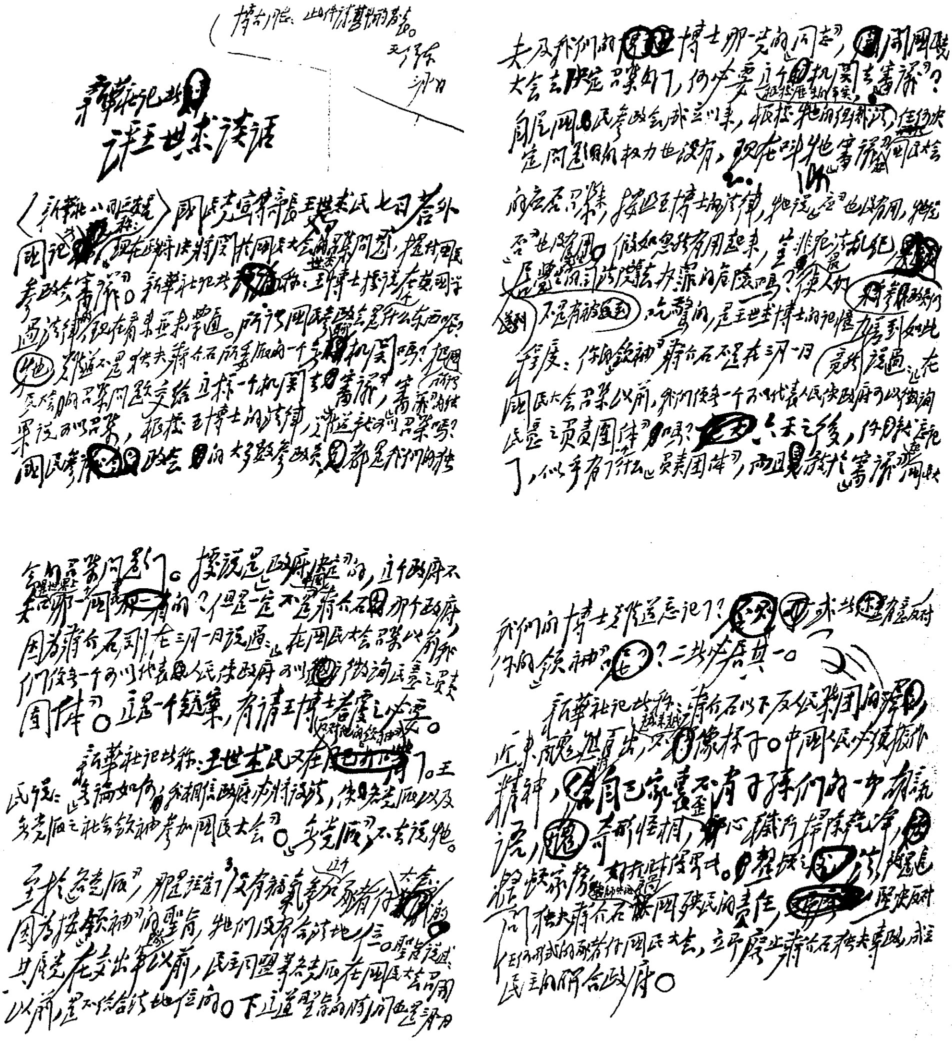
新华社记者称：王世杰氏又在反对他的“领袖”了。王氏说：“无论如何，我相信政府必将设法，使各党派以及无党派之社会领袖参加国民大会”。“无党派”，不去说它。至于“各党派”，那是注定了没有福气参加这个猪仔大会的，因为按“领袖”的圣旨，它们没有合法地位。圣旨说过：共产党在交出军队以前，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是不给合法地位的。下这道圣旨的时间也是三月一日，我们的博士难道忘记了？或者有意反对你的“领袖”？二者必居其一。

新华社记者称：蒋介石以下反人民集团的一群，近来丑态百出，越来越不像样子。中国人民必须振作精神，将自己家里不肖子孙们的一切胡言乱语，奇形怪相，歪心秽行扫除干净，整顿家务，

---

[1] 居觉生，即居正，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院长。

好打日本侵略者。整顿之法，就是追问独夫蒋介石丧师失地祸国殃民的责任，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猪仔国民大会，立即废止蒋介石独夫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新华社记者评王世杰谈话》的手稿。

给王枚的信[1]

（1945年3月10日）

来信及代耕粮款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及援助。我不缺少物资，我决定把你送给我的三千五百元转送给你，作为我对你致谢的礼物，希望你接受。

---

[1] 这是毛泽东致王枚信的主要内容。王枚，当时在军委第二局菜园生产队任文化教员。

和谢伟思[1]的谈话

（1945年3月13日）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相互同情、彼此了解和利害相关的紧密联系。双方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主张民主、尊重任何人的；本质上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

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的生活水平这么低，不能采用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来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双方将不会发生竞争。中国不具备建设大规模重工业的必要条件，它不希望在高级的特制产品上与美国竞争。而美国为了它的重工业和这一类产品，需要出口市场，它同时还需要为投资寻找出路。

中国必须建立轻工业以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并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最终可以向远东其他国家提供这类产品。中国所拥有的原料和农产品，可以作为外贸和外国投资的补偿。

---

[1] 谢伟思（1909—1999），出生在中国四川成都。1938年到1941年在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其后，到重庆美国驻华使馆任二等秘书。1944年7月，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和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政治顾问，参加美国军事观察组去延安，至1945年4月，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作过多次正式与非正式谈话，在半年中，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电讯、报告30余篇，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主张。

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

由于上述原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冲突、隔阂或误解。

但是中国人民实际上是农村人口，是农民。四亿五千万中国人当中，农民至少有三亿六千万。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商人和资本家只占上面薄薄的一层。农民就是中国。

像中国这么幅员辽阔而又落后的国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造，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必然是农业占优势。

因此，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将来的基本问题。中国除非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基础，否则是不能成功地实现工业化的，因为农民必须要为这种工业化的产品提供真正的市场。

我们以日本为例，由于它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去谋求工业化的，所以不得不追随帝国主义和向外侵略。它没有从解决本国的土地问题入手。

华莱士[1]和其他一些美国政治家、作家（例如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中国农民》这篇文章的布鲁克斯·阿特金）对中国的这一基本事实表示出一种清楚的认识。

中国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从封建的租佃关系中解放出来，不再依赖地主资本家贷款和收购他们的产品。这就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实行民主。农民必须独立自主，有权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

从总体上看，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不准备实现社会主义，在未

---

[1] 华莱士（1888—1965），美国政治家。在罗斯福政府中1933年至1940年任农业部部长，1941年至1945年任副总统，1945年3月起任商务部部长。1944年曾访问延安。

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不会准备实现社会主义，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民主管理私人企业的阶段。谈论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反对革命”，因为这是不切实际的，试图付之实行，就会自取灭亡。

国民党与中国人口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没有任何联系，它是一个由军人和地主集团组成的政党，这些集团通过一种保守而又毫无创见的官僚主义实行统治。国民党对于根本改善农民的状况，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和清除至今依然存在的封建残余这样一些事情，过去无所作为，将来也不会有所作为。它之所以不能做，是因为这样做了就会侵犯国民党主要支持者的权力基础。

国民党由于惧怕真正的民主，不得不法西斯化。这样，它就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封建法西斯的混合体。这就是国民党不能从中自拔的背景和特征。

国民党不愿解决土地问题，借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来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它就转而采取硬性规定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工业发展的原则。因此，它在国内的政权方面，或在国外同俄国和其他邻国的合作和友好关系方面，都不能建立起一个牢固的基础，它就倾其全力发展“国防工业”，并迷恋于权力政治的危险游戏。

可以预料，在这些政策当中埋伏着未来的国内和国外的冲突。如果它坚持这种政策，那么这种预料一定会成为现实。在这些政策指导下，国民党不能解决中国国内的基本问题，不能引导国家走向完全民主化，不能成为远东的一种稳定力量。而这些政策如果没有国民党内部的一场革命，没有一个全新的领导集团，是不可能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则是一个代表中国农民利益的政党。它制定的纲领是要使农民问题得到民主的解决，减租减息，实行累进

税，扶助生产，促进合作化，从根本上实行民主政治。在这一基础上，随着各阶层人民在团结的而不是互相冲突的基础上建立必要的自由资本主义企业，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给中国带来民主和健全的工业化的促进力量。这些就是实现和平和稳定的唯一可行的保证。

正如在中国的前途上不能忽视农民一样，也不能忽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想要忽视它，但是它的枪炮不能给它带来胜利。总之，绝大多数战士像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农民。因为我们是为了人民，而且来自人民，所以我们是代表中国人民说话的。人民从我们的经历中认识了这一点。

可以预料，蒋介石会不择手段地破坏和解，因为在和解中他和支持他的集团必将被迫削弱权力，放弃他们的独裁统治。但是他现在所选择的道路正直接导致内战和国民党的最后自取灭亡。

蒋介石拒不承认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还宣布打算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召开国民大会，这都表现出他日益增长的绝望情绪。这种大会完全是国民党的一种工具。无论邀请哪一位非国民党的代表参加会议，都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已。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是在一九三六年由国民党组织挑选出来的。当时（一九三六年）在国共之间处于公开内战的时期，那是一次最虚伪的普选的骗局，那些代表不能代表在过去七年中同日本人进行战斗并在解放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他们甚至不能代表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

由这伙傀儡选举蒋介石为总统，并使他的政府成为合法的中国民主政府，那将成为一出丑剧。不能设想和期待这样一个政府会有任何作为。但直接的危险还在于这个国民大会将被蒋介石利用为要求中共承认其权威并交出自己的武装的一种手段。毋须赘言，在没有把敌人从中国的国土上赶出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敌战区人民是决

不会接受这些无理要求的。于是他们就会被蒋介石宣布为反叛，公开内战的帷幕就要拉开了。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中国最重要的朋友美国必须认识清楚蒋介石最近这个策略所具有的内在危险（决定在国民党一党基础上马上成立“立宪政府”），这就是我们目前对蒋介石开展强大宣传运动的原因。这场斗争关系重大，我们不得不克尽全力大声疾呼。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不管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民党外，为数众多而且日益增加。他们之中包括民主党派和国民党的派系集团、小党派、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许多近代资本家。

但是他们不可能推翻国民党组织或改变国民党现在的反动领导，他们也无力控制蒋介石集团策划的新的“立宪政体”。如果美国不施加影响，要赢得真正的统一和民主还得经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

联合政府是和平过渡到立宪政体的唯一希望，它将在民主的基础上容纳和代表全国各派力量。建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刻不容缓，因为这是目前统一全国各派力量，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的唯一途径。

为什么在国家尚未从日本人那里收复失地，解放区人民尚无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之前，蒋介石现在就要决定推行“宪政”了呢？因为他知道人民是不会同意的。在欧洲，对于被占领各国已有规定，只有等全国解放，人民能决定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之后，才能确定政府的形式。这项政策是公平合理的，我们向同盟国的领导人推荐采用它。为什么中国是个例外呢？上海比雅典大，中国的敌占区相当于比希腊大得多的一个国家！

美国没有觉察到它对中国的影响及左右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蒋介石依赖美国援助。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他可能早就垮台了，或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得到民众的支持，不得不改变他的政策。美国

不干涉中国内政？没有那么回事！你们在这儿，作为中国最大的盟国，你们的参与这一事实就事关重大。

美国的用意曾经是良好的。当赫尔利[1]大使来到延安并签署了五项基本协议的时候，我们是表示赞赏的。要不是他了解罗斯福总统具有同样想法，他是不会签字的。

我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现在似乎摇摆起来。毫无疑问，蒋介石的动机和伎俩是十分明显的。他提出“战时内阁”和“党派会议”的建议不解决任何根本分歧，因为它们是毫无权力的，它们在各方面都不及联合政府。蒋介石提议“改编共产党军队”并“将它们置于美国指挥之下”，这都是企图挑拨我们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以引起误解。像英国人在欧洲那样，我们是乐于接受美国的指挥的，但所有的中国军队都必须做到这一点。

蒋介石一直企图把谈判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为了取得外国消费物资，他布置了一个非常狡猾的宣传骗局，这就是答应在今年通过召开一个伪国大，立即实现“民主”。我们不相信美国人会轻易上当。

召集国民大会，这是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王牌，美国认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将关闭和平的大门。一旦召开国民大会，则木已成舟，和解就不可能了。如果迫不得已，我们将进行战斗，因为我们不仅为目前解放区一亿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而且为全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战斗。

当祖国的一半土地遭到分割或被敌人占领的时候，当国民党以

---

[1] 赫尔利（1883—1963），1944年11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外的一切政党都被视为非法的时候，不能召开国民大会。形势所要求的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挽救目前的时局。我们希望美国能发挥自己的影响促其实现。做不到这一点，美国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乌有。

给任弼时的信[1]

（1945年3月24日）

弼时同志：

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四十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成定议，再交七中通过。

---

[1] 这是3月24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从头至尾修改一遍后，给任弼时写的一个短信。

给李富春的信[1]

（1945 年 3 月 29 日）

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修改本今日印五十本，留一本给我，四十九本由秦邦宪交你。今日给参加七中全会的每人发一本，叫他们收到即看，附白纸一张，请他们再写意见，于三十一日开会时带交。给陈绍禹、冈野进、王稼祥各发一本。

---

[1] 这是毛泽东致李富春信的主要内容。

对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复示[1]

（1945年3月30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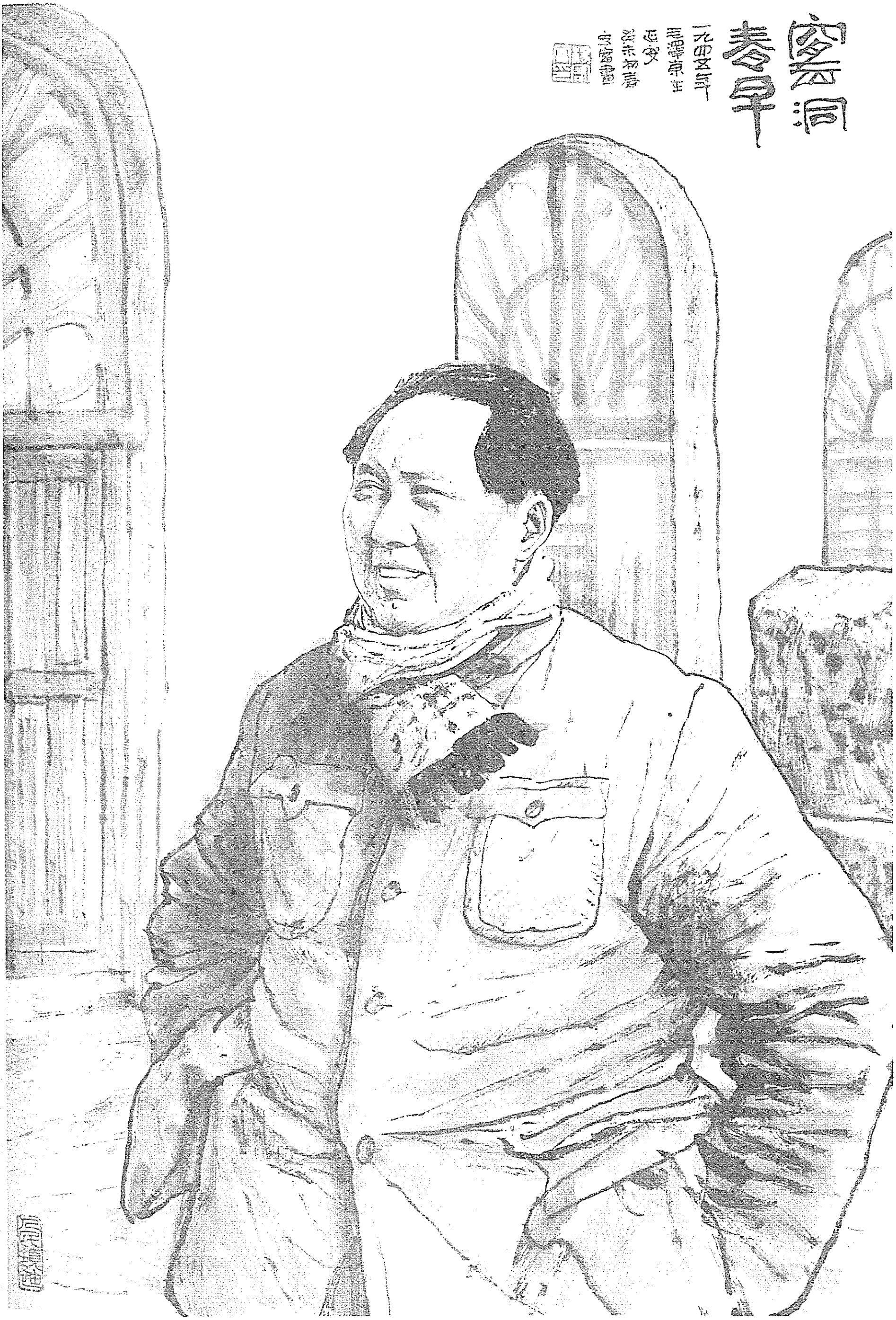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对《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指示》的复示。在报头上还批有“此报转发华中、湖北、王震”字样。3月11日，《河南区党委关于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策略的指示》中指出：一、近来国民党顽固派积极组织河南地方势力，动员河南国民党，组织反共反八路军，并公开勾结敌伪。其实际企图，是在河南组织反共统一战线，抵抗与进攻我们。我们的策略，应广泛与切实地在河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络一切可能联络的各种地方势力，团结各阶层人民，要力争中间阶层大部同我们联合或中立，应认识到河南社会势力中，中间阶层占大多数，河南社会也是两头小，中间大。二、我们打击的对象只是少数，对其余的采取不打，要中立它，联合它，与大部分地方势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三、国民党顽固派与河南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与地方势力之间，中间阶层与军阀、军僚、大地主之间，敌伪之间，河南基本群众与国民党统治势力之间，均有许多矛盾，我们应注意利用，实现争取群众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四、对国民党在河南地方党员，我们一般地采取合作与督促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执行我们的军令政令，但不能给他们以任何领导权，领导权要完全掌握在我们之手。五、对河南保甲政权，我们除一方面暂时利用外，一方面深入组织农民抗敌救国会，逐步地从农抗基础上改造乡村政权，组织与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是我们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六、对乡村士绅，应注意好好团结他们，采取一区及一县为单位，组织参议会，争取士绅们为民主政权、地方行政服务。

河南区党委：

你们寅真电所述策略是正确的，望好好执行。

毛泽东
寅卅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窑洞春早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在延安
癸未初春

《窑洞春早》（中国画）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5年3月30日）

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你们究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

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

---

[1] 这是毛泽东复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建立湘北根据地然后南进[1]

（1945年3月31日）

王震、首道：

你们占领平江、崇城[2]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3])，然后再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毛泽东
寅世

---

[1] 1944年，日军向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进攻，国民党军接连败退，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大片国土沦于敌手。为增强华南抗日力量，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11月9日，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1945年3月，他们先后抵达崇阳、平江地区，并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这是毛泽东给王震、王首道的复电。

[2] 崇城，应为崇阳。

[3] 指湖北的崇阳、通城和湖南的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长沙、湘潭。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1]

（1945年3月31日）

一

中国在这一次有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可能性，为近百年来、五四以来、有党以来所仅有。我们应该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纲领，动员全国人民争取其实现，也就是团结全党全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这个纲领以前大部分是有的，现在加以综合及发挥。

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2]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我这个报告讲抗日的部分不太多，有些同志对此有些意见，这是因为思想不很通。《新民主主义论》讲抗日的话还要少一些。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当时有同志不赞成，他们不知道抗日的问题是已经定了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抗日。我说的这次有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2] 指蒋介石1940年2月23日至25日在柳州召集的军事会议。

些同志思想未通，但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1]至六中全会时期的错误倾向是有区别的，那是主张依靠国民党，不要民主、民生，不要三民主义的。要三民主义是一个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同志们的意见很好，百分之九十以上我都采取了。

我们提出放手发动群众是否“左”倾了？对国民党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是否采取绅士腔调如同招待新闻记者那样？那时我们的名誉很好，可是斯坦因、福尔曼[2]对我的谈话就很不满意，那种腔调有一很大缺点，即不能说透问题，不能揭破蒋介石。或者如同苏联的态度那样？这也不适当，因为我们是不合法的，不像苏联，而蒋介石又非罗斯福、丘吉尔[3]。那末，是否像《解放日报》那样？也不好，《解放日报》可以那样说，但也并非天天说，我们的负责人就不宜于那样说。我在这个报告里面批评了他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有希望，虽然只占一分不足。这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会犯错误。对国民党抗战成绩我没有多说，从科学的意义上应说国民党是半法西斯主义，我没有说，免得为他们

---

[1] 十二月会议，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否定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决议，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

[2] 斯坦因，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福尔曼（1898—1978），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驻重庆记者。1944年6月，他们参加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毛泽东分别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3] 罗斯福，当时任美国总统。丘吉尔（1874—1965），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张目。对他们的说法我是随地而异的，其基本精神是我们的独立性更强了，但对蒋介石仍留有余地。

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们都采取联合的态度，但也略示区别，略有批评。这一点也很重要，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对资产阶级，我说是多半与土地联系着。对大后方民主运动中的某些分子，也批评其不坚决，指孙科[1]之类。有的人看到三月一日蒋介石的讲话与我们的痛驳后，又慌张了；听说赫尔利[2]回我们的电报中说不要作最后结论，就又高兴了。中间派是动摇的，中国的政治力量是两头硬中间软。假如中国有农民党，我们也要与它区别。这是要我们共产党员弄清楚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

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动摇，是两面派。一面抗日，一面投降；一面联共，一面反共；一面联苏，一面反苏。蒋介石的欺骗我们都揭穿了，而且有外国人压。赫尔利来延安，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个影响很大，国民党特务机关也受到影响。爱金生、高桂滋[3]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文化界签名谢冰心、顾颉刚[4]都参加了。这个报告中我们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这个报告，蒋介石看了最不高兴，中间派看了又高兴又不高

---

[1] 孙科，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2] 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3] 爱金生，今译为阿特金森（1894—1984），美国《纽约时报》驻重庆记者。1944年任重庆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同年9月、10月间曾到延安参观访问。高桂滋（1891—1959），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军长。

[4] 谢冰心（1900—1999），福建长乐人，作家。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他们参加了1945年2月22日发表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签名。

兴。中间派是有前途的，外国人在蒋介石不行了的时候会扶他们，他们的壮大现在对我们是无害的。但他们是动摇的，蒋介石让步了他们就会拥护。三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罗隆基[1]就写文章欢迎“还政于民”；二日我们广播了新华社记者对蒋介石讲话的评论，民主同盟在十日又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所以，他们是可以听我们的，但需要我们的坚强领导。领导问题我在报告中讲了一下，除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其他民主分子。

对外国主要联合苏联，对英、美及其他反法西斯的各国以联合为主，但也有警戒的暗示，希望他们尊重中国人民的意见。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2]。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3]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

---

[1] 罗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2] 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指出，随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日益成长，“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8页）

[3] 华盛顿（1732—1799），美利坚合众国的奠基人，第一任总统。北美独立战争时期，任大陆军总司令。1787年主持费城会议，制定联邦宪法。1789年当选总统。林肯（1809—1865），1861年至1865年任美国总统，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南北战争爆发后，颁布《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作过。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因为那时我们被打倒在地上，不把孙中山丢开自己就站不起来，如同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现在不同了。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反旧民主主义也提了一下，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但不着重反对旧民主主义，因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这个区别以前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改变，以后还可以用若干年。工农民主专政是新民主主义的本质。具体纲领在各个阶段是不同的。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如果大家同意报告的这些基本观点，则修改后即发给所有代表，代表大会上仍可提出各种修改意见。

二

刚才几位同志提到大会的精神算不算旧账的问题。不算旧账当然不是一个口号，总结经验也可以说是算账，但我们的算账不要含有要搞垮谁的意思。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过去的历史错误主要是一个社会现象，由于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以为自己是对的才要在党内党外打倒一切。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王明同志最近写信给我，也赞成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与团结全党两点，这是很好的。如果在大会上讨论历史问题，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议题，而结果仍不会超过现在的决议草案。扯到军事历史、华北历史、各个山头等等，更是扯不清楚。决议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没有说品质，没有说非法，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至多成为缺点，而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都采取了这个方针。

政治报告中关于军事方面有一点还要说明的，即共同建设人民的军队问题。抗战中我军内部情况已有很大变化，有一些军事首长不是共产党员。军队要全部是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即使内战时期红军中的党员也不过占三分之一。如果有的军队和我们合作，以后又不合作了，这时我们应该让他们走，留余地，不要伤感情，即使再变成敌人也不过同合作以前一样。同别的军队的外部合作，山东

做得很好，我们许多地方还是“左”了，需要耐心说服。

联合政府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性，即要我们交出军队去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但政府还是独裁的，我们做官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去做，也不要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不过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为了委曲求全，而这个政府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做宣传工作。第二种可能性，也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仍是蒋介石的独裁政府。第三种可能性，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一亿五千万人民时，在蒋介石的力量更加缩小、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个问题不在报告上写。还有，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问题，故历史问题延至现在的七中全会解决才成熟，各地的历史问题现在就不必急于解决，因为不成熟。

关于布置接收第一架起义飞机致华中局电[1]

（1945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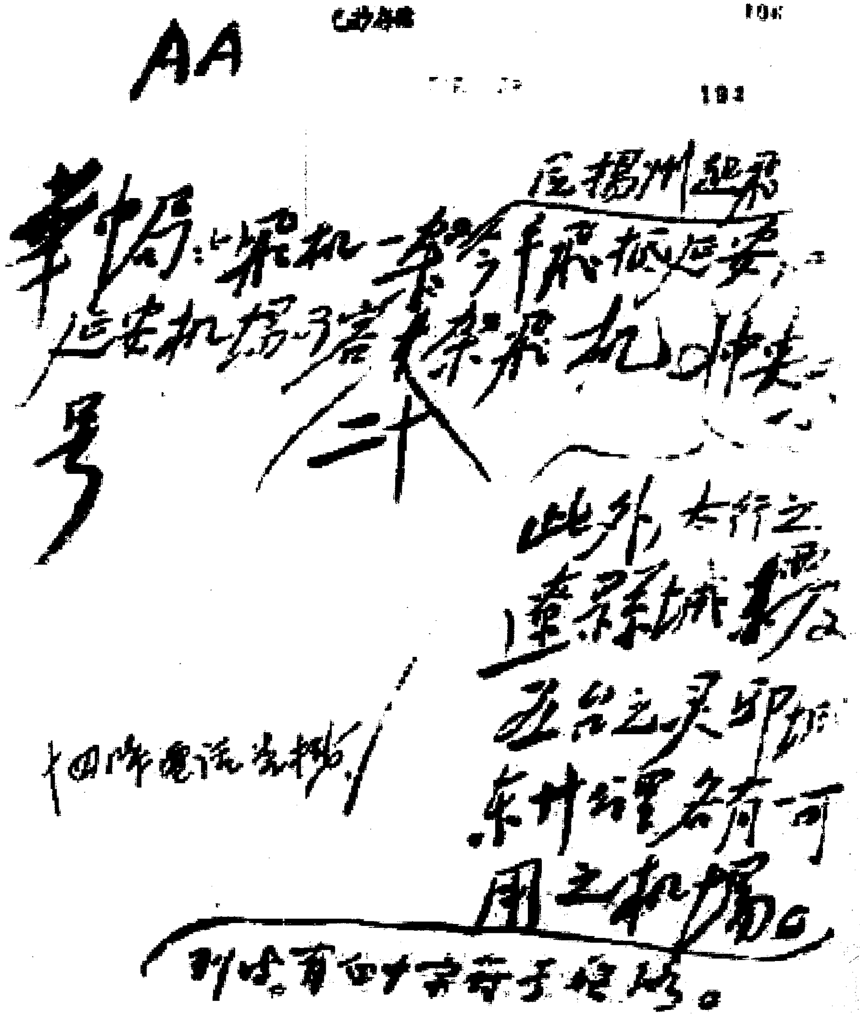
华中局：

（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廿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

中央

---

[1] 1945年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一些汪精卫伪政权旗下人员逐步认定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才是中国的希望，开始想办法起义投诚，奔向光明。汪伪空军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就是其中两位。他们通过多方联系找到新四军苏浙军区，向司令员粟裕表达了起义的愿望。经过秘密商谈，周致和、黄哲夫计划于8月20日驾驶汪伪“国府专机班”专机“建国号”从江苏扬州飞抵延安起义。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的电报，要求华中局安排布置降落机场。周恩来在电文中加了一句：“到时，有白十字符号联络。”1945年8月20日，这架飞机飞抵延安。



AA

193

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今午从扬州起飞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东来飞机二十[illegible]

此外，太行之辽县、黎城、长治，五台之灵邱，胶东之[illegible]各有可用之机场。

到时有白十字符号于[illegible]。

十四时电话告[illegible]

毛泽东致华中局电的手稿。

和谢伟思的谈话[1]

（1945年4月4日）

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在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对国民党的政策仍旧是：一方面批评并试图激励其进步，另一方面提出能够作为实现真正统一、民主和使全国一切力量致力于赢得战争的基础的妥协。这个妥协必须意味着国民党和蒋介石专政的结束，这个妥协必须包括承认共产党军队是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放区政权是合法的地方政府。对于国民党，我们不打第一拳，不放第一枪。但是蒋介石现在计划召开的国民大会一定会带来内战。一旦受到攻击，我们将予以反击。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

---

[1] 这是毛泽东在住处和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同谢伟思进行的最后一次谈话的一部分。谢伟思于1945年4月4日离开延安，奉召回美国。

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1945年4月9日）

郑、李、陈[1]：

寅寒郑电、卯冬三人电[2]，均悉。

（一）派兵困难，不要依靠。

（二）你们将重点移到路西[3]，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兵力部署你们自己调剂。

（三）财经、民运干部，已令组织部考虑酌派。

（四）你们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应由主要依靠税收转到主要依靠生产自给，放手由各区自己生产解决，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办法。一九四〇、四一、四二整整三年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情形比你们还要厉害，从四三年起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解决了问题。仅有人口一百五十万的边区，却养活了十万公家人而民不伤。五台、太行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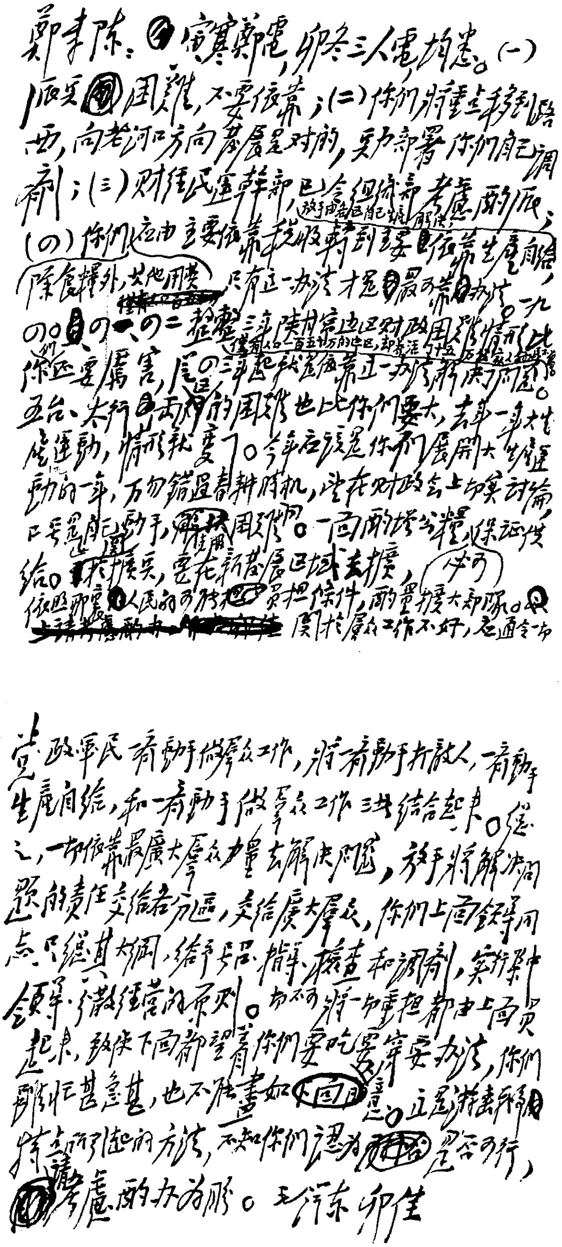
[1] 郑，指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少敏（1902—1977），山东寿光人，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2] 寅寒郑电，指郑位三1945年3月14日给中共中央并华中局的电报。卯冬三人电，指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1945年4月2日给中共中央并华中局的电报。

[3] 路西，指平汉路以西地区。

区的困难也比你们要大，去年一年大生产运动，情形就变了。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口号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一面酌增公粮，必可保证供给。关于扩兵，要在新发展区域去扩，依照那里人民的可能负担条件，酌量扩大部队。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一切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总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人意。这是游击战争特点所引起的方法，不知你们认为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办为盼。

毛泽东
卯佳



郑李陈：寅真郑电，卯冬三人电均悉。（一）应克服困难，不要依靠；（二）你们将重点移到路西，向老河口方向发展是对的，具体部署你们自己调剂；（三）财经民运干部已令组织部考虑酌派，放手由各区自己训练解决；（四）你们应当主要依靠秋收并到明春依靠生产自给，除食粮外，其他用费只有这一办法才是最可靠的办法。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整整三年陕甘宁边区财政困难情形比你们还要厉害，仅有人口一百五十万的边区，却养活了十五万脱离生产人员，从四三年起就是依靠这一办法解决问题。五台、太行区、太岳区的困难也比你们要大，去年一年大生产运动，情形就变了。今年应该是你们展开大生产运动的一年，万勿错过春耕时机，望在财政会上切实讨论，只要是能动手，就能克服困难。一面开荒公粮保证供给，一面支援主力兵，要在新发展区域去援，依照那里人民的可能负担条件，酌量援助大部队。关于群众工作不好，应通令全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将一齐动手打敌人，一齐动手生产自给，和一齐动手做群众工作三者结合起来。总之，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放手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各分区，交给广大群众，你们上面领导同志只管其大纲，给予号召、指导、检查和调剂，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切不可将一切重担都由上面负起来，致使下面都望着你们要吃要穿要办法，你们虽忙甚急甚，也不能尽如下面之意。这是游击环境特点所引起的方法，不知你们认为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办为盼。毛泽东　卯佳

毛泽东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电的手稿。

对《新华日报》五日时评《我们的坚定而明确的态度——评赫尔利将军谈话》的批语

（1945年4月9日）

重庆此件很好。延安暂取不理态度。

关于太岳四四年生产情况与四五年生产计划的报告给太岳区党委的复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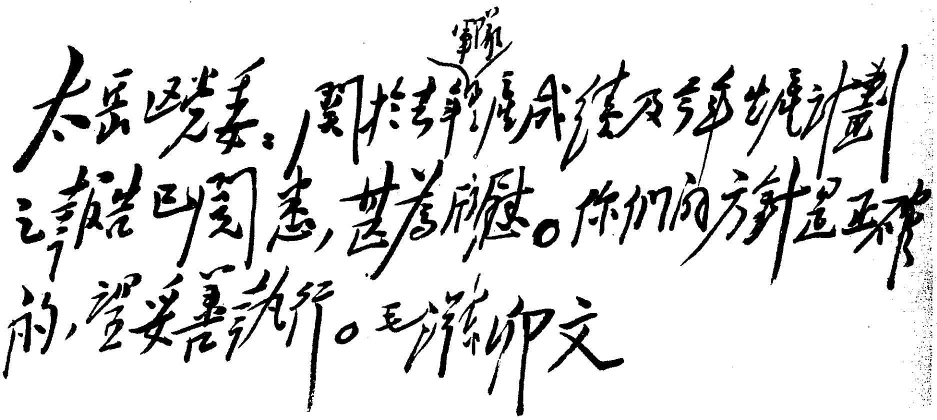
（1945 年 4 月 12 日）

太岳区党委：

关于去年军队生产成绩及今年生产计划之报告已阅悉，甚为欣慰。你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妥善执行。

毛泽东

卯文



太岳区党委：關於去年軍隊生產成績及今年生產計劃之報告已閱悉，甚為欣慰。你们的方針是正確的，望妥善執行。毛澤東卯文

毛泽东给太岳区党委的复示的手稿。

---

[1] 毛泽东在太岳区党委1945年4月8日的电报上写有“此报转发平原、山东、华中、湖北、河南”字样。

关于罗斯福逝世的唁电[1]

（1945年4月13日）

华盛顿杜鲁门总统：

罗斯福总统不幸逝世，我们谨向美国人民及总统遗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吊唁。举世均将深痛此种损失。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朱德为吊唁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给继任总统杜鲁门的电文。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1]

（1945年4月20日）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如何做？交七大还是交七中全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会讨论通过？原来是准备交七大的，后来决定交七中全会。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问题，不是随便决定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大会把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

内容上的其他问题：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治病救人的方针证明是有效的，要看什么时候需要强调哪一个方面。前年十二月以后治病太多，救人差一点，所以去年就多加些“甘草”。最近的情形也是如此。一九四〇年不许提路线[1]，一九四一年谈了路线[2]，以后就发生了王明同志的问题。他养病的时候，

---

[1] 在1940年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十年内战后期的“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比立三路线还大，使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根据地损失不止十分之九。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会议讨论中，有同志不同意提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因此，毛泽东稍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只说在土地革命时期后期有“许多过左的政策”，这种过左政策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提是路线错误。

[2]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会议经过讨论，对十年内战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毛泽东为会议起草的结论草案中，指出：“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我们整了风，讨论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问题，“项庄舞剑，意在沛公”[1]，这是确实的，但“沛公”很多，连“项庄”自己也包括在内。发展的过程就是如此。到了现在，这个决议就比较好，把治病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王明同志写了这封信[2]，内容有无缺点错误还可以研究，但其态度是好的，应该欢迎的。其他许多同志的意见都很好。错误不是少数人的问题，写几个名字很容易，但问题不在他们几个人。如果简单地处理几个人，不总结历史经验，就会像过去陈独秀犯了错误以后党还继续犯错误一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3]。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党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要分清界限。

---

[1] 典出《史记·项羽本纪》。项庄是项羽的武将，沛公即刘邦。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占秦都咸阳后，派兵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军攻入，进驻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准备消灭刘邦。经项羽叔父项伯调解，刘邦亲至鸿门会见项羽。宴会上，项羽谋士范增以“助兴”为名命项庄舞剑，欲乘机刺杀刘邦。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体掩护刘邦。此时，刘邦谋士张良至军门告诉刘邦参乘樊哙：“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于是樊哙带剑拥盾闯入，刘邦才能乘隙脱身。

[2] 指王明1945年4月20日写给任弼时并转毛泽东及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各同志的信。他在信中表示赞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检讨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

[3]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从前许多同志都苦于中国没有马、恩、列、斯那样的革命领袖，我也是如此，中国的落后不能产生列宁那样的伟人。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凡是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现在改正了的同志，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全党要像决议上所说的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这个支票是要兑现的。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1]、“轻骑队”[2]、“西北风”[3]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生产运动也是这样，没有生产运动，党就要向后退，就要往下垮。这些都是学习来的，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是有些道理的。我们就是这样慢慢学习着前进，现在也并不是什么都学会了，只是错误犯得少一些。

防止敌人利用，这一点也要说一下。人家成立了一个“非常委员会”，我们的决议还没有做他们就利用，说什么四中全会是正确的，现在做了决议他们更要利用，更要挑拨，我们必须准备。团结——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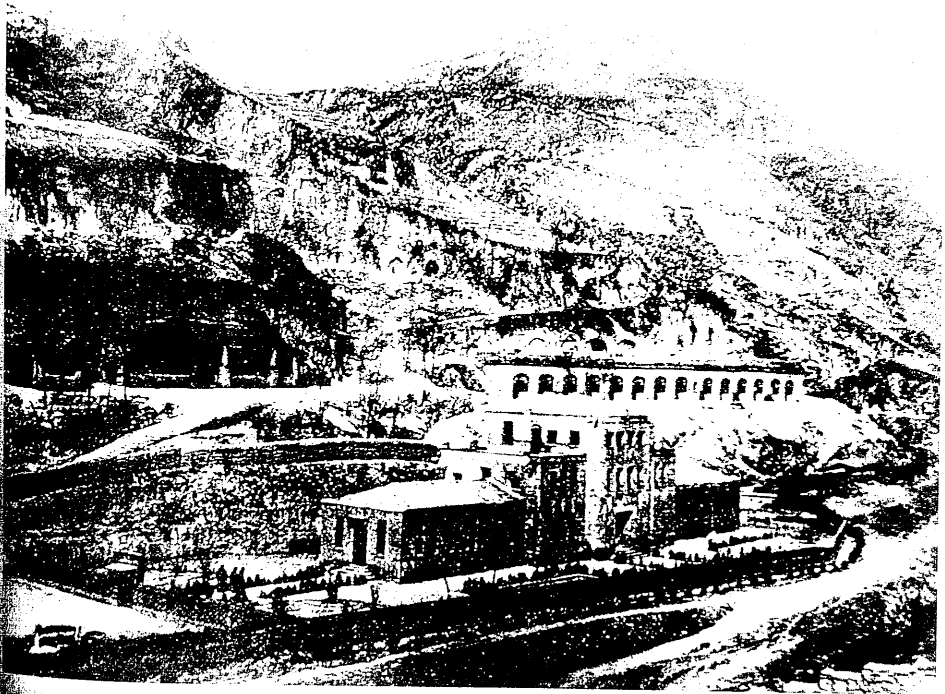
---

[1]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员，他写的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分两次发表在1942年3月13日和23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

[2] “轻骑队”，是中共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

[3] “西北风”，是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办的墙报。

评——团结，这是不怕挑拨的。但是小广播就不同，这需要搜集并加以分析。其中有许多是闲话，是没有恶意的；有许多是错误的，但也不一定是恶意的；至于有恶意的也要听，因为只有听了才能发现它的恶意。总之，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把各种闲话都引到自己的责任上来，这就卸下一个大包袱，不至于多生气。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



1944年5月21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图为会议旧址。

1945年，毛泽东和康生在延安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

（1945年4月21日）

代表同志们！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

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斗争，不讲很远的历史，单讲比较近一点的历史，也有一百多年了。从一八四〇年和英国人打仗的鸦片战争起，到一九四五年，已经是一百零五年了。这一百多年中间，有很多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当着资产阶级刚刚开始产生，或者稍微长大一点，或者后头更长大一点的时候，当着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先锋队的时候，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还不高，但是资产阶级有各种优势，它在文化上、经济上、政治经验上都占优势，它有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的报告。

党，有口号，有自己奋斗的目标。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它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只是近二十几年，无产阶级才有了自己的政党、口号和奋斗目标。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历史，据说有五十万年。[1]这五十万年之中，一段是野蛮史，一段是文明史。文明史只有五千年或者稍多一点。我们中国的历史算长得很，但也只有四千多年至五千年。从黄帝纪元算起到辛亥革命四千六百零九年，再加辛亥革命后的三十四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四十三年。其实所谓黄帝那个时代，还不是文明社会。文明社会从奴隶社会算起，在中国据现有的可靠资料，应从商、周算起。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在座的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就会知道，记得此事。这次战争，刚才讲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到那种程度，就要出这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这次

---

[1]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损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胜利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九一九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

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所以我说，同志们，你们很幸福。我们那时候长得很大了，还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帝国主义，什么马克思主义。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如华盛顿、拿破仑。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1]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

---

[1]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辛亥革命后组织进步党，1916年该党演变为研究系，他是首领。1902年至1904年，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上，几次讲到过马克思。朱执信（1885—1920），原籍浙江萧山，生于广东番禺，同盟会会员，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者。1906年1月，他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共产党宣言》的一些内容，还提到《资本论》。

[2] 1912年，上海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连载了施仁荣译的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文题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

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一九二一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十二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1]，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2]，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十二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3]，一个是陈公博[4]。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

---

[1] 陈潭秋（1896—1943），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39年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这个报告中还说他“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

[2]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1945年4月，受中共中央的委派，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

[3]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叛党。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4]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人。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汪精卫叛国投降日本侵略者，先后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等职。

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1]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联共党史》开卷第一页第一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现在还是在根据地，还没有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二十四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中国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四年，世界是翻天覆地的二十八年。这二十八年是苏联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二十八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四年也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二十四年。这一点是要使广大人民知道的。

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在这二十四年之中，经过共产主义的小组，经过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壮大起来了。但中间被人家拦腰一枪打在地上，爬将起来又和他打，叫做土地革命。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主要是北伐战争，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是国内战争，一九三七年至现在是八年抗日

---

[1] 参见《庄子·人间世》。

战争。现在的同志经历三个时期的不多，经历两个时期的那就很多。这是就我们全党讲。在座的代表中，这个统计还没有做，究竟是三朝元老多，还是两朝元老多，还是一朝的多，现在还不知道。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年。打蒋介石是不错的，但是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所讲的。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在这三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中，有一部分同志的意见大体上比较恰当，适合中国国情，比较正确些，在组织队伍、如何打法的问题上比较好一些，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当时党内的同志天南地北，除了几个被国民党悬赏几万元捉拿的人以外，大都互相不知道。可是意见可以相同，或者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相同，或者在那样一个问题上相同。

孙中山这个人我见过，在座的同志看见过他的还有。他是一九二五年去世的。当他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的时候，我见到了他，那时他已将近六十岁。当时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座的林老[1]也是参加的一个。我们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出席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所谓“跨党分子”，是国民党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动手也不行，因为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2]，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我们当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有很多人反对我们，说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三十六天罡星[3]。搞军队也是国共合作，当时的主要干部，军队的与党的，都有国共两党的人。第一军是蒋介石当军长，恩来同志是党代表，第二军军长谭延闿，党代表是李富春同志，第六军党代表是林老。那个时候也就是联合政府，军队是政府的主要部分，所以联合政府以前就有过。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

---

[1] 林老，指林伯渠。

[2] 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1923年10月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参加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回国。

[3] 据道家说，北斗丛星中，有三十六个天罡星。《水浒传》中把梁山泊的前36名头领称为三十六天罡星。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36名委员。

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至于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现在讲一讲《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经同志们详细讨论过。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的。决议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交给大会以后的新中央采纳修改。

大会的工作方针就是团结和胜利。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

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

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打麻雀战；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谦虚就不骄，就可以戒骄。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如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

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联共党史》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苏联一九一七年就胜利了，三八年才由中央出版《联共党史》，经过二十年，可见此事不易。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我们在其他问题上，也应该这样。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

历史问题。

我再讲一讲治病救人。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无论偏向哪一方面都不好，都应该改正。一切同志，要在这个历史决议案下团结起来，像决议案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过去常说，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是写文章的词藻。我们这回说，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家庭是有斗争的，新家庭里的斗争，是用民主来解决的。我们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样，从这里能得到安慰，疲劳了，可以在这里休息休息，问长问短，亲切得很。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有偏差是实际生活，有了偏差，就喊看齐。但是，官长不能打士兵，这就是说，干部与党员要有正确的关系。一个队伍里头，人们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经常是不整齐的。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好的态度。家庭里是很少有开除家籍的事情的。阿Q[1]到底姓什么虽不清楚，但也没有听说他曾被开除家籍。阿Q斗争起来也算英勇。他的缺点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加党八股，毫无自我批评精神。人家的疮疤他要揭，他的疮疤人家揭不得。至于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那厉害得

---

[1] 阿Q，鲁迅《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

很，长凳一定要叫长凳，不能叫条凳，叫条凳是路线错误，那样教条主义，那样党八股！但是，写阿Q的作家还是喜欢阿Q的，因为反革命把他枪毙了。所以对于有缺点错误的人，我们要团结。

共产党里头闹别扭的有两个主义：一个教条主义，一个经验主义。这个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1]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2]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又如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我们大家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来的人，只有这样多的一点知识，这样大的一点本领。说我毫无本领，一点也

---

[1] 罗明（1901—1987），广东大埔人。1933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2] 这里可能是指1927年3月至4月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最早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个观点。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因为工业品特贵，农产品特贱，农民受商人剥削非常厉害，不得不消极的自卫。看这个趋势，农村将完全退缩到自足经济时代，除盐以外，农村将抵制一切商品进乡，同时又将尽量阻止农产品进城，如现在把谷米阻得天死地煞一样。”后来作者修正了这个观点。

不懂马列，那我也不同意。一个托派分子，过去是共产党员，名叫叶青，他说毛泽东这个人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只有一个主义叫做毛泽东主义，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主义。这我不赞成。好像我这里没有，他那里倒有很多马列主义，甚至都在他那里。说我马列主义成了堆，那也不是。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现在比过去是进步了。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动物，出了人类。人类又有几十万年的历史，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还要进步，直到阶级没有了，政党也不要了，共产党、国民党一概不要，八路军、新四军也不要了。太阳、地球在很远的将来也都有一天要毁灭。旧的东西毁灭了又有新的产生。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一定要这样看问题。但今天要政治不要？要。什么是政治？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从科学上说来他这话不对。他这话只有一个革命意义，即是反封建，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是皇帝一人专制。但原始共产社会有众人，没有政治。政治是从奴隶社会才开始有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恩格斯说阶级斗争有三种：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理论斗争。后面两种斗争也都含有政治性质。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这种观点，这是彻底革命的观点。因此，我们要经过战争，经过阶级斗争，要放手发展壮大共产党，壮大八路军、新四军。

人世间的事总是不完全的，儿子比老子完全一些，孙子比儿子完全一些，后来居上。

这次大会有些同志未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有什么，大家可以解释解释。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五次大会我参加了，但没有表决权。我当时身为农委书记，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央不通过，五次大会也没有采纳。现在党是比过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会有的。

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

现在又出了一个“共产党”，那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集合了一些叛徒，组织成的一个“非常委员会”。他们已经发出了宣言，口号是打倒毛泽东。我们这个历史决议出来后，敌人一定会利用它。但是我们不管他们利用不利用，还是作出了这个历史决议。我们要不听任何敌人的挑拨。党内也可能有一些有歪风的人进行挑拨。不要怕这些挑拨。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总起来说，我们党二十四年来有成绩，成绩也相当的大。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

两个中国之命运[1]

（1945年4月23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2]；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3]。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现在的时机很好。在欧洲，希特勒快要被打倒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的一部分是在西方，那里的战争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是苏联红军努力的结果。现在柏林已经听到红军的炮声，大概在不久就会打下来。在东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也接近着胜利的时节。我们的大会是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2] 指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

[3] 指毛泽东准备在这次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面前。

既然日本现在还没有被打败，既然打败日本之后，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那末，我们的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这就是我们大会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全党的任务，这就是全中国人民的任务。

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样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经验丰富和集合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这个解放区包括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九十一万军队，二百二十万民兵；

第三，有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

第四，有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苏联的援助。

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个强大的解放区，全国人民的援

助，国际人民的援助，在这些条件下，我们的希望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认为是能够实现的。这些条件，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多少年来虽然有了一些条件，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完备。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经过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这样三个英勇奋斗的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现在，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在现时，为着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将来，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论联合政府[1]

（1945 年 4 月 24 日）

一　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地方性的联合政府。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成为配合同盟国作战、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国民党统治区

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

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之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们也说什

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

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

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

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走着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

团结。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

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

[1]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成立于1936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先队员参加了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先队组织，1938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在抗日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并入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

人民战争

这一时期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移到了西北的中国红军主力，

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留在长江南北各地的中国红军游击部队，则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相继开赴华北华中作战。内战时期的中国红军，保存了并发展了北伐时期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民主传统，曾经扩大到几十万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南方各根据地内的残酷的摧毁、万里长征的消耗和其他原因，到抗日战争开始时，数量减少到只剩几万人。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军队，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是最好的鉴定人，他们知道八路军新四军这时数量虽小，质量却很高，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的前线，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结合，其前途是无限的。人民是正确的，当我在这里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已发展到了九十一万人，乡村中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了二百二十万人以上。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

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一切妨害团结的现象，都在必须克服之列。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在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它善于按照变化着的具体条件从事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也善于作运动战。

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其任务是为团结我军，团结友军，团结人民，瓦解敌军和保证战斗胜利而斗争。

在这个宗旨下面，在游击战争的条件下，全军都可以并且已经是这样做了：利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从事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达到军队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之目的，借以克服经济困难，改善军队生活和减轻人民负担。在各个军事根据地上，也利用了一切可能性，建立了许多小规模的军事工业。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有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这样广大的群众武装组织，和它一道配合作战。在中国解放区内，一切青年、壮年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自愿的民主的和不脱离生产的原则下，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之中。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除加入军队和游击队者外，则组织在民兵的队伍中。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还由于它将自己划分为主力兵团和地

方兵团两部分，前者可以随时执行超地方的作战任务，后者的任务则固定在协同民兵、自卫军保卫地方和进攻当地敌人方面。这种划分，取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划分，例如说，如果只注意主力兵团的作用，忽视地方兵团的作用，那末，在中国解放区的条件下，要战胜敌人也是不可能的。在地方兵团方面，组织了许多经过良好训练，在军事、政治、民运各项工作上说来都是比较地更健全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打击敌人，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借以配合各个解放区正面战线的作战，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在中国解放区，在民主政府领导之下，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和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援助军队的各项工作。这些工作不但包括动员人民参加军队，替军队运输粮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帮助军队解决物质困难，而且包括动员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展开袭击运动和爆炸运动，侦察敌情，清除奸细，运送伤兵和保护伤兵，直接帮助军队的作战。同时，全解放区人民又热烈地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动员全体人民从事粮食和日用品的生产，并使一切机关、学校，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律于工作或学习之暇，从事生产自给，以配合人民和军队的生产自给，造成伟大的生产热潮，借以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在中国解放区，敌人的摧残是异常严重的；水、旱、虫灾，也时常发生。但是，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灭蝗、治水、救灾的伟大群众运动，收到了史无前例的效果，使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总之，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国人民，这就是中国解放区

全体军民的总口号、总方针。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一旦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它就会更加强大，就能够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了。

两个战场

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为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同时，针对着国民党政府的失败情绪，声言愿意和它谋取妥协的和平，并将卖国贼汪精卫诱出重庆，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实施民族的欺骗政策。从这时起，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由抗日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这首先表现在军事方面。它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保存军事实力，而把作战的重担放在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寇大举进攻解放区，它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反动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权利，一概取消。从此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地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各个省份的监狱和集中营内，充满了共产党人、爱国青年及其他民主战士。从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三年秋季为止的五年之内，国民党政府发动

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1]，分裂国内的团结，造成严重的内战危险。震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和歼灭皖南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的事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内。直到现时为止，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军队进攻的事件还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准备停止的征象。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污蔑和谩骂，都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嘴里喷出来。什么“奸党”“奸军”“奸区”，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等等污蔑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的称号和断语，都是这些反动分子制造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针对着当时的危机，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按照这些适合时宜的口号，我们党在五年之内，有力地打退了三次反动的反人民的“反共高潮”，克服了当时的危机。

在这几年内，国民党战场实际上没有严重的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主要地向着解放区。到一九四三年，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百分之三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五而已。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举行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了，国民党军队表现了手足无措，毫无抵抗能力。几个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广大区域沦于敌手。仅在此时，两个战场分担的抗敌的比例，才起了一些变化。然而就在我做这个报告的时候，在侵华日军（满洲的未计在内）四十个师团，五十八万人中，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是二十二个半师团，三十二万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国民党战场抗击的，不过十七个半师团，二十六万人，仅占百

---

[1] 参见《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关于国民党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的叙述。

分之四十四。抗击伪军的情况则完全无变化。

还应指出，数达八十万以上的伪军（包括伪正规军和伪地方武装在内），大部分是国民党将领率部投敌，或由国民党投敌军官所组成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事先即供给这些伪军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叛国谬论，事后又在精神上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使他们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区。此外，则动员大批军队封锁和进攻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其数量达到了七十九万七千人之多。这种严重情形，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政策下，很多的中国人外国人都无法知道。

中国解放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解放区，现在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口。其地域，北起内蒙，南至海南岛，大部分敌人所到之处，都有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人民军队的活动。这个广大的中国解放区，包括十九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在这个广大的解放区内，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是十九个解放区中的一个；而且除了浙东、琼崖两区之外，按其人口说来，它是一个最小的。有些人不明了这种情形，以为所谓中国解放区，主要就是陕甘宁边区。这是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造成的一个误会。在所有这些解放区内，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

么“民族至上”，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不符合于民族中大多数人民的要求。他们也说什么“国家至上”，但是他们所指的国家，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国家，并不是人民大众的民主国家。因此，他们惧怕人民起来，惧怕民主运动，惧怕认真地动员全民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他们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对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动政策的总根源。他们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虽在抗日，一面又采取消极的作战政策，并且还被日本侵略者经常选择为诱降的对象。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一面又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残酷地压迫中国共产党，把共产党看成他们的所谓“第一个敌人”，而把日本侵略者看成“第二个敌人”，并且每天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处心积虑地要消灭共产党。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建立一个“近代国家”，一面又在实际上拼死命保持那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一面和苏联在形式上保持外交关系，一面又在实际上采取仇视苏联的态度。一面同美国孤立派合唱“先亚后欧论”，借以延长法西斯德国也就是延长一切法西斯的寿命，延长自己对于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的寿命，一面又在外交上投机取巧，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法西斯的英雄。要问如此种种的自相矛盾的两面政策从何而来，就是来自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社会阶层这一个总根源。

但是，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被这个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反动集团所统治，所领导，却并不整个儿等于这个反动集团。它有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被这个集团所打击、排斥或轻视。它有不少的干部、党员群众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并不满意这个集团的领导，而且有些甚至是反对它的领导的。在被这个反动集团所统制的国民党的军队、国民党的政府机关、国民党的经济机关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中，都存在着这种情形。在这些军队和机关里，包藏着不少的民主分子。这个反动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把国民党看成清一色的反动派，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比较

中国人民从中国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获得了明显的比较。

难道还不明显吗？两条路线，人民战争的路线和反对人民战争的消极抗日的路线，其结果：一条是胜利的，即使处在中国解放区这种环境恶劣和毫无外援的地位；另一条是失败的，即使处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种极端有利和取得外国接济的地位。

国民党政府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缺乏武器。但是试问：缺乏武器的是国民党的军队呢，还是解放区的军队？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中国军队中武器最缺乏的军队，他们只能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和在最恶劣条件下自己制造武器。

国民党中央系军队的武器，不是比起地方系军队来要好得多吗？但是比起战斗力来，中央系却多数劣于地方系。

国民党拥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但是在它的错误的兵役政策下，

人力补充却极端困难。中国解放区处在被敌人分割和战斗频繁的情况之下，因为普遍实施了适合人民需要的民兵和自卫军制度，又防止了对于人力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人力动员却可以源源不竭。

国民党拥有粮食丰富的广大地区，人民每年供给它七千万至一万万市担的粮食，但是大部分被经手人员中饱了，致使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缺乏粮食，士兵饿得面黄肌瘦。中国解放区的主要部分隔在敌后，遭受敌人烧杀抢“三光”政策的摧残，其中有些是像陕北这样贫瘠的区域，但是却能用自己动手、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粮食问题。

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国民党统治者面前摆着这些反常的状况，怪谁呢？怪别人，还是怪他们自己呢？怪外国缺少援助，还是怪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腐败无能呢？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是谁？

真凭实据地破坏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和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国家的，难道不正是国民党政府吗？这个政府一心一意地打了整十年的内战，将刀锋向着同胞，置一切国防事业于不顾，又用不抵抗政策送掉了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打进关内来了，仓皇应战，从卢沟桥退到了贵州省。但是国民党人却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见一九四三年九月国民党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案）唯一的证据，就是共产党联合了各界人民创造了英勇抗日的中国解放区。这些国民党人的逻辑，和中国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相同，无怪乎很多问题都讲不通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国民党政府抛弃了从黑龙江到卢沟桥，又从卢沟桥到贵州省这样广大的国土和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吗？

第二个，究竟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解放区战胜了敌伪军长期的残酷的进攻，从民族敌人手里恢复了这样广大的国土，解放了这样众多的人民？难道不是由于人民战争的正确路线吗？

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

国民党政府还经常以“不服从政令、军令”责备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只能这样说：幸喜中国共产党人还保存了中国人民的普通常识，没有服从那些实际上是把中国人民艰难困苦地从日本侵略者

手里夺回来的中国解放区再送交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所谓“政令、军令”，例如，一九三九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九四一年的所谓“解散新四军”和“退至旧黄河以北”，一九四三年的所谓“解散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四年的所谓“限期取消十个师以外的全部军队”，以及在最近谈判中提出来的所谓将军队和地方政府移交给国民党，其交换条件是不许成立联合政府，只许收容几个共产党员到国民党独裁政府里去做官，并将这种办法称之为国民党政府的“让步”等等。幸喜我们没有服从这些东西，替中国人民保存了一片干净土，保存了一支英勇抗日的军队。难道中国人民不应该庆贺这一个“不服从”吗？难道国民党政府自己用自己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将黑龙江至贵州省的广大的土地、人民送交日本侵略者，还觉得不够吗？除了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欢迎这些“政令、军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欢迎这些东西吗？没有一个不是形式的而是实际的、不是法西斯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联合政府，能够设想中国人民会允许中国共产党人，擅自将这个获得了解放的中国解放区和抗日有功的人民军队，交给失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法西斯独裁政府吗？假如没有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还有今日吗？我们民族的前途还能设想吗？

内战危险

迄今为止，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着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早已准备，尤其现在正在准备这样的行动：等候某一个同盟国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驱逐日本侵略者到

了某一程度时，他们就要发动内战。他们并且希望某些同盟国的将领们在中国境内执行英国斯科比将军[1]在希腊所执行的职务。他们对于斯科比和希腊反动政府的屠杀事业，表示欢呼。他们企图把中国抛回到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国内战争的大海里去。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谈判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为着防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了其他民主派别的同意之后，于一九四四年九月间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一项要求。无疑地，这项要求是适合时宜的，几个月内，获得了广大人民的响应。

关于如何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以及实行必要的民主改革等项问题，我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曾经有过多次谈判，但是我们的一切建议都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拒绝。国民党不但对一党专政不愿废止，对联合政府不愿成立，即对任何迫切需要的民主改革，例如，取消特务机关，取消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释放政治犯，

---

[1] 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撤退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等等，也一项不愿实行。就是这样，使得中国的政治关系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之下。

两个前途

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的分析看来，我请大家注意，不要以为我们的事业，一切都将是顺利的，美妙的。不，不是这样，事实是好坏两个可能性、好坏两个前途都存在着。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不许民主改革；不是将重点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反对人民方面；即使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中国仍然可能发生内战，将中国拖回到痛苦重重的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不统一、不富强的老状态里去。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前途。这个可能性，这个前途，依然存在，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好，国内人民觉悟程度增长和有组织的人民力量发展了，它就似乎没有了，或自然地消失了。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在外国是那些怀抱帝国主义思想的反动分子。这是一方面，这是必须注意的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从整个形势看来，从上述一切内外情况的分析看来，使我们更有信心地更有勇气地去争取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前途。这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希望中国实现这个可能性、实现这个前途的，在中国是广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别，在外国是一切以平

等地位待我的民族，外国的进步分子，外国的人民大众。

我们清楚地懂得，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还有很大的困难，还有很多的障碍物，还要走很多的迂回路程。但是我们同样地懂得，任何困难和障碍物，我们和全国人民一道一定能够加以克服，而使中国的历史任务获得完成。竭尽全力地去反对第一个可能性，争取第二个可能性，反对第一个前途，争取第二个前途，是我们和全国人民的伟大任务。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是有利于我们和全国人民的。这些，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希望国民党当局，鉴于世界大势之所趋，中国人心之所向，毅然改变其错误的现行政策，使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使中国人民少受痛苦，使新中国早日诞生。须知不论怎样迂回曲折，中国人民独立解放的任务总是要完成的，而且这种时机已经到来了。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所怀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们这一代人去实现，谁要阻止，到底是阻止不了的。

四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上面，我已将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给了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在广大的中国人中间，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具体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在一九四四年中外新闻记者参观团来到中国解放区以前，那里的许多人对于解放区几乎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害怕解放区的真实情况泄露出去，所以在一九四四年的一次新闻记者团回去之后，立即将大门堵上，不许一个新闻记者再来解放区。对于国民党区域的

真相，国民党政府也是同样地加以封锁。因此，我感到我们有责任将“两个区域”的真相尽可能使人们弄清楚。只有在弄清中国的全部情况之后，才有可能了解中国的两个最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政策何以有这样的不同，何以有这样的两条路线之争。只有这样，才会使人们了解，两党的争论，不是如有些人们所说不过是一些不必要的，不重要的，或甚至是意气用事的争论，而是关系着几万万人民生死问题的原则的争论。

在目前中国时局的严重形势下，中国人民，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一切关心中国时局的外国人民，都希望中国的分裂局面重趋于团结，都希望中国能实行民主改革，都愿意知道中国共产党对于解决当前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政策。我们的党员对于这些，当然更加关心。

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历来是明确的，八年的战争考验了这些政策。我们的大会应该对此作出结论，作为今后奋斗的指针。

下面，我就来说明我们党在为解决中国问题而得出的关于重要政策方面的若干确定的结论。

我们的一般纲领

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种共同纲领，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和具体性的两部分。我们先

来说一般性的纲领，然后再说到具体性的纲领。

在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大前提之下，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基本点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这就是说：第一，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因为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由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十八年统治证明为完全破产了。第二，中国也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因为在中国，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表现得很软弱；另一方面，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第三，在中国的现阶段，在中国人民的任务还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那末，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

这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因为，第一，它取得了和可能取得数百万产业工人，数千万手工业工人和雇佣农民的同意；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即在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占了三亿六千万的农民阶级的同意；又其次，也取得了和可能取得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及其他爱国分子的同意。

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仍然是有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就是显著的一种；因此，这些阶级各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这种矛盾，这种不同的要求，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矛盾和这种不同的要求，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这些阶级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项建设。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废止国内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压迫，并且主张在推翻和废止这些之后不是建立一个旧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而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我们的这种主张，是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的。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军队和其他武装力量，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部分，没有它们，就不能保卫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切武装力量，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它们和一切属于少数人、压迫人民的旧式军队、旧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土地问题上，孙先生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孙先生在上述宣言里这样说：“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

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不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不赞成保护私有财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能够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

按照孙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

私”的文化。

上述一切，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上，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上所主张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说来，这是我们的最低纲领。实行这个纲领，可以把中国从现在的国家状况和社会状况向前推进一步，即是说，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

这个纲领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

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

强的中国而奋斗。我们果然是这样做了，我们共产党人，协同广大的中国人民，曾为此而英勇奋斗了二十四年。

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说也奇怪，有些中国资产阶级代言人不敢正面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而要转弯抹角地来说这个问题。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就可以到达社会主义社

会，什么要将三民主义和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很明显地，这类现象，有些是反映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些则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民众的欺骗手段。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任何的空谈和欺骗，是不会让它迷惑我们的清醒头脑的。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似乎不是忠诚的。这是由于不了解我们所承认的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

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俄国的历史形成了俄国的制度，在那里，废除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实现了最新式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都被人民抛弃了，人民仅仅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因此形成了俄国的局面，这在他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的。但是在俄国的政权机关中，即使是处在除了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没有其他政党的条件下，实行的还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联盟，或党和非党联盟的制度，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或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才可以在政权机关中工作。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

我们的具体纲领

根据上述一般纲领，我们党在各个时期中还应当有具体的纲领。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中，在几十年中，我们的新民主

主义的一般纲领是不变的。但是在这个大阶段的各个小的阶段中，情形是变化了和变化着的，我们的具体纲领便不能不有所改变，这是当然的事情。例如，在北伐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没有变化，但其具体纲领，三个时期中是有了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敌军和友军在三个时期中发生了变化的缘故。

目前中国人民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中：（一）日本侵略者还未被打败；（二）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团结起来，实现一个民主的改革，以便造成民族团结，迅速地动员和统一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三）国民党政府分裂民族团结，阻碍这种民主的改革。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具体纲领即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要求是适当的，并且是最低限度的。

动员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国际和平；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要求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要求惩办那些制造内战危机的反动分子，保障国内和平；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反动的特务机关和特务活动，取消集中营；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要求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要求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要求撤退一切包围和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并将这些军队使用于抗日前线；要求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要求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及其军队，收复一切失地；要求帮助沦陷区人民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要求允许中国人民自动武装

起来，保乡卫国；要求从政治上军事上改造那些由国民党统帅部直接领导的经常打败仗、经常压迫人民和经常排斥异己的军队，惩办那些应对溃败负责的将领；要求改善兵役制度和改善官兵生活；要求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使前线官兵安心作战；要求优待殉国战士的遗族，优待残废军人，帮助退伍军人解决生活和就业问题；要求发展军事工业，以利作战；要求将同盟国的武器和财政援助公平地分配给抗战各军；要求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要求改善中下级公务员的待遇；要求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的权利；要求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1]；要求救济难民和救济灾荒；要求设立大量的救济基金，在国土收复后，广泛地救济沦陷区的受难人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取缔官僚资本；要求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要求制止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要求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2]，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要求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要求保护青

---

[1] 保甲制度是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1932年8月，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其中规定“保甲之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保设保长”，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联保连坐法，以及各项反革命的强迫劳役办法。1934年11月7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决定在它所统治的各省市一律推行这种保甲制度。

[2] 这里是指国民党政府所实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教育。

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要求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要求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要求保护因被日本侵略者压迫而逃来中国的外国人民，并扶助其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要求改善中苏邦交；等等。而要做到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就是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进行稍为认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这些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呼声，也是各同盟国广大民主舆论界的呼声。

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具体纲领，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准备以上述纲领为基础和他们进行协商。各党可以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各党之间应该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

这样的纲领，对于国民党统治区，暂时还是一个要求的纲领；对于沦陷区，除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项外，是一个要等到收复后才能实施的纲领；对于解放区，则是一个早已实施并应当继续实施的纲领。

在上述中国人民的目前要求或具体纲领中，包含着许多战时和战后的重大问题，需要在下面加以说明。在说明这些问题时，我们将批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将回答其他人们的一些疑问。

第一　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

开罗会议[1]决定应使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这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里进行活动，企图获得妥协的和平；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分子，经过南京傀儡政府，也正在和日本密使勾勾搭搭，并未遇到制止。因此，中途妥协的危险并未完全过去。开罗会议又决定将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是很好的。但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要想依靠它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不许中途妥协。一切妥协的阴谋活动，必须立刻制止。中国人民应该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现在的消极的抗日政策，将其一切军事力量用于积极对日作战。中国人民应该扩大自己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并在一切敌人所到之处，广泛地自动地发展抗日武装，准备直接配合同盟国作战，收复一切失地，决不要单纯地依靠国民党。打败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神圣的权利。如果反动分子要想剥夺中国人民的这种神圣的权利，要想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要想破坏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那末，中国人民在向他们劝说无效之后，应该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中国反动分子的这种背叛民族利益的反动行为，完全是帮助日本侵略者的。

---

[1] 开罗会议是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这次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并将侵占的中国领土台湾等地归还中国。

第二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

所谓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际上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从八年抗日战争的惨痛经验中，中国人民已经深刻地认识了它的罪恶，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废止它。这个反人民的专政，又是内战的祸胎，如不立即废止，内战惨祸又将降临。

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应该“结束”是确定的了，毫无疑义的了。但是如何结束呢，可就意见分歧了。一个说：立即结束，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一个说：等一会再结束，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却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两种做法的表现：真做和假做。

第一种，真做。这就是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

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如同我们在前面提出的那些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这是一个团结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拥护这个方针的。

第二种，假做。不顾广大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的要求，一意孤行地召开一个由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在这个会上通过一个实际上维持独裁反对民主的所谓“宪法”，使那个仅仅由几十个国民党人私自委任的、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强安在人民头上的、不合法的所谓国民政府，披上合法的外衣，装模作样地“还政于民”，实际上，依然是“还政”于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谁要不赞成，就说他是破坏“民主”，破坏“统一”，就有“理由”向他宣布讨伐令。这是一个分裂的方针，中国人民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

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根据这种分裂方针所准备采取的步骤，有把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去的危险。他们准备把一条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并且让它永远也解不开，这条绳索的名称就叫做“国民大会”。他们的原意是想把所谓“国民大会”当作法宝，祭起来，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可是，历史的逻辑将向他们所设想的反面走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谁也明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人民没有自由，在日寇占领区域，人民不能参加选举，有了自由的中国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又不承认它，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国民代表？哪里来的“国民大会”？现在叫着要开的，是那个还在内战时期，还在八年以前，由国民党独裁政府一手伪造的所谓国民大会。如果这个会开成了，势

必闹到全国人民群起反对，请问我们的反人民的英雄们如何下台？归根结底，伪造国民大会如果开成了，不过将他们自己推到绝路上。

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不管国民党人或任何其他党派、集团和个人如何设想，愿意或不愿意，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

在这个问题和其他任何有关民主改革的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声明：不管国民党当局现在还是怎样坚持其错误政策和怎样借谈判为拖延对间、搪塞舆论的手段，只要他们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但是谈判的基础必须放在抗日、团结和民主的总方针上，一切离开这个总方针的所谓办法、方案，或其他空话，不管它怎样说得好听，我们是不能赞成的。

第三　人民的自由

目前中国人民争自由的目标，首先地和主要地是向着日本侵略者。但是国民党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捆起人民的手足，使他们不能反对日本侵略者。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和

统一一切抗日的力量。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的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巩固联合政府的基础。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国土上进行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产生民主的国民大会，成立统一的正式的联合政府。没有人民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选的国民大会，就没有真正民选的政府。难道还不清楚吗？

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在其临终的遗嘱上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背叛孙先生的不肖子孙，不是唤起民众，而是压迫民众，将民众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权利剥夺得干干净净；对于认真唤起民众、认真保护民众自由权利的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则称之为“奸党”“奸军”“奸

区”。我们希望这种颠倒是非的时代快些过去。如果要延长这种颠倒是非的时间，中国人民将不能忍耐了。

第四　人民的统一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为着防止内战，为着建设新中国，必须将分裂的中国变为统一的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任务。

但是如何统一呢？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还是人民的民主的统一呢？从袁世凯以来，北洋军阀强调专制的统一。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和这些军阀的志愿相反，所得的不是统一而是分裂，最后是他们自己从台上滚下去。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抄袭袁世凯的老路，追求专制的统一，打了整整十年的内战，结果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了进来，自己也缩上了峨眉山[1]。现在又在山上大叫其专制统一论，这是叫给谁听呢？难道还有什么爱国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愿意听它吗？经过了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又经过了十八年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人民已经有了充分的经验，有了明亮的眼睛。他们要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的统一，不要独裁者的专制的统一。我们共产党人还在一九三五年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没有一天不为此而奋斗。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推行其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造成投降、分裂、倒退的危机，国民党人大叫其专制统一论的时候，我们又说：非统一于投降而统一于抗战，非统一于分裂而统一于团结，非统一于倒退而统一于进步。只有这后一种统一才是真统一，

---

[1] 峨眉山是四川省西南部的名山。毛泽东的这句话是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最后撤退到四川山地。

其他一切都是假统一[1]。又过了六年了，问题还是一样。

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能够统一吗？有了这些，立刻就统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争联合政府的运动，同时就是争统一的运动。我们在具体纲领中提出了许多争自由争民主的要求，提出了联合政府的要求，同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不废止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能实行任何民主的改革，不能动员那里的全体军民打倒日本侵略者，而且还将发展为内战的惨祸，这是很多人都明白的常识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有党有派无党无派的民主分子，包括国民党内的许多民主分子在内，一致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就因为他们看清楚了时局的危机，非如此不能克服这种危机，不能达到团结对敌和团结建国的目的。

第五　人民的军队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

---

[1] 参见《必须制裁反动派》《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等文。

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1]八路军、新四军正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针，成了“国民之武力”，就是说，成了人民的军队，所以能打胜仗。国民党军队在北伐

---

[1] 参见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的《北上宣言》（《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297页）。

战争的前期，做到了孙先生所说的“第一步”，所以打了胜仗。从北伐战争后期直至现在，连“第一步”也丢了，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所以一天一天腐败堕落，除了“内战内行”之外，对于“外战”，就不能不是一个“外行”。国民党军队中一切爱国的有良心的军官们，应该起来恢复孙先生的精神，改造自己的军队。

在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对于一切可以教育的军官，应当给予适当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得正确观点，清除陈旧观点，为人民的军队而继续服务。

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赞助改革中国军队的事业。八路军、新四军对于一切愿意团结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而不反对中国解放区的军队，都应该看作自己的友军，给以适当的协助。

第六　土地问题

为着消灭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目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时代的正确的主张。

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

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民主派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哪些人们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农民的绝对大多数，就是说，除开那些带上了封建尾巴的富农之外，无不积极地要求“耕者有其田”。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民主派，“耕者有其田”使农业生产力获得发展，对于他们是有利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需要市场，他们也赞成“耕者有其田”；他们又多半和土地联系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又惧怕“耕者有其田”。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现在坚决地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正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因为他们是代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出而张牙舞

爪，进行了十年反人民战争，亦即反“耕者有其田”的战争的，就是那个集中了孙中山一切不肖子孙在内的团体——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

抗日期间，中国共产党让了一大步，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让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

但是背叛孙先生的人们不但反对“耕者有其田”，连减租减息也反对。国民党政府自己颁布的“二五减租”一类的法令，自己不实行，仅仅我们在解放区实行了，因此也就成立了罪状：名之曰“奸区”。

在抗日期间，出现了所谓民族革命阶段和民主民生革命阶段的两阶段论，这是错误的。

大敌当前，民主民生改革的问题不应该提起，等日本人走了再提好了。——这是国民党反人民集团的谬论，其目的是不愿抗日战争获得彻底胜利。有些人居然随声附和，作了这种谬论的尾巴。

大敌当前，不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就不能建立抗日根据地抵抗日本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且已经这样作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抗日期间，减租减息及其他一切民主改革是为着抗日的。为了减少地主对于抗日的阻力，只实行减租减息，不取消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又奖励地主的资财向工业方面转移，并使开明士绅和其他人民的代表一道参加抗日的社会工作和政府工作。对于富农，

则鼓励其发展生产。所有这些，是在坚决执行农村民主改革的路线里包含着的，是完全必要的。

两条路线：或者坚决反对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腐败无能，无力抗日；或者坚决赞助中国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而使自己获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伟大的同盟军，借以组织雄厚的战斗力量。前者就是国民党政府的路线，后者就是中国解放区的路线。

动摇于两者之间，口称赞助农民，但不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武装农民和建立农村民主政权，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路线。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动员一切力量，向着中国共产党放出了一切恶毒的箭：明的和暗的，军事的和政治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说来，实质上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究竟在哪一点上触怒了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呢？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吗？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之所以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和鼓励，难道不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面，给日本侵略者帮了大忙吗？所谓“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所谓“奸党”“奸军”“奸区”，所谓“不服从政令、军令”，难道不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做了真正符合于民族利益的认真的事业吗？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认识这一切，不但中国共产党人，而且一切民主派，都是完全必要的。

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就是说，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原来在农民中就有了的，但在那时，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现在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其形式和内容都起了变化，它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消

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

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说，从城市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不容易了解农村现时还是以分散的落后的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这种特点；在解放区，则还要加上暂时还是被敌人分割的和游击战争的环境的特点。因为不了解这些特点，他们就往往不适当地带着他们在城市里生活或工作的观点去观察农村问题，去处理农村工作，因而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这种现象，必须用教育的方法加以克服。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第七　工业问题

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但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一切依赖外国，它的财政经济政策是破坏人民的一切经济生活的。国民党统治区内仅有的一点小型工业，也不能不处于大部分破产的状态中。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就整个来说，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消灭日本侵略者，这是谋独立。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使全国军队成为人民的武力，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这是谋自由、民主和统一。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这种幼稚的梦的幻灭，正是中国富强的起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学得了许多东西，知道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有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之必要，而这些条件是互相关联的，不可缺一的。果然如此，中国就有希望了。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这一点，懂得的人已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

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

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协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部分产业界，为上述目标而奋斗。中国工人阶级在这个任务中将起伟大的作用。

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一九二一年，产生了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使中国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极大的努力和极有价值的贡献。在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收复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将起着极大的作用。在抗日结束以后，可以预断，中国工人阶级的努力和贡献将会是更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的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利；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

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

第八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

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

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第九　少数民族问题

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1]。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一九四三年对于伊克昭盟蒙族人民的屠杀事件，一九四四年直至现在对于新疆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事件，以及近几年对于甘肃回民的屠杀事件，就是明证。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

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地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个政策而奋斗；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

---

[1] 这是指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的一种错误说法。

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们的言语、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应被尊重。

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第十　外交问题

中国共产党同意大西洋宪章和莫斯科、开罗、德黑兰、克里米亚各次国际会议[1]的决议，因为这些国际会议的决议都是有利于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和维持世界和平的。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例如配合作战、和平会议、通商、投资等等。

中国共产党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

---

[1] 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8月美英大西洋会议结束时联合发表的一个文件。莫斯科会议是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德黑兰会议是1943年11月至1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会议。克里米亚会议是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南部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当时所有这些国际会议都决定以联合的力量击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并在战后防止侵略势力和法西斯残余的再起，维护世界和平，赞助各国人民的独立民主的愿望。

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1]。

我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必须停止对于苏联的仇视态度，迅速地改善中苏邦交。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召集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和在其后进行北伐战争时，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苏联又是第一个援助中国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国家。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这些援助，表示感谢。我们认为太平洋问题的最后的彻底的解决，没有苏联参加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求各同盟国政府，首先是美英两国政府，对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呼声，加以严重的注意，不要使他们自己的外交政策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因而损害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我们认为任何外国政府，如果援助中国反动分子而反对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那就将要犯下绝大的错误。

中国人民欢迎许多外国政府宣布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措施。但是，我们认为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这种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而努力之道就是把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建

---

[1] 1944年8月至10月，苏、美、英、中四国代表按照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草拟了联合国机构的组织草案。1945年4月至6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有5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成立大会。当时中国解放区派遣董必武为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设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否则便只会有形式上的独立、平等，在实际上是不会有的。就是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现行政策，决不会使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平等。

我们认为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并无条件投降之后，为着彻底消灭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由产生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原因，必须帮助一切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建立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没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制度，便不能彻底地消灭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便不能保证太平洋的和平。

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关于朝鲜独立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应当帮助朝鲜人民获得解放。

我们希望印度独立。因为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对于南洋各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能够得到建立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权利。对于泰国，应当仿照对待欧洲法西斯附属国的方法去处理。

关于具体纲领的说明，主要的就是这样。

再说一遍，一切这些具体纲领，如果没有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就不可能顺利地在全中国实现。

中国共产党在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二十四年中，创造了这样的地位，就是说，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的人，企图孤行己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但是结果都行不通。这是什么缘故呢？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

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谁要是不尊重中国共产党，谁就是在实际上不尊重最广大的中国人民，谁就一定要失败。

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的任务

关于我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我已在上面作了充分的说明。无疑地，这些纲领是要在全中国实行的；整个国际国内的形势，给中国人民展开了这种想望。但是，目前在国民党统治区，在沦陷区，在解放区，这三种地方互不相同的情势，不能不使我们在实行时要有所区别。不同的情形，产生不同的任务。这些任务，有些我已经在前面说到了，有些还须在下面加以补充。

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没有爱国活动的自由，民主运动被认为非法，但是包括许多阶层、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分子的积极活动是在发展中。中国民主同盟，在今年一月发表了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社会各界发表同类性质的宣言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对于他们自己的领导机关的政策，日益表示怀疑和不满，日益感觉他们的党在广大人民中孤立起来的危险性，而要求有一种适合时宜的民主的改革。重庆等地的工人、农民、文化界、学生界、教育界、妇女界、工商界、公务人员乃至一部分军人的民主运动，正在发展。所有这些，预示着一切受压迫阶层的民主运动正在逐渐地向着同一的目标而汇合起来。目前运动的弱点，在于社会的基层分子还没有广泛地参加，地位非常重要而生活痛苦不堪的农民、工人、士兵和下层公教人员，还没有组织起来。目前运动的另一弱点，是参加运动的民主分子中，还有许多人

对于根据民主原则发动斗争以求转变时局这一个基本方针，还缺乏明确的和坚决的精神。但是客观形势，正在迫着一切受压迫的阶层、党派和社会集团，逐渐地觉悟和团结起来。不管国民党政府如何镇压，也不能阻止这一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统治区内被压迫的一切阶层、党派和集团的民主运动，应当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并把分散的力量逐渐统一起来，为着实现民族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应当给予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援助。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人应当继续执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哪怕昨天还是反对我们的，只要他今天不反对了，就应该同他合作，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

中国沦陷区的任务

在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号召一切抗日人民，学习法国和意大利的榜样，将自己组织于各种团体中，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里应外合地消灭日本侵略者。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对于我沦陷区内的兄弟姊妹们的摧残、掠夺、奸淫和侮辱，激起了一切中国人的火一样的愤怒，报仇雪耻的时机快要到来了。沦陷区的人民，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的鼓舞之下，极大地增高了他们的抗日情绪。他们迫切地需要组织起来，以便尽可能迅速地获得解放。因此，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必须有大批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去工作。必须就沦陷区人民中训练和提拔大批的积极分子，参加当地的工作。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

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在一切沦陷区，共产党人应当执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反对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的，就要联合起来，为打倒共同敌人而斗争。

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

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

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

中国解放区的任务

我党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已经在解放区实行了并且有了显著的成绩，聚集了巨大的抗日力量，今后应当从各方面发展和巩固这种力量。

在目前条件下，解放区的军队应向一切被敌伪占领而又可能攻

克的地方，发动广泛的进攻，借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但是同时应当注意，敌人在目前还是有力量的，它还可能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解放区军民必须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注意解放区的各项巩固工作。

应当扩大解放区的军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并加紧整训，增强战斗力，为最后打败侵略者准备充分的力量。

在解放区，一方面，军队应实行拥政爱民的工作，另一方面，民主政府应领导人民实行拥军优抗的工作，更大地改善军民关系。

共产党人在各个地方性的联合政府的工作中，在社会工作中，应当继续同一切抗日民主分子，在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础上，进行很好地合作。

同样，在军事工作中，共产党人应当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抗日民主分子，在解放区军队的内部和外部，很好地合作。

为了提高工农劳动群众在抗日和生产中的积极性，减租减息和改善工人、职员待遇的政策，必须充分地执行。解放区的工作人员，必须努力学会做经济工作。必须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大规模地发展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和贸易，改善军民生活。为此目的，必须实行劳动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在城市驱逐日本侵略者以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必须迅速学会做城市的经济工作。

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爱惜当地的人力物力，

任何地方都要作长期打算，避免滥用和浪费。这不但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是为着建设新中国。

在推进解放区的各项工作时，必须十分注意扶助本地人管理本地的事业，必须十分注意从本地人民优秀分子中大批地培养本地的工作干部。一切从外地去的人，如果不和本地人打成一片，如果不是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并适合情况地去帮助本地干部，爱惜他们，如同爱惜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那就不能完成农村民主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

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每到一地，就应立即帮助本地人民，不但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民兵和自卫军，而且要组织以本地人民的干部为领导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然后，就可以产生有本地人领导的主力部队和主力兵团。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如果不能完成此项任务，就不能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发展人民的军队。

当然，一切本地人，应当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从外地去的革命工作人员和人民军队。

关于对待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的问题，必须提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公开的敌人，公开的民族破坏分子，容易识别，也容易处置；暗藏的敌人，暗藏的民族破坏分子，就不容易识别，也就不容易处置。因此，对于这后一种人必须采取严肃态度，而在处理时又要采取谨慎态度。

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

我们的大会应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联合政府的成立。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全国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人民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不要使他们失望。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对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起一个巨大的推进作用。

五　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我们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政策，那末，我们应该用怎样的工作态度去执行这些政策和完成这些任务呢？

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在我们和中国人民面前显示了光明的前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是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困难条件。谁要是只看见光明一面，不看见困难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道，不论在整个党的二十四年历史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创造了巨大的力量，我们的工作成绩是很显然的，毫无疑义的。但是同时，我们的工作中依然存在着

---

[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45年7月13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开会，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缺点。谁要是只看见成绩一面，不看见缺点一面，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自从一九二一年诞生以来，在其二十四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三次的伟大斗争，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还在进行中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党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的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党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抗日时期入党的，在他们之中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

思想教育。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我们的代表大会应该号召全党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

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总之，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中

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闭幕之后，我们就要上战场去，根据大会的决议，为着最后地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达此目的，我们要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重说一遍，不管什么阶级，什么政党，什么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是赞成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我们就要加以联合。为达此目的，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我们的党，在北伐战争时期，不超过六万党员，后来大部分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超过三十万党员，后来大部分也被当时的敌人打散了；现在我们有了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这一回无论如何不要被敌人打散。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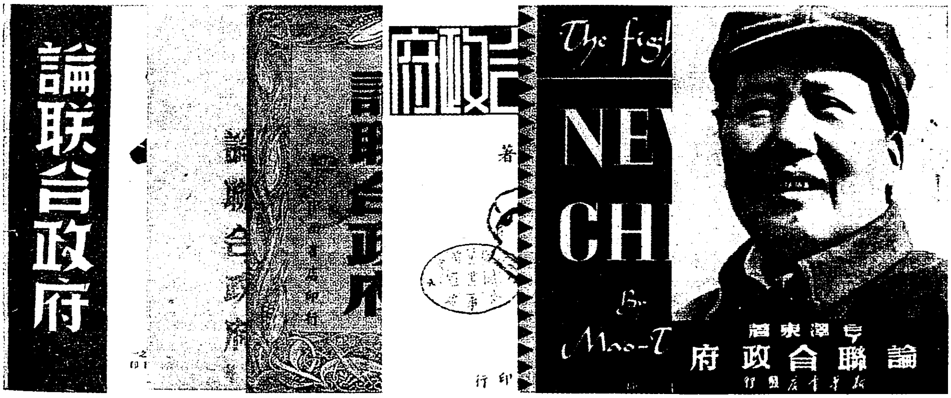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

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同志们，有了三次革命经验的中国共产党，我坚决相信，我们是能够完成我们的伟大政治任务的。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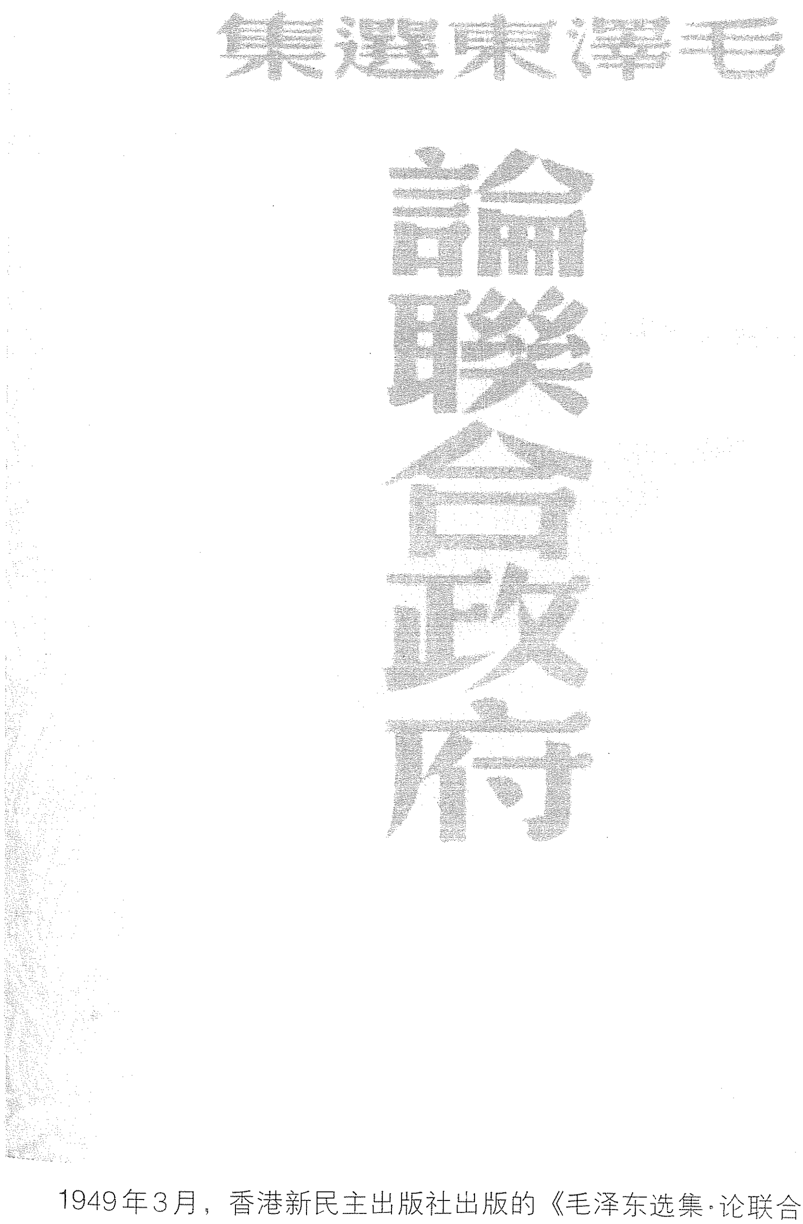

論联合政府
府政合
著
The figh
NE
CH
By
Moo-T
著東澤毛
府政合聯論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联合政府》（部分版本）。

毛澤東：
論聯合政府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之一
晉察冀日報社出版

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毛泽东在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资料图片


毛澤東選集

論聯合政府

1949年3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论联合政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

（1945年4月24日）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　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

---

[1] 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时又在大会上作了这个口头政治报告。

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

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

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1]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

---

[1] 左舜生（1893—1969），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代理主席。他于1945年3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民盟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1]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

---

[1] 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

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

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的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八月开了洛川会议，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

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为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的，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我们蚀本了没有？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1]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

---

[1] 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1947年6月并入国民党。

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

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

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了呢？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1]，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响不去，他们的影响就不走。所以说，国民党的影响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势力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

---

[1] 冈村宁次（1884—1966），当时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1]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万岁的，有九千岁的，有八千岁的……。就是从我们党员来讲，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最近华北、华中开了很多座谈会，反映出来不但在党外人士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而且在党员中间也有些人，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我看是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有，虽然万岁也有。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比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

---

[1] 参见鲁迅《故乡》，原文是：“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

加旧金山会议[1]，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我们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2]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3]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4]，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

---

[1] 旧金山会议，指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等文件。

[2] 指董必武。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3]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4] 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1937年9月1日，他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

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关于这一部分，最后我讲几句，结束一下。

第一，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八年以来也好，二十四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非常欢迎像我刚才所讲的政策。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第二，小资产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第三，自由资产阶级怎么样？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是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

---

[1]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样。最明显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这样的事，多得很，现在时间有限，一下子说不完。总之，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样？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1]一样。昨天报纸上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篇文章[2]，同志们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号是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成立联合政府，在下次大选当中用选举来推翻丘吉尔。他说的"推翻"在我们中国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的特点和外国不同，在我们这里，"推翻"就是要争取领导权，过去我们曾经"推"过一次，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

---

[1] 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2] 指1945年4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文章《论英国大选》。

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1]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最后，讲到外国。外国怎样呢？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其他外国，几个大国，同盟国[2]，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为什么《解放日报》上没有登这个话呢？没有登不是永远不登，并不是否定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报告中提醒了这个意思。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现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变化了，这一方面在我的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关于黑暗的一面，我写得很少。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

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叫形势与路线。

---

[1] 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二　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第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1]，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2]，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党发布过很多对时局宣言，都是具体的纲领。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

---

[1] 指1937年8月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为抗战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

[2] 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

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

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1]，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

---

[1]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她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已。再有还可以叫保守党。但是，一

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账挂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称。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从前有许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个坏的名字叫猫，叫狗。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1]，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爱金生，多少带点自由主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称我们为“温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见我们并不那样“红”。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尖锐地批评它，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他们有一点好处，我们也要给他们挂在账上。可惜国民党的好处不多，虽然想挂，却是很难，只能挂几笔，而且还拖了一个尾巴，要委员长洗去脸上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说过打倒委员长没有呢？没有。在我的报告里，就连一个委员长也没有提。这位委员长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本来应当提一提，但还是没有提，这实在是可惜。我的报告里提到的，去世的人

---

[1] 王镇恶（373—418），东晋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刘裕部将。在辅佐刘裕之子镇守关中期间，因与中兵参军沈田子不和，为沈所杀。

有孙中山，现在又加上一个罗斯福[1]，活着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为妙。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了，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要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

---

[1] 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1945年4月12日病逝。

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1]，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这个方针，就会犯错误。麻烦是很多的，我们和国民党的麻烦更多得很。

第六个问题，关于改造旧军队。改造旧军官，利用旧军官，这里有思想问题，要在我们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军队多得很，这中间有很多的军官需要改造，不能个别地对付，要有整个的政策。

---

[1] 参见《列子·汤问》。

除彻底的反动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不相信旧军官能改造，认为旧军官不好搞，旧军官没有马列主义，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许多旧军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饭吃、找出路的，到我们这里才有出路，我们不怕他们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两种，一种是公开造反，一种是秘密造反，搞特务。公开造反我们有准备，而且公开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结果来。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惕性。另一个就是走人，如果他带了枪走，我们并不蚀本，因为枪支是他带来的又带走了。你要走，送你几块法币，开个欢送会，并且告诉他将来要来还可以来，这就叫做政治。对比较进步的军队，要适当地帮助，从前我们对这些军队也有过帮助。有两种极端思想，一种是对旧军队一个都不要，不信任还要缴枪，这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对比较进步的军队，什么东西都送给他，这叫帮倒忙，也是不好的。我们改造旧军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七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历来我们军队中的党员最多只有一半，经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党员是占少数的。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所谓“人士”就是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

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些人听说无产阶级领导他，他就不高兴。有些人却偏要喊你要归我领导，如果你不归我领导那就不正确，路线就发生问题。这种神气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欢迎。在这里，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第八个问题，扩大解放区。在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但是我们要注意防御敌人的进攻，敌人进攻我们就粉碎它，我们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在抗战初期，是进攻的，到处发展。在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缩小，以防御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发展。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规定了这样两条：第一条是进攻，第二条是防御。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损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就怕。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各地作的关于一九四五年任务的计划，第一条就是进攻，第二条就是防御。这不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讲是在可能条件下，不是讲在没有可能的条件下去进攻，而且还讲了敌人有可能来进攻我们，要注意巩固根据地，所以这不是冒险主义。

第九个问题，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我们提出过，但那时只是一种希望。那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那时我们前面的敌人是日本人，后面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我们被夹在中间。我们的力量在那时是个小手指头。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

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是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动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我们现在要“就敌就粮”。敌人的据点很多，但敌人只有点、线及小面。敌人要搞点、线，我们就分散搞面，这是“就敌”。人要吃饭，集中在一起没有饭吃，要分散吃饭，这是“就粮”。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的，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

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灭你一百人。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条，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了，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包含准备转变的意思。在解放区的任务里面，我讲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就是说，进攻应在前，防御应在后。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将来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时，如果没有准备就不好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方针也要变，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

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那么多房子，乡村没有人去，行吗？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

第十个问题，军队与地方。要深入农村，争取国民党统治区，争取沦陷区。我们要夺取大城市，但我们现在的旗子并没有插在北平、武汉，还是插在山上，像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等等。我们

现在的根据地，是战略的出发地，但现在拥有的人口太少了，我们要发展到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一半。我们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的军队，我们就能集中地从日本人手里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条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将来我们是“武器加数量”，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几百万军队，全国老百姓负担也并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况下，扩大军队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我们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军队，但是如果到处扩大，扩大得不亦乐乎，一月、两月没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对了。所谓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十一个问题，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1]。召集这样一

---

[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1945年7月13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开会，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个会议，是我们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的提议，这是一件大事。报纸上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同志们！我那个政治报告名叫《论联合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讲得很少，在这里就讲一下。请委员长组织联合政府，我们请了没有呢？请过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来同志去请过，我们《解放日报》、新华社不是几天就请一次吗？你每请一次，他总是摇头，不大高兴。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们说是和他联合，他说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们说开党派会议，他就叫“分赃会议”，他说他的政府是赃，不赞成人去分。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讲：“孙中山先生讲过，将来要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说：“你们把我的政府当作北洋军阀的政府，你们就是总理！”那个人实在难得讲理，还有一点流氓脾气，比较坏。

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党外人士要占大多数。我们准备选举一个机关，它的名称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们想的也许很好。现在拟定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要解放中国人民，谁人敢讲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权利，都要争取这个

权利，反动派如干涉进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权利，是绝对不许可的。提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

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讲到我们党内，这一点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部队，是

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有的同志讲："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

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1]。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2]。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是解决了生产问题，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

---

[1] 吴满有，1942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赵占魁，山西定襄人，1939年进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司炉工。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和劳动英雄。张治国，陕西吴堡人，1943年任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七团第七连副班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2] 客里空，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的话剧《前线》中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的名字。

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1]，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2]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还有到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女同志，在清凉山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他们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3]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2] 赵毅敏（1904—2002），河南滑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3]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

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历史问题也比较恰当地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那天在预备会议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

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我们对这几部分同志要特别注意。

（一）理论工作者。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1]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做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

---

[1] 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1章第4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1]。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2]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3]，《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

[1]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苏格拉底，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2] 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3]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主要谋士。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刘伯温，即刘基（1311—1375），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受朱元璋礼聘参加起义军，提出时务18策。明朝建立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里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戏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些同志心里怄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1]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作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1]，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2]，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敝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

---

[1] 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2] 戴季英，当时任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

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五）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军队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个根据地、解放区有广大的经济工作，有广大的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对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们提倡、宣传得不够，使得许多同志感觉到，在这些部门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没有地位。我曾经讲过，延安有一个同志告诉我，要他做总务处长，他不愿意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起。人家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做一般工作。为什么他说做一般工作呢？是因为做总务工作吃不开，现在我们应当使他们吃得开。有些同志认为，做军队工作、党务工作吃得开，在军队里面是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开，做后勤工作还是吃不开。因为他们吃不开，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们吃得开。

（六）民运工作干部，工、青、妇干部。这些干部也感觉吃不开。有人把他们叫做“杂牌军”，其实都是“中央军”，没有什么杂牌军。大城市打开以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开展起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现在留下的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我们要照顾他们，尊重他们。同样，没有青年工作、妇女工

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我们现在还叫他们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万里长征来的，那就没有几个大人，不过一两万而已。同志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经验当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否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味道大得很，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这样不好，我们年纪比较老，并不十分漂亮，还是他们比较漂亮，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大多数是青年同志，当然年纪大的也有。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1]，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党外干部。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

---

[1] 胡适之，即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这句话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73页）。

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

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1]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

---

[1] 徐老，指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参见《论语·为政》。

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

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1]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

---

[1] 徐老，指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参见《论语·为政》。

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1]，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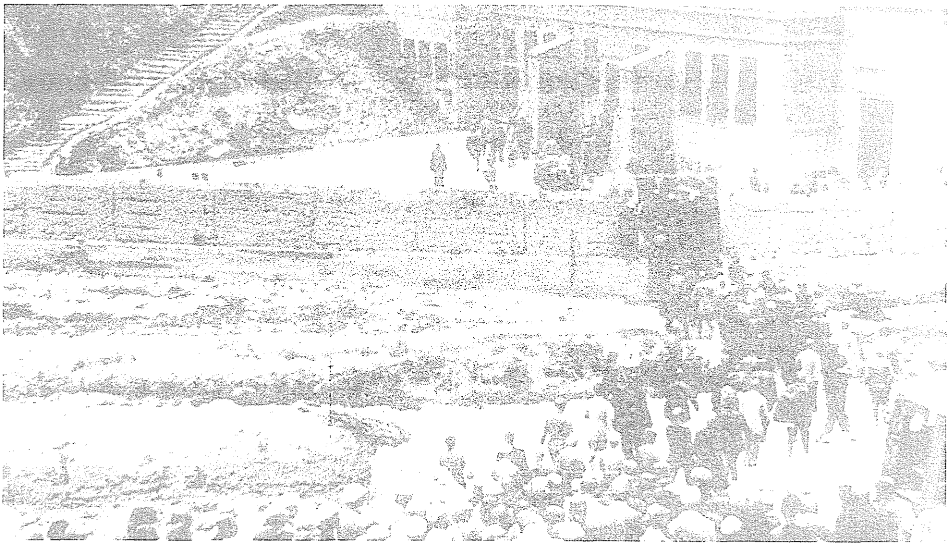
---

[1] 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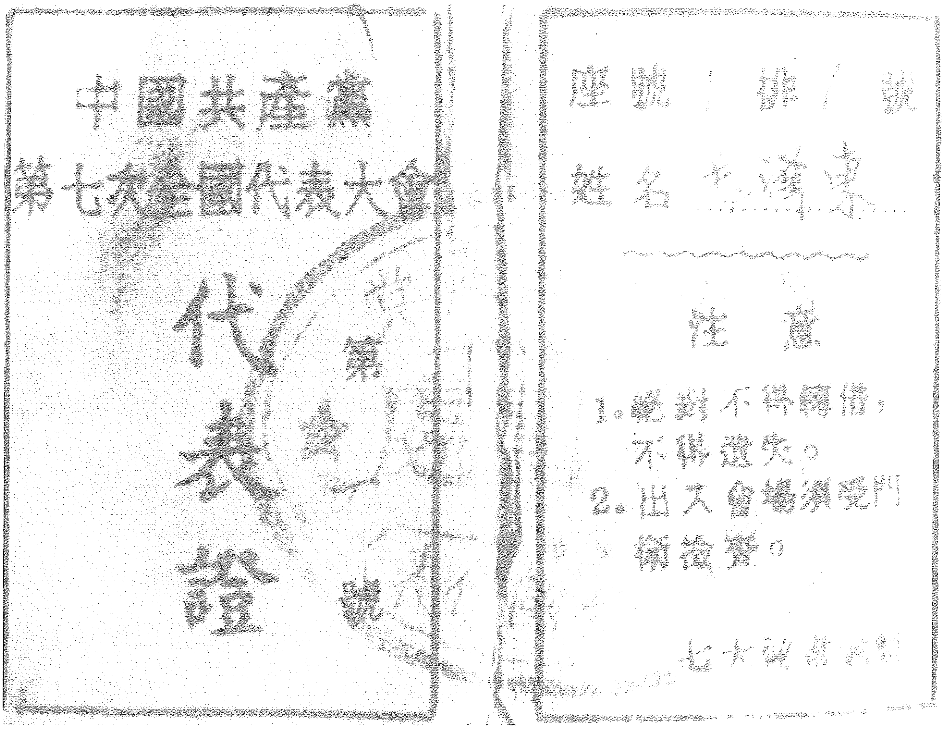
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图为七大代表正在进入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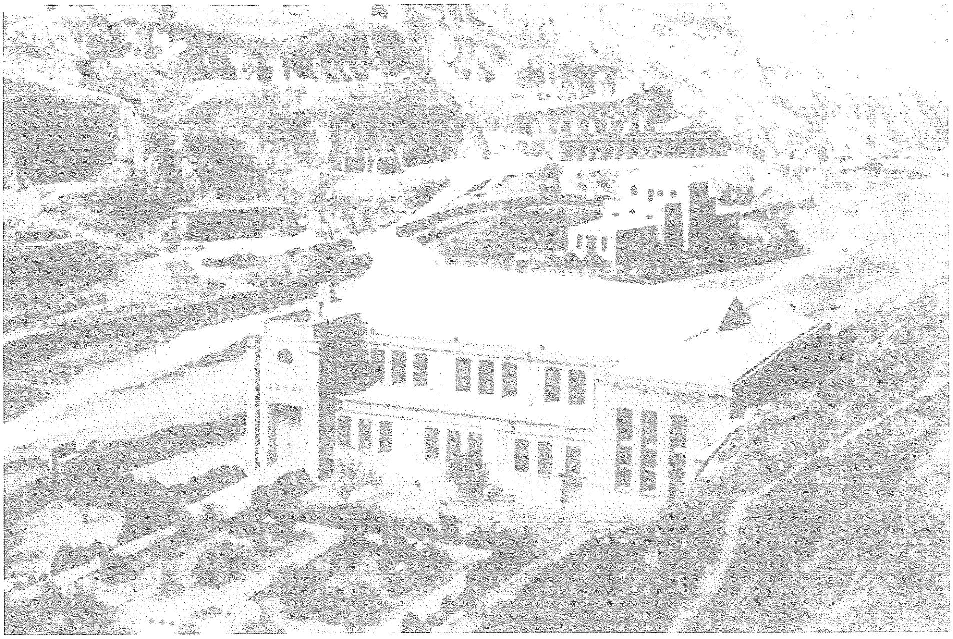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代表證
第　號

座號　排　號
姓名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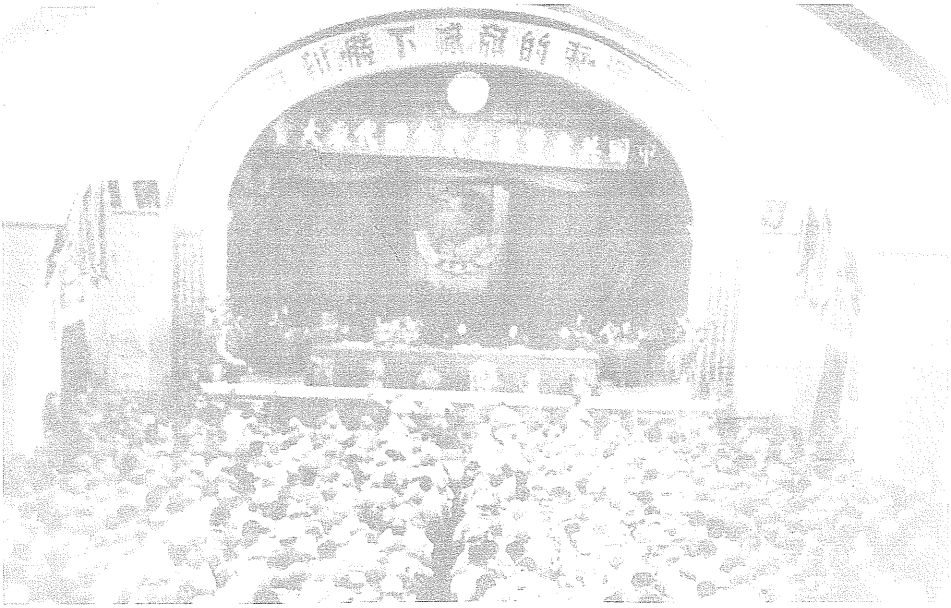
注意
1.絕對不得轉借，不得遺失。
2.出入會場須受門衛檢查。

七大秘書處製

毛泽东的中共七大代表证。



中共七大会议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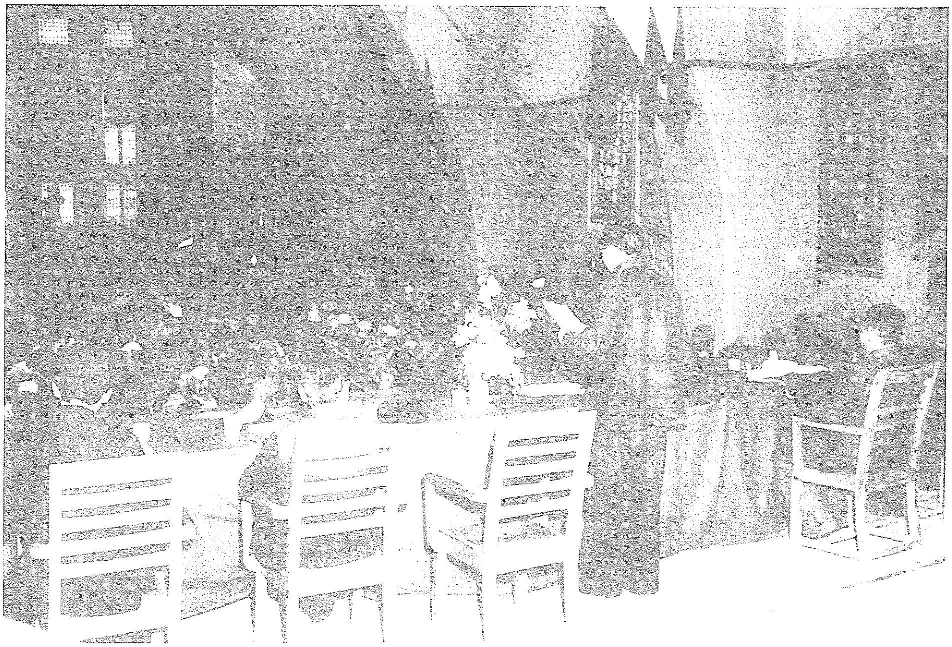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毛泽东等步入七大会场。

毛泽东等在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主席台上。

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七大主席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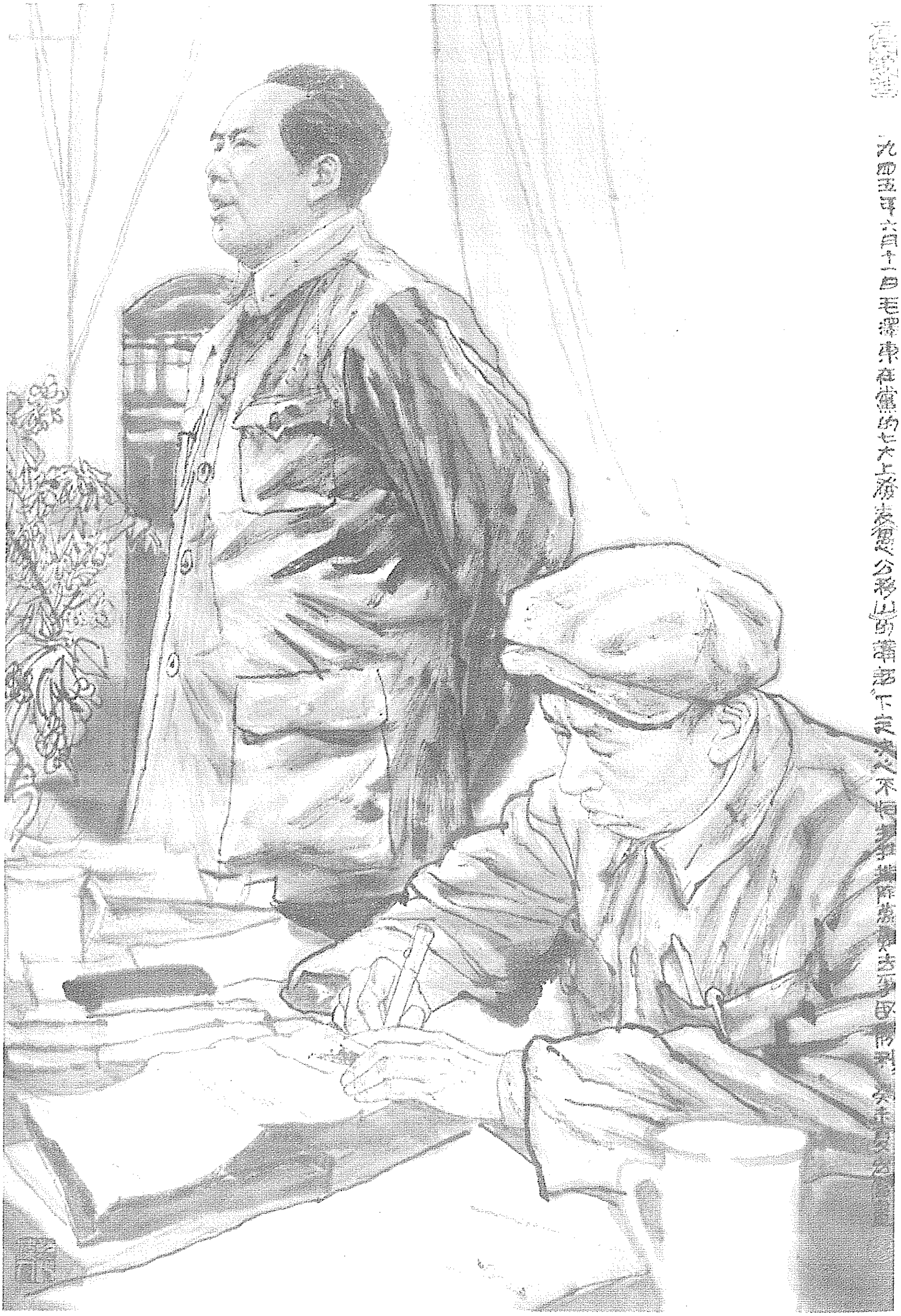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台上作报告。

毛泽东在七大上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口头报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阶级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毛泽东在七大主席台上作报告。

毛泽东在七大上作报告。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發表愚公移山的講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中国画）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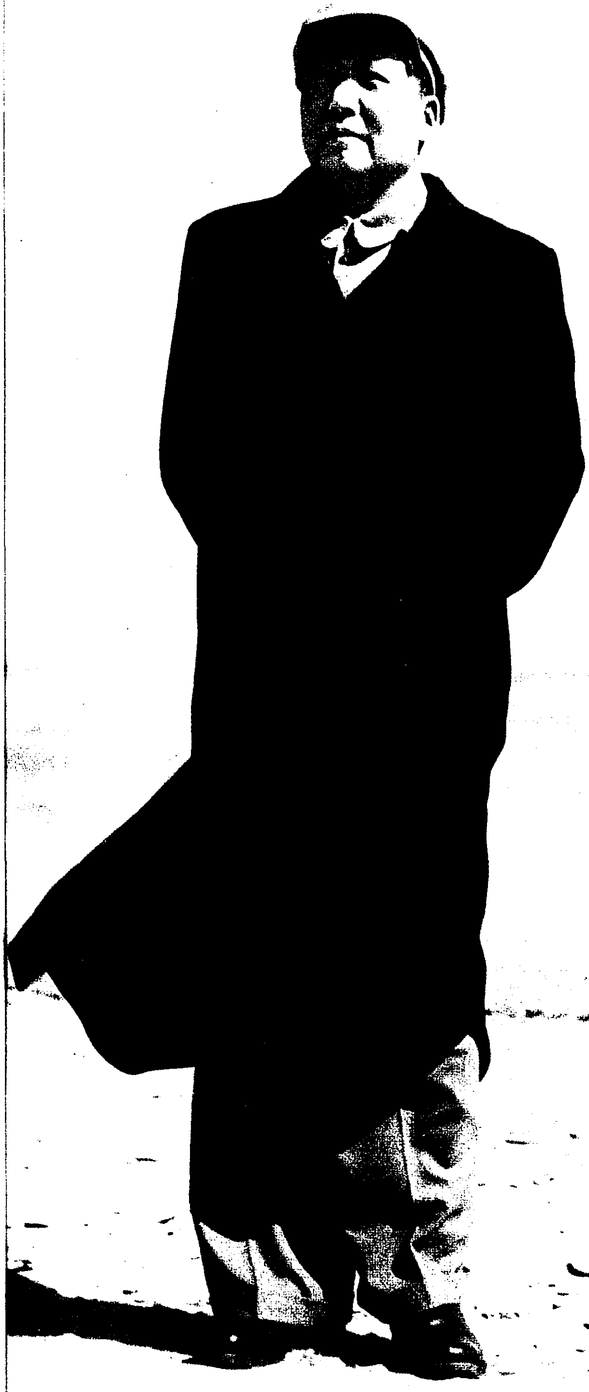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0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生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家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合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
（1945年4月27日）
关于提议将王明等选进“七大”中央委员会的讲话…………………6
（1945年4月）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7
（1945年5月1日）
为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给斯大林的贺电……………………………………8
（1945年5月3日）
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9
（1945年5月4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11
（1945年5月8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12
（1945年5月23日）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13
（1945年5月24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31
（1945年5月27日）
给冈野进的信 ……………………………………………………………32
（1945年5月28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34
（1945年5月31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79
（1945年6月2日）
在准备南下支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80
（1945年6月7日）
复罗荣桓电 ……………………………………………………………81
（1945年6月9日）
致邓小平电 ……………………………………………………………82
（1945年6月10日）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 ………………………………83
（1945年6月10日）
愚公移山 ………………………………………………………………93
（1945年6月11日）
中共不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 ………………………………………98
（1945年6月15日）
王震王首道部的行动方针……………………………………………100
（1945年6月15日）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03
（1945年6月15日）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104
（1945年6月17日）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悼词…………………………112
（1945年6月17日）
为中国革命死难烈士题写挽词……………………………………114
（1945年6月17日）

挽抗日烈士联……115
（1945年6月17日）
欢迎七参政员来延安商谈国是的复电……116
（1945年6月18日）
豫中、豫东日军占领区较利于建立根据地……117
（1945年6月18日）
致王若飞电……119
（1945年6月18日）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20
（1945年6月19日）
南下部队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121
（1945年6月24日）
给各级党部的通知……124
（1945年6月26日）
挽李公朴、闻一多联……125
（1945年6月27日）
复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电……126
（1945年6月30日）
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127
（1945年）
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的谈话……129
（1945年7月2日）
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会谈记录……130
（1945年7月4日）
和黄炎培谈跳出周期律……137
（1945年7月4日）

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139
（1945年7月5日）
评蒋介石七七演说* ……………………………………141
（1945年7月8日）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44
（1945年7月10日）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48
（1945年7月12日）
开辟郑州许昌等地甚为必要………………………………150
（1945年7月14日）
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151
（1945年7月15日）
在《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上加写的一段话…………154
（1945年7月19日）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王震部会合…………………………155
（1945年7月22日）
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157
（1945年7月22日）
评国民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159
（1945年7月22日）
争取目前时间创立五岭根据地……………………………162
（1945年7月22日）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163
（1945年7月22日）
关于扩大反内战宣传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的指示…………164
（1945年7月22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65
（1945年7月23日）
爷台山战事扩大……………………………………………166
（1945年7月25日）
坚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168
（1945年7月27日）
致福斯特电…………………………………………………169
（1945年7月29日）
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171
（1945年7月30日）
批转太行区党委关于检讨统一领导问题的报告…………172
（1945年7月30日）
胡军侵占边区问题及我军对策……………………………173
（1945年7月30日）
对留守兵团工作的分析……………………………………174
（1945年7月）
准备应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176
（1945年8月4日）
准备与王震王首道部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178
（1945年8月4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182
（1945年8月4日）
中央关于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条件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83
（1945年8月6日）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85
（1945年8月9日）

致斯大林电……………………………………………………190
（1945年8月9日）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1
（1945年8月9日）
争取一切条件准备对付内战………………………………193
（1945年8月10日）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194
（1945年8月11日）
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197
（1945年8月11日）
华中准备对付内战的部署…………………………………198
（1945年8月12日）
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200
（1945年8月12日）
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迎接外蒙军及红军………………202
（1945年8月12日）
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203
（1945年8月12日）
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204
（1945年8月12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205
（1945年8月13日）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220
（1945年8月13日）
在战役上须占绝对优势不可浪打…………………………224
（1945年8月13日）

河南部队目前的任务……………………………………225
（1945年8月13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227
（1945年8月）
广占乡村不打大城市……………………………………240
（1945年8月15日）
关于警察问题致华中局电………………………………242
（1945年8月15日）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246
（1945年8月16日）
华中部队当前任务和作战方法…………………………250
（1945年8月16日）
包围大同和解决太原问题………………………………252
（1945年8月16日）
就去重庆会见问题复蒋介石电…………………………253
（1945年8月16日）
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蒋介石电………………………254
（1945年8月16日、22日、24日）
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避免无把握的硬仗…………259
（1945年8月18日）
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毅部…………………260
（1945年8月18日）
山西国民党军部署及我军作战任务………………………261
（1945年8月19日）
抽九个团赴东三省………………………………………263
（1945年8月20日）

彻底执行上海起义的方针……265
（1945年8月20日）
动员城内人民起义，配合我军夺取城市……266
（1945年8月20日）
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267
（1945年8月21日）
审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268
（1945年8月22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269
（1945年8月23日）
目前党的方针及新四军的工作部署……276
（1945年8月24日）
力求占领许多中小城市……278
（1945年8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279
（1945年8月25日）
复王震、王首道电……282
（1945年8月25日）
复魏德迈电……283
（1945年8月25日）
和刘伯承、邓小平的谈话……284
（1945年8月25日）
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国民党进攻……286
（1945年8月26日）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287
（1945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290

（1945年8月26日）

致林枫等电…………………………………………………………294

（1945年8月26日）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295

（1945年8月27日）

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311

（1945年8月28日）

和张澜的谈话………………………………………………………323

（1945年8月28日至9月11日）

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332

（1945年8月29日）

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341

（1945年8月30日）

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八项原则性意见…………………………344

（1945年9月2日）

为民主人士题词……………………………………………………361

（1945年9月2日）

为庆祝抗战胜利题词………………………………………………362

（1945年9月2日）

和大公报记者的谈话………………………………………………364

（1945年9月5日）

为中学生卢国琦题词………………………………………………365

（1945年9月6日）

在重庆的公开声明…………………………………………………367

（1945年9月13日）

尽快派人到上海等地办报……………………………………………368
（1945年9月14日）
复中共中央电…………………………………………………………370
（1945年9月15日）
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371
（1945年9月18日）
复中共中央电…………………………………………………………372
（1945年9月19日）
为《大公报》题词…………………………………………………373
（1945年9月20日）
为徐迟题词……………………………………………………………374
（1945年9月22日）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376
（1945年9月27日）
给柳亚子的信…………………………………………………………380
（1945年10月4日、7日）
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383
（1945年10月8日）
七律·重庆谈判 ………………………………………………………385
（1945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00
（1945年10月11日）
《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 ………………………………402
（1945年10月12日）
关于迟滞国民党军北进致刘伯承、邓小平电……………………405
（1945年10月12日）

夺取平绥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407
（1945年10月16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410
（1945年10月16日）
东北应坚决阻止蒋军登陆………………………………………411
（1945年10月16日）
致聂荣臻电………………………………………………………412
（1945年10月16日）
关于重庆谈判……………………………………………………413
（1945年10月17日）
致王震电…………………………………………………………423
（1945年10月17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424
（1945年10月17日）
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425
（1945年10月17日、27日、29日）
给续范亭的信……………………………………………………430
（1945年10月18日）
应抽调地方军补充野战军………………………………………431
（1945年10月19日）
目前东北发展方针………………………………………………432
（1945年10月19日）
组织一支野战军进行津浦战役…………………………………433
（1945年10月19日）
致陈赓等电………………………………………………………435
（1945年10月19日）

目前时局及今后六个月的任务……436
（1945年10月20日）
关于山东华中作战问题的指示……439
（1945年10月22日）
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441
（1945年10月22日）
归绥包头大同等地必须占领……443
（1945年10月22日）
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歼灭向承德进攻之敌……444
（1945年10月23日）
孤立傅作义部于集宁后再歼灭之……446
（1945年10月24日）
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以利野战……447
（1945年10月24日）
东北我军力量的布置……448
（1945年10月24日）
致郑位三、李先念电……449
（1945年10月24日）
迅速组织热河野战军和冀东纵队……450
（1945年10月25日）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452
（1945年10月25日）
尽快抽调部队海运东北……456
（1945年10月25日）
程子华速去热河准备反击蒋军进攻承德……458
（1945年10月27日）

准备集中全力歼灭傅作义部夺取归绥……………………………460
（1945年10月27日）
致东北局电…………………………………………………………461
（1945年10月28日）
和国民党谈判的补充意见…………………………………………462
（1945年10月29日）
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十一月份必须完成三项任务…………………464
（1945年10月30日）
赵尔陆即率部兼程至临城地区……………………………………466
（1945年10月30日）
致热河分委等电……………………………………………………467
（1945年10月30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面之敌然后再打援敌…………………468
（1945年10月30日）
准备钳制王仲廉可能北援之部队…………………………………470
（1945年10月30日）
歼灭霍守义陈大庆李品仙部即是援助华北东北…………………471
（1945年10月30日）
准备在邹、滕地区打大歼灭战……………………………………473
（1945年10月31日）
集中最大兵力歼灭当面之敌………………………………………475
（1945年10月31日）
致赵尔陆电…………………………………………………………476
（1945年10月31日）
抵抗由营口葫芦岛登陆之蒋军迫其缓进…………………………477
（1945年10月31日）

致周恩来电……………………………………………………479
（1945年10月31日）
致东北局电……………………………………………………480
（1945年10月31日）
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题词………………481
（1945年10月）
为李少石题挽词………………………………………………482
（1945年10月）
挽范旭东先生联………………………………………………484
（1945年10月）
书鲁迅《自嘲》摘句…………………………………………485
（1945年10月）
为柳亚子的诗尹瘦石的画联展题词…………………………487
（1945年10月）
十一月作战部署………………………………………………489
（1945年11月1日）
冀中地区动员一切力量破坏铁路……………………………492
（1945年11月1日）
在山海关锦州地区坚决歼灭北进之敌………………………493
（1945年11月1日）

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

（1945年4月27日）

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应该说：同志们，大家动手，克服困难吧。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如果上面不去这样作，而把一切事实上担负不起来的担子老是由自己担起来，不敢放手让下面去做，不去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虽然上面费尽了气力，结果将是上下交困，在目前条件下永远也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

解放区的军队，已经达到了九十多万。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扩大军队到几个九十万。但是我们还没有外援。就是假定将来有了外援，生活资料也只能由我们自己来供给，这是一点主观主义也来不得的。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需要集中必要的兵团，离开现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

在分散作战的地区，到一定的攻击目标上去作战。这种集中行动的大兵团，不但不能生产自给了，而且需要后方的大量的物质供给；只有被留下来的地方部队和地方兵团（其数目将还是广大的），还能照旧一面作战，一面生产。照此看来，我们全军应趁目前的时机，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

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在形式上，我们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国家贫困、国家分裂（这些都是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所造成的罪恶结果）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是进步的了。大家看，国民党的军队面黄肌瘦，解放区的军队身强力壮。大家看，我们自己，在没有生产自给的时候，何等困难，一经生产自给，何等舒服。现在，让站在我们面前的两个部队，例如说两个连，去选择两种办法中的一种：或者由上面全部供给生活资料；或者不给它或少给它，让它全部、大部、半部或小部地生产自给。哪一种结果要好些？哪一种它们愿意接受些呢？在认真地试行一年生产自给之后，一定会认为后一种办法结果要好些，愿意接受它；一定会认为前一种办法结果要差些，不愿意接受它。这是因为后者能使我们部队的一切成员改善生活；而前者，在目前的物质困难条件下，无论怎样由上面供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至于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表面上“落后的”“倒退的”办法，而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

解放全中国的目的。这种历史意义，难道还不伟大吗？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官兵一道生产劳动，亲如兄弟了。（二）增强劳动观念。我们现行的，既不是旧式的募兵制，也不是征兵制，而是第三种兵役制——动员制。它比募兵制要好些，它不会造成那样多的二流子；但比征兵制要差些。我们目前的条件，还只许可我们采取动员制，还不能采取征兵制。动员来的兵要过长期的军队生活，将减弱他们的劳动观念，因而也会产生二流子和沾染军阀军队中的若干坏习气。生产自给以来，劳动观念加强了，二流子的习气被改造了。（三）增强纪律性。在生产中执行劳动纪律，不但不会减弱战斗纪律和军人生活纪律，反而会增强它们。（四）改善军民关系。部队有了家务，侵害老百姓财物的事就少了，或者完全没有了。在生产中，军民变工互助，更增强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军队生产了，机关生产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全体人民的普遍增产运动，当然也更显得必要，更有劲了。

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

大家明白，我们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剩下的不过数万人，而我们现在的党员是一百二十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在大量干部中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这个矛盾——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地（不是完全统一地）大踏步地但又是稳步地前进了。在今后，我们党还会、也还应该有更大的发展，而我们是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原则下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了。

另一个环子是生产运动。抗战八年了，我们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这是伴随着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三年敌人大举进攻和国民党政府发动三次大规模反人民斗争（所谓“反共高潮”）而来的绝大的困难，绝大的矛盾。如果不解决这个困难，不解决这个矛盾，不抓住这个环节，我们的抗日斗争还能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但是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会着生产，这样一来，我们又活跃了，我们又生气勃勃了。再有几年，我们将不怕任何敌人，我们将要压倒一切敌人了。

这样看来，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具有何种历史重要性，是明白无疑的了。

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目前正当春耕时节，希望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工作人员、人民群众，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取得比去年更大的成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学会生产的地区，今年应当更大地努一把力。

关于提议将王明等选进“七大”中央委员会的讲话[1]

（1945年4月）

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而中国还没有什么小资产阶级政党，他们之中革命的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也把他们的思想情绪带了进来，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应当太着重个人的责任。

---

[1] 这是毛泽东提议将王明等8位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选进“七大”中央委员会讲话的一部分。

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

（1945年5月1日）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苏联红军攻克柏林给斯大林的贺电

（1945 年 5 月 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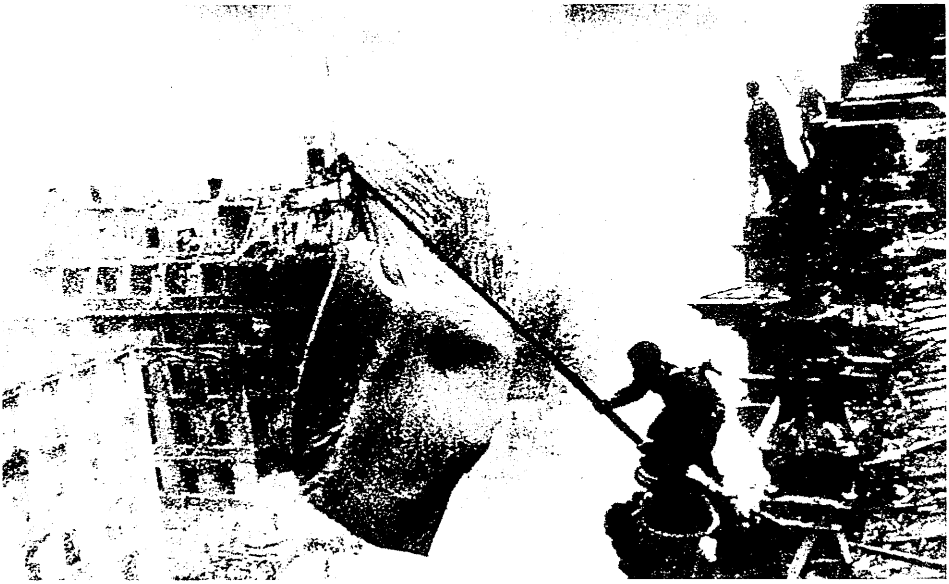
斯大林元帅：

欣悉红军解放柏林，特致热烈的贺忱！

毛泽东

朱　德

五月三日



1945 年 5 月 2 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1]

（1945年5月4日）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

（一）顽方既以六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可以采用机动作战，在你们考虑成熟之后，即可执行。机动办法，或以大部向修铜行动一次，或由王震率精干支队向南行动，均由你们依据情况考虑决定。（二）湘鄂赣边区根据地必须创立，以为南北枢纽，区党委组成问题，中央另电通知。（三）“七大”辰有前可毕，会后数日九旅[2]三千一百人，文旅[3]二千一百人即可由延出发赴湘。（四）“七大”文件广播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辰支

---

[1] 这是毛泽东给王震、王首道并告中共鄂豫赣边区区委书记郑位三、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先念的电报。1945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湘鄂赣军区，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

[2] 九旅，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该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于1945年6月由司令员刘转连、政治委员张启龙率领南下。

[3] 文旅，指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该旅一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1945年6月由司令员文年生、政治委员雷经天率领南下。

毛泽东在检阅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力量。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5月8日）

结论缓一点作，多酝酿些好，小组中有许多好的意见。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蒋介石一定要反共。总之，这次苏联强大了，人民觉悟了，我们党也强大了。同志们强调困难是好的，但结论要多指出光明才好。

---

[1] 这是毛泽东在枣园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听取各代表团讨论情况的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5月23日）

少而精的思想是好的，但这是理想。山头是要照顾的。中央委员会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各方面的知识。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过去八七会议不要陈独秀出席，后来又不选他，过去还有人主张所有犯错误的人都不要，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拟的名单，形式上看很庞杂，实际上大不同。现在世界形势变了，党有了三个时期的经验，整风以来二十五个中央委员中起了很大变化。少而精只是一方面的真理，少不见得就很精，多一点也不见得就不精。就是说要照顾到山头，要照顾到犯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次就精得不得了，太精了就会脱离群众。

---

[1] 5月23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各代表团讨论中，提出中央委员会要少而精，有人提出不要照顾山头、陈绍禹是否要列入中央委员会候选名单等意见。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讲话的一部分。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1]

（1945年5月24日）

同志们！我们的大会开得很顺利，三个议事日程已经过去了，大会结论等两天就可以做。

第四个议事日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关于选举的方针，主席团交换过几次意见，决定了一个方针，我现在向同志们报告一下。

一　选举的标准

我们要选举一个全党的领导机关，即在大会闭会以后、两次大会之间的全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我们采取一个什么标准，用什么原则来进行选举呢？各个代表团的主任反映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主席团认为应该采取这样的标准，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这样一个原则，应该是我们选举中央委员会的原则。

这次要选举许多过去不是中央委员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就是说，有两批人要选进中央委员会来。一批是过去中央委员会的同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志，人数并不很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十七年了，这十七年中间，经过三中全会[1]、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几次的选举，现在剩下来的中央委员还有二十五个人。这二十五个人，大部分应该继续选进中央委员会工作，因为他们有很多经验。再就是应该选举大批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因为他们也有很多经验。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比过去老的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五个人扩大，我们大会必须采取扩大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这样一个政策，对于我们党现在的情况、国内的情况、国际的情况都是适合的。就是说，新的中央委员会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但必须比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扩大，如此才能够适应党的目前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

按照这样的标准和原则，于是就提出：（一）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现在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不应该选举，一种是应该选举。（二）这次选举中央委员会要提拔许多过去不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来，要不要照顾各方面？就是所谓要不要照顾山头？也可以有两种考虑，一种是不要照顾，一种是要照顾。（三）中央委员的资格和标准是能够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是重要的，但对他的能力要求如何？是不是要有各方面知识的人我们才选他？还是有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知识的就可以选他？这个问

---

[1] 三中全会，指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

题，同志们也提出来了。总之，在选举方面有这样三个问题。

关于第一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只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凡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就不选，这样一种意见，主席团认为是一种好的愿望，一种好的理想。这种意见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们吃了亏，原因就在一些同志犯路线错误。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跟过去历次大会都有很大的区别，过去的大会我参加过三次，代表们一般对选举都不大认真，只有少数人认真。而这次大会，我们各方面的同志对选举都非常认真。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有了经验。过去我们的经验非常不足，觉得我自己也选不到中央委员会去，随便你提一批人吧，你提什么人，我就选什么人，结果是我们自己受了惩罚。这次情况变化了，大家对选举都非常关心。所以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一方面的理由的。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选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人，甚至绝对化一个也不选，那就不好，就不恰当。

我来讲一点我们党的历史。

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事，就是六次大会不选举陈独秀到中央。结果是不是好呢？陈独秀后头跑到党外做坏事去了，现在看不选他是不对的。我们党是不是因为六次大会不选陈独秀，从此就不出乱子，天下太平，解决了问题呢？六次大会选举出的中央纯洁得很，没有陈独秀，可是我们党还有缺点，还是闹了纠纷，出了岔子，翻了筋斗，并没有因为不选他，我们就不闹纠纷，不出岔子，不翻筋斗。不选陈独秀，这里面有一条原因，就是为了图简便省事。在预备会上我曾讲过，过去我们图简单、爱方便，不愿意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这种情绪在我们党内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的。再有一次，是六届四中全会把李立三开除出政治局，要他离开中央工

作，虽然中央委员的名义还保留，但实际工作离开了。以为这样一来立三路线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真的解决了呢？我们把陈独秀赶走得干干净净，结果我们还是跌筋斗；李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可是政治局的工作赶开了，中央的工作也赶开了，但四中全会也跌了筋斗，赶李立三的那天就是一个筋头，以后翻的也不少。这两次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我们党也有另一方面的经验。在最近的十个年头之内，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到现在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十个年头之内的中央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中央委员会主要的成员，是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选举的，六次大会选举的现在只剩下五位[1]，就是说现在的二十五位中央委员中，绝大多数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举的，就是翻筋斗的两次全会选举的。六中全会也选了三位。恰恰在这十年中，筋斗翻得少了一点，乱子闹得少了一点，我们的工作还算有进步。这一条经验是不是很重要的呢？是一条很重要的经验。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第二次是六届六中全会，大家知道，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当时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即对放手动员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

---

[1] 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李立三、关向应。

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倾向，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样。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至于到了一九四二年整风以后的这三年中间，情况就更加起了变化，到七大前作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这个变化更大。相信经过七大这样重要的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会议以后，我们党会更加向好的方面前进。我们的这种信心与估计是有根据的。这十年中，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比较顺利，比较内战时期犯的三次路线错误（连张国焘的那一次就是四次）就不大相同。内战时期，喜欢图简便，不愿意同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共事，“一掌推开”“简单明了”的那样一种作风是不好的。最近十年，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因此，七次大会应该接受过去的经验，就是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所以说：“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

情况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团结这些同志，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有信心、有根据断定将来是要好的。如果说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该选举，我看就不如采取这样的原则，

即：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是他已经承认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党在原则上是不含糊的，与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必须有“承认错误并且改正错误”的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去选他。这个原则和不选的那个原则不同，那个原则是一个很好的理想。虽然理想一定要有，但是还要结合一个东西，叫做“现实”。我们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叫做革命的现实主义，我们不是无原则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是原则性，现实主义就是灵活性，理想主义的原则性与现实主义的灵活性要统一起来，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凡是犯过错误的一概不选举，这是理想。但只确定这一条还不够，还缺少一条，就是说，人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我们就要选举他。我们党必须有一个原则，就是犯错误是不好的，但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好的。一定要把这后一条加上，这样才是全面的。这两条一定要结合起来，不然就要出毛病，我们就会丧失好处，就可能产生缺点，甚至可能造成错误。我们只有制定一个很好的选举方法，才可以避免过去的错误。鉴于历史上闹的乱子，这次要谨慎一点，不是凡犯过错误的就不选，只要承认错误又决心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还要选。这就是现实主义，这也是一条原则。这两条原则看起来好像是不一致的，但只有使这两条原则结合起来才能够办好事情。这才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不完全正确，就搞得不好，就会犯错误。我看没有哪个同志想犯错误，说“我一定要犯错误”。如果对一些同志犯错误这个问题不加以分析，对历史不加以具体的分析，不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那就不行。就是说，如果不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不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那我们就要造成缺陷、缺点，甚至造成错误。这一点，是必须向同志们提出来的。对犯过错误的同

志，从感情上是不愿意选的，但从理智上我们可以选。感情和理智这两个东西，现在我们要统一一下，也是可以统一的，就是在理智指导下的感情，把理智放到第一位。鉴于历史，为着将来，为着全国人民，为着全党，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方针——现实主义的方针。过去对陈独秀，对李立三，痛快明了，从感情上说倒很痛快，没有烦恼，但结果搞得不痛快，很烦恼。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所以我们要下决心不怕麻烦，下决心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合作。你不大来，我就去；你口里有许多闲话，我长了耳朵，这个耳朵听不完那个耳朵听；你说那边窗户开得不够，我就连这边也打开。要练习和那些曾经同我闹过纠纷、有过原则分歧的人，打击过我以及开除过我的党籍的人合作。我们在要求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个原则下去同他团结、合作。这一条，的确要练习，不练习就做不到，练习就可以做到。所以感情和理智这个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我在这里再举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例子，国际的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第一国际时，为着团结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群众，曾经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也曾经同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同马志尼[1]合作。马克思、恩格斯做出了这样的榜样，这就告诉我们要避免宗派主义，因为实质上是一个广大群众的问题。那个时候，无政府主义者有很多的群众，因此要同他们合作，逐渐来改造他们，感化他们。后来无政府主义者分裂出去了，意大利民主分子也不干了，但这并不损伤马克思主义，你不干就不干吧！

---

[1]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民主共和派领袖。

中国的和外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党内要尽可能的团结。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在我们的纲领下，争取他们和我们的团结、合作。我在报告里已经说了，任何一个同志，只要他愿意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我们就要和他团结起来。我们的团结也是有原则的，就是遵守党纲党章，服从决议，要在这样的原则下，和所有同志团结起来。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第二点，要不要照顾到各方面？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照顾山头的问题。也有两种解决方法，一种是要照顾，一种是不要照顾。主席团认为还是要照顾才好。昨天傅钟[1]同志在这里讲了一篇很好的话，我全篇都赞成。在选举上，应不应该照顾山头？应不应该照顾到各方面？我看那个主张不应该照顾山头、不应该照顾各方面的意见，也是一个理想，但事实上行不通，事实上还是要照顾才好，照顾比不照顾更有利益。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内战时期，有苏区有白区，在苏区之内又有这个部分那个部分，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内战之后是八年抗战，抗战时期也有山头，就是说有许多抗日根据地，白区也有很多块，北方有，南方也有。这种状况好不好？我说很好，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所以这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山头它有什么坏？清凉山有什么坏？太行山有什么坏？五台山有什么坏？没有。但是有了山头主义就不好。因此，对这些问题要分析，任何一块根据地中，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山头主义。山头主义的情绪，也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上的不同，比如一、四方面军就

---

[1] 傅钟（1900—1989），四川叙永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有不同，一方面军里又有好几个部分，昨天傅钟同志讲了。有一、二、四方面军的区别，还有三军、七军、十军等的区别，因为在各个地方工作，情况不同，关系搞得不好，这就有山头主义倾向，但有些也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昨天傅钟同志讲了山内山外的关系，彼此间关系好，山头主义就可以消灭。但许多事情还带着盲目性，工作就做不好，这就要先分析一下。现在我们在这里搬石头，搞关系。现在我们来他一个总结性的办法，把大小石头纷纷搬开，这样关系就会好一点，山头就少了，山头主义也就少了，这样就搞掉了一半；再把相互关系搞好一点，那一半也没有了。有山头而没有主义，另外来一个主义叫做马克思主义，叫做山上的马克思主义。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一定要认识山头。从前我们说要承认山头，承认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或者讲认识山头更确当一点，要了解它。照顾也一定要照顾，认识了以后才能照顾，照顾就能够逐步缩小，然后才能够消灭。所以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所以不要怕。将来许多年之后，全国铁路如网，飞机也比这几天来往的要多，那时，你再找山头就没有了。没有全国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要彻底消灭山头主义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的革命发展了，根据地也更多了、壮大了，如果我们去掉盲目性，比较善于处理矛盾，那末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得比较好。

过去的中央委员会，即七大以前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反映这种

实际情况，就是说，在组织成分上没有反映各个方面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个中央是不完全的，是有缺点的。整风以来，我们提出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在政策上反映了这一点，但在组织成分上还没有反映这一点。这是一个缺点，是不好的。鉴于这一点，我们这次选举就要注意这个问题。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反映这方面的情况，要成为一个缺陷最少的中央。完全避免缺点恐怕也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要它少一点，也可能使它少一点。

我们顾及到前面所讲的第一点，则对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可以选举；顾及到第二点，就使我们党能够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这样，我们的缺点就会少一些。

关于第三点，每一个中央委员是不是都应该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都应当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一种是每一个中央委员不一定要通晓各方面的知识。主席团认为，前一种意见也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有道理的，如果能做到那样，当然很好。但是事实上，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所谓各方面的知识，就是各方面事物发展的逻辑。斯大林讲过：联共中央委员会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有文化教育方面的，有经济建设方面的，各方面的都有。我们的新的中央也应该是包罗各种人才的，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各个山头。我说的是尽可能的照顾，各方面都照顾得那样周密、完全，就可能是一种凑数，那就不好，完全不照顾也不好。因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对过去犯过错误的人，无原则地选他们，他不承认错误、不改正错误，我们还要选他们，这是右；但是人家已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还说不要选，就是“左”。对知识的要求也是一样，要尽可能地通晓的方面多一点。

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中国有句老话：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如果我们有各方面的人，每一个人都通晓一方面或者有比较多的专长，选这样几十个人，我们的中央就会比较完全。我们要从集体中求完全，不是从个人求完全。我们要完全或者比较完全一点才好，但是再过几年我们的中央又会是不完全的。比如现在经济建设才开始，将来还要搞大工业，陈云[1]同志讲不要打烂机器，搞大工业我们相当生疏。为什么这次大会提出不要打烂机器这样一条呢？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知识，从前因为没有知识就打烂过，我们进过城，把玻璃打烂了，把机器也打烂了，因此才提出不要打烂机器的问题。鉴于过去的中央不完全，再选一个中央将来也还会不完全，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学习的任务。现在我们在军事上是不是很高明呢？早两天林彪[2]同志讲，我们比国民党的某些方面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有比不过他们的，比如我们就不会驾驶坦克，不会驾驶飞机，不会打大炮。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不完全，在经济建设上、文化建设上也不完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来一个比较完全，搞一个现实主义，再来一个学习。选举中央委员会，就要选有学习精神的人，他不懂得这不要紧，我们选他，让他去学。我们的选举，就应该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即不是从个人求完全，而是从集体中求完全，从对现实的学习中求完全。

总起来讲，我们大会的代表同志们应该有一个希望，希望有这

---

[1]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2] 林彪，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包含有大批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这里不是讲没有犯过错误，而是说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也要包含一批过去犯过路线错误但今天表示放弃错误路线接受正确路线的同志；要包含有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就是出了名的，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也要包含大批过去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要提拔他们到中央委员会来，把他们提高，因为将来我们还要发展。我们现在有近一万万人口，将来还要发展，很快也许就有两万万人口，也许还要多一些，因此我们现在就要训练领袖，首先要训练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是我们党的领袖，全党都要拿眼睛来望着它，这就是训练；拿嘴巴哇啦哇啦地讲，这也就是训练；打开窗户，要空气透进来，这也就是训练。我们的中央过去虽然不大，只有二十几个人，也做了事，现在应该扩大一点。所以我们要有意识地训练领导干部，这倒不是说现在要故意地搞“成名干部”，但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们还要搞，以便适应发展着的中国革命。这个中央还要包含有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也包含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或者专门通晓某一方面的同志。总之，新的中央要包含这样一些同志：大批未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一批犯过路线错误而又改正错误的同志；大批有全国影响的同志，大批现在有地方影响、将来可能有全国影响的同志；一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多的同志，大批通晓的方面比较少的同志。如果经过同志们考虑，采取了主席团这样一个组织路线的话，我们相信这个中央将是缺点比较更少的中央。这样一个中央委员会，就可以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包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就是说，这个新的中央要既能弄通思想，又能团结同志。同志们！我们这次大会就要选出这样的中央。我们的代表多得很，有的同志送给

他一个代表名义他还不要，有许多同志要求不要当选中央委员，这种态度是好的。孔夫子讲过：“临事而惧，好谋而成。”[1]不要说什么革命没有胜利就是因为我没有当中央委员，这样说是不好的。我们要慎重地选举，慎重地就职，这样才是好的态度。这样的中央，才能够保证执行大会的路线；这样的中央，就可以避免或者大体上避免重复历史上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中央，才适合于我们党目前发展的情况及适应于将来的发展情况；这样的中央，才能够给全党同志、全国人民以好的影响。这样一个中央，就是一个缺点比较少的中央，一个比较更有保证的中央，一个使人比较放心的中央。历史的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世界上的事，大体上都是这样。

还要解释几个问题：有同志说这样的中央岂不太庞杂了吗？还有同志担心，有一批人难免要落伍、要掉队，就是说要再犯错误怎么办？能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还有人说，这样的选举不大公平，名单规定的人数只有那么多，又要照顾这个方面，又要照顾那个方面，就势必使得有些同志甚至是能力比较强的同志不能当选，这就不公平。

首先，关于庞杂问题。我们党过去就是庞杂的，现在我讲一下庞杂的历史。我们党在大革命的后期是庞杂的，存在着一条错误的陈独秀路线没有被清算。结果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庞杂大革命失败了，是一个不良的结果。革命一失败，使成千成万的人民受了损伤，党也大大地缩小了，被打入了地下。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在我们党内曾经存在盲动主义路线与立三路线，后头虽然清算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而

---

[1] 参见《论语·述而》。原文是：“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且还有长期没有被清算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与后头的张国焘路线。这种情况庞杂不庞杂？庞杂，而且是路线的庞杂。受了损失没有？受了损失，而且受了很大损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已经写了。第三个时期是从遵义会议到七大。这中间又可以分为两段。第一段，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已经结束，但还没有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凡是一个东西不搞彻底，就总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因此又出了一些乱子。第二段，从六中全会到七大，这时逐步地比较彻底地清算了“左”倾路线。以上三个时期比较起来，究竟哪个时期不庞杂呢？第一个时期有路线的庞杂；第二个时期有几次路线的庞杂；第三个时期，六中全会以前还有点庞杂，六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三年整风以后，庞杂问题解决了，人还是那么多的人——二十五个中央委员。这是不是事实？是事实。所以对过去犯过错误、翻过筋斗的人，现在要以新的眼光去看，犯过错误是事实，但说现在还犯错误就不适当。遵义会议以来，十年工夫，六中全会以来，七年工夫，整风以来，三年工夫，逐步改变了过去庞杂的历史，现在比较不庞杂了。一个庞杂，一个不庞杂，有性质上的区别。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是质的区别，性质上的不同。这个质我们要抓到，不抓到这一点就不好。我们要记得这个历史，关于庞杂这个问题不必害怕，再选他们，不会使我们新的中央搞得很危险。

第二，会不会落伍，会不会再犯错误呢？有些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我们大会代表都一致地欢迎。在他们讲话的时候，就是希望在大会代表的帮助之下改正错误。我看这讲了一个真理，就是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荷花虽好，还须绿叶扶持”，任何一个人也需要大家帮助的，互相批评，自我批评，大家帮

助，才能进步，才能解决问题。从我们全党现在的情况看，从我们这次大会的情况看，以及从我们过去三个时期的经验、抗战八年中的好的坏的事情和整风中的经验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真理。落伍问题、重犯错误问题会比过去少，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就是说更有了保证。那末是不是可以绝对地完全地有了保证呢？也不能这样说，还有落伍的可能，还有再犯错误的可能。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还可能再犯错误；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不谨慎，更可能犯错误。因为推起车子走路，跌过跤的和没有跌过跤的，会有有经验和没有经验的不同。推车子没有跌过跤的人更要注意，更要谨慎，说不定正是你高兴自满地说“我就没有跌过跤呀”的时候，恰好跌了跤，翻了车。过去跌过跤的人，往往比较稳一些，眼睛到处望，还有站在两旁的人提醒说：“你要谨慎一点，过去跌过跤呀！”他的帮手也多一点。但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比较先进的、中间状态的、比较落后的这样三种情况，现在我也不能写保字，保证我们这次大会绝不选错一个人。现在看来他是好的，将来他又不好了，这种可能还是有的。我们这次要选举几十个人，可能中间有若干人，走到半路上脚痛蹲下去了，这就可能落伍、掉队。过去没有跌过跤、翻过筋斗的，也许这次跌一下，跌过的可能再跌一次。这样的事，世界上还不是有过？老百姓推车子，并不是跌了一次就再也不跌了，搞不好可以跌好几次。所以几十个人中间要一个也不落伍，这个险是保不了的。我们要选举几十个中央委员推车子，载小米，推的推，拉的拉，可能漏掉一些小米，但只要保证明天早上靠得住有吃的就行了。当然这也要谨慎，不然一大堆粮食都翻掉，明天便没有饭吃。同时也不要怕，丢一两颗、两三颗小米也没有什么，我们生产的小米很多，丢两三颗不要紧。如果个把

车夫搞得不好，在八次大会还可以另选，或者在两次大会中间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改选一下就行了。

第三，关于不公平的问题。要照顾各方面，老的里头，有犯过路线错误的和没有犯过路线错误的两方面，这两方面都要照顾；新的里头，要照顾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即是所谓山头。这种照顾，我在前面讲过，只是尽可能地照顾。知识也是尽可能懂得多一点，但是懂得少一点，必要的时候我们也选他。这样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既然老的新的都要照顾，知识又不一定能通晓各方面，我们又不能选举几千几万的中央委员，这就会在选举中使有些在能力上知识上比较好、对党也有功劳的同志没有当选，这岂不是不公平吗？从一个侧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从更大的方面看、从全面看，是公平的。因为虽然犯了错误又改正了错误的同志与没有犯错误的同志有不同，但是我们不选他们，单选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就会有另外方面的缺点，所以一定要选他们。当然，我这也是一个建议。因为要照顾各方面，就会使得有些同志按他的能力、知识本来可以当选，但是没有被选上，这种情况会有的，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准备。如果我们不在这里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会有同志说：犯过错误的倒又选上了，没有犯错误的倒选不上；人家知识不及我被选上了，我还不错却没有选上。对这种情况，我们大家在精神上都要有准备。大会闭幕以后，如果有同志对这个选举方针不理解，我们要好好解释，从历史上解释，从历史的经验上说明这个方针。

二　选举的人数

今天要通过选举法，选举法的第一条，就规定了要提两回候选

名单，第一回是预选的名单，第二回是正式选举的名单。通过选举法以后，大家就要考虑，在代表团进行小组酝酿，明天或后天主席团就要提出预选的名单。

关于人数问题，主席团考虑了很久，但是没有提出确定的人数，我做这样一个数目字的提议，叫做七十人左右。上面我讲过，我们要照顾各个方面，照顾新提拔的、知识比较多的、知识比较少的、代表各个地方的革命力量的，这个数目字要有多大呢？要有七十人左右。在人数问题上，也考虑过三个方案，一个是一百人左右，一个是七十人左右，一个是三十人左右，就是大、中、小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中，我想我们两头不要，取一个中间，就是七十人左右。主席团认为这个方案比较好，太小了不能够反映我们党的现状和发展，今天我们党有一百多万党员，将来还要发展，比如一年之内可能发展到两百万党员。新的中央委员会比过去扩大些，扩大到七十人左右可以不可以？我想可以，应该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要采取一个慎重的方针，不要选得太多，但是也不要选得太少。三十个人、四十个人左右太少了，一百个人左右太多了，七十个人左右很好。我代表主席团提出这些意见，当然最后还是决定于大家。

这次选举，同志们是要为着保证大会路线的实行，要考虑这是有关全党的利害的，对党、对人民是有利还是比较没有利？是完全有利的，是完全为着有利的。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我们要注意没有到会的、我们不认识的同志，如果候选名单里有他的名字，我们就要注意；自然，到了会的也不见得都认识，这就要经过各代表团主任的介绍。这样，我们这次选举，就会选举出一个比较好的（当然是比较的）领导机关，作为指挥中国革命的工具。我们是马克

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政府是什么东西呢？国家是什么东西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外一个阶级的机关，是个机器，是个工具。我们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反革命的工具。反革命的政府是什么呢？是压迫革命的工具。总之，都是一种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府也是工具，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导机关，也是党的工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党是阶级的领袖，中央是全党的领袖，我们都当作工具来看。这一点，我今天讲一下。过去我们有许多同志不了解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英雄，出来是干革命的，很有一番自豪。有一番自豪是对的，但应该是作为工具的一番自豪。我们是阶级使用的武器，我们阶级要胜利，就要选出先锋队来。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就是《国际歌》上所讲的，少奇同志在这里念过几次：“不是神仙，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1]自己救自己，他就要选举党，选举工具。

总之，我们大会主席团希望同志们，全体代表同志，采取这样的选举路线。主席团认为这种希望是反映了代表同志大多数的意见，反映了全党同志大多数的正确意见的。这样的选举路线，如果得到了同志们同意的话，那就这样做。请同志们考虑。

---

[1] 这是当时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中的一段。1962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修订的《国际歌》歌词的译文。这段歌词的新译文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5月27日）

关于战略指导问题，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是由日本、我们、国民党三方力量决定的，而我们是处在中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采取何种形式？我们在抗战开始时搞的麻雀战是进攻的形式，是对的。一九四〇年后我们应退却。一九四〇年冬以后，敌后才转入相持，现在基本上还未脱离相持阶段。后来我们采取更分散的形式——武工队。后来，十大政策那一整套我们学会了，加上太平洋形势的变化，我们又前进了，比一九四〇年发展更大了。今后的问题，要得到技术条件，要准备二十到三十个旅，十五万到二十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东北去。关于干部问题，新老干部关系、外地本地干部关系发生问题，一般情况下要老干部、外来干部负责。两万老干部团结带领广大的新干部、本地干部、非党干部的问题，是关系中国革命胜败的问题。凡是历史上跌了跤的事，不要害怕正视，当作经验是很好的。历史地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搞工业，不学工业，我们就会灭亡的。这个问题在转变中要讲一下。

---

[1] 5月27日，毛泽东在枣园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选举问题，决定中央委员会由正式中央委员45名、候补中央委员25名组成。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给冈野进的信[1]

（1945年5月28日）

冈野进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是一篇好文章。通过它，我了解了日本共产党的具体纲领。我认为，关于没收垄断资本（操纵国民生计者）一条，是非常正确的。这一条，英国、法国的共产党都是如此，中国党也一样。如今，日本党也有了。只有美国的共产党人还没有接受这一条。关于这一点，他们没提出什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我颇感怀疑，我想他们是找不到出路的。此点，正待研究。我

---

[1] 冈野进，即野坂参三。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之后，野坂参三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名为“冈野进”。这封信，是毛泽东针对野坂参三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提出的意见。其中，有关日本的天皇制的问题，是人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当时，日本共产党内，德田球一、志贺义雄等领导人都主张“打倒天皇制”，而野坂参三则主张由日本人民投票决定是否废除天皇制。野坂参三在发言稿中提出的观点是“天皇存废的问题，应当在战后尽快由一般人民投票来决定”。毛泽东是了解当时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要求废除天皇制的愿望的，但是，他考虑到战后的日本可能出现实际状况和日本共产党的实力尚不足等情况，认为如果仓促举行公民投票，恐怕大多数人仍会选择继续实行天皇制的。因此，他建议野坂参三把“尽快”二字去掉。从那以后，60年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日本的天皇制，至今也没有废除。

[2] 指野坂参三的文章《建设民主的日本》。

想把你的意见也提供出来。去年出版的白劳德同志[1]的《德黑兰》一书，你看过了吗？希望你看一看。改日我们一起议论一下。

此外，有几个细微之处，列举如下：

第15页第2行的“新兵与老兵比较多”，是“新兵比老兵多”的意思吗？如是，我想还是改正过来的好。

第31页第5行的“上下级指挥官”的“上下级”三个字，我想还是去掉为好。同页第9行“大小政治家”的“大小”两个字，我想改成“反动”为好。同页第10行的“下层法西斯分子”的“下层”两个字，我想还是去掉为好。同页第11行“思想检事等”的后面，我想还是加上“其中的积极分子”等字为好。现在，因为正处于宣传时期，涉及更大范围是不合适的。到了将来的实行时期，根据大众的发动程度，我想到那时采取更灵活的对策是有利的。

第37页第10行的“尽快由一般人民”的“尽快”二字，我想可以删去。这个投票问题，到那时，究竟是早一些有利，还是晚一些有利，应当看情况决定。我推测，让日本人民不要天皇这件事，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

以上，请斟酌。然后，请送给博古[2]发表，并交广播电台播送。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

[1] 当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

[2] 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

（1945年5月31日）

同志们！我的结论讲三个问题：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三个问题。

我们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这条方针里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说的组织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就是说的总司令、指挥官；"打败日本侵略者"，就是说的敌人；"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说的目标。

关于放手发动群众问题，昨天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手是我们自己的，放不放在我们。谁不叫我们放手呢？有许多人，其中就有蒋介石。现在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三十条政纲中有一条是"绝对禁止违背政府法令及在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币制上有任何破坏统一之设施与行动"。比如军事的统一，那就是要我们把军队统统交给他们，不要八路军、新四军。这个斗争早

就有了。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舰事件[1]，就是不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2]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内战时期我们放手了，但又过了一点，没有把放手发动群众同冒险主义相区别。在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就是这条路线，这次大会只是批准这条路线，并对这条路线有所发挥。如果没有过去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大会不可能作出肯定这条路线的决定。放手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条件下，而不是冒险。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放手而不冒险。这一个方针一直到全国胜利都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压力很大，要使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束缚手足的精神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不容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如此。第二国际一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一八四八年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第二国

---

[1]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指广东省会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立刻谣言蜂起。3月20日，蒋介石谎称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暴动，宣布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所谓中山舰事件。

[2] 汪精卫，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主席。初期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其限制工农运动、反对共产党的面目逐渐暴露。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分共”决定，公开宣布同共产党决裂。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1938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

际违背这一方针，崇拜自发论，一切听其自然。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联共党的领导下，先打倒沙皇，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后打倒资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我们要宣传这条方针，肯定这条方针。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和我的报告[1]，都是贯穿着这个精神，坚持这条方针。阶级不消灭，我们的这条方针是不会取消的。由于各个阶段情况不同，政策会有变化，但总方针是不变的。至于如何实行这条方针，这须要根据周围情况及其内部联系来决定。

一　国际形势

我在报告中这样说："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这是历史的总趋向。这一看法到底对不对？世界是不是会倒退？"倒退"这个问题，报告中也讲到了，说应该"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那就要作另外的一种估计，报告中的某些基本点就要修改。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世界上有两种势力在斗争：苏联和各国

---

[1] 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朱德所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和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人民的势力是一方，反动势力是另一方。前一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好，第二种势力要使局势变坏，这样就要经常斗争。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世界。但是，说苏、英、美三国不团结，说英、美两国要联合日本，联合德国的那些俘虏，组织一个反苏反世界人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可能性今天存在不存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为什么说没有呢？因为客观实际上不存在。现在有两个客观实际，我上面说的不是按照反动派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而是按照苏联和世界人民这个客观实际讲的，苏联和世界人民不要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说现在反苏反世界人民的大战的危险是不存在的。英、美资产阶级内部，有一部分反动派要干，一部分不愿干，一部分是想干而不敢干。旧金山会议可能无结果而散，也可能有些成绩而散。苏联在旧金山会议的记者分析得就很好，我们只能就大势而论，有三种可能性：（1）有所成就但不甚圆满；（2）无结果而散，也不破裂（同我们跟蒋介石谈判一样），下次再来；（3）最坏的结果是完全破裂，推翻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现在看来，第三种可能性不大，第一、第二两种可能性大一些。但是，即令第三种情况发生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决定推翻了，这是不是说英、美就要组织反动派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进攻苏联呢？也不能作这样的结论。莫洛托夫[1]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声明说得对，他说即使这次会议不能成功，不能建立防止侵略的国际安全机构，也不等于将来也不能建立，我们要努力争取建立，这次搞不好将来再搞。他的这个话是包括对整个世界情况的估计，和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相信苏联的力量，相信世界人民的力量，相信印度、南美、中国人

---

[1] 莫洛托夫（1890—1986），当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是参加旧金山会议的苏联代表。

民的力量，相信英、美资产阶级内部不统一，不是完全反苏的，有一部分人还是愿意同苏联合作的。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还没有结束，只结束了一半，日本还没有被打败。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即使旧金山会议这次搞不成，也不能说就永久搞不成。在宣布欧洲胜利的那天，斯大林说，欧洲已进入和平时期。斯大林说得对不对呢？很对。在欧洲，战争时期过去了，和平时期到来了。斯大林的判断是根据整个情况说的。苏联是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列宁曾经讲过：俄国布尔什维克“只要在十至二十年内和农民保持正确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发展着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延迟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二十至四十年白匪恐怖的苦难”。[1]这是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同志们，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是不是二十年呀？在莫斯科危急时，斯大林说：或者胜利，或者灭亡。现在是胜利了。苏联的胜利是从在莫斯科打胜仗开始的，不是从斯大林格勒[2]才开始的，没有莫斯科的胜利，也就没有斯大林格勒的胜利。现在苏联红军的旗子已经插在柏林，列宁的话讲灵了。苏联在国际范围内胜利了，现在只是努力巩固这种胜利。苏联的胜利，就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

资本主义有它的历史，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两三百年以前，世界上才有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娃娃叫资产阶级，同时产生了另一个娃娃叫无产阶级。中国和外国的古书上没有资产阶

---

[1]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的几个提纲》。新的译文是：“只要在10~20年内和农民保持正常的关系，就能保证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甚至在日益发展的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推迟爆发的情况下），否则就会遭到20~40年白匪恐怖的苦难。”（《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8页）。

[2] 斯大林格勒，即今伏尔加格勒。

级和无产阶级，更没有共产党，这都是近代的产物。按照列宁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削弱着帝国主义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单独胜利。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讲社会主义将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至少在几个文明国家同时胜利。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列宁根据新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的话又说灵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十月革命，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从这时起，资本主义倒霉了，走下坡路了，社会主义走的是上坡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我也讲资本主义是向下没落，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从十月革命起，资本主义缺了一只脚，剩下的资本主义，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现在这两部分资本主义打架，民主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合作，将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夹，夹掉了一个德国法西斯，再一夹，就要把日本法西斯也要夹掉。资本主义好比一个四只脚的马，十月革命搞掉它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夹掉它一只脚，现在只剩下了两只脚，成了一个跛子，成了不完全的东西。资本主义残废了，它怎样走路呢？就装上木脚来走路。你们说这剩下的资本主义，是比过去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呢？不是更强大，而是更削弱了。

我们的同志要注意，要看大的东西，要看普遍的大量的东西。许多同志往往对于普遍的大量的东西看不见，只看见局部的小量的东西。十月革命，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法西斯资本主义打倒了，法国内部最坏的东西垮台了，许多小皇帝也垮台了，小国家起了变化，都进步了，这又砍掉了资本主义一只脚。这些都是大事情，必须看到这些大事情，才能正确地进行分

析，才能在分析时不会犯错误。

现在英、美各国的通讯社和报纸，专为一些小问题咬住不放，吵闹不休，令人看起来很觉奇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资本主义有一种特性，就是“蚀大本，算小账”。第一次世界大战失掉一只脚，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失掉一只脚，现在却抓着一根头发死也不放。本钱蚀去了，不仅把法西斯打掉了，而且英国本身也打得五劳七伤，这表示资本主义残废了，苏联和欧洲人民强大了，他们不抓小辫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他们的资本很小了，所以只得抓着小辫子不放，放不得，放了就无话可讲了。这是我们的看法，但他们也有他们的用意。世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言论，其作用在于：（1）阻止苏联及欧洲人民力量的发展，在苏联及欧洲人民面前，抓着小辫子讨价还价。（2）调动国际国内的反动势力，给自己撑腰。要找人撑腰，就不得不唱些适合于反动派的调子，才能调动那些反动派，团结那些反动派，作为自己的基础。（3）压制革命人民。丘吉尔[1]发现他处在欧洲人民包围之中，处在英国人民包围之中，所以要唱一点反动调子，压压人民。由此看来，我们便可懂得，旧金山会议争论那么凶是为了什么，将来东方问题还要争论的。这些争论，好比做文章，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他们还有两只脚未砍掉，还可以走路，还不甘心，所以有争论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争论反倒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现在世界上大国的外交政策，只有苏联是主动的，英、美、中都是被动的。波兰问题的小辫子也抓不了几天了。苏联没有挂牵，所以能主动。英、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被动的，英国原来

---

[1] 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是搞“慕尼黑”的，想叫希特勒去打苏联，把苏台德区等送给德国，但是它雇佣的希特勒这个“劳动力”有点闹独立性，先打了老板一顿，打得哇哇乱叫。对日本也是如此。美国和英国原是出钱雇“劳动力”去打苏联的，送铁送汽油给日本，也就是出工钱的意思。日本就在边界向苏联挑衅，从美、英拿工钱，把工钱弄到了手，它不去打苏联，而去打珍珠港了。日本打了珍珠港，美国和英国才对日本宣战，英国并与苏联签订有效期为二十年的《同盟互助条约》，美国与苏联签订在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援助的协定。资本主义的主动性，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还有一点，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便昏庸腐朽，变成帝国主义，即处于被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是被迫打的，没有计划的。对南斯拉夫，他们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现在对波兰也不承认，将来还是要承认的。现在他们不承认中国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将来也会承认。

资本主义是向下的。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下降了，日本的资本主义下降了，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下降了。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它的生产在战争中是它历史上未曾见过的大发展，超过它战前生产的一倍半到两倍。一九二八年繁荣期间，美国的生产总值为六百万万美元，现在，有人说是二千万万，有人说是一千八百万万，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说是一千五百万万到二千万万。如果说过去六百万万是两个指头，那末现在若为二千万万就差不多是七个指头。它的生产有这样大的发展，所以说美国资本主义是向上的。但是，美国现在的繁荣，带有特殊性，是特殊的繁荣，美国的经济危机很快地就要到来了。从经济上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喜马拉雅山，但这个山是要倒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看问题，应该这样来认识。美国的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

这次旧金山会议，即使搞不成，第二次旧金山会议还是会要来的。因为世界情况需要它。关于建立反苏堡垒线，英国保守党是有这种企图的，从前是以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组成的这道墙壁，现在被苏联拆掉了。若它再搞这一套，那就回到张伯伦[1]那里去了，但现在已不是那个时代了。希特勒倒了，苏联强大了，欧洲人民觉悟了，英国人民觉悟了，美国资产阶级中有想与英国反动分子结合反苏的，但大部分人是愿与苏联搞好关系的。英、美都是现实主义的，一手打日本，一手抓一把（做生意）。打败日本后，两只手都要做生意。

总起来讲，第一次大战以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已经没有了，不稳定就经常产生危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的，大概是十年八年来一次，是有规律的有周期性的。这次美国的战时繁荣是带特殊性的，以后也不会有稳定。他们要和平，要建立国际安全机构，要做生意，都是求得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也可能稳定下来，但不是长期稳定，其中包含着危机。

世界上这几个大国谁是领袖？是苏联还是美国？有人说美国是领袖。这种说法不对。从经济上可以这样说，但经济之外还有政治，政治与经济结合起来才是更强大的，那就是苏联。苏联在经济的量上说不如美国，但苏联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它产生了伟大无比

---

[1] 张伯伦（1869—1940），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内阁首相。他推行纵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主张迁就德、意、日法西斯入侵中国、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既成事实”，实行妥协。

的力量，产生了强大的红军和英勇的人民。苏联是全世界人民的领袖，英、美各国的人民，对苏联的信仰都是非常高的。

中国也要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性质？前边说过，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一部分是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动的法西斯资本主义主要的已经打垮了。民主的资本主义比法西斯资本主义进步些，但它仍然是压迫殖民地，压迫本国人民，仍然是帝国主义。它一方面打德国，一方面又压迫人民，打法西斯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它打法西斯的时候，对它的压迫人民要忍一口气。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我们提倡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有它的生命力，还有革命性。从整个世界来说，资本主义是向下的，但一部分资本主义在反法西斯时还有用，另一部分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在中国及欧洲、南美的一些农业国家中还有用，它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的，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的。

二　国内形势

第一，《论联合政府》报告的原稿上有“两三年中将是中国情况大变化的关键”这样一句话，在发表时删去了。删去这句话，不是因为说得不对，而是不说为好。但是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应付大事变。

第二，三个大会。去年九月民主同盟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日前

国民党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正在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个大会如果说有一点相同，那就是都要打日本。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大会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实际上也是法西斯主义的。昨天和今天的《解放日报》上都有文章批评国民党的大会[1]，同志们可以去看。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有一点特殊，蒋介石的话就是国民党的命令，过去这仅仅是事实，这次变成了纪律，中央委员要赌咒发誓服从总裁。世界上除法西斯政党外，资产阶级民主的政党都没有这样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规定国民党员不准加入其他政党。我们共产党不是谁想入就能入，党章规定要经过支部大会表决通过，入党是有条件的，但出党是自由的。上面这两条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国民党现在更虚弱了，更惧怕了，他们的党员中想要加入其他政党的人更多了。但这个赌咒发誓，在现在这个时代往往是不行的。一个党不是靠党员个人的思想自觉，而是靠赌咒发誓，它的事情就大不妙了，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国民党大会的性质与我在《论联合政府》报告里所说的一样，没有多大变化，还是法西斯主义。民主同盟是旧民主主义，我们是新民主主义，这是基本的区分。民主同盟可以跟我们联合。国民党里也有旧民主主义者，这些人虽然赌了咒，还是可以和我们联合的。

有的同志问，我们这个《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表后，对于国民党的大会以及在外面起了何种影响？最近我们才收到报告，是起了影响的。《论联合政府》小册子在重庆发了三万份，每一个《新华日报》的读者都能看到，有些平时不看《新华日报》的人这回也看了，有人一晚上没有睡觉看完了这个小册子。蒋介石是很不喜欢

---

[1] 1945年5月30日、31日《解放日报》分别发表新华社评论《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该报社论《评国民党大会各文件》。

的，他说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之耻辱，大概他们那个大会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国民党的最大耻辱。蒋介石侍从室的秘书陈布雷看了这本书说，只有两个字，就是“内战”。他们要打内战，要消灭我们。但是在他们的很多代表中这个小册子是发生了影响的，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别看国民党有几百条，但没有办法。他们大会的宣言是事先就起草好了的，我们这个报告一发表就把他们那个大会给打乱了，原来准备开十天会，五月十五日就结束，后来拖到二十一日才闭幕。他们想驳我们又不好驳，想重新起草宣言又不大好写，现在发表的那个宣言不晓得是哪位先生重新写成的。我们这次大会在他们大会之前开幕是好的。他们有些东西是受了我们的影响的，比如，关于少数民族问题，他们现在也不得不讲民族问题了，我们来了一个减租减息，他们就搞了不止一个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政策纲领。

第三，有人提出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我看这个提法很对。在抗战以前近一百年中间，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以后，国民党削弱了，就不得不依赖美国，这样中国就可能变成以美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主统治的半殖民地。以美国为主控制国民党，英国可能插进一只小脚。这一变化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我们共产党要好好准备，以应付这个变化。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这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进攻中国以来十六年中的大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是有利的。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来了一个“特殊繁荣”的美国，它现在控制着国民党，所以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争取美国的无产阶级援助我们。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中国可能变成美国的半殖民地，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第四，有一个问题要讲清楚，叫做“准备吃亏”。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些困难，又有些同志希望我讲一点光明。我看光明多得很，国内民主运动已经兴起，将来更有希望，苏联援助我们，美国、英国的无产阶级将来也还是要帮助我们的，这些都是光明。但是我们更要准备困难，我下面讲的困难有十七条：

第一条，外国大骂。现在英、美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在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他们有人曾经向我们示过威，说：你们那样不行，美国舆论要责备你们。我说：你们吃面包，我们吃小米，你们吃面包有劲，嘴长在你们身上，我们管不了。这叫做没有办法，要准备着挨外国人的骂。

第二条，国内大骂。是大骂，不是小骂，他们将动员一切人来大骂，什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等等。只要是世界上数得出的骂人的话，我们都要准备着挨。

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不是说几小块，也不是说统统占光，而是被他们占去几大块，他们要打内战“收复失地”。在十年内战时期，他们就曾经占去我们几大块，这次我们还要准备被他们再占去几大块。

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一九四一年中央曾打电报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说我们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可能性有两种，我们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军队，准备被搞掉二十五万，还有二十五万。这二十五万是什么？原来五十万是伸开的手掌，这二十五万是握紧的拳头，虽然缩小了，可是精壮了。现在我们的军队差不多有一百万，我们还要发展，到将来蒋介石进攻我们时，我们可能有一百五十万，被他搞掉三分之一，还有一百万，搞掉一半，还有七十五万。如果我们不

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

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伪军摇身一变，挂起蒋介石的旗子，欢迎蒋介石，欢迎阎锡山[1]，使我们很不好办。日本人撤出的地方，他们马上就占了，我们来不及。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第六条，爆发内战。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制止内战。现在的揭露就是一种方法，我们要经常揭露，在大会文件上、在报纸上、在口头上揭露。此外，还要用别的办法来制止内战。内战越推迟越好，越对我们有利。抗战八年以来，我们的政策就是使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我们的政策还要这样继续下去，使他不敢轻意地发动内战，但是我们要准备他发动内战。

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这种情况我们要用各种方法来避免，如果发生了，就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2]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

---

[1]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城濮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国大战于此。战争开始，楚军占优势。晋文公令晋军退却90里，到达城濮一带，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严重打击，再集中优势兵力，击溃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退。

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1]，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无论斯科比来了也好，蒋介石来了也好，我们都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不打第一枪这个原则我们要谨记，从一个时期来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很有利的。当然到了该打的时候，就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有人讲两面作战怎么得了？他们要搞两面作战，我们有什么办法，我只好准备这一着。我们现在好像坐牢一样，前门是日本人守着，后门是蒋介石守着。

第八条，“不承认波兰”。这里是比喻我们得不到承认。现在我们是一个中指头，你不承认，将来是一个大指头，你也不承认，到了是一个拳头、两个拳头的时候，看你承认不承认？你九十年不承认，一百年不承认，将来到一百零一年，你就一定得承认。因为我们的政策正确，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将来如果形势不好，蒋介石、斯科比两面夹攻，到处打枪，有些党员就向后转开步走，跑掉了，散掉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散得最厉害的是一九二七年，还有散得多的是内战时期，有组织的党员只剩下三几万。在不好的情况下，党员中有一部分悲观失望的人就跑了，有一部分被压散了，也无非就是这样，我们准备散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些。

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中国革命是长期的，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从一九二一年到现在二十四年了还没有胜利，还要搞下去，还要牺牲许多党员和军队。党内会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的问题，不仅要对我们大会、中央、中央局，还要对区党委、地委这些领导机关都讲清楚。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天灾是天不下雨，玉皇大帝不帮忙。最近得到报告，华北、华中很多地方都天旱。古人说过："艰难困苦，玉汝于成"。[1]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今年我们边区没有收成，这是一件大事。所以，我们要讲节省，从中央起都要讲节省，准备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华北、华中许多地方都要准备这一条。

第十二条，经济困难。有天灾经济是困难的，没有天灾经济也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大力学做经济工作。我们曾经提出这样的口号——在两三年内学会做经济工作，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克服困难。

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有的同志问：日军退出华南、华中，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怎么办呢？现在日本法西斯作战是寸土必争，看样子是不会撤的。但我们要把事情往坏一点想，即使长

---

[1] 语义出自宋代张载《西铭》："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

江流域的日军统统撤到华北，难道我们就呜呼哀哉了吗？中国抗战的局面是明年日本就要被打倒了，它横行不了多久了。敌人集中华北，提出和平妥协的条件，跟英、美讲和，假如这件事出现了怎么办？我们准备想各种办法对付之，这些办法大家想，中央也想。

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有准备，以防万一。

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不要以为不会发生意见分歧，上述困难一来，许多情况出现，就可能产生党内意见的分歧，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不满意等等。如果我们准备了，分歧就可能少一些，没有准备，分歧就可能多一些。

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中国革命是长期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国际无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帮助我们，他们还料不到我们的困难来得这样早，就是料得到也没有办法，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要做国际联络工作，做外交工作，很希望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但由于各种情况的原因而没有援助，我们怎样办？还是按照过去那样，全党团结起来，独立自主，克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

困难我讲了十七条，下面讲我们一定要胜利。

第一，暂时吃亏，最终胜利。这个原则是不会错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吃亏都是暂时的，终久我们是要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坚信这一条。

第二，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此处吃亏，彼处胜利，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们总有道路。

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天要下雨，他硬要跑那有什么办法？就让他跑掉吧。党员中间的动摇分子，他们在革命热闹的时候来凑热闹，在困难的时候就跑了，要跑就跑，我们开欢送会。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难的人又来了，我们党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说一定有许多的人会来的。

第四，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

第五，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我们要感谢何应钦[1]，他不给八路军、新四军发饷，他这样一困，我们就提出了是解散，是饿死，还是自己动手搞生产的问题。解散不甘心，饿死不愿意，那剩下一条，就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克服困难。

第六，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共产党会捉蝗虫，这些经验很好。

第七，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来一次大纠纷，就是一次大锻炼。毛铁炼成钢，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敲打的。

第八，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没有援助有一个好处，援助太多了也有一个坏处。在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个国际主义的原则下，要学会自力更生，准备没有援助。现在对中国共产党

---

[1]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

就是一个大考验，考验我们究竟成熟了没有，有本事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不是只有外国援助我们，我们也援助外国。二十四年来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我们这个队伍的斗争就援助了外国无产阶级，也援助了苏联，国际无产阶级也一定会援助我们的。

三　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

上面讲了国际国内形势，现在讲第三个问题，关于党内思想政策问题，这里面又包括若干个问题。

（一）领导问题

《解放日报》昨天发表了一篇苏联人华西里也夫写的文章，叫做《论科学的预见》。这篇文章我们很久以前就翻译过来了，这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几个月写的，所以文内没有讲到关于这次大战的情况，但是可以从中看到对于这次大战也有预见。

什么叫做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斯大林说：没有预见就不叫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1]整个人类在马克思主

---

[1] 参见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原文是：“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布尔什维主义不是这样理解领导的。要领导就应当有预见。而预见，同志们，不是什么时候都容易做到的。”（《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页）

义产生以前对于社会的发展历来没有预见，或者没有很清楚的预见。例如原始社会变成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发生革命变成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又发生革命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革命往往是自发的。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多好的预见，但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是盲目的。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比如，我们中国有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中间阶级，我们能看清它们的前途。这三个阶级都在活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快要胜利的时候，都在那里准备日本打垮以后干什么。去年九月召开的民主同盟代表会议，日前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正在召开的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准备的体现。我们的文章，我们的大会文件，根据我们的预见，指出了中国人民将要走什么道路，并规定了我们的政策。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这是斯大林讲的。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人们通常看得见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但是有些大东西，也看不见。比如，大城市是一个大东西吧，国民党加帝国主义是大东西吧，可是我们就是看不见，总叫国民党是“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也是一个大东西吧，但是我们也曾看错过，以为这个东西很容易打，很容易就可以把它赶走，于是产生轻敌观念、速胜论。陈独秀那个时期，农民要土地，这是一个大东西吧，土地问题是一个大

量的普遍存在的东西吧，但是那时候也看不见。凡是政策上犯错误的，一定是大东西看不见。小东西看不见，也会犯错误，但那只是一点一件的错误，牵涉的面不大，这种错误十个、八个也不是很关紧要的。当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也不好，但毕竟不算大错误。凡是大的错误，就是对大量的普遍的东西看不到。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我们这次大会提出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就属于这种预见。现在还有很多同志对于这些问题感觉不到，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在农村，还是在关内。大城市是一个大量的普遍的东西，东北四千万人口也是一个大东西，但是在今天来讲，还不是一个眼前的现实问题，还不容易注意到。现在我们大会就已经指出这是明天的事，是一个大量的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如果我们对于工业问题，对于大城市问题，对于经济问题，对于军队正规化问题，不能解决，那共产党就要灭亡。二十四年来，我们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再有二十四年还不解决，那就一定要灭亡。工业在人家手里，大城市在人家手里，机械化在人家手里，正规军在人家手里，我们都没有，过了四十八年还没有，那还不灭亡吗？我们要依靠老百姓，但总是吃小米，靠小米加步枪是不行的。不能设想，我们党永远没有大城市，没有工业，不掌握经济，没有正规军队，还能存在下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

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无产阶级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无产阶级成为自觉的阶级只不过几十年。一八四三年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到一九〇三年整整六十年，地球上的俄国才产生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叫做社会民主工党，社会民主工党内出了一个派别，叫做布尔什维克派，然后全人类才找到新的方向。六十年前人类就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但是没有普及，没有去实现，六十年以后，才产生了这样一个派别，后来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行动中去实现马克思主义。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一九〇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一九二一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

方向。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

我们要提倡想问题。早几年前《新中华报》要我写几个字，我当时是有感而发，就写了两个字“多想”[1]。“多想”，就是说要开动脑筋。我们的同志过去不大想问题，这要怪过去的领导不提倡想问题。脑筋是“心之官”，是思想器官，这个器官专门做一项工作，就是“想”。孟子说“心之官则思”[2]，两千年以前他就规定了脑筋的任务。我们全党要提倡想问题。这次大会闭幕后，同志们回到各个地方去，要告诉每个同志，我们的脑筋要多想，想党内的各种问题，想阶级的问题，想国家的问题，想我们民族的问题，等等。遇到问题就分析一番，错了也不要紧，有错误就纠正。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我们要提倡想各种问题，多思多想，开动机器，开动脑筋，还要放下包袱，精神解放，轻装前进。我们的同志们还要善于分析问题。我们党内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固定的框子，无论做文章、讲话，都用这个框子去套。这个框子就是所谓党八股。我们要打破这个框子。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人分析不了，就大家来交换意见，要造成交换意见的空气和作风。我这个人凡事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问同志们，问老百姓。打仗也是这样。我们要善于跟同志们交谈。比如，《逼上梁山》就是一个集体创作，《三打祝家庄》也是一个集体创作，《白毛女》也是一个集体

---

[1] 参见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

[2] 参见《孟子·告子上》。

创作，让自己的功劳同大家共有，这有什么不好呢？《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合作写的。我们搞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搞了一个政治报告，如果不是大家都来，一个人怎么能够搞得完全呢？首先要承认这一点，就是一个人搞不完全，要依靠大家来搞，这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要用这样的方法来启发同志的思想，去掉盲目性。

（二）民主集中制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好，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我跟他交谈过，这是我们共同的意见，别的同志也赞成。我想可以叫做高度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放手”这两个字，还可以再斟酌一下，这是个程度的问题。我们党历来就讲民主，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不够民主。我们党历来也是讲集中的，但是有些时候、有些地方集中得不恰当或者集中不够。民主要有很高程度的民主，集中也要很高程度的集中，这两个东西有没有矛盾呢？有矛盾的，是可以统一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两个带着矛盾性的东西的统一。

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

同志们！我们党是最公平的，最讲道理的，大多数的人是公平的，大多数的人也知道要集中，他们也要求集中。我们党内的同志是有这个觉悟的，他们不会不懂得集中，也不会妨碍集中。当然，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思想也是有的，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要批评它，指出这些思想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同志懂得高度集中的必要了。我们不怕人家批评，我们是批不倒的，就是犯过路线错误的也不怕批评，也是批不倒的，只要有改正错误这一条就行。愈是不怕人家批评，愈是敢让人家讲话，给人家讲话的机会，人家的批评可能会愈少。我们要学会听闲话，我们长两个耳朵就要听闲话。我们的党员有意见要在组织里面讲，不许在组织外面讲，这是一个原则。但是还有在组织以外讲的，那是闲话，这也是事实。我不是提倡小广播，不是要大家在七大以后去大搞小广播，我是说小广播是存在的，哪一年也有一点，我们要去听，去收集材料。这些材料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误的，一种是正确的。正确的收集起来，错误的也收集起来，都把它当作原料。我们现在是开工厂，七大就是开政治工厂，我们中央也是开政治工厂，这个工厂没有原料怎么行呢？原料贫乏制出的东西就不像样子，所以我们要收集原料。打开窗户就使原料有来源，我们还要登广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登广告就是为了要收集原料，为了使我们的政治工厂的原料多一些，其中包括小广播这种原料在内。如果我们扩大民主，把小广播合法化，把“黑市”变成合法的，原料就会多起来。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没有集中，就不能胜利，就要

失败，就要被消灭，所以没有集中不行。但是我们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三）干部关系问题

这个问题的性质，现在是一个农民问题，将来是一个全国人民的问题。从内战时期开始到今天，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农民问题。我在前面已经引用过列宁在一九二一年讲的关于布尔什维克党应同农民保持正确关系的一段话，这段话很重要。我看也可以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在十年至二十年之内，同农民有正确关系，那就可以保证中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忍受二十年至四十年的白色恐怖。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如果同农民关系搞不好，那就会灭亡。

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一个同农民的关系问题，现在如此，将来还要加上一个同城市人民的关系问题。我们三番五次地讲这个问题，远的不说，就讲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提出的宗派主义倾向，就包括了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这些问题在内。这两个问题是带历史性质、普遍性质的问题，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不是暂时的、个别的问题。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明白这个问题是从农业地区革命斗争中提出来的，因为我们长期活动在农业地区，因此是农业地区的长期的、普遍的问题，或者是历史的、普遍的问题。为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呢？同志们想一想，内战时期苏区为什么垮台，路线问题当然是一个原因，但与这个问题也有关系的，就是对于当地人民总是不信任，外来人非常相信自己，因此使苏区垮台

了。白区工作也是这样，“钦差大臣”一到哪个区域，那里的工作就跟着垮台。这个痛苦大不大？白区工作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差不多全部光了；红军和苏区光了一大块，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剩下的太少了，但是质量更好，质量提高了。

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内战时期是有一个路线问题，那末在抗战时期总没有一个路线问题了吧，可是这个问题还是发生。华中、华北我没有去过，在边区我就亲自见过，我也亲手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好。这个问题得出的教训深刻得很，因此值得提出来讲一下。一九三六年从窗户吹了一点风进来，有同志说：边区的人民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检查一下，原来我们搞错了，先是对待红二十六军，后头是对待红二十七军。中央派到各县的人自称英雄，说什么我是二万五千里，你是什么？你是土包子，吃不开，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这就引起本地人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我也讲一个例子。去年春节，杨家岭的秧歌队到安塞演出，正赶上安塞的劳动英雄开会，我们杨家岭的娃娃同志、青年同志和劳动英雄一起扭秧歌，这说明关系好了，我说从此天下太平了。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同志们！躲飞机这是要命的事，还分得这样清，不走一条路，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军队里面也是一样，总是说地方对不起军队，提起这些事来，他们可以说出几十条。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服，但是很难说服，这个问题要怪我们自己，因为没有系统地分析和系统地解决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

确的也不是科学的。一九四二年冬的高干会议[1]我们系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说服了同志们。高干会议以前，我们没有系统地说清楚这个问题，没有说服同志们，这个责任在我们。经济问题也是一样，也是一九四二年高干会议才系统地说明了。

现在高干会议已开过两年多了，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军民关系是不是彻底好了呢？我看还没有。在座的有许多是边区的军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我想大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做这样的结论是有害的。说有很大的进步，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还有很多地方不好，至少还需要一年到两年的努力才能解决。华北、华中、华南的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与地方的党和政府的关系，与地方干部的关系，也至少需要两三年的努力，并且要抓得很紧，才能解决。稍一抓得不紧就容易动摇，因为我们军队的同志两只耳朵经常听到的是地方对不起军队、老百姓对不起军队这些话。对这个问题，也要有系统的分析和系统的解决。在军队里头，有军事工作人员，有政治工作人员，有老干部，有新干部，有外来的，有本地的，都有一个同地方、同老百姓的关系问题。所以，军队的负责同志要下决心，首先是军分区的和军区的负责同志、团长以上各级负责同志要下决心，要看清楚这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将来要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能否胜利，就看我们能否团结中国的三万万六千万农民，实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容易经常动摇的，决心是不容易下的，所以我们就要坚持这个原则，经常说服我们的同志，一次说服不了，二次再说，要经常讲。要告诉大家应当怎样去做，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现在有许多事的确是地方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也有不对的，如果不讲这一条，军队也不服气。但是，问题解决首先从哪里做起？首先应该从军队做起。军队又从哪里做起？首先从军区、军分区的主要负责人做起。要有坚定的原则，要多听地方同志的意见，因为地方同志的话你们很难听得到，他们也难得有机会讲。我就有这个经验，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什么陕北人只能创造苏区不能当红军，为什么陕北红军不编一个师？说什么张国焘学问好，毛泽东学问不好。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了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为什么说张国焘的学问比我好呢？就是因为批判张国焘路线把人家整苦了，抗大派去的十八岁娃娃当指导员，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拿老百姓一个鸡蛋也是张国焘路线。三八五旅的旅部打电报给留守兵团司令部反映这些情况。我说再也不要整人家的张国焘路线了。那个张国焘路线好不好呢？我说当然不好。但三八五旅的同志他们从另一方面想，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毛泽东就整了他们的张国焘路线，所以张国焘的学问就好，毛泽东的学问就不好。我是不是也承认了这一条呢？我承认了这一条，必须要承认这一条。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是有原因的，说我的学问比张国焘差也是有原因的，要分析这些原因，要解决问题。

我们军队的同志，老干部是主要的骨干，这里强调“主要的”三个字。在将来，再过二三年，抗战初期入党的干部，有些就要参加到骨干中来了。现在有许多力量是抗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抗战以后的干部领导的，这是好事，但是主要的骨干还是老干部。现在北伐时期的干部不到一千人，内战时期的干部不到两万人，时间越长老干部就越少，新干部就越多，这是自然规律，后面的要接上来。军队是关系中国革命存亡的问题，我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已经讲到了这一点，“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老干部即抗战以前的干部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六中全会时我就讲过，老干部是党的光荣，也是全民族的光荣。这个估价是很高的，这个估价是反映了人民的意见，也是全党的估价。老布尔什维克是领导的骨干，严格地说，我讲是重要的领导骨干。

所谓军队与地方的关系，就是我们的军队与农民的关系。忽略了这一点是不行的，就要犯错误，我们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个原则，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军队每到一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对我们如何，地方党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对他们都要采取帮助的态度，他们有缺点错误我们要采取原谅的态度。对于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每一个军分区、每一个军区应该采取更严肃的态度。对自己要严格一些，这样才是对的，应该如此，也必须如此，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现在我们的很多部门、很多机关，距离我们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们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是不是人民的军队呢？是，而且早已经是人民的军队了，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是，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还需要加倍努力。

我们的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的关系，首先是我们军队的负责同志应该说明这个问题。没有系统的说明，下面的干部战士就不信

服，他觉得你说的总是老一套。所以，我今天要讲清楚这一条。少奇同志、总司令[1]已经讲了，要学会善于当骨干，就是说要善于当先生，要学会教授方法，这个教授方法要经常讲。要经常存一个心，就是总怕对不起地方，如果我们出了错误，就允许地方同志批评我们，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2]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陈云[3]同志讲，进了城市不要打烂机器，这就有一个学习问题，不学会还是要打烂的。抓到机器、抓到工业以后怎么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没有学会的东西还多得很。

在干部问题上我还要简单补充几句，就是所有干部一样的光荣。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团，各个军队，都一样的光荣。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区工作的同志，都一样的光

---

[1] 指朱德。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委员、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荣。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党务工作、文化工作，从事这五大门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的光荣。不能说某些部分特别光荣，另外一部分就不光荣。过去我们有盲目性，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在这个问题上，一个长期的严重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要承认各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光荣，对于各个部分都要加以照顾，不要有一点态度不好，欺负任何一个部分，看轻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方面，凡是过去搞得不对的都要承认错误。今天，当着大会代表们的面我再讲这样几句，就是凡是我们做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不论是我亲自做的还是别的同志做的，都应该承认错误，并且加以改正。军队的同志，地方的同志，凡是过去我们没有搞好的，估价不适当的，让你们怄了气的，我们都应该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还有技术干部，上一次我讲的时候漏掉了，今天补充一下。有各种技术工作干部，例如做通讯方面和经济方面带有技术性工作的干部，对做各种技术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军队里面的、政府里面的、党组织里面的，我们都要尊重他们，承认他们有功劳，全党同志要看得起他们，过去在政治待遇上搞得不好，今后要搞好。

（四）整风、审干、锄奸问题

这次整风、审干、锄奸工作是有成绩的。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我是党校校长，整风在党校老一部得到的成绩相当大，但也有缺点与错误；第二部搞得比较好，进步了。以后整风要照第二部的方法，照这种进步的方法去办。

审干中搞错了许多人，这很不好，使得有些同志心里很难过，我们也很难过。所谓“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是与天下人

共欢乐的。对搞错的同志，应该向他们赔不是，首先我在这个大会上向他们赔不是。在哪个地方搞错了，就在哪个地方赔不是。为什么搞错了呢？应该是少而精，因为特务本来是少少的，方法应该是精精的而不是粗粗的，但我们搞的却是多而粗，错误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进入甄别阶段以后又觉得很少。还有，被认为是特务的多数不是特务。对这个问题，过去不大了解，审干以后才知道的。所以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

多年来，我们就搞过这项工作，比如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1]，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上，规定有一条叫“废止肉刑”。从理论上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就主张废止肉刑，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就更应该废止肉刑，封建主义才采取肉刑。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作了这个决议，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们讲不要搞肉刑，结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后来我们作了总结，重申废止肉刑，不要轻信口供。因为不废止肉刑，轻信口供，就要出乱子，一打一逼就供，一供就信，一信就搞坏了。

内战时期，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当然我们不应从根本上否定反对反革命，反对反革命是应该的。但是，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

---

[1] AB团是1926年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月起，赣西南根据地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时期，出了湖西肃反的错误[1]，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犯了错误，也有好的方面，我现在就讲好的这个方面。在肃反问题上前前后后都犯过错误，打仗也打过许多败仗，这样的政策、那样的政策，也碰过许多钉子。凡是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这个犯错误的经验，抓到我们手里来，同样也非同小可。中央在这里，党校在这里，七大在这里开，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华民族就胜利了。所以犯了错误不可怕，要把错误抓到手里，变作经验，当作武器。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现在还有没有宗派主义呢？我听见有一个同志说：没有宗派主义了。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看？我认为，主观上不要忙于否认有宗派主义，有没有宗派主义，要以客观事实来证明，要在将来工作中来证明，主观上否认，效果很小，不能解决问题。有人要求在党章上加一条：“保障党员的政治生命。”同志们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它反映了在审查干部中有的同志受冤屈。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这一条当作教训，当作武器，这样就有用处。

在审干中间，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九条方针[2]并不是一

---

[1] 湖西地区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3省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1939年8月至11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这是一起重大历史冤案，1940年至1945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处理。1983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2] 九条方针，参见《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

开始就发明出来的，而是经过几个月情况的反映，逐渐积累才搞出来的。废止肉刑，不轻信口供，再加上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乱子就出不来了。但是这九条方针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以致有很多人不知道。

在目前，同志们还要警戒自由主义的危险，严肃性是必要的。在这次审干中有很大的成绩，不说清楚这一条，是不好的。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上说：被推翻了的阶级，一定要报复，搞复辟。这件事，将来会要证明的。过去我们没有经过那种危险，如果注意这一条，提高警惕性，警戒自由主义，危险就可能减少。不然，将来要吃大亏的。我们党内有两种情绪，一种是过火的情绪，潮流一来，就是急急忙忙地搞，搞逼、供、信，结果搞错了；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熟视无睹，这种情绪也是不对的，要克服的。

（五）准备转变问题

由农村转变到城市，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减租减息转变到耕者有其田，这些都是民主革命阶段中因形势变化而产生的。对各方面的转变，我们要作准备，某些方面也已经有了准备，有些同志让我解释一下将来如何转变，我想现在不用多讲，就是按实际情况去学习，去准备。比如，我们可能要集中二十到三十个旅，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去打大城市，这也要有准备，具体的步骤交给中央军委去办。各位同志回去后要告诉各个地方，就是要开始准备，这个问题朱总司令已经讲了很多。到城市去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七大现在只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在精神上作准备。现在可以做的具体的工作，就是派人去或者调人来训练，或者再多派一点人去

训练地下军。把日本赶走以后，我们如果占领了城市，首先要搞吃饭、穿衣的问题。在座的将军们，如果你们搞到北京，没有煤炭烧，搞到上海，没有饭吃，火车不能开，电车不能开，怎么行呢？因此，现在我们要有这种精神准备。

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工人运动的重要性，七大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做过工人运动的同志，我们要很好地注意他们，培养他们。有了大城市，整个情况就会起大的变化，今天还没有这个变化，我们还觉不出来。这个变化是很大的，因此要加以注意。

再就是东北的问题。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坚固的基础。现在有没有基础呢？有基础，但是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

（六）关于政治路线

我们大会给了我们一个检查全国工作的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我们就可以检查全国的各种工作。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几句：在八年抗战中，就

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某些地方、某些时间、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过错误的。我这里不讲错误的大、中、小，也不讲或者是路线的，或者是严重的原则的，或者是个别问题上的，所有这些错误都在内。第一、第二这两方面合起来就完全了，忽略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对的。

（七）关于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也可以照上面的方法来讲，就是就八年时间与全国范围来说，路线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时间、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同志来说，是有错误的。这个“某些”究竟是指哪些，今天说不清楚，还要大家研究。

（八）　我们党能不能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这个问题我想要看情况来决定，或者能领导，或者不能领导，有时候能领导，有时候不能领导。比如对德国的大资产阶级和希特勒就不能领导，又如对汪精卫就不能领导，他们要打倒我们，你还能去领导他们?对蒋介石来说也要按情况来决定，他在抗战初期有过进步，如果说是因为我们将了他的军，那也是对的。这是叫领导还是叫影响呢?我说这是叫影响，我们对于他有了影响。但是后来他就闹别扭，开了一个五中全会，要消灭我们，这就不能说是我们去领导他。所以，要看情况来决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

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共同领导”这个提法怎么样？我说不在于如何说，而在于如何做。比如现在的旧金山会议，哪个会出来说我领导你们，谁也不会讲这句话，还不是说五大国共同领导。克里米亚会议也是三大国共同领导。所以不在话怎样说，而是要看怎样做，领导者怎样领导。从前同孙中山合作时，我们说在孙中山领导之下，其实是共同领导。抗战初期，我们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抗战到底，这个话错了没有呢？我说没有错。因为要打日本，就要有个头子，中国当时的头子就是蒋介石，他有那么多军队，外国也承认他。但是他后来要反共，这句话我们就少讲了，以至于不讲了，改为要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把他那个政府改组一下。如果说共同领导，那就是你领导你那一堆子，领导中央军；我们就领导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广大人民，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但是，过去所谓的“共同领导”，实际上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问题就在这里。

（九）国共两党谈判还有没有希望？

我们从来是主张要谈的，七大的文件上也规定了要谈，至于谈

拢的希望是一丝一毫也没有。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我们说现在可能性总还有一点，这一点我们也不放弃，就是在没有破裂以前还要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蒋介石洗脸、改造，如果有一天他变成大花脸，发动内战，那时我们党就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现在我们还是极力阻止内战，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拒绝跟他谈判，情况就是这样。

成立联合政府有没有希望？我们要尽量争取。将来如果能成立解放区人民联合会，还是要打电报请他组织联合政府。我们总是请，但他总是不出来，就像新媳妇一样不肯上轿。那怎么办呢？你不出来我们就请，你还不出来我们就再请，在没有全面破裂以前我们还是要请，明天早晨破裂，今天晚上我们也还要请。

（十）关于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

我们的文件上说，要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一开，就要搞一个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或者叫解放区人民联合会。中国要解放，所以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一个政权机关呢？我们已经打了电报告诉各地，这不是第二个中央政府，和内战时期我们成立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不同，和那时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情形也不同。它的名称不叫政府，叫解放联合会。它是不是有政权机关的性质？我们说他有发号施令的职权，是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是为了联合各解放区而奋斗的过渡时期的组织形式。什么时候召集呢？大概在十一月份。

这里还要讲一个党外合作的问题。全党要注意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并且要加强这个合作，使我们能联合更多的人，联合得更好。

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

（十一）党性与个性问题

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的问题，集体与个人关系的问题。在我们党内，在我们解放区，人民有了比较充分的自由，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是没有人格、没有自由、没有独立性、没有个性的。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1]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财产所有权，他们使大批的人破产，使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他们自己就有独立性、个性、自由，而广大人民丧失了财产所有权，也就没有个性、独立性、自由，或者是削弱了。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比如我们组织工会，在资本家的工厂里把工人组织起来，在解放区搞减租减息，建立人民的武装和政权，这就使人民有了个性、自由和人格。至于我们党，它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然不会使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出身的党员没有人格。人民有人格，我们党也就有，人民都没有，我们党哪里会有呢？我们要向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懂得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格，没有自由，

---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6页）。

要为他们的自由而奋斗。在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社会上的人都有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而且在我们党的教育下，更发展了他们的人格、独立性和自由。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很清楚，他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这里我记起了龚自珍[1]写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其实人有各种各样的，只要他服从党纲、党章、党的决议，在这个大原则下，大家发挥能力就行了。讲清楚这一点，对于党的进步，对于全体党员积极性的发挥是会有好处的。

有两种个性，即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对我们党来说是如此，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创造性的个性是什么呢？比如模范工作者、特等射击手、发明家、能独立工作的干部，不但党外斗争有勇气，党内斗争也有勇气，盲目性少，不随声附和，搞清楚情况再举手，这就是创造性的个性，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完全统一的。另一种个性，是带破坏性的、个人主义的，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搞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立异也有两种：一种是革命的标新立异，比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发明家，他们提出很多好的意见，比许多人工作更进步，这一种是创造性的革命性的标新立

---

[1]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和诗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两句诗，参见龚自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异。另一种是破坏性的标新立异，它越出了无产阶级轨道，同党性不一致，是小资产阶级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我们要使许多自觉的个性集中起来，对一定的问题、一定的事情采取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有统一的意志，这是我们的党性所要求的。有些人所谓的发展个性就是说，我们拥护新民主主义，就必须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新民主主义，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主张打日本，就一定要有另外一批人反对打日本，才算是发展个性；我们反对汪精卫，就一定要有一批人拥护汪精卫，才算是发展个性。这种发展个性，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整风中有党性，也有个性；生产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军事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政府工作中有党性，也有个性；任何一项凡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和事情中都有党性，也有个性。这种个性必须是与党性统一的。

（十二）理论工作问题

对外国党和共产国际的经验，我们都要吸收，这个问题上次已经讲过。加强理论学习至少要读五本书，我向大家推荐这五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1]《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里马、恩、列、斯的都有了。如果有五千

---

[1] 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个方法可以在各个地方介绍一下，我们不搞多了，只搞五本试试。我们还应经常注意报纸上刊登的外国党的宣言、纲领一类文章，看他们做些什么事情。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许多人不重视理论工作，似乎这个工作不要紧。对理论工作看法的动摇是不对的。我们对搞翻译工作的、写理论文章的人要看得起，应多和他们谈谈。没有搞翻译工作的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他们翻译外国的书，很有功劳，即使一生一世只翻译了一本书，也是有功劳的。别人不重视这个工作的思想，是不好的；做这个工作的同志自己对这个工作的认识也有动摇，这同样是不好的。有的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改行，说做这个工作吃不开，要求做别的工作。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

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鲁迅全集》开卷第一页，有蔡元培[1]写的一篇序，其中有几句写得不错。他说鲁迅是一个既博览又很谦虚的人，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家的作品，翻译的作品占了他的全集的一半。所以，轻视这个工作和对这个工作的动摇都是不对的。

（十三）实事求是问题

第一，我们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力量只能一点一点地聚集，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二十四年的经验证明：想一手抓一个天下是抓不到的，土地是一寸一寸地争来的，叫作“寸土必争”。我们的敌手，日本人和蒋介石，对我们也是寸土必争。我们的枪是一支一支地增加，地方是一小点一小点地扩大，然后合起来就壮大了，就可以夺取天下。我们应当是现实主义的，当然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斯大林告诉我们，要学习美国人的实际精神，还要有俄国人的革命气概，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们要以科学的精神、革命的现实主义，切切实实、一点一滴、一个一个地夺取敌人的阵地，这样才是比较巩固的。

第二，我们这次大会强调团结精神，就是要在一个原则下团结起来，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是头脑清醒的团结，不是盲目的团结。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2]，就是要大家学习

---

[1]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中国民主革命家、教育家。1916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曾为复社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作《鲁迅先生全集序》。

[2] 参见《列子·汤问》。

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中国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2日）

美国现在定的方针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全面称霸东方，决不会退。对美国的态度是，只要它是打日本，我们就愿意同它合，要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订一个军事条约。美国只帮助蒋介石反共，这种政策是很危险的。

选举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自己选不选自己有自由，只在自己选自己对党不利时才不选，否则就应自己画自己的。所有同志把自己想讲的话彻底讲清楚好。历史证明，凡原则性的问题，敷衍下去，总有一天还会出来。彻底弄清楚，才有利于团结。

---

[1] 6月2日，毛泽东在枣园主持召开的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主任会议。会议听取叶剑英介绍关于美国在八路军、新军敌后战场进行军事布置的计划。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准备南下支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7日）

这次有两个旅，还有很多干部，要到前方去，这是关乎中华解放的问题。

我今天代表全党向你们赠送的礼物就是“由小到大，一定胜利”。你们这次出去，能不能胜利，决定于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的好坏和政策的正确与否。你们要同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有了正确的政策就到处无敌。

---

[1] 这是毛泽东在准备南下的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警备第一旅营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8日，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警备第一旅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南下。

复罗荣桓电[1]

（1945年6月9日）

来电[2]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

[1] 这是毛泽东复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2] 罗荣桓5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自己的病未痊愈，准备来延安治疗，山东分局的工作请中央决定，或暂时指定一代理书记。

致邓小平电[1]

（1945年6月10日）

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

[1] 这是毛泽东致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

（1945年6月10日）

一、今天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同志们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三十四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末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在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之后，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团说，希望注意选举，要选能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到中央来。这个方针，主席团已经提出过了，我在这里也代表主席团作过报告，各个代表团也讨论酝酿了好几天，昨天同志们选正式中央委员就是按照这个方针选举的。那末，为什么这位同志在昨天选举之后还要提出这个意见呢？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候选人并不知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若干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长时期中证明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不知名甚至有若干缺点错误而不选他。我认为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1]同志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2]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3]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

---

[1]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3人军事领导小组。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44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2]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1931年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3] 顾作霖（1907—1934），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

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1]、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

---

[1] 洛甫，即张闻天。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1]，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

---

[1]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他在1945年4月17日和22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谈到对待党的批评和自己的错误应采取严肃态度。信中说：“党严肃的检讨过去历史问题，每个个人也应严肃的对待自己。”“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的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若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康健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济，思路前后不连续，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这两封信毛泽东曾批示印发七大代表。

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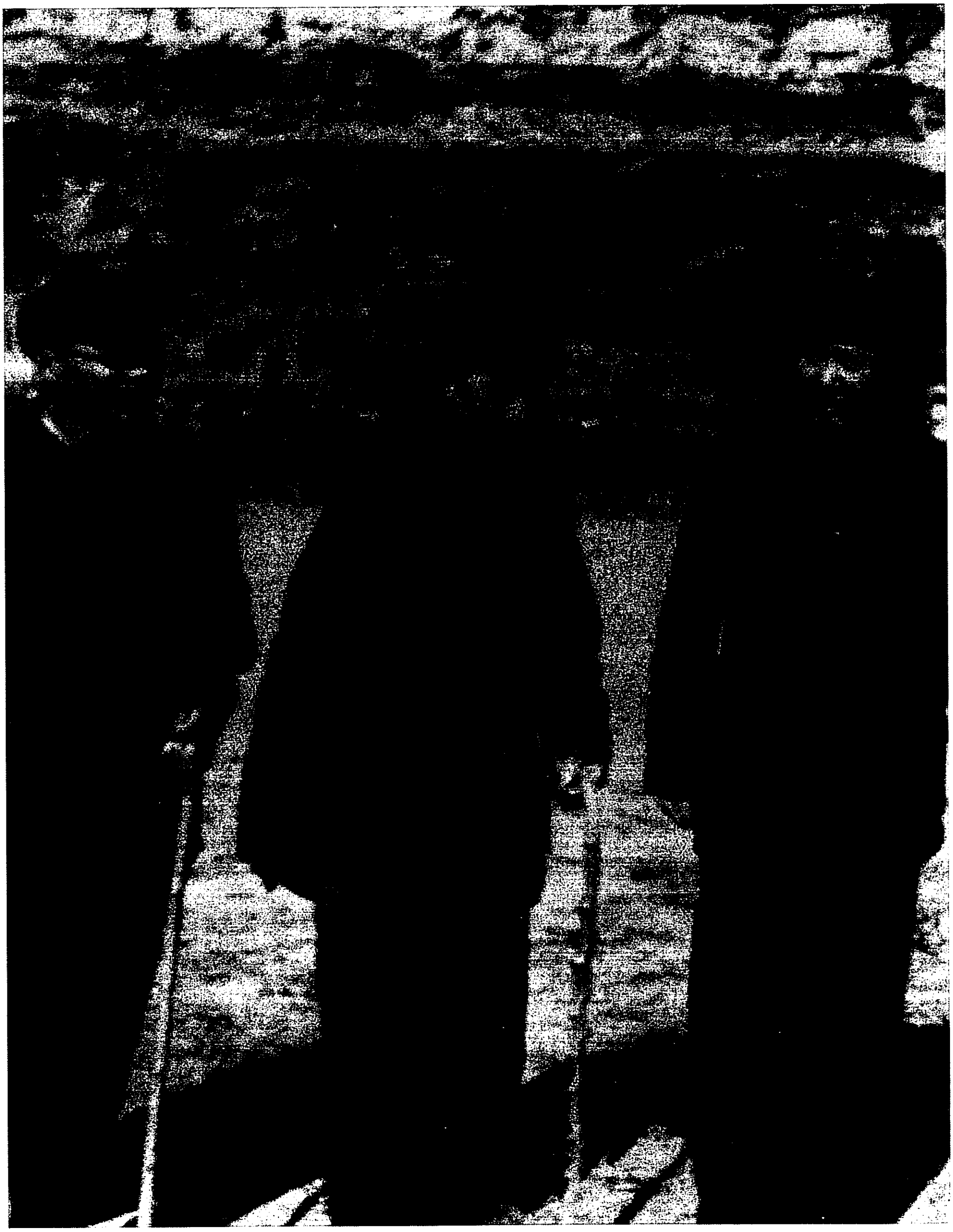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1945年，毛泽东和周扬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叶剑英在延安。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扬在交谈。



1945年，毛泽东和林伯渠、吴玉章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和黄华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和张经武在延安观看文艺演出。

愚公移山[1]

（1945年6月11日）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中国古代有个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闭幕词。

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1]。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

---

[1] 愚公移山的故事，参见《列子·汤问》。原文是：“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平呢?

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我对这两个美国人说：告诉你们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我们解放区禁止你们到那里去，因为你们的政策是扶蒋反共，我们不放心。假如你们是为了打日本，要到解放区是可以去的，但要订一个条约。倘若你们偷偷摸摸到处乱跑，那是不许可的。赫尔利已经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1]，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解放区去乱跑呢?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变为主流。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2]。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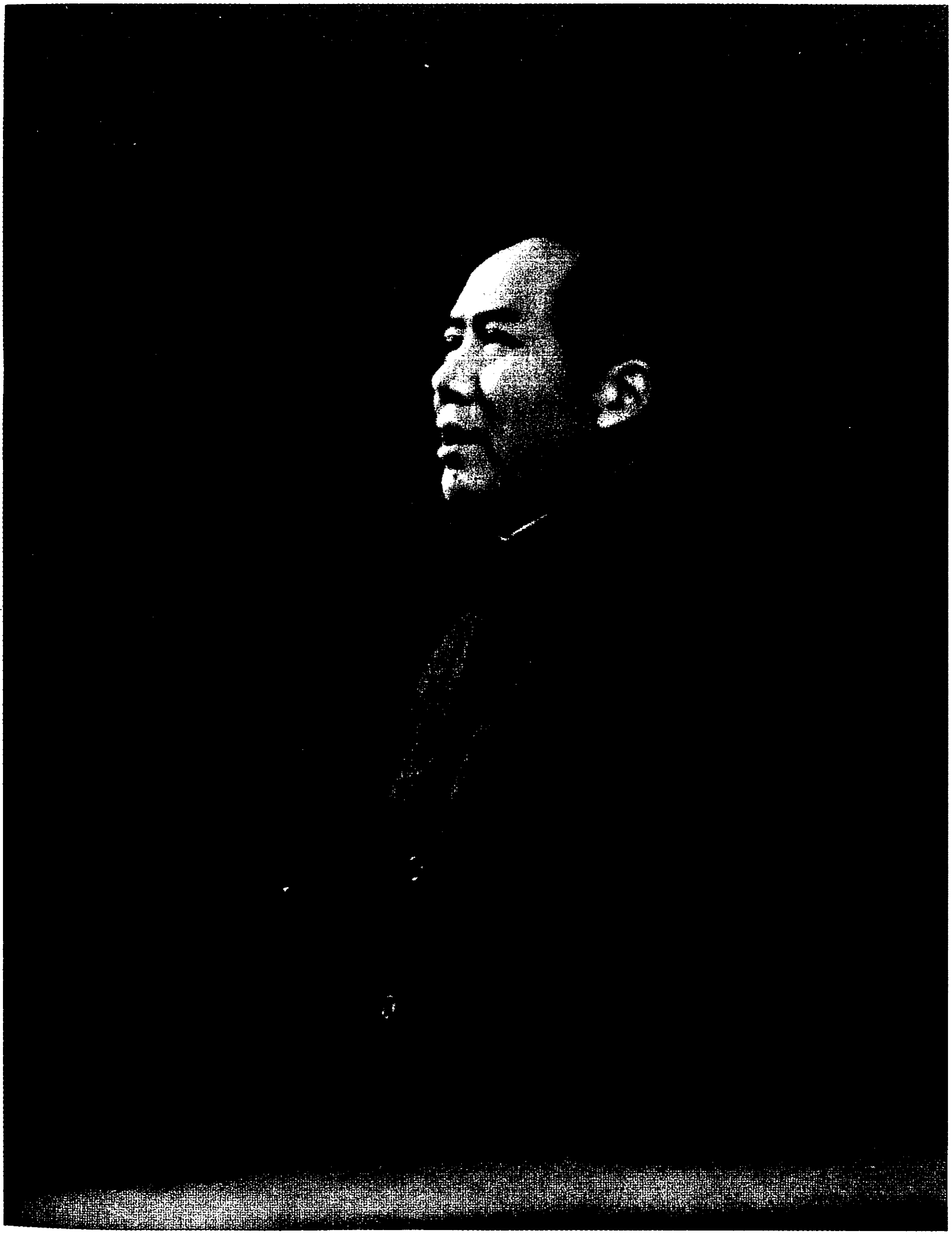
---

[1] 赫尔利（1883—1963），美国共和党人。他在1944年11月底被任命为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1945年11月被迫宣布离职。1945年4月2日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公开宣言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参见《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和《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

[2]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一部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6～187页）。

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不出席四届一次参政会[1]

（1945年6月15日）

【新华社延安十六日电】新华社记者就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七月七日召集新的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是否有人出席一项问题，询问中共中央负责人，承其答复如下：

国民党政府决定于今年七月七日召集的所谓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没有什么人去出席。这是因为：（一）从去年九月以来，中共与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广大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发布民主纲领，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2]战胜日本侵略者；并由此种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于全部国土获得解放之后，实行自由的无拘束的人民的选举，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正式政府。此项主张，实为中国大多数人民公意之反映，但在本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几次谈判之后，已被国民党政府所拒绝。至于恢复团结与建立联合政府之一些起码的条件，例如取消镇压人民的自由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答记者问，刊载于1945年6月17日《解放日报》。

[2]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的法令，取消特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及一切爱国分子，承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撤退包围与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等项，不但一项也不愿实行，反而变本加厉，增强了破坏团结与破坏抗战的反动措施。（二）此次所谓新的国民参政会之召集，国民党政府当局事前并未与本党协商，亦未与其他民主党派协商，仍和过去的国民参政会一样，完全由国民党一手包办。依据国民党政府的法令，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至今没有合法地位。即就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而论，亦为国民党当局所指派，并非中共自己所推选。而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力量，现在已成了战胜民族敌人、解放中国人民的中心力量。国民党政府此种对待中共的态度，不但与民主原则相违背，亦与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不符合。（三）尤其重要的，是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顾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的一切反对意见，一意孤行地决定于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那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分裂人民的准备内战的所谓国民大会，而在行将开会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要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而如果这样做，就将铸成大错，反民族反人民反民主的大规模内战就会爆发。很明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帮助了日本侵略者。根据上述各项理由，中共方面已决定不参加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以示抗议。

王震王首道部的行动方针[1]

（1945年6月15日）

王震、首道，并告郑、李[2]：

此次作战[3]虽有牺牲，亦有胜利，你们数月来在湘鄂边行动是有成绩的。惟王陵基[4]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地小，已处被动。今后方针，不外（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如取第二项方针，又有（一）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二）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南进，留小部配合张体学[5]创造湘鄂边区，等候张启龙文年生[6]等。南进时之目的地又有两项：（一）以三个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湘鄂赣军区司令员王震、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区委书记兼新四军湘鄂赣军区政治委员王首道的电报。

[2] 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区委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和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5年6月6日至7日新四军湘鄂赣军区部队与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二师的战斗。

[4] 王陵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

[5] 张体学，当时任新四军湘鄂赣军区副司令员。

[6] 张启龙、文年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和第三支队司令员。

左右时间一直进至湘粤边，在赣州、韶州[1]、梧州、桂林、衡州[2]五点之间创造游击区及根据地，与广东部队靠拢打成一片，启龙、年生等亦以八个月左右时间进至同一地区，建立南方局面，并准备被隔断；（二）你们进至衡宝地区[3]创立根据地，张启龙率九旅后续[4]亦进至此区，而以文旅进至湘粤边与广东打通，亦须准备被隔断。以上各项方针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考虑电复，以便决定。目前整个形势仍于我有利，南洋战区由英国负责，美军不打广东，故日寇放弃南宁，缩短防线，巩固粤汉[5]，并东攻三南[6]、河源。美军由欧东调需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之时间可以利用，过此则将发生变化，国民党有发动内战可能，到那时你们的根据地须具相当规模，以便应付内战，造成南方一翼，此任务具有重大意义。望根据此种前途考虑见复。

军委

巳删

---

[1] 韶州，旧府名，即今广东省韶关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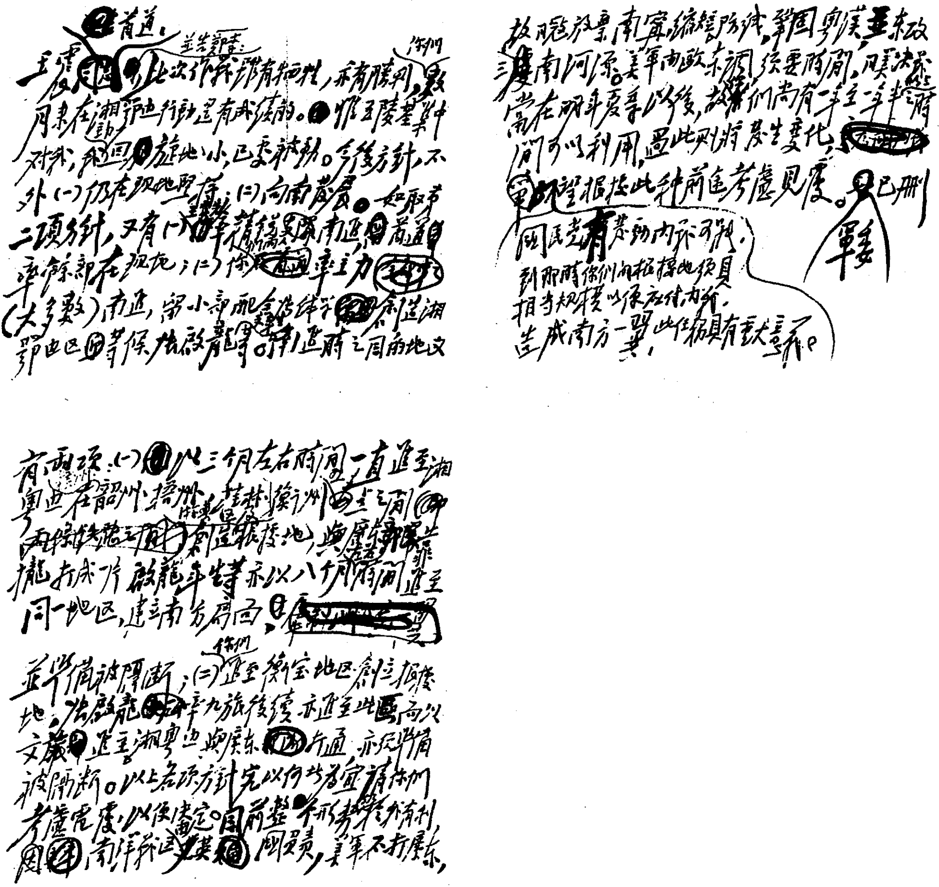
[2] 衡州，旧府名，即今湖南省衡阳市。

[3] 衡宝地区，即今湖南衡阳、邵阳（旧为宝庆府治）地区。

[4] 指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1945年6月编为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南下。

[5] 粤汉，即粤汉路，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6] 三南，指江西南部虔南（即今全南）、龙南、定南三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王震、王首道等电的手稿。

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15日）

我们不出席参政会，跟着也就不参加国民大会。不参加好处很多，因为这一套都是独裁，而以民主为招牌。这次不参加是给美、蒋一个警告，给反蒋的民主派撑腰。我们拟发表谈话，举出三项理由，而以第三项为主，意思是说如果不开国民大会我们还可参加参政会。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和各代表团主任会议上讨论是否参加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

（1945年6月17日）

同志们：

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延安人民的代表联合在这里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几十年来中国革命队伍在各个战线上所牺牲的人。这些牺牲者，有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中间，有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有做各方面民众运动的同志，有做政权工作的同志，有做党务工作的同志，有做技术工作的同志，从很高职位的到火夫、马夫、战斗员、工人、农民都有。就是这样两部分人，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同我们的敌人斗争。就是这样两部分人组成的队伍，开头是不大的，后来慢慢发展，到现在是相当大了。开头的路线、方针、政策、方法，都只是有一个方向，至于如何才能搞得更好、更正确，那是在长期奋斗中得到的，是从几十万的共产党员、成百万的革命民众的流血牺牲中得到的。这一次我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纲领、政策。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少数个人的头脑里想出来的和发明的，而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斗的结果，取得了经验，才形

成我们现在七大的决议案和文件。

中国有两大敌人、两座大山压迫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另一座大山就是封建主义，外国的压迫和中国的压迫，压得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不能抬头，破坏了我们的生产力。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帝国主义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侵入中国。现在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已经打了八年，如果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就已经有十几年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敌。中国内部的反动派，实际上是跟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来压迫中国人民的。这些反动力量还很大，它们压迫全中国人民，束缚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其不能发展。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没有独立，那就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没有民主，那就还是受封建势力的压迫，哪还有什么统一？在国民党里面有民主派，有反动派，现在掌权的是国民党的反动派，他们所说的统一中国，就是要使中国继续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继续成为封建制度统治的国家，不要独立，不要民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能解放。我们现在的抗战还没有胜利，还要努力，要团结全国人民做很大的努力，才能战胜我们的敌人。但首先阻碍我们团结起来的，就是国民党的反动派。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经过了好几个阶段

的。太平天国之前，有反对英国侵略的广东平英团，后头有太平天国革命，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带着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和民主主义的性质。这些运动的目标，在要求独立、要求民主这一点上跟我们是相同的。在这几十年的斗争中都还没有共产党，这些斗争是由别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因为没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就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他们利益的彻底的革命纲领，没有一个正确的领导者毫不动摇地始终如一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国民党是发生了变化的，孙中山时期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时期的国民党是不同的，前者是奉行革命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后者是退步的走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动摇，也只有共产党才能不动摇，彻底地干下去，不怕死多少人，不怕牺牲。从一八四一年平英团在广东起义反对英帝国主义起，到现在一九四五年已经有一百零四年的历史了，在这一百零四年中，中国人被杀的有多少，被关的有多少，已计算不清了。中国自有共产党以来，在二十四年里，单共产党人就死了几十万，革命民主主义者跟我们一道反对外国的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也成百万地牺牲了。反动派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就采取杀人的办法，以为屠杀会使革命者退却，可以停止或缩小中国的革命运动。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我讲这是成正比例的，是一条规律，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反动派的希望和企图是他们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就越小，但是希望和结果是两回事。

从国民党的历史上也可以证明上面所说的规律。清王朝和外国帝国主义曾经压迫国民党，是把国民党压迫小了还是大了呢？最后还不是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国民党拿帝国主义、

封建势力曾经用来对付他们的办法来对付中国人民，压迫共产党、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我说他们这就错了！他们的队伍开来得越多，他们自己就会变得越小，而我们的队伍就会越大。这是我们从几十年的历史中得出的一条结论。日本帝国主义杀了很多人，难道它是越杀的多越大吗？希特勒也是杀了很多人，难道他是越杀的多越大吗？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反动派，只要他们杀人越多，他们自己的力量就会越小，而革命的力量就会越大。

我们建设的党是东方的共产党，我们建设的队伍是东方人民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英勇奋斗的。想用杀人、压迫这一套来缩小我们，来消灭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几十万的共产党人、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拿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时期来说吧，头一个时期发展到五万多党员，一巴掌被打散了，剩下的很少；第二个时期我们发展到三十万党员，又被打散了很多，剩下的也是很少；到抗日战争中我们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党员。至于军队，同志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没有红军，要说有就是明朝朱洪武[1]起过一次“红军”，他们打的旗子是红旗。有的人以为红军这个名称一定是外国来的，我说不一定，你就只知道外国的事情，中国祖宗的事情就不知道。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和屠杀人民，中国又产生了红军。这个红军是在先进政党领导下的，开头数目很小。我经常和一些同志讲：“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古书《庄子》上讲

---

[1] 朱洪武，即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明朝的建立者。1352年参加郭子兴部起义军。起义军以红巾包头和红旗为号，故名红巾军，亦称红军或香军。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都南京，国号明，年号洪武。同年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统治。

的[1]。“作始”就是开头的时候，“简”就是很少，是简略的，“将毕”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巨”就是巨大、伟大。这可以用来说明是有生命力的东西，有生命力的国家，有生命力的人民群众，有生命力的政党。中国革命力量现在“巨”了没有呢？在一八四一年，广东平英团的力量有好几万人，他们的口号是反对英国的侵略，但那时的人们没有料到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代将来会怎么样。孙中山搞出一个辛亥革命，也没有料到有五四运动，没有料到又产生了共产党。我们的前人没有料到世界会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变，更没有料到中国会进步到有共产党领导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队伍，同时他们也没有料到中国革命会这样长还没有胜利。他们那时在敌人压迫面前只是开始起来反抗，至于下文如何，我看是还没有考虑成熟。不像我们现在开七大这样，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我们的前人没有预料到这些，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那时还没有革命的社会科学、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我们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人，看清楚社会前途的人，我们比他们进步，我们要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一年平英团那些英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平英团现在没有了，太平天国也没有了，义和团也没有了。但是平

---

[1] 参见《庄子·人间世》。

英团以后出了一个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以后出了一个义和团，义和团以后出了一个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出了一个共产党，因此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革命力量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可能被消灭，弄得不好就会被敌人消灭，被敌人屠杀，甚至可能几十万地被他们消灭，但是跟着却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我看见过这样的家庭，同志们一定也看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反动派杀掉了父亲，他的儿子，三个四个，甚至七个八个，还有女儿，统统加入共产党，统统跑到延安来了。所以，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队伍反而扩大了。

我们今天开大会，我们是有信心的。烈士们是已经离开我们了，他们的责任交给了我们，我们要完成这个责任。同志们，现在同死难烈士他们进行斗争的那个时期是不同了，在两年到三年内中国要起变化，或者变得很坏，或者变得很好，总之是要起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要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中国与外国的反动派又想要把我们打倒，把中国人民打倒，下决心要把中国一切人民的民主力量、革命力量统统消灭。那时或者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全国就是黑暗的，延安也是黑暗的，中国像沉到大海里去了，每天都是夜晚不见太阳，黑暗得很，要再过上几十年恐怖日子。这是一种可能性。或者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另外一个样子，那就是把黑暗势力压下去，把拿刀子杀人的人压下去。中外新闻记者们去年来延安的时候，问了我一些问题，就包括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但如果谁拿刀子杀人，要来杀我们，我们就有办法对付。我曾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有一百支枪，你们有本领缴我们九十九支，我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会打，我们不会打。一百支枪被你们缴去了九十九支，我们还剩下一支，用这一支枪，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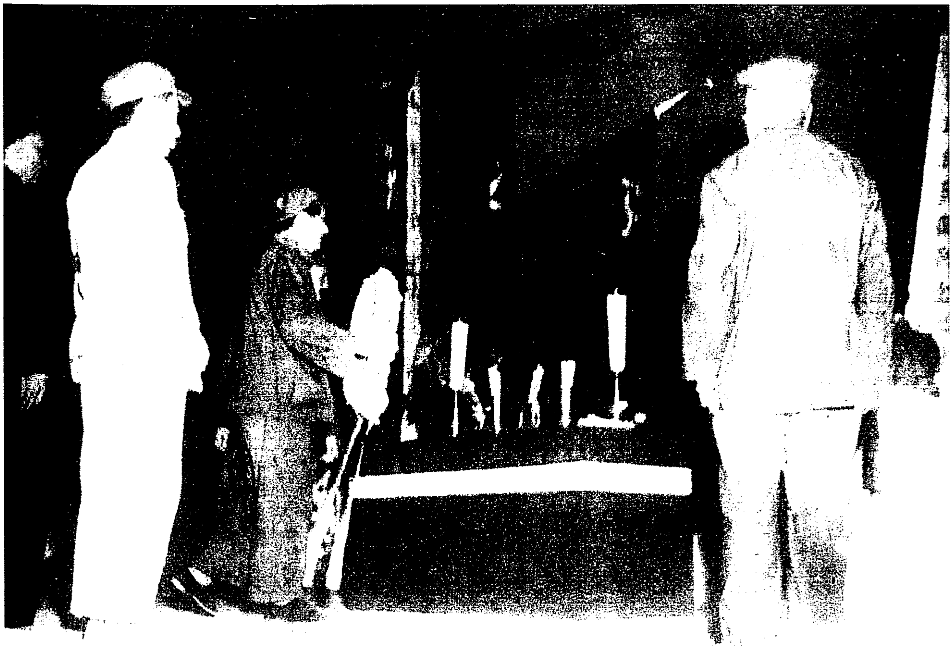
也要打下去。剩下一支枪了，你们说投降吧！我们说那不行，“投降”这个词在我们的字典里是没有的，在你们的字典里可能有。

同志们，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很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朋友，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同我们共产主义者需要更懂得团结，更懂得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懂得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就更能团结，人家就打不散我们。同志们要注意，将来是一定要打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准备了。现在，他们实际上是同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互相配合要消灭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一切革命力量他们都想统统消灭。但是结果将像我在七大闭幕词中所讲的，革命一定要胜利，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的。来延安的美国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给你开一张支票，你回到美国去，将来再见面时还是这些人，因为中国是人民的。这是一种前途。中国是反动派的，这是又一种前途。现在美国政府赫尔利[1]所实行的政策是反动的，是赞助中国反动派的。现在我们党有清醒的头脑，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一定要把黑暗的中国从地球上除掉，建设一个光明的中国。这个光明的中国是烈士们长期奋斗的目标，他们虽然没有成功就牺牲了，但是他们给了我们经验教训。我们今天开追悼大会纪念他们，革命也还没有成功，但是明天我们就要成功。我们下决心要把中国变为人民的中国，要战胜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反动派，一切外国的、中国的压迫者，不战胜他们决不罢休。我们全党团结起来，解放区一万万的人民团结起来，沦陷区及其他区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团结起来，这个目的就一定能达到，不达到目的是不停止的！

---

[1] 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1945年6月17日，延安各界及中共七大代表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追悼死难烈士大会。



1945年6月17日，毛泽东等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1945年6月17日）

百年以来，特别是自共产党成立后的二十四年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为了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进行了轰轰烈烈前仆后继的斗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便是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中牺牲了，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他们以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要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外国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法西斯，中国的满清政府和北洋军阀，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革命的人民，虽然被屠杀了几十万、几百万，但是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起来继续革命，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中国今天的广大人民抗日民主运动，一万万人民的解放区，一百万的人民抗日军队，一百二十一万共产党员，与共产党七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的纲领，就是那些几百万的民主主义者与几十万的共产主义者先烈们的鲜血所创造的，就是他们几十年奋斗的结果。现在中国人民已经更懂得如何团结，如何奋斗了，中国一定是人民的，中国一定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建立一个独

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一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四年来，一切革命先烈们的志愿，一定要胜利地实现。

为中国革命死难烈士题写挽词

（1945年6月17日）

死难烈士万岁。

挽抗日烈士联[1]

（1945年6月17日）

为人民而生，为人民而死，你们的事业永与人民同垂不朽；
为胜利而来，为胜利而去，我们的任务是向胜利勇往直前。

---

[1] 1945年6月17日，中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敬献的挽联。

欢迎七参政员来延安商谈国是的复电[1]

（1945年6月18日）

褚慧僧、黄任之、冷御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巳巧

---

[1]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御秋、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人公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这是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

豫中、豫东日军占领区较利于建立根据地[1]

（1945年6月18日）

河南区党委：

根据来电，伏牛山似非敌占区，胡宗南[2]必用全力来争，我党在伏牛山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可能性似甚小，而比较利于建立根据地之豫中、豫东广大敌占区尚未开辟，因此请你们考虑根本部署问题究以何者为宜。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我党如丧失这个时间则将难在河南立足。再则国民党对日寇取避战政策，对我党取坚决作战政策，其战斗力决不可轻视。请根据这一形势考虑电复。对高树勋[3]及其他杂牌部队必须争取其中立，对任何国民党部队必须坚守自卫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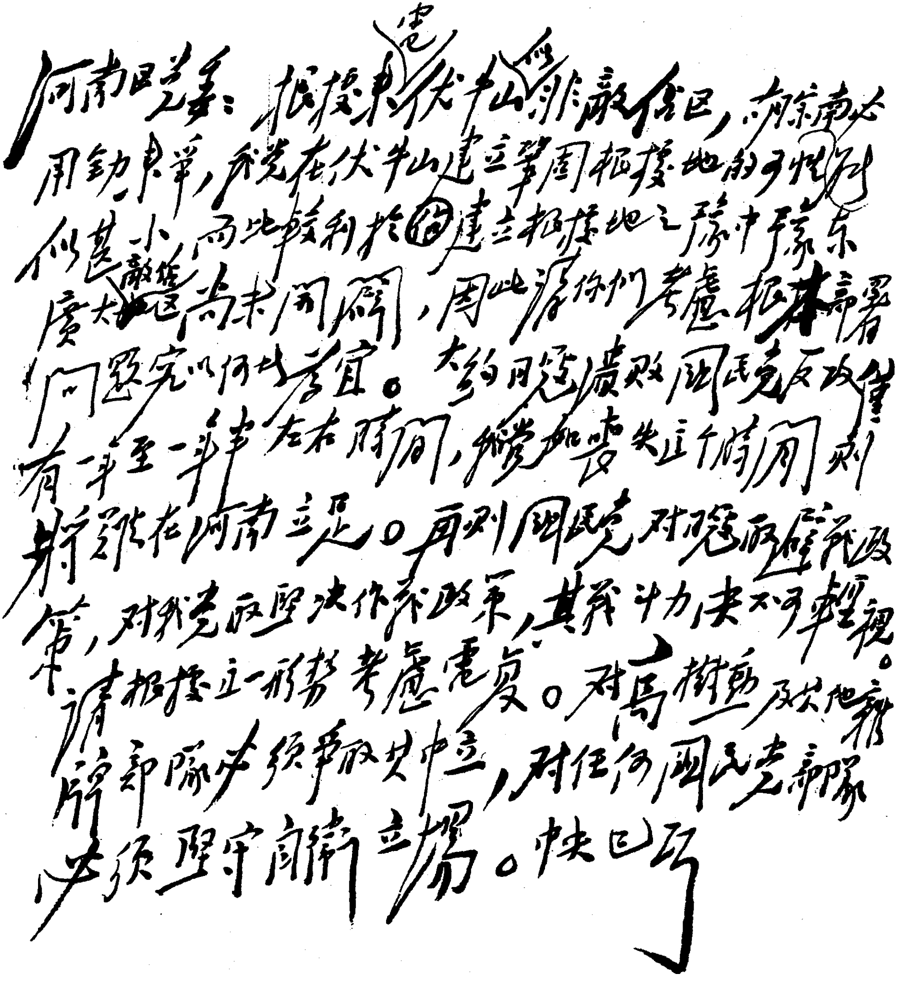
中央
巳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河南区委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3]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新八军军长。



河南区党委：根据来电，伏牛山仍非敌占区，胡宗南必用劲来争，我党在伏牛山建立牢固根据地的可能性似甚小，而比较利于建立根据地之豫中豫东广大敌后区尚未开辟，因此请你们考虑根本部署问题究以何地为宜。大约日寇溃败国民党反攻仅有一年至一年半左右时间，我党如丢失这个时间，则将难在河南立足。再则国民党对[illegible]取进攻政策，对我党取坚决作战政策，其兵力决不可轻视。请根据这一形势考虑电复。对高树勋及其他杂牌部队必须争取其中立，对任何国民党部队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中央巳巧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河南区党委电的手稿。

致王若飞电[1]

（1945年6月18日）

复七参政员电[2]请你抄送。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观，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

---

[1] 这是毛泽东致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毛泽东和周恩来6月18日复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参政员的电报。电报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6月19日）

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是危险的，故我们拒绝参加。我们决定不参加，把一个问题摆在美、蒋面前，也使中间派有文章做。这次国民大会开不开得成，蒋介石下决心的时候是在十一月。不开的好处是大家不合法；开的好处是蒋介石骑虎难下，成为众矢之的。我们的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则是稳当的、有利无弊的。它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向联合政府发展，选举一个解放区联合会；另一个也是向联合政府发展，但要经过一个曲折。成立解放区联合会，这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前途就是成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府。

王明同志写信给我，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一中全会的三个文件——全会议程、中央分工、解放区代表会议决议。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南下部队[1]应依据五岭山脉建立根据地

（1945年6月24日）

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各同志：

（一）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地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

（二）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有利的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不应在干部与战士中灌输专门打顽军或主要打顽军的思想，而应向他们灌输主要打敌伪军，只在自卫立场上打顽军的思想，以提高他们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的认识与情绪。

（三）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2]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

---

[1] 南下部队，指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和张启龙、文年生率领的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南下支队于1945年3月下旬占领湖南平江县，公开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2] 衡、宝、潭、醴，指湖南衡阳、宝庆（今邵阳）、湘潭、醴陵。

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地位，甚至被迫北返之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1]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这一方针和在延安时我们向你们所说在地区上是不同的，但我们认为这一方针是正确的。

（四）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2]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接，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3]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4]、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5]、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6]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唯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如果你们在这些政策上犯了大错误，那便要接受失败的结果，这一点必须预计到，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

---

[1] 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等抗日武装。

[2] 张，指张启龙（1900—1987），湖南浏阳人；文，指文年生（1906—1968），湖南岳阳人。他们率领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游击第二、第三支队，于1945年6月18日从延安出发南下。

[3] 三南，指江西南部虔南（今全南）、龙南、定南三县。

[4] 道州，今湖南省道县。

[5] 永明，今湖南省江永县。

[6] 五岭，是位于广西、湖南、广东、江西4省（区）边境的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的总称。

黑暗的种种可能情况，并从这点出发去克服困难，争取光明与胜利的局面。

（五）各领导干部必须十分虚心，力戒骄傲，十分谨慎，力戒浮躁，十分团结，避免并逐步消除可能的意见分歧，在情况许可条件下实行委员会的民主讨论，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然后坚决执行之。

（六）现在大局有利于我，只要党内能团结，不丧失时机，在政策上不犯大错误，我们相信你们是能够完成中央给你们的伟大任务的，希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中央

六月二十四日十六时

给各级党部的通知[1]

（1945 年 6 月 26 日）

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级党部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挽李公朴、闻一多联[1]

（1945年6月27日）

继两公精神，再接再厉争民主；
汇万众悲愤，一心一德反独裁。

---

[1] 1945年6月27日，在延安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参加了大会并敬献挽联。这是毛泽东写的挽联。

复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电[1]

（1945年6月30日）

三先生拟来延赐教，无任欢迎，何日命驾，乞示行期。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沈钧儒、陶行知、张申府电的主要内容。

在延安各界欢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晚会上的讲话

（1945年）

我们要做亲者快仇者痛的事，而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一件也不做。我们要站定自己的立场，决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们的口号是要处处与敌人对立，决不能有丝毫与敌人混同，一切与敌人相同的言论都是助敌张目的滥调，任何人想要肩起敌人的口号而又言抗敌，那只是欺人之谈，残酷的历史将给予严厉的证明。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和褚辅成等六参政员的谈话[1]

（1945年7月2日）

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

[1] 1945年7月2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在杨家岭会见褚辅成等6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这是毛泽东和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会谈记录

（1945年7月4日）

来延安六人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

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

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方面之建议：

为着团结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共商国是，以便在民主基础上动员统一与壮大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起见，并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并提出在召开前须确定下列各点：

一、政治会议之组织：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三方面各自推出同数之代表及由三方面各自推出三分之一（其数等于每一方面代表数）并经他方面同意之无党派代表人士共同组成之。

二、政治会议之性质：

1. 公开的。

2. 平等的。

3. 自由的。

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三月一日蒋介石说：“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咨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既然如此，不知道我们的委员长为什么又向参政会“聆取”起“意见”来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中国境内是并无任何“可以咨询民意的负责团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吃饭的“团体”而已，今天的“聆取”，于法无据。可是不管怎样，只要参政会说一声停开那个伪造的“国民”大会，就说违反了三月一日的圣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积了一件功德。当然，今天来评论参政会，为时尚早，因为参政会究竟

1945年7月，毛泽东在机场欢迎国民参政会6位参政员到延安。

1945年7月，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来到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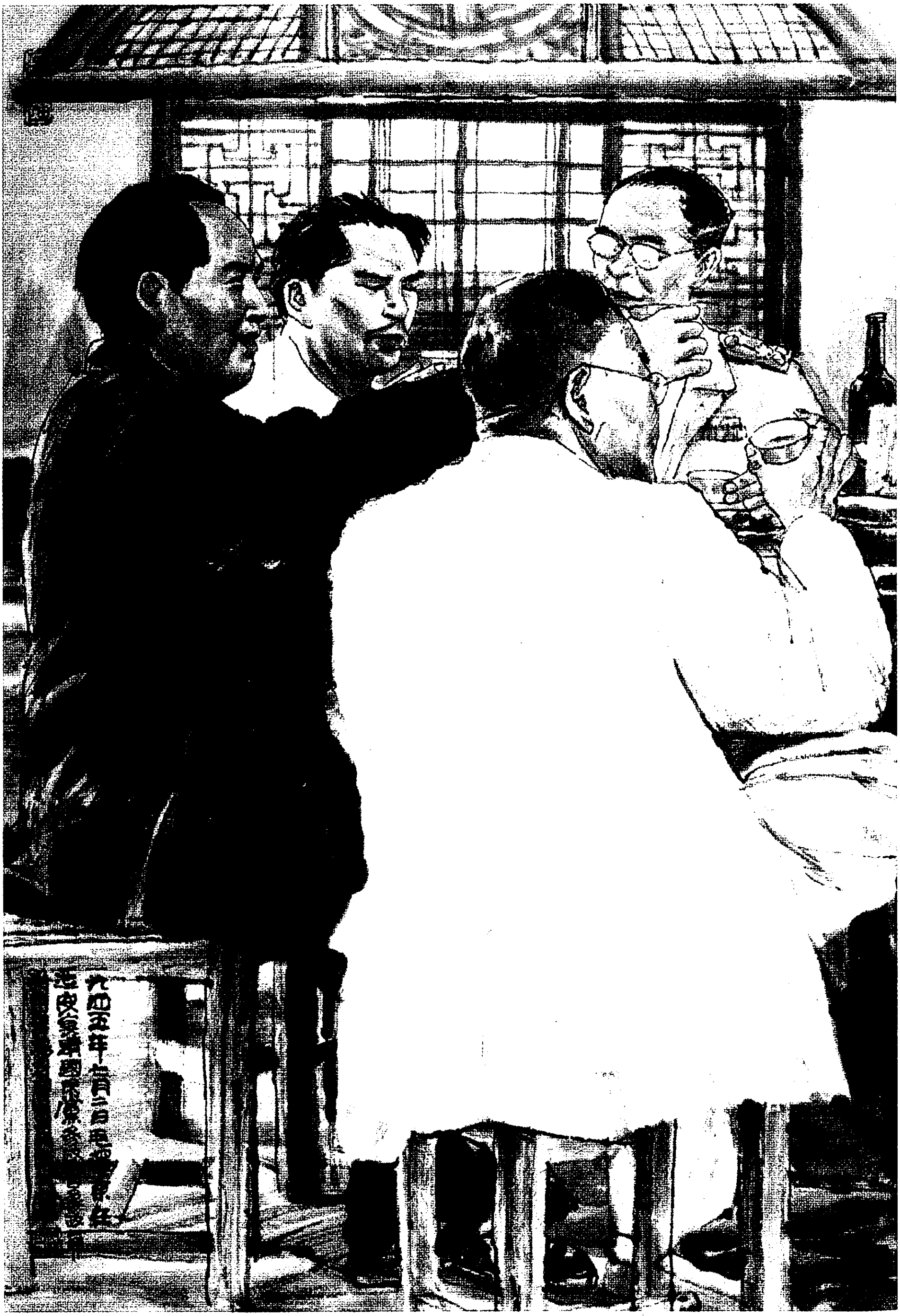
1945年7月，毛泽东和国民参政员在延安机场。

1945年7月，毛泽东、朱德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延安。

1945年7月，毛泽东出席迎接国民党参政会各民主党派参议员到延安访问的宴会。

1945年7月，毛泽东设宴招待参政人员。

1945年7月，毛泽东设宴招待参政人员。



《宴请》（中国画）

和黄炎培谈跳出周期律[1]

（1945年7月4日）

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

[1] 毛泽东请黄炎培等人到家里做客，毛泽东问黄炎培延安考察感想，黄炎培坦率讲到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盛衰周期律，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这是毛泽东关于跳出周期律问题和黄炎培谈话的一部分。

1945年7月，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机场。

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1]

（1945年7月5日）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做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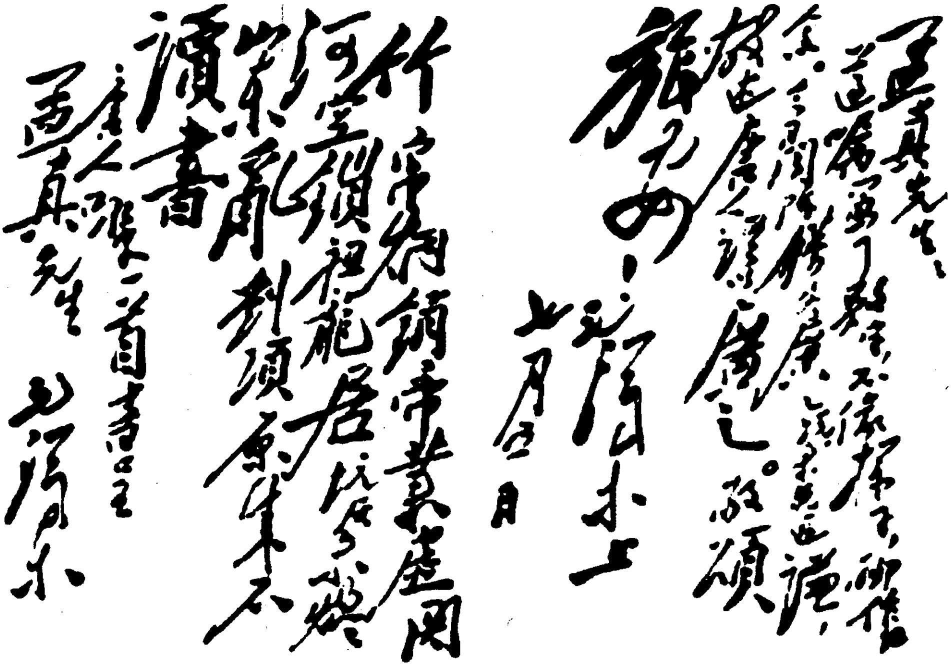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

[1]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访问延安，并“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这是毛泽东写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



孟真先生：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旅安！毛泽东 七月五日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亂，刘项原来不讀書。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给傅斯年的短笺和条幅的手稿。

评蒋介石七七演说*

（1945年7月8日）

空空洞洞，毫无内容，是昨天蒋介石讲演的特点。稍为异样的，是他忽然讲起“容忍”来了。但是，我们记得，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对他的将领曾经说过：“大家要拿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想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用快刀斩乱麻的人才来做事，本着硬干快干实干的精神来消灭土匪……你们既是我的部下……就要有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和能力，我做上官的一定要做快刀斩乱麻的上官，做部下的一定要做快刀斩乱麻的部下；我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要找一般快刀斩乱麻的将领，我们现在总要勇敢进取轰轰烈烈地来干，要知道，革命就是那么一回事！”在那年蒋介石讲的不是“容忍”，而是八个“快刀斩乱麻”。到了昨天，蒋介石却讲了四个“容忍”，所以显得异样。但是，蒋介石真的对于中国人民忽然“容忍”起来了吗？事实是最好的证据。去年今日，蒋介石用来进攻中国解放区的军队是六十余万。今年今日，这个数目增加到了将近一百万。现存的国民党全部军队，包括地方系在内，总共不过一百五十万左右，其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用来包围与进攻解放区，这就是蒋介石的容忍。在蒋介石统治区，政治犯一个也不放，人民的自由一点也没有，特务如麻，贪污成阵，这就是蒋介石的容忍。对于吴开先、方先觉等日寇使者，则大批收容之，对于庞炳勋、孙殿英等叛

国将领，则大批放纵之，这就是蒋介石的容忍。在此种情况下，国民党内广大党员的不满，也表露出来了。五月间开的国民党六次代表大会的六百多代表中，因为痛恨蒋介石的专横不法，竟有二百多人要求退党，就是明证。在昨天的讲演中，蒋介石还夸称他从前说的话如何灵验。可是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五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对请愿学生们说过：“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我蒋中正之头，以谢天下。”一九三四年七月，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作“精神讲话”时，他又说：“日本人只要发一个号令，真是只要三天之内，就完全可以把我们中国要害之区都占领下来，灭亡我们中国。”请问这些话是否也灵验了呢？蒋介石昨天又说什么“今后一年为收获战果的一年”。按照蒋介石及其一群的作法：一切依赖美国，那么中国人民在今后几年之内可以看到，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将被拖进实际上的殖民地地位，这将是一个确实的“战果”。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尔利之流与中国的封建买办法西斯分子蒋介石辈，结成了甜蜜的伙伴，大批的武器加黄金装备了蒋介石，据说是为了打日本。但是明眼人早已看清楚了，其结果不会是别的，只会造成中国的内战。因为美国的帝国主义分子——赫尔利之流，拼命要保存蒋介石的独裁制度，把中国人民的民主力量看成眼中钉，这个反动政策如不改变，中国绝无不爆发内战之理。目前蒋介石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都是为了打内战，“容忍”二字仅仅是准备内战的词令。内战一起，蒋介石统治的中国，还能逃脱殖民地命运吗？不错，美国的这样一部分统治人物，除了保存蒋介石独裁制度、企图将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以外，确实还要打倒日本侵略者。对于这一点，我们和美国政府之间，并无异议。可是，六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实质上是一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我们希望一切善

良的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中的开明人物，充分地注意这一点，并迅速起来加以纠正。否则，美国人自己造成的后果，将不但对于中国人民是不利的，对于美国人民也是不利的。说到中国人民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可以说已达容忍的最高限度。直到现在，中国人民还同意在将来的联合政府中给蒋介石留下一个位置，其目的在于使他获得机会革面洗心，将功赎罪。但是，实在说来，蒋介石早已没有资格当一个全国性的领袖了。除了一小群中国人加上一小群外国人还要他之外，广大人民早就愿与蒋介石偕亡，叫他作“蒋该杀”了。虽然如此，中国人民还是愿意给他以革面洗心的机会，这就是一种极端的容忍态度。在中国只有这一种容忍是真的。蒋介石的所谓“容忍”，不过是准备内战的别名而已。中国人民应该提起警觉，反对外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勾结一起，制造反民族反民主反人民的内战，并用一切方法制止之。为着打倒日本侵略者与解放中国人民，这种警觉是决不可少的。

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

（1945年7月10日）

以粉饰蒋介石独裁统治为目的而召集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七月七日在重庆开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者之少，为历届参政会所未有。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定数二百九十名的参政员中，出席的仅有一百八十名。蒋介石在开幕时说了一通话。蒋介石说："政府对于国民大会召集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政府准备以最诚恳坦白的态度，聆取诸位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所谓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一件公案，大概就此收场了。这件公案，也和帝国主义者赫尔利有关系。原来这位帝国主义者是极力怂恿蒋介石干这一手的，蒋介石的腰这才敢于在今年元旦的演说[2]里稍稍硬了起来，至三月一日的演说[3]而大硬，说是一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还政于民"。在蒋介石的三月一日的演说里，对于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2] 这是指1945年1月1日蒋介石的广播演说。他在这个演说里，对过去1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军进攻面前的溃败一字不提，反而大肆诬蔑人民，反对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所拥护的关于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及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的主张，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并且以准备召开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国民党御用的"国民大会"，作为反对人民的挡箭牌。

[3] 这是指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的演说。

的公意而提出的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则拒之于千里之外。对于组织一个所谓有美国人参加的三人委员会来“整编”中共军队，则吹得得意忘形。蒋介石竟敢说：中共必须先将军队交给他，然后他才赏赐中共以“合法地位”。所有这一切，赫尔利老爷的撑腰起了决定的作用。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发表声明，除了抹杀中共的地位，污蔑中共的活动，宣称不和中共合作等一派帝国主义的滥调而外，还极力替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等项臭物捧场。如此，美国的赫尔利，中国的蒋介石，在以中国人民为牺牲品的共同目标下，一唱一和，达到了热闹的顶点。从此以后，似乎就走上了泄气的命运。反对者无论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中，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在有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到处皆是，不计其数。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赫尔利蒋介石这一套，不管他们怎样吹得像煞有介事，总之是要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三月一日蒋介石说：“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我们便无一个可以代表人民、使政府可以咨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既然如此，不知道我们的委员长为什么又向参政会“聆取”起“意见”来了。按照委员长的说法，中国境内是并无任何“可以咨询民意的负责团体”的，参政会不过是一个吃饭的“团体”而已，今天的“聆取”，于法无据。可是不管怎样，只要参政会说一声停开那个伪造的“国民”大会，就说违反了三月一日的圣旨，犯了王法，也算做了一回好事，积了一件功德。当然，今天来评论参政会，为时尚早，因为参政会究竟

拿什么东西让委员长“聆取”，还要等几天才能看到。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自从中国人民群起反对之后，就是热心“君主立宪”的人们也替我们的君主担忧，劝他不要套上被称为猪仔国会的那条绞索，谨防袁世凯来找替死鬼。因此，我们的君主就此缩手，也未可知。然而我们的君主及其左右，是决不让人民轻易获得丝毫权力而使他们自己损失一根毫毛的。眼前的证据，就是这位君主将人民的合理批评，称之为“肆意攻击”。据说，“在战争状况之下，沦陷区域势必无法举行任何普遍的选举。因此，在两年以前，国民党中央全会乃有于战事结束一年以内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的决定。若干方面，当时曾肆意攻击”，以为迟了。及至他“鉴于战事的完全结束为时容或延长，即使战事结束后各地秩序亦未必能于短时期内恢复，所以主张在战局稳定之时即行召集国民大会”，不料那些人们又“肆意攻击”。这样一来，闹得我们的君主很不好办。但是中国人民必须教训蒋介石及其一群：对于违反人民意志的任何欺骗，不管你们怎样说和怎样做，是断乎不许可的。中国人民所要的是立即实行民主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给人民以自由，给各党派以合法地位等项。对于这些，你们一件也不做，却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的时间问题上耍花样，这是连三岁小孩子也欺骗不了的。没有认真的起码的民主改革，任何什么大会小会也只能被抛到毛厕坑里去。就叫做“肆意攻击”也罢，任何这类的欺骗，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攻击掉，决不容许保留其一丝一毫。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它是欺骗。有无国民大会是一件事，有无起码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暂时没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实施后者。蒋介石及其一群，既然愿意“提早”“还政于民”，为什么不愿意“提早”实施若干起码的民主改革？国民党的先生们，当我写这

最后几行时，你们得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总算不是向你们“肆意攻击”，仅仅提出一个问题，难道也不应该吗？难道你们也可以置之不答吗？你们得答复这个问题：为什么你们愿意“还政于民”，却不愿意实行民主改革呢？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

（1945年7月12日）

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坚持反动政策的国民党政府，从它在十八年前成立之日起，就是以内战为生活的；仅在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入中国本部这样的时机，才被迫暂时地放弃全国规模的内战。但从一九三九年起，局部的内战又在发动，并且没有停止过。国民党政府在其内部的动员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被放在次要的地位。目前国民党政府一切军事布置的重心，并不是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而是放在向着中国解放区“收复失地”和消灭中国共产党方面。不论是为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或是战后的和平建设，这种情况均须严重地估计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他是估计到了这一点的，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赫尔利以罗斯福私人代表的资格来到延安的时候，他曾经赞同中共方面提出的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计划。但是他后来变卦了，赫尔利背叛了他在延安所说的话。这样一种变卦，露骨地表现于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所发表的声明。这时候，在同一个赫尔利的嘴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变成了美人，而中共则变成了魔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怪；并且他率直地宣称：美国只同蒋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当然这不只是赫尔利个人的意见，而是美国政府中的一群人的意见，但这是错误的而且危险的意见。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去世了，赫尔利得意忘形地回到重庆的美国大使馆。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这一种必然的趋势，难道还看不清楚吗？在中国的前途这个问题上，看清楚了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统一的不可阻止的势力必然要代替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而勃兴的美国一部分舆论界，对于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是感到焦急的，他们要求改变这个政策。但是，美国的政策究竟是否改变和哪一天改变，今天我们还不能说什么。可以确定地说的，就是赞助中国反人民势力和以如此广大的中国人民为敌的这个赫尔利式的政策，如果继续不变的话，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

开辟郑州许昌等地甚为必要[1]

（1945年7月14日）

请刘邓[2]商彭滕[3]拟复。由冀鲁豫调得力人率大部西渡，负责开辟郑州、许昌、郾城与新黄河间广大地区，甚为必要。

毛

---

[1] 这是毛泽东在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第十二军分区司令员余克勤等关于开辟河西的意见给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和副参谋长杨立三的电报上写的批语。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

[3] 彭滕，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滕代远。

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

（1945年7月15日）

河南区党委：

（一）我军入豫后，在对敌作战、发动群众与建立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领导是正确的。

（二）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向南进攻（即对顽占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1]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2]部队完全打成一片，逐步地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可靠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3]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此点必须预先想到。

（三）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太岳再给你们以军力、财力及干部之援助。向一切负责

---

[1]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洪水阻止日军进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再流入颍河，在安徽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1940年，改道的黄河又分流入涡河、西淝河、茨河、北淝河，并分别注入淮河。黄河改道后流经的这些河道当时统称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修复，黄河复归故道。

[2] 指李先念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的新四军第五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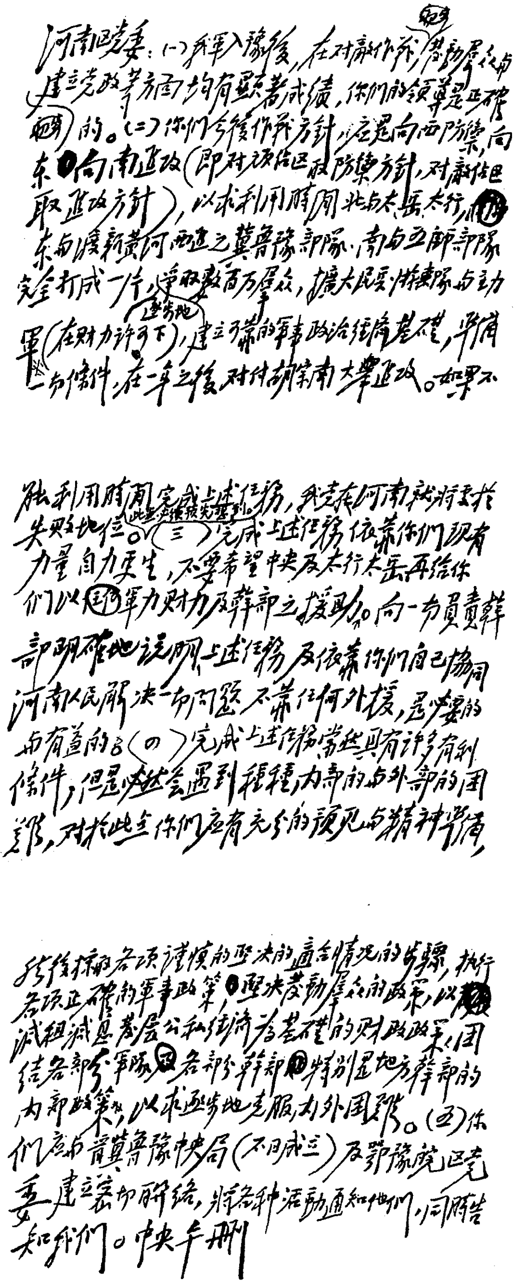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代司令长官。

干部明确地说明上述任务，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与有益的。

（四）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必然会遇到种种内部的与外部的困难，对于此点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然后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内外困难。

（五）你们应与晋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

中央
午删



河南区党委：（一）我军入豫后，在对敌作战、发动群众和建立党政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你们的领导是正确的。（二）你们今后作战方针，应是向西防御，向东和向南进攻（即对顽伪区取防御方针，对敌伪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争取数百万群众，扩大民兵、游击队与主力军（在财力许可下），建立豫西的军事政治经济基础，准备一切条件，在一年之后对付胡宗南大举进攻。如果不能利用时间完成上述任务，我党在河南就将处于失败地位。（三）完成上述任务依靠你们现有力量自力更生，不要希望中央及太行太岳再给你们以军力财力及干部之援助。向一切负责干部明确地说明上述任务及依靠你们自己协同河南人民解决一切问题不靠任何外援，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四）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必然会遇到种种内部的与外部的困难，对于此点你们应有充分的预见与精神准备，必须采取各项谨慎的坚决的适合情况的步骤，执行各项正确的军事政策，坚决发动群众的政策，以减租减息发展公私经济为基础的财政政策，团结各部分军队、各部分干部、特别是地方干部的内部政策，以求逐步地克服对外困难。（五）你们应与冀鲁豫中央局（不日成立）及鄂豫皖区党委建立密切联络，将各种活动通知他们，同时告知我们。中央午删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入豫部队的作战方针》的手稿。

在《新华社记者再评赫尔利政策》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5年7月19日）

为了共同战胜日寇与建设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一切原以平等待我的公正的美国舆论界、政府人员及军队人员积极起来纠正赫尔利式的错误政策，因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只会拖延对日战争的胜利与破坏世界和平。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王震部会合

（1945年7月22日）

启龙、年生[1]同志：

（一）你们现达何处，在太岳、中条[2]境内准备休息几天（应完全恢复疲劳），部队情绪如何，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如何？

（二）渡汾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作战将有帮助。

（三）已令王震首道[3]率部南开，直达粤北。在湖南中部不可久留，在此等地方不可能建立稳固根据地，日寇失败后蒋介石一定要用全力驱走我们，故应直往湘南粤北，依五岭[4]建立永久根据地。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

---

[1] 启龙、年生，即张启龙、文年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和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

[2] 太岳，即太岳山，在山西省中部、汾河东岸，长200余公里。中条，即中条山，在山西省西南部，黄河和涑水河、沁河间，长约160公里，宽10至15公里。

[3] 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

[4] 五岭，是位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4省边境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五岭的总称。

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1]会合。

（四）河南解放区新创，经济极端困难，你们到时应备价购买，不要当地供给。

（五）你们电台应与王震首道台经常联络。

毛泽东

午养

---

[1] 二王，指王震、王首道。

争取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1945年7月22日）

王震、首道[1]：

（一）巧电悉。桃花山、金家坪[2]在何处，沿途情况如何，估计多少时间到达五岭山脉？

（二）日寇为对付盟军在山东登陆，由湘桂抽调五个师〔团〕北开，并非放弃华南。但为缩短防线，已放弃南宁、柳州、赣州等处，还可能放弃若干地点。但至少他要固守广州及整个粤汉路。吉安、袁州[3]并未被占，商人所传不确。

（三）三巨头在柏林开会[4]将决定欧、亚两大问题。宋子文[5]赴苏会谈十余天，尚未解决问题。三巨头会后，宋仍将赴苏，可能决定中

---

[1] 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

[2] 桃花山、金家坪，均位于湖南省平江县西南。

[3] 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县。

[4] 三巨头，指苏、美、英3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3国首脑（会议后期英国首脑为继任首相艾德礼）和外长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着重讨论战后对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等问题。会议期间，中、美、英3国于7月26日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5] 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

苏共同作战。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

（四）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的。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1]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2]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看问题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

（五）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

（六）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例如严重的敌情，打败仗，无饭吃，部队不但无扩大而且很大缩少，内部意见分歧，不团结等等。只有对这一切预先想透，有了充分精神准备，并使干部有此种准备，然后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毛泽东
午养

---

[1] 浏醴衡宝，指湖南浏阳、醴陵、衡阳和宝庆（今邵阳）。

[2] 1943年12月2日，活动于广东东江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

评国民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的决议[1]

（1945年7月22日）

中国独裁派是很狡猾的，他们善于在政治上耍花样与善于组织对人民的突然袭击。他们一群的下一手是什么，中国人民，首先是各民主党派，必须十分注意。新华社记者说：参政会决议的第二条也是极其含糊的，反动派很可以利用这一条。这一条说：“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酌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尽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这里所说的“政府”，是独裁派的政府，这里所说的“法律”，是独裁派的法律，现在写上了决议案，将来他们“衡酌”一番的结果，依然不外强迫人民承认十年前的那一批国大“代表”依然有效。独裁派也会“衡酌”“事实”，其结果不外加“选”或加派一批人。这样他们就会说：已经“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了。但是中国人民与民主党派应该这样来看问题，所谓“政府”必须是一个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组成的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任何由现在的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召集的“国民”大会，我们都反对。所谓“法律”，必须由联合政府来重新制定，任何由国民党独裁政府所制定的反动的代表选举法、国大组织法等等，我们都反对。“事实”是十年前的所谓国大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记者论时局：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的评论稿时加写的文字。

代表，是由国民党一手伪造的，必须全部否定它；在敌人未完全消灭、国土未完全解放、人民无完全自由的全部时间内，不许可办理国大代表的选举。只有全部否定旧代表，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下重新选举新代表，才能称之为“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我们完全赞成“极完满之代表性”这几个字。从今以后，谁要召开什么绝无代表性及代表性不完满的“国民”大会，必将受到坚决的反对。第三条：“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这一条表现了国民党独裁派的反动计划，依然坚持着。历来只唱“制颁”宪法、反对“实施”宪法的，现在他们唱起“即予实施”的好听的调子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选举”大总统，仿效袁世凯做皇帝。今天中国的独裁派即帝制派很需要这一条，他们急于要以帝制（一名大总统）来镇压人民、发动内战，以维持其自己的反动统治。第四条列举了几项要求。“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这一项，独裁派必然要耍新花样，对于民主派所主张的召开党派会议、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一项要求，仍将深闭固拒。第二项，保障人民自由，加了“合法”二字，第三项，承认各政治党派，加了“依法”二字，在独裁派看来，一切都好办了。第四项，“各省各级民选机构之设置”，也是独裁派需要的，因为所谓“民选”，实际上都是党选，独裁派有了这些“机构”，他们的宝座就更稳当了。综合第四条各项，对于独裁派，并不会损失什么东西。仅有一点稍有意义，就是规定这些措施，应在“国民大会召开前”做到，表示国民大会今年或者不会开。新华社记者结语说：独裁制度丝毫未变，内战危险空前严重，现有各种铁一般的事实，包括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军事行动在内，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较前更加积极地准备发动一个极大规模的内战，借此以援助日本侵略者。国民参政会对于国

民大会问题的决定，绝不会改变这种危险的形势。新华社记者说，只有三个条件可能改变中国的政治形势：第一个，解放区军民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坚决制止内战；第二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力量一致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内战；第三个，英、美、苏三国在东方问题上团结一致，反对中国的内战。中国人民应该为争取三个条件，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争取目前时间创立五岭根据地[1]

（1945年7月22日）

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阳、醴陵、衡阳、宝庆（今邵阳）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军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全党应取的态度。谦虚则不骄，谨慎则不躁，骄与躁是革命工作的大敌。希望你们以此自守，并教育一切干部。凡事要设想一切可能的困难，只有对一切困难有了充分精神准备，才能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

---

[1] 这是毛泽东致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1]

（1945年7月22日）

渡汾河战役虽有损失，但已胜利通过，此次经验对于以后行军将有帮助。已令王震、王首道率部南开，直达粤北。你们目的地亦是湘南、粤北，在不使部队过于疲劳条件下应注意酌量缩短行军过程，争取在阳历年底到达五岭与二王会合。

---

[1] 这是毛泽东致张启龙、文年生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扩大反内战宣传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的指示[1]

（1945年7月22日）

徐、张[2]：

蒋一切布置都是准备反共的，内战危机空前严重。要求：（一）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这些新闻的措辞将使中间派认为太尖锐，但日后将证明我们意见之正确性。（二）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不使我党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完全挨打与束手无策的地位，现在就应派人去领导贵州等处的民变。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扩大反内战宣传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给徐冰、张明的指示电。

[2] 徐，指徐冰（1903—1972），河北南宫人；张，指张明，即刘少文（1905—1987），河南信阳人。他们均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7月23日）

胡宗南他们已经展开战役，问题是大打还是小打，小打就是打爷台山。要准备他们大打大闹。大打，要准备他们打到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关于如何打退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的进攻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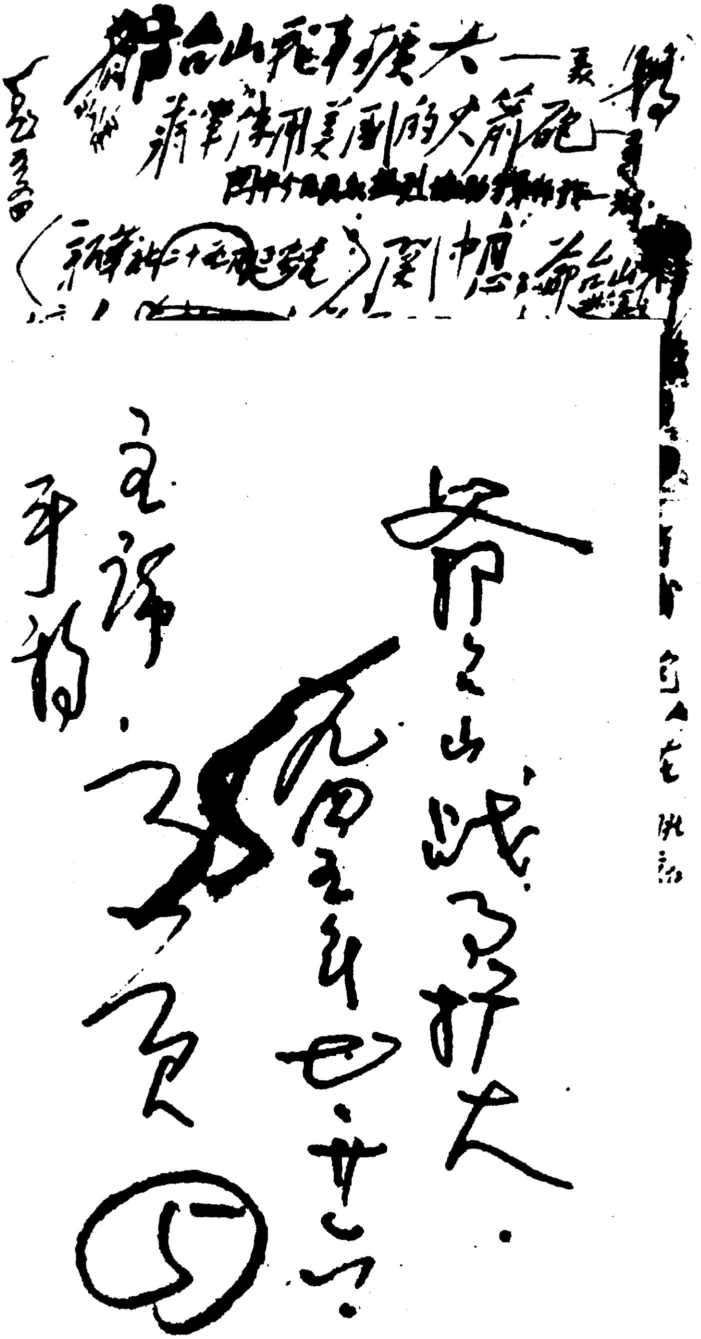
爷台山战事扩大[1]

（1945年7月25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五日电】关中息：爷台山战事扩大，蒋军正面攻击部队，除三十六军之暂五十九师外，增加了一个师。据我侦察员报告：增加上来的是从河南前线调来之十六军部队。据三十六军逃来我方之士兵说：他们有许多新式武器，是美国送来的，其中有一种叫火箭炮，你们要注意。爷台山为一重要据点，蒋军志在必得，然后深入关中分区，据为向北进攻之有利阵地。但我军士气高涨，决不让任何反动派轻易窜入，屠杀边区人民。关中全区民众已迅速动员起来，协助守军作战，送茶水、抬伤兵，热烈异常，对于战胜这些反动派，具有充分的信心。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1945年7月21日，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所属的暂编第五十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突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进攻，23日又以预备第三师加入进攻。毛泽东在写这条揭露蒋介石集团挑动内战的消息时，还加了副标题“蒋军使用美国的火箭炮”。



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消息《爷台山战事扩大》的手稿。

坚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1]

（1945年7月27日）

二十一日至今七天侵入边区之胡宗南部，计有第三十六军之暂十五师、暂五十九师和第十六军之预备第三师，战线长达百余里。我们决将入侵之胡军打出去。

---

[1] 这是毛泽东致徐冰、刘少文电的主要内容。

致福斯特电

（1945年7月29日）

福斯特同志和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欣悉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会议决定抛弃白劳德的修正主义的即投降主义的路线[1]，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并已恢复了美国共产党。我们对于美国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个伟大的胜利，谨致热烈的祝贺。白劳德的整个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

[1] 白劳德（1891—1973），曾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共产党内以白劳德为代表的右倾思想，曾经形成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并于1944年4月出版了作为他的纲领性的著作《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白劳德“修正”了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理论，否认美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保持着青年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特点”，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利害”，主张保护托拉斯制度，经过“阶级调和”来避免美国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危机。白劳德于1944年5月，主持解散了美国无产阶级的政党——美国共产党，而另行组织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的这一错误路线一开始就遭到以福斯特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员的反对。1945年6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7月，又举行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白劳德后来仍然坚持其错误主张，公开拥护杜鲁门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进行反党的派别活动，因此在1946年2月被开除出党。

路线（这条路线充分表现于白劳德所著《德黑兰》一书中），本质上是反映了美国反动资本集团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这个反动资本集团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的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美国共产党反对白劳德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胜利，对于中美两国人民目前所进行的反日战争和战后建设和平民主世界的伟大事业，无疑地将有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关于批评美国对华政策的电报

（1945年7月30日）

徐、张[1]：

（一）美大使馆前曾劝告我们不要批评蒋介石，这一点现在他们不说了，却来劝告我们不要批评赫尔利[2]。美国报纸经常批评外国元首，去年曾激烈批评蒋介石，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批评赫尔利？赫尔利曾经批评中共，把中共和军阀并列，并且是当作整个党来批评的，为什么中共不能批评他？我们的批评是将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中决定对华政策的人物与其他人员分开，又将美国政府一部分错误政策与其他正确政策分开。只要美国政府的现行扶蒋反共政策有一天能改变，我们就将停止批评这个政策，否则是不可能停止的。以上意见，请向有关方面给予解释。

（二）给美共福斯特电[3]，除在《新华日报》发表（可去掉国民党三字）外，请翻成英文用快邮发寄美共。

毛泽东

午三十

---

[1] 徐，指徐冰（1903—1972），河北南宫人；张，指张明，即刘少文（1905—1987），河南信阳人。他们均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委员会负责人。

[2] 赫尔利，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3] 即《致福斯特电》。

批转太行区党委关于检讨统一领导问题的报告[1]

（1945年7月30日）

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转发各区党委仿照办理。

毛
午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在批转报告上的批语。太行区党委在报告中称：“（一）在上下级关系上，重要的有两个：认为历来军队欺压地方，地方上许多意见未能伸张。区党委患“软骨病”，不与撑腰。认为过去自我批评与批评风气不开展，党内干部不敢大胆活跃，上级即使有检讨，一则提不到思想观点上，二则又不敢公开揭露，开展群众性的检讨与批评，对下面呼声不注意。（二）在同级关系上，重要的反映是：党委会如何领导部队、军政委员会及政治部如何成为党委一个部门，有的嫌地委会讨论问题多，有的嫌讨论少，地方说军队不服从决议，军队说地方强调人民困难，不解决实际问题。其次是军队兼书记的，不懂如何领导党委会，有首长作风，书记兼政委的，是不懂如何做政委，成为形式，引起不尊重。”

胡军侵占边区问题及我军对策[1]

（1945年7月30日）

胡宗南军此次进攻分为四路，共侵占八路军防地四十四个村。东面第一路侵入陕甘宁边区三十四里，中间第二路侵入边区二十四里，中间第三路侵入边区十二里，西面第四路侵入边区十里，东西两端顽军相距四十五里。将上述情况在报上公布，并向各方交涉。

如彼方全部撤退，我方保证不超出边区原有防地一步。如爷台山不撤，难免一战，我方已调集相当兵力待命。

---

[1] 这是毛泽东致徐冰、刘少文电的主要内容。

对留守兵团工作的分析[1]

（1945年7月）

高干会批评了留守兵团，但是留守兵团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留守兵团是有缺点错误，但性质是属于联共（布）党史结束语中第五条的性质，不是路线错误。高干会给留守兵团所做的不恰当的结论应予纠正。高干会前后调动了许多留守兵团干部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在方法上是不对的。

---

[1] 毛泽东在枣园和萧劲光就留守兵团的工作进行了一番长谈。这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1945年，摄影师吴印咸在为毛泽东照相。

1945年，毛泽东和苏联、美国医生在一起。

准备应付必然到来的内战局面

（1945年8月4日）

郑、李、陈[1]：

午马电未支收阅。你们已估计到将来问题是很对的。

（一）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你们做准备工作，你们必须在这时间内准备一切，对付必然要到来的内战局面，方不至临事张皇，遭受挫折。

（二）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虑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你们应有几个根据地，其中鄂东、鄂南、鄂西、襄北，可就现根据地逐步发展之，大别、桐柏两处，现亦有相当基础，将来可集中主力夺取其一部或大部，作为主要根据地，而以其他各处为卫星。目前极力发展豫南力量，迅速与王、戴[2]打成一片，甚为必要。是否可将师部及区党委移至豫南，请加考虑。

---

[1] 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书记、新四军第五师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委员会副书记。

[2] 王，指王树声；戴，指戴季英，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三）加强群众工作，加强民兵，加强军训，加强财经工作及准备干部，此五项，望在扩大会上根据自己经验加以总结。此五项中，有几项是你们不甚擅长的，应加强调。军队不只是打仗一项任务，还有做群众工作及从事生产自给两项任务。这个问题，你们必须着重解决。军队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亦须于军训中很好解决。不是缺少做地方工作干部问题，而是军队帮助地方做群众工作一项任务强调不足之故，对此加以强调，转变军队作风，地方工作干部就会多起来。

（四）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

中央
未支

准备与王震王首道部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1]

（1945年8月4日）

广东区党委：

午陷电[2]悉。

（一）王震、王首道[3]率三千人七月从鄂南出发，现到湘潭衡山间，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4]率六千人现到河南，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

（二）你们应立即加强北江[5]及小北江各部之兵力及领导，并从东纵[6]派出一有力支队由一个得力同志率领附电台及大批地方工作干部，于半月至一个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二王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三）现到广宁四会间并向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推进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区委的电报。

[2] 指1945年7月30日中共广东区委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广东解放区现状的电报。

[3] 王震、王首道，当时分别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张启龙，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5] 北江，珠江北支，在广东北部，到三水与西江相通。

[6] 东纵，指东江纵队。

珠江纵队[1]主力，与你们有无电台联络，领导人是谁，兵力多少，该地区敌顽分布情形，均望即告。这一地区（小北江）极端重要，你们对之应加强领导。

（四）盟军登陆日寇北撤后，你们所处平原地区将处于极端困难地位，目前即应充分考虑此种情况，在精神上与部署上作周密而适当之准备。整个广东力量应就各部现在活动地区及其附近，选择适当地点，深入群众工作，训练干部，准备将来长期奋斗，方不至临时张皇失措，遭受挫折。这些地区为小北江地区、乐昌地区、南始地区、北江地区、东江地区、珠江地区、西江地区、中路地区[2]、高雷钦廉[3]地区、琼崖地区、潮汕地区等。每区均应有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之组织，极力和民众打成一片，坚决减租减息，解除民生痛苦，准备长期奋斗，不怕内战，对国民党绝不让步。每区均应有电台联络并多备无线电器材。上述各区中应有一区为中心根据地，作为建立广东军区机构及区党委所在地。此区以在何处为宜，望考虑电告。

（五）中央除给你们干部二百人（由伍晋南[4]率领随文年生部队南下）及派王震等至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和你们配合作战外，一切依靠你们及各区同志自力更生，依靠人民，独立奋斗，发扬创造力，

---

[1] 珠江纵队，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1945年1月，由珠江指挥部所属武装改编成立，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梁嘉任。

[2] 中路地区，指广东台山、鹤山、开平、新会、恩平、高明、新兴、阳江、阳春等县。

[3] 高雷钦廉，指高州、雷州、钦州、廉州，均为旧府名，今分别为广东高州县、海康县和广西钦州市、合浦县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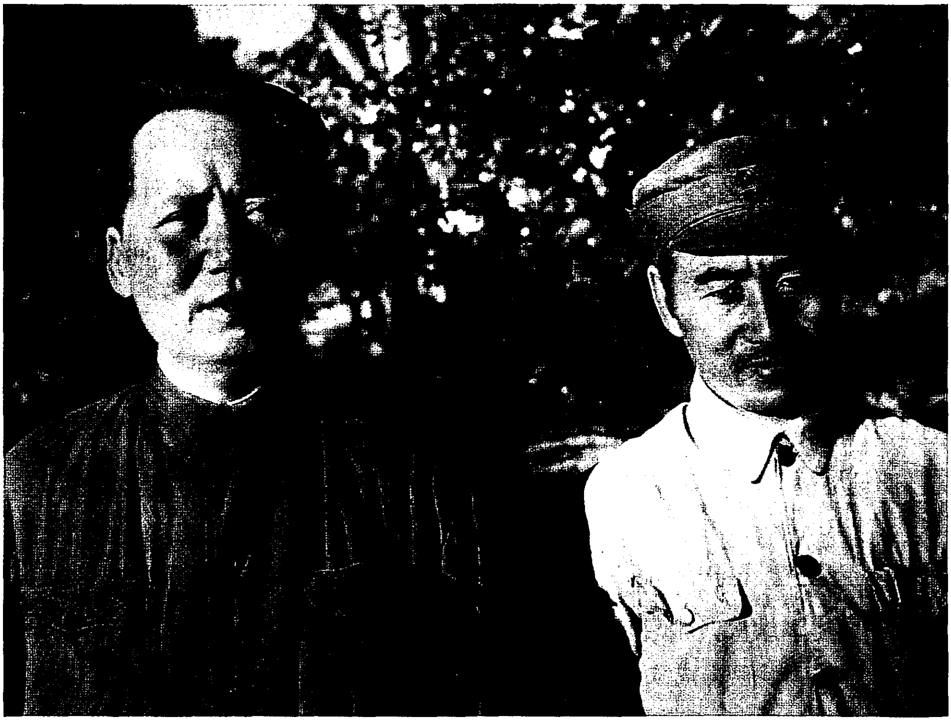
[4] 伍晋南，参加南下支队前，曾任陕甘宁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副主任。

绝对不要依赖外援，即王震部亦是配合作用，不可存依赖心理。

（六）你们必须将上述方针在半年内部署完毕。尤其注重精神准备，要有不怕一切困难之精神。

中央

未支



1945年，毛泽东和林彪在延安。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5年8月4日）

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二十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复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条件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

（1945年8月6日）

山东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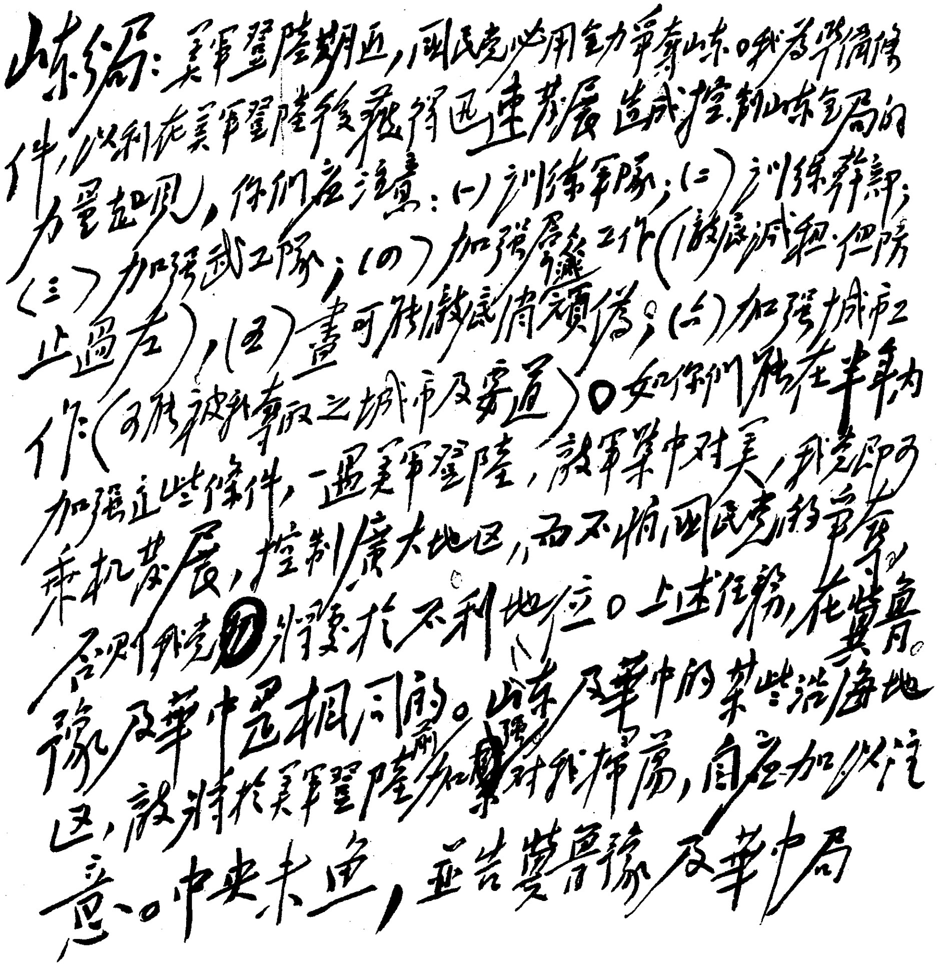
美军登陆期近，国民党必用全力争夺山东。我为准备条件，以利在美军登陆后获得迅速发展，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力量起见，你们应注意：（一）训练军队；（二）训练干部；（三）加强武工队；（四）加强群众工作（彻底减租，但防止过左）；（五）尽可能彻底消灭顽伪；（六）加强城市工作（可能被我夺取之城市及要道）。如你们能在半年内加强这些条件，一遇美军登陆，敌军集中对美，我党即可乘机发展，控制广大地区，而不怕国民党的争夺，否则我党将处于不利地位。上述任务，在冀鲁豫及华中是相同的。山东及华中的某些沿海地区，敌将于美军登陆前加强对我扫荡，自应加以注意。

中央
未鱼

并告冀鲁豫及华中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6日，系毛泽东起草本文日期，正式发出日期为8月10日。



山东分局：美军登陆期近，国民党必用全力争夺山东。我为准备条件，以利在美军登陆后放手迅速发展造成控制山东全局的力量起见，你们应注意：（一）训练军队；（二）训练干部；（三）加强武工队；（四）加强群众工作（放手减租，但防止过左）；（五）尽可能做物资准备；（六）加强城市工作（可能被我夺取之城市及要道）。如你们能在半年内加强这些条件，一遇美军登陆，敌军集中对美，我党即可乘机发展，控制广大地区，而不怕国民党的争夺，否则我党将处于不利地位。上述任务，在冀鲁豫及华中是相同的。山东及华中的某些沿海地区，敌将于美军登陆前加紧对我摧残，自应加以注意。中央未鱼，并告冀鲁豫及华中局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分局的指示的手稿。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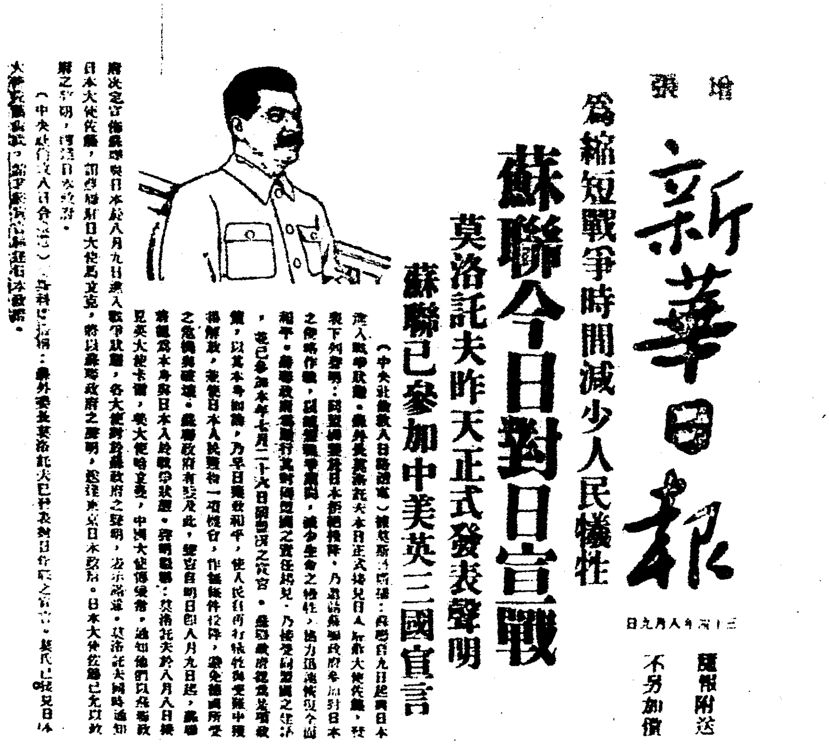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9日）

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解放区的巩固工作仍应注意。今冬明春，应在现有一万万人民和一切新解放区的人民中，普遍地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组织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加强民兵工作，加强军队的纪律，坚持各界人民的统一战线，防止浪费人力物力。凡此一切，都是为着加强我军对敌人的进攻。全国人民必须注意制止内战危险，努力促成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

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



增號

新華日報

三十四年八月九日

隨報附送
不另加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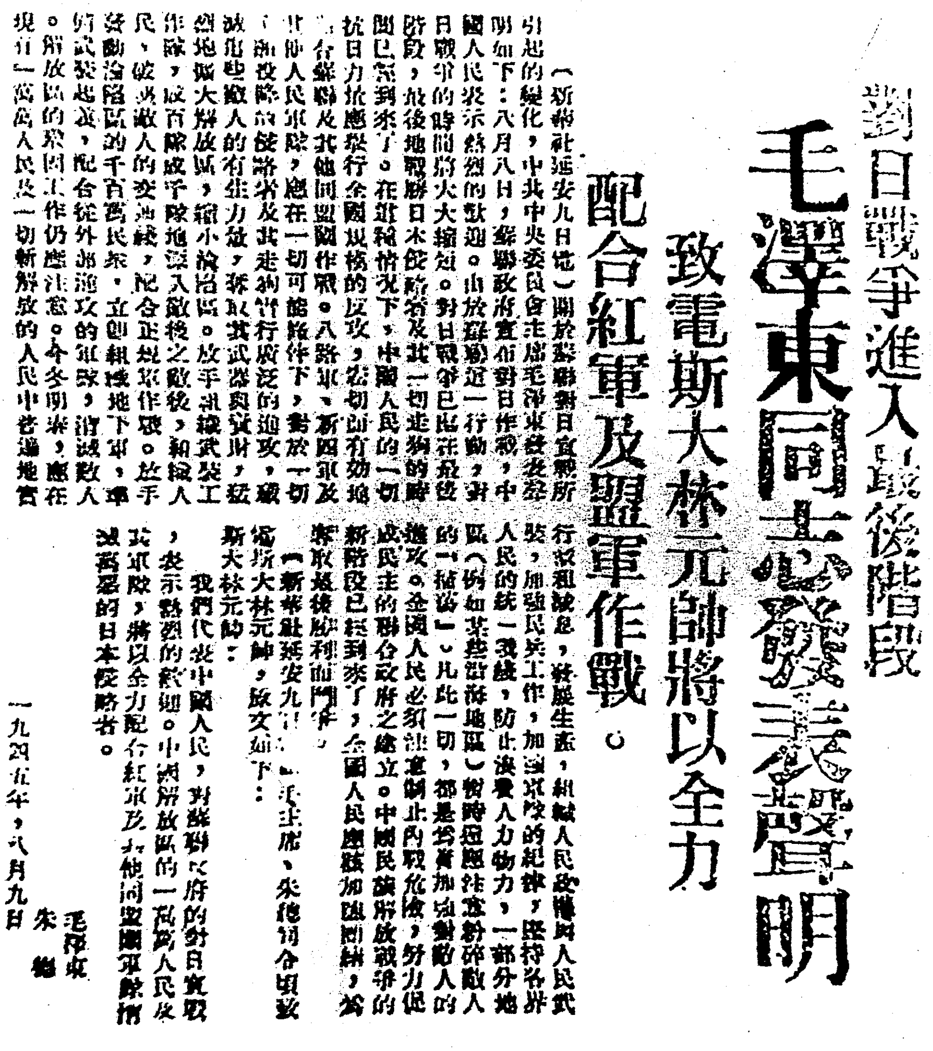
爲縮短戰爭時間減少人民犧牲

蘇聯今日對日宣戰

莫洛託夫昨天正式發表聲明

蘇聯已參加中美英三國宣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图为当时《新华日报》刊发的号外。



對日戰爭進入最後階段

毛澤東同志發表聲明

致電斯大林元帥將以全力

配合紅軍及盟軍作戰。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關於蘇聯對日宣戰所引起的變化，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表聲明如下：八月八日，蘇聯政府宣布對日作戰，中國人民表示熱烈的歡迎。由於蘇聯這一行動，對日戰爭的時間將大大縮短。對日戰爭已處在最後階段，最後地戰勝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時間已經到來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應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蘇聯及其他同盟國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應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對於一切不願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實行廣泛的進攻，殲滅這些敵人的有生力量，奪取其武器與資財，猛烈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放手組織武裝工作隊，成百隊成千隊地深入敵後之敵後，組織人民，破壞敵人的交通綫，配合正規軍作戰。放手發動淪陷區的千百萬民衆，立即組織地下軍，準備武裝起義，配合從外部進攻的軍隊，消滅敵人。解放區的鞏固工作仍應注意。今冬明春，應在現有一萬萬人民及一切新解放的人民中普遍地實行減租減息，發展生產，組織人民政權與人民武裝，加強民兵工作，加強軍隊的紀律，堅持各界人民的統一戰綫，防止浪費人力物力，一部分地區（例如某些游擊地區）暫時應注意粉碎敵人的「掃蕩」。凡此一切，都是為着加強對敵人的進攻。全國人民必須注意制止內戰危險，努力促成民主的聯合政府之建立。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新階段已經到來了，全國人民應該加強團結，為奪取最後勝利而鬥爭。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毛主席、朱總司令頃致電斯大林元帥，原文如下：

斯大林元帥：

我們代表中國人民，對蘇聯政府的對日宣戰，表示熱烈的歡迎。中國解放區的一萬萬人民及其軍隊，將以全力配合紅軍及其他同盟國軍隊消滅萬惡的日本侵略者。

毛澤東
朱　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解放日报》关于毛泽东发表声明的报道。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声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广泛的进攻。图为八路军收复山海关。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致斯大林电[1]

（1945年8月9日）

斯大林元帅：

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同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为欢迎苏联对日宣战给斯大林的电报。

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8月9日）

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们的任务有四项，即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现在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的。具体如何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配备干部，发展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考虑一个计划。防御的问题在解放区一般地是不存在了，只有局部还有敌人的“扫荡”，因此我们应广泛发展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我们要对日本军队放手进攻，这不会犯冒险主义，要学习较大规模的作战。如果在战略上今天还不放手就会犯错误，当然战役上要谨慎。日本交防给蒋介石，这种接防一般地是难于制止的，中间是蒋，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我们在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方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了地方，扩大了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在第二时期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大城市内中央

---

[1]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在杨家岭召开，会议通过分别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的讨论意见修改后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会议着重讨论时局问题。这是毛泽东关于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任务讲话的一部分。

管。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准备继续国共谈判，国共谈判要在国际的基础上（不是一切）来解决。苏联参战后，美国的政策可能有某些改变，但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随着日本垮台而增加。

争取一切条件准备对付内战[1]

（1945年8月10日）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众，准备对付内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并告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书记。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陈少敏，当时任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副书记。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1]

（1945年8月11日）

一、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2]。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二、在此情况下，我党任务分为两阶段：

（甲）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为此目的，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面。但各地均应保留必要数量之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放手提拔地方干部带兵，用以保卫地方，民兵枪支必须保留，决不可一切皆集中。在此阶段内，陕甘宁、晋绥、太岳、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将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转交对日作战的中、美、英、苏4国政府，要求投降。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4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向公众宣布无条件投降。

南、湖北、皖中、浙西、湘粤等地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其余均用于解决敌伪。某些有特殊情况的地方，中央已另发个别指示。

（乙）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其数量与规模依情况决定。一部分地区如江南、豫、鄂、晋、绥[1]等地，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

三、迅速加强城市工作，特别加强我党可能夺取与必须夺取的那些城市的工作。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这些城市里去，迅速学会管理城市中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人参加城市工作，解决维持城市秩序，坚决镇压反动派的反抗，但不可轻易杀人。兵力使用与干部使用应有重心，否则将一事无成。

四、掌握政策，任何行动不要脱离群众。扩兵是必要的，但决不可超过人民财力负担的限度。收集物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只顾军队，不顾人民，尤不可损害人民利益。攻破据点、占领城市应有统一的指挥与严格的纪律。迅速训练干部，迅速加强军队政治工作。

五、我军人力资源是民兵，保卫乡村也是民兵，必须迅速扩大民兵组织。

六、今冬明春，必须在一万万人民中，放手发动减租（已经减好的照旧）。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减租，放手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地方政府与提拔地方干部，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基本群众中的基础，迅速巩固一切新解放区。但是，绝对不可损害中农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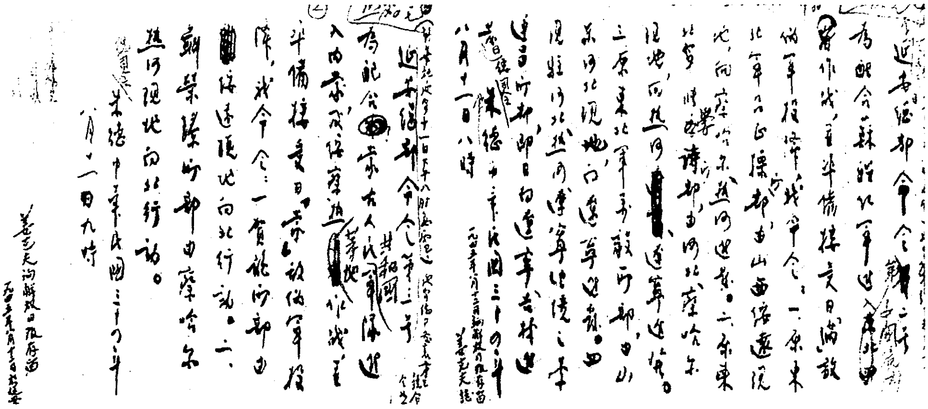
---

[1] 绥，指绥远，即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中农也是基本群众）；富农除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外，不应加以打击；地主须使之可以过活，没收分配土地是过早的。某些地区已经分配者不再变动，但对地主必须设法救济，对富农必须设法拉拢，对中农受损害者必须补偿损失。这些方面如不注意，将破裂农村统一战线，使我党陷于孤立，有利于国民党。

七、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科比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八、望各地本此方针，参酌地方情况，考虑执行之。



1945年8月10日和11日，八路军总部连发7道反攻命令。图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朱德发布的第二号、第三号反攻命令。

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1]

（1945年8月11日）

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八路军游击第一支队（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华中准备对付内战的部署[1]

（1945年8月12日）

华中局：

真电[2]悉。在国共力量对比下，华中部署改变如下：（一）江南[3]力量就现地向四周扩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组织仍取隐蔽政策。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内战失利时准备转到浙南。（二）江南在内战胜利（打几个大胜仗）后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此种可能很大。但如在内战中失利，不可能在现地坚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指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集中兵力占领南京，彻底消灭苏中地区伪军的部署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1）由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占领南京，并准备迎击来犯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部队。（2）由新四军第七师抽3个团南渡长江夺取芜湖。（3）以新四军苏浙军区浙东部队主力控制上海、杭州段铁路线，阻止国民党顽军进占上海，并以浦东部队开入上海。（4）对上海、杭州2城，除派去部分主力部队外，主要采取发动群众的方式夺占之。（5）以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控制浦口，第八旅协同苏浙军区等部彻底解决苏中一带伪军，第十旅协助地方收复淮阴、涟水，并向淮北机动。（6）以新四军第二师、第四师夺取徐州以南至浦口段铁路线。电报还建议由八路军担任收复徐州的任务。

[3] 指位于长江以南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未到职）。

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此点使少数领导人作精神准备，决不退回江北，或在内战发生后，先派小部开入闽浙赣起钳制作用。（三）江北力量全部留江北，不再派兵去江南，任务为力争占领津浦路[1]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准备与李品仙、何柱国[2]作战，并以有力部队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

中央

十二日

---

[1]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 李品仙、何柱国，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

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城市[1]

（1945年8月12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

依据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确定我党必须力争占领之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如下：（一）太原（含）以北之同蒲路，（二）归绥[2]（含）以东之平绥路[3]，（三）北宁路[4]，（四）正太路[5]，（五）道清路[6]，（六）白晋路[7]，（七）德石路，（八）郑州以北之平汉路[8]，（九）郑州以东之陇海路，（十）津浦路[9]，（十一）胶济路（美军如在青岛登陆，将占去其东段），以上应力争占领之。平绥路西端（包头），太原以南之同蒲路，郑州以西之陇海路及以南之平汉路，长江以南各要道及大城市，根本不作占领计划，而置重点于占领广大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区党委的电报。

[2]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3] 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4] 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5]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6] 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清化镇的铁路。

[7] 白晋路，指当时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8]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9]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乡村，并须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之进攻。在城市及要道未取得前，乡村仍是我党的根据地。

中央

八月十二日

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迎接外蒙军及红军[1]

（1945年8月12日）

我绥远部队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2]，我晋冀、平北、冀东三区部队务速分兵北进，迎接外蒙军及红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绥、晋察冀两分局电的部分内容。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他率领自五原东进部队中的4个军，在占领归绥后继续向张家口东进。

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1]

（1945年8月12日）

万毅东北军[2]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往东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山东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2] 万毅，原东北军第一一一师旅长，中共秘密党员。后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军，接受八路军第一一五师领导，万毅任第一一一师师长。1943年第一一一师改称滨海支队。万毅当时任山东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队长。

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1]

（1945年8月12日）

鄂豫皖中央局成立后，河南区党委受鄂豫皖中央局之领导。

---

[1] 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鄂豫皖中央局（10月30日改称为中原局），郑位三为代理书记。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及河南区党委电的部分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

（1945年8月13日）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正如毛泽东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要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这就是说，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决定胜败的斗争，就是从抗日战争结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内容，这个历史时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一再撕毁和平的协议，发动了空前的反革命的大内战，企图消灭人民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只经历了4年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战胜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

打下去了[1]。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2]，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3]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

---

[1]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0日，蒙古政府对日宣战，苏联红军从海陆两方面，进入中国东北和朝鲜，迅速击溃了日本的关东军。苏蒙联军越过内蒙古沙漠，进入热河和察哈尔。日本政府被迫于8月10日发出乞降照会，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东军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是日本的战略总预备队。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妄图依靠这支军队，凭借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有利战略地位，进行长期的战争。苏联的参战，使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承认失败，接受投降。

[2] 关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3次反共高潮的经过，参见《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3] 这里所说的“山”，即峨眉山，实际上是泛指中国西南、西北部的山区。自1938年武汉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自己和他所指挥的很大一部分部队就躲在这些山区里，坐观解放区军民在敌后同日本侵略者作艰苦的斗争。

在山上，他在水边[1]；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抗战，英勇奋斗，大后方[2]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前面有给他守卫的，这就是解放区，就是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时间——八年零一个月，地方——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这些条件是我们给他的。没有我们，他是旁观不成的。那末，“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

[1] 抗日战争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多数建立在山区。当时，蒋介石的统治中心是在沿江、沿海的大城市。所以毛泽东说一在“山上”，一在“水边”。

[2] 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军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西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大后方”。

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党中央再三再四地讲明内战危险，使全国人民、全党同志和党所领导的军队，都处于有准备的状态中。

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军阀、地主、土豪劣绅、帝国主义，手里都拿着刀，要杀人。人民懂得了，就照样办理。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六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三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在这宽一百里、长二十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1]。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

---

[1] 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所部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突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攻击。随后又以预备第三师和暂编第十五师加入进攻。边区部队于7月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国民党军占领上述地区后，继续向边区腹地进犯。边区部队于8月8日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自卫反击，收复了爷台山地区。

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宽一百里、长二十里的地方。七月底放弃，八月初收回。在皖南事变以后，有一次，国民党的联络参谋问我们的动向如何。我说，你天天在延安还不清楚？“何反我亦反，何停我亦停”[1]。那时候还没有提出蒋介石的名字，只提何应钦。现在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照他的办法办理。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去年有个美国记者问我：“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我说：“人民给的。”如果不是人民给的，还有谁给呢？当权的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是不承认我们的。我们参加国民参政会，按照参政会条例的规定，是以“文化团体”的资格。我们说，我们不是“文化团体”，我们有军队，是“武化团体”。今年三月一日蒋介石说过：共产党交出军队，

---

[1] 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派到延安做联络工作的人员。“何”，指何应钦。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8日，蒋介石曾经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先后发出“皓”“齐”两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接着，国民党反动派即制造了袭击新四军北移部队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在这里指何应钦为发动反共高潮的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实际上就是指蒋介石。

才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这句话，现在还适用。我们没有交出军队，所以没有合法地位，我们是“无法无天”。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1]。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

[1] 参见《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于人民，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要以为胜利的果实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里。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着美国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太原以北的同蒲，平绥中段，北宁，郑州以北的平汉，正太，白晋[1]，德石，津浦，胶济，郑州以东的陇海，这些地方的中小城市是必争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靠得住落在人民手里的有没有呢？有的，河北、察哈尔、热河[2]、山西的大部、山东、江苏的北部，这些地方的大块乡村和大批城市，乡村和乡村打成一片，上百的城市一块，七八十个城市一块，四五十个城市一块，大小三、四、五、六块。什么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这是靠得住的，我们的力量能够取得这批胜利果实。得到了这批果实，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历史上，我们只在一九三一年下半年打破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后，江西中央区联合起来有过二十一个县城[3]，但是还没有中等城市。二十一个小城市联在

---

[1] 白晋，指当时山西省东南部由祁县的白圭到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

[2] 察哈尔，原来是一个省，1952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热河，原来也是一个省，1955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3] 这里所说的21个县城，是指江西省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省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

一起，最多的时候有过二百五十万人口。依靠着这些，中国人民就能奋斗那样久的时间，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粉碎那样大的“围剿”。后来我们打输了，这不能怪蒋介石，要怪我们自己没有打好。如果这一次，大小城市几十个联成一块，有了三四五六块的话，中国人民就有了三四五六个大于江西中央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形势就很可观了。

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

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

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陕甘宁边区南面有条介子河。介子河南是洛川，河北是富县。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国民党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人民没有组织起来，龌龊的东西多得很。我们有些同志就是相信政治影响，以为靠着影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是迷信。一九三六年，我们住在保安[1]。离保安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个地主豪绅的土围子。那时候党中央的所在地就在保安，政治影响可谓大矣，可是那个土围子里的反革命就是死不投降。我们在南面扫、北面扫，都不行，后来把扫帚搞到里面去扫，他才说：“啊哟！

---

[1] 保安是当时陕西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即现在的志丹县。中共中央从1936年7月初至1937年1月上旬驻在保安，以后迁往延安。

我不干了。”[1]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扫帚到了，政治影响才能充分发生效力。我们的扫帚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手里拿着扫帚就要研究扫的办法，不要躺在床上，以为会来一阵什么大风，把灰尘统统刮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绝不作空想。中国有句古话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2]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但是，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曾经有个美国人向我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

---

[1] 这里说的土围子，是指保安县西南的旦八寨。该寨有200余户人家，地形极为险要。当地地主豪绅兼民团团总曹俊章率反动武装百余人，长期盘踞该寨。红军多次围攻未能打下。1936年8月，红军一面用地方武装围困，一面争取寨内基本群众，瓦解寨内敌军。同年12月，曹俊章率少数人员逃跑，旦八寨获得解放。

[2] 参见明末清初人朱柏庐所著《治家格言》。

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1]我说：“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同志们，这个美国人的话是吓人的。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他们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苏联出兵了，红军来援助中国人民驱逐侵略者，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影响，是不可估计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想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2]。但是扫不掉，没有那样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

---

[1] 这里所说的“美国人”，是指美军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这个观察组是当时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队在1944年取得中国共产党同意后派往延安的。

[2]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美国和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就此大肆宣传，说什么日本政府所以投降，是因为害怕美国原子弹的缘故。他们想用这种宣传来贬低苏联参战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1]。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我们队伍中的唯武器论，单纯军事观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作风，个人主义思想，等等，都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

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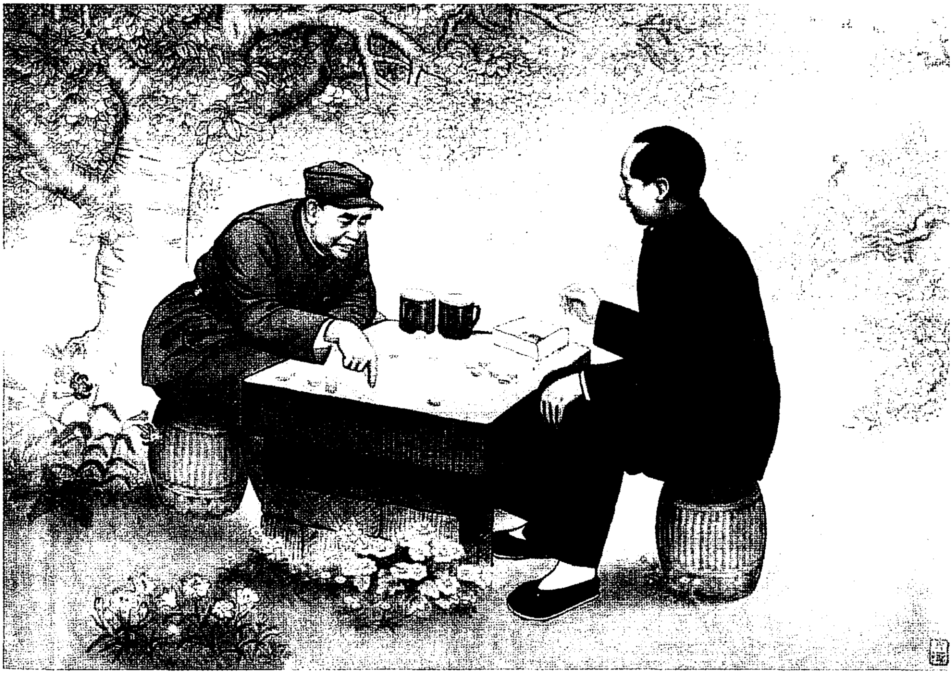
---

[1] 蒙巴顿（1900—1979），当时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指挥官。1945年8月9日，他发表谈话，欢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并说：“认为原子弹会停止远东战争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言論集
毛澤東抗戰言論集
毛澤東救國言論選集

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部分）。

1945年，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研究作战方针。



《毛主席对弈图》（中国画）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1]

（1945年8月13日）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说，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于八月十日在延安总部所发表的限令敌伪投降的命令[2]，是一种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

[2] 1945年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本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全文如下：“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下列命令：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依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前，率队反正，听候编遣，过期即须全部缴出武装。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接着，在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6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解放区的解放军坚决地执行了这些命令，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唐突和非法之行动”。这种评论，荒谬绝伦。根据这种意见，可以逻辑地解释为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1]和敌人投降的意向，下令给所属部队促使敌伪投降，倒反错了，应该劝使敌伪拒绝投降，才是对的，才算合法。无怪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蒋介石，在敌人尚未真正接受投降之前，敢于“命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束手让敌人来打。无怪这同一个法西斯头子，又敢于“命令”所谓地下军（实际上就是实行“曲线救国”[2]的伪军和与敌伪合流的戴笠系特务[3]）和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而不许解放区抗日军队向敌伪“擅自行动”。这样的敌我倒置，真是由蒋介石自己招供，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除异己的全部心理了。可是

---

[1] 指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3国在波茨坦会议过程中发表的促令日本投降的公告。其主要内容为：盟军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肃清；日本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的军事工业必须拆除；日本的战犯必须交付审判；开罗宣言必须实施，即日本必须放弃前所掠取的土地，如朝鲜，中国的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地，日本的领土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和其他小岛之内；同盟国军队占领日本直到日本民主政府建立以后为止。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亦签字于该公告。

[2] “曲线救国”，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内一些顽固派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变成伪军、伪官，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并将这种叛国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

[3] 戴笠系特务，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为首的特务系统。“军统”成立于1938年8月，其前身是1932年4月成立的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军统”是国民党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也对国民党军队、警察及行政机关等进行监视和控制。

中国解放区的人民抗日军队，绝不会中此毒计。他们知道：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正是坚决地执行波茨坦公告第二项的规定：“对日作战，直至其停止抵抗为止。”而蒋介石的所谓“命令”，正是违反了他自己签字的波茨坦公告。只要拿这一比，就知道谁是不“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了。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其实，国民党反动派是蠢得可怜的。他们找了朱德总司令命令敌伪投降缴械当作借口。这难道也算得一个聪明的借口吗？不，这样来找借口，只足以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把敌伪看得比同胞还可亲些，把同胞看得比敌伪还可恨些。淳化事件[1]，明明是胡宗南军队攻入陕甘宁边区，挑拨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却说是中共的“谣言攻势”。淳化事件这个借口，好容易被国民党反动派找着了，却被中外舆论界一下子识破，于是又说八路军、新四军不该要敌伪缴枪了。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受尽了蒋介石和日本人夹击围攻的苦楚，现在抗战瞬将结束，蒋介石又在暗示日本人（加上他亲爱的伪军），叫他们不要向八路军、新四军缴枪，说是只能缴给我蒋介石。蒋介石剩下一句话没有说，这一句就是：好使我拿了这些枪杀共产党，并破坏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不是吗？叫日本人缴枪给蒋介石，叫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这会有什么结果呢？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以宁渝合

---

[1] 淳化事件，即1945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等地的事件。

流[1]、蒋伪合作，去代替“中日提携”、日伪合作；以蒋介石的反共建国，去代替日本人、汪精卫的反共建国。这难道还不是违背波茨坦公告吗？抗战一旦结束，内战危险立即严重威胁全国人民，这一点难道还有疑义吗？现在我们向全国同胞和世界盟邦呼吁，一致起来，同解放区人民一道，坚决制止这个危及世界和平的中国内战。

究竟谁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呢？中国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在国民党政府毫无接济又不承认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拥护，得以独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和一万万以上的人民，抗击着侵华敌军百分之五十六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没有这一个军队，中国绝无今天的局面！实在说，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

我们要向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民宣布：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中国人民要求，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有在朱德总司令指挥之下，直接派遣他的代表参加四大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和军事管制日本的权利，并且有参加将来和会的权利。要不是这样做，中国人民将认为是很不恰当的。

---

[1] “宁”指当时南京汉奸集团的伪政权，“渝”指当时重庆的蒋介石政权。“宁渝合流”，是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与南京方面以及重庆蒋介石方面共同策动的一个政治阴谋。

在战役上须占绝对优势不可浪打[1]

（1945年8月13日）

华中局：

十二日电[2]悉。同意你们集中主力打李品仙何柱国[3]，只以若干可能的力量协助八路夺取陇海[4]与徐州。在打李、何时，不可浪打，不可打得过早，致打成对峙，或仅击溃之。必须有充分兵力，在战役上占绝对优势，并有充分动员准备，待敌进至有利于我之地点，以包围歼灭其一路，再打其余。

中央

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指1945年8月12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关于集中新四军第二、第三和第四师全部主力，同国民党军第十战区李品仙、何柱国部在津浦路西作战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3] 李品仙、何柱国，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

[4] 陇海，这里指陇海铁路的连云港至徐州段。

河南部队目前的任务[1]

（1945年8月13日）

河南区党委，文、张[2]，并告郑、李[3]：

同意文张建议，在河南收复失地，归王、戴[4]统一指挥。整个河南部队任务，除韩钧[5]部在原地区发动群众坚持外，其余应展开行动，东与水东[6]联系，南与五师联系，将嵩山[7]、水东、五师迅速打成一片。目前作战仍是着重于歼灭伪顽薄弱部，广占乡村与中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河南区委等的电报。

[2] 文、张，指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和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3] 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4]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韩钧，当时任八路军河南军区第二支队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6] 水东，指1938年黄河改道后陇海铁路以南、新黄河以东的河南省东部地区。中国共产党曾在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水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水东军分区。1945年1月，水东军分区改为冀鲁豫军区第十二军分区。

[7] 嵩山，位于河南登封县北部。当时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在这一带活动，并成立河南军区第一军分区，皮定均任司令员，徐子荣任政治委员。

城镇，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包围大城及要道，设法劝令敌伪投降。具体部署望告。冀鲁豫已派一万二千人南下至水东，连水东原有八千人共二万人，为夺取新乡、开封及其附近广大地区而斗争，望你们速与他们配合行动。

中央军委
十三日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1]

（1945年8月）

八月十三日的电报

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此外，还有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一类的话。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据中央社重庆十一日电是这样说的：“最高统帅部今日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

---

[1] 这两个电报是毛泽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当时蒋介石政府，在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武力援助下，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并且借口受降调运大军向解放区进逼，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毛泽东写第一个电报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教育全国人民警惕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在第二个电报里，进一步揭穿了蒋介石集团准备内战的阴谋，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制止内战的6项主张。为着同样的目的，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两篇评论，即本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由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这种决不被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吓倒的坚定的果断的立场，使解放区和解放军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并且使蒋介石在国内外反对中国内战的强大政治压力之下，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和平姿态，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举行和平谈判。

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我们认为这两个命令是互相矛盾的。照前一个命令，“驻防待命”，不进攻了，不打仗了。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苏美英的军队也在每时每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照后一个命令，我们认为是很好的。“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这才像个样子。可惜你只把这个命令发给你的嫡系军队，不是发给我们，而发给我们的另是一套。朱德在八月十日下了一个命令给中国各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正是“加紧作战”的意思。再有一点，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日本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难道这样不是很好的吗？无疑这是很好的，无疑这是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可是“驻防待命”一说，确与民族利益不符合。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八月十六日的电报

在我们共同敌人——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但尚未实行投降之际，我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和二亿六千万人民，特向你提出下列的声明和要求。

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结束的时候，我提起你注意目前中国战场上的这样的事实，即在敌伪侵占而为你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地区中，违背你的意志，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解放了过一万万的人民，组织了过一百万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区内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1]，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亿六千万人口）中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伪。在作战中，我们至今还抗击和包围着侵华（东北不在内）日军的百分之六十九和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而你的政府和军队，却一向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方针，对于我们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以九十四万大军包围和进攻它们。中国解放区全体军民虽受尽了敌伪和你的军队两方面夹击之苦，但丝毫未减弱他们坚持抗战、团结和民主的意志。中国解放区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向你和你的政府提议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以便停止内部纷争，动员和统一全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证战后的和平，但都被你和你的政府所拒绝。凡此一切，我们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现在敌国投降将要签字了，而你和你的政府仍然漠视我们的意见，并且于八月十一日下了一个非常无理的命令给我，又命令你的军队以收缴敌人枪械为借口大举向解放区压迫，内战危机空前严重。凡此种种，使得我们不得不向你和你的政府提出下列的要求：

---

[1] 19个大块的解放区，指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皖中、浙东、广东、琼崖、湘鄂赣、鄂豫皖、河南。

一、你和你的政府及其统帅部，在接受日伪投降、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的时候，我要求你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你和你的政府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如果协定和条约中，有涉及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之处，而未事先取得我们同意的时候，我们将保留自己的发言权。

二、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1]，接受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的一切规定。我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给中国解放区军队，叫他们努力进击敌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八月十五日，我已下令给敌军统帅冈村宁次[2]，叫他率部投降，但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干涉其他区域。我的这些命令，我认为是非常合理、非常符合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

三、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国接受敌人的投降，和处理敌国投降后的工作。

四、中国解放区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有权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将来关于处理日本的和平会议和联合国会议。

五、请你制止内战。其办法就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由解放区军队接受其投降，你的军队则接受被你的军队所包围

---

[1]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苏、中、美、英4国请降。11日，4国政府复文规定，“日本一切陆海空军当局以及彼等控制下之一切部队（不论其在何处）”，必须“停止积极活动，缴出武器”。

[2] 冈村宁次当时是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的敌伪军的投降。这不但是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了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做，势将引起不良后果。关于这一点，我现在向你提出严重的警告，请你不要等闲视之。

六、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

此外，我在八月十三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你，回答你在八月十一日给我的命令，谅你已经收到了。我这里重复声言，你那个命令是完全错误的。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打敌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还只在口头上宣布投降，并没有在事实上投降，投降协定尚未签字，投降事实尚未发生。我的这个意见，和英美苏各同盟国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给我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缅甸前线英军当局宣布：“对日战争仍在进行中。”美军统帅尼米兹[1]宣布：“不仅战争状态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毁灭结果的战争，必须继续进行。”苏联远东红军宣布：“敌人必须粉碎，不要留情。”八月十五日，红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大将还作了下列声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发表的日本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给武装部队关于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尚未发布，而且日本军队还在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日本实际投降尚未发生。我们只有在日皇命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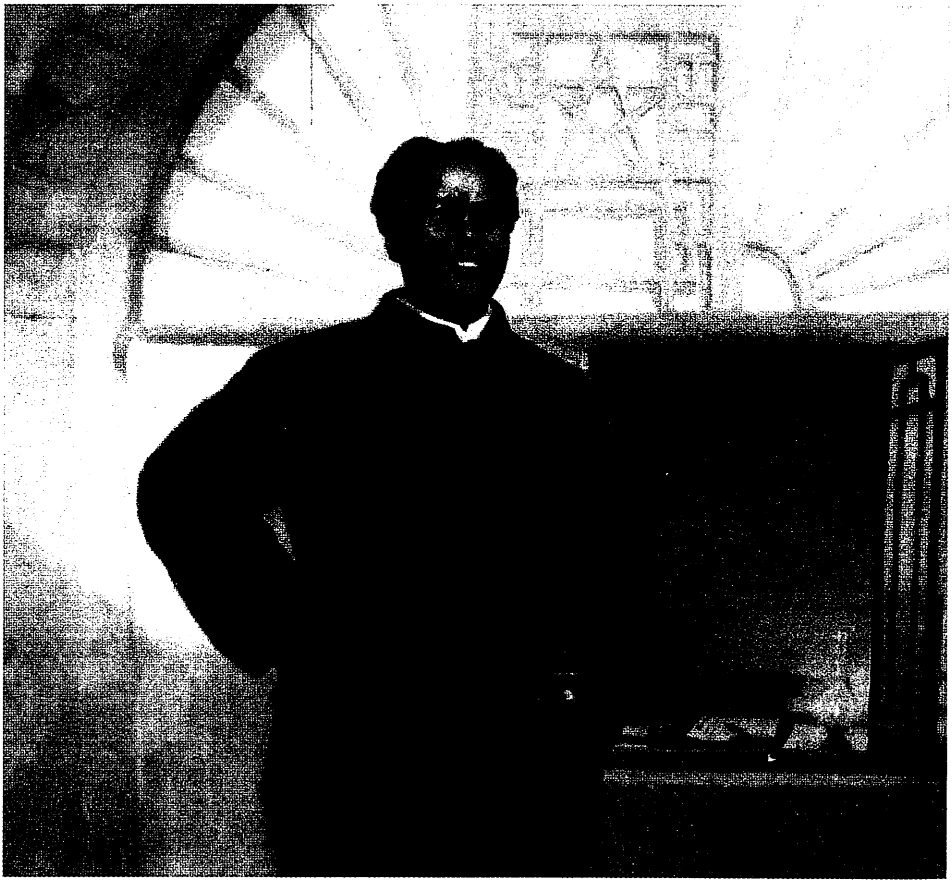
---

[1] 尼米兹（1885—1966），美国海军上将。当时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兼太平洋战区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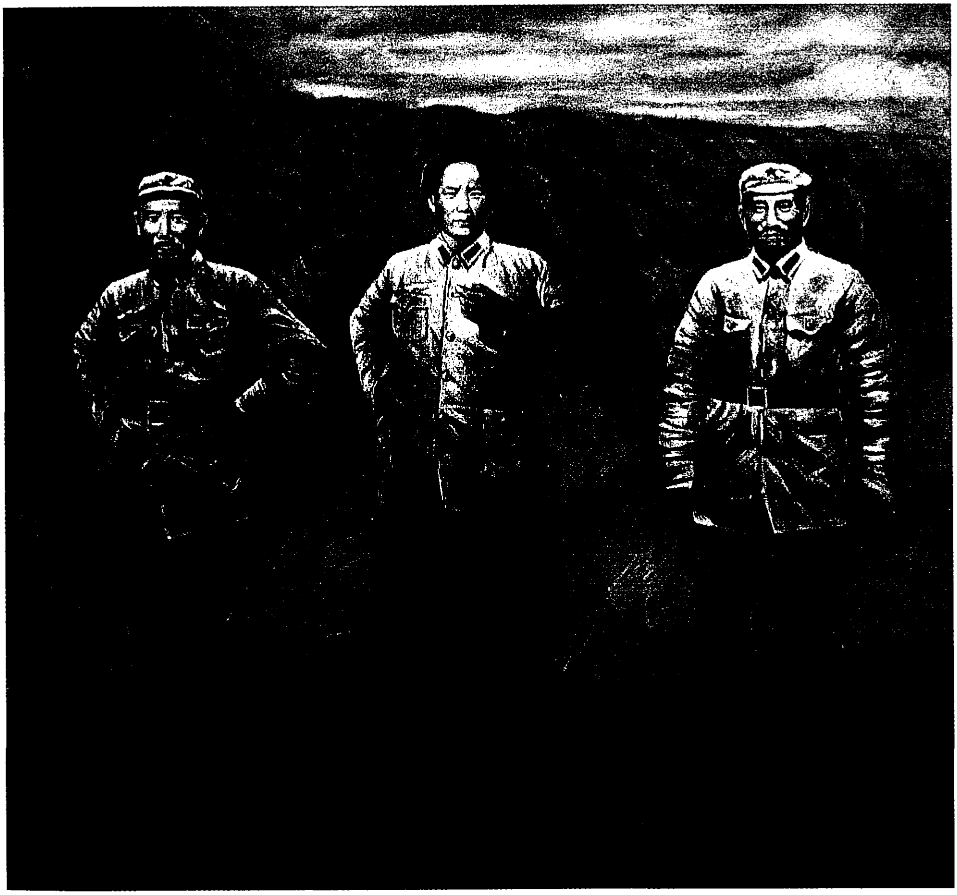
军队停止敌对行为和放下武器，而且这个命令被实际执行的时候，才承认日本军队投降了。鉴于上述各点，远东苏军将继续进行对日攻势作战。”由此看来，一切同盟国的统帅中，只有你一个人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我认为你的这个错误，是由于你的私心而产生的，带着非常严重的性质，这就是说，你的命令有利于敌人。因此，我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坚决地彻底地反对你的命令，直至你公开承认错误，并公开收回这个错误命令之时为止。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

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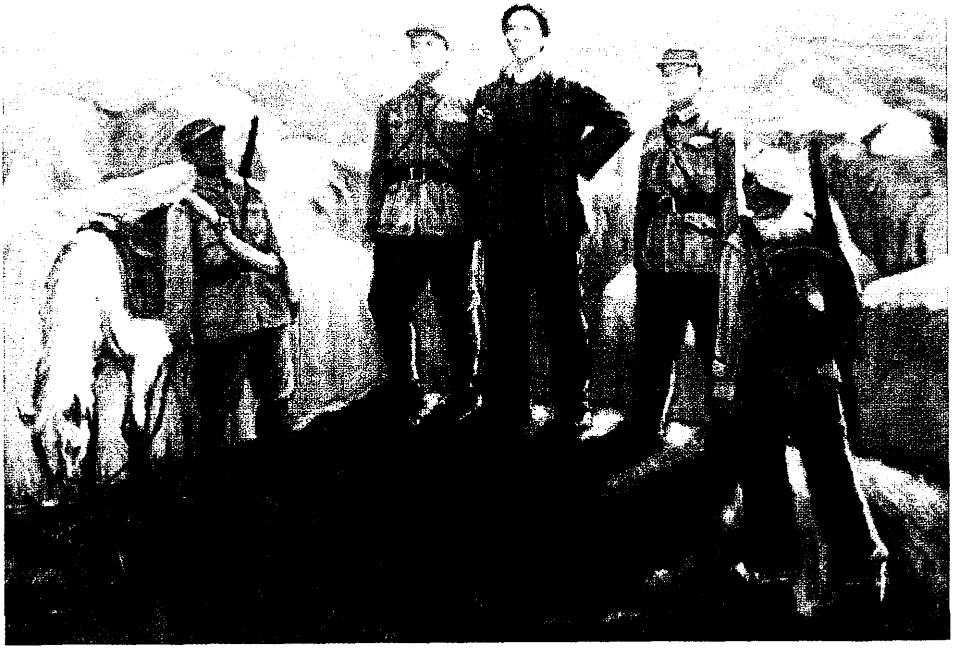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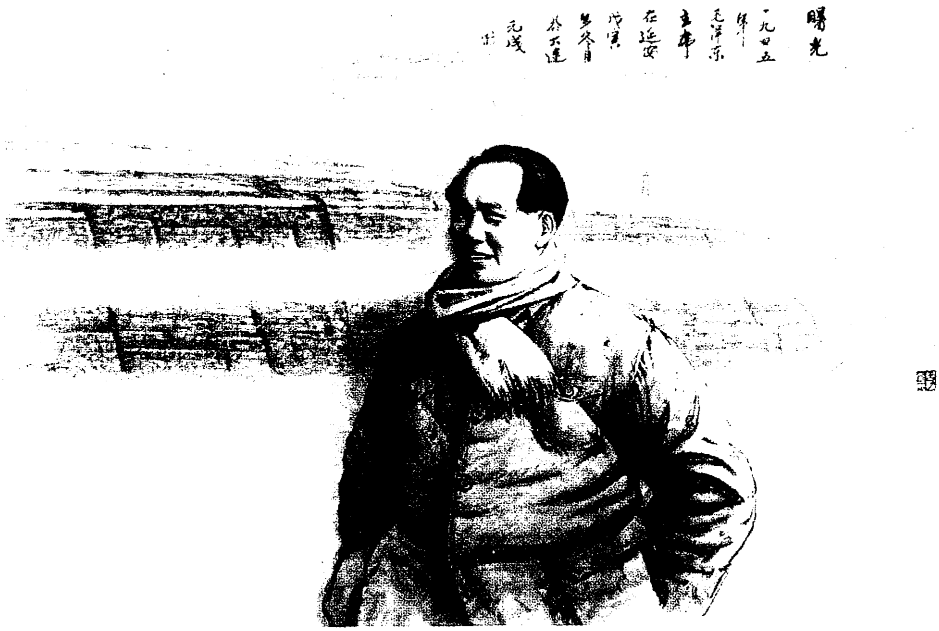
《延安曙光》（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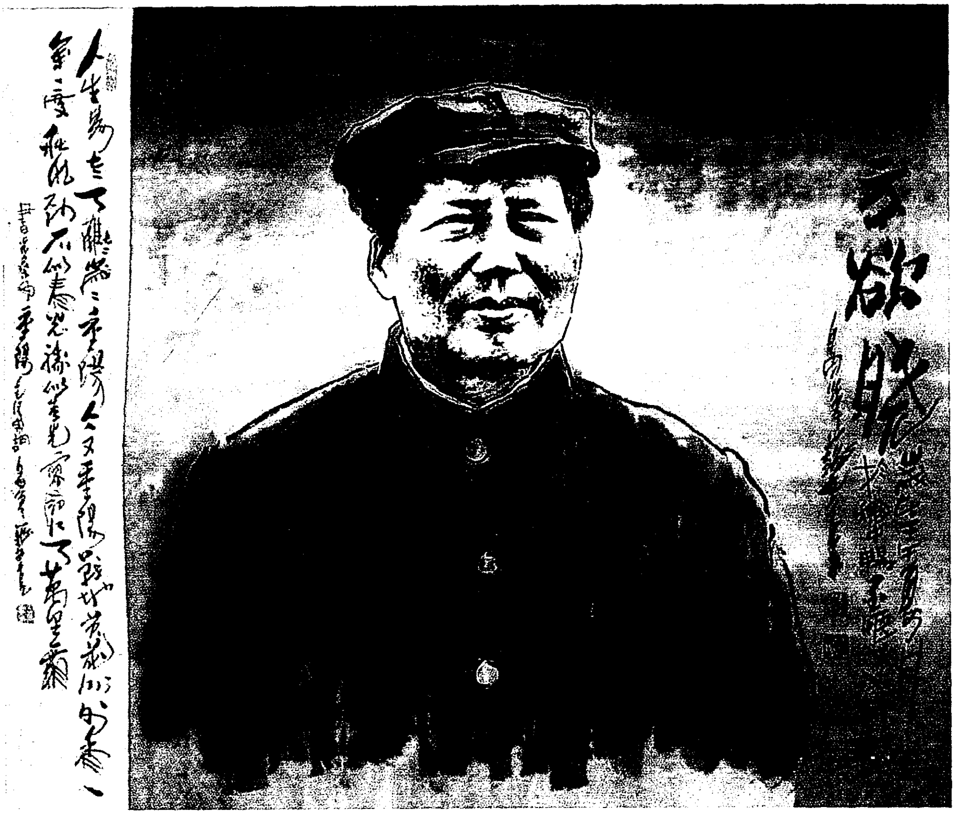
《延安的曙光》（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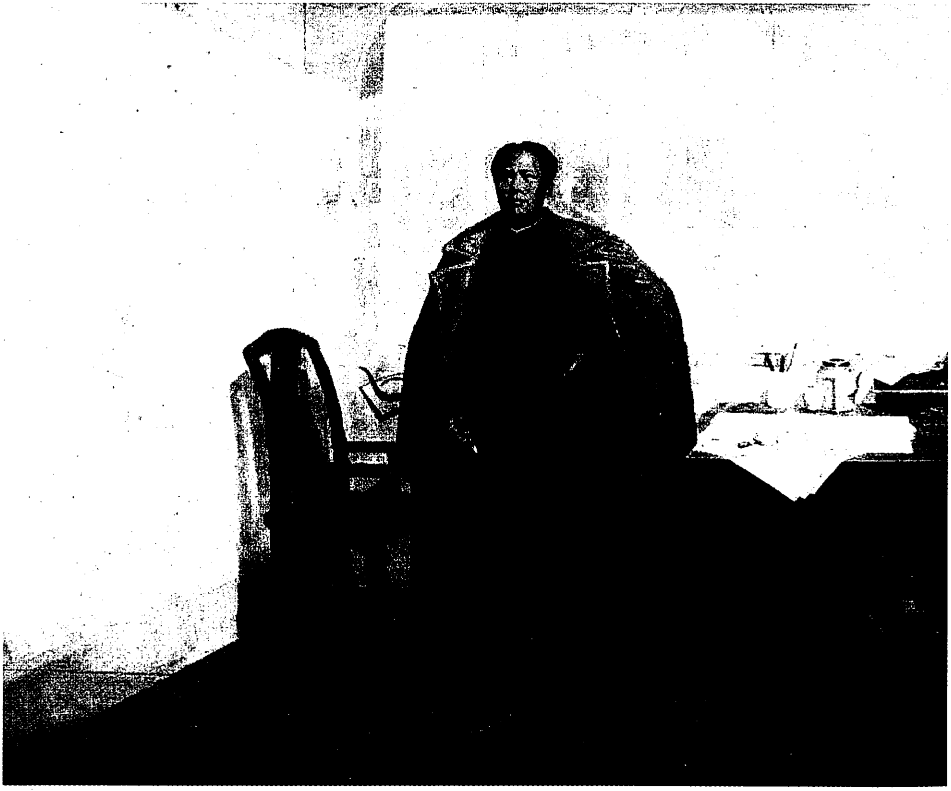
《曙光》（油画）


曙光
一九四五年
毛泽东主席
在延安
戊寅岁冬月
於大连
元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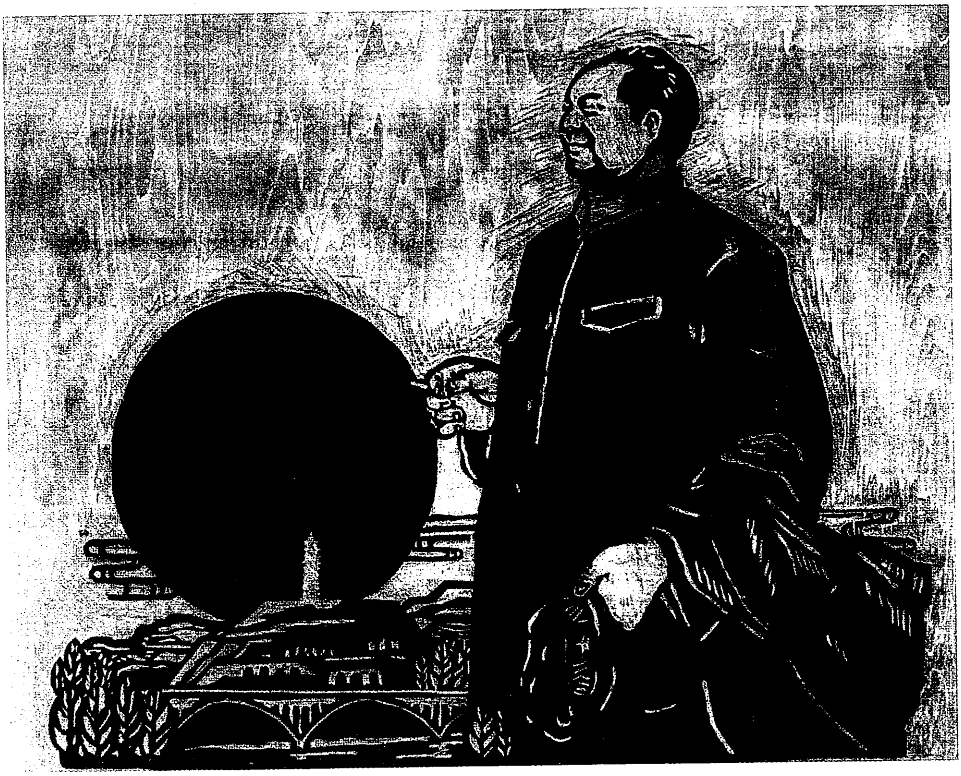
《曙光——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画）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欲晓

《东方欲晓》（中国画）



《东方欲晓》（油画）



《延安红日升》（木刻版画）

广占乡村不打大城市

（1945年8月15日）

文、张[1]，并告王、戴，郑、李[2]：

（一）你们可恢复原番号。（二）工作地区在郑州、五师、水东间，不是打大城市而是广占乡村。（三）孙连仲[3]十一战区军开始东进，抢郑、洛[4]、许昌线，你们及王戴均须在东面展开，俟顽军确占郑、洛、许线后方空虚之时，再西进至陕豫边，吸引顽军不能东进。（四）派赴洪湖之一个营仍须南进。（五）三十八军[5]尚未与中央取得联络，他们能否经得起严重局面，留豫去晋何者有利，望征

---

[1] 文、张，指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和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2]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3]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4] 洛，指河南洛阳。

[5] 指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该军原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受中共影响较深，在抗日战争中一直与中共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坚持对日作战，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做法。1945年7月和1946年5月该军所属第十七、第五十五师先后在河南起义，1946年9月正式改编组建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孔从周，政治委员汪锋。

询电告。（六）赴粤干部二百除化装南行者外，集中太行，准备绕道南进。

毛泽东

未删

关于警察问题致华中局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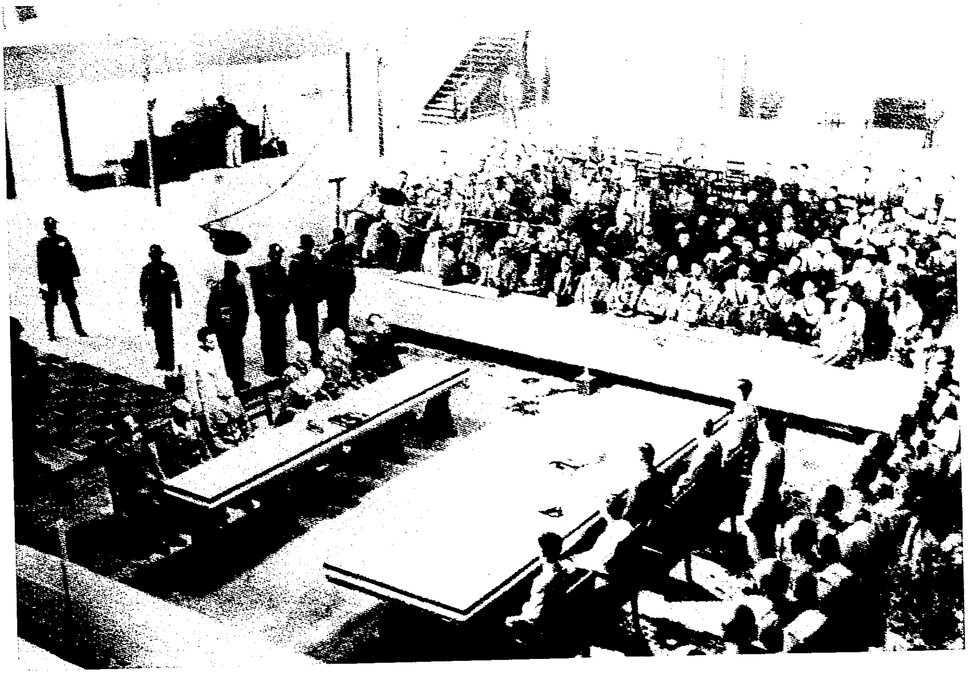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

关于各城市的警察，我方入城前，即应以军事机关命令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入城后不可将警察拘捕起来，以免秩序无人维持，更易引起混乱，所有警察局长，在能服从我们军事管制命令的条件下，亦可暂时不加调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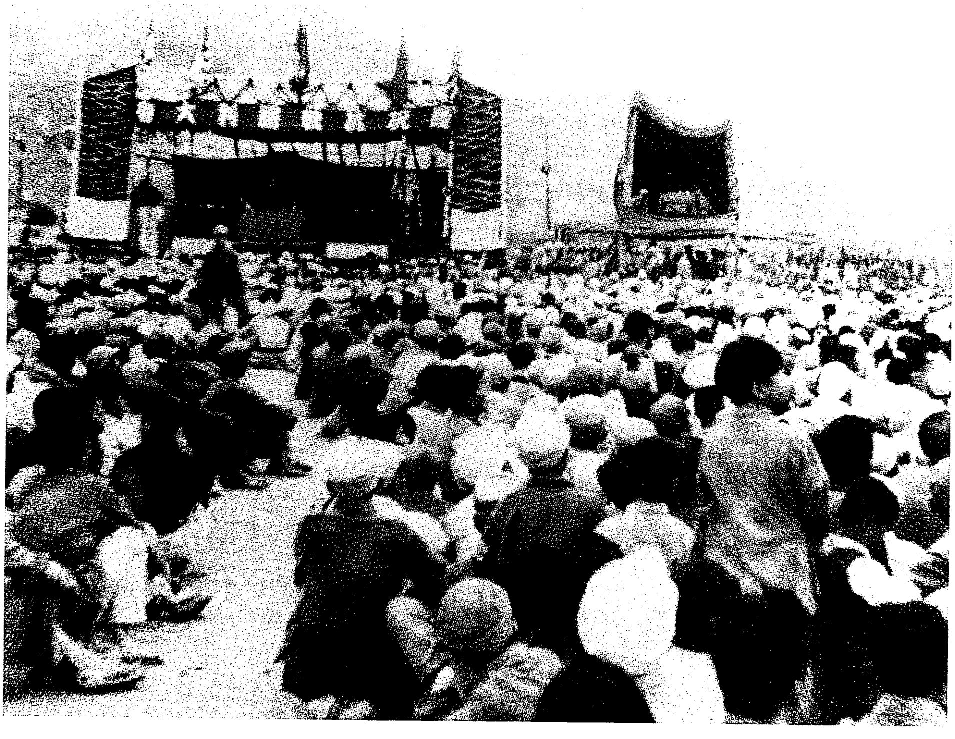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警察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1945年8月，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在山海关会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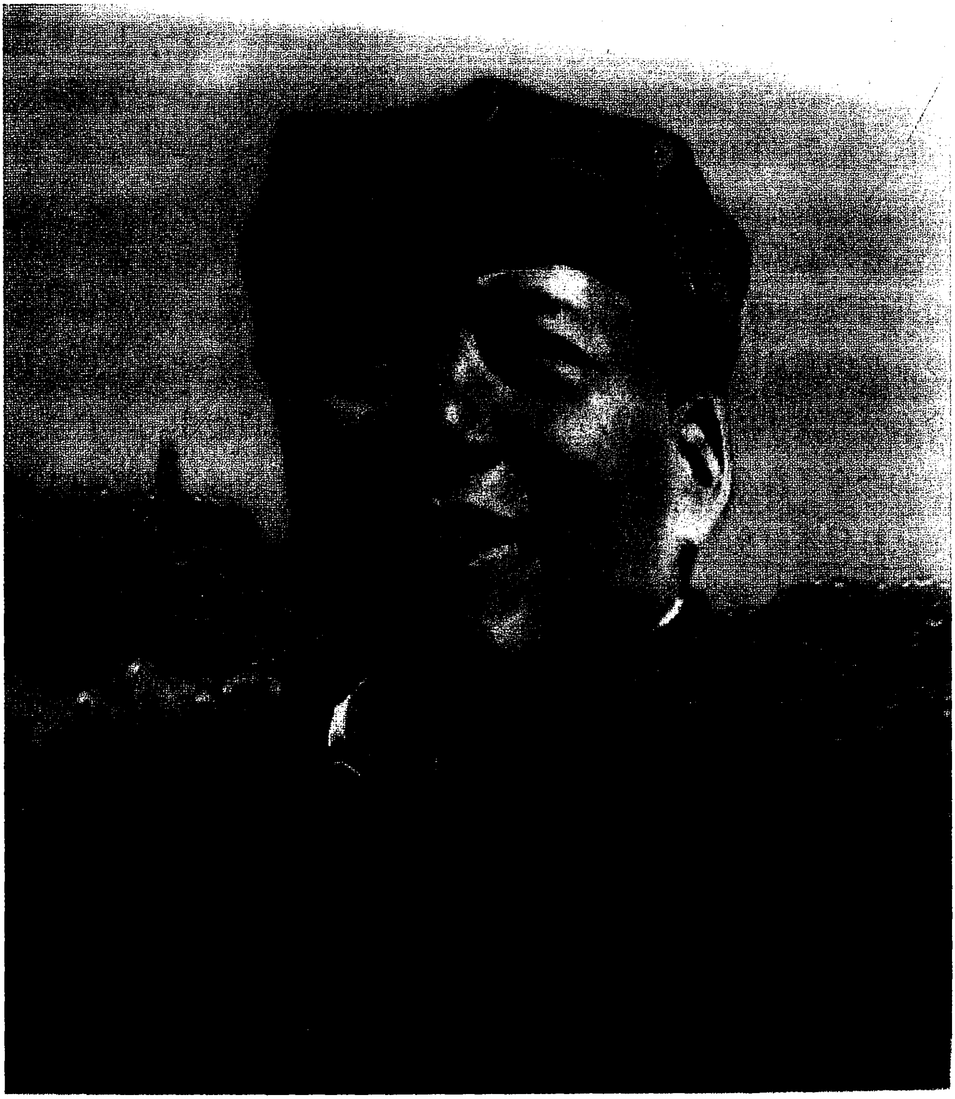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北平人民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延安人民在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油画)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1]

（1945年8月16日）

蒋介石的发言人，于十五日下午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讲关于所谓共产党违反蒋介石委员长对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时说："委员长之命令，必须服从。""违反者即为人民之公敌。"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蒋介石于十一日发出一个背叛民族的命令，在最后消灭日寇的关头，禁止八路军新四军和一切人民军队打日本打伪军。这个命令，当然是绝对不能接受和绝对不应接受的。随后，蒋介石经过他的发言人，就把中国人民的军队宣布为"人民公敌"。这样就表示：蒋介石向中国人民宣布了内战。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然不是从十一日的命令开始的，这是他在抗战八年中的一贯计划。在这八年中，蒋介石曾于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2]，每一次都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由于中国人民和盟邦人士的反对，才未实现，使蒋介石引为恨事。因此，蒋介石不得不把全国内战改期到抗战结束的时候，这样就来了本月十一日的命令和十五日的谈话。蒋介石为了发动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

[2] 蒋介石发动3次大规模反共高潮的经过，参见《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以及所谓中国过去只有过“剿共”，没有过“内战”，因此也不会有“内战”等等。这一次稍为特别的，是增加了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但是人们会感觉到，这个发明是愚蠢的。因为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至于人民群里，这样的争论是越来越少了。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人民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早在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候，就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于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以惊人的努力，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自己的主张，因而实现了抗日战争。在抗日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从没有一次放松了提醒人民，制止内战的危险。去年以来，共产党更以蒋介石所准备好了的在抗战结束时发动全国内战的大阴谋，再三再四地唤起人们的注意。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关心中国和平的人士一样，认为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但是共产党认为，内战仍然是可以制止和必须制止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

拒绝了这个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制止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伎。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新华社记者唤起全中国和全世界来反对这样一种最虚伪和最无耻的谎言。这些谎言是说：蒋介石禁止中国人民去解放敌占大城市，禁止他们去解除敌伪武装和建立民主政治，而由他自己到这些大城市去“世袭”（而不是破坏）敌伪的统治，中国的内战反而可以避免。新华社记者说，这是谎言，这种谎言不但显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主利益，而且直接违反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事实。必须永远记得：蒋介石所进行的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内战，并不是因为大城市在共产党手中而不在蒋介石手中，恰恰相反，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在蒋介石或蒋介石所让与的日本和汉奸手中，正是这样，内战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十年，并局部地继续到现在。必须永远记得：十年内战之所以被停止，抗战中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直到最近陕甘宁边区南部蒋介石入犯事件[1]）之所以被制止，并不是由于蒋介石的力量强大，恰恰相反，都是由于蒋介石力量相对地不够强大，由于共产党和人民力量相对地强大。十年内战，不是因为全国一切愿望和平害怕战争人士的呼吁（例如过去的“废止内战大同盟”[2]之类的呼吁）而停止，而是

---

[1] 指1945年7月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爷台山等地的事件。

[2] “废止内战大同盟”，1932年8月成立于上海，主要是由一些资产阶级人物组成的。他们发表了主张“消弭内战、共御外侮”的宣言。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要求和张学良杨虎城所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的武装要求而停止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其他无数次挑战，不是因为共产党的无限制的让步和服从而打退的，而是因为共产党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1]的严正自卫态度而打退的。如果共产党毫无力量，毫无骨气，不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到底，十年内战何能结束？抗日战争何能开始？即令开始，又何能坚持到今天的胜利？又何能让蒋介石辈直到今天还安然活着，在离前线那么远的山坳里发表什么命令谈话呢？中国共产党是坚决反对内战的。“确立内部和平状态”“成立临时政府，使民众中一切民主分子的代表广泛参加，并确保尽可能从速经由自由选举以建立对于人民意志负责的政府”，这是苏美英三国在克里米亚说的话[2]。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

---

[1] 参见《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文。

[2] 这些话引自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3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

华中部队当前任务和作战方法

（1945年8月16日）

张、饶、曾、赖[1]：

元午电[2]悉。（一）冀鲁豫区已调十个小团共万人南下水东，位于开封、归德[3]线以北，新乡以东地区，任务为相机夺取开、归线及新乡。水东原有八千人，河南王树声、戴季英、文年生、张启龙[4]等部共二万余，李先念部[5]主力不久亦将转至豫南，均足牵制李何[6]，故李何不可能全部东进。（二）作战决定于打法，不浪打，非

---

[1] 张、饶，指张云逸、饶漱石，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副军长和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部长。赖，指赖传珠，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2] 指1945年8月13日午时张云逸、饶漱石、曾山、赖传珠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要点是：（1）以新四军江北的现有力量，完成占领津浦路东及长江以北一切城市，消灭伪军，并击退国民党军第十战区来犯顽军等任务，颇为困难。（2）拟从新四军江南部队调回两个旅，到江北执行上述任务。（3）江南的任务，由留下的另两个旅担任（新四军第七师的江南部队在外），必要时该两旅进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

[3] 归德，旧府名，即今河南商丘。

[4] 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文年生、张启龙，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和第二支队政治委员。

[5] 李先念部，指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是李先念。

[6] 李何，指李品仙、何柱国，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

确能聚歼不打，养精蓄锐，以多胜少，例如以五六个团打一个团，可能聚歼。（三）以打胜仗为目的，不以占地为目的，津浦[1]能全占则全占之，不能则占一部，又不能则让顽伪全部代替了日寇位置，亦胜于过去局面，只要日寇投降，大局于我有利。（四）江南兵力不调动，有坚持现地，扩展胜利，创建苏浙皖边纵横数百里广大根据地威震江南（江北军亦如此）之极大可能。非至万一时机绝不轻言去闽浙赣，此旨望告粟叶[2]，动员全党全军全民为此而奋斗。完成此任务亦取决于打胜仗，打法亦如上述。他们过去三仗[3]打得不错，只是歼灭性还少了一点。与其调两个旅至江北，不如留在江南夹江配合为有利。

毛泽东

十六日五时

---

[1]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2] 粟叶，指粟裕、叶飞，当时分别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5年2月14日至18日、3月1日至27日、5月29日至6月23日，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在浙江西部天目山地区的3次反顽作战。

包围大同和解决太原问题

（1945年8月16日）

贺、吕、林[1]：

（一）红军[2]占领张北、多伦。（二）我绥远[3]主力速包围大同，我必须和傅作义[4]争大同。（三）运城敌十五日尚未撤退，定十九日北撤。估计太原敌暂不会撤，阎[5]亦暂不能公开占太原。我主力必须切断汾阳、孝义与太原间，占领据点，构筑工事，准备与阎决战。（四）我太岳部队在棉上[6]集中向平介[7]进，望派人带电台去平介联络。我太行部队十九日集中武乡后向太原进，为时太迟，你们须用自己的及太岳的力量解决太原问题。

毛泽东

十六日

---

[1] 贺，指贺龙，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吕、林，指吕正操、林枫，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红军，指苏联红军。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6] 棉上，村名，位于山西沁源县北部。

[7] 平介，指山西平遥和介休。

就去重庆会见问题复蒋介石电[1]

（1945年8月16日）

【新华社延安十七日电】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十四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请他去重庆讨论国事，没有提出讨论的范围与内容。十六日毛主席答复蒋氏一电，要求蒋氏对朱总司令给蒋氏电中所提关于国事的具体意见表示他的意见，然后考虑会见问题。毛主席电文如下：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2]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3]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2] 指蒋介石1945年8月14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电报。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3] 指毛泽东起草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1945年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

关于赴重庆谈判问题复蒋介石电

（1945年8月16日、22日、24日）

一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1]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2]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

未铣

二

重庆蒋委员长勋鉴：

---

[1] 指蒋介石1945年8月14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一个电报。电报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2] 指毛泽东起草的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1945年8月16日给蒋介石的电报。

从中央社二十日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1]，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到后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
未养延安

三

蒋介石先生勋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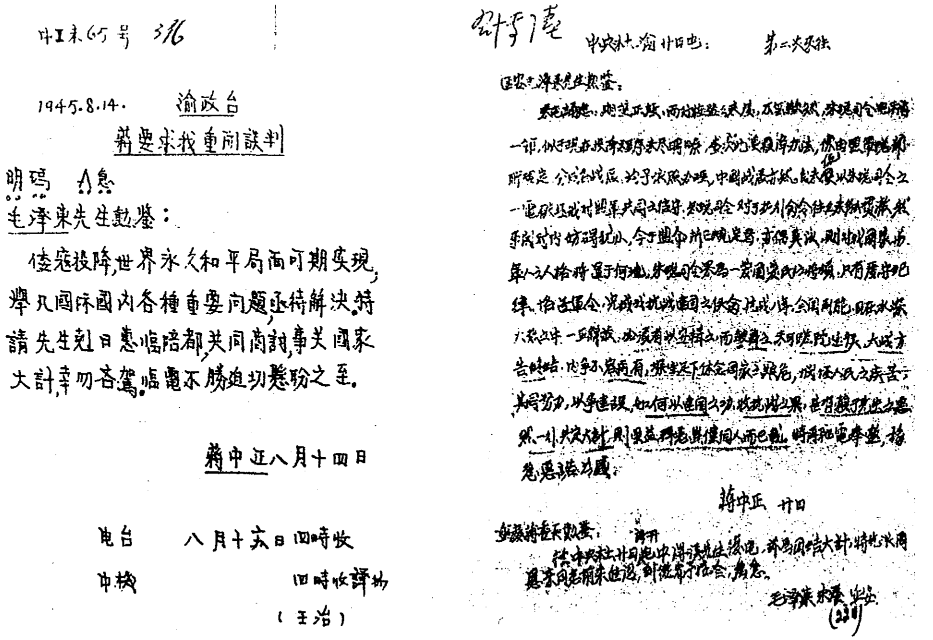
梗电[2]诵悉，甚感盛意，鄙人极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
敬

---

[1] 指蒋介石1945年8月20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二个电报。该电一方面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成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为借口，拒绝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8月16日电报中提出的有关对日受降问题的要求；另一方面则再次打着和平建国的旗号“恳词”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电报中说，“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以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2] 指蒋介石8月23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第三个电报。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切迫，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中工未65号 516

1945.8.14.　渝政台

蒋要求找重開談判

明碼　急

毛澤東先生勳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际國内各種重要问題，亟待解决。特請先生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关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

电台　八月十六日四時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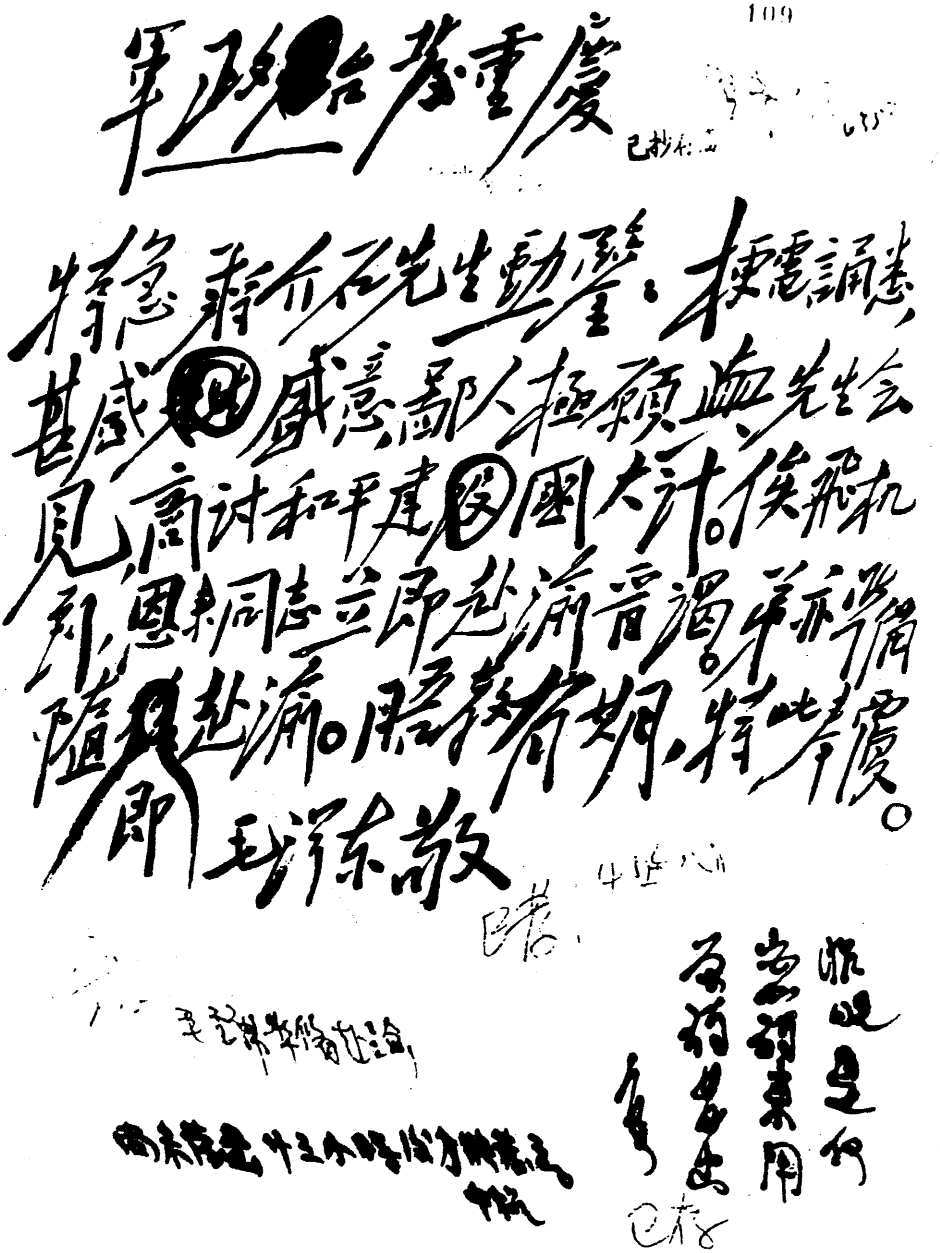
中樞　四時收譯协

（王治）

中央社渝廿日电：

蒋中正　廿日

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图为其中的两个电文。



109

军政[illegible]台转重庆 已抄[illegible]

特急 蔣介石先生勛鑒：梗電誦悉，甚感~~[illegible]~~盛意。鄙人極願與先生會見，商討和平建~~[illegible]~~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晉謁，弟亦準備隨~~[illegible]~~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毛澤東敬

已發

十五 八 [illegible]

[illegible]辯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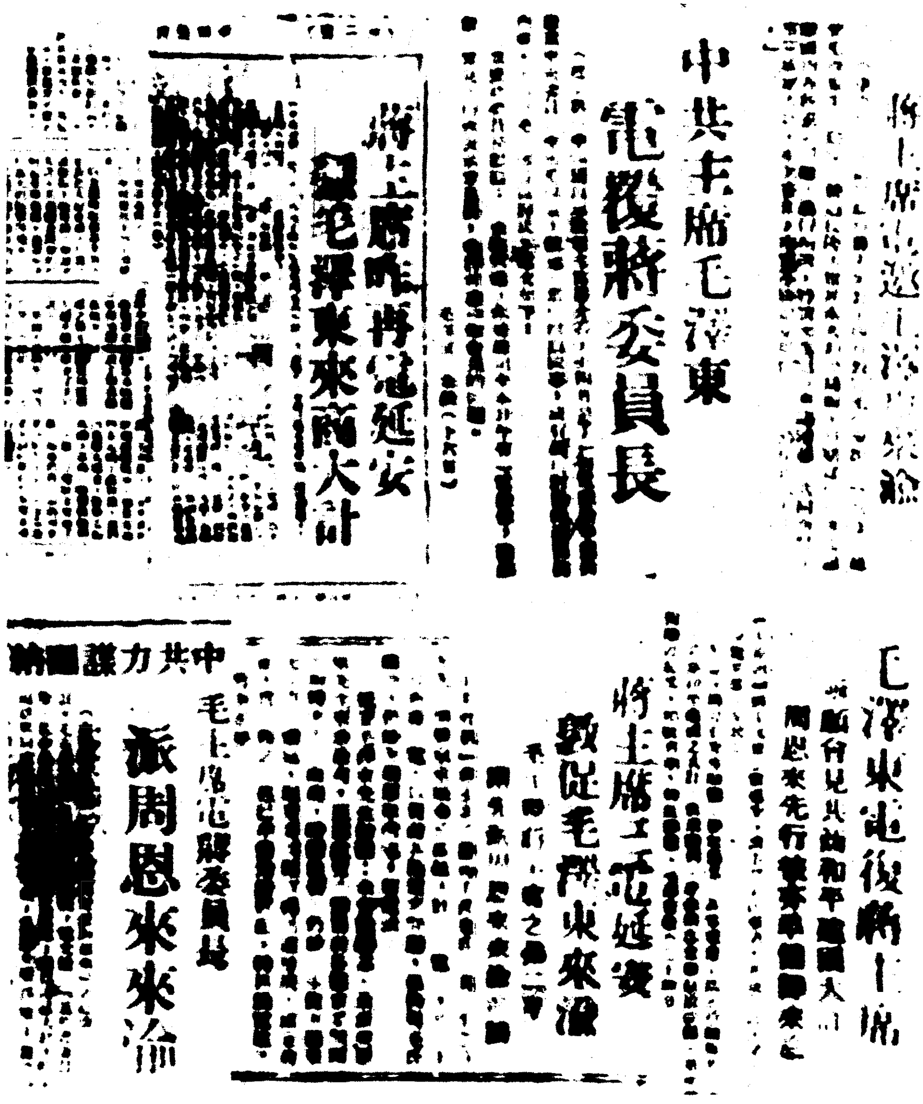
恩來先走廿三个[illegible]方[illegible]發之。

[illegible]

照此送何 密碼來用 發蔣先生 [illegible]

已存

毛泽东复蒋介石电的手稿。



蔣主席邀毛澤東來渝

中共主席毛澤東

電復蔣委員長

蔣主席昨再電延安

毛澤東來商大計

毛澤東電復蔣主席

周恩來先行來渝

蔣主席二電延安

敦促毛澤東來渝

中共力謀團結

毛主席電蔣委員長

派周恩來來渝

蒋介石和毛泽东相互往来的6次电报内容。

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避免无把握的硬仗[1]

（1945年8月18日）

你们及整个河南我军必须学会机动作战及分散游击，无把握的硬仗应避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河南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文年生、第二支队政治委员张启龙并告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治委员戴季英电的主要内容。

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毅部[1]

（1945年8月18日）

万毅支队即调东北，经河北至热河边境待命。该支队现有二千五百人，汰去老弱及开小差者外，能有一千五百到达目的地即好。东北干部凡能调动者尽可能调至万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政治部主任萧华电的主要内容。

山西国民党军部署及我军作战任务[1]

（1945年8月19日）

贺、林，并告程、耿[2]：

十六、十七两电悉。（一）胡宗南调其主力第一军、十六军、九十军入晋，先头一个师已渡河，其余大部集中潼关至韩城线，准备渡河。九十军从河南调来，须月底集中潼关。阎锡山[3]除集中孝义区域之八个师准备入太原外，一部在运城、洪洞线准备接防，另一部（两个师）由浮山东进，争夺长治、长子区域。但日寇从永济至太原仍在原地未动，交防缴械非易，长治、长子区域亦然。（二）谢富治[4]率太岳六千人十六日集中棉上[5]，日内当可至平遥附近，请派人去联络并指挥之，其任务为协助晋西北打击孝义北进之阎军。（三）李达[6]率太行九千人本日可集结武乡以东蟠龙洪水[7]地区，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的电报。

[2] 程、耿，指程子华、耿飚，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参谋长。

[3]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谢富治，当时任八路军太岳军区副司令员。

[5] 棉上，村名，位于山西沁源县北部。

[6] 李达，当时任八路军太行军区司令员兼参谋长。

[7] 蟠龙、洪水，均为村名，位于山西武乡县东部。

部原定开平遥地区协助夺取太原，现因胡宗南大军入晋，该师似宜用以对胡，同时对付侵入长子区域之阎军。（四）赵尔陆[1]率三个大团位于榆次、寿阳地区夺取正太[2]，并协助夺取太原。（五）传说阎部九千人已入太原，徐沟[3]亦被阎占，请查是否确实。（六）李井泉[4]已动身来你处任副政委。张宗逊[5]率两团不日到延[6]来你处，张任副司令。林枫准备去东北，以张秀山为分局副书记，帮助张稼夫[7]。去东北干部一千二百人一星期后由延出发，交林枫率领北进，请林先作准备。（七）包围大同由冀察晋担任，你处北方任务仍是阻止傅作义。

中央军委

十九日

---

[1] 赵尔陆，当时任八路军冀晋军区司令员。

[2] 正太，即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3] 徐沟，旧县名，1952年与清源县合并为山西清徐县。

[4] 李井泉，当时任八路军晋绥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5] 张宗逊，当时任八路军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

[6] 延，指陕西延安。

[7] 张稼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

抽九个团赴东三省[1]

（1945年8月20日）

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冀鲁豫分局，并告冀察晋分局：

红军[2]占领东北，国民党力图争夺东北。我方除李运昌[3]率三个大团深入辽宁，冀东冀察两区各有一部深入热河[4]之外，中央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万毅支队[5]在内），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共四个团，归万毅率领开赴东三省。山东之两团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即行出发，经河北会合冀鲁豫及冀中之两团，开至热河边境待命。每团官兵不得少于一千五百。必须明确宣布去东三省之任务（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必须配备必要之地方工作干部。三处所集中之东北干部亦望交万毅带去。必须有良好之纪律。配备及出动情形望告。另由陕甘宁边区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分局并告晋察冀分局的电报。

[2] 红军，指苏联红军。

[3] 李运昌，当时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万毅支队，指八路军滨海军区滨海支队，万毅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

枫[1]率领开东三省。以上告知万毅，但勿在报上发表。

中央军委
未号

---

[1] 吕正操、林枫，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彻底执行上海起义的方针[1]

（1945年8月20日）

你们发动上海起义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华中局8月19日报告说：“上海我可掌握控制的力量总共有20万人，我能掌握大部分水电工人、邮政工人、电车工人、电话工人、铁路工人。日本厂10万失业工人可动员，沪东、沪西各可动员数万。沪西大部分巡捕我可控制。伪方只有税警团、保安队维持秩序，甚恐慌。根据目前主客观力量可以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但暂不向驻守不动的日军攻击。”“即使将来万一不能长期坚持，亦可退到农村发展游击战争取得胜利。”

动员城内人民起义，配合我军夺取城市[1]

（1945年8月20日）

对于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应迅速布置城内人民的武装起义，以便于不失时机配合攻城我军实行起义，夺取这些城市，主要是平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分局并告各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改变上海起义的方针[1]

（1945年8月21日）

浙东主力到上海有被消灭危险，不如仍在浙东，困难时可退浙南。日本投降条约即将签字，蒋介石已委任上海官吏，在此形势下上海起义变为反对蒋介石，必被镇压下去，宜改为群众组织各种团体发动清查汉奸斗争，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分开出版，而不建立政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审改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占领大城市方针的指示稿[1]时加写的一段话

（1945年8月22日）

对大城市仍应积极派人去发动群众，争取伪军，出版报纸，布置秘密工作，争取我党在城市中的地位。

---

[1]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利用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

（1945年8月23日）

一

现在的情况是，我国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包括欧洲、东方，都进入了和平建设的阶段。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不会爆发是肯定的。我们可能在两种情况下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了。我们曾力争在进入和平阶段前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北平、天津、太原，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2]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中苏条约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签字的，内容现在还未公布，大概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进入热、察是临时性质。苏联如公开助我，美国必公开助蒋，大战就可能爆发，和平不能取得。二是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一）和结论（本篇二）。

[2] 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6日，这个条约正式公布。

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虽然现在我们对国民党还要提出受降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没有希望了。由于这两点，我们想力争的那一批胜利果实就得不到了。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这不是不力争的结果，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这是第一点。

第二，关于蒋介石的地位。他的有利方面是，有合法地位和大城市。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的内部有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

第三，关于我们的地位。我们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这是蒋介石不能抹煞的，我们党目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是大革命和内战时期所没有过的；广大解放区的存在，蒋介石无法进行封锁；我们党有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纲领，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我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四，我们之所以没有得到大城市和没有机械化的军队，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外援，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对伪军和国民党军）没有做好。当然，即使工作做好了，我们得到了北平、天津，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是事实，所以不能阻止国民党军占领大城市的行动。

第五，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的口号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可能取得的，因为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中国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严重，人民需要和平，我们党需要和平。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胡宗南[1]现在只

---

[1] 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有三个军包围我们（其他的三个军去了山西，三个军在河南，一个军不知所在），我们伸出拳头去，他就没有办法。同时，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这次他们缴了一百万日本侵略军的枪，可能引起新的矛盾。中央军、杂牌军共二百万，加上收编的伪军八十万，共二百八十万，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而我们的军队还可以扩大。国民党本身有这些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我们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

第六，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

第七，我们要求的条件，就是《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1]，如果大家同意就通过，由书记处进行修改。十四条中除第三、四、五条外都是老的要求，着重于民主、民生问题。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第三、四、五条要求参加处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和接受日军投降等是不得不提的，其中除参加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一项或许有旧金山式的希望外，其余都是没有希望的。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过去争论过多年，他只承认我们编十二个师，就是为的等得到了大城市再和我们讲价钱，现在

---

[1] 《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是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准备向国民党提出的。

日本人走了，国共双方面对面了，问题拖不下去了。

第八，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决定停一下的，但因为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所以不得不再批评它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介石的高压下，不经过斗争就可以取得我们的地位。

第九，最近两个星期的进军[1]是必要的，集中了军队，振奋了人心，我们控制的县城已增至一百三十四个。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整训军队。解放区的人口和军队都扩大了，财政困难，穿衣吃饭问题如何解决？以后要缩编和搞生产。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是不好打的姿式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气不能松，松下来就谈不好。

第十，和平时期的两项重要工作——城市工作和军队工作，非常重要，过去我们没有做好，今后要下全力认真地去做。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

---

[1] 指8月11日至23日近两个星期内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对日军进行的全面反攻。1945年8月10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限令日伪军投降的命令。8月11日，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了6道命令，命令晋绥解放区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领导的武装部队、冀热辽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内蒙古和东北进军；命令山西解放区的武装部队肃清同蒲路沿线和汾河流域的日伪军；命令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各解放区的武装部队坚决执行这些命令，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差不多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有胜利，或者不是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我们要准备对付最大的困难，如外国不帮助，军队可能因谈判而缩小，内部不一致等等。现在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的情况非常危险。但起决定作用的一点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自己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

第十二，准备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一个宣言[1]，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姿态出现。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2]。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危险。

第十三，各解放区要作持久之计。这回军队集中很好，但不便于过多集中的地方，应该根据吃饭、穿衣、有枪等条件加以改变。解放区可能要再来一个精兵简政。打仗一定要有利，没有把握的仗不打，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不要增加人民负担，今冬要搞大减租，明春要搞大生产。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

---

[1] 即后来在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2] 这里所说的周恩来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安排，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改变，决定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毛泽东于同日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安，他和周恩来可以偕赫同机飞重庆。

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二

大家的意见很好，今天的方针是七大定下来的，七大的方针就是反对内战的方针。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的内战，和平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进攻还是退却？主要的当然还是进攻，是在和平中的进攻，但部分的会有退却。解放区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蒋介石是不会完全承认的。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新环境，和北伐、内战、抗日三个时期都不同，因为这是和平时期。我们很需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全国人民，来锻炼我们自己。学会了做许多工作，才有能力去搞全国、搞大城市工作。

机会主义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苏联红军不入关，这不是我们主观上的问题，日军不缴枪给我们，我们曾经力争过了。至于我们扩大地方是否是“左”倾机会主义？那也不是。有些地方我们占领了又退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种想法不对，退出了的地方，群众也得到了教育。插草为标时要搞大一点，到安居乐业时就搞小一点。经过三个时期的战争，现在来个和平时期，我们要准备做城市工作。

东北的工作如何？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有可能不能去。

谈判如果不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我们是否要打？应该打，

但必须打胜仗。

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召开？如果实现了和平，就开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的会议。

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所以回赫尔利的电报[1]是说先派恩来去。如果赫尔利、邵力子[2]来请，我就和他们一起去，这个姿态比较好。

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3]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可以开会。

划定区域的问题，我们不提，因为我们要求承认一切解放区，但蒋介石是要提的。博古[4]同志提议把十四条归纳为六条，这个意见很好，交书记处再去考虑决定[5]。

---

[1] 指毛泽东1945年8月23日复魏德迈的电报。电报说："来电奉悉，极表欢迎。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鄙人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兹先派周恩来将军前来接洽，请转达赫尔利大使并给交通便利为感。"

[2] 邵力子（1882—1966），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是国民党参加重庆谈判的代表。

[3]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均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4] 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

[5] 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中央书记处把原拟的《目前紧急要求》十四条归纳成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的六项紧急措施，写入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目前党的方针及新四军的工作部署

（1945年8月24日）

饶、张、赖[1]，并转粟、叶[2]：

各电悉。

（一）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

（二）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三）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

（四）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

（五）中央正向重庆谈判，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建国。

（六）蒋介石困难甚多，加上国内外压力，可能赞成和平建国。

（七）江南江北我军主力各就现地集结整训，恢复疲劳，养精蓄锐，准备于顽军进攻时，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打，打则必胜，每次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之）。打得几个大胜仗，

---

[1] 饶，指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治委员。张，指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赖，指赖传珠（1910—1965），江西赣县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

[2] 粟，指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当时任中共苏浙区委书记、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指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当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副司令员。

威震大江南北，对于促成国共谈判非常有利，顽军亦不敢轻视你们。

（八）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

（九）设法向敌伪购买子弹，愈快愈多愈好，同时注意从敌伪撤退区收集军用资材，为持久计。

毛泽东

二十四日

力求占领许多中小城市[1]

（1945年8月25日）

平原分局：

敬电[2]的意思是因为中小城市的敌伪能歼灭者则歼灭之，不能歼灭者如有可能则让其集中大城市，以便我们能占领许多的中小城市，应付即将到来的新局面。

中央

未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平原分局的电报。

[2] 指194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晋察冀区、冀鲁豫区、平原区和山东区的电报。要点是：敌受投降条约限制，不许向我投降，因此决定了华北大城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暂时不易为我夺取与占领。为围困大城市，夺取小城市，增加国民党军与我争夺胜利果实的困难，应彻底破坏所有铁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1945年8月25日）

全国同胞们!

由于日本的投降，我全民族八年来所坚持的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地结束了！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了！在全中国与全世界，一个新的时期，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对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最后扑灭了法西斯的暴政、奴役与侵略，在全人类面前展开了和平发展的前途，这是英、美、苏、中四大同盟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相信，我全国同胞必能以自己表现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转而用之于伟大的建国事业中。中国解放区的一万万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与牺牲，为中外所公认，在今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中，也应继续作为全国民主建设的模范与和平团结的中坚，而尽其伟大的任务。

但是，在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的道路上，不是没有阻碍、没有困难、没有荆棘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还没有

执行波茨顿宣言，还没有放弃使其侵略的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企图，他们还在放肆地施行挑拨、分裂与奴役中国的阴谋。他们在中国的走狗们——中国的吉斯林们，正奉行其日本主子的指示，摇身一变，取得保护色彩，以图继续挑拨内战、破坏团结、阻挠民主，他们的这种企图并没有遇到打击，他们的罪行并没有受到惩处。相反，他们还受到了鼓励，愈益横行无忌。因此，中国吉斯林们及其他反动分子们的各种危险活动，重大地威胁着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中国人民必须严重警戒与击破敌人的阴谋。

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目前必须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实施若干紧急措施，以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这些紧急措施是：

（一）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与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五）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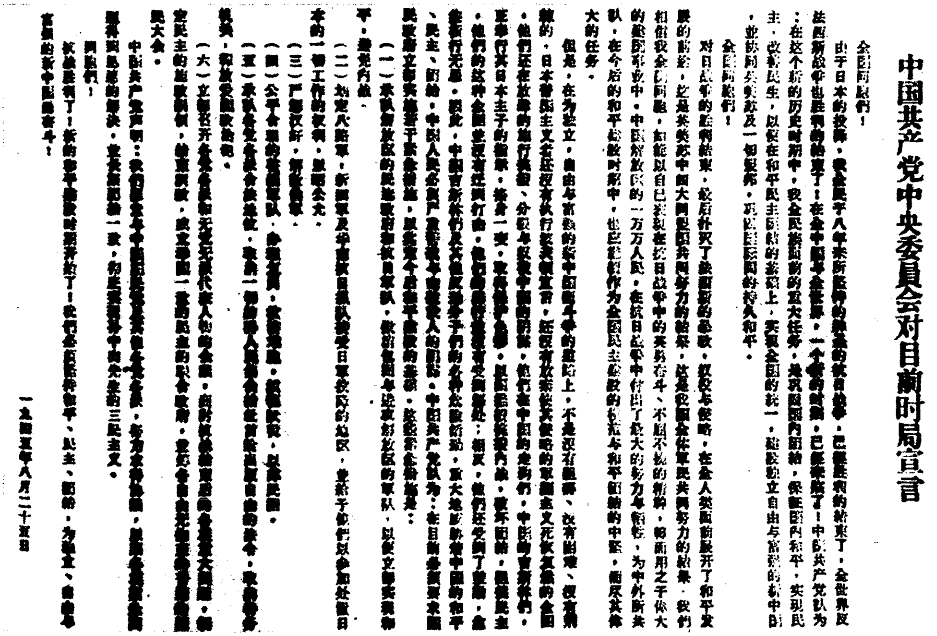
（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声明，我们愿意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努力求得协议，以期各项紧急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并长期团结一致，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同胞们!

抗战胜利了！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开始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阐明中共中央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

复王震、王首道电[1]

（1945年8月25日）

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王震、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复魏德迈电[1]

（1945年8月25日）

鄙人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兹特奉达，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

---

[1] 这是毛泽东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电的主要内容。

和刘伯承、邓小平的谈话[1]

（1945年8月25日）

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即将乘美军观察组飞机返回太行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的一部分。同机飞抵太行的还有：陈毅、薄一波、陈赓、萧劲光、李天佑、邓华、陈锡联、陈再道、宋时轮、滕代远、张际春、杨得志、林彪等。9月9日，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搭乘自延安去晋察冀接回被救的美军飞行员的飞机返部。由于苏联出兵东北未曾通知中共中央，参加中共七大的几个大战略区主要负责人在大反攻开始时尚未离开延安。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

1945年8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乘美军观察组飞机前往太行根据地前在机场的合影。

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国民党进攻[1]

（1945年8月26日）

河南区党委：

来电悉。对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中央

未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河南区委的电报。

赴重庆谈判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45年8月26日）

根据各地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因为我们不能进入大城市，何应钦[1]不分配给我们受降缴械的地点，苏联红军不入关，情绪有些波动，需要安定一下。其实这一向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胜利，察热[2]没有蒋介石的足迹，江淮、山东、河北、山西、绥远[3]的大部分，都可以在我们手中。同志们现在的愤激是可以理解的，但还要仔细地计算一下。我们这个电报[4]发出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去重庆的问题，昨晚政治局七位同志同若飞[5]同志商谈，决定答复魏德迈的电报[6]，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

---

[1] 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受降最高指挥官。

[2] 察，指察哈尔省；热，指热河省。

[3] 绥远，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

[4] 指毛泽东1945年8月26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5] 若飞，即王若飞（1896—1946），贵州安顺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重庆工作委员会书记，负责主持南方局日常工作。1945年8月28日他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赴重庆谈判。

[6] 指毛泽东1945年8月25日复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电报。

在我。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我们准备让步的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这要看谈判的情况，在有利条件下是可以考虑让步的。[1]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末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事件[2]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绝不要怕。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3]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4]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我可以打一个电报给蒋介石，说我要去，明天报上要发消息[5]。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更多一些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延安不要轻易搬家。

---

[1] 中共中央当时考虑可以让出的地区，指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抗日根据地。

[2] 何鸣事件，指1937年7月，当时任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团长兼政治委员的何鸣，由于对国民党借谈判消灭闽粤边区红军的阴谋毫无察觉，致使所率独立第三团近千人被包围缴械。

[3] 指苏、美、英3国。

[4] 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5] 1945年8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决定赴重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消息。

将来召开国民大会时，共产党员可否投票选蒋介石当大总统，这要看情况才能决定。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我们又不得不和他搭伙。

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

（1945年8月26日）

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蒋介石垄断了受降权利，大城要道暂时（一个阶段内）不能属于我们。但是华北方面，我们还

---

[1] 这是毛泽东在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前两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通知。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坚定地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3日3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还在8月27日为此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所起草的这个通知，分析了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两个星期内中国形势的发展，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准备作出的某些让步以及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的对策，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的指示，告诉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毛泽东等在8月28日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43天的谈判。这次谈判的结果，虽然只发表了一个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但是在政治上却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入被动，因而是成功的。10月11日，毛泽东回到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在重庆继续谈判。关于这次谈判的结果，参见《关于重庆谈判》一文。

要力争，凡能争得者应用全力争之。两星期来，我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我军威震华北，配合苏军和蒙古军进抵长城之声势，造成了我党的有利地位。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哪怕暂时也好。同时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和府城县城小市镇。例如新四军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许多县城和江淮间许多县城，山东占领了整个胶东半岛，晋绥占领了平绥路南北许多城市，就造成了极好的形势。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对大部分，热察两个全省和辽宁一部。

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1]，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2]，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

---

[1] 在日本投降前后的一个时期内，苏、美、英3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但是不久以后的事实证明，美国所谓不赞成中国内战的声明，只不过是它用来作为积极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反革命内战的掩护而已。

[2] 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是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目前时局宣言》中提出的。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

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1]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

在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省的我党力量比华北、江淮所处地位较为困难，中央对于这些地方的同志们深为关怀。但国民党空隙甚多，地区甚广，只要同志们对于军事政策（行动和作战）和团结人民的政策，不犯大错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完全有办法的。除中央给予必要的指示外，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生存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

---

[1] 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当时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

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置。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必须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坚决依靠人民，就是你们的出路。

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但是整个国际国内大势有利于我党和人民，只要全党能团结一致，是能逐步地战胜各种困难的。

致林枫等电[1]

（1945年8月26日）

（一）赴东北四省工作之干部团一千二百人及赵副旅长[2]所率一个团不日由延安出发，交林枫率领开至热河边境，相机进入东四省工作；（二）军队是否能去辽吉黑三省，现在尚不知道。目前晋绥争夺战极其重要，故正操[3]及其所部暂时仍在现地执行原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枫并转吕正操及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2] 赵副旅长，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副旅长赵承金。

[3] 正操，即吕正操，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1945年8月27日）

各局、各区党委：

抗日阶段瞬将完结，争取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已经开始，国共关系必须调整，避免内战。中央决定毛、周[1]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同志为候补书记。

中央

未感

---

[1] 周，指周恩来。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7日，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专程到延安来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和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

1945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和赫尔利等交谈。

1945年8月，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延安合影。

1945年8月，毛泽东、朱德和张治中在延安。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的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赫尔利、张治中在延安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

1945年8月28日，邓颖超等在延安机场为毛泽东送行。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前在延安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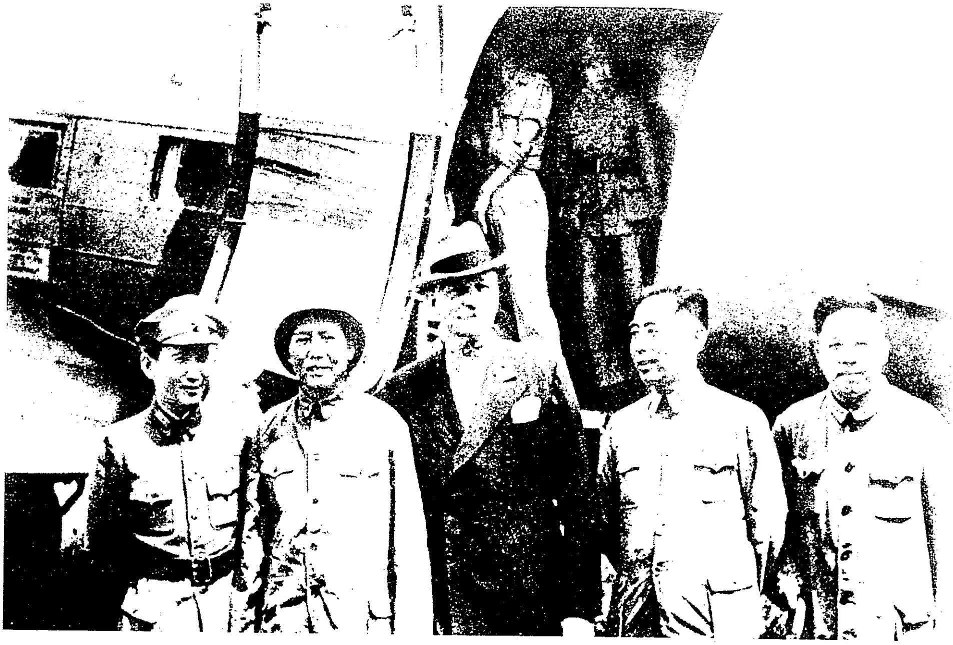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前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赫尔利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延安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赫尔利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赫尔利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赫尔利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赫尔利等在飞机前合影。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在重庆机场发表的谈话[1]

（1945年8月28日）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

---

[1] 毛泽东在赫尔利、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于下午4时5分飞抵重庆。这是毛泽东在重庆机场接见记者时发表的谈话。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途中。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赴重庆谈判的飞机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机场，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图为毛泽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飞抵重庆机场，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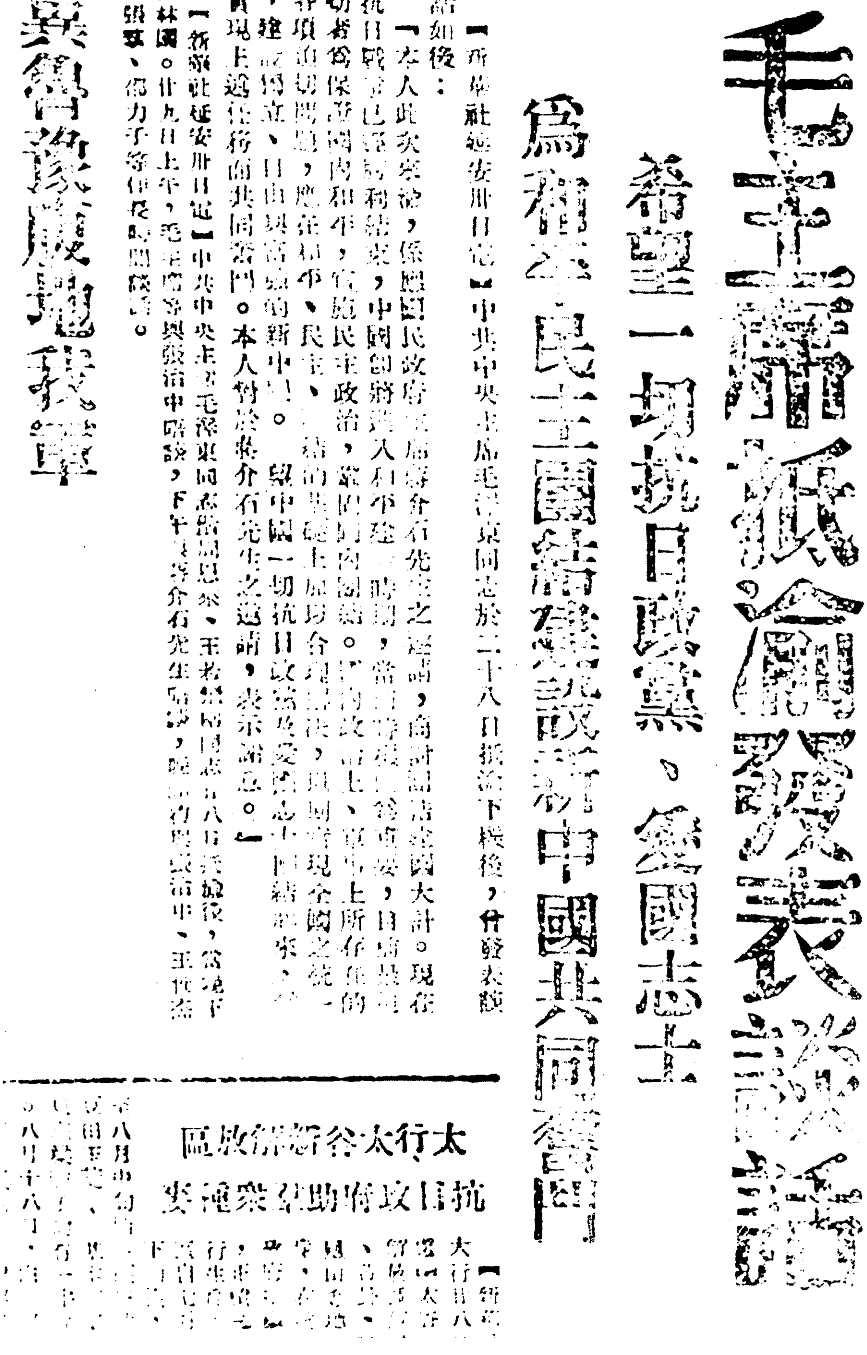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抵达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机场。

重庆各界人士欢迎毛泽东到重庆。

毛泽东抵渝当晚和第二天以及离渝前夜下榻的重庆歌乐山林园“中正楼”。



毛主席抵渝發表談話

希望一切抗日黨派、愛國志士

爲和平民主團結建設新中國共同奮鬥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於二十八日抵渝下機後，曾發表談話如後：

「本人此次來渝，係應國民政府蔣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爲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爲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希望中國一切抗日政黨及愛國志士團結起來，爲實現上述任務而共同奮鬥。本人對於蔣介石先生之邀請，表示謝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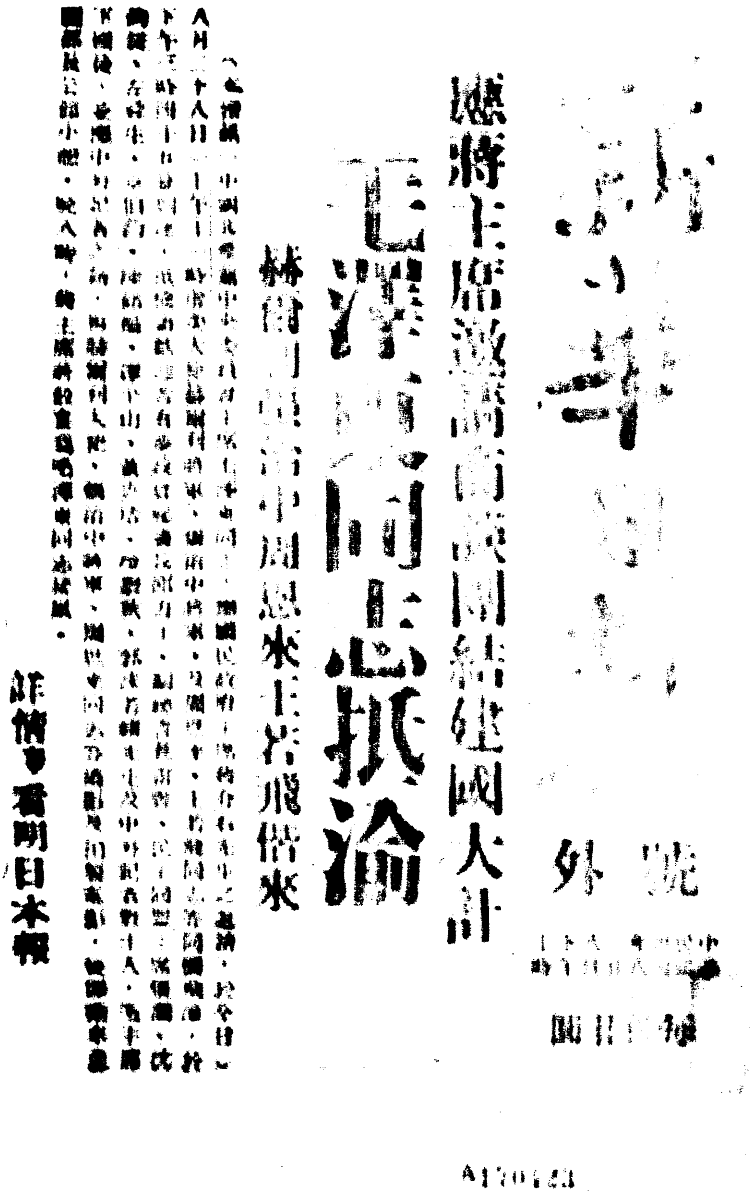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暨周恩來、王若飛兩同志廿八日抵渝後，當晚下榻林園。廿九日上午，毛主席與張治中晤談，下午與蔣介石先生晤談，晚間與張治中、王世杰、張羣、邵力子等作長時間談話。

[illegible]

太行太谷新解放區

抗日政府助群衆種麥

毛泽东抵达重庆时在机场发表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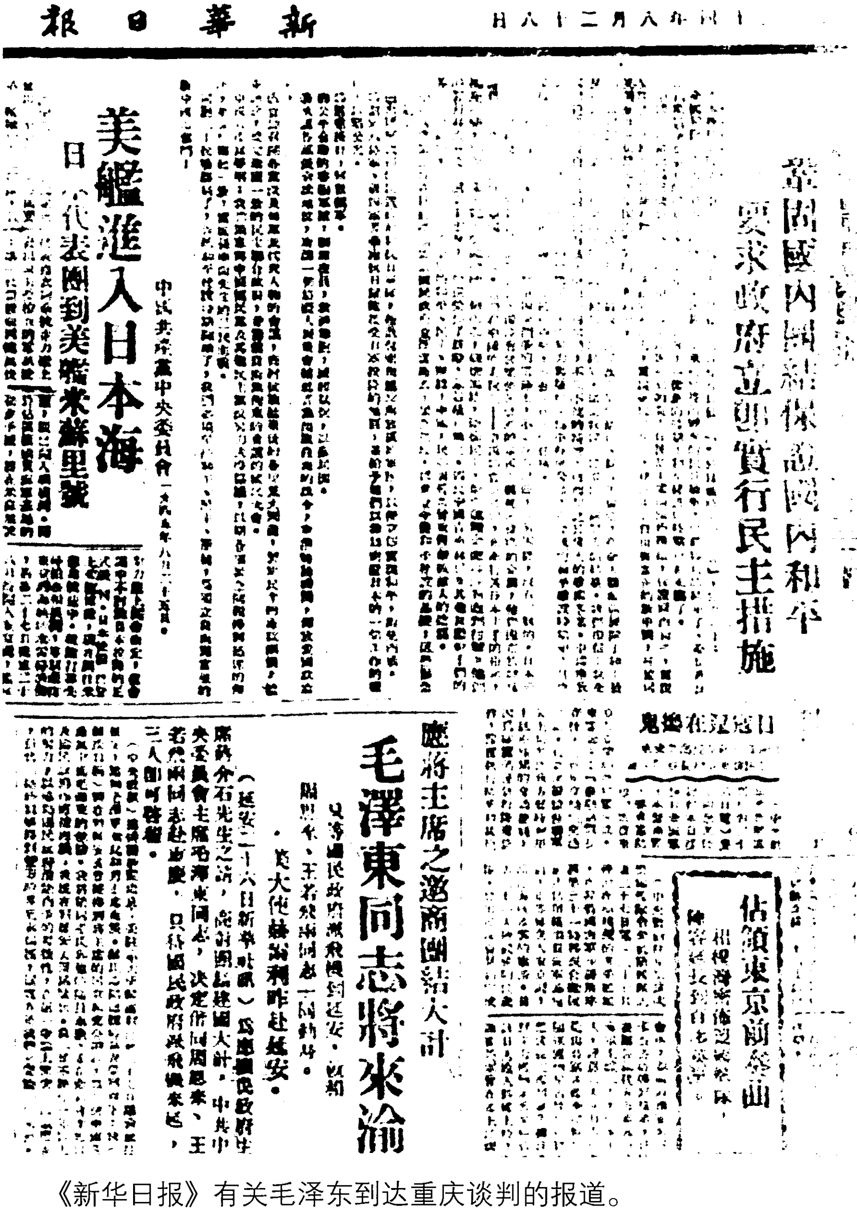
新華日報 號外

應蔣主席邀請商談團結建國大計

毛澤東同志抵渝

赫爾利 張治中 周恩來 王若飛偕來

《新华日报》关于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号外。



新華日報

卅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

要求政府立即實行民主措施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美艦進入日本海

日代表團到美艦米蘇里號

應蔣主席之邀商團結大計

毛澤東同志將來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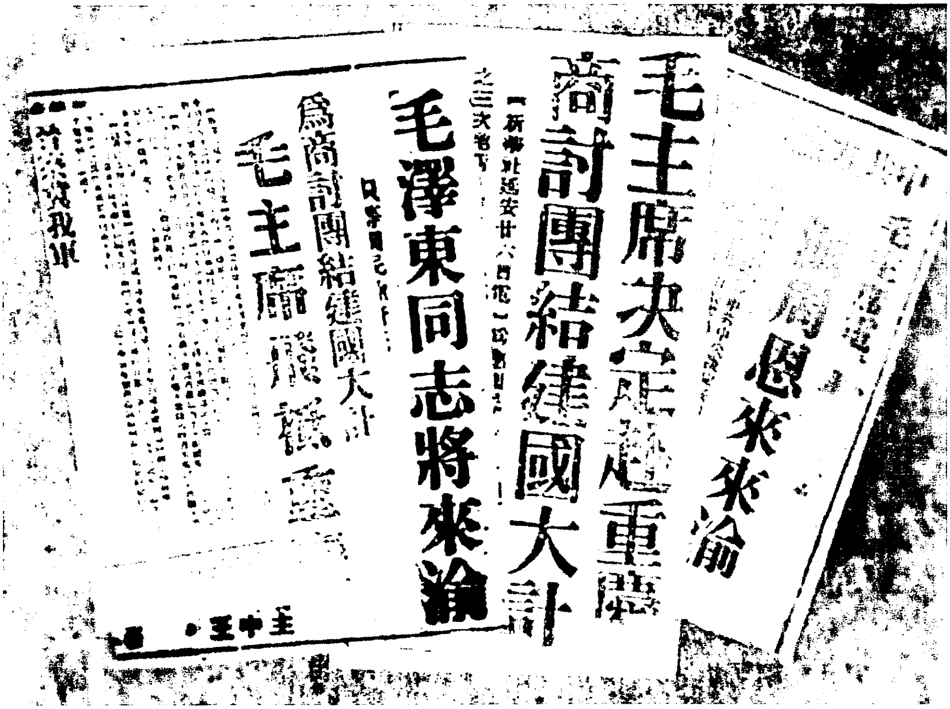
周恩來、王若飛兩同志一同飛渝。

美大使赫爾利昨赴延安。

（延安二十六日新華社電）為應國民政府蔣主席介石先生之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決定偕同周恩來、王若飛兩同志赴渝，只待國民政府派飛機來延，三人即可啟程。

佔領東京前奏曲

《新华日报》有关毛泽东到达重庆谈判的报道。



恩來來渝

毛主席決定赴重慶

商討團結建國大計

毛澤東同志將來渝

爲商討團結建國大計

毛主席飛抵重慶

重庆各大报刊有关毛泽东抵渝谈判的社论和报道。

和张澜的谈话[1]

（1945年8月28日至9月11日）

一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您是张表老吧？您好！

张澜（以下简称张）：不敢！不敢！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

毛：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不敢当，不敢当！

张：应该的嘛，您奔走国事，才真是辛苦了！

毛：哪里，哪里！

毛：改日长谈。

---

[1]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今西充县莲池乡人）。1919年五四运动后赞助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10月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至1955年2月9日逝世，享年83岁。这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和张澜的几次谈话。本篇一是毛泽东到达九龙坡机场时同前来迎接的张澜的谈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周恩来到特园拜访张澜时的谈话。本篇三是9月15日，毛泽东同张澜、鲜英会晤时的谈话。本篇四是毛泽东返回延安时在机场和张澜等的谈话。

二

毛：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1]**（以下简称鲜）**：毛先生，因为表老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曾来做客，听到这名称后，欣然提笔写了这块匾。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

毛：原来这是董老题的名，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诗，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也堪称三绝了。

毛：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执掌天下事，长集此民主之家。谁的手笔？

鲜：表老所作。

---

[1] 鲜英（1885—1968），字特生，四川西充人。民盟创始人之一，著名民主人士。军人出身，1925年出任江巴卫戍司令驻防重庆，1933年春，与张澜代表刘湘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联络反蒋抗日，为后来的红桂川协定的签订奠定了基础。1937年在成都与张澜、钟体乾代表刘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签订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1939年后开始拒绝仕途。鲜宅名“特园”，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聚会共商国是之场所，董必武、冯玉祥分别以“民主之家”的尊号赠予特园。毛泽东称他为“当代孟尝君”。1968年，鲜英夫妇先后逝于北京。

毛：意义好，词好。

张：斯是陋室。

毛：惟吾德馨，何陋之有！

张：润之先生，此次您竟会来重庆，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您现在来了，我们又不能不为您的个人安危而忧虑啊！

毛：多谢关怀！多谢你们各位的关怀！此次单刀赴会，来之前，我们是作了充分研究和估计的，按目前形势看来，可以说是有惊无险，或者是有险不危，我现在不是甚好吗？毫发无损，我一下飞机，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啊！我是诸葛亮到东吴，身在虎口，安如泰山啊！

张：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毛：表老，这次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必大放其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这种调子已经在唱了，不得了，罪名一大堆往你头上浇下来，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润之先生，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哼，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明是非，这场戏不也就大有价值了？

张：润之先生，您看此次谈判前途将如何？

毛：国民党一方面要同我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我们进攻，包

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仅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军队已经有八十万。

张：哦？

毛：所以说蒋的主意是老早定了，他要消灭我们，而且是越快越彻底越好，不如此，他是不舒服的。

张：足见此人根本无诚意谈判，他在骗人！

毛：是啊！他总是骗人，他没有诚意，他是靠不住的，积多年之经验，我们深知是这么一回事。不说别的，此次他们三请四邀，诚意惊人，可我来了，他们却毫无准备，看来，今后一切提案还得由我们提出呢，岂非笑话？

张：这就足证其假了，我看他们本来就没想到您真会来的，故而，我认为谈判很难有什么真正结果。内战危机重重啊！

毛：表老，您说的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据的。但是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表老，蒋氏要打内战有三大顾虑：一、我们解放区现放着人民一万万、军队一百万、民兵两百万，这个力量，他是不敢小看的。二、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今天，民盟在广大人民中已有很大影响，民盟在中国民主革命中为民主团结、统一、建国，为反对内战，起着重大作用。现在，民盟在您的领导下，正和我们共同奋斗。蒋氏对此岂敢轻视？三、国际上的有识之士也不满意中国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有此三条，蒋氏要实现其妄想，决非易事，这迫使他不能不讲点现实主义。他邀请我，我就来谈判。至于谈判结果如何，到时再看，但我们还是要力争，以成其好事。他来两手政策，我们也早有准备，谈则谈之，以此求和平；打则打之，消灭他个干干净净。他要这么干，你有什么办法！当然我们不先动手，后

发制人，还要怎么样呢?

张：现在既然国共谈判了，蒋氏是从来不讲信义的，承认了的也会赖掉，为了不让他赖，我说应该有第三者参加。

毛：这恐怕他们是不会同意的。

毛：我看这样吧，以后我叫恩来他们随时向您和诸公报告谈判的情况如何?

张：那也好。

（毛泽东将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加以概括，向张澜作了介绍，并对此作了详尽的解释。）

张：很公道，很公道！抗战八年，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解放了大片土地和人口。不给几个受降区是不公平的。这六项，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全部采纳施行。你刚才说假戏真演，看来，这场戏倒是很有看头哩！

（毛泽东又给张澜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政权建设、社会面貌、生产、教育以及人民福利等情况。）

张：上个月，黄炎培、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等几位参议员从延安回来对我讲了一些，真是“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啊！

警卫员：主席，今晚宴会的时间快到了。

毛：我们谈话忘了时间，晚上张治中先生邀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要告辞了。

张：他也邀了我。

毛：那好极了，我们晚上再见。

三

张：润之先生，展望谈判，终将如何？

毛：表老，目前谈判是有所收获的，已有部分达成协议。首先，他们同意避免内战和两党和平建设新中国。其次，他们承认了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自由权利。另外，蒋氏已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会议。

张：召开政治会议，也即党派会议，这我们从年初喊到现在，斗到今天了，蒋是迫于时势，总算同意召开这个曾被他们视为分赃会议的会议了，不容易啊！那么联合政府呢？

毛：我们提出在政治会议上讨论决定之。当然其他问题如和平建国纲领、国民大会、宪法等等，都将在会议上讨论决定之。上述这些您也已有所闻，目前，大体上都有了眉目。

张：这些看来都是确定的了？

毛：口头是确定了，也记录在卷，问题是要看今后实现得如何。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的东西，还得加一大把力呢。

毛：这次我们为了换得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是作了一些让步的，我们让出了南方八个解放区。

张：这是为什么？

毛：人家要回南京，我们的这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在他的过道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宋太祖是困着觉的。他硬要争，还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我们考虑到这还不至于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作了这个让步。抗战时我们自动取消工农革命政府名称，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所作

让步比现在还大呢。现在我们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其内战阴谋，使他们的谣言制造厂破产关门，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

张：您所见在大处，甚是，甚是。

毛：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大问题是目前的症结所在。

张：至今还谈不出一个圆满办法来？

毛：是啊。

毛：表老，关于军队问题，我们提出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为四十三个师，国民党他们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他们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很好，照比例减下去，我们可以缩到二十四个师，甚至二十个师。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我看，蒋氏本意是要以“统一军令”为借口取消我们的军队，这就是问题实际上今天没有、也不大可能真正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

毛：关于解放区的问题，我们先后提出了四个解决方案，但逐一给他们否定了，理由只有一个，我们所提均不合其“政令统一”的口味，被认为与“政令统一”背道而驰，看来蒋氏这个“政令统一”非取消解放区不可。

张：润之先生，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表老，蒋氏在抗战之初，打仗还像个样子，一上峨眉，就基本上躲在山上观战了。对他来说，胜利是等来的，他的方针也是早已定了的：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坚决反对内战，尽最大努力，委婉忍让以制止内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内战危机十分严重。如果蒋氏置一切于不顾，决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拿起刀来，那么人民被迫也只能拿起刀来。我们这个没有合法地位

的“武化团体”[1]也就只能回敬他一个“无法无天”了。表老，对此我们是有估计的，也是作了精神准备的。

张：*如果时局真的发展到不可逆转之境地而被迫一战，敢问，前途如何？有几分把握？*

毛：广大人民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这是我们的事业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我们有坚强的党，有从事人民战争的军队，有具有威力的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藉以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当然困难是有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张：*润之先生，内战到了不可避免之日，四川该怎么办？*

毛：表老，我今天主要就是为这件事来的。四川支持八年抗战，蒋氏在这里有一定势力，他还都南京后，对此岂肯放手？他是会另有打算的。表老，如内战不可避免，我谨代表我党中央郑重拜托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请您以您之威望，影响地方实力派与我党通力合作；第二件大事，请您协助我地下党发展武装，组织游击队。目前，我和恩来商量决定，派贾子群等在南充组织川北民主联军，打通华蓥山、大巴山、伏牛山至五台山，成就连接四川与华北解放区的地下通道。表老，这要请您大力协助了。

张：*我当尽力为之，不负君命！*

毛：表老，如果国共谈判成功而建立联合政府，视情况许可，川康问题可由地方自己解决；如果谈判失败，内战打起来，川康力量够，就早起义，力量不够，可等我军进川时协同作战。

毛：表老，恩来和我都有一个想法，也有一个要求，我们希望今后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民盟能与中共事先交换意见，共同商讨，

---

[1] 抗战时期，共产党被规定以文化团体资格参加国民参议会，因共产党有军队，故毛泽东作此戏语。

统一认识后，采取一致行动，未知尊意以为如何?

张：甚好，先前我亦早有此想，因如此始有力量掣肘蒋氏，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双方必须建立此种密切合作关系。

毛：表老，我们刚才谈的是准备战争的事，当然话得说回来，打仗，只是到了被逼至无可奈何的地步，出此下策，才走的一着棋子，我们总还是要用一切办法，尽最大努力来争取实现和平!

张：是啊，是啊。这更是我素所主张的！润之先生，我们民盟不日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民盟决心与中共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共同奋斗到底!

张：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就应该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

张：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

毛：好，好，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

毛：今日畅谈甚快!

四

毛：有劳相送，甚不敢当!

张：应该的，应该的！您总算平安归去了!

毛：多谢关心!

张：二天[1]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您吻!

毛：欢迎欢迎，欢迎您来延安，延安川人多，会做川菜招待您!

毛（向鲜英）：再见了！我们的孟尝君。

---

[1] 四川方言，意即日后。

在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谈话

（1945年8月29日）

一、对中苏订约之观感：苏联此次与中国订约目的有四：（一）防止日本法西斯之复活与英美反动派之阴谋。（二）确定中苏边界，避免将来中国为边界问题而作反苏之根据。（三）苏联对中国友好实属必要，如条约不立，将来中国必为反苏之重要根据地。（四）苏联今后中共之希望与援助，在条约内虽明定苏联今后之援助为国民政府，似对共党为不利，其实苏联今后将更积极支持中共，扶持建立民主之新中国。此次本人[1]来渝与国民党商讨，亦为苏联之暗示，盖苏联希望国共能有合作机会，此种政府固不甚合于苏联理想，但较发生剧烈之内战为佳。

二、与国民党谈判之预测：此次谈判两方面均确相当诚意，谈判前途比较乐观，但各位不可理想太高。观测蒋主席此次之谈判目的有二：（一）希望本党[2]能接纳其条件，彼以全国领袖自居，俟国内安定逐渐趋独裁之路。（二）如谈判无结果，内战不免发生，此时两方面牺牲必相当重大。此次本人与蒋主席商讨：一方面可以说受苏之暗示；一方面为打破蒋之企图争取国际国内之舆论。但此次本党所拟条件愿作相当让步，如联合政府之提议，可以取消，但其他

---

[1] 本人即毛泽东，下同。

[2] 本党即中国共产党，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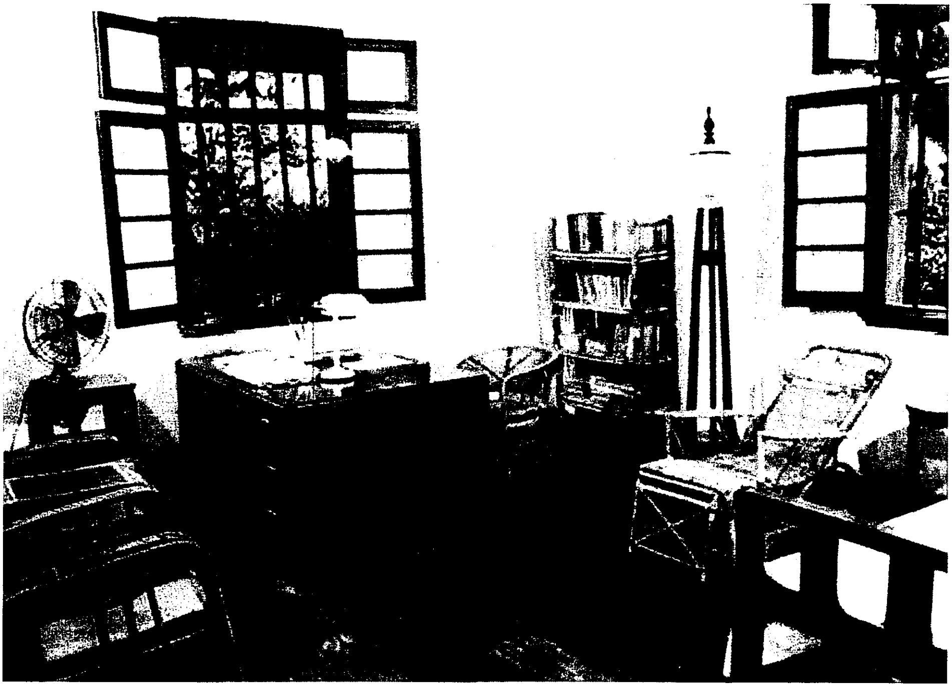
重要谈判原则将不予更改。

三、本党今后之新动向以鼓动全国之“民主”潮流为原则，故应由农村工作，而转向都市活动，各地下活动同志将来可以半公开活动，以争取群众对中共之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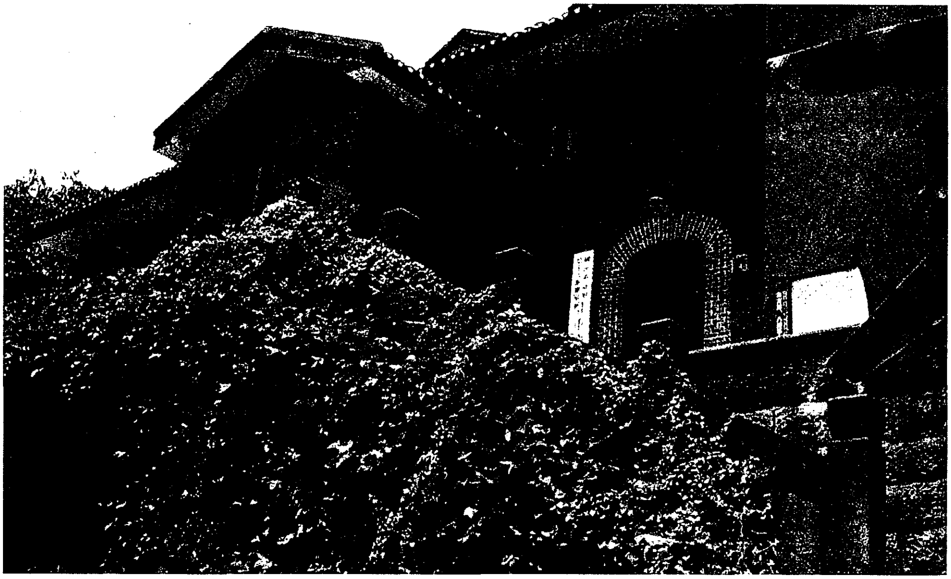
四、此次谈判所取策略：此次谈判希望有所结果，故所取方式：一方面与蒋直接谈判；一方面拉拢与联络国民党之左派，如孙科等及民主同盟张澜等，又美大使赫尔利亦可作侧面帮忙，故预料谈判前途当有相当结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办公室。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住所红岩村十三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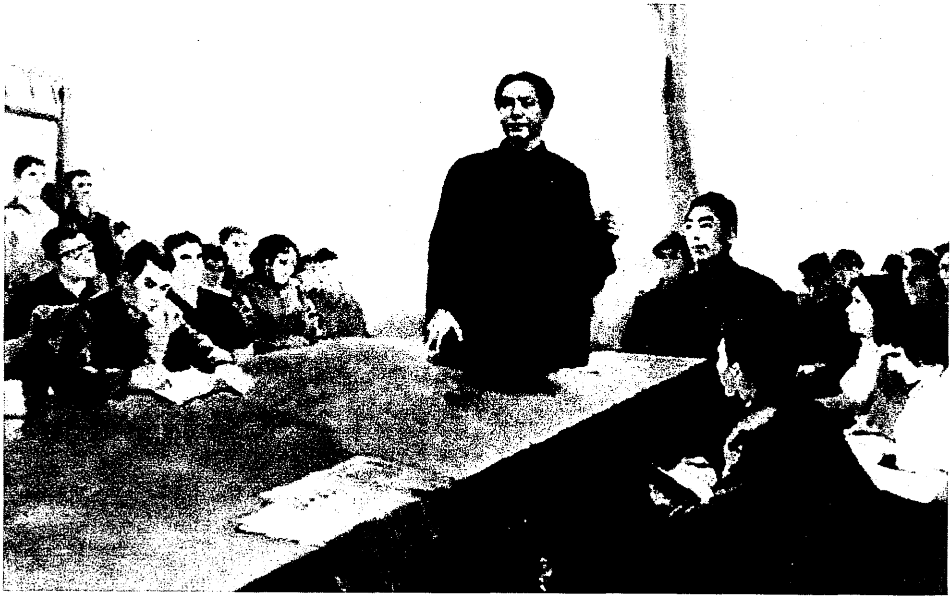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办公和休息的地方——中山四路桂园张治中公馆。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送别来访客人。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和中外记者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斯诺、龚澎等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斯诺、龚澎合影。



《毛泽东在重庆曾家岩50号接见中外记者》(油画)

和国民党谈判的十一条意见

（1945年8月30日）

刘[1]转中央：

兹将支日由周口头向国方代表张、张、王、邵四人提出的十一点意见[2]电告如下：

一、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二、拥护蒋[3]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确立长期合作、和平建国之方针。

四、承认解放区部队及地方政权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和合法地位。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

[1] 刘，指刘少奇。

[2] 这个谈判意见是周恩来起草的，原拟于1945年9月4日（支日）向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后提前于9月3日提出。张、张、王、邵分别指张群（1889—1991），四川华阳（今属双流）人，当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邵力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

[3] 蒋，指蒋介石。

六、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各部暂留原地待命。

八、在结束党治过程中，迅速采取必要办法，达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的地步。

九、政治民主化的必要办法：

甲、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协商国是，讨论团结建国大计、民主的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及抗战后复员善后等项问题。

乙、确立省制，信任地方，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1]、河北、山东、山西五省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组织省政府，其他绥远[2]、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及东北各省与平、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请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副主席、副市长及委员。

丙、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

丁、全国大赦。

戊、实行紧急救济。

十、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

甲、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解放区正规部队已达一百二十万人，亦拟逐步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

乙、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上条十六个军的驻防地区应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丙、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上述整编后部队的各级官位。

---

[1] 热河，即热河省；察哈尔，即察哈尔省。

[2] 绥远，即绥远省。

丁、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

戊、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

己、编余官位，实行分区训练。

庚、解放区民兵，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

辛、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

壬、确定政治教育计划。

十一、党派平等合法的必须办法：

甲、释放政治犯。

乙、保证各项自由。取消一切不合理的禁令。

丙、取消特务。

毛

陷

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八项原则性意见[1]

（1945年9月2日）

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

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

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

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

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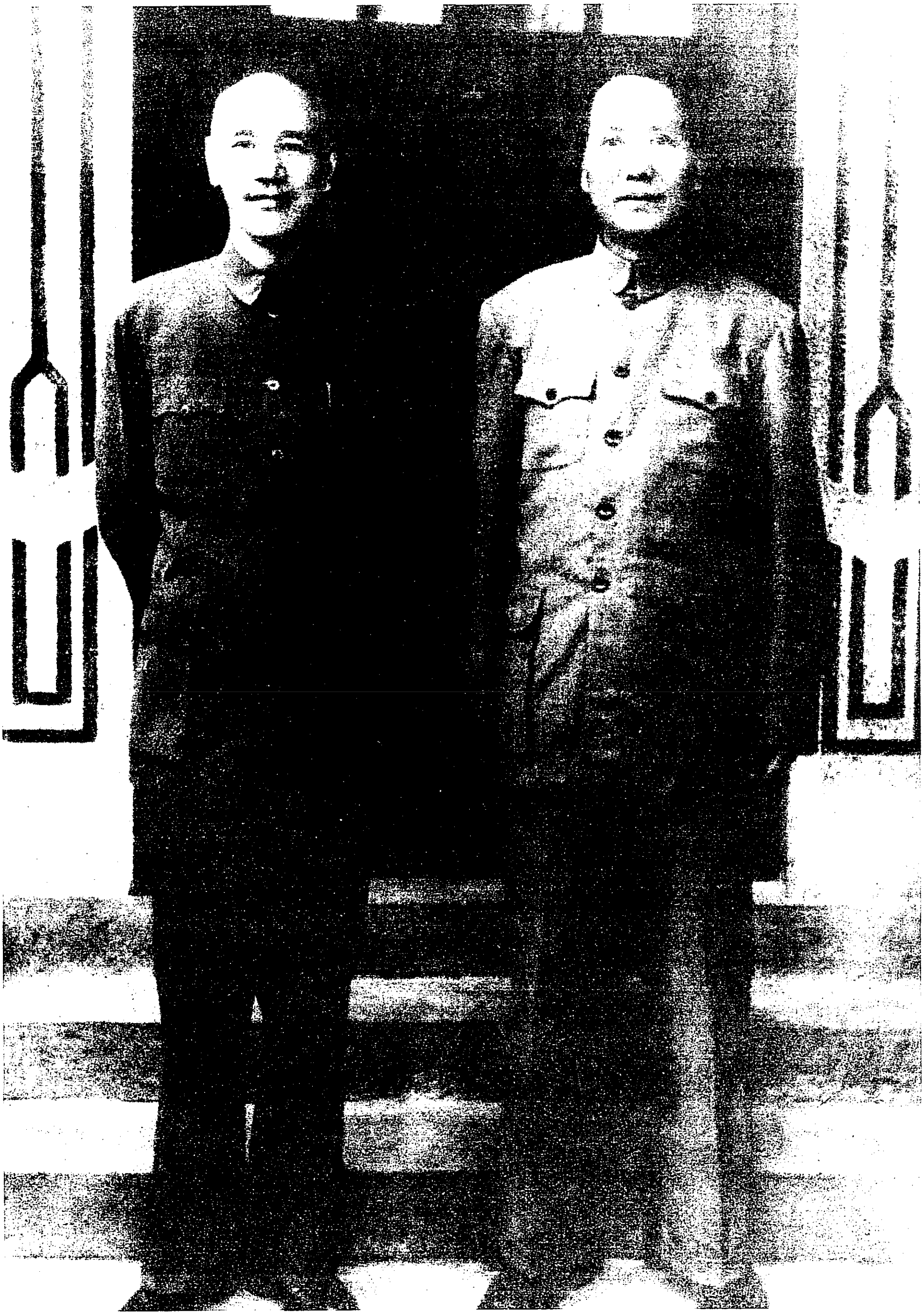
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四十八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

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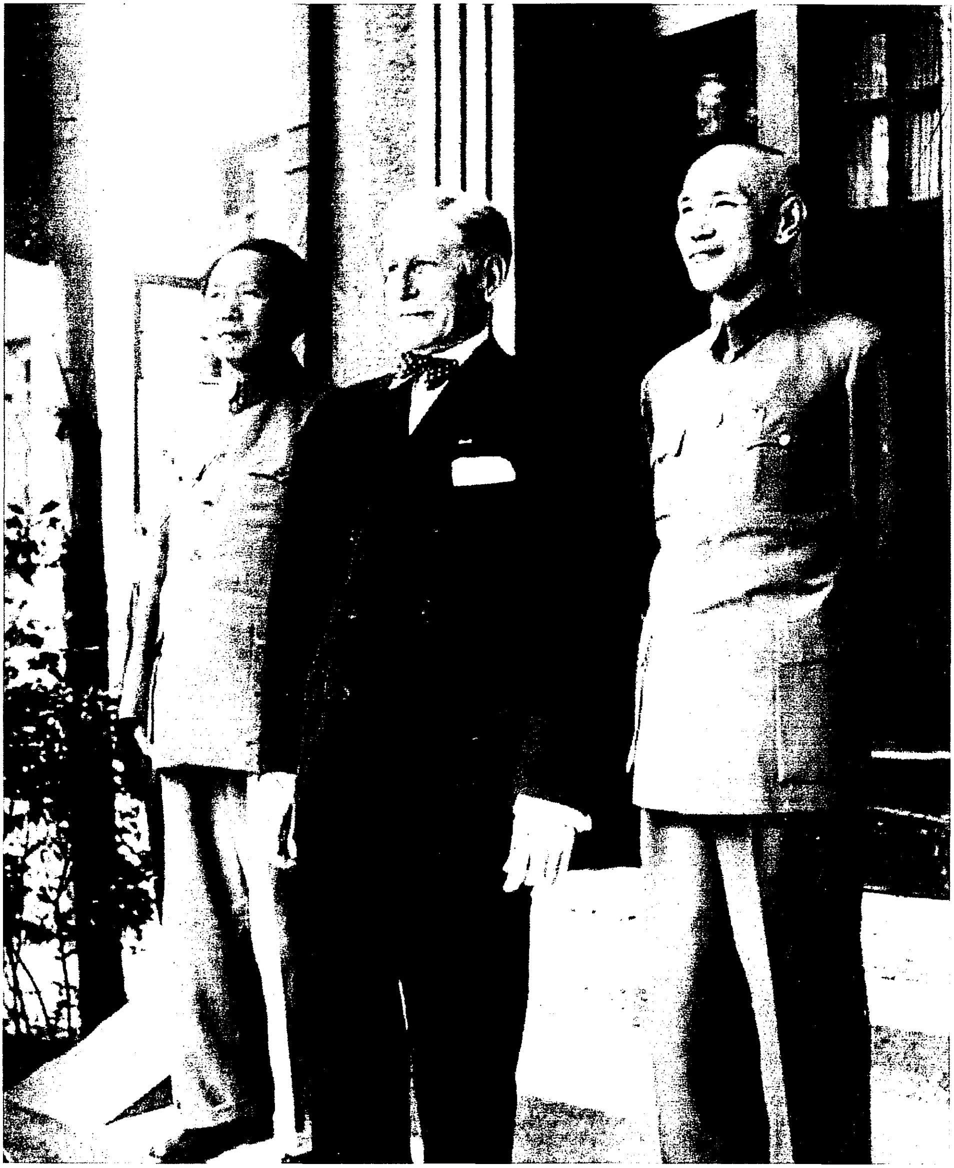
---

[1] 毛泽东于9月2日上午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在座。这是在商谈过程中，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谈判提出的八项原则性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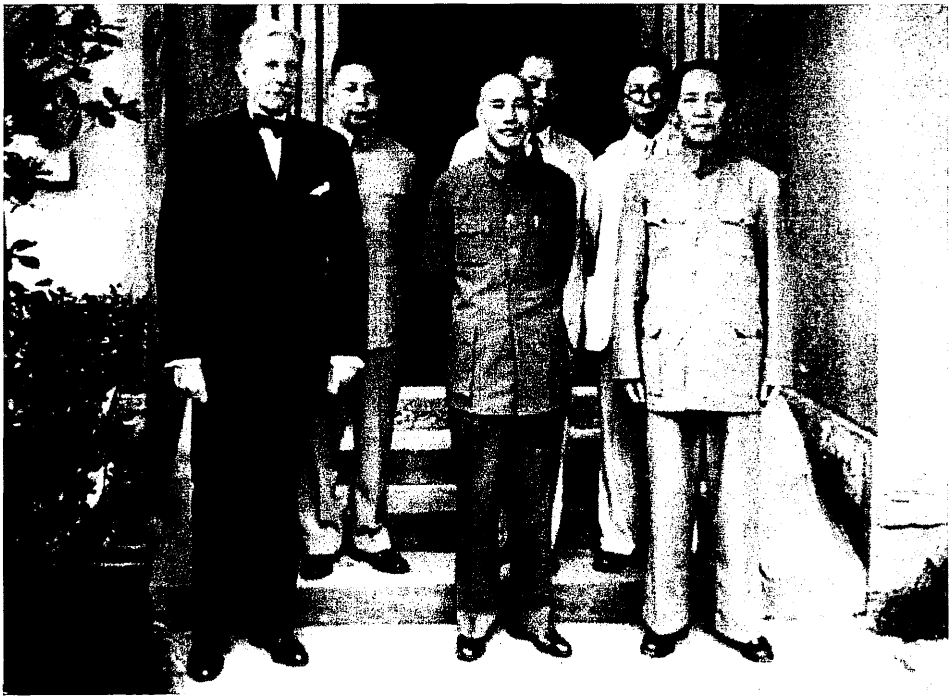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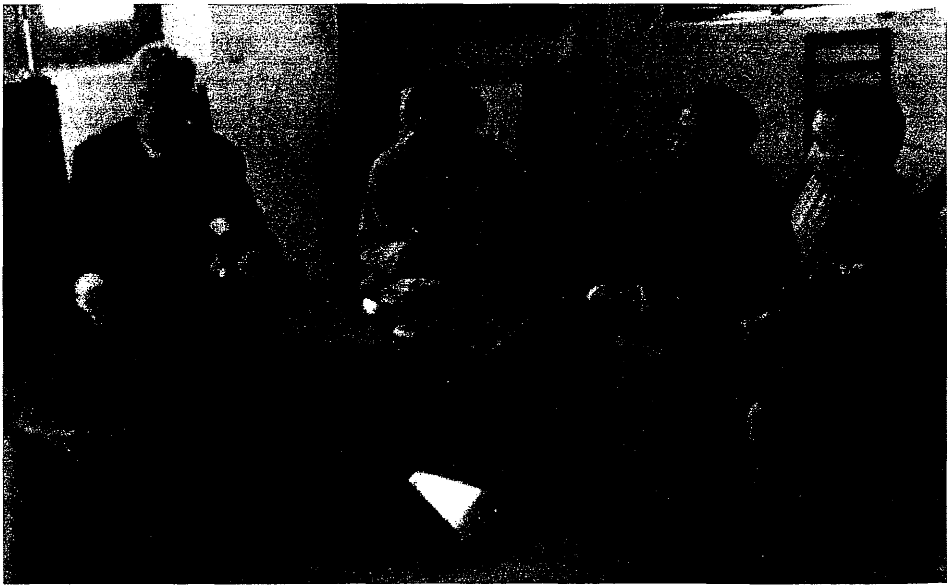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赫尔利、蒋介石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代表合影。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赫尔利、张治中等在一起谈话。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和蒋介石相互敬酒。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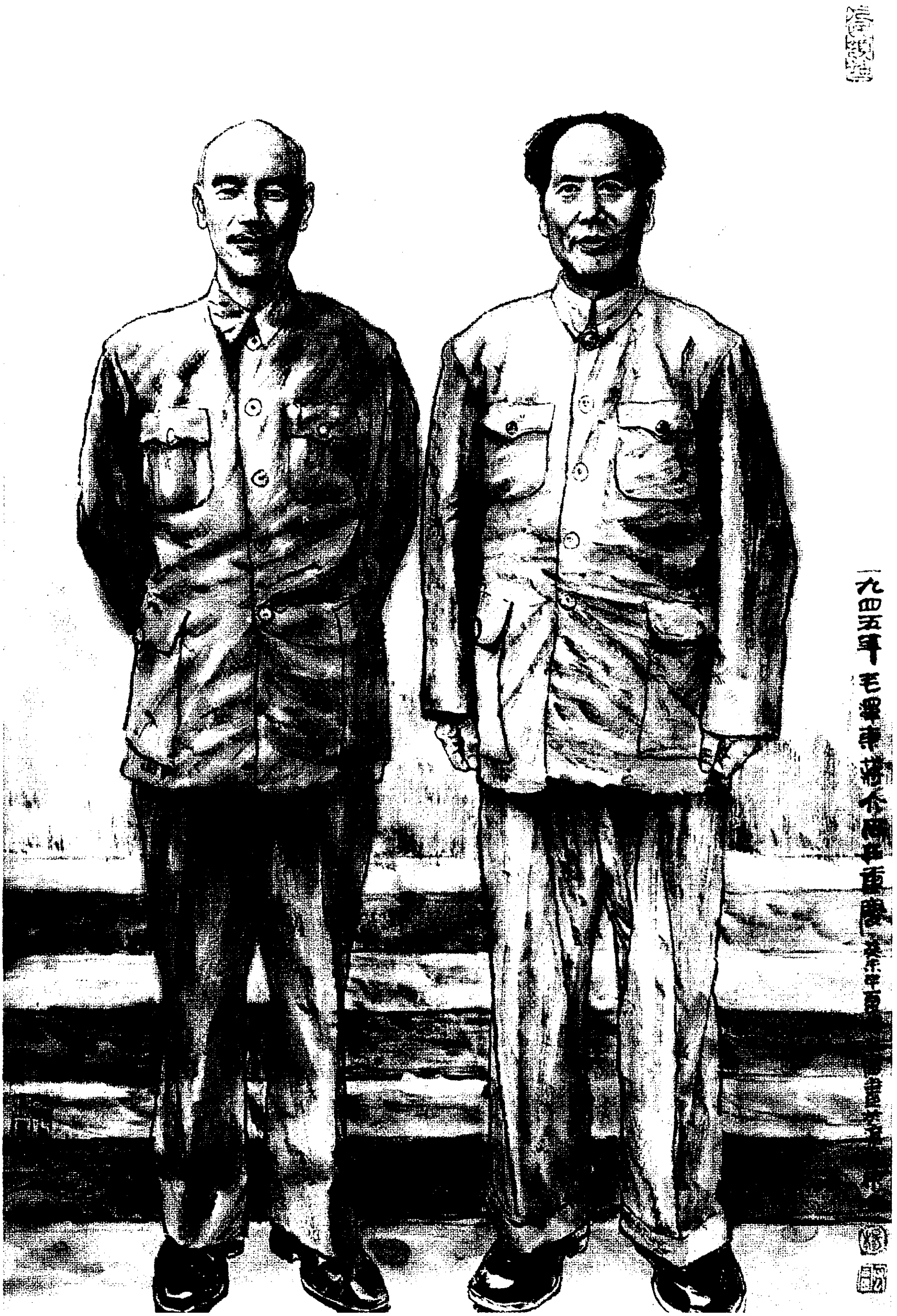
重庆谈判期间的毛泽东。

重庆谈判期间，郭沫若赠送给毛泽东的欧米茄手表。

中蘇文協昨日盛會

慶祝中蘇同盟條約

重庆谈判期间，中苏文协召开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图为大会会场和相关报道。


一九四五年 毛泽东蒋介石

《毛泽东与蒋介石》（中国画）

为民主人士题词[1]

（1945年9月2日）

光明在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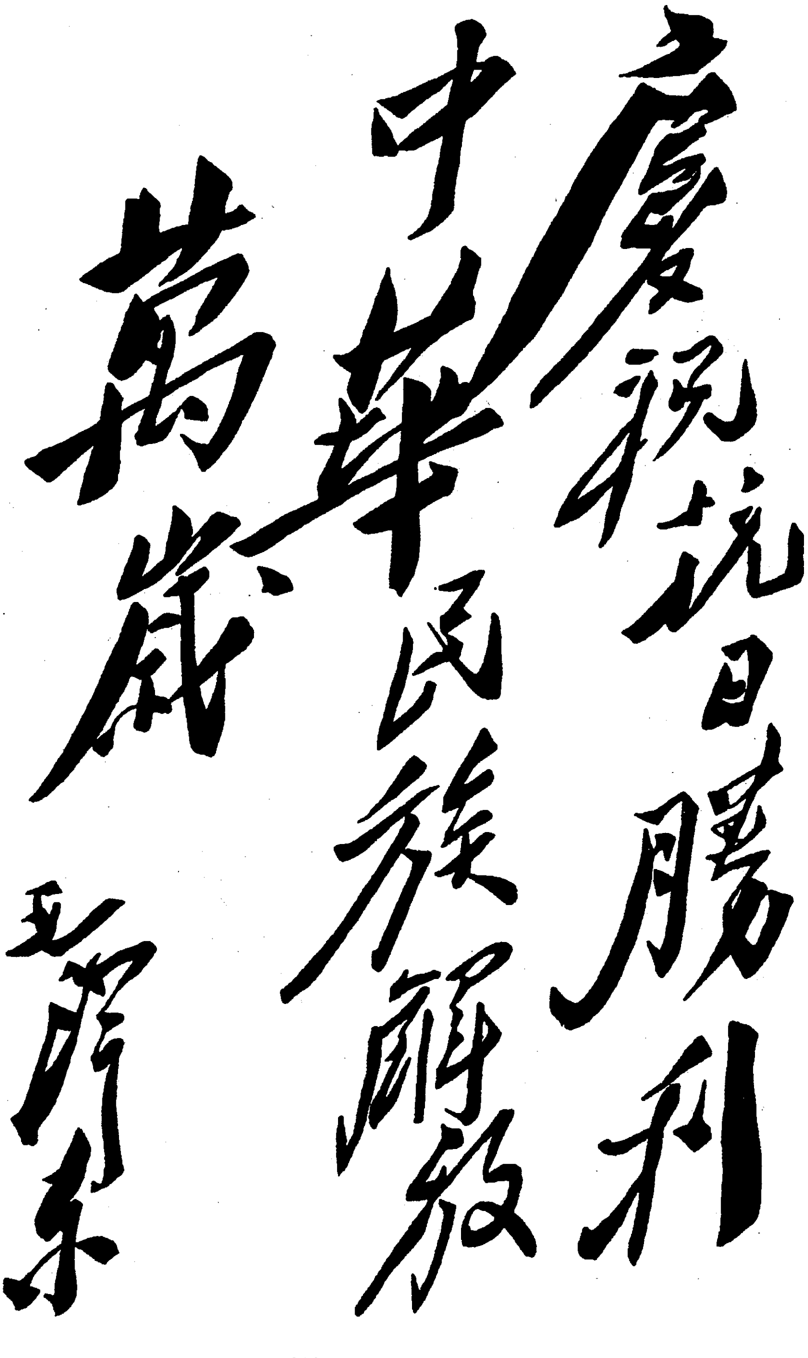
[1] 1945年毛泽东参加国共谈判时“三访特园”。二访特园在9月2日，张澜与鲜英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与王若飞。毛泽东在纪念册上题词“光明在望”四字。

为庆祝抗战胜利题词

（1945年9月2日）

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毛泽东



慶祝抗日勝利

中華民族解放

萬歲

毛澤東

毛泽东为庆祝抗战胜利的题词。

和大公报记者的谈话

（1945年9月5日）

毛泽东接见大公报记者称：

来渝五日，与中央商谈团结问题，目前尚未可能有确切之结果以慰国人，可以说者仅为内战决可避免。我国政令军令如果再不统一，的确为不得了的事体，然统一之政令军令必须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础上。只有包括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代表人士之政治会议，始能解决当前国是，民主统一之联合政府始能带给全国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谓也。边区解放区情形与其他地区不同，有民选政府，有自卫军，无保甲长；保甲长为统治人民者，最要不得。协商之另一结果为国民大会将延缓举行，对代表问题则双方意见犹未能一致。中共方面不主张维持旧代表，原则上主张实行普选。

毛泽东评论《中苏条约》称：

该条约为远东和平之保障物，有人认为对我国之民主运动不利，实则相反，可拭目待之。又有人因苏联以国民政府为对象而惊讶，实则除国民政府而外自无可为对象者。然条约亦并未束缚苏联对中国政治批评之权，舆论仍可说话，前数日苏联红星报撰文谓中国应走向民主政治，对我两党团结寄以殷切之期望。中国获得强有力之盟邦，可勿疑心于被其他国家侵略。

为中学生卢国琦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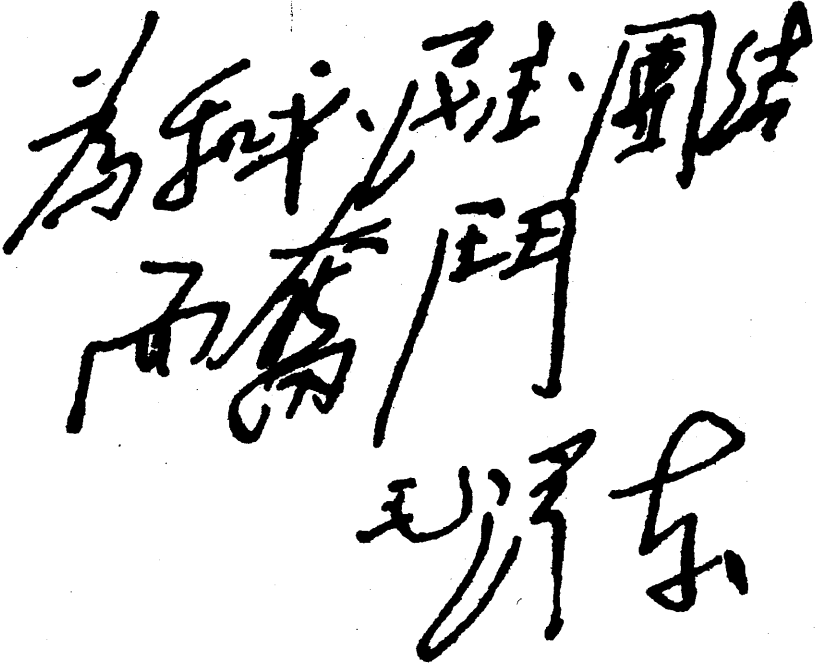
（1945年9月6日）

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

---

[1] 1945年9月6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王若飞走访柳亚子，柳亚子邻居的小孩卢国琦——一个中学生，人小胆却不小。他拿着纪念册，闯进柳亚子家，请求毛泽东为其题词。毛泽东就接过纪念册和钢笔为其题写：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接着，周恩来、王若飞也都题了字。最后柳亚子为其和诗一首。



为和平、民主、团结
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学生卢国琦的题词。

在重庆的公开声明[1]

（1945年9月13日）

【合众社重庆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按照两党协议，毛氏说不能评论与国民党领袖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情形，他说：“对于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和平。”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是整个世界的希望。毛氏称，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达到上述目的。

【路透社重庆十三日电】自国共会谈于两周前开始以来，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将军今天发表他第一次的公开声明说：全国人民都期望和平，我到重庆来尽一切努力以达到和平。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会谈将有良好结果，使中国能由抗战转到和平建设的时期，毛氏说：目前双方保证不向外公布会谈的情形，但他希望会谈会成功。他又说：希望当谈判正在进行中，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不会发生冲突。共产党宁愿撤退，而不愿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但他们仍然将继续与敌伪军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报道。

尽快派人到上海等地办报[1]

（1945年9月14日）

中央，并转张、饶，李，林平[2]：

（一）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二）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3]等，要多去，快去。除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谈判期间发出的电报。

[2] 张，指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代书记兼新四军代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林平，即尹林平（1908—1984），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3] 范长江（1909—1970），四川内江人，当时任华中新华社、华中新华日报社社长。钱俊瑞（1908—1985），江苏无锡人，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阿英，即钱杏邨（1900—1977），安徽芜湖人，作家，当时任华中文协常委。梅雨，即梅益（1913—2003），广东潮安（今潮州）人，当时任中共上海文委书记。

（三）工作进行情形望随时电告，以便配合。

毛　周

寒

复中共中央电[1]

（1945年9月15日）

浙东、苏南、皖南三地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通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请通知华中拟具体意见。

---

[1] 中共中央9月14日电告：苏军在东北的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代表贝鲁罗索夫中校与我冀热辽十六分区司令曾克林（当时任沈阳卫戍司令）乘飞机于本日同来延安，该中校向朱德总司令转达马林诺夫斯基口头通知，请命令八路军已到沈阳、平泉、长春、大连等地的各部退出。朱德表示，热河、辽宁各一部在中日战争爆发时即有八路军活动并创有根据地，请允许该地区八路军仍留原地。中共中央9月15日电告：已决定迅速地坚决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已去东北；决定组织东北局，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同日，毛泽东还接到中央转来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9月14日的电报，黄建议山东应调3万至5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3万至6万人去山东，江南的第一师应调江北。这是毛泽东关于答复中共中央9月14日和15日来电致中共中央电的主要内容。

在参政会茶会上的演说

（1945年9月18日）

今日是九一八纪念日，首先应该庆祝胜利。八年抗战，胜利终于到来，尤其东北，自九一八事变后，已沦陷十四年，今日也得到胜利解放，身临此日，倍觉兴奋。所最感光荣的，是能够在这个时期和诸先生朋友和各老前辈见面。回忆抗战期间，虽极艰苦，但因全国一致的努力，现已平安渡过，蒋主席特邀来渝共商国是，意至可感。今后当为和平发展、和平建国的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因之各党各派应在上述方针之下，团结一致，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

复中共中央电[1]

（1945年9月19日）

（一）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同意你们及张、饶计划[2]，越快越好，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二）同意陈、饶[3]去山东，罗及萧[4]去东北，林彪去热河[5]，亦以快为好。华中由谭、邓[6]组织分局。

---

[1] 刘少奇9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中说："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这是毛泽东复中共中央电的主要内容。此电并决定几个战略区领导人的调配。

[2] 中共中央9月19日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提出长江以南部队北撤计划，并告知张云逸、饶漱石的建议，其内容是将江南主力迅速北调，越快越好，浙东和皖南部队及党政干部全部转移，以此作为对国民党的一个让步。

[3]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

[4] 罗，指罗荣桓。萧，指萧华。

[5] 林彪和萧劲光当时分别被任命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8月25日飞抵太行后，即前往山东，途中得知中央调令后，转道出山海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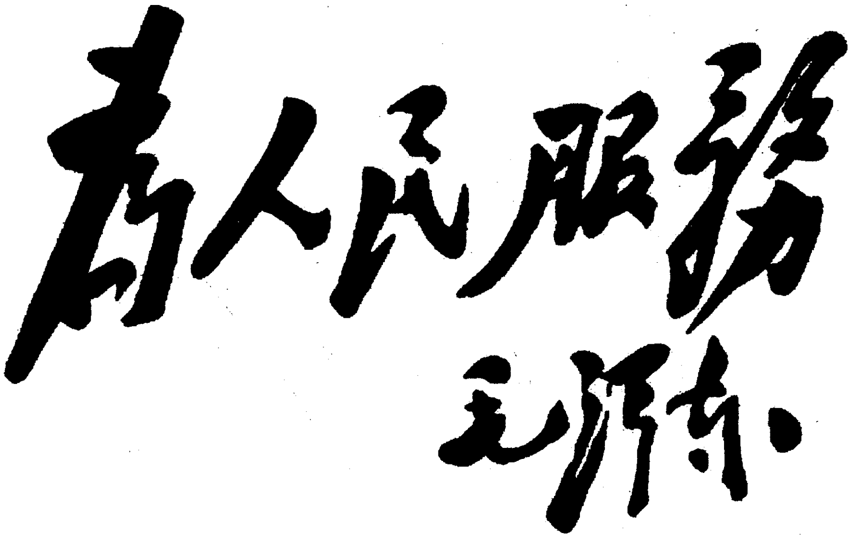
[6] 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淮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二师兼淮南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淮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政治委员。

为《大公报》题词[1]

（1945年9月20日）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大公报》的题词。

---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其间曾宴请《大公报》总编王芸生。王芸生跟毛泽东谈，说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然后，毛泽东诙谐地回答了一句："不是我们共产党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灶里不许我们造饭。"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还特地为《大公报》写下5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为徐迟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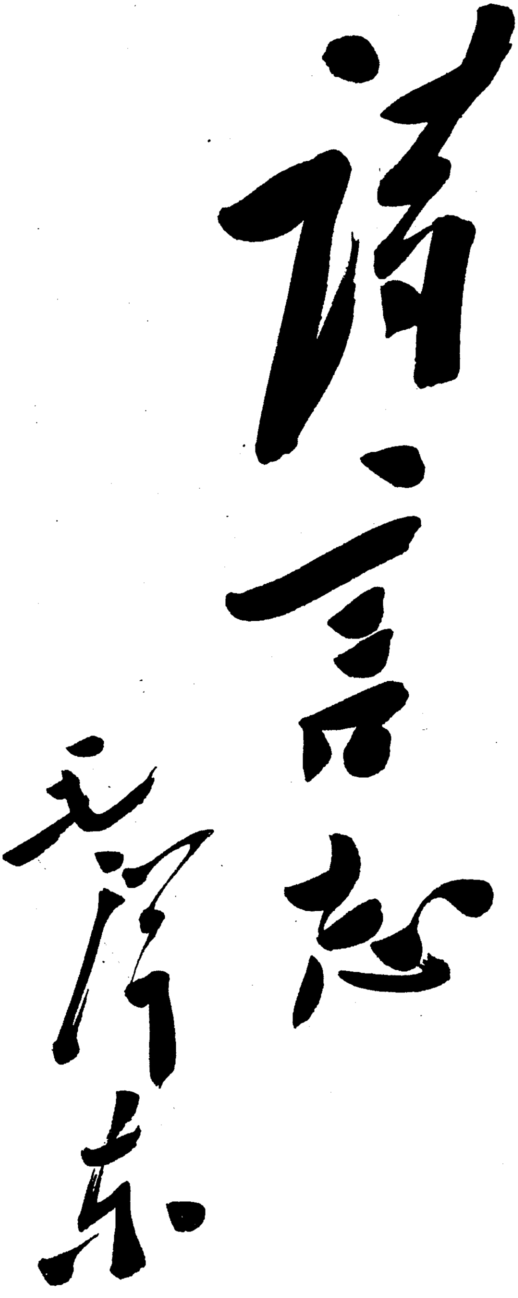
（1945年9月22日）

诗言志。

毛泽东

---

[1] 这是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为诗人徐迟所写的题词。



诗言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徐迟的题词。

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1]

（1945年9月27日）

（一）**问：是否可能不用武力而用协定的方法避免内战？**

答：可能。因为这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于中国当权政党的利益。目前中国只需要和平建国一项方针，不需要其他方针，因此中国内战必须坚决避免。

（二）**问：中共准备作何种让步，以求得协定？**

答：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中共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三）**问：中央政府方面须作何种的妥协或让步，才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呢？**

答：中共的主张见于中共中央最近的宣言[2]，这个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允许他们参加接受日本投降，严惩汉奸伪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及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四）**问：你对谈判会达到协定甚至只是暂时协定一事，觉得有**

---

[1] 这是毛泽东对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书面提出的12个问题的答复。

[2] 指1945年8月2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目前时局宣言》。

希望吗？

答：我对谈判结果，有充分信心，认为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与互相让步之下，谈判将产生一个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足以保证长期和平建设的协定。

（五）**问：假若谈判破裂，国共问题可能不用流血方法而得到解决吗？**

答：我不相信谈判会破裂。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中共都将坚持避免内战的方针。困难会有的，但是可能克服的。

（六）**问：中共对中苏条约[1]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完全同意中苏条约，并希望它的彻底实现，因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

（七）**问：日本投降后，你们所占领的地区，是否打算继续占领下去？**

答：中共要求中央政府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与人民军队，它的意义只是要求政府实行国民党所早已允诺的地方自治，借以保障人民在战争中所作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与教育上的地方性的民主改革，这些改革是完全符合于国民党创造者孙中山先生的理想的。

（八）**问：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你们准备和蒋介石合作到什么程度呢？**

答：如果联合政府成立了，中共将尽心尽力和蒋主席合作，以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九）**问：A. 你的行动和决定将影响到华北多少共产党员？B. 他**

---

[1] 中苏条约，指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们有多少是武装起来的？C. 中共党员还在些什么地方活动？

答：共产党员的行动方针，决定于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共现在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十）**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1]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2]。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十一）**问：**在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中，中共的建设方针及恢复方针如何？

答：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这一切也都是与孙中山先生的遗教相符的。

---

[1] 林肯（1809—1865），曾任美国总统。

[2] 指美国总统罗斯福（1882—1945）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十二）**问：你赞成军队国家化，废止私人拥有军队吗?**

答：我们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这两件事的共同前提就是国家民主化。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给柳亚子[1]的信

（1945年10月4日、7日）

一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2]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3]，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

---

[1]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民主主义者、诗人。当时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

[2] 柳夫人，即郑佩宜（1888—1962），江苏吴江人。当时正患盲肠炎，在重庆市立医院作手术治疗。

[3] 陆游（1125—1210），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陈亮（1143—1194），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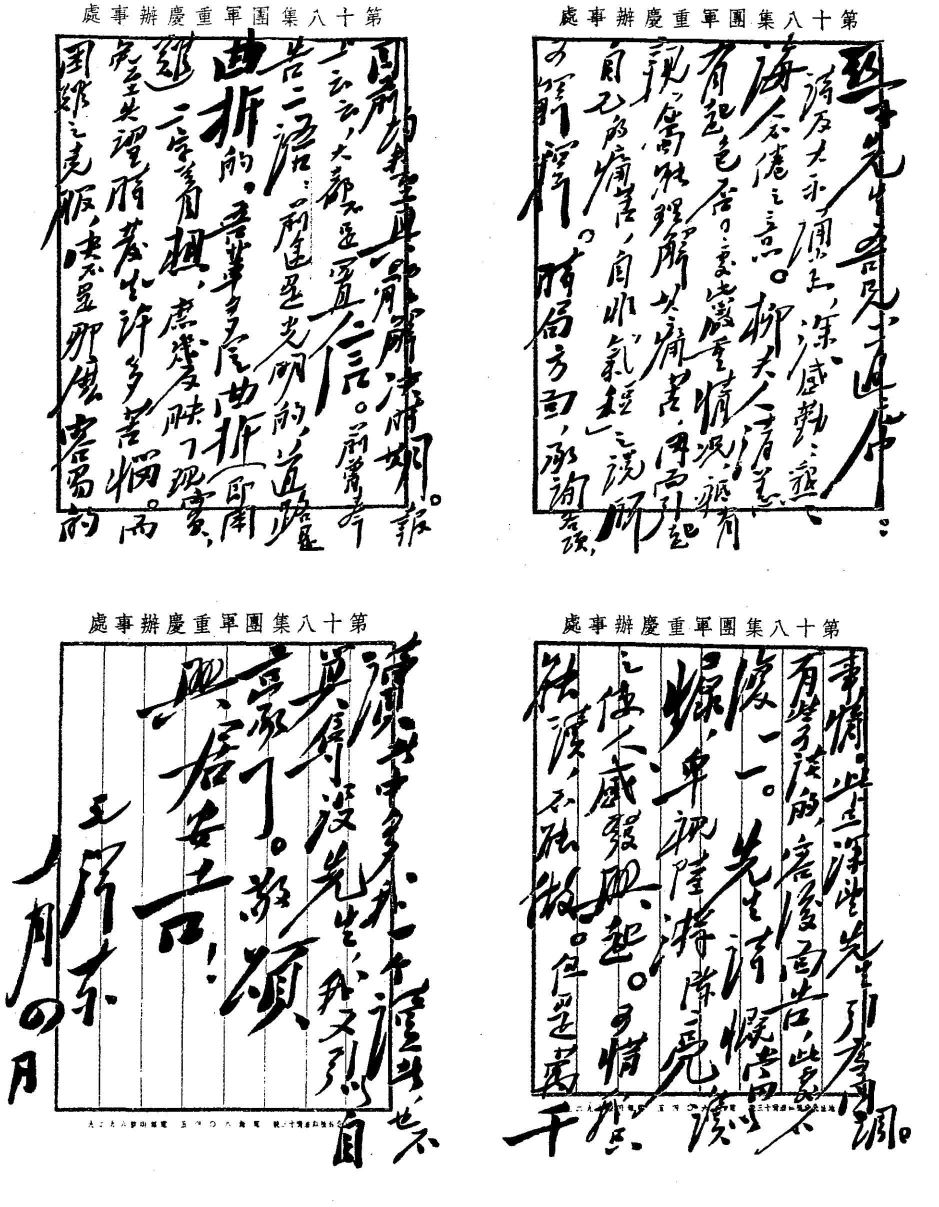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迭示均悉。最后一信慨乎言之，感念最深。赤膊上阵，有时可行，作为经常办法则有缺点，先生业已了如指掌。目前发表文章、谈话，仍嫌过早。人选种种均谈不到，置之脑后为佳。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1]，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敬颂
道安！

毛泽东
十月七日

---

[1] 指毛泽东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



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祇有说，当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

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

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机。报上云云，大都不甚可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illegible]这二字着想，庶几接了现实，而免至失望情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实不是那样容易的

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

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应当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

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

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得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的手稿。

中国只能走和平一条路[1]

（1945年10月8日）

这次来渝，首先感谢蒋[2]先生的邀请与四十多天的很好的招待，感谢今晚的主人张文白[3]先生设了这样盛大的宴会，也感谢所有今天到会的各界人士。

这次商谈，全国的人民、全世界的友人与各同盟国的政府都很关心，因为商谈不是仅仅关于两党，而是与全国人民的利害有关的问题。商谈的情况如张先生所说，是可以乐观的。在东、西法西斯打倒以后，世界是光明的世界，中国是光明的中国。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和平、民主、团结，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全世界人士与同盟国政府的要求。和平与合

---

[1] 这是毛泽东离开重庆前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宴会上的演说。

[2] 蒋，指蒋介石。

[3] 张文白，即张治中，字文白，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作应该是长期的。大家一条心，不作别的打算，作长期合作的计划。全国人民、各党各派一致努力几十年，在蒋主席的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

不能否认，困难是有的，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好的。中国人民的面前现在有困难，将来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是中国人民不怕困难，国共两党与各党各派团结一致不怕困难，不管困难有多大，在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方针下，在蒋主席领导下，彻底实现三民主义的方针下，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1945年10月8日，毛泽东在张治中举行的欢送会上讲话。

七律·重庆谈判

（1945年）

有田有地皆吾主[1]，
无法无天是尔民[2]。
重庆有官皆墨吏[3]，
延安无土不黄金[4]。
炸桥挖路[5]为团结，
夺地争城[6]是斗争。

---

[1] 有田有地，指革命根据地。皆吾主，都是我们作主。另有一说，有田有地，指富人。皆吾主，指他们统治着人民。

[2] 无法无天，指共产党不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指挥，不遵蒋介石所谓的“法”。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说，共产党要交出军队，否则就是无法无天。还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尔，你的，指国民党政府。尔民，你的老百姓，这里是讽刺国民党政府的说法。

[3] 重庆，1938年至1946年，国民党政府迁驻陪都重庆。墨，脏污。墨吏，贪官污吏。《佐传·昭公十四年》：“贪以败官为墨。”

[4] 延安，1937年至1947年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黄金，有多重含意，既是说，延安位于秦晋黄土高原，又表现那里是祖国的大好河山，一片大好形势。

[5] 炸桥挖路，指破坏敌人的交通。

[6] 夺地争城，指从敌人手中夺取城市和土地。

遍地哀鸿[1]遍地血，
无非一念救苍生[2]。

---

[1] 哀鸿，鸿雁哀鸣。《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这里比喻流离失所的难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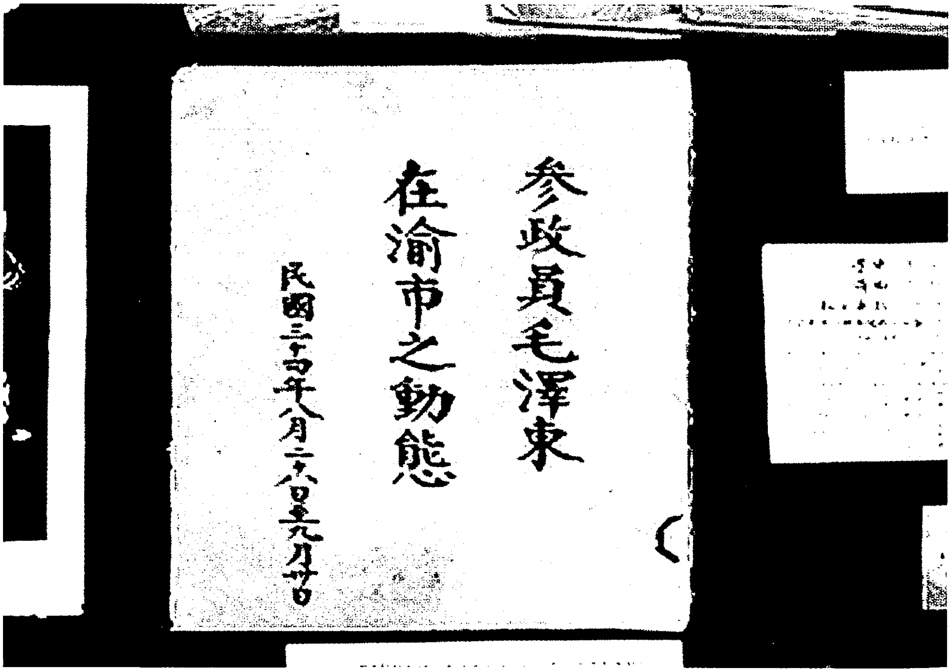
[2] 一念，一个想法。苍生，本指生长草木之处，后多借指百姓。

附件：

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两党的会谈情况一览表

时间	地点	两党代表	会谈内容
1945.9.3	101号	蒋介石、毛泽东	中共军队组编数目、驻地、解放区、政治会议、国民大会
1945.9.4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整编和解放区
1945.9.8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组编数目和省区划分
1945.9.10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政治会议、国民大会(张治中在会上首先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一词)
1945.9.11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叶楚伧、张厉生	国民大会、代表名额
1945.9.12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厉生	国民大会、政治会议、施政纲领、各党派参加政府及承认解放区
1945.9.15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	省区划分、地方政府人选及军队驻地等
1945.9.17	101号	蒋介石、毛泽东、赫尔利	军事问题
1945.9.19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缩编数目、驻地和解放区
1945.9.21	101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改编军队和解决解放区

时间	地点	两党代表	会谈内容
1945.9.27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缩编和解放区
1945.9.28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军队整编技术
1945.10.2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政治协商会议和解放区
1945.10.5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政治协商会议、解放区
1945.10.8	103号	周恩来、王若飞、张群、邵力子、张治中	商讨修改周恩来起草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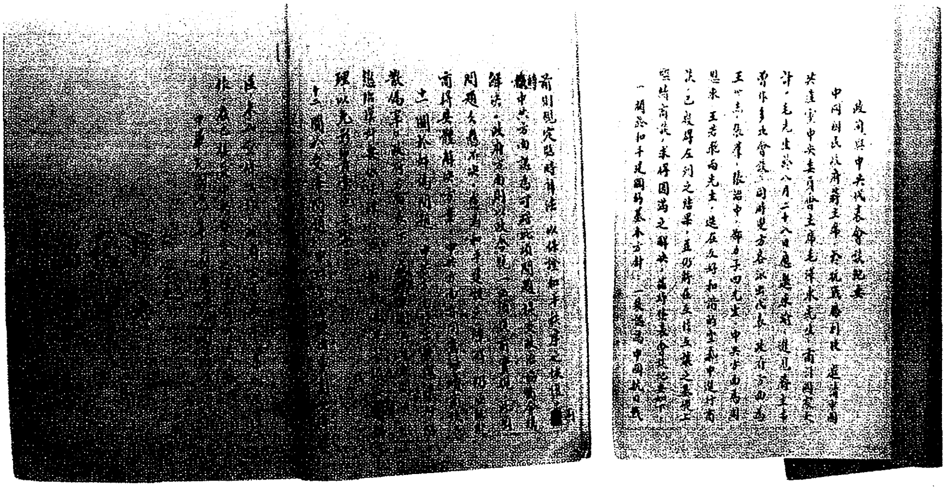
参政員毛澤東

在渝市之動態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廿日

记录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主要活动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

国共两党主要谈判地点——中山四路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宋美龄官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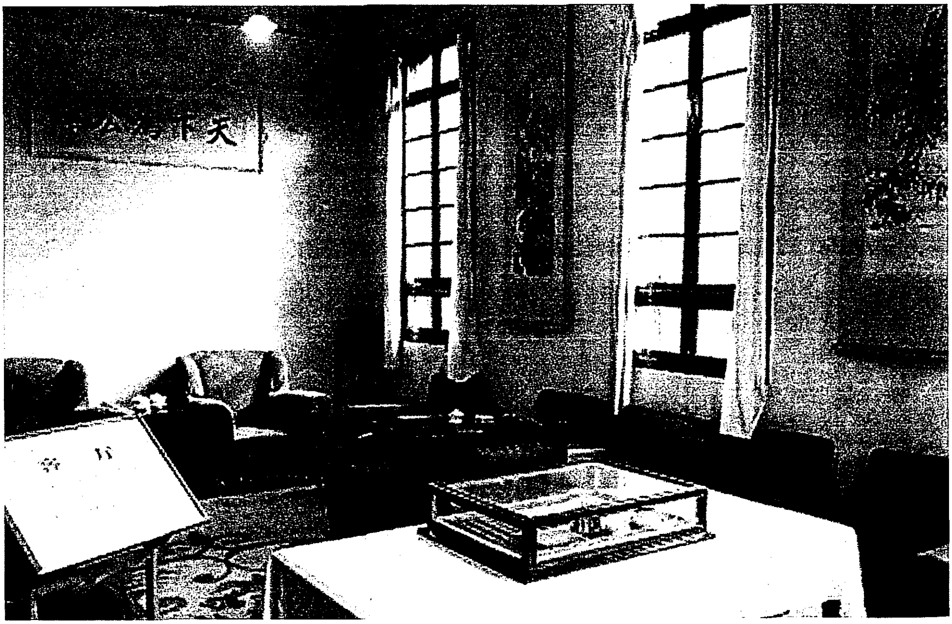


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中國國民政府蔣主席，於抗戰勝利後，邀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先生商討國家大計，毛先生於八月二十八日應邀來渝，進見蔣主席，曾作多次會談，同時雙方各派出代表，政府方面為王世杰、張群、張治中、邵力子四先生，中共方面為周恩來、王若飛兩先生，迭在友好和諧的空氣中進行商談，已獲得左列之結果，並仍將在互信互讓之基礎上，繼續商談，求得圓滿之解決，茲特將業經會談之要點公布如下：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

1945年10月10日，国共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签订地点。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11日，陈诚代表蒋介石到九龙坡机场为毛泽东送行。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镇将军握手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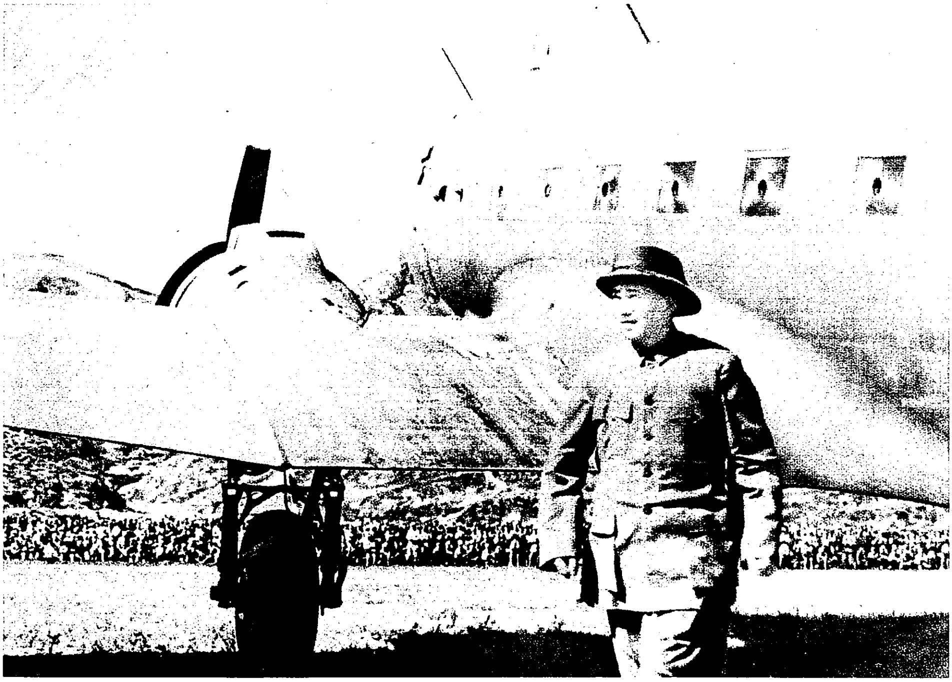
1945年10月11日，重庆各界人士到机场送行。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机场和前往送行的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告别。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送行的张澜握手。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图为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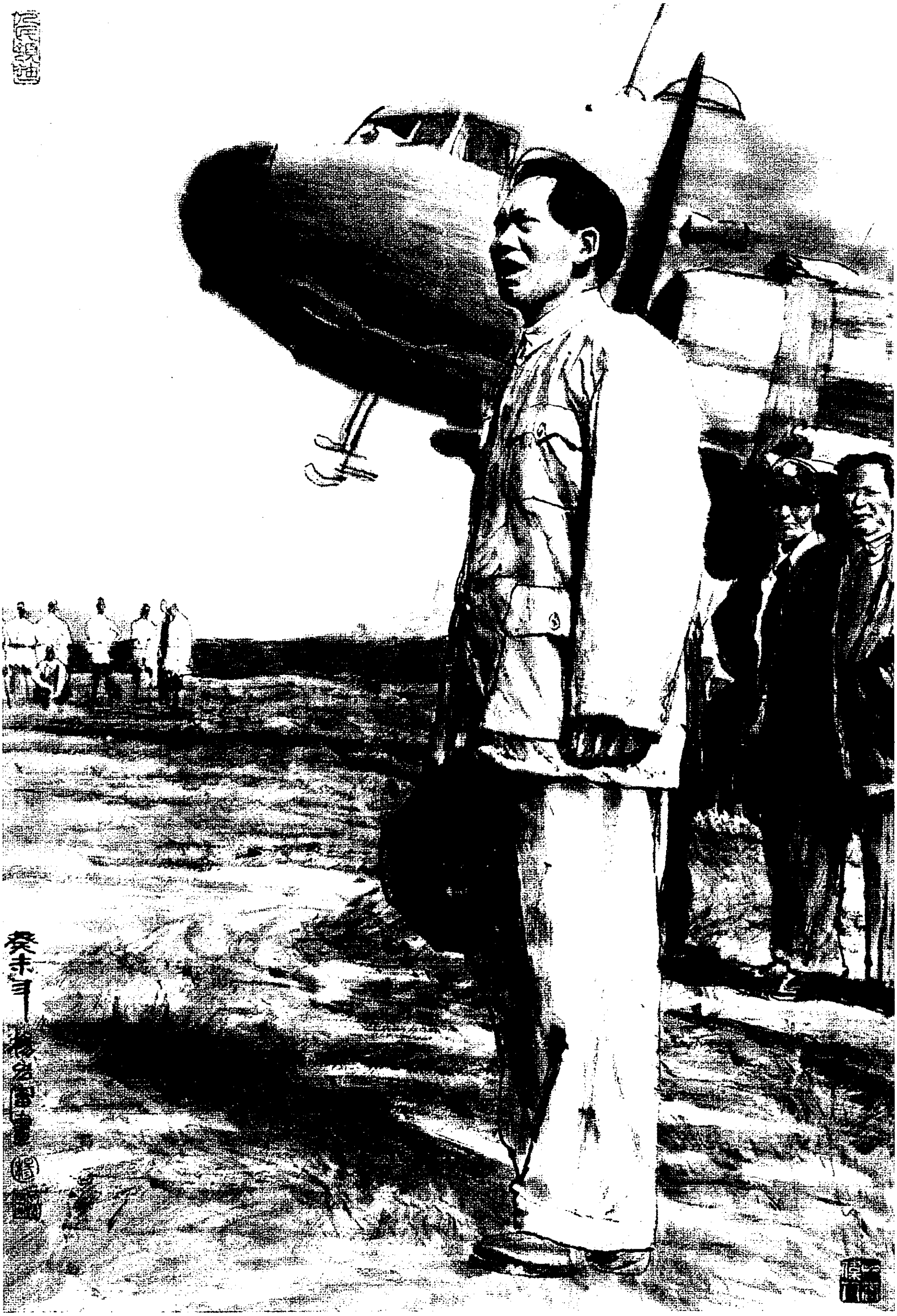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等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谈判归来》（中国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5年10月11日）

重庆会谈纪要是恩来同志起草的，采纳国民党方面意见略有修改。其中，国民大会与解放区问题未解决，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不给解放区几个省主席，省以下可以给。我们乃提出维持现状，将来解决。赫尔利回美国前，要我们交出解放区，说要末承认蒋介石的要求，要末破裂。我说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本来说解决军队数目之后发公报的，后来又说要解决解放区以后才发公报，从此就停了几天。民主同盟说我们调子低。这样，我们就开始攻势，恩来十天之内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小党派、国民党民主派各界活动。但我们守约，谈判情况可以口头说，不登报。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而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社会舆论造成了非发会谈公报不可。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如地方自治，在纪要发表后，我们提出省府民选，可以找出根据来的，因为孙中山说过。还有言论、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重庆谈判的经过讲话的一部分。

集会、出版自由等等。我原准备九号走，蒋介石留我过双十节。张治中讲，不发表这个会谈纪要不行，你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得搞个什么。解放区问题，还要经过斗争。我对王芸生[1]说："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王芸生听了说，多年写社论没有方针，今后有了。陈立夫表明是他首先主张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许多人说CC派破坏谈判，我看很多CC派人物包括陈立夫在内是动摇的。

---

[1] 王芸生，当时任《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

《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1]

（1945年10月12日）

各局，并转区党委：

双十节国共协定[2]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此次谈判的重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望加注意：

（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浙及苏南等地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3]、同蒲、正太[4]等路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双方确定将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国民党拒不承认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国民大会问题也未达成协议，中共领导的军队整编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

[3]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4] 正太，即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夺北宁[1]、胶济、平绥[2]三路的战斗亦将到来，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

（二）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

（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四十三个师，是对彼方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的七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一百二十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二十个师，也是七分之一[3]。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过去中央指示各地扩大军队编整主力计划，继续执行不变。

（四）为表示让步，取得全国同情起见，我方答应退出浙东、苏南、豫、鄂等八地，这是因为在和平局面下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广东则执行分散长期坚持计划不变。

（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一切既定计划照样执行。

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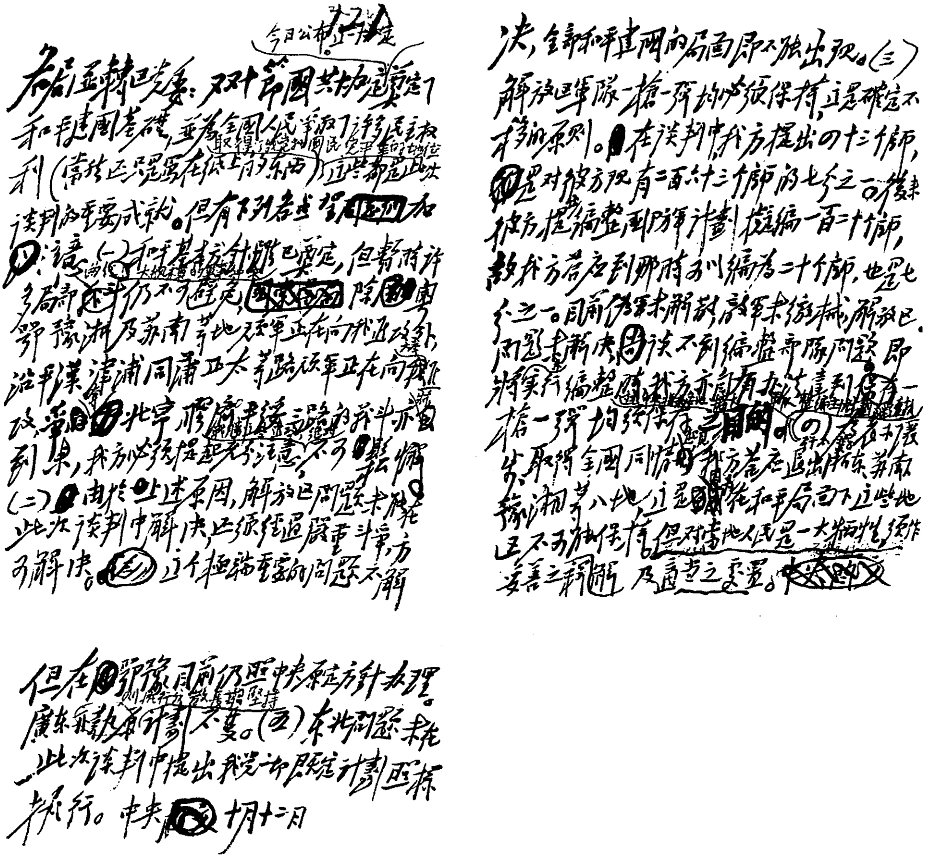
十月十二日

---

[1] 北宁，即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2]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3] 原文如此，似应为六分之一。



各中央局、区党委：双十节国共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这是我党在此次谈判的主要成就。但有下列各点望你们注意：（一）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illegible]仍不可避免，除粤鄂豫湘及苏南等地之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外，沿平汉、津浦、同蒲、正太等路顽军正在向我进攻，华北[illegible]，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不可松懈。（二）由于上述原因，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三）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在谈判中我方提出的二十个师，是对彼方现有二百六十三个师的七分之一，后来彼方提出编整国防军计划，拟编一百二十个师，故我方答应到那时可以编为二十个师，也是七分之一。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实行编整时，我方亦[illegible]一枪一弹均须保存[illegible]。（四）[illegible]我方答应退出广东、苏南、皖南、豫湘等八地，这是为着和平局面，这些地区不可能保存，但对当地人民是一大牺牲，须作妥善之解释及适当之处置。

但在鄂豫目前仍照中央原定方针办理，广东亦执原计划不变。（五）东北问题未在此次谈判中提出，我党按照既定计划迅速执行。中央　十月十二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双十协定〉公布后应注意的问题》的手稿。

关于迟滞国民党军北进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5年10月12日）

刘、邓：

（一）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个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习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为着争取时间，目前以中心区地方兵团、游击队、民兵，向交通要道沿线集结，配合小部分主力于铁道、公路，对顽军阻击、侧击、扭击，广泛地雷爆炸，破路拆碉，平毁城寨，迟滞、疲惫、消耗顽伪，以便利我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顽军每路一师或数师。你们主力将来是否应到冀东决战，看上述成效及时局再行决定。

（二）沿同蒲北进之十六军，已集中榆次、太谷线，在敌掩护下，通过正太路，难以寻求机会歼灭其一师或一团。我对第三军之三十二师及七师，尚未消失歼灭其部分机会，似以太岳区[2]近五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2] 指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一个军区，地处山西省南部太岳山、中条山一带。

主力与地方军对付即够，集中一万五千至二万主力，每次消灭其一两个团，有两三次这样战斗，第三军即不能前进，十六军亦可能牵制于正太路给以部分的打击。我太行及冀鲁豫区[1]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沿平汉路北进的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以上意见请你们斟酌电复。

军委

酉文午

---

[1] 指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两个军区。太行军区地处山西祁县、虒亭和河北石家庄、邯郸之间的太行山北段地区。冀鲁豫军区地处平汉铁路以东，河北、山东、河南3省相接的各一部分地方。

夺取平绥战役[1]的胜利意义重大

（1945年10月16日）

晋察冀、晋绥两局诸同志，并告东北及晋冀鲁豫两局：

即将开始的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蒋介石令傅作义[2]集结五万余人于归绥、集宁、大同之线，一俟陆运、空运、海运兵力集中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即将配合傅部进攻张垣[3]，并进攻沈阳、承德。而绥远[4]之毕克齐、归绥、武川、集宁、丰镇、陶林[5]、凉城、清水河等地或为我原有之解放区，或为我不久前所收复，均被傅部在日寇援助下，协

---

[1] 平绥战役，也称绥远战役。日本投降后，驻绥远西部的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调集所辖主力和收编的伪军共6万余人，进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和已被解放的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镇，企图夺占张家口，控制北平至归绥的铁路。1945年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部队对进犯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解放凉城、陶林、集宁等地后围攻归绥、包头未克，于12月中旬结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

[2] 傅作义（1859—1974），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张垣，即张家口市。

[4] 绥远，即绥远省。

[5] 陶林，即陶林县，1954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右翼后旗和察哈尔右翼中旗。

同伪军王英、李守信[1]等所强占，并曾进占我兴和、尚义，迫近张垣。现兴和、尚义虽被我收复，其余各地仍在顽伪手中，并积极准备攻击张垣，企图切断我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故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完成你们的神圣任务。至平绥战役胜利后，主力应迅速准备转移冀东、平西地区，执行严重的新任务。而以必要数量之得力部队，由大同南下，肃清阎[2]逆势力，直至太原附近，再依情势，考虑夺取太原问题。因阎逆不但长期勾结日寇，近更大举进攻我上党解放区，虽受到我上党战役[3]的严重打击，歼灭其主力三万余人，但其残部尚有六万以上，阎逆并丧心病狂，组织日寇数千人准备进攻自己的同胞，因此在不妨碍速援东北条件下，尽可能彻底歼灭阎逆残余，是完全必要与有理由的。

中央

酉铣

---

[1] 王英（1894—1950），河北邢台人，原任伪绥西联军司令，抗日战争结束后所部被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收编，任暂编骑兵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守信（1892—1970），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属包头市）人，原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结束后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

[2] 阎，指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3] 1945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配合下，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展开自卫反击，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3.5万余人，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因山西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故这次战役称上党战役。

1945年10月，毛泽东参加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和李讷在一起。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5年10月16日）

刘、邓，并告陈：

因上党与阎顽作战（这是必要的），胡顽之十六军得以顺利通过，第三军亦在积极北进中。如该两军均能到达石家庄集中，即将力图南北打通平汉路（高邑汤阴段），配合空运、海运进入平津，我向东北、冀热辽转移兵力，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除请严令赵尔陆等积极歼灭阻击十六军外，请你们务必采取一切办法，阻止敌第三军北进，消灭其大部以至全部。提议太岳所有地方兵团及大部县区干队，一刻不停地、有计划地向同蒲分段集结，控制同蒲一段至数段（并尽量动员民兵协助），在不能消灭该军时，采取运动防御节节抗击，争取我主力转移与必需恢复疲劳的时间。在主力中，伤亡疲劳较轻者，抽一两个团为先遣队，协同地方兵团进行上述动作。

军委

酉铣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的电报。

东北应坚决阻止蒋军登陆[1]

（1945年10月16日）

大连为自由港，苏方已拒绝国民党军登陆，旅顺亦不许登陆，故蒋方从营口、锦州试探登陆，还可能从安东等处试探。

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攻击前进，是必然的。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止登陆，争取时间。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致聂荣臻电[1]

（1945年10月16日）

蒋系十六军主力已达石家庄[2]，可能迅到北平，九十二军从武汉、九十四军从上海均于酉东[3]开始空运至平、津，现已半月，月底运完，故本月底蒋系至少有三个军到平、津，望注意平、津蒋军动向之侦察。

---

[1] 这是毛泽东致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第十六军属胡宗南建制，是由山西运城沿同蒲路、正太路运至石家庄的。邯郸战役（平汉战役）中，该军由石家庄南下，以配合孙连仲部北上，企图南北夹击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因刘邓部队在邯郸战役中迅速取胜，该军缩回石家庄。

[3] 酉东，即10月1日。

关于重庆谈判[1]

（1945年10月17日）

讲一讲目前的时局问题。这是同志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2]。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八十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

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3]。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我们解放区的地方，他们要拼命来争。这个问题好像不可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地争呢？在我们手里，在人民手里，不是很好吗？这是我们的想法，人民的想法。要是他们也是这样想，那就统一了，都是“同志”了。可是，他们不会这样想，他们要坚决反对我们。不反对我们，他们想不开。他们来进攻，是很自然的。我们解放区的地方让他们抢了去，我们也想不开。我们反击，也是很自然的。两个想不开，合在一块，就要打仗。既然是两个想不开，为什么又谈判，又成立《双十协定》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我遇到许多人都给我这样说过，其中也有国民党员。我向他们说，你们说的是有理由的，有根据的，积十八年之经验[4]，深知是这么一回事。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我们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两百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敢小视。我们党在国

内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不是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了，也不是一九三七年时候的情况了。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我们解放区的工作，已经影响到全中国、全世界了。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我们八月二十八日到达重庆，二十九日晚上，我就向国民党的代表说：从九一八事变以后，就产生了和平团结的需要。我们要求了，但是没有实现。到西安事变以后、“七七”抗战以前，才实现了。抗战八年，大家一致打日本。但是内战是没有断的，不断的大大小小的磨擦。要说没有内战，是欺骗，是不符合实际的。八年中，我们一再表示愿意谈判。我们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也这样声明：只要国民党当局“一旦愿意放弃其错误的现行政策，同意民主改革，我们是愿意和他们恢复谈判的”[5]。在谈判中间，我们提出，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蒋介石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会谈纪要》上所发表的和平方针和若干民主协议，一方面是写在纸上的，还不是现实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决定的。解放区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

量，国际形势，大势所趋，使得国民党不得不承认这些东西。

“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成立了《双十协定》以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事情就是这样，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是为了争取和平。不给敢于进攻解放区的反动派很大的打击，和平是不会来的。

有些同志问，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6]？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现在全国所有的宣传机关，除了新华社，都控制在国民党手里。它们都是谣言制造厂。这一次谈判，它们造谣说：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我们的

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我们过去和蒋介石办交涉，也作过让步，并且比现在的还大。在一九三七年，为了实现全国抗战，我们自动取消了工农革命政府的名称，红军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还把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这一次，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军队的问题也是这样。国民党宣传说，共产党就是争枪杆子。我们说，准备让步。我们先提出把我们的军队由现在的数目缩编成四十八个师。国民党的军队是二百六十三个师，我们占六分之一。后来我们又提出缩编到四十三个师，占七分之一。国民党说，他们的军队要缩编到一百二十个师。我们说，照比例减下来，我们的军队可以缩编到二十四个师，还可以少到二十个师，还是占七分之一。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一个师不到六千人。照他们的编法，我们一百二十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编二百个师。但是我们不这样做。这样一来，他们无话可说，一切谣言都破产了。是不是要把我们的枪交给他们呢？那也不是。交给他们，他们岂不又多了！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上面就是我向同志们讲的时局问题。目前时局的发展，有许多矛盾现象。为什么国共谈判中有些问题可以达成协议，有些问题又不能达成协议？为什么《会谈纪要》上说要和平团结，而实际上又在打仗？这种矛盾现象，有些同志想不开。我的讲话就是答复这些问题。有的同志不能了解，蒋介石历来反共反人民，为什么我们又愿意同他谈判呢？我党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只要国民党的政策有所转变，我们就愿意同他们谈判，这对不对呢？这是完全对的。中国

的革命是长期的，胜利的取得是逐步的。中国的前途如何，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如何来决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我们要加倍地努力，争取局势的发展有利于全国人民。

还讲一点我们的工作。在座的有些同志要往前方去。许多同志满腔热忱，争着出去工作，这种积极性和热情，是很可贵的。但是也有个别的同志抱着错误的想法，不是想到那里有许多困难需要解决，而是认为那里的一切都很顺利，比延安舒服。有没有人这样想呢？我看是有的。我劝这些同志改正自己的想法。去，是为了工作去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那些地方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有许多本地的干部，现在要离乡背井，到前方去。还有许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从前从南方到了延安，现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应当做好精神准备，准备到了那里，就要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是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方针[7]，我们要为这个方针奋

斗。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现和平，实现民主。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前途是光明的。这是总的趋势。伦敦五国外长会议失败了[8]，是不是就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不会的。试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打完，怎么就可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国际事务上，还是会妥协的，因为妥协有好处[9]。反苏反共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人民都坚决反对。在最近的三十年内，打过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一次大战和第二次大战之间，间隔了二十几年。人类历史五十万年，只有在这三十年内才打过世界战争。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有很大进步。这一次大战以后，世界一定会进步得更快。第一次大战以后，产生了苏联，全世界产生了几十个共产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更强盛了，欧洲的面貌改观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觉悟更提高了，全世界的进步力量更团结了。我们中国也处在急剧的变动中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

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

[1] 这是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

[2] 这里是指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国民党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下面是《会谈纪要》上关于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问题谈判经过的记载，里面的所谓“政府方面”是说国民党政府。

“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中共方面提出：

中共及地方军事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编余官佐，应实行分区训练，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并确定政治教育计划。政府方面表示：所提各项，均无问题，亦愿商谈详细办法。中共方面提出：解放区民兵应一律编为地方自卫队。政府方面表示：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时，酌量编置。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军令部、军政部及第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进行之。”

“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开始提出的方案为：依照现有十八个解放区的情形，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即以原由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名单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依据蒋主席曾向毛先生表示：在全国军令政令统一以后，中央可考虑中共所荐之行政人选。收复区内原任抗战行政工作人员，政府可依其工作能力与成绩，酌量使其继续为地方服务，不因党派关系而有所差别。于是中共方面提出第二种解决方案，请中央于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五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员为省府主席及委员，于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六省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省府副主席及委员（因以上十一省或有广大解放区或有部分解放区），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委任中共推选之人为副市长，于东北各省容许中共推选之人参加行政。此事讨论多次，后中共方面对上述提议，有所修改，请委任省府主席及委员者改为陕甘宁边区及热、察、冀、鲁四省，请委省府副主席及委员者，改为晋、绥两省，请委副市长者改为北平、天津、青岛三特别市。政府方面对此表示：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具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决定任用，倘要由中共推荐某某省主席及委员，某某省副主席等，则即非真诚做到军令政令之统一。于是中共方面表示可放弃第二种主张，改提第三种解决方案：由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重新举行人民普选，在政治协商会议派员监督之下，欢迎各党派、各界人士还乡参加选举。凡一县有过半数区乡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县级民选。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即举行省级或行政区民选。选出之省区县级政府，一律呈请中央加委，以谋政令之统一。政府方面表示：此种省区加

委方式，乃非谋政令之统一，惟县级民选可以考虑，省级民选须待宪法颁布，省的地位确定以后方可实施。目前只能由中央任命之省政府前往各地接管行政，俾即恢复常态。至此，中共方面提出第四种解决方案：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则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3]　上党区，指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这一带的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1945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9月10日至10月12日，解放区军民展开自卫反击，举行了上党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3.5万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

[4]　“积十八年之经验”，指自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起到1945年止中国共产党同它作斗争的经验。

[5]　参见《论联合政府》。

[6]　指分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等8个省区内的人民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建立的根据地。

[7]　参见《两个中国之命运》《愚公移山》两文。

[8]　苏、中、美、英、法5国外长会议是根据1945年8月波茨坦协定而设立的，自1945年至1949年共举行6次会议。这里所说的伦敦5国外长会议是指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一次5国外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同曾参与法西斯德国侵略战争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签订和平条约以及处理意大利的殖民地等问题。在讨论对罗、保、匈3国和约草案时，美英无理要求罗、保、匈3国民主政府辞职或改组；美英还违背波茨坦协定，给予法国参加讨论和约的权利，遭到苏联拒绝；苏联提议讨论成立对日本的管制委员会问题这一合理主张，也被美国拒绝。由于上述分歧，这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

[9]　参见《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致王震电[1]

（1945年10月17日）

南支在王、王[2]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目前五师及王、戴[3]处境较为困难，南支既加入五师野战兵团序列，望在郑、李[4]领导下，协助五师及王、戴争取一个至几个战役的胜利。南支尔后行动当与五师及王、戴的整个行动加以考虑。目前鄂豫我军的胜利行动，对于争取华北及东北的胜利有重大帮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2] 南支，指南下支队。王、王，指王震、王首道。10月上旬该部北返到达大悟山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

[3]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

[4]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1]

（1945年10月17日）

在反对顽军向解放区进攻争取和平局面的战斗中，望各地注意收集顽军反共反解放区的证件，不论是文字的或俘虏官佐的口供，都甚重要。文字证件及俘虏官佐均加拍照，送来延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1]的胜利

（1945年10月17日、27日、29日）

一

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

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

---

[1] 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1945年10月，自新乡沿平汉铁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邯郸进犯，企图迅速打通平汉铁路。10月24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邯郸以南包围国民党军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八军。30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起义。战役至11月2日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两万余人，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

力，由刘邓[1]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中央
酉篠

二

刘、邓、薄、张、李[2]：

酉宥电[3]悉。部署甚当，俟后续到齐，养精蓄锐，那时敌必饥疲，弱点暴露，我集中主力寻求弱点，歼灭其一两个师，敌气必挫。石家庄胡部[4]酉宥致胡电，着一个师配合侯如墉[5]向高邑推进，

---

[1] 刘，指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

[2] 薄，指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指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1905—1994），陕西眉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3] 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1945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4] 胡部，指当时进至石家庄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第三军和第十六军。

[5] 侯如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先遣军总司令。

接应安阳北上部队。其战力亦不如当面之敌，可用地方部队迟滞其行动。石家庄、新乡两处之顽共八个师，你们当面之顽共六个师，总计不过十四个师。在你们歼当面之顽一两个师时，可能引起南北增援，你们须准备在连续多次战斗中总共歼灭四五个师，即能转变局势。绥远[1]方面，聂、贺[2]两军五万余，十八日打起，敌甚顽强，开始仅歼灭一个团，击溃一骑兵师一步兵师及若干杂部，苦战一星期，占领丰镇、凉城，至二十四日攻克集宁，局势即起变化。何文鼎[3]二十六师（蒋系）被我歼灭于卓资山，傅作义[4]主力百〇一师、三十二师西窜，我正向归绥[5]追击中。鄂豫方面，我五师野战纵队业已组成，占领桐柏，与王戴、王震[6]会合，已令其放手行动，配合你们作战。望你们注意动员人民参战，对敌坚壁清野，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战胜当面之敌。粮食筹划，须作持久打算。

军委
酉感

---

[1] 绥远，即绥远省。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

[3]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6] 王，指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戴，指戴季英(1906—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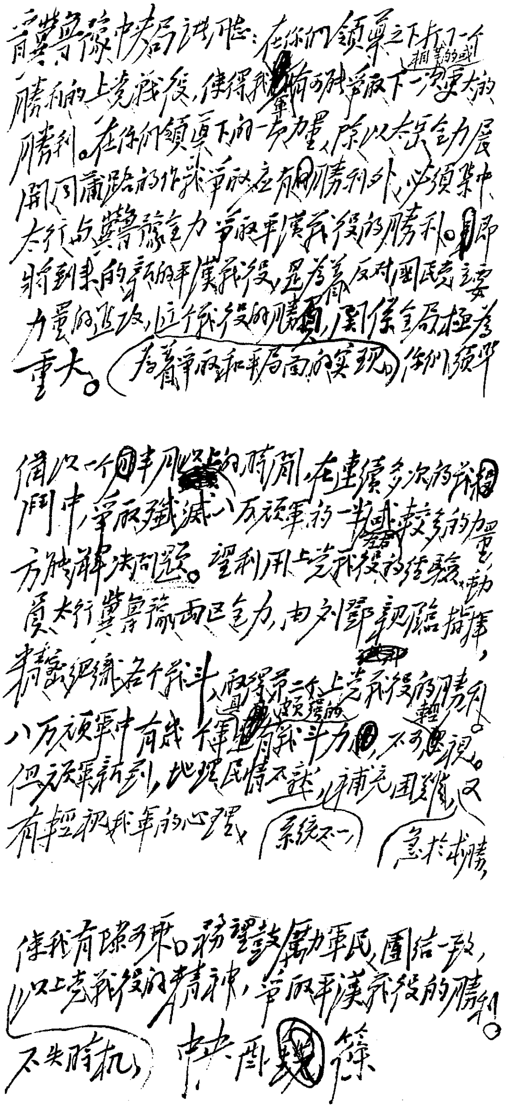
三

刘、邓：

十六军三个师南援，进至高邑后，估计将以一个师位于临城、柏乡、高邑各点，掩护后路及侧翼，两个师向南推进。如我以地方兵团及民兵地雷战作有力之打击，使彼误认为我有主力部队在该地区，必能迟滞多日不敢放手前进，我则争取时间歼灭当面之敌，然后再歼援敌，仍甚有利。你们当面六个师，再增十六军两个师，共计不过八个师，只要我取各个歼灭政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一次歼灭一个师，则在两三次作战歼灭两三个师之后，整个局势必起变化。

军委

二十九日



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相当大的或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的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邓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是有较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急于求胜，）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不失时机，）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中央酉筱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致晋冀鲁豫中央局诸同志电的手稿。

给续范亭[1]的信

（1945 年 10 月 18 日）

范亭兄：

示悉。大势所迫，使当局不能不签订双十协定，但其实现却尚是大问题。私利所囿，他们尚不愿承认解放区，并正向解放区进军，此问题之解决，麻烦尚多。看你写字，精神甚好，尚望研究休养办法，多活许多年，看见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

百合果敬收，至谢！

江青致候。

---

[1]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7 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应抽调地方军补充野战军[1]

（1945年10月19日）

郑、李：

（一）阅酉寒电[2]，你们野战军太少，地方军太多，望从各分区再抽调至少一万兵力补充野战军，使九个团每团充实到二千人以上，方能打大仗。这是第一批野战军，总数须达二万四千左右。（二）将来还须编第二批野战军，估计到沿河平原地区在国民党集中摧毁政策下不能生存，现在就须在高级人员中有精神准备，先作必要准备工作，到了那时，使当地变为合法斗争（配合当地的非法斗争），而将那里的主要力量编成第二批野战军（每分区一个旅），随第一批野战军到新地区行动。此事须精密考虑，不使步骤零乱。（三）鄂南及九江附近之力量须立即北移。（四）你们意见盼告。

军委

酉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郑位三和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兼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李先念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14日新四军鄂豫皖军区（即鄂豫皖湘赣军区）关于军区部队整编人员统计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目前东北发展方针[1]

（1945年10月19日）

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2]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3]，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时加写的一段话。

[2]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3] 这里的安东，指当时国民党政府新划定的安东省，在今辽宁省东部和吉林省西南部，省会通化，1949年撤销。

组织一支野战军进行津浦战役[1]

（1945年10月19日）

罗、李，即转陈、黎，并告华中局：

山东除竭尽全力组织渡海[2]外，陈黎组织津浦战役[3]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望陈黎精心计划，组织一支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在徐州、济南间适当地区占领铁路一段并向南北扩大占领区，然后选择时机，歼灭蒋军一两个师，打一个开始的好胜仗。再连续各个击破顽军，准备歼灭顽四五万人，方能解决问题。此外，再责令渤海军区负责协同冀中占领德州、天津间一段铁路，坚决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处长李作鹏即转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并告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指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渡渤海开赴东北的行动。

[3]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乘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开赴东北和新四军入鲁部队尚未到达山东之际，由徐州沿津浦铁路北上，在日伪军的掩护下进占济南，并与伪军一道占领铁路沿线及鲁南解放区的一些城镇，企图首先控制津浦路南京、济南段，尔后向北平、天津及东北推进。为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并力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中共中央军委令新四军北上山东主力和山东军区部分主力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在津浦铁路徐州、济南间组织战役。10月18日战役正式发起，至1946年1月13日，共歼灭国民党军2.8万余人，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截断国民党军向天津及东北开进的陆上道路。

灭北上蒋军，是为作战的辅助方向。

中央

酉皓

致陈赓等电[1]

（1945年10月19日）

陈赓，并告刘、邓、聂、萧：

（一）胡顽之十六军已顺利通过正太路，到达石家庄，胡令该军积极准备向北平前进。第三军之三十二师十一日晚宿霍县城，翌日续北进，估计已抵榆次；第七师十二日宿临汾以南之赵曲，以后该师行动不明；其军部十四日宿赵城，估计已抵榆次。十六日胡令第一军之一六七师集中侯马待令，有继续北进模样，该师十六日以前，在闻喜、安邑、虞乡线。

（二）太岳纵队应向洪洞、灵石、介休段东侧地区隐蔽集结，积极准备战场，坚决歼灭第七师或一六七师。如该师不北上时，则占领临汾至介休段同蒲路，发动群众，创造战场。

（三）正太路南北各军分区之地方兵团及民兵，仍继续向正太路破袭。赵尔陆部主力立即转向平汉路，集中力量攻占石家庄、保定段的几个车站、县城，控制铁道一段，各个歼灭顽军。

军委

十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陈赓并告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萧克的电报。

目前时局及今后六个月的任务

（1945年10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各兵团首长：

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在这一期间内，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例如重庆、上海、北平）内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与广大友好的及可能争取的中外人士合作，组织广大群众，发动要求民主、惩治汉奸、挽救经济恐慌、救济失业人民与援助还乡人民等项运动，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党在解放区的中心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为此目的，除移动大量军队与干部去东北及热河[1]等地，并在那里组织人民，扩大军队，阻止与粉碎顽军侵入外，在一切解放区，是组织强大的野战军，有计划地歼灭向我进攻的顽军，歼灭得愈多愈干净愈彻底愈好。这是自卫的战争，我们具有充分的理由，站在有理有利的地位。解放区的一切工作，都应为这一中心任务而服务，其中实现新区域的减租减息，肃清汉奸分子，建立民主政府，推行瓦解伪顽的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明年全体解放区人民的生产运动，保证各解放区军民的粮食、被服及日用品的供给，关系

---

[1] 热河，即热河省。

于争取胜利特别重大。和过去几个月一样，今后六个月中，是全党工作特别紧张时期，希望各地领导同志及中心骨干善于掌握自己的工作。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党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最后结果如何，要看我们今后六个月的努力。估计到顽方和我争夺华北、东北虽有其便利条件（美国人、日本人及伪军的援助），但有其不便利条件（地区太广，兵力不敷分配，地理人情不熟，孤军深入，脱离群众，补充困难，系统不一等），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1]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

---

[1] 指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的《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全文十二条。在这个纪要中，国民党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也不得不同意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之权”“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等。同时，国民党却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企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纪要公布后不久，国民党即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

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后六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中央
酉号

关于山东华中作战问题的指示

（1945年10月22日）

张、饶、赖[1]，并告罗、李，陈、黎[2]：

（一）接陈黎哿[3]电，我山东第八师占领邹县，控制铁路四十余里，歼灭顽伪二千余，并准备歼灭续进之顽。此外，我山东第三第四两师占领大汶口，控制铁路二十里。

（二）希望我新四野战军在蚌埠、徐州间扩展铁路占领区，集中主力歼灭顽军。

（三）只要我控制铁路一段，顽方是一定要进攻的，战斗将愈打愈大。因此我军第一，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利于打运动战的战场；第二，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

---

[1] 张、饶、赖，指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罗，指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原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准备赴东北工作。李，指李作鹏，1914年生，江西吉安人，原任八路军山东军区参谋处长，这时准备赴东北工作。陈，指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黎，指黎玉（1906—1986），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3] 哿，即20日。

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我山东、华中均须以连续战斗各歼灭四万至五万顽军为目标；第三，为了集中歼灭顽军之目的，山东、华中两地只应该各有一个主要作战方向，其他都是辅助作战方向，不要分散兵力。

（四）山西上党战役我以三万一千主力，五万助战民兵，四十天时间，连续举行几个战斗，结果阎[1]顽三万八千人，除逃去四千余外，被歼三万三千余人，缴获山积，可为范例。现刘邓[2]集中六万野战军，准备歼灭新乡北进八万顽军至少四万左右，聂贺[3]集中五万野战军正在歼灭绥东顽军五万之大部或全部。如你们能在山东、华中打几个好的歼灭战，则对整个局势将起大影响。

军委

酉养

---

[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

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

（1945年10月22日）

郑、李[1]：

（一）你们须准备至少六个月内在豫鄂活动，三部[2]会师后，集中强大野战军打几个大胜仗，方能有助于整个局势，也方能转变你们自己的局势。（二）目前你们野战军会合王戴、二王[3]，以夺取桐柏山区域最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4]），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几个月后之预备机

---

[1] 郑，指郑位三（1902—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代理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局委员、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2] 三部，指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即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五师。

[3]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二王，指王震、王首道。王震，当时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王首道，1906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委员。

[4]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河南郑州以北的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洪水阻止日军进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贾鲁河再流入颍河，在安徽正阳关一带注入淮河。1940年，改道的黄河又流入涡河、西淝河、黄河、北淝河，并分别注入淮河。黄河改道后流经的这些河道统称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修复，黄河复归故道。

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三）只要打胜仗，财政就有办法，几个胜仗之后，占领大块地区（至少七八个县），不怕不能解决财政问题，各解放区军队都是如此解决，你们自亦能解决。目前你们即应有坚定决心在桐柏山区域（铁路以西，南阳以东，叶县以南，随、枣[1]以北）创造战场，歼灭顽军，解决财政。这本是你们原定计划，希望坚决执行。

中央
酉养

---

[1] 随、枣，指湖北随县（今随州）和枣阳。

归绥包头大同等地必须占领[1]

（1945年10月22日）

聂、萧、罗、刘，并告贺、李：

（一）二十一日二十二时电悉。你们取得初步胜利，甚为欣慰。（二）傅[2]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三）二局情报，归绥城内混乱恐慌，陶林[3]被姚喆[4]占领。（四）速令冀晋、冀中、平北各组第二批野战军，每处至少一万，共三万，候令开至平北作战。

军委

二十二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并告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陶林，旧县名，1954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和察哈尔右翼中旗。原县治陶林镇为察哈尔右翼中旗旗府。

[4] 姚喆，当时任绥蒙军区司令员。

组织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歼灭向承德进攻之敌[1]

（1945年10月23日）

聂、萧、罗、刘，并告彭、程，林、萧[2]：

关于组织冀察晋第二野战军：（一）至下月上旬，顽方即将有三个军八个师（空运第九十二军三个师，现到石家庄之第十六军三个师，第三军两个师）集中北平，判断除以一部保护北平及平津线外，主力将向承德进攻，并威胁张家口。（二）决定迅速组织冀察晋第二野战军，由晋冀、冀中、平北现有精干地方兵团抽调至少三万人，编成十二个至十五个大团，限于两星期至多三星期内集中平北军区[3]，完成作战准备，其任务为协同热河[4]、冀东部队，坚决歼灭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巩固热河及平北，并充当这一战斗任务中的主力。（三）第二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望萧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的电报。

[2] 彭、程，指彭真、程子华，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林，指林彪，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当时正赴东北途中。萧，指萧劲光，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当时正赴东北途中。

[3] 平北军区，应为平北军分区，属晋察冀军区。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一星期内到达平北军区布置一切，立即建立与中央及聂刘的电台联络，不得迟误。（四）林萧野战军以歼灭由天津、秦皇岛线向东北进攻之顽军为目的，位于沈阳、山海关线，该军负有与萧罗野战军及热河、冀东我军配合作战之任务。（五）萧罗野战军之组成及作战不影响现在绥远[1]作战之聂刘野战军，只在聂刘坚决完成绥远作战任务后，应以主力迅速东调，援助萧罗。（六）赵尔陆[2]兵团如何使用，请你们提出意见。（七）原定冀察晋出二万人去东北，现改为编入萧罗野战军。

中央
酉漾

---

[1]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2] 赵尔陆，当时任冀晋军区司令员。

孤立傅作义部于集宁后再歼灭之[1]

（1945年10月24日）

聂、贺：

如傅[2]部主力固守集宁，一时不能攻克，望集中主力歼灭十八台、卓资山、三道营、旗下营、白塔[3]之敌，占领集宁、归绥[4]间二百余里铁路，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收集粮食，使集宁傅部陷于孤立，然后歼灭之。此办法是否可行，望考虑电告。如集宁可能攻克，歼灭傅部主力，则不必变更部署。

军委

酉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电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均为平绥线上集宁与归绥间的村镇。十八台、三道营、旗下营属卓资县。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白塔，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4]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以利野战[1]

（1945年10月24日）

陈、黎：

你们占领铁路地段还太短，要攻占打成一片的几个城市，如像刘邓[2]占领高邑、内丘、邢台、邯郸、磁县等城那样，方利野战。徐蚌[3]间及津济[4]间亦宜如此。

军委

酉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4] 津济，指天津和济南。

东北我军力量的布置

（1945年10月24日）

彭真[1]：

西齐电[2]告我军发展分布情形，酉养收阅，甚慰。俟大批干部及军队到后，除仍以旧辽宁省[3]及热河[4]为第一位布置力量外，对旧吉黑二省首先是吉林省各重要城市迅速布置相当力量，甚为必要。洮南[5]方面亦望注意。报告大连情况电已收到。

毛泽东
酉敬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政治委员。

[2] 指1945年10月8日彭真、陈云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汇报了国民党利用东北地区伪警察、土匪进行反共，以及新到东北的我军发展与分布等情况。

[3]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将原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九省，这里指原东北三省中的辽宁省。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洮南，旧县名，1958年与白城县合并为吉林洮安县。

致郑位三、李先念电[1]

（1945年10月24日）

庆祝你们占领桐柏[2]。望努力扩大战果，大批歼灭顽军，占领多数县城，创造新局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2] 桐柏战役，于1945年10月20日发起。中原军区主力经过一个半月连续作战，相继攻克豫鄂边境平汉路以西的桐柏、枣阳、新野、唐河四座县城，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

迅速组织热河野战军和冀东纵队[1]

（1945年10月25日）

彭真、子华，即转李运昌[2]：

关于组织冀东野战军。（一）蒋介石正由陆海空运兵至平津、唐山、秦皇岛线，其数达二十万。其中十万将位于唐山、秦皇岛线，是进攻东北的，运输及到达期均尚未定；十万位于北平、天津线，除一部守备该线外，主力将向热河[3]进攻，此部正在空运及陆运，十一月中旬可到齐。（二）我已决定组织冀察晋第二野战军，由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于三星期内组成，五个旅十五个大团（每团二千人）位于平北地区，任务为由西向东歼灭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我黄永胜[4]两团，文年生[5]两团，共约六千（均老兵）到承德，作为热河野战兵团骨干，请运昌速令热河所部抽调较有战斗力者八千至一万人左右，与黄文两部合编为热河野战军，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军区政治委员彭真和司令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李运昌，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黄永胜，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正率部护送延安干部团赴东北。

[5] 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正率部开赴热河。

程子华指挥，迅速巩固古北口地区，配合萧罗作战。（三）我运昌所部冀东部队，迅速区分为野战军地方军两部，即从现有全部队伍中抽调较有战斗力者一万五千至二万左右，编为七个至十个大团，每三团编为一旅，共编为两旅至三旅，总称为冀东纵队，由运昌亲率位于机动地区，依将来情况决定，或者配合我辽宁野战军打击由关内向关外进攻之顽军，或者配合萧罗及程子华野战军打击由北平向承德进攻之顽军。（四）中央对冀东热河两区我军数量、质量、分布位置均不明了，望运昌接此电后一面按照上项方针实行编组部队，一面将两区实况经彭真电告我们，愈快愈好。

军委

酉有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

（1945年10月25日）

同志们：

抗大七分校的学员同志都是从边区、从华北来的，在各地做过工作，有许多人还打过仗，在抗日中有功劳。你们到七分校来学习已经很久了，现在就要到前方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开大会欢迎你们，又欢送你们。

大家知道，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日军大部分还没有缴枪，伪军有几十万也没有缴枪，还有许多日伪军在打我们。我们的解放区，华北、华中、东北、陕甘宁边区，已经有一万万五千万人口，有一百三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万以上的民兵。现在国民党顽固派也要打我们，在八年抗战中他们躲在后方，仗打得很少，有很多军队根本没有打过仗，日本投降了，他们出来了，还要吃掉我们的解放区，要打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这次我到重庆，见了蒋介石，我们的代表和他们的代表谈了四十多天，谈出了一点东西。有两条，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我们提出来，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在双十节签订了协定[1]。但同时他们又准备了很多军队进攻解放区，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要算进去就有一百万以上。已经

---

[1] 即《双十协定》。

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如果我们打赢了，可能会得到和平，那时候我们派代表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我们是不要打的，那时候就可能和平了。如果是他们打赢了，我们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我们的党校办不成了，七分校也办不成了，边区让他们占了，边区政府也没有了，减租减息也取消了。所以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军队、政府、共产党要一致团结起来，把顽固派的进攻打垮，要坚决消灭他们。哪个敢来，就消灭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这个办法。

最近打了两个胜仗[1]。第一仗是在太行山附近长治、长子那一带打的。阎锡山军队有三万八千人进攻我们，我们只有三万一千正规军，其他是民兵，有五万民兵帮助抬伤兵、搞运输，结果是消灭了他们三万五千人，只有三千人跑掉了，还缴了他们很多步枪、机关枪和大炮。第二仗是在绥远[2]打的。顽伪军有六万多人打我们，打到张家口附近。头一次，被我们打回去了，第二次他们打到集宁（平地泉）、丰镇、浑源，占了二百五十里铁路线，现在还在打。其余在平汉线、津浦线、河北、江苏、安徽各地，仗也开始打起来了。这些仗我们是有把握打胜的，因为广大地方在我们手中，人民拥护我们，地方部队、游击队已发展成为野战军。一个地方有几万、十几万野战军，又有几十万民兵，就能很好对付他们了。

将来怎么样呢？将来总是要和平的。今后的几个月我们要做很多工作，要实行双十协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这一条也要实行。双十协定没有解决解放区问题，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解放区。几个月

---

[1] 指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进行的上党战役和1945年10月18日开始，当时正在进行的绥远战役。

[2] 绥远，即绥远省。

后，我们还要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不承认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的大势。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任务，解放区人民的任务。

讲到人民，我在大后方见到很多人，他们都非常热心，愿意帮助我们，赞成我们解放区。我又见到许多外国人，比如美国人，他们政府的政策是不好的、反共的，可是他们的飞行员、士兵很友好，一群群地来找我，一定要送点东西给我。我在重庆也见到了英国人、法国人，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不好，多数还是好的，他们的政府是不好的，和美国一样。所以我们要学会分析，少数人不好，多数人是好的。我们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是有朋友的，我们不是孤立的。

你们上前方是很好的。去前方，希望你们注意，我们总的任务是为全国和平奋斗，把敢于进攻我们的反动派打垮，要取得和平，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希望你们扩大自己的队伍，巩固自己的队伍。官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要像朋友、同志、兄弟一样地对待战士们。你们当了官长，就要采取这样的态度，不要学国民党军队官长对弟兄们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线上为人民服务，都准备牺牲性命为全国人民谋利益，为什么要对战士不好呢？一定要好。今后，无论你们到哪一个部队，一定要把官兵关系搞好。你们对战士好，战士一定会以很好的态度对待你们，这样的队伍，是什么敌人也打不散的。我们党中央也是一样，我们党内要有民主，就是对同志要有同志的、朋友的、兄弟的、姐妹的态度。全党团结一致，一百多万党员团结一致，什么敌人我们也不怕。

第三条是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我们的队伍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关心老百姓，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吃东西、

住房子、穿衣服，都要靠老百姓帮助解决，如果关系搞不好，得不到老百姓的帮助，就没有办法打仗了。我们一定要把军民关系搞好，但有许多地方还没有搞好。当然总的说起来，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老百姓是好的。你们七分校也是好的。你们七分校在陕甘宁边区也搞生产，不搞生产人民负担就太重了。现在华北、东北等许多地方打起来了，我们更要注意把军民关系搞好。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每出去一批人，我们就讲一次，现在你们出去我们又讲，你们到了前方也要去讲。所有我们的军队都要和人民团结起来。

你们学得不少了，我就讲这几条。有了这几条，也就是坚决反对反动派的进攻，为全国和平而奋斗，改善官兵关系，全体人民和全体军队团结起来，中国的事情就好解决了。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老百姓来办。我们有决心、有办法实行和平，实行民主，实行团结，实行统一。和平、民主、团结是我们党已经定下来的方针，我们要为这个方针而奋斗。中央同你们做的工作是一样的，我和朱总司令做的工作同你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除了解放中国人民以外，没有别的工作。同志们！团结起来，大家一条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尽快抽调部队海运东北

（1945年10月25日）

陈、黎，罗、李[1]：

（一）渡海与野战[2]并重，而渡海最急，请陈黎衡量新四到达情况及当面顽情，如新四到达增多，而顽情又不甚紧，是否可令应渡海者抽出先去？（二）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使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三）以上两项，请考虑见复。

毛泽东
酉有

---

[1] 陈、黎，指陈毅、黎玉，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李，指罗荣桓、李作鹏，原分别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处长，当时正准备赴东北。

[2] 渡海，指八路军山东军区部队渡渤海开赴东北的行动。野战，指山东军区部队与入鲁的新四军部队，举行反击国民党军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以及歼灭拒降顽抗的日伪军的作战。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程子华速去热河
准备反击蒋军进攻承德[1]

（1945年10月27日）

彭、程，并告林、萧[2]：

梗电[3]悉。黄永胜[4]所率一个团及赵[5]副旅长所率一个团均留热河[6]，另从黄张[7]所率干部二千人中拨出四百人留热河，张秀山、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军区政治委员彭真和司令员程子华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萧，指萧劲光，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当时他们正赴东北途中。

[3] 指1945年10月23日彭真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林枫、张启龙等干部已抵东北。并告黄永胜、张秀山24日将到承德，昨夜已由锦州去车接干部来，部队尚须徒步走。

[4] 黄永胜，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正率部护送延安干部团赴东北。

[5] 赵，指赵承金，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副旅长，正率部赴东北。

[6]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7] 黄，指黄永胜。张，指张秀山，原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副书记，此时正调赴东北。

毅敏[1]二人亦留热河，刘其人[2]师又去，热河情况当可好转，请子华速去领导，争取于一个月至两个月内肃清反动，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扩大并整训军队，分别组成野战军与地方军，准备力量反对蒋军从北平向承德的进攻。中央前曾电文年生旅[3]及伍晋南[4]所率二百干部去热河，未见回电，如未去，他们可以不去承德，仍随三五九旅[5]去辽宁，望转知。

中央
酉感

---

[1] 赵毅敏，当时系从延安派赴热河的干部团负责人，不久任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部长。

[2] 刘其人，当时任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正率原渤海军区的三个团赴东北。

[3] 文年生旅，指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旅长文年生。该部于1945年6月编为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原拟向湖南挺进，进至河南新安时，逢日本投降，旋奉命转赴东北。

[4] 伍晋南，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此时正调赴东北。

[5] 指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参谋长刘转连率领的第三五九旅一部。该部于1945年6月编为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继王震率领的第三五九旅主力之后向湖南挺进，进至河南新安时，逢日本投降，旋奉命转赴东北。

准备集中全力歼灭傅作义部夺取归绥[1]

（1945年10月27日）

聂、贺：

二局确息，傅作义[2]二十五日部署，集中一〇一师、三十二师、二十六师于卓资山[3]以西与我决战，坚决歼灭我之进攻部队，暂十七师为截击我军之用，暂十一师守备归绥。似此情况如确实，我军应在卓资山附近休息数天，完成一切进攻准备，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傅顽，夺取归绥。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并须准备血战多天。

军委

二十七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电报。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致东北局电[1]

（1945年10月28日）

蒋已展开八十万军队向我华北、华中进攻及准备进攻东北，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到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和国民党谈判的补充意见[1]

（1945年10月29日）

甲乙二十九致丙丁：

（一）同意宥电[2]所述办法。

（二）除平、津、青[3]外，八条铁路（加上热河路、沧石路、白晋路、道清路[4]为十二条）不得驻国民党军队，平、津、青八路须驻一部。

（三）立即停止内战，撤退各区进攻军队。

（四）东北、华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实行孙中山民选地方自治，不得委派人员。

（五）同时请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

---

[1] 这是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2] 指周恩来、王若飞1945年10月26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为坚决避免内战，以实现和平建国基本方针，我们提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四项临时办法：（一）立即停止武力进攻。（二）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兵。（三）恢复各铁路一般情形，铁路线上不得驻兵（城市不在内）。（四）国民党军队在八条铁路（平绥、同蒲、正太、陇海东段、平汉北段、津浦、胶济、北宁）上无运兵必要。

[3] 青，指青岛。

[4] 白晋路，指当时从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后已全部拆除。道清路，指从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极大典。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十一月份必须完成三项任务

（1945年10月30日）

聂[1]转萧、罗[2]及澜涛[3]，并告热河分委：

你们一面组织野战军，一面组织运输队，一面则要指挥冀察现成部队迅速肃清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上之伪军并控制该路（至少北面一段），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准备野战战场。此项任务必须在十一月内争取先机完成之，否则将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巩固热河[4]，亦不能巩固张家口。故萧、罗下月一个月内必须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是组成野战军，第二是组织运输队赴承德接运武器弹药，第三是占领北平、古北口间铁路线，准备野战战场。以上三项任务，澜涛等领导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须尽全力协助完成之。澜涛等同志的主要精力，今后须转向东方战线，西方战线则由聂、耿[5]独力

---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萧，指萧克（1907—2008），湖北嘉禾人，当时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罗，指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当时任晋察冀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3] 澜涛，即刘澜涛（1910—1997），陕西米脂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4] 热河，即热河省。

[5] 聂，指聂荣臻。耿，指耿飚，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

处理之。澜涛电台速与延安联络勿误。关于歼灭石匣[1]、密云、怀柔地区之敌伪，发动该地区民众创造野战战场一项任务，热河分委负有由古北口向南竭力协助萧、罗之任务，该地区地方工作之管辖划归热河负责，免去过去三不管状态。

中央

酉三十

---

[1] 石匣，位于北京密云县北部，解放后修建密云水库时成为库区而消失。

赵尔陆即率部兼程至临城地区[1]

（1945年10月30日）

赵尔陆，并告聂、萧，刘、邓[2]：

三十、四十、新八等军被我刘邓包围于邯郸地区，正激战中，胡宗南[3]令石家庄十六军三个师全部南援。我为坚决歼灭被围之敌然后歼灭援敌之目的，改变对赵部部署，赵尔陆同志接电后，即率六个主力团兼程向南，进至高邑西南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俟任务完毕再移平北。

军委

西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冀晋军区司令员赵尔陆的电报。

[2] 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致热河分委等电[1]

（1945 年 10 月 30 日）

本年两个月内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望动员热河全党全军紧张工作，一切为着粉碎蒋介石向热河进攻之总目标而努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热河分委并告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当面之敌然后再打援敌[1]

（1945年10月30日）

刘、邓：

胡[2]部十六军九十四师（原预一师）、一〇九师，过去任陕西河防，久未作战，二十二师（原预三师）亦久未作战，今年七月淳化事变[3]时该师一个团守爷台山被我歼灭五个连。三个师人数经此次长途行军后，估计每师实际不超过五千余人。胡宗南二十五日令三十四集团全部南援，至二十九日，李文[4]始令十六军一个军南援，已是四天之久，命令上又有到高邑后逐次向南进军之语，似不十分积极。该军一部似可日内开动，另一部似须交防给第三军（两个师）后才能南进，到高邑后，又须查明情况才能前进。如北面地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1945年7月21日，胡宗南所属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十九师突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淳化县的爷台山发起攻击。随后又以预备第三师和暂编第十五师加入进攻。边区部队于7月27日主动撤出爷台山及其以西41个村庄。国民党军占领上述地区后，继续向边区腹地进犯。边区部队于8月8日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自卫反击，收复了爷台山地区。

[4] 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兵团及民兵能作有力之阻击、困扰，可能迷惑该顽不敢冒进，给我以充分时间，集中优势兵力，放手作战，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每次歼灭一部分），然后再打援敌。

军委

西三十

准备钳制王仲廉可能北援之部队[1]

（1945年10月30日）

刘、邓：

为集中一切可能力量歼灭当面之敌，再歼援敌之目的，除令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是否调太行七八两分区主力至磁县地区，准备钳制王仲廉[2]可能北援之部队，沁阳不必打了。

军委

酉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歼灭霍守义陈大庆李品仙部即是援助华北东北[1]

（1945年10月30日）

陈、黎，并告华中局：

（一）陈黎酉俭布置甚妥。（二）北面歼灭霍守义[2]，南面歼灭陈大庆[3]，即是援助东北，因为这些军队都是要开东北的。除注意邹滕[4]间战役，不失时机歼陈吴[5]，并还须准备对付更多北上顽军外，北面歼灭霍守义极端重要，请注意该地作战指导，首先歼霍部二、三个团，顿挫其行动，然后各个歼灭之。（三）李品仙[6]亦有开平津之可能，徐蚌[7]间破路及歼灭李部战役，其意义即是援助华北、东北，此点望华中充分注意。（四）破路重在掘毁路基及军民兼顾，掘毁路基使缺乏人力之顽方难于修复，公私兼顾使人民获得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的电报。

[2]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3]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4]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

[5] 陈，指陈大庆。吴，指吴化文，原任伪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此时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司令。

[6]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司令长官。

[7]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益，方能彻底执行破路。

中央

酉三十

准备在邹、滕[1]地区打大歼灭战

（1945年10月31日）

陈、黎[2]：

据息，临城[3]陈大庆[4]九十七军以护路为任务，若干天内似无强大后续力量。惟邹、滕地区蒋介石在所必争，必将增兵北进，我以主力位于该区，准备打大歼灭战是完全必要的。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占领黄河涯、恩县[5]，歼灭一部敌伪，具有很大意义。望令该军区扩大铁路占领区，发动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并集中注意于歼灭霍守义[6]十二军。该军似急于赴东北，决不应让其过去。为此目的，请考虑增加该方面兵力，并加强作战指导。

军委

酉世

---

[1]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

[2] 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黎，指黎玉，当时任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3] 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

[4] 陈大庆（1905—1973），江西崇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5] 恩县，1956年撤销，辖区分别划归山东平原、夏津和武城三县。

[6]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1945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

集中最大兵力歼灭当面之敌[1]

（1945年10月31日）

刘、邓：

已令赵尔陆率六个主力团南下对付十六军，使你们安心歼灭当面之敌，望速指示赵部行进路线。你们是否还感兵力不足，除陈赓纵队主力外，一切在半月行程内可能调动之部队均可调动，以便集中最大兵力。杨张派赴邹滕地区协助陈黎作战之一个旅可即西调，四军[2]已陆续入鲁，那边不需要了。

军委

酉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同一天，毛泽东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给赵尔陆的电报。

[2] 四军，指新四军。

致赵尔陆电[1]

（1945年10月31日）

赵尔陆：

昨电令你率六个主力团南进，协同太行部队歼灭由石家庄南进之十六军，谅收到。情况甚紧，该地作战关系全局，望飞速分路出动，取捷径直达临城附近接受刘、邓命令。如何速告。

军委

十月三十一日

---

[1] 这是1945年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赵尔陆的电报。赵尔陆，当时任冀晋军区司令员。

抵抗由营口葫芦岛登陆之蒋军迫其缓进[1]

（1945年10月31日）

彭真：

（一）三十一日四时电[2]悉。时间大迫，有军队亦来不及，刘转连杨国夫[3]才开始到达，就是证明。（二）请严催已到冀东及山东渡海各部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务必通过海城、锦州一线。黄克诚[4]要十一月十日才能到玉田，将来只好绕道赴洮南[5]。（三）营口、葫芦岛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同一天，中共中央决定入东北部队组建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分别为第一、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罗荣桓分别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

[2] 指1945年10月31日彭真给林彪、萧劲光并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1）苏军允许蒋军10月30日在营口登陆，蒋军11月20日将进至沈阳、阜新线，苏军将全部撤走，请林、萧速来沈阳商讨部署。（2）为对付蒋军登陆，拟编派两个旅担任锦州方面作战，三个旅担任营口方面作战。如同意，请令有关部队星夜赶来沈阳，时间紧迫，不可再缓。

[3] 刘转连，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他们正率部赴东北。

[4] 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5] 洮南，旧县名，1958年与白城县合并为吉林洮安县。

登陆之蒋军必须抵抗，可能迫使蒋军缓进，我可争取时间。（四）蒋[1]入满只两个军，现方开始由海防[2]、广州起运，目前拟在葫芦岛登陆者似系天津去的一小部，若能有十万军队能打的，可能用野战歼灭之，并且必须确定此方针，按此方针去部署。（五）刘其人文年生[3]催其速开沈阳不去热河[4]。黄克诚不日可通过平津线。

毛

三十一日十八时

---

[1] 蒋，指蒋介石。

[2] 海防，越南东北部的港口城市。当时国民党军一部接受侵越日军投降后经此海运东北。

[3] 刘其人，当时任八路军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正率渤海军区三个团挺进热河。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正调赴热河。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致周恩来电[1]

（1945年10月31日）

周：

进入邯郸地区之三个军血战七天，昨（三十日）夜，新八军高树勋起义脱离副长官部，三十军、四十军全体向漳河以南退却，我正追击中。详情后报，暂不发表。

军委

十月三十一日

---

[1] 这是1945年10月3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东北局电[1]

（1945年10月31日）

决定以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为第一副司令，李运昌为第二副司令，萧劲光为第三副司令兼参谋长，彭真为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为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为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题词[1]

（1945年10月）

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

[1] 1945年日寇投降后的一天，联政宣传队的乐队奉命去枣园为中央同志的周末晚会伴奏，晚会结束后，毛泽东为他们题词。

为李少石题挽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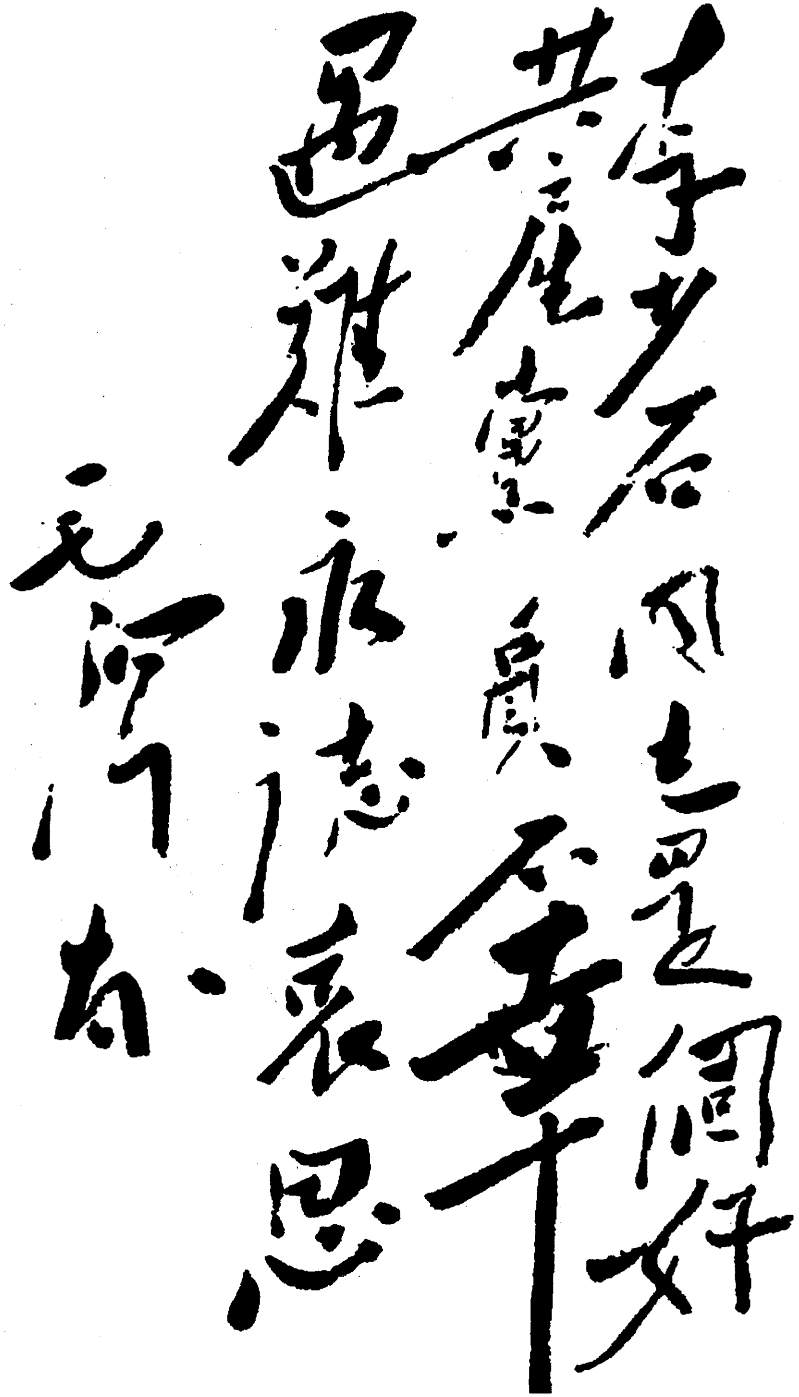
（1945年10月）

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志哀思！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追悼他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误伤牺牲的南方局工作人员李少石题写的挽词。



李少石同志是個好
共產黨員，不幸
遇難，永志哀思
毛澤東

毛泽东为李少石的题词。

挽范旭东先生联[1]

（1945年10月）

工业先导；
功在中华。

---

[1] 1945年10月范旭东在重庆逝世。当时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闻讯后送了这副挽联。范旭东（1884—1945），名锐，湖南省湘阴县人，中国化学工业开拓者，1914年他在天津渤海塘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精盐厂。1918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碱厂，从此中国有了自己制造的纯碱。1922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七七事变”后，他带领这几个厂的技术管理人员，迁入四川，积极支援抗战。抗战胜利前夕，他亲自拟订新建扩建十厂的宏伟计划，却遭到国民党的拒绝，愤郁成疾，1945年10月在重庆猝然逝世。

书鲁迅《自嘲》摘句[1]

（1945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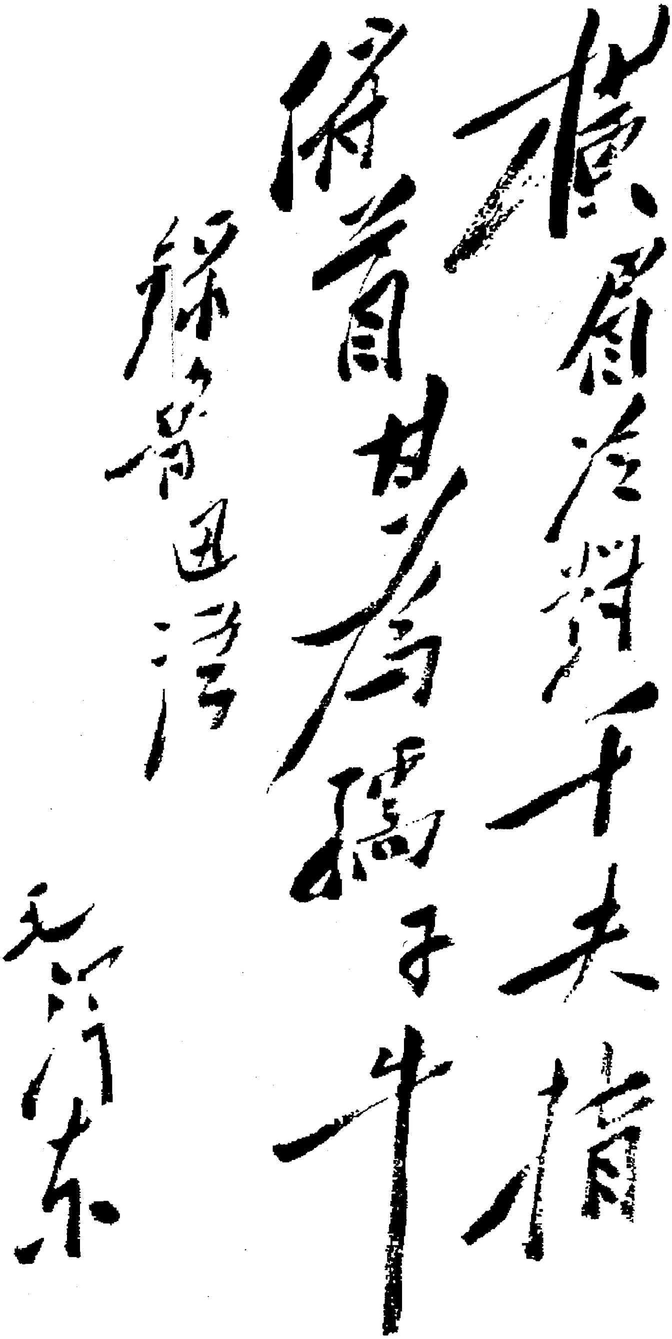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录鲁迅语。

毛泽东

---

[1] 1945年10月在鲁迅逝世九周年祭日，毛泽东亲笔书写了鲁迅的这一诗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录鲁迅语
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鲁迅《自嘲》摘句。

为柳亚子的诗尹瘦石的画联展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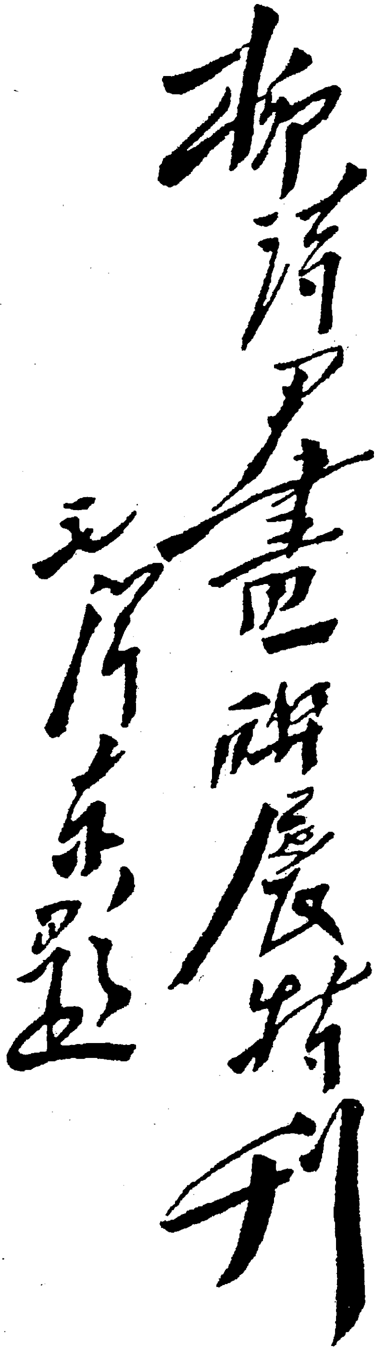
（1945年10月）

柳诗尹画联展特刊。

毛泽东

---

[1] 1945年10月25日，《柳亚子、尹瘦石诗画联合展览》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展出诗画作品百余件，成为重庆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是日，《新华日报》刊出了毛泽东的题词“柳诗尹画联展特刊”。



柳诗尹画联展特刊

毛泽东题

毛泽东为柳亚子的诗尹瘦石的画联展的题词。

十一月作战部署[1]

（1945年11月1日）

林、彭，聂、萧、罗，陈、黎，罗、李，刘、邓，张、饶、赖[2]：

十一月作战部署。（一）情况：东北方面，我以李运昌[3]所部五千为基础已扩大至十万人，惟战斗力弱。我各地入东北部队截至目前止，尚只有万毅、沙克、杨国夫、刘转连、曹里怀、萧华、吴克华[4]等部约三万以上。在路上前进者有山东刘其人[5]师，山东第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战略区负责人的电报。

[2] 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聂、萧、罗，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黎，指陈毅、黎玉，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罗，指罗荣桓，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李，指李作鹏，原任山东军区参谋处长，此时正随罗荣桓赴东北。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饶、赖，指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李运昌，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

[4] 万毅，当时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沙克，当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刘转连，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司令员。曹里怀，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萧华，当时任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克华，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五师师长。当时他们正率部抵达或即将抵达东北。

[5] 刘其人，当时任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

第二、第三、第七等师，四军黄克诚师[1]等部约八万人。而蒋军已决定在葫芦岛、营口登陆，其数约两个军六万人，按其计划是十一月十二日进至锦州、海城一线，十一月底进至沈阳，苏军则于十一月底从东北撤完。华北方面，蒋军主力由平绥、同蒲、平汉、津浦四路[2]集中平津，经北宁热河两路[3]入东北之计划，基本上已被我打破。我聂、贺[4]军已击破平绥路蒋军五万以上，包围归绥[5]。我刘邓军已开始击破平汉路蒋军六万（高树勋两师起义[6]投我），并吸引由正太路[7]窜入石家庄之蒋军三万五千不易北进。我陈黎军及华中已切断津浦路南北中三段，阻滞了蒋军，因此使空运平津之蒋系两个军陷于孤立，亦将使海运入东北之两个军陷于孤立及被南北夹击之地位。

（二）我党任务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而十一月开始之主要作战方向已转至东北方面，第二个作战方向则是华北、华中。为此目的部署如下：甲、东北方面，林彭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

---

[1] 黄克诚师，指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2]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3] 北宁，即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聂，指聂荣臻。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5]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高树勋，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5年10月率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河北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任该军总司令。

[7]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葫芦岛至锦州、营口至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已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部队之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歼灭蒋军，不使进沈阳。乙、陈黎、罗李速令山东第一批入东北部队（一、二、三、七等师）兼程北进，第二批部队及四军一部即速起程北上。丙、黄克诚师即速过平津路北上。丁、萧罗野战军限上半月在平北集中编组完毕，待命东进，侧击进入山海关、锦州、沈阳线上之蒋军。戊、刘邓军待当面战役完毕，准备抽出杨苏纵队[1]配足十个团待命北上，另组新纵队代替杨苏。己、华中叶飞纵队[2]待穿上棉衣后起程北上。庚、聂、贺军待绥远[3]作战完毕，即以主力转至平津方面，策应东北作战。辛、刘邓、陈黎及华中三处除开东北者外，仍服原任务，准备歼灭必然继续向北进攻之蒋军主力。

（三）各部执行情形随时电告。

中央军委
戌东

---

[1] 杨苏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2] 叶飞纵队，指新四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叶飞。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冀中地区动员一切力量破坏铁路[1]

（1945年11月1日）

聂转冀中军区：

冀中黄同志二十日电[2]悉。动员一切力量破坏定县至石门[3]铁路甚为重要。我刘邓军在邯郸地区与顽军六万血战兼旬，石门顽军三个师南援，情况紧急，三十日高树勋新八军举行起义站到我们方面，顽三十军、四十军被迫向漳河以南退却，我正追击中。判断石门南进之顽亦必北返，故冀中加紧破路甚为重要。霍守义[4]第十二军由济南北上，我渤海军区在德州南北占领两段铁路，阻击该顽，望冀中亦于沧州南北地区占领铁路一二段，动员民众，公私兼顾，掘毁路基，配合渤海行动。

军委

戌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并转冀中军区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20日16时黄寿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目前斗争重点，为稳定十分区，以九、十分区主力打击伪顽企图，以巩固对平津的基地。为严防沿正太、平汉路积极北进之顽军，现正以六、七分区主力，动员一切力量，破坏定县至石家庄之铁路。

[3] 石门，即今河北石家庄。

[4]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在山海关锦州地区坚决歼灭北进之敌[1]

（1945年11月1日）

李运昌，并告彭真：

（一）运昌三十一日电[2]悉。你的决定很对，你即在彭真、林彪[3]指挥下担任山海关、锦州地区指挥作战，编整部队，运输干部等项任务，而以作战为中心任务。坚决歼灭北进之敌，不要回冀东。詹才芳[4]编成之野战军及在山海关、锦州地区之一切军队及地方工作统归你指挥，而你则接受彭、林指挥。（二）杨国夫师[5]据詹电已到山海关，山东刘其人师前令其去古北口，现令其改开山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李运昌并告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指1945年10月31日李运昌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要点是：前接军委电，令我回冀东组建野战军。因又接彭真电，令我留锦州主持交涉车辆，运输干部，整编部队，指挥作战，故一时未能抽身回冀东。现美蒋军已在秦皇岛登陆万余，昨与我山海关一部冲突，有向东北前进之势。第三五九旅刘转连部刚到锦州，疲劳，缺武器，尚未整编，人地生疏。因此，又延缓我返冀东时间。刻已请詹才芳先着手组建野战军，配合山海关作战。此役关系重大，须全力打退、消灭顽军。黄克诚、杨国夫部须兼程东进，增援山海关和冀东。

[3] 林彪，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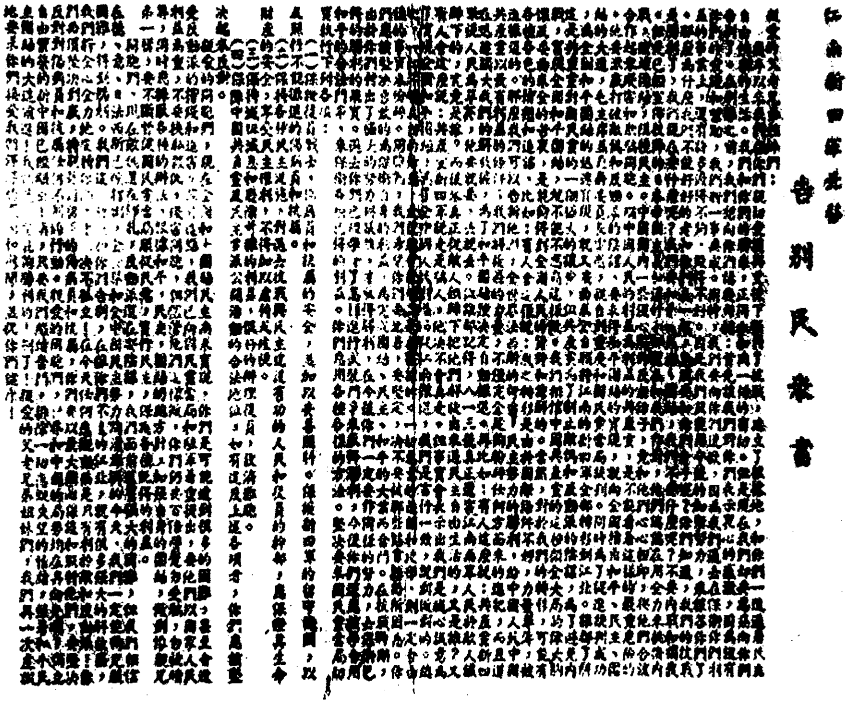
[4] 詹才芳，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5] 杨国夫师，指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杨国夫。

关、锦州（请要詹才芳速通知）。黄克诚三万五千现到冀中，十日可到玉田，请令詹才芳催其速进。山东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等师亦已开动，月底可到。

中央

一日



告別民衆書

新四軍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

1945年11月1日，江南新四军根据《双十协定》全部撤往长江以北。图为新四军向江南人民发出的《告别民众书》。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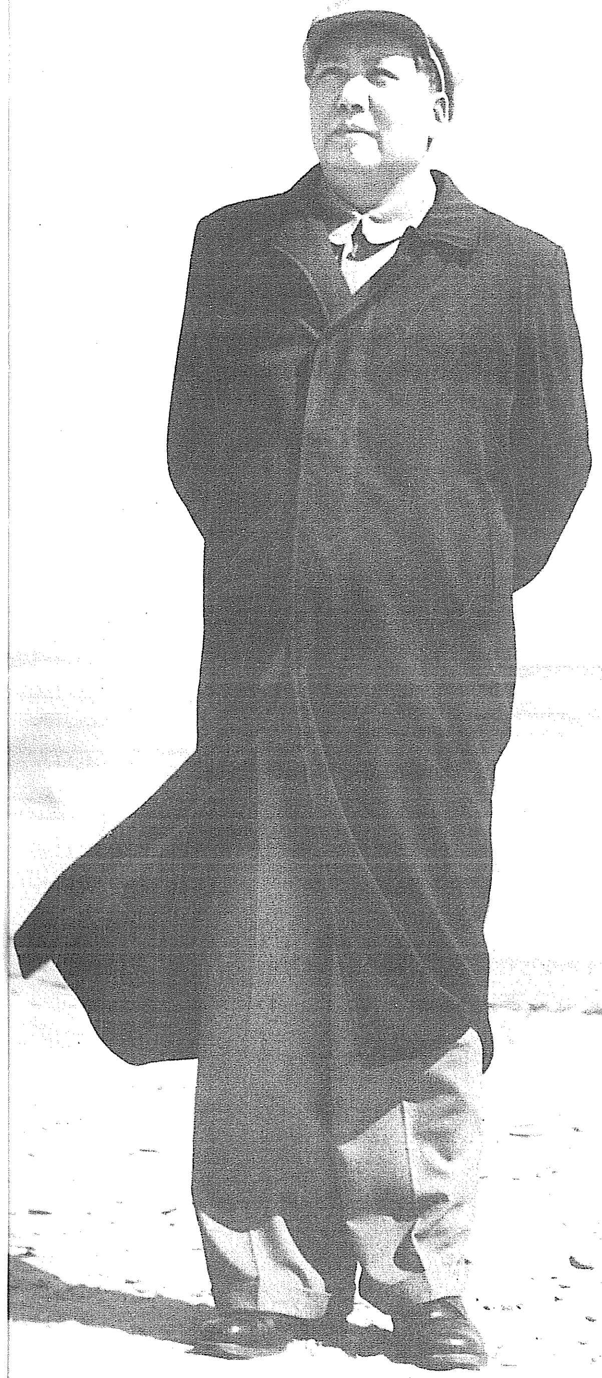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0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2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淦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5年11月1日）
致高树勋贺电……………………………………………………………2
（1945年11月2日）
给续范亭的信……………………………………………………………3
（1945年11月2日）
平汉战役胜利经过………………………………………………………4
（1945年11月2日）
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5
（1945年11月2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7
（1945年11月2日）
复东北局电………………………………………………………………8
（1945年11月2日）
杨苏纵队速加补充十天后开锦州沈阳…………………………………9
（1945年11月3日）
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 ……………………………………………10
（1945年11月3日）
我方发动反攻具有充分理由 ……………………………………………12
（1945年11月3日）

对俘虏官兵的处理办法 ……14
（1945年11月3日）
给周恩来和各战略区的电报 ……15
（1945年11月3日）
给周恩来的电报 ……16
（1945年11月3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17
（1945年11月3日）
增兵东北之部署 ……18
（1945年11月4日）
对西北系和东北系部队展开军运工作 ……21
（1945年11月4日）
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 ……23
（1945年11月4日）
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 ……26
（1945年11月5日）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28
（1945年11月5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 ……33
（1945年11月5日）
黄克诚梁兴初两部速至锦州充当歼灭顽军之主力 ……34
（1945年11月7日）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35
（1945年11月7日）
目前宣传与谈判的方针 ……39
（1945年11月7日、8日）

致程子华等电 ……………………………………………………42
（1945 年 11 月 9 日）

保卫热河并组织破路司令部 ……………………………………43
（1945 年 11 月 10 日）

罗荣桓等渡海后立即去沈阳会商作战大计 ……………………44
（1945 年 11 月 10 日）

把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作东北当前紧急战略任务 ……………45
（1945 年 11 月 10 日）

将创造战场当作战略任务 ………………………………………47
（1945 年 11 月 11 日）

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应取捷径赴锦州 ……………………………48
（1945 年 11 月 11 日）

关于平汉战役后的行动问题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50
（1945 年 11 月 11 日）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 ………………51
（1945 年 11 月 12 日）

夺取归绥方案 ……………………………………………………59
（1945 年 11 月 14 日）

坚守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掩护我主力集中锦州 ………………60
（1945 年 11 月 14 日）

以锦州地区为战略枢纽布置工作 ………………………………61
（1945 年 11 月 14 日）

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 ………………………62
（1945 年 11 月 15 日）

中美人民行动起来制止中国内战扩大*…………………………64
（1945 年 11 月 15 日）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大召开问题*……66
（1945年11月16日）
为杨步浩题写祝寿词……68
（1945年11月18日）
贺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69
（1945年11月）
为悼念冼星海题词……70
（1945年11月）
和鲁艺、延大即将去东北的领导干部和教员的谈话……72
（1945年11月）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73
（1945年12月15日）
给司徒美堂的信……78
（1945年12月28日）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79
（1945年12月28日）
给黄齐生的信……83
（1945年12月29日）
为党的“七大”代表记录本题词……85
（1945年）
为党的《七大纪念册》题词……87
（1945年）
为刘书林题词……89
（1945年）
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90
（1945年）

为八路军题词 ……………………………………………………92
（1945年）
给毛岸青的信 ……………………………………………………97
（1946年1月7日）
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98
（1946年1月7日）
给蔡博等的信……………………………………………………112
（1946年1月8日）
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114
（1946年1月10日）
给续范亭的信……………………………………………………119
（1946年1月22日）
给柳亚子的信……………………………………………………120
（1946年1月28日）
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题词…………………………………122
（1946年1月）
为叶挺之子叶正明题词…………………………………………125
（1946年1月）
为新华书店题名…………………………………………………126
（1946年初）
延安权威人士评称政协会获重大成果* ………………………127
（1946年2月1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37
（1946年2月6日）
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138
（1946年2月9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主张* ……139
（1946年2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43
（1946年2月12日）
为谢子长陵题词……144
（1946年2月19日）
在审阅《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时加写的一段话……145
（1946年2月25日）
只要了解事实真相，群众是决不会盲从反动派的……146
（1946年2月26日）
和毛岸英的谈话……148
（1946年2月）
欢送马歇尔元帅时的谈话……152
（1946年3月5日）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157
(1946年3月6日)
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59
（1946年3月7日）
复叶挺电……160
（1946年3月7日）
要求各地汇报工业及工运情况的通知……162
（1946年3月12日）
给洪禹的信……163
（1946年3月12日）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165
（1946年3月15日）

在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上加写的一段话……169
（1946年3月16日）
致周恩来电……170
（1946年3月16日）
在东北进驻地区要十分注意政策……171
（1946年3月17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三月十七日谈话* ……172
（1946年3月17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73
（1946年3月17日）
致周恩来电……174
（1946年3月17日）
为徐昆庭题词……175
（1946年3月20日）
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177
（1946年3月24日）
为《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题词……180
（1946年3月24日）
关于工业与工运问题的方针……182
（1946年3月24日、28日）
中央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的指示……184
(1946年3月27日)
对国民党武装和非武装人员的政策……186
（1946年3月30日）
给胡乔木的信……188
（1946年3月）

中央关于用坚决斗争的立场保卫政协决议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89
（1946年4月1日）
反动逆流高涨之时严防敌人突袭……………………………………190
（1946年4月5日）
关于对付美蒋大举进攻东北的对策…………………………………192
（1946年4月5日）
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是当前关键…………………………………193
（1946年4月6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95
（1946年4月7日）
致各中央局电…………………………………………………………196
（1946年4月7日）
对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197
（1946年4月8日）
致叶剑英、饶漱石等电………………………………………………199
（1946年4月10日）
致聂荣臻、程子华电…………………………………………………200
（1946年4月10日）
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201
（1946年4月11日）
东北作战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204
（1946年4月12日）
在修改《东北应无条件停战》时加写的一段话……………………206
（1946年4月12日）
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207
（1946年4月13日）

给徐明清的信……208
（1946年4月14日）
速歼东北之敌在停战前夺取优势……209
（1946年4月15日）
破袭北宁路并向沈阳以北游击……211
（1946年4月16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212
（1946年4月16日）
致东北局及林彪电……213
（1946年4月16日）
致东北局及林彪电……214
（1946年4月16日）
望准备应付任何事变……215
（1946年4月18日）
致各中央局并告叶剑英等电……218
（1946年4月18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219
（1946年4月18日）
致东北局电……220
（1946年4月18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221
（1946年4月18日）
占领长春后的东北军政工作部署……222
（1946年4月19日）
集中优势兵力在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225
（1946年4月19日）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227
（1946年4月19日）
挽“四八”烈士联……228
（1946年4月19日）
为“四八”被难烈士题词……229
（1946年4月19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231
（1946年4月20日）
全力争取四平公主岭地区作战的胜利……232
（1946年4月20日）
南满速调部队北上作战长春应布置守城……234
（1946年4月20日）
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的指示……235
（1946年4月20日）
复李富春、黄克诚电……237
（1946年4月20日）
长春部队迅即划分为城防与野战两部……238
（1946年4月21日）
宜多调部队北上保卫长春哈尔滨……240
（1946年4月21日）
歼灭新一军的作战部署……241
（1946年4月21日）
对东北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意见……242
（1946年4月23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243
（1946年4月23日）

致林彪等电……………………………………………………244
（1946年4月23日）
死守本溪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245
（1946年4月26日）
致林彪电………………………………………………………246
（1946年4月27日）
致周恩来电……………………………………………………247
（1946年4月28日）
致彭真、林彪电………………………………………………248
（1946年4月28日）
应慎重使用生力军……………………………………………249
（1946年4月28日）
致周恩来电……………………………………………………250
（1946年4月29日）
中原军区部队应争取合法转移………………………………251
（1946年4月30日）
坚守四平目前不要举行大规模进攻…………………………252
（1946年4月30日）
立即准备对平古线及南口等地区举行攻击…………………253
（1946年4月30日）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254
（1946年4月）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256
（1946年4月）
关于练兵的指示………………………………………………257
（1946年5月1日）

在四平本溪坚持奋战争取有利于我之和平……259
（1946年5月1日）

同意中原局对顽军进攻所取方针……262
（1946年5月2日）

于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263
（1946年5月3日）

坚守本溪挫敌锐气……264
（1946年5月3日）

继续不断破毁锦榆段铁路……265
（1946年5月3日）

关于热河战役的意见……266
（1946年5月3日）

对断敌后路围歼四平之敌的意见……268
（1946年5月4日）

致萧华等电……269
（1946年5月6日）

关于土地政策的发言要点……270
（1946年5月8日）

加紧准备对付傅作义的进攻……272
（1946年5月9日）

致东北局等电……273
（1946年5月9日）

布置热东战役要兼顾其他工作……274
（1946年5月10日）

切断四平敌军后路钳制本溪援敌……275
（1946年5月12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276
（1946年5月12日）
速派部队相机占领锦西…………………………………………………277
（1946年5月13日）
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279
（1946年5月15日）
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及我方的对策…………………………………283
（1946年5月15日）
望热河各部积极行动配合东北我军作战………………………………285
（1946年5月15日）
复周恩来电………………………………………………………………286
（1946年5月15日）
为陈昌奉题词……………………………………………………………287
（1946年5月17日）
望研究破坦克之术………………………………………………………289
（1946年5月18日）
坚守四平不可能时应主动放弃…………………………………………290
（1946年5月19日）
退出四平后的军事部署…………………………………………………291
（1946年5月19日）
对顽军进攻取局部报复手段……………………………………………292
（1946年5月19日）
对平古线和热东地区行动的部署………………………………………294
（1946年5月19日）
东北目前仍应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放在首位…………………………296
（1946年5月19日）

给聂荣臻并王稼祥的信……298
（1946年5月19日）
致萧克、程子华等电……299
（1946年5月19日）
致张鼎丞等电……300
（1946年5月19日）
给新安旅行团的信……301
（1946年5月20日）
放弃四平后我之行动方针……303
（1946年5月21日）
东明作战暂勿举行……304
（1946年5月21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电……305
（1946年5月21日）
致周恩来电……306
（1946年5月22日）
致周恩来电……307
（1946年5月22日）
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电……308
（1946年5月23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309
（1946年5月24日）
积极准备作战并加强顽军内线工作……310
（1946年5月26日）
致周恩来等电……311
（1946年5月26日）

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312
（1946年5月26日）
东北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准备长期斗争……313
（1946年5月27日）
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314
（1946年5月27日）
准备对付国民党向晋绥晋察冀发动进攻……315
（1946年5月27日）
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316
（1946年5月29日）
大量购办黄色炸药着重练习攻城战……317
（1946年5月29日）
关于鞍山战斗及俘虏官兵的处理问题的指示……318
（1946年5月29日）
山东军区以首先消灭吴化文等部为有利……319
（1946年5月30日）
不用照会即可攻取泰安等地……321
（1946年5月31日）
致贺龙、李井泉电……322
（1946年5月31日）
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323
（1946年5月至9月）
中原部队须求自救之道与准备突围……327
（1946年6月1日）
先取泰安等城后再考虑攻济南……328
（1946年6月1日）

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329
（1946年6月1日）
为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开学题词………………………………331
（1946年6月1日）
同意在东北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332
（1946年6月3日）
加强兵力全部控制吕梁地区…………………………………334
（1946年6月4日）
大同口泉及朔县宁武等地的作战部署…………………………335
（1946年6月4日）
准备一切条件在运动中歼灭进攻承德之敌……………………337
（1946年6月5日）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等的唁电……………………………338
（1946年6月5日）
在修改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时加写的话…………339
（1946年6月5日）
停战期间东北部队应休整补充严防敌军进袭……………………340
（1946年6月6日）
休整养精准备粉碎敌人进攻…………………………………341
（1946年6月6日）
致林彪、彭真、罗荣桓电……………………………………342
（1946年6月7日）
先取朔县宁武再取山阴岱岳不要惊动傅作义……………………343
（1946年6月9日）
必须用一切方法歼敌于南线…………………………………344
（1946年6月11日）

总结攻城经验休整补充部队……345
（1946年6月11日）
准备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346
（1946年6月12日）
我行动愈坚决有力和平可能性愈增……347
（1946年6月12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349
（1946年6月12日）
致陈毅等电……350
（1946年6月12日）
力争和平准备再战……351
（1946年6月13日）
迅速歼灭聊城等处伪军……352
（1946年6月15日）
延安权威人士声明反对贝纳斯援蒋法案* ……353
（1946年6月16日）
致饶漱石等电……355
（1946年6月17日）
准备夺取兖州及聊城博平……356
（1946年6月18日）
中原军区部队须随时准备突围……357
（1946年6月19日）
准备对付蒋军对胶东苏中的大举进攻……358
（1946年6月19日）
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360
（1946年6月19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363
（1946年6月19日）
准备攻取宁武等城……364
（1946年6月20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365
（1946年6月20日）
复周恩来电……366
（1946年6月20日）
应考虑承德弃守问题……367
（1946年6月21日）
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369
（1946年6月21日）
致周恩来电……370
（1946年6月21日）
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371
（1946年6月22日）
致周恩来电……373
（1946年6月22日）
东北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粉碎蒋介石进攻……374
（1946年6月22日）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375
（1946年6月22日）
正确对待军调执行小组的国、美人员……378
（1946年6月22日）
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380
（1946年6月23日）

先攻怀仁等地然后相机夺取大同……382
（1946年6月23日）
致东北局等电……383
（1946年6月23日）
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384
（1946年6月24日）
给邝赛朝暨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工的电报……386
（1946年6月24日）
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无和平希望……387
（1946年6月25日）
苏中可能暂时失陷宜预作准备……388
（1946年6月25日）
分途突围及保护军调小组安全……389
（1946年6月25日）
对晋绥作战的部署……390
（1946年6月25日）
给马叙伦等的慰问电……391
（1946年6月25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393
（1946年6月25日）
复周恩来电……394
（1946年6月25日）
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395
（1946年6月26日）
蒋介石已向我中原部队实行攻击……397
（1946年6月27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398
（1946年6月27日）
国民党大打后晋察冀军区的基本任务……399
（1946年6月28日）
为避免仓卒作战七月底前完成大打准备……402
（1946年6月28日）
给十二军军委的信……403
（1946年6月28日）
致周恩来电……405
（1946年6月29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406
（1946年6月29日）
致罗荣桓电……407
（1946年6月30日）
致余光生电……408
（1946年6月30日）
利用停战时机加紧备战……410
（1946年6月30日）
准备应付边打边谈局面……411
（1946年6月30日）
各部暂处待机位置加紧准备……412
（1946年6月30日）
反动派的企图终究要失败……413
（1946年6月30日、7月7日）
致全体战地司令员命令……416
（1946年7月1日）

夺取青县沧州需有充分准备……417
（1946年7月2日）
中央关于对付蒋介石边打边谈政策的对策的指示……418
（1946年7月2日）
关于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的行动问题……419
（1946年7月3日）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421
（1946年7月4日）
对时局的估计和我党的方针……422
（1946年7月5日）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的形势和任务……424
（1946年7月5日）
致聂荣臻电……426
（1946年7月5日）
复重庆各界名流等电……427
（1946年7月5日）
攻打平汉路的时机和作战部署……428
（1946年7月6日）
统一指挥夺取代县崞县等地……430
（1946年7月6日）
“七七”宣言发表后应采取的策略方针……431
（1946年7月6日）
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433
（1946年7月6日）
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央“七七”宣言的通知……436
（1946年7月8日）

致周恩来等电……437
（1946年7月8日）
致郑位三、李先念电……438
（1946年7月8日）
国民党不全面长期停战我绝不片面停战……439
（1946年7月9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电……441
（1946年7月10日）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442
（1946年7月11日）
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等电……445
（1946年7月11日）
注意加强部队纪律教育……446
（1946年7月12日）
中原军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外线牵制敌人……447
（1946年7月13日）
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449
（1946年7月13日）
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452
（1946年7月13日、17日）
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收复长春路两侧各县……454
（1946年7月15日）
中原军的战略任务是在敌后创立根据地……456
（1946年7月15日）
中原军胜利突围的意义……458
（1946年7月15日）

复陈毅、宋时轮电……461
（1946年7月15日）
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电……462
（1946年7月15日）
学习陈赓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463
（1946年7月16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465
（1946年7月16日）
关于攻打忻州五台定襄问题……466
（1946年7月17日）
致郑位三、李先念等电……467
（1946年7月17日）
徐州附近作战关系全局力争打好……468
（1946年7月19日）
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等电……469
（1946年7月19日）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470
（1946年7月20日）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476
（1946年7月20日）
刘邓军须配合山东野战军的第二战役……477
（1946年7月21日）
八九两月内东北仍应保持平静同时作好战斗准备……479
（1946年7月21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481
（1946年7月21日）

致粟裕电……482
（1946年7月21日）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483
（1946年7月22日）
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等电……484
（1946年7月23日）
在鄂西鄂北豫南灵活作战建立根据地……485
（1946年7月24日）
应下决心在陕南分散游击……487
（1946年7月25日）
给陶行知先生家属的唁电……488
（1946年7月25日）
致叶剑英、李维汉等电……489
（1946年7月25日）
晋察冀部队应立即开始学习攻城战……490
（1946年7月26日）
关于援助中原部队突围给习仲勋的信……491
（1946年7月至9月）
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人……498
（1946年7月28日）
为悼念关向应题写挽词……499
（1946年7月28日）
致黄霖、张水泉电……501
（1946年7月29日）
致王震等电……502
（1946年7月29日）

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勉强作战……503
（1946年7月30日）

到处扶植地方游击队创立游击根据地……504
（1946年7月31日）

在陕豫边分散打游击做群众工作……505
（1946年7月31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等电……506
（1946年8月1日）

致粟裕等电……507
（1946年8月2日）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5年11月1日）

各主要铁路均被切断，蒋军各部均不得进。谈判时我已提出各铁路双方不驻兵，运兵要协商，但实际上我方不能同意彼方运兵，因运兵即是内战。对美政策仍取友好态度，只在美军向我进攻条件下我方不能不自卫。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致高树勋贺电[1]

（1945年11月2日）

建侯将军吾兄勋鉴：

闻吾兄率部起义，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凡属血气之士，莫不同声拥护，特电驰贺，即颂戎绥。

毛泽东
朱　德
戌冬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给在邯郸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的贺电。

给续范亭[1]的信

（1945年11月2日）

范亭兄：

示悉。力疾为文，词严义正，已付报社发表[2]。侵入我河北解放区的孙连仲[3]三个军（七个师）六万人被我刘邓军包围于邯郸地区，战十天，高树勋[4]率新八军两个师起义，反对内战，站到我们方面。卅军（鲁崇义）三个美械师及四十军（马法五）两个师总退却，我于前日起总反攻，已歼灭两个师，其余尚在作战中，可望日内解决。知注敬闻。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

[1]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2] 指续范亭写的《忠告国民党当局及其画策者》一文，载于1945年11月6日《解放日报》。

[3]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河北省主席，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4]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

平汉战役胜利经过[1]

（1945年11月2日）

丙丁：

（一）昨今两电悉。对方诡计多端，我应加强警惕。（二）高树勋率两个师起义，影响极大，三十军、四十军总退却，被我围击于磁县以东、漳河以北狭小地区，激战两昼夜，四十军军部、一〇六师全部及另一团被歼灭，师长被俘，三十军（美械）之炮兵营及两个团被歼灭，其余均溃乱，我正全部歼灭中。今夜明晨或可解决战斗。胡宗南[2]闻高树勋叛变及各军危急，已令十六军停止南援。郑州、新乡等处中央军按兵不动，见死不救。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三）歼灭何文鼎[3]二十六师时，缴获何数年日记及其他反共文件。现令刘邓[4]清查缴获文件，为数必多，拟公开发表，击破国民党之诬蔑宣传。

甲乙

戌冬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兼新编第二十六师师长。

[4]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1]

（1945年11月2日）

彭真：

（一）你处与罗荣桓[2]电台、庄河方面电台及承德电台均联络否，如未，须即联络，调兵灵便。（二）罗荣桓已到胶县，正北上中。三十日来电，第二期山东决调四万，其中有第一、第二、第三师三万二千，其他八千。（三）沈阳得失决于美军是否协助蒋军进攻，如不协助，依靠你们现有兵力及不久到达之兵力，很能打胜孤立前进之蒋军；如协助，亦需坚决作战，争取时间，控制东西北满[3]。（四）葫芦岛打枪[4]，重庆已有反映，王世杰[5]请苏方令中共撤退，苏方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他们不与闻。似此如我在葫岛、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罗荣桓，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

[3] 东满，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段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安图、延吉、敦化等地区。西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段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今双辽）、扶余等地区。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

[4] 指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军一部在美国军舰护送下企图在葫芦岛登陆，遭东北人民自治军击退事。

[5] 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营口、安东[1]等地坚决抵抗，可能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

毛
戌冬

---

[1]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5年11月2日）

刘、邓、薄、张、李：

（一）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

（二）请将国民党军队如何进攻，人数多少，焚杀情形，我区军民如何被迫起而自卫实行反攻，歼灭多少，俘虏缴获多少，俘虏官长叙述剿共内战内情，俘虏士兵叙述被迫进攻情形，缴获反动文件之内容，均经新华社公开发表，但不要直指蒋介石名字（反动文件载明者仍可发表）。

（三）上党战役的经过亦可公开发表。

军委

二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1945年11月2日22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的电报。

复东北局电[1]

（1945年11月2日）

同意周保中为第四副司令，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决定组织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任务为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民众，镇压反动，巩固东北之后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杨苏纵队速加补充十天后开锦州沈阳[1]

（1945年11月3日）

刘、邓、薄、张、李，并告杨、苏[2]：

（一）戌冬未电[3]悉，甚为欣慰。（二）休整十天，甚为必要。（三）杨苏纵队速加补充，配足十个团，二万人，十天后动身开锦州、沈阳，参加东北方面具有伟大意义之作战。（四）你们再组新纵队代替杨苏。（五）下一步行动，如高邑方面之李正先[4]十六军好打，则以歼灭该军于政治上及援助东北作战上最为有利；如该军不好打，而南面好打，则打南面。望侦察考虑电告。

军委

戌江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和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杨、苏，指杨得志、苏振华，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5年11月2日未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经过两天两夜之战，我已消灭国民党军第一〇六师全部（师长被俘）、第二十七师一个团，该师师部及一个多团正被我围歼中。三十师之山炮营及两个团已被歼。其余敌人均溃乱，我正在全部歼灭中。四十军军部及四个团已被消灭。

[4] 李正先，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

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1]

（1945年11月3日）

甲乙戌江致丙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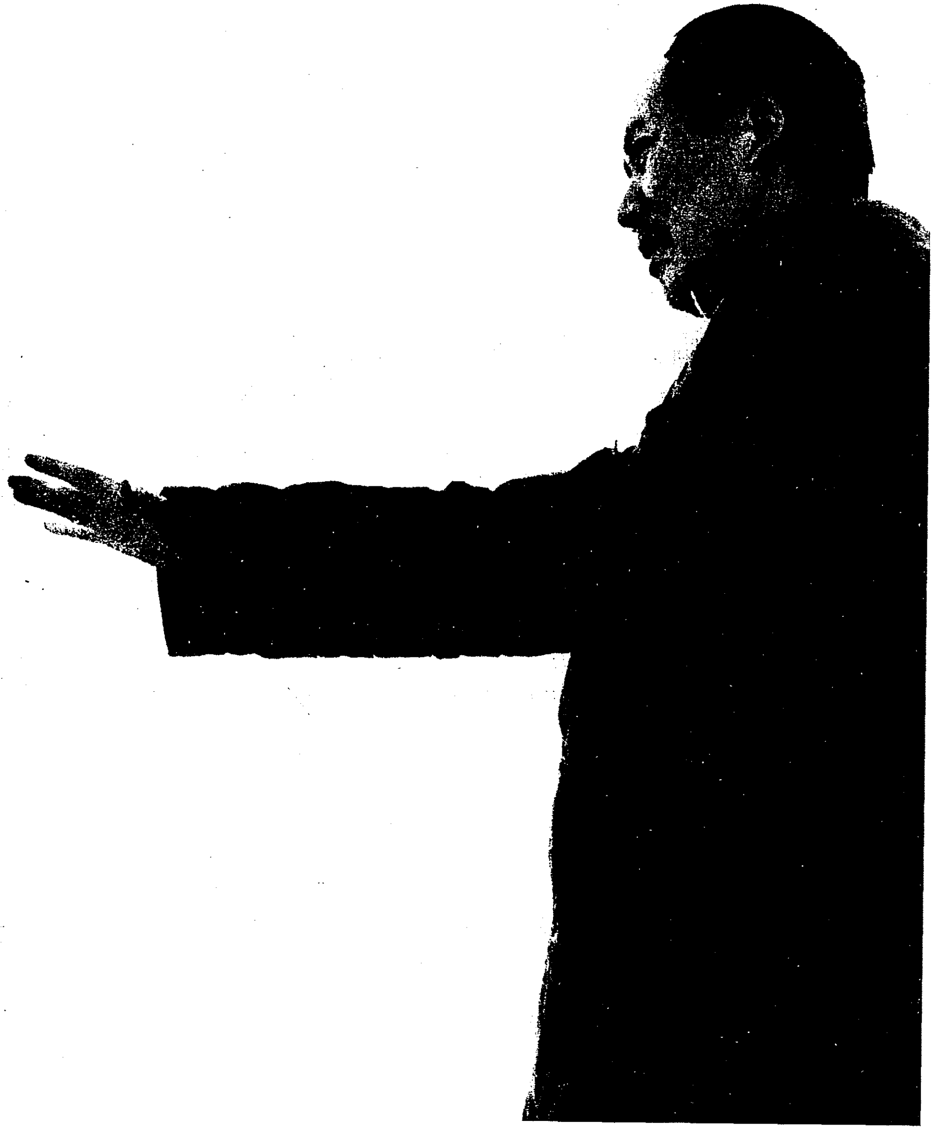
昨日电悉。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2]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3]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东北问题现在就应提出。华北各地敌伪受降全部归我，华北各路交通待敌伪缴械蒋军退出后，由民选的政治委员会负责恢复，目前不能恢复，这是由于敌军未缴械、伪军未歼灭与蒋军发动内战所致，这些问题解决后我方负责恢复，现在则绝对不可能。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又蒋军侵占各县须退出。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

---

[1] 这是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2] 青，指青岛市。

[3]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

我方发动反攻具有充分理由[1]

（1945年11月3日）

甲乙戌江未致丙丁：

二日电悉。归绥[2]、包头、五原、临河必须攻下，时间至少半月，大同现只包围，待绥、包解决后方能解决。傅作义、阎锡山[3]发动内战，各以五万以上军队攻我解放区，我方发动反攻具有充分理由，如诬我方发动内战，我方将发表蒋介石酉皓致胡宗南电[4]及其他各项内战文件。国大代表必须重选，时间必须推迟至一年以后，否则我方坚决反对。政治会议开会办法、开会日期等项你们商定初稿，待你[5]回来讨论方能表示最后意见，出席代表要那时才能考虑。只要会议推迟，你尽可能在重庆拖延时间，不要回来。政治

---

[1] 这是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2] 归绥，今呼和浩特市。

[3]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指1945年10月19日蒋介石饬令胡宗南打内战，进行所谓“剿匪”的电报。电报说：“此次剿匪，为人民祸福之所关，建国成败之所系，务本以往作战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鼓励所部，努力进剿，迅速达成任务者，功在国家，必膺懋赏，其迟疑贻误者，当执法处置。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一体恪遵为要。”

[5] 指周恩来。

会议实际上是一对于各中间派的教育机关，使他们取得经验，问题是不会在那里解决的。又补充前电[1]一点，即平、津、青[2]三市应驻八路军，中央军只许暂时驻一小部，将来应退出。

---

[1] 指中共中央同日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另一电报，参见《华北东北等地须归人民自治》。

[2] 青，指青岛市。

对俘虏官兵的处理办法

（1945年11月3日）

刘、邓、薄、张、李[1]：

戌江电悉。（一）对西北系军官加以优待是正确的，但不要放走。他们如愿意发表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宣言及谈话，应鼓励之。（二）一切俘虏官兵照中央指示原则上均收留教育，反动者监视，均不放走，仅在必需时可考虑放走个别的人。（三）十分注意搜寻蒋介石的“剿匪”文件（如《剿匪手本》[2]等）并公开发表之，尤其注意勾结美国打内战的材料。

军委

戌江亥

---

[1] 刘、邓、薄、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2] 《剿匪手本》，是1933年蒋介石编的专门讲述进攻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方法的一本小册子。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重印这个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军官，并下达密令打内战。

给周恩来和各战略区的电报[1]

（1945年11月3日）

周、各战略区：

侵入我平汉中段邯郸地区之孙连仲属三十军、四十军、新八军共七个师六万人，被我刘伯承、邓小平[2]包围，血战十天，高树勋[3]率新八军两个师起义，反对内战，其余两军（其中有三个美械师）除逃去约三千外，全部歼灭，俘获甚多，正清查中。我亦伤亡八千人。

军委

十一月三日

---

[1] 这是1945年11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给周恩来和各战区的电报。

[2] 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3] 高树勋，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

给周恩来的电报[1]

（1945年11月3日）

恩来：

邯郸战役俘获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四十军三十九师长司光恺、一〇六师长李振清、三十师长王震、六十七师长李学正等高级官长，已令前方予以优待。

军委

三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1945年11月3日23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优待国民党被俘将领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5年11月3日）

国民党诬蔑我党发动内战，亟应作有力回答，请从高树勋处及缴获文件中，清出最有用者用新华社明码发表。蒋介石发有剿匪手册，每师数十本，注意清查公布，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的主要内容。

增兵东北之部署

（1945年11月4日）

刘、邓、薄、张、李[1]，并告聂、萧、刘、罗[2]及罗、李[3]：

关于调杨苏[4]纵队二万人及陈赓[5]纵队一万二千人去东北参加反对蒋[6]顽进攻，以利控制东北，建立百年大计之部署，你们如何处置请考虑电复。苏[7]方已许蒋方酉陷[8]在葫芦岛、营口登陆，戌文[9]

---

[1] 刘、邓、薄、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2] 聂、萧、刘、罗指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罗，指罗荣桓。李，指李作鹏，原任山东军区参谋处长，此时正随罗荣桓赴东北。

[4] 杨，指杨得志（1911—1994），湖南株洲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苏振华（1912—1979），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5] 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6] 蒋，指蒋介石。

[7] 苏，指苏联。

[8] 酉陷，即10月30日。

[9] 戌文，即11月12日。

进至锦州、海城线，戌号[1]进至沈阳，苏军则于戌有[2]撤完。现我军控制葫芦岛、营口，拒止蒋军登陆。王世杰[3]向苏大使交涉，劝告中共不要拒止，苏大使答此是中国人自己事，苏方不过问，故至今蒋军尚未登陆。可能迫使蒋军先在大沽、唐山、秦皇岛登陆，如此我可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现已任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萧劲光、李运昌、周保中（义勇军领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副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为副政委，统率东北全军，部署作战。东北各省政府及工业，半月内外我可接收完毕。李运昌最先入东北之五千人现已扩大至八万，分布南满[4]各地为地方部队，惟战斗力弱。我正规军入满[5]者至此刻止，计有五万左右，在路上半月内可到者约五万，共十万左右，为内线之主力。惟蒋介石决心争夺东北，前定派两个军，现见我势大，有加派三个军消息，我们估计至少派五个军十五个师（美械）十五万人，在此形势下，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因此我方必须增调有力兵团参加作战。现决调杨苏纵队二万，陈赓纵队一万二千，赵尔陆[6]部一万二千，山东第二期四万，新四军二万，边区五千，共十万九千，十二月下半月到达热

---

[1] 戌号，即11月20日。

[2] 戌有，即11月25日。

[3] 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4]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5] 满，指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

[6] 赵尔陆（1905—1967），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冀晋军区司令员。

河[1]、辽宁、冀东交界地区，从外线夹击蒋军，一部尽可能进入内线。从晋冀鲁豫抽调三万二千人，对于你们执行继续打击蒋顽北上自感困难，但在你们两次大胜之后，组织两个新纵队代替抽调之兵力，仍有可能。如何？望复。

中央
戍支

---

[1] 热河，即热河省。

对西北系和东北系部队展开军运工作[1]

（1945年11月4日）

陈、黎，张、饶、赖及华中局：

（一）邯郸战役二日结束，除逃去三千人外，高树勋率两个师反正，三十军三个师、四十军三个师全部歼灭，俘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四十军长马法五，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及三十九师、一〇六师、三十师、六十七师等四个师长，我正予以优待，以利争取。（二）十一战区副长官李延年所属，除第八军三个师（美械）在广州待运青岛外，共十个师，计霍守义[2]十二军三个师（一一一师、一一二师已到济南，一一七师尚在徐州），何柱国[3]骑二军两个师（何本人瞎眼在重庆，该军军长何人待查）已到济南，王毓文[4]九十七军两个师（三十三师、暂三十师）在临城[5]，骑八师在徐州，五十一军两个师在徐州。计在临城、徐州线上者共六个师（均归十九集团军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饶漱石和参谋长赖传珠的电报。

[2]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3] 何柱国，原任国民党军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结束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参谋长，因眼睛失明未到职。

[4] 王毓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5] 临城，即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

大庆[1]指挥），均将北上，但战斗力均弱。（三）第二集团军刘汝明[2]所部五十五军曹福林[3]三个师（二十九师、七十四师、八十一师）、六十八军刘汝珍[4]两个师（一一九师、一四三师）现到尉氏、扶沟、太康、兰封[5]之间，正向兰封集中，判断将开徐州北上。此两军为西北系，战斗力颇强。望利用孙连仲[6]失败，高树勋起义之影响用大力争取。据刘汝明酉有电称，该属三十团及一二〇团二千余在太康境内叛变，已令二十九师进剿。请查明是否拖到我方来。（四）对一切西北系（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三十八军）、东北系（十二军、骑二军、五十一军）展开军运工作，极端重要。对西北系各伪军亦然。

军委

戌支

---

[1]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2]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3] 曹福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五军军长。

[4] 刘汝珍，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八军军长。

[5] 兰封，旧县名，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6]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1]

（1945年11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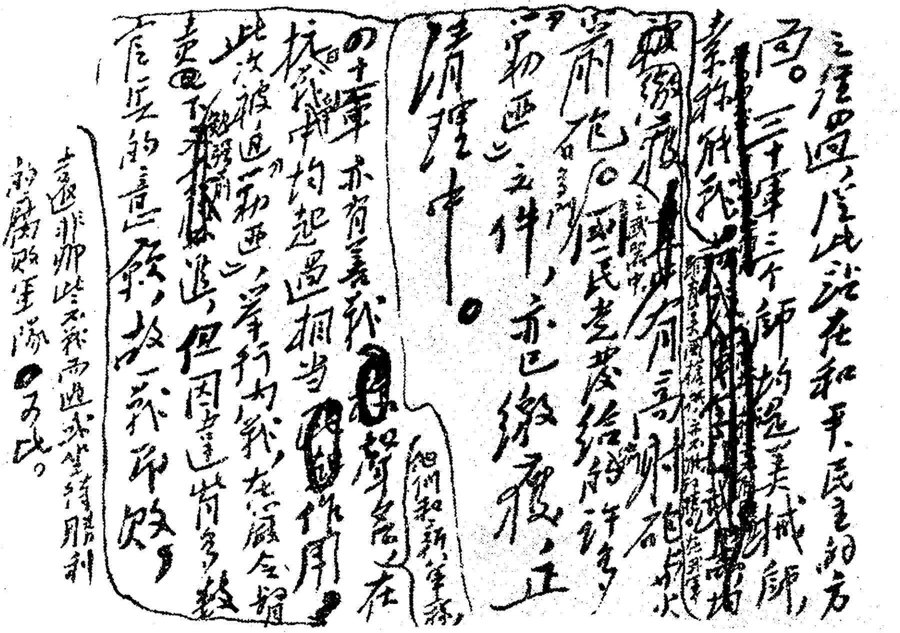
【新华社冀鲁豫四日急电】沿平汉铁路北犯侵占我豫北冀南解放区之国民党部队，共达十万以上。侵入我磁县、邯郸地区者，有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及新八军共八个师，约七万之众。我当地军民站在自卫立场上举行反攻，取得伟大胜利。进攻军中之新八军反对内战，在战场上起义，给了这一自卫战以有力的援助。

九月中旬以来，国民党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在何应钦授以密令之后，从各地调集军队，猛犯我豫北解放区，连陷我豫北之封邱、延津、原武、武陟、获嘉、辉县、汤阴等七城及广大市镇乡村。所到之处，实行“清剿”，摧毁民选政府，屠杀抗日干部及抗日军人家属，抢掠财物，奸淫妇女。人民惨遭荼毒，忿不能忍。但我八路军为和平团结大计，仍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最后退至漳河以北。国民党当局犹以各军进得太慢，命令胡宗南秘密飞赴郑州，颁发《剿匪手册》，坚决“剿匪”，强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氏所属各部限期进攻。十月二十一日，新八军高树勋部，四十军马法五部，三十军鲁崇义部，在严令督责下，渡过安阳河（漳河），分路北进。二十三日占我磁县，二十四日占我马头镇，并向武安、邯郸攻击前进。直至此时，我冀南军民始起而自卫。十月二十五日，我军

---

[1]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反攻，收复磁县，将进攻各部加以包围。同时，向进攻各部官兵，实行劝告，请他们共体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之重要，要求他们立时拒绝内战命令。十月三十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深明大义，响应我军民之号召，率其直属之新八军（包括暂二十九师、新六师两个师）全体官兵举行起义，拒绝国民党反动派之“剿匪”命令，停止内战，站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但四十军与三十军一部将领尚不觉悟，继续向我攻击。三十日晚，我军被迫总反攻，激战一昼夜，于三十一日，先后将该两军击败。此时该两军多数官兵愿意放下武器，仅少数部队二三千人向南逃去。放下武器之高级军官，计有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唐、四十军三十九师师长司光恺、一〇六师师长李振清、三十军三十师师长王震、六十七师师长李学正等多人。我冀南解放区人民，现正对于反对内战、站在人民方面之高树勋将军及其全军将士举行慰劳。对于放下武器之三十军、四十军各高级将领及全体官佐士兵，亦予以优待。其中许多人声称：国民党当局，尤其何应钦、胡宗南二人，藉恢复交通为名，实行“剿匪”及进攻解放区，实属违背大多数人之志愿，他们愿意详述被迫进攻之经过，从此站在和平、民主的方面。三十军三个师均是美械师，素称能战，四十军亦有善战声名，他们和新八军一样，在抗日战争中均起过相当作用，远非那些不战而逃或坐待胜利的腐败军队可比。此次被迫“剿匪”，举行内战，在严令督责下勉强前进，但因违背多数官兵的意愿，故一战即败，虽有美国枪械，亦不能取胜。在我军缴获之武器中，有高射炮与火箭炮多门。国民党发给他们的许多“剿匪”文件，亦已缴获，正清理中。



毛泽东修改《冀南我军自卫战大捷》的手稿（部分)。

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1]

（1945年11月5日）

甲乙戌微致丙丁：

支电[2]悉。

（一）目前我在谈判中，在恢复交通问题上有几点提法已处于被动，必须考虑成熟，恢复主动；决定《解放日报》明日发表中共发言人谈话[3]，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否则即是帮助内战；在受降问题上必须由解放区担任受降，其他军队撤回原防。

（二）邯郸战役[4]缴获大批文件证明政府有全盘反共内战计划，请你考虑可否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不要撤回原提四点[5]，只说政府一面谈判，一面大举进攻，现并大举调兵，所谈尽是欺骗，我们不能信任；如欲取信，必须立即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伪

---

[1] 这是中共中央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2] 指周恩来1945年11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3] 即《国民党进攻的真相》。

[4] 邯郸战役，也称平汉战役。

[5] 指周恩来、王若飞1945年10月26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的四项临时办法。

军、自治三大问题。

（三）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

（四）交通线上可以双方不驻兵，彼方已驻者须退返原防，不能让其驻在我解放区。

（五）双方军队撤离交通线后，应由解放区自治政府管理。

（六）不能同意组织交通考察团，应先解决受降（包括撤兵驻防）、伪军、自治三问题，亦即解决内战危险问题，由解放区负责恢复交通，目前则绝对不能恢复。

（七）不要急忙回答彼方所提六点，也不怕他们发表，实际上吴国桢[1]已于四日向合众社发表，此间今晚发表批评。

（八）同意东北问题暂缓提出。

（九）关于揭发内战及美军干涉两点，已令几个机关动员来做，材料可大增加。

（十）西安息，蒋[2]令胡宗南[3]立即去郑州，发动大举进攻，彼方一不做二不休，深堪注意。

---

[1] 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2] 蒋，指蒋介石。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

（1945年11月5日）

合众社重庆三日电报道，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宣称，“政府在此次战争中全居守势”，并提出所谓恢复交通的办法[2]。新华社记者为此询问中共方面发言人。

中共发言人告记者称：吴氏所说“守势”云云，全系撒谎。除我军已撤退的浙东、苏南、皖中、皖南、湖南五个解放区全被国民党军队进占、大肆蹂躏人民外，其他大多数解放区，例如广东、湖北、河南、苏北、皖北、山东、河北等省，国民党正规军已有七十余师开到我解放区及其附近，压迫人民，进攻我军，或准备进攻。正在向我解放区开进者，尚有数十师。这难道是取守势吗？其中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八个师，两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六个师（其中有三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区军民举行自卫的反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这一路国民党军的许多军官，其中有副长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的谈话。这时蒋介石已经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的内战规模已经日趋扩大。

[2] 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的大部分铁路交通线都在解放区军民的控制或包围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在所谓“恢复交通”的借口下，企图利用这些交通线分割解放区，并且把它的几百万军队运往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进攻解放区，抢占大城市。

官、军长、副军长多人，现在都在解放区[1]，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队，现被国民党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战区的军队共二十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都被国民党军队侵占，大肆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2]。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在晋绥察三省，也是如此。十月上旬，阎锡山指挥十三个师，攻入我上党解放区襄垣、屯留区域，被当地军民在自卫战斗中全部缴械，被俘人员中亦有军长师长多人。他们现在我太行解放区，一个个活着，足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的全部真情。最近阎锡山在重庆报道他如何被攻，而他则仅取“守

---

[1] 1945年9月，国民党军队自郑州、新乡一带沿平汉路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10月下旬，其先头三个军，侵入磁县、邯郸地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经1周激战，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等部1万余人，在邯郸地区起义，其余的两个军，在溃退中被人民解放军围歼，放下武器。当时被迫放下武器的高级军官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第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军参谋长李旭东、副师长刘树森等多人。

[2]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调集了3个战区的20多个师的兵力大举进犯豫、鄂两省解放区。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分兵一部，自西北方向，沿陇海路两侧东犯豫西解放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所部，沿平汉路两侧，自北向南进犯豫中、鄂中、鄂东解放区；第六战区的部队自鄂南北犯加以配合。以上的国民党军队大都归刘峙指挥。豫鄂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对进犯军作了坚决的斗争，保存了实力，于1945年10月下旬，转移至豫、鄂交界之大洪山、桐柏山、枣阳地区，后因国民党军队继续追逼，又转移至平汉路东之宣化店地区。

势”，说了种种谎话。他大概忘记了他的十九军军长史泽波，暂四十六师师长郭溶，暂四十九师师长张宏，六十六师师长李佩膺，六十八师师长郭天兴，暂三十七师师长杨文彩等位将军[1]，现正住在我解放区，足以驳斥吴国桢氏、阎锡山氏和一切挑拨内战的反动派的任何谎话。傅作义将军奉命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已两个多月，曾打到张家口的门口，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和察哈尔西部。难道这也是取守势和未放“第一枪”吗？我察绥两省军民起而自卫，在反攻战斗中亦俘虏大批官兵，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进攻等等[2]。在各次自卫战斗中，我方缴获大批“剿匪”和反共文件，其中有国民党最高当局所颁发而被吴国桢氏称为不过是“笑话”的《剿匪手本》、“剿匪”命令[3]和其他反

---

[1] 这里所列举的一些军官，都是上党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阎锡山部队的高级将领。

[2] 绥远，1954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察哈尔，1952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山西两省。热河，1955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及内蒙古自治区。傅作义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的司令长官。他的部队，抗日战争时期驻扎在绥远西部的五原、临河一带。日本投降后，他奉命进攻绥远、热河、察哈尔三省解放区。1945年8月攻占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集宁、丰镇。9月初攻占兴和、尚义、武川、陶林、新堂、凉城，大举向察哈尔解放区进攻，迫近张家口。人民解放军起而自卫，将其击退，并俘虏其大批官兵。

[3] 《剿匪手本》，是1933年蒋介石编的专门讲述进攻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方法的反革命小册子。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以后，蒋介石重印这个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军官，并下达密令称：“此次剿匪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匪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共文件，正在向延安解送中。这些反共文件，都是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铁证。

记者又问中共发言人，吴国桢氏所提恢复交通办法，你的意见如何？该发言人答道：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先解决交通问题，后解决三项问题呢，还是先解决三项问题，后解决交通问题呢？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劳其他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地方自治，《双十协定》上已有明文规定，孙中山先生早主省长民选，为什么还要政府派遣官吏呢？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我们主张：（一）已经进入华北、苏北、皖北、华中各解放区及其附近的政府受降军队和进攻军队，立即撤返原防，由解放区军队去接受敌人投降和驻防各城市与交通线，恢复被侵占的解放区；（二）全部伪军立即缴械遣散，在华北、苏北、皖北者，由解放区负责缴械遣散；（三）承认一切解放区的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的规定。发言人说：只有如此，才能制止内战；否则完全没有保障的。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缴获的文件以及大举调兵和大举进攻的实际行动，

已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中国人民被欺骗得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5年11月5日）

（一）刚才博古说，前在焦作被迫降落之国民党飞机，内有军委会（蒋署名）给阎锡山的信及剿匪手册两本，此信由太行拍来总社，博古已发广播，此事一下揭穿了蒋的秘密，且看反映如何。（二）你可借此转入主动地位，采取有理有利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黄克诚梁兴初两部速至锦州充当歼灭顽军之主力

（1945年11月7日）

富春、克诚[1]：

山海关发生战事，该处有李运昌杨国夫[2]两部当可迟滞顽军前进，掩护黄梁[3]两部到锦州。黄梁任务是迅速到锦州充当歼灭顽军之主力，你们到玉田后立即调查由玉田通往锦州路线，不走山海关，走山海关以西，荫蔽前进，以免暴露，看地图似以走喜峰口为宜。喜峰口、山海关中间地区是否有直路，请调查。路线确定后，黄梁均应派人率少数掩护部队先行到锦州打前站或径到沈阳设办事处，与东北局彭林[4]接头，解决两部各项问题。

毛泽东

戍虞

---

[1] 富春，即李富春，原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此时正调赴东北。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2] 李运昌，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

[3] 黄，指黄克诚。梁，指梁兴初，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

[4] 彭林，指彭真、林彪，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和副书记。

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

（1945 年 11 月 7 日）

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

关于减租与生产指示：（一）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我党当前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保卫解放区，争取和平局面的出现。为达此目的，使解放区农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时又使地主还能生活，使工商业资本家还有利可图；并于明年发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救济饥民、难民，供给军队的需要，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二）目前战争的规模很大，许多领导同志在前方指挥，不能分心照顾减租和生产。因此，必须实行分工。留在后方的领导同志，除了做直接援助前线的许多工作之外，一定要不失时机，布置减租和生产两件大工作。务使整个解放区，特别是广大的新解放区，在最近几个月内（冬春两季）发动一次大的减租运动，普遍地实行减租，借以发动大多数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同时，在一九四六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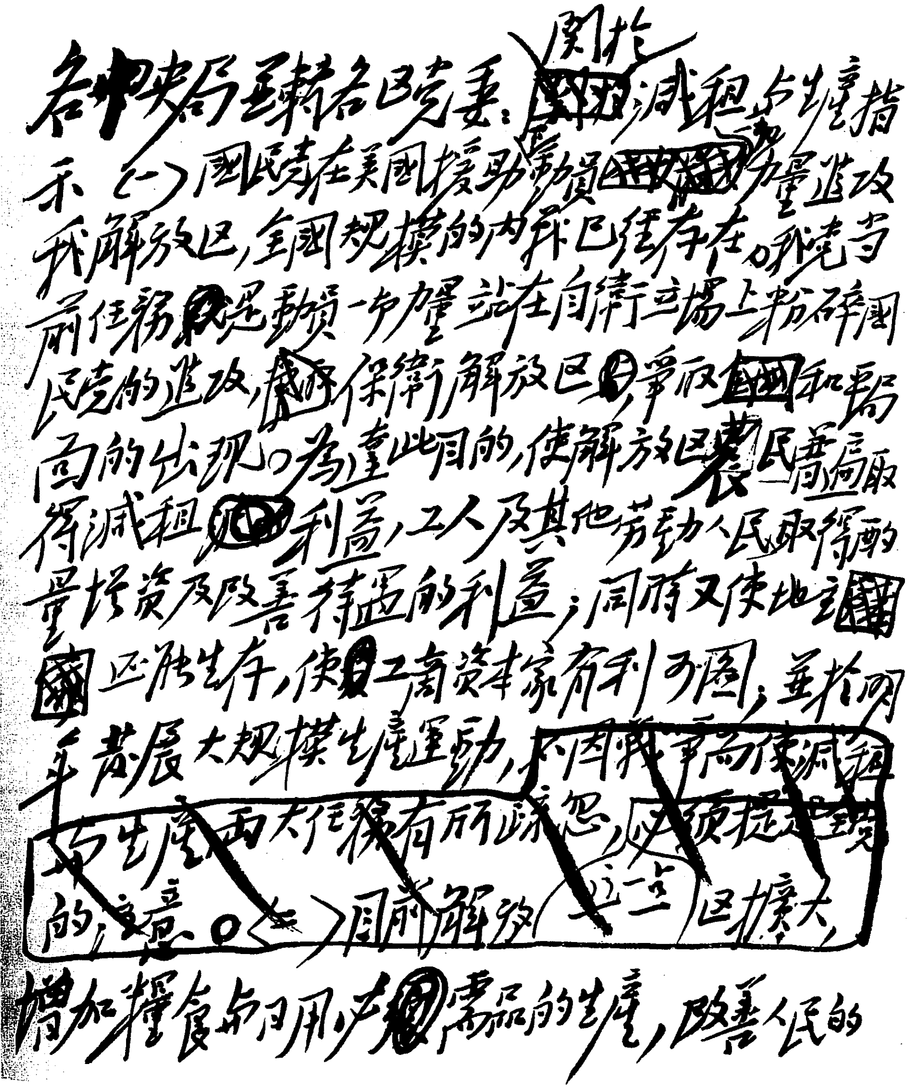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要因为新的大规模战争而疏忽减租和生产；恰好相反，正是为了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要加紧减租和生产。（三）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减租斗争中发生过火现象是难免的，只要真正是广大群众的自觉斗争，可以在过火现象发生后，再去改正。只有在那时，才能说服群众，使他们懂得让地主能够活下去，不去帮助国民党，对于农民和全体人民是有利的。目前我党方针，仍然是减租而不是没收土地。在减租中和减租后，必须帮助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会中。（四）使大多数生产者组织在生产互助团体中，是生产运动胜利的关键。政府发放农贷、工贷，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不违农时，减少误工，也十分重要。现在一面要为战争动员民力，一面又要尽可能地不违农时，应当研究调节的办法。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五）我们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许多中等城市。掌握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成了我党的重要任务。为此目的，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材，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六）告诉党员坚决同人民一道，关心人民的经济困难，而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一切仍要从长期支持着想，爱惜人力、物力，事事作长期打算，我们就一定能够胜利。

中共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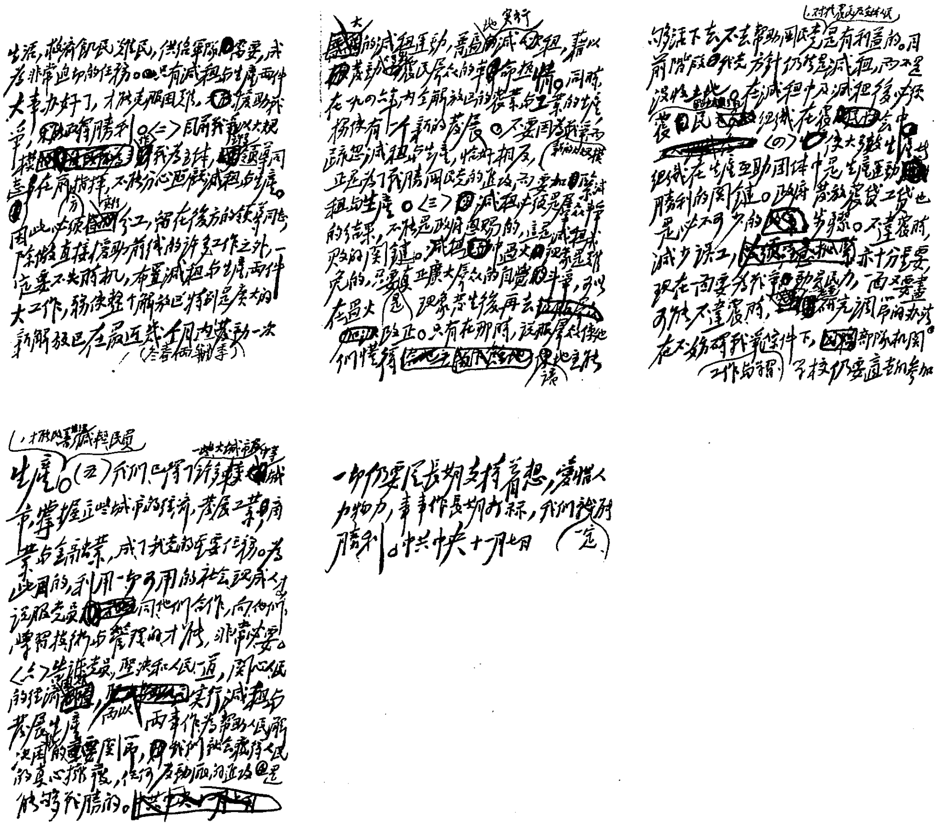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七日



各中央局並轉各區党委：关於减租与生產指示

（一）國民党在美國援助下動員力量進攻我解放區，全國規模的內戰已經存在。我党当前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站在自衛立場上粉碎國民党的進攻，保衛解放區，爭取和平局面的出現。為達此目的，使解放區民普遍取得减租利益，工人及其他勞動人民取得酌量增資及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時又使地主還能生存，使工商資本家有利可圖，並於明年發展大規模生產運動，~~不因戰爭而使减租与生產兩大任務有所疏忽，必須提起全党的注意。（二）目前解放區擴大，~~增加糧食与日用必需品的生產，改善人民的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手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手稿。

目前宣传与谈判的方针[1]

（1945年11月7日、8日）

甲乙戌虞致丙丁：

美国政策深堪注意，友人[2]意见值得考虑。但在美蒋坚决进攻方针下，我们无法退让，只有自卫一法。东北方面，山海关三日已打响，第十五师在美军支持下由秦皇岛进攻，事先要求我军退出山海关及离开铁路线，当地我军没有接受，彼即攻击，被我击溃。沈阳得失，决于作战结果，如我能在本月内歼灭其首先进攻的两三个师，取得集结兵力、整训后备之时间（需要两个月），并在尔后能根本歼灭其进攻力量，则东北可能归于我有，那时让国民党插一只脚，很好讲话。目前可以不公开自治军及全盘自治的宣传与要求，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战不利，蒋[3]得沈阳、长春，则我方只能获得边境二等地方。即使如此，也要用战争才能解决，洮南、龙江、佳木斯等地也不是谈判可以获得的。中央军退出华北一点，谈判时可以提得恰当些，宣传与谈判可以有些不同，但华北问题的解决同样取决于作战。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我方宣传弱点甚多，你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电报。

[2] 友人，指苏联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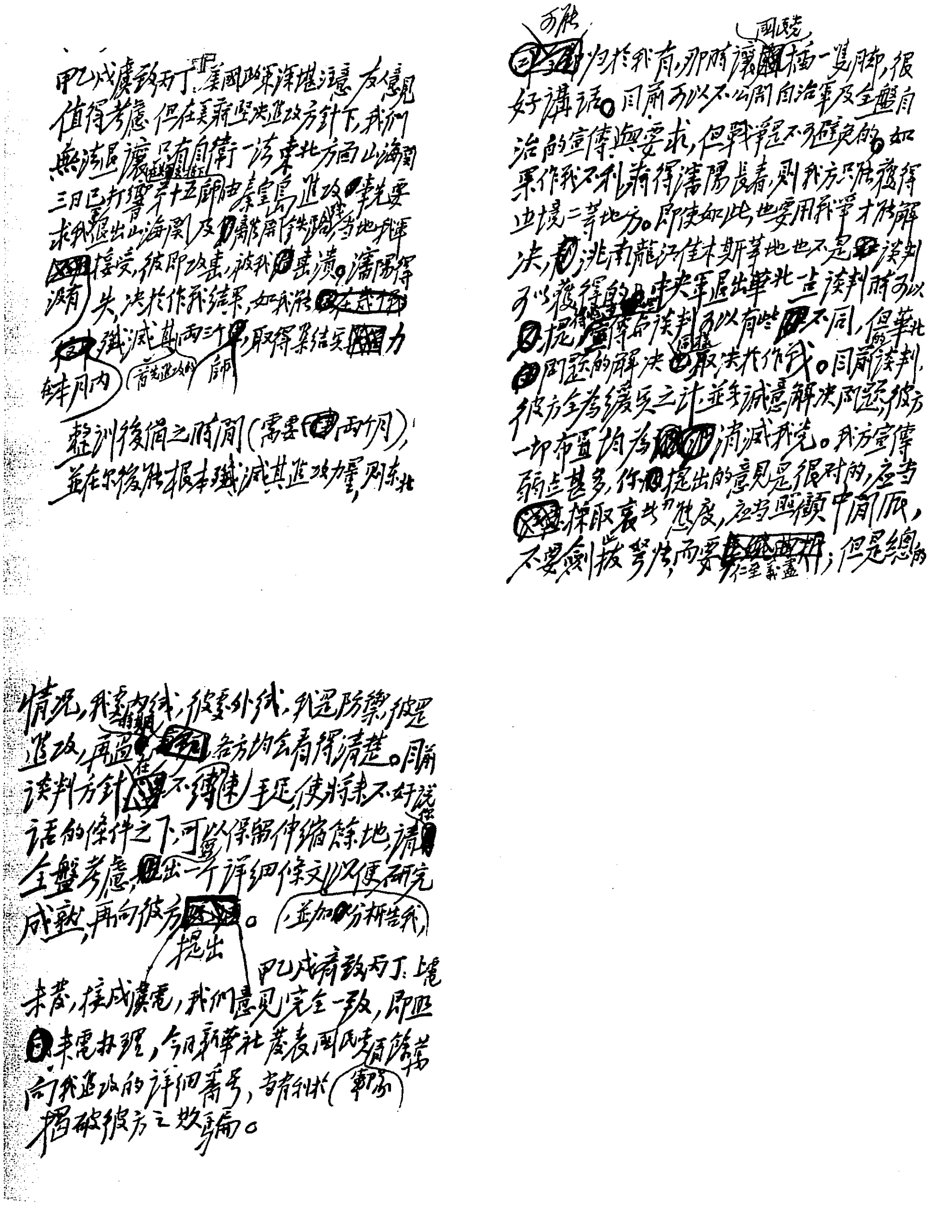
[3] 蒋，指蒋介石。

出的意见是很对的，应当采取“哀者”态度，应当照顾中间派，不要剑拔弩张，而要仁至义尽；但是总的情况，我处内线，彼处外线，我是防御，彼是进攻，再过一时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谈判方针在不束缚手足使将来不好说话的条件之下，可以保留伸缩余地。请你全盘考虑，写出一个详细条文，并加分析告我，以便研究成熟，再向彼方提出。

甲乙戌齐致丙丁：上电未发，接戌虞电[1]，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即照来电办理。今日新华社发表国民党军队百余万向我进攻的详细番号，当有利于揭破彼方之欺骗。

---

[1] 指周恩来、王若飞1945年11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甲乙戊庚致丙丁：美國政策深堪注意，所提意見值得考慮。但在美蔣堅決進攻方針下，我們無法退讓，只有自衛一法。東北方面，山海關三月已打響，第十五師由秦皇島進攻，事先要求我退出山海關及北寧鐵路各地，我軍拒絕接受，彼即攻擊，被我擊潰。瀋陽得失，決於作戰結果，如我能在本月內殲滅其首先進攻的兩三個師，取得整训後備之時間（需要兩個月），並在爾後能根本殲滅其進攻力量，則東北

可能歸於我有，那時國民黨插一隻腳，很好講話。目前可以不公開自治軍及全盤自治的宣傳與要求，但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作戰不利，失掉瀋陽長春，則我方只能獲得邊境二等地方。即使如此，也要用戰爭才能解決，洮南龍江佳木斯等地也不是談判可以獲得的。中央軍退出華北一點，談判時可以提，宣傳上談判可以有些不同，但華北問題的解決，同樣最後決於作戰。目前談判，彼方全為緩兵之計，並無誠意解決問題，彼方一切布置均為消滅我党。我方宣傳弱點甚多，你們提出的意見是很對的，應當採取哀兵態度，應當照顧中間派，不要劍拔弩張，而要仁至義盡；但是總的

情况，我是內线，彼是外线，我是防禦，彼是進攻，再過一時期各方均会看得清楚。目前談判方針，在不縛束手足、使將來不好說話的條件之下，可以保留伸縮餘地，請全盤考慮，擬出一个詳细條文，以便研究成熟，再向彼方提出。（並加以分析告我）

甲乙戊庚致丙丁：上電未發，接戍虞電，我們意見完全一致，即照來電办理，今日新華社發表國民党軍隊向我進攻的詳细番号，請利用（軍事）揭破彼方之欺騙。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宣传与谈判的方针》的手稿。

致程子华等电[1]

（1945年11月9日）

热河军队、财政及干部均依靠晋察冀解决，而东北局集中注意组织内线作战，无暇兼顾，因此，改变过去决定，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仍归晋察冀中央局指挥。冀热辽中央分局以程子华为书记，以萧克、罗瑞卿、李运昌、胡锡奎、赵毅敏、吴德、詹才芳为委员。以萧克为冀热辽军区司令，李运昌为副司令，程子华为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为第二政治委员。萧克、罗瑞卿指挥的野战军改称冀察晋辽热第二野战军，仍以萧、罗为该野战军首长，任务主要是保卫热河及坚持冀东、平北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程子华、热河分委、冀热辽区党委、晋察冀局、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保卫热河并组织破路司令部[1]

（1945年11月10日）

萧、罗：

保卫热河主要靠你们，赵尔陆[2]归还你们建制，望催其昼夜兼程到古北口作战。为确保古北口，须令现在冀察集中之兵力立即调若干抢至古北口，协同刘其人[3]（四千人）作战。能攻克密云否，密云、北平间铁路已破坏否，请动员一切力量不分昼夜破坏该路，越彻底越好。公私兼顾（使人民得利）掘毁路基是破路根本政策，望组织破路司令部指挥之，路破得快破得大，顽军即不敢大进攻。此外，望令冀东、冀中大举破北宁路（主要至急）、津浦路，分段设置破路司令部，专管破路，协助我山海关之作战（已打了七天）。平汉路亦照此大破。十六军三个师正开北平，十分注意勿误。以上如何执行速告。

军委
戌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萧克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赵尔陆，当时任冀晋军区司令员。

[3] 刘其人，当时任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正率部开赴东北。

罗荣桓等渡海后立即去沈阳会商作战大计[1]

（1945年11月10日）

罗、李：

（一）你们现到何处，渡海后立即去沈阳会商作战大计，千万要快。（二）渡海部队万分加速，目前只争半个月时间，除山海关至沈阳线已有布置外，山东继续渡海各部火速集中营口、沈阳间，这方面作战完全由你们负责。安东[2]、庄河及其以北亦由你们负责，但不需大兵力。

军委

戌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原山东军区参谋处处长李作鹏的电报。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的电报中提出，请令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所率山东军区第三师1.6万人“火速北进渡海，不得片刻迟误，沿途鼓励士气，力争时间”。

[2]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把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当作东北当前紧急战略任务[1]

（1945年11月10日）

子丑戌灰致寅卯：

（一）戌鱼电[2]佳日[3]收到，有此结果甚慰。

（二）目前只争半个月，半个月内黄永胜、文年生[4]两部五千，梁兴初、黄克诚[5]两部四万多必能到沈阳、锦州线。望令山海关我军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山东渡海部队须以主力集中营口、沈阳间，照林彪[6]办法部署作战。国民党美械师战力不强，我刘邓[7]已俘

---

[1] 这是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

[2] 戌鱼电，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45年11月6日给中央的电报。

[3] 佳日，即九日。

[4] 黄永胜（1910—1983），湖北咸宁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文年生，当时任八路军游击第三支队司令员。

[5] 梁兴初（1913—1985），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6] 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7]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缴三个完全的美械师，望扩大宣传以振士气。

（三）沈阳步枪既不多，须保留一部装备后到部队，能送一部枪弹去热河[1]否？

（四）石家庄李正先[2]十六军三个师已开始北运，半个月内可能集中山海关附近，石觉[3]十三军由上海海运，估计本月中旬可到山海关附近，五十二军由安南[4]起运，估计本月底可到山海关，你们面前之敌只有这三个军约八万人，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

（五）十分注意控制长春等处机场，必须保证歼灭空运部队。

（六）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向民众宣传蒋介石收复东北无功，抛弃东北有罪，造成民众反蒋热潮。派大批民运党务干部去沈阳、山海关线，沈阳、营口、安东[5]线，把发动民众创造战场当作当前紧急战略任务，千万注意。

---

[1] 热河，即热河省。

[2] 李正先（1904—1983），浙江磐安（今东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

[3] 石觉（1908—1986），广西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

[4] 安南，即越南。

[5] 安东，今丹东市。

将创造战场当作战略任务[1]

（1945年11月11日）

陈、黎：

（一）庆祝你们歼灭吴化文的胜利[2]。（二）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铁路线的占领区，拔除临、滕、邹、兖[3]地区的据点，广泛发动民众，给民众以经济利益。国民党正在重庆开将领会议，实行全国反共，惟调集大军于邹滕地区尚须时日，你们应利用此间隙创造战场，将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中央
戌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黎玉的电报。

[2] 指1945年11月上旬新四军第二纵队和山东军区第八师在鲁南滕县界河地区，歼灭由伪军改编的国民党军第五路军吴化文部3个师的胜利。

[3]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滕、邹、兖，指山东滕县、邹县和兖州。

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应取捷径赴锦州[1]

（1945年11月11日）

克诚，立即转梁兴初，并告李、沙，林、彭[2]：

（一）佳未电[3]悉。你们不要走喜峰口、平泉线，路太长，又无火车，你们应走冷口[4]及界岭口[5]捷径赴锦州，只有八百里。（二）山海关作战已一周，顽军火力盛，士气低，鱼夜我杨国夫师[6]一个团出击，俘兵五十，缴炮一门，重机一，轻机十八。顽军最怕冲锋，一冲即溃。已令李运昌、沙克指挥杨师坚持山海关，掩护克诚全部速到锦州。惟梁师过界岭口后，望准备随时候令转至绥中（山海关以东），策应杨国夫坚持山海关、绥中、兴城、锦州线，如能坚持一个月至两个月，于大局极有利。（三）由冀东经冷口、界岭口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即转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梁兴初的电报。

[2] 李，指李运昌，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沙，指沙克，当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

[3] 指1945年11月9日未时黄克诚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梁兴初师11日向喜峰口、平泉前进，新四军第三师各旅跟进。请电东北局在平泉到义县沿线准备粮草。到平泉后，能否坐火车，请电复。

[4] 冷口，关隘名，位于河北迁安县北部。

[5] 界岭口，关隘名，位于河北抚宁县北部。

[6] 杨国夫师，指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杨国夫。

锦州路上全靠你们自己办粮草，东北局照顾不及，你们立即组织前站人员先行数日筹办给养，亦不要希望坐火车，一切均作艰苦的打算。(四）行军情况每日电告。

军委

戌真申

关于平汉战役后的行动问题[1]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1945年11月11日）

刘、邓：

蒋介石召各战区长官、副长官、总司令于八日飞重庆开会，内容闻系剿共第一，因此反共战争更严重存在，平汉必会继续进攻。但因我邯郸战役大捷，继续北犯须时准备可能要一个月。我应利用时间，抓紧整编两个新的主力纵队，代替杨得志、陈赓两纵队。在不妨碍部队整编训练，不妨碍对付第二次平汉大进攻时迅速集中兵力之情况下，尽可能拔除根据地内的反动据点，如太行之沁县、浮山县城，冀鲁豫区之郓城、巨野、金乡、聊城，冀南永年、肥乡、武城，以及扩展同蒲南段解放区加强控制赵城等。请作通盘计算，目的在创造更大更好的战场，以利今后之作战。

军委

十一月十一日

---

[1] 这是1945年11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平汉战役后的行动问题给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

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

（1945年11月12日）

最近时局发展很快，自从苏联出兵、日本投降后，三个月来有点手忙脚乱，国共两党加上美国都是如此。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列车上了轨道。过去的游击部队正组成强大的野战军。再就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派遣去东北的干部已在路上的就超过三万，彭真[2]来电说已收到三千人，不包括山东去的。我们组建的野战军，算上已经走的和部分正在走的有：聂荣臻[3]第一野战军原定七万人，现在不到七万；贺龙[4]三万人，现在也不到三万；刘伯承[5]七万；陈毅[6]七万；李先念[7]三万；粟裕[8]五万。关内这六大军区，加上东北一个军区（林彪[9]二十万），共七个大军区。六大军区三十二万野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一政治委员。

[3] 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5] 刘伯承，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6] 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7] 李先念，当时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8] 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9] 林彪，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

军，东北算二十万，共五十二万，再过几个星期，组建工作大体可以完成。

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已到九万，正在走的十万。已到李运昌[1]部一万、沙克[2]部二千、曹里怀[3]部二千、黄永胜[4]部四千、刘转连[5]部五千、杨国夫[6]部七千、梁兴初[7]部七千、萧华[8]部二万、万毅[9]部一万五千。黄克诚[10]部三万五千，几天后就出关。李运昌到得早，部队已扩大为十万。现在山海关正在打，已打了一星期。从时间上我们还能争取本月的最后十八天，因为本月底苏军就要撤走了[11]。黄克诚部如到锦州，这一线老兵就在六万以上。在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今天还未登

---

[1] 李运昌（1908—2008），河北乐亭人，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

[2] 沙克（1907—1993），辽宁丹东人，当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

[3] 曹里怀（1909—1998），湖南兴宁（今资兴）人，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

[4] 黄永胜，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

[5] 刘转连（1912—1992），湖南茶陵人，当时任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司令员。

[6] 杨国夫（1905—1982），安徽霍丘人，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

[7] 梁兴初，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

[8] 萧华（1916—1985），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 万毅（1907—1997），辽宁金县人，当时任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兼滨海支队支队长。

[10] 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11] 苏联军队原计划于1945年11月底撤离中国东北回国，后延期至1946年3月开始撤退，5月初全部撤完。

陆，可能不登了。仗只在山海关打，时间是完全有的。蒋介石准备空运部队，但美国不出飞行员，苏军不走也不能空运。两星期内我们如能在山海关坚持住，葫芦岛、营口国民党军队不登陆，争取到这两条，我们就有办法。沙克以满洲人民自卫军名义不许美国中将巴贝登陆，他们就没有登陆。最近两星期是一个关键。

我们控制东北的可能性在增长。国民党军在葫芦岛、营口没有登陆，按苏军是允许他们登陆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要求共军撤退，苏军说这是中国的事。以后他们也可能登不了，只有山海关还能坚持争。国民党的兵力尚未集中，平、津要守备，石家庄那里的五个师又手忙脚乱。他们利用空隙进入石家庄五个师、进入济南两个师，但现在都动不得。现在他们计划从北平运一个师到长春，但天津司令部说共军在那一带有十万兵力，不能运走。现在他们顶多可能运三个军。

东北的事情，我们只能做不能说。现在有一部分政权我们接收了，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工厂也接收了一些。再有一两个星期，苏军撤走前，必须接收完。接收要有人有兵，现在真正在沈阳附近接收的不多，那方面很紧张，正在进行争夺战。现在差的是长春、哈尔滨，要有个把团，待苏军一走我们就接收。

我们正在调动十万兵力，罗荣桓[1]部四万，叶飞[2]部二万二千，谭政[3]带五千，杨得志[4]部二万二千，陈赓[5]部一万二千，共十万零

---

[1] 罗荣桓，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

[2] 叶飞，当时任新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3] 谭政，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4] 杨得志，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5]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

一千人，准备夹击国民党军。现在用海运，每次六千人，三天一次，迄今没有遇到过危险。东北三千多万人口，我们去了这么多干部和兵，也差不多了。

在关内，可以说国民党军的三路进攻[1]已被我们打破了。今年八月，傅作义率部六万多人，沿平绥线东进，占领已被我们解放的城镇，来势很凶。晋察冀、晋绥两军区部队集结、整训约一个月后，第一个回击就把傅部打到了平地泉，以后一直打到归绥。昨天我们总攻归绥，计划一直打到五原、临河去[2]。现在傅的原计划是被打破了，我们即使不能取得归绥、包头，他要再进攻也困难了。在上党战役中，阎锡山的主力被消灭了，将官被捉者二十七人。这一仗意义很大，我们已无后顾之忧。上党区是出兵出粮之地。平汉战役打了十天，是这几仗中主要的一仗，使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北进受阻了。现在潼关至徐州这一带有国民党军三十个师，因为这一仗，他们不能前进了，李先念的部队与苏北新四军也起了钳制作

---

[1] 指1945年8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军队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线，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分三路向华北解放区的推进和进攻。在西路，傅作义部4个军由绥西出动，在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集宁等城市后，沿平绥路东进，逼近张家口；胡宗南部8个军由关中出潼关，主力沿陇海路东进，一部沿同蒲路北折，准备再沿正太路东进，夺取石家庄并进取北平、天津；阎锡山部7个军，以主力占据同蒲路沿线，一部侵入晋冀鲁豫人民军队所控制的晋东南长治地区。在中路，孙连仲部3个军，由豫西出郑州沿平汉路北进，准备打通平汉路，与胡宗南会合于石家庄。在东路，李品仙部2个军占据浦口、蚌埠，沿津浦路北进，准备与李延年部4个军在徐州会合。国民党的意图是，迅速控制华北等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通道，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中共在谈判中屈服。

[2] 这里讲的是绥远战役。

用。新四军调山东的只到了两个旅，就配合山东军区部队消灭了吴化文[1]部，过几天，再到四个旅，共十八个团，力量就更大了。在同蒲路，陈赓纵队攻占了洪洞、赵城。陈赓部调离太岳，因此太岳还要组织几个团注意防范胡宗南[2]。

蒋介石在重庆开会[3]，实际上是研究如何对付我们。目前国民党对付我们的兵力，最多有一百二十七个师（四十九个军），实际上广州新一师只能出个把团，南京的新六军只能向浦口睃一下，所以充其量也不过五十个军。现在我们已搞掉了他们九个军，只剩下四十个军了。目前他们要再增加兵力是困难的，除守备要点外，能够进行野战的不会超出一半，而我们的野战军大体已组成了。这一时期，我们缴获的枪支有二十万。

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我们没有因谈判而影响军事行动，集中了军队，打了三个大仗[4]，东北也派去了干部。

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现在还不能说：我们已控制了东北，在华北占了优势。只有确实打下来了，才能说是我们的。到那时，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控制了东北，是不是不允许国民党插足？可以允许的。但他们却决不允许我们插足，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

---

[1] 吴化文（1904—1962），山东掖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路军总司令。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指1945年11月9日至16日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军事会议，会议作出在6个月内击溃共产党军队，然后实行分区“围剿”的部署。

[4] 指上党战役、绥远战役和邯郸战役。

打。谈判是要谈的。我们不成立中央政府，蒋介石下讨伐令，我们也只是要他收回成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也可以开。如他取消第十八集团军，我们朱彭[1]就搞解放军，我们还可以打电报要他收回成命，取消错误政策。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不下讨伐令。

美国实际上在干涉中国内政，但也有弱点，必须声明不干涉。有消息说它要派二十万美军来，但没有得到证实，可能不致搞到这样。就是来二十万，分布在中国也相当稀薄，也弱得很。美国无产阶级声援我们，纽约举行示威是事实，周恩来同志已打电报去了。

蒋军的基本弱点有二：兵心不固、民心不归。还有弹药不济，粮食不足，打仗全靠火力，我们一个冲锋它就垮了，一个手榴弹可以缴它五挺机关枪。还有天时不利，蒋军中南方人多，去北方打仗冷得很。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军心与民心。另外还有杂牌军叛变的可能，如孙良诚[2]可能过来，张岚峰[3]也有可能。此外还有刘汝明、曹福林、商震、冯治安[4]，再加三十八军[5]。高树勋造成的影响很大，

---

[1]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当时任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2] 孙良诚（1893—1951），河北静海（今属天津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路军总指挥。

[3] 张岚峰（1902—1952），河南柘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路军总司令。

[4] 刘汝明（1895—1975），河北献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曹福林（1891—1964），河北景州（今景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十五军军长。商震（1889—1978），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参军长。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5] 指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1946年5月，该军副军长孔从洲在河南巩县率部起义。

通电传得很广，现在已令各处庆祝。破路也成了宣传战，他们说我们破坏复员，我们说这是制止内战的手段之一。我们组织了破路司令部，公私兼顾，群众得到铁轨和枕木，积极得很。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

打下去是否会引起世界大战？我看不会。苏联在战后必须休养生息，它不愿再发生新的世界大战，要引起大战，除非有谁去进攻苏联。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美国实际上是在干涉中国，但只要我们不断打胜仗，他也得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能取得胜利，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对我们能打胜，就更不相信了。白崇禧[1]的秘书说，白无论如何不相信他们打不胜。如果我们能坚持半年，蒋介石和美国都可能重新考虑问题。

解放区现在要搞生产与减租，新区要搞大的减租运动，彻底地普遍地搞。如果做到这一条，人民群众的元气是会恢复的。对地主的土地是不是要没收？七大的方针还是减租减息，要彻底减，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

生产方面，明年要有组织地搞粮食和日用品。现在大兵团作战，消耗很大。搞工业生产，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中等城市。

如果不彻底减租，群众的情绪不能提高，对生产也没有兴趣。现在要划分前方和后方，不要造成后方工作无人管。恐怕还要两个月，才能走上轨道。

在东北，经济工作是个很大的问题。什么本溪湖，什么抚顺，

---

[1] 白崇禧（1893—1966），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

谁会搞？少奇[1]同志前面说了，谁会搞谁就搞。现在平绥线上开火车的，还不就是那些老人。东北工业占全国百分之八十，要把这百分之八十的工业搞起来，用日本技术人员是可以的。

---

[1] 少奇，即刘少奇。

夺取归绥方案[1]

（1945年11月14日）

聂、贺：

归绥[2]久围不下，我军应以一部监视归绥，以主力迅即西进，攻占包头、五原、临河，使归绥傅[3]顽陷于孤立，粮尽援绝，必求突围，然后于野战消灭之，最后夺取归绥。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戌寒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电报。

[2]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3]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坚守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掩护我主力集中锦州[1]

（1945年11月14日）

李、沙：

（一）合众社称蒋军占领山海关，情况如何即告。（二）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必须坚守，掩护我主力黄梁集中锦州，时间至少三星期，多则两个月，望动员民众构筑多道防御工事。（三）凡不得已放弃之地必须于放弃前破坏道路阻敌前进；破坏铁路必须采公私兼顾政策（使民众得木料铁轨等物）及将路基掘毁（掘成宽深之坑，使敌不易修复）。（四）山海关、绥中、兴城一线我军共有多少兵力，战斗力如何，民众发动如何，游击队民兵组织如何，地形利于作战否，即告。

军委

十四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李运昌和冀中军区参谋长沙克的电报。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黄克诚、梁兴初的电报中命令新四军第三师和山东军区第一师两部“迅分数路平行前进，限二十四日前全部到达锦州地区。以黄师位于锦州休整，梁师位于锦州通兴城方向休整，并准备策应杨国夫师之作战”。

以锦州地区为战略枢纽布置工作

（1945年11月14日）

冀热辽分局，并告东北局、晋察冀局及黄、梁[1]：

以锦州为中心之地区为我主力集中作战之战略枢纽，冀热辽分局必须兼顾东南两面，除南面以粉碎从北平向承德进攻之蒋军为目标创造战场、布置工作前已电告外，望迅即派大批干部并有得力领导同志去朝阳建立领导中心，将干部分配于朝阳、凌源、阜新、绥中、兴城、锦西、锦州、义州各县，其任务为发动民众，镇压反动，组织民兵游击队及地方军，创造战场，援助锦州、山海关主力之作战，并为我军建立稳固后方，设立兵站线，供给粮食，收容伤病，输送干部，确保锦、朝铁路线于我手。在这一工作上，分局应接受东北局之指导意见。

中央

戌寒

---

[1] 黄，指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梁，指梁兴初，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

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

（1945年11月15日）

林、彭[1]：

十三日十九时电悉。顽十三军、五十二军正在秦皇岛、抚宁地区集中，估计其后续尚有一个军，至少集中三个军，然后向山海关、绥中之线攻击前进。目前山海关作战并非真面目战斗。我黄、梁[2]两部四万二千远道新到，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目前开至义院口、驻操营，必无好仗可打，即使歼敌一部，不过战术胜利，而兵力暴露，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为避免此种缺陷，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李运昌、杨国夫[3]两部坚持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梁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荫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恢复疲劳，补充枪弹，熟悉地理民情，创造战场，

---

[1] 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

[2] 黄，指黄克诚，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梁，指梁兴初，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

[3] 李运昌，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司令、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杨国夫，当时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

演习夜战，俟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三万五千，梁兴初七千，杨国夫七千，李运昌、沙克[1]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二万（新部队可以参战作为辅助兵力），共约七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荣桓[2]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冀东已编成两个野战旅，可调至山海关、绥中、兴城之线的西面山地荫蔽集结，于正面主力举行决战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总之，从内线作战着眼，此种方针最为有利。你们是否同意，仍望考虑电复。

毛泽东
戌删

---

[1] 沙克，当时任冀中军区参谋长。

[2] 荣桓，即罗荣桓，当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

中美人民行动起来制止中国内战扩大*

（1945年11月15日）

正在国民党答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装腔作势好像要想经过谈判以求得和平的时候，不宣而战的内战中一次最大的战役，就要在山海关一带发生了。这个战役的第一个特点，是国民党把自己最精锐的队伍统统集中在这里，已经调到和准备调去参加这个战役的，计有六个军之多，即第十三军、第九十二军、第九十四军、第十六军、第五十二军等（另一个军的番号待查），其中五个军将用来进攻山海关一线，而九十二军则用来进攻热河，作为配合。这个战役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最露骨地表现出驻华美军对中国内政的武装干涉。所有这些国民党军队，都是由美军帮助，并用美舰美机运输去的；山海关南面国民党军队集中的基地秦皇岛，是美军所一手布置的，现在仍驻美军保护；所有这些国民党军队，都是在“准备对日反攻”的名义之下，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并且由美国军官训练出来的。所有这些国民党军队中现在都有美国军官“帮助”指挥，有些队伍每个团有十个美国军官，每个营有一个美国军官，美国驻军供给这些国民党军队以重武器——大炮、坦克、飞机等等；这些国民党军队的弹药、粮食、汽油，没有一件不是由美舰美机运去的；甚至这些国民党军队所用的煤，也是由美军所“保护”的矿里出产出来，经美军所“保护”的铁路运输的。没有驻华美军的这些“不

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这些“不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这些“不希望中国内战”的行为，这些“不在反共战争中帮助中央军”的行为，那么，这个空前未有的山海关大战怎能打得起来呢？

说驻华美军这些行为是为了解除日本武装和遣送日本人回国吗？难道不是离题万里吗？不是南辕北辙吗？

魏特梅耶口口声声说“保护美国生命财产”，而同时把许多美国人放到国民党军队里去，放到阵地上去，放到时刻有死亡可能的炮火中去，难道这就是“保护美国生命”的办法吗？使美国士兵不是死在对日本的正义战争中，而是死在阻碍中国人民独立自由的反动的内战中。这有什么意义，什么价值呢？

空前的大屠杀将在山海关一带发生，这是一桩肮脏的大屠杀，这在实际的意义上，不单单是中国的内战，而且简直是驻华美军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必须立即加以制止！中国和美国的各界人民，应该立即派遣自己的调查团到那里去，并且一致起来，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制止这个大屠杀。

及时地行动起来，制止立即到来的山海关一带的大战，救援那成千成万将被驱赴屠场的中国人民的子弟和美国人民的子弟！反对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反对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大召开问题*

（1945年11月16日）

【新华社延安十六日电】据路透社兴美新闻处电讯称：本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宣布国民大会将在明年五月五日召开。此间除此项简单报道外，未接获任何更详细之消息。但延安方面对此项消息极为重视，认为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双十协定》的又一次背弃。查上月十二日公布之《国共会谈纪要》关于国民大会项全文如下：“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延缓国民大会召开日期及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和五五宪法草案等三项主张。政府方面表示：国民大会已选出之代表应为有效，其名额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地解决，五五宪法草案原曾发动各界研讨，贡献修改意见。因此，双方未能达成协议，但中共方面声明：中共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裂团结。同时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又《纪要》中规定“协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纲领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为政治协商会议之主要议题。及纪要公布仅及一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尚未开会之时，国民政府竟以片面行动，宣布国民大会之日期。此举足证国民党方面，对目前国内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均无诚意经政治途径与各党派会议协商解决。此举亦透露了国民党政府现在已下定破裂国内团结实行大规模内战的决心。同一权威方面表示，原来以讨论有关国民大会诸问题为中心

议题之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此种一意孤行的片面行动之后，是否尚有意义，大成问题，而且即使协商会议开会之后，谁又能保证国民党以后不再背信弃义撕毁会议的协议呢?

为杨步浩题写祝寿词[1]

（1945年11月18日）

与人民同寿。

---

[1] 杨步浩，陕北延安地区普通农民。放羊倌出身，曾参加赤卫队并加入共产党，大生产运动中被评为边区劳动英雄，是毛泽东的农民朋友。1945年11月18日，是杨步浩40岁生辰，周围七个村庄的邻里亲友200多人前来祝贺。毛泽东也派代表前来庆贺，并送给他一条写着“与人民同寿”的大红绸帐、20万元、一块毛毯、两篓酒。

贺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1]

（1945年11月）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

[1]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组织领导了“南洋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积极动员南洋华侨捐款、购买救国公债、选送华侨司机回国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1945年11月18日，在重庆的集美校友会、厦门大学校友会、福建同乡会等10个团体500多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联合举行“华侨领袖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送了题写这副对联的贺轴。陈嘉庚（1874—1961），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早年侨居新加坡，经营橡胶事业。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后，在集美创办中小学和水产、商业、农业、幼稚师范、国学专门学校等十所学校。1918年创办南洋华侨中学。1921年创办厦门大学。1940年3月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回国，5月31日访问延安。抗战胜利后，参加爱国民主活动。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

为悼念冼星海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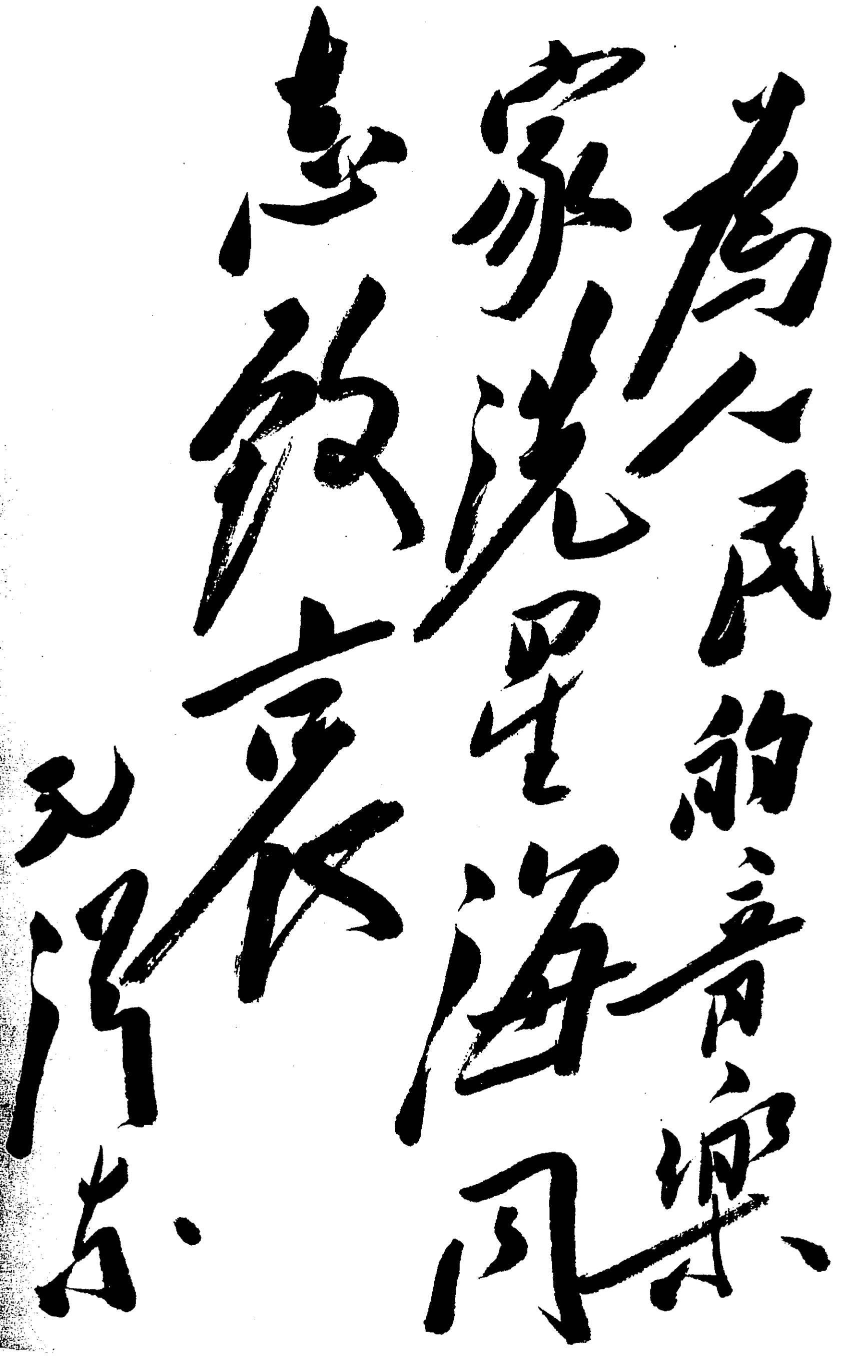
（1945年11月）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的冼星海追悼会的题词。冼星海（1905—1945），广东番禺人，作曲家。1938年到延安，曾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主任。1940年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并学习。1945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病逝。主要作品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為人民的音樂
家冼星海同
志致哀
毛澤東

毛泽东为悼念冼星海的题词。

和鲁艺、延大即将去东北的领导干部和教员的谈话[1]

（1945年11月）

这次去赢了一着棋。他们认为我们不敢去。我们去了，他们拿不出计划来。这说明没有诚意。我们去了，使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我们也送了一些礼物（指我们同意把我们的军队撤离长江以南的几个地区）。在人家卧榻之侧嘛！有些民主人士觉得我们吃了亏，那也很好嘛，了解我们作了让步。

你们去东北，那里形势紧张，是必争之地。现在还是敌强我弱，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比如我们的力量是五个手指，敌人的力量也是五个手指。我们怎么打呢？不是五个手指对五个手指，而是以两个手指牵制敌人的四个手指，然后我们用三个手指去歼灭敌人的一个手指。

你们这次去东北的任务是去争取青年，办大学。你们这次去，冰天雪地，可能有害病的，还可能有牺牲的。遇到问题要分析，要学会分析。一个西瓜可以切为两半，一半叫困难，一半叫光明。刚才我说过，东北是必争之地。事不宜迟，说走就走。我们的“飞机”是两只腿。

---

[1] 这是毛泽东和鲁艺、延大即将去东北的领导干部和教员谈话的一部分。

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

（1945年12月15日）

过去几个月内，我党领导人民在肃清敌伪和粉碎国民党向解放区进攻的激烈斗争中，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全党同志齐心协力，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显著的成绩。一九四五年即将过去，一九四六年各解放区的工作必须注意如下各点：

（一）粉碎新的进攻。国民党自从在绥远、山西、冀南三处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被我军粉碎后，又在调动更大的兵力，准备新的进攻。假如没有新的情况足以使国民党迅速停止内战，则一九四六年春季的战斗，将是紧张的。因此，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

（二）开展高树勋运动[2]。为着粉碎国民党的进攻，我党必须对一切准备进攻和正在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分化的工作。一方面，由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公开的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以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1945年10月30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等部1万余人在邯郸内战前线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为了进一步加强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的榜样，拒绝进攻解放区，在内战战场上实行怠工，和人民解放军联欢，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

解国民党内战军的战斗意志。另一方面，须从国民党军队内部去准备和组织起义，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仿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为使此项工作切实进行和迅速生效起见，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则要给以密切指导。

（三）练兵。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练兵项目，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项技术程度为主，提高战术程度为辅，特别着重于练习夜战。练兵方法，应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一九四六年必须进一步实现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保证练兵、供给和作战任务的完成而奋斗。各地民兵，须按目前条件，重新组织。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须重新调整。应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军事学校应继续办理，着重技术人材的训练。

（四）减租。按照中央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指示[1]，各地务必在一九四六年，在一切新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但是有领导的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则酌量增加工资。使广大群众，在此运动中翻过身来，并组织起来，成为解放区自觉的主人翁。在新解放区，如无此项坚决措施，群众便不能区别国共两党的优劣，便会动摇于两党之间，而不能坚决地援助我党。在老解放区，则应复查

---

[1] 即《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

减租减息的工作，进一步巩固老解放区。

（五）生产。按照十一月七日指示，各地立即准备一切，务使一九四六年我全解放区的公私生产超过以前任何一年的规模和成绩。人民中发生的疲劳情绪，只有在认真实现减租和生产两项任务，并有了显著成绩之后，才能克服。减租和生产两大任务是否能够完成，将最后地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的胜负，各地切不可疏忽。

（六）财政。为着应付最近时期的紧张工作而增重了的财政负担，在一九四六年中，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转到正常状态。人民负担太重者必须酌量减轻。各地脱离生产人员，必须不超过当地财力负担所许可的限度，以利持久。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建军原则之一。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1]，生产和节约并重等项原则，仍是解决财经问题的适当的方针。

（七）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2]。一九四六年，这两项工作，必须比过去几年做得更好些。这对于粉碎国民党进攻和巩固解放区，将有重大意义。军队中应当从每个指战员的思想上解决问题，使他们彻底认识拥政爱民的重要性。只要军队方面做好了，地方对军队的关系必会跟着改善。

（八）救济。各解放区有许多灾民、难民、失业者和半失业者，

---

[1] 这里所说的“公私兼顾”的“公私”，是指公家和个人两方面，而不是指公营企业和私营企业两方面。

[2] 拥政爱民，是人民解放军“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是解放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人民群众“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口号的简称。“拥军优抗”的口号，后来改为“拥军优属”，即拥护人民解放军、优待革命军人家属。

亟待救济。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救济之法，除政府所设各项办法外，主要应依靠群众互助去解决。此种互助救济，应由党政鼓励群众组织之。

（九）爱护本地干部。现在每个解放区，都有大批外来干部做各级领导工作。东北各省，此种情形尤为显著。对于这些外来干部，各地领导机关，务须谆谆告诫他们，以充分的热情和善意，爱护本地干部。将识别、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当作自己的重要任务。只有这样，我党在解放区才能生根。外来人轻视本地人的作风，应当受到批评。

（十）一切作持久打算。不论时局发展的情况如何，我党均须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目前我党一方面坚持解放区自治自卫立场，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巩固解放区人民已得的果实；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1]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同时，我党代表团即将出席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和国民党重新谈判，为全国的和平民主而奋斗。但事情可能还有曲折。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例如新区域、新部队还不巩固和财政困难等。我们必须正视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十分注意人力物力的

---

[1] 1945年11月25日晚，云南省昆明市大中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反动派派遣军队包围会场，发射小钢炮、机关枪、步枪，并在学校附近戒严，禁阻师生通行返家。各校学生于第2天起联合罢课。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派大批军警和特务在西南联合大学校舍、师范学院两处投掷手榴弹，并骚扰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和南英中学等处。当日，师生死4人，伤数十人。一般称这个血案为“一二·一惨案”。

节省使用，力戒侥幸成功的心理。

以上十项，为一九四六年尤其是上半年工作应加特别注意之点。望各地同志根据当地情况，灵活地实现上述方针。至于各地政权建设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从党内外推广时事教育的工作，解放区附近城市的工作等项，都是重要的，这里不来多说。

给司徒美堂[1]的信

（1945年12月28日）

纽约司徒美堂先生勋鉴：

顷接十一月二十七日代电，反对内战，力争民主，不胜钦佩。敝党代表团久已抵渝出席即将召开之政治协商会议，并已向政府当局提议立即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谋国家之团结、统一与和平建设。尚祈贵党与全美侨胞，一致主张，促其实现。民族前途，实深利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

[1] 司徒美堂（1868—1955），广东开平人，当时任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

（1945年12月28日）

（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2]。建立这种根据地，不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苏联宣布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北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遣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与东北抗日联军会合，领导东北人民，消灭日军和伪满的残余，肃清汉奸，剿除土匪，建立各级地方民主政府。但是这时坚持要独占全东北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并攻占了已被人民解放军解放的山海关、锦州等要地。东北的严重斗争已经不可避免，而这一斗争对于全国局势显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这个指示中，预见到东北斗争的艰苦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发动群众，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个正确的方针，由中共中央东北局有效地实现了，因而能在3年以后的1948年11月，取得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

[2] 当时，东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段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安图、延吉、敦化等地区；北满根据地是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西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段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今双辽）、扶余等地区。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南满建立了根据地，南满根据地是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市）、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坚持南满的对敌斗争，对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也起了重要作用。

轻而易举的事，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的时间，需要三四年。但是在一九四六年一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

（二）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做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种地区，我党应当做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道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但是，这种地区将是两党的游击区，而不是我们的巩固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目前，应当确定这种地区，以便部署力量，引导全党向此目标前进。

（三）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最近热河省委的发动群

众斗争的指示[1]，可以应用于东北。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否则，群众分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优劣，可能一时接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甚至反对我党，造成我们在东北非常不利的形势。

（四）我党现时在东北有一项主观上的困难。这就是大批干部和军队初到东北，地理民情不熟。干部对于不能占领大城市表示不满，对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表示不耐心。这些情况，都是同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相矛盾的。必须反复教育一切外来干部，注重调查研究，熟悉地理民情，并下决心和东北人民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培养出大批积极分子和干部。应向干部说明，即使大城市和交通线归于国民党，东北形势对于我们仍然是有利的。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必须告诉干部，对于国民党势力切不可估计太低，也不可以为国民党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而产生不耐心做艰苦工作的情绪。这样说明时，当然不要使干部觉得国民党势力大得了不得，国民党的进攻是不能粉碎的。应当指出，国民党在东北没有深厚的有组织的基础，它的进攻是可

---

[1] 指1945年12月中共热河省委颁发的《发动群众的指示》。这个指示指出：发动群众对汉奸、特务的控诉复仇的清算运动是目前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应当通过这一运动，发扬群众的积极性，提高群众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地位，组织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并准备在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后转入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在城市中发动群众，必须首先发动工人，使工人在清算汉奸、特务的运动中起先锋作用和领导作用。这个指示还提出要学会管理城市的一套办法，爱护民力，一切作长期打算。

以粉碎的，这就给我党以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但是，国民党军队现在正向热辽边境进攻，如果没有受到打击，他们不久即将向东满和北满进攻。因此，我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

（五）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一切军队，均须有确定的地区和任务，才能迅速和人民结合起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六）此次我军十余万人进入东北和热河，新扩大者又达二十余万人，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加上党政工作人员，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一九四六年决不可空过，全东北必须立即计划此事。

（七）在东北，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动向，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同争取将来的胜利关系极大。因此，我党对于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工作，特别是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应当充分注意。鉴于抗战初期我党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注意不够，此次东北党组织除注意国民党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外，还应尽可能吸引工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

给黄齐生[1]的信

（1945年12月29日）

黄老先生道席：

新词拜读，甚感盛意！钱老先生[2]处乞代致候。敬祝六七荣寿，并颂新年健康！若飞[3]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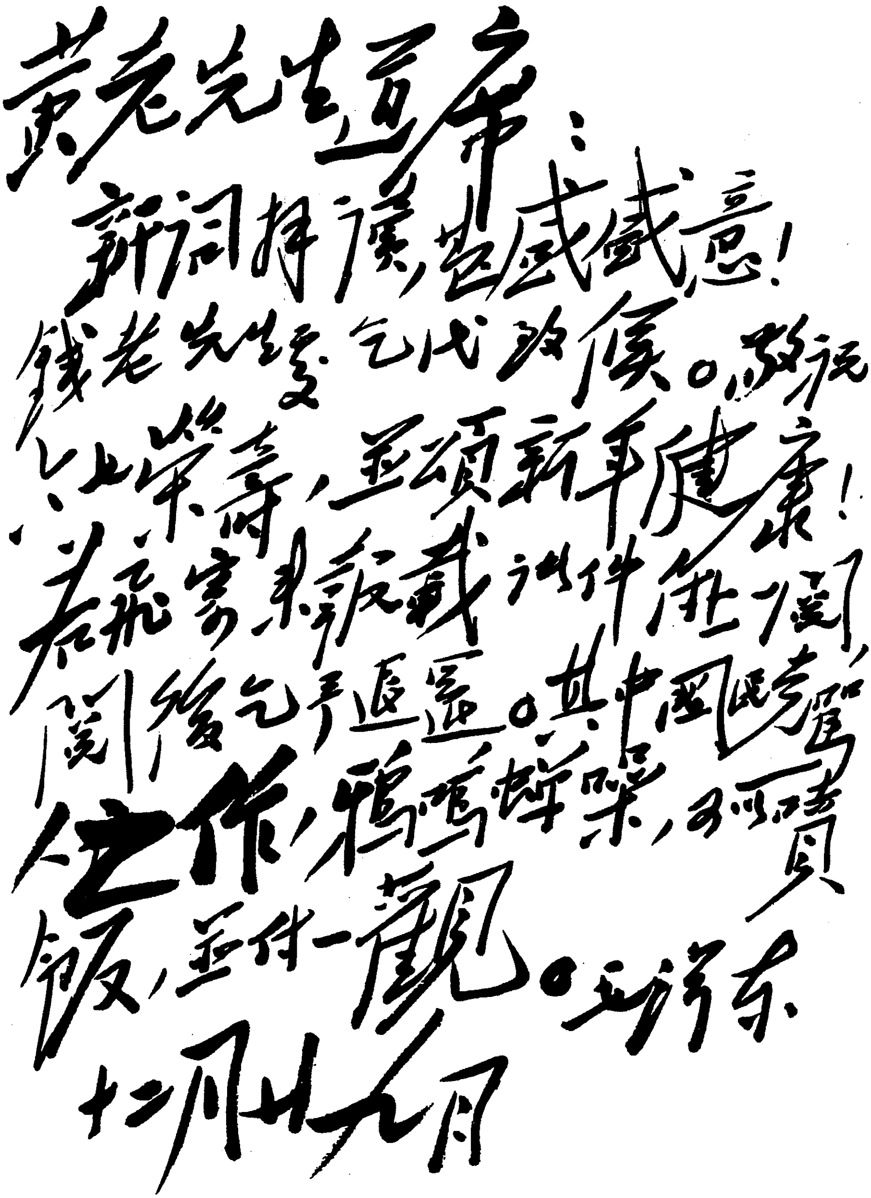
十二月廿九日

---

[1] 黄齐生（1879—1946），贵州安顺人，教育家。他是王若飞的舅父，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当时在延安。

[2] 指钱拯（1884—1968），原籍浙江杭县（今余杭），当时是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3] 若飞，即王若飞。



黄老先生道席：

新词拜读，甚感盛意！钱老先生处乞代致候。敬祝六十荣寿，并颂新年健康！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俱阅，阅后气为远遥。其中国民党人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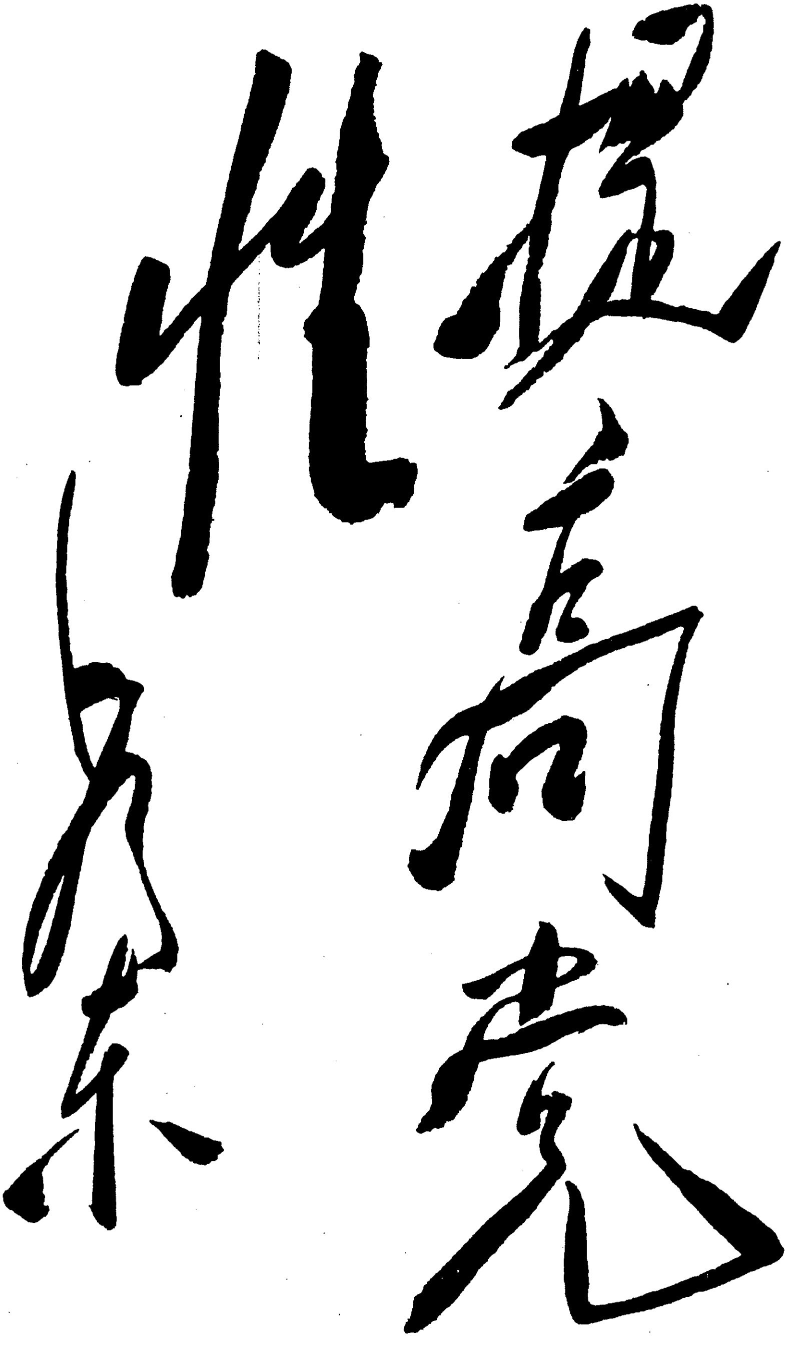
十二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黄齐生信的手稿。

为党的“七大”代表记录本题词

（1945年）

提高党性。



提高党性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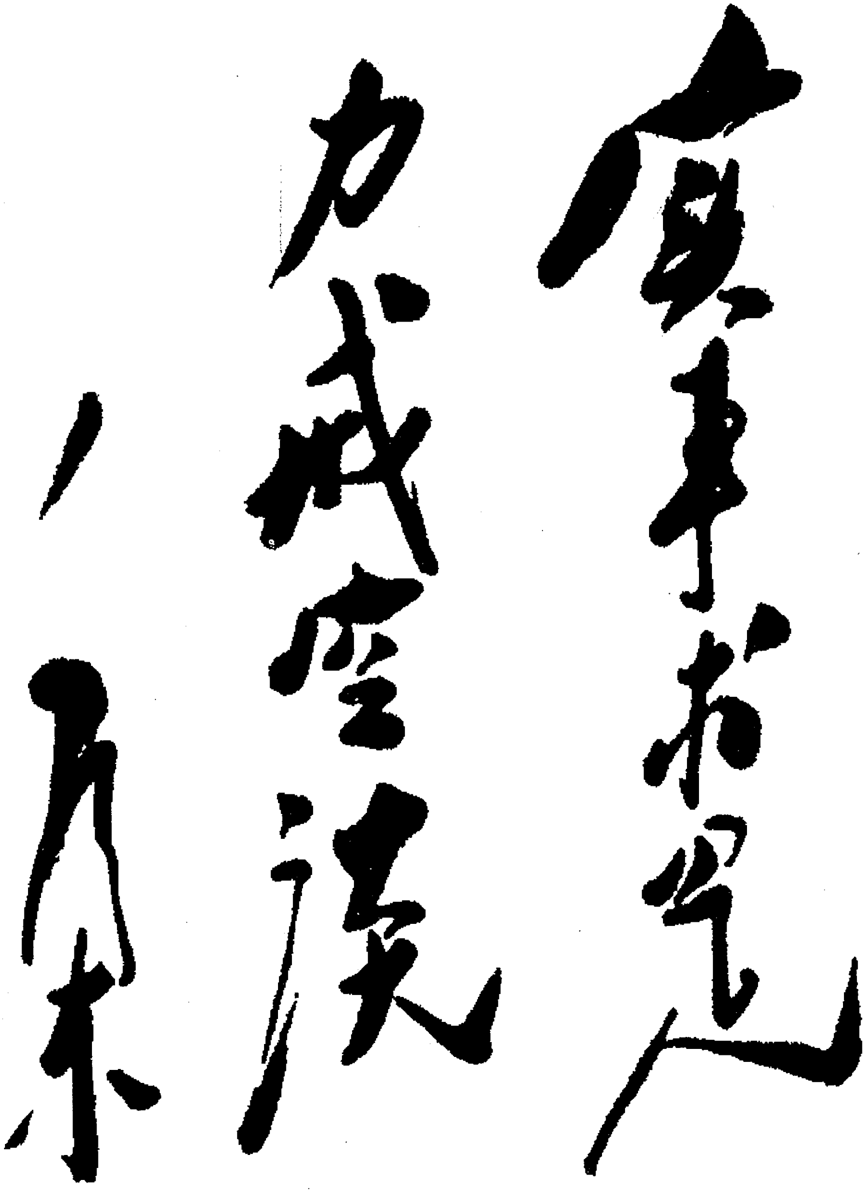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党的“七大”代表记录本的题词。

为党的《七大纪念册》题词

（1945年）

实事求是，力戒空谈。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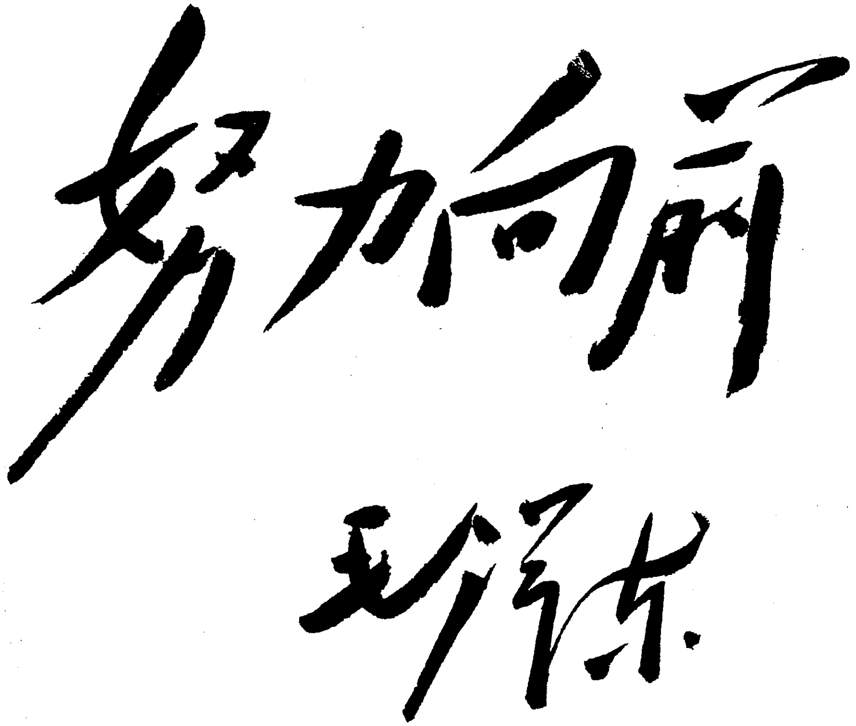
实事求是
力戒空谈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党的《七大纪念册》的题词。

为刘书林题词

（1945年）

努力向前。



努力向前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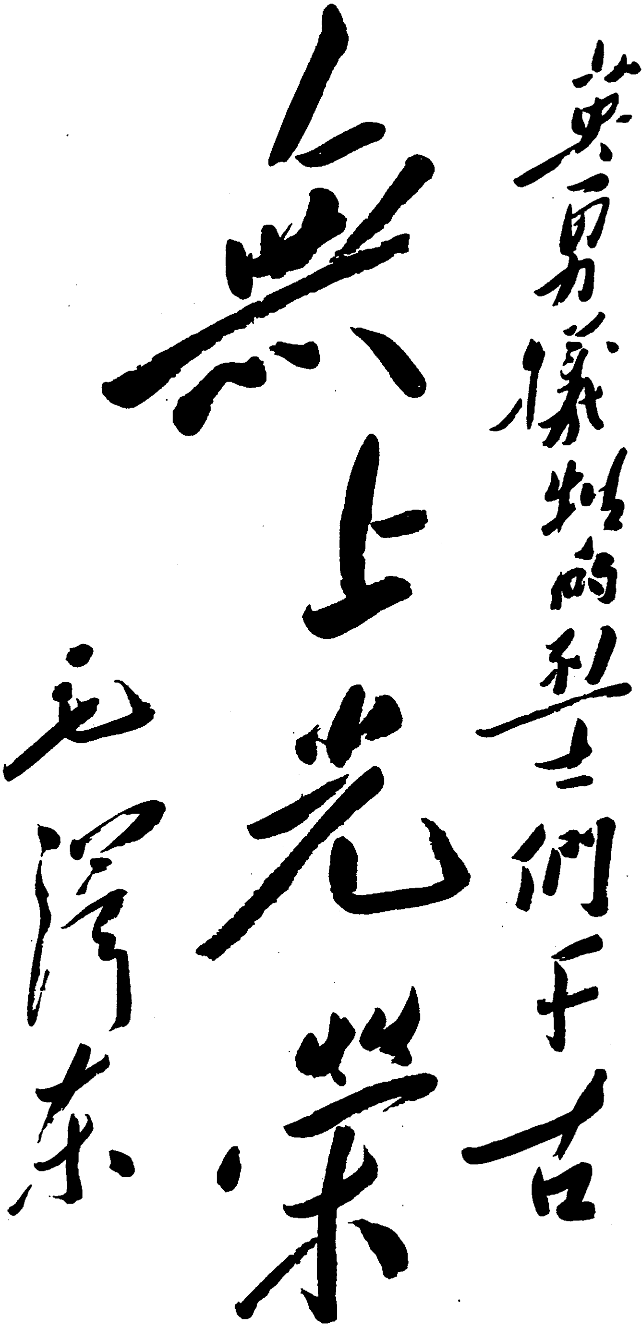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刘书林的题词。

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题词

（1945年）

英勇牺牲的烈士们千古，无上光荣。

毛泽东



英勇犧牲的烈士們千古

無上光榮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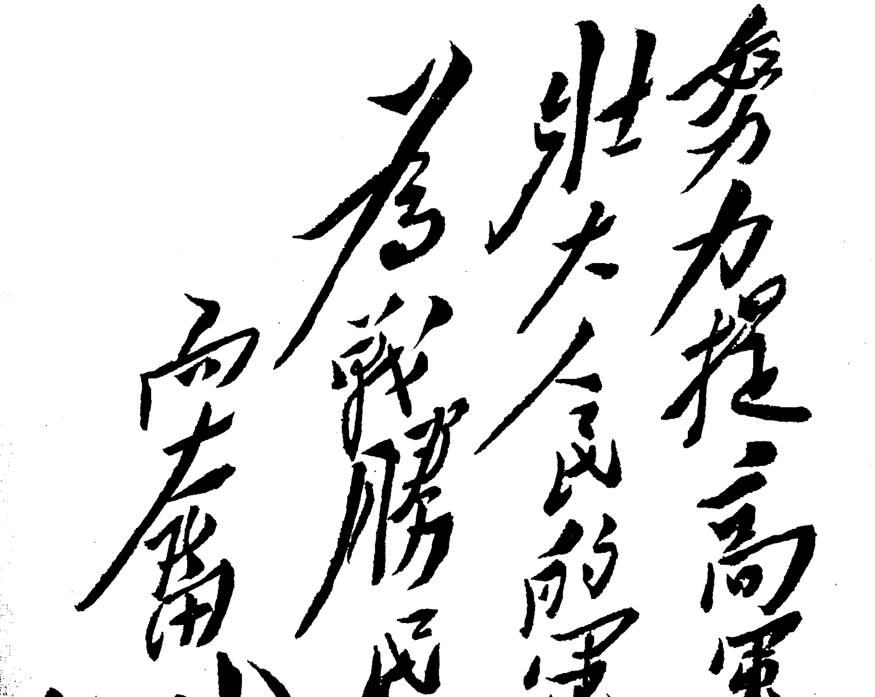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的题词。

为八路军题词

（1945 年）

努力提高军事文化，壮大人民的军队，为战胜民族敌人而奋斗。

毛泽东



努力提高軍事文化
壯大人民的軍隊
爲戰勝民族敵人
而奮斗
毛澤东

毛泽东为八路军的题词。

1946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窑洞中工作。

给毛岸青[1]的信

（1946年1月7日）

岸青，我的亲爱的儿：

岸英回国，收到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很是欢喜。看见你哥哥，好像看见你一样，希望你在那里继续学习，将来学成回国，好为人民服务。你妹妹（李讷[2]）问候你，她现已五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

祝你进步，愉快，成长！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

---

[1] 毛岸青，当时在苏联学习。

[2]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7日）

被国民党方面再三延宕的政治协商会议，据说要在本月十日开会了。虽然政治协商会议还在去年十月就已由国民党政府同意召集，但是直至三个月以后的今天，据说国民党方面对它还没有什么“准备”，也没有作过什么带建设性的表示。重庆社会早已传出：国民党对于这个为中外各方一致重视的会议，完全抱一种敷衍的态度，简直不打算在这个会议上解决任何问题。这个态度，在今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氏的广播演说中，已被完全证实了。

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什么重视政治协商会议呢？一言以蔽之，希望这个会议能为中国今天险恶的政治形势求得一种解决，即能够停止内战，并对造成内战根源的独裁制度加以决定性的改革。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早已应该废止了。还在前年秋季，中国和外国（首先是美国）的舆论界就已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的主张，接着中国共产党就根据这个主张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正式的书面建议，这个建议并曾获得罗斯福总统的赞助。在这以后，虽然如同罗斯福总统所说，“现在一切似乎已经无望了，因为国民党对延安的修正案提出了一些全然荒谬的反对”（见斯诺：《苏维埃政权的模型》第八章），但是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不但没有放弃过这个主张，并且进一步要求首先召集各党派与无党派民主分子

的代表会议，以求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得以经过这一会议而具体实现。去年八月底，毛泽东同志应蒋介石氏的邀请到重庆商讨国家大计时，又一次提出召集这一会议的问题，虽因自高自大的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愿接受党派会议或政治会议的名称，而力求团结的共产党代表也不愿与国民党在名称上争执不休，所以会谈纪要便写作政治协商会议，但它的任务还是规定为“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这里所谓协商国是与讨论国民大会，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而国民党当局的所谓“国民大会”，却是国民党“训政”当局一手伪造的一个反对民主的加强独裁的破坏团结的扩大分裂的东西，是一个企图把一党专政合法化并延长到无限期的东西，所以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中国国是中的这个根本关键，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中是明确地表现出来了。杜鲁门总统要求“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并“召开全国主要政治分子代表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而为了解决内争，促成统一，这个代表会议就必须有权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杜鲁门总统说：“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此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与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举行全国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和有效的代表

权。美国政府认为此举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建立作为国家向民主进展之临时办法的‘一党训政制度’。”杜鲁门总统肯定政治民主化应该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他说：“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自治性军队及中国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合成一中国的国军。”十二月二十七日，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公报重申改组国民政府使之民主化的必要，并用了更明确的词句：“必须广泛地吸收国内一切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或译各级）机构中。”十二月三十日，美国国务卿贝纳斯的广播也复述同一论点，并明白指出只有和平民主才能达到统一：“要保证在国民政府下的一个统一和平与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并让民主分子广泛地参加整个国民政府。”现在事情是明明白白的了：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必须是实现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使一切民主分子在整个民主联合的国民政府之一切机构中都有广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这个民主联合政府既然要无条件地和有效地结束一党训政制度，当然要无条件地和有效地结束一党训政制度的私生子——一党国民大会，当然不能允许在这个“有效的”民主联合政府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成立的时候（这是完全可能的），就如国民党当局所布置的在五月五日“移交权力”给那个莫名其妙的没有一个民主分子承认的私生子，使中国更加走上独裁与分裂，而又把这种“移交”美其名曰“宪政”，以欺骗国人。全中国与全世界所希望与重视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这样一种全权的无条件停止内战与无条件结束一党专政的会议，在这一点上，什么歪曲躲避的余地也不能有。

对于杜鲁门总统的声明与三国外长会议的公报，国民党当局都宣称完全同意，蒋介石氏更说是“杜鲁门总统之声明与我之声明完

全一样，杜之意见亦即我之意见”，因此人们对于蒋氏在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日期同时所发表的广播，不能不抱有很高的希望。人们都希望从他的演说中，听到他对于将在十天以后开幕并将决定中国今后历史方向的这个会议的意见。非常可惜，蒋氏的长达五千字的演说，虽然涂着很厚的和平民主词令的脂粉，却故意一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一字不提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的声明。而尤其可惜的是，他在实际上是严厉地拒绝了他们关于中国的建议，严厉地拒绝了付与政治协商会议以任何权力——甚至讨论召开国民大会这样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因为国民党当局未经任何协商即于去年十一月宣布今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而蒋氏的演说竟也再三地肯定了这一点，虽然他还说这是尊重各党派的意见。蒋氏在他的演说中强烈地但是不指名地责难污蔑共产党，企图把内战与内战所造成的各种破坏都归罪于共产党，但是这些我们却不愿意多加辩解，因为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的《和平日报》）几个月以来就一直宣传“反内战者即是共产党”，而国民党是“反反内战”的，即此一端，就足以说明一切了。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蒋氏对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见解，这是与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命运有直接关系的。蒋氏坚称：“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不是和平民主，而是他的“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不管这些军令政令是否违背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否违背人民的基本权利与普遍意志。他也说内战是可以停止的（他文雅地称之为“收束军事”，因为虽然全世界都已在谈论中国的内战，中国的军事委员长却是至今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内战的），但不是无条件停战，而是“必须首先恢复交通”，就是说必须首先恢复他扩大内战的便利条件；国民政府是可以扩大的，但不是先扩大政府后统一军队，而是相反，在政府民主化以前，必须首先把八路军

新四军交给国民党亦即交给他个人，就是说必须首先保证他扩大独裁的便利条件；民主是可以实现的，但不是由联合政府来实现，而是必须首先在四个月以后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或独裁大会，这是“根本大法不容变更”，也就是独裁大法不容变更。蒋氏的这些见解，显然是与中国一切民主分子以及杜鲁门总统和三强外长的观点不相容的，如果依照蒋氏的见解，那么政治协商会议就没有召开的任何必要。因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人们就不得不首先正视、审查与解决这个根本的分歧：在一方面，是中国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全体人民的要求，是美国、苏联、英国三国人民与政府经过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所声明的愿望，这就是经过政治协商会议来无条件地停止内战，结束独裁，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此而实现中国的统一；在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氏与国民党内的少数军阀党阀财阀的企图，这就是不让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任何问题，继续保持独裁，并以继续内战为继续独裁的后盾。前一种意见是得到全中国与全世界的支持的，直至蒋氏的演说发表以前，也是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口头支持的，但是现在蒋氏已经起而攻击这种见解了，分歧是已经表面化了。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漫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解决这个分歧将是一个严重复杂的斗争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将大大地教育中国人民，使人民有充分的机会来识别究竟孰是孰非，识别每一个党派、每一个报纸、每一个人物的政治面，看他们究竟是站在哪一边——究竟是拥护人民的，还是反对人民的。

《纽约前锋论坛》报在批评蒋氏的演说时问道：“中国之和平岂

仅赖重弹老调所能获得者乎?”蒋氏演说中的论点，虽然确是一些久遭全国人民拒绝的老调之无味的重复，并显然与全中国民主分子和全世界民主国家的见解相对立，我们现在为了审慎起见，仍然不妨作一番耐心的客观的考察，看看他的论点中是否也包含若干片面的真理？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以和平建设，民生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计划，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否定的。在外国，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天皇都实行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但是在他们的统一之下，并没有达到过什么和平、民主、繁荣等等，他们说是巩固了国防，但结果却是毁灭了自己的国家。至于在中国，中国人民对于这种统一的经验尤其丰富。中国有几千年统一的历史，这些统一都经过了专制的方法或“训政”的方法（蒋氏曾经无数次赞美中国专制时代的“民主”，并责备当时人民的“自由太多”），但是，“训”了几千年究竟还是不曾“训”出过一个民主来。民国以来，每一个实行军事专政、个人专政的军阀都宣称：在他们的统一之下将有和平民主等等，但是三十五年中也没有一个人兑现过。蒋介石氏与他的前辈军阀们有什么不同吗？有的。首先，他比他们多一个全国范围的盖斯

塔波式的一党专政，过去的军阀从来没有梦见过这种恐怖的工具。其次，他的军事专政比他们强得多，因为他有空前庞大的私人化和特务化的军队，其规模也是过去的军阀所没有梦见过的。最后，他的个人集权的程度也远超过过去的任何军阀，他无论在他的党中、军队中或政府中，都是绝对地独断专行，他个人的“手令”可以改变任何政府机关与军事机关的决定，因此除了人民的反抗就没有任何权力可以约束他的任何活动。蒋氏比这些军阀更多一些“民主”的“理想”吗？决不。蒋氏说他现在不能实行民主，是因为没有统一，这个逻辑是不能成立的。他至少已经“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其时间已经有十八年之久，但是他曾经在哪一天哪一处小地方实行过哪一点民主，改善过哪一点民生吗？十八年来在蒋氏的统治区“统一”是一年比一年多，但民主是一年比一年少，因为他的特务机关与特务化的军队，是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人民的穷困与国家经济的危机是一年比一年加深，因为他的官僚资本集团与贪污恶霸集团的统治，是一年比一年发展了。他的军队与政府的军事预算虽然一年比一年膨胀，但是“九一八”以来特别是“七七”以来的事实证明，蒋氏军队的国防力量却是惊人地下降，因为他的军队是只为打内战，也只会打内战，这种从精神上物质上破坏国防力量的内战是他十八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的。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确是人民赠给他的军事领导的确当的评语。凡是这一切他都想用不统一来辩护，但是事实岂不恰恰相反，这一切岂不都正是他实行独裁“统一”的结果吗？退一步说，他诚然没有“统一”全国，但是共产党与他比较起来，格外是没有“统一”全国；蒋氏有中央政权和大部分中国，而共产党只对于小部分中国的地方政权能够发生领导的影响。可是看吧：为什么共产党在它发生领导影响的地

区，不论省、县、区、乡，都能实行人民的选举，都能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呢？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装备和给养都不好，但是却能够八年坚持在最前线抗击大部分敌军与几乎全部伪军，这个事实难道也是由于共产党“统一”了全国，而蒋氏没有“统一”之故吗？蒋氏说：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国家莫大的耻辱和损失”，但是难道抗击敌伪就叫做莫大的耻辱和损失，而一触即溃，一退千里，观战避战，曲线救国，制造了一百万伪军，而且至今仍与敌伪和平共居，共同反共，反而叫做莫大的光荣和收获吗？蒋氏的演说责备共产党妨碍建设，妨碍人民的安居乐业等等，但是蒋氏何不让人民自由地往来比较，看看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与从事建设的地方，究竟是延安还是重庆，究竟是北平还是张家口呢？共产党在和平的区域努力恢复交通，而蒋氏则不但用内战来逼迫共产党破坏交战区域的军事交通，而且用封锁解放区来破坏非交战区域的和平交通，用运兵来破坏蒋氏统治区的和平交通，用轰炸来破坏解放区的和平交通。那么破坏交通者究竟是谁呢？这一切岂不说明，蒋氏以不“统一”来辩护自己的罪恶，是完全不足置信吗？不但如此，凡是共产党所曾解放而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所侵占的地区，对于蒋氏来说也就是由不“统一”而“统一”的地区，其原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亦莫不立即在蒋氏的军令政令与其执行者贪官污吏特务恶霸的“统一”之下归于残酷的毁灭，这个情形也是举世所共知的。这岂不说明，凡蒋氏“统一”所及之处，凡奉行蒋氏军令政令的忠实同志足迹所到之处，恰恰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不能存在之处吗？平心而论，蒋氏所“统一”的地区，不但绝对不能与共产党所领导建立的民主自治地区相比较，就是比之他所指的军阀也有逊色。蒋氏说龙云是军阀，用武力把他逐出云南，以实现蒋氏军令政令在云南的

“统一”。但是看吧，龙云之在云南，与杜聿明之在云南如何？不是蒋氏也不得不明令撤杜的职以谢罪于天下吗？杜去而关麟征来，关之在云南又如何？不是蒋氏又不得不明令撤关的职以谢罪于天下吗？但是虽然如此，龙云依然不能复职，而杜聿明离开云南，马上就又向辽宁热河“统一”军令政令去了，关麟征因为闹出了民国以来未有过的军警开入学校杀人的大血案，暂时不免要避一避风头，但是不但没有依法惩治，而且赏了“忠勤勋章”。蒋氏军令政令在所谓收复区“统一”的结果，尤其使得中国人民得了一个寒心的教训，就是蒋氏的“统一”在若干方面竟与敌伪的“统一”不相上下，人民的生活比以前甚至还更痛苦，急得以拥护蒋氏“统一”著名的《大公报》也不能不大声疾呼“莫失尽人心”。这岂不说明，依蒋氏现在的作法，则必然是愈“统一”而民主民生愈悲惨吗？这是蒋氏“统一”过去与现在的情形。将来又如何呢？就依蒋氏自己在这次演说中所宣布的，将来的结局，也不过是召开一个一党国民大会即独裁大会而已。这个国民大会的“代表”无一不出于逼选贿选代选与指定，是世界与民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国会，这个国民大会所准备通过的《五五宪章》，规定总统有一切权力，而人民权利可以被无限制地剥夺，是世界与民国历史上最独裁的宪法。经过这个独裁大会，通过这个独裁宪法，蒋氏允许我们一个为世界法西斯主义者所标榜、为中国法西斯主义经典《中国之命运》所抄袭，反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全民政治”。这就是蒋氏“统一”完成后的蒋氏“民主”。请问：中国人民能够接受这种“统一”，能够接受这种“民主”吗？中国人民与一切外国人民一样，当然是要国家统一的，但是中国人民所要的统一，是一个足以保护国家与人民的统一，是一个民主的统一，这个统一与蒋氏口中的“统一”，能够同日而语吗？

第二个问题，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能否统一中国的问题，其答案也是否定的。无论在外国，在中国，的确都有过一个历史时期，曾经能够实现这种“统一”，但是这个历史时期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中国，如果不说一百年，至少也已有五十年是不能实现这种“统一”了。五十年来，中国的人民为了求自由独立、安定繁荣，始终希望中国的统一——在民主基础上的巩固的统一。但是中国的独裁者们世袭地拒绝这种统一，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独裁始终与人民相分裂，虽然他们反而责备人民破坏“统一”。自从清朝末年的皇帝责备孙中山先生组织“自主的军队”破坏了他们的“军令政令统一”，企图以武力维持自己的“统一”以来，这种分裂的局面就不曾有过根本的改变。蒋介石氏演说中要求人民不要“坐视国家重蹈民国初年的覆辙，陷于分崩离析的绝境”。但是民国初年，应负国家分崩离析之责者究竟是谁呢？蒋氏自己也说，这是因为“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于是有民国二年以来的革命”。换句话说，造成国家分崩离析的不是别人，而正是得到世界各国承认，坐在中央天天高唱“军令政令统一”的窃国军阀袁世凯。袁世凯当然不说自己是军阀割据，而说当时的孙中山先生与国民党各都督是军阀割据，对付所谓民国二年的革命，袁世凯的唯一法宝就是“统一”。他说：“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之问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但是今天盖棺论定，孙先生（以及孙先生部下一分子的蒋氏自己）虽然组织“自主的军队”，虽然被责为破坏军令政令统一以至破坏交通等等，还是叫做反军阀，叫做革命，叫做民主，叫做求统一。孙先生晚年北上与另一窃国军阀段祺瑞谈判和平统一，希望段氏实行民主，这就是蒋氏演

说中所引用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口号的由来。醉心独裁的段祺瑞拒绝了孙先生的谈判，迫使中国爆发了大革命。中国本来有希望在这个大革命中达到统一，不意又发生蒋氏窃国，民国颠危，国民不能真正表达自由意志和力量，而造成军阀的割据，于是有民国十六年以来共产党与全国革命人民对于蒋氏极端白色恐怖的武装自卫与民主运动。在蒋氏独裁与内战政策之下，九一八事变起，共产党不念旧恶，本“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这个呼吁，直到民国二十五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才得以开始实现，但是有功于这个和平解决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却至今还没有得到自由，而蒋氏对于共产党从民国二十八年以来也没有一天停止过武装攻击。抗战结束以后，共产党仍本“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精神，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建国，但自去年十月，国共会谈纪要发表以来，蒋氏反而变本加厉，密令全国“剿匪”在“复员”声中把抗战时期被调到老远后方的二百万大兵统统复员出来开到东北华东华中华南去打空前大规模的内战，把全中国投入纷争不安之中。五十年来，中国的历史上就是这样地充满这种独裁者所制造的内战的。可是看吧：中国究竟是在这些独裁者的手下“统一”了呢？还是分裂了呢？一切这些分裂，难道不都是独裁者们所谓“统一”政策的结果吗？独裁的“统一”就只能产生分裂，唯有与民主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够真正达到统一。如果段祺瑞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要求，如果蒋介石氏接受了共产党及其他民主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那么中国的统一早就实现了。蒋氏及其一派说解放区的地方自治妨碍统一，但是人民自己选举政府，这不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国家的根本规律吗？蒋氏自己也说要还政于民，为什么对于已经还政于民的地方又要实行夺政于民呢？在地方范围内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政

令，这有什么政令不统一之可言呢？难道四万万五千万人除了一个人以外都不能自由活动，才叫做政令统一吗？由于不承认人民有选举地方政府与决定地方法令的普通权利，蒋氏及其一派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的政治分裂。他们幻想用武力统一来解决这个政治分裂，结果不但没有找到什么武力统一，而且找到了一个武力分裂。为什么是一个武力分裂呢？因为五十年来，政治上的独裁与民主之争，常常引导到军事上的独裁与民主之争，政治上的独裁者总是依靠私人化独裁化的军队去消灭民主分子，迫使政治上的民主派不得不创造真正国家化即人民化的军队，这个真正国家化即人民化的军队因为合于历史与人民的需要，不但不能被独裁者所消灭，而且愈来愈强大了，其主体在今天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国人民并不利用这个军队来寻求分裂，相反地是利用它来寻求民主的统一，所以抗战爆发，这个军队就成为统一的国民革命军之一部分。可是坚持军队私人化独裁化的蒋介石氏，不愿意利用这个军队的榜样来使自己的军队国家化人民化，反而在事实上与法律上拒绝承认八路军新四军，诬之为“奸军”“匪军”，用一切力量来加以“围剿”，这样就造成了今天的武力分裂。既然蒋氏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抱着这种分裂的方针，证明自己的军队是完全党派化私人化独裁化，而不让任何国家化人民化的军队存在，那么，为了保证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人民化，作为中国军事改革核心的八路军新四军，如果没有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当然决不应该送给独裁者去消灭；如果那样做了，就不但是冒险，而且是犯罪——对于中国军事改革的犯罪，因而也就是对于中国民主统一的犯罪。中国的人民既然为民主统一坚决奋斗了五十年，既然不曾接受满清的独裁统一，也不曾接受袁世凯段祺瑞的独裁统一，也不曾接受十八年来蒋介石氏的独裁

统一，那么，如果蒋氏今天不抛弃他的独裁方针，纵然他用继续内战来威胁，也必然吓不出什么“统一”来。因此，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五十年来的历史都证明了中国的统一只能走民主团结的道路，而绝对不能走独裁的道路。

如上所述，蒋氏的论点是不能经受任何事实的考验的，是并不包含任何真理的。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相反地，只有按照中国民主党派与世界民主强国的要求，经过全权的政治协商会议，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蒋氏的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广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就既能得到民主，也能得到统一。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对于这一切简单的因果关系，蒋氏难道是不明白吗？当然他明白，他之所以故意倒果为因，只是为了寻找借口来保存他的独裁罢了。其实中国人民和世界民主强国一样，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来就承认国民政府是实现民主统一的便当的机构，就从未打算推翻这个政府而另起炉灶，因此蒋氏在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中仍然将保持他的一定的地位，虽然决不能再是独裁的地位。蒋氏说他对于“革命的责任不能放弃”，我们认为，蒋氏如果牺牲个人而服从人民，牺牲独裁而服从民主，将是他对于革命所尽的最伟大的责任。蒋氏在抗战结束以后，仍然坚持独裁与内战政策的结果，如他自己所说，确已“使我们八年余流血牺牲所获得的国家地位与民族光荣，顿时为之降低”，并遭遇“任令中国成为国际上唾弃的落伍者”的危险，所以贝纳斯十二月三十日的广播，就已经公开声明：“为内战分裂之中国，将不能在盟国中占有其应有之地

位，及确当地履行其国际义务。”不幸蒋氏的元旦演说，依然重复了自己过去的错误。不过历史的趋势是已经确定了，无论蒋氏及其一派如何抵抗，中国的和平民主，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奋斗与民主友邦的同情声援之下，终将获得决定的胜利。我们是希望团结统一的，因此我们仍然希望蒋氏及其一派能够善审时机，放弃成见，与中国一切民主分子通力合作，使政治协商会议得到圆满的收获，从而使中国迅速走上和平建设的光明大道，并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

给蔡博等的信

（1946年1月8日）

蔡博、张芝明、刘永斌、黄平、赵小炎[1]诸位青年同志：

永福[2]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兴。正如你们信上所说，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及技术人员，你们向这方面努力是很适当的。这里，只能简单地写几句话给你们，总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紧紧地握着你们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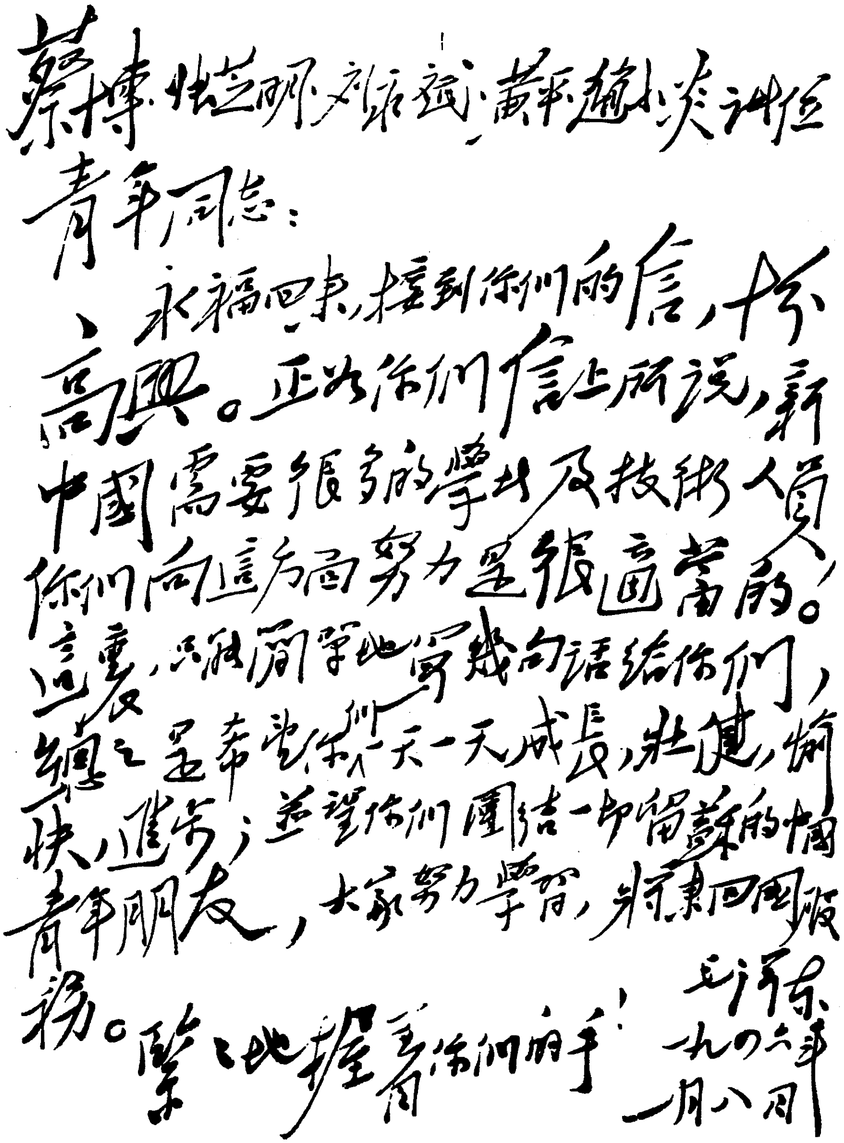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

---

[1] 蔡博（1924—1991），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蔡和森之子。张芝明（1927—2008），1927年生，江苏常州人，张太雷之子。刘永斌，即刘允斌（1925—1967），湖南宁乡人，刘少奇之子。黄平，应称尤里黄平，是黄平之子在苏联时用的名字，现名黄健，1927年生，广东中山人。赵小炎，即赵施格，1928年生，四川酉阳人，赵世炎之子。当时他们均在苏联莫斯科钢铁学院学习。

[2] 永福，即毛岸英（1922—1950），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长子。



蔡博、朱芝明、刘永诚、黄永超、尤炎诸位青年同志：

永福回来，接到你们的信，十分高興。正如你们信上所說，新中國需要很多的學者及技術人員，你们向這方面努力是很適當的。這裏，只順便帶幾句話給你们，總之是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長，壯健，愉快，進步；並望你们團結一切留蘇的中國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學習，將來回國服務。緊緊地握着你们的手！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
一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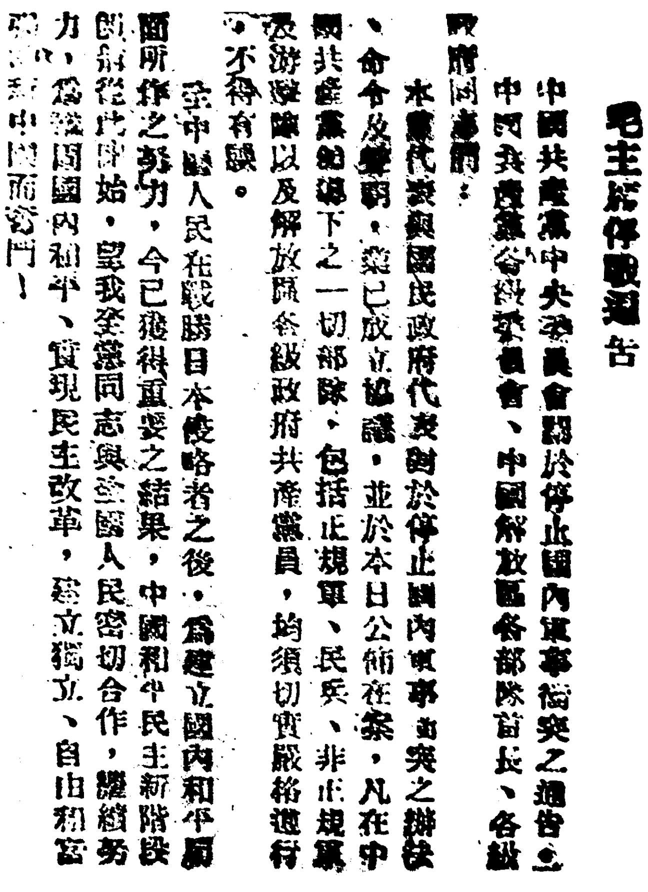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蔡博信的手稿。

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

（1946年1月10日）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中国解放区各部队首长、各级政府同志们：

本党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对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之办法、命



毛主席停戰通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通告：

中國共產黨各級委員會、中國解放區各部隊首長、各級政府同志們：

本黨代表與國民政府代表對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之辦法、命令及聲明，業已成立協議，並於本日公佈在案，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之一切部隊，包括正規軍、民兵、非正規軍及游擊隊以及解放區各級政府共產黨員，均須切實嚴格遵行，不得有誤。

全中國人民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爲建立國內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獲得重要之結果，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望我全黨同志與全國人民密切合作，繼續努力，爲鞏固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改革，建立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日

1946年1月10日，毛泽东签发的《停战通告》。

令及声明[1]，业已成立协议，并于本日公布在案。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

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今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从此开始。望我全党同志与全国人民密切合作，继续努力，为巩固

---

[1]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会谈纪要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继续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经过多次交换意见，双方于1946年1月10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主要内容是：关于“办法”，协议要求由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一人会同美国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提请国民党政府实施；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及政治协商会议各推定国共两党以外的公正人士八人，组织军事考察团，会同国共双方，在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之。关于“命令”：（一）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二）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唯复员、换防、给养、行政及地方安全必要的军事调动除外。（三）破坏与阻碍一切交通线的行动必须停止，障碍物应即撤除。（四）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委员三人组成，一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国共产党，一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关于“声明”，协议提出：“命令”中的第二条，对国民政府在扬子江以南整军计划之继续实施、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并不影响；恢复交通包括邮政在内；同意国民政府军队在上述规定下调动，应每日通知军事调处执行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一切协定、建议及指示只涉及停止冲突所引起的直接问题；美国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仅为协助中国委员实施停止冲突令；军事调处执行部内设执行组；军事调处执行部各委员，得个别设置通讯线，足保迅速而无阻碍之通信；军事调处执行部先设于北平。

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革，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十日

1946年1月，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耶顿上校、记者罗德里克在延安合影。

1946年1月，毛泽东和罗德里克等在延安机场等候国共谈判代表周恩来。

1946年1月，毛泽东、刘少奇在机场迎接自重庆返回延安的周恩来。

1946年1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在延安机场迎接周恩来。

给续范亭[1]的信

（1946年1月22日）

范亭同志：

你打过“潘尼西林”[2]没有？此药虽不治结核菌，但治球菌、螺旋菌有大效，体内此后两类菌如能去掉，则结核孤立，有早愈之可能。

此祝健康！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我休养已满两月，有进步，并告。

---

[1]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2] 即青霉素。

给柳亚子[1]的信

（1946年1月28日）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2]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3]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4]，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敬颂

道安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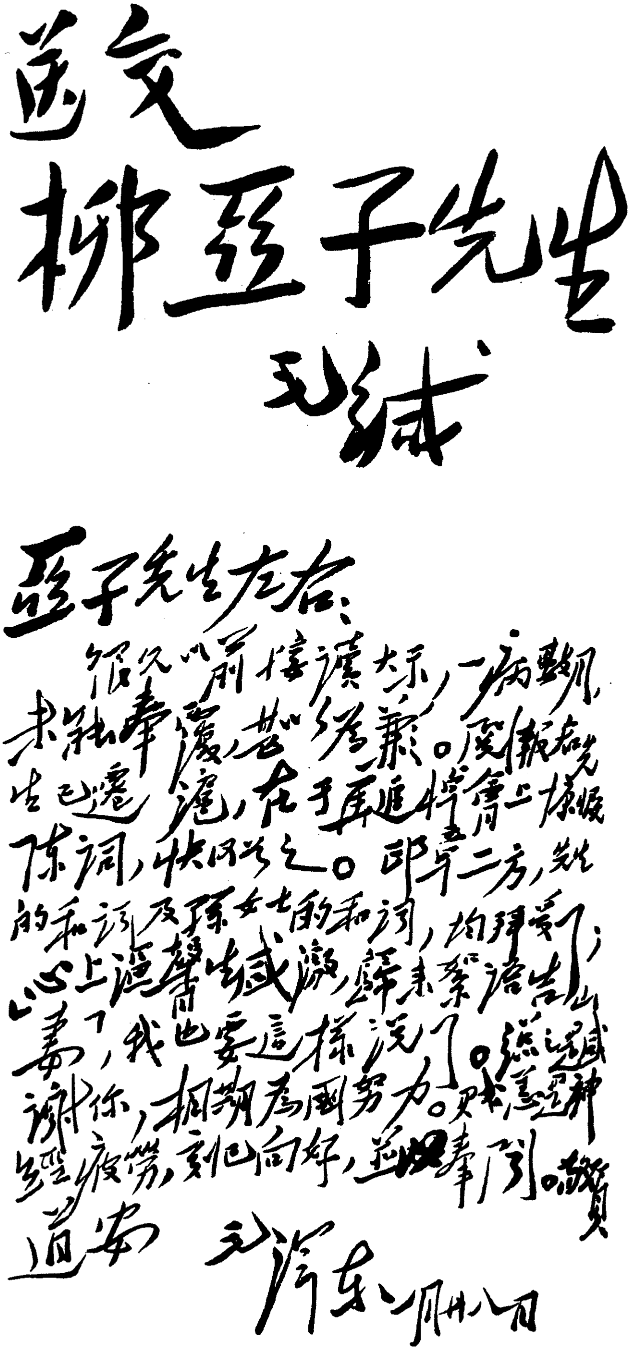
---

[1] 柳亚子，当时任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

[2] 于再，昆明南菁中学教员，1945年在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一二·一运动中牺牲。

[3] 孙女士，即孙荪荃，谭平山夫人，爱国民主人士。

[4] 这是柳亚子1945年秋写的《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一诗中的两句。



送交
柳亞子先生
毛緘

亞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讀大示，一病數月，未能奉復，甚以為歉。閱報知先生已遷滬，在于再追悼會上慷慨陳詞，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詩及孫女士的和詞，均拜受了；"心上溫馨生感激，歸來絮語告山妻"，我也要這樣說了。總之是感謝你，相期為國努力。賤恙是神經疲勞，刻已向好，並[illegible]奉聞。敬頌

道安

毛澤东 一月廿八日

毛泽东给柳亚子信的手稿。

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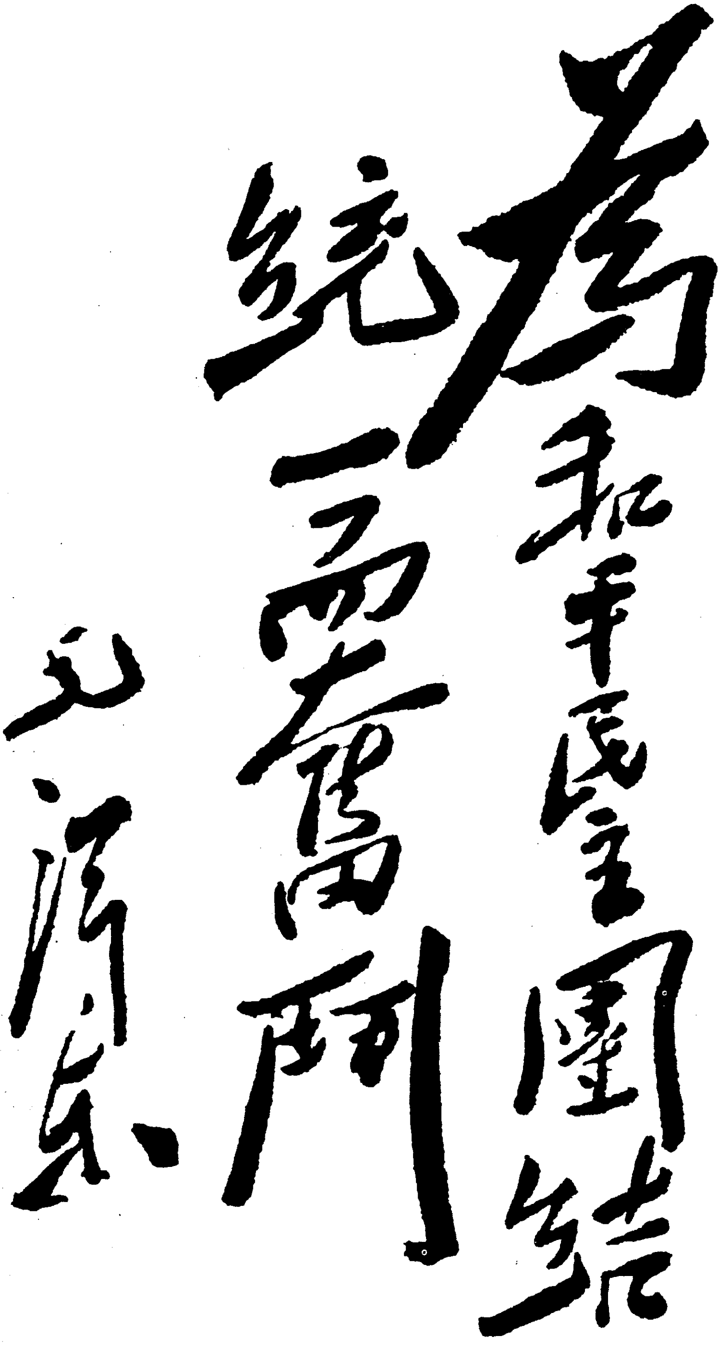
（1946年1月）

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

毛泽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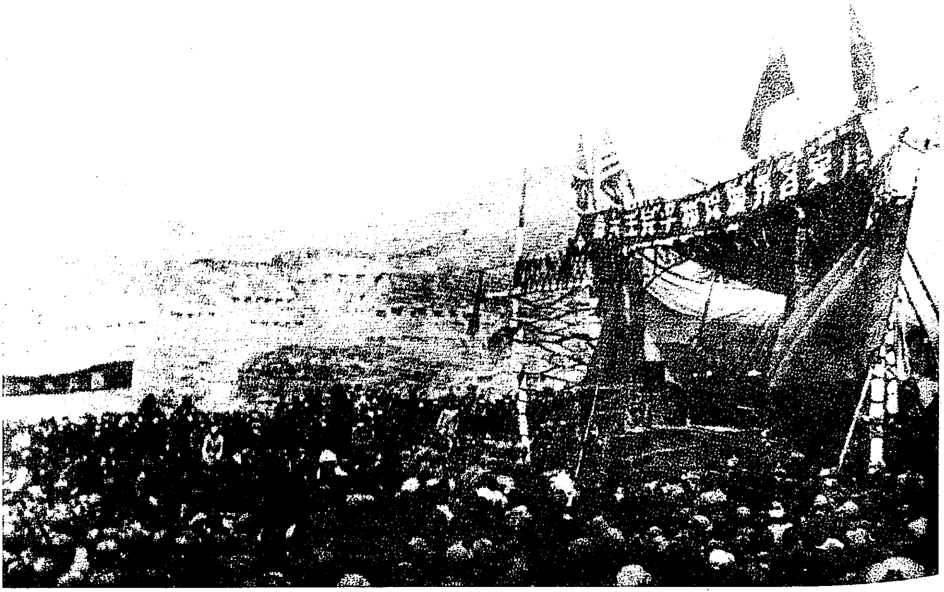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题词。



為和平民主團結
統一而奮鬥
毛澤東

毛泽东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题词。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1946年1月1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图为会场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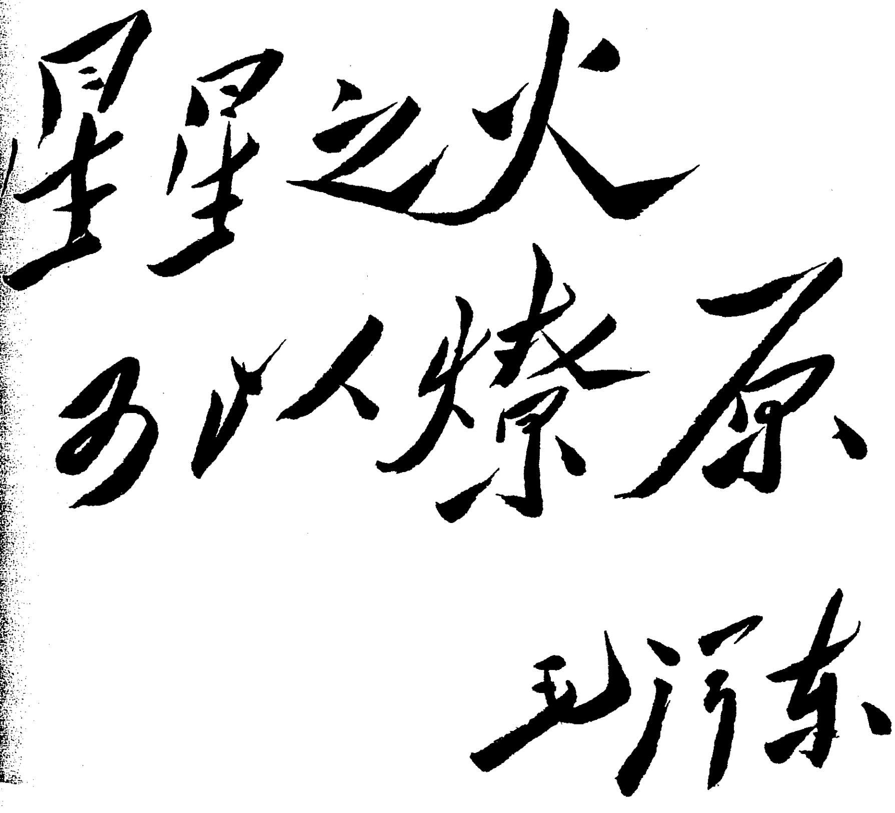
1946年2月3日，延安各界召开庆祝和平与民主大会。

为叶挺之子叶正明题词

（1946年1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毛泽东

毛泽东为叶正明的题词。

为新华书店题名[1]

（1946年初）

新华书店总店。

---

[1] 1946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延安大批干部被调往东北和其他革命根据地，延安的党政机关精简机构。中央出版局和中宣部合并，下设发行科，由许元祯任科长，张仲宪任副科长，对外联系工作和开展活动用新华书店总店的名义。一天，许元祯向毛泽东汇报出版发行工作情况，并请毛泽东为新华书店总店题写店牌。毛泽东挥笔题写了“新华书店总店”6个大字。

延安权威人士评称政协会获重大成果*

（1946年2月1日）

政协会所获成果，是极其重大的。和平建国纲领是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之共同施政纲领，是过渡时期中全国所应遵循的民主改革的总方向。修改宪草原则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的基本原则，整军决议规定了全国一切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原则，而改组政府及增加国大成分的决议是保障共同纲领实施及国大制宪胜利完成的条件。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行，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开始脱离国民党一党专政而走上国家制度民主化的第一步。虽然一切决议尚待实行，即在实行以后，要达到彻底民主化，还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奋斗过程，去克服各种艰难障碍，但是，中国从此无疑地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历史的胜利。这个胜利是中国人民百年来不屈不挠斗争的结果，是与会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努力，特别是各民主党派据理力争，同时又作了重大让步的结果。权威人士指出，良好的决议，仅仅是事情的开端，一切决定于如何确切与忠实地实施决议。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对于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将以最忠诚的态度在各解放区与解放区军队中加以贯彻实施。中共全体党员，将在全国致力于和平合法的奋斗，以求国家之彻底民主化，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中共欢迎蒋主席关于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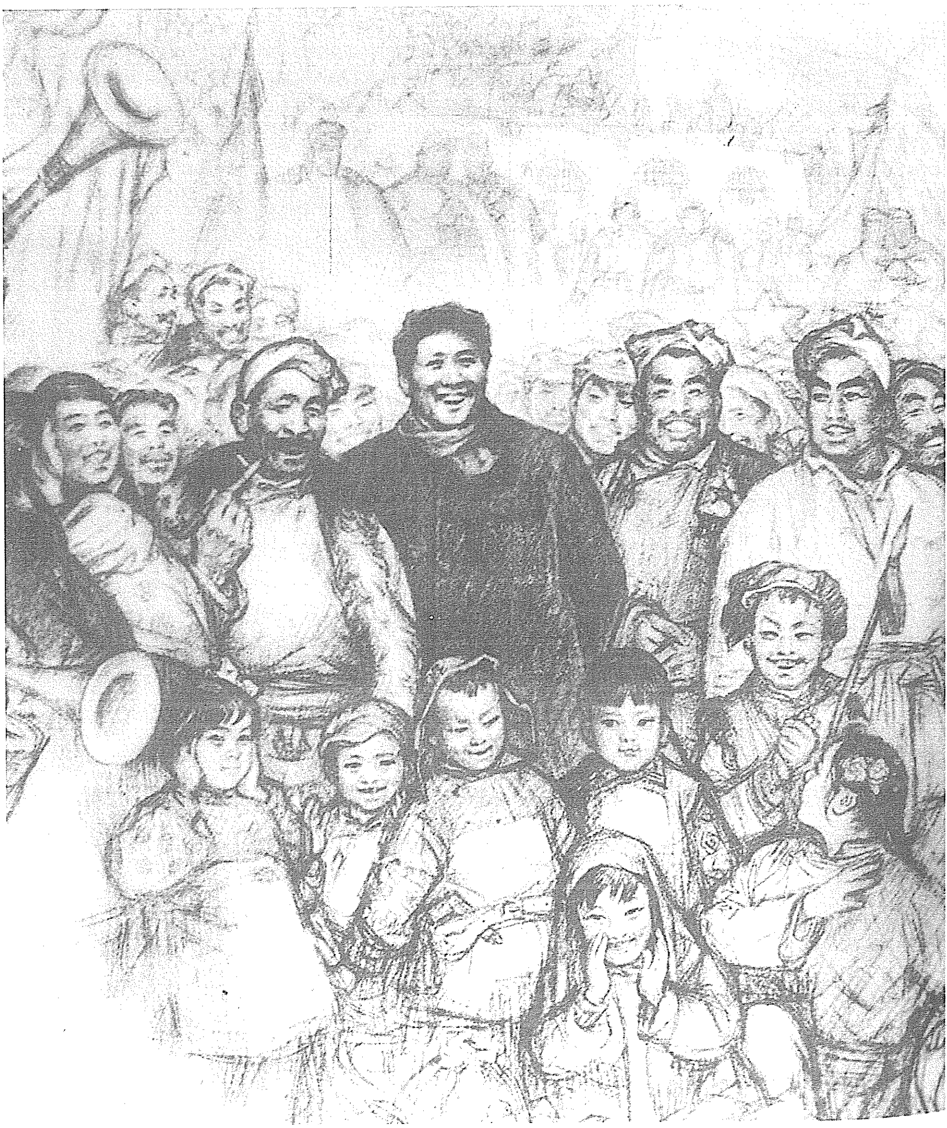
议与和平建国纲领的诺言，希望中国国民党能本此精神，与全国人民及各党派长期合作，使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完全实现。

1946年2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延安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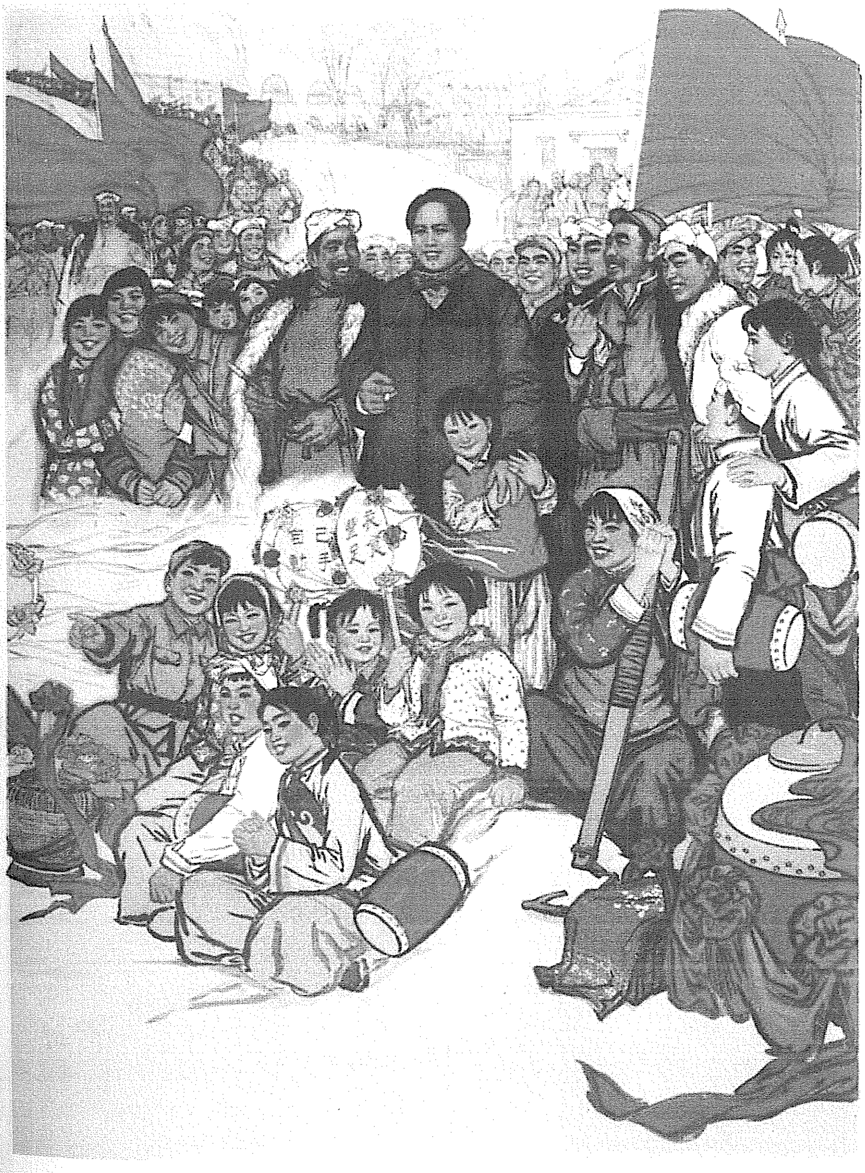
194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延安机场合影。

1946年春节，延安人民向毛泽东赠匾。

1946年，毛泽东和延安军民一起欢度春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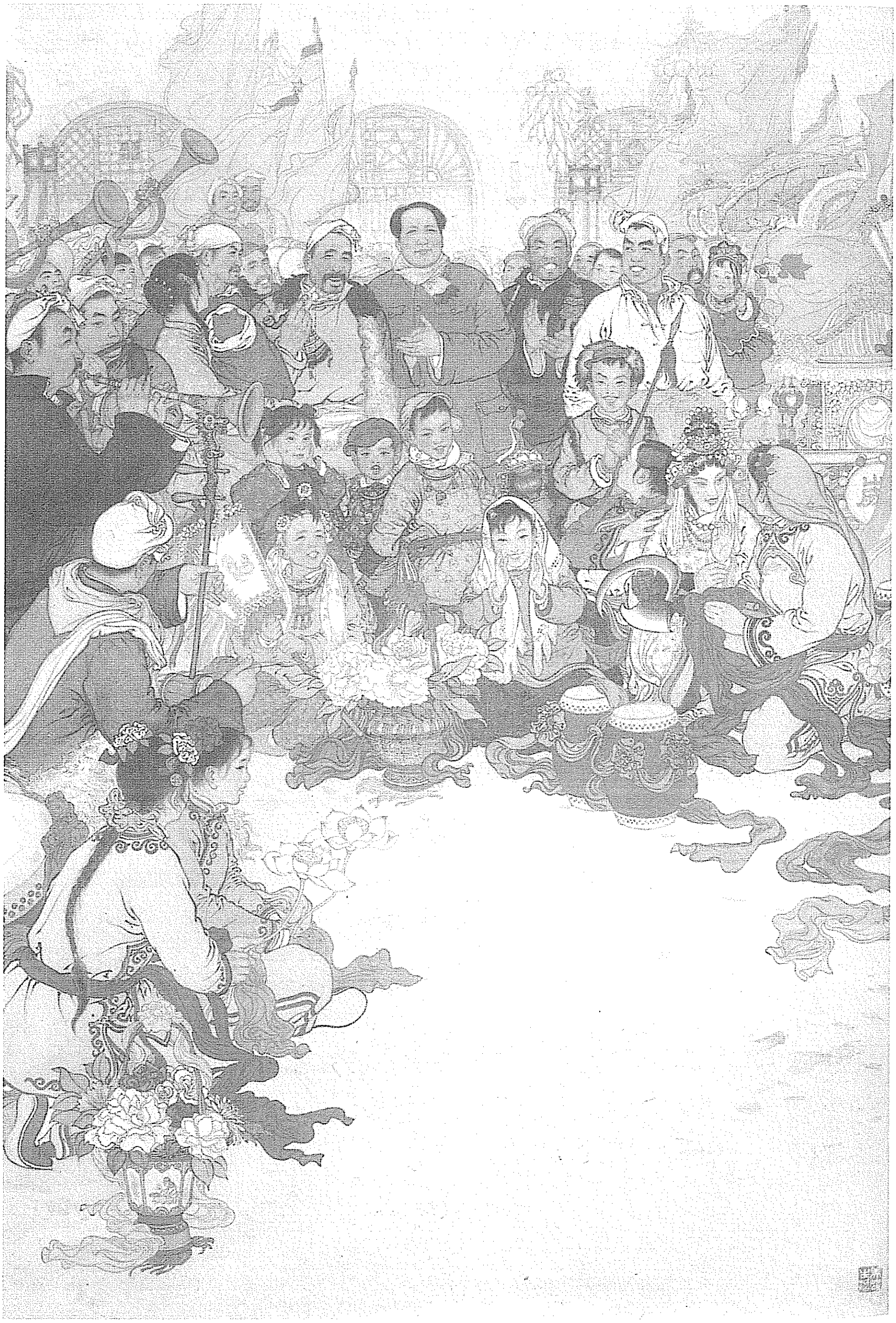


《延安的春节》（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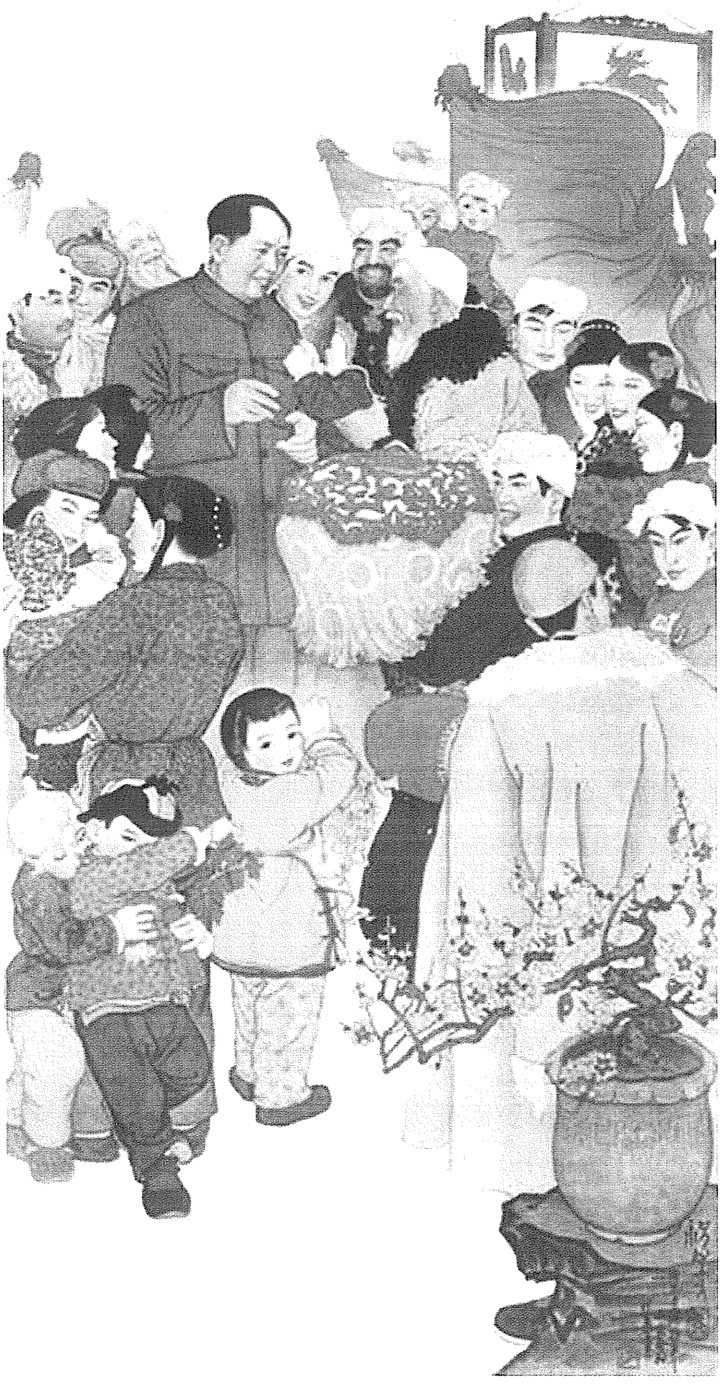


延安新春　　　　陕西省美术创作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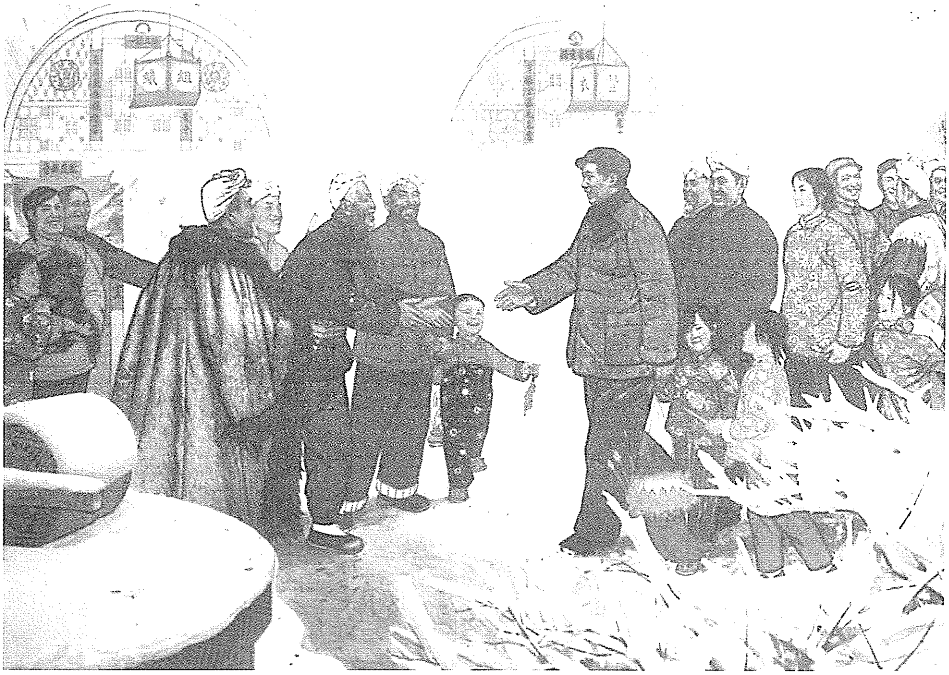
《延安新春》（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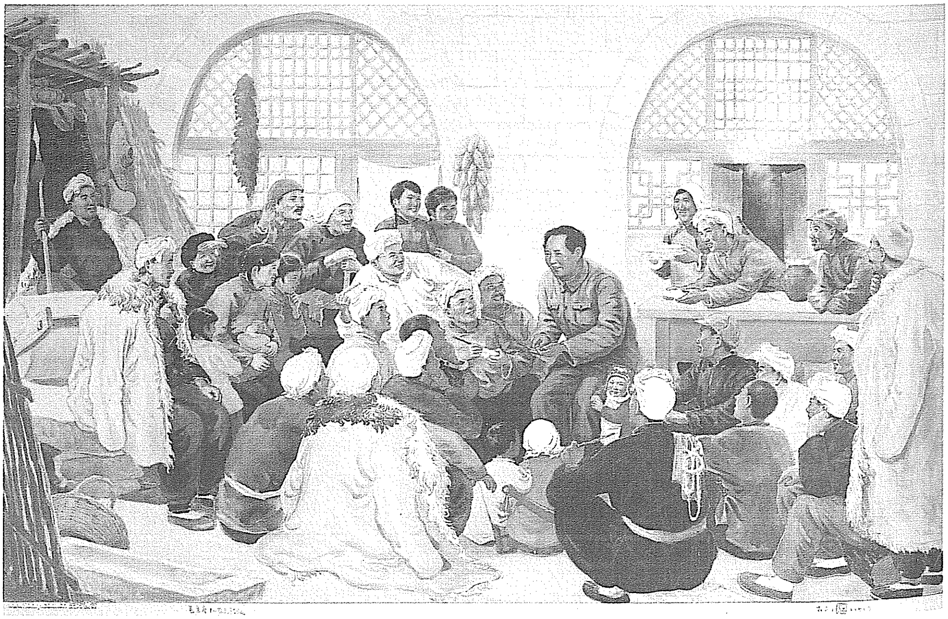
《同欢共乐》（中国画）



《毛泽东和延安人民一起欢度春节》（中国画）



《新春》（中国画）



《毛主席和农民谈话》（中国画）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2月6日）

同意以周、林、董、王（若飞）分任行政院副院长、两部长及不管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部分内容。

和美联社记者的谈话[1]

（1946年2月9日）

政治协商会议成绩圆满，令人兴奋。但来日大难，仍当努力，深信各种障碍都可加以扫除。

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实际上中国恢复和平，建立民主政府，世界各国也交相有利。

各党当前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于此准备出力拥护。

---

[1] 这是毛泽东和美联社记者谈话的一部分。

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对东北问题的主张*

（1946年2月11日）

问：现在东北一般情况如何？

答：自从苏军进入东北消灭敌伪以后，东北领土主权复归我国，国民政府亦已派遣军队与官吏前往接收，十四年来的国耻一旦荡涤。东北本为我国资源最丰富、工矿最发达的地方，但因敌人十四年的残酷统治，人民生活现极困苦，工商金融也因战争的影响，多少陷于停顿或紊乱，所以现在东北人民最大的要求就是彻底肃清敌伪残余的势力，在广泛民主方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安定的生活，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这一个问题的中心关键，则在于国民党方面派去的军队和行政人员，如何根据停战协定及和平建国纲领的原则与东北各地地方人士、地方军队、八路军及各地的民选政府，实行和平民主的合作。

问：东北各地现在有些什么军队？地方政权情形如何？

答：东北民间武装素为全国之冠，自去年八月苏军开入后，各地民众即纷纷武装起来消灭敌伪，从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部队和干部，此时最为活跃，发展亦极为迅速。前抗日联军领袖周保忠指挥下的部队，已有数万人分布在东满北满，并成立了杨靖宇支队、赵尚志支队等。在八年抗战中，被敌人俘虏，囚于东北的八路军战士

与东北游击队员及民兵为数亦众，他们在获得自由后，亦积极参加消灭敌伪工作。同时，八路军中东北将领张学诗、吕正操、万毅等所部，与其他奉命前往东北消灭敌伪的八路军新四军一部，亦均在战争中与东北人民得到密切的结合。原在冀热辽边区抗战的李运昌将军所部则在辽西一带。东北人民在这些抗日武装领导下，现已组成为一支数近三十万人的东北民主联军，分布于苏军所未驻防或已撤退的东满、南满、西满、北满各地。此外，还有各地的保安队与警察协力肃清敌伪残余，维护地方秩序。敌伪消灭以后，各地人民又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推选各方公正人士，成立了各县民主政权，负责地方行政。这些部队与地方政权的领导，除东北各方民主人士外，多数都有本地的与外来的共产党员参加。但是，由于我党在东北的领导机关久被敌伪破坏，所以这些党员的行动最初未能完全一致。直至我党中央派去的彭真、陈云、林枫、林彪、罗荣桓等同志到达以后，而建立了党在东北的最高领导机关，才联系和统一了东北各地党的组织与党员的行动。现在，凡有共产党员活动的地方，秩序都已经安定或正在安定。土匪已逐步肃清，工商业亦已逐步恢复，汉奸已着手惩办。人民在抗日反汉奸向汉奸算账复仇的斗争过程中，其政治的觉醒与生活的改善，都已有了良好的开端。但在某些偏僻的地方，还有土匪与伪军残部骚扰，若干野心未死的日人并予利用他们，以谋破坏东北的和平民主与保存自己的侵略势力，人民对之极为痛恨，希望民主联军能够迅速前往剿除，以便东北同胞能安居乐业。

问：中共对于东北前途的主张如何？

答：中共对于东北的主张与对于全国的主张一样，可以用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八个字来概括。中共从未反对由国民政府派

人接收东北主权并派遣一部分军队到东北维持治安，这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朱德总司令谈话中，即有明白的表示。在今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共同发布的停战命令中也正式声明，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不受军事调动一律停止的限制。但是为了实现东北的和平民主与团结建设，我们认为以下的原则是应该确定的：

（一）现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合于东北与全国民意。因此，从行营及其政治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到各省政府都应该改组，尽量吸收东北民主人士与国内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参加，使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

（二）对于东北现有抗日民主部队，应予以承认并整编使与国民政府派去的军队共同维持地方治安，消灭伪军、土匪，避免军事冲突。

（三）对于东北各县民主自治政府应予承认。如认为它们的基础尚有不够广泛之处，亦应采取协商改组办法或另行选举；不应不予承认或坚持委派的不民主办法，而反对人民选举的民主办法。

（四）现在中苏友好，国共停战，全国要求裁兵复员，东北治安又有地方部队协力维持，故国民政府为恢复主权而开入东北的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之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至于收编东北伪军及利用华北伪军（如姜鹏飞部新二十七军）去接收东北之权，则应予以禁止。

问：中共上述方针能否实现，政府方面对此有何表示？

答：我们认为：在今天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东北人民的要求下，在东北只有这个方针才是正确的，行得通的。与此相反的方针，必然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东北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如果不承认

国民党的地位，不与国民党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同样，国民党方面如果不承认东北地方民主力量与共产党的地位，不与他们推诚合作，共谋东北的和平、民主、团结、建设，也会犯严重的错误。过去，国民党方面曾实行以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我们是坚决反对这个方针的。但为了求得整个东北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领导的军队，在军事上曾作过许多世界共知的让步，但是事实证明，仅仅片面的退让，显然并不足以维护和平。因此，甚至在一月十日以后，国民党方面的军队仍图夺取营口、盘山，以至停战令确已发生时效，冲突仍续有发生，而且国民党方面这种武力解决的方针，如仍固执不改，则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之下，同样的不幸事件仍然有继续发生的可能。最近重庆三人委员会方面，曾有派遣执行组前往调处的提议，我们为了实现全国的停战，是赞助这一提议的。相信政府方面应该不致拒绝。在政治方面，政治协商会议对于有争执的地方政权问题，也已经成立了以民主方法合理解决的协议，相信也应首先实用于东北。总之，东北在全国地位既如此重要，情况又如此复杂，如果有关各方不作一通盘协议，因而引起东北的军事冲突，那就实在太对不起被蹂躏十四年，渴望和平、民主的东北人民，实在也就对不起渴望东北问题和平解决的全国人民。中共现正要求与政府进行这个谈判，希望政府仍本停战协定与政治协商会议的精神，使这一谈判能够迅速进行，并迅速得到圆满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6年2月12日）

美国和蒋介石要以全国军队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杂牌军还没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合编的，连杂牌的集团军都没有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掺杂合编。我们现在只有对付好，才能摆脱危险。全国军队统一，原则上我们只好赞成，实行步骤要看具体情况，这是我们与法国不同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同国民党谈判整军方案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为谢子长陵题词[1]

（1946年2月19日）

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

---

[1] 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瓦窑堡为谢子长修建了陵墓，还举行公葬典礼，毛泽东再次题词。

在审阅《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时加写的一段话[1]

（1946年2月25日）

国民党军事当局对于东北伪军尽量收编，甚至把伪军姜鹏飞部开入长春“接收主权”，为什么对于东北人民的爱国武装必加以消灭然后甘心呢？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胡乔木为《解放日报》起草的社论稿《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时加写的一段话。

只要了解事实真相，群众是决不会盲从反动派的[1]

（1946年2月26日）

一

所有这些反动示威，包括二十二日的重庆示威在内，被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欺骗参加的学生都只占当地全体学生的极少数，例如二十二日在重庆只有七千人，二十三日减至二千人，二十三日在上海只有二千余人，可见中国人民绝大多数其政治觉悟程度甚高，他们能够判别是非曲直，决不盲目跟随反动派走。法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欺骗，即是利用人们不明东北真相与不明反动派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阴谋之结果。我们相信只要东北真相被了解、反动派的阴谋被揭露，真正的群众是决不会盲从反动派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述评稿《在政府当局的纵容与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时加写的两段话。第一段话加写在原稿列举国民党反动派煽动和组织重庆、成都、南京、上海、北平、武汉等地少数学生进行反苏反共示威活动，以及国民党特务破坏活动之后。第二段话加写在这篇述评稿的末尾。

二

但是不论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如何起劲地欺骗并煽动一部分学生举行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反革命示威，也不论某些政府当局如何纵容与鼓励这种反革命示威，归根结底，反动派自己是要失败的。企图挑拨美、苏两大强国举行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中国法西斯反动派好从中取利、从此“翻身”的阴谋，是确定要失败的。对于美、苏，它们的团结政策一定不变，断不会受这批中国法西斯臭物所煽动。对于中国人民，因为这种阴谋完全是反民族的，即是说，如果反动阴谋实现了，仅仅于德日意法西斯残余有利，于中国民族是绝对不利。关于那些反动口号，例如所谓“铁血收复东北”“自动参战，武装收复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之类，中国人民很快就会知道，这是反对中华民族利益的反动阴谋。关于反动派挑拨内战的阴谋，表现在极端诬蔑与侮辱中共与民主人士，捣毁中共与民主派的报纸，殴打中共党员与民主人士，所有这一切，中国人民也是很明白，内战是确定地不能再打了。总之，在反动派极度猖獗之下，中国人民将更加团结起来，制止一切反动活动。

和毛岸英的谈话[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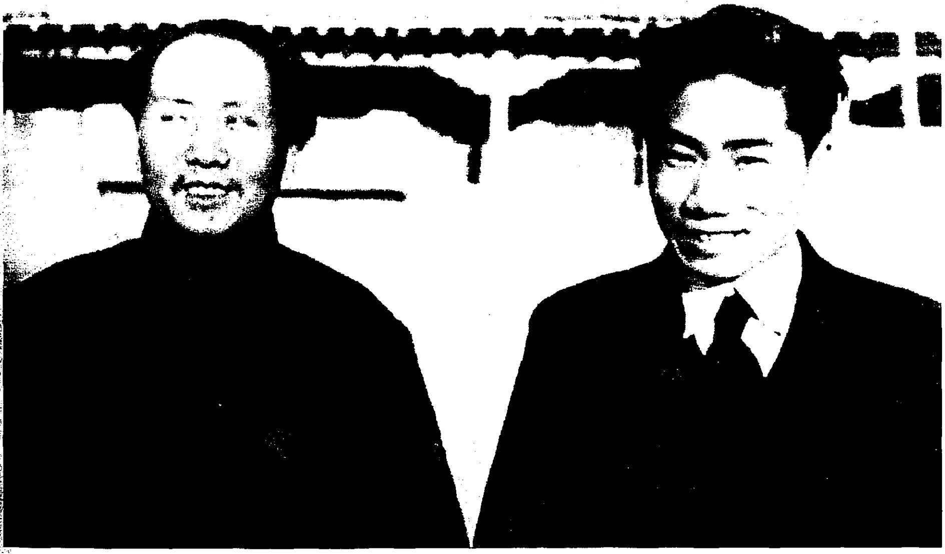
（1946年2月）

应当知道外国的知识，又要懂得中国的革命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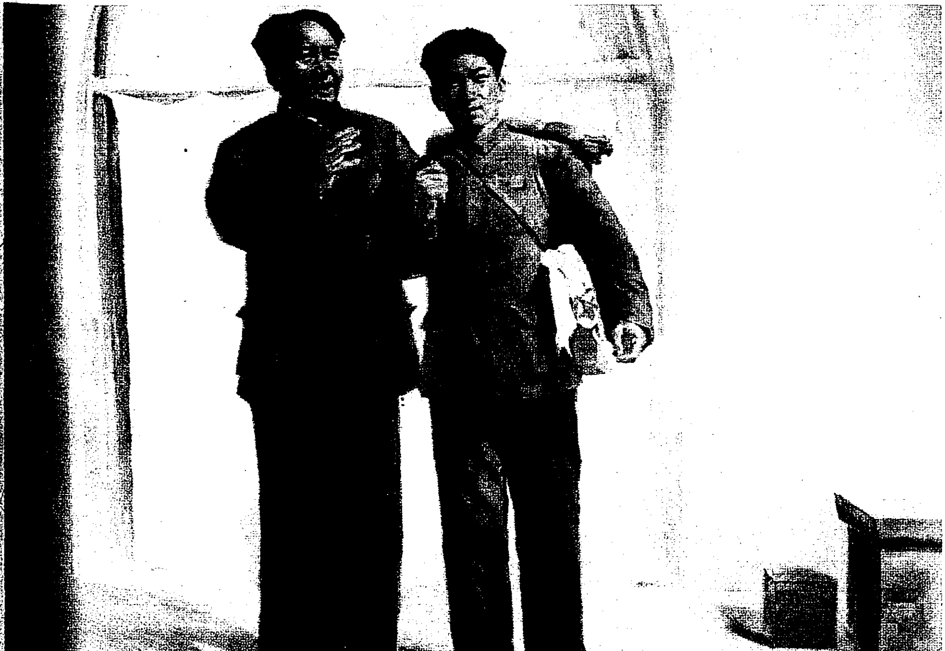
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只是知识的一半，这是不完全的。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上学不到的知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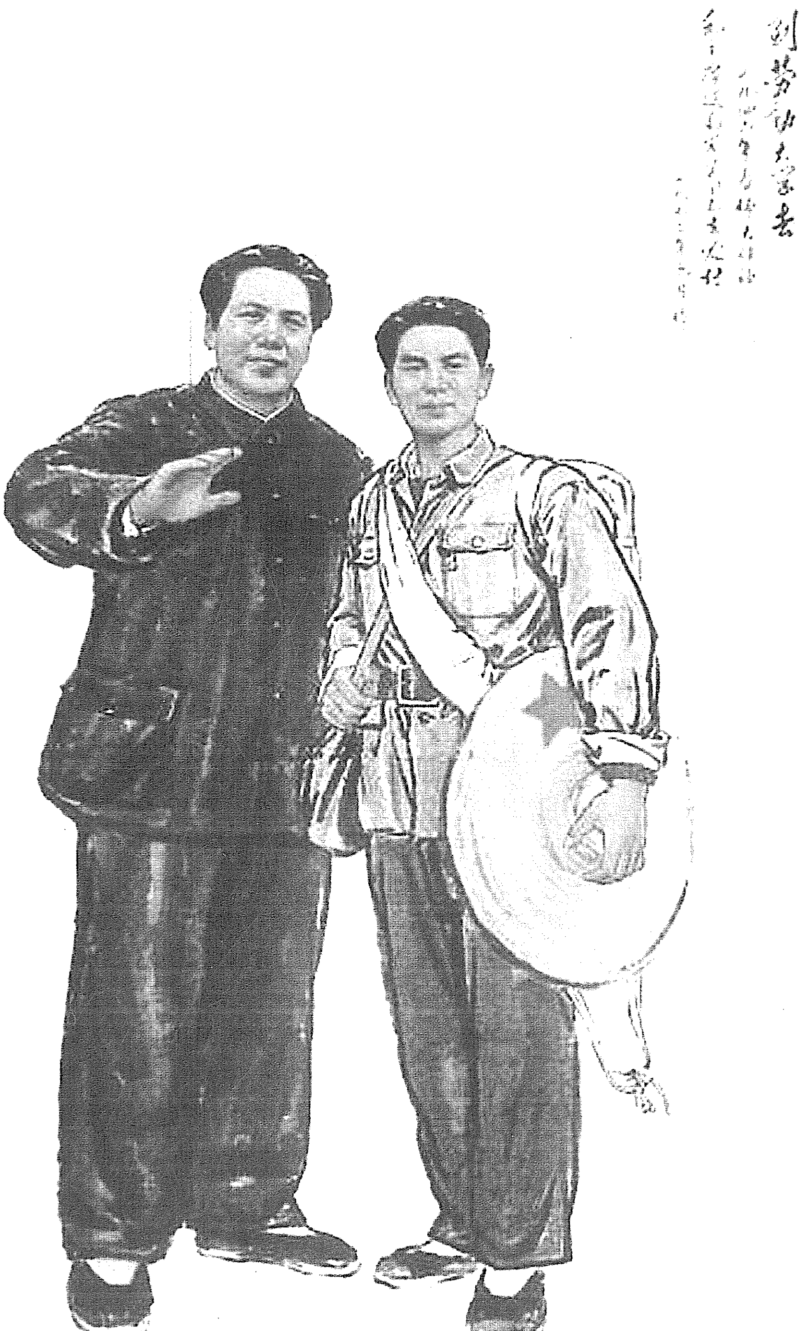
[1] 毛岸英于1946年2月从苏联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国后，到王家坪向毛泽东汇报在苏联的学习及生活情况。这是毛泽东给毛岸英讲的一段话。几天后，毛岸英就背着小米、菜籽及棉被到了吴家枣园。毛泽东还把自己的一套打过补钉的灰布衣服送给他，一再嘱咐他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向农民虚心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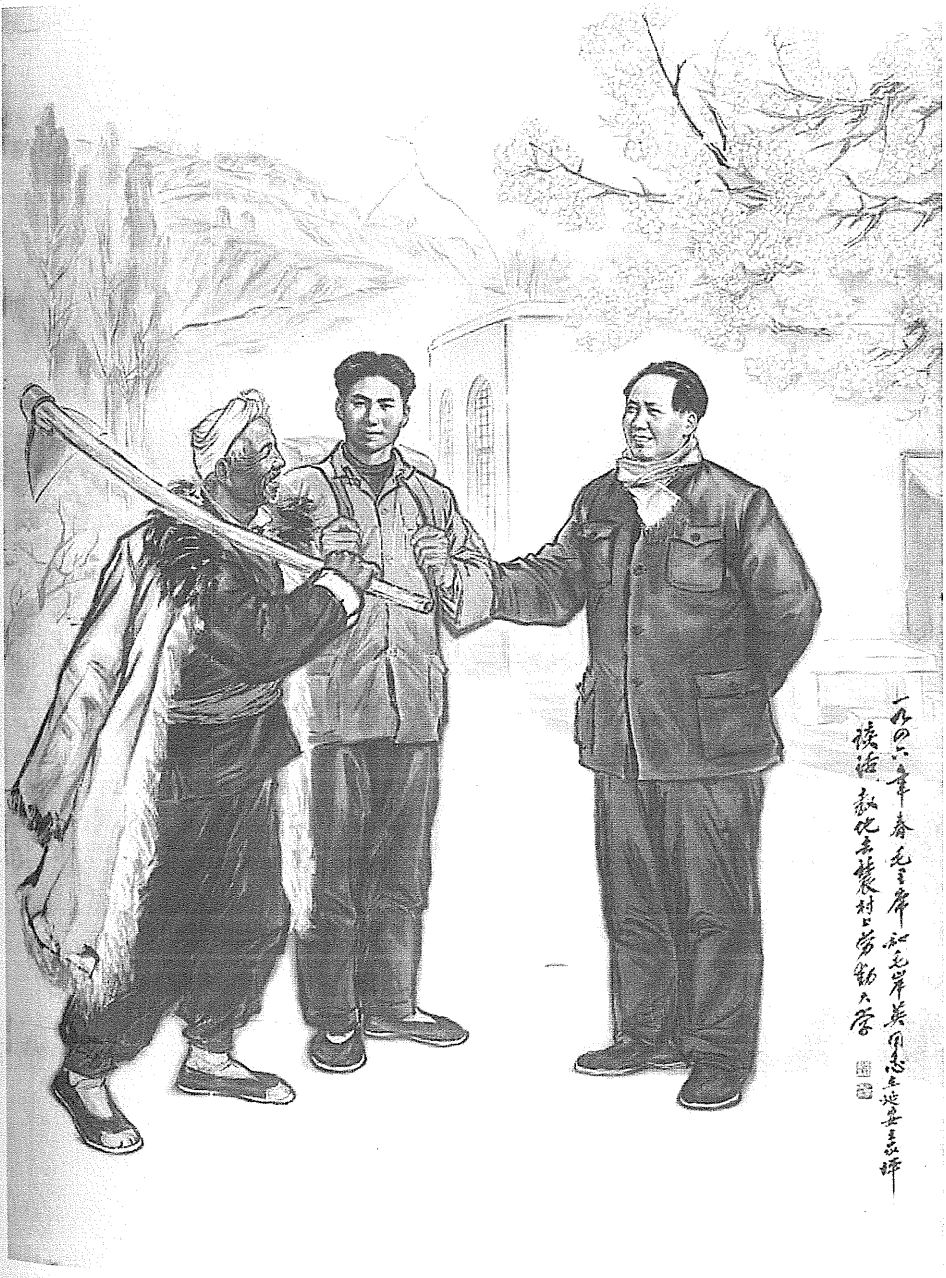
1946年，毛泽东和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长子毛岸英合影。



《到劳动大学去》（油画）



《到劳动大学去》（中国画）


一九四六年春毛主席和毛岸英同志在延安王家坪
谈话，教他去农村上劳动大学

《一九四六年毛主席和毛岸英同志在延安王家坪谈话，教他去农村劳动大学》（中国画）

欢送马歇尔元帅时的谈话

（1946年3月5日）

马：我对你和延安各界的热忱招待，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此次有机会来延和你会晤，深感愉快，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毛：我也愿意重申我们对您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的衷心感谢。我特再一次声明，中国共产党必用全力坚决贯彻三个协定（按即停战协定、政协会决议与整编全国军队方案）。

1946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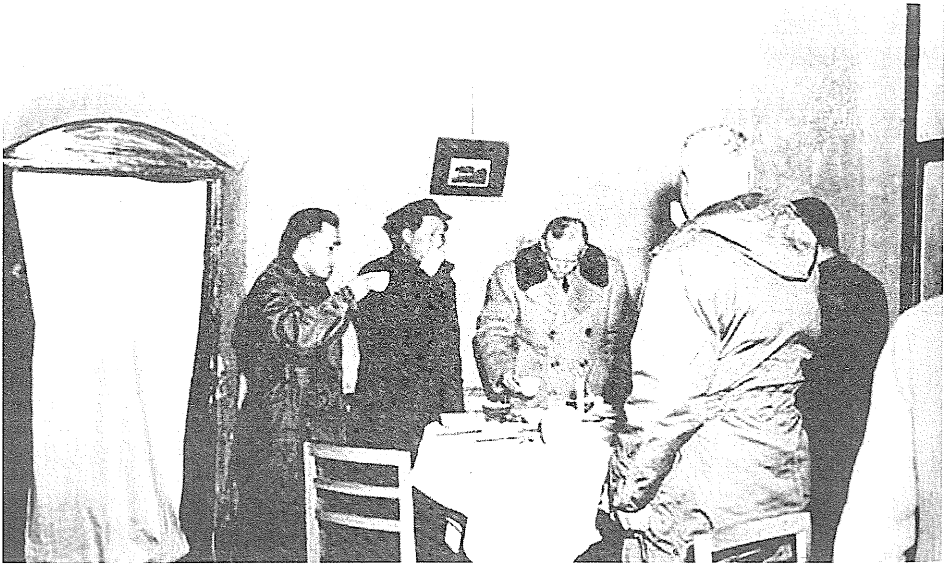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和军事三人小组在延安机场合影。

1946年3月4日，军事三人小组到达延安。左起：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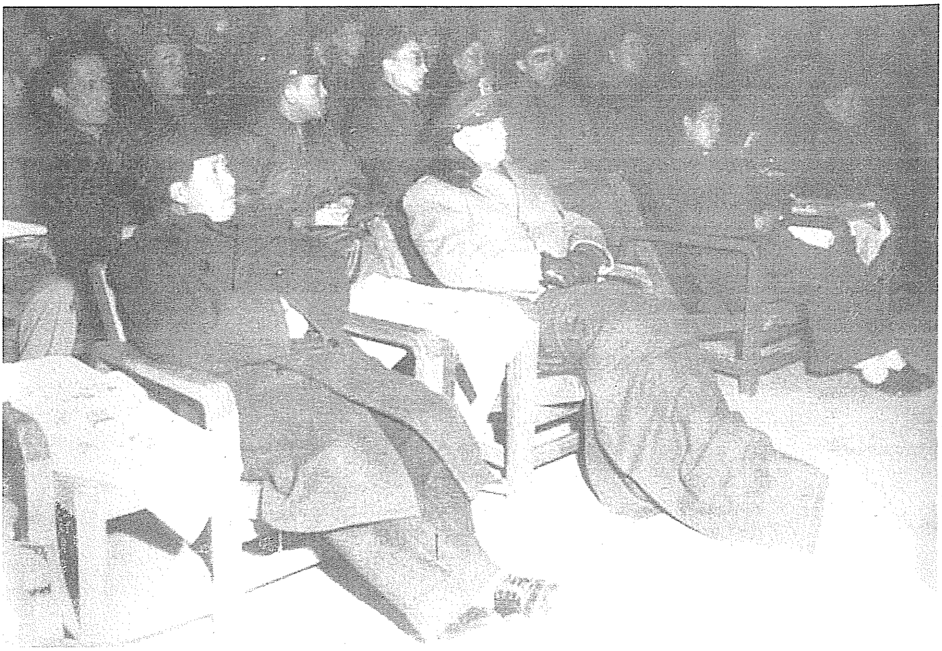
1946年3月4日，毛泽东等陪同军事三人小组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1946年3月4日晚，毛泽东设宴欢迎马歇尔将军。

1946年3月4日晚，毛泽东在延安设宴欢迎马歇尔和张治中。



1946年3月4日晚，毛泽东设宴欢迎马歇尔将军。



1946年3月4日晚，中共中央举行晚会欢迎马歇尔。左起：毛泽东、马歇尔、江青、张治中。

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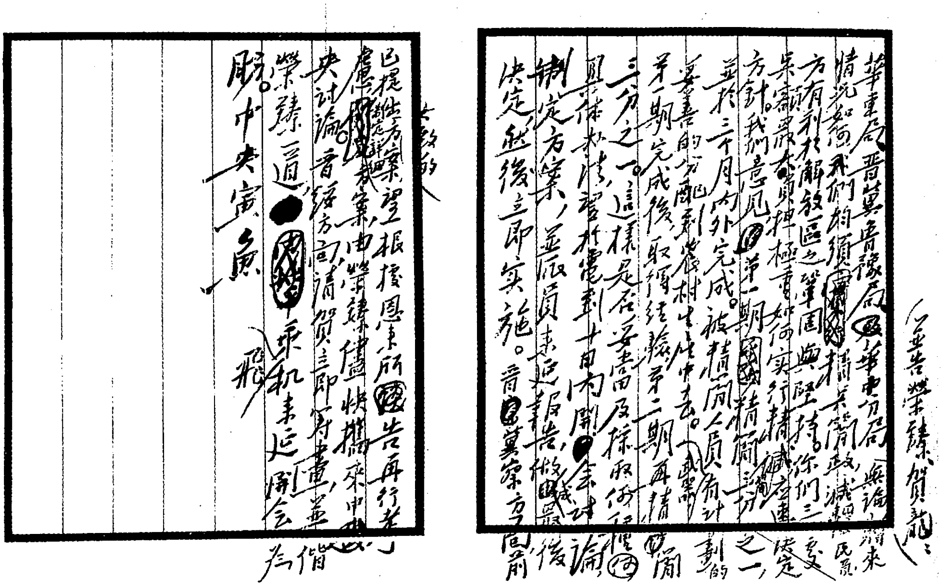
(1946年3月6日)

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

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减轻民负，方有利于解放区之巩固与坚持。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武器，有计划的妥善的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制定方案，并派员来延报告，做成最后决定，然后立即实施。晋冀察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望根据恩来所告，再行考虑，制定详细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晋绥方面，请贺立即筹划，并偕荣臻一道，乘飞机来延开会为盼。

中央

寅鱼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致董必武、王若飞电[1]

（1946年3月7日）

同意叶入党。叶来电与中央复电，均于今晚广播，收到时请在《新华日报》发表，并先告叶，但不要登广告。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叶挺3月5日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入党申请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董必武、王若飞电的主要内容。3月8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复叶挺电："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复叶挺电[1]

（1946年3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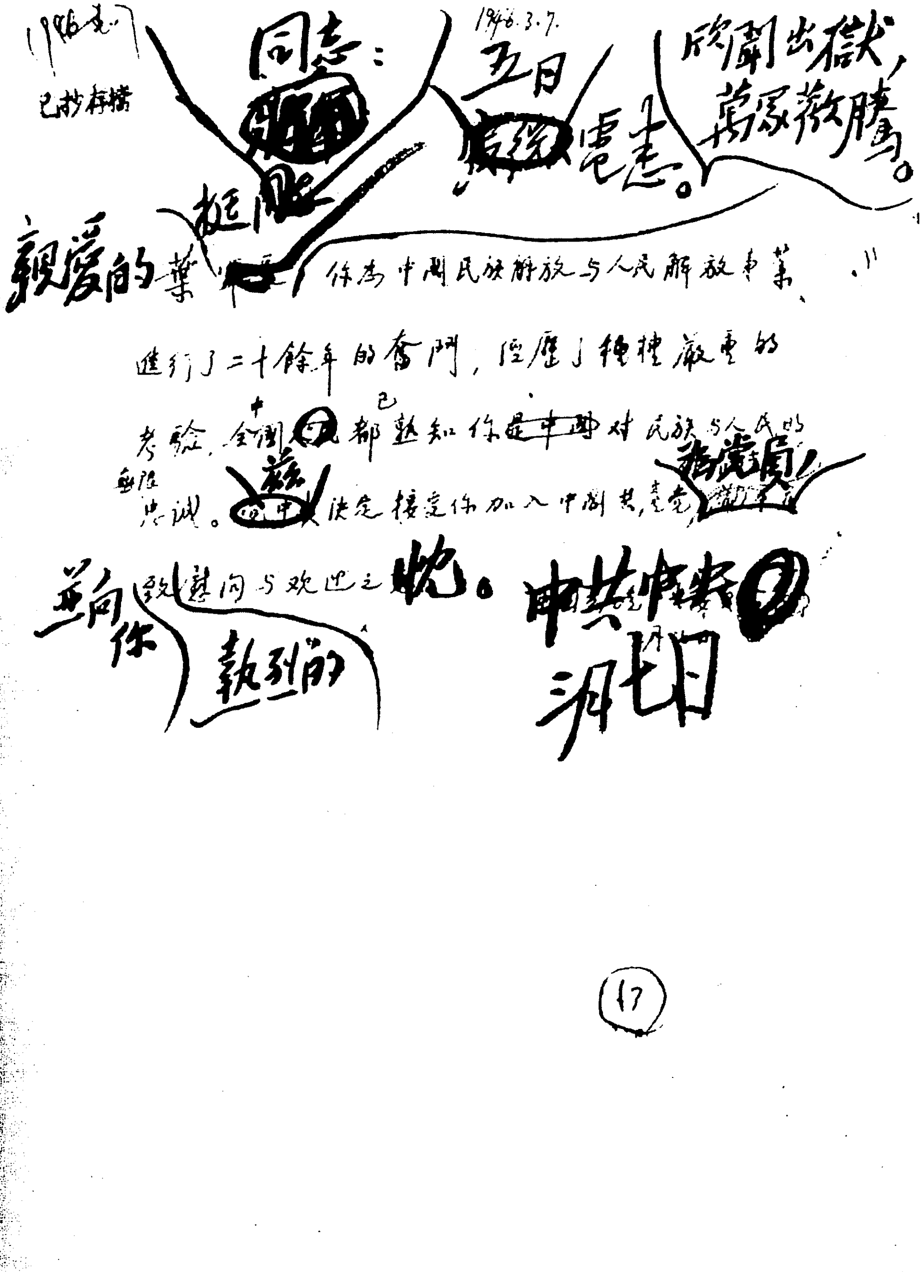
亲爱的叶挺同志：

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
三月七日

---

[1] 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监禁的叶挺，1946年3月5日在出狱的第二天，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亲笔修定的中共中央给叶挺的复电。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1946

已抄存档

1946.3.7.

挺同志：五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

親愛的葉挺同志：你為中國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二十餘年的奮鬥，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人民都已熟知你~~是中國~~对民族与人民的無限忠誠。中共中央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並向你致熱烈的慰問与欢迎之忱。

中共中央

三月七日

⑰

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接受叶挺为中共党员复叶挺电的手稿。

要求各地汇报工业及工运情况的通知

（1946年3月12日）

各中央局及分局负责同志：

你们区域工业及工运中好的与坏的倾向表现如何？

（一）是否有因劳动条件提得太高致有生产低落、资本家畏避之事发生，如有此种现象，你们采取了何种对策？

（二）经过斗争，工人有了组织，又适当地满足了工人改善生活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并不过火，没有伤害资本家的企业兴趣，只是提高了工人们的劳动热忱，因而发展了生产，繁荣了经济，对劳资双方均为有利，此种事例，在你区多不多？是否成了一般倾向？

（三）工会及党支部的工作方针是和厂方合作（不论公营、私营），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为共同任务，就是说，实行了解放区工业及工运的正确方针；或者不是这样，而是工会及支部与厂方对立，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不管生产是否发展，经济是否繁荣，即是说，承袭内战时期的白区工运方针？这两种方针，在你们区域内，党与工会干部了解情况如何？

以上三个问题，请就所知于最短时间用简电答复我们。

中央

寅文

给洪禹[1]的信

（1946年3月12日）

洪禹同志：

一月二十五日给我的信，很久就收到，很对你不起，到今天才复你，这是由于我几个月来都在病中的原故，请你原谅。在详细看了你的信以后，我感觉应当同意你的意见[2]。在关于你本人的具体问题上，当然这是你一方面的声音，而别方面的我还未听到；但是我觉得你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确是我们的党组织值得注意与必须注意的。因为今天离你发信的日子已有一个半月，在这期间内不知道你的问题已获解决否？如果尚未，请你去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

---

[1] 洪禹，1918年生，福建南安人，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在延安审干期间，他曾受到错误的审查，为此向毛泽东写了申诉信，在毛泽东过问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2] 洪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在抢救运动中，被毫无根据地怀疑为国民党特务，抢救运动后，又长期不作结论，不予甄别平反。他说，这种作法无论对党对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这只能伤害无辜，制造混乱，绝不可能帮助党组织弄清问题。希望党中央关照各级党组织密切注意，千万不要因为革命节节走向胜利，就以为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因而可以对受审查的人任意处置，或者置之不理。党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十分细密的关于人心的组织工作，任意对待受审查的人，后果不仅仅是一两个受到粗暴对待的人的问题，它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志当面商量解决，我已把你给我的信付给安子文同志看去了。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致以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关于时局的四条分析[1]

（1946年3月15日）

关于时局，有四条分析要说一说，大家看看是否恰当，这些也是过去一贯的看法，现在看来，似乎还不很定型。时局确实在动荡不定之中，影响着各个国家。有很多人问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打起来，虽然我们被问到的人都说现在打不起来，但是担心的人还是不少。我想讲四条：

第一条，法西斯主力军被打倒了，为世界各国人民民主势力的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斯大林、莫洛托夫[2]和我们都这样讲过。这是事实，法西斯主力军的确被打倒了。打倒了法西斯，不是民主灭亡，而是民主向前发展。

第二条，法西斯残余势力与同盟国[3]内的亲法西斯势力（丘吉尔、赫尔利、何应钦[4]之流。丘过去不是，现在是。赫是孤立派。这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 莫洛托夫（1890—1986），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3] 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美、英、苏、法等国。

[4] 丘吉尔（1874—1965），英国保守党领袖。1940年至1945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领导英国抗击法西斯德国的进攻。赫尔利（1883—1963），美国共和党人。1944年11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里没把英国工党及蒋介石放在内，只讲那些“专家”，就是只采取一面政策而没有采取两面政策的），已经在组织、今后还一定要继续组织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革命运动，并企图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些反动势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敌人，这些势力如果不被克服，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很难避免的。

第三条，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内有两部分民主势力，就是广大的人民及资产阶级和苏和共派。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但广大的人民极大地提高了觉悟，能够积极地反对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和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英、美、法、中的资产阶级和德、意、日的资产阶级正分裂为两大集团，今后还要继续分裂，成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过去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曾经是打倒法西斯主力军的重要条件（如果只有张伯伦[1]没有丘吉尔，只有汪精卫[2]没有蒋介石，就打倒不了法西斯），现在的继续分裂必将起着新的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这种分裂。资产阶级和苏和共派又包括两部分人：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如蒋介石就是中派。他的主张有两条：第一条是一切革命党全部消灭之；第二条是如果一时不能消灭，则暂时保留，以待将来消灭之。而左派则和蒋介石不同，如张东荪[3]等人。这两派今天都是能和我们合作的，因为中派

---

[1] 张伯伦（1869—1940），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在他任期内实行纵容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绥靖政策。

[2] 汪精卫（1883—1944），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1938年3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 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有“暂时保留”一说，这就产生了妥协的可能性。不要以为天下都是黑的，没有缝。广大的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有一条缝，资产阶级继续分为两派也是一条缝。广大的人民加上资产阶级和苏和共派，就可能击破反苏反共的阴谋，就可能出现以内战代替世界大战的前途。至少是可以迟滞大战的爆发，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如果能争取到十五年，那就可能不打世界大战，只打内战。如果那时爆发世界大战，那末反革命力量就一定会被打败。

第四条，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的人民及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打倒法西斯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这是党历来的路线。对资产阶级中最顽固的、不能妥协的势力要反对；凡是能妥协的就联合。

不管风浪多么大，这几条我们要把握住。第一条很清楚。第二条是人们容易忘记的，稍微平静一点就忘了。二月一日到九日就忘了，较场口事件[1]一来就又记得了。马歇尔[2]能够放长线，蒋介石也和何应钦有不同，假如美蒋有一个放长线的，放半年我们有些人就会忘了第二条，就会觉得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就危险得很。我们的军队是要缩编的，但不是缩编得越少越好，一些同志不知道这些，需要说清楚。

五年是一个关头。只要过五年，苏联完全从战争创伤中恢复

---

[1]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二十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60多人。

[2] 马歇尔（1880—1959），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12月被美国总统派任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1946年8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了，我们也强大起来，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就能够摆脱被消灭的可能，也一定要摆脱。当然这里面包含着坚决地同反动派作斗争，而且在斗争中把他们消灭得越多越好。

在中共中央致周恩来电上加写的一段话[1]

（1946年3月16日）

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只有经过严重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修改政协决议和宪草原则问题致周恩来的电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3月16日）

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全路及全撤退区[2]，可见具体问题须再协商决定。过去让彼占领锦州，现又让其占沈阳，即是履行协定。一切均应到前方与前方将领去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东北的长春铁路及苏军全部撤退区域。

在东北进驻地区要十分注意政策

（1946年3月17日）

彭、林[1]：

（一）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但在进驻时及进驻后，不得伤害国民党之接收人员。东北大部是我们的，我们应作长期打算。此点请十分注意。（二）全满[2]各地均须注意除罪大汉奸外，不杀一人，以收人心而利谈判。

中央

寅篠

---

[1] 彭、林，指彭真、林彪，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和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2] 满，指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

中共中央发言人三月十七日谈话*

（1946年3月17日）

国民党内许多有力人士，现正试图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若干原则决定，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此举将不能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同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各党派全权代表共同协议，一致同意的结果，凡所决定都切合国家的需要与人民的期望，特别是关于宪法原则的决定，尤得国内外舆论一致赞美，认为非此决不足以奠定国家民主化的基础。在政协会议中，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任会议主席，蒋氏曾于一月三十一日闭幕致词中郑重声明，说政治协商会议“所决定的各种方案，本人虽然不能出席参加，但是时时刻刻都在研究和注意，觉得各项方案的内容都是大家诚洽协商的结晶。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规定手续以后，即当分别照案实行”。现在距该会闭幕之日仅一个半月，国民党方面忽然对于宪法原则等项决议提出修改意见，实使人们不胜惊异。中国共产党对于蒋介石氏与国民党的诺言素极重视，对于信守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更认为是各政党政治信誉与国家百年大计所关。因此中国共产党决不动摇，并坚持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特别是宪法原则决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并呼吁一切民主人士与全国人民准备为此神圣的任务进行严重的奋斗。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3月17日）

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民盟亦然，请与民盟商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3月17日）

我们决不能承认小组只随政府军，这是侮辱中共的规定。必须增加一项政府保证按政治协商会议各项决议之原则迅速与中共商讨解决东北政治问题，否则不要签字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东北停战协定的修改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徐昆庭题词[1]

（1946年3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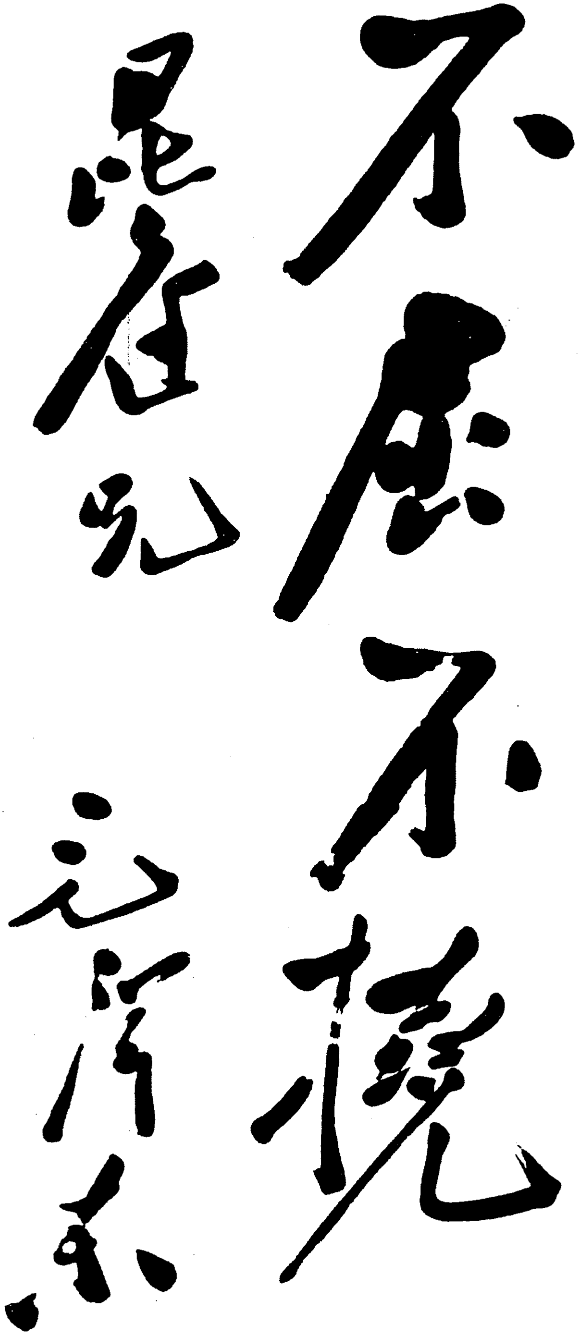
不屈不挠。

昆庭兄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高树勋部民主建国军总参谋部处长徐昆庭的题词。



不屈不挠

昆庭兄

毛泽东

毛泽东为民主建国军总参谋部处长徐昆庭的题词。

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1]

（1946年3月24日）

东北局，并告林彪，黄、李[2]：

（一）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3]，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二）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4]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5]为辅助方向。（三）为此目的，请速与辰兄[6]交涉，允许由我方派兵占领长哈两市及中东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等的电报。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2] 黄、李，指黄克诚、李富春，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王世杰，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

[4] 中东，即中东路，指当时中长路长春至哈尔滨、哈尔滨至绥芬河段。

[5]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西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段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今双辽）、扶余等地区。

[6] 辰兄，指苏联军队代表。

线，如得允许，即令周保中[1]部担负占领任务并厉行剿匪。（四）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2]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五）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顽军不得北进。（六）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3]而奋斗，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七）以上望考虑电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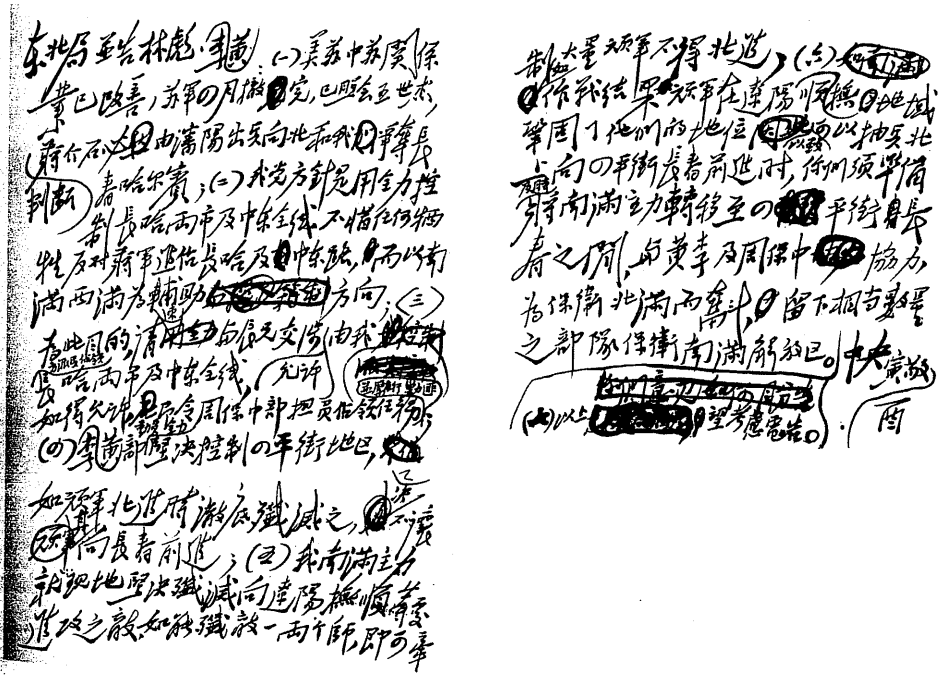
中央
寅敬酉

---

[1] 周保中，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东满军区司令员。

[2] 四平街，旧市名，即今吉林四平。

[3] 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



东北局并告林彪、彭真：（一）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蒋介石正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们争夺长春、哈尔滨；（二）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三）为此目的，请向苏方交涉由我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如得允许，令周保中部担负此任务；（四）黄、李部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蒋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不让蒋军向长春前进；（五）我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本溪进攻之敌，如能歼敌一两个师，即可牵制大量蒋军不得北进；（六）如作战结果蒋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抽兵北向四平街、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只留下相当数量之部队保卫南满解放区。（七）以上望考虑电告。

中央
寅敬
酉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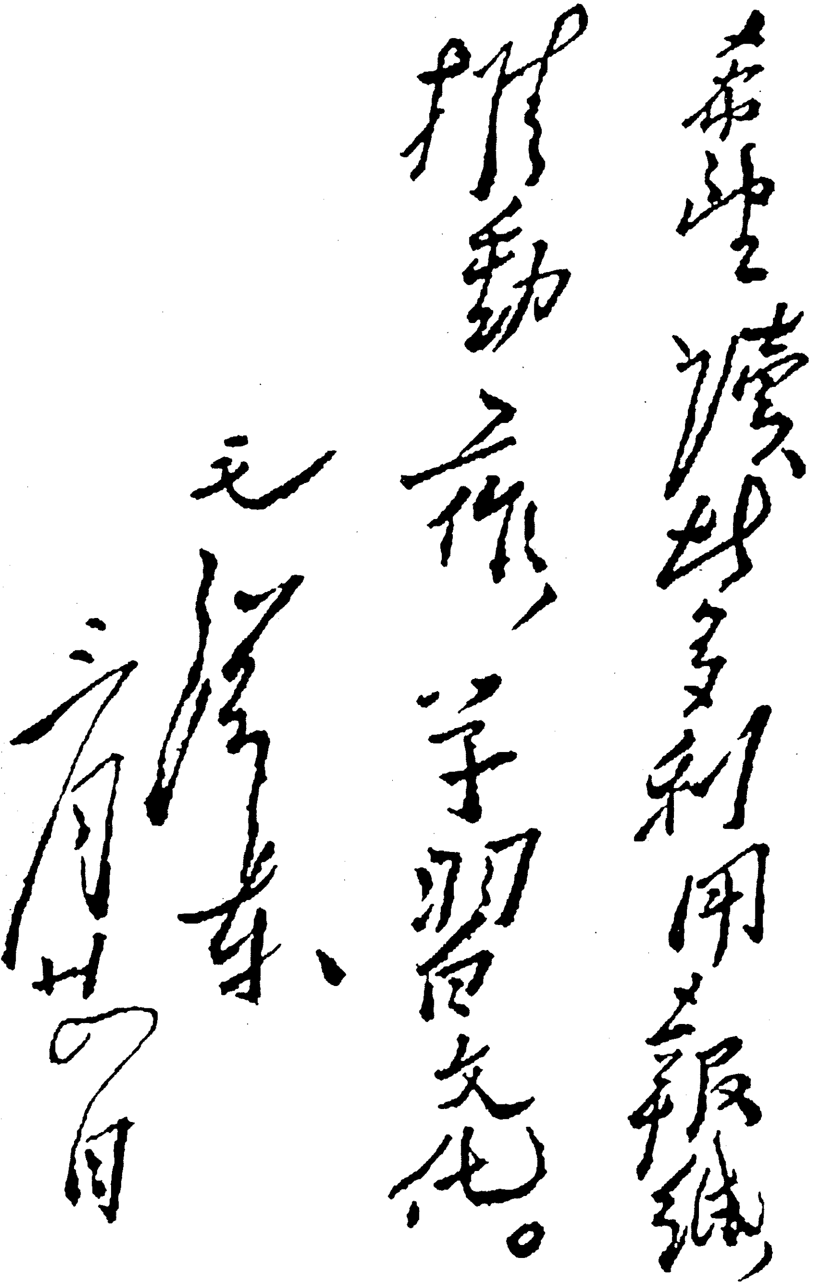
为《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题词

（1946年3月24日）

希望读者多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学习文化。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要使讀者多利用報紙，推動工作，學習文化。

毛澤東

六月廿四日

毛泽东为《边区群众报》创刊六周年的题词。

关于工业与工运问题的方针[1]

（1946年3月24日、28日）

一

各局：

为使工业与工运问题在党内展开讨论，纠正目前严重存在着的过左偏向，请将中央关于工业与工运三个问题询问电转发至区党委（或省委）及分区党委两级讨论，特别注意抄给从事工业与工运的干部加以讨论，并将他们意见反映到中央来。但在纠正偏向时，须着重于干部思想上打通，不要着重于犯错误的责任，对于他们领导群众艰苦奋斗，还须给以勉励与安慰，以便好好地将“左”倾偏向纠正过来，而不是泼冷水。

中央

寅敬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后来决定暂不发出。本篇二是毛泽东在1946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几项通知》稿中加写的第七项。29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将这个通知稿报送任弼时写的信上，写了以下批语：“弼时同志：前次拟发的工业与工运指示电，暂不发了，在此电中加上一项，即可给以方针，请酌定。”

二

解放区劳资关系必须取合作方针，以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无论公营、私营，都是如此。任何工厂、工会与党支部必须与厂方协同制定生产计划并协同执行之，力求以较低之成本，得较多较好之产品，从此获得较多之盈利，劳资双方有利。工人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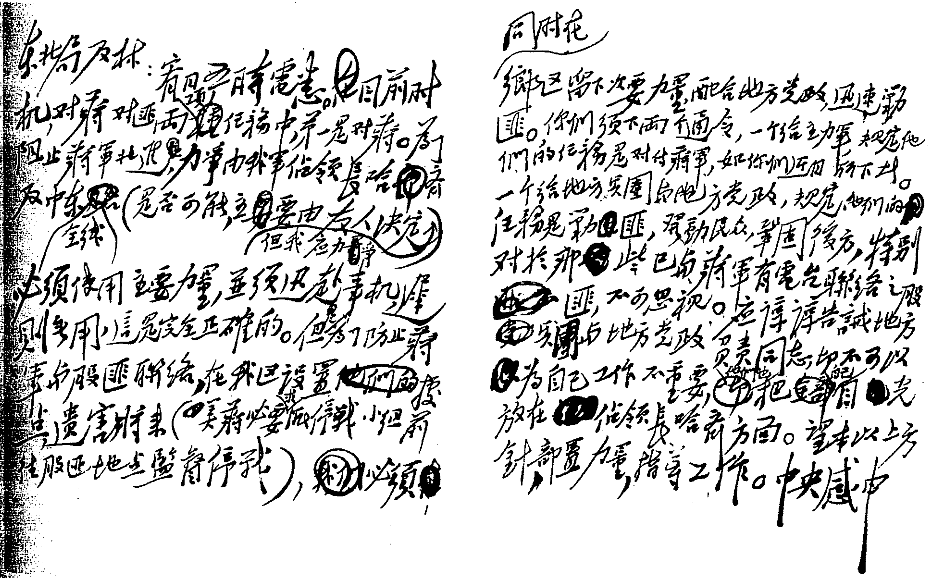
中央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的指示

(1946年3月27日)

东北局及林：

宥日五时电悉。目前时机，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为了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决定，但我应力争），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迟则无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为了防止蒋军与股匪联络，在我区设置据点，遗害将来（美蒋必要求派停战小组前往股匪地点监督停战），必须同时在乡区留下次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你们须下两个通令，一个给主力军，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对付蒋军，如你们近日所下者。一个给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剿匪，发动民众，巩固后方，特别对于那些已与蒋军有电台联络之股匪，不可忽视。应谆谆告诫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切不可以为自己工作不重要，他们也把自己目光放在占领长哈齐方面。望本以上方针，部署力量，指导工作。

中央
感申



东北局及林：有日两电悉。目前时机，对蒋对匪两项任务中，第一是对蒋。为阻止蒋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路全线（是否可能，主要由友人决定，但我应力争），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迟则多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为了防止蒋军与股匪联络，在我区设置他们的据点，遗害将来（如美蒋必要求停战，小股匪地区亦须停战），必须同时在乡区留下必要力量，配合地方党政，迅速剿匪。你们须下两个命令，一个给主力军，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对付蒋军，如你们所已下者。一个给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规定他们的任务是剿匪，发动民众，巩固后方，特别对于那些已与蒋军有电台联络之股匪，不可忽视。应谆谆告诫地方兵团与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切不可以为自己工作不重要，而把精力放在占领长哈齐方面。望本以上方针部置力量，指导工作。中央感申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东北目前工作方针的指示》的手稿。

对国民党武装和非武装人员的政策[1]

（1946年3月30日）

东北局：

寅艳给各地指示电[2]悉，很好。在用迅速猛烈手段夺取长哈齐[3]时，对其武装部队应取歼灭政策，将其全部解决武装，但对其非武装人员（党政）勿加侮辱与杀害，将其移置乡下软禁以利将来交换。此点应令各地首长明确知道，有所遵循。

中央

寅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指1946年3月29日24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给周保中、陈光、张启龙、陈云、李天佑、李富春、黄克诚、程世才、萧华并告林彪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军必须迅速完成一切准备，于苏方撤退时以敏捷迅速手段进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市，争取在一日内全部干净消灭各市顽匪。此举关系东北及中国革命前途甚大，望亲自负责周密部署。抢占与确保长春的决定一环是开原、四平间的作战，请林彪、李富春、黄克诚注意。辽东（南满）军区部队为配合沈阳以北及长、哈、齐之争夺战，除集中主力坚决歼敌一部外，应分出适当兵力牵制大量敌人于南满。后方党政军应积极地有计划地全力歼灭各地股匪。

[3] 长哈齐，指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式装备。

给胡乔木的信[1]

（1946年3月）

起草了一个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电，请你到少奇同志处拿了看一看。请你清出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加以审查，看其中是否已有现时已不适用之处，列举告我为盼！

---

[1] 这是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中央关于用坚决斗争的立场保卫政协决议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

（1946年4月1日）

丙、丁：

（一）敬日以来，我党代表在综合小组会议上所取坚决斗争立场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才能保卫政协决议，而对于过去所取不适当的让步态度，因而使自己处于很不利的被动地位这一种情况，有求得解脱与恢复主动之可能。但此项斗争尚未胜利，国民党的反动压力还将增大，务望精心研究，密切注意。

（二）省自治法仍应改为省宪，如目前不便提，将来适当时机仍应提出。

（三）在宪草与国大等问题没有解决，中央没有最后通知以前，我党参加政府的名单不要提出，名单内容亦尚待考虑。

甲　乙

卯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

反动逆流高涨之时严防敌人突袭[1]

（1946年4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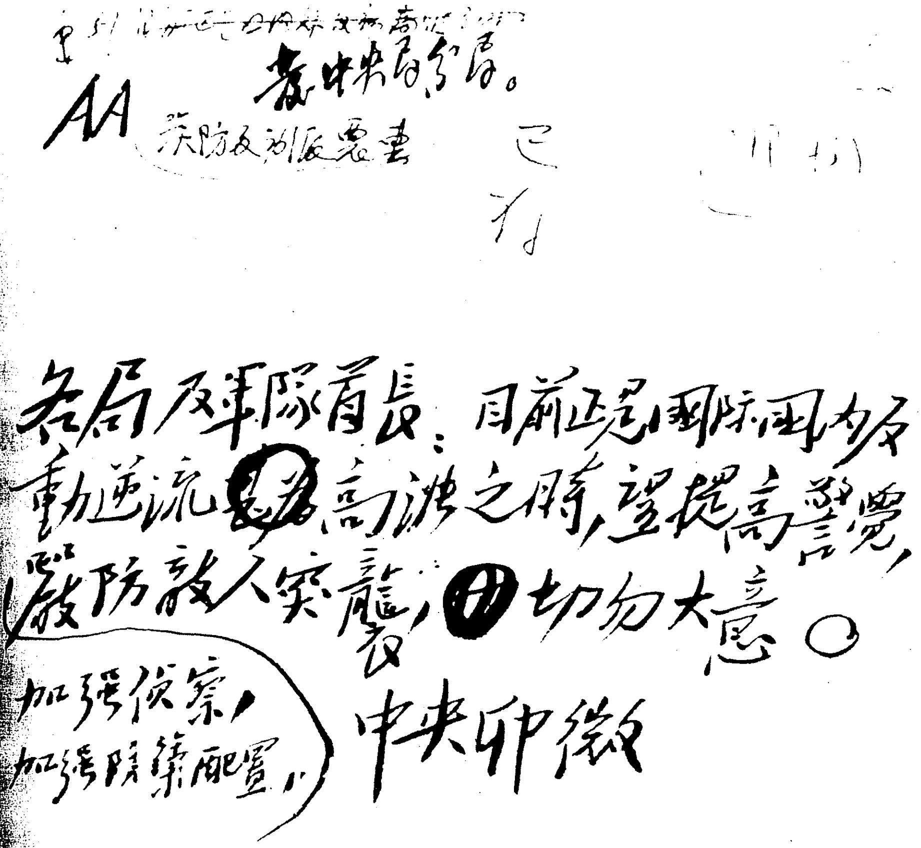
各局及军队首长：

目前正是国际国内反动逆流高涨之时，望提高警觉，加强侦察，加强防御配置，严防敌人突袭，切勿大意。

中央
卯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军队首长的电报。



[illegible]

AA 發中央局分局。

突防反動反霸書

已發

各局及軍隊首長：目前正是國際國內反動逆流高漲之時，望提高警覺，嚴防敵人突襲，加強偵察，加強防禦配置，切勿大意。

中央卯微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动逆流高涨之时严防敌人突袭》的手稿。

关于对付美蒋大举进攻东北的对策[1]

（1946年4月5日）

东北局及林：

（一）美蒋决以十五个军（已到七个尚有八个待运）向我大举进攻，尽占东北点线，然后与我谈判。（二）我方政策，一方面利用停战小组[2]力争停战；另一方面不要被停战小组所迷惑，必须同时有对付十五个军进攻的全盘与持久计划。

中央

卯微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停战小组，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全国各地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的执行小组。

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是当前关键[1]

（1946年4月6日）

林彪同志，并告彭：

（一）林支日从四平所发电悉，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哪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2]，刘邓[3]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二）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三）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飞[4]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部[5]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并告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姜鹏飞，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该军系由伪“铁石部队”改编组成。

[5] 龙部，指国民党军龙云所属部队。

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四）各军区后方剿匪与发动群众斗争，一刻不能松懈，望同时严督实行。

中央

卯鱼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4月7日）

《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中央局电[1]

（1946年4月7日）

《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

---

[1] 这是毛泽东致各中央局电的主要内容。

对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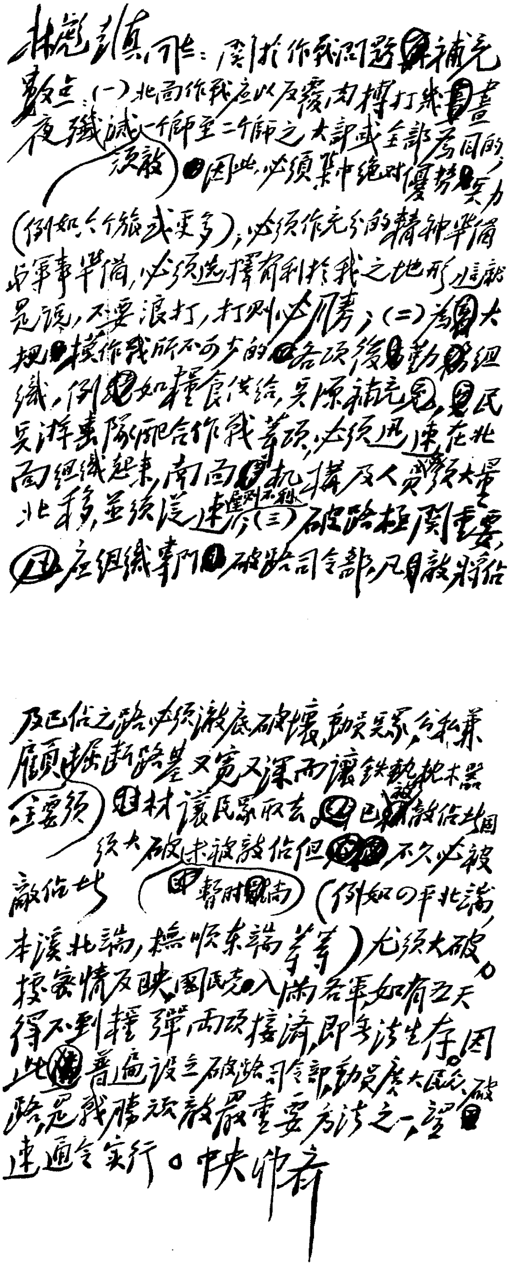
（1946年4月8日）

林彪、彭真同志：

关于作战问题补充数点：（一）北面作战应以反复肉搏打几昼夜歼灭顽敌一个师至二个师之大部或全部为目的。因此，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这就是说，不要浪打，打则必胜。（二）为大规模作战所不可少的各项后勤组织，例如粮食供给、兵源补充、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等项，必须迅速在北面组织起来，南面机构及人员必须大量北移，并须从速，迟则不利。（三）破路极关重要，应组织专门破路司令部，凡敌将占及已占之路必须彻底破坏，动员民众，公私兼顾，主要须掘断路基又宽又深，而让铁轨、枕木、器材让民众取去。已被敌占者固须大破，暂时尚未被敌占但不久必被敌占者（例如四平北端、本溪北端、抚顺东端等等）尤须大破。据密情反映，国民党入满各军，如有五天得不到粮弹两项接济，即无法生存。因此普遍设立破路司令部，动员广大民众破路，是战胜顽敌最重要方法之一，望速通令实行。

中央

卯齐



林彪彭真同志：关于作战问题补充数点：（一）北面作战应以反复同敌搏打，每战以一昼夜歼灭敌一个师至二个师之大部或全部为目的，因此，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必须选择有利于我之地形，只能是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二）为大规模作战所不可少的各项后勤组织，例如粮食供给，兵员补充，民兵游击队配合作战等项，必须迅速在北面组织起来，南面机构及人员须大量北移，并须迅速，[illegible]；（三）破路极关重要，应组织专门破路司令部，凡敌将占及已占之路必须彻底破坏，动员民众，公私兼顾，掘断路基又宽又深，而让铁轨枕木器材让民众取去。（四）已被敌占或须大破未被敌占但不久必被敌占者（例如四平北端，本溪北端，抚顺东端等等）尤须大破。据密情反映，国民党入满各军如有五天得不到粮弹两项接济即无法生存。因此普遍设立破路司令部，动员广大民众破路，是我战胜敌人最重要方法之一，望迅速通令实行。中央卯齐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的手稿。

致叶剑英、饶漱石等电[1]

（1946年4月10日）

此次国、美急于要三人会议去沈，目的全在压迫我方承认国方占领长哈齐三市及沈哈铁路线。恩来在渝已据理力争，根本拒绝，望叶、饶注意，切勿答应国、美任何要求。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饶漱石、周恩来并告彭真、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致聂荣臻、程子华电[1]

（1946年4月10日）

国、美两方通同一气，久欲寻找借口在热察两省建立反苏反共据点，因此察北、热北两处匪患必须迅速肃清，两处之无秩序状态必须迅速消除，两处之群众斗争必须迅速发动。为此目的，须选派大批得力干部前往工作，并派有威信之领导人前往领导一切。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迅速加强察北和热北两处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聂荣臻、程子华电的主要内容。

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

（1946年4月11日）

陈毅[1]同志：

七日电悉。关于纠正群众工作中的错误，建议如下：

（一）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有两类。第一类是空白村子及命令主义。空白村子是右的领导完全不去发动群众的结果。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其结果亦仍然是空白村子，并使群众受到坏影响。故凡属存在这一类错误现象的地方，必须注意研究与纠正。

（二）第二类是党在领导群众斗争过程中所发生的过火行动，即“左”的错误。其中，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侵犯中农利益，一经发现，必须迅速纠正；其次是除减租减息外过分地打击了富农与中小地主，亦必须注意于适当时机加以纠正。

（三）至于给汉奸、豪绅、恶霸、反动分子以严重打击，只要是真正群众的行动，则不是错误而是必需。大城市中豪绅地主的大声叫喊是必然现象，我们绝不应为其所动。但是到了群众斗争已经胜利、清算减租已经实现之时，党便应当劝告群众，对地主阶级由打的政策改变为拉的政策。例如让逃亡地主还乡，给地主以生活上的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出路，并联络开明绅士参加某些工作等。拉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减少反对力量，使紧张空气和缓下来，因此是必须的。但应注意不要拉得过早，损害群众利益与影响群众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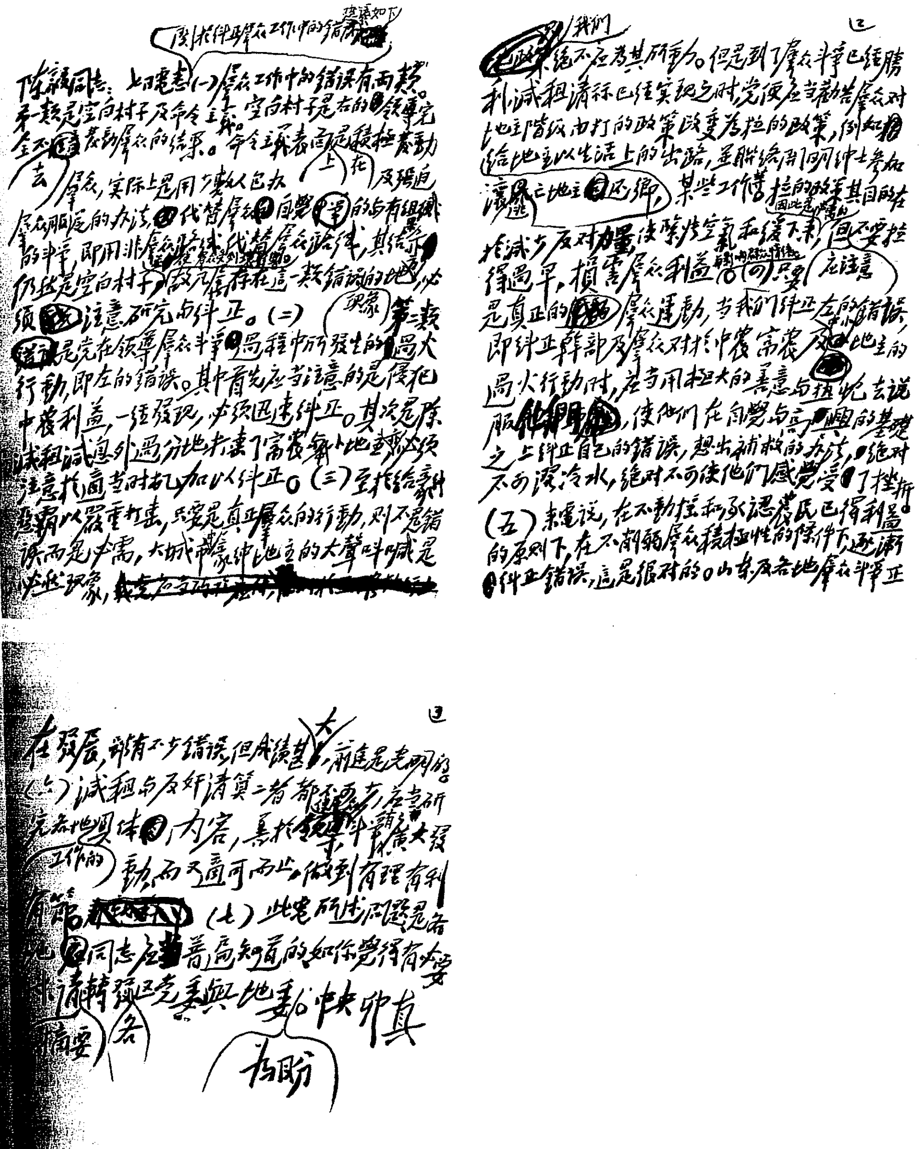
（四）只要是真正的群众运动，当我们纠正“左”的错误，即纠正干部及群众对于中农、富农及中小地主的过火行动时，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

（五）来电说，在不动摇和承认农民已得利益的原则下，在不削弱群众积极性的条件下，逐渐纠正错误，这是很对的。山东及各地群众斗争正在发展，虽有不少错误，但成绩甚大，前途是光明的。

（六）减租与反奸清算，二者都不可少，应当研究各地工作的具体内容，善于领导，使群众斗争有广大发动，而又适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七）此电所述问题，是各地同志应当普遍知道的，如你觉得有必要时，请摘要转发各区党委与地委为盼。

中央
卯真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的手稿。

东北作战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

（1946年4月12日）

东北局及林[1]：

（一）同意林真子电[2]，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二）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否则放弃占领计划，但以一部力量占领飞机场，阻敌空运，以利谈判。（三）詹才芳[3]在绥中破路已见大效，望你们重视破路，看作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四）注意组织民兵，全满[4]普遍实施民兵制度。（五）注意组织受县区指挥之游击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2] 指林彪1946年4月11日子时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军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目前方针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对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建议我军采取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向四平前进，求得我军四平作战兵力之集中。南满方面亦应采取以上方针。

[3] 詹才芳（1907—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4] 满，指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

队，全满各县均应有游击队。（六）在敌占区组织武工队，每县数队，每队数十人，遍布敌占区。（七）你们最近数仗打得不错，敌人已在叫苦，望对打胜仗之部队传令嘉奖，鼓励士气。（八）全满普遍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巩固后方，一切从长期打算出发。

中央

卯文

在修改《东北应无条件停战》时加写的一段话[1]

（1946年4月12日）

解决东北问题应当从这里着手，舍此再无他道。东北应无条件停战，难道这不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吗?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东北应无条件停战》时加写的一段话。这段话加写在要国民党当局“首先实行停止进攻，停止增兵”一句话后面。

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1]

（1946年4月13日）

林，并告彭：

马歇尔[2]有于文日动身来华说。马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情况如何望告。

中央
卯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并告第一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马歇尔，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12月任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国共关系，参与国共谈判。1946年8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给徐明清的信[1]

（1946 年 4 月 14 日）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

---

[1] 当时王观澜病重，生命危在旦夕。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此时，为了应对国民党全面内战的部署，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他还是很快亲笔写了这封回信。

速歼东北之敌在停战前夺取优势[1]

（1946年4月15日）

林、彭：

（一）马歇尔数日内可到渝，国美对我和战方针究竟如何，短期内即可看清楚。（二）七十一军现进至何处，我是否有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击溃或阻止进攻之敌于四平以南及西南。（三）本溪方面我军望令其速加整理，以便再战[2]。（四）除长春你们寒卯电[3]已有正确处置外，其他苏军撤退地点及匪占地点须迅速占领及消灭成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1946年4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部队在保卫本溪作战中，曾两次击溃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第十四师的进攻，歼敌4000余人。4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彭真、林彪等的电报中说：本溪的胜利，“必能引起于我有利之变化。望通令全军鼓励士气，粉碎顽军之进攻”。

[3] 寒卯电，似为卯寒电。卯寒电是1946年4月14日林彪给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中、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光、副政治委员张启龙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对固守长春之敌不应采取全线包围于48小时内解决战斗的计划，只派少数部队进行牵制，而勿进行正式攻击。应着重于占领飞机场，断其空运，然后逐次攻略城内诸目标。对所选攻击目标须采取局部性的包围攻击，不可平分兵力，防止侦察准备不充分而仓促攻击。如无全部占领长春可，则应勇敢放弃全部攻占的计划，采取占领一部与敌对峙，以利谈判的划。

之匪，以便在停战以前夺取优势。大约一切重要作战问题须争取于十天内外解决。（五）敌准备使用飞机助战，望注意领导机关之安全。

中央
删午

破袭北宁路并向沈阳以北游击[1]

（1946年4月16日）

李、黄，并告林：

删电[2]悉。占领法库，对援助四平、长春方面之作战有很大重要性。望组织一精干有力部队（例如一千人左右）携带充分爆炸器材，由法库南下破袭北宁路[3]，并向沈阳以北游击，发展群众工作。

军委

卯铣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李富春和司令员黄克诚并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指1946年4月15日李富春、黄克诚关于我军于4月14日收复法库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3] 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4月16日）

长春守军全部是伪军[2]，东北人民现在与将来都有权利消灭这些伪军，谈判时不要承认伪军为政府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2] 当时驻守长春的系原伪满洲国的“铁石”部队。

致东北局及林彪电[1]

（1946年4月16日）

马歇尔到华后，可能迅速停战，马、周、陈诚[2]之三人会议可能在二十号至二十五号之间到沈阳。长、哈问题必须争取于停战前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及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陈诚4月接替张治中为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方面的代表，张治中奉国民党政府之命前往新疆。

致东北局及林彪电[1]

（1946年4月16日）

夺取长、哈、齐后，注意纪律，给市民以好影响。

保护国民党一切文职人员，不要杀害一人，以利谈判，军事俘虏亦不杀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及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望准备应付任何事变[1]

（1946年4月18日）

各局，并告叶、饶、林[2]：

渝周铣电[3]称：蒋[4]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马歇尔来后态度如何，尚难断定等语。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

中央
卯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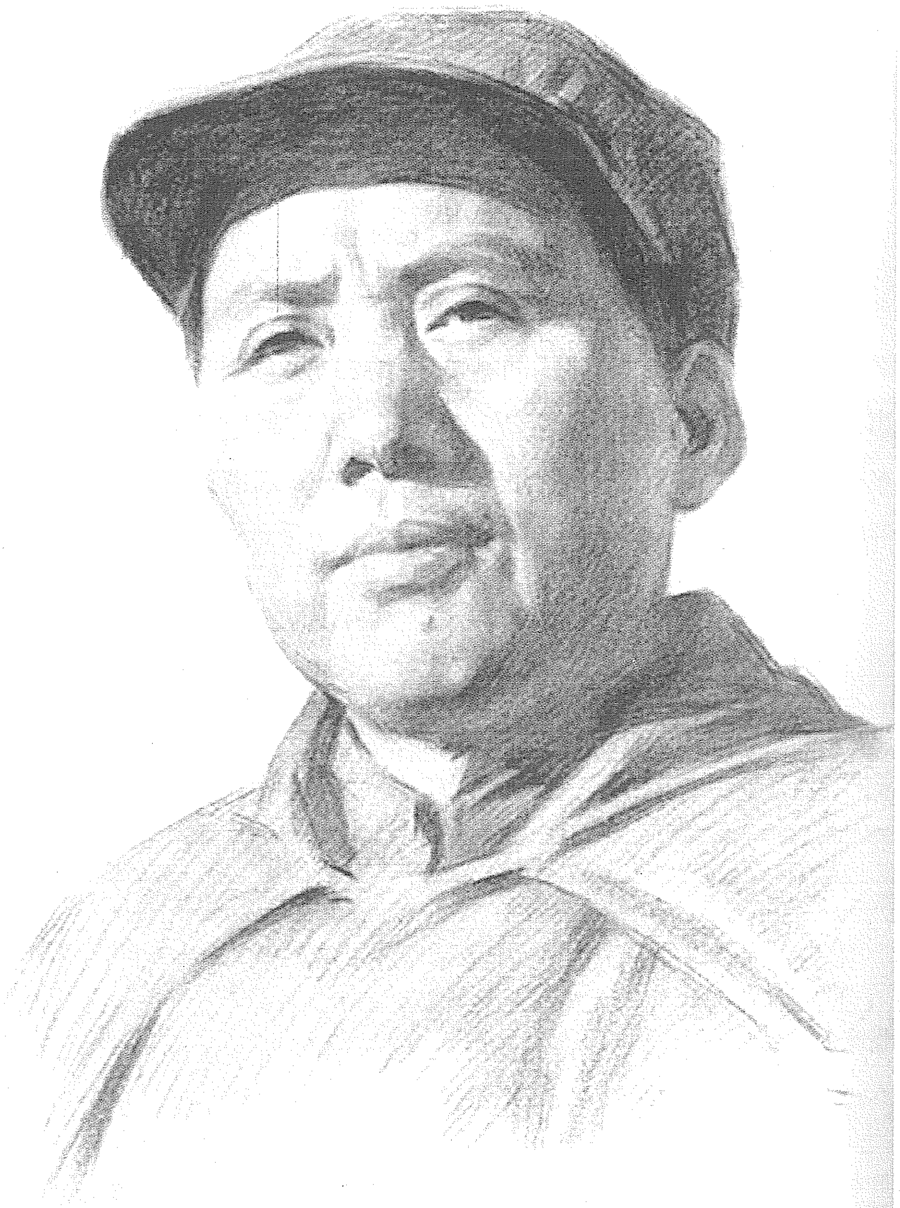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和分局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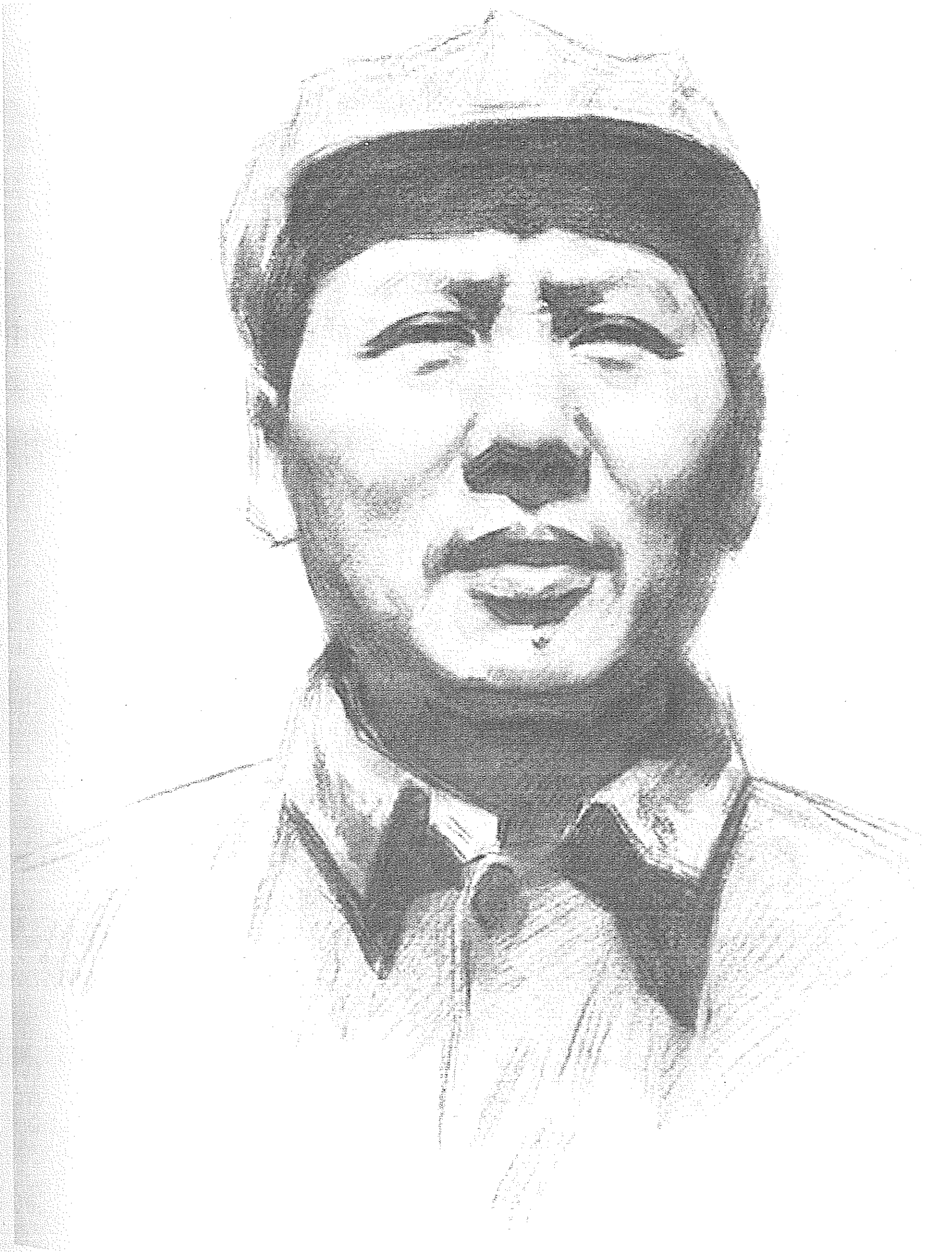
[2] 叶，指叶剑英，当时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十七小组（沈阳）中共方面负责人。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3] 指1946年4月16日周恩来在重庆给中共中央并转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蒋介石仍是两面做法，表面公开催促各方交参加政府及国大的名单，催促赶快修改宪草，暗中却召集秘密会议。何应钦、白崇禧已奉命布置军事，陈诚赴沪，定有阴谋。

[4] 蒋，指蒋介石。



《毛泽东在陕北》（素描）



《毛泽东在陕北》（素描）

致各中央局并告叶剑英等电[1]

（1946年4月18日）

望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并告叶剑英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4月18日）

铣夜电[2]悉。估计及应付甚当。民盟及国民党民主派两方动态关系甚大，望多做工作。如长、哈、齐三地占领，后方巩固，军队锻炼更多，蒋要大打也不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2] 铣夜电，指周恩来4月16日夜给中共中央并转东北局的电报。

致东北局电[1]

（1946年4月18日）

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难作最后决定，须看斗争结果如何而定。在未作最后决定前，你们应作长期保持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在得知东北民主联军占领长春消息后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4月18日）

长春已得，已令彭、林、周、陈、高[2]夺取哈、齐，并发动群众，整顿军队，为保卫长春而战。同时增强四平兵力，歼灭进攻之敌，坚决保卫整个北满。至西满、南满我军已打出经验，寸土必争，决不退让。如国、美要求我让出长春，请断然拒绝。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2] 彭、林、周、陈、高，指彭真、林彪、周保中、陈云、高岗。

占领长春后的东北军政工作部署

（1946年4月19日）

彭、林[1]，并转周，陈、高[2]：

（一）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二）杨[3]师立即或休息数日南下参战，必须增加四平方面兵力，歼灭新一军主力，并准备继续打几个大胜仗，方能保卫长春。

（三）用全力夺取哈、齐[4]二市。

（四）用全力发动长、哈、齐三市及长哈齐线东西两侧各二百里左右地区的数百万群众，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作为控制全满[5]之中心区域，迅速准备一切，为保卫长春而战。为此目的，应派遣大批有经验、懂策略干部分布中心区域各县市工作，发动群

---

[1] 彭、林，指彭真、林彪，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和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2] 周，指周保中（1902—1964），云南大理人，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员。陈，指陈云（1905—1995），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政治委员。高，指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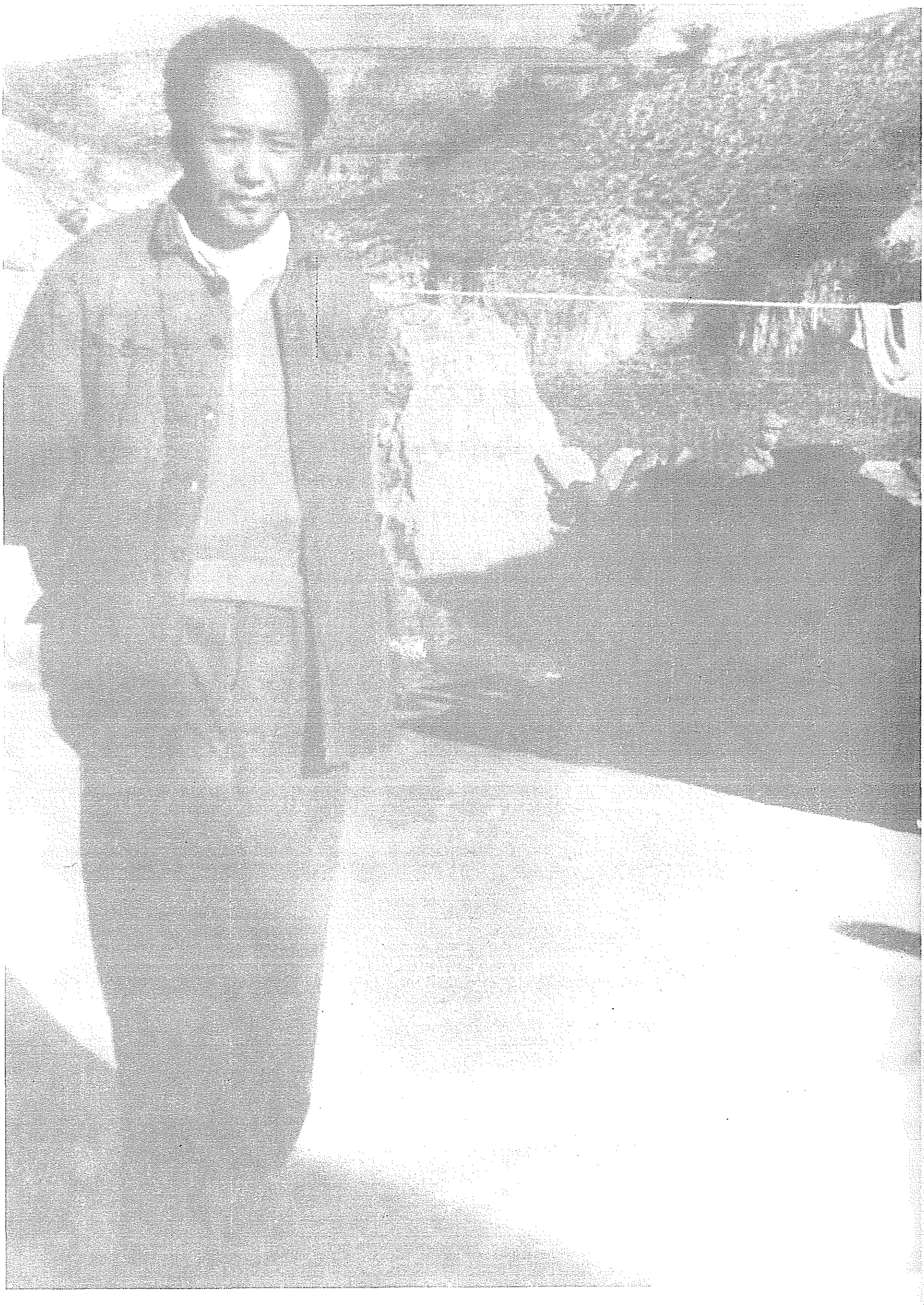
[3] 杨，指杨国夫，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长。

[4] 哈齐，指黑龙江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5] 满，指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

众，消灭土匪，清算汉奸，减租减息，改善职工待遇，分配大汉奸土地，这些工作短时期内须见成效。但须注意坚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只得罪少数人，不要得罪太多的人。为群众所反对之汉奸、豪绅、恶霸，必须惩办，但不要牵连太广。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

中央
卯皓午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

集中优势兵力在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

（1946年4月19日）

彭、林[1]：

（一）杜聿明[2]由平赴沈对人称，东北共军四十余万，国军十余万，相差甚远，但仍须决心打下去，有坦克百余将运沈阳，并要使用飞机等语。要战胜顽敌保卫长春，必须准备对付飞机、坦克（参加过抗日的将士有办法对付之），并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二）在不削弱各地工作条件下，抽调大批干部加强长、哈[3]为中心地区的工作，即四平、海龙以北，齐齐哈尔、海伦以南，洮南以东，牡丹江以西，约三十至四十个县市，似应派较多干部分往各县市，发动群众，改造政权，组织武装，解决土地问题，掌握工商业，将这一带建设成民主东北的重心。这主要应从工作较深入、干

---

[1] 彭、林，指彭真、林彪，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和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2] 杜聿明（1904—1981），陕西米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3] 哈，指黑龙江哈尔滨。

部较多的南满[1]方面抽调干部（南满工作不要放松），是否可行，请加考虑。这一计划是从我能确保长、哈、齐三市至少确保哈、齐二市来设想的。至于三市是否能确保，决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敌人，故争取战争胜利，是基本环节。

（三）东北局如移长春，应住在郊外安全地点统筹全满[2]工作，解决有关全局各项重大问题，而不要直接去管长春市工作。如你们觉得长春尚不稳固，暂缓迁移亦可。

中央

卯皓

---

[1]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2] 满，指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

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1]

（1946年4月19日）

亲爱的战友们，不朽的英雄们：

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事业而死，虽死犹荣！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将加深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它将加强中国人民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事业的决心！

你们的死是一个号召，它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将继承你们的遗志，继续奋斗，直到胜利，决不懈怠，决不退缩！

---

[1] 1946年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获释不久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等乘美国飞机从重庆回延安，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本篇是毛泽东为烈士们写的祭文。

挽“四八”烈士联[1]

（1946年4月19日）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丧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为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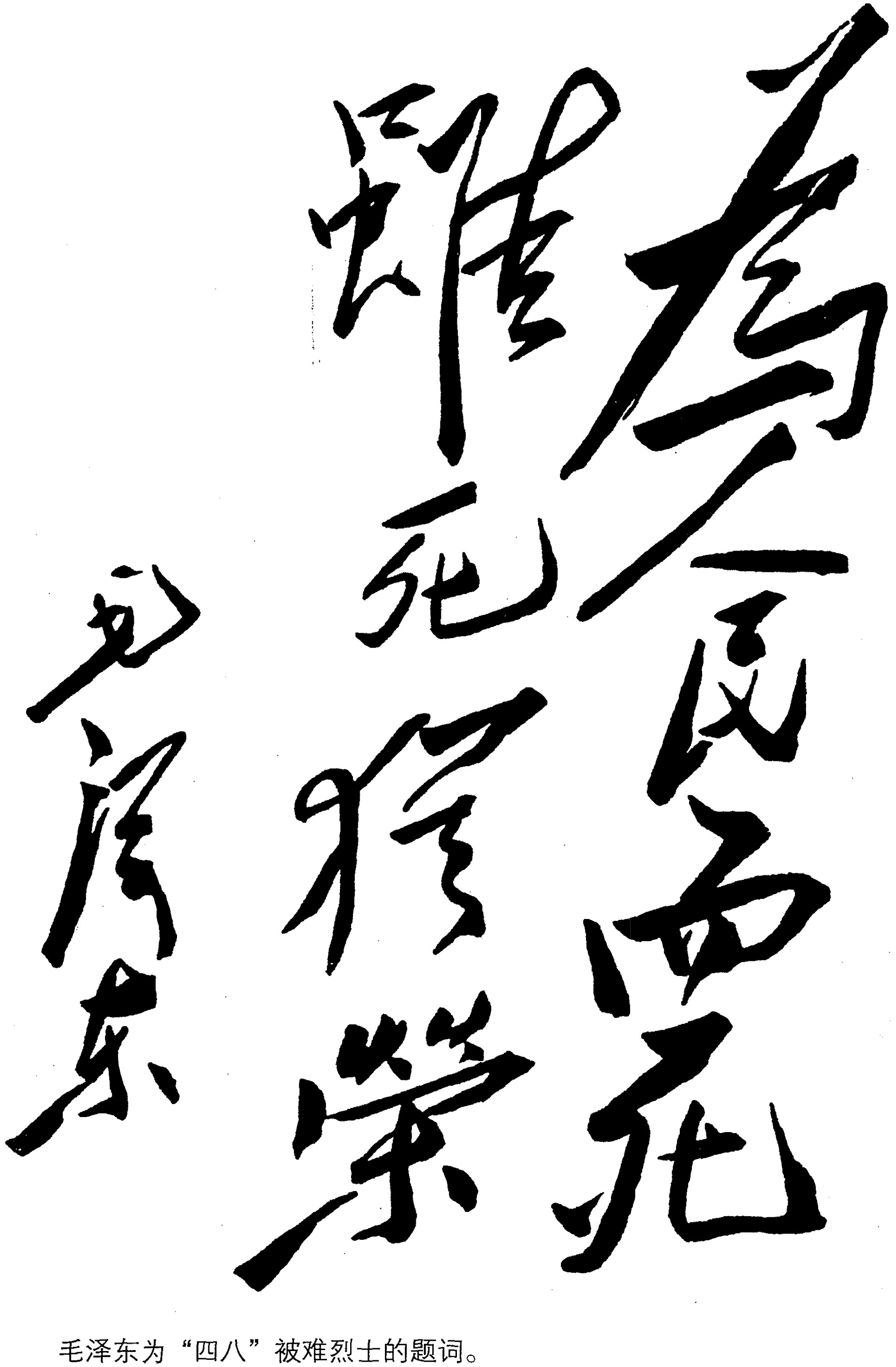
[1] 1946年春，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央委员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于4月8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进步教育家黄齐生等13人飞返延安，因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不幸殉难。同机遇难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治华、赵登俊、魏万吉和叶挺夫人李秀文等。4月19日在延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中共中央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这副挽联。

为“四八”被难烈士题词

（1946年4月19日）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毛泽东



為人民而死
雖死猶榮
毛泽东

毛泽东为“四八”被难烈士的题词。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6年4月20日）

为争取时局好转之可能，东北美机轰炸事除由报纸发表外，请叶向罗伯逊提出抗议，周暂时不用抗议形式。因马歇尔初来，周应和他维持过去那样的良好关系，以期争取东北停战，并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看马歇尔在这些问题上所取态度如何，再考虑我们是否应取强硬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全力争取四平公主岭地区作战的胜利[1]

（1946年4月20日）

东北局及林：

皓晨电[2]悉。（一）国民党兵力，除进至四平街[3]一带之新一军三个师、七十一军一个师共四个师作为第一线进攻部队外，尚有在昌图集结待命之五十二军一个师（即从热河[4]开来的一九五师）似系预备队，尚有六十军一个师（一八二师，新到）位于铁岭、开原、双庙子[5]线守备铁路。（二）大战将在四平至公主岭地区打，不歼灭顽方三四个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凡可调与应调之兵力必须早调，兼程向公主岭集中，争取主动，不要逐渐增兵，陷于被动。（三）对长春（哈齐[6]同样）国民党党政财经文化人员，一般应使他们留下好印象，表示我们的宽大；对进步分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指1946年4月19日晨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巩固与确保长春的方针及有关城市政策等问题给中共中央并林彪等的电报。

[3] 四平街，旧市名，即今吉林四平。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双庙子，镇名，位于辽宁昌图县中部。

[6] 哈齐，指黑龙江哈尔滨和齐齐哈尔。

给以优待；对特务则予以监禁。（四）一切决定于打胜仗，望全力争取之。

中央
卯号

南满速调部队北上作战
长春应布置守城[1]

（1946年4月20日）

彭、林：

（一）南满[2]部队速调一部北上交林直接指挥作战。（二）长春应布置守城，指定守城部队准备粮弹死守，配合野战军歼灭敌人。（三）速调新兵补充主力。（四）彻底破坏沈阳、四平间铁路。

中央
卯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和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的指示

（1946年4月20日）

周：

皓夜电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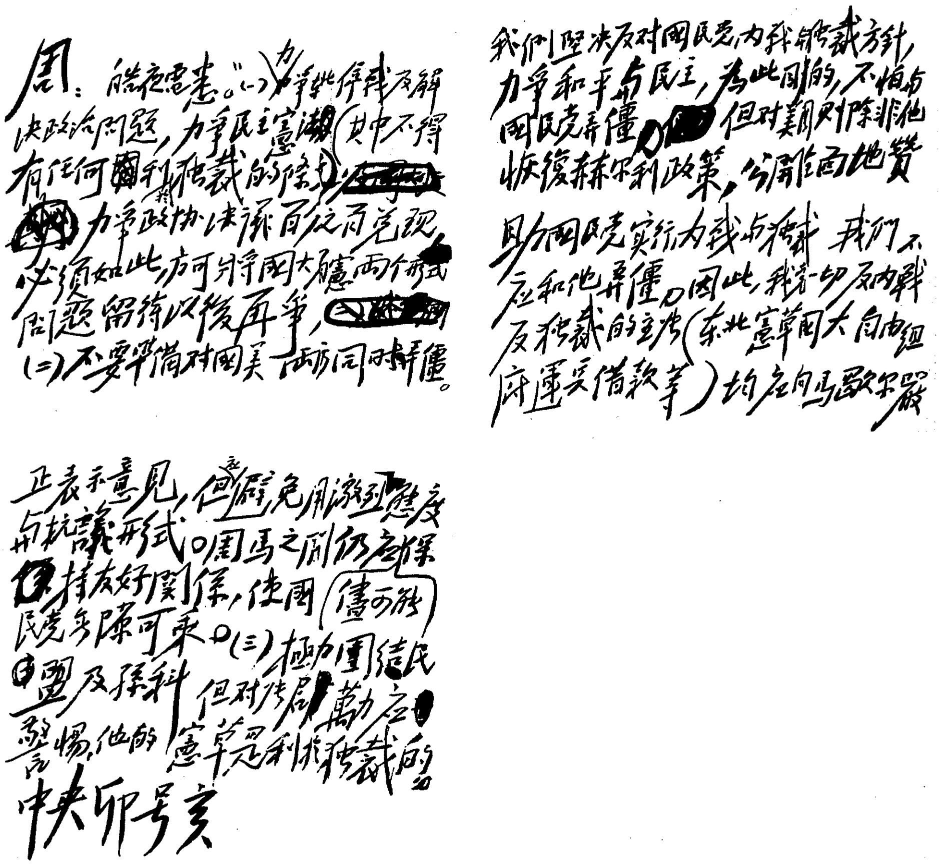
（一）力争东北停战及解决政治问题，力争民主宪法（其中不得有任何利于独裁的条文），力争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兑现，必须如此，方可将国大省宪两个形式问题留待以后再争。

（二）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面同时弄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与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全面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自由、组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

（三）极力团结民盟及孙科，但对张君劢应警惕，他的宪草是利于独裁的。

中央

卯号亥



周：皓夜电悉。（一）力争停战及解决政治问题，力争民主宪法（其中不得有任何有利独裁的条文），力争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实现，必须如此，方可将国大、宪草两个问题留待以后再争。（二）不要单对国美两方同时并僵。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方针，力争和平与民主，为此目的，不怕与国民党弄僵，但对美国则除非他恢复赫尔利政策，公开地赞助国民党实行内战与独裁，我们不应和他弄僵。因此，我党一切反内战反独裁的主张（东北、宪草、国大、改组政府、运兵、借款等）均应向马歇尔严正表示意见，但应避免用激烈态度与抗议形式。周马之间仍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三）极力团结民盟及孙科，但对张君劢应警惕，他的宪草是利于独裁的。

中央卯号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复李富春、黄克诚电[1]

（1946年4月20日）

巧午电[2]悉。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李富春、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2] 巧午电，指李富春、黄克诚18日午时致中共中央电，内称："新一军已到距四平七八里之地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目前最大问题，敌有新力量源源增加，而我无新力量增加。"

长春部队迅即划分为城防与野战两部[1]

（1946年4月21日）

东北局，林，并告李、黄[2]：

（一）长春我军除杨师[3]已南下外，其余迅即划分为城防野战两部分，以明职责。任城防者，准备死守长春，任野战者，随时调赴前线作战。（二）由保中[4]负责，党政协助，乘长春民众热潮，招募志愿兵一万至数万，干部由长春部队、前线各旅及总部派出，组成多数之新兵团，每团千五至二千人，略加训练，源源开赴四平前线补充各旅，时间愈快愈好，能于十天内外办出成绩否。此外，永吉哈市[5]二处亦应招募志愿兵，成立几个新兵团。（三）姜鹏飞[6]伪军俘虏，迅速淘汰反动落后分子，加以必要政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李、黄，指李富春、黄克诚，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3] 杨师，指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长杨国夫。

[4] 保中，即周保中，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吉辽军区司令员。

[5] 永吉即永吉县，位于吉林省吉林市东北部。哈市即黑龙江哈尔滨市。

[6] 姜鹏飞，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十七军军长。该军系由伪“铁石部队”改编组成。

训练，至可用时补充前线。

中央
卯马

宜多调部队北上保卫长春哈尔滨[1]

（1946年4月21日）

林、彭：

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2]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中央

卯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歼灭新一军的作战部署[1]

（1946年4月21日）

东北局及林：

新一军是缅甸远征军[2]，蒋军主力，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养精蓄锐，待其疲劳不堪，粮弹两缺，选择良好地形条件，以数日之连续战斗，将其各个击破，全部或大部歼灭之，就可顿挫蒋方攻势。望照林电令杨国夫曹里怀[3]及第八旅等星夜南下，南满[4]两个旅兼程北上，必要时还应加调部队，总期集中优势兵力，争取这一有决定性的战役胜利。

中央

卯马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缅甸远征军，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派赴缅甸对日军作战的军队。

[3] 杨国夫，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师长。曹里怀，当时任吉林军区司令员。

[4]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对东北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意见

（1946年4月23日）

彭真同志，并告林：

东北局近来几次指示我都看了，都好。特别是卯皓五条指示[1]很好，望切实执行。速将南北主力依林彪电向四平集中，速招新兵补充前线，速组织民兵及地方部队剿匪保乡，速发动四平以北哈市以南广大群众为保卫长、哈而战，速在全满解决土地问题，放手地大量地用本地人做事。取得长、哈后，一定有许多人把眼光集中于大城市，忘记乡村，忘记艰苦工作，须再三指出纠正。

毛泽东

卯漾

---

[1] 指194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各级党政军领导的指示。其主要内容为：一、除一部分干部及部队负责进行长哈齐等城市之攻取与巩固工作外，其他应在原地区加紧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分配敌伪土地，深入清算运动，肃清敌伪残余，特别是迅速肃清土匪，迅速加强战时各种后方建设，加强交通运输，尤其是铁路之管理。二、各地地方武装，应大量抽出编成独立团、营，以便及时补充主力。三、除加强战区工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破坏交通运输外，必须在四平以北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准备新的战场，以便大举歼灭敌人。四、应用防匪自卫的名义大量发展、组织民兵，从老部队中抽出一些下级干部和党员战士作民兵骨干。五、除个别地区外，地委、军分区一级一律取消，在省委和县委之间可设立中心县委。

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4月23日）

关于国大问题：我们希望在和平民主条件下，各党派合作开国大，但现在一切重要问题都未解决，东北在打仗，宪草未定，政府未改组，自由无保障，五五[2]时间太促，决不能开，必须延期，请与民盟协同力争延期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要求延期召开国大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2] 五五，指国民党拟于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

致林彪等电[1]

（1946年4月23日）

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彪并告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死守本溪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1]

（1946年4月26日）

程、萧、罗，并告林、彭[2]：

养电[3]悉。我以两个战斗力不强之团，从卯巧起死守四平，至卯有已守了八天。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一部（例如两个团）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不在远。

中央

卯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程世才、政治委员萧华和副司令员罗舜初的电报。

[2] 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4月22日程世才、萧华、罗舜初给林彪、彭真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敌可能抽三四个师对本溪作新的大规模进攻。以我现有兵力对敌作战，只能求得迟滞敌人，争取时间，并在运动防御中消灭部分敌人，但本溪难以确保。

致林彪电[1]

（1946年4月27日）

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一至二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4月28日）

马歇尔说为蒋设想，总要接收一些地方才行。你应告马，蒋除占沈阳及北宁线外，近一个半月又占我抚顺、鞍山、辽阳、海城、营口、铁岭、昌图、开原直至四平附近。这一带是满洲主要工业区，我占地面积虽较宽，但工业甚微，故我决难再让。东北军民对蒋军屠杀政策甚愤慨，要求设立民主机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重庆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真、林彪电[1]

（1946年4月28日）

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为有利。如打下去，须准备五月间顽方能增加一个军的兵力（九十三军卯号[2]第一批上船，估计全部到东北当在五月中旬及下旬）。如我能于五月上半月歼灭及击溃现攻四平之新一军，则以打一仗再停战为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卯号，即4月20日。

应慎重使用生力军[1]

（1946年4月28日）

林：

目前情况，马歇尔虽急于停战，但蒋[2]尚想击破我主力，打到长春。因此，我从长春及南满[3]调来的生力军集中后，我们意见只在有充分把握能击溃新一军并歼灭一大部根本改变战争局面这样的条件下，才应当使用生力军，否则不宜轻易使用，留待将来使用为有利。你的计划如何盼告。

军委

卯俭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4月29日）

（一）为反对国民党阴谋围击五师[2]，本日已发表公开声明；（二）迅向马歇尔交涉保证五师不被围攻，并迅即转移；（三）请考虑是否可以向马歇尔借美金百万元，为五师粮食及转移之用，六个月后由苏鲁两省筹还；（四）五师问题办妥你再赴东北。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包围封锁下供应极端困难，处境十分危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因中原军区部队大部系原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当时习惯上仍将中原军区部队称为五师。

中原军区部队应争取合法转移[1]

（1946年4月30日）

郑、李、王：

（一）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二）假如顽军破裂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向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二者利害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三）五月上半月必须将二万人复员完毕。（四）王震不要来延[2]。

中央

卯三十

---

[1]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调集重兵加紧包围和蚕食以豫鄂交界的宣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企图首先消灭中原军区部队，打通向华东、华东北进军的通道。为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份给中共中央中原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司令员李先念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电报。

[2] 延，指陕西延安。

坚守四平目前不要举行大规模进攻[1]

（1946年4月30日）

林：

感电悉。（一）击退二十六日敌之进攻，并有缴获甚慰。（二）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三）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四）控制强大机动部队，养精蓄锐以为将来之用，目前不要向敌人举行大规模进攻。

中央
卯三十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立即准备对平古线及南口等地区举行攻击[1]

（1946年4月30日）

聂、刘，程、萧：

蒋介石拒绝马歇尔、民盟[2]及我们三方都同意之东北停战方案，继续在东北进攻，并继续调兵。冀热方面除热河[3]已调一九五师及八十八师外，平津地区之军队亦有调一部赴东北可能。望你们立即准备，如顽方再调军队，聂刘须对平古线[4]及南口地区举行攻击，程萧须对石觉[5]举行攻击，并将准备情形电告。电台每日联络。

中央
卯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程子华、司令员萧克的电报。

[2] 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

[3]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平古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古北口的铁路。

[5] 石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军军长，该军此时位于热河境内。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

（1946年4月）

（一）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所谓妥协，是指经过和平协商达成协议。所谓较早较迟，是指在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内，或者更长时间。

---

[1] 这个文件是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而写的。1946年春季，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日益加紧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鼓吹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有一些同志，由于过高地估计帝国主义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爆发新的世界战争，因而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的面前，表示软弱，不敢坚决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个文件里，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只要世界人民力量向世界反动力量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就可以克服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同时，又指出，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取得某些妥协，但是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这个文件，当时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1947年12月的中共中央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由于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将全文收入了中共中央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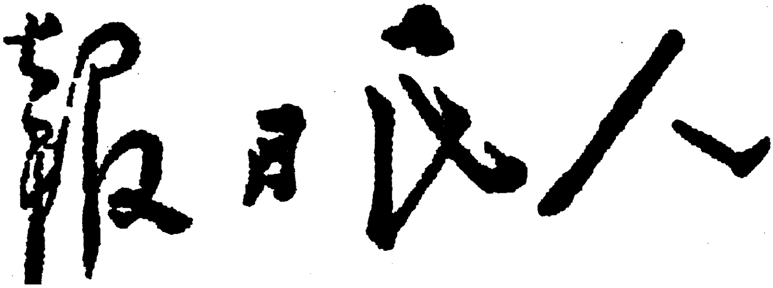
（二）上述这种妥协，不是说在一切国际问题上。这在美、英、法继续由反动派统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这种妥协，是说在若干问题上，包括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但是，这一类的妥协在目前短时期内还不会很多。美、英、法同苏联的通商贸易关系则有扩大的可能。

（三）美、英、法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

（1946年4月）

人民日报



毛泽东第一次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6年4月间，晋冀鲁豫中央局正准备办一张机关报，薄一波受社同志的委托，请毛泽东给该报题写一个报头：《晋冀鲁豫日报》或者《大日报》。毛泽东听后欣然应允题写报头，却认为报纸名称不一定要冠上地区名字。毛泽东提议用“人民日报”。这样《人民日报》就诞生了。

关于练兵的指示[1]

（1946年5月1日）

各局：

关于练兵指示：

（一）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二）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

（三）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

（四）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上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

（五）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2]，练守城，练夜战，政治提高战胜顽军、保卫解放区之决心与信心；

（六）执行情形速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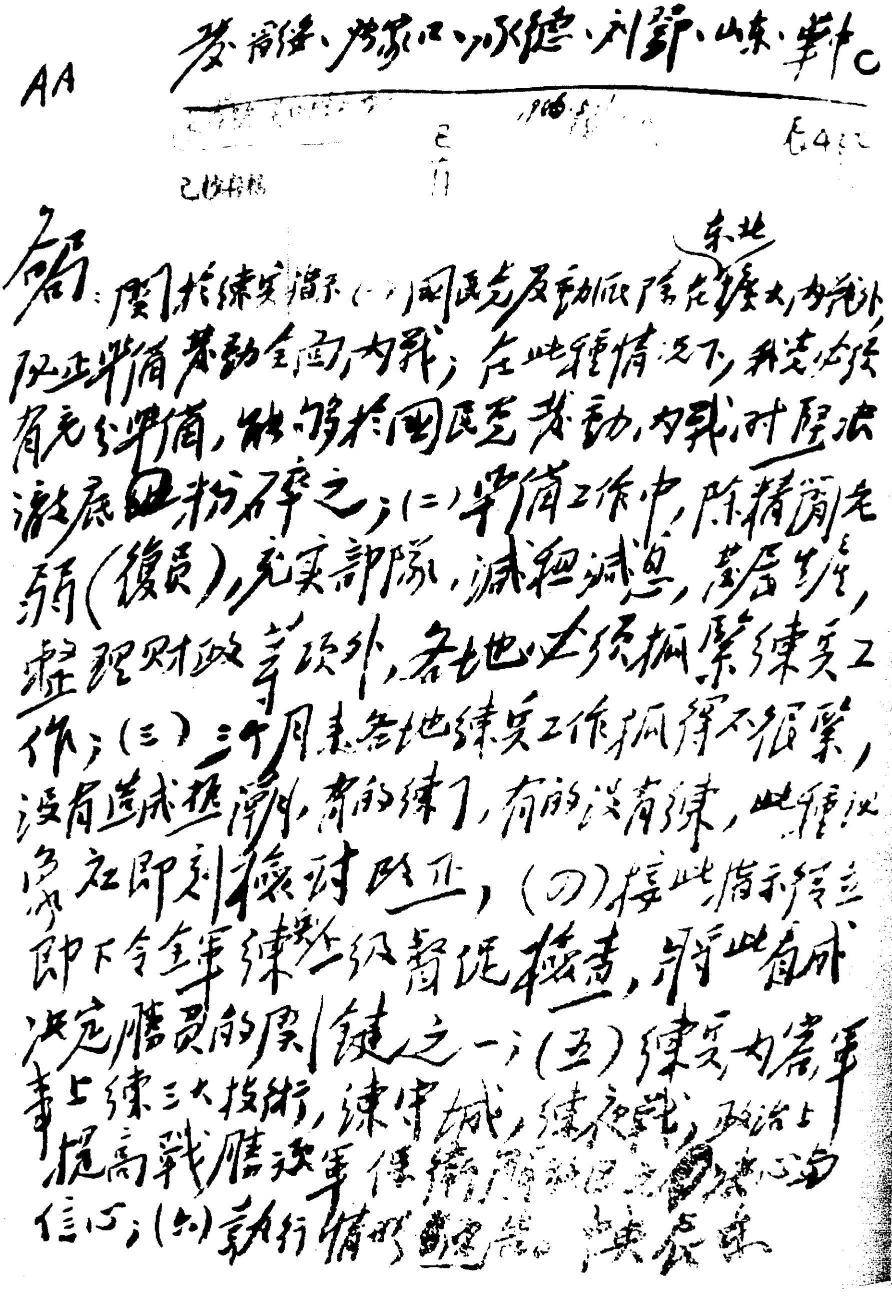
中央

辰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的电报。

[2] 三大技术，指射击、刺杀和投弹三项军事技术。



AA　发晋绥、张家口、承德、刘邓、山东、华中

1946.5

已发　毛4

各局：关于练兵指示：（一）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大打外，正在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二）准备工作中，除精简老弱（复员），充实部队，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理财政等项外，各地必须抓紧练兵工作；（三）三个月来各地练兵工作抓得不很紧，没有造成热潮，有的练了，有的没有练，此种现象应即刻检讨改正；（四）接此指示后立即下令全军练兵，各级督促检查，将此看成决定胜负的关键之一；（五）练兵内容，军事上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政治上提高战胜蒋军[illegible]决心与信心；（六）执行情形电告。中央　辰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练兵的指示》的手稿。

在四平本溪坚持奋战
争取有利于我之和平

（1946年5月1日）

林[1]：

感电[2]悉。（一）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3]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二）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4]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三）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此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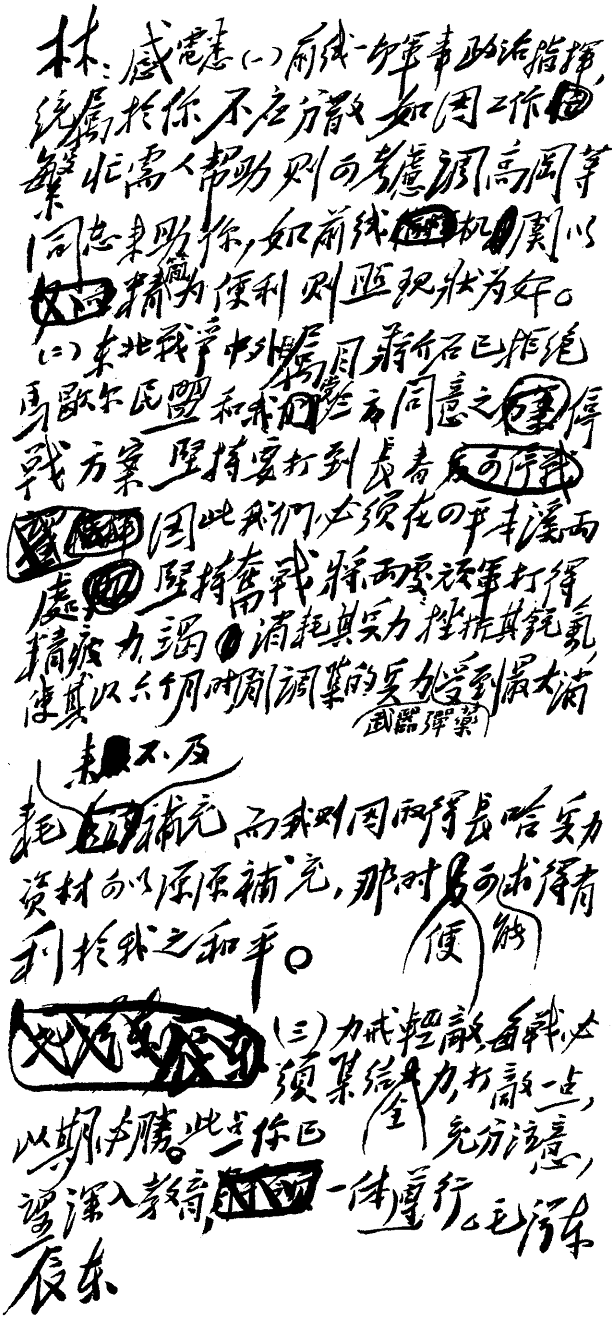
[2] 指1946年4月27日林彪关于四平战况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昨日白天，敌向我城东阵地进攻，经死战后，将敌击退。昨日杨国夫部袭击城北三道林子阵地未奏效，拂晓时自动撤出。现我加筑工事，死守顽强抗击敌人。

[3] 高岗，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司令员。

[4] 民盟，即中国民主同盟。

点你已充分注意，望深入教育，一体遵行。

毛泽东
辰东



林：感電悉（一）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於你，不应分散，如因工作繁忙需人帮助，则可考虑调高岗等同志来助你，如前线机关以精简为便利，则照现状为好。（二）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所提和我们所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敌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实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实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实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於我之和平。（三）力戒轻敌，每战必须集结全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此点你已充分注意，望深入教育，一体遵行。毛泽东

毛泽东起草的《在四平本溪坚持奋战争取有利于我之和平》的手稿。

同意中原局对顽军进攻所取方针[1]

（1946年5月2日）

中原局：

一日两电[2]均悉。顽进攻时在原地打几仗，不轻走，以免中敌挑拨之计和自取困难，万不得已向西突围方针甚好，即照此执行，但一切准备工作宜快。

中央
辰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电报。

[2] 指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给中共中央的两份电报。电报说，部队准备在敌进攻时在原地打一两仗，不轻易走，万不得已时再突围向西转移。

于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1]

（1946年5月3日）

林、彭：

艳日林来电[2]悉。自蒋介石拒绝停战后，东北我军须作长期打算。前方不要攻坚，除必须数量之守城部队外，应控制强大机动部队，以为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之用。除坚持四平阵地外，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后方必须保证新兵与弹药之充分接济，必须迅速建立兵工厂，自造弹药、地雷及必要枪械。后方一切机构应用全力为前线服务。总之，一切为着前线胜利。

中央
辰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指1946年4月29日林彪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由于近日无月亮不便我军夜战，又由于敌军相互靠拢，构筑阵地，故在10日内歼灭或击溃新一军可能性不大。

坚守本溪挫敌锐气[1]

（1946年5月3日）

萧华同志及各旅首长，并告林、彭[2]：

辰东电[3]悉。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望鼓励士气，争取胜利。各部在进行攻击时，应集中主力打敌一点，以期必胜，切戒处处攻击，分散兵力；在进行防御时，应学习四平范例，以少对多，死守不退。只要你们能在本溪地区坚守十天至半月时间，敌之锐气必受挫折，我之胜利就有希望。我詹才芳[4]率两个旅在榆锦线[5]大破路协助你们。

中央
辰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政治委员萧华等的电报。

[2] 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5月1日萧华关于坚守本溪给所属各部队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

[4] 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5] 榆锦线，指山海关（榆关）至锦州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继续不断破毁锦榆段铁路[1]

（1946年5月3日）

程、萧，并转詹才芳同志：

詹三十日电悉。破路又有成绩，甚为欣慰。东北正在大战，五六两月将是重要关键，务望鼓励士气，继续不断破毁锦榆段[2]。为着将破路范围扩展至兴城、锦县起见，请考虑从两个旅中抽出一部向北发展，多带地方工作人员，将兴城、锦县铁路线以西，朝阳、凌源铁路线以东地区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并组织游击队，建立巩固根据地。该地区目前情形如何，望詹电告。

中央
辰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司令员萧克并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电报。

[2] 锦榆段，指锦州至山海关（榆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关于热河战役的意见[1]

（1946年5月3日）

聂、刘，程、萧，并告叶、罗，林、彭[2]：

（一）同意冀热辽分局辰东电，在一星期内发动对朝阳、平泉铁路线上顽军之攻击及彻底破坏该段铁路线。理由是顽方违约调动两个师去东北打内战，为阻止再调动，我不能不破路。（二）攻敌及破路时，各部应集中力量攻击某几点，每一部只应选择一点举行攻击，得手后再打第二点、第三点，切忌处处都打，分散兵力，并应保留预备队，以利继续战斗。（三）黄朱文[3]纵队使用于此战役，暂不他调。（四）詹才芳[4]部集中于破毁锦榆路。（五）平古线[5]及南口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司令员萧克的电报。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的电报中说："詹才芳两个旅二十九日又在绥中破坏大段铁路。一星期内，热河方面亦将对十三军举行攻势，并破毁锦热路。"

[2] 叶、罗，指叶剑英、罗瑞卿，当时分别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和参谋长。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

[3] 黄朱文，指黄永胜、朱涤新、文年生，当时分别任冀热辽军区热辽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4] 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5] 平古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古北口的铁路。

方面目前仍应保持平静，但聂应令该线我军采取某种适当动作，占领若干空白地点，起示威作用，使该线顽军不敢调动。（六）热河战役[1]完成后再与国美开会，恢复和平。

中央
辰江

---

[1] 热河战役，亦称热东战役，指1946年5月冀热辽军区部队在当时热河省东部的朝阳、平泉一线发起的以破袭交通线为主的作战。

对断敌后路围歼四平之敌的意见

（1946年5月4日）

林彪同志：

我军准备于双庙子以南建立据点，断敌后路，包围四平之敌而聚歼之，这是一个勇敢的计划[1]。但应估计当我断敌后路时，敌必死力来争，如我能战胜来争之敌，则四平之敌非全线撤退不可；如我不能战胜来争之敌，则战局仍将成胶着状态，于我不利。为了使我能于双庙子以南确定地战胜来争之敌，引起整个战局变化起见，使用于该方面之兵力，似宜多于两个旅，即于南满调来之两旅外，再加一部兵力。这样，我将以强大力量出现于敌后，保证建立坚固据点及歼灭来争之敌（例如歼灭其一个师），则四平之敌必将退走。我于该敌退走之际举行反攻，可获大胜。此种反攻，须准备连续打好几天，似宜准备一部分干粮。以上意见系供参考之用，请按实际需要决定之。

毛泽东

辰支

---

[1] 1946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的电报中说："集中两个旅于双庙子以南开辟第二战场，断敌后路，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但该两个旅新到疲劳，似宜给以数天休息与准备时间，然后举行攻击。"

致萧华等电[1]

（1946年5月6日）

本溪虽失[2]，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萧华并告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本溪于5月3日被国民党军占领。

关于土地政策的发言要点[1]

（1946年5月8日）

（一）七大时说“寻找适当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央“五四”指示就是这种为群众所创造，为中央所批准的适当方法。现在类似大革命时期，农民伸出手来要土地，共产党是否批准，必须有坚定明确的态度。

（二）在政治上十分需要，目前国民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帮助，占有四分之三人口的地区。我们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与之斗争，才能改变这种他大我小的形势。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

（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必须使全党干部认识其重要性。

（四）由于广大群众的行动推平了土地（即平均分配）的地方，不要去批评农民的平均主义。相反的农民这种彻底消灭了封建势力的行动应该批准。但无止的推平，不联合中农的推平，不照顾应当照顾的各色人等的推平，就要不得，群众未提出推平的地方照群众所提方法办理，也不要推平。

---

[1] 这是毛泽东、刘少奇在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指示》时发言的要点。

（五）不要怕自由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暂时的动摇，只有我们坚决实行土地改革，使农民得到土地，我之力量更加强大巩固时，我们才能有力量，更可能争取团结他们。但对自由资产阶级及中间派应作正确而有力的解释，指出减租与耕者有其田都是实行政协决议，其方式又与内战时期大不相同。

（六）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必须与土地政策农民运动有原则区别，切忌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订得太高，应该是劳资合作，并订出共同生产计划（原料足，产品多，成本低，质量好，销路广），努力生产，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劳资两利。只有如此才能与外国和本国的垄断资本作斗争，使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

加紧准备对付傅作义的进攻[1]

（1946年5月9日）

贺、李，并告聂[2]：

（一）你们须加紧准备对付傅作义[3]之进攻。（二）速在卓资山[4]、集宁、凉城、丰镇等处构筑强固工事，并预先指定守城部队（数目不要太多），屯集粮弹，准备死守，以待主力从机动位置歼灭敌人。此次东北四平街战役，我以两个团（一星期后增加一个团）守城，敌五个师三面包围，打了二十天不得逞，我主力正在外围寻求歼敌机会，望通知部队效法。（三）聂对南口方面之敌，亦须作同样准备。（四）迅速剿灭察[5]北土匪。（五）加紧练兵，提高技术与士气，准备粉碎进攻之敌。望将各项准备工作电告。

军委

辰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等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4]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5]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致东北局等电[1]

（1946年5月9日）

六十军及九十三军系云南部队，归孙渡指挥，孙驻锦州，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驻新民。你们应设专门机关派专门负责人进行该军工作，东北干部中一切滇籍干部尽可调作此项工作。收集该军每一个逃兵，加以训练，进行兵运。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开展对滇军的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林彪并转吕正操、萧华电的主要内容。

布置热东战役要兼顾其他工作[1]

（1946年5月10日）

冀热辽分局，并告聂、刘，林、彭[2]：

（一）当着你们布置及执行热东战役的时候，不要忘记热西的剿匪，不要忘记热中、热西、热北、冀东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工作，同时须着重领导生产。（二）热东战役胜利后，准备以黄朱文纵队[3]开入辽西作战（仍属你们指挥），位于锦沈铁路线以北地区，担任破毁锦沈线铁路及发动该地区群众。该纵队何时可以去辽西及应做些什么准备工作，望考虑电告。（三）詹才芳[4]纵队应扩展其破路范围至兴城、锦州线，并应注意该地区群众工作及组织地方游击队。

中央
辰蒸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冀热辽分局的电报。

[2] 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林、彭，指林彪、彭真，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和第一政治委员。

[3] 黄朱文纵队，指冀热辽军区热辽纵队，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朱涤新、副司令员文年生。

[4] 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切断四平敌军后路钳制本溪援敌

（1946年5月12日）

林[1]：

（一）望将最主要力量放在开原、昌图地区，切断四平敌之后路，歼灭由沈阳北进之敌。（二）南满[2]应取积极动作钳制现在本溪地区之敌五个师，使其不能调动或不能多调动。（三）热河我军明日开始进攻十三军，得手后向辽西发展，协助你们。

毛泽东

辰文亥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

[2]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这里指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5月12日）

请考虑强调停战。不停战，宪草、整军等事无从谈起，以打破国民党一面在东北大打，一面又和各党派谈宪草、要我党交整军材料之阴谋。我们应强调东北停战是先决问题，不停战一切不谈，整军材料也不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速派部队相机占领锦西[1]

（1946年5月13日）

萧、程，即转詹才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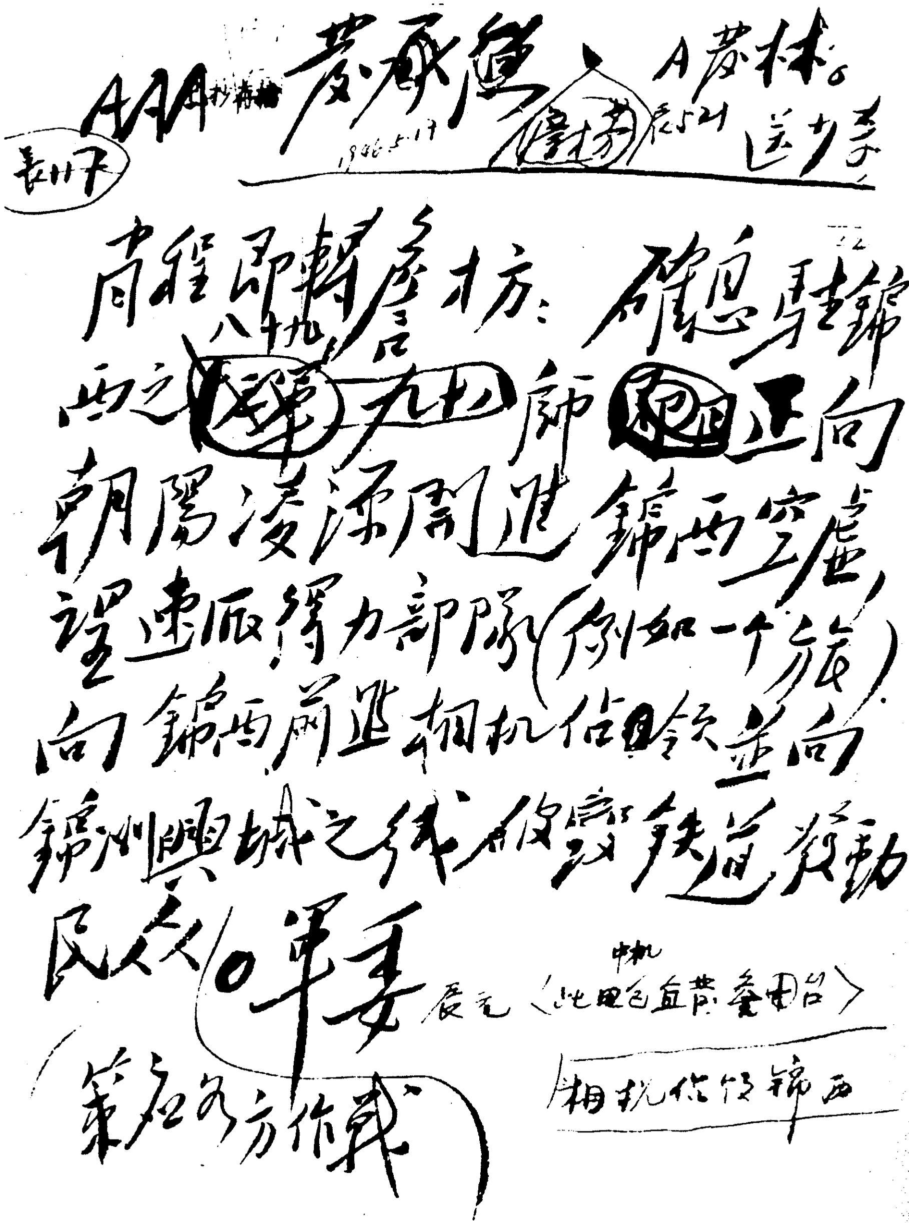
确息，驻锦西之八十九师正向朝阳、凌源开进，锦西空虚。望速派得力部队（例如一个旅）向锦西前进，相机占领，并向锦州、兴城之线破毁铁道，发动民众，策应各方作战。

军委

辰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和政治委员程子华即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电报。


长117

AAA 黄程詹才芳 A 黄林。 1946.5.17 辰21 送少奇

黄程即转詹才芳：确息驻锦西之八十九师正向朝阳凌源开进，锦西空虚，望速派得力部队（例如一个旅）向锦西前进相机占领，并向锦州兴城之线破毁铁道，发动民众，策应我方作战。

军委
辰元

中机〈此电已发黄詹电台〉

相机占领锦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速派部队相机占领锦西》的手稿。

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

（1946年5月15日）

各局，周，叶、罗，饶、李、伍[1]：

关于时局及对策：

（一）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2]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

（二）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蚕食”或进攻，我必须坚决将其击退，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内战将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纠纷发生，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

---

[1] 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罗，指罗瑞卿，当时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参谋长。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组长。李，指李立三，当时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政治顾问。伍，指伍修权，当时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参谋长。

[2] 蒋，指蒋介石。

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1]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即对国方代表及国方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丙、东北方面是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热河[2]方面，因彼方源源调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热路[3]加以破击，一俟告一段落，即应转入调整。丁、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必须于今后六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即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六个月又分为两期，五、六、七月为一期，八、九、十月为一期，望各地首先抓紧目前三个月工作，切勿麻痹松懈。戊、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群众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各部分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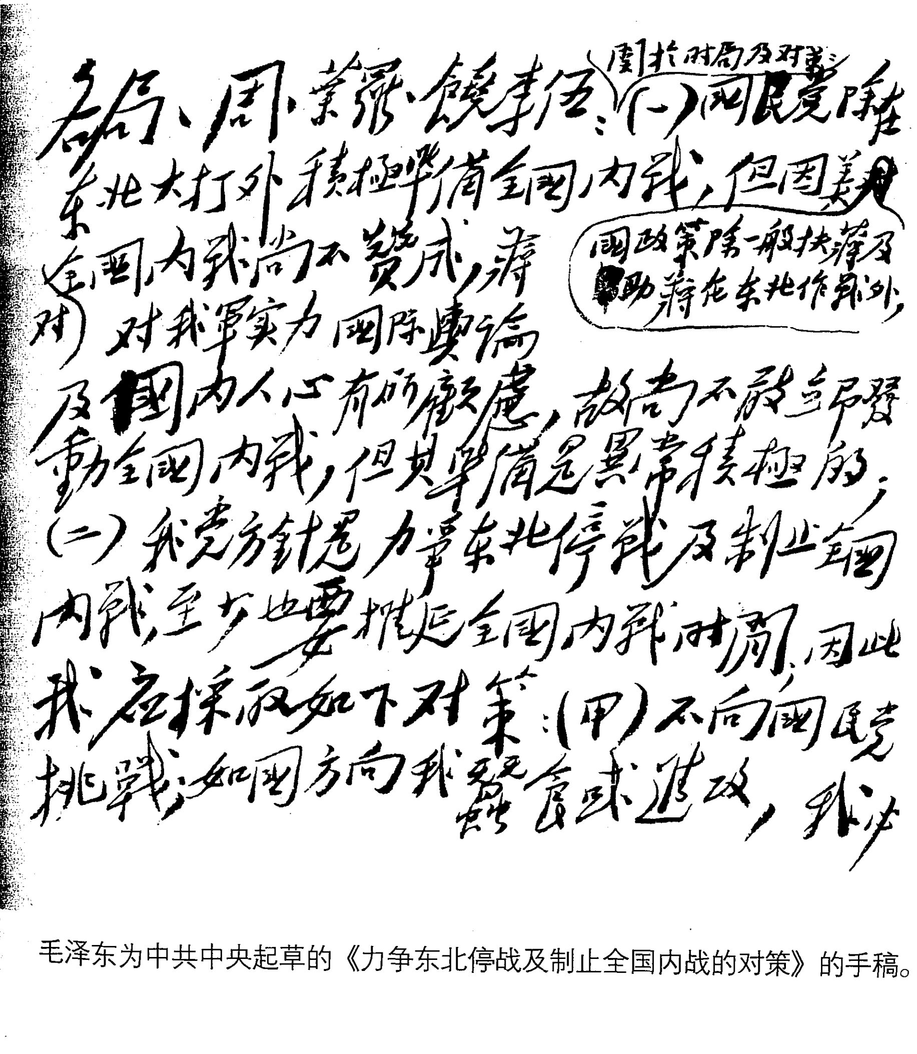
中央
辰删

---

[1] 赫尔利，美国共和党人。1944年11月底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1945年11月离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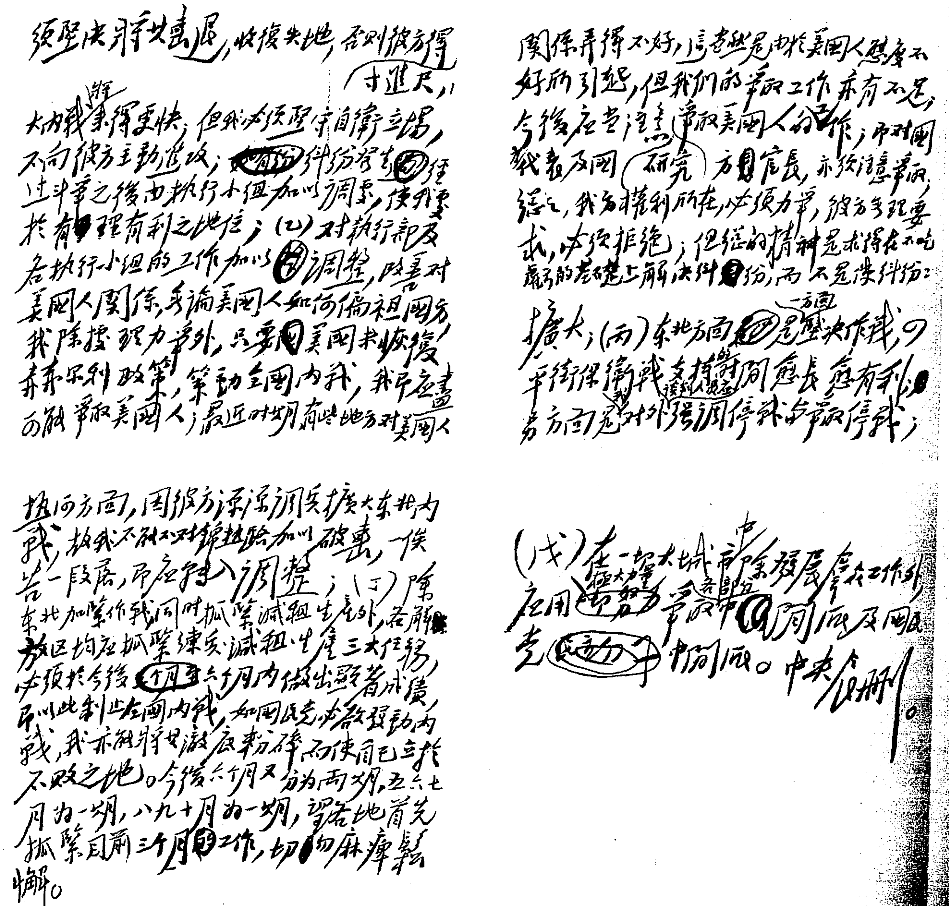
[2] 热河，即热河省。

[3] 锦热路，指锦州至承德的铁路，即今锦承线。



各局、周、叶罗、饶李伍：关于时局及对策：（一）国民党除在东北大打外积极准备全国内战，但因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蒋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其准备是异常积极的；（二）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迟全国内战时间，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如国方向我发动局部进攻，我决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的手稿。



须坚决打击其进攻，收复失地，否则彼方得寸进尺，大打内战来得更快；但我必须坚守自卫立场，不向彼方主动进攻；一切纠纷均经过斗争之后由执行小组加以调处，使我处于有理有利之地位；（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其扶蒋反共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们应当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争取美国人的工作；而对国共代表及国方研究官长，亦须注意争取，总之，我方权利所在，必须力争，彼方无理要求，必须拒绝；但总的精神是求得在不吃亏的基础上解决纠纷，而不是使纠纷扩大；（丙）东北方面一方面是坚决作战，保卫战支持谈判人员，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对外强调停战和争取停战；

热河方面，因彼方源源调兵扩大东北内战，故我不能不对锦热路加以破坏，一俟告一段落，即应纳入调整；（丁）除东北加紧作战同时抓紧减租生产外，各解放区均应抓紧练兵、减租、生产三大任务，必须于今后六个月内做出显著成绩，以此制止全国内战，如国民党必欲发动内战，我亦能将其彻底粉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六个月又分为两期，五六七月为一期，八九十月为一期，望各地首先抓紧目前三个月的工作，切勿麻痹松懈。

（戊）在一切大城市中，除发展会外工作外，应用极大力量争取中间派及国民党中间派。中央巳删。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的对策》的手稿。

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及我方的对策[1]

（1946年5月15日）

林、彭：

（一）十三日马歇尔找恩来[2]谈话，马称：东北问题，已无法再向蒋[3]进言，除非中共军队撤出长春，我可提议，政府亦可现时不进，只让执行部[4]派一部分人驻长；同时，也须将解决东北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等方案谈好；政治、经济、交通如在渝所谈，而军事则须将整军计划、驻军地点及双方比例谈定；如中共能同意此项建议，则全国停战停运，恢复交通，平毁碉堡，整军复员，自由保证及政协决议等问题，亦须同时实施等语。（二）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三）现在是马歇尔第二次出面调停，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望复。（四）作战方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恩来，即周恩来。

[3] 蒋，指蒋介石。

[4] 执行部，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务望用全力击溃新六军，并坚守四平，同时令萧华[1]率南满各旅积极动作。热河[2]方面及詹才芳[3]纵队正在积极动作，可能将九十三军大部吸引于锦州地区（该军一个师守备绥中，其余两师大约月底可到锦州）。在此形势下和美蒋成立妥协较为有利。

中央

辰删

---

[1] 萧华，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政治委员。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3] 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望热河各部积极行动配合东北我军作战[1]

（1946年5月15日）

萧、程，并转詹才芳：

（一）东北战局异常紧急，务望萧程指挥热河[2]各部积极动作，尽量歼灭顽军有生力量及彻底破毁铁路。（二）至作战第二阶段时，望考虑抽出黄朱文纵队[3]东出阜新、义县地区举行袭击，吸引九十三军（云南军，其主力目前正在葫芦岛登陆）。（三）詹纵队主力速向锦西、锦州地区推进，广泛破击北宁路[4]吸引九十三军。是为至要。

军委

辰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和政治委员程子华并转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电报。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3] 黄朱文纵队，指冀热辽军区热辽纵队，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朱涤新、副司令员文年生。

[4] 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复周恩来电[1]

（1946年5月15日）

可向马歇尔提出：（一）东北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陈昌奉题词[1]

（1946年5月17日）

昌奉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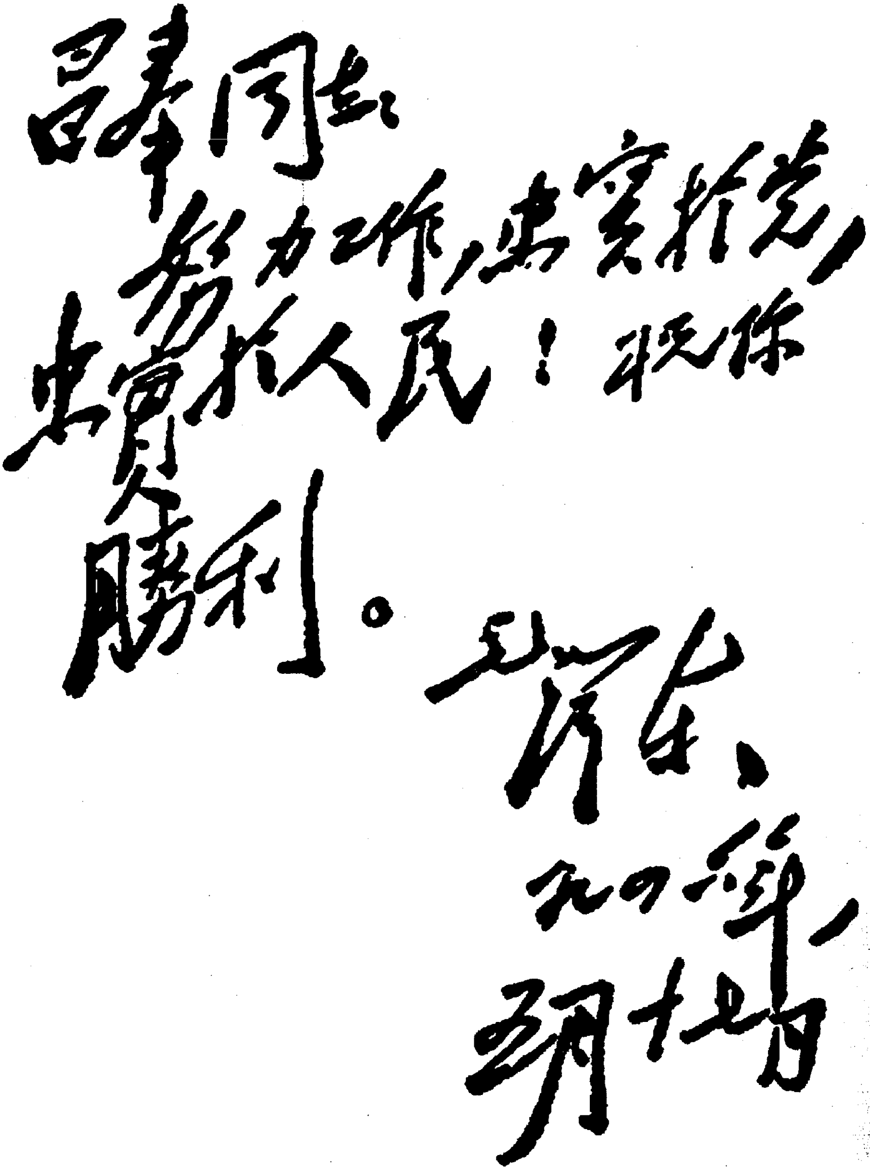
努力工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祝你胜利。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长征时期的警卫员陈昌奉的题词。



昌奉同志：
努力工作，忠实于党，
忠实于人民！祝你
勝利。
毛泽东
九四六年
三月十七日

毛泽东为陈昌奉的题词。

望研究破坦克之术[1]

（1946年5月18日）

林：

（一）十六军一个师攻我北平城南之庞各庄[2]，使用战车攻击，遇我坚强工事，攻击无效，现我正反攻中。顽军在四平方面准备使用坦克，望研究破敌之术。（二）我热河破击战已进行四天，除吸引十三军全部不能动外，又吸引九十三军新到之一个师开至热河[3]。在此形势下，九十三军只能对付热河及北宁路[4]。（三）据息，新六军之十四师使用于西丰方面，望注意。

军委

辰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庞各庄，镇名，位于今北京市大兴县南部。

[3]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坚守四平不可能时应主动放弃[1]

（1946年5月19日）

林，并告彭：

巧电[2]悉。（一）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二）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三）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四）长春以南铁路应迅速彻底破坏。[3]

中央
辰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并告第一政治委员彭真的电报。

[2] 指1946年5月18日林彪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

[3] 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另一件电文有五项内容，其中第五项是：“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退出四平后的军事部署[1]

（1946年5月19日）

东北局，林：

（一）四平退出，我兵力获得自由使用，顽占领面积愈大，补给线愈长，将愈困难。（二）鉴于在敌北进以前未能破坏沈阳、四平段铁路，使我吃了大亏，现应动员一切力量昼夜不停彻底破坏长春至四平段铁路，不但搬去铁轨，炸毁桥梁、水塔、车站，而且要广泛掘坏路基，使顽不易修复，此事万不可放松。（三）立即开始在稳固后方建立兵工厂，自己制造枪弹，作长期战争打算。（四）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作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远后方行动。（五）所获大批步枪除补充主力及地方兵团外，应大量武装农民，组织民兵及自卫军。（六）十分注意长哈线[2]两侧十余县的群众工作。

中央

辰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长哈线，指长春至哈尔滨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对顽军进攻取局部报复手段[1]

（1946年5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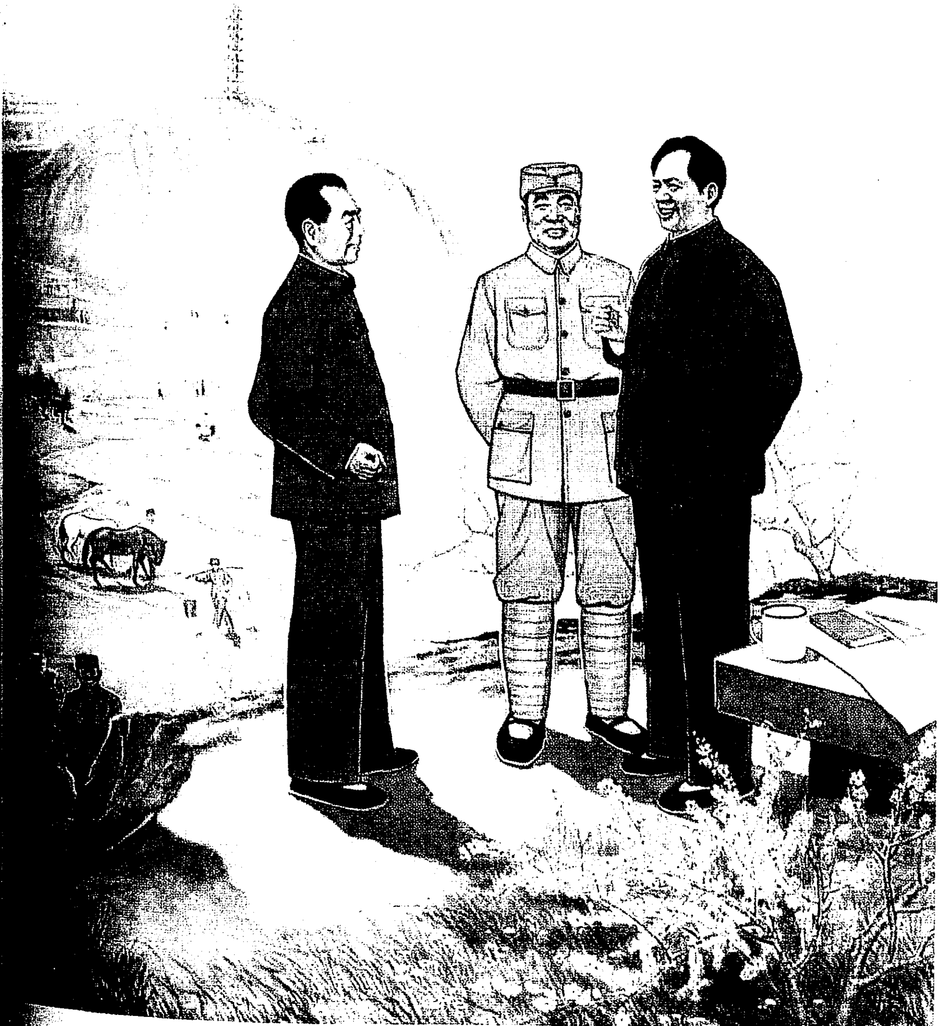
周、叶：

（一）四平已难再守，决定放弃该城，打运动战。（二）最近一星期，顽方连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四城，并向我水东区进攻，每处使用兵力约二万之众，明为挑衅行动。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

甲乙
辰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
代表叶剑英的电报。



《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水粉）

对平古线和热东地区行动的部署[1]

（1946年5月19日）

聂、刘，并告叶、罗，贺、李，萧、程[2]：

十七日十时电[3]悉。（一）郭天民杨成武[4]两纵队应停于现位置，不要动作，平古线[5]及南口正面应保持平静，平汉路[6]不要破毁。（二）对傅作义[7]应保持平静，并加强联络。（三）热东破路是因为彼方违约调动大批部队去东北扩大内战（第五师由热河调攻营口、海城，第一九五师由热河调攻四平街[8]），我应当予以报复并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的电报。

[2] 叶、罗，指叶剑英、罗瑞卿，当时分别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和中共方面参谋长。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萧、程，指萧克、程子华，当时分别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似指1946年5月17日11时聂荣臻、刘澜涛、唐延杰、曾涌泉关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东犯和我军在平绥、平汉路作战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叶剑英、罗瑞卿的电报。

[4] 郭天民，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察纵队司令员。杨成武，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中纵队司令员。

[5] 平古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古北口的铁路。

[6]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7]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8] 四平街，旧市名，即今吉林四平。

止其再调。（四）热东应着重破路，特别破坏朝阳、凌源间及凌源、平泉间两段，应掘毁路基，炸毁一切桥梁，使顽不易修复，并尽可能控制一段。此外则着重收复建平地区。

军委

辰皓

东北目前仍应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放在首位

（1946年5月19日）

东北局，北满[1]分局：

我们虽已得了长、哈[2]两个大城市，但乡村及中小城市工作仍是第一位，切不可将大批干部堆积在长、哈两市。应令各县加紧练兵、剿匪及解决土地问题，今年务必将土地问题全部或大部解决完毕。土地问题解决，兵也有了，匪也容易剿了，大城市也巩固了。为此目的，应从南满、东满[3]群众工作比较深入各县抽出一批干部，调到北满各县做群众工作。长哈路两侧十余县的群众工作，十分重要。

中央
辰皓

---

[1] 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

[2] 长，指吉林长春。哈，指黑龙江哈尔滨。

[3] 东满，指中长路沈阳至长春路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安图、延吉、敦化等地区。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

给聂荣臻[1]并王稼祥[2]的信

（1946年5月19日）

聂，并转稼祥同志：

关于派机接稼祥赴苏治病，自我方交涉后，彼方考虑已久，初则顾虑国际环境，要稼祥夫妇去外蒙登机，但现在已无此种顾虑，决定派机直飞张家口。因此现在只有一个稼祥身体能否坐飞机的问题。请稼祥自己决定告我，即可告远方[3]派机来接。我意只要身体勉强可以乘机，以去苏医治为上策。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46年去苏联治病。

[3] 指苏联。

致萧克、程子华等电[1]

（1946年5月19日）

热河作战之主要目的在于吸引十三军、九十三军并消耗他们，此战役应着重破路与部分歼灭及消耗其有生力量，破路应十分彻底，务使长期不能修复。此战役应延长至月底，再看情形考虑调处问题，不要收束太早，以利援助东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萧克、程子华并告聂荣臻、唐延杰、叶剑英、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致张鼎丞等电[1]

（1946年5月19日）

顽占我萧县、夏邑、定远，应速向执行组提出抗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给新安旅行团[1]的信

（1946年5月20日）

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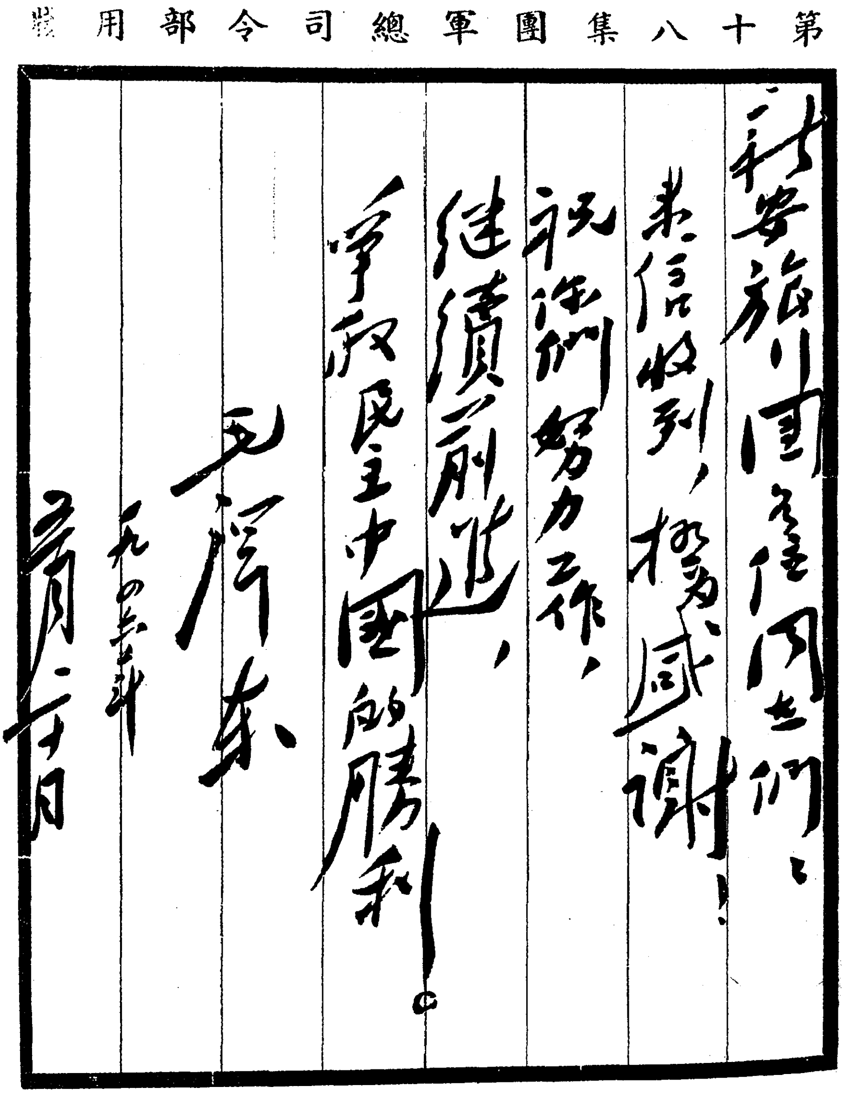
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

---

[1] 新安旅行团，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它的前身是江苏省淮安县的新安小学。1935年10月成立后，该团从淮安出发旅行，宣传抗日救亡，途经18个省、市，行程4.5万里。1953年，该团与其他文艺团体合并组成上海歌剧院。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用箋

新安旅行團同志們：

來信收到，極為感謝！

祝你們努力工作，

繼續前進，

爭取民主中國的勝利！

毛澤东

一九四五年

二月二十日

毛泽东致新安旅行团信的手稿。

放弃四平后我之行动方针[1]

（1946年5月21日）

陈、舒，张、粟、谭[2]：

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各地除对顽方进攻之地区例如定远、夏邑、萧县等处予以还击收复失地外，仍应保持平静，不要有所动作。

中央
辰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政治部主任舒同等的电报。

[2] 张、粟、谭，指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东明作战暂勿举行[1]

（1946年5月21日）

刘、邓：

四平已失，为不给顽方以发动大战之借口，东明作战暂勿举行，但对东明、长垣、考城[2]、永年、聊城等处进行侦察准备。

中央
马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1946年5月20日晨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集中第七纵队主力攻取东明，然后再向长垣方向发展。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电中说："同意攻取东明，得手后再考虑夺取长垣，以为顽夺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四城及向水东区进攻之报复手段。"并询问攻取永年、聊城的可能条件。马卯电对原定攻取东明等地的部署作了修改。

[2] 考城，旧县名，1954年与兰封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致聂荣臻、刘澜涛电[1]

（1946年5月21日）

必须将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与剿匪任务联系起来，方能达根除匪患目的。望通令晋察冀热辽全军协助地方党政，动员民众，解决土地问题，至要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聂荣臻、刘澜涛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5月22日）

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让出长春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如中央上次所提，双方不驻兵，中间派任市长；第二种如马歇尔所提，执行小组先去，一切谈好后蒋军再去；第三种蒋军无条件即进长春，这种情况最坏，结果恐谈不好，仍是要打。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东北局提出坚守长春困难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5月22日）

马歇尔二十日声明似是美政府授意，对于马歇尔愿和态度及民盟五人三点主张[2]，我们应表欢迎。

延安宣传即日转向缓和。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对时局的估计及我党的方针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民盟张君劢、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五人提出的三项条件是：（一）共产党军队撤出长春；（二）国民党政府军不再进军长春，但进行和平接收长春；（三）现有东北政务委员会今后移驻长春，但委员会人选应由各方面包括东北地方有代表性的团体在内，进行协商推定。

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电

（1946年5月23日）

君劢、任之、衡山、伯钧、漱溟先生勋鉴：

养（二十二日）电奉悉，东北问题和平解决，为敝党一贯主张，先生等四月俭（二十八日）提议，周恩来同志曾代表敝党允予考虑。不幸为对方拒绝，竟不获协议，自堪惋惜。兹承电示，原则上极表赞同，一切由恩来面商。特复。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5月24日）

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积极准备作战并加强顽军内线工作[1]

（1946年5月26日）

聂、唐，并告贺、李[2]：

国民党积极准备进攻，你们必须积极准备作战。为此，除加紧练兵，加紧剿匪，加紧解决土地问题外，应注意扩大民兵，加以整训，以便将来作战时动员一部民兵，补充前线之消耗。此外，应认真进行顽伪军内线工作，派得力干部专门主持此项工作。

军委

辰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参谋长唐延杰的电报。

[2]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致周恩来等电[1]

（1946年5月26日）

东北方面，我们让到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再不能有任何让步。美蒋要打，让他们打去，要占地，让他们占去。我们绝不能在法律上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1]

（1946年5月26日）

望根据中央五四土地问题指示，通令全军协同地方党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此项通令应在连队中宣布，并解释其重要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军区首长及政治部主任电的主要内容。

东北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准备长期斗争[1]

（1946年5月27日）

东北局，林：

寝电[2]悉。目前军事方针，除以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给以扰乱及破路外，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脱离并远离敌人，争取时间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再行作战。外交方针已告恩来，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总之东北是未了之局，我党须准备长期斗争，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中央

辰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指1946年5月26日子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部队状况和今后作战方针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东北我军经过长期苦战，主力甚为疲惫。敌已占领四平至长春线及郑家屯、西安至海龙线。我西满、北满甚为空虚。同时东、西、北满土匪尚未肃清，今又乘虚弥起，现敌向我军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今后作战方针，请中央指示。

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1]

（1946年5月27日）

东北四平街[2]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目前，我力守大城市则许多中、小城市将被丢掉，许多运动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不能利用，敌如继续增兵对我守军进行包围攻击，则我必然仍要放弃大城市。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电的主要内容。

[2] 四平街，旧市名，即今吉林四平。

准备对付国民党向晋绥晋察冀发动进攻[1]

（1946年5月27日）

贺、李，聂、唐：

为准备对付将来国民党向我发动大举进攻起见：（一）晋绥方面兵力应区分为两部分，即以主力对傅[2]，位于凉城、卓资山[3]、集宁地区，准备俟顽来攻于运动中歼灭之；以一部及地方兵团对阎，位于大同至太原之线阎顽所占各据点附近，多备黄色炸药，练习攻城及爆炸，准备逐一夺取大同及其以南各县城。我晋冀察部队之位于同蒲东侧者，其准备任务与此同。（二）晋冀察部队之位于平古线两侧者，同样多备黄色炸药，练习攻城及爆炸，准备攻占平古路。冀中方面须组成主力纵队，并加强各分区独立团营，加强县区游击队及民兵，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顽军进攻。

军委

辰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的电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1]

（1946年5月29日）

各军区首长：

（一）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在关内积极准备对我大举进攻，因此我应有对敌作战之充分准备。（二）对于在力量对比上可以攻克或炸毁与应当攻克或炸毁之城市、车站、桥梁，各战略区应于电到半月至一月内完成侦察敌情、配备兵力、配备武器弹药（例如黄色炸药）及预拟作战计划等项准备工作，不得有误，对于防御方面之准备工作也是如此。（三）准备情形随时电告。

军委

辰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军区首长的电报。

大量购办黄色炸药着重练习攻城战[1]

（1946年5月29日）

各军区首长：

黄色炸药为攻城之重要武器，各军区应设法大量购办，储存备用，每旅应有数百斤至数千斤。各大战略单位应自己制造黄色炸药。在练兵中，除练三大技术[2]，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之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练习黄色炸药之使用。此事甚为重要，望唤起全军注意。

军委
辰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军区首长的电报。1946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军区首长的电报中再次强调黄色炸药的重要作用，要求各军区向附近和大矿山收集黄色炸药，并向矿工学习使用方法，每旅、团均应设置专门使用黄色炸药的技术人员，并各以自己的经验摘要电告。

[2] 三大技术，指射击、刺杀和投弹三项军事技术。

关于鞍山战斗及俘虏官兵的处理问题的指示[1]

（1946年5月29日）

对六十军[2]之俘虏官兵，予以特别优待，详细调查其内部情形，抓紧顽军反蒋情绪，转变为反内战，号召他们学习高树勋，建立民主建国军。对这些俘虏应举行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负责人分别进行谈话，造成六十军反内战的热烈情绪，然后分途遣送一部比较进步分子回队，每一个据点送回十数名，并给以较多旅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鞍山战斗及俘虏官兵的处理问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2] 六十军，系滇军，同国民党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矛盾。

山东军区以首先消灭吴化文等部为有利[1]

（1946年5月30日）

陈：

梗电[2]所提意见，经与张黎[3]研究，似以首先消灭泰安、大汶口[4]、兖州地区吴化文部[5]一万二千人，张店、周村、南定[6]地区张景月部[7]一万二千人，德州王继祥部[8]六千人，共三万人为有利。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电报。

[2] 指1946年5月23日晨陈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建议内战爆发时，山东拟采取北攻南守战略。根据山东国民党军兵力分散、战力不强，徐州地区敌工事强固等情况，我山东现有兵力，拟以一部配合华中对徐州进行运动防御，而集中30余团围攻济南，至多1个月可以攻克。攻济任务达成后，以主力南下或北上攻平津，一部东进收复济南至青岛铁路线，则全局取得主动自由，便利自卫和持久。

[3] 张黎，指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此时均在延安。

[4] 大汶口，镇名，位于今山东泰安市南部。

[5] 吴化文部，指国民党军暂编第七纵队，纵队司令吴化文。

[6] 张店、周村、南定，均为镇名，属今山东淄博市。

[7] 张景月部，指国民党军山东保安第三师，师长张景月。

[8] 王继祥部，指国民党军暂编独立第十三总队，指挥官王继祥。

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打吴化文时，济南、徐州均可能增援，我打张景月时，济南、潍县[1]均可能增援，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以上意见提供你们考虑，如有新的重要理由，望电告。

军委
辰三十

---

[1] 潍县，旧县名，1983年撤销，并入山东潍坊市。

不用照会即可攻取泰安等地[1]

（1946年5月31日）

华东局，并告刘、邓、薄，邓、张、粟、谭[2]：

陷电[3]悉。国民党在东北扩大战争，占我四平、长春、吉林等十余城，现正向哈尔滨进攻中。在关内，五个月来占我城镇乡村数百处，近日又占我安次、萧县、夏邑、定远，攻我水东。本日悉，北平十一战区司令部不用事先任何通牒，即出动数万兵力进攻我冀东三河、宝坻、香河、宁河等县。因此你们已用不着事先提出照会即可动手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战况随时电告。

中央

辰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刘、邓、薄，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邓、张、粟、谭，指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拟就一个照会，分致南京三人委员会及北平执行部，拟于5日送出，10日不得答复，即于11日开始夺取泰安、大汶口、周村、张店、德州、枣庄，兖州暂不攻取。如同意，即于5日由中央分送叶剑英、周恩来转致国美及我，以便遵行。

致贺龙、李井泉电[1]

（1946年5月31日）

为便于集中兵力对付傅作义之进攻，请贺、李考虑是否有把握在短期内夺取大同、怀仁、山阴、朔县、神池、宁武、代县、繁峙等据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贺龙、李井泉电的主要内容。

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1]

（1946年5月至9月）

一　磨擦消息暂停广播

从二十三日起，磨擦消息暂行停止广播，惟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对马歇尔[2]声明如写评论，请送我一阅为盼！

（五月二十二日）

二　适时揭露敌人

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本日《参考消息》中，《顽军侵占青州龙山两车站》《文水阎军占我孝义镇》等项消息请补发后播，并登报。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的两封信；本篇三是给陆定一的信。

[2] 马歇尔，当时任美国总统的驻中国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谈判，力图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1946年5月20日发表了关于止东北内战的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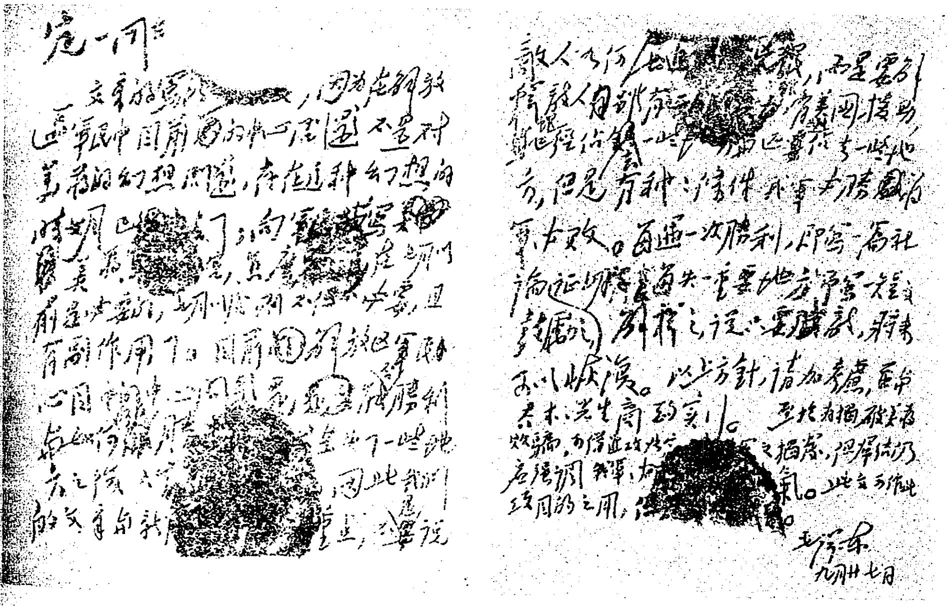
今日报纸头条新闻黄墨涵等名流，似在渝不在沪，说他们在沪是否有错，请加考查。

（六月三十日）

三　强调我军必胜蒋军必败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九月二十七日）



定一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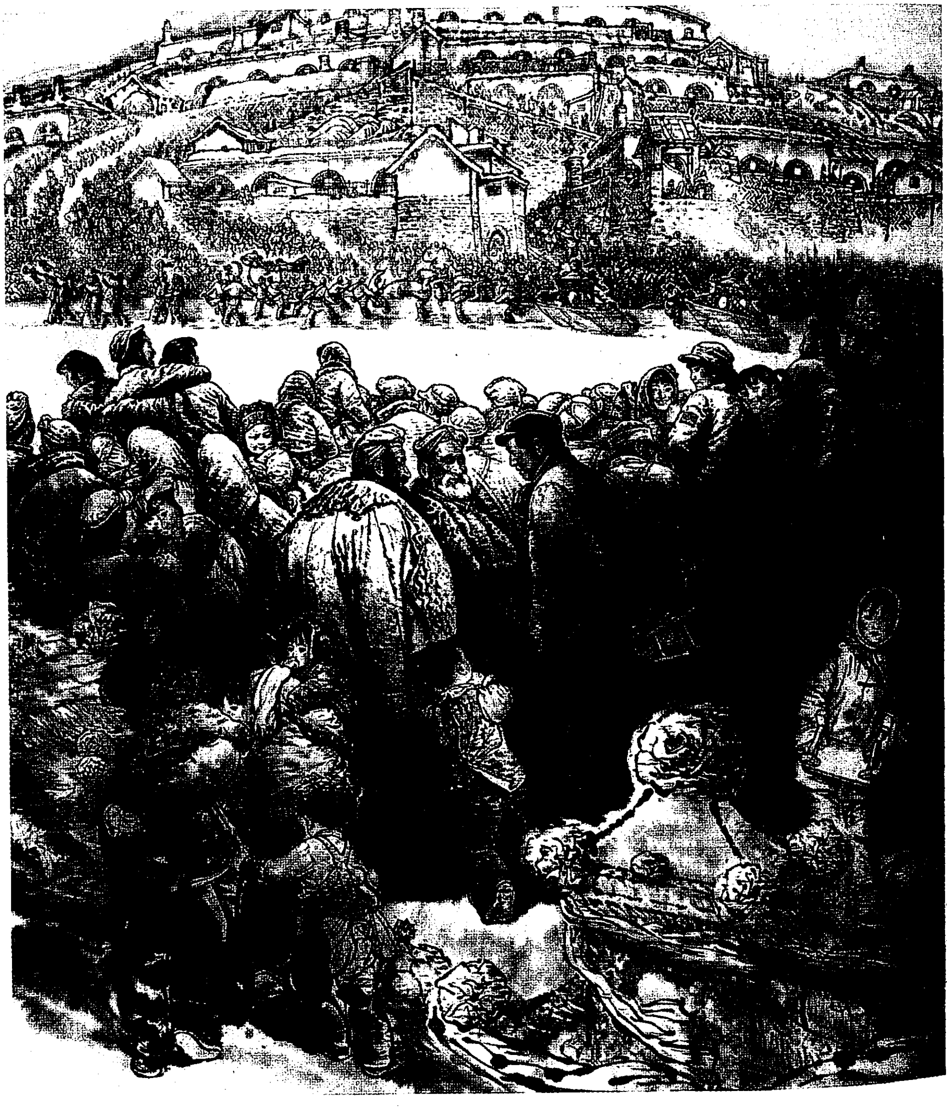
文章很好[illegible]，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主要的已经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illegible]了，而[illegible]美蒋[illegible]，[illegible]在他们前是必要的，[illegible]，且有副作用了。目前在解放区军民[illegible]胜利[illegible]一些地方之[illegible]，因此我们的文章[illegible]，要说

敌人[illegible]，而是要[illegible]美国援助[illegible]一些地方，但是[illegible]大败。每一次胜利，[illegible]论证[illegible]解释[illegible]。以上方针，请加考虑。[illegible]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陆定一信的手稿。



《解放区的天》（中国画）

中原部队须求自救之道与准备突围[1]

（1946年6月1日）

郑、李、王：

（一）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要求美机运款接济你们，恐已希望甚小。你们须求自救之道，如一方面节省用费留出准备突围时费用；另方面麦子已熟，向民众征收粮税。（二）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三）目前时机紧迫，你们应充分注意，并团结内部，准备艰苦斗争。

中央
巳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司令员李先念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的电报。

先取泰安等城后再考虑攻济南[1]

（1946年6月1日）

华东局：

（一）经考虑后，同意你们辰梗电所提战略方针，但应先夺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2]、德州诸点，然后进攻济南。望照此进行部署及各项准备工作。（二）在夺取泰安等地之后，如那时情况不宜于打济南时，可以临时决定不打。（三）济南霍守义[3]徐州冯治安[4]两部内应工作加紧进行为要。（四）致南京、北平照会修改后已发出。

中央
巳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1946年6月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和舒同电，提出："望于数日内攻取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枣庄等地，愈快愈好。"

[2] 大汶口，镇名，位于今山东泰安市南部。张店、周村，均为镇名，属今山东淄博市。

[3]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军军长。

[4]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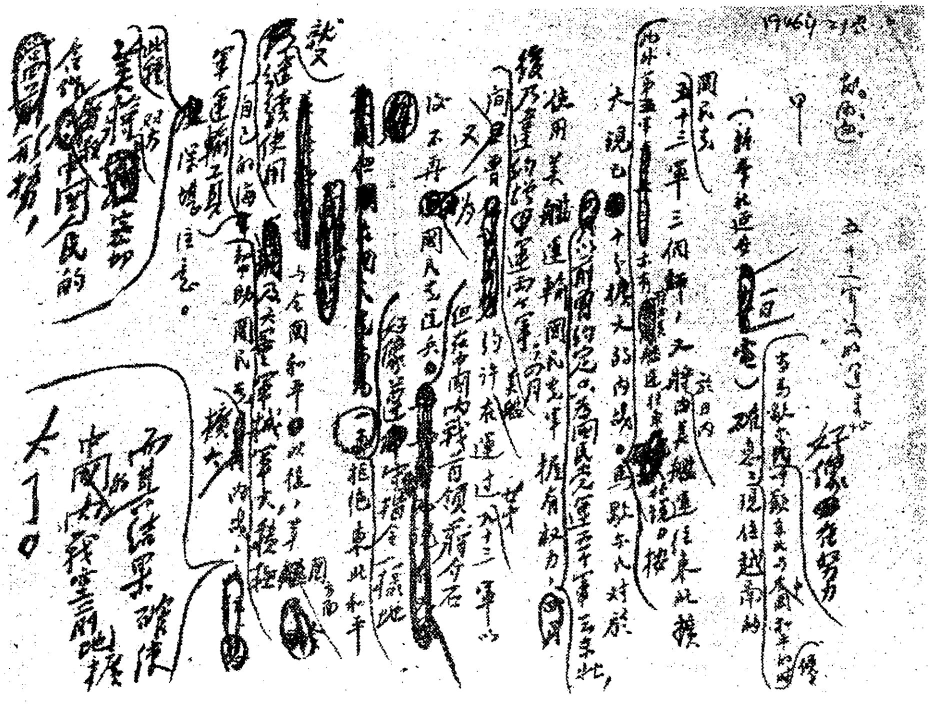
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1]

（1946年6月1日）

【新华社延安一日电】确息：当马歇尔氏好象在努力呼吁东北与中国和平的时候，现住越南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三个师，又将于日内由美舰运往东北扩大现已十分扩大的内战。此外第五军亦有将由美舰运往东北说。按马歇尔氏对于使用美舰运输国民党军握有权力，以前曾约定只为国民党运五个军去东北，后乃违约增运两个军；四月间又曾约许美舰在运过第九十三军以后不再为国民党运兵。但在中国内战首领蒋介石好象遵守指令一样地拒绝东北和平与全国和平以后，美国方面就又继续使用自己的海军运输工具及大量军械军火，积极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而其结果确使中国的内战空前地扩大了。此种美蒋双方密切合作屠杀中国人民的形势，深堪注意。

---

[1]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消息《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的手稿。

为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开学题词[1]

（1946年6月1日）

努力奋斗，光明在前。

---

[1] 1946年6月1日西北医药专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勉励师生并为他们题词。

同意在东北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1]

（1946年6月3日）

东北局，林，并告李、黄[2]：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指示[3]，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对于分散与孤立之敌据点，应在可能条件下攻取之。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

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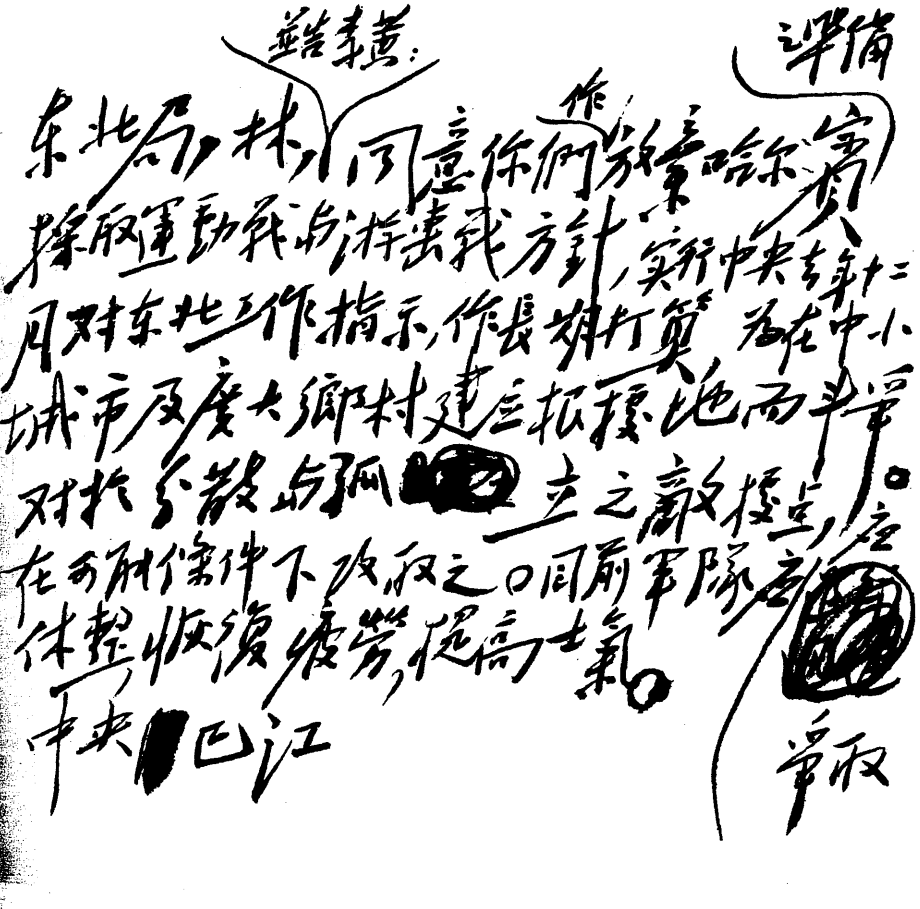
巳江

---

[1] 国民党军侵占四平后，又先后占领公主岭、长春、吉林等城镇，企图北犯哈尔滨。为争取主动，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和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于1946年5月底和6月初分别向中共中央提议主动放弃哈尔滨，以便休整主力，诱敌彻底分散兵力，各个击破之。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林彪的回电。6月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给林彪、彭真和罗荣桓等的电报，改变了以上部署，提出："（一）望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于我手中，尤其保持哈市。（二）望保持鞍山、营口于我手中。"

[2] 李、黄，指李富春和黄克诚。李富春，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

[3] 即《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並告李黃：

東北局，林，同意你們作放棄哈爾賓準備，
採取運動戰與游擊戰方針，實行中央去年十
二月對東北工作指示，作長期打算，着在中小
城市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而軍
對於分散與孤立之敵，應
在有利條件下攻取之。目前軍隊應
休整，恢復疲勞，提高士氣。爭取
中央[illegible]巳江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同意在东北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的手稿。

加强兵力全部控制吕梁地区[1]

（1946年6月4日）

陈、谢，并告刘、邓，贺、李[2]：

据贺李电称：吕梁兵力薄弱，陈赓路过吕梁时说，可从太岳调兵增强吕梁等语。查吕梁为太岳与陕甘宁之接联枢纽，有加强兵力全部控制该区之必要，此种责任，责成陈谢担任，望统筹部署电告。

军委

巳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大同口泉及朔县宁武等地的作战部署[1]

（1946年6月4日）

贺、李，并告聂、刘，刘、邓[2]：

（一）巳东电[3]悉。大同、口泉[4]地区敌多守固，又有日军，又可能牵动傅作义[5]，因此，暂时只作准备工作，加强侦察及内应，准备黄色炸药，不要动手。（二）朔县、宁武敌较少，又不致牵动傅作义，你们可首先攻取一处（或朔县，或宁武），得手后，看情形如何再行考虑是否打第二处。（三）打时须作充分准备，迅速拿下，又须抓住理由，收集阎[6]顽攻我事实，以便说理。（四）不要调动北线对付傅作义之兵力。（五）麦收后，应动员一部民兵补充主力，每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1946年6月中旬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各一部在同蒲线北段发起攻势，分别攻占朔县、宁武、繁峙等地。

[2] 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6月1日20时贺龙、李井泉关于雁北地区敌情及我军将立即组织夺取大同、宁武、山阴、怀仁地区战役的作战部署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4] 口泉，镇名，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南。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6]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补足一百二十人，准备粉碎傅作义之进攻。至要至要。

军委

巳支

准备一切条件在运动中歼灭进攻承德之敌[1]

（1946年6月5日）

聂、刘、唐、曾，并告程、萧[2]：

三日十六时电[3]悉。国民党正在准备进攻承德，我应集中精力准备一切条件，以便于敌向我进攻时，从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粉碎其进攻阴谋。因此：（一）不要进攻平古线，也不要进攻南口、八达岭，以免惊动敌人，消耗自己；（二）由你们统一冀察晋与冀热辽两区军事步调，以便在统一指挥下战胜敌之进攻；（三）加紧练兵，养精蓄锐；（四）征调一部民兵补充主力，每连补足一百二十人；（五）加强群众工作（解决土地）与剿匪工作，巩固根据地；（六）准备大批黄色炸药，演习使用方法，以便在粉碎敌人进攻后，夺取敌之据点或恢复已失据点。

军委

巳微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参谋长唐延杰和副参谋长曾涌泉的电报。

[2] 程、萧，指程子华、萧克，当时分别任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3] 指1946年6月3日16时聂荣臻、刘澜涛给中共中央军委摘转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的电报。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等的唁电

（1946年6月5日）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什维尔尼克主席阁下暨苏联政府内阁委员会主席斯大林阁下：

对于苏联最高苏维埃前任主席中国人民的挚友加里宁氏的逝世，谨致哀悼之忱！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

在修改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时加写的话

（1946年6月5日）

很明白，华北和东北的内战，是由美国代替国民党运送军队和军火之后，才能发生与加剧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运输，中国反动派要在东北华北进行大规模的内战，就根本没有可能。

停战期间东北部队应休整补充严防敌军进袭[1]

（1946年6月6日）

东北局，林，并告萧、曾，李、黄，陈、高[2]：

据宁周[3]五日电告，十五天停战协定[4]，七日起实行，至二十一日为止。在此十五天内，我党代表团在宁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应利用此十五天时间，休息补充，提高士气，准备再战。在十五天内，如国民党遵守协定，停止进攻，则我亦应遵守协定，停止军事冲突，但须严防敌军进袭，不要松懈警惕性。

中央

巳鱼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

[2] 萧、曾，指萧华、曾克林，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李、黄，指李富春、黄克诚，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陈、高，指陈云、高岗，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3] 周，指周恩来。

[4] 指根据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议，国共双方经过磋商，于1946年6月6日分别发表的自6月7日12时起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

休整养精准备粉碎敌人进攻[1]

（1946年6月6日）

萧、程，并告聂、刘[2]：

（一）新一军、新六军在长春、吉林之线，不可能来热河[3]。你们当面之敌并无变化，十三军在原位置，九十三军一部警备锦榆线[4]，一部在该线以西至建昌一带进剿我詹[5]纵队及地方部队，除非从南方海运新部队，顽方不可能向热河增兵。（二）但你们准备保卫承德很对，必须准备一切条件粉碎其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进攻，但在情况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过多调动兵力，目前以休整养精为要。

军委

巳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和政治委员程子华的电报。

[2] 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4] 锦榆线，指锦州至山海关（榆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5] 詹，指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

致林彪、彭真、罗荣桓电[1]

（1946年6月7日）

（一）你们如不在哈尔滨，望即去哈尔滨，主持和战大计。（二）我党基本方针应是在不丧失基本利益下实现和平，长期战争于我不利。（三）恩来本日来延开会，佳日[2]返宁，约寒日[3]赴哈尔滨和你们见面。（四）哈尔滨机场如有破坏，速即修好，勿误。（五）全军加紧休整，准备再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彪、彭真、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2] 佳日，即九日。

[3] 寒日，即十二日。

先取朔县宁武再取山阴岱岳不要惊动傅作义[1]

（1946年6月9日）

贺、李，并告聂、刘[2]：

（一）你们可以同时或先后攻取朔县、宁武两点，得手后再考虑攻取山阴、岱岳[3]两点。（二）对大同、口泉[4]、怀仁三点不去惊动。（三）不要调动北线主力，不要惊动傅作义[5]。

军委

巳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

[2] 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山阴，指山阴城，位于山西山阴县南部。岱岳，镇名，今为山西山阴县县治。

[4] 口泉，镇名，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南。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必须用一切方法歼敌于南线[1]

（1946年6月11日）

张、粟、邓、谭，并告陈[2]：

鱼电[3]悉。（一）国民党攻我淮南路东[4]，现又攻我路西及南通区，我向国民党某区取主动攻势，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二）军事上究竟应否攻宜陵、白塔，由你们根据实情决定之。（三）我必须用一切方法歼灭敌人于南线，保卫九百万人口的南线各区。

中央

巳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邓子恢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

[3] 指1946年6月6日华中军区给中共中央、新四军军部并告淮北、淮南军区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军主力4个军极可能以泰州为出发点攻占我兴化、东台、高邮。我如失东台、兴化，则苏中900万人口之富裕区即无法坚持。为转变此不利形势，我军决集中兵力攻占扬州、泰州线之宜陵、白塔，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出来决战，在此地求得打两三个大仗，歼敌2至3个师，相机夺取泰州，以巩固南线。建议山东部队一部提早进攻海州，使国民党军不敢南下。

[4] 淮南路东，指华中淮南军区所辖之津浦铁路（今京沪线天津至浦口段）以东地区。

总结攻城经验休整补充部队[1]

（1946年6月11日）

陈：

（一）望将此次攻克泰安、大汶口[2]、枣庄、德州、周村、张店[3]、胶县等处攻城经验，尤其是使用黄色炸药及工兵组织之经验总结电告。（二）战役完毕后，立即休整补充部队，一切部队每连补足百二十人，并实行大练兵。（三）继续攻取兖州。

军委

巳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电报。1946年6月7日，山东军区部队在胶济、津浦线上同时向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大汶口、高密、即墨等城镇发起讨逆战役，到16日预定攻击的据点除大汶口外，全部夺取，歼灭伪军3万余人。

[2] 大汶口，镇名，位于山东泰安市南部。

[3] 周村、张店，均为镇名，属今山东淄博市。

准备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1]

（1946年6月12日）

华东局，并告周：

真电[2]悉，甚慰。（一）此次恩来回延[3]讨论时局，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二）山东我军肃清大汶口[4]伪军后，暂时告一结束，全军休整练兵，准备于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对济南、兖州、海州[5]进行侦察及兵运。（三）从政治上巩固郝部[6]，该部情形如何，盼告。

中央

巳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告周恩来的电报。

[2] 指1946年6月11日山东野战军关于攻克胶县、泰安等地后第二步作战行动问题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3] 延，指陕西延安。

[4] 大汶口，镇名，位于山东泰安市南部。

[5] 海州，旧府名，今为江苏连云港市一个区。

[6] 郝部，指郝鹏举部。郝鹏举原任汪伪淮海省保安司令，抗战结束后该部为国民党收编，为国民党军第六路军，郝任总司令，参与对鲁南解放区的进攻。1946年1月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改编为华中民主联盟军，郝任总司令。1947年1月郝率部叛变，2月郝部被歼，郝鹏举被俘。

我行动愈坚决有力和平可能性愈增[1]

（1946年6月12日）

丙丁，并告寅卯：

真电悉。（一）山东灰电称：泰安、大汶口[2]、枣庄、张店、周村[3]、胶县已完全占领，德州已占四门正向城内扫荡中。（二）我已令刘邓[4]攻取永年并令陈赓纵队[5]占领太原、临汾间同蒲线，因阎[6]部大举向我太岳区抢粮及以六个团攻占我文水、交城地区。（三）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四）蒋军攻我南满[7]海城以东地区战事激烈，我已克服拉法[8]。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并告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大汶口，镇名，位于山东泰安市南部。

[3] 张店、周村，均为镇名，属今山东淄博市。

[4]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陈赓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陈赓。

[6]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7]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8] 拉法，村名，位于吉林蛟河县北部。

（五）哈尔滨机场完好，林彭罗、高陈[1]均在哈尔滨。（六）可先修复津浦[2]、胶济、陇海三路，在三路中应先修津浦，后修胶济、陇海，否则先修津浦、平汉[3]，后修胶济、陇海。

甲乙
巳文

---

[1] 林彭罗，指林彪、彭真、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高陈，指高岗、陈云，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3]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6年6月12日）

我为报复起见，攻克枣庄、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等处，如美国人讲话，应驳斥之。数月来国民党攻占我村镇数百处，县城四十处（尚有二十六处未恢复），人口三百万，美国人不说话。现在他们说话了，可见不公平。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我方的报复也不会停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等电[1]

（1946年6月12日）

我占枣庄、泰安、德县后，声威大振，美怕我攻青，国怕我攻济，此时我如在彼方不攻五师及不增加军队等条件下保证不攻青、济，美蒋即可安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陈毅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力争和平准备再战[1]

（1946年6月13日）

饶，林、彭，周，叶：

（一）我党方针是竭力争取和平，争取于十五天内保持平静，争取延长停战时间，变暂时停战为长期停战。（二）同时我东北全军应积极准备再战，并应准备长期战争。（三）望根据以上基本方针进行工作。

中央
巳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十七小组（沈阳）中共方面负责人饶漱石，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叶剑英的电报。

迅速歼灭聊城等处伪军[1]

（1946年6月15日）

陈、舒，刘、邓、薄：

聊城伪军三千及高唐、博平[2]、禹城间伪军万余必须迅速肃清。除晋冀鲁豫出兵一万五千外，望陈舒令渤海出兵一万以上，迅速出动，归刘邓薄统一指挥，消灭该匪，以除后患，而利尔后之作战。望刘邓薄立即任命此战役的统一指挥机关，进行各项准备，争取于本月底下月初消灭该匪。

军委

巳删

---

[1] 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拟发起聊（城）高（唐）禹（城）战役，建议渤海军区出兵1万予以配合。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舒同和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的电报。

[2] 博平，旧县名，1956年并入山东茌平县。

延安权威人士声明反对贝纳斯援蒋法案*

（1946年6月16日）

美国若干当局不顾中国人民与各民主党派停止助长中国内战之呼吁，决心继续在军事上援助中国内战的发动者——蒋介石政府。据美新闻处华盛顿十四日电：“美国务卿贝纳斯今（十四日）以法案提交参院，请求核准，对华实施军事训练及技术上之援助。在附函中贝氏指出：对华军事援助之继续不断，极为重要。贝氏称：中国曾请求美方遣派军事使团驻华，其性质将与美国遣往拉丁美洲之军事代表团相同。此次准许对华实施军事援助之法案，系由陆海两部及国务院联合拟订。本人坚信国家之利益（包括本国在重建与维护亚洲和平及安全之利益），须要美国援助中国组织与维持相当数量之现代化军队，俾中国可对该方面之和平与安全有所贡献。”此间人士认为，当南京的中共代表正经过马歇尔氏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力争中国全面长期和平，而国民党方面正公然号召全面长期内战之际，美国政府提出此项鼓励中国内战之法案，诚为对于中国人民和平愿望之一种不友好表示。事实与贝氏的断言完全相反，此项法案如被通过，则中国将陷于严重的不和平不安全之中，而美国人民的利益与美国国家的信誉亦将因此遭受重大的损失。中国与世界舆论均已再三指明，美国对好战的中国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巨大军事援

助，乃是中国今日内战发生、扩大并难于制止的唯一根本条件。中国人民不能了解美国政府究有何种权利将内战与独裁强加于中国，并要求中国与拉丁美洲同样降为美国势力范围或为美国“国家利益”范围之一部分。中国人民亦不了解美国政府究有何种权利破坏杜鲁门总统去年十二月“不以军事干涉影响中国任何内争过程”的声明，与去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公报的原则。延安权威方面表示：中国的和平民主乃是中国人民神圣权利所在，任何人不能予以干涉与剥夺，中国的反动派如果依靠外力援助坚持内战与独裁，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公开直接变为秦桧、张邦昌、刘豫政府，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主席变为向外国称臣的儿皇帝，那么，可以断言，中国人民必将抵抗至最后一滴血。

致饶漱石等电[1]

（1946年6月17日）

在停战问题上国、美有矛盾，望注意利用。

---

[1] 这是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饶漱石、李立三及林彪、彭真、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准备夺取兖州及聊城博平[1]

（1946年6月18日）

陈、舒，刘、邓、薄：

（一）对夺取兖州及聊博[2]两战役，望在本月内准备完毕，但在未得中央最后电令前，不要实行攻击。（二）最近我已得了许多地方，目前短时期内需要平静一下。（三）如蒋方于十五日期满后重新发动向东北进攻，或大举攻我苏北，你们便可夺取兖州、聊、博。

中央
巳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舒同和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的电报。

[2] 聊，指山东聊城。博，指博平，旧县名，1956年并入山东茌平县。

中原军区部队须随时准备突围[1]

（1946年6月19日）

郑、李、王：

（一）宁周[2]电称：蒋[3]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二）突围后有两个可能前途：第一个能达向北目的；第二个被敌阻隔不能达向北目的。（三）因此你们须作两个准备：第一个争取一切可能向北；第二个在向北不可能时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以待时局之变化。

中央
巳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司令员李先念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的电报。

[2] 周，指周恩来。

[3] 蒋，指蒋介石。

准备对付蒋军对胶东苏中的大举进攻[1]

（1946年6月19日）

陈、舒，并告刘、邓、薄[2]：

（一）宁周[3]电称，蒋[4]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望根据此种情况进行准备。（二）统一胶东滨海两区指挥，集中兵力于即墨、胶州、高密之线，待敌进攻时歼灭之。此处须准备对付三个美械军，如能歼灭其二、三个师，即可顿挫敌锋，阻其西进。（三）准备夺取济南。（四）准备粉碎徐州北进之敌。（五）在蒋决定大打条件下，我渤海兵力是否能抽万人配合冀鲁豫夺取聊博[5]，请陈舒与刘邓薄商定之。（六）吴化文[6]动摇，速争取其反正。（七）孙良诚[7]亦动摇，望令华中争取孙部反正。（八）华中须准备于蒋军大举进攻苏中时，坚决粉碎之。（九）为推迟蒋军大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政治部主任舒同的电报。

[2] 刘、邓、薄，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3] 周，指周恩来。

[4] 蒋，指蒋介石。

[5] 聊，指山东聊城。博，指博平，旧县名，1956年并入山东茌平县。

[6] 吴化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七纵队司令。

[7] 孙良诚，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五纵队司令。

进攻时间，目前我不应有进攻行动。

中央
巳皓

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1]

（1946年6月19日）

刘、邓、薄，贺、李，聂、刘[2]，并告陈、舒[3]：

（一）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二）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4]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5]及夺取同蒲北线，以又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6]。

（三）我贺李统一指挥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准备粉碎傅作义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等的电报。

[2]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陈、舒，指陈毅、舒同，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6] 正太线，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

（四）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其余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

（五）拟以陈赓[1]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组织指挥机关，统一指挥太行（太南不在内）、太岳、晋西南（吕梁）及晋东北靠近正太路两个分区之一切党政军民力量，其任务为夺取同蒲南线、晋西南全区、白晋路之东沁线[2]及太原、娘子关间之正太路。陈赓纵队司令员职务以别人代替或代理。

（六）你们对于上述布置有何意见，望告。

（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衅由彼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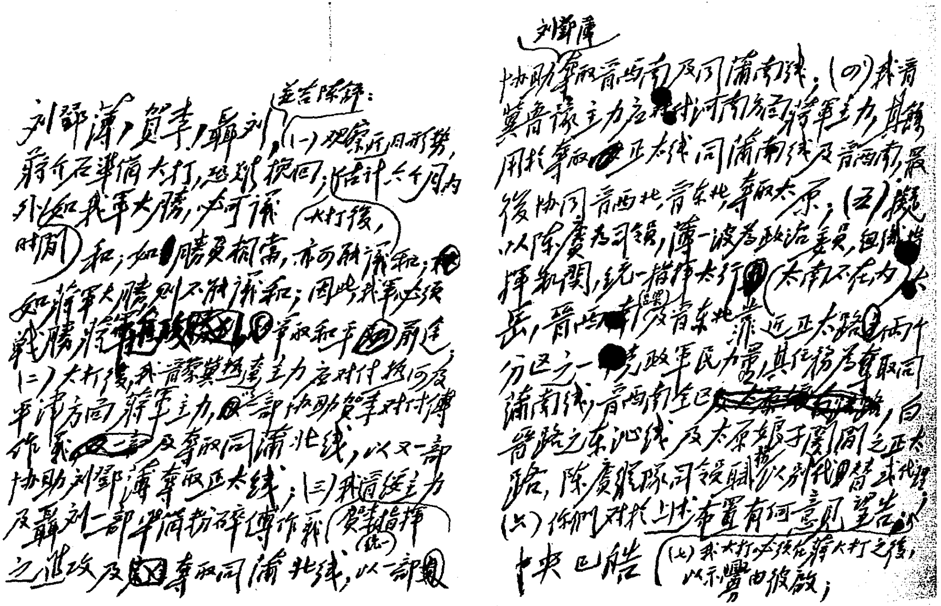
中央

巳皓

---

[1]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2] 白晋路，指山西祁县的白圭至晋城的一条未完成的铁路。东沁线，指山西祁县东观至沁县的铁路。


刘邓薄，贺李，聂刘，并告陈饶：（一）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估计大打后，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二）大打后，我晋察冀、热察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向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以又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正太线；（三）我晋绥主力及聂刘一部（贺李统一指挥）应打击傅作义之进攻及夺取同蒲北线，以一部协助刘邓薄夺取晋西南及同蒲南线；（四）我晋冀鲁豫主力应对付河南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用于夺取正太线、同蒲南线及晋西南，最后协同晋西北、晋东北夺取太原；（五）以陈赓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组织指挥机关，统一指挥太行（太南不在内）、太岳、晋西南及晋东北靠近正太路之两个分区之党政军民力量，其任务为夺取同蒲南线、晋西南全区、白晋路之东沁线及太原娘子关间之正太路，陈赓纵队司令职务以别人代替或代理；（六）你们对于上述布置有何意见，望告。（七）我大打必须在蒋大打之后，以示曲由彼启；

中央巳皓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的手稿。

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1]

（1946年6月19日）

中原郑、李电，他们准备于垣曲、济源间渡河，请你们准备船只及接护。请你们计算郑李部从该地渡河可能条件如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电的主要内容。21日，刘、邓、薄电报中央：北岸部队很难进入南岸活动，故派队过河接护实感困难，须五师自行负责，黄河北岸我们可负完全责任。同时，五师突围后，有大军尾追，在陇海线必遇有力堵击，而我们又无法直接配合，如走直线，恐难实现过河目的，此点似应顾及。

准备攻取宁武等城[1]

（1946年6月20日）

贺、李：

（一）占领朔县及轩岗镇[2]甚慰。（二）望即攻取宁武，事先充分准备，然后一举攻克。（三）待宁武占领后，再考虑对崞县[3]、代县、繁峙、山阴、岱岳[4]等处逐一攻取之。（四）在打这些城市中，锻炼出一支善于攻城的队伍来。（五）对傅作义[5]及大同、口泉[6]、怀仁仍不要惊动。

军委

巳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

[2] 轩岗镇，位于山西原平县西北。

[3] 崞县，旧县名，1958年撤销，部分划归山西宁武县，部分与代县合并为山西原平县。

[4] 山阴，指山阴城，位于山西山阴县南部。岱岳，镇名，今为山西山阴县县治。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6] 口泉，镇名，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南。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6月20日）

站在有理立场取强硬态度是很对的，只有如此，才有出路。已令各地准备一切，粉碎蒋之大举进攻，估计打六个月后又将讲和。东北方面须尽可能争取延长休战时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6年6月20日）

同意对马歇尔暂不作针锋相对的批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应考虑承德弃守问题[1]

（1946年6月21日）

聂、刘，程、萧：

如果敌于平泉集中三个师西进，我不能于野战中歼灭其主力，承德即有被占之可能。假如将来出现这一形势；则应考虑固守承德或者主动放弃承德的问题。如有把握歼灭敌军主力，从根本上粉碎其进攻，则应当固守承德；如无此种把握，则应准备放弃承德。一则保存杨苏纵队[2]及其他部队有生力量不至过于消耗，坚持冀热辽广大区域，俟土地问题解决，兵力即可增强，那时可能收复锦热路[3]及承德；二则抽出赵纵队[4]回晋冀，协同太行、冀中夺取保府石门[5]及正太路[6]。究以何者为适宜，请依敌我力量对比考虑电告。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和冀热辽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司令员萧克的电报。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电报，指出：“谈判破裂后，顽方必攻承德”“如顽方确已集中优势兵力我方不可能阻止时，你们即应作退出承德之准备，以免临事仓卒，丧失物资”。

[2] 杨苏纵队，指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3] 锦热路，指锦州至承德的铁路，即今锦承线。

[4] 赵纵队，指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纵队司令员赵尔陆。

[5] 保府，保定府的简称，即河北保定市。石门，即今河北石家庄。

[6]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考虑期间不要下达。再则，假如承德不守，其对我增加之困难情况如何，亦望告。

中央
巳马

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1]

（1946年6月21日）

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6月21日）

美国在华舆论界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反对中国内战，深堪注意。望本既定方针，争取美国人，打击反动派。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反对美国对蒋军事援助法案的声明[1]

（1946年6月22日）

美国国务院于本月十四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此项法案。中共此种意见，并为中国广大民主人士所支持。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于中国实施军事援助，并派遣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协同作战，其目的是击败中美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但就在那时，由于美国错误地仅仅援助国民党军阀，这种援助也并未有效地加强中国的抵抗，相反地是被国民党军阀用以加强其对于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区的进攻与封锁。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仅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履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关于中国问题的约束，与中国国民党宣布停止内战，并宣布履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决议的前提之下，中国共产党才曾经不反对美国对于中国的某种军事援助。但是现在这些前提都已被严重破坏，因此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

---

[1] 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表的声明。

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领土，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太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得太久，他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在此种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以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6月22日）

今日用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军事援华法案。你收到后，请即正式具函送交马歇尔，请其转达美国政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东北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粉碎蒋介石进攻

（1946年6月22日）

东北局，转各分局、各省委、各纵队：

蒋介石为着完成进攻准备，延长休战[1]八天至三十日止，如我党不能承认其苛刻条件（例如东北只给旧黑龙江[2]，其余一切不给），七月初将向东北及全国进攻。你们现在即应准备于谈判破裂时动员全党全军克服任何动摇犹疑恐惧心理，利用我方各项有利条件，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我党取得大的胜利之后，必能实现国内和平。在此伟大斗争中，我华北、华中解放区及全国民主力量均将以行动援助你们。

中央

巳养

---

[1] 根据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提议，国共双方经过磋商，于1946年6月6日分别发表自6月7日12时起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期延长至6月30日。

[2]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九省。旧黑龙江指原东北三省中的黑龙江省。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

（1946年6月22日）

刘、邓、薄，陈、舒[1]：

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

（一）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长垣、考城[2]、民权、兰封、封丘、宁陵、睢县、杞县、陈留[3]、通许、太康、柘城、淮阳、商丘、鹿邑、西华各点，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

（二）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即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

（三）太行区除山西对阎[4]部队外，其余以一部监视豫北之敌，

---

[1] 刘、邓、薄，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陈、舒，指陈毅、舒同，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2] 考城，1954年与兰封县合并为兰考县。

[3] 陈留，1957年并入开封县。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应以最大主力出动于豫东区域。

（四）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1]，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主力全部南下。

（五）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有些县城可让地方部队逐次攻占之，我主力不必每个城均去打。

（六）在上述作战阶段中，充分注意争取杂牌及伪军反正。

（七）在上述作战计划中，我五师[2]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八）粟谭[3]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

（九）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

（十）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

（十一）这一计划可保障五师不致被消灭或吃大亏。

（十二）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

（十三）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十四）蒋现延长休战至本月三十日，七月初即将大打，我须速

---

[1] 青、潍，指今山东青岛和潍坊。

[2] 五师，指原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3] 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谭，指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当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

定战略方针，以利作战。

（十五）意见如何，望告。

中央
巳养

正确对待军调执行小组的国、美人员[1]

（1946年6月22日）

各局，并转各有关机关及有关部队：

据北平执行部巳号[2]电称：关于执行小组来往我区安全保证及对于他们的态度问题，最近出了不少乱子，例如故意留难、检查、扣留以及态度上不礼貌等等到处发生，特别是随便放枪致北票打伤美方组员，晏城打死国方雷奋强，本日又据报新乡小组在修武地区被射击，致国方组员死一伤一。这样事件，许多当系出于误会，但许多亦由于下级对国、美的简单仇恨心理所产生，若不予纠正，尽管我方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可讲（特别是我方组员被扣被侮辱伤害之事件不少），但在政治上总是无理及丧失同情的。请中央训令各战略区，必须切实约束部下，并进行教育，求得不再发生上述事件。对于国、美之调处不公，我方随时都必须有严正态度，但在小组来往相处的关系上，任何时候都需讲求适当的礼貌和很好的友谊，使我外交斗争处于更加有理的地位。当否请中央决定施行等语。所述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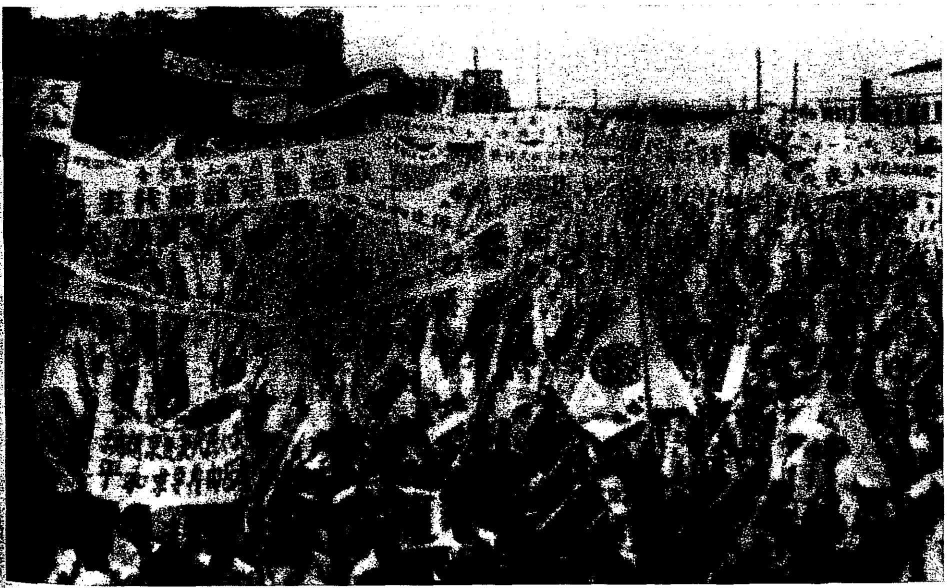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正确对待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各地的军调执行小组中国民党和美国方面人员的通令。同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叶剑英、罗瑞卿及周恩来的电报，告知：“业已通令各战略单位进行教育，对国、美两方人员待以礼貌，尤不得有伤害之事发生。”

[2] 巳号，即6月20日。

为合理，望各局通令各有关机关、有关部队普遍进行教育，嗣后对国、美两方人员待以礼貌，尤不得有伤害之事发生，是为至要。

中央
巳养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集会欢送赴南京请愿团，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1]

（1946年6月23日）

中原局：

（一）二十一日电[2]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二）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时机，并保机密。（三）望团结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电报。

[2] 指194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军对我区包围、封锁已愈益加强。“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我们原谋向南突围有长江之隔，向东突围则因国民党在津浦路上控制有强大兵力，难于达到目的，由首界附近北渡黄河则由于不能徒涉的河川很多，危险极大，比较安全的只有由豫西南向鄂中向西突围的两条路，但这两条路最近因顽军之攻占我信、随地区已失去其一，如顽军最近再将应山、安陆、云梦各要点占去，则成纵队的集体突围的路线，则完全丧失。在此情况下，虽部分队伍还可以旅团为单位分散突围，但由于分散突围的路线也不很多，故可能有半数的部队突不出”。“如果等顽军已经完全部署完毕，正式向我全面进攻时再突围，则我不仅在战略上及在战术上亦处于被动地位，那个局面很难设想的，因此我们提议中央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我们认为就时间及敌情来说，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大大困难，在突围过程中可能遭受一定损失，但如再不主动突围，则以后更难了。”

斗。预祝你们胜利。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先攻怀仁等地然后相机夺取大同[1]

（1946年6月23日）

贺、李，聂、唐：

（一）必须于最近期间攻取怀仁、岱岳、山阴[2]、宁武、应县、繁峙、代县、崞县[3]、原平、忻县、五台、定襄，然后相机夺取大同。（二）为执行此任务，同意贺李第二方案，从绥[4]东四个主力旅中抽调一个旅，使用于上述目的。调动时注意隐蔽，不露形迹。（三）聂刘[5]即派一个主力旅附炮交贺李指挥执行上述任务，同时令路东[6]地方党政军协同动作，并即派人至贺李处受领任务。（四）为完成此任务，望贺李与聂刘直接联络。

军委

二十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的电报。

[2] 岱岳，镇名，今为山西山阴县县治。山阴，指山阴城，位于山西山阴县南部。

[3] 崞县，旧县名，1958年撤销，部分划归山西宁武县，部分与代县合并为山西原平县。

[4]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聂，指聂荣臻。刘，指刘澜涛，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6] 路东，指同蒲铁路以东地区。

致东北局等电[1]

（1946年6月23日）

南京谈判，蒋介石只许兴安、齐齐哈尔、北安、延吉四处由我党驻兵，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均由蒋驻兵，我们认为不能接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并告李富春、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1]

（1946年6月24日）

陈、舒，并告刘、邓、薄[2]：

为使作战有重点起见，（一）开徐[3]间陇海线之占领及豫东、淮北各城之占领全归刘邓薄负担。（二）陈舒全力担负占领徐蚌[4]间铁路线及调动徐敌出击而歼灭之。（三）以苏中地方兵团吸引并牵制通扬[5]线上之敌，粟谭[6]率主力占领蚌浦[7]间铁路线，歼灭三、四分区[8]之敌，策应北面作战。（四）动员民众，公私兼顾，彻底破坏陇海路、津浦路[9]。（五）必须策动杂牌军及伪军举行起义。（六）以上为第一阶段，渡淮向南为第二阶段。（七）郑李[10]主力在豫鄂西吸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和政治部主任舒同的电报。

[2] 刘、邓、薄，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3] 开徐，指河南开封和江苏徐州。

[4]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5] 通扬，指江苏南通和扬州。

[6]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7] 蚌浦，指安徽蚌埠和江苏浦口。

[8] 指华中军区所属淮南军区的第三、第四军分区。

[9]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10]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敌人，一部在原地吸引敌人。（八）准备时间为半个月，必要时酌量延长。（九）不要阻止敌方向青济[1]等地增兵，彼方向北增兵愈多愈好。（十）望考虑利弊见告。

军委

巳敬

---

[1] 青济，指山东青岛和济南。

给邝赛朝暨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工的电报

（1946年6月24日）

邝赛朝先生暨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侨工友：

接获来电[1]，得悉诸位工友呼吁立即停止中国内战，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对依靠外力进行内战的行为表示义愤。诸位关怀祖国前途，热爱和平民主，令人感佩兴奋。深望诸位再接再厉，唤起全美侨胞、全美劳工界与各界人士，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任何援助，撤退驻华美国海陆空军，并撤销已向美国会提出的继续军事援华法案，使中国和平民主得以早日实现，中美传统友谊得以保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

[1] 指邝赛朝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转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的电报。电报说："美国海员工会中三千华侨会员要求根据停战协定与政协决议，立即停止中国内战，实现和平与重建中国。我们厌恶在内战中使用日伪军与美军的办法。我们认为必须肃清空前的贪污，取消一党专政，代之以民主联合政府。美国劳工界将尽一切力量拥护民主自由独立的中国。"

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无和平希望

（1946年6月25日）

林[1]：

敬电[2]悉。（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

中央
巳有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2]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46年6月24日给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考虑不能将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今丹东）给国民党驻兵。与其立即交出以上地点，不如在长期战争中力求保持。为打破国民党在战略上的各个击破，彼如集中力量打东北，则我应在华北、华中发动大攻势，给彼以大破坏，迫其停战，这是求得全面停战的最有效方法。目前国民党在东北已外强中干，其在外交上对我之苛刻要求，带有吓唬性质，我不可轻易让步。蒋介石如继续增兵东北，进行战争，则除非是准备全国破裂、与苏联冲突，或已把握苏绝不致干涉。如决心全国内战，则除非已取得美国援助其大规模内战的保证。我们固然要基本上准备作战，但同时应力争和平，作一定限度的让步。

苏中可能暂时失陷宜预作准备[1]

（1946年6月25日）

华中局，并告陈、舒[2]：

苏中地区在蒋[3]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以免临事仓卒，受过大损失。

中央
巳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电报。

[2] 陈、舒，指陈毅、舒同，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

[3] 蒋，指蒋介石。

分途突围及保护军调小组安全[1]

（1946年6月25日）

郑、李、王：

敬电[2]悉。（一）巧妙避开敌之打击，分途突出包围圈。（二）如遇严重不利情况，则以旅为单位分散前进。（三）留下部队至少万人，坚持原有地区。（四）务必保护三十二小组[3]安全，或留置现地交由我地方部队妥为护送其回汉，或带至铁路附近让其返汉，或带其同行（暂禁其电台工作），由你们决定。

中央
巳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司令员李先念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的电报。

[2] 指1946年6月2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已决定28日突出包围圈，24日晚王树声、戴季英部即开始在我区内荫蔽行动，但很难不被敌发觉。请特别注意供我及两纵密息情报。三十二小组仍在宣化店，留去都难。如分途安全突出包围圈后，我们根据中央意旨及自己具体情况拟定行动计划。请中央随时指示。

[3] 三十二小组，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中原军区的第三十二小组。

对晋绥作战的部署[1]

（1946年6月25日）

贺、李，并告聂、刘[2]：

（一）同意贺李意见，从绥[3]东调两个旅南下夺取同蒲北线。（二）留两个旅固守绥东，如遇傅[4]部进攻，由聂刘令陈正湘[5]兵团协同歼灭之（蒋[6]计划是令傅以一个军向绥东行牵制性攻击，另一个军即二十二军向陕北行牵制攻击）。（三）运动时注意隐蔽。（四）派人至傅作义处妥为联络。

军委

巳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

[2] 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陈正湘，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6] 蒋，指蒋介石。

给马叙伦[1]等的慰问电

（1946年6月25日）

南京周恩来同志，请转上海人民团体请愿代表马叙伦、蒉延芳、张絅伯、包达三、盛丕华、吴耀宗、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陈立复[2]诸先生公鉴：

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3]，

---

[1] 马叙伦（1885—1970），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团长。

[2] 蒉延芳（1883—1957），浙江镇海人，当时任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张絅伯（1885—1969），浙江宁波人，当时任中兴实业公司董事。包达三（1884—1957），浙江镇海人，当时任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盛丕华（1883—1961），浙江宁波人，当时任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药厂董事长。吴耀宗（1893—1979），广东顺德人，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校会组主任、青年协会书局主任。阎宝航（1895—1968），辽宁海城人，当时任中国经济事业协会理事，是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发起人之一。雷洁琼（1905—2011），广东台山人，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理事、东吴大学教授。陈震中，1926年生，浙江海宁人，当时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市学生会团体联合会主席。陈立复（1924—1994），江苏镇江人，当时是东吴大学学生、东吴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

[3] 1946年6月中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推举马叙伦等10人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代表们于6月23日傍晚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纠缠、辱骂和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及新闻记者数人被打伤。这个事件被称为“下关惨案”。

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民主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毛泽东
朱　德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6月25日）

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又不可能则请考虑恩来托故回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带必要人员回来，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坚持代表团工作，以待时局之变化。大概半年之后又可能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6年6月25日）

同意整军方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1]

（1946年6月26日）

华中局，并告陈、舒[2]：

（一）八天期满[3]后，国民党即将向我大举进攻。（二）为粉碎国民党之进攻，决令刘邓[4]主力出陇海豫东，陈舒主力出徐蚌[5]间，调动敌人而歼灭之。（三）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通扬[6]线上之敌，粟谭[7]率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分区，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8]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9]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电报。

[2] 陈、舒，指陈毅、舒同，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

[3] 根据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提议，国共双方经过磋商，于1946年6月6日分别发表了自6月7日12时起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6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期延长至30日。

[4]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6] 通、扬，指江苏南通和扬州。

[7]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8] 蚌、浦，指安徽蚌埠和江苏浦口。

[9] 指津浦铁路东西淮南军区的两个军分区。

用全力策动孙良诚[1]起义。（五）午灰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攻击。（六）你们一切听陈舒指挥。（七）为应付长期连续作战，你们应准备动员并适当使用自己的各项后备力量，一切作长期打算。

中央

巳宥亥

---

[1] 孙良诚，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五纵队司令。

蒋介石已向我中原部队实行攻击[1]

（1946年6月27日）

周，并告刘、邓、薄，陈、舒，邓、张[2]：

蒋介石所谓四十八小时后有惊人举动，是指阴谋歼灭我中原部队而言，蒋于月中下令聚歼有不许漏网之语。昨宥起实行攻击，我中原部队不得不起而自卫[3]。这一自卫斗争是否能不受严重损失，现尚不能预计。请对外广泛揭发国民党之阴谋。

中央
巳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周恩来的电报。

[2] 刘、邓、薄，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陈、舒，指陈毅、舒同，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邓、张，指邓子恢、张鼎丞，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3]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保存力量，争取主动，中原军区主力于是日分路向西突围。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1946年6月27日）

中央正考虑由各解放区发行土地公债发给地主，有代价地征收土地分配农民。其已经分配者，补发公债，如此可使地主不受过大损失。惟汉奸、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特务分子不在此例。你们可向中间派非正式地透露此项消息。

国民党大打后晋察冀军区的基本任务

（1946年6月28日）

聂、萧、刘、罗[1]，并告子华[2]：

二十六电[3]悉。

（一）你们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二）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

（三）热河[4]四个独立旅，冀东、冀中各两个旅，商都两个团及其他地方部队，均为保卫地方之用。在地方保卫战中，在万不得已时，一城一地之暂时得失是不足怪的。

（四）当敌进攻承德时，你们的主力不是保卫承德（因为这将劳

---

[1] 聂、萧、刘、罗，指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子华，即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今属运城市）人。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罗瑞卿1946年6月26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完全同意中央之战略方针，即先消灭阎锡山，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西北、晋冀鲁豫三区连成一片，解放出许多兵力对付东面敌人之机动作战。但我各区在兵力分布上，则恰与这一方针相反。因此我须取东防西攻之方针，尽量抽出可能抽出之兵力，集中使用于主要方面，方可实现大兵团运动战之歼敌计划。

[4] 指热河军区，属冀热辽军区。

而无功），而是乘敌北进，集中杨、杨、郭、赵[1]四个纵队及冀中、冀晋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

（五）举行平汉战役其利有七：一能集中最大兵力；二能打通冀晋、冀中；三能割断平津左臂；四能锻炼新队伍；五能增加人力物力；六能获得热河、冀东两区之战略配合作用；七是该线夺取后可能巩固。因此希望你们用全力组织平汉战役，于半月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

（六）平汉胜利后，即以主力三个纵队不少于二十团四万人入晋，充当夺取山西之主力，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使冀晋、晋绥、吕梁、太行、太岳五区打成一片，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

（七）野战军以萧克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

（八）冀热辽方面由程子华、李运昌[2]负军事领导之责。

（九）所有对平汉、正太、同蒲三路之进攻，均是攻城战，望立即训练攻城技术，多备黄色炸药，制造黄色炸药之工厂日夜加工。

（十）夺取三路四城（保定、石门、太原、大同）须准备六个月或较多时间，但是必须完成此任务。

（十一）刘、邓[3]另有任务，不能以主力配合你们打石门。

---

[1] 杨，指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杨，指杨成武，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郭，指郭天民，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晋纵队司令员。

[2] 李运昌，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十二）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十三）此电阅后即烧毁。

中央

巳俭

为避免仓卒作战七月底前完成大打准备[1]

（1946年6月28日）

刘、邓，陈、舒，并告邓、张[2]：

（一）陈舒电请由刘邓统一指挥，中央认为甚为必要。为达统一步调克敌致果之目的，请刘邓即日担负此职。（二）必须待谈判破裂国民党动手打我，然后方能打他，争取有理地位。（三）根据陈舒建议，为准备充分避免仓卒作战起见，将准备时间延长至午哿，必要时延长至午三十，但最迟不要过午三十。（四）各事均望刘邓、陈舒直接商定。

中央
俭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主任舒同的电报。

[2] 邓、张，指邓子恢、张鼎丞，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给十二军军委的信

（1946年6月28日）

粟裕同志转边区工作委员会，谭震林转十二军军委：

此次十二军工作区域分得不妥当，清流、连城应让第二军作第二步工作区，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为工作区，十二军担任这三县，三十五军担任瑞金一县，三军担任于都、会昌二县，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地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十二军两个月要做三县工作是不容易的，二次战争后四个月中，十二军做了石城一县宁南丰县工作，现在宁南是半色区域，石城是全色区域，过去成绩如此。现二个月做三县工作是必然难做好的，必定增加工作时期才行，若推广到清、连二县，并且耗十二军主力三十四师摆到二县去，那么十二军工作将又是毫无效果，因此须变更康都决议，让三十四师担任长汀全县，军直属队在三县之间，望坚决照此布置。

依大局看来，过去所拟三军团去二崇、四军去宁安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两广的共同行动乃由我们一□□□。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去

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变，只有东方才是好区域：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较之我们去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一军以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三军团应以建宁、太守、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先泽为筹款区域，四军应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明溪为筹款区域即在三县筹款自给，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赣东独立师的中心工作区域：广昌使之联系建宁与石城，所有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建立地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作宣传而不分田地不建立政权，此时期暂定两个月，延长不去可达两个月，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两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十二军在宁化、长汀、石城工作要力求工作好，最近在宁工作之失败（石城游击队尽是流氓与农民，通通反了水，要来一个透底的转变，坚决反对群众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若三县工作再如过去建宁石城一样，那么军委和三个师委□□负重要责任。

总前委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时于建宁

致周恩来电[1]

（1946年6月29日）

中原部队被攻，再不突围即被歼灭，为求生存该部决定日内突围，此举完全为求生存，并不牵涉和战问题。如政府愿和，应停止攻击与追击，允许该军由豫西渡河入山西或由陕西入陕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6年6月29日）

国民党二十一个师攻击我中原军区，我军突围求生存，理由全在我方，国民党毫无理由，切不可以为我军突围是不对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罗荣桓电[1]

（1946年6月30日）

你到目的地后，除治病外，请找菲里波夫[2]对满洲情况有所陈述，但勿作过高与过多要求，东北斗争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请就你所知对关内解放区情况有所陈述，勿作任何要求，因关内应完全靠自力更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即将赴苏联治病的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7月，罗荣桓偕夫人赴苏联治病，翌年5月回国。

[2]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

致余光生电[1]

（1946年6月30日）

光生同志：

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为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

本月参考消息，顽军侵占青州、龙山再车站，“文水阎军占我孝义镇”等项消息，请补发广播，并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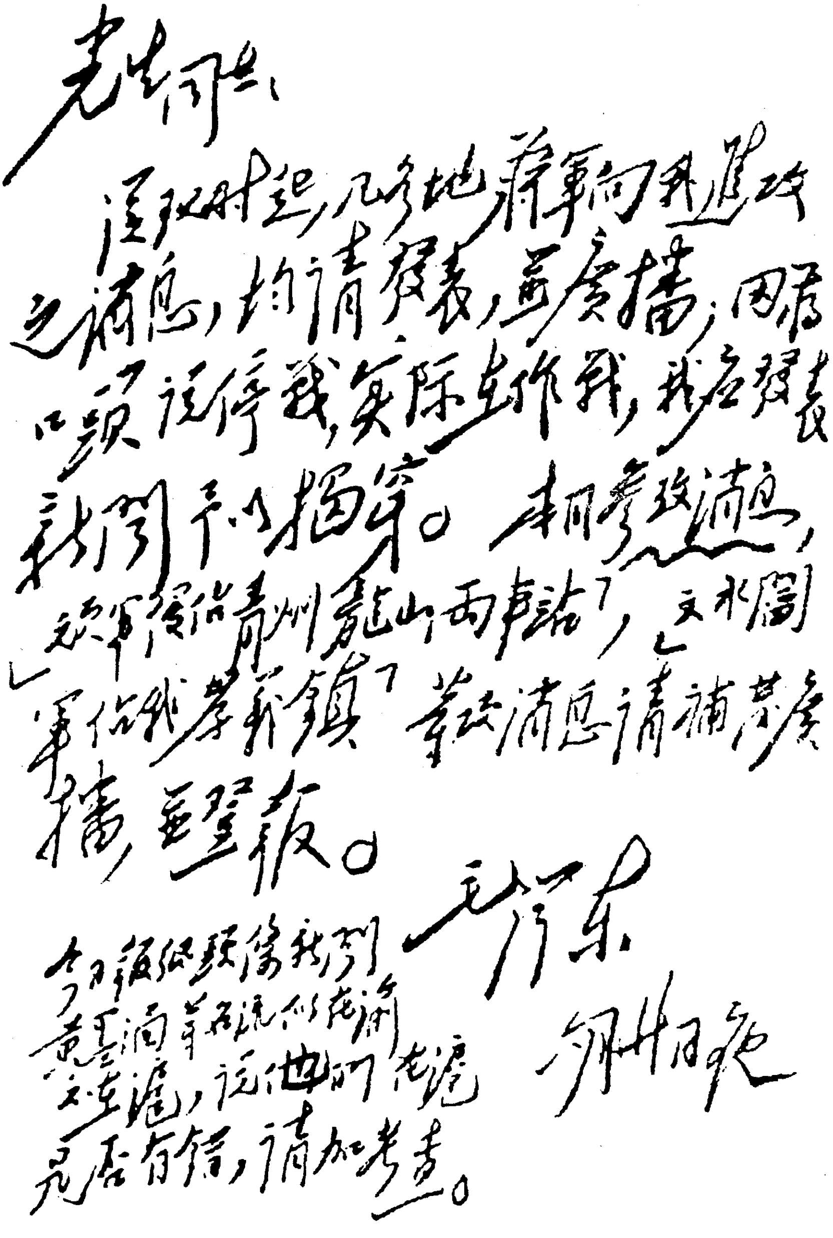
今日报纸头条新闻黄墨涌等名流似在渝不在沪，说他们在沪是否有错，请加考查。

毛泽东

十月卅日夜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发表揭露蒋军进攻解放区新闻问题给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社长余光生的电报。



光生同志：

从现时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为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本周各该消息，如「蒋军侵占青州龙山两车站」，「文水阎军侵我羊角镇」等该消息请补发广播并登报。

毛泽东
一月廿日夜

今日报纸载伪我们黄县消息等各说伪济方造谣，说他们在沪究否有信，请加考查。

毛泽东给余光生的指示的手稿。

利用停战时机加紧备战[1]

（1946年6月30日）

东北局：

（一）蒋介石在各方逼迫下明日起继续停战[2]。（二）望利用此时机加紧进行军事、政治、群众工作各方面之准备。（三）敌不攻我，我亦不攻敌，保持平静。（四）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心理，准备持久战争。（五）提倡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外援。

中央
巳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根据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提议，国共双方经过磋商，于1946年6月6日分别发表了自6月7日12时起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延长至30日。这里指蒋介石在各方面坚决斗争下，于6月30日停战时效再次期满后，又宣布在东北无限期停战。

准备应付边打边谈局面[1]

（1946年6月30日）

周：

（一）蒋介石得寸进尺，除已让国民党象征占领哈尔滨[2]及东北三师关内七师[3]外，目前一时期内不要再作让步，请表示再无可让，以观动静。（二）陈舒[4]电，济南顽军于二十七日攻占我龙山、枣园[5]两车站及章丘县城。（三）以后局面是边打边谈，我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

中央

巳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周恩来的电报。

[2] 1946年6月下旬，由国共双方和美国总统特使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初步协定。其中，中共同意国民党军队1个团（不超过5000人）驻哈尔滨。电文中“让国民党象征占领哈尔滨”即指此。

[3] 1946年2月25日，周恩来、张治中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会议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方案规定在18个月内，政府军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缩编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其中，中共在东北3个师、华北7个师。

[4] 陈、舒，指陈毅、舒同，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

[5] 龙山、枣园，均为镇名，位于山东章丘县西部。

各部暂处待机位置加紧准备[1]

（1946年6月30日）

刘、邓，陈、舒，邓、张[2]：

（一）蒋[3]为各方所迫，将发继续停攻命令。似此，我各部暂时宜位于待机位置，以免集中过早暴露企图。（二）望利用此时机，一面加紧练习攻城战及进行具体侦察，一面加紧进行高树勋运动，例如对守备徐蚌[4]间之滇军五十八军，应设置专门机关，集中一切云南人，由此专门机关率领直达徐蚌间各据点附近进行工作。

军委

巳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陈、舒，指陈毅、舒同，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邓、张，指邓子恢、张鼎丞，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3] 蒋，指蒋介石。

[4]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反动派的企图终究要失败[1]

（1946年6月30日、7月7日）

一

弼时[2]同志，并告乔木[3]同志：

请考虑“七七”发表宣言，以便动员全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进攻。此宣言首述日本投降后本党发表宣言[4]，主张和平建国；继述双十协定[5]及内战；继述政协表现光明；继述较场口[6]以来中国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向解放区及人民大众的进攻及人民应取之方针。全文应说明外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合作，要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中国人民的任务仍是争独立争民主为中心；应表明我党坚决反内战；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起草要点给任弼时并告胡乔木的信；本篇二、三是毛泽东修改宣言稿时加写的两段话。

[2] 弼时，即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塾塘乡（今属汨罗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乔木，即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4] 指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

[5] 双十协定，即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会谈纪要。

[6] 较场口，指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20多个团体的群众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伤李公朴、郭沫若及新闻记者等60多人。

应说历史不会开倒车，反动派的企图终要失败。请乔木执笔。

毛泽东
六月三十日

二

目前中国反动派的猖獗，不是表示他们的强大和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的软弱和回光返照。任何国家的法西斯统治，都具有这种性质，中国不能是例外。法西斯主义是最丑恶的，而又是最软弱与最无生命力的。因此，中国反动派要想消灭人民的力量，实现永久的法西斯统治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

三

全国同胞应该懂得，中外反动派的反动企图是可以被打败的。我们一定要打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我们一定要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我们一定要实现停战令、政协决议[1]与整军方

---

[1] 政协决议，指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面口头上表示承认这些协议，另一面积极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案[1]。凡愿意实现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就表示欢迎。凡属反对这些的，不论什么人，我们就表示反对。全国同胞们，我们的要求是这样的合理，我们的事业是这样的具备正义性，那末，我们的要求是一定要实现，我们的事业是一定要胜利的。

---

[1] 整军方案，指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提出“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改善征兵制度”“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之外”“实行军党分立”“实行军民分治”等原则，还对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的整编作出了规定。

致全体战地司令员命令[1]

（1946年7月1日）

共产党员、全体战地司令员：

在任何地点，如果国民党军队不攻击我军，我军即不应主动地攻击国民党军。但如被攻击，我军将坚持采取自卫手段，以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并维持民主政府的法令。

毛泽东
朱　德
七月一日

---

[1] 蒋介石7月1日通过广播演说公开发布给各地战区长官的命令，声称："如共军不进攻我军，则我军亦不进攻共军。"这是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发布的这个命令和朱德公开发布致全体战地司令员的命令。

夺取青县沧州需有充分准备[1]

（1946年7月2日）

聂、刘，并告孙、林：

（一）孙林艳电[2]悉。夺取青、沧需有充分准备，如准备尚未充分，宁可迟几天动作。（二）在二十天至一个月内，请令冀晋冀中两区对平汉线[3]保持绝对平静，不要有任何破击扰乱之事，以便麻痹敌人，放松对我之戒备。

军委

午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并告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和政治委员林铁的电报。

[2] 指1946年6月29日18时孙毅、林铁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静海至沧州段铁路沿线共有原伪军7000余、国民党军1个营。我们与渤海军区协同组织对该敌之反击战役定于7月6日夜开始，在夺取唐官屯、青县等据点，破坏有关几段铁路后，再乘胜夺取沧州。同时，对平汉线北段有关路段作小规模的破击，大的破击待战役完毕后始能进行。

[3]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中央关于对付蒋介石边打边谈政策的对策的指示[1]

（1946年7月2日）

各局：

（一）据恩来巳卅电称：蒋介石政策如中央所指是边打边谈。东北方面因兵力不足，一时不致有大动作；关内则必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及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之下，向我中原、苏北、山东、热河等地进攻，同时保持谈判，这样一则便于美国军事援助，二则不过于刺激群众。

（二）望各地照原定计划，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

中央
午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局的电报。

关于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的行动问题[1]

（1946年7月3日）

郑、李，并告王、戴，王、张[2]：

（一）你们应以数天行程，进至天河口[3]以西、枣阳以北地区，争取数天休息。（二）信阳、天河口、枣阳之线以北地区属孙震[4]所辖之第五绥靖区，而孙震指挥之兵力只有第十五、第四十一、第四十七、第三等四个整编师。其中四十七师陈鼎勋部受命进剿宣化店[5]；十五师武庭麟部只有两个旅，现到柳林[6]准备向西；四十一师

---

[1]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以八个整编师又两个旅约22万人的兵力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部队为保存力量，争取主动，除一部分武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以一部伪装主力向东突围迷惑和牵制敌人外，主力由宣化店等地分两路向西突围，实行战略转移，分别于6月29日和7月1日越过平汉路。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和司令员李先念的电报。

[2]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王、张，王，不详，张，指张体学，当时任鄂东军区司令员。

[3] 天河口，村名，位于湖北随县北部。

[4]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5] 宣化店，镇名，位于湖北大悟县东北。

[6] 柳林，镇名，位于河南信阳市南部。

曾甦元部[1]正由确山向信阳进，该师准备以一部位于桐柏，以主力协同十五师向西追击；而以天河口为各部攻击目标。此外可能有六十六师宋瑞珂[2]一部参加西进。共计追击兵力不会超过六个旅。第三师赵锡田部亦受孙震指挥，孙令该师第三旅周庆祥[3]部由枣阳以西向枣阳前进，守住枣阳，节节抗击，以待追兵之到达。（三）因此，只要你们进到天河口以西、枣阳以北地区，便可将一切敌人主力抛在后面及侧面，可以取得数天休息，而这是完全必要的。（四）休息时可将各纵队各旅分布于东西向之长方形地区内，待敌向我前进时，我将各部逐渐由东边向西边收拢，以少数部队任后卫与敌保持接触，如此可以取得数日至一星期之休息时间。（五）第三师还有两个旅在襄樊及南阳任守备，似难用于野战。（六）待你们取得休息查明敌情后，在有利条件下，可考虑用伏击方法歼灭敌人一部（例如一个旅），顿挫其追击计划。

军委
午江亥

---

[1] 曾甦元部，指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师长曾甦元，当时由陈宗进代师长。

[2] 宋瑞珂，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

[3] 周庆祥，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副师长，第三旅旅长为何竹本。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

（1946年7月4日）

刘、邓，陈，华中局：

据华中电，刘汝明曹福林[2]部队传出消息，该两军将由考城[3]、东明开济宁；据剑英[4]电，午东收到国方备忘录，限我军午陷退出东明及至考城之走廊，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据恩来午冬电，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据刘邓电，顽方准备以三十一集团进攻焦作，以四十四集团进攻冀南；据陈电，济南、潍县两顽正攻胶济路，等语。似此，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果如此，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对顽军可能大举进攻情形望提高注意。

军委

午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的电报。

[2]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曹福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兼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长。

[3] 考城，旧县名，1954年与兰封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4]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

对时局的估计和我党的方针[1]

（1946年7月5日）

周，并告叶、李[2]：

（一）时局有好转可能，主要原因是我党力量存在及坚决斗争。（二）我军主力现作准备，如坏转则大打，如好转则不打，如拖延则小打。（三）请根据中央七七宣言[3]（今夜广播）精神，坚持政治、军事同时解决，即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全部实现政协决议[4]及整军原则[5]，蒋介石一切无理要求，坚决拒绝。（四）我五师已脱危险期，到了随枣[6]南北地区，堵兵甚少，追兵不力。我军休息数日后，即自由行动。如时局好转，则在国民党不追不堵条件下可以退到华北；如时局坏转又堵又追，该部将在广大区域自由活动，以求生存。

中央

午微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周恩来的电报。

[2] 叶、李，指叶剑英、李克农，当时分别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和秘书长。

[3] 七七宣言，指《中共中央为“七七”九周年纪念宣言》。宣言呼吁：（一）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的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停止建立工事、停止征兵的命令；（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三）复员裁兵，废除军阀制度；（四）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

[4] 政协决议，指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二）和平建国纲领。（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后来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5] 整军原则，指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军事问题协议中提出的整军原则。这个协议规定“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改善征兵制度”“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之外”“实行军党分立”“实行军民分治”等原则。

[6] 随枣，指湖北随县和枣阳。

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后的形势和任务[1]

（1946年7月5日）

郑、李，并告王、戴，王、张[2]：

（一）蒋介石以武庭麟宋瑞珂[3]作战不力，未能堵我西进，饬令查办，并称，此次“剿匪”关系整个战局及建国前途，要求努力作战。从各“剿匪”将军反映，一切“剿匪”部队，均未完成任务，我方损失甚微，彼方毫无所获。（二）据整编七十五师第六旅午江反映，我王戴部[4]已至平林市[5]附近，该旅长林曦祥率部由安陆向北准备追击。据武庭麟称，该师午江开始由柳林[6]西进，但粮食困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电报。

[2] 王、戴，指王树声、戴季英，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王、张，王，不详，张，指张体学，当时任鄂东军区司令员。

[3] 武庭麟，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师长。宋瑞珂，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

[4] 王戴部，指王树声率领的中原军区左路突围部队。该部由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欠第一旅）和第二纵队第十五旅（欠一个团）组成。戴季英未随该路行动。

[5] 平林市，镇名，位于湖北应山县西南。

[6] 柳林，镇名，位于河南信阳市南部。

曾甦元[1]宋瑞珂两部何日行动尚无反映；第三师之第三第二十两旅，程潜[2]令其抽兵确保随枣[3]，判断该两旅除守备襄樊者外，仅能各抽一部增防随、枣据点。（三）现在一切主要敌军均被你们抛在后面，你们各路，每路应以一小部附电台任后卫，远距离与敌保持接触，迟滞敌人，主力争取时间休息。（四）你们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南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人，对全局贡献极大。（五）江汉军区部队应令其在原地坚持，不要带走，该区仍是你们很好回旋地区之一，不要轻易放弃。（六）整个时局变化于我有利，反动派外强中干，弱点甚多。

军委

午微

---

[1] 曾甦元，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师长。

[2]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

[3] 随枣，指湖北随县和枣阳。

致聂荣臻电[1]

（1946年7月5日）

同意你们攻大同计划[2]。望令张、罗、杨[3]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同时准备歼灭傅作义向我进攻之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聂荣臻、刘澜涛6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如政治上许可，在步骤上以攻占大同为有利，然后沿同蒲路南扫。"

[3] 张、罗、杨，指张宗逊、罗瑞卿、杨成武。

复重庆各界名流等电[1]

（1946年7月5日）

重庆黄墨涵、黄次咸、邓初民等先生均鉴：

奉读来电，甚佩卓见。坚持和平，反对内战，乃今日中国之惟一国是。敝党决本此方针奋斗到底。尚祈一致努力，以速和平之实现。

毛泽东谨复微

重庆基督教协进会和平祈祷大会诸先生惠鉴：

铣电奉悉，诸先生热心国事，呼吁和平，无任钦佩。敝党素主以和平团结解决国内一切争端，已由敝党南京代表团提议双方明令全面长期无条件停战。惟少数好战分子仍在迷信武力解决，致内战危机依然存在。尚望共同努力，制止战祸，国命民生，实深利赖。

毛泽东谨复微

---

[1] 重庆各界名流黄墨涵、黄次咸、邓初民等4271人，及基督教协进会和平祈祷大会，6月致电毛泽东，呼吁和平，毛泽东特于5日分别电复。

攻打平汉路的时机和作战部署[1]

（1946年7月6日）

聂：

四日电[2]悉。（一）我打平汉[3]应在国民党向我大打，例如打苏北、打承德之时；现在只作准备，请争取于本月内大体准备完毕。（二）打时四个纵队（陈正湘[4]不在内）中以一个位于平绥路[5]，以三个打平汉，配合冀晋、冀中，兵力很够。（三）如能占领平汉全部或大部，国民党第三、第十六两军能被歼灭一半左右，平津之敌即不敢妄动，平绥即可巩固；如平汉在敌手，平绥即不能巩固。（四）本月内如能占领青沧[6]，既可威胁天津，又能集中兵力打平汉。（五）本月内如能占领怀仁、应县、繁峙、代县、五台、定襄、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指1946年7月4日聂荣臻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攻击平汉路须考虑巩固平绥路现有地位，但互相策应颇为困难，因此晋察冀区至多只能出3个纵队配合冀中、冀晋地方主力，整个西线（晋绥）须由晋绥军区部队负责。

[3]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4] 陈正湘，当时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

[5] 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6] 青沧，指河北青县和沧县。

县[1]、忻县一线，则傅作义[2]必有所畏而不敢东进，即进亦可以贺李[3]主力及陈正湘部对付之。（六）待青、沧及同蒲北线占领后再打平汉最为有利。

中央
午鱼

---

[1] 崞县，旧县名，1958年撤销，部分划归山西宁武县，部分与代县合并为山西原平县。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统一指挥夺取代县崞县等地[1]

（1946年7月6日）

贺、李，聂、刘：

宁武、繁峙夺取后，两部[2]应即统一指挥，协力夺取代、崞[3]，打通两区[4]联系，第二步再取五定忻[5]。至北面之怀仁、应县，就当地力量能取则取之,不能取则暂置之。请聂刘即令繁峙陈旅[6]接受周士第[7]指挥，部署夺取代、崞为要。

军委

午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的电报。1946年7月1日，晋绥、晋察冀军区各一部组成晋北野战军，4日发起晋北战役，解放与收复崞县、五台、原平等地，歼敌8000余人。8月15日，战役胜利结束。

[2] 两部，指参加晋北战役的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部队。

[3] 代，指山西代县。崞，指崞县，旧县名，1958年撤销，部分划归山西宁武县，部分与代县合并为山西原平县。

[4] 两区，指晋西北与晋东北两区。

[5] 五定忻，指山西五台、定襄和忻县。

[6] 陈旅，指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一旅，旅长陈仿仁。

[7] 周士第，当时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七七”宣言[1]发表后应采取的策略方针

（1946年7月6日）

各局，及周、叶、伍[2]：

中央“七七”宣言尖锐批评美国及中国反动派，唤起国人起来救国，足以振奋人民意志，置反动派于困难地位，以便在人民面前孤立他们。但同时指出，加强对美国民主人士之联系，主张国内开各党派在内的政治协商会议，不论何人，只要赞成政协者均表欢迎。因此，各地对北平执行部及各小组仍应照前指示[3]尊重国、美两方代表，并注意拉拢美国一切人员。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

---

[1]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呼吁：（一）立即重行发布全国（包括东北）无例外无条件无限期地停止冲突、停止运兵、停止建立工事、停止征兵的命令。（二）重开政治协商会议，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三）复员裁兵，废除军阀制度。（四）美国政府停止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自动撤退一切在华陆海空军。

[2] 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代表。伍，指伍修权，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参谋长。

[3] 指中共中央1946年6月22日给各中央局的电报。参见《正确对待军调执行小组的国、美人员》。

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面前均有许多困难，我们对于他们的困难条件应当有足够估计，以便利用他们的困难进行坚决的但是适当的斗争，争取时局好转。若干中间人士必以为我们宣言所取态度太强硬，应向他们解释：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

中央
午鱼

对付美蒋的主要政策
不是让步而是斗争

（1946年7月6日）

李、黄[1]：

时局分析电[2]收到。你们分析中许多观点是合乎实际的，是好的，但缺点是对美帝国主义及蒋介石的困难条件估计不足，同时对国际国内人民民主力量所具备的顺利条件也估计不足。第二次大战后，各国革命力量所处的地位是比第一次大战后要好得多，而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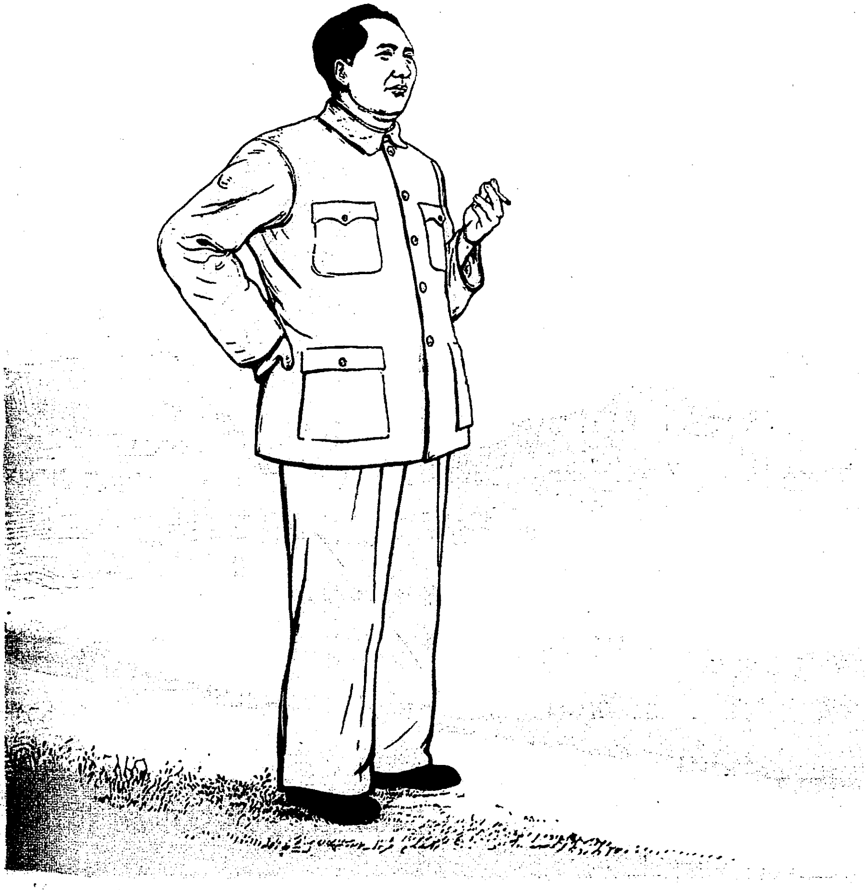
---

[1] 李，指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政治委员。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司令员。

[2] 指李富春、黄克诚1946年6月28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势力有了大的发展，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主义与以苏联为中心的人民势力的矛盾更加尖锐了。但战后的人民力量并没能形成大规模的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解放运动，帝国主义也未发生像那时的严重危机。在中国八年抗战中，人民的势力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与壮大，中国整个反革命势力在抗战中是削弱了，但反革命的中心势力蒋介石的力量在战后则是加强了。基于上述分析，党的方针是力求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具体办法是：需让步以达和平，需拖延以待时机，需坚决打下去以分胜负。目前已到和战最后关头。估计蒋介石不会因我们让步放下屠刀，这样则不如采取坚决打下去的方针。这个方针也危险，胜利把握不大，但如打得好可能打打停停，可以长期坚持以待国内外的根本变化。

要差些。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出以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毛泽东
午鱼



《毛主席在延安》(木版套色)

关于学习和宣传中央“七七”宣言[1]的通知

（1946年7月8日）

各局，转各省委、区党委：

（一）中央“七七”宣言应在党内开展讨论，团结全党同志执行中央路线，将党内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的悲观失望情绪根本扫除。（二）引导党外人士在座谈会中讨论时局，争取他们同意我党主张，团结一切进步分子及中间派和我党一致行动。（三）将宣言中各项要点在报纸刊物上作文发挥或作讲演，例如，美国反动派与中国反动派互相勾结危害中国；一切反动派进攻必须打败与能够打败；中国法西斯猖獗不是表示他们强大与有生命力，而是表示他们软弱与回光返照；国际国内民主力量发展壮大足以打败一切反动派；宣言中四项要求的重要性与必须实现；一部分人对国际与中国光明前途认识不足是错误的；爱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之重要性；团结一切美国民主人士之重要性等。（四）将宣言印成单张，向大城市及国民党军队广为散发。

中宣部

午齐

---

[1]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

致周恩来等电[1]

（1946年7月8日）

对五师，要求彼方停追停剿；各地大员不要出外谈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郑位三、李先念电[1]

（1946年7月8日）

希望你们不但生存，而且发展，并为全局牵制大批敌人，这有极大战略意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国民党不全面长期停战
我绝不片面停战[1]

（1946年7月9日）

周、叶：

（一）一月十三日后，顽在关外占我二十余县及重镇，在关内除收复者外，亦占十余县，最重要者为占我二千余村镇，五百万人口之中原解放区被占是其中之最显著者。（二）顽如能全面长期停战，我自可停止报复，否则绝无片面停止理由。（三）大同太原两点决暂时不打，待顽攻苏北，或承德，或他处时再打，但山西其余各县凡能打者我必打之，除非全局及五师能真正和平解决，不应考虑派小组[2]到山西来束缚自己手足。（四）朔县、繁峙是攻占，山阴[3]、宁武、代县是顽自己放弃，尚拟攻占怀仁、应县、崞县[4]、五台、定襄、忻县、介休、灵石、霍县、孝义、中阳、石楼、汾西、蒲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周恩来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叶剑英的电报。

[2] 小组，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执行小组。

[3] 山阴，指山阴城，位于山西山阴县南部。

[4] 崞县，旧县名，1958年撤销，部分划归山西宁武县，部分与代县合并为山西原平县。

隰县、大宁等县，使几个解放区打成一片，以为丧失中原解放区之代价。

甲乙
午佳

致各中央局、分局电[1]

（1946年7月10日）

必须认识蒋介石此种作法的两面性：一方面，国际国内大局迫使他不能全国大打，有些地方兵力不够也无法大打，故申言要停战，要和平，我党力量强大及坚决斗争是迫使他如此做的最主要因素；另方面，对五师，对胶济，已在大打，对苏皖即将大打，对豫北对热河亦在准备打，均以自卫为名。此种边打边谈以打为主的局面，至少还将继续一时期，各地应充分注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马歇尔转来蒋介石发给全国各长官的一个以自卫为名进行内战的命令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1]的修改意见

（1946年7月11日）

林彪[2]同志：

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提议作如下之修改：

（一）第一段改写如下：去年八月，英勇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进攻日本侵略者，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配合红军作战，消灭日寇与伪满，替东北人民开辟了自由生活的道路。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对日反攻以后，我党更从关内派遣大批军队与大批干部至东北，帮助东北人民创造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但是，丧失东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在美国反动派援助之下，违背和平约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从去年十一月山海关战役起，至今年六月七日两军停战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坚决的自卫战争。目前双方虽尚

---

[1] 1946年7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国内外和东北的形势，总结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止国民党军进攻的经验教训，统一对敌强我弱形势、和与战、城市与乡村以及作战方针等问题的认识。5日，东北局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决议稿，报请中共中央审批。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在停战状态，但战争仍有再爆发之可能。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处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尚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与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与粉碎蒋军可能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二）第二段甲项，提议作如下之修改：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目前英美矛盾增长，美国内部矛盾又极严重，蒋介石在全国范围说来仍感兵力不敷分配，且人心不顺，经济困难，尤其重要的是我党我军的力量强大与坚决斗争。因此，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于十五天及八天停战期满后，又宣布无限期停战[1]。在某些蒋军力量不足地区，停战对于蒋军亦属有利，但在蒋军力量充足地区，例如对中原区，对胶济路，蒋介石已经发动大打，对苏皖，有很快大打可能。对东北，目前蒋军兵力不足，利于停战，但如增兵到来，便有极大可能向我再进攻。蒋介石在此次南京谈判[2]中，除允许给我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3]一部与延吉地区外，其余均要接收，不但要占点，而且要占面，此为

---

[1] 根据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的提议，国共双方经过磋商，于1946年6月6日分别发表了自6月7日12时起在东北休战15天进行谈判的声明。21日，蒋介石宣布东北休战延长至30日。6月30日停战时限再次期满后，蒋介石在各方面的压力和坚决斗争下又宣布在东北无限期停战。

[2] 指1946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国共双方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冲突、恢复交通、整编军队3个问题的谈判。

[3] 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嫩江省，是国民党政府于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新划定的省份。当时国民党政府将东北划为九省，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及嫩江省所辖范围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

我方所绝不能接受者。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因此，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取得的，但主要应依赖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的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三）乙项，删去“展开背靠朝鲜、苏联、外蒙、热河的根据地”一句。

（四）丙项，斗争和战争目的，应先说为保卫解放区而斗争，东北人民已经从日伪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自由生活的解放区。但是，中国反动派在外国反动派援助之下向我解放区进攻，我东北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不能不举行自卫战，因为不自卫就灭亡，所以自卫战是完全正当与必须的。然后再说到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及其具体内容。阶级斗争口号不要提。

（五）其他各部分均同意。

中央

午真

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等电[1]

（1946年7月11日）

周恩来七月十日自南京来电，说国民党拟于本月十二日开始大举进攻苏皖区。望充分注意。接此电后，粟裕率部于七月十三日发起苏中战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注意加强部队纪律教育

（1946年7月12日）

各局，转各部队首长：

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近来仍有部分部队，由于事先忘记进行此项教育，或在进行此项教育时未采取认真的严肃的态度，或以为过去进行过此项教育，在新的行动时不必再做，或仅使少数人知道，未能由部队首长举行全体讲话，以致在进入城市时发生破坏纪律之事，实属不好。望各部队首长责成政治机关对此予以检讨，加强一切部队的纪律教育，是为至要。

中央
午文

中原军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外线牵制敌人[1]

（1946年7月13日）

郑、李：

（一）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计划是先攻苏皖，后攻华北，并企图消灭我中原军。其攻苏皖之计划定于数日内行动，分为三路，一路由徐州向南，一路由津浦向东，一路由江北向北，同时向我苏皖边区进攻，总兵力在二十师以上。

（二）我党决心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胜利，取得和平。

（三）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境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是为作战之第一阶段；然后我内线部队渡淮向南，与中原军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是为第二阶段。

（四）上述计划务守秘密。

（五）此电阅后即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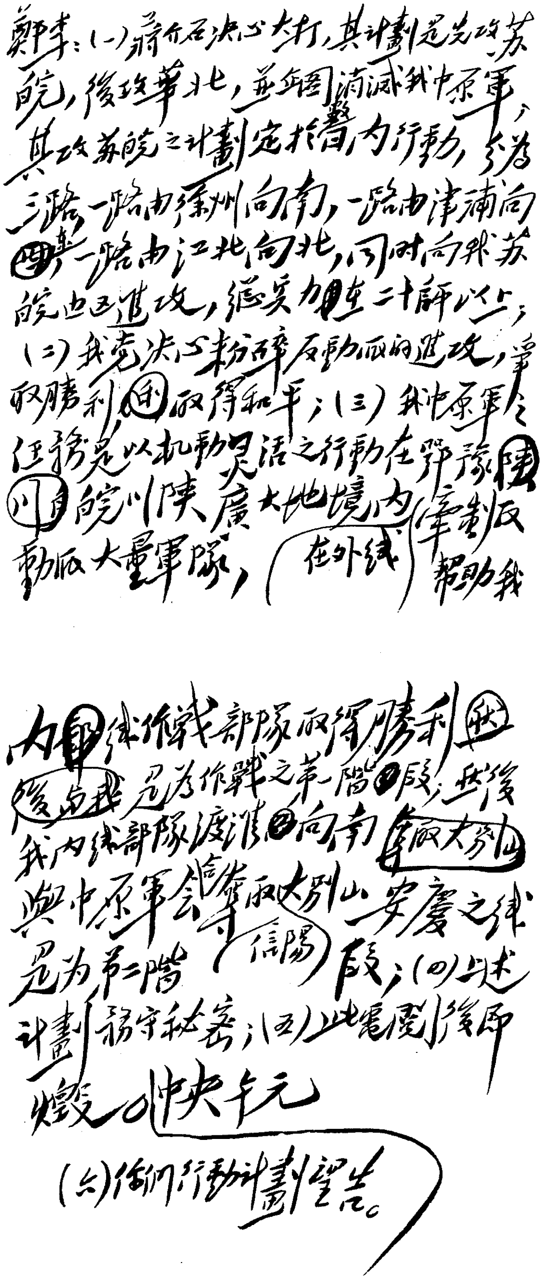
（六）你们行动计划望告。

中央

午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军区政治委员郑位三和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电报。



鄭李：（一）蒋介石决心大打，其計劃是先攻苏皖，後攻華北，並企圖消滅我中原軍；其攻苏皖之計劃定於數日内行動，分為三路，一路由徐州向南，一路由津浦向東，一路由江北向北，同时向我苏皖边区進攻，總兵力在二十師以上；（二）我党决心粉碎反動派的進攻，爭取勝利，求取得和平；（三）我中原軍之任務是以机動靈活之行動在鄂豫陝川廣大地境内，在外线牽制反動派大量軍隊，帮助我内線作戰部隊取得勝利，此是為作戰之第一階段；然後我内线部隊渡淮向南與中原軍会合奪取信陽、大别山、安慶之线，是为第二階段；（四）上述計劃務守秘密；（五）此電閱後即燒毁。

中央午元

（六）你們行動計劃望告。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原军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外线牵制敌人》的手稿。

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1]

（1946年7月13日）

陈、张、黎，刘、邓、薄，张、邓、粟、谭[2]：

（一）陈张黎真子电[3]判断及部署均正确，对桂顽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于被动地位。（二）刘邓所部亦在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轻动。（三）宁周[4]午文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5]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第一副军长兼第一副司令员张云逸和副政治委员黎玉等的电报。

[2] 刘、邓、薄，指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邓、粟、谭，指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指1946年7月11日子时陈毅、张云逸、黎玉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并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据华中息，桂系国民党军将以两个师进攻我淮北地区，估计进攻灵璧的可能性大。我们对其进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备，但鲁南大军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暴露我军企图。建议华中军区令第九纵队利用青纱帐设伏，能歼桂系国民党军一部就好。

[4] 周，指周恩来。

[5]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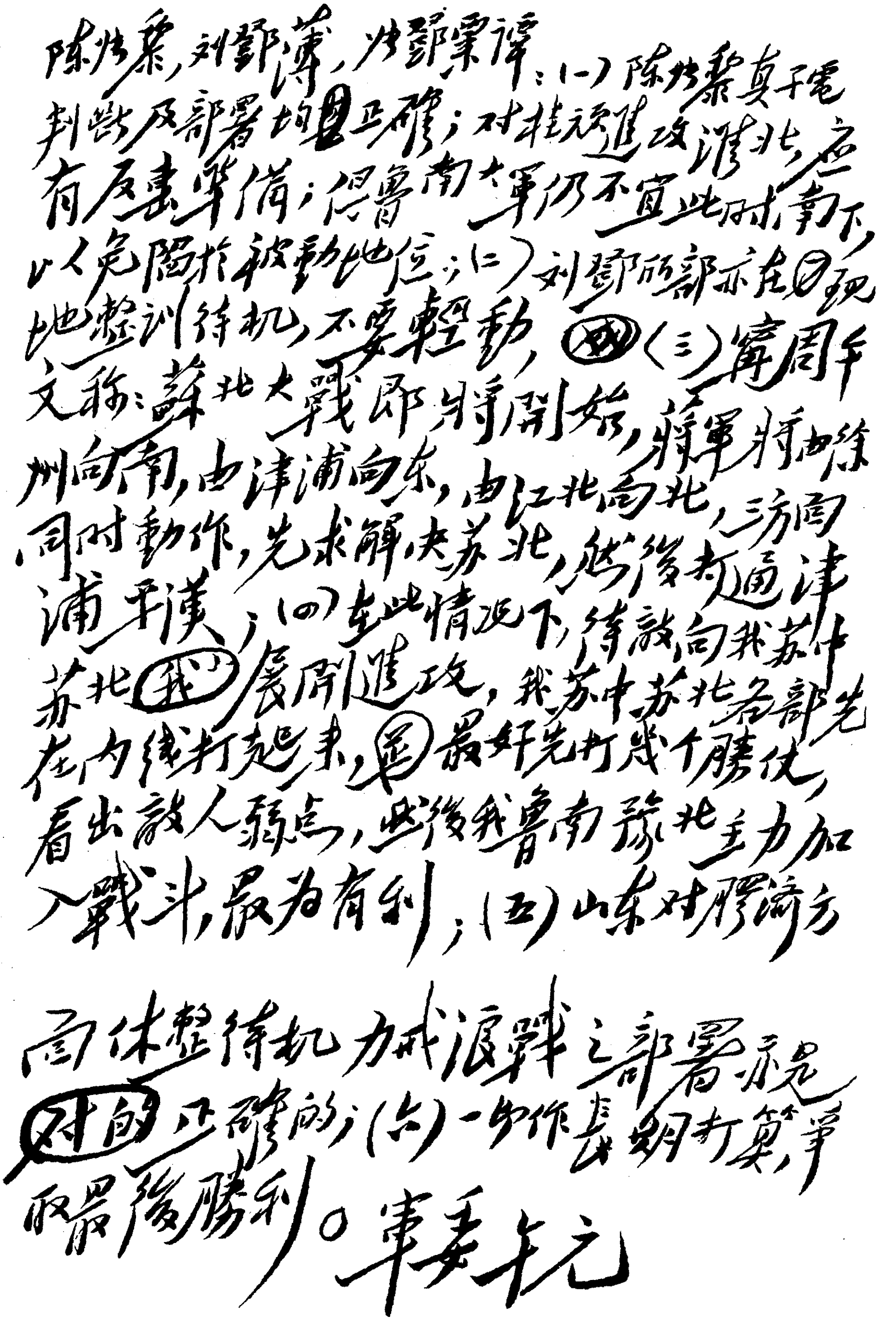
汉[1]。（四）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五）山东对胶济方面休整待机力戒浪战之部署亦是正确的。（六）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军委

午元

---

[1]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陈张黎，刘鄧薄，张鄧粟谭：（一）陈张黎真午电判断及部署均~~[illegible]~~正確；对桂系進攻淮北应有反击准備；但鲁南大軍仍不宜此时南下，以免陷於被動地位；（二）刘鄧所部亦在~~[illegible]~~现地整训待机，不要輕動，~~四~~（三）甯周午文称：蘇北大戰即將開始，蔣軍將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同时動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後打通津浦平漢；（四）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我~~展開進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最好先打几个勝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後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戰斗，最为有利；（五）山东对胶济方面休整待机力戒浪戰之部署亦是~~对的~~正確的；（六）一切作長期打算，爭取最後勝利。軍委午元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苏中苏北各部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手稿。

给李公朴、闻一多[1]家属的唁电

（1946年7月13日、17日）

一

昆明探转李公朴夫人张曼筠女士：

惊悉李公朴先生为反动派狙击逝世，无任悲愤！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肃电致唁。

毛泽东
朱　德
午元

---

[1] 李公朴（1900—1946），江苏扬州人，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遇害前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遇害前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

二

昆明国立西南联大请转闻一多先生家属：

惊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特电致唁。

毛泽东
朱　德
午篠

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收复长春路两侧各县[1]

（1946年7月15日）

东北局：

（一）蒋介石计划八月间从东北抽调两个至三个师入热河[2]，夺取承德，打通锦古路[3]，各个击破我军。

（二）你们须在一个月内（未删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新兵补充，部队训练，特别是攻城战，长春路[4]两侧各县的群众工作），待命收复长春路两侧各县。

（三）不论一个月后是否实行攻击，你们须于一个月内完成一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3] 锦古路，指锦州经承德至古北口的铁路。

[4] 长春路，即中国长春铁路。自哈尔滨起，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这条铁路原为俄国修建和经营，称中东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后，长春以南段为日本占据，称南满铁路。俄国十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合办，仍称中东铁路，九一八事变后也为日本所占。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统称中国长春铁路，归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1952年12月，苏联政府将长春铁路全部移交给中国。现分段改称滨洲、滨绥和哈大等铁路。

攻击准备。

（四）部队情况如何？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中央

午删

中原军的战略任务是在敌后创立根据地

（1946年7月15日）

中原局：

胡宗南[1]有强兵节节堵击，北上很难通过，且牵制大批敌军在敌后创立根据地是我中原军的光荣战略任务，因此我中原军全部应遵中央午文电[2]在鄂、豫、皖、川、陕五省境内进行机动灵活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目前为避免和胡宗南、刘峙[3]两路大军作战，并取得休息时间起见，你们可南入巴山，进一步占领通南巴[4]及川东北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我王刘[5]纵队则在鄂西创造根据地；皮徐[6]则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应为午元电，即中共中央1946年7月13日给中原军区郑位三、李先念的电报。

[3] 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4] 通南巴，指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

[5] 王，指王树声，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刘，指刘子久（1901—1988），山东广饶人，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副政治委员。

[6] 皮，指皮定均（1914—1976），安徽金寨人，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徐，指徐子荣（1907—1969），河南确山人，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政治委员。

活动于皖西及其附近；原路东、路西根据地[1]留下之部队则坚持原地区。将来你们还应准备派一部向大西南发展。总之为着根本破坏蒋介石以重兵进攻东北、华北、华中、中原之反动计划，并发展解放区至中原及长江上游，我党必须采取午文电计划及本电所述之部署。你们意见如何速告。

中央
午删

---

[1] 指平汉铁路（今京广线北京至武汉段）以东和以西的原中原解放区。

中原军胜利突围的意义

（1946年7月15日）

郑、李、戴[1]，并告王震[2]：

（一）十五日电[3]悉。你们休息两天很好。

（二）进到山阳、柞水、镇安地区时，既是山地，又两面无敌，应多休息几天，完全恢复疲劳。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能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顿住一时期，然后留小部在陕南游击，主力渡汉水占领通南巴[4]，开展新局面。

（三）你们尽可能多休息，敌人无奈你们何。

（四）王刘[5]过襄河后，十五旅至流水沟被七十五军之第六师追上未能过去，现沿襄河东岸北上，进至宜城东北耿家集、新街地

---

[1] 郑、李、戴，指郑位三、李先念、戴季英，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和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2] 王震，当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 指郑位三、李先念1946年7月15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及各路突围部队的电报。电报说：我北路军除损失300人外，已全部渡过丹江，进到淅川以西；右纵王震部已进到荆紫关河南岸宿营，决定再休息两天后西进。

[4] 通南巴，指四川通江、南江和巴中。

[5] 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区，该旅虽与第六师作战，但损失很小（据敌人反映）。

（五）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1]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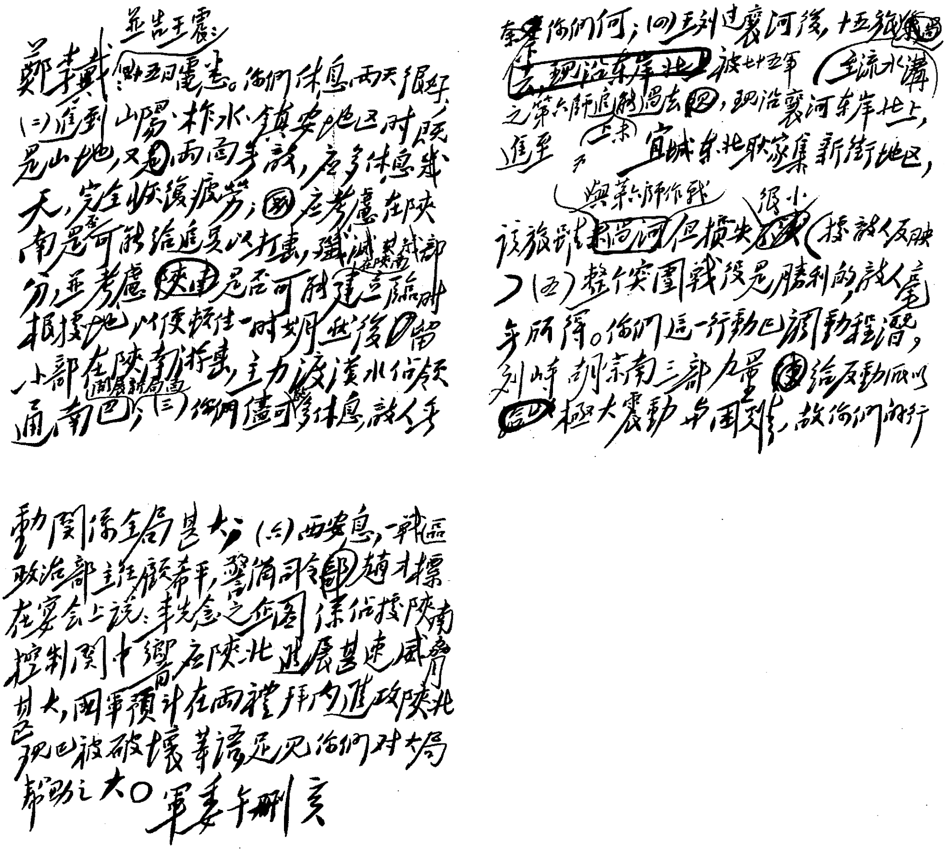
（六）西安息，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赵才标在宴会上说：李先念之企图系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甚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等语，足见你们对大局帮助之大。

军委

午删亥

---

[1]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鄭李戴並告王震：（一）魚五日電悉。你們休息兩天很好，（二）進到山陽、柞水、鎮安地区時，是山地，又是兩面受敵，應多休息幾天，完全恢復疲勞；（三）應考慮在陝南是否可能給追兵以打擊，殲滅其一部分，並考慮是否可能在陝南建立臨時根據地，以便堅持一時期，然後留小部在陝南打擊，主力渡漢水向鄂[illegible]通南巴；（三）你們儘可多休息，敵人奈你們何；（四）王劉過襄河後，十五旅[illegible]被七十五軍（主流水溝）之第六師追截，[illegible]，現沿襄河東岸北上，進至宜城東北耿家集新街地區，與第六師作戰，該旅戰[illegible]過河，但損失很小（據敵人反映）；（五）整個突圍戰役是勝利的，敵人毫無所得。你們這一行動已調動程潛、劉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給反動派以極大震動與困難，故你們的行動關係全局甚大；（六）西安息，一戰區政治部主任顧希平、警備司令部趙才標在宴會上說：李先念之企圖係向陝南控制關中，響應陝北，進展甚速，威脅甚大，國軍預計在兩禮拜內進攻陝北邊区，現已被破壞等語，足見你們對大局幫助之大。軍委午刪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中原军胜利突围的意义》的手稿。

复陈毅、宋时轮电[1]

（1946年7月15日）

午寒电[2]悉。在蒋军尚未进攻苏皖时，我军仍在现地待机，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3]结果如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陈毅、宋时轮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陈毅，当时兼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宋时轮，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

[2] 7月14日，陈毅、宋时轮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立即执行前定作战计划，截断津浦南段、陇海徐西段，造成山东、太行主力在淮北之会合，准备渡淮作战”。

[3] 泰兴战斗，即苏中战役的第一仗，后称宣（家堡）泰（兴）战斗。

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电[1]

（1946年7月15日）

此次泰兴作战不论胜败如何，均须于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即使打了大胜仗，也要如此，因敌人会继续进攻，我军在南线须准备打四五个大胜仗，方能解决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转粟裕并告陈毅、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

学习陈赓[1]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2]

（1946年7月16日）

各局、各军区转各师各纵首长：

据陈赓十四日辰电称：我纵主力昨（十三日）晚对闻喜方面向我进攻之顽军右翼进行各个击破，经五小时夜战，消灭顽十一旅两个团。据不完全统计，我缴获山炮四门、迫击炮七门、重机枪八挺、步枪五百余支、轻机枪三十余挺，俘顽千余名，我伤亡甚少。现正进行第二步战斗，继续歼灭该顽。又据陈赓十五日辰电称：闻喜第二次作战系在十四日夜，彻夜激战，结果我缴获山炮六门、平射炮二门、迫击炮十一门、小炮二门、重机枪八挺、轻机枪数十挺、步枪五百余，俘虏七百余，我军士气高涨，准备继续作战等语。此次阎[3]军万余，胡宗南[4]第一、第二十七两军五万余向我晋南解放区进攻。我陈赓纵队现已开始作战，采取集中主力打敌一部、各个击破之方针，取得两次胜利。我各地作战亦应采取此种方法，每次集中大力打敌一部，其比例应为三对一，最好是四对一，以求

---

[1]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2]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央各局、各军区的电报。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必胜，各个击破敌人。望将此种战法普遍教育团级以上将领，是为至要。

军委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6年7月16日）

请你们考虑，鲁南、太行两军现在是否已至开始行动之时机，两军准备情况如何，华中原定破击蚌浦路之九个团已准备完毕否。以上各点盼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宋时轮并告华中分局、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攻打忻州五台定襄问题[1]

（1946年7月17日）

贺、李，并告聂、刘：

午铣电[2]悉。忻州有敌七千，可能急切难下，似不如先取五、定，扫清忻州附近据点，发动民众，断绝忻敌接济，然后夺取该城较为有利，如阎派部增援，则先打援后取城，亦属有利。以上仅供参考。如周贺廖[3]根据实情，决定先取忻州，即照其决定办理。又该城敌亦有逃走可能。

军委

午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

[2] 指1946年7月16日贺龙、李井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军正向忻州追击中。先打何处，方案有二：（1）乘胜先攻占忻州，尔后即夺取定襄、五台；（2）以一部速攻取定襄、五台，主力集结于忻口、忻州间地区，扫除忻州外围据点，准备打援。此二案已告周、贺、廖考虑。周贺廖部队共有3个旅1.5万人。现忻州有敌7000，定、五各1000，如阎锡山派部增援，可在野战中消灭其一部，采取各个击破的打法。目前最好争取先打下忻州，然后再打援队。

[3] 周贺廖，指周士第、贺炳炎、廖汉生，当时分别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致郑位三、李先念等电[1]

（1946年7月17日）

目前国方重心在歼灭我军，无意和平。你们应集中注意对付敌人，不要上当。只有到敌人无法歼灭我军，我军反而严重威胁敌人大后方之时，才有可能迫使敌人改变计划，停止追击，恢复和平。因此你们暂时不要派代表出去，但可写信给两小组（由地方交顽军转达），要求国方停止追击，以便派遣代表出去谈判。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三人小组向突围的中原部队空投通知要求谈判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郑位三、李先念并告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徐州附近作战关系全局力争打好[1]

（1946年7月19日）

陈、宋，并告刘、邓[2]：

徐州附近之作战关系全局，如打得好，歼灭蒋军东进主力，则我军可以南打九十九及五十八等军[3]，可以切断徐蚌路[4]，配合刘邓大军发展新局面，杂牌军亦可能起来反内战；如打得不好，则苏中、淮北将处于困难地位。因此你们必须等候八十八师、二十八师[5]出来，并进至有利我们之地点，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师，得手后再歼第二个师。此两师解决，则全局胜利。你们意见如何？

军委

皓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此时国民党军第九十九军、第五十八军已分别改称整编第六十九师和整编第五十八师。这里仍沿用旧番号。

[4] 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5] 该两师均为整编师，相当于未整编的军。

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等电[1]

（1946年7月19日）

你们必须下决心在鄂西山地各县建立根据地，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在鄂西各县游击活动。成败关键是取得人民拥护，目前抢食办法非常危险，必须改变政策，分散游击，依靠民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当时分别任进入鄂西北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副司令员、参谋长。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

（1946年7月20日）

（一）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2]，破坏政协决议[3]，在东北占我四平、长春等地后，现在又在华东、华北向我大举进攻，将来亦有可能再向东北进攻。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

（二）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三）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

（四）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在农村中，一方面应坚定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农、贫农，团结中农；另方面在进行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

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国民党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五）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必须十分节省地使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力戒浪费。必须检查和纠正各地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必须提倡普遍植棉，家家纺纱，村村织布。即在东北亦应开始提倡。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总之，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和蒋介石的一切依靠外国，完全相反。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

（六）我们面前存在着困难，但是这些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全党同志和全解放区军民，必须团结一致，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1945年《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就不断地破坏这个协定，但是当时他对全面内战还没有准备好，主要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还没有运到内战前线。因此，在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压力下，仍然不能不召集有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

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一系列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并且在1月10日发布停战令。蒋介石不愿意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停战令。在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继续在许多地方向解放区进攻，在东北进攻的规模更大，形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同时美国用极大力量运输和装备国民党军队。到了1946年6月底，蒋介石和他的美国主子认为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认为可以在3个月至6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就以6月26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从7月起到9月止，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大举进攻。10月，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在全国规模内战爆发的时候，国民党用于进攻解放区的兵力，正规军共达193个旅（师），约160万人，占其总兵力正规军248个旅（师）200万人的80%。各解放区军民，在中共中央和各中央局、分局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了蒋介石军队的进攻。当时，解放区共有六个大的作战区域。这六个作战区域和在这些区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是：晋冀鲁豫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华东解放区（包括山东解放区和苏皖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东北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晋察冀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聂荣臻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晋绥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贺龙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中原解放区，在那里作战的是由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当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约为120万人，较之敌人的兵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人民解放军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所制定的作战方针，不断地给进犯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经过约8个月的时间，在消灭了敌人正规军66个旅，加上非正规军，共71万多人以后，便停止了敌人的全面进攻。接着，人民解放军又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逐步地展开了战略性的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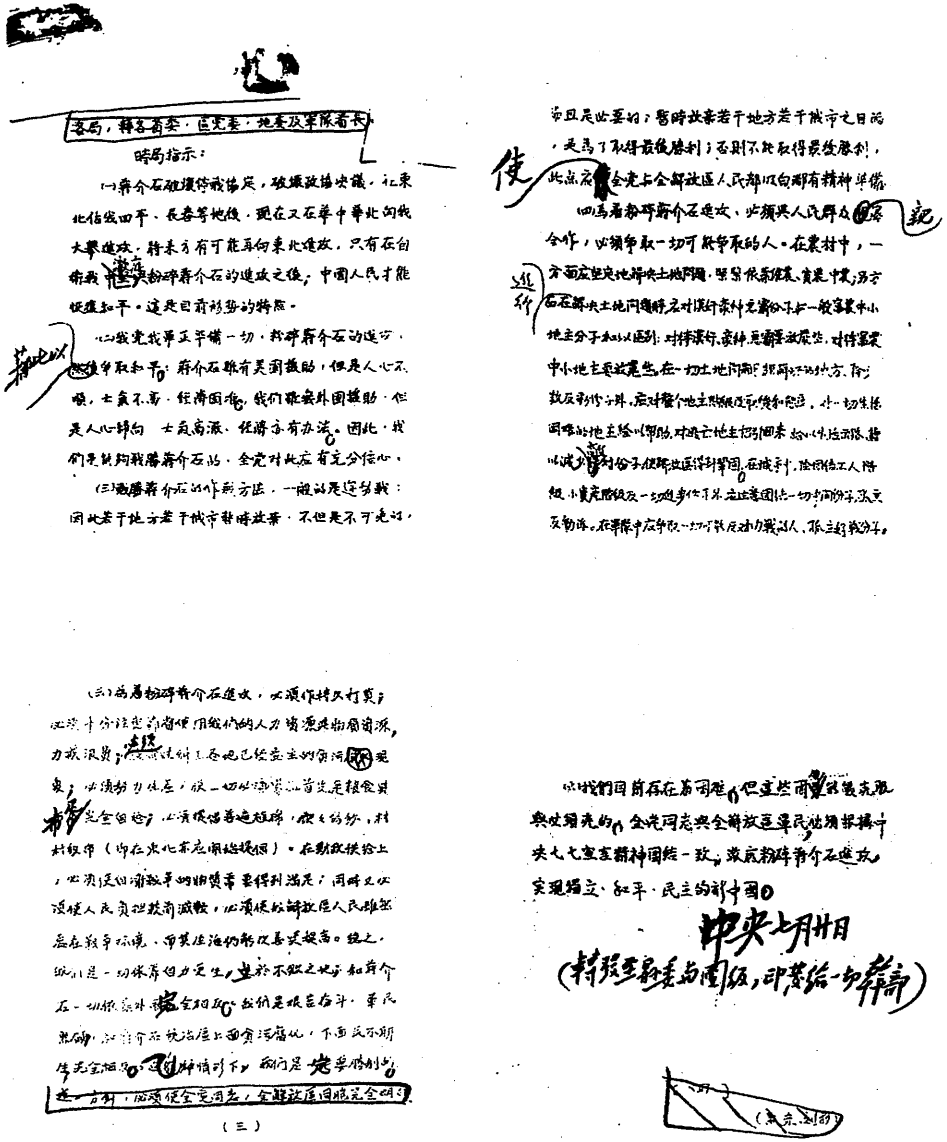
[2]　《停战协定》，即1946年1月10日公布的中共代表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代表签订的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双方军队应在1月13日午夜就各自位置上停止军事行动。但是蒋介石实际上是利用这个停战协定作为布置大战的幌子，在停战令下达的同时，即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地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到6月下旬蒋介石便公开撕毁

了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进攻。

[3] “政协”，即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个会议通过了5项议案。（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确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增加国民政府委员的名额；“国民政府委员由国民政府主席就中国国民党内外人士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各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由各党派自行提名，但主席不同意时，由各该党派另提人选”；“国民政府主席提请选任无党派人士为国府委员时，如所提人选有为各被选人三分之一所反对者，则主席须重新考虑，另行选任之”。“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由国民党人员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抽象地规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其权力为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和预算以及国民政府主席交议的事项等；同时，国民政府主席却有很大的权力，有指定权、议案的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又规定国民政府“行政院现有部会及拟设之不管部会政务委员总额中，将以七席或八席，约请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二）和平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包括《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及财政》《教育及文化》《善后救济》《侨务》等9章。在《总则》一章中，规定全国各党派“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在《人民权利》一章中，规定“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严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机关或个人，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之行为，犯者应予惩处”。在《政治》一章中规定“整饬各级行政机构，统一并划清权责，取消一切骈枝机关，简化行政手续，实行分层负责”；“保障称职人员，用人不分派别，以能力、资历为标准，禁止兼职及私人援引”；“厉行监察制度，严惩贪污，便利人民自由告发”；“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均权主义，各地得采取因地制宜之措施，但省、县所颁之法规，不得与中央法令相抵触”。在《军事》一章中，规定“军队建制应适合国防需要，依民主政制与国情改革军制，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改进军事教育，充实装备，健全人事、经理制度，以建设现代化之国军”；“全国军队应按照整军计划切实缩编”。在《经济及财

政》一章中，规定“防止官僚资本之发展，并严禁官吏利用其权势地位，从事于投机、垄断、逃税、走私、挪用公款与非法使用交通工具”；“实行减租减息，保护佃权，保证交租，扩大农贷，严禁高利盘剥，以改善农民生活，并实行土地法，以期达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实行劳动法，改善劳动条件”；“财政公开，厉行预算决算制度，紧缩支出，平衡收支，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缩通货，稳定币制，并公布内外债之募集及用途，由民意机关监督之”；“改革税制，根绝苛杂与非法摊派”。在《教育及文化》一章中，规定“保障学术自由，不以宗教信仰政治思想干涉学校行政”；“在国家预算中，增加教育及文化事业经费之比率”“废止战时实施之新闻、出版、电影、戏剧、邮电检查办法”。（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国民大会的代表“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组织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改国民党的宪法草案；并且规定了宪草修改的原则。除对国民大会、政府机构的职权作了原则规定外，特别对于地方制度和人民之权利义务作了规定。关于地方制度，规定“确定省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省与中央权限之划分依照均权主义规定”；“省长民选”；“省得制定省宪，但不得与国宪抵触”。关于人民之权利义务，规定“凡民主国家人民应享之自由及权利，均应受宪法之保障，不受非法之侵犯”；“关于人民自由，如用法律规定，须出之于保障自由之精神，非以限制为目的”；“工役应规定于自治法内，不在宪法内规定”；“聚居于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军队制度应依我国民主政制与国情实行改革”；“改善征兵制度”；“军队教育应依建军原则办理，永远超出于党派系统及个人关系以外”；“实行军党分立”，“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实行军民分治”，“凡在军队中任职之现役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关于整编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规定“军事三人小组应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整编完竣”；国民党军队“依军政部原定计划，尽速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师之整编”；“上两项整编完竣，应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师或六十师”。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些协议，在各种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

这些协议，在后来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各局，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及军队首长：

時局指示：

（一）蒋介石破壞停战協定，破壞政協決議，在东北佔我四平、長春等地後，現在又在華中華北向我大舉進攻，將来亦有可能再向東北進攻。只有在自衛戰爭中粉碎蒋介石的進攻之後，中國人民才能恢復和平。這是目前形勢的特点。

（二）我党我軍正準備一切，粉碎蒋介石的進攻，藉此以爭取和平。蒋介石雖有美國援助，但是人心不順，士氣不高，經濟困难。我们雖無外國援助，但是人心歸向，士氣高漲，經濟亦有办法。因此，我們是能夠戰勝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有充分信心。

（三）戰勝蒋介石的作戰方法，一般的是運動戰。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暫時放棄，不但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暫時放棄若干地方若干城市之目的，是為了取得最後勝利，否則不能取得最後勝利。此点应使全党与全解放區人民都明白，都有精神準備。

（四）為着粉碎蒋介石進攻，必須與人民群众親密合作，必须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在農村中，一方面应坚决地解决土地问题，紧紧依靠雇農、貧農，团结中农；另一方面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对汉奸豪绅恶霸分子与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宽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在城市中，除团结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一切进步分子外，应注意团结一切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在军队中应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六）为着粉碎蒋介石进攻，必須作持久打算；必須十分注意節省使用我們的人力資源與物質資源，力戒浪費；坚决纠正有些地区已经发生的贪污现象；必須努力生產，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糧食與布匹完全自给；必須提倡普遍植棉，做到户户紡紗，村村織布（即在東北亦应開始提倡）。在財政供給上，必須保證自衛戰爭的物資需要得到满足；同時又必須使人民負擔較前減輕，必須使我解放區人民雖然處在戰爭環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總之，我們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於不敗之地，和蒋介石一切依靠外國完全相反。我們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必然要胜利的。这一方针，必须使全党同志，全解放区同胞完全明了。

（三）

（七）我們目前存在着困難，但這些困難是能夠克服與必須克服的。全党同志與全解放區軍民必須根據中央七七宣言精神團結一致，徹底粉碎蒋介石進攻，實現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

中央七月廿日

（轉發至縣委與團級，印發給一切幹部）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6年7月20日）

同意刘、邓率野战司令部进至菏泽地区，三纵进至朝城、濮县地区待机。

---

[1] 20日，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先将野战军领导机关移至菏泽。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26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指出：“对陇海线总以准备充分、攻击奏效为原则，时间上可酌量推迟数天，一切由你们依前线情况决定。”原定南线7月底外线出击的计划就此后推。

刘邓军须配合山东野战军的第二战役[1]

（1946年7月21日）

刘、邓，并告陈、宋[2]：

（一）陈宋号午称，敌八个团由徐沿陇海线东进，我军决心歼灭该敌，战斗可能于梗或敬开始，胜利后向南歼灭五十八及九十九军[3]等部，然后截断徐蚌路[4]。（二）估计陈宋第一个战役可能于数日内结束，第二个战役[5]可能于月底开始，我刘邓军来不及配合第一个战役，但是可能与必须配合第二个战役。因此，提议刘邓军日内即开始运动，俭前或艳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于三十日或世动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宋，指陈毅、宋时轮，当时分别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此时国民党军第五十八军、第九十九军已分别改称整编第五十八师和整编第六十九师。这里仍沿用旧番号。

[4] 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5] 陈宋第一、第二战役，指山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和当面敌情制定的两个战役计划。第一战役指消灭由徐州东进之敌整编第二十八师和第五十七师（原第九十八军）等部；第二战役指南下切断徐蚌路，寻歼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原第九十九军）、第五十八师和第七军的作战。

夺取汴徐线[1]，尔后依情况向南发展，夺取豫东、淮北诸县。（三）请刘邓考虑上述提议是否适当，如同意，请即部署行动，并盼复。

军委

马酉

---

[1] 汴徐线，指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路一段。

八九两月内东北仍应保持平静同时作好战斗准备[1]

（1946年7月21日）

东北局：

（一）皓电[2]悉。通令各部准备攻城战及积极做群众工作甚好。（二）但敌攻热河时不要你们配合。已令聂萧程[3]争取在古北口地区歼灭进攻之敌，承德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暂时放弃，而准备移杨得志郭天民[4]两纵队夺取平汉路北段及正太路[5]。（三）为使军队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指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给各分局转各部队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东北各部队须在1个月内完成一切攻击准备，待命收复长春路两侧各县。除担任剿匪和做群众工作的部队外，其他部队须迅速加强攻城训练，同时注意侦察敌情，选择攻击目标，待命攻击，准备乘机收复一些城市，以扩大地区，消灭敌人，使敌攻热河企图失败。对于群众工作仍须进行，用各种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创造根据地问题是东北长期斗争成败的根本关键。

[3] 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程，指程子华，当时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杨得志、郭天民，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充好，训练好，并使群众工作做出成绩，东北方面在八九两月内仍应保持平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同时须准备于一个月后能作战。

中央
午马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7月21日）

请你们考虑目前是否可能经过马歇尔要求国方对中原军停战，以利谈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致粟裕电[1]

（1946年7月21日）

（一）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二）敌情尚严重，望将参战主力集中休整，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1]

（1946年7月22日）

大同由你们负责攻取，请即加筹划，能于八月内取得为最好。平汉、正太、同蒲三路及吕梁各县均须争取于八月内取得，一到九月，时局可能发生变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晋绥分局电的主要内容。24日，聂荣臻致电中央军委，提议先攻取大同，第二步向平汉路挺进，第三步再向正太路进攻。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聂荣臻电：“同意先取大同，再取平汉，再取正太。”

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等电[1]

（1946年7月23日）

你们与郑、李之间有第七十六、第十、第十五、第六十六等师重兵隔断，你们万万不可再北进。你们必须就现地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长久打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王树声、刘昌义、张才千并告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在鄂西鄂北豫南灵活作战建立根据地

（1946年7月24日）

王、刘、张[1]，并告郑、李、戴、王[2]：

（一）庆祝你们粉碎敌一个团又六个连的大胜利[3]。

（二）你们任务是在长江以北、襄河以西以南广大区域内实行机动灵活之作战，各个歼灭敌人，发动民众，建立根据地。这一任务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必须逐步转变向华北归队及向郑李会合的思想，因为敌人重重阻碍不许可你们这样做。只要你们善于作战，再打几个二十一日那样的胜仗（集中优势兵力，每次歼灭敌一营一团，各个击破），只要你们能解决军民关系，你们就能够建立根据地。

---

[1] 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张，指张才千（1911—1994），湖北麻城人，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参谋长。

[2]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戴，指戴季英，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随中原军区机关行动。王，指王震，当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 指1946年7月21日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在湖北谷城县石花街地区击溃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第一八五旅第五五三团和整编第十五师第六十四旅第一五三团共6个连的战斗。

（三）闵、张、吴[1]之任务是在襄河以东、平汉以西即原江汉军区地境建立根据地，和郑、李、王及你们互相呼应。该部现到豫西南，敌三个旅正由郑、李后尾回头向东对付该部，因此该部亦应回头向南到襄河、平汉之间，以团为单位，划分地区，分散活动。该部亦应转变向北归队及向西与郑、李会合之思想，因为敌情不允许。该部和你们也不要会合，因为分开活动互相呼应比较集中一处为有利。此电请转给闵、张、吴。

（四）请郑、李指示黄霖[2]仍回豫南桐柏地区建立根据地。

（五）必须灵活使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之策略，必须善于欺骗敌人，诱其分散，各个击破之。

（六）现华中、华北我军正大举反攻敌人，在他们取得胜利后，我中原军局面亦可能改善。

军委

午敬

---

[1] 闵，指闵学胜，1914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旅长。张，指张忠（1912—1982），安徽六安人，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副旅长。吴，指吴钊统，1913年生，河南信阳人，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三旅副政治委员。

[2] 黄霖（1913—198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应下决心在陕南分散游击[1]

（1946年7月25日）

李、文、任：

各电悉。（一）已电西安办事处周子健代表先念与三十二小组[2]接洽，声明愿意调处，要求政府军停止围追，以利谈判。（二）只要你们能生存，恢复谈判及实行停战是有希望的，因国民党对我中原军四出游击深为恐惧。（三）你们应下决心以团为单位分散于陕南各县，划分区域，每团管一县至二县，分散的程度以能打民团及国民党一连一营为标准。你们可开始分散于三四个县内，取得经验，然后逐步展开，从敌人包围圈内分股伸出圈外，如此方能生存。

中央
午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和政治委员任质斌的电报。

[2] 三十二小组，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派驻中原军区的第三十二小组。

给陶行知先生家属的唁电

（1946年7月25日）

上海吕班路环龙路口胜利饭店陶行知先生家属礼鉴：

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

毛泽东
朱　德
七月二十五日

致叶剑英、李维汉等电[1]

（1946年7月25日）

（一）据李先念电，军事调处执行第三十二小组由飞机抛下公函，称该小组及第九小组已到龙驹寨，要李派代表去龙驹寨谈判，然后经三人委员会决定停战驻地及给养问题。如联络不上，则该两小组于二十五去西安停三天，然后去北平请示等语。（二）计时该小组今日已到西安，已令周子健[2]代表李先念去接洽，声明愿意谈判，惟须政府军停止围追以利谈判[3]。（三）望你注意此事，并适当处理。如政府及马歇尔要谈苏北问题，我们则要谈中原军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李维汉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子健，当时任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代表。

[3] 与此同时，在陕南的中原部队根据飞机抛下的执行小组的公函，派出张文津等为代表，直接找陕南国民党军交涉停战。国民党军却继续以重兵围攻，并于七月底秘密杀害了中原部队派出的谈判代表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和毛楚雄（毛泽覃之子）。

晋察冀部队应立即开始学习攻城战[1]

（1946年7月26日）

聂、刘、唐、曾：

请令部队立即开始学习攻城战。（一）陈杨两纵[2]及教导旅除在扫清大同外围各城之作战中学习攻城战外，在直接攻取大同之前须有数天时间在大同附近学习与演习攻城战，然后攻城。（二）位于古北口及延庆之杨郭两纵[3]及冀中、冀晋一切地方兵团，令其自即日起学习与演习攻城战，准备攻城器具，待命夺取平汉路[4]。学习与演习时间定为两星期，可能时延长一星期，望令各部依限完成，不得有误。

军委

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参谋长唐延杰和副参谋长曾涌泉的电报。

[2] 陈杨两纵，指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陈正湘和杨成武。

[3] 杨郭两纵，指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杨得志和郭天民。

[4]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关于援助中原部队突围给习仲勋的信

（1946年7月至9月）

一

仲勋同志：

陕南来报五份请查阅。李、王[1]两部决定分散；李部分为七股，均在陕东南。王震率部正向柞水、镇安前进，将分散于柞水、镇安及其以西地区，这一带西北局是否可派干部前去协助？因该区尚无像巩德芳[2]那样的地方部队，如不多派熟悉情形的干部，恐立脚困难。此外，郑位三[3]、陈大姐[4]、戴季英[5]三同志及其他大批离军干部，如何秘密接引来边区（需十分秘密），亦请考虑办法。再

---

[1] 李、王，指李先念、王震，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 巩德芳，当时是中共陕南工委、陕南游击队负责人之一。

[3] 郑位三，当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委。

[4] 陈大姐，指陈少敏，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长。

[5] 戴季英，当时任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

则，苏斌、曾谅芳[1]支要求受陕西省委领导，请加处置为盼！

请考虑派一二个大员去帮助李、王两部，如汪锋[2]及其他适当之人。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二

仲勋同志：

请考虑派出几支游击队（武工队性质），策应李先念、王震，创造游击根据地，以利将来之发展：（一）麟游为中心一支，约三至五个连，其中以三分之二（两个至三个连）以班或以排为单位，分散于泾渭之间、陕甘之间十余县，只要有党的地方，或无党而群众条件好，就放下一班或一排；完全地方化；如穿军衣不便，则穿便衣；如一班、一排目标太大，给养困难，则更加分散，每地（例如一区）三五支枪；总以广泛分布于泾渭间十余县，作为当地人民武装斗争之骨干为目的；其余三分之一（一个至两个连）则集中公开行动，但须取当地人民自卫队或人民游击队名义，或其〔他〕地方性名义；无论分散的，集中的，在一年内一律由边区供给经费，不从民间筹款；派出之前须加以训练；须配备充备多〈人〉数政治工作人员；须有强的领导；须有本地干部率领，队员都要陕甘人（或

---

[1] 苏斌、曾谅芳，职务不详。

[2] 汪锋，当时任中共陕西工委书记。

杂以少数外地有经验者）；要自愿肯干；要准备吃苦。（二）两当、徽县为中心一支，约二个至三个连；办法同上。（三）此外，尚请考虑可否以海原、固原为中心派出一支，以静宁、庄浪为中心派出一支，每支约二百人左右。

以上方针是否可行？估计派出后是否有站稳脚跟之把握？或先派麟游、两当二支，每支数目较小？请你召集有关同志讨论见覆复。此外，蒲城、白水各县力求就当地非法武装予以干部及指导，创造游击根据地。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三

仲勋同志：

十七军八十四师现开陕南佛坪堵击我王震部。八十四师内是否有同志及同情者，情况如何，请查明见告为盼！

毛泽东
八月十日

四

仲勋同志：

王震行进甚速，拟以十一天到达宁镇[1]或栒正[2]地区。王来两电请阅，并摘要转告关中、陇东。关于准备三个强的团位于适中地点，以便迅速出动策应王震，此事请于日内准备好，并即速出动于边境附近待命策应为要。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五

仲勋同志：

长武、邠县[3]、平凉、隆德、静宁、正宁、宁县、西峰、镇原、固原等处共有多少敌军驻防及其分布情形请即告。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夜

---

[1] 宁镇，指甘肃省栒宁县、镇原县。

[2] 栒正，指陕西省邑（今作旬邑）县、甘肃省正宁县。

[3] 今作彬县。

六

仲勋同志：

来示悉，布置甚好，已告王震。陕西边境仍以保持平静为宜，请告关中分区，栒邑以东不去扰击；宁县、正宁及陇东分区各部则照计划办理。

今晨付上之电报阅后请退还。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七

仲勋同志：

王震部主力已到边边[1]，即在陇东休整，请令陇东党政军予以欢迎及帮助。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

[1] 边边，指陕甘宁边区边沿地带。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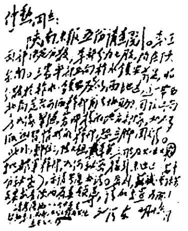
仲勋同志：

（一）胡宗南似有向陇东进攻之计划，我们如何应付，请加筹划，并见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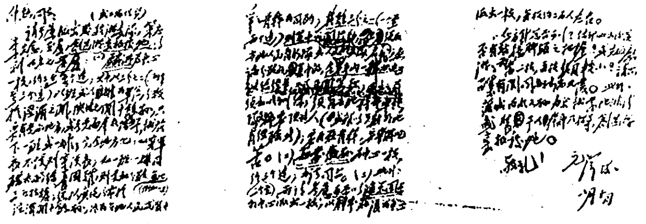
（二）我军出至封锁线外占领多少地方，消灭多少敌人，缴枪多少，正宁、宁县、镇原一带碉堡线是否已完全攻破，或尚余多少，请饬人绘图附说〔明〕送我为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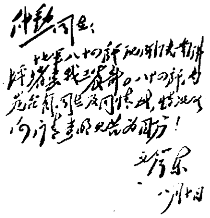
九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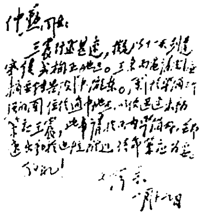
1946年7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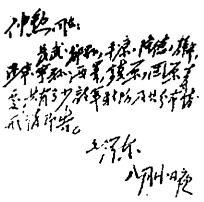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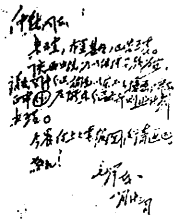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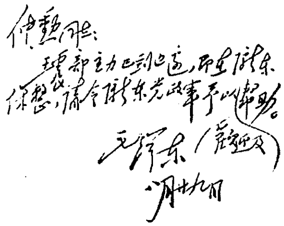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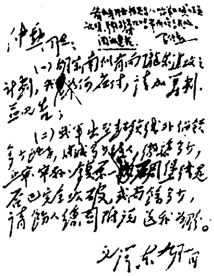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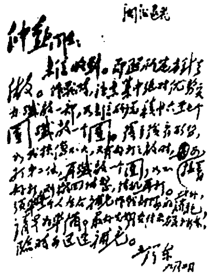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23日



1946年8月29日



1946年9月1日



1946年9月2日

毛泽东致习仲勋信的手稿。

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人[1]

（1946年7月28日）

刘、邓，陈、宋，张、邓[2]：

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欲速不达。无好打之机会时，宁可迟几天等候机会。

军委

二十八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陈、宋，指陈毅、宋时轮，当时分别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为悼念关向应题写挽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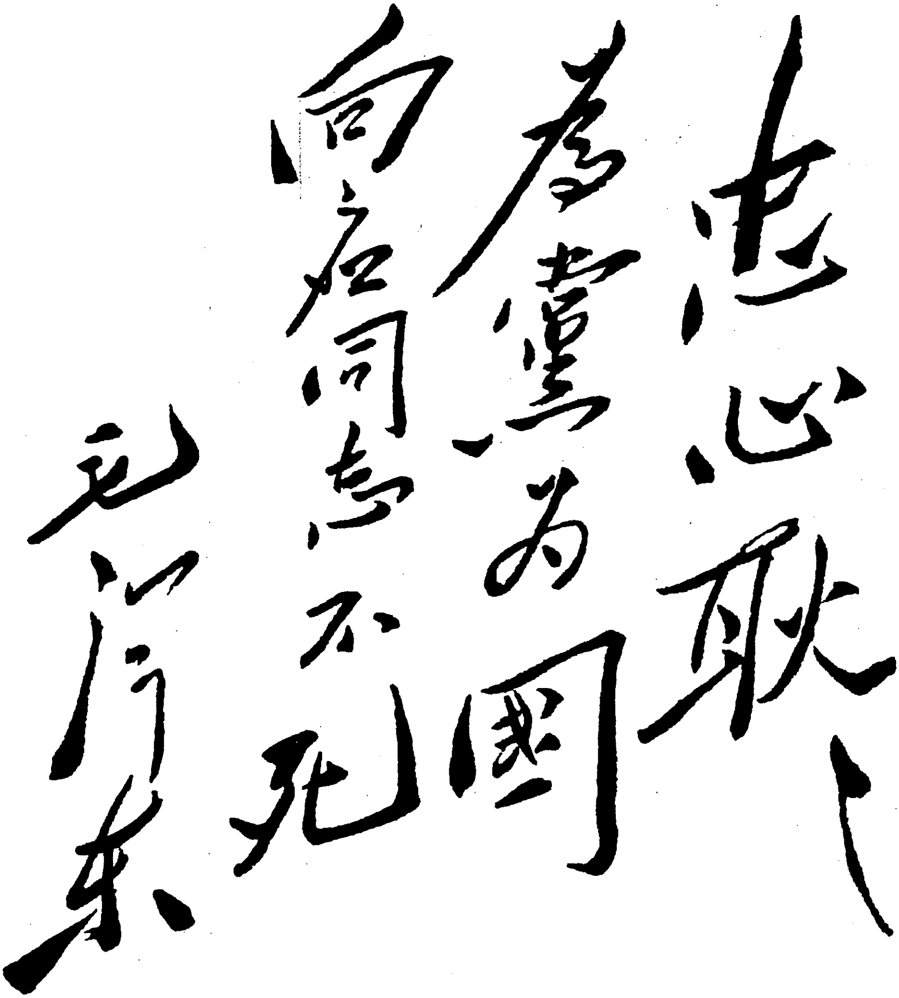
（1946年7月28日）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为7月21日因病逝世的关向应举办的追悼大会上敬献的挽词。



忠心耿耿
爲黨爲國
向應同志不死
毛澤東

毛泽东为关向应题写的挽词。

致黄霖、张水泉电[1]

（1946年7月29日）

你们暂时即在洛南、商南、卢氏一带打游击，再不要西进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黄霖、张水泉电的主要内容。黄霖，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水泉，当时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

致王震等电[1]

（1946年7月29日）

（一）你们通过商山大道到达安武、黑山，布置分散游击战争，甚慰。（二）李、任、文等不再西进，分为七股就地打游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王震并告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的主要内容。

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勉强作战

（1946年7月30日）

张、邓、粟[1]：

在我军主力未获充分补充休息恢复疲劳以前，及敌未进至有利于我之地形条件以前，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此次粟部歼敌二万[2]，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敌以十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免的。你们应有对付恶劣环境之精神与组织准备。

军委

午三十

---

[1] 张，指张鼎丞（1898—1981），福建永定人，当时任华中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当时任华中军区政治委员。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

[2] 指华中野战军1946年7月进行的宣家堡、泰兴战斗和如（皋）南战斗，两次战斗共歼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

到处扶植地方游击队创立游击根据地[1]

（1946年7月31日）

吴、张、熊，并告郑、李[2]，华中：

（一）你们决定分散游击，甚慰。（二）注意做群众工作，紧紧依靠人民。（三）华中二师两个连及七师留桐西游击队，同意由鄂豫皖地委统一领导和指挥，该两部宜即在原地活动，不宜与你们主力会合，致失去独立活动能力，总以分散游击创立几处根据地为有利。（四）大别山各游击队统一归你们指挥。（五）到处扶植地方游击队，到处创立游击根据地。

军委

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旅长吴诚忠、政治委员张体学和副政治委员熊作芳的电报。

[2]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在陕豫边分散打游击做群众工作[1]

（1946年7月31日）

黄、张，并告李、任、文[2]：

（一）三十电[3]悉。你们已下决心在商县、洛南、商南、卢氏地区打游击，甚慰。必要时可以向豫西各县临时活动，但不要去柞水、镇安，因敌将封锁山阳南北大道，进去了出不来。现郑李亦不去柞水、镇安，仅王震部[4]西去是准备不出来的。（二）最要紧的是改善军民关系，紧紧依靠人民建立地方游击队。（三）善于化整为零，化零为整，目前应划分地区以营为单位分散打游击及做群众工作，应开一干部会说明情况及方针，然后有计划地分散。

军委

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河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霖和副司令员张水泉的电报。

[2] 李、任、文，指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3] 指1946年7月30日黄霖、张水泉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已进入商县、山阳地区，决心在卢氏、商南、洛南、商县、山阳、镇安等地打游击。

[4] 王震部，指由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

致聂荣臻、刘澜涛等电[1]

（1946年8月1日）

应县久攻不下，你们对攻大同把握如何？

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攻打大同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刘澜涛并告贺龙、李井泉电的主要内容。

致粟裕等电[1]

（1946年8月2日）

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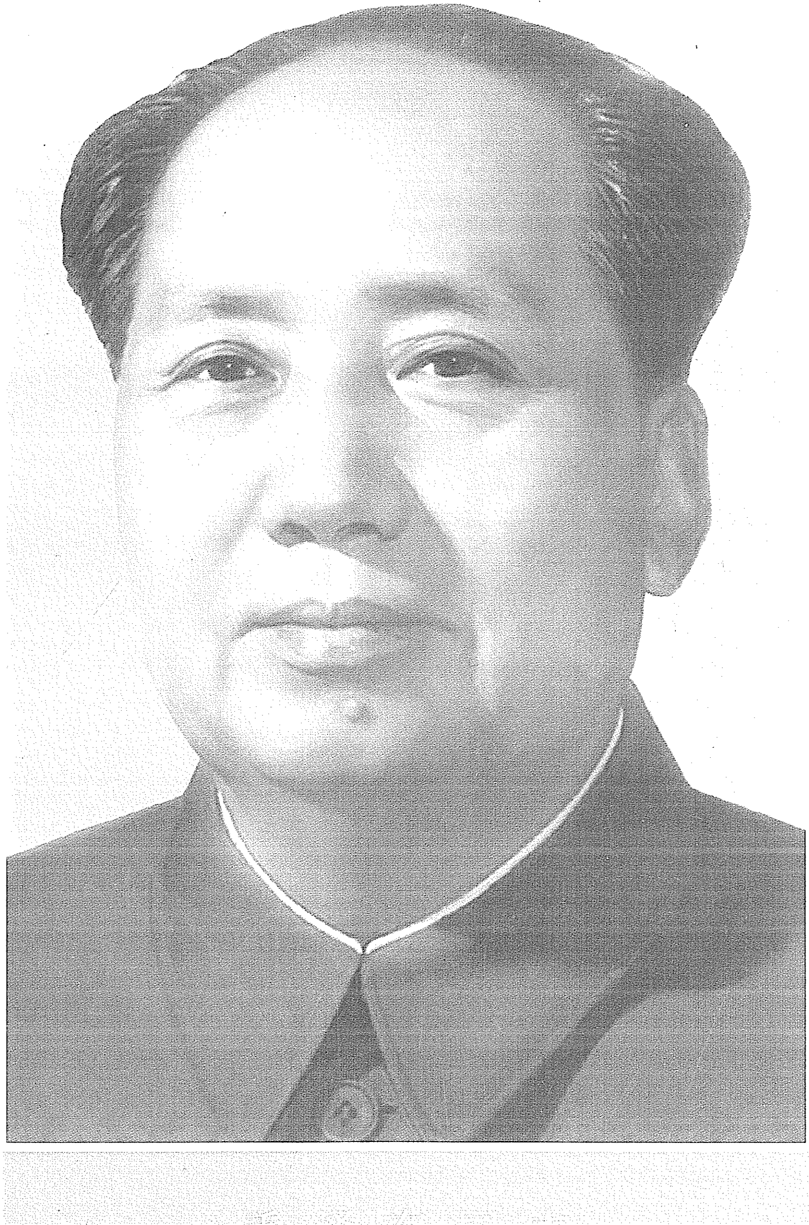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粟裕建议速将淮南第五旅东移苏中作战以及陈毅建议粟裕率部西调开展淮上新区两电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毛泽东全集》第21卷
主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划：树　旺
出版：润东出版社
承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852）23500066
电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址：www.enricheast.com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长：言　臣
装帧：平　装
开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面：544面
版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SBN：978-988-12907-0-0
定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不要打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1
（1946年8月3日）
只要五万机动兵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2
（1946年8月4日）
致贺龙、李井泉电…………………………………………………3
（1946年8月4日）
冀热辽作战要由现有部队担负……………………………………4
（1946年8月6日）
用袭击方法夺取洪洞赵城…………………………………………5
（1946年8月6日）
大同战役后即准备平汉战役………………………………………6
（1946年8月6日）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7
（1946年8月6日）
致陈毅电 …………………………………………………………15
（1946年8月6日）
复槟榔屿侨胞电 …………………………………………………16
（1946年8月7日）
致粟裕等电 ………………………………………………………17
（1946年8月7日）

东北八九两月完成作战准备 ……………………………………………18
（1946年8月8日）
复周恩来电 ……………………………………………………………19
（1946年8月8日）
在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并陈毅、张云逸、黎玉电中加写的一段文字…20
（1946年8月8日）
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歼敌 …………………………………………21
（1946年8月8日）
尽可能集中更多军队于主要作战方向 ……………………………………22
（1946年8月9日）
太行山东华中积极作战以援中原 …………………………………………23
（1946年8月9日）
须于最短期内攻取洪赵霍三城 …………………………………………25
（1946年8月10日）
为陶行知题写挽词 ………………………………………………………26
（1946年8月10日）
复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 …………………………………………29
（1946年8月10日）
致林彪电 ………………………………………………………………30
（1946年8月10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31
（1946年8月10日）
王震部应坚决就地分散和敌人打小圈子 …………………………………32
（1946年8月11日）
粟裕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更为有利 ……………………………………33
（1946年8月12日）

争取时间创造战场 ……………………………………………34
（1946年8月13日）
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 ……………………………35
（1946年8月13日）
调动刘峙兵力推迟主力决战时间 ……………………………36
（1946年8月13日）
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苏中歼敌 …………………………37
（1946年8月15日）
给胡乔木的信 …………………………………………………38
（1946年8月）
致华中分局电 …………………………………………………39
（1946年8月17日）
致王震电 ………………………………………………………40
（1946年8月17日）
集中兵力歼灭一一八旅与十一旅 ……………………………41
（1946年8月19日）
占领霍县灵石待歼胡宗南军 …………………………………42
（1946年8月19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43
（1946年8月19日）
占领南通海门后应注意扩大政治影响 ………………………44
（1946年8月20日）
对付海安如皋之敌的意见 ……………………………………45
（1946年8月20日）
以持久战斗夺取大同 …………………………………………46
（1946年8月20日）

栗谭主力暂不西移 ……47
（1946年8月20日）
配合陈赓及太岳力量夺取吕梁 ……48
（1946年8月21日）
致陈赓、谢富治电 ……49
（1946年8月21日）
战役战斗上不要平均使用兵力 ……50
（1946年8月22日）
要歼敌四十几个旅 ……51
（1946年8月23日）
陕南豫西鄂西各部应彻底分散控制广大地区 ……52
（1946年8月23日）
采取打圈子办法迷惑敌人 ……54
（1946年8月24日）
提高警惕，切勿上当 ……55
（1946年8月24日）
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等电 ……56
（1946年8月25日）
刘邓部应充实十五至二十个主力团 ……57
（1946年8月25日）
致方正平等电 ……58
（1946年8月25日）
攻占薄弱据点调动敌人而歼灭之 ……59
（1946年8月27日）
寻机歼灭薛岳部八至十个旅的作战方案问题 ……60
（1946年8月27日）

粉碎蒋军进攻热东冀东等地的部署 ……62
（1946年8月28日）
将陕南鄂西北打成一片造成根据地 ……63
（1946年8月28日）
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 ……64
（1946年8月28日）
致张宗逊、罗瑞卿等电 ……66
（1946年8月28日）
山东华中的歼敌方针 ……67
（1946年8月29日）
相机歼灭敌第三师 ……69
（1946年8月29日）
寻机歼敌造成有利局势 ……72
（1946年8月29日）
致王震电 ……74
（1946年8月29日）
致东北局电 ……75
（1946年8月29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76
（1946年8月29日）
关于歼灭大同之敌的意见 ……77
（1946年8月30日）
吸引蒋军向苏中增援对全局有很大利益 ……78
（1946年8月31日）
为“九一”记者节题词 ……80
（1946年9月1日）

复周恩来等电 ……………………………………………………………81
（1946年9月1日）
准备固守张家口至南口沿线地区 ………………………………………82
（1946年9月2日）
集中优势兵力着重歼灭保安团 …………………………………………83
（1946年9月2日）
主力他调须留得力部队在苏中作战 ……………………………………85
（1946年9月2日）
给习仲勋的信 ……………………………………………………………86
（1946年9月2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87
（1946年9月2日）
立即部署歼灭刘峙一路 …………………………………………………88
（1946年9月3日）
歼灭第三师后的行动部署 ………………………………………………89
（1946年9月4日）
速将主力隐蔽集结准备打击北进之敌 …………………………………90
（1946年9月4日）
华中野战军九十月份的作战任务 ………………………………………91
（1946年9月4日）
致张宗逊、罗瑞卿电 ……………………………………………………92
（1946年9月4日）
歼第三师后相机解决东明之敌 …………………………………………93
（1946年9月5日）
望派地方部队扰击向单县进攻之旅 ……………………………………94
（1946年9月5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95
（1946年9月6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 ……………………………………………96
（1946年9月6日）
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等电 …………………………………97
（1946年9月6日）
复张宗逊、罗瑞卿等电 …………………………………………98
（1946年9月6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 ……………………………………………99
（1946年9月6日）
参战主力集结休整未使用之部队相机歼灭东明之敌一部…………100
（1946年9月7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01
（1946年9月8日）
致陈毅等电………………………………………………………102
（1946年9月8日）
复粟裕、谭震林电………………………………………………103
（1946年9月9日）
歼灭进攻集宁之敌的作战部署…………………………………104
（1946年9月10日）
准备在宿迁新安沭阳等地相机歼敌……………………………106
（1946年9月10日）
坚决克服归队思想在敌后创造根据地…………………………108
（1946年9月10日）
致中原局、鄂西北区党委、鄂皖边地委诸同志电………………113
(1946年9月10日)

提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114
（1946年9月11日）
对陆定一送审的社论稿及来信的批语……115
（1946年9月11日）
致陈毅、宋时轮等电……116
（1946年9月11日）
致陈毅电……117
（1946年9月12日）
各个击破的战法须应用到战术上……118
（1946年9月13日）
关于刘邓军作战经验的通报……119
（1946年9月13日）
给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的贺电……121
（1946年9月13日）
要学会集中优势打击一点的战法……122
（1946年9月14日）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23
（1946年9月16日）
致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130
（1946年9月16日）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131
（1946年9月18日）
致王树声、刘昌义等电……133
（1946年9月19日）
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134
（1946年9月20日）

给陈瑾昆的信……135
（1946年9月22日）
给续范亭的信……137
（1946年9月22日）
致陈毅等电……139
（1949年9月22日）
集中最大兵力攻击一点逐一歼灭敌人……140
（1946年9月23日）
致陈毅等电……141
（1946年9月23日）
只要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就能打破敌人进攻……142
（1946年9月25日）
望早日执行攻取金乡鱼台单县计划……144
（1946年9月26日）
致粟裕、谭震林电……146
（1946年9月26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等电……147
（1946年9月26日）
晋察冀区应为歼敌八个旅而斗争……148
（1946年9月27日）
接见南下支队时的讲话……149
（1946年9月27日）
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151
（1946年9月28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等电……152
（1946年9月28日）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153
（1946年9月29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等电……156
（1946年9月29日）
须准备连续打几个大仗……157
（1946年9月30日）
给符定一的信……158
（1946年9月30日）
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电……160
（1946年9月30日）
致冯白驹、黄康、李振亚电……161
（1946年9月30日）
三个月总结……162
（1946年10月1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等电……168
（1946年10月1日）
全力歼灭薛岳十个旅左右以转换战局……169
（1946年10月3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70
（1946年10月3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71
（1946年10月4日）
致冀察热辽分局并晋察冀中央局电……172
（1946年10月4日）
致萧克、罗瑞卿等电……173
（1946年10月5日）

致聂荣臻等电……………………………………………………174
（1946年10月6日）
复民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电………………………………………175
（1946年10月8日）
致聂荣臻电………………………………………………………176
（1946年10月8日）
目前应于第二线第三线做好作战准备…………………………177
（1946年10月9日）
请刘邓考虑以主力袭击敌后空虚地带…………………………178
（1946年10月9日）
关于目前战局及谈判问题………………………………………179
（1946年10月10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电……………………………………………182
（1946年10月10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电……………………………………………183
（1946年10月10日）
张家口失陷后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方针…………………………184
（1946年10月12日）
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以开展局面……………………………185
（1946年10月13日）
选送学生学习坦克问题…………………………………………186
（1946年10月13日）
集中山野华野全力歼灭东进之敌………………………………187
（1946年10月15日）
致陈毅电…………………………………………………………189
（1946年10月17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90
（1946年10月19日）
给任弼时的信…………………………………………………………191
（1946年10月20日）
致东北局电……………………………………………………………193
（1946年10月22日）
采取围城打援办法歼敌有生力量………………………………………194
（1946年10月24日）
敌强我弱必须准备长期斗争……………………………………………195
（1946年10月25日）
致聂荣臻等电…………………………………………………………196
（1946年10月25日）
华中等战略区战况及对蒋军攻势的估计………………………………197
（1946年10月28日）
望即组织部队歼敌二十六师……………………………………………199
（1946年10月28日）
电贺高树勋将军起义周年………………………………………………200
（1946年10月29日）
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201
（1946年10月29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202
（1946年10月29日）
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203
（1946年10月30日）
壮大力量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204
（1946年10月30日）

应集中主力歼灭南满分散之敌……206
（1946年10月30日）
敌攻临沂是调虎离山切勿上当……207
（1946年10月31日）
贺黄有凤、赵雪明婚联……209
（1946年10月）
鄄城战役结束后应向西进击……210
（1946年11月1日）
对密集之敌可钳制一路打另一路……211
（1946年11月1日）
关内作战快到转折点有利东北作战……212
（1946年11月1日）
致林彪等电……213
（1946年11月1日）
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示电……214
（1946年11月2日）
致萧华电……215
（1946年11月2日）
致林平等电……216
（1946年11月2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217
（1946年11月2日）
歼灭桂系一部和冯治安等部的部署……218
（1946年11月3日）
以拖住邱清泉胡琏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219
（1946年11月3日）

迅即攻占大宁吉县区域……221
（1946年11月3日）
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部署……223
（1946年11月6日）
南方各省乡村工作方针……225
（1946年11月6日）
为苏联第二十九届国庆给斯大林的贺电……227
（1946年11月6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228
（1946年11月6日）
对俘虏军官的处理办法……229
（1946年11月8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等电……230
（1946年11月8日）
战役和战术上均须集中兵力以期必胜……231
（1946年11月9日）
晋察冀部队应争取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232
（1946年11月9日）
陈谢军西进前须作好充分准备……233
（1946年11月10日）
集中三四两纵各个歼灭九十一师……234
（1946年11月11日）
给凯丰的信……235
（1946年11月14日）
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236
（1946年11月14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237
（1946年11月15日）
扩大战果再歼孙震一部……240
（1946年11月20日）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241
（1946年11月21日）
乘机打击敌七师七十四师极为必要……247
（1946年11月23日）
致陈赓、谢富治电……249
（1946年11月24日）
发展吕梁区以保卫延安巩固太岳……250
（1946年11月26日）
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251
（1946年11月29日）
为朱德六十寿辰题词……252
（1946年11月30日）
对党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所作的解释……254
（1946年11月）
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题词……255
（1946年11月）
如在一两个月内歼灭第五军等北进之敌则全局好转……260
（1946年12月1日）
冀东地区的作战方针……262
（1946年12月4日）
致晋察冀中央局电……263
（1946年12月4日）

同意夺取中阳并歼赵承绶部……264
（1946年12月9日）
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265
（1946年12月9日）
致粟裕等电……274
（1946年12月11日）
歼灭进攻沭阳之敌极为重要……275
（1946年12月13日）
南满集中主力歼敌拖延敌对北满进攻……276
（1946年12月13日）
应逐步扩充冀东主力部队……278
（1946年12月14日）
宿迁沭阳大胜后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279
（1946年12月18日）
调动邱清泉东进歼灭之较为有利……280
（1946年12月18日）
陈谢纵队迅速集中蒲县附近准备连续战斗……282
（1946年12月19日）
在内线多歼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284
（1946年12月20日）
复暹罗侨胞电……285
（1946年12月22日）
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中、山东两区合并给华中分局的电报时加写的一段话……286
（1946年12月22日）
宜集中主力于鲁南歼灭二十六师……287
（1946年12月24日）

鲁南首战以歼敌二十六师为宜……………………………………288
（1946年12月25日）
在苏中等敌占区必须坚持游击战争……………………………290
（1946年12月25日）
多打小仗以歼敌有生力量为目标………………………………291
（1946年12月26日）
给毛岸英的信………………………………………………………293
（1946年12月26日）
刘邓军宜速向东南歼敌……………………………………………295
（1946年12月29日）
在嘉祥等地打几个大歼灭战………………………………………296
（1946年12月31日）
为《冀南解放区烈士英名录》题词……………………………298
（1946年）
为《三边报》题写报头……………………………………………300
（1946年）
新年祝词……………………………………………………………303
（1947年1月1日）
在修改《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时加写的一段话……………………………………………………………306
（1947年1月1日）
力争每战歼敌三至四个旅…………………………………………307
（1947年1月2日）
歼灭八十八师主力开辟东南战场…………………………………308
（1947年1月4日）
致陈毅、粟裕电……………………………………………………310
（1947年1月4日）

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311
（1947年1月5日）
打王敬久部应当作一个大歼灭战来准备……314
（1947年1月5日）
集中最大兵力彻底歼灭当面之敌……315
（1947年1月7日）
电贺华中民主联军举义一周年……316
（1947年1月8日）
歼灭冯治安部后再行决定打欧震……317
（1947年1月10日）
为徐特立七十寿辰题词……318
（1947年1月10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320
（1947年1月10日）
围城打援是歼敌的重要方法之一……321
（1947年1月11日）
宜加紧补训不必急于打仗……323
（1947年1月11日）
歼灭邱清泉军的几个办法……324
（1947年1月12日）
攻临城时准备歼灭增援队……325
（1947年1月14日）
给陈瑾昆的信……326
（1947年1月16日）
攻克枣庄并准备歼灭欧震部……329
（1947年1月17日）

致陈毅、粟裕电……331
（1947年1月17日）
全力歼击欧震军开辟南进道路……332
（1947年1月18日）
夺取平介灵霍巩固孝义……333
（1947年1月18日）
乘胜展开攻势收复失地创造机动战场……334
（1947年1月18日）
抓住时机攻占豫东淮北收复失地……336
（1947年1月19日）
准备充分后再打欧震……337
（1947年1月19日）
打欧震务必集中五十个团于一个战场……338
（1947年1月21日）
不要位于敌诸路之合击点上……339
（1947年1月22日）
不被敌牵制找敌弱点打……340
（1947年1月22日）
注意多打歼灭战少打击溃战……341
（1947年1月23日）
准备于五月开始转为外线作战……342
（1947年1月24日）
春节宴请延安附近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时的讲话……343
（1947年1月24日）
致董必武、王炳南电……344
（1947年1月24日）

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345
（1947年1月25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驳斥国民党中宣部声明，所谓和平方案全系欺骗……346
（1947年1月25日）
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351
（1947年1月27日）
对粉碎陈诚进攻计划的意见……352
（1947年1月28日）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354
（1947年1月28日）
晋察冀上半年应基本解决平汉线上蒋系各军……355
（1947年1月29日）
为朱宝庭题写挽词……357
（1947年1月29日）
力争三至四个月内歼灭董钊四五个旅……358
（1947年1月30日）
复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等电……359
（1947年1月30日）
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360
（1947年1月31日）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362
（1947年2月1日）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371
（1947年2月1日）
给续范亭的信……377
（1947年2月2日）

关于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建议……………………………379
（1947年2月3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381
（1947年2月3日）
威胁徐州抑留邱清泉部……………………………………………382
（1947年2月4日）
必须等候敌进至郯城临沂地带再打第一仗………………………383
（1947年2月4日）
在临沂建筑防御工事以利歼敌……………………………………384
（1947年2月6日）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385
（1947年2月6日）
围城打援各个歼灭商丘砀山之敌…………………………………387
（1947年2月7日）
关于开至莱芜新泰作战的问题……………………………………388
（1947年2月7日）
解决郝鹏举部应与全部战略方针联系考虑………………………390
（1947年2月9日）
庆祝歼灭敌军之胜利………………………………………………391
（1947年2月10日）
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392
（1947年2月10日）
阻止四十六师向临沂逃走…………………………………………394
（1947年2月17日）
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395
（1947年2月21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396
（1947年2月21日）
我军似宜北上参战……397
（1947年2月22日）
进行胶济战役必须有充分准备……398
（1947年2月23日）
莱芜战役后我军的行动方针……399
（1947年2月24日）
致各野战军、各中央局电……401
（1947年2月24日）
集中主力乘胜攻占胶济路……402
（1947年2月25日）
致林彪电……403
（1947年2月28日）
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405
（1947年3月6日）
保卫延安主要依靠外线作战……408
（1947年3月6日）
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412
（1947年3月10日）
致张宗逊等电……413
（1947年3月10日）
陈谢等部主力的行动方案……414
（1947年3月11日）
致聂荣臻、萧克电……416
（1947年3月12日）

保卫延安的命令……417
（1947年3月16日）
和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负责同志的谈话……423
（1947年3月16日）
撤离延安时的讲话……425
（1947年3月18日）
对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的讲话……426
（1947年3月18日）
致彭德怀电……427
（1947年3月23日）
为刘胡兰题词……428
（1947年3月25日）
青化砭战斗后准备打第二仗……430
（1947年3月26日）
同意积极歼敌的方针和部署……432
（1947年3月27日）
只要打破胡宗南军即可改变陕北局面……434
（1947年3月27日）
攻占晋西南各县不在占地而在歼敌有生力量……438
（1947年3月28日）
中央军委机关转移情况……442
（1947年3月29日）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443
（1947年3月30日）
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工作……444
（1947年3月30日）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446
（1947年3月30日）
和团干部的一次谈话 ……………………………………………447
（1947年3月）
应提早举行正太战役及缩短作战时间……………………………448
（1947年4月2日）
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战法…………………………………449
（1947年4月2日）
暂时避免作战隐蔽待机……………………………………………450
（1947年4月3日）
关于西北野战兵团的行动方针问题………………………………451
（1947年4月6日）
休整数天后分数路广泛袭击敌之后路……………………………453
（1947年4月8日）
放手扩大战果打敌薄弱据点 ……………………………………455
（1947年4月9日）
工事太坚者不必强攻，应超越前进………………………………456
（1947年4月9日）
敌情正在变化，我军主力现地待机………………………………457
（1947年4月9日）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459
（1946年11月、1947年4月）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483
（1947年4月11日）
修改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时加写的一段话··484
（1947年4月14日）

致陈赓、谢富治等电……486
（1947年4月14日）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487
（1947年4月15日）

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490
（1947年4月15日）

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电……492
（1947年4月15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493
（1947年4月15日）

在修改《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的两段话……494
（1947年4月17日）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495
（1947年4月20日）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496
（1947年4月22日）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498
（1947年4月23日）

王世泰部应保证断敌粮道……499
（1947年4月26日）

望部署歼击瓦窑堡可能逃跑之敌……500
（1947年4月26日）

致林彪、高岗电……501
（1947年4月26日）

致李先念等电……502
（1947年4月27日）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503
（1947年4月28日）
确有把握方可攻击瓦窑堡或蟠龙……504
（1947年4月30日）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505
（1947年5月2日）
修改《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加写的一段话……506
（1947年5月3日）
一周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507
（1947年5月4日）

不要打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1]

（1946年8月3日）

陈、宋，并告刘、邓，张、邓、粟[2]：

世电[3]悉。凡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仗不要打，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过于急躁之意见并不恰当。

军委

未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邓、粟，指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6年7月31日陈毅、宋时轮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黎玉、袁仲贤、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的电报。电报说，陇海线两侧敌主力均有增加，刻在双沟、曹八集正集结15个团兵力，因此情况变化，只能击溃不能歼灭，我军决以主力向灵璧、泗县找桂顽求战，拟先消灭两个团，再转而进击津浦路徐宿段。

只要五万机动兵力在手总有机会歼敌[1]

（1946年8月4日）

陈、宋：

（一）叶赖纵队决定南调[2]不再改变。（二）粟裕集团[3]应否于此时调动各有利害，待考虑再告。（三）你们手里有五万机动兵力，只要有耐心不性急，总可找到各个歼敌之机会，除灵泗[4]两地敌分散孤立外，双沟[5]之敌再向东进，即可找到打好仗之机会，如能打三四次每次歼敌二三个团之仗，即可转换局势。（四）攻泗结果如何？（五）近来电报收发很慢，你处午世电未江始阅悉，你处未东两电未支始阅悉。

军委

未支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的电报。

[2] 1946年7月山东野战军决定由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率领第一纵队在完成胶济路作战任务后，按预定方案南下淮北作战。

[3] 粟裕集团，指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

[4] 灵泗，指安徽灵璧和泗县。

[5] 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睢宁县西北。

致贺龙、李井泉电[1]

（1946年8月4日）

在全国和平未实现以前，你们不要接受阎锡山缓兵之计，签订任何停战协定，束缚自己手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贺龙、李井泉电的主要内容。

冀热辽作战要由现有部队担负[1]

（1946年8月6日）

子华、运昌，并告聂、刘[2]：

现在必须立即开始执行三路四城之任务[3]。第一步夺取大同，已经开始外围战，杨成武纵队[4]西调；第二步夺取平汉[5]；第三步夺取正太[6]及太原。在此任务下，杨苏纵队[7]须立即调动。今后冀热辽区域之作战由现有部队担负之，任务艰巨而光荣。望你们按照上述情况与任务重新部署，依靠民众作长期打算为要。

中央

未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副司令员李运昌的电报。

[2] 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参见《国民党大打后晋察冀军区的基本任务》。

[4] 杨成武纵队，指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纵队司令员杨成武。

[5]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6] 正太，即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

[7] 杨苏纵队，指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用袭击方法夺取洪洞赵城[1]

（1946年8月6日）

陈、谢：

（一）你们对洪赵[2]应先行侦察，然后秘密运动部队，用袭击方法夺取之，不使胡军[3]事前知道。（二）主力北上攻洪赵，闻喜附近是否应留一部钳制胡军？（三）部队已休整好否，何日可开始行动？

军委

未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洪赵，指洪洞、赵城，均为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洪赵县，1958年改为山西洪洞县。

[3] 胡军，指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二十七师。该两师当时位于山西闻喜、夏县地区。

大同战役后即准备平汉战役[1]

（1946年8月6日）

聂：

你在布置大同战役[2]后，望集中注意于准备平汉战役。凡列入平汉战役序列之军队，迅即补充人员武器，训练攻城技术，司令部则完成侦察事项，拟定作战计划，务于未智前完成一切准备事项，一俟大同得手立即开始平汉作战。

军委

未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1946年7月31日，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各1部发起大同战役。至8月4日，歼灭外围国民党军2000余人。8月14日开始夺取城关及郊区据点。9月初肃清郊区各据点及北关、西关国民党守军。后由于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3万余人于9月13日攻占集宁增援大同，晋绥和晋察冀军区部队遂于16日撤除了对大同的包围。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

（1946年8月6日）

斯特朗问：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的希望没有？

毛泽东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问：如果美国除了它所已经给的以外不再帮助了[2]，那末蒋介石还可以打多久？

答：一年以上。

问：蒋介石在经济上可能支持那样久吗？

答：可以的。

问：如果美国说明此后不再给蒋介石以什么帮助了呢？

答：在现时还没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国政府和蒋介石有任何在短时期内停止战争的愿望。

问：共产党能支持多久？

答：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问：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答：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问：你对于美国是否可能举行反苏战争如何看法？

答：关于反苏战争的宣传，包括两个方面。在一方面，美国帝国主义确是在准备着反苏战争的，目前的反苏战争宣传和其他的反苏宣传，就是对于反苏战争的政治准备。在另一方面，这种宣传，是美国反动派用以掩盖当前美国帝国主义所直接面对着的许多实际矛盾，所放的烟幕。这些矛盾，就是美国反动派同美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帝国主义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美国反苏战争的口号，在目前的实际意义，是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伙伴日本军阀，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曾经把反苏的口号作为奴役本国人民和侵略其他国家的托辞。现在美国反动派的做法，也正是这样。

美国反动派要掀动战争，首先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他们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他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压迫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准备在美国实行法西斯主义。美国人民应当起来抵抗美国反动派的进攻。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

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现在美国在太平洋控制了比英国过去的全部势力范围还要多的地方，它控制着日本、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半个朝鲜和南太平洋；它早已控制着中南美；它还想控制整个大英帝国和西欧。美国在各种借口之下，在许多国家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布置，建立军事基地。美国反动派说，他们在世界

各地已经建立和准备建立的一切军事基地，都是为着反对苏联的。不错，这些军事基地是指向苏联。但是，在现时，首先受到美国侵略的不是苏联，而是这些被建立军事基地的国家。我相信，不要很久，这些国家将会认识到真正压迫它们的是谁，是苏联还是美国。美国反动派终有一天将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处在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中。

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反动派不想进攻苏联。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有了苏联，美国和世界反动派的野心就根本不能实现。因此，美国反动派非常痛恨苏联，确实梦想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的时候，美国反动派如此大吹大擂地强调美苏战争，闹得乌烟瘴气，就使人不能不来看看他们的实际目的。原来他们是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的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我以为，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

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答：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

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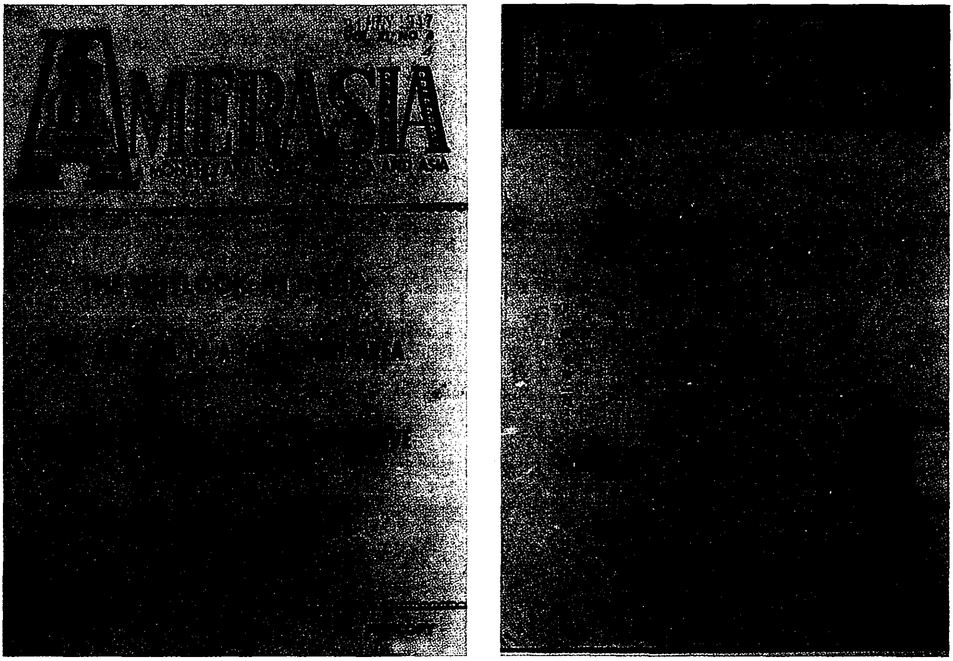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的一篇很重要的谈话。在这篇谈话里，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这个论点，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加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同列宁把帝国主义看做“泥塑巨人”一样，毛泽东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做纸老虎，都是从它们的本质说的。这是革命人民的一个根本战略思想。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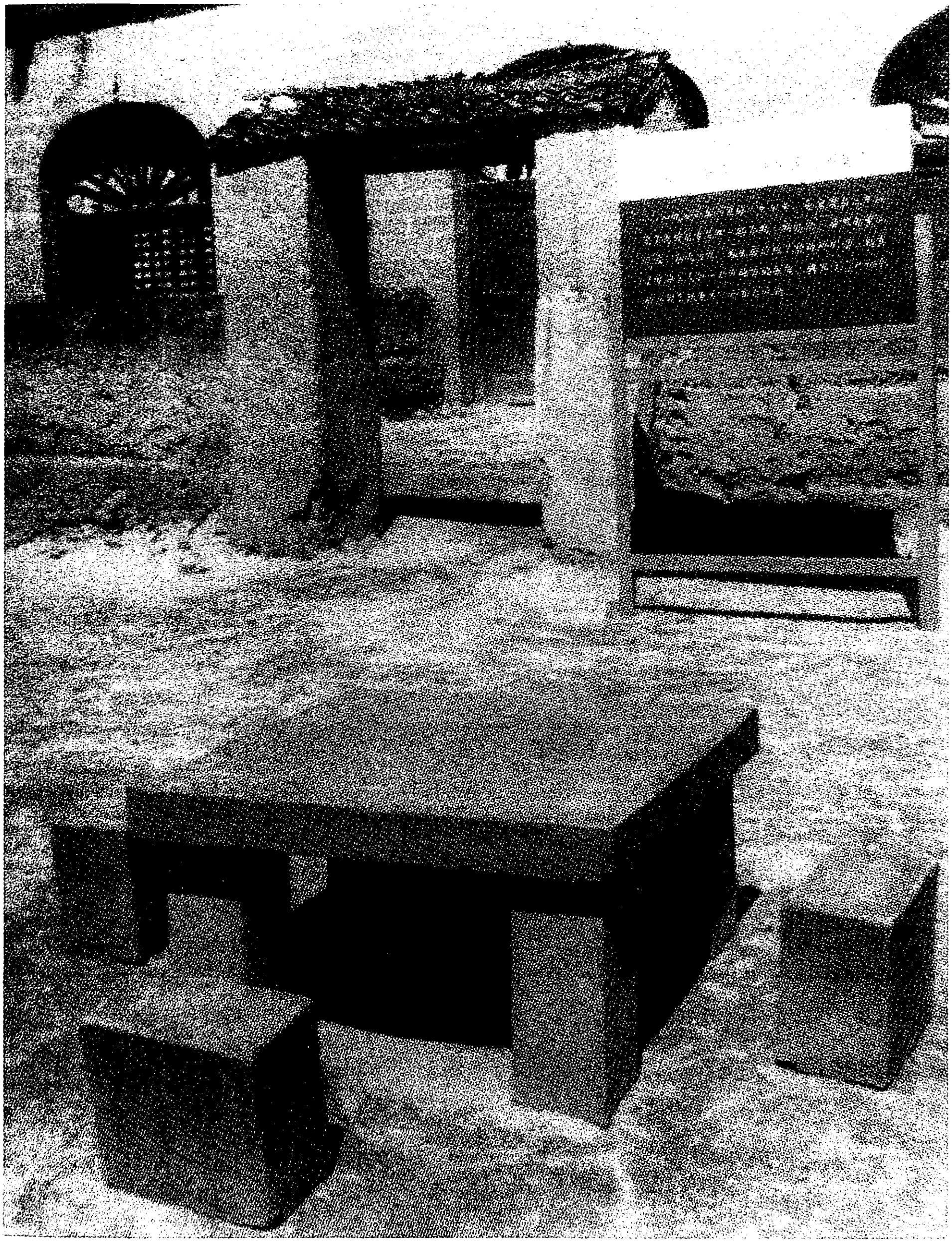
期以来，毛泽东曾经多次地指出，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地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毛泽东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写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关于必须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问题，参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五章第六节和《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第一部分。

[2] 美帝国主义为了支持蒋介石发动反人民内战，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巨大援助。到1946年6月为止，美国共装备国民党军45个师，为国民党训练陆军、海军、空军、特务、交通警察、参谋、军医、军需等军事人员15万人。美国用军舰、飞机运送了国民党军队14个军共41个师，另外8个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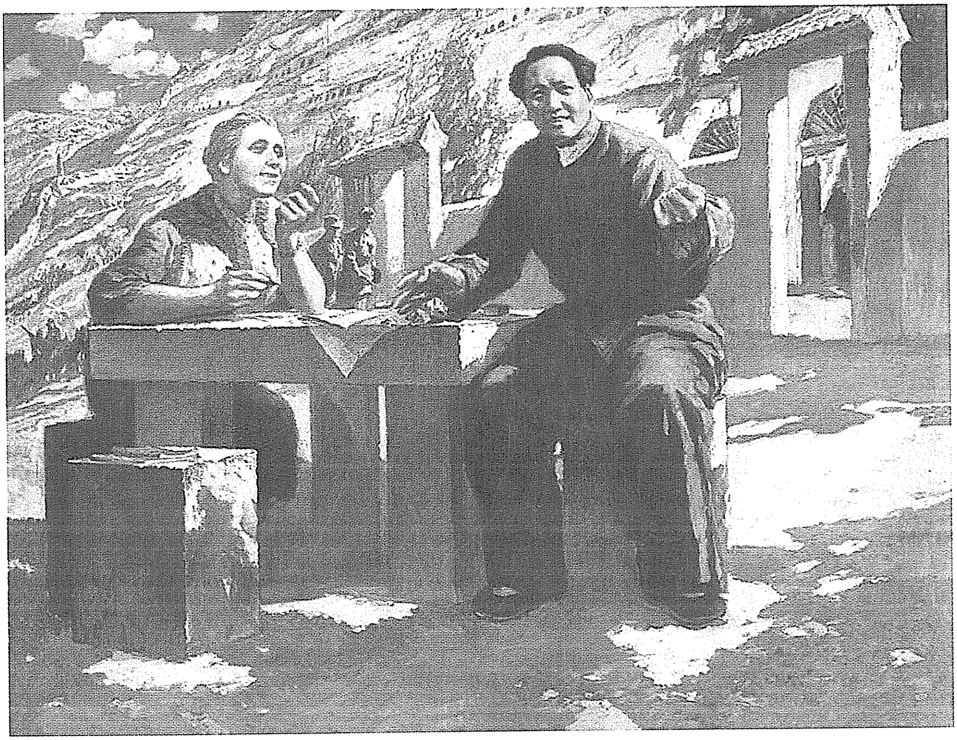
警察总队，共计54万余人，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政府以9万人的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登陆，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在华北并为国民党保护交通线。美国给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援助，据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披露的材料，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8年，总数共达45亿多美元（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予国民党政府的援助，绝大部分也被国民党留作以后进行反人民内战之用）。但实际上，美国援蒋数字远不止这个数目。美国白皮书承认，美国给蒋介石政府的援助，等于蒋政府“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与该国政府预算相较，在比例上超过战后美国对任何西欧国家的援助的数量”。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图为1947年4月的《美亚杂志》和5月的上海《文萃》杂志刊登此谈话的期刊封面。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图为会见地点。



《笑谈纸老虎——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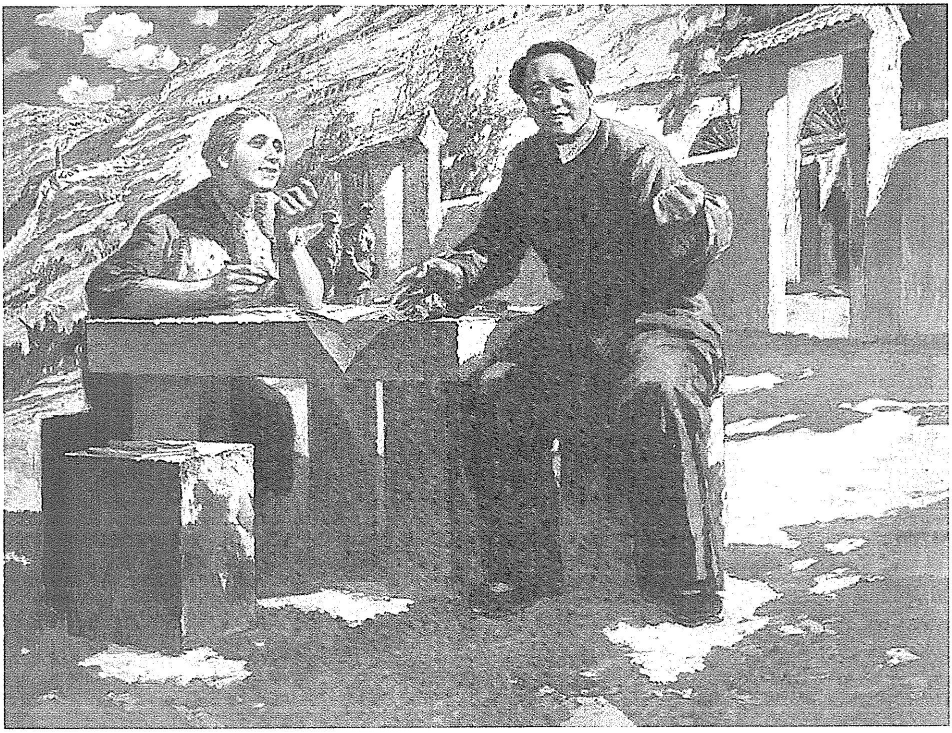
致陈毅电[1]

（1946年8月6日）

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笑谈纸老虎——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油画）

致陈毅电[1]

（1946年8月6日）

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复槟榔屿侨胞电

（1946年8月7日）

贵会厌恶内战，呼吁和平，所提各项主张，均切中利弊，堪称卓识。谋独立民主和平，为敝党战后建国之基本方针，而解决当前危机局面，则应停止内战，重开政治协商，一切争端均以政治方式解决；而好战分子不此之图，致内战继续扩大，时局日趋严重。敝党将与海外侨胞与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挽此时局，并本和平民主方针奋斗到底。

致粟裕等电[1]

（1946年8月7日）

由你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蚌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微午[2]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方案意见如何盼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并告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微午，即5日午时。

东北八九两月完成作战准备[1]

（1946年8月8日）

东北局，并转各满、各省委：

甲、鱼日司徒[2]向周[3]转达蒋介石五条：（一）让出苏皖边区。（二）让出胶济线。（三）让出承德及其以南。（四）东北在十月十五日以前退至黑龙江、兴安、嫩江[4]及延吉，其余均交出。（五）鲁晋两省须让出六月七日后占领地区。周答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乙、你们须积极准备作战，务于八九两月准备完毕，待命行动。在两个月内，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中央

未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司徒，即司徒雷登，1946年7月11日起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

[3] 周，指周恩来。

[4]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政府将原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及兴安九省。这里黑龙江、兴安、嫩江是当时东北九省中的三个省。

复周恩来电[1]

（1946年8月8日）

蒋之五条绝对不能接受，一条也不行。你的答复很对。我各解放区正在动员全力粉碎蒋介石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致华中分局并陈毅、张云逸、黎玉电中加写的一段文字

（1946年8月8日）

我们必须自觉地向富农让步，坚持中央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的原则。但在已经解决并取得多数人民同意的地方，不要再变动。此外，对待一般中小地主亦应与对待汉奸豪绅恶霸有所区别。

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歼敌[1]

（1946年8月8日）

粟，并告陈、宋，张、邓、谭[2]：

（一）粟虞辰电[3]悉。歼敌良机已至，甚好甚慰。（二）如连续歼敌两个旅有便利条件则可连续歼敌两个旅，否则可先歼其一个旅，休息数日再找机会歼其另一旅。（三）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四）飞速动员新兵送上前线，并继续组训几个补充团。（五）照陈电向人民公开说明敌进不可怕，暂时失地将来可收复，号召民兵自卫，援助新四军歼敌。

军委

未齐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陈、宋，指陈毅、宋时轮，当时分别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张、邓、谭，指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8月7日辰时粟裕给陈毅和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因华中兵力过于分散，形成钳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击方向。希望调淮南第五旅加入苏中作战，苏中战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开展。

尽可能集中更多军队于主要作战方向[1]

（1946年8月9日）

刘、邓，并告薄、王[2]：

（一）在证明豫北敌之主力向新汴[3]线集中，确无向焦作、向邯郸、向濮阳进攻之意图以后，我在该三方面之钳制部队应当减少（当然要各留一小部监视当地之敌）而尽可能集中更多军队于主要作战方向。（二）皮定均旅[4]归队后休息数日应即使用于新黄河方向，将来向大别山前进时该旅可起大作用。

军委

未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薄、王，指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新汴，指河南省新乡和开封。

[4] 皮定均旅，指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皮定均。该旅中原突围后，于1946年7月20日进入苏皖解放区，划归华中野战军序列。

太行山东华中积极作战以援中原[1]

（1946年8月9日）

刘、邓，陈，粟：

（一）刘邓未鱼电[2]（迟到）今悉，决于未灰开始作战，时机甚好。（二）程潜[3]所属十三个旅，刘峙[4]所属（潼关以东、信阳以北）十三个旅，胡宗南[5]所属（潼关以西）六个旅，重庆行营所属五个旅及桂军两个旅，共计三十九个旅，其中除一个旅（五十三旅）入晋，六个旅守备洛阳、潼关、西安线外，全部用于对付我中原军，故我中原军负担极重，急需援助。（三）未灰至申灰一个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6年8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关于进行陇海线作战等问题给陈毅、宋时轮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现敌已发现我军集结陇海线，正赶修工事，而平汉线敌整编第三十师主力已调潼关豫北道清线，我黄新友部亦已开始作战。时机对我有利，故决心仍于8月10日开始作战。我们控制陇海线后，拟以主力占领路南涡河北10余县城，届时可与山野向西作战互相声援。

[3]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内，如我粟裕军能在苏中歼敌二至三个旅，陈宋军[1]能在徐蚌线[2]及其以东歼敌二至三个旅，刘邓军能占领汴徐线[3]及豫东、淮北十余城，并歼敌二至三个旅，共歼敌六至九个旅，则于大局有极大利益。一则蒋军向苏中、苏北之进攻必受顿挫，二则新黄河受我军威胁，这两点均将迫使蒋介石从我中原军方面抽调至少数个旅向东向北增援。如嗣后我军有更大胜利，中原军面前之蒋军被调向东向北者必愈多，因而使我中原军能在陕南、豫西、川东、鄂西、鄂中、鄂东、皖西等七八处地方站住脚跟，即是战略上一大胜利。

军委
未佳亥

---

[1] 陈宋军，指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宋时轮。

[2] 徐蚌线，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3] 汴徐线，指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须于最短期内攻取洪赵霍三城[1]

（1946年8月10日）

陈、杨：

（一）顽三十军所属之二十七旅（许文耀）正渡河开安邑[2]，该旅到后，董钊[3]共有五个旅及刘钊铭[4]残部，可能向北接防至临汾以北地区。（二）我军必须于最短期内逐一攻取洪赵霍[5]三城（可能时夺取临汾），在阎胡两军之间迅速创造战场，吸引胡军向北，而各个击破之。（三）希望你们于本月内完成夺取洪赵霍三城之任务。你们意见如何，何日开始行动，把握如何，部署如何？

军委

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副政治委员杨奇清的电报。

[2] 安邑，旧县名，1958年与解虞县及临猗县、永济县各一部合并为山西运城县。

[3]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4] 刘钊铭，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七军副军长。

[5] 洪赵，指洪洞、赵城，均为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洪赵县，1958年改为山西洪洞县。霍，指山西霍县。

为陶行知题写挽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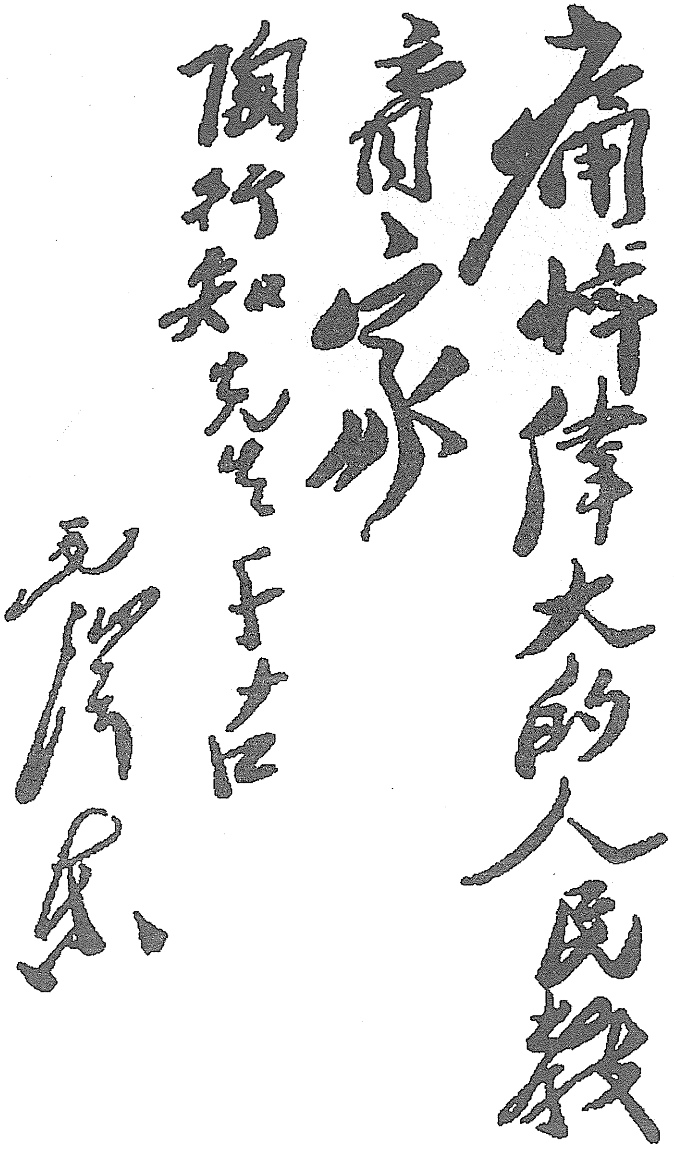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10日）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教育家陶行知大会上敬献的挽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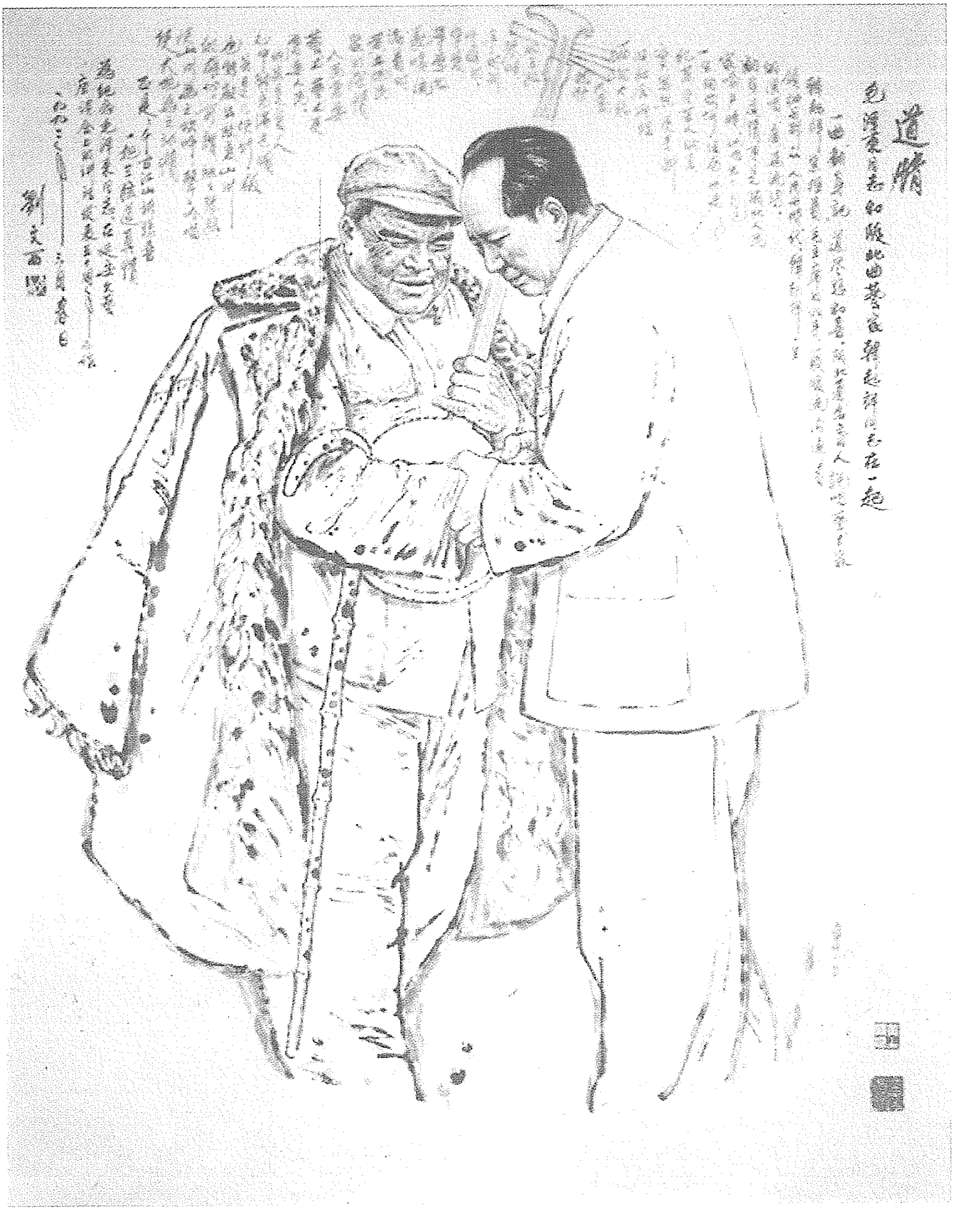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千古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陶行知题写的挽词。



《道情》（中国画）

复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1]

（1946年8月10日）

划定数个军分区，以营为单位，依靠民众，分散游击，是唯一出路，甚好甚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电[1]

（1946年8月10日）

东北我军还可能有两个月时间或更多时间从事休整、剿匪及做群众工作，在此时间内可放手分散以利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关内粉碎蒋军进攻之战争正在发展的情况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6年8月10日）

此次安平调查，国、美合作造假证据，说成一切为中共有计划袭击美军是必然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应准备宣布国、美进攻我方被迫自卫之一切证据，并准备向国际申诉。此案对美方不利之处是暴露国、美站在一边，美方之假中立已难保持，而内战结果我方日益胜利，三个月后将使美蒋陷入困境。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查安平事件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安平事件，指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美军配合国民党军进攻冀东解放区香河县安平镇的事件。

王震部应坚决就地分散和敌人打小圈子[1]

（1946年8月11日）

王震：

（一）因刘邓大军进攻陇海线[2]（准备出新黄河），迫使刘峙[3]将豫南豫西两个旅调开封，现河南空虚，又将第三师由陕南调开封，丹河[4]敌情减轻。（二）李文任[5]各部以营为单位分散后，敌人即无可奈何。（三）你部应坚决就地分散和敌人打小圈子，只要是小部队就可从敌人间隙中穿过来穿过去。望按情决定。

军委

十一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的电报。

[2] 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1946年8月10日发起的出击陇海路战役。

[3]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4] 丹河，指陕西东南的丹江。

[5] 李文任，指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粟裕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更为有利[1]

（1946年8月12日）

陈、宋：

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2]，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人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蚌浦路[3]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

军委

未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的电报。

[2] 指苏中战役中的李堡战斗。1946年8月10日夜，在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指挥下，华中野战军主力乘国民党军新编第七旅旅部及一个团在海安县李堡与第一〇五旅旅部及一个团换防之机，突然向李堡发起攻击，于11日下午将两个旅部及两个团全部歼灭。同日又歼灭新七旅由海安去李堡接防的另一个团。李堡战斗共歼敌9000余人。

[3] 蚌浦路，指蚌埠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争取时间创造战场[1]

（1946年8月13日）

刘、邓，并告陈、宋：

（一）你们未灰是否已开始动作[2]，你们宜速动作争取于十日内外占领汴徐路及涡河流域各城。（二）只有四十七师之一二七旅（李家英）可于日内到汴，四十一师之一二二旅（张宣武）先到郑州整补然后开汴，第三师之第三旅、第二十旅更须整补方能开进。故你们尚可争取十天内外时间，攻占各县，创造战场。（三）开封方面至少集中六七个旅方能大举出击，你们如能迅速动作攻占多县，胜利极大，声势甚盛；又将靠近汴徐之铁路彻底掘毁，可以麻痹敌人，使其不敢轻易出击，可能取得多于十天半月之时间从事创造战场。（四）情况如何盼告。

军委

未元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并告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的电报。

[2] 指进行陇海路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1946年8月10日夜乘敌之虚，在豫东向陇海路发起进攻，至12日，攻克兰封、砀山等城镇、车站10余处，歼敌5000余人，控制铁路100余公里。此时，毛泽东尚未得到消息。

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

（1946年8月13日）

粟、谭[1]，并告陈、宋[2]：

十二日电悉。部署歼灭九十九旅及六十五师一部，甚好甚慰。苏中各分散之敌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3]，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你们如能彻底粉碎苏中蒋军之进攻，对全局将有极大影响。惟希注意：（一）告诫部属，切勿骄傲，每次作战，均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不要轻敌。（二）适当休整部队，恢复疲劳，保存元气。

军委

未元亥

---

[1]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指宋时轮（1907—1992），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

[3] 交通总队，即国民党政府的交通警察总队，由戴笠指挥的忠义救国军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淞沪别动军（投降日伪后驻上海，改称税警总团）于1945年9月经蒋介石批准合编而成，该部配有美制武器，用于华中战场。

调动刘峙兵力推迟主力决战时间[1]

（1946年8月13日）

刘、邓、张，并告陈、宋[2]：

（一）文酉电[3]悉。庆祝你们占领陇海路大胜利。（二）陇海作战完结后整顿队势，第二步应即夺取陈留[4]、通许、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太康、柘城、鹿邑、亳县等城，威胁新黄河，迫使刘峙[5]从陕豫调动之军队向新黄河布防，不敢集中开封一处向我攻击。如此可以争取半月以上时间占领豫东全境（主要的）及涡河流域，推迟主力决战时间。

军委

未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副政治委员张际春的电报。

[2] 陈、宋，指陈毅、宋时轮，当时分别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6年8月12日酉时刘伯承、邓小平和张际春给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宋时轮、薄一波、王宏坤的电报。电报说：晋冀鲁豫野战军于灰夜开始陇海作战，经两天两夜已攻占兰封、野鸡岗、李坝、柳河集、杨集、砀山城、李庄等城镇车站，民权城今晚可占领。刻已控制铁路3段约200里，正动员群众彻底破坏。各部正向东西扩张战果。

[4] 陈留，旧县名，1957年并入河南开封县。

[5]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苏中歼敌[1]

（1946年8月15日）

粟、谭：

未寒午电[2]悉。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内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

军委

未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指1946年8月14日午时粟裕和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意见在苏中打仗为有利。（1）在苏中作战不仅群众、地形、运输、粮食均较淮南方便，且有足够民力可用。同时威胁长江，亦直接拖住敌人无法他调，引其继续调兵来援。（2）苏中敌人已先后遭受华中野战军3次打击，未被歼者已遭很大消耗与损失。（3）如华中野战军主力向西，必须首先打下盱眙和天长两城，然除付出一定代价外，不一定能调动敌人。如舍天长和盱眙而直趋铁道线，则战场狭小，后方亦无法安全。基于上述，我们拟于周内以一部攻占南通、海门吸引敌人南援而歼灭之。估计能再歼敌两个旅，则苏中局势将更好转。

给胡乔木的信[1]

（1946年8月）

请写一篇号召解放区军民起来粉碎反动派进攻的社论。目前亟需这样一篇社论，以利公开动员。

---

[1] 这是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社论《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

致华中分局电[1]

（1946年8月17日）

淮北路西分区工作十分重要，你们应派吴芝圃[2]及其他党政军民工作干部一大批迅去该区工作，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2] 吴芝圃，当时任华中分局第八地委书记兼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

致王震电[1]

（1946年8月17日）

我们希望你率所部进至陇南后，即在两当、徽县一带分散游击，建立陇南游击根据地，对于目前牵制敌人，帮助五师及粉碎蒋介石向整个解放区进攻，帮助必大。对于将来我军向南发展则是一准备步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兵力歼灭一一八旅与十一旅[1]

（1946年8月19日）

刘、邓：

遗失命令事[2]，此时尚无直接反映。但敌一一八旅与十一旅已向你们进攻，你们正应集中兵力歼灭该敌[3]。你们须准备用各个歼敌方法，每次歼其一个旅，连续打几个胜仗方能解决问题。在打一个旅时须集中主力先歼其一个团，然后再歼其另一团。

军委

未皓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1946年8月17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考城国民党军袭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在该纵政治部丢失的文件中有晋冀鲁豫野战军出击陇海路战役第二步作战的书面命令。

[3] 1946年8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的另一电报中说："我集中兵力之程度最好四比一，至少三比一。"

占领霍县灵石待歼胡宗南军[1]

（1946年8月19日）

陈、谢：

（一）占领赵城[2]甚慰，望配合二十四旅迅速占领霍县并相机占领灵石。（二）胡[3]军北进第一步在打通闻喜至临汾段，我以一个旅迟滞其行动，争取时间，占领霍、灵，创造战场，待胡军再向北进时，各个歼灭之。

军委
未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赵城，旧县名，1954年与洪洞县合并为山西洪赵县，1958年改为山西洪洞县。1946年8月17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占领赵城。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8月19日）

应集中兵力歼灭向我军进攻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我集中兵力之程度最好四比一，至少三比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占领南通海门后应注意扩大政治影响[1]

（1946年8月20日）

粟、谭，并告陈，张、邓[2]：

（一）占领南通、海门部队应秋毫无犯，不搬走任何工厂，不没收任何商店，也不筹款，扩大政治影响。（二）入城后可张贴下列标语：反对内战实现和平，反对独裁实现民主，反对媚外实现独立，实行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决议，召集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一切问题，取消特务机关，言论集会自由及其他地方性要求。（三）学生工人有愿入解放区工作者可大批招收，但不要勉强。

中央

未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1946年8月中旬李堡战斗后，华中野战军拟以一部攻占南通、海门，吸引如皋、海安等地国民党军南援而歼灭之。后因情况变化这次作战未实行，改为攻占如皋以南的丁埝、林梓。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对付海安如皋之敌的意见[1]

（1946年8月20日）

粟、谭，并告陈、宋[2]：

你们率主力攻占丁、白、通、海[3]之线后，海、如[4]之敌南下则将该敌歼灭之。但该敌亦有固守原地不敢南下可能。此种情况下，请考虑第二步是否可以攻占磨头镇、张黄港、加力市[5]，并相机攻占黄桥，调动或迫退海、如之敌。将这些敌后市镇上之敌军，那怕每处一营一连予以歼灭，均有极大意义。如我能收复黄桥、蒋垛等地，则海、如、曲、姜[6]等地之敌陷于孤立，势必被调动或被迫退。是否可行，望按实情决定。

军委

未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宋，指陈毅、宋时轮，当时分别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丁、白、通、海，指位于江苏中部的丁堰、白蒲、南通和海门。

[4] 如，指江苏如皋。

[5] 加力市，村名，位于江苏如皋县西南。

[6] 曲、姜，指位于江苏中部的曲塘和姜堰。

以持久战斗夺取大同[1]

（1946年8月20日）

张、罗、杨，并告聂，贺[2]：

（一）大同作战迭有进展，甚慰，望鼓励士气以持久战斗夺取之。（二）城外据点完全攻克后，休息数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然后攻城。

军委

二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副司令员杨成武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粟谭主力暂不西移[1]

（1946年8月20日）

粟谭主力留在苏中作战，暂时不要西移。待苏中作战任务彻底完成，而淮南方面又有十分必要时，再行考虑西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张云逸、邓子恢并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配合陈赓及太岳力量夺取吕梁[1]

（1946年8月21日）

贺、李：

（一）陈赓[2]已夺取洪赵[3]，现令其继续夺取灵霍[4]。（二）胡宗南[5]六个旅除以一部守备闻喜以南外，主力北攻，占我绛县，现正攻我侯马以北，有直入临汾之势。已令陈赓夺取灵、霍后集结兵力粉碎胡军之进攻。（三）已令太岳注意向吕梁南端各县发展。（四）请你们令彭罗[6]派部队及干部南下，配合陈赓纵队及太岳力量夺取吕梁全境。

中央
未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的电报。

[2]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洪赵，指洪洞、赵城，均为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洪赵县，1958年改为山西洪洞县。

[4] 灵霍，指山西灵石和霍县。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致陈赓、谢富治电[1]

（1946年8月21日）

你们宜利用目前时间迅速夺取霍、灵，创造战场，以利将来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第一师、第二十七师等部共五个旅向北进攻的情况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赓、谢富治电的主要内容。随后，陈、谢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以小部阻击阎锡山部南下，隐蔽集中主力3个旅在临汾、浮山间待机捕歼胡宗南部的第一师。

战役战斗上不要平均使用兵力

（1946年8月22日）

刘、邓，并告各首长：

（一）刘、邓马戌[1]电悉。庆祝你们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2]。

（二）望集中主力至少十八个团于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

（三）大战方开始，你们必须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一切补充休整应以此为目标。

（四）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是存在的）。

军委

未养

---

[1] 马戌，即21日戌时。

[2] 指晋冀鲁豫野战军1946年8月10日至22日进行的陇海路战役。此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五师一个半旅和第六十八师一部。

要歼敌四十几个旅[1]

（1946年8月23日）

刘、邓，陈：

蒋介石直接向我进攻之兵力，伪军及保安队不算，单算正规军，计有：汤恩伯[2]十一个旅（扬州、如皋线），薛岳三十五个旅，刘峙三十个旅，程潜七个旅，胡宗南十六个旅（晋南、陕南及边区），王耀武[3]十四个旅，孙连仲[4]十四个旅，杜聿明[5]二十四个旅，共计百五十一个旅。这是最高限度的兵力，全部摆上来了，难再增加，即增为数不大。我们任务就是要从这一五一个旅中歼灭约四十几个旅，就能解决问题。过去在东北歼灭的不算，热河及胶济线歼灭小部亦不算，午元至未马共已歼十个旅。

军委

未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3]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4] 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

[5]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陕南豫西鄂西各部应彻底分散控制广大地区

（1946年8月23日）

李、戴、文、任[1]：

我刘邓[2]军又打了胜仗，未马[3]在民权以南歼敌一个旅全部及又一旅之一个团，至此，未灰[4]至未马共歼敌两个正规旅五个保安团，又伪军四千余反正。刘峙[5]仓卒调兵应战，除从陕南、豫西南调去七个旅，又从鄂西及鄂中调去七十五师两个旅，留在鄂西的只有六十六师之一八五旅。请告王刘、罗文[6]彻底分散，依靠民众，

---

[1] 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原军区司令员。戴，指戴季英，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文，指文建武，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任，指任质斌，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未马，即8月21日。

[4] 未灰，即8月10日。

[5]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6] 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罗，指罗厚福（1909—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江汉军区司令员。文，指文敏生，1915年生，山西垣曲人，当时任江汉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等当时正在筹建鄂西北军区。

坚决创造根据地。你们方面凡未能分散游击的如黄霖、闵学胜[1]等部，应令其迅速彻底分散。总之，我陕南、豫西、鄂西各部乘此时机，部队越分散越好，控制的地方越广大越好。给养被服可用此法解决，疲劳体力可用此法恢复，民众武装可用此法培植（只有培植了民众武装才算生根）。望指导各部坚决实行为要。位三[2]在何处，身体如何，望告。

中央

二十三

---

[1] 黄霖、闵学胜，当时分别任豫鄂陕军区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2] 位三，即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

采取打圈子办法迷惑敌人[1]

（1946年8月24日）

王震：

你们如过分疲劳，似宜在陇海路、西兰路[2]之间采取打圈子办法，即向西又忽然向东，向北又忽然向南，如此可以迷惑敌人，取得短时休息，然后突过西兰路入边区。如何，望按情酌定。

军委

未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的电报。

[2] 西兰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提高警惕，切勿上当[1]

（1946年8月24日）

最近三个月，国、美密谋诱致林彪、陈毅、李先念、贺龙诸重要负责人去大城市谈判，企图羁留他们，以利进攻，但为我识破拒绝。最近国、美密谋在进攻热河之前诱致李运昌，现已拒绝。蒋军攻热得手后，将攻哈尔滨，彼时可能又发生诱骗企图，望东北局及李、伍、边先有精神准备，切勿上当。八个月来我们受国、美密谋欺骗之事极多极大，应当提高警惕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热河分局以及李立三、伍修权、边章伍、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边章伍，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长春执行分部中共方面小组成员。

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等电[1]

（1946年8月25日）

你们解决衣服时不必一律做军装，最好穿便衣，以便与民众打成一片，目标又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和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电的主要内容。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当时分别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第二副政治委员。

刘邓部应充实十五至二十个主力团[1]

（1946年8月25日）

刘、邓，并告陈：

你们应充实至少十五个到二十个主力团，每团人数二千至二千五百，经常保证满员，作为突击力量，勿取平均主义。

军委
未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并告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致方正平等电[1]

（1946年8月25日）

我军恢复疲劳后，必须着重歼灭反动保安团队（不反动者则联络之），才能建立根据地。但目前时期不要打任何县城，以免引起大的震动。

---

[1] 这是毛泽东致方正平并告李先念、文建武、任质斌电的主要内容。方正平，当时任豫鄂陕军区副政治委员。

攻占薄弱据点调动敌人而歼灭之[1]

（1946年8月27日）

粟、谭，并告陈，刘、邓[2]：

（一）粟谭二十六电[3]悉，歼灭九十九旅甚慰。（二）围歼加力市[4]之敌得手后，休息数日恢复疲劳，然后从黄桥、蒋垛、古溪、运粮河等处中择敌力薄弱者攻取之（不可必胜之地，则暂置不取），逐一肃清敌后各小据点，使海安、曲塘、大小白米、姜堰一线之敌完全陷于孤立，然后相机夺取该线。总之攻占薄弱点，威胁敌之后路，调动敌人而歼灭之。望按当前情况决定部署。

军委

未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8月26日17时粟裕、谭震林和刘先胜给中共中央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电报说：第九十九旅全部约6000人，在黄桥以东分界附近被我全部解决。我正转移兵力包围由如皋西援之国民党军3个团于加力附近。如能顺利完成包围，则可完全消灭。

[4] 加力市，村名，位于江苏如皋县西南。

寻机歼灭薛岳部八至十个旅的作战方案问题[1]

（1946年8月27日）

陈，并告刘、邓，张、黎[2]：

据张黎宥电[3]主张主力北靠陇海线歼灭二十八师、七十四师利于机动等语。现在秋高水落，正是歼敌时机。薛岳[4]手中有三十几个旅，我军不论在津浦线[5]上，在陇海线上，或在两线之间，或在他处，总之，必须寻找机会，歼灭薛部正规军八个至十个旅（刘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黎，指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8月26日张云逸、黎玉、舒同和袁仲贤给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的电报。电报说：徐州之敌继续东进，似有控制陇海东段分割我华中、山东解放区再行向北打通，南北夹击进攻，企图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我们建议，目前野战军在淮北如无好仗可打，应将主力北靠陇海线休整，准备消灭东进的顽整编第二十八师及整编第七十四师，以使陇海路东段打通，这样便于将来野战军对华中、山东作战机动，对刘邓作战亦有配合。

[4]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5] 津浦线，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则须歼灭刘峙[1]八个至十个旅），方能初步解决问题。请你考虑切断津浦、调动敌人打野战，是否尚有希望？如有希望，则以切断津浦执行原计划为有利；如无希望，则须考虑是否有被东进之敌将我主力隔断于陇海路南之危险；并请考虑在睢宁、宿迁地区歼敌较之在陇海线上歼敌孰为有利？如无隔断危险，并在睢、宿歼敌更加有利，则可在该地歼敌；如有隔断危险，且在陇海线上歼敌亦属有利，则以照张黎宥电主张行动为宜。究应如何方利于打开局面，请考虑见复。

军委

未感

---

[1]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粉碎蒋军进攻热东冀东等地的部署[1]

（1946年8月28日）

程、李，并告聂、萧、刘[2]：

（一）蒋军进攻计划是先攻热东[3]、冀东及长城线，以一部向承德佯攻，俟热东、冀东及长城线得手后，再以全力攻承德。（二）你们应动员全力在热东、冀东及长城线上打击与消耗敌人，迟滞敌人前进时间；对佯攻承德之敌必须给以有力回击以阻止之。（三）上述斗争时间愈延长愈对我先取大同再取平汉[4]之作战计划有利。

军委

未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子华和副司令员李运昌的电报。

[2] 聂、萧、刘，指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热东，指当时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的东部地区。

[4]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将陕南鄂西北打成一片造成根据地[1]

（1946年8月28日）

李、任、文：

（一）望一小队带电台与电池去找周志坚[2]，找着后要周部以汉水以北为根据地分散游击，站稳脚跟后酌量派队渡江向南岸发展。（二）柞水、镇安成立分区，站稳脚跟后极力向西面发展。（三）郧西方面我军一时期后向南发展直抵汉水，尔后并相机派队渡江。（四）要王刘[3]及罗文[4]各派一部向均县[5]、郧县、白河、旬阳、平利各县发展建立分区。（五）总之使陕南、鄂西北打成一片，占领广大地区，造成根据地。

军委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任质斌和司令员文建武的电报。

[2] 周志坚，当时任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率该部第三十九团两个营与上级失去联系。

[3] 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罗文，指罗厚福、文敏生，当时分别任江汉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均县，即今湖北丹江口。

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

（1946年8月28日）

各首长：

据粟裕、谭震林[1]未感[2]电称：我军于二十六日在如皋西南地区歼灭六十九师之九十九旅后，又于二十七日在上述地区歼灭由如皋来援之敌六十五师（粤系）之一八七旅及七十九师一个团。总计两日战斗，将敌一万五千人全部解决，除毙伤外，俘虏近万人。第二次由如皋增援之一个团亦被歼一半。我军略加休整，以利再战，等情。我粟谭军从午元[3]至未感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4]，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很有战斗力的，没有采取平均主义的补充方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未宥[5]集中十个团打敌

---

[1] 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未感，即8月27日。

[3] 午元，即7月13日。

[4]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由粟裕、谭震林指挥的华中野战军依托苏中解放区，连续作战7次，先后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编师师部、6个旅、1个团和5个交通大队，共5.37万余人，被誉为“七战七捷”。毛泽东写这个电报时，尚未收到华中野战军关于邵伯保卫战的报告，故电报中说作战6次。

[5] 未宥，即8月26日。

两个团，未感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军委

未俭

致张宗逊、罗瑞卿等电[1]

（1946年8月28日）

（一）蒋军北线作战计划规定，大同属十二战区[2]，傅部有相机占领卓资山、凉城之任务；（二）你们必须立即开始部署歼灭傅军向卓资山、凉城进攻之部队，同时不影响我对大同之攻击；（三）你们所得情况如何，歼灭傅部把握如何，及是否可以不影响对大同之攻击，均盼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2] 1946年8月10日，蒋介石为促使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增援大同，将原属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辖的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管辖。

山东华中的歼敌方针

（1946年8月29日）

陈，张、黎，张、邓，粟、谭[1]，并转各区党委，各师各纵首长：

鲁中九师攻击文祖、埠村获胜[2]，鲁中警备旅攻击危家庄获胜[3]，望传令嘉奖。即使是小胜仗，亦足以长人民之志气，灭敌人之威风，故应当奖励。鼓励一切正规军、地方军及民兵发挥积极性，多打胜仗，各个击破与大量歼灭敌人。要告诉山东及华中全党全军，必须大量歼灭王耀武[4]（十四个旅）、薛岳[5]（三十五个旅）、汤恩伯[6]（十五个旅）三部之正规军，方能解决问题。胶济我军及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黎，指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1946年8月24日至25日，鲁中军区第四师和第九师集中4倍于敌之兵力远道奔袭山东章丘县文祖、埠村，歼灭国民党军暂编第十五师一个团部、五个营十六个连，并击溃两个团的增援。

[3] 1946年8月24日至25日，鲁中军区章丘县独立营配合第四师侦察连包围袭扰危山子之敌，章丘武工队并袭击了国民党军暂编第十五师师部。

[4] 王耀武（1903—1968），山东泰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5] 薛岳，1896年生，广东乐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6] 汤恩伯（1900—1954），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鲁南、苏北我军对王耀武、薛岳两部应各以歼灭三分之一（即五个旅与十二个旅）为第一步目标。苏中我军已于过去一个半月中（午元至未感[1]）歼敌正规军六个半旅、交通警察五千，已接近歼敌二分之一，今后应以歼敌十分之八至十分之九为目标。歼敌方法，是集中大力打敌一部，例如：苏北午感鱼沟战役[2]集中十二个团（实际使用七个团）歼敌九十二旅两个团，苏中未宥如皋西南战役[3]集中十个团歼敌九十九旅两个团就是好例。这种打法，通全局看来，用力省而成功多，每战必胜，既能全歼，又能速决，必须教育干部普遍采用。野战军补充应有重点，胶济、苏北、苏中三战区各应补充野战军十至十五个主力团，每团二千五百至三千人（国民党有三千余人的大团），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平均主义。望本上述战略方针，规划一切。

中央
未艳

---

[1] 午元至未感，即7月13日至8月27日。

[2] 鱼沟战役，也称朝阳集战役。1946年7月27日至29日，山东野战军以第二纵队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在安徽灵璧县北部朝阳集、鱼沟地区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九师第九十二旅及第六十旅一部共5000余人。

[3] 如皋西南战役，也称如（皋）黄（桥）路战役。1946年8月26日，华中野战军集中主力在江苏如皋、黄桥之间的分界地区，以5倍于敌的兵力，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九旅；接着，27日又集中15个团的兵力在分界以东的加力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一八七旅等部3个团。毛泽东在电报中指的是26日的作战。

相机歼灭敌第三师[1]

（1946年8月29日）

刘、邓，并告陈[2]：

刘峙[3]令刘汝明[4]率部攻曹县，孙震[5]率部攻定陶。刘汝明令曹福林[6]率其残部、张岚峰[7]率三个团先肃清曹县东南，尔后再攻曹县，他自己的六十八师一部在后跟进；刘汝明集团除进攻外，还有守备开封、兰封[8]、民权、柳河、商丘之任务。孙震令第三师（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余万人，乘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结束陇海战役之机，由郑州、徐州之线分路进攻鲁西南解放区，企图钳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曹县地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于9月3日至6日在山东定陶县以西大扬湖、大黄集地区分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俘该师中将师长赵锡田。7日，乘胜追歼后撤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师和四十一师等一部。此役称定陶战役，共歼敌1.7万余人。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4]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5]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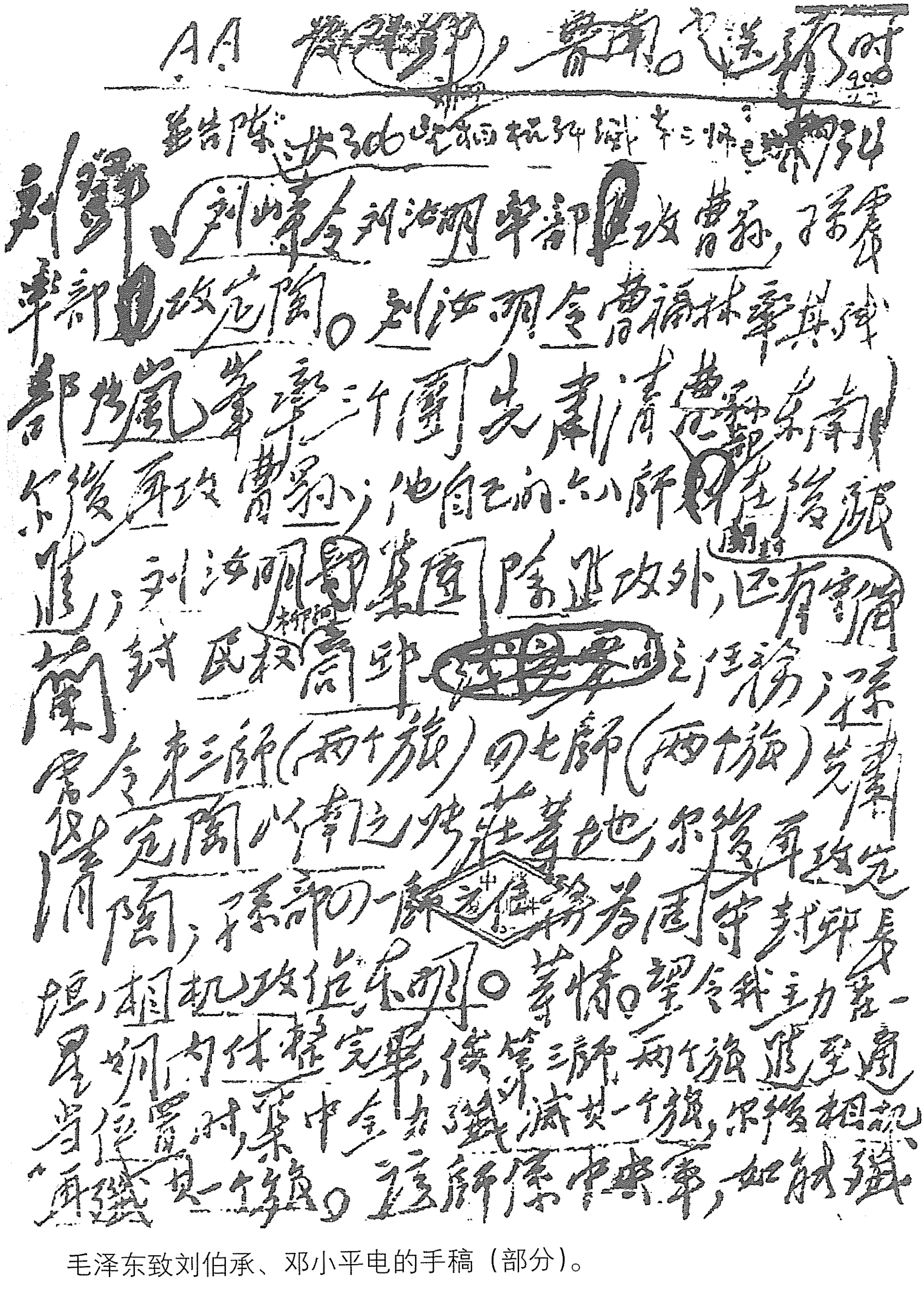
[6] 曹福林，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五师师长。

[7] 张岚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暂编第四纵队司令。

[8] 兰封，旧县名，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个旅）、四十七师（两个旅）先肃清定陶以南之张庄等地，尔后再攻定陶；孙部四十一师之任务为固守封丘、长垣，相机攻占东明，等情。望令我主力在一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望按实情处理。

军委
未艳



AA [illegible]

並告陈[illegible]

刘邓：刘峙令刘汝明率部攻曹县，孙震率部攻定陶。刘汝明令曹福林率其部为左翼，第[illegible]团先肃清曹县东南，尔后再攻曹县；他自己的六八师在后跟进；刘汝明部集团除进攻外，还有警备兰封、民权、商邱[illegible]之任务；孙震令第三师（两个旅）、四七师（两个旅）先肃清定陶以南之[illegible]庄等地，尔后再攻定陶，孙部一师任务为固守封邱、长垣，相机攻占东明。等情。望令我主力在一星期内休整完毕，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手稿（部分）。

寻机歼敌造成有利局势[1]

（1946年8月29日）

陈：

寝电[2]悉。（一）现在敌人逐步向东，企图打通陇海线并威胁淮阴、临沂，我军必须寻找机会歼敌。我军休整一个月之计划事实上不可能，将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你率主力应在睢宁以东地区待机，仿粟裕[3]办法，集中主力歼敌一部，休整若干天又打，打后又休整若干天。如此常保高度士气，纪律亦可改善。九月正是作战时机，刘邓[4]军、中原军均希望你军配合。此时不打，敌占地愈多，威风愈大，我士气民气均将受损，故必须寻机作战，灭敌人威风，壮自己志气。每次歼敌一团一旅，打五六次，即可造成有利局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指1946年8月26日陈毅、宋时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就山东野战军在陇海、淮北作战行动提出三个方案：第一方案，山野率二、七、八3个师打敌第二十八军；第二方案，山野集结泗阳及运河以东争取1个月休整；第三方案，山野全部南下准备与粟裕会合出击。我们意见着重采取在泗阳及运河以东整训待机的办法，可北可南，可相机向西反攻。

[3] 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4]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二）以地方部队对付冯治安[1]部，调叶赖纵队[2]担任歼灭二十八师（分几次打，每次歼灭一团至两团）。你意如何？

军委
未艳

---

[1]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2] 叶赖纵队，指当时在胶济路方向担负作战任务的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

致王震电[1]

（1946年8月29日）

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东北局电[1]

（1946年8月29日）

蒋军可能于十月向你们大举进攻，望利用九月加紧准备一切作战条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8月29日）

俟第三师两个旅进至适当位置时，集中全力歼灭其一个旅，尔后相机再歼其一个旅。该师系中央军，如能歼灭影响必大。

---

[1] 这是毛泽东根据国民党军调集其主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三师等部共32个旅30余万人，乘晋冀鲁豫野战军结束陇海路战役尚未休整之机，由郑州、徐州分路向鲁西南解放区内的定陶、曹县一带进行合击这一敌情，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歼灭大同之敌的意见[1]

（1946年8月30日）

张、罗，并告聂，贺[2]：

（一）大同敌有固守顽抗与突围西窜两种可能。（二）你们应加紧消灭城外据点，并布置力量于其分路出击时（例如最近两次城内敌人分路出击），包围歼灭之（最近两次只击溃未歼灭），以促进城内敌人恐慌心理，准备攻城，夺取大同。（三）如大同敌全部突围西窜，则不要拦阻，让其窜至离城数十里时歼灭之。

军委

未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吸引蒋军向苏中增援对全局有很大利益[1]

（1946年8月31日）

粟、谭，并告陈，张、邓，刘、邓[2]：

（一）粟谭二十九电[3]悉，所见甚是。不管敌情变化如何，一、六师至少休整十天加以补充，五旅攻占黄桥后，亦须休整，养精蓄锐，以备再战。皮定均旅[4]亦宜开至如皋西南和主力靠拢，参加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8月29日晨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等的电报。电报说：苏中战役击破了敌顽三次“清剿”计划和两次对高邮的进攻计划，至此敌顽在苏中现有兵力已完全失掉了进攻能力和主动权。估计敌顽可能调6个师到苏中，以打通海泰、如黄、通如3条交通线。目前苏中我军相当疲劳，必须争取7天到10天休息，无法乘胜攻占如皋、海安两点。因此一、六师暂在如皋、海安西部一面休整，一面加紧对海安之包围，令第五旅攻占黄桥。如敌顽不能在10天内外向如、海增援，我决心攻占海安，否则让敌分散后再说。

[4] 皮定均旅，指原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该旅突围抵苏皖边解放区后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旅长皮定均。

战。（二）如能照你们所说吸引蒋军数个师向苏中增援，那对于全局有很大利益。各增援师到来之后，仿照七八两月作战方法，给以各个歼灭，对于苏中也是有利的。

军委
未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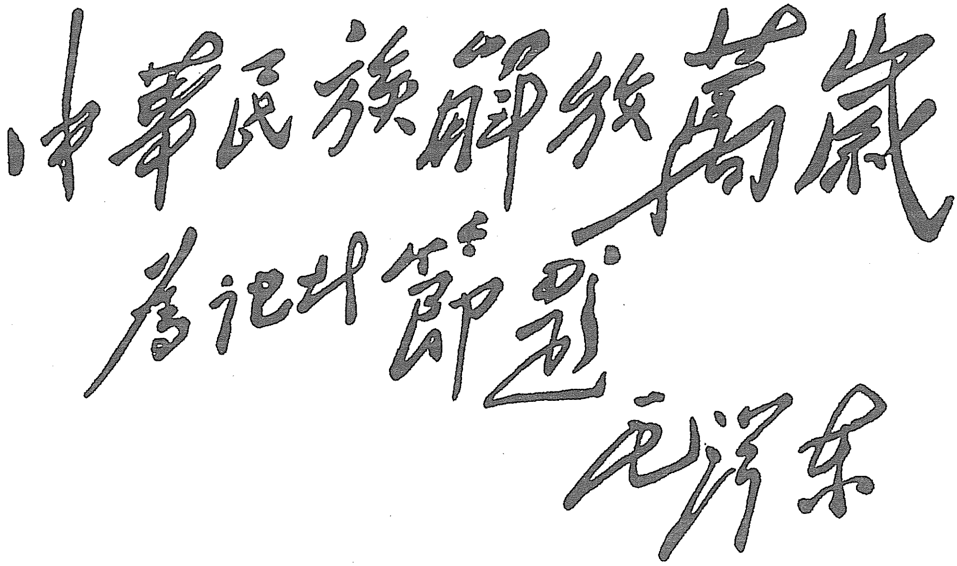
为“九一”记者节题词

（1946年9月1日）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为记者节题

毛泽东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為記者節題

毛澤東

毛泽东为记者节的题词。

复周恩来等电[1]

（1946年9月1日）

同意你的估计及彻底揭露美蒋阴谋的方针，望坚决执行；目前只有这一方针才能与解放区胜利的自卫战争相配合，彻底击破反动派的进攻。各国人民觉悟程度日益增长，进步舆论日益发展，配合苏联坚决反对各国反动政策的活动，使整个局势日益有利于民主派，不利于反动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周恩来并告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准备固守张家口至南口沿线地区[1]

（1946年9月2日）

聂：

张家口至南口沿线及延庆、龙关[2]、怀来、涿鹿各县，须择要点建立堡垒，划定范围，指定地方兵团，屯集粮草，准备固守。

军委
申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龙关，旧县名，1960年撤销，并入河北赤城县。

集中优势兵力着重歼灭保安团[1]

（1946年9月2日）

李、任、文：

（一）一日电[2]悉。完全同意你们计划，望按具体情况粉碎敌之进攻。作战时，着重打保安团，只要你们用各个击破方法歼灭大部分保安团，顽正规军即被孤立，那时再打正规军不迟。（二）作战时应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集中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包围歼灭保安团五百人），期于速决尽歼，得手后休整数日，再打第二仗，只要每次都是歼灭战，打三四个胜仗，即可开展局面。（三）六十一旅由洛南开潼关，第一旅在咸阳集中，第三十六师之二十八旅及一二三旅似将用于进攻陇东边区。你们周围并无六十三旅，十五师之六十四旅只有一个团在郧西地区。向你们进攻的正规军主要是八十四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任质斌和鄂豫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的电报。

[2] 指1946年9月1日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在汇报了国民党军对豫鄂陕大“清剿”的情况后说，此次反“清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1）基本上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2）基本上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以便保卫刚建立起来的地方和稳住刚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及群众情绪。一部分队伍则应积极向外线发展游击战争。（3）作战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地方武装和保安团。在有利条件下，亦可集中一定兵力歼灭以营为单位分散“清剿”之正规军。

（已到洛南接六十一旅防）、一四四旅（一个团在陕南，另一个团追王震[1]可能回陕南）、一三五旅（未敬由洋县出发开漫川关附近）。你们一般应避开这些正规军，专门打保安团，如能将十一个保安团歼灭大部，根据地即可建立。（四）我陇东已展开进攻，打破二百里封锁线，占领大块地方，必可吸引胡[2]军一部。（五）我刘邓[3]军一部在豫东进攻，主力转入内线待机歼敌，必能继续吸引敌人。

军委

申冬亥

---

[1] 王震，当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46年8月29日率第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边区。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主力他调须留得力部队在苏中作战[1]

（1946年9月2日）

粟、谭，并告陈[2]：

（一）世午电[3]悉，甚慰。各事照你们计划办理。（二）十纵及皮旅[4]仍在原地加紧整训，不要东调，该两部速补充一批俘虏，提高战力。（三）准备在主力他调后仍有得力部队留苏中作战，保卫苏中不失，须令七纵、十纵、皮旅及其他地方部队参加打几次大仗，打出经验，提高战力。

军委

申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8月31日午时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宋时轮、张鼎丞和邓子恢的电报。电报报告了在苏中李堡等地战斗中的参战部队伤亡和补充情况，提出今后之作战方针为包围海安，加强政治攻势，迫敌军起义，否则以充分的军事准备攻占之。如敌来援，则决舍海安歼其援敌。海安得手后休整20天至1个月再行相机攻占泰州、仙女庙之线，予敌二十五师以打击，尔后转移主力于淮南。

[4] 皮旅，指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旅长皮定均。

给习仲勋[1]的信

（1946年9月2日）

仲勋同志：

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得手后看形势，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再歼敌一个团；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此外，须准备三千人左右补充作战部队的消耗，请早为准备。最好先期交付各旅训练，临时可迅速补充。

毛泽东

九月二日

---

[1]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委员。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9月2日）

刘、邓：

八月三十日第三师位置：师部及炮十团第三营孟砦；第三旅旅部及第八团李堡、蔡口、韩庄；第二十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南门刘、杜寨、王庄；第三旅第八团守备考城。

军委

二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立即部署歼灭刘峙一路[1]

（1946年9月3日）

刘、邓：

（一）蒋介石迫令刘峙[2]冒险前进正是我歼敌良机，望即部署歼灭其一路。（二）望从豫北钳制部队中酌抽一部加强主力。

军委

申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歼灭第三师后的行动部署[1]

（1946年9月4日）

刘、邓：

（一）如你们尚有未使用之足够后备力量，或主力伤亡不大，可以再打一仗，则于歼灭第三师后，迅即转移兵力至东明方面，歼灭东明附近之川军两个团[2]，确保东明于我手中，甚为有利。（二）如你们后备力量不足，或主力伤亡较大，不适宜连续作战，则以休整数日待机再战为有利。（三）薛岳[3]主攻方向在东面，属于薛岳指挥现到丰县、砀山、夏邑之线之十一师（一个旅）、五师（两个旅）等部，其任务似是助攻，而不是主攻，对于你们的主攻力量是孙震[4]集团七个旅。

军委

申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一师第三一一团和整编第四十七师第三七四团。

[3]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4]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速将主力隐蔽集结准备打击北进之敌[1]

（1946年9月4日）

陈、谢：

江电[2]悉。蒋军北进可能极大，你们决定集中主力给北进顽军以坚决打击很对。望迅速将主力移至机动位置，隐蔽集结准备作战，以歼灭顽军一个旅为目标。

军委

申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1946年8月中旬，当陈谢纵队在山西灵石、洪洞间发动攻势时，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匆忙调集整编第三十师和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共4个旅沿同蒲路及其东侧北犯临汾、翼城地区，企图配合由平遥、介休南下的阎锡山部夹击第四纵队于洪洞、赵城地区。陈谢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集结隐蔽于洪洞一带，在9月22日至24日，取得歼敌整编第一师第一旅的胜利。

[2] 指1946年9月3日陈赓、谢富治、韩钧、杨奇清给中共中央军委和薄一波、王宏坤的电报。电报说：估计顽军现在企图肃清晋南我军，开始北进，我除以分区部队积极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外，主力准备予北进顽军以坚决打击。

华中野战军九十月份的作战任务[1]

（1946年9月4日）

粟、谭，并告陈[2]：

（一）冬辰电[3]悉，计划甚好。希望能于九月上半月完成东面作战任务，下半月休整。十月上旬攻取扬泰[4]线，中旬休整，下旬进入淮南作战。（二）攻如皋时各部须作充分准备。

军委

申支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9月2日辰时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和陈毅、宋时轮并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电报说：黄桥已占领。海安5、6日开始总攻击不成问题。我们拟定攻海安后以7个团攻如皋，3个团作预备队，如顽在9月5日前不能增援，我将攻占海安；如顽在5日后出来增援，我决以20个团歼其两至三个师后再攻如皋。似此，苏中战场第一期作战9月份完成后即可西进，如顽援兵不来可以提前15天西进。西进是按中央指示，夺取扬泰恢复三、四分区。估计需时两月。

[4] 扬泰，指江苏扬州和泰州。

致张宗逊、罗瑞卿电[1]

（1946年9月4日）

傅作义九月一日部署进攻集宁，望令丰镇守军沉着应战，于顽来攻时相机反击而歼灭之。大同前线指挥部随即以主力北上寻求首先歼灭傅作义援兵，留下第三纵队等部继续围攻大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大同前线张宗逊、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歼第三师后相机解决东明之敌[1]

（1946 年 9 月 5 日）

刘、邓：

现向前后王楼、砖庙集进攻之川军两个旅（一二二及一二七）不甚疲劳，且两旅靠拢，似较难打。现向东明进攻之川军两个团，是两个师的部队（三一一团属四十一师，三七四团属四十七师），经过鄂北、陕南长途跋涉，比较疲劳，且远离其后梯队，孤军深入，直迫东明城下，似较好打。望以一部固守东明，待第三师完全解决后，相机解决东明附近之敌。请按实情决定。

军委

申微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望派地方部队扰击向单县进攻之旅[1]

（1946年9月5日）

刘、邓：

侵占夏邑的五师一个旅，从其派出一个团向南清剿营阁集地区这一行动看来，暂时似无向北进攻之意。侵占砀山之十一师一个团（属十八旅），似亦暂在该地未动；惟该师侵占丰县之一个旅（十一旅），有向单县进攻模样，望派地方部队加以扰击。

军委
申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9月6日）

刘、邓：

第五军以一个营接单县城防，以一个营驻单县、砀山间之马良集维持交通，以一个团开夏邑以南清剿，主力驻砀、夏。观此部署，该军任务是维持交通与扩展占地，暂无大举进攻意图。该军全部美械，但尚未整编，故仍称军、师，无旅，已到者为两个师，另一师由滇东开，十月可到。该军在淮南时被我新四军歼灭一个营。该军属中央系。

军委

九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9月6日）

刘、邓：

望相机占领考城，城内有一工兵营一坦克队一汽车队。

军委

九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等电[1]

（1946年9月6日）

绥傅[2]大举进攻，必须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该敌。此战役归你们总负责，如何部署，速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并告张宗逊、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7日，聂荣臻、萧克复电中央军委：“傅顽东犯，尚不能取得东西两面之直接配合，我先集中力量打傅顽与继续围攻大同，尚属有利。”

[2] 绥傅，指从绥远出动的国民党军傅作义部。

复张宗逊、罗瑞卿等电[1]

（1946年9月6日）

集中十三个团于机动地区，于敌东进时于运动中或于其立足未稳时歼灭其一部，得手后再歼第二部、第三部，你们的部署很好，望按实情处理。命令集宁守军死守，任何情况下不许放弃，否则执行纪律。

---

[1]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张宗逊、罗瑞卿并告聂荣臻、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9月6日）

无条件停战之要求，现在已感不适宜，蒋军已占我二十余县，其中有承德、淄博、台儿庄等要地，无条件停战可使蒋军获得休整以利再战，而我则不能恢复失地，因此必须开始考虑改变此要求。必须（一）蒋军退出被侵占之解放区，（二）蒋军从东北、华北、华中、西北撤退二分之一开往华南各省，方能保证停战之后不再打，否则无保证。我军现正开始动员起来，决心将蒋军驱出解放区，在六个月至八个月内，歼灭第一线全部进犯军三分之一，即一六二个旅中五十四个旅（阎傅马及伪军保安队交警等不在内）。你们意见如何，望讨论见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8日，周恩来复电，认为中央决定歼敌三分之一力量的胜利以转变局势，是绝对正确与需要的。

参战主力集结休整未使用之部队相机歼灭东明之敌一部[1]

（1946年9月7日）

刘、邓：

（一）鱼亥电悉，甚慰。庆祝你们歼灭第三师的大胜利，望传令全军嘉奖。（二）敌人尚有进攻力量，我军此次参战主力立即集结休整补充，准备再战，申齐起十天内休补完毕。（三）以尚未使用之部队相机歼灭东明方面敌之一部，并相机占领考城，收复东明；以地方部队深入敌后活动，扰击敌人。（四）你们现在兵力配备，人数，枪数，主官姓名，战力强弱，盼告。

军委

申虞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9月8日）

刘、邓：

七日十三时电[2]悉，甚好甚慰。如能歼灭川军三个旅，刘峙此次进攻即可打破。

军委

八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1946年9月7日13时，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张际春致电军委，电文如下：“第三师（军）两个旅全部已被我歼，并获战车六辆。第四十七师（军）之一个旅亦被我全部消灭，另一个旅在白茅集正被我围歼中，估计可迅速解决战斗。另四十一师之一二五旅大部（一个团又两个营）在东明全被我包围，正激战中。”

致陈毅等电[1]

（1946年9月8日）

我刘、邓已大胜，对你们必有帮助。同意八师暂不北调，俟秋高水落，集中兵力在淮海歼敌，并与粟、谭南北配合[2]，巩固两淮，开展局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并告张云逸、黎玉电的主要内容。

[2] 南，指华中野战军主力所在的苏中地区；北，指山东野战军所在的淮海地区。

复粟裕、谭震林电[1]

（1946年9月9日）

同意放弃海安，休整十天，准备向北机动。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粟裕、谭震林8日提出的撤围海安北上泗阳、稳定两淮局势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此电改变了中央军委本月4日关于华中野战军攻取扬泰线和西进淮南的决定。

歼灭进攻集宁之敌的作战部署[1]

（1946年9月10日）

张、罗，并告聂，贺[2]：

（一）张罗九日十九时电[3]悉。敌攻集宁，正是歼灭傅[4]部良机。（二）速令杨得志[5]部四个团开到集宁西南地区作为最后决胜之用。（三）严令集宁防军死守一星期，我军主力务于三天至七天内彻底歼灭窜至集宁附近之敌。（四）歼敌方法最好将我主力突入敌后，由西向东打，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四对一）先解决一个师，得手后再解决一个师，最后全部解决该敌。望按实情处理。（五）集宁附近之敌彻底歼灭后，乘胜收复卓资山[6]，相机占领三道营、旗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3] 指1946年9月9日19时张宗逊、罗瑞卿给聂荣臻、贺龙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已于7日开始向集宁方向前进，估计明晨可能开始攻击。我预定以12至14个团集结于集宁西南地区，乘敌攻集宁时突击敌侧后，求得歼敌一个到一个半师。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6]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营及陶林[1]。

军委

十日二十时

---

[1] 陶林，旧县名，1954年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后旗和察哈尔右翼中旗，原县治陶林镇为察哈尔右翼中旗旗府。

准备在宿迁新安沭阳等地相机歼敌[1]

（1946年9月10日）

陈，并告粟、谭[2]：

（一）陈电决定待宿迁蒋军渡运东进，我军准备于宿迁、新安[3]、沭阳之间歼敌，或进至睢泗[4]地区歼敌，以打中央系为目标，不打桂系，此项计划甚好。待打一二胜仗后，台儿庄地区之敌必分兵南顾，不敢向鲁南深入，那时可将叶纵[5]南调和主力一起继续开展局面。（二）惟现时桂系集中四个团于洋河，距两淮甚近，我在泗阳方面之防御力量如何？如洋河之敌向泗阳前进，你们如何对付？（三）台儿庄、宿迁之线以西敌占大块地区内，是否尚有我地方部队及民兵活动，区乡政权是否存在，人民斗志如何？（四）刘邓大胜，已将十一师及五军（师）吸引向定陶、曹县地区，八十八师亦有西进讯，估计系接十一师最近所占丰、单、鱼、成[6]等县之防。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新安，即新安镇，今为江苏新沂县县治。

[4] 睢泗，指江苏睢宁和泗阳。

[5] 叶纵，指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叶飞。

[6] 丰、单、鱼、成，指江苏丰县和山东单县、鱼台、成武。

外，估计薛岳[1]至少还须派一个师进至砀山、夏邑、永城等处接替五军防务。请侦察二十六师是否将从淮南移至上述地区。

军委

申灰

---

[1]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坚决克服归队思想在敌后创造根据地

（1946年9月10日）

区党委[1]各同志，并告中原局：

（一）我们完全同意中原局八日电[2]，以十五旅全部即调陕南，另派一部分力量到大洪山联系当地力量，发展大洪山根据地。这样鄂西、鄂中、陕南成犄角之势，牵制蒋军一大部分力量，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这是你们的伟大战略任务，你们应把这一战略任务传达每一指战员，坚决克服归队思想。

（二）蒋军现以十四个旅对付我中原军（包括陕南、鄂西、鄂中、鄂东、皖西），以九十八个旅沿长江下游、津浦南线、新黄河及陇海全线（徐州至天水）向我苏中、淮海、鲁南、豫东、鲁西、晋南及陇东各解放区进攻。从午元至申齐[3]不到两个月内，已有十八个半旅被我歼灭或受我歼灭性之打击。我们计划在今后四至六个月

---

[1] 指中共鄂西北区委。

[2] 指中共中央中原局1946年9月8日给王树声并鄂西北区党委、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留中原军主力在敌后可以起莫大的战略作用。就中原军本身说，只有忍艰刻苦地创造根据地，才能生存与发展。应坚决抛掉北归思想，将十五旅全部立即转移到陕南，以一部渡襄河，东到大洪山，重创大洪山新的局面。我们意见以李人林率电台和一部回大洪山。

[3] 午元至申奇，即7月13日至9月8日。

内再歼敌二十个旅左右，便可粉碎此次国民党大举进攻并获得向中原发展之可能性。如果我能再歼敌二十个旅，则我刘邓[1]军必可渡新黄河向南阳、信阳之线发展，我华中军及山东军之一部必可向大别山发展，到那时便可和你们直接配合作战。

（三）因此，坚决克服归队思想，在敌人后方创立几个根据地，立稳脚跟，钳制大量敌人，这是你们的神圣任务。

（四）同时，距离近、部队小还可以冒险归队，像你们这样大部队距离如此之远，勉强归队有拖垮之危险，故万万不可行。

（五）为执行上述战略任务并便于解决衣粮，应照中原局指示，迅调十五旅全部入陕南，再派李人林[2]率电台及一个相当大的部队去大洪山。

（六）如果鄂西北衣粮十分困难，除十五旅及陈先瑞[3]部决定调陕南、罗文[4]全部必须留在鄂西北不能变动外，可考虑王刘[5]率一纵主力去大洪山发展根据地，但须估计六十六师全部及七十二师大部将向鄂中进攻之情况。

（七）总之，不论如何是要在敌后创造根据地而不是归队，你们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李人林（1914—1995），湖北天门人。当时任鄂西北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3] 陈先瑞（1914—1995），安徽金寨人。当时任鄂豫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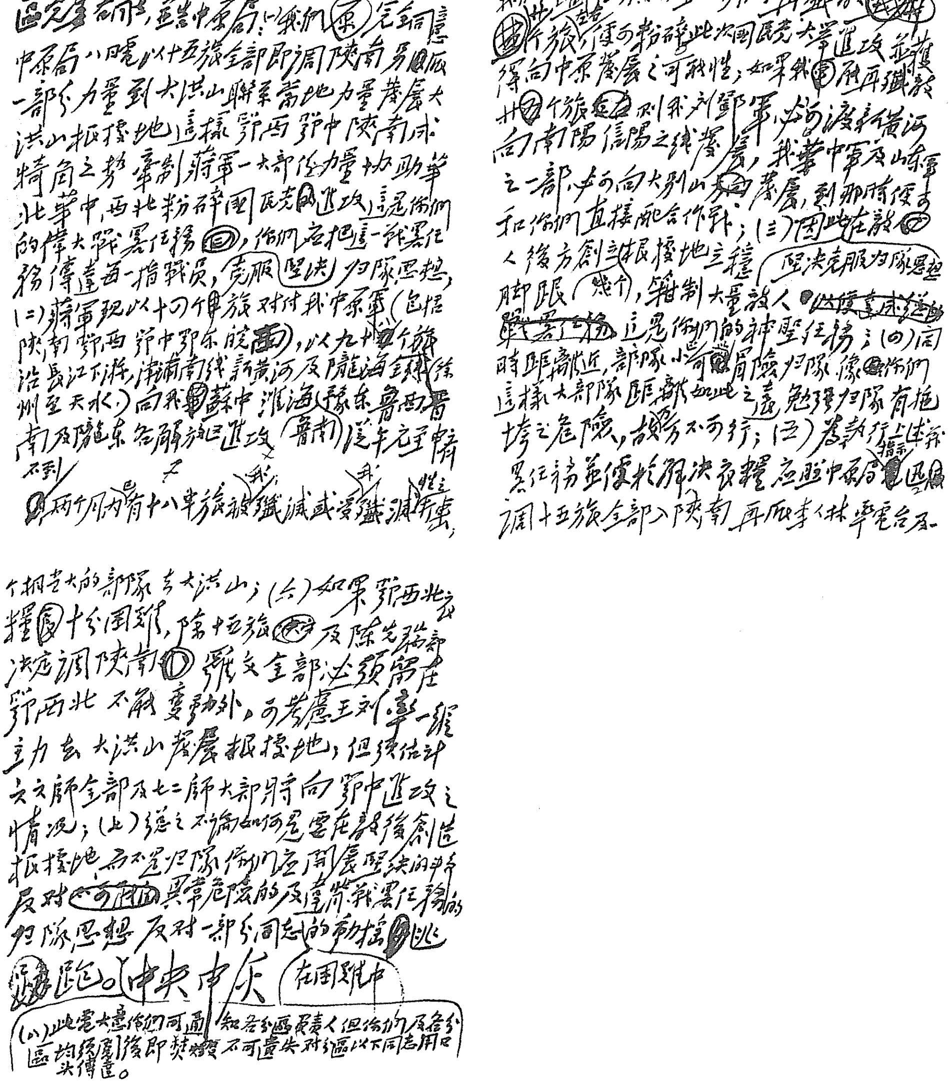
[4] 罗文，指罗厚福、文敏生，当时分别任鄂西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二副政治委员。

[5] 王刘，指王树声、刘子久，当时分别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应开展坚决的斗争，反对异常危险的及违背战略任务的归队思想，反对一部分同志在困难中的动摇逃跑。

（八）此电大意你们可通知各分区负责人，但你们及各分区均须阅后即焚毁，不可遗失，对分区以下同志用口头传达。

中央
申灰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坚决克服归队思想在敌后创造根据地》的手稿。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

致中原局、鄂西北区党委、鄂皖边地委诸同志电[1]

(1946年9月10日)

在陕南、鄂西、鄂中、鄂东对付我中原军者共十四个旅，分属胡宗南、程潜、刘峙三人指挥。我中原军的任务就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在当地立稳脚跟，创立根据地，钳制这十四个旅，协助老解放区粉碎国民党进攻。你们过去两个多月英勇斗争已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中央希望并责成你们今后还要起同样的作用，全党全军均关心你们，你们不是孤立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各地战况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原局、鄂西北区党委、鄂皖边地委诸同志电的主要内容。

提议华中野战军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1]

（1946年9月11日）

陈，张、邓、粟、谭：

据陈电，敌以七军、七十四军、二十八军三部南攻泗阳、两淮[2]。除照陈电部署，陈率二、七、八师及九纵坚决歼灭该敌（须准备经过残酷的战斗）外，提议：（一）粟谭率主力即开两淮机动位置，到达后如北面南下之敌已歼灭，则在两淮休整待机，或配合二、七、八师全力打开淮海局面，或向南攻取扬泰[3]线，或向淮南路东歼敌。（二）两淮后方军火工厂即速向东移，以备万一。

军委

申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3] 扬泰，指江苏扬州和泰州。

对陆定一送审的社论稿及来信[1]的批语

（1946年9月11日）

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应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

[1] 社论，指9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陆定一在送审社论时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对美的各种幻想。”

致陈毅、宋时轮等电[1]

（1946年9月11日）

敌六个旅南下，两淮危急[2]，粟率苏中主力（一、六师）立即开两淮，准备配合陈宋主力彻底歼灭该敌。但陈、宋现应独立作战，务于粟、谭到达前歼灭南下之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之前进，争取时间，以待苏中主力到达，协力歼敌全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宋时轮、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2] 8月上旬，山东野战军进攻泗县失利后，撤至泗阳休整。9月10日起国民党军沿运河两岸南下，进犯两淮。

致陈毅电[1]

（1946年9月12日）

你们务必在泗阳、淮阴之间歼敌一个至两个旅，顿挫敌锋，以待粟谭主力到达，歼灭余敌。此战关系大局，望集中全力以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各个击破的战法须应用到战术上[1]

（1946年9月13日）

张、罗：

（一）十二日二十二时电悉。三岔口已获胜，集中主力歼灭增援之敌，得手后即可打开战局。（二）务必集中优势兵力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敌人，不可贪多务得，分散兵力，同时打许多敌人。（三）对城[2]内之敌亦必须集中力量先解决一部分，得手后再逐一解决其余部分。（四）各个击破的战法须应用到战术上。

军委

十三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宗逊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指今内蒙古集宁城。

关于刘邓[1]军作战经验的通报

（1946年9月13日）

张、罗[2]，并告聂，贺，陈、宋[3]。

（一）战况如何，甚念。

（二）此次刘邓军五万人打敌第三师两个旅九千人，从三号黄昏打起至六号上午始解决一个旅，引起敌人全线恐慌，另一旅于六号下午突围时，被我以半天时间解决该旅。七号上午四十七师两个旅增援赶到，我又以一天时间解决该两旅。此外尚解决四十一师及七十四旅各一部。[4]这一经验告诉我们：第一，必须集中优于敌人五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张、罗，指张宗逊、罗瑞卿，当时分别任大同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陈、宋，指陈毅、宋时轮，当时分别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1946年8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14个整编师32个旅共30余万人，乘晋冀鲁豫野战军刚刚结束陇海战役之机，由郑州、徐州之线分路进攻鲁西南解放区，企图钳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定陶、曹县地区。9月3日至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定陶县以西大杨湖、大黄集地区分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俘该师中将师长赵锡田。7日，乘胜追歼后撤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师和四十一师等一部。此役称定陶战役，共歼敌1.7万余人。

倍或四倍至少三倍的兵力，首先歼灭敌一个至两个团，振起我军士气，引起敌人恐慌，得手后再歼敌第二部、第三部，各个击破之。切不可贪多务得，分散兵力。此点已屡次电告，不知你们已照此实行否？第二，必须准备打五天至七天，歼灭窜平地泉附近之敌，因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歼敌，又估计敌人是顽强的，故须准备较多时间对付该敌。假如敌人企图西撤，又当别论。

军委

十三日十五时

给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的贺电[1]

（1946年9月13日）

祝你们胜利地参加了人民军队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

---

[1] 这是原杨虎城部组成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时毛泽东发去的贺电的主要内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被蒋介石撤销总部，缩编为第三十八军。该部第十七师和五十五师分别于1945年7月17日和1946年5月15日在洛宁、巩县相继起义，起义后接受晋冀鲁豫军区领导。

要学会集中优势打击一点的战法[1]

（1946年9月14日）

刘、邓：

元电[2]悉。（一）十一师及五师[3]均美械，战力较强，须先用小部及民兵多方阻击，消耗其弹药，疲劳之，迷惑之，然后主力出击各个歼灭。（二）集中优势打击一点（而且是弱点）的战法须使干部切实学会，善于应用到战术上。（三）为使敌人疲劳消耗，为使自己获得充分休整，并确保主动，你们以在二十号以后开始作战为宜，即使敌占东明、菏泽亦所不惜。（四）敌六个旅由泗阳向两淮[4]前进，我陈毅军正部署歼敌。

军委

申寒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1946年9月13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我各部正在休补，大约20号才能开始作战。我们想先打十八军（即整编第十一师）和五军之1个旅。现该两军已占定陶，正向菏泽前进，刘汝明部及川军也已开始小的活动，我正以小部分头阻击，估计可能要在敌占东明、菏泽之后才能打。

[3] 五师，应为国民党军第五军，此时第五军还未整编为整编第五师。

[4]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

（1946年9月16日）

各首长：

关于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2]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

（二）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3]（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我军以少数兵力牵制敌军的其余各旅（或团），使其不能向被我军围击的旅（或团）迅速增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党内指示。

[2] 在本书各篇中所说的“歼灭敌人”或者“消灭敌人”，都是包括把敌人击毙、击伤和俘虏。

[3] 国民党正规军的编制，原来是1个军下辖3个师或2个师，每个师下辖3个团。1946年3月起，国民党分期整编了当时在黄河以南地区的正规军，将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师改编为旅，旅下辖3个团或2个团。在黄河以北地区的军队没有整编，仍按原来编制。1948年9月以后，国民党又将整编师恢复为军，旅改称师。

以利我军首先歼灭这个旅（或团）。得手后，依情况，或者再歼敌军一个旅至几个旅（例如我粟谭军在如皋附近，八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歼敌交通警察部队五千，八月二十六日又歼敌一个旅，八月二十七日又歼敌一个半旅[1]。又如我刘邓军在定陶附近，九月三日至九月六日歼敌一个旅，九月六日下午又歼敌一个旅，九月七日至九月八日又歼敌两个旅[2]；或者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役部署上，必须反对那种轻视敌人、因而平分兵力对付诸路之敌、以致一路也不能歼灭、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的错误的作战方法。

（三）在战术的部署方面，当着我军已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包围敌军诸路中的一路（一个旅或一个团）的时候，我军担任攻击的各兵团（或各部队），不应企图一下子同时全部地歼灭这个被我包围之敌，因而平分兵力，处处攻击，处处不得力，拖延时间，难于奏效。而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即集中六倍、五倍、四倍于敌，至少也是三倍于敌的兵力，并集中全部或大部的炮兵，从敌军诸阵地中，选择较弱的一点（不是两点），猛烈地攻击之，务期必克。得手后，迅速扩张战果，各个歼灭该敌。

---

[1] 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苏皖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奋起自卫。进攻苏中解放区的敌军，是汤恩伯指挥的15个旅，约12万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19个团（后增至20多个团）的兵力，自7月13日至8月31日，在苏中的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连续作战7次，歼敌军6个旅、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本文所提到的是其中3次作战的战果。

[2] 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自徐州、郑州一带，分两路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指挥下，集中优势兵力迎击自郑州出发的一路敌军，自9月3日至9月8日，先后在山东的菏泽、定陶、曹县一带歼灭敌军4个旅共1.7万余人。

（四）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全歼，方能最有效地打击敌军，使敌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速决，则使我军有可能各个歼灭敌军的增援队，也使我军有可能避开敌军的增援队。在战术和战役上的速决，是战略上持久的必要条件。

（五）现在我军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平时，他们赞成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但到临战，则往往不能应用这一原则。这是轻敌的结果，也是没有加强教育和着重研究的结果。必须详举战例，反复说明这种作战方法的好处，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

（六）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是我军从开始建军起十余年以来的优良传统，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但是在抗日时期，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在现在的内战时期，情况改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

（七）在敌处进攻地位、我处防御地位的时候，必须应用这一方法。在敌处防御地位、我处进攻地位的时候，则应分为两种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军兵力多，当地敌军较弱，或者我军出敌不意举行袭击的时候，可以同时攻击若干部分的敌军。例如，六月

五日至六月十日，山东我军同时攻击胶济、津浦两路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1]。又如，八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一日，我刘邓军攻击陇海路汴徐线十几个城镇而占领之[2]。如果我军兵力不足，则应对敌军所占诸城一个一个地夺取之，而不要同时攻击几个城镇的敌人。例如山西我军夺取同蒲路上诸城[3]，就是这样打的。

（八）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候，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地方兵团（或部队）在打敌一团一营一连的时候，也适用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

（九）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原则，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有些时机，为着集中兵力歼击敌军的目的，或使我军主力避免遭受敌军的严重打击以利休整再战的目的，可以允许放弃某些地方。只要我军能够将敌军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此，凡能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不但歼灭敌军的正规部队应当

---

[1] 1946年6月上旬，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所属一部，为了打击国民党收编的在停战令生效后不断向解放区挑衅的伪军，决定在胶济线和津浦线上发动讨逆战役。先后解放胶县、张店、周村、德州、泰安、枣庄、高密、即墨等十余座城镇。

[2]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为了配合中原、华东的人民解放军作战，于1946年8月10日至21日，分数路向驻在陇海路上开封至徐州一线的国民党军出击，先后占领砀山、兰封（今并入兰考）、李庄、杨集等十余座城镇。

[3] 1946年7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阎锡山部联合进犯晋南解放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和晋绥军区所属一部举行反击，击退敌军的进犯；8月，又向驻在同蒲路上临汾至灵石一线的敌军发起攻势，至九月一日战役结束，先后解放洪洞、赵城、霍县、灵石、汾西诸城。

受到奖励；就是歼灭敌军的保安队、还乡队[1]等反动的地方武装，也应当受到奖励。但是，凡在敌我力量对比上能够保守或夺取的地方和在战役上战术上有意义的地方，则必须保守或夺取之，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凡能保守或夺取这些地方者，也应受到奖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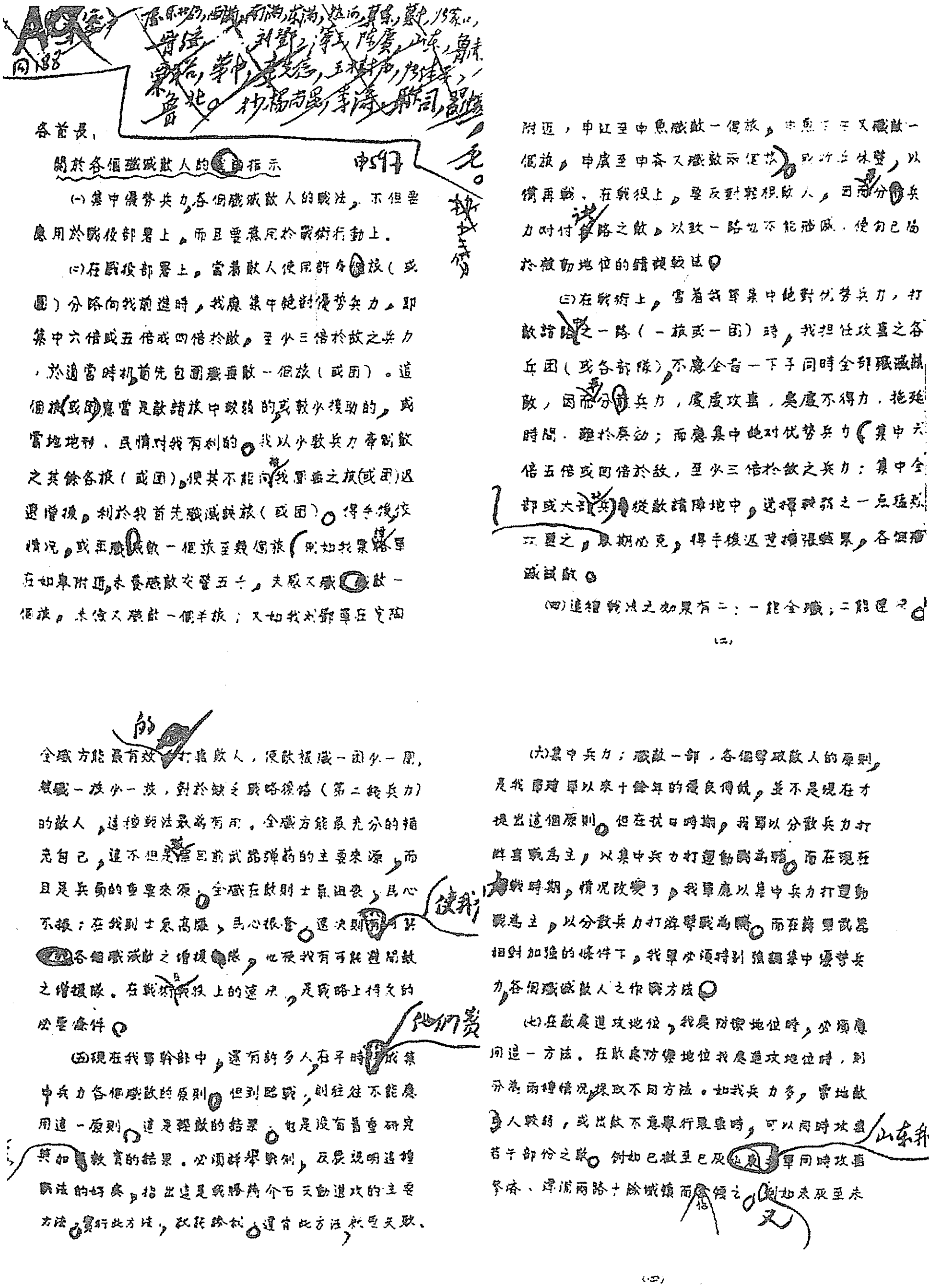
（附注）：此指示发到团级，团以下口头传达。

军委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

---

[1]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些解放区的地主、恶霸逃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把他们组织成为“还乡队”“还乡团”等反动武装，随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这些地主反动武装，到处抢掠屠杀，无恶不作。



各首長，

關於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　申銑

毛。

(一)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法，不但要應用於戰役部署上，而且要應用於戰術行動上。

(二)在戰役部署上，當着敵人使用許多個旅（或團）分路向我前進時，我應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於敵，至少三倍於敵之兵力，於適當時機首先包圍殲擊敵一個旅（或團）。這個旅（或團）應當是敵諸旅中較弱的，或較少援助的，或當地地形、民情對我有利的。我以少數兵力牽制敵之其餘各旅（或團），使其不能向被我軍圍之旅（或團）迅速增援，利於我首先殲滅該旅（或團）。得手後依情況，或再殲敵一個旅至數個旅（例如我粟譚軍在如皋附近，本月殲敵交警五千，未感又殲敵一個旅，未儉又殲敵一個半旅；又如我劉鄧軍在定陶附近，申虞至申魚殲敵一個旅，申魚午至申又殲敵一個旅，申庚至申齊又殲敵兩個旅），或收兵休整，以備再戰。在戰役上，要反對輕視敵人，因而分散兵力對付諸路之敵，以致一路也不能殲滅，使自己陷於被動地位的錯誤戰法。

（二）

(三)在戰術上，當着我軍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敵諸路中之一路（一旅或一團）時，我擔任攻擊之各兵團（或各部隊）不應企圖一下子同時全部殲滅該敵，因而分散兵力，處處攻擊，處處不得力，拖延時間，難於奏效；而應集中絕對優勢兵力（集中六倍五倍或四倍於敵，至少三倍於敵之兵力），集中全部或大部兵炮，從敵諸陣地中，選擇較弱之一點猛烈攻擊之，限期必克，得手後迅速擴張戰果，各個擊滅該敵。

(四)這種戰法之效果有二：一能全殲；二能速決。全殲方能最有效的打擊敵人，使敵被殲一團少一團，被殲一旅少一旅，對於缺乏戰略後備（第二線兵力）的敵人，這種戰法最為有用。全殲方能最充分的補充自己，這不但是我軍目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是兵員的重要來源。全殲在敵則士氣沮喪，民心不振；在我則士氣高漲，民心振奮。速決則使我有可能各個殲滅敵之增援部隊，也使我有可能避開敵之增援部隊。在戰術戰役上的速決，是戰略上持久的必要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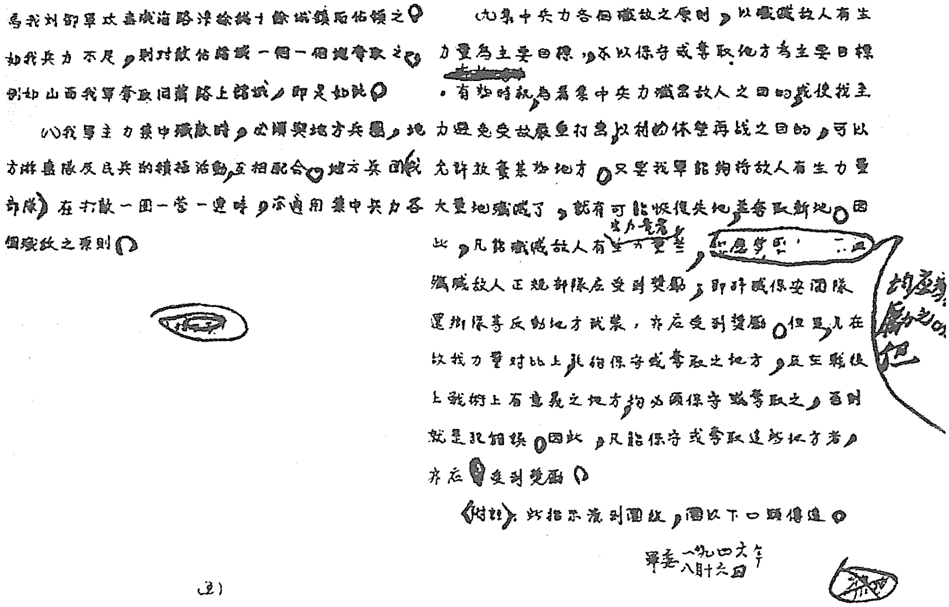
(五)現在我軍幹部中，還有許多人在平時贊成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但到臨戰，則往往不能應用這一原則。這是輕敵的結果，也是沒有着重研究與加強教育的結果。必須詳舉戰例，反覆說明這種戰法的好處，指出這是戰勝蔣介石進攻的主要方法，實行此方法，就能勝利；違背此方法，就要失敗。

(六)集中兵力，殲敵一部，各個擊破敵人的原則，是我軍建軍以來十餘年的優良傳統，並不是現在才提出這個原則。但在抗日時期，我軍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主，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而在現在內戰時期，情況改變了，我軍應以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擊戰為輔。而在蔣軍武器相對加強的條件下，我軍必須特別強調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之作戰方法。

(七)在敵處進攻地位，我處防禦地位時，必須應用這一方法。在敵處防禦地位，我處進攻地位時，則分為兩種情況，採取不同方法。如我兵力多，當地敵人較弱，或出敵不意舉行襲擊時，可以同時攻擊若干部分之敵。例如已微至已灰山東我軍同時攻擊膠濟、津浦兩路十餘城鎮而佔領之。又如本灰至未

（四）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电。



為我刘鄧軍攻擊隴海路汴徐綫十餘城鎮而佔領之。如我兵力不足，則對敵佔城鎮一個一個地奪取之。例如山西我軍奪取同蒲路上諸城，即是如此。

（八）我軍主力集中殲敵時，必須與地方兵團，地方游擊隊及民兵的積極活動互相配合。地方兵團（地方部隊）在打敵一團一營一連時，亦適用集中兵力各個殲敵之原則。

（九）集中兵力各個殲敵之原則，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illegible]~~有些時候，為着集中兵力殲滅敵人之目的，或使我主力避免受敵嚴重打擊以利休整再戰之目的，可以允許放棄某些地方。只要我軍能夠將敵人有生力量大量地殲滅了，就有可能恢復失地，並奪取新地。因此，凡能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生力量者，[illegible]殲滅敵人正規部隊應受到獎勵，即殲滅保安團隊還鄉團等反動地方武裝，亦應受到獎勵。但是凡在敵我力量對比上能夠保守或奪取之地方，及在戰役上戰術上有意義之地方，均必須保守或奪取之，否則就是犯錯誤。因此，凡能保守或奪取這些地方者，亦應受到獎勵。

均應[illegible]獎勵之

（附註）此指示發到團級，團以下口頭傳達。

軍委 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

（3）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电。

致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1]

（1946年9月16日）

四分区反顽战斗迭获胜利，甚好甚慰，望传令嘉奖。望将陕南、豫西建立根据地的经验经常通知王、刘、罗、文及张体学[2]，鼓励他们学习照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电的主要内容。

[2] 王、刘、罗、文，指王树声、刘子久、罗厚福、文敏生。张体学，当时任鄂东独立第二旅政治委员，中原军区突围后，率部在鄂东坚持斗争。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 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1]

（1946年9月18日）

聂、萧、刘、罗：

（一）十六日十八时、十七日十四时两电[2]均悉。（二）我们同意你们十六日十八时电之精神，除各方布置外，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

---

[1] 大同集宁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计划集中第十一、十二战区主力对张家口东西夹击。1946年9月17日，晋察冀军区首长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主动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电报。

[2] 指1946年9月16日18时和17日14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和罗瑞卿分别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前电说：我在集宁附近歼傅作义部约5000余而未消灭其主力，集宁14日失守威胁大同攻城，故决心撤除对大同之围攻。根据平绥线将处于敌之严重进攻的情况，我已集结主力准备打击进攻之敌，保卫察哈尔。为配合主力保卫察哈尔，热河我军应牵制热河敌人，冀东应适时向平蓟以东活动，原定进行平汉战役之5个旅及各地武装应即准备对平汉线进击，冀中东部及十分区则在敌后破坏平津间之北宁路。后电说：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三）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1]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四）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胡宗南[2]以其精锐八个旅（整编旅）入晋，我陈赓纵队只有三个旅，第一仗即歼敌一个旅[3]，现又准备再歼一个旅。胡军自被我歼灭一个旅后，即畏惧不敢冒进。希望你们聚精会神，充分准备，寻找良机歼敌一两个团。打第一个胜仗，即能振奋军心民心，打出威风。（五）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这种准备和积极布置歼敌计划并不矛盾。（六）晋绥部队担任钳制傅作义[4]，冀中、冀晋担任破坏平汉路，热河[5]、冀东担任钳制敌后尾。

军委
申巧

---

[1] 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西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1946年7月13日至22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山西闻（喜）夏（县）战役中，获得首战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的胜利。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致王树声、刘昌义等电[1]

（1946年9月19日）

（一）占领草店[2]歼敌一个营，甚慰，望传令嘉奖。（二）望鼓励各部多打此类胜仗，每次歼灭保安团一营一团，正规军一连一排，就能振奋军心民心，解决衣粮，建立根据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王树声、刘昌义、罗厚福、刘子久、文敏生电的主要内容。

[2] 草店，湖北省均县县城以南的一个镇。

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1]

（1946年9月20日）

陈，粟、谭，并告张、邓[2]：

我放弃淮阴后各部主力撤至距敌较远地区休整，以一部扰击敌人，待一、六师[3]到达之后，待敌分散有机可乘之时，各个歼灭敌人。依据苏中经验，敌分散占领我区利于我各个歼敌，人民亦可从战争中获得锻炼，惟军事工业须迁往安全地点。

军委

申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1946年9月19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乘山东野战军主力位于渔沟、来安地区和华中野战军主力正自海安地区北上，尚未赶到淮阴之际占领淮阴。

[2] 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华中野战军第一师和第六师。

给陈瑾昆[1]的信

（1946年9月22日）

陈瑾昆先生：

今日阅悉尊著《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义正词严，足以壮斗士之志，夺奸邪之魄，拟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全国。蒋军正大举进攻张垣[2]，拟请先生来延安共策工作之进行，如何，盼复。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1] 陈瑾昆（1887—1959），湖南常德人，法学家。1946年从北平（今北京）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2] 张垣，即张家口。

1946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给续范亭[1]的信

（1946年9月22日）

范亭兄：

近日集宁、淮阴、菏泽失了，张家口大概也会失去，将来还会要丧失一些地方。但是今日看了六十老人陈瑾昆[2]教授所作《余为何参加中共工作》一文，觉得所得大于所失。陈先生已到张家口，据说决心参加我们的工作。陈文不日当在报上发表。听说你的病好些，不胜欣慰。我比去冬好得多，仍在半休养中，知注敬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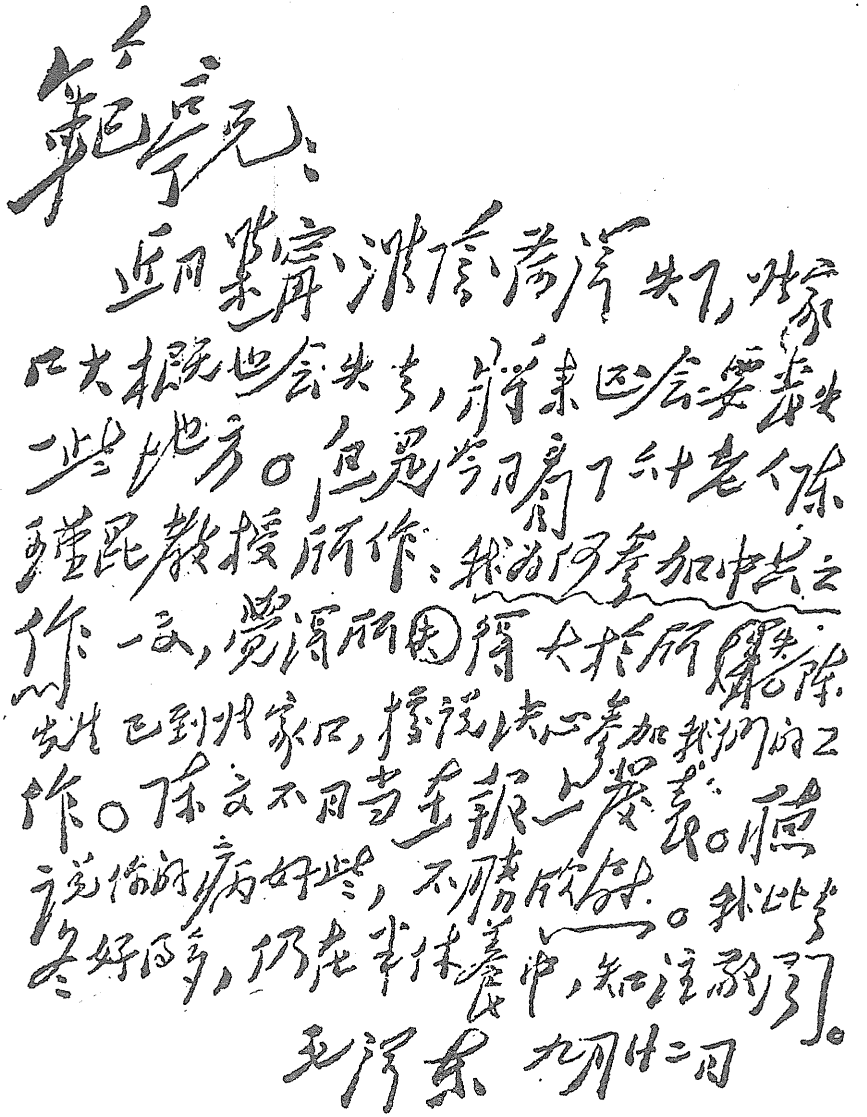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

[1]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2] 陈瑾昆（1887—1959），湖南常德人，法学家。1946年从北平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



范亭兄：

近日集宁、淮阴、承德失了，张家口大概也会失去，将来还会要失去一些地方。但是今日看了六十老人陈瑾昆教授所作：我为何参加中共之工作一文，觉得所得大于所失。陈先生已到张家口，据说决心参加我们的工作。陈文不日当在报上发表。听说你的病好些，不胜欣慰。我比去年好得多，仍在半休养中，知注敬闻。

毛泽东　九月廿二日

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手稿。

致陈毅等电[1]

（1949年9月22日）

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最大兵力攻击一点逐一歼灭敌人[1]

（1946年9月23日）

聂、刘，并萧、罗：

（一）二十二电悉，布置甚妥。（二）昨（二十二日）中央社广播三路攻张垣[2]似欲吓我撤退，以便照承德样不战而得张垣，因敌只有六个旅（师）不过三万人左右。（三）作战时注意第一仗只包围一至两个团，集中最大兵力及全部炮兵攻击一点（切勿同时攻击两点以上），得手后扩张战果逐一歼灭之。第一仗胜利后依情况再决定新行动。（四）先以一部阻敌，使其疲劳消耗，引其进入有利于我之地点，然后歼击之。（五）提倡猛打猛冲猛追，以期必胜。

军委
二十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并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萧克和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致陈毅等电[1]

（1946年9月23日）

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陈毅等电的主要内容。

只要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就能打破敌人进攻[1]

（1946年9月25日）

聂、刘，并转萧、罗[2]，并告程、李，詹、毕[3]：

我陈赓纵队[4]申漾已将胡宗南[5]之第一旅全部歼灭，其一六七旅亦伤亡惨重，其一部正被我围歼中，胡军侵占之浮山城已被我收复。查我陈赓纵队仅三个旅，七月间歼灭胡军一个旅后，胡军停止于绛县以南不敢冒进。八月我陈纵队北上攻取洪、赵、霍、灵[6]及汾西五城，此时胡军乘机占我垣曲、曲沃、浮山等地，故陈纵此次回师再歼胡军主力（第一旅及一六七旅均老一军）。由此可见，只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等的电报。

[2] 萧、罗，指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程、李，指程子华、李运昌，当时分别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詹、毕，指詹才芳、毕占云，当时分别任冀东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4] 陈赓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陈赓。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 洪、赵，指洪洞、赵城，均旧县名，1954年合并为山西洪赵县，1958年改为山西洪洞县。霍、灵，指山西霍县和灵石。

指挥上既灵活又勇敢，敌人进攻是能够打破的。望通知全军鼓励士气。

军委
申有

望早日执行攻取金乡鱼台单县计划[1]

（1946年9月26日）

刘、邓：

有辰电[2]悉。（一）攻取金、鱼、单等城，调动五军及十一师，歼其一部，计划甚好，望早日执行。顾祝同[3]养令五军及十一师另有任务，即将转用，限五日内准备完毕，待命行动等语。究竟另有何种任务，即将转用于何处，尚不明了。你们攻取金、鱼、单等城威胁徐州，可以破坏顾祝同计划，迫使该两部向西增援而各个击灭之，对淮海区我军亦是有力援助。（二）山野华野两军会合[4]，陈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定陶战役后，国民党军继续向冀鲁豫解放区进攻，其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分别沿菏（泽）济（宁）公路和洙水河南岸东进。1946年10月3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实施反击，发起巨野战役，经4天激战，歼敌5000余人。

[2] 指1946年9月25日辰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陈毅、张云逸、黎玉、薄一波和王新亭的电报。电报说，我拟于1星期内攻夺金乡、鱼台、单县等城，消灭敌第十八旅及整编第八十八师各1个团及一部土顽，以调动敌第五军及整编第十一师于野战中而歼灭其一部。

[3]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4] 山东、华中两个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6年9月23日的指示会合在一起进行作战。正式合编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治委员，是在1947年1月下旬。

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统一指挥，十月初可以开始新的作战行动，与你们新的行动正可配合（但彼此都不要依赖配合）。

军委

二十六亥

致粟裕、谭震林电[1]

（1946年9月26日）

山野、华野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叶剑英等电[1]

（1946年9月26日）

不管淮阴、菏泽、集宁甚至其他某些要地已被或将被敌占，我野战歼灭敌四五十个旅是完全可能的（七月至今已歼二十旅）。只要此目的达到，局面即将改观。蒋之后备已用尽，歼一旅即少一旅。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及地方武装在浮山城附近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周恩来、叶剑英及林彪、李富春电的主要内容。

晋察冀区应为歼敌八个旅而斗争[1]

（1946年9月27日）

中央局（转萧、罗[2]），分局，冀东区党委：

你区除阎傅[3]外，蒋军正规部队共为二十四个旅（师），你们首先应为歼敌三分之一即八个旅而斗争。如你们能在几个月内歼敌八个旅，则蒋军地位即被削弱，其进攻能力必大减少。最近期内热河冀东两区的斗争于我有利，歼敌一营一连之作战已有多次。此次平绥作战，必须力争打几个胜仗，每次歼敌一团一旅，如能在几次作战中共歼敌二三个旅，此次进攻即可粉碎。热河冀东两区应积极行动多打胜仗援助平绥。以上是总的战略意图。具体作战，望按情况处理。

中央
申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冀热辽分局和冀东区党委的电报。

[2] 萧、罗，指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接见南下支队时的讲话[1]

（1946年9月27日）

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敢顽强，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返回延安，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二次长征。你们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是光荣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也可以说是从战争这所大学里毕业出来的优秀大学生。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胜利返回延安的南下支队时讲话的一部分。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三五九旅在中原军区指挥下突围，于9月27日回到延安。图为三五九旅指战员一路长途跋涉回到延安。

1946年，毛泽东和中原突围回到延安的三五九旅干部合影。

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1]

（1946年9月28日）

陈：

两军[2]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我们意见：（一）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二）不要分兵打两个敌人，必须集中打一个敌人。你们部署如何盼告。

军委
申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指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等电[1]

（1946年9月28日）

一切按照今年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解决问题。如国、美进行和平攻势，我们即提出双方退至一月十三日前的位置。这包括：（一）退出侵占地；（二）一月十三以后调动至长江以北的一切军队均须复员。这样咬住停战令与政协，便可击败一切无理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

——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

（1946年9月29日）

斯蒂尔问：阁下是否认为美国调解中国内战之举已告失败？如美国政策按目前形式继续实行，则结局将如何？

毛泽东答：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1]。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

---

[1]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名，从各方面加强美国侵略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地位。蒋介石为着争取时间布置内战，在表面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的要求。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并组成了有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进行所谓“调处”的时期内，美方首先在东北，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大量的军火和其他作战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200万人）的80%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其中有54万多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即于6月下旬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一政策继续实行下去，必将激起全中国一切爱国人民起来作坚决的反抗。

问：中国内战将延长多久？其结果将如何？

答：如果美国政府放弃现行援蒋政策，撤退驻华美军，实行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的协定[1]，则中国内战必能早日结束。如果不是这样，就有变为长期战争的可能。其结果，一方面，当然是中国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必将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的命运。不管怎样艰难困苦，中国人民的独立、和平、民主的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任何本国和外国的压迫力量，不可能阻止这一任务的实现。

问：阁下是否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当然领袖”？共产党是否将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接受蒋介石的五项要求[2]？如果国民党企

---

[1] 指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在莫斯科会议公报中，三国外长重申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苏美外长并一致同意苏美两国军队尽早撤离中国。苏联忠实地履行了这个协议。只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一再请求，苏联军队才推迟了撤军的时间。1946年5月3日，苏军即全部从中国东北境内撤出。但美国政府却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拒不撤走自己的军队，并且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内政。

[2]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曾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些无理要求。同年8月，蒋介石又提出五项要求，要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下列各地：一、陇海路以南的一切地区；二、胶济线全线；三、承德和承德以南的地区；四、东北的大部分；五、1946年6月7日以后解放区人民武装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蒋介石还声称只有中共方面承认了这些要求，才能考虑停止内战。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拒绝了这些无理的要求。

图召集一个无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1]，则共产党将采取何种行动？

答：世界上无所谓“当然领袖”。蒋介石如能按照今年一月间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决议处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而不是按照所谓“五项”或十项违反上述协定和决议的片面要求，那末，我们是仍然愿意和他共事的。国民大会只应当按照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由各党派共同负责去召集，否则我们将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

---

[1] 按照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和会议中协商的精神，国民大会应该是各党派参加的民主的团结的大会，必须在政协各项协议付诸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之下才能召开。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在同年6月下旬发动全国性内战，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蒋介石被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即于当日下令召开国民大会。11月15日至12月25日这个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除青年党、民社党及极少数“社会贤达”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拒绝参加并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等电[1]

（1946年9月29日）

请向国、美提备忘录，如彼方攻张家口，即是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之，并公布备忘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中共驻北平军调部代表电的主要内容。30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国民党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即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国民党方面负责。

须准备连续打几个大仗[1]

（1946年9月30日）

聂、刘、萧、罗：

（一）傅作义[2]不可能出很多兵向东，且有我张宗逊陈正湘[3]两部钳制，东面李文[4]两师五个旅集中与进攻都很缓慢，兵力不多。平绥线[5]是我巩固区域，我集中全力配合民兵各个歼敌，可以粉碎敌之进攻。（二）为此目的，你们须准备连续打几个大仗，杨成武纵队[6]最好不要分散，并须准备新兵补充伤亡，发动劳军，鼓励士气。

军委

申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3] 张宗逊，当时任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正湘，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4] 李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5]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6] 杨成武纵队，指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纵队司令员杨成武。

给符定一[1]的信

（1946年9月30日）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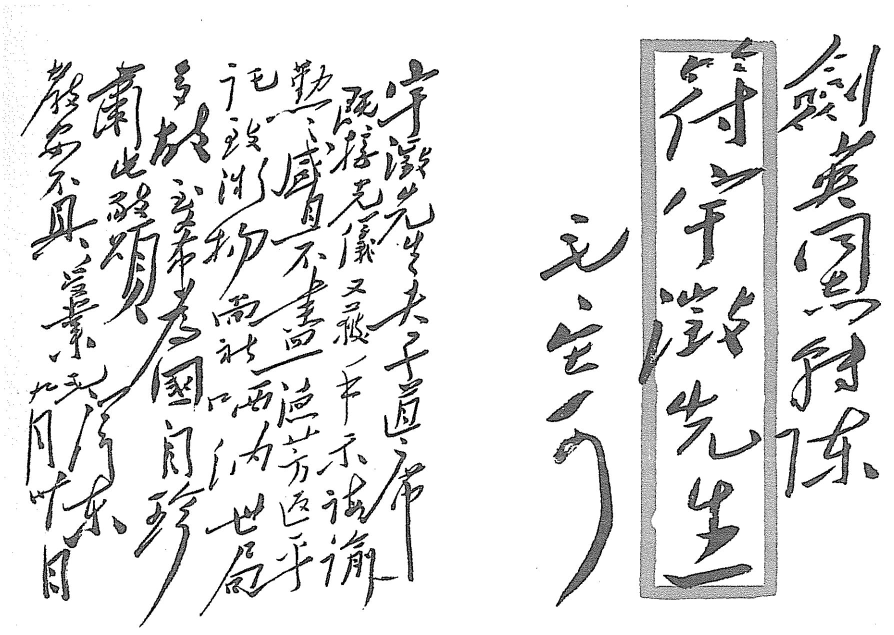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2]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受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

[1] 符定一（1877—1958），字宇澄，湖南衡山人，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任校长时，毛泽东在那里读过书。1946年夏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过延安。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德芳，符定一之女。1946年夏随符定一去延安。不久，符定一先回北京。稍后，她回北京时带了毛泽东给符定一的这封信。



剑英同志转陈
符宇澂先生
毛泽东

宇澂先生夫子道席：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廿日

毛泽东致符定一信的手稿。

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电[1]

（1946年9月30日）

你们须力争于三个月内外歼灭薛岳七个至十个旅，刘、邓则担任歼灭五军及十一师，总之，今后一时期内主要打击薛岳，转换战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致冯白驹、黄康、李振亚电[1]

（1946年9月30日）

祝贺你们粉碎国民党进攻的胜利。希望全党全军团结一致，为消灭敌人扩大解放区而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冯白驹、黄康、李振亚电的主要内容。冯白驹、黄康、李振亚，当时分别任琼崖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参谋长。

三个月总结[1]

（1946年10月1日）

（一）七月二十日中央对时局的指示[2]上说："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七、八、九三个月的作战，业已证明此项断语是正确的。

（二）除了政治上经济上的基本矛盾，蒋介石无法克服，为我必胜蒋必败的基本原因之外，在军事上，蒋军战线太广与其兵力不足之间，业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此种矛盾，必然要成为我胜蒋败的直接原因。

（三）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蒋军，除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不计外，共计一百九十几个旅。此数以外，至多再从南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难再调。而此一百九十几个旅中，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二十五个旅。今年二月至六月被我军在东北所歼灭者，尚未计算在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详细地总结了1946年7月全国规模内战爆发以来的3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作战任务，指出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克服一个时期的困难以后必然能够取得胜利。对于支持和配合人民解放战争所需要解决的解放区内部的土地改革问题，发展解放区的生产问题，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斗争的领导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这个文件作了原则的说明。

[2] 即《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四）蒋军一百九十几个旅中，须以差不多半数任守备，能任野战者不过半数多一点。而这些任野战的兵力进到一定地区，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备。敌人的野战军，一方面，不断地被我歼灭，另方面，大量地担任守备，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五）三个月被我歼灭的二十五个旅中，计汤恩伯（原为李默庵）七个旅，薛岳两个旅，顾祝同（原为刘峙）七个旅，胡宗南两个旅，阎锡山四个旅，王耀武两个旅，杜聿明一个旅。除李宗仁、傅作义、马鸿逵、程潜四部，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之外，其余七部，或者受到我军相当严重的打击，或者受了初步的打击。受我严重打击者，有杜聿明（包括今年二月至六月在东北的作战）、汤恩伯、顾祝同、阎锡山。受我初步打击者，有薛岳、胡宗南、王耀武。所有这些，都证明我军能够战胜蒋介石。

（六）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约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复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扩大解放区。那时国共军力对比，必起重大变化。欲达此目的，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成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1]。

---

[1] 后来情况证明，开始转变敌我形势是在1947年6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的时候。这时人民解放军作战已12个月，平均每月歼灭国民党军8个旅，共已歼灭敌军约100个旅，比较这里估计的数目要多些。这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使用其一切可能的力量来进攻的缘故。

（七）过去三个月内，我们损失淮阴、菏泽、承德、集宁等几十个中小城市。其中多数是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和应当主动地暂时放弃的；一部分是仗打得不好被迫放弃的。不管怎样，只要今后仗打得好，失地即可收复。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地方，在不得已时被敌占去，但是将来均可收复。各地应检讨过去作战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八）过去三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1]。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并将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九）过去三个月战争，吸引了蒋介石原拟调赴东北的几支有力部队于关内，使我们在东北得到休整军队、发动群众的时间，这对将来斗争也有重大的意义。

（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时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六倍、五倍、四倍、至少三倍于敌，方能有效地歼敌。不论在战役上，战

---

[1] 1946年6月底，李先念、郑位三等领导的中原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队30万人的包围进攻下开始主动地作战略转移，胜利地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毛泽东这里所说的转入老解放区的一部，是指突围后转入陕甘宁边区的由王震等所领导的部队。另有一部，由皮定钧等领导转入苏皖解放区。在陕南创造的游击根据地，是指由李先念、郑位三率领一部主力突围到达陕南后，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在卢氏、洛南、灵宝、潼关、华阴等地创建的豫鄂陕游击根据地。在鄂西创造的游击根据地，是指由王树声率领的另一部主力突围后进入武当山区，创建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游击根据地。还有一部分散在大别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术上，都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十一）过去三个月内，我军不但歼灭敌正规军二十五个旅，又歼灭伪军、保安队、交通警察部队等反动军队为数不少，这也是一个大成绩。今后仍应大量地歼灭此类军队。

（十二）过去三个月经验证明：歼灭敌军一万人，自己须付出二千至三千人的伤亡作代价。这是不可避免的。为应付长期战争（各地应处处从长期战争着眼），今后必须有计划地扩兵，保证主力军经常满员，并大量训练军事干部。必须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遵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项原则，坚决地实施之。

（十三）三个月经验证明：在一月至六月休战期间，凡依照中央指示加紧进行了军事训练的军队（中央曾反复指示各地应以练兵、生产和土地改革等三项工作为中心任务），其作战效能就高些，否则效能就低得很多。今后各区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一切军队必须加强政治工作。

（十四）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决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1]，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

---

[1] 即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日本投降以后，中共中央根据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决定改变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五四指示》的制定就是表现这种改变。

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

（十五）三个月经验证明：凡民兵、游击队、武装工作队等地方武装组织得好的地方，虽然被敌人暂时占领许多的点线，我们仍能控制广大的乡村。凡地方武装薄弱和领导不好的地方，就给敌人以很大的便利。今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在暂时被敌占领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保护群众利益，打击反动派活动。

（十六）三个月战争，使国民党的后备力量快要用完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力量大为减弱了。同时，国民党恢复征兵征实[1]，引起人民不满，利于群众斗争的发展。全党必须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

（十七）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指使下，破坏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都是骗人的，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

（十八）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已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已引起各国广大人民日益不满。各国人民的觉悟程度日益提高。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民主斗争日益高涨，各国共产党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反动派想要压服它们是不可能的。苏联的国力及其在各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高涨。

---

[1] 征实，指田赋征收实物（粮食）。

美国反动派和被美国反动派所扶助的各国反动派，必然日益陷于孤立。这些就是极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凡此国内国际形势，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大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力量是极大地发展了。不管中外反动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各地领导同志，应当向党内一部分同志，即对于国内国际有利形势认识不足、因而对于斗争前途怀抱悲观情绪的人们，作充分的解释。必须明白，敌人还有力量，我们自己也还有弱点，斗争的性质依然是长期的，残酷的。但是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此项认识和信心，必须在全党巩固地建立起来。

（十九）今后数月是一个重要而困难的时期，必须实行全党紧张的动员和精心计划的作战，从根本上转变军事形势。各地必须依照上述各项方针坚决实施，力争军事形势的根本转变。

致聂荣臻、刘澜涛等电[1]

（1946年10月1日）

庆祝杨成武、王平[2]所率各部在平汉线上之大胜利望传令嘉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2] 9月29日至10月3日，杨成武、王平（冀晋军区政治委员）率晋察冀野战军一个旅和晋察冀军区各独立旅在平汉路北段发起大规模破击战，歼敌8000余人，控制铁路120余公里，策应了平绥路东段的作战。

全力歼灭薛岳十个旅左右以转换战局[1]

（1946年10月3日）

陈，并告张、邓、粟[2]：

（一）酉东电[3]悉。部署甚好,望坚决执行。（二）目前你处与刘邓[4]之任务是集中全力歼灭薛岳[5]十个旅左右，即能转换战局。（三）刘邓现正对邱胡[6]两部举行歼击，如得手，薛岳威势必将减煞。希望你们在淮海方面打几个好胜仗。

中央
酉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张、邓、粟，指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3] 指1946年10月1日陈毅给中共中央等的电报。电报说：集中山野、华野主力于宿迁、沭阳之间六塘河以北地区，10月5日前后可集中完毕，如敌东进即歼敌于运河东岸，敌如不进即西渡运河恢复淮北，此部署着重点是集中主力出击并确保和坚持华中地区。

[4]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6]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胡，指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10月3日）

你们是否已发动对邱、胡[2]的歼灭战？歼灭该敌目前正是时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2]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胡，指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10月4日）

周恩来自上海返南京后，须将过去无条件停战口气改变为恢复一月十三日地区与军队原状，以保证停战后不再破坏。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皆不能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致冀察热辽分局并晋察冀中央局电[1]

（1946年10月4日）

你们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土地问题与多打胜仗两项。这两项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冀察热辽分局并晋察冀中央局电的部分内容。

致萧克、罗瑞卿等电[1]

（1946年10月5日）

你们已歼敌一个团，取得初步胜利，望令各部坚持各个击破原则，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每次歼敌一个团，至多不要超过两个团，分为多次，歼灭十六军全部或大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萧克、罗瑞卿并告聂荣臻、刘澜涛电的主要内容。

致聂荣臻等电[1]

（1946年10月6日）

如敌十六军转入固守不利于我军继续攻击，即应撤回休整补充新兵，准备再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等电的主要内容。

复民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电

（1946年10月8日）

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霹雳分部盟员大会主席王廷俊先生钧鉴：

九月二十日代电敬悉，贵盟痛恶内战，呼吁和平，所提甚为切中时弊，敝党自日寇投降之后，即以和平民主与独立为奋斗之目标，但国民党好战分子恃有美政府外援，坚持独裁，坚持内战，破坏政协决议、整军方案与停战协定。数月以来，以无理要求作为商谈条件，以掩蔽其进行扩大内战之烟幕，发展至目前，已到最严重阶段。解决的关键为使一月政协决议切实付诸实施，希海外侨胞诸贤达，再接再厉，为祖国之和平民主独立而努力，敝党亦当本此方针奋斗到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十月八日

致聂荣臻电[1]

（1946年10月8日）

（一）闻傅作义一部窜至张北，必须立即击灭，巩固后方；（二）傅作义还可能以一部东进，你们必须准备击退该敌；（三）请考虑将平汉方面杨成武一个旅调回平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应于第二线第三线做好作战准备[1]

（1946年10月9日）

聂、刘、萧、罗：

（一）萧罗决心以主力打九十四军向镇边城樊山堡[2]前进之部队（据北平讯有两个师，缺一个团及一个营），甚对。（二）必须准备于怀来、镇边城、延庆之线作战一时期之后（即使取得几次胜利），我仍须退至第二线，方利继续歼敌。你们目前即应于第二线第三线有所准备，以免临时仓卒措手不及。你们准备情形如何盼告。（三）必须准备大批新兵补充前线主力兵团，使其能连续作战。

军委

酉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张家口保卫战期间，由平绥路东线进攻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于1946年10月7日由北平附近西调，企图经马刨泉、横岭迂回怀来。针对这一敌情，晋察冀野战军决定转移兵力，设伏歼灭该军第四十三师。

[2] 镇边城，村名，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樊山堡，一称矾山堡，即今矾山，镇名，位于河北涿鹿县东南。

请刘邓考虑以主力袭击敌后空虚地带[1]

（1946年10月9日）

刘、邓：

齐酉电[2]悉。休息数日后，请考虑以主力出至敌后空虚地带，收复各薄弱据点，占领敌交通线，以调动邱胡[3]，各个击破。

军委

酉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1946年10月8日酉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及陈毅、张云逸、黎玉、薄一波、王宏坤的电报。电报说：（一）张凤集战斗将敌第十一旅第四十二团大部消灭，其团长率数百人，在两营援兵和飞机掩护下突围。（二）由于敌已缩为一团，全师仅据守少数村庄，构成坚强工事，不好下手，故决停止进攻，寻求有利条件另行机动。

[3]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胡，指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关于目前战局及谈判问题[1]

（1946年10月10日）

周、董，并告叶[2]：

酉庚沪电悉。（一）家康[3]发言很好。（二）现时一切所为均在为分裂时责在彼而不在我，所见甚是。（三）蒋军一般能守，但攻击精神很差，这是反映官兵矛盾，士兵及下级战意不高。怀来正面十六军被我歼灭一个团又一个营后，其攻势即顿挫。现一方面以九十四军之两个师（缺一个团又一个营）从门头沟向怀来以南，一方面从延庆方向抽出五十三军两个师中之一个师加入怀来正面，又一方面从东北抽调一个旅正向昌平集中，准备第二次进攻。此外，十三军攻围场向沽源，傅作义[4]一部进张北。蒋[5]提十天休战，全是便于调兵，并使我在十天内不能还击。（四）各地蒋军进攻快要达顶点，过此以后他便无力再进，我即可以寻找弱点，逐一歼灭其有生力量，逐渐转入反攻，收复失地（目前短期内还将失去几个地方），此种可能性现已明白显露出来。（五）午未申三个月共歼蒋正规军二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驻上海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的电报。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

[3] 家康，即陈家康，当时任中共中央南京局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共驻上海办事处新闻发言人。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5] 蒋，指蒋介石。

五个旅（包括阎锡山[1]），今后三四个月内应为再歼二十五个旅而奋斗。（六）目前谈判与军事无联系，不发生配合问题。你们只把握教育群众，表明分裂责不在我一点便好，对美蒋欺骗取坚决揭露方针，对马司[2]退出调停之表示不要表示挽留之意，再过一时期我即应考虑退出执行部[3]（似以冬季过后提出为宜，因双方在东北冬季均无意大打，执行部在东北还有些作用）。（七）东北目前继续休战一时期是蒋方需要调一部兵力攻热河[4]（七十一军一个师）及平绥[5]（快速部队及一个旅）。我方现发动报复作战，攻克西丰，并拟再打几仗，但在东北全局上，大体仍应保持平静。但这些对外均不要提及。

甲乙
酉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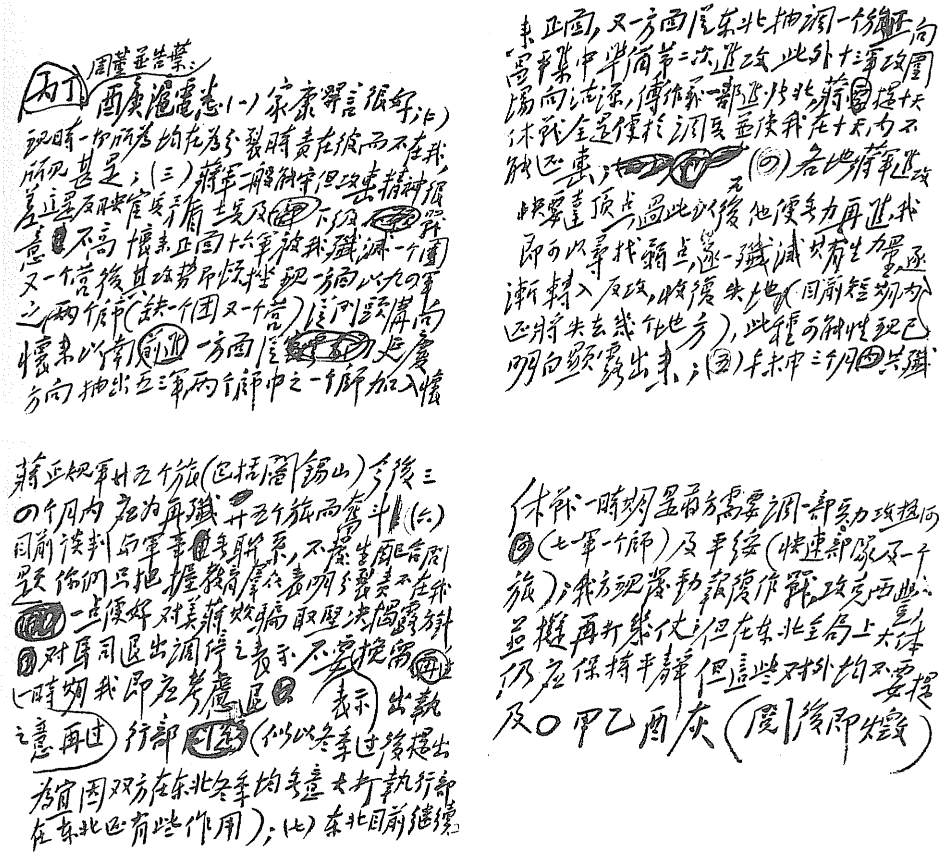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2] 马，指马歇尔。司，指司徒雷登，1946年7月11日起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3] 执行部，即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4]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战局及谈判问题》的手稿。

致聂荣臻、刘澜涛电[1]

（1946年10月10日）

进攻张家口任务，蒋已交给傅作义。你们必须严防傅部于数日内进攻张垣，你们必须数日内布置好巩固张垣之防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刘澜涛电的主要内容。

致聂荣臻、刘澜涛电[1]

（1946年10月10日）

你们应先在张家口设立坚固碉堡及防线，派兵固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刘澜涛电的主要内容。

张家口失陷后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方针

（1946年10月12日）

聂、刘、萧、罗[1]，张宗逊[2]，并转各纵队、各军区首长：

张垣失守[3]后，傅作义部已极端分散，利于我各个歼灭。但目前我仍应以一部在张垣附近钳制傅军，我主力仍在东面原地依原计划歼敌，以期彻底击破东面之敌。我对十六军已给了一个相当严重之打击，如这两天对九十四军又能给以根本打击，则今后只须对五十三军以一二个打击及对十六军再给一二个打击，便可彻底粉碎东面敌人之进攻。然后我军加以休整即可向西打傅。在几个月内完全可能打破东西两面之敌。目前你区敌人进攻，无论傅作义、李宗仁均已达到顶点，其后备已经用尽，我们方面一城一地之得失无关大局，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望本此方针鼓励士气，团结全党，完成中央给你们的神圣任务。

中央
酉文

---

[1] 聂、刘、萧、罗，指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张宗逊，当时任晋绥野战军副司令员。

[3] 张垣，即张家口，1946年10月11日被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占领。

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以开展局面[1]

（1946年10月13日）

陈、张、邓、粟、谭：

各电均悉。你们仍照过去决定集中山野、华野全军（包括八师）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开展局面，对淮海本身，对鲁南，对苏中，对配合刘邓[2]均好，对将来出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几个月之后）亦有利。在此方针下，八师亦暂时不回鲁南。

中央

酉元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选送学生学习坦克问题[1]

（1946年10月13日）

华东局，并告东北局：

前已通知在山东挑选学生六百送大连学习坦克，未见复电，不知是否着手挑选。机会难得，望指定专人负责秘密挑选此项学生。必须年青强壮，是党员或可靠同情分子，对外须守秘密。一经选就，即开赴大连。如何进行望告。

中央
酉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告东北局的电报。

集中山野华野全力歼灭东进之敌

（1946年10月15日）

陈、张、邓、曾[1]，并告粟、谭[2]：

删子电[3]悉。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南京息，蒋[4]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5]，于二至三个月内务歼薛岳[6]七至十个旅，就一定能转变局势，收复两淮，并准备将来向中原出动。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组织部部长。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陈毅、张鼎丞、邓子恢1946年10月15日子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商讨共同认为宜速出击淮北。李延年正布置北攻沭阳。已令粟裕率一、六两师北回沭阳集结，可能打几个好仗。如敌东进快，而华东野战军来不及北返时，则就地相机打击敌侧背。山东野战军拟选蒋军之一路，从1个团到2个团着手，亦可能打一二个胜仗，故回鲁南的打算已暂缓。

[4] 蒋，指蒋介石。

[5] 运西，指运河以西的淮北地区。

[6]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鲁南方面由叶[1]纵及各警备旅监视该敌，必要时可考虑将滨海警备旅派去。只要淮北胜利，鲁南之敌决不敢深入临沂。总之，转变局势主要依靠你军与刘邓[2]军，而其关键是歼灭薛岳十至十五个旅（你们担任歼灭七至十个旅，刘邓担任歼灭三至五个旅），只要不再犯错误，此项目的是能实现的。

中央

酉删亥

---

[1] 叶，指叶飞，当时任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致陈毅电[1]

（1946年10月17日）

此战关系极大，不宜打得过早，望诱敌深入沭阳附近，然后集山、华，全力聚歼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军占领淮阴后向苏北解放区沭阳、涟水东进情况，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6年10月19日）

同意将华中八分区与冀鲁豫六分区合组一个军区，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为司令员，属太行局领导，以利斗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华中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给任弼时[1]的信

（1946年10月20日）

弼时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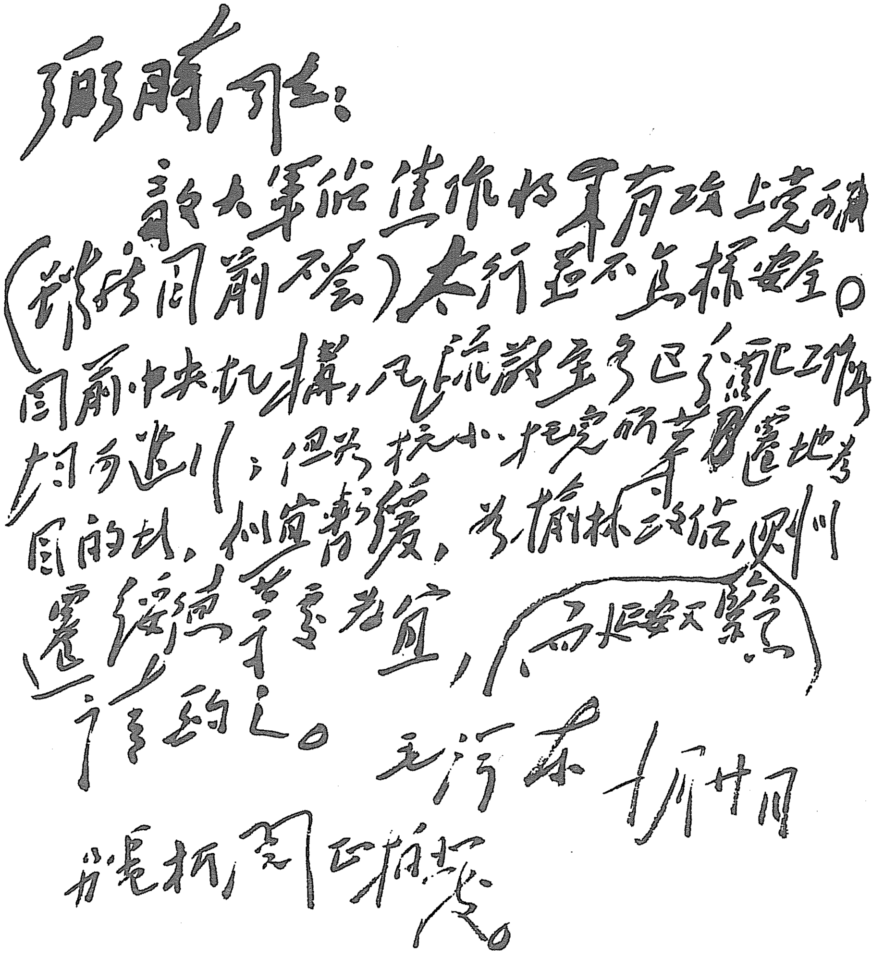
敌大军占焦作，将来有攻上党可能（虽然目前不会），太行并不怎样安全。目前中央机构，凡疏散至各区分配工作者均可进行；但如抗小、托儿所等以迁地为目的者，似宜暂缓，如榆林攻占，而延安又紧急，则以迁绥德等处为宜。请酌之。

毛泽东
十月二十日

另电祈阅正拍发。

---

[1] 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唐家桥（今属汨罗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弼时同志：

敌大军从焦作北来有攻上党可能（邯郸目前不会），太行区不甚安全。目前中央机构，凡能疏散至各区分配工作者均可迁入；但为数较小、性质所不宜迁地者目前的，似宜暂缓。若榆林战役胜利，则迁绥德米脂为宜，而延安又紧缩，请酌之。

毛泽东　十月廿日

并[illegible]，[illegible]。

毛泽东致任弼时信的手稿。

致东北局电[1]

（1946年10月22日）

国民党和平攻势完全是欺骗，关内战争不会停止，必能使蒋军不易开东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采取围城打援办法歼敌有生力量

（1946年10月24日）

詹、李、王[1]，并告程、李[2]：

你们作战方针应着重歼灭敌有生力量，然后敌占各据点自然容易为我收复。为实行此方针，应采取围城打援办法。围城之目的不在得城，而在打援。集中七八倍于敌之兵力（例如集中四五个团打敌援兵一个至二个营），每次事前均应有充分准备，不浪打，打则必胜。打时须用包围迂回，以期尽歼。此点对干部应作深刻教育。

军委

酉敬

---

[1] 詹，指詹才芳，当时任冀东军区司令员。李，指李楚离，河北元氏人，当时任冀东军区政治委员。王，指王智涛，河北沧县人，当时任冀东军区参谋长。

[2] 程、李，指程子华、李运昌，当时分别任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敌强我弱必须准备长期斗争

（1946年10月25日）

东北局：

酉养[1]电悉。你们的估计是正确的，中美反动派消灭解放区的政策不会改变。我党同志绝不要幻想恩赐和平，只在大量歼灭敌军有生力量、粉碎敌人多次进攻并使解放区获得发展之后，暂时休战才有可能。在全国与东北均是敌强我弱，为改变此种形势起见，必须准备长期艰苦斗争。

中央

酉有

---

[1] 酉养，即10月22日。

致聂荣臻等电[1]

（1946年10月25日）

我陈赓纵队原拟歼击北上之敌，因敌七个旅密集行军不好打，故转入临汾以南打敌后路，收复大部失地，亦是威胁敌之好方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并告萧克、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华中等战略区战况及对蒋军攻势的估计[1]

（1946年10月28日）

周，叶，林，陈，刘、邓，聂，贺[2]：

（一）我粟谭[3]军歼灭七十四师七千，该师两个旅已失战斗力。至此，我粟谭军不到四个月歼敌十个旅，连同山东军七月间在淮海区歼敌两个旅，该区共已歼十二个旅，地方部队零碎解决者不在此内。如今后数月内再歼敌七八个旅，则苏北便可确保，失地便可恢复。（二）顾祝同胡宗南[4]两部受我打击，锋芒已钝，再给几个打击便无能为力了。（三）王耀武[5]被我歼灭两旅以上，但尚可进攻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周恩来等的电报。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委员。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

[3]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威[1]，须再予以打击。（四）已给李宗仁[2]以初步打击，再歼灭几部分，威风也会低下来。（五）进攻边区主要靠马鸿逵[3]，三边[4]可能失守，并将威胁延安，现正准备对付。（六）估计关内蒋军攻势还可能有两个月至三个月，过此即无力再攻。我军如能于今冬（十月起）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明春即可开始反攻，大量收复失地。

中央
酉俭

---

[1] 烟威，指山东烟台和威海。

[2]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

[3]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4]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望即组织部队歼敌二十六师[1]

（1946年10月28日）

陈，并告粟、谭[2]：

二十六师东进是歼敌良机，望组织一纵、八师及其他部队歼灭该敌。此次涟水胜利[3]已给七十四师歼灭性打击。现须给二十六师以同样打击，则薛岳[4]威风可望打下来。

军委

俭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1946年10月27日至30日，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十师在鲁南峄县（今山东枣庄市峄城）以东进行傅山口反击战，打击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等东犯之敌。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华中野战军主力在江苏北部地区进行的第一次涟水保卫战。此战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所部等8000余人。

[4]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电贺高树勋将军起义周年[1]

（1946年10月29日）

民主建国军高总司令勋鉴暨全体官兵均鉴：

民主建国军的成立，证明人民独立和平民主事业必然胜利，反动派卖国内战独裁计画必然失败。今当贵军成立一周年，特电申贺，并祝进步。

毛泽东
朱　德
十月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为高树勋将军率领所部起义一周年纪念所写的贺电。

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1]

（1946年10月29日）

如能在今后三个月内外再歼敌七八个旅，则蒋之进攻即可根本打破，苏北即可巩固，然后我主力再转至外线，似较有利。因内线作战歼敌较易，补充亦较易。大约在明春三四月间转入外线为适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6年10月29日）

敌人尚有多少进攻力量？

内线作战歼灭敌人一半左右，失地大部收复之后应照前计划以主力向中原出动，此计划约在何时可以实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复电中央：如果我们能消灭川军两个旅，王仲廉两个旅，王敬久两个旅，就可以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个月实现此计划，是有可能的，届时尚可向南发展。

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1]

（1946年10月30日）

有十几个团在手，只要打得好，可使深入鲁南之敌彻底被打败。你们手里有十五个团，如能歼灭其两个旅，即可停止其进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的主要内容。

壮大力量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目标[1]

（1946年10月30日）

冯、黄、李：

西宥电[2]悉，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坚决斗争，扩大军队，扩大解放区，学会集中主力打运动战，争取每次歼灭敌军一营一团，同时发展民兵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你们应以占领整个海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琼崖特委书记、琼崖游击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特委委员黄康和特委副书记、纵队政治部主任李明（林李明）的电报。1946年2月14日，驻海南岛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集中5个团的兵力向白沙解放区发起进攻，海南内战全面爆发。琼崖游击独立纵队经过8个月近百次战斗，歼灭国民党军3000多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2] 指1946年10月26日冯白驹、黄康和李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东江纵队撤退后，上级指示我们一面坚持斗争，一面把干部撤到海外，人员疏散。我们一致认为，如执行此指示，不但碰到无港口、少船只的困难，而且整个工作要垮台，琼崖斗争不堪设想。为琼崖革命前途计，不得不请示中央。倘中央认为今后的粤琼必更黑暗，为保存干部，应即大批撤退，我们必坚决执行。但如中央认为自卫战争之结局，只要琼崖坚持得好，至少可以争取关于广东武装北撤的3项协议的实现或获得更大成果，那么我们有坚强的信心与办法，坚持斗争，决不被敌人打垮。

岛为目标，将来再向南路[1]发展。你们“坚持自卫反击再决议”[2]是正确的。

中央
酉三十

---

[1] 南路，指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及廉江、化州和广西浦北、钦州地区。

[2] 指1946年10月27日冯白驹、黄康和李明给中共中央关于自卫反击总结的报告。

应集中主力歼灭南满分散之敌[1]

（1946年10月30日）

林：

南满[2]方面敌很分散，我须集中十几个主力团一起行动，每次歼敌一个团左右，打几个好仗转变战局。你们部署如何。

军委

酉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的电报。

[2]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敌攻临沂是调虎离山切勿上当[1]

（1946年10月31日）

陈、张、黎，粟、谭[2]：

（一）二纵（韦国清[3]）行动须待涟南战役[4]结束后方能考虑。（二）敌既不打通津浦[5]又不切断陇海而进攻临沂，其目的是欲调动我苏北主力北援（调虎离山），以便先解决苏北，然后以苏北、苏中主军（十二个旅以上）进攻山东，我们切不可上当。（三）刘邓昨日歼灭刘汝明一个旅，正在歼击另一个旅[6]。望鲁南方面给进犯军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张云逸和副政治委员黎玉等的电报。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韦国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涟南战役，指1946年10月19日至11月1日华中野战军第一次涟水保卫战后期向涟南出击的作战。为粉碎国民党军对涟水的进攻，将敌整编第七十四师消灭于涟水城南河套地区，华中野战军主力于10月30日向涟南出击，首先消灭敌整编第二十八师一九二旅两个营、五七五团和旅直。11月1日，整编第七十四师全线崩溃，退回马厂、淮阴，战役结束。

[5]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6] 1946年10月29日至31日，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鄄城发动进攻，歼灭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所属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一一九旅和整编第五十五师第二十九旅9000余人。

一二个大的打击。

军委

酉世

贺黄有凤、赵雪明婚联[1]

（1946年10月）

一

革命到底；
白头偕老。

二

一对机要干部；
两个工人阶级。

---

[1] 这是毛泽东祝贺黄有凤、赵雪明结婚讲话时的口占联，属准对联。黄有凤(1914—1989)，江西兴国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机要科科长、中共中央机要科办公室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机要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机要处处长。建国后，历任东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处长、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第一副局长、总参谋部机要局局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在北京逝世。

鄄城战役结束后应向西进击[1]

（1946年11月1日）

刘、邓：

（一）歼灭刘汝明[2]向鄄城进攻四个团中之两个团，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继续歼灭其余两个团，基本上解决六十八师。鄄城战役结束后休整十天左右向西进击，用各个击破方法将孙震[3]刘汝明两集团大部歼灭，使邱胡[4]陷于孤立，然后解决邱胡。（二）我粟谭[5]军于涟水作战胜利后发起涟南作战，已解决二十八师之一九二旅，现正向七十四师攻击中。

军委

戌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3]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4]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胡，指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5]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对密集之敌可钳制一路打另一路[1]

（1946年11月1日）

聂、刘、萧、罗：

不要怕敌密集，敌两路中只要间隔十里至十五里，我即可以一部钳制其一路，而以主力大胆打其另一路。敌之增援能力是很差的。

军委

戌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副司令员萧克和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关内作战快到转折点有利东北作战[1]

（1946年11月1日）

林、彭、高、陈：

（一）酉世电[2]悉。你们作战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二）关内作战快到转折点，蒋之进攻力量快要用完，戌亥两月如能歼敌十几个旅，即可停止敌人进攻，我可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收复失地。如此必可钳制蒋军无法向东北增兵，利于你们执行新作战计划。（三）我粟谭[3]军在涟水以南又歼敌二十八师一个旅，正续向七十四师攻击中。刘邓军歼六十八师一个旅，正续向另一旅攻击中。

中央

戌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和副政治委员彭真、高岗、陈云的电报。

[2] 指1946年10月31日林彪、彭真、高岗、陈云给中共中央并告萧华、程子华、程世才和罗舜初的电报。电报说：敌利用松花江阻我北满部队，而集中主力进攻南满与西满。最近正在布置攻洮南，但长春以北敌兵力较空虚。我拟以5个师兵力，用火车运输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绕至松花江以南，再步行向敌发动攻势歼灭敌人，以破坏敌攻洮南及策应南满和破坏敌攻哈尔滨的计划。

[3]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致林彪等电[1]

（1946年11月1日）

除北满五个师绕道南进外，请考虑再加西满一二个师（旅）集中行动，更利连续作战；俟敌人分散疲劳后，南满两纵队主力宜集中行动，各个歼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等电的主要内容。

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示电[1]

（1946年11月2日）

用各个击破方法将刘汝明、孙震两集团大部歼灭，使王敬久集团陷于孤立，尔后歼灭该敌，转变战局。

---

[1] 这是毛泽东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指示电的主要内容。

致萧华电[1]

（1946年11月2日）

（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萧华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平等电[1]

（1946年11月2日）

请代向何香凝先生致问候之意，现战事日益好转，有把握粉碎反动派之进攻。我党方针是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及实现政协决议。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平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林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

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1]

（1946年11月2日）

如十六军将南下，以先打十六军再转平汉为好；如十六军不南下，则可转至平汉作战。你区须再歼敌六至七个师（旅），方能停止敌人进攻，而这是完全可能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歼灭桂系一部和冯治安等部的部署[1]

（1946年11月3日）

粟，并告陈[2]：

冬午电[3]悉。（一）如确实有把握自以歼灭桂顽一部为好，宜在十天内完成任务，以便早日休整部队，准备新作战。（二）陈率十七个团主动歼击冯治安[4]及二十六师，甚关重要。希望精心组织，务获大胜。此役完成后八师或一纵可南下监视宿迁之敌，我华野全力加二纵、七纵可集中打击由两淮[5]进攻之敌。

军委

戌江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同日毛泽东还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陈毅和陈士榘的电报，要他们集中17个团歼灭冯治安部及二十六师，努力争取大胜。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11月2日粟裕给陈毅、张云逸、黎玉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涟南战役结束后，估计敌将更稳重，不敢猛进。因此，我们拟乘机予桂顽以大的打击。已令二纵七师作打击整编六十九师及桂顽之各种准备。如能将桂顽打塌，我即完全转入主动。

[4]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

[5]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以拖住邱清泉胡琏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1]

（1946年11月3日）

刘、邓：

戌东电[2]悉。（一）下一步你们究打敌何部，可依那时情况再决定，总以拖住邱胡[3]不使加入鲁南为原则。如打孙震[4]可以吸引邱胡西援，则打孙震为好；如打七十五师可以抑留邱胡，则打七十五师为好；如打金、鱼、单、成、定、曹[5]足以威胁徐州吸引邱胡并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1946年1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和张际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报告了当时国民党军刘汝明、孙震、王敬久三军主要兵力配置情况后，提出：现敌之真正机动部队并不多，如果我们能消灭川军两个旅、王仲廉两个旅、王敬久两个旅就可打开局面，收复大部失地。三四个月实现此计划是可能的。在今后3个月的机动中不把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消灭一二个旅，我们受限制太大。

[3]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胡，指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4]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5] 金、鱼、单、成、定、曹，指山东金乡、鱼台、单县、成武、定陶和曹县。

接策应苏北，则以南下突袭上述诸城为好。（二）薛岳[1]所属李默庵[2]（苏中）、李延年[3]（苏北）、冯治安[4]（鲁南）、王敬久[5]（鲁西）、王耀武[6]（胶济）及直属各部共达八十个旅，为全国第一个强敌，而我苏中、苏北现处困难中。如邱胡加入鲁南，切断陇海，则苏中、苏北难于支持，极为不利。此种情况望加注意。

军委

戌江

---

[1]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2] 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

[3]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4]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

[5] 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

[6]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迅即攻占大宁吉县区域[1]

（1946年11月3日）

陈、谢，并告薄、王[2]：

东西电[3]悉。（一）如胡宗南[4]进攻延安很快，则不能等候你们打击九十师然后西调。望派二十四旅不待彭罗[5]配合迅即出动，攻占大宁、吉县区域，四纵主力在现地待命。（二）调杨苏纵队[6]南下位于太岳接替四纵在晋南之任务，但杨苏南下需时，四纵必须在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薄、王，指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指1946年11月1日酉时陈赓、谢富治、杨奇清和刘忠给中共中央军委并薄一波、王宏坤的电报。电报说：（一）配合延安作战必须即刻攻占大宁、吉县区域。（二）四纵必须给胡顽九十师以歼灭打击后始可抽兵西援。建议独四旅及第二十四旅由彭绍辉、罗贵波指挥攻占大宁、吉县。四纵同时围攻霍县，引诱敌第九十师增援将其消灭，并攻占霍县、赵城，调1个旅配合太岳地方部队钳制董钊，然后，四纵再配合彭罗部西援延安。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6] 杨苏纵队，指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苏到达之前一接命令即行出动。（三）同时望将打九十师需要时间多少，把握如何电告。

军委

江

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部署[1]

（1946年11月6日）

贺、李，聂、刘，陈、谢，薄、王，刘、邓[2]：

（一）第一军、第九十军正由临汾开西安，准备进攻边区，马鸿逵[3]主力集结河东准备进攻三边[4]，然后两路会攻延安。（二）我军有粉碎该敌保卫延安并于胜利后发展西北之任务。（三）决调杨苏纵队[5]（三个旅）、陈谢纵队（三个旅）、张宗逊纵队[6]（两个旅）协同边区部队执行此项任务，以陈赓为司令员、张宗逊为副司令员、习

---

[1] 1946年11月，蒋介石令胡宗南抽调驻晋南的整编第一、第九十师共4个旅西渡黄河入陕，准备会同原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进攻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李井泉等的电报。

[2] 聂、刘，指聂荣臻、刘澜涛，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薄、王，指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4]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5] 杨苏纵队，指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6] 张宗逊纵队，指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张宗逊。

仲勋为政委统一指挥各部。（四）贺李令张纵队迅即开至兴临[1]地区休整补充，待命开延。（五）聂刘令杨苏纵队迅即补充新兵开至兴临地区，待命开延。事前应进行充分政治工作，保证减少逃亡。（六）陈谢纵队迅即攻占隰县、蒲县、大宁、吉县、乡宁，控制马斗关渡口，开辟到延安之道路。贺李即令彭罗[2]及独四旅南下吕梁配合陈谢作战，并于陈谢西进时接管吕梁各县而巩固之，彭罗立即至汾西与陈谢商讨一切。（七）第一第九十两军回陕后，留晋胡[3]军已大减，待陕甘战场开辟，留晋胡军将大部或全部调陕，太岳方面除留二十四旅外，应就地方升级组成一个新旅即可应付。皮徐[4]在华中至少须待粟谭[5]再打一胜仗方能调动，且路远缓不济急，故须就当地自行设法。

军委

戌鱼

---

[1] 兴临，指山西兴县和临县。

[2]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皮徐，指皮定均、徐子荣，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旅长和政治委员。

[5]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南方各省乡村工作方针

（1946年11月6日）

方、林[1]，并告周、董，刘，吴[2]：

在目前全面内战形势下，南方各省乡村工作应采取两种不同方针：

甲、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原有各根据地，如海南岛，如南路、中路、西江、北江、东江[3]、闽南、闽西，应鼓励原有公开或半公开武装紧紧依靠群众继续奋斗，不应采取消极复员政策，长敌人之志气，灭自己之威风。现在南方各省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调走，征兵征粮普遍施行，正是我党发动游击战争的好机会。在此方针下，你们酉有[4]电乙项叫闽西

---

[1] 方，指方方（1904—1971），广东普宁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林，指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

[2] 周，指周恩来。董，指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刘，指刘晓（1908—1988），湖南辰溪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吴，指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3] 指华南5处由中共创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南路根据地在钦州、廉江地区；中路又称中区根据地，在新兴、恩平、阳春、阳江地区；西江根据地在广宁、四会地区；北江根据地在英德、翁源、新丰、佛冈等县边境地区及清远县境的文洞地区；东江根据地的中心为增城、博罗两县边境的罗浮山区及东莞、惠阳等县的部分地区。

[4] 酉有，即10月25日。

南大量复员之方针是不妥的，应重新考虑。你们派人到海南岛传达复员方针，已引起那里极大不满。中央已去电叫他们坚决斗争，以占领海南岛全部为目标，将来则向南路发展。

乙、凡条件尚未成熟之地区，则采取荫蔽待机方针，以等候条件之成熟。此种地区在目前当然是占多数，但其目标仍是积极准备发动公开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之各种条件，而不是不管条件是否成熟，一概采取长期荫蔽方针。

以上两项方针，适用南方各省一切乡村，按具体情形分别采取甲项或乙项。东南各省望周、董、刘直接布置。西南各省望吴及川省委布置。

中央
戌鱼

为苏联第二十九届国庆给斯大林的贺电

（1946年11月6日）

苏联斯大林元帅阁下：

谨祝贵国第二十九届国庆。二十九年来苏联一贯同情中国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事业，中国人民从孙中山先生起亦一贯同情苏联对于人类和平与进步的贡献，祝这个友谊永远巩固。

毛泽东
朱　德
十一月六日

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1]

（1946年11月6日）

庆祝你们歼灭九四军之三六九团及另一营，望传令嘉奖。

从本月起，你们应为歼敌七个正规旅而奋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刘澜涛、萧克、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对俘虏军官的处理办法[1]

（1946年11月8日）

张、黎、舒：

支电悉。俘虏军官应分别处理：（一）佐官，除吸收入我军者外，一律释放。（二）主官，营长以上一律不放，仅个别有作用者可放出做分化工作；连排长应进行教育，争取一部分进步分子加入我军，其余如无法收留，可以释放，但最反动者不放。（三）凡释放者应加以教育，然后放之。

中央
戌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治委员黎玉和政治部主任舒同的电报。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等电[1]

（1946年11月8日）

据悉蒋介石拟于十一号下虚伪的停战令，你们有所闻否？我们准备事先揭穿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并告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战役和战术上均须集中兵力以期必胜[1]

（1946年11月9日）

萧、江、程、罗，并告林[2]及西满、东满[3]：

你们此次作战[4]经验很好。（一）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二十五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酉世至戌冬）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十团八团兵力，最好能集中十二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二）战术上亦须集中兵力。你们世日包围二十五师，东日九次攻击皆未奏效，冬日拂晓，集中炮火攻破南北山一点，从此扩张战果，即于半天内将该师全部歼灭。尔后作战每次均须采用此种方法。

军委

戌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副政治委员江华、第三纵队（兼辽宁军区）司令员程世才和政治委员罗舜初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3] 西满、东满，指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和东满军区，司令员分别为黄克诚和周保中。

[4] 指1946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南满）军区第四纵队举行的新开岭战役。是役，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8000余人。

晋察冀部队应争取
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1]

（1946年11月9日）

聂、萧、罗、刘：

虞电[2]悉。只要能大量歼敌，先打九十四军或五十三军，再打十六军也好。你们应争取每月歼敌两个旅左右，三至四个月歼敌六个旅左右不是不可能的。手里要经常掌握十二至十八个团一起行动，要能一次包围敌一个师（三个团）而歼灭之，就能打开局面。

军委
戌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刘澜涛的电报。

[2] 指1946年11月7日10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和罗瑞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怀来战役因主力未适时集结，打由矾山堡西进之敌第四十三师未能达到目的，丧失了在桃花堡以北地区打敌第十六军之机会。故决定东转平汉作战，决心以主力先在东西寻机歼敌第九十四军或五十三军，待敌第十六军继续深入我区后，再集全力逐次歼灭之。

陈谢军西进前须作好充分准备[1]

（1946年11月10日）

陈、谢，并告刘、邓，薄、王[2]：

（一）你们动身西进之前，对于被服、弹药、新兵须作充分之准备，尽量携带，并要太岳于尔后源源接济。你们的基本后方仍是太岳，因边区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口，供给现有十万党政军犹感困难，外来大军只能供给粮食。（二）你部每人应做米袋一根，以便携带粮食。（三）你们到吕梁后看情况，如胡[3]军向延安急进则你们亦急进，如胡军缓进则你们可攻占吕梁各县，待命开延。（四）二十四旅速西开吕梁。

军委

戌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薄、王，指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集中三四两纵各个歼灭九十一师[1]

（1946年11月11日）

萧、江，并告林[2]：

根据你们微电，二十二师向凤城、通远堡集中，一九五师在通化，该两师暂不好打。九十一师分散在永陵、新宾、桓仁三处（桓仁是主力），请你们考虑集中三四两纵全力逐一攻击永陵、新宾、桓仁，各个歼灭九十一师，收复该三地并准备歼灭增援之敌。如该三地收复则通化之敌陷于孤立，可于尔后歼击之，南满[3]局面即可好转，并很好地配合北满[4]之作战。你们意见如何？

军委

戌真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和副政治委员江华的电报。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3]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4] 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

给凯丰的信[1]

（1946年11月14日）

凯丰同志：

书四本及来信已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2]，请斟酌采用。你身体谅好些？我病了大半年，现好得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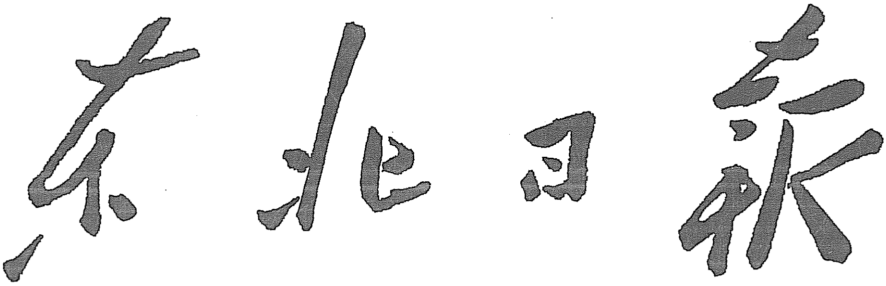
[1] 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

[2] 报头，指毛泽东写的“东北日报”。这四个字写在信的左边。

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1]

（1946年11月14日）

东北日报



毛泽东为东北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东北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解放区创办的第一张地区报纸。从1945年11月1日创刊，到1954年8月31日止。毛泽东为《东北日报》题写报头后，该报1946年12月改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头。

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1]

（1946年11月15日）

“国大”已开会[2]，除董及少数人留京外，周及其余各人宜即回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的主要内容。

[2] 11月15日，国民党单独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在南京除依附国民党的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所谓社会贤达外，第三方面人士大部分未参加。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国共产党坚决不承认这个“国大”。

1946年11月，周恩来从南京归来，毛泽东、朱德等到机场迎接。

扩大战果再歼孙震一部[1]

（1946年11月20日）

刘、邓：

智午电悉。对孙震作战大捷[2]，甚慰。如能扩张战果，再歼孙震一部，并准备歼灭王仲廉[3]之可能的增援队则最好。总之，你们在西边胜利愈大，不但抑留了第五军，且有可能抑留整十一师（该师正向徐州调动），对鲁南、苏北之帮助甚大。

军委

二十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1946年11月18日至2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的滑县战役。是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由濮县、鄄城以北地区向河南滑县隐蔽急进，歼灭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所属保安第十二纵队、第一〇四旅全部及第一二五旅大部，共约1.2万人。

[3]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

（1946年11月21日）

在党的七大时我们就估计到，在日本投降以后，如果不克服蒋介石的阴谋和中国出斯科比[2]的危险，中国的内战就不可避免。在今年一二月间蒋介石似乎有点变了[3]，后来证明七大的估计还是正确的。以前，世界上是法西斯和反法西斯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变成了美国反动派和世界人民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反映在中国，就是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因此，中国的斗争和世界有密切

---

[1] 这是毛泽东在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

[2] 斯科比，英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任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1944年10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12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3]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公布停战协定，并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同时下达停战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在会上宣布了4项诺言：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政协会议于1月31日闭幕，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和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大会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5项议案。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即“整军方案”。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蒋介石在这一段时间内的言行。但对以上各项协议，蒋介石从来没有准备履行，以后不久就被他一一撕毁了。

的联系。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例如蒋的这次停战令，人民对它的幻想就少多了，上海等地的反映证明了这一点。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这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情况一样，当时有人担心是否能战胜日本和希特勒。现在，许多人希望我们胜利，但又害怕我们不能胜利，怪我们失掉许多地方，失掉了长春、张家口，现在还可能失掉延安、烟台等地。因此，揭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现在已经降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是要宣传我们有条件取得胜利，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这个工作最近几个月都在做，今后还要做。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要使我们的人多一些，就要孤立敌人，当然敌人也想孤立我们，但被孤立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就国际条件来说，我们也不会孤立。现在世界上有三块地方：美国，苏联，还有美苏之间。这三块地方的人民都反对美国反动派，今天的世界是美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和对立。几个月以前，我们对美国记者说，美国的政策是错的，他们不相信，还要辩护，现在他们不辩护了，他们到延安来只是问你们为什么不批评苏联。美国国内的人也会起变化，那里的人民会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的。美国的基础是极端危险的，它不像从前保安的旦八寨子[1]，你不打它，它没有什么危机，美国的危机就要到来，比过去要严重得多。美帝国主义外强中干，蒋介石也是如此，都是可以打

---

[1] 保安，即今陕西志丹县。旦八寨子，在保安县西南。该寨有200余户人家，地形极为险要。当地地主豪绅兼民团团总曹俊章率反动武装百余人，长期盘踞该寨，红军多次围攻未能打下。1936年8月，红军一面用地方武装围困，一面争取寨内基本群众，瓦解寨内敌军。同年12月，曹俊章率少数人员逃跑，旦八寨子获得解放。

倒的。拿破仑、希特勒最后不是都被打倒了吗？我们说中美反动派外强中干，要藐视他们，这不是单单为了鼓励自己，而是有事实根据的。总之，世界在进步，苏联在发展，美国在面临危机，今天主要矛盾是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矛盾，美国和中间地带的矛盾。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

蒋介石对我们的方针是一不给自由，二要消灭你，不允许我们在保存一块地方的条件下订城下之盟。因此我们的方针只能是打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现在同抗战初期相比，我们的条件是更好了一些，统一战线也更宽广了。从上海、北平回来的人，我们都问他们：抗战初期的统一战线宽广还是现在的宽广？抗战初期我们一些同志出去没人理，现在不同了，很多人都愿意找我们的同志谈几句话，说我们的政策可以，只是问将来变不变。在解放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否比抗战时期狭一些呢？也差不多。搞土地改革并不影响我们团结地主，抗战时期减租减息也得罪了地主，但仍可以团结他们。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明年也可以对地主拉一把，照顾他们的生活，学延安地区对待地主的经验，让他们和农民一样可以进行生产，富足起来。现在陕南、鄂西、豫西，地主只有十分之一同我们作对，十分之九中立或愿意帮助我们。统一战线是一个基本的问题，无论如何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只要我们不搞关门主义，蒋介石要孤立我们是不可能的。看看中美商约[1]第二条，蒋介石怎么能不孤立呢？孤立了他，我们就胜利了。

在军事上，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差不多五个月了，我们至今已

---

[1] 中美商约，即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1946年11月4日在南京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经歼灭了敌人三十八个旅，占七十五个旅[1]的半数多一点，很难想象以后就不能再歼灭了。阎锡山、顾祝同[2]两区已不能进攻了，程潜[3]现在也没有攻势。刘邓十九日发起的战役[4]可以说是我们反攻，这次是我们进攻他们，他们处处被动。顾祝同若不调动胡宗南[5]的部队就很难再进攻，可能由薛岳[6]那里调第十一师或者由胡宗南那里调部队来打，这样延安又解围了。如果顾祝同不能进攻，我们就攻他。我们还是用袭击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目前国民党军对延安、涟水、临沂、烟台还可能有攻势，对晋察冀、东北也还可能有一些攻势，此外便无足观。对敌人如果不加分析，就会像

---

[1] 毛泽东在1946年10月1日总结全国内战爆发以来的3个月的战争经验时指出：过去3个月内，国民党军已被我军歼灭25个旅。今后3个月内外，必须再歼敌25个旅。“可以预计，在歼灭第二个二十五个旅这一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那时的任务，是歼灭敌军第三个二十五个旅。”毛泽东在本篇中所说的75个旅，就是指这3个阶段的歼敌目标的总和。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1893—1987），江苏涟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3]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武汉行辕主任。

[4] 指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1946年11月18日至22日进行的滑县战役。这次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法，歼灭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孙震所属的保安第十二纵队、第一〇四旅全部及一二五旅大部共1.2万人，打破了敌人企图控制鲁西南、打通平汉路的计划。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三国时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把东吴搞得议论纷纷[1]一样。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在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当然我们也不能说那时就能消灭蒋介石，我们宁可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一些，最坏也无非是打十五年，打得我们连一个县城都没有了，这些我们也要有准备。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我们占有的县城就极少。现在，我们原有的四百九十九个县城还只失掉了一百七十多个。

解决土地问题是一切工作的根本。明年的春耕是在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基础上的春耕。一切都要按照长期战争来打算。

代表团谈判一年之久，工作做得好。谈判主要是为了教育人民，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代表团不能早回来，一定要在开“国大”[2]以后，这样战争与分裂的责任才清楚，才不致失去人心。打

---

[1] 这个故事出自小说《三国演义》。说的是曹操率大军南下进攻东吴，号称有83万人马。在大军压境情况下，东吴的文武官员意见不一，有的主降，有的主战，孙权也犹豫不定。后来诸葛亮游说东吴，具体分析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才说服孙权联合刘备共同抗曹。

[2] “国大”，指1946年国民党政府召集的国民大会。按照1946年1月政协决议和会议中协商的精神，国大应在政协决议实施之后，在改组后的政府领导下由各党派参加始能召开。但是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在同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10月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后，于11月15日至12月25日召开了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除青年党、民社党及极少数所谓“社会贤达”外，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均拒绝参加并严正声明不承认这个国民大会，使国民党蒋介石在政治上陷于孤立。

起仗来，人心如不属我，我就输了。教育人民历来是我们党的任务，要一直坚持下去。现在究竟谁要打谁要和，人民已经知道了；美国政府的欺骗，人民也更清楚了。我们党本身也需要教育，也有一个教育过程。在复员的问题上我们就吃了亏，结果有些部队不充实，民兵也减少了。

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口号仍然是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协定生效时的双方位置和实现政协决议。我们要估计到，同蒋介石再打下去，如果消灭他七十五个旅以后，美国还会加强援助，那时新的困难又会出现。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己志气，灭敌人威风，而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周密，不要疏忽。什么时候又要谈判？开“国大”是蒋介石的失着，想加强自己反而削弱了自己，但他预先说了半年以后“宪法”[1]仍可修改，如果我们打掉他七十五个旅，那时他又要“爱和平”了，他可能又要谈判，而我们也不能拒绝。麻烦的事还很多。总的说，斗争是长期的，中间还会有许多曲折。这不仅仅是蒋介石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

国共这次决裂，和一九二七年不同。那次我们是完全被动的，这次我们有准备，干部们对前途是清楚的，群众也懂得。

---

[1] 指所谓“中华民国宪法”。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反动派违反政协决议，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宪法”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反对。

乘机打击敌七师七十四师极为必要[1]

（1946年11月23日）

粟、谭，并告陈，刘、邓，张[2]：

二十二电[3]悉。乘顽新调兵力未到之前，给七师及七十四师以重大打击，使其丧失战斗力极为必要。刘邓在长垣、滑县、濮阳中间地区歼灭孙震[4]一〇四旅全部、一二五旅一部及伪军一部，直接威胁开封。邱清泉[5]第五军由鄄城向西面考城方向增援，东面郓、巨、嘉、金、鱼、单[6]各县极为空虚，整十一师是否暂留该地尚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指张鼎丞，当时任华中军区司令员。

[3] 指1946年11月22日粟裕、张鼎丞、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并陈毅、陈士榘、张云逸、黎玉和舒同的电报。电报说：两淮之敌已进至高庄、车桥、渔沟等地，七军以3个团兵力向包家河以东进攻。我拟乘顽军尚未集结之前，决心给桂顽以重大杀伤后，再寻机给七十四师以更惨痛之打击，或者以主力一部寻找较弱之处给以歼灭，逼顽不能集中较大兵力突击。

[4]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5]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

[6] 郓、巨、嘉、金、鱼、单，指山东郓城、巨野、嘉祥、金乡、鱼台和单县。

探查。总之，刘邓胜利愈大对你们愈有帮助，但直接解决苏北问题依靠你们自己努力。

军委

二十三

1946年，毛泽东和枣园人民在一起。

致陈赓、谢富治电[1]

（1946年11月24日）

务于数日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隰县、蒲县、乡宁、吉县、大宁等五县，并准备在蒲县、乡宁地区歼灭整一师可能向我进攻之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胡宗南又令整编第一师从陕西禹门口东渡返回晋西南，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赓、谢富治电的主要内容。

发展吕梁区以保卫延安巩固太岳[1]

（1946年11月26日）

陈、谢，并告王、罗[2]：

（一）为威胁临汾、河津、禹门、吉县等处胡军，延滞其北进时间，除攻隰县所必要之部队外，其余各部应迅速南进攻占蒲县，并相机攻占乡宁，攻占南面一切阎顽所守之薄弱据点。派遣几个支队迫近吉县（该城已有九十师一个旅）、禹门、河津、临汾各胡顽据点，展开游击，愈快愈好。（二）据王罗报，二十四旅在大宁得粮五万担，证明吕梁各县阎顽掠夺人民之粮食甚多，只要打开据点便有粮食。望通令各部注意保存为持久计。（三）必须说服全体指战员，不要讨厌吕梁区居民落后，物质困难，应使人人明白发展吕梁区是保卫延安巩固太岳的重要条件。目前是蒋军与我军争夺吕梁时期，望全体努力取得胜利。

军委

宥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王、罗，指王震、罗贵波，当时分别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王震于1946年10月下旬率第三五九旅由陕西绥德至山西离石，与晋绥野战军独立第四旅整编为第二纵队。

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1]

（1946年11月29日）

望令胶东密切注意八军行动，如该军有调东北征候，我军务须以积极行动抑留之。至要，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张云逸、黎玉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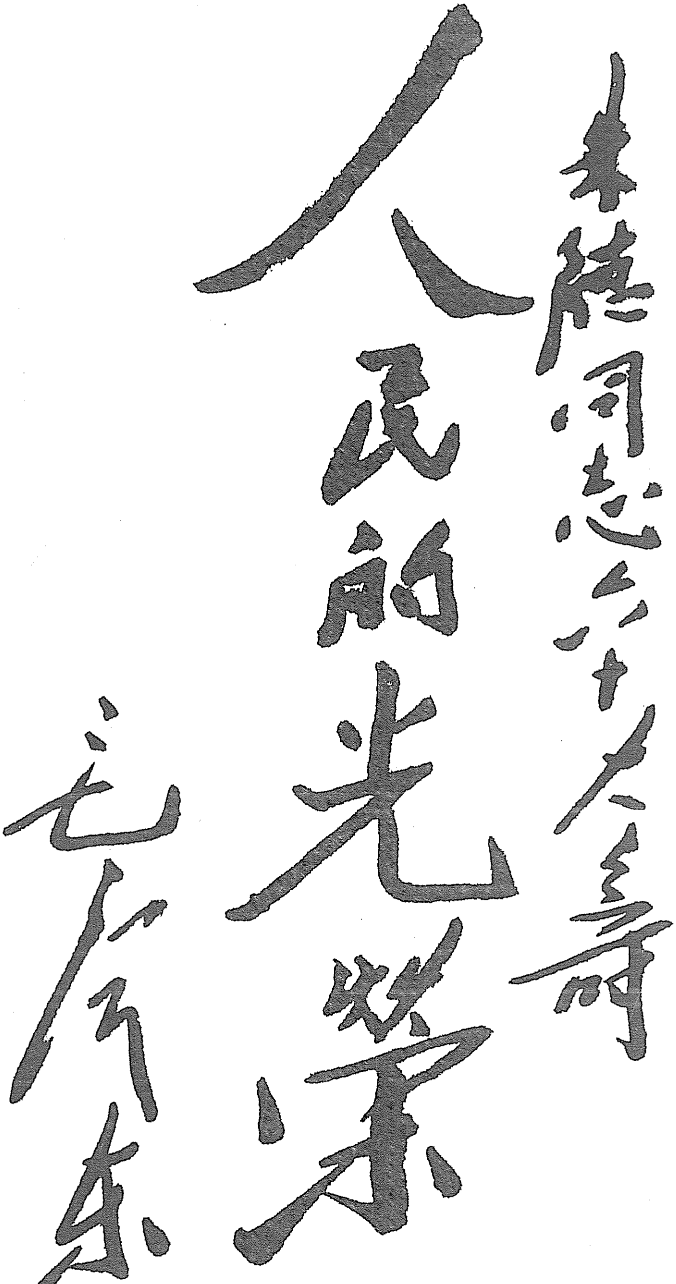
为朱德六十寿辰题词

（1946年11月30日）

朱德同志六十大寿，人民的光荣。

毛泽东

1946年11月30日，朱德六十大寿，党中央为其举行了庆祝会。



朱德同志六十大寿

人民的光荣

毛泽东

毛泽东为朱德六十寿辰的题词。

对党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所作的解释[1]

（1946年11月）

丢掉延安没什么不好，我们是丢块骨头换块肥肉，胡宗南进边区后，我们不要立即切断他们的后路，要让他多进来一点，也不要着急打，而是要拖着他，牵着他的鼻子，跟他打蘑菇战，以减轻刘、邓大军的压力。

我们在这里多拖住胡宗南一个兵，就给刘、邓大军减少一分危险，他们就可以站稳脚跟，挺进大别山，打开新局面。

---

[1] 对党中央决定放弃延安一些人想不通，这是毛泽东关于放弃延安的原因谈话的一部分。

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题词[1]

（1946年11月）

已有进步，更求进步。

毛泽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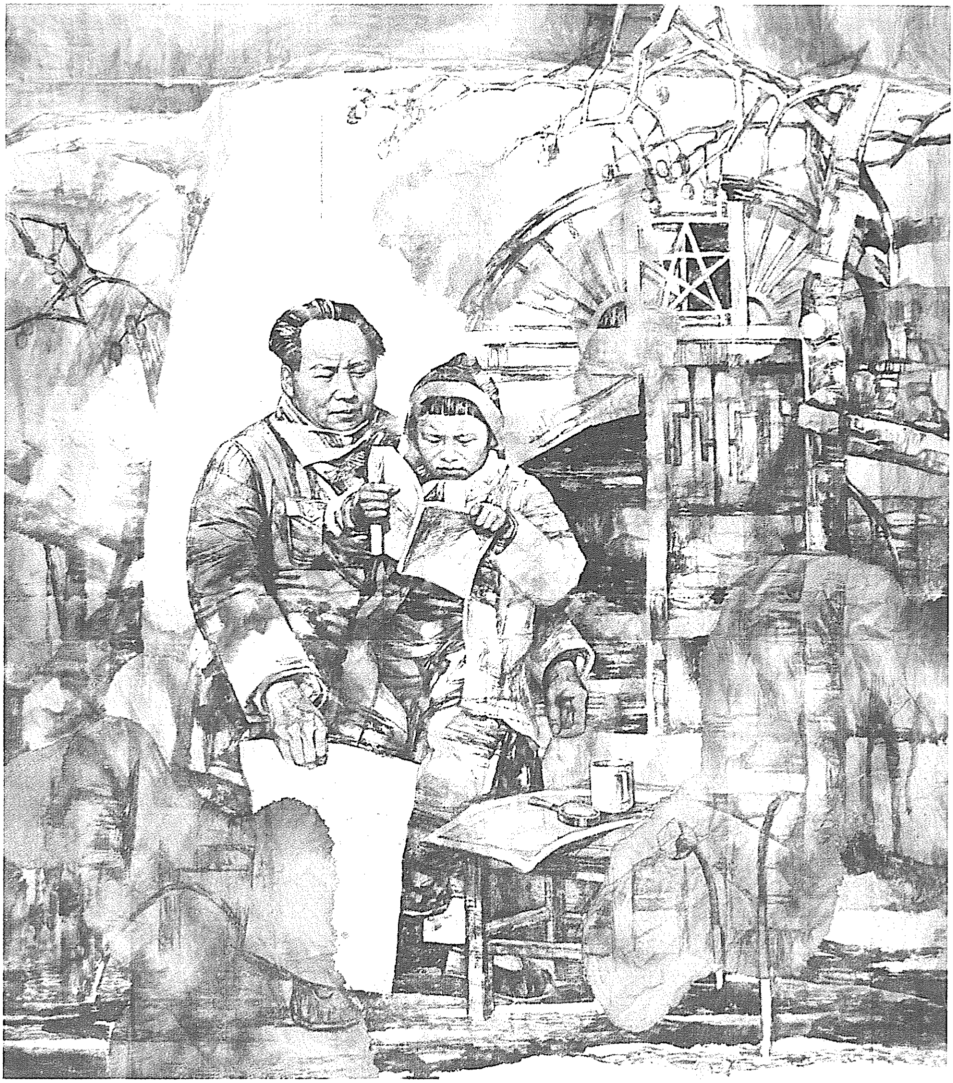
[1] 1946年11月的一天，毛泽东专门来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看望孩子们。应托儿所工作人员请求，毛泽东在临走时为他们题词："已有进步，更求进步"。

已有进步
要求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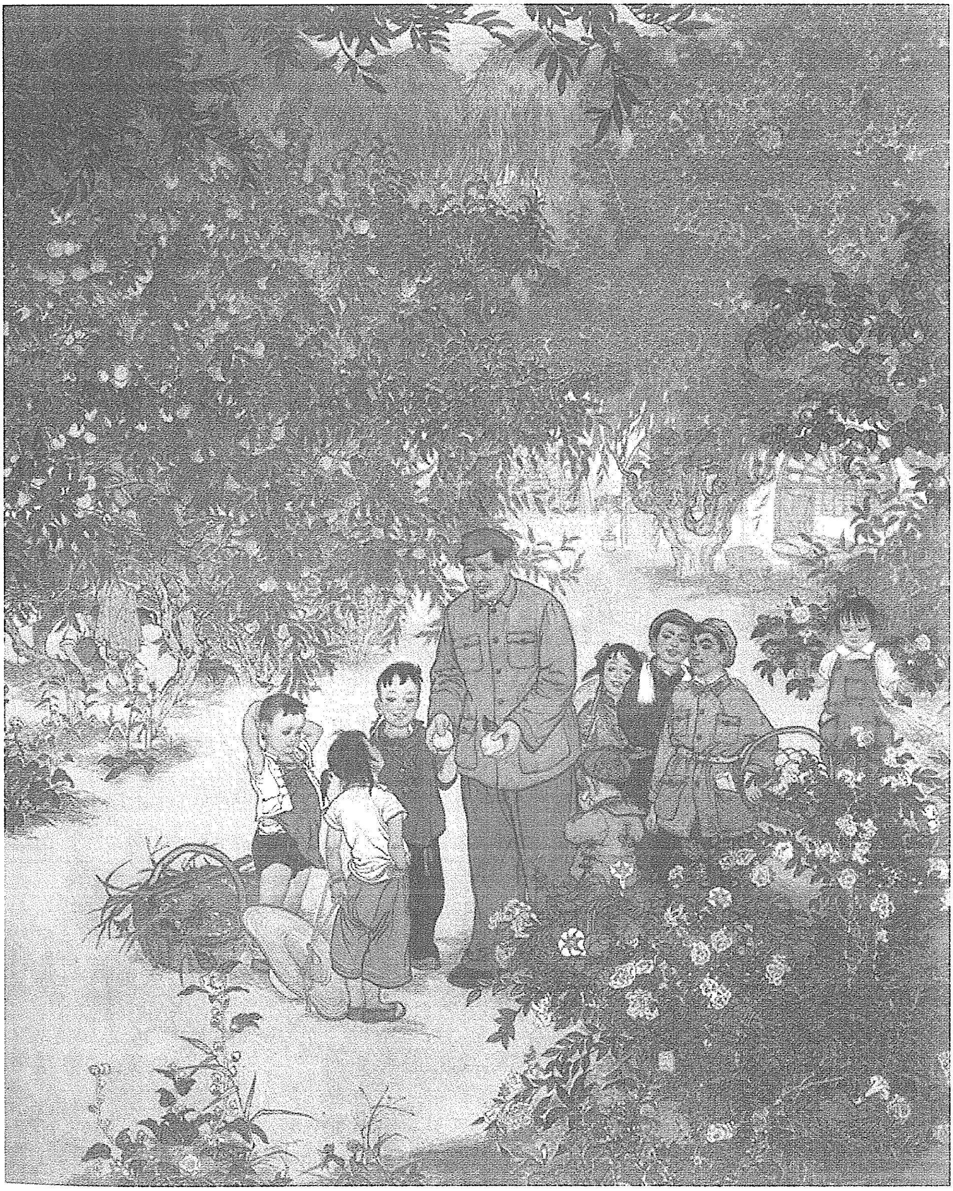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题词。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教李讷识字。



《明天》（中国画）



《枣园桃李》（中国画）

如在一两个月内歼灭第五军等北进之敌则全局好转[1]

（1946年12月1日）

刘、邓，并告滕、薄、王[2]：

（一）你们过去两仗已使顾祝同[3]处于被动地位，我则夺取了主动。现敌五军、八十五师、七十五师向北进攻是从报复观点出发，仍是被迫的，只要打得好，对我仍甚有利。望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集结休整，到有利时机、地点歼击其一部，最好先打较弱部分，准备在一两个月内先后打几仗，歼灭该军则全局好转。（二）由于我采取坚决措施，迫使蒋介石暂时放弃攻延[4]计划，九十师两个旅由河津返临汾，一师两个旅由韩城返河津，董钊[5]部留河西者只有一师一个旅、二十七师一个旅，攻延已无主力。我们布置除张宗逊[6]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滕、薄、王，指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4] 延，指陕西延安。

[5]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

[6] 张宗逊，当时任晋绥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两个旅留边区整训外，陈赓纵队[1]协同王震部[2]全力经营吕梁，威胁临汾侧翼；太岳正面由滕薄王指挥十二旅及各地方团组成一个纵队，担任保卫地方。（三）为加强南面兵力，利于尔后向河南出击，杨苏纵队[3]仍决南调，该纵亥灰可出动，待其过正太路[4]后拟令其开太行休整两个月。望你们准备一批优良武器及一批新兵补充之。该纵尔后即归你们指挥，如何使用待该纵南下并休整后再决定。

军委

亥东

---

[1] 陈赓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陈赓。

[2] 王震部，指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

[3] 杨苏纵队，指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

[4]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冀东地区的作战方针[1]

（1946年12月4日）

冀东区党委，并告中央局，分局：

三十电悉。过去五个月我军歼敌三十九个旅，业已基本上停止了蒋军的大举进攻。今后半年内，我军必须力争歼敌四十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战局。你区及热河[2]就一般情况来说，暂时自然是以游击战为主的局面，但你们应经常集中三个旅（九个团）寻敌弱点打运动战，打不甚坚固之据点，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每次歼敌一个营、两个营至一个团，在半年内力争歼敌五六个团，收复可能收复之各据点，各分区则都是游击战争。

中央
亥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冀东区委并告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和冀察热辽分局的电报。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致晋察冀中央局电[1]

（1946年12月4日）

同意照刘邓区[2]组织方式，指导重点放在前线，现有之野战司令部取消，其人员合并于军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电的主要内容。

[2] 刘邓区，指晋冀鲁豫军区。该军区在作战时组织指挥所到前方，平时指挥所合于军区。

同意夺取中阳并歼赵承绶部[1]

（1946年12月9日）

陈赓，并告王、彭、罗，贺、李[2]：

齐电[3]悉。同意增调二十四旅及十三旅及全部炮兵向北，由陈赓统一指挥夺取中阳，并歼灭赵承绶[4]，打通晋西北与太岳联系，巩固后方。乡、吉行动[5]可放在第二步。

军委

九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的电报。

[2] 王、彭、罗，指王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12月8日9时陈赓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王震、罗贵波、贺龙、李井泉的电报。电报说：赵承绶部已在平介集结，声言增援中阳、孝义。中阳工事坚固，一两天不能攻下，建议增调二十四旅及十三旅迅速攻下该城，并给赵承绶以歼灭打击，但吉县、乡宁行动必须再过几天。

[4]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5] 1946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示陈赓、谢富治，请他们“考虑集中三至四个旅及全部炮兵向吉县、乡宁前进，寻找分散之敌各个歼灭之，相机占领吉乡二县”。

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

（1946年12月9日）

哈默（以下简称哈）：国民党军队是否仍然企图进攻延安？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进攻延安的计划是早已定了，还要打，但我们有很大可能把进犯的军队打垮。

罗德里克（以下简称罗）：中国国内局势是否就要打下去了？怎样才能够恢复谈判？

毛：是要打下去，因为人家要打。“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方针仍然是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并为恢复一月停战协定的位置而奋斗，现在召开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应该解散。”[1]现在政治协商会议的所有协定都让他们破坏了，他们政治上召开“国大”，军事上发动全面进攻。

罗：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否不受停战协定的约束了，以前总是借口被打才还击，现在是否可以在任何共产党军队有力量攻击的地方就实行进攻？

毛：停战协定早已让人家破坏了，我们当然不再受它的约束，将来的谈判就是看战争的结果而定。

哈：这样是否将来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共产党力量变得很

---

[1] 引号内的话，是毛泽东同意哈默等记者发表的。

大，或者变得很小？

毛：很有这样的可能。

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美国海军陆战队驻在中国的原因是：（1）保护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家属、财产的安全；（2）保障天津塘沽间铁路的通车，以便使北平执行部美方人员能获得供应品。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撤退执行部的中共人员，使执行部根本不存在，这样岂不就打消了他们的借口，而是一种聪明之举吗？

毛：现在哈尔滨、延安都有美国人，美国干脆把驻军扩充到哈尔滨和延安来岂不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说法只是借口。

哈：保存执行部的理由究竟是什么？

毛：美国人不要撤退，所以我们也没有要撤退，将来是否撤退我们还未考虑。

罗：美国人完全支持蒋介石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排外的缘故，过去一九二七年的历史就是如此。

毛：中国共产党并不排外，对罗德里克这样的人是很欢迎的。对赫尔利[1]之流那就要反对他了，但也不是不给他饭吃，小米饭还是要给吃的，就是不开欢迎会，他讲话时也不拍巴掌，希望把他这一流的人都送出中国才好。现在有两种美国人，马海德[2]、李敦白、

---

[1] 赫尔利，美国共和党人。1944年11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45年11月离职。

[2] 马海德（1910—1988），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1933年来到中国上海从事医疗工作，1936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李敦白，1921年生，美国进步人士。1945年来中国。1946年7月和10月，先后在张家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

史沫特莱[1]都是好的美国人，在延安有个斯特朗[2]也是好人，这样的人我们都欢迎。不光是这样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愿意让他们到解放区来看一看，只要做一些比较公道的报道就对我们有好处。希望记者都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不要成为反动派的代言人。

罗：人民代表会议是否准备召开？

毛：我们已经看到你的电稿，态度比较公正。人民代表会议现在还没有召开，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不召开，不进攻也不召开。将来是一定要召开的，因为它是人民的代表会议，至少也要总结一些工作经验。

哈：共产党对《中美商约》[3]是反对的，为什么？

---

[1] 史沫特莱（1890—1950），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1928年年底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1937年曾到延安采访中共领导人。后随新四军转战华中和华东两年。1941年返回美国。

[2] 斯特朗（1885—1970），美国进步女作家、记者。1946年6月第五次到中国访问，同年7月底进入延安。1947年2月离开延安。

[3] 中美商约，即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1946年11月4日在南京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共有30条，主要内容是：第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和非专为中国人保留的各种职业，以及租赁土地等权利。倘若允许第三国采勘及开发中国矿产资源，美国也享有此项权利。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得与中国人享受同样待遇。第二，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商品在中国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第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开入中国“对外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毛：中美商约是不平等条约，准许美国人在中国随便购置房屋、地产，建工厂，开商店，美国船只可以到中国内河航行。以前日本人在“二十一条”[1]中曾要求在中国的一部分——满洲[2]做到这些事情，结果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哈：英国内河也允许美国船只去，中国人也可以在外国买房屋、开工厂，为什么要说中美商约是不平等条约？

毛：再过多少年，等中国有了资本，有了船舶才可以去外国，现在还不可能。

哈：我准备在北平买所房子，将来是否会被没收？

毛：不会没收，像你们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送几所房子给你们住。

哈：中国人眼里的平等条约，就是不把中国的利益给外国，却要享有外国的利益。

毛：像你说的这样的条约，也是不平等条约。

罗：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对中美商约不公开表示反对的态度，将

---

[1]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机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占中国的秘密条款。这些条款共有5号，分为21条。主要内容是：一、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利，并加以扩大；二、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三、将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或租予第三国；五、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允许日本在湖北、江西、浙江、广东各省之间修筑重要铁路，并承认日本在福建享有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山、整顿海口等优先权。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政府对日本的这些要求，除声明第五号要求的一部分“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后来，因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上存在矛盾，日本的这些要求没有全部实现。

[2] 满洲，即中国东北地区。

来共产党得势，是否要废止这一条约？

毛：我们公开表示将来一定要废弃，解放区现在就没有实行这一条约。“对于中美商约，我们表示反对，十一月四号是中国新的国耻纪念日，这个商约应该废止，另订平等商约。”[1]

罗：今年二月间，主席谈到世界局势有利于民主运动的发展，现在是否还是这样？

毛：现在更高涨了。今年二月迄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所干的一套都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快要失败了。美国反动分子和美国人民是有区别的，反动分子想独霸世界，势必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反动分子世界各国都有，他们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压迫民主，压迫人民，一定遭到人民的反对。几个月以前，美国人民还不认识美国的反动政策，如对在中国驻兵、干涉中国内政、扶蒋反共等都是反动政策，现在美国记者斯诺[2]、史沫特莱等都写文章表示反对。今年七月七日，我们发表宣言[3]批评美蒋政策，当时中外人士都说有些过火，但现在很少有人替美国政策辩护了，斯蒂尔[4]也没有替美国政策辩护，白修德[5]写书批评了国民党。现在美国反苏是

---

[1] 引号内的话，是毛泽东同意哈默等记者发表的。

[2] 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作家、记者。1928年来中国。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多次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1939年再次到延安采访，毛泽东会见他时作了关于统一战线和国际问题的谈话。1941年受国民党反动派打击，被迫离开中国。1942年至1943年又来过中国。

[3] 指1946年7月7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

[4] 斯蒂尔，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驻中国记者。

[5] 白修德，1915年生，美国记者、作家。1939年至1945年任美国《时代》杂志驻重庆记者，1944年访问过延安。1946年与贾安娜合著《中国暴风雨》，该书因揭露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腐败，一度在蒋管区被禁止。

放烟幕弹，是想独霸世界，首先是损害中国和英国的利益，其次是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而苏联闭门搞建设，对它毫无影响。所以这种政策一定要失败。美国人民也向左倾，不喜欢现在的政策，这次选举就是证明，如喜欢民主党政策的，一定会选民主党，而选共和党的是因为共和党十二年来没有管过事，想换一个试一试，十年以内可能会有变化。英国人民也向左倾，百分之四十的工党议员反对贝文[1]的政策，我估计一年至一年以上英国工党内反对贝文和艾德礼[2]的人可占大多数。中国人民也在左倾，共产党人在延安住土窑洞，吃小米，有什么本钱？但五个月已经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九个旅。善良的记者不要相信反苏的谎言。美国国内现在工人运动还不统一，有两三派，组织上和政治上不统一，但将来有希望，美国将来一定会实现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比较困难一些，前途还会有曲折。总之，全世界民主运动是高涨的。

陈依范：美国对国共的调解，共产党已不可能接受，是否欢迎英国调解？

毛：英国现在没有勇气反对美国的政策，它跟着美国走，又能有什么用处？它要反对美国，美国又不好对付。中国的问题还是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但欢迎外国的技术帮助。

哈：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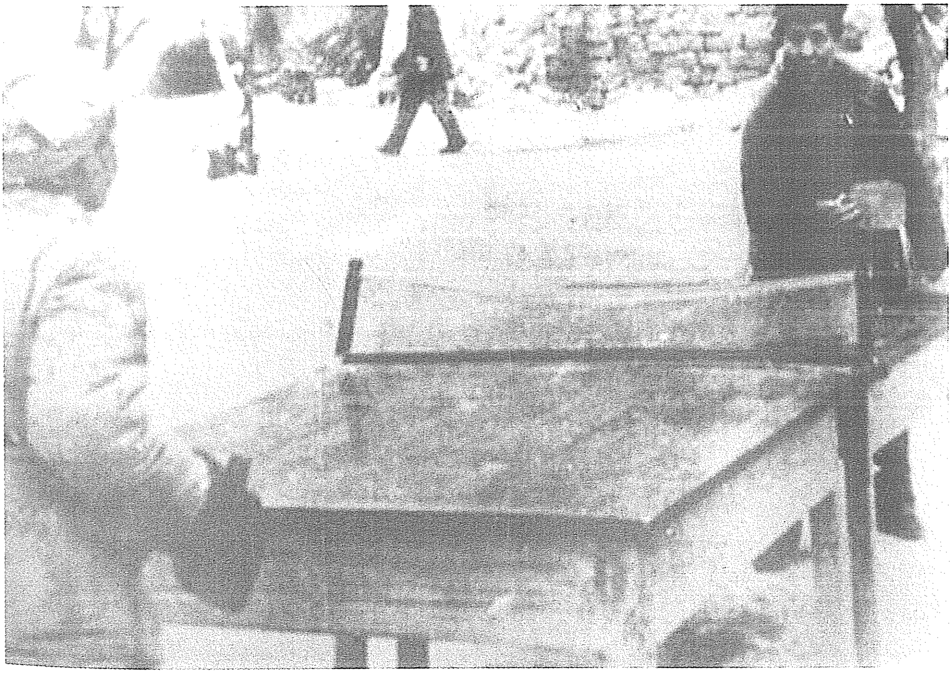
毛：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

[1] 贝文（1881—1951），英国政治家。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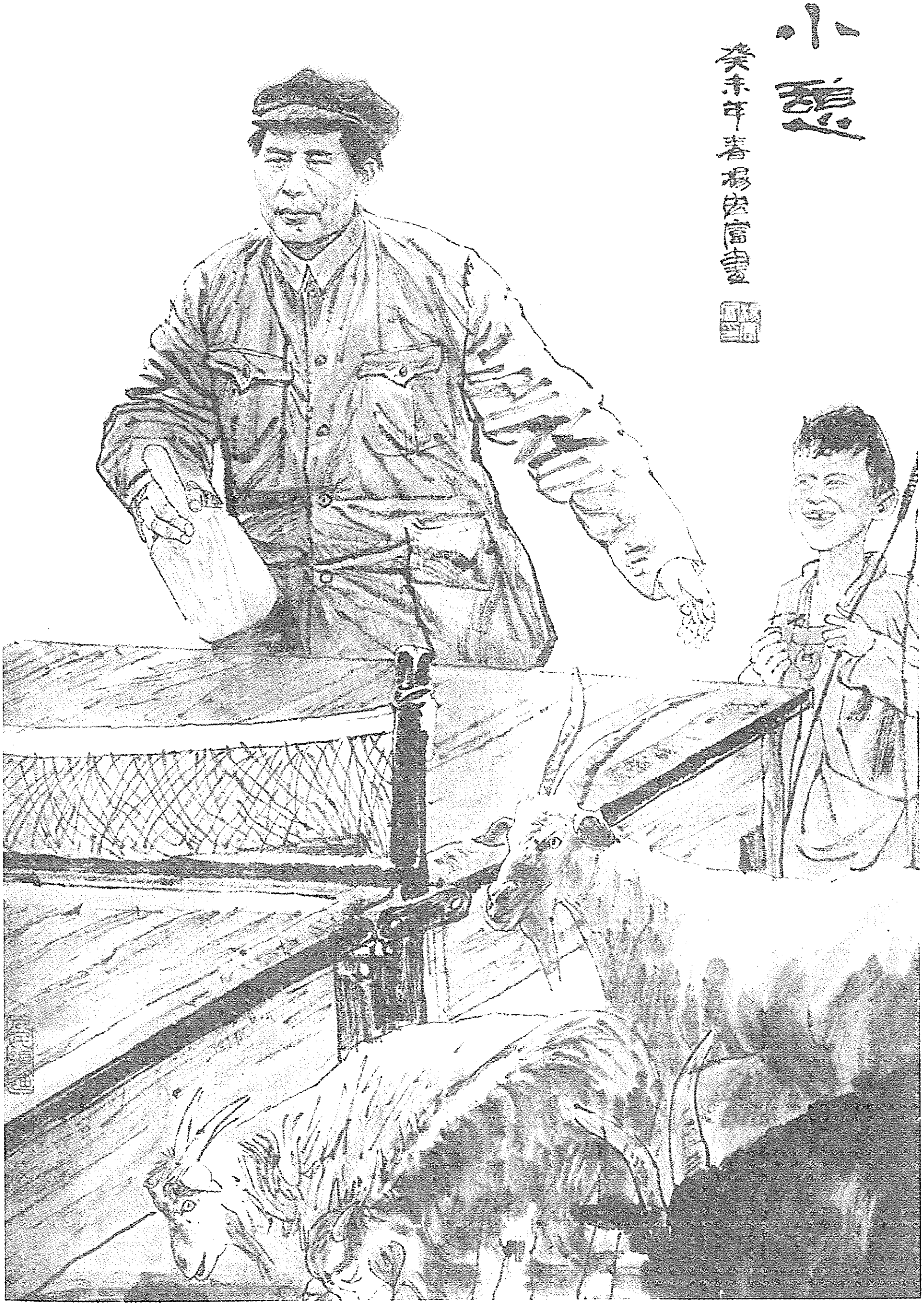
[2] 艾德礼（1883—1967），英国工党领袖。当时任英国首相。

马海德教李讷打乒乓球。



毛泽东在延安打乒乓球。

毛泽东在延安打乒乓球。


小憩
癸未年春杨俊富画

《小憩》（中国画）

致粟裕等电[1]

（1946年12月11日）

（一）庆祝盐城大胜[2]，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二）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沭阳作战；（三）一师及皮旅[3]于结束追击战斗后休息二三天，即行北返。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并告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的主要内容。粟裕接此电后立即自盐城北返，于12日同由山东南下的陈毅会合，筹划在淮海地区歼敌。

[2] 华中野战军在11月26日至12月8日的盐（城）南反击战中，歼灭由东台北犯之敌五千余人。

[3] 皮旅，指从中原突围至华中的皮定均任旅长的中原军区第一旅。

歼灭进攻沭阳之敌极为重要[1]

（1946年12月13日）

粟、谭，并告陈，张、邓[2]：

整十一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六十九师及预三旅等向沭阳进攻，惟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即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盼告。

军委

亥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1946年12月中旬，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指挥二十五个半旅分4路从江苏东台、淮阳、宿迁和山东峄县（今峄城）向苏北和鲁南解放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华中野战军，或迫其北撤山东。其中整编第六十九师和整编第十一师由宿迁分别向新安镇（今新沂县）和沭阳进犯。山东、华中两野战军以20个团钳制其中3路敌军，集中第一、第二、第九纵队，第八师及第七师主力共24个团，求歼由宿迁进犯之敌。经激战，将敌整编第六十九师和第十一师一部共2.1万余人全歼于宿迁以北地区。此役称为宿北战役。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南满集中主力歼敌拖延敌对北满进攻[1]

（1946年12月13日）

林，并告东北局：

七日电[2]悉。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3]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4]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

军委

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林彪并告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为破坏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迫使其两面作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的方针。从1946年12月中旬起，在南满、北满两战场，与敌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

[2] 指1946年12月7日林彪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我主力到达农安西北地区已20余日，只能打一点小仗和威胁整个进攻南满的敌人，而无法使战局开展。敌目前将兵力集中于农安、长岭之线，主要目的似为防御性质，今后企图尚难判断。我军则力求拖延敌对北满的进攻，同时将主力集中于松花江以北，准备迎击敌进攻，另以一部西去，钳制敌之北进和觅小仗打。

[3] 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

[4]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这里南满指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

1946年冬，毛泽东在延安。

应逐步扩充冀东主力部队[1]

（1946年12月14日）

区党委，并告中央局，分局：

十日电[2]悉。冀东主力现时既然只有两旅六团，自然应就此数集中作战。在战争过程中，依靠大批的缴获及俘虏加上人民中动员，逐步扩大至三旅九团，同时用大力整理村财政，以应增加军费的需要。此外各分区每区一个警卫团，每县游击队二百至五百，每区二十五人均必不可少。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必须普遍组织。

中央

亥寒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冀东区委并告中共中央晋察冀局和冀察热辽分局的电报。

[2] 指1946年12月10日中共冀东区委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现冀东共编两个旅（三团制），五个警卫团，县游击队每县三百人，区游击队每区二十五人。现两个旅缺额，再补六千人始能满员，区游击队正在建立。冀东村财政浪费太大，村开支约占财政开支三分之二。我们将用力整理村财政，整理后，人民负担可大为减轻。”

宿迁沭阳大胜后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1]

（1946年12月18日）

陈、粟，并告张、邓，张、黎[2]：

（一）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此战胜利整个苏鲁战局好转，涟水暂失将来可以收复，也一定要收复。但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峄台[3]，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一切失地。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军委

亥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张、黎，指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枣峄台，指山东枣庄、峄县（今峄城）和台儿庄，今均属枣庄市。

调动邱清泉东进歼灭之较为有利[1]

（1946年12月18日）

刘、邓，并告陈、粟[2]：

铣电[3]悉。我陈粟军主力在宿迁附近已获大胜，第二步准备渡运西进，迫近津浦[4]、徐州，恢复淮北局面。在此情况下，如果你们西面之敌不好打，似以南下寻歼八十八师，恢复嘉、巨、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这一电报精神，决心以一个纵队围攻聊城，一个纵队附地方武装伪装主力钳制豫北当面之敌，另两个纵队置豫北之敌于不顾，而向敌守备薄弱的徐州西北地区大踏步挺进，发起巨（野）金（乡）鱼（台）战役。1946年12月22日至1947年1月16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这一地区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及地方团队共1.6万余人。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3] 指1946年12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和张际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深感华中形势如何对山东及冀鲁豫影响甚大。如能找机会消灭敌五军一两个师，则战局可较大开展，且可对华中、山东作有力配合。我们觉得今后作战，战略机动必须集中最大兵力，先打开一个战线，才能更好地转变战局。这种条件在平汉战线是具备的。建议杨苏纵队南下后，将陈谢纵队亦调集平汉路西侧作战。

[4]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鱼、成、单[1]各地，调动邱清泉[2]东进而歼灭之较为有利。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决定。苏振华纵队[3]已令其开大名归建。胡宗南[4]主力有向隰县进攻模样，其企图似欲收复吕梁各县，然后进攻延安。我已令陈谢[5]就蒲、隰地区打击该敌。

军委
巧亥

---

[1] 嘉、巨、金、鱼、成、单，指山东嘉祥、巨野、金乡、鱼台、成武和单县。

[2]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

[3] 1946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率部开太岳。后杨得志留晋察冀野战军任第二纵队司令员，苏振华率第一纵队开回河北大名，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当时苏振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陈谢纵队迅速集中蒲县附近准备连续战斗[1]

（1946年12月19日）

陈、谢，王、彭、罗[2]，并告刘、邓，滕、薄、王[3]：

（一）此次向吕梁进攻之敌，现已查明一师两个旅，九十师两个旅，由董钊[4]率领沿大宁、临汾公路前进，其目的似在占领大宁后再攻延安。一师之七十八旅守备宜川。原驻宜川之四十七旅开吉县，似将协攻大宁。三十师除六十七旅驻土门外，馀在临汾南北未动。（二）此次作战，不但保卫吕梁，而且有保卫延安意义。你们应迅速集中兵力于蒲县附近地区准备连续战斗，以歼敌两个旅为目标。（三）滕薄王应令王新亭[5]部攻击浮翼[6]，积极向同蒲线活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等的电报。

[2] 王、彭、罗，指王震、彭绍辉和罗贵波，当时分别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滕、薄、王，指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4]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

[5] 王新亭，当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

[6] 浮翼，指山西浮山和翼城。

策应吕梁。

军委

十九日二十时

1946年12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延安召开保卫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图为毛泽东在张宗逊的陪同下出席大会。

在内线多歼敌人
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1]

（1946年12月20日）

陈、粟，并告张、黎，张、邓，刘、邓[2]：

皓日两电[3]均悉。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一切有功将士望传令嘉奖。七十四师向沭阳前进，先打该师，甚为必要。只要有好仗打，在内线多歼灭几部分敌人再转外线作战更为有利。

军委

亥号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张、黎，指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6年12月19日午时和18时陈毅、粟裕给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汇报了宿北战役的战果，并说，现薛岳令整编第七十四师和桂顽第一七一师由涟水、淮阴北攻，我军应先回师消灭第七十四师。此后，视情回援鲁南或西进转入淮北。

复暹罗侨胞电

（1946年12月22日）

暹罗华侨建国救乡联合总会、暹罗职工总会、暹罗华侨青年会、暹罗华侨教育协会，暹罗琼崖同乡会等七十一团体并请转全暹罗华侨公鉴：

戌养电悉，义正词严，至深钦佩。国民党当局既拒绝开非法国大之建议于先，又拒绝解散非法国大之要求于后，实为自闭谈判之门，全国人民对该非法的分裂的一党国大与其所通过之所谓宪法决不承认。今后本党决为恢复政协路线与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而奋斗到底，尚望海外国胞一致努力，以实现祖国之独立和平民主。

毛泽东

亥养

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华中、山东两区合并给华中分局的电报时加写的一段话

（1946年12月22日）

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宜集中主力于鲁南歼灭二十六师[1]

（1946年12月24日）

陈、粟、谭，张、邓[2]，并告张、黎[3]：

敬电[4]悉。主力似不宜分散，如放弃七十四师不打，似宜集中二十五个团（包括四师、九师、十纵[5]、警旅在内）左右兵力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迫退冯治安[6]部，然后相机出淮北较为有利。如何，请按实情处理。

军委

敬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的电报。

[2] 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张、黎，指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指1946年12月24日陈毅、粟裕、谭震林、张鼎丞和邓子恢给张云逸、黎玉、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七十四师迟援，我决放弃歼击，留部队钳制，主力回援鲁南并相机收复淮北，一纵今晚北开，一、六师继续西开。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本夜北返临沂。请张云逸、黎玉令十纵等部坚决阻击敌第二十六师，保卫临沂。陈士榘、唐亮到新安后，即计划集中一纵、八师歼击第五十九师之侵入部队。如是可配合刘邓行动，造成威胁徐州的形势。

[5] 十纵，应为十师。

[6]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

鲁南首战以歼敌二十六师为宜[1]

（1946年12月25日）

陈、粟：

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你们必须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师及一纵、警旅等部，并有必要之部署准备时间，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歼灭战。第一仗似以打二十六师三个旅为适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冯部[2]，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究应如何，望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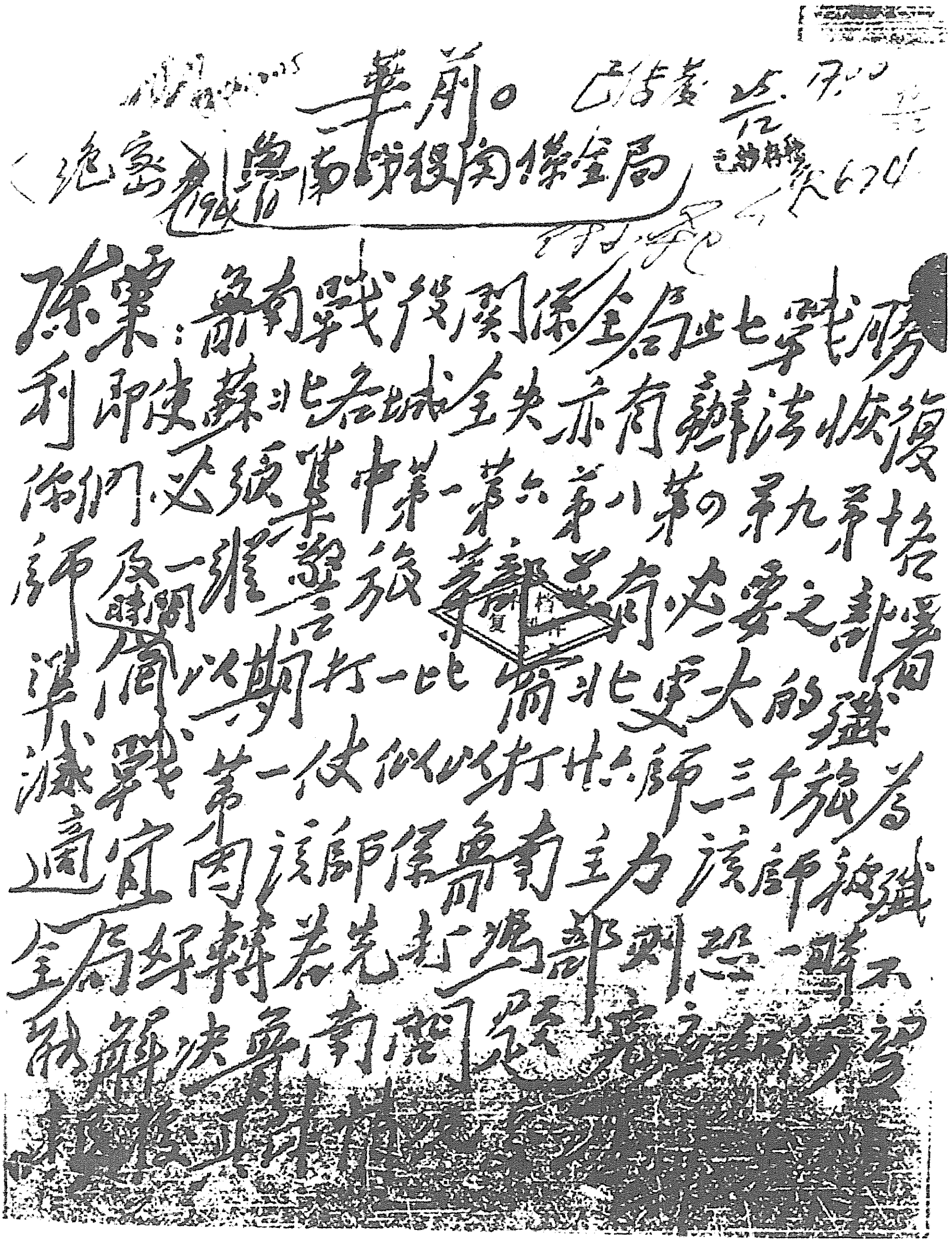
军委

有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宿北战役后，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为巩固后方，决定集中第一纵队、第八师、第一师，鲁中军区第四师、第九师，鲁南军区第十师，共27个团，组成左右两个集团，求歼位于山东枣庄以东向城、卞庄（今苍山）一线之敌整编第二十六师主力和第一快速纵队，尔后再乘胜扩张结果。1947年1月2日发起鲁南战役，至4日，全歼该敌。接着挥师西进，于1月9日至20日攻克峄县（今峄城）、枣庄，歼敌整编第二十六师残部和第五十一师全部，共歼敌5.3万余人。

[2] 冯部，指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指挥的整编第五十九师、整编第七十七师。



華前。

（絕密）魯南戰役關係全局

陳粟：魯南戰役關係全局，此一戰勝利，即使蘇北各城全失，亦有辦法恢復。你們必須集中第一、第六、第八、第四、第九、第十各師及一縱、警旅等部，並有必要之部署時間，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殲滅戰。第一仗似以打廿六師二三个旅為適宜，因該師係魯南主力，該師被殲，全局好轉。若先打馮部，則恐一時不能解決魯南問題 [illegible]

毛泽东致陈毅、粟裕电的手稿。

在苏中等敌占区必须坚持游击战争[1]

（1946年12月25日）

陈、粟，张、邓：

苏中、苏北、皖东敌占县城及要镇各县，我党必须坚持游击战争。第三、第四、第七各分区必须派部队、派干部恢复工作。只要各分区、各县能坚持游击战争，收复县城便有希望。

中央
亥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多打小仗以歼敌有生力量为目标[1]

（1946年12月26日）

陈、谢、王：

各电悉。（一）你们最近两仗打得很好，每次歼敌一个营，若能再打几个这样的仗就可等于一个大胜仗。（二）现地区作战敌我皆困难，你们应在隰县、永和附近地区找小仗打，每次歼敌一个营、二个营，坚持一时期，不怕敌人深入，总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暂时不要去打蒲县、土门。（三）待两星期左右以后，敌人业已深入，后路完全空虚，那时可以考虑以二十四旅留在现地，陈谢率三个旅经蒲县附近通过，第一步袭取乡宁、河津、稷山，第二步袭取万泉、荣河、猗氏、临晋[2]，调动董钊[3]各部南返，并破坏刘戡[4]各部向延安进攻计划。如那时刘戡业已深入陕北向延安进攻，你们即可由韩城附近渡河袭击刘戡后路（关中各县）。（四）汾河下游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和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的电报。

[2] 万泉、荣河，均为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万荣县。猗氏、临晋，均为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临猗县。

[3]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

[4]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津、稷山等处是否结冰，能否徒涉，盼调查电告。（五）第三条所述计划，现在只作调查，是否可行看以后情况发展再作决定。

军委

亥宥

给毛岸英的信[1]

（1946年12月26日）

岸英儿：

来信两封均收到。第二封信写得很好，这表示较之你初回国时不但文字有进步，思想品质也有进步。你的那些工作是好的。坚持读文章的计划，很有必要，再读一年也是好的。我身体比你走时更好些了。江青、李讷都如常。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 1946年11月，毛岸英随中宣部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一带后，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学习心得写信告诉父亲。毛泽东收到信后，在12月26日他53岁生日的那一天给毛岸英回了这封信。

1946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延安。

刘邓军宜速向东南歼敌[1]

（1946年12月29日）

刘、邓：

俭午电[2]悉。第一步攻占巨野、嘉祥、成武等城甚好。黄河北汛在即，薛岳[3]对苏鲁进迫甚紧，蒋介石可能增加二至三个师向你区进攻。故你们向东南行动宜速，并准备于最短期内歼灭五军及七十五师等部，方能打开局面。

军委

艳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1946年12月28日午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粟裕、张际春等的电报。电报说：为调动敌人配合华东作战，仍以主力按原计划，第一步攻占巨野、嘉祥、成武，威胁陇海，以二纵全部留南乐、观城监视王敬久。

[3]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在嘉祥等地打几个大歼灭战[1]

（1946年12月31日）

刘、邓：

聊城情况如何，是否可能攻下？我们觉得聊城能于数日内攻下，自以攻下为有利。但如急切难下，则宜停止攻击，集中全力于嘉、巨、成、鱼[2]地区，调动五军及七十五师等部打几个大歼灭战，开展局面。

军委

亥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嘉、巨、成、鱼，指山东嘉祥、巨野、成武和鱼台。

1946年的毛泽东。

为《冀南解放区烈士英名录》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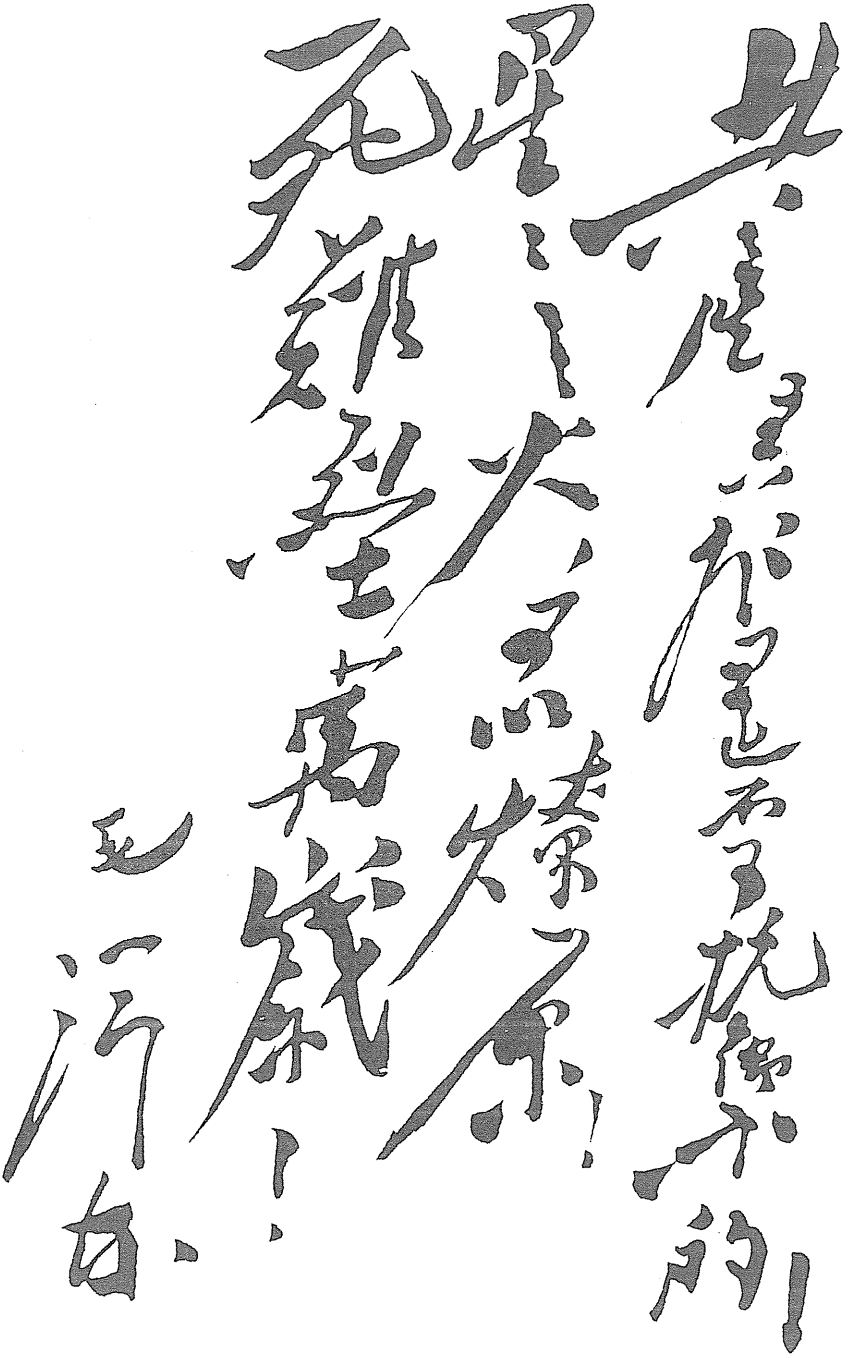
（1946年）

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应邀为冀南抗战史料编委会编辑的《冀南解放区烈士英名录》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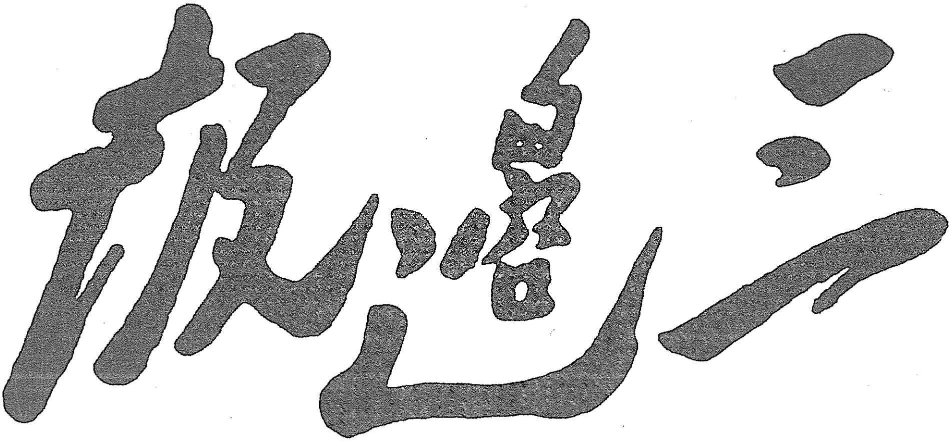
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
最大的光荣！
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

毛泽东为《冀南解放区烈士英名录》的题词。

为《三边报》题写报头

（1946年）

三边报



毛泽东为《三边报》题写的报头。

1947

1947年，转战陕北前夕的毛泽东。

新年祝词[1]

（1947年1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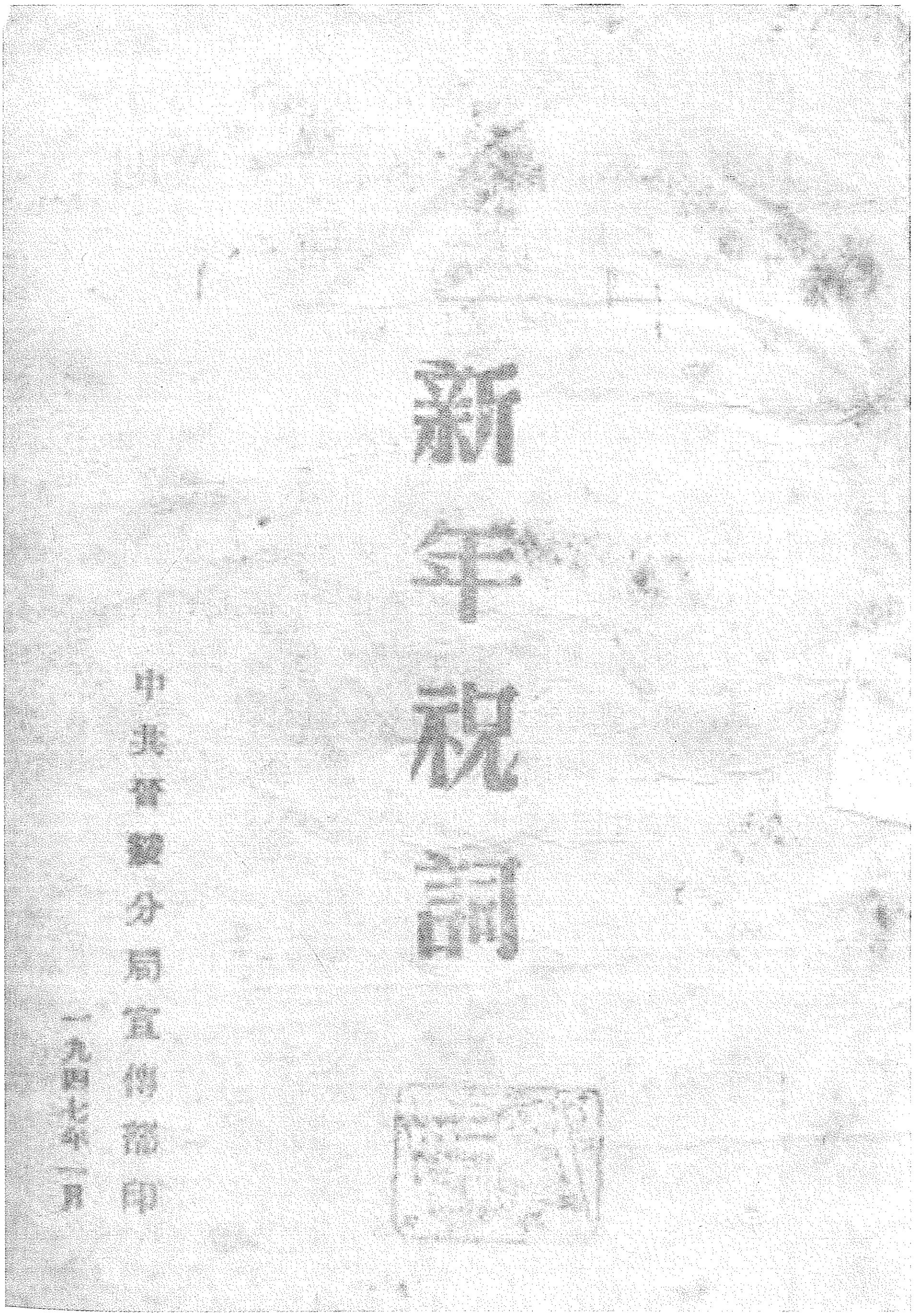
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阻止不住的。但是反动派总是企图阻止。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的任务，在于团结一切力量，击破反动派的阻力。在一九四七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政策的世界统一阵线，将要迅速发展；而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则将要得到比一九四六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有利于和平的恢复与国家的独立。

我们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力求战后各党派的合作，但是同时提出了警告：“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及‘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偷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末，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和全国人民在一起，曾经用一切忍耐的努力来阻止内战的发生和扩大，不幸这个努力是被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国民党一党的“国

---

[1] 这是毛泽东1947年1月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新年祝词。

大”所破坏了。但是中国人民仍在经过两种努力来继续争取和平，即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粉碎反动派进攻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日见高涨的群众运动。中国人民的这个联合意志将要确定地压倒任何反动分子的意志，从而使各党派间诚意的和平谈判和全国范围内真实的和平生活成为可能。现在国民党当局还没有表示任何起码的和平意图，他们在美国政府指使下，正在忙于以分裂的“国大”和独裁的“宪法”来装饰自己，以便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但是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末，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新年祝詞

中共晉綏分局宣傳部印
一九四七年一月

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印制的《新年祝词》。

在修改《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一文时加写的一段话

（1947年1月1日）

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切都变了，并正在继续变。在人民方面，是变得如此坚强，如此有觉悟，有组织，有决心，有信心。在反动派方面，则已变得如此横蛮猖獗，但又如此外强中干，众叛亲离，对于前途完全失去信心。可以预断，三年至五年后的中国与世界，其面目将比现时大不相同。全党同志与全中国人民，都应当为一个新中国与新世界而坚决奋斗。

力争每战歼敌三至四个旅[1]

（1947年1月2日）

陈，并告粟[2]：

子东电[3]悉。（一）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东战役[4]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即每战全部彻底歼敌三至四个旅，如此再打二三仗即可停止敌之进攻，并收复一部失地。（二）打马励武[5]是否准备完毕？粟及一师是否已至鲁南与你们在一起？我们希望此次作战能获宿东同样战果。

军委

子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3] 指1947年1月1日陈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总结了宿北战役和盐城、涟水作战的经验教训。电报提出，最近的胜仗，缴获多而大，但由于本位主义打埋伏，抛散浪费太多，今后确定以战养战的思想。部队对使用炮兵，处理俘虏，防空防炮均有进步，但打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则未克服反坦克的困难，故又提出以战教战，打一战进一步的思想。

[4] 宿东战役，即宿北战役。

[5] 马励武，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

歼灭八十八师主力开辟东南战场[1]

（1947年1月4日）

刘、邓，并告陈、粟[2]：

子冬电[3]悉。部署很好，望坚决执行。王仲廉王敬久[4]均向北进，利于你们歼灭八十八师。如你们能集中兵力用迂回方法歼灭八十八师主力，一可给薛岳[5]重大打击，援助陈粟；二可给你们自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3] 指1947年1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粟裕、张云逸、黎玉等的电报。电报说：1日我占聊城、巨野、嘉祥三城，我另一部在金乡外围消灭敌整编第八十八师第二十一旅第六十三团大部，敌整编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主力正赶赴金乡增援。顾祝同已令张岚峰率3个团到定陶，曹福林两个团到菏泽，归刘汝珍指挥，可能向东前进。我准备集结3万人消灭六十二旅，寻求该敌作战。王仲廉的八十五师、三十二师已占大名，今明五军将占观城、南乐，我太行部队昨夜开始伸至平汉路作战，如打得好可能调动王仲廉和王敬久。一切目的在调动王敬久，集结5个纵队寻机歼灭该敌。

[4]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

[5]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开辟东南战场。八十八师歼灭后，如刘汝珍[1]东进，则歼灭刘汝珍，如刘不进，则应乘胜攻占金乡、鱼台、成武、单县诸城，以利尔后作战。因为今后数月内你们均将在这个地区作战，你们应为开辟东南战场并在该地长期作战作出计划，尤其黄河归故后更是如此（自然黄河以北仍是机动地区）。目前顾[2]、薛均不知你们主力究在何处，歼灭六十二旅并进占金、鱼、成、单各县后情况即将暴露，那时刘汝珍不会单独东进，王敬久则必然向南转东。

军委
子支

---

[1] 刘汝珍，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八师师长。

[2] 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致陈毅、粟裕电[1]

（1947年1月4日）

（一）希望于歼灭二十六师之后，接着彻底歼灭七十七师。（二）第二步行动待此役结束后再定，但我们觉得沭阳得失无关大局，似以攻取台枣线[2]歼灭五十一师、五十九师，根本解决鲁南问题为最好。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1月2日发起的鲁南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2] 台枣线，指台儿庄、枣庄一线。

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

（1947年1月5日）

陈、粟[1]，并告刘、邓[2]及谭[3]：

支亥电[4]悉。

（一）彻底歼灭二十六师甚好甚慰，全军将士传令嘉奖。

（二）第二步歼灭冯部[5]两师四旅，估计可能用追击战方式解决一部，但要全部解决并收复峄、台、邳[6]堡垒线，或需一周以上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谭，指谭震林，当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

[4] 指陈毅、粟裕1947年1月4日23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二十六师及其快纵今日可完全歼灭，不会有多的漏网。我们已颁令进击，力争歼灭冯治安，恢复台儿庄、峄县并向贾汪、陇海东段发展，力求彻底解决鲁南之敌，造成威胁徐州形势。打冯治安后我们拟转打敌整编七十四师、十一师，并攻海州向南收复失地。

[5] 冯部，指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指挥的整编第五十九师和整编第七十七师。

[6] 峄、台，指山东峄县（今峄城）和台儿庄，现均属枣庄市。邳，指江苏邳县。

（三）上述任务完成后，鲁南全军应在峄、台、邳线附近地区休整两三星期，补充新兵，恢复疲劳，准备再战。

（四）此时薛岳[1]必从苏中、苏北抽调十个旅左右及从他处调动几个旅（例如六十四师、十四师[2]等），估计共可有十五个旅左右布防陇海线并企图恢复台、峄线，其时间约需三星期左右。

（五）在歼灭冯部，占领台、峄，并休整部队后，你们任务就是歼灭陇海线上或其南北地区新来之敌，在这一线打仗可以展开大军，打更大的歼灭战。那时你们应当集中四十个团左右兵力并有充分准备，以期一次歼敌五六个旅。

（六）因此你们在占领峄、台、邳后不要轻动，不要去打海州，也不要去打七十四师、十一师，而要休整部队，巩固胜利，并吸引七十四师、十一师（可能还有四师、四十四师等部）北上到你们面前适当地区，然后歼灭之最为有利。

（七）只有吸引敌人北上再打三四个宿东、鲁南这样的大歼灭战[3]，苏中、苏北失地才能收复。不要在未歼灭敌人主力之前过早企图收复失地，收复峄、台线之目的在于创造战场。

（八）在歼灭冯部占领峄、台后，为着创造战场之目的，可考虑歼灭五十一师，占领枣庄，前锋可过运河控制陇海线。九纵全部应

---

[1]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2] 应为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

[3] 指1946年12月中旬的宿东战役（即宿北战役）和1947年1月上旬的鲁南战役。这两次战役分别歼敌2.1万余人和5.3万余人。

去淮北睢、宿、灵、泗[1]地区恢复工作。皮旅[2]应去盐阜[3]地区，坚持工作。二师[4]、二纵、七师（共二十个团）亦应休整补充，准备参加新的大会战。沭阳暂时得失，无足轻重。总之，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望按此方针部署工作。

（九）只有一种情况才使我们放弃上述企图，现时即取南下收复失地之方针，即是蒋[5]、薛并不调动苏中、苏北之敌北上陇海线，也不从他处调兵至陇海线。但此种估计此刻似嫌过早，且陇海线暴露于我面前，为着防御该线亦是要调兵的。

军委
子微亥

---

[1] 睢、宿、灵、泗，指江苏睢宁、宿迁和安徽灵璧、泗县。

[2] 皮，指皮定均，当时任华中野战军第十三旅旅长。

[3] 盐阜，指江苏盐城和阜宁。

[4] 似应为第六师。

[5] 蒋，指蒋介石。

打王敬久部应当作一个大歼灭战来准备[1]

（1947年1月5日）

刘、邓，并告陈、粟[2]：

在你们歼灭方先觉[3]增援队之后，接着要打王敬久[4]集团，应当作一个大歼灭战来准备，即一次解决王部三四个旅。为此目的，应集中四十个团左右之兵力。苏振华[5]部现在即宜调至你们附近。

军委
子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3] 方先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

[4] 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

[5] 苏振华，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集中最大兵力彻底歼灭当面之敌[1]

（1947年1月7日）

陈、粟：

为着彻底歼灭七十七师、五十九师、五十一师，攻占邳、台、峄、枣[2]，并相机歼灭二十师及五十二师残部，攻占临韩[3]，将苏北之敌吸引至徐州以北之目的，如你们感觉现在手中兵力不够，请考虑从震林[4]那里抽调主力一部北上参战，以便集中最大兵力彻底解决问题，而沭阳则在不能保守时准备暂时放弃之。

军委

虞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邳，指江苏邳县。台、峄、枣，指山东台儿庄、峄县（今峄城）和枣庄。

[3]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今山东微山县东南。

[4]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正率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七师、第二纵队、第九纵队及第十三旅等部在江苏沭阳地区作战。

电贺华中民主联军举义一周年[1]

（1947年1月8日）

华中民主联军郝总司令毕副总司令勋鉴暨全体将士均鉴：

贵军成立周年，特致热烈之祝贺。望共同努力，彻底粉碎蒋介石之进攻，以促和平民主新中国之实现。

毛泽东
朱　德
八日

---

[1] 1946年1月5日，国民党军郝鹏举部（原属西北军）2万多人在台儿庄地区起义，被编为中国民主联盟军。这是毛泽东在该军举义一周年之际，和朱德联名发去的贺电。

歼灭冯治安部后再行决定打欧震[1]

（1947年1月10日）

陈、粟：

（一）当面敌军分布及战况如何。（二）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歼灭冯[2]部并夺取峄枣[3]，则可推迟十一师前进时间，以利部队获得休整，然后再打十一师。（三）李延年欧震[4]两军相当强大，震林[5]所部准备打欧震，此时是否合宜，是否暂时不打，待打冯结束后再行决定为宜。（四）刘邓在鱼台胜利[6]对你们帮助极大。

军委

子灰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冯，指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

[3] 峄枣，指山东峄县（今峄城）和枣庄。

[4]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九军军长。

[5]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正率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七师、第二纵队、第九纵队及第十三旅等部在江苏沭阳地区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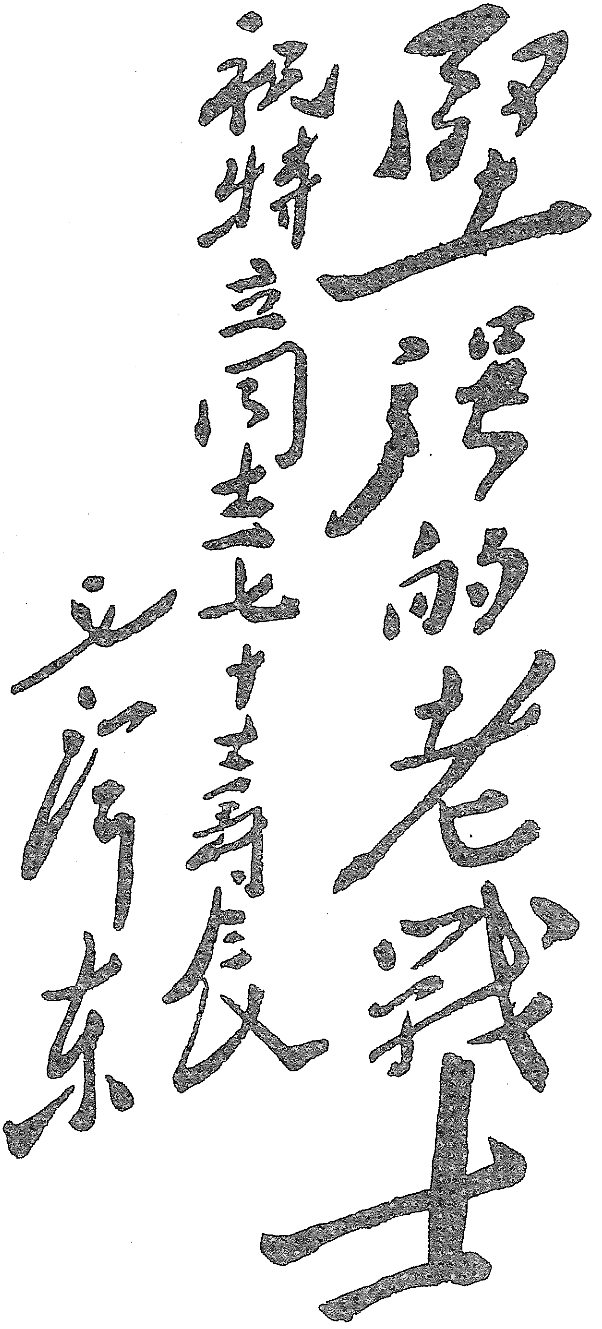
[6] 指1947年1月7日至9日，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山东鱼台县西北胡海子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第六十二旅、第七十师第一四〇旅大部的胜利。

为徐特立七十寿辰题词

（1947年1月10日）

坚强的老战士，祝特立同志七十寿辰。

毛泽东



坚强的老战士

祝特立同志七十寿辰

毛泽东

毛泽东为徐特立七十寿辰的题词。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1月10日）

（一）歼灭一四〇旅、六十二旅各一部甚慰，如能歼灭该两旅全部开辟东南战场，于大局有利；（二）此战结束后，望相机攻占金、鱼、城、单、丰、沛[2]诸城全部或大部或一部；（三）迅速集中最大兵力（四十个团左右），准备打大歼灭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2] 金、鱼、城、单、丰、沛，指金乡、鱼台、城武（今成武）、单县、丰县、沛县。

围城打援是歼敌的重要方法之一

（1947年1月11日）

林、高、彭[1]：

（一）最近北满、东满[2]开始打胜仗，甚慰。包围其塔木一点引起九台、吉林、德惠三处之敌无计划的增援，均被我歼灭或击溃[3]。这一经验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利用结冰时期有计划地发动进攻，普遍寻找敌之薄弱据点，采用围城打援方法，大量歼敌，转变敌我形势，甚为必要。

（二）南满[4]四纵二十天敌后作战经验亦指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他们还要勇敢一点，要敢于进攻一营两营驻守之敌而歼灭之，并且每次均一定要准备打援兵。

（三）关内几个主要战场，我军开始取得主动，并日益发展成为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高、彭，指高岗、彭真，当时均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2] 指东北民主联军北满军区和东满军区。

[3] 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为配合南满的作战，以一部包围吉林以北其塔木要点，主力分别在张麻子沟、焦家岭歼灭自九台、德惠来援之敌，最后乘胜攻歼其塔木之敌，先后歼灭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

[4] 指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军区。

大歼灭战。蒋介石的主要力量（薛岳[1]八十个旅，顾祝同[2]三十个旅，胡宗南[3]二十四个旅，共计一百三十四个旅）大批被歼灭。全国计算，六个月零十天共已歼敌正规军五十一个旅，至今年七月可能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根本转变敌我形势。在此种情况下，迫使蒋介石以全力对付陇海线各战场，不可能向东北增兵；只要你们能用一切方法将杜聿明[4]现有力量（五个军十五个师及技术兵种、保安部队等）加以削弱，例如平均每月歼敌一个师（相当于关内之旅）以上，一年内歼敌十二个师以上，就可使自己转入有利地位。如此打两三年（因敌被歼后又可补充），就可从根本上转变敌我形势，并建立巩固根据地。

军委
子真

---

[1]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2]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

宜加紧补训不必急于打仗[1]

（1947年1月11日）

陈、粟，谭、张：

灰电悉。沭阳失守无关大局，且有利于引敌北上作战。但目前谭张所部似宜加紧补训，不必急于打仗，待峄枣战役[2]结束（部队亦需短期休整），欧震[3]等部超过沭阳、东海之线向北，那时可以考虑集中最大兵力歼灭欧震集团。究应如何，请按实情酌定。

军委
子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和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张元寿的电报。

[2] 1947年1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在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大部和第一快速纵队后，乘胜攻击山东峄县（今峄城）、枣庄之整编第五十一师及第二十六师残部。11日攻克峄县，20日攻克枣庄。

[3]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九军军长。

歼灭邱清泉军的几个办法[1]

（1947年1月12日）

刘、邓：

（一）你们鱼台胜利，陈粟又克峄县[2]，并可即克枣庄，形势极为有利。（二）邱军[3]不顾你们在徐州西北之行动，既占观城，又占范县，是否意在威胁我后方，调动我主力回援，解除徐州、陇海之威胁。对付该军有几个办法：甲、让邱军进至嘉巨[4]地区而后歼灭之；乙、邱军被迫回至菏泽（此种可能是有的），待其由菏泽东进而后歼灭之；丙、我军至范县地区歼灭之。以上究以何者为宜？（三）金、成、鱼、济[5]等县是否可能攻克一二处？（四）一七两纵何时可向嘉巨集中？

军委
子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峄县，即今山东枣庄市峄城。

[3] 邱军，指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4] 嘉巨，指山东嘉祥和巨野。

[5] 金、成、鱼、济，指山东金乡、成武、鱼台和济宁。

攻临城时准备歼灭增援队[1]

（1947年1月14日）

陈、陈、粟：

文电[2]悉，计划甚好。鲁南胜利，局面打开，我已夺取主动，敌已陷于被动。数部敌军正向徐州附近调动，如我攻占临城[3]，还可能有几部敌军被调北上，利于我以鲁南为基地各个歼灭之。你们攻临城时仍须集中优势兵力，准备歼灭六十四师之增援队。临城作战完毕，如南面敌军未动，全军休整两三星期，极为必要。新兵补充是否有办法，俘虏兵可否大量补入部队，先补后训，以期迅速。

军委

寒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陈士榘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7年1月12日15时陈毅和陈士榘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现计划继续留在临枣线作战，以调动薛岳在徐州集结兵力。打下枣庄之后，相机打击临城川军3个团，如整编第十一师、冯治安部、整编第六十四师来增援，则就地歼灭之；不来增援，则就地整训，准备大战。

[3] 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

给陈瑾昆[1]的信

（1947年1月16日）

瑾昆同志：

大示诵悉。从新的观点出发研究法律，甚为必要。新民主主义的法律，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的法律相区别，另方面，又与欧美日本一切资本主义的法律相区别，请本此旨加以研究。目前美蒋所提和谈，如过去一切和谈一样，全属欺骗性质，因其军事失败，企图取得休息时间，整军再战，我们切不可上当。敬复。顺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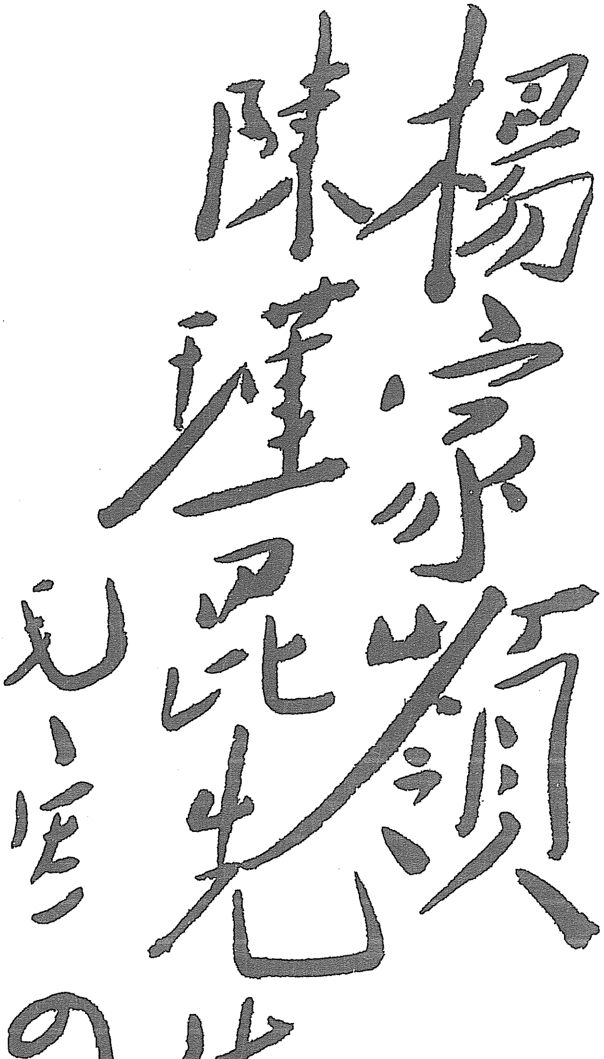
健康!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

[1] 陈瑾昆（1887—1959），湖南常德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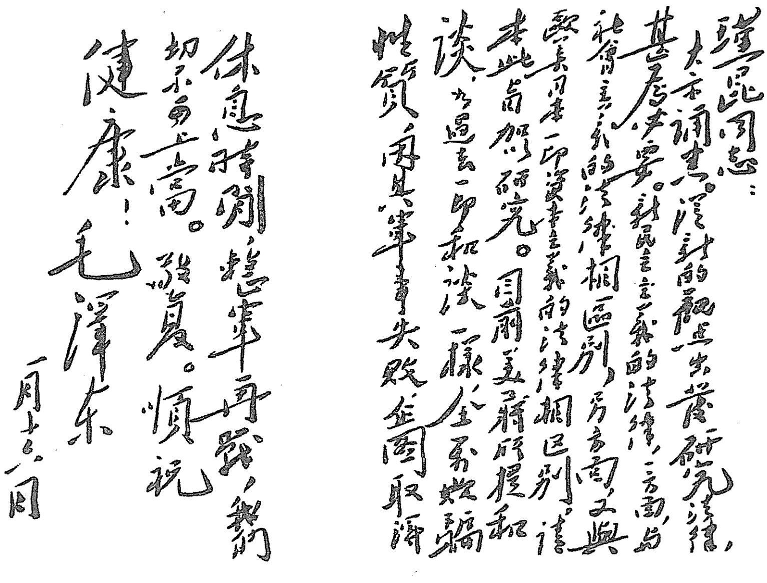


楊家嶺

陳瑾昆先生

毛澤東

毛泽东致陈瑾昆信的信封。



瑾昆同志：

大示誦悉，從新的觀點出發研究法律，甚為必要。新民主主義的法律，一方面，與社會主義的法律相區別，另方面，又與歐美日本一切資本主義的法律相区別，請本此旨加以研究。目前美蔣所提和談，與過去一切和談一樣，全系欺騙性質，因其軍事失敗企圖取得休息時間，整軍再戰，我們切不可上當。敬覆。順祝

健康！

毛澤東

一月十六日

毛泽东致陈瑾昆信的手稿。

攻克枣庄并准备歼灭欧震部[1]

（1947年1月17日）

陈、陈、粟，并告华东局：

铣电[2]悉。（一）攻克齐村[3]，甚慰。再以数天时间攻克枣庄甚为必要。（二）枣庄攻克后，似宜拆毁大部分堡垒，留下一部分堡垒派兵固守。峄县[4]亦如此做。你们打欧震[5]时利用这些堡垒防御冯治安胡琏[6]可能的进攻，以便取得时间，打完欧震，再打冯、胡。（三）除攻枣庄之四个团外，其余休整已一星期，震林[7]指挥各部则已休整近一个月，大约再有一星期至十天左右时间，即可开始打欧战役。望抓紧此点速作准备，新兵补充愈快愈好。（四）你们应以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陈士榘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7年1月16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叶纵一部今晨攻克齐村，守敌第一一三旅旅部及一个团全部就歼，俘正副旅长以下2000余人，毙500余。现我陶师一部正向孤守枣庄残敌围歼中。

[3] 齐村，镇名，位于今山东枣庄市中部。

[4] 峄县，即今山东枣庄市峄城。

[5]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九军军长。

[6]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7]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

灭欧震六个旅至八个旅为目标，集中四十五个团左右，事先开一干部大会（半天至一天开完），准备以连续多日之战斗，打更大之歼灭战。

军委

十七日

致陈毅、粟裕电[1]

（1947年1月17日）

陈、粟：

如果你们感觉打欧震需要集中更大兵力，则四九两师可否留下一个师，打完欧震再回鲁中，即使泰安失守也不要紧。

军委

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全力歼击欧震军开辟南进道路[1]

（1947年1月18日）

陈、陈，粟、谭：

毫无疑义，薛岳[2]必和我军争夺陇海台枣[3]两线，你们必须准备在这两线打几个大歼灭战，开辟向南进攻的道路。目前除以一部打枣庄外，主力立即准备打欧震[4]，以歼灭欧部八个旅为目标，务于一星期内准备完毕。待欧震进至陇海线，即举全力歼击之。此项准备工作愈早完成愈好。

军委

子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参谋长陈士榘和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

[3] 台枣，指山东台儿庄和枣庄。

[4]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九军军长。

夺取平介灵霍巩固孝义[1]

（1947 年 1 月 18 日）

陈、谢，王、彭，并告贺、李[2]：

（一）攻克孝义甚慰。（二）如平、介之敌向你们攻击，你们可于野战中歼灭之而后夺取平、介，如平、介之敌不动，你们即应攻击介休，调动平遥及灵、霍[3]之敌增援而歼灭之，然后逐一夺取平遥、灵、霍，如此则孝义可巩固。如你们不打平、介、灵、霍而打汾阳，则孝义必失守。你们打汾阳，应在平、介、灵、霍大胜之后。

军委
子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和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副司令员彭绍辉的电报。

[2]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灵、霍，指山西灵石和霍县。

乘胜展开攻势收复失地创造机动战场[1]

（1947年1月18日）

刘、邓，并告陈、粟[2]：

你们已击破方先觉刘汝珍两部[3]，形势极为有利。望乘胜展开攻势，向你们附近广大地区敌占据点中一切较薄弱可攻取者广为攻取，不论敌正规军、伪军、民团广为歼灭，收复大批失地，并不被铁路所限制。路北[4]扫荡一时期，即可越过路南攻占大批县城市镇，北面有隙可乘又过路北行动，根本不被邱[5]军所牵制。如邱军南下向你们求战而又好打，则集结全力歼灭邱军，仍继续执行上述任务；如不好打，则以一部钳制之，主力仍找好打之敌去打。如此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即可将路北、路南广大地区创造为机动战场，以便吸引邱军及其他薛顾[6]主力来此而歼灭之。大约在今年五月间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

[3] 方先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八师师长。刘汝珍，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八师师长。

[4] 路北，指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以北。

[5]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

[6] 薛，指薛岳，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力即可向中原出动，我五师在陕南、豫西、鄂西非常困难，如你们出动过迟即有失败之危险。

军委

子巧亥

抓住时机攻占豫东淮北收复失地[1]

（1947年1月19日）

刘、邓：

路北[2]局面业已打开，形势极好。为着歼敌大批有生力量，壮大地方兵团，创造战场，孤立敌人主力，以利最后歼击之目的，利用王敬久、王仲廉、孙震[3]三部均在黄河以北及张岚峰[4]被我俘虏之机会，请考虑休整数天后，大举向路南行动一次，以四五星期时间，攻占豫东、淮北大批可能攻克之城镇，收复大批失地。四五星期以后王敬久部势必被迫南调，那时依情况好打则就地打王部，不好打，转回路北，继续找弱点打。是否可行，望斟酌电告。

军委

子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路北，指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以北。

[3] 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4] 张岚峰，原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暂编第四纵队司令，1947年1月13日在山东成武被俘。

准备充分后再打欧震[1]

（1947年1月19日）

陈，粟、谭：

前电要你们迅速准备打欧震[2]，但欧震集团北进甚速，数日内即将占领陇海线。如果各部准备不及，不能歼敌于立足未稳之时，则率性推迟至两星期以后发起歼击，以期准备充分，一举解决欧军大部至全部似较有利；仓卒去打，只能歼灭一部，又要休整方能再战，不如准备充分再打为宜。二十六师进占向城、兰陵二十天后，我军仍能于两日内攻歼，即是一证。如何，望你们按情酌定。

军委

子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九军军长。

打欧震务必集中五十个团于一个战场[1]

（1947年1月21日）

陈、粟、谭：

（一）枣庄攻克，五十一师全歼，甚好甚慰。望对有功将士予以嘉奖。（二）从攻克枣庄翌日起，全军整训两星期，集中一切力量歼灭欧震。（三）三十五天内你们歼灭第六十九、第二十六、第五十一等三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中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2]牵制了我军二十个团以上，否则胡琏冯治安[3]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五十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对台徐临方面仅用地方游击队监视之即可。

军委

子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1947年1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山东军区和华东军区合并组成华东军区。

[2]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

[3] 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

不要位于敌诸路之合击点上[1]

（1947年1月22日）

陈、谢：

你们现在何地与阎[2]军作战，照来电是采取防御方针，而不是采取进攻方针，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诸路中之一路而迅速解决之，不要位于敌诸路之合击点上，而要位于敌之一翼。情况如何，望续告。

军委

二十二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不被敌牵制找敌弱点打[1]

（1947年1月22日）

刘、邓、张，并告陈、饶，粟、谭[2]：

养电悉。完全同意你们意见，小平带两纵南下，其余在路北不被邱军[3]牵制，完全主动地找弱点打，准备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达到削弱敌人创造战场之目的。对张岚峰[4]部之处置，可照来电所述办法相机处理，以有利于解决问题为原则。

军委
养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副政治委员张际春的电报。

[2]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邱军，指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4] 张岚峰，原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暂编第四纵队司令，1947年1月13日在山东成武被俘。

注意多打歼灭战少打击溃战

（1947年1月23日）

文、汪[1]：

你们集中主力行动并已打了一个胜仗，甚慰。关于作战方法，请你们严重注意多打歼灭战，少打击溃战。打歼灭战的条件有二：（一）集中优势兵力包围敌军一部，每一仗只打一部分敌人，切不可同时打几部分敌人；（二）以主力打迂回，以一部打正面，切不可以一部打迂回，以主力打正面。你们如能实行上述两个条件，多打歼灭战，形势就会好转。

军委
子漾

---

[1] 文，指文建武，当时任鄂豫陕军区司令员。汪，指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当时任鄂豫陕军区政治委员。

准备于五月开始转为外线作战[1]

（1947年1月24日）

陈、饶及华东局，并告刘、邓[2]：

我们已令刘邓缩短内线作战时间至四月底为止，准备五月开始（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向中原出动转变为外线作战。华东方面亦请按此计划办理，努力争取于五一以前在内线解决蒋军主力，并完成外线作战的一切准备条件（弹药、新兵、干部、经费等）。

中央
子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及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春节宴请延安附近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时的讲话[1]

（1947年1月24日）

积极生产、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婚嫁丧葬事宜不要铺张。

我们好比爬山，已经快攀登到山顶，去年的困难已经克服，但对于在政治上破坏“政协”，军事上破坏“停战令”，进攻我们的蒋介石，定要坚决粉碎其进攻，争取全国和平。

---

[1] 1947年1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设宴招待附近地区劳动英雄、居民及驻军干部。这是毛泽东在宴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董必武、王炳南电[1]

（1947年1月24日）

（一）目前情况下董暂在上海工作，不要回宁；（二）王亦不要去看美蒋两方的人，对他们表示冷淡；（三）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2]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3]（最低限度）不能开谈。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董必武、王炳南并告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董必武，当时任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并负责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王炳南，当时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外事工作。

[2] 四条，指蒋介石1947年1月16日提出的重新恢复谈判的四项条件：（一）国民政府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去或是邀请共产党派一个代表团到南京来，或同意在任何双方可以接受的地点举行圆桌会议；（二）政府与共产党方面应立即颁布停战命令，并商讨该命令的实施问题；（三）政府愿意根据三人小组会议的原则，重新讨论有关整编军队与恢复交通的实际的计划；（四）政府表示愿意对于发生争执的地区的政治管辖问题与共产党方面立即达成一项协议。

[3] 两条，指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恢复谈判的两项条件：（一）废除违反政协决议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二）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的军事位置。

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1]

（1947年1月25日）

聂、萧、罗：

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钳制敌之其他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面。（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希望你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军委

子有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和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驳斥国民党中宣部声明，所谓和平方案全系欺骗[1]

（1947年1月25日）

【新华社延安二十五日电】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今日就二十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声明加以驳斥如下：

国民党中宣部声明的全部内容，是拒绝中共恢复和谈的两个条件，即拒绝取消蒋介石伪宪与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而提出所谓“和平方案”四条。这四条已于二十三日由蒋介石经美方转交南京中共办事处，所以是蒋介石的提案。就蒋介石这一行动本身来看，就可以知道所谓“和谈”完全是欺骗，所谓四条是用来拒绝真正和谈的先决条件的。既然不要真正可以保障和平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又有什么诚意可言，又有什么和谈可言？

陆部长指出：取消蒋介石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是必须做到与完全做得到的。

蒋介石既然能够以强迫和欺骗种种方法把他的兵力百分之九十调来进攻解放区，有何理由不能在和平的需要之下把这些军队调回

---

[1] 此稿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审阅修改过，由新华社播发。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原防？人民解放军俘获的蒋介石进犯军，已达三十余万人，上自军长师长，下至士兵，人人都说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都极愿和平回到原地去，蒋介石有何理由硬要把他们放在内战中当炮灰？所谓“越时经年，彼此位置变动甚大”，因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实际上办不到等等，岂不是明明白白骗人么？

国民党中宣部声明中拒绝恢复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的另一“理由”，是“政府已经收复之地区，如一经撤退，则该区人民之生命财产即无所依托”。这是十足的谎话。蒋军占领了解放区一百六十余城市，十七万九千多平方公里土地，那里有二千余万解放区人民，等于半个法国的人口。在蒋军侵占以前，那里的农民已实现耕者有其田，民主政府已建立，汉奸已惩办，各阶层人民已安居乐业，没有灾荒，没有经济危机。蒋军侵占之后，农民的土地被没收，法西斯的特务恐怖代替了民主政治，汉奸恶霸回来并由蒋政府封官进爵，蒋官蒋军烧杀奸淫，横征暴敛，抽丁派粮，贪污横行，二千余万人民重新受到蒋介石独裁的无边苦难。蒋介石的确尽情的“保护”了汉奸、特务、恶霸、赃官，哪里有一分钟保护过人民的生命财产？正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蒋军非由全部侵占区退出不可！

在蒋介石的“和平方案”中，提出所谓“现地停战”。大家应记得：现地停战，从去年一月停战令以来，已有三次。一月停战令是第一次,三月二十七日东北停战协定是第二次，六月现地休战谈判是第三次，每次都是中共方面极度让步，但让步的结果是蒋介石一连三次的破坏。难道中国人民真是一群阿斗，以后还要给蒋介石来一个第四次现地停战，以便蒋介石再作第四次的破坏，便于他将所有解放区消灭干净么？谁人能够担保他不这样做？现在国民党的所谓“现地停战”，乃是蒋介石全部撕毁停战令与政协决议，放手发动空

前内战之后的“现地停战”。这就是要中国人民承认他背信弃义地违反协议以武力造成的结果，从而鼓励军阀实行武力统一的迷梦，鼓励反动派放肆撕毁一切信义大打内战。蒋介石口口声声“政治解决”，但他实际行动，却是“军事解决”。中国人民如果同意这点，以后还有什么和平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如果同意了这点，它又怎样向人民交代？中国共产党为了祖国的国内和平，为了祖国人民的福利，决不能够承认蒋介石如此违法以武力造成的结果，因此绝对不能同意所谓“现地”而实际上是企图消灭全部解放区的“停战”。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非完全恢复不可，蒋介石违法调动的百分之九十的蒋军非一个一个退返原来驻地不可。不如此，和平绝无保障。

至于蒋介石“和平方案”中第三第四条，如整编军队、恢复交通、地方政权等等，以前不知提过多少回，谈过多少次，但是或则毫无结果，或则有了结果也被蒋介石撕毁。在蒋介石取消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以前，这些问题根本谈不上。因此，蒋介石“方案”中第一条，所谓“政府愿意派员商谈，以至举行圆桌会议”，在中共两项条件未得实现前，并无必要。蒋介石提出这些题目作为“方案”，其目的仅在空洞搪塞，以便骗人而已。

陆定一部长指出：蒋介石的伪宪，也是必须取消和可以取消的。自民国以来，这是第三个伪宪了。既然袁世凯和曹锟的两个伪宪都取消过，为什么蒋介石的伪宪就取消不得？蒋介石既然背信弃义地违反政协决议，单方面召集“国大”，通过伪宪，人民就有理由命令他取消这个伪宪。

国民党中宣部声明，说什么这个蒋记伪宪“中共实无理由加以反对”。那么试问，蒋介石又有何理由制造出这个伪宪来呢？试问，中国人民从前反对过袁世凯和曹锟的伪宪，又有没有理由呢？蒋介

石既然制造了这个伪宪，不把它取消掉，就是承认法西斯独裁，承认军阀毁法乱纪，还有什么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可言？所以伪宪非取消不可。

蒋介石擅自召开的“国大”，不论中外，绝大多数舆论，都一致唾骂。中共和各方民主人士，老早就忠告蒋介石不要开什么一党非法的分裂的“国大”，蒋介石偏偏不听。蒋记“国大”开幕之后，我们又忠告他，叫他解散，他又不听。蒋介石这样横行无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许，中国人民及真正民主人士绝对不承认这个非法的分裂的“国大”为有效的。

至于蒋记“国大”的代表，大部分是十年前由指定圈定贿选舞弊弄出来的，一部分是蒋介石及其帮闲们临时“增补”的，里面还有汉奸，比曹锟时候的猪仔议员还要丑，哪里是什么“全国各民族各省市各职业代表”？蒋介石的伪宪，其草案几时由政治协商会议最后审查过？其中的主要原则问题，如人民权利，少数民族自治，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地方均权等，哪里符合于“政协协议原则”？蒋介石不肯取消这样丑恶的法西斯的伪宪，才是“固执己见”，贻祸全国，背叛人民，背叛民族，决心反动到底呢！

陆部长又指出：取消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乃是最低限度的和谈先决条件。这所以是最低限度的条件，因为蒋介石已经干净撕毁了四项诺言，停战协定、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召集了非法“国大”，订立了卖国的中美商约，发动全国大打，侵占了那样多的解放区。蒋介石干了这样许多无法无天的事情，再要和谈，当然不能不实行几个先决条件，否则谁能相信他有丝毫诚意？照法理来说，应当把国民党的一切好战分子当作战犯惩办，把破坏政协的

国民党反动分子和特务分子当作法西斯惩办，把签订中美商约的国民党政府负责人员当作卖国贼惩办，并赔偿全国人民与解放区人民因蒋介石发动内战而受到的浩大损失。这些公平合理的要求，我们都还没有提出，仅仅提了取消伪宪和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两条，对于蒋介石岂不是宽大到了极点么？一年以来，蒋介石无法无天，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如果连我们所提最低限度的两条都不要他实行，把过去的罪恶一概不算，“现地停战”下来，让他得到休整时间，巩固侵占地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取得美国政府五万万或更多的借款和军火援助，有了再来大举进攻的力量，那时蒋介石还必定要更加无法无天。“殷鉴不远”，就在去年。所以，我们不要民族独立国内和平与民主自由则已，如果还要独立和平民主，则一定要蒋介石实现取消伪宪与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军事位置两条，不达目的决不能休止，一切欺骗都是无用的。现在蒋介石既然拒绝这两条，悍然提出欺骗的“和平方案”来对抗，则一切后果，当然由蒋介石负责。

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1]

（1947 年 1 月 27 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二十六电[3]悉。（一）先打右翼较弱之敌很好。胜利后，如七十四师、十一师未动，可再打左翼六十四师、二十师及中间七十七师、五十九师、八十三师等部，使七十四师、十一师、七师完全孤立，然后相机歼灭之。总以多打弱敌孤立强敌为原则。（二）部队休整情形如何，似宜再休息十天左右。（三）刘邓已占定陶，切断陇海阻止五军当无问题。

军委

子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 1947 年 1 月 26 日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敌集结在陇海、新安镇一线者 17 个旅，集中在临城至台儿庄者 8 个旅。我正商决先打右翼敌整编第二十五、第六十五两师，再引诱整编第七十四、第十一师北进以歼击。建议刘邓军切断铁路拖住敌第五军一个时期，使我能于 2 月初取得第一步胜利，尔后作战才易于得手。

对粉碎陈诚进攻计划的意见[1]

（1947年1月28日）

陈、粟、谭：

你们是否得到消息，陈诚[2]直接指挥之进攻将于不久时间发动？其进攻兵力现在徐海徐临两线[3]二十几个旅中，能使用于第一线者，似不会超过十八个旅，其中只有六个旅是较强的。你们是否觉得陈诚还要等候从他处调集兵力方能举行进攻？如果陈诚之进攻确将于二月上旬或中旬举行，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一可使我军获得充分休整时间；二可打敌立足未稳；三可连续作战歼灭多数之敌。但如敌进攻时间推至二月底或三月初，则我军自不宜等候太久。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你们是否认为歼灭该两师并不困难？又打该两师时七十四及八十三师势必增援，我军可能于歼灭该两师后，接着歼灭七十四及八十三师之一部至大部。如此则陈诚之进攻计划根本被破坏，尔后我军将对冯治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3] 指徐州至海州（今属连云港市）和徐州至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的铁路。

胡琏[1]及六十四师、二十师等逐一采取阵地攻击之方针，此种情形亦须估计到。请将你们意见电告。

军委
子俭

---

[1]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一师师长。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1]

（1947年1月28日）

攻克曹、单甚慰。望乘邱军尚未到达之际，攻占铁路一段，调动商丘七十五师增援而歼灭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继续发展豫皖边战役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晋冀鲁豫野战军陇海路北集团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晋察冀上半年应基本解决平汉线上蒋系各军[1]

（1947年1月29日）

聂、萧、罗、刘、黄：

（一）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等部[2]，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二）你们已在平汉线[3]取得主动，望在今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以便下半年主力转入平绥线[4]解决傅作义[5]。

军委

子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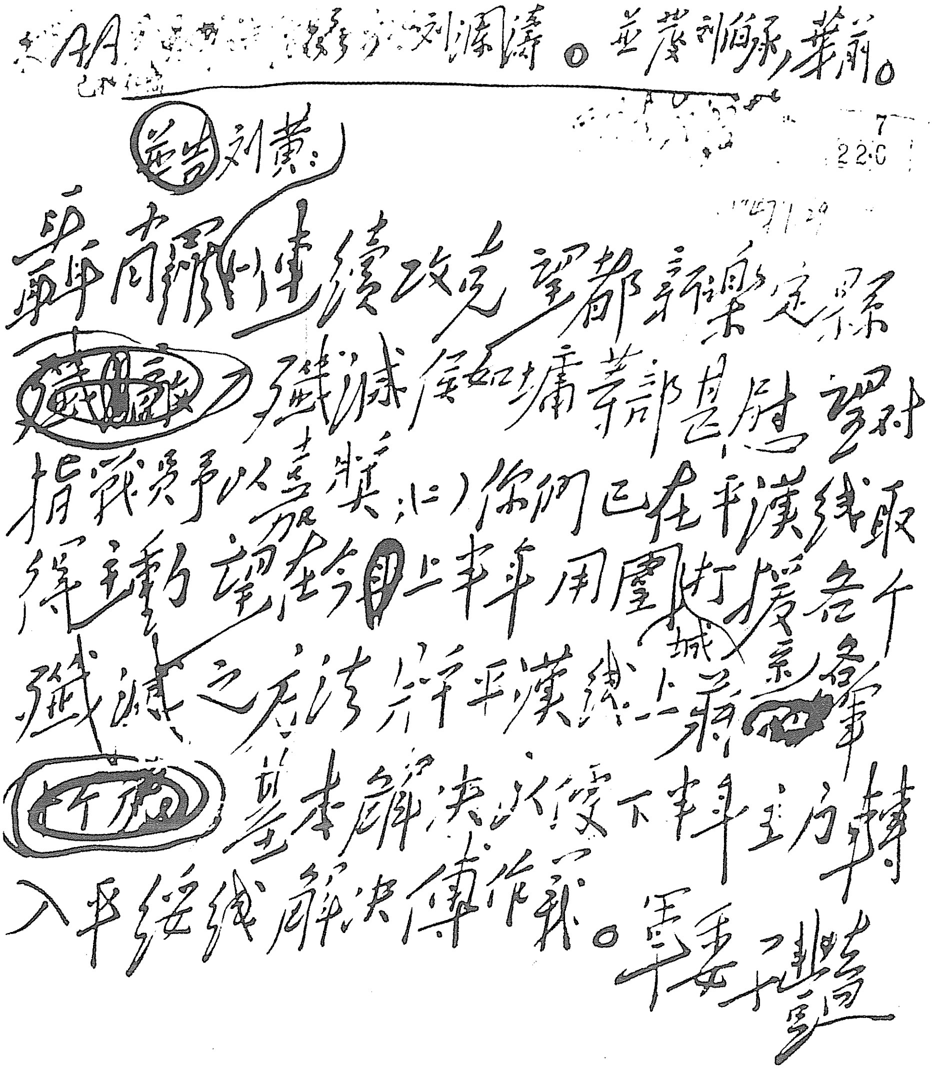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和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刘澜涛、黄敬的电报。

[2] 1947年1月20日至28日，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发起保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两个营和保安第五总队侯如墉部4个团共8000余人，攻克望都、新乐、定县三县。

[3]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4]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



聂荣臻、刘澜涛。并发刘伯承、萧前。

并告刘黄：

（一）南线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敌侯如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二）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年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敌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以便下半年主力转入平绥线解决傅作义。

军委子皓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晋察冀上半年应基本解决平汉线上蒋系各军》的手稿。

为朱宝庭题写挽词[1]

（1947年1月29日）

工人阶级的英雄。

---

[1] 朱宝庭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参与领导过香港的两次大罢工。1935年因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出狱后到延安。1947年1月因病去世。1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为之举行追悼大会。这是毛泽东为朱宝庭题写的挽词。

力争三至四个月内歼灭董钊四五个旅[1]

（1947年1月30日）

滕、薄、王，陈、谢，王、孙[2]，并告贺、李，王、彭[3]：

（一）胡宗南[4]令董钊[5]集中二万人于临汾，准备机动，估计可能向临汾以东举行攻势，董军各部正向临汾移动中。（二）四纵及二十四旅结束打阎[6]战役后，开至平介[7]以东地区补充新兵，休整一个月，准备打董钊主力，力争于三至四个月内歼灭董钊四五个旅，准备尔后向中原出动。（三）王孙所部十二旅及新组成之旅应即接受陈谢统一指挥对董钊作战。（四）十二旅现在何处，该旅不宜他调。

军委

子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代远、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和第二副司令员王宏坤等的电报。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孙，指王新亭、孙定国，当时分别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3]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彭，指王震、彭绍辉，当时分别任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

[6]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7] 平介，指山西平遥和介休。

复陈赓、谢富治、王新亭等电[1]

（1947年1月30日）

同意四纵及二十四旅转移至平、介以东，补充新兵，整训一个月。王、彭、罗[2]率吕梁各部坚持吕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陈赓、谢富治、王新亭并告贺龙、李井泉电的主要内容。王新亭，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太岳军区司令员。

[2] 王、彭、罗，指王震、彭绍辉、罗贵波。

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1]

（1947年1月31日）

陈、饶、粟、谭：

蒋介石企图于三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2]以前击败我军。据南京息，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3]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似宜待其进至郯马以北发起全力歼击，可连续打数个大歼灭战，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动地位，丝毫不陷于被动（如打得太早即有打成胶着陷于被动可能）。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决定。此外，后方机关须迁至安全地点，临沂须准备万一失去。许世友王建安[4]野战军须立即组成，开至胶济路南待机歼敌，以对付蒋方南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应为四国外长会议。1947年3月10日至4月24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问题的第四届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处理德国问题。但亦曾建议对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协议的执行情况加以讨论。

[3] 郯马，指山东郯城和位于郯城西北的马头镇。

[4] 许世友，当时任胶东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当时任鲁中军区司令员。194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华东军区的报告，同意以胶东、鲁中部队组织胶济野战军，许世友任司令员，王建安任政治委员，作为胶济线突击兵团。后王建安、许世友两部分别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第九纵队。

夹击之计。总之，此次蒋军孤注一掷，我军必须有全盘计划，准备以连续作战歼灭其十个旅左右，便可彻底打破其进攻，而这是完全有把握的。

军委
子世

1947年初，毛泽东在延安。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

（1947年2月1日）

（一）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二）目前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七个月作战，已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五十六个旅，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被歼灭的大量伪军和保安部队，被击溃的正规军，都未计算在内。蒋介石的攻势，在鲁南、鲁西、陕甘宁边区、平汉北段和南满等地虽然还在继续，但是比较去年秋季已经衰弱得多了。蒋军兵力不敷分配，征兵不足规定数额，这同他的战线之广和兵员消耗之多，发生了严重的矛盾。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最近在苏北、鲁南、鲁西、晋西等地几次作战中，许多蒋军部队士气的下降已到了很大的程度。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预料今后数月内可能达到歼灭蒋军连前共计一百个旅的目的。蒋介石共有正规军步骑九十三个师（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一百九十一万六千人，伪军、警察、地方保安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后勤部队和技术兵种等，都未计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在内。进攻解放区的为七十八个师（军），二百一十八个旅（师），一百七十一万三千人，约占蒋军正规军兵力百分之九十。留在蒋管区后方的仅十五个师，三十个旅，二十万三千人，约占百分之十。因此，蒋介石不可能再从他的后方调动很多有战斗力的军队向解放区进攻。进攻解放区的二百一十八个旅中，被我歼灭者已超过四分之一。虽然有些部队在被歼灭后又以原番号补充恢复，但其战斗力很弱。有些补充后又被歼灭，有些则根本没有补充。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连前共达一百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三）同时，蒋介石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因国民党压迫摊贩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1]和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因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2]，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涨。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已向全国各大城市发展，参加人数达数十万，超过“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3]的规模。

---

[1] 从1946年8月起，上海国民党当局禁止黄浦、老闸两区的摊贩营业，至11月下旬，拘捕和拘押继续营业的摊贩近千人。摊贩于11月30日举行3000余人的请愿游行，并包围黄浦区警察局。国民党当局下令开枪镇压，摊贩死7人，受伤被捕者甚多。12月1日，摊贩请愿游行队伍增至5000余人，继续进行斗争，当日又被杀10人，受伤百余人。上海全市商店曾经停业表示同情。这样就形成了全市性的反蒋群众运动。

[2]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京大学一名女生的事件。12月30日至1947年1月，国民党统治区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为此相继罢课，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参加这一运动的学生人数在50万以上。

[3] 指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

（四）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

（五）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还在前年四月，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即曾预见美蒋实施这些反动政策的可能性，并为战胜这些反动政策而制定了完整的和完全正确的政治路线。

（六）美蒋的上述反动政策，迫使中国各阶层人民处于团结自救的地位。这里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它和抗日时期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不但规模同样广大，而且有更加深刻的基础。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1]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对人民利益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后，

---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解放区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仍将受到保障。

（七）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施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由于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在著名的卖国条约——中美商约[1]中同美国的帝国主义资本相结合，使恶性通货膨胀迅速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于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分子日益丧失了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毫无财产的人，罢工，罢课等项斗争因之不断发生。中国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已经威胁着各阶层人民。蒋介石为了继续内战，恢复了抗日时期极端恶劣的征兵、征粮制度，这将迫使广大的乡村人民首先是贫苦农民不能生活，因而民变运动已经起来，并将继续发展。这样，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就将在广大人民面前日益丧失自己的威信，遭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这个形势，一方面推动蒋管区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日益向前发展，另方面影响蒋军士气更加下降，增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的可能性。

---

[1] “中美商约”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这个大量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共有30条，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美国人有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慈善事业，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得与中国人享受同样待遇。第二，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第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八）以孤立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为目标而召开的蒋介石的非法的分裂的国民大会及其所制造的伪宪法，在人民面前没有任何威信。它们没有使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陷于孤立，反而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自己孤立起来。我党和其他民主势力采取了拒绝参加伪国大的方针，这是完全正确的。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已将青年党、民社党[1]两个历来在社会上毫无威信的小党派和某些所谓“社会贤达”[2]拉拢到自己方面，并且中间派队伍中预计今后还可能有一部分人投到反动派方面去，这是因为中国民主势力日益壮大和反动势力日益孤立，所以敌我两条阵线不得不划分得这样清楚。一切隐藏在民主阵线中欺骗人民的分子，最后都将露出自己的原形而为人民所唾弃，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队伍则将因为同隐藏的反动分子分清了界限，而更加壮大起来。

（九）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人民的斗争，极为有利。苏联力量的增长及其外交政策的胜利，世界各国人民的日益左倾及其反对本国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斗争的日益发展，这两大因素，已经迫使并将继续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日益陷于孤立。如果再加上无可避免的美国的经济危机这一因素，必将迫使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更加处于困难地位。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

---

[1] 青年党，即中国青年党，1923年成立。民社党，即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年8月由中国国家社会党和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主要成员都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它们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1946年11月参加了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这次国民大会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2] “某些所谓社会贤达”，是指那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而为蒋介石的“国民大会”粉饰门面的无耻之徒，如王云五、傅斯年、胡政之等。

强大仅仅是暂时的，他们的进攻是可以粉碎的。所谓反动派进攻不能粉碎的神话，在我们队伍中不应有它的位置。中央曾经多次指出这一点，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日益证明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十）为着取得休息时间补充军队，重新进攻，为着向美国取得新的借款和军火，为着缓和人民的愤怒，蒋介石又在施行新的骗术，要求和我党恢复所谓和谈[1]。我党方针是不拒绝谈判，借以揭露其欺骗。

（十一）为着彻底粉碎蒋军的进攻，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为达此目的，必须充分地实行去年十月一日中央关于三个月总结的指示和去年九月十六日军委关于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指示。这里特再着重指出几点，引起各地同志注意：

甲、军事问题。我军在过去七个月艰苦奋战中，已经证明自己有一切把握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取得最后的胜利。我军的装备和战术，均有进步。今后军事建设方面的中心任务，是用一切努力加强炮兵和工兵的建设。各大小军区，各野战兵团，必须具体地解决为

---

[1] 1947年1月16日，国民党政府由于它的军事进攻的不断失败和军事形势的日益恶化，为了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攻，经过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向中国共产党要求允许派遣代表到延安进行“和平谈判”。美蒋这一新的骗局，立即为中国共产党彻底揭穿。中国共产党指出，恢复谈判，必须实现两个最低条件，即（一）废除国民党违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制定的伪宪法，（二）国民党军队退出1946年1月13日停战协定生效以后侵占的解放区的一切土地；否则无法保证以后谈判中所获协议不再被国民党撕毁。国民党政府看到“和平”骗术无法实施，即于2月27日、28日，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退，宣布国共谈判完全破裂。

了加强炮兵和工兵而发生的各项问题，主要是训练干部和制造弹药两项问题。

乙、土地问题。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1]，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还有约三分之一的地方，必须于今后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已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地方，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在，主要是因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以致没收和分配土地都不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意。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平补齐[2]，务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都能获得土地，而豪绅恶霸分子则必须受到惩罚。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全部过程中，必须坚决联合中农，绝对不许侵犯中农利益（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如有侵犯中农利益的事，必须赔偿道歉。此外，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之处，都照《五四指示》办理。总之，在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务须团结赞成土地改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众，孤立反对土地改革的少数封建反动分子，以期迅速完成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任务。

丙、生产问题。各地必须作长期打算，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并在生产和节约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财政问题。这里第一个原则是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因此，必须反对片面地着重财政和商业、忽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错误观点。第二个原则是军民兼顾，公私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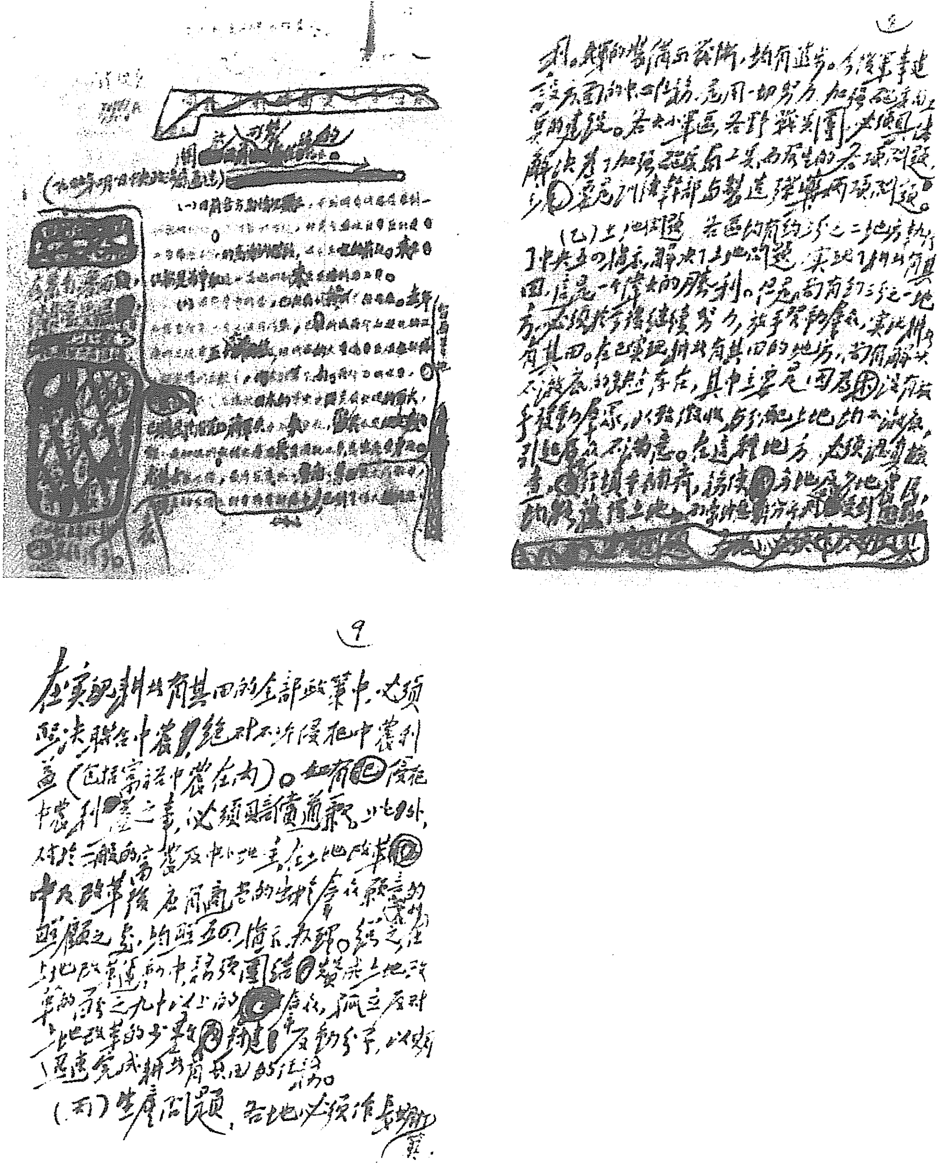
---

[1] 指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2] 填平补齐，是在土地改革比较彻底的老区，为了解决某些贫雇农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足以及土地改革中遗留下的其他问题，在较小的范围内，采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合理地调剂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顾。因此，必须反对只顾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的错误观点。第三个原则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因此，除依情况应当集中经营者外，必须反对不顾情况，一切集中，不敢放手分散经营的错误观点。

（十二）我党和中国人民有一切把握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面前已没有困难。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长期性，中外反动派将继续用全力反对中国人民，蒋管区的法西斯统治将更加紧，解放区的某些部分将暂时变为沦陷区或游击区，部分的革命力量可能暂时遭受损失，在长期战争中人力物力将受到消耗，凡此种种，全党同志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并准备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手稿（部分）。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1]

（1947年2月1日）

这个文件[2]去年还不能发，现在可以发了。现在向全党对总的形势及个别问题作出结论，是有益处的。总的形势是：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其他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3]、土地革命战争等规模都不够，土地革命战争也没有发展到全国范围。现在全国规模的第四次革命高潮，可能很快到来。第一次革命高潮无产阶级没有参加领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内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时的讲话。

[2] 指《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

[3] 五卅运动，指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2月和4月，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几万名工人大罢工，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工人运动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恐慌与仇恨，从而加紧部署镇压工人运动。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了该厂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10余人。5月30日，当2000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示威游行时，100余人遭巡捕逮捕，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五卅”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导，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同盟会[1]领导的。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这一次高潮是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也许有一些同志会怀疑革命高潮是不是要到来，他们以为这种高潮多少年才有一次，并不是容易的事。这的确不容易，但根据最近的形势来看，高潮是确定地快要到来了。凡是出现革命高潮，总是敌人有弱点，给我们以可乘之机，否则就很难。例如，第二次革命高潮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现在这次高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次革命高潮都带有民族性，都是反帝的，这次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2]，是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不会因美军撤出中国而发生变化。正如文件上所说："这一形势，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3]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的情况之下形成的。在美蒋这些反动政策下，全国人民除了斗争，再无出路。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而斗争，仍然是现时期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从前我说过，和国民党打的结果，解放区的区域有打得大、

---

[1] 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1905年8月，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采用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联合会党、新军发动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运动。在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2] 中美商约，即《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3] 汪精卫，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1938年3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后任日本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提出两个基本矛盾没有解决，现在仍未解决，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这次革命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能不能胜利呢？根据过去的经验，三个主要法西斯国家[1]都被打倒了，为什么美蒋不能被打倒？从各方面来看，敌人是可以打败的。现在我们最困难的就是五师[2]活动的地区，那里的同志很难想像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但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虽然十年内战后期连江西苏区都退出了，但革命高潮仍然要到来，果真是黑了南方有北方。欧洲为什么在左倾，就因为那里一些国家的中产者和小资产者在日益丧失他们的积蓄而变为无产者。中国的情况也相同，蒋管区人民的生活比抗战时期还要困难，因此中国人民是不能不革命的。《大公报》是拥护蒋介石而又同蒋有分歧的资产阶级报纸，该报提出中国有三个前途：第一，政治协商的前途；第二，南北朝的前途；第三，十月革命的前途。唯独没有说有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前途。中间派的报纸也没有一家说蒋介石能统一中国的，甚至连国民党的报纸也不能不说只有民主才有出路。指出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这一点，使全党了解并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预作准备，那末在这次高潮中我们就可能取得胜利。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政策（好比英国对希腊的政策），我们在去年还很难判定，现在可以确定了。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将来还有没有和平的可能呢？我们的文件没有堵死和平的可能，也不拒绝同国民党谈判。但是，美国要和蒋介

---

[1] 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

[2] 五师，指原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

石共同统治中国，蒋介石要独裁，而人民一定要反帝反封建，这三条都是确定了的，没有疑问的。为什么还可能有和平呢？如果我们再消灭蒋军五十个旅，蒋介石就迫切需要休息，以便再战。我们呢？要看高潮的势头和人力物力的情况，如果也需要休息，以便继续进攻，也可以和他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有半年到一年的休战时间是可能的，这种休战只是一种临时的步骤，并不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所谓原则性的问题，就是反帝反封建。我们采取这种步骤是为了保障革命的胜利。在去年的停战中，我们的五师及江南是吃了亏的，军队受损失，人民受摧残。但这种停战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是必需的。当时如不停战就没有理，蒋介石也是如此，美国也觉得如此，这就产生了短期的停战。而这种性质的停战在将来也还可能发生，所以在文件中没有否定和平的可能。

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应该继续解决，使一切无地的农民都得到土地。已经分过土地的地方，如果有多数人没有得到土地，只是少数人得到，应该考虑重分，这样可以得到多数群众的拥护。要使农民同地主撕破脸，而不是和和气气。对地主打了再拉，不打只拉就不好。现在有一批干部实际上站在地主方面，应该对他们进行教育。要使司令部、专署、地委在思想上都站在农民群众方面。过去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他们怕违反政策。

关于统一战线，文件上说了是极其广泛的，还应该加一点，说明青年党、民社党[1]站到蒋介石方面去并不是我们孤立了，而是蒋

---

[1] 青年党，即中国青年党，1923年成立。民社党，即中国民主社会党，1946年8月由中国国家社会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抗日战争时期，它们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1946年11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拥护这次大会通过的所谓“中华民国宪法”，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

介石更加孤立的结果。蒋不得不拉拢这样的小党派，由这些小党派出来帮助维持他的局面，正好证明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广大了。这种事情将来还会有，因为人民的力量将来会更加壮大。

现在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和抗战时期有些不同，但不是原则上的不同，在抗战时期我们同他实际上也是斗争多、妥协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虽有一些作用，但其妨害也很大。抗战时期，我们对蒋的政策是，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拉他同我们一道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凡能对我们进攻之处无不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抵抗，没有这个准备，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我们在抗战中的主要同盟军是农民，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中有某些作用，但比起丘吉尔[1]在英国反德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如。

土地问题现在解决是好的。从去年或从今年开始解决也不能算迟，但如果现在还不解决，再拖延下去就将犯很大的错误。“三三制”[2]现在还要，为什么不取消？因为现在解放区的状况与抗战时民主改革已经深入了的根据地的状况基本相同，因此，中间分子、党外进步分子还应该吸收进政权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不要“三三制”了，这是不妥当的。在土地改革运动深入的地方，如果地主已经屈服，我们再拉他们一下，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总之，这一次革命高潮同前三次不同，同第一次不同的是有了

---

[1] 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出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领导英国抗击法西斯德国的进攻。

[2]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的关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根据地政权中的人员分配是，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我们党，同第二次第三次不同的是没有国民党参加领导。凡是分掌领导权的都搞不好。内战时我们没有占领广大城市，也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这次则不同。革命胜利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我过去曾说过，少则三年到五年，多则十年到十五年。假如以少则三年到五年来说，那末，从日本投降时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半了，即一年半了，但最后的困难我们还要估计到。

这个文件应在党内广泛散发。

给续范亭[1]的信

（1947年2月2日）

范亭兄左右：

大示早已接读，奖勉极多，自当努力以副期望。闻贵恙减轻，增加食量，每日能走若干步，真是一大快事。致邓[2]函已看过，词严义正，发人深省。最近刘绍庭[3]兄来电述及邓之方针，鄙意以为可以同意，暂时各守原防，将来再决进止。目前时局，邓之地位，只能做到这一步。各区作战日有起色，击破蒋氏进攻是可能的。惟蒋尚欲孤注一掷，集中四五十个团于徐州附近，欲在山东决一胜负，我方现正准备迎击中。边区局势现较平稳，如绥德方面住得相宜，似不必去晋西北，增加劳顿，如何尚祈酌定。敬颂

康吉！

毛泽东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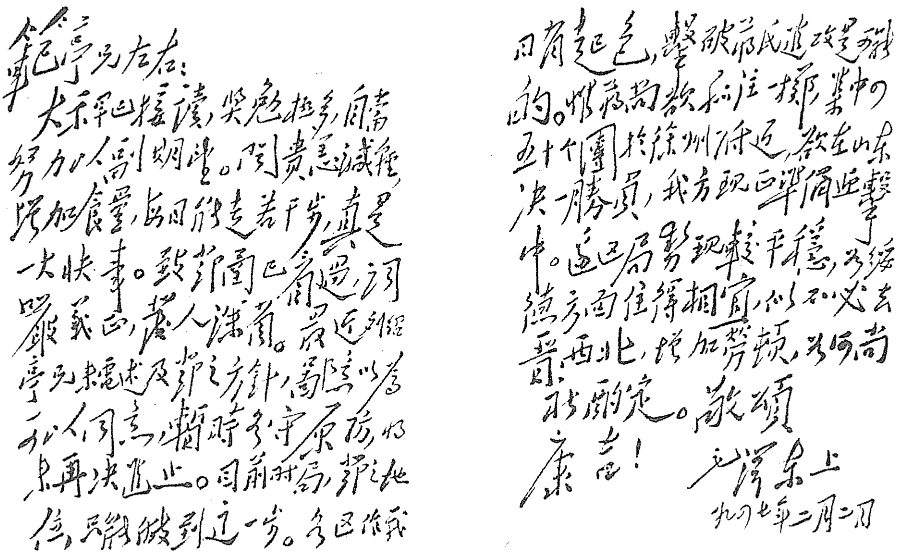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日

---

[1]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2] 指邓宝珊，当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3] 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范亭兄左右：

大示早已接讀，獎飾過多，自當努力以副期望。聞貴恙減輕，增加食量，每日能走若干步，真是一大快事。致郭團長函，措詞嚴正，令人滿意。最近劉紹亭兄來電述及郭之方針，當覆以為可以同意，暫時可守原防，明春再決進止。目前時局，郭之地位，只能做到這一步。各區作戰日有起色，擊破蔣氏進攻是有把握的。惟蔣尚欲孤注一擲，集中五十個團於徐州附近，欲在山东決一勝負，我方現正準備迎擊中。邊區局勢現較平穩，如綏德方面住得相宜，似不必去晉西北，增加勞頓，如何尚祈酌定。敬頌

康吉！

毛澤东上

九四七年二月二日

毛泽东致续范亭信的手稿。

关于彻底粉碎陈诚向鲁南进攻的建议[1]

（1947年2月3日）

陈、饶、张、黎，粟、谭：

为着彻底粉碎陈诚[2]向鲁南之进攻，请你们注意下列各点：（一）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你们将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3]三部南调是很对的。（二）休整部队，利用敌大举进攻前夜全军休整，多一天好一天，休整即是胜利。（三）诱敌深入，敌不动我不打，敌不进到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地点我亦不打，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四）先打弱者，后打强者，可能进攻之敌二十二个旅中，战力较强者约八个旅，较弱者约十四个旅。如我能首先歼灭较弱之十四个旅，此次进攻即算打破，然后再歼较强之八个旅，便很从容。（五）每次歼敌不要超过四个旅，最好是三个旅，一则保证速胜，二则手中留有未使用的大量兵力，可以接着打第二仗。这即是说，将你们手中的

---

[1] 1947年1月下旬，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华东战场的作战重心转入山东。敌判断华东野战军将固守临沂，于是，制订了鲁南会战计划，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在临沂附近决战。这是“会战”发起前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治委员黎玉和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3] 王建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

全部兵力分为两个集团，轮番作战与休息，准备在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内连续不断打七八个大仗，彻底粉碎敌之进攻。以上各点，当作建议，究应如何办理最为妥善，请按实情决定。

军委
丑江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2月3日）

你们目前任务是拉住王敬久主力。从本月中旬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周旋于民权、兰封和鲁西南地区，有效地牵制这些敌人，以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威胁徐州抑留邱清泉部[1]

（1947年2月4日）

刘，并转邓，并陈、粟、谭[2]：

现在我军须直接威胁徐州，抑留邱清泉[3]及其他部队。因此，路北不要攻济宁，而要攻虞、鱼、丰、沛[4]并大破陇海，向邱部举行攻击方能抑留该部；路南如邱军主力尚在民权地区，则我应攻宁陵、睢县，如邱军主力业已向东，则我应进至永、夏、萧、宿[5]，大破徐宿段[6]。

军委
丑支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并转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

[4] 虞、鱼、丰、沛，指河南虞城、山东鱼台和江苏丰县、沛县。

[5] 永、夏、萧、宿，指河南永城、夏邑和安徽萧县、宿县。

[6] 徐宿段，指徐州至宿县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必须等候敌进至郯城临沂地带再打第一仗[1]

（1947年2月4日）

陈、饶、粟、谭：

不管邱[2]军到鲁与否，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必须等候敌进至郯城、临沂之中间地带（比较接近临沂），然后打第一仗方为上策。敌愈北上，士气愈下降，指挥官愈恐慌，接济愈困难。现在南京方面已起恐慌，国防部参谋部人员均无信心，认为即使占领临沂，问题仍不能解决。我刘邓军现在所处地位甚好，必能在战局中起积极作用，帮助你们。望令政治机关在敌人前进路上充分布置对敌政治宣传，以降低敌军官兵战斗意志。

军委

支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和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

在临沂建筑防御工事以利歼敌[1]

（1947年2月6日）

陈、饶、张、黎，粟、谭：

你们应在临沂建筑必要防御工事，以便在有利情况下，在临沂附近歼灭敌人。这样做对于在必要时准备放弃临沂并不矛盾。峄枣[2]工事应一概平毁。

军委

丑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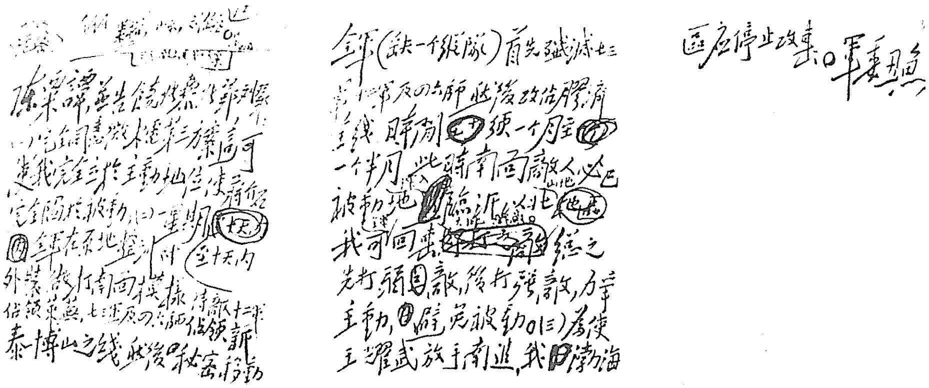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司令员张云逸、副政治委员黎玉和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峄枣，指山东峄县（今峄城）和枣庄。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1]

（1947年2月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的手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华东野战军按中央军委同意的作战方案，于1947年2月20日发起莱芜战役。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分南北两线进攻山东解放区。南线国民党军以8个整编师，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国民党军李仙洲集团3个军由明水（今章丘）、淄川、博山等地南下莱芜、新泰策应，同时从冀南、豫北抽调1个军及3个整编师集结在鲁西南地区，阻止华东野战军西撤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企图同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临沂地区决战。华东野战军以一部阻击南线之敌，佯作决战模样，主力则隐蔽兼程北上莱芜歼击李仙洲集团。战斗自2月20日开始至23日下午结束，歼灭该敌5.6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

陈、粟、谭，并告饶、张、黎，张、邓，刘、邓[1]：

（一）完全同意微未电第三方案[2]，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二）一星期至十天内，全军在原地整训，对外装做打南面模样，待敌十二军占领莱芜，七十三军及四十六师占领新泰、博山之线，然后秘密移动全军（缺一个纵队），首先歼灭七十三军、十二军及四十六师，然后攻占胶济全线，时间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此时南面敌人必已被动地深入临沂以北山地，我可全军回击，大批歼敌。总之，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力争主动，避免被动。（三）为使王耀武[3]放手南进，我渤海区应停止攻击。

军委

丑鱼

---

[1] 饶、张、黎，指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张、邓，指张鼎丞、邓子恢，当时分别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1947年2月15日13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第三作战方案是：如南线敌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则除以一个纵队留临沂地区与敌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敌人，平毁胶济线，威胁南线，以吸引南线敌人进入临沂以北山地，或增援胶济线，尔后我再举全力反攻，各个歼灭之。

[3]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围城打援各个歼灭商丘砀山之敌[1]

（1947年2月7日）

刘，并转邓：

我路南部队连克数城，又歼十六旅大部，自应休息数日，然后向北与主力靠拢，用围城打援方法吸引商砀[2]之敌，各个歼灭之。今后一时期内，你们全军任务是各个歼灭敌正规军，先打五军及七十五师，并准备打七十二师、八十五师及四十九旅。同时令路南、路北各地方兵团夺取薄弱城镇，收复失地。

军委

丑虞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并转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商砀，指河南商丘和安徽砀山。

关于开至莱芜新泰作战的问题[1]

（1947年2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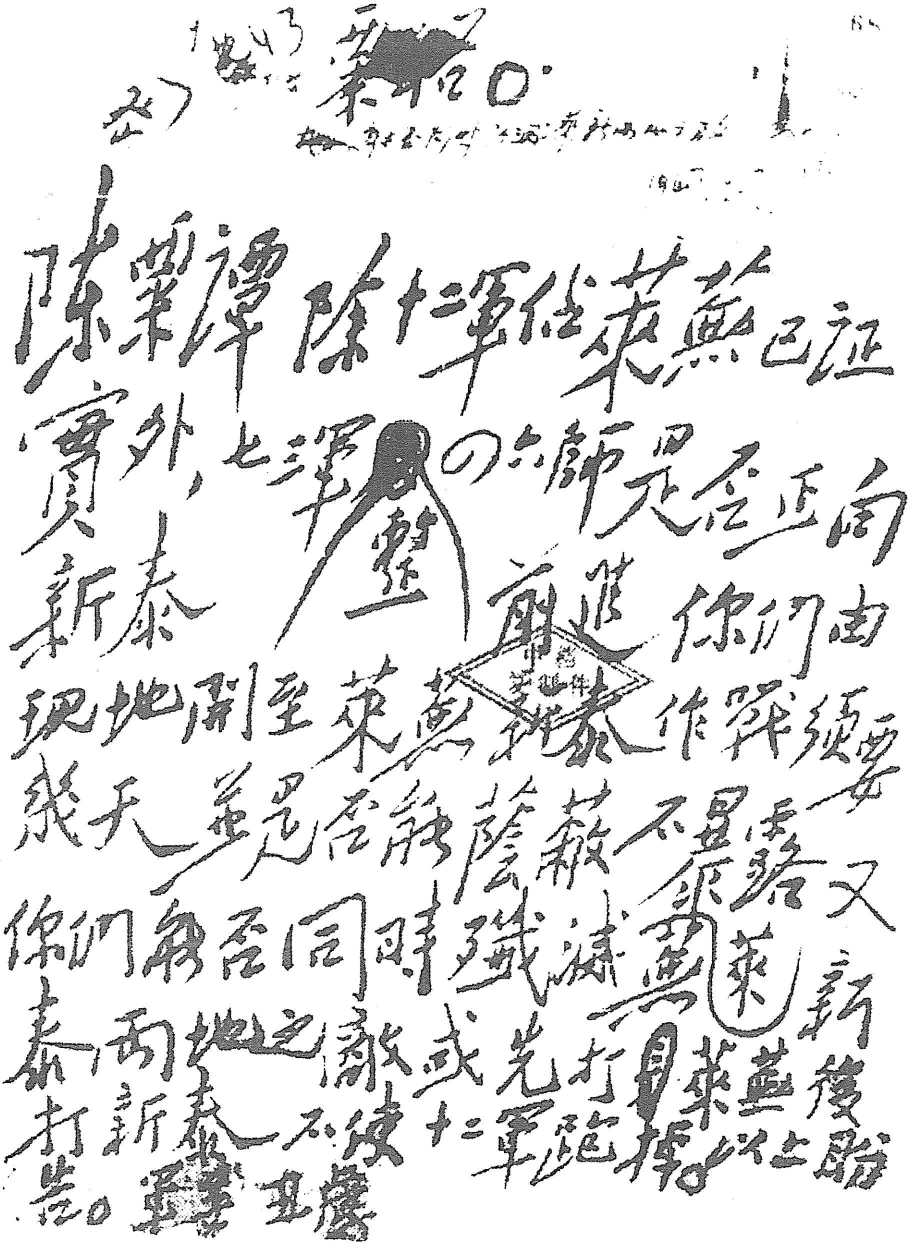
陈、粟、谭：

除十二军占莱芜已证实外，七十三军、整四十六师是否正向新泰前进？你们由现地开至莱芜、新泰作战需要几天，并是否能荫蔽不暴露？又你们能否同时歼灭莱芜、新泰两地之敌，或先打莱芜，后打新泰，不使十二军跑掉？以上盼告。

军委
丑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陈粟谭：除七三军位莱芜已证实外，七三军整四六师是否正向新泰前进，你们由现地开至莱芜新泰作战须要几天，是否能荫蔽不暴露，又你们能否同时歼灭莱芜新泰两地之敌或先打莱芜后打新泰，不使七三军跑掉，以上盼告。军委 丑灰

毛泽东致陈毅等电的手稿。

解决郝鹏举部
应与全部战略方针联系考虑[1]

（1947年2月9日）

陈、粟、谭，并告饶，刘、邓[2]：

解决郝鹏举部很好。但就全部战略方针来说，如你们方针是解决南面，则似乎打得早了一点，可能影响敌各部进得更谨慎。打了郝鹏举后你们似应按兵不动（要有极大忍耐心），让敌各部放手北进，然后各个歼灭之。如你们方针是先解决北面，则打郝鹏举并无妨碍。你们须在两个方针之间首先有所决择。

军委
丑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庆祝歼灭敌军之胜利[1]

（1947年2月10日）

陈、饶、粟、谭：

祝你们歼灭郝部及俘虏郝逆之大胜利，有功将士予以嘉奖。

军委

二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和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

（1947年2月10日）

一

中共愿意同国民党恢复谈判，条件是：双方恢复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协定签订时的实际控制区域；取消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由“国大”通过的“宪法”，恢复一年前各党派一致通过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他又说：你在离开延安以后，一定会听到敌人传布的许多关于我们的所谓“暴行”的谣言。不过你一定记得你在许多地方看到过我们的部队，它是世界上若干最有纪律的部队之一。

---

[1] 据斯特朗在《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中回忆：“在我离开延安之前的那天晚上，我被邀请去向毛泽东主席告别。”“那天我接到周恩来的邀请，要我到杨家岭的礼堂去看戏。”“戏演完了以后，周恩来带着我进入山边一个窑洞，那里已经摆好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还有茶和花生。我在那里最后一次和毛主席谈话。他肯定我不能随同共产党一起到山里去，并说，我已经知道了外界需要知道的关于他们所有地区的情况，我应该带着这些情况走向世界。‘当我们再同外界取得联系时’，——他认为这需要‘大约两年’——我可以再回来。他说，我特别应该把这些情况带到美国去。”本篇一是毛泽东和斯特朗关于国共恢复谈判条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关于美国拥有原子弹谈话的一部分。

二

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

阻止四十六师向临沂逃走[1]

（1947年2月17日）

陈、粟、谭：

望将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位于临沂、新泰之间，阻止四十六师向临沂逃走。

军委

二月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1]

（1947年2月21日）

今后行动应学习陈粟、刘邓、陈谢三区大踏步进退、完全主动作战的方针。你们部队休整若干天后，请考虑是否可以打第三军。其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顽伪有生力量，并吸引保定以北之敌南下，利于第二步歼击之。总之，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2月21日）

你们应开至大名、冠县一带巩固地区休整，引诱吴绍周[2]部深入黄河以北，待我休补完毕然后歼灭该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2]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

我军似宜北上参战[1]

（1947年2月22日）

陈、粟、谭：

为彻底解决北面三个军二十三个团之众，我韦国清纵队及八师似宜北上参战。

军委

二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进行胶济战役必须有充分准备[1]

（1947年2月23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本战役[3]胜利后，（一）乘胜进攻胶济路。如你们部队损伤及疲劳不大，又不和敌主力第八军等作战，可实行此项方针。（二）休整若干天，整顿队势，然后进攻胶济路。如你们部队损伤疲劳较大，又须与敌主力作战，则应采取此项方针。总之，胶济战役是一个单独的重大的战役，必须有充分准备然后举行。望酌情决定。

军委

丑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华东野战军进行的莱芜战役。

莱芜战役后我军的行动方针[1]

（1947年2月24日）

陈、粟、谭，刘、邓，并告饶[2]：

（一）今日接陈粟谭梗日十八时电[3]悉。李仙洲五万人被歼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二）同意陈粟谭意见，先以一部破坏铁道，主力休整五六天，然后举行胶济战役，希望能于三月上旬歼灭十二军全部、九十六军、八军各一部，打通渤海、胶东两区与鲁中区之联系，以便用胶、渤之人力、物力供给大军长期作战之需要，并利于尔后集中最大兵力向欧震王敬久[4]两集团作战。（三）刘邓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2月23日18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一）20日晚完成对李仙洲及其第七十三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之新编第三十六师各部之包围，战至23日午后大部解决。此役共歼敌约5万人，李仙洲及两个军长亦在俘。（二）即派宋时轮部和许世友部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破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向北。（三）经此役，估计欧震、王敬久集团可能在津浦路兖州南北会合。

[4]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九军军长。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军军长。

军（五个纵队）除以一部监视王敬久外，主力应集中于黄河以北巩固区域休整补充，待华东部队完成胶济任务后，准备相机会合两军歼灭欧、王。望令六、七纵队迅取间道向主力靠拢。

军委

丑敬

致各野战军、各中央局电[1]

（1947年2月24日）

据陈、粟、谭二十三日电称：我军于莱芜地区，以三天激战，歼灭李仙洲指挥之第七十三军、第四十六军各全部及第十二军一个师，共约五万人，李仙洲及两个军长均被俘，详情后报等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野战军和各中央局的电报。

集中主力乘胜攻占胶济路[1]

（1947年2月25日）

陈、粟、谭，并告饶，刘、邓[2]：

敬辰电[3]悉。完全同意你们意见，除留三纵位于邹滕[4]方向外，集中六十个团乘胜歼击八军、十二军，彻底解决胶济问题。此次莱芜作战时间异常短促，部队伤亡疲劳似不甚大，休整数日即可向北攻击。至南线诸敌应不加阻碍，让其北进愈远愈好，估计至快亦要两星期方能达到泰安一线，估计两星期内我可完成胶济任务，然后休整两三星期，约卯初又可向南作战。

军委

丑有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2月24日9时陈毅、粟裕和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临沂敌主力已逐渐向西转移，桂顽第七军由郯城转移至临城，并有以主力沿津浦北上企图。我除以一部地方武装于临沂周围与敌周旋外，将三纵调至临城以北地区，以阻击敌之北进。集中60个团立即乘胜投入胶济线，求得与王耀武再作一次决战，则胶济线问题可基本解决。

[4]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

致林彪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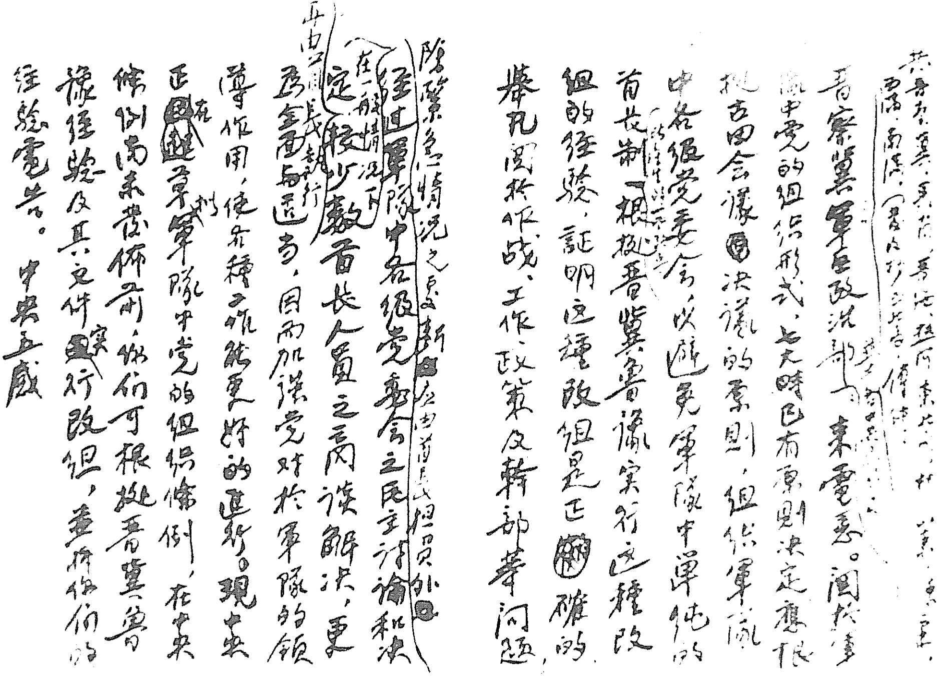
（1947年2月28日）

此次大举进攻[2]时机甚好，歼灭城子街敌五个营，占领九台、农安，极为欣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东北民主联军于2月下旬第二次越过松花江，向敌出击，歼灭九台以北城子街守敌一个多团，歼敌援军1000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南满保卫临江的战斗。



共晋察冀、晋绥、[illegible]、东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傅[illegible]：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illegible]来电悉。关于军队中党的组织形式，七大时已有原则决定，应根据七大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健全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根据晋察冀冀鲁豫实行这种改组的经验，证明这种改组是正确的。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置外，须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在一般情况下较少数首长人员之个人决定更为全面与正确，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现在中央正在起草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在中央条例尚未发布前，你们可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将你们的经验电告。　中央丑感

1947年2月，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的决定，肯定了晋察冀军区组织党委的经验，恢复党的各级委员会。

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

（1947年3月6日）

陈、饶、张、黎，粟、谭、陈[1]，并告刘、邓[2]：

支午电[3]悉。你们主力五个纵队争取休整半月以上，甚为必要。至下一步行动，目前可从几个方案考虑，待敌情发展再行决定。但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即是对于敌人之威胁与对于友军之配合，不必顾虑距离之远近。转入外线之时间现亦不必顾虑，因五师主力一部已渡河到达太

---

[1] 陈、饶、张、黎，指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陈士榘（1909—1995），湖北钟祥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粟裕、谭震林、陈士榘1947年3月4日11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张鼎丞、邓子恢的电报。电报说：华东野战军现以5个纵队暴露于胶济线张店、周村之周围及淄博地区休整待机，以引诱南线敌人深入山地，造成尔后歼敌之有利条件。对今后作战，我们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集中山东及刘邓军于津浦线之兖、济间与敌决战。第二，华东主力转鲁南线歼敌，建议刘邓军向东南进击，截断陇海，与华东部队形成对徐州之钳形攻击，迫津浦敌南返，尔后我再全力于运动中歼灭南下之敌。但辗转南北需时较长，转入外线作战时间亦需推迟。

岳，一部正待机北渡，鄂西王树声[1]部一部已渡江去湘西，一部留原地。因此，中央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援助五师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我华东军在今后十个月内，以平均每月歼敌四个至五个旅，付出伤亡六千至七千人计算，共须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付出伤亡六万至七万人之多（明年的尚未计算在内）。你们须从长期作战的思想出发，并使广大干部建立此种思想，随时随地节省人力物力，方能战胜蒋介石，解决中国历史任务。在同样的长期作战任务下，我刘邓军现时亦须休整补充，恢复元气。其下一步行动，似以打黄河以北之王仲廉孙震[2]两部，与华东作远距离之配合较为适宜。在一般情形下（特殊情况除外），刘邓军须在黄河以北，基本上解决王孙两部，并调动吴绍周[3]指挥之两个师到黄河以北给以歼灭，然后南下陇海较为有利，因黄河已放水，过去与现在情形已不相同。此外，你们的三纵似亦宜令其就地休整，以利尔后加入主力作战。对敌津浦集团[4]北进不要阻止，让其进至泰安一线，于我最为有利。王许[5]两纵如能歼灭八军夺取潍

---

[1] 王树声，当时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王仲廉，1903年生，江苏萧县（今属安徽）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孙震（1892—1985），四川成都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3] 吴绍周（1902—1966），贵州天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

[4] 指沿津浦路滕县、兖州段北犯之国民党军第七军和整编第十一师、第六十四师、第二十师等部。

[5] 王许，指王建安、许世友，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和第九纵队司令员。

县[1]是很好的，但如果情况已不许可则宜令其适时进入休整，务使尔后作战经常集中六十个团行动。

军委
寅鱼

---

[1] 潍县，今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

保卫延安主要依靠外线作战[1]

（1947年3月6日）

刘、邓，并告陈、谢，王、孙，韩，滕、薄、王[2]：

鱼午电[3]谅达。陈谢率五个旅寅皓渡河袭占陇海潼洛线[4]，为调动胡[5]军、保卫延安最好方法。你们休整务于寅删前结束，期于寅皓与陈谢渡河同时攻击平汉线。第一个战斗结束后，应会合太行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队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为守势，抽调兵力对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3月初，国民党军在西北地区集中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孙，指王新亭、孙定国，当时分别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和副司令员。韩，指韩钧，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滕、薄、王，指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似指1947年3月6日（寅鱼申）中共中央军委给陈赓、谢富治等的电报。电报命令陈谢率四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共5个旅于9日全部出动，16日到达黄河北岸，19日开始渡河，在数日内攻占阌乡、新安等县及洛河以北区域。电报要求刘邓军应于19日以前休整完毕，19日起向平汉道清两线举行攻击，牵制顾祝同部不使南调。

[4] 陇海潼洛线，指陇海铁路潼关至洛阳段。

[5]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团连续举行第二个、第三个及更多战斗。你们应将后方移至太行一个时期，面向平汉、道清[1]作战，直接援助陈谢。此役关系重大，望速作准备。胡宗南指挥第一师三个旅、九十师两个旅、二十七师两个旅（一个团位于大宁）、三十六师两个旅、十七师两个旅、七十六师三个旅、十五师一个旅及一个保安旅、一个骑兵旅共十七个旅，除一部守备陇东、关中外，主力正向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寅灰可集中完毕，寅删可能开始攻击（亦有可能延至寅删、寅号之间）。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入延安亦难持久，而陈谢在潼洛之行动又需你们积极援助。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公路[2]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孤注一掷。判断系因山东及冀鲁豫两区失败，薛岳[3]去职，顾祝同[4]调徐，胡宗南实际上主持郑州军事，急欲抽兵进攻豫北，故先给延安一个打击。而我们则须保持延安及边区，以便钳制胡军。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钳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你们准备情形盼告。

军委

寅鱼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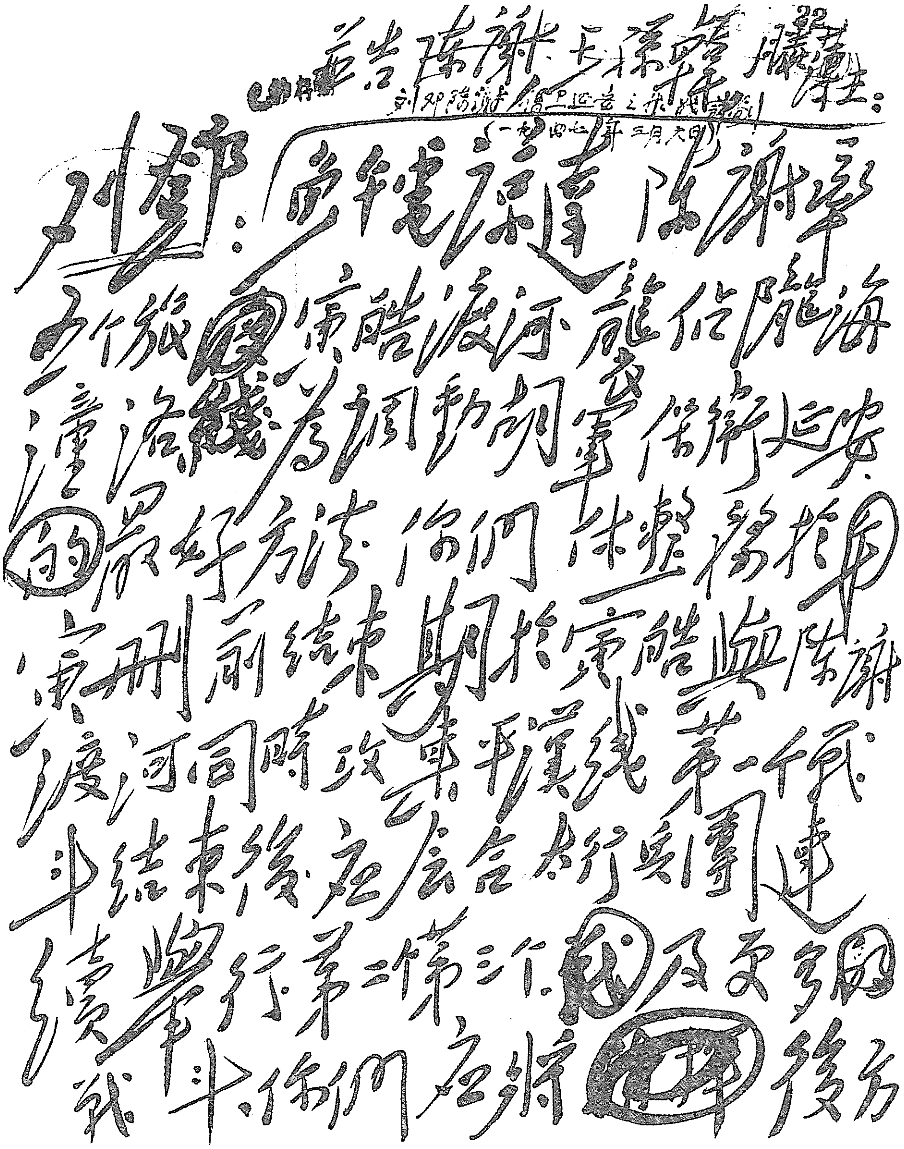
---

[1] 道清，即道清路，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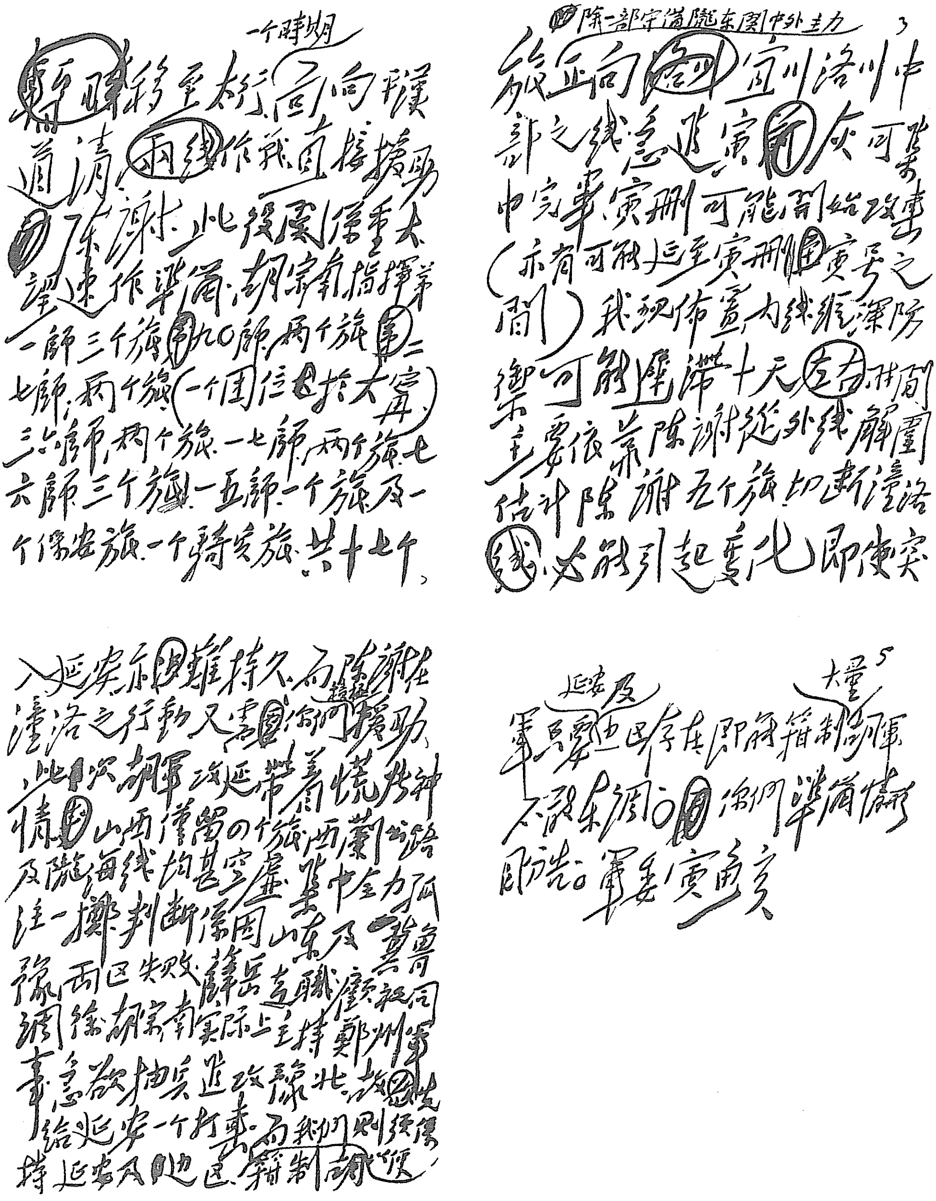
[2] 西兰公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3] 薛岳，原任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3月初去职。

[4]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3月初，他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指挥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保卫延安主要依靠外线作战》的手稿。



~~陈赓~~移至太行一个时期，向平汉道清两线作战，直接援助陈谢，此段间仍重太岳，迅速作准备。胡宗南指挥第一师三个旅，九〇师两个旅，第二七师两个旅（一个团位于大宁），三六师两个旅，一七师两个旅，七六师三个旅，一五师一个旅及一个保安旅，一个骑兵旅，共十七个旅，

3

除一部守备陇东关中外主力正向~~宜川~~宜川洛川中部之线急进，宜川六日可集中完毕，宜川可能开始攻击（亦有可能运至宜川宜君之间）。我现布置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左右~~。目前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线，必能引起变化，即使突

入延安亦~~因~~难持久。而陈谢在潼洛之行动又需你们积极援助，此次胡军攻延带着慌张神情，~~因~~山西仅留四个旅，西兰公路及陇海线均甚空虚，集中全力抓住一擊。判断蒋因山东及冀鲁豫西区失败，薛岳去职，顾祝同调徐，胡宗南实际上主持郑州军事，急欲抽兵进攻豫北，故给延安一个打击。而我们则须保持延安及边区，箝制胡军使

5

军只要延安及边区存在，即能箝制大量胡军，不敢东调。你们準備情形即告。军委寅鱼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保卫延安主要依靠外线作战》的手稿。

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1]

（1947年3月10日）

三月份可全部作为休整时间，你们全军彻底休整一个月，以利尔后作战。在华东野战军休整期间，蒋介石为了实施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撤销徐州、郑州两绥靖公署，组成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主持的“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绥署的部队；将王敬久集团自冀鲁豫战场调至山东，将“五大主力”中的三个主力部队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分别编入三个兵团，在山东战场上的总兵力达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张宗逊等电[1]

（1947年3月10日）

（一）西安确息，胡宗南准备伞兵千人，寅齐[2]在西安集中，待命起飞袭击延安；（二）望着新四旅立即开延安，以两天行程赶到延安附近，保卫延安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张宗逊、习仲勋、王世泰、廖汉生电的主要内容。

[2] 寅齐，即3月8日。

陈谢等部主力的行动方案[1]

（1947年3月11日）

刘、邓、张、李，并陈、谢、王、韩[2]：

灰申电[3]悉。延安准备暂时让敌占去，但陈先瑞韩东山[4]所率五师部队三千余人有被敌歼灭之危险，故无论如何应派队救援。目前陈谢王所部主力五个旅之行动有三个方案：（一）照鱼午电出潼洛线[5]。（二）以一个旅出潼洛线，接护五师北上，主力四个旅参加平汉道清线[6]作战。胜利后，或立即配合刘邓所派之一个至两个纵队出潼洛线，或配合刘邓所派之一个至两个纵队先占同蒲线，再占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和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指王新亭，当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韩，指韩钧，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3] 指1947年3月10日15时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和李达给中共中央军委并滕代远、薄一波和王宏坤的电报。电报说：完全同意以陈谢集团先加入道清、平汉内线作战。完成任务后，我们可抽出一个纵队随陈谢南出。

[4] 1947年3月中旬，豫鄂陕军区集中各分区部队组成野战第二纵队，由军区副司令员陈先瑞、四分区司令员韩东山分别任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潼洛线，指潼关至洛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6]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道清线，指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

洛线（即把占潼洛线放在最后一着）。（三）以一个旅渡河接护五师，主力四个旅即刻占同蒲线。以上三方案究以何者最为有利，望再分析电告，陈谢王韩亦可表示意见。无论采何方案，均须接护五师北上。派一个旅去是否能完成任务，亦须考虑。

军委
寅真午

致聂荣臻、萧克电[1]

（1947年3月12日）

你们作战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歼灭敌人，就是对于他区的配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萧克电的主要内容。

保卫延安的命令[1]

（1947年3月16日）

一、敌以五师十二旅约八万人进攻延安，经三天猛烈攻击，突破我第一线阵地，由于我军坚决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困难增加，颇疲劳，今后将更甚。

二、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2]军进攻延安企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兵团守备任务区分如下：

1. 独一旅、八旅、警七团为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3]同志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小劳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

---

[1]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等部共15个旅14万余人向陕北发起进攻。中共中央军委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共3个团5000余人的兵力在富县、临真以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抗击进攻之敌。经过6天激战，在予敌以重大杀伤，并完成掩护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和群众疏散的任务后，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这是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名义给陕甘宁边区各兵团的命令。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张宗逊、廖汉生，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教导旅、二纵队（王震[1]部）为左翼兵团，归王震罗元发[2]同志指挥，在王震未到前由罗元发同志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金盆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战斗。上述地区至少坚持七天。

3. 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以不少于四个营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不含）、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庙尔梁阵地。馀为预备队，位置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该旅首长仍兼延安卫戍。

三、各守备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灵活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

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五、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一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3]

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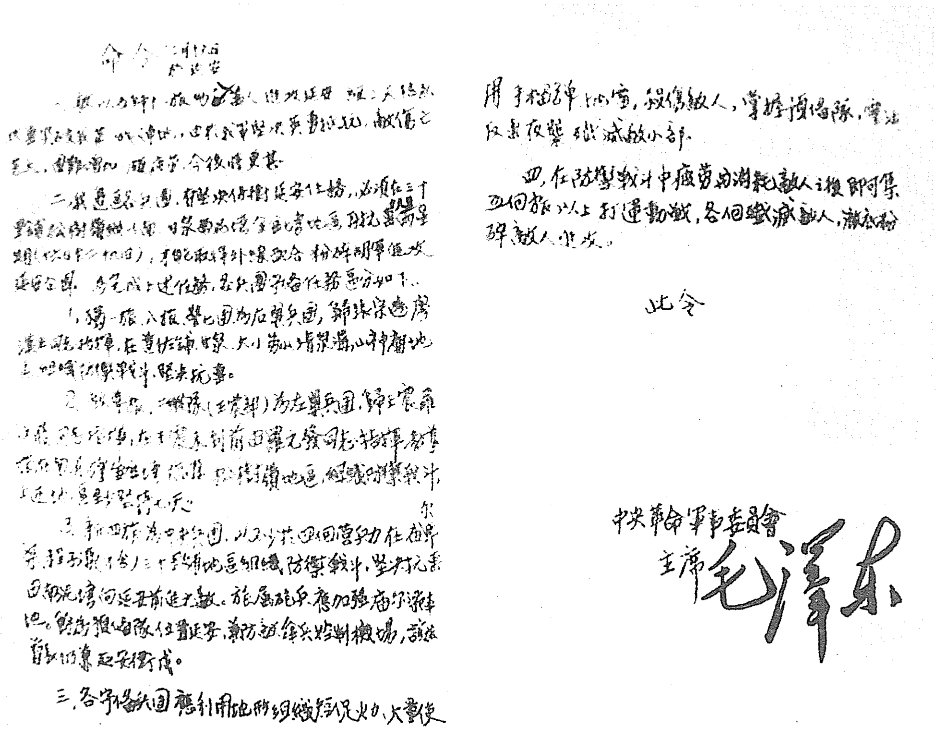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

[1] 王震，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罗元发，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

[3] 收电抄件中有第五项。



命令 三月十五日
于延安

一、胡以五个旅[illegible]进攻延安，[illegible]二天激战，我[illegible]英勇抵抗，敌伤亡甚大，[illegible]，今后将更甚。

二、教导旅与[illegible]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之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illegible]，[illegible]，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为完成上述任务，各兵团之任务区分如下：

1、独一旅、八旅、警七团为右翼兵团，归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illegible]、大小劳山、清泉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

2、教导旅、二纵队（王震部）为左翼兵团，归王震[illegible]指挥，在[illegible]罗元发[illegible]指挥，[illegible]地区，组织防御战斗，[illegible]七天。

3、新四旅为中央兵团，以三个营兵力在[illegible]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illegible]向延安前进之敌。旅属炮兵应加强[illegible]。[illegible]留警备队任卫延安，兼防敌伞兵控制机场，[illegible]延安卫戍。

三、各守备兵团应利用地形组织短促火力，大量使用手榴弹、地雷，杀伤敌人，掌握预备队，实施反击夜袭，歼灭敌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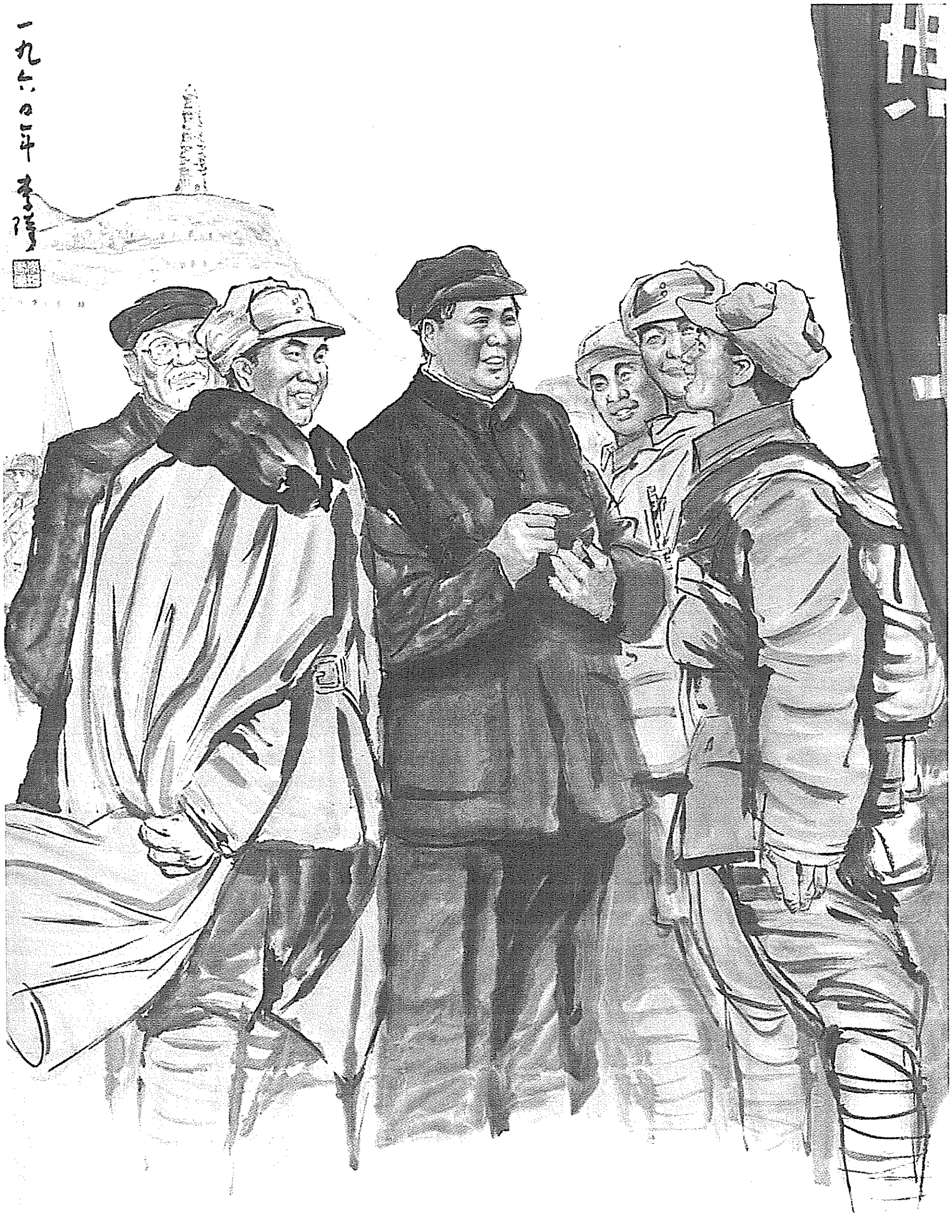
四、在防御战斗中疲劳与消耗敌人之后，即可集中五个旅以上打运动战，各个歼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进攻。

此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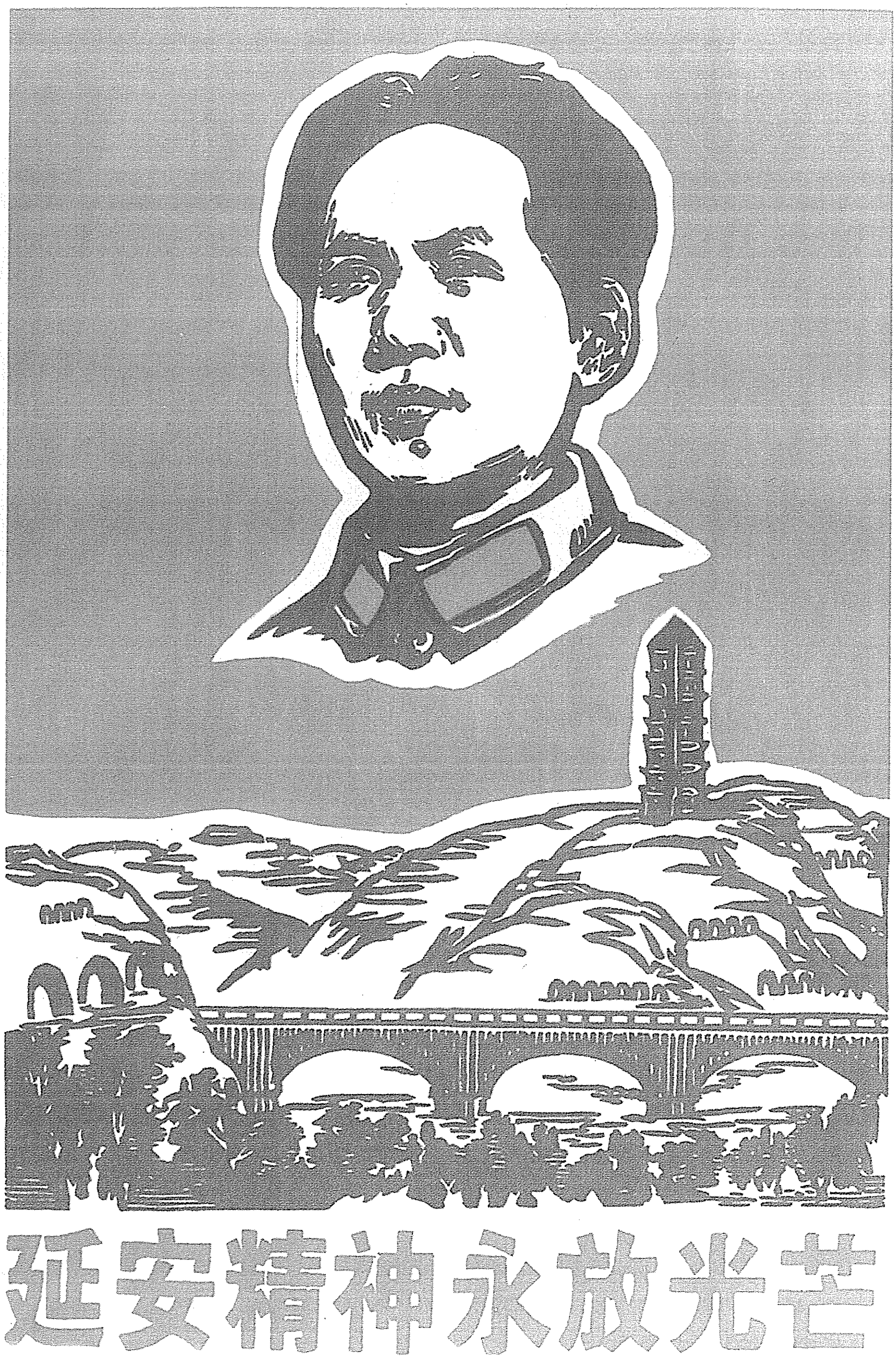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毛泽东

毛泽东签署的保卫延安的命令。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油画）



《延安精神》（中国画）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宣传画）

和陕甘宁边区部队的负责同志的谈话[1]

（1947年3月16日）

战士们的这种决心很好，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年，挖了窑洞，吃了小米，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了全国革命。全中国全世界者都知延安，同志们对延安这种深厚感情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必须用坚决斗争的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

现在国民党派了二十多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边区，他们有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有飞机坦克。而我们在边区的部队只有二万人，我们在武器方面，基本上是小米加步枪。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在数量方面与武器方面，虽然比我们优越，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边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只要我们有一个正确作战方针，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我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山里周旋，把敌人磨得十分疲劳的时候，十分缺乏粮食的时候，然后寻找机会消灭它，这就是磨菇战术。蒋介石占领延安这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他们不久就要倒霉的。

---

[1] 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纠集23万兵力，进犯我陕甘宁边区。当时有人提出“在延安大门之外斩断敌人魔爪”的主张。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充分利用边区的有利条件，采取“蘑菇”的战术，牵敌人在陕北转战，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在准备撤离延安之前，毛泽东在王家坪接见了保卫边区部队的部分负责同志，听取了他们汇报部队的情况。这是毛泽东和边区部队负责人谈话的一部分。

我们的作战目的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一个地点为主。只要我们能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将来就可以恢复失地，并且能够夺权新的地方。因此说，有人失地，人地则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现在我们主动放弃延安，就是这个道理。

你们回去给战士们讲一讲。一年，最多两年我们还要回延安来，到那时，延安就永远是人民的了。

撤离延安时的讲话

（1947年3月18日）

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一人半边，他走他的，他们到那个山头，我就到这个山头，怕什么，没有什么可怕的。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图为蒋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视察延安。

对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的讲话[1]

（1947年3月18日）

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在撤离延安之前，接见参加保卫延安的人民解放军部分领导干部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3月23日）

彭：

二十二日九时电[2]悉。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

军委

二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1947年3月22日9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军委："1. 二十日敌约两个旅向蓝家坪进攻，似系九十师，与我八旅一个营接触；另约一个旅经杜甫川、小贬沟向枣园东进攻，似系一六五旅，与我独一旅一个营接触。胡宗南二十一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限二十四日到达青化砭筑工据守。胡似系判断我主力在安塞及其以西地区，有进攻安塞找我主力决战企图。2. 我拟以伏击或乘敌立足未稳围歼三十一旅。王震纵队及教导旅限二十二日晚隐蔽集结青化砭东南之阎罗寺、郝家河、胡家河之线；新四旅隐蔽集结青化砭东北之二筛渠、常家塔之线；张纵队八旅集结青化砭西之梁村，独一旅拟集结于冯家庄，但须二十四日才能赶到，只能为预备队，监视延安、安塞方面，因该旅擅自开高桥之故。3. 上述部署有何指示盼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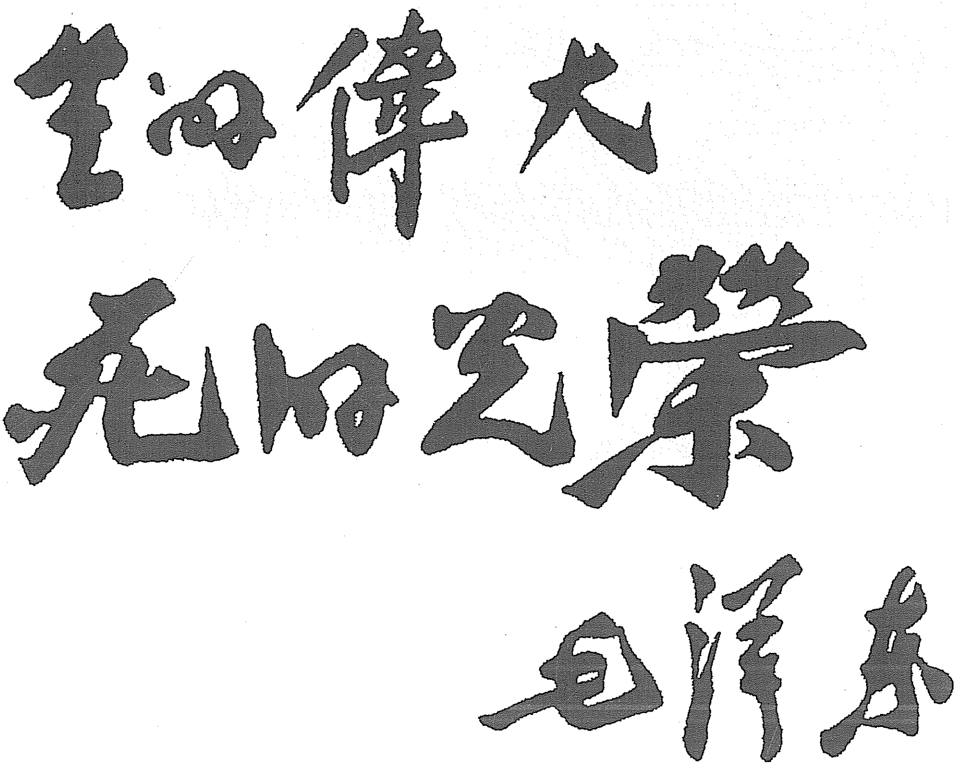
为刘胡兰题词[1]

（1947年3月25日）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1]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在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突然袭击文水县云周西村时因叛徒出卖被捕。她在敌人威胁面前，坚贞不屈，从容躺在刚刚铡死6个干部家属和回乡八路军战士的铡刀下，壮烈牺牲，当时年仅15岁。这是1947年3月25日，毛泽东听了任弼时汇报刘胡兰事迹后，为刘胡兰写的题词。解放后为了纪念刘胡兰，在刘胡兰的家乡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修了刘胡兰烈士陵园。1957年1月，毛泽东得知他当年的题词因战争丢失后，又为刘胡兰陵园重写了这一题词。刘胡兰（1932—1947），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人，1946年6月加入共产党，为候补党员，曾任村妇救会秘书，区妇救会干事。1947年1月12日因叛徒出卖被捕，被敌人杀害。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她为中共正式党员。



生的偉大
死的光榮
毛澤東

毛泽东为刘胡兰的题词。

青化砭战斗后准备打第二仗[1]

（1947年3月26日）

彭、习：

（一）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一三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三十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三）毛[2]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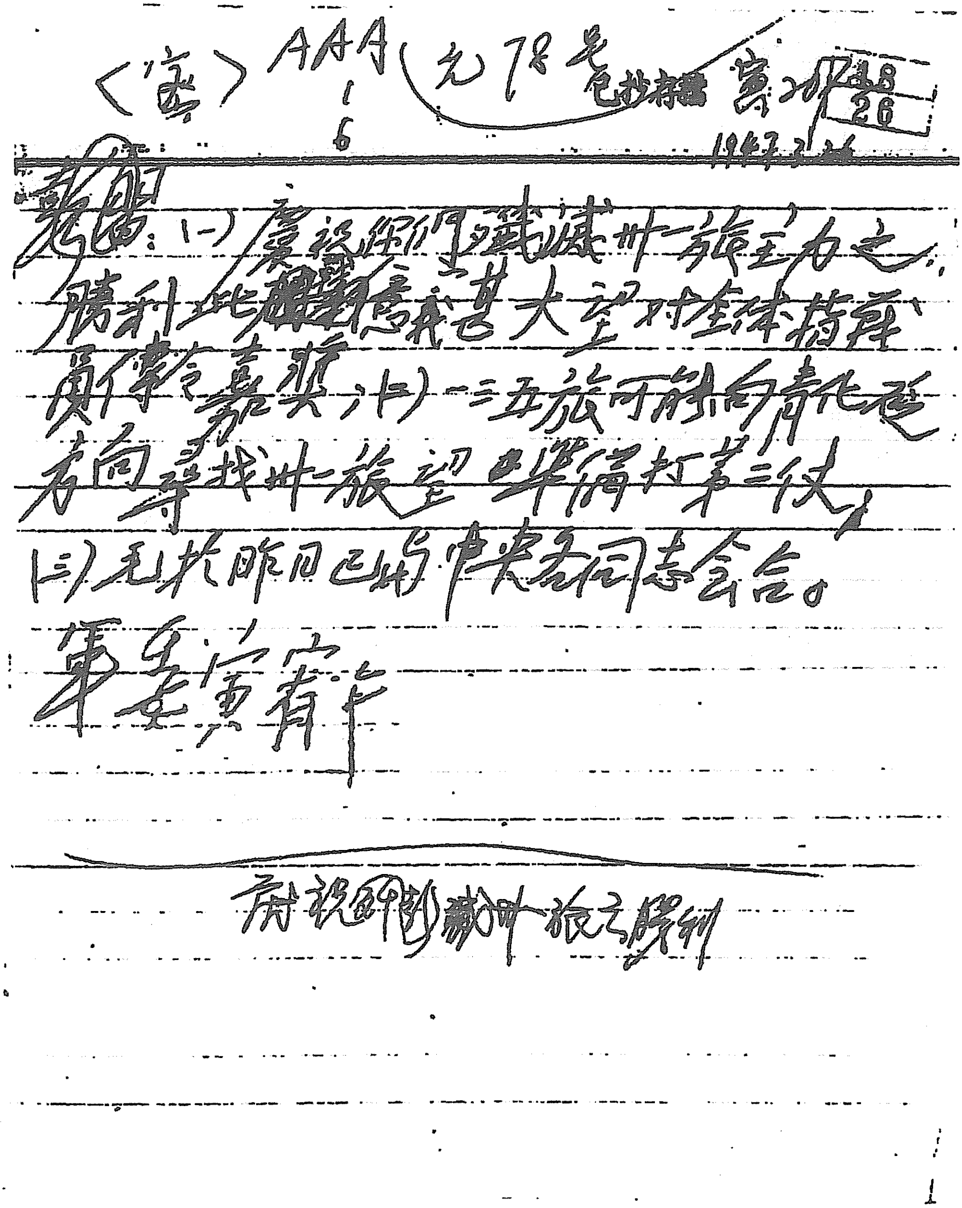
军委

寅宥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主动撤出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安塞（在延安西北），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3月25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旅部率1个团共2900余人进入西北野战兵团预伏圈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被我全部歼灭。

[2] 毛，指毛泽东。



（密）AAA（元78号 寅26

1947.3.26

彭习：（一）庆祝你们歼灭卅一旅主力之胜利，此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二）一二五旅可能向青化砭方向寻找卅一旅，望准备打第二仗。（三）毛于昨日已与中央各同志会合。

军委寅宥

庆祝[illegible]歼卅一旅之胜利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习仲勋电的手稿。

同意积极歼敌的方针和部署

（1947年3月27日）

彭[1]：

宥电[2]悉。积极歼敌方针极为正确，部署亦妥，已令陈谢[3]积极动作。现在不怕胡[4]军北进，只怕他不北进，故陈谢迟几天行动未为不利。傅作义[5]的一〇一师等部向晋西北进攻，左云失守。阎锡山[6]攻占孝义、兑九峪，有向中阳、石楼出扰之可能。数月内，贺李[7]处局面将较紧，但只要陕北及陈谢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7年3月2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胡宗南目前寻求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集结5个旅隐蔽于青化砭西北山梁后与安塞之间。此区地形好，粮多，群众好，能封锁消息，待敌深入至甘谷驿、岔口之线及其以东地区时，我争取3至5天休息，然后东进敌后，寻求机动，歼击九十师、一师。每次只歼敌1个团至多2个团，求得在一月内连续打两三仗，停止敌进攻，才可争取较长时间休息。陈赓、谢富治25日电仍在沁水、端氏间集结待命，该纵队行动，请指示电告。

[3]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

[6]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7]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阎、傅。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毛泽东

寅感

只要打破胡宗南[1]军即可改变陕北局面

（1947年3月27日）

贺、李[2]，并告彭、习[3]：

榆林之敌只能自保，出扰能力不大，贺炳炎[4]旅可即解除渡河掩护之任务，该旅使用由你们决定。中央直属人员到晋西北者是否转到太行，待恩来到你处决定。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据彭电已歼三十一旅（缺一个团），俘四千人，旅长以下无一漏网，缴子弹二十万，士气大振，信心提高，并可能争取新胜利，各个歼灭胡军。为配合打胡宗南，我陈谢[5]集团日内开始向晋南三角地带出击，约需一个月时间。如阎锡山向石楼、中阳出扰，那时亦可北上打阎。大约在三四个月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指习仲勋，1913年生，陕西富平人，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副政治委员。

[4] 贺炳炎（1913—1960），湖北松滋人，当时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旅长。

[5] 陈，指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谢，指谢富治（1909—197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内，我主力尚不能北上打傅作义[1]，全靠你们以现有兵力支持北线。详由恩来面达。

中央
寅感

---

[1]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 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攻占晋西南各县
不在占地而在歼敌有生力量[1]

（1947年3月28日）

陈、谢、王，并告彭、习，刘、邓，滕、薄、王，贺、李[2]：

昨电[3]谅达。陈谢率主力四个旅，日内西进，并令十二旅（二十三旅）在后跟进，用突然动作袭占曲沃、新绛、河津、稷山四县，同时王率二十二旅及地方兵团攻占翼城、绛县，然后全军相机逐一攻占乡宁、吉县、蒲县、汾城、襄陵、万泉、荣河、猗氏、临晋[4]、闻喜及三角地带一切可能攻取之地方。攻占上述各地之主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和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的电报。

[2]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滕、薄、王，指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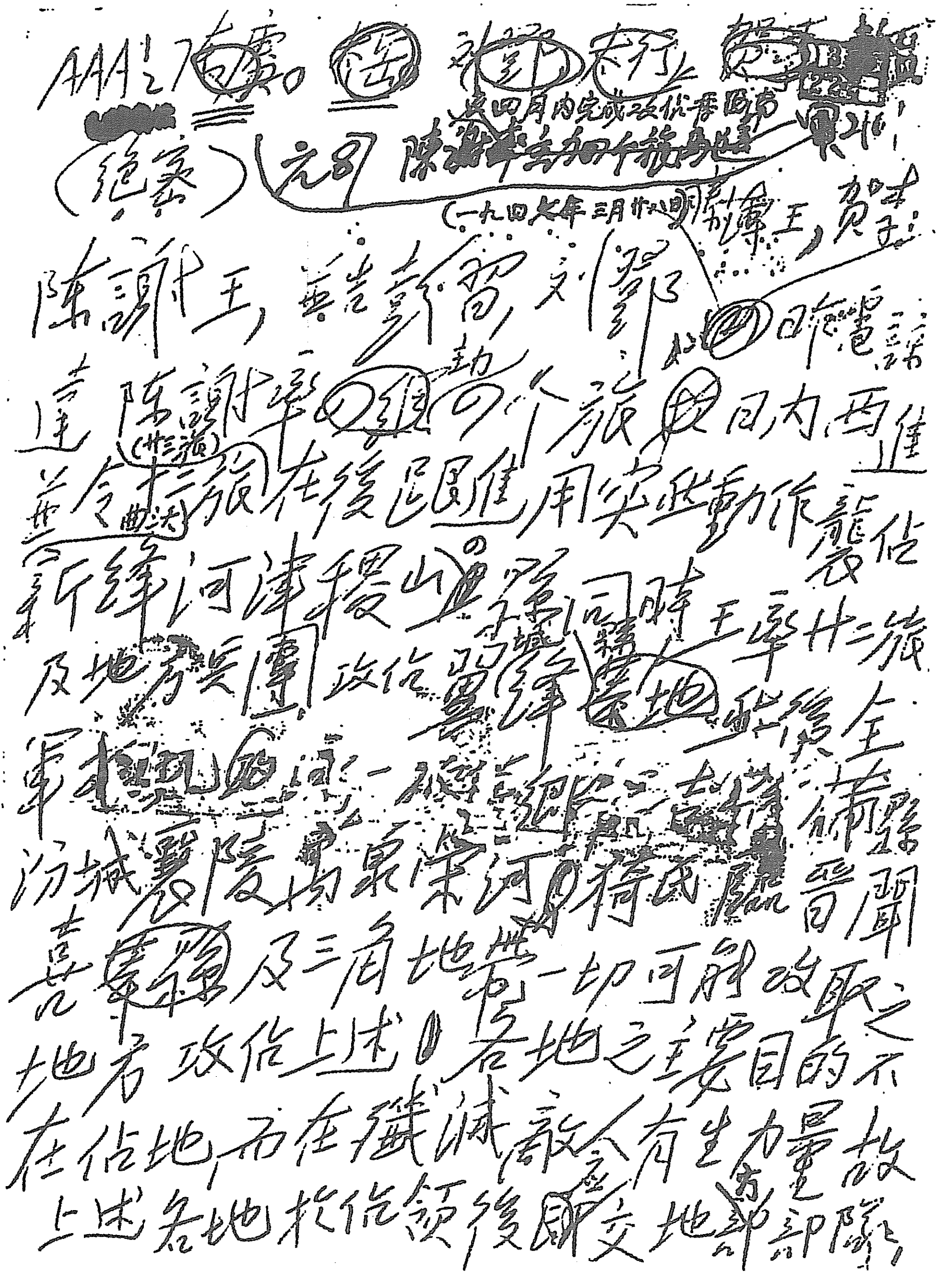
[3] 指1947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给陈赓、谢富治的电报。电报说：你们25日开始以主力攻新绛、河津、稷山，地方兵团攻翼城、绛县，这样部署很好，望迅实施。

[4] 万泉、荣河，均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万荣县。猗氏、临晋，均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临猗县。

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故上述各地于占领后应交地方部队及工作人员管理，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一些无法巩固之地方，只守可能巩固之地方，而主力则准备使用于他处。攻占上述各地之任务，希望于四月内完成之，五月内准备执行新任务。你们全军统由陈谢指挥。

军委

寅俭



（绝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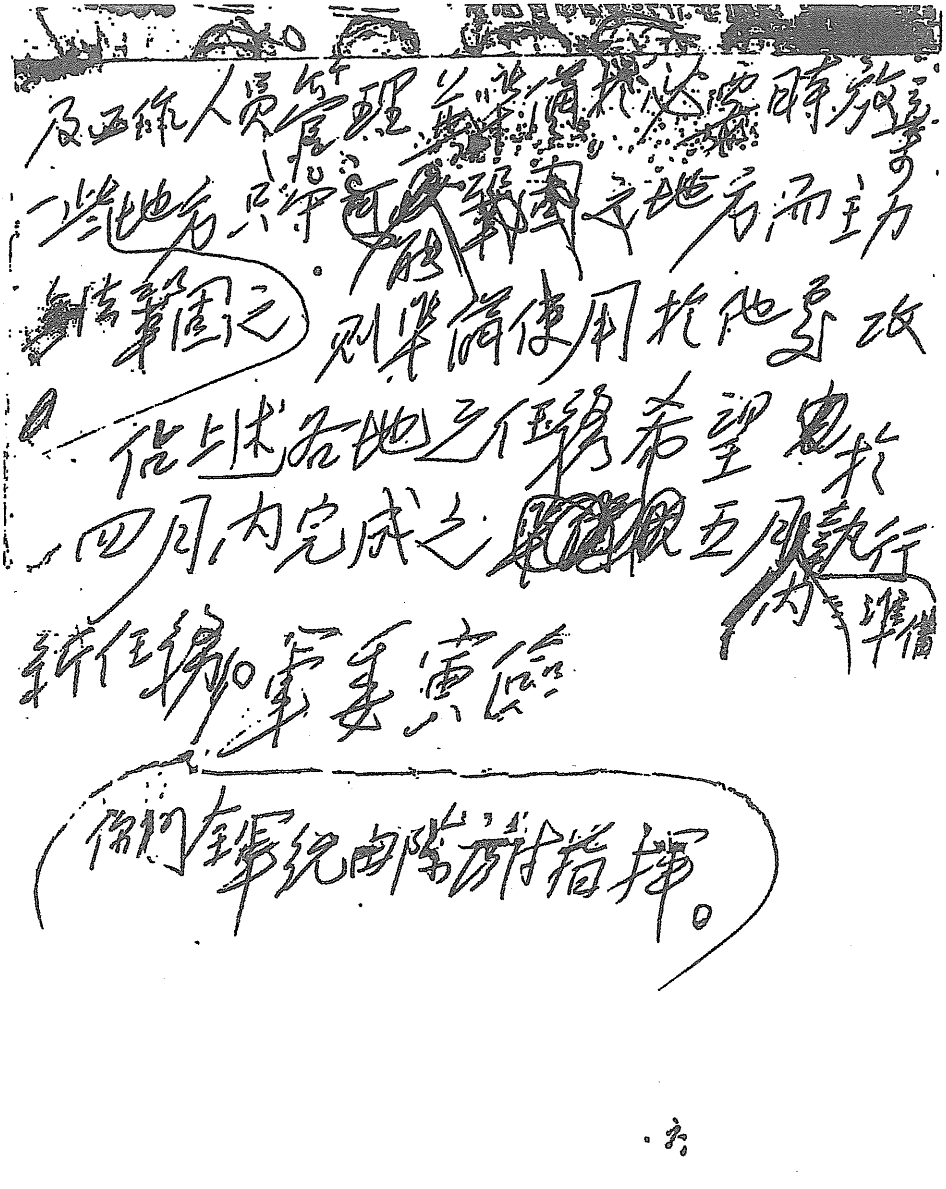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三月廿八日）

陈谢王，并告彭贺，刘邓

陈谢率四个旅日内西进，并令十二旅在后跟进，用突然动作袭占新绛、河津、稷山之线，同时王率廿二旅及地方兵团攻占翼城、绛县、曲沃、侯马，全军

汾城、襄陵、洪洞、临晋、闻喜及三角地带一切可能攻取之地方。攻占上述各地之主要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故上述各地于占领后即交地方部队，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攻占晋西南各县不在占地而在歼敌有生力量》的手稿。



及正统人员管理，并准备在必要时放弃
一些地方，只守可能控制范围之地方，而主力
则准备使用于他处攻
占上述各地之任务希望于
四月内完成之，五月内准备执行
新任务。军委寅俭

你们全军统由陈谢指挥。

2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攻占晋西南各县不在占地而在歼敌有生力量》的手稿。

中央军委机关转移情况[1]

（1947年3月29日）

彭、习：

昨今两日各电均悉。（一）你们部署甚好。[2]（二）我们昨夜移至绥德以南地区，为迷惑敌人之目的，先向东移，下一步则准备向西移。（三）侦察台今晚可到，明日可恢复工作。

军委

二十九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1947年3月28日9时，彭德怀、习仲勋致电军委，电文如下：“1. 青化砭附近敌系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昨（二十七）日一二三旅向青化砭东北攻击，一三五旅在青化砭附近筑工，一六五旅位置赵家圪塔。第一师，九十师在拐峁，甘谷驿线。五十五旅一个团由吉县开至临真、金盆湾接防，该地之二十四旅、一四四旅向延长推进，似已进占。守备延安城防只有四十七旅，十二旅及三十一旅之两个营。安塞敌于二十六日放弃，我已收复。敌已感兵力不足。2. 二十七日二十时电部署，我以小部背靠岔口力求吸引敌向东，主力纵深位置于贺家渠、财神庙线，节节阻敌北进。我一二两纵、教导旅在原地休练，待敌侧背暴露时再求歼敌。”

1947年3月29日，彭德怀、习仲勋致电军委，电文内称：“新四旅两个营位置于永坪以东五里之石窑坪，主力集结于永坪至瓦窑堡大道两侧。”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1]

（1947年3月30日）

彭、习：

二十九日二十一时电[2]悉。部署于待机位置甚妥。

军委

三十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1947年3月29日21时，彭、习致电军委：“ 1. 敌左路为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次序，由青化砭向东北以永坪以南高地前进；中路为第一军，由甘谷驿经禹居；右路为七十六师两个旅，由延长向交口镇。三路均向延川会攻。估计敌占延川后，可能巩固延川、延长；清漳、永坪、青化砭地区或向北打通咸榆公路，或者继续寻找我主力决战。2. 我拟寻求歼击一三五旅，好打时再歼一二三旅，因该两旅较其他东进各敌战力稍弱。为此部署：拟于三月三十一日隐蔽集结蟠龙、石咀、李家沟、贺家岩、风背上之弧线上，位置此线可以应付敌占延川后上述三种情况，寻求歼敌左路之机会。妥否盼示。”

中央工作委员会
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工作[1]

（1947年3月30日）

贺龙同志即转恩来：

（一）中央决定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在少奇主持下进行各项工作。朱、刘[2]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驿（绥德南七十里）动身去临县与董、叶[3]诸同志会合，经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已至晋西北者，照前议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叶处理，嗣后听候中央工委指示。

（二）接电后请你于数日内回来，嗣后即由毛、周、弼[4]三人主持中央。我们现在石咀驿附近。

（三）敌已占两延[5]，下一步行动待侦。

（四）如敌攻清涧，我们准备移至安定、保安[6]之间。为免被敌

---

[1] 这是毛泽东、任弼时给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转周恩来的电报。

[2] 朱、刘，指朱德、刘少奇。

[3] 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4] 毛、周、弼，指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

[5] 两延，指延长、延川。

[6] 安定，今子长县。保安，今志丹县。

隔断，故请你早回河西，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

毛　弼

寅三十申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1]

（1947年3月30日）

兹决定冀热辽分局改为受东北局领导，接电后东北局、东总及东北政委会即与冀热辽分局、军区、政府发生指导关系（冀东包括在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冀热辽分局、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和团干部的一次谈话

（1947年3月）

蒋介石打仗，是为了争地盘，占领延安，他好开会庆祝，我们就给他地盘。我们打仗是要俘虏他的兵员，缴获他的装备，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来壮大自己。这样，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好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就迟了。

蒋介石占领延安，《双十协定》就被他彻底撕毁了，他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我们撤出延安，意味着我们要解放西安，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这是战争的转折点。

应提早举行正太战役及缩短作战时间[1]

（1947年4月2日）

聂、萧、罗：

世电[2]悉。正太战役[3]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杨得志[4]）去晋西北打傅作义[5]（晋西北有四个旅在陕北作战）。

军委

卯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和副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指1947年3月31日聂荣臻、萧克、罗瑞卿、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即举行正太战役，歼灭正太线及石家庄外围之敌，战役拟分两期完成，第一期着重于东段，第二期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预计4月9日前打响，全战役预计一个月左右完成。

[3] 1947年4月，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由安国、定县南下，向正（定）太（原）路国民党军发起进攻。此次作战从4月9日开始至5月4日结束，共歼敌3.5万余人，攻克了阳泉工矿区和平定、寿阳、获鹿等县城，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军。

[4] 杨得志，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

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的战法[1]

（1947年4月2日）

彭、习：

（一）据西安情报称：胡宗南[2]率参谋人员进驻延安，并定以全力取瓦窑堡，然后攻绥德，预定四月半攻下绥德等语。判断胡军攻瓦窑堡必将先取永坪及清涧以西之折家坪，然后由该线两路或三路攻瓦窑堡。（二）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此次我在蟠龙、永坪设伏，因敌未走此路，且只有正面（较弱）及右翼，缺少左翼埋伏，故未打成；但只要敌前进，总有机会歼敌。（三）请考虑敌攻瓦窑堡，我应如何部署方为有利：甲、在瓦窑堡、清涧之间（丹头、杨家园子一带）设伏，准备打清涧西进之敌；乙、在永坪附近设伏，准备打延水西进之敌。以上两方案究以何者为宜，请酌定。（四）敌是否已占清涧，请查告。

毛

卯冬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暂时避免作战隐蔽待机[1]

（1947年4月3日）

彭、习：

冬电[2]悉。（一）敌十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二）敌占瓦窑堡后动向如何？速告。（三）我们现在瓦窑堡东北地区，二局无法侦察，敌情完全不明，望派一个营附电台到瓦窑堡以西旧安定城附近担负侦察及掩护之责。我们尚须两天至三天时间，方能转至安定以西安全地区。（四）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丙丁

三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指1947年4月2日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十个旅（一军五个旅，三十六师两个旅，一四四旅，十二旅，一三五旅）背依延川、清涧两城，分三路前进。敌之左路进至永坪东之冯家坪，中路进至永坪西北之王家沟，右路进至热思湾西高地。我二日于永坪公路侧伏，但因敌间隔很小纵深大，在南北三十五里、东西四十五里深以十个旅布成方阵，故停止伏击，荫蔽撤至蟠龙西北地区集结。敌未发现，另找机会击敌。自三十一旅歼灭后，此间未弄清敌情，请二局所得，随时电告。"

关于西北野战兵团的行动方针问题[1]

（1947年4月6日）

彭、习：

支日两电[2]悉。请告下列各点，以便考虑行动方针：（一）你们进至绥德、双庙湾、瓦市[3]、清涧之间以后，如南面不好打，是否可打北面，歼灭邓高[4]有生力量，补充自己并减轻北面威胁。如打邓高，如何打法（邓高如不出击，我须攻坚）。（二）马鸿逵[5]是否已至定边，共有多少兵力，如我进至绥德地区，南北都不好打，是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指1947年4月4日19时和23时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本日向瓦窑堡、蟠龙间合击十二旅、一三五旅，扑了一个空，情况仍未弄清。明日拟在蟠龙、石咀及以西地区休息。根据敌情，西北野战兵团目前行动方针：一是集结绥德、清涧、瓦窑堡、双庙湾四点之间，待敌向绥德前进时，寻机歼敌一两个旅，但因敌挤得太紧，有不好打的可能；其次向延长、延川寻求七十六师作战，打五十五旅，然后出甘泉、富县、关中，即所谓各打各的。两者以何者为是或另有方案请示。

[3] 瓦市，即陕西瓦窑堡。

[4] 邓，指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高，指高双成，原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第二十二军军长，1945年病故。此时第二十二军军长为左世允。

[5]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否可移师打马鸿逵，然后再打陇东、关中之敌，或由现地直打马鸿逵，再打陇东。（三）打延长、临真、甘泉是一个很好方针，但如胡[1]军不进绥德，将过早引退胡军，是否对尔后行动有妨碍，是否引胡军北进绥德，于我尔后行动更为有利。（四）率性休息数天，看清情况再定行动是否有利。

毛

鱼午

---

[1]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休整数天后分数路广泛袭击敌之后路[1]

（1947年4月8日）

彭、习：

（一）根据西安情报及胡[2]军退返永坪行动，敌似已放弃攻绥德企图。粮食极缺，又找不着我主力，将领极苦闷，认为仗不好打。（二）在此情况下，似已至实行你们所提打敌后路之时机。全军休整数天（避免作战），检讨经验，调整人事，极为必要。在休息期内考虑行动方针：或仍对敌之主力待机歼击一部（要有极大忍耐心）；或分为数路广泛袭击敌之后路（一路出金盆湾、临真[3]、宜川、韩城、澄城、蒲城、白水，留一部附电台位于金盆湾、临真地区，经常袭击该线；一路出洛川、中部[4]、宜君、同官、耀县，留一部附电台位于延、甘、富地区，经常袭击该线），正面（瓦市[5]一带）只留一个旅或少于一个旅即够。此外则集中主力打邓左[6]，打马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电报的节录。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3] 临真，今为临镇，位于陕西延安市东南。

[4]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5] 瓦市，即陕西瓦窑堡。

[6] 邓，指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左，指左世允，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第二十二军军长。

逵[1]，打马鸿宾[2]（镇原），打陇东、关中，而以一部钳制胡军，亦可作为考虑方针之一。究应如何？望斟酌电告。

军委

卯齐

---

[1]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2] 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军陕甘宁绥靖总部副司令。

放手扩大战果打敌薄弱据点[1]

（1947年4月9日）

陈、谢、王、韩，并告彭、习[2]：

（一）整十师（罗广文[3]）之八十五旅（文景渊[4]）到达运城，除令地方游击队加以监视外，你们主力不要理他，放手扩大战果，尽快攻占河津、荣河、万泉、猗氏、临晋[5]等城，打敌薄弱据点，歼敌有生力量为要。（二）彭习称，胡[6]军主力向延安方向退却，饥疲不堪。

军委

九日十六时

---

[1]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为配合陕北战场作战，于1947年4月4日发起晋南攻势。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韩钧和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的电报。

[2]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4] 文景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第八十五旅旅长。

[5] 荣河、万泉，均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万荣县。猗氏、临晋，均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临猗县。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工事太坚者不必强攻，应超越前进[1]

（1947年4月9日）

陈、谢、王：

（一）攻占新绛、稷山，甚慰。十旅纪律甚好，予以嘉奖。（二）望相机攻占河津、万泉、荣河[2]等地。（三）工事太坚者不必强攻，应超越前进，攻其较弱者。（四）胡[3]军现由瓦窑堡向青化砭退却。

军委

卯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和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的电报。

[2] 万泉、荣河，均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万荣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敌情正在变化，我军主力现地待机

（1947年4月9日）

彭、习[1]：

（一）敌情正在变化，可实行你们前提议分散三四个营各带电台四面袭扰敌人之办法[2]，主力则在现地待机为有利。此外，请考虑要王世泰[3]袭击洛川、三原间公路。（二）陈谢[4]于占翼城、侯马

---

[1]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 1947年4月2日21时彭德怀、习仲勋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敌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路爬高山；不就房屋设营，多露天宿营；不单独一路前进，数路并列间隔很小。如25日青化砭战斗后，27日以一二三旅、一三五旅、一六五旅进犯，以两旅沿青化砭、拐峁大道两侧山地，一旅偕行李走。另一师自拐峁以东十余里向岔口北进，九十师在一师左侧，此其一例。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敌人此种小米滚子式的战法，减少我各个歼敌机会，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目前敌军甚疲劳，掉队落伍逃亡日渐增加。为对付敌人此种强大集团战法，拟分散三四个营兵力，以一连至两连为一股（现群众游击战未开始），派得力指挥员在敌前后左右四面袭扰，断敌交通，将敌疲困，使敌不能不分散部分守备交通，以创造打击分散与打援敌之机会。此法拟试行，妥否盼示。

[3] 王世泰，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

[4]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外，虞又攻占新绛、稷山[1]，俘获颇多，已令其向河津等地前进。

毛泽东

九日

---

[1] 1947年4月8日，陈赓、谢富治、王新亭、韩钧关于攻占新绛、稷山向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攻占新绛是4月7日，攻占稷山是4月8日。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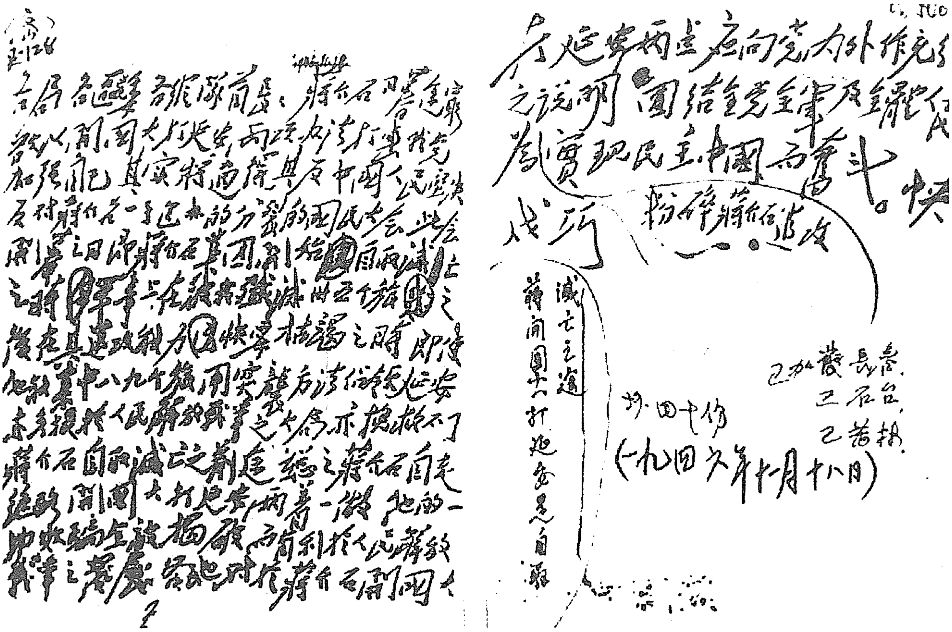
（1946年11月、1947年4月）

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指示

各局，各区党委，各部队首长：

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2]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各地对于蒋介石开“国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

中央
戌巧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指示的手稿。

二　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

国民党为着挽救其垂死统治，除了采取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我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代表机关，宣布国共破裂[3]等项步骤之外，又采取进攻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项步骤。

国民党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强有力，而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已异常深刻化。其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还为着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决定：

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

三、同时，为着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

以上三项，为上月所决定，业已分别实行。特此通知。

---

[1]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文件，一个是在1946年冬季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延安的时候在延安写的，一个是在国民党军队已经在1947年3月19日占领延安以后的20天在陕北靖边县青阳岔写的。蒋介石在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以后，为了挽救自己的垂死统治，采取了召开伪国民大会，驱逐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等项疯狂的步骤。蒋介石采取这些步骤的结果，如本文所说，在政治上完全是自取灭亡。在军事上，他企图集中兵力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解放区，实行所谓重点进攻，结果也完全失败。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兵力达到25万人，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在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只有两万多人，因而国民党军曾经先后占领过人民解放军主动放弃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所有县城。但是国民党军不但没有达到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解放军或者把它们赶到黄河以东的目的，而且受到人民解放军多次的沉重打击，损失兵力约达10万人，最后不得不逃出边区，而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转入解放大西北的进攻。同时，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以很少兵力吸引和歼灭了敌军的大量主力部队，也有力地支援了其他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战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帮助他们较快地转入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从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起，到1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转入进攻止，一直留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极大地鼓舞了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

胜利信心。毛泽东在留驻陕甘宁边区期间，不但继续指导了全国各个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而且直接指挥了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地达到了本文所提出的“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的目的。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参看《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和《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两文。

[2] 这是1946年7月初到11月13日的统计。

[3] 1947年2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强迫中国共产党驻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撤退。1947年3月15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宣称国共破裂，决心作战到底。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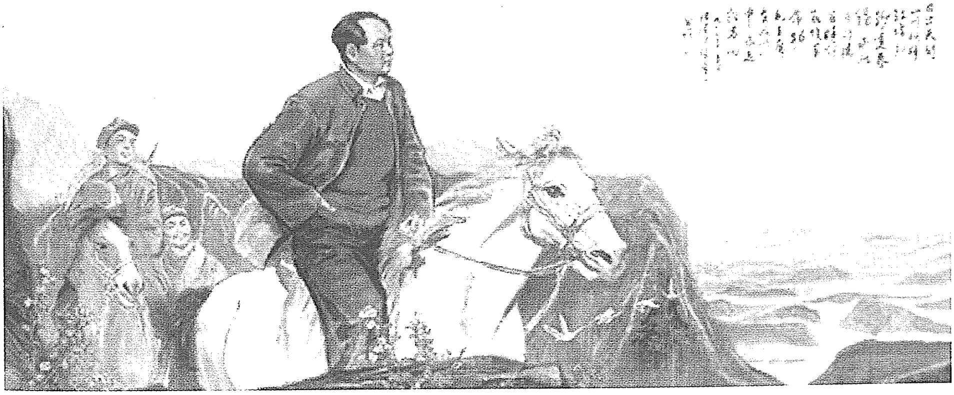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小憩。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途中小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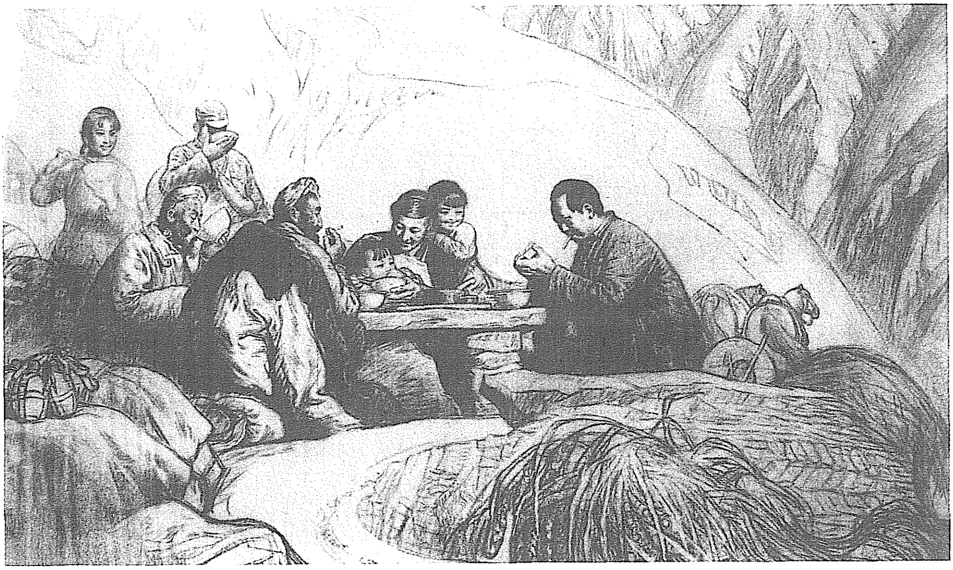
1947年，毛泽东（前右三骑马者）和任弼时（前右二骑马者）、周恩来（前右一骑马者）在转战陕北途中。

1947年，毛泽东和江青在转战陕北途中休息。

1947年，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在转战陕北的途中和老乡一起吃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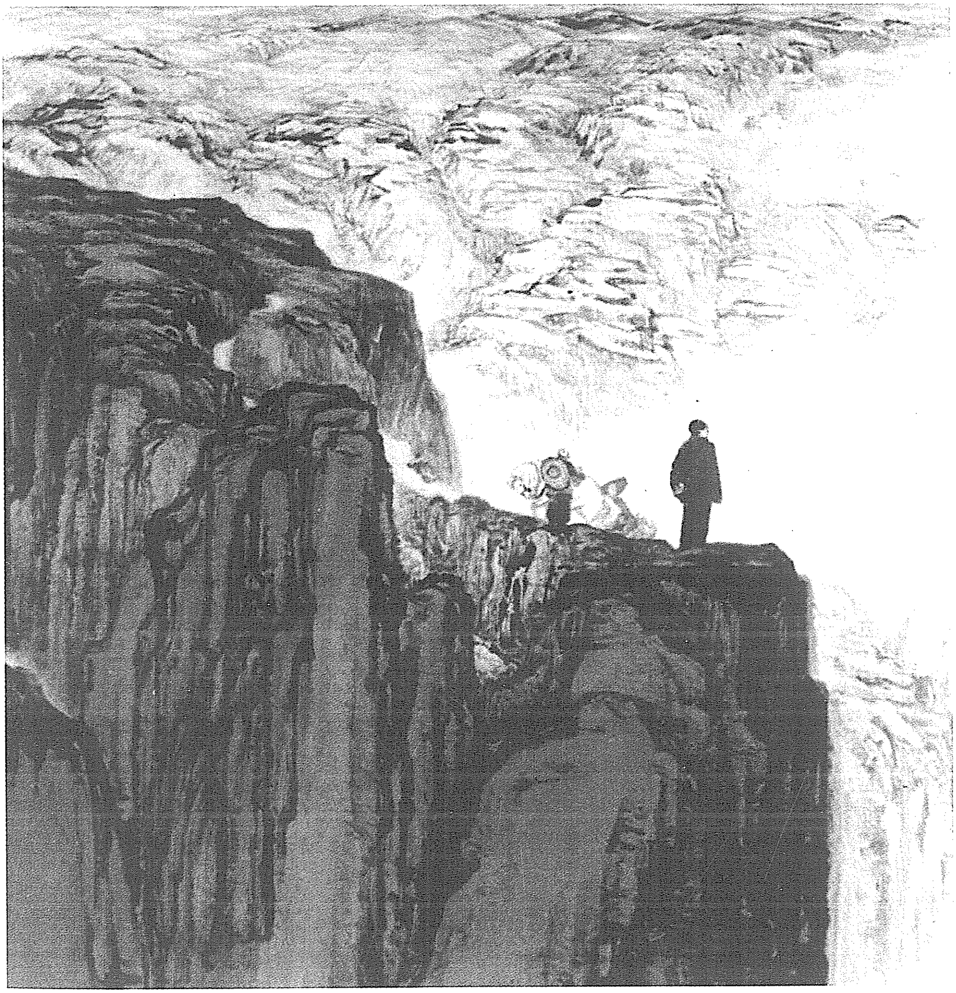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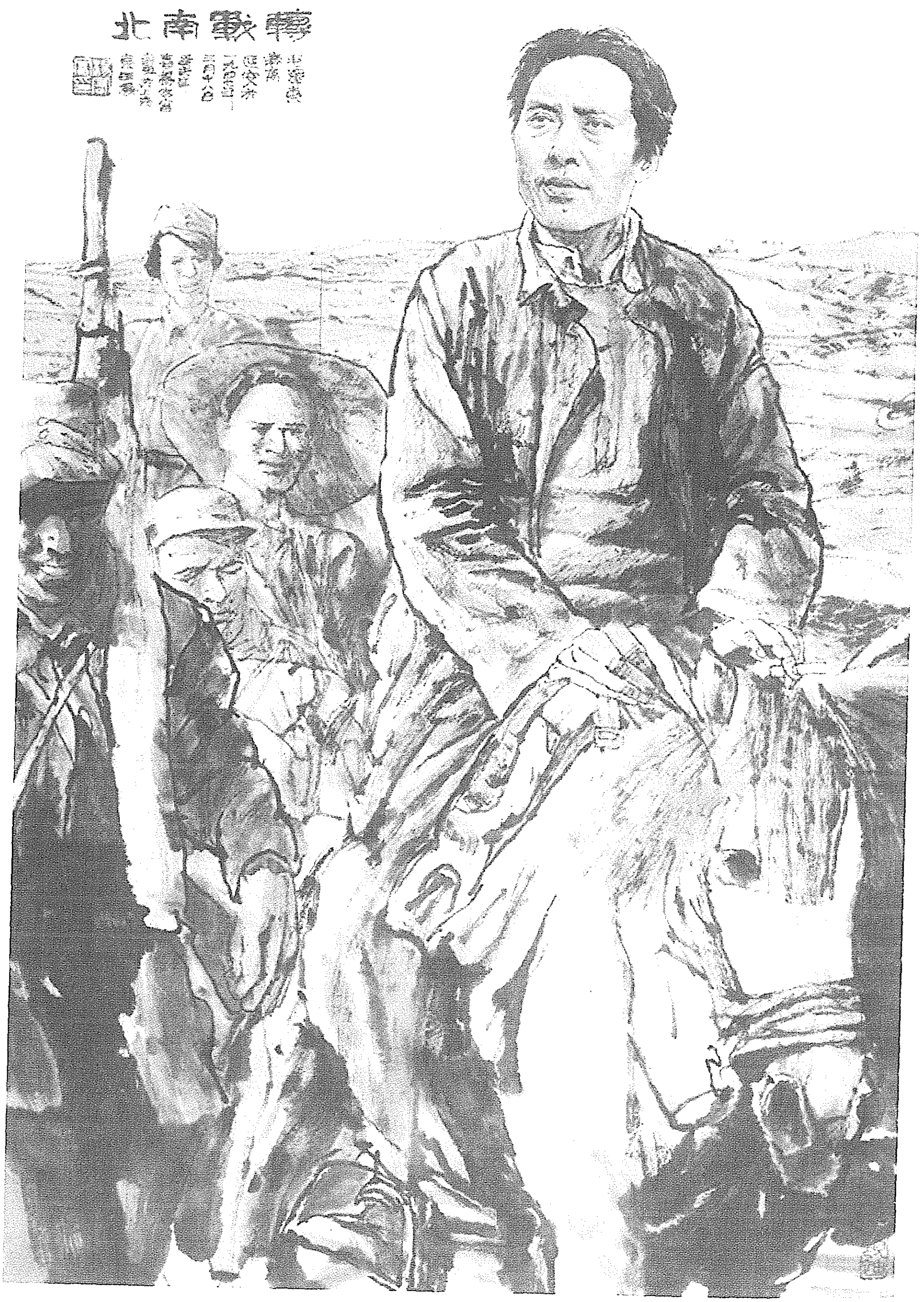


《小米饭》（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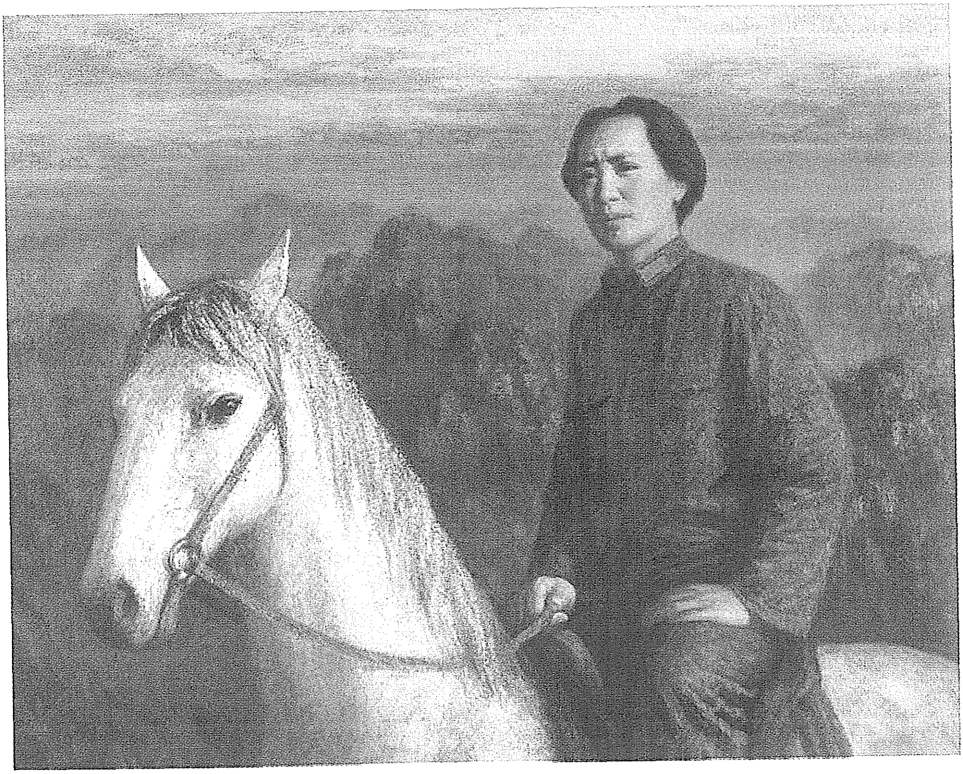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期间使用的望远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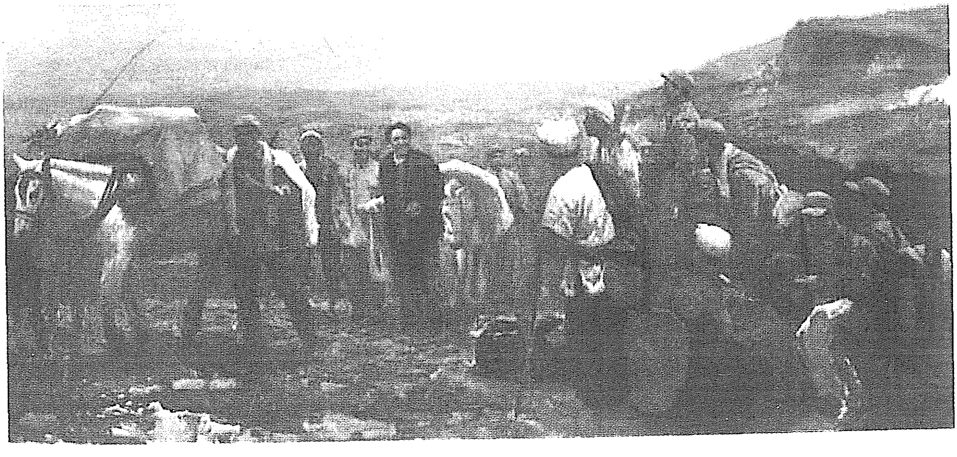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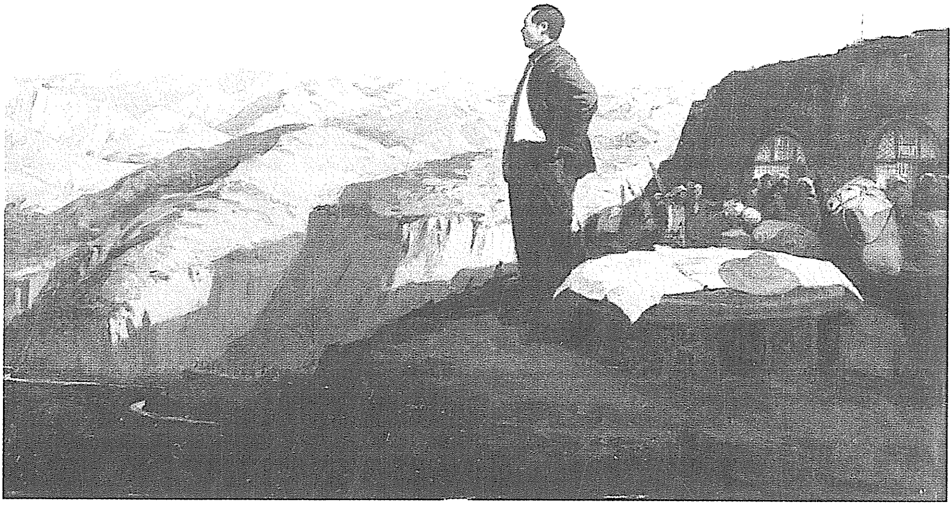
《转战南北》（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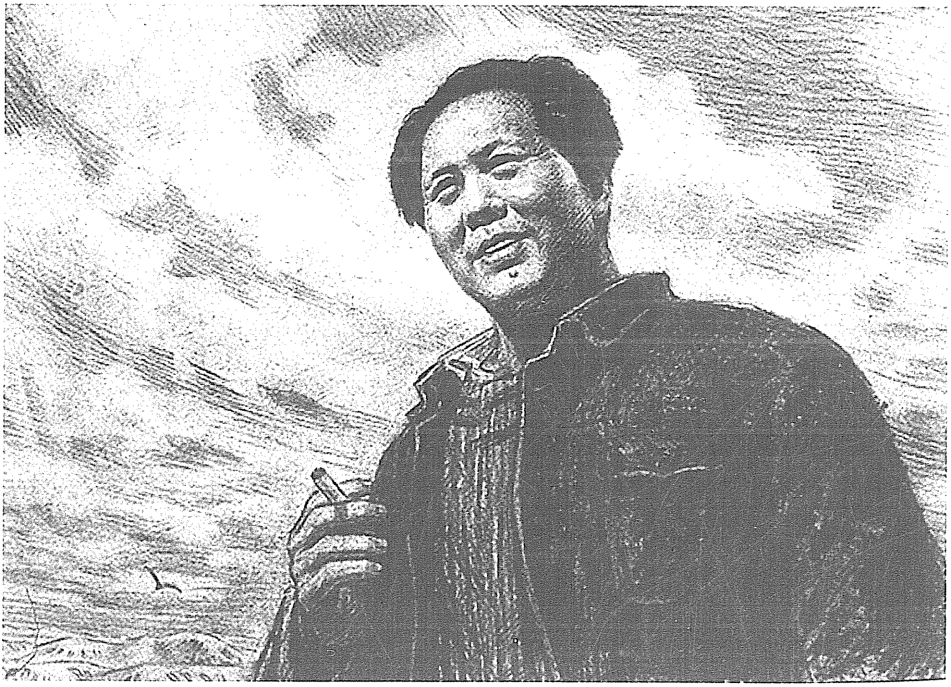
《毛主席在转战途中》（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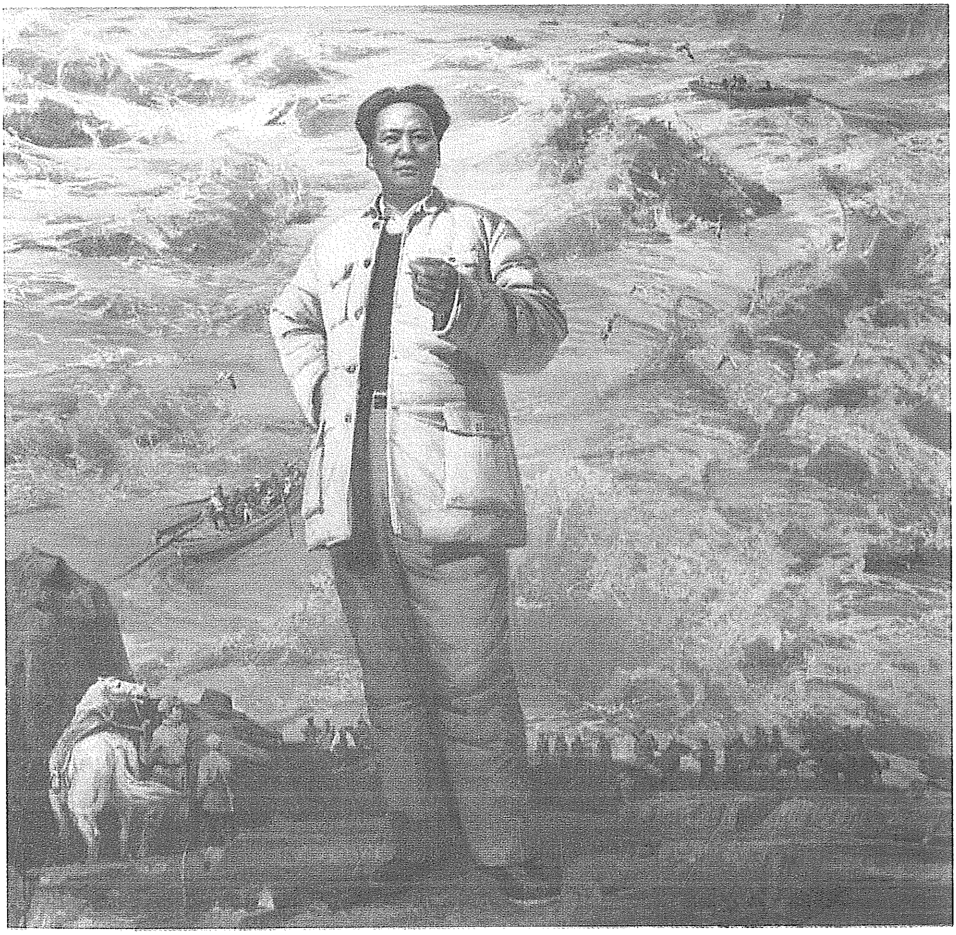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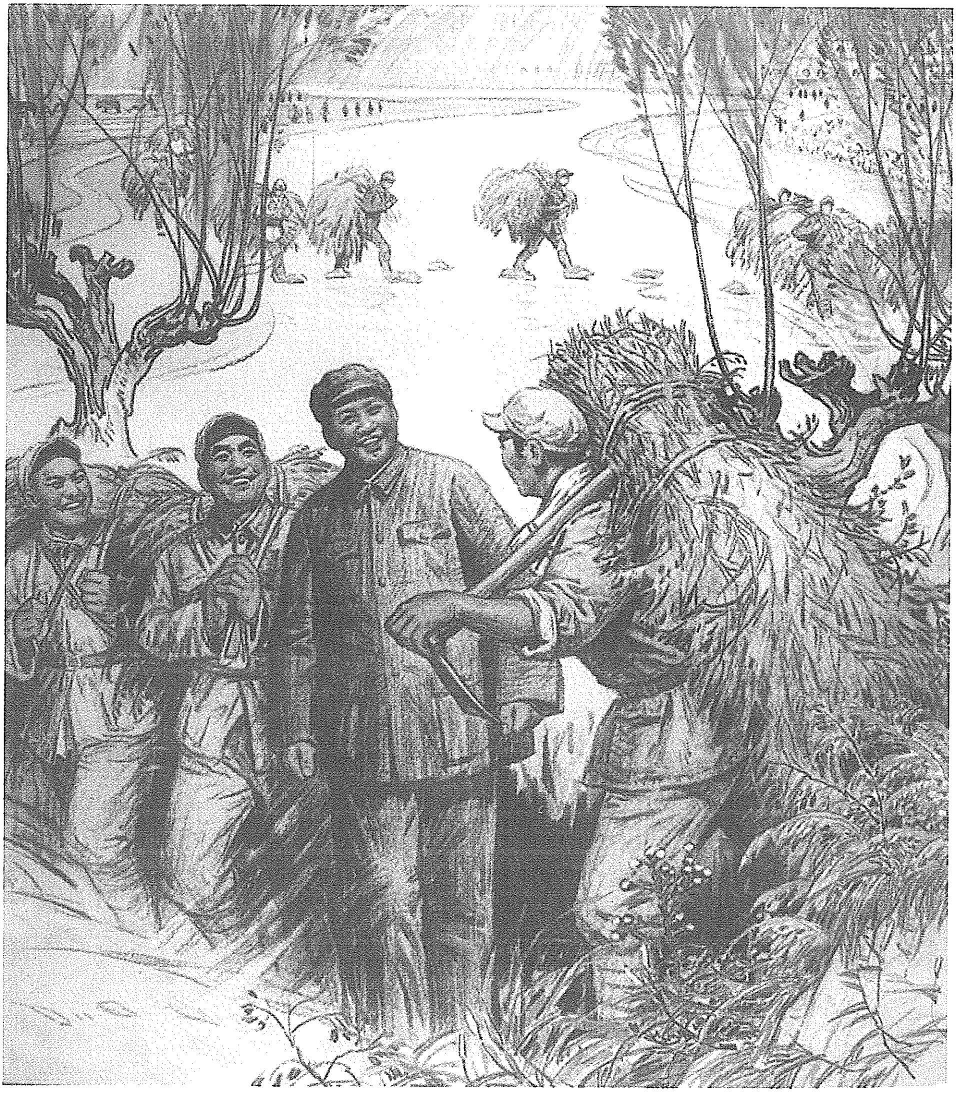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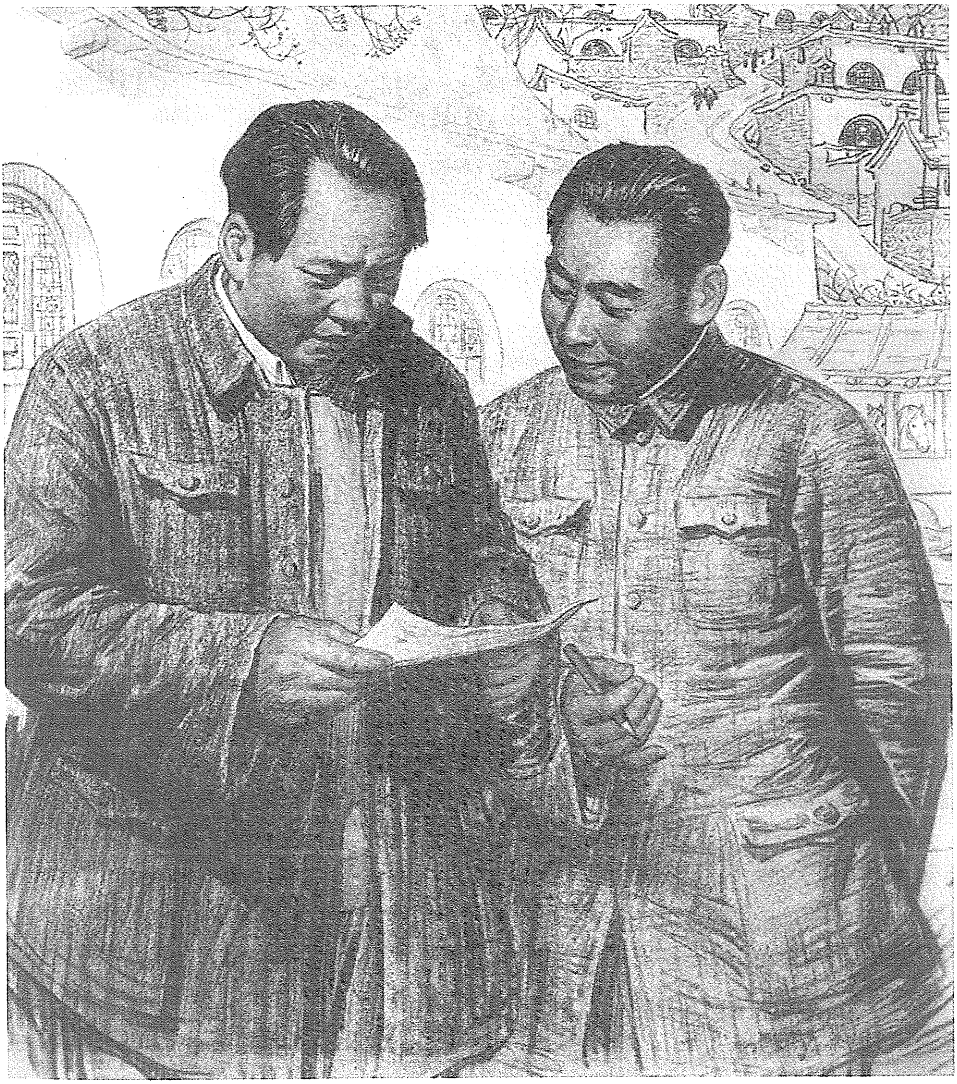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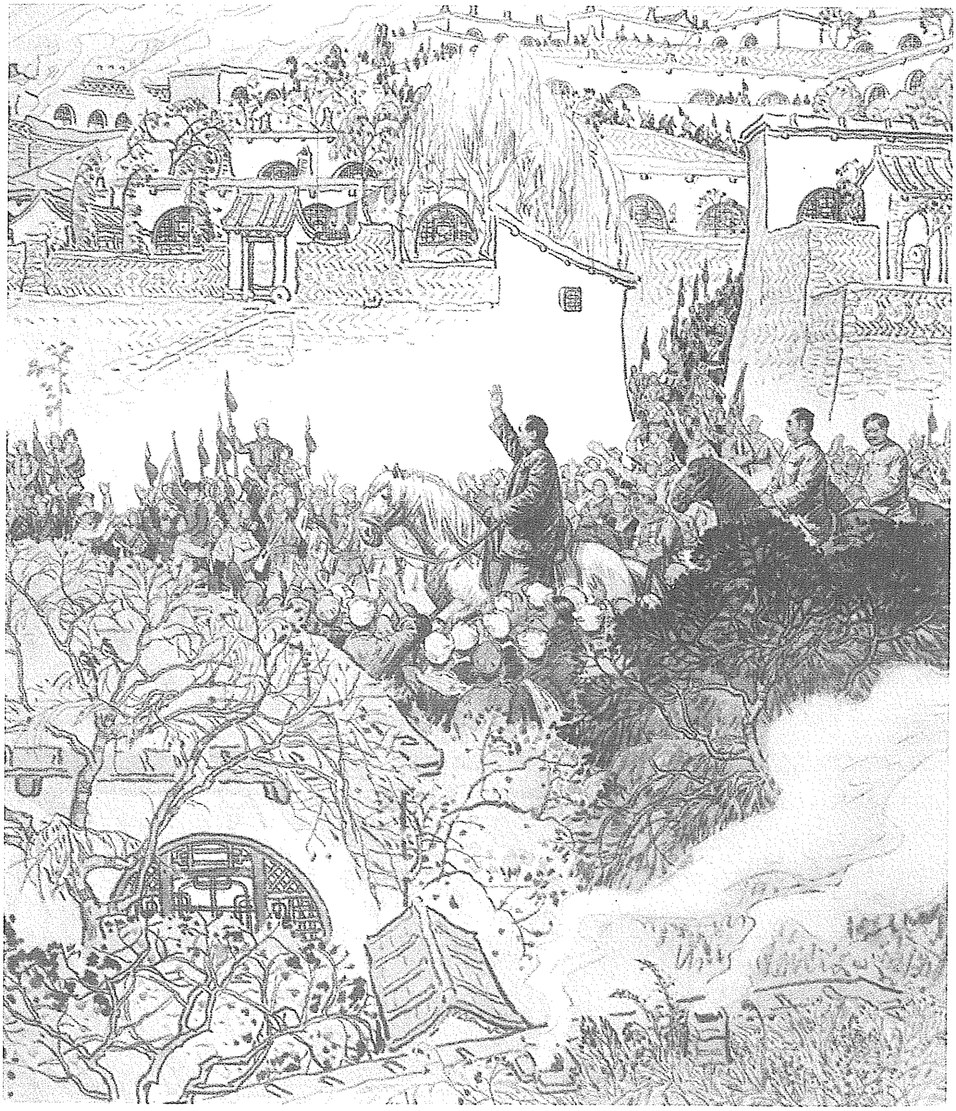
《中流砥柱》(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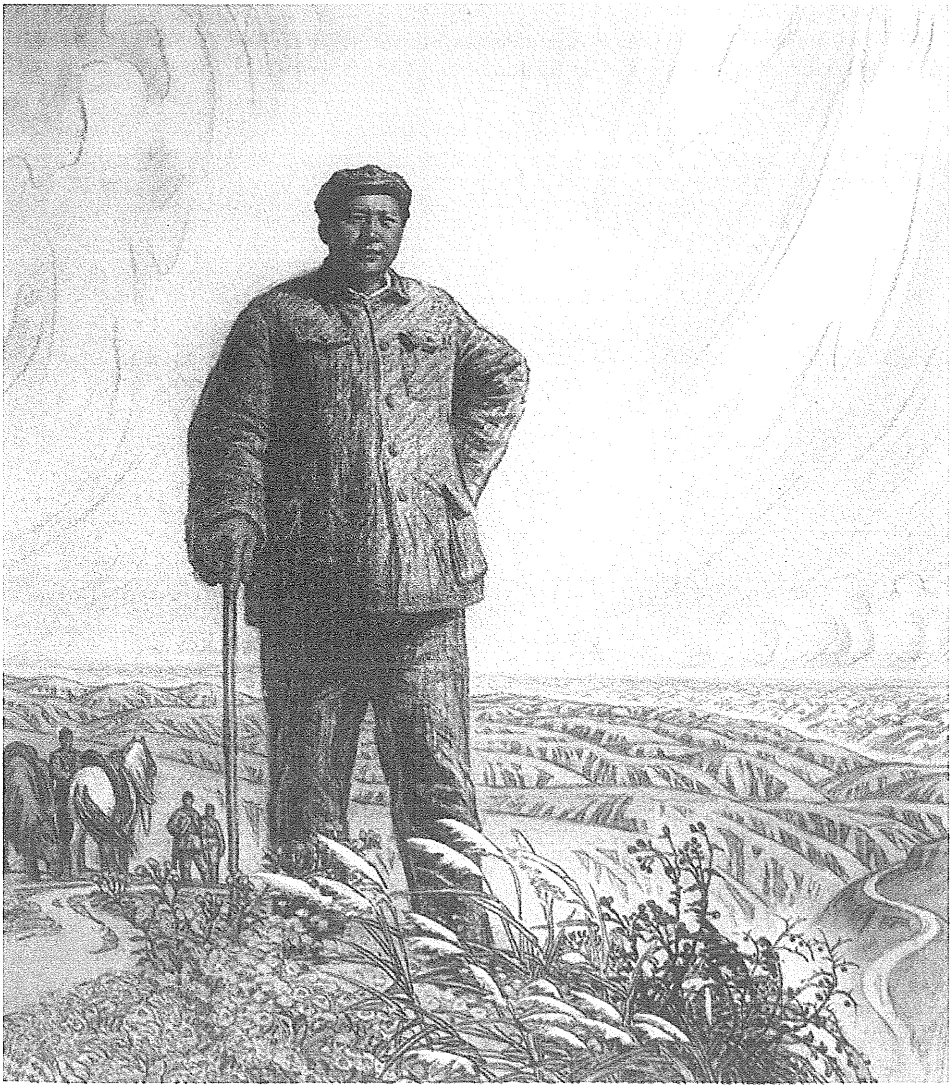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组画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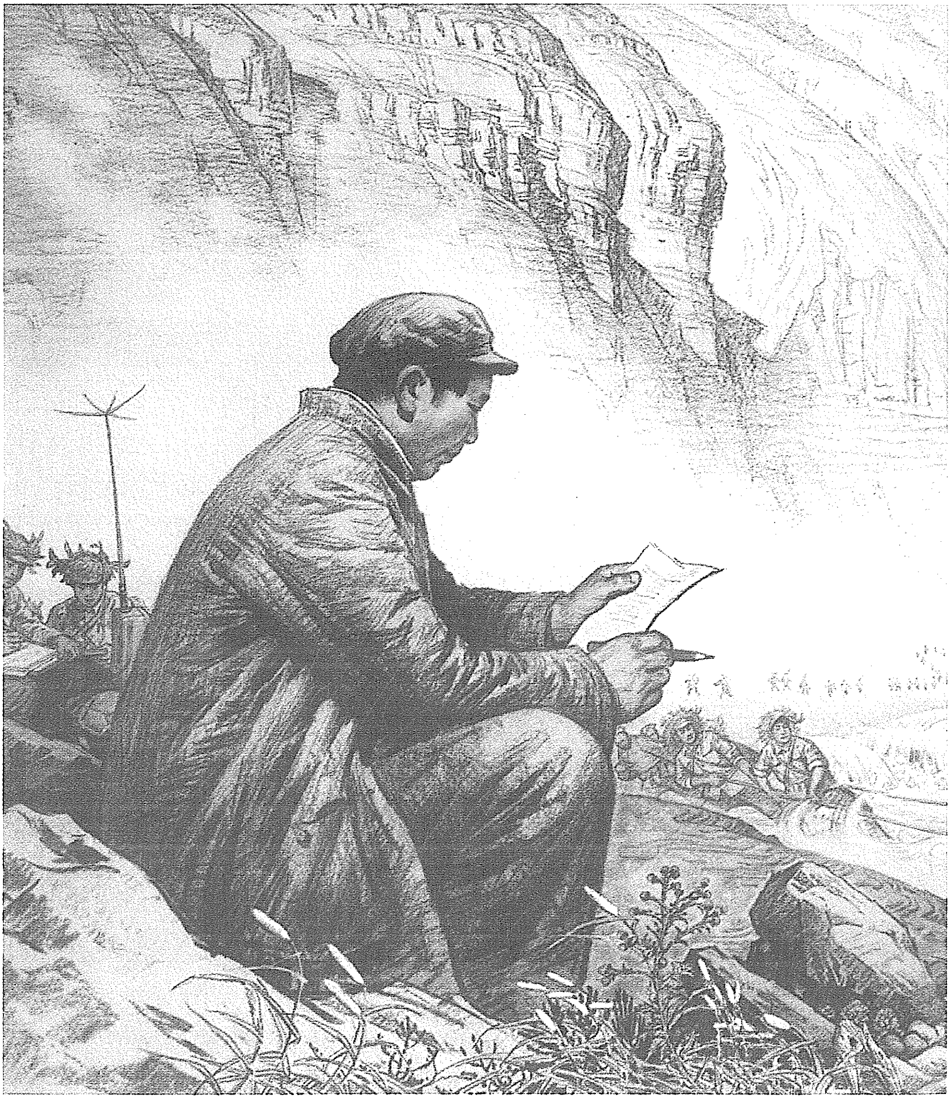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组画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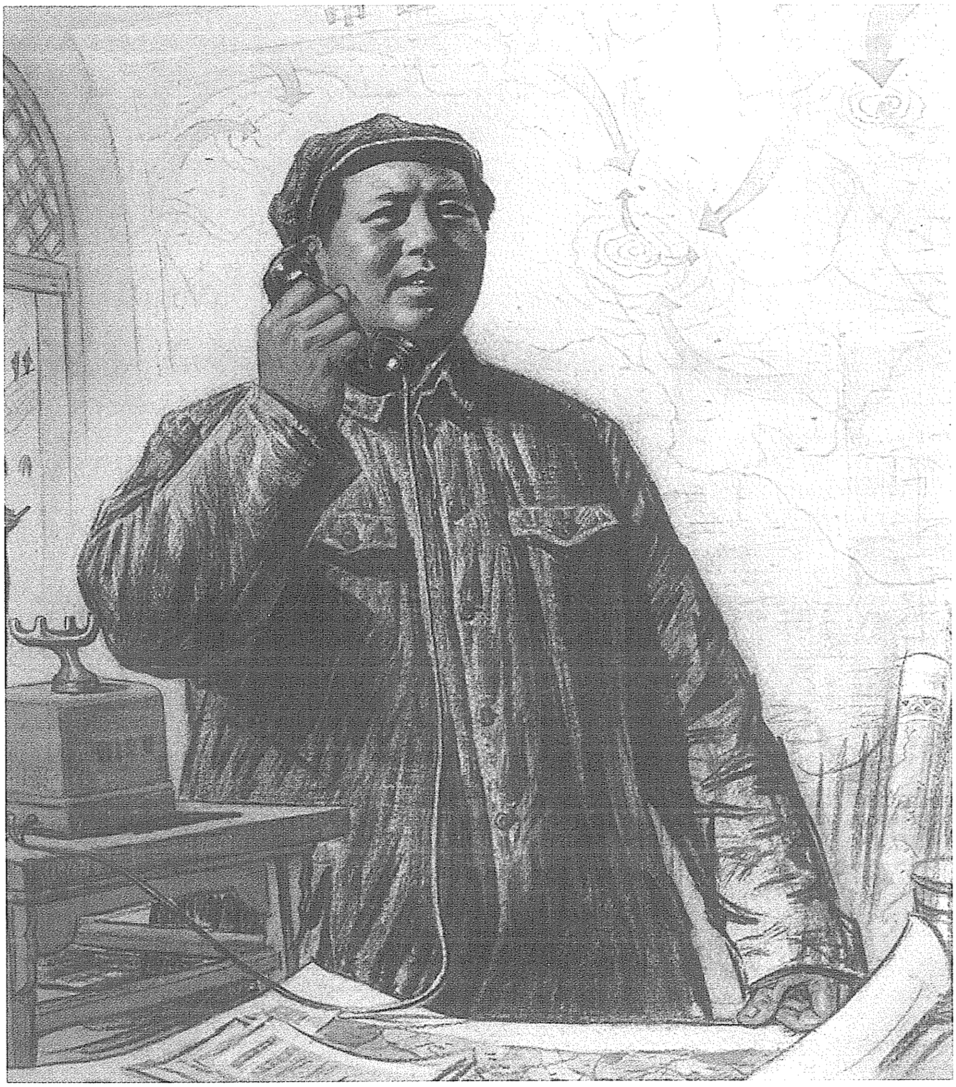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组画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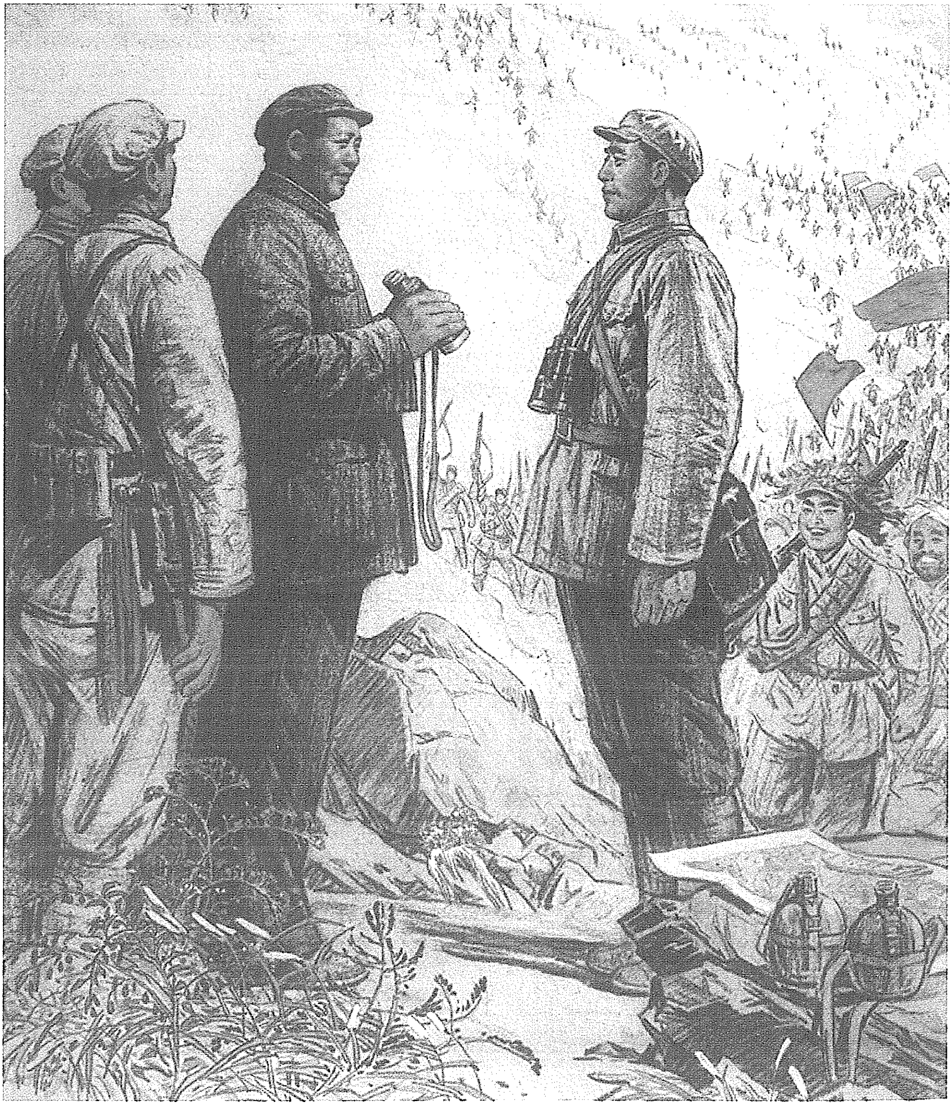
《转战陕北》（组画之四）



《转战陕北》（组画之五）



《转战陕北》（组画之六）



《转战陕北》（组画之七）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1]

（1947年4月11日）

清涧之二十四旅一个团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瓦后，一三五旅很可能调动，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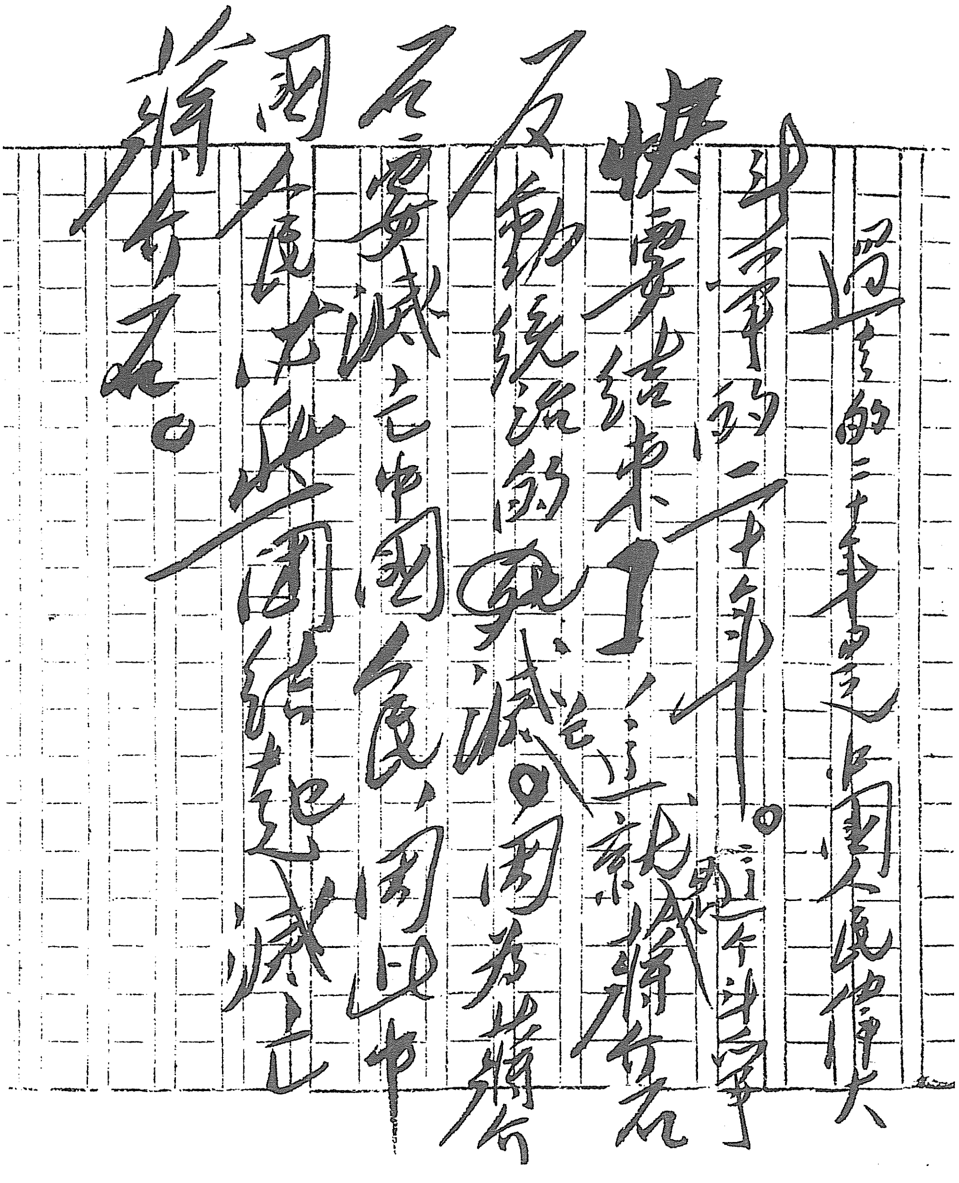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修改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时加写的一段话

（1947年4月14日）

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必然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



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这个斗争快要结束了，这就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灭亡。因为蒋介石要灭亡中国人民，因此中国人民就团结起来灭亡蒋介石。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二十年》时加写的一段话。

致陈赓、谢富治等电[1]

（1947年4月14日）

占领曲沃后以主力南下，相机攻占运城外围各据点，如有可能，则攻取运城及整个三角地带各城，直至风陵渡，威胁关中，是很好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赓、谢富治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1]

（1947年4月15日）

（一）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军自歼敌第三十一旅[2]后，虽未大量歼敌，但在二十天中已经达到使敌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之目的，给今后使敌十分疲劳、断绝粮食和最后被歼造成有利条件。

（二）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敌三月三十一日到清涧不即北进，目的是让一条路给我走；敌西进瓦窑堡，是赶我向绥、米。现在因发现我军，故又折向瓦市以南以西，再向瓦市赶我北上。

（三）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1947年7月改称西北野战军）的电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是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所组成的。

[2] 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以小部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安塞（在延安西北），主力埋伏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1947年3月25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旅部率一个团共2900余人进入人民解放军伏击圈内，经过1个多小时的战斗，人民解放军将其全部歼灭。这是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陕北战场的第一个胜仗。

路。应向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说明，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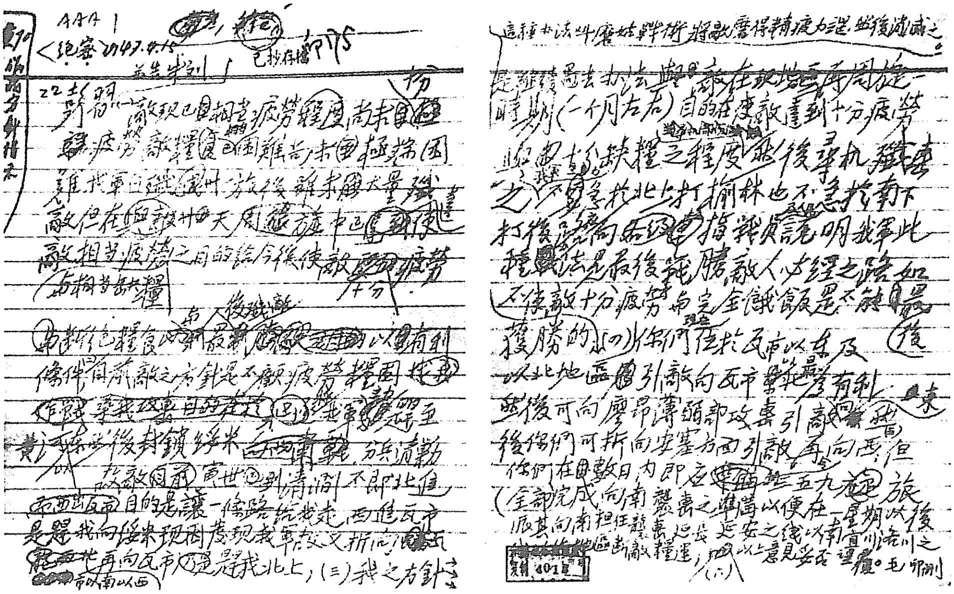
（四）你们现在位于瓦市以东和以北地区，引敌向瓦市以北最为有利；然后可向敌廖昂[1]薄弱部分攻击，引敌向东；再后你们可折向安塞方面，引敌再向西。

（五）但你们在数日内即应令三五九旅（全部）完成向南袭击之准备，以便在一星期以后派其向南担任袭击延长延安之线以南、宜川洛川之线以北地区，断敌粮运。

（六）以上意见妥否望复。

---

[1] 廖昂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当时率部驻守于延川、清涧一带，后来在1947年10月11日清涧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活捉。



毛泽东致彭德怀、习仲勋等电的手稿。

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1]

（1947年4月15日）

彭、习，并告朱、刘，贺、李，聂、萧、罗，林、王，叶、杨，刘、邓，陈、谢，滕、薄、王，陈、饶、粟、谭，林、高[2]：

接彭习寒亥电，继寅有在青化砭歼灭三十一旅主力之后，卯寒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并告各地领导人的电报。1947年4月11日，当获悉国民党军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公路南下策应主力的动向后，毛泽东当即指示西北野战兵团以伏击手段求歼第一三五旅于运动中。4月14日，当第一三五旅进至羊马河以北地区时，遭到西北野战兵团4个旅的伏击，经8小时激战，该旅4700余人全部被歼。

[2] 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贺、李，指贺龙、李井泉，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聂、萧、罗，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林、王，指林伯渠、王维舟，当时分别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叶、杨，指叶剑英、杨尚昆，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和副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滕、薄、王，指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林、高，指林彪、高岗，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又在瓦窑堡附近将敌一三五旅（属十五师建制）全部歼灭。这一胜利给胡宗南[1]进犯军以重大打击，奠定了彻底粉碎胡军的基础。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这一胜利又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望对全军将士传令嘉奖，并望通令全边区军民开会庆祝，鼓励民心士气，继续歼敌。

中央
卯删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等电[1]

（1947年4月15日）

（一）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奖励；（二）傅作义对晋西北已无大威胁，杨纵[2]可不调动；（三）你们彻底完成正太作战任务后，休整若干天再歼三军一部甚为必要，尽可能全部歼灭第三军，只要能歼敌有生力量，时间可以延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并告朱德、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杨纵，指杨得志为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4月15日）

五师文汪部[2]七千人是该师精华，你们应当作自己建制部队一样给以积极帮助。中原局郑、李[3]诸同志（现在离石待机过路来你处）希望你们补充该部一部新兵、一部俘虏及相当武器弹药，望召文、汪征询情况，给以关于整训的指示并商定补充计划。补充与整训完成后，可给以适当的作战任务，使该部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以便将来和大军一道出河南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并告陈赓、谢富治、王新亭、韩钧电的主要内容。韩钧，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2] 五师文汪部，即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治委员汪锋率领的部队。该部由中原突围出来的中原军区第二纵队一部和河南军区部队合编组成。因中原军区是由原新四军第五师等部组成的，这里仍沿用旧称。

[3]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

在修改《战局的转折点——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时加写的两段话

（1947年4月17日）

可以预计，四月开始的两三个月内，蒋军将由攻势转变成为守势，人民解放军将由守势转变成为攻势。

历史事变的发展表现得如此出人意料，蒋介石占领延安将标志着蒋介石的灭亡，人民解放军的放弃延安将标志着中国人民的胜利。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1]

（1947年4月20日）

你们过去时期以休养生息为主要方针是对的，现在必须转变，以打运动战为主，为着完成必要的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左右时间也是可以的。你们现归东北局及东总[2]领导，尔后应向东北局及东总作报告及请示方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转程子华、李运昌、黄克诚并告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程子华、李运昌、黄克诚，当时分别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政治委员。

[2] 东总，指东北民主联军总部。

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1947年4月22日）

聂、萧、罗[1]，并告朱、刘[2]：

马电[3]悉。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4]，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地歼击之，选击何部那时再定。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军委

卯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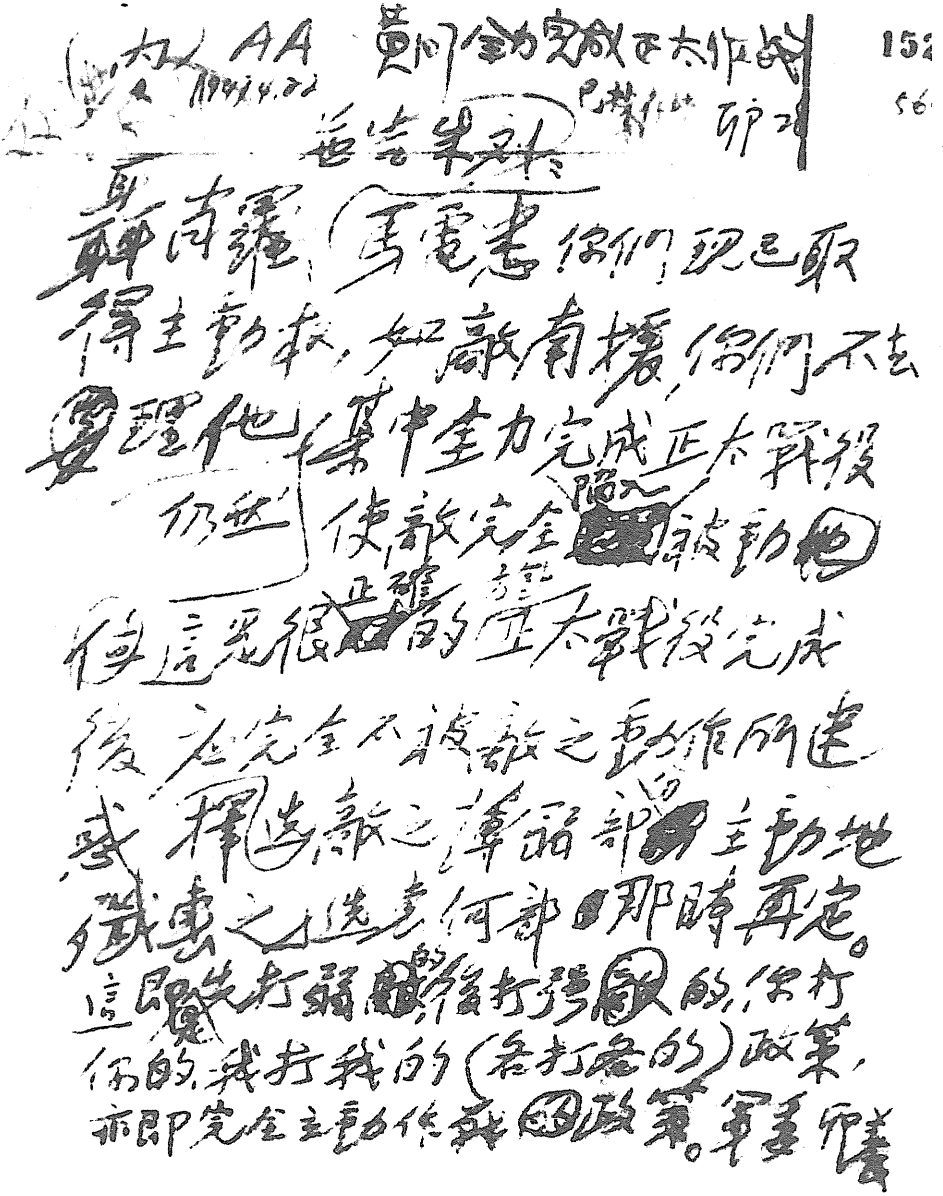
---

[1] 聂、萧、罗，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2] 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3] 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1947年2月2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南援可能性最大，我晋察冀军区主力仍按预定计划完成正太战役第二期作战。战役完成休整若干天后，敌如未南援，则按中央指示继续歼灭第三军；敌如南援，则以围点打援办法，向平保段或保石段出击。

[4] 1947年4月，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纵队及地方武装一部，由安国、定县南下，向正太路国民党军发起进攻。这次作战从4月9日开始至5月4日结束，共歼敌3.5万余人，切断了太原与石家庄之敌的联系，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孤立了石家庄的国民党军。



AA 貴門全力完成正太作戰 152

1947.4.22 已發 卯 56

並告朱劉

聶荀羅，（馬電悉）你們現已取得主動權，如敵南援，你們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戰役，使敵完全陷入被動。在這有把握的正太戰役完成後，在完全不被敵之動作所迷惑，擇選敵之薄弱部分主動地殲滅之，選擇何部那時再定。這即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動作戰政策。軍委 卯養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正太战役的指示的手稿。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1]

（1947年4月23日）

彭、习：

二十日电[2]悉。部署甚妥。

军委

二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20日10时，彭、习致电军委称："牵制敌人主力，疲劳与动摇其军心，各兵团准备继续困扰敌人，部署如下：1. 一、二纵队应各以两个连，以排为单位，派得力干部指挥，一纵分布董刘两军北西两面，二纵分布该敌南东两面，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对敌散发传单、喊话，捉敌落伍逃兵，争取补充自己。新四旅对瓦市，教导旅对清涧，亦取同样动作。2. 一纵队移至石家川、李家川、桑树坪、磁窑、桃园地区。3. 第二纵队、教导旅移至热思湾、王家庄及其东及其南北地区。4. 新四旅移至杜家畔、吴家峁、高家河、吴家寨地区。5. 警七团另有任务，着移至大寨、徐家岔。6. 指挥所及其直属队移至中庄、新庄之线。以上各兵团，均于二十日黄昏时向目的地转移。"

王世泰部应保证断敌粮道[1]

（1947年4月26日）

彭、习：

除阎揆要[2]率一个团及两个营南进外，主力宜在现地多休息数日，完全弄清敌情，然后考虑行动。又王世泰[3]对甘泉、洛川、耀县间之袭击应是长期的，保证断敌粮道。以上请酌。

毛

二十六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阎揆要，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3] 王世泰，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

望部署歼击瓦窑堡可能逃跑之敌[1]

（1947年4月26日）

彭、习：

（一）陈赓[2]威胁西安，董军[3]可能南撤。（二）瓦市敌可能逃跑，其道路或经瓦市东北（王家湾、李家川等地）向清涧，或经瓦市西南向蟠龙，望部署歼击之。

军委

卯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董军，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

致林彪、高岗电[1]

（1947年4月26日）

请你们考虑，在东北今后是否尚须破坏铁路。我们感觉似不宜再破路，例如南满、吉奉[2]、安奉[3]、四梅[4]，打通诸路，敌我来去，争夺必尚有一个时期，即尚有一个时期被敌利用而我不能利用，即使如此也不要紧，不久将来即可全为我用，若再破坏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彪、高岗电的主要内容。

[2] 吉奉，指吉林到沈阳段。

[3] 安奉，指安东（今丹东）到沈阳段。

[4] 四梅，指四平到梅河口段。

致李先念等电[1]

（1947年4月27日）

文、汪所部多者已休整二月余，少者亦有月余，已电太行给以补充，现请考虑如该部已获补充，可否令该部于五月中旬结束整训，准备于五月下旬或六月依刘、邓计划开往豫皖苏边区。作为该区主力之一部，相机向河南发展（如刘邓主力出豫西，则随刘、邓一起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李先念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1]

（1947年4月28日）

彭、习：

感酉电[2]悉。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军委

二十八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4月27日19时，彭、习致电军委："1. 董刘两军二十七日十五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模样。蟠龙留一六七旅直及四九九团守备，似有粮弹未发完。2. 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得手后再围歼甘谷驿、桥儿沟八十四旅之二五一团，并彻底破坏永延段公路。妥否？望即复。"

确有把握方可攻击瓦窑堡或蟠龙[1]

（1947年4月30日）

彭、习：

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准备运动中歼敌。

军委

卯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1]

（1947年5月2日）

彭、习：

冬已电悉，攻击蟠龙决心[2]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

毛泽东

冬午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4月29日20时，彭、习致电各纵并报军委，电文如下："围歼蟠龙之敌部署如下：1. 一纵队由核桃坪、孙家台线南北高地由西向东攻击蟠龙镇、窑坪线之敌。2. 二纵之独四旅由何家峁子、郭家庄之线向北攻击蟠龙线之敌。教导旅主力位于青化砭以北地区机动，一部肃清青化砭及其以南之反动组织，彻底破坏青化砭南北公路。3. 新四旅由谢家咀、刘家坪向纸坊坪、蟠龙线之敌攻击。4. 各兵团务必根据上述地域区分，明（三十）日进行详细侦察与各种战斗准备，限明（三十）日午后四时以前报告和提出攻击部署意见，以备五月一日攻击参考。5. 彭参明（三十）日午前至蟠龙东北侦察地形敌情，午后二时以前至薛家沟附近。纵队与旅正副首长有一人来薛家沟面商和接受攻击命令。"

修改《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加写的一段话

（1947年5月3日）

五四运动所开始的新的文化事业，它为现在的革命战争与将来的革命建设而服务，没有它，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面前还有强大的敌人与艰苦的战斗，因此，我们十分需要广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业，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

一周内攻克蟠龙即可保持主动[1]

（1947年5月4日）

彭、习：

（一）江未电[2]悉。俘敌六百，甚慰。敌主力似在绥米[3]地区有数天停留，至少一星期才能返抵蟠龙。我军如能在一星期内攻克蟠龙[4]，即可保持主动。胡宗南[5]已令张新[6]率二十四旅一部（可能是一个团）增援，望注意。（二）东北自卯初歼敌四个团后，敌之攻势已停，我正准备发动攻势。山东卯宥歼七十二师三个旅，现似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指1947年5月3日13时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今拂晓攻击蟠龙，敌将保安队守备第一线，我攻占一线后，天已大明，故停止攻击，共俘保安队600余人，我主力均已接近敌阵地，伤亡甚少。本日黄昏后决心再攻。

[3] 绥米，指陕西绥德和米脂。

[4] 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的一个市镇。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在蟠龙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守军670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给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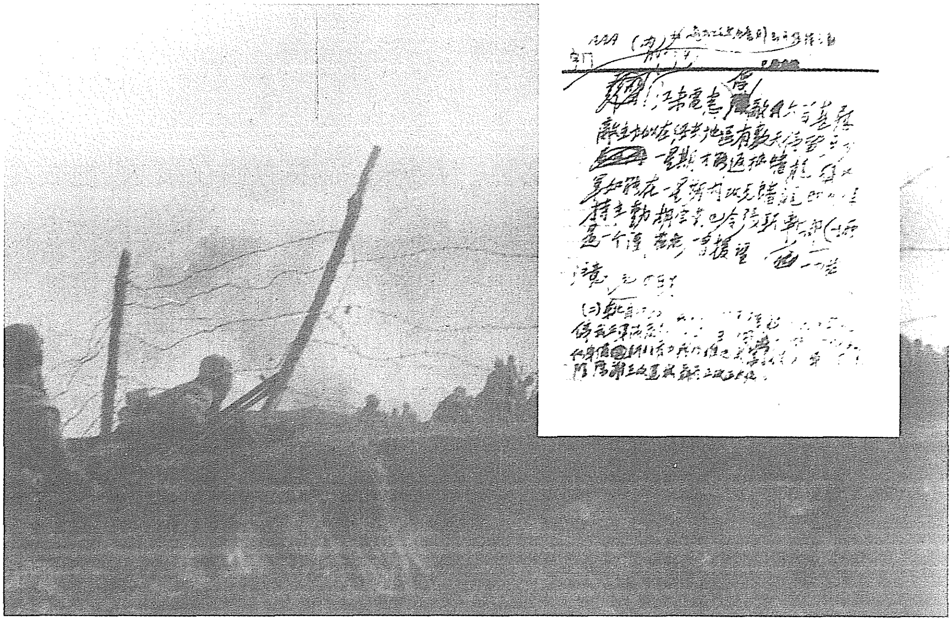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 张新，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第二十四旅旅长。

新的有力战役，惟尚未接报告。刘邓[1]已克汤阴。陈谢[2]正攻运城。聂萧[3]正攻正太线[4]。

毛

四日午



1947年3月至5月，毛泽东指示西北野战军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取得三战三捷。图为蟠龙战役作战场面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蟠龙战役的指示的手稿。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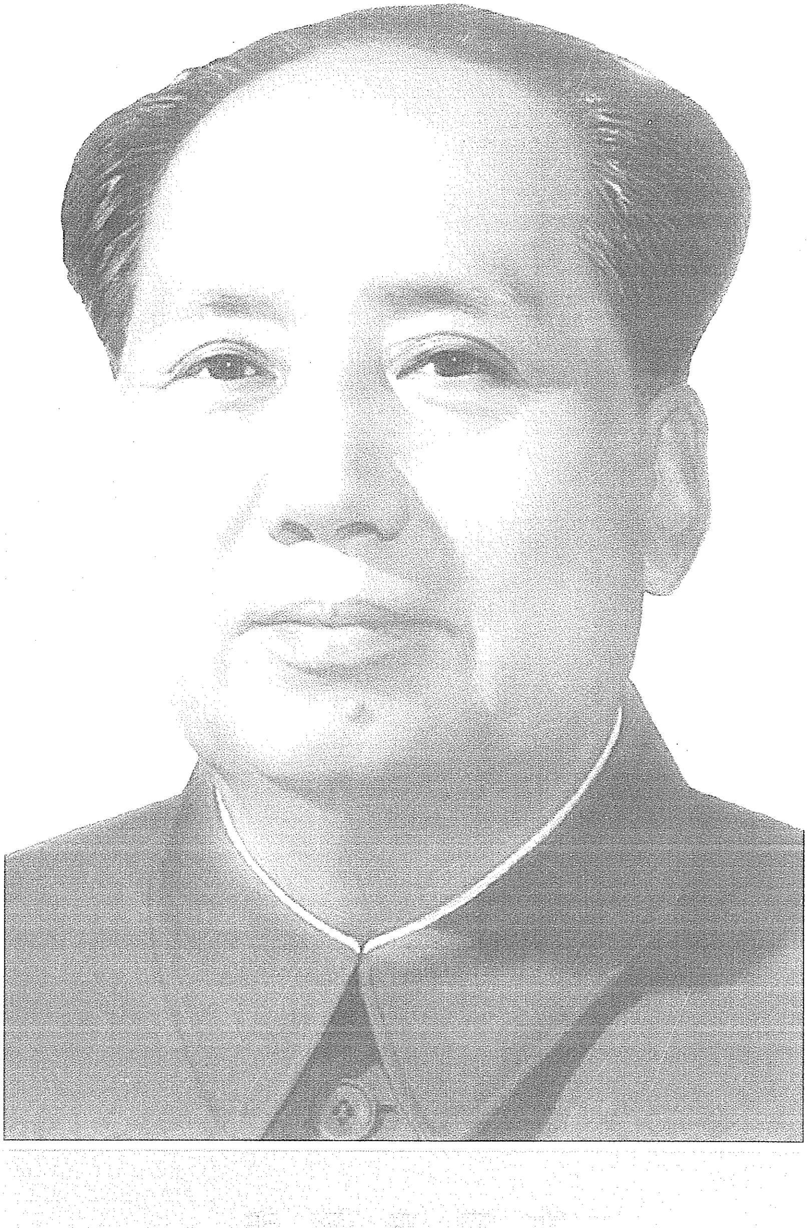
[4] 正太线，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2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8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3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攻克蟠龙后的行动部署……………………………………………1
（1947年5月4日）
刘邓陈粟晋南陕北各部队的作战任务……………………………3
（1947年5月4日）
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5
（1947年5月4日）
能否解决敌一四四旅………………………………………………7
（1947年5月5日）
待敌分散疲惫之时发起歼击为宜…………………………………8
（1947年5月5日）
部队荫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9
（1947年5月5日）
不性急不分兵待机歼敌 ……………………………………………10
（1947年5月6日）
迟滞敌军行动掩护青化砭作战 ……………………………………13
（1947年5月6日）
攻击昌潍可能引起的几种情况及处置办法 ………………………14
（1947年5月6日）
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的部署 ………………………………15
（1947年5月8日）

钳制关内敌军配合东北作战 ……17
（1947年5月8日）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 ……18
（1947年5月10日）
致陈毅、饶漱石、黎玉等电 ……19
（1947年5月10日）
蒋介石驱我至黄河以北而歼灭的方针将归于破产 ……20
（1947年5月11日）
须不失时机歼击一路好打之敌 ……22
（1947年5月12日）
同意西北野战兵团六月作战方针 ……23
（1947年5月14日）
集中兵力打破一路则全局好转 ……24
（1947年5月14日）
吸引敌人主力组织打援战役 ……26
（1947年5月16日）
荫蔽休整待机再战 ……27
（1947年5月18日）
给内蒙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 ……28
（1947年5月19日）
东北作战方针及关内战局 ……29
（1947年5月20日）
山东战场的作战方针 ……32
（1947年5月22日）
对陈谢纵队西进作战的部署 ……34
（1947年5月24日）

陈谢纵队应立即发起吕梁战役 ……………………………………36
（1947年5月26日）
中原军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37
（1947年5月28日）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39
（1947年5月30日）
目前阶段陈粟谭军与刘邓军只作战略配合 ………………………44
（1947年6月1日）
同意刘邓全军休整月底渡河 ………………………………………45
（1947年6月3日）
先打八十一师后打十八师 …………………………………………46
（1947年6月4日）
六月中旬作战以全歼敌七个旅为目标 ……………………………47
（1947年6月4日）
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动应予停止 ……………………………48
（1947年6月4日）
在修改《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时加写的两段话 ………………………………………………………………49
（1947年6月4日）
做好夺取大西北的一切准备 ………………………………………50
（1947年6月6日）
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 ………………………………………………52
（1947年6月13日）
各战场形势和中工委今后六个月内的工作 ………………………53
（1947年6月14日）
陕甘宁边区三个月的作战情况 ……………………………………56
（1947年6月15日）

致林伯渠、王维舟等电 ……………………………………57
（1947年6月15日）
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 …………………………………58
（1947年6月17日）
晋察冀主力的作战方向 ……………………………………60
（1947年6月19日）
陈谢军七月中旬开始向榆林方向出击 ……………………62
（1947年6月20日）
边区野战军与陈谢军的作战方针 …………………………63
（1947年6月20日）
在修改《哀号无济于事》时加写的两段话 ………………65
（1947年6月21日）
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66
（1947年6月22日）
复彭德怀、习仲勋电 ………………………………………68
（1947年6月22日）
中共中央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六月十六日通报的指示 ……………69
（1947年6月22日）
复林彪、罗荣桓电 …………………………………………70
（1947年6月25日）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等电 ………………………………71
（1947年6月25日）
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 ……………………………72
（1947年6月29日）
部署强大力量准备马鸿逵逃跑时歼灭之 …………………74
（1947年6月30日）

每战应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为主 ……………………………………75
（1947年7月1日）
修改《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
时加写的两段话 ……………………………………………………77
（1947年7月1日）
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 …………………………………78
（1947年7月2日）
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 ………………………………………80
（1947年7月2日）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82
（1947年7月2日）
晋察冀野战军下半年的行动部署 …………………………………83
（1947年7月3日）
以尽歼泰安至临城全线之敌为第一目标 ……………………………85
（1947年7月3日）
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两个方案 …………………………………86
（1947年7月4日）
目前应采取四路分兵各打各的方针 …………………………………88
（1947年7月4日）
歼击第八军并相机攻取潍县 ………………………………………90
（1947年7月5日）
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电 ………………………………………91
（1947年7月9日）
争取在内线多歼敌人 ………………………………………………92
（1947年7月10日）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 …………………………………………94
（1947年7月10日）

放手歼敌粉碎鲁中敌军进攻 ……………………………98
（1947年7月12日）
部队是否西移须依情况决定 ……………………………99
（1947年7月12日）
给陈瑾昆的信……………………………………………100
（1947年7月13日）
蒋贼介石卖国殃民国人都可得而诛之* ………………101
（1947年7月13日）
给续范亭的信……………………………………………103
（1947年7月13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04
（1947年7月14日）
目前应放手攻占泗水等七城……………………………105
（1947年7月14日）
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107
（1947年7月19日）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09
（1947年7月21日）
陈谢等部速作好出豫西的准备…………………………118
（1947年7月22日）
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120
（1947年7月23日）
给李井泉的信……………………………………………123
（1947年7月23日）
对刘少奇《给晋绥同志的信》的批语…………………125
（1947年7月25日）

复林彪电……126

（1947年7月25日）

致朱德、刘少奇、康生电……127

（1947年7月26日）

做好到国民党区域作战的准备工作……128

（1947年7月26日）

刘邓军立即集结休整准备南进……130

（1947年7月27日）

同意临朐战役后我主力移诸城莒县地区……132

（1947年7月27日）

陈谢集团归刘邓指挥并组织前委……133

（1947年7月27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34

（1947年7月27日）

刘邓陈谢等部的作战任务……135

（1947年7月29日）

致各区各级首长电……137

（1947年7月29日）

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138

（1947年7月30日）

刘邓军出大别山的准备工作……141

（1947年7月30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43

（1947年7月30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44

（1947年8月3日）

粟裕迅去郓城指挥五个纵队策应刘邓作战……145
（1947年8月4日）
华野五个纵队渡运河后的作战任务……146
（1947年8月5日）
立足鲁西南粉碎敌驱我过黄河企图……148
（1947年8月5日）
对刘邓出动后敌之对策的估计……150
（1947年8月6日）
刘邓陈粟等部配合作战的部署……152
（1947年8月6日）
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155
（1947年8月6日）
陈粟应速西去……157
（1947年8月6日）
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钳制敌人……159
（1947年8月7日）
陈谢集团应提前渡河……161
（1947年8月9日）
刘邓南进决心完全正确……162
（1947年8月10日）
令王世泰部直出长武彬县速占泾渭间诸县……164
（1947年8月10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65
（1947年8月10日）
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统归刘邓指挥……166
（1947年8月11日）

总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67

（1947年8月11日）

停攻榆林城集中兵力打钟松部………………………………………168

（1947年8月11日）

对我军南进的三点意见…………………………………………………170

（1947年8月12日）

陈谢宜早日渡河援助刘邓……………………………………………172

（1947年8月12日）

致彭德怀等电……………………………………………………………173

（1947年8月12日）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指示……………………………………………………………………174

（1947年8月13日）

注意分割敌人逐一歼灭之……………………………………………176

（1947年8月15日）

军委关于陕北部队配合南线三路大军的行动部署的指示…………177

（1947年8月16日）

陈粟部的供应和晋冀鲁豫三个纵队行动问题………………………179

（1947年8月16日）

致彭德怀电………………………………………………………………181

（1947年8月19日）

复陈毅、粟裕等电………………………………………………………182

（1947年8月19日）

在今后四个月内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183

（1947年8月21日）

对西北战场形势的分析……186
（1947年8月22日）
新华社记者评陕北之捷……188
（1947年8月23日）
在沙家店战役总结会上的讲话……190
（1947年8月23日）
西兵团的作战任务……191
（1947年8月24日）
我军对蒋介石企图在胶东抽兵的对策……194
（1947年8月25日）
陈谢渡河后应放手向豫西发展……196
（1947年8月26日）
致陈毅、粟裕电……197
（1947年8月27日）
陈粟部应迅速渡河南进打开局面……198
（1947年8月28日）
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200
（1947年8月28日）
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针……203
（1947年8月29日）
东北我军应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以配合南线……204
（1947年8月29日）
致彭德怀电……205
（1947年8月29日）
致各首长电……206
（1947年8月30日）

陈谢主力速抢占陕县灵宝等县……………………………………………207
（1947年8月30日）
先敌抢占绥清间一段阻敌南进……………………………………………209
（1947年8月30日）
新华社记者评论掩饰美国亡华罪行鸨母妓女串演双簧* …………210
（1947年8月30日）
致陈毅、粟裕电…………………………………………………………213
（1947年8月30日）
刘邓部目前的行动方向……………………………………………………214
（1947年8月31日）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215
（1947年9月1日）
陈谢部的作战范围和原则…………………………………………………220
（1947年9月2日）
西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南进相机攻占洛川等城……………………………222
（1947年9月2日）
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223
（1947年9月3日）
要有建立鄂豫陕根据地的决心……………………………………………225
（1947年9月4日）
在修改《军队中的民主运动》时加写的一段话…………………………227
（1947年9月4日）
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229
（1947年9月6日）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231
（1947年9月6日）

注意歼灭运动中的中央系各部及滇军……………………………232
（1947年9月11日）
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根据地有重大战略意义……233
（1947年9月11日）
在修改新《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时加写的两段话………………236
（1947年9月11日）
给毛岸英的信…………………………………………………………237
（1947年9月12日）
陈谢集团攻克卢氏后的作战任务……………………………………239
（1947年9月13日）
中国土地法大纲*……………………………………………………240
（1947年9月13日）
致陈毅、粟裕电………………………………………………………244
（1947年9月13日）
致彭德怀电……………………………………………………………245
（1947年9月14日）
西兵团暂不分兵运河以东为好………………………………………246
（1947年9月15日）
陈谢部的行动计划……………………………………………………248
（1947年9月15日）
目前各战区的作战情况………………………………………………250
（1947年9月15日）
西北野战军应配合陈谢完成重要任务………………………………252
（1947年9月16日）
部队自行解决棉衣问题………………………………………………253
（1947年9月16日）

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255
（1947年9月16日）

抓住时机打开陕东陕南局面……256
（1947年9月17日）

致彭德怀等电……257
（1947年9月17日）

西北野战军有配合陈赓兵团争取战略胜利之任务……258
（1947年9月18日）

西北野战军主力南进的部署……260
（1947年9月18日）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266
（1947年9月18日）

致彭德怀电……267
（1947年9月19日）

致晋察冀中央局电……268
（1947年9月19日）

同意陈谢韩三路出兵意见……269
（1947年9月20日）

为续范亭题写挽联……271
（1947年9月22日）

四纵东进协同秦纵歼击李铁军部……272
（1947年9月23日）

打李铁军部的部署……274
（1947年9月23日）

西北主力应在内线完成三项任务……276
（1947年9月23日）

复朱德、刘少奇等电……………………………………………277
（1947年9月24日）
打李铁军及以后的作战任务………………………………………278
（1947年9月25日）
四纵第十二旅应在陕南建立根据地………………………………282
（1947年9月26日）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283
（1947年9月26日）
复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等电…………………………………284
（1947年9月26日）
在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上加写的一段话………………285
（1947年9月28日）
同意陈粟部分两路前进方针………………………………………286
（1947年9月30日）
致彭德怀电…………………………………………………………287
（1947年9月30日）
为中共佳县县委题词………………………………………………288
（1947年9月）
清涧瓦窑堡两处可先打一处………………………………………290
（1947年10月2日）
致彭德怀电…………………………………………………………291
（1947年10月2日）
陈粟部在一两个月内应只打小仗不打大仗………………………292
（1947年10月3日）
在新区作战的方针…………………………………………………294
（1947年10月4日）

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各纵的作战任务……297
（1947年10月4日）
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299
（1947年10月8日）
我军已全面转入反攻……300
（1947年10月8日）
给毛岸英的信……301
（1947年10月8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303
（1947年10月8日）
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304
（1947年10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305
（1947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311
（1947年10月10日）
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315
（1947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317
（1947年10月10日）
固守清涧杀伤消耗敌人待机举行反突击……318
（1947年10月11日）
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319
（1947年10月11日）
中共发言人严正揭露蒋美勾结行凶迫害民主人士* ……323
（1947年10月12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325
（1947年10月12日）
复彭德怀等电……326
（1947年10月13日）
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327
（1947年10月13日）
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329
（1947年10月15日）
陈谢部休整后的行动部署……331
（1947年10月20日）
组织野战机动兵团及分散作战的部署……333
（1947年10月20日）
同意三军举行大破平汉路战役……335
（1947年10月21日）
攻石门打援兵的部署……336
（1947年10月23日）
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电……339
（1947年10月23日）
同意陈粟提早集中主力大破陇海路……340
（1947年10月24日）
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342
（1947年10月26日）
对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稿的修改和批语……344
（1947年10月27日）
致刘少奇电……346
（1947年10月31日）

对佳县县委的指示……347

（1947年10月）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348

（1947年11月2日）

民盟的教训……349

（1947年11月3日）

对胡宗南企图打通陇海线应取的方针……351

（1947年11月4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352

（1947年11月4日）

关于攻取榆林城和打援的问题……353

（1947年11月5日）

充分准备彻底破毁陇海路汴徐段……354

（1947年11月6日）

我们完全有把握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355

（1947年11月6日）

庆贺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致斯大林元帅电……356

（1947年11月6日）

给傅连暲的信……357

（1947年11月10日）

对敌援军宜先打十八师……358

（1947年11月11日）

东北局应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支援全国作战……359

（1947年11月13日）

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电……361

（1947年11月13日）

对集结之敌的打法……362
（1947年11月14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363
（1947年11月16日）
晋察冀野战军准备配合东北作战……364
（1947年11月17日）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366
（1947年11月17日）
给陈瑾昆的信……367
（1947年11月18日）
给吴玉章的信……368
（1947年11月18日）
给张曙时的信……369
（1947年11月18日）
给吴创国的信……370
（1947年11月18日）
致王震等电……371
（1947年11月22日）
出击三边及进攻榆林问题……372
（1947年11月23日）
给大连大众书店、大众书店同人自治会、大众印刷厂全体职工的信…373
（1947年11月23日）
陈赓部队目前的中心任务……374
（1947年11月28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375
（1947年11月28日）

致粟裕等电……………………………………………………………376
（1947年11月28日）
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377
（1947年11月29日）
中共中央发言人严斥蒋美肮脏买卖* …………………………………379
（1947年12月2日）
同意再打运城…………………………………………………………381
（1947年12月4日）
刘邓军明年的任务……………………………………………………382
（1947年12月4日）
建立空军已成党的迫切任务…………………………………………385
（1947年12月5日）
复杨得志、罗瑞卿等电………………………………………………386
（1947年12月7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387
（1947年12月8日）
粟部与陈谢部配合攻击平汉路………………………………………388
（1947年12月9日）
目前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390
（1947年12月9日）
粟裕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的部署…………………………391
（1947年12月20日）
粟裕部可南下破路歼敌………………………………………………393
（1947年12月20日）
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394
（1947年12月21日）

致粟裕等电……398
（1947年12月21日）
关于东北冬季作战的部署……399
（1947年12月23日）
新华社记者评南线我军破击战大捷……401
（1947年12月24日）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403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426
（1947年12月25日、28日）
二八两纵的作战任务……437
（1947年12月29日）
致林彪、罗荣桓电……438
（1947年12月29日）
为延安中学某同志题词……439
（1947年）
致王益久电……440
（1947年）
三条理由和三条规定……442
（1947年）
为《抗日战争的战术问题》题名……443
（1947年）
五律·张冠道中……446
（1947年）
五律·喜闻捷报……447
（1947年）

庆祝刘邓大军之胜利……………………………………………………451
（1948年1月1日）
三军协力解决大别山困难…………………………………………………452
（1948年1月2日）
致林彪、罗荣桓等电……………………………………………………456
（1948年1月6日）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457
（1948年1月7日）
对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460
（1948年1月8日）
应向全军施行政策与纪律教育……………………………………………461
（1948年1月9日）
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作战部署………………………………………………462
（1948年1月9日）
对习仲勋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的批示…………465
（1948年1月9日）
对粟裕部在宽大区域机动作战的指示……………………………………467
（1948年1月10日）
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469
（1948年1月14日）
征询邓小平对新解放区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471
（1948年1月14日）
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等电………………………………………………473
（1948年1月14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的意见……………………474
（1948年1月14日）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475
（1948年1月15日）
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488
（1948年1月16日）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490
（1948年1月18日）
致刘少奇电……………………………………………………………497
（1948年1月18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语………………498
（1948年1月20日）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499
（1948年1月22日）
对中央一月决定的补充意见…………………………………………504
（1948年1月24日）
南线三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506
（1948年1月26日）
致粟裕电………………………………………………………………509
（1948年1月27日）
采取渤海整军经验开展军队的民主运动…………………………511
（1948年1月28日）

攻克蟠龙后的行动部署

（1947年5月4日）

彭、习[1]，并告陈、谢，刘、邓[2]：

支子电[3]悉。昨日战斗，俘敌千人，甚慰。蟠龙完全攻克后，如二十四旅增援到达，则歼灭该部，再歼拐峁之敌，并在蟠龙、拐峁地区休息数日。然后请考虑取直路（南泥湾或临真[4]）直趋洛川、中部[5]、宜君、蒲城、白水，大闹关中，并考虑是否接引陈谢纵队主力（四个旅）过河，协力歼灭胡[6]军，打开西北局面。董钊刘戡[7]率九个半旅本日在绥德未动，似尚有数天停留，估计董、刘

---

[1]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5月4日1时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昨（3日）黄昏前后我用坑道爆破，夺取蟠龙东南与西南高地，估计尚须两昼夜，才能全部解决战斗，昨日俘虏共约1000人。

[4] 临真，今为临镇，位于陕西延安市东南。

[5]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7]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由绥德到洛川、中部之线约需二十天以上，时间于我有利。如何，望酌复。

毛泽东
辰支申

刘邓陈粟晋南陕北各部队的作战任务[1]

（1947年5月4日）

刘、邓，陈、谢，陈、粟[2]，并告彭、习[3]：

现在可以确定下列诸点：（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4]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5]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巳东以前完毕，巳东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6]以西为机动地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7]，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4]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3月初，他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军队。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7] 汴徐，指河南开封和江苏徐州。

宜，往来机动，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军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习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

中央
辰支

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1]

（1947年5月4日）

陈、粟，并告刘、邓[2]：

江日两电均悉。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你们后方移至胶东、渤海、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忍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南下过早，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但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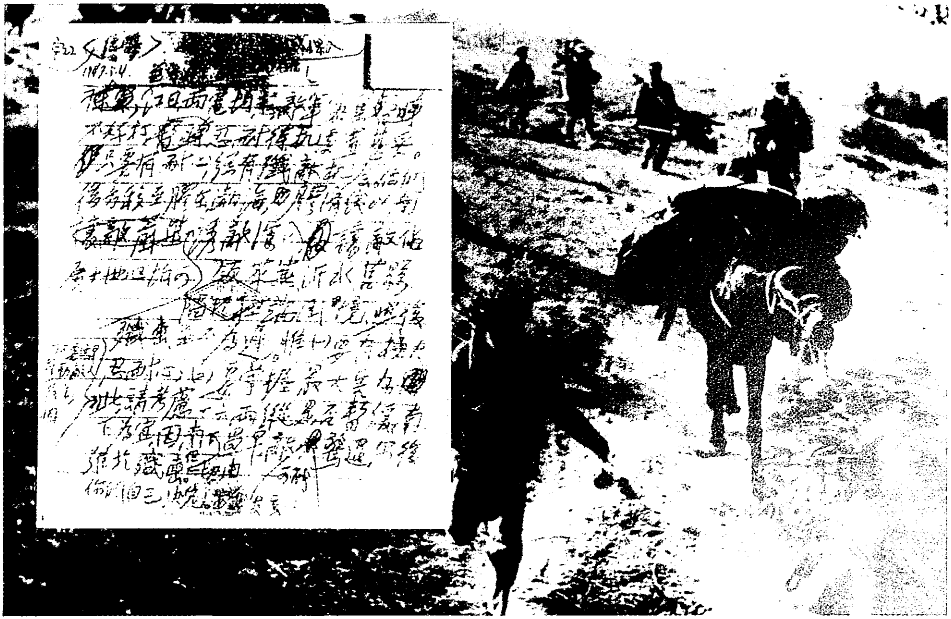
军委

支亥

---

[1]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被迫缩短战线，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在山东战场，国民党军集中24个整编师采取密集平推、稳扎稳打、不轻易分兵的新战法向鲁中推进。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发起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精锐整编第七十四师。图为毛泽东关于孟良崮战役的电文手稿和向孟良崮进发的部队。

能否解决敌一四四旅[1]

（1947年5月5日）

彭、习：

分布于延川、交口、延长等处之一四四旅工事强弱如何，是否有攻取可能？请加调查。如董刘[2]徘徊绥德一个时期，似可考虑于青化砭解决之后（休整数日）移师解决一四四旅，然后再出关中、陇东。

毛

辰微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董刘，指董钊、刘戡，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待敌分散疲惫之时发起歼击为宜[1]

（1947年5月5日）

彭、习：

（一）如无好仗可打，仍以隐蔽待机，待敌分散并更加疲惫之时，发起歼击为适宜。（二）我们已转至旧安定城西北地区。（三）望每日电告敌情。

丙丁
微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部队荫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1]

（1947年5月5日）

彭、习：

蟠龙之敌解决后，延安、瓦市[2]、清涧等地之敌必起恐慌。昨日白天胡[3]以绥德重要令一师留守，半夜得悉蟠龙陷落，立刻令董钊[4]放弃绥德。本日董刘[5]均已行动，似是回头，如急行军走公路，可能四五天内赶至蟠龙。因此，青化砭战斗[6]及一切战后处理，望在三四天内办理完毕。部队如甚疲劳，可移至安塞以西荫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似较稳妥。如何，望酌定。

毛

微亥

---

[1] 这是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瓦市，即陕西瓦窑堡。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董钊，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

[5] 董，指董钊。刘，指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6] 蟠龙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兵团计划在青化砭再打一仗，后因情况变化，此次战斗未进行。

不性急不分兵待机歼敌

（1947年5月6日）

陈、粟[1]，并告刘、邓[2]：

你们三日电四日收到，当即复电提出几点意见，谅已收到。今日收到你们二日电[3]，得悉青驼寺歼敌三千，但因一纵远去宁阳，来不及集中兵力打七十四师等部，失一歼敌机会。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鉴于青驼寺教训，尤不宜分兵，不但一六两纵不宜过早分出，即七纵亦似宜暂留滨海地区一个月左右作为钳制之用，一个月后看情形再行南下。因此，五六两月你们除以七纵位于滨海外，其余全部似宜集中莱芜、沂水地区休整待机，待敌前进或发生别的变化，然后相机歼击。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陈毅、粟裕1947年5月2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华东野战军攻泰安时期，敌继续向新泰、蒙阴山区猛攻，企图诱我出击，与我决战。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新泰、蒙阴，主力进至临蒙公路以东地区，以一部攻宁阳，调动敌人（第五军）向西使敌分散，主力东移，配合攻击进入蒙阴之敌。4月29日至30日夜，敌第八十三师约两个团兵力在青驼寺以南地区被我军歼灭。但未能及时施行对敌七十四师等部之攻击。

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例如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凡在局势未定之时，我主力宜位于能应付两种可能性之地点。此次你们一意对付西面之敌，没有料到汤[1]兵团主力北上，没有事先准备集中最大兵力于适当位置，可以打由西向东之五军、十一师等部，亦可打由南向北之七十四师等部。青驼寺作战时已来不及集中兵力，但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着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又在泰安大胜[2]，敌人深入恐慌日增之际，故估计五六两月内，可能给我歼敌机会。即使没有机会，只要敌主力进至泰安、莱芜、沂水之线，最好让其进至淄博地区，你们则退至淄博之线或淄博以北，装作向河北退走模样，使敌发生错觉。我主力距敌要远一点，不要守阵地，对敌正面侧面后面一枪不打，让敌放心前进，又使敌完全不知我主力所在，当此时机好打则打之，不好打则以主力转入敌后，局势必起变化。此次胡宗南[3]以三十一个旅攻入只有人口一百五十万之陕甘宁边区，集中十一个旅，有时十个旅，有时九个旅成一横直四五十里之方阵，使我无歼击之机会，我们即以上述方法对付之。对集中之敌置之不理（此次敌九个半旅入绥德，我们一枪不打），而集中全力打敌后路，使敌完全陷入被动地位，可作你们参考。所不同的山东地区较狭，你们兵力甚大，转动不易，自

---

[1]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一兵团司令官。

[2] 指1947年4月22日至26日华东野战军第十、第三纵队围攻泰安的战斗。这次战斗，歼泰安守敌整编第七十二师（缺一个旅），俘师长杨文瑔。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应因地制宜，一切望按情况决定。

军委

辰鱼

迟滞敌军行动掩护青化砭作战[1]

（1947年5月6日）

彭、习：

董刘[2]行动似可大体确定，昨（五）日由绥德向南到田庄镇南北地区，估计走得快可能今日到老君殿，明（七）日到瓦市[3]。你们可派一部进至蟠龙以北迟滞其行动，掩护青化砭作战及打扫战场。

军委

鱼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董刘，指董钊、刘戡，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3] 瓦市，即陕西瓦窑堡。

攻击昌潍可能引起的几种情况及处置办法[1]

（1947年5月6日）

陈、粟，并告刘、邓[2]：

四日一短电，今（六）日一长电，谅达。为扫清后方及引敌深入之目的，请考虑以有力部队攻击昌乐、潍县[3]之敌，估计此种行动可能引起几种情况：（一）蒙阴、新泰之敌深入昌潍地区增援，如好打则以主力各个歼灭增援之敌，然后攻克昌、潍；（二）如不好打，则我以相当力量拒止援敌于昌、潍以南，以利攻克昌、潍；（三）既不能拒止援敌，又不能攻克昌、潍，则将攻昌、潍行动改为佯攻，引诱援敌深入，以利我主力转入敌后行动；（四）如敌不敢增援，则我有充分时间攻克昌、潍，达到扫清后路之目的。是否可行，盼告。

军委

鱼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潍县，旧县名，1983年撤销，并入山东潍坊市。

击破顾祝同系统第一线兵力的部署[1]

（1947年5月8日）

刘、邓，陈、粟：

为着于六七两月内击破顾祝同[2]系统第一线兵力（位于泰安、新泰、蒙阴、临沂之线约三十个旅）之目的：（一）刘邓军仍按中央辰支电[3]争取于巳东前休整完毕，巳灰前渡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敌进击，第二步向中原进击。为着在该区长期立脚，全军应有充分的政治动员（使每个人明白政治任务，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及干部、经费等项的充分准备。对中央二一时局与任务指示[4]应作普遍传达。（二）陈粟军在巳灰以前应集结全力（二十七个旅）寻求与创造歼敌机会，并准备于巳灰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3月初，他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军队。

[3] 即《刘邓陈粟晋南陕北各部队的作战任务》。

[4] 指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以《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击。谭[1]率七纵亦似于巳灰以后向苏中出动为宜。

军委

辰齐

---

[1] 谭，指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钳制关内敌军配合东北作战[1]

（1947年5月8日）

聂、萧、罗，并告朱、刘：

东北我军由北满[2]出动主力八个师（每师约万人）入南满[3]，向敌举行反攻，五、六、七月是重要关键，你们必须钳制关内敌军，不使东调，使东北取得胜利。你们主力立即开始休整，辰有前休整完毕。你们下一步作战，打何地何部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作战，望拟具计划电告。

军委
辰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罗瑞卿并告朱德和刘少奇的电报。

[2] 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

[3]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致彭德怀、习仲勋电[1]

（1947年5月10日）

彭、习：

（一）十日五时电悉。恩来、定一今日动身去真武洞和你们商量作战方针，并参加祝捷大会。

（二）在祝捷大会上请代我及朱总司令慰问全军将士，并致祝贺之忱。

军委

十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致陈毅、饶漱石、黎玉等电[1]

（1947年5月10日）

你处中心关键是用全力解决粮食问题，只要你们能维持二十七个旅的粮食至秋收，以后全力能在现地区坚持几个月，必能击破蒋军，根本转变局面。因此，你们应动员地方党政为彻底解决粮食而奋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饶漱石、黎玉、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蒋介石驱我至黄河以北而歼灭的方针将归于破产

（1947年5月11日）

陈、粟，刘、邓，彭、习[1]，并告朱、刘[2]：

（一）从实施黄河堵口复故计划之时起，蒋介石一贯方针，第一步驱我至黄河以北，第二步于黄河以北歼灭我军。

（二）二月间刘邓渡河休整，蒋认为已经驱逐，再难飞渡，故敢将王敬久[3]军用于山东。

（三）很长时间开放泰安缺口，让陈粟由此北渡，陈粟不听，且歼李仙洲[4]，蒋乃开放胶济，封锁泰安，压陈粟北撤西转。今后方针必以第一线各部（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六十五师、七师、四十八师等）向胶济线前进。如陈粟放手让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 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3] 王敬久（1902—1964），江苏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二兵团司令官。

[4] 李仙洲，原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1947年2月在莱芜战役中被俘。

路，敌必误认为不敢恋战，可达驱逐目的。

（四）胡宗南[1]此次进攻，亦是企图将我驱至河东，寅世[2]占清涧故意不去绥德，让一条路给我走，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卯宥[3]起才令董钊[4]率八个半旅北上，辰冬[5]到绥德，认为可以驱我渡河。辰微[6]我克蟠龙，彼始惊悉我在延安附近，令董钊迅速南撤，绥德不留一兵，仍然开放着。由此证明，胡军目的完全不是所谓打通咸榆公路，而是驱我过河。

（五）待陈粟击破顾祝同[7]第一线，刘邓渡河向南，彭习向陇东、关中进军，蒋将发现他的迷梦归于破产。

军委

辰真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 寅世，即3月31日。

[3] 卯宥，即4月26日。

[4] 董钊（1902—1977），陕西西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

[5] 辰冬，即5月2日。

[6] 辰微，即5月5日。

[7]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3月初，他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

须不失时机歼击一路好打之敌[1]

（1947年5月12日）

陈、粟：

野参真辰电悉。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军委
辰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同意西北野战兵团六月作战方针

（1947年5月14日）

周、陆，彭、习[1]，并告陈、谢[2]：

寒辰电[3]悉。（一）完全同意六月作战方针，除留警七团于现地外，全军出陇东，先打新一旅，再打一百旅或其他顽部。（二）在目前短期内，陈谢部除以一部扫清吕梁顽敌开辟西进道路外，主力休整待命渡河。陈谢兵团过河后，或与边区兵团分开作战一时期，再集中作战；或开始即集中作战，依当时情况酌定。

毛泽东

辰寒申

---

[1] 周，指周恩来。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5月14日辰时周恩来关于同彭德怀、习仲勋等商定的6月份作战计划给毛泽东的电报。

集中兵力打破一路则全局好转[1]

（1947年5月14日）

陈、粟，并告刘、邓[2]：

元酉电[3]悉。以一、四、八、九纵歼击七十四师极为正确。该敌歼灭后，你们应集中尚未使用之各纵（二、三、六、七、十，除小部用于钳制外），乘胜歼击八十三师及二十五师，收复蒙阴、青驼之线，实现中间突破。为此目的，使用于钳制东西两面敌人（五军、十一师、七师等）之兵力，不应超过一个纵队，或仅以地方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1947年5月上旬，国民党军3个兵团共17个整编师由山东临沂、泰安一线分三路北进，企图压迫华东野战军退至胶东狭窄地区。13日，华东野战军对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发起攻击，将其完全包围于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山区。此时，蒋介石急忙调约10个整编师兵力增援，企图解孟良崮之围，均被华东野战军阻截，未能得逞。激战至16日，华东野战军全歼敌整编第七十四师3.2万余人。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5月13日17时陈毅、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敌七十四师11日开始向坦埠进攻，八十三师在青驼寺以北跟进，二十五师在蒙阴东南为其左翼部队，桂顽在临沂东北。我们今晚集结一、四纵与八、九纵向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十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队钳制之，而集中在你们手里直接使用于坦埠附近地区者，至少要有八个纵队。总之，集中一切力量打破一路，则全局好转。

军委
辰寒亥

吸引敌人主力组织打援战役[1]

（1947年5月16日）

刘、邓：

删巳电悉。（一）我们未得郑州方面情报。（二）你们以一部打安阳吸引王仲廉[2]增援，集中最大兵力组织打援战役，如能在运动中歼灭王仲廉三四个旅，对于你们尔后行动有甚大利益。

军委
铣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

荫蔽休整待机再战[1]

（1947年5月18日）

陈、粟，并告刘、邓[2]：

（一）篠午电悉。歼灭七十四师后，因敌援兵已靠近，适可而止，停止攻击二十五、八十三两师，全军集结休整，待机再战，处置甚妥。（二）泰安一战，吸引王欧[3]主力注意西北，给了你们以歼击七十四师的机会。现在敌人注意力已集中至蒙阴以东，其后路（吐丝口、莱芜、泰安等处）驻防之七十五师、八十五师等部已形孤立。鉴于此次六纵由南向北起了配合作用，因此同意你们意见，派一二个纵队荫蔽集结于鲁南山区，作为预伏兵力（不要惊动敌人后路，让敌放手东进或北进），主力位于沂蒙间休整待机，吸引五军、十一师向东，然后相机歼击七十五、八十五师等孤立之敌或其他好打之敌，各个击破敌人。

军委

辰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王欧，指王敬久、欧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司令官。

给内蒙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

（1947年5月19日）

亲爱的内蒙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们：

你们五月十七日来电收到了。曾经饱受困难的内蒙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庆祝你们的胜利。

毛泽东
朱　德
五月十九日

东北作战方针及关内战局

（1947年5月20日）

林、高[1]，并告朱、刘[2]：

高卯号[3]电，林辰巧、辰皓两电[4]均悉。出师顺利，甚慰。东北在你们领导之下，改革了土地，发动了群众，建设了一支强有力军队。在全国各区中，就经济论你们占第一位；就军力论你们已占第二位（山东为第一位）。目前你们以八个师南进，希望能于夏秋两季解决南满[5]问题，争取于冬春两季向热河[6]、冀东行动一时期，歼灭十三军、九十二军等部，发动群众，扩大军队。该两区共有人口一

---

[1] 林、高，指林彪、高岗，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 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3] 卯号，即4月20日。

[4] 指林彪1947年5月18日、19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东北民主联军北满8个师8日开始渡松花江南下，17日在长春西北之怀德将敌新一军一个团及一个保安团全歼，18日又将增援怀德之敌两个师（缺一个团）歼灭，俘获甚众。预计10天后到达南满，依托南满根据地与山地作战。今后南满北满主力能密切配合，东北战争形势可望有较大开展。

[5]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6] 热河，即热河省。

千五百万，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1]，长、沈、平、津四城必不可少之条件。夺取两路四城必须准备的条件有三：你们已在北满[2]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解决了第一个条件；现在正向南满作战，估计不要很久即可解决第二个条件，建立强大的南满根据地；第三步还要解决冀热辽地区的根据地问题。关内方面，我苏鲁军[3]负担最大，在他们面前，集中了三十二个整编师八十五个旅（包括被歼者在内），直至此次歼灭七十四师，才使敌人进攻发生了困难，今后再歼二三个师（军），即可转入全面反攻。我刘邓军现攻安阳，六月间可以十万人渡黄河向中原前进。我彭习[4]军（只有六个不充实的旅）对付胡宗南[5]三十一个旅的进攻，两个月作战业将胡军锐气顿挫，再有几个月必能大量歼敌，开展局面。陈赓[6]部四个旅拟使用于西北。聂萧罗[7]军上月正太作战歼敌三万余，缴枪一万五千以上，现须休息半月，约下月中旬拟打津沧线，配合你们作战。总观

---

[1] 长春路，指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铁路）。自哈尔滨起，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抗日战争胜利后统称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管。1952年12月，苏联政府将中长铁路全部移交给中国，现分段改称滨州、滨绥和哈大等路。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北京至沈阳段。

[2] 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

[3] 苏鲁军，指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分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6]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7] 聂萧罗，指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全局，目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二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毛泽东
辰号

山东战场的作战方针

（1947年5月22日）

陈、粟、谭、粲，张、饶、邓、黎[1]，并告刘、邓[2]：

哿[3]电悉。歼灭七十四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证明在现地区作战，只要不性急，不分兵，是能够用各个歼击方法打破敌人进攻，取得决定胜利。而在现地区作战，是于我最为有利，于敌最为不利。现在全国各战场除山东外均已采取攻势，但这一切攻势的意义，均是帮助主要战场山东打破敌人进攻。蒋管区日益扩大的人民斗争，其作用也是如此，刘邓下月出击，作用也是如此。而山东方面的作战方法，是集中全部主力于济南、临沂、海州之线以北地区，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五月起），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该线击破之日，即是全局大胜之时，尔后一切作战均将较为顺利。下一步行动方针有二：（一）休整若干天后即执行你们哿

---

[1] 陈、粟、谭、粲，指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张、饶、邓、黎，指张云逸、饶漱石、邓子恢、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和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哿，即20日。

电办法，以三个纵队攻潍县[1]，以六个纵队打援兵（六、七两纵均留北面不分散很对）。（二）将攻潍计划再行推迟（已经推迟一次，打了七十四师，甚为正确），考虑先打五军。该军现驻莱芜、颜庄两地，比较孤立，但不知其工事坚固程度如何？你们对打该军把握如何？我军钳制十一师等部，使之不能增援，把握如何？望你们从长考虑，分析利害电告。如能先歼五军（或该军一二个师）及其他数部，然后再打昌[2]、潍，则利益甚大。因我打昌、潍，敌必增援（这是必然的），时间愈早，则援敌愈大，我军打援愈难；时间愈迟（即在正面多歼几部敌军之后），则援敌愈小，我军打援愈易。故应把打潍当作一种争取我军主动、使敌陷入被动之重要手段，尽可能不要过早使用。只有在正面已绝无作战机会之时，才采取打潍步骤。如何，盼复。

军委

辰养

---

[1] 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

[2] 昌，指山东昌乐。

对陈谢纵队西进作战的部署[1]

（1947年5月24日）

陈、谢、韩，并告新亭，滕、薄、王[2]，贺、李，刘、邓，彭、习：

（一）你们纵队六月内完成休整及一切西进准备工作（包括肃清吕梁，打开通路），准备于七月上旬由大宁、军渡之间渡河，先至陕北作战，再至宁夏、甘肃广大区域作战，以歼灭胡军及其他顽部，夺取大西北为目标，即借此以保卫山西。应在部队中提倡吃苦耐劳，不怕困难，告诉他们只有消灭胡宗南才能保卫山西。

（二）陈赓卯梗电[3]，胡军将返晋，并主张夺取太原。在目前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和副司令员韩钧的电报。中央军委对陈谢纵队西进作战的部署以后作了改变。

[2] 新亭，即王新亭（1908—1984），湖北孝感人，当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滕，指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王，指王宏坤（1909—1993），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3] 指陈赓1947年4月23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目前陕甘宁的努力使胡宗南陷于进退维谷，但其仍未放弃对山西的野心，估计移兵晋南是意中之事。我必须集中最大限度的兵力到山西作战，我意在平汉线暂取守势，刘邓至少以两个纵队增加同蒲线并尽可能抽晋绥兵力参加，先给入晋之胡军以打击，再配合聂荣臻、萧克部控制正太进取太原，今冬明春再集中主力南渡进入中原，配合陈毅进取徐州。

势下，我之主要作战目标是蒋介石，对于阎锡山[1]主力的消灭及太原的夺取，应放在尔后去做。目前胡军亦不一定返晋，即返晋我应吸引其回到陕甘给以消灭，对于保卫山西解放区最为有利。

（三）为开辟至陕北之通路并保障尔后接济顺利起见，应举行一次大的作战，各个歼灭乡、吉、蒲、大、平、介、灵、孝[2]八县之敌。为达此目的，你们推迟半月入陕亦可。

（四）陈谢入陕后，由新亭指挥所部协同吕梁部队（五旅不久可由绥、米返吕梁，作战时受新亭统一指挥），巩固与发展吕梁、太岳两区。

（五）陈谢入陕后，粮食由陕甘宁边区解决，其他一切仍由太岳、太行接济，你们对此应作准备。又，尔后作战，阵地战必多，应多带炮弹。

（六）政治上应作充分之动员工作，务使人人明了西进之伟大政治意义。

军委
辰敬

---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2] 乡、吉、蒲、大、平、介、灵、孝，指山西乡宁、吉县、蒲县、大宁、平遥、介休、灵石和孝义。

陈谢纵队应立即发起吕梁战役[1]

（1947年5月26日）

陈、谢、韩，并告彭、习[2]：

辰敬电[3]谅达。为着执行西进任务，你们纵队全部协同十二旅应立即开始发起吕梁战役，歼灭乡、吉、蒲、大、襄、汾[4]等县之敌，相机占领乡、吉、蒲、大诸城。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必要，再对介休、灵石、孝义举行一次作战，削弱该地区阎[5]军。以上作战统限六月份完毕，七月上半月全军休整，下半月待命渡河。如何部署盼告。

军委

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和副司令员韩钧的电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太岳军区主力及晋绥部队遂发起攻势作战，先后解放乡宁、大宁、蒲县、汾城、襄陵等县城。

[2]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即《对陈谢纵队西进作战的部署》。

[4] 乡、吉、蒲、大，指山西乡宁、吉县、蒲县和大宁。襄、汾，指襄陵、汾城，均旧县名，1954年两县合并为山西襄汾县。

[5]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中原军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1947年5月28日）

郑、李[1]，并转中原军全体同志，并告刘、邓，徐、薄、滕、王，陈、谢、王、韩[2]：

我中原各部为着反对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从去年七月起在陕南、豫西、鄂西、鄂中、鄂东、湘西等地，在极端困难条件之下，执行中央战略意图，坚持游击战争，曾经钳制了蒋介石正规军三十个旅以上，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蒋介石进攻的最困难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所有参加这一英勇斗争的指战员，均为全国人民所敬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意。所有参加这一斗争的部队，在和优势敌人的艰苦战斗中，虽然遭受了不小损失，但是基本骨干依然保存。中央希望你们在位三、先念二同志领导之下，加紧学

---

[1] 郑、李，指郑位三、李先念，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副书记和第二副书记。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指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薄、滕、王，指薄一波、滕代远、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三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指王新亭，当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韩，指韩钧（1912—1949），河南新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习，根据中央路线检讨经验，团结一致，准备为着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而奋斗。

中央
五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

（1947年5月30日）

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

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和世界，看成和过去一样，不许改变任何事物的样式，不许任何人违背他们的意志。在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决定要使中国回复到过去的旧秩序。经过政治协商和军事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了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

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指出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号召人民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这个预言，不久以后就得到了证实。本篇和《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都是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王家湾写的。

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1]。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蒋介石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2]。蒋介石的军警宪特同学生群众之间，到处发生冲突。蒋介石用逮捕、监禁、殴打、屠杀等项暴力行为对付赤手空拳的学生，学生运动因而日益扩大。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狞面貌暴露无遗。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

---

[1] 从1946年12月起，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有了新的高涨，逐步形成为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1946年12月底到1947年1月初，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几十个大中城市，50多万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一名女生的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这一斗争，迅速获得了工人、教员和其他人民群众的支持。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同时，发生了上海8000工人、学生包围国民党警察局的事件。这一爱国运动，立即扩大到南京、北平、杭州、沈阳、青岛、开封等许多城市。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了极端野蛮的镇压办法。5月20日，同时在南京和天津殴伤和逮捕学生共百余人，造成有名的“五二〇血案”。但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在广大人民支持之下，并没有被镇压下去。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罢课示威运动，和工人罢工、教员罢教等各界人民的反美反蒋斗争，当时遍及60多个大中城市。1948年5月间，上海学生又同文化界、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一起，展开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爱国运动，这个运动也迅速地扩展到其他许多城市。直到全国胜利为止，学生的爱国斗争从未停止过，给了国民党以严重的打击。

[2] 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18日颁布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人民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方政府，对于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紧急措施”，进行镇压。

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由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他们就宣布他们自己和全国人民为敌，他们就将全国各阶层人民放在饥饿和死亡的界线上，因而就迫使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并使这个斗争迅速发展下去。全国人民除此以外，再无出路。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这是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自己反动统治的两个主要工具，现在人们已经看到这些工具的迅速破产。

蒋介石的军队，无论在哪个战场，都打了败仗。从去年七月到现在共计十一个月中，仅就其正规军来说，即已被歼灭约九十个旅。不但去年占长春、占承德、占张家口、占菏泽、占淮阴、占安东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没有了，就是今年占临沂、占延安时候的那种神气，现在也没有了。蒋介石、陈诚曾经错误地估计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和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以为退却就是胆怯，放弃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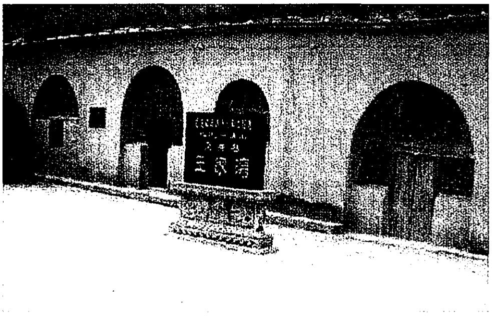
干城市就是失败，妄想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但在十个月之后，蒋介石全部进犯军已经深入绝境，被解放区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所重重包围，想要逃脱，已很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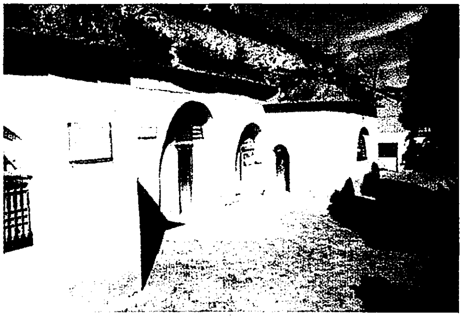
蒋介石军队在前线打败仗的消息传到后方的日益增多，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日益感觉自己的出头翻身有了希望。恰在这时，蒋介石的一切政治欺骗，由于蒋介石的迅速扮演而迅速破产。一切出于反动派意料之外。什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呀，什么改组一党政府为多党政府呀，其目的原是为着孤立中共和其他民主力量；结果却是相反，被孤立的不是中共，也不是任何民主力量，而是反动派自己。从此以后，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什么是蒋介石的国民大会，什么是蒋介石的宪法，什么是蒋介石的多党政府。在这以前，中国人民中的许多人，主要地是中间阶层的分子，对于蒋介石的这些手法是多少存了幻想的。对于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也是这样。在几次庄严的停战协定被蒋介石撕毁得干干净净之后，在用刺刀向着要和平反内战的学生群众之后，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政治上毫无经验的人们之外，什么人也不会相信蒋介石的所谓和谈了。

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我们曾经不断地向人们指出，蒋介石政府不是别的，仅仅是一个卖国内战独裁的政府。这个政府欲以内战的手段，削平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达到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和维持自己独裁统治的目的。这个政府因为采取了这些反动政策，它就在政治上变得毫无威信，毫无力量。蒋介石政府的强大只是暂时的，表面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它的进攻是能够打败的，不论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战线上。它的前途必然是众叛亲离，全军覆灭。一切事变，都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

这些估计的正确性。

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王家湾毛泽东旧居。


青阳岔毛泽东旧居。

天赐湾毛泽东旧居。

小河村毛泽东旧居。

目前阶段陈粟谭军与刘邓军只作战略配合[1]

（1947年6月1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世电[3]悉。（一）无论刘邓是否按原定时间行动，你们和刘邓之间在目前阶段上均只须作战略配合，不须作战役配合。你们的战役作战应完全单独进行。（二）在情况许可（即确有胜利把握）条件下，我们希望你们于六月上旬及下旬各有一次战役作战。

军委

东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5月31日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和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询问刘邓大军是否按原计划出击，以便布置配合作战。

同意刘邓全军休整月底渡河[1]

（1947年6月3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2]及朱、刘[3]：

巳冬电[4]悉。（一）同意本月刘邓野战全军休整，渡河时间推迟至月底。（二）在此期间，望令老黄河以南、新黄河[5]以北各区之地方部队，亦以主力从事休整，以期下月配合作战更为有力。（三）主力南进须作长期打算，望作政治上、物质上之各种准备工作。

军委

巳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4] 指1947年6月2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刘少奇、朱德等的电报。电报说，根据目前的敌情和部队的情况，部队于6月10日出动实来不及，为避免仓卒行动，影响今后任务，建议推迟于月底准时渡河。

[5] 1938年6月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西犯，致使黄河改道向东南沿贾鲁河入颍河和西淝河，在正阳关等地注入淮河。当时通称这一段黄河为新黄河。1947年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复归故道。

先打八十一师后打十八师[1]

（1947年6月4日）

彭、习：

江申电[2]悉。提议先打八十一师，再打十八师，即专打马鸿逵，暂时不打青马[3]，亦不向南。这是因为：（一）宁马较好打，青马较难打。我应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二）打开西北一面，利于尔后机动，利于安置大批伤兵。（三）董钊有开山西讯，刘戡有开延安以南讯。我应让敌向东向南，而我军则不应过早向南。如果我军过早向南，则有抑留董钊不去山西之可能（董军去山西对我利益甚大）。以上请考虑见告。目前数日内如环县敌未跑，则打环县之敌（应以两天至三天时间进行详细侦察及充分准备）；如环县之敌已跑，则休整数日为宜。

军委

支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指1947年6月3日15时彭德怀、习仲勋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如敌八十一师及马步芳所属独骑五团坚守环县时，则准备歼灭该敌。如该敌向北退出环县，则5日即准备向南打八十二师，消灭马步芳部。

[3] 青马，指青海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六月中旬作战以全歼敌七个旅为目标[1]

（1947年6月4日）

陈、饶、粟、谭、榘，并告刘、邓[2]：

江午电悉。完全同意你们所定作战方针，本月上旬充分准备，中旬作战，以干净歼灭五军及七十五师、八十五师共七个旅为目标。对于二十五师、十一师则以一部钳制之。对于汤兵团[3]各师，除以地方部队袭扰外，不要派出任何主力部队担任钳制，以便集中八个纵队，至少七个纵队，歼灭五军等七个旅。此战胜利，全线必起变化。望你们以全力组织这一战役。

军委

支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饶漱石和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汤兵团，指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一兵团，兵团司令官汤恩伯。此时汤恩伯因孟良崮战役失利已被撤职，由范汉杰接任。

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动应予停止[1]

（1947年6月4日）

各局各首长：

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仍可予以局部性的战术性的破坏外，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动应予停止。我军所到之处，对于铁路员工及铁路上的铁轨、枕木、路基、桥梁、涵洞、车站设备等项，一律加以保护，并劝告人民一律保护。其因作战需要所作之战术性破坏，于歼灭敌人占领该地后，应尽可能迅速地加以修理。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望转饬所属，切实遵照。

中央

巳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共中央局和战略区领导人的电报。

在修改《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时加写的两段话

（1947年6月4日）

另有一部分君主立宪派，他们不赞成蒋介石的君主专制，但仍希望蒋介石接受他们的君主立宪论，这次也参加了参政会。但是，这个参政会连同蒋介石政府在一起，按照于斌主教在开幕词中所说，是辆破车。

就在这次参政会开会的第一天，即五月二十日，南京六千爱国学生结队向参政会请愿，表示要饭吃，要和平，却被全城军警展开巷战，不许请愿。这个参政会的参政员们亦溜之大吉，不愿接受请愿。

做好夺取大西北的一切准备[1]

（1947年6月6日）

陈、谢、韩，并告彭、习[2]：

（一）同意你们微电[3]所提意见，准备于十五日后开始北移西渡。（二）你们要开营以上干部大会，反复说明在和晋南很大不同的条件下作战，要准备吃很多的苦，要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要有消灭胡宗南[4]、夺取大西北的雄心，并要准备打阵地战（以后运动战将大大减少），学会近迫作业，善于攻坚。以上这些，你们一定要用积极态度向营以上干部说得明明白白，经过他们向战士说明，鼓动一切指战员勇敢地执行新任务。关于陕甘宁边区只能供给你们粮食，其他一切都要太岳自己接济一项，你们也要向干部说得清清楚楚，免得将来发生怨言。总之，你们要有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充分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和副司令员韩钧的电报。中央军委对陈谢纵队西进作战的部署以后作了改变。

[2]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陈赓、韩钧1947年6月5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情况若无变化，我部决心于本月15日以后开始北移，经汾离公路，由军渡西渡。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备。为此目的，你们可在晋南至军渡之间择一适当地点休息数日，开干部会及军人大会。

军委

鱼

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1]

（1947年6月13日）

以后凡中央密电所发出之任何文件，凡未得中央许可者禁止印发。

私人不得记录党政军机密事件及不得携带此种笔记本，中央迭有通知，特重申禁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保密问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各战场形势和中工委今后六个月内的工作

（1947年6月14日）

朱、刘[1]：

各电均收，处置很对。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我们自四月中旬移至大理河上游，安静地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2]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3]之间回窜，其目的全在骚扰。总结边区三个月战争，第一个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起即已步入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向敌人作斗争。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见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彭习[4]率野战军上月底到陇

---

[1] 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

[2] 刘戡（1908—1948），湖南桃源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3] 保安，今陕西志丹县。

[4]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东，因青马[1]八十二师颇顽强，打合水未得手，但歼灭骑二旅一个团及宁马[2]八十一师一个团于曲子附近。目前正攻环县八十一师主力，拟先打开西面包围线，然后向关中进击。陈谢[3]纵队本月休整，决于七月一日西调，协同边区兵团[4]开辟西北局面。东北方面进展极快，不到一个月歼敌六个师（旅）以上，收复三十余城，增加五百万人口，目前正攻四平。山东自歼七十四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5]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四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八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毛泽东
巳寒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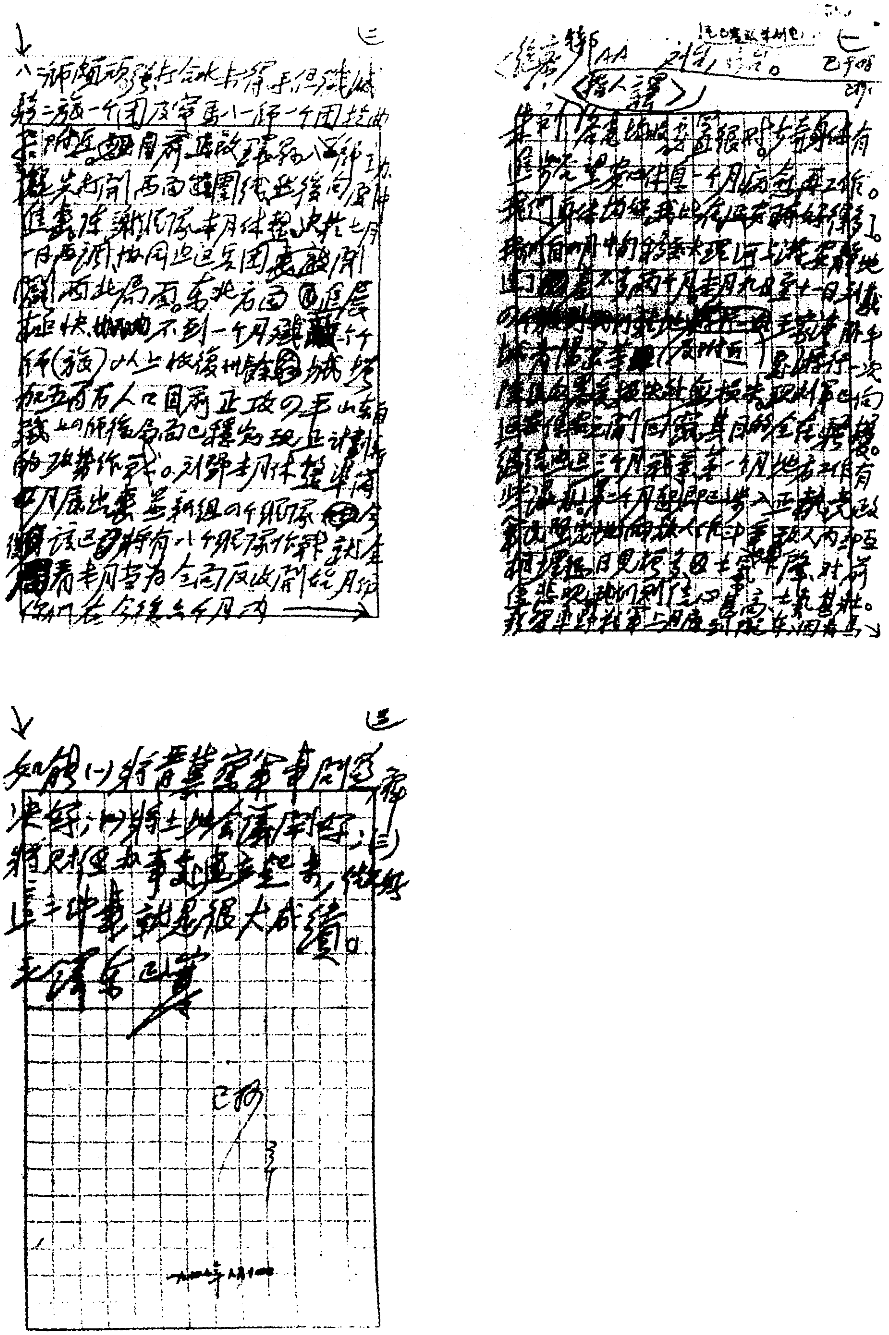
[1] 青马，指青海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2] 宁马，指宁夏马鸿逵（1892—1970），甘肃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3]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指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致刘少奇等信的手稿（部分）。

陕甘宁边区三个月的作战情况[1]

（1947年6月15日）

敌以三十一个正规旅加上保安团队为数二十万人以上，压迫我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及四万余军队的边区，约为七个半人对付一个敌人。以敌人力量论，山东第一，边区第二，以人口与敌人相比较，则边区为第一。但三个月战争已使敌人士气沮丧，对前途无信心。我军则士气甚壮，信心甚高。中央机关于四月中旬移青阳岔、卧牛城附近安静地工作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率四个旅至我驻地游行一次，除民众略有损失外无他损失，中央仍在卧牛城附近不远地方工作。我主力现在陇东作战[2]，并准备于下月初调陈赓纵队过河，与边区部队协力歼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

---

[1] 这是毛泽东致高岗并告各地首长电的主要内容。

[2] 陇东作战，后称陇东、三边战役，指西北野战部队主力5月29日自安塞西进，为收复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的作战。

致林伯渠、王维舟等电[1]

（1947 年 6 月 15 日）

敌之“清剿”，主要在骚扰我区，捉走壮丁。据我们经验，只要我们采取积极态度，坚持反“清剿”斗争，即使是十数人的游击队，经常保持与敌接触，也可使敌踌躇不敢冒进，或者据山筑工，不敢下沟捉人。这样，既可迟敌前进，便我掩护群众及机关转移，又可阻敌骚扰，减少群众及机关损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伯渠、王维舟等并告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杨尚昆电的主要内容。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王维舟，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1]

（1947年6月17日）

彭、习：

铣未篠午两电[2]悉。（一）攻克环县，甚慰。（二）董军[3]铣日、刘军[4]篠日从高桥出发，似准备以五六天行程到达庆合[5]。你们在环县休整三五天后，开至东华池地区打该两军一部，时间上恐来不及，且目前宜打分散与较弱之敌，不宜打集中与强大之敌。目前对董刘两部野战军及青马[6]八十二师皆宜避开不打，专打各方分散之敌。（三）在董、刘到达庆、合条件之下，我军下一步行动可从打宁马[7]十八师，收复定盐[8]；或打延安、洛川间守备之敌，断敌后路二者择一。如你们觉得打十八师有把握，则先打十八师，再打延洛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指1947年6月16日13时和17日11时彭德怀、习仲勋关于攻克环县后的行动部署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3] 董军，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

[4] 刘军，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

[5] 庆合，指甘肃庆阳和合水。

[6] 青马，指青海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7] 宁马，指宁夏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8] 定盐，指陕西定边和宁夏盐池。

上之敌最为有利。究应如何，请以你们意见电告。同时，等候董、刘情况完全判明后再作决定。

军委
十七日二十三时

晋察冀主力的作战方向[1]

（1947年6月19日）

朱、刘、聂，并转杨、罗、杨[2]：

（一）先后接聂十五日十六时电[3]、杨罗十五日十时电[4]，青沧战役[5]胜利完成，甚慰。（二）聂电所称，以三纵及八分区主力攻静海、独流，是否举行，结果如何。（三）下一步行动似以全力（主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朱德、刘少奇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6月15日16时聂荣臻给中共中央军委和萧克、黄敬、赵尔陆并刘少奇的电报。电报说：青沧战役虽已胜利，但尚未完成钳制当面敌人、不使增援东北之战略任务。为调动向东北增援之敌折返天津及十六军主力向津浦增援，拟以三纵队全部及八分区主力相机攻占静海城、独流镇，威胁天津，达成目的后，野战军全部即转向平保间北河至漕河段机动，以便继续抓住敌人与消灭敌人。

[4] 指1947年6月15日10时杨得志、罗瑞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青沧战役已胜利完成，为继续配合东北作战，我们意见，部队休息三五天后，继续向平津段出击。

[5] 青沧战役，指1947年6月12日至15日，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在冀中地区发起的作战。此役攻克青县、沧县、永清3座县城，控制捷地、减河以北至东官屯段铁路70余公里，配合了东北战场的作战。

三个纵队不要分散，再加地方部队）向平津段[1]出击，截断杨村、黄村段，争取在大清河北歼灭援敌为有利；如援敌不好打时，则转向平保段[2]出击。如此，可在平津平保两线往来机动，寻歼敌之正规部队。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委

十九日十五时

---

[1] 平津段，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 平保段，指北平（今北京）至保定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陈谢军七月中旬开始向榆林方向出击[1]

（1947年6月20日）

陈、谢：

你纵务于月底结束休整，不再延长，午东由谢韩[2]（陈赓二十五日动身先来中央）率领，由现地出发，午灰前后在绥德集结完毕，午哿开始向榆林方向出击。准备以二十天左右时间，各个歼灭三十六师之二十八旅（两个团），邓宝珊[3]之新十一旅（两个团），左世允[4]之八十六师（三个团），并相机夺取神、府、榆、横[5]等地，然后与边区野战军协同向南出击。在你们攻榆林期间，彭习则打宁马[6]十八师（三个旅），收复定盐[7]。

军委

巳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和政治委员谢富治的电报。

[2] 谢，指谢富治。韩，指韩钧，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

[3]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4] 左世允，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第二十二军军长。

[5] 神、府、榆、横，指陕西神木、府谷、榆林和横山。

[6] 宁马，指宁夏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7] 定盐，指陕西定边和宁夏盐池。

边区野战军与陈谢军的作战方针

（1947年6月20日）

德怀[1]同志：

十九电悉。陈纵[2]午东由曲翼[3]出发，约午删在绥德集结完毕，午智左右开始向榆林方向出击，约一个月完成任务，然后向南作战。边区野战军月底开始执行歼灭宁马[4]十八师、收复三边[5]之任务，甚为适当。胜利后并望向西扩大战果，相机攻占预旺、韦州、惠安、同心城等地，将部队展开于镇原、固原、海原之线以北，准备下一步向固、镇、海及静宁、兰州线出击。陈纵则南下关中，东西策应击胡[6]。依西北之敌情、地形、补给等条件来看，边区野战军与陈谢[7]集团在数个月内似宜分开行动，而不宜集中行动。惟分开行动，有远距离分开与近距离分开两种（上述一出静宁，一出关中是远距离一例），究应如何为宜，依当时情况决定。数月内作战方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陈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陈赓。

[3] 曲翼，指山西曲沃和翼城。

[4] 宁马，指宁夏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5]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7] 陈，指陈赓。谢，指谢富治，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针仍应采取先打分散较弱之敌，孤立集中强大之敌。数个月后，此种方针方可考虑改变。榆林、三边两役完成之后，准备向南出击之前，似宜开会一次，讨论作战及补给等事，届时当请你们及陈谢来中央集会。

毛泽东
巳智

在修改《哀号无济于事》时加写的两段话

（1947年6月21日）

黄埔军人中现在正发展厌战情绪，其中有些人正在酝酿反蒋反战，投奔人民解放军。这种情况，随着今后蒋军的失败，必定会有可观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欢迎这一发展。真正的黄埔革命精神，仅仅属于站在人民立场上的革命军方面，这就是事物的根本变化。

总而言之，蒋介石的灭亡局势是确定了。蒋介石正在为此哀号，并且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哀号文告发表，但是大势已去，不能挽回了。

不要打无把握之仗[1]

（1947年6月22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十九电[3]悉。（一）东北夺取四平后，下一步行动尚未定。聂区[4]下一步拟向平津平保两线[5]机动。刘邓月底出击不变。陕北俟陈赓[6]部到后拟打榆林、三边[7]之敌，然后向南行动。蒋[8]区学运暂时休息，准备再起。（二）据悉蒋以东北危急令杜聿明[9]坚守两月，俟山东解决即空援东北等情，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你们作战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6月19日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蒋介石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为顾问，召开了多次军事会议，提出“并进不如重迭，分进不如合进”。敌以三四个整编师重迭交互前进的战法，摆成方阵，加配了山地作战器材和炮兵、工兵，在各要点屯积了大批作战物资。

[4] 聂区，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5] 平津平保两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和北平至保定的铁路。

[6]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7]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8] 蒋，指蒋介石。

[9]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东北行辕副主任。

针，仍以确有胜利把握然后出击为宜。只要有胜利把握，则不论打主要敌人，或打次要敌人均可，否则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

军委

二十二日十五时

复彭德怀、习仲勋电[1]

（1947年6月22日）

三边敌力强大，请注意各个击破，每次集中全力歼其一两个团，以一个月以上时间完成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意彭德怀、习仲勋21日提出的收复三边的作战计划，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彭德怀、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六月十六日通报的指示[1]

（1947年6月22日）

各局、各首长必须检查自己地区工作是否有上述类似情形[2]，如有必须严格纠正，务须从长期战争着眼，不能只顾目前忘记将来，只顾军队忘记人民，是为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晋冀鲁豫中央局6月16日通报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2] 指晋冀鲁豫中央局6月16日通报中列举的一些地方在扩兵、支前等项工作中，造成群众负担过重的情形。

复林彪、罗荣桓电[1]

（1947年6月25日）

八天作战占领四平一半，你们决心再以一星期时间歼灭四平之敌，占领此战略枢纽，极为正确。四平占领，不仅对我军建立攻坚信心关系甚大，而且对全国正在斗争的广大群众是一大鼓励。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等电[1]

（1947年6月25日）

（一）你纵仍在曲翼地区[2]荫蔽休整待命，待陈赓来中央商定开动日期，然后部队再动。因胡军主力尚在延甘富地区[3]，彭、习正打三边，你们出动过早，有引起胡军过早向榆林增援可能。（二）陈赓即日来中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赓、谢富治、韩钧并告彭德怀、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2] 曲翼地区，指曲沃、翼城地区。

[3] 延甘富地区，指延安、甘泉、富县地区。

应取分路出击敌远后方之方针[1]

（1947年6月29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二十八电[3]悉。蒋军毫无出路，被迫采取胡宗南[4]在陕北之战术，集中六个师于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前进。此种战术除避免歼灭及骚扰居民外，毫无作用，而其缺点则是两翼及后路异常空虚，给我以放手歼击之机会。你们应以两个至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滕、临、枣[5]，纵横进击，完全机动，每次以歼敌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6月28日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刘先胜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张云逸、饶漱石、黎玉的电报。电报说：根据敌6个整编师采取靠拢在不及百里之正面，向我沂鲁山区进犯的情况，我以一个纵队攻占费县后，向西威胁泗水敌主要补给基地，以4个师扫除临蒙之少数敌人后即控制该线。其余主力仍集结于沂水西南与东里店之线及其南北地区。估计刘邓南下前，我一部西进，可能引起变化，创造出击机会。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临、枣，指山东临城（今薛城）和枣庄。

个旅为目的。以歼敌为主，不以断其接济为主，临蒙[1]段无须控制，空费兵力。此外，你们还要准备于适当时机，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扫荡泰安以西、以南各地，亦以往来机动歼敌有生力量为目的，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使外出两路易于得手。以上方针是因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之方针。其外出两路之兵力，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二十九日十二时

---

[1] 临蒙，指山东临沂和蒙阴。

部署强大力量
准备马鸿逵逃跑时歼灭之

（1947年6月30日）

彭、习[1]：

马鸿逵[2]迭次令其所部见小敌则抵抗，见大敌则保存实力转移逃避。环县敌人逃跑是一证，马万荣[3]部骑兵此次在定边（似与我侦察部队作战）稍战即逃赴盐池又是一证。因此，你们打三边[4]时，除注意攻坚外，应部署强大力量准备于其逃跑时歼灭之。此外，请注意每次作战集中全力只打一点，得手后再打第二点，哪怕打一个团也是如此。这样可保证全歼，且常保有余力在自己手中，足以应付意外情况。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三十未

---

[1]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3] 马万荣，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所属骑兵第十旅第二十团团长。

[4]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每战应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为主

（1947年7月1日）

朱、刘，聂[1]转杨、罗[2]，并告林、罗[3]：

（一）现时距雨季尚有一个时期，漕河、北河店间战役[4]结束后休整数日。如定兴、北平间有好仗可打，即集中全力向该段薄弱之敌进击，否则应即转移至永定河以北，向平津路进击。

（二）每打一仗后，如损伤不大时，休整数日至十天即打第二仗，目前不要作整月休息计划。

（三）每次作战计划，以歼灭孤立分散之敌为主，必须对敌方增援有充分之事先准备，但不要将计划重心放在打增援上。因在目前情况下，敌方往往畏惧增援，若决心增援，又往往集中兵力使我不易歼击。

---

[1] 朱、刘，指朱德、刘少奇。聂，指聂荣臻，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3]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4] 漕河、北河店间战役，即保北战役。1947年6月25日至7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在保定以北漕河至北河店间发起攻势，共歼国民党军8200余人。

（四）占领之地能守者（如正太、青沧），以地方部队守之，不能守者则不惜立即放弃，让敌重占，以利我再度、三度、四度之歼击。总之，我军必须完全主动，不要有任何被动。

（五）速令杨罗台与军委台通报。

军委
午东

修改《努力奋斗迎接胜利——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二十六周年》时加写的两段话

（1947年7月1日）

我们有个伟大的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者、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开明绅士、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这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困难，宁可作长期打算，不要有速胜论，有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也一定可以克服。同胞们，同志们，勇敢前进，努力奋斗，迎接胜利。

以神速动作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1]

（1947年7月2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三十电[3]悉。布置甚好，惟莱芜距敌主力甚近，陈士榘[4]所部似以越过莱芜直打泰安及其南北之线为宜。得手后收复肥城、东阿、平阴、宁阳、汶上、济宁，与刘邓直接联系。尔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陇海路，出淮河，展开新局面。判断蒋方七天或十天内必改变部署，以主力一部回到兖泗[5]，阻止我军与刘邓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1947年6月30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约13万人，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南作战。为配合这一行动并最后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进攻，华东野战军在未及充分准备情况下，依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立即分两路向敌侧后出击。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6月30日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由叶飞、陶勇率第一和第四纵队越过临蒙公路向鲁南挺进。二、由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向鲁西的泰安、大汶口方向挺进。三、正面部队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集结沂水、悦庄公路两侧，各以少部兵力与东犯之敌接触，主力待机出击。

[4] 陈士榘，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

[5] 兖泗，指山东兖州和泗水。

合。因此，我军必须在七天或十天内，以神速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如动作过缓，则来不及。如攻泰安时间过长亦可置之不打，并应在打泰安时先以一部抢占泰安以西及西南各县。以上请酌办。

军委

午冬十二时

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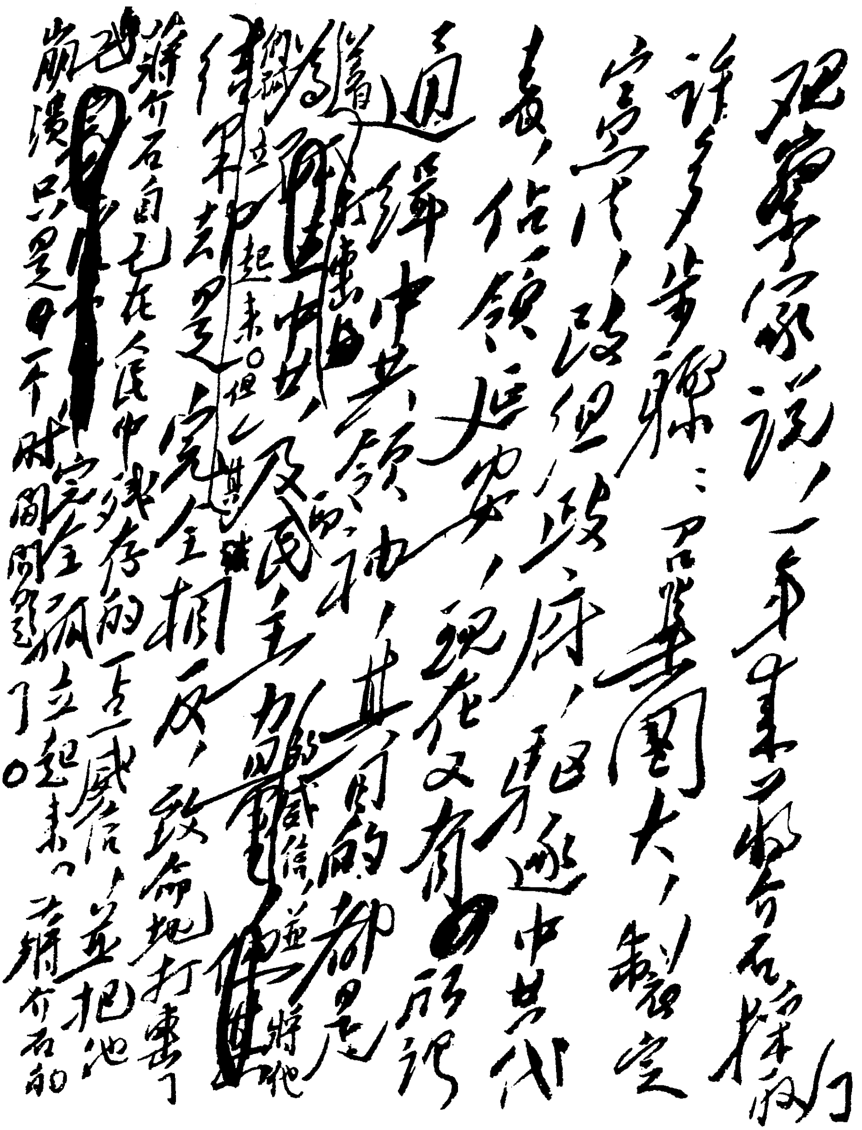
（1947年7月2日）

【新华社陕北二日电】国民党中央社六月二十九日南京电宣布，南京蒋介石政府已对中国人民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实行所谓“下令通缉”。蒋介石采取此项步骤正是在全国人民群起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时候。仅仅一个月以前，蒋介石的参政会还电请中共代表去南京恢复和谈，蒋介石还宣称“国家绝对需要和平”云云，当时熟悉内幕的舆论界即已断言这种姿态完全是欺诈。蒋介石的所谓“通缉令”，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反攻的浪潮中特别显得滑稽。此间观察家认为，在蒋军到处失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蒋介石此种反动的举措是企图挽救蒋军将士与国民党官员普遍绝望情绪之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此项步骤的另一动机，则为对于美国国务院赠送子弹一万万三千万发的一种立时响应。该观察家称：既然蒋介石已经“通缉”中共领袖，则任何一个解放区政府和任何一个中国人就有更大理由缉拿蒋介石，并审判其罪行。中国人民继西安事变以后，第二次活捉卖国贼杀人犯内战祸首蒋介石一事，现已日益富于现实性。观察家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了许多步骤，召集“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驱逐中共代表、

---

[1] 这是新华社的时评。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占领延安，现在又有所谓“通缉”中共领袖，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观察家说，一年来蒋介石和他们许多事：召集国大，制定宪法，改组政府，驱逐中共代表，占领延安，现在又有所谓通缉中共领袖，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时评《蒋政府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时加写的一段话。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

（1947年7月2日）

四平战役虽未全部解决敌人，但已取得经验，给了敌人很大打击。援敌如太集中不好打，可弃之不打，而以一个月时间休整部队，八月间再行出击，出击方向提议向北宁路方面。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的主要内容。刘亚楼，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

晋察冀野战军下半年的行动部署[1]

（1947年7月3日）

朱、刘、聂，即转杨、罗[2]，并告林、罗[3]：

杨罗巳陷电[4]悉。现在距雨季尚有一个月，主力应即照杨罗电移至高阳、雄县以东休息若干天，争取在午号或午有以前，在永定河以北（平津间）进行一个战役。此役完成后即回至石门[5]以东休整一个月（八月），然后进行石门战役（九月）。打石门以后休整一时期，即应移至平绥平汉两路之间，对该两路之敌作战，计时约在十月半以后，准备以三四个月时间，将该两路之敌充分削弱，然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朱德、刘少奇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3]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4] 指1947年6月30日杨得志、罗瑞卿给朱德、聂荣臻并刘少奇的电报。电报说：保定附近之敌恐难打好，故转移。建议地方兵团在北保之间活动，主力南移，整训半月后，乘各地雨季，向石家庄进攻。其方法，首先采取削弱敌人手段，达到消灭由北向南增援之敌。如援兵不来时，则向石家庄坚决进攻。主力如欲在北保间求战，野战军主力应到高阳、雄县以东休整。由于部队行动作战将近3个月，必须补整一时期再战为宜。

[5] 石门，即今河北石家庄。

与我东北部队配合夺取平绥路。我东北部队目前须有一个多月休整，尔后即可以一半兵力向北宁路[1]及热河[2]、冀东进击，明春即可向平绥路进击，以占领整个平绥路，打通华北与东北联系为目标。你们应按照这个方向进行部署（现在距雨季究有多少时间，望告）。

军委
午江

---

[1] 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以尽歼泰安至临城全线之敌为第一目标[1]

（1947年7月3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根据野参冬未电，泰安为七十三军残部，大汶口、曲阜为七十二师残部，泗水、宁阳、汶上、兖、济、邹、滕[3]为杨干才、吴化文、耿继勋[4]等杂部。你们西进、南进之五个纵队，应以攻占泰安至临城[5]全线尽歼该线之敌为第一目标，胜利后再攻占该线以西各地。如行动迅捷可能达此目的，与刘邓打成一片。

军委

江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兖、济、邹、滕，指山东兖州、济宁、邹县和滕县。

[4] 杨干才，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师师长。吴化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耿继勋，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第九专区保安旅旅长。

[5] 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

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的两个方案

（1947年7月4日）

彭、习[1]：

关于击灭胡宗南[2]，夺取大西北，有两个方案仍然值得考虑：（一）陈谢[3]纵队照原议来边区，从内线歼灭其相当数量，然后出外线（陇南），与边区集团[4]直接协力完成任务。（二）估计到边区人口稀少，粮食及各种供应颇为浩繁；又估计到鄂豫陕三省交界及平汉以西、汉水以北、渭水以南广大地区敌力空虚；又估计到假如使用陈纵于该区，必然要吸引胡部一个军（五个到八个旅）使用于该方面，而如果胡部有一个军出该方面，则边区敌力大减，利于边区集团各个歼敌；又估计到刘邓[5]十二万人已渡河向陇海前进，如若陈纵到鄂豫陕边开辟新战场，对刘邓亦有帮助，但陈纵基本任务是协同边区集团击灭胡宗南，夺取大西北，并不变更。以上两案究以

---

[1]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指西北野战兵团。

[5]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何者较为适宜，请予考虑。陈赓七日可到军渡（部队仍在曲翼[1]整训待命），在绥德停一二日，约于十二三日可到小河。你们二位是否可于盐池收复后，令部队在现地休整一时期，自己来小河会商一次。如若你们赞成开会，则我们拟电约贺龙[2]同志亦来开会，时间大约可定在十三日。

毛泽东
午支四时

---

[1] 曲翼，指山西曲沃和翼城。

[2] 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目前应采取四路分兵各打各的方针[1]

（1947年7月4日）

陈、粟、谭，华东局，并告刘、邓[2]：

饶张[3]诸同志四日一时电悉。（一）为顾及后方可能被敌侵扰，攻击郯马[4]、新安镇之任务，在目前数日内可作积极准备，待我西进两路在津浦[5]打响，正面之敌开始后撤时，立即执行。（二）正面之敌后撤时，可能扰乱后方之敌只有昌潍[6]之八军。你们应组织地方兵团对付该敌，保卫后方，以便不但使用三个纵队执行南下任务，而且为着使南下三个纵队易于完成歼灭五十一师等部起见，有使用陈粟谭手中留下之一个纵队，临时钳制桂系于现地一个时间之必要。（三）五十一师歼灭后，你们应准备以两个纵队直下淮北、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饶张，指饶漱石、张云逸，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4] 郯马，指山东郯城和位于郯城西北的马头镇。

[5]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6] 昌，指山东昌乐。潍，指潍县，旧县名，1983年撤销，并入山东潍坊市。

中，打开新局面。北面留下两个纵队，迅速移至胶济线，准备打八军。（四）这样四路分兵打敌后路，对于敌之主力完全置之不理，是因为正面之敌极端集中，没有好打机会，故应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方针，完全主动作战，将敌抛入被动地位。而在目前情况下，此项方针是可能收效的。（五）胶东、渤海、滨海、鲁中四区尚有多少地方旅，可否集中数个旅成立一个至二个新纵队，使北面共有三个至四个野战纵队。（六）尔后敌主力分散给我以歼击机会时，我仍可集中四至五个主力纵队作战。

军委

四日十八时

歼击第八军并相机攻取潍县[1]

（1947年7月5日）

陈、粟、谭：

为吸引正面之敌向东，不使后撤太快，便于我西进两兵团取得胜利[2]，同时保护后方，请考虑以足够兵力歼击由潍县[3]向临朐前进之八军，并相机攻取潍县，而将南进计划推迟一步执行。

军委

微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1947年6月30日，华东野战军为执行6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的三路分兵的指示，决定由叶飞、陶勇率领第一、第四纵队西进鲁南；由陈士榘、唐亮率领第三、第八、第十纵队西进鲁西；野战军指挥部率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正面抗击国民党军。

[3] 潍县，旧县名，1983年撤销，并入山东潍坊市。

致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电[1]

（1947年7月9日）

攻克泰安甚慰。正面蒋军近日陷入麻痹状态，进退维谷，此种麻痹状态可能再延长几天。你们除正面待机及令叶、陶[2]进击临、枣[3]外，望令陈、唐[4]以主力向南，于数日内相机攻占大汶口、泗水、曲阜，歼灭七十二师残部及二十师一部，然后以全力向西，攻占路西、湖东[5]各县，以聊城为后路。目前数日内，不要顾虑八十五师之增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2]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司令员。

[3] 临、枣，指临沂、枣庄。

[4]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

[5] 路西、湖东，指津浦路以西，东平湖、南阳湖、昭阳湖以东地区。

争取在内线多歼敌人[1]

（1947年7月10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

（一）叶陶[2]歼灭峄枣[3]之敌后，似宜向西攻占邹、滕、临、韩[4]，切断津浦[5]，吸引桂系及欧震[6]向西，直接威胁徐州，策应刘邓。（二）陈唐[7]望照前电[8]主力迅速南下，歼灭大汶口、泗水、曲阜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3] 峄枣，指山东峄县（今峄城）和枣庄。

[4]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微山县东南。

[5]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6]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官。

[7]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8] 指1947年7月9日24时中共中央军委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正面蒋军近日陷入麻痹状态，进退维谷，你们除正面待机及令叶飞、陶勇部进击临、枣外，望令陈士榘、唐亮部以主力向南，于数日内相机攻占大汶口等地，然后以全力向西攻占路西、湖东各县，以聊城为后路。

地之敌，以小部向西攻占肥城、平阴、东阿。（三）正面我军望精心选择机会歼灭黄百韬部[1]，然后再决第二步行动。（四）刘邓已克郓城等地，如能歼灭七十师，并争取在路北多歼几部敌人，然后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举行陇海作战，似属有利。我军愈在内线多歼敌人，则出到外线愈易发展。

军委
灰午

---

[1] 黄百韬部，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

（1947年7月10日）

林、罗、高[1]：

战略方针：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一切区域均已将敌战略进攻停止，并已转入我军之进攻。敌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由于地形等条件，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已能主动作战；东北及太行早已采取攻势；五台[2]自改善领导后亦能主动作战；山东敌集中攻我鲁中，估计亦难持久，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

（二）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歼伪军、保安部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歼敌一百一十二万人。

（三）敌军主力仍在南线[3]，连被歼者（其中大半已补充，惟人数不足，战力弱，一部在准备补充中）计算在内，共有一百五十四个旅，其中，山东（包括苏北）八十八个旅，太行二十六个旅，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四十个旅。北线[4]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罗、高，指罗荣桓、高岗，当时均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2] 指晋察冀地区。

[3] 南线，这里指华东、晋冀鲁豫、西北（包括晋南、榆林、宁夏，不包括兰州以西）诸战场。

[4] 北线，这里指东北、晋察冀、晋绥诸战场。

敌力较弱，共有六十四个旅（被歼者在内），其中，东北（不包括冀东、察[1]北）二十四个旅，五台及晋绥四十个旅（孙连仲[2]十五个旅，傅作义[3]十个旅，阎锡山[4]十五个旅）。敌后方守备兵力三十个旅，其中，新疆及甘西八个旅，湘鄂川滇黔五省十六个旅，东南各省及台湾六个旅。全国敌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去年七月共有兵员一百八十余万人，一年作战被我歼灭七十八万人，补充六十万，逃亡二十万，现有兵员一百五十万人，今后一年准备补充一百万人。此外尚有特种部队（炮、工、辎、海、空）、伪军、交警[5]及保安部队等一百万人（被歼者除外），后方军事机关一百八十万人。一年作战，敌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在人民中已陷孤立。

（四）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一百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五）我军山东有二十七个头等旅；太行（不包括陈赓[6]）有十三个头等旅，十四个二等旅；西北有边区六个旅（其中四个是晋绥来的），陈赓四个旅，晋绥三个旅；五台有九个头等旅，四个二等旅；东北（包括察北、冀东）有头等二等三十二个旅。我全军共计一百一十二个旅（东北、山东两炮纵，东北、晋绥四个骑旅不在

---

[1] 察，指察哈尔省。

[2] 孙连仲（1893—1990），河北雄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

[3]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张垣（张家口）绥靖公署主任。

[4]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5] 交警，指交通警察总队。

[6]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内），九十万人。此外，地方部队六十万人，军事机关四十万人。

（六）第二年我军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我军力求占领中长、北宁[1]、平承、平石、平绥[2]、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其中极重要的是占领平绥路，打通东北与华北联系，使华北、西北我军获得军火接济。

（七）上述北线任务应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五台、晋绥为辅助完成之。

（八）东北我军目前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约于八九月间发动新攻势，以四个月至六个月时间占领中长、北宁两路之大部，相机夺取长春、四平、辽阳、锦州等城。如能顺利达成上述任务，约在明春即须以东北有力兵团，配合五台、晋绥进攻平绥路。待战争发展平绥附近时，五台、晋绥我军统一归林罗指挥作战。

（九）在第二年计划顺利完成条件下，第三年，山东、太行两主力即可向长江以南发展；东北、五台我军，除留必要兵力攻击平、津、沈及其他第二年尚未占领之城市，并守备本地外，即可以相当数量之兵力加入西北及长江以南作战，而主要是加入西北，以期夺取西北各省及四川全省，巩固后方。

（十）东北军事工业应全力接济关内。目前开始的一年内，你们必须用大力建立大规模军事工业。

（十一）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

---

[1] 中长，即中长路。北宁，即北宁路，指北平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北京至沈阳段。

[2]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等城市及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及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夺取地方；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与大部兵员（十分之九的士兵及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配合土地改革与发展生产，支持长期战争；今后作战，运动战的可能已减少，主要是攻击敌军阵地，必须用大力加强炮兵与工兵。

（十二）以上是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午灰

放手歼敌粉碎鲁中敌军进攻[1]

（1947年7月12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

十日二十一时电悉，布置甚好。望令陈唐、叶陶[2]利用目前绝好时机，以十天至十五天时间，放手歼灭七十二师残部，二十师、八十四师（吴化文[3]）全部，耿继勋部[4]，完全占领运河以东、泰安以南、临城[5]以北全区，同时以一部扫清泰安以西各县。如你们能完成上述任务，则必可保证粉碎鲁中敌军之进攻，否则仍将发生困难。你们正面则以全力寻求机会歼灭黄百韬部[6]。

军委

十二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3] 吴化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

[4] 耿继勋部，指国民党军江苏第九专区保安旅，旅长耿继勋。

[5] 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

[6] 黄百韬部，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

部队是否西移须依情况决定[1]

（1947年7月12日）

陈、粟、谭：

你们手中各纵宜寻机歼击黄百韬部[2]。东里店战斗[3]后，你们是否向西移动须依情况决定：（一）如敌以一部西援，确有夹击歼敌机会，则你们可移至利于夹击之位置（不是与陈唐等会合），与陈唐等夹击该敌，自属有利。（二）如敌仍维持现状，则你们西移与陈唐会师，无仗可打，且敌将全军向西，迫你们处于背水地位。（三）如敌大部或全部西援，则你们西移亦不好打。总之，只有第一种情况方可考虑西移，第二第三两种情况均不可西移，而以位于东面吸引敌人，并寻机多歼敌数部最为有利。东里店胜利后，望再找歼敌机会。陈唐、叶陶则放手歼击津浦线上各敌，愈多愈好。

军委

十二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黄百韬部，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

[3] 1947年7月10日晚，华东野战军第二、六、七、九等纵队，准备歼击东里店之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后因欧震兵团进占沂水，与整编第二十五师靠拢，故未遂行。

给陈瑾昆[1]的信

（1947年7月13日）

瑾老同志：

大示敬悉。你们一家安于农村生活，闻之甚慰。立法工作是一新部门，得兄主持，日起有功，是大好事。时局如兄所料，人民战争是发展的；惟艰苦奋斗，尚须付以数年时间。我们在此均好，勿以为念。谨复。顺候

大安!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陈瑾昆，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蒋贼介石卖国殃民
国人都可得而诛之*

（1947年7月13日）

蒋介石于本月四日亲自向国民党的所谓“三党政府”提出并通过所谓总动员决议，这一事实最后一次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两件事：第一，内战祸首就是蒋介石；第二，从去年重庆校场口惨案以来，国民党特务的一系列的法西斯暴行，背叛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停战协定，发动内战，签订出卖祖国的中美商约，用美国武器屠杀同胞，起用日本战犯冈村宁次参加内战，到处抓丁征粮派款，背叛政协决议，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驱逐中共代表，进占延安，逮捕与屠杀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反卖国的学生、记者、民主人士，所有这些罪行，都是蒋介石为首发动的。蒋介石的这一切倒行逆施，都是为了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的利益，却叫中国人民遭殃送死。蒋介石的总动员就是蒋介石的总崩溃。总动员不会挽救蒋介石的军事、经济与政治危机，相反恰恰只能加重这些危机。蒋介石的崩溃无可避免。全国人民由于蒋介石的总动员，面临着更大更深的苦难，同时又已日益明白这些苦难的来源就是蒋介石。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蒋贼不除，国无宁日。这样对于内战的首祸卖国奸贼，中国人民为要免除自己的灾难，人人得而诛之。国民党中孙中山忠实信徒，应当团结起来，和人民一道，讨伐这个叛逆，国民

党在朝派里如果有人还有一点良心，应该把蒋介石逮捕起来，宣布其祸国殃民的罪状，听候人民审判。

给续范亭[1]的信

（1947年7月13日）

范亭同志：

迁入晋绥后，未知贵恙如何，极以为念。人民战争发展，极艰苦时期虽尚未完，但展望是好的。我们在此都好。我身体比在延安时要好些。敬祝

安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三日

---

[1] 续范亭（1893—1947），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西社村人，著名爱国将领。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在国民党任职，曾经隐退一段时间，后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建山西新军。1947年病逝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7月14日）

刘、邓十四日电提出迅速补充太行纵队及五师，两个月内向豫西出动，极为必要，望照此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应放手攻占泗水等七城[1]

（1947年7月14日）

陈、粟、谭，并告刘、邓[2]：

你们近日对陈唐[3]指示变化太多。陈唐主力仍宜迅速打下泗曲[4]，以十纵攻取宁阳、汶上、济宁，对十二军暂置不理，否则将丧失时机，一事无成。正面敌军西援必十分谨慎，不敢冒险，故陈唐、叶陶[5]应放手攻占泗、曲、邹、滕、宁、济、汶[6]等地，不要顾虑太多。俟西援之敌迫近，依情况，好打则由你们全军夹击该敌；不好打则另寻机会，再无机会，则考虑以两个纵队（似以叶陶为宜）过湖西[7]协同刘邓作战。但目前任务是坚决放手攻占泗、曲、邹、滕、宁、济、汶等七城，并准备与你们正面配合夹击敌人。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4] 泗曲，指山东泗水和曲阜。

[5]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6] 邹、滕、宁、济、汶，指山东邹县、滕县、宁阳、济宁和汶上。

[7] 湖西，指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和河南三省交界地区。

们正面四纵目前亦应坚决歼击较为分散之敌。东里店未能歼敌，甚为可惜。

军委

十四日二十一时

陈谢[1]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

（1947年7月19日）

刘、邓，徐、滕、薄、王，郑、李，谢、韩[2]：

（一）为着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决将陈谢纵队使用方向改为渡河南进，首先攻占潼洛郑段，歼灭该区敌人，并调动胡军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豫西、陕南、鄂北进击，创建鄂豫陕边区根据地，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陈谢纵队仍属彭习序列不变，同时仍属晋冀鲁豫建制。

（二）提议赵基梅[3]纵队（五师主力）、秦基伟[4]纵队及孔汪三十

---

[1]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滕、薄、王，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三副司令员。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副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谢、韩，指谢富治、韩钧，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赵基梅（1910—1947），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第十二纵队前身为新四军第五师。

[4] 秦基伟，1914年生，湖北黄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八军[1]与陈谢纵队一同南进，统受陈谢指挥。

（三）上述陈、赵、秦、孔四部统于电到二十天内完成一切政治、军事、经费、干部等项准备工作，未皓[2]以前渡河。

（四）一切准备注意机密。

（五）陈赓日内回太岳。

军委

午皓

---

[1] 孔，指孔从周，即孔从洲（1906—1991），陕西西安人，当时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汪，指汪锋，当时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政治委员。

[2] 未皓，即8月19日。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47年7月21日）

一

关于军事计划，西北战场原先打算由西北野战兵团和陈赓[2]纵队两部集中起来打胡宗南[3]，现在决定分开打，这样在战略上和粮食供给上都有利。今年我们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七月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以依靠晋绥边区为主，今后更是如此，因为战争使陕甘宁边区的地方和人口都缩小了。现在决定由贺龙同志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资格来统一指挥，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和地方工作三个问题。

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山东的局面最近可以转变，陕甘宁边区还不能，但基本上停止了敌人的进攻，这就为以后转变局面打下了一个基础。过去一年消灭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一十二万人，我们伤亡三十几万人，假定第二、第三年的战争更激烈些，五年就要准备伤亡二百万人。现在我们有主力部队九十万人，地方部队六十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的讲话，二、三、四是毛泽东的插话。

[2]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万人，如能把主力扩展到一百五十万人，就足够解决问题了。

蒋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了，也就是说人民群众更加不信任他，他更加众叛亲离了。当然还没有到彻底孤立的地步，还有一些人迷信他，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过去在抗战时期我们对蒋介石顽固派的方针就是孤立他，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一方面要作若干让步，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在国民党区域开展群众工作，批评顽固分子。我们没有犯像美国共产党在一个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1]，也没有等到抗战结束以后再转变方针，那样就来不及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和谈是必要的。虽然我们希望全部问题政治解决的目的没有达到，但蒋介石的确是更加孤立了。只有经过长期地教育群众，我们党才能在今年“七七”提出十六条口号[2]。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现在不公开讲出来，还是要准备长期斗争，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

---

[1] 指白劳德解散美国共产党的错误。1943年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后，当时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白劳德，用“阶级合作”的观点来解释德黑兰会议，并于1944年4月发表了《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白劳德认为，要实现同垄断资产阶级的合作，无产阶级就必须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取消自己独立的政党。1944年5月，白劳德主持解散了美国共产党，另组非党的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白劳德的错误一开始就遭到以福斯特为首的许多美国共产党员的反对，1945年6月，在福斯特领导下，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通过了批判白劳德路线的决议，同年7月，又举行特别代表大会，决定重建美国共产党。

[2] 指1947年7月7日《人民日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七七”纪念日发布对时局口号》，其中提出了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蒋介石进犯军，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饥饿、独裁、卖国政策，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保护民族工商业等项主张。

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几个月消灭共产党，后来又说还要几个月，到现在又说战争才开始。

抗战结束以来，党的统一战线的成分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减少了，一部分人增加了。减少的是解放区的地主，因为我们现在搞土地改革，不像抗战时期仅仅实行减租减息。但南方的地主却因征兵征粮首先同蒋介石闹翻，而同我们还没有决裂。增加的是中间派，这些人在抗战时期更相信蒋介石，现在则和我们共同反抗蒋介石，这种情况是十年内战时期所没有的。黄炎培[1]在抗战时期对新四军很满意，但不能和我们共同抵制国民参政会[2]，现在他对苏北的土地改革不满意，但能和我们共同抵制伪国大。坚持土地改革不至于吓跑民族资本家，但不坚持土地改革势必会丧失农民，从而丧失革命战争，也丧失民族资本家。土地改革应该采取平分土地的方针，地主不要多分，但不能不分。土地改革要和统一战线相结合。十年内战时期我们犯过“左”的错误，一是在土地革命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现在我们是一律平分；二是在城市中没有建立统一战线，不团结民族资本家，现在我们是采取打倒官僚资本而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关于国际情况，英、美继续联合在一起，企图孤立苏联，似乎

---

[1] 黄炎培（1878—1965），上海川沙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2] 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1938年3月31日决议设置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国民党员占大多数。国民参政会成立初期，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一定作用。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于1947年5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德黑兰会议、波茨坦会议[1]关于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问题的原则发生了动摇。现在虽然还不能说英、美、苏一定不会共同签订对德和约，但分别签订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是对于七大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的一个修正，但现在还不能作最后的结论。出现了以美国反动派为首的各国反革命统一战线是可以肯定的，他们企图搞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各国革命统一战线也大大发展了，这个统一战线将要战胜反革命的统一战线。我们不要来一阵风就被吓倒，对形势要作分析。中央今年二月一号指示[2]中提到的三个因素——苏联的强大，各国人民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仍旧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将迫使英、美和苏联进行贸易，给苏联以建设的机会，给中国革命和各国人民加强团结的机会。上一次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不能不和苏联复交。波立特[3]说一九二八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反共的最高峰，而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使这一高峰下降。现在的反苏也只是限于宣传和外交方

---

[1] 德黑兰会议，是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关于加速打败法西斯和战后世界安排等重大问题的会议。会议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和《苏美英三国关于伊朗的宣言》。波茨坦会议，是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附近的波茨坦举行的进一步商讨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及苏联对日出兵问题的会议。会议期间，经中国政府同意，于7月26日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2] 指毛泽东1947年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页~1217页）。

[3] 波立特（1890—1960），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

面。反共实际上是反对各国人民。各国反革命和中国反革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外强中干，这是由于他们存在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蒋介石的总动员令[1]就说明了这一点。总动员令还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使要求和平的人民认清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本来面目。分析形势，要看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全世界人民的同情、民族统一战线、土地革命，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国民党军队的优势，发动突然的进攻，这些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内部紧迫的危机，美国即将到来的危机，终归要使他们走向众叛亲离。众叛是群众不要他们，亲离是内部不和。蒋介石内部不和，蒋、美之间也不和。

地方工作就是要联系群众，其中心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要学晋西北的方法，搞贫农团，坚决克服一些干部中偏向地主富农的情绪。犯了错误的干部，多数可以教育好，少数教育不好的清除出去，有利无害。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相信西北局的同志可以实现这个任务。

二

金融、贸易系统存在的根本错误是两个：第一，只看财政不看经济，只看少数不看多数。不知道金融贸易系统如果不采取正确的方针，其他方面的工作就难以着手。第二，没有对外严格统制，大公、小公、群众贸易都要严格统制，这是任何弱小革命力量对反革

---

[1] 总动员令，指国民党政府1947年7月4日发布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命势力的包围作斗争时所必须坚决实行的。总之，以后一个时期应该坚持自给自足、对外统制、军民兼顾的原则。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是有困难的，必须有步骤地去做。

三

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一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去解释。敌人把取胜放在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各个边区要实行简政，降低生活水平，先从干部降起。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制，不但奢侈品、非必需品不许入口，就是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也不许入口，而由自己生产。中纺公司的布又好又便宜，我们还是要禁止入口，发展农村的自纺自织，只有这样才有活路。金融、贸易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的，一定要实行军民兼顾。

四

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到抗战时期必须改变，否则就不能缓和国内矛盾和根据地内部的矛盾，发展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共同打日本。当时，我们根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同地主阶级也搞统一战线，这并不影响下层政权，也不限制群众的斗争。现在一般来说“三三制”仍旧不变，但对它的解释是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而不包括反动地

主。土地政策今天可以而且需要比五四指示[1]更进一步，因为农民群众要求更进一步，如土地推平。平分土地是一个原则，但按情况不同可以有某些伸缩，如对杜斌丞、侯外庐[2]，但对共产党员不应该有例外。中农的土地应该不动，但在群众运动的大潮流中和中农同意的情况下，要富裕中农拿出少许土地也是许可的，这种做法不要正式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部队打到外线去以后，与其马上没收地主的土地，不如先按阶级路线摊派征税，立即实行耕者有其田势必造成强迫群众去做。西北财经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中央领导上也应该负责。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对错误采取尖锐、严肃的态度，加强具体领导，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陕甘宁这个区域有几个有利条件便于团结群众坚持斗争：第一，有本地领导骨干。这是就整个边区来说的，但三边[3]、陇东及其他某些县区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是腐化得不可救药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也是可以教育的，他们在工作中出的问题有许多是因为我们在政策上交待得不明确。领导上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第二，有政治上可靠的军队。第三，人民是好的。第四，保留了土地革命时期老区的许多好的工作作风。有了这些条件，敌人是可以被战胜的。

---

[1] 五四指示，指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示》决定将抗日战争期间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2]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侯外庐（1903—1987），山西平遥人，历史学家。

[3] 三边，指陕西定边、安边和靖边。

1947年7月，毛泽东和随同转战的机要人员在小河村合影。

1947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

1947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小河村旧居前留影。

陈谢等部速作好出豫西的准备[1]

（1947年7月22日）

徐、滕、薄、王，并告刘、邓，郑、李，谢、韩[2]：

哿电[3]悉。（一）已决定陈谢纵队、秦基伟纵队[4]、五师[5]、三十八军四部统由陈谢指挥出豫西，冀南纵队暂留豫北，太岳纵队暂留晋南为宜。（二）出动时间必须在八月二十五日以前，除陈谢纵队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和第三副司令员王宏坤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副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谢、韩，指谢富治、韩钧，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7年7月20日滕代远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豫西敌军兵力空虚，除太行纵队进入豫西作战外，冀南纵队全部、太岳纵队两个旅同时南渡作战，并拟调太岳纵队主力攻垣曲、白坡、焦作、辉县等据点，扫清南下障碍。

[4] 陈谢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秦基伟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5] 五师，指原新四军第五师。此时第五师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赵基梅。

有准备外，望令秦纵、五师、三十八军速作准备，务于八月二十日以前准备完毕。船只、经费、粮食、干部、新兵补充及政治动员等项，均按此时间准备完毕。（三）请令冀南纵队准备攻占白坡，太岳纵队准备攻占垣曲。攻击该两点须与陈谢渡河同一时间，不要过早暴露企图。（四）如五师准备时间不足，则该师可推迟半月南进，但其余各部必须按期渡河。（五）待五师出发后，先念即可偕中原局工作人员及王树声[1]，并带一批干部去刘邓处工作。

军委

午养

---

[1] 王树声，原任鄂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此时已转移到晋冀鲁豫地区。

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

（1947年7月23日）

刘、邓，陈、粟、谭[1]，华东局：

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与扩大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

（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我们已令陈赓[2]纵队，并指挥太行纵队、五师[3]、三十八军共七万余人，八月下旬出豫西，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吸引胡宗南[4]一部打运动战。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2]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五师，指原新四军第五师。此时第五师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赵基梅。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二）陈士榘所部在未能出泗曲[1]与叶陶会合，因而不得不出鲁西情况下，邱清泉吴绍周[2]两集团可能迅出鲁西，并可能集中行动，不利歼击。因此，陈唐应以一部钳制邱、吴，主力迅速行动，放手歼击陇海线上及其以北地区分散孤立薄弱之敌，扩大该区战场，钳制邱、吴于该区内，待其分散时相机歼其一部。陈唐不可轻出陇海以南，仅在必要时可临时以一部或大部出至陇海、新黄河、淮河之间机动。尔后，陈唐可往来陇海南北机动，并可以一部回至鲁南配合主力作战。

（三）叶陶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广东纵队[3]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组织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4]前往主持。

（四）陈粟谭率鲁中主力并在刘邓到大别山后，指挥陈唐担负整个内线作战任务。陈谢集团至豫西后受刘邓指挥作战。

中央军委

午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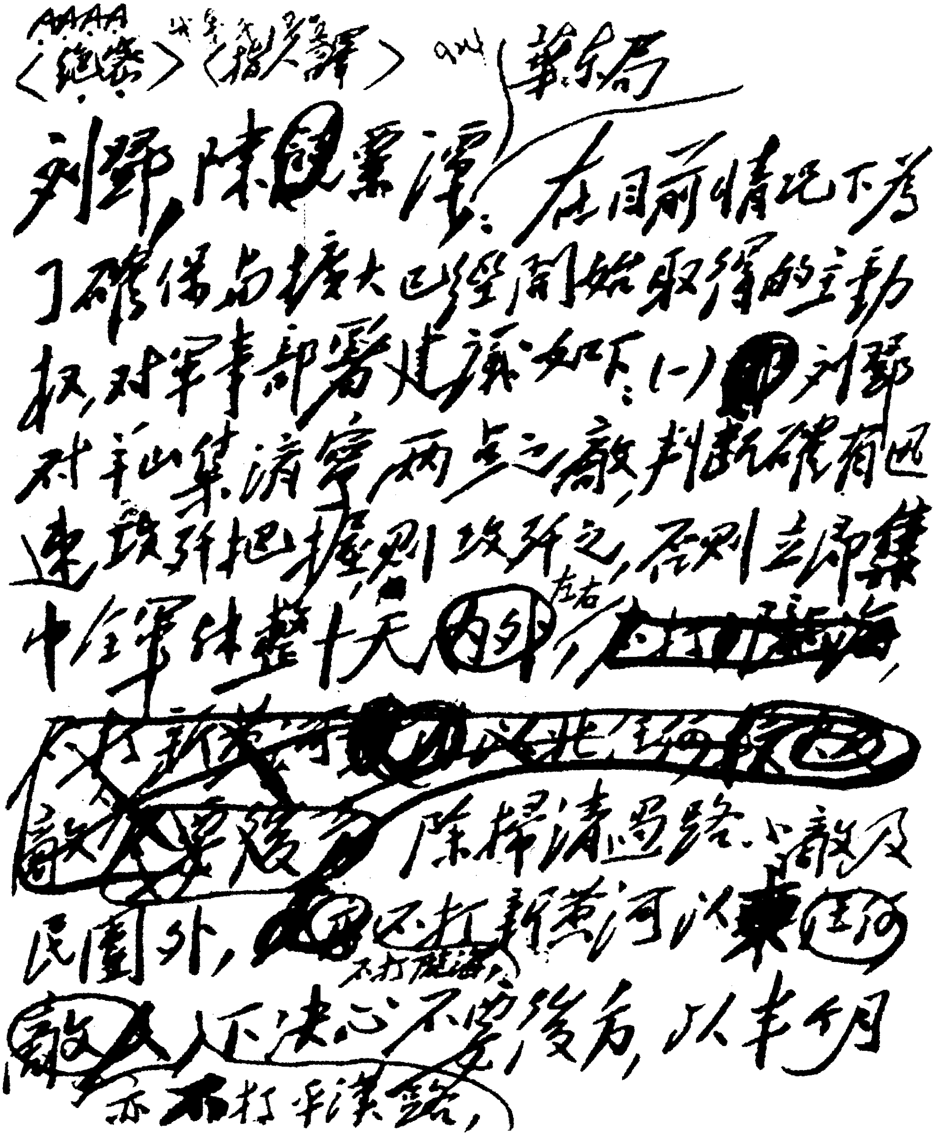
---

[1] 泗曲，指山东泗水和曲阜。

[2] 邱清泉（1902—1949），浙江永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

[3] 广东纵队，当时指归华东野战军建制与指挥的两广纵队。

[4]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鼎丞，即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



〈绝密〉〈指人译〉　华东局

刘邓陈粟谭：在目前情况下为了确保尚据大局已经开始取得的主动权，对军事部署建议如下：（一）刘邓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歼灭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illegible] 除扫清道路之敌及民团外，不打新黄河以东 [illegible] 不打陇海 敌人，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 亦不打平汉路，

毛泽东致刘伯承等电的手稿。

给李井泉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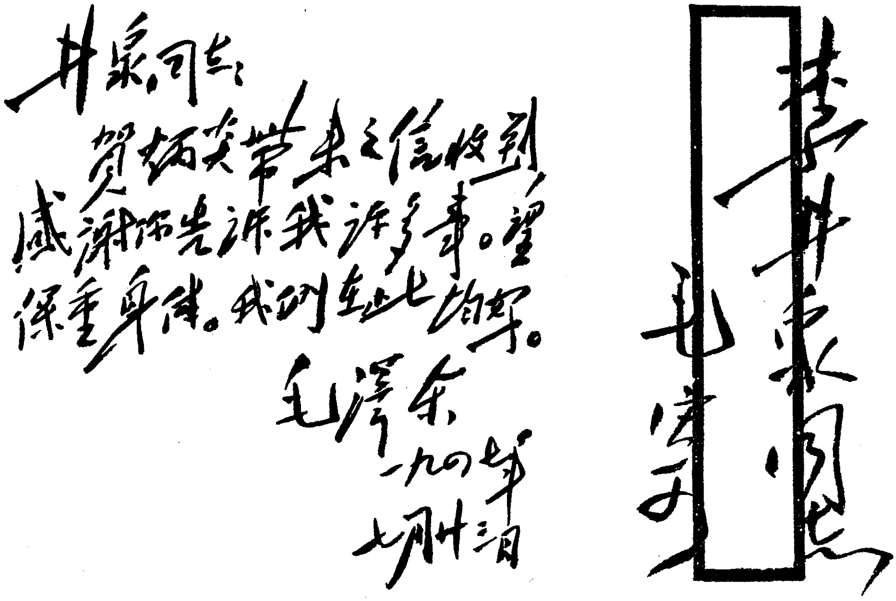
（1947年7月23日）

井泉同志：

贺炳炎带来之信收到，感谢你告诉我许多事。望保重身体。我们在此均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七月廿三日



井泉同志：

贺炳炎带来之信收到，感谢你告诉我许多事。望保重身体。我们在此均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
七月廿三日

李井泉同志

毛寄

毛泽东致李井泉信的手稿。

对刘少奇《给晋绥同志的信》的批语[1]

（1947年7月25日）

少奇同志这封信写得很好，很必要。少奇同志在这封信里所指出的问题，不仅是在一个解放区存在着，而是在一切解放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他所指出的原则，则是在一切解放区都适用的。因此，应将这封信发到一切地方去，希望各地领导机关将这封信发给党政军各级一切干部，并指示他们研究这封信，用来检查自己领导下的一切群众工作，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彻底解决土地问题，改造一切脱离群众的组织，支持人民战争一直到胜利。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

[1] 刘少奇发出的《给晋绥同志的信》对晋绥一些地区群众运动问题作了指示。这是毛泽东对此信的批语。

复林彪电[1]

（1947年7月25日）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尚未成熟，在第二年作战再歼敌一百个旅左右，攻占中长、北宁大部，平绥、同蒲全部，并向长江流域发展，全国人民更加同情我党之时，可以考虑此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林彪10日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议电的主要内容。

致朱德、刘少奇、康生电[1]

（1947年7月26日）

（一）中央已召集彭、贺、习、马、贾[2]诸同志开会三天，检讨工作，决定河东、河西统一后方工作由贺负责，西北局回后方主持；又决定精简人员，规定新的生活标准，以利持久；又决定向脱离群众的干部作斗争，展开土地改革。（二）野战军自打合水、曲子、环县歼灭八十一师及骑二旅大部后，三边敌人逃回宁夏，收复三边；现决定向榆林行动，给该方之敌一个打击，相机夺取榆林，吸引胡军北援，以利陈赓纵队行动；[3]决定陈纵不来边区，八月底向豫西出动。（三）刘、邓歼敌八个半旅，山东歼敌一个半旅，邱清泉、吴绍周等十个旅从鲁中被迫调至兖州，山东局面稍见松动。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近期工作和战争情况致朱德、刘少奇、康生电的主要内容。

[2] 彭、贺、习、马、贾，指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当时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3] 西北野战军7月30日向榆林开进，8月6日开始攻击。8月11日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增援榆林进抵横山以北地区。8月12日彭德怀决定撤围，榆林虽未打下，但诱敌北过无定河，给陈谢集团渡过黄河、南进豫西，创造了有利形势。

做好到国民党区域作战的准备工作

（1947年7月26日）

滕、薄、王[1]，并告刘、邓，谢、韩，郑、李[2]：

敬[3]电悉。（一）已令各部加速准备，按时出动，甚慰。赵[4]纵最好能与各部同时出动。（二）各部除完成新兵补充，军事整训，干部配备及经济、粮食、船只等项准备工作外，还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必须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使一切指战员明了任务的光荣与重要性，指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与在解放区作战的不同，指出战胜国民党的各项条件，使一切人具有克服困难的决心与勇气，具有远征意志，完成充分的精神准备。第二，各纵、各旅领导机关，必须由你们派人帮助他们研究并确定到国民党区域工作的各项政策，包括如何征集粮食，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利用与对付国民党

---

[1] 滕、薄、王，指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三副司令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韩，指谢富治、韩钧，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副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3] 敬，即24日。

[4] 赵，指赵基梅，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

的保甲、税收机关及区乡政府人员，如何对付地主武装及建立群众武装等项。

军委
午宥

刘邓军立即集结休整准备南进[1]

（1947年7月27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2]：

（一）利用五军回驻莱芜，吴绍周[3]亦在对付叶陶[4]之机会，望你们立即集结全军休整补充半个月，执行中央梗电[5]任务。（二）我们已面告陈赓[6]，准备提早至未哿以前渡河。陈赓约未鱼可到太岳。（三）从现在起，陈赓集团即归刘邓指挥，望令陈秦赵各纵[7]及三十八军提早于未删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未删至未哿间渡河。（四）未齐左右边区部队开始攻击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8]军主力北援，以利你们南进。如陈赓能于未哿前渡河，你们能于未删左右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

[4]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5] 即《对确保与扩大战略主动权的军事部署》。

[6]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7] 陈秦赵各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陈赓、秦基伟和赵基梅。

[8]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进，则可能取得几个星期时间在豫西及大别山立住脚跟。（五）按陈粟谭有午电[1]，陈唐[2]不出湖西[3]而与叶陶会合，全力对付鲁中之敌，并吸引吴绍周等在鲁中，对于刘邓南出最为有利。叶陶可照中央梗电，在两个月后再行南出。

军委

午感

---

[1] 指1947年7月25日11时陈毅、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叶飞、陶勇部东撤枣庄、万村线后，敌企图以桂系及吴绍周两集团捕捉叶陶。因此，我们已令叶陶向西北，与陈士榘、唐亮部会合，并令陈唐以主力至兖州附近，策应叶陶。

[2]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湖西，指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和河南三省交界地区。

同意临朐战役后我主力移诸城莒县地区[1]

（1947年7月27日）

陈、粟、谭，华东局：

同意华东局午宥电，临朐战役[2]后主力移诸城、莒县地区，吸引敌人向滨海及胶东前进，以利尔后机动。同时，陈唐[3]与叶陶[4]会合作战，不要过湖西[5]，以利刘邓[6]之行动。

军委

午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1947年7月21日，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师进占临朐城。华东野战军第二、第六、第七和第九纵队一部于7月25日对该敌发起攻击，激战五昼夜，由于攻坚器材不足，加以南线援敌迅速逼近而未能得手，于29日主动撤出战斗。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4]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5] 湖西，指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和河南三省交界地区。

[6]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陈谢集团归刘邓指挥并组织前委[1]

（1947年7月27日）

刘、邓，徐、滕、薄、王，陈、谢、韩，郑、李[2]：

（一）为争取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胜利地迎击胡[3]军，陈秦赵各纵[4]及三十八军提早于未删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未删至未晉间渡河南进。（二）从现在起，陈谢集团[5]归刘邓直接指挥。（三）陈谢集团组织前委，以各部首长为委员，陈谢韩三人为常委，陈赓为书记，谢富治为副书记。

军委

午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徐、滕、薄、王，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王宏坤，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三副司令员。陈、谢、韩，指陈赓、谢富治、韩钧，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郑，指郑位三，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副书记。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陈秦赵各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陈赓、秦基伟和赵基梅。

[5] 陈谢集团，指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的作战集团。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7月27日）

速令到达豫皖苏边区的张才千、李人林两部[2]加紧整训，务于八月二十五日以前整训完毕，届时随刘、邓南下，恢复鄂豫皖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郑位三、李先念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以张才千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人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中原游击纵队所辖第一、第四支队。该两部于1947年6月到达豫皖苏解放区，整训后编为中原独立旅。

刘邓陈谢等部的作战任务[1]

（1947年7月29日）

刘、邓，陈、粟、谭[2]，华东局，邯郸局，并告陈、谢[3]及彭[4]：

各电均悉。（一）在山东敌不西进及刘邓所告各种情况下，刘邓全军休整半个月后，仍照刘邓原来计划，第一步依托豫皖苏，保持后方接济，争取大量歼敌，两个月后看情况，或有依托地逐步向南发展，或直出大别山。（二）陈谢集团照原计划于八月出潼洛[5]，切断陇海，调动胡[6]军一部增援，相机歼灭之，以配合陕北之作战。该部亦与太行、太岳保持后方接济。该部是否远出伏牛、桐柏，依情况决定，有利则远出，不利则缩回河北。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陈谢及刘邓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致陕北不能支持，则两个月后胡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4]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潼洛，指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主力可能东调，你们困难亦将增加。（三）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纵[1]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

军委

午艳

---

[1] 叶纵，指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叶飞。

致各区各级首长电[1]

（1947年7月29日）

第二年第一个月作战，除山东及他处歼敌一部外，我刘邓军自午东[2]至午俭[3]在郓城、巨野、定陶地区，以连续不停之作战，歼敌正规军九个半旅及四个师部，毙伤俘敌五万余人，战绩甚大，特此通令嘉奖。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令嘉奖刘邓军鲁西南战役大捷，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区各级首长并转全军指战员电的主要内容。

[2] 午东，即7月1日。

[3] 午俭，即7月28日。

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1]

（1947年7月30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2]：

（一）午艳电悉。我们午艳电[3]谅达。（二）你们准备再歼王仲廉[4]三五个旅，打开南进通路，计划甚好。作战之前至少休整十日，多则更好。鉴于一二月间你们连续作战四十天未得休息，以致不能坚持之教训，此次南下必须于两个战役间争取休息，恢复元气。（三）如陈唐[5]到鲁西，则与陈唐协同打一仗，然后留陈唐于路北，你们出路南。（四）边区野战军（三万余人）自辰微蟠龙战役后，至陇东歼灭马鸿逵[6]八十一师主力及胡宗南[7]骑兵一个团，进击三边[8]，马部十八师逃回宁夏。在此期间，胡军主力进行游击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即《刘邓陈谢等部的作战任务》。

[4] 王仲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军军长。

[5]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6]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7]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8]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清剿”，六月由安塞北至横山南端，又南至富县太白镇，七月南至关中，又北至保安。胡拟八月由保安向靖边，我军八月打榆林方面之敌，吸引胡军增援，以利陈赓[1]出潼洛[2]。边区受胡军蹂躏，人民损失颇大，粮食缺乏，又加天旱，人口减少至九十万。我军预定给榆林敌一个打击后，即回头打胡，或出关中，或出西兰公路[3]，配合陈赓及你们。（五）陈赓部出动时间可暂定未哿左右，届时依情况可酌量推迟，由你们酌定电告我们。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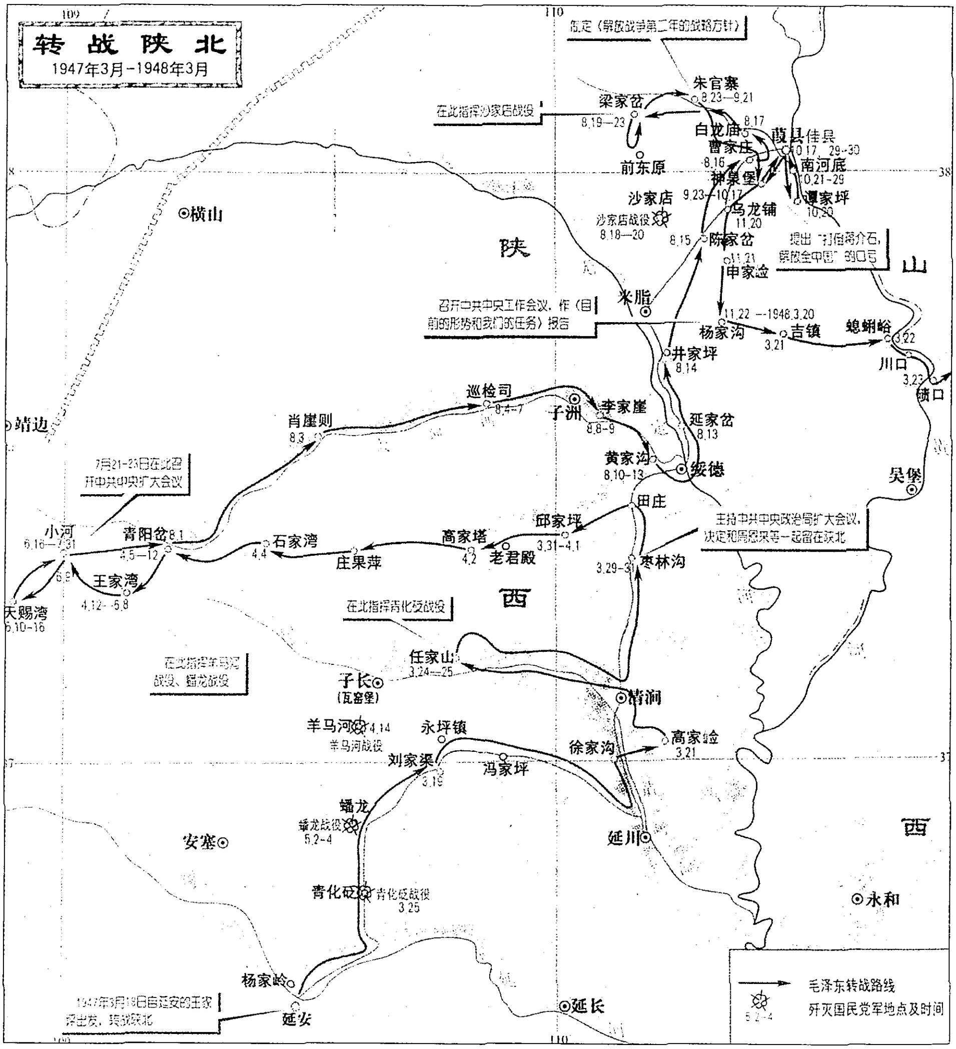
午三十

---

[1]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

[2] 潼洛，指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

[3] 西兰公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转战陕北
1947年3月-1948年3月
109
110
38
37
制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朱官寨
8.23—9.21
梁家岔
8.19—23
在此指挥沙家店战役
白龙庙
8.17
葭县
佳县
10.17　29-30
曹家庄
8.16
神泉堡
9.23—10.17
南河底
10.21-29
谭家坪
10.20
前东原
沙家店
沙家店战役
8.18—20
乌龙铺
11.20
8.15
陈家岔
11.21
申家塬
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横山
陕
山
米脂
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
11.22 --1948.3.20
杨家沟
吉镇
3.21
螅蜊峪
3.22
川口
3.23
碛口
井家坪
8.14
巡检司
8.4-7
子洲
李家崖
8.8-9
延家岔
8.13
肖崖则
8.3
靖边
黄家沟
8.10-13
绥德
吴堡
7月21-23日在此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
田庄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和周恩来等一起留在陕北
小河
6.16—7.31
青阳岔
8.1
4.5—12
石家湾
4.4
高家塔
4.2
邱家坪
3.31-4.1
老君殿
庄果萍
6.8
王家湾
4.12—6.8
枣林沟
3.29-31
天赐湾
6.10-16
西
在此指挥青化砭战役
在此指挥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
任家山
3.24—25
子长
(瓦窑堡)
清涧
羊马河
4.14
羊马河战役
永坪镇
高家塬
3.21
徐家沟
刘家渠
3.19
冯家坪
蟠龙
蟠龙战役
5.2-4
安塞
延川
西
青化砭
青化砭战役
3.25
永和
杨家岭
1947年3月18日自延安的王家坪出发，转战陕北
延安
延长
毛泽东转战路线
5.2-4
歼灭国民党军地点及时间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路线图。

刘邓军出大别山的准备工作

（1947年7月30日）

刘、邓[1]，并告陈、谢、韩[2]，及陈、粟、谭[3]：

午陷电[4]悉。如你们决心直出大别山，请注意下列各点：

（一）开一次团长以上干部会，除告以各种有利条件外，并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

（二）营长以上每人发鄂豫皖三省有县境的明细地图一份，油印的亦好，如能每连发一份更好，使一切干部明白地理环境。

（三）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陈、谢、韩，指陈赓、谢富治、韩钧，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委。

[3]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指刘伯承、邓小平1947年7月30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连日来我们再三考虑军委23日电提出的方针，恰好顷接29日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照现在情况，我们当面有敌19个旅，至少有10个旅会尾随我部行动，故我部不宜仍在豫皖苏，而以直趋大别山，先与陈谢集团成犄角之势，实行宽大机动为适宜，准备无后方作战。建议陈士榘、唐亮兵团在鲁西南拉一下敌人，山东抽出原皮定均旅到大别山作军区骨干。

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的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赤贫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国民党人员未逃跑者，除极坏分子外，均可利用，逐步过渡到人民政权。

（四）如皮定均旅[1]一时调来不及，请考虑以赵[2]纵使用于大别山。该纵由潼洛[3]渡后直趋大别山。陈谢则使用三十八军于豫西建立根据地。

（五）如你们决定直趋大别山，决心不要后方，亦应使陈谢建立此种决心。如陈谢于八月下旬渡河，可能争取一个月时间，在豫西立住脚跟。胡[4]军主力由靖边、横山线南调，估计至少须一个月行程，该敌十分疲劳。

军委

午三十

---

[1] 皮定均旅，指原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第一旅，旅长皮定均。该旅此时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皮定均已调任第六纵队副司令员。

[2] 赵，指赵基梅，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

[3] 潼、洛，指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7年7月30日）

请考虑要李先念率赵基梅纵队即日动身，于八月十五日前到巨野和你们一道去大别山。如先念直接掌握该纵为大别山军区骨干，对于建立根据地当有帮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8月3日）

待陈、唐、叶、陶五个纵队集结郓城地区时，该五纵统归你们指挥，就现有力量从内线钳制敌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粟裕迅去郓城指挥五个纵队策应刘邓作战[1]

（1947年8月4日）

陈、粟、谭，并告华东局：

我们支午电[2]发后，接你们江午电。我们仍主张粟裕迅即绕道聊城去郓城，指挥陈唐、叶陶五个纵队在郓城地区休整，就现有兵力在鲁西南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不可丧失时机。粟未到前该五纵均归刘邓直接指挥，粟到后粟受刘邓指挥。陈率六、九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

军委

支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指1947年8月4日11时中共中央军委给陈毅、粟裕、谭震林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电报说，粟裕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的5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5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

华野五个纵队渡运河后的作战任务[1]

（1947年8月5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2]：

待陈唐、叶陶[3]五个纵队渡过运河后，请令该五纵以有力部队沿运河西岸择要筑工固守，制止敌邱欧[4]西渡；主力集结郓城地区休整，并在郓城地区构筑防御工事，保证北岸接济。该五纵至少须有两星期安全休整，并待粟裕到来方能举行机动作战。在局面没有大开展时期内，该五纵主要任务是直接钳制邱欧，即借以间接钳制陇海线上及其以北之敌，而不是直接钳制陇海及其以北之敌。只要该五纵能于你们出动以前，制止邱欧西渡，又于你们出动后，能在鄄郓[5]地区立住脚跟，不被邱欧切断后路，则不但邱欧不敢使用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4]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欧，指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官。

[5] 鄄郓，指山东鄄城和郓城。

进攻你们方面，即金乡、菏泽等地之敌亦将不敢轻动。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委
微午

立足鲁西南粉碎敌驱我过黄河企图[1]

（1947年8月5日）

陈、粟、谭，华东局，并告刘、邓[2]：

各电均悉。（一）华东局仍应在胶东。陈率六、九纵应迅速转至东面，与谭及二、七纵会合，从反面钳制敌人，不使敌达到驱我过黄河目的。我们多次告诉你们，敌之基本计划是驱我过黄河，而不是迫我入滨海与胶东，你们必须重视此种企图。（二）但目前你们有五个纵队已到运河以西，正好协助刘邓执行出击计划。对于此种计划，刘邓及陈谢集团[3]准备已久，非有特别重大情况，不应轻易动摇。根据刘邓江酉电，此次黄河大水已过，敌我均在抢修河堤，仍争取实现原计划。根据陈粟谭未支电，陈唐[4]三个纵队此次行动中仅减员五千余，不算很大，不必补充人员，只须休息十天左右即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陈谢集团，指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的作战集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

[4]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作战。各部略有损失即叫苦连天，你们应予指导。叶陶[1]减员较多，应酌量补充，但亦非不得补充即不能作战。该五纵均应集中郓城，由刘邓指导整理。你们速派粟裕西去，统一指挥五纵，将全军供给重心经渤海转至鲁西南，争取在鲁西南立足，协助刘邓作战，否则有被敌驱过黄河危险，你们必须严重对付此种情况。（三）待刘邓南出最后决定并实现后，原先刘邓所得之供给可拨交粟裕，加上渤海供给即可支援五纵作战。冀鲁豫仍属邯郸局管理，但应指定暂作华东局机动地区，望刘邓区处。

中央军委

未微酉

---

[1]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对刘邓[1]出动后敌之对策的估计

（1947年8月6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陈、谢[2]：

你们对于出动后敌之可能对策估计如何？我们觉得敌可能采取两种或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迅速组织进攻，使你们不能立足。但此种办法难于调动很多军队，估计可用于进攻者约十二个旅（或较多）左右，即七师、四十八师、十师、七十九师、三师、五十八师各两个旅。其中除桂系外，战力均不甚强。其出发地点不一，在短期内，势必参差不齐。如我能于运动中歼灭其四五个旅，其攻势必受顿挫，我可取得休息机会，以利再战。敌此种办法的基本缺点，是进攻兵力太少，我之回旋余地甚大，并有迫我渡江南进之危险（敌很怕此着）。第二种办法，宁可给我以立足机会，不急于尾我进攻。除上述十二个旅（或较多）外，并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共二十几个旅，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先从长江、平汉两线完成部署，然后向西向北进攻。此种办法之基本缺点，是给我以立足时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间，且使山东攻势完全破坏，鲁西、豫东亦大部难保，即使集中二十几个旅，分两线多路进攻，我亦可能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第三种办法，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办法，既以十二个旅左右分数路迅速进攻，又从山东抽调十几个旅用于长江方面。你们必须同时准备对付这几种办法，而主要准备对付第一种办法，即用全副精神注意于运动中大批歼灭敌人，一切依靠打胜仗。陈谢出豫西后，胡宗南[1]对陕北攻势必被破坏，除现已东调十师两个旅、七十九师一个旅及骑一旅外，必再调至少六七个旅，使用于潼关、商、洛[2]方面，估计一个月内，很难举行有力进攻。此外，我两路南出后，合肥、安庆、鄂东、汉口、平汉沿线，汉水流域及南阳、潼关、洛阳等地均须守备，而要守备这许多地方，非有几十个旅不可。敌在山东、鲁西、陕北之机动部队共有四十五个旅（山东二十九，鲁西八，陕北八），守备兵力则有九十六个旅（被歼者在内）。为要抽出几十个旅守备长江、汉水、平汉各地，不但有大减陇海线及其以北各地守备兵力之可能，且有将机动兵力一部改为守备兵力之可能。如此，则全局可能引起变化。只有在我南出兵团不能大量歼敌，因而不能立足，被迫缩回之情况下，便只能起临时调动敌人之作用，不能起变化全局之作用，且需付以较大伤亡、减员之代价。此种代价，无论起何种作用均须准备付出，但如能取得变化全局之作用，则付出此种代价更加值得。

军委

未鱼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商、洛，指陕西商县（今商州）和洛南。

刘邓陈粟等部配合作战的部署[1]

（1947年8月6日）

刘、邓，并告陈、粟、谭[2]：

微巳电悉。敌现时计划是以邱欧[3]十至十二个旅由运河线，桂系四个旅为主力配合罗广文[4]等由陇海线，向我郓巨[5]地区进攻，至少需两星期方能部署完毕。故你们从未鱼起，至少尚有十天时间，容许你们及陈唐、叶陶[6]休整补充。因此：（一）你们仍争取至未删以后出动，最快未灰以后出动，不要太急。此时桂系刚到兰封[7]，邱欧在运河以东，你们南出暂时只需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二）陈粟率郓城五个纵队，再加六纵，目前主要任务是从侧面，将来则从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谭，指陈毅、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欧，指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官。

[4] 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5] 郓巨，指山东郓城和巨野。

[6]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7] 兰封，旧县名，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面（将来邱欧可能南进）钳制邱欧，如邱欧由陇海线向南，陈粟则尾随之。总之，陈粟从反面钳制敌人最为有力。谭许[1]三个纵队则在滨海钳制鲁中之敌。（三）你们南出前不要企图再打一仗，南出后在沙河以北亦以避免打大仗为宜。

军委

鱼午

---

[1] 谭，指谭震林。许，指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1947年的毛泽东。

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

（1947年8月6日）

刘、邓，陈、粟[1]，并请转告陈、唐、叶、陶[2]：

目前整个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敌机动兵力分置于鲁中、运东、陇海（桂系等）三处，加以鲁西之敌新受巨创，士气不振，我则以一部钳制鲁中之敌，主力位于鲁西南；敌虽想从运河陇海两线向鲁西南进攻，但估计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敌目前既怕你们全力向东攻邱欧[3]，又怕你们全力向南攻陇海。在此情况下，你们全军可以安全休整十天内外，鼓励士气，整顿队势，以利争取新胜利。此次华东各部虽有几仗未打好，但完成了集中兵力、分散敌人之巨大任务。待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到郓巨[4]，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特向你们致慰问之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陈，指陈士榘，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唐，指唐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3]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欧，指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官。

[4] 郓巨，指山东郓城和巨野。

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

中央
未鱼

陈粟应速西去[1]

（1947年8月6日）

华东局，陈、粟、谭：

鱼午电告你们，同意陈粟率野直及六纵去鲁西南，谭黎许[2]组成东兵团[3]，并同意华东局去渤海之建议。兹接饶、张、黎、曾、袁[4]微巳电，云逸、子恢、舒同[5]以全力组成西兵团[6]供应，华东局领导中心暂设东面，俟西面布置完毕，后方中心另作决定等语。关于华东局是否即日西移或暂留东面，何者较便，请华东局依情况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谭，指谭震林。黎，指黎玉，当时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许，指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3] 东兵团，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亦称内线兵团，下辖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和正在组建的第十三纵队等部。

[4] 饶、张，指饶漱石、张云逸，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黎，指黎玉。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袁，指袁仲贤，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5] 云逸，即张云逸。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舒同，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6] 西兵团，指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亦称外线兵团，下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定。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

中央

鱼申

陈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钳制敌人[1]

（1947年8月7日）

刘、邓，并告陈、粟[2]：

鱼辰电悉。（一）你们至少一星期不动，帮助陈唐、叶陶[3]休整，并待陈粟到来。（二）陈粟集中六个纵队于郓鄄[4]地区筑工固守，控制黄河渡口，不怕邱欧[5]来攻。万一不能守，退至黄河以北，转攻泰安一带，邱欧亦不敢南下，孙震刘汝明[6]亦不敢全部南下。（三）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反对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线直接掩护。（四）你们出动，全局变化。敌不可能专心先打陈粟。（五）只要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4] 郓鄄，指山东郓城和鄄城。

[5]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欧，指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官。

[6] 孙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主任。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粟六个纵队集中处于内线，一切有办法；如果分散南进，则全局不利。（六）叶陶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黄河船只是否不缺，过渡是否便利，嘉祥是否尚在我手，望即告。

军委
虞

陈谢集团应提前渡河[1]

（1947年8月9日）

陈、谢，并告刘、邓[2]及滕[3]：

（一）接刘邓未虞电，刘邓及山东两军已于未虞开始，由郓城向豫皖苏及大别山前进。（二）为有力地协助刘邓行动，我陈谢集团应提前于未灰至未删间渡河，首先控制潼洛段[4]山区，再看形势决定下一步行动。照刘邓未虞电，刘邓现在行动中，陈谢暂为军委指挥。（三）我攻榆林吸引胡[5]军北援。现胡令三十六师，由靖边经横山向榆林急进，第一师、九十师及他部由安塞以北向横山以南之石湾进，洛川以南只有新九旅、暂二旅、新一旅等，极空虚。

军委

未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和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滕，指滕代远，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

[4] 潼洛段，指潼关至洛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5]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刘邓南进决心完全正确[1]

（1947年8月10日）

刘、邓，陈、粟：

（一）刘邓虞电[2]，陈粟齐电[3]均悉。（二）在敌主力东迫郓城、西迫鄄城情况下，我在郓巨[4]作战已不适宜，即北撤亦来不及，只有南进才利机动，刘邓决心完全正确。（三）敌此次判断我北撤，完全不料我南进，又有宋时轮王秉璋两纵[5]迷惑阻滞敌人，南面除桂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7年8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邱清泉、欧震主力昨日已过运河以西，罗广文兵团同日占临濮集东北之郑家营，其目的为郓城，估计明日可到达。我已以宋时轮王秉璋两纵队与敌保持小接触，迷惑敌人。我两主力已向南转移，宋王两纵亦适时转至敌侧背或外线。我们即顺此态势南下。陈唐则第一步在陇海两侧，第二步在陇海路南，第三步转到鲁西南内线。

[3] 指1947年8月8日陈毅、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第五军主力已进到蔡家林东北地区与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对战。建议刘伯承、邓小平部协助上述部队打一仗再走。

[4] 郓巨，指山东郓城和巨野。

[5] 宋时轮王秉璋两纵，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宋时轮和王秉璋。

系到商丘，潘文华[1]两个旅位于平汉[2]外，完全空虚，极利机动。（四）陈唐、叶陶[3]到豫皖苏后，照刘邓虞电，在该区活动一时期，掩护刘邓南进，尔后即活动于陇海南北地区。陈粟率六纵及军直到黄河北岸后，如邱、欧、罗广文[4]已南进，即相机渡河与宋时轮、王秉璋会合，在鲁西南活动。

军委

未灰

---

[1] 潘文华，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六师师长。

[2]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4]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原第五军）师长。欧，指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第三兵团司令官。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令王世泰部直出长武彬县速占泾渭间诸县[1]

（1947年8月10日）

贺、习，并告彭：

我刘邓[2]大军已开始向大别山前进，陈谢集团[3]未哿前渡河进攻潼洛段[4]。请令王世泰[5]率警一警三两军迅速行动，直出长武、彬县，攻占泾河以南、渭河以北诸县，吸引暂二旅、新一旅等部，使不能东调。世泰现到何处，该部行动愈快愈好。

军委

未灰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习仲勋并告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陈谢集团，指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的作战集团。1947年7月27日正式成立集团前委，陈赓任书记，谢富治任副书记。

[4] 潼洛段，指潼关至洛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5] 王世泰，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7年8月10日）

情况紧急不及请示时，一切由你们机断处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统归刘邓指挥[1]

（1947年8月11日）

刘、邓，陈、粟：

（一）佳辰灰申两电[2]均悉。（二）刘邓部署很好。前已通知你们所有山东全军统一归刘邓指挥，一切决策临机处理，不要请示。我们尽可能帮助你们。（三）六纵似宜开至聊城，相机与宋王会合，直接策应陇海南北，不宜分散使用，望按情酌办。

军委

真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佳辰电，指1947年8月9日7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已进至成武、曹县之线以南，今夜迫近陇海线后，休息一天，即进至陇海路南。到陇海路南后，有两个方案：如敌来得慢，则可出目的地；如敌尾我快，则可打一二个圈子，尽量争取先到目的地。灰申电，指1947年8月10日15时陈毅、粟裕给刘伯承、邓小平并陈士榘、唐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根据敌情，陈士榘、唐亮部一时难以北返转入内线，建议继续随刘伯承、邓小平进至陇海线或路南地区，待敌大部南移，再行北返转入内线，其行动请刘邓决定指挥。

总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1]

（1947年8月11日）

陈、粟，饶：

（一）陈鱼午电悉，所见甚是，完全同意。七月几仗虽减员较大，并未妨碍战略任务，目前整个形势是有利的。（二）漱石既在东面，华东局即应在东面，子恢[2]到渤海可以工委书记名义执行任务。（三）刘邓[3]南下，全局必有变动，鲁西南诸敌势必大部南去。陈粟率六纵及野直进至聊城待机与宋王[4]会合，可能开展鲁西南局面，并利于直接策应陈唐、叶陶[5]。（四）总的意图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

中央
未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的电报。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宋王，指宋时轮、王秉璋，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

[5]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停攻榆林城集中兵力打钟松部[1]

（1947年8月11日）

彭：

真卯电[2]悉。榆林非急攻可下，而钟松[3]仍有可能迅速增援，似宜决心暂停攻城，集结部队，准备于十二日夜或十三日打钟松。胡宗南[4]虽因畏我伏击令钟松停进，而钟松本日似仍行动，仍有此种可能，即胡宗南见钟松绕道横山西北，向榆林西南六十里之白家涧、古城见前进，可以出我不意，仍令钟松前进。因此，你们宜准备于钟松到达白家涧、古城见之当夜，乘其立足未稳，立即攻击之。若当夜不攻，钟松可能在该地建立立足点，与榆林、石湾（刘戡[5]）成犄角之势，迫我离开榆林。打钟松时宜集中七个旅。望今晚部署完毕，明晨看好地形，并先以一部适时占领白家涧、古城见。又横山我军于钟松通过横山西北以后，击其后路为宜。如钟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47年8月11日5时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攻击榆林，因坑道破坏，爆炸未成，停止攻击。决定如刘戡、董钊两军徘徊不进，本晚继续攻城，如援军到达，则围城打援。

[3]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六师师长。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改变计划攻横山，则仍在横山抗击之。以上望酌办。

军委

真午

《高原颂》（油画）

对我军南进的三点意见

（1947年8月12日）

刘、邓[1]，并告陈、粟[2]：

有三点请你们斟酌：

（一）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情况紧张时应当走几天长的，但应跟着休息几天，恢复疲劳。

（二）在目前几个星期内，必须避免打大仗，专打分散薄弱之敌，不打集中强大之敌，待我军习惯于无后方外线行动，养精蓄锐，又在有利于我之敌情、地形条件下，方可考虑打大仗。

（三）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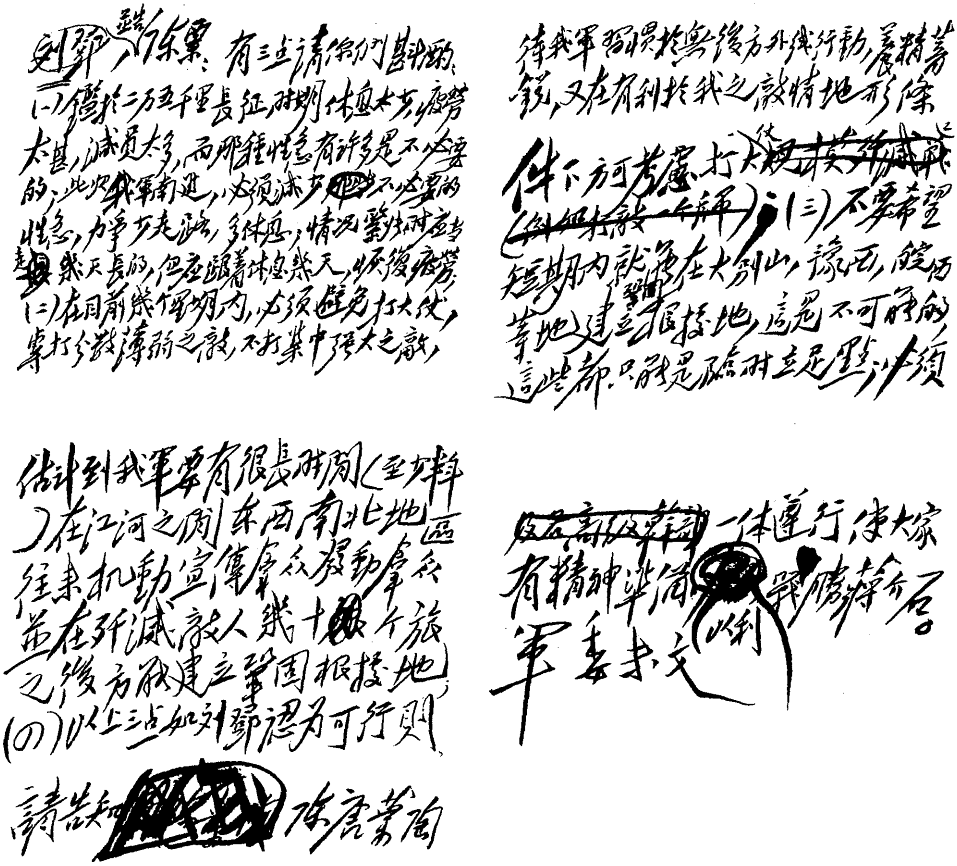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四）以上三点，如刘邓认为可行，则请告知陈唐、叶陶[1]一体遵行，使大家有精神准备，以利战胜蒋介石。

军委

未文



劉鄧，並告陳粟：有三點請你們考慮：(一)鑒於二萬五千里長征時期休息太少，疲勞太甚，減員太多，而那種性急有許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軍南進，必須減少不必要的性急，力爭少走路，多休息，情況緊張時應當走幾天長路，但應跟著休息幾天，恢復疲勞；(二)在目前幾個月內，必須避免打大仗，專打分散薄弱之敵，不打集中強大之敵，待我軍確實於敵後方外線行動，養精蓄銳，又在有利於我之敵情地形條件下方可考慮打大仗；(三)不要希望短期內能在大別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鞏固根據地，這是不可能的，這些都只能是臨時立足點，必須估計到我軍要有很長時間（至少半年）在江河之間東西南北地區往來機動，宣傳群眾，發動群眾，並在殲滅敵人幾十個旅之後方能建立鞏固根據地；(四)以上三點如劉鄧認為可行，則請告知陳唐葉陶一體遵行，使大家有精神準備，以利戰勝蔣介石。

軍委未文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对我军南进的三点意见》的手稿。

---

[1]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陈谢宜早日渡河援助刘邓[1]

（1947年8月12日）

陈、谢、韩，并告刘、邓[2]：

真日二十时电悉。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又胡宗南[3]主力正向榆林增援，三十六师两个旅本日到横山、榆林间，刘戡[4]五个旅本日到石湾。彭习[5]亦甚盼你们早日渡河，变动局势。

军委

未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5]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

致彭德怀等电[1]

（1947年8月12日）

（一）我攻榆林未克，敌钟松[2]部明元日可进榆林，刘戡五个旅可到麒麟镇以东。（二）我军即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钟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谢行动。陈、谢定于未帤渡河。（三）为防刘、董进占绥德，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移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2]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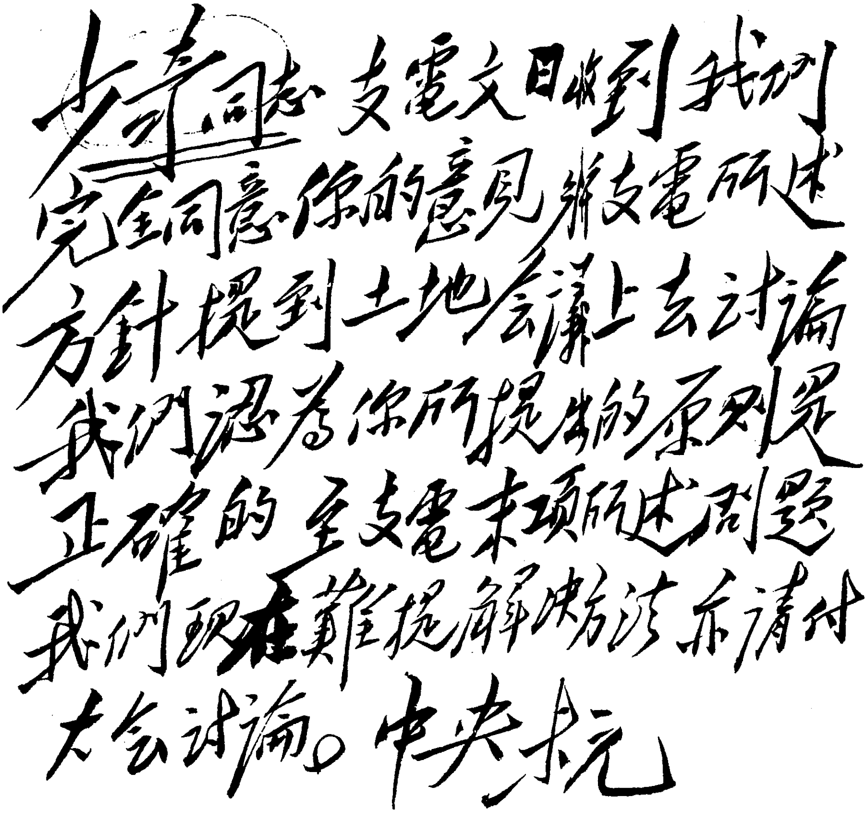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指示

（1947年8月13日）

少奇同志：

支电文日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将支电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我们认为你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至支电末项所述问题我们现在难提解决方法，亦请付大会讨论。

中央
未元



少奇同志 支電文日收到我們
完全同意你的意見 將支電所述
方針提到土地會議上去討論
我們認為你所提出的原則是
正確的 至支電末項所述問題
我們現在難提解決方法 亦請付
大會討論。中央未元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指示》的手稿。

注意分割敌人逐一歼灭之[1]

（1947年8月15日）

彭：

寒未电[2]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部署，但请注意分割该敌为几部分，逐一歼灭之。二十八旅主力可能随钟松[3]前进。（二）刘戡[4]十六日进绥德，十七日补粮，要十八日才能开始北进，故南面顾虑甚小。（三）我们今十五日至乌龙铺[5]。

军委

删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47年8月14日13时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刘戡令三十六师向米脂前进，西北野战军准备歼击之。拟集中第二、三两纵队和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

[3] 钟松，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六师师长。

[4]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5] 乌龙铺，镇名，位于陕西佳县西南。

军委关于陕北部队配合南线三路大军的行动部署的指示

（1947年8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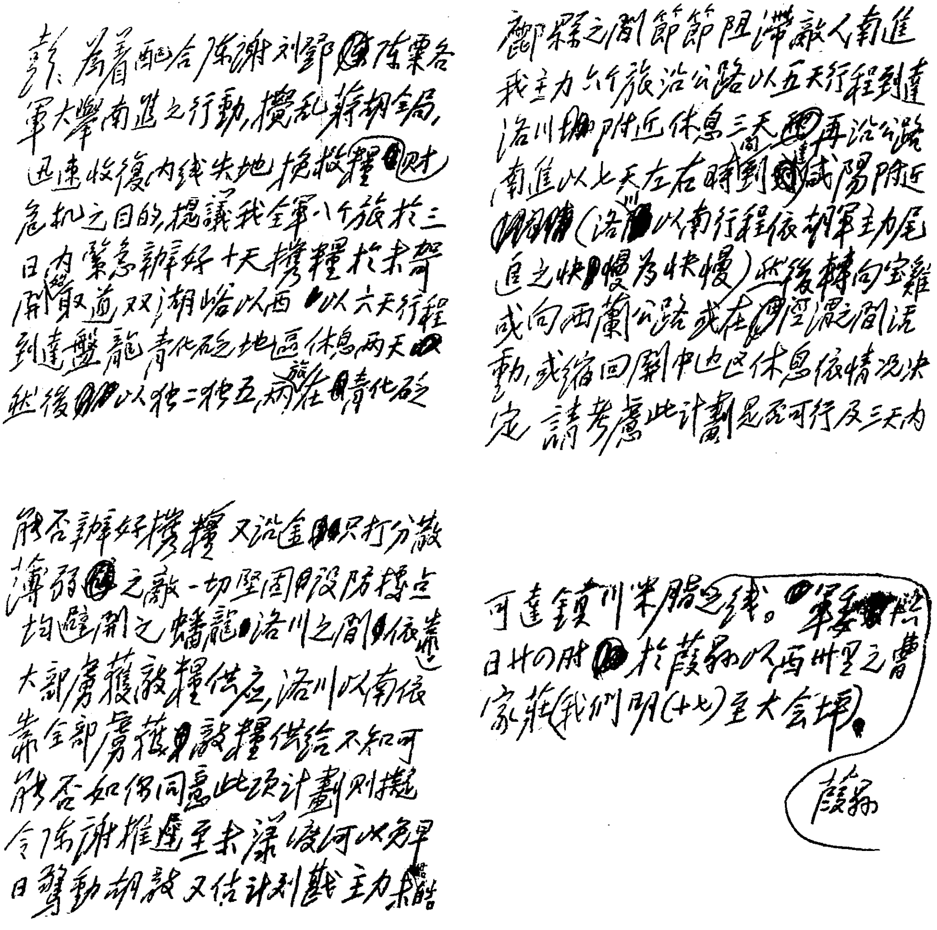
彭：

为着配合陈谢刘邓陈粟各军大举南进之行动，搅乱蒋胡全局，迅速收复内线失地，挽救财粮危机之目的，提议我全军八个旅于三日内紧急办好十天携粮，于未哿开始取道双湖峪以西，以六天行程到达盘龙、青化砭地区，休息两天，然后以独二独五两旅在青化砭、富县之间节节阻滞敌人南进。我主力六个旅沿公路以五天行程到达洛川附近，休息三天，再沿公路南进，以七天左右时间到达咸阳附近（洛川以南行程依胡军主力尾追之快慢为快慢），然后转向宝鸡或向西兰公路或在泾渭之间活动，或缩回关中边区休息，依情况决定。请考虑此计划是否可行及三天内能否办好携粮。又沿途只打分散薄弱之敌，一切坚固设防据点均避开之，蟠龙、洛川之间依靠大部虏获敌粮供应，洛川以南依靠全部虏获敌粮供给，不知可能否？如你同意此项计划，则拟令陈谢推迟至未漾渡河，以免早日惊动胡敌。又估计刘戡主力未皓可达镇川、米脂、佳县之线。

军委

十六日廿四时于佳县以西卅里之曹家庄（我们明（十七）至大

会坪）。



彭、習：為着配合陳謝、劉鄧、陳粟各軍大舉南進之行動，攪亂蔣胡全局，迅速收復內線失地，解救糧財危机之目的，提議我全軍八個旅於三日內緊急辦好十天攪糧，於米脂附近取道雙湖峪以西以六天行程到達盤龍、青化砭地區休息兩天，然後以獨二獨五兩旅在青化砭

鄜縣之間節節阻滯敵人南進，我主力六個旅沿公路以五天行程到達洛川附近休息三天，再沿公路南進以七天左右時間到達咸陽附近（洛川以南行程依胡軍主力尾追之快慢為快慢），然後轉向寶雞或向西蘭公路或在涇渭之間活動，或縮回關中邊区休息，依情况決定。請考慮此計劃是否可行及三天內

能否辦好攪糧，又沿途只打分散薄弱之敵，一切堅固設防據点均避開之。蟠龍、洛川之間依靠大部虜獲敵糧供應，洛川以南依靠全部虜獲敵糧供給，不知可能否。如你同意此項計劃，則擬令陳謝推遲至米脂渡河，以免早日驚動胡敵，又估計到我主力南

可達鎮川米脂之線。

軍委 [illegible]六日廿四時於葭縣以西卅里之曹家莊（我們明（十七）至大会坪）。

葭縣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陕北部队配合南线三路大军的行动部署的指示》的手稿。

陈粟部的供应和晋冀鲁豫三个纵队行动问题[1]

（1947年8月16日）

滕，并告陈、粟[2]：

删辰电悉。（一）我山东主力六个纵队及炮纵均在冀鲁豫及豫皖苏地区作战，你们必须以全力援助解决供应问题，即派负责人去聊城、寿张[3]找陈粟商量。（二）王新亭纵队[4]仍在太岳地区，以一部攻占垣曲，策应豫西陈谢[5]行动。先念[6]率赵纵[7]至聊城，受陈粟指挥，相机南进。王宏坤纵队[8]迅速完成编整准备，于本月底下月初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的电报。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寿张，旧县名，1964年撤销，辖区分别划归山东阳谷县和河南范县。

[4] 王新亭纵队，指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纵队司令员王新亭。

[5]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6]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7] 赵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赵基梅。

[8] 王宏坤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纵队司令员王宏坤。

受陈粟指挥，加入鲁西南作战。

军委

铣申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8月19日）

我们明二十日在梁家岔（梁家岔在柏树坞北三十里、槐树湾南十里）休息不动。

---

[1] 这是毛泽东19日21时30分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受陈粟指挥，加入鲁西南作战。

军委
铣申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8月19日）

我们明二十日在梁家岔（梁家岔在柏树坞北三十里、槐树湾南十里）休息不动。

---

[1] 这是毛泽东19日21时30分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复陈毅、粟裕等电[1]

（1947年8月19日）

陈、唐、叶、陶必须克服部队中转回内线之情绪，学习刘、邓向外线英勇奋斗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在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区域行动，绝对不可有渡黄河北返或运河东返老根据地长期休整之思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陈毅、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在今后四个月内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

（1947年8月21日）

朱、刘，刘、邓，陈、粟，林、罗，贺、习，饶、黎、谭，陈、谢，聂、萧，杨、罗，叶、杨，井泉，徐、滕、薄[1]：

（一）我们自靖边之小河，经石湾、绥德、米脂、佳县及通秦寨附近，昨日转至榆林东南百二十里、镇川堡正北八十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大家都安全。

---

[1] 朱、刘，指朱德和刘少奇。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饶、黎、谭，指饶漱石、黎玉、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副书记。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二）刘戡[1]率七个旅昨日进至镇川堡、佳县一线，另三个旅至绥德一带。我军集中八个旅，今日拂晓开始歼击三十六师于镇川堡、乌龙铺之间，黄昏解决战斗，除小部逃脱外，该师主力被歼[2]。经此一战，局势即可改变，利于陈谢南进。

（三）我刘邓全军于未皓[3]全部渡过沙河，并占项城等数县城，向大别山前进；我陈唐、叶陶[4]四个纵队现至鲁西南成武、单县地区，从内线钳制敌人以利刘邓行动；陈粟率六纵及炮纵至聊城地区，会合宋时轮[5]十纵及李先念[6]部，略作休整即出鲁西南；许世友谭震林[7]率四个纵队现在胶东休整，准备歼击鲁中之敌；我陈谢集团（陈谢四纵四个旅，秦基伟[8]九纵三个旅及孔从周[9]三十八军）定于未马[10]渡河进攻潼洛[11]及豫西。由于以上各项行动及陕北胜利已

---

[1]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2] 1947年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歼灭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歼敌6000余人。从这个战役开始，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

[3] 未皓，即8月19日。

[4]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5] 宋时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

[6] 李先念，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7] 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兼第九纵队司令员。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东兵团政治委员。

[8] 秦基伟，当时任陈谢集团第九纵队司令员。

[9] 孔从周，即孔从洲，当时任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军长。

[10] 未马，即8月21日。

[11] 潼洛，指陕西潼关和河南洛阳。

使并将使南线各敌处于被动地位，我之战略局势大为改善。东北我军再有一个多月休整补充即可大举出击。晋察冀我军亦正准备出击。

（四）我全党全军应在目前数月内一致努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整个军事形势的转变。申酉戌亥[1]四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

（五）以上各点望转告所属，一体知照。

中央
未马

---

[1] 申酉戌亥，即9月、10月、11月、12月。

对西北战场形势的分析[1]

（1947年8月22日）

刘、邓，陈、谢，并告朱、刘（转聂、萧），杨、罗、杨，陈、粟，林、罗，贺、习[2]：

三十六师主力被歼后，残部向绥德方向逃窜。胡宗南[3]三个主力师（一师、三十六师、九十师），仅九十师未受歼灭打击。现刘戡[4]急率九十师（二个旅）、十七师之十二旅、七十六师之一四四旅、三十八师之五十五旅由佳县乌龙铺集结镇川堡，罗列[5]率一师（二个旅）由绥德向米脂集结。以上共计七个旅。此外，尚有九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朱、刘，指朱德、刘少奇。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5] 罗列，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旅，分布于榆林一个旅（三十六师之二十八旅），绥德一个旅（十七师之四十八旅），清涧、两延、瓦市[1]一个旅（七十六师之二十四旅），永坪一个旅（二十七师三十一旅一个团，一师一六七旅一个团，该两团是青化砭蟠龙两役未被歼者），延安一个旅（二十七师之四十七旅），甘富[2]一个旅（十七师之八十四旅，缺一个团在运城），洛川一带一个旅（邓锡侯[3]三十九师之新九旅），三原、马栏一带一个旅（七十六师之新一旅），长武、彬县一个旅（七十九师之暂二旅），陇东、三边[4]均是杂部，兰州附近尚有胡军一个旅。故不但整个陕南无正规部队，大关中极其空虚，即陕北大部分地方亦已无敌，胡宗南猖獗时期已经过去。我野战军士气高涨，仍在镇川堡以北地区休息数日，即可寻机歼敌。我王世泰[5]率两个旅又到关中活动，完全可能吸引全部至少大部胡军不敢东调，以利陈谢放手进攻豫西，协助刘邓作战。

军委

二十二日十四时

---

[1] 两延，指陕西延川和延长。瓦市，即今陕西瓦窑堡。

[2] 甘富，指陕西甘泉和富县。

[3] 邓锡侯，当时任国民党军川康绥靖公署主任。

[4]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5] 王世泰，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新华社记者评陕北之捷[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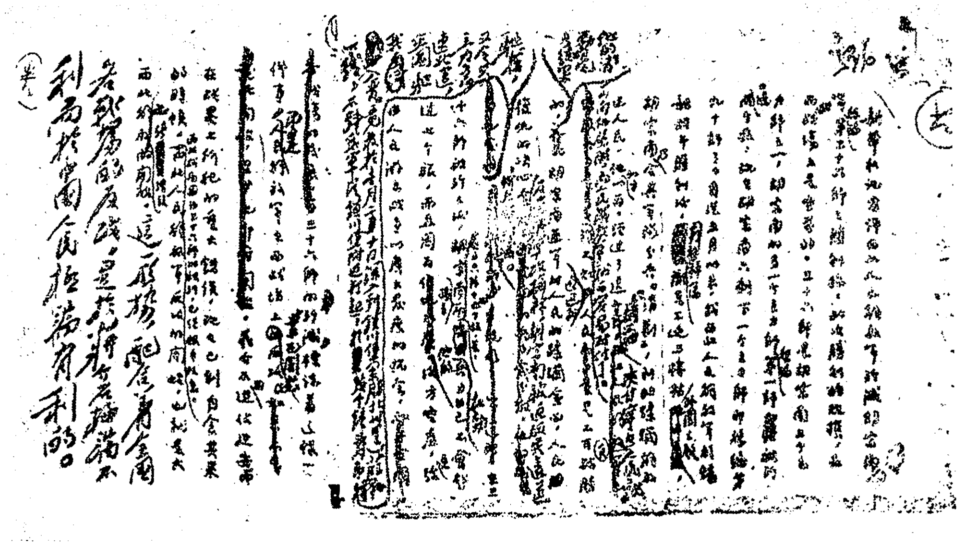
（1947年8月23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三日电】新华社记者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歼灭胡宗南军整编第三十六师之胜利称：此次胜利的规模，在西北战场上是空前的。三十六师是胡宗南三个主力师之一，胡宗南的另一个主力师整编第一师被歼过两个旅，现在胡宗南只剩下一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九十师了。自从五月以来，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于蟠龙战斗胜利后，扫荡陇东、三边与榆林外围之敌，胡宗南乃令其军队分兵“清剿”，到处蹂躏解放区人民，他似乎以为经过了这“清剿”，陕甘宁边区人民就可向他屈服，而人民解放军就可容易对付了。殊不知边区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他的“清剿”毫无结果。胡宗南军对人民的蹂躏愈凶，人民复仇的决心愈坚。及至我军攻榆林，胡宗南被迫派兵远道驰援，又令其主力急速北进，企图驱我入晋，竟敢于本月二十日深入到镇川堡（米脂北三十里）佳县一线。不料我军从镇川堡附近打起，于几个钟头内即将三十六师歼灭。在三十六师被歼之后，胡宗南嫡系的兵力只余十四个旅，其机动兵力已不会超过七个旅，而且因为他的后方空虚，更给人民游击战争以广大发展的机会。三十六师的歼灭，标志着这样一件事：即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

---

[1] 这是新华社的评论。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战场上业已开始反攻。蒋介石因进占延安而在战略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现在已到自食其果的时候。西北战局因为三十六师的被歼，已经根本改变。西北人民解放军反攻的开始，也就是大西北解放之新阶段的开始。这一形势，配合着全国各战场的反攻，是于蒋介石极端不利，而于中国人民极端有利的。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评论《新华社记者评陕北之捷》的手稿。

在沙家店战役总结会上的讲话[1]

（1947年8月23日）

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侧水侧敌[2]本是兵家所忌，而我们彭老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英勇奋战，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就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在沙家店战役总结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2] 侧水侧敌，指沙家店战役的战场，北面是沙漠，东面是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国民党军，回旋余地狭小。

西兵团[1]的作战任务

（1947年8月24日）

陈、粟[2]，并告刘、邓[3]，华东局：

粟裕同志巧酉电[4]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粟唐、叶陶[5]及

---

[1] 西兵团，指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也称外线兵团，下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指粟裕1947年8月18日17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华东局的电报。电报说：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因此西兵团应位于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进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地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此计划如能有效实施，不仅可拖住一部敌人不能南去，且可迫使鲁中、胶济线之敌抽出一部分敌西来。建议东兵团于迅速完成整补后，第一步以歼灭沂水南北之敌为目标，第二步向临沂、蒙阴地区进击，与西兵团相呼应，腰断山东之敌为南北两段，而后向陇海。西兵团拟在泰西打开局面并与陈唐会合后，即以运河西岸为中心。

[5] 粟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六、十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目前除六纵、十纵、炮纵在聊城张秋镇休整，迅速准备南进外，请令粟唐、叶陶遵刘邓哿辰马申[1]两电，攻占鲁西南各薄弱县城，并大举破袭汴徐线。第二步准备向路南行动，务必采取积极行动，策应刘邓作战。现已有约二十个旅之敌军向刘邓方面前进，鲁西南及豫皖苏边区较为空虚。你们必须在九十两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若西兵团在九十两月内不能达到上述目的，而使刘邓在大别山站不住脚，甚或遭受不利，因而被迫北返，则于大局不利。部队每旅有五千人左右即很可作战，不应经常顾虑补充，应当提倡不怕牺牲、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猛攻猛打之作风。一个大的战役（包括几个战斗）之后，休整时间亦不宜过长，十天半月即够，整月休整之事，一年只宜有一次或二次，因为敌情不许可我们作长时间休整。彭副司令[2]指挥之西北野战军原来只有六个旅，本月始由晋西北增加两个旅，每旅人数少者三千，多者五千，共不过三万四千人，其中包括两个战力很弱的地方旅，五个多月（三月十九日起）作战，完全未补充解放区新兵，补充的都是俘虏兵，五个月共歼敌约八个旅。他们连续作战，每次作战后只有五天至多十天之休息，但现在不但人数比战前略为增多，战斗力也增强了。我华东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七月减员较多，无损大局。希望你们尽速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当地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付给我华东军的伟大任务。我相信你们必能完成此种任务。为着使执行任务

---

[1] 哿辰、马申，即20日9时和21日15时。

[2] 彭副司令，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坚决有力，必须使全兵团一切部队，从上至下（一切指战员）明确了解自己任务。此次西兵团仓卒出动，对于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平汉以东地区作战之新任务，尚未充分传达。望令各纵首长迅速传达，并令各级干部研究地理环境（营长以上每人发简明地图一张）及民情、敌情，以利作战。第二年作战基本任务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部分任务是在内线歼灭敌人，借以破坏国民党之计划（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破坏解放区，使不能持久），达到我们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人，并使解放区不被破坏，使战争能够持久之目的。这一战略方针亦须使各级干部完全明了。此电请转发西兵团及东兵团[1]各纵及旅级同志为盼。陈毅同志已从渤海回部否，你们何时可到聊城?

毛泽东
未敬

---

[1] 东兵团，指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也称内线兵团，下辖第二、第七、第九纵队和正在组建的第十三纵队。

我军对蒋介石企图在胶东抽兵的对策

（1947年8月25日）

饶、黎[1]，并告陈、粟，刘、邓[2]：

敬亥电悉。蒋介石似乎判断我主力必守胶东，企图以四五个师向胶东进攻，吸引我主力进入内线后，即在青岛、平度、掖县线建筑坚固工事加以封锁，以两个师左右守备该线，然后以三四个师向东攻击。彼似希望此计迅速成功，以便抽出两三个师用于他处。目前彼在临沂以北使用了二十个旅，与向大别山对付刘邓之兵力约略相等，而在鲁西南对付陈粟之兵力则甚薄弱，在陕北对付彭习[3]之兵力，自三十六师被歼后已甚感不足（仅有七个机动旅），在豫西对付我陈赓[4]之兵力则完全没有。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必在胶东方面力求速决，以便抽兵。因此，我们完全同意你们以一部位于内线，

---

[1] 饶、黎，指饶漱石、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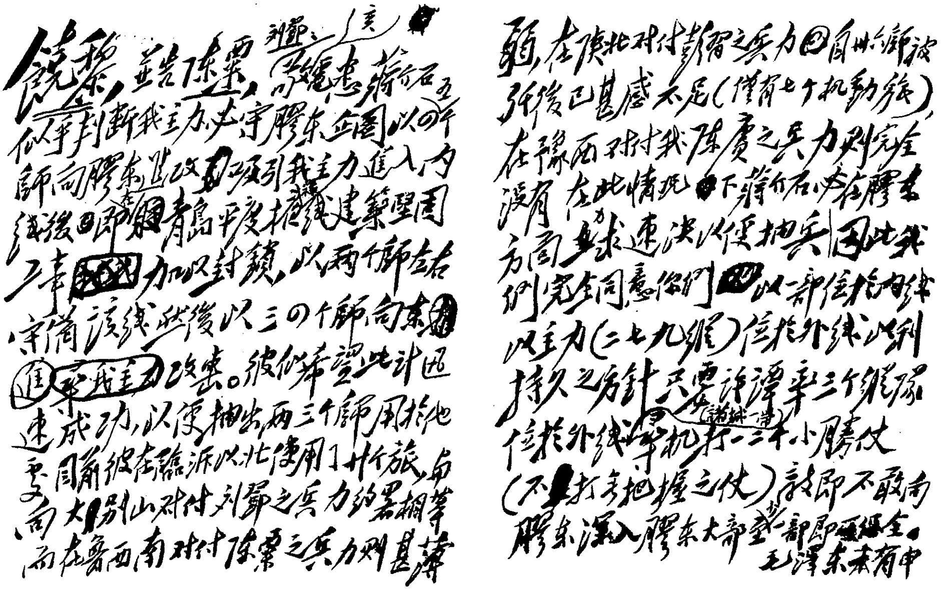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4]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

以主力（二、七、九纵）位于外线，以利持久之方针。只要许谭[1]率三个纵队位于外线（诸城一带），寻机打一二个小胜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敌即不敢向胶东深入，胶东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

毛泽东
未有申



饒黎，並告陳粟，劉鄧、陳謝：蔣介石
似乎判斷我主力大部守膠東，企圖以四個
師向膠東進攻，吸引我主力進入內
線後，即在青島、平度、掖縣線建築堅固
工事，加以封鎖，以兩個師左右
守備該線，然後以三四個師向魯南
進攻。彼似希望此計迅
速成功，以便抽出兩三個師用於他
處。目前彼在臨沂以北使用十幾個旅，向
大別山對付劉鄧之兵力約略相等，
而在魯西南對付陳粟之兵力則甚薄
弱，在陝北對付彭習之兵力自胡宗南部被
殲後已甚感不足（僅有七個機動旅），
在豫西對付我陳賡之兵力則完全
沒有。在此情況下，蔣介石必在膠東
方面力求速決，以便抽兵。因此我
們完全同意你們以一部位於內線，
以主力（二七九縱）位於外線，以利
持久之方針。只要許譚率三個縱隊
位於外線（諸城一帶）尋機打一二個小勝仗
（不打無把握之仗），敵即不敢向
膠東深入，膠東大部至少一部即可保全。
毛澤東未有申

毛泽东起草的《我军对蒋介石企图在胶东抽兵的对策》的手稿。

---

[1]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陈谢渡河后应放手向豫西发展[1]

（1947年8月26日）

陈、谢，并告彭、习，刘、邓，陈、粟：

（一）陈谢渡河后，主力攻占新安、渑池、陕县、灵宝、阌乡[2]，相机夺取潼关；以一部攻占宜阳、洛宁、卢氏、嵩县，另以一部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切断西荆公路[3]，迫使胡[4]军一部向陕南布防。（二）三十六师被歼及陈谢渡河后，胡军主力七个旅今日仍在镇川堡（米脂北）以北与我主力对峙，饥疲不堪，每旅四五千人，少者三千人。此外，绥德、清涧、蟠龙、延安、洛川、三原、马栏（关中分区）各一个旅，富甘[5]一个团。一个月内胡军主力不可能到豫西，陈谢应乘此时机放手发展。

军委

二十六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和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3] 西荆公路，指陕西西安至河南荆紫关的公路。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富甘，指陕西富县和甘泉。

致陈毅、粟裕电[1]

（1947年8月27日）

敌大军向刘、邓追击，情况异常紧迫。目前几个星期内是重要关头，望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星夜兼程急进，不惜疲劳，不要休息，不要补充，立即南渡，统一指挥陈、唐、叶、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陈粟部应迅速渡河南进打开局面[1]

（1947年8月28日）

陈、粟：

宥酉电[2]悉。饶黎、许谭[3]均主张东兵团在外线作战，要他们转回胶东很勉强，且到内线确有被敌封锁不能出来之危险，不如在外线较为机动。目前中心一环是：你们率六纵、十纵、炮纵迅速南渡与陈唐、叶陶[4]会合，在九、十月内打开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8月30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粟裕的电报中又指出："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过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2] 指1947年8月26日19时陈毅、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电报说：敌正调动5个师，由范汉杰指挥，有向胶东进攻企图。华东野战军拟集中东兵团4个纵队另两个师，在胶东于敌前进时，进行运动战，停止敌向胶东的进攻。西兵团则拟全力向鲁西南及陇海线行动，以策应胶济线作战。

[3] 饶黎，指饶漱石、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汉[1]以东、运河以西之广大局面，大量歼敌（打有把握之仗），并在渤海、冀南建立补给中心，则侵入胶东之敌必难持久，否则两头失塌，刘邓[2]亦难在南边立脚，则于大局不利。你们现到何处，何日可渡河南进，极以为念。

军委

俭申

---

[1]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

（1947年8月28日）

刘、邓，陈、粟，许、谭（饶、黎转），陈、谢[1]，并告彭、习，朱、刘（转聂、萧），杨、罗、杨，林、罗[2]：

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方能奏效。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兵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饶、黎，指饶漱石、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2] 彭、习，指彭德怀、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朱、刘，指朱德、刘少奇。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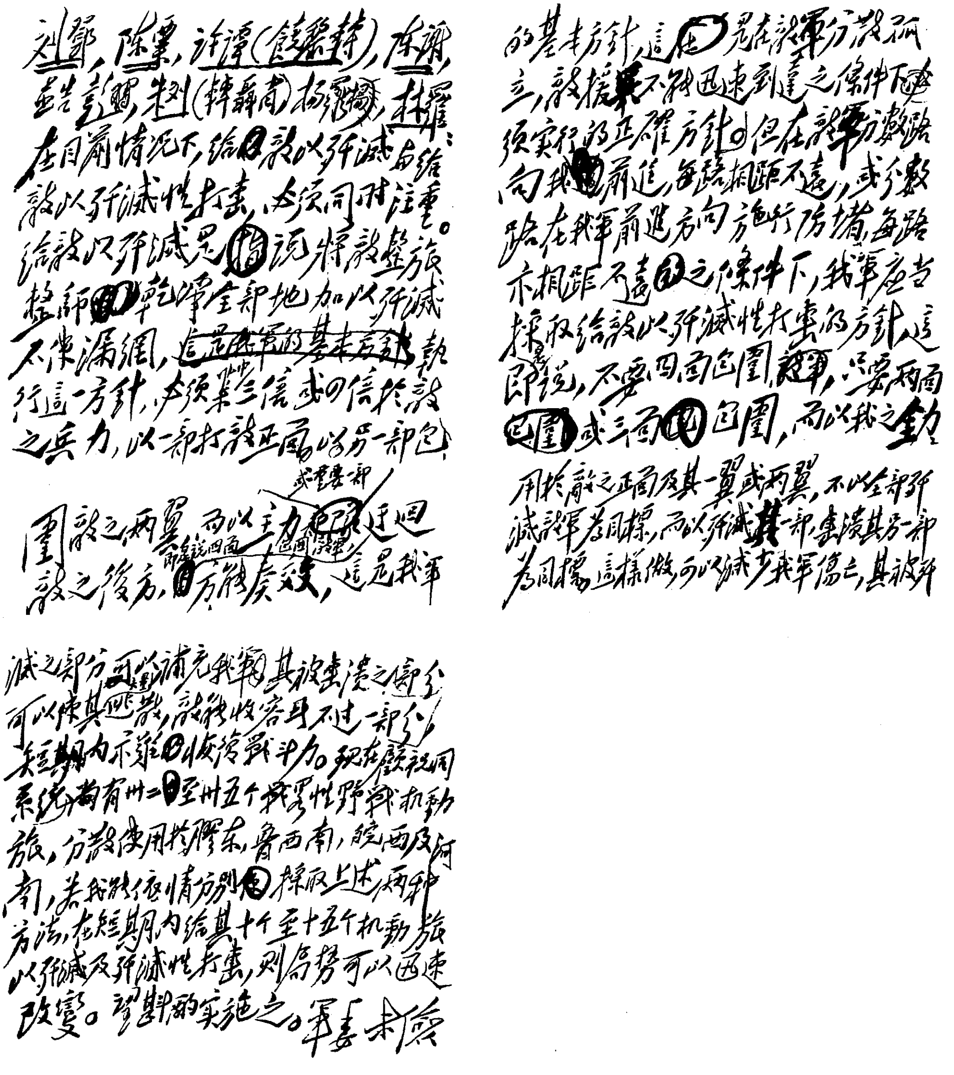
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四面包围，只要两面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全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大量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亦难恢复战斗力。现在顾祝同[1]系统尚有三十二至三十五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十个至十五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望斟酌实施之。

军委

未俭

---

[1]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1947年3月初，他在徐州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统一指挥原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的部队。



刘邓，陈粟，许谭（饶黎舒），陈谢，西北彭习，朱刘（韩聂肖），杨罗耿，林罗：

在目前情况下，给敌以歼灭与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注重。给敌以歼灭是指说将敌整旅整师干净全部地加以歼灭，不使漏网，~~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执行这一方针，必须集中三倍或四倍于敌之兵力，以一部打敌正面，以另一部包围敌之两翼，而以主力或重要一部迂回敌之后方，方能奏效，即是说四面包围敌军，这是我军的基本方针。这是在敌军分散孤立，敌援军不能迅速到达之条件下必须实行的正确方针。但在敌军分数路向我前进，每路相距不远，或分数路在我军前进方向施行防堵，每路亦相距不远之条件下，我军应当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针，这即是说，不要四面包围敌军，只要两面包围或三面包围，而以我之主力用于敌之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不以全部歼灭敌军为目标，而以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为目标。这样做，可以减少我军伤亡，其被歼灭之部分可以补充我军，其被击溃之部分可以使其逃散，敌能收容者不过一部分，短期内不能恢复战斗力。现在敌统帅系统尚有卅二至卅五个战略性野战机动旅，分散使用于胶东、鲁西南、皖西及河南，若我能依情况分别采取上述两种方法，在短期内给其十个至十五个机动旅以歼灭及歼灭性打击，则局势可以迅速改变。望斟酌实施之。

军委　未灰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敌以歼灭与歼灭性打击须同时注重》的手稿。

采取于运动中
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针[1]

（1947年8月29日）

饶、黎（转震林），陈、粟：

接饶黎二十八日十时电，华东局及九纵被迫留在胶东，震林率二、七两纵在诸城，这样，实际上比饶黎许[2]率九纵到诸城或震林率二、七纵到胶东都要好些。这样，胶东有九纵、十三纵及广大地方部队，可以逐步形成有力的内线作战兵团，直接保卫胶东，可以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之作战方针（即对敌一个或二个旅，以歼灭其一部、击溃一部为目标而部署战役作战，注意多打小胜仗）。震林在诸城应完全遵照饶黎指示休整待机，在胶东外线直接配合内线，目前不要南下临沂或陇海。作战时应注意打小规模歼灭战，每次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标，不打无把握之仗。

军委

二十九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和副政治委员黎玉等的电报。

[2] 饶黎，指饶漱石、黎玉。许，指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兼第九纵队司令员。

东北我军应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以配合南线

（1947年8月29日）

林、罗[1]：

未巧电悉。（一）计划甚好，甚慰。（二）希望你们能于九月下旬开始作战，配合南线。（三）新的作战，似宜以有力兵团进攻山海关、沈阳线上之敌，以另一有力兵团进攻中长线上之敌，以求分散敌人，各个击破，重点放在中长路或山沈路，由你们酌定。（四）十分希望你们能于明年四月底五月初，以三至四个有力纵队开始平绥线上之作战，首先在张家口、北平间打开一个缺口，将大量山野炮弹及黄色炸药向南线各军输送。他们对此如大旱之望云霓。（五）最艰苦之战争是在南线，这里担负了对敌军主力一百五十七个旅之作战（北线为七十个旅，其中东北占二十六个旅），而山东、苏北大部已被敌占。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时不能离开。

毛泽东

二十九日十七时

---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8月29日）

请率全军以三天至四天急行军赶到石咀驿、九里山之线，夺取先机，制敌死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首长电[1]

（1947年8月30日）

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同志现在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同志为副政委），不能兼顾军委工作，特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代理军委总参谋长工作，副参谋长仍是叶剑英同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首长电的主要内容。

陈谢主力速抢占陕县灵宝等县[1]

（1947年8月30日）

陈、谢：

艳十五时电悉。（一）西面空虚，攻取较易，洛阳附近敌所必争，不应使用主力。（二）速以四纵全力、三十八军及二十二旅抢占陕县、灵宝、阌乡[2]、洛宁、卢氏，相机抢占洛南、商县、商南。秦纵[3]位于新孟洛[4]地区，牵制洛阳之敌，以一部攻占宜阳、嵩县。（三）避开强固设防据点，专打守备薄弱据点，并力求运动战，求达机动迅速、广占敌区、多歼敌人之目的。（四）你们现在作战比在晋南时环境大不相同，每一大的行动计划必须事前报告军委，必须经常迅速报告敌情、我情、民情，我们方能及时帮助你们。此次渡河将重点放在东面，现在改变，丧失几天宝贵时间，给了胡宗南[5]在西面完成其部署的机会，极为可惜。但胡军主力尚在绥米[6]地区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和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3] 秦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4] 新孟洛，指河南新安、孟津和洛阳。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6] 绥米，指陕西绥德和米脂。

我军所抑留，洛川以南只有几个旅及若干特种部队（炮兵等），这点对于你们极为有利。

军委

三十日十三时

先敌抢占绥清间一段阻敌南进[1]

（1947年8月30日）

彭：

敌已确定全军南撤，九十师可能以一部向东佯动吸引我军，以利其主力迅速向南。我军务宜摆脱当面之敌，以三天急行军先敌抢占绥清[2]间一段，阻敌南进，然后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大举沿公路南下（不要脱离公路），直指咸阳，制敌死命，有力地配合刘邓、陈谢[3]。

军委

三十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绥清，指陕西绥德和清涧。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新华社记者评论掩饰美国亡华罪行鸨母妓女串演双簧*

（1947年8月30日）

魏德迈声明之后蒋家小朝廷的连日种种做唱，正表示美蒋双方在上演上海大世界陆奇奇张嘻嘻之类的双簧戏。美帝国主义者明知“贪污”“颟顸无能”是与蒋集团根本无法分解的东西，因而要这个满身溃疮的蒋介石来“改革”，是等于牵着大骆驼穿针眼。那么满口“实际效率”的花旗老子，为什么一定要儿子做一番绝不可能的事呢？这目的只有两个：一方面，替美帝国主义当局制造借口，以便替蒋介石集团的马桶盖略加粉刷之后，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将军火及贷款投入蒋介石的无底洞；另一方面，魏德迈的假模假样的“严厉”“公正”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等等的花言巧语，正是为的想缓和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这臭腐统治的愤怒。二十七日，美《科学箴言》报就泄漏了天机：“魏德迈声明并未关闭援蒋反共之门。”同时，纽约时报就直截了当道出：“蒋‘主席’之下许多具有能力的‘权威’与幕僚，是‘绝对’胜任改革的。”真心话就说出来了，蒋介石和四大家族都是好的、“权威”的，坏的仅是一般“颟顸无能”的底下职员，“地方政府机构”人员须略加“改革”而已。

鸨母唱了一阵之后，婊子于是跟着上场，以孙科、吴铁城为

首，就大表演其妓女□良的文明戏。这题目叫做“清除贪污”和“厉行惩治贪污条例”。这有几个心照不宣的“好处”：各个集团可以乘此机会来的每人的眼中钉出出气。同时“肃清贪污”就“很有成绩”了。我们今后可以看到不少黄埔检举CC，或政学系拖着孔宋集团之类的笑话。这之后，鸨母不满意地回来了，再一阵做唱，随之而来的大概就会是丑角唱须生，花脸唱花旦的所谓“改组”。美联社二十七日电：“魏德迈的批评，将被国民党中委们彻底消化，他们将于最近开会，以部分改组国民党控制的‘联合政府’。”孙科就更出色了，他在广州对中央社记者谈话：“孙氏一扫外间对魏德迈声明误会，美国将完全停止援华（蒋）之前奏之一切疑窦，强调‘特使’之主要任务，乃在确定美国应如何援助中国。”因此，吴铁城感激涕零了：“魏德迈将军的谈话坦白而真挚。”因此魏德迈所指点的，不过是一幕双簧而已。

然而双簧的压轴戏仍是孙科。魏德迈的大放“和平”厥词，最上目的固是想求取一段缓兵时间，给蒋介石重新整顿与装备部队以加强准攻的机会，但他知道这目的的达成将万分困难。于是他只好求其次了：一、援蒋与内战不可分，而内战与援蒋的数量又不可分，可是这必须有所借口，来说服美国国内对无底洞望而却步的一班财政老板；二、为保持花旗老子的身份，固不得不有所训诲，然而语句太重，又可能产生娃娃们当中“可鄙的失败主义”与内部泄气的副作用。于是就必须有精彩表演，上以说服老板，下以给喽罗打气。这就须要与众不同的和CC、黄埔等稍为有别的嘴脸来说话。等于新式动物园的最精彩节目是洋人与动物合串一样，孙科表演过婊子之后，就以猢狲姿态出现了。魏德迈在后边唱“要他和了罢?”孙科就满场打滚：“打！打!”“非以武力戡平共党不可。”由公

开法西斯头子蒋介石来唱“打完了亦完”与以“自由主义者”资格卖淫的孙科来唱“打到底”，是会有一些分别的。跟着，我们可以预料鸨母第三次又会上场，铜板和刀枪就会来了。

记者最后指出：魏德迈在各方面的声誉破产，和蒋家朝廷的被各方面宣布破产，也最后宣告了一群婊子猢狲如孙科之流的最后破产。人民将把他们由完全破产推入永远的坟墓。

致陈毅、粟裕电[1]

（1947年8月30日）

现在欧震、张淦、罗广文、张轸、王敬久、夏威[2]各部均向刘、邓压迫甚紧，刘、邓有不能在大别山立脚之势，务望严令陈、唐积极歼敌，你们立即渡河，并以全力贯注配合刘、邓。

---

[1] 这是毛泽东致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2] 欧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当时任该兵团所辖第三纵队司令。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武汉行辕前进指挥所（驻漯河）主任。王敬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夏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绥靖区（驻合肥）司令官。

刘邓部目前的行动方向[1]

（1947年8月31日）

刘、邓：

三十日十五时电修正如下：在目前形势下你们行动方向有三：（一）照原计划，以大别山为中心寻机歼敌，建立根据地；（二）在江河之间打圈子，逐步歼敌，建立根据地；（三）至必要时机，请考虑南渡长江是否可能，是否有利。

军委

世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1947年8月30日15时，中央军委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提出刘邓部行动方向有二，即本文中的第二和第三条。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1]

（1947年9月1日）

（一）第一年作战（去年七月至今年六月），歼灭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部三十四万人，共计一百十二万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当时他和中共中央住在陕北佳县朱官寨。这个指示规定，解放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国民党区域，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也就是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人民解放军按照毛泽东所规定的战略计划，从1947年7月至9月，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6月30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8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太岳兵团，8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其主力部队于8月初挺进鲁西南，9月下旬进入豫皖苏地区。华东野战军的内线兵团（1948年3月改称山东兵团），从10月初起向胶东地区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西北野战军8月下旬转入反攻。晋察冀野战军9月初对平汉线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东北野战军紧接着全东北范围的夏季攻势之后，从9月起，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所有这些战场上的攻势，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面进攻的总形势。人民解放军的大举进攻，使解放战争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标志着战争形势的根本改变，参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

（二）第一年作战，敌人以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中的二百十八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的特种兵（海军、空军、炮兵、工兵、装甲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正确地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余万人的伤亡，大块土地的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了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的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的土地[1]。

（三）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

[1] 本文所说我军在东北、热河（现分属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冀东的战略反攻，是指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的夏季攻势。自5月13日开始，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和热河、冀东各个战场上同时展开进攻，到7月1日止，歼灭国民党军8.2万余人，收复和一度攻克城镇42座，打通了南满、北满的联系，迫使敌军收缩于长春至大石桥、沈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转为防御，从而改变了东北整个局势。本文所说我军在晋南、豫北的战略性反攻，是指晋冀鲁豫野战军1947年3、4、5月间在豫北和晋南同蒲路两侧所展开的攻势。豫北攻势于3月23日发起，在接连攻克延津、阳武（今并入原阳）、濮阳、封丘后向北扩张战果，4月3日挥师北上，至5月28日止又攻克淇县、浚县、滑县、汤阴等城，歼敌4万余人。晋南攻势于4月4日发起，至5月11日，连克曲沃、新绛、永济等22座县城和黄河渡口的禹门口、风陵渡要点，歼敌1.4万余人。

（四）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创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将是不少的。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

（五）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六）敌军分布，到今年八月底止，连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都算在内，南线一百五十七个旅，北线七十个旅，国民党后方二十一个旅，全国总数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实际人数约一百五十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警察、保安部队等约一百二十万人；敌后方军事机关非战斗人员约一百万人。敌全军共约三百七十万人。南线各军中，顾祝同系统一百十七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七个旅，胡宗南系统三十三个旅。顾军一百十七个旅中，被我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六十三个旅。其中一部尚未补充；一部虽已补充，但人数很少，战斗力很弱；另一部虽有较多人员武器补充，战斗力也恢复到某种程度，但仍然远不如前。尚未被歼和尚未受歼灭性打击者只有五十四个旅。全部顾军，使用于守备和仅能作地方性机动之用者占了八十二到八十五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三十二到三

十五个旅。程潜系统和其他的七个旅大体均只能任守备，其中一个旅曾受歼灭性打击。胡宗南系统（包括兰州以东，宁夏榆林以南，临汾洛阳以西）之三十三个旅中，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者有十二个旅，能用于战略性机动者只有七个旅，其余均任守备。北线敌军共有七十个旅。其中，东北系统二十六个旅，内有十六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孙连仲系统十九个旅，内有八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傅作义十个旅，内有二个旅受歼灭性打击；阎锡山十五个旅，内有九个旅被歼灭和受歼灭性打击。这些敌军现在大体均取守势，能机动作战的兵力只有一小部分。国民党后方任守备的兵力仅有二十一个旅。其中，新疆和甘西八个旅，川、康七个旅，云南两个旅，广东两个旅（即被歼灭的第六十九师），台湾两个旅，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江西六省全无正规军。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今年计划征兵一百万补充前线并训练若干新旅和若干补充团。但是，只要我军能如第一年作战平均每月歼敌八个旅，在第二年再歼敌九十六至一百个旅（七、八两月已歼敌十六个半旅），则敌军将进一步大受削弱，其战略性机动兵力将减少至极度，势将被迫在全国一切地方处于防御地位，到处受我攻击。国民党虽有征兵百万训练新旅和补充团之计划，也将无济于事。其征兵纯用捕捉和购买方法，必难达到百万，而且逃亡甚多。我军执行外线作战方针，又可缩小其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七）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包括一次打几个旅的大规模歼灭性战役在内，例如今年二月莱芜战役，七月鲁西南战役），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地方是歼敌有生力量的结果，往

往须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之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以求达到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之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一方面，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之把握；另方面，必须发扬勇敢战斗、不惜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必须力求调动敌人打运动战，但同时必须极大地注重学习阵地攻击战术，加强炮兵、工兵建设，以便广泛地夺取敌人据点和城市。一切守备薄弱之据点和城市则坚决攻取之，一切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和城市则相机攻取之，一切守备强固之据点和城市则暂时弃置之。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兵员（十分之八九的士兵和少数下级官佐）补充自己。主要向敌军和国民党区域求补充，只有一部分向老解放区求补充，特别是南线各军应当如此。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只有这样做，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果然这样做了，就一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

（八）以上是一年战争的总结和今后战争的方针。望各地领导同志传达给军队团级以上、地方地委和专署以上的各级干部，使大家明白自己的任务而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之。

陈谢部[1]的作战范围和原则

（1947年9月2日）

陈、谢、韩，并告刘、邓，彭[2]：

（一）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时、三十一日十二时、一日十时、一日十九时各电均悉。攻占新安、渑池、宜阳、洛宁等地，歼敌四千余，甚慰。

（二）你们作战范围，包括黄河、渭水以南，汉水以北，平汉路以西，西安、汉中线以东广大地区。应使干部熟习这一地区地理、敌情、民情，准备以至少半年时间在这一地区东西南北往来机动，大量歼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

（三）作战原则：对敌守备薄弱之据点及城市则坚决攻取之，对敌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又环境许可之据点及城市则相机攻取之，对敌守备强固之据点及城市则避开之，着重点放在调动敌人打运动战及占领广大乡村，消灭反动武装，发动群众，必须准备经过一个困难时期，逐步建立根据地。

---

[1] 陈谢部，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常委韩钧。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目前停攻横水，以一部监视洛阳之敌，主力西进，相机攻取陕县、灵宝、阌乡[1]、卢氏、洛南、商县、商南七城或七城中之几城，着重扫除七县乡村中之反动武装。你们第二步机动方向是东向平汉路或南向汉水以北，临时酌定。

军委

二日十二时

---

[1]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西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南进相机攻占洛川等城[1]

（1947年9月2日）

彭，并告贺、习[2]：

世日命令[3]很好。乘敌二十九军在米脂地区徘徊犹豫，我军以一部节节阻敌，主力迅速南进（避开一切强固据点），相机攻占洛川、中部[4]、宜君、同官、耀县、三原、蒲城、白水、富平及黄河以东、渭水以北各城，开辟战场（背靠黄龙山），解决冬衣，扩大兵源是可能的。

军委

二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7年8月31日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发布的命令。命令说，为配合陈谢部队，争取战略先机，迟敌南退，决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向关中平原进军，与陈谢纵队呼应击灭胡军，解放大西北。

[4]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

（1947年9月3日）

陈、粟[1]：

申东[2]电悉。作战方向及征调地方工作人员均很对。但有一点，你们应从根本上改变依靠后方接济的思想。刘邓[3]已实行无后方作战。陈谢[4]亦决心深入敌区，准备与后方隔断。你们的胶东、渤海都成了前线，决不可希望仍有过去一样的接济，对晋冀鲁豫亦不可要求过高过大。从你们自己起到全军一切将士，都应迅速建立无后方作战的思想，人员、粮食、弹药、被服，一切从敌军、敌区取给，准备在连续作战之后缩编部队，准备打得剩下三千人、四千人一个旅，而战斗意志愈打愈强（彭副司令[5]所部就是如此），俘虏兵即俘即补，重炮不要带去，不要怕后方被敌切断，勇敢地向淮河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申东，即9月1日。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5] 彭副司令，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以北、平汉以东进军。你们各纵过去依赖后方补给心理太重，你们自己亦反映了此种心理，望你们迅速转变，适应新形势。军中要禁绝怕牺牲，怕吃苦，要带大部队，要求大休息，每日叫苦连天等等错误思想。中央已同意华东局留在胶东，你们不应坚请他们到渤海。

毛泽东
申江

要有建立鄂豫陕根据地的决心[1]

（1947年9月4日）

陈、谢，并告刘、邓，彭[2]：

（一）据密息：二十七旅以一个团分散守备灵宝、阌乡[3]及该地车站，主力驻华阴为预备队，陕南、豫西南各县似甚空虚。（二）你们应以四纵有力兵团位于阌乡以西，准备歼灭二十七旅主力之增援，以四纵主力分别同时包围陕[4]、灵、阌三城，相机攻占之。得手后，交三十八军守备，令其着重肃清三县地主武装（这是非常重要的）。四纵全部则分两路，一路取捷径出陕东南，相机攻取洛南、商县、商南、荆紫关诸城镇；一路出伏牛山，相机攻取卢氏淅川内乡三城。四纵于占领上述各地后，即应散开于各县乡村，攻破地主围寨，消灭地主武装。上述任务，争取于本月内完成。（三）秦纵[5]以有力兵团位于洛阳以西，阻止洛敌西犯，其余南进，相机攻取嵩县、鲁山、南召诸城，并消灭各县地主武装。（四）应将占领县城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和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4] 陕，指河南陕县。

[5] 秦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占领乡村、消灭敌正规军与消灭敌地主武装看得同等重要。全军都要有在豫西、陕南、鄂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军委

四日二十四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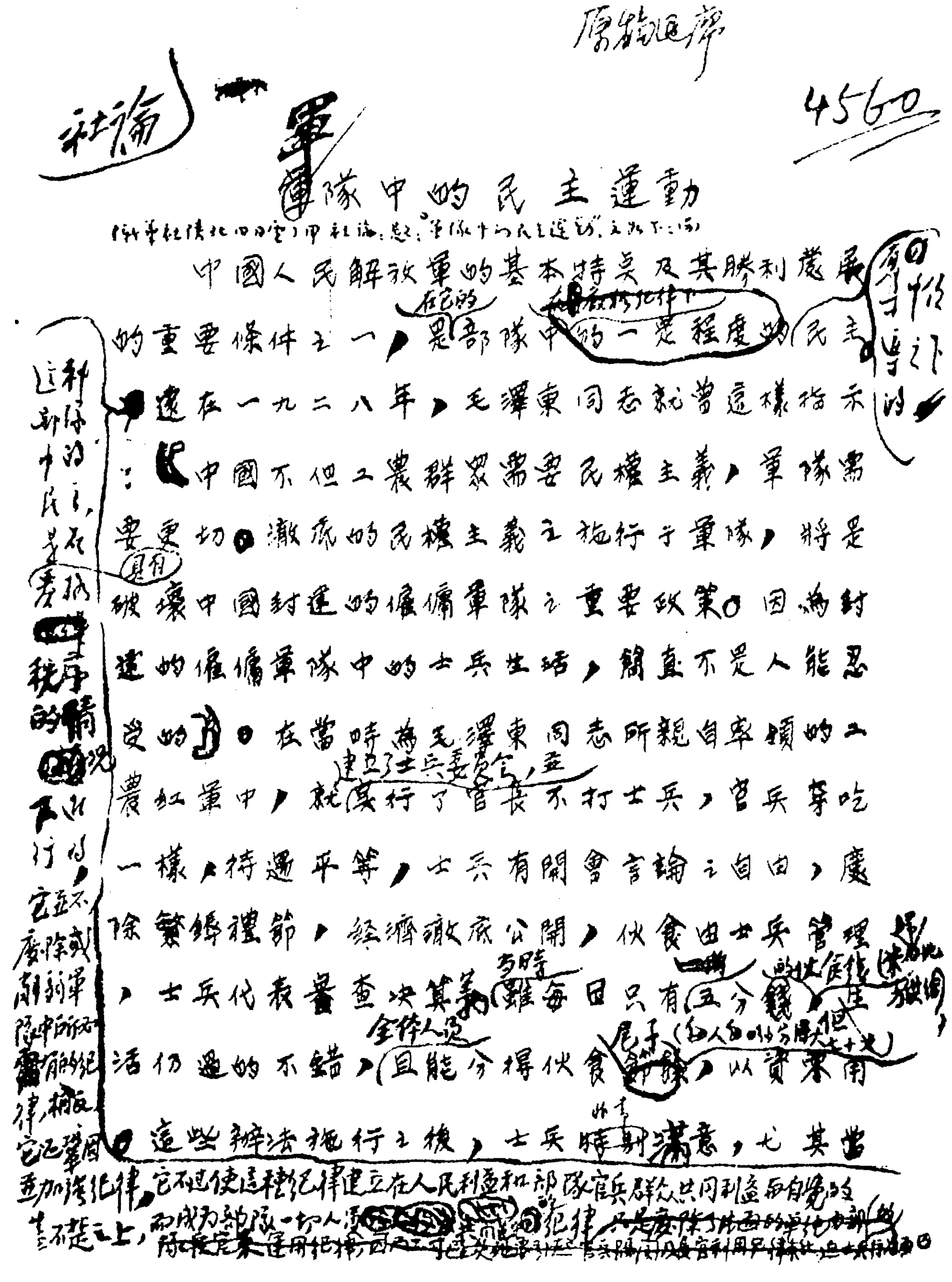
在修改《军队中的民主运动》时加写的一段话[1]

（1947年9月4日）

这种部队中的民主，是在具有严格秩序的情况下进行的，它并不废除或削弱军队中所必需有的纪律，相反，它还巩固并加强纪律，它不过使这种纪律建立在人民利益和部队官兵群众共同利益与自觉的基础之上，而成为部队一切人员共同遵守的纪律而已。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1947年9月4日的新华社社论稿《军队中的民主运动》时加写的一段话。



社論

4560

軍隊中的民主運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基本特点及其勝利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是部隊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遠在一九二八年，毛澤東同志就曾這樣指示：「中國不但工農群眾需要民權主義，軍隊需要更切。徹底的民權主義之施行于軍隊，將是破壞中國封建的僱傭軍隊之重要政策。因為封建的僱傭軍隊中的士兵生活，簡直不是人能忍受的」。在當時為毛澤東同志所親自率領的工農紅軍中，就建立了士兵委員會，並實行了官長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樣，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言論之自由，廢除繁縟禮節，經濟徹底公開，伙食由士兵管理，士兵代表審查決算等。雖每日只有五分錢，生活仍過的不錯，全體人員且能分得伙食尾子，以資零用。這些辦法施行之後，士兵非常滿意，尤其當

它不但使這種紀律建立在人民利益和部隊官兵群眾共同利益的自覺的基礎之上，而成為部隊一切人員……紀律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社论《军队中的民主运动》的手稿。

土地会议[1]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

（1947年9月6日）

中工委：

申微电[2]悉。平分土地，利益极多，办法简单，群众拥护，外界亦很难找出理由反对此种公平办法，中农大多数获得利益，少数分出部分土地，但同时得了其他利益（政治及一般经济利益）可以补偿。因此，土地会议应该采取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将农村中全部土地、山林、水利，平地以乡为单位，山地以村为单位，除少数

---

[1] 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建屏县（1958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确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作出了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

[2] 指刘少奇1947年9月5日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土地会议已进入结束阶段，会议集中讨论了土地政策问题。多数意见赞成彻底平分土地，认为该办法简单，进行迅速，得利者在老区占50%~60%，不动者占20%~30%，仍可团结80%以上的农民，是利多害少。因此，决定普遍实行彻底平分，由土地会议通过一个公开的土地法大纲，各解放区政府提议，同时通过一个党内决议，以总结一年来土改经验，并提出执行政策的方法等。土地法大纲及决议草案待通过整理后，电请中央批准并发出。上述各项，特别关于彻底平分田地原则，是否妥当，望即复示。

重要反动分子本身外，不分男女老少，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平均分配。不但土地、山林、水利平均分配，而且要将地主、富农两阶级多余的粮食、耕牛、农具、房屋及其他财富拿出来，适当地分配给农民中缺乏这些东西的人们，地主、富农所得的土地财产不超过也不低于农民所得。大规模的森林及水利工程不能分配者，由政府管理。此外，同意即由土地会议通过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解放区政府的建议。同时，起草一个党内决议，由中央公布[1]。

中央
鱼酉

---

[1]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决议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今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集的全国土地会议，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1]

（1947年9月6日）

四纵主力西进，相机攻取陕、灵、阌三县以后再入陕东南及豫西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的主要内容。

注意歼灭运动中的中央系各部及滇军[1]

（1947年9月11日）

刘、邓：

（一）民众情绪，我军情况及粮食、被服解决之可能性如何？（二）先念[2]及赵基梅纵队[3]是否应令其迅速南下，并使用于桐柏山、大洪山地区，恢复原江汉军区，在该区形成一战略单位；而冬衣弹药的护送则由王宏坤王秉璋两纵[4]负责，宏坤纵队则可使用于大别山作为军区武力。（三）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作战似应避开桂系主力七师、四十八师，集中注意歼灭中央系及滇军。因七师较强，不易俘缴，四十八师情况不明，似和七师相差不远，而中央系各部及滇军五十八师则在运动中，易于歼俘。

军委

真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3] 赵基梅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纵队司令员赵基梅。

[4] 王宏坤王秉璋两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十一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王宏坤和王秉璋。

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根据地有重大战略意义

（1947年9月11日）

陈、粟[1]，并告刘、邓，饶、黎，陈、谢[2]及彭副司令[3]：

（一）陈粟佳辰[4]电悉。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5]，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西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

（二）根据来电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给五军以歼灭性打击等语，果能再歼五军一部或大部，使该军失去战斗力，则鲁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饶、黎，指饶漱石、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彭副司令，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佳辰，即9日9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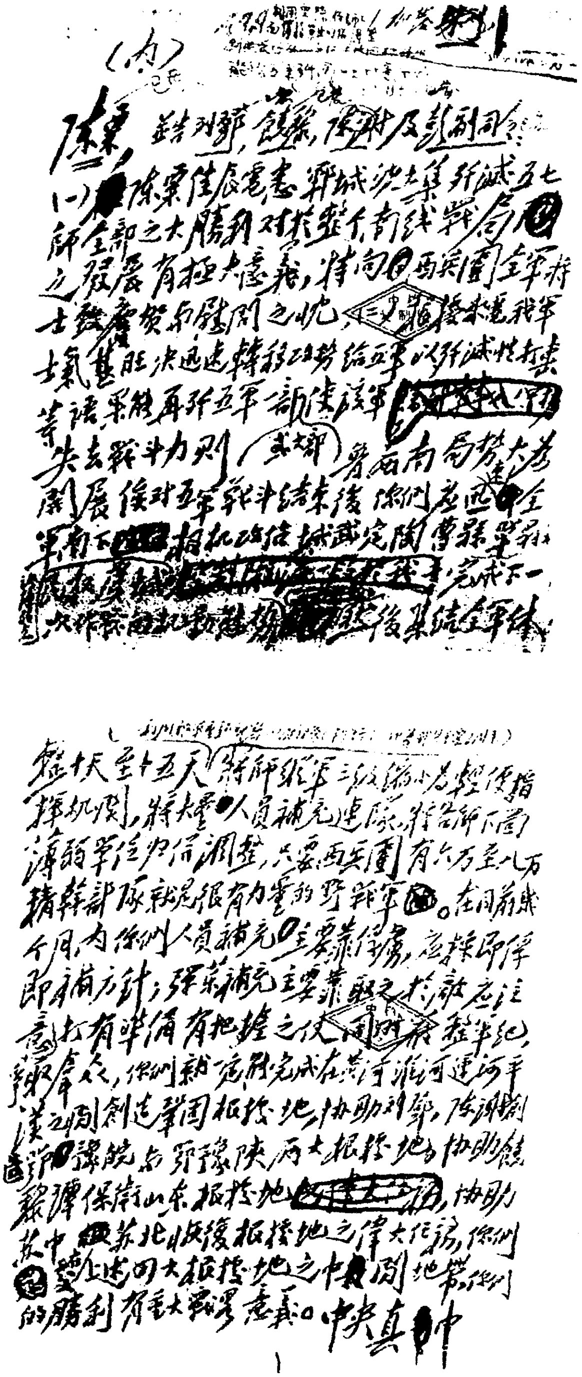
[5] 指沙土集战役。1947年9月7日，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在山东巨野以西、菏泽以东的沙土集地区，对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实施南北夹击，经两日激战，全歼该师9500余人，俘中将师长段霖茂。

西南局势大为开展。俟对五军战斗结束后，你们应迅速全军南下，相机攻占成武、定陶、曹县、单县、民权、虞城诸薄弱点，完成下一次作战的机动态势。然后，集结全军休整十天至十五天，利用敌军重新部署的间隙（判断十一师等部将要调来），将师纵军三级缩小为轻便指挥机关，将大量人员补充连队，将各师下面薄弱单位归并调整。只要西兵团有六万至八万精干部队，就是很有力量的野战军。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采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同时严整军纪，争取群众，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与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1]保卫山东根据地，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
真申

---

[1] 饶黎，指饶漱石、黎玉。谭，指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东兵团政治委员。



（内）

陈粟，并告刘邓，饶黎，陈谭及彭副司令：

（一）陈粟佳辰电悉。郓城决战歼灭五十五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蒋介石前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特向两兵团全军将士致庆贺与慰问之忱。（二）据来电我军士气甚旺，决迅速转移攻势，给五军以歼灭性打击，并请采取再歼五军一部，使该军[illegible]失去战斗力，则鲁西南局势大为开展。俟对五军战斗结束后，你们应以全军南下[illegible]，相机攻徐城武定陶曹县单县[illegible]，完成下一次作战[illegible]后集结全军休整十天至十五天，将师级军三级缩小为轻便指挥机关，将大量人员补充连队，将各师下属薄弱单位归併调整，只要两兵团有六万至八万精干部队就是很有力量的野战军。在目前几个月内你们人员补充主要靠俘虏，应採取即俘即补方针；弹药补充主要靠取之于敌，应注意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整军纪，争取人心，你们就一定能完成在黄河淮河运河平汉之间创造巩固根据地，协助刘邓、陈谢创造鄂豫皖及鄂豫陕两大根据地，协助饶黎谭保卫山东根据地[illegible]，协助苏中苏北恢复根据地之伟大任务。你们处在上述四大根据地之中间地带，你们的胜利有重大战略意义。

中央 真申

毛泽东致陈毅等电的手稿。

在修改新《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时加写的两段话

（1947年9月11日）

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志，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愈陷愈深，互相埋怨，见死不救，这就是整个匪军营垒的现状。再打一年两年，蒋介石匪帮就离全军覆灭不远了。

打倒蒋介石才有和平，打倒蒋介石才有饭吃，打倒蒋介石才有民主，打倒蒋介石才有独立，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常识了。

给毛岸英的信

（1947年9月12日）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1]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2]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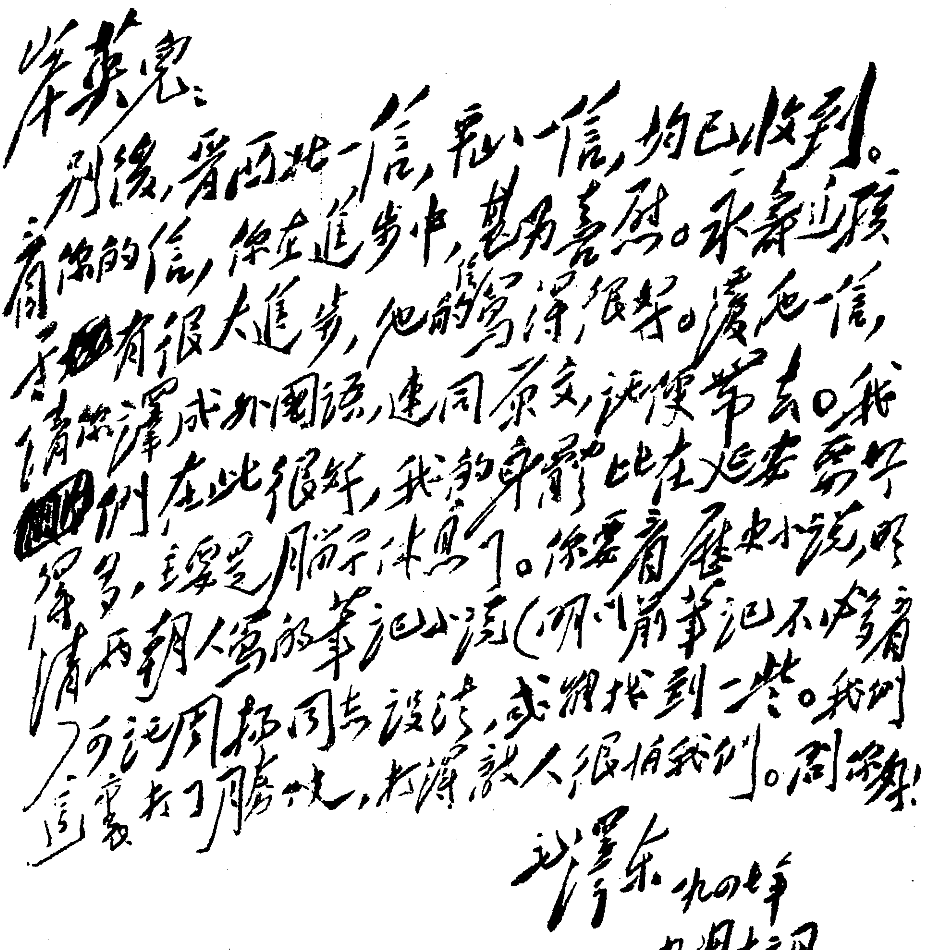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

[1] 永寿，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2] 周扬，当时任晋察冀总学委主任。



岸英兒：

別後，晉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進步中，甚為喜慰。永壽近頗有很大進步，他的寫譯很好。覆他一信，請你譯成外國語，連同原文，託便帶去。我們在此很好，我的身體比在延安還好些，主要是腦子休息了。你要看歷史小說，明清兩朝人寫的筆記小說（明以前筆記不必看）可託周揚同志設法，或能找到一些。我們這裏打了勝仗，敵人很怕我們。問好！

毛澤东 一九四七年
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毛岸英信的手稿。

陈谢集团攻克卢氏后的作战任务[1]

（1947年9月13日）

陈、谢、韩：

十二日八时电悉。（一）庆祝你们歼灭新一旅一个团及攻克卢氏。（二）卢氏我军应即将卢氏以西以南地主围寨攻克，并相机袭占商南及荆紫关，扫荡该地一带地主武装，迫使胡宗南[2]分兵向陕南各县布防。（三）秦纵[3]除以一个旅（或一个团）位于新安以东钳制洛[4]敌六十四旅等部外，秦率主力应即向东南方面发展，相机攻占伊阳[5]、临汝、鲁山、宝丰、郏县、方城、南召等薄弱据点，迫使洛敌主力（整三师）向东南救援。总之，秦纵愈向东南发展，则新安、渑池愈巩固愈安全。

军委

十三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 秦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4] 洛，指河南洛阳。

[5] 伊阳，旧县名，即今河南汝阳。

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9月13日）

第一条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第二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第三条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第四条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中共中央注：本条所称应予废除之债务，系指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

第五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第六条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中共中央注：在平分土地时应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有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在老区半老区平分土地时，应按照一九四八年

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进行。）

第七条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第九条　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材、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第十条　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己）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基本上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第十二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第十三条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五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

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利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第十六条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致陈毅、粟裕电[1]

（1947年9月13日）

必须注意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对五军、七十五师暂时不打很对。对俘虏应采取即俘即补方针。俘获后有数天训练，开一个翻身会（吐苦水），即可补入部队。彭习野战军全靠俘虏补充，即用此种方法，而战斗力很好。用此种方法，只要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均有俘获，即能保持兵员的经常状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9月14日）

陈、谢已克灵宝、阌乡、卢氏，现正以三个旅攻陕县，三个旅向西急进，直迫潼关。鲁崇义的整编三十师主力现被我王新亭部阻困于临汾，难于西撤。西安、潼关线空虚。拟令陈、谢攻克陕县后率五个旅向渭南、华阴攻进，以秦基伟三个旅及三十八军一部留豫西活动。

在此种情况下，我军似宜扭住刘、董于大小劳山以北、永坪以南地区，协助陈、谢得手，削弱刘、董，使其恐慌动摇，进退维谷，至时机成熟时，各个歼灭之，或与陈、谢直接会合于渭水以北根本解决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西兵团暂不分兵运河以东为好[1]

（1947年9月15日）

陈、粟，并告华东局：

十四日二十四时电[2]悉。（一）我西兵团刚刚集中六个纵队，打了一个胜仗，若又分开两个纵队到运东，是否会减弱鲁西南作战力量。并且不久你们就要准备向豫皖边区调动敌人作战，是否四个纵队已够，西兵团现共有多少人，每纵各有多少人，各纵战斗力如何，你们想派哪两个纵队去运东，拟派何人去指挥，如指挥员能力不够是否难起作用，以至两头失塌。现在的中心问题是打胜仗，只要再打两三个沙土集这样的胜仗，不但能调动胶东敌军，而且能保障你们及刘邓[3]的后方通路。只要前面打胜仗，敌即无法断我后路。但我军在一个时间内，必须要有一往无前、不要后路的决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7年9月14日24时陈毅、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张云逸、邓子恢、饶漱石、黎玉的电报。电报说：依目前敌对胶东进攻之态势看来，胶东的部队似难持久。果如此则数万伤残人员有遭摧残危险。为此，拟派两个纵队转至泰安以西打开局面，以配合鲁西南作战，亦可威胁济南，调转进攻胶东之敌，使胶东我军能取得余裕时间，击破敌人之进攻。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以上请陈粟答复。（二）胶东伤员状况如何，是否必须西兵团派两个纵到运东，是否可以迟两个月再考虑派兵。以上请饶黎[1]答复。

军委

十五日十五时

---

[1] 饶黎，指饶漱石、黎玉，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陈谢部的行动计划[1]

（1947年9月15日）

陈、谢、韩，并告彭[2]及刘、邓[3]：

（一）刘邓电告，罗广文[4]整十师两个旅将由信阳转至郑州。判断是因新一旅、六十四旅等部被歼，调该师加强洛阳方面。在此种情况下，秦纵[5]仍应照前电，以一个旅留于新安以东监视洛阳之敌，秦率两个旅向洛阳东南机动，相机攻占临汝、郏县、襄城、叶县、宝丰、鲁山、方城、南召诸城，威胁平汉路[6]，迫使三师、十师等部向洛阳东南各县救援。（二）许文耀[7]之二十七旅两个团现由龙驹寨、三要司、朱阳镇向洛南及芦灵关收缩，西安新到骑二旅（该旅已被我在环县附近歼灭一个团，其残部调至西安编整），可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5] 秦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6]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7] 许文耀，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师第二十七旅旅长。

开至西安以东防守。此外三原淳化两地之新九旅、暂二旅，仍在原地防我王世泰纵队[1]，但有可能抽一个旅至西安以东布防，渭、华、商、洛[2]一带七八个城防广兵单，利于我给该敌一个打击，减轻建立豫西根据地之西面威胁，创造你们尔后出桐柏山方向之便利条件。因此你们应令卢氏之十二旅于扫除卢氏附近地主武装之后，迅即南进，相机攻占荆紫关、商南、龙驹寨三点，然后转向西北，相机攻占商州、山阳，威胁西安侧翼，吸引西安敌人注意该方面。你们在陕州[3]作战完毕后，不论得手或不得手，休整数日，留三十八军一个师于陕灵阌[4]地区。你们亲率四纵全部及三十八军一个师，携带数天粮食，于商州、潼关之间自择道路（避开坚固据点），进入渭、华以南，商、洛以北地区，然后相机攻占临潼、渭南、华阴、华县、潼关、蓝田、洛南诸城。如你们能于本月下旬进入上述地区，并开始作战，则甚为有利。那时，我彭副司令[5]所部及王世泰两个旅，当可钳制胡[6]军主力，并可能向洛川一带前进，配合你们作战。

军委

十五日二十四时

---

[1] 王世泰纵队，指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王世泰。

[2] 渭、华、商、洛，指陕西渭南、华阴、商县和洛南。

[3] 陕州，旧州名，即河南陕县。

[4] 陕灵，指河南陕县和灵宝。阌，指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5] 彭副司令，指彭德怀。

[6]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目前各战区的作战情况[1]

（1947年9月15日）

彭，刘、邓，陈、粟，陈、谢，饶、黎、谭[2]，并告各首长：

目前情况：（一）我军在大别山、豫西、鲁西南、豫皖边区及陕北，业已完成战略展开任务。（二）我刘邓军已在豫东南、鄂东、皖西占领十多县及广大乡村，威震大江南北。该区群众很好，粮食已可吃新谷，地方工作已在布置，现正准备歼灭敌主力之作战。在该区周围之敌共二十三个旅，其中机动兵力约十二个旅左右，近又有抽整十师二个旅去郑州消息。（三）我陈粟西兵团已集中鲁西南，并已歼灭五十七师，奠定了该军扩大根据地至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3]以东并在该区内继续歼敌之有利地位。该区敌只有十五个旅左右，其机动兵力不过五个旅左右。（四）我陈谢兵团已占豫西九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饶、黎、谭，指饶漱石、黎玉、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3]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宜阳近被敌占），除歼灭大量保安部队外，并歼灭胡宗南[1]七十六师之新一旅，三十六师一个独立团，又歼灭洛阳李铁军[2]部整十五师六十四旅一个团，击溃其两个团。现该区除陕县尚未攻克外，淅川、南召以北，洛阳、临汝、鲁山以西均为我占。现渭水、黄河以南，汉水以北，平汉以西甚为空虚，利于我军放手发展。（五）陕北我已收复佳县、米脂、吴堡、子洲、镇川、横山、靖边、保安[3]、吴旗、安定、固临诸城镇。彭率野战军已进至青化砭、延川之线以南地区。胡军主力七个旅又二个团则在该线以北被我扭击，无法迅速南撤。我军待完成歼敌一部之任务后，准备不久即打到外线去。（六）目前只有胶东方面敌尚维持十五个旅左右的攻势，该区尚有一个时期是困难的，但估计只要陈粟、刘邓、陈谢三方面再打几个胜仗，中原及长江发生更大震动之后，胶东敌军将被迫大批南撤。只要我军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均能歼敌一部（不论多少），就能改变该区形势。

军委

申删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五兵团司令官。

[3] 保安，旧县名，即今陕西志丹县。

西北野战军应配合陈谢完成重要任务[1]

（1947年9月16日）

彭，并告贺、习：

删未电悉。（一）目前一个月内是重要关节，望鼓励全军将士英勇奋斗，配合陈谢完成重要任务。（二）不管本日是否作战，又不管作战得手不得手，请令王震[2]率两个旅立即向延安以南开进，占领大小劳山、甘泉之线，节节阻敌南退。该纵在该线要处于正面，不要处于侧面。（三）主力六个旅即于现地休息三天、四天至多五天，解释行动方针，约于二十二日左右向南急进。全军（六个旅）直迫宜川，相机攻取该城；然后向南相机攻取韩城、合阳、澄城、蒲城、白水、平民、朝邑、大荔诸城。争取于十五天至二十天内完成上述任务。（四）为争取时间，请不要打清涧、延川，也不要打延长。（五）新兵冬服随后追送。

军委

十六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王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部队自行解决棉衣问题[1]

（1947年9月16日）

刘、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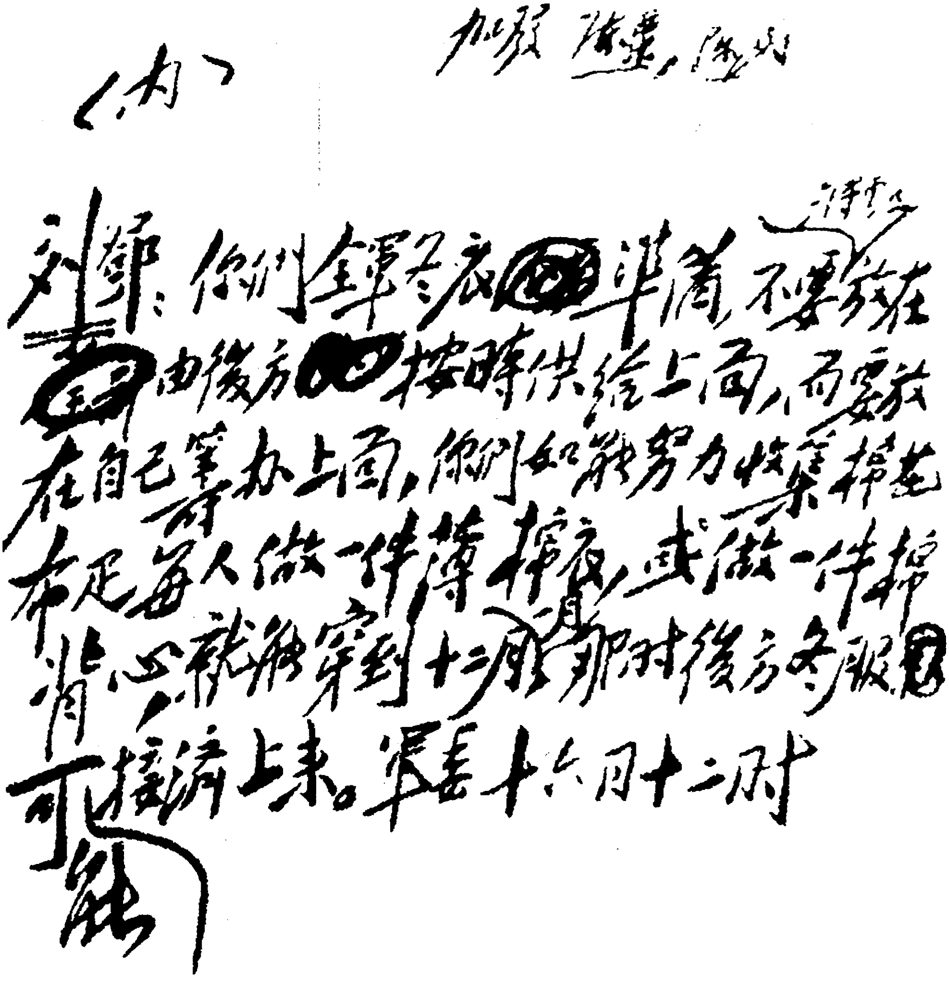
你们全军冬衣准备，不要将重点放在由后方按时供给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筹办上面，你们如能努力收集棉花布匹，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十二月、一月，那时后方冬服可能接济上来。

军委

十六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illegible]　　加發陳粟、陳謝

刘鄧：你們全軍冬衣準備的重心，不要放在由後方按時供給上面，而要放在自己籌辦上面，你們如能努力收集棉花布疋，每人做一件薄棉衣，或做一件棉背心，就能穿到十二月，那時後方冬服可能接濟上來。

軍委 十六日十二時

毛泽东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手稿。

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1]

（1947年9月16日）

陈、粟，饶、黎，许、谭：

我们认为震林所率二、七两纵目前不宜离开滨海，只要该区有粮食，就应留在该区打些小胜仗，即使一二个月不打胜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如地区狭小，不便集中行动，则以纵队或以旅为单位，暂时分散在诸城、莒县、沂水、临朐、日照等县广大乡村也有利，一可钳制八十三师、二十八师、四十五师等部，二可策应胶东内线。大约坚持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局势就会变化。如二、七纵出鲁南或苏北，则八十三师、二十八师等部必跟去，亦不见得容易歼灭，对于胶东则减少直接配合作用。胶东方面敌至多使用十二个旅进攻，而在占领平度、掖县、莱阳、龙口、招远、蓬莱、黄县诸城，留出大量守备兵力之后，其机动兵力就不多了，利于我军各个歼敌。一个月后，敌有很大可能调走一部兵力，故该方面只要我军不打败仗，局势亦可能好转。

军委

十六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等的电报。

抓住时机打开陕东陕南局面[1]

（1947年9月17日）

陈、谢、韩：

（一）申一日至十日综合战报已悉，甚慰。（二）四纵两个旅及五十五师是否在攻陕州[2]，把握如何，若有把握则坚决攻取之，若无把握或把握不大，则应撤围休整四五天。除五十五师留陕灵阌[3]外，四纵两个旅应即向陕东跟进，加厚陕东兵力，以利打几个歼灭战。在十五天至二十天内，胡[4]军主力尚不能向你们攻击。你们必须很好利用这十五至二十天时间，打开陕东及陕南局面，这是有决定重要性的。如不能在陕东、陕南建立根据地，则将妨碍你们在豫西及鄂西北建立根据地。

军委

十七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陕州，旧州名，即河南陕县。

[3] 陕灵，指河南陕县和灵宝。阌，指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致彭德怀等电[1]

（1947年9月17日）

提议王世泰部编为第四纵队，辖两个旅，参加野战军作战，使该部正规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西北野战军有配合陈赓兵团争取战略胜利之任务[1]

（1947年9月18日）

彭副司令，并转王震[2]及各纵各旅首长：

（一）我陈赓兵团[3]十个旅七万人，已占领宜阳、嵩县、伊阳[4]、新安、渑池、灵宝、阌乡[5]、洛宁、卢氏等九县，歼敌万余。现该兵团秦基伟纵队[6]正向临汝、郏县、襄城、叶县、宝丰、鲁山、南召诸县攻进。陈谢率主力六个旅，决于二十日开始向西安方向前进。其计划是首先夺取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蓝田、商县、洛南、商南、山阳等十县，建立陕东南根据地。（二）我陕甘宁野战军全军八个旅及王世泰[7]两个旅，有配合陈赓兵团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王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陈赓兵团，指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组成的作战集团。

[4] 伊阳，旧县名，即今河南汝阳县。

[5]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6] 秦基伟纵队，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7] 王世泰，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争取战略胜利之任务。其方法是：甲、王震纵队两个旅，不惜疲劳，不怕牺牲，立刻出动，星夜兼程，抢占大小劳山、甘泉之线，在敌主力九十师、一师先头，从正面节节阻敌南撤。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必须将敌在大小劳山、甘泉地区至少阻止一个星期。乙、主力在现地休整五天，照彭十七日电，二十三日向南急进，相机攻占宜川、蒲城、白水、韩城、澄城、平民、朝邑、大荔等八县，迫使南退之敌分兵兼顾渭南、渭北两方面，只能取守势，不能取攻势，保障我南北两军完成战略任务，是为至盼。

军委

十八日四时

西北野战军主力南进的部署[1]

（1947年9月18日）

彭：

（一）据悉，敌除由榆林空运二十八旅赴西安外，又由延安空运一个旅去西安。（二）我军部署，除请令王震纵队[2]两个旅，星夜先机赶至大小劳山，从正面（不是从侧面）阻敌，务必保证在该地区至少迟滞敌进一个星期外，我主力休整五天（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后，不要去打宜川、韩城，而要走直路，分为两路：一路取道九龙泉、牛武镇；一路取道临真镇[3]。二十三日出动，以七天左右时间，全军（六个旅）直取蒲城、白水。到达后，休息两天，再分两路：一路直逼富平、三原、高陵及渭河北岸；一路向东南相机攻占澄城、大荔、平民、朝邑四城。这样，可于十月二日左右到达渭水北岸，使敌完全处于被动，不得不分兵兼顾渭南、渭北，只能防守，不能进攻，以利我南北两军达成战略任务。（三）由现地至富平七天内粮食问题之解决，除迅速动员携带一部外，请令各部下决心宰杀骡马充食。（四）宜川韩城两县，由攻占澄城、大荔、朝邑、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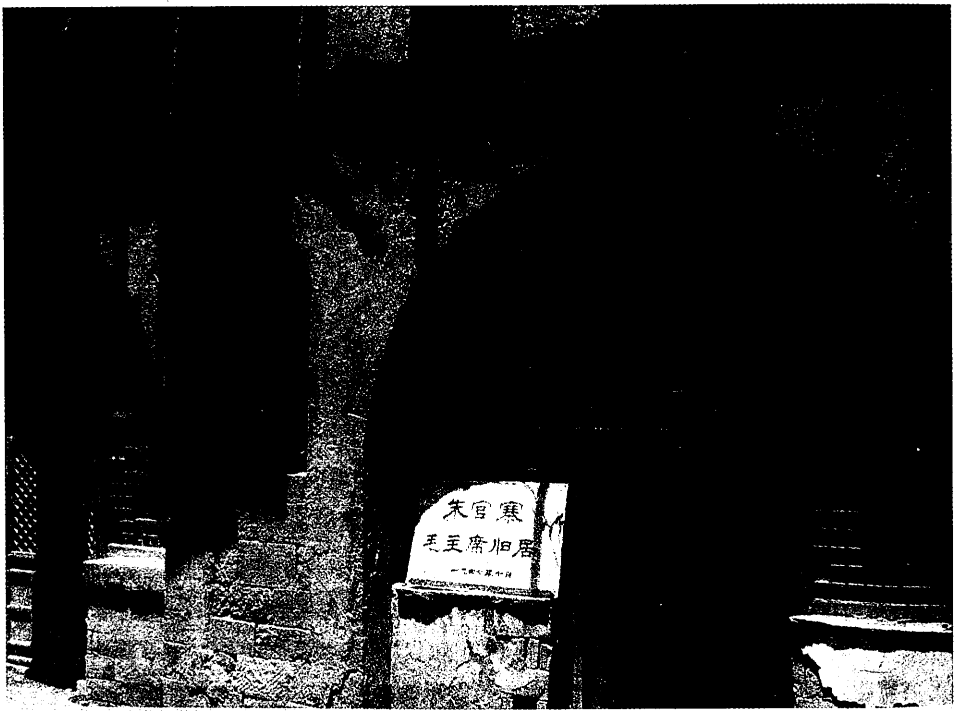
[2] 王震纵队，指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

[3] 临真镇，今为临镇，位于陕西延安市东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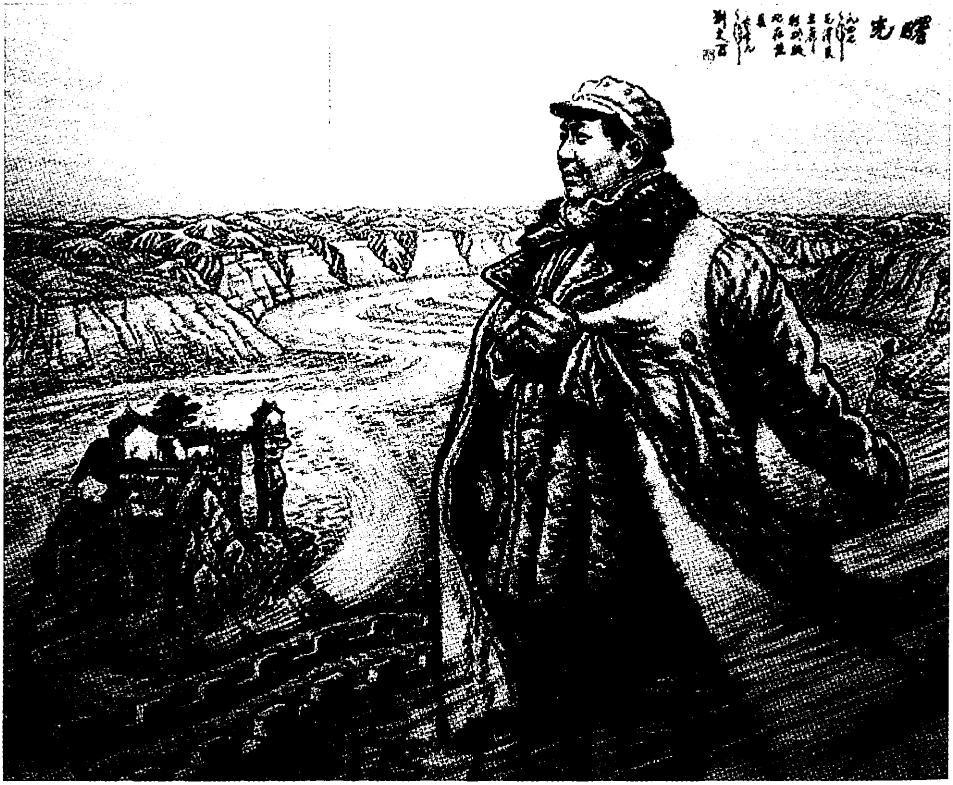
民之部队，以一部回师攻取之。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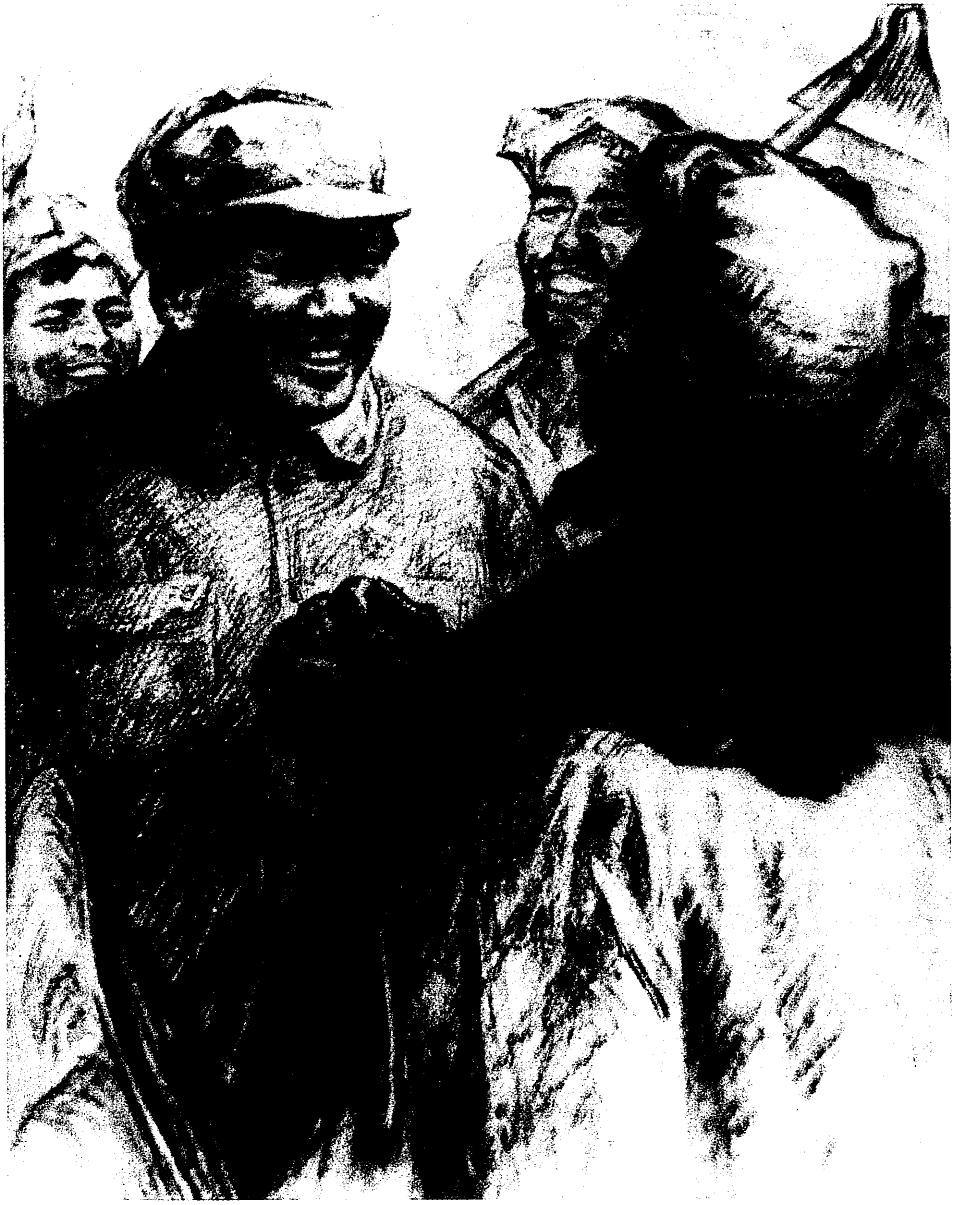
十八日八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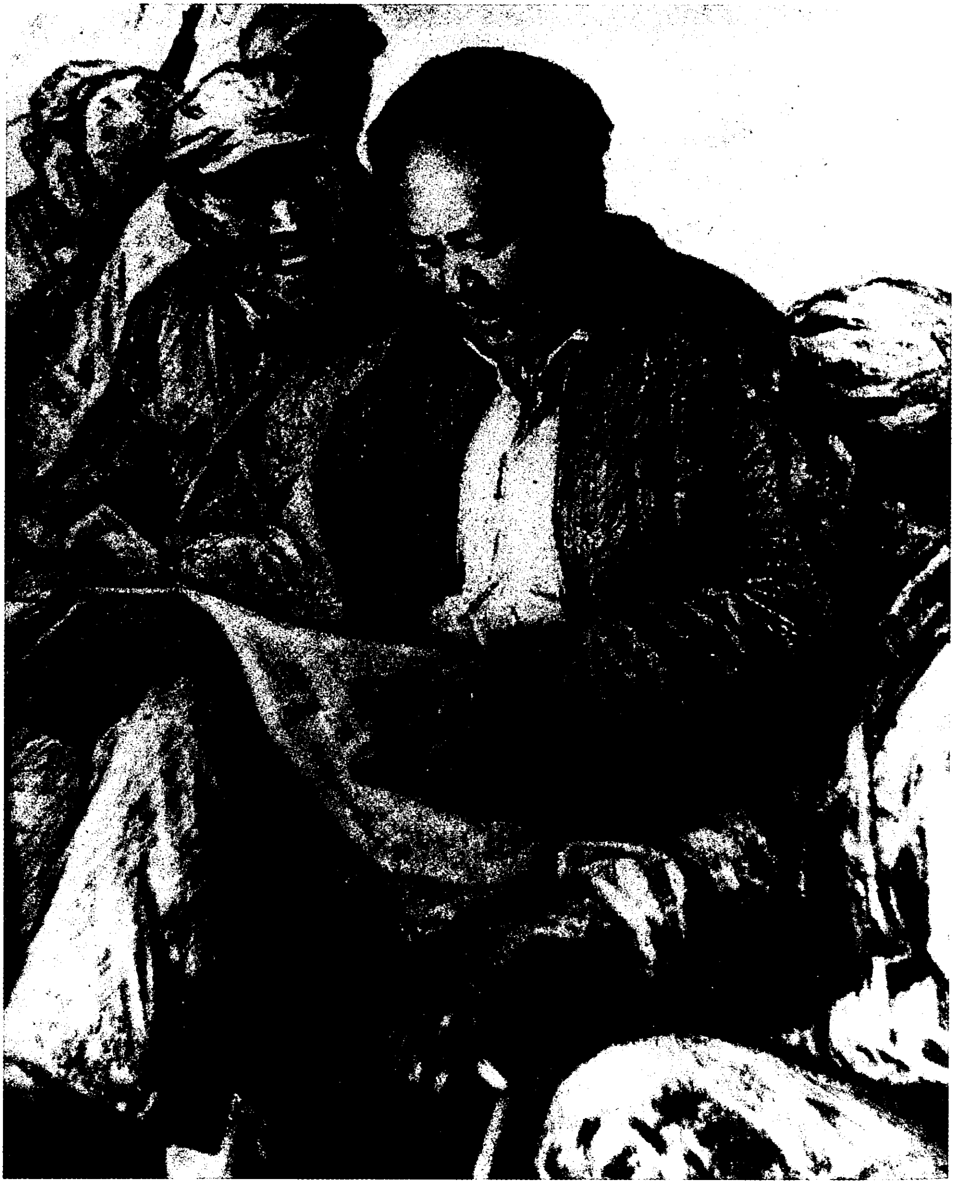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的旧居张家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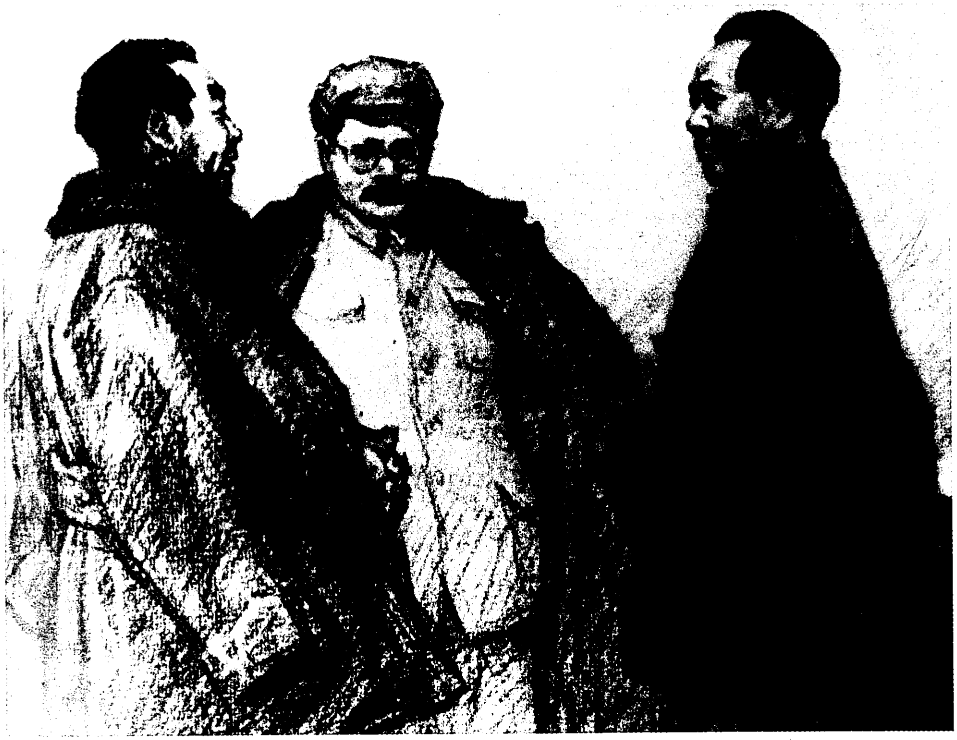
《曙光》（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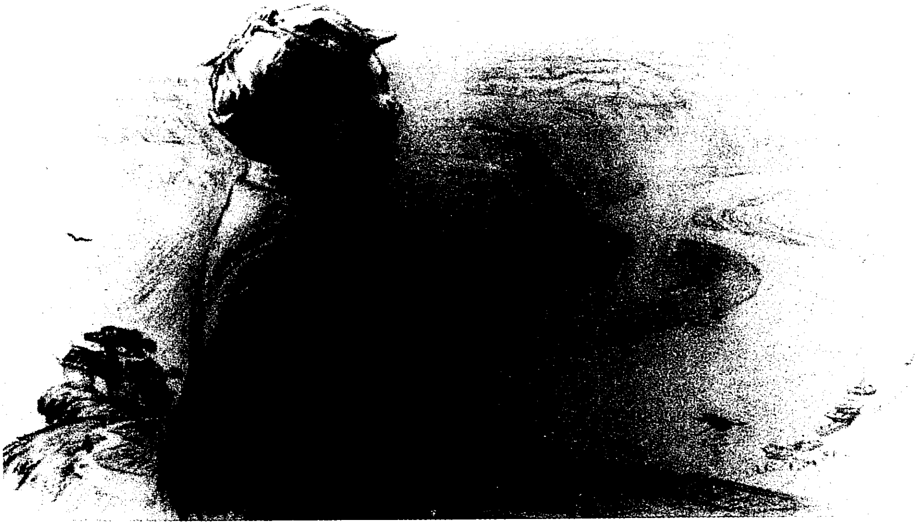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陕北人民在一起》（《曙光就在前面》素描组画之一）



《转战途中》（《曙光就在前面》素描组画之二）



《战友》（《曙光就在前面》素描组画之三）



《佳城东望》（《曙光就在前面》素描组画之四）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1]

（1947年9月18日）

请令秦基伟主力（两个旅）由伊阳向东，相机攻占临汝，然后由临汝向东南，以一个旅相机攻占郏县、襄城、宝丰、叶县，威胁许昌，吸引整三师及一二四旅向该方面救援。该旅即留在上述各县，与救援之敌周旋。以另一个旅相机攻取鲁山、南召县城后，迅即转至卢氏、嵩县、伊阳、鲁山、南召、内乡六县交界，即伏牛山地区纵横二百里内外，展开乡村工作，剿灭民团、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创造该纵后方。必须使该纵干部明了，该纵后方不是新安、渑池，而是伏牛山，用全力在伏牛山建立根据地，是为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9月19日）

三天战斗给了敌人以相当削弱，迟滞了敌人南进，特别是认识了敌人士气衰落，我军士气大增，不怕这个敌人，对于我军向渭北出击争取胜利，大有利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晋察冀中央局电[1]

（1947年9月19日）

根据中央工委建议，为着加强晋察冀工作之目的，决定派彭真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资格帮助与指导晋察冀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晋察冀中央局并告中央工委及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陈谢韩三路出兵意见[1]

（1947年9月20日）

陈、谢、韩：

我们因不明你们当前敌情、地形、道路、粮食等具体情况，为稳重起见，故有本（二十）日十七时电[2]改变十六日十二时电意见，要你们集中兵力向商、洛、蓝田。但过细研究你们十九日二十时电三路出兵的意见亦有理由，因此可照你们意见，以刘旅[3]出商州，陈旅[4]经朱阳镇、芦灵关出洛南，相机占商、洛，会师蓝田，威胁西安，掩护主力侧翼，周李查三旅[5]及十七师则第一步进至大峪口以南之芦灵关、巡检司地区，看情况，如情况有利，则进至华阴、华县、渭南三县地区，相机攻占一二城。如有必要，可将陈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指1947年9月20日17时中共中央军委给陈赓、谢富治、韩钧的电报。电报说：根据目前的敌情，你们不应分兵先打潼关、华阴、华县等城，而应集中兵力先取商、洛，进迫蓝田，中间突破，相机歼灭蓝田至大华山一线之敌，在该线可能求得野战。

[3] 刘旅，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四纵队第十二旅，旅长刘金轩。

[4] 陈旅，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四纵队第十三旅，旅长陈康。

[5] 周李查三旅，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四纵队第十旅、第十一旅和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旅长分别为周希汉、李成芳和查玉升。

向主力靠拢作战，只令刘旅出蓝田。如情况不宜如此行动，则可照我们二十日十七时电所述方针，以一个旅位于芦灵关、巡检司地区，向华潼[1]之敌佯动，其余进至蓝田附近，相机作战。总之，由你们按敌情、地形、道路、粮食诸项具体情况临机决定，我们意见只作参考。敌人虽有九个旅，系统不一，大部战力不强，陕西人民反胡[2]情绪甚高，均对我有利。

军委

二十日十九时

---

[1] 华潼，指陕西华阴和潼关。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为续范亭题写挽联[1]

（1947年9月22日）

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
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

---

[1] 晋绥边区行署主任续范亭的葬礼于18日在临县某地庄严隆重举行。晋绥边区各界代表、临县各机关代表及附近各村翻身农民，均赶来送葬，毛泽东由陕北来电吊唁，并送花圈挽联。这是毛泽东为续范亭写的挽联。

四纵东进协同秦纵歼击李铁军部[1]

（1947年9月23日）

刘、邓，并告陈、粟，陈、谢[2]及彭[3]：

哿午电悉。因西潼线[4]敌于一周内可集中十至十一个旅，难于得手，汉水流域无敌正规军，可留待下一步去占。李铁军[5]六个旅较弱，决令四纵主力东进，协同秦纵[6]歼击李部，并相机攻占郑洛[7]以南、平汉[8]以西各县。如罗广文[9]部用在陈粟方面，则一个月左右可能完成此项任务。那时如胡宗南[10]部进至陕、灵、阌、卢[11]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西潼线，指西安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5] 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五兵团司令官。

[6] 秦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

[7] 郑洛，指河南郑州和洛阳。

[8]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9] 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10]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11] 陕、灵、卢，指河南陕县、灵宝和卢氏。阌，指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则西击胡军，再向汉水流域，否则直向汉水流域。你们于一个月后派两纵一旅西进，建立桐柏襄汉两军区，时机恰好。惟你们冬衣（每人只发一件棉衣，严寒时再发一条夹裤）必须下决心立即动手自制，其办法即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照市价立借据，由王宏坤[1]送款（愈多带愈好）清还，分文照付。如此不但不会丧失军誉，且会增长军誉，第二年又可照办。惟须向商民说明理由，办理须有秩序，须分派多数有能力干部去做，以免苛扰。此项办法陈粟、陈谢亦可仿行，解决部分冬衣，以待后方接济。刘邓则万万不可依靠后方长途送冬衣。

军委

二十三日二十一时

---

[1] 王宏坤，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

打李铁军部的部署[1]

（1947年9月23日）

陈、谢、韩，并告徐、滕、薄（转新亭），刘、邓，陈、粟，彭[2]：

因西潼线[3]已到及于数日内可到之敌共有十个半旅，难于得手；汉水流域无敌正规军，可留待一个月后去占；郑洛[4]区李铁军部[5]六个旅较弱，故改变部署如下：（一）于二十六日前以三十八军一部开文底，逼近潼关佯动，迷惑敌人。（二）刘旅[6]附三十八军一部，除留小部控制卢氏剿匪外，立即西进，相机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山阳诸县，肃清反动，发动群众，援助陕南游击队。（三）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新亭，即王新亭，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西潼线，指西安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4] 郑洛，指河南郑州和洛阳。

[5] 李铁军部，指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官李铁军。

[6] 刘旅，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四纵队第十二旅，旅长刘金轩。

十八军主力位于陕灵阌[1]三县剿匪。（四）你们率主力四个旅，协同秦纵向旅[2]，于二十六日开始荫蔽东进，突然包围六十四旅及武庭麟师[3]部（可能在磁涧），相机歼灭之，收复新安。（五）在打六十四旅期间，秦纵主力可继续休整。（六）歼灭六十四旅后，协同秦纵歼击李铁军主力，并相机攻占郑、洛以南，平汉[4]以西十余县。（七）准备一个月时间，完成上述任务，然后留秦纵位于上述地区，四纵向汉水流域。

军委

二十三日二十二时

---

[1] 陕灵，指河南陕县和灵宝。阌，指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2] 秦纵向旅，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九纵队（纵队司令员秦基伟）第二十六旅，旅长向守志。

[3] 武庭麟师，指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五师，师长武庭麟。

[4]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西北主力应在内线完成三项任务[1]

（1947年9月23日）

彭，并贺、习：

二十三日二十时电[2]悉。（一）决定你军主力（六个旅）在内线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完成歼敌休整补充三项任务，然后打出去。望按此部署一切，主要是筹粮一万五千大担。（二）王震[3]两个旅相机攻占劳山、甘泉等地，阻敌数天后，即可先出渭北。

军委

二十三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指1947年9月23日20时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准备26日攻延川、延长，同时准备打援，得手后再攻清涧、瓦市，准备半个月至20天完成战斗任务，一个月后打出去。

[3] 王震，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复朱德、刘少奇等电[1]

（1947年9月24日）

此次大清河战役[2]，歼敌一部，虽未获大胜，战斗精神极好，伤亡较多并不要紧。休整若干天，按照该区具体条件部署新作战，只要有胜利，无论大小，都是好的。一切按自己条件独立部署作战或休整，不要顾虑东北或别区配合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朱德、刘少奇并告聂荣臻、萧克、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的主要内容。

[2] 晋察冀野战军于9月2日至12日举行大清河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000余人。

打李铁军及以后的作战任务[1]

（1947年9月25日）

陈、谢、韩：

你们南渡后第一个月作战成绩很好，歼敌二万余，控制渑、陕、灵、阌、宁、卢[2]六县。原定第二步打西潼线[3]上之敌，第三步出汉水、豫西南。因西潼敌已先我集中兵力，把握较少，故改变计划，东打李铁军[4]，并相机占领郑洛[5]以南、平汉[6]以西若干县。包括作战与休息在内，估计大约须一个月左右时间。如此举成功，不但对你们有利，对陈粟、刘邓[7]亦有利（陈粟现正在曹县打十一师，估计罗广文[8]十师将向曹县增援，刘邓主力亦在豫东南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渑、陕、灵、宁、卢，指河南渑池、陕县、灵宝、洛宁和卢氏。阌，指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3] 西潼线，指西安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4] 李铁军，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五兵团司令官。

[5] 郑洛，指河南郑州和洛阳。

[6]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7]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8] 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在你们打李铁军期间，胡宗南可能集中三四个旅向陕、灵、阌、卢进扰，援助李铁军。故在打李铁军之后，你们还要准备回头打可能进至陕、灵、卢之敌，以期在几个月内，歼灭几万敌人，控制新[1]、渑、陕、灵、阌、宁、卢数县于我手。此数县群众，看见我军歼敌这样多，胜利这样大，加上你们的群众工作，就会敢于起来向地主斗争，并援助你们（群众最快要几个月内才能广大发动起来，不要企图在几星期内就能发动）。那时你们就可以一部留在北面，主力南进，攻占豫西南及汉水流域，把局面向前开展一大步。那时，刘邓将派部占领桐柏山、大洪山及汉水下流，建立桐柏军区、襄汉军区。目前则南面无敌正规军，北面有仗可打，故应打北面之敌，南面留待将来再去。望你们本此意图，部署作战，部署后方，部署群众工作。在你们打李铁军期间，彭副司令所部留在陕北内线，完成歼敌、整训、补充等项任务，时间约一个月左右，然后打出去，第一步向渭北，第二步向陇南，与你们相呼应。但你们及任何其他战略单位之作战，均是独立性的，各按自己情况，独立部署行动，不要依赖任何方面之直接配合。你们当地粮食如不够，可从河北运济一部。地方工作干部，望太岳、太行多派。又胡宗南主力进退维谷，现仍在延安附近，在陕北我军威胁之下，必不敢大举南下压迫你们，是否有一部南下，还要看一看才能定。

李铁军各部具体位置，东西赵堡在何处，盼告。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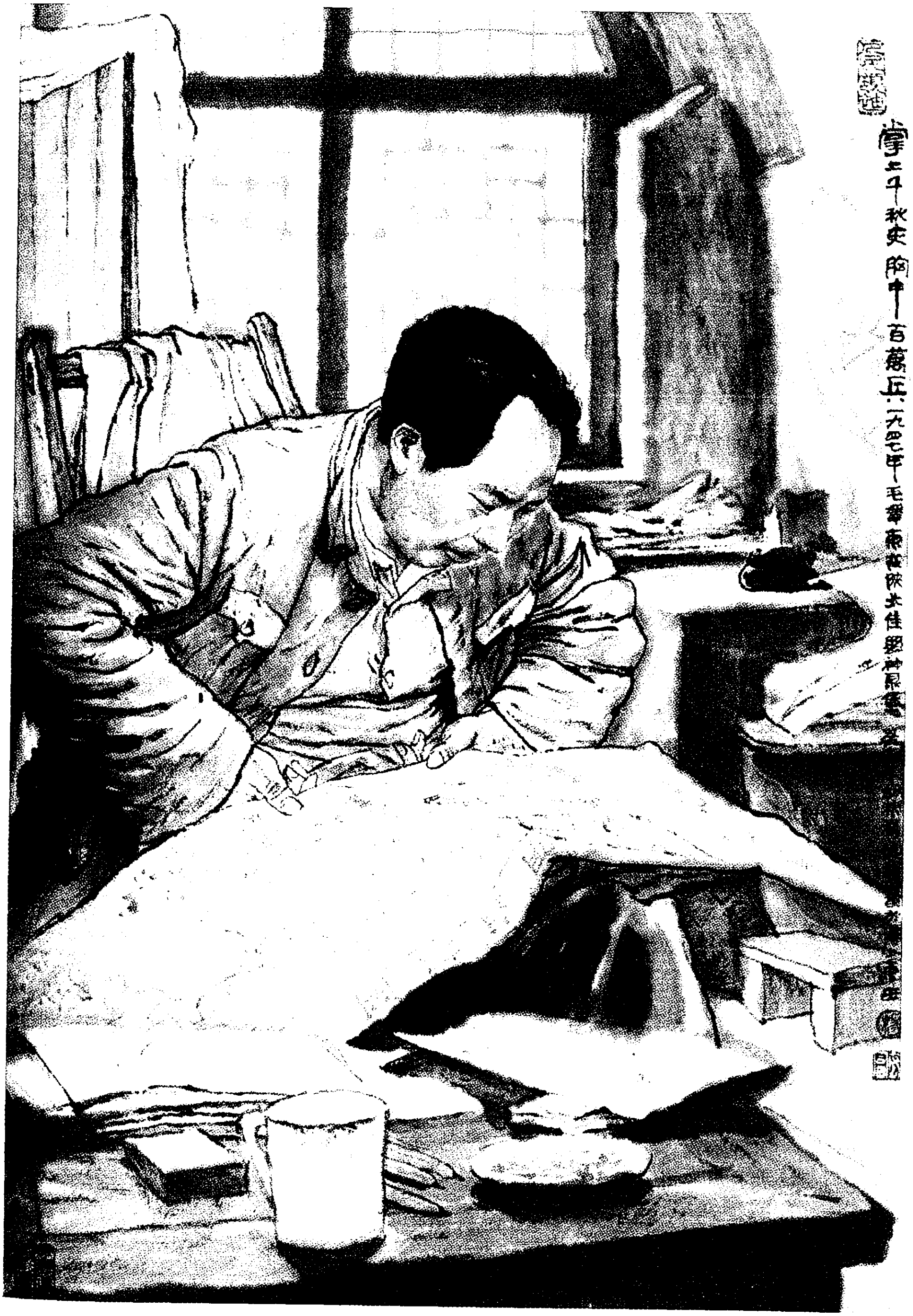
二十五日十八时

---

[1] 新，指河南新安。

1947年，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窑洞内查看军事地图，部署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

1947年，毛泽东在陕北朱官寨住所查看地图。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 一九四七年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中国画）

四纵第十二旅应在陕南建立根据地[1]

（1947年9月26日）

陈、谢：

二十五日二十时电[2]悉。（一）我们只知八十三旅到洛南消息，商县情况不明，望令刘李[3]自己侦察，机动处理。我们只规定该部大方向是在陕南建立根据地，包括洛南、蓝田、商县、龙驹寨、商南、山阳、柞水、镇安、宁陕等地，遇大敌则避开之，遇小敌及民团则歼灭之，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二）东进主力应以神速动作，迂回至新安以东，切断六十四旅退路，然后攻城。同时，要以重兵在新安以东设伏，准备打援敌。

军委

二十六日二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和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指1947年9月25日20时陈赓、谢富治向中共中央军委询问洛南、商县情况的电报。

[3] 刘李，指刘金轩、李耀，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四纵队第十二旅旅长和政治委员。

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1]

（1947年9月26日）

（一）打六十四旅行动时间，由你们自己决定，总以确保胜利为原则。（二）宜阳之敌，可能向新安增援，你们要准备打援敌，应令秦纵参加此次作战。（三）应以一部向潼关方向之敌佯动，迷惑该敌（直至现时止，西安方面均认你们必打西潼线，甚为恐慌），以利主力荫蔽东进，突然包围六十四旅而歼击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赓、谢富治、韩钧电的主要内容。

复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等电[1]

（1947年9月26日）

徐、滕、薄二十四日提出的“以彭、罗[2]监视临汾之敌，集中八纵两个旅夺取运城，再北上相机夺取临汾，并打阎敌”的计划甚好，望坚决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转王宏坤、张际春并告陈赓、谢富治、韩钧电的主要内容。

[2]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吕梁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在辽东三纵队诉苦教育经验报告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7年9月28日）

过去我们诉苦运动，收到不少成绩。今后还应继续开展。在内容上过去是多方面的，范围很广。在目前深入阶段，以下几点，希各部注意：（一）以揭发封建压迫为主。如若是由于被民族压迫及其他压迫者，应联系到封建压迫上去，进一步引导到土地政策的学习。（二）发动干部诉苦。经验证明，这是可能的。因为全军干部，大多数皆工农成分。而且已证明干部诉苦，可以提高阶级觉悟。有时比战士诉苦作用大，更能影响群众。（三）部队诉苦与地方诉苦相结合。应派人参加地方诉苦大会或邀请群众典型到部队诉苦。部队同志亦可到地方上诉苦，以发动群众，使工农兵血肉相连，体验到天下穷人是一家。（四）发动地主富农出身的干部揭发反动社会制度的没落与黑暗，从反面来教育群众，使群众知道封建阶级的本质及没落的前途。现已有个别进行控诉自己家庭的黑暗，压迫贫苦人民的罪恶者。这是进步表现，应受表扬，不应歧视。（五）诉苦后，号召团结部队。阶级教育的目的，是使工农分子阶级觉悟提得更高，非工农分子应彻底抛弃自己出身的阶级立场，站到劳动大众一边，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同意陈粟部分两路前进方针[1]

（1947年9月30日）

陈、粟，并告刘、邓：

各电均悉。（一）你们分两路前进方针很好。至少一个月内专打分散薄弱之敌，发动群众，了解情况，然后看情形再集中相当兵力，打有把握有准备的较大规模的仗，半个月时间太短。（二）士榘[2]所部第一步相机攻占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第二步应向南相机攻占商水、项城、沈丘、临泉、上蔡、汝南、新蔡，在该地区建立根据地，与刘邓衔接。（三）你们则在夏邑、永城、宿县、亳县、涡阳、蒙城、怀远、凤台、阜阳、太和地区建立根据地。（四）你们与士榘所部暂时分开建立根据地，将来看情形，各留一个纵队在当地发展根据地，集中三个纵队打较大规模的仗，如此方可迫使敌人分得很散，造成好打之条件。（五）各纵辗转活动，破击三条铁路，歼灭分散之敌，极为重要。

军委

三十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士榘，即陈士榘，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9月30日）

王世泰部已占白水，王震部日内可到白水附近，该两部应会合一起，即以白水为枢纽向四周发展，建立渭北根据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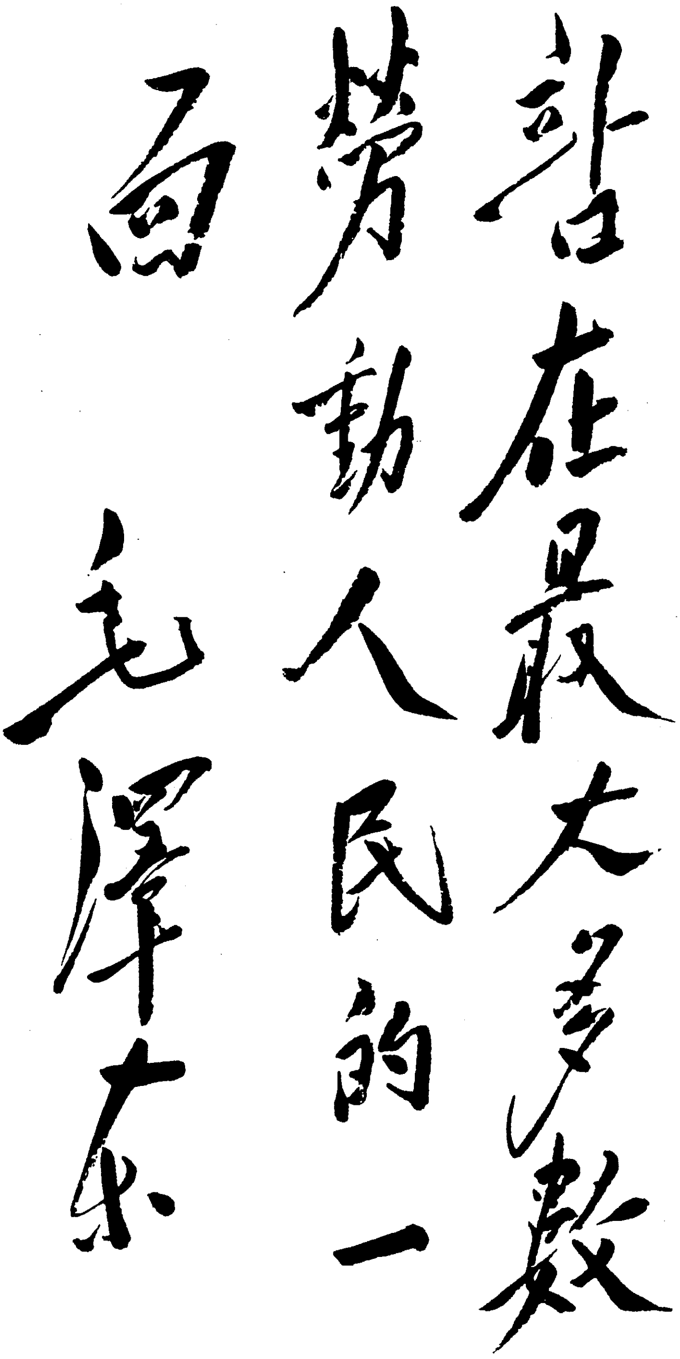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为中共佳县县委题词

（1947年9月）

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毛泽东



站在最大多數
勞動人民的一
面
毛澤東

毛泽东为中共佳县县委的题词。

清涧瓦窑堡两处可先打一处[1]

（1947年10月2日）

彭：

冬辰电[2]悉。（一）据我们所得情报，四三〇团已随九十师南去。清涧确实情况及工事配备，可用包围试攻方法了解之，如有希望则坚决攻取，否则可临时停止。（二）清瓦[3]两处可先打一处，再打一处，不必同时打。（三）以一部附电台迫近延安侦察，如敌增援则加阻击，取得时间。

军委

二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指1947年10月2日9时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电报说：敌四三〇团改为七十一团，是否在清涧城？如该团在清涧城，即有6000余人，不易攻克；如已他调，则决心攻夺清涧。如粮食得到解决，亦可先攻瓦市，后攻清涧。

[3] 清瓦，指陕西清涧和瓦窑堡。

致彭德怀电[1]

（1947年10月2日）

两延[2]手后，我军似宜迅即以主力打清涧，以一部打瓦市，以期同时歼灭两地之敌，使绥德之敌无法逃跑。然后两路北进，歼灭绥德之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两延指延川、延长，10月1日被西北野战军收复。

陈粟部在一两个月内应只打小仗不打大仗[1]

（1947年10月3日）

陈、粟，并告刘、邓[2]：

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不但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你们冬衣问题亦须照刘邓办法，令各纵自己分别向商人及有花布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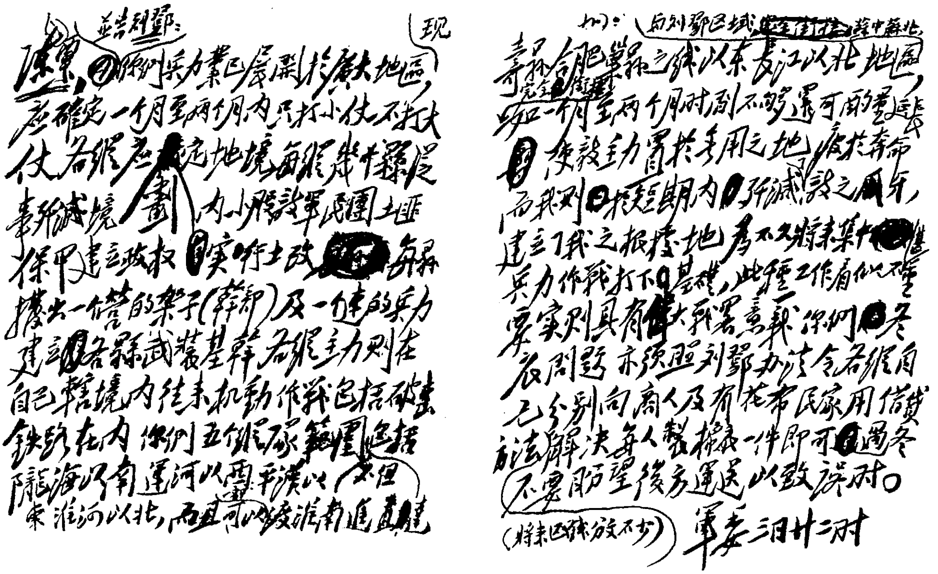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家用借贷方法（将来还钱分文不少）解决。每人制棉衣一件即可过冬，不要盼望后方运送，以致误时。

军委

三日廿二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陈粟部在一两个月内应只打小仗不打大仗》的手稿。

陈粟部在一两个月内应只打小仗不打大仗[1]

（1947年10月3日）

陈、粟，并告刘、邓[2]：

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从事歼灭境内小股敌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拨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不但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一部渡淮南进，直达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与刘邓区域、苏中、苏北完全衔接。如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酌量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了敌之爪牙，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甚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你们冬衣问题亦须照刘邓办法，令各纵自己分别向商人及有花布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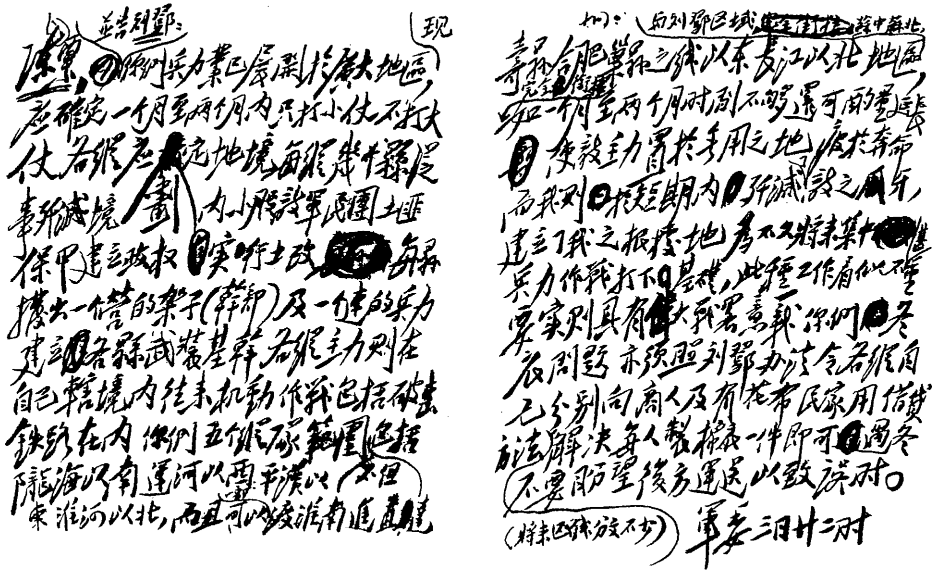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家用借贷方法（将来还钱分文不少）解决。每人制棉衣一件即可过冬，不要盼望后方运送，以致误时。

军委

三日廿二时



陈粟，并告刘邓：你们兵力业已展开于广大地区，现应确定一个月至两个月内只打小仗不打大仗，各纵应划定地境，每纵几个县，于所划境内歼灭小股蒋军民团土匪保甲，建立政权，实行土改，每县抽出一个营的架子（干部）及一个连的兵力建立各县武装基干，各纵主力则在自己辖境内往来机动作战，包括破击铁路在内。你们五个纵队范围包括陇海以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淮河以北，而且可以渡淮南进直达

长江，如刘邓区域包括豫中苏北寿县合肥巢县之线以东长江以北地区，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不够，还可延长，使敌主力置于无用之地，疲于奔命，而我则于短期内歼灭敌之一部分，建立了我之根据地，为不久将来集中兵力作战打下基础，此种工作看似不重要，实则具有伟大战略意义。你们冬衣问题亦须照刘邓办法，令各纵自己分别向商人及有布市民家用借贷方法解决，每人制棉衣一件即可过冬，不要盼望后方运送，以致误时。

（将来还钱分文不少）

军委三日廿二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陈粟部在一两个月内应只打小仗不打大仗》的手稿。

在新区作战的方针[1]

（1947年10月4日）

刘、邓，并告陈、粟：

为着（一）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二）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两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广泛歼灭民团、保甲；（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四）解决物资，目前主要是冬衣等项目的，请考虑你们手中集中的九个旅，分出三个旅越路西进，相机攻占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门、钟祥、随枣[2]诸县。你们手中集中六个旅，仍有每战歼灭弱敌两个旅、强敌一个旅之能力。目前向西南，相机攻占麻城、黄安[3]、黄陂、礼山[4]、广水、花园诸地，并相机控制铁路一段。尔后则可向东方或向东北方机动。而桐柏山地区则留待赵王两纵[5]去经营。陈谢[6]十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并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随枣，指湖北随县和枣阳。

[3] 黄安，旧县名，即今湖北红安。

[4] 礼山，旧县名，即今湖北大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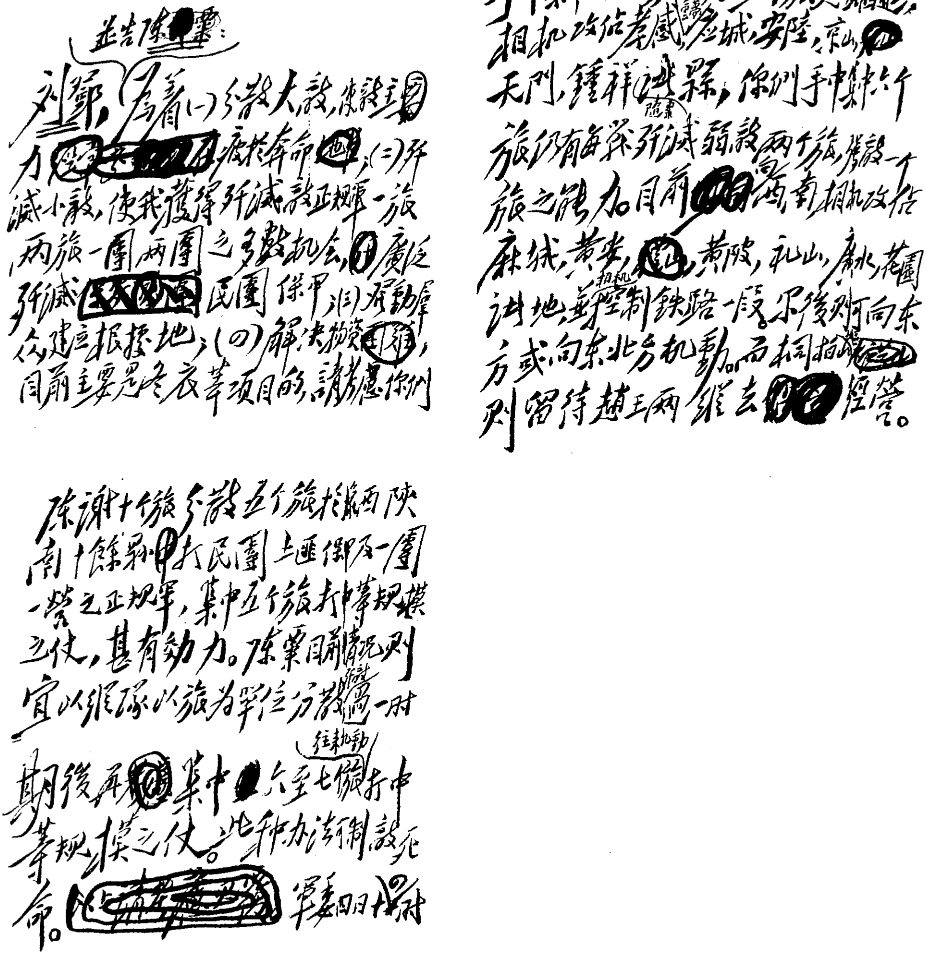
[5] 赵王两纵，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和第十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赵基梅和王宏坤。

[6]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余县，打民团、土匪、保甲及一团一营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效力。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歼敌，过一时期后，再集中六至七个旅往来机动，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可制敌死命。

军委

四日十四时



刘邓，并告陈粟：

目前（一）分散大敌，使敌主力疲于奔命，（二）歼灭小敌，使我获得歼灭敌正规军一旅两旅一团两团之多数机会，（三）广泛歼灭民團保甲，（四）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五）解决物资，目前主要是冬衣等项目的。請考慮你們手中集中的九个旅，分出三个旅越汉西进，相机攻佔孝感、云梦、应城、安陆、京山、天門、鍾祥、随枣诸縣，你們手中集中六个旅仍有每次歼灭弱敌两个旅或敌一个旅之能力。目前向南相机攻佔麻城、黄安、黄陂、礼山、广水、花園诸地，並相机控制鐵路一段。尔後则向东方或向东北方机動，而桐柏则留待赵王两縱去經營。

陈谢十个旅分散五个旅于豫西陕南十餘縣中打民團土匪及一團一營之正规军，集中五个旅打中等规模之仗，甚有効力。陈粟目前情况则宜以縱隊以旅为单位分散作战一时期後再集中六至七个旅往机動打中等规模之仗。此种办法制敌死命。

军委四日十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在新区作战的方针》的手稿。

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各纵的作战任务[1]

（1947年10月4日）

陈、粟，并告刘、邓，陈、谢[2]：

三十日午电悉。（一）分路前进，连克诸城，甚慰。（二）八纵进击平汉[3]沿线，彻底破击该线，可迫使罗广文[4]转至该线防御。一纵、十二纵占领鄢陵、扶沟后，应即南进，相机攻占商水（有五十二师一个团）、上蔡、项城、沈丘、临泉、新蔡诸城，即展开于该区域工作；十二纵待刘邓指定路线归建。（三）六纵相机攻占太和、阜阳、颍上、霍丘、正阳关、寿县、凤台诸城，即展开于该区域工作；三纵相机占领宿县、睢宁、泗县、灵璧、五河诸城，彻底破击津浦徐蚌线[5]，并展开于该区域工作；四纵攻占涡阳、蒙城、怀远诸城后，请考虑是否可以该纵全部渡淮南进，相机攻占凤阳、定远、嘉山、滁县、盱眙、来安、天长、六合、全椒、和县、含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4] 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5] 津浦徐蚌线，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即今京沪线一段。

巢县诸城，该纵即展开于该区域工作，并彻底破击蚌浦线[1]，而以三六两纵各一部接替四纵在涡、蒙、怀地区之工作。（四）陈谢两个旅在陕南游击；一个旅及两个地方团在新、渑、陕、灵、阌[2]控制铁路，剿匪，分田；两个旅在伊阳[3]、临汝游击；主力五个旅西东收复新安，歼灭十五师六十四旅，现正于宜阳西南地区围歼三师之两个旅，得手后拟相机东进，攻占宜阳、伊川、嵩县、临汝、登封、郏县、叶县诸城。请告陈士榘[4]。

军委
四日二十时

---

[1] 蚌浦线，指蚌埠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 新、渑、陕、灵，指河南新安、渑池、陕县和灵宝。阌，指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3] 伊阳，旧县名，即今河南汝阳。

[4] 陈士榘，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

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1]

（1947年10月8日）

陈、谢、韩：

八日十时电悉。同意你们以主力东进佯攻洛阳，留小部监视韩城之敌，待其回援歼其一部之方针。如敌回援时不好打，则进攻登封、密县、禹县、郏县诸地，迫使敌人分散，然后各个歼灭之。你们手中应集中五个旅打确有把握之仗，另两个旅则用于配合方面。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

军委

八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我军已全面转入反攻[1]

（1947年10月8日）

华东局转许、谭[2]及各纵：

各电均悉。庆祝你们收复掖县及歼灭敌人数部的重大胜利[3]。自从你们转入反攻后，我军业已无例外地全面转入反攻。敌人已没有任何一处再能进攻。我刘邓、陈粟、陈谢[4]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西北我军不久即将向敌区进攻。东北我军攻势有很大发展。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希望你们在华东局正确领导之下，继续争取胜利。

中央

八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华东野战军东兵团于1947年10月2日进行了胶河战役，至8日歼灭国民党军1.2万余人，收复了掖县。从此，东兵团转入反攻。

[4]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给毛岸英[1]的信

（1947年10月8日）

岸英：

告诉你，永寿[2]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3]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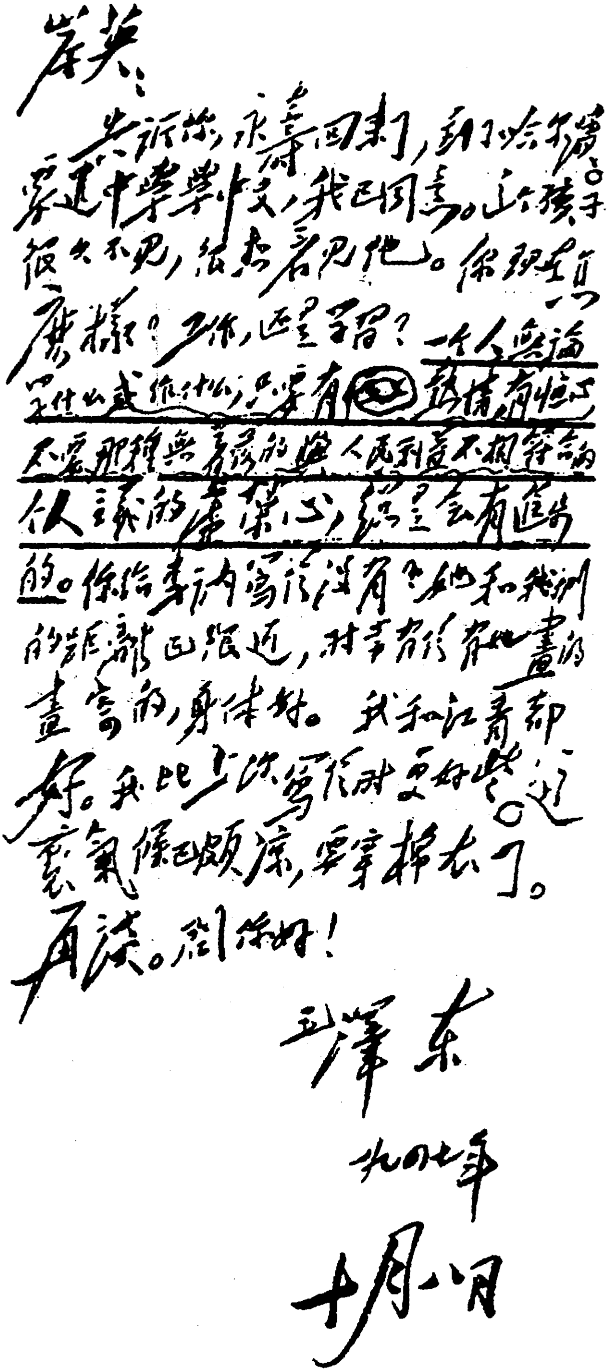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

[1]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2] 永寿，即毛岸青，1923年生，毛泽东的次子。

[3] 李讷，1940年生，毛泽东之女。



岸英：

告诉你，永寿回来，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校，我已同意。这孩子很久不见，你去看看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写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氣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祝你好！

毛泽东

九四七年

十月八日

毛泽东致毛岸青信的手稿。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7年10月8日）

你们手里只有七个旅，不要再分散。现在不要出平汉及平汉以西。陈、谢环境很好，不须你们配合。你们按照自己情况，逐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无把握的仗不要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1]

（1947年10月9日）

（一）土地法大纲业已修改完毕，决于明（十）日发表。（二）从报上登载至传达到乡村，当在半个月以后，似不至影响种麦。如中央局认为可能发生影响，可以推迟若干天发表。至于按照土地法实行分配土地，应在你们土地会议决定实行步骤全部布置完毕以后，方才开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央工委、晋察冀中央局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

（1947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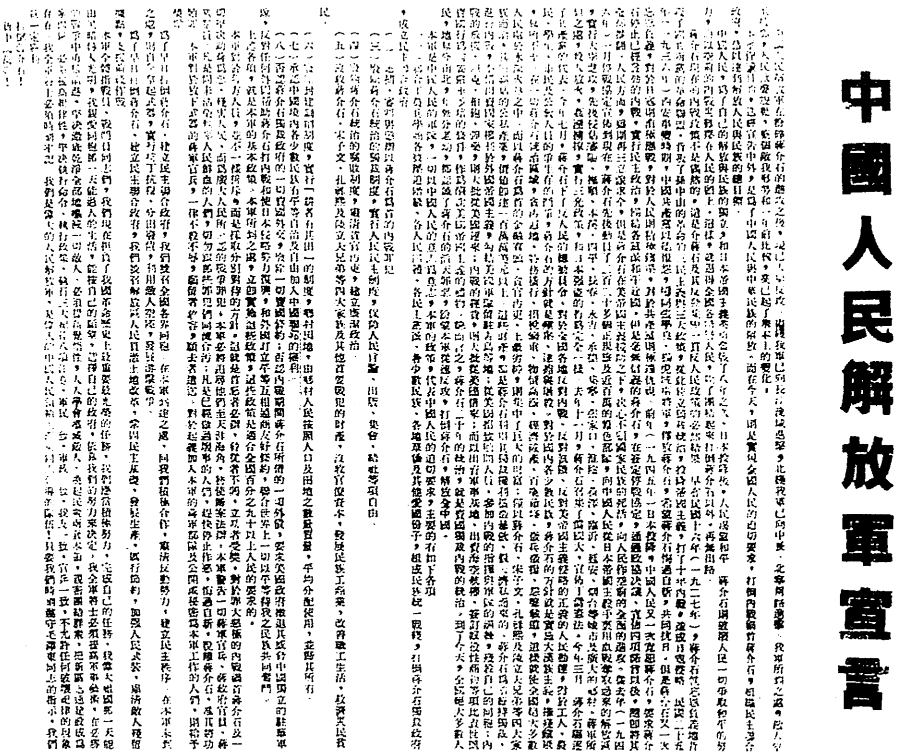
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则是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借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所起草的政治宣言。在这个宣言里，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在1947年10月10日公布，被称为《双十宣言》。宣言是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

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1]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二百二十多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四平、长春、永吉、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临沂、延安、烟台等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宣布了伪宪法。今年三月，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今年七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2]。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

---

[1] 四项诺言，指蒋介石1946年1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词中宣布的保障人民自由、保障各党派合法地位、实行普选和释放政治犯。

[2] 1947年7月4日，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了蒋介石的“国家总动员提案”，随即下了所谓《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其实，蒋介石的反革命内战的总动员早已实行了。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转入进攻。蒋介石自己也供认他的统治已到了“严重危机”。这个“总动员令”，只是表示蒋介石的垂死挣扎。

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1]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

---

[1] 奴役性商约，指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主权的所谓《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上述各项，就是本军的基本政策。本军所到之处，立即实施这些政策。这些政策是适合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要求的。

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军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

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在本军到达之处，同我们积极合作，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动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

为了早日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号召解放区人

民贯彻土地改革，巩固民主基础，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人民武装，肃清敌人残留据点，支援前线作战。

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历史上最重要最光荣的任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我全军将士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必须提高觉悟性，人人学会歼灭敌人、唤起民众两套本领，亲密团结群众，把新区迅速建设成为巩固区。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我全军将士必须时刻牢记，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

打倒蒋介石！

新中国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

（1947年10月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级军政首长同志们：

一、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1]，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至于其他应当注意事项，各地各军最高首长，可根据具体情况，规定若干项目，以命令施行之。

二、三大纪律如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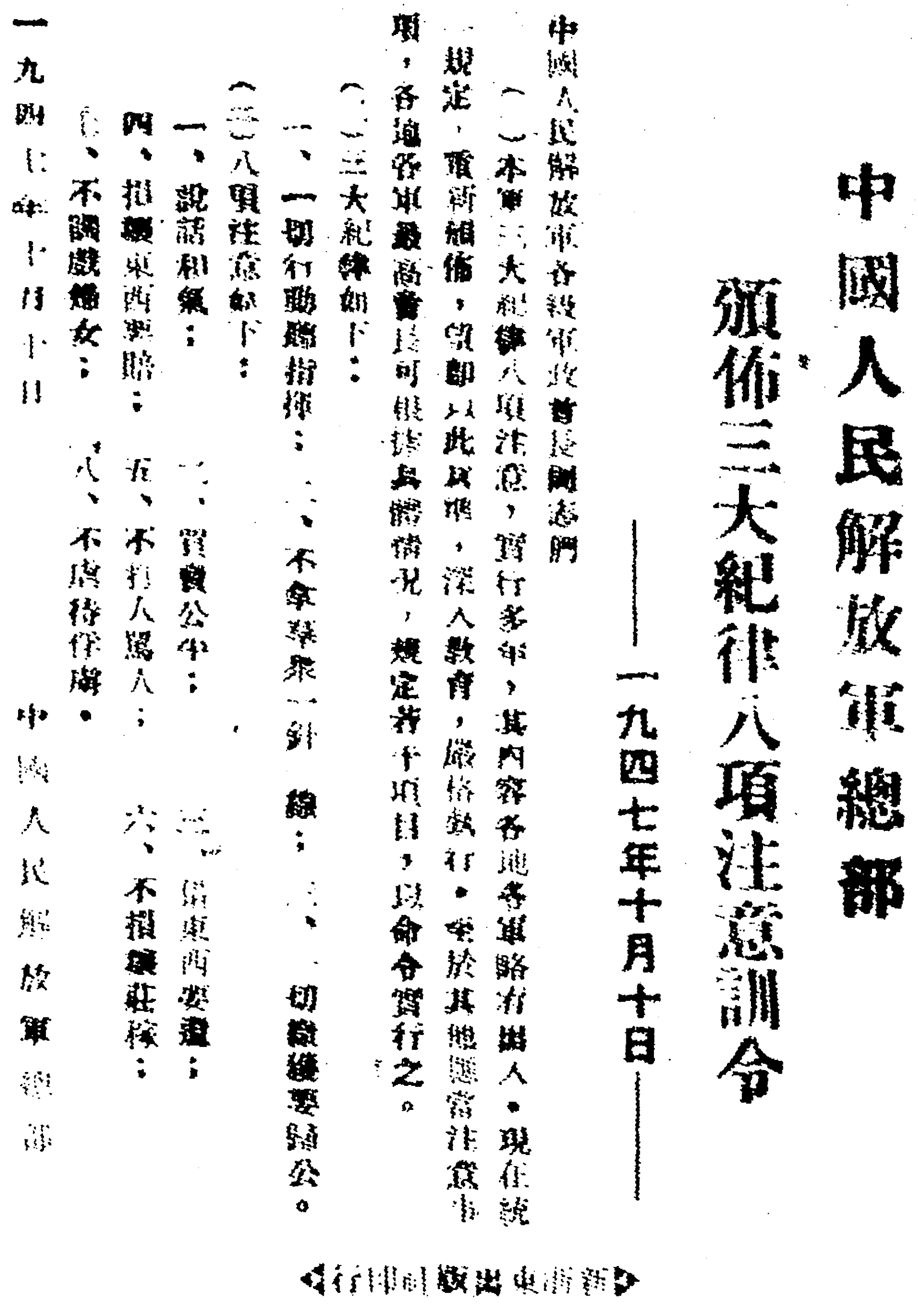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在红军初创时期，就已提出部队对待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不打人，不骂人。1928年春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规定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夏提出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从而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纪律，曾经是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

三、八项注意如下：

（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
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訓令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級軍政首長同志們

（一）本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多年，其內容各地各軍略有出入。現在統一規定，重新頒佈，望即以此為准，深入教育，嚴格執行。至於其他應當注意事項，各地各軍最高首長可根據具體情況，規定若干項目，以命令實行之。

（二）三大紀律如下：

一、一切行動聽指揮；二、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三、一切繳獲要歸公。

（三）八項注意如下：

一、說話和氣；二、買賣公平；三、借東西要還；

四、損壞東西要賠；五、不打人罵人；六、不損壞莊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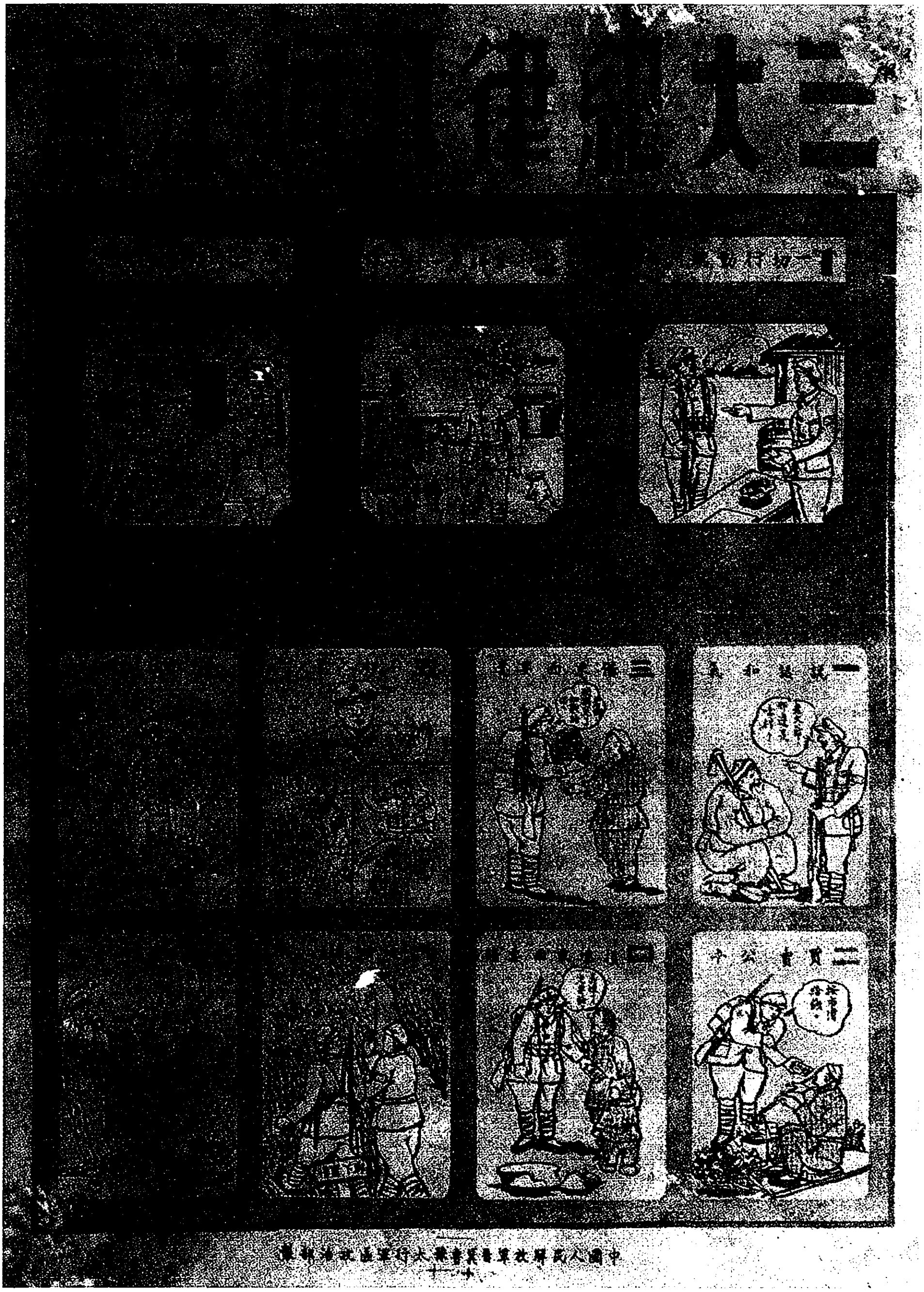
七、不調戲婦女；八、不虐待俘虜。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新華東出版同排行▶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批准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对多年来实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


三大紀律
一說話和氣
二買賣公平
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太行軍區政治部

晋冀鲁豫野战军太行军区印制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画。

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1947年10月10日）

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90%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20%至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二十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改革，已有巨大的成绩及丰富的经验。今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1947年，河北农民正在往墙上抄《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毛泽东和任弼时在陕北研究土改问题。

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1]

（1947年10月10日）

现在，我们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六十七条。你们接到后，应即发给全军指挥员、战斗员，逐条讲解牢记，认真实行。同时，在你们所到之处，你们应当将这些口号，向全国人民，向蒋党蒋军被欺骗被胁从的人们，普遍地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务使他们完全了解，万众一心，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的主要内容。

固守清涧杀伤消耗敌人待机举行反突击[1]

（1947年10月11日）

彭、张：

我已歼灭廖昂。刘戡所率五个旅及一个团，只有一个旅粮食可吃至明日，其余灰日即已无粮，全靠空投。在此情况下，如清涧城周围堡垒工事可资利用，地形又险要可守，请考虑以教新两旅中之一个旅部署固守，主力撤至附近休息，看形势能守几天即守几天（守一二天也好）。其目的是利用我之胜利与敌之被动、沮丧，吸引敌人攻我阵地而杀伤消耗之。假如敌攻我阵地三四天（以教新两旅换班守备），而我能屹立不动，敌人消耗甚大，主力又已恢复疲劳，则可在清涧城外举行反突击，以歼敌一团一旅为目的。假如此种反突击又告成功，则可扩大战果，再歼其一部。以上意图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军委

十一日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1]

（1947年10月11日）

各首长：

西北战场的情况与经验：（一）我王震王世泰两部[2]四个旅在渭水以北，咸榆公路[3]以东，黄河以西，洛川、宜川之线以南广大国民党区域活动，歼灭分散之敌，建立根据地。（二）彭张[4]率主力六个旅攻克延长、延川后，本日攻克清涧，歼灭七十六师师直、该师二十四旅旅直及该旅一个团，师长廖昂、旅长张新以下全部歼俘。（三）胡[5]军主力十个旅又一个团，上月底以来，部署于拐峁（延安东四十里）、延安、甘泉、富县之线，士气低落，进退两难。酉齐刘戡[6]率一师两个旅、九十师两个旅、二十七师一个旅及七十六师之一四四旅一个团，仓卒向清涧增援，昨（灰）晚行至清涧以西三十里地区被我阻击。该敌粮食全赖空投。胡宗南主力暂时被吸引于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

[2] 王震王世泰两部，指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和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王震和王世泰。

[3] 咸榆公路，指陕西咸阳至榆林的公路。

[4] 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5]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6] 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北，对于陈赓[1]等在豫西作战，王震等在渭北作战，甚为有利。（四）胡宗南本人已由延安返西安。西安、潼关线上之敌，为由临汾调来之三十师两个旅（该师为前冬在邯郸被歼后补充者）、一师之一六七旅（仅有一个完全的团，余为本年五月蟠龙被歼后补充者），由榆林空运来之三十六师二十八旅，由甘肃调来之骑二旅（该旅之一个团，五月在环县附近被歼后补充者）等部。估计该线敌至多只能以一部向阌乡[2]、灵宝进扰，对我陈赓兵团现在洛阳地区之作战不致有多大妨碍。从汉口郑州两处空运西安之六十五师两个旅，从运城空运西安之十师八十三旅，现为维持西荆公路[3]之目的，部署于商洛[4]、商南地区，对付我陈部两个旅在陕南之活动，亦无余力东进。（五）瓦窑堡有七十六师一个团（缺一个营，此次在清涧被歼），绥德有七十六师一个团及三十六师一六五旅残部，洛川有三十六师一二三旅残部，耀县、三原、淳化、旬邑线有新九、暂二两旅，陇东有马步青[5]两个旅及一个团，三边[6]有马鸿逵[7]三个旅，榆林有邓宝珊[8]一个旅，均任守备。（六）西北我军在彭副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

---

[1] 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

[2]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

[3] 西荆公路，指陕西西安至河南荆紫关的公路。

[4]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5] 马步青，原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五军军长、第四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946年国民党军整编后，未任职。

[6]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7]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8]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军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这一经验，望各首长转知所属，加以研究。对于若干干部似乎认为一定要有定期大休整，要有两三千人一个团的充实的大部队，要有大批民伕、大车随军使用，要有充分的后方粮弹供给，才能打大胜仗，稍有疲劳减员即叫苦连天的思想，转变为一切取给于敌，不靠后方接济，大大减少民伕、大车，节省粮弹，提倡不怕伤亡，连续战斗，善于利用两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进行短时休整（七天、十天或半月），善于捕捉战机，经常保持旺盛士气，多打胜仗，每战确保胜利，一切从打胜仗中解决问题的思想。这后一种思想，必须在各军巩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关内各军必须如此。即使有后方接济，亦决不可存依赖之心，必须将重点放在依靠前线，依靠野战军从前线自己解决问题。不但西北有此经验，各区自己亦必有这种经验，务望总

结起来，加深部队教训，争取大反攻胜利。

军委
酉真

中共发言人严正揭露
蒋美勾结行凶迫害民主人士*

（1947年10月12日）

蒋介石在屠杀民主人士时，无耻地说他们是共产党。蒋介石匪徒于七日在西安枪毙杜斌丞先生时，宣布杜是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实则杜先生为民主同盟的西北负责人，一生为民主事业奋斗，为西北人民所敬仰，并非中共党员。发言人说，蒋介石匪徒在上海为了要镇压工人的罢工运动，并为了要逮捕与屠杀罢工工人，伪造了所谓中共文件，说中共要破坏上海的电厂。匪徒们为了要迫害民主同盟，造出谣言说什么民盟接收了中共的地下工作，匪徒们在北平逮捕了许多表示不满的分子，包括若干高级官员在内。美国政府若干官员和美国的特务机关过去和现在，都替蒋介石当侦探，指示给蒋介石匪徒，谁是这种民主人士和不满的人士，使蒋介石逮捕和屠杀他们。现在被迫害的人们中，不少是曾经没有防备的对血腥屠夫魏德迈之流以及某些假装同情中国民主运动的美国官员明白表示过他们的立场的人们。发言人说，蒋介石匪帮现在对蒋管区民主运动实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说明了蒋介石匪帮对自己的统治能力业已丧失信心，因为人民解放军在一切战场上，包括山东战场在内，都已进入反攻，引起了匪徒们的惊慌失措，所以急于找寻杀人的借口，使人民不敢反抗蒋介石。但是屠杀将只会使反蒋运动扩大，独

裁者愈加疯狂好杀的时候，就是他愈加接近死亡的时候，中外历史已经千百次证实了这个真理。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和摄影记者张治宾谈话。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10月12日）

自你们进到鄂豫皖边区并立住脚跟，配合陈、粟在淮河以北，陈、谢在豫西、陕南，彭、张在西北，许、谭在山东，我军已完成了南线第二年作战的战略展开，并打了许多胜仗，迫使南线诸敌分散应付，处于被动，创造了我军在今后大量歼敌的条件。尚望各同志在刘、邓正确领导下，继续努力，团结全党全军，克服困难，完成伟大战略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转各纵队各旅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德怀等电[1]

（1947年10月13日）

行动时间，须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为有利。如刘戡在现地徘徊，则似宜先打宜川引其南退，然后打榆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两线

（1947年10月13日）

林[1]：

十二日十时电[2]悉。关内除李宗仁[3]系统可能抽调少数出关外，各战场蒋军均感兵力不敷应用，很难抽援东北。胶东整八师及某部前有抽调说，是否实行，尚待证明。你们攻克吉林后，应将主攻方向转至北宁平绥[4]两线。沈阳、锦州间，锦州、山海关间，山海关、天津间，天津、北平间，北平、张家口间均为很好作战地区。依据关内各战场经验，在敌尚有能力举行大规模进攻时期，因敌高度集中前进，我集中的大军很难求得运动战机会。在现时敌已被迫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2] 指1947年10月12日10时林彪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在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所在地区，敌完全采取守势，并以较多兵力防御。因此，不宜直接求得运动战，拟进攻吉林，力求攻占之，并求得打增援。对有些分散之敌，拟以次要力量歼灭之。依东北现有的敌我形势，关内如再增加四五个军来，敌出战的可能就多些，则能使东北得到更多的打胜仗的机会，同时也可以使关内我军减少负担。

[3]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

[4] 北宁线，指北平（今北京）经天津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平绥线，指北平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分散于黄河、长江间六七个战场上，采取战略守势时期，我集中大军更难求得运动战。但如我兵力不太大，则尚有许多运动战机会，且可大量歼灭分散守备之敌。故目前南线各军的野战机动兵团，大体都是以五个旅至十个旅的兵力组成之，其余则以纵队以旅为单位分散作战。你们今后野战兵团之组成，除若干特别情况外（例目前打吉林，将来打锦州或他处），亦应注意此种经验。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组成一个有九个师左右的头等野战兵团，几个有四个或五个或六个师的二等三等野战兵团，同时在几个区域机动作战。

毛泽东

十三日十六时

东西兵团的指挥和建制等问题

（1947年10月15日）

陈、粟[1]：

（一）我们意见，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让漱石[2]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胶东此次防御部署及反攻部署均甚适当，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及黎玉[3]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你们有意见向饶、黎提出。你们则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二）你们部队对外仍称华东野战军，对内则属晋冀鲁豫建制，以利部队补给及地方工作之统筹。一切后方补给事宜及地方工作干部之派遣等事，你们应尊重徐滕薄[4]意见，向他们报告情况，请他们指示办法。（三）因胶东、渤海、鲁中三区现在已可打通，渤海武装应即向黄河以南发展，故将原决定改变，渤海仍归华东局管辖，但该区对于你们的补给事宜，则仍归邯郸局统一筹划，以免分歧。（四）战局可能发展得快，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黎玉，当时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4] 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六个月内（十月至三月），你们各纵在河淮[1]之间作战，另准备以原淮南独立旅恢复淮南。六个月后（约在明年四月），你们须准备以一个或两个纵队出皖浙赣（不是闽浙赣）边区。那时拟由刘邓[2]方面派一个或两个纵队出湘鄂赣边区。当你们派部出皖浙赣时，拟由许谭所部四个纵队中抽出一个加强你们西兵团兵力，但此是预计，须待那时考虑方能决定，现时不要通知他们。（五）我们发给你们电报中，有许多未接你们复电，不知你们是否收到及是否同意。嗣后，你们收到我们电报，请复电说明收到某日某时电，同时对该电内容哪些可以实行，哪些与情况不符不能实行，表示你们具体意见。

毛泽东

十五日二十二时

---

[1] 河淮，指运河和淮河。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陈谢部休整后的行动部署[1]

（1947年10月20日）

陈、谢、韩：

十七日九时电悉。（一）四九两纵休整时间可延长至本月底，下月一日开始行动。（二）我陈粟[2]八纵三个旅活动于郑汴线[3]以南、郑许线[4]以东地区，六纵主力两个旅活动于许昌、确山线以东、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三）敌五师主力两个旅在漯河对付我八纵，敌十师两个旅及骑一旅在许昌一带对付我六纵，均任守备，不敢进攻。（四）你们休整完毕后行动部署：甲、拟以一个旅破平汉路[5]。因许昌以北敌力较大，应直向许昌、武胜关段及武胜关以南机动破袭，吸引十师向南，然后转破许昌以北。该旅应充分准备破路器材，研究破路方法。该旅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专任钻隙破路，不作别事，要有机动灵活之干部去领导。乙、一个旅位于新、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郑汴线，指郑州至开封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4] 郑许线，指郑州至许昌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5]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伊、嵩[1]，剿匪、分财、分田，与卢氏打通并监视洛敌。丙、主力五个旅，第一步分数路同时出动，相机攻占陇海以南、平汉以西、方城、南召、舞阳之线以北诸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发动群众，分地主粮食、财物。第二步看形势集结兵力，歼击由洛、郑、漯、许[2]可能向我前进之敌，但遇五师主力则避开之，遇三师、十师等部则各个歼灭之。如洛、郑、漯、许之敌取守势，则延长第一步作战方案之时间。以上方案是否适当，望召集前委会研究电告。（五）十二旅及十七师亦休整至月底为止。下月初除留一部于卢氏及西荆公路[3]以东剿匪、分粮、分财、分田以外，主力下月初西进，分几个步骤攻占陕南七八个县，歼灭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建立根据地。陕南较贫，但建立根据地有战略意义，要说服指战员具有艰苦奋斗之决心。

军委

二十日十二时

---

[1] 新、宜、伊、嵩，指河南新安、宜阳、伊川和嵩县。

[2] 洛、郑、漯、许，指河南洛阳、郑州、漯河和许昌。

[3] 西荆公路，指陕西西安至河南荆紫关的公路。

组织野战机动兵团及分散作战的部署

（1947年10月20日）

陈、粟[1]：

铣辰[2]电悉。迭获胜利，甚慰。

（一）鉴于叶陶[3]两纵及王秉璋[4]纵减员较大，该三纵休整时间可以延长一至两星期。

（二）你们全军除休整者外，酉戌[5]两月均依现态势分散作战及工作。亥月[6]初起，集中六个至九个旅，组成一个头等野战机动兵团，打中等规模之仗，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明年一月以后，看形势再组成一个至二个各包含四个至六个旅的二等三等野战机动兵团，其余仍分散作战及工作。直至民团、保甲、土匪及小股敌军大体已经歼灭，群众分粮、分财、分田任务大体已经完成，人民武装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铣辰，即16日9时。

[3] 叶陶，指叶飞、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4] 王秉璋，1914年生，河南安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该纵队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5] 酉戌，即10月、11月。

[6] 亥月，即12月。

已经发展，方可将全部二十个正规旅转为野战军，但仍须分属两三个野战兵团，最大之野战兵团在至少半年内不要超过九个旅。因为敌已被迫分散，今后还将更分散，集中太大兵力，吓跑敌人，打不到运动战，但若集中不大不小之兵力，则不但可以大量歼灭守备薄弱及中等守备之敌，而且可以调动敌人打运动战。望本以上意图部署兵力及工作。

毛泽东
二十日十二时

同意三军举行大破平汉路战役[1]

（1947年10月21日）

刘、邓，陈、粟，陈、谢：

（一）刘邓巧电提议，十一月二十日左右三军举行大破平汉路[2]战役，使三区打通，使敌分割支解，以利分别歼击，我们认为极为必要，且有胜利把握。但不知陈粟方面时间上来得及否，是否能集中九个旅打较大之歼灭战。（二）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甲、照刘邓巧电，三军同时破平汉。乙、刘邓、陈谢两军为主，陈粟一部（在沙河以南者）为辅，担任破平汉，时间推迟至十二月上旬举行，陈粟主力则于十一月下旬举行大破陇海战役，断徐郑[3]交通并吸引五军东援，以利平汉得手。以上两案何者为宜。（三）陈谢本月底休整完毕，十一月初开始攻击嵩山区及以南各县，准备十二月上旬协同刘邓破平汉。（四）以上请复。

军委

酉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3] 徐郑，指江苏徐州和河南郑州。

攻石门打援兵的部署[1]

（1947年10月23日）

聂、萧、刘、黄、罗，并告朱、刘，杨、杨[2]：

二十二日十二时电[3]悉。清风店大歼灭战[4]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和副政治委员刘澜涛、黄敬、罗瑞卿的电报。

[2] 朱、刘，指朱德、刘少奇。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二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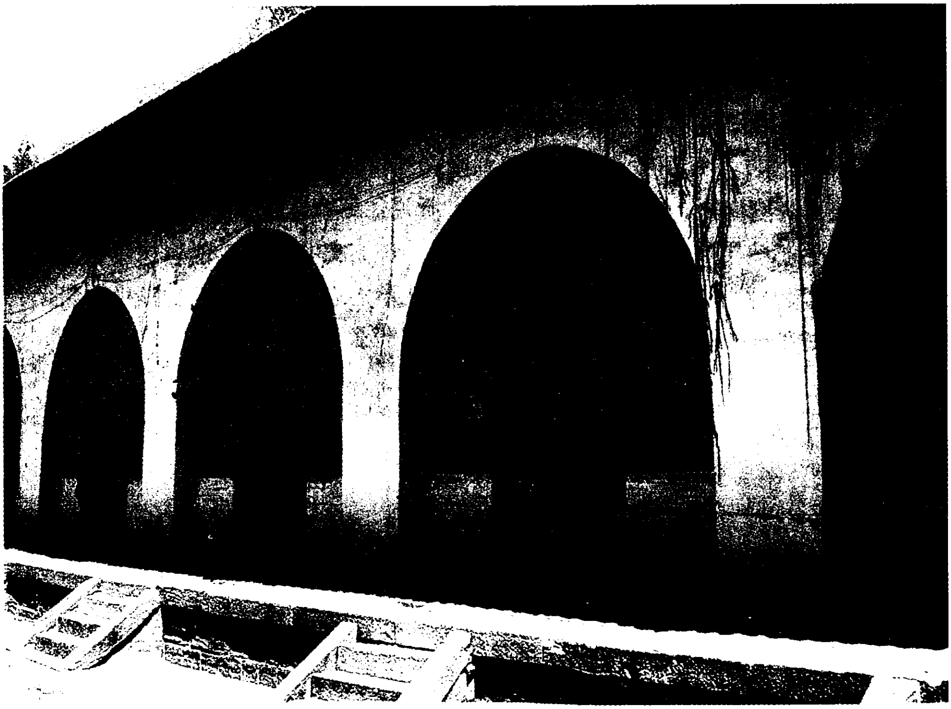
[3] 指1947年10月22日12时聂荣臻、萧克、刘澜涛、黄敬、罗瑞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22日晨敌第三军第七师及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共4个团及1个军部和师部）在望都、定县之间被全部歼灭，现石门仅有3个正规军及1部伪军，晋察冀军区拟乘胜夺取石门。

[4] 1947年10月11日，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破击了徐水至固城段铁路，第二纵队主力包围了徐水，并发起攻击。为解徐水之围，蒋介石急调5个师的兵力，自霸县、涿州地区沿固城、容城南下增援。晋察冀野战军以一部围攻徐水，主力与援敌激战于徐水东北地区。15日，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北上增援。晋察冀野战军立即以主力隐蔽南下，19日将该敌包围于清风店地区，激战54个小时，于22日全歼敌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及第六十六团，俘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第七师师长李用章，击落、击伤敌机各1架。

疲劳，侦察石门[1]，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军委

二十三日十二时



1947年，毛泽东在佳县神泉堡的旧居高家大院。

---

[1] 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1947年秋，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

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等电[1]

（1947年10月23日）

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历戎，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2]，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并告各首长电的主要内容。耿飚，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

[2] 晋察冀野战军于10月19日至22日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1.7万余人。

同意陈粟提早集中主力大破陇海路[1]

（1947年10月24日）

陈、粟，并告刘、邓，陈、谢[2]：

篠午电[3]悉。（一）陈粟决定提早集中主力大破陇海路，孤立徐州，甚好。惟集中兵力时，各新占区域应留下适当兵力，继续分散工作；破路时间以十一月上旬开始为好。（二）陈谢日内开始东进，攻占平汉[4]以西各县，十二月初协同刘邓大破平汉路。那时，陈粟陇海战役应已完毕，并获得短时休息，亦可协同破平汉路。（三）精密研究破路技术（东北铁路大翻身办法又快又彻底，你们应采用），很好地组织破路战役，求达彻底破路与大量歼敌两项目的，但不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指1947年10月17日11时陈毅、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分割敌人，打通我南北东西之交通，尔后便于主力自由回旋于豫皖苏广大地区，有力配合陈谢部队平汉线之行动，决于10月底前后以一、四、六、八、十、十一纵队及地方武装，展开对陇海路徐州至郑州段的破击，完全孤立徐州。

[4]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无把握之仗。（四）陈粟、陈谢两方电台速即沟通，互通情报。

军委

二十四日十四时

1947年10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陕北佳县神泉堡。

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1]

（1947年10月26日）

一

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

---

[1]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以后，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的刘航琛提出了一个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的方案。为了揭露这一方案是美蒋缓兵之计的阴谋，同时纠正党内部分同志认为可以利用它促蒋下台的错误认识，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修改这个中央指示稿时加写的第五条。本篇二是毛泽东审改中央指示稿后写给周恩来的信。该指示于1947年10月27日下发。

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

二

周副主席：

指示电很好，很有必要。惟须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将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完全弄清楚，预防过左倾向发生，这一倾向，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

此电当作普遍指示，发往各地。投降主义不要分对敌对阶级，这是一个问题。临时迂回可能，亦须指出[1]。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

[1] 毛泽东在修改中央指示稿第三条时，对必须揭露各种伪装的反蒋分子企图混入反蒋阵线，迷惑人民，继续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阴谋问题加写了一段话：“但如果我们事先的揭露工作做得不够，南方及各大城市人民群众的多数竟被刘航琛一类计划所迷惑时，我们为争取群众起见，亦可能采取某种临时迂回方法，达到觉醒群众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之目的。”

对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稿的修改和批语[1]

（1947年10月27日）

一

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对于在平分土地后生长出来的新富农，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左性急是错误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二是关于修改和发出这一指示给周恩来的信。刘航琛，当时被聘为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提出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以为美蒋的缓兵之计。

二

指示电很好，很有必要。惟须增加一条，作为第五条，将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完全弄清楚，预防过左倾向发生。这一倾向，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此电当作普遍指示，发往各地。

致刘少奇电[1]

（1947年10月31日）

朱总到杨、杨[2]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最前线。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

对佳县县委的指示[1]

（1947年10月）

全国胜利已经为时不远了，用不了五年，三年就差不多了。只有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才能获得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负责同志要带领群众搞好土改，做好支前工作，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了佳县县委负责同志汇报的土改情况后给他们的指示。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7年11月2日）

邓宝珊东晚八时抵扎萨克，据称援兵陆续赶到。你们除以主力攻城外，必须以有力兵团准备打邓援兵，务不使入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民盟的教训[1]

（1947年11月3日）

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

---

[1] 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发表解散公告。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事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文章说，这一事件，使人民更加确切地认识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盟的光荣。在民盟中，既有许多坚决反对蒋介石独裁和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主战士，并有一些人例如闻一多、李公朴、杜斌丞等，为此献出了他们的生命；也有许多虽然一面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独裁，但在另一方面却不但过去而且现在仍然对蒋介石，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抱有某种幻想的人物。而中国民主运动的基本特点，乃是武装的革命人民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集团。蒋介石解散民盟和大施迫害民主分子的恐怖行动，只能教育人民，要有自由、真正的和平，就必须坚决用武力来打倒蒋介石，拥护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决不能依靠任何和平的合法的改良的方法。本篇是毛泽东在修改这篇文章时加写的一段话。1948年1月，沈钧儒、章伯钧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领导机构，恢复活动。全会指出，过去我们以和平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已经失败，今后应积极支持以人民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武装，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同时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和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幻想，在人民与反人民、民主与反民主的问题上绝不能有中立的态度，中间路线是行不通的。

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1947年11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和王明、谢觉哉商议宪政促进会的工作。

对胡宗南企图打通陇海线应取的方针[1]

（1947 年 11 月 4 日）

陈、谢、韩：

胡宗南利用我陕北主力攻榆林时间，将第一师两个旅、三十六师一个半旅调至潼关，协同三十师、六十五师进攻豫西，目的在恢复陇海交通。在此情况下，我十二旅及十七师应停止西进，位于卢氏地区监视六十五师，掩护四九两纵现在向东、尔后向南之作战，五十五师及查旅[2]一个团位于现地，监视西面诸敌。你们应准备陕、灵、阌、渑、洛诸城全部失去，而只坚持乡村，黄河南北交通暂时断绝。待你们在东面及南面打开局面，并寻机歼灭李铁军兵团[3]一部或数部之后，在胡军已分散在陇海线之后，即可找到歼灭胡军重占陇海之机会。

军委

四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和常委韩钧的电报。

[2] 查旅，指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旅长查玉升。

[3] 李铁军兵团，指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郑州指挥部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官李铁军。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7年11月4日）

你们应将重心放在打援方面，只要援敌歼灭榆城可从容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攻取榆林城和打援的问题[1]

（1947年11月5日）

彭、张：

（一）据马[2]部情况及经横山里程估计，至快要灰日才能到榆城附近。（二）邓[3]部援兵三个团及炮兵一部，我以八个团加四六两团，似有把握将其歼灭或击溃。（三）但未知攻城作业确能于你们昨电所称三日内完成，并能于灰日以前攻克榆城否。（四）如十个团打邓，八个团攻城确有把握，并于灰日以前取得打邓攻城两项胜利，则可照你们原定计划执行不变；否则应改变计划，停止攻城，集中全力先打邓，再打马，然后攻城。究应如何，望酌情处理。（五）请考虑调王世泰纵队[4]，由延长取捷径，以六至七天行程到达横山地区，打马部后路。

军委

五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西北行辕副主任。

[3] 邓，指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4] 王世泰纵队，指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王世泰。

充分准备彻底破毁陇海路汴徐段[1]

（1947年11月6日）

陈、粟：

（一）陈谢[2]四日电，他们已占领登封、鲁山、宝丰、临汝、郏县，歼杂顽及民团四千余。敌五师一部到襄城，三师、二十师、四十七师到临汝、郏县附近。（二）你们休整情形如何。望以彻底破毁陇海汴徐段[3]为目标，进行充分准备工作，尤其要研究破路技术，开各种干部会，指示具体办法，于戌真以后发起破路，配合陈谢行动为盼。

军委

戌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汴徐段，指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我们完全有把握
彻底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1]

（1947年11月6日）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国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时加写的一段话。这篇社论发表在1947年11月9日《人民日报》。

庆贺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致斯大林元帅电[1]

（1947年11月6日）

斯大林大元帅：

我们代表正在为独立民主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热烈庆祝伟大十月革命的三十周年，庆祝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先驱——苏联日益强盛，庆祝中、苏两大民族的伟大战斗友谊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　德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在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周年之际给斯大林的贺电。

给傅连暲的信

（1947年11月10日）

连暲同志：

来示悉。很感谢！我身体近来更好些。你身体有病，望于工作中保重。此祝

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

对敌援军宜先打十八师[1]

（1947年11月11日）

彭、张：

对敌援军先打何部，日内即须决定。邓宝珊[2]在扎萨克[3]未动，所谓十七师及西安空运部队似均虚张声势，至多不过三五千人，在十八师接近榆城之前，该部亦不敢迫近榆城。十八师则有于十四日接近榆城可能。因此，我军似宜确定打十八师，先歼其一个旅，再歼余部，望酌定。打十八师须携带数天粮食。

军委

十一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

[3] 扎萨克，旧旗名，1959年与郡王旗合并为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

东北局应全力加强军事工业建设支援全国作战

（1947年11月13日）

林[1]，并告朱、刘[2]，东北局：

八九两日电[3]悉。（一）新部署甚好。（二）清风店胜利后，石家庄又被攻克。杨杨[4]部休整短期后，即可至平津保[5]三角地区作战。晋察冀野战军及后方工作，近已改变作风走上正轨，冬春两季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2] 朱、刘，指朱德、刘少奇。

[3] 8日电，指1947年11月8日林彪给毛泽东并朱德、刘少奇的电报。电报说：过去50天（9月14日到11月3日）作战，共歼敌6.8万余人（内俘敌近5万人）。吉林佯攻战即将结束，因守敌近两万人，地形险要，工事坚固，故始终未硬攻。9日电，指1947年11月9日林彪关于冬季攻势的行动部署给东北民主联军各兵团首长并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以3个纵队及总部炮兵进至康平、法库地区，配合七纵准备以各个击破的方法，歼灭法库、康平、彰武等地区之敌并求得歼灭增援部队。今冬明春，三、四纵队担任在开原至营口线上寻求战机，一、二两纵须作西进的行动准备。各兵团凡遇有利机会，则应单独自动歼灭敌人，如需要其他部配合时，则应报告上级，以求得配合。

[4] 杨杨，指杨得志、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二政治委员。

[5] 平津保，指北平（今北京）、天津和河北保定。

可与你们配合作战。（三）南线陈粟、刘邓、陈谢、许谭、彭张[1]五军均已完全取得主动，一切困难均可克服。敌已完全陷入疲于奔命的被动地位。（四）望东北局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

毛泽东
戌元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电[1]

（1947年11月13日）

庆祝晋察冀我军攻克石家庄歼灭二万余人之大胜利。

尚望团结全军继续寻机歼敌，争取冬季作战之大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杨得志、杨成武、耿飚电的主要内容。

对集结之敌的打法[1]

（1947年11月14日）

彭、张：

如敌集结一点不能歼灭，请考虑以一部监视正面，全军主力转至敌后，向三边[2]方向前进数十里至百余里，迫敌后撤回救，然后于运动中歼灭之。

军委

十四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三边，指陕西西北的定边、安边和靖边。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7年11月16日）

在十八师向榆林靠拢情况下，我军宜乘虚进攻三边。该地只有几个保安团，较易解决，并吸引十八师回援，歼其一部。该地为十八师，准备的粮食必不少，吃的问题可能解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晋察冀野战军准备配合东北作战

（1947年11月17日）

杨、罗、杨、耿[1]，并中工委，军区[2]，告林彪[3]及东北局：

十五日二十二时电悉。

（一）同意移至晋县，休整三个礼拜，然后配合东北作战。

（二）东北本月下旬开始新战役，若你们能于下月中旬开始新战役，则可起有力配合作用。

（三）你们应准备于结冰期间四个月内（十二月至三月），进行几个战役，争取切断平津、平保及可能时平张等铁路，夺取铁路及其附近可能夺取之城市据点，歼灭在这些铁路城市据点及其附近之可能歼灭的敌人，准备和东北我军直接配合作战。这一计划应包括每一战役后必须休整的时间及必须补充的人力、物力在内。

（四）休整时政治上着重土地教育，军事上着重攻坚教育。

（五）迭获胜利后，干部骄傲轻敌之心理必然会发生，你们应严格防止之，首先是领导者自己应防止此种心理之发生。

---

[1] 杨、罗、杨、耿，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指晋察冀军区。

[3] 林彪，当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六）彭聂萧黄[1]着重注意以生产及缴获之炮弹、炸药的一部分，供给西北彭张[2]野战军，并以一部分新兵补充彭张，将此作为自己的任务，放在自己经常的供应计划内（徐滕薄[3]已实行此项计划，你们尚未实行）。

军委
戌篠

---

[1] 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黄，指黄敬(1912—1958)，浙江绍兴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

[2] 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致晋察冀中央局等电[1]

（1947年11月17日）

你们妇委五人联名于申宥[2]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央已于酉鱼[3]复电，同意你们提出的今后妇女工作方针。现再将该两电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参考，以引起他们对妇女工作更多的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致晋察冀中央局转杨之华电的主要内容。杨之华，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女部部长。

[2] 申宥，即8月26日。

[3] 酉鱼，即9月6日。

给陈瑾昆[1]的信

（1947年11月18日）

瑾昆同志：

十月八日来示敬悉。国内外大势观察正确，不会有第二个方向，进度亦快，不会稽延不决，诚如尊论。惟我们宁可作从长打算，估计到一切可能的困难，以自力更生精神，准备付以较长时间，似属有益。兄及诸同志对于宪草惨淡经营，不胜佩慰。惟发表时机尚未成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即拙著《新民主主义论》及《论联合政府》中所指之基本原则），详由王谢[2]二同志面达。弟身体有时略有毛病，大体尚好，勿以为念。天寒尚祈珍摄。

敬祝

安好！并问陈夫人及诸小弟妹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江青附笔祝全家安好！

---

[1] 陈瑾昆，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2] 王，指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谢，指谢觉哉，当时是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给吴玉章[1]的信

（1947年11月18日）

玉章同志：

来示及意见书，收到读悉。尊体日益强健，热情甚高，极为快慰。贱躯虽间或有些小毛病，但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向川陕鄂边发展根据地一事，业已有所部署，其详请问叶参谋长[2]。宪草尚未至发表时期，内容亦宜从长斟酌，以工农民主专政为基本原则，详情由王谢[3]二同志面达。天寒尚望保重身体。

敬祝

安好！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

[1] 吴玉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2] 这是当时对叶剑英的习惯称呼。抗日战争时期叶剑英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

[3] 王谢，指王明、谢觉哉。

给张曙时[1]的信

（1947年11月18日）

曙时同志：

十月十七日来示读悉。法律工作是中央新设领导工作的一个部门，兄及诸同志努力从事于此，不算“闲居”。将来时局开展，出到外面工作，自属必要。目前则在激烈战争中，年老的人出去，似乎尚非其时。法律本于人情，收集各解放区实际材料，确是必要的。关于宪草的意见，托王谢[2]二同志转达，不赘。贱体粗安，承问极感，天寒尚望珍摄。

敬候

起居健吉！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

[1] 张曙时（1884—1971），江苏睢宁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

[2] 王谢，指王明、谢觉哉。

给吴创国[1]的信

（1947年11月18日）

创国同志：

十月二十五日来信读悉，甚为感慰。消灭一切敌人，你的志向很对。你对农民土地斗争所表示的热情非常之好，你的诗也写得好，我就喜欢看这样的诗。你年纪高，望保重身体！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

[1] 吴创国（1888—1960），湖南平江人。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长期从事职工运动。解放战争时期曾在农村参加土地改革。

致王震等电[1]

（1947年11月22日）

各电均悉。（一）攻运[2]未克，打援又未全歼，指战员中引起一时情绪不好，是很自然的，但我军精神很好，一二次仗未打好并不要紧，只要你们虚心研究经验，许多胜仗就在后头，望将此意向指战员解释。（二）同意二、八两纵择地休整一时期，然后找阎锡山打几仗；然后两纵同出渭北，协同西北主力歼灭胡宗南，有力地配合陈、谢。（三）在你们休整及打阎期间，注意编组新的地方军，并带领一同训练与作战，几个月后代替八纵在晋南的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王震、王新亭及彭德怀、张宗逊、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贺龙、习仲勋，并告陈赓、谢富治电的主要内容。

[2] 运，指运城。

出击三边及进攻榆林问题[1]

（1947年11月23日）

彭、张，并告贺、习：

昨今两电悉。（一）主力依原计划休整不动。（二）四纵及三边兵团[2]可日内出动，首先占宁条梁，虚张声势，可能迫使十八师径回宁夏。如对安定盐[3]有把握，则于占宁条梁后择一城攻占之，如无把握，则不如不打，而向安定盐以北扰击十八师，不致暴露我之虚实。（三）榆城现已增加绥远一个团，西安空运至扎[4]之八十三旅一个营亦可能日内进城。我军粮食炸药两项是否有足够把握攻克榆林，请全盘考虑见复。如有把握，则主力于休整十日或半月后，以一部占扎东，其余打榆城，否则只好放弃北线计划。

军委

二十三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并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和政治委员习仲勋的电报。

[2] 三边兵团，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当时该旅兼三边军分区。

[3] 安定盐，指陕西安边、定边和宁夏盐池。

[4] 扎，指扎萨克，旧旗名，1959年与郡王旗合并为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

给大连大众书店、大众书店同人自治会、大众印刷厂全体职工的信

（1947年11月23日）

大连大众书店、大众书店同人自治会、大众印刷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你们送来的书及钢笔、表均收到，谢谢你们的好意，并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陈赓部队目前的中心任务[1]

（1947年11月28日）

陈赓：

二十七日电[2]悉。你的意见值得考虑。十二月你们应以配合刘邓[3]破击平汉路[4]及歼灭土顽为中心，明年一月起，准备打胡宗南[5]。最近你们歼灭很多土顽，有大的战略意义。

军委

二十八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的电报。

[2] 指1947年11月27日13时陈赓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军应在今冬明春大量歼敌。若此时不能大量歼敌，将增加明年下半年作战的困难。目前必须几个力量配合或集中作战，现集中打胡宗南是机会。建议陕甘宁边区主力及王震、王新亭部迅速转至渭北，我四纵集中11个团由西荆公路直趋渭南，与彭总集中歼灭胡宗南部为好。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5]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7年11月28日）

依大局看，以放弃北线计划，集结训练一个月，配合陈、谢打胡为有利。但如十二月能确有把握攻克榆城，亦可考虑第三次攻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并告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致粟裕等电[1]

（1947年11月28日）

在划定给你们之区域内（黄河以南，运河以西，平汉及淮南铁路以东，长江及淮河以北，以淮南铁路及淮河为你们与刘、邓之分界），以今年九月初至明年八月底之一年时间，做到完成土改、消灭敌人两大任务，将此两大任务明确告之各级一切干部，并领导他们与刘邓、陈谢两军比赛，有步骤地完成任务，不要落在友军之后。

在明年八月以前不准备派主力部队渡江，各部均要在现地安心工作与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粟裕（陈毅已去中央工委）并告晋冀鲁豫局，华东局，中原局及张云逸、邓子恢电的主要内容。

在土地改革中注意纠正“左”倾错误[1]

（1947年11月29日）

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带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正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须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的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

---

[1] 194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等发出指示说：“一九三三年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发之《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其中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项政策是过左的错误政策，但关于阶级成分的规定（即两项文件的主要部分）则是基本上正确的。现将该两文件之错误部分及与阶级分析无关部分删去，经新华总社电告，当作你们的参考文件。望你们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参考此项文件，提出关于阶级成分分析的明确意见电告，然后由中央制定统一的正式文件，公开发表。”本篇是毛泽东修改这个中央指示稿时，在第四条“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者”一句后面加写的一段话。以后，中共中央对这两个文件再次修订、加注，于1948年5月25日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供各级党委在土地改革中应用。

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中共中央发言人严斥蒋美肮脏买卖*

（1947年12月2日）

蒋介石匪帮与美国帝国主义者之间，最近又秘密地谈妥了一宗肮脏的买卖，蒋匪已同意美国帝国主义的要求，把中国海关当作向美国借款的抵押。自血腥屠夫魏德迈来华考察以来，美国帝国主义已经过蒋介石匪帮攫去了中国多项国家主权。魏德迈在华期间，蒋介石匪帮卖给美国帝国主义的，有八个军事基地，一个海军基地，三个空军基地，三个基地网和在两广投资三亿五千万美元的权利。九月六日美人杨格就任平准基金委员会顾问，他和他带来的一批美国人，就实施了对于蒋匪政府金融的监督权。十月十七日蒋匪政府外交部照会允许美国在中国驻兵，这样就把驻兵权正式送给了美国帝国主义。十月二十七日签订的所谓中美救济协定，蒋匪政府又把对于救济物资以及中国生产及由外国输入的同类物资的监督权给了美国帝国主义。十一月十日签订的所谓美国对华教育基金协定，就是蒋匪政府把文化教育监督权送给美国帝国主义的协定。此外，美国帝国主义已在蒋军的训练方面取得了日益增多的权利，并且正在企图组织像存在于希腊的以美国人为主的联合参谋部，以获得对蒋军的指挥权。最后，蒋介石匪帮又出卖了海关主权。蒋匪自七月以来出卖了如许国家主权，他所到手的美国借款，仅是二千七百七十万美元的所谓“粮食救济”。尚未到手而可能到手的只有去年九月十

二日签订的美棉贷款六千七百万美元，十一月十一日马歇尔所宣布的三亿美元，以及最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所提出的临时援助六千万美元而已。自从人民解放军反攻以来，美国反动派已经看出蒋介石匪帮在反对中国人民的斗争中，是一条“扶不起的癞狗”，任何援助也不能挽救这条癞狗的死亡。美国帝国主义者极端仇恨中国人民，然而中国人民既然证明是不可能战胜的，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就唯有给癞狗以吃不饱饿不死的“援助”，以延长其寿命，延长中国的内战，延长中国人民的痛苦。但是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神圣主权的侵略是决不放松的，在蒋介石匪帮形势更加危险的时候，贪婪而吝啬的金元帝国主义者就提出日益苛刻的条件，用更少的钱使蒋介石匪帮出卖更多的国家主权。美国帝国主义者中随便何人，不论张三李四，乌龟王八，只要高兴就都可以把癞狗蒋介石训斥一顿，蒋匪不但不敢出一口气，而且还要表示接受。

一切爱国的中国同胞，要想收回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就只有实行今年双十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的内容，加速打倒蒋介石匪帮。最后清算窃国大盗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蒋介石匪帮与美国帝国主义进行罪恶买卖所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蒋介石匪帮与美国帝国主义者负完全的责任。

同意再打运城[1]

（1947年12月4日）

徐、滕、薄：

江辰电[2]悉。（一）同意你们打运城[3]。（二）王震纵队[4]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仍无把握。（三）彭张主力本月休整，下月上旬向渭北出动。王震纵队须于该时西渡，勿误。

军委

亥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的电报。

[2] 指1947年12月3日9时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电报。电报说，运城敌守备兵力约5000人，士气甚低。城内物资极丰，武器弹药甚多。潼关之敌已陆续分散，顾虑较少。拟集中第二、八纵队和独立旅，再攻取运城。

[3] 1947年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等部开始围攻运城，历经一个多月，未能攻克，仅歼敌3700余人。12月17日，第八纵队和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等部再次对运城发起围攻，激战至18日上午攻占全城，全歼守敌整编第十七、第三十六师各一个团及地方保安团队，缴获军用物资甚多。

[4] 王震纵队，指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

刘邓军明年的任务[1]

（1947年12月4日）

刘、邓：

（一）你们全军（除陈谢）明年八月以前在长江以北作战，完成创造大别山、桐柏山及江汉区根据地，并与陈谢、陈粟两区联成一片之任务。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二）为着准备执行上述计划，请考虑目前开始派少数地方工作人员或少数游击支队南渡，求得生根。请清查张体学旧部[2]中是否尚有熟悉鄂南情形的人，足以派去负此责任（张体学本人暂时不去）。到明年夏季，则准备派一个较大的游击支队南渡。以上均为先遣部队。此种人员及部队须加以训练，然后派去。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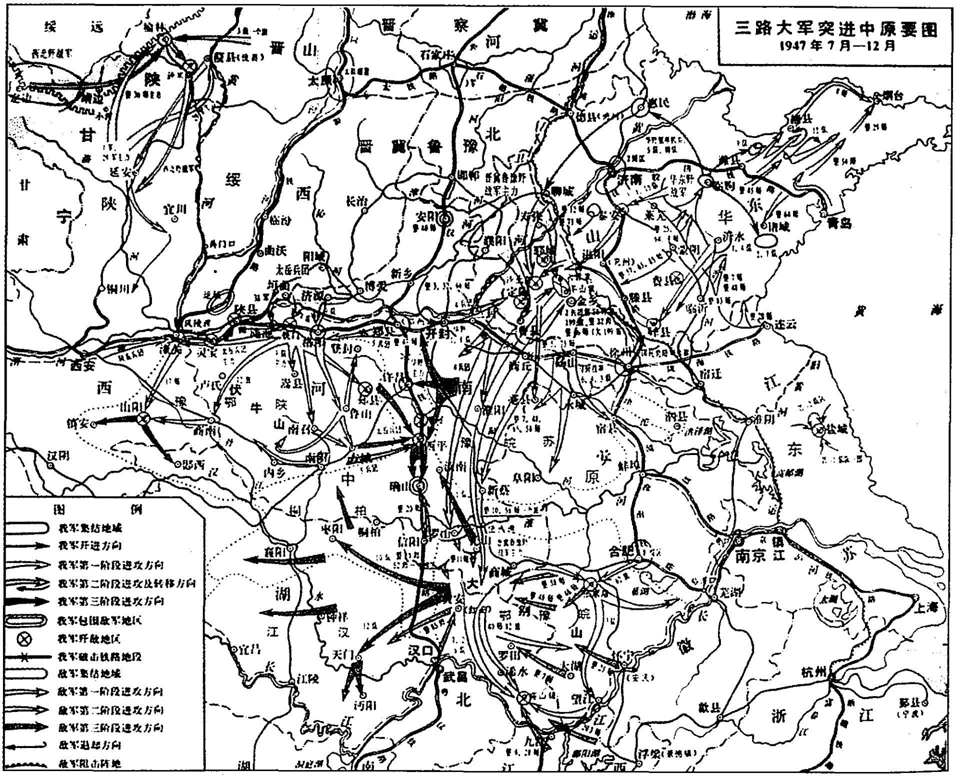
亥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张体学旧部，指原中原军区鄂东独立第二旅，旅政治委员张体学。

1947年7月开始，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大反攻。图为刘邓大军夜渡黄河和挺进大别山。


三路大军突进中原要图
1947年7月—12月
图例
我军集结地域
我军开进方向
我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我军第二阶段进攻及转移方向
我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
我军包围敌军地区
我军歼敌地区
我军破击铁路地段
敌军集结地域
敌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敌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敌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
敌军退却方向
敌军阻击阵地
延安
宜川
石家庄
太原
安阳
济南
青岛
烟台
西安
洛阳
郑州
开封
徐州
许昌
信阳
合肥
南京
上海
杭州
汉口
武昌
襄阳
宜昌
渤海
黄海

三路大军突进中原要图。

建立空军已成党的迫切任务[1]

（1947年12月5日）

建立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你们对此有何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47年12月5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电报上加写的一句话。周恩来的电报说：“你处关于建立空军的准备工作，如飞机集存的数量、种类，修理装制的能力，机件汽油的储备，空军人员的训练和数量，空军基地，航空站及工厂的准备以及可能发展的条件等等，统望电告。”

复杨得志、罗瑞卿等电[1]

（1947 年 12 月 7 日）

下一步作战方针，以歼灭敌人为原则，至于何时在何地打及如何打法统由你们依情况决定。东北方面冬季作战本月中旬可打响，你们二十日以后开始打甚为适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耿飚并告彭真、聂荣臻、萧克、黄敬，中央工委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7年12月8日）

因为敌人向大别山进攻，刘、邓已停止破平汉计划，这是对的。请陈、谢考虑是否仍有单独破击许信段[2]铁路之必要，如陈、谢以五个旅破该段，第一可使该路暂时切断，第二可将李铁军调至东边，以利下一步向西行动，但是否可行望按实情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赓、谢富治并告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2] 许信段，指平汉路许昌至信阳段。

粟部与陈谢部配合攻击平汉路[1]

（1947年12月9日）

粟，并告刘、邓，陈、谢：

八日八时电[2]悉。（一）如无重大不便，粟部以攻击平汉郑许段[3]以配合陈谢攻击许信段[4]为宜。郑许战役结束后，再打开封，并彻底平毁陇海郑州、兰封[5]段似亦方便。（二）如粟定于十三日攻郑许段，则陈谢攻许信段时间，可与粟同时举行，亦可提早几天举行。

军委

九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7年12月8日8时粟裕给刘伯承、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和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的电报。电报说，华东野战军西兵团原拟肃清菏泽外围之敌，相机攻占菏泽，主要为吸引援敌而歼灭之。现为直接配合大别山作战起见，决即转向平汉线郑许段，或攻开封，以调动南线之敌，唯时间须至13日才能开始。

[3] 平汉郑许段，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郑州至许昌段，即今京广线一段。

[4] 许信段，指许昌至信阳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5] 兰封，旧县名，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1947年，毛泽东和陆定一、谢觉哉、王明、蔡畅等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合影。

目前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1]

（1947年12月9日）

粟裕同志，并告刘、邓[2]：

佳晨电悉。（一）意图及部署很好。（二）目前时期，华野仍以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如敌集中强有力兵团向你们攻击，仍宜避开，别求机动。

军委
佳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粟裕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的部署[1]

（1947年12月20日）

粟，陈、谢，并告刘、邓[2]：

（一）粟皓电悉。刘邓行军忙碌，电台难于联络。（二）刘邓将敌主力吸引至西面后，我主力乘隙向东，此举甚为适当，破坏了白崇禧[3]驱我向西向北计划。（三）完全同意粟皓丑意见[4]，粟及陈谢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四）配合方法：除八、十及十一纵照粟电转至民权，相机歼灭吴化文[5]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4] 指1947年12月19日1时粟裕给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原拟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歼灭七十五师于通许地区，但因我钳制敌五军之阵地被突破，故改变部署，以八、十及十一纵转至民权，设法歼灭吴化文部及新二十一旅，相机攻占商丘，再东向破击津浦路。至此刻为止平汉路已被破坏，但敌对大别山之“清剿”计划，迄未改变，似拟集中全力打垮我大别山后，再转移兵力，对付其他地区。因此，我们及陈谢必须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至完全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为止。

[5] 吴化文，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长。

及新二十一旅，攻占商丘，再东向破击津浦[1]外，主力三、四、六、一等四个纵队，提议由粟亲率南下与陈谢会合，并归粟统一指挥，沿平汉[2]向南直追武汉，沿途节节破路，攻克一切可能攻克之城镇车站，歼灭一切孤立分散之敌军。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各分散之敌。现白崇禧主力纷纷东进尾随刘邓，留武汉附近者仅川军五十六师两个旅，留信阳、武汉之间者仅八十五师及二十师及九师之第九旅，共五个旅，在泌阳、桐柏、南阳间者仅三师两个旅。你们南进时，遇敌分散则歼灭之，遇敌集中固守则绕过之。如此行动，可保证粉碎敌人进攻大别山之计划，又可全部破坏平汉路。是否可行，有何困难，你们另有何种更有效之方法，盼告。

军委

二十日十六时

---

[1]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2]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粟裕部可南下破路歼敌[1]

（1947年12月20日）

粟，并告陈、谢[2]：

顷接陈谢二十日十四时电，主张你部四个纵队南下，打现到明港附近正北向新安店进之整三师（两个旅），然后向信阳前进。如你们同意向南，即可部署行动。似此，你们应不为从前划定之界线所束缚，而向整个平汉路[3]及其两侧机动，以破坏平汉路及歼灭敌若干个旅为目标（希望能歼敌五六个旅）。

军委

二十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1]

（1947 年 12 月 21 日）

关于戏，我是个外行，只会看。这里在座的有从西安、北平等地来的，也有从张家口来的，就从张家口说起吧。张家口失守时大家也许很不高兴，但我们的战术就是这样，“你来我就走”。当然用很多的兵力也不是不可以坚守，不过那样不合算。我们打仗是用大的兵力吃敌人小的兵力。一年多的自卫战争，我们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多万，其中俘敌一百零几万。我们打仗，部队主要是靠俘虏来的蒋军士兵补充，枪炮子弹也主要靠国民党运送，我们没有大的兵工厂。过去吃穿供给是靠解放区内部解决，现在还要靠国民党区来解决，如刘邓[2]大军在大别山地区、陈谢[3]大军在伏牛山地区打仗，人员、枪炮、子弹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这是我们解放军扩大队伍的一个特点。这是世界上任何军队所少有的，而我们一贯就是用这个老法子。八路军的干部大多是从南方来的，不久仍要打到南方去，现在住在北方，这叫做南方的骨头长了点北方的肉。胡宗南[4]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对晋绥平剧院演出队的讲话。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占领了我们的延安，还要把我们赶出陕北，但我们却至今仍在这里。从延安撤出时，很多人怀疑我们能不能消灭胡宗南，当时边币[1]也跌价。然而现在却改变看法了，他们相信我们能消灭胡宗南。我们现在有个口号是："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至于最后胜利需要几年，那要看我们的努力如何再来决定。现在美国人在开会，还要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最多也就是像去年那样援助多少亿美金，还不是很快就花完了。我们还准备着美国出兵援助呢。国民党在去年七月发动全面内战时，由于还有尚未遣返的日军一百万以及遗留下来的物资，再加上美国的援助，因此它可以疯狂地进攻一下。各国的情形都是如此，统治者的力量由大而小，解放者的力量由小而大。俄国的沙皇曾经多么威风，后来还不是倒了。苏联的共产党开始时人枪也很少，我们的解放军开始时人数也很少，但现在已经发展至两百万。国民党军队现在的人数比我们的多，但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据说苏联有一个工人，人家五年才能做完的事情他一年就可以做完，这里有一个道理，就是解放了的人民为自己而工作，所以具有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打蒋介石、胡宗南并没有任何外国的援助，但是我们可以打垮他们，就是这个道理。不久，张家口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夺回来。

艺术团体也是如此。你们平剧院接受旧的艺术，还要创造新的艺术。旧的艺术是有缺点的，尤其是它的内容，我看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历史本来不是帝王将相创造的，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是在旧戏中，比如孔明[2]一出场就神气十足压倒一切，似乎世界

---

[1] 边币，指1941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纸币。

[2] 孔明，即诸葛亮（181—234），三国时的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主要谋士，刘备称帝后任蜀国丞相。

就是他们的，劳动人民不过是跑龙套的。世界上本来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工人、农民，我们住的房子，都是他们双手盖起来的，土豪劣绅连个柱子都搬不动，可是许多的旧戏却把劳动人民表现成小丑。当然，旧戏中也有些剧本是好的，如《打渔杀家》[1]之类。有些旧戏你们可以改造它，用自己的创造力掌握了这门艺术，并且从政治上来个进步，你们就可能写些新的东西。打仗也是个创造，但这是死了好多人才换来的。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还是个白面书生，但是在以后二十年的战争中创造了打仗的新的方法。同样，我们党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和干部，在各种工作中都有可能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前途是我们的。打败仗我们不怕，不打败仗我们就不知道仗应该是如何打法。平剧这个剧种在延安曾有过很多的争论。平剧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写成一个世界，穷人就不算数。平剧的形式目前我们不忙改，只挑出若干需要修改的戏，首先从内容着手改造。过去在延安改造了两个戏，一个是《逼上梁山》[2]，一个是《三打祝家庄》[3]，缺点就是太长了。有些旧戏我看写的还很精练。

---

[1] 《打渔杀家》，又名《庆顶珠》《讨鱼税》，戏曲传统剧目。主要内容是，萧恩与女儿桂英打鱼为生，当地恶霸丁自燮勾结官府，勒索鱼税，滥施刑杖，父女被迫起而反抗，杀死恶霸全家，远走他乡。

[2] 《逼上梁山》，新编历史剧，中共中央党校大众艺术研究社于1943年集体创作，杨绍萱、齐燕铭等执笔，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主要内容是，北宋末年，高俅专权，内忧外患交织，饥民惨遭杀害，同情饥民的禁军教头林冲因遭高俅父子陷害，被迫投奔梁山义军。

[3] 《三打祝家庄》，新编历史剧，延安平剧院1944年集体创作，李纶、魏晨旭、任桂林执笔，取材于小说《水浒传》。主要内容是，梁山宋江率军两次攻打祝家庄，因情况不明而失利，第三次攻打，改变了策略，派人打进庄去作内应，弄清了情况，联合庄内贫苦农户，里应外合，取得成功。

希望你们大胆地进行艺术创造，将来夺取大城市后还要改造更多的旧戏。《恶虎村》这出戏应该把黄天霸改写成特务[1]。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国家组织第一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力量，第二是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政府是压制恶霸、土豪劣绅的。至于我们有个别干部欺压老百姓，也要根据老百姓的意见对他进行制裁，因为他是人民的罪人。

平剧在中国有很多人搞，国民党统治区那里有一摊子。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提高了，将来到了大城市，要把那些旧的戏剧团体接收过来，去领导他们。如果单靠演旧戏，我们自然演不过他们。如果在政治上不提高，那我们就领导不了他们。

---

[1] 《恶虎村》，又名《江都县》《三义绝交》，戏曲传统剧目。清代杨振纲根据小说《施公案》改编。主要内容是，清代江都县令施世纶升迁，路经恶虎村时，被庄主濮天雕、武天虬劫去。施世纶的护卫黄天霸与濮天雕、武天虬是盟兄弟，他借祝寿为名，入庄探明情况，当夜聚集同伙，杀死武天虬夫妇和濮天雕妻，逼死濮天雕，救出施世纶，并火烧了庄院。毛泽东看了晋绥平剧院演出团演出的《恶虎村》并提出修改意见后，晋绥平剧院曾对该剧作了改编的尝试。

致粟裕等电[1]

（1947年12月21日）

庆祝你们两军配合行动破击平汉、陇海两路之大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粟裕、陈赓、谢富治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东北冬季作战的部署

（1947年12月23日）

林、罗、刘[1]，并告东北局，中工委：

十二日电[2]早已收到，兹复如下：（一）结冰期内，你们集中全力在山海关、辽河地区作战是完全正确的，你们明年建军计划也是正确的。（二）现时到解冰尚有三个多月，在此期内，如果我军只在许多战斗之间进行若干短时间的休息补充而不进行大休整，待解冰以后再进行大休整，则估计可能利用冰期歼灭大量敌人，可能将沈阳、铁岭、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秦皇岛等几个大据点之间的中小据点、广大乡村及锦州以西、以北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归于我手。只要办到这一点，尔后就只剩下打大据点的问题了。（三）不论冬季作战胜利大小，解冰以后，你们可将冀热辽的两个纵队派至冀东作战，而以主力在满洲打大据点。（四）你们两个纵队派至冀东，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似指1947年12月1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锦州到沈阳一带河流目前皆已结冰。今年我们拟乘结冰期间，利用河流失去障碍的条件，投入最大兵力，在锦州沈阳间作战。根据秋季攻势后的敌情，打小据点和打小增援很难求得，故只有集中兵力打大据点。我们拟明年4、5月，再扩大100个新兵的团。

配合晋察冀全力在明年春夏两季，不但占领北宁路津榆段[1]的大部，而且可能在张家口、天津间打开一个至两个缺口，使东北、华北开始打通联系，从东北输送炮弹、炸药至华中、中原与西北，此种任务极为重要。（五）因此，关于在结冰后派两个纵队至冀东及运送一部炮弹、炸药入关两点，如果你们认为可行，现在就应有所准备。（六）至于是否可派出比两个纵队更多之部队，则待明春看形势再作考虑。

毛泽东

二十三日二十四时

---

[1] 北宁路津榆段，指北平（今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即今京哈线一段。

新华社记者评南线我军破击战大捷

（1947年12月24日）

平汉南段与陇海东段之全部破毁，已使蒋匪内战主要战场之中原作战体系为之支离破碎，而豫鄂皖、苏鲁豫皖及豫陕鄂三大新解放区则已在广大地区上联成一片。此一形势已为人民解放军今后大量歼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预告了一九四八年度将有着更多的与更大的胜利。回顾月余以来，我三路南下反攻大军，曾以全力扫荡新区的地方匪伪，协助当地广大人民翻身，致战况沉寂一时。蒋匪曾为此惊惧惶惑，并鉴于陇海路开封以东一段之破毁已使其遭受惨重打击，妄图结集重兵确保中原残存之唯一铁路线平汉南段。但我三路大军终挟雷霆万钧之力，以疾风迅雷之势，于十三、十四两日分别发动大破击战。仅经三日，即已破毁平汉南段郑州信阳间及陇海东段开封郑州间铁道八百四十里，攻克县城许昌、兰封、民权、新中牟、陈留、尉氏、洧州、长葛、鄢陵、扶沟、新郑、息县、上蔡、确山、西平、遂平、临颍、桐柏、泌阳、舞阳、叶县、襄城、枣阳等二十三座，歼蒋匪二万余名。过去内战必争之中原战略重镇漯河及驻马店等，也已为我军解放。

此一巨大战役目下尚在开展中。平汉南段与陇海东段之破毁，不独粉碎了蒋匪中原作战体系，且使蒋匪利用铁道交通辗转机动之有利条件亦趋幻灭。而战争发展趋势，将更暴露蒋匪因兵力不足顾

此失彼、东拉西凑、疲于奔命之弱点，从而为我机动灵活饱经战斗之野战军创造大规模歼敌之有利条件。目下蒋匪陆军总司令部指挥部所在地的郑州以及开封、洛阳、商丘等据点，业已陷于孤立，蒋匪另一重要军事据点信阳亦暴露在我大军阵前，朝不保夕。广大中原几全为我所控制，此后解放军已可随意所欲，或东叩京浦，或西临襄樊，或南渡长江，使玩弄“空心战术”之蒋匪无所措手足。

中原千万翻身人民之崛起自卫，及与解放军亲密结合，已使我反攻大军战力空前充沛。而我三路大军之密切配合，将予各孤立蒋匪以应得之惩罚。平汉南段之大捷仅是今后一连串更大胜利的开端而已。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

一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的会议上的报告。这次会议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讨论了和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关于毛泽东的报告，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各项文件（按指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国土地法大纲》和《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进行深入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这次会议的其他重要决定有：（1）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应该力争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全胜利，应该不让敌人用缓兵之计（和谈）获得休整时间，然后再来打人民。（2）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时机目前尚未成熟，须待我军取得更大胜利，然后考虑此项问题，颁布宪法更是将来的问题。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的结果后来由毛泽东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从本篇起，直到1948年3月20日《关于情况的通报》止，都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写的。

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还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此次战争的第一个年头内，人民解放军即已在几个战场上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迫使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而从战争第二年的第一季，即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人民解放军即已转入了全国规模的进攻，破坏了蒋介石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现在，战争主要地已经不是在解放区内进行，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已经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域里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同时，对于正在斗争的欧洲和美洲各国的被压迫人民，也是一种援助。

二

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

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然而恰在这时，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地结束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代替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地位，组成反动阵营，反对苏联，反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反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在这种时候，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汪精卫一模一样，充当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将中国出卖给美国，发动战争，反对中国人民，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在这种时候，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地进行了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反对蒋介石的进攻。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当着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匪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的时候，蒋介石匪帮认为，只须三个月至六个月，就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他们认为他们有正规军二百万，非正规军一百余万，后方军事机关和部队一百余万，共有军事力量四百余万人；他们已经利用时间完成了进攻的准备；他们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们拥有三万万以上的人口；他们接收了日本侵华军队一百万人的全部装备；他们取得了美国政府在

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他们又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已经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数量上和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被肃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和不彻底，就是说，人民解放军的后方还不是巩固的。从这种估计出发，蒋介石匪帮就不顾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最后地撕毁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间签订的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和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冒险的战争。那时，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十八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三

十七个月（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为止，十二月的尚未计入）作战，共打死、打伤、俘虏了蒋介石正规军和非正规军一百六十九万人，其中打死和打伤的有六十四万人，俘虏的有一百零五万人。这样，就使我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保存了解放区的基本区域，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我们所以能够如此，在军事方面来说，是因为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我们的军事原则是：（1）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2）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3）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

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往往需要反复多次才能最后地保守或夺取之。（4）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5）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6）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7）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8）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9）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10）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休整的时间，一般地不要过长，尽可能不使敌人获得喘息的时间。以上这些，就是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是人民解放军在和国内外敌人长期作战的锻炼中产生出来，并完全适合我们目前的情况的。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

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在军队和人民团结一致、指挥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以及瓦解敌军等项原则的基础上，人民解放军建立了自己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当着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兴高采烈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十八个月中，蒋介石的前线高级指挥官，大部分因为战败被撤换。这里有郑州的刘峙，徐州的薛岳，苏北的吴奇伟，鲁南的汤恩伯，豫北的王仲廉，沈阳的杜聿明、熊式辉，北平的孙连仲等人。负指挥全部作战责任的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亦被取消此种指挥职权，降为东北一个战场的指挥官。而在蒋介石自己代替陈诚担任全局指挥的期间，却发生了蒋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这样一个局面。蒋介石反动集团及其美国主子，现在应当感觉到他们自己的

错误了。他们将日本投降以后一个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力争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的表现。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我们敌人的战略打算是彻底地输了。

四

现在，比较十八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的后方也巩固得多了。这是由于我党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的结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着同国民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团结当时尚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们起见，我党主动地把抗日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是完全必需的。日本投降以后，农民迫切地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我党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出的指示，就是表现这种改变。一九四七年九月，我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并立

---

[1] 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9月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这个会议在9月13日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这样，土地法大纲就不但肯定了1946年《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

即在各地普遍实行。这个步骤，不但肯定了去年《五四指示》的方针，而且对于去年《五四指示》中的某些不彻底性作了明确的改正。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1]。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为着坚决地彻底地进行土地改革，乡村中不但必须组织包括雇农贫农中农在内的最广泛群众性的农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而且必须首先组织包括贫农雇农群众的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以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关，而贫农团则应当成为一切农村斗争的领导骨干。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地主富农应得的土地和财产，不能超过农民群众。但是，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实行过的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的错误的政策，也不应重复。地主富农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大约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以户为单位计算），而他们占有的土地，按照一般情况，

---

[1] 《中国土地法大纲》所规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有了一些改变。194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在一切封建制度已被推翻的老区半老区，不再平分土地，而只在必要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调剂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给尚未彻底翻身的贫雇农，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数量。在封建制度还存在的地方，平分的重点，也限于地主的土地财产和旧式富农的多余的土地财产方面。无论在哪一种地方，对于中农和新式富农的多余土地，只有在确有调剂必要和本人确实同意的条件下，才允许抽出调剂。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对一切中农的土地都不再抽动。

则达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因此，我们的土地改革所反对的对象，人数甚少，而乡村中能够参加和应当参加土地改革统一战线的人数（户数），则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样多。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旧式富农按照平分原则所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之所以应当拿出来分配，是因为中国的富农一般地带着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富农大都兼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其雇佣劳动的条件亦是半封建的[1]。还因为他们所占的土地数量较多，质量较好，如不平分则不能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但是按照土地法大纲的规定，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一般地应当有所区别。土地改革中，中农表现赞成平分，这是因为平分并不损害中农利益。在平分

---

[1] 中国土地改革中的富农问题，是在中国具体的历史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富农，一般具有很重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的性质，而这种富农经济在全国农业经济中又不占重要地位，这两点都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富农。在中国的反对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斗争中，广大的贫雇农要求同时废除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分给农民的政策，从而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要求，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在1948年2月，中共中央规定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新政策，即将新区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首先是打击大地主；第二阶段，在平分地主土地的时候，也分配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但是对待富农和对待地主仍然有所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6月发布土地改革法，规定在土地改革中对富农只征收其出租的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对富农的其他土地和财产则予以保护。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富农经济就不再存在了。

时，中农中一部分土地不变动，一部分增加了土地，只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有少数多余的土地，他们也愿意拿出来平分，这是因为在平分后他们的土地税的负担也减轻了。虽然如此，各地在平分土地时，仍须注意中农的意见，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在没收分配封建阶级的土地财产时应当注意某些中农的需要。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必须注意不要把本来是中农成分的人，错误地划到富农圈子里去。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在土地税和支援战争的负担上，必须采取公平合理的原则。这些，就是我党在执行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一战略任务时所必须采取的具体政策。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五

为了坚决地彻底地实行土地改革，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必须整编党的队伍。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内部的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但是，在党的地方组织方面，特别是在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所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则没有获得解决。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七年，十一年时间内，我们党的组织，由几万党员，发展到了二百七十万党员，这是一个极大的跃进。这使我们的党成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大的

党。这使我们有可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并打退蒋介石的进攻，领导一万万以上人口的解放区和二百万人民解放军。但是缺点也就跟着来了。这即是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这个任务如果不解决，我们在农村中就不能前进。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彻底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并规定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现在正和平分土地的决定一道在各地坚决地实施。其中首先重要的，是在党内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地揭发各地组织内的离开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和严重现象。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

六

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已经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垄断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

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被这些阶级及其国家政权所压迫和损害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虽然也是资产阶级，却是可以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保守中立的。他们和帝国主义没有联系，或者联系较少，他们是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权力到达的地方，对于这些阶级，必须坚决地毫不犹豫地给以保护。蒋介石统治区域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其中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这些阶级的右翼分子，存在着反动的政治倾向，他们替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散布幻想，他们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当着他们的反动倾向尚能影响群众时，我们应当向着接受他们影响的群众进行揭露的工作，打击他们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使群众从他们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政治上的打击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如果混同这两件事，我们就要犯错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

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里所说的上层小资产阶级，是指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小规模的工商业者。此外，还有不雇佣工人或店员的广大的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对于这些小工商业者，不待说，是应当坚决地保护的。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由于新民主主义国家手里有着从官僚资产阶级接收过来的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巨大的国家企业，又有从封建制度解放出来、虽则在一个颇长时间内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个体的、但是在将来可以逐步地引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在这些条件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其存在和发展，并没有什么危险。土地改革后，在农村中必然发生的新的富农经济，也是如此。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期间所犯过的那样（过高的劳动条件，过高的所得税率，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者，不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目标，而以近视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为目标），是绝对不许重复的。这些错误如果重犯，必然要损害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利益。中国土地法大纲上有一条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这里所说的工商业者，就是指的一切独立的小工商业者和一切小的和中等的资本主义成分。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

误的。

七

一九四七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发表宣言，其中说：“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从表面上看来，现在时期，比较抗日时期，我们的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似乎是缩小了。但是在实际上，只是在现在时期，只是在蒋介石出卖民族利益给美国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之后，只是在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罪恶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之后，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才是真正地扩大了。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他们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如果说，在一九四六年，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还有一部分人怀着所谓第三条道路[1]的想法，那末，在现在，这种想法已经破产了。由于我党采取了彻底的土地政策，使我党获得了

---

[1] 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比较抗日时期广大得多的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压迫和我党坚决保护群众利益的正确方针，我党获得了蒋介石统治区域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同情。这些群众，因为挨饿，因为政治上受压迫，因为蒋介石的反人民的内战夺去了人民的一切活路，他们就不断地掀起了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斗争，他们的基本口号是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时期，乃至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他们的觉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这件事，不但同我们的土地政策和城市政策相联系，而且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同蒋介石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中国革命已经进入新的高潮时期，这一总的政治形势，密切地联系着。现在，人们看到了蒋介石统治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身上，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的

军队，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地执行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坚决地扩大了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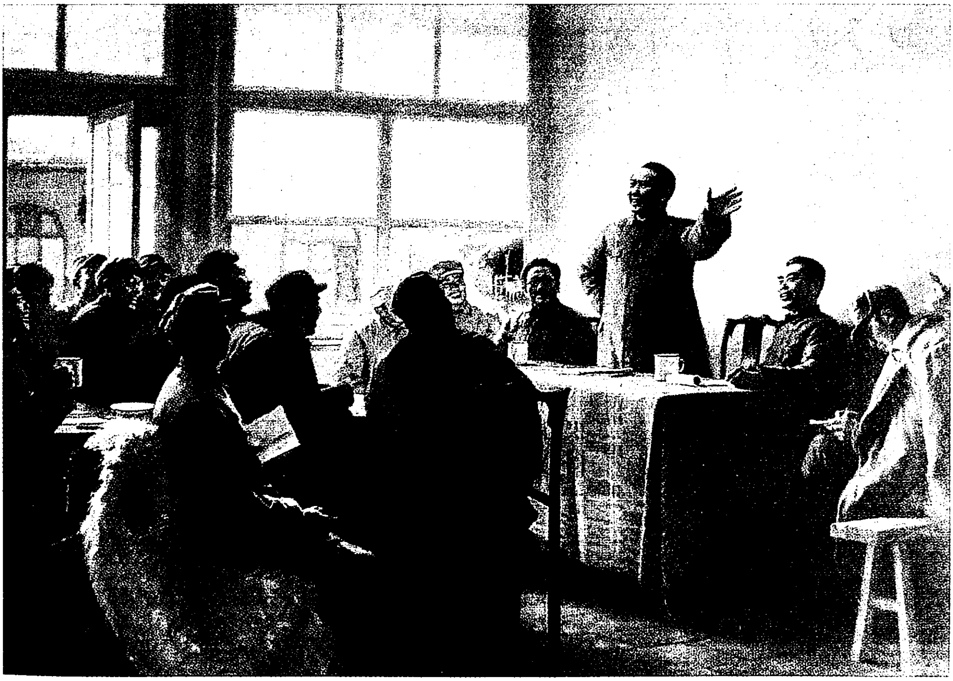
蒋介石反动集团在一九四六年发动全国规模的反人民的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冒险，不但依靠他们自己的优势的军事力量，而且主要地依靠他们认为是“异常强大”的、“举世无敌”的、手里拿着原子弹的美国帝国主义。一方面，以为它能够像流水一样地供给他们以军事上和财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设想所谓“美苏必战”，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这种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依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世界各国反动势力的共同特点。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世界资本主义的打击的严重性，反映了各国反动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和丧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强大，使得各国反动派除了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就感到毫无出路。但是，在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帝国主义，是否真如蒋介石和各国反动派所设想的那么强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样地接济蒋介石和各国反

动派呢？并不如此。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增强起来的经济力量，遇着了不稳定的日趋缩小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这种市场的进一步缩小，就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的战争景气，仅仅是一时的现象。它的强大，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国内国外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像一座火山，每天都在威胁美国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就是坐在这座火山上。这种情况，迫使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计划，像野兽一样，向欧亚两洲和其他地方乱窜，集合各国的反动势力，那些被人民唾弃的渣滓，组成帝国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反对以苏联为首的一切民主势力，准备战争，企图在将来，在遥远的时间内，有一天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败民主力量。这是一个狂妄的计划。全世界民主势力必须打败这个计划，也完全能够打败它。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重威胁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正在巩固其内部，并互相团结起来。以法意为首的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力量，正在发展。美国内部，存在着日趋强大的人民民主势力。拉丁美洲的人民，并不是顺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整个亚洲，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欧洲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业已组成了情报局，发表了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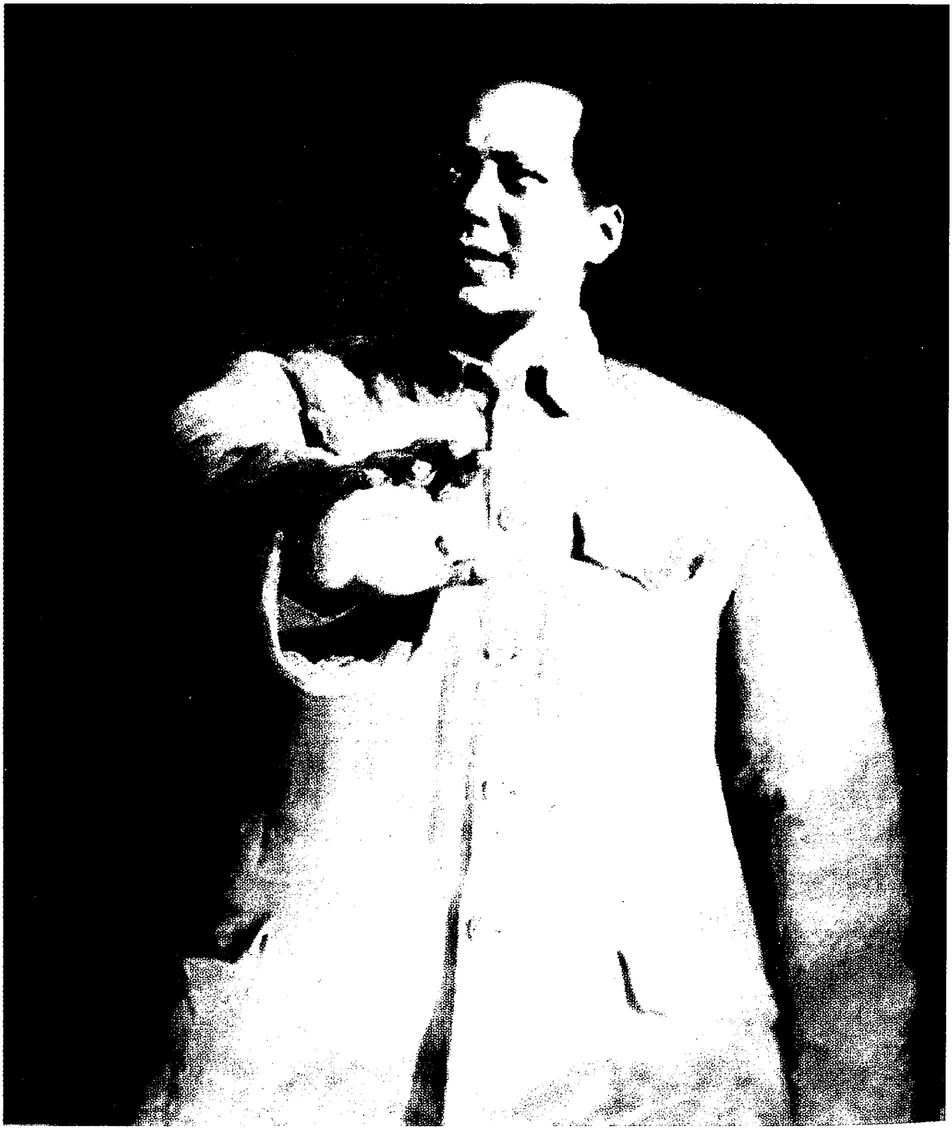
义奴役计划的檄文[1]。这篇檄文，振奋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们的斗争方向，巩固了他们的胜利信心。全世界的反动派，在这篇檄文面前惊惶失措。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也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内部反动派的压迫，以东方十万万以上被压迫人民获得解放为奋斗的目标。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我们清醒地知道，在我们的前进道路上，还会有种种障碍，种种困难，我们应当准备对付一切内外敌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和挣扎。但是，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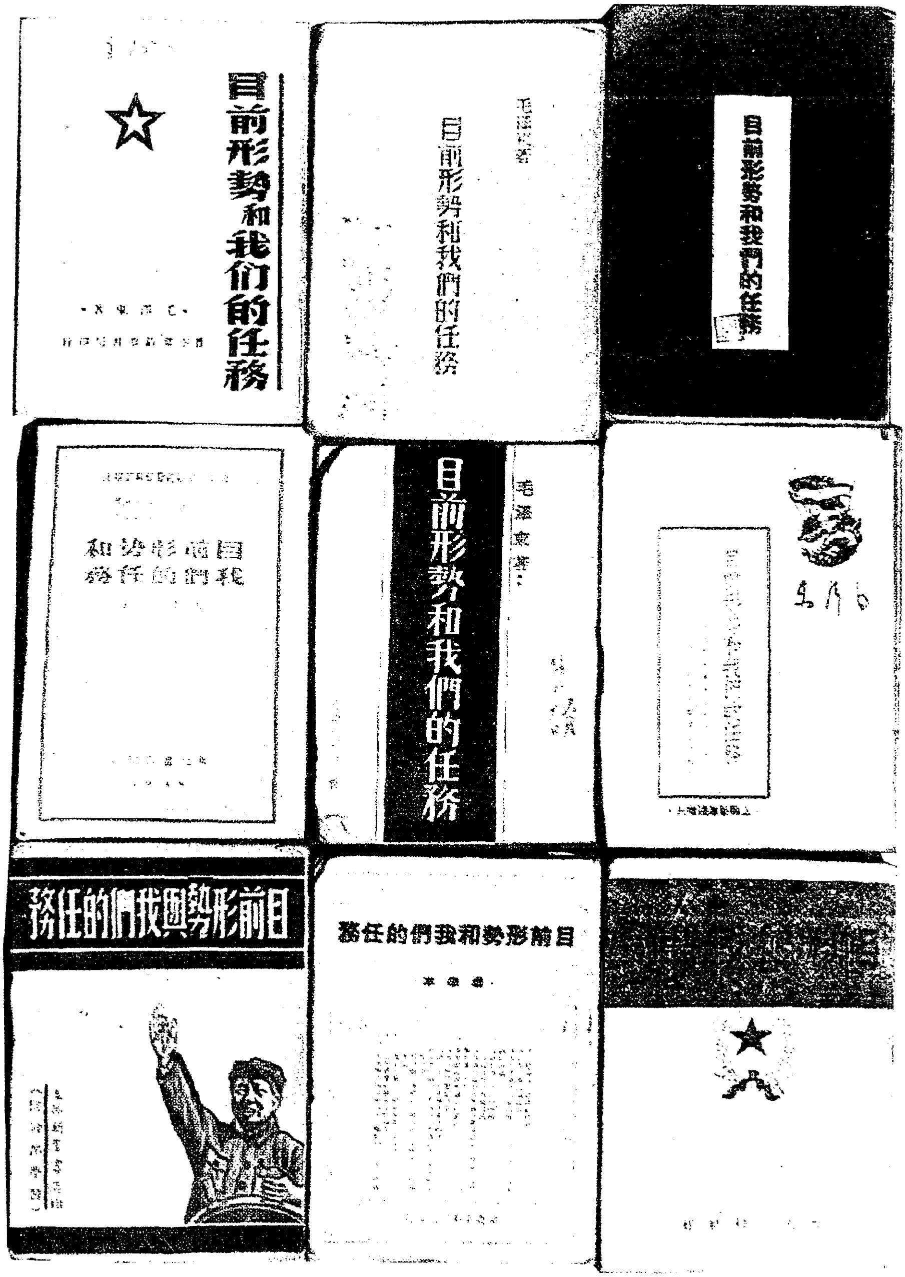
[1]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1947年9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1956年4月宣布停止活动。毛泽东在这里所说情报局发表的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奴役计划的檄文，是指情报局1947年9月的会议通过的《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十二月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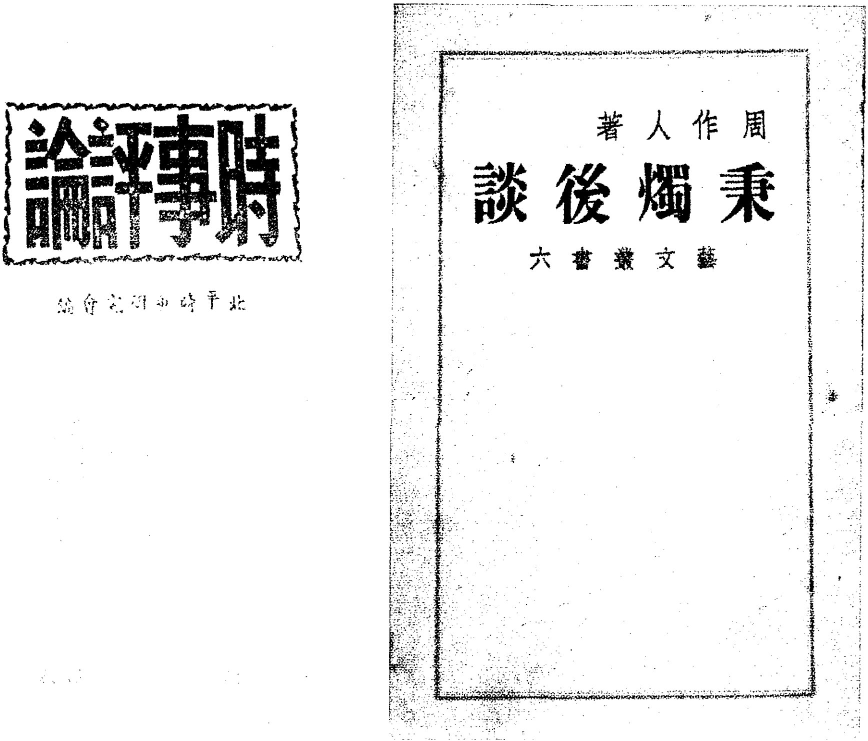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油画）


目前形勢和我们的任務
毛澤東著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著
目前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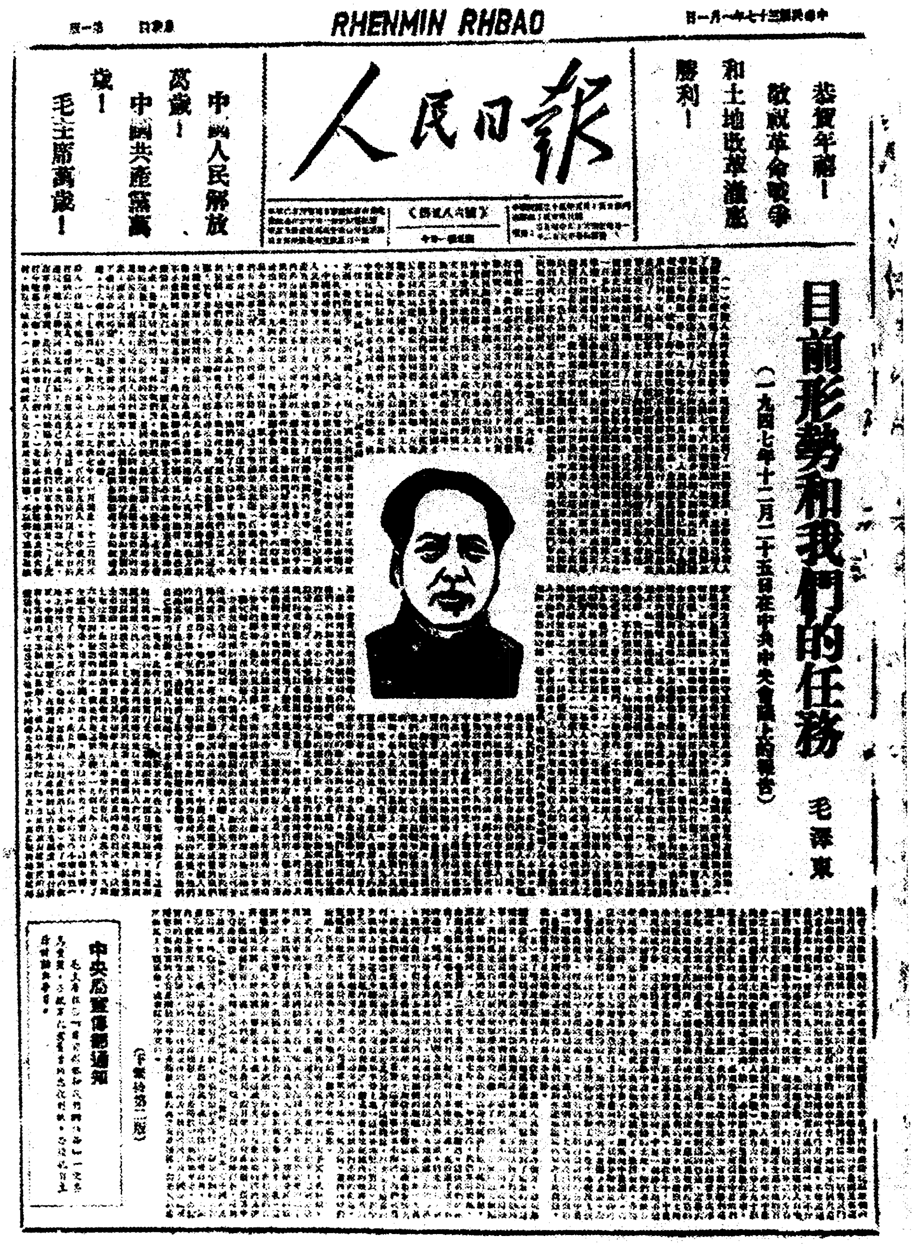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部分版本)。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東北書店印行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安東日報社翻印
毛澤東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各种《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单行本)。


時事評論
北平時事研究會編
周作人著
秉燭後談
藝文叢書六

伪装成《时事评论》和《秉烛后谈》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RHENMIN RHBAO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一日

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解放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恭賀年禧！敬祝革命戰爭和土地改革進軍勝利！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

毛澤東

（下轉第二版）

中央局宣傳部通知

1948年1月1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发表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47年12月25日、28日）

一

今天讲一讲敌我形势、统一战线、英美苏关系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敌我形势。关于国际形势，苏联的日丹诺夫、莫洛托夫[2]等已经说过了，比我们说得更全面。我现在着重讲一下国内形势。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已经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以前，我们把转到

---

[1] 这是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本篇一）和结论（本篇二）。

[2] 日丹诺夫（1896—1948），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莫洛托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外线作战称为反攻，不完全妥当，以后都要叫进攻[1]。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况到今年已经很严重了。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搞了土地改革，而蒋介石没有搞；另外我们的主力打出去以后，又减轻了解放区的负担。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已经走上了轨道。土地法大纲[2]的公布是一件大事。以前中间派曾劝我们发公债购买地主的土地，现在我们搞平分土地，他们也赞成了。土地会议[3]以前特别是以后，各解放区的土改和整党都普遍动起来

---

[1] 1948年2月21日，陈毅传达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军事上，今年（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十年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地位，没有进剿敌人，进攻敌人。抗战时期，我们也还是处于分散防御地位。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这是革命的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带着防御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在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

[2] 即《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9月1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上通过，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

[3] 指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1958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1946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倾向，确定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

了。晋冀鲁豫和东北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最好，东北在短期内建立了很大的军队，主要是得力于土地改革。山东和西北的土地问题最严重。晋绥地区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可能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贺龙、习仲勋主持的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有必要。近来《晋绥日报》《战斗报》和《边区群众报》[1]都办得很吸引人看了，这就是工作方向正确的一个表现。

从现在起到明年一年内，国内形势还会有很大的变化，有利于我们的变化。中国革命已经进入高潮，将来还会更加高涨。以前我们曾希望在革命高潮中有城市暴动来配合，现在看来这是很难了，只能有像巴黎解放和北伐军占领上海那样的里应外合。城市群众运动在蒋介石发布“总动员令”[2]后并没有低落，学生中的地主、富农子弟在土地改革以后并不是造我们的反，而是造蒋介石的反，现在三青团[3]完全灰溜溜了。在战争期间，革命高潮主要表现

---

[1] 《晋绥日报》，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原名《抗战日报》，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创刊，1946年7月1日改为本名。1947年下半年，该报曾开展反“客里空”运动，连续发表读者的反映和报社有关调查材料，公开检查土地改革前期宣传中的失实报道，使报纸工作得到改进。1949年5月1日终刊。《战斗报》，是晋绥军区政治部机关报。1936年10月在湘鄂黔根据地创刊，1945年8月暂时停刊，后又继续出版。1949年4月改由西北军区出版，1950年终刊。《边区群众报》，是陕甘宁边区的以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通俗报纸。1940年3月25日在延安创刊，1947年3月以后，报社随中共中央西北局转战陕北，坚持继续出报。该报通俗易懂，形式多样，活泼有趣，为群众喜闻乐见。

[2] “总动员令”，指国民党政府1947年7月4日发布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

[3] 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1938年7月9日正式成立，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1947年6月30日，三青团并入国民党。

为军事的胜利，这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战争仍是长期的，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人只是怕苏联也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战争的时间还要准备四五年，也可能还要长一些。战争需要不断地进行，不让蒋介石得到休息、整训和补充的时间，但这一点不能说死，也可能有一年半年的间断，例如蒋介石下台，推出别人出面讲和，那时的和战问题就要根据大城市和南方的群众觉悟程度来决定。所以我们要争取战争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现在就要着手做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的工作。不靠外援（不是不要外援），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政策，依靠群众，来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二个问题，统一战线。我们的原则是孤立敌人而不是孤立自己。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本来是不孤立的，后来因陈独秀[1]右倾而孤立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农民，脱离了军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左”，先是表现在城市工作方面，不但把自己孤立了，而且到后来在城市简直立也立不住了，只好退到农村。到了农村，他们又有军事斗争方面的“左”和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方面的“左”。他们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当然，我们党在农村中还是有群众的，不能说是在农民中完全孤立。总

---

[1]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实行“左”的政策的结果，我们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抗战时期我们孤立了蒋介石（如果在抗战胜利以后再孤立他就来不及了），我们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坚决同蒋介石的反人民政策作斗争，这是反右，但如果只斗争而不同他合作，不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而改为减租减息，不实行“三三制”等政策，群众就不能理解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实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我们吸收一些开明绅士参加政府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将来占领西安、太原、上海等地以后也还是需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所规定的对蒋方人员的不同政策[1]也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以便划清界限，避免造成自己的孤立和失败。现在反右，第一是反对对敌人估计过高，不敢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害怕美国。美国在中国搞得这样久，现在可以摸清楚它了，其实它并不可怕。刘邓等三路大军出兵国民党区域[2]，

---

[1] 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规定：“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于罪大恶极的内战祸首蒋介石和一切坚决助蒋为恶、残害人民、而为广大人民所公认的战争罪犯，本军必将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务使归案法办。本军警告一切蒋军官兵，蒋政府官员，蒋党党员，凡是尚未沾染无辜人民鲜血的人们，切勿跟那些罪犯们同流合污。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其将功赎罪。本军对于放下武器的蒋方官兵，一律不杀不辱，愿留者收容，愿去者遣送。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则给予奖励。”

[2] 指1947年7月至9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陈赓、谢富治率领的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和太岳军区第二十二旅所组成的作战集团，以及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挺进中原的军事行动。

一个月就解决了棉衣问题，这证明到国民党区域去作战也不可怕。第二是反对对中间派的认识模糊不清，对他们的动摇性估计不足。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在政治上的打击同经济上的消灭是两件事，不能混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曾混淆了这两点。现在，我们在对待中间派的问题上是既须反右又须反“左”。第三，在土改、整党工作中反对右的倾向，是反对一些干部对消灭封建阶级、驱除党内坏分子的斗争立场动摇，软弱无力。当然也要反对“左”的倾向，内战时期更容易犯“左”的错误。消灭封建阶级的斗争，同对美蒋的斗争一样，要求我们在全局问题上要大胆，在具体斗争上要谨慎。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却相反，重视抽象之敌，小视具体之敌。在土地问题上反“左”主要是反对对中农的冒险政策，哪怕只发生一户中农被错当作地主来整，我们也必须十分注意纠正。在农村中按户数计算，地主、富农只占百分之八左右，中农、贫农、雇农合占百分之九十，这个阵线不能混乱，许多同志对此没有确定的观念。对地主、富农也要有些区别，《土地法大纲》已有规定，农民也会加以区别。对他们，在消灭封建剥削和平分土地问题上是没有区别的，但在处置财产问题上有区别（个别恶霸除外）。土地分配不能搞绝对平均。由于当地地主、富农太少就要同中农扯平，这也是不对的。对同中农有关系的事一定要征求中农的同意。在土地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农问题处理好，在城市问题上一定要把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处理好。一定不要重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片面强调工人利益是错误的。在工厂劳资双方可以共同订生产计划，在商店可以共同订营业计划。劳资两利，公私两利，这就不“左”不右。对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政策上也不要犯“左”的错误，延安审干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在国民

党区域，民主同盟等团体的反蒋斗争，对我们是有很大作用的，冯玉祥在美国反蒋[1]，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其他爱国分子”，是指开明绅士，例如地主阶级中的李鼎铭、刘少白[2]等人，他们同我们共过患难，在丝毫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对这些人分别情形加以照顾是必要的，个别人物还可以留在我们高级政府内。现在，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还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关于杀不杀反动分子的问题，不可不杀，不可多杀，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反“左”反右。一个不杀，群众不赞成；不可多杀，也是从群众着想，不是从少数人着想。只要是不积极破坏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人都可以不杀，把他们当作劳动力保留下来。对于外国人，像华莱士[3]

---

[1]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46年9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在美期间，积极从事和支援祖国人民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主张国共停战议和，成立联合政府。11月上旬，在纽约组织成立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任执行委员会主席。11月15日，在美国《民族报》上发表《我为什么与蒋决裂?》一文。12月7日，出席美国“民主远东政策促进会”为纪念珍珠港事件六周年大会，并发表演说，以确凿的事实说明“美国政府援蒋是走的一条错路，是破坏中美友谊之路，是最不聪明的办法”。

[2]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刘少白（1883—1968），山西兴县人，当时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主动将自家土地和多余住房交给人民政府处理。

[3] 华莱士（1888—1965），美国政治活动家、农业专家。1941年至1945年任美国副总统期间，主张国际合作，支持中国抗日，反对姑息日本法西斯。1944年6月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委派来中国，劝说蒋介石保持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并加强中苏关系。1946年9月因不同意杜鲁门的遏制苏联政策而辞去美国商业部部长的职务。

之类的，我们还是需要的，中央十月二十七日的指示在这一点上要作修改[1]。华莱士主张反对战争、联合苏联，同美国大资产阶级的联系很少，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而且依靠工人。关于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要实现领导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现在要公开讲，不公开讲容易模糊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坏处多于好处。

第三个问题，英、美同苏联的关系[2]。有两种提法，一种是他们之间或者妥协或者破裂，一种是在若干问题（包括某些重大问题）上早一点妥协或者迟一点妥协。我看正确的应该是第二种提法，而不是第一种提法。世界上的反动派是要搞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的危险是充分存在着，但战争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谓妥协当然不是在一切问题上的妥协，这是不可能的。美、苏迟早要妥协。将来，美国还要和苏联大做生意，这就需要进行妥协。这种妥协是民主的妥协，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妥协。苏联是个大国，它的妥

---

[1] 本文说到“要作修改”的地方，是指中共中央1947年10月27日关于对待自由资产阶级须防止过左倾向的指示中所说的“今天要孤立一切对美蒋尚有幻想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到明天就连反对杜鲁门之美亲华莱士之美、反对蒋介石之国亲李济深之国的阶级、党派及其领袖，也要将他们孤立起来”。

[2] 关于英、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1946年4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对于国际形势的一种悲观估计，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但没有发表，只在中共中央一部分领导同志中间传阅过。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印发了这个文件，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这个文件的内容。后来全文收入中共中央1948年1月发出的《关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决议事项的通知》中，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协可能会对中国、法国、意大利等国人民的斗争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大国之间妥协了，其他各国人民也都要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的方针应当是按照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斗争。

二

这是一次很令人高兴的会议，和洛川会议[1]相似，都是在时局开展中召开的。日本投降对于我们是个喜事，同时又有了新的担心。因为日本人走了，又来了一个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我们同蒋介石的力量对比问题直到今年中央发出“二一”指示[2]时还没有解决，还准备退出延安，并且后来确实退出了，直到现在这个问题才解决了。二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力量对比的优势问题，今天解决了。这不但领导者看得出，而且人民群众都能看出来。在北伐时期，革命斗争曾有短期开展的局面，随后国民党的压迫就来了。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都是受压迫的，生存的地方很小，党内纠纷很多。长征以后情况更困难。我在日本投降以后一段时间内没有写过文章，是因为兢兢业业，对形势只能作估计而不能作结论。现

---

[1] 洛川会议，指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形势下召开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并作了结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 指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明朗了，人民解放战争正在不断取得胜利，蒋介石被孤立了，土改、整党等工作都走上了轨道。在这次会议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负责同志讲话讲得很好，很令人满意，说明他们政治上已经成熟了。晋西北的路线，贺龙同志、李井泉[1]同志、习仲勋同志是正确的，晋绥告农民书[2]总的是正确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同志的领导下作了很大的努力，由防御转入进攻，完成了重大的任务，因此我们这次开会比今年七月在小河开会时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今后打倒蒋介石时期是起纲领作用的。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打倒封建主义，这三个目标是立得正确的；团结中农，团结中小资产阶级，以共同反对这三大敌人，这个方针也是正确的。这篇文章看起来似乎没讲什么新的问题，其中所说革命战争的转折点，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追述同蒋介石斗争的历史，这更不是新的；十大军事原则，也不是新的，仅仅把它概括出来是新的；土地问题，在土地会议上已经解决了，其中中农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次只是特别强调一下；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早已解决了的，但在今天有特别意义。因为反对右的偏向问题在土地会议、晋西北会议、义合镇会议[3]上已经解决了，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新的问题，是

---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2] 指1947年9月24日发表的《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告农民书》共分三部分：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3] 晋西北会议，可能指中共中央晋绥分局1947年5月7日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召开的讨论土地改革问题的地委书记会议。义合镇会议，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7年11月1日在陕西绥德义合镇召开的贯彻土地法大纲的会议。

在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和党外人士问题上新出现的“左”的偏向。中农问题之所以再提出来，是因为晋西北在划分成分时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强调不团结中农的偏向。中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出现了偏向：我们有些同志在经济工作中对团结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动摇。义合镇会议好比一河水，这河水十个浪头有八个是好的，但是没有解决好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问题，发生了偏向，那末这两个浪头就是不好的。当“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个潮流，如同在抗日时期反对投降倾向的潮流一样。关于党外人士问题，过去中央没有解决，今天解决了。地主作为整个阶级来说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还要分别情况不同对待。在土改中，对地主阶级中赞成土地法的，或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的上层人士，可以采取或分而不斗的办法，除个别人物犯了死罪的要出布告枪毙外，对一般的人采取上述办法比较恰当。

关于打人问题，共产党在原则上主张废止肉刑，这个原则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封建的口号，无产阶级应该接受这份遗产。一九二九年，我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就已提出废止肉刑，但以后还发生过使用肉刑的现象。到了延安，还是没有完全废止肉刑，这表示共产党没有本领，只能依靠封建的办法。现在必须重申，共产党绝不要提倡打人，绝不要组织打人，这是一条原则。

今年晋绥地区财政困难，陕甘宁边区出现灾荒，都是严重的问题，必须用大力解决，我相信这两个区域的同志是可以解决的。

关于宪法，近期内不会颁布，过早颁布也是不利的，但目前应该着手研究。关于组织革命的中央政府，现在暂不考虑，要等到蒋介石更困难，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时候，至少在平绥路打通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二八两纵的作战任务[1]

（1947年12月29日）

徐、滕、薄：

艳辰电[2]悉。攻克临汾对各方面（特别是对支持西北战争）极为有利。二纵可以再留晋南作战一时期。但对临汾城防及陕州[3]宜川两处敌人增援之可能性，我们尚无把握，望调查并考虑电告。又徐子荣部[4]你们是否决定使用于豫北，八纵攻克临汾后是否可以不去豫北，协同二纵进攻渭北，以便陕北主力进攻陇南，望一并电告。

军委

艳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的电报。

[2] 指1947年12月29日辰时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第二、第八纵队拟即集结休整20天至1个月。今后作战方案：甲、二、八纵并独三旅及地方5个团攻临汾；乙、如二纵须西返，则八纵开豫北，集中太行、冀南4个独立旅及独立师，共8个旅的兵力，攻取安阳、新乡、焦作等据点。

[3] 陕州，旧州名，即河南陕县。

[4] 徐子荣部，原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独立师，师政治委员徐子荣，1947年12月划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

致林彪、罗荣桓电[1]

（1947年12月29日）

庆祝你们攻克彰武，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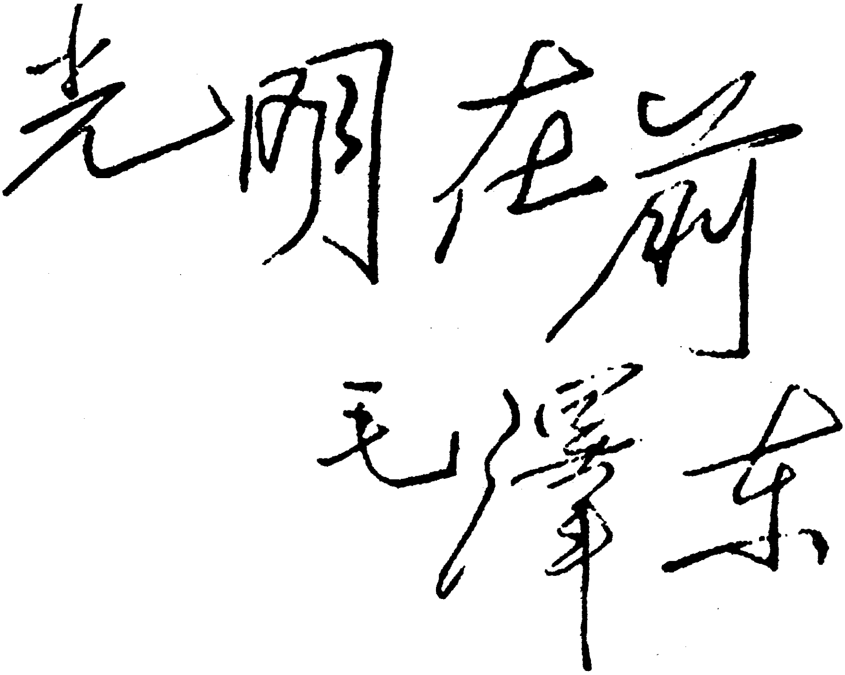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为延安中学某同志题词

（1947年）

光明在前。

毛泽东



光明在前

毛澤东

毛泽东为延安中学某同志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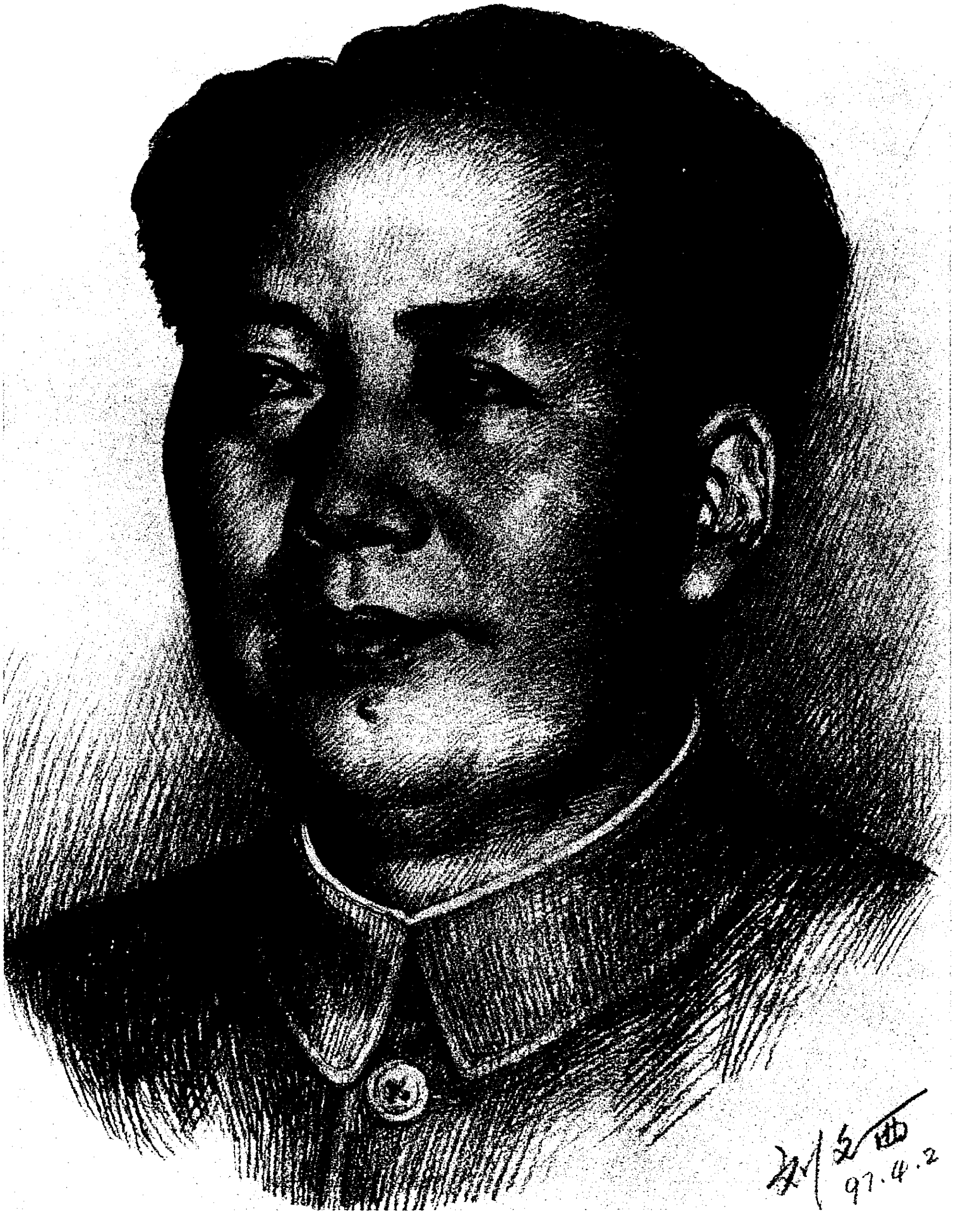
致王益久电[1]

（1947年）

人民币是属于国家的，是政府发行的。因此，不能把我的像印在票面上。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币致王益久电的主要内容。王益久，中国第一套人民币设计者。



为（第五版）人民币创作的毛泽东素描像。

三条理由和三条规定[1]

（1947 年）

三条理由是：一是战争时期，许多同志为革命牺牲，应该纪念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群众没有粮食吃，搞庆祝活动会造成浪费，脱离群众；三是我才五十岁，往后的日子还长哩，更用不着祝寿。

三条规定是：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有剧团，就演给老乡们看；三不许开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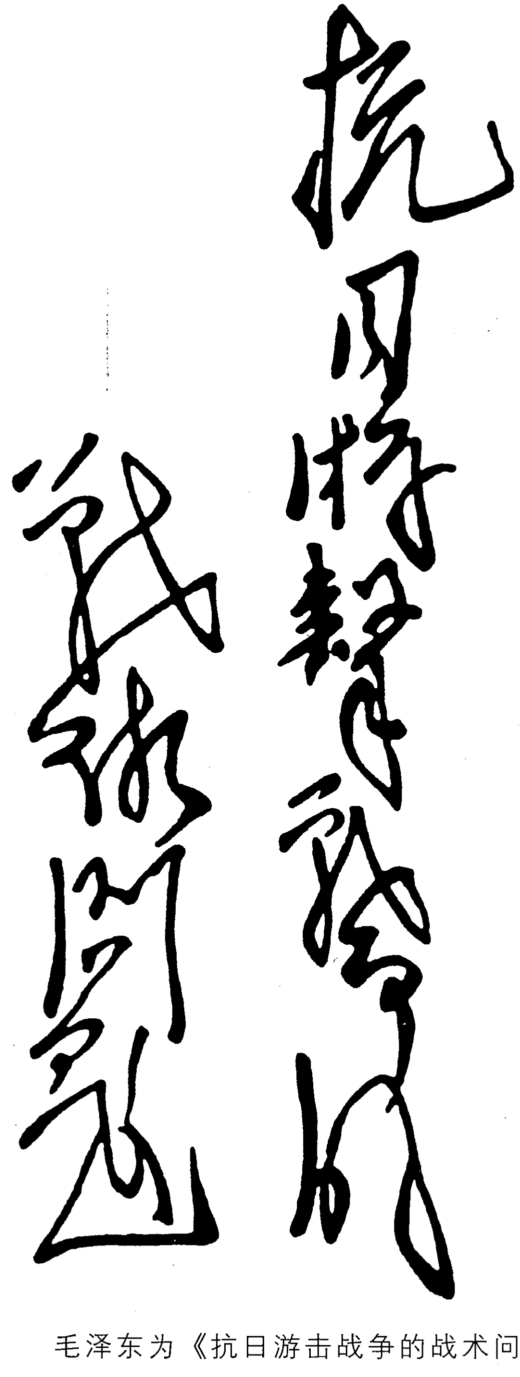
---

[1] 中央机关移驻杨家沟之后不久，正好毛泽东的生日快到了，大家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一来可以趁此机会聚会，二来可以让毛泽东吃好一些。想法提上去以后，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提了三条理由和三条规定。

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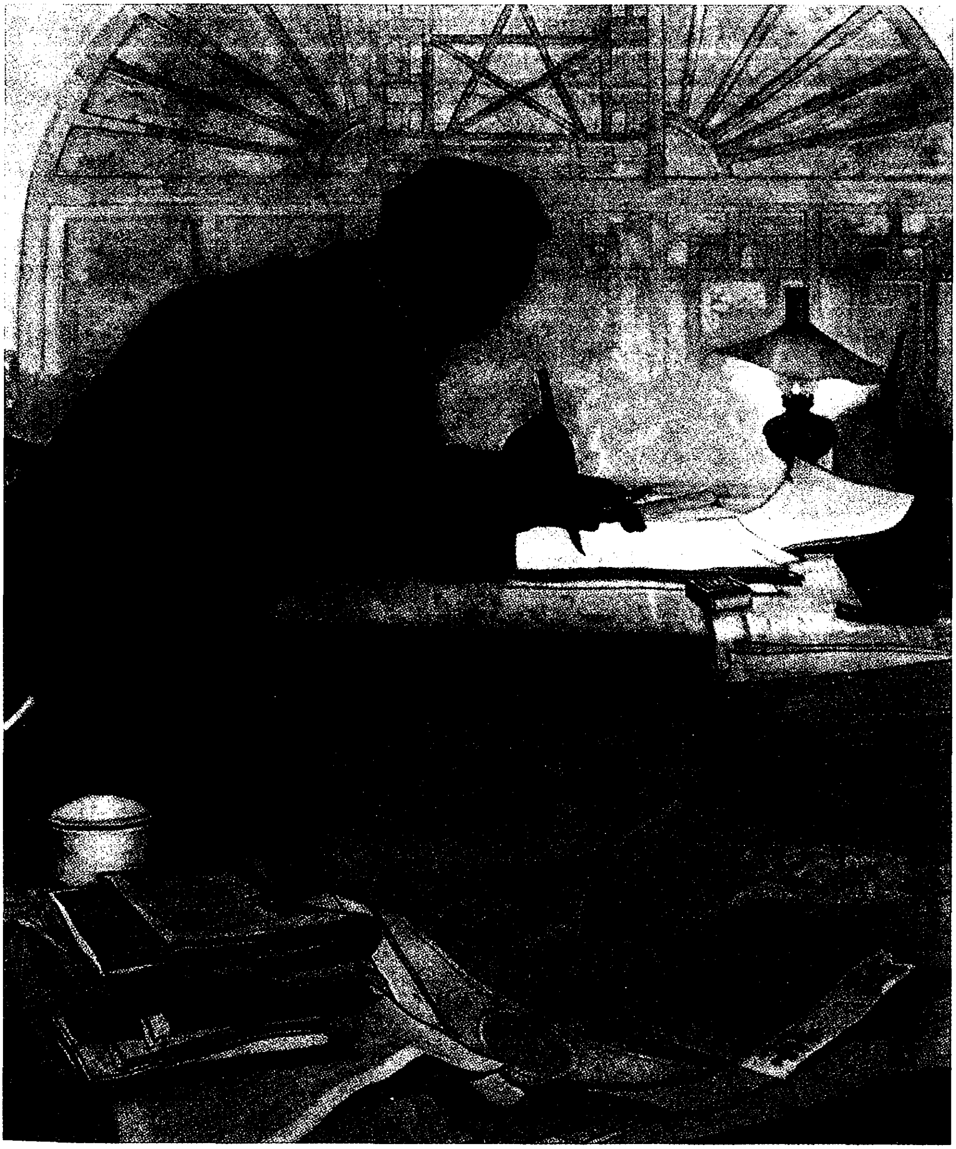
（1947年）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



抗日游击战争的
战术问题

毛泽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题写的书名。



《毛主席著作》（中国画）

五律·张冠道中[1]

（1947年）

朝雾弥琼宇[2]，
征马嘶北风[3]。
露湿尘难染[4]，
霜笼鸦不惊[5]。
戎衣犹铁甲，
须眉等银冰。
踟蹰[6]张冠道，
恍若塞上[7]行。

---

[1] 张冠道中，1947年3月中旬，胡宗南指挥国民党军14万余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动进攻。3月18日晚，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撤离延安。随后，在陕北延川、清涧、子长、子洲、靖边等县转战。张冠道，是当时转战中经过的一条道路。

[2] 琼宇，即玉宇，指天空。

[3] 征马，这里指战马。嘶北风，在怒号的北风中长鸣。

[4] 本句写寒露打湿黄土地，尘土难以沾染衣物。

[5] 本句写军服因雾沾露湿而结冰，像铁衣一样又重又硬。

[6] 踟蹰，徘徊不进。

[7] 塞上，边远地区。这里指我国北方长城内外。

五律·喜闻捷报

（1947年）

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1]作。

秋风度[2]河上，
大野入苍穹[3]。
佳令[4]随人至，
明月傍云生。
故里鸿音绝[5]，
妻儿信未通。
满宇频翘望，
凯歌奏边城[6]。

---

[1] 蟠龙，在延安城东北70多里，是一个古镇。

[2] 度，通“渡”，过的意思。

[3] 大野，一望无际的原野。入，溶进。苍穹，即苍天。

[4] 佳令，美好的节令，这里指中秋节。

[5] 鸿音绝，音信已断绝。鸿即大雁，《汉书·苏武传》载有大雁传书之事。

[6] 凯歌奏边城，指1947年8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取得沙家店战役胜利；9月中旬，又收复青化砭、蟠龙等城镇。

1948

1948年，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8

1948年，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

庆祝刘邓大军之胜利[1]

（1948年1月1日）

（一）庆祝你们突围东进之胜利；（二）庆祝十纵、十二纵在桐柏、江汉两区之胜利。[2]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2] 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采取密集靠拢、向心合击战术。刘、邓决定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打击和牵住敌人，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和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由刘伯承率中原局及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在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展开，以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并于1947年12月6日、13日，分别成立江汉军区和桐柏军区，实现了刘、邓将淮河和汉水变成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的计划。12月24日，刘邓东进部队一部攻克广济，待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来援时又跳出合击圈。东进部队在外线收复鄂东、皖西县城十余座，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万余人。

三军协力解决大别山困难

（1948年1月2日）

刘、邓，粟、陈、唐，陈、谢[1]，并告徐、滕、薄[2]：

（一）粟、陈、唐东晨电[3]悉。此次粟、陈两军歼灭三师及围攻

---

[1] 刘，指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粟，指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陈，指陈士榘（1909—1995），湖北荆门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唐，指唐亮（1910—198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陈，指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谢，指谢富治（1909—197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副书记。

[2] 徐，指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滕，指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薄，指薄一波（1908—2007），山西定襄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3] 指粟裕、陈士榘、唐亮1948年1月1日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电报就配合大别山战斗提出3种行动方案：一是粟陈部、陈谢部及刘邓之一纵三军沿平汉线南下，威胁武汉，以调动敌人。二是三军分开行动，陈谢部向西，月底进入渭南；刘邓之一纵仍东返淮河以北、正阳息县以东地区活动；粟陈部4个纵队转至沙河以北、许昌郑州以东地区，会合八、十、十一纵队全力东向击破津浦。三是陈谢部仍留确山以西地区活动，吸引分散敌人。电报认为以执行第二方案为适当。

确山之行动，已从大别山方面调动敌人六个旅向西向北，八十五师亦被赵纵[1]之行动调至应城地区，五师、七十五师亦被调动至沙河附近。这一形势有利于大别山方面之作战，亦有利于郑徐线南北我军之活动。但因二十师未能歼灭，刘邓方面尚未来得及执行由分散工作到集中歼敌，白崇禧[2]所部进攻刘邓之实力并未减少，如果此时粟陈唐部迅即转回郑徐线，陈谢准备向渭南，则大别山之困难仍难解决；而大别山困难只有由刘邓、粟陈、陈谢三军协力在一至二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

（二）因此我们意见：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开始集中相当兵力，以寻机歼敌二个至三个旅为目标。乙、刘邓之一纵仍在淮河以北执行钳制任务，必要时配合粟陈、陈谢作战。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如南面无好打之仗，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唐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3]，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之一部。同时让敌重占许昌、确山段，以利尔后粟陈唐回师歼其一部。陈谢占襄樊后与已占郧阳之刘旅[4]打通联系，在汉水中段建立自己的巩固后方，以利尔后向渭南

---

[1] 赵纵，指赵基梅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

[2] 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

[3] 指湖北的襄阳和樊城，1950年合并为襄樊市。

[4] 刘旅，指刘金轩任旅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十二旅。

之行动（在大别山困难已获初步克服之后），并协助王、赵两纵[1]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如果我军采取此项行动，还可能分散白崇禧一部向宜昌一带布防。丁、八、十、十一纵于攻克菏泽后休整若干天即举行徐蚌段破击战役，该三纵在两个月内即在徐蚌东西、郑徐南北地区单独作战，不要盼望主力向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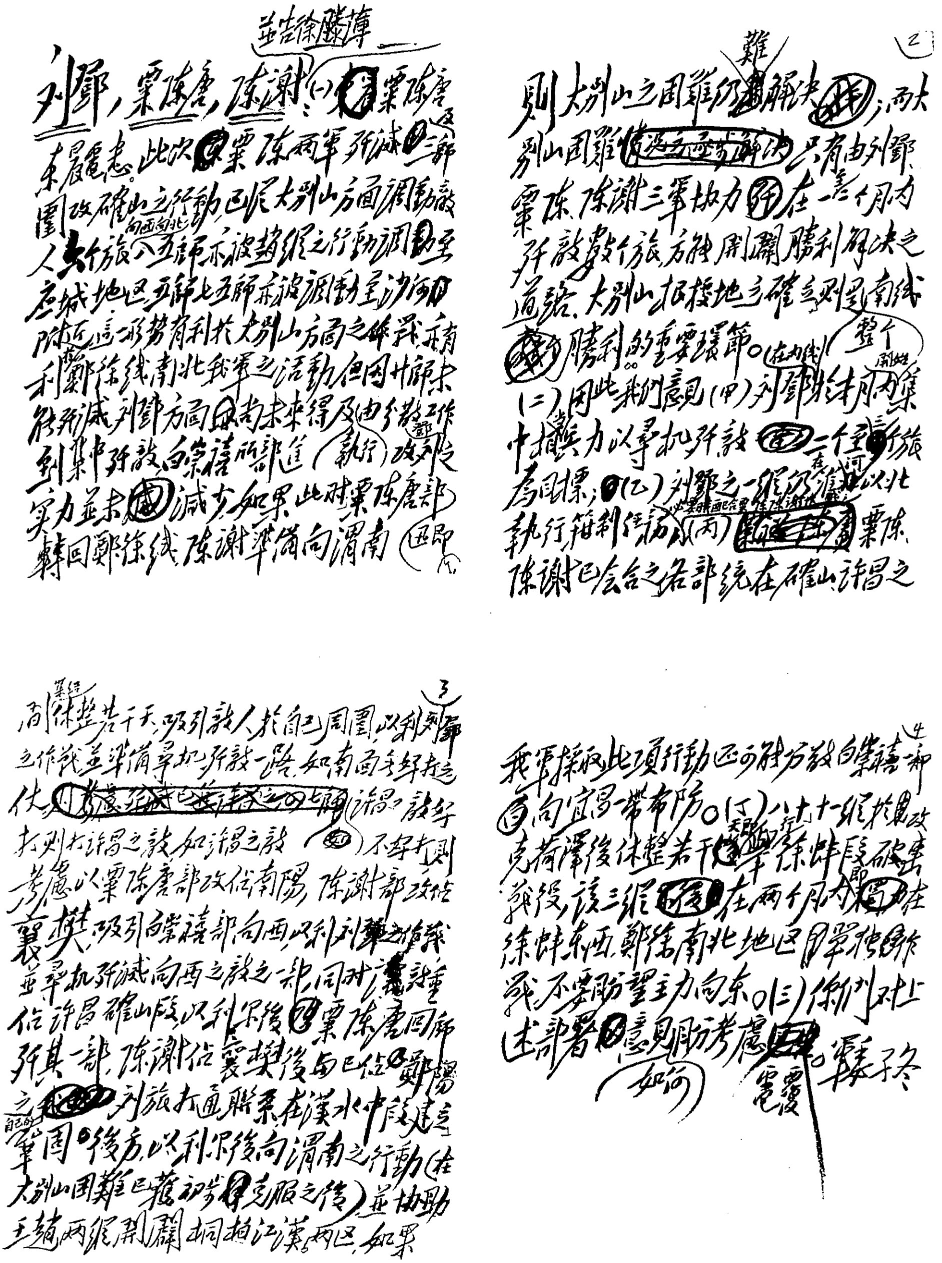
（三）你们对上述部署意见如何，盼考虑电复。

军委

子冬

---

[1] 王、赵两纵，指王宏坤和赵基梅分别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十二纵队。



并告徐滕谭

刘邓，粟陈唐，陈谢：（一）粟陈唐本晨电悉。此次粟陈两军歼灭三师及围攻确山之行动，已使大别山方面调动敌人六个旅（向西向北），五师亦被我纵之行动调动至应城地区，五师七五师亦被调动至沙河附近。这一形势有利于大别山方面之作战，并有利于郑徐线南北我军之活动。但因廿师未能歼灭，刘邓方面尚未来得及由分散工作到集中歼敌，白崇禧所部进（执行）攻刘邓之实力并未减少。如果此时粟陈唐部即转回郑徐线，陈谢准备向渭南

2

则大别山之困难仍难解决。而大别山困难只有由刘邓、粟陈、陈谢三军协力在一二个月内歼敌数个旅，方能开辟胜利解决之道路。大别山根据地之确立则是整个南线胜利的重要环节。（二）因此我们意见（甲）刘邓在内线于本月内集中兵力以寻机歼敌三个至四个旅为目标；（乙）刘邓之一纵仍在淮河以北执行箝制任务；（丙）粟陈、陈谢已会合之各部统在确山许昌之

3

间集结休整若干天，吸引敌人于自己周围，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准备寻机歼敌一路。如南面之敌好打，许昌之敌好打则打许昌之敌，如许昌之敌不好打则考虑以粟陈唐部攻占南阳，陈谢部攻占襄樊，吸引白崇禧部向西，以利刘邓之作战，并寻机歼灭向西之敌之一部，同时继续攻占许昌确山段，以利尔后粟陈唐回师歼其一部。陈谢占襄樊后与已占郧阳之刘旅打通联系，在汉水中段建立自己的后方，以利尔后向渭南之行动（在大别山困难已获初步克服之后），并协助王赵两纵开辟桐柏江汉两区。如果

4

我军采取此项行动，还可能使敌白崇禧部向宜昌一带布防。（丁）八、十、十一纵于攻克菏泽后休整若干天，即南下徐蚌段破击敌段，该三纵在两个月内即在徐蚌东西、郑徐南北地区展开作战，不要盼望主力向东。（三）你们对上述部署意见如何，盼考虑电复。军委子冬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三军协力解决大别山困难》的手稿。

致林彪、罗荣桓等电[1]

（1948年1月6日）

庆祝你们一九四七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人民解放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的主要内容。自1948年1月起，东北民主联军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1]

（1948年1月7日）

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的报告制度。

（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这个指示中所规定的报告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这个问题在这时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了极大的进展，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者即将解放，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正规性程度大为提高，全国胜利已经在望。这种情况，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就是中共中央为此目的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关于这个问题，参看《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第六部分和《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的第四点。

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报告用电报发来。这是各中央局、分局书记个人负责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的经常性的报告和请示。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代理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此外，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所作的临时性的报告和请示，照过去一样，不在此内。

我们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是因为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仍然有一些（不是一切）中央局和分局的同志，不认识事先或事后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和重要性，或仅仅作了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以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而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党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须密切联系。当此革命已进入新的高潮时期，加强此种联系，极为必要。

（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此项报告和请示的内容是：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

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此项报告的字数、写作方法以及发报时间，和各中央局、分局报告的办法相同。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报告用电报发给军委主席。我们规定此项政策性综合报告的理由，和上述中央局、分局应作综合报告的理由相同。

对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

（1948年1月8日）

林、罗[1]，并告中工委：

东北与华北敌人愈打愈少，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请考虑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例如彰武、新立屯、义州[2]、承德间铁路不加破坏，打虎山[3]、锦州、山海关、天津间铁路只作战术性破坏，铁岭、长春间及吉林、长春间铁路则不再破坏，沟帮子、营口、大石桥间及鞍山以南铁路似亦可不再破坏。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子齐

---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2] 义州，旧州名，即辽宁义县。

[3] 打虎山，即今大虎山，位于辽宁黑山县南部。

应向全军施行政策与纪律教育[1]

（1948年1月9日）

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毛泽东

一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习仲勋1948年1月2日关于我军攻克高家堡时发生破坏纪律事件的报告上的批语。

中原和西北地区的作战部署

（1948年1月9日）

刘、邓，粟、陈、唐，陈、谢[1]，并告邯郸局，华东局，中工委：

各电均悉。为着在两至三个月内歼敌十个旅左右，协助刘邓建立大别山、桐柏山、江汉等处根据地，协助陈谢建立豫西南、鄂西北、陕东南及豫西根据地，协助彭张[2]建立渭北根据地，并破坏津浦路，扩大豫皖苏根据地，协助苏北、苏中作战之目的，部署如下：

甲、第一阶段，（一）刘邓集结相当力量，粟裕三个纵队（四纵不在内），陈谢不少于五个旅，于子有（二十五日）以前休息整训完毕；子有以后，粟裕及陈谢两军统一由粟指挥，由现地向豫鄂陕边行动，相机攻占南阳、镇平、内乡、淅川、邓县、新野、襄阳、樊城、宜城、南漳、光化[3]、老河口、谷城、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2] 彭，指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3] 光化，1983年并入老河口市。

均县[1]、郧阳、西坪、卢氏、商南、商县诸城镇，相机歼灭该区敌人，并吸引白崇禧[2]军一部西进相机歼灭之。在配合作战时，王宏坤、赵基梅两纵[3]受粟指挥（该两纵以分散游击为主）。（二）刘邓在大别山、淮北各部集结相当力量相机歼敌。（三）陈粟[4]八、十、十一纵及四纵分别在陇海汴徐线以北及沙河流域休整一个整月，然后以三个纵队在徐蚌线东西、郑徐线南北相机歼敌，并大破该两路。（四）彭张主力（八个旅）于本月休整完毕，下月初开始向延安、宜川线出击（该线有胡[5]军七个旅），得手后向该线以南、渭水以北进击，以建立渭北根据地为目的（该地是向陇南行动建立甘陕川边根据地之跳板）。

乙、第二阶段，粟部及陈谢部在豫鄂陕边地区休整一时期，然后陈谢部向渭南行动，粟陈唐三个纵队并加一个纵队向北行动，相机攻占郑州、潼关间各城镇，歼灭该线敌人。刘邓在现地相机休整及作战，陈粟之八、十、十一纵仍服原任务，准备从山东调二、七两纵至苏北作战，待华中分局建立后，该两纵归陈粟指挥（陈毅于子虞[6]到中央，约两星期后动身归队）。

丙、第三阶段，粟部准备在郑潼线上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请

---

[1] 均县，今湖北丹江口市。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兼国防部九江指挥部主任。

[3] 指王宏坤和赵基梅分别任司令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和第十二纵队。

[4] 陈，指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

[5] 胡，指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6] 子虞，即1月7日。

邯郸局准备粮食），然后向平汉线上及平汉、津浦之间作战。

军委

子佳

对习仲勋关于检查绥属各县土地改革情况的报告的批示[1]

（1948年1月9日）

贺龙，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

（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中央关于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业已阅悉。

（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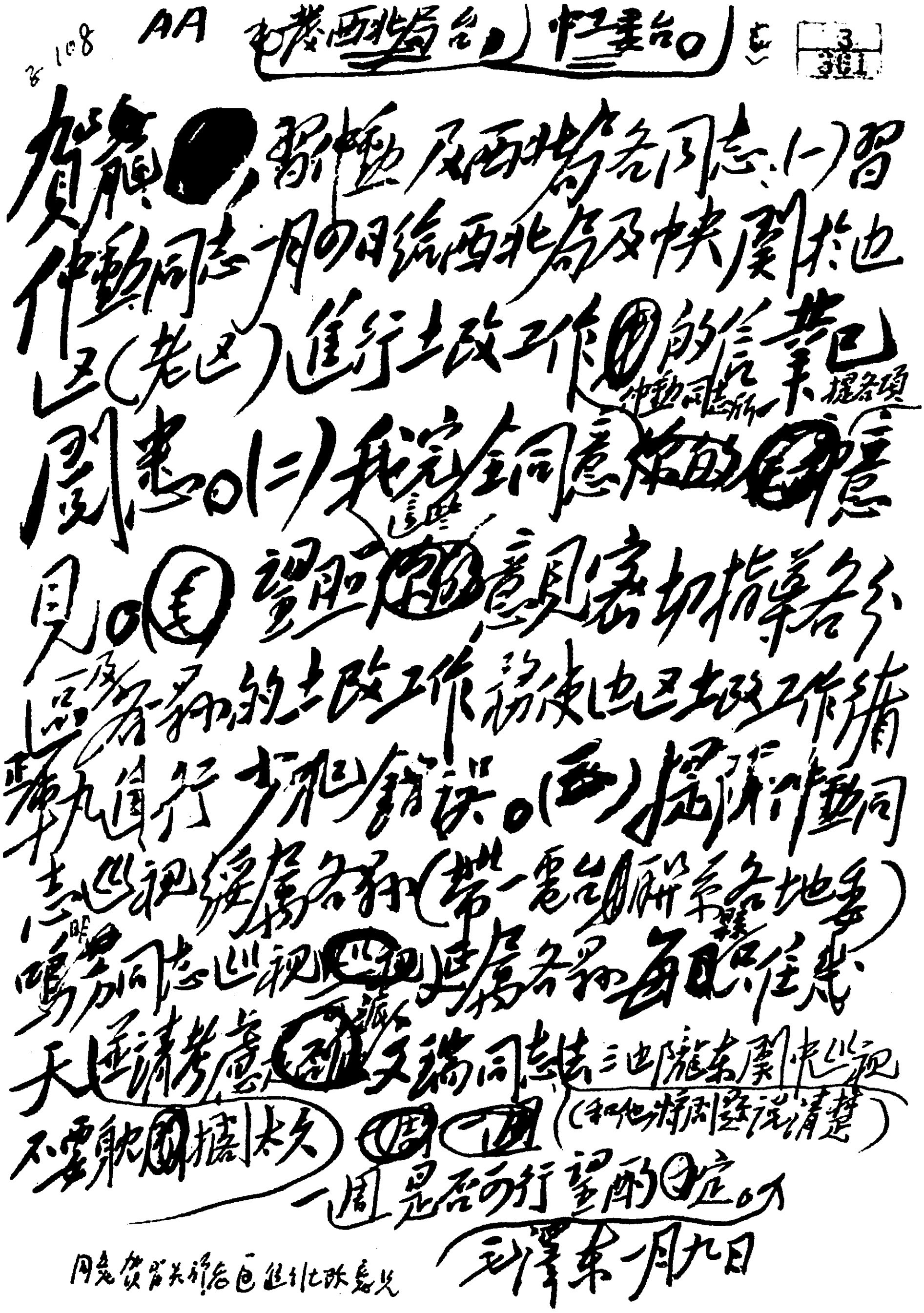
（三）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属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不要耽搁太久，并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和他将问题说清楚）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一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毛泽东

一月九日

---

[1] 习仲勋1月4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8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的农民定为地富。



乙108

AA 电发西北局台，[illegible]台。

贺龙、[illegible]、习仲勋及西北局各同志：（一）习仲勋同志一月四日给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老区）进行土改工作的信，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业已阅悉。（二）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的意见。（三）望照仲勋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四）提议仲勋同志巡视绥德各县（带一电台，联系各地委），马明方同志巡视延属各县，每县只住几天，还请考虑派文瑞同志去三边、陇东、关中巡视（和他将问题说清楚），不要耽搁太久，一周至二周，是否可行，望酌定。

毛泽东 一月九日

同意贺习关于各区组织队意见

毛泽东致贺龙、习仲勋等电的手稿。

对粟裕部在宽大区域机动作战的指示

（1948年1月10日）

粟、陈[1]，并告陈、谢，刘、邓[2]：

佳申电[3]悉。

（一）军委佳电[4]已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两个方案都要执行。你们现在集中全力进行准备工作，休养兵力，提高士气及战术，整顿纪律（十分要紧），开干部会，二十五日以后执行向西南行动的计划。

（二）西南十余县是一个宽大机动区域。有山地，亦有平地，有缺粮区域，亦有富足区域。敌情不甚严重。分几个步骤，争取攻占南阳、淅川、西坪、卢氏、襄樊[5]、老河口等城，争取歼灭六十五师及其他敌人及地主武装。攻城先经侦察及试攻。环境许可时，用坑

---

[1] 粟、陈，指粟裕、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粟裕、陈士榘1948年1月9日申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向郑陕线行动、击破津浦线和向南阳、襄樊行动的两个方案。

[4] 指毛泽东1948年1月9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等的电报。

[5] 指湖北的襄阳和樊城，1950年合并为襄樊市。

道作业去攻。无法攻的，临时改为围城打援，或弃之不攻，再攻别地。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即算多少。军队疲劳了就休息（充分注意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要准备打九师、十师、二十师等部的增援。增援到了看形势，好打就打，不好打就机动，临机决定。这一战役将包括许多次战斗，时间亦不要固定。顺利则打久些，一个月两个月均可，看情况决定。如果形势有利的话，还可设想到信阳、汉口、襄阳三角地区去机动。对你们困难的是安置伤员的地点。你们应与陈谢一道在汉水中段设置临时后方。那里在肃清土顽以后，估计会是安全的。陈谢有一个旅已占郧西、郧阳。只要再占淅川、均县[1]、老河口等处，并派小部武装及政工人员剿灭土匪，发动群众，后方就有了。你们熟悉这一带，对于秋季机动，也许是几条道路中的一条道路。

（三）你们应召集陈谢开一次会，大致商定作战步骤。陈谢及十纵、十二纵受你们指挥，你们应当放胆指挥。对不大之敌两军分区行动，对较大之敌（仍然只打中等规模之仗）则合同行动。总之一切由你们相机处理。

（四）补充一事，待执行第二计划你们到达郑州、潼关线上作战时，可以解决。

（五）陈军长[2]到此谈了你们的情形，我们认为是满意的。

毛泽东
子灰

---

[1] 均县，今湖北丹江口市。

[2] 陈军长，指陈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军长。

对可以争取的中间派
应采取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

（1948年1月14日）

叶、罗[1]转香港分局、上海局，并告中工委、各局、邯郸局并转承志[2]：

（一）对西感指示[3]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

（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4]，对李济深[5]等国民党反蒋派，对

---

[1] 叶，指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罗，指罗迈，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

[2] 承志，即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指中共中央1947年10月27日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的指示。指示估计了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覆灭过程的几种形式，分析了国内各阶级、各党派在此种形势下可能会持的立场和态度，并且提出和规定了我党所应采取的策略与原则。

[4]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1948年1月，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恢复活动，并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携手合作。

[5]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在美的冯玉祥[1]，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

（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

（四）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五）对华莱士[2]及其一派应采联合态度。

中央

子寒

---

[1]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组织“旅美中国和平民主同盟”，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

[2] 华莱士（1888—1965），美国政治活动家。1941年至1945年任美国副总统。1944年6月曾到中国访问，主张国民党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并促成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

征询邓小平对新解放区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1]

（1948年1月14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1948年1月22日，他在给毛泽东的复电中详细谈了他对6个问题的看法。2月6日，毛泽东再电邓小平等，指出：“在大反攻后所占新区斗争策略与组织形式，均应与日本投降前的老区及日本投降至大反攻两年期间的半老区有所不同。在斗争策略上似应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缩小打击面，中立富农，专对地主，又应分为打击大地主阶层与打击整个地主阶级两个步骤。此阶段内因为中农是观望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最为积极，故农会实际上是以贫农为主体，似乎可以不组织贫农团，而农会的名义亦似以农民协会为适当。第二阶段，则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至此时才动，此时应组织贫农团，以为农会或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2月8日，邓小平复电毛泽东，认为在新区树立这样两个观念非常必要：一是“根据地之确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半载所能达到”；二是“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段、分地区地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以免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大别山区“应分为两种区域，即可以巩固的区域和游击区域”。在可以巩固的区域应注意：一、中农打乱平分应绝对采取自愿原则，不要勉强。二、贫农团已保证了贫农在农村的领导骨干作用，即应迅速扩大为农民协会，吸收中农入会和个别中农积极分子加入领导机关。亦可不先组织贫农团，而先组织农民协会，但必须保证贫农的领导。三、暂时不斗富农底财。四、使地主，特别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复电还讲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应该保留，不予没收。2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这份电报，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小平同志：

请回答下列问题：

（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

（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

（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

（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

（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

（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毛泽东
子寒

致粟裕、陈士榘、唐亮等电[1]

（1948年1月14日）

既然决定不去抢占汉水中段，敌情又不紧张，如果粮食条件能解决，刘邓、粟陈唐、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整一个整月，补充人员弹药，处置伤病员，训练技术，研究战术，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策略及方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并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对中共中央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的意见[1]

（1948年1月14日）

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亟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

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阶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1月15日）

同志们：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向中央会议作的那个报告[1]里，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呢？今天我就讲讲这个问题。

革命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我们共产党开始组织的时候，这个问题还不存在。到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和蒋介石合作北伐，那时要不要胜利这个问题发生了。但是，那时犯了错误，共产党还幼稚，党的领导上有投降主义，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迁就国民党，投降农村的地主、富农、土豪劣绅和城市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不要军队，这就丧失了夺取胜利的可能性。后来实行土地革命，跟国民党打了十年。开始我们是游击队，很小，只能消灭敌人几个团，搞几个县。那时在几个县胜利的问题是提到议事日程上了，但全国胜利还比较渺茫。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提出争取全国胜利，提出经过持久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

---

[1] 指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去，组织人民大众的力量把它打倒。日本投降以后，新的问题就来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内战。蒋介石如果没有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他要打内战还会慢一点，美帝国主义一积极支持，内战很快就打起来了。北伐是内战，土地革命战争也是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打蒋介石又是内战，来了三次革命的内战。现在的内战跟前两次不同。北伐战争是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封建势力，结果蒋介石夺取了胜利果实，失败的是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革命力量受到很大的挫折，来了一个长征。前两次内战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的斗争比较孤立，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孤立。抗日战争本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有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持。现在的内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革命胜利的前途看得很清楚了。在座的大多数同志，经历过从大革命到今天的四个革命时期，大家想一想，在这四个时期中，哪一个时期对于胜利的前途看得最清楚？那就是现在这个时期。

现在，要不要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过去，北伐战争没有胜利，土地革命战争没有胜利，抗日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也没有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次是不是能胜利？现在这个问题还存在着，有些人对消灭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心还没有下。但是，我们领导机关，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我们的高级干部，大多数的党员，对这个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我在去年十二月会议上的报告中曾说要经过长期的战争，现在看来，战胜敌人的时间不会太长了。我们要有这个信心。去年三月以前，我们说能够胜利，是根据其他解放区抗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经验，那时我们陕甘宁边区还没有打起来，胡宗南还没有进攻陕北。现在，全国的解放战争已经

打了十八个月，陕甘宁边区也打了十个月，消灭了那么多的敌军，我们能打胜这一点，便看得更清楚了。第一年我们平均每月消灭敌人正规军八个旅，第二年前半年的战绩增加到平均每月消灭九个旅，以我们至少平均每月消灭八个旅来计算，一年可以消灭敌人正规军九十六个旅。敌人这些被消灭的部队第一次打垮了可以补充，第二次打垮了还可以补充，第三次第四次就不好补充了。我们将敌人总是这么消灭下去，打个三四年就差不多了，胜利的把握很大。同志们回去后，要向未到会的同志讲清楚为什么这一次比过去那三次胜利的把握大，因为现在这个时期跟过去那三个时期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情况不同，人民解放军的情况跟红军也不同。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为什么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革命时期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至于具体纲领，解放军宣言讲了八条[1]，我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又讲了八条[2]，彭副司令的报告讲

---

[1] 指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宣布的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

[2] 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共分八个部分。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了九条[1]，但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没有打倒，社会主义没有到来以前，总的纲领就只能是这一条，没有第二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主要就是农民。我们讲能够胜利，就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现在有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寄托在人民解放军身上。最近看到外面的报刊如《观察》杂志上有文章这样说：“假如二十年来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

---

[1] 似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1948年1月主持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的决定中所说的九条。主要内容是：一、我军进入蒋管区有两个基本任务：一是大量消灭敌人，二是建立根据地。二、我军进入敌占区后，必须坚持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大军事原则，灵活地坚决执行，达到各个歼灭敌人正规部队、强大自己的目的。同时必须坚决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建立人民自卫武装，建立有力的武装工作队。三、对于宗教迷信帮会等组织，在不反对我们土地改革及我军行动的原则下，应争取他们和我们合作，或使他们站在善意中立的地位，在土改运动中逐渐分化他们，争取其下层群众，孤立其上层头子。对于学生、教职员及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加以保护。四、我军所到之处，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国民党政府，宣布一律取消。五、对于工商业，必须保护其营业，不得有任何没收物资及捉人等破坏行为。六、军队给养一般地应向地主阶级征发及夺取敌人仓库解决。必要时，向富农征借。七、我军政治工作必须采用新方式：1. 用诉苦等办法提高士兵阶级觉悟；2. 建立纪律值班制度；3. 建立各种互助小组，特别是战斗小组，以及记功、记过、查功、查过、庆功大会与民主评判等项制度。八、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训练。九、在彻底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势力的政策下，不应再吸收地主富农当兵。继续进行诉苦与“三查”运动，注意吸收贫苦积极分子入党，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使支部成为今后的领导核心。

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1]傅斯年[2]到过延安，他骂宋子文[3]，在文章中说：世界上出了怪事，哪有资本家拥护共产党？硬是宋子文搞的。宋子文是封建买办阶级的一个代表。去年春天有个人写文章，说：现在全国人民对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秋天这个人又写文章，说蒋介石和中国现政府业已失去民心，如在太阳底下的影子。周副主席[4]到上海，很多资本家请他吃饭。我们丢了张家口，有资本家掉了眼泪，共产党的张家口竟然跟资本家的眼泪发生了关系。对这些资本家，还有像西安大华纱厂的资本家，我们把他们放在中产阶级范围内，要跟他们合作。他们跟帝国主义联系很少或者没有联系，跟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有区别，并且受着官僚资本的压迫。现在中间阶层有许多人找不到出路，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内战打了一年半，蒋介石已完全陷入孤立，这是在抗战以前、抗战中间甚至抗战胜利后一个时期内都没有过的事情。那末，蒋介石的孤立是不是等于我们的胜利？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要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了？我看不能这样讲。

---

[1] 参见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载于1947年10月20日出版的《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2] 傅斯年（1896—1950），山东聊城人。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5年7月曾以国民参政员身份访问延安。1947年2月15日在《世纪评论》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一文，文中说：“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指宋子文）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的，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今天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

[3]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47年9月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

[4] 周副主席，指周恩来。

蒋介石孤立，是因为他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有人说共产党是蒋介石逼出来的，“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结果弄得人人离心，个个厌恶，共产党越来越大。这是一方面的真理。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当，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俘虏政策完全成功。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一个不杀，其中大部分可以参加我们的部队，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国民党军官，经过改造可以为我们所用。蒋介石搞关门主义，我们放回去的国民党军官他也不敢用。我们比他胆大，对他的军官，一部分大胆地用，大部分放回去。放的时候和他订个条件，要他出去做工作，只要做一点工作，对我们就有帮助。比如打宜川时，有个被俘的军官在广播中对国民党军讲话，说他可以“保证缴枪不杀”。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很注意听我们的广播，我们的广播威信大得很。可见，俘虏政策很重要。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要消灭，作为个人要保护。为什么要消灭地主阶级？因为它代表的是反动的生产关系。政治上打倒蒋介石，目的就是为着在经济上摧毁封建买办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农村就是解放农民，打破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平分土地，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农民，使农民放心大胆好好生产，改进

农作方法。在城市，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要收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名称就叫所有权。对于私有权，先破坏一部分，即破坏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变成农民的私有权，破坏四大家族的私有权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但废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并不等于连他的人也不要了。地主和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全国共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社会的劳动力，是一种财富。我们分一份土地、财产给他，让他参加生产劳动，他能抬担架，能生产粮食，还能缴公粮，对国家有利。至于选举权，农民在几年之内是不愿意给他的，那末是不是永世不给了？不是的，开始先不给，过些年后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农民就可以给了。现在工业不发达，将来工业发达了，工人从哪里来？还不是从农村来。农村劳动力多了抽到城市做工，要有几百万人到城市去。三千六百万人改造后是很大的一批劳动力，快等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了。我们对封建剥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还是劳动力，经过改造过几年还有选举权。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会出乱子，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地主有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之分，还有反动的和开明的之分，我们应当分别情况进行处理。

打人杀人的问题，这里也讲一下。我们共产党不主张打人，人长两只手是用来做工的，不是打人的。打人是封建野蛮的行为。丈夫打老婆，工头打工人，教员打学生，官长打士兵，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都是野蛮的做法。农村里斗地主，打人也是不好的，不要提倡。在斗地主的时候，农民气愤得很，上去打他一下，我们如果马上出来说“你不能打人”，这会给群众泼冷水。群众气愤时打了一下不要紧，但我们不提倡打人。这样说是不是矛盾呢？不矛盾。我们的口号叫废除肉刑，这是我们的原则，但也要有灵活性。比如，

破除迷信是我们的原则，但是陕北现在还经常有庙会，很多人去参加庙会，我们的秧歌队也去。群众迷信神灵，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迷信。还有陕北政策规定废除买卖婚姻，但是现在买卖婚姻还很多。这些都需要逐步地来改造。

杀人是越少越好。不可不杀，但不可多杀。解放军宣言上讲对于蒋方人员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第一是首恶者必办，要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第二是胁从者不问；第三是准许将功折罪；第四是立功者受奖。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样，要杀的人就少了。反革命特务也不用杀那样多。杀几个特务人家就不再搞特务了？他还是要搞。我们来个以毒攻毒，使这些国民党训练了多年的“技术”人员为我所用。你过去整了共产党，今天你要帮我做事，把蒋介石打垮了，就算将功折罪。这次把王实味杀了大为可惜，他是一个坏人[1]，但他还会写文章。那末是不是一个不杀？一个不杀不能当作法律方针。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非常痛恨的可以杀。至于一般地主、富农分子、俘虏军官，则另行处置。现在八万俘虏军官，二百万俘虏士兵，我们杀他一个没有？没有杀一个。八万军官造反没有？没有造反。妨碍了革命战争没有？没有妨碍。相反，对我们还有帮助。对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如学生、教员、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要慎重对待。这些人过去给资

---

[1]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整风运动中，发表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受到批判并被开除党籍，同年年底因“反革命托派”等问题被关押。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地处决。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产阶级服务，现在受革命运动影响，经过教育，可以给我们做事。我们这样做了，胜利就有了保障；如果不这样做，即没有把全民族绝大多数人都团结在民族统一战线中，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全国胜利以后怎么办？那时还要不要统一战线？是不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下一个命令不要统一战线了？不是的。那时的问题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能巩固。

同志们，我们去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整训，后方工作也搞得好。河东河西统一起来了[1]，大家有把握打胜仗，前方缴获了很多东西，后方接济了充足的粮食和炮弹。这些使我们很满意。中央开会[2]，对全国各解放区作战成绩估计了一下，已消灭敌人一百六十几万，包括你们的胜利在内。对西北野战军来说，后方的确出力很大。经费问题曾经非常困难。在去年八月半时就说镇川堡以北没有粮食了，想去胡宗南那里“借粮”，结果我们并没有去“借”，而是贺龙[3]同志搞来五万石粮食，从八月半一直吃到十二月，军队总是有粮吃。总的说来，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共产党有了军队，有了政权，困难就可以解决。现在要打到外线去，你们可以对后方工作放心，对前方领导放心，中

---

[1] 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黄河以西的陕甘宁边区和黄河以东的晋绥边区的工作，组成一个统一的后方，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

[2] 指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

[3] 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兼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央也放心，这主要是由于有西北局和晋绥分局的领导，有前委的领导。你们这么多干部有这个信心，不管地主怎么造反，我们都不怕。

你们部队经过两个月整训，从农民那里学会了诉苦运动，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如果我们两百万军队都通过诉苦运动团结起来，就没有打不败蒋介石的道理。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依靠贫雇农，紧紧地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中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不杀俘虏官兵，这个天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有了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就有了胜利。我们的势力越大，胜利的把握就越大，这是很硬的道理。

那末，我们是不是可以轻视敌人呢？不能。我在那个报告中讲了，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它的强大是表面的、暂时的。它不可能像流水一样地援助蒋介石。对美帝国主义，对蒋介石，总的方面我们应该轻视他们，但对具体的敌人就不能轻视，如果轻视就会犯原则性的错误。原则性有两个，对总的敌人我们是轻视的，对具体的敌人不能轻视。我记得我在红大[1]讲过这个道理。当时有个同志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也是道理，那也是道理，老子打起仗来，没有那么多道理，就是一冲。”我跟这个同志讲，你有你的道理，你的一“冲”是对的，但是，你只有一“冲”就不对了，要再加一“冲”，变成两“冲”。勇敢是一“冲”，智谋又是一“冲”，有勇无谋只是一“冲”，智勇双全才是两“冲”。现在再举例来说，消灭地主阶级是一“冲”，给地主个人分地又是一“冲”。打倒国民党是一“冲”，对国民党的职员不能打倒又是一“冲”。战略上我们必须轻视敌人，这是一“冲”。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他们矛盾很多，问题很多。美国有危机，在外部苏联反对它，在内部人民反对它。蒋介石那里人心不齐，军心不

---

[1] 红大，指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堡创办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齐。美国援助蒋介石我们不怕，胡宗南有二十万人我们不怕。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能轻敌，这又是一“冲”。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战斗中要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夺取。总之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这次前委扩大会的决议[1]很好，但要准备将来会修改。前年的《五四指示》，我们去年九月做了修改，提出平分土地的政策[2]。前年要提出平分土地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那时还不能下决心平分土地。从实际情况看，那时不下决心去年九月下决心比较好。西安事变时我们放了蒋介石，现在又提出打倒蒋介石，这不但不矛盾，而且只有这样做才不致脱离群众。那时对蒋介石一定要放，不放，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我们放了他，先打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结果我们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解放军，然后进到平分土地。日寇投降前两年，太行地区有的地方分了地，他们打来电报

---

[1] 指1948年1月通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这个决定对部队进军敌占区后应遵循的基本方针和原则作了规定，内容包括以下9项：进军敌占区的基本任务；进军敌占区的作战目的；对宗教迷信会帮组织的政策与策略；区别不同情形处理国民党反动组织、贪官污吏、恶霸、特务分子和一般无劣迹的国民党人员；对工商业的保护；军队给养的解决；军队政治工作的新方法；战斗间隙的军事训练；纯洁队伍，保证党的政策的执行。

[2] 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坚决支持广大农民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一指示，对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总结了“五四指示”发布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肯定了“五四指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方针，又改正了这一指示的某些不彻底性，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一切土地。

问要不要纠正？我们告诉他们，人家分了就分了，不要纠正。那时部分地区可以分地，但不能当作全国的政策来实行。抗日时期我们跟蒋介石合作，实行减租减息，这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相比，是不是退了一步？是退了一步。抗战胜利后我们仍然退了一步。退一步的目的是什么？是准备前进。为什么我们退出延安？退出延安是准备打到西安。退一步，进两步、三步。在我们思想中、工作中，退一步的政策是主动采取的。在抗战开始时退一步，不是承认蒋介石不应该打倒，土地不应该分，而是因为日本打进中国来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错误。现在要平分土地是正确的，农民有这个要求，但是同志们要注意纠正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如果我们思想中、工作中有了缺点错误，要随时准备修正，这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要坚持，有时真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了解，我们也要反“潮流”。不论是错误是缺点，哪怕是很小的，我们都要准备修正。

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的机会。党校闲话很多，我们让他讲，这叫合法的闲话（军队里叫作怪话)。闲话有两种，一种是好人讲的，一种是坏人讲的。如果是好人讲的，说明你这个领导在工作上很可能有问题。我们讲党要听闲话就是这个道理，注意收集不同的意见。意见一致了就不会发生不团结现象，不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同的意见而又得不到解决。我们需要像拣破铜烂铁一样将不同意见收集起来，经过熔化，准备修正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毛病和错误。过去有个同志犯了严重错误，听见隔壁房子里有人讲他的闲话，便一晚上睡不着觉，跑到我那里去。我告诉他，你的错误相当大，精神上要有准备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讲你的闲话，而是几百个人讲，你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并且

依旧照常工作，以后就不会有人讲你了。过了几个月以后，果然人家就不讲他了。这个同志现在牺牲了。工作中间犯错误，哪一个人会没有呢？犯了错误就要改正，叫作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准备收集不同的意见，并且已经有了决议，不同的意见公开地讲出来，什么意见都可以讲。正确路线的领导之下也会有缺点错误，如黄河之水滚滚而流中间还会有几个小泡，我们多收集各种意见，认清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边区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1]

（1948年1月16日）

邯郸局，并告中工委，新华总社：

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电讯中，有在边区农代大会成立前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筹委会的意见和依据贫农、雇农、工人的要求改进工作等语。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是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此项新闻不知你们是否事先看过或事后有所检讨。根据此项新闻，至少我们的新华社及报纸的工作人员，对于毛主席亥有报告[2]并未研究，以至对于这些同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晋冀鲁豫中央局（邯郸局）并告中央工作委员会和新华总社的电报，就一则新闻报道中所发现的不妥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2] 指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的过左的不正确的观点，并未纠正。望你们根据此电检查新华社的工作，并将结果电告。

中央
子铣

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1]

（1948年1月18日）

一　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

反对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例如，惧怕美帝国主义，惧怕到国民党区域作战，惧怕消灭买办封建制度、平分地主土地和没收官僚资本，惧怕长期战争等。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全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统治，已经腐烂，没有前途。我们有理由轻视它们，我们有把握、有信心战胜中国人民的一切内外敌人。但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不论是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或思想的斗争），却又决不可轻视敌人，相反，应当重视敌人，集中全力作战，方能取得胜利。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中农，独立工商业者，中产阶级，学生、教员、教授和一般知识分子，一般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开明绅士），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

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

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

二　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一、必须将贫雇农的利益和贫农团的带头作用，放在第一位。我党必须经过贫雇农发动土地改革，必须使贫雇农在农会中在乡村政权中起带头作用，这种带头作用即是团结中农和自己一道行动，而不是抛弃中农由贫雇农包办一切。在老解放区中农占多数贫雇农占少数的地方，中农的地位尤为重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

二、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中农和其他阶层订错了成分的，应一律改正，分了的东西应尽可能退还。在农民代表中，农民委员会中排斥中农的倾向和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将贫雇农同中农对立起来的倾向，必须纠正。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

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1]。富裕中农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

三、必须避免对中小工商业者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各解放区过去保护并奖励一切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人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仍应继续。减租减息时期鼓励地主富农转入工商业的政策也是正确的，认为“化形”而加以反对和没收分配是错误的。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只有官僚资本和真正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才可以没收。这种应当没收的工商业，凡属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在国家和人民接收过来之后，必须使其继续营业，不得分散或停闭。对于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工商业征收营业税，必须以不妨碍其发展为限度。在公营企业中，必须由行政方面和工会方面组织联合的管理委员会，以加强管理工作，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公私两利的目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应当试行这种办法，以达到降低成本、增加生产、劳资两利的目的。工人生活必须酌量改善，但是必须避免过高的待遇。

四、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冒险政策。中国学生运动和革命斗争的经验证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可以参加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因此，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

---

[1] 关于农村划分阶级的标准，参见《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章第四节。

五、关于开明绅士问题。抗日时期，我党在各解放区政权机关（参议会和政府）中同开明绅士合作，是完全必需的，并且是成功的。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其中政治上较好又有工作能力者，应当继续留在高级政府中给以适当的工作。政治上较好但缺乏工作能力者，应当维持其生活。其为地主富农出身而人民对他们没有很大恶感者，按土地法平分其封建的土地财产，但应使其避免受斗争。对于过去混进我政权机关中来、实际上一贯是坏人、对人民并无好处而为广大群众所极端痛恨者，则照一般处理恶霸分子的办法交由人民法庭审处。

六、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加以区别。在减租减息时期提出鼓励新富农和富裕中农，对于稳定中农、发展解放区农业生产是收了成效的。平分土地以后，必须号召农民发展生产，丰衣足食，并劝告农民组织变工队、互助组或换工班一类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平分土地时，对于老解放区的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其土地。

七、地主富农在老解放区减租减息时期改变生活方式，地主转入劳动满五年以上，富农降为中贫农满三年以上者，如果表现良好，即可依其现在状况改变成分。其中确仍保有大量多余财产（不是少量多余财产）者，则应依照农民要求拿出其多余部分。

八、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1]，尤其不应在斗地财上耗费很长时间，妨碍主要工作。

---

[1] 地财，指地主埋藏在地下的财物。

九、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必须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

十、对大、中、小地主，对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和非恶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也应有所区别。

十一、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土地法大纲上规定的经过人民法庭审讯判决的这一斗争方式，必须认真实行，它是农民群众打击最坏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有力武器，又可免犯乱打乱杀的错误。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以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十二、对于某些犯有重大错误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的某些坏分子，必须进行批评和斗争。在批评和斗争的时候，应当说服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方式，避免粗暴行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应使这些干部、党员和坏分子提出保证，不对群众采取报复。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

三　关于政权问题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

三、现在时期，在乡村中可以而且应当依据农民的要求，召集乡村农民大会选举乡村政府，召集区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区政府。县、市和县市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乡村的农民，而且代表市镇、县城、省城和大工商业都市的各阶层各职业人民，就应召集县的、市的、省的或边区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在将来，革命在全国胜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应当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四　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

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例如共产党要领导中农，必须率领中农和自己一道向封建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消灭地主武装，平分地主土地）。如果没有坚决的斗争，或虽有斗争而没有胜利，中农就会动摇。再则，必须以地主土地财产的一部分分配给中农中的较贫困者，对于富裕中农则不要损害其利益。在农会中和乡区政府中，必须吸收中农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并须在数量上做适当规定（例如占委员的三分之一）。不要订错中农的成分，对中农的土地税和战争勤务要公道。同时，还要给中农以政治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我们就要丧失中农的拥护。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也是如此。

致刘少奇电[1]

（1948年1月18日）

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2]，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一份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48年1月20日）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1]。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

[1] 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

（1948年1月22日）

粟裕[1]同志：

子篠[2]电悉，各项布置均妥。该区地方武装必须分散游击，掩护群众斗争，不应过早与过多地集中组织纵队，你的布置极为适当。惟土改工作不能性急，我们去年曾告你们一年内彻底平分土地，你们应当灵活执行。你们应当按照消灭敌人武装力量的情况，领导土改干部的多少强弱，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决定土改工作的速度。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三年内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能够全部按土地法分配土地，就是极伟大的成绩。所谓大体上长江以北各区全部三年内按土地法分配土地，是指中原、华中、华东、邯郸、阜平、晋绥、西北、东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管辖地区一九四七年所占可耕土地，再加一九四八年胜利战争所占可耕土地，应当争取于一九四八年一月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的三年内，有步骤地不但从土地的数量上而且从土地的质量上大体上按人口平分完毕。所谓积极努力，工作得法，不犯大错误，是说依照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3]及其后中央及中央工委所发有关土改的指示，有步骤地

---

[1] 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

[2] 子篠，即1月17日。

[3] 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在河北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启发群众的觉悟，团结全体农民，达到平分土地之目的，不犯大的“左”右倾错误，而主要是不犯“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如果没有这些条件，如果犯了大的错误，则三年解决各区土地问题还是不可能的。所谓有步骤地启发群众觉悟，团结全体农民平分土地，是说土改方法应从宣传群众，寻找群众中的少数积极分子（不是投机分子），调查研究具体的阶级关系，发动群众分大地主的钱财，斗恶霸，组织群众团体，组织党的支部，组织民兵游击队，组织区乡政府做起，然后发展到没收分配土地。

在新区没收分配土地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中立富农，富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在没收分配地主土地时，应当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地主的恶霸与非恶霸，采取不同的待遇。在此阶段内，以贫农为主体，组织农民协会，除地主、富农不许入会外，一切农民包括在内，不另组织贫农团。在国民党统治的农村中，贫农、雇农及其他无地少地农民约占百分之七十，中农约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及其他剥削分子约占百分之十。故农会所包括的群众极为广大，而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最为积极，自然成为农民协会的主体。中农在初期是徘徊观望的，斗争开展有了胜利希望的时候，中农方愿加入农民协会，故此时期可以不另组织贫农团。第二阶段，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的土地此时才动。在此阶段内，是否于农协内部组织贫农团，看那时农协的情况决定。如果农协的领导权确是掌握在贫雇农积极分子手中，可以不另组织贫农团，如果农协有地主、富农及其他狗腿混入，并掌握了领导权，则必须另组贫农团，并改造农协的领导机关。在新区（例如鄂、豫、皖三省）土改工作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应当经过这些步骤或阶段，才能启发群众觉悟，斗倒封建阶级，建

立稳固根据地。

在群众觉悟程度有很大区别的新区与老区，例如陇海以南与陇海以北，土地法的应用必须有所区别。这就是说，平分土地是反封建斗争的最高目标，必须经过几个阶段，几番手续，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次可以彻底完成的，老区的经验正是如此。老区是经过多少年、多少月方才把土地分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必须在自己亲身经验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觉悟，认清敌人，取得胜利。共产党员也是如此，必须在斗争中教育自己，取得经验，才能领导群众得到胜利。为了这个原故，你们不应对于全区几十个县的一切区乡同时动手，而应选择若干条件适当的县，每县先从一至二个区做起，做出成绩，取得经验，影响他区群众，然后逐步推广。必须认识，群众工作、土改工作是极细致的工作，必须研究领导艺术。每个乡村，必须有绝大多数群众认为没收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由群众自己批驳了落后群众中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比如贫穷是由于命运，分土地是不道德行为等等，绝大多数群众真心愿意平分土地，然后才能行动；否则，就会犯冒险主义错误，被地主、富农及坏干部利用，乱打，乱杀，乱斗，乱分阶级，乱订成分，土地分不好，又要走回头路。必须认识，共产党员领导着缺乏精神准备、缺乏团体生活、缺乏斗争艺术的农民群众，向着鬼〈诡〉计多端、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占优势的地主、富农作斗争，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员只有与农民群众一道，逐步完成精神准备，逐步把自己组织起来（党的团体、群众团体、民兵、游击队、区乡政府），逐步学会斗争艺术，才能最后斗倒封建阶级，实现真正的平分土地；否则，必然被地主、富农打败，必然闹出许多危害群众的大乱子，即使平分，也

是假平分。这一点不论在老区，在新区，都是如此。因此，我们应当坚决采用逐步推广的方法，不用普遍动手的方法。逐步推广的运动，看来很慢，其实是快；普遍动手的方法，看来是快，其实是慢。如果环境许可，干部又多，又有训练（必须有充分的训练），可以在全区中一切有工作团的县，每县选择一个区，同时进行土改工作，而对其他的区，则是进行准备土改的工作。一县之内，一个区大体上做好了土改，不犯冒险主义，没有乱打，乱杀，乱斗，大体上没有分错阶级，订错成分，全体农民真正自觉地团结起来，得到土改利益，县一级干部及工作团干部，真正学会了土改方法，这个县的土改工作，就会很快地开展，群众运动就会出现真正的高潮，而不是易起易落的形式上的高潮。这里所谓环境许可，是说在新区应当分为两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第一种，是我军大量消灭了敌人，敌我力量对比起了基本变化，敌人以后不易再来，即使再来，也不可能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应当由开仓济贫，斗恶霸，分大地主的浮财，组织农会、政府、民兵、游击队，逐步发展到没收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这种地区的环境，是许可我们进行土改的。第二种，是敌人还能再来，并将久占的地区。在此种地区，我们的工作，是向群众做宣传，开仓济贫，分发一部分财物，寻找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的精干的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相机组织精干的游击队，并须教育群众准备敌人再来时的应付办法。在这种地区，环境还不许可我们进行土改，土改工作还要有所等待。

新区工作中，还有一个地主、富农左翼分子问题应当好好地解决。历来经验，新区游击战争时期，地主、富农阶级有一部分左翼分子，拥护我党反帝反蒋反大地主的政策，愿意参加这一斗争，而在新区群众尚未起来，工农积极分子尚未形成，没有或很少现成的

本地干部，我党不得不和这些左翼分子合作，经过这种合作，打败蒋军及大地主阶层，成立政权，发展地方武装及地方军。这些左翼分子，就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了党，成为当地党政军民各项工作骨干之一部分。他们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不是知识分子，有些能在党内教育下改变其地主、富农立场，继续执行党的路线，有些则在群众起来实行土改的时候，发生动摇，有些竟至成为土改的严重障碍。你们到新区，对于这个问题应取正确态度。首先不怕同他们合作，不怕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但须加重对于他们的教育工作。到了实行土改时期，则应分别情况处理：有些人继续任用；有些人调职受训或做他事；对于把持权力，压迫人民，障碍土改，无法教育者，则坚决发动群众洗刷他们。

此外，为着了解农村情况，为着进行土改，区党委书记以下，政治部主任以下，必须亲自调查几个区乡的土改工作，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地领导土改。

以上望告知豫皖苏区党委及你们政治部各同志（此件可印成单张发给各级区党委及工作干部），并望将你们的经验电告。

毛泽东
子养

对中央一月决定[1]的补充意见

（1948年1月24日）

少奇同志：

子养电[2]悉。

（一）为了详尽考虑一月决定，你可召集阜平中央局诸人和中工委一道开几天会，缓几天复电不要紧。

（二）尚有几点拟加入此决定：甲、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乙、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丙、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丁、货债及农民内部债务之处理；戊、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第一阶段只组织农会，第二阶段再组织贫农团。以上各点请一并考虑。

---

[1] 中央一月决定，指毛泽东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内容包括“党内反对错误倾向问题”“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关于政权问题”“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4个部分。

[2] 指刘少奇1948年1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已派人到两个县的下层搜集对《中央一月决定》的意见，三四天后可将讨论意见电告。除个别问题可能有若干意见外，一般赞成这个决定。又已将决定告知阜平中央局，他们可能有若干意见提出。

（三）我起草了一个给粟裕的电报[1]，内容是说土改不能性急，长江以北至满洲[2]各大解放区三年内完成土改即是很大成绩；新区应分两阶段完成土改，第一阶段应中立富农；土改方法应逐步推广，不应普遍动手。此电拟同时告知各区，现尚未发出，你有何意见，盼告。

毛泽东

子敬

---

[1] 指毛泽东1948年1月22日关于新解放区土改问题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

南线三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

（1948年1月26日）

刘、邓、李[1]，并告粟，陈、谢，徐、滕、薄[2]，华东局，邓子恢[3]，中工委：

有午电[4]及小平、刘邓报告一般情况各电均悉。

（一）陈粟[5]、陈谢两军本月休整，丑月开始新作战，丑寅卯三个月包括作战间隙中的几次短期休息在内，可以举行三次至四次较大战役，歼灭大批敌人，即可有力地帮助你们。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2] 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徐、滕、薄，指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3] 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4] 指刘伯承、邓小平1948年1月25日午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原拟乘粟裕和陈谢2月初行动、敌人略有调动时，即向敌弱点进攻，打开战局，故部队已集结休整。敌发现我集结后，又部署以5个师主力寻我作战，暂时不能减轻我之负担。我在敌几个强师压迫下，又无法作战，故只能再次分散行动。

[5] 陈，指陈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

（二）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三）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1]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四）请徐滕薄除训练新兵准备输送前方外，注意炮弹、手榴弹及炸药对于南线各军之供给。

（五）彭贺陈[2]到中央会商完毕，彭张军丑齐以前从清涧以北开始南进，陈于月底动身东返，经中工委、五台、渤海、邯郸转达中央方针后，约寅初可到部队。

（六）许谭[3]率七、九两纵休整完毕后，由胶济线向苏北出动。今后苏北、苏中可形成一重要战场，威胁京沪。中央决定恢复华中分局[4]，陈毅为书记，邓子恢为副书记，受华东局领导，管辖现豫皖苏地区、苏北苏中地区及巢湖以东之淮南地区，七、九两纵及一切华中部队统归陈粟指挥。

军委
子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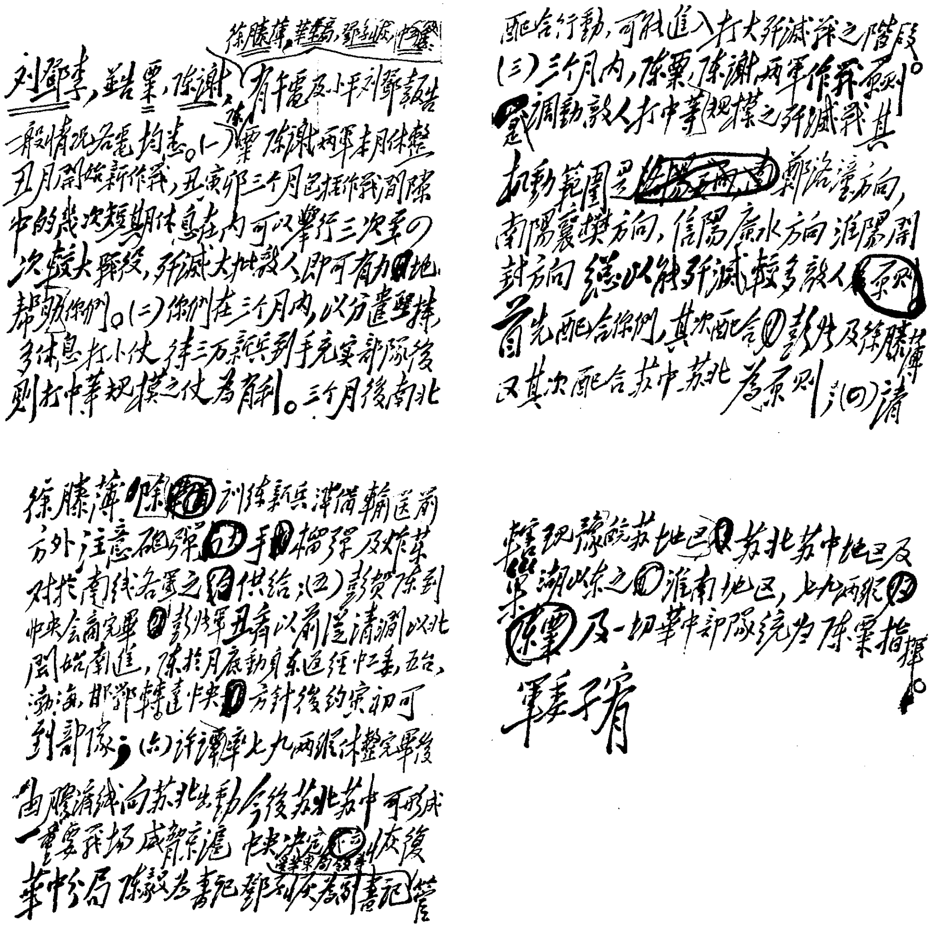
---

[1] 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彭，指彭德怀。贺，指贺龙。陈，指陈毅。

[3] 许，指许世友（1906—1985），河南新县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谭，指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政治委员。

[4] 因情况变化，中共中央关于恢复华中分局的决定没有实行。



徐滕谭，华东局，邓子恢，中工委

刘邓李，并告粟，陈谢，有午电及小平刘邓报告
一般情况各电均悉。（一）陈粟陈谢两军本月休整
丑月开始新作战，丑寅卯三个月包括作战间隙
中的几次短期休息在内可以举行三次至四
次较大战役，歼灭大批敌人，即可有力地
帮助你们。（二）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
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
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
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
（三）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
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
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
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
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为原则
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谭
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四）请
徐滕谭训练新兵准备输送前
方外，注意炮弹手榴弹及炸药
对于南线各军之供给。（五）彭贺陈到
中央会商完毕，彭将军丑青以前返清涧以北
开始南进，陈于月底动身东返经忻县、五台、
渤海、邯郸转达中央方针后约寅初可
到部队；（六）许谭韦七九两纵休整完毕后
由胶济线向苏北出动，今后苏北苏中可形成
一重要战场，威胁京沪。中央决定恢复
华中分局（受华东局领导）陈毅为书记，邓子恢为副书记，管
辖现豫皖苏地区及苏北苏中地区及
鄂湖以东之淮南地区，七九两纵
及一切华中部队统为陈粟指挥。
军委子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南线三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的手稿。

致粟裕电[1]

（1948年1月27日）

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2]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3]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八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寅、卯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南北，指淮河以南的刘邓野战军和淮河以北的陈粟野战军与陈谢集团。邓子恢，当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在山东渤海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军工作。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2] 叶、王、陶，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六、第四纵队司令员。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

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采取渤海整军经验开展军队的民主运动[1]

（1948年1月28日）

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毛泽东
子俭

---

[1] 这是毛泽东批转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时的批语。194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就渤海整党、整财、整军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报告指出，渤海整军通过民主检讨，在各连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发动战士对干部与党员进行批评与检查，战士阶级觉悟和积极性极高。此种士兵委员会，即成为经常制度，由士委会自己管伙食、管娱乐、管学习，自己维持纪律，一切连排长之升、降都通过士委会，党员之吸收与洗刷亦征求士委会与军人大会之意见。我们认为这种制度是加强部队团结，防止军阀主义，提高战斗力的最好制度。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3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8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组建苏北兵团和山东兵团……………………………………………………1
（1948年1月30日）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3
（1948年1月30日）
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信的批语……………………………………………5
（1948年1月31日）
对出击平绥路的意见………………………………………………………7
（1948年1月31日）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8
（1948年1月）
和陈毅的谈话 ………………………………………………………………12
（1948年1月）
为蒋英题词 …………………………………………………………………14
（1948年初）
粟裕部渡江的路线和方法 …………………………………………………15
（1948年2月1日）
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17
（1948年2月3日）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 ……………………………………19
（1948年2月5日）

关于审查新区土改指示给刘少奇的信 ……………………………21
（1948年2月5日）
老区半老区实行土地法应有所不同 ……………………………22
（1948年2月6日）
致邓小平等电 ……………………………………………………25
（1948年2月6日）
刘邓部宜组织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 ……………………………27
（1948年2月7日）
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29
（1948年2月7日）
致东北局等电 ……………………………………………………34
（1948年2月9日）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35
（1948年2月11日）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37
（1948年2月15日）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39
（1948年2月15日）
在林彪给中宣部的电报上写的批语 ……………………………47
（1948年2月15日）
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48
（1948年2月16日）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的运用 …………………………………50
（1948年2月17日）
给□□的信 ………………………………………………………53
（1948年2月17日）

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54
（1948年2月17日）
致邓小平电 ……………………………………………………………55
（1948年2月17日）
打几个胜仗以配合粟裕部休整 ………………………………………56
（1948年2月17日）
攻城部队整训地点应便于打逃敌 ……………………………………57
（1948年2月18日）
对薄一波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59
（1948年2月19日）
对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60
（1948年2月19日）
致粟裕电 ………………………………………………………………62
（1948年2月19日）
对中原各军的作战部署 ………………………………………………63
（1948年2月20日）
致邓小平、李达电 ……………………………………………………65
（1948年2月20日）
抓紧时间整训部队然后出击汉水流域 ………………………………66
（1948年2月21日）
钳制敌十一师等部以利刘邓主力休整 ………………………………69
（1948年2月22日）
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71
（1948年2月22日）
在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时加写的几段话 ……………………………73
（1948年2月22日）

关于审查新区土改指示给刘少奇的信 ……………………………21
（1948年2月5日）
老区半老区实行土地法应有所不同 ……………………………22
（1948年2月6日）
致邓小平等电 ………………………………………………………25
（1948年2月6日）
刘邓部宜组织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 ……………………………27
（1948年2月7日）
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29
（1948年2月7日）
致东北局等电 ………………………………………………………34
（1948年2月9日）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 …………………………35
（1948年2月11日）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37
（1948年2月15日）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39
（1948年2月15日）
在林彪给中宣部的电报上写的批语 ………………………………47
（1948年2月15日）
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48
（1948年2月16日）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的运用 ……………………………………50
（1948年2月17日）
给□□的信 …………………………………………………………53
（1948年2月17日）

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54

（1948年2月17日）

致邓小平电 ……………………………………………………………55

（1948年2月17日）

打几个胜仗以配合粟裕部休整 ………………………………………56

（1948年2月17日）

攻城部队整训地点应便于打逃敌 ……………………………………57

（1948年2月18日）

对薄一波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59

（1948年2月19日）

对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60

（1948年2月19日）

致粟裕电 ………………………………………………………………62

（1948年2月19日）

对中原各军的作战部署 ………………………………………………63

（1948年2月20日）

致邓小平、李达电 ……………………………………………………65

（1948年2月20日）

抓紧时间整训部队然后出击汉水流域 ………………………………66

（1948年2月21日）

钳制敌十一师等部以利刘邓主力休整 ………………………………69

（1948年2月22日）

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 ……………………………………71

（1948年2月22日）

在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时加写的几段话 ……………………………73

（1948年2月22日）

复聂荣臻、萧克等电 ……………………………………………75
（1948年2月23日）
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76
（1948年2月25日）
为李鼎铭题写挽词 ………………………………………………81
（1948年2月25日）
杨罗杨部应按时进入冀东 ………………………………………82
（1948年2月25日）
关于工商业政策 …………………………………………………83
（1948年2月27日）
对起义部队不用虚名笼络方法 …………………………………85
（1948年2月27日）
在晋冀鲁豫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的批语…86
（1948年2月29日）
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拟发的关于部队民主生活问题的通知上加写的话…87
（1948年2月）
转发彭德怀关于征收营业税的调查报告的批语 …………………88
（1948年2月）
对刘邓等部的作战部署 …………………………………………89
（1948年3月1日）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 ……………………………93
（1948年3月1日）
用诉苦和三查方法整训部队收效宏大 …………………………97
（1948年3月2日）
给朱学范的信 ……………………………………………………99
（1948年3月4日）

西北大捷基本原因在于冬训……………………………………100
（1948年3月4日）
政策和经验的关系………………………………………………101
（1948年3月6日）
致中央工委电……………………………………………………104
（1948年3月6日）
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105
（1948年3月7日）
攻击洛阳的重点应放在打援上…………………………………107
（1948年3月7日）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09
（1948年3月7日）
对邓小平报告的指示……………………………………………115
（1948年3月8日）
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116
（1948年3月8日）
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117
（1948年3月9日）
致刘少奇电………………………………………………………119
（1948年3月10日）
《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 ………………120
（1948年3月12日）
攻克洛阳后的行动方向…………………………………………123
（1948年3月14日）
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125
（1948年3月14日）

致邓小平电……127
（1948年3月14日）
致陈士榘、唐亮电……128
（1948年3月15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电……130
（1948年3月14日）
致刘少奇电……131
（1948年3月17日）
攻克淄川后的行动部署……132
（1948年3月20日）
关于情况的通报……134
（1948年3月20日）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141
（1948年3月20日）
致刘少奇电……142
（1948年3月20日）
陕甘全局战事由彭德怀部独力担任……143
（1948年3月21日）
刘邓陈唐两部的作战部署……144
（1948年3月22日）
致中央工委等电……149
（1948年3月23日）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150
(1948年3月25日)
给王观澜的信……152
（1948年3月31日）

关于部队中民主生活的指示……153
（1948年3月）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54
（1948年4月1日）
为《晋绥日报》题写报头……171
（1948年4月2日）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题词……172
（1948年4月2日）
关于土地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题词……174
（1948年4月2日）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76
（1948年4月2日）
应集结主力歼灭敌三十五军……182
（1948年4月4日）
致彭德怀电……183
（1948年4月4日）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84
（1948年4月8日）
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186
（1948年4月10日）
同意先歼暂四军主力……189
（1948年4月10日）
刘邓军准备出豫西南和汉水流域……190
（1948年4月16日）
致陈毅、粟裕电……192
（1948年4月21日）

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的批语…193
（1948年4月21日）
可先打长春但不应强调南下困难……………………………………194
（1948年4月22日）
晋察冀野战军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196
（1948年4月22日）
中共中央祝贺收复延安给彭德怀等的电报………………………197
（1948年4月24日）
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200
(1948年4月26日)
给蓝公武的信……………………………………………………203
（1948年4月27日）
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205
（1948年4月27日）
给毛岸英的信……………………………………………………207
（1948年4月29日）
批转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的批注………………………208
（1948年4月29日）
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209
（1948年5月1日）
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211
（1948年5月5日）
许谭兵团休整后向津浦线行动……………………………………214
（1948年5月7日）
中央关于和各民主党派交换召开新政协给港局等的指示…………215
（1948年5月7日）

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216
（1948年5月11日）
关于对付傅作义的指示电……………………………………………217
（1948年5月11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219
（1948年5月11日）
关于解放北平的一份指示电文………………………………………220
（1948年5月17日）
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夏季作战目标的指示…………………………223
（1948年5月21日）
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226
（1948年5月21日）
陈锡联部主要任务是钳制十八军……………………………………227
（1948年5月22日）
致邓小平电……………………………………………………………229
（1948年5月24日）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231
（1948年5月25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239
（1948年5月25日）
关于对外订立有借有还商业性协定问题……………………………240
（1948年5月28日）
许谭兵团是否进入鲁西南依情况而定………………………………241
（1948年5月28日）
许谭兵团应逐一攻占汶上济宁兖州等七城市………………………243
（1948年5月29日）

东北应充分准备大军所需粮食……………………………245
（1948年5月31日）
中央关于三三制政权问题的指示……………………………249
（1948年5月31日）
是否可能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250
（1948年6月1日）
多方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机会……………………………252
（1948年6月3日）
请林罗刘回答朱总司令提出的三个问题……………………………254
（1948年6月3日）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256
（1948年6月3日、8月28日）
关于攻打长春的几点考虑……………………………258
（1948年6月7日）
在批转华北局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计划的通报上加写的话……………………………261
（1948年6月8日）
待歼灭七十五师后再打别部……………………………262
（1948年6月15日）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264
（1948年6月15日）
复粟裕、张震等电……………………………265
（1948年6月17日）
致许世友、谭震林等电……………………………266
（1948年6月17日）
徐向前兵团已北上打阎不能西调……………………………267
（1948年6月18日）

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269
（1948年6月19日）
致韦国清、吉洛等电……271
（1948年6月19日）
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272
（1948年6月22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275
（1948年6月25日）
复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电……277
（1948年6月25日）
在睢杞通许之线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278
（1948年6月26日）
对西北局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土改和整党指示的报告的批语……279
（1948年6月26日）
致许世友、谭震林等电……280
（1948年6月26日）
许谭兵团一部仍应吸引敌军增援兖州……281
（1948年6月27日）
许谭兵团威胁徐州配合粟裕部作战……283
（1948年6月27日）
致中原局电……285
（1948年6月28日）
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的信……287
（1948年6月28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电……289
（1948年6月30日）

对开封守敌的喊话材料……290
（1948年6月）
许谭兵团集中兵力攻克兖州济宁是上策……292
（1948年7月4日）
不失时机寻歼吴绍周……294
（1948年7月6日）
钳制敌第十八军保障粟军胜利……296
（1948年7月6日）
一周内不使敌十八军越过睢杞线……298
（1948年7月6日）
致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等电……300
（1948年7月6日）
粟裕部应于十天内完成再战准备……301
（1948年7月8日）
对付胡琏张轸部北进的措施……302
（1948年7月8日）
对破坏铁路的指示……303
（1948年7月1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305
（1948年7月10日）
国内外暂时均不要出毛泽东选集……307
（1948年7月12日）
致中原局电……308
（1948年7月13日）
致华北局、华东局等电……309
（1948年7月13日）

争取三四日内攻克济宁汶上……………………………………310
（1948年7月14日）
许谭兵团宜攻击济南分散敌人………………………………311
（1948年7月14日）
歼敌后考虑主力北上…………………………………………313
（1948年7月14日）
军委关于准备歼灭东进之胡宗南部的指示…………………314
（1948年7月14日）
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316
（1948年7月15日）
望派兵抢占太原机场…………………………………………317
（1948年7月16日）
抢占机场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318
（1948年7月16日）
粟陈部应阻止邱兵团北援济南………………………………319
（1948年7月16日）
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321
（1948年7月16日）
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323
（1948年7月16日）
控制砀山黄口段威胁徐州……………………………………324
（1948年7月16日）
韦吉兵团应不惜疲劳再打几仗………………………………325
（1948年7月16日）
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的兵源问题…………………327
（1948年7月17日）

许谭所部暂在现地待命……330
（1948年7月17日）
致香港分局电……331
（1948年7月17日）
如不太困难应迅即抢占太原机场……332
（1948年7月18日）
变敌人的假和平运动为人民的真和平运动……333
（1948年7月18日）
准备歼击可能北犯之敌是正确的……335
（1948年7月20日）
同意刘陈邓歼击胡琏一部……337
（1948年7月20日）
询问一三两纵能否向西参战……338
（1948年7月20日）
给德田球一的慰问电……339
（1948年7月20日）
林罗刘部应作好南进作战的各种准备……340
（1948年7月22日）
立即组织西进兵团向绥远作战……342
（1948年7月23日）
致许世友、谭震林等电……344
（1948年7月23日）
致徐向前、周士第等电……345
（1948年7月23日）
部队休整及下一步作战计划……346
（1948年7月26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348

（1948年7月26日）

在审阅修改《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时加写的两段话…………………………………………………………349

（1948年7月29日）

应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350

（1948年7月30日）

致周恩来电………………………………………………………351

（1948年7月）

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352

（1948年8月1日）

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354

（1948年8月1日）

杨成武部向绥远行动配合锦榆线作战问题……………………356

（1948年8月3日）

东北主力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357

（1948年8月7日）

杨成武兵团应按原计划西进……………………………………359

（1948年8月9日）

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部队应迅速行动…………………………360

（1948年8月9日）

目前宜在渭北打胡宗南…………………………………………362

（1948年8月11日）

同意杨罗耿兵团行动计划………………………………………363

（1948年8月11日）

务必抓住可能从东北大量转移之敌……………………………365

（1948年8月12日）

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367
（1948年8月12日）
致各野战军、各军区等电……………………………………370
（1948年8月14日）
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371
（1948年8月15日）
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需要刘陈邓有力配合……………………373
（1948年8月15日）
不要过早引起傅作义西援……………………………………374
（1948年8月16日）
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处理占领城市工厂职工人员问题致东北局电时加写的话……………………………………376
（1948年8月19日）
综合报告十分必要……………………………………377
（1948年8月20日）
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378
（1948年8月22日）
关于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问题……………………………………380
（1948年8月22日）
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382
（1948年8月22日）
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指示……………………383
（1948年8月23日）
同意调韦吉兵团主力参加济南战役……………………………384
（1948年8月24日）
致杨成武、李天焕电……………………………………385
（1948年8月25日）

济南作战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战胜敌人······386
（1948年8月26日）

在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等电上加写的话······389
（1948年8月27日）

集中最大兵力阻援与打援······390
（1948年8月28日）

刘邓各纵似以待机歼敌为有利······392
（1948年8月28日）

致电哀悼日丹诺夫同志病逝······394
（1948年9月1日）

相机夺取归绥集宁等城······395
（1948年9月2日）

同意攻济及打援之部署······396
（1948年9月2日）

同意刘陈邓攻打熊绶春的部署······397
（1948年9月2日）

密切注视刘峙向济南空运兵力······399
（1948年9月2日）

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400
（1948年9月2日）

准备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403
（1948年9月3日）

东北秋季作战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404
（1948年9月5日）

准备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406
（1948年9月7日）

致电吊唁冯玉祥氏之丧……411
（1948年9月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412
（1948年9月）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432
（1948年9月11日）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435
（1948年9月11日）
攻济打援以按原计划进行为宜……436
（1948年9月13日）
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贺电……443
（1948年9月19日）
关于健全党委制……444
（1948年9月20日）
首先歼灭锦塘段之敌……446
（1948年9月21日）
攻济第二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447
（1948年9月21日）
布置多层堵击力量防王耀武突围逃窜……449
（1948年9月22日）
战争第三年的歼敌任务……450
（1948年9月24日、27日）
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453
（1948年9月25日）
复粟裕电……455
（1948年9月25日）

先打锦州可使我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456

（1948年9月27日）

集结主力先歼骑十一旅等部……458

（1948年9月27日）

做好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459

（1948年9月28日）

攻占锦州、义县、锦西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461

（1948年9月29日）

关于锦州战役和济南战役的指示电……464

（1948年9月30日）

以主力攻取襄阳威胁宜昌……466

（1948年9月30日）

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467

（1948年9月30日）

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470

（1948年9月至11月）

九月会议的中心议题……472

（1948年9月）

为《群众文艺》题名……474

（1948年9月）

给刘少奇等的信……476

（1948年9月）

复海外侨团电……477

（1948年10月1日）

华北第三兵团目前应集中兵力作战……478

（1948年10月3日）

攻占锦州计划不应再改……480
（1948年10月3日）

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483
（1948年10月3日）

致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电……485
（1948年10月3日）

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是正确的……486
（1948年10月4日）

同意对付援敌的处置……489
（1948年10月5日）

复粟裕等电……491
（1948年10月5日）

对太原作战的意见……492
（1948年10月6日）

到锦州前线指挥作战应保障安全……494
（1948年10月6日）

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的作战任务……495
（1948年10月6日）

乘胜扩大战果相机攻占太原……497
（1948年10月6日）

给彭真的信……499
（1948年10月7日）

为杜斌丞题写挽词……501
（1948年10月9日）

把全部精力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502
（1948年10月10日）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504
（1948年10月10日）

组建苏北兵团和山东兵团[1]

（1948年1月30日）

华东局，并告粟、陈，刘、邓[2]，邯郸局，中工委：

艳申电悉。兹决定：（一）韦国清[3]率二纵于丑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4]为政委，但实际仍主持工委工作，吉洛[5]为副政委，与韦国清一起主持军队。二纵、十一纵、十二纵负责人由华东局斟酌配备，报告我们。苏北兵团受陈粟[6]指挥。（二）许谭[7]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其作战、休整、补充等计划，经过华东局考虑向军委提出意见，得军委批准然后执行。目前应争取于丑号以前完成休整任务，丑月下旬开始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粟、陈，指粟裕、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参谋长。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韦国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陈丕显，当时任苏北军区政治委员。

[5] 吉洛，即姬鹏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委员。

[6]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7]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东兵团此后改为山东兵团。

作战行动，以一部监视胶东之敌，主力向胶济西段机动。（三）准备于三四个月后成立一个新纵队，加入山东兵团作战。

军委

子三十

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1]

（1948年1月30日）

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军部队中热烈进行的三查、三整[2]，就是用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方法，达到前两项目的。

关于经济民主，必须使士兵选出的代表有权协助（不是超过）连队首长管理连队的给养和伙食。

关于军事民主，必须在练兵时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战时，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此种会应开几次。此项军事民主，在陕北蟠龙战役[3]和晋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党内指示。

[2] 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的一个重要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3] 蟠龙是位于延安东北的一个市镇。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在蟠龙全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守军6700余人，并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给养。

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证明只有好处，毫无害处。

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应当相信，士兵对于一切好的和较好的干部是不会不加爱护的。同时，应当使士兵在必要时，有从士兵群众中推选他们相信的下级干部候选人员、以待上级委任的权利。在下级干部极端缺乏的时候，这种推选很有用处。但是这种推选不是普遍的推选，而是某些必要时的推选。

转发朱德给中共中央信[1]的批语

（1948年1月31日）

朱总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2]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3]，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

---

[1] 指朱德在视察晋察冀野战军和冀中等地后于1947年12月（亥）10日（灰）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信中介绍了晋察冀部队在攻打石家庄等地的战斗中，发动官兵边打仗边群策群力学习运动战、歼灭战、攻坚战战术夺得胜利的经验。同时反映了一些城市工人工资待遇过高的问题，认为这样会使公私工厂大部分关门，工人失业，损害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杀”政策。

[2] 指1947年5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东北的蟠龙镇全歼国民党守军胡宗南部6700余人的战斗。

[3] 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里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毛泽东
子世

对出击平绥路的意见[1]

（1948 年 1 月 31 日）

杨、罗、杨、耿，并告阜平局，中工委，林、罗、刘[2]：

你们部队是否正在作出击平绥路[3]的准备，何时开始行动，作战计划如何。我们意见除冀中地方兵团外，野战主力及五台、察[4]北一切部队，同时对北平、大同线举行攻势。但主力先打北平、张家口段，得手后向西再打张家口、大同段。此战役时间估计为一个月至四十天，然后休整一个月向冀东出动。

军委

子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4]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 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 年撤销。

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范围内[1]

（1948年1月）

……

一

用明码明日开始拍发，争取两天或三天发完，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立即在一切报纸上公开发表，并印小册子。请范长江同志注意不要译错文字或标点符号。我们这里除新闻简报上发表外，并印小册子送中后委。

二

兴县蔡家崖算是当地地主、富农比较集中的地方。该县多数乡村地主、富农没有蔡家崖这样多。可是蔡家崖的经验，却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向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二至九是毛泽东在讲话稿上修改和加写的几段文字。

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

三

这里必须指出，我提出兴县蔡家崖划错阶级成分的问题，只是当作一个例子来说。在晋绥其他乡村，在华北、华东、华中、东北及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如像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分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

四

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或出租一部分土地。他们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

五

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

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与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

六

土地平分后要号召农民勤劳生产，改良农业技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求得农民自己生活上的改善，求得民主政府与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公粮以利于战胜反动派，并求得日益增多的当作商品出卖的粮食及原料，使城市人民与工业获得足够的农业产品。

七

杜斌丞[1]是民主同盟[2]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3]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

---

[1]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7年10月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2] 民主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主要是文教科技界知识分子。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八

我们反对乱杀人，并不是说一个人也不能杀。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分子，国人皆曰可杀的这类分子，经过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经过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或更高的政府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执行枪决，并公布其罪状（杀人必须公布罪状，不得秘密杀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能建立革命秩序。但是，不能随便加人罪名而去处人以死罪。须知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这是因为多杀人必然要失去人民群众的同情，遭受很多人反对。

九

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述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和陈毅的谈话[1]

（1948 年 1 月）

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孤立蒋介石是长期的斗争，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内战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时我们孤立，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较大。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蒋介石的主要错误，是消极抗战，坐山观虎斗，他失去了民族领袖的地位。其次是垄断经济，政治上搞特务，实行一党专政，这三条使他送掉了国民党的江山。现在，人心向我，解决了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这是一九四七年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原因。军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的地位，没有进攻敌人。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是带着

---

[1] 这是毛泽东和陈毅在杨家岭谈话的主要内容。

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是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自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举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御），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更适合。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美国主张放弃纬线四十度以北，即东起安东，经过北宁线、平绥线、大同，西至西安，就是放弃东北，争取华北，巩固长江，经营华南。蒋介石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都堆下来了。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加困难。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战争不应使其间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如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说要下野，金蝉脱壳，移花接木，想借此得到休息的机会，以图卷土重来，预见到这种情况，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干涉方式多种多样，出兵参战亦可打退。我们不去挑战，只应战。美国人还有几年凶的，你若被他吓倒，就上了他的当。吓不倒也就算了。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为蒋英题词[1]

（1948年初）

光明在前，努力奋斗。

---

[1] 蒋英，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的夫人，1936年1月进入抗大学习，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随中央转战陕西、山西、河北。1948年初毛泽东为蒋英题写了：“光明在前，努力奋斗。”

粟裕部渡江的路线和方法[1]

（1948年2月1日）

粟裕，并告刘、邓，饶漱石，邓子恢[2]：

世午电[3]悉。（一）完全同意第一方案，叶王陶三纵[4]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三万新兵中，以两万补充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1948年1月底，中央军委决定将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调回黄河以北之濮阳地区休整，编成第一兵团，由粟裕率领南渡长江，挺进到闽、浙、赣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创建新解放区，以求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迫敌处于更加被动地位。4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渡江，集中兵力在苏淮平原歼敌。4月3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作了专门研究，同意粟裕的建议，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不向江南出动，在4至8个月内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

[3] 指1948年1月31日午时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以华东野战军目前状况，最近即行出动渡江南进比较困难，因此建议两个方案：一是将叶、王、陶纵调到陇海路附近继续休整一个半月，到3月下旬出动；二是叶、王、陶纵仍照目前部署南下参加一两个战役，3月中旬起休整一个半月或两个月，到5月中旬出动。

[4] 叶王陶三纵，指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一纵队、第六纵队、第四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叶飞、王必成和陶勇。

王陶三纵。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二）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1]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三）豫皖苏区党委及地方部队照原布置不变动，子恢率华中分局机构丑月可至该区。十一纵仍属粟唐野战军[2]。陈[3]日内动身东返。（四）请漱石、子恢帮助粟裕解决南进有关诸问题。

军委

丑东亥

---

[1]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2] 粟唐野战军，指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率领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

[3] 陈，指陈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1]

（1948年2月3日）

关于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

一、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这种地区大体上早已分配土地，只须调整一部分土地。这种地区的工作中心，应当是按照平山经验[2]，用党内党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在这种老区，不是照土地法再来分配一次土地，也不是人为地、勉强地组织贫农团去领导农会，而是在农会中组织贫农小组。这种小组的积极分子，可以担负农会和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工作，但是不应当排斥中农，规定一定由贫农做领导工作。这种地区的农会和农村政权的领导工作，应当由贫农和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在这种地区，过去的贫农大多数已升为中农，中农已占乡村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必须吸收中农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农村的领导工作。

二、日本投降至大反攻，即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七年八月两年内所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占现在解放区的绝大部分，可称

---

[1] 这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2] 平山县在河北省西部，当时属于晋察冀解放区。这里说的平山经验，是指该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采取邀请党外群众列席党支部会议的方式，整顿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经验。

为半老区。在这种地区，经过两年清算斗争，经过执行《五四指示》[1]，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已经相当提高，土地问题已经初步解决。但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尚不是很高，土地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并且应当准备一次分不好再分第二次，还要复查一、二次。这种地区，中农占少数，并且是观望的。贫农占大多数，积极要求土地。因此，必须组织贫农团，必须确定贫农团在农会中、在农村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三、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这种地区，群众尚未发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的势力还很大，我们一切尚无基础。因此，不应当企图一下实行土地法，而应当分两个阶段实行土地法。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在这个阶段中，又要分为宣传，做初步组织工作，分大地主浮财[2]，分大、中地主土地和照顾小地主等项步骤，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在这个阶段中，应当组织贫农团，作为领导骨干，还可组织以贫农为主体的农会（可称为农民协会）。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拿来分配，并对前一阶段中分配地主土地尚不彻底的部分进行分配。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

---

[1] 即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2] 浮财，指粮食、金钱、衣服、什物等动产。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1]

（1948年2月5日）

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许多党的地方领导机关在长时期内，甚至没有正式讨论与宣传解释过中央的路线，以致于使得工运工作同志完全不了解中央的路线，他们竟达到如此麻木不仁的地步。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党的一切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纪念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二十五周年社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毛泽东还把这篇社论稿的原题《解放区职工运动的方向》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在社论稿论述工人应有的工作态度的地方加写了：“其他劳动条件亦不可定得太高，不可违背经济情况所许可的限度，不可违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原则。”这篇社论发表在1948年2月8日《人民日报》。

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关于审查新区土改指示给刘少奇的信

（1948年2月5日）

少奇同志：

因粟裕、陈谢两军正在休整开干部会，请你对我一月二十二日给粟裕的指示先加审查提出意见，以便二月十日左右能将此指示发给他们，盼复。

毛泽东

老区半老区实行土地法应有所不同

（1948年2月6日）

井泉、仲勋[1]，并告少奇，一波[2]：

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与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去年九月）时两年内所占地方的半老解放区，与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的新解放区，此三种地区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应有所不同，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似亦应有所不同，请将你们对此种区别的意见电告。

在半老解放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组织贫农团与农会，而以贫农团为领导骨干，农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只占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老解放区，例如，晋绥的九十万人口或四十五万人口的老区，陕甘宁约一百万至一百二十万人口的老区，土地大体上早已平分了，即是大体上早已实行了土地法，在这里不是再来一次平分，而是调剂土地，填平补齐，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也照中农占少数，贫农

---

[1] 井泉，即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兼晋绥军区政治委员。仲勋，即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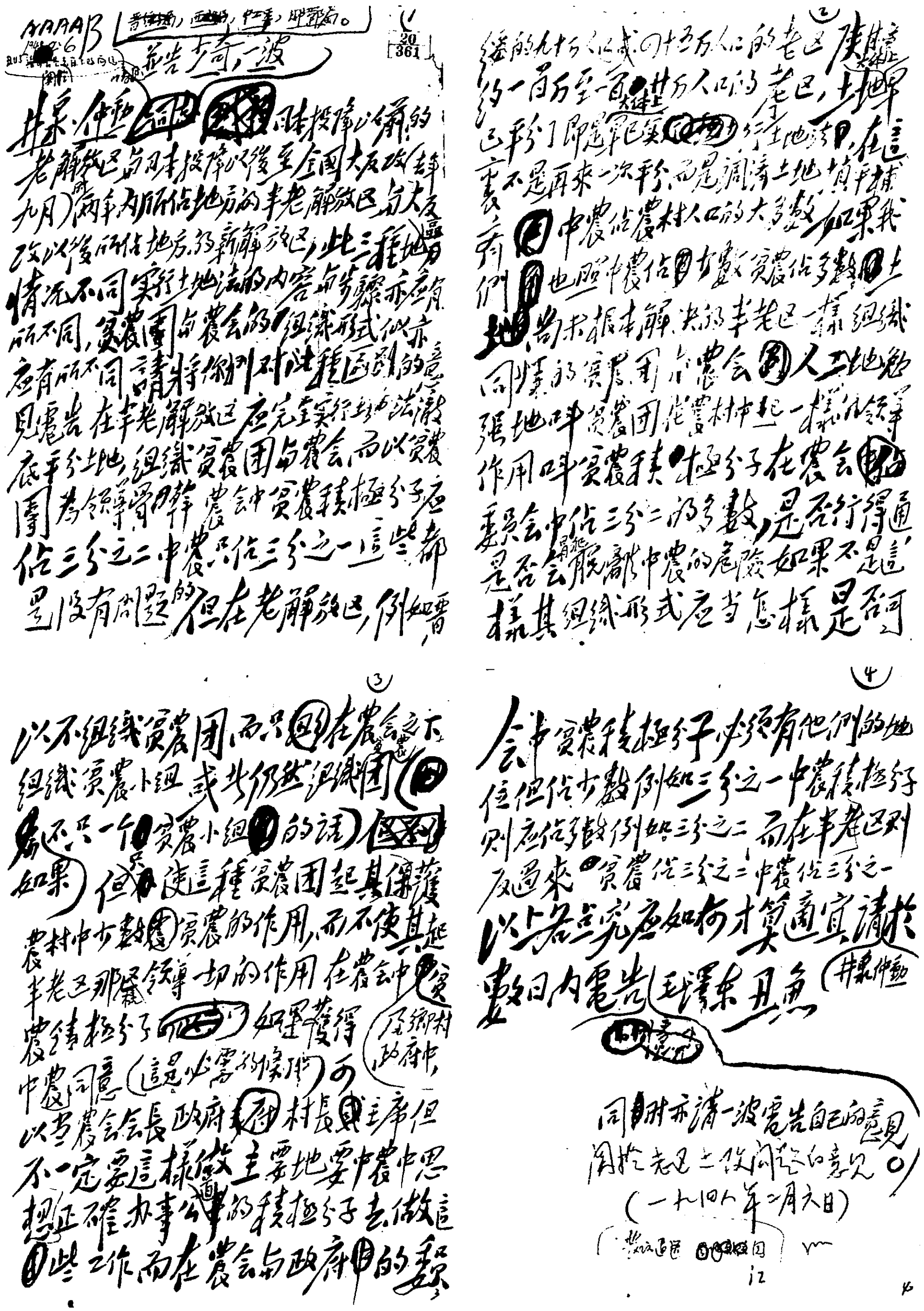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兼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占多数，土地尚未根本解决的半老区一样，组织同样的贫农团与农会，人工地勉强地叫贫农团在农村中起一样的领导作用，叫贫农积极分子在农会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是否行得通，是否会冒犯脱离中农的危险？如果不是这样，其组织形式应当怎样？是否可以不组织贫农团，而只在农会之下组织贫农小组或者仍然组织贫农团（如果不只一个贫农小组的话），但只使这种贫农团起其保护农村中少数贫农的作用，而不使其起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在农会中及乡村政府中，贫农积极分子如果获得中农同意（这是必需的条件），可以当农会会长，政府村长、主席，但不一定要这样做，主要地要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这些工作，而在农会与政府的委员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必须有他们的地位，但占少数，例如三分之一，中农积极分子则应占多数，例如三分之二，而在半老区则反过来，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

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井泉、仲勋于数日内电告，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

丑鱼



并告少奇、一波

井泉、仲勋：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与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去年九月）两年内所占地方的半老解放区及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的新解放区，此三种地区情况不同，实行土地法的内容与步骤亦应有所不同，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似亦应有所不同。请将你们对此种区别的意见电告。在半老解放区应完全实行土地法，彻底平分土地，组织贫农团与农会，而以贫农团为领导骨干。农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只占三分之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在老解放区，例如晋绥的九十万人口或四十万人口的老区，陕甘宁约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老区，土地早已平分了，即是说已实行了土地法了，在这里不是再来一次平分，而是调济土地，填平补齐。中农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如果我们也照中农占少数、贫农占多数、土地问题尚未根本解决的半老区一样组织同样的贫农团与农会，使这些地区的贫农团在农村中起一样的领导作用，贫农积极分子在农会委员会中占三分之二的多数，是否行得通，是否会有脱离中农的危险。如果不是这样，其组织形式应当怎样，是否可以不组织贫农团，而只在农会之下组织贫农小组，或者仍然组织贫农团，但只使这种贫农团起其保护农村中少数贫农的作用，而不使其起半老区那样领导一切的作用。在农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如果获得中农同意（这是必需的条件），可以当农会会长、政府委员、村长或主席，但不一定要这样做，主要地要中农中思想正确、办事公道的积极分子去做这些工作，而在农会与政府中的委员会中贫农积极分子必须有他们的地位，但占少数，例如三分之一，中农积极分子则应占多数，例如三分之二，而在半老区则反过来，贫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以上各点究应如何才算适宜，请于数日内电告。

毛泽东　丑鱼

同时亦请一波电告自己的意见

关于老区土改问题的意见。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

毛泽东致李井泉、习仲勋电的手稿。

致邓小平等电

（1948年2月6日）

小平，并野后，陈、谢，粟、陈、唐：

在大反攻后所占新区斗争策略与组织形式，均应与日本投降前的老区及日本投降至大反攻两年期间的半老区有所不同。在斗争策略上似应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缩小打击面，中立富农，专对地主，又应分为打击大地主阶层与打击整个地主阶级两个步骤。此阶段内因为中农是观望的，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最为积极，故农会实际上是以贫农为主体，似乎可以不组织贫农团，而农会的名义亦似以农民协会为适当。第二阶段，则平分一切封建阶级的土地，富农至此时才动，此时应组织贫农团，以为农会或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这样是否较为适宜，请将你们的意见于数日内电告。上述这种意见与小平答复六项询问电中某些意见不合，尤其与野后某电所述组织贫农团取得了成绩的情况不合。是否因为鄂豫皖曾经是老苏区不适用上述意见，而在完全的新区则适用上述意见？究以何者为较适宜，请小平分析比较电复，亦请野后、粟陈唐、陈谢三方面考虑电复。我在子养就起草了一个复粟裕关于论新区斗争策略的电报，因为对上述问题及其他几点尚未确定，故尚待征集少奇及你们意见加以修改才能发出。又土改时间问题，我在几个月前觉得可以快些，后来得到陈谢在陕灵阌区的经验及晋绥陕甘宁等老区经

验，觉得不能过于性急，应以条件成熟为原则，而就整块区域来□□□□□□□□□□□时间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过于性急，必出毛病，此点亦望考虑。

毛泽东
丑鱼

刘邓部宜组织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1]

（1948年2月7日）

刘、邓：

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如果尚在大别山，似宜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你们三个纵队、陈唐[2]四个纵队、陈谢[3]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4]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这是因为：（一）粟裕[5]准备机动；（二）你们准备派两部机动；（三）将敌人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等机动，并利于大别山、江汉等地放手发展；（四）北面缺乏指挥中心；（五）北面有巩固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六）必须打歼灭战才能解决问题。以上望统筹见复。此外根据陈谢支电要求成立区党委及军区，先念[6]既不能去，似以派雪峰[7]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4]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5] 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

[6]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7] 雪峰，即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副书记。

当区党委书记兼政委，陈赓为军区司令员兼野战司令员，谢富治为军区副政委兼野战政委为适宜，暂时不成立中央分局。如何？亦盼复。

又你们三万五千新兵，似宜分作两批补充各纵，头一批补充二万至二万五千，留下一万至一万五千，几个月后在歼灭战中补充那些损失较大的部队，因为今年再无新兵。

军委

丑虞

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

（1948年2月7日）

林、罗、刘[1]并朱、刘[2]：

六日电悉。

（一）庆祝你们攻克辽阳。

（二）南线各军除一部分外，一年半中没有作过大休整，最近作了一次全面大休整。彭张军[3]丑[4]上旬结束休整，中旬行动。陈粟军，陈谢军，许谭军，徐滕薄军[5]丑底结束休整，寅[6]初行动。刘邓

---

[1] 林，指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指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刘，指刘亚楼（1910—1965），福建武平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2] 朱、刘，指朱德、刘少奇。

[3] 彭张军，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

[4] 丑，即2月。

[5] 陈粟军，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的华东野战军。陈谢军，指陈赓任前委书记、谢富治任副书记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许谭军，指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徐滕薄军，指晋冀鲁豫军区所属部队，由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领导。

[6] 寅，即3月。

军[1]暂时分散打小仗，是半休整状态。苏北军[2]原只四个旅二万余，现拟增强至七个旅五万余，寅月可行动。南线敌除对大别山尚有重点进攻外，其他均取守势。杨罗杨军[3]丑底寅初当可打平绥[4]，卯月[5]或可出冀东。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扩大了，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

（三）你们如能照我前次电报所讲的意见，将大休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时间推迟至解冰以后，而在解冰以前只利用几个战役或战斗之间的空隙作若干次小休息（这种小休息是完全必要的），则尚可利用冰期打两个月仗，歼灭大批敌人，替夏秋两季创造良好战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6]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7]等地之敌。究

---

[1] 刘邓军，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

[2] 苏北军，指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3] 杨罗杨军，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1911—1994），湖南株洲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1914—2004），福建长汀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

[4] 平绥，即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5] 卯月，即4月。

[6] 指辽宁的辽阳、鞍山、本溪和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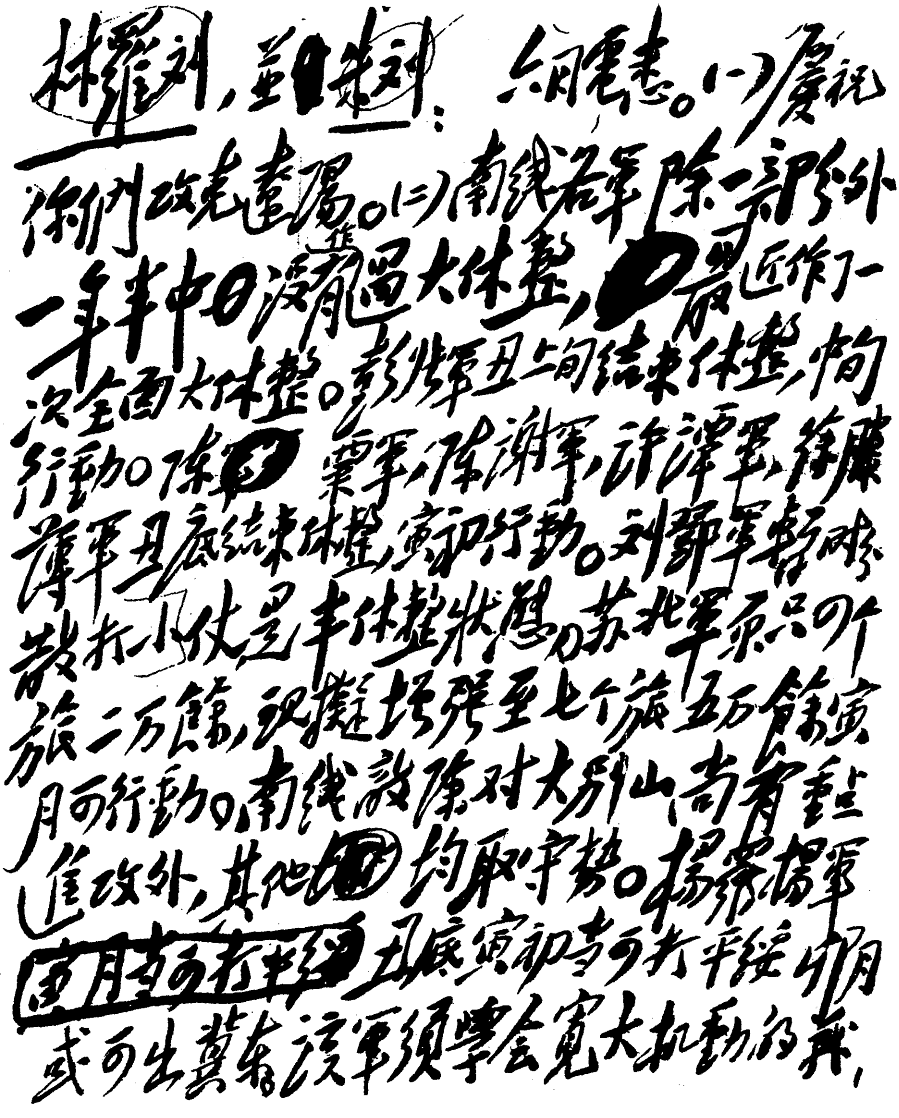
[7] 滦州，即河北滦县。

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蒋介石曾经考虑过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华北，后来又决定不撤。这主要是因为南线我军尚未渡过长江及北线我军尚未给蒋军以更大打击的原故。但最近你们已连续取得几次大胜仗，如果你们再有几次大胜仗，杨罗杨又出平绥、出冀东，南线我军又有积极行动，蒋军从东北撤退可能性就将突然增长，其时间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点。因此你们应准备于一个月内外完成现地区之作战，而于一个月以后再进行一个战役（包括打几仗），然后进入大休整，准备应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势。但不知部队情况许可这样做否？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1]、昌、滦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毛泽东
七日廿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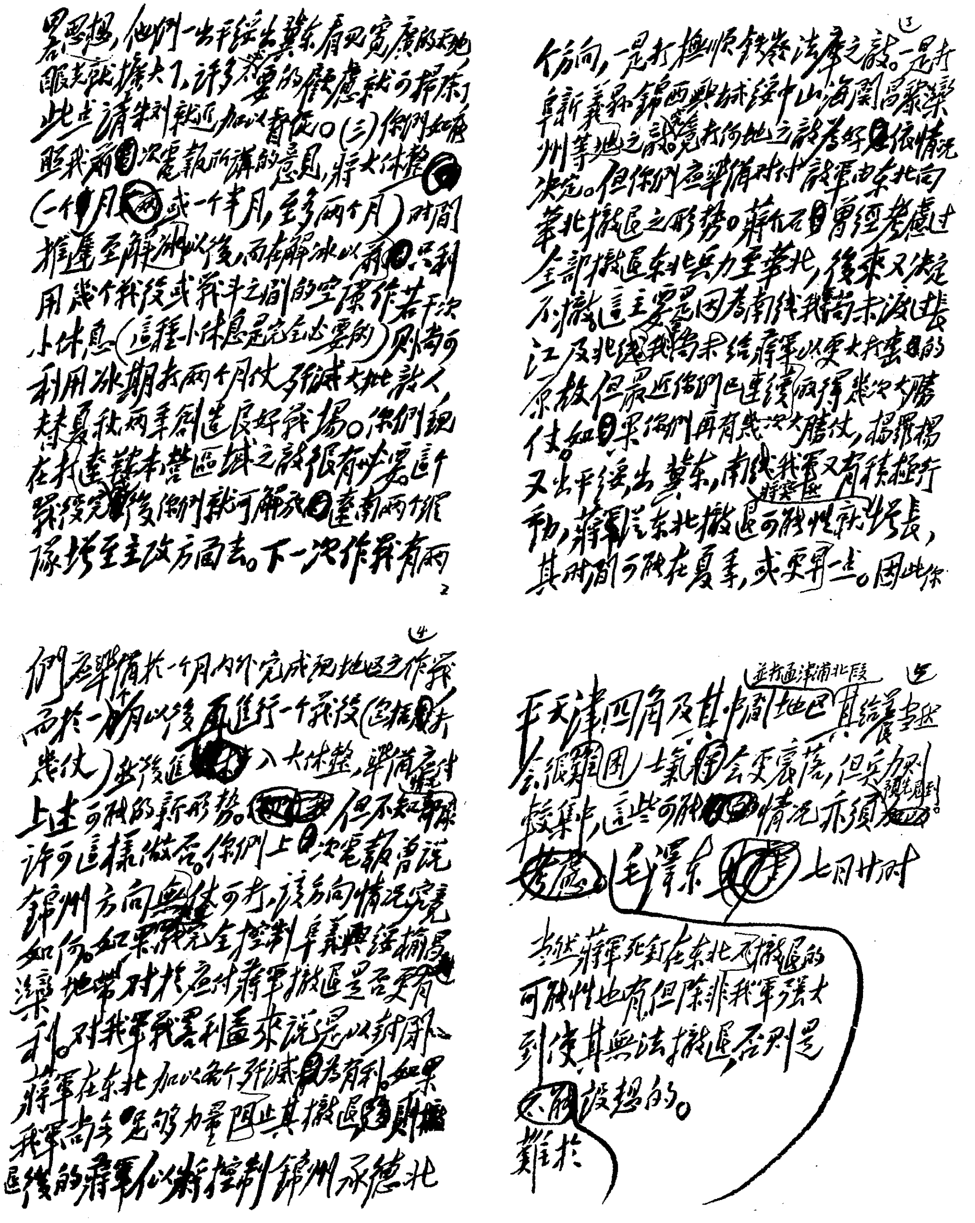
---

[1] 榆，指榆关，即山海关。



林罗刘，并朱刘：六同志。（一）庆祝你们攻克遼陽。（二）南线各军除一部外一年半中日没有进过大休整，最近作了一次全面大休整。彭张军丑上旬结束休整，中旬行动。陈粟军、陈谢军、许谭军、徐滕薄军丑底结束休整，寅初行动。刘邓军暂时散打小仗是半休整状态。苏北军原只四个旅二万余，现拟扩至七个旅五万余，寅月可行动。南线敌除对大别山尚有重点进攻外，其他均取守势。杨聂杨军~~寅月当可打平绥~~丑底寅初当可打平绥，卯月或可出冀东。该军须学会宽大机动的战，

毛泽东致林彪等电的手稿。



略思想，他們一出平綏出冀东看见宽廣的天地，眼光就擴大了，許多不要的顧慮就可掃除了，此点請朱刘就近加以督促。（三）你們如能照我前次電報所講的意見，將大休整（一個月或一個半月，至多兩個月）時間推遲至解冰以後，而在解冰以前只利用幾個戰役或戰斗之間的空隙作若干次小休息（這種小休息是完全必要的），則尚可利用冰期打兩个月仗，殲滅大批敵人，替夏秋兩季創造良好戰場。你們現在打遼鞍營區域之敵很有必要，這許多戰役完結後你們就可解放遼南兩個縱隊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戰有兩

2

③

個方向，一是打撫順鐵嶺法庫之敵。一是打阜新義縣錦西興城綏中山海關昌黎灤州等地之敵。究竟打何地之敵為好，望依情況決定。但你們應準備對付敵軍由东北向華北撤退之形勢。蔣介石曾經考慮過全部撤退东北兵力至華北，後來又決定不撤退，主要是因為南線我軍尚未渡過長江及北線我軍尚未給蔣軍以更大打擊的原故。但最近你們已連續取得幾次大勝仗，如果你們再有幾次大勝仗，楊羅楊又出平綏出冀东，南線我軍又有積極行動，蔣軍從东北撤退的可能性就增長，其時間可能在夏季，或更早一些。因此你

④

們應準備於一個月內外完成現地區之作戰，而於一個月以後進行一個戰役（包括幾仗），然後進入大休整，準備應付上述可能的新形勢。但不知實際許可這樣做否。你們上次電報曾說錦州方向無仗可打，該方向情況究竟如何。如果我完全控制阜義興綏榆昌灤地帶，對於應付蔣軍撤退是否更有利。對我軍戰略利益來說，是以封閉蔣軍在东北加以各個殲滅為有利。如果我軍尚無足夠力量阻止其撤退，則撤退的蔣軍似將控制錦州承德北

⑤

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間地區（並打通津浦北段），其給養當然会很困難，士氣会更衰落，但兵力較集中，這些可能的情況亦須預先慮到。

毛澤东 七日廿时

當然蔣軍死釘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軍強大到使其無法撤退，否則是不能設想的。

毛泽东致林彪等电的手稿。

致东北局等电[1]

（1948年2月9日）

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中央工委电的主要内容。

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1]

（1948年2月11日）

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例如：

一、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或者说民主政府只是农民的政府，或者说民主政府只应该听工人和贫雇农的意见，而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这是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而我们的通讯社、报纸或广播电台竟将这类通讯发表。各地党委宣传部，对于此类错误竟没有任何的反映。此类宣传，在过去几个月中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相当多，以致造成了一种空气，使人们误认为似乎这是正确的领导思想。甚至因为陕北广播电台播发了某些不正确的新闻，人们竟误认为这是被中央认可的意见。

二、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

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关于既反对观望不前、又反对急性病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抓紧了；但在许多地区却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扬急性病的东西。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四、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

总之，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分，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就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的工作同志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中央路线，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种检查，责成各地党委宣传部和新华总社负主要责任，并将结果用自己的名义写一个政策性的报告给中央宣传部。

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1]

（1948年2月15日）

一、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这点在老区和半老区亦是如此。

二、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又要分几个步骤：首先打击大地主，然后打击其他地主。对于恶霸和非恶霸，对于大、中、小地主，在待遇上要有区别。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在内。但在待遇上，对待富农应同对待地主有所区别。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在区别待遇和总的打击面上，半老区亦是如此。老区一般只是填平补齐工作，不发生此项问题。

三、先组织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严禁地主富农分子混入农民协会和贫农团。贫农团积极分子应作为农民协会的领导骨干，但必须吸引一部分中年积极分子参加农民协会的委员会。在土地改革斗争中，必须吸引中农参加，并照顾中农利益。

四、不要全面动手，而应选择强的干部在若干地点先做，取得经验，逐步推广，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在整个战略区是如此，在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个县内也是如此。这在老区、半老区都应如此。

五、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

六、反动的地主武装组织和特务组织，必须消灭，不能利用。

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此点老区半老区都适用。

八、应当利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但是赞成土地改革的本地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参加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但要加紧对于他们的教育，防止他们把持权力，妨碍土地改革。一般不宜要他们在本区本乡办事。着重任用农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

九、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从长期观点筹划经济和财政。军队和区乡政府都要防止浪费。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1]

（1948年2月15日）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

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是社会的生产力。

人们为着要进行生产，就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彼此发生一定的相互关系，否则就无法进行生产。因为人们的生产从来就是社会的生产，不能孤立地进行生产。这种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为

---

[1]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章是毛泽东写的。整个规定草案共有25章。毛泽东在1948年2月20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着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这个规定起草于1947年冬，1948年2月15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完稿，次日发给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进行讨论，规定不下达。

着通俗起见，所有关系在本文件中称为占有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财产的所有权关系。

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的生产关系相结合，就是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在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开始由社会一切人们的共同占有关系，发展成为一部分人们的私人占有关系。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多数人丧失或只占有很少的生产资料。这样，后一种人的绝大部分就被迫为前一种人劳动，把自己劳动的结果交给前一种人，并向前一种人领取少量的报酬，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这就是说，后一种人受前一种人的剥削，而前一种人则依靠大量地剥削后一种人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后一种人中间的一部分，因为占有足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资料，是以进行独立劳动作为自己的生活来源的，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逃脱前一种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剥削。这样，人们就分裂成为不同的阶级，分裂成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例如由石头工具发展到简单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较精的金属手工工具，再发展到复杂的机器工具，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人们的生产关系，就发生变化。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剥削阶级对于被剥削阶级施行剥削的方法也就发生变化。

社会分裂成为许多阶级，这样的社会，叫做阶级社会。这样的阶级社会，既区别于人类历史上分裂为阶级以前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又区别于阶级被消灭以后的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后一种社会，现在已经在苏联存在和发展。全世界一切人类社会现在正向着苏联所走的道路前进，阶级社会的历史快要完结。人类历史上的阶

级社会，大体上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如此。只是因为外部和内部的原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〇年中英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由古代的独立的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逐步地改变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形态，即是说半独立的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在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就生产技术而论，中国存在着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中小规模的机器生产事业和以家族为单位的手执简单工具以从事生产的各种小生产事业。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在鸦片战争以来的长时期内占据优势。这种优势，现在正在被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所迅速地代替着。

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赖他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是适合于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就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现实的基础，而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层建筑物，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竖立起来的。同时，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是和这个基础相适合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一般社会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者说，就和

所有权关系（所有权关系不过是现存生产关系的法律上的表现而已）发生矛盾。而生产力，在此以前，是在这些关系的内部发展了的。于是这些关系，就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枷锁。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在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物中，也就或多或少地迅速地发生大变革。”[1]

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竖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

第二章　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

第一节　中国目前所有的主要阶级如下：（甲）无产阶级。例如

---

[1] 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新的译文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资本家经营的机器工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他们都不占有私有的生产资料。但是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按其原来状况，是无产阶级，但是按其现在状况，他们却经过了他们和其他劳动人民所共同支配的新民主国家，已经集体地占有国家企业中的生产资料，就是说，已经与其原来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则受资本家所剥削。（乙）农民。农民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或者耕种地主的土地，或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都耕种地主的土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所有农民都耕种自己的土地。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不足维持生活，因而必须出卖部分劳动力的，叫做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农民中间占有的生产资料足以维持生活，因而不必出卖劳动力的，叫做中农。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贫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彻底完成以后，中农占农民的大多数。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以前，农民都受地主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只有在新民主国家实现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后方才免除这种剥削。（丙）农民以外的独立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他们都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以自己的独立劳动为生。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其他剥削阶级所直接地或间接地剥削。（丁）自由资产阶级。这就是民族资本家和新式富农。他们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以自由资本主义的方法剥削雇佣劳动者。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他们受帝国主义者、地主和官僚资本家所压迫、损害或限制。（戊）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

和旧式富农。他们占有最多的生产资料，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帝国主义相结合，以封建的、买办的、垄断的方法剥削劳动人民，并压迫、损害或限制自由资产阶级。

第二节　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们，共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九十，其中农民则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所有这些劳动人民，在反动的国家政权下，除受经济上的剥削外，还受政治上的压迫。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1]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这种革命斗争经验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建设新国家的伟大的领导能力。

第三节　自由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但是因为他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这种压迫、损害或限制远较劳动人民所受者为轻），所以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内，他们可以参加这种革命，或者保守中立。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

---

[1] 关于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后来中共中央作了修正。1951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但是，他们中间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是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中国人民对于这部分人的反动行为，必须予以警戒和揭露。但是这种政治上的警戒和揭露，应当与经济上的消灭严格地区别开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

第四节　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旧式富农，人数很少，却占有全国生产资料的最大部分。其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是按照一般情况，大约只占乡村人数百分之十、户数百分之八左右，而他们占有的土地，则达全部可耕土地的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之多。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即中国的大资产阶级，人数更少，但是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极为巨大，以致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仅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的财富而论，其价值即达一百万万至二百万万美元之多。所有这些封建的、买办的反动阶级，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以及代表这个国家的反动的腐朽的政府。这个反动政府，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订立各种不利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动条约，使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政治的和经济的特权，因此这个政府就变成了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对内方面，这个政府压迫人民，举行反革命战争，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势力。全国一切生产力，除了已经获得解放的地区以外，均被这些

反动阶级所控制的反动的退步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所束缚，日趋衰败，不能发展。而生产力本身的要求，则是用革命方法解除这种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推翻这种旧有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使全国一切积极的生产力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替未来的更进步的更能自由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准备条件。这个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容，就是废除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强占的特权，废除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废除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垄断的资本所有权。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生产关系，都是被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的。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被什么样的阶级的国家权力所保护，而所谓国家权力，首先就是军队的武力。人们如果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人们就或早或迟地要推翻旧的国家权力，建立新的国家权力。中国人民如果要消灭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和买办的生产关系，完成民族独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借以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他们就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及旧式富农所结合在一起的反动的腐朽的国家权力，首先就必须消灭一切反动军队。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所从事的伟大的神圣的正义的革命战争，正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这个革命战争，现在正是日益接近于全国的胜利。

在林彪给中宣部的电报[1]上写的批语

（1948年2月15日）

（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2]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外文。

---

[1] 林彪在电报中，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发表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他的信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这封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陆，指陆定一。乔，指胡乔木。

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

（1948年2月16日）

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粟裕，陈、谢，彭、张，杨、罗、杨，陈、唐，林彪，许、谭[1]，华东工委，阜平局，东北局，西北局，晋绥分局，中后委，法委，并告中原局及各野战前委：

本日起经新华社电台拍发《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草案给你们（西北局，晋绥分局，中后委，法委四处用人送达），共二十五章，二万余字。你们收到后，请召集会议逐章或分为几部分加以讨论，提出内容及文字的修改意见，在寅铣[2]以前电告我们。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见加以必要的修

---

[1] 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林彪，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寅铣，即3月16日。

改，然后公开发表[1]。

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你们讨论这个文件草案的会议，应当包括政府、军区及民众团体的若干负责同志，使你们对于这个文件草案的讨论成为有中央局一级多数负责同志参加的讨论，大家负有责任，使这个文件成为一个尽可能正确与切实可行的文件，在中央发表之后，各地能够步骤一致地而不是参差不齐地见于实施。为着便于讨论，会议人数亦不可过多，大约以十至十五个负责同志到会为适宜，望斟酌办理。中原局及各野战前委因其环境不可能讨论，此项草案故未发给他们。

中央
丑铣

---

[1]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的运用

（1948年2月17日）

中原局、野后各同志：

丑元电[1]悉。

（一）同意你们的意见，先建立贫农团，提高贫雇农的觉悟性、组织性，树立贫雇农威信。在对国民党及地主的斗争中，吸收中农参加。几个月后，再建立联合全体农民的农民协会。此点在中央新区土改要点指示[2]中已规定了。贫农团及农民协会，均须严防地主、富农及其他投机分子混入。农民协会及其委员会，必须有三分之二

---

[1] 指中共中央中原局、晋冀鲁豫野战军后勤部1948年2月13日关于新区斗争策略与组织形式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中央在新区斗争策略上分为两个阶段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在组织形式上先建农协（农会）而后建贫农团，我们感觉有困难和不利之处。这主要是，贫农一开始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农协领导权和斗争果实将落入中农、流氓甚至富农手中。中农甚至少数富农因先于贫农登上政治舞台，大大妨碍贫农核心的建立。另外，由于派到新区的工作人员成分不纯，常有意无意忽视贫农核心的建立。因此，我们觉得斗争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贫农核心的培养树立，组织形式以同时建立农协和贫农团为好。这与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基本路线亦极符合。如果必须先建立农协的话，农协委员及农协会员内贫农均须占三分之二以上。

[2] 指毛泽东1948年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

的贫雇农作会员及委员，确实掌握贫雇农的领导权，此点亦是完全必要的。

（二）新区斗争策略阶段必须分为先斗地主后斗富农两个大阶段。在第一个大阶段中，又必须分为几个步骤，从斗大地主、恶霸、反动分子开始，依据群众觉悟及组织程度逐步推广打击面（总的打击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乡村人口百分之十）。这是一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农民要求先向他们最痛恨的属于富农、小地主甚至个别中农中的保甲长、恶霸分子施行斗争，我们也不允许。特别是因为有许多乡村，没有大地主，只有中小地主及富农，应当允许农民这样做。我们打击富农、小地主中的反动的保甲长、恶霸分子，和我们在第一个大阶段中缩小打击面，对于富农、小地主中的多数人暂时不去惊动他们的策略，并不矛盾。

毛泽东
丑篠

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

给□□的信

（1948年2月17日）

看到你的报告以后，对你所提出的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在老区凡是已实行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还不十分彻底，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方，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而是应该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来满足部分农民土地不足的要求，此种地区如再去平分土地，那是错误的。在这种地区，只在农民内部组织贫农小组来保障贫雇农的利益。在农民委员会中，在农民代表会议及政府中，能使贫雇农与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保障他们在农村中的领导权，并同时又使老中农能占三分之一的地位，这样做是很好的。在贫雇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并硬要贫农团去指挥一切，这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路线的，是极端冒险的命令主义，如果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还是有这样做的应立即停止，并将他们调回训练，训好后再回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起来，此事希很好注意。

其次，在老区与新区之外，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半老区。在这种半老区里，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得像老区那样彻底，但它较之完全没有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又更好些。在这种半老区的工作方针，应同老区有区别，也同新区有区别，望你们加以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函告我。

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

（1948年2月17日）

（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

（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毛泽东
丑篠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给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各前委的电报。

致邓小平电

（1948年2月17日）

小平同志：

齐佳两电悉。

（一）意见很好，已转各区仿办。

（二）第一阶段缩小打击面，应将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痛恨者包括在打击范围之内，否则不能充分动员群众，这与暂时对富农、小地主中的多数不去惊动，以待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再去打击之策略并不矛盾。

（三）无论何地仍以先组贫农团，几个月后再组农民协会为有利。

毛泽东

丑篠

打几个胜仗以配合粟裕部休整

（1948年2月17日）

小平、先念：

粟裕所部为敌五军等部扰乱，不利休整，需要桀唐、陈谢[1]及你们淮北部队集中兵力打几个胜仗调动五军等部，方能安心休整。该部休整需一个多月，大约要卯月中旬或下旬方能出动。在此期间，桀唐、陈谢及你们淮北部队正好集中打几仗，然后当粟部出动时，则以全力配合粟之行动。同时你们主力四个纵队（十个机动旅）不宜全部集中，只宜集中两个纵队（五个机动旅）和桀唐、陈谢一起行动。兵力已很大，应留五个机动旅于大别山待机歼敌。因此，我的意见，大别山全区交先念指挥，小平率领应当集中的部队，现在就渡淮北上，和伯承[2]会合，统一指挥三军合组的野战军（共有二十二个机动旅）。大别桐柏江汉三区均为辅助战场，北面为主要战场。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毛泽东

篠亥

---

[1] 桀唐，指陈士桀、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2] 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

攻城部队整训地点应便于打逃敌

（1948年2月18日）

向前，并告李、周，彭、张、赵，滕、薄[1]：

篠酉电[2]悉。（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荫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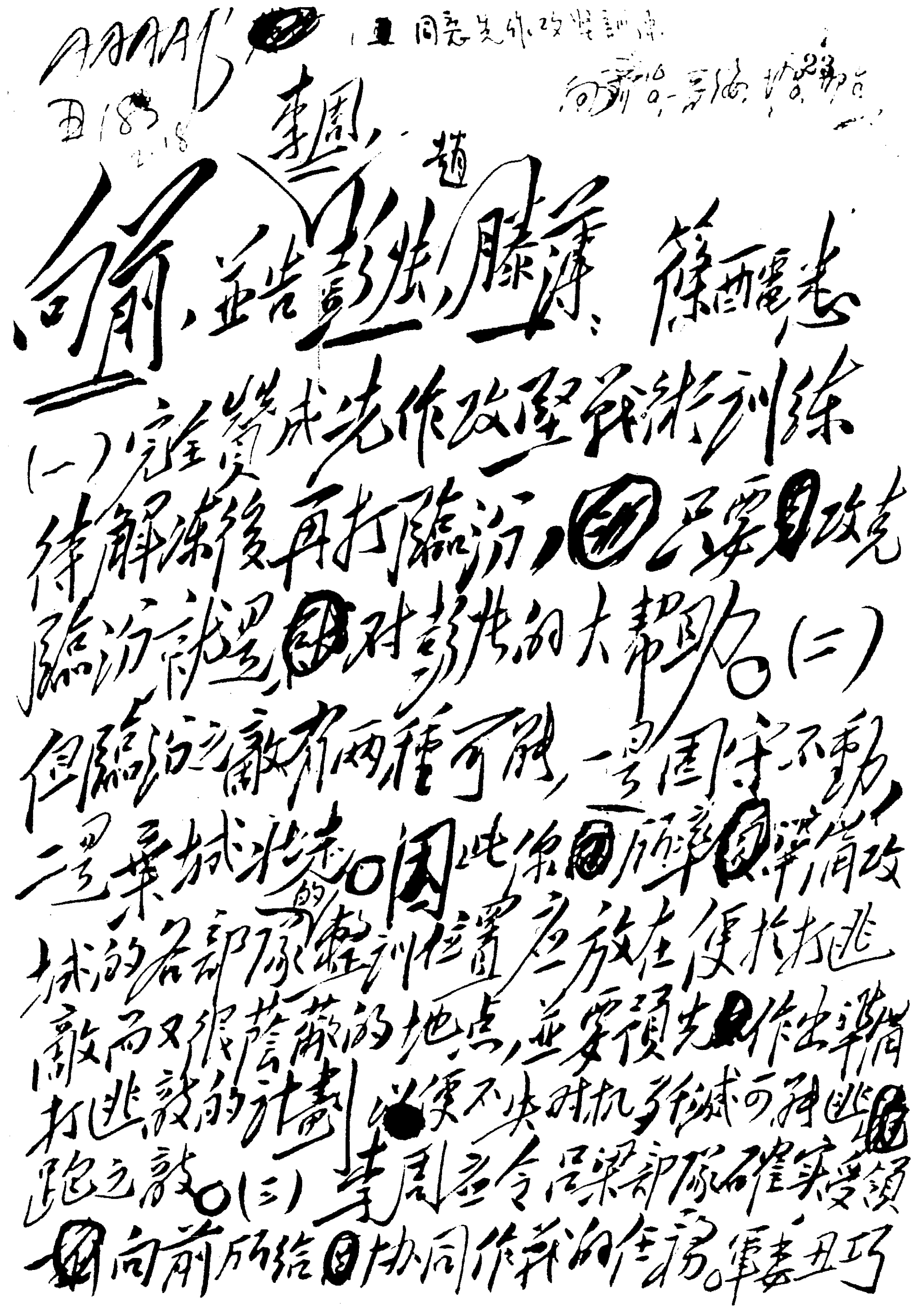
军委

丑巧

---

[1] 向前，指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李、周，指李井泉、周士第，当时分别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赵，指张宗逊、赵寿山，当时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滕、薄，指滕代远、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2] 指1948年2月17日酉时徐向前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攻占运城、解县后，下一步拟攻歼临汾之敌。作战开始前，将对部队普遍进行攻坚战术训练，包括土工作业、连续爆破、破坏外壕、坑道作业，攻击碉堡群、地堡，打开城墙突破口、竖梯登城，巩固突破口向两翼发展、纵深战斗及步、炮、工协同动作等内容。预计在地化冻时训练完毕，开始作战。



丑18

2.18

1 同意先作攻坚训练

[illegible]

向前，并告彭张、滕薄、（李周、赵）[illegible]同志：

（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决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逃的，因此你们攻城的各部队的配置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

军委丑巧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徐向前电的手稿。

对薄一波[1]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1948年2月19日）

二月十日报告悉。分别不同情况的地区采取像你们所说的不同的政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下面是否这样做却是另一问题。你们必须经常和下面保持通讯联系，随时纠正偏向，不要待几个月后开总结会议的时候才来作一次总纠正。这样做，损失太大。随时纠正偏向，则损失较小。以上望酌办。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对李井泉关于老区贫农中农领导地位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1948年2月19日）

井泉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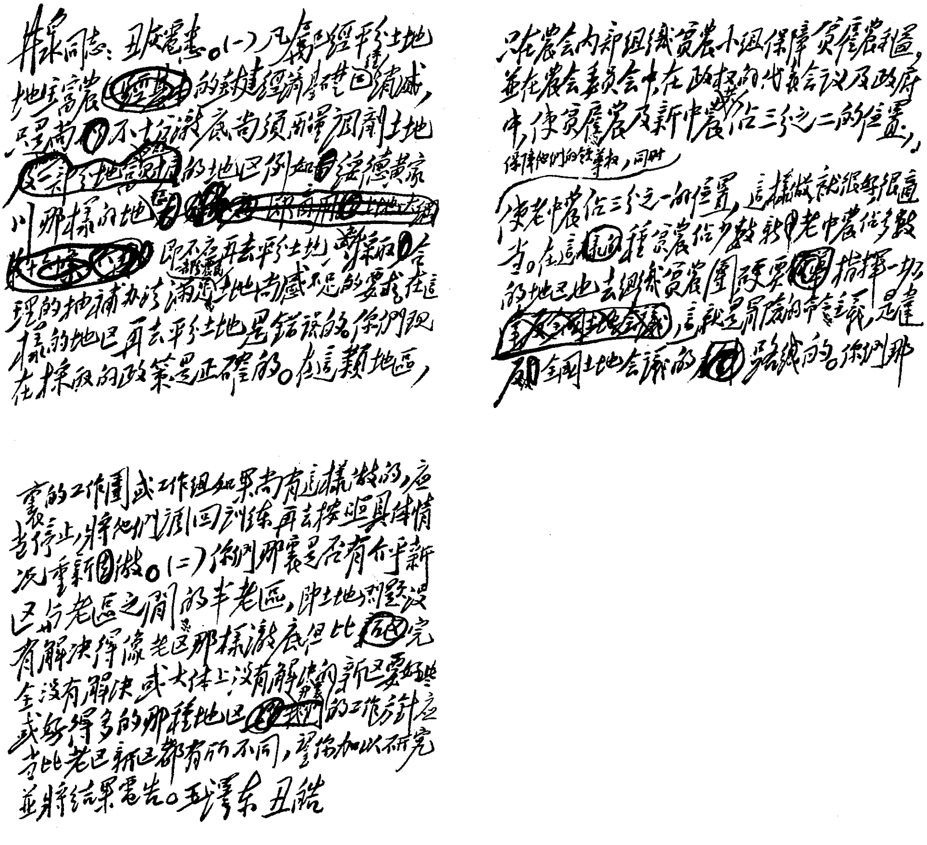
丑灰电悉。

（一）凡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并在农会委员会中，在政权的代表会议及政府中，使贫雇农及新中农共占三分之二的位置，保障他们的领导权，同时使老中农占三分之一的位置，这样做就很好，很适当。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你们那里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如果尚有这样做的，应当停止，将他们调回训练再去按照具体情况重新做。

（二）你们那里是否有介乎新区与老区之间的半老区，即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得像老区那样彻底，但比完全没有解决或大体上没有解决的新区要好些，或好得多的那种地区，那里的工作方针应当比老

区新区都有所不同，望你加以研究，并将结果电告。

毛泽东
丑皓



毛泽东致李井泉电的手稿。

致粟裕电[1]

（1948年2月19日）

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对中原各军的作战部署[1]

（1948年2月20日）

刘、邓，陈、唐，陈、谢，粟、刘[2]：

（一）粟部须休整两个月才能出动，刘邓除留三万人在大别山坚持外，四个纵队主力集中沙、淮间休整补充亦须一个月左右时间，伯承暂时不去许昌。而敌孙元良胡琏[3]即欲打通平汉路[4]，邱清泉[5]等部向鲁西南尾进并欲打通郑徐段[6]，裴昌会[7]部欲打通郑潼段[8]。（二）因此决定：甲、陈唐率三、八两纵至平汉路西与陈谢主力靠拢，陈谢受陈唐指挥，在平汉以西、郑潼以南地区集中十一个旅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粟、刘，指粟裕、刘先胜，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

[3] 孙元良、胡琏，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军军长和整编第十八军军长。

[4]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5]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

[6] 郑徐段，指郑州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7] 裴昌会，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

[8] 郑潼段，指郑州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上兵力，主动寻求作战机会，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内不要盼望和他部配合作战。乙、十、十一两纵在完成护送新兵给刘邓之任务后，暂时即在沙河、陇海、津浦[1]之间机动作战，或破击陇海，或破击津浦，或打其他分散之敌，调动五军等部向南，以利粟部休整。该两纵暂时受粟裕指挥。丙、在刘邓集中整补完毕，并和陈唐、陈谢靠拢，确实建立战役指挥关系以前，陈唐（包括陈谢）仍受我们指挥，并即提出丑底寅初作战计划，电告我们。

军委

丑智亥

---

[1]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致邓小平、李达电[1]

（1948年2月20日）

丑皓电悉。同意你们四个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邓小平、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抓紧时间整训部队然后出击汉水流域[1]

（1948年2月21日）

刘、邓、李，并告粟、刘，陈、唐，陈、谢[2]：

（一）哿亥电[3]发后，今日接到你们丑篠电[4]。（二）粟部决移至黄河以北安全休整两个月，约辰初方能南下。粟部北移后敌必判断粟部或回山东或攻平津或攻太原，敌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暂时当仍在鲁西南，但稍久即有向沙河以南压迫你们之可能。你们四个纵队向沙、淮间集中补整至开始西进，是否能于你们所说那样快的时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副司令员李先念的电报。

[2] 粟、刘，指粟裕、刘先胜，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即《对中原各军的作战部署》。

[4] 指1948年2月17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一、为利于粟裕部及大别山部队集结，陈谢、陈唐部即于3月初开始行动。二、行动方向以南阳、襄樊为好，因可调动十一师等部，利于我军集结。三、陈唐、陈谢部作战，以包围一点吸敌打援为主。如敌十一师、十师、二十师西援，则尾敌之后，或陈谢、陈唐两军，或陈唐与我们两军集中，先歼其一两个弱师，局面即可展开。四、如十一师、十师西移，一纵、二纵、六纵在一周内可集结于淮河两岸，补充新兵，需时3天，即可开始作战。

做到。我们估计你们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目前陈唐、陈谢十一个旅位于平汉[1]西侧，达到了打通平汉目的之敌十一师、十师似不至威胁你们集结补整，你们亦应利用时间稍作整训。再则，在你们补整完毕向西与陈唐、陈谢现有兵力会合后，共有二十一个野战旅之多，不需要再将十、十一两纵加上去，如果加上该两纵则达二十六个野战旅，全部主力向西及西南则敌亦必全部向西及西南尾进，于战局不利，两个月后粟部南下，东边亦无协助之兵力。因此，十、十一两纵完成护送新兵给你们之任务以后，应照我们罾亥电回至郑徐线[2]以南，受粟裕指挥。在该区作战两个月后，亦在该区协助粟裕行动，不过平汉路。（三）为了监视胡琏孙元良[3]，利于你们集结补整，陈唐、陈谢十一个野战旅在你们过路和他们会合以前，似以在平汉西侧寻机打较弱之敌，暂时不去南阳方向为宜。如无打好仗之机会，即在平汉西侧监视胡琏，等候你们西进以后，集中二十一个旅同时向汉水流域行动，向该方向行动须准备二至三个月时间。（四）洛阳地区之裴昌会兵团[4]（七个旅）估计不会有大作为，如该敌会同孙元良向嵩叶[5]地区出击，陈唐、陈谢可以择一歼击之。向前[6]所部在浮翼[7]地区训练攻城战术，准备打临汾。攻克临汾对接济

---

[1]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2] 郑徐线，指郑州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3] 胡琏、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军长和整编第四十七军军长。

[4] 裴昌会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官裴昌会。

[5] 嵩叶，指河南嵩县和叶县。

[6] 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7] 浮翼，指山西浮山和翼城。

彭张[1]、陈谢及你们利益甚大，故不拟改变计划。彭张丑底打宜川、韩城，得手与否均向黄龙山、渭水之间前进，抓打胡[2]军主力。你们二十一个旅向汉水流域完成两至三个月行动任务，粟部亦完成指定任务以后，那时你们须以不少于十五个旅之兵力，进行一次打裴昌会战役，重占郑潼线[3]，打通你们的第二后方通路，陈谢的唯一后方通路。

军委

马亥

---

[1] 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 郑潼线，指郑州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钳制敌十一师等部以利刘邓主力休整[1]

（1948年2月22日）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粟、刘[2]：

马酉电[3]悉。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信段[4]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淮间集结及补上新兵。在刘邓主力业已集结并补上新兵之后，照我们意见只要环境许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刘，指粟裕、刘先胜，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

[3] 指1948年2月21日酉时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对今后两个月行动的意见：一、第一步仍以向郑潼线行动为好，破击郑潼线铁路，袭占密县、荥阳、巩县、汜水、偃师各县城，威胁郑州，调动裴昌会兵团增援，于运动中歼灭该敌，相机攻占洛阳。二、第一步任务达成后，经短期休整，于4月上中旬南下襄樊、南阳一带行动。首先解决宛西四县封建地主武装、保安团队，相机攻占南阳、襄樊、老河口等城，并继续越汉水，向荆河一带发展，威胁长江下游，与江汉、桐柏发展连成一片，造成对武汉包围形势，调动敌人，便于粟部执行机动任务，或配合刘邓于平汉线作战。

[4] 平汉郑信段，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郑州至信阳段，即今京广线一段。

刘邓尚须有一短时期休息整训。如果刘邓亦同意这样做，又不反对你们执行郑潼战役，则可照你们意见，以你们现有兵力先打郑潼线[1]。但要寅月上旬才能作具体决定，目前两星期内你们应在郑信段寻找作战机会，以协助刘邓。

军委

丑养亥

---

[1] 郑潼线，指郑州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1]

（1948年2月22日）

发言人说：虽然如此，可是人们不要误认杜鲁门、蒋介石及东方一切美国傀儡们的互相合作，多少亿元的援蒋计划，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这些合作与援助当然有一点作用，这就是病人临死前的强心剂的作用。现在世界形势已变到于美国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极端不利，而于世界人民民主力量极端有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两年时间之内，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业已混乱不堪，并正在走向更大的混乱局面；而世界人民民主势力，则有极大的发展，并正在走向更大的发展局面。优势是在民主力量方面，不是在反动力量方面。反动派的金钱和枪炮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优势，人心讨厌反动派，不赞成反动派，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反动派，并和反动派作斗争，这个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在蒋介石匪帮发动内战以前，曾经得到美国帝国主义者四十亿美元的帮助，又得到日本一百万军队留下的装备，蒋介石自己有四百多万军队，所有这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比较起来，应该算得是优势了。然而仅仅一年工夫，人民解放军即已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个具体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单是金钱和枪炮的优势，单是物质的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发言人驳斥美国总统杜鲁门援蒋咨文的新闻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即是说，人民的革命力量，才是真正的优势吗？如果过去如此大量的美国援助不但不能使蒋介石匪帮得到胜利，而且使他们得到如此严重的失败，那末，五亿七千万美元的新借款[1]又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发言人说，中国人民必须明白，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一定要作垂死挣扎的，我们必须准备坚持的斗争方能最后战胜他们。但是每一次卖国贼与其外国主人的丧权辱国的勾当，每一次美国反动政府给其中国走狗的新借款，已经激起并且还要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这种愤怒将转化为力量，加速蒋介石匪帮的灭亡。

---

[1] 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美国国会提出“特别咨文”，要求批准国务院提出的以5.7亿美元援助蒋介石政府的议案。4月3日，援蒋议案获得通过，款额改为4.63亿美元。

在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时加写的几段话

（1948年2月22日）

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

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

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

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

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

复聂荣臻、萧克等电[1]

（1948年2月23日）

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即于三月上旬以三个纵队向蔚县、西河营、桃花堡方向歼敌，尔后向北向东进击，以两个纵队向阳高、天镇线歼敌，尔后向柴沟堡、大同线进击，一个纵队出大清河北等项部署。

此次行动是一年多以来你们主力部队第一次远出行动。你们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干部中如果现在尚存有这类思想，你们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聂荣臻、萧克、赵尔陆、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电的主要内容。

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

（1948年2月25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工委：

关于城市工作

（一）中工委丑皓电所述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1]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须讨论中工委丑皓电，并将中工委丑皓电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各级党委

---

[1] 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1948年2月19日在给各地并中央的电报中，就收复石家庄后城市工作的经验作了总结。主要有：一、攻城前和攻城中训令部队及民兵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和自由搬取；进城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市民哄抢，禁止任何机关部队乘机搜集、搬走与购买物资，同时设立统一的物资委员会，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二、向进城干部和部队宣布我们在石家庄的工作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大吃大喝，缴获物资一律归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三、严格审查原有的地下工作人员，管理城市主要依靠外面派去的干部，但这些干部有对城市不熟悉、搬用农村工作经验的缺点。四、及时制止急于组织工会、贫民会及各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宣布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委派人员组织人民法院，接受人民申冤，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限期登记国民党员和一切伪公务人员。五、召集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成立临时参议会，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复工，保证工人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并分发实物。

收到中工委丑皓电以后均应引起讨论。

（二）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即以中工委丑皓电所述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

（三）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攻占及管理的城市似乎还没有作过一次认真的研究，亦没有将城市工作的比较完全的经验向中央作过反映。我们占领了并长期管理了张家口、邯郸、长治、晋城、淮阴、烟台、威海卫、淄川、博山、德州、承德、赤峰、安东[1]、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石家庄等几十个大城市及中等城市，临时占领不久又退出的则有沈阳、长春、焦作、韩城、许昌、漯河、运城等处。可是，这一切城市工作经验（不能说不丰富），除运城一处我军入城秩序不好，曾由邯郸局有过反映外，没有任何一处有过反映。像石家庄这样重要的经验，是由中工委总结的。两年前张家口的经验，我们是从中工委的丑皓电才看到的[2]。这种在重大问题上（不是小问题或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极端恶劣的习惯，在七大以后并未根绝，现在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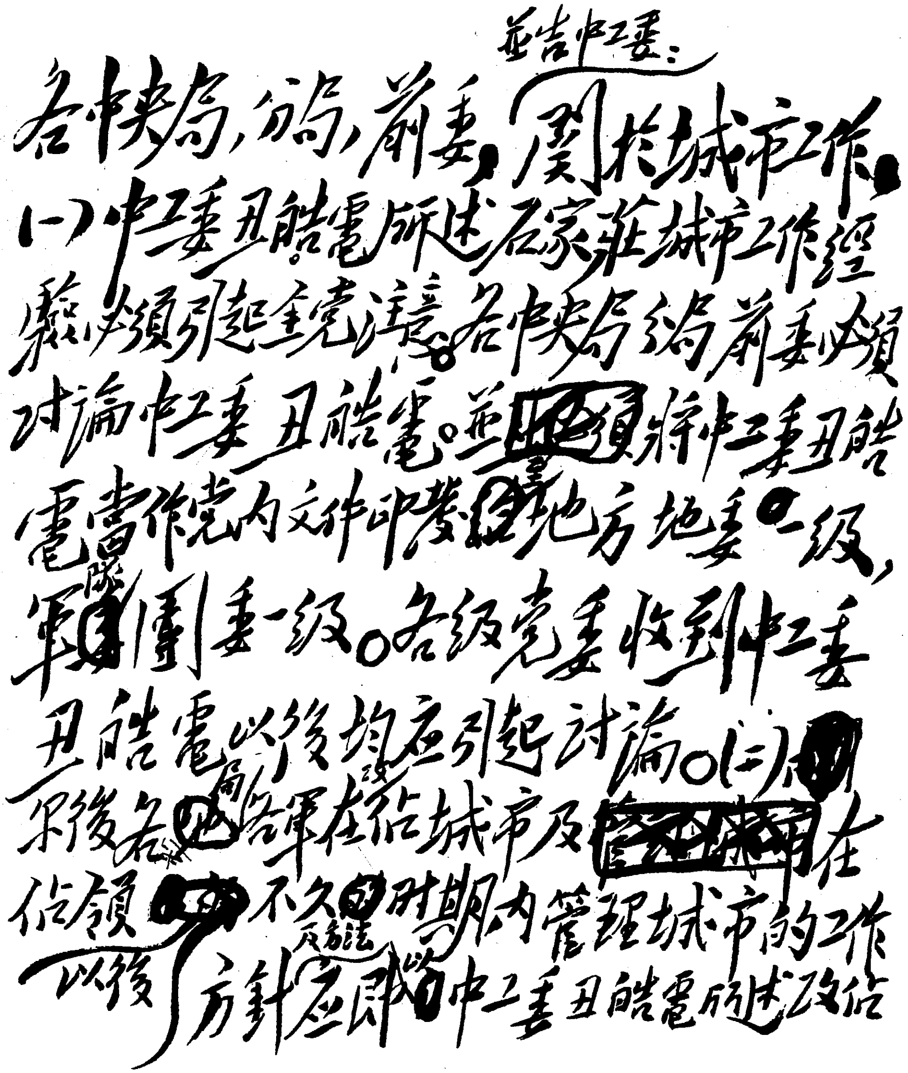
---

[1] 安东，即今丹东市。

[2] 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1948年2月19日电报中提到的收复张家口后，领导机关随即迁入城市，因而引起一些干部往城市跑，乱抓乱买东西，贪污腐化，放松乡村工作，引起士兵与乡村干部不满的现象。

（四）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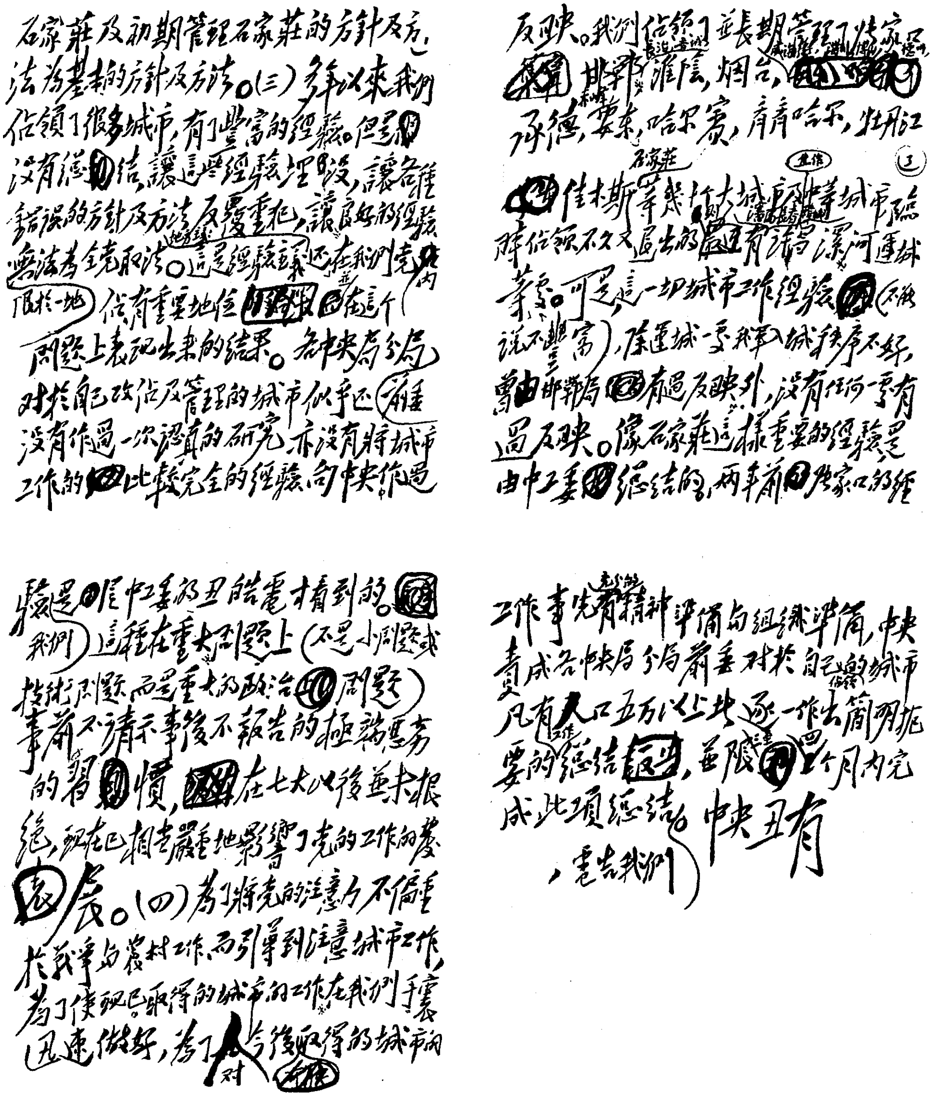
中央
丑有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並告中工委：關於城市工作

(一)中工委丑皓電所述石家莊城市工作經驗，必須引起全黨注意。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必須討論中工委丑皓電。並須將中工委丑皓電當作黨內文件印發至地方地委一級，軍隊團委一級。各級黨委收到中工委丑皓電以後均應引起討論。(二)爾後各野戰軍在攻佔城市及在佔領以後不久時期內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針及方法應照中工委丑皓電所述改進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手稿。



石家莊及初期管理石家莊的方針及方
法為基本的方針及方法。(三)多年以來我們
佔領了很多城市，有了豐富的經驗。但是
沒有總結，讓這些經驗埋沒，讓各種
錯誤的方針及方法反覆重犯，讓良好的經驗
無法為全黨取法。這是經驗主義還在我們黨內
佔有重要地位並在這个
問題上表現出來的結果。各中央局分局
對於自己攻佔及管理的城市似乎還
沒有作過一次認真的研究，亦沒有將城市
工作的比較完全的經驗向中央作過

反映。我們佔領了並長期管理了張家口、
邯鄲、淮陰、烟台、
承德、安東、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
佳木斯等幾十個大城市，臨
時佔領不久又退出的運城、四平、漯河、運城
等處。可是這一切城市工作經驗（不能
說不豐富），除運城一處我軍入城秩序不好，
曾由邯鄲局有過反映外，沒有任何一處有
過反映。像石家莊這樣重要的經驗是
由中工委總結的，兩年前張家口的經

驗是中工委的丑皓電才看到的。
這種在重大問題上（不是小問題或
技術問題，而是重大的政治問題）
事前不請示事後不報告的極端惡劣
的習慣，在七大以後並未根
絕，現在已相當嚴重地影響了黨的工作的發
展。(四)為了將黨的注意力不偏重
於戰爭與農村工作，而引導到注意城市工作，
為了使現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們手裏
迅速做好，為了對今後取得的城市的

工作事先有精神準備與組織準備，中央
責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對於自己的城市
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簡明扼
要的總結，並限四个月內完
成此項總結，電告我們。中央丑有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手稿。

为李鼎铭题写挽词

（1948年2月25日）

李鼎铭先生与其他许多和李先生一样的开明绅士，在中国人民民族民主斗争的困难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者进攻中国时期，在美帝国主义者援助蒋介石匪帮举行反革命内战时期，抱着正义感毅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独裁，赞助人民革命战争，同情消灭封建制度实现土地改革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开明绅士，无论过去与现在都是中国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一分子，对于李鼎铭先生的逝世表示我们的悼念之意。

杨罗杨部应按时进入冀东

（1948年2月25日）

林[1]：

（一）完全同意二十五日十时电[2]的部署计划；（二）杨罗杨部当照来电所说的时间进入冀东；他们现在尚未建立出冀东的意图与信心。

毛泽东

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8年2月25日10时林彪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1. 我军一部正布置攻开原站（铁岭以北五十里，敌约四千）、营口（敌约一万二千）。我大部现在新民附近钳制敌之主力（连向新民增援者，共十一个师），并拟于二十七日起，主力乘开始解冰之际，迅速跨过辽河，围歼四平之敌（约一万五千人），并打增援。2. 范汉杰兵团到东北者，大约只有两个旅到三个旅。在此种情形下，如我军摆在沈、锦之间，则敌必害怕，不敢出来打通铁路，则我军即难寻战机。故现拟在四平战斗结束后，将部队摆在四平和吉林、长春之间，一面进行补整，一面防止吉林之敌退集长春。同时，引沈、锦间敌人出来，打通交通和分散兵力。3. 下一攻势，或突然回击北宁线，或攻长春，依当时情况再定。4. 我意，杨罗杨部队在东北新攻势未发动前，将勿过早来冀东，以免使敌不敢打通北宁路。他们最好在下一次攻势发动时进入冀东，以便造成我们和他们配合打大城市（在没有中小城市可打的情况下）、打大增援的可能。”

关于工商业政策[1]

（1948年2月27日）

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违反党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这些地方的党委，在纠正这种错误的时候，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认真地进行检查。

二、在领导方针上。应当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同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损害人民革命事业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地加以区别。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许多地方所犯的错误就是由于全部、大部或一部没有掌握上述方针而发生的。各中央局、分局应当明确提出此一问题，加以分析检查，定出正确方针，并分别发布党内指示和政府法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三、在领导方法上。方针决定了，指示发出了，中央局、分局必须同区党委、地委或自己派出的工作团，以电报、电话、车骑通讯、口头谈话等方法密切联系，并且利用报纸做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在通常情况下，各中央局和下面的联系必须力求密切，经常注意明确划清许做和不许做的事情的界限，随时提醒下面，使之少犯错误。这都是领导方法问题。

四、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政策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和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和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

对起义部队不用虚名笼络方法[1]

（1948年2月27日）

林：

二十六日十三时电[2]悉。对营口起义部队[3]采取查明情况慎重处理之态度很好。惟整编时，除你们已知之逐步地淘汰坏人提拔好人及加入我们的人进去等项办法以外，应当：（一）废除原称号，改用人民解放军称号，亦不用民主联军等项称号。（二）照我军例，有一师人就称为师，有一团人就称为团，不要名不符实，其师长团长等军官不要升格。（三）给养不要特别优待，宁可初期较差，逐步升至我军水平。总之，以老实态度对待他们，不用虚名笼络方法。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的电报。

[2] 指1948年2月26日13时林彪就如何处理营口起义部队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对该部的详细处理问题，待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再确定，可能暂不解除武装，开到后方整训。

[3] 1948年2月25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围攻营口，守卫该城的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军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并协助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交警第三总队等部3000余人。

在晋冀鲁豫局宣传部《检查报社发现“左”偏》的报告上的批语

（1948年2月29日）

开明绅士问题不是什么革命性质的原则问题，中央并未这样指出过。中央指出，不要抛弃那些赞成反蒋和土改而愿意同我们合作的从地主富农阶级出身的开明绅士，如陕北的李鼎铭、晋绥的刘少白[1]等人，借以分化地主阶级，是于反蒋和土改有利益的。

---

[1] 李鼎铭，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少白，曾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

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拟发的关于部队民主生活问题的通知上加写的话[1]

（1948年2月）

西北野战军与晋察冀野战军均曾在战斗中放手发动连队士兵开会讨论如何攻克难于攻克的敌人堡垒阵地，收到了极大效果。

---

[1] 1948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拟发一个关于部队民主生活问题的通知，这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时加写的一段话。

转发彭德怀关于征收营业税的调查报告[1]的批语

（1948年2月）

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

[1] 彭德怀2月14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据我们在延川城大概调查，全城征营业税者13家，内无一家雇人劳动，均属小本摊贩。1947年向这13家征营业税，折合细粮30石，如按此征收，13家全部货物不够抵偿，实际上只收到9石，约占1947年全年营业利润60%。1947年，征税80%用于税局办公，20%上缴，税务人员粮食、衣服仍由公家发给。按此情形，从财政观点看，固不合算，从经济观点看更不利，如市场停滞，剩余产品不能交换。提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

对刘邓等部的作战部署[1]

（1948年3月1日）

刘、邓，粟、刘，陈、唐，陈、谢[2]，并告中工委，邯郸局，向前，彭、张、赵[3]：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一）刘邓应即将一、二、十、十一等四纵组成为一集团，寅卯两月在津浦[4]以西、平汉[5]以东、淮河以北、黄河以南地区机动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辰巳两月或仍在该区配合粟刘机动，或向平汉以西机动，依情况决定。粟刘即令十、十一纵完全接受刘邓指挥。（二）陈唐并指挥陈谢主力，寅卯两月举行陇海郑潼线[6]作战，包括休息时间在内。日内开始第一阶段打郑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刘，指粟裕、刘先胜，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3] 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赵，指张宗逊、赵寿山，当时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4]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5]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6] 郑潼线，指郑州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段[1]，相机攻取洛阳；第二阶段打洛潼段[2]，争取歼灭裴昌会兵团[3]大部（原七个旅已有两个旅西开合阳、潼关，一个旅在商洛[4]未动，现留阌乡[5]至洛阳一线者约四个旅）、孙元良兵团[6]一部，配合彭张渭北作战。彭张现正围攻宜川，吸引九十师、二十七师增援，各个歼灭之，现正战斗中。（三）粟刘所部依五军情况决定，或跨河两岸，或全部到北岸，总以安全休整两个整月为目的。（四）刘邓除留大别山之三万人外，其三六两纵主力暂时最好留大别山一时期，钳制十师、二十师等部，尔后或向北或向西，依情况决定。（五）向前所部在浮翼[7]整训，准备打临汾。阎锡山[8]集中七个旅于平介[9]有南援模样。许谭[10]所部除留十三纵于胶东外，主力七九两纵配合渤海地方兵团，寅月上旬开始向胶济西段作战。韦国清[11]率二纵，丑下旬由诸城南下苏北，与该地十一、十二两纵合组苏北兵团，加强苏北之作战。东北方面冬季作战已消灭敌九个正规旅（内一个旅起义），现正准备攻四平，得手后休整，然后举行春季作战。我东北兵力有很

---

[1] 郑洛段，指郑州至洛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2] 洛潼段，指洛阳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3] 裴昌会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官裴昌会。

[4] 商洛，指陕西商州和洛南。

[5] 阌乡，旧县名，1954年并入河南灵宝县。

[6] 孙元良兵团，指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军，军长孙元良。

[7] 浮翼，指山西浮山和翼城。

[8]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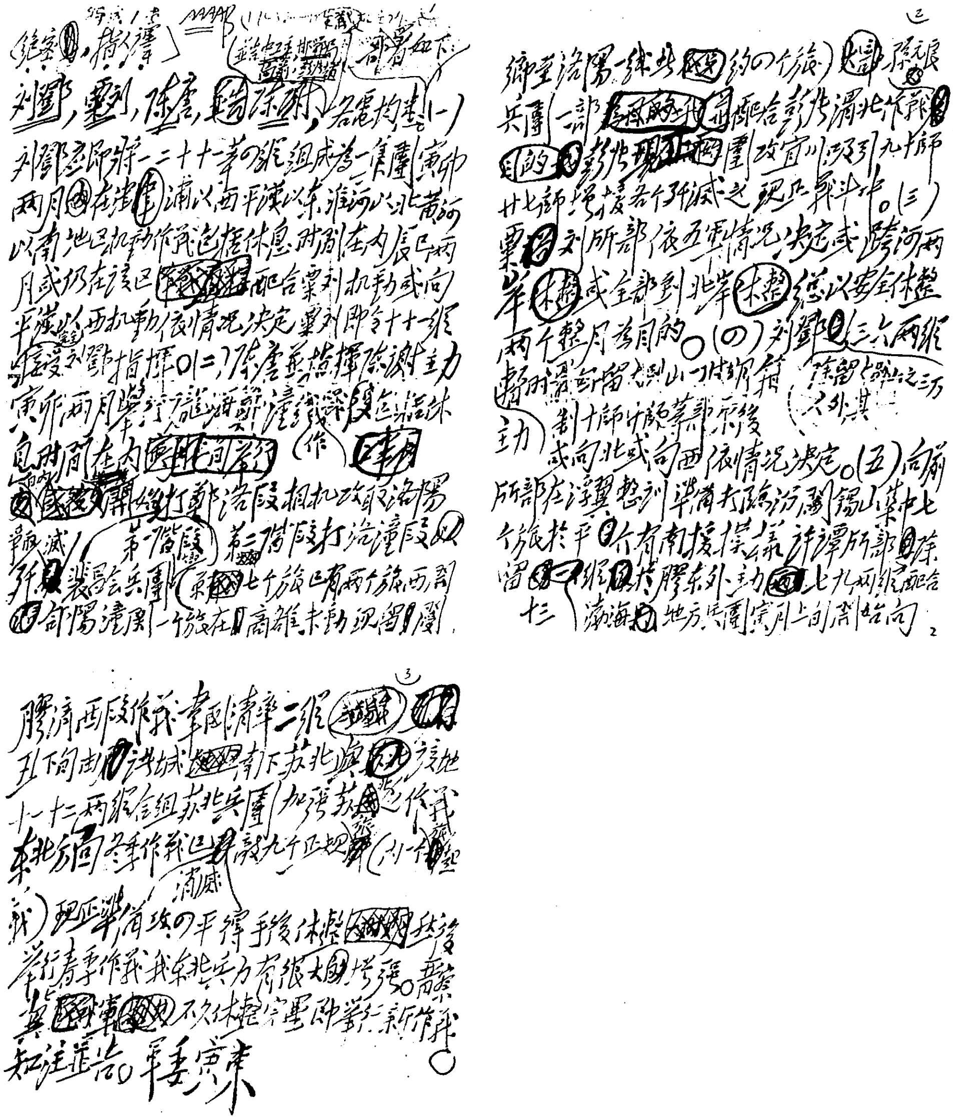
[9] 平介，指山西平遥和介休。

[10]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1] 韦国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

大增强。晋察冀军不久休整完毕，即举行新作战。知注并告。

军委
寅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的手稿。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1]

（1948年3月1日）

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所谓人民大众，是指一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压迫、损害或限制的人们，也即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上明确地指出的工、农、兵、学、商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2]。在宣言上所说的“学”，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知识分子。所说的“商”，即是指一切受迫害、受限制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所说的“其他爱国人士”，则主要地是指的开明绅士。现阶段的中国革命，即是由这些人们团结起来，组成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而又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革命。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

我们不要抛弃那些过去和我们合作过、现在也还同我们合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八项政策的第一项。

赞成反美蒋和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例如晋绥边区的刘少白、陕甘宁边区的李鼎铭[1]等人，在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以后的困难时期内，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而在我们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又并不妨碍和反对土地改革，因此对他们仍应采取团结的政策。但是团结他们，并不是说将他们当作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力量来看。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是主要的敌人和主要的革命者两方面。我们今天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今天同敌人作斗争的主要力量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一切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民。这就决定了我们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而不同于十月革命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依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对人民民主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少数右翼分子，他们也是革命的敌人；依附劳动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分子以及从封建阶级分裂出来的少数开明绅士，他们也是革命者。但是这两者都不是敌人或革命者的主体，两者都不是可以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软弱的和动摇的阶级。但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由于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迫害和限制，他们又可以参加人民民主革命，或者对革命守中立。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但不是人民大众的主体，也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力量。但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又因为他们可以参加反对美蒋，或者在反对美蒋的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之我们便有可能和必要去团结他们。在中国共产党未产生以前，以孙中山为领导的国民党，曾经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充当过当时中国革命（不彻底的

---

[1] 刘少白，1942年11月被选为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李鼎铭，1941年11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经产生，并且表现出自己的能力以后，他们就已经不能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了。这个阶级曾经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而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他们中间的不少分子，曾经附和了蒋介石的反动。但是，决不能因为这一点，就认为那个时期我们在政治上不应该争取他们，在经济上不应该保护他们；就认为我们在那个时期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不是冒险主义的政策。相反地，那时我们的政策，仍然应当是保护和争取他们，以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去反对主要敌人。在抗日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抗日的参加者。在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增长了对美蒋的仇恨，他们中间的左翼分子依附于共产党，右翼分子则依附于国民党，其中间派则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犹豫和观望的态度。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必要和可能争取其大多数，孤立其少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

开明绅士是地主和富农阶级中带有民主色彩的个别人士。这些人士，同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矛盾，同封建的地主、富农也有某种矛盾。我们团结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大的力量，也不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什么重要性（他们根据封建制度占有的土地，应当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交给农民分配），而是因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反美蒋斗争时期，在政治上曾经给我们以相当的帮助。在土地改革时期，如果有少数开明绅士表示赞成我们的土地改革，对于全国土地改革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特别是对于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是地主富农的家庭出身），

对于争取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同土地有联系），对于争取全国的开明绅士（大约有几十万人），以及对于孤立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反动派，都是有益的。正因为开明绅士有这些作用，他们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分子，所以，团结他们也是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我们对于开明绅士的要求，在抗日时期是赞成抗日，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减租减息；在现阶段是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不反共），赞成土地改革。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我们就应该毫无例外地去团结他们，并且在团结中教育他们。

用诉苦和三查方法整训部队收效宏大[1]

（1948年3月2日）

彭、张、赵，并告贺、习，向前，陈、唐，陈、谢，刘、邓[2]，中工委：

东戌冬卯两电悉。（一）庆祝你们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二）同意以一四两纵取中部、宜君，相机取同官[3]，以三六两纵在攻克宜君后取洛川、富县、甘泉，控制甘泉至同官公路机动地带，二纵取澄城、白水，并准备协同一、四纵作战。各部在上述任务完成后，休整半月至一个月，消化俘虏，发动群众。此次休整两个半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4]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同官，旧县名，即今陕西铜川。

[4] 诉苦，指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诉苦和三查是1947年11月到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所用的主要方法。

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目前数日整顿队势，如粮食有办法，以寅齐前后出动为宜；如粮食困难，则提早出动。（三）大胜之后干部极易发生骄傲，望谆谆告诫，以利逐步扩大胜利。（四）建议俘虏随军尾进就粮，俘官将校后送，尉级就地向西南两线各城释放，扩大敌军失败情绪。

军委
寅冬

给朱学范[1]的信

（1948年3月4日）

朱学范先生：

接二十九日电示，欣悉先生到达哈尔滨，并决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的共同事业而奋斗，极为佩慰。我们对于先生的这一行动，以及其他真正孙中山信徒的同样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

此致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周恩来

三月四日

---

[1] 朱学范（1905—1996），上海金山人。当时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世界工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邮电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西北大捷基本原因在于冬训[1]

（1948年3月4日）

宜川战役[2]我以十一个旅七万人包围歼灭胡[3]军精锐部队五个旅（缺一个团，洛川），两个师部，一个军部，共二万八千人，无一漏网，为西北战场第一大捷。其基本原因在于两个多月的冬季整训。经此役后，胡军除守延安之十七师两个旅，近由豫西开返潼关之第一师约两个旅尚有较强之战斗力外，已无主力。我向渭北陇南进军之门户，业已洞开。

军委

寅支

---

[1] 这是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关于宜川战役战果的报告上为中共中央军委写的按语。这个按语连同战果报告一起转发给了中央工作委员会、有关中央局和各野战军。

[2]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运动后，于2月23日发起宜川战役，至3月3日攻克宜川，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和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九十师共5个旅近3万人，击毙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整编第九十师师长严明。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政策和经验的关系

（1948年3月6日）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1]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2]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

---

[1] 指刘少奇1948年2月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能迅速得到党中央有关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并说："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刘少奇在电报中还对老区土地改革中不必再一次平分土地、不人为地再搞贫农团、怎样进行土地调剂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2] 指中共中央1948年2月22日发出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

（二）划分阶级草案[1]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2]上所写的东西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

[2] 指毛泽东1948年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

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1]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

（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2]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三月六日

---

[1] 指毛泽东1948年1月22日就新解放区土改问题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即《新解放区土改斗争策略》。

[2] 饶，指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康，指康生（1898—1975），山东诸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致中央工委电[1]

（1948年3月6日）

合并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成立北方局，有利无害。时机亦已成熟，拖下去无必要。我们意见即以中工委为中心合并两个中央局成为北方局，刘少奇兼任北方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任第二书记，聂荣臻任第三书记。两区的军政两项机构，暂时不合并，但将财经逐步集中于华北财经办事处。华北财办实际上管两区财经，同时在政策方面领导华东、西北两区的财经。经过几个月，待党务及财经两方面工作在统一之后有了头绪，再将军事机构合并。待开全区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华北人民民主政府，再将两区政府合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央工委电的主要内容。

迅速对洛阳及洛郑线发起攻击[1]

（1948年3月7日）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2]，邯郸局，粟、刘[3]，中工委：

（一）我彭张赵军[4]正向澄城、白水、洛川、中部[5]、宜君、同官[6]攻进，向前[7]军正攻临汾。（二）敌一师、三十师、三十六师将全部缩回陕境，估计一部守潼关，大部回至西安一带。（三）你们率三、四、八纵应以夺取洛阳并准备歼灭孙元良[8]援兵之目的，迅速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陈唐、陈谢两军1948年3月9日完成对洛阳的包围，14日攻克该城，全歼守敌2万余人，活捉第二〇六师中将师长邱行湘。因郑州整编第十八军、第四十七军增援，人民解放军于17日撤出洛阳。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粟、刘，指粟裕、刘先胜，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

[4] 彭张赵军，指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

[5]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6] 同官，旧县名，即今陕西铜川。

[7] 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8]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军军长。

洛阳及洛郑线[1]发起攻击，希望能于两周内外完成此项任务。（四）第二步准备向陕东前进，配合彭张赵歼灭胡[2]军。（五）望邯郸局速筹十万人，两个月粮食，供给三、四、八纵。

军委
七日二时

---

[1] 洛郑线，指洛阳至郑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攻击洛阳的重点应放在打援上[1]

（1948年3月7日）

陈、唐，陈、谢，并告刘、邓[2]：

鱼巳电[3]悉。（一）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顾祝同[4]决不会不增援。你们占领黑石关[5]、偃师、新安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敌援兵可能主要是孙元良[6]，十一师亦可能来一部。请刘邓令十一纵速向十一师佯攻以钳制之。（二）宜川胜利后，西安一带大震，三十师已到合阳防我南下，一师、三十六师亦有向潼关集中讯，究竟是否开动，请令九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副书记谢富治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3月6日巳时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拟于7日晚以八纵抢占黑石关、偃师，并破击铁道，切断郑洛铁路交通。以九纵袭占新安，切断洛陕联系。9日三纵、四纵直袭洛阳。电报中还对敌人可能增援洛阳的情况作出估计并提出相应的打法。

[4]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兼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总司令。

[5] 黑石关，洛河渡口，位于河南巩义西南。

[6]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七军军长。

纵查明。（三）我十一个旅五六两日由宜川向西南攻进，估计一星期内外可能占领澄城、白水、洛川、中部[1]、宜君、同官[2]诸点，威胁西安。（四）向前[3]所部本日起攻临汾。

军委

七日二十四时

---

[1] 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2] 同官，旧县名，即今陕西铜川。

[3] 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1]

（1948年3月7日）

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评西北人民解放军最近一次大捷称：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的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发言人说：这次西北人民解放军突然包围宜川敌军一个旅，胡宗南令其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两个整编师的四个旅，即整编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四十七旅，整编九十师之五十三旅、六十一旅共约二万四千余人，由洛川、宜君一线向宜川驰援，于二十八日到达宜川西南地区。西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歼灭战，经过二十九日至三月一日三十小时的战斗，即将该部援军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计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评论。这时西北战场国民党军的进攻已被粉碎，我军已经转入进攻。这篇评论分析了西北战场的形势，也扼要地介绍了全国其他战场的概况。这篇评论的更重要方面，是在着重地说明了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的伟大意义。这个新式整军运动是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和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当时全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军队中的反映。这个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官兵的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同时也极其有效地加速了把大批被俘国民党军队士兵改造为解放军战士的过程，对于人民解放军的巩固扩大和作战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俘一万八千余人，毙伤五千余人，刘戡本人和九十师师长严明等人，亦被击毙。接着于三日攻克宜川，又歼守敌整编七十六师的二十四旅五千余人。此役共歼敌一个军部、两个师部、五个旅，共三万人。在西北战场上，这是第一个大胜仗。

发言人分析西北战场的形势说：胡宗南直接指挥的所谓“中央军”二十八个旅中，有八个旅属于三个主力师，即整编第一师、整编三十六师和整编九十师，其中整编第一师之第一旅，前年九月在晋南浮山被我歼灭一次，其一六七旅主力，去年五月在陕北蟠龙镇被我歼灭一次，整编三十六师之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于去年八月在陕北米脂沙家店被我歼灭一次，这次整编九十师又被全歼，剩下的胡军主力，就只有整编第一师的七十八旅和整编三十六师的二十八旅，还没有受到过歼灭。因此，整个胡宗南军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精锐骨干了。经过此次宜川歼灭战，胡宗南过去直接指挥的正规兵力二十八个旅，现在只剩下二十三个旅，这二十三个旅分布在下列地区：晋南临汾一个旅，已成死棋；陕豫边境和洛阳、潼关线有九个旅，对付我陈、谢野战军；陕南有一个旅，任汉中一带守备。此外，分布在潼关到宝鸡、咸阳到延安“丁”字形交通线上的有十二个旅。其中三个是“后调旅”，全系新兵；被我军全歼新近补充起来的有两个旅；曾被我军给以歼灭性打击的有两个旅；受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可以想见，这些部队不但很弱，而且极大部分分任守备。胡军以外还有邓宝珊两个旅防守榆林，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的九个旅分布在三边和陇东。以上胡、邓、马各部，全部正规军包括过去被歼一次至两次但又补充起来的部队在内，目前总共三十四个旅。

以上是就西北敌军态势而言。再说所谓“丁”字形交通线上受

我军打击较少的五个旅，其中两个旅困守延安，三个旅在大关中；其他多数是新补充的部队，少数是受过歼灭性打击的部队。这就是说，整个大关中特别是甘肃方面，敌军异常空虚，无法阻止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这种形势，势必牵动蒋军在南线的一部分部署，首先是牵动其豫陕边境对付我陈、谢野战军的部署。我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此次向南进攻中，旗开得胜，声威大震，改变了西北敌我对比的形势，今后将比过去更有效力地同南线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配合作战。

发言人说：我刘邓、陈粟、陈谢三路野战大军，从去年夏秋起渡河南进，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大量敌人，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获得全国人民的称赞。我东北野战军在冬季攻势中，冒零下三十度的严寒，歼灭大部敌人，迭克名城，威震全国。我晋察冀、山东、苏北和晋冀鲁豫各路野战军，都在去年英勇作战大量歼敌之后，完成了冬季整训，不日又将展开春季攻势作战[1]。总观全局，说明了一个真理，就是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

---

[1] 1948年春季，人民解放军各路野战军，在冬季整训之后，相继发起了春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以及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绥军区各一部，在3月至5月间，先后进行了察南绥东战役、临汾战役，共歼敌4.3万余人，收复了广大地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在3月8日至6月3日，先后发起了洛阳战役、宋河战役、宛西战役、宛东战役，共歼敌5.6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中原防御体系，发展和巩固了中原解放区。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于3月11日至5月8日，先后进行了胶济路西段战役和胶济路中段战役，共歼敌8.4万余人。至此，山东省除济南、青岛、烟台、临沂和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沿线的部分城镇外，全部解放。苏北兵团在3月间胜利地进行了益林战役，歼敌7000余人。

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1]，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打得蒋介石匪帮，或者只有暂时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或者连招架都没有，只有被我一个一个地歼灭干净。

发言人着重指出：西北野战军的战斗力，比之去年是空前地提高了[2]。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前线领导同志们的坚决的、灵活的指挥，后方领导同志们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协助，以及敌军比较孤立，地形有利于我等项，都是应当指出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由于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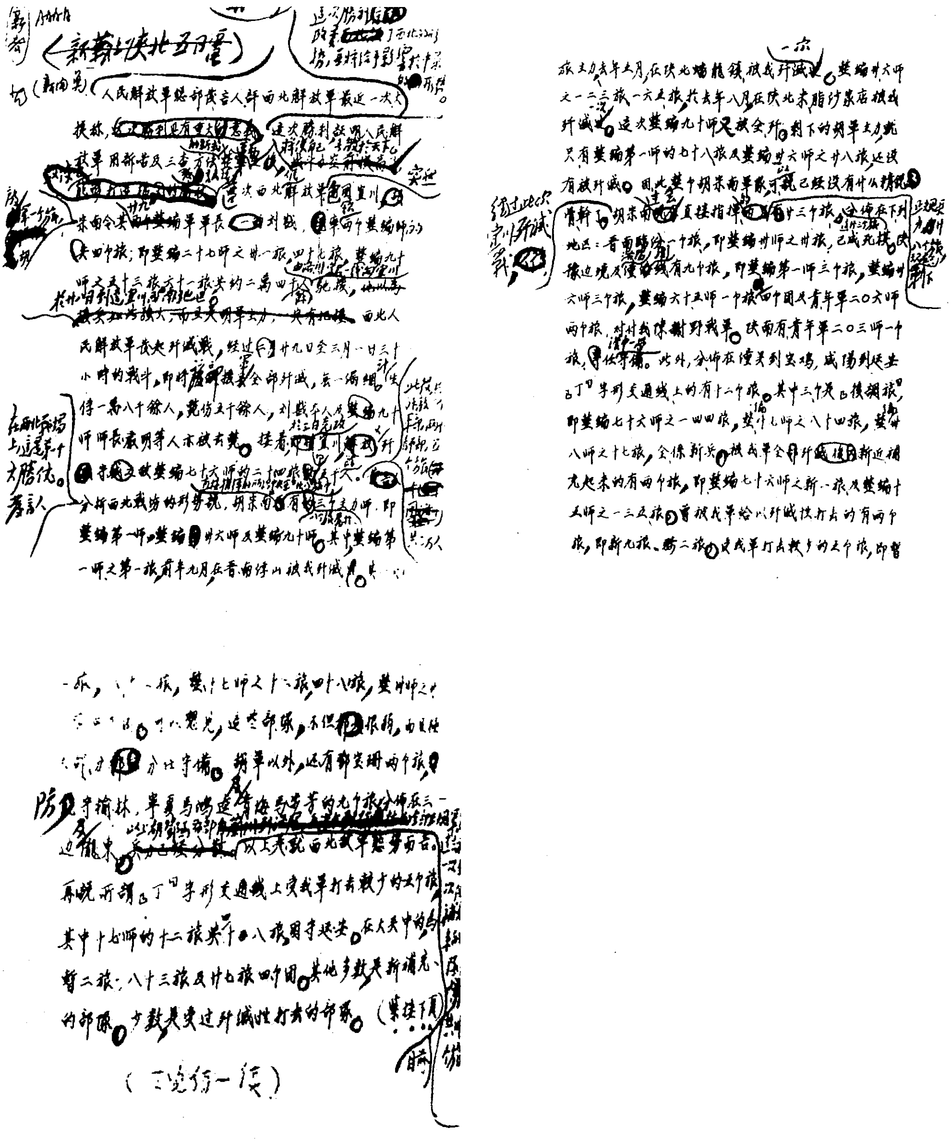
---

[1] 十大军事原则，参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第三节。

[2] 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军，是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的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所组成的。1947年春，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参加陕北作战的西北野战兵团，为两个纵队又两个旅，共2.7万余人。同年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把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命名为西北野战军。到1948年春，参加陕北作战的主力部队增加到5个纵队，7.5万余人，经过一年作战的锻炼和1947年冬至1948年年初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以后，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也空前提高。这样，就为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继宜川大捷之后，西北野战军于4月中旬发起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战役，挺进泾水渭水间的广大地区，截断西兰公路，并且在4月21日收复延安。

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发言人说：这种新式的整军运动，不但在西北方面实行了，在全国人民解放军中都已实行，或者正在实行着。这种整军运动，是在作战的间隙中进行的，并不妨碍作战。这种整军运动，同我党正确地进行着的整党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同我党缩小打击面，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严禁乱打乱杀（杀人愈少愈好），坚决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大众的正确方针相结合，同我党实行正确的城市政策，坚决地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方针相结合，这样就必然会使人民解放军的威力无敌于天下。任凭蒋介石匪帮及其主子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面前如何拼命挣扎，胜利总是属于我们的。



毛泽东起草并修改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的手稿。

对邓小平报告的指示[1]

（1948年3月8日）

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晋冀鲁豫军区暨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所作的《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1]

（1948年3月8日）

说今后不要提倡新式富农的意见是不对的。我们提倡新式富农的目的和俄国革命后保存富农的目的是不相同的。中国富农经济不占重要成分，粮食供给主要依靠中农、贫农，并不是依靠富农，我们鼓励吴满有[2]一类人之目的，在于这样能够稳定新旧中农，刺激其生产。如果过去这是需要的，现在这种情形仍未改变，不能说这种需要已不存在。如果中国的某些地区有依靠富农粮食供给的情形，那就鼓励富农经济更加是需要的了。一种模糊的违反经济要求的“左”倾情绪在人们的思想中作怪，在土地法公布后甚为普遍，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当加以批判，而不应为其动摇而投降这种情绪。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一份关于新式富农入党问题的电报稿上写的批语。

[2]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县务农，后经过土地革命分得了土地，发展成为新式富农。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被评为劳动英雄。陕甘宁边区曾开展向吴满有学习的运动。

及时播发山西崞县土改的好经验

（1948年3月9日）

请乔木将此件（《山西崞县两个区是怎样进行平分土地的》）交给范长江，用明码发给新华社[1]，转播全国，在报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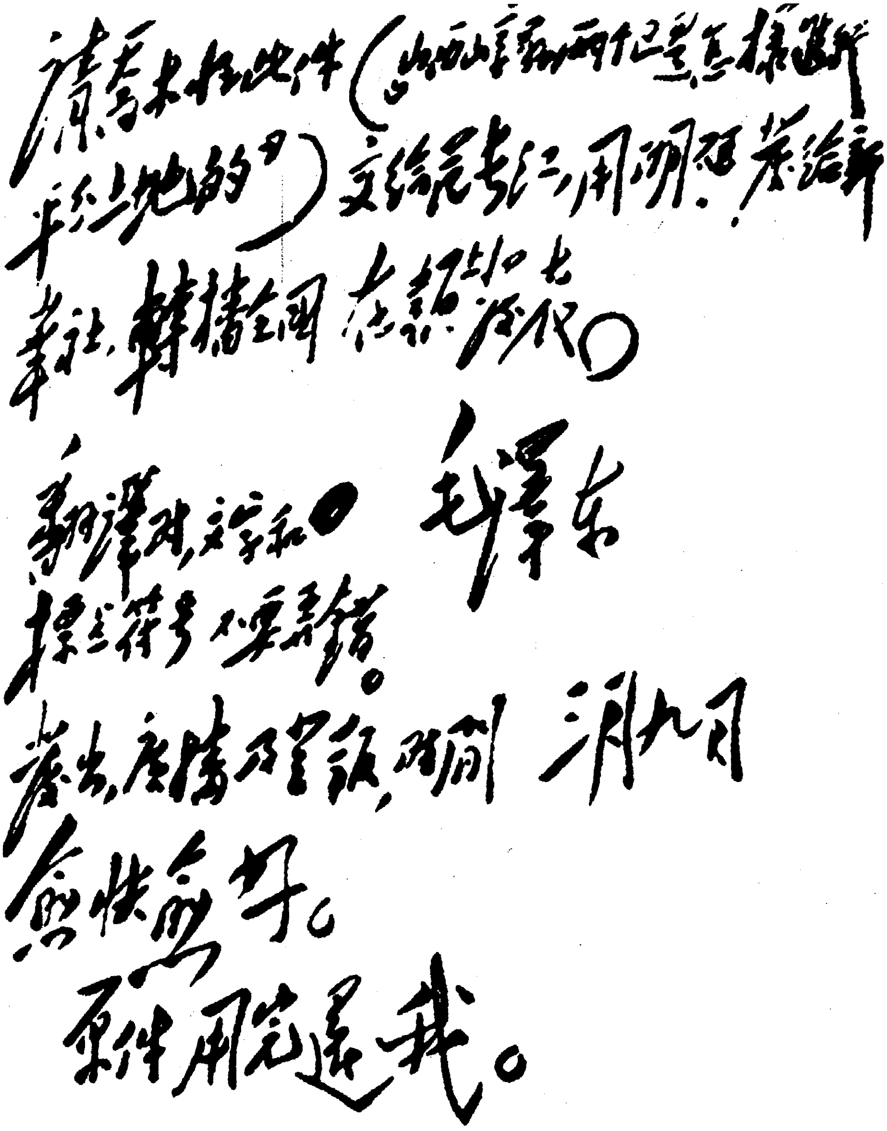
翻译时，文字和标点符号不要弄错。发出，广播及登报，时间愈快愈好。

原件用完还我。

毛泽东
三月九日

---

[1] 1947年3月中旬延安撤退后，新华社由副总编辑范长江率领工作队随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由社长廖承志率领大队人马转移太行。他们密切配合，使新华社工作照常进行，保证了党中央的声音不中断。



請乔木看此件（山西山區兩個農業社怎樣進行平整土地的），交給吴冷西，用明天發給新華社，轉播全國，在報紙上發表。翻譯時，文字和標點符號不要弄錯。發出，廣播及登報，時間愈快愈好。原件用完退我。

毛澤東

二月九日

毛泽东给胡乔木批示的手稿。

致刘少奇电[1]

（1948年3月10日）

我们拟于三月二十日动身东移，约于四月十五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1]一文按语

（1948 年 3 月 12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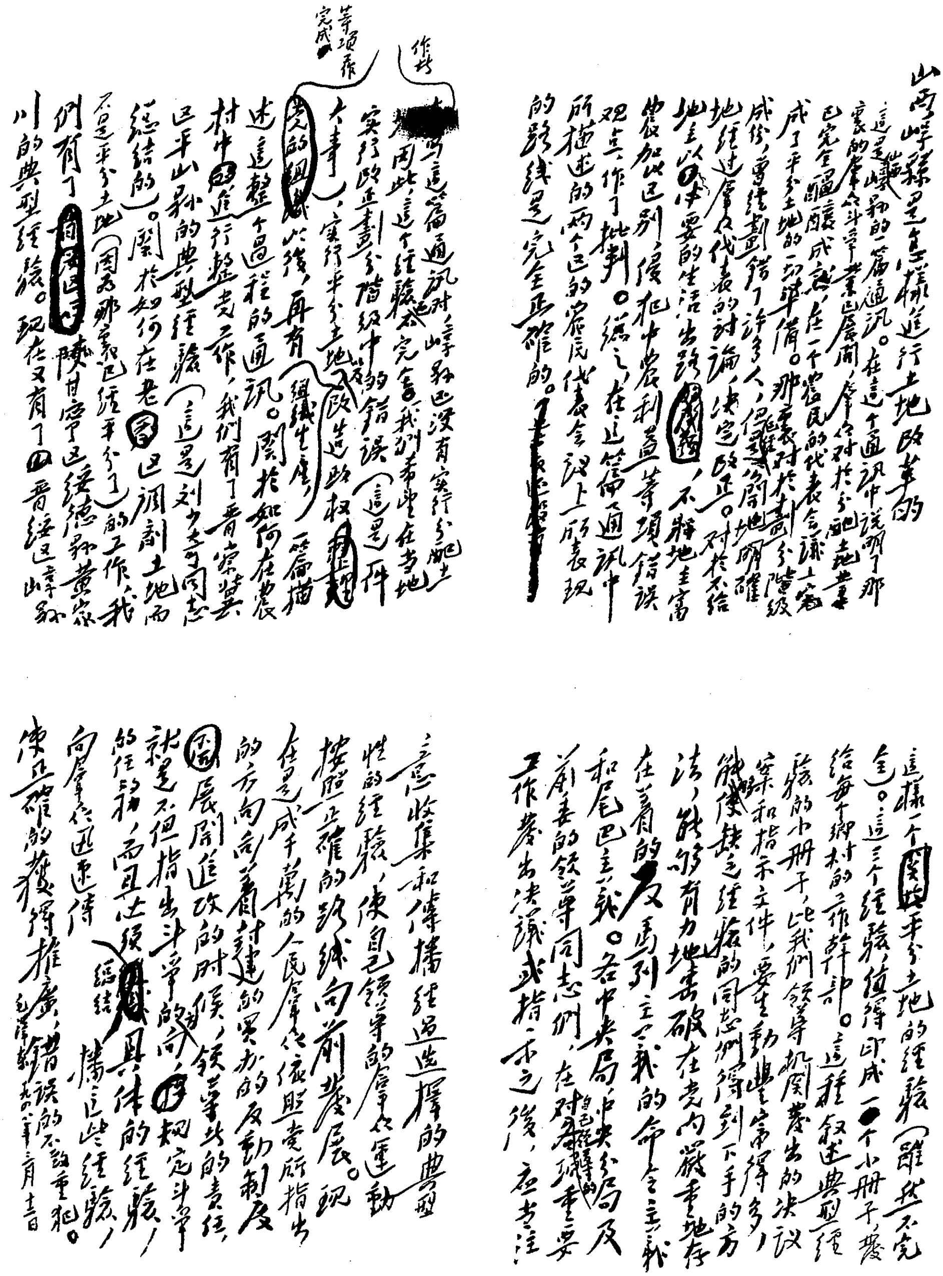
这是山西崞县的一篇通讯。在这个通讯中说明了那里的群众斗争业已展开，群众对于分配土地业已完全酝酿成熟，在一个农民的代表会议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准备。那里对于划分阶级成分，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地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总之，在这篇通讯中所描述的两个区的农民代表会议上所表现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在作者写这篇通讯时，崞县还没有实行分配土地，因此，这个经验还不完全。我们希望在当地实行改正划分阶级中的错误（这是一件大事），实行平分土地以及组织生产、改造政权等项工作完成以后，再有一篇描述这整个过程的通讯。关于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我们有了晋察冀区平山县的典型经验（这是刘少奇同志总结的）。关于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为那里已经平分

---

[1] 这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政文 1948 年 2 月 8 日关于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的情况给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的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报告写按语时，将标题改为《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此文和按语一起发表在 1948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上。

了）的工作，我们有了陕甘宁区绥德县黄家川的典型经验。现在又有了晋绥区崞县这样一个平分土地的经验（虽然不完全）。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够有力地击破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的反马列主义的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



山西崞縣是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

這是崞縣縣委的一篇通訊。在這个通訊中說明了那裏的群眾斗爭業已展開，群眾對於分配土地業已完全醞釀成熟，在一个農民的代表會議上完成了平分土地的一切準備。那裏對於劃分階級成份，曾經劃錯了許多人，但已經明確地經過農民代表的討論，決定改正。對於不給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將地主富農加以區別，侵犯中農利益等項錯誤觀點作了批判。總之，在這篇通訊中所描述的兩个區的農民代表會議上所表現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這篇通訊對崞縣過去沒有實行分配土地，因此，這个經驗還不完全。我們希望在當地實行改正劃分階級中的錯誤（這是一件大事）、實行平分土地、改造政權、組織生產等項工作完成以後，再有一篇描述這整个過程的通訊。關於如何在農村中進行整黨工作，我們有了晉察冀區平山縣的典型經驗（這是劉少奇同志總結的）。關於如何在老區調劑土地而不是平分土地（因為那裏已經平分了）的工作，我們有了陝甘寧邊區綏德縣黄家川的典型經驗。現在又有了晉綏區崞縣這樣一个關於平分土地的經驗（雖然不完全）。這三个經驗值得印成一个小冊子，發給每个鄉村的工作幹部。這種敘述典型經驗的小冊子，比我們領導機關發出的決議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動豐富得多，能夠使缺乏經驗的同志們得到下手的方法，能夠有力地去破除在黨內嚴重地存在着的反馬列主義的命令主義和尾巴主義。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領導同志們，在對自己經手的重要工作發出決議或指示之後，應當注意收集和傳播經過選擇的典型性的經驗，使自己領導的運動按照正確的路線向前發展。現在是成千成萬的人民群眾依照黨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買辦的反動制度展開進攻的時候，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斗爭的方向，規定斗爭的任務，而且必須總結具體的經驗，向群眾迅速傳播這些經驗，使正確的獲得推廣，錯誤的不致重犯。

毛澤東
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

毛泽东为《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写的按语的手稿。

攻克洛阳后的行动方向[1]

（1948年3月14日）

陈、唐，并告刘、邓，粟[2]，邯郸局，中工委：

元亥电[3]悉。（一）洛阳战役结束后，一部在前面阻击援敌，掩护洛城搬运必要与应当搬运的物资（注意城市政策），主力即在洛阳附近休整。邯郸局给陈唐、陈谢[4]的弹药等援助，务求迅速。（二）下一步行动，如洛阳以东及东南有作战机会，应在这一带再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应准备打南阳，得手后出汉水。打南阳有两方案：甲、走伏牛山东麓直打南阳。乙、先打商县、洛南（有六十五师四个团）、卢氏（情况不明，大约敌人很少）、淅川（有较强的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

[3] 指1948年3月13日亥时陈士榘、唐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至本日黄昏止，洛阳之敌大部被解决，已俘敌约8000余，毙伤2000余，决以主力继续彻底歼灭洛阳残敌，另以八纵在黑石关、偃师、缑氏镇地区阻击西援之敌，以九纵和四纵一部钳制援敌第十一师，以求停止第十一师向西展开。由于连续攻击，加上连日阴雨，部队异常疲劳，战斗结束后，拟以一部截阻援敌，主力转至洛阳以南地区休整待机。

[4]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动民团），取得巩固后方再打南阳。以上两方案何者为适宜，望与陈赓商酌电告。（三）你们率三、四、八纵或再加九纵一部出南阳、汉水，必将调动十一师、二十师等部西援，你们可能求得运动战。你们有十个旅以上，可以独力作战，不要刘邓配合。（四）但刘邓于本月休整完毕后，有两个行动方案：甲、率一二两纵过路西，配合陈唐歼灭援敌。乙、独力作战，率一、二纵过沙河，会合十、十一纵寻打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等部，于四五两月争取歼敌三四个旅，以利粟裕机动，否则粟裕行动将遇到困难。以上两案何者为适宜，请刘邓酌定，粟及陈唐、陈赓亦可发表意见。（五）前电要陈唐准备协助彭张[1]打西潼线[2]之意见，拟不执行。

军委
寒亥

---

[1] 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当时分别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西潼线，指西安至潼关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1948年3月14日）

杨、罗、杨、耿[1]，并告中工委（转彭聂[2]），晋绥分局，林、罗、刘[3]：

十日十五时电[4]悉。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5]包括绥远[6]全省在

---

[1] 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耿，指耿飚（1909—2000），湖南醴陵人，当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指杨得志、罗瑞卿1948年3月10日15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作战指导上尚未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集中，敌亦集中，兵力堆在一起，不是打不成，就是打不好。这次我军出平绥，在战役指导上有意识将五个纵队组成两个拳头，如敌主力对我一、六纵队，好打则集中全力打，否则引敌向西，我主力乘虚出平张段。如敌主力出察南不好打时，我一、六纵队则挺进绥远，歼灭孤立分散之敌，切断平绥西段。如此迫敌分散，便于我军各个击破。

[5]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6] 绥远，即绥远省，1954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

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目前所采出平绥线的方针，应当执行到敌人已经大量集中该线我军已无好仗可打之时为止。下一步主力的行动，可以出平保线打一二仗，调回敌人主力，然后再出平绥线。你们拟派两个纵队出绥远的计划是很好的，可令该两纵于攻克柴沟堡一线之后，不要停留太久，迅速出绥远，以绥远全境为活动范围。你军所占地方即归你们管辖，多派干部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晋绥分局取协助方针。晋绥分局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同蒲线阎军[1]地区及协助西北局向陕甘川前进。你们主力必须建立向冀热察[2]交界地区及冀东地区作战的计划，但出动的时机与出动兵力的数量应依情况决定。此外你们必须向全体指战员进行在新区工作的策略与政策教育，此点不知你们在此次休整中已做了没有，如果没有或不足，你们应在作战中补足之，此种教育极为重要。

军委

十四日二十四时

---

[1] 阎军，指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所辖部队。

[2] 热，指热河省，1955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察，指察哈尔省，1952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致邓小平电

（1948年3月14日）

小平同志：

寅齐电[1]悉，非常之好，立即转发各地仿照办理。希望你对陈唐、陈谢各部及豫皖苏区，凡你处电台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说的那些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毛泽东

寅寒

---

[1] 寅齐电，指邓小平3月8日关于新解放区全般的策略与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致陈士榘、唐亮电[1]

（1948年3月15日）

陈、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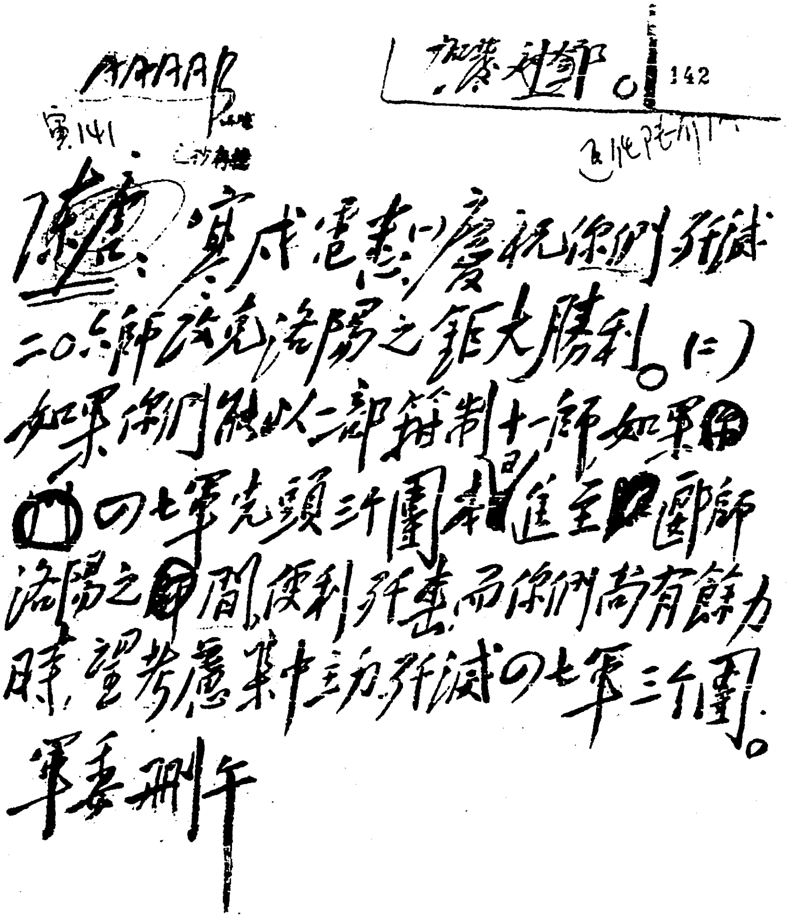
寒戌电悉。（一）庆祝你们歼灭二〇六师攻克洛阳之巨大胜利。（二）如果你们能以二部钳制十一师，如果四七军先头三个团本日至进偃师洛阳之间，便利万千志，而你们尚有余力时，望考虑集中主力歼灭四七军三个团。

军委

删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为攻克洛阳给陈士榘、唐亮的电报。



AAAA 寅141

加發粟劉鄧。 142

陳唐：寅戌電悉。（一）慶祝你們殲滅二〇六師攻克洛陽之巨大勝利。（二）如果你們能以一部鉗制十一師，如果四七軍先頭三个團未進至鄭師洛陽之間，便利殲擊，而你們尚有餘力時，望考慮集中主力殲滅四七軍三个團。

軍委刪午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士渠、唐亮电的手稿。

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电

（1948年3月14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

兹将邓小平同志寅齐电发给你们。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可能，而没有全盘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中国革命是永远不能胜利的。最可怕的是领导同志的自满自足，自己缺乏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而又对中央的指示熟视无睹（不细看这些指示，不研究这些指示，忙于不应当忙的事务工作，而忽略了策略指导与政策指导这种自己责任上的主要工作）。我们要求你们每两个月作一次（每年共六次）的综合性的工作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致刘少奇电

（1948年3月17日）

我们决定发表弼时同志一篇讲演，不发表一月决定草案，因为弼时同志的讲演比一月决定充实得多。

攻克淄川后的行动部署[1]

（1948年3月20日）

中工委转饶、陈、康，华东局转许、谭[2]，并告粟[3]：

（一）庆祝你们周村、张店[4]、邹平、桓台等地的大胜利。（二）淄川[5]攻克后略作休息，进攻昌潍[6]得手后休整半月，待命进攻津浦路[7]济南徐州段，届时渤海、鲁中部队参加此一作战，协助粟裕行动。（三）胶济全路一切尚存路基、铁轨、车站、桥梁、水塔及其他设备，通令保护，不得再破坏（过去破胶济路曾得中央批准，其实是不必要的，吃了大亏）。津浦路津济段已在我手，注意保护，济徐段[8]不要再破坏，暂时被敌利用，并不要紧。陇海全路亦不要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央工作委员会转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副书记陈毅、康生的电报。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周村、张店，今为山东淄博市的两个区。

[5] 淄川，旧县名，1955年并入山东淄博市。

[6] 昌潍，指山东昌乐和潍坊。

[7]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8] 济徐段，指济南至徐州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破坏。[1]

军委

寅号

---

[1] 毛泽东在同日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西北野战军首长的电报，指示对平绥路全线不要破坏，对平张、平保、平津路可作战术上必要之破坏，津榆、平承路完全不要破坏，陇海全线、胶济全线、平汉路信阳以北段、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均不要再破坏。

关于情况的通报[1]

（1948年3月20日）

一、最近几个月，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关于工商业方面、关于统一战线方面、关于整党方面、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现在的“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农，侵犯民族资产阶级，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对待地主和对待富农没有区别，对待地主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没有区别，不按平分原则给地主留下必要的生活出路，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越出了某些政策界限，以及不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不要开明绅士，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在策略上的重要性，工作步骤上的急性病等。这些“左”的偏向，在过去大约两年的时间内，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好在纠正这类偏向并不甚困难，几个月内已经大体上纠正过来了，或者正在纠正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通报。在这以后，党中央就离开陕甘宁边区，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1948年5月到达河北省西部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着。但须各级领导者着重用力才能彻底纠正此类偏向。右的偏向主要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惧怕美国大量援蒋，对长期战争有些厌倦，对国际民主力量的强大的程度有些怀疑，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对党内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熟视无睹等。但这类偏向现在不是主要的，改正亦不困难。最近几个月，我党在战争、土地改革、整党整军、发展新区和争取民主党派等方面均有成绩，在这些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有了着重的纠正，或正在纠正中，这样就可以使整个中国革命运动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二、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着某种幻想，对我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一切内外敌人的力量表示怀疑，并因此认为所谓第三条道路尚有存在可能、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人士，在国民党的突然的攻势之下，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最后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采用我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1]。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他们的某些错误观点则作适当的批评。在将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邀请他们一部分人参加政府工作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这些人的特点是从来不愿意

---

[1] 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当时，其他民主党派也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不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活动。1948年1月1日，李济深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月5日，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继续进行政治斗争。这两个党派当时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时局的主张，发表宣言，主张联合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反对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

接近劳动群众，又习惯于大城市的生活，不愿轻易到解放区来。虽然如此，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基础，即民族资产阶级，却有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因此，应当争取他们。估计要待我们有更大的胜利，夺取几个例如沈阳、北平、天津那样的城市，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已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他们可能愿意来解放区和我们共事。

三、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1]，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蒲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2]。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这样做，可以有力地支援南线作战，可以抽出许多干部输往新解放区。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中央亦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

[1]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京召集“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

[2] 1948年5月，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实行合并，改称华北解放区，同时成立了中共华北中央局、华北军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也联合办公。同年8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边区政府正式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山东的渤海区仍属中共华东中央局管辖。

四、我南线各军，即山东兵团九个旅，苏北兵团七个旅，河淮间兵团二十一个旅，豫鄂陕兵团十个旅，江淮汉水间兵团十九个旅，西北兵团十二个旅，晋南豫北兵团十二个旅，除江淮汉水间刘邓兵团的主力因白崇禧集中兵力向大别山进攻[1]，未获休整，到二月底才抽出一部到淮河以北休整外，其余各兵团均在十二月至二月间作了休整。这是过去二十个月作战中的第一次大休整。这次休整，采取群众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成分，查工作，查斗志）和群众性练兵（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发动了全军指挥员战斗员的高度的革命积极性，教好了或清除了一部分军队中的地主、富农分子或坏分子，提高了纪律，讲明了土地改革中的各项政策、对待工商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发扬了军队中的民主作风，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战术。这样就使得我军极大地增长了战斗力。现在除刘邓兵团的一部尚在休整外，各兵团均已于二月底三月初先后开始新的作战行动，并在两星期内歼敌九个旅。北线各军，即东北兵团四十六个旅、晋察冀兵团十八个旅、晋绥兵团两个旅，在冬季则大部作战，一部休整。东北兵团，利用辽河结冰，举行了三个月作战，歼敌八个旅，争取敌一个旅起义，攻占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和四平街，并收复吉林。该兵团现已开始休整。俟休整完毕，或打长春，或打北宁路上之敌。晋察冀兵团休整一个多月，现已向平绥线行动。晋绥兵团数量较小，其主要任务是对阎锡山起钳制作用。总计我军现有南北两线大小十个兵团，正规兵力已达五十个纵队（等于国民党的整编师），一百五十六个旅（等于国民党的整编旅），一百三十二

---

[1] 白崇禧开始进攻大别山地区的时间是1947年12月，进攻的兵力共33个旅。

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八千左右。此外，尚有非正规军，包括地方兵团、部队、游击队、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一百一十六万八千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占八十万人），全军总计为二百四十九万一千余人。而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我们只有正规军二十八个纵队，一百一十八个旅，六十一万二千余人，平均每旅（三个团）人数不足五千；加上非正规军六十六万五千余人，总计一百二十七万八千余人。可以看出，我们的军队现在是壮大了。旅的数目增加不多，每旅的人数却大为增加。经过二十个月作战，战斗力亦大为增加。

五、国民党的正规军，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去年夏季，是九十三个师，二百四十八个旅，现在则有一百零四个师，二百七十九个旅的番号。其分布是：北线二十九个师，九十三个旅（沈阳卫立煌十三个师，四十五个旅；北平傅作义十一个师，三十三个旅；太原阎锡山五个师，十五个旅），约五十五万人。南线六十六个师，一百五十八个旅（郑州顾祝同三十八个师，八十六个旅；九江白崇禧十四个师，三十三个旅；西安胡宗南十四个师，三十九个旅），约一百零六万人。第二线九个师，二十八个旅（西北区，包括兰州以西地区，四个师，八个旅；西南区，包括川、康、滇、黔，四个师，十个旅；东南区，包括长江以南诸省，八个旅；台湾，一个师，两个旅），约十九万六千人。国民党正规军番号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国民党军大量被我军歼灭，并由战略攻势转入战略守势之后，甚感兵力不足，因此将大量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为正规军，计北线卫立煌系统增加三个师，十四个旅；傅作义系统增加两个师，六个旅；南线顾祝同系统，增加六个师，九个旅；胡宗南系统，增加两个旅；共计增加十一个师，三十一个旅。因此，国民党军现在不是

九十三个师，而是一百零四个师，不是二百四十八个旅，而是二百七十九个旅。但是第一，最近几个月（至三月二十日为止）被我歼灭的六个师，二十九个旅，只有空番号，尚未来得及重建或补充，也许有一部分永远无法重建或补充了，因此，国民党军在实际上现在只有九十八个师，二百五十个旅，比之去年夏季以前只多了五个师的番号和二个实际的旅。第二，现在实有的二百五十个旅中，只有一百十八个旅未受过我军歼灭性的打击，其余一百三十二个旅，或者被我军歼灭过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然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受过我军一次、二次，甚至三次歼灭性打击的（以旅为单位，全体被消灭，或大部被消灭者，称为被歼灭，一个团以上被消灭，但其主力未受损失者，称为受歼灭性打击），其士气和战斗力甚为低落。在未受歼灭性打击的一百十八个旅中，有一部分是在第二线训练的新兵，有一部分是从地方部队和伪军升级或编组的，战斗力很弱。第三，国民党军队的数量也减少了。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其正规部队二百万人，非正规部队七十三万八千人，特种部队三十六万七千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一百零一万人，总计四百三十万五千人。而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他的正规部队一百八十一万人，非正规部队五十六万人，特种部队二十八万人，海空部队十九万人，后勤机关、学校八十一万人，总计三百六十五万人，即是说，减少了六十五万五千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一月的十九个月中，我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一百九十七万七千人（二月和三月上半月尚未统计好，大约有十八万人左右），即是说，国民党不但将其在过去作战期间所动员参军的一百余万新兵消耗了，而且大量消耗了它原有的兵力。在此种形势下，国民党采取和我们相反的方针，不是充实各旅人员的数目，而是减少旅的人员，增加旅

的番号。国民党军在一九四六年平均每旅差不多有八千人，而在现在则平均每旅只有六千五百人左右。今后我军占地日广，国民党军兵源粮源日益缩小，估计再打一个整年，即至明年春季的时候，敌我两军在数量上可能达到大体上平衡的程度。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事实上，从去年秋季以后，超过了这个数目；今后可能有更大的超过。五年左右（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消灭国民党全军[1]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六、目前南北两线敌军在两个地区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举行战役性的进攻，使那里的我军暂时处于困难地位。其一，即大别山，有约十四个机动旅。其二，淮河以北地区，有约十二个机动旅。在这两区，国民党军还有主动权（淮河以北地区，由于我抽出九个主力旅开至黄河以北休整，准备使用于其他方面，故国民党军有了主动权）。其余一切战场的敌军，全是被动挨打。具有对我特别有利形势的战场是东北、山东、西北、苏北、晋察冀、晋冀鲁豫和郑汉路以西、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

[1] 5年左右消灭国民党全军，这是当时的预计。后来，这个时间缩短为3年半左右。

政策和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1]

（1948年3月20日）

各野战军前委及各军区对部队推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是否有没有抓得很紧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事，必须从前委与军区自己领导方面加以检讨。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2]。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使这种教育贯彻到底，使全体指战员充分明了，不加检查，让单纯军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向这种错误观点让步妥协或者隐瞒这些现象不向前委或军区反映，而前委或军区则不向或少向中央反映，只将战绩向上级及中央反映，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不对的，是离开了或多少离开了党的路线的，必须认为是极端严重的现象，应当立即加以检讨。

毛泽东
寅号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各纵队应继续提高政策教育的电报写的批语。

[2] 在写这个批语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报中也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致刘少奇电[1]

（1948年3月20日）

此次工委和华北、华东、华中各负责同志一起，彻底检讨各项领导工作上的错误缺点，并由此获得纠正，走上正轨，极为欣慰。

我们明日动身东移，由此到兴县走路及谈话十天，坐车去代县五天，走路到你处十天，约卯删可到你处。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陕甘全局战事由彭德怀部独力担任

（1948年3月21日）

德怀[1]同志：

（一）我们本日动身东移，约卯删可至中工委所在地[2]。（二）不论现在打洛川，将来打延安，敌均有增援可能，望部署打援。（三）陈唐[3]（指挥陈谢[4]）已放弃洛阳，集结新、渑、宜、洛[5]休整一时期，或打南阳，或打平汉[6]，或再打洛阳，尚待决定。向前[7]克临汾后，或打豫北，或打平介[8]灵石，那时再定。总之陕甘全局，除陈谢一个旅在陕南外，由你们独力担任。

毛泽东

寅马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驻地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村。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4]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

[5] 新、渑、宜、洛，指河南新安、渑池、宜阳和洛宁。

[6]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7] 向前，即徐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8] 平介，指山西平遥和介休。

刘邓陈唐两部的作战部署[1]

（1948年3月22日）

刘、邓，陈、唐，陈赓，并告陈、粟[2]，中工委，彭、张、赵[3]：

各电均悉。部署如下：（一）陈唐（指挥陈赓）率三、四、八纵休整至卯微止。休整地点或在现地，或照刘邓意见移至临汝、伊阳[4]，争取补充（首先是受损最大之八师）。卯微至卯灰间开始向南阳方向行动。或先打南阳，后打宛西四县[5]，或先打宛西四县，后打南阳，临机决定。（二）刘邓率一、二、十、十一纵及其他可能集中之兵力，在沙河、淮河及平汉线[6]之间机动作战。（三）两军互相声援，独立作战，必要时由刘邓决定以一部或全部配合作战，争取于卯辰两月歼敌三五个旅，变动战局，协助粟裕行动。在配合作战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陈赓的电报。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赵，指张宗逊、赵寿山，当时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4] 伊阳，旧县名，即今河南汝阳。

[5] 宛，河南南阳的古称。宛西四县，指河南邓县、镇平、内乡和淅川。

[6]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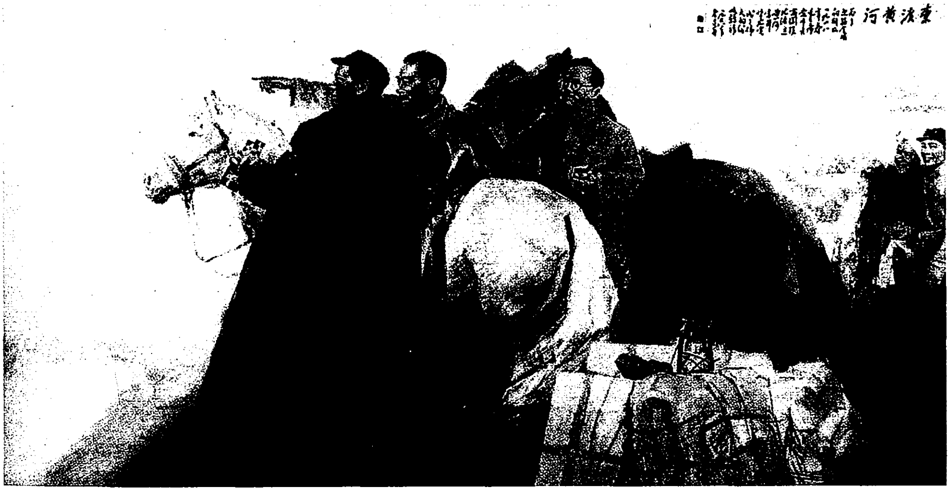
互相策应时，陈唐受刘邓指挥。

军委
寅养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图为毛泽东在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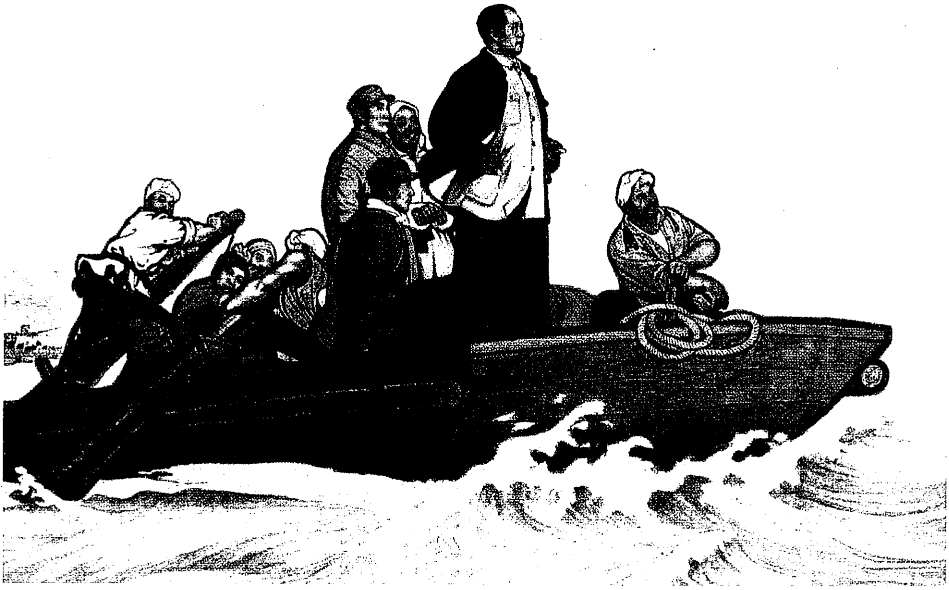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上岸。



《东渡黄河》（中国画）

《东渡黄河》（油画）



《东渡黄河》（油画）

致中央工委等电[1]

（1948年3月23日）

同意由中原局管辖津浦路东陇海路南包括豫、陕、鄂整个地区，统一该区党政军民一切工作之领导。陈、邓加入中原局。苏北仍归华东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央工委并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

(1948年3月25日)

中工委转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为使中央充分明了情况起见，除已规定的报告制度务须严格遵守外，兹规定：

（一）你们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军事，土改，财政，经济，整党，政权，外交，工青妇运，宣传，组织，文教，城工，肃反，打人杀人及对待中间人士等），不论是用电报发出的或用书面发出的，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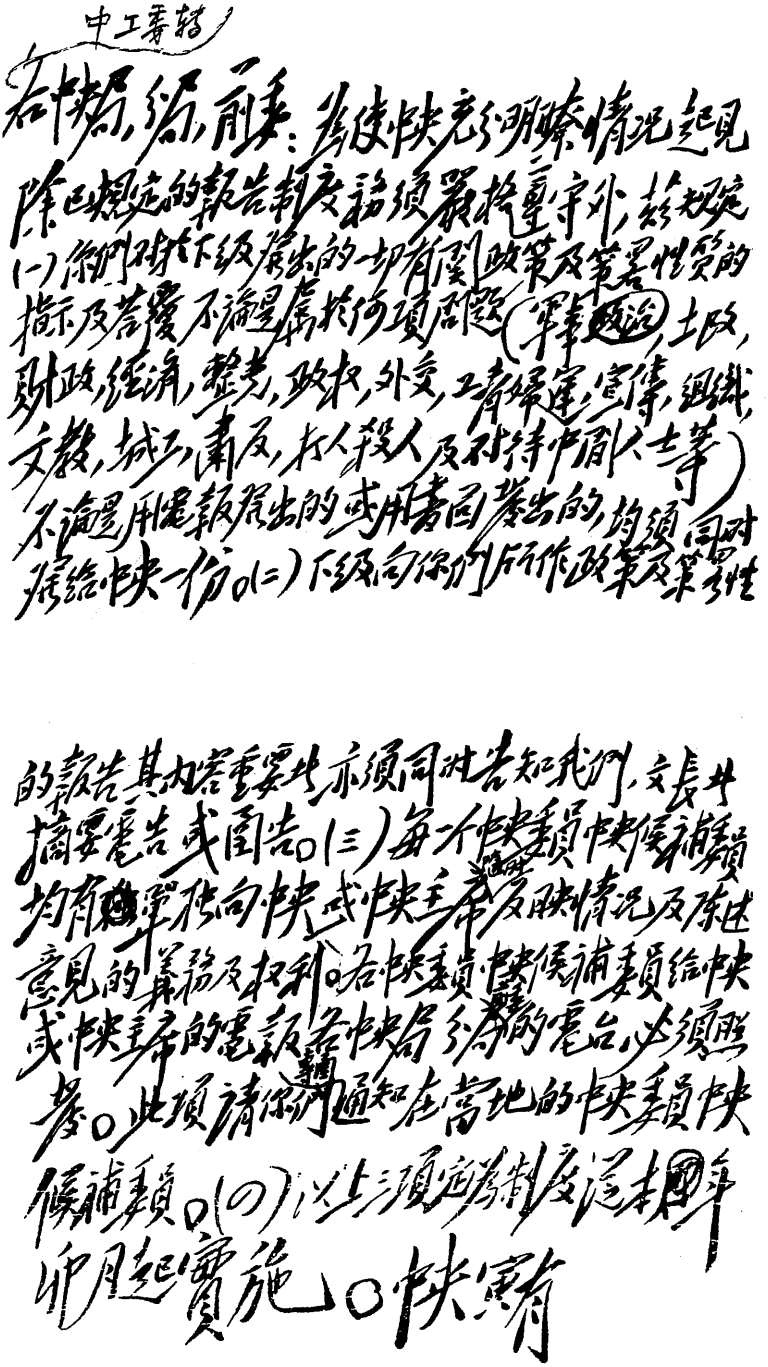
（二）下级向你们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我们，文长者摘要电告或函告。

（三）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电台必须照发。此项请你们专函通知在当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四）以上三项定为制度，从本年卯月起实施。

中央

寅有



中工委轉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為使中央完全明瞭情況起見除已規定的報告制度必須嚴格遵守外，茲規定（一）你們對於下級發出的一切有關政策及策略性質的指示及答覆不論是屬於何項問題（軍事問題，土改，財政，經濟，整黨，政權，外交，工青婦運，宣傳，統戰，文教，城市，肅反，打人殺人及對待中間人士等）不論是用電報發出的或用書面發出的，均須同時發給中央一份。（二）下級向你們所作政策及策略性的報告其內容重要者亦須同時告知我們，文長者摘要電告或書面告。（三）每个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均有單獨向中央或中央主席反映情況及陳述意見的義務及權利。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給中央或中央主席的電報各中央局分局的電台必須照發。此項請你們轉通知在當地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四）以上三項規定為制度從本年四月起實施。中央寅有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的手稿。

给王观澜[1]的信

（1948年3月31日）

观澜同志：

来示悉。大有起色，极为欣慰。去苏联治病是可以的，待秋季你到五台区，如果平绥线已打通，路上好走，即可和那边交涉前往，你即可去。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

[1] 王观澜（1906—1982），浙江临海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色中华》总编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历任中央农民委员会主任、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1948年曾到苏联治病。

关于部队中民主生活的指示

（1948年3月）

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攻克蟠龙敌整一师一六七旅阵地的经验，也是如此。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做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4月1日）

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主要地是一些和晋绥工作有关的问题，然后讲到一些和全国工作有关的问题。

一

我认为，在过去一年内，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领导的区域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是成功的。

这是从两方面来看的。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反对了右的偏向，发动了群众斗争，在全区三百多万人口的二百几十万人口中，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又纠正了在运动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因而使全部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从这两方面来看，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我认为是成功的。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封建了，再也不敢厉害了，再也不敢贪污了。”这是晋绥人民的话。这是晋绥人民对于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做的结论。他们说“再也不敢封建了”，就是说，我们领导他们发动了斗争，消灭了或者正在消灭着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和老区半老区的封建剥削制度的残余。他们说“再也不敢厉害了，再

也不敢贪污了”，就是说，在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过去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许多坏分子混入了党和政府的组织内，许多人发展了官僚主义的作风，仗势欺人，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完成工作任务，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或者犯了贪污罪，或者侵占了群众的利益，这些情况，经过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晋绥干部会议。图为会议旧址——晋绥军区司令部礼堂。

“过去对于我们是致命的东西，现在去掉了。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有了。”这是在座同志们中有一位同志对我说的。他所说的致命的东西，就是指的存在于党和政府组织内的成分不纯或作风不纯并因而引起群众不满的严重现象。这种现象，现在是根本上去掉了。他所说的过去没有而现在有了的东西，就是指的贫农团、新农会、区村人民代表会议，以及由于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所造成的农

村中面目一新的气象。

这些反映，我以为是合乎实际的。

这就是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伟大的成功。这是成功的第一个方面。在这个基础上，晋绥的党组织才能够在过去一年内完成巨大的军事勤务，支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假使没有成功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要完成这样大的军事任务，那是困难的。

另一方面，晋绥的党组织纠正了在工作中发生的几个“左”的偏向。这主要地是三个偏向。第一，在划分阶级成分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现在，这项偏向已经纠正了。这样，就大大地安定了人心，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第二，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所有的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的斗争中，超出了应当清查的范围；以及在税收政策中，打击了工商业。这些，都是属于对待工商业方面的“左”的偏向。现在，这些偏向也已纠正，使工商业获得了恢复和发展的可能。第三，在过去一年的激烈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并给农村中的坏分子以乘机报复的可能，由他们罪恶地杀死了若干劳动人民。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

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过去一年中，晋绥在这方面曾经发生的偏向，现在也已纠正了。

毛泽东同志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部分版本)。

在认真地纠正了上述一切偏向之后，我们可以有证据地来说，在晋绥中央分局领导下面的全部工作，现在已经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

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部分版本）。

关于整理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你们已经根据中央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1]，采用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即是邀集党外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的支部会议，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借以改变党的组织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的现象，使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你们这样做，将使你们有可能健全地完成对于党的组织的全部整理工作。

---

[1] 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是1948年2月22日发出的。这个指示总结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经验，规定了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着重地纠正了某些地区在这两项工作中曾经发生的“左”的偏向。

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你们已经执行了或者正在执行着这个方针，这也是对的。

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到了那时，贫农团和农会就成为它们的助手。我们曾经打算在各地农村中，在其土地改革任务大致完成以后再去建立人民代表会议。现在你们的经验以及其他解放区的经验，既已证明就在土地改革斗争当中建立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那末，你们就应当这样做。在一切解放区，也就应当这样做。在区村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普遍地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建立县一级的人民代表会议。有了县和县以下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就容易建立起来了。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当然不是勉强凑数，而是要分别有市镇的农村和没有市镇的农村，分别市镇的大小，分别城市和农村，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实现这个联合一切民主阶层的任务。

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的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今后应当加强对于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在工

作中不断地获得进步。同时，应当向他们提出警告，决不可以因为成功，因为受到奖励，而骄傲自满。

由于这一切，由于上述各方面的成功，应当说，晋绥解放区现在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巩固了。在其他解放区，凡是这样做了的，也就同样地巩固了。

二

晋绥解放区获得上述成功的原因，就领导方面来说，主要的是：（甲）在去年春季刘少奇同志的当面指示和去年春夏康生同志在临县郝家坡行政村的工作的帮助之下，晋绥分局在去年六月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批判了过去工作中存在着的右的偏向，彻底地揭发了各种离开党的路线的严重现象，决定了认真地发动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方针。这个会议是基本上成功的。假如没有这个会议，这样大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这个会议的缺点是：没有按照老区半老区和新区的不同的情况决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在划分阶级成分的问题上采取了过左的方针；在如何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上太注重了清查地主的地财；以及在对待群众要求的问题上缺乏清醒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了“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关于这后一个问题，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地委书记会议仅仅强调了党应当执行群众意见的方面，而忽视了党应当教育群众和领导群众的方面，以致给了后来某些地区的工作同志

以不正确的影响，助长了他们的尾巴主义错误。（乙）晋绥分局在今年一月采取了纠正“左”的偏向的适当的步骤。这个步骤是在分局同志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回来以后实行的。分局为此发出了五项指示[1]。这一纠正偏向的步骤，如此适合群众的要求，又执行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在短时期内，几乎一切“左”的偏向都已纠正过来了。

三

晋绥的党组织在抗日时期的领导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这表现在实行了减租减息，相当地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纺织业、军事工业和一部分轻工业，建立了党的基础，建立了民主政府，建立了近十万人的人民军队，因而就能依据这些工作作基础，进行了胜利的抗日战争，并打退了阎锡山等反动派的进攻。当然，

---

[1] 指1948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的《关于改正错订成分与团结中农的指示》。指示内容共分5项。其要点是：一、由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不明确，在农民自发的要求下，将不少人错订为破产地主和富农，特别是将富裕中农错订为富农，影响了对中农的团结，这是错误的。二、对上述错误应采取适当步骤，坚决地说服农民加以改正。对于已取出的财物，应作适当退还。三、向农民和干部说明，划分阶级成分，应以剥削关系为唯一标准。成分错订者应该改正。四、掌握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的原则。在农民代表会议中，在农会领导机关中，使中农占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并在税收中、土地改革中，照顾他们的利益。五、对于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负责干部应认真研究。按照党对中农的政策，凡属错误，都要改正；同时必须通过群众去进行改正。在发出上述5项指示的同时，晋绥分局又发出了《关于保护工商业的指示》，纠正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业的偏向。

这个时期的党和政府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明白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许多工作上的不良现象。但是，就总的情形说来，抗日时期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这就给了我们在日本投降以后能够据以打败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的有利条件。抗日时期，晋绥党组织的领导方面的缺点或错误，主要地是未能依靠最广大的群众克服党内和政府内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分不纯或者作风不纯，以及由此产生的工作中的不良现象；这个任务，留给了你们到现在来完成。那时的晋绥的某些领导同志，缺乏对于党和群众的许多真实情况的了解，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也是同志们应当引为教训的。

四

今后晋绥党组织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努力，继续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继续发展和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不再加重人民负担，并酌量减轻人民负担，恢复和发展生产。你们现在正在开生产会议。在目前数年内，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是一方面改善人民的生活，一方面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你们有广大的农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使用机器的轻工业和重工业。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农业方面，过去被官僚主义分子所把持的、对于人民群众有害无益的那些变工队和合作社[1]都垮台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毫不可惜的。你们的任务，是在于细心地保存和发展那些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变工队、合作社和其他必要的经济组织，并推广这样的组织于各地。

---

[1] 这里是指供销合作社。

晋绥干部会议会场——晋绥军区司令部礼堂（内景）。

五

全国的形势，是同志们所关心的。自从去年党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采取新的方针，展开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以后，差不多在一切解放区都召开了有关整党和土地改革的大的干部会议，批判了存在于党内的右倾思想，揭发了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

纯或者作风不纯的严重现象。而在以后，在许多地区，又采取适当的步骤，纠正了或者正在纠正着“左”的偏向。这样，就使我党在全国的工作，在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之下，走上了健全发展的轨道。差不多一切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最近几个月内，都利用了战争的空隙，实行了大规模的整训。这种整训，是完全有领导地和有秩序地采用民主方法进行的。由此，激发了广大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群众的革命热情，明确地认识了战争的目的，清除了存在于军队中的若干不正确的思想上的倾向和不良现象，教育了干部和战士，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种民主的群众性的新式的整军运动，今后必须继续进行。你们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所实行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整党、整军和土地改革工作，我们的敌人国民党是一样也不能实行的。在我们方面，是如此认真地纠正自己的缺点，把我们的全党全军团结得差不多像一个人一样，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有效地执行着我党中央所规定的一切政策和策略，胜利地进行着人民的解放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则一切相反。他们是那样腐化，那样充满日益增多的无法解决的内部争吵，那样被人民唾弃而陷于完全的孤立，打了那样多的败仗，因此他们就必不可免地走向灭亡。这就是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互相对比的全部形势。

在这种形势下面，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不能由任何别的阶级和任何别的政党充当领导者，只能和必须由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充当领导者。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

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的基础。因此，土地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只能和必须是贫农。这个贫农阶层，和雇农在一起，占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土地改革的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就是满足贫雇农群众的要求。土地改革必须团结中农，贫雇农必须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中农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不这样做，贫雇农就会陷于孤立，土地改革就会失败。土地改革的一个任务，是满足某些中农的要求。必须容许一部分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土地改革的对象，只是和必须是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剥削制度，不能侵犯民族资产阶级，也不要侵犯地主富农所经营的工商业，特别注意不要侵犯没有剥削或者只

有轻微剥削的中农、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新式富农。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封建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因此，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应当是有步骤的，即是说，有策略的。必须依据环境所许可的情况，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决定发动斗争的策略，不要企图在一个早上消灭全部的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的总的打击面，根据中国农村封建剥削制度的实际情况，一般地不能超过农村户数百分之八左右，人数百分之十左右。而在老的和半老的解放区内，此项数目还要减少。离开实际情况，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是危险的。在新区，还必须分地区，分阶段。分地区，是说应当集中力量在那些可以巩固地占领的区域进行适当的合乎当地群众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而在那些暂时尚难巩固地占领的区域，则不要忙于进行土地改革，而只做一些可以做的按照当前情况有利于群众的工作，以待情况的变化。分阶段，是说在人民解放军刚才占领的区域，应当提出和实行中立富农和中立中小地主的策略，将打击面缩小到只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和打击豪绅恶霸分子。应当集中一切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作为新区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被提高了的情况，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的阶段。在新区，分浮财和分土地，均必须在环境比较安定和绝大多数群众充分发动之后，否则就是冒险的，靠不住的，有害无益的。在新区，必须充分地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所谓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制度，就是说，必须分别地主和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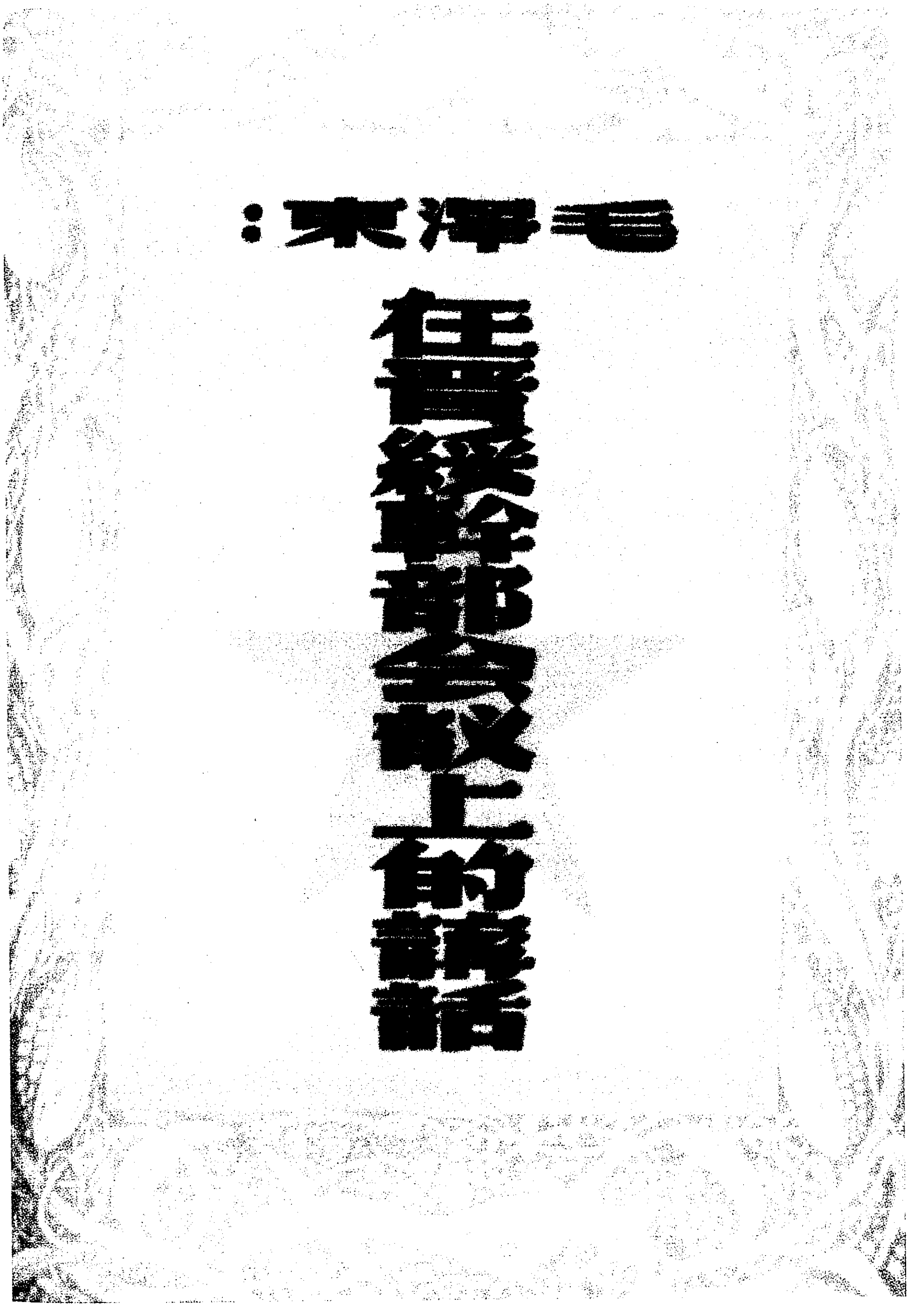
农，分别地主的大中小，分别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分子和非恶霸分子，在平分土地、消灭封建制度的大原则下面，不是一律地而是有所分别地决定和实行给予这些不同情况的人们以不同的待遇。在我们这样做了的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发展农业生产，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灭封建制度，才能取得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农村党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须放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上面。为了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和市镇上的工业生产，在消灭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必须注意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采取办法坚决地反对任何人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破坏和浪费，反对大吃大喝，注意节约。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劝告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组织为现时经济条件所许可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各种生产的和消费的合作团体。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

同志们知道，我党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又规定了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但是，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各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让我再说一遍：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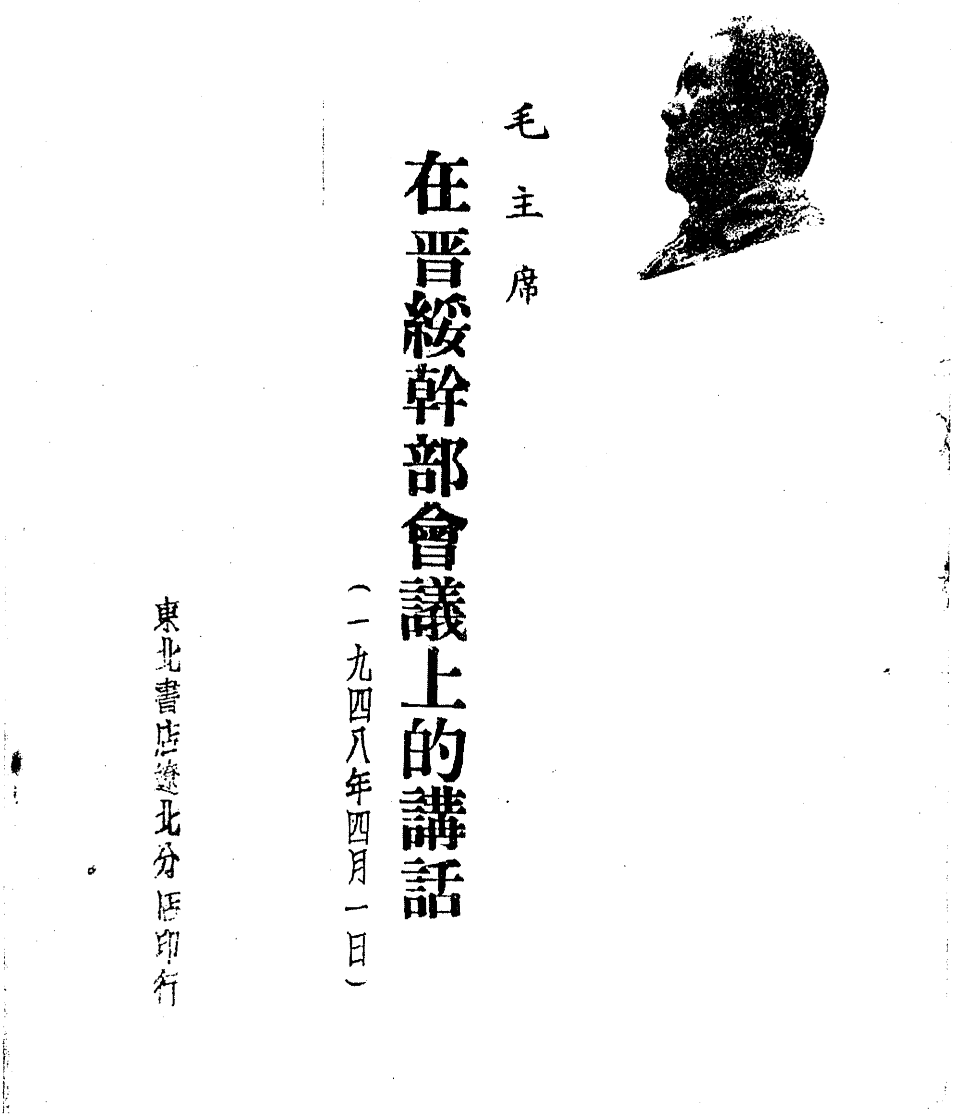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毛澤東：

在晉綏幹部会議上的講話

1948年6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毛主席

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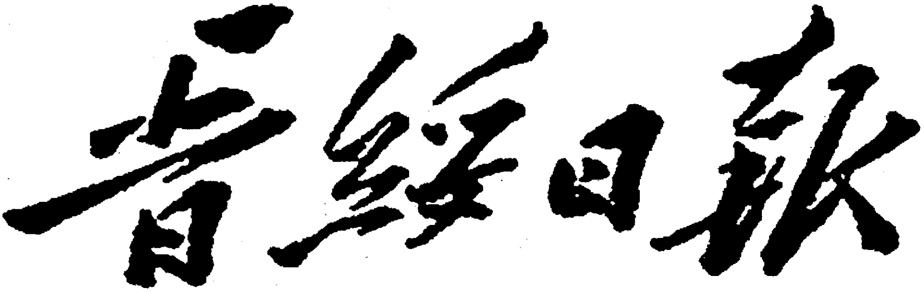
東北書店遼北分店印行

1948年，东北书店辽北分店出版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较早出版的单行本之一。

为《晋绥日报》题写报头[1]

（1948年4月2日）

晋绥日报



毛泽东为《晋绥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晋绥日报》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晋绥分局的机关报，前身是1940年9月18日创刊的《抗战日报》，1946年7月1日改名，内容主要是社论、国际国内新闻、地方消息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指导地方的工作。1948年4月2日，毛泽东曾对该报编辑人员发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9年5月1日《晋绥日报》停刊。这是1948年4月，毛泽东为《晋绥日报》题写的报头。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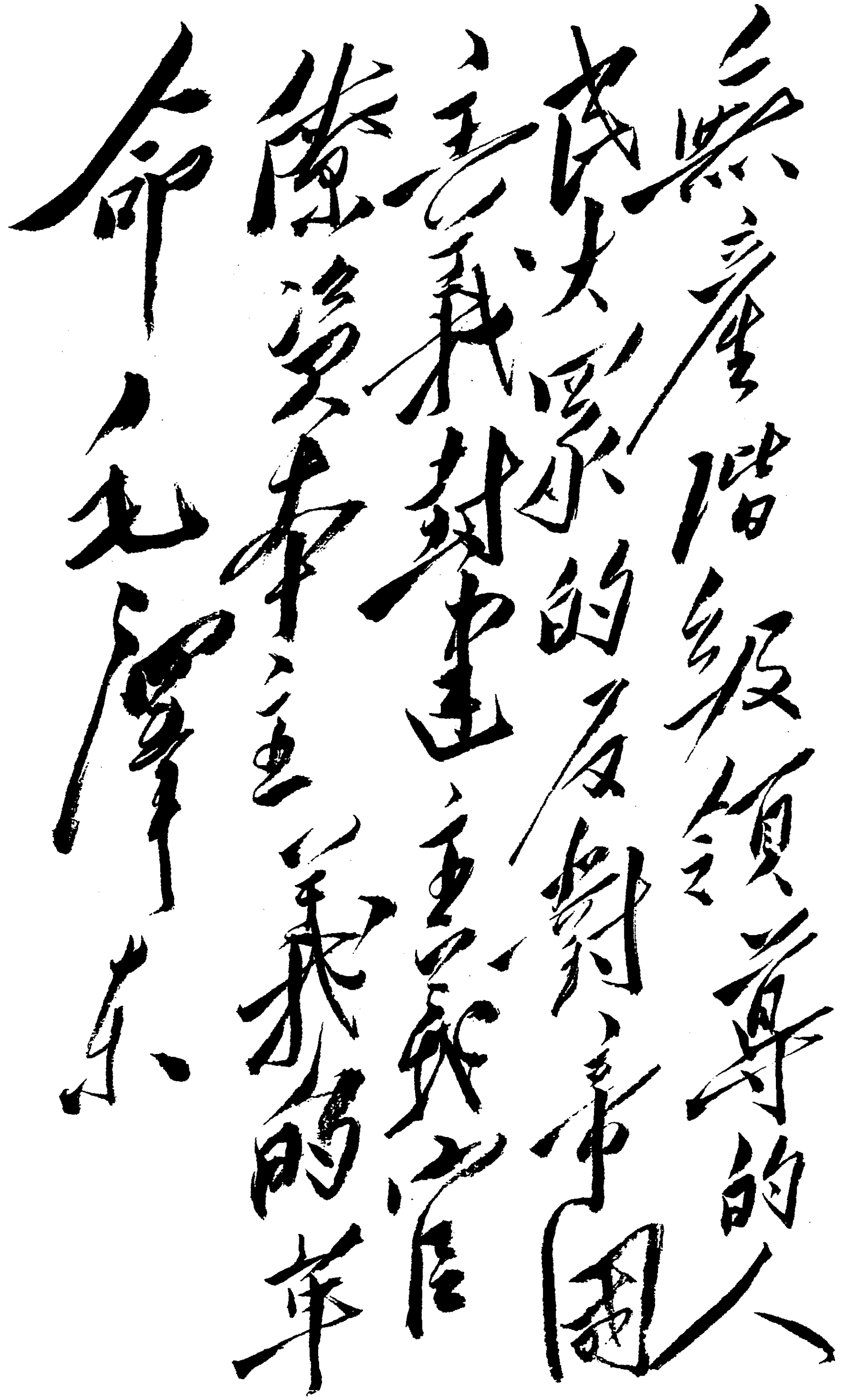
（1948年4月2日）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赴河北途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为《晋绥日报》的题词。



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

毛澤東

毛泽东为《晋绥日报》的题词。

关于土地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的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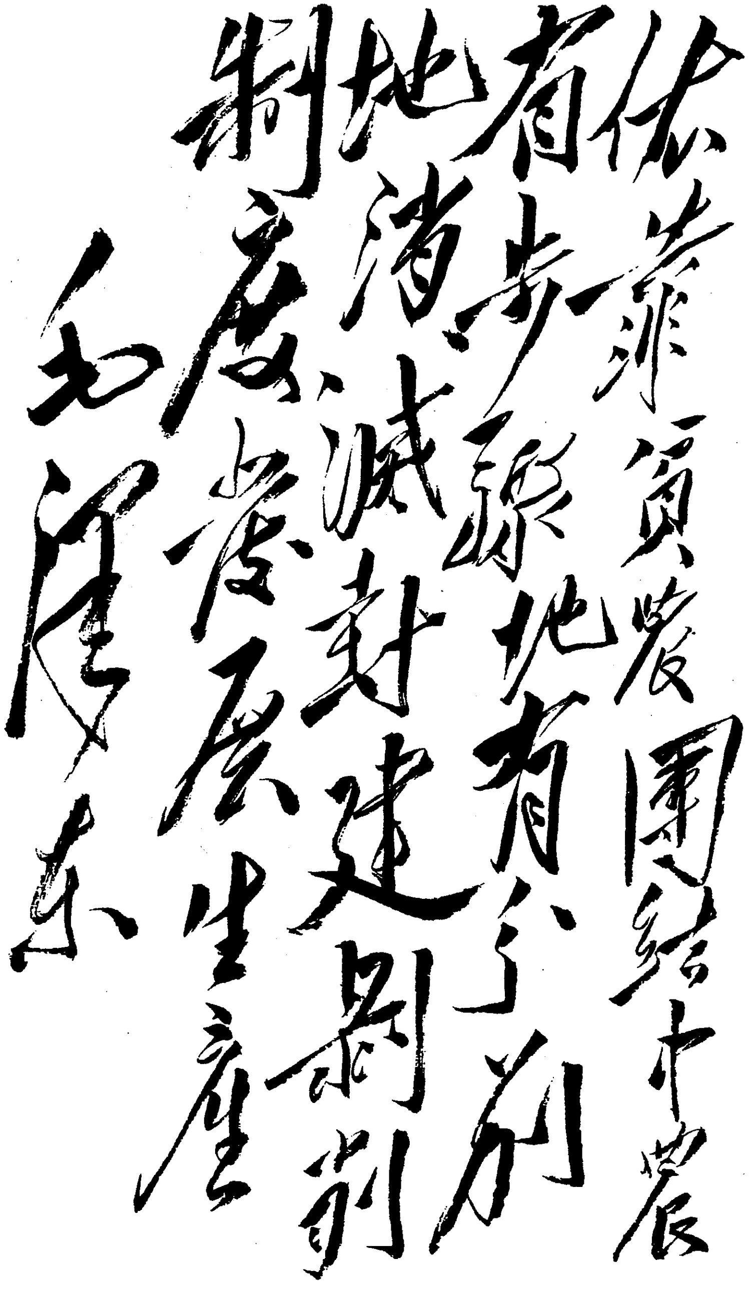
（1948年4月2日）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赴河北途中关于土地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为《晋绥日报》的题词。



依靠贫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生產

毛澤东

毛泽东为《晋绥日报》的题词。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1948年4月2日）

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传。我们正在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陕北的部队经过整训诉苦以后，战士们的觉悟提高了，明了了为什么打仗，怎样打法，个个摩拳擦掌，士气很高，一出马就打了胜仗。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

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但是在有些同志的工作中间，群众路线仍然不能贯彻，他们还是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做工作。其

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当然要从思想上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同时也要教给同志们许多具体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报纸。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

同志们是办报的。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的报上天天讲群众路线，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没有实行群众路线。例如，报上常有错字，就是因为没有把消灭错字认真地当做一件事情来办。如果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报上有了错字，就把全报社的人员集合起来，不讲别的，专讲这件事，讲清楚错误的情况，发生错误的原因，消灭错误的办法，要大家认真注意。这样讲上三次五次，一定能使错误得到纠正。小事如此，大事也是如此。

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当着群众还不觉悟的时候，我们要进攻，那是冒险主义。群众不愿干的事，我们硬要领导他们去干，其结果必

然失败。当着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这些问题有许多同志还不懂得。我们的报纸要好好地宣传这些观点，使大家都能明白。

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崞县两个区的农民一百八十多人，开了五天会，解决了分配土地中的许多问题。假如你们的编辑部来讨论那些问题，恐怕两个星期也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问题你们不懂得。要使不懂得变成懂得，就要去做去看，这就是学习。报社的同志应当轮流出去参加一个时期的群众工作，参加一个时期的土地改革工作，这是很必要的。在没有出去参加群众工作的时候，也应当多听多看关于群众运动的材料，并且下工夫研究这些材料。我们练兵的口号是：“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战士们有很多打仗的实际经验。当官的要向战士学习，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领就大了。报社的同志也要经常向下边反映上来的材料学习，慢慢地使自己的实际知识丰富起来，使自己成为有经验的人。这样，你们的工作才能够做好，你们才能担负起教育群众的任务。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的地委书记会议以后，有很大进步。内容丰富，尖锐泼辣，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我很愿意看它。但是从今年一月开始纠正“左”的偏向以后的这一时期，你们的报纸却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你们现在正在检查工作，总结经验，

这样很好。总结了反右反“左”的经验，使头脑清醒起来，你们的工作就会有改进。

《晋绥日报》在去年六月以后进行的反对右倾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你们作得很认真，充分地反映了群众运动的实际情况。对于你们认为错误的观点和材料，你们采用编者按语的形式加以批注。你们的批注后来也有缺点，但是那种认真的精神是好的。你们的缺点主要是把弓弦拉得太紧了。拉得太紧，弓弦就会断。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1]现在“弛”一下，同志们会清醒起来。过去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主要是“左”的偏向。现在作一次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左”的偏向，就会做出更大的成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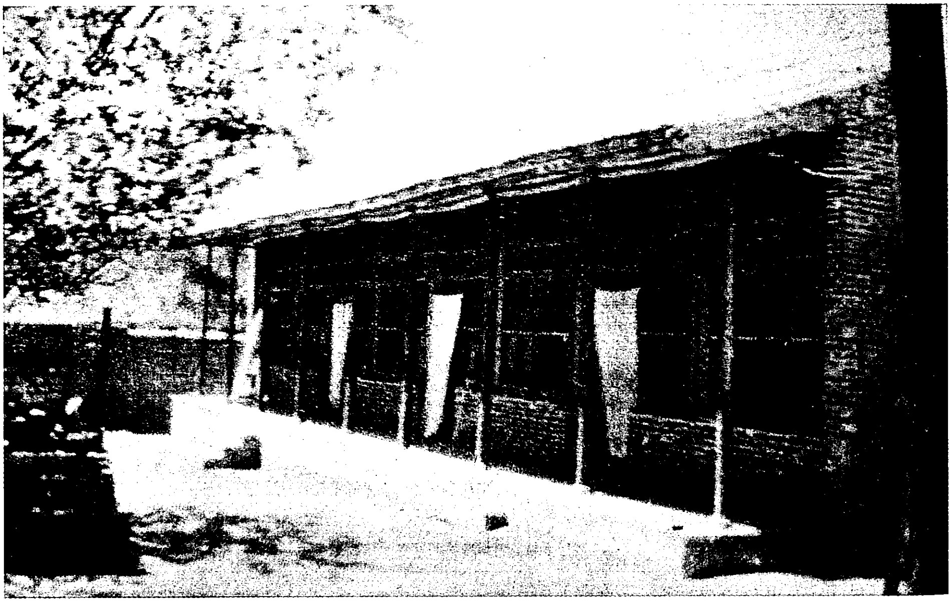
在我们纠正偏差的时候，有的人把过去的工作看得毫无成绩，认为完全错了。这是不对的。这些人没有看到，党领导了那么多的农民得到土地，打倒了封建主义，整顿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干部的作风，现在又纠正了“左”的偏向，教育了干部和群众。这不是很大的成绩吗？对于我们的工作，对于群众的事业，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不应当否定一切。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去年六月到现在的短短时期内，经过反右和反“左”的斗争，使大家都知道了反右、反“左”是怎么一回事。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大家是不会知道的。

经过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以后，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应当保持你们报纸的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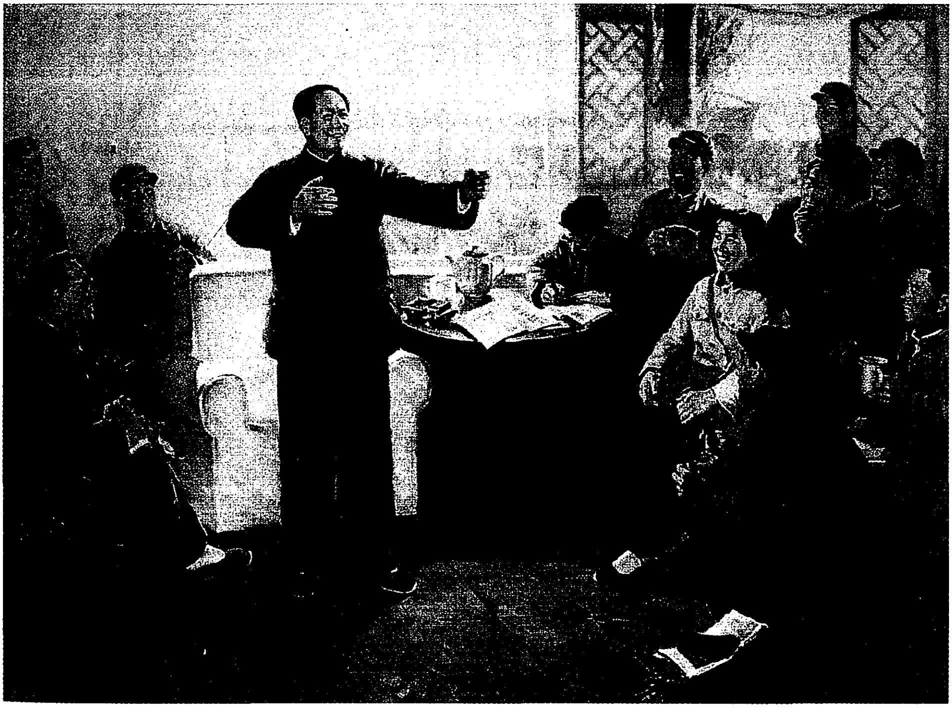
---

[1] 参见《礼记·杂记下》。原文是：“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真地办。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



1948年，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旧址。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油画）

应集结主力歼灭敌三十五军[1]

（1948年4月4日）

杨、罗、杨、耿，并告聂、萧[2]，中工委：

三日电[3]悉。你们应集结主力歼灭西援之三十五军，然后继续在绥远[4]扩张，吸引东敌西援，各个击灭之。

军委

四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聂、萧，指聂荣臻、萧克，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8年4月3日杨得志、罗瑞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提议以下两个作战方案：（一）以主力出绥远作夺取全绥远的计划。（二）一、六纵队打下凉城后即以一部围大同，主力集中打援，如援不好打则出平绥东段。"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致彭德怀电[1]

（1948年4月4日）

西北战场重要性已增长，战争规模已扩大，四百多万人口支援这一战争已感吃力，民负应减轻不应加重。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1]

（1948年4月8日）

此次再克洛阳[2]，可能巩固。关于城市政策，应注意下列各点。

一、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

二、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对于那些查明确实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即完全官办的工商业，应该确定归民主政府接管营业的原则。但如民主政府一时来不及接管或一时尚无能力接管，则应该暂时委托原管理人负责管理，照常开业，直至民主政府派人接管时为止。对于这些工商业，应该组织工人和技师参加管理，并且信任他们的管理能力。如国民党人已逃跑，企业处于停歇状态，则应该由工人和技师选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然后由民主政府委任经理和厂长，同工人一起加以管理。对于著名的国民党大官僚所经营的企业，应该按照上述原则和办法处理。对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因为它的内容不但适用于洛阳，也基本上适用于一切新解放的城市，所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了其他前线和其他地区的领导同志。

[2] 洛阳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河南西部的一个重要据点。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3月14日首次攻克洛阳，以后为便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主动撤出。同年4月5日，人民解放军再度攻克该城。

小官僚和地主所办的工商业，则不在没收之列。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

三、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对于土地在乡村家在城里的地主，由民主市政府依法处理。其罪大恶极者，可根据乡村农民团体的请求送到乡村处理。

四、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在战争时期，能够继续生产，能够不减工时，维持原有工资水平，就是好事。将来是否酌量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要依据经济情况即企业是否向上发展来决定。

五、不要忙于组织城市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斗争。要等市政管理有了头绪，人心已经安定，经过周密调查，弄清情况和筹有妥善解决办法的时候，才可以按情况酌量处理。

六、大城市目前的中心问题是粮食和燃料问题，必须有计划地加以处理。城市一经由我们管理，就必须有计划地逐步解决贫民的生活问题。不要提“开仓济贫”的口号。不要使他们养成依赖政府救济的心理。

七、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必须妥善地予以清理和登记。

八、一切作长期打算。严禁破坏任何公私生产资料和浪费生活资料，禁止大吃大喝，注意节约。

九、市委书记和市长必须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应该对所属一切工作人员加以训练，讲明各项城市政策和策略。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如果应用对待国民党管理的城市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人民自己管理的城市，那就是完全错误的。

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1948年4月10日）

华东局，转许、谭、谢[1]，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许谭谢卯东[2]电悉。你们对昌潍地区之敌宣布宽大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不正确的，即对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大反革命分子及大恶霸分子，也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将功折罪。你们这样宣布，对敌方事实上将是一种欺骗，因为事实上这些罪大恶极分子被捕以后，当地群众将很有理由地要求我军及民主政府加以惩办，而我军及民主政府必须接受群众的要求，否则就要犯错误。你们这样宣布，将使你们在政治上处于软弱和被动的地位，因为在这些罪大恶极分子被捕以后，人民群众要求惩办的时候，如果你们要维持对敌方的信用而坚持既往不咎的政策，你们就将违反群众的正义的要求和意志。你们在宣布这样原则性的政策之前，应当向华东局及中央请示，因为对罪大恶极分子和其他敌方人员不加区别地一概宣布既往不咎，是直接违反

---

[1]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指谢有法（1917—1995），江西兴国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部主任。

[2] 卯东，即4月1日。

我党政策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首恶者必办一项规定的，而你们没有事先请示，粗率地向敌方发出这项不正确的声明。如果你们的声明尚未公开宣布，必须迅即修改这项声明，方能宣布；如果已经公开宣布，则你们已使你们自己犯了一次错误。当然，目前不要马上宣布取消此项声明，但总有一天你们要宣布执行惩办首恶分子的正确规定。

中央不止一次地向各地各军领导同志指出，中央的一切政策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不能允许不得中央同意由任何下级机关自由修改。但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两年多时间内，不少地方在关于土地改革的政策方面，在关于工商业及工运的政策方面，在关于打人杀人的政策方面，在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面，在宣传教育的政策方面，以及在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得中央同意，甚至不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即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前委及其他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地方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恶劣作风，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恶劣作风，多报功绩少报（甚至不报）错误缺点的恶劣作风，对于原则性问题粗枝大叶缺乏反复考虑慎重处置态度的恶劣作风，不愿精心研究中央文件以致往往直接违反这些文件中的某些规定的恶劣作风，仍然存在。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中央要求一切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并指导所属中级及下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同样严肃地注意加以改变，一遇此类现象，立即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予以指出并予以纠正。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合乎中国革命形势的要求的。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这一形势要求我们全党全军首先在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及策略方

面，在军事上的战略及重大战役方面的完全统一，经济上及政府行政上在几个大的区域内的统一，然后按照革命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地考虑在军队的编制和供应上，在战役行动的互相配合上，以及在经济上在政府行政上（那时须建立中央政府）作更大的统一。

总之，革命形势要求我党缩小（不是废除）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分则统一于受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据我们所知，各地区和各部分的内部对于受中央委托的机关存在着极大的极不正常的和极有害的不统一状态）。各地领导同志必须迅速完成在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

中央
卯灰

同意先歼暂四军主力[1]

（1948年4月10日）

杨、罗、杨、耿，并告聂、萧、赵[2]，中工委：

你们主力先歼天镇附近之暂四军主力，如有可能再歼怀安之敌，是正确的。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或者向平绥[3]东段进击，或者向绥远[4]协同在绥两纵歼灭三十五军，打开绥远局面，然后主力回师打平绥东段，依情况决定为适宜。

军委

十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聂、萧、赵，指聂荣臻、萧克、赵尔陆，当时分别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 平绥，即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刘邓军准备出豫西南和汉水流域[1]

（1948年4月16日）

刘、邓，并告陈、粟，陈、唐，陈赓[2]：

卯元电[3]悉。（一）请令转入太康、柘城及以北之一、十一两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赓，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

[3] 指1948年4月13日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并转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甲、我3月29日进攻阜阳，蒋从四周抽调20个旅的兵力，欲合击我于沈丘、临泉水网地区。我以拆散敌阵、伺机寻击张轸之目的，于4月3日以一纵向西北、十一纵向北转移，以二、三、六、十等4个纵队向西转移，并乘势袭取上蔡、汝南、驻马店、确山等地，开辟战场，以陈谢、陈唐军袭取洛阳及其以东、漯河及其以北诸城镇，互相策应。乙、敌人特点是，在我攻击中心据点时，从四周向中心集中最大兵力。如打边沿之敌，则敌取密切协同。在我特别易于歼击方向之敌，依托水砦，强固工事，密集稳重，以待其友邻可以抄我侧背时而后出动。其次，由于高度集中，只守战略要点，放弃其要线之据点。如难守时退守郑州，而放弃郑州西南两铁路地带一切据点，以避免歼灭。丙、我大别山部队，只二纵才休息两星期，三、六纵两个月来未休整，非常疲惫。拟争取时间进行短期休整，待判明敌新企图后另行机动。

在陇海郑徐段[1]及其南北地区歼灭分散之敌。（二）你们所率二、三、六纵及陈士榘、陈赓各纵，在平汉路[2]西将黄河以北补充人员及物资运达各纵，补充完毕，准备新行动。（三）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鄂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以西，以利粟裕行动。不要企图在平汉线附近和数个师集中行动之敌作战，而应远离集中之敌，到有分散之敌可打之地区去作战。我军到豫西南及汉水流域去的兵力亦不要太大。我们意见：甲、将宋纵[3]派回郑徐线地区，与一纵、十一纵会合成为一兵团，担负该区作战任务。乙、以陈士榘、陈赓之三、四、八纵共十个至十一个旅，待补充新兵、弹药、夏衣后，早日向西南，首先夺取宛西四县[4]，然后出汉水。他们说该区缺粮，我们则认为在夺取宛西四县及汉水广大城镇乡村之后，是可能解决粮食问题的。丙、你们直属之二、三、六纵则位现地区休整，居中策应郑徐线地区及汉水地区两兵团之作战。第一步准备协助陈唐、陈赓向西南行动，第二步准备向沙、淮间行动。（四）以上意见是否适宜，盼复。我们已到阜平，不日即可与中工委会合。

军委

卯铣

---

[1] 郑徐段，指郑州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2]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3] 宋纵，指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纵队司令员宋时轮。

[4] 宛，河南南阳的古称。宛西四县，指河南邓县、镇平、内乡和淅川。

致陈毅、粟裕电[1]

（1948年4月21日）

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至卯世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

[1] 粟裕4月18日致中央军委电，内称：我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得不到群众较好配合，行动不易保密，伤病员难安插，补给困难，重装备不能发挥作战能力，变成拖累。五军及整编十一师系美械重装备可能留中原以发挥其作用，蒋对桂顽两个主力师不至放虎归山，可能仍留大别山，如我军南进未能调动这四个最强的整编师南下，会使中原地区遭到摧残而难于恢复。建议中原三军依托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等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求得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津浦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是毛泽东关于粟裕建议缓出闽浙赣以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几个大仗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在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封面上写的批语

（1948年4月21日）

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可先打长春但不应强调南下困难

（1948年4月22日）

林、罗、高、陈、李、刘、谭[1]：

巧电[2]悉。（一）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二）我们可令杨罗杨[3]（正在商量中）以三个纵队出至承德、北平之线以东地区，或者可能出至承德以东地区，起配合作战之作用。望令该地区准备八万人的粮食及其他协助事项，该三纵到达时间可能在辰删以前，亦可能在辰删至辰卯之间。但你们主要不要依靠杨罗杨。（三）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高、陈、李，指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当时均任东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刘、谭，指刘亚楼、谭政，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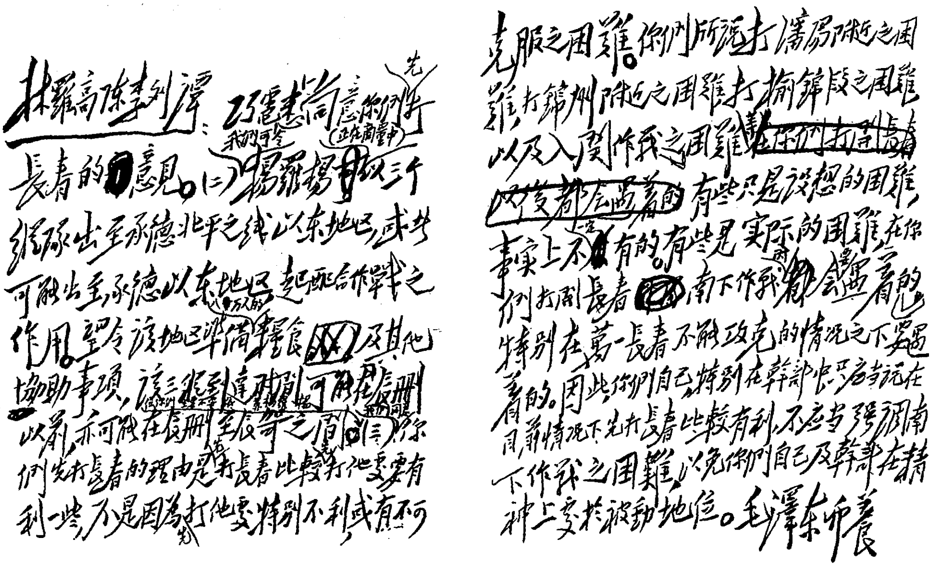
[2] 指1948年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提出，东北我军在目前进行的政治、军事训练结束后，拟于5月中下旬集结9个纵队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力求在半个月左右时间内打下长春，结束战斗。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好，其他意见，如打铁岭、抚顺、本溪、新民，如打义县、攻锦州，如向锦州、唐山之线进击，所遇敌军甚强，我军粮弹衣服不济，困难比较多，故均不适应。

[3] 杨罗杨，指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第二政治委员。

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榆锦段[1]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等，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有些是实际的困难，在你们打开长春南下作战时会要遇着的，特别在万一长春不能攻克的情况之下要遇着的。因此，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

卯养



毛泽东致林彪等电的手稿。

---

[1] 榆锦段，指山海关至锦州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晋察冀野战军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1]

（1948年4月22日）

杨、罗、杨、耿：

你们有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主力三个纵队必须于辰初出动，辰删以前到达热河[2]境内。因此，你们派赴门头沟[3]之一个纵队应立即收回，集结三个纵队于桑干河以南休息至辰冬左右为止，准备七天携粮并在政治上完成远出之一切准备工作，注意不要暴露企图，待命出动。

军委

卯养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3] 门头沟，今为北京市的一个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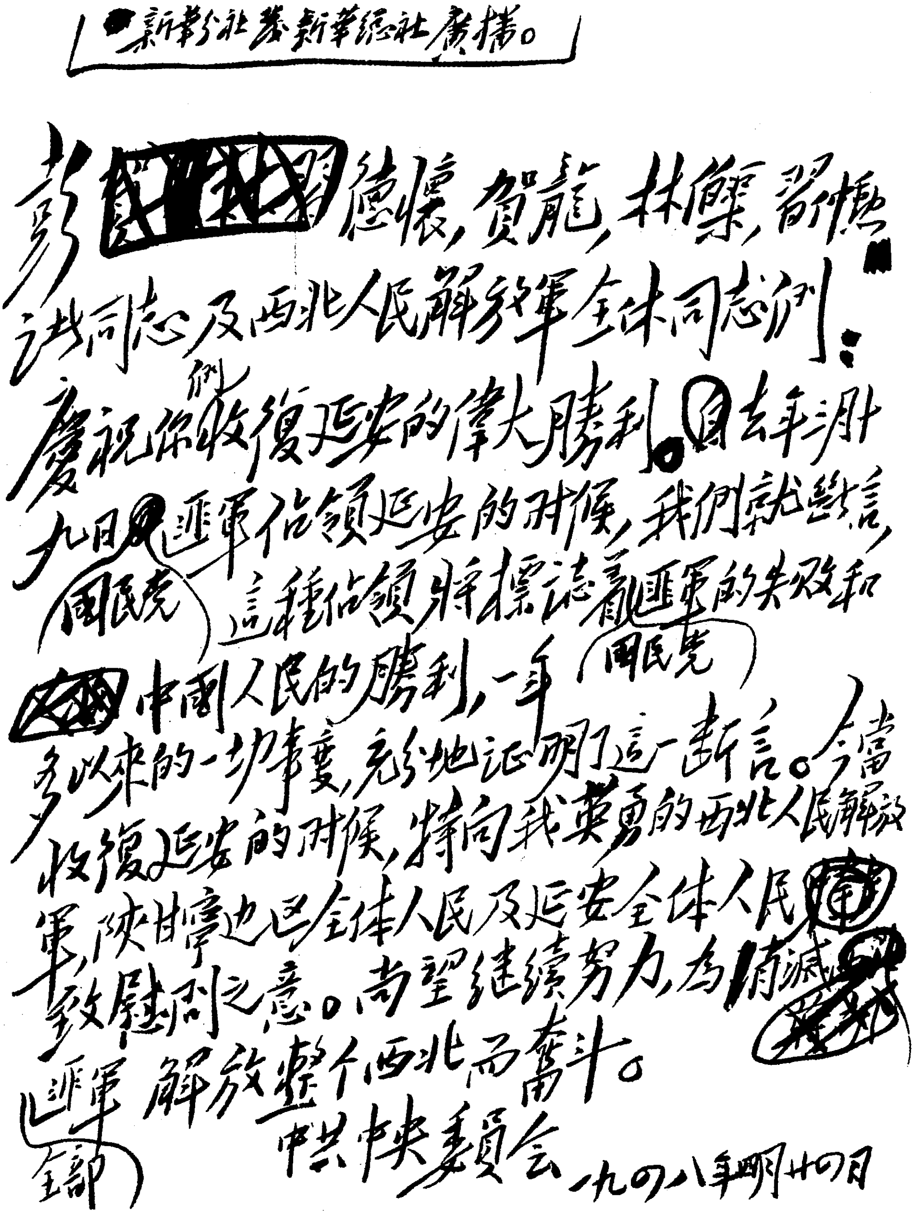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祝贺收复延安给彭德怀等的电报

（1948年4月24日）

彭德怀，贺龙，林伯渠，习仲勋诸同志及西北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收复延安的伟大胜利。去年三月十九日国民党匪军占领延安的时候，我们就断言，这种占领将标志着国民党匪军的失败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一年多以来的一切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断言。今当收复延安的时候，特向我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全体人民及延安全体人民致慰问之意。尚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匪军、解放整个西北而奋斗。

中共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四月廿四日



新華分社發新華總社廣播。

彭德懷、賀龍、林彪、習仲勛同志及西北人民解放軍全体同志們：

慶祝你們收復延安的偉大勝利。自去年三月十九日國民党匪軍佔領延安的時候，我們就斷言，這種佔領將標誌着國民党匪軍的失敗和中國人民的勝利，一年多以來的一切事變，充分地証明了這一斷言。當收復延安的時候，特向我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軍、陝甘寧邊区全体人民及延安全体人民致慰問之意。尚望繼續努力，為消滅匪軍全部解放整个西北而奮斗。

中共中央委員会

一九四八年四月廿四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起草的致彭德怀等电的手稿。

1948年4月22日，西北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

企业管理委员会应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1]

(1948年4月26日)

华东局，并告谭震林同志：

卯东震林同志关于淄、博、周、张城市政策电[2]甚好，请转发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1948年4月1日关于淄川、博山、张店、周村的情况及所取之政策报告的批语。1948年4月11日，毛泽东在审阅谭震林这个报告时，写过一段和本文内容一致的按语，说："这里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也要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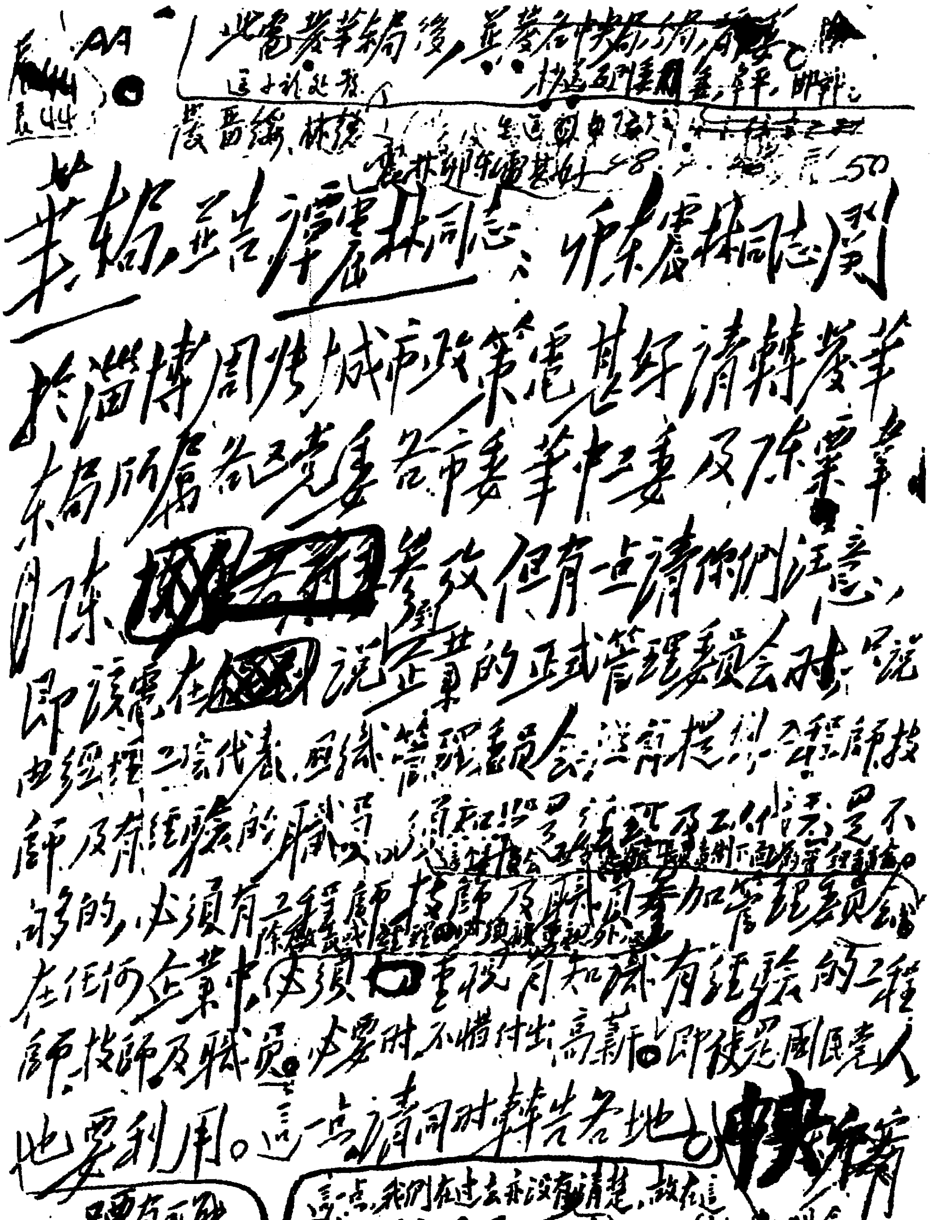
[2] 指谭震林1948年4月1日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并转中央等的报告。报告说，周村针对去年斗错了一些商人的情况，决定召集市民座谈会、大中商人会议听取意见，解决问题。设法解决被斗错了的商人的困难，退还没收错了的房屋、机器等，私人工厂发还给私人，股份制企业用代管办法经营，归还私人的股份。协助企业搞好生产，繁荣市面。张店情况较好。淄川、博山也采取与周村一样的方针。对公营大煤矿，决定工厂管理经营的方式是由工人职员及财办派去的干部共同组织管理委员会，以后再正式成立经理、工会代表合作的正式管理委员会。

东局所属各区党委、各市委、华中工委及陈粟、韦陈[1]参考。但有一点请你们注意，即该电在说到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时，只说由经理、工会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单是经理及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是厂长负责制下面的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除厂长或经理必须被重视外，还必须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这一点，请同时转告各地。这一点，我们在过去亦没有说清楚，故在这里补充说明。

中央
卯宥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韦，指韦国清（1913—1989），广西东兰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陈，指陈丕显（1916—1995），福建上杭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政治委员。



此电发华东局后，并发各中央局、分局，[illegible]

华东局并告谭震林同志、[illegible]震林同志：

关于淄博周村城市政策处置甚好，请转发华东局所属各工党委、各市委、华中工委及陈粟华[illegible]参考。但有一点请你们注意，即该处在[illegible]说企业的正式管理委员会时，只说由经理、工人代表组织管理委员会，没有提到工程师、技师及有经验的职员。须知只有工人代表是不够的，必须有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参加管理委员会。在任何企业中，必须[illegible]重视有知识有经验的工程师、技师及职员，必要时不惜付出高薪，即使是国民党人，只要有可能，也要利用。这一点请同时转告各地。这一点，我们在过去亦没有说清楚，故在这里补充说明。

中央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东局电的手稿。

给蓝公武[1]的信

（1948年4月27日）

公武先生：

三十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现闻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蒙拨冗枉驾，无任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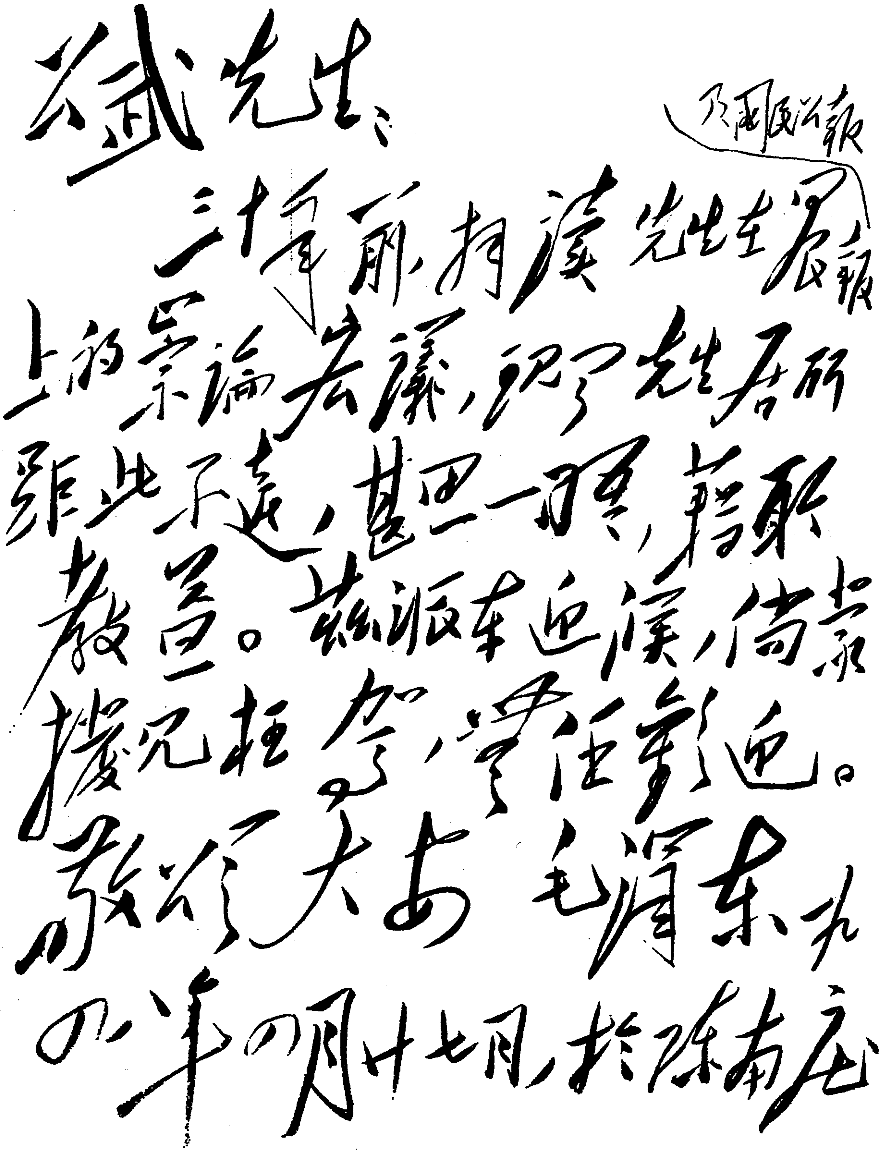
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四月廿七日，于陈南庄

---

[1] 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秋到达晋察冀解放区，先后任察哈尔省政府教育厅厅长、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1957年逝世，根据他临终前的申请，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公武先生：

三年前拜读先生在晨报及国民公报上的崇论宏议，知道先生居所距此不远，甚思一晤，借聆教益。兹派车迎候，倘荷拨冗枉驾，曷任欢迎。

敬颂大安 毛泽东 九四八年四月廿七日，於陈南庄

毛泽东致蓝公武信的手稿。

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1]

（1948年4月27日）

刘仁同志：

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

（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

（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

---

[1] 这是毛泽东给北平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刘仁的信。

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

毛泽东

卯感

给毛岸英的信[1]

（1948年4月29日）

岸英儿：

我们到了石家庄。岸青有信给你，是俄文，原文临行掉了，兹将译文附上。

祝你工作顺利

你的父亲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

[1] 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毛岸英听到消息后，心情异常激动，他多么想去看看父亲啊！正当他翘首西望时，毛泽东已离开陕北，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在万里征程中，毛泽东给儿子写了这封信。

批转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的批注[1]

（1948年4月29日）

一

企业中的管理委员会究竟以三人为有利还是以五人左右为有利，值得研究。如果只以厂长、支书及工会主任这样三个人组织委员会，如果这三个人又都是党员，而无工程师、技师或职员的代表参加及有能力的党外人士参加，似乎是不妥的。

二

这类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

[1] 本篇一是对“在公私企业中，成立以厂长为首的三人委员会，以利生产”一句的批注；本篇二是对“有些人认为工商业均带封建性。不斗工商业，不能肃清封建，满足群众要求”一句的批注。

给李济深、沈钧儒[1]的信

（1948年5月1日）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2]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

---

[1] 李济深，字任潮，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沈钧儒（1875—1963），号衡山，浙江嘉兴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

[2]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毛泽东在审阅这些口号时，加写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1]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

[1]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

粟裕兵团暂不渡江，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1]

（1948年5月5日）

刘、邓[2]，并华东局：

---

[1] 粟裕兵团，指粟裕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关于粟裕兵团的作战地点和任务，中央军委曾于1948年1月决定由粟裕率领兵团的3个纵队南渡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任务，先在湘赣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然后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挺进闽浙赣地区，如此吸引20至30个旅的国民党军回防江南，迫敌处于更加被动地位。毛泽东在1948年1月27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的电报中，提出3个渡江方案：一是休整半个月后，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二是在2、3、4月进入伏牛山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休整一个月，然后渡江；三是2、3、4月在伏牛山、长江之间作战，5月北返，休整两三个月后在秋季渡江。2月1日，毛泽东又就渡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同意粟裕率3个纵队赴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取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4月18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渡江，认为3个纵队渡江后不一定会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回防，反而分散了自身兵力，加上其他不利条件，不如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为好。4月30日，经中央开会讨论，粟裕的建议被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所采纳。此后，中原战场我军取得重大胜利，为即将到来的淮海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内，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1]及一波、先念[2]所商定者。粟裕兵团，待陈粟由中央回去，结束政策学习及军事训练，约于本月底渡河作战。陈唐[3]所率三、八两纵应回至豫皖苏区，调换一纵西去，以便该兵团有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集结打大仗。十纵已去豫陕鄂边，可不回来。但六七两月作战，陈唐回来已来不及，应由一纵参加此两月作战，待雨季休整时再由陈唐与一纵调换。本月内请刘邓命一纵、十一纵在汴徐以南适当地点休整，待粟裕命令，月底协同作战。当粟裕打五军等部时，许谭兵团[4]应向津浦线行动，相机歼灭并钳制十二师、七十五师、八十四师、七十三师等部。其动作时间，应在本月下旬，请华

---

[1] 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正在河北阜平城南庄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4] 许谭兵团，指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

东局令知许谭准备。同时，令知韦陈兵团[1]，在苏北发起歼敌战役，配合动作。粟裕兵团的供应，由华北、山东两方统筹。

军委
辰微

---

[1] 韦陈兵团，指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

许谭兵团休整后向津浦线行动[1]

（1948年5月7日）

许、谭，并华东局：

辰微电悉。王[2]匪西撤必集结谨慎，暂难歼灭。我七、九、十三等纵应集结休整至本月十八日或二十日为止，准备于十九日或二十一日以后开始向津浦线[3]行动。那时如新泰敌一个旅未退，则以围新泰打援军为第一目标，如该敌已退，则直向济南、徐州间选择某地攻击并打援，以协助粟裕兵团[4]之作战。粟兵团渡江目前尚有困难，决定在运河以西、淮河以北地区歼灭几批敌人再行南进。你们有协助他们作战并供给弹药及新兵之任务。

军委

七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谭震林并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王，指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3] 津浦线，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4] 粟裕兵团，指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

中央关于和各民主党派交换召开新政协给港局等的指示[1]

（1948年5月7日）

港局、沪分局及汉年：

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或交换意见的态度（不是用正式决定和邀请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中央
辰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港局、沪分局以及潘汉年的电报。

晋绥分局应将工业生产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

（1948年5月11日）

晋绥分局，并告华北局，西北局：

五日电悉。

（一）你们万余人进驻运城地区，必须向所有人员讲明对待当地人民及党政军的正确态度。

（二）中央已决定将北起赵城、南至蒲州沿同蒲线及其以西地区划归你们管辖，你们应准备有关接收及管理事宜，不要因接收引起人员的不满及物资的损失。具体的移交、接收及划界，望华北局拟出办法通知晋绥分局及当地党政军机关，务使划分以后不至引起不满及损失。

（三）至少在一个时期内，分局应将自己的注意力主要地放在接收各县的工作上。

（四）分局应将工业生产问题放在领导工作的重要位置。有了工业生产的条件，党如果不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党的领导人员如果缺乏工业方面的知识，如果不用力去学会这一方面的知识，那就会要犯错误。在收复延安后，西北局亦须注意恢复及发展工业。

中央

十一日

关于对付傅作义的指示电[1]

（1948年5月11日）

林、罗、刘，并告程：

（一）杨得志、罗瑞卿率三四两纵及二纵一个旅共七个旅，决于十四日或十五日出发，十七日或十八日过平绥路，尔后即以歼击十三军为目标，向密云、古北口之线及承德方向进击。

（二）傅作义四个军主力，由张家口、怀来线向蔚县方向进攻，图解应县之围。我以一纵攻应县（不一定能攻克），以二纵两个旅在蔚县抵抗，吸引傅军向应县方向，以利我主力过路。

（三）我六纵已将向石家庄方向进扰之阎军歼灭其一个师的主力，估计该敌已不敢再进，即可将六纵转用于平保线，协同一七两纵（一、六、七纵均系成立不久之新部队），由杨成武指挥从内线对付傅作义，保卫石家庄，配合杨罗[2]作战。二纵之两个旅尔后看情况或开热河或留内线。

（四）因傅军主力已向蔚县前进，詹大南[3]所部除派少数在平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3] 詹大南，当时任晋察冀军区冀热察纵队第九旅旅长。

为杨罗带路外，即可使用于热河作战。

（五）以上部署业已确定。但你们仍然不要依靠杨罗，而应依靠你们自己。

军委

十一日十六时

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

（1948年5月11日）

请即令陈、唐率三、八两纵迅速东进，直达汴徐线附近，接受粟裕指挥，协力歼击五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解放北平的一份指示电文

（1948年5月17日）

林、罗、刘，并告程、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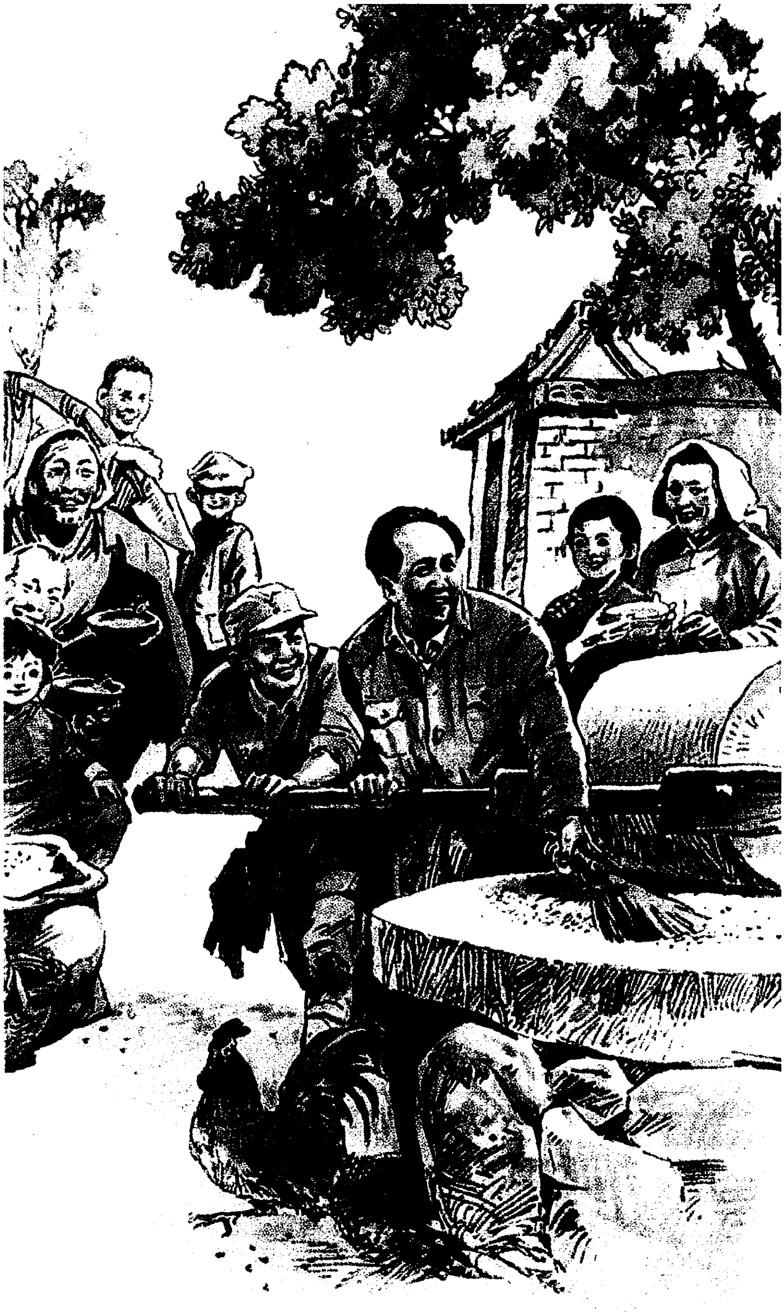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五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甸、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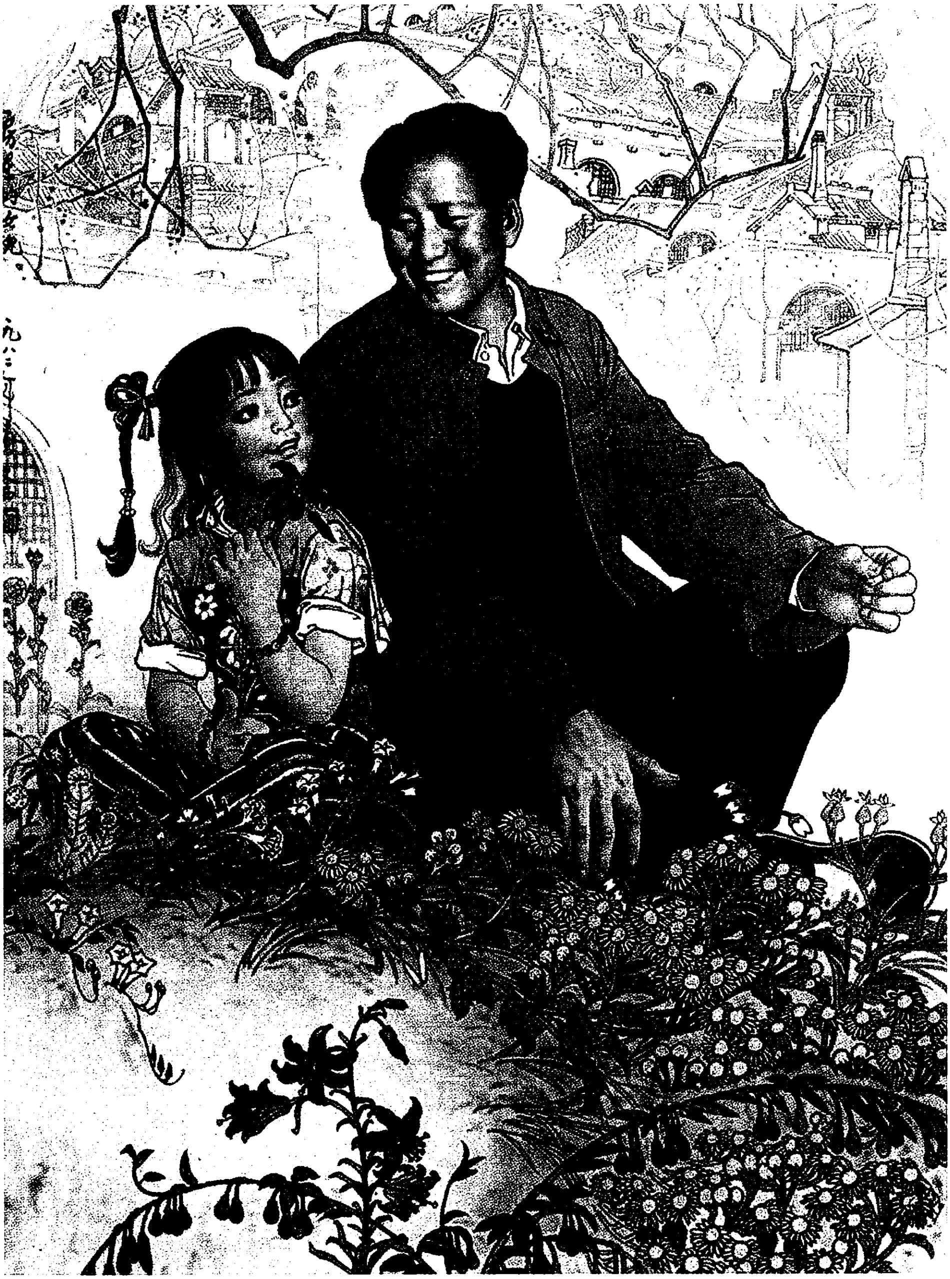
（三）十一纵既在石景山作战并尚须协同五纵在丰台一带作战，似暂时难于去南口、沙河一带接替四纵任务。因此，四纵可留一个师在南口、沙河一带，纵队部率主力去张家口即很够用。该纵出发时间请林罗刘规定，大约一星期内外到达张家口即可。

军委

十七日十八时



1948年5月18日凌晨，毛泽东的住地城南庄遭敌机轰炸，毛泽东等秘密转移到了花山村。图为毛泽东在花山。（课本插画）



《房东的女儿》（中国画）

军委关于华东野战军夏季作战目标的指示

（1948年5月21日）

陈、粟，并告华东局，许、谭，刘、邓[1]：

巧申、哿巳两电悉。

（一）我一、四、六纵可于廿五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五军之条件，而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

（二）你们集中兵力之最大数目为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共十六万人之众，这个数目足够担负各个歼灭五军及该区其他敌军，对于供应问题较易解决，又不致影响山东兵团及刘邓兵团之兵力配备，如果有抽调刘邓一纵及许谭某纵以聚歼五军之充分必要时，望报告我们批准然后执行。

（三）刘邓担负钳制十八军使不能东援。

---

[1] 陈、粟，许、谭，刘、邓，指陈毅、粟裕，许世友、谭震林，刘伯承、邓小平。当时陈毅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伯承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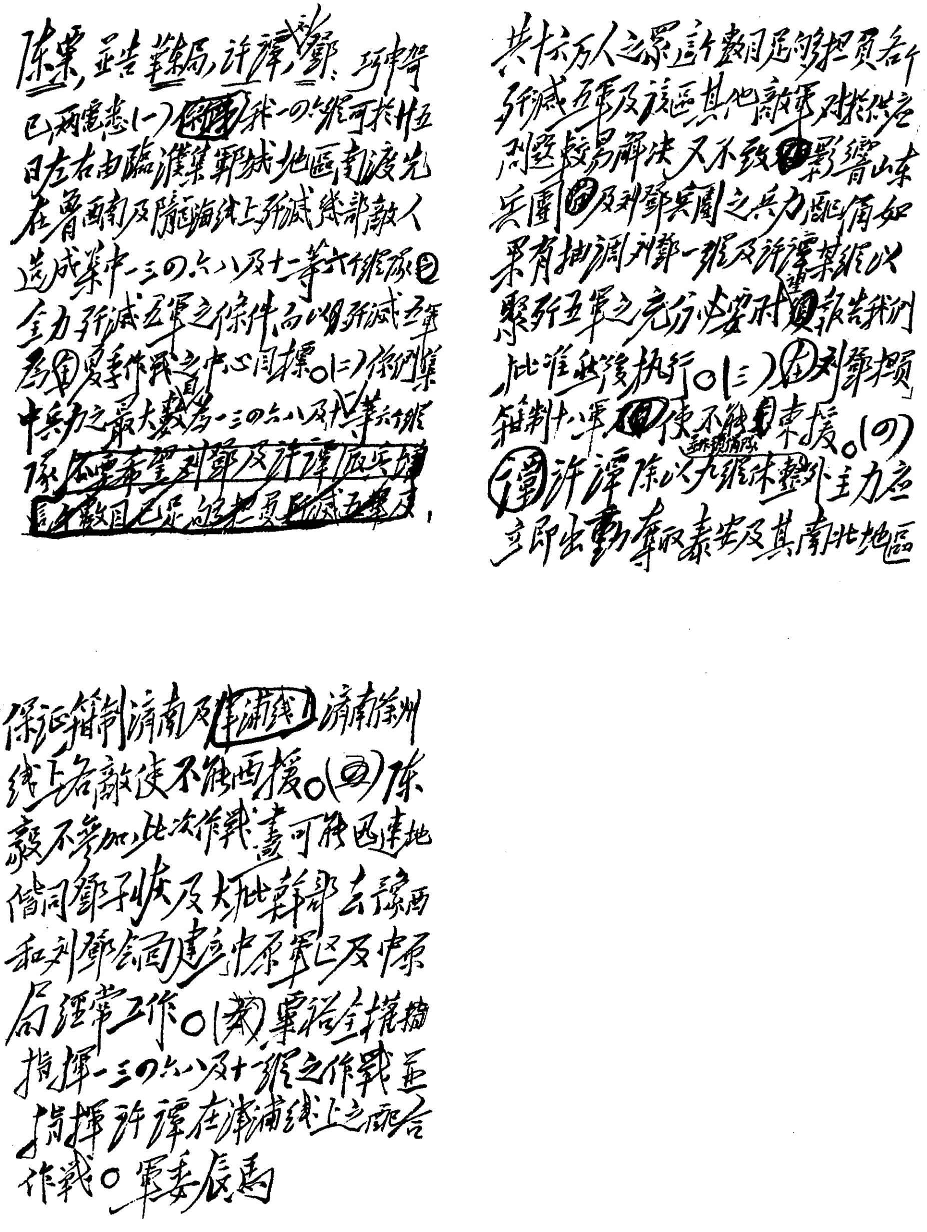
（四）许谭除以九纵休整并作预备队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

（五）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面，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

（六）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

军委

辰马



陈粟，并告华东局，许谭，刘邓：卯申寄巳两电悉。（一）粟率一、四、六纵可于五日左右由临濮集郓城地区南渡，先在鲁西南及陇海线上歼灭几部敌人，造成集中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全力歼灭五军之条件，而以歼灭五军为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二）你们集中兵力之最大数为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等六个纵队，~~不要希望刘邓及许谭派兵增援，这个数目已足够担负歼灭五军及~~共十六万人之众，这个数目足够担负歼灭五军及该区其他敌军，对于供应问题较易解决，又不致影响山东兵团及刘邓兵团之兵力配备。如果有抽调刘邓一纵及许谭某纵以助歼五军之充分必要时，须报告我们批准然后执行。（三）刘邓须钳制十八军使不能东援。（四）许谭除以九纵休整外，主力应立即出动夺取泰安及其南北地区，保证钳制济南及津浦线济南徐州线上各敌使不能西援。（五）陈毅不参加此次作战，尽可能迅速地偕同邓子恢及大批干部去豫西和刘邓会同建立中原军区及中原局经常工作。（六）粟裕全权指挥一、三、四、六、八及十一纵之作战，并指挥许谭在津浦线上之配合作战。军委辰马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陈毅、粟裕等电的手稿。

对知识分子应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

（1948年5月21日）

恩来、乔木[1]：

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2]，今上午已交通讯员送还你们。现在觉得关于知识分子部分，说得不完全，是不妥的。原件说地主出身者是地主，富农出身者是富农，中农出身者是中农，这是说社会出身，这是对的。但必须补充说，根据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例如参加军队者是军人，参加政府工作者是政府职员，参加生产企业者是工人、职员、技师或工程师，参加文化工作者是教员、记者、文艺家等，并将着重点不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放在社会职业方面，方可避免唯成分论的偏向。以上请斟酌修改后发出。

毛泽东

二十一日十五时半

---

[1] 乔木，即胡乔木（1912—1992），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3年10月为纠正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正确解决土地问题而颁发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这两个文件提出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并对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规定。中共中央将这两个文件作若干修改后，于1948年5月25日重新发给各级党委遵照实施。毛泽东在本文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身和社会职业应有区别的意见，用“说明”的形式加在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知识分子部分中。

陈锡联部主要任务是钳制十八军[1]

（1948年5月22日）

刘、邓，并告陈、粟：

号巳电[2]悉。陈锡联[3]指挥之一、三、六纵，目前时期主要任务是钳制十八军，使其不能东援五军。因此，请你们准确估计，如果陈兵团出息县、正阳、罗山威胁信阳，相机攻占光潢[4]等地，能调动十八军向该方面，则是有利的；如果只能调动二十八师回援，不能调动十八军回援，或反而使十八军因为减轻了陈兵团对他的威胁，于五军受攻紧急时敢于东进增援五军，则我陈兵团以在现地一带继续休整，确实监视十八军为适宜，否则就是不利的。总之，夏季作战的重心是各方协助粟兵团歼灭五军，只要五军被歼灭，便取得了集中最大力量歼灭十八军的条件，只要该两军被歼灭，中原战局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并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8年5月20日巳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分散敌人各个歼击，决以一、三、六纵成立一个集团，由陈锡联指挥，准备于二十八师（位于驻马店、确山地区）北进时，击息县、正阳、罗山，威胁信阳，相机攻占潢川、光山等地。预料此招出敌不意，可获好效果，对配合粟裕部行动亦最有力。

[3] 陈锡联，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4] 光潢，指河南光山和潢川。

可顺利发展。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军委

二十二日十二时

致邓小平电

（1948年5月24日）

小平同志：

辰佳电悉。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因为过早地分浮财，只是少数勇敢分子欢迎，基本群众并未分得，因而会表示不满。而且，社会财富迅速分散，于军队亦不利。过早地分土地，使军需负担过早地全部落在农民身上，不是落在地主富农身上。不如不分浮财，不分土地，在社会改革上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实益；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合理负担，使地主富农多出钱。这样，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在一两年甚至三年以后，在大块根据地上，国民党反动派已被消灭，环境已经安定，群众已经觉悟和组织起来，战争已经向遥远地方推进，那时就可进入像华北那样的分浮财、分土地的土地改革阶段。这一个减租减息阶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就是在华北、东

北、西北各大解放区的接敌地区，亦须实行上述同样的策略。此外，开仓济贫口号，亦于军队不利，只可在准备撤退的大城市及其附近临时实行，不应普遍实行。上述策略意见，请你提到你们的前委会上，加以讨论。如果你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给中原局所属各区党委及地委加以讨论，请他们提出意见，然后由你汇集这些意见电告我们，以便制定统一的方针。

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

此电请中央发给邓小平之后，同时发给陈粟、彭张赵、华东局及许谭、东北局及林彪、热河及杨罗、西北局、晋绥分局，并抄华北局。

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

（1948年5月25日）

一

必须注意季节。必须利用今年整个秋季和冬季，即自今年九月至明年三月，共七个月时间，在各中央局和分局所划定的地区内，依次完成下列各项工作：（甲）乡村情况调查。（乙）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初步整党。上级派到乡村的工作团或工作组，必须首先团结当地党的支部组织内的一切积极分子和较好分子，共同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丙）组织或改组或充实贫农团和农会，发动土地改革斗争。（丁）按照正确标准，划分阶级成分。（戊）按照正确政策，实行分配封建土地和封建财产。实行分配的最后结果，必须使一切主要阶层都感觉公道和合乎情理，地主阶级分子亦感觉生活有出路，有保障。（己）建立乡（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三级政府委员会。（庚）发给土地证，确定地权。（辛）调整或改订农业税（公粮）负担的标准。这种标准，必须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这即是一方面利于支援战争，一方面使农民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兴趣，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壬）按照正确政策，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癸）将工作方向由土地改革方面，转移到团结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村中一切劳动人民并组织地主富农的劳动力为共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的方面去。开始组织在自愿和等价交换两项原则上的小规模的变工组织和其他合作团体；准备好种子、肥料和燃料；做好生产计划；发放必要的和可能的农业贷款（以贷给生产资料为主，必须有借有还，严格区别于救济性质的赈款）；在可能的地点，做好兴修水利的计划。以上是由土地改革到生产的全部工作过程，必须使一切直接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了解这样的工作过程，避免工作的片面性，并不失时机地于秋冬两季全部完成上述工作。

二

为达上述目的，今年六月至八月的三个月内，必须完成下列工作：（甲）划定土地改革工作范围。这种范围，必须是在下列三项条件下划定之：第一，当地一切敌人武装力量已经全部消灭，环境已经安定，而非动荡不定的游击区域。第二，当地基本群众（雇农、贫农、中农）的绝对大多数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数人有此要求。第三，党的工作干部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确能掌握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听任群众的自发活动。如果某一地区，在上述三个条件中，有任何一个条件不具备，即不应当将该地区列入一九四八年进行土地改革的范围。例如，在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解放区的接敌区域和中原局所属江淮河汉区域的绝大部分地区，因为尚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即不应当列入今年的土地改革计划内。明年是否列入，还要看情况才能决定。在这类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

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乙）开好干部会议。在为着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召集的干部会议中，必须充分讲明关于这两项工作的全部正确政策，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必须将中央颁布的各项重要文件，责成一切从事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干部，认真学习，完全了解，并责成他们全部遵守，不许擅自修改。如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部分，可以和应当提出修改的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实行修改。今年的各级干部会议，必须由各地高级领导机关，在开会之前，作充分而恰当的准备，这即是事前由少数人商量（由一个人负主责），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写好成文的纲要，精心斟酌这个纲要的内容和文字（注意简明扼要，反对不着边际的长篇大论），然后向干部会议作报告，开展讨论，吸收讨论中的意见，加以补充和修改，作为定论；并将此项文件通知全党和尽可能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必须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这即是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致使会议时间延长，得不到明确而周密的结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和地委的领导工作中，如果存在着这种有害的经验主义方法，必须注意克服。讨论政策的会议，人数不可太多，只要事先有良好准备，会议的时间亦可缩短。按情况，大约以十几个人，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开会一星期左右为适宜。传达政策的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不可过长。只有整党性质的高级和中级的干

部会议，人数可以多些，时间亦可以长些。（丙）九月上半月，至迟九月下半月，全部直接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必须到达乡村，并开始工作，否则就不能利用秋冬两季的全部时间，完成全部土地改革、整党建政和准备春耕的工作。

三

在干部会议中和在工作中，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区别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必须区别老区、半老区、接敌区和新区的不同，否则就要犯错误。

四

凡属封建制度已经根本消灭，贫雇农已经得到大体上相当于平均数的土地，他们同中农所有的土地虽有差别（这种差别是许可的），但是相差不多者，即应认为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不要再提土地改革问题。在这类地区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工作和支援前线的工作。在这类地区的部分乡村中，如果尚有土地须待分配或调剂，阶级成分须待改订，土地证须待发给者，自然应当按照实际情形完成这些工作。

五

在一切解放区，不论是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或者尚未完

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都必须在今年秋季指导农民耕种麦地，并进行一部分土地的秋耕。在冬季，要号召农民积肥。所有这些，都对一九四九年解放区农业的生产和收成有极大重要性，必须用行政力量，配合群众工作，加以实现。

六

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执行他们自以为是的违背统一意志和统一纪律的极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各级党委必须对这一点进行反复讨论，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1]。

七

中央、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直到支部，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小型会议（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谈话等项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例如三至五个人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

---

[1] 这里所说的中央代表机关，是指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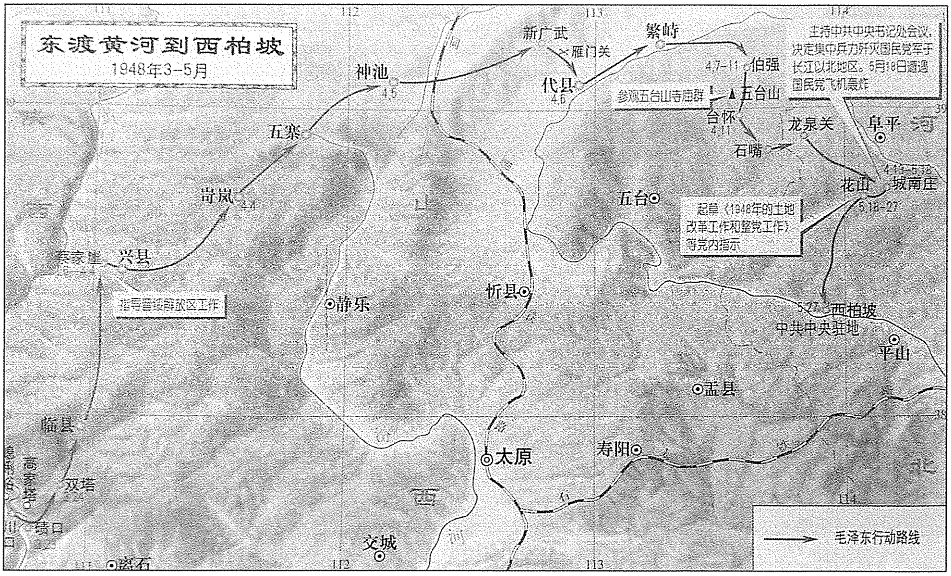
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不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这种报告和指示，往往过时，失去作用，或者减少了作用。犯错误的已经犯过，来不及纠正，损失太大。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

八

必须将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将工业生产任务和农业生产任务，放在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省委、地委和市委的领导工作的适当位置。即是说，不要因为领导土地改革工作和农业生产工作，而忽视或放松对于城市工作和工业生产工作的领导。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大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工矿交通企业，如果各有关领导机关忽视或放松这一方面的工作，我们就要犯错误。

1948年，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大院写下了《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著作。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旧居阎家宅。


东渡黄河到西柏坡
1948年3—5月
神池
4.5
新广武
雁门关
繁峙
代县
4.6
4.7—11
伯强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于长江以北地区。5月18日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
参观五台山寺庙群
五台山
台怀
4.11
五寨
龙泉关
阜平
河
石嘴
4.13—5.18
花山
城南庄
5.18—27
岢岚
4.4
五台
起草《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等党内指示
西
山
蔡家崖
兴县
指导晋绥解放区工作
静乐
忻县
5.27
西柏坡
中共中央驻地
平山
盂县
临县
高家塔
双塔
3.24
碛口
太原
寿阳
西
文城
离石
毛泽东行动路线
112
113
114
39
38

毛泽东东渡黄河到西柏坡路线图。

1948 年 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驻西柏坡。毛泽东在这里和朱德、周恩来指挥了闻名中外的三大战役。图为西柏坡全景。

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1]

（1948年5月25日）

中央决定将一九三三年《怎样分析阶级》及《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略加修改，经新华社广播。各地收到后，立即在报纸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加入任弼时同志报告为附件）发给各级党委及工作团，当作正式文件，遵照实施。《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尚须继续收集意见加以考虑修改，暂时不准备发表，可作为高级领导机关的参考文件，不要普遍印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对外订立有借有还商业性协定问题

（1948年5月28日）

林、罗、刘[1]，并东北局：

辰寝电悉。

（一）嗣后凡有借有还之协定，只要有可能，你们尽可订立。但须将要求详情事前报告中央审查批准，事后将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报告中央审核。

（二）事前不经批准事后又不报告经营结果及偿还情形，则是不许可的。

（三）除武器总清单由林罗刘速报中央外，过去一切商业性协定之详细内容及经营和偿还情形，望东北局补报中央。你们过去为什么对于这样重要的外交行动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态度，亦须对中央说明理由。

（四）凡在有借有还之商业性协定以外之要求，则必须遵守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之原则，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提出要求。

毛泽东

辰俭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许谭兵团是否进入鲁西南依情况而定[1]

（1948年5月28日）

陈、粟，并刘、邓，许、谭[2]：

感九时电[3]悉。（一）陈锡联兵团[4]担负钳制十八军务使不能东援之任务，望刘邓按情部署实行之。（二）许谭兵团是否应以一个纵队进入鲁西南协助歼击五军，以八十四师、十二师等是否向鲁西南增援五军而定。如果许谭兵团在津浦路济兖段[5]之行动能够钳制八十四师、十二师，使其不能向西增援，则该兵团抽调一个纵队向西参加打五军时，有可能吸引八十四师或十二师随同向西（即我集中敌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5月27日9时陈毅、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歼敌第五军作战计划，许谭部及陈唐部应以敌五军之行动而决定自己之行动，务须不失战机，捕捉五军于增援鲁西南中，配合一兵团歼灭之。许谭兵团应以一个纵队为预备队，待命进入鲁西南参战。

[4] 陈锡联兵团，指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六纵队组成并统归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指挥的临时作战集团。

[5] 津浦路济兖段，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济南至兖州段，即今京沪线一段。

集中），反不如在远距离钳制该两师为有利。如果许谭在济兖段之行动未能达到钳制八十四师及十二师之目的，以致该两师中有一个师向西增援，则许谭自然应当以主力钳制济兖段敌之主力，而抽调一个纵队向西。或者许谭主力已能钳制八十四师、十二师使不敢动，而有一个纵队之余力使用于西面，则亦可抽出一个纵队向西。此事由粟裕按照上述情况，临时命令许谭办理。

军委

俭午

许谭兵团应逐一攻占汶上济宁兖州等七城市[1]

（1948年5月29日）

粟，并告许、谭，刘、邓，陈、邓[2]，华东局：

俭午电[3]悉。（一）许谭以执行你们俭电第一方案为好，即第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邓，指陈毅、邓子恢，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

[3] 指1948年5月28日午时陈毅、粟裕给许世友、谭震林、陈士榘、唐亮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四、六纵南渡黄河后，为调动敌第五军回援，作如下部署：1. 许谭应乘敌收缩未及，歼灭泰安守敌，在敌收缩时，则以一部控制泰安、泗水、大汶口、曲阜地区，主力相机攻占汶上、济宁或兖州。我则于控制曹县、定陶、成武后，以一部围攻金乡，主力待机歼灭援敌。2. 许谭于控制泰安、曲阜、泗水、大汶口等处后，主力直下邹县、滕县，攻占临城、韩庄，迫近徐州。我则于控制成武、定陶、曹县地区后直迫徐州，攻占丰县、鱼台，以两路直逼徐州之态，调动五军来援歼灭之。3. 在敌五军主力屯集商丘以西时，我们决以四晚行程，进占成武。4. 陈唐不论遂行何种方案，应以监视五军为主。在该敌来援时，则尾随其后，配合此间部队夹击，歼敌于运动中。

步占领泰安、泗水、大汶口[1]、曲阜；第二步相机攻占汶上济宁兖州三点中之一点，并求得调动他点之敌增援而歼灭之，逐次攻占汶济兖三点；第三步相机攻占邹、滕、临、韩[2]。执行这一方针，对于许谭兵团的供应，对于割断津浦[3]孤立济徐[4]，对于打通鲁中与鲁西南交通，对于有力配合粟部作战，均是有利的。如果汶济兖三点之敌难攻，而邹、滕、临、韩较为易攻时，亦可先攻邹、滕、临、韩，后攻汶、济、兖，或于汶、济、兖、邹、滕、临、韩七点中选择其较易者先攻，较难者后攻。总之，许谭任务是逐一攻占七点，准备以四五个月完成此项任务。（二）俭电中关于粟陈唐[5]六个纵队以歼灭五军为中心之部署是很好的。（三）粟陈唐兵团之作战与许谭兵团之作战必须各作独立作战之计划，即两兵团只作战略上之配合，不要企图作战役上之配合，以免互相牵累依赖，失去独立部署之战机。此点甚为重要，望你们预先计及。

军委
辰艳

---

[1] 大汶口，镇名，位于山东泰安市南部。

[2] 邹、滕，指山东邹县和滕县。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微山县东南。

[3] 津浦，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

[4] 济徐，指山东济南和江苏徐州。

[5] 粟，指粟裕。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东北应充分准备大军所需粮食[1]

（1948年5月31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一）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2]线及平、张、绥、包[3]线作战，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至少有由通辽至赤峰，由赤峰至察[4]北绥[5]东，由赤峰至平张线，由赤峰至冀东之几条较好的汽车路。修复通辽至义县，义县至承德的铁路线则更加重要。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必须估计到敌人集中到几个大据点，我军须旷日持久和他斗争，待其粮尽援绝，发生变化，方能最后夺取这些据点这样一种持久战的情况。在此种情况下，我军必须保持粮食的充分接济，方能取得胜利。而热河[6]、冀东尤其是察北、绥东出产之粮食，不足供给大军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并告东北局的电报。

[2] 锦、榆、津、平，指辽宁锦州、榆关（山海关）、天津和北平。

[3] 平、张、绥、包，指北平、张家口、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

[4]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5]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6]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期需要，必须准备由东北加以充分之接济。四月间，我杨罗杨军[1]两个纵队出至绥东，因当地无粮，不能久留，丧失良好之歼敌机会，你们必须引为教训。（二）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半关于行动方案电[2]已收到，正在研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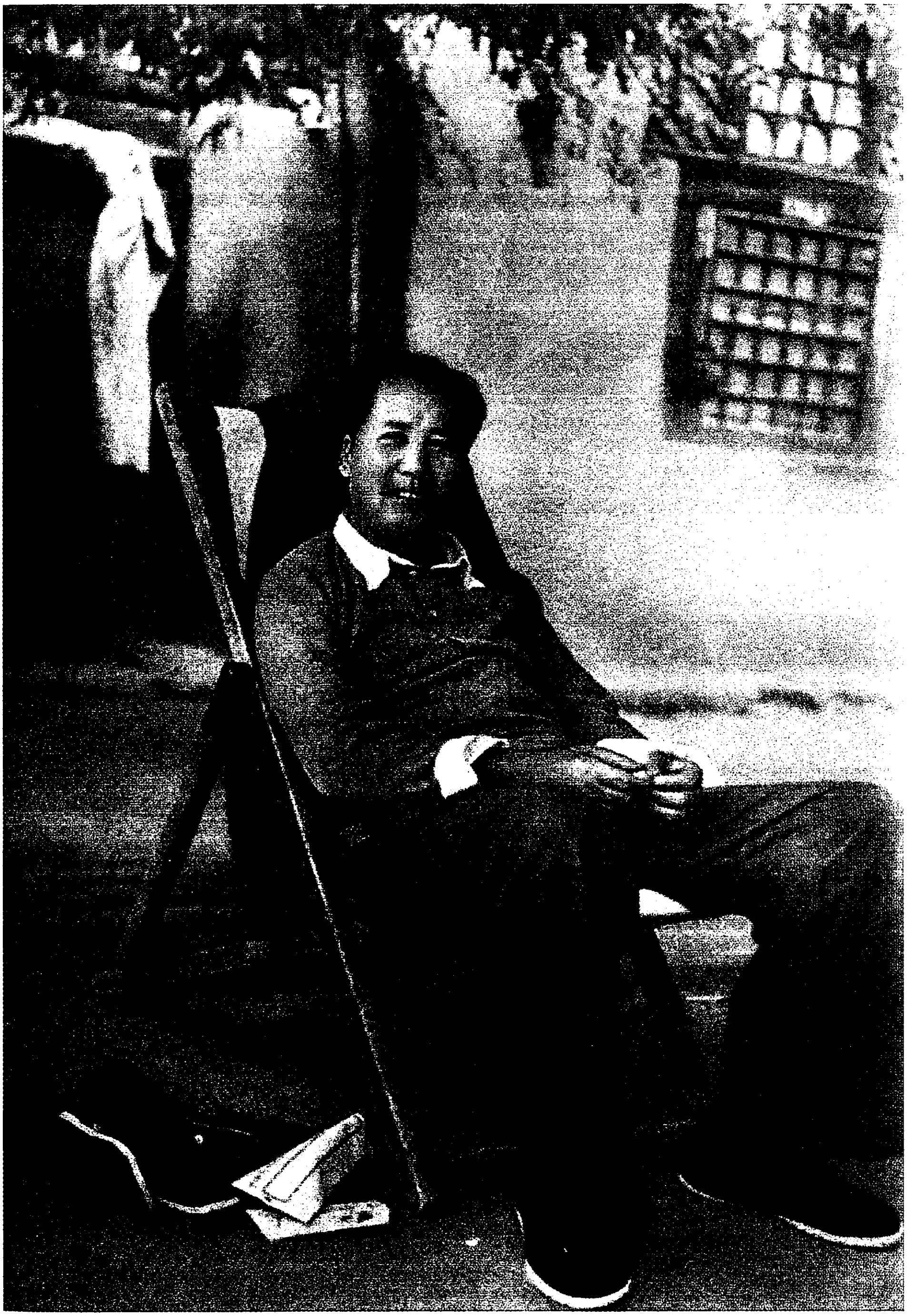
军委

三十一日十二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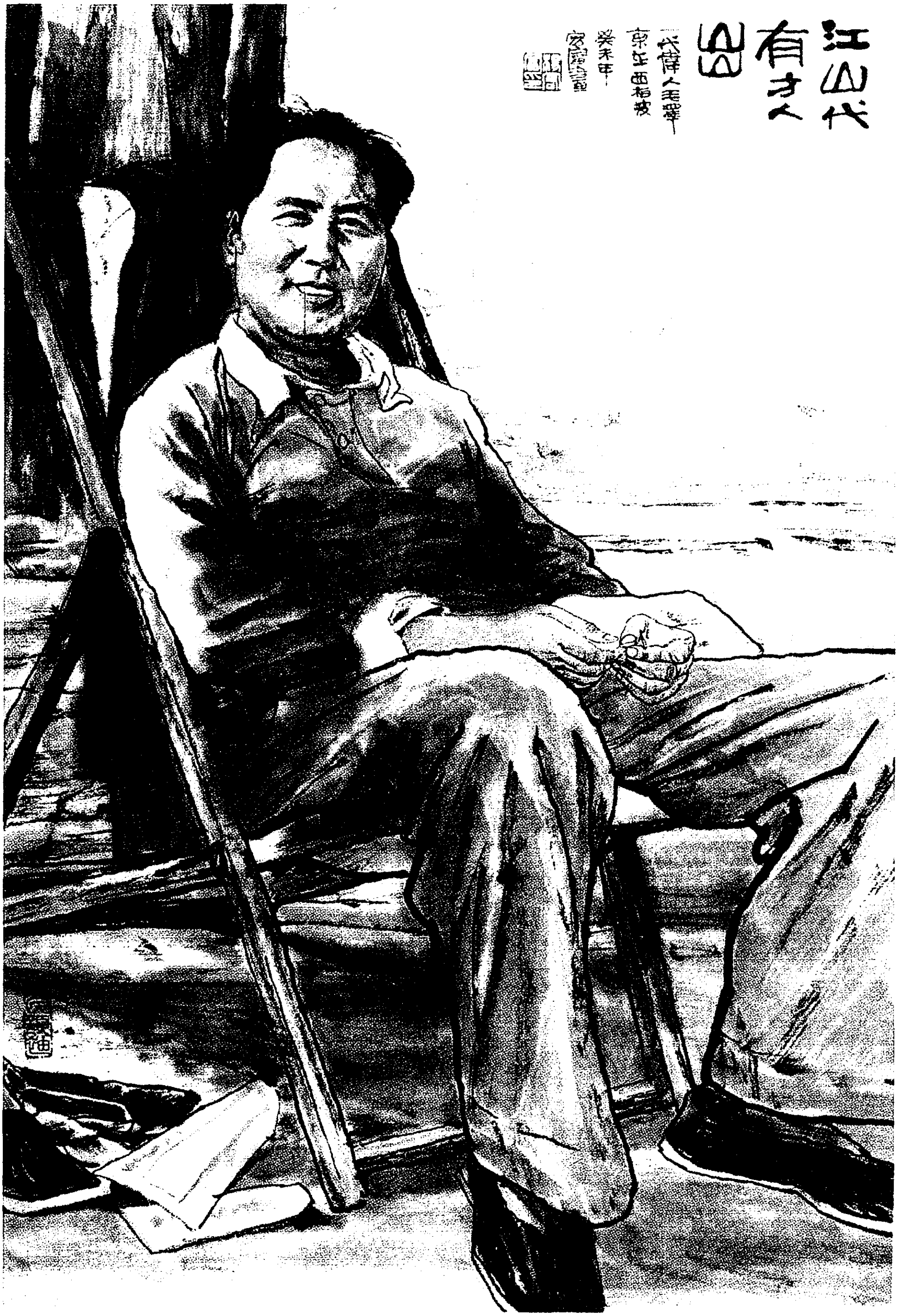
---

[1] 杨罗杨军，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

[2] 指1948年5月29日23时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采取对长春以一部分兵力久困长围，准备乘其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将东北野战军主力转到热河南部承德、古北口之线作战的方针。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


江山代有才人出
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西柏坡
癸未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中国画）

中央关于三三制政权问题的指示[1]

（1948年5月31日）

华北局、东北局、华东局、西北局、中原局、晋绥分局、冀察热辽分局并告各前委：

中央去年二月一日指示三三制仍应执行，废除三三制的意见是错误的，但自去年“二·一”至今的一年多时间内，很多解放区不得中央同意，擅自修改这一指示，从政治上及组织上打击三三制党外人士，其中除少数是罪有应得者外，大多数的打击是过“左”的错误行动。而各地对于此项重大问题，事前既不向中央请示，至今亦很少甚至没有向中央反映情况。兹特责成各局于电到后半月至一月内，将当地地委一级、区党委一级、中央局或分局一级共三级的党外知名人士列一总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我党对他的待遇意见，电告中央。和此项名单调查报告之同时，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工作委员会（如华中工委）负责将自己对统一战线三三制及党外人士问题对中央作一总结报告，是为至要。

中央

辰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北局等的电报。

是否可能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1]

（1948年6月1日）

林、罗、刘：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长春使用几个纵队，是否已展开全力攻击。（二）八天作战我军伤亡多少。（三）长春外围工事是否均已夺取。（四）是否已和六十军接触，该军战力如何。（五）部队打堡垒战术是否已由集团冲击的老办法，改变为小组攻击的新办法。（六）八天作战中是否已采用坑道爆炸方法。（七）是否已实行军事民主，即遇到困难时，由连队指战员在火线上开会，反复研究攻克敌阵的方法（大家想办法）。（八）现在是否已停止攻击，或者还在继续攻击。（九）你们指挥所在何处，是否已召集纵师干部开会，详细检讨经验。最前线是否有你们的代表执行阵地指挥职务。（十）沈阳方面反应如何，有无准备增援意图。（十一）徐向前[2]同志指挥之临汾作战[3]，我以九个旅（其中只有两个旅有攻城经验）攻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临汾战役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3] 临汾作战，指晋冀鲁豫军区部队1948年3月7日至5月17日攻击山西临汾城的战役。这是我军以坑道爆破为主要手段进行的攻城战，共歼敌2.5万余人，俘敌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拔除了晋南地区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连成一片。

两个正规旅及其他杂部共约两万人，费去七十二天时间，付出一万五千人的伤亡，终于攻克。我军九个旅（约七万人）都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临汾阵地是很坚固的，敌人非常顽强。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军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如果我军不惜伤亡，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你们估计是否有此可能，局势将会怎样。

军委

一日七时

多方调动敌人，创造歼敌机会

（1948年6月3日）

粟、张[1]，并告刘、邓，陈、邓[2]：

冬午电[3]悉。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最近时间内，陈唐[4]需要协助刘邓作战。只要刘邓能打一二个好仗，局势就会开始起变化。因此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

---

[1] 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张，指张震，1914年生，湖南平江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邓，指陈毅、邓子恢，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粟裕、张震1948年6月2日午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原拟攻占城武，歼灭来援之敌，否则围攻曹县，吸引敌五军主力于曹县、民权、商丘间歼灭之。现敌五军已先我到达，如实行此方案，仓促应战，且部队连续行军，较为疲劳，我主力不能集结，兵力不足，为争取主动，伺机歼敌，故建议部队暂以战备状态，进到定陶、城武及金乡外围集结，休息3天，再决定第二步行动。

[4]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力也不要去打。等候刘邓对张轸[1]作战完全结束，陈唐到达陇海汴徐线附近，并休息若干天恢复疲劳之后，再采取调动敌人之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在打五军、七十五师等部时，不要企图一次打得太多，而要准备一次只打一两个旅，各个歼灭该敌，因为该敌是比较强的。要说服干部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坚忍沉着，随时保持主动。

军委

江寅

---

[1] 张轸（1894—1981），河南罗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请林罗刘回答朱总司令提出的三个问题[1]

（1948年6月3日）

---

[1] 指1948年6月3日朱德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关于攻打长春的意见中的3个问题。电报说：“我看了李黄两纵队的电，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1. 敌人正规军不到六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二万八千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军中政治上要拼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2. 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3. 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4. 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二十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三十万斤，手榴弹二百万个，即可能打开。再准备伤亡三万以上的人。5. 攻坚即强攻，打城军不在多，两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能攻能防敌人反攻即够，其余的可打增援队。打的打法是用坑道为第一，用技术、炸药、手榴弹、抵近射击，以各种炮为主，以工事对工事，进一步巩固一步，做好工事再进，如攻到纵深处，将敌人分割或混乱后，敌人坚强性即减少，也有可能投诚的。6. 李纵攻过四平，有经验，但遇着顽敌抵抗，即估计艰难些。长春与四平不同点，即敌士气不如以前旺，质量也差些。黄纵估计可能打开，即损失代价须大。7. 攻城必须先有计划，收集各种专门炮、工人才，组织指挥所，必须要用攻城战术，实事求是地、一步一步地进攻，带一种学习态度，决不可性急。准备两月、三月打下，也算是快的。只要是土质城底，又无城墙，是可能打下的。8. 再一种攻法是长围，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9. 这两种攻城战术，强攻与长围，如有家务，可采取第一种。打久了第二种也出现了。如家务不大，攻一城将炮弹、炸药耗尽，一时难补充，则不如打野战。打长春要看家务大小来决定。”

林、罗、刘[1]：

你们一日二十时电[2]及转来李黄两纵[3]意见均悉。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二）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三）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军委

江午

---

[1] 林、罗、刘即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

[2] 指1948年6月1日2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东北新老共十二个纵队，目前有一个纵队在热河，其余均在东北。此次如攻长春，我们拟以新老八个纵队直接投入攻城，以两个纵队阻援。我攻城兵力与守城兵力对比，不到三与一之比，但即三与一之比，打援兵力则绝对悬殊，故要攻城则不能同时打援。如敌不增援，我军在攻城战中逐屋争夺，消耗必大。能否维持消耗到底，而获得解决战斗的结局，尚无把握。有可能消耗到战斗末期，连队人数太少，无力续攻，使战斗出现僵持的局面。届时敌增援，则可能与守敌会合。”“目前对长春地形条件还不够具体了解，不知地形条件对我是否有利，须待实地侦察后才能看出。因此，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

[3] 李黄两纵，指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和第六纵队，纵队司令员分别为李天佑和黄永胜。

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1]

（1948年6月3日、8月28日）

一

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二

各地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

---

[1] 本篇一是6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来电《华东近一年来办报情形》上写的一段批语；本篇二是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起草过程中加写的一段话。

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即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和前委会）相平列。相反地，必须公开向党内外声明，各受中央委托的机关是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发出自己的决议、指示、命令和训令时，亦必须注意到此点，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和李讷在西柏坡。

关于攻打长春的几点考虑[1]

（1948年6月7日）

林、罗、刘[2]：

（一）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电[3]的第三个方案，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

（二）长春是否能攻克，决定于：甲、时间。乙、攻城方法。丙、打援能力及方法。在你们的计划中，时间问题已解决了，即不是如同你们原先计划的半个月，而是三个月至四个月。有了这样长的时间，兵力因经训练而加强了，攻城亦可采用新的方法了。

（三）关于攻城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

---

[1] 本文提出的攻打长春的计划，后来因有新的考虑而没有实施。1948年10月19日，长春在辽沈战役中和平解放。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6月5日19时半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的东北我军行动的3个方案是：一、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无把握，成功的可能性较小。二、目前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封锁粮食，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作战。但南下作战，除可能到处扑空，或因敌人力量集中不好打外，粮食补给也极为困难，同时长春之敌又可能乘机退回沈阳，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三、用二至四个月时间，对长春实行较长时间的围城打援，然后攻城。电报认为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

战相结合的方法，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如果单用地面攻击方法，则伤亡必很大，而且不一定确实保证胜利。

（四）关于歼灭援敌问题，我们认为在有沈阳、锦州这样大的敌军并且必然增援的条件之下（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虽有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还不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保障取得阻止援敌及歼灭援敌的胜利，方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你们应有不少于五个纵队（最好是六个纵队）在沈阳、长春间援敌必经的道路上构筑必要强固阵地（利用昌图、四平、公主岭等地敌人原来构筑的阵地加以修理），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借以消耗和顿挫援敌，并有能力歼灭援敌一部或大部，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我们认为以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采用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一个条件，阻止与歼灭援敌则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二个条件，两个条件不可缺一。

（五）这个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但是因为我军采取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向敌要塞下面攻进，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筑垒前进，使敌之反击（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的反击，所以我军前进必须逐步构筑坚强堡垒）只能消耗敌人自己，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我军有了大约四个或五个纵队及七个独立师使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在作战实施中，依据城敌与援敌两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之变化，你们可以酌量调节攻城与打援两方面的兵力，在某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打援方面（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

（六）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取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但是敌人可能从空中取得粮食，城内粮食亦可能不

只维持三个月。因此你们主要应从攻城方法方面与打援的兵力配备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即是说，即使敌人的粮食能维持五六个月，外面又有强大敌军来援，我们亦有办法在三四个月内攻克长春。

（七）长春胜利将给你们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这次战役，预先估计到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逐步总结经验，直至完全胜利。

（八）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需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准备工作。

（九）你们的及各纵队的指挥所，必须构筑巩固的可靠的防空洞。

军委

七日十五时

在批转华北局关于执行中央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指示计划的通报上加写的话

（1948年6月8日）

必须依照中央指示将已经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区和尚未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划分清楚，并公开宣布。在尚未解决土地问题而其主观客观条件均已完全成熟可以和应当实行平分土地的地区，必须争取一次进行到底，达到彻底解决，方能有利于生产。

待歼灭七十五师后再打别部[1]

（1948年6月15日）

粟、张，并韦、吉，刘、邓，陈、邓，许、谭[2]，华东局：

（一）敌八十三师、二十五师均由苏北向鲁西南前进，我韦吉兵团主力应即向津浦线徐蚌段[3]前进，并攻击该线[4]。（二）十八军正向陇海汴徐线[5]前进，望刘邓迅以有力兵团尾该敌攻击。（三）许谭兵团仍照原计划于攻占邹县后攻兖州，再攻济宁，争取于雨季前歼灭十二师，攻克兖济，休整一时期南下，攻临、韩、枣、峄[6]及徐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邓，指陈毅、邓子恢，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津浦线徐蚌段，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徐州至蚌埠段，即今京沪线一段。

[4] 这一部署在1948年6月19日酉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韦国清、吉洛（姬鹏飞）的电报中有所改变。

[5] 汴徐线，指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6]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微山县东南。枣，指今山东枣庄市。峄，指峄县，旧县名，即今山东枣庄市峄城。

线[1]。（四）粟张寒未变更元申部署[2]，我们意见只要陈唐[3]到达曹县，粟张主力即应攻歼七十五师。此次战役目的，只在歼灭七十五师，不要企图打五军，待七十五师歼灭后再作打别部之部署。

军委
删亥

---

[1] 徐海线，指徐州至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市）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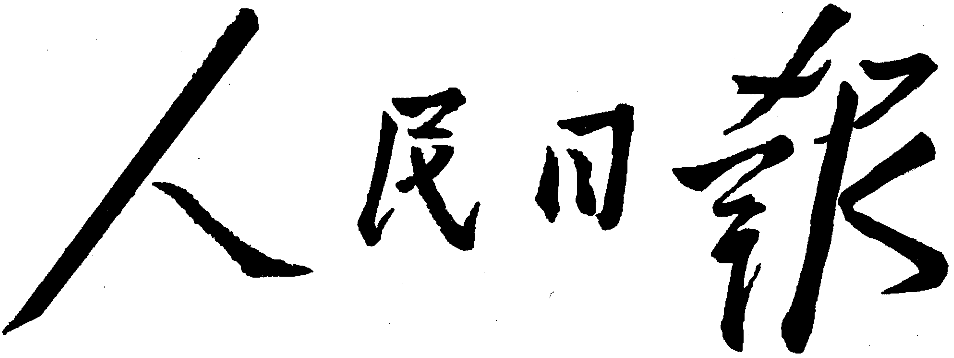
[2] 1948年6月13日申时粟裕、张震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分3步歼灭敌七十五师、五军和八十三师的计划，并说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纵队于16日晚可达陇海，故决于16日晚完成对七十五师之分割包围，发起歼灭五军战役。后因敌情变化，粟裕、张震又于14日未时致电陈唐并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上述计划，并要陈唐在原地停止侦察开封情况，尔后或由陈唐奔袭开封歼灭守敌，或佯攻吸敌回援，在运动中歼灭之。

[3] 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

（1948年6月15日）

人民日报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8年6月，《晋察日报》和晋察鲁豫军区《人民日报》合并，仍叫《人民日报》，请毛泽东重题报头。194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时间。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8年6月17日）

完全同意铣午电部署[2]，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

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请刘邓确实钳制十八军及四十七军。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将寻歼第五军改变为攻占开封的部署，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并告中原局、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2] 粟裕、张震6月16日午时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邓子恢，华东局：为迫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敌一路，乃以陈士榘、唐亮率第三、第八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

致许世友、谭震林等电[1]

（1948年6月17日）

你们仍应执行原计划，攻击兖州，调动八十三师、二十五师来援，减轻敌对粟、张方面之压力，这是你们援助粟、张使粟、张作战得手的最好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张震，华东局、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徐向前兵团已北上打阎不能西调[1]

（1948年6月18日）

彭、张、赵、甘，并告贺、习[2]：

十六日电[3]悉。你们以七万人左右担负西北作战重任是很艰苦的，但别方面很难给你们以兵力上的直接援助。杨罗[4]几次要求向前兵团[5]协助打傅作义[6]，你们现又要求该兵团协助打胡宗南，我们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6月16日午时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给中共中央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电报说：“我二、三两纵集中韩城芝川镇及其西南地区，一纵队在石铺镇，西野直在石铺，四纵在土桥、旬邑，六纵在河津。如合、澄之敌进犯韩城，准备以一、二、三纵队歼击之，不进则以备战姿势进行整训。据彭实际侦察，合、澄一带村落城垣多，我军此后集中五个纵队作战，三、七两旅扰乱该敌有可能，惟无打援力量。请考虑向前兵团打阎可否推迟两三个月进行，将该兵团与西野共同组织渭北战役，求得消灭胡宗南三十二个旅，使渭北敌与渭南不能连成一片。否则，西北野战军于七月先寻机打胡一两个旅，取得俘虏和等待新兵补充，秋后再打马。”

[4]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5] 向前兵团，指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

[6]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为均不适宜。因为我集中敌亦集中，不一定能打好仗，我集中兵力太大，粮食决难持久，别方面则失去歼敌机会。不如固定各兵团之兵力与任务，不惜时间各自寻机歼敌较为有利。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1]。嗣后，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2]，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惟在两个月以后，彭罗[3]指挥之晋绥两个旅可以调给你们，并归入你们建制。你们于七月寻机歼胡一两个旅加以休整，秋后打马[4]之计划是很好的。

军委

十八日十四时

---

[1] 晋中战役，是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和晋绥军区在晋中地区向山西国民党军发起的进攻战役。1948年6月11日，第一兵团首长先以地方武装围攻孝义以东的高阳镇，阎锡山急调闪击兵团由介休、平遥等地西援。第一兵团于18日乘虚向同蒲路介休、平遥段出击，至24日，在祁县、平遥地区歼灭东返之敌万余人。28日，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山西保安副司令、野战军司令赵承绶率两个军及一个总队由太原南援，企图于祁县以南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第一兵团先以一部兵力插入敌侧背，切断退路。敌军被迫北撤，在太谷以北的大常镇被第一兵团包围。激战至7月16日，全歼南援的国民党军，生俘赵承绶，击毙山西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前方指挥官兼太原绥靖野战军副总司令元泉馨（日本军官）。随后乘胜攻占14座县城，孤立了太原。至21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非正规军7.4万余人，另生俘民卫军等2.6万人，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

[2]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彭罗，指彭绍辉、罗贵波，当时分别任吕梁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

攻克开封后的各项政策[1]

（1948年6月19日）

粟、张，陈、唐，并告中原局，华东局，许、谭[2]：

攻克开封后，（一）对蒋伪公营企业、银行、商店、市政机关、医院、学校及私人企业、商店、教堂等应由攻城部队一律加以保护，不要没收。（二）攻城部队可以俘虏的人员，限于敌方武装部队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其他一切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加以俘虏和逮捕，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参谋长张震和华北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由于鲁西南地区敌军密集，华东野战军首长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改变原定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计划，及时部署了豫东战役。华东野战军8个纵队、中原野战军2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部分兵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于1948年6月17日至22日攻克开封，全歼开封守敌，共歼灭国民党军约4万人，击毙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蒋介石为了挽回其不利的战局，亲临开封上空督战，调集邱清泉、区寿年、黄百韬3个兵团，分路进攻开封。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开封，于6月27日至7月6日将区寿年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以及黄百韬兵团的3个多团，先后包围于睢县、杞县地区，经9昼夜激战，歼敌5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省政府人员中只有主席刘茂恩一人应加逮捕，其余均不要逮捕。（三）估计到开封此次不能巩固地占领，而在占领后不久我军即将退出，故应采取上述政策以示宽大，而使城市不遭破坏，以便将来巩固地占领时于我有利，且使此种宽大政策传播出去有利于我将来占领全国大城市。（四）城内公用物资除武器弹药公粮及其他军用品可由军队取用以外，一律保护不要破坏。（五）除持枪抵抗者外，不杀一人，即使是特务分子，因为一时很难清理，也不要逮捕和杀害。（六）公安局及警察枪支不要收缴，以便我军离开后由他们维持治安，免遭抢掠破坏。（七）如果省政府、省党部、公安局、市政府等机关业已惊散，再难集合，应设法找出中间人士，例如大学校长等出面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

中央军委
巳皓

致韦国清、吉洛等电[1]

（1948年6月19日）

你们应遵照粟张十八日电集中可能集中之兵力打敌弱点，我们十五日亥电要你们出击津浦线之意见不要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韦国清、吉洛并告粟裕、张震，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1]

（1948年6月22日）

刘、邓、陈、邓，并粟、陈、唐[2]：

你们哿电[3]、马巳电[4]、马亥两电[5]均悉。（一）庆祝攻克开封之大胜利。（二）如果郑州东援敌一二二旅、一二五旅、交十六总及战车队能被我粟陈唐歼灭于开封以西，郑州敌力减少，并估计能于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指1948年6月20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了攻克开封后中原野战军攻击郑州，调动敌张轸兵团向北增援，邱清泉、沈澄年等部向西增援，寻求一路分割歼灭，以打张轸为主的战役部署。

[4] 指1948年6月21日巳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同意攻击郑州的设想，并认为打击东路援敌邱清泉兵团比打击南路援敌张轸兵团更为有利。

[5] 指1948年6月21日亥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和粟裕、陈士榘、唐亮给中央军委等的电报。前电说：“如执行攻郑打援计划，因敌军每一路均可集结到六个师以上，有可能打成僵局。建议进行短期休整，然后或执行原方案，或看情况变化调散敌人，争取歼敌新机。”后电报告了攻占开封的战斗情况。

星期左右有攻克之确实把握时，则我们同意以陈谢[1]率四、九、一等三个纵队攻郑州，以陈锡联[2]率二、三、六纵再加宋时轮[3]阻击张胡[4]，以粟陈唐全力阻击邱沈[5]，重点放在攻郑，不放在打援。如果一二二旅、一二五旅等部未被歼灭而缩回郑州，攻郑无确实把握，则应照刘邓陈邓马亥电放弃攻郑计划。（三）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故须避免。你们两大集团今后或者分开行动，每次歼敌以不超过一个整编师为限度，或者集中行动，一次歼敌以不超过两个整编师为限度，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哪怕歼敌一个旅也是好的，例如宛西那样的仗[6]。（四）许谭[7]打兖济[8]，韦吉[9]打陇海东段分散之敌是有利的，特别是兖济攻克，整十

---

[1]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陈锡联，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3] 宋时轮，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

[4] 张胡，指张轸、胡琏，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和整编第十八军军长。

[5] 邱沈，指邱清泉、沈澄年，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

[6] 指1948年5月2日至17日中原、华东野战军各一部及桐柏军区部队在河南南阳以西地区举行的宛西战役。这次战役，采取远距离奔袭和突然包围的方法，袭歼敌人比较分散薄弱的旅以下目标，共歼敌2.1万余人，收复县城9座。

[7]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8]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9]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二师被歼，再加攻克滕、临、枣、峄[1]，使许谭能出至陇海东段，对全局有极大战略意义，故不应改变攻兖济计划。

军委

养酉

---

[1] 滕，指山东滕县。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枣，指今山东枣庄市。峄，指峄县，旧县名，即今山东枣庄市峄城。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

（1948年6月25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下列各项，嗣后必须在事先或事后报告中央，经中央审查批准已在执行中者，除业已呈报者外，须将指示或决议或条例或命令补行呈报备审。

（一）税收政策，内分农业税（即公粮）、工业税、商业税。

（二）工资政策，内分公营企业工资、民营企业工资（包括合作社）、乡村工资。

（三）每年财政预算。

（四）全区脱离生产人员的数量和人口数量的比例。

（五）每年动员新兵计划。

（六）增加新的团、旅（师）及纵队的数量及编制。

（七）全区每年土改工作范围、政策及干部配备。

（八）全区生产计划、投资及贷款计划，内分工业、交通、矿业、航业、农业及商业。

（九）货币政策及发行计划。

（十）外交政策、外交事件之处理及外人宗教案件之处理。

（十一）文化教育政策，全区文教事业计划。

（十二）高级人民代表会议及高级政府组成中我党与他党及非党人员的配备。

（十三）我党与民主党派及非党人员合作的政策。

（十四）全区司法政策，即如何对待各类犯罪分子。

（十五）党校及军校的计划及教育方针。

（十六）区党委或省委的书记、副书记及委员的配备。

（十七）旅（或师）一级及其以上各级主要人员的配备。

（十八）整党计划及政策（包括三查三整[1]在内）。

中央

巳有

---

[1] 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里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复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电[1]

（1948年6月25日）

敬十九时电悉，部署甚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在睢杞通许之线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1]

（1948年6月26日）

刘、邓、陈、邓，粟、陈、张[2]：

敌八十三师调援兖州，二十五师一部到滕县，主力有返徐州讯。蒋白似均判断我粟陈张南进与刘邓会合打十八军等，故令邱区[3]从民权、兰封[4]、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邱军又以一部守开封。在此情形下粟陈张部署在睢杞[5]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敌指挥官中区寿年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

军委

宥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区，指区寿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官，指挥由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的兵团。

[4] 兰封，旧县名，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5] 睢杞，指河南睢县和杞县。

对西北局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土改和整党指示的报告的批语

（1948年6月26日）

西北局六月二十二日计划是正确的。各局、各分局应按本区具体情况，迅速订出本年计划，并于七、八两月开完各级干部会，九月布置全区工作完毕，干部到达乡村，或做土改或做减租或做整党建政，务必按照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的程序和方法，在今后一年的工作中，不但要避免过去数年所犯过的严重政治错误，不使重犯，而且要紧紧地抓住季节，于秋季农民较闲时及冬季农民最闲时在农村开会（亦不可过多），做完可做和应做的工作。过去各地在秋、冬两季开高级及中级干部会，布置全年工作的习惯，未能顾到农民的季节，对于农村工作有极大妨碍，这种情况，从今年起必须改变。各级干部会开会时间必须缩短，必须遵照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第二条乙项的方法，人数不要太多，事前准备提纲，过去将干部会动辄开一两个月之久的习惯，必须改变。

致许世友、谭震林等电[1]

（1948年6月26日）

你们攻兖行动已将二十五师两个团调至滕县，八十三师亦于有日[2]起由民权车运滕县，估计数日内可到，然后增援兖州。这对于粟、陈、张是极大援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有日，即25日。

许谭兵团一部仍应吸引敌军增援兖州[1]

（1948年6月27日）

许、谭，并告粟、陈、张[2]，华东局，中原局：

二十六日十九时半电[3]悉。我们不明韩仓[4]七十三师情况，韩仓距济南远近及我攻韩仓兼打济南援兵是否有把握，如果你们觉得有把握，自以打韩仓为有利，且可从容部署，以期必胜。惟七纵及鲁中部队暂时仍应吸引二十五师、八十三师援兖，该两师不到兖州附近不要解围，以利粟陈张行动。并须估计我攻韩仓不得手，该两师到兖州后以一个师或一个旅加入兖州城防，蒋介石认为济兖两处均可确保，而于汴徐线[5]紧急时以该两师之主力回援汴徐线，加重对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指1948年6月26日19时半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对津浦路中段战役下一步作战提出3个方案：一、以一部在韩仓围歼敌七十三师，吸引敌二十五师、八十三师北援济南，一部从泰安、大汶口切断铁路，夹击济南。二、以一部集结泰安、大汶口一带，一部集结泗水，待敌恢复津浦路中寻其一部包围歼灭，打击援兵。三、以三个纵队集结于曲阜、邹县以东地区监视敌人，相机歼敌一部。

[4] 韩仓，村名，位于山东济南市历城区。

[5] 汴徐线，指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部之压力。故在你们所提三个方案中，只在估计打韩仓兼打济援确有把握时，采取第一方案为最有利，否则应采取第二方案或第三方案。

军委

二十七日三时半

许谭兵团威胁徐州配合粟裕部作战[1]

（1948年6月27日）

许、谭，并粟、陈、唐、张[2]，华东局，中原局：

根据粟陈唐张宥未电[3]，八十三师仍随邱兵团[4]攻汴[5]，并未向滕县，邱区[6]两兵团全力尚有十一个旅，四十七军至中牟，六十八师向开封等项情况，考虑许谭兵团行动，我们认为兖州既已不能再打，今后行动不是打韩仓[7]，而是改变三个纵队分置三地的部署，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粟、陈、唐、张，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参谋长。

[3] 指1948年6月26日未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邱清泉部第五军、第七十师、第八十三师截止二十五日止，仍为我阻击于兰封以西，我决于二十五日夜放弃开封，拟待敌邱清泉兵团入开封后，以一部分割其与区寿年兵团的联系，以主力歼灭区兵团于杞县地区，如区兵团迟迟不进，则我向北跃进，在民权、兰封、杞县、睢县地区求歼区兵团一部或大部。"

[4]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5] 汴，即河南开封。

[6] 邱，指邱清泉。区，指区寿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绥靖区副司令官，指挥由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的兵团。

[7] 韩仓，村名，位于山东济南市历城区。

三个纵队集中。其布置是将泰安、大汶口、邹县等地让给敌人，让敌重新打通徐济路[1]，许谭率三个纵队照粟张前电提议，攻击临、韩、枣、峄[2]、台儿庄及其以南一带，威胁徐州。这样对于配合粟部作战较为有利。你们对于此项提议意见如何，盼考虑电复。

军委
感申

---

[1] 徐济路，指徐州至济南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微山县东南。枣，指今山东枣庄市。峄，指峄县，旧县名，即今山东枣庄市峄城。

致中原局电[1]

(1948年6月28日)

中原局：

完全同意你们六月六日的指示，望即发给中原全党全军切实执行。惟在第二节亥项之后“同时必须着重指出”一段，应改为一节作为第三节，而将原文第三节第四节改为第四节第五节，以加强对于成绩估计的力量。在该节中“大量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一句之后，应增加下面的文句：“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下接原文“我们的军队虽然在个别部队有减员”。在该节末尾“便是很好的证明”之后，应加上“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忘记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据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并因此损害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右倾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局的电报。

会主义的观点”。我们将根据这几点增加，将你们的指示全文转发给中原局以外之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

中央
巳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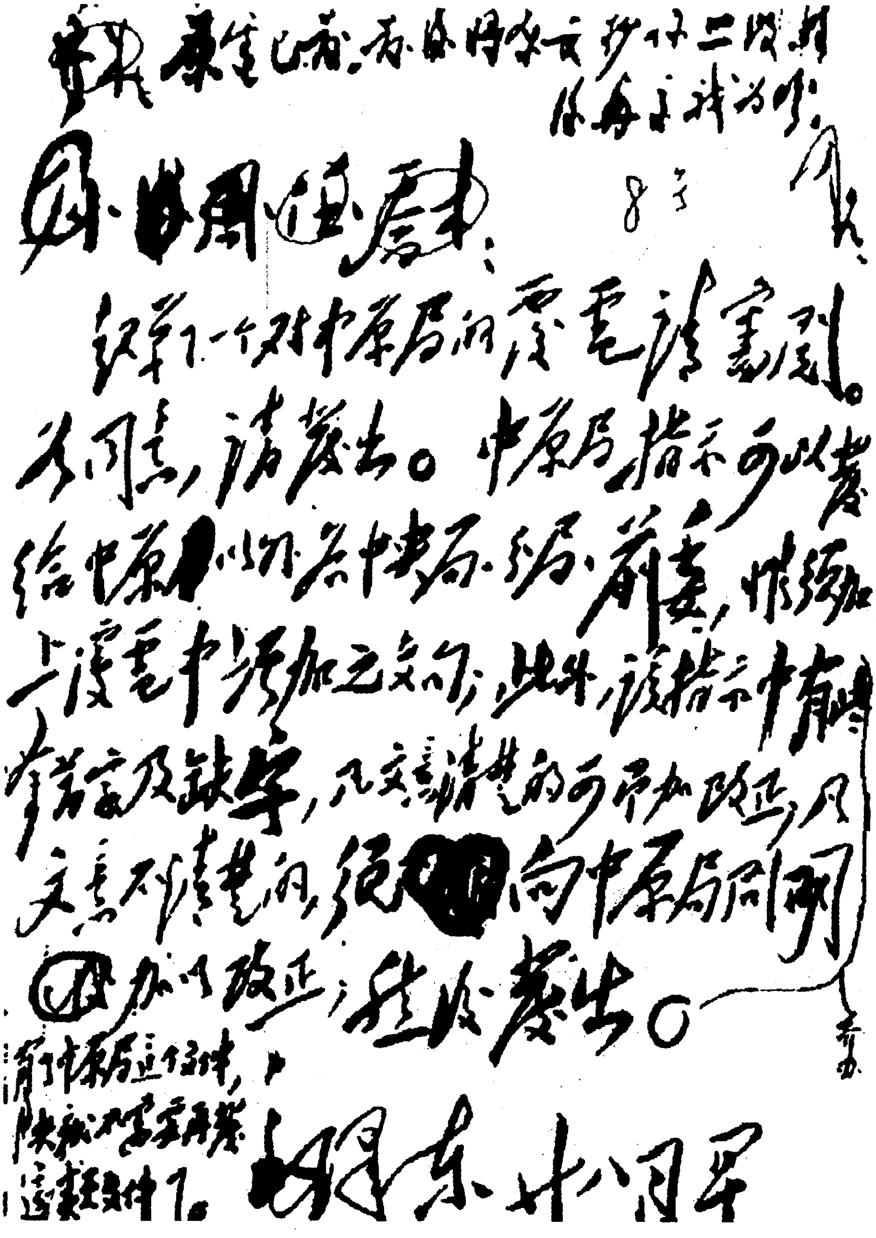
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的信

（1948年6月28日）

刘、朱、周、任、乔木：

起草了一个对中原局的复电，请审阅。如同意，请发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惟须加上复电中增加之文句。此外，该指示中有些错字及缺字，凡文意清楚的可即加改正；凡文意不清楚的，须向中原局问明加以改正，然后发出。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毛泽东
廿八日早



康生已看，亦请同阅，交[illegible]抄付二份，并保存于我处为要。

8点

毛

刘、朱、周、任、乔木：

兹草一个对中原局的覆电，请审阅。如同意，请发出。中原局指示可以发给中原局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惟须加上覆电中所加之文句，此外，该指示中有些字句及缺点，凡文意清楚的可予加改正，凡文意不清楚的，须向中原局问明加以改正，然后发出。

前中原局这个文件，已由陕北[illegible]这样转发了。

毛泽东　廿八日早

毛泽东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胡乔木信的手稿。

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电[1]

（1948年6月30日）

现在是打歼灭战的极好时机，粟、陈、唐正围歼区兵团五个旅于睢县地区，吴绍周必兼程北进，如果你们集中全力于运动中围歼该敌，可能打一大胜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的主要内容。

对开封守敌的喊话材料[1]

（1948年6月）

困守开封的国民党军全体官兵注意：

国民党省县市政府机关全体人员注意：

开封城内的一切公私商店、工厂、银行、仓库、邮电、交通等经济机关注意：

河南大学和其他学校、医院、教堂、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关注意：

全开封各阶级各行业的市民注意：

现在开封城外的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特向你们讲话。

第一，本军无论在兵力上火力上对于开封的守军都占绝对优势，你们等候的援军亦被本军隔断无法接近，你们的一切抵抗都是害人害己的无意义的牺牲，你们如果顾念自己的安全，顾念全城的生命财产，应该立即放下武器，开城迎接本军入城。本军郑重负责保护你们全体官兵的安全。只要你们立即这样做，使得开封城内外居民的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少受损失，本军就认为你们护城有功，无论官兵一律宽待。如果你们不这样做，而进行顽固的抵抗，本军当坚决予以消灭，直到你们全部放下武器为止。如果有人故意破坏武器、物资和伤害人民生命财产，本军一定彻查严办。

---

[1] 此文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

第二，无论在本军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城内一切机关团体和各界人民都要共同负责维持全城秩序，不许有丝毫破坏。所有国民党省县市各级政府机关官员和警察，所有属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文化机关中的一切人员，都要安心照常供职，并且负责保护各该机关的一切资财文件，听候本军处理，不得怠职毁损，不得阴谋破坏。凡不持枪抵抗的一切官员警察，本军一律优待。其他学校、教堂、医院和一切私人工厂、商店、住宅，本军一律保护，不准侵犯。希望所有热心公益的社会团体和公正人士在本军进城后与本军合作，共同维持全城秩序，免遭破坏，希望全体市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自相惊扰。

许谭兵团集中兵力攻克兖州济宁是上策[1]

（1948年7月4日）

粟、陈、唐、张，并告刘、陈、邓[2]：

江辰谭电[3]、江午许谭刘电[4]，你们谅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既有把握继续围歼二十五师、七十二师，而在此战结束后你们全军必须休息若干天，整顿队势，处理战后各项问题，然后或者立即进入大休整（大约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或者再举行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攻占民权、砀山线，控制该线以利休整。总之，暂时不打邱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7月3日辰时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饶漱石的电报。电报说："按目前中原情况，山东兵团行动方针有三：全部南下攻击临韩，威胁徐州为上策；以一个纵队南下，主力继续打兖州为中策；全部打兖州为下策。今日召开会议研究，估计多数人会赞成下策，经说服可能执行中策。我以为以执行上策为有利。"

[4] 指1948年7月3日午时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就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的作战部署提出两个方案：一、集中全力打兖州，歼灭守敌第十二师，攻占兖州、济宁、汶上。二、全力南下，相机攻取临城、韩庄，威胁徐州，直接配合中原作战。

团[1]，不进行严重的作战。而目前徐州方面对于你们已无威胁，在此种情形下许谭南下威胁徐州，只可能起一种作用，即迫使刘峙[2]从郑州将四十七军空运徐州增防，而从豫北调四十师填防郑州，或更从张轸[3]兵团调出一部填防郑州，或者四十七军不动径从张兵团抽一部空运徐州，除此以外无他作用。似不如同意许谭刘江午意见，集中兵力攻克兖、济，打通山东和你们间的交通，并使许谭兵团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南下作战，对于雨季以后你们的作战可起大的和直接的配合作用。这是上策，不是下策。你们意见如何，盼复。

军委
支丑

---

[1]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不失时机寻歼吴绍周[1]

（1948年7月6日）

刘、陈、邓，粟、陈、唐、张，许、谭[2]，并告华东局：

你们各电均悉。（一）据陈唐张微午电，邱兵团[3]九天前进仅十里，陈留、兰封[4]被我占领，形成被包围形势，进退维谷，要求刘汝明[5]来解围，七十二师弹尽粮绝，师长哭脸，部队动摇。在此种情况下，只要十八军被我拖回不能北援，则我粟军于歼灭二十五师之后仍有可能续歼七十二师。因此务望刘陈邓照微午电第二项，决心不失时机寻歼吴绍周[6]，借以拖回十八军，保障粟陈唐张取得完全胜利。粟陈唐张是否继续歼击七十二师，应由粟陈唐张于歼灭二十五师之后按当前具体情况决定。（二）许谭即照粟陈唐微晨电集中三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唐、张，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参谋长。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4] 陈留，旧县名，1957年并入河南开封县。兰封，旧县名，1954年与考城县合并为河南兰考县。

[5]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6]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指挥由整编第八十五师、第二十八师、第十师组成的兵团。

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攻克兖、济，歼灭十二师并准备歼灭八十四师南援部队。你们于兖州将克未克之时，注意以一部兵力监视济宁之敌，不使该敌跑掉，以利续歼。

军委
鱼丑

钳制敌第十八军保障粟军胜利[1]

（1948年7月6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唐[2]：

微未电[3]悉。为保障粟军胜利，你们行动有二方案：（一）全军（一、二、三、四纵）尾敌北进，直达睢杞[4]地区。（二）以四纵尾十八军北进直达睢杞，以一、二、三纵歼灭吴绍周[5]。以上方案望择一施行。如果不取第一案，则必须取第二案。务使十八军于午灰[6]前不超过睢杞，争取歼灭七十二师（是否续歼七十二师，由粟裕按当面情况临机决定），并使粟军于战役结束后有十天左右喘息时间，北移休整，立于主动地位（此点甚为重要），是为至盼。全军进展情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指1948年7月5日未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已令四纵今夜全部进至周口、商水以东投入战斗，阻止胡琏部十八军北援。一、二、三纵主力今夜进至东洪桥地区，按原部署对吴绍周进攻。

[4] 睢杞，指河南睢县和杞县。

[5] 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指挥由整编第八十五师、第二十八师、第十师组成的兵团。

[6] 午灰，指7月10日。

望逐日电告。

军委

鱼丑

一周内不使敌十八军越过睢杞线[1]

（1948年7月6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唐[2]：

微申电[3]、鱼六时电[4]均悉。（一）你们已割裂二十八师、十师各一部加以攻歼，并有陈谢[5]一个旅向周口十八军尾击，甚好甚慰。（二）希望你们将已被割裂攻击之敌解决后，再行割歼敌一部，如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指1948年7月5日申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粟裕、陈士榘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十八军由昨上午起，对我匡斌部攻击，今十三时占领周口，刻匡斌三个小团在周口、淮河线布防阻击，争取该敌明日不能超过淮阳，陈谢一个旅正向周口尾击中。二、陈谢两个旅今向商水东洪桥之线出击，已抓住吴绍周兵团第二十八师一部，并协同一纵一个旅，将吴兵团割断。正战斗中。"

[4] 指1948年7月6日6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粟裕、陈士榘、唐亮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昨午后我一、二、三、四各纵在商水、上蔡之线以西，均与敌打响，刻已将吴绍周兵团二十八师一个团及第十师之八十五旅割开，拟于今夜先选一点攻歼之。

[5]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们能在数日内歼敌两个旅，则可能拉回十八军。（三）陈谢尾击十八军之一个旅，应紧随十八军直至淮阳、太康及其以北，如该敌回头援吴[1]则阻击之。（四）望粟陈唐以一部进至淮阳地区，协同匡斌[2]四个小团阻击十八军，如无正规军可派则派地方军，保障一星期内外该敌不超过睢杞[3]线。

军委
鱼申

---

[1] 吴，指吴绍周，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指挥由整编第八十五师、第二十八师、第十师组成的兵团。

[2] 匡斌，当时任豫皖苏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

[3] 睢杞，指河南睢县和杞县。

致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等电[1]

（1948年7月6日）

关于集中三个纵队及鲁中兵团全力在雨季以前攻克兖州、济宁、汶上诸点，全歼十二师及其他杂部，并争取歼灭从北面来的援敌，打通山东和粟部的交通，孤立济南，以利雨季后你们兵团放手南进或西进，更有力地配合粟部打大歼灭战，粟、陈、唐、张和我们意见已完全一致，希望你们本此方针精心组织此次战役。关于完成任务的时间，应按敌情和你们自己的条件来决定，十天或二十天均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华东局、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刘少卿，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参谋长。

粟裕部应于十天内完成再战准备[1]

（1948年7月8日）

粟、陈、唐、张并刘、陈、邓，许、谭：

虞酉电[2]悉。（一）在来电所述各种情况下，你们的撤退是正确的。（二）望你们于十天内完成再战准备（整理组织，补充弹药，恢复疲劳），以利再战。估计敌人有休整补充一较长时期然后向我进攻及仅仅休息几天乘我疲劳马上向我进攻之两种可能，你们的工作及部署应放在第二种可能上，即准备于十天内外再打可能进攻之敌。（三）刘邓陈的部署望按整个情况酌定。（四）希望许谭争取于十天内外攻克兖济[3]，以便于粟部再战时能够直接援助粟部。

军委

齐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指1948年7月7日酉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白崇禧以豫东作战关系整个中原之安危，令胡琏及张轸继续北上，拟东西夹击我军，据此情况，加上我军连续作战，已很疲劳，为应付敌人乘我疲劳后进攻，决放弃对敌二十五师等部之作战，即北撤民权、考城、菏泽、曹县、定陶地区，争取休整。如敌继进，则相机予以歼击。

[3]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对付胡琏张轸部北进的措施[1]

（1948 年 7 月 8 日）

刘、陈、邓，并告粟：

各电均悉。（一）白崇禧七日四时令胡琏[2]按原计划北上，张轸[3]在击破我军后亦兼程北上，此情你们谅已获悉。（二）粟部已于昨夜开始撤退，胡琏、张轸是否继续北进，数日内即可看清楚。如果胡、张继续北进企图集全力先击破我粟部，则你们应率全军北进援助粟部；如果胡、张停止北进则你们亦可停止北进，惟正式休整计划须待蒋介石全般部署明了后方能决定。（三）假定胡、张继续北进，因此你们亦须北进的情况下，你们似以位于胡张两部之间，将两部隔断为适宜。如果你们认为以全军位于胡、张全军侧后，和粟部处于反对方向为适宜，亦可采用此种办法。总以使粟部取得喘息时间，立于主动地位为原则，此种时间大概要十五天。

军委

齐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军长。

[3]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对破坏铁路的指示[1]

（1948年7月10日）

刘、陈、邓，粟、陈、唐，许、谭，韦、吉[2]，华东局，宋任穷[3]：

已宥许谭提议，对陇海路郑州以东、津浦路[4]兖州或滕县以南，作彻底之破坏，使敌非二三个月不能通车，但主要铁桥可不破等语。我们认为，为妨碍敌人军运起见：（一）平汉路[5]信阳以南、津浦路徐州以南，可作彻底破坏，包括主要铁桥之破坏在内。（二）平汉路郑信段[6]、陇海路郑徐段[7]，只作某些必要的破坏，例如在确山、信阳间一段及砀山、徐州间一段，加以较大破坏，使其不能通车，其余则不要破坏或只作小破坏。（三）陇海路徐海段[8]、津浦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

[4]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5]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6] 郑信段，指郑州至信阳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7] 郑徐段，指郑州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8] 徐海段，指徐州至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市）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徐济段[1]，则要严格保护，不可作任何破坏。（四）破坏方法，根据美蒋方面反映，他们最怕的是曲线式的破坏路基，即将铁路分作多数小段，不是掘毁其全部路基，而是掘毁路基之一方面；不是掘毁路基之同一方面，而是在各段上掘毁路基之不同方面。例如第一段掘毁左边留下右边，第二段掘毁右边留下左边，第三第五第七段照第一段掘法，第四第六第八段照第二段掘法。敌人修复之后，修复部分和留存部分硬度不同，车行危险，故为敌人所最怕。你们是否已经采用此种办法破路，如尚未采用，望注意采用之。

军委

午灰

---

[1] 徐济段，指徐州至济南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

（1948年7月10日）

（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由保、罗、匈、波、苏、德、捷、意各国共产党所参加的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举行这个会议并通过这个决议，乃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保卫世界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所应尽的职责，乃是他们为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保卫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所应尽的职责。

（二）以铁托、卡德尔、德热拉斯、兰科维奇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员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从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泥坑。铁托集团因为它执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外政策，因为它采取反苏立场，压制党内批评，拒绝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共产党的兄弟批评，拒绝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在情报局会议的决议公布以后，继续压制南斯拉夫党内外的正确意见，继续敌视国际共产主义，已经严重地损害了南斯拉夫

的人民事业，并使南斯拉夫的敌人欢呼。中国共产党热烈希望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国际主义分子能够坚决地起来纠正铁托集团的错误，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重新走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走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轨道。

（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南斯拉夫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只要是阶级存在的国家，带着资产阶级反革命观点的投机分子，总是企图混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混入共产党，企图利用机会从内部来破坏革命事业。这种情况曾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多次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则曾经表现为陈独秀主义和张国焘主义。这种情况，要求共产党人努力提高觉悟，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以便及时地识别和反对这些资产阶级分子，保卫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不受破坏和损失，保卫共产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纯洁。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当认真研究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问题的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

国内外暂时均不要出毛泽东选集[1]

（1948年7月12日）

无论国内、国外，暂时均不要出选集。半年后，经审查后，再说。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给中央宣传部关于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准备印毛泽东选集可否允其印刷的请示电报上的批示。

致中原局电[1]

（1948年7月13日）

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原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北局、华东局等电[1]

（1948年7月13日）

兹决定黄河以南运河以东地区，即兖州、济宁、汶上、宁阳、东阿、平阴、东平、肥城等县，划归华东局及华东军区管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北局、华东局，许世友、谭震林并告粟裕、陈士榘、唐亮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三四日内攻克济宁汶上[1]

（1948年7月14日）

许、谭，并告华东局，粟、陈、唐、张[2]：

（一）兖州既已攻占三分之二，望立即将九纵使用于济宁、汶上方面，争取于三四日内攻克济、汶，同时派部扼守运河要点，使邱黄[3]援兵不能东渡。邱黄本日已至定陶，可能向东急进，务望注意。（二）兖济汶三点攻克后全军立即休整，暂以十五天为休整时间，情况许可再延长之。立即将大批俘虏兵补入部队，不要盼望补翻身农民。（三）中央已令华北局将泰西分区划归华东，望华东局迅速接收并注意指导该区工作，以利尔后夺取济南。

军委

寒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粟、陈、唐、张，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参谋长。

[3] 邱黄，指邱清泉、黄百韬，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和第七兵团司令官。

许谭兵团宜攻击济南分散敌人[1]

（1948年7月14日）

粟、陈、唐、张，并告许、谭[2]，中原局，华东局：

雨季时间据说有两个月，雨季期内你们及许谭、韦吉[3]除争取休整外，是否还有作战之可能及必要。估计敌人似将利用你们疲劳，集中力量向你们压迫，使你们不能安心休整。似须以有效行动分散敌人，你们则乘敌分散之际，歼灭几部敌人，方能实行大休整（许谭、韦吉亦然）。此种分散敌人的行动，似以许谭攻击济南为最有效。拟令许谭于攻克兖济[4]后，休息两星期，即向济南攻击，迫使邱黄[5]两兵团分兵北援（敌非北援不可）。此时，你们则寻敌一部攻击，使敌既被迫分散，又首尾不能相顾，利于我之各个击破及尔后之大休整。许谭攻济南，可先占领机场，以两三个星期时间完成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5] 邱黄，指邱清泉、黄百韬，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和第七兵团司令官。

城准备（包括恢复疲劳，补兵，练兵，侦察及部署等）。然后看敌援兵情况，决定先打援或先攻城。如攻城打援均无把握，则收兵休整。邱、黄既抽一部援济，即不可能向你们压迫，你们或作战，或休整，便均有了自由。目前许谭不宜和你们集中行动，若许谭加入鲁西南，将迫使邱、黄集中，不易求得歼击机会。以上请考虑电复。

军委

寒寅

歼敌后考虑主力北上[1]

（1948年7月14日）

许、谭，并告粟：

攻克兖州甚慰。

（一）你们将九纵插入大汶口以北，切断八十四师退路，准备歼灭八十四师甚为正确。我们要你们以九纵打济宁之提议取消。（二）八十四师歼灭后，请考虑以主力立即北上，占领济南飞机场，筑工固守，使敌不能向济南增兵，以利尔后夺取济南，另以一部攻歼济宁、汶上之敌。

军委

寒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军委关于准备歼灭东进之胡宗南部的指示[1]

（1948年7月14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许、谭，华东局：

（一）胡宗南抽出两个师（番号待查）由裴昌会指挥，拟经洛阳出郑州业已确定，你们须加紧准备，待敌由灵宝东进至适当地点时歼灭之。

（二）敌因中原失败，除从胡部抽出两个师外，又有从东北抽回第八军消息，如属实，估计将于连云港登陆加入徐州方面，填补七五师、六六师等部被歼后之空缺。

（三）兖州已克，守敌全歼，许谭正准备歼灭援敌八四师，此战如胜利，拟令许谭攻济南，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许谭全军（七纵九纵十三纵渤纵鲁纵）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粟陈韦吉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

（三）〈（四）〉向前所部北进于歼灭阎敌三个师后现又于太谷地区围歼阎军四个师又三个总队，日内可全部解决他们，并准备继歼由平介汾孝向清源方面退却之两个师。假如这些敌人能解决，则阎部仅余五个师及若干特种部队困守榆次、太原、阳曲、忻县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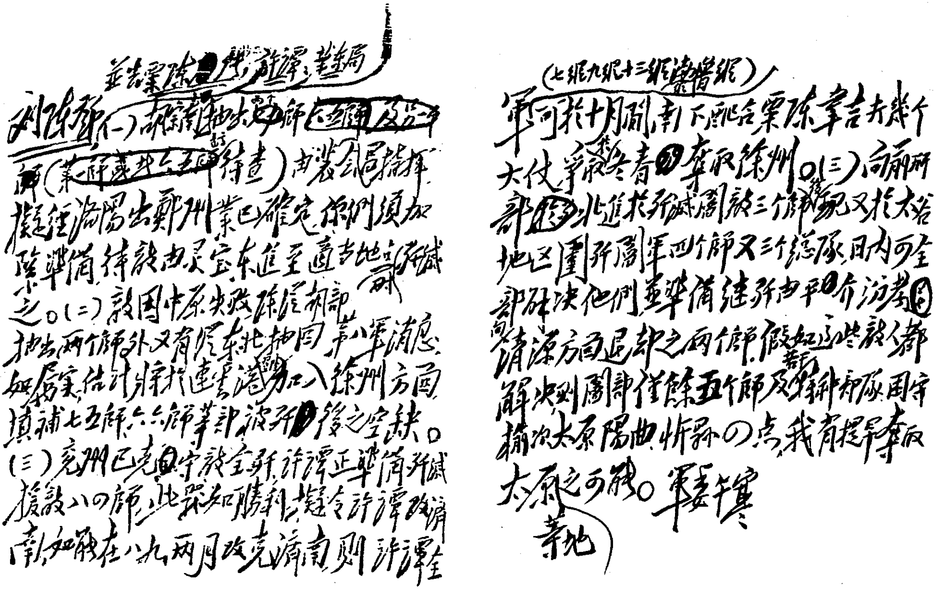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点，我有提早夺取太原等地之可能。

军委

午寒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准备歼灭东进之胡宗南部的指示》的手稿。

致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

（1948年7月15日）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闻悉意大利反动派阴谋刺伤托格里亚蒂同志之消息，表示极大的愤慨。特对托格里亚蒂同志致以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遇刺受伤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格里亚蒂的慰问电。

望派兵抢占太原机场[1]

（1948年7月16日）

徐、周，并告华北局：

在你们当面敌人歼灭之后，太原已形孤立，我军有提早夺取太原之可能，杨爱源[2]至南京求救，蒋[3]有允派援兵之意。望你们考虑派必要兵力抢占太原机场，估计到阎锡山[4]可能和我们争夺机场，故你们如决心占领机场时须注意：（一）派出充分之兵力；（二）于机场附近构筑坚深地堡及工事；（三）全军即位于太原附近休整，并于此次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

军委

铣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的电报。徐周兵团至1948年7月21日收复晋中12座县城，攻克太原附近各要点，逼近飞机场，太原成为一座孤城。10月下旬，根据全国战局，中央军委决定发起太原战役。12月徐周兵团转入对太原的长期围城，部队进行休整。

[2] 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

[3] 蒋，指蒋介石。

[4]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抢占机场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1]

（1948年7月16日）

许、谭，并告粟、陈、唐、张[2]：

你们歼灭八十四师后除以一部兵力歼灭济宁、汶上之敌，并负责扼守运河要点阻止可能之敌东渡以外，主力应不惜疲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以期提早夺取济南。

军委

铣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粟、陈、唐、张，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参谋长。

粟陈部应阻止邱兵团北援济南[1]

（1948年7月16日）

粟、陈、唐、张，并告许、谭[2]：

（一）已令许谭于歼灭八十四师后，主力立即抢占济南飞机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估计八十四师可能于日内被解决，并可能于数日内抢占济南飞机场。如果济南敌人不强而我军又能于短期内（例如十天左右）完成攻城准备，则有迅速夺取济南之可能。（二）我攻济南时，判断邱兵团[3]可能取道郓巨[4]东进北援，而黄兵团[5]则将设法返回徐州。（三）在此种情况下，你们于铣篠两日占领商徐段[6]后，应看形势，如邱兵团经郓、巨东进北援，你们应返回郓、巨以南，将自己处在邱黄两兵团之间，隔离两兵团，使邱兵团不敢冒进援济，保障攻济胜利；如邱兵团徘徊定曹[7]，则你们应控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4] 郓巨，指山东郓城和巨野。

[5]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6] 商徐段，指商丘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7] 定曹，指山东定陶和曹县。

商、徐间不动，看清形势再动；如邱兵团折回陇海线东援徐州，则你们可以向路南休息，亦可回路北休息。望酌情处理之。

军委

铣子

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1]

（1948年7月16日）

徐、周，并告华北局：

删酉电[2]悉。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你们决心甚好。望首先控制机场，以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即行攻城。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小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于已炸开之洞内，炸成一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此方法，据王建安[3]说，已告知你们参谋长，你们可以试用。王建安认为攻临汾的方法不如他们的方法好，你们可注意采用，争取于短时间内夺取太原。同时，你们完成对太原之包围后，可派俘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4]，要他迅即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对于全部阎军将领及其眷属，亦可保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的电报。

[2] 指1948年7月15日酉时徐向前、周士第关于攻取晋源、包围太原的部署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3] 王建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

[4]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证不杀。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

军委

铣午

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1]

（1948年7月16日）

许、谭，并粟、陈、张[2]，告华东局，中原局：

删夜电悉。攻克兖州又歼八十四师[3]甚好甚慰。望鼓励士气，于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对济南之包围（首先夺取飞机场），并乘胜夺取济南。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济南。

军委

铣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于1948年7月1日包围兖州，12日黄昏发起总攻，13日下午攻占该城，全歼守敌2.7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整编第十二军军长兼整编第十二师师长霍守义。同日，打援部队又歼灭由济南南援之敌整编第八十四师一部1万余人。

控制砀山黄口段威胁徐州[1]

（1948年7月16日）

粟、陈、张，许、谭[2]：

各电悉。许谭已歼灭八十四师，济汶[3]敌已南逃，邱兵团[4]可能停止东进。许谭在现地休息一、二天，应不惜疲劳减员迅即北上包围济南，并争取于十天内外攻克之。粟陈张率四、八纵篠晚攻占砀山、黄口线并准备歼灭黄兵团[5]，计划甚好。只要黄兵团歼灭，邱兵团即不敢冒险援济，可保证许谭攻济胜利，尔后你们可能各个歼灭邱兵团，并可能再入开封，夺取菏泽。战局可能迅速发展，望作精神准备。你们攻占砀山、黄口段后，应尽可能控制该段多日，威胁徐州，吸引黄兵团来援，以利歼击。望酌定为盼。

军委

铣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济汶，指山东济宁和汶上。

[4]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5]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韦吉兵团应不惜疲劳再打几仗[1]

（1948年7月16日）

粟、陈、唐、张（转管、丕[2]），并告韦、吉[3]，华东局，许、谭[4]，中原局：

各电均悉。韦吉兵团迭获胜利，甚好甚慰。该兵团需要补充休整也是完全对的。但须注意：（一）目前二十天至一个月内，应不惜疲劳与减员再打几个小的及中等的仗，在可能条件下争取攻占睢宁、灵璧及该区某些据点，控制徐蚌[5]以东、陇海以南广大地区于我手中，配合粟军威胁徐州，援助许谭夺取济南，不要马上进行休整。（二）韦吉兵团应以一个纵队长期位于苏中，受管、丕指挥，独力作战，韦吉则集中两个纵队在淮海[6]作战。此两纵队将来休整地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管、丕，指管文蔚、陈丕显，当时分别任苏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6] 这里的淮海是指江苏淮阴、淮安和海州（今属连云港市）之间地区。

应照粟电在淮海地区，不要去盐阜[1]。（三）我徐向前[2]同志所部三个纵队，于攻克临汾伤亡万五千人之后仅休息二十天，即北上作战，连续歼灭阎[3]军七个师（等于旅）又四个军部（等于整编师部），现尚包围敌两个师，又两个总队（略等于旅），又一个军部，又一个总指挥部于榆次以南正歼击中。向前所部仅一个纵队有二万余人，其余两个纵队各只一万余人，此次大战估计将伤亡万余。军委正令该军于完成榆次以南作战后，立即抢占太原飞机场，准备夺取太原。此种情形，望宣示干部，鼓励士气。

军委
午铣

---

[1] 盐阜，指江苏盐城和阜宁地区。

[2] 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襄阳太原济南各地战况及今后的兵源问题[1]

（1948年7月17日）

刘、陈、邓、邓，并告粟、陈、唐[2]，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西北局，彭、张、赵，徐、周，许、谭，杨、罗[3]：

铣酉篠辰两电[4]悉。襄阳攻克，康、郭就俘，胜利极大，甚好甚慰。删日徐周最后解决三十三、三十四两军，俘赵承绶沈瑞[5]。榆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粟、陈、唐，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赵，指张宗逊、赵寿山，当时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指周士第，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指1948年7月16日酉时和17日辰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报告了襄樊战役的战况，称襄阳残敌已于16日全部就歼，生俘国民党军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副司令官郭勋祺。

[5] 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山西保安副司令兼野战军总司令。沈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军军长。

之敌，逃入太原市。忻州之敌南逃，被我地方部队歼击中。晋源县[1]（即太原县）之敌，或逃或被解决，日内可明了。至此，阎锡山[2]仅剩太原市一个孤城，我军不日即可合围，可能提早解放该城。这样，将使我们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兵工和工业两大问题。许谭亦于删日最后歼灭十二师、八十四师，至此，王耀武[3]仅剩济南孤城，我军亦有提早解放该城之可能，使正太德石两路[4]和胶济通连，并使津浦路[5]由德州通至韩庄，许谭四个纵队即可加入南面作战。凡此几大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各线主力抓住了敌人主力，并大量歼敌，故能使侧翼战场顺利得手。你们补兵补枪问题，当从太原夺取后通盘解决，主要是俘虏兵，其次是晋中军区所属若干地方部队（豫北、冀鲁豫两区之地方部队，负有作战任务不能抽调），拟共补给你们二万左右人，一万左右枪，依太原胜利结果如何而定。太原夺取后，徐周兵团拟使用于夺取绥远[6]、宁夏，打通内蒙、东北和华北、西北联系。彭绍辉[7]所率晋绥地方旅拨归彭张赵。晋中地方部队则大部拨归你们。济南解放后，山东地方部队除酌量补充华野外，提议拨一万人一万枪补充刘邓（因刘邓在大别山作战部队大为削弱，四

---

[1] 晋源县，原名太原县，1947年6月更名晋源县，1951年并入山西太原市。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4] 正太德石两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今石太线）和德州至石家庄的铁路（石德线）。

[5]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6]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7] 彭绍辉，原任吕梁军区司令员，1948年7月改任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

个纵队不足六万人），请华东局筹划电复。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冀南、太岳会门活跃。肥乡（冀南）、遵化（冀东）发生地主领导的暴动。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明年是否扩一点兵，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今后各区扩兵，征税，编组新部队新兵团，供给标准，脱离生产人数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均须获得中央批准，方许施行，严禁各自为政，以利持久。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中央
午篠

许谭所部暂在现地待命[1]

（1948年7月17日）

粟、陈、唐，许、谭，并告中原局，华东局：

铣午粟陈唐电[2]悉。许谭所部暂在现地休息待命，看粟陈唐占领砀徐段[3]及他部击破徐蚌段[4]后，邱兵团[5]动作如何，再定是否提早攻击济南。

军委

篠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指1948年7月16日午时粟裕、陈士榘、唐亮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休整时间一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于打援中选择有利阵地，求歼邱兵团之大部或全部，均属可能。为求迅速攻占济南，必要时此间可抽出几个长于攻坚速决的部队参战（估计有半月时间即可）。只要济南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转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属极大可能。

[3] 砀徐段，指砀山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4] 徐蚌段，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5]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致香港分局电[1]

（1948年7月17日）

南方各游击区应执行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及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及中立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争取游击战争胜利，不应当过早实行分配土地的政策，致使自己陷于孤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香港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如不太困难应迅即抢占太原机场[1]

（1948年7月18日）

徐、周：

敌机十七日起由西安运鲁师[2]三十旅至太原，你们如不是太困难，应迅即抢占飞机场。

军委

午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的电报。

[2] 鲁师，指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师，师长鲁崇义。

变敌人的假和平运动为人民的真和平运动[1]

（1948年7月18日）

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另一方面，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但仍有极大顾虑。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一方面，坚决揭露敌人和平运动的欺骗性，使群众不被欺骗；另一方面，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其具体要求，应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美军及美国军事代表团退出中国，取消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卖国条约，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向人民承认发动内战的错误，惩办一切战争罪犯，取消伪宪伪国大及依据伪宪伪国大所成立的反动政府，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不包括反动派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取消特务机关，实行言论集会自由，反饥饿，反迫害，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这样将美帝和国民党的假和平运动，转变为人民要求真和平的运动，以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相配合，促进反动派瓦解崩溃的速度。在蒋管区提出上述口号时，应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平阴谋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依群众情绪及环境所许可的情况有所增减，酌量提出，并须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相配合，务使美帝和国民党更加孤立，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准备歼击可能北犯之敌是正确的[1]

（1948年7月20日）

彭、张、赵，并告贺、习，刘、陈、邓[2]：

皓午电[3]悉。关于胡[4]军行动，我们获得两种情报：一种是胡应蒋[5]求以两个至三个师出中原，并已集中潼关，因此昨电要你们准备和刘陈邓配合作战；另一种是分路进攻黄龙区，我们原来不大相信，如果胡宗南竟如此做，必是他不愿出兵中原宁可冒险北犯。不论他出哪一着均于你们有利，均可歼击获胜。你们首先准备歼击可能北犯之敌是正确的。洛川机关学校亦应待命迁移，惟实行迁移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7月19日午时彭德怀、张宗逊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胡宗南集中12个半旅北犯，企图声援解救太原之危。我拟集结一、二、三纵于石堡镇附近，首先消灭十七师，得手后再打三十师或三十八师。六纵集中韩城及以西，抗击三十八师。四纵主力拟南进秦关镇及其东南，小部吸敌向中部、洛川前进。请贺龙、习仲勋告延属、吕梁、晋南立即动员一批担架，洛川地委、专署、延大分校立即准备迁宜川。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蒋，指蒋介石。

可待到情况完全明了以后。准备担架则完全必要，因不论敌东进北进，你们不久均须作战。

军委
哿子

同意刘陈邓歼击胡琏一部[1]

（1948年7月20日）

刘、陈、邓：

皓申电[2]悉。你们争取歼击胡琏[3]一部是好的。惟粟陈唐张[4]所部甚为疲劳，又未补充弹药，未知能否调一三两纵向西参战。如有困难，则你们须准备独力作战。

军委

哿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1948年7月19日申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唐亮的电报。电报说：甲、白崇禧18日令胡琏指挥十八军、十师、八十五师向舞阳、叶县、鲁山进犯，胡琏行动可能系掩护胡宗南东进。照我军现在态势，以集中全力加上华野一、三两纵，先歼胡琏兵团一两个师为有利。打胡宗南很不顺手，拟于打胡琏后，再看情况对胡宗南作战。乙、请军委适时告以胡匪东援情况。请粟陈张令睢杞地区之一、三两纵第一步移至通许地区休整，并准备适时西进，参加这次战役。

[3] 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军长。

[4] 粟陈唐张，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参谋长。

询问一三两纵能否向西参战[1]

（1948年7月20日）

粟、陈、唐、张，并刘、陈、邓[2]：

胡琏[3]正向豫西进攻，刘陈邓准备歼击其一二个师。此战如胜利，估计可能调动邱黄[4]一部西进，有利于许谭[5]攻济南及你们主力之休整与补充弹药。一三两纵向西参加作战甚有必要。该两纵能否西移，盼告。

军委

哿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八军军长。

[4]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军军长。黄，指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5]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给德田球一的慰问电[1]

（1948年7月20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闻悉日本人民的领袖德田球一同志遭遇反动派的卑鄙暗害，极表愤慨，特向德田球一同志致以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7月19日在日本演讲时遇刺受伤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的慰问电。

林罗刘部应作好南进作战的各种准备[1]

（1948年7月22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午哿午养两电[2]均悉。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攻击长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7月20日和22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两份电报。前电说："最近东北局常委重新讨论了行动问题，大家均认为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我们意见东北主力待热河秋收前后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是再等一个月到八月中旬时，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首先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然后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的战斗。我军南下最大的困难是粮食的接济，但可以解决。在平绥线作战，则须要晋察冀方面有所准备。"后电说："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如中央同意七月二十日电的建议，在我们南下尚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围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以便我军能各个击灭敌人。凡五万人以下的守城的部队，我们均有歼灭他的把握；十万人的守城部队，只要不受大的增援威胁，我们亦有歼灭他的相当把握。因此，如能将傅作义调动一两个军向西去，我们就有可能全部歼灭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大同之敌的把握。"

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并且应向全军指战员首先是干部充分说明这些条件，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和坚定他们的决心。但在同时，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诸如粮食困难，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这些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你们高级领导方面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现在距八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必须加紧进行，否则八月间还不能在北宁、平承、平张[1]等线打响。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般方案电告。你们指挥机关似以先期南下和程子华、罗瑞卿[2]诸人会面为适宜。东北局应速加强冀热察辽区域的工作，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该区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

军委

养亥

---

[1] 北宁，即北宁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平承，即平承路，指北平至承德的铁路，今京承线。平张，即平张路，指北平至张家口的铁路，今京包线一段。

[2] 程子华，当时任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罗瑞卿，当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第一政治委员。

立即组织西进兵团向绥远作战[1]

（1948年7月23日）

聂、薄，转杨成武，并告杨、罗、耿[2]及林、罗、刘[3]：

（一）杨成武部在现地区之作战应于二十五日以前结束，全军主力撤至平保线[4]以西山地荫蔽休整，一部接近平保线休整。（二）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进兵团，担负向绥远作战之任务，此兵团组成为一纵全部、二纵两个旅、六纵两个旅，共三个纵队七个旅，杨成武为西兵团之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二十六日起至八月九日止共十五天，为休整时间，八月十日开始西进，取道大同以南，务于八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达归绥[5]附近，并相机夺取归绥，尔后相机向包头、五原、临河地区攻击，占领整个绥西产粮区，或向归绥以东机动，吸引傅作义[6]至少以一个军西援，以利东面之作战。（三）杨罗耿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治委员薄一波转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平保线，指北平（今北京）至保定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5]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本月底结束在现地之作战，即行休整至八月十五日为止，准备于八月二十日左右直接接受林罗刘的作战任务。（四）杨成武兵团从午宥起，直接受军委指挥，其后方补给由华北军区担任，晋绥军区协助之，并以晋西北为后方，并须准备长期在整个绥远境内作战。华北局应即组织一批地方工作干部随军西进。（五）六纵一个旅及七纵全部留平保线以西以南地区作战，受华北军区指挥。

军委

二十三日二时

致许世友、谭震林等电[1]

（1948年7月23日）

（一）按粟部情况目前难于进行作战，雨季又到，你们各纵应即进入休整，地点在大汶口、兖州地区，暂定一个月，分为两期，半个月为一期，期满情况许可再延长之。粟、陈、唐、张所部亦照此休整，韦吉部何时开始休整由粟、陈、唐、张规定令行。（二）休整完毕，或配合粟、陈、唐、张各纵在陇海南北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由粟、陈、唐、张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许世友、谭震林并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电的主要内容。

致徐向前、周士第等电[1]

（1948年7月23日）

马辰电[2]悉，计划甚好。全军应即进入休整及补充兵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徐向前、周士第并告华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2] 马辰电，指徐向前、周士第7月21日辰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电，内称：今后将进入攻取太原外围据点的阵地攻坚战。阎军外围据点工事，长宽各20公里左右，据点棋布，堡垒林立，且多洋灰作成，一般颇为坚固。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必须完成补充兵员、整顿组织、调整装备、后方准备、弹药准备及攻坚战术技术训练等工作。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是切实完成对太原的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部队休整及下一步作战计划[1]

（1948年7月26日）

刘、陈、邓，粟、陈、唐，并告许、谭[2]：

（一）雨季已到，你们决心进入休整是正确的。（二）休整时间应从午智起算，并照刘陈邓办法统一规定每十天为一期，到八月底为止，共四十天。此期内如有紧急情况发生，则随时结束整训进入战斗，否则坚持完成四十天计划。（三）此四十天内各部除训练及检讨教训外，必须完成人员和弹药两项补充计划。（四）四十天计划完成后，如有可能和必要，再由军委决定延长若干天，但你们现在不要准备延长，你们应在四十天内集中精力完成休整补充计划。（五）下一步作战任务，预定粟陈唐并统一指挥许谭歼灭第五军，刘陈邓主力则以寻歼张轸一个师以为配合，预计在九月上旬或中旬两处同时发起战斗，避免参差不齐失去主动和有效配合作用。此项作战计划，望于八月下旬作出报告军委决定。（六）为此目的，韦吉[3]所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

[2]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应于日内新安镇[1]附近之作战完毕后，立即进入休整。该部只有八月一个月休整时间，因此不要再打徐继泰[2]，以便该兵团于未东起就地休整三十天，即进入歼灭五军之配合作战。在歼灭五军之作战时，韦吉任务是钳制八师[3]、二十五师。

军委

宥酉

---

[1] 新安镇，今为江苏新沂县县治。

[2] 徐继泰，是苏北地区的国民党土顽军首领。

[3] 八师，似应为八十三师。

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1]

（1948年7月26日）

希望你们严格督促所属厉行报告制度，你们则应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中央的报告制度，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在审阅修改《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时加写的两段话

（1948年7月29日）

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早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的防御也已证明是失败了。他们所最后赖以抵抗解放军保存自己的设防城市与设防地带，在解放军攻坚能力大大提高的条件下，又已证明并在以后还要不断证明其失败。那末，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抵抗解放军的进攻和阻止解放军的胜利呢？他们的彻底失败，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

中国的革命是不能在一次武装及简单的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的，中国的反动势力是不会在一次或几次打击之下就能完全消灭的。中国人民虽然已经在广大的地区内，彻底消灭了反动势力，但是反动势力仍然在另外的广大地区内存在，而且他们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仍然还有他们一定的力量，并继续压迫那里的人民。因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只能是逐步地胜利，敌人的阵地只能一个一个地被夺取，反动势力只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消灭。因此，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战争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中国。

应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1]

（1948年7月30日）

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2]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3]。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4]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西面粮食极为困难，东面则是产粮区，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先打范汉杰是否有可能，望以你们意见电告。

军委

午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范汉杰，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锦州指挥所主任。

[3]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致周恩来电[1]

（1948年7月）

请电晋绥将杨澄源[2]迅即送交徐向前，放入太原和阎锡山办交涉。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杨澄源，原是阎锡山部晋西地区总指挥，1946年11月28日在隰县战役中被晋绥军区部队俘虏。

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

（1948年8月1日）

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诸先生，并转香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公鉴：

五月五日电[2]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

---

[1]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章伯钧，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马叙伦，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王绍鏊，当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理事会常务理事。陈其尤，当时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彭泽民，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李章达，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蔡廷锴，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谭平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郭沫若，当时为无党派人士，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2] 指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1948年5月5日从香港发给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的电报。电报谴责国民党政府“窃权卖国，史无前例”，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

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八月一日

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1]

（1948年8月1日）

沪局、港分局，并告克坚、汉年[2]：

据克坚午篠[3]电告，李济深、冯玉祥[4]想利用美国务院及司徒[5]促蒋下台，由李、冯主政，下令国军就地停战，不听命者以武力解决。据说此事李恐我港方人员幼稚，不便实告，乃改派人告克坚将此事转告中央，克坚表示我港方人员很好，应大家合作等语。另讯，冯将回国至港。据闻，李曾派彭泽湘[6]见司徒，要求倒蒋，司徒未同意。按美国务院政策，现仍以支持蒋介石反共为主，同时对蒋

---

[1] 这是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给上海局、香港分局的电报。

[2] 克坚，即吴克坚（1900—1986），湖南平江人。汉年，即潘汉年。他们当时分别是中国共产党派在上海、香港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情报工作的负责人。

[3] 午篠，即7月17日。

[4]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1948年7月底由美国启程回国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遇难。

[5] 司徒，即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当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6] 彭泽湘（1899—1970），湖南岳阳人。当时在李济深处帮助工作。

无能及老吃败仗感不满。为迫蒋让出更多权力，为准备在蒋军更加崩溃时能够团结反动统治各派并企图团结一部分中产阶级分子共同反共起见，又正在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其中包括对我党试探和谈的可能性。到蒋介石真正无法统治下去时，则准备以李宗仁、何应钦[1]等代替蒋介石。此时则希望与我党停战议和，以便取得喘息时间，重整兵力，然后卷土重来，消灭革命力量。在准备以李、何代蒋一点上，蒋及其死党是要反抗的，近日平、津、沪、宁一带所传出的和谣及翁文灏[2]的反共演说，都是这种反抗的表现。我们对于美帝这类阴谋是应当揭穿的，但对反动统治内部的分裂与倒蒋运动则应当利用，以促成他们间的更大分裂。我们对于李济深、冯玉祥一类中间派人士的倒蒋活动，不要无分析地一概反对，而应告诉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我们赞成倒蒋是因为蒋倒之后对于解放战争的开展有利，而不是对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有任何幻想。相反，应在人民中随时揭破美帝和反动派的阴谋，以免上当。望你们体会上述策略，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3]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作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中央
未东

---

[1] 李宗仁（1891—1969），广西桂林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何应钦（1890—1987），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2]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3] 章伯钧，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谭平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

杨成武部向绥远行动配合锦榆线作战问题[1]

（1948年8月3日）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2]：

本日杨成武[3]来中央面商向绥远行动问题，杨部（八个旅）本月二十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拟待你们在锦榆线[4]作战业已开始，杨罗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行动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即由涞源附近以二十天行程，主力到达归绥附近攻击归绥，一部袭取集宁、兴和，以配合你们之作战。杨罗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

军委

江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一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杨成武，原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此时准备就任正在组建的第三兵团司令员。

[4] 锦榆线，指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东北主力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的时间[1]

（1948年8月7日）

林、罗、刘：

鱼日十九时电[2]悉。绥远[3]为傅作义[4]所必救，不怕不能调动傅部向西，调动傅部是必然的。问题是傅作义自己有三个军及几个独立师，如果他以两个军及一二个独立师援绥，则杨成武[5]在绥难于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8月6日19时林彪、罗荣桓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估计傅作义发现我东北主力南下时，必采取放弃次要据点、集中主力守大城市的方针。二、我军应取调动和分散傅作义，以便歼灭傅部和夺取其所守城市，包括相机夺取平津之方针。三、为了将傅部调一两个军向西去，以便我军能在承德、张家口、保定和北平取得胜利，不宜由我们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北向东，而应由杨成武部先行动，调动傅作义向西，以便我们与杨罗部队开展战局。杨成武部能愈早出发愈有利。四、我们拟歼灭北宁线上五城之敌以后即攻承德。五、目前白城子、郑家屯、通辽等处河水猛涨，铁路桥梁多处被冲，因此还不可能开始向西运输粮食，须待来月五号后才能将桥梁修好。我们要在八月底九月上旬才能出动。但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足，因绥远及晋西北均粮缺，必须取得集宁归绥[1]两点才能解决粮食问题，过去两次入绥失败的教训不应忘记。不管你们何时开始攻锦榆线[2]，杨罗兵团[3]必须与杨成武兵团配合行动。兹规定杨成武兵团八月二十一日由涞源以东出动，九月十日左右向归绥集宁两点开始攻击，杨罗耿兵团须在九月十日以前以主力到达承德、北平线并开始攻击，另以一部向平张线[4]动作，配合杨成武兵团之作战，在这一阶段内杨罗耿受军委直接指挥。你们主力按上述两兵团行动时间规定自己出动及开始攻击锦榆线之时间，并预先报告军委。你们对上述规定如有意见，速即电告，否则即照此部署执行。

军委

七日十八时

---

[1]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2] 锦榆线，指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3] 杨罗兵团，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

[4] 平张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杨成武兵团应按原计划西进[1]

（1948年8月9日）

成武，并告李井泉，聂、薄、滕[2]：

你部八个旅并指挥姚喆纵队[3]，应于二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按原定计划于二十一日开始西进，九月十日左右以主力到达归绥[4]附近，并开始攻击归绥，以一部到达集宁、兴和附近，并开始攻击该两点，一切准备及行军注意荫蔽。井泉及姚喆应不失时机与成武会合。具体部署望考虑电告我们。

军委

未九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的电报。

[2]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政治委员。聂、薄、滕，指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姚喆纵队，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第八纵队，纵队司令员姚喆。

[4]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部队应迅速行动[1]

（1948年8月9日）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2]：

齐十七时电[3]悉。（一）杨成武部[4]已确定二十一日由涞源以东出动，以二十天行程（九月十日左右）到达归绥[5]、集宁附近，并开始攻击。（二）傅作义[6]自己所有的三个军（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及各个独立师均位平绥线[7]及北平附近，并未东去，随时可增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8月8日17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傅作义主力目前业已调至锦州、唐山之线，正便于我杨成武部向西袭击。因此我杨成武部能于日内即出发西进则更好，否则，亦以愈早出发为好。为了造成杨成武部能乘虚袭取归绥、集宁，决令目前在山海关西南之我十一纵，极力威胁山海关、唐山之线，以便吸引傅作义主力。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故目前还不能具体确定。

[4] 杨成武部，指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杨成武。

[5]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7]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归绥。我军是走路，敌人是乘车或空运，我军走路的二十天中可能被敌发觉，使援军先我或稍后到达。故杨罗耿必须向平古、平张[1]配合行动，并须先几天打响，才能保障杨成武攻占归绥、集宁。（三）你们所说的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是交给傅作义指挥的蒋介石部队，不是傅作义自己的。这些部队的中心任务是保卫平榆[2]、平古、平张、平保[3]诸线，只要杨罗耿向平古、平张行动，除九十二军外，均将迅速缩回。九十四军、十六军等部均在对付杨罗耿，且距锦榆线[4]极远，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线。九十四军并无到锦州讯，第八军王伯勋[5]部两个师（旅）由秦皇岛经上海到蚌埠，并无又回北宁线[6]消息，只有九十二军确到滦县一带，你们以一部钳制该军，决不会妨碍你们打锦榆。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军委
九日二十三时

---

[1] 平古，即平古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古北口的铁路，今京通（通辽）线一段。平张，即平张路，指北平至张家口的铁路，今京包线一段。

[2] 平榆，即平榆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3] 平保，即平保路，指北平（今北京）至保定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4] 锦榆线，指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5] 王伯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军长。

[6] 北宁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目前宜在渭北打胡宗南

（1948年8月11日）

德怀[1]同志：

歼灭三十六师甚慰。目前如我军尚有余力，敌三十八师等部又有歼击机会，则可于休息数日后再打一仗，否则应即收兵休整若干天，然后再在渭北寻机歼敌。渭北是产粮区，东起黄河，西至淳耀[2]，正面颇宽，敌军摆成一线利于我各个攻歼。在渭北专门打胡[3]，陇东马[4]部不一定增援；若向西打马，则胡必增援。在渭北再歼几部胡军，对于抑留胡部在陕不向中原进犯，又是一大利益。故我们认为目前一个较长时期，宜在渭北打胡，待渭北大体肃清或虽未肃清但已不好再打之时，即可集中全力打马。是否可以如此，盼复。

毛泽东

未真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淳耀，指陕西淳化和耀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马，指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同意杨罗耿兵团行动计划[1]

（1948年8月11日）

杨、罗、耿，并告成武[2]：

十日十九时三十分电悉。（一）同意你们的行动计划，以全力于二十号左右先打小营石匣古北口[3]，求得歼灭三点敌人，吸敌主力于古北口附近，然后你们西进，九月初在平张线[4]打响，阻敌西援，以利成武在绥远[5]得手。（二）你们所说最好有两至三个纵队作战，查你们手里原有七个旅，当然应全部西进。程子华[6]拨给你们指挥之两个旅是否亦应西进，由你们依情况酌定。至于十一纵则应留在冀热[7]边，不要西进。北张线[8]以北地区粮食缺乏，不宜集中太多兵力。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成武，即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3] 小营，位于河北滦平县东北。石匣，旧镇名，位于北京密云县北部，解放后修建密云水库时作为库区而消失。古北口，长城隘口，位于北京密云县东北。

[4] 平张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5]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6] 程子华，当时任冀热察辽军区司令员。

[7] 热，指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8] 北张线，即平张线。

们有詹大南[1]部配合，兵力是够用的。

军委

十一日十三时

---

[1]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代司令员。

务必抓住可能从东北大量转移之敌[1]

（1948年8月12日）

林、罗、刘：

十一日十一时电[2]悉。关于敌人从东北撤运华中之可能，我们在你们尚未结束冬季作战时即告诉了你们，希望你们务必抓住这批敌人，如敌从东北大量向华中转移，则对华中作战极为不利。关于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8月11日11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1. 我们前几天得的消息说，九十四军增加到了锦州，第八军已回到了唐山以北。但近日又得到这样的消息说，在锦州之五十四军要开往山东。昨日合众社广播中说，范汉杰部将增援华中。又据报，沈阳敌人七月二十九日起宣布戒严，承德敌第四师有开古北口的消息。据以上情况看来，敌人是将作新的行动，但其具体情况与企图不明，正继续侦察中。如敌人不是打通沈锦路，则也有可能从锦州附近调兵增援华中。2. 东北主力数月来均未作战，指战员均甚急迫要求作战，部队随时皆可出动。但在现在地区，无战机可求，南下则因大军粮食的需要无法解决。向热河运粮，道路甚远，必须利用铁路、汽路。但今年雨水之大，为三十年来所未有，铁路、汽路冲毁甚多，近日来雨势更猛。原估计八月十五日左右可修好铁路、汽路、桥梁，以现在雨势来看，能否如期完成仍无把握。我们现在只待郑家屯南北运粮道路修复，雨势稍减（因全军皆无雨具）即可随时出动，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但目前对出动时间，仍是无法肯定。"

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而你们所以不能决定出动日期的原因，最近数日你们一连几次来电均放在敌情上面，并且因此又均放在杨成武是否能提早出动上面。你们六日十九时电，虽曾提到粮食问题，但是你们说“如杨成武部出动时间能提早，则我们出动时间亦能提早”。你们八日十七时电，则全未提到粮食问题，但说敌情严重，并作出结论说“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才能确定”。当着我们向你们指出不应当将南面敌情看得过分严重，尤其不应当以杨成武部之行动作为你们行动的标准，并且同时即确定了杨成武的行动时间以后，你们却说（相距不到三天）“决不以杨成武部行动之迟早为标准”，而归结到了粮食问题。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傅作义东面顾虑甚少，使用大力援绥，将杨成武赶走，又回到东边来对付杨罗[1]及你们，如像今年四月那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你们对于杨成武部采取这样轻率的态度，是很不对的。对于北宁线上敌情的判断，根据最近你们几次电报看来，亦显得甚为轻率。为使你们谨慎从事起见，特向你们指出如上，你们如果不同意这些指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

军委

未十二日六时

---

[1]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

（1948年8月12日）

粟、陈、唐、张[1]，并告许、王、谭[2]，华东局，中原局：

灰日四时电[3]悉。你们所提三个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待你们和许、王、谭会商提出更接近实际的意见以后，再正式答复你们。现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感想，作为你们会商时的参考材料。

（一）九月作战，预计结果有三种可能。第一，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你们所说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五军等部大部分援敌。

---

[1] 粟、陈、唐、张，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和副参谋长。

[2] 许、王、谭，指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许、谭，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王建安（1908—1980），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

[3] 指粟裕、陈士榘、唐亮、张震、钟期光1948年8月10日4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华东野战军结束雨季休整后的3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是集中全力转到豫皖苏及淮北路东地区作战，截断徐蚌段铁路，孤立徐州，将重点放在打援上，求得于运动中首先歼灭五军，继而扩大战果，歼击其他兵团。第二方案是集中主力攻占济南，对可能北援之敌，仅以必要兵力阻击。第三方案是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有重点地配合与使用兵力。战役第一阶段，以两个纵队抢占济南机场，同时以其余11个纵队打援，歼灭援敌一路或两路。第二阶段，以一部阻击而将主力转到攻击济南。电报认为，以执行第三方案为最好。

第二，打一个大的但不是极大的歼灭战。这即是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援敌。第三，济南既未攻克，援敌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寻战机。

（二）你们第三方案之目的，是为了争取第一种结果。其弱点是只以两纵占领飞机场，对于济南既不真打，而集中十一个纵队打援，则援敌势必谨慎集结缓缓推进，并不真援。邱、区[1]兵团之所以真援开封，是因为我们真打开封，敌明确知道我是阻援，不是打援，故以十天时间到达了开封。如果你们此次计划不是真打济南，而是置重点于打援，则在区兵团被歼、邱黄[2]两兵团重创之后，援敌必然会采取（不会不采取）这种谨慎集结缓缓推进方法。到了那时，我军势必中途改变计划，将重点放在真打济南。这种中途改变计划，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好，但丧失了一部分时间，并让敌人推进了一段路程，可能给予战局以影响。

（三）在一个条件即是在使用许谭全力而不要其余各纵参加，或者即使参加也只是个别的师，至多不超过一个纵队的条件下，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即采取你们第二方案，争取上述第二项结果。我们觉得这样做比较稳当，比较能获结果。因为此次作战，是在区兵团主力被歼，邱、黄又受重创，二十五师后撤的情况之下，虽然新来了八师、六十四师，至多只能抵上区兵团主力之被歼及二十五师之后

---

[1] 邱，指邱清泉（1902—1949），浙江永嘉人，当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五军（1948年9月扩编为第二兵团）军长。区，指区寿年（1902—1957），广东罗定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1948年7月在豫东战役中被俘。

[2] 邱，指邱清泉。黄，指黄百韬（1900—1948），原籍广东梅县，生于天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毙命。

撤，你们集中六至七个纵队不但能阻住援敌于适当地区，而且能歼灭其一部分，至少能保障攻克济南。这就是我们所想的攻城打援分工协作计划。

（四）不管你们采取第二方案或者第三方案，在兵力部署方面，叶飞[1]所指挥的三个纵队，应于本月下旬结束整训，北移嘉、巨[2]地区。已经在北面之各纵及正在移动中之第三纵，则应适时位于兖、济[3]或其以南地区。即是说，除韦吉[4]之五个旅可以临时决定参战位置外（该部似以担任攻击徐蚌段为宜），一切正规兵力均应位于正面，先求阻击，然后寻机歼其几部。而不要企图以叶飞三个纵队尾邱、黄之后，作夹击邱、黄之部署。如果你们是企图打援，则邱、黄决不分散走两路而让你们夹击其一路。那时敌之部署，极大可能是以一部位于运河以西（例如金乡）以钳制我军一部，而以主力沿津浦路北进援济。或者相反，以一部扰击津浦路，而以主力沿运西北上援济。因此，我军必须事先夹运而阵，并构筑几道防御工事，以便随时转移兵力于运东或运西阻击与歼灭敌援。

（五）粮食是极大问题，你们到兖、济开会，华东局及冀鲁豫均应派负责干部参加协筹粮食及其他问题。

军委

十二日十九时

---

[1] 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2] 嘉、巨，指山东嘉祥和巨野。

[3]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4] 韦，指韦国清，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吉，指吉洛，即姬鹏飞（1910—2000），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副政治委员。

致各野战军、各军区等电[1]

（1948年8月14日）

我们希望一切野战兵团及一切后方军区均有这样内容充实有分析有结论的报告。但是在军队中对于重要的训练计划和作战计划、训练经过和作战经过、政策教育和执行政策经过等重大事项，事前既不请示，事后又不报告，仍然将自己所指挥的野战兵团或军区机关部队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对于中央发动党内反对这种无纪律状态的危险倾向，仍然没有认真的检讨和反省这样一种现象，是还没有完全消灭的。我们现在向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们提出警告，在战争第三年内，我们将要求你们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将这件事作为一种绝对不允许违反的指令。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各野战军、各军区及各中央局、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1948年8月15日）

吴玉章[1]同志：

未元电[2]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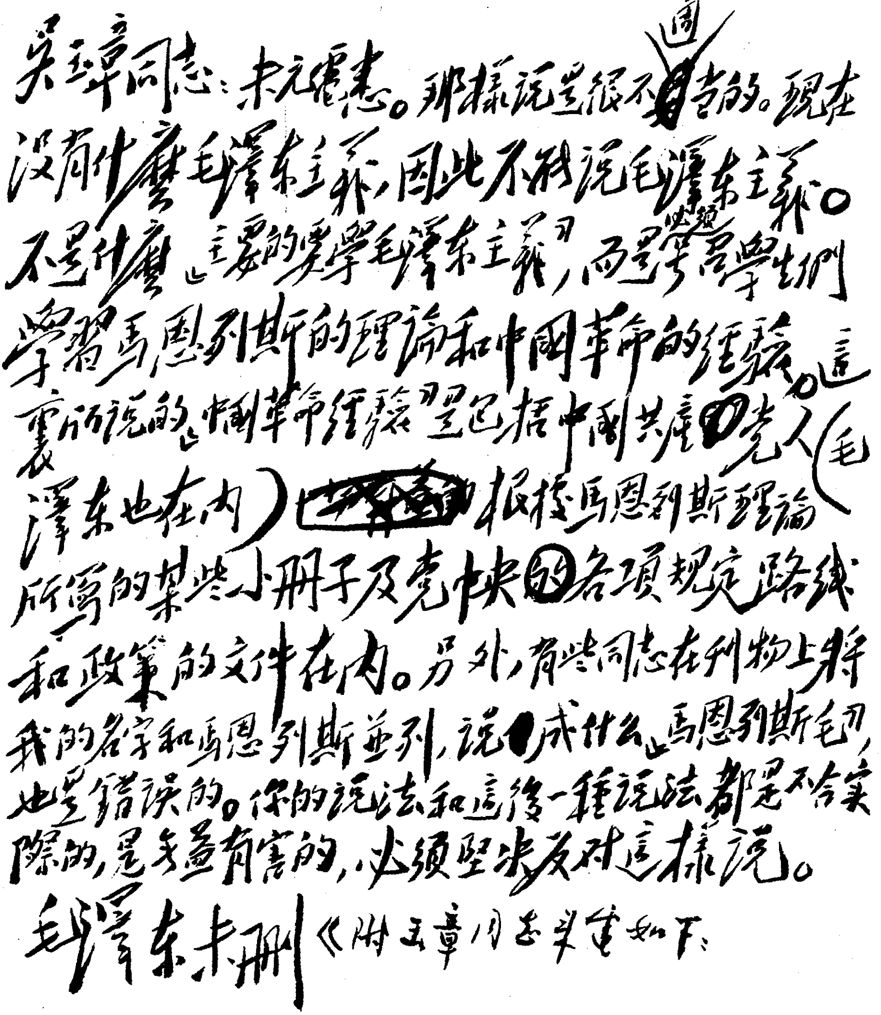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未删

---

[1]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2] 指吴玉章1948年8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对这样的提法“是否妥当”，请周恩来“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吳玉章同志：來電悉。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麼毛澤东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东主義。不是什麼"主要的要學毛澤东主義"，而是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裏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东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並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後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实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决反对這樣說。

毛澤东 卅

《附玉章同志來電如下：

毛泽东致吴玉章电的手稿。

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需要刘陈邓有力配合[1]

（1948年8月15日）

刘、陈、邓：

你们直属各纵新兵、弹药补充情形如何？九月华野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需要你们的有力配合，望对你们直属各纵九月作战计划预先筹划，于月底以意见电告，再则望将大别山敌我情况见告。

军委

未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不要过早引起傅作义西援[1]

（1948年8月16日）

杨、罗、耿：

十六日电[2]悉。东北主力因雨阻要本月底或下月初才能出动。杨成武部[3]出动过早，傅[4]敌以大力西援，杨部可能达不到目的。你们此次打平古[5]是为引退遵化之敌的临时性行动。若为配合杨部，则过早将敌引至平绥线，实为不利。我们意见，你们歼灭石匣、小营[6]、古北口之敌后，应在该线休整。如敌进迫，则稍向东撤。待杨部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指1948年8月16日杨得志、罗瑞卿和耿飚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主力已进入平古以西，三兵团行动按我们意见应该提早，而他们反要推迟，这将使我们更困难。主要是没有饭吃，热西完全无粮，冀热察粮食全部只能供给十天，再退回冀东也不好。而且我们一进入平北，傅作义必将主力塞在平古南段或平绥东段，因而增援西面快，对于他们行动亦不利。"

[3] 杨成武部，指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杨成武。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平古，即平古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古北口的铁路，即今京通（通辽）线一段。

[6] 石匣，旧镇名，位于北京密云县北部，解放后修建密云水库时作为库区而消失。小营，位于河北滦平县东北。

归绥[1]、集宁打响之前数天，再向西行动，那时军委将另有命令。

军委

十六日二十一时

---

[1]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不要过早引起傅作义西援[1]

（1948年8月16日）

杨、罗、耿：

十六日电[2]悉。东北主力因雨阻要本月底或下月初才能出动。杨成武部[3]出动过早，傅[4]敌以大力西援，杨部可能达不到目的。你们此次打平古[5]是为引退遵化之敌的临时性行动。若为配合杨部，则过早将敌引至平绥线，实为不利。我们意见，你们歼灭石匣、小营[6]、古北口之敌后，应在该线休整。如敌进迫，则稍向东撤。待杨部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指1948年8月16日杨得志、罗瑞卿和耿飚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主力已进入平古以西，三兵团行动按我们意见应该提早，而他们反要推迟，这将使我们更困难。主要是没有饭吃，热西完全无粮，冀热察粮食全部只能供给十天，再退回冀东也不好。而且我们一进入平北，傅作义必将主力塞在平古南段或平绥东段，因而增援西面快，对于他们行动亦不利。”

[3] 杨成武部，指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杨成武。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平古，即平古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古北口的铁路，即今京通（通辽）线一段。

[6] 石匣，旧镇名，位于北京密云县北部，解放后修建密云水库时作为库区而消失。小营，位于河北滦平县东北。

归绥[1]、集宁打响之前数天，再向西行动，那时军委将另有命令。

军委

十六日二十一时

---

[1]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处理占领城市工厂职工人员问题致东北局电时加写的话

（1948年8月19日）

在占领城市时，除持枪抵抗及实行破坏的人们必须逮捕外，一切其他的人包括国民党的重要官吏在内，均不要由军队逮捕。应待秩序安定方可由民主政府分别情况考虑逮捕那些重要官吏和最反动的分子，务必避免多捕滥捕。

综合报告十分必要[1]

（1948年8月20日）

八月十五日你的综合报告收到，甚慰。此种综合报告和各个具体问题的个别报告，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必须有此种报告，并要有多次此种报告之后，才能使我们看得出一个大战略区的全貌。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

---

[1] 这是毛泽东复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执行报告制度的重要性

（1948年8月22日）

东北局：

未皓电悉。你们这次检讨是有益的，这样，你们就可以脱出被动状态，取得主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像你们现在所作的这种认真的自我批评，就不可能脱出被动，取得主动，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适用于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某种严重地存在着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克服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各部门各党委（首先是军队）同样存在着的这种不良现象。不但你们应当作此种自我批评（你们已经作了），一切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均应当作此种自我批评（他们还未作）。你们未皓电所指出的缺点及错误，他们及他们所属是大体上同样存在着的。因此我们决定将你们未皓电及中央本电转发给他们，并要求他们就此问题作一次正式检讨。这一问题的性质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一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中央现已起草了一个关于具体规定报告制度的决议[1]，待饶、邓、贺、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这个决议于1948年9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徐、薄、聂[1]诸同志到齐共同讨论后，即可发给你们及各地。你们起草的工作制度与报告制度文件，望早日发来。

中央
未养

---

[1]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薄，指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

关于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问题[1]

（1948年8月22日）

粟、谭、陈、唐：

智申电[2]悉。（一）关于攻济及打援的作战计划由你们会商电告。（二）关于作战时间，提议在申删以前完成有关攻城及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申删左右开始攻城，御援及打援部队申删以前进入指定阵地。（三）申删以前及申删以后两个月（包括作战及战后休整）共约八十至九十天，全军粮食、草料必须筹备齐全。（四）由临城[3]至大汶口[4]及由金乡至汶河两条敌援道路上，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要有多道防御阵地，要能在临城至兖州间、金乡至济宁间阻止敌援二十天以上，打援歼灭战似应预定在兖州附近地区。（五）叶飞[5]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

[2] 指1948年8月20日申时粟裕、陈士榘、唐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西兵团各部除三纵已至金乡、嘉祥地区，野司直机关已至济宁东北地区外，均在原地休整待命。在陇海路南之一、四、八纵因考虑过早北移，易引起敌警惕，空运加强济南守兵，反影响下一战役行动，拟决定行动后，同时北移。

[3] 临城，即今山东枣庄市薛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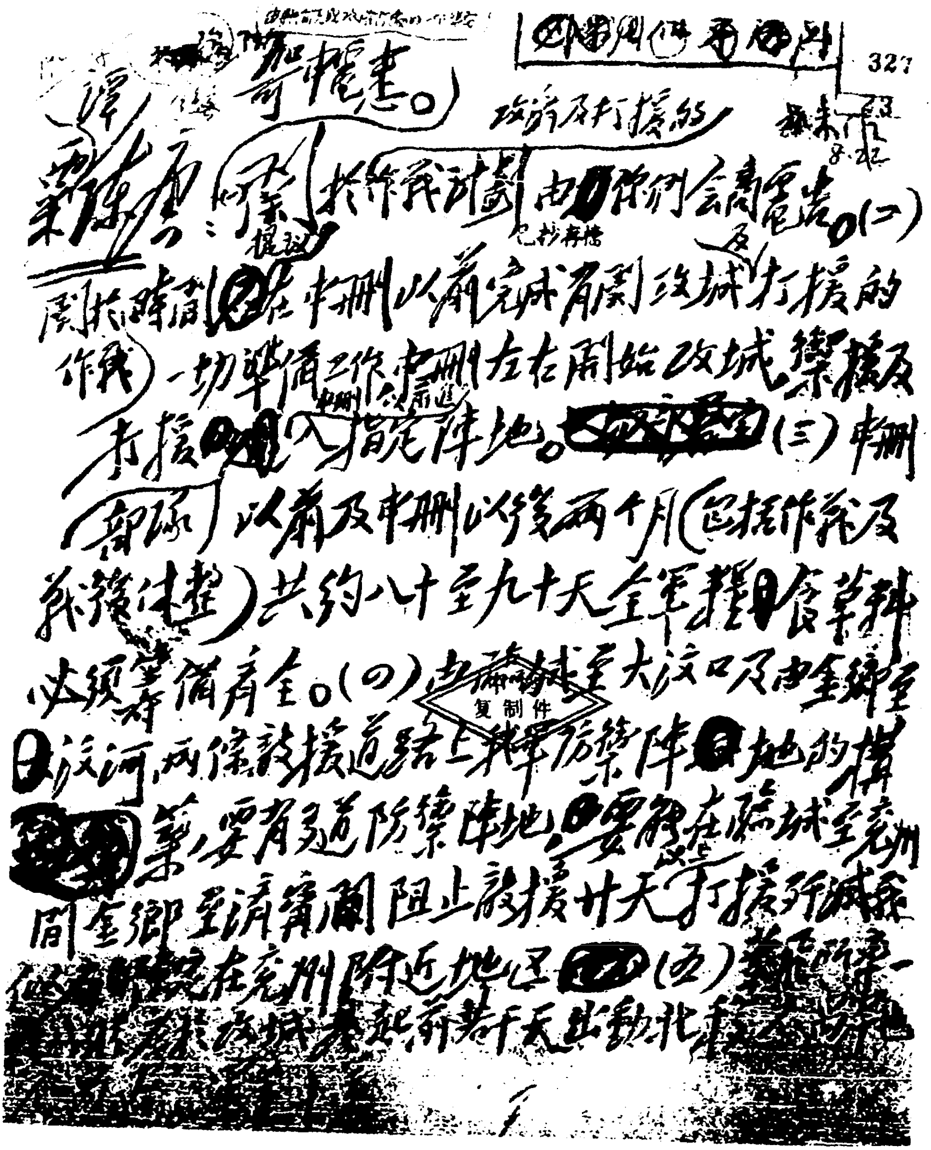
[4] 大汶口，镇名，位于山东泰安市南部。

[5] 叶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率一、六、八纵应于攻城发起前若干天出动北移，不过早也不过迟。

军委

未养



加寄饶黎。

粟陈唐：（一）关于作战计划由陈谭会商电告。（二）关于时间：在中秋以前完成有关攻城打援的作战一切准备工作，中秋左右开始攻城，攻济及打援部队进入指定阵地。（三）中秋以前及中秋以后两个月（包括作战及战后休整）共约八十至九十天全军粮食草料必须筹备齐全。（四）由济城至大汶口及由金乡至汶河两条敌援道路上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要有多道防御阵地，要能在济城至兖州及金乡至济宁间阻止敌援廿天，打援歼灭敌人在兖州附近地区。（五）[illegible]于攻城发起前若干天出动北[illegible]

复制件

毛泽东致粟裕等电的手稿。

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稿时加写的话

（1948年8月22日）

无论反动派如何疯狂镇压，只要我党能有清醒的头脑，灵活的策略，并坚决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我们是一定能够对付反动派的进攻，保持并发展自己的阵地的。

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指示[1]

（1948 年 8 月 23 日）

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克服自己及自己属下的经验主义、游击主义、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仿照东北局办法，在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一次至几次会议上加以认真检讨，实行自我批评，规定克服办法，仍有完全必要。不能因为作几次综合报告，就不检讨这个长期在党内首先在各高级领导机关内存在着尚未解决仅在近来才开始认真解决的关系重大的问题。

你们对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不论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评，亦请提出。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要求各地改进向中央作综合报告的工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及前委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同意调韦吉兵团主力参加济南战役[1]

（1948年8月24日）

粟、谭、陈、唐：

梗午电[2]悉。（一）同意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及打援战役，酌留三十三旅、三十四旅在苏北。该兵团北移时间不可过早，免使敌警觉先我集中。（二）你们对于济敌坚守程度及攻克快慢之估计望告。

军委

敬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

[2] 指1948年8月23日午时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唐亮就调苏北兵团主力参加攻济南战役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济南有敌7万余人，近又调部队空运济南，因此攻济必须加强兵力才能奏效。建议将苏北兵团全部（除三十四旅）调来参加此次大战役。如感到苏北必须留适当部队，则以三十三旅留苏北亦可。

致杨成武、李天焕电[1]

（1948年8月25日）

我东北主力可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九月六号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你们接电后应即开始出动，按原计划向绥远进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杨成武、李天焕电的主要内容。李天焕，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济南作战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战胜敌人[1]

（1948年8月26日）

粟、谭、陈、唐：

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下，即应临机改变作战计划，由以攻城为主，改变为以打援为主，在打胜援敌后再攻城。估计到这一点，在你们将全军区分为攻城集团和阻援打援集团之后，两个集团均应留出必要的预备兵力，特别是阻援打援集团应留出强大预备兵力，准备在第三种情况下，你们手里有足够力量歼灭援敌。为达此种目的，你们应着重多道坚固阻援阵地的构筑，以便一方面节省阻援兵力，不使自己的大量兵力消耗和疲劳于阻援作战之中，另方面使敌大量消耗于我阻援阵地之前。弹药的使用及储备，粮秣的筹集，均须和上述要求相适应，即要注意在第三种情况（最困难的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只有在你们预先准备好了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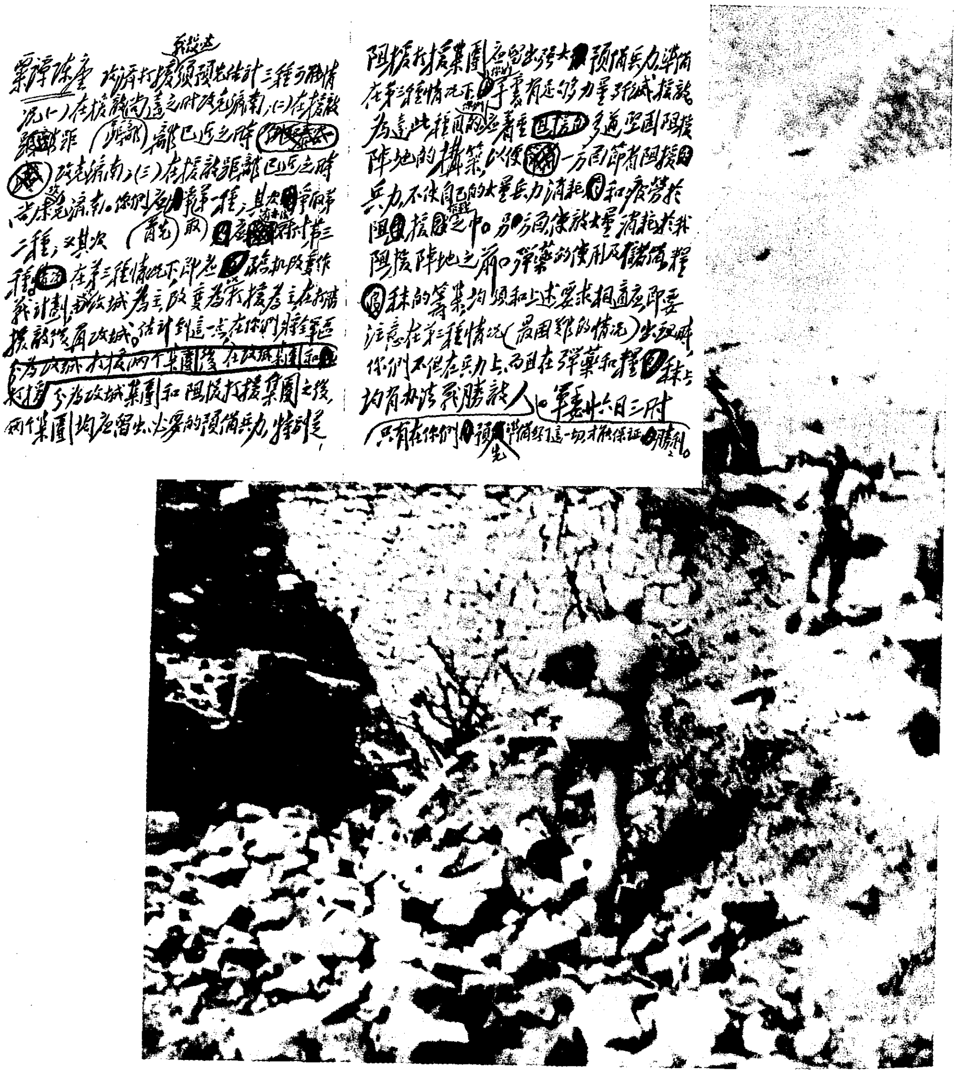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

才能保证胜利。

军委

二十六日三时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了济南战役，大决战拉开序幕。图为毛泽东关于济南战役的指示电和解放军突破济南城垣。

在中共中央致上海局、香港分局等电上加写的话

（1948年8月27日）

你们必须注意，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集中最大兵力阻援与打援[1]

（1948年8月28日）

粟裕同志：

感晨电[2]悉。此役关系甚大，根据敌我两方情况，你的顾虑是有理由的。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我们二十六日三时电[3]所说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攻克济南之时间不能预先只规定一种，而应预先规定三种，即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这三种时间中，我们固然要争取第一种，其次是第二种，但这在战役发起之前只是一种理想，是否能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8年8月27日晨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关于攻占济南，原建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达到吸引援敌之力量（约2至3个纵队）使用于济南方面外，其余应全部使用于打援，以求于第一阶段歼援敌6个旅，迫使援敌其余各路不敢继续猛进。然后于战役第二阶段，集中主力（东兵团全部及西兵团3至4个纵队）攻占济南，仅以一部担任阻援，为此才能争取攻济时间，才能保证打援无问题。顷奉军委26日3时电令后，拥护军委电示作战原则，发动硬攻，尽量争取第一种前途，避免第三种前途。但鉴于敌我情况之变化及此役关系战局及政局甚大，可否本稳打方针采取上述两阶段作战方案，但我们当尽一切努力以迅速夺取济南为唯一目的。

[3] 即《济南作战应准备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战胜敌人》。

现要依攻击过程中敌之防御能力如何才能确定。或者二十天左右即可攻克，这样我阻援兵团是有把握阻得住援敌的（包括歼敌一部分）；或者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攻克，这样我必须歼灭援敌几个旅，虽然不一定是六个旅，但歼其三至四个旅是完全必须的，否则就不能阻住援敌，我攻济必功败垂成。但最重要者是一个月左右还不能攻克济南，必须大量歼灭援敌，例如六个旅、八个旅或更多些，根本停止了援敌前进，给我以所需要的一切攻城时间，例如一个半月，两个月，或更多些（打临汾曾费去七十二天）才能克城，你们的根本出发点应放在这种情况上。我们不是要求你们集中最大兵力，不顾一切硬攻济南，这样部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要求你们的是以一部兵力真攻济南（不是佯攻，也不是只占飞机场），而集中最大兵力于阻援与打援。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故我们于十二日十二时电要你们只用东兵团攻城，至多再加个别的师或一个纵队，而用其余全力阻援及打援，二十六日三时电则要你们不但在阻援打援方面留出强大后备兵力，就在攻城方面亦须如此，以便在必要时机集中全力先歼援敌，因不真攻济南，则援敌必不来。攻城使用兵力太大，则打援又无力量。在此种形势下同意你的意见，第一阶段以足够攻占机场及吸引援敌之力量（两至三个纵队）用于攻城，其余全部用于打援。依情况发展，如援敌进得慢，而攻城进展顺利，又有内应条件，则可考虑增加攻城兵力，先克城，后打援；如援敌进得快，则应以全力先打援，后攻城。

军委

俭丑

刘邓各纵似以待机歼敌为有利[1]

（1948年8月28日）

粟、谭、陈、唐：

关于刘邓[2]各纵配合你们九月作战，他们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以一部兵力出襄樊，歼灭守敌，调动张轸[3]往援，我主力截歼其一部，但杨干才[4]依靠七师、四十八师、二十八师往援襄樊，可能调不动张轸。我主力与桂系接战，使张轸集团很自由应援南北，于我不利。第二，佯攻南阳，吸引张轸增援，而于运动中歼灭其一部，或在张轸援宛[5]中、孙元良[6]向禹襄[7]出动时（有可能），歼击孙军。第三，在孙元良军因济徐[8]吃紧而东援时，以一部出武胜关[9]，吸引张轸南顾，而以主力攻歼郑州之敌。第四，在济、徐吃紧，张轸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

[4] 杨干才，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官兼整编第二十师师长。

[5] 宛，河南南阳的古称。

[6]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7] 禹襄，指河南禹县和襄城。

[8] 济徐，指山东济南和江苏徐州。

[9] 武胜关，关隘名，位于河南信阳县南部，为河南、湖北交通要冲。

援，不得已而必须钳制时，则应采取进攻的手段，在平汉[1]中段割歼其一部。总之，我刘邓、陈谢[2]两部应担任对张轸、杨干才、孙元良三部之钳制，并寻歼一部，自应以对张轸集团为主要对象。以上意见仅作初步研究，提供军委于决定新作战时之参考等语。我们认为，依据刘邓各纵本身情况及对付张轸、孙元良各部之任务，似以按兵不动，待你们大打，济、徐吃紧，张轸、孙元良被迫行动，然后于运动中发起攻击，歼敌一部，再歼二部三部，较能保持主动。若和你们同时动作，一击不胜，反为不利。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军委
俭申

---

[1]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致电哀悼日丹诺夫同志病逝[1]

（1948年9月1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大林同志：

惊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日丹诺夫同志逝世，不胜痛悼特电致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日丹诺夫逝世给斯大林的唁电。

相机夺取归绥集宁等城[1]

（1948年9月2日）

杨、李，并告井泉，杨、罗、耿，林、罗、刘，黄、程[2]：

（一）你部确定于申微（五日）由现地出发，照你们所定计划分路隐蔽前进，主力以二十二天左右，一部以二十天左右分别到达归绥[3]、集宁附近，并相机夺取两城及附近各城。（二）我林罗刘及杨罗耿所部，当于你们到达目的地以前在东面击敌，以配合你们。

军委

二日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的电报。

[2] 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政治委员。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黄、程，指黄克诚、程子华，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和司令员。

[3]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同意攻济及打援之部署[1]

（1948年9月2日）

粟、谭、陈，并告华东局、中原局：

完全同意八月三十一日电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军委

九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参谋长陈士榘的电报。

同意刘陈邓攻打熊绥春的部署[1]

（1948年9月2日）

刘、陈、邓，并告粟、谭、陈[2]：

我们冬丑电[3]发后接你们东亥电[4]，我们同意你们打熊绥春[5]之部署。此役能胜，就是给粟谭陈一个大帮助。打法，以主力不失时机抓住熊绥春歼击为最好，对十一师及南阳方面则以次要兵力钳制之。注意准备时间及开进时间的机密隐蔽，否则将惊走敌人达不到目的。此役结论可能有三种：（一）全部或大部歼灭熊绥春三个旅，因此吸引北面之三师、十一师，南面之二十八师、四十八师等部集中于确山一带对我。（二）因打得不好，仅歼熊绥春一部（例如一个旅），结果亦将吸引三师、十一师或再加二十八师集中信确[6]一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粟、谭、陈，指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9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刘伯承、陈毅、邓子恢的电报。电报要求刘陈邓精心组织歼灭国民党军熊绥春部的战役，并说如能在9月15日前后完成歼敌任务，就是对华野作战的极大帮助。

[4] 指1948年9月1日亥时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关于准备歼击泌阳、唐河间之熊绥春部或春水地区之十一师一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5] 熊绥春，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十师师长。

[6] 信确，指河南信阳和确山。

但不会吸引更多敌人。（三）因事前泄漏机密惊走敌人，或因打得很不好形成对峙，连一部敌人也不能歼灭，结果只能吸引十一师或再加三师稍为向南移动一点，于大局无变动。不论此役结果如何，你们均必须准备在那时将主力各纵迅速移至许漯[1]附近待命，准备在粟谭陈方面出现困难情况时向豫东前进，一则使刘峙[2]感受威胁，二则使孙元良刘汝明[3]不敢东援，三则（这是主要的）调动三师、十一师、十师、八十五师等部于运动中歼其一部。粟谭陈方面出现可能的困难情况的时间大约在十月，那时你们必须精心筹划策应办法，以援助之。因此，在九十两月或者甚至还有十一月的上半月，你们所率直属各纵必须准备连续行动和连续作战，这一点望向各纵干部预先讲清楚，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弹药、粮食、医药等项之使用及储备，均须和此项要求相适应。

军委

冬申

---

[1] 许漯，指河南许昌和漯河。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密切注视刘峙向济南空运兵力[1]

（1948年9月2日）

粟、陈、唐：

据韦吉[2]称，他们定于冬日开始北移，你们是否亦令叶飞[3]所部同时北移。当该两部北移越过陇海路以后，刘峙[4]可能再以一部兵力空运至济南，你们须密切注视此种可能情况，并预先考虑当发现此种情况时，是否提前发动攻占机场。

军委

申冬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电报。

[2]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叶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1]

（1948年9月2日）

【新华社陕北二日电】新华社奉命声明：七、八月间国民党统治区域某些报纸刊物上所登载的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2]的信，完全是蒋帮的捏造。根据可靠情报，当蒋帮的军事失败愈益明显，特别是在开封及豫东作战中遭受惨败以后，某些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蒋帮的作战能力表示愈益丧失信心，企图利用李宗仁[3]、何应钦[4]、宋子文[5]等反动军阀政客，于蒋帮更加失败无法维持时，以和平的假面具欺骗中国人民，代替蒋介石继续反对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美帝国主义者的这一阴谋，使蒋介石嫡系尤其是CC系[6]感到恐慌，乃由国民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声明。

[2]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北平进行谈判。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留驻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3]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任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1965年7月回到北京。

[4]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5] 宋子文，当时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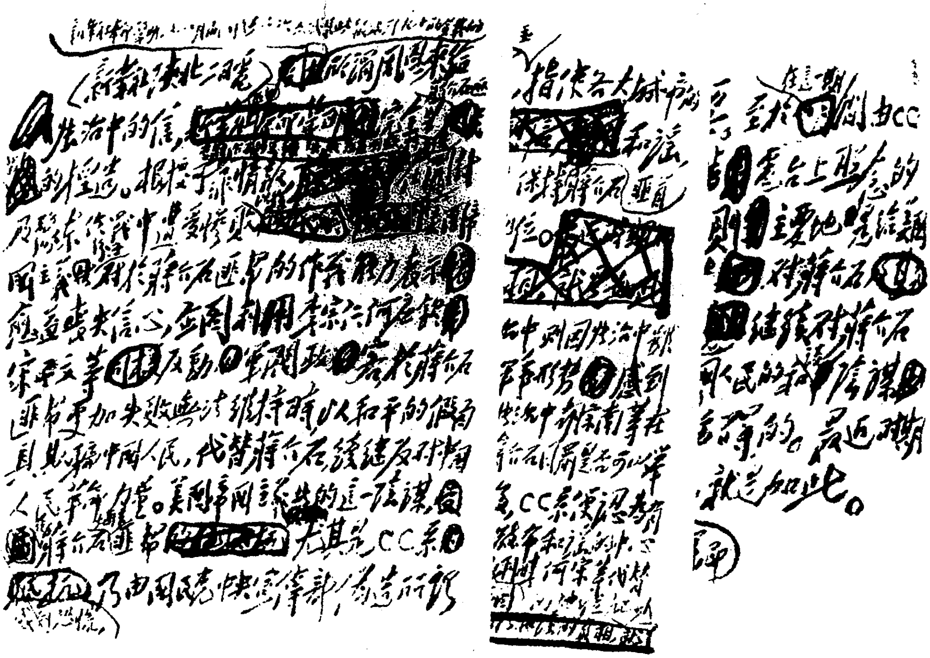
[6] 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组织“中央俱乐部”（即CC），控制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的特务系统。国民党的这一特务势力，被称为CC系。

党中央宣传部伪造所谓周恩来给张治中的信，发给各省市党部，并指使各大城市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散布和谣，藉此给李、何、宋等以打击，以便团结内部，保持蒋介石的地位。若问CC系为什么要打击张治中，则因张治中虽然忠于蒋介石，却对蒋介石的军事形势感到忧虑。当六月下旬蒋介石召集张治中、胡宗南[1]等在西安开会时，张治中曾探问蒋介石目前是否可以举行和谈。这句话泄露出来以后，CC系便认为有打击张治中的必要。但CC系散布和谣的中心目的，还是他们恐惧美国人企图利用李、何、宋等代替蒋介石，为保护蒋介石及其嫡系的地位起见，认为有预先揭露之必要。至于在这一期间由CC起草交给翁文灏[2]在广播电台上照念的那篇反共演说词，则主要地是给美国人看的，其目的是哀求某些对蒋介石丧失信心的美国人继续对蒋介石给以保护。他们告诉这些美国人，就是欺骗中国人民的和谈阴谋也使不得，这不但对蒋介石及其嫡系的利益有妨碍，即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有妨碍的。最近时期一切所谓和谣的真相，就是如此。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2] 翁文灏，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他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1951年从法国回国，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声明《新华社奉命驳斥和谣》的手稿。

准备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1]

（1948年9月3日）

林、罗、谭：

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制订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由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等语。望注意此项消息，国民党似有将长沈[2]军队从营口撤退之准备。如此事在你们攻击锦榆线[3]以后实现，你们须准备于攻占锦榆后回师歼击由沈阳撤退之敌军，务使长沈敌军不能向华中撤走。

军委

申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谭政的电报。

[2] 长沈，指吉林长春和辽宁沈阳。

[3] 锦榆线，指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东北秋季作战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1]系统

（1948年9月5日）

林、罗、刘[2]：

（一）同意江十九时电[3]部署。

（二）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涉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4]指挥的承德十三军。照你们江十九时电部署，打了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之敌以后，锦西之两个师，山海关、前卫屯之两个师，锦州之五个师，津

---

[1]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范汉杰（1895—1976），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9月3日19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在分析敌情后提出东北我军的作战方案：“拟以靠近北宁线的各部，突然包围北宁线各城，然后待北面主力陆续到达后，进行逐一歼灭敌人，而以北线主力控制于沈阳以西及西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之敌，或歼灭由长春突围南下之敌。对长春之敌，以现有围城兵力，继续包围敌人，并准备乘敌突围时歼灭该敌。”

[4] 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榆[1]线上之五个师（这五个师名义上属傅作义指挥，实际上似是属范汉杰指挥），均互相孤立，均好歼击。在歼击这些敌人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增援，可在运动中歼击增援队。如此，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在我杨成武部[2]向绥远[3]进击，我杨罗耿部[4]威胁平张线的条件下，傅作义除已在唐山地区之五个师外，不可能有多的兵力向北宁线增援。你们主要要对付的敌人，目前仍然是卫立煌。因此，你们现以七个纵队又六个独立师位于新民及沈长线是正确的。但在你们未攻锦州以前，长、沈[5]敌人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之下是否敢于有所动作，还不敢断定，恐怕要在你们打锦州时才不得不出动。以上是我们对敌情之估计及你们行动之大体设计，希望你们预先加以考虑，具体判明及决定要在你们打了几部敌人之后。

军委

申微

---

[1] 榆，指榆关，即山海关。

[2] 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

[3] 绥远，即绥远省。

[4] 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

[5] 指吉林长春和辽宁沈阳。

准备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

（1948年9月7日）

林、罗、刘：

六日十三时电悉，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2]。要求华东野战军担负歼灭四十个旅左右（他们七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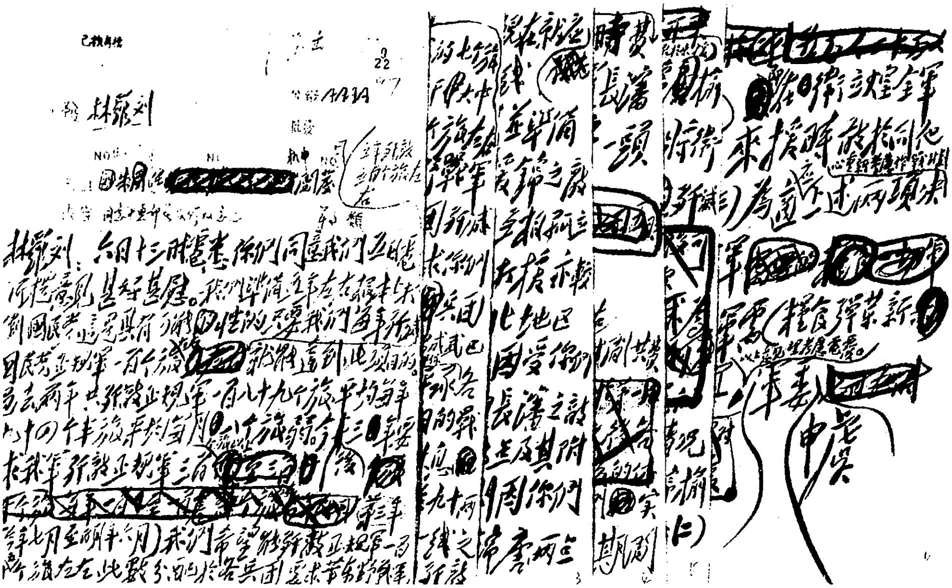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决定，把原各大战略区的部队划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3类。将野战部队编为野战军。野战军以下辖兵团，兵团辖军（即原来的纵队），军辖师，师辖团。各野战军以其所在地区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野战军所属兵团、军、师的数目，依各大战略区具体情况而定。后来，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辖2个兵团；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辖3个兵团；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辖4个兵团；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辖4个兵团。华北军区所辖的3个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歼灭的七个旅在内），并攻占济南和苏北、豫东、皖北若干大中小城市。要求中原野战军担负歼灭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两个旅在内），并攻占鄂豫皖三省若干城市。要求西北野战军担负歼灭十二个旅左右（八月已歼一个半旅在内）。要求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歼灭阎锡山十四个旅左右（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占太原。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欲达此目的，战役部署指挥的适当，作战休息调节的适当，是决定性关键。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因为锦榆唐三点及其附近之敌互相孤立，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锦打援亦较有希望。如果你们以主力位于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长、沈出来之敌，则该敌因受你们威胁太大，可能不敢出来。一方面长、沈之敌可能不出来，另一方面锦榆唐诸点及其附近之敌（十八个旅）则因你们去的兵力过小，可能收缩于锦唐两点，变为不甚好打而又不得不打，费时费力，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被动地位。不如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再则，今年九月至明年六月的十个月内，你们要准备进行三次大战役，每次准备费去两个月左右时间，共费去六个月左右时间，余四个月作为休息时间。如果在你们进行锦榆唐战役（第一个大战役）期间，长、沈之敌倾巢援锦（因为你们主力不是位于新民而是位于锦州附近，卫立煌才敢于来援），则你们便可以不离开锦榆

唐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当注意：（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以上意见望考虑电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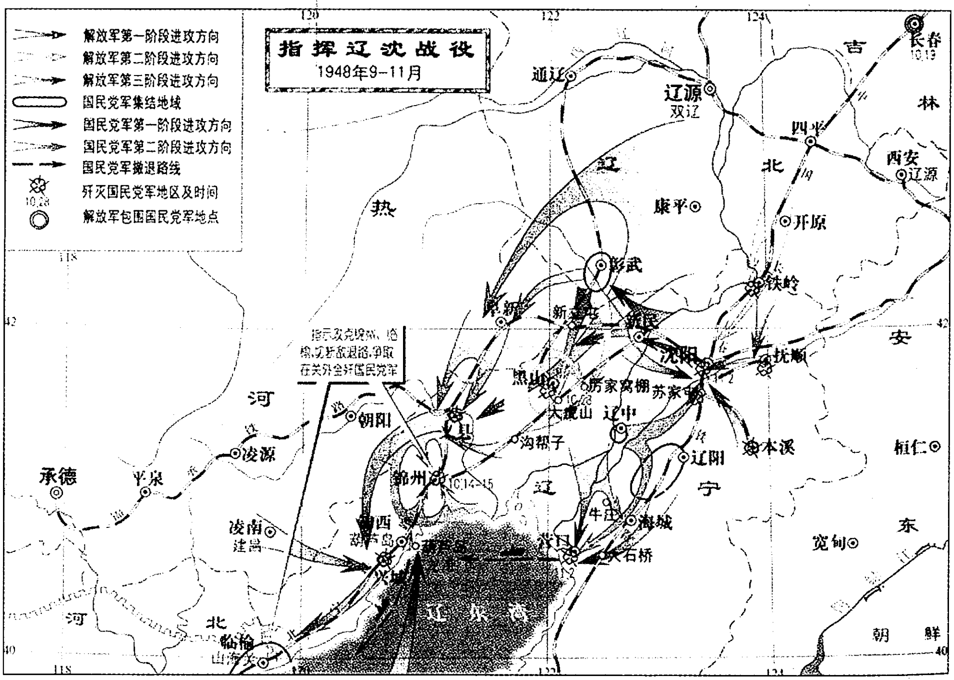
军委
申虞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手稿。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图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指挥攻打锦州。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锦州前线指挥作战。


指挥辽沈战役
1948年9－11月
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集结地域
国民党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撤退路线
歼灭国民党军地区及时间
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地点
指示攻克锦州，堵截、切断敌退路，争取在关外全歼国民党军
长春
10.19
吉
林
通辽
辽源
双辽
四平
西安
辽源
辽
北
康平
开原
热
彰武
铁岭
阜新
新立屯
新民
安
沈阳
抚顺
黑山
厉家窝棚
苏家屯
10.28
大虎山
辽中
河
朝阳
义县
沟帮子
本溪
桓仁
凌源
辽阳
承德
平泉
锦州
10.14－15
辽
宁
牛庄
海城
锦西
凌南
建昌
葫芦岛
营口
大石桥
宽甸
东
兴城
河
北
临榆
山海关
辽东湾
朝
鲜
120
122
124
118
42
40

辽沈战役示意图。

致电吊唁冯玉祥氏之丧[1]

（1948年9月7日）

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不胜震悼。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特电致唁，并申哀思。

毛泽东
朱　德
九月七日

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嫒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致力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九月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为冯玉祥在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途中不幸因轮船失火逝世，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的唁电。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

（1948年9月）

一　报告

（9月8日）

我们这次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有八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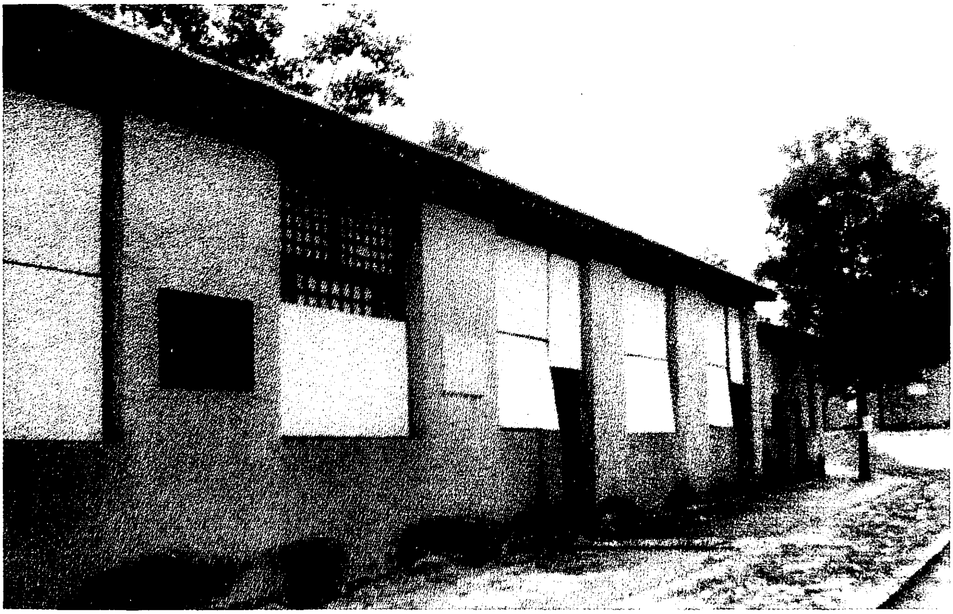
第一，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

对国际形势，去年十二月会议[1]曾作过估计。当时党内意见不一致，就在中央委员会中意见也不一致。提法是两种：一种是或者和平或者战争；一种是有战争危险，但是不致爆发战争。有战争危险是共同的，或和或战就不一样。前一种提法，认为全世界人民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后一种提法，认为苏联及全世界人民能够动员力量制止战争，美、英反动派对战争也未准备好，我们可以争取时间制止战争，因此，我们有任务动员全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一次大战后不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次大战打败了德、日法西斯，要把他们再扶起来还不容易。美、英反动派确在准备战争，战争危险确实存在着。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已

---

[1] 指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印发了毛泽东1946年4月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并讨论和通过了这个文件。

超过反动力量（莫洛托夫、日丹诺夫[1]都这样说了，我们党内有些同志，特别是中间派还看不清楚），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所以战争危险必须而且必能克服，其条件就是要努力。时间如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就必能制止战争。我们不应提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我们应该提或者较迟妥协或者较早妥协的问题，最近在柏林问题[2]上就是这样。



1948年9月8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图为会议旧址。

---

[1] 莫洛托夫（1890—1986），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日丹诺夫（1896—1948），194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2] 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在它们占领的德国西部（西占区）和西柏林单独实行币制改革，断绝了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随后，苏联宣布在苏占区进行币制改革，并对西柏林实施封锁，美、英、法三国又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并禁止西方国家进口东欧国家的出口物品。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柏林危机，美、英、法同苏联进行了多次谈判。

我们讲的妥协，不是讲在一切问题上都能妥协，如要做出决议取消殖民地那就不可能，而是讲在若干问题上可能妥协。这种妥协，是讲国际问题，而不是国内问题；不是一切问题，而是若干问题，包括重要问题在内。一九四七年苏、美、英等国就同意、罗、匈、保、芬五国订了和约。对德、奥和对日的和约，虽然很难订，但也终究会订下来的。英法与苏联之间的通商贸易有发展可能，但美、苏之间的这种可能会少些。

苏联与美英法按民主原则妥协，我们同国民党也来一个妥协吧，中间派就这样想。我看不能这样提。苏联的政策是不干涉各国内政，大西洋宪章[1]也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是不选择蒋介石那个制度的。苏联及一切民主力量向反动派力量作斗争，按民主原则妥协就是斗争的结果。是不是各国人民都必须向国内的反动派妥协呢？不能这样提。当然，如能强迫蒋介石照我们的做，解散法西斯组织，不要土豪劣绅，让我们搞军队又搞土地改革，那有什么不好？但是蒋介石是反动派，他不赞成。从古以来，反动派对民主势力就是两条原则：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留待将来消灭之。英国现在先消灭政府内部的共产党，对社会上的共产党就慢慢来。我们对反动派也应采取同样的两条原则，我们今天实行的是第一条。

以上是去年十二月会议的三点估计。世界和平，苏联不打仗，对世界人民有极大的利益。可是蒋介石希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党内也有人认为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如果

---

[1] 指1941年8月美、英在大西洋会议结束时签署的联合宣言。宣言称：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赞同摧毁德国纳粹暴政和解除侵略国家的武装等。

能够和平生产十年到十五年，苏联能提高生产力到年产六千万吨钢，人家就望也不敢望了。时间已过了三年，只差十二年了。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九月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合影。

第二，关于我们的战略方针。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军队向前进，就要生产长一寸，不这样就没有饭吃。又必须加强纪律性，作战方式要逐渐正规化。这是方针。

作战方式要由游击战争逐渐过渡到正规战争。游击战我们是得了益处的。我们有过早正规化的教训。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

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如东北正规化就搞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军队的编制是五个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五个地区都是相同的番号，碰到一块就发生困难。即使番号统一了，人数、编制、供给标准也不统一。因此，有计划地走向正规化完全必需，走迟了就要犯错误，正同过早正规化犯错误一样。要统一，要正规化，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恩来同志正在草拟一个文件[1]，尚未准备好。

建军五百万是为了全部打倒国民党，一切角落都扫光。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时间五年左右[2]即可以，军力四百万即可以。第三年军队数目上不增加，现在我们有军队二百八十万，加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一百四十万，共四百二十万，编制不足的还要补充起来，如只有一万多人的纵队，要补到两万人。第四、第五年还要扩大，到江南后即可以扩大。五百万是包括这一切的。

消灭敌人正规军五百个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第二年九十二个旅，两年已消灭正规军近二百个旅。第二年较少的原因是：一、敌军将每旅二团制改成了三团制。二、东北和粟裕[3]少打了一个仗。

---

[1] 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1948年11月1日）。

[2] 当时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时间，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后来这个时间大为缩短。

[3] 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在这以前，曾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进行当时计划的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三、刘邓[1]到大别山后减弱了。四、华野外线兵团主力，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山东逢水过水，逢田过田，打大仗的神气就不足。所以，消灭敌人数目就不多。今年上半年，陈粟[2]五个月未打仗，东北半年未打仗，但我们还歼敌九十二个旅，一百五十万人，可见国民党军队不难消灭。第二年的好处是把临汾打开了，徐[3]兵团变成有战斗力的兵团，许谭[4]兵团加强了，陈粟的情况变了，刘邓已开始壮了，东北虽少打一个仗，但现在壮得厉害。今年还有四个月，再搞三十六个旅是可能的。把济南、太原搞下来，刘邓搞南阳，彭[5]只要一个月缴一个旅就很好。以后各种条件更好，第三、第四、第五年再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没有理由说不可能。国民党现在有二百八十四个旅，有新的，有空的，有强的，也有弱的，消灭五百个旅，一般的是消灭了两次。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不是说把每一个角落都扫清了，如在济南、太原打下之前，是否就可以说在山东根本上打倒了蒋介石，在山西根本上打倒了阎锡山[6]？是可以这样说的，但不是全部打倒。争取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与公开宣传至少五六年在全国胜利也是符合的。至于夺取城市，扩大解放区的人口和面积，我们历来不提，因为把敌人消灭了，城市也来

---

[1] 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

[2] 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3] 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许、谭，指许世友、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5] 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军。

[6]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了，解放区也扩大了，人口也增加了。过去两年歼敌二百个旅，我们就得到了四平、吉林、运城、临汾、延安、潍县、洛阳等城市。

第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专政。

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的提法，在我们党内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革命时期我们提的是“联合战线”，当时右的理论是政权归国民党，我们以后再来革命。后来我们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规定的是工农民主专政，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在帝国主义压迫下还可以跟无产阶级合作。合作是后来发生的，因为有了日本的侵略，现在又有美国的侵略，我们又回到大革命中的正确时期。现在不是国共合作，但原则上还是“国共合作”。现在不是同蒋介石合作，是同冯玉祥、李济深[1]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学生合作，同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合作。“中间路线”“第三方面”[2]的主张行不通，但是我们要同有这种主张的分子合作。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

---

[1] 冯玉祥，1948年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2] “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在人民解放战争初期，有一些民主人士幻想在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外，另外寻找所谓第三条道路，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第三方面”，指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

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我们政权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要打倒它们，就要打倒它们的国家，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以人民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来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问题，十二月会议只是想到了它，这次会议就必须作为议事日程来讨论。石家庄一打开，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都要求统一。太原未打开，晋绥与华北的统一也还有些意见。等平绥路一打开，东北又会提出统一问题。人们的思想是跟着物质的变化而变化的，打开石家庄就是一个物质的变化。

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我们又叫“苏维埃”，又叫“代表大会”，“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这是死搬外国名词。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1]都搞过，已经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

---

[1]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清末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辛亥革命后，1912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1913年用武力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又把国会解散，另行组织御用工具“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1915年12月恢复帝制。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曹锟（1862—1938），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在1912年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巡阅使等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他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次年10月，他贿买国会议员，当上了总统。

出开人民代表大会，孙中山遗嘱还写着要开国民会议，国民党天天念遗嘱，他们是不能反对的。外国资产阶级也不能反对，蒋介石开过两次“国大”他们也没有反对。德国、北朝鲜也是这样搞的。我看我们可以这样决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

政协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要开一次会，现在开始准备。战争第四年将要成立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叫做什么名字，或叫临时中央政府，或叫中国人民解放委员会，其性质都是临时性的中央政府。究竟叫什么，到那时再定。

第四，关于财经统一。

这个问题不需要多讲。以华北人民政府的财委会统一华北、华东及西北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工的可能的和必要的建设工作和行政工作。不是一切都统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统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统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暂时不统一。如农业、小手工业等暂时不统一，而金融工作、货币发行就必须先统一。行政上的统一，就是由华北财委会下命令，三区的党、政、军要保障华北财委会统一命令的执行。

第五，发展党内民主，训练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准备占领全国后所需要的各方面工作干部。

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干部会议的好处是迅速、便利，召集比较容易，代表会议要保存干部会议的好处，不要太繁杂了。

训练干部，不仅要训练党内的，而且要训练党外的。冀中村干部轮训，是大批训练基层干部的办法。政府要办学校，包括大学、专门学校，大批培养各种干部。训练全国各方面工作的干部，是一

个大问题。要出兵川、湘、鄂、赣，马上就需要两三万干部。所以要搞一个计划。

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这样大的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如划阶级就表现了我们党理论水平之低。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全国有几百万学生、教授，还有许多戏班子，你说不出一篇道理来，就只好听他的。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不然就说不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例如有一个候补中委，看见土改中打人、杀人的现象，他不赞成，但是他讲不出一篇道理来，没有那一股神气。如果要求大家读全部马列选集，也不现实，可以挑选一些，不然书那么多，读起来也是困难。华东局印了五本，说是有人在读。如果五本不够，可以选十本，包括《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概论》《帝国主义论》[1]在内。列昂节夫[2]的《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选一些。宣传部可以研究一下，看挑些什么书好，五本不够就十本，但是不要太多，多则不灵。

第六，关于学习工业和做生意。

全党要提出这个任务来，还要写文章做宣传，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

第七，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

上面说了许多条，还必须有这一条，没有这一条，那许多条实行起来都不会顺畅。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令人不

---

[1] 《帝国主义论》，即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2] 列昂节夫（1901—1974），苏联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他早期的著作，出版于1935年。

能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之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九个照顾[1]变成了九个不照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一些人因为没有分田，他们嗷嗷待哺。这些状态必须改变。中央同志要以全力来做这件事，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第八，关于“新资本主义”“农业社会主义”。

我们政权的性质前面已经讲过，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社会经济呢？有人说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是不妥当的，因为它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

[1] 1946年，在讨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过程中，有些解放区针对一些地方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的错误，提出需要从政策上规定一系列的照顾，内容有9条，即：照顾中农利益，分给中农斗争果实；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多留一些土地，政治上替他们保留面子；照顾中小地主，多留一些土地；照顾开明绅士（与“军干属地主”相同）；照顾被汉奸恶霸利用的人员中的贫苦出身者；照顾地主富农开设的工商业，除大汉奸大恶霸开设的由行署以上政府没收外，一律不动；照顾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家庭是地主者多留一点土地，家庭是劳动人民者多分点斗争果实；照顾地主人员的生活出路，对豪绅、恶霸、大地主，除依法处死者外，也要留给土地，给他们饭吃，对逃亡地主应争取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这些照顾当时被称为“九个照顾”。

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1]，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比如我们基本的税收原则还是统一累进税。但这十条里面没有没收官僚资本，没有联合中小资产阶级。那时这个纲领对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权上根本不要它，在经济上根本不动它。现在我们的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可以吸收资产阶级民主分子、知识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参加（这一条比十大纲领缓和一些），经济上则没收官僚资本（这一条比十大纲领激烈一些）。这是与六大决议案有区别的。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后有两节讲“前途”和“两重性”[2]，大家可以翻翻，这同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有联系的。

---

[1]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2] 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二章第六节“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第七节“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9~652页）。

六次大会和七次大会[1]都承认资本主义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有一个发展，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在我国太少了，需要它的发展。但讲到社会主义因素，只讲了政治条件，没有讲没收官僚资本。许多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这就叫做社会主义因素。现在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已经在一万万六千万人口中变成现实性了，即有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六大到现在已经二十年。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抗战八年中，官僚资本有了很大发展。我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报告[2]中讲到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新中国的经济构成，首先是国营经济，第二是由个体向集体发展的农业经济，第三是私人经济，国营经济是领导成分。现在不提国营经济就不能解决问题了。六大决议案没有规定没收官僚资本，而后来连小的也没收了，那是违反六大决议案的。抗战时期在对待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上是完全实行六大决议案的。内战时期“左”的错误实际上是否定了六大的有关城市政策。

写《新民主主义论》时，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区别在我们脑子里尚不明晰。大工业、大银行、大商业，不管是不是官僚资本，全国胜利后一定时期内都是要没收的，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而只要一没收，它们就属于社会主义部分。我们国家银行的资本，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在土地革命后搞合作社，要看在谁的领导之下：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资本主义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当然，今天我们农村的合作社，是个体

---

[1] 七次大会，指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 指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的书面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农民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组织的合作社，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和国营企业不同，国营企业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不带资本主义性。机关生产组织的合作社比民营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更多一些。

社会主义性质这种话应该讲，但整个国民经济还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

中国这个国家，应有五千万到一万万的产业工人。如有五百万到八百万产业工人在我们这里，那事情也就好办了。

二　结论

（9月13日）

我没有多少讲的了。

三年来还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其中头一年是没有大打的，那时许多原则问题解决了，例如对国民党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没有争论了，因此政协才搞得好；军事战略问题完全一致了；减租减息早就有了，以后进行土改，命令一下就做了。这次会议的讨论比去年延安的二月会议[1]更展开了，这同我们政策成功和胜利有关。

---

[1] 指1947年2月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上什么都讲了，而且连前途问题都讲了。关于几年胜利的问题，过去所讲的只是可能性，对发展前途的分析谈谈就是了，并没有正式提到会议上，就是提出讨论了也没有结论。去年七月小河会议[1]上总结了一年的战绩，可以看出局势的发展。现在战争已有两年多了，情况更清楚一些，可以讲出带确定性的意见了。

这次会上对国际国内局势讲得少了些，有的也讲到了。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对我们是很好的。历来我们都讲形势是很好的，七大也讲了，不过那时对许多问题还是估计的，是那时条件下看到的“好”，有些估计后来发生了变化。例如说英、美、法、苏的团结是决定了的，而现在并不团结了。克里米亚会议[2]曾经说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开辟了民主的道路、团结的前途，但现在并未证明这一点，关系反而越搞越僵了。世界革命的力量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这是日丹诺夫在九国情报局会议[3]上讲过的，莫洛托夫也讲

---

[1] 指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第一年的战绩，着重讨论了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等问题。

[2] 克里米亚会议，又称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签署了公报和议定书，并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会议公报表示，三国政府“将使自己的政策协调一致”，以援助被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经济问题”，“为和平而团结正如为战争而团结”，三国决心“在未来的和平时期将保持和加强联合国家在目标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3] 指1947年9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过，斯大林也讲了几遍。我们现在的估计，还是九国情报局会议的估计。反动派发动战争的计划是可以打破的。战争危险很厉害，但不是马上就打，从战争危险到战争爆发是有一个过程的。总之，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国内形势是我们革命力量更大了，蒋介石的力量更小了。

关于我们的任务，这次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并且还有发挥，这很好。有很多意见是属于计划性的，例如建军计划，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有妇女代表会议、青年代表会议、政工会议等，都可以开。

要提出反对浪费的口号，不只限于粮食，包括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例如争取俘虏、常备担架队、炮弹、军工。同样是作战，有的打进去，只伤亡十二人；有的伤亡六十余人，还打不进去。对俘虏也一样，有的争取使用了，有的就放了、散了；有的争取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不到一半。缴获必须归公，克服浪费现象，这个口号有丰富的内容。反对浪费与发展生产相配合才能取得胜利，才能实现军队增长到五百万人、五年左右打倒国民党的目标。

加强国际联系，例如青年方面的、妇女方面的，我的报告没有提到，邓颖超[1]同志在妇女工作报告中提到了。这两年来，我们在妇女、青年、工人运动方面有了广泛的国际活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活动以后还要增加。我们宣布中央政府成立之后，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是会同我们合作的。还有，我们同其他兄弟党的联系也要增加。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威信相当高，这是一件大事。

关于教育问题，值得注意。在第三、第四年，恐怕有召开教育会议的必要。还有，加强新华社的工作也是必要的，报纸是很灵

---

[1] 邓颖超（1904—1992），河南光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副书记。

的、很有力的，所以必须抓。过去中央、中央局对报纸都没有抓紧，现在新华社的大样是少奇同志看，或者恩来、弼时[1]同志看。这是专政吗？你们这样专政专得好呀！要专上三五个月就好了。看大样有好处，自己可以学，用心地去改，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听说华北局的报纸也是一波[2]同志看大样的。

“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里有一个“大约”，一个“左右”，还有“根本上”。这些形容词不能去掉，去掉一个都不行。关于公开宣传“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固然有好处，原则上我不反对，但用什么方式讲，怎么讲，还得考虑。我现在倾向于讲困难一些，像“八一”社论[3]上那样的提法，这可以使人更沉着、更努力些。在内部，首先在干部中，其次在战士中，是可以说的，在地方上也可以说。但说就要说得清楚些，有个“大约”五年“左右”和“根本上”，这就不会错。还要估计到，虽然解释清楚了，但一传出去，还会即刻被说成是“五年”胜利。“建军五百万”“消灭敌人五百个旅的正规军”“大约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些

---

[1] 弼时，即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

[3] 指《人民日报》1948年8月1日刊载的新华社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的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社论中说：“中国人民还必须准备继续作几年的艰苦奋斗，至少还要准备拿三、四年时间去作这种艰苦斗争，才能最后解放全中国，并在民主基础上统一全中国。在斗争过程中，某些暂时的、局部的间歇和曲折，仍然还是可能有的。那些以为中国革命会在一次或几次斗争中就能完全胜利，并在具体斗争中抱轻敌态度的人们，或者以为它会完全一帆风顺，不会有任何暂时的、局部的曲折，而在遇到这种曲折时就感觉迷乱的人们，是错误的。”

话简单明了，是口号式的。口号的作用，就是好讲好传。斯大林在《论中国》里讲得很好，那时他就指出了在联合战线中对国民党要批评[1]。我们说“又团结又斗争”，这意思一样，作成了口号式的，就好讲好传。

这次会议对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可能性作了充分估计。我们党曾遇到两次大困难，是由两次大错误造成的，那就是一九二七年的失败和一九三五年的万里长征。后来的困难同那两次困难不同，也比较容易克服。今后还会遇到什么大困难呢？比如说，假使我们估计错了，由于工作做得不好，力量不足，未能阻止战争，世界大战爆发了，并且爆发得很快，这就是困难。世界大战不爆发，当然对中国革命有利得多。苏联不打仗，养精蓄锐，我们有可能得到国际方面的援助。有世界民主力量对我们帮助，这意义是很大的。但是如果我们估计不足，世界大战来了，怎么办？还不是要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世界大战来了，这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尤其是共产党人，经过了多年战争，对此是不怕的。我们有了精神准备，就会更好一些。再比如说，来一个大旱灾。在七大上我们讲过这一条，它很有可能来，来了确是个大困难，我们一定要战胜它。从前太行、山东、晋绥都有对付灾荒的经验。如果出现了大旱，别无办法，只有

---

[1] 指《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一书。书中编入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发表的演说《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其中指出：“支持武汉的政策同时就是展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取得由此而产生的一切结果的政策。由此便有了共产党人之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革命政府，这一参加并不排斥共产党人用一切办法批评国民党党内自己的同盟者的不彻底和动摇，而是以此为前提。”

全党动员起来，组织人力克服它。又比如说，战争延长，指挥错误，军事不顺利，明年不能渡江，那就得在长江以北打。蒋介石的力量百分之八十在这一地区，消灭了他的力量，也就算打倒了国民党。所谓蒋政权，主要就是他的军队。如果李宗仁[1]等出来成立政府，搞个曲折，这也是困难。但是正如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也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要完全拒绝谈判，这是要考虑到人民觉悟的问题。那时可能有两种情形，或者拒绝和谈，或者进行和谈。但现在就要对国民党可能搞的和谈骗局进行揭露。如果群众觉悟，要打下去，认识到和谈就是让敌人休息后再打，是费力的，那我们就打。如果群众没有这种觉悟，要和，那就进行和谈，一面谈，一面打，并在谈判中教育群众，向群众解释和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还是要继续打下去，不上敌人的当。总之，那时看人民的觉悟，党内党外群众的觉悟，但始终不要把和谈的门关死。无论在党内党外，都不要犯这个错误。还有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给我们造成的困难，这个困难我们也是能够克服的。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2]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到中央局后，对这一点可以作宣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意思“二七”社论[3]都写了。现在点明一句话，资产

---

[1]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

[2] 指刘少奇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 指新华社为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发表的社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这篇社论曾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修改部分参见《反对职工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

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其次，内部还有民族矛盾，如汉族同西藏、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矛盾，同回民的矛盾，在某一个民族内部也有矛盾。这可以用苏联的办法来解决。此外，在工农之间也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可以在工农联盟内部通过供给机器、组织合作社、参加国家管理等予以解决。要巩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分给农民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单有这一条还不够。所谓领导权，就是要使被领导者相信，将来在经济建设方面，还要给他机器，组织合作社，使农民富裕起来，集合起来。他们信服了，领导权就巩固了，否则会失去领导权的。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了。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至于对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考虑，先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

我所说的一些要点，加上青年、妇女、政工等问题，要做出简单的决议案。此外，还有个别问题已写出了决定。会议基本上通过，交书记处做若干修改后发下去，以便取得一致。同志们提出的好的建议，以后一一见之实行，这里不多讲了。这次会议开了六天，长了一些，还可以紧缩一点。有的同志讲得短，使人记住了；有的讲得长，反而使人忘记了。我们也可以采取“节制资本”的办法来开会。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

（1948年9月11日）

世友[1]同志，并告粟、谭、陈[2]，华东局，中原局：

真电[3]悉。你已到前方，甚慰。你所说的有重点地使用兵力，是正确的。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即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而以一、四、六、七、八、十一、韦吉[4]等共八个纵队担任打援，以其余各纵担任攻城。这种部署在下列两种情形下是准

---

[1] 世友，即许世友，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

[2] 粟、谭、陈，指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许世友1948年9月1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以现在情况打下济南是有把握的，但部署上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使用。现攻济南的兵力已布置好，不能变动，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因此，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4]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备予以改变的，即：（一）在阻援与打援有出乎意料的顺利（歼敌甚多，敌已停顿），而攻城尚未得手之时，应当从打援方面抽调兵力参加攻城。（二）攻城已有把握，但尚不能最后解决战斗，而援敌则因被阻难于急进之时，亦可从打援方面抽调一部兵力参加攻城。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应准备作和上述调动相反的调动，即在攻城第一阶段中，已经证明不能短期解决战斗，而援敌又已大举进犯，非歼灭援敌不能继续攻城，在此种情况下则应坚决由攻城兵团中抽调一部至半数兵力（除占领飞机场及其他必要部分外），加入打援。此点，你们亦应预先作精神准备。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第二阶段则依战况发展，将主力使用于最利发展之方向，如果东面利于发展，则应使用于东面。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整个战役应争取一个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须准备打两个月至三个月，准备对付最困难的情况，并以此作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发点。饶政委[1]大约三天后即可由中央所在地动身回山东，并先到粟处及你处。

军委

真亥

---

[1] 饶政委，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1948年，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的炮兵阵地。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1]

（1948年9月11日）

同意灰十八时关于军事情况的估计及部署[2]。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9月10日18时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说：目前北宁线作战，最主要的关键在于能以奔袭动作将锦州以南和以北的敌人堵住切断，如此，则我军第一步即能歼灭兴城、绥中等五城之敌，第二步即能将主力集中起来攻锦州和打援。决以六个纵队攻击北宁线，以五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长、沈间阻援。

攻济打援以按原计划进行为宜[1]

（1948年9月13日）

粟裕同志，并告许、谭、王[2]，华东局，中原局：

真酉电[3]悉。我用一个兵团攻徐东南郊外围之敌，另以几部兵力发动向徐海、徐蚌、商兰[4]之破击，造成攻击徐州之势，以求牵制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攻济打援，是指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在济南战役中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联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10万余人守备济南。同时，准备以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主力3个兵团，约17万人，随时北援。为了以多数兵力歼灭援敌，保证夺取济南，华东野战军以7个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担负攻克济南的任务；以8个纵队，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随时准备阻击和歼灭沿津浦路北援的敌人。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9月16日晚，对济南守敌发起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24日全歼守敌10万余人（内有2万余人起义），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由于华东野战军打援力量的强大和迅速攻克济南，徐州之敌未敢大举北援。

[2] 许、谭、王，指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8年9月11日酉时粟裕给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

[4] 徐海，即徐海路，指徐州至海州（今属江苏连云港市）的铁路，陇海线一段。徐蚌，即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商兰，即商兰路，指商丘至兰封（今并入河南兰考县）的铁路，陇海线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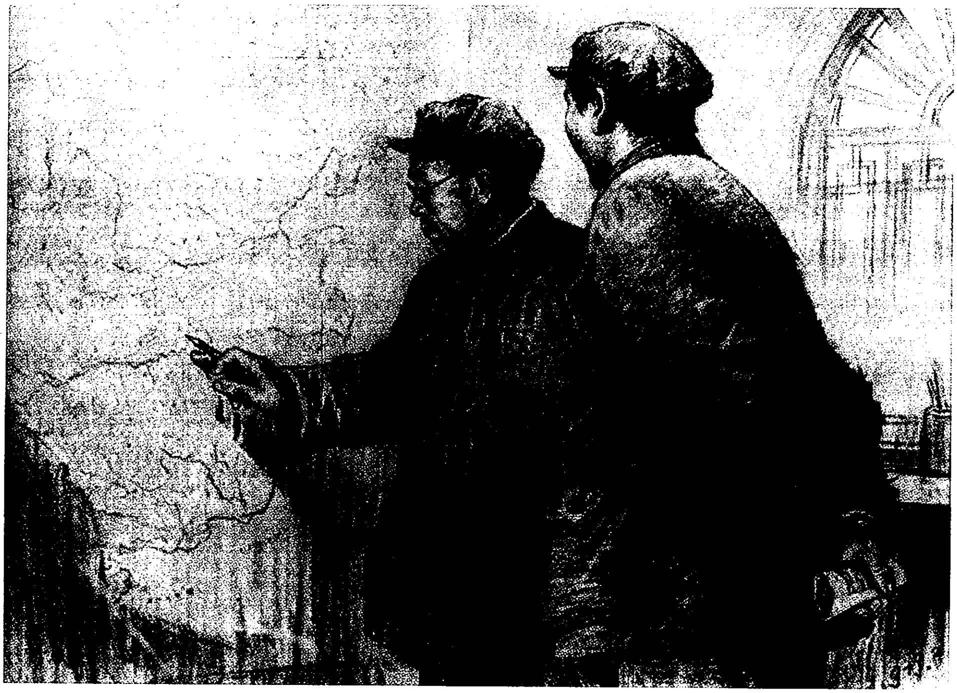
敌不敢北援。因刘峙[1]有三个有力兵团分驻商丘、新安、蚌埠三处，随时可以集中徐州附近，除给我分散各部以反击外，尚有充分兵力（十个旅以上）组成一个集团北上援济，此时我分散各部，势必被迫调回，兵力疲劳处于被动，恐已难达打援目的，因此乙项方案不宜采用。甲、丙两项方案是按照原计划作战的两项打援方法，这是可以依据敌援情况临时选择的。因此，只要你们在八十三师加到济南后，仍有把握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一部，你们仍以按照原计划发动攻济并在徐、济间准备打援为适宜，只要你们能在飞机场及其附近歼敌二个旅左右，则济市之敌等于没有增加。除非你们对夺取飞机场及在济市外围歼敌二个旅左右业已完全无把握，那就只好根本放弃攻济计划，而另作其他计划。但即使如此，亦不妨试攻一次两次，假如试攻无效，对我亦无大损失。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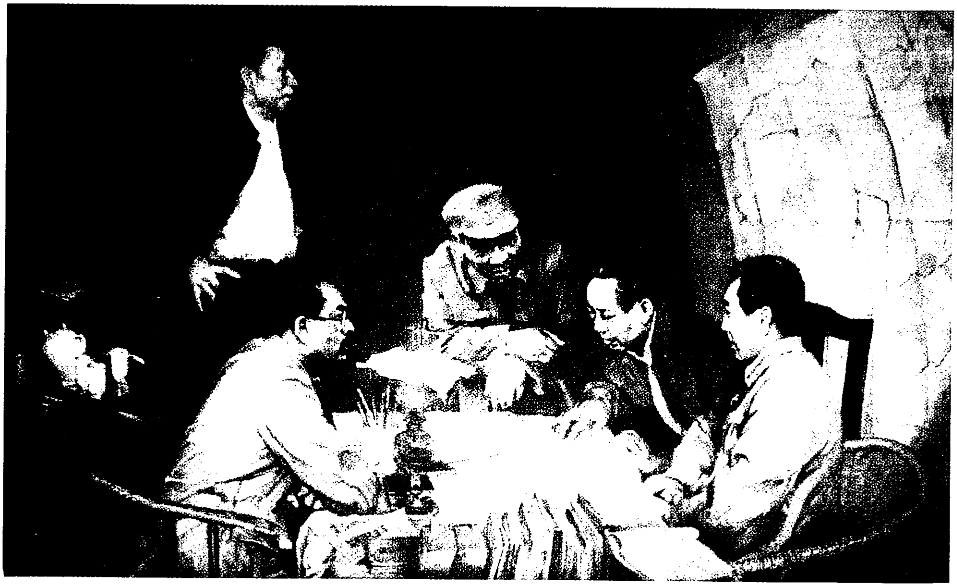
元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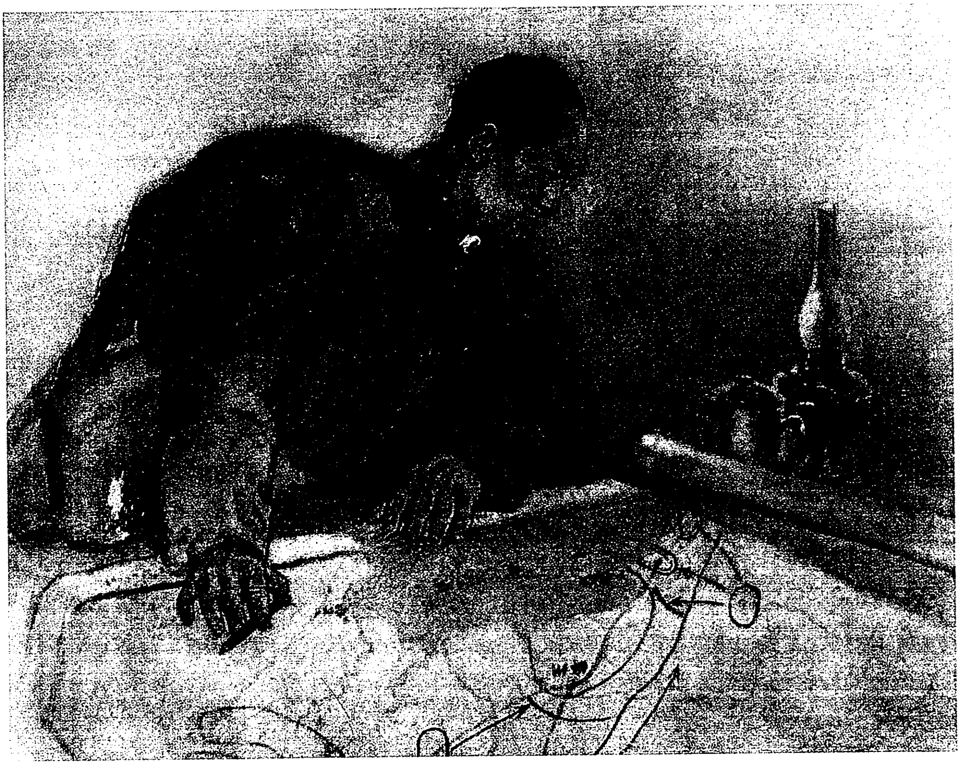
[1]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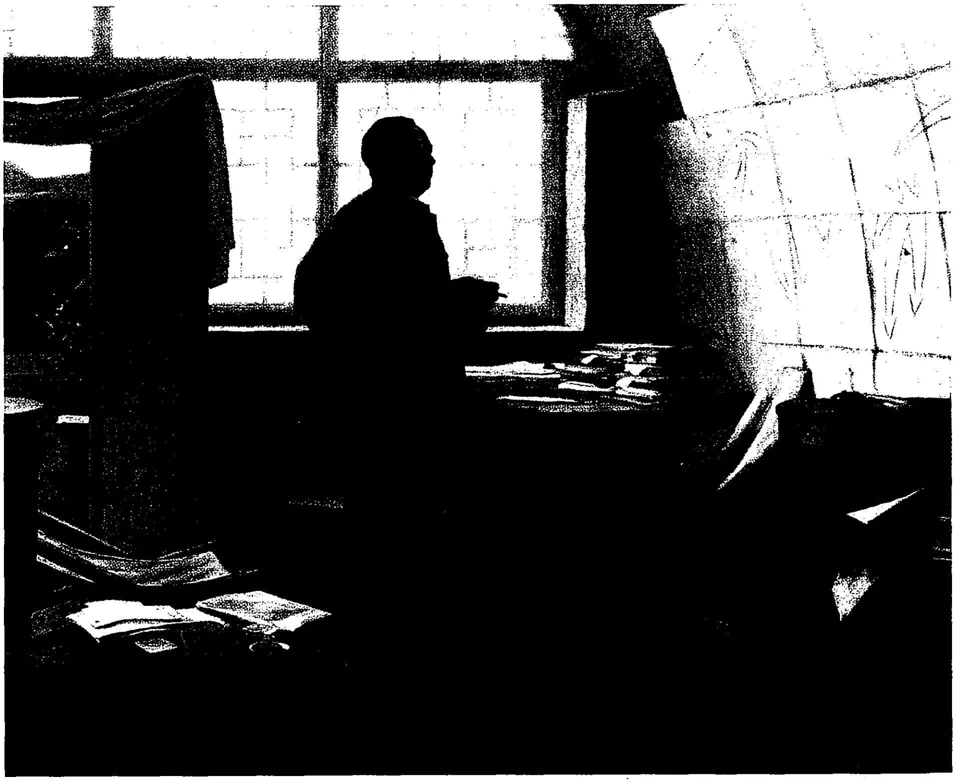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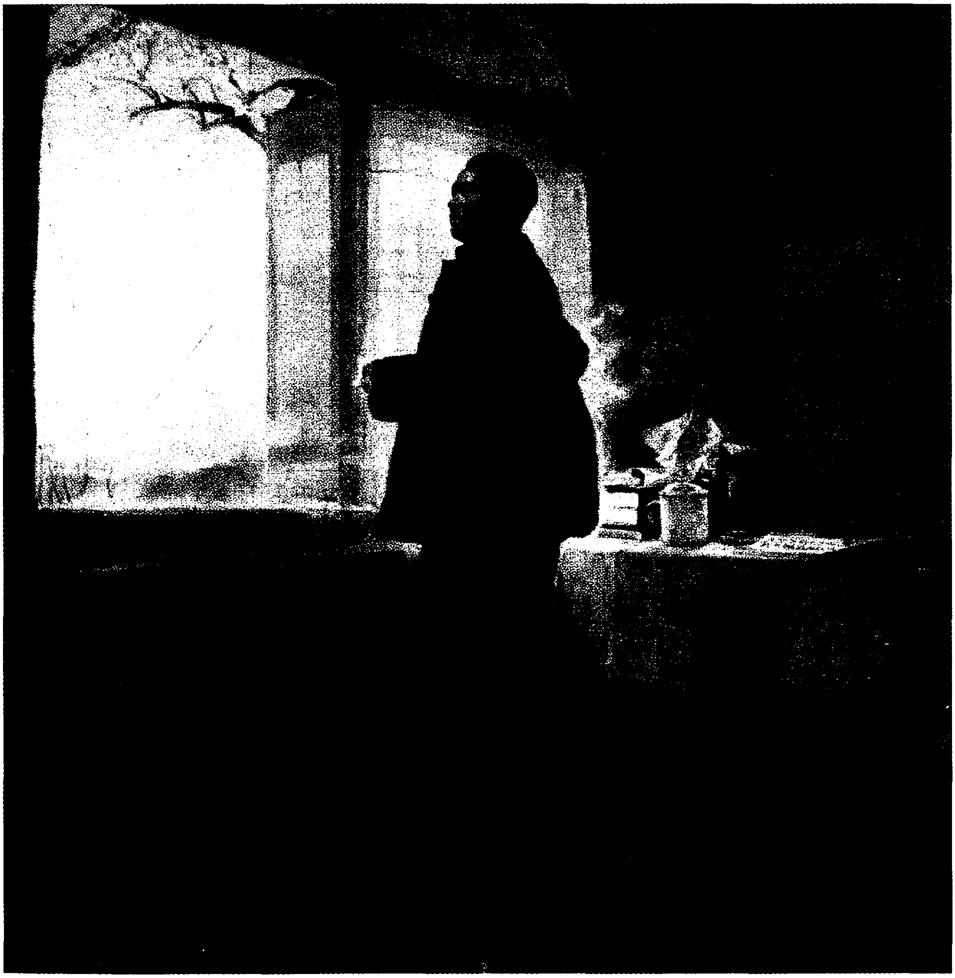
《决策》（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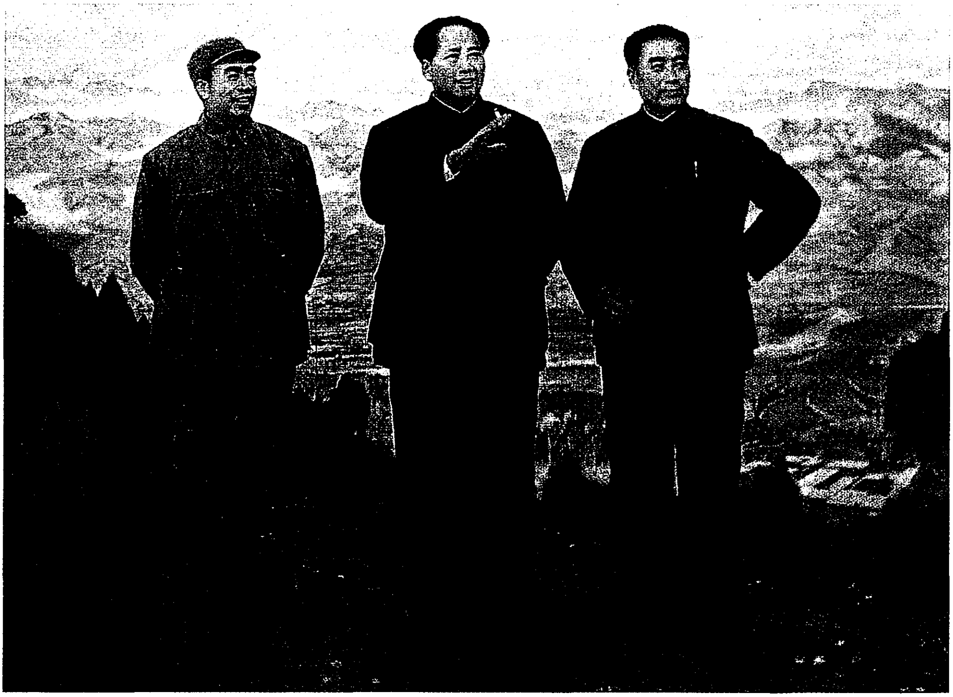
《决战前夕》（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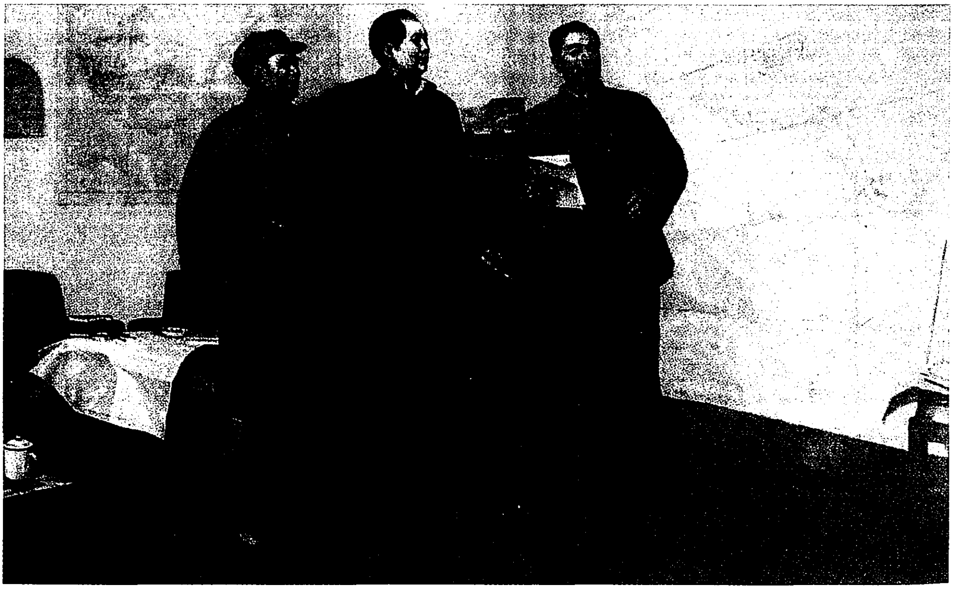
《决战前夕》（油画）



《决战前夕》（油画）



《胜利在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在西柏坡》（油画）



《伟大的战略决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在西柏坡》（油画）

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贺电

（1948年9月19日）

朝鲜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团金科凤主席，
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金日成总理：

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最高人民议会的召开，与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成立，是朝鲜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胜利，是对于东亚各民族解放事业的伟大鼓舞。谨代表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庆贺。

毛泽东　朱德
九月十九日

关于健全党委制[1]

（1948年9月20日）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这个文件的意义，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1948年9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

首先歼灭锦塘段之敌[1]

（1948年9月21日）

林、罗、刘：

按照近日北宁线[2]敌情，甚有利于我军发展，望你们集中注意于该线之作战，首先达成歼灭该线（锦州至塘沽）敌军十九个师之目的。若此目的达成，则将来一切好办，否则将发生困难。

军委

申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北宁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攻济第二阶段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

（1948年9月21日）

粟、陈、唐、张，并许、谭、王[2]：

（一）刘峙[3]集邱黄李三兵团[4]北援，望充分注意阻援及打援。（二）攻城第一阶段虽获顺利发展，但第二阶段可能须费大气力，千万不可轻敌。（三）许谭以三纵、十三纵、九纵、渤海、鲁中各部攻城，以十纵位机场一带监视吴化文[5]并作攻城总预备队，这是适当的。你们须尽可能不使用十纵于攻城，以便必要时使用该纵于打援。（四）刘峙虽已将邱兵团调集临城[6]，对金乡、成武地区似不使用大兵力，但你们目前仍须部署一部兵力于该地，以防李弥可能走该路。我军最大兵力应迅速集中兖邹滕[7]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许、谭、王，指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邱黄李三兵团，指邱清泉任副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黄百韬任司令官的第七兵团和李弥任司令官的第十三兵团。

[5] 吴化文，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

[6] 临城，即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

[7] 兖邹滕，指山东兖州、邹县和滕县。

其以东地区。

军委

申马

布置多层堵击力量防王耀武突围逃窜[1]

（1948年9月22日）

粟、陈、唐、张，许、谭、王[2]，华东局：

为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入城内王耀武[3]率其死党突围而出分路逃窜时全歼该敌勿使漏网起见，你们应在其主要逃路及次要逃路，近距离及远距离布置多层堵击力量，除正规部队由许谭王及粟陈唐张负责外，华东局应立即布置通往临沂、枣庄、青岛、运河、鲁西南各路之地方部队及民兵的节节堵击，是为至要。

军委

养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许、谭、王，指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王耀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

战争第三年的歼敌任务[1]

（1948年9月24日、27日）

一

关于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的作战计划，要求东北全军和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协力歼灭卫、傅[2]两军至少三十六个师，攻占北宁、平绥[3]、平承、平保四线及其线上除平、津、沈三城以外之一切城市。准备以现有主力军之半数于战争第四年向长江流域出动，留下半数攻击平、津、沈。为适应第四年出兵南进之需要，你们应于第三年内，准备第一批远出工作干部一万五千名至二万名，其条件为地方区委委员以上、军队排长以上各种党政军民财经文教及新闻工作者，望于此次干部会议上布置完毕，待命于明年秋季随军出发。那时再准备第二批一万五千至二万名远出工作干部，以便你们能在长江流域及南方管理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区域。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48年9月24日在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电报稿时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二是毛泽东1948年9月27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

[2] 卫、傅，指卫立煌、傅作义，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和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平绥，即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二

杨、罗、耿，杨、李、李[1]，并告林、罗、刘，华北局，东北局：

（一）战争第三年（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全军应担负歼敌正规军一百二十八个旅左右。在此数内，你们华北第二、第三两兵团应担负歼敌正规军十二个旅（平均每月一个旅），七月份保北歼敌一个旅在内。因此，你们必须集结兵力作战。每一重要作战，你们必须亲临前线指挥（过去打古北口，此次打永宁，前线指挥均不得力，因此，你们应上前线亲身指挥每一个较大的作战），必须发挥正太路、清风店、石家庄等处打大歼灭战[2]之作风，必须有计划地独立作战，不要依赖东北主力的协助。

（二）中央在决定今年作战任务时，除分配你们十二个旅外，分配西北彭张赵兵团[3]担负歼敌十二个旅（包括八月已歼之一个半旅在

---

[1]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李，指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杨成武、李井泉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李天焕（1912—1986），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这是晋察冀野战军在1947年内举行的以下3次战役：4月9日至5月4日，在河北正定至山西太原铁路沿线歼灭国民党军3.5万余人；10月11日至22日，在河北定县清风店一带歼敌1.7万余人；11月6日至12日，解放石家庄，歼敌2.4万余人。这三次战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3] 彭张赵兵团，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

内），他们兵力比你们要少；分配晋中徐周兵团[1]担负歼敌十四个旅（七月已歼八个旅在内）并攻克太原，他们兵力亦不比你们多；分配刘邓十四个旅，他们总兵力比你们大，但因第二年大别山作战削弱了主力，故只能担负此数；分配陈粟[2]歼敌四十个旅，包括七月已歼七个旅、九月济南已歼六个旅及三个旅起义均在内，他们兵力较大，担负任务亦很大；分配林罗刘歼敌三十六个旅，他们兵力最大，应能担负此项任务。以上各部歼敌任务均未包括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在内，第三年全军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总数应争取超过第二年歼敌一百五十二万的数目。

（三）人民解放军全军必须争取于大约五年（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左右的时间内，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及特种部队七百五十万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建军五百万左右（现已有二百八十万），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3]规定的总任务，而这是根据过去两年经验，从最谨慎的估计出发，是有实现的充分可能性的。这一任务可向党内宣布。

军委

申感

---

[1] 徐周兵团，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

[2] 陈粟，指陈毅、粟裕分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3] 指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1948年9月25日）

饶、粟[1]，并告许、谭、王，刘、陈、李[2]：

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3]。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休整。淮海战役可于十月十号左右开始行动。你们应利用目前半月时间，使攻济部队获得短时休息，然后留一个

---

[1] 饶、粟，指饶漱石、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许、谭、王，指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陈，指刘伯承、陈毅，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第一副司令员。李，指李达，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

[3] 1948年9月24日粟裕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就华东野战军下一步行动提出如下建议：一、即进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强1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自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全军转入休整。二、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峄枣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三、全力向南求援敌之一部而歼灭之。四、全军即进入休整。

纵队位于鲁西南起牵制作用，吴化文[1]亦应移至鲁西南，其余全部南下，准备进行几个作战：（一）估计不久邱兵团[2]将退回商砀[3]地区，黄兵团[4]将回至新安镇、运河[5]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二）歼灭两淮高宝[6]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三）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因此，你们应在酉灰[7]以前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要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8]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军委

二十五日十九时

---

[1] 吴化文（1904—1962），山东掖县人。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

[2] 邱兵团，指邱清泉任代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

[3] 商砀，指河南商丘和安徽砀山。

[4] 黄兵团，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5] 运河，镇名，在江苏省邳县。

[6] 两淮高宝，指江苏淮阴、淮安、高邮和宝应。

[7] 酉灰，即10月10日。

[8] 曲阜会议，指1948年8月下旬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有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订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

复粟裕电[1]

（1948年9月25日）

敬七时电[2]悉。望你们召集许、谭、王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粟裕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的主要内容。

[2] 敬七时电，指24日7时粟裕建议举行淮海战役的电报，内称：攻济战斗日内即可结束，如敌停止北援，我们下步行动，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即第一步以苏北兵团攻占淮安、淮阴、宝应、高邮，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打援；第二步攻占海州、连云港。如即进行休整，易失去适宜作战之秋凉气候和济南战役后加之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先打锦州可使我军完全处于主动地位[1]

（1948年9月27日）

林、罗、刘：

寝九时电[2]悉，计划极好。惟歼灭义县、高桥[3]、兴城、绥中、锦西五处之敌以后，如能同时打锦州山海关两处，则应同时打两处。如不能同时打两处，则先打山海关还是先打锦州值得考虑。因先打山海关，然后以打山海关之兵力回打锦州则劳师费时，给沈阳之敌以增援的时间；如先打锦州，则沈阳之敌很可能来不及增援，继续陷于麻痹状态（目前已是麻痹状态），我则可以主力移攻山海关、滦县、唐山、塘沽，并且只要有可能便应攻占葫芦岛、秦皇岛，完全肃清锦州、塘沽之线，直迫天津城下，迫使国民党用空运方法从沈阳调兵增防平津。除此以外绝无其他方法增防平津，而空运方法则是很迟缓的，并且是运不完的。这个时候你们全军休整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9月26日9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东北我军准备于9月27日以一部攻歼绥中之敌，一部攻占义县，一部歼高桥、西河口之敌，一部向锦西前进。“义县、高桥解决后，准备接着歼锦西、兴城之敌。然后如山海关之敌未逃时，即攻山海关，如敌已逃，则回头打锦州。”

[3] 高桥，镇名，位于今辽宁锦西东部。

个月至多四十天（不要超过四十天），然后分为两个集团，以一个集团第一步攻占平承线[1]，第二步攻占平张线[2]，以另一个集团攻沈长[3]，如此方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则完全处于主动地位。你们现在就应计算到这些步骤。

军委

感亥

1948年9月，解放军炮兵部队打击锦州守敌。

---

[1] 平承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承德的铁路，即今京承线。

[2] 平张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3] 沈长，指辽宁沈阳和吉林长春。

集结主力先歼骑十一旅等部[1]

（1948年9月27日）

杨、李、李：

感十二时电[2]悉。敌援甚快，先取归绥[3]已不可能。你们应当立即集结主力首先歼灭骑十一旅、骑十二旅、暂四军之三十二师，控制丰集兴[4]地区，并准备连续战斗，接着歼灭三十五军。你们行动要快，不要迟延。你们要有歼灭上述敌军全部（四个师又两个旅）之决心与勇气。对归绥则应以一部举行佯攻，待上述敌军歼灭后，再打归绥。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指1948年9月27日12时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集宁战斗尚在继续，今日可能解决。敌整骑十一旅已进到玫瑰营子，整骑十二旅今日由兴和向集宁急援。我拟坚决歼灭敌骑十一旅。另敌三十五军全部及暂四军之三十二师正车运柴沟堡转运兴和西援中，估计28日三十二师可到兴和。我们意见如三十五军从左援来得快，最好先集中主力在集丰段以东或以西地区先歼该军主力，尔后再攻取归绥城。

[3]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4] 丰集兴，指今内蒙古丰镇、集宁和兴和。

做好淮海战役的准备工作[1]

（1948年9月28日）

黄兵团[2]调回新安镇地区业已证实。你们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是最主要的作战是钳制邱李[3]两兵团、歼灭黄兵团。新安镇地区距离徐州甚近，邱李两兵团赴援甚快。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4]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5]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因此，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战役时间包括打黄兵团、打东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并告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的第一部分。

[2] 黄兵团，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3]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代司令官。李，指李弥（1901—1973），云南莲山（今属盈江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4] 济南战役，指1948年9月16日至24日华东野战军进行的以攻克济南为主要目标的战役。这次战役歼敌10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5] 睢杞战役，指1948年6月2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睢县和杞县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我军将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部、整编第七十五师及黄百韬兵团的3个多团，先后包围于睢县、杞县地区，经激战歼敌5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打两淮[1]在内，须有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战后休整一个月，故你们须准备两个月至两个半月的粮秣用品。此次济南战役只费十天，战后休整似需二十天左右，淮海战役估计为一个半月，共计两个半月左右。这个时间，即是原来准备对付攻济及打援可能有的最不利情况的时间，如果你们能按照这个时间取得济南（已经取得）、淮海两大战役的胜利，那是很合算的。师长以上干部到会的曲阜会议似宜推迟数日举行，以便攻济兵团各纵、师能在会议以前稍加整理。伤亡最大之九纵、十三纵等部宜迅速给以补充，在可能条件下如能抽调若干地方建制部队补入该两纵，特别是七十三团和一〇九团是有必要的。在执行淮海战役时，该两纵在作战第一阶段宜作预备队使用。俘虏六万余人中，宜有半数以上拨补全军人数最感不足的各纵。为顾到攻济兵团的休补，淮海战役出动时间似须推迟至酉哿[2]左右。

---

[1]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2] 酉哿，即10月20日。后来淮海战役开始的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

攻占锦州、义县、锦西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

（1948年9月29日）

林、罗、刘[1]：

俭日十时电[2]悉。先打锦州后打锦西，计划甚好。卫立煌[3]赴宁与蒋、顾、何[4]会商，二十七日返沈，必是决定接出长春之敌和增援锦州之敌无疑。因卫如不接出长春之敌，则难向锦州增援。但接出长春之敌，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向锦州增援又需要十天左右时间，故你们攻取义县、锦州、锦西三点必须顾及此种时间性。你们准备追歼长春逃敌是必要的，但不知在沈敌向北迎接长春逃敌时，你们使用多少兵力，及在使用这些兵力之后，你们是否尚有足够兵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9月28日10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已决定先攻锦州再打锦西，因为锦州之敌虽多但不强，易于突破，且便于随时打沈阳来援之敌。对义县之敌，因我炮兵过河困难，尚须数日才能攻击。兴城、绥中之敌均被包围，不日即可攻击解决。长春之敌最近企图突围的迹象更多，我们已准备追歼该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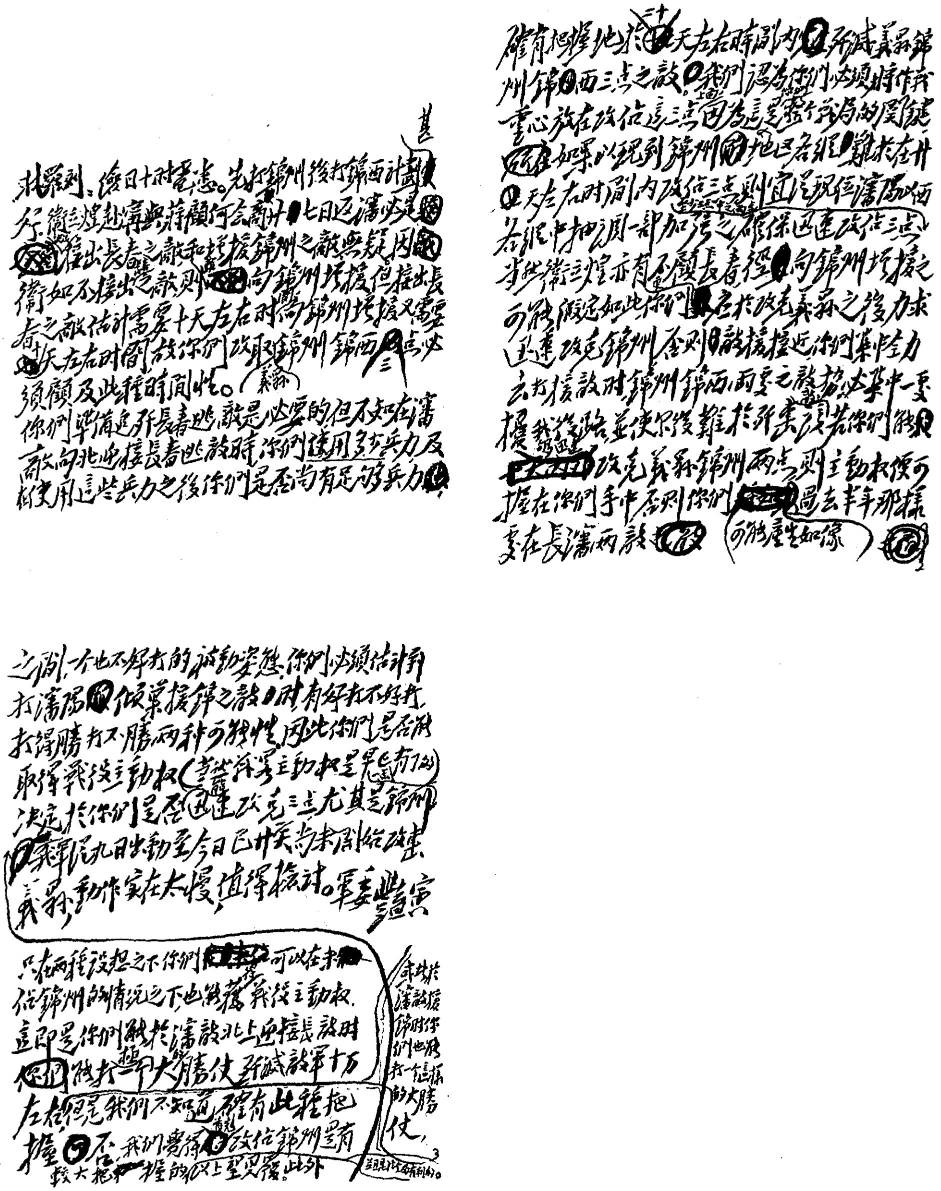
[3]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蒋，指蒋介石。顾，指顾祝同（1893—1987），江苏涟水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指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

力确有把握地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歼灭义县、锦州、锦西三点之敌。我们认为，你们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这三点上面，因为这是你们整个战局的关键。如果以现到锦州地区各纵难于在二十天左右时间内攻占三点，则宜从现位沈阳以西各纵中抽调一部加强之，确保迅速攻占三点至少三点中之两点。当然卫立煌亦有不顾长春，径向锦州增援之可能。假定如此，你们更应于攻克义县之后，力求迅速攻克锦州，否则敌援接近，你们集中全力去打援敌时，锦州、锦西两处之敌势必集中一处扰我后路，并使尔后难于歼击该敌。若你们能够迅速攻克义县、锦州两点，则主动权便可握在你们手中，否则，你们可能产生如像过去半年那样处在长、沈两敌之间，一个也不好打的被动姿态。你们必须估计到打沈阳倾巢援锦之敌时，有好打不好打，打得胜打不胜两种可能性。因此你们是否能取得战役主动权（当然战略主动权是早已有了的），决定于你们是否能迅速攻克三点尤其是锦州一点。只在两种设想之下，你们可以在未占锦州的情况之下，也能获得战役主动权，这即是你们能于沈敌北上迎接长敌时，能打一个极大的胜仗，歼灭敌军十万左右，或者于沈敌援锦时你们也能打一个这样的大胜仗，但是我们不知道确有此种把握否？我们觉得，首先攻占锦州是有较大把握的，并且是于全局有利的。以上望见复。此外，我军从九日出动至今日已二十一天，尚未开始攻击义县，动作实在太慢，值得检讨。

军委

艳寅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攻占锦州、义县、锦西是东北整个战局的关键》的手稿。

关于锦州战役和济南战役的指示电[1]

（1948年9月30日）

林、罗、刘：

二十九日十九时电[2]悉。（一）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二）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三）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八九两纵耽误两天封锁机场，应予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1948年9月29日19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军委，电文内称："我们攻锦州的兵力，共五个纵队（三、四、七、八、九纵），又两个最强的师及炮兵与大小坦克十五辆。以一个纵队（十一纵），对付锦西之敌。以六个纵队（一、二、五、六、十、十二纵队）（缺两个师）打援。但五纵与十二纵，均系今年成立，战斗力均较差，准备担任对付沈阳之敌，无论该敌向北策应长春，或向南增援锦州，均打。围长春和准备堵击长春之敌，共有大小九个独立师。在山海关方面，有三个独立师。拟依以后情况，随时将攻城部队抽出打援，或将打援部队参加攻城。""锦州敌除原来六个师外，又空运四十九军两个师（也是秋季战斗以后又成立的新部队），共八个师。敌兵虽多，但缺乏坚强骨干，城市房屋及工事皆不顶坚固，周围地形对我亦有利。故我们仍决心攻击。估计敌新兵多，容易突破，容易混乱，便于我发展。像四平战斗那样逐屋逐堡的争夺，可能性不很多。""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已有密息证明）。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

评。(四）济南除吴化文率三个旅（两万人）起义外，毙伤万余，俘六万余，王耀武已生俘，我伤亡近两万，缴获物资甚多。

军委

三十日十九时

以主力攻取襄阳威胁宜昌[1]

（1948年9月30日）

刘、陈：

（一）袭破平汉路信汉段[2]不宜过早，应俟七师、四十八师到达确山地区并向西有所动作时实施破袭方能生效。（二）在七师、四十八师集中确山地区以后，你们主力作战目的似以攻取襄阳为最适宜。你们如能集中主力攻占襄阳，威胁宜昌，则七师、四十八师又将被迫南调，你们可以回头攻取南阳，否则你们除攻郑州外再无好打机会，将处于到处不好打之被动地位，而攻郑州则十八军向北增援之距离和七师等部向襄阳增援之距离较近，似亦不如打襄阳为较有利，较易获得战役主动权。现在你们尚只有战略主动权，尚未获得战役主动权。如何，望考虑见复。

军委

三十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第一副司令员陈毅的电报。

[2] 平汉路信汉段，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信阳至汉口段，即今京广线一段。

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1]

（1948年9月30日）

人民解放军于九月十六日起开始向山东省会济南发起攻势。到二十四日，仅仅八天时间，就解放了敌人强固设防和重兵守御的济南市，全歼守敌十万余人，并争取吴化文军长率部起义。这个伟大的胜利，不但使国民党反动派及其美国主人目瞪口呆，甚至全国的人民也因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惊异。

济南的解放，对于整个战局的重大意义是很明显的。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以后的一年多中间，始终是把华东战场当作他的军事重点，他曾经使用八十几个整编旅的兵力在这个方向，妄图在这里决定战争的胜负。当华东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在苏中、苏北、鲁南、鲁中各战场光辉地完成了大量歼灭敌军的任务，而于去年七月转入外线作战的时候，敌人曾经一度在山东大肆骚扰，并曾经竭力吹嘘他们的所谓“战略胜利”。敌人曾经打通过胶济路，打通过济南以南的津浦路，在这个基础上，敌人甚至还梦想过打通津浦全线，借以沟通他们的华中和华北。但是就在那时，我们就指出过这并不是什么攻势的胜利，而只是攻势的失败，是敌人由全面攻势降为局部攻

---

[1]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这篇社论经刘少奇、周恩来修改后，毛泽东最后修改审定。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庆祝济南解放》。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势，又由局部攻势转入全面守势的时候，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果然，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转入进攻以后，在华东也无例外地反守为攻。曾经丧失过几乎全部县城的华东人民解放军，经过去年十月胶河的胜利，十一月胶济东段的胜利，十二月莱阳的胜利，今年三月胶济西段的胜利，四月胶济中段的胜利，五月至七月津浦沿线的胜利，直到这次济南的胜利，在不满一年中间，就造成了整个山东战局的彻底转变。现在山东除青岛、烟台、菏泽等少数据点外是被全部解放了，敌人在山东的战争计划是被摧毁了。济南这个敌人在山东最强大据点的攻克，使华东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的自由。在这个情况之下，不但山东的残敌岌岌可危，而且整个华东和中原的敌人也将遭受更加沉重的打击；华东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经更加迫近；而中外反动派在长时期内关于所谓“巩固华北、确保华中”，乃至所谓在几个月以内“肃清黄河以南”的喧嚷，已经成为普遍的笑柄了。

济南是国民党长期困守的孤立据点之一。与济南处于同样情形的，仅就目前而论，就还有长春、沈阳、锦州、承德、保定、太原、安阳、南阳、榆林等城市。这些城市中的人民和国民党军队，从济南的解放中，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教训呢？虽然济南有十万国民党守军，虽然他们有美国的装备，有永久性的层层工事构筑，有准备长期固守的物资，有美国所供给的空军的接济和配合，又有蒋介石所允许的大量援军集结在徐州附近，还有国民党的有名将领王耀武指挥，但是在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之下，只在八天里面就全军覆没。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那么，国民党今天不顾人民的死活，硬要困守许多孤城，究竟是为

着什么？难道不是等候灭亡吗？当国民党守城的时候，他们强迫市民忍受种种勒索，担负种种苦役，甚至强迫他们大批地饿死冻死；到了国民党失败了，却又马上对市民滥施轰炸，难道这不是故意拿老百姓当仇人吗？而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也只能是做着莫名其妙的牺牲品。既然明明守不住，为什么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呢？既然明明没有援兵出动，为什么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待援呢？难道不是故意骗人送死吗？守济南的国民党军队有一部分是明白了这一点，这就是吴化文军长和他的部下，他们避免了无谓牺牲的命运，并且得到了人民的谅解和欢迎，给予他们在今后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但另一部分就没有想明白这一点，而他们或者是做了俘虏，或者是白白地丧失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两条相反的道路，两种相反的结果。这是值得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加以思索和选择的。济南的战斗是过去了，其他被围城市的战斗正在接踵而来。在这里，我们愿意正告这些城市中国民党军队的一切开明人士们：你们不应当白白送死！你们更加不应当强迫许多无辜的同胞跟你们一起白白送死!你们应当走的道路就是辽南潘朔端师长、营口王家善师长和济南吴化文军长们的道路。这样，不但可以使我们的祖国和同胞少受一些损失，使人民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胜利，而且你们自己也得到一个将功折罪、重新改造自己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关于标题、导语和综合报道[1]

（1948年9月至11月）

一

凡新闻，标题必须有内容。原题[2]并无内容，不能引人注目。

（九月十四日）

二

凡论文标题，亦须有内容。原题[3]没有内容，不能引人注目。

（九月十四日）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一条新闻和一篇社论时写的批语，本篇三是给胡乔木的信。

[2] 这条新闻的原题是《华北召开中等教育会议》，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华北中等教育会议决定改善中等教育的诸项制度》。

[3] 这篇社论的原题是《中等教育问题》，毛泽东审阅时改为：《恢复和发展中等教育是当前的重大政治任务》。

三

本日（卅）《人民日报》[1]第一版《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做法》那篇新闻[2]值得广播各地照办，惟须将其中的数目字删掉一些，并须加上明确的新闻导语。请酌办。

（十一月三十日）

---

[1] 指华北《人民日报》。

[2] 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太行结束土改的两种做法：宣传政策进展顺利，捏手捏脚造成不安》。

九月会议的中心议题[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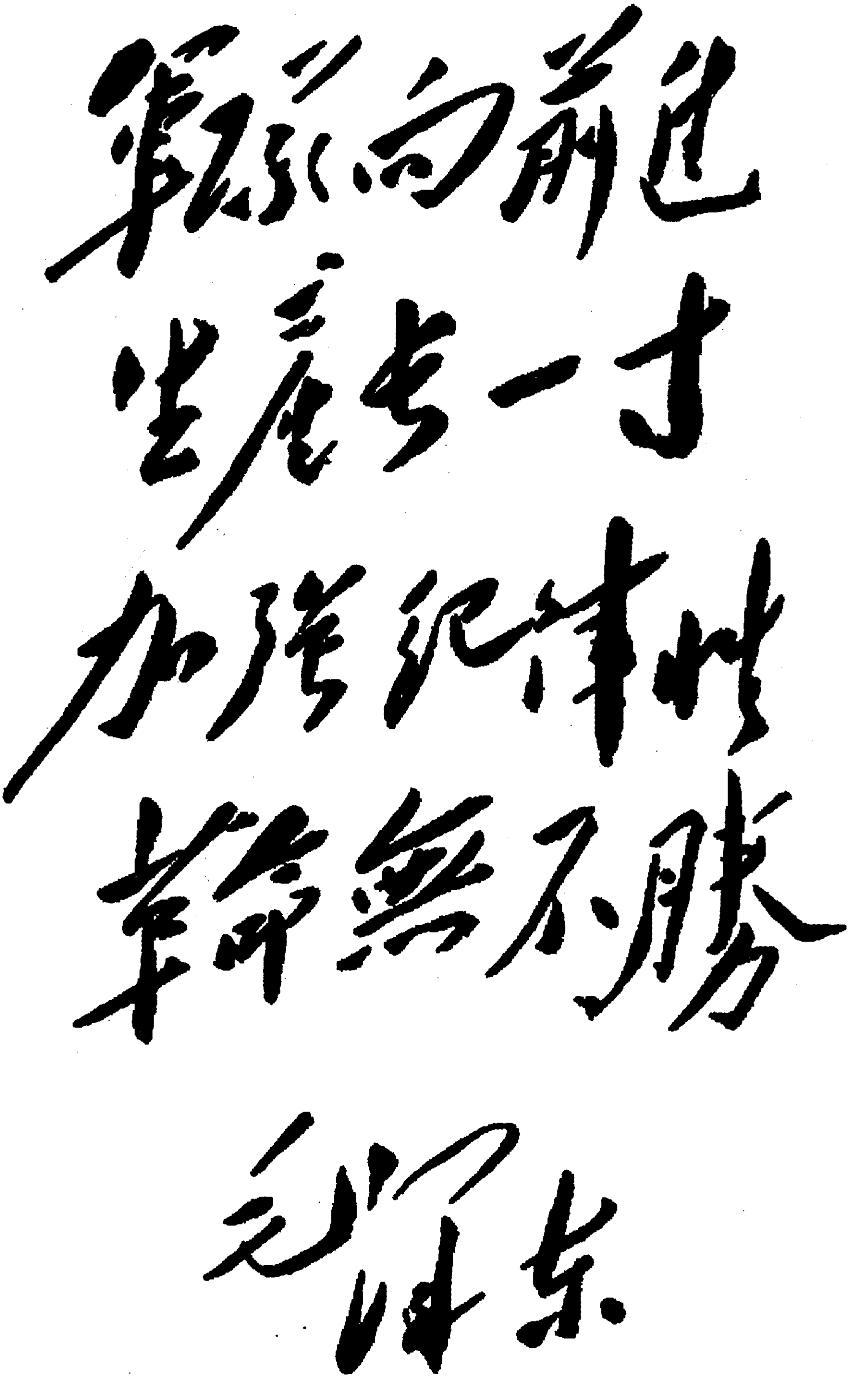
（1948年9月）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作报告的中心议题。



軍隊向前進
生產長一寸
加強紀律性
革命無不勝
毛澤東

毛泽东题写的九月会议的中心议题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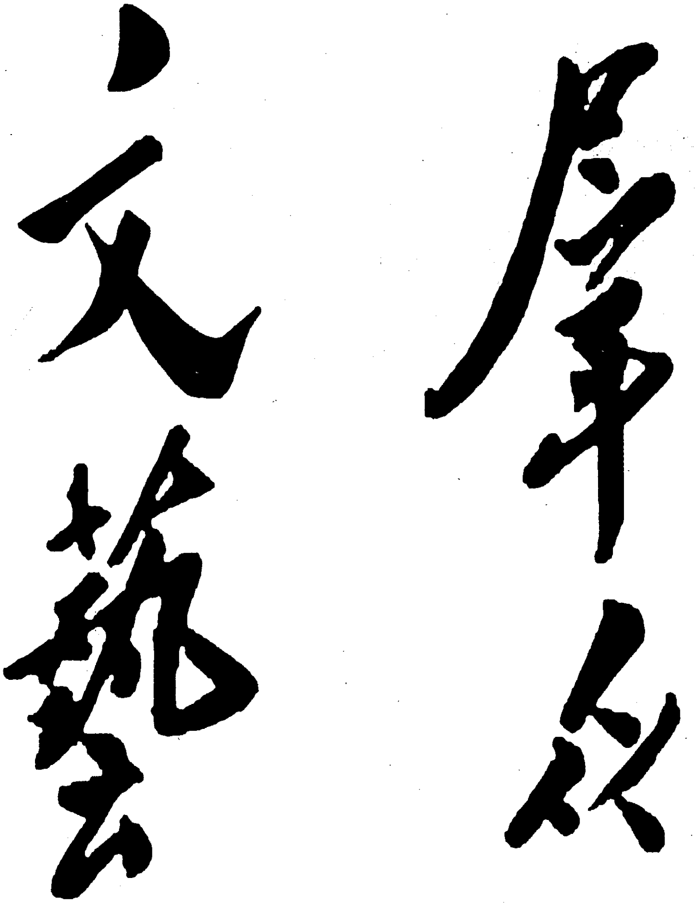
为《群众文艺》题名[1]

（1948年9月）

群众文艺

---

[1] 《群众文艺》，由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1948年9月在延安创刊，月刊，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共出版12期停刊，后作为西安出版的《群众日报》的副刊出版。



毛泽东为《群众文艺》题写的刊名。

给刘少奇等的信[1]

（1948年9月）

请告东北局，不用“毛泽东青年团”名称，一律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信的主要内容。

复海外侨团电[1]

（1948年10月1日）

陈嘉庚先生并请转各地侨胞民主团体及一切主张民主的侨胞公鉴：

五月四日星加坡侨团大会来电及南洋各地侨团函电，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关怀祖国，赞助敝党五月一日对时局主张，热心卓见，无任感佩。诸先生与各界侨胞对于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具体意见，尚望随时电示，以利进行，实深企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十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海外侨胞团体的复电。

华北第三兵团目前应集中兵力作战[1]

（1948年10月3日）

杨、李、李，并告杨、罗、耿[2]：

酉冬电[3]悉。（一）你们的根本意图是正确的。（二）来电只有一纵、六纵、八纵、骑旅、北岳集团之位置，二纵现在何处？（三）分两个旅西去攻占毕克齐、察素齐、托县[4]，有分散兵力之嫌。如必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0月2日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对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下一步绥东作战提出三个方案：一、如敌主力一、二天后还不动，我拟以两个旅西进打绥包段，攻歼毕克齐、察素齐、托县地区之敌，威胁包头、绥城，调敌主力西去，我主力即在卓资山以东寻机歼敌。二、如敌向我进攻，第一线两个师左右兵力，决在丰镇北打，求歼其大部。如敌主力全来，则不好打，拟以主力一部西去打绥包段或东进打兴和、柴沟堡段，调动分散敌主力后，寻机以我主力适时投入战斗歼正面之敌。三、如敌主力自动西进，即在集宁、兴和地区求得歼敌。总之，力求早日歼敌一、二个师主力，才对我有利。因此要避免与敌对峙，否则天冷后困难更多。如敌不动，我们要动，以我之动，调敌人动，才可能捕捉到战机。

[4] 毕克齐，镇名，位于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部。察素齐，镇名，今为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政府驻地。托县，即今内蒙古托克托县。

分出时，应先得我们同意。我们认为，在目前时期，你们应集中兵力作战，各部应在一天至多两天行程内赶得上参战。（四）只要集宁之敌出动，让敌到卓资山附近或至丰镇附近打为好，不要在集宁附近打。因集宁附近敌有步骑九个师或旅，集中在那一带决不好打。（五）你们认为敌出来时第一线两个师左右兵力，即应坚决下决心打，如敌来得太多则不应打，这是正确的。（六）我们已规定你们关于作战及政治指导属于军委，关于后勤属于华北及晋绥，但你们来电没有分清两类性质，平列军委、军区衔名，使接电者不知你们究竟请求何人作答，这是不对的。嗣后关于向军委请示事项，可同时告知军区，关于向军区请示事项，可同时告知军委，以明责任。

军委

三日八时

攻占锦州计划不应再改[1]

（1948年10月3日）

林、罗、刘：

二日二十二时电[2]悉。（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2日22时电文如下："（一）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二）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三）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四）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一万八千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五千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八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五）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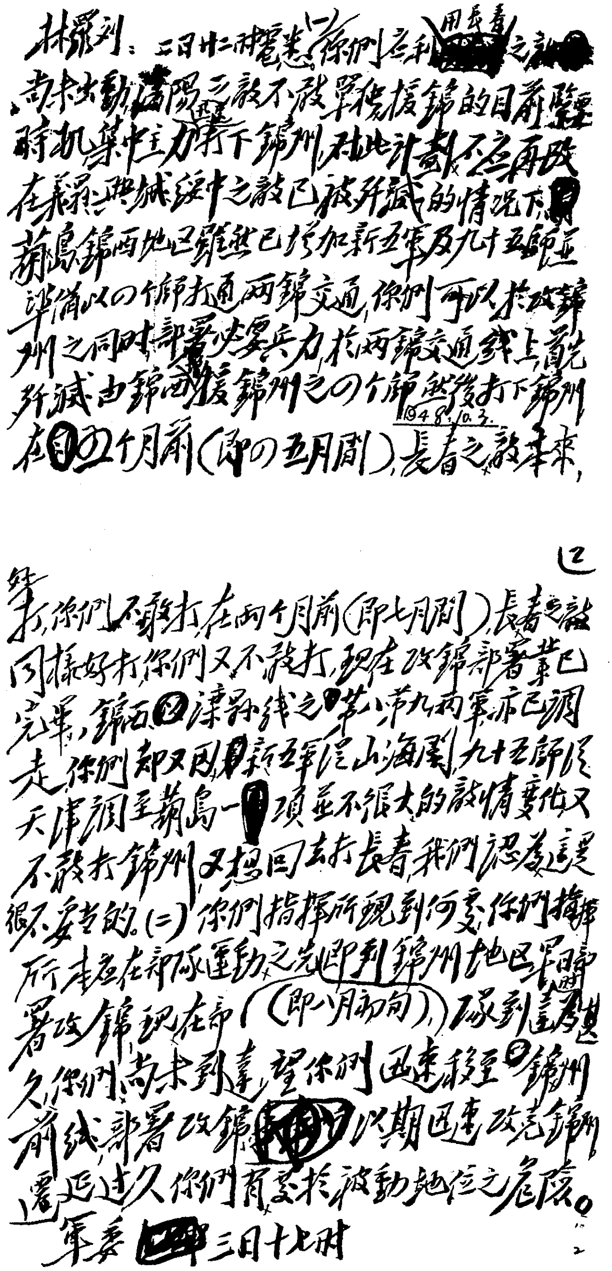
通两锦[1]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军委

三日十七时

---

[1] 两锦，指辽宁锦州和锦西。



林羅劉：二日廿二時電悉。(一)你們應利用長春之敵
尚未出動、瀋陽之敵不敢單獨援錦的目前緊要
時機，集中主力打下錦州，對此計劃不應再改。
在義縣與城郊中之敵已被殲滅的情況下，
葫蘆島錦西地區雖然已增加新五軍及九十五師，並
準備以四個師打通兩錦交通，你們可以於攻錦
州之同時，部署必要兵力於兩錦交通線上，首先
殲滅由錦西援錦州之四個師，然後打下錦州。
1948.10.3.
在五個月前（即四五月間），長春之敵本來

2

好打，你們不敢打；在兩個月前（即七月間），長春之敵
同樣好打，你們又不敢打。現在攻錦部署業已
完畢，錦西、灤縣線之第八、第九兩軍亦已調
走，你們卻又因新五軍從山海關、九十五師從
天津調至葫蘆島一項並不很大的敵情變化，又
不敢打錦州，又想回去打長春，我們認為這是
很不妥當的。(二)你們指揮所現到何處，你們指揮
所本應在部隊運動之先即到錦州地區部
署攻錦，現在部（（即八月初旬））隊到達甚
久，你們尚未到達，望你們迅速移至錦州
前線，部署攻錦，以期迅速攻克錦州，
遲延過久，你們有陷於被動地位之危險。
軍委　三日十七時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攻占锦州计划不应再改》的手稿。

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

（1948年10月3日）

林、罗、刘[1]，并告东北局：

本日十七时电[2]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3]。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指毛泽东1948年10月3日17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这个电报是对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2日22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电报的答复。林、罗、刘的电报根据敌新五军和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向军委表示：攻锦州还是攻长春“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军委复电指出：“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电报要求迅速将部队指挥机关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州，并指出：“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3] 两锦，指辽宁锦州和锦西。

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以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

军委

三日十九时

致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电[1]

（1948年10月3日）

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弟等正在邀请国内及海外华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尚希随时指教，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致到达东北解放区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电的主要内容。

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是正确的

（1948年10月4日）

林、罗、刘[1]，并告东北局：

三日九时电[2]悉。

（一）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二）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3]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我们过去一个月中曾有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3日9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电报还汇报了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向的具体兵力部署，并表示，尽早开始总攻，力求迅速解决战斗，战斗目的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

[3] 热河，即热河省。

多次电报叫你们如此做，你们到现在才想通这一重要点，不是平分兵力，而是以主力放在两锦方面。虽然在时间上应当一开始就如此做，从你们部队开始行动起到今天差不多已有一个月之久，你们才把攻击重点问题弄清楚，重新增加两个纵队到两锦方面去，可能对于作战要受一些影响（是否有影响及影响之大小，要看作战结果如何才能定），但是平分兵力的错误算是纠正了。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

（三）攻击锦州的时间愈快愈好，但因你们兵力尚未到齐，你们指挥所方才接近锦州附近，部队的攻城动员准备工作尚未进行，当然应当稍待时日，等候兵力到齐和完成准备工作，然后开始攻击。但是你们应当力求缩短这一准备过程，不要延迟太久，当然决不要有任何的慌忙。

（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十七时及十九时两电[1]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

（五）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

[1] 指毛泽东1948年10月3日17时和19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两封电报。

（六）蒋介石已到沈阳，不过是替丧失信心的部下打气。他讲些做些什么，你们完全不要理他，坚决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部署做去。

军委

四日六时

同意对付援敌的处置[1]

（1948年10月5日）

林、罗、刘：

（一）完全同意你们四日十五时电[2]关于对付援敌的处置，这种处置，可以保障攻击锦州时不受东西两面现有任何援敌的威胁，即使再加一部援敌亦可阻止之。（二）据息，国民党正在海运台湾孙立人[3]的三十一军向葫芦岛登陆。该军如全部北运，则是两个师，每师三个旅，全部美械新兵，虽已训练一个长时间，但无作战经验，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4日15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对援敌的处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锦西与锦州敌人阵地之间只有30余里，我军决以第四纵队和十一纵在两锦间空隙地区，采取攻势防御，顽抗和消耗敌人。另以两个独立师在锦西、葫芦岛向敌侧后进攻，以拖住敌人。二、拟以第十纵及第一纵的一个师抗击沈阳来援之敌，以我六纵两个师及五纵、十二纵全部，策应十纵之作战，采取运动战方式从敌侧后歼灭敌人和争取时间。三、锦州战斗结束后，锦西援敌可能缩回锦西原阵地。沈阳援敌则处于进退两难，我军则以攻锦主力回师歼灭沈阳援敌，确保锦州，下一步再攻锦西。但如当时锦西援敌被我切断未及南退，则我军首先在我阵地前歼灭该敌。

[3] 孙立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陆军副总司令兼陆军训练司令，在台湾负责三十一军等部队的编练。

力不强，估计十天内难于到达。你们不应被此项消息所扰乱，而动摇你们的决心。惟须尽可能缩短准备时间，早日开始攻击。（三）大连所得沈阳援锦部署是很胆怯的，该部署表示极怕我攻锦打援战法，采取逐步推进看势行事的谨慎方针。因此你们不要顾虑该敌难于阻止，大约有九个师左右即够阻止该敌。你们可从该方面十二个师中以九至十个师位于第一线第二线，以三或两个师位于接近锦州不太远之地点，以便在必要时转用于锦西方面。（四）沈阳锦西两方援敌攻击精神必不强，你们以六个纵队阻援必能胜任愉快，同时攻城兵力亦可能不要使用到六个纵队，估计有五个纵队即够，尚有一个纵队可以作为总预备队，保证整个战役的胜利。（五）尚须几日完成准备，何日可开始攻击，盼告。

军委

五日四时

复粟裕等电[1]

（1948年10月5日）

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2]后作，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粟裕并告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曲阜会议。济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转入休整。为贯彻中共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华野前委于10月上旬在曲阜召开会议。

对太原作战的意见[1]

（1948年10月6日）

徐、周、陈：

申俭作战计划电[2]，酉江作战部署电[3]及酉微战况电均悉。你们原定酉巧开始太原战役[4]，现已提前十三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能缩短攻城时间，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参谋长陈漫远的电报。

[2] 指1948年9月28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前委关于太原战役作战计划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太原战役的“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电报还报告了我军攻击太原的主要步骤和兵力部署。

[3] 指1948年10月3日20时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

[4] 太原战役，指华北军区对山西省会太原的国民党守军发起的城市攻坚战。10月5日开始外围战斗，12月4日，占领了城南和东山各要点，歼敌3万余人。此后，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太原前线部队暂缓攻城，转入围城休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0日对太原发起总攻，至24日攻占该城，全歼守敌。此役共歼敌13万余人，生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太原防守司令王靖国等，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反动统治。

要停留多久，即可乘势攻城，提早解放太原。因此你们发布战讯时，不要说敌人向外扩张，而应说你们业已开始太原战役，并且战讯要待外围战大体告一段落时发表为宜。

军委
鱼子

到锦州前线指挥作战应保障安全[1]

（1948年10月6日）

林、罗、刘：

四日九时电[2]悉。（一）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应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各城兵团即妥，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旨，迫近城垣指挥（亦不要太近）。（二）国民党统治机构全般慌乱，一切战场处于被动，士气一般下降，望鼓励全军将士奋勇杀敌，争取大胜。

军委

六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4日9时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已于今晨到达阜新，拟于今晚出发，继续前进到锦州附近指挥，我担任攻锦后续部队，正向锦州前进中，约五日后可到齐。”

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的作战任务[1]

（1948年10月6日）

杨、罗、耿，杨、李、李，并告华北局：

（一）因我杨罗耿兵团在平张线[2]积极活动（已歼敌一部）威胁张垣[3]，傅作义[4]被迫将三十五军主力及骑四师从绥[5]东调回柴沟堡[6]、张垣之线，此种情况对我绥东作战甚为有利。（二）我杨李李兵团应即集中全力向东，在丰镇、集宁、兴和地区乘机各个歼敌。该地一带尚有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你们应采取先打一部，吸引余部增援而各个歼灭之，准备分几次将敌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全部歼灭，重占丰集兴三城，然后再打绥包[7]。（三）我杨罗耿兵团应忍受暂时一切困难，吸引三十五、暂三两军主力来攻，集中该兵团全力歼其一路，打开平张局面；如敌不来攻，亦应寻敌薄弱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和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并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电报。

[2] 平张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3]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6] 柴沟堡，镇名，今为河北省怀安县县治。

[7] 绥包，指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

作战，务必不要放松每一个歼敌机会。（四）两兵团东西互相呼应，但必须各自独立作战，不要互相依赖。

军委

六日二时

乘胜扩大战果相机攻占太原[1]

（1948年10月6日）

徐、周、陈，并华北局：

（一）五日二十一时及六日辰电[2]均悉，歼敌两师甚慰。（二）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向前三日函称，连续一直打下去，在最快期间全歼敌人直至夺取城垣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是中策，旷日持久是下策。此项意见和我们今晨电[3]意见相同。你们现有良好机会可以全歼南面及东面之敌，得手后敌必震动。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全歼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然后看形势，如我军伤亡甚大，城内敌人尚多，城防尚固，则应略为休息补充，然后攻城；如我军伤亡不大，城内敌人不多，城防不甚坚固，则应乘胜攻城。此外尚有一点，即城外之敌大部歼灭，一部尚未歼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参谋长陈漫远并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5日21时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给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和6日辰时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给中央军委、聂荣臻、薄一波等的电报。前电报告了太原外围战况，并提出“拟乘胜向太原城周扩大战果”。后电说：经一昼夜战斗，已全歼敌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师，俘敌师长李子德、郑继周。

[3] 即《对太原作战的意见》。

（例如北面），是否可以派兵监视城外残敌，使用主力即行攻城，此点亦可考虑。望你们相机处理。（三）攻城所需弹药望聂薄[1]迅速接济。（四）太原有速下可能，华北局应速即完成接收太原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要太原已下，无人接管。

军委

六日二十时

---

[1] 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给彭真[1]的信

（1948年10月7日）

彭真同志：

刘澜涛[2]来信阅悉。中组[3]应发一指示给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其中规定若干项重要事项必须报告和请示的；尔后，不断督催，建立起中组的业务来。请与安子文[4]同志商酌办理为盼。

毛泽东

十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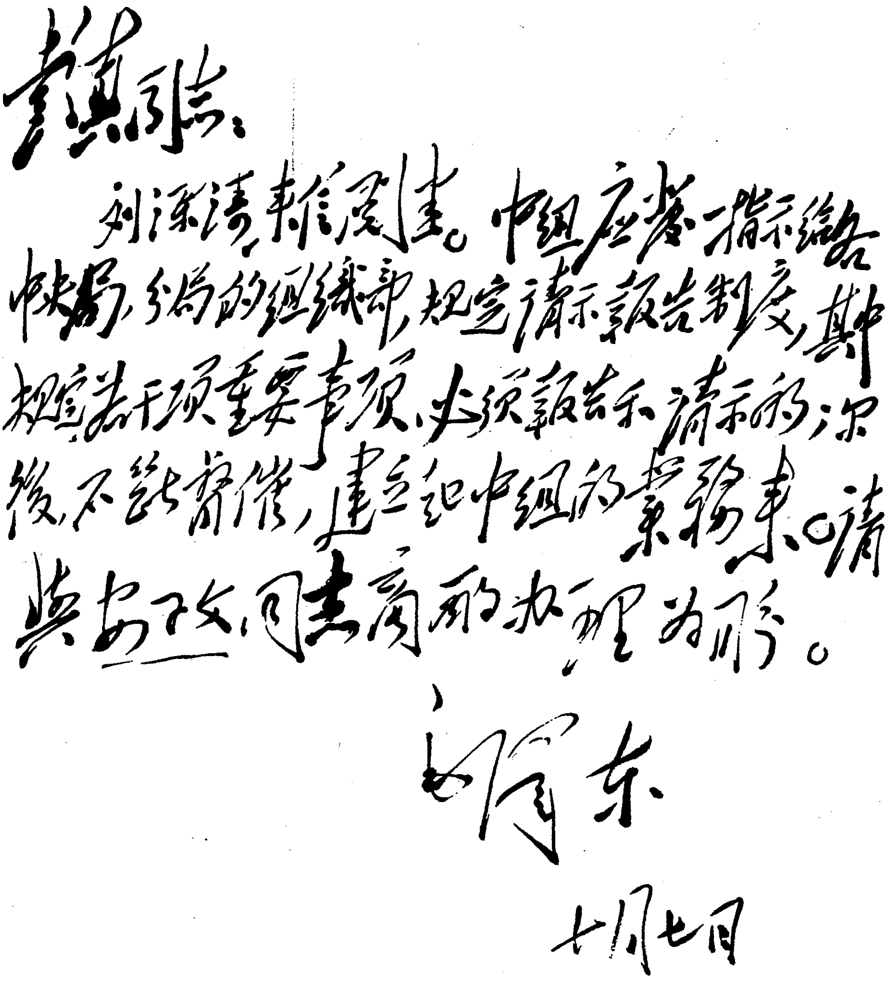
---

[1] 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2] 刘澜涛（1910—1997），陕西米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

[3] 即中共中央组织部。

[4] 安子文（1909—1980），陕西子洲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彭真同志：

刘澜涛来信阅悉。中组应发一指示给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其中规定若干项重要事项，必须报告和请示的，决後，不能擅作，建立起中组的业务来。请与安子文同志商酌办理为盼。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毛泽东致彭真信的手稿。

为杜斌丞题写挽词[1]

（1948年10月9日）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

[1] 杜斌丞（1888—1947），陕西米脂人，爱国民主人士。曾任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对促成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过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7年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毛泽东主席为杜斌丞的牺牲题写了挽词。

把全部精力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1]

（1948年10月10日）

（一）从你们开始攻击锦州之日起，一个时期内是你们战局紧张期间，望你们每两日或每三日以敌情（锦州守敌之抵抗能力，葫芦岛、锦西援敌和沈阳援敌之进度，长春敌军之动态）我情（攻城进度，攻城和阻援之伤亡程度）电告我们一次。

（二）这一时期的战局，很有可能如你们曾经说过的那样，发展成为极有利的形势，即不但能歼灭锦州守敌，而且能歼灭葫、锦援敌之一部，而且能歼灭长春逃敌之一部或大部。如果沈阳援敌进至大凌河以北地区，恰当你们业已攻克锦州、使你们有可能转移兵力将该敌加以包围的话，那就也可能歼灭沈阳援敌。这一切的关键是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

（三）按照我军攻击锦州的进度和东西两路援敌的进度，决定阻援部署的方法。如果沈阳援敌进得较慢（如果长春之敌在你们攻锦过程中突围，并被我十二纵等部抓住歼击，则沈阳援敌可能被麻痹，进得较慢，或停止不进，或回头救援长春之敌），葫、锦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准备以总预备队加入四纵、十一纵方面歼灭该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如果葫、锦援敌被我四纵、十一纵等

---

[1] 这是1948年10月10日9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等的电报。

部所钳制和阻止而进得很慢或停止不进，长春之敌没有突围，沈阳援敌进得较快，而锦州之敌业已大部被歼，全城已接近于攻克，则你们应使沈敌深入大凌河以北，以便及时转移兵力包围该敌，然后徐图歼击。

（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前面所说各点，只是希望你们予以相当的注意。尤其在锦州作战的头几天内，东西援敌不会大动，你们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

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1]

（1948年10月10日）

（一）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到政治局委员七人，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四人、重要工作人员十人参加，其中有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的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会议检查了过去时期的工作，规定了今后时期的工作任务。

（二）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内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2]，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到了进攻。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歼敌二百六十四万人，其中俘敌一百六十三万人。两年主要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知。1948年九月会议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集的。它是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因为在这以前，绝大多数中央委员都分散在各个解放区从事紧张的解放战争，交通十分困难，不可能举行这样大的会议。

[2] 国民党的第一次叛变是在1927年。这里所说的“再一次叛变”，是指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反革命的全面内战。

获，计有步枪近九十万枝，重轻机枪六万四千余挺，小炮八千余门，步兵炮五千余门，山野重炮一千一百余门。两年中人民解放军由一百二十余万人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人。其中正规军由一百一十八个旅增加到了一百七十六个旅，正规军人数由六十一万增加到了一百四十九万。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已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县城以上大中小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

由于我党坚决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万万人口的区域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村人民，首先是贫雇农。

我党党员由一九四五年五月的一百二十一万，增加到了现在的三百万（我党党员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前为五万人，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以后降为大约一万人左右，一九三四年因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升至三十万人，一九三七年因南方革命失败[1]降为大约四万人左右，一九四五年因抗日战争顺利发展增至一百二十一万人，现在因反蒋战争和土地革命顺利发展又增至三百万人）。党在最近一年内，一方面基本上克服了并正在继续克服着党内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的成分不纯（地主富农分子）、思想不纯（地主富农思想）和作风不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不良现象，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跟着大规模发动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斗争而产生

---

[1] 南方革命失败，指以陈绍禹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造成的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南方各革命根据地。

的，部分地但是相当多地侵犯了中农，破坏了某些私人工商业，以及某些地方越出了镇压反革命的某些政策界限等项“左”的错误。经过过去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的伟大的激烈的革命斗争，和对于自己错误的认真的纠正，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

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三万余人。

两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内，在人民解放军中，实行了有秩序的、有领导的、由全体战斗员和指挥员一起参加的民主运动，开展了自我批评，克服了和正在继续克服着军队中的官僚主义，恢复了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二年期间曾经实行有效、而在后来被取消了的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和连队中的战士委员会制，这样就使军队指战员的政治积极性和自觉性大为提高，战斗力和纪律性大为增强，溶化了大约八十万左右从国民党军队来的俘虏兵，使他们变为解放战士[1]，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两年内，从解放区动员了大约一百六十万左右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相当多的铁路、矿山和工业，我党正在大规模地学习管理工业和做生意。两年内，我们的军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增长。但是还不足以应付战争的需要。我们缺乏若干重要的原

---

[1] 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

料和机器，我们基本上还不能炼钢。

我们已在华北四千四百万人口的区域建立了统一的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人民政府，并决定由这个政府将华北、华东（有人口四千三百万）和西北（有人口七百万）三区的经济、财政、贸易、金融、交通和军事工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统一起来，以利支援前线，并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将东北和中原两区的上述工作也统一起来。

（三）中央会议，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为四百三十万人，两年被歼和逃亡三百零九万人，补充二百四十四万人，现有三百六十五万人。估计今后三年尚能补充三百万人，今后三年被歼和逃亡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人左右。这样，五年作战结果，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可能只剩下二百万人左右了。我军现有二百八十万人，今后三年准备收容俘虏参加我军一百七十万人（以占俘虏全数百分之六十计算），动员农民参军二百万人，除去消耗，五年作战结果，我军可能接近五百万人。如果五年作战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经从根本上被我们打倒了。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共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第一年歼敌正规军折合成九十七个旅（师），第二年歼敌

正规军折合成九十四个旅（师），根据这一情形看来，这样的目标是可能达到并且可能超过的。国民党现有全部军事力量三百六十五万人中的百分之七十是在第一线（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东，承德和长春之线以南），在其后方者（包括长江和巴山山脉之线以南，兰州和贺兰山脉之线以西）仅有大约百分之三十。国民党现有全部正规军二百八十五个旅，一百九十八万人，其中在第一线者二百四十九个旅，一百七十四万二千人（北线九十九个旅，六十九万四千人，南线一百五十个旅，一百零四万八千人），在其后方者，仅有三十六个旅，二十三万八千人，并且大部分是新建立的部队，缺乏战斗力。因此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为着执行歼敌任务，除有计划地谨慎地从解放区动员人民参军外，必须大量利用俘虏。

（四）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过去两年中，军队和作战的正规性是增长了一步，但是还不够，必须在第三年内再进一大步。为此目的，必须尽一切可能修理和掌握铁路、公路、轮船等近代交通工具，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

（五）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六）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1]，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现在，我们正在组织国民党区域的这些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七）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是支援战争、

---

[1] 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是毛泽东提出的。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口号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为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又改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认为，必须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必须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否则是不可能的。

执行这两方面的任务，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大军进入国民党区域执行无后方的或半有后方的作战，一切军事需要必须全部地或大部地就地自己解决。而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则需要有较好的组织工作，很好地领导解放区内部的市场和管制对外贸易，解决某些机器和原料缺乏的问题，首先是解决交通运输和修理铁路、公路、河道的问题。目前解放区的经济状况和财政状况，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困难比较国民党的困难要小得多，但是确实有困难。这主要是物资和兵员不足供应战争的需要，通货膨胀已到了相当大的程度，而我们的组织工作特别是财经方面的组织工作不够，则是形成这种困难的原因之一。我们相信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并且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必须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在前线注意缴获归公，爱护自己的有生力量，爱护武器，节省弹药，保护俘虏；在后方，减少国家机构的开支，减少不急需的人力和畜力的动员，减少开会时间，注意农业的季节，不违农时，节省工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全党动员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做生意，尽可能地将各解放区的经济加以适当的组织，克服市场上的盲目性，并同一切投机操纵的分子进行必要的斗争。从这一切着手，我们就必能克服自己面前的困难。

（八）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成为完成上

述任务的重要环节。中央会议已通过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生活的专门决议[1]。关于提高干部理论水平的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并引起了到会同志的注意。

（九）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已经胜利地召开，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2]明年上半年，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3]将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4]并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5]。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对于建立和扩大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问题作了以下的规定：各级党委要按照党章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对于这种会议要赋予党章所规定的一切权力，不许侵犯。开会要有充分的准备。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争论要及时地、真实地向上级报告，其中重要的争论须报告中央。此外，还规定要健全党委制，各级党委必须实行重要问题经党委集体讨论和作出决定的制度，不应当由个人决定重要问题，但是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不可偏废。

[2] 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是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恢复了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前5次全国劳动大会，先后举行于1922年、1925年、1926年、1927年、1929年。

[3] 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49年3月在北平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全国妇女群众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1957年9月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改称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4] 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49年5月在北平召开的。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1958年4月中华全国青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改称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1949年1月由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建立的。它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9年4月在北平召开。1957年5月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5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口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口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同意杨成武部主力向西行动……………………………………………………1

（1948年10月11日）

敌占彰武对我攻锦并非不利…………………………………………………3

（1948年10月11日）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4

（1948年10月11日）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电…………………………………………9

（1948年10月11日）

对援锦敌军动向的分析 ……………………………………………………10

（1948年10月12日）

望令陈锡联陈赓部全力攻击郑州 …………………………………………12

（1948年10月13日）

望杨罗耿部歼敌十六军一部 ………………………………………………14

（1948年10月13日）

钳制徐州援敌歼灭黄百韬兵团 ……………………………………………15

（1948年10月14日）

力争于月底攻取包头 ………………………………………………………19

（1948年10月14日）

推迟攻击郑州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 ……………………………………20

（1948年10月14日）

将锦西援敌诱至锦州附近包围歼灭之 ······23
（1948年10月14日）
对付冯治安部及侧击徐州援敌的部署 ······25
（1948年10月15日）
淮海战役计划不应变更 ······27
（1948年10月15日）
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 ······29
（1948年10月15日）
不失时机争取六十军起义 ······30
（1948年10月16日）
下一步行动宜打锦西葫芦岛 ······32
（1948年10月17日）
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 ······35
（1948年10月17日）
速派部队阻绝沈敌从营口撤退 ······37
（1948年10月18日）
致东北局等电 ······39
（1948年10月18日）
宜以五纵六纵十二纵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 ······40
（1948年10月19日）
占领长春后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41
（1948年10月19日）
准备各个歼灭廖耀湘部 ······43
（1948年10月19日）
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 ······45
（1948年10月20日）

即刻部署全歼廖耀湘兵团 ……………………………………46
（1948年10月20日）
对歼灭廖耀湘兵团具体部署的意见 …………………………49
（1948年10月20日）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 …………………………………51
（1948年10月20日）
同意围歼廖兵团及其他项部署 ………………………………52
（1948年10月21日）
部队休整后宜西移攻取同官耀县等地 ………………………53
（1948年10月21日）
陈邓部攻克郑州后迅即东进 …………………………………55
（1948年10月22日）
我军解放郑州 …………………………………………………57
（1948年10月22日）
同意照淮海战役的修改部署执行 ……………………………59
（1948年10月22日）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 …………………………………62
（1948年10月22日）
电勉吴化文 ……………………………………………………63
（1948年10月22日）
粟裕谭震林速赴南线指挥作战 ………………………………64
（1948年10月23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郑州解放 ………………………………66
（1948年10月23日）
控制营口阻塞敌人海上逃路 …………………………………68
（1948年10月24日）

应到蒙城集中以利机动作战 ……71
（1948年10月25日）
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不小的失着 ……73
（1948年10月25日）
同意杨成武部打归绥的意见 ……75
（1948年10月25日）
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解放郑州、开封 ……76
（1948年10月25日）
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具体部署 ……77
（1948年10月26日）
给刘少奇的信 ……80
（1948年10月26日）
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 ……81
（1948年10月26日）
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83
（1948年10月27日）
淮海战役的部署要估计到情况的变化 ……85
（1948年10月27日）
望以有力兵团东渡辽河歼灭营口一带之敌 ……88
（1948年10月27日）
复曾泽生等电 ……89
（1948年10月27日）
立即抽几个纵队兼程东进歼灭沈阳逃敌 ……90
（1948年10月28日）
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 ……91
（1948年10月28日）

复陈毅、邓小平电 ……………………………………92
（1948年10月28日）
关于华北三纵七纵的行动部署 ……………………………93
（1948年10月29日）
十一纵可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 ………………94
（1948年10月29日）
请考虑将东北第十一纵派往通县北平方向活动 ………96
（1948年10月29日）
东北南调部队宜放在玉田蓟州等地区 …………………97
（1948年10月29日）
打归绥可稍为推迟 ………………………………………98
（1948年10月29日）
给胡乔木的信……………………………………………100
（1948年10月29日）
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电…………………………101
（1948年10月29日）
给刘少白的信……………………………………………102
（1948年10月30日）
对黄李邱三兵团在同一个晚上发起攻击为好…………104
（1948年10月30日）
东北华北部队准备协力夺取平津地区…………………106
（1948年10月31日）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109
（1948年10月31日）
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名………………………………112
（1948年10月）

宜首先歼灭黄百韬指挥所……116
（1948年11月1日）
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小平指挥……117
（1948年11月1日）
杨罗耿兵团应进至满城以西地区待命……119
（1948年11月1日）
除对付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120
（1948年11月1日）
破击平汉路延滞敌八十五军北上……123
（1948年11月2日）
致习仲勋、林伯渠等电……125
（1948年11月3日）
四纵十一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地区之计划不变……126
（1948年11月4日）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128
（1948年11月4日）
致东北局等电……129
（1948年11月5日）
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130
（1948年11月5日）
攻击归绥的部署……132
（1948年11月5日）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34
（1948年11月5日）
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贺电……138
（1948年11月5日）

对冯治安部之抵抗和游移不决者应坚决歼灭……………………139
（1948年11月6日）
复陈毅、邓小平等电……………………………………………141
（1948年11月6日）
淮海战役第一仗和第二仗的歼敌任务…………………………142
（1948年11月7日）
给刘少奇等的信……………………………………………………144
（1948年11月8日）
应迅速分割包围黄兵团…………………………………………145
（1948年11月8日）
复粟裕、陈士榘、张震电………………………………………146
（1948年11月8日）
截断宿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147
（1948年11月9日）
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149
（1948年11月9日）
待东北我军南下攻平津杨成武部再攻归绥……………………150
（1948年11月9日）
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151
（1948年11月9日）
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152
（1948年11月10日）
应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153
（1948年11月10日）
歼灭孙元良部控制徐蚌段………………………………………154
（1948年11月10日）

注意堵击黄百韬兵团……156
（1948年11月10日）
力争歼灭孙元良部包围徐州……158
（1948年11月11日）
隔断黄维与邱清泉李弥兵团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160
（1948年11月11日）
同意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署……163
（1948年11月11日）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165
（1948年11月11日）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67
（1948年11月12日）
黄百韬解决后华野主力速移宿县地区……171
（1948年11月13日）
阻止黄维部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172
（1948年11月13日）
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徐图歼灭之……174
（1948年11月13日）
让邱清泉深入断其后路并包围之……175
（1948年11月14日）
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清泉李弥，歼灭黄百韬……176
（1948年11月14日）
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178
（1948年11月14日）
蒋介石政府正在覆没……181
（1948年11月14日）

歼灭黄百韬后再定下一步作战方针……184
（1948年11月15日）
复方方电……186
（1948年11月15日）
推迟攻击宿县切断固镇蚌埠间联系……187
（1948年11月16日）
推迟总攻碾庄诱敌深入……188
（1948年11月16日）
祝贺越南人民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189
（1950年10月16日）
东北主力是否早日入关为好……191
（1948年11月16日）
推迟攻取太原……193
（1948年11月16日）
由刘陈邓粟谭组成总前委统筹一切……194
（1948年11月16日）
总攻碾庄同时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197
（1948年11月16日）
准备在国民党军再度进扰石家庄时南下歼敌……199
（1948年11月16日）
防止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敌军逃走的部署……201
（1948年11月18日）
东北野战军取捷径迅速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之敌……203
（1948年11月18日）
关于阻歼南线敌人的部署……205
（1948年11月18日）

关于淮海战役下一步作战方针……………………………207
（1948年11月19日）
对邱清泉李弥各军以先歼一部为宜……………………………210
（1948年11月19日）
华东野战军应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212
（1948年11月19日）
复彭泽湘电……………………………214
（1948年11月19日）
打李延年兵团由华东野战军负责……………………………215
（1948年11月20日）
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217
（1948年11月20日）
东北部队入关的时间路线和任务……………………………220
（1948年11月21日）
华东野战军今后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222
（1948年11月21日）
给刘少奇等的信……………………………224
（1948年11月21日）
复杨得志、罗瑞卿等电……………………………225
（1948年11月21日）
杨成武部主力准备东进切断北平张家口之联系……………………………226
（1948年11月22日）
必须准备连续作战争取战役全胜……………………………227
（1948年11月23日）
同意歼灭李延年的部署……………………………230
（1948年11月23日）

同意先打黄维……232
（1948年11月24日）
暂不理山海关秦皇岛之敌……233
（1948年11月24日）
杨成武主力三个纵队的行动部署……235
（1948年11月24日）
给吴晗的信……237
（1948年11月24日）
致华东局等电……240
（1948年11月24日）
关于杨罗耿部的行动部署……241
（1948年11月26日）
东北大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242
（1948年11月26日）
注意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244
（1948年11月26日）
迅速抓住扭打平张线上之敌……246
（1948年11月27日）
引李延年部前进打击其侧后……249
（1948年11月27日）
向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250
（1948年11月27日）
请考虑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254
（1948年11月28日）
程子华黄志勇部暂在原地待命……257
（1948年11月28日）

请考虑在歼灭固镇曹老集敌人以后可否渡淮作战……………………259
（1948年11月28日）
给徐向前的信…………………………………………………………………260
（1948年11月29日）
歼灭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的关键…………………………………261
（1948年11月29日）
包围张宣之敌务使不能逃跑………………………………………………263
（1948年11月29日）
歼灭黄维后全力解决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部……………………………264
（1948年11月30日）
程黄部仍按原计划准备西进………………………………………………266
（1948年11月30日）
为张天义题词…………………………………………………………………268
（1948年11月30日）
给胡乔木的信…………………………………………………………………270
（1948年11月30日）
给胡乔木的信…………………………………………………………………271
(1948年11月)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273
（1948年11月）
防止敌军向两淮或连云港逃跑……………………………………………277
（1948年12月1日）
抓住胡宗南使其兵力不能他调……………………………………………278
（1948年12月1日）
杨成武部务必包围几部敌人………………………………………………280
（1948年12月1日）

程子华黄志勇部立即向南口怀来前进……………………………281
（1948年12月2日）
加强兵力确保切断张家口宣化敌之联系…………………………282
（1948年12月2日）
华东野战军应派两个纵队堵歼西逃之敌…………………………283
（1948年12月2日）
重点应放在隔断张宣两地之敌……………………………………284
（1948年12月3日）
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285
（1948年12月4日）
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以利歼击……………………………………286
（1948年12月4日）
平张线上各兵团的作战任务………………………………………287
（1948年12月4日）
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289
（1948年12月4日）
一纵必须全部用于切断张宣联系…………………………………291
（1948年12月4日）
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292
（1948年12月4日）
六纵应加强阻击李延年北进………………………………………294
（1948年12月4日）
对一个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谈话材料的批语………………………295
（1948年12月4日）
给刘少奇等的信……………………………………………………296
（1948年12月4日）

为防止蚌埠敌人威胁应构筑多层坚强防御阵地……………………297
（1948年12月5日）
对怀来敌如何攻击依情况决定……………………………………298
（1948年12月5日）
阻止可能从张家口西逃之敌………………………………………300
（1948年12月5日）
关于杨李部部署的指示电…………………………………………301
（1948年12月6日）
围歼张家口宣化怀来诸敌的部署…………………………………303
（1948年12月6日）
占领徐州及歼敌情况的通报………………………………………306
（1948年12月6日）
全力堵追张家口宣化向东突围之敌………………………………308
（1948年12月7日）
程黄部协助杨罗耿歼灭东逃之敌…………………………………309
（1948年12月7日）
华北部队应遵军委命令阻敌东逃…………………………………311
（1948年12月7日）
务将三十五军与怀来联系完全切断………………………………313
（1948年12月8日）
准备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之敌…………………314
（1948年12月8日）
如东进追敌来不及则以八纵等协助包围张垣……………………318
（1948年12月8日）
杨成武部应以全力包围张家口之敌………………………………320
（1948年12月8日）

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采取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321
（1948年12月8日）
关于歼灭怀来之敌的指示电………………………………………………323
（1948年12月9日）
东北部队以三五两纵威胁北平钳制敌人…………………………………324
（1948年12月10日）
歼灭一〇四军的作战应力求迅速…………………………………………326
（1948年12月10日）
复何基沣、张克侠电………………………………………………………328
（1948年12月10日）
迅速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329
（1948年12月10日）
关于平津地区的形势及部署………………………………………………331
（1948年12月11日）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333
（1948年12月11日）
关于五纵三纵十纵的部署…………………………………………………338
（1948年12月11日）
确实围住三十五军全力防敌突围…………………………………………339
（1948年12月11日）
杨成武部须准备打退敌人多次进攻………………………………………340
（1948年12月11日）
三纵到北平以东可试图切断平津路………………………………………341
（1948年12月11日）
华北部队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342
（1948年12月11日）

同意以程黄两纵及五纵包围南口昌平之敌……343

（1948年12月11日）

同意迅速包围南口昌平唐山等敌……345

（1948年12月12日）

包围通县之敌切断平津联系……346

（1948年12月12日）

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347

（1948年12月12日）

防止北平通县敌人逃跑……350

（1948年12月13日）

巩固地控制南口八达岭一带……352

（1948年12月13日）

迅速包围塘沽以防平津等敌从海上逃跑……353

（1948年12月13日）

准备阻击可能由天津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之敌……354

（1948年12月13日）

歼灭津塘线之敌然后控制海口……355

（1948年12月13日）

堵住北平通县天津之敌的退路……356

（1948年12月13日）

中央军委关于准备接收北平、天津、唐山的指示……358

（1948年12月13日）

全力阻击延迟敌人南逃……360

（1948年12月13日）

从东南面包围北平之敌……361

（1948年12月13日）

四纵应留南口八达岭防御……………………………………364
（1948年12月14日）

围歼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的各纵只作防御不作攻击………………365
（1948年12月14日）

加厚对北平东南的阻击兵力……………………………………366
（1948年12月15日）

攻击三十五军需在完成对平津包围之后…………………………368
（1948年12月15日）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369
（1948年12月15日）

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归林罗刘直接指挥……………………………370
（1948年12月16日）

准备增加包围张家口的兵力……………………………………371
（1948年12月16日）

抽调两个旅参加夺取张家口战役………………………………373
（1948年12月16日）

向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部连续进行政治攻势………………………374
（1948年12月16日）

同意林罗刘的军事部署意见……………………………………375
（1948年12月16日）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376
（1948年12月16日）

华北军一兵团不要去张家口……………………………………377
（1948年12月17日）

应继续攻歼尚义一带之敌………………………………………378
（1948年12月17日）

约在明年一月正式攻击天津北平张家口之敌……………………379
（1948年12月17日）
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381
（1948年12月17日）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382
（1948年12月17日）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385
（1948年12月17日）
迅速切断天津与新河塘沽等处联系…………………………………386
（1948年12月18日）
四纵速至张家口西面协同华北第三兵团堵歼逃敌………………388
（1948年12月18日）
密切注视胡宗南部动向……………………………………………………389
（1948年12月18日）
致高岗等电…………………………………………………………………………391
（1948年12月18日）
关于平绥线上的作战计划…………………………………………………392
（1948年12月19日）
调查能否炮击塘沽口岸敌船………………………………………………394
（1948年12月19日）
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395
（1948年12月20日）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404
（1948年12月20日）
中原野战军各纵待李延年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405
（1948年12月21日）

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407
（1948年12月21日）
复廖运周等电………………………………………………………409
（1948年12月21日）
立即将大部俘虏补入部队…………………………………………410
（1948年12月22日）
华东野战军全军可多休整数日……………………………………411
（1948年12月22日）
暂时不必普遍立条例………………………………………………412
（1948年12月22日）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413
（1948年12月23日）
包围大同归绥之敌…………………………………………………414
（1948年12月24日）
目前不要忙于包围胡宗南军………………………………………415
（1948年12月24日）
庆祝张家口的伟大胜利……………………………………………417
（1948年12月24日）
防止天津敌人向南突围……………………………………………418
（1948年12月25日）
陕北某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问题* ………………………………419
（1948年12月25日）
攻击塘沽时间推迟至下月上旬为宜………………………………420
（1948年12月26日）
推迟攻击两沽，严防平津两敌突围………………………………421
（1948年12月26日）

迅速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防敌南逃……………………………423
（1948年12月26日）
准备堵击平津南逃之敌…………………………………………424
（1948年12月26日）
南方游击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425
（1948年12月27日）
如傅作义南逃华北第一兵团三个纵队应到石家庄堵击………427
（1948年12月27日）
我们应对民主人士采取保护政策………………………………428
（1948年12月27日）
给刘少奇等的信…………………………………………………429
（1948年12月27日）
关于攻击太原所需兵力的问题…………………………………430
（1948年12月28日）
加强对被围之敌的政治攻势……………………………………431
（1948年12月28日）
同意调两杨兵团参加平津会战…………………………………433
（1948年12月28日）
放弃两沽集中夺取天津…………………………………………434
（1948年12月29日）
同意杨罗耿部参战及军事部署…………………………………435
（1948年12月30日）
将革命进行到底…………………………………………………436
（1948年12月30日）
各军原地休息然后渡江南进……………………………………450
（1948年12月31日）

为新华书店题名……………………………………………………451
（1948年12月）
为《人民邮电》题写报头…………………………………………452
（1948年12月）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453
（1948年冬）
为革命母亲夏娘娘八十寿辰题词…………………………………454
（1948年）
为华北大学题名……………………………………………………455
（1948年）
复林彪电……………………………………………………………459
（1949年1月1日）
致林彪电……………………………………………………………461
（1949年1月3日）
评战犯求和…………………………………………………………462
（1949年1月4日）
对孤守工厂区敌军可劝降以减少破坏……………………………466
（1949年1月6日）
攻天津时需特别注意学校…………………………………………467
（1949年1月6日）
中共中央关于欢迎民主人士工作致东北局、李富春、洛甫电……469
（1949年1月6日）
复林彪电……………………………………………………………471
（1949年1月7日）
致林彪电……………………………………………………………472
（1949年1月7日）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473
（1949年1月8日）
复林彪、聂荣臻电……………………………………………………480
（1949年1月9日）
中央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总前委……………………………481
（1949年1月10日）
在中共中央对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483
（1949年1月10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484
（1949年1月11日）
复林彪、聂荣臻电……………………………………………………485
（1949年1月11日）
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486
（1949年1月12日）
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按部署休整完成渡江作战准备……………487
（1949年1月12日）
致林彪、聂荣臻电……………………………………………………488
（1949年1月12日）
致东北局电……………………………………………………………489
（1949年1月14日）
致各中央局等电………………………………………………………490
（1949年1月14日）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491
（1949年1月14日）
致各中央局等电………………………………………………………496
（1949年1月15日）

致傅作义公函……………………………………………………………497
（1949年1月15日）
复林彪等电…………………………………………………………………498
（1949年1月15日）
同傅作义部谈判的补充意见和积极作好攻城准备问题……………499
（1949年1月16日）
致林彪等电…………………………………………………………………501
（1949年1月16日）
注意防止北平敌人突围……………………………………………………502
（1949年1月17日）
复斯大林电…………………………………………………………………503
（1949年1月17日）
致华东、中原两野战军首长等电…………………………………………504
（1949年1月17日）
给宋庆龄的两封信…………………………………………………………505
（1949年1月19日、6月19日）
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509
（1949年1月19日）

同意杨成武部主力向西行动[1]

（1948年10月11日）

杨、罗、耿，杨、李、李，并告华北局：

你们两方十日九时各一电[2]已悉。同意你们共同意见，杨李李主力向西行动。具体部署照杨李李意见，以北岳集团和八纵一个旅及一个骑兵团控制兴和、台基庙[3]、集宁地区，并向东活动，阻击西进之敌。以八纵另一个旅及骑兵一部进占陶林、武川，歼灭绥[4]北之敌。一、二、六纵即速西转首先肃清绥包段[5]，相机攻取包头。这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和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10日9时30分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给中共中央军委和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前电提议，三兵团主力应西去，以一部控制兴和、集宁、丰镇地区，尽力迟阻援敌。援敌不来，即打下绥、包。援敌来，即预定在归绥附近歼灭援敌。后电对今后行动提出两个建议：（一）主力补充棉裤后，即速西转，威迫绥远，首先扫掉绥包段敌人，攻占毕克齐、察素齐、萨拉齐县、托克托县，相机攻取包头。（二）为配合二兵团现在之行动，主力则向柴沟堡、万全进攻。并认为以执行第一个建议为好。

[3] 台基庙，位于内蒙古兴和县北部。

[4]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绥包段，指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行动可能吸引暂四军、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利杨罗耿作战。杨李李主力到西边后，应确定一个时期内专打中等的及小的敌人，即用全力攻占毕克齐、察素齐、托克托、陶思浩、萨拉齐、包头及该线以西以北地区，广占地面，征集粮食。待敌主力西援，并有机可乘时，再相机集中兵力，歼敌主力。归绥城则作为将来之攻取目标，目前不要理他。这一行动，将使傅作义[1]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现在已经处于被动地位），以免又想打大仗又想打小仗两头失塌。杨罗耿号召部队打大仗的精神甚好，只要有一次歼敌一个师两个师的机会，就不应放松。但如果没有此种机会时，则每次歼敌一团两团也是好的。统望你们依情况机动处理。杨罗耿除指挥自己部队外，应密切注意对杨李李之指挥。

军委

十一日二时

---

[1]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敌占彰武对我攻锦并非不利[1]

（1948年10月11日）

东总：

十日六时电[2]悉。（一）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它已失去时间。（二）国民党放出撤出长春空气，似在引起我军注意长春，并非真要马上撤出。是否如此，数日后即可判明。

军委

十一日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总部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10日6时东北野战军总部给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攻击锦州外围的战况和锦西援敌情况，并说“新民附近之敌九日占秀水河子并进逼彰武”。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1]

（1948年10月11日）

饶、粟、谭，并告华东局、中原局：

关于淮海战役[2]部署，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

（一）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台儿庄、临沂等地。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两个纵队担任歼灭敌一个师的办法，共以六个至七个纵队，分割歼灭敌二十五师、六十三师、六十四师。以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歼灭临城、韩庄地区李弥部一个旅，并力求占领临韩，从北面威胁徐州，使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敢以全力东援。以一个纵队，加地方兵团，位于鲁西南，侧击徐州、商丘段，以牵制邱兵团一部（孙元良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即速部署攻击郑徐线牵制孙兵团）。以一个至二个纵队，活动于宿迁、睢宁、灵璧地区，以牵制李兵团。以上部署，即是说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邱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这一部署，大体如同九月间攻济打援[3]的部署，否则不能达到歼灭黄兵团三个师的目的。第一阶段，力争在战役开始后两星期至三星期内结束。

（二）第二阶段，以大约五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

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估计这时，青岛之五十四师、三十二师很有可能由海运增至海、新、连地区[4]。该地区连原有一个师将共有三个师，故我须用五个纵队担任攻击，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钳制邱李两兵团，仍然是九月间攻济打援部署的那个原则。此阶段亦须争取于两个至三个星期内完结。

（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5]作战。那时敌将增加一个师左右的兵力（整八师正由烟台南运），故亦须准备以五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和钳制。此阶段，大约亦须有两个至三个星期。

三个阶段大概共须有一个半月至两个月的时间。

（四）你们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明年一月休整。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军委

酉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告知华东局和中原局。此后，全国局势发生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利的急剧变化，中原野战军奉命东进徐州、蚌埠地区，由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的地方部队共同作战。战役发起后，毛泽东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野战军并告中原野战军的电报，下达在徐州附近歼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战役决心。于是，淮海战役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这个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5000多人。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所提出的战役方针得到完全的成功，只是战役的发展比

预计的更为顺利，因而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在这个战役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就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了。淮海战役在1949年1月10日结束，1月21日蒋介石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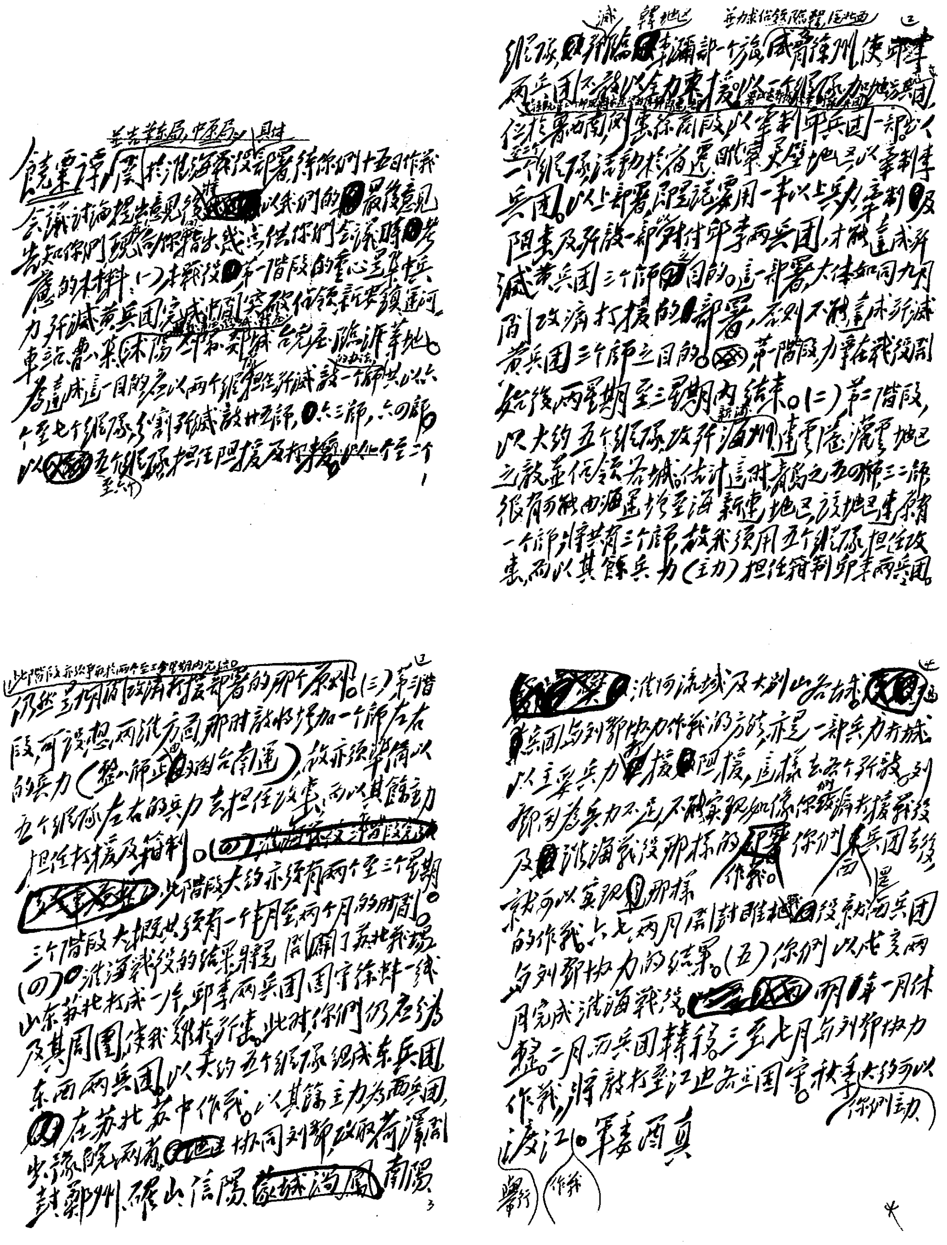
[2]　毛泽东在起草这个电报的时候，对淮海战役确定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后来，由于局势发生变化，中原野战军东进与华东野战军会合，共同作战，淮海战役遂发展成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决定性的战役。集结在上述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下的4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连同以后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共5个兵团和3个绥靖区部队。人民解放军参加这次战役的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华东、中原军区和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的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淮海战役过程中，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5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人，此外还击退了由南京方面来援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1月6日到22日，人民解放军于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围歼了黄百韬兵团（黄百韬毙命），解放了碾庄以东陇海路两侧和徐州以西以北广大地区，切断了津浦路徐（州）蚌（埠）段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三个半师，共23000人，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人民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司令官吴绍周。该兵团一个师起义。同时，华东野战军将由徐州西逃的杜聿明指挥下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包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随后歼灭了力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孙元良只身潜逃。第三阶段，从1948年12月16日到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部队首先进行了20天的战场休整。从1949年1月6日起，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逃

脱。至此，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3] 攻济打援，是指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所采取的作战方法。济南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以第二绥靖区的10万余人守备济南。同时，准备以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主力3个兵团，约17万人，随时北援。为了以多数兵力歼灭援敌，以保证夺取济南，华东野战军以7个纵队，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担负攻克济南的任务；以8个纵队，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随时准备阻击和歼灭沿津浦路北援的敌人。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16日晚，对济南守敌发起攻击。经8昼夜连续攻击，于24日全歼守敌（内有2万余人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由于人民解放军打援力量的强大和迅速达到攻济目的，徐州之敌未敢北援。

[4] 后来该敌没有敢来。

[5] 指淮阴、淮安一带。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手稿。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电[1]

（1948年10月11日）

蒋令孙元良[2]三个师东进，你们应即速部署以攻击郑徐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兵团，否则孙兵团加至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2]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总”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对援锦敌军动向的分析[1]

（1948年10月12日）

林、罗、刘：

真二十时半电[2]悉。（一）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甚慰。（二）沈敌进占彰武置于无用之地，表示卫立煌[3]想用取巧方法，引我回援，借此以解锦州之围，不敢直援锦州，避免远出被歼之危险，锦州守敌都是杂牌，即使被歼彼亦不甚痛心。如你们能于数日内攻下锦州，沈敌势必由彰武退回新民固守。但如攻锦需时较多，卢浚泉[4]等呼援迫切，蒋介石严令卫立煌增援，则该敌有由彰武经新立屯[5]、黑山到打虎山[6]，或由彰武转回新民经绕阳河到打虎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11日20时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今日攻占锦州城外防御阵地之战斗，已按计划完成，八纵逼近城关。（二）锦西援敌一度突破我塔山阵地，反击后敌被击退，敌伤亡重大，我恢复原阵地，并略有缴获。（三）沈阳援敌三个军已逼近彰武附近。（四）长春之敌以小部队出击，均被我击退。（五）明日锦州方面继续攻取敌城外防御阵地。（六）阻住锦西援敌和打下锦州均有把握。

[3]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卢浚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5] 新立屯，镇名，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北部。

[6] 打虎山，今名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南部。

之可能，但只要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则该敌无论如何是不能迫近锦州的，锦州一克该敌又必立即后撤，使你们无法寻歼该敌，此种可能性似乎很大。长春之敌是否撤退，亦是疑问，暂时不撤的可能性似较大。假定如此，则你们于攻克锦州之后，仍以向南各个歼灭北宁线[1]上之敌为最有利。（三）你们在新立屯、阜新、义县一线之补给品屯储情况如何，是否已采必要措施，盼告。

军委

十二日十五时

---

[1] 北宁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沈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望令陈锡联陈赓部全力攻击郑州[1]

（1948年10月13日）

刘、陈、邓、邓、李，并告饶、粟、谭[2]：

文未电[3]悉。（一）白[4]令黄维张淦[5]由确山、遂平线向唐河、赊旗[6]线前进，这样就给你们南北两区作战以必要的时间。望令陈锡联陈赓[7]率一、三、四、九纵，全力按你们所规定之时间攻击郑州，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和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0月12日未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子恢、李达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孙元良兵团六十九师已于11日由郑州东运，“我们遵令决定以陈锡联率一、三、九纵攻歼郑州之敌，预定十八日开始战斗，以陈谢率四纵十八日到襄城，并继续移靠攻郑部队，加强攻郑后备力量，并准备打援，另以陕南部队留方城、赊旗镇地区，伪装主力吸引麻痹黄维与张淦兵团”。“六纵现位唐河、枣阳间之湖阳镇，争取补充棉衣，暂缓北调，并相机扑歼图犯枣阳之二十师一部，以保障宏坤集团之后背，使其对吴绍周部队放手作战。”

[4]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黄维、张淦，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司令官。

[6] 赊旗，旧镇名，即今河南省社旗县县治社旗镇。

[7] 陈锡联、陈赓，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和第四纵队司令员。

部署阻援及打援。只要郑州攻克，你们在北面就取得了主动，就可迫使孙元良兵团[1]回顾开封，或留在开封、徐州线而不能再东进。（二）六纵暂时留在桐柏策应王宏坤[2]是可以的，只要王宏坤打一个较大的胜仗，张淦兵团势必南顾，黄维兵团则将向北对付二陈[3]，尔后你们便有各个歼击黄维的机会。

军委

十三日十四时

---

[1] 孙元良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元良。

[2] 王宏坤，当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

[3] 二陈，指陈锡联和陈赓。

望杨罗耿部歼敌十六军一部[1]

（1948年10月13日）

杨、罗、耿：

（一）你们攻克西拨子、岔道、青龙桥、八达岭等处，歼敌一部，并准备在一周内彻底破坏怀来、北平段铁路线，甚好。（二）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2]在绥远[3]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

军委

十三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杨李李，指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钳制徐州援敌歼灭黄百韬兵团[1]

（1948年10月14日）

饶、粟、谭[2]，并告中原局：

文子、文亥、元午三电[3]均悉。

（一）你们文子电部署的缺点是将打援兵力放在正面，而不是放在侧面。你们元午电同意我们真电[4]意见，即可改正此项缺点。其具体部署应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5]车站，歼灭守敌，控制该地一带；以三个纵队攻占及控制台儿庄及其以南地区，一部直达铁路；以两个纵队攻占临、韩[6]（得手后留一个纵队于临、韩，直追贾汪，以一个纵队移至台儿庄及其以西地区）。以上共六个纵队，可由三纵、八纵、十纵、十三纵、渤纵（你们文子电未提到渤纵，不知何故）及从韦吉[7]到路北[8]之两个纵队中抽出一个纵队充任。务使邱、李[9]援敌感到威胁，不驱逐我侧面兵力，不攻占台儿庄，即无法越运河向东增援，又使徐州城内感受威胁，不得不留李部第八军驻守。

（二）韦吉率一个纵队南下（不要到滨海去补棉衣，应在现地补棉衣，即从运河车站附近直下睢宁），会合留在路南之十一纵，不要位于宿迁以东，而要位于睢宁地区，控制徐宿公路，从南面威胁徐州，使邱、李援敌感到如不驱逐韦吉，则无法经睢、宿东援，同时对于徐蚌[10]线亦起威胁作用，使李部第九军不敢离开该线。

（三）以九、广两纵出鲁西南，会合当地地方兵团，位于丰县、鱼台以西，虞城以北，城武[11]以南地区，从西北威胁徐州，使孙元

良部[12]只能对付我九、广两纵，而不能到徐州接替李部第八军守城。

（四）我刘邓[13]主力一、三、四、九纵，不日开始攻击郑州，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刘汝明[14]全部、孙元良一部西顾。

（五）以上各项部署，都是为着钳制徐州各部援敌，使其第一个感觉是我军似乎有意夺取徐州，而不能确切断定我军并非夺取徐州，而是歼灭黄兵团。等到我军对黄兵团攻歼紧急而决定增援时，又发现如不解除南北两侧威胁，则很难赴援，这样就给我军以必要的时间歼灭黄兵团。至于敌人援军的组成，大概只能使用邱兵团各师。李兵团似难离开徐、蚌，因为刘峙[15]不但要对付我军对徐、蚌的威胁，而且要防备冯治安、孙良诚[16]的可能叛变。孙元良部则可能停留在汴徐线上。

（六）以一、四、六、七、十一、鲁中等六个纵队再加特纵，担任歼灭黄兵团三个师，这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

（七）除九、广两纵应从兖、济[17]直出丰、鱼、虞城地区外，其余各部，第一步，应全部开至临沂、梁丘、白彦[18]、邹县之线的展开位置，并休息几天，而不应先后参差不齐；第二步，各按规定任务由该线同时前进。因此，你们不但应等候棉衣、棉花完全到手分配，而且应等候攻济各部的兵员补充及由济南附近开到临沂、邹县之线，因此全军从临邹线向南出动之日期，应推迟至十一月五日至十日之间为适宜。

（八）后勤工作准备（粮食、弹药等）及政治工作准备，力求比较完备周到。

（九）你们对于上述意见望再考虑电告。

军委

寒丑

---

[1] 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2] 饶、粟、谭，指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饶漱石、粟裕、谭震林1948年10月12日子时、亥时和13日午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3封电报。文子电说：据敌黄百韬兵团现有态势，便于我分割而全部歼灭之。因此决定：(一) 以八纵、三纵袭占运河东站，歼灭守敌，控制运河、邳县、官湖地区，阻击沿铁路东援之敌。以九、十、十三纵位于兰陵西南东南地区为总预备队，威胁运河，使徐敌迟疑不敢东援。(二) 苏北兵团（二纵、十二纵）第一步进到滨海地区，补充棉衣，于战斗发起同时南下，进至新安镇以南、宿迁东北五花顶、晓（崔）店子地区，并以一部控制宿迁向睢宁攻势佯动，阻敌东援，并准备适时（黄兵团大部歼灭后）协同路北主力，歼击由徐州沿陇海路东援之敌，或乘胜南进进击两淮(淮阴、淮安)，须依黄兵团歼灭后的敌援情况而定。(三) 以鲁纵截断包围郯城之敌，相机攻歼之。以一、四、六、七、十一5个纵队及特纵日榴野炮团(必要时出坦克10辆攻击)，担任分割围歼黄兵团主力于新安镇、瓦窑、红花埠地区。(四) 广纵接替路北防务，担任威迫与监视临城、韩庄段敌人任务。(五) 如情况无大变化，拟本月25日前后发起战斗。文亥电提出：(一) 根据部队棉衣、棉花发放情况，建议将战役时间推迟至28日举行。(二) 为防敌孙元良、刘汝明兵团由鲁西南地区北犯汶上、济宁地区，捣乱威胁我新解放之济南，影响前方作战，拟以九纵队放置于济宁、兖州、汶上地区，作战役预备队休整待命，并协同冀鲁豫独立旅监视掌握鲁西南丰县、商丘一带情况；其他纵队不变。元午电说：接到军委酉真（10月11日）电，我们感到军委部署有如下好处：(一) 我们兵力规定全部展开，避免拥挤，给徐州敌侧背威胁大，增大敌人顾虑，减轻我对敌正面抗击、阻击压力。(二) 便于粮食供给和后方交通运输。

[4] 指毛泽东1948年10月11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给华东野战军并告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电报。电报提出：(一)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达到这

一目的，应以2个纵队担任歼灭敌1个师的办法，即用6个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兵团3个师，另以一半兵力牵制阻击邱、李两兵团并歼其一部。战役第一阶段力争在2至3星期内结束。（二）战役第二阶段，是以大约5个纵队的兵力，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此阶段亦争取2至3个星期内完结。（三）第三阶段，可设想在两淮方面作战。时间亦须2至3个星期。

[5] 运河，镇名，在江苏省邳县。

[6]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省微山县东南。

[7]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8] 指陇海铁路线徐州至海州段以北。

[9] 邱，指邱清泉，当时已接替杜聿明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李，指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兼第八军军长。

[10] 蚌，指安徽蚌埠。

[11] 城武，今山东成武。

[12] 指孙元良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

[1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14] 刘汝明（1895—1975），河北献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第四绥靖区在淮海战役时改称第八兵团。

[15] 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6] 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孙良诚（1893—1951），天津静海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1948年11月13日在江苏睢宁率该军军部和1个师共5800人投诚。

[17]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18] 白彦，旧县名，1953年撤销，划归山东滕县、邹县、平邑等县。

力争于月底攻取包头[1]

（1948年10月14日）

杨、李、李，并告杨、罗、耿[2]及华北局：

（一）西元十六时电[3]悉。计划及部署均好，即照此执行。（二）不管傅[4]军主力是否西援，你们应力争于月底攻取包头，你们便能取得有利地位，否则，绥包[5]间各点虽被占领，仍是不稳固的。

军委

寒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0月13日16时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遵军委电示，昨日召开前委会确定首先扫掉绥包段（托克托在内）及绥北之陶林、武川、乌兰花，攻占毕克齐、察素齐、陶思浩、萨县、澄口、唐县地区，大量筹粮。我攻占上述地区后，如傅作义主力仍未西援时，即以5个旅（二、六纵）及2个骑兵团的兵力，攻取包头，一纵留置于归绥附近。八纵攻占武川后，相机动作。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绥包，指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

推迟攻击郑州加紧完成淮海战役准备[1]

（1948年10月14日）

刘、陈、邓，并告饶、粟、谭[2]：

元酉电[3]悉。据沪宁谍息，国防部令刘峙[4]称，攻济共军损失奇重，现正整补，应趁其立足未稳急起反攻。又据国防部某科长称，为保卫徐郑[5]间之呼应绝不放弃鲁西，除原有邱清泉刘汝明[6]部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0月13日酉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原定18日夜开始进攻郑州，求歼守敌并调动孙元良兵团西援，配合华野淮海作战。但现在孙兵团仅调民权附近，杜聿明兵团集结商丘周围。在我攻郑开始后三四日孙兵团即可赶到增援，杜兵团亦可能尾同前来，如此，则我攻城未下，打援无力，势必被迫退出战斗。而杜兵团又可及时东返，于华野帮助不大。因此，我们考虑拟将攻郑时间推迟在淮海作战开始前五日开始行动，同时建议华野务准于25、26日开始作战，我们则推迟两日于20日开始攻郑。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徐郑，指江苏徐州和河南郑州。

[6]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另增两个整编师，番号不明。为保卫徐州及徐浦段，采取以攻为守战术，佯攻方面在鲁西。共军为巩固济南，保持兖济[1]，并掩护整补，亦采以攻代守。佯攻方向在郯城、东海及苏北等情。据刘陈邓元酉称，孙兵团[2]调集民权附近。据粟谭陈张[3]元午称，据谍息，邱兵团另有新任务，邱匪令骑一旅加强金乡、成武地区之侦察。又称，黄兵团[4]之六十三军，佳息拟以一六八师附一二五师一个团由新安、运河[5]段西开徐州，拟经萧县向永城扫荡。又称，李兵团[6]以八军之新二十师开丰县接一百军防等情。由此可大体判明，敌邱孙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这种进攻之目的，是根据国防部判断我军攻济损失甚大，现正掩护整补，而将来进攻主要方向是经鲁西南出徐蚌段，故先以重兵向鲁西南动作，究竟是否如此，不久即可判明。假如邱孙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因此决定：（一）刘陈邓主力攻郑作战应推迟时间，一、三、四、九纵原地休息待命，惟王宏坤[7]南进各部可迅速动作。（二）粟谭主力本月不动，加紧完成淮海战役一切准备工作。（三）

---

[1]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2] 孙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元良。

[3]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陈张，指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4]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5] 新安，镇名，今为江苏省新沂县县治。运河，镇名，今为江苏省邳县县治。

[6] 李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官李弥。

[7] 王宏坤，当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

粟谭即令韦吉[1]准备率十二纵于本月二十三、四日先行南下，与苏北十一纵会合，集结于运西[2]泗县、灵璧地区，其二纵暂留现地不动，尔后随主力南下归建。

军委

十四日二十一时

---

[1]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2] 运西，指运河以西。

将锦西援敌诱至锦州附近包围歼灭之[1]

（1948年10月14日）

林、罗、刘：

本日十八时电[2]悉，攻入锦州甚慰。如果你们的总预备队没有使用，如果锦州城内之敌比较容易解决，又如果你们攻锦各部伤亡不很大，尚有继续打一仗的能力，则我们主张在锦州残敌将歼未歼的时机，或者将敌指挥机关及敌军一部故意保留不急于歼灭，让其急叫呼援，而将锦西方面防御部队向后撤退，将锦西援敌五个师诱至锦州附近，加以包围歼灭。果能如此，你们便能接着夺取锦西。望按情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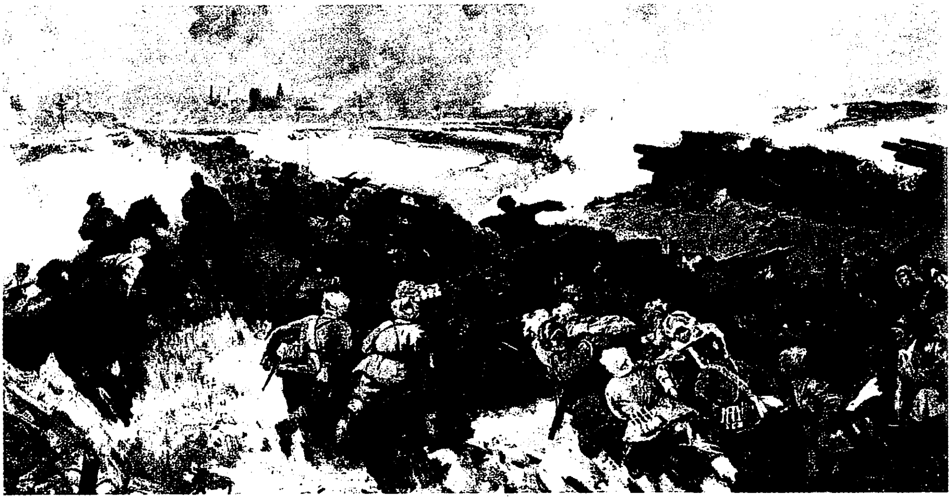
军委

十四日二十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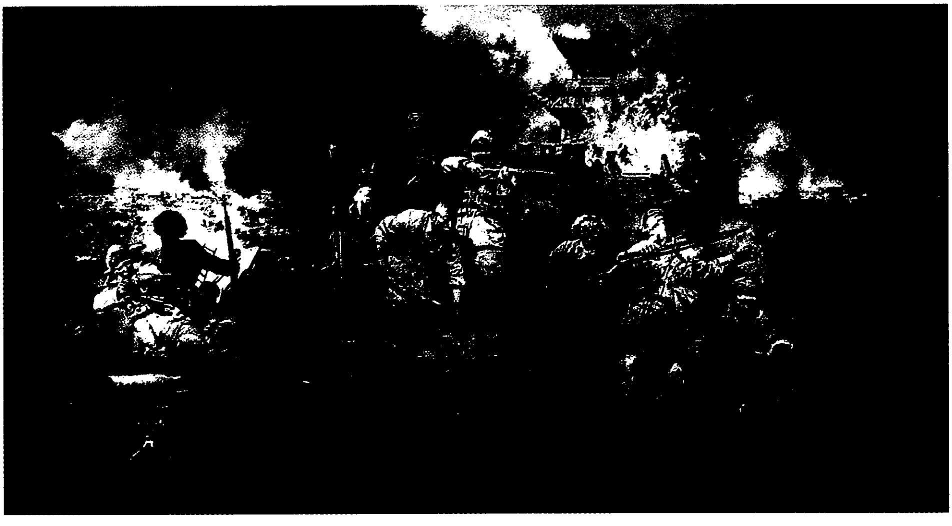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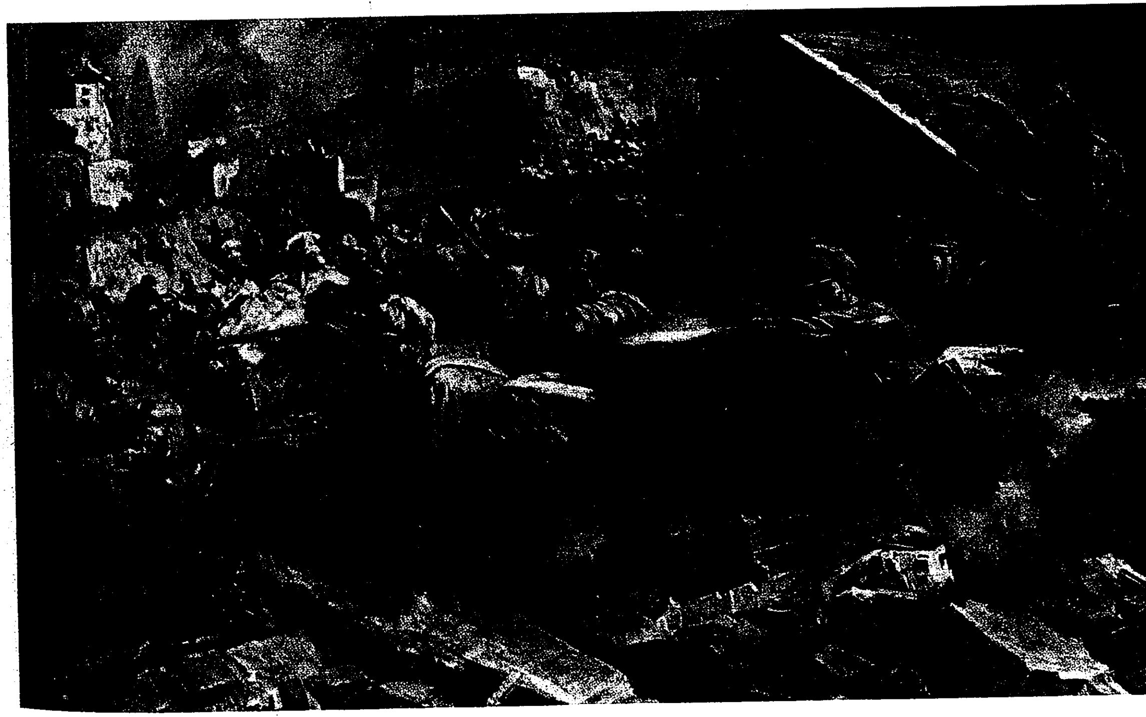
[2] 指1948年10月14日18时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一）我军本日11时发起总攻击，各纵主力皆突入城内，正进行巷战中。（二）锦西之敌，本晨5时又开始进攻，正激战中，敌在第一线展开有5个师。



《攻克锦州》（油画）



《攻克锦州》（油画）



《攻克锦州》（油画）

对付冯治安部及侧击徐州援敌的部署[1]

（1948年10月15日）

饶、粟、谭：

寒电悉。（一）完全同意你们对冯治安[2]部的方针，望作具体布置，并且要快。（二）关于对付冯部及侧击徐州援敌之兵力，我们认为除以一个强力纵队袭占运河[3]车站，控制该段运河由正面阻援外，必须使用五个纵队攻占临、枣、峄、台[4]及其以南地区，控制运武两河，架设多数浮桥，使我军有强大部队直达铁路附近，从铁道北侧起，直到运河构筑阻击工事，吸引援敌向该方进攻，使我取得时间。为此，应将围冯打冯及迫冯起义之兵力，与超越冯部南下直达铁路北侧之兵力，分为两部分别规定任务，不要混杂，不要使用五个纵队全部围冯打冯，而应至少使用两个纵队担负超越冯部南下阻敌之任务，否则就不能有效阻止援敌取得时间。（三）如邳县等处有敌，我担任歼击黄兵团[5]之兵力亦应分路超越邳县等处，迅速直达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3] 运河，镇名，今为江苏省邳县县治。

[4]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枣，即枣庄市。峄，指峄县，旧县名，即今枣庄市峄城。台，指台儿庄，位于枣庄市南部。

[5]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兵团各师所在地，分割围歼。（四）昨电[1]询问你们七个问题，请即答复。

军委
删申

---

[1] 指1948年10月14日申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粟裕的电报。电报要求查告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具体位置等项情况。

淮海战役计划不应变更[1]

（1948年10月15日）

饶、粟、谭，并告刘、陈、邓[2]：

（一）据华东参寒删两电所获情报，邱孙两兵团[3]向鲁西南进攻计划业已证实。其出动时间估计在酉智左右，月底可能占领金、鱼、成、单、曹、定、菏[4]甚至郓巨[5]一带，其目的是阻塞你们出汴徐线[6]道路，并使你们误认其将收复济南，因而仓卒部署应敌，不得休整，并不敢出苏北。（二）在此种情况下，你们淮海战役计划不但不应变更，而且给你们以极大便利。（三）望将九、广两纵开至兖济[7]地区，以主力控制运河，担任防守，以一部协同鲁西南地方兵团在金、鱼、成地区应付该敌。（四）其余全部速作准备，按照我们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邱孙两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兵团司令官分别为邱清泉和孙元良。

[4] 金、鱼、成、单、曹、定、菏，指山东金乡、鱼台、成武、单县、曹县、定陶和菏泽。

[5] 郓巨，指山东郓城和巨野。

[6] 汴徐线，指开封至徐州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7] 兖济，指山东兖州和济宁。

提意见，首先集结临沂、邹县之线，待邱孙进至相当位置之际，即齐头南进举行淮海战役。韦吉部[1]仍在现地隐蔽，和主力同时行动，不要先动，以免惊动敌人。（五）刘陈邓攻击郑州时机，应待邱孙向北深入再行决定，不可过早。对郑攻击时应以有力兵团绕至郑州、中牟之间，从东边向郑州攻击，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到即可能逃跑。（六）东北我军已克锦州，歼敌七个师（旅）。彭张赵[2]歼灭胡[3]部两个整编师。附告。

军委

删酉

---

[1] 韦吉部，指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赵，指张宗逊、赵寿山，当时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

（1948年10月15日）

寒巳电[2]悉。华野南进时间推迟，黄维、张淦亦未急进，邱、孙可能由汴、徐向北，你们攻郑宜略推迟，各纵现地待命为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的主要内容。

[2]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10月14日巳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在我华野推迟攻势至28日发动不再变更的条件下，我决心以陈锡联集团于20日开始围攻郑州，陈、谢率部跟进加入作战”。

不失时机争取六十军起义[1]

（1948年10月16日）

东北局，林、罗、刘：

你们两处铣电及转来一兵团删电均悉。你们争取六十军起义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兵团对六十军的分析及处置也是对的，惟要六十军对新七军表示态度一点，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吴化文[2]退出济南战斗时，曾以电话告诉王耀武[3]说，我不能打了，但我也不打你等语，这是军阀军队难免的现象。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愿意加入解放军序列，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拥护共产党及人民解放军，也就够了。你们应当不失时机和六十军代表加紧商谈，并注意这些代表。张冲[4]应速去一兵团。如果曾泽生[5]愿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吴化文，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年9月19日在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

[3] 王耀武，原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4] 张冲，原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副军长兼第一八四师师长，1946年年初到延安，后到东北前线，1948年写信策动曾泽生在长春率部起义。

[5] 曾泽生，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官兼第六十军军长，1948年10月17日辽沈战役中率六十军在长春起义。

见潘朔端[1]，则潘可秘密见曾谈判。如果六十军能照上述办法拖出长春，则一兵团（加十二纵）便应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即使不能一下解决，也可逐步解决之。

中央
铣亥

---

[1] 潘朔端，原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1946年5月在辽宁海城率部起义。此时任嫩江军区副司令员。

下一步行动宜打锦西葫芦岛[1]

（1948年10月17日）

林、罗、刘、谭，并告东北局：

（一）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十五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十一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在你们打锦葫期间，沈敌可能被迫增援。因锦葫守军是国民党嫡系，和锦州守军多为杂牌不同。我克锦州，卫立煌实际上坐视不救，必为许多人所不满。故我攻锦葫时，沈敌可能增援。而只要沈敌远离沈阳，走打虎山[2]、大凌河增援锦葫，便于大局有利。因为国民党对于沈阳向分撤与不撤两种意见。据最近息，卫立煌是主张不撤者。但南京国防部对撤的某些准备仍在进行。其办法有走陆路、走海路两种。我占锦州，走陆路很困难。要撤就是经营口海运。要海运须在十一月。过此营口封冻，便不能走。如因我攻锦葫，沈敌十一月被迫从打虎山、大凌河增援，他们便不能利用十一月从营口撤退了。只要沈敌十一月不撤，待你们攻克锦葫以后，你们便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入关打津榆线[3]，主力回至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并告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打虎山，今名大虎山，镇名，位于辽宁黑山县南部。

[3] 津榆线，指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阳周围，逐步削弱沈敌，直至夺取沈阳。

（二）锦葫现有八个师，且战力较强，如果加上九十二军的一个师及烟台第八军的两个师（一个较强，一个是地方部队组成很弱，该两师原定开徐蚌[1]归制，最近有开葫芦岛或塘沽息，尚待证明），则共有十一个师。我们不明锦葫地形及工事强弱，锦葫两处敌军配备，锦葫间相距多远，能否钳制一处先打一处，各个歼灭。但我们觉得你们现有二十七个师，士气高，兵员多，敌军士气低，援兵远，加以我军大胜声威，是可能夺取锦葫的。即使葫芦岛地形不利攻取，单取锦西也就很好。

（三）锦州作战我军伤亡及缴获情形，你们觉得打锦葫有何困难，仅休整十五天能否作战，均望告。

（四）上电写完，接你们铣十二时电，蒋介石至沈部署撤退长春。蒋介石素来对我军力量估计不足，他似在判断我军打锦州后伤亡必大，非有一月以上休整不能再打，而我军过去在一次大战后，总是要作长时间休整，亦给他这种判断以根据。他当然不相信你们现在能打新民、彰武之敌，也不相信你们在半月之后能打锦西。他的计划大概是在本月内完成撤退长春，以长春兵力回守沈阳，以沈阳全力增援锦葫。如你们能争取六十军于撤退前拖出长春，我一兵团又能乘机攻入长春解决新七军，则可破坏蒋介石集沈敌全力援锦葫的计划；即使六十军不能起义，我一兵团能于长敌突围后歼灭其一部或大部，亦可破坏蒋计划的一部或大部。蒋、卫为接应长敌撤退，势必令现至彰武、新民之敌北进接应，往返需要两星期左右。如你们能于两星期内完成休整及攻锦葫的准备工作，于长、沈刚刚

---

[1]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会合之际，即发起攻锦葫，必出蒋、卫意料之外，若你们能以十天左右时间攻克锦西，则沈阳增援必难赶到。

（五）有一种可能是蒋、卫将长敌接出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州，而将主力放在津榆线。如果是这样，则你们更应争取尽可能迅速地攻占锦、葫、榆、滦、唐[1]诸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兵力增援平津，以利回头歼灭敌主力。如果敌经营口海运增援榆、唐、平、津，则你们亦须先取锦葫，然后再议入关作战。

军委

篠寅

---

[1] 榆、滦、唐，指河北渝关（山海关）、滦县和唐山。

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1]

（1948年10月17日）

刘、陈、邓、邓，并告饶、粟、谭[2]：

篠辰电[3]悉。（一）你们攻郑时机似以再推迟两三天为好。因为你们不但要顾到黄维[4]可能北援，并要顾到孙元良[5]可能西援。据粟谭铣巳电[6]，邱孙[7]拟于酉智北犯。若你们择选酉梗、酉敬或酉有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副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0月17日辰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现黄维兵团三个师正掩护军需品送南阳，七师已南调广水对付我王宏坤部，而华野作战又在二十天以后，如果我们推迟攻郑州时间，可能丧失这个较好战机。""因此，我们决心在黄维兵团尚未回头时攻取郑州，并拟于明（十八）日夜由禹襄地区开进，二十一日夜进攻，求得五天或七天内攻克。只要六七天内打下郑州，就很主动，对华野配合也更有利。"

[4]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5]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6] 指1948年10月16日巳时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给赵健民、徐深吉、傅秋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邱、孙兵团因拟酉智向鲁西南进犯，可能再占菏泽、金巨，甚而郓城地区，以此行动破坏我进入汴、郑，使我误为敌将重占济南，为不妨碍我下一步作战行动，决定九纵、广纵进入鲁西南地区。"

[7] 邱，指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孙，指孙元良。

攻郑开始时间似较好。如果这个时间对于黄维方面的情况也大体适合的话。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时间仅对孙元良方面适合，对黄维方面根本不适合，则照你们篠辰电行动。（二）不论刘陈邓何时攻郑，粟谭方面按照删申致军委电[1]所定计划行动不变更。

军委

篠未

---

[1] 指1948年10月15日申时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详细报告了作战的具体部署，提出整个战役以10月31日前进至邹临线集结准备位置，11月5日对新安镇及其东西守敌发起突然攻击。

速派部队阻绝沈敌从营口撤退[1]

（1948年10月18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巧十时电[2]悉。我们所最担心的是沈敌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据悉，蒋介石在天津征集五万吨轮船，似是准备十一月从营口撤兵。长春合乎我们理想的解决，使蒋、卫[3]很难下决心走陆路向锦葫[4]增援。假如蒋、卫利用你们打锦葫的时机，迅速全军退至营口据守，利用海道运粮接济，然后逐步运向津榆[5]或华中，则有使你们无法阻止之虞。我们不知道你们部队是否可以利用蒋、卫踌躇不决之时，很迅速地攻下锦葫，然后迅速以主力回围沈阳。即使如此，攻锦葫总需相当时间，而营口方面全无守备。因此，提议在日内长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并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18日1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蒋介石在锦州失守后，决定锦西、沈阳两方援军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同时又令长春之敌突围。我们预定诱沈敌南下后，再打大运动战，但昨日六十军起义，新七军被围，估计蒋军不敢再按原计划向锦州前进。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只有攻锦葫为好，目前正进行侦察准备。

[3] 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锦葫，指辽宁锦西和葫芦岛。

[5] 津榆，指天津和河北榆关（山海关）。

解决后，除留几个独立师监视郑洞国[1]及新七军（假定该部反正的话）外，攻长各纵及几个独立师应迅速全部南下，位于沈阳、营口之间。时间应在十一月上旬，过迟则无保障。并须以一个纵队控制营口，构筑坚守阵地，阻绝海上与陆地的联系，使蒋、卫不敢走营口，即使他们走营口，我可先行抗击，以待主力到达聚歼。如何，盼复。

军委
巧亥

---

[1] 郑洞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致东北局等电[1]

（1948年10月18日）

关于逼迫和争取郑洞国[2]起义，望令萧、萧、陈及各部对长春取威迫政策，堵塞其一切可能的逃路，暂时不攻击他，以促其变化。你们除将恩来致郑洞国电派人送交外，林彪及萧劲光亦可写信给他，萧、萧、陈并应选派适当人员与郑进行谈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转萧劲光、萧华、陈伯钧电的主要内容。萧劲光、萧华、陈伯钧，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2] 郑洞国，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

宜以五纵六纵十二纵
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1]

（1948年10月19日）

林、罗、刘：

既然长春敌人愿意投降，我五纵、六纵、十二纵即可停止去长春，该三个纵队似宜以两个位于沈阳、营口之间，以一个在营口筑工守备，并宜在你们打锦葫[2]以前到达该区，堵塞沈敌向营口的退路。如沈敌向锦葫增援，则该三纵从侧后钳制沈敌。长春附近之九个独立师，亦宜以大部开沈营间，萧萧[3]则赴该区指挥。如何，望酌复。

军委

皓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锦葫，指辽宁锦西和葫芦岛。

[3] 萧萧，指萧劲光、萧华，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占领长春后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

（1948年10月19日）

林、罗、刘：

巧二十时电[2]悉。（一）十七日新一军还是从新立屯[3]向西前进，请查彰武、新民方面各军是否亦尚在向西前进。如果在长春事件[4]之后，蒋、卫[5]仍不变更锦葫[6]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二）但同时仍须估计在长春敌人完全解决，我北面各纵及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18日2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独六、独八两师已进入长春市，接防六十军阵地。十七日进占新立屯敌新一军，本日继续前进，我军决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我十纵主力向沟帮子、黑山撤退，我五纵主力向阜新方向撤退。"

[3] 新立屯，镇名，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北部。

[4] 长春守敌在我军长期围困，特别是我攻克锦州全歼守敌的情况下陷于绝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1948年10月17日率部起义。长春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5] 蒋，指蒋介石。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 锦葫，指辽宁锦西和葫芦岛。

立师主力南下之时，蒋、卫改变计划的可能，你们仍应考虑部署有力兵团于营口及其西北与东北地区，以免在蒋、卫采取从营口撤退时，你们措手不及。现时新一军等相当西进，甚至进至沟帮子[1]一带，仍然有利于他们突然向营口撤退，此点望你们充分注意。蒋介石在天津集中五万吨船只，准备从营口撤兵的情报是相当确实的。

军委
皓申

---

[1] 沟帮子，镇名，位于辽宁省北镇县南部。

准备各个歼灭廖耀湘部[1]

（1948年10月19日）

林、罗、刘：

（一）本日十四时电[2]悉。沈敌似已决心撤退，退营口的可能性很大。你们目前第一要紧的部署是立即令萧萧[3]率长春各独立师大部（留两个至多三个独立师在长春一带即够）及十二纵，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目前为应急计，请你们考虑令十纵自打虎山[4]进至营口筑工，该方有十纵、十二纵及六至七个独立师，形势就巩固了。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就在战略上胜利了。你们在锦州各部须争取至少再休整一星期，准备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19日14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昨日进至新立屯以南之敌，如果仍按蒋介石计划向锦州继续前进，则我们来不及先歼锦、葫之敌，而只有先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前进之敌。如敌因长春守敌起义改变计划，不即向锦州前进，则我军稍加休整后，即攻锦、葫，或攻新立屯。“长春解决后，我北线各部即向营口前进。我六纵已在彰武以东停止。五纵昨日已退至阜新。十纵自新立屯以南退打虎山。”

[3] 萧萧，指萧劲光、萧华，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打虎山，今名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南部。

击由新立屯[1]向你们前进之敌。如该敌不再前进，则攻新立屯，抓住廖耀湘[2]攻击，使他走不脱，各个歼灭之。因沈敌决心撤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3]。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钳制目标。（二）你们巧十二时关于锦州作战初步总结电已阅悉。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

军委

十九日二十二时

---

[1] 新立屯，镇名，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北部。

[2] 廖耀湘，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官。

[3] 锦葫，指辽宁锦西和葫芦岛。

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1]

（1948年10月20日）

东北局，林、罗、刘：

东北局酉皓十八时电[2]对郑部处置各项办法甚好。望林罗刘令萧萧[3]迅即结束长春工作，一切交陈正人[4]接管，率十二纵及十一个独立师的大部取捷径开至沈阳、营口、沟帮子[5]三点之间，除以一部守备营口外，主力由东向西配合锦州我军作战，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攻取沈阳。

军委

哿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19日18时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萧劲光、萧华的电报。电报说，郑洞国投诚后，我们拟派陈正人带一批干部去处理郑部安置问题，以便能使萧劲光、萧华减去不必要事务，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电报并提出对郑部的具体处理方针。

[3] 萧萧，指萧劲光、萧华，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兼吉林军区政治委员。

[5] 沟帮子，镇名，位于辽宁省北镇县南部。

即刻部署全歼廖耀湘兵团[1]

（1948年10月20日）

林、罗、刘[2]：

皓二十一时电[3]悉。

（一）你们行动方针已有电示，即不打锦、葫[4]而打廖耀湘。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建议，如廖兵团继进，则等敌再进一步再进攻之；一经发觉敌不再进，或有退沈阳退营口的象征时，则立即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为方法，以全歼廖兵团为目的。望即本此方针，即刻动手部署，鼓励全军达成任务。

（二）因敌有随时退至营口可能，望令十纵准备，一经发觉敌有

---

[1] 指廖耀湘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九兵团。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19日21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估计彰武、新立屯地区之敌，有可能在现地不动，等整八军到锦西后，再南北配合向锦州前进，沈阳之敌则向营口撤退。但亦有另一可能，即是：现在彰武、新立屯地区之敌撤回新民、沈阳，利用辽河阻隔我军，全部向营口撤退。"电报建议，如沈阳之敌仍继续向锦州前进，则等敌再前进一步后再向敌进攻，但若有征候敌不再前进，或有回撤沈阳转往营口的动向时，则我军立即迅速包围彰武、新立屯两处敌人，以各个击破方法全部歼灭之。

[4] 锦、葫，指辽宁锦西和葫芦岛。

退营口的象征，即兼程开营口守备。

（三）高、伍[1]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2]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二十四日以前全部运抵清源，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惟十纵仍须准备从打虎山开营口，以占先机。当然，十纵目前可在打虎山不动，待敌有退营口征候时迅开营口。

（四）高、伍又建议，以其余各独立师及二线兵团由萧、萧[3]指挥，向法库、彰武、新民急进，配合锦州主力歼敌。我们认为这也是完全必要的。惟第一，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共六个师开鞍山、海城是否足够，如敌全力退营口，我六个师恐难抵御，是否应增加一二个独立师于营口方面。第二，去彰武、新民与敌接触的时机不可过迟，也不可过早，似宜适时隐蔽开至法库以北，待你们主力业已发起攻击抓住了廖耀湘时，突然断敌向沈阳退路为宜。以上两点请酌复高、伍。

（五）蒋介石十五日到沈阳时即携杜聿明[4]同来，是帮助卫立煌指挥撤退的。外国通讯社十八日讯，蒋介石又到沈阳。目前数日是

---

[1] 高，指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伍，指伍修权（1908—1997），湖北武昌人，当时任东北军区第二参谋长。

[2] 钟伟（1915—1984），湖南平江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

[3] 萧、萧，指萧劲光、萧华。萧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华（1916—1985），江西兴国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

[4] 杜聿明（1904—1981），陕西米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敌决策时机，撤退是十五日就决定了的，如何撤退则或者昨今两日已经决定，或者尚待决定，并且决定之后又可改变。望你们密切注视这数日的动态，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军委

二十日四时

对歼灭廖耀湘兵团具体部署的意见[1]

（1948年10月20日）

林、罗、刘：

关于立即准备不失时机歼灭廖耀湘兵团[2]五个军的方针，我们和你们意见完全一致，业已电告。关于具体部署，由你们根据情况相机处理。我们提出下列意见供你们考虑：（一）以原对锦葫[3]防御之两个纵队及三个独立师，仍任该方防御，不再增加兵力。（二）以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共九个纵队二十七个师全部，分割包围廖兵团五个军十二个师。其办法，以六个战斗力最强的纵队分割包围攻击敌三个军，即以两个纵队担任围歼一个军。另以两个纵队分割半包围敌另外两个军，即以一个纵队担任半包围敌一个军，暂不攻击，只保证其不能增援与不能逃脱，待我主力六个纵队歼灭敌主力三个军之后，再移师歼灭之。以剩下之一个纵队为总预备队，随时加入主力方面之作战。我们认为，敌无强固工事，士气衰落，用我两个纵队围歼敌一个军是足够的。并且我主力包围敌三个军以后，可以不同时攻击三个军，可以先攻一个军或两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廖耀湘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3] 锦葫，指辽宁锦西和葫芦岛。

军，只要敌一个军被歼灭得差不多了，就可同时动手攻击三个军。如果萧萧[1]能率几个独立师及时赶到截敌归路，那就更为有利。（三）高伍[2]提议六个师（十二纵加三个独立师）位于营口以北。我们觉得似宜增加一个师，共七个师位于营口以北，阻敌逃路，其中应有二至三个较有战斗力的师。（四）你们应立即召集一次干部会议，动员新战役的作战。以上四项，望斟酌办理。

军委

二十日七时

---

[1] 萧萧，指萧劲光、萧华，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高伍，指高岗、伍修权，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副参谋长。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1]

（1948年10月20日）

（一）你们攻郑主力应从郑州以南出郑州、中牟之间，然后从东面向郑州攻击，否则敌人将从东面向开封逃跑。（二）如果郑州敌人不多，你们攻击时间可以提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围歼廖兵团及其他项部署[1]

（1948年10月21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完全同意你们二十日十时围歼廖兵团及其他各项部署[2]，并无补充意见。

军委

二十一日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1948年10月20日1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军委，电文内称："锦州、长春敌解决后，沈阳、新立屯、彰武、铁岭、抚顺、本溪等地之敌有实行全部总退却的可能。现在彰武、新立屯敌新一、新三、新六、七十一、四十九等军可能继续向锦州前进，锦西之敌则继续北进策应。但新立屯、彰武之敌，亦有缩回沈阳，会同现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之二〇七师（三个旅）、五十三军、五十二军及卫敌直属队向营口退却。""此次大战，全局关键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的退路。如敌退路已断，则沈阳之敌将亦被拖住，如我十二纵能包围铁岭之敌，南下各独立师能陆续包围沈阳、抚顺之敌，则敌人必更将难退。故我军决以主力拖住和歼灭敌人。对营口方面，能以小部在海岸进行防御，使海上敌人不能进行增援。如万一我军未在新立屯、彰武抓住敌人，该敌转向营口撤退时，则除由长春附近南下之部队外，我军主力即在沟帮子迅速东进过河作战，在营口、牛庄之间歼灭该敌。"

部队休整后宜西移攻取同官耀县等地[1]

（1948年10月21日）

彭、张，并告贺、习[2]：

十八日戌时电[3]悉。目前敌主力集中澄城、合阳、蒲城，西面较空虚，你们似宜于休整二十天后全军西移，相机攻取同官[4]、耀县、三原、泾阳、淳化一带，并准备在该区打一二仗以后派一部出乾礼[5]、永寿，大约费时一个月左右。如果你们采取此种行动，澄、合、蒲之敌势必全部或大部西调，并于其调至西面时相机歼灭几部，那时你们才有可能收复澄、合、平、朝[6]地区，取粮过冬。若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0月18日戌时彭德怀、张宗逊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荔北战役后，拟休整20天，恢复疲劳。拟于11月中旬再组织一次战役争取恢复澄城、合阳、朝邑、平民，解决吃饭过冬与进行整训。以目前敌我情形来看，拟以一、四纵攻取淳化、通润、口头镇，威胁泾阳、咸阳，调敌主力向西集中。二、三、六纵相机歼敌，收复失地与扩大新区。

[4] 同官，旧县名，即今陕西铜川。

[5] 乾礼，指陕西乾县和礼泉。

[6] 平、朝，指平民、朝邑，均旧县名，1958年撤销，并入陕西省大荔县。

以一纵、四纵去淳化，恐不能调动很多敌人西去，我两头力弱，恐难收复澄、合、平、朝，如果你们在十一、十二两月的大部分时间，以全力向西面作战并就粮，留下晋南及澄、合、平、朝之粮食，在十二月下半月及明年一、二月部队转至东面休整时食用似较合算。我们不明白西面大军作战有何困难，望你们加以考虑，酌情处理。

军委
马子

陈邓部攻克郑州后迅即东进[1]

（1948年10月22日）

陈、邓，并告饶、粟、谭[2]，中原局：

刘峙[3]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孙[4]向鲁西南行动，以李兵团[5]之第九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6]则为对付我二、六、十纵，以黄张两兵团[7]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8]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饶、粟、谭，指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邱孙，指邱清泉、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5] 李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官李弥。

[6]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7] 黄张两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官分别为黄维和张淦。

[8] 指淮海战役发起前，为钳制孙元良兵团，使其不能东进，中原野战军于1948年10月下旬进行的攻击郑州的作战。

元良、刘汝明[1]，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九、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鱼、成、单[2]与陈邓协力作战。九、广两纵是否已出动，何时可到金、鱼、成、单地区，望粟谭即告。

军委

养子

---

[1]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四绥靖区司令官。

[2] 金、鱼、成、单，指山东金乡、鱼台、成武和单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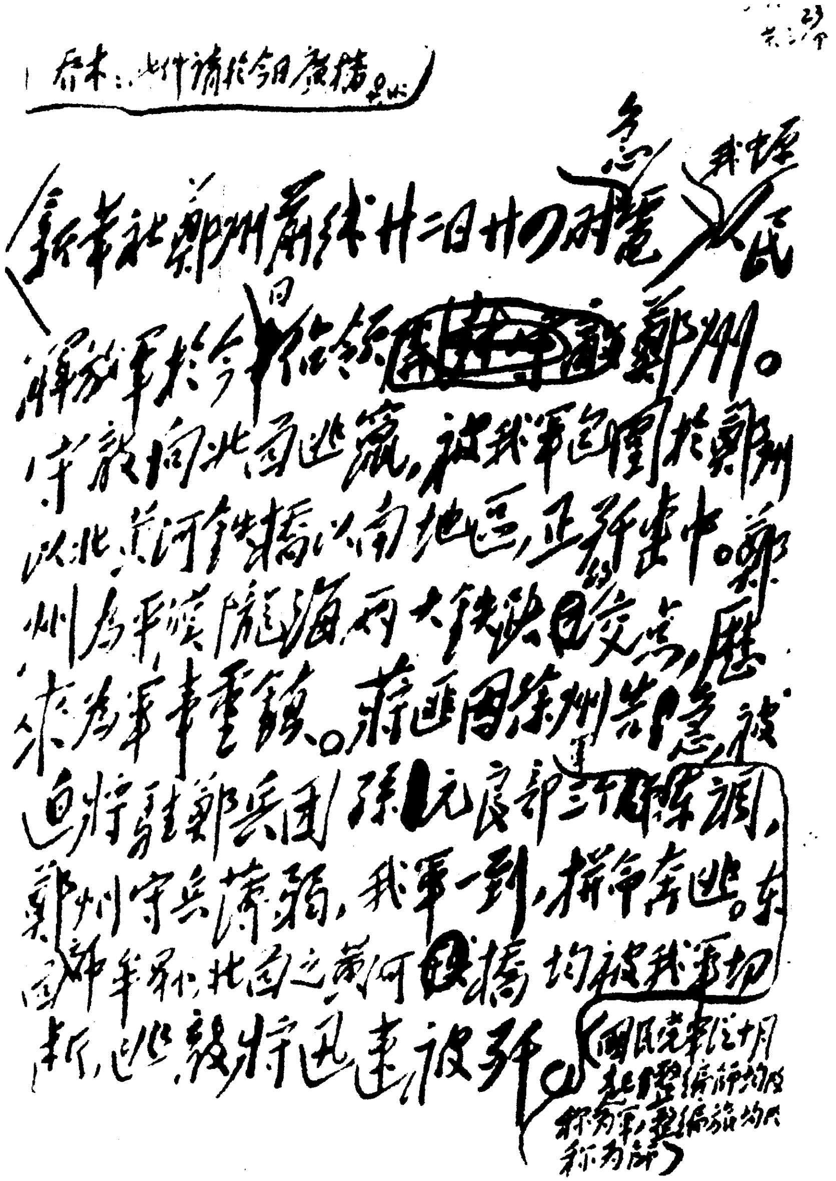
我军解放郑州[1]

（1948年10月22日）

【新华社郑州前线二十二日二十四时急电】我中原人民解放军于今日占领郑州。守敌向北面逃窜，被我军包围于郑州以北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正歼击中。郑州为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点，历来为军事重镇。蒋介石因徐州告急，被迫将驻郑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按：国民党军从十月起整编师均改称为军，整编旅均改称为师）东调，郑州守兵薄弱，我军一到，拼命奔逃。现郑州东面之中牟县、北面之黄河桥均被我军切断，逃敌将迅速被歼。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



乔木：此件请於今日广播。

新华社郑州前线廿二日廿四时急电　我中原人民解放军於今廿二日占领~~[illegible]~~郑州。守敌向北面逃窜，被我军包围於郑州以北黄河铁桥以南地区，正歼灭中。郑州为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的交点，历来为军事重镇。蒋匪因徐州告急，被迫将驻郑兵团孙元良部三个军东调，郑州守兵薄弱，我军一到，拼命奔逃。东面中牟、北面之黄河铁桥均被我军切断，逃敌将迅速被歼。（国民党军队十月起整编师均改称为军，整编旅均改称为师）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我军解放郑州》的手稿。

同意照淮海战役的修改部署执行[1]

（1948年10月22日）

饶、粟、谭，并告陈、邓[2]，中原局：

（一）完全同意你们马午电[3]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4]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0月21日午时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根据敌情变化，我除先以一部在鲁西南暴露，佯攻迷惑敌人，调敌回顾，以便迅速实现围歼黄兵团外，必须加强运河车站南北两侧正面阻援兵力，以保证主要突击方向成功。根据各纵现在位置与休补状况，战斗预定于11月5日发起，提议修改部署如下：以苏北兵团全部及一、六、九纵、鲁中南纵等7个步兵纵队共20个旅附特纵主力，担任分割围歼阿湖、阴平、高流、新安、瓦窑地区的黄百韬兵团8个旅。以四纵、八纵担负袭歼炮车、运河车站之敌第九军，控制铁路两侧及运河两岸，准备阻援。以十纵、七纵袭歼韩庄之敌，尔后以主力围歼贾汪之敌，后相机攻占柳泉地区。十三纵围歼台儿庄守敌，或以主力直攻宿羊山、泝塘之敌。以三纵、广纵进入鲁西南地区，协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组织对鱼台、丰县、砀山、商丘地区之敌牵制攻击，抑留孙元良兵团，不得东西增援。其余主力拟暂集结现地待机。

[4]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三）三纵、广纵及鲁西南两个旅应于三十日以前进至商砀线[1]以北地区，距敌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摆成一字形阵线，断绝行人来往，不要向商砀线攻击，使敌早日觉察我在该方不过是佯攻部署，要在东面微日发起战斗之同时（或者早一天即支日），才向商砀线及丰县之敌举行牵制性攻击，否则可能不起大的作用。（四）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2]部黄张两兵团[3]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4]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5]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6]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7]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8]全军于孤立地位。假如二

---

[1] 商砀线，指商丘至砀山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2]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黄张两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和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官分别为黄维和张淦。

[4]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军向中原地区进犯，国民党军队不战溃退，在河南郑州附近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黄河水沿贾鲁河入颍河及西淝河注入淮河，淹没河南、安徽及江苏3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所淹地区称黄泛区。1947年花园口决口堵复，黄河回归故道后，泛区变成沙荒地。

[5] 孙刘，指孙元良、刘汝明，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和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6]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7]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8]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十三日开始之郑州作战，能在数日内达成任务，休整数日，本月底或下月初东进，以十天左右时间到达宿、蚌附近，休息数日，举行徐蚌作战，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般考虑电复。

军委

二十二日十三时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

（1948年10月22日）

林、罗、刘：

本日十三时半电[2]悉。沈敌总退却情况已明，你们决心及处置都是正确的。

军委

二十二日二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1948年10月22日13时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致电军委并东北局，电文内称："1. 谍息，五十三军一三〇师及原在辽阳之五十二军第二师，均已到巨流河、新昆地区。在铁岭之五十二军部队，亦有撤退象征，可见敌现已开始向锦州总退却。2. 决心照原定计划在新立屯、黑山地区与敌决战。攻锦各部已接近集结地区，两三天内可以在北镇、黑山地区集结完毕，长春方面之十二纵已达四平附近，各独立师今日黄昏开始南下。3. 已令六纵今晚出动，明日包围彰武之敌一个师，以拖住敌之尾，吸引敌回头兵援，分散敌人。4. 辽南独二师已无去营口之必要，已令其回头至新民以西钳制敌人。"

电勉吴化文[1]

（1948年10月22日）

吴军长、杨旅长、赵旅长、何旅长，并转全体官兵均鉴：

贵军长等率部起义，发表通电，决心参加人民解放事业，极为欣慰。中国共产党站在人民立场上，对于任何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们，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只要他们能够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紧要关头，幡然觉悟，脱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领导，加入人民解放军阵营，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即表示热烈欢迎。贵军长等此次义举，符合人民的希望，深堪庆贺。尚望团结全军，力求进步，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为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奋斗。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在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军吴化文部的贺电。

粟裕谭震林速赴南线指挥作战[1]

（1948年10月23日）

陈、邓，饶、粟、谭：

（一）陈邓养亥电[2]悉。占领郑州甚慰。你们休息两天即东进攻占开封甚好。（二）请粟谭在济南不要留住太久，济南方面一切问题交漱石处理。粟谭速赴南线指挥，以便按预定时间（戌微）发起战斗。（三）淮海战役最紧张时间是戌微至戌智约两星期左右。陈邓西有东进，估计月底可能攻占开封。如开封之敌东逃，则陈邓月底可能进至商丘附近，可以适时密切配合淮海作战。（四）请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3]以北，并受陈邓指挥。（五）陈邓东进与三纵、广纵诸部会合后，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22日亥时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郑州之敌，于今日辰向新乡撤退，被我九纵1个旅截击于郑州以北30里处。郑州城已于今日被我占领。我们拟在现地休息2天，于25日开始东进，攻占开封。

[3] 砀，指安徽砀山。

元良兵团[1]，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2]。

军委

二十三日五时

---

[1] 孙元良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元良。

[2] 宿蚌，指安徽宿县和蚌埠。

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郑州解放

（1948年10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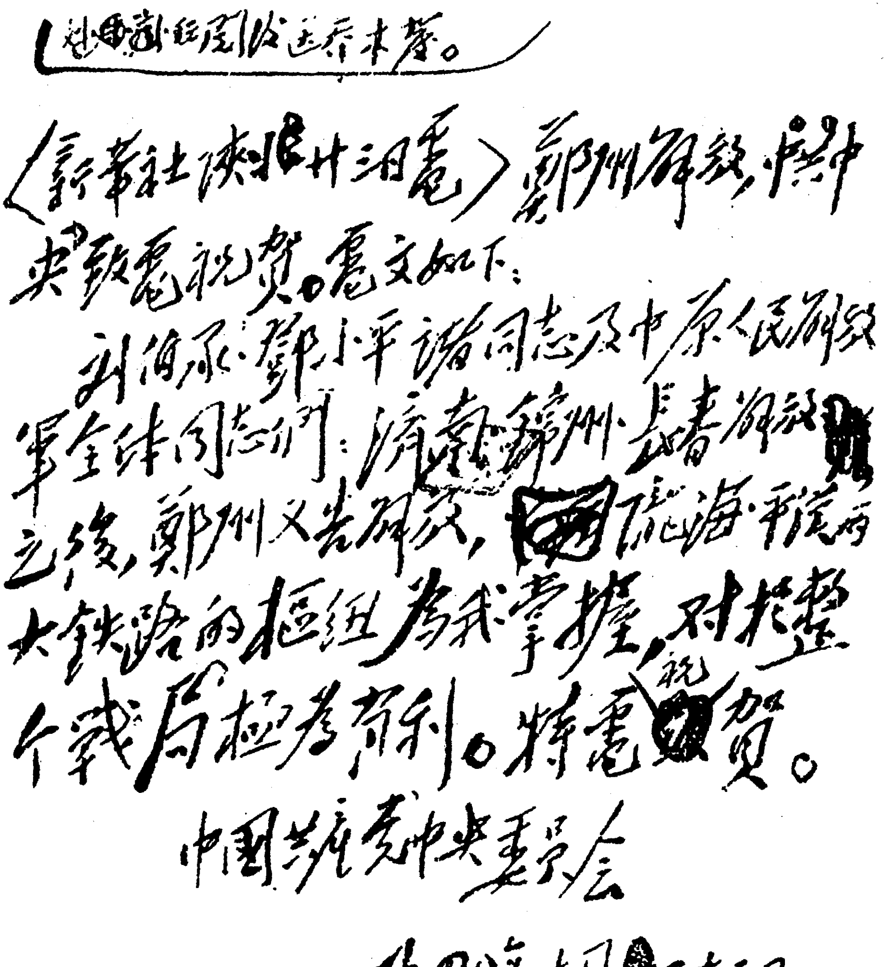
【新华社陕北廿三日电】郑州解放，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电文如下：

刘伯承、邓小平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后，郑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战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刘、周、朱、任阅后送乔木发。）

（新华社陕北廿三日电）鄭州解放，中共中央致电祝贺。电文如下：

刘伯承、邓小平诸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济南、锦州、长春解放之後，鄭州又告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于整个戰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郑州解放》的手稿。

控制营口阻塞敌人海上逃路[1]

（1948年10月24日）

林、罗，并告高、伍[2]：

迥电[3]悉。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及二〇七师主力既然尚在铁岭、沈阳、抚顺、本溪、鞍山一带，五十二军一部且已进占海城、牛庄[4]，则敌人准备以营口为其两条退路之一，已甚明显。敌主力在黑山、北镇地区被我歼击时，其溃逃部队亦可能退向营口。因此，你们仍应从各独立师中抽出一部向南，歼灭鞍山、海城、牛庄之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

[2] 高、伍，指高岗、伍修权，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和第二参谋长。

[3] 指1948年10月24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昨日敌先头一小部到达黑山附近与我接触。新一军、新六军、新三军、四十九军、七十一军及二〇七师的一个旅，及三个骑兵旅，均在新立屯以南、黑山以北地区。二〇七师师部已由沈阳进至新民，其余两个旅，似尚在抚顺、本溪一带。五十二军一个团，昨日已占海城及牛庄附近。（二）我六纵昨日已占彰武，本日继续南进，我自锦州北上部队一部已到打虎山、北镇之线，其余部队，正向清河边门、阜新、新立屯方面转进，准备配合正面夹攻敌人。我十二纵先头本日可到铁岭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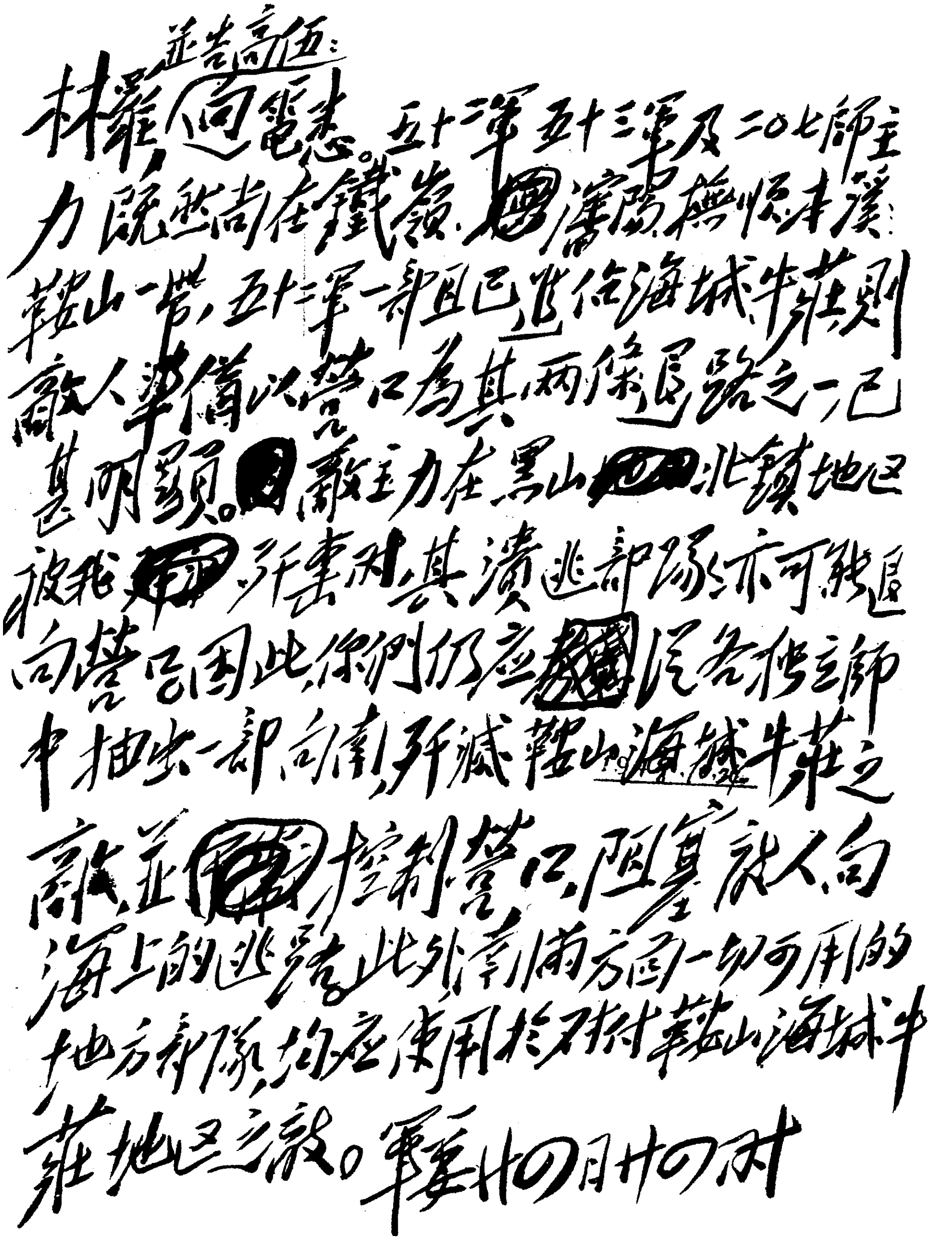
[4] 牛庄，镇名，位于辽宁省海城县西部。

并控制营口，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此外，南满[1]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队，均应使用于对付鞍山、海城、牛庄地区之敌。

军委
二十四日二十四时

---

[1] 南满，指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庄河、通化、临江、清源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并告高伍：

林羅劉同志。五十軍五十三軍及二〇七師主力既然尚在鐵嶺瀋陽撫順本溪鞍山一帶，五十二軍一部且已進佔海城牛莊，則敵人準備以營口為其兩條退路之一已甚明顯。敵主力在黑山北鎮地區被我殲滅時，其潰逃部隊亦可能退向營口，因此你們仍應從各縱之師中抽出一部，向南殲滅鞍山海城牛莊之敵，並控制營口，阻塞敵人向海上的逃路。此外遼南方面一切可用的地方部隊均應使用於對付鞍山海城牛莊地區之敵。軍委 廿四日廿四時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控制营口阻塞敌人海上逃路》的手稿。

应到蒙城集中以利机动作战[1]

（1948 年 10 月 25 日）

陈、邓，并告饶、粟、谭[2]及刘、邓、李[3]：

敬午电[4]悉。开封之敌已逃。你们不要去开封，也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5]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一个旅守郑州，秦基伟[6]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此着为敌人所不及料。敌为防我渡江，必从徐州附近分兵南压，亦有可能从白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刘、邓、李，指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指 1948 年 10 月 24 日午时陈毅、邓小平关于中原野战军主力东进后的作战方案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计划 27 日我军主力占领开封，休息一天，再以五天行军于 11 月 2 日进至商丘南及西南地区，于东线打响后，再视情况决定行动。

[5] 蚌浦段，指蚌埠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6] 秦基伟，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

禧[1]系统调兵向东。我华野则可能于两个月内歼灭刘峙[2]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如敌以重兵对付你们，则你们可用暂时分散作战的方法，将全军（十二个旅）分散配置于江、淮、巢、运[3]之间，躲过其压力，以待华野之南下。请你们考虑此案是否可行。最后决定，可待你们到达蒙城以后，如那时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4]作战方案。如那时孙元良[5]好打，亦可向北打孙元良。如黄维[6]跟踪东进，亦可回头打黄维。蒙城是机动地带，可东，可西，可南，可北。在你们到达蒙城以前，敌人亦不知道你们究竟要打哪一点。你们是否同意出蒙城，及郑蒙间里程多少，望告。

军委
二十五日三时

---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江、淮、巢、运，指长江、淮河、巢湖和运河。

[4]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5]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6]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忽视对营口的控制是不小的失着[1]

（1948年10月25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

二十五日九时电[2]悉。（一）你们事先完全不估计到敌人以营口为退路之一，在我们数电指出之后，又根据五十二军西进的不确实消息，忽视对营口的控制，致使五十二军部队于二十四日占领营口，是一个不小的失着。（二）你们除以六纵插到黑山、打虎山[3]以东断敌退路外，是否尚有别的纵队在黑山、打虎山以东及东南地区。你们必须充分估计到敌人随时有向营口退却可能，如果没有足够兵力则难于阻敌退路。你们主力从阜新、新立屯[4]方面下来，如果敌人集结一起从打虎山向东，正面无重兵堵击，不能收夹击之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25日9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敌五十二军部队二十三号占海城、牛庄，昨（二十四日）已占营口。我在辽南只有地方武装，辽南独二师已不能先占营口。（二）我一个独立师昨日已插到铁岭以南与敌对战。我十二纵本晨可包围铁岭，意图拖住敌人。（三）昨日新六军、七十一军及二〇七师一个旅各一部向我黑山、打虎山进攻，四次冲锋，均被击退。（四）我六纵本日可插到黑山、打虎山以东地区，断敌退路，其他各纵均陆续前进，首先抓住敌人。”

[3] 打虎山，今名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南部。

[4] 新立屯，镇名，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北部。

则敌有全部或大部跑到营口的可能。（三）长春各独立师现到何处？我们认为这些独立师应迅速经铁岭附近兼程南进，收复营口、牛庄[1]、海城，并以主力位于打虎山、营口之间，配合你们主力夹击敌人。（四）你们整个部署盼告。

军委

二十五日十八时

---

[1] 牛庄，镇名，位于辽宁省海城县西部。

同意杨成武部打归绥的意见[1]

（1948年10月25日）

杨、李、李，并杨、罗、耿，华北局：

（一）同意杨李李二十四日二十四时电戌灰开始打归绥[2]的意见。（二）杨罗耿即令三纵转至兴和、集宁地区，以主力位于集宁固守阻敌，以一部位于兴和阻滞援敌前进，该纵务于戌微以前到达兴、集地区。（三）杨罗耿率四纵及其他各部越路[3]南下，准备随三纵后跟进至兴、集地区，担任阻援。是否应留一部在路北或路南担任破袭平张段[4]，请杨罗耿筹划电告。（四）杨罗耿所需粮弹等项供应由聂薄滕[5]负责。（五）军区两个炮兵连现在何处，戌灰以前是否能到归绥，盼聂薄滕即告。

军委

二十五日十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3] 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4] 平张段，指北平（今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5] 聂薄滕，指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解放郑州、开封[1]

（1948年10月25日）

刘伯承、邓小平两同志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郑州解放，歼敌万余，开封守敌弃城东窜，开封遂第二次光复。从此，中原三大名城——洛阳、郑州、开封均入人民解放军掌握，对于今后战局，极为有利。特电祝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及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电报。

钳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具体部署[1]

（1948年10月26日）

粟、谭，并告陈、邓[2]及刘、邓、李[3]：

（一）一百军两个师均已增至新安镇[4]并隶属七兵团，黄百韬[5]手里已有八个师，李弥[6]五个师已集结运河[7]车站及运西李家集地区，黄、李共十三个师连接在一起。你们原企图以两个纵队歼灭运河车站之两个师，控制运河正面阻敌，恐将感觉困难。你们似只能从黄李两集团的接合部，即新安镇与运河车站之间，以两个纵队插入隔断李、黄联系，而以一个至两个纵队由台儿庄[8]向南从北面钳制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刘、邓、李，指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新安镇，今为江苏省新沂县县治。

[5]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6] 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7] 运河，镇名，今为江苏省邳县县治。

[8] 台儿庄，镇名，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南部。

弥，另以一个至两个纵队攻歼韩庄、贾汪、柳泉[1]地区之敌，迫使邱兵团[2]以一个至两个军向正北防御，再以一个纵队及广纵向丰县砀山两点攻击，迫使邱清泉一部留于该方，另以地方兵团牵制孙元良[3]，另以韦吉[4]一个至两个纵队从睢宿[5]向徐州东南攻击，如此方能确保钳制邱、李，以利主力分割歼灭黄兵团。关于应当使用强力部队，而不应当使用第二等部队于主攻方面，前已电告，如此须有几天时间重新调整部署。为了确保胜利，宁可推迟几天发起战斗，不要仓卒从事。

（二）因我六纵等部正在老河口[6]附近围歼杨干才部[7]，白崇禧[8]已令黄维[9]主力向南阳以南，如我陈邓所部不走开封、商丘，而走蒙城直接攻击徐蚌[10]，则在一星期内外不至暴露目标，黄维不会马上向东。待至陈邓在徐蚌打响，则黄维即使向东，已来不及。陈邓以十一个旅出现于刘峙空虚的后方，必然要迫使他以孙元良全部及邱清泉一部对付陈邓，如此可以确保邱孙两兵团不敢向运河以东增

---

[1] 韩庄，镇名，位于山东省微山县东南。贾汪，镇名，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柳泉，村名，位于江苏省铜山县北部。

[2]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3]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4]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5] 睢宿，指江苏睢宁和宿迁。

[6] 老河口，旧镇名，今为湖北省老河口市。

[7] 杨干才部，指国民党军第十四兵团第二十军，军长杨干才。

[8]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9]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10]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援。徐海线[1]上虽有李黄两部十三个师，你们仍能有把握地实现制李打黄之目的。

（三）睢杞战役后，刘峙系统中很多人对邱清泉不满，似乎黄百韬特别不满意邱清泉，故要李弥靠近黄部，又将一百军从邱部归入黄部，此点亦可注意。

军委

二十六日三时

---

[1] 徐海线，指徐州至海州（今属江苏省连云港市）的铁路，即陇海线一段。

给刘少奇的信

（1948年10月26日）

少奇同志：

此件[1]修改得很好。在第29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

[1] 指经中共中央修改过的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

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1]

（1948年10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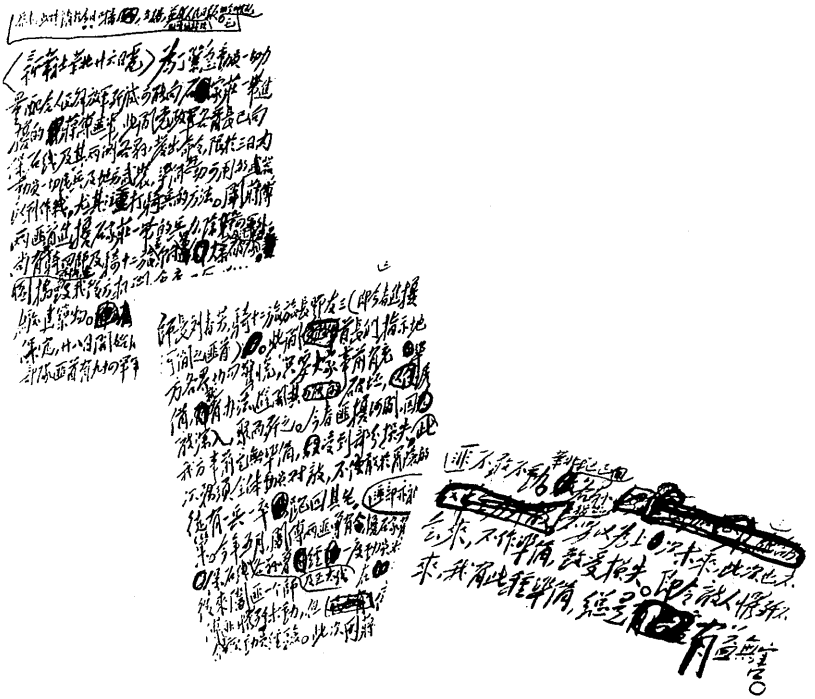
【新华社华北二十六日电】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傅军[2]，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保石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利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闻蒋傅军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九十四军外，尚有新骑四师及骑十二旅，并附属爆破队及汽车百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工厂、学校、发电厂、建筑物。据悉，该敌准备于二十七日集中保定，二十八日开始由保定南进。进扰部队为首的有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新编骑四师师长刘春芳，骑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即今春进扰河间之敌）。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发表在1948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

[2] 指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卒跑回其老巢。今年五月，阎[1]、傅曾有合扰石家庄的计划，保石线及正太线各县曾经一度动员对敌。后来阎军一个师在盂县被歼，傅军惧歼未动，但保石线人民已有了一次动员经验。此次因蒋介石在北平坐督，傅作义不敢不动。华北军区已向各县指出，不要以为上次未来，此次也不会来，不作准备，致受损失。即令敌人惧歼不来，我有此种准备，总是有益无害。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的手稿。

---

[1]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1]

（1948年10月27日）

【新华社辽西前线二十七日十七时急电】由沈阳进至辽西的蒋军五个军，已全部被我包围和击溃。我军俘敌数万，现正猛烈扩张战果中。此五个军，即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四十九军，全部美械装备，由廖耀湘[2]统率，锦州作战时即由沈阳进至新民、彰武、新立屯地区。锦州攻克，长春解放，该敌走投无路，全部猬集黑山、北镇、打虎山[3]地区，企图逃跑。我军迅移锦州得胜之师回头围歼，飞将军从天而降，使该敌逃跑也来不及。蒋军尚有五十二军、五十三军、青年军整编二〇七师（辖三个旅）及各特种部队、杂色部队，在沈阳、铁岭、抚顺、本溪、辽阳、新民、台安等处，一部占我海城、营口，连廖兵团在内，共有二十二个正规师，加上其他各部，共约二十万至三十万人，为蒋军在东北的主力。廖兵团五个军，则为其主力中的主力。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

[2] 廖耀湘（1906—1968），湖南邵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官。

[3] 打虎山，今名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南部。

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全军现正举行全线进攻，为歼灭全部蒋军而战。

淮海战役的部署要估计到情况的变化[1]

（1948年10月27日）

饶、粟、谭，并告陈、邓[2]（请陈、谢[3]转陈、邓）：

二十七日九时电[4]悉。你们研究修正部署后望即告。你们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目前情况可能的变化是：（一）黄兵团八个师在你们接近他时，可能由现时比较分散配置利于分割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指1948年10月27日9时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不同意王建安10月22日提出的关于集中一、三、四、六、八、十纵和鲁中南纵队对付黄百韬兵团的建议。电报说：“关于王建安建议各点，我们在马午部署前，曾经考虑过。”我们以七、十及十三纵用于运河以西，四、八纵用于运河站担任阻敌，其他各纵用于攻黄百韬兵团，其理由是：（一）该五个纵队较充实，对阻击战亦较有经验。（二）如阻击无问题，则东面歼灭黄兵团的任务亦可完成。（三）便于我歼黄兵团后第二阶段续歼李、邱兵团。对敌情变化，当重新研究，适当修正部署。

歼的状态，改变为比较收缩比较靠拢难于分割围歼的状态。（二）黄兵团八个师在围歼后，有几个师被歼灭，但可能有几个师因其集结在一起，难于最后歼灭。（三）李弥[1]两个军靠在一起，可能使我无法控制运河，如我从台儿庄[2]向宿羊山[3]方向之部队动作不得力，则八九两军可能全部加入运河[4]车站及其以东，和黄百韬靠得很近，可能妨碍你们全歼黄百韬。（四）如果你们从临城[5]向韩庄、贾汪、柳泉[6]攻击之部队不得力，或动作不适当，不能吸引邱清泉[7]一个军左右去对付该方面；又如果你们派向丰县、砀山方向攻击之部队动作不积极，不能吸引邱清泉一部留在该处，则邱部可能以一个军或超过一个军的兵力进至大许家、八义集、碾庄[8]之线，联接李弥，使李弥能够积极增援黄兵团。（五）陈邓率十一个旅戌支进至涡阳、永城、亳州三县中间地区，争取打孙元良[9]并威胁徐蚌[10]，对于你们作战当然会起很大的配合作用，可能吸引邱清泉一个军及孙元良全部去对付他们。但你们的计划应放在华野自己直接有效地钳制邱清泉

---

[1] 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2] 台儿庄，镇名，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南部。

[3] 宿羊山，村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4] 运河，镇名，今为江苏省邳县县治。

[5] 临城，即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

[6] 韩庄，镇名，位于山东省微山县东南。贾汪，镇名，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柳泉，村名，位于江苏省铜山县北部。

[7]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8] 大许家，镇名，位于江苏省铜山县东部。八义集、碾庄，均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9]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10]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上面，才是最可靠的。因为敌处内线，调动灵便，而陈邓对刘峙[1]不能起致命的作用。（六）济南大捷后，干部中可能发生轻敌心理，如果不克服此种心理，则可能影响此次作战。以上数点望注意。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时

---

[1]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望以有力兵团东渡辽河歼灭营口一带之敌[1]

（1948年10月27日）

林、罗、刘：

本日十七时电[2]悉。（一）围歼五个军，俘敌数万，极为欣慰。（二）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3]、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三）廖兵团[4]被歼后，蒋介石将从葫芦岛运一部兵力加强营口，并令沈阳一带敌军向营口迅速退却，此点你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四）如果在目前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27日17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廖兵团五个军已全部被包围和被击溃，已俘敌数万，俘虏中已查出副军长一名、师长一名，目前正在猛烈扩张战果中。二、由锦西北上之敌，本日向我塔山阵地进犯，我正顽抗中。"

[3] 牛庄，镇名，位于辽宁省海城市西北。

[4] 廖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兵团司令官廖耀湘。

复曾泽生等电[1]

（1948年10月27日）

曾军长、白师长、刘师长，并转全军官兵均鉴：

十月十七日电悉。贵军在长春举义，加入人民解放军，使长春获得有秩序的解放，深堪欣慰。贵军长等此次行动，应当为东北与全国一切愿意觉悟的国民党军队官兵所效法。希望贵军长等在林司令员、罗政委直接领导之下，团结全军，力求进步，改善官兵与军民关系，与全国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驱逐美日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十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在长春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军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等的电报。

立即抽几个纵队兼程东进歼灭沈阳逃敌[1]

（1948年10月28日）

林、罗、刘：

刚发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2]给你们，接到你们二十七日十八时电及十一时半电，你们业已部署大军迅速向鞍山、海城前进，歼灭沈阳南下之敌，甚好甚慰。希望你们立即抽出几个纵队于明[3]（二十八）日兼程东进，如能于二十九日渡过辽河，则沈阳逃敌跑不掉，否则，沈阳之敌有于三十日退到营口的可能。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四时半[4]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即《望以有力兵团东渡辽河歼灭营口一带之敌》。

[3] “明”字应为“今”字。

[4] 原件如此，应为二十八日零时三十分。

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

（1948年10月28日）

各同志：

兹将林罗十月二十三日发给他们部队的一个指示电[1]转发给你们作参考。关于作战在以迅速动作将敌分割包围之后，不要慌忙攻击，要待准备好了之后，然后举行攻击一项问题，请你们加以注意。电中所举沙后所、王道屯的不良战例，是在九月间他们两个独立师攻击兴城、绥中时候的事。这种情形，恐怕不但东北部队有，你们所属部队也会有的，不过你们在战术问题方面给我们反映太少，我们无从知道。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注意，请你们在全军干部中进行教育，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如果得到你们同意，请将此电及林罗电发给各纵队，引起大家的注意。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八日

---

[1] 指1948年10月23日9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给各纵并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各级干部每次攻击之前，均须走在部队前面，亲自侦察地形和布置攻击准备。但并不是指随便暴露目标，或在部队冲锋时也跑在前面，“须严戒沙后所、王道屯的打法。那种打法在未侦察地形状况，未等部队大部到齐，未将兵力火力很好配备，未将敌人退路截断，即仓促地乱打乱冲”。

复陈毅、邓小平电[1]

（1948年10月28日）

我们同意你们不出淮南，但是否打孙元良，要看孙元良是否被你们调动到徐蚌线。如果仍在汴徐线，则似以不打为宜。你们在徐蚌线以西地区出现，对整个敌人威胁极大。这种威胁作用，胜过在汴徐线上打一胜仗。请你们考虑到达亳、涡、永中间地区休息数日之后，第一步是否可以分路攻占亳、涡、蒙三城，再看形势。估计三城占领，淮南即将震动，孙、邱两部均将被调动，而你们行动的目的是调动孙、邱，主要是调动邱清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陈毅、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华北三纵七纵的行动部署[1]

（1948年10月29日）

周：

请告聂[2]，如敌本日（二十九）进至望都及其以南，明日进至定县以北，则我三纵应于三十日进袭方顺桥[3]、望都一线，萧克[4]指挥之一个旅应加上去，使七纵集中向北反攻。三七两纵应于本夜取得联络，统受郑维山[5]指挥，可能打一胜仗。如敌本日不动，或本日仅进至望都而明日在望都不动，则三纵可在满城以南休息一日，与七纵取好联络，后天再打。

毛泽东

二十九日早

---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1948年10月24日，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秘密调遣第九十四军、骑兵第四师等部组成“援晋兵团”，以救援太原为名，企图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和揭露了国民党的阴谋，并预作防范准备。11月初，国民党军偷袭部队由定县以北唐河地区退回保定。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

[3] 方顺桥，村名，位于河北省满城县西南。

[4] 萧克，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副司令员。

[5] 郑维山，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纵队司令员。

十一纵可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1]

（1948年10月29日）

林、罗、刘，并告热河[2]：

本日八时电[3]悉。你们既已将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整，十一纵似可调出使用于北平方面。如你们同意，即请令该纵取捷径，经遵化、蓟县到三河集结，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并暂受杨罗耿[4]指挥。蒋傅[5]为捣毁平山、石门[6]一带中央及华北政府所在地之目的，使用三个最强的军，一个骑兵师，一个骑兵旅，一个坦克队及一个工兵爆炸队，先头本日已占望都。我杨罗耿回援后，在兵力对比上，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这里指热河军区。

[3] 指1948年10月29日8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昨日我已有3个纵队进到辽河沿岸，因无浮桥而少渡船无法过河，现正加紧架桥。我十纵昨将一一六师（缺1个营）全部歼灭。已令我塔山守备部队撤下休整。

[4]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5] 蒋，指蒋介石。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 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不足歼灭此敌。现通县、北平一带空虚，原开通县之十三军的第四师亦被调用于平保线[1]，如十一纵能出现于通县方面调动南下敌军一部回头，则我杨罗耿可给其余部以歼灭打击。

军委

艳酉

---

[1] 平保线，指北平（今北京）至保定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请考虑将东北第十一纵派往通县北平方向活动[1]

（1948年10月29日）

林、罗、刘：

蒋介石、傅作义[2]为挽救危局刺激人心起见，令十六军、三十五军、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附坦克及爆炸部队向石家庄进攻，其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等部昨日已进至保定以南之方顺桥[3]。除令杨罗耿[4]率部回援外，请你们考虑将现在锦西附近之十一纵派至冀东向通县、北平方向活动，威胁北平，是否可能，盼告。

军委

酉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方顺桥，村名，位于河北省满城县西南。

[4]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东北南调部队宜放在玉田蓟州等地区[1]

（1948年10月29日）

林、罗、刘：

本日十四时电[2]悉。你们将四纵、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南调很好。惟在部署上，提议位于玉田、蓟州[3]、三河、宝坻地区，可以同时威胁平古、平津、津榆[4]三线，主要威胁北平，主力在该区休整，派出多数支队分向三线袭击，即能起很大作用。

军委

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29日14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牵制傅作义，我们可将目前在锦西附近之第四纵、十一纵全部及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日内即开始向山海关冀东方面前进，威胁敌人，但四纵、十一纵在守备战及小战斗中各伤亡五、六千人，部队已较疲劳，故每日行程不能过多，并须一方面前进，一方面休整，便其恢复组织和疲劳。

[3] 蓟州，即今天津蓟县。

[4] 平古，即平古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古北口的铁路，今京通（通辽）线一段。平津，即平津线，指北平至天津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津榆，即津榆线，指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打归绥可稍为推迟[1]

（1948 年 10 月 29 日）

杨、李、李：

西俭电[2]悉。（一）你们打归绥[3]的时间可以稍为推迟，待打公庙[4]的部队回来，集结三个纵队，然后对归绥举行攻击。（二）所谓三面向你们夹击是不可能的。（三）十六军、三十五军、九十四军、骑四师、骑十二旅现正向石家庄进攻，我杨罗耿[5]南下对付该敌，尔后即在平保线[6]作战，我东北两个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指 1948 年 10 月 28 日 12 时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据贺龙、张宗逊 27 日 6 时电，蒋介石命令包头、绥、榆三处之敌三面夹攻杨部已完成准备，待命出发。另据俘称，宁马骑兵一部已到五加河西。我一纵及六纵十六旅集结于察素齐等地区；二纵以四个步兵团及两个骑兵团，今日西进奔歼公庙之敌，另以两个团于包头；六纵主力位于鄂尔格逊、巴拉盖地区机动。我们现在萨县附近。攻取归绥城，我们单独执行有把握，但打援无力量。二兵团南进后，敌援绥兵力有可能在两个军以上。

[3]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4] 公庙，位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部。

[5]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6] 平保线，指北平（今北京）至保定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师不久出冀东威胁平津。在此种情况下，敌很难以两个军援绥[1]。

军委

二十九日二十四时

---

[1]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给胡乔木的信[1]

（1948年10月29日）

我第一次口播已见效，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二十七日二十一时告傅作义称：昨收听广播得知匪方对本军此次袭击石门行动似有所警惕。广播谓本军附新二军两师拟袭石门，彼方既有所感，必然预有准备，袭击恐难收效。

---

[1] 这是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电[1]

（1948年10月29日）

傅部以三个军及两部骑兵位于平保线向石门进攻，我应集中三、四、七纵及二纵一个旅，各个歼灭该敌。杨、罗率主力，昨夜如尚未过路[2]，应于今夜过路，于明（三十）日起，以四天至五天行程，不惜疲劳，赶至满城地区，会合三纵、七纵作战歼敌，破坏敌之进扰石门计划。如杨、罗昨晚已过路，应于今日起亦以四天行程赶到满城。杨、李、李主力应即东移归绥附近，准备于敌十六军、三十五军南下作战后，即发起攻打归绥。望杨、罗令詹大南[3]部应向张北、张家口、宣化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使不能增援归绥。杨、李、李在绥东并应自行配备阻援兵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并告聂荣臻、薄一波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平绥铁路。

[3]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给刘少白[1]的信

（1948年10月30日）

少白同志：

九月十五大示读悉。我们的工作是有错误的。好在现已一般地纠正，并正在继续纠正中，正如你在五事中第二项所说那样。情形既已明白，则事情好办，你也就可以安心了。大函已转付彭真[2]同志，党籍一事，请与彭同志商酌。

敬颂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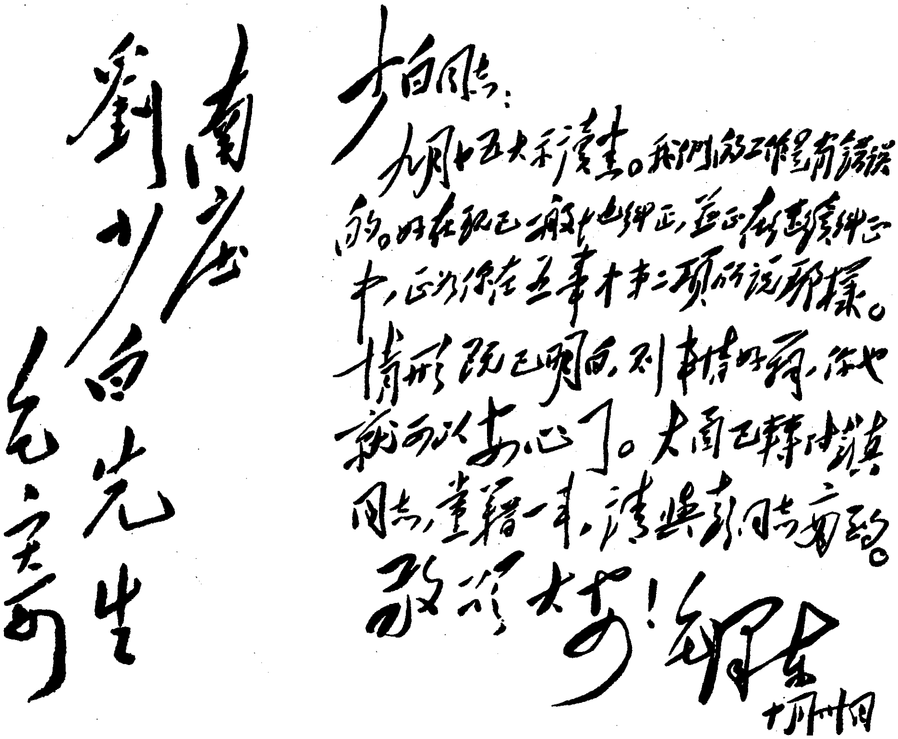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

[1] 刘少白（1883—1968），山西兴县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开明绅士身份进行革命活动。曾任晋绥边区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多年。1947年土地改革中被错斗，不久被党中央发现和纠正。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南庄
劉少白先生
毛澤東寄

少白同志：

九月十五大示讀悉。我們的工作是有錯誤的。現在則已一般地糾正，並正在徹底糾正中，正如你在五事中第二項所說那樣。情形既已明白，則事情好辦，你也就可以安心了。大函已轉付譚同志，黨籍一本，請與彭同志商酌。

敬祝大安！毛澤東

十月卅日

毛泽东致刘少白信的手稿。

对黄李邱三兵团在同一个晚上发起攻击为好[1]

（1948年10月30日）

饶、粟、谭，并告刘、陈、邓[2]：

俭戌电[3]悉。计划与部署甚好，请即照此施行。只有一点，分为虞齐两晚发起作战，是否有使黄兵团[4]闻声警觉，于齐日白天你们尚未接近该敌时迅即收缩集结之虞，似不如同时于虞晚或齐晚各处一起动作，使各处之敌同时受攻，同时认为自己处于危险境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0月28日戌时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就淮海战役计划与具体作战部署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便于运东作战，我运西各部均于11月7日晚发起战斗，造成南北聚歼李弥兵团，攻略徐州之姿态。运东作战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战斗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开辟战场，布置阻援阵地，分割敌人，使其不能集结或靠近李弥兵团，或东窜新浦、海州。第二步即以6个纵队分割歼灭新安镇及阿湖之敌，1个纵队正面阻敌，1个纵队包围六十四军。如我军南下，黄兵团集结新安镇近郊时，即会攻新安镇，但还可实施战场分割包围攻击。我可力求秘匿突然奔袭，达到使敌不能收缩避战。运东各纵统于8日晚发起战斗。

[4]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互相不能照顾，要在两三天后才能查明我之主攻方向，但又因为我各部均已迫处他们面前，又已无法互相增援，尤其使黄兵团各部丧失收缩集结的必要时间，极为重要。故此役胜利建筑在两个条件上面，即是：（一）使黄李邱[1]三个兵团及三个兵团中之各军互相不能增援。要达到这一点，除华野全军照俭戌电部署外，陈邓方面亦请于虞日或齐日同时动作。（二）使黄兵团各军没有收缩集结之时间。要达到这一点，就应当在同一个晚上动作，不要在两个晚上先后动作。以上请加考虑酌定。此外，你们后方各事如尚有未处理完毕者，宜交与适当之同志去处理，以便粟谭专心指挥作战。此战打得好，可能歼灭黄兵团八个师，李兵团两个师，冯治安[2]两至三个师，接着不久并可能歼灭东海及两淮[3]之敌，则长江以北之战局便可展开。那时即使蒋介石将锦西、葫芦岛、营口等处之敌全部南调，亦只能布防于长江沿岸，于大局无补。故望你们精心组织这一伟大的战役。又我军今日可占领沈阳，知注并告。

军委

三十寅

---

[1] 黄，指黄百韬。李邱，指李弥、邱清泉，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和第二兵团司令官。

[2]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3]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东北华北部队准备协力夺取平津地区

（1948年10月31日）

林、罗、刘[1]，并告程、黄[2]，东北局，华北局：

三十日九时半部署电[3]及三十日十一时电均悉，部署很好。下列各点请注意：

（一）我杨罗耿兵团[4]全部已从平张线向平石线转移，平张线上尚有敌暂三、暂四两军及暂五军一个师。我杨成武李井泉兵团[5]正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程，指程子华，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黄，指黄志勇（1914—2011），江西崇义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参谋长。1948年10月28日，程、黄率四纵，十一纵，热河独立第四、第六、第八师和骑兵师组成东北野战军入关先遣兵团。

[3]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0月30日9时半给程子华、黄志勇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局的电报。电报说：我军决定四纵，十一纵及独四、六、七、八师及热河骑兵师及察北骑十一、十六师，统向北平近郊前进，并统归程黄指挥。我东北全力待营口、沈阳之线战斗结束后，稍加补充兵员，即向北平、天津前进，夺取平津。

[4] 杨罗耿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

[5] 指杨成武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

在准备夺取归绥[1]（约戌灰[2]左右开始），张平线敌有以一个军向归绥增援之可能，而我杨李兵团只有攻城力量，没有打援力量。我平北、察[3]北部队有积极负责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的敌人举行钳制性作战的任务，如该线敌有一部向归绥增援时，并应派部向绥[4]东、兴和、集宁等地尾敌前进，抓住该敌。因此，察北骑十一师、骑十六师似不宜向北平附近前进，而以归詹、牛[5]指挥担负上述任务为宜。

（二）四纵、十一纵、独四、独六、独七、独八等师向北平附近前进后，锦榆线及热河[6]空虚，请在占领沈阳后，从北面各独立师中抽出几个先行南下，应付锦西、承德之敌，免其泛滥残民。

（三）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第三年的下半年即明年一月至六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7]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8]、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

---

[1] 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

[2] 戌灰，即11月1日。

[3] 察，指察哈尔省。

[4] 绥，指绥远省。

[5] 詹，指詹大南，1914年生，安徽金寨人，当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牛，指牛树才（1908—1990），河北曲阳人，当时任冀热察军区政治委员。

[6] 热河，即热河省。

[7]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8] 平绥，即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今京包线。

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四）争取于一个月内外修通沈锦线、彰武义县承德线铁路，整理热河及冀东境内各主要公路，以利军运并迅速运屯粮弹，否则将无法供应大军作战。此项部署望迅速作出。

（五）中央九月会议[1]规定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因为战争迅速发展，可能提早一年完成。此点你们应有精神准备，从而加速组织准备，并以此种精神教育干部。

军委
酉世

---

[1] 指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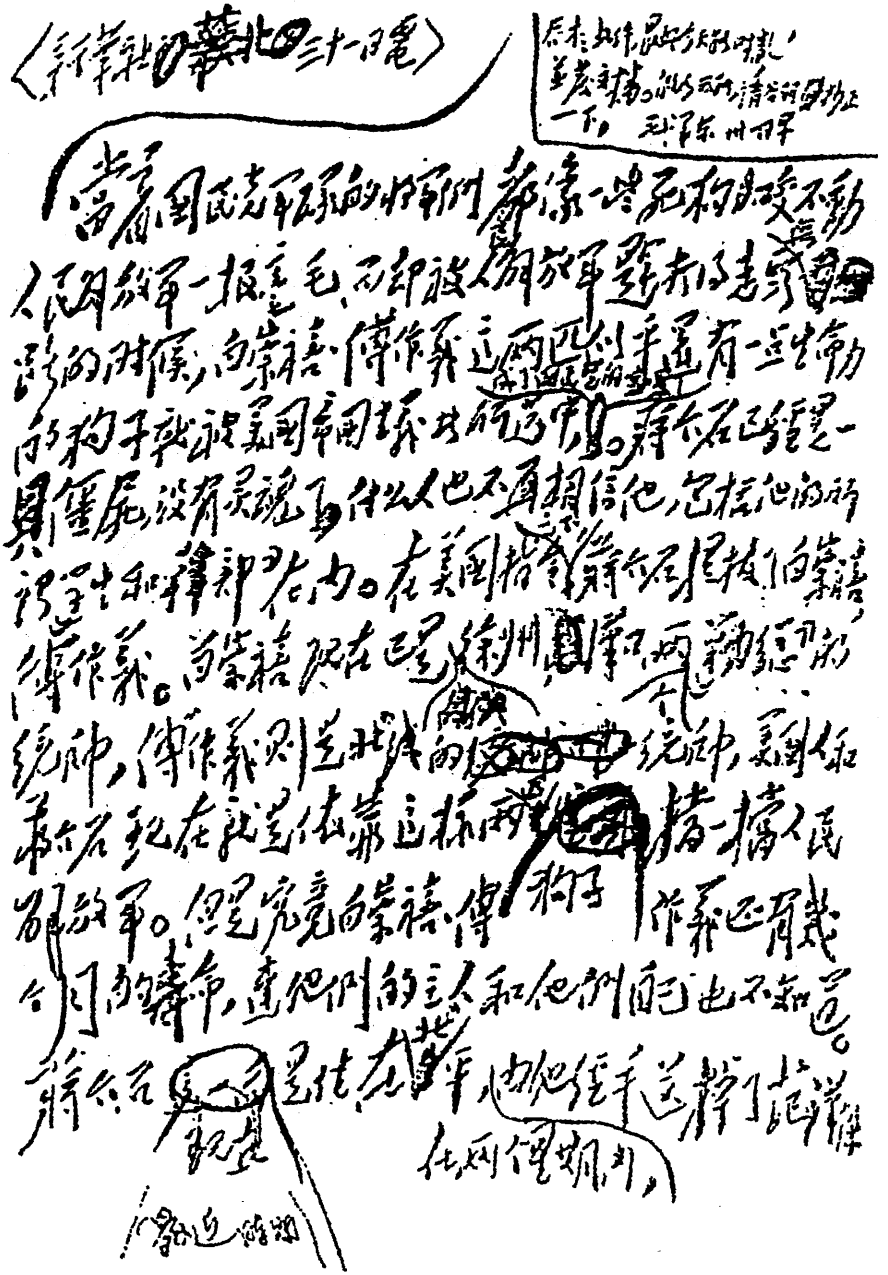
（1948年10月31日）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军们都像一些死狗，咬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而被人民解放军赶打得走投无路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所选中，成了国民党的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生”和“干部”在内。在美国指令之下，蒋介石提拔了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已是徐州、汉口两个“剿总”的统帅，傅作义则是北线的统帅，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他们挡一挡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最近时期是住在北平，在两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昨日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蒋介石原先是要傅作义组一支轻兵去偷袭济南的，傅作义不干。偷袭石家庄，傅作义答应了；但要两家出本钱。傅作义出骑兵，蒋介石出步兵，附上些坦克和爆炸队，从北平南下了。真是异常勇敢，一个星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

期到达了望都地区；指挥官是郑挺锋。从这几天的情报看来，这位郑将军似乎感觉有些什么不妥之处，叫北平派援军。又是两家合股，傅作义派的是第三十五军，蒋介石派的是第十六军，正经涿州南下。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二〇八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新华社华北三十一日电〉

原来此件是此文的开头，并发新稿，以作改正，请分别照改一下。 毛泽东 卅日早

当着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都像一堆死狗躺着不动，人民解放军一根毫毛、一根毫毛被人民解放军拔去了毫发的时候，白崇禧、傅作义这两匹剩下来的有一点生动的狗子就被美国帝国主义者作为宝贝了。蒋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了，什么人也不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将士和党羽在内。在美国指令下，蒋介石提拔白崇禧、傅作义。白崇禧现在是徐州、华中两个剿总的总司令，傅作义则是北平的剿总总司令，美国人和蒋介石现在就是依靠这两个狗子去搞人民解放军。但是究竟白崇禧、傅作义还有几个月的寿命，连他们的主人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蒋介石奴才是活不了几年了，他们手下的将领们在两个星期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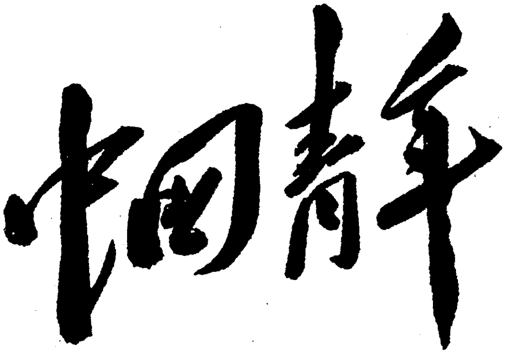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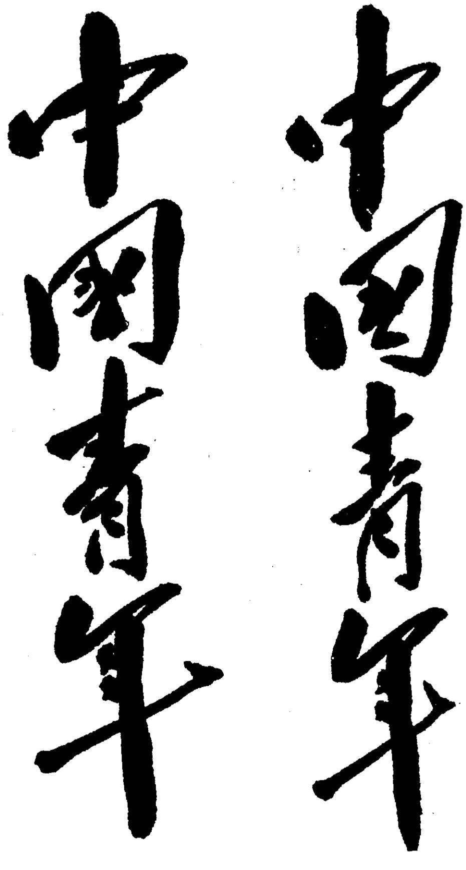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的手稿。

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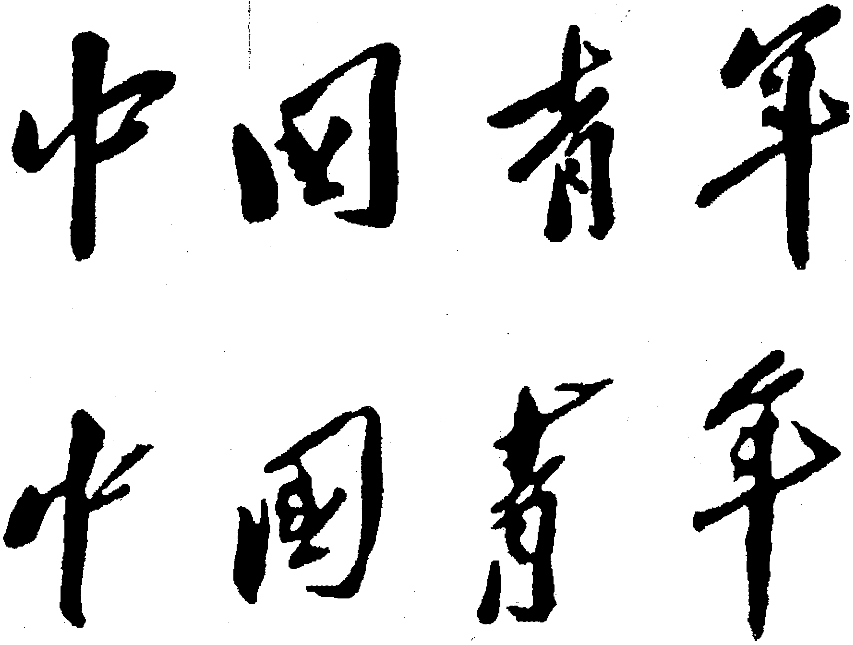
（1948年10月）

中国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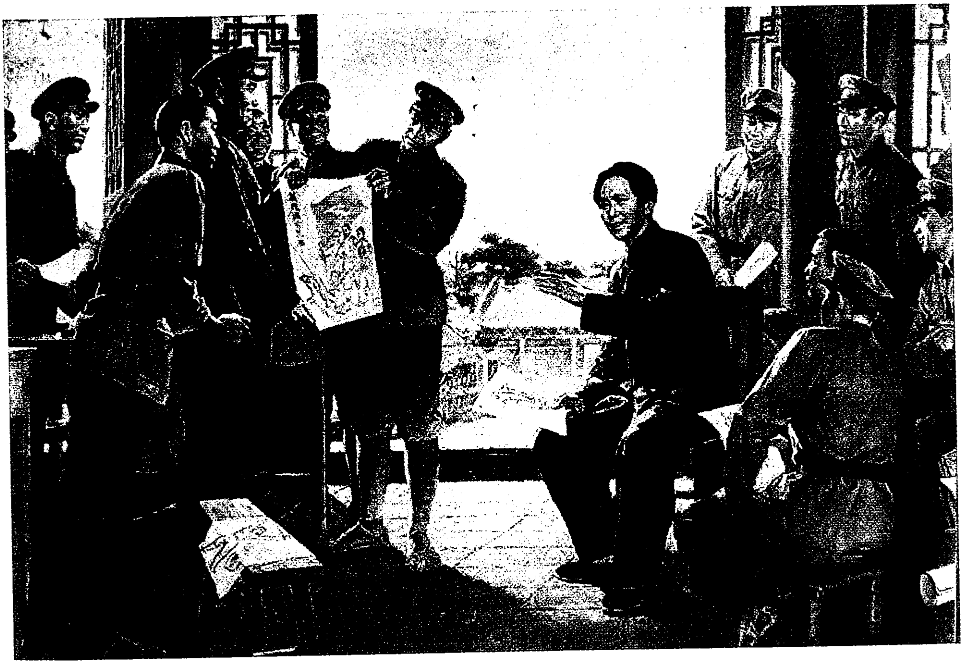


毛泽东第二次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写的刊名。



毛泽东第二次为《中国青年》杂志题写的刊名。

1948年，毛泽东和警卫战士合影。



《毛主席教我们画画》（油画）

宜首先歼灭黄百韬指挥所[1]

（1948年11月1日）

粟：

世晨电[2]悉。谍息，一百军已移至薛埠、牛山、大刘圩[3]，六十四军城头，七兵团指挥所附榴炮营城头附近，黄[4]本人似即在该处，二十五军阿湖，六十三军黄花埠、新安镇，此种情况有利于你们分割围歼。你们似宜首先歼灭黄百韬指挥所。

军委

一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31日晨粟裕给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电报说："一、职已返抵前方。震林、建安同志今晚可自济南南来，尔后即随东兵团司令员行动。饶政委、康生同志在济南尚有三、五天停留，始可返华东局。""二、淮海战役，当遵令于齐晚同时发起战斗，但不知陈军长、邓政委所部能否于齐晚发起战斗，请陈邓示复。三、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3] 牛山，镇名，今为江苏省东海县县治。薛埠、大刘圩，村名，均位于江苏省东海县境。

[4] 黄，指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小平指挥[1]

（1948年11月1日）

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

（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二）同意陈邓世亥电[2]，徐州西南方面我军之动作，依情况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由陈邓临机决定。（三）卫立煌逃至葫芦岛，沈阳、营口之敌已被我军包围，数日内即可全部解决。傅作义偷袭石家庄之计划已被阻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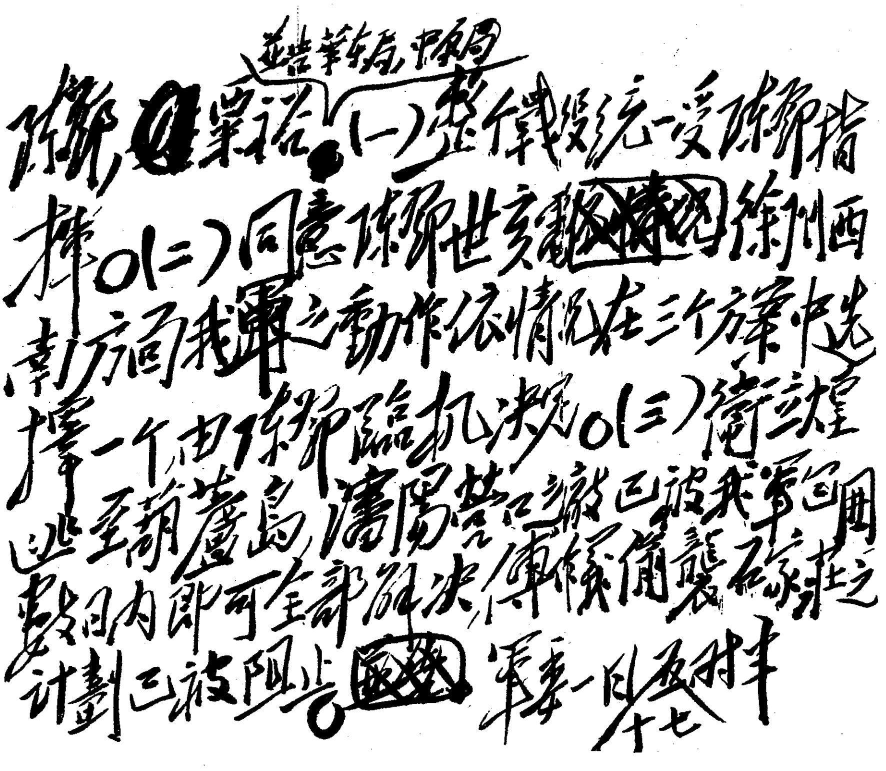
军委

一日十七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

[2] 指1948年10月31日亥时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我们8日晚与华野同时开始进入战斗。根据华野部署，我们的作战方案有三：第一方案：如邱兵团仍在砀山地区、孙兵团仍在马牧集以南地区，则我宜照军委电示，以1个纵队直出萧县进迫徐州，以有力一部出黄口东西，组成向西防御，位于邱兵团之右侧，以迟阻邱兵团东援之目的。第二方案：如邱兵团沿路缩至黄口、徐州之线，孙兵团移至砀山、黄口之线，则我以一部协同三、广两纵，钳击邱敌一部，其余全部歼灭孙兵团一部或大部。第三方案：如邱孙两兵团均沿路缩至徐州及其附近，则我只有由西南两面向徐州攻击，以达钳制邱孙之目的。无论哪个方案，集结永城均属有利。我们力求实现第二方案。



陈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一)整个戰役统一受陈邓指揮○(二)同意陈邓世亥電徐州西南方向我軍之動作依情况在三个方案中选择一个由陈邓臨机决定○(三)衛立煌逃至葫芦島，瀋陽營口之敌已被我軍包围，数日内即可全部解决，傅作義偷襲石家莊之計劃已被阻止○

軍委　一日十七时

毛泽东致陈毅、邓小平等电的手稿。

杨罗耿兵团应进至满城以西地区待命[1]

（1948年11月1日）

聂、薄、滕，杨、罗、耿，并告林、罗、刘[2]：

（一）敌九十四军等部已由唐河退至方顺桥，三十五军至保定，十六军至涿州、保定间。（二）杨罗耿所率四个旅及后续各部应于明（二）日进至满城以西地区休息待命，看清傅部各军行动方向，再决自己的行动，并迅即与三七两纵及各地方兵团取好联络，并统一指挥他们。（三）目前一时期杨罗耿兵团即在平汉线[3]作战。（四）林罗刘已派两个纵队、四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由程黄指挥，由锦西方面向北平附近前进，到达时间大约在十天以后。（五）沈阳、营口之敌已被包围，不日即可解决。

军委

一日十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除对付邱孙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1]

（1948年11月1日）

陈、邓，并告刘、邓、李，粟、谭、陈[2]：

白崇禧[3]以徐州陇海会战一触即发，令黄维兵团[4]戌灰在太和、阜阳集中完毕等情。我华野戌齐发起战斗后，估计戌齐至戌巧十天内战况最为紧张，务须保障在此十天内邱兵团[5]不能东援。但你们除对付邱孙[6]两兵团外，还要对付黄维兵团（四个军），你们对黄维进程之估计及对策盼告。我们认为，除六纵必须立即尾黄维东进外，十纵如在南阳附近，亦宜协同二纵尾黄维东进。如何，盼复。

军委

东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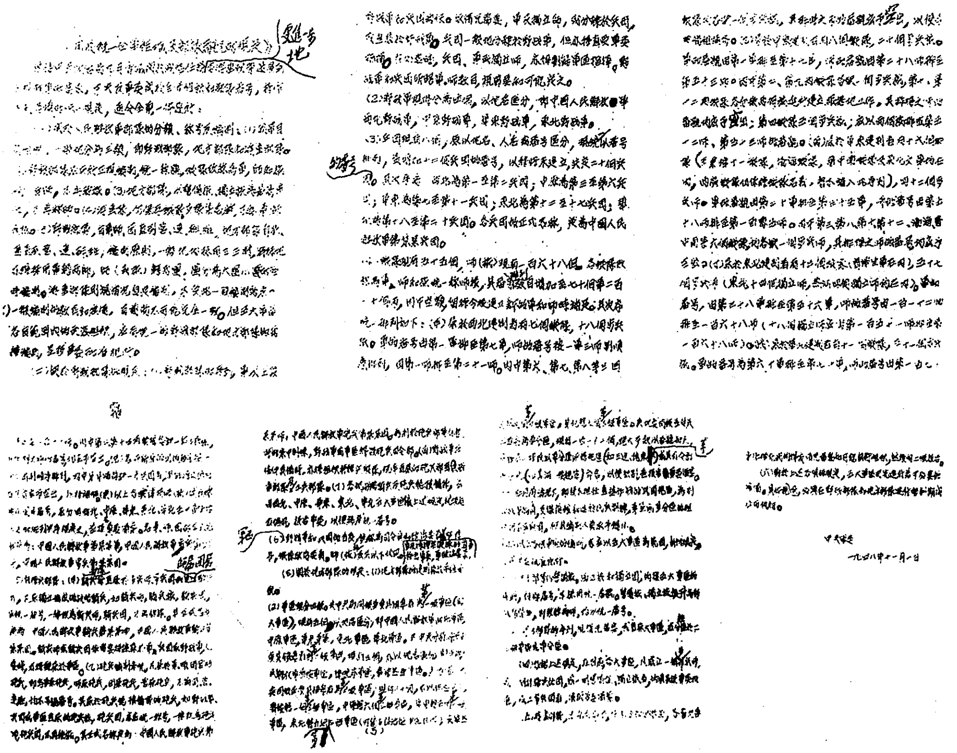
[2] 刘、邓、李，指刘伯承、邓子恢、李达，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粟、谭、陈，指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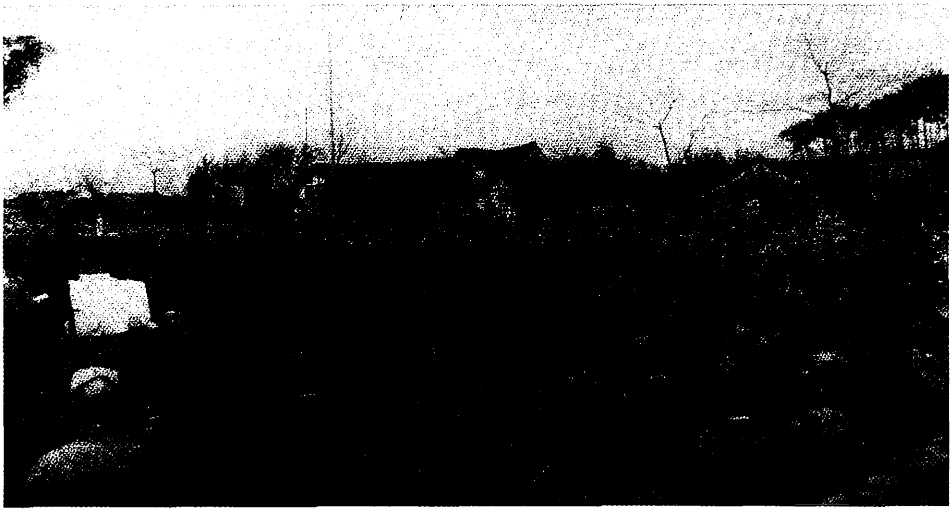
[4]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5]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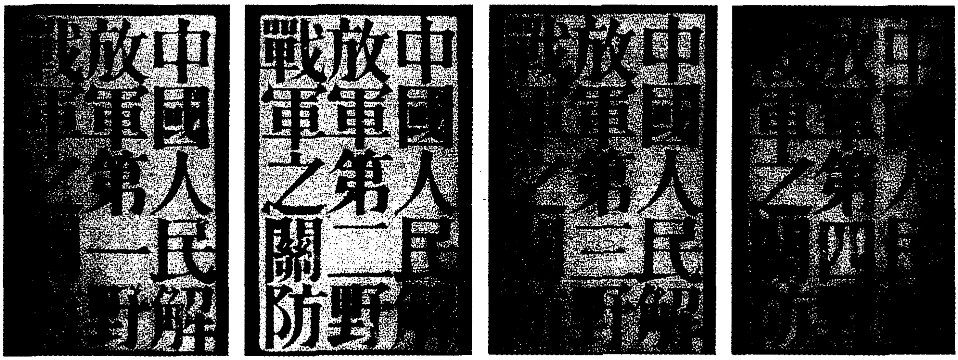
[6] 邱，指邱清泉。孙，指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宣读整编命令。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之關防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之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之

整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之关防。

破击平汉路延滞敌八十五军北上[1]

（1948年11月2日）

刘、邓、李，并告陈、邓[2]：

世东两电[3]悉。（一）二纵及江汉、桐柏主力对平汉路[4]破击如能彻底，并坚持多日，则不但能延滞八十五军北上的时间，且可能迫令黄维[5]以一部从北面南下夹击，打通平汉，如此则能推迟黄维东进之时间。请令王宏坤[6]极力扩展该路之破击，并极力延长破路时间。（二）二纵下一步行动，似宜经商城方向出豫皖苏。（三）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邓子恢和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刘伯承、邓子恢、李达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前电说：我为继续吸引白崇禧向南，已令王宏坤指挥二纵及桐柏、江汉两军区主力，对平汉路信阳到孝感段连续破击。今晨已开始战斗，今夜大破路。后电说：根据黄维东调，王凌云南移之情况，我们已令六纵并指挥豫西六分区主力，截击由镇平以西向东撤退、由南阳向南撤退之王凌云部；陕南十二旅进出南阳以东之桥头地区，截击由南阳东撤之十四军及由南阳向南撤退之王凌云部。

[4] 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5]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6] 王宏坤，当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

纵行动值得考虑，截击王凌云[1]由镇平向南之部可能打不着，又费去时间，似不如由内乡取直径开太和、阜阳，先黄维到达该地，从正面或侧面阻滞黄维为适宜。二纵到商城后渡淮向太和、阜阳进，与六纵协力拖阻黄维。以上是否适宜，请酌办。

军委

二日二十时

---

[1] 王凌云，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绥靖区司令官。

致习仲勋、林伯渠等电[1]

（1948年11月3日）

因政协召开在即，临时中央政府即将建立，东北人民政府亦将建立，拟请伯渠来中央工作，并准备去哈尔滨参加政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习仲勋、林伯渠并彭德怀、贺龙电的主要内容。

四纵十一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地区之计划不变[1]

（1948年11月4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程、黄[2]：

（一）三日各电[3]悉。迅速彻底干净歼灭各敌，光复沈阳，极为欣慰，望向全军传令嘉奖。（二）傅[4]军南进各部已北撤，但四纵、十一纵及各独立师进至遵化、蓟州[5]地区之计划仍不变更。程黄率各部到达后，分派几个支队向平古[6]、平津、津唐各线袭扰，主力择地整训，待东北主力入关后，统一发起对傅军作战。惟傅军如在我杨成武[7]攻归绥[8]时派兵西援，则应暂停整训，向北平等地有所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1月3日7时、16时半和3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沈阳、营口战斗歼敌情况先后给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局的电报。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蓟州，即今天津蓟县。

[6] 平古，指北平（今北京）和古北口。

[7]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8]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作，牵制傅军西援兵力，帮助杨成武得手，因杨罗耿[1]所部已开回平汉线[2]并须休整，平张线[3]上傅军已不受威胁。（三）向平津作战时，冀东一带粮食必不够供应大军需要，平津攻克后，军民需粮亦多，东北需有所协助，望早日筹划。

军委

四日二时

---

[1]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平汉线，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3] 平张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1]

（1948年11月4日）

休整时间可至十二月十五日为止，以便有几天时间开纵委会及师委会，分两项议程，专门讨论反无政府状态及整理纪律问题，并各自通过两项专门决议。

中央前给你们第三年担负歼敌三十六个正规师的任务，你们在极短期间即已完成，你们现在应向全军正式公开提出打平、津及在平津战役中歼灭傅军主力的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的主要内容。

致东北局等电[1]

（1948年11月5日）

原文规定一律停止使用，这在东北目前情况下原则上是对的，但仍须于文尾增加“但对于某种货币，例如金圆券可由民主政府协助持券人向敌占区抛出”一句。因货币问题关系人民利益甚大，金圆券尚有相当价值，如一律作废一般市民受损太大，仍应由政府以压低比价的方法限期收兑若干，向蒋区抛出。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处理国民党政府的纸币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的主要内容。

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方案[1]

（1948年11月5日）

陈、邓，并告粟、陈、张[2]：

（一）你们现到何处？（二）敌已知蒙城重要，孙元良[3]率兵团部由宿县昨（支）日到板桥集[4]，估计本（微）日可到蒙城。该兵团之九十九军（即原六十九师）已到蚌埠接防，原驻蚌埠之九十六军（即原四十五师残部）由蚌埠东移临淮关[5]。该兵团之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估计有一个军随孙往蒙城，另一个军则留宿县。因邱兵团[6]全部现在砀山、徐州（均不含）间及丰县，刘汝明[7]则移砀山及其以西，前闻邱兵团以一个师开宿县似未实行，如此则孙兵团必有一个军驻宿县。是否如此，望你们速查明。（三）我三、广两纵攻砀山附近之刘部，可能吸引邱兵团以一部西援。（四）在上述情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4] 板桥集，镇名，位于安徽省蒙城县东北。

[5] 临淮关，镇名，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

[6]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7]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下，第一方案，你们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好打则攻歼之，如敌援甚快不好打则打援敌。估计援敌可能从北面（邱兵团一部）、西面（孙元良率一个军从蒙城）、南面（九十九军）来，亦有可能孙元良由蒙城先到蚌埠，集合两个军均由南面来。不论怎样，你们以一部位于北面阻援，以主力打西、南两面援敌是有利的，但亦有可能西、南两面都不敢来援，仅有北面来援，如此则应打北面援敌。此方案可望确定地调动邱兵团一部。第二方案，以一部破徐蚌路[1]，以主力打蒙城，得手后大破宿蚌路[2]。以上何者为宜，望酌复。

军委

微丑

---

[1] 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 宿蚌路，指宿县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攻击归绥的部署[1]

（1948年11月5日）

杨、李、李，并告杨、罗、耿，程、黄[2]及林、罗、刘[3]：

（一）杨罗耿兵团现位平保线[4]以西相机攻歼该线之敌，从南面威胁北平。程黄率两个纵队、四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本月十二日前后集中遵化、蓟县地区，从北面威胁北平。估计傅[5]部难于抽出两个军援绥[6]，但仍须准备对付其一个军增援。除由程黄命詹大南[7]于你们攻归绥[8]时，用全力向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之线积极活动，钳制暂三暂四两军外，你们自己仍应以八纵相当力量位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平保线，指北平（今北京）至保定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5]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7]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8]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兴集[1]地区，协同北岳部队从正面阻击可能西援之敌。你们主力亦应留出一部作预备队，位于卓资山[2]附近以为策应。归绥至包头线暂时只留少数部队，以便抽出八纵主力位于东面。是否可行盼告。（二）攻击时间以在程黄兵团到达冀东，北平方面业已感受威胁之时为宜，具体时间可定在十五号左右。（三）周密调查归绥城敌方配合情况，以利攻城迅速奏效，应争取十天左右攻克归绥。（四）你们应与詹大南密切联络，詹部钳制行动时间应与你们攻城时间相配合。

军委

五日六时

---

[1] 兴集，指内蒙古兴和和集宁。

[2] 卓资山，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1]

（1948年11月5日）

【新华社郑州五日电】在人民解放军伟大的胜利的攻势下，南阳守敌王凌云于四日下午弃城南逃，我军当即占领南阳。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2]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帝刘秀[3]，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4]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在过去一年中，蒋介石极重视南阳，曾于此设立所谓“绥靖区”，以王凌云为司令官，企图阻遏人民解放军向南发展的道路。上月，白崇禧使用黄维兵团[5]三个军的力量，经营整月，企图打通信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

[2] 曹操（155—220），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张绣（？—207），三国武威祖厉（今甘肃靖远西南）人，董卓部将张济之侄。张济死后，继领其众屯兵宛城（今南阳）。197—198年，曹操几次征讨张绣。后张绣降曹。

[3] 刘秀（前6—57），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西汉皇族。新朝末年起兵反对王莽，加入绿林军，公元25年称帝，建立东汉王朝，亦称后汉王朝。

[4] 王莽（前45—23），“新王朝”的建立者。西汉末年，以外戚掌握政权。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23年，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新朝灭亡。

[5] 黄维兵团，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阳、南阳间的运输道路，始终未能达到目的。最近蒋军因全局败坏，被迫将整个南部战线近百个师的兵力，集中于以徐州为中心和以汉口为中心的两个地区，两星期前已放弃开封，现又放弃南阳。从此，河南全境，除豫北之新乡、安阳，豫西之灵宝、阌乡，豫南之确山、信阳、潢川、光山、商城、固始等地尚有残敌外，已全部为我解放。去年七月，南线人民解放军开始向敌后实行英勇的进军以来，一年多时间内，除歼灭了大量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最大的成绩，就是在大别山区（鄂豫区）、皖西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江汉区、江淮区（即皖东一带）恢复和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创立了七个军区，并极大地扩大了豫皖苏军区老根据地。除江淮军区属于苏北军区管辖外，其余各军区，统属于中原军区管辖。豫皖苏区、豫西区、陕南区、桐柏区现已联成一片，没有敌人的阻隔。这四个军区并已和华北联成一片。我武装力量，除补上野战军和地方军一年多激烈战争的消耗以外，还增加了大约二十万人左右，今后当有更大的发展。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域，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在去年下半年的一个极短时间内，我们在这一区域曾经过早地执行分配土地的政策，犯了一些策略上的“左”的错误。但是随即纠正了，普遍地利用了抗日时期的经验，执行了减租减息的社会政策和各阶层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这样，就将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阶层，均联合或中立起来，集中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及乡村中为最广大群众所痛恨的少数恶霸分子。这一策略，是明显地成功了，敌人已经完全孤立起来。在我强大的野战军和地方军配合打击之下，困守各个孤立据点内的敌人，如像开封、南阳等处，不得不被迫弃城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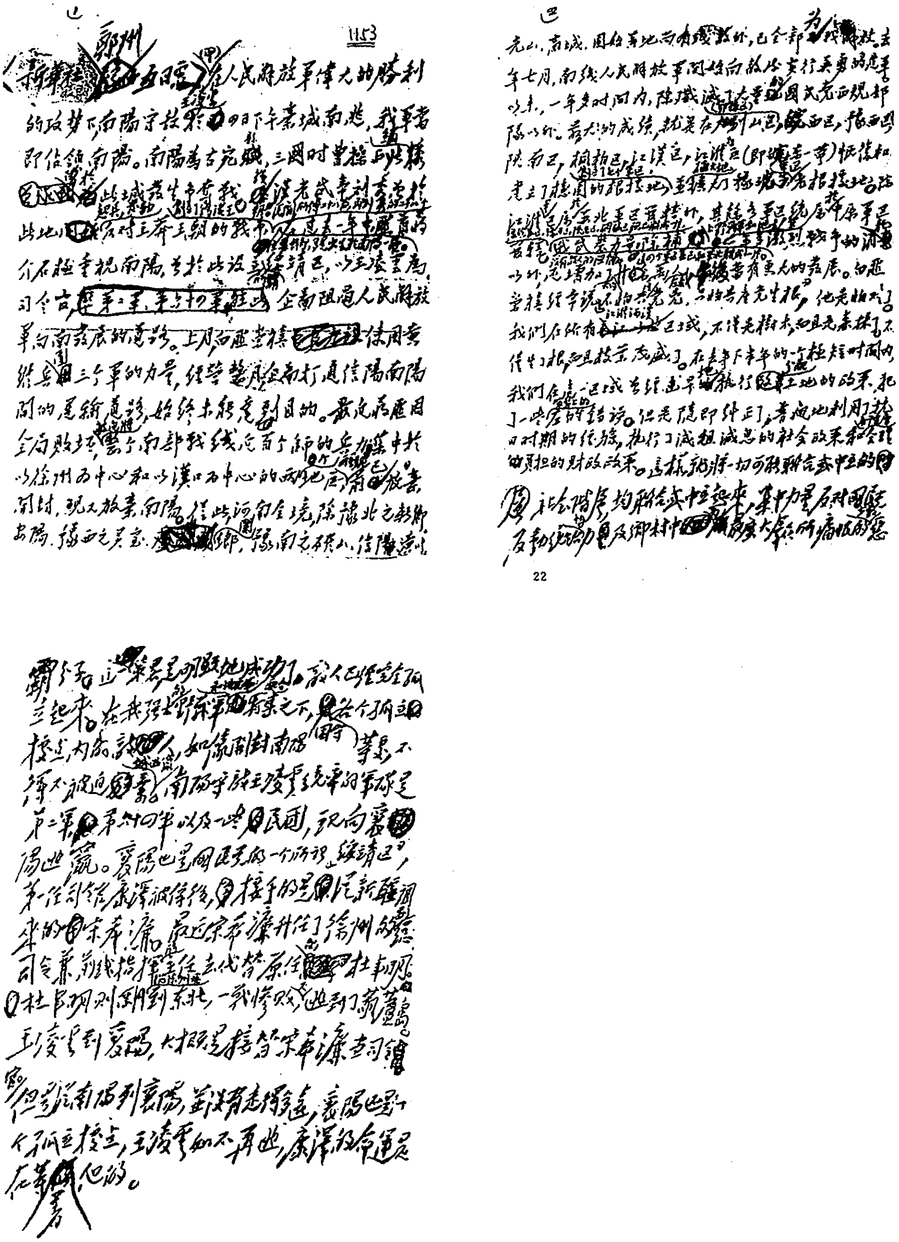
窜。南阳守敌王凌云统率的军队是第二军、第六十四军以及一些民团，现向襄阳逃窜。襄阳也是国民党的一个所谓“绥靖区”，第一任司令官康泽[1]被俘后，接手的是从新疆调来的宋希濂[2]。最近宋希濂升任了徐州的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所主任，去代替原任的杜聿明[3]。杜聿明则刚从徐州飞到东北，一战惨败，又逃到了葫芦岛。王凌云到襄阳，大概是接替宋希濂当司令官。但是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

---

[1] 康泽（1904—1967），四川安岳人。曾任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7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俘。

[2] 宋希濂（1907—1993），湖南湘乡人。1948年8月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9月调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3] 杜聿明，1948年10月由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调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手稿。

苏联十月革命节的贺电[1]

（1948 年 11 月 5 日）

斯大林大元帅：

当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一周年纪念的时候，敬祝世界和平民主堡垒苏联的日益强盛，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在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之际给斯大林的贺电。

对冯治安部之抵抗和游移不决者应坚决歼灭[1]

（1948年11月6日）

粟、陈、张，并陈、邓[2]：

你们对冯治安[3]部之抵抗者及游移不决者，应取坚决歼灭手段，以便迅速夺取临、韩、峄、台、贾、柳[4]地区，威胁徐州。仅对其决心起义者，则取超越前进方法，将其留在后面。对刘汝明[5]部亦是如此。

军委

鱼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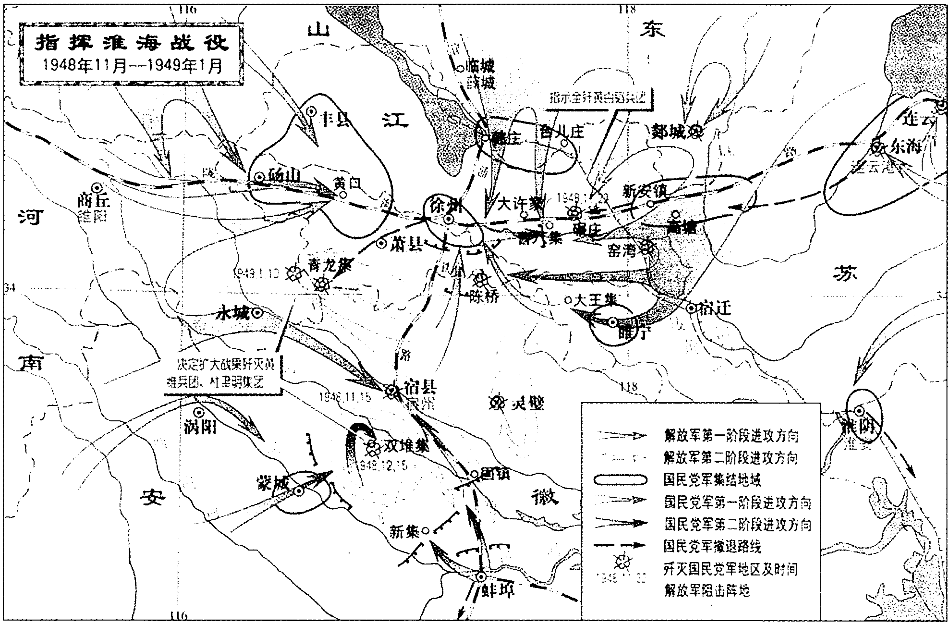
[2] 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4]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省微山县东南。峄，指峄县，旧县名，即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台，指台儿庄，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南部。贾，指贾汪，镇名，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柳，指柳泉，村名，位于江苏省铜山县北部。

[5]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序幕。


指挥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1949年1月
山
东
江
苏
河
南
安
徽
116
118
临城
薛城
枣庄
台儿庄
郯城
连云
东海
连云港
丰县
砀山
黄口
商丘
徐州
萧县
大许家
曹八集
碾庄
新安镇
窑湾
1948.11.22
指示全歼黄百韬兵团
1949.1.10
青龙集
陈桥
大王集
睢宁
宿迁
永城
决定扩大战果歼灭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
1948.11.15
宿县
宿州
灵璧
涡阳
双堆集
1948.12.15
固镇
蒙城
新集
蚌埠
淮阴
淮安
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集结地域
国民党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撤退路线
歼灭国民党军地区及时间
解放军阻击阵地

淮海战役示意图。

复陈毅、邓小平等电[1]

（1948年11月6日）

同意你们三五天内首先解决刘汝明之方针。刘汝明两个军主力均移永城地区。你们决定打刘汝明应直开永城附近，并派部阻击砀山、黄口之敌的可能增援。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陈毅、邓小平并告粟裕、陈士榘、张震电的主要内容。

淮海战役第一仗和第二仗的歼敌任务[1]

（1948年11月7日）

粟、陈、张、钟、刘，并告陈、邓[2]，华东局及王、谭[3]：

（一）完全同意鱼戌电[4]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但将战况及意见每日或每两日或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和后勤司令刘瑞龙的电报。

[2] 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王、谭，指王建安、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指粟裕、陈士榘、张震等1948年11月6日戌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淮海战役决仍按已定方针执行。为着驱逐与解决沂河以东沿岸少数土顽，便于掩护架桥和主力开进，今晚即以鲁纵围歼郯城、大埠之王洪九顽部；六纵围歼马头及南北沿河岸之敌；七纵围歼峄县、枣庄之敌；十纵包围临城，逼独立旅（土顽改编的）起义。”三纵、广纵及冀鲁豫独立旅向丰县、砀山线前进，以求扫清敌外围。明晚即迫近敌人，封锁消息，8日晚即完成分割包围，展开攻击。电报还说：“已令淮海分区派队迫近新浦、海州，确实查明情况。如敌确已撤退，即布置接收入城，维持秩序纪律，掌握政策，并控制连云港，向海上布置警戒。另以一部配合滨海地方武装及苏北兵团一部，严防敌四十四军之西进，使其不能迅速与黄兵团会合配合作战。”

三日报告一次。

（二）第一仗估计需要十天左右时间，力争歼灭黄百韬[1]十个师（包括四十四军），李弥[2]一个至两个师，冯治安[3]四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刘汝明[4]六个师（包括可能起义者在内），以上共计二十一个至二十二个师。如能达成此项任务，整个形势即将改变，你们及陈邓即有可能向徐蚌线迫进，那时蒋介石可能将徐州及其附近的兵力撤至蚌埠以南。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5]，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三）为了连续作战歼灭大量敌人之目的，你们应仿照济南战役之办法，对我各作战部队随战随补，随补随战，使部队经常保有充足的兵员和旺盛的士气，此点甚为重要。为此，应将后方补训兵团移到接近战场的位置，以便将已经训练好的新兵及俘虏能够迅速补充部队，同时将此次战役中所获俘虏迅速接收训练及补充部队。

军委

七日二十时

---

[1]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2] 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3]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4]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5] 黄维（1904—1989），江西贵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孙元良（1904—2007），四川华阳（今属成都市）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给刘少奇等的信

（1948年11月8日）

刘、朱、周、任、彭[1]各同志：

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须准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平、津、张三城当然要华北局负责准备，是否要东北局协助？唐山是否由华北局负责，还是由东北负责？解放后冀东、察北两区应划归华北局管辖，如果决定这一点，应不待平、津解放，该两区即应重划隶属关系，干部及粮食诸问题方利统筹。此事请会商拟定办法。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事先调查政治、经济、文化诸种情况，拟定处理方案。

---

[1] 朱、周、任、彭，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

应迅速分割包围黄兵团[1]

（1948年11月8日）

陈、邓并粟、陈、张[2]：

（一）刘汝明[3]开蚌埠守备，九十九军开宿县向西扫荡，孙元良[4]率两军返回宿县守备，邱清泉[5]派有力一部收复永城，以上是刘峙[6]六日部署，现正执行，并非总退却。邱清泉主力仍在黄口[7]、丰县地区。（二）粟陈张应迅速分割包围黄兵团[8]，否则该敌可能西移。

军委

齐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4]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5]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6]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7] 黄口，镇名，位于安徽省萧县西北。

[8]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复粟裕、陈士榘、张震电[1]

（1948年11月8日）

虞午电悉。（一）估计及部署均很好。（二）昨今两日战况望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陈士榘、张震电的主要内容。

截断宿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1]

（1948年11月9日）

陈、邓，粟、陈、张并谭、王[2]：

齐电[3]悉。

（一）徐州敌有总退却模样，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

（二）陈、邓直接指挥各部，包括一、三、四、九纵应直出宿县，截断宿蚌路，四纵不应在黄口附近打邱清泉[4]，而应迅速攻宿县，一纵在解决一八一师后，应立即去宿县。华野三、广两纵的任务是对付邱清泉，但应位于萧县地区从南面向黄口徐州线攻击，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陈毅、邓小平1948年11月8日给谭震林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已令三纵向黄口、徐州急进，协同四纵歼敌。现三、九两纵正向东进。今晨经由永城向宿县逃退之敌，确系邱清泉兵团部队。蒋军究竟只撤退邱清泉、刘汝明两部，还是整个放弃徐州，不日即可判明。如判明蒋军整个南撤设防淮河时，如有可能，你们要派部队举行追击，迅速进至淮南、路东。

[4]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便与宿县我军联结。如敌向南总退却时，则集中六个纵队歼灭之。

（三）粟、陈、张应令谭、王集中七、十、十三纵及由南向北之十一纵，以全力向李弥兵团[1]攻击，用迅速手段歼灭该兵团的全部或大部，控制并截断徐州至运河[2]车站之间的铁路，运东主力则歼灭黄兵团[3]。

（四）只要以上几点办到，就能破坏敌人总退却的计划，遭我全部歼灭，并占领徐州。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4]）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

（五）敌指挥系统甚为恐慌混乱，望你们按照上述方针，坚决执行，争取全胜。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

军委

九日十六时

---

[1] 李弥兵团，指李弥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

[2] 运河，镇名，在江苏省邳县。

[3] 黄兵团，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4] 江淮战役于1949年1月16日至24日举行。这次战役歼灭了残留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并向江南撤退的敌人，解放了江淮间广大地区。

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1]

（1948年11月9日）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2]，中原局：

齐辰电[3]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

军委
佳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陈、邓，指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1月8日辰时粟裕、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蒋介石可能采取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和立即放弃徐蚌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的两种方针。如果老解放区尚可能作较大的支持，则以迫使敌人实现第一方针为更有利。如是，则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向徐固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津浦铁路，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如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运。

待东北我军南下攻平津杨成武部再攻归绥

（1948年11月9日）

周：

请以电话与聂薄[1]商量：（一）杨成武[2]停止攻归绥（因无打援把握），即在归绥、卓资山[3]、集宁地区休整，待东北我军南下攻平津时再攻归绥。（二）杨罗耿[4]率三四两纵及五纵一个旅即开保定、石家庄之间休整补充至十五日为止，十六日开始向西参加太原作战。（三）在本月及十二月内给徐周[5]一万俘虏及新兵的补充。（四）杨罗耿另外两个旅加入七纵集团在平保线[6]活动。

毛泽东

十一月九日

---

[1] 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3] 卓资山，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4]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5] 徐周，指徐向前、周士第，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6] 平保线，指北平（今北京）至保定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1]

（1948年11月9日）

望在归绥附近休息待命，数日内不要开始攻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电的主要内容。

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1]

（1948年11月10日）

陈、邓：

你们主力是否已达宿县附近，并开始向宿县攻击。你们务须不顾一切，集中四个纵队全力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2]等部，切断徐蚌路[3]。华野三、广两纵亦应用于攻击徐宿段[4]，至要至盼。

军委

灰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3] 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4] 徐宿段，指徐州至宿县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应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1]

（1948年11月10日）

粟、张，谭、王：

敌七兵团、十三兵团均向徐州撤退，你们是否已将该两敌包围歼击并切断其退路，尤其是七、十、十三纵及苏北十一纵，应乘十三兵团慌忙撤退之际，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该敌，至要至盼。

军委

灰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参谋长张震和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的电报。

歼灭孙元良部控制徐蚌段[1]

（1948年11月10日）

陈、邓：

九日十六时电悉。（一）冯治安全军起义[2]，刘峙[3]以冯部八日下午情况不明，于九日一时电令黄李两兵团[4]均撤回徐州固守，邱兵团[5]仍在黄口[6]一带，并无向东增援黄李任务，亦无向南撤退意图。刘峙又令孙元良[7]赶回宿县，敌之部署是固守徐州、黄口、宿县。（二）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于1948年11月8日率1个军部和3个师、1个团共2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第三绥靖区司令官冯治安本人当时在徐州，没有起义。

[3]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黄李两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官分别为黄百韬和李弥。

[5]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6] 黄口，镇名，位于安徽省萧县西北。

[7]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良，控制徐蚌段[1]，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对刘汝明[2]部不要理他。

军委
十日三时

---

[1] 徐蚌段，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2]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注意堵击黄百韬兵团[1]

（1948年11月10日）

陈、邓，粟、谭：

（一）十三兵团已全部退集于引河与徐州间的狭小地区，从北面保卫徐州，邱兵团[2]仍在黄口[3]地区。刘峙[4]误认华野有六个纵队从金、鱼[5]、成武南下，故令邱兵团担任西面防御。因此我十纵宜从贾汪[6]进至徐州西南[7]，向徐州附近之十三兵团防御，必要时可使用向南参加堵击黄兵团[8]。（二）冯治安部事变发生后，刘峙为加强徐州防御力量，还从蚌埠调九十九军车运徐州增防，而以被认为不甚可靠的刘汝明[9]部调防蚌埠。（三）刘峙又急调孙元良[10]两个军从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3] 黄口，镇名，位于安徽省萧县西北。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金、鱼，指山东金乡和鱼台。

[6] 贾汪，镇名，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

[7] “西南”似应为“东南”。

[8]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9]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10]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城回宿县守卫，限本（灰）日到达，但估计可能要明（真）日才能到齐。如陈邓各纵今日或明日能到宿县，正好打着孙元良，并堵住黄百韬的逃路，估计黄兵团是会向五河、灵璧、宿县一线溃退的，望注意。

军委

十日二十一时

力争歼灭孙元良部包围徐州[1]

（1948年11月11日）

刘、陈、邓：

灰日十三时及十六时电[2]均悉。（一）你们真夜向宿县前进甚好。（二）孙元良[3]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共四个师，原来留在徐州者两个团，此次刘峙[4]又令留一个团于蒙城，故你们真夜到宿县附近时，将要遇到的敌人是孙元良的一个兵团部、两个军部及三个师，望你们努力争取歼灭此敌。此战胜利，即完成了包围徐州的战略任务。然后以宿县为中心控制整个徐蚌线，构筑几道防线阻止徐敌[5]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指1948年11月10日13时和16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并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前电说：“邱兵团主力昨（佳）夜似开始东撤，我明（真）夜以三个旅进至徐宿线破路，三、四、九纵主力位于铁路侧山地相机打敌。估计我军进到徐宿后，敌必由徐州、宿县两点南北向我进攻，我已令孙、丁、马紧尾邱敌东进，其主力应置于徐州西南，以便适时配合作战。”后电说：“我们现在永城以北，遵命于明（真）夜南进宿县。另以一个旅明（真）夜赶至夹沟破路。”

[3]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徐敌，指当时收缩在徐州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及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部队。

南逃，待其南逃时协同华野全歼徐敌。但应同时注意对黄百韬[1]溃兵的堵击。（三）冯治安全军起义，我七、十、十三纵昨（灰）日正歼击侯集、大许家、曹八集[2]线上之二十五军，已令其得手后向双沟[3]、灵璧之线攻进。运东各纵正歼一百军、六十四军、四十四军，黄百韬全部可能跑不掉。（四）邱清泉[4]仍在徐州、黄口[5]线上，李弥[6]已缩回徐州、引河之间，刘峙部署甚慌乱。（五）九十九军按刘峙佳子电，是由蚌埠车运徐州，但铁路时断可能过不去，望侦查。

军委

十一日四时

---

[1]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2] 侯集、大许家，均镇名，位于江苏省铜山县东部。曹八集，今名八义集，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3] 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北。

[4]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5] 黄口，镇名，位于安徽省萧县西北。

[6] 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隔断黄维与邱清泉李弥兵团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1]

（1948年11月11日）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2]：

（一）根据粟陈张、谭王李灰日上午各电看来，除冯治安集团已全部起义外，黄百韬[3]五个军十个师似已被我全部包围，没有跑掉。邱兵团[4]因误认我华野有六个纵队从鲁西南方面向他前进，又受中原四纵一个打击，估计该敌不敢移动。李弥兵团[5]因徐州空虚，刘峙[6]令其迅速撤救徐州，置于徐州、引河之间，防御冯治安及我从临韩[7]南下部队，估计数日内亦不敢动。刘峙受冯部叛变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李，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4]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5] 李弥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官李弥。

[6]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7] 临，指临城，即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韩，指韩庄，镇名，位于山东省微山县东南。

震动极大，不但将李黄[1]仓卒西调，又将刚到蒙城之孙元良[2]调回宿县（估计本真日可到），又将刚到蚌埠之九十九军调回徐州（估计因徐蚌路[3]近日时有破坏，可能仅到宿县附近，请刘陈邓注意侦查）。刘汝明[4]之六十八军估计已到蚌埠，五十五军则因一八一师受我围歼，尚在萧县地区徘徊。刘峙似已要该军即在萧县守备，应付我军从西南对徐州之威胁，但刘峙对该军必不信用，调九十九军到徐州，似即为向五十五军防御。九十九军如未到徐，则李弥还需兼顾五十五军。此间日内即发动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5]率部起义之广播，不但使徐州方面增加对曹福林之顾虑，而且使南京方面增加对蚌埠刘汝明兄弟[6]之顾虑，有可能迫使南京将黄维兵团[7]调至蚌埠一带。

（二）在此种形势下，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李，夺取徐州。

（三）在黄孙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蒋介石有令邱李向南或向西突围，而令黄维接应他们突围之极大可能。因此在歼灭黄百韬、孙元良后，粟陈张、谭王李所部，除以一部位于徐州以东外，主力应迅速移至以宿县为中心之徐蚌路及其两侧，中原我军及华野

---

[1] 李黄，指李弥和黄百韬。

[2]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3] 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4]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5] 刘汝珍、曹福林，当时均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官。

[6] 刘汝明兄弟，指刘汝明与刘汝珍。

[7]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三、广两纵，则应待粟谭到达徐蚌路后，迅速移至永城、商丘之间，隔断黄维与邱李之联系，完成攻徐作战之战略展开。此种部署在歼灭黄孙后应立即施行，时间大约在十五日（戌删）左右。

（四）韦吉[1]率三个纵队从南面迂回西进之部署极好。但第一步应至睢宁地区堵击黄兵团溃兵（估计有很多败兵向该方溃窜），待黄兵团全歼后，再移宿州。

（五）谭王李指挥之十纵，应迅速南下控制双沟[2]，堵住黄部[3]西窜，并从东南监视徐州。七纵、十三纵于歼灭当面之敌后，亦应向南追击逃敌。

（六）冯治安部[4]暂时即在原地（贾汪[5]、韩庄、台儿庄[6]）休整，可起从北面威胁徐州的作用。你们应告诉该军将领，徐州之敌决不敢攻击该军，该军可在原地整训，不要轻动。

军委

真申

---

[1]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2] 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北。

[3] 黄部，指黄百韬兵团。

[4] 冯治安部，指由何基沣、张克侠率领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部队。

[5] 贾汪，镇名，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北。

[6] 台儿庄，镇名，位于今山东省枣庄市南部。

同意围歼黄百韬兵团的部署[1]

（1948年11月11日）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李[2]：

（一）五军移驻萧县。骑一旅移驻曹村[3]。孙兵团[4]两个军部及四个师（不是三个师）已到宿县，位于东西南北四关附近。九十九军仍守蚌埠。刘汝明[5]部守定远、合肥线。黄百韬[6]本人在碾庄[7]。（二）粟谭陈张灰日十时[8]第一步完成对黄兵团之包围，第二步歼灭黄兵团之部署，甚好。我们前电有与此部署不相符合者，应照此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李，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 曹村，镇名，位于安徽省宿县北部。

[4] 孙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兵团司令官孙元良。

[5]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6]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7] 碾庄，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8] 这里是指1948年11月10日10时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和张震给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作出为全歼黄百韬兵团而调整作战部署的决定，同时提出，战役第一步以完成包围黄兵团，不使其西逃为主要任务。待完成包围后，再分割聚歼之。

署办理。（三）五军在萧县分得很散，望刘陈邓以华野三纵歼灭其一部。

军委

真亥

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

（1948年11月11日）

林、罗、刘、谭[1]，并告东北局及各局，各前委负责同志：

（一）戌齐作战经过报告[2]收到阅悉，甚为欣慰。即转发各野战军前委阅看，以资参考。中央对你们胜利之贺电，望即印发全军，以励士气。

（二）你们尚有许多新的经验教训，望写出电告，以资推广。

（三）国民党全军除后方部队外，分为徐州、沈阳、北平、汉口、西安、太原六个集团，以徐州、沈阳两个最大的集团为主干，沈阳集团业已被我解决，徐州集团如能被我大部解决，国民党即已失去主力。我全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七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三百万人，我军则已增至三百余万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谭，指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2]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1948年11月8日关于9、10两月作战一般情况总结给毛泽东并东北局的电报。

局会议[1]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即是说，国民党已不可能再动员三百万人，我军已不需要再以三年时间（从今年七月算起）歼敌三百个正规师，才能达到根本上打倒国民党之目的。我军大约再以一年左右的时间，再歼其一百个师左右，即可能达成这一目的。但要全部解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以上请向干部会上宣布。

毛泽东
戌真

---

[1] 指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今属平山县）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1]

（1948年11月12日）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的第二年底，即今年六月底，总数约计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人。这个数目，对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开始发动全国性内战时期的四百三十万人来说，是少了六十五万人。这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两年战争中虽然被歼、被俘和逃亡了大约三百零九万人（其中被歼、被俘为二百六十四万人），但在此期内又补充了约二百四十四万人，故亏短数尚只有六十五万人。最近则起了一个突变。经过战争第三年度的头四个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时，国民党军队即丧失了一百万人。四个月内国民党军队的补充情形尚未查明，假定它能补充三十万人，亏短数为七十万人。这样国民党的全部军队包括陆海空军、正规军非正规军、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在这篇评论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以后敌我力量变化的新形势，对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时间重新作了估计，指出从1948年11月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后来的中国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

部队和后勤机关在内，现在只有二百九十万左右的人数。人民解放军，则由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万人，增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二百八十万人，现在又增至三百余万人。这种情况，就使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长期占有的优势，急速地转入了劣势。这是由于四个月内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英勇作战的结果，而特别是南线的睢杞战役[1]、济南战役，北线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的结果[2]。国民党的正规军，因为它拼命地将非正规军编入正规军内，至今年六月底，尚有二百八十五个师的番号。四个月内，即被人民解放军歼灭了营以上部队合计共八十三个师，其中包括六十三个整师。

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至于在全国一切地方消灭反动势力，完成人民解放，则尚需较多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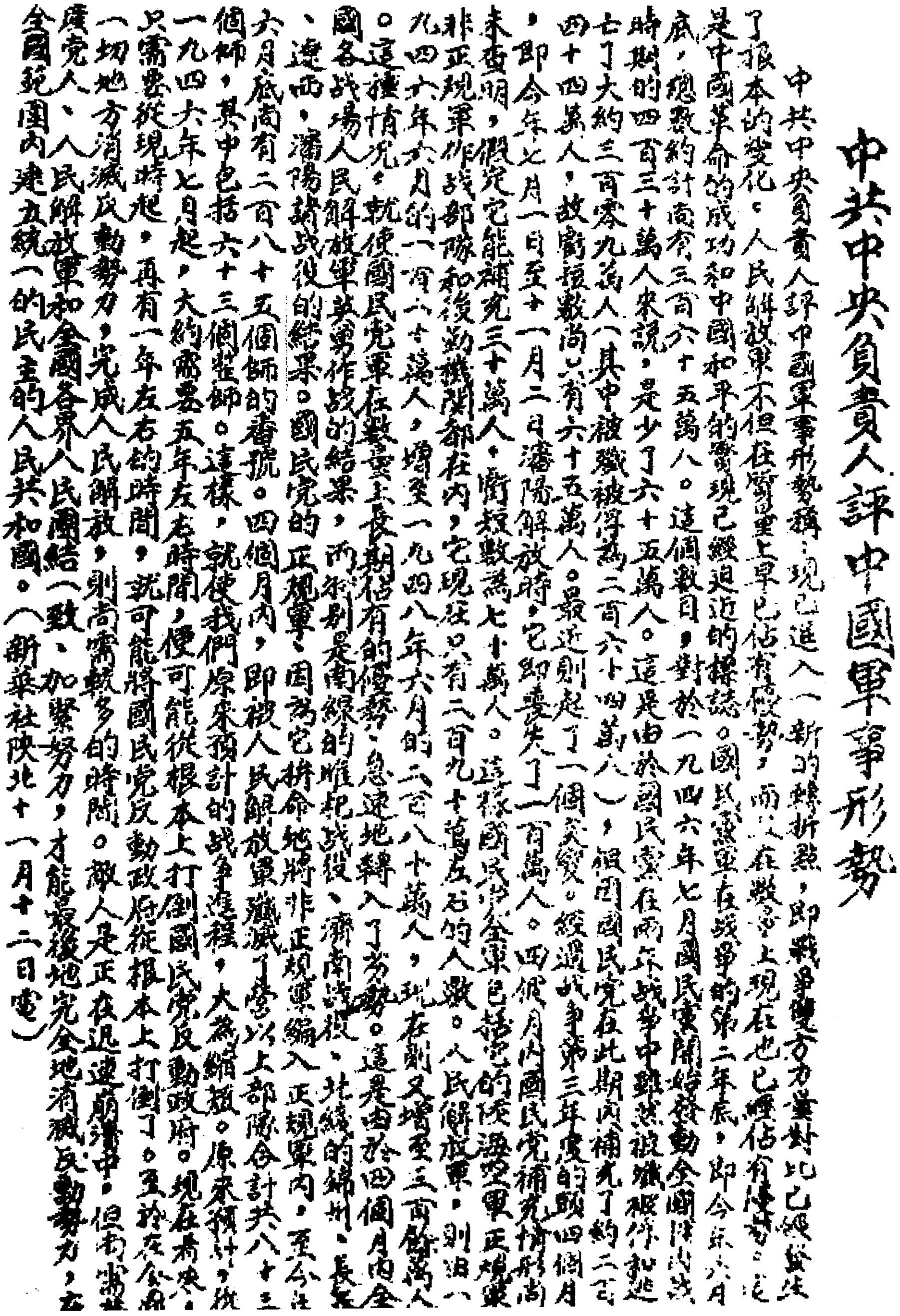
敌人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但尚需共产党人、人民解放军和全国

---

[1] 睢杞战役，亦称豫东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河南省东部的开封和睢县、杞县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和豫皖苏军区部分兵力，在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统一指挥下，于1948年6月17日至22日，全歼开封守敌，共歼灭国民党军约4万人，击毙国民党军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蒋介石为了挽回其不利的战局，亲临开封上空督战，调集邱清泉、区寿年、黄百韬三个兵团，分路进攻开封。人民解放军于6月27日至7月6日，将区寿年兵团部及整编第七十五师以及黄百韬兵团的3个多团，先后包围于睢县、杞县地区，经九昼夜激战，歼敌5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官区寿年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2] 这里所说的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战役，统称辽沈战役。

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加紧努力，才能最后地完全地消灭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中共中央負責人評中國軍事形勢

中共中央負責人評中國軍事形勢稱：現已進入一新的轉折點，即戰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佔有優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佔有優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誌。國民黨軍在戰爭的第二年底，即今年六月底，總數約計尚有三百六十五萬人。這個數目，對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國民黨開始發動全國性內戰時期的四百三十萬人來說，是少了六十五萬人。這是由於國民黨在兩年戰爭中雖然被殲被俘和逃亡了大約三百零九萬人（其中被殲滅的為二百六十四萬人），但國民黨在此期間補充了約二百四十四萬人，故虧損數尚只有六十五萬人。最近則起了一個突變。經過戰爭第三年度的頭四個月，即今年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日瀋陽解放時，它即喪失了一百萬人。四個月內國民黨補充情形尚未查明，假定它能補充三十萬人，虧損數為七十萬人。這樣國民黨全軍已經包括陸海空軍、正規軍非正規軍、作戰部隊和後勤機關都在內，它現在只有二百九十萬左右的人數。人民解放軍，則由一九四六年六月的一百二十萬人，增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二百八十萬人，現在則又增至三百餘萬人。這種情況，就使國民黨軍在數量上長期佔有的優勢，急速地轉入了劣勢。這是由於四個月內全國各戰場人民解放軍英勇作戰的結果，而特別是南線的睢杞戰役、濟南戰役，北線的錦州、長春、遼西、瀋陽諸戰役的結果。國民黨的正規軍，因為它拚命地將非正規軍編入正規軍內，至今年六月底尚有二百八十五個師的番號。四個月內，即被人民解放軍殲滅了營以上部隊合計共八十三個師，其中包括六十三個整師。這樣，就使我們原來預計的戰爭進程，大為縮短。原來預計，從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約需要五年左右時間，便可能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政府。現在看來，只需要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至於在全國一切地方消滅反動勢力，完成人民解放，則尚需較多的時間。敵人是正在迅速崩潰中，但尚需廣黨人、人民解放軍和全國各界人民團結一致、加緊努力，才能最後地完全消滅反動勢力，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新華社陝北十一月十二日電）

1948年11月12日，新华社发表的社论《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中国军事形势》。

黄百韬解决后华野主力速移宿县地区[1]

（1948年11月13日）

刘、陈、邓，粟、陈、张：

（一）刘陈邓已抓住孙元良[2]歼击甚好，此点关系全局，因黄维[3]十四日到太阜[4]，若你们能于日内解决孙元良，控制徐蚌路[5]，则有余裕时间对付黄维。（二）请粟陈张考虑是否可以韦吉兵团[6]早日西移宿县，与中原各纵会合，以便数日后中原各纵西移永城，对付黄维。（三）中原二、六纵现至何处，是否可以迅速赶至太阜附近牵制黄维，盼告。（四）黄百韬解决后，华野主力速移宿县地区为要。

军委

十三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3]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4] 太阜，指安徽太和和阜阳。

[5] 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6] 韦吉兵团，指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

阻止黄维部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1]

（1948年11月13日）

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刘、陈、邓，粟、谭、张：

（一）冯治安部四个师已起义。黄百韬[2]十个师，李弥[3]一个至两个师，孙良诚[4]两个师，孙元良[5]四个至五个师，共计十七个至十九个师，正被我华野中原两军包围歼击中，大约本月十七日左右可以全部解决。刘汝明[6]部六个师，除一个师已被我歼灭外，其余已南开定远、合肥线。徐蚌铁路[7]已被我中原部队切断并控制，只待黄孙[8]两敌歼灭后，我军即可围困徐州，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夺取徐州。（二）原在葫芦岛之五十四军三个师，第八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3] 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4] 孙良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一〇七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于1948年11月13日，率该军军部和1个师5800人，在江苏睢宁西北投诚。

[5]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6]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7] 徐蚌铁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路一段。

[8] 黄孙，指黄百韬和孙元良。

两个师，十日已离该岛海运南下，估计十七日可到南京。该五个师可能将使用于恐慌万状之南京一带，亦有可能开至蚌埠策应徐州之突围。但徐蚌路已被我切断，该敌将不能起大作用。（三）使我们担心的是黄维[1]的十个师，十四日可到太、阜[2]，估计十五日休息一天，十六日即可能由太、阜向亳县、涡阳、永城前进，策应邱李[3]之突围。（四）在黄百韬、孙元良被歼之后，估计蒋介石必迅速命令邱李突围，其突围方向必是黄维所在地之太、阜或亳、涡、永。（五）因此，中原局邓李[4]必须将上述情形立刻告诉二六两纵，不分昼夜，不惜疲劳，兼程前进，务必于十四日，至迟于十五日，赶到太、阜黄维的前头，由正面阻止黄维向亳、涡、永前进，不得误事。该两纵现到何处，何日可到太和以东追过黄维，望邓李速告。（六）分局宋任穷[5]同志立即动员一切可用的武装力量，在太、阜、亳、涡、永中间地区迅速破坏黄维通路上的桥梁道路，迟滞黄兵团行动。动员情形及太、阜至亳、涡、永之里程，望任穷即告。

军委

十三日六时

---

[1]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2] 太、阜，指安徽太和和阜阳。

[3] 邱李，指邱清泉和李弥。

[4]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李，指李先念，当时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

[5]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

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徐图歼灭之[1]

（1948年11月13日）

刘、陈、邓，粟、陈、张：

（一）现邱清泉[2]正在向东增援，请粟陈张酌量对黄百韬[3]各军被歼情形，当黄部将近全歼之际，让邱清泉向东深入大许家、曹八集[4]，以便将邱兵团包围，使其跑不掉，然后徐图歼灭之。（二）刘陈邓以一部攻击宿县，以主力向北追歼孙元良[5]之部署甚好。如邱兵团能于数日后被我包围歼击，黄维[6]势必向徐州增援，我中原各纵及华野三、广两纵，须准备独力担任打黄维。

军委

十三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3]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4] 大许家，镇名，位于江苏省铜山县东部。曹八集，今名八义集，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5] 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6]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让邱清泉深入断其后路并包围之[1]

（1948年11月14日）

粟、陈、张，并告韦、吉，谭、王，刘、陈、邓[2]：

（一）蒋介石以黄兵团[3]危急万分，令邱兵团[4]星夜挺进，限十三日夜到达碾庄[5]解围。（二）黄兵团本日大约可解决。目前是继续歼灭邱兵团的良机，望令正面阻击部队向东撤退，让邱匪深入。令韦吉兵团于本夜切断邱匪后路，完成对该匪之包围。否则该匪一闻黄匪被歼，将迅速退回徐州。（三）邱匪东援兵力为七个师，留下三个师（骑一旅在内）在徐州及以西。

军委

十四日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4] 邱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邱清泉。

[5] 碾庄，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清泉李弥，歼灭黄百韬[1]

（1948年11月14日）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韦、吉[2]：

（一）粟陈张十二日十二时电悉。目前首要任务是阻止邱李[3]，歼灭黄百韬[4]，然后才能谈到围歼邱李的问题。你们阻援兵力是否足够？一纵及鲁中南纵现在何处？该两纵似宜迅速移至阻援方面，配合七纵、十纵及苏北十一纵担任阻援。你们应估计到，万一十五日以前不能歼灭黄兵团，而邱李援兵又已迫近的情况，妥善部署歼黄阻援的兵力。（二）如邱李已向东深入，使用韦吉全力于切断并攻击邱李后路，在目前可起拉住邱李作用，在将来即成为从西面包围邱李的兵力。（三）在邱李业已东进的情况下，请刘陈邓考虑可否将华野三纵使用于徐州以东，和韦吉一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4]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攻击邱李之后尾。

军委

十四日十二时

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

（1948年11月14日）

刘、陈、邓[1]，并告粟、陈、张，韦、吉，谭、王[2]及华东局，中原局：

（一）粟元酉电[3]悉。

（二）目前数日内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兵团[4]全部及宿蚌段上敌人。

（三）我们很担心寒、删两日[5]不能解决黄百韬，又担心阻击兵力不足或阻击不得力，邱李[6]能够靠拢黄匪。希望粟裕同志照元酉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黄匪二十五军、四十四军、一百军，留下

---

[1]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粟裕1948年11月13日酉时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陈赓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提出了包围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阻击并歼灭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

[4] 黄兵团，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5] 寒、删两日，即14日、15日。

[6] 指邱清泉、李弥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

黄之兵团部及六十四军，吸引邱李东进，然后以韦吉、谭王两集团向邱李东西合围，乘势猛击，歼其一部，构成徐州与邱李间之阻绝阵地。同时，士榘[1]指挥各部歼灭黄匪余部。只要此着成功，整个形势即有利于我。

（四）请刘陈邓集中全力于歼灭宿县之敌后迅速南进，歼灭现已进至固镇等地之刘汝明[2]六十八军及可能跟进之五十五军。此着胜利，则黄维兵团[3]处于孤立地位，较易对付。

（五）黄维兵团到阜阳后，因为黄百韬被歼及宿县、固镇之敌被歼蚌埠感受威胁之情况，估计蒋介石将令其先到蒙城或蚌埠集中，徐图向北推进。我们应即决定以中原一、二、三、四、六、九纵及豫皖苏地方兵团之全力，以徐蚌路为枢纽，对付黄维及南面可能增加之敌人。华野全部则对付陇海线上之敌人。

（六）在黄百韬全部被歼、邱李与徐州之联系已被确实切断、敌已无法打通之情况下，究竟先打邱李，后打徐州，还是先打徐州，后打邱李，值得考虑。但同时打两个敌人则不适宜。我们现在设想，在黄百韬被歼、邱李被围的情况下，估计蒋介石必令邱李迅速猛烈突围回徐州。因此，必须集中华野全力，首先完成对邱李之包围，其中主要是以最强大兵力隔断徐州与邱李之联系，在徐州与邱李之间构筑稳固的突不破的阻绝阵地，同时举行对邱李之猛击，歼灭其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使其无法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完成歼灭邱李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灭邱李。为此目的，华野三纵似应加入韦吉集团，参加打邱李之任务，而中原四纵则应南

---

[1] 士榘，即陈士榘。

[2]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3] 黄维兵团，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下，参加现在打刘汝明、将来打黄维之任务。三纵究应如何行动，请刘、陈、邓决定令行。

（七）此战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请华东局、中原局用全力组织支援工作。

军委

十四日二十三时

蒋介石政府正在覆没[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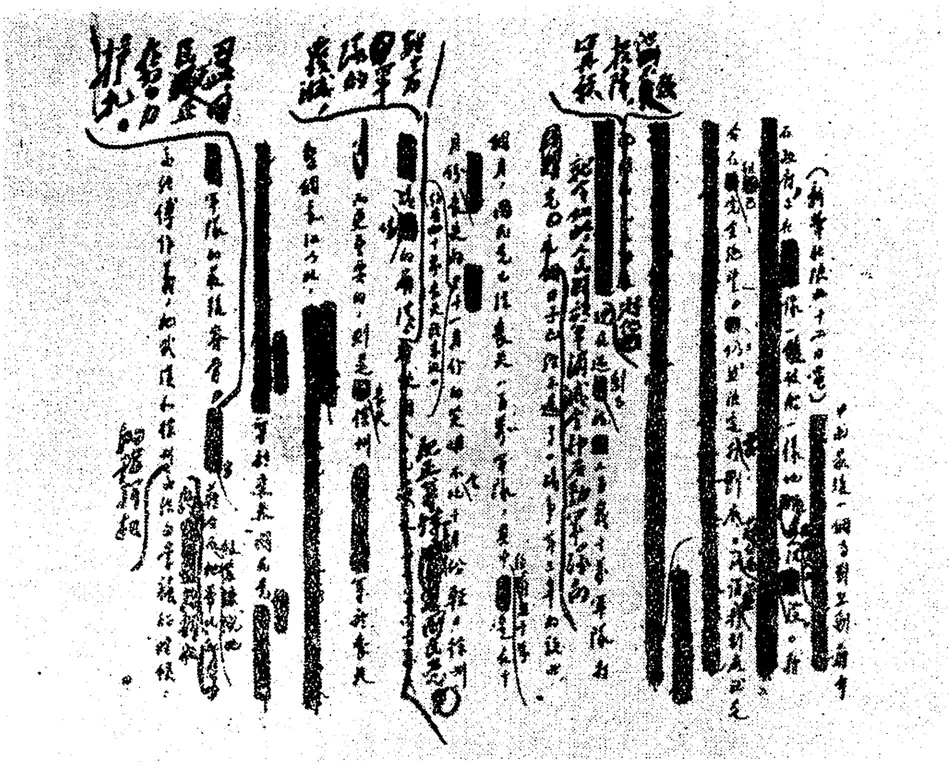
（1948年11月14日）

【新华社陕北十四日电】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蒋介石政府，正在象一只破船一样地从历史上沉没。蒋介石虽已完全绝望，仍然决定要打到底。蒋介石所谓要打到底就是他不愿投降，宁愿将他现在还剩下的二百几十万军队打光。就令如此，人民解放军消灭全部反动军队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战争第三年的头四个月，国民党已经丧失一百万军队，其中约有五十万是在十月份丧失的。约有四十万丧失于东北。十一月份的灾难不会比十月份轻。徐州战场的崩溃，数十万军队的覆灭，现正等待着国民党。而更重要的，则是丧失徐州等于丧失整个长江以北，等于丧失国民党军队的最后脊骨，因此，国民党正在努力挣扎。当蒋介石假装慷慨地把华北的指挥权交给傅作义，把武汉和徐州的指挥权交给白崇禧的时候，他是看到长江以北已经完了，打算把自己的嫡系撤退到长江以南去。但是他的计划已经来不及实现。南线和北线，蒋介石都没有什么完整的战线了。北线的太原、保定、承德、大同、归绥诸点早已互相不能联结了。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诸点的联结亦时被破坏。南线也是如此，徐州、汉口、西安三大中心已经不成一条什么战线。这只是三

---

[1] 这是新华社的述评。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个据点及在这三个据点附近摆了三堆军队，当然不成什么战线了。长江以南，国民党的战线还没有建立，并且是建立不起来的了。对于这种形势，不但蒋介石的左右，而且连蒋介石自己在内，无不极度悲观。据悉，蒋介石由沈回平，闻锦州失守，极度悲痛，召开军事会议，谋求“死里求生”。其他消息称：辽西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后，蒋介石在北平吐血，回南京后又连续吐血。蒋介石回南京以后，一方面是面对着徐州的危急情况，另一方面是面对着金圆券和限价崩溃后经济战线特别是粮食的危急情况。上海的米价一周内由每石八十金圆涨到一千八百金圆，南京的米荒使十日一天内一百家米店被抢。南京行政院长一职自翁文灏辞职后至今无人敢就。南京的要人们纷纷准备向两广及台湾逃难，并谈论着迁都广州的问题。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之流正在活动着逼迫蒋介石“下野”。为了准备下一步，为了夺取“反蒋”的领导权，蒋介石嫡系中的某些分子也参加了这个活动。被称为官方反派的特务分子“立法委员”刘不同，公开著文主张蒋介石出国并“恢复和平”。他们的目的是想用“和平”的方法替反动派保留下一些力量。因此他们的活动，与人民反对反革命内战的斗争所遭遇者相反，并未受过禁止。但蒋介石现在还不愿接受他们的建议。蒋介石在八日发表演说称：“我个人平生做事的态度是一件事不开始则已，一开始就一定要求其成功；任何职责不轻易担任，一经担任就决定负责到底。”这是说，你们要我下台，我是不想下台的。蒋介石安慰他的部下说：“这次东北军事虽然失败，但在关内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丝毫没有动摇。与共匪实力比较，仍然居于优势。”这只是在说谎。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基础根本上已在崩溃，他的什么“优势”已经不存在了。



毛泽东修改新华社述评《蒋介石政府正在覆没》的手稿（部分）。

歼灭黄百韬后再定下一步作战方针[1]

（1948年11月15日）

刘、陈、邓，并粟、谭[2]：

我们十四日二十三时电[3]发出后，接到刘陈邓十四日十时电及谭王李十四日十时半电。我们和你们在基本方针上是一致的，需待黄兵团[4]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5]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据谭王李[6]称，邱李十三日向东猛攻一天仅进五里，又称尚需三个晚上才能解决黄兵团。又据邱清泉寒午电告蒋介石，捏造重大战果骗蒋[7]，又称我军企图断其后方联络，彼以七十四军、十二军主力，骑一旅及三十二师等部，在潘塘[8]一带阻我西进。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即《必须集中精力彻底解决黄百韬兵团》。

[4]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5] 邱清泉、李弥、黄维，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6] 谭，指谭震林。王李，指王建安、李迎希，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7] 蒋，指蒋介石。

[8] 潘塘，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东南。

据上述情况，我诱邱李东进，断其后路之计划，恐不一定能实现。黄兵团被歼后，邱李缩回徐州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黄维在阜阳观望形势，或到蒙城观望形势，或到蚌埠巩固其后方的可能性也很大。再则，你们几次来电均未提到六十八军到固镇一带，未提打六十八军，究竟我们所得六十八军在固镇一带的消息是否确实，你们是否需要集中四个纵队于攻克宿县后再攻固镇一带，亦尚待你们查明确定。总之，一切须待粟谭歼灭黄百韬，你们歼灭宿县之敌以后，依情况变化才能决定下一步作战方针。如果那时邱李缩回徐州，黄维开到蚌埠，两处均不好打，则可给我以短时休息机会也是好的。惟目前华野仍应争取于歼灭黄兵团以后再打邱李，你们于攻克宿县以后，如果刘汝明[1]部在固镇，则应争取再歼刘部。

军委

十五日六时

---

[1]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

复方方电[1]

（1948年11月15日）

我军主力现时宜集中在长江流域歼灭国民党主力，则将来南方各省之占领及发展甚为容易。且此种时机已不甚远，你们应依靠现有基础逐步发展，准备迎接主力的到来。关于酌派干部南来是需要的，当令有关部门研究并准备派遣。

---

[1] 这是毛泽东复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电的主要内容。

推迟攻击宿县切断固镇蚌埠间联系[1]

（1948年11月16日）

刘、陈、邓：

十五日十七时电悉。为使固镇之敌（六十八军）不因宿县攻克而缩回蚌埠，以利歼击，如宿县尚未攻克，似宜推迟一二天攻击，而令四纵迅速南下，切断固镇、蚌埠间联系，或从宿县附近各纵中抽一个纵队南下执行阻隔任务。如何，望酌办。

军委

十六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推迟总攻碾庄诱敌深入[1]

（1948年11月16日）

粟、陈、张，并告谭、王[2]：

碾庄[3]之敌四十四军、一百军已歼灭，二十五军、六十四军亦已各歼一部，并已定铣夜总攻碾庄，则现在已到令七纵、十纵、苏十一纵[4]等部向后撤退，放敌东进之时机，而且似宜推迟一二天总攻，才能诱敌深入。究应如何，望酌情机断行之。

军委

十六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碾庄，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4] 苏十一纵，指苏北兵团第十一纵队，纵队司令员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

祝贺越南人民取得“边界战役”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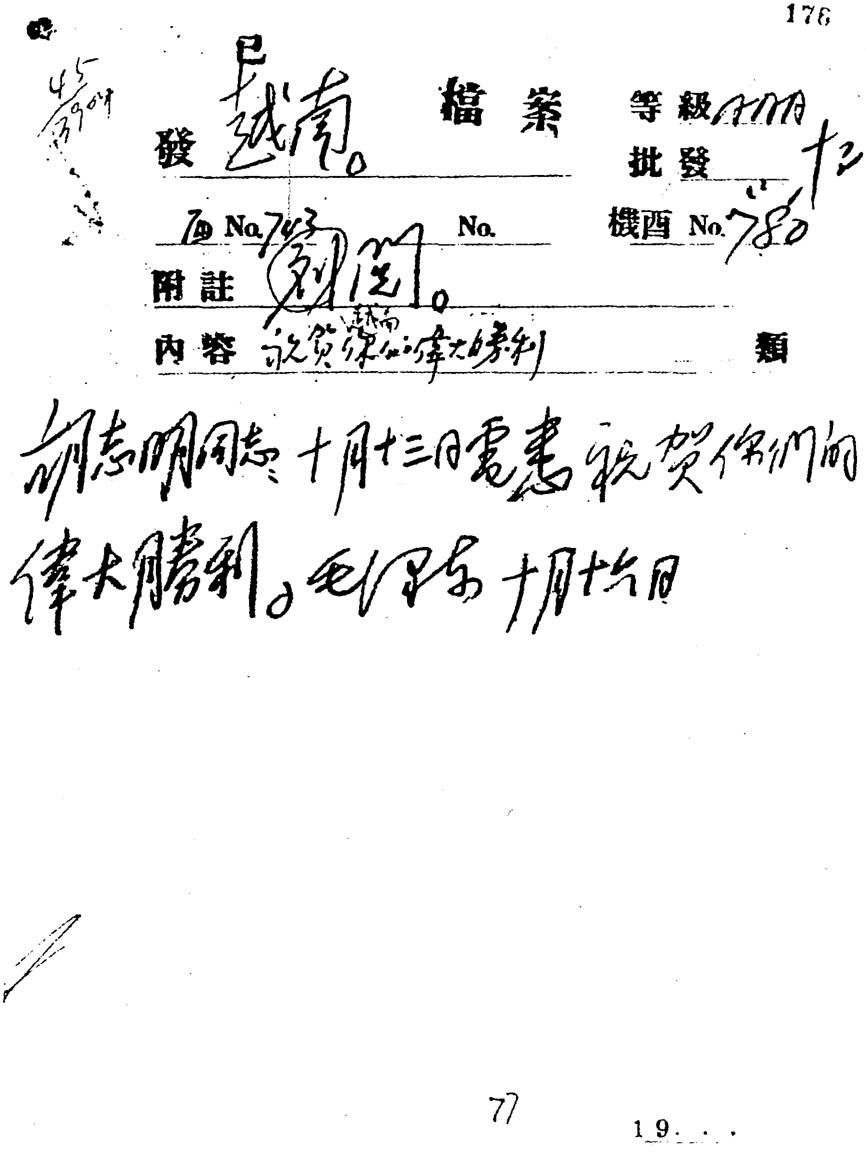
（1950年10月16日）

胡志明同志：

十月十三日电悉。祝贺你们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176

4.5
1539时

已
發 越南。　　檔案　　等級 特加

批發 十二

西 No.743　　No.　　機酉 No.780

附註 劉閱。

內容 祝賀你們的偉大勝利　　類

胡志明同志：十月十三日電悉，祝賀你們的偉大勝利。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77

19. . .

毛泽东致胡志明电的手稿。

东北主力是否早日入关为好[1]

（1948年11月16日）

林、罗、刘：

十五日十三时电[2]悉。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们曾经考虑过，认为如以杨罗耿部[3]位于绥[4]东与杨成武[5]集结一起，可以阻止傅作义[6]部向绥远撤退，但不能阻止傅部及中央军向海上撤退，包围张家口也不能达此目的。因敌共有三十五个步兵师、四个骑兵师，敌如决心从海上撤退，可以集中十几个师将张家口之敌接出来，集中于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1月15日13时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建议徐周、杨罗两部除留一部监视太原外，应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切断其与北平的联络。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使傅作义及其所属之中央军，既不能撤手南下，亦不能撤退绥远，亦不能集中兵力守天津或守北平。如我不攻城，他来增援则正便于我军歼灭，等到东北部队南下后，再同时合力发动攻势，歼灭全部敌人。

[3] 杨罗耿部，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

[4]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6]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沽逐步船运。保定守军是两个由保安队组成的师，包围与否不关大局，近亦有撤退模样。承德敌人已撤退。徐周[1]所部十万人近月打得很苦，伤亡二万，可以停止对太原的攻击，但要他们将已攻占的阵地放弃，并开至张家口去担负包围任务，一则阎[2]匪将出城滥扰；二则部队情绪上转不过来；三则我军未到张家口，而张家口之敌势将惧歼先逃。且张家口驻敌甚少，原只一个由保安队组成的师，现闻增加一个师，待证。傅部主力均在北平附近。我们曾考虑过你们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十六日四时

---

[1] 徐周，指徐向前、周士第，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推迟攻取太原[1]

（1948年11月16日）

徐、周：

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2]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3]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4]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如何，盼复。

军委

十六日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的电报。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平、津、张、唐，指北平、天津、河北张家口和唐山。

[4] 杨罗耿部，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

由刘陈邓粟谭组成总前委统筹一切[1]

（1948年11月16日）

刘、陈、邓，并粟、陈、张[2]，告谭、王，韦、吉[3]，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苏北工委，华北局：

（一）各电均悉，处置甚妥。（二）若华野于歼灭黄兵团[4]后，能接着歼灭邱李[5]几个师，将该两敌打得不能动弹，则于大局极为有利。（三）若中原于攻克宿县后能续歼固镇一带之敌，并以一部进驻蒙城，则可能推迟黄维[6]向宿县进攻时间，并威胁蚌埠。（四）李延年[7]现在蚌埠充六兵团司令官，辖九十六军、九十九军。据李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5]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6]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7]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三十九军（即原驻烟台，后运锦西，现运浦口之八军王伯勋[1]部两个师）十六日可到蚌埠、凤阳。请刘陈邓加以注意。由锦西南运之五十四军（阙汉骞[2]四个师）是否亦将加至蚌浦线[3]，则尚待侦查。假定该部亦到，则南线将有黄维、刘汝明[4]、李延年、王伯勋、阙汉骞等部共计二十五个师，是一个大敌，必须妥筹对策。（五）中原华东两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至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八十万人左右，必须由你们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中央军委
十六日十八时

---

[1] 王伯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军长。

[2] 阙汉骞，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军军长。

[3] 蚌浦线，指蚌埠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4]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华东野战军等单位电，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图为总前委成员。

总攻碾庄同时攻击邱清泉李弥兵团[1]

（1948年11月16日）

刘、陈、邓，并告粟[2]：

删日二十二时及铣午电悉。（一）五十四军、三十九军详情由参谋部查告。（二）据刘峙[3]铣日称，三十九军、九十九军集结固镇，向宿县攻击前进，要九十六军长于兆龙开蚌埠，以主力向北策应，未提五十四军。一则该军由葫芦岛开唐山，再由唐山南开需时较多；二则该军使用于保卫南京，还是使用于向宿县攻击，似还未定，但你们应准备该军到来。（三）你们似以二、六纵钳制黄维[4]，以一、三、四、九纵歼灭可能向宿县进攻之三十九军、九十九军似较适宜，因这些敌人均是较弱的。如五十四军四个师（不是三个师），刘汝明[5]五个师和上述敌人一起来，则数量较多，质量上亦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11月11日将国民党军第七兵团黄百韬部4个军合围在江苏省邳县以碾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内。16日晚对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22日黄昏，将敌全歼，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毙命。

[2] 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3]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5]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有二三个师较强的。（四）刘峙几次告黄百韬[1]，均判断我军要逃跑，要黄等候援军，协同击溃我军。但据韦吉[2]报告，他们删晚已向邱李[3]后尾攻击，未免过早。粟到韦吉处指挥极好。请粟考虑韦吉各纵及三纵，于明（篠）日向南撤退一步，正面七纵、十纵、苏十一纵亦同时于明（篠）晚向东撤退一大步，待巧晚谭王[4]向碾庄[5]总攻时，同时大举向邱李攻击似较妥善，请粟酌办。

军委

十六日二十四时

---

[1]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2]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4]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5] 碾庄，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准备在国民党军再度进扰石家庄时南下歼敌[1]

（1948年11月16日）

程、黄，并告林、罗、刘[2]：

十一日十九时电[3]悉。（一）你们准备在敌再度进扰石家庄时南下歼敌计划甚好。（二）敌如再度进扰石家庄，其时机当在十二月上旬，因我杨罗耿部[4]十二月一日起参加太原作战，傅作义[5]发现此种情况后，可能按兵不动，亦可能分兵进扰石家庄。（三）望你们对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1月11日19时程子华、黄志勇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军委9日指示我们准备进击北平或南下的两个方案，我们认为南下似较有利。目前华北敌兵力增强，如以3个军南犯石家庄，北平近郊仍可控制三四个军的机动兵力对我，进击北平，恐不易拖住敌人，我南下则能拖住敌人，且可在野战中歼敌一部或一路。如我南下后，敌发现我东北主力入关，则可能迅速集中西撤。此时，我则可经平西转向平张段上阻敌西撤，以利全歼傅作义部队。

[4] 杨罗耿部，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

[5]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南进的道路及渡河等项加以研究和准备。

军委
戌铣

防止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敌军逃走的部署[1]

（1948年11月18日）

杨、罗、耿，并告杨、李、李，程、黄[2]：

（一）平、津、张、唐[3]蒋傅[4]两系军队在我徐州作战胜利进展下，有分向西、南两方撤退或集中向南方（经海路，亦有某种可能走陆路）撤退的可能。（二）为着不让蒋傅两系军队从平、津、张、唐逃走，除已令杨李李停止攻击归绥[5]，并将其三个纵队位于绥[6]东地区，坚决阻止傅军向绥远逃跑外，又已令徐周[7]停止攻击太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杨、李、李，指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平、津、张、唐，指北平、天津、河北张家口和唐山。

[4] 蒋，指蒋介石。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7] 徐周，指徐向前、周士第，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以免刺激傅作义早日逃跑。（三）杨罗耿所部即在阜平待命，并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动，协同杨李李阻止敌人逃跑。

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

东北野战军取捷径迅速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之敌[1]

（1948年11月18日）

林、罗、刘：

（一）傅作义经过彭泽湘[2]及符定一[3]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现符定一已到石门[4]，明后日即可见面。我们拟利用此机会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迅速解决中央军。（二）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三）望你们在发出出发命令后，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四）我们已令杨罗耿[5]在阜平停止，并准备出张家口附近协同杨成武[6]阻止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彭泽湘，民主人士。

[3] 符定一，文字学家。1946年夏应毛泽东的邀请到过延安。

[4] 石门，即河北石家庄。

[5]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6]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作义西退。徐周[1]已复电同意停攻太原。（五）如何部署，盼复。

军委

十八日十八时

---

[1] 徐周，指徐向前、周士第，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关于阻歼南线敌人的部署[1]

（1948年11月18日）

刘、陈、邓，并粟、谭[2]：

（一）各电均悉。（二）敌在防御时虽尚有相当战斗能力，但攻击精神差到极点。我军捉住敌人这个弱点，可以分离敌军各部，给以各个歼灭。（三）北线何张起义是第一个大胜利。今后数日内歼灭黄兵团[3]全部，将是第二个大胜利。如能精心组织战斗，再歼邱李[4]四五个师，打得邱李不能动弹，则将是第三个大胜利。（四）刘汝明[5]一八一师被歼及宿县攻克，已给南线敌人一个大打击。现刘峙[6]令黄维[7]由蒙城向宿县，令李延年[8]率三十九军、九十九军由蚌埠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

[3]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4]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5]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6]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7]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8]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固镇、大店集[1]向褚兰[2]，以上两路均为攻击兵力，令刘汝明由蚌埠向宿县，为宿蚌段的守备兵力。对于上述敌人，我们意见：甲、完全同意刘陈邓办法，以一纵在蒙城、宿县间作正面防御，以二、六纵组成突击集团打黄维后尾，只要能歼其二、三个师，就可停止其前进。这是最主要的一着。乙、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3]反蒋[4]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丙、以三纵、四纵再加叶飞[5]一纵对付李延年，不要打得太早，先以小部接敌，逐步后退，诱敌进入大店集一带地区，达到全部歼灭该敌之目的。此战胜利，即协同九纵歼灭刘汝明，打开南线局面。（五）谭王[6]指挥之四、六、八、九及十三纵，于歼灭黄兵团余部后，迅速移至徐州、宿县间，作为南线的预备队，准备协同南线各纵歼灭黄维。只要南线各敌约有一半左右被歼，无法北进，北线各敌就成瓮中之鳖，可以逐步歼灭。（六）应尽一切努力控制徐蚌路[7]一段于我手中，务必隔断南北两敌，使之不能会合。（七）你们意见望告。

军委

十八日二十四时

---

[1] 大店集，镇名，位于安徽省宿县东南。

[2] 褚兰，镇名，位于安徽省宿县北部。

[3] 刘汝珍、曹福林，当时均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副司令官。

[4] 蒋，指蒋介石。

[5] 叶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6] 谭，指谭震林。王，指王建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

[7] 徐蚌路，指徐州至蚌埠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关于淮海战役下一步作战方针[1]

（1948年11月19日）

粟、谭，并告刘、陈、邓[2]：

（一）十八日二十四时电[3]谅达。

（二）估计黄兵团[4]今晚明晨可能全歼，我四、六、八、九及十三等五个纵损伤程度如何，望即告。

（三）叶飞[5]一纵你们准备使用于何处？现刘峙[6]依靠黄维[7]（十个师）、李延年[8]（在五十四军未到前是四个师）北上救命。我们觉得南线集中中野三、四纵及叶飞一纵歼灭李延年兵团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9]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叶纵现到何处？你们是否可以将叶纵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即《关于阻歼南线敌人的部署》。

[4]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5] 叶飞，当时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

[6]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7]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8]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9]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交刘陈邓指挥，以便早日与中野三、四纵会合一起作歼灭李延年之充分准备。刘峙令李延年戌朌进至大店集[1]，时间已很迫近。同时请刘陈邓令陈谢[2]注意，不要过早打李延年，不要暴露兵力，应让李延年深入大店集以北地区再打为有利。刘峙因受我韦吉[3]威胁，自以为李延年由大店集出褚兰[4]与邱清泉[5]夹击韦吉，必可收效，令李延年急进，因而可能造成我军歼灭李延年两个军的良机。该两军四个师只有三十九军（王伯勋[6]）中的一个师战力较好一点，其余三个师战力均差，较易歼灭。

（四）你们集中二、三、七、十、冀十一、苏十一及鲁中共八个纵[7]，精心组织一次对邱李[8]之作战，以歼其四、五个师为目标，心愿不要太大，你们觉得兵力是否足够。我们觉得最好是使用这样多的兵力，不要增多，以便将谭王[9]五个纵于结束黄百韬后，迅速移至曹村、夹沟[10]地区休整，准备打黄维。刘峙令黄维戌朌到宿县，他是没有估计到中野一纵在蒙城、宿县间的阻击及二、六纵准备对

---

[1] 大店集，镇名，位于安徽省宿县东南。

[2] 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褚兰，镇名，位于安徽省宿县北部。

[5]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6] 王伯勋，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军长。

[7] 原文如此，似漏写了“第十二纵队”。

[8] 邱，指邱清泉。李，指李弥，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9] 谭，指谭震林。王，指王建安，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副司令员。

[10] 曹村、夹沟，均镇名，分别位于安徽省宿县北部和西北。

黄维后尾的打击在内，事实上黄维大约要二十三、四日才能到宿县。如果我中野一、二、六纵作战得力，还可能使黄维多推迟几天到宿县。如果我陈谢、叶飞准确地歼灭了李延年，又歼灭了或者驱逐了刘汝明，则黄维在宿县即处于我谭王（在夹沟）、陈谢、叶（在固镇）的包围之中，尔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1]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这时对于北面之邱李等部，则取钳制手段，待歼灭黄维后，再打邱李。我们认为你们应按这个方针去部署兵力。假如今晚明晨解决了黄百韬，则晝马两日谭王五个纵在碾庄附近休息，养梗两日即移至曹村、夹沟地区，准备休整一星期左右，即协同中野全力打黄维。这样部署是否适当，望考虑电告。

军委

十九日十时

---

[1] 碾庄，镇名，位于江苏省邳县西部。

对邱清泉李弥各军以先歼一部为宜[1]

（1948年11月19日）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谭、王[2]：

顷接粟陈张巧二十一时电[3]，已知华野全军用于北线打黄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8年11月18日21时粟裕、陈士榘、张震给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并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现邱、李兵团东进已到达大许家以西我预歼地区，我“决本晚向该敌反击，并以一、二、三、鲁纵、十二、十一纵截断五军、八军苑山之退路，求得配合正面之七、十、苏十一纵歼灭之”。“现六兵团（李延年辖五十四军、二十九军）、八兵团刘汝明部，似已集中固镇附近”，“而灵璧仍有顽二三八师，及土顽约万人驻守”。“为便于我各个歼灭援敌，应适时转用兵力，请你们周密谨慎地部署对碾庄之总攻，求得能于马辰全歼该敌。截至今止，黄兵团之六十三、四十四军、一百军已全歼，二十五军、六十四军已各歼一半，且敌甚为紊乱，如能如期完成，则你们应抽出三个纵队待命，荫蔽打援。”“建议中野在黄兵团未全歼前，以一部负责对李（延年）、刘北犯之阻击。现中野九纵位于任桥、公平集线，建议其向东伸展到沱河集后，以攻势防御迫近刘、李，争取时间首歼碾庄之敌，尔后再转移一部南下，配合中野歼灭刘、李，或黄维。”

李[1]，目前不能分兵协力中野打南线之敌，应即照粟陈张部署实施，请刘陈邓适当应付南线之敌。但请粟陈张注意对邱李各军不要打得太多，以先歼一部为宜。

军委

十九日十七时

---

[1] 黄邱李，指黄百韬、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华东野战军应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1]

（1948年11月19日）

刘、陈、邓并粟、陈、张[2]，告谭、王[3]：

十九日九时电[4]悉。我们十八日二十四时电[5]和十九日十时电[6]的基本方针是和刘陈邓大体上一致的。本日下午接粟陈张十八日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4] 指1948年11月19日9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电报说：18日黄维兵团主力3个军已进至蒙城东西地区，正向我一纵攻击。综合我当面之敌有黄维11个师。如果歼灭黄百韬后，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李，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以我们现有6个纵队，单独对付两路大军困难颇多，如取正面防御，必分散兵力不能歼敌；如果机动作战，则可逐个歼敌，但对粟陈张作战不无影响；如实行钳制黄维，打李延年5个军，至少须5个纵队，但以1至2个纵队防御黄维均无把握。故我们仍拟只以九纵与李、刘5个军周旋，集中5个纵队先歼黄维一两个军，再协同华野对付李延年。

[5] 即《关于阻歼南线敌人的部署》。

[6] 即《关于淮海战役下一步作战方针》。

十一时电，以华野全军使用于打北线邱李孙[1]（我们早几天亦有此主张），并且已经部署好，所以我们于本日下午复电又认为可以按照粟陈张部署实行，而将对付南线黄刘李[2]全责委托刘陈邓。现接刘陈邓十九日九时电，知刘陈邓以主力歼击黄维，以一个纵队对付刘汝明，而无力顾及李延年。在此种情况下，粟陈张方面必须将对邱李孙之作战，在目前短期内只限制于歼敌四五个师的范围，以便抽出必要兵力对付李延年。我谭王五个纵除为解决黄百韬[3]残部所必须之兵力外，余部应即速西移，担负歼灭李延年的任务。只有歼灭了至少阻止了李延年，粟陈张的侧翼才不受威胁，才能保证继续歼灭邱李孙。此事请粟陈张妥善处理，是为至盼。

军委

十九日十九时

---

[1] 邱李孙，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2] 黄刘李，指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八兵团和第六兵团司令官。

[3] 黄百韬，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

复彭泽湘电[1]

（1948年11月19日）

符[2]老先生带来虞寒[3]两日大示收到，当即转呈上峰，弟个人认为某先生[4]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敬希转达某先生。

---

[1] 这是毛泽东为聂荣臻起草的复彭泽湘电的主要内容。

[2] 符，指符定一。

[3] 虞寒，即7日、14日。

[4] 某先生，这里指傅作义。

打李延年兵团由华东野战军负责[1]

（1948年11月20日）

粟、陈、张，并告谭、王[2]，刘、陈、邓[3]：

据刘陈邓皓十七时电[4]，中野主力决定打黄维[5]。对李延年兵团[6]须由你们负完全责任，中野无法派兵。除你们已派出王张[7]十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指1948年11月19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陈士榘、张震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决心先打黄维的理由，已详19日9时电。“我们认为徐海作战必须从三五个月着眼，必须分作三四个战役阶段，每阶段都需要有休息、整补俘兵，才能保证必胜。因此，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

[5]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6] 李延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兵团司令官李延年。

[7] 王张，指王秉璋、张霖之，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纵及十三纵外，应即速转移四、六、八、九诸纵之主力（留一部打六十四军）对付李延年。打李延年的指挥责任即由谭王负担，望谭王迅即转移指挥地点至大店集、褚兰、双沟[1]之中间适当地区。

军委

二十日二十时

---

[1] 大店集、褚兰，均镇名，分别位于安徽省宿县东南和北部。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北。

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

（1948年11月20日）

林、罗、刘[1]，并告程、黄，杨、罗、耿[2]，东北局：

十九日十一时电[3]悉。

（一）包围唐山敌人的时机值得考虑，程黄可以准备在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包围唐山，切断唐敌退路，但实行须等候我们最后命令。

（二）应研究者，傅作义[4]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5]等人为强，程黄包围唐山过早，距离主力到唐山、平、津附近有两三星期之久，这个时间内蒋[6]、傅必有所动作。如果敌以中央系在北平附近各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1月19日11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提出以程子华、黄志勇所属之四纵、十一纵及3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于24日全力包围唐山的作战部署，向军委请示。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卫立煌，原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后被软禁于南京。

[6] 蒋，指蒋介石。

军，甚至加傅军一部或大部或全部进至津塘唐线，而以主力位于塘沽，则可以接出唐山之敌，并完成从海路撤退的准备，我军入关很难歼灭该敌。

（三）我们认为，应以锦州新民线上及营口地区之我军先行秘密开动，以四个纵队的兵力与程黄现有兵力同时隔断天津、北平间和唐山、塘沽间之联系，使北平、唐山两处之敌均不能到达津、沽。欲达此目的，就要推迟程黄包围唐山的行动，并先以四个纵队夜行晓宿秘密入关，执行隔断平、津的任务。而沈阳附近的兵力则宜推迟出发时间，因沈阳有敌电台，我一行动，敌必警觉。

（四）杨罗耿部两个纵队现在曲阳，可以出张家口附近与杨成武、詹大南[1]配合，执行包围张家口，阻止傅部西退的任务，亦可以执行切断平、津的任务。但该部六个旅共四万人左右，以之单独担负切断平、津实感力量不足，以之配合杨成武、詹大南包围张家口则较适合，该部如何使用，望林、罗、刘提出意见。由曲阳至平津线及至平张线各有若干里，需多少行军时间，望杨、罗、耿即告。

（五）为不使早日惊动傅军，我们已令聂、薄、滕[2]转令攻击保定之七纵停止攻击，改取包围监视方针。该城现只有一个由地方部队编成的师留守，其目的是钳制我军一部，使傅军执行撤退或固守计划有余裕时间（傅现正大批将地方兵力，例如王凤岗[3]等编入

---

[1] 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詹大南任司令员的冀热察军区部队。

[2] 聂、薄、滕，指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王凤岗（1914—1966），河北新城（今高碑店市）人，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傅、蒋两系正规军内。王等不愿，正和我们接洽投诚）。

（六）傅、蒋在山海关的一个军尚未撤退，其目的是估计你们主力入关必走该地，让该部先挡一挡，争取主力逃跑或固守之余裕时间。因此你们主力入关应取四纵、十一纵所走道路，不要走山海关。

（七）部队行动须十分荫蔽，蒋、傅对我军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他们尚未料到你们主力会马上入关。因此除部队行动应十分荫蔽外，请东北局及林、罗、谭[1]令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台在今后两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各地我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八）以上各项望复。

军委

二十日二十四时

---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谭，指谭政，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东北部队入关的时间路线和任务[1]

（1948年11月21日）

林、罗、刘：

二十日十五时电[2]悉。你们可以位于锦州、打虎山[3]、营口等地之五个纵队于二十三日出发，取捷径夜行晓宿荫蔽迅速行进，以三个或四个纵队担负隔断北平与天津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两地之敌；以一个纵队加程黄兵团[4]担负隔绝唐山塘沽两地之敌；其余在新民、打虎山、营口地区之各部，则可于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出发。以上各部均走热河[5]境内出冀东，不走山海关。沈阳地区各部及总部大行李则应缓若干天出发，走山海关附近出唐山。如林罗刘决定先走，则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1月20日15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沈阳开会的各纵、师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今晨已开始离沈，远者须要明日才能回到部队。如二十二号出发，则实在太仓促，全军皆无法进行起码的政治动员，因此出发时间可否改在二十三号。"

[3] 打虎山，今名大虎山，位于辽宁省黑山县南部。

[4] 程黄兵团，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

[5] 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地区，1955年撤销。

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请陈伍陶[1]注意）。各部行进均注意荫蔽。

军委

二十一日三时

---

[1] 陈伍，指陈云、伍修权，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和第二参谋长。陶，指陶铸，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华东野战军今后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1]

（1948年11月21日）

粟、陈、张，并告刘、陈、邓，谭、王，韦、吉[2]：

（一）粟陈张哿二时电[3]悉。（二）关于对付李延年兵团[4]由华野担负全责一事，昨已电告，谅达。（三）华野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1月20日2时粟裕、陈士榘、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完全拥护军委指示对南线先打李延年再打黄维之方针，并已准备派十一纵及十三纵于20日晚南下，21日晚可到时村东西地区待机。为求得迅速歼灭李延年，明（21日）晚我们尚可从攻碾庄部队中抽1至2个纵队南下，参加歼灭李延年军之末期作战。估计以中野三、四、九纵，加华野两个纵队，可以首先发起战斗。如中野尚有3个纵队担任阻击黄维兵团，尔后攻碾庄之四、六、八、九纵中，可抽出2个或3个纵队，加到对付黄维兵团方面去。我们对邱、李兵团难于截断其退路，只能争取歼其一部，故只使用8个纵队包围、钳制徐州之敌即可。

[4] 李延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兵团司令官李延年。

任务是歼灭李延年。请粟陈张、谭王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我们已在十八日二十四时及十九日十时两电[1]内充分地指出了。（四）碾庄已克，剩下六十四军余部，今明两日谅可解决。黄兵团[2]全歼后，你们即已做好了一件大事。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是你们歼灭邱李[3]四、五个师（或更少一点），将邱李打得不能动弹，以便迅速抽出现八个纵的主力，连同打黄百韬的各纵主力去打李延年。这件事是否做得恰好。（五）前（十九）晚及昨（二十）晚你们打邱李结果如何，我军损伤情形如何，希即告。（六）粟陈张哿二时电说，难于切断邱李退路，只能歼其一部，故使用八个纵即可等语，这个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但今（二十一）晚是否再打，今天白天即须作出决定。我们意见，如有顺利发展的条件，可以再打一晚两晚，否则应当机立断，适可而止。抽出必要兵力，协同谭王所部位于徐州、宿县、双沟、大店[4]之间，筹划歼灭李延年。只要李延年歼灭，战局便可改观。如何，盼复。

军委

二十一日五时

---

[1] 即《关于阻歼南线敌人的部署》《关于淮海战役下一步作战方针》。

[2] 黄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

[3]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4] 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大店，镇名，位于安徽省宿县东南。

给刘少奇等的信[1]

（1948年11月21日）

关于军委全衔，提议加革命二字，即：“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信的主要内容。

复杨得志、罗瑞卿等电[1]

（1948 年 11 月 21 日）

为着不使傅作义部逃跑，决定东北主力提早入关，你们有配合作战之任务。你们应于二十五日前准备完毕待命，于二十五日出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潘自力并告华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杨成武部主力准备东进切断北平张家口之联系[1]

（1948年11月22日）

杨、李、李：

（一）傅[2]军有收缩各外围据点集中平、津向南逃跑之可能。（二）为阻其逃跑歼灭傅军于平、津、张、唐之目的，东北我军决早入关，为守秘密不要下达。（三）拟以你们三个主力纵队迅速秘密东进，协同詹大南部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使张家口之敌无法向平张[3]收缩，吸引北平之敌派部西进救援张家口，以迟滞平津傅军向南逃跑之时间。为此，你们三个纵队除在归绥附近之部队暂时不动，迷惑归绥之敌外，主力应准备待命于二十五日东进。（四）由你们各部现在位置到达宣化、怀来地区的里程、路线、时间，即刻查告。

军委

二十二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原文如此，似应为平津。

必须准备连续作战争取战役全胜[1]

（1948年11月23日）

刘、陈、邓，粟、陈、张，谭、王，韦、吉[2]，并转各纵委，并告华东局，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华中工委：

（一）庆祝你们歼灭黄百韬兵团十个师的伟大胜利。

（二）从戌虞至戌养[3]十六天中，你们消灭了刘峙[4]系统正规军十八个整师（包括争取何张三个师起义[5]在内），并给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四个兵团[6]以相当打击，占领徐州以南、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等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山东兵团副司令员。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戌虞至戌养，即11月7日至11月22日。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于1948年11月8日率1个军部和3个师、1个团共2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

[6] 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刘汝明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第十六兵团和第八兵团。

东、以北、以西广大地区，隔断徐蚌联系，使徐敌处于孤立地位，这是一个伟大胜利。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这种形势的造成，主观上是因为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会合并攻占宿县，客观上是敌人只有某种程度的防御能力（对于这一点决不可轻视），很少有攻击能力（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认识）。

（三）敌八个兵团，一个起义（何张），一个被歼（黄百韬），四个受了相当打击，北面邱李孙、南面黄刘李[1]已被我分割为二，敌人士气将有进一步衰落。你们及各级干部必须认识这一伟大胜利的重大意义，并向战士进行教育，这是一方面。但是，同时必须认识敌人主力邱清泉、李弥、黄维三兵团及李延年兵团中的一个军（从葫芦岛调来的五十四军）在防守方面尚有相当顽强的战斗力。敌直接与你们作战的六十六个师（冯治安[2]四个、黄百韬十个、邱清泉十个、李弥七个、孙元良四个、黄维十一个、刘汝明六个、李延年九个、刘峙直辖五个）中，除被歼者外，尚有五十个师左右。这个敌人是可以消灭的。但是，必须准备给予全战役以三个月至五个月时间，必须准备以几个作战阶段（你们已完成了第一个作战阶段）去取得全战役胜利，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伕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三个月至五个月的粮食、草料、弹药，十万至二十万伤员的医治，必须争取全军各部队在全战役所需时间中有二分之一以上时间的休息

---

[1]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刘汝明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和李延年（1904—1974，山东广饶人）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

[2]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整补，务使士气旺盛，精力饱满。对于兵员必须实行随战随补、随补随战的方针，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在战术方面，必须不是依靠急袭，而是依靠充分的侦察和技术准备（近迫作业、步炮协同等）去取得成功。必须对于我军及居民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对于敌军进行猛烈的有实效的政治攻势，对于刘汝明等部则进行内部策反工作。只要你们注意了和完成了这些条件，你们就有可能取得这一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四）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使你们离开现地区另寻作战机会，即南面黄维、刘汝明、李延年暂时停止不进，又未受到你们的严重歼灭打击，蒋介石为救出邱、李、孙各兵团重新部署江防保卫沪宁之目的，将桂系各军及平津蒋系各军调至蚌埠，向北打通徐蚌，接出徐敌。如果蒋介石这样做，他将丢掉平津，并使武汉及长江中游暴露于我军面前，对于国民党是很危险的。敌人是否这样做，时间上是否来得及，短时期内即可看清楚。对于我们，最有利的是以现态势各个歼灭当面之敌，我们应力争这一着。如果我们能在第二阶段中大量地歼灭南面敌人，即使敌人这样做，我们亦有可能实现原定计划。

（五）望华野、中野全军，在刘、陈、邓、粟、谭五人总前委（邓为书记）[1]统一领导之下，争取新的大胜利。

军委

戌梗

---

[1] 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在淮海战役期间统筹一切。

同意歼灭李延年的部署[1]

（1948年11月23日）

刘、陈、邓，粟、陈、张，并告华东局，谭、王，韦、吉[2]：

（一）粟陈张马十八时歼灭李延年部署电[3]及梗十时电，刘陈邓梗辰复粟陈张电均悉。（二）我们和刘陈邓一样同意粟陈张马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1月21日18时粟裕、陈士榘、张震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军区等的电报。电报说：为保障刘陈邓中野歼灭黄维兵团与南线我军歼灭李延年兵团，我们决定以7个纵队监视徐州近郊之邱李孙兵团，采取逐次削弱的方法，坚决阻击其南窜。部署如下：1. 第一、三、十、十二纵、鲁纵、广纵，冀独一、独三旅，监视与阻击徐州之敌，截断徐敌与李、黄之联系，保障刘陈邓中野及南线我军侧背之安全。2. 以二、六、七、十纵、王张十一纵、胡张十一纵、十三纵，歼灭李延年兵团。3. 六纵、十三纵则沿沱河两岸由东南向西北攻击，配合正面聚歼敌于任桥以北地区。4. 七纵、胡张十一纵，则待二、六、王张纵、十三纵将敌分割后，依实况加入作战。5. 十纵为总预备队。6. 江淮两个旅攻占灵璧后，待命经固宅集，向固蚌段攻击。为便于配合，建议中野于南平集、孙町集线以南，歼灭黄维兵团为好。战役第一步，我当集力歼灭李延年兵团。

电部署。不管黄维、刘汝明、李延年[1]前进或停止，这个部署都是好的，敌前进则可歼李刘大部、黄维一部，敌停止则可取得短时休整。（三）目前还不要涉想另寻战机。目前应捉住徐敌[2]孤立、粮食困难这个弱点，隔断徐蚌[3]两敌，待机歼敌。（四）我大军屯于徐蚌之间日子久了，粮食亦必感到困难，但你们必须用一切方法克服此项困难。（五）如十天以后徐蚌区域还无战机可寻，在不妨碍隔断徐蚌歼灭刘峙[4]主力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派出一部兵力攻占两淮[5]的意见。（六）解决粮食问题是实行此项总方针的重要环节。粮食情况如何，望告。（七）为实现长期隔断徐蚌围困徐敌，华野应在徐蚌之间，以宿县为枢纽，构筑坚固的阻隔阵地。（八）实施情形望告。

军委

梗亥

---

[1] 黄维、刘汝明、李延年，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八兵团和第六兵团司令官。

[2] 徐敌，指当时收缩在徐州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及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

[3]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4]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同意先打黄维[1]

（1948年11月24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2]：

梗二十二时电[3]悉。（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4]；（二）望粟陈张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军委

二十四日十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指1948年11月23日22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关于先歼黄维兵团的部署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现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而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陈张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4个纵队加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如军委批准，我们即照此实行。

[4]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暂不理山海关秦皇岛之敌[1]

（1948年11月24日）

林、罗、刘：

（一）请将你们各纵到达玉田、蓟县及到达平津线[2]之时间，计算电告。（二）你们后尾部队及总部亦不要走山海关，对于山海关、秦皇岛之敌不要理他，待切断平津、津塘、塘唐、唐滦并歼灭滦县、唐山、塘沽三处之敌以后，如榆秦[3]敌不走，再派兵去歼灭之。（三）傅作义[4]似遵蒋[5]令准备撤退大同、张家口，集中平津唐线，未作向西撤退之准备。故我们拟令杨成武[6]率三个纵队日内由绥[7]东向东包围张家口之敌，杨罗耿[8]则率现位石家庄附近之两个纵队，加上保定一个纵队（保定之敌已北撤），日内开始向北移动，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平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3] 榆秦，指河北榆关（今山海关）和秦皇岛。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蒋，指蒋介石。

[6]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7]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8]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近涿县，尔后于你们切断平津、津塘、塘唐攻击唐滦之敌时，或钳制北平之敌，或加入切断平津。这样是否适当，即告。

军委

二十四日二十时

杨成武主力三个纵队的行动部署[1]

（1948年11月24日）

杨、李、李，并告杨、罗、耿[2]，华北局，黄、程，林、罗、刘[3]：

（一）成武率主力三个纵队于明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发，以六天时间（愈快愈好）到达张家口附近，然后以两个纵队包围张家口西南周家河[4]、怀安两地之敌（二一〇师及骑十一旅），以一个纵队插入张家口、宣化之间，隔断张宣两处敌人的联系（张宣两处各有敌一个师），使周家河、怀来、张家口三处不能逃掉。如周家河、怀来之敌迅速缩入张家口或张家口之敌迅速向东收缩，则你们应迅速向东，包围张家口、宣化（一个师）或下花园[5]（一个师）。总之，以抓住一批敌人不使向东跑掉为原则。抓住并包围之后，不要攻击，等候东北主力入关（守秘）围歼敌人之后，再相机攻击。（二）北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黄、程，指黄志勇、程子华，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参谋长和司令员。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周家河，镇名，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西南。

[5]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集团[1]迅速开至大同附近，监视大同之敌，不使向东或向西跑掉了。（三）井泉率姚喆[2]八纵留在绥远[3]。（四）给养等事，请聂薄[4]筹备。

军委

二十四日二十二时

---

[1] 北岳集团，指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赵振声。

[2] 姚喆，当时任绥蒙军区司令员兼第八纵队司令员。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 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给吴晗[1]的信

（1948年11月24日）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2]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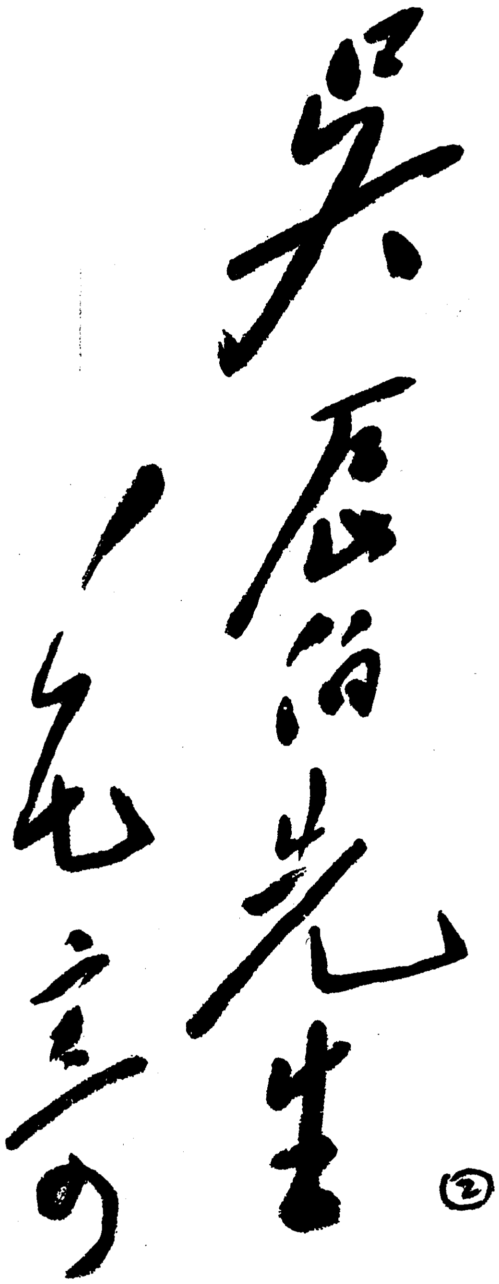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

[1] 吴晗（1909—1969），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等校教授。1948年秋进入解放区，11月毛泽东在河北平山会见了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2] 指吴晗所著《朱元璋传》一书。1948年11月吴晗到达河北平山，将此书的修改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来，吴晗在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自序中说，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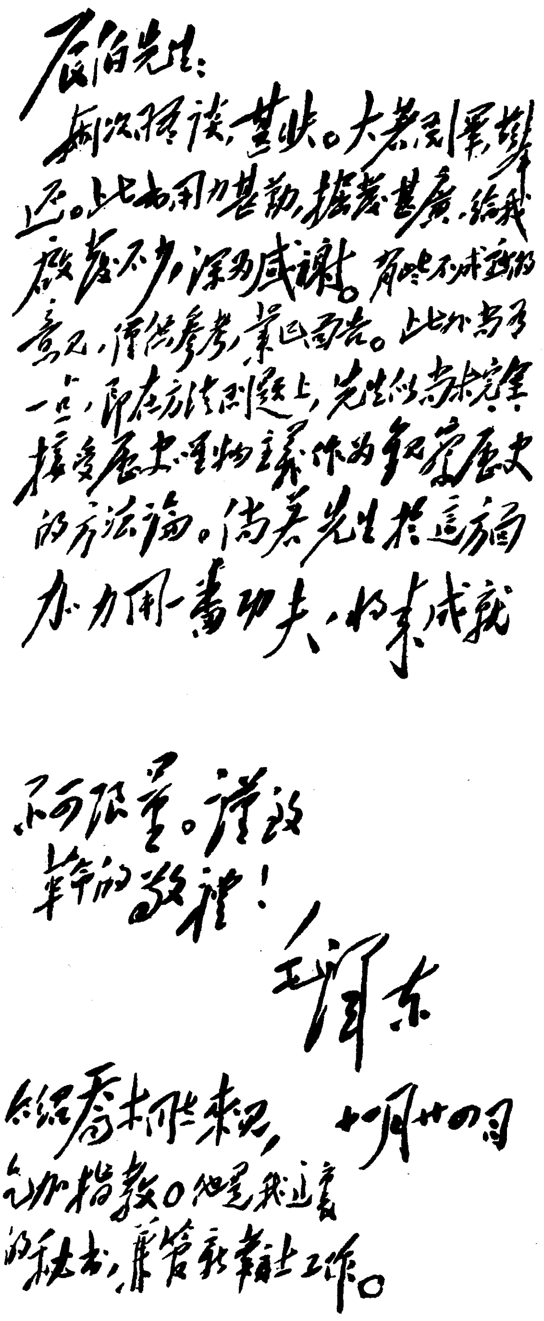


吴晗先生

毛泽东 四

②

毛泽东致吴晗信的手稿。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胡乔木同志来到，请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致吴晗信的手稿。

致华东局等电[1]

（1948年11月24日）

同意你们对孙良诚[2]所采取的方针和态度。因为孙良诚是在被包围后未经战斗自愿放下武器的，和别的俘虏官有区别，故对孙及其干部的待遇应比较好一些。可将他们集合送入军校学习（除反动分子外）。对孙本人给以礼遇，不要放走，要他努力帮助我们进行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3]及刘部各师长的策反工作。一〇七军军官中凡有适合做此项工作者均应加以训练，派去刘部工作。对刘部工作甚为重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东局并告华中工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陈士榘、张震电的主要内容。

[2] 孙良诚，原为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11月13日在睢宁向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投诚。

[3] 刘汝明、曹福林、刘汝珍，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该兵团第五十五军军长、第六十八军军长。

关于杨罗耿部的行动部署[1]

（1948年11月26日）

杨、罗、耿，并告杨、李，程、黄，聂、薄，林、罗[2]：

（一）着杨罗耿率二兵团于今二十六日由曲阳出动，以五日至六日行程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地区待命。尔后依情况或向平绥线协同李杨歼敌，或向平西地区活动打击并钳制平敌，或向其他地点作战，由尔后命令规定。

（二）七纵受杨罗耿指挥，应由保定北进迫近敌人活动。

军委

二十六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

东北大军入关后的作战计划[1]

（1948年11月26日）

林、罗、刘，并告程、黄，杨、罗、耿[2]：

（一）你们大军入关，敌情必有变化。作战计划部署必须适时决定。因此，希望你们数日内处理后方事务完毕，在主力到达冀东之前，你们乘车赶过部队先到冀东。此点甚为重要。

（二）截至现在止，平、津、张、唐之敌，尚是固守计划，没有撤退计划。但今后数星期变化如何，则难断定。

（三）作战计划：甲、已令杨成武[3]包围怀来及张家口之敌，并令杨罗耿由曲阳进至涿县、涞水以西，必要时加至平张线，拖住几部敌人。乙、你们主力的第一个作战应不是唐山，而是在平津线上之廊坊等地。该地有九十四军两个师，估计可能增加兵力，你们必须首先歼灭此敌，并且必须准备歼灭北平方面可能增援之敌。因傅、蒋[4]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电报的节录。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蒋，指蒋介石。

力是在北平为中心的区域，计有十三军四个师、十六军三个师、九十四军一个师、三十五军三个师、三十一军一个师、暂三军三个师、暂四军三个师、暂五军一个师、新二军一个师及四个骑兵旅，分布于涿州、北平、通州、密云、张家口之线。你们必须准备和这些敌军之一部或大部增援兵力作战并歼灭之，方能达成切断平、津联系（一条铁路及一条公路）的任务。与此的同时，应以必须兵力包围唐山之敌（八十七军三个师），使其跑不掉。丙、在上述切断平津、包围唐山两个任务达成后，第二个作战任务还不是打唐山，而是歼灭天津、唐山间之六十二军三个师（芦台及天津以东之赤城滩）及独九十五师一个团（塘沽），假如该些敌人没有跑掉的话。丁、歼灭唐山之敌。戊、夺取天津（九十二军及独九十五师主力）。己、歼灭北平周围之敌。庚、夺取北平。以上是我们想到的作战计划大要，提供你们考虑，待你们到冀东后依据当前情况决定，交我们作最后批准。

（四）唐山是平津的煤源，在你们没有切断平、津以前去包围唐山，有调动北平敌人到津、唐作战或从海路陆路跑掉的危险。如你们同意这点，望电告程黄目前不要去包围唐山，但如唐山之敌有撤退的确实消息，则应迅速包围之。

（五）如果杨成武包围了张、宣[1]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时，则程黄从蓟县，杨罗耿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协同杨成武歼灭该敌。

军委

二十六日八时

---

[1] 宣，指今河北宣化。

注意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1]

（1948年11月26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2]：

二十五日十一时二十六日五时两电[3]均悉。黄维[4]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挣扎，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指1948年11月25日11时和26日5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前电说：昨夜我一、二、三、六纵由西向东出击，正在南平集、芦沟集之线与敌激战中。黄维以十军、十四军、十八军主力向我朱口、半埠店、丁楼、大小王庄之线四、九纵阵地猛攻，企图打开宿县通路。请粟陈张“令各纵兼程南进，主力（包括六纵，不包括王张纵）控制宿县、桃园集、蕲县集及其西南二十五里之大营集一线（线上均属华野），置重点于桃园集、蕲县集以东地区，并控制宿县、水池铺沿铁路线待机作战”。后电说：“黄维兵团完全被我合围于南平集、蕲县集、邵围子、双堆集、芦沟集之间地区。敌企图向邵围子、双堆集之间突围，已被我堵阻。我们已令各纵逐步紧缩，达成全歼此敌。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

[4]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们除使用华野的二纵、王张纵[1]外，十纵亦应迅速进入战场，准备参加最后战斗，保证歼黄维的足够兵力。粟陈张对李延年[2]如有歼击机会，以抓歼其一个军左右的兵力为好。总之，使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变化为适宜。在黄维全部解决并休息数日之后，请由华野各部中抽出两个纵队渡淮南进，切断宁蚌[3]联系，孤立蚌埠，同时加紧对刘汝明[4]的工作，迫其反正，是为至要。

军委

二十六日二十时

---

[1] 王张纵，指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纵队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霖之。当时归华东野战军指挥。

[2]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3] 宁蚌，指江苏南京和安徽蚌埠。

[4]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迅速抓住扭打平张线上之敌

（1948年11月27日）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1]，并告华北局：

为着在十二月全月份内吸引傅作义[2]部几个军于平张线上，并歼灭该线各军之一部或大部，借此使我林罗主力于十二月进至冀东以后顺利地切断平津、津唐诸线，歼灭数部敌人，打开主要地区的战局之目的，部署如下：

（一）以程、黄所率东北四纵、十一纵及一个骑兵师，杨、罗、耿所率华北第二兵团之三纵、四纵、八纵，杨、李所率华北第三兵团之一纵、二纵（两个旅）、六纵，再加詹大南[3]地方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以上各部受程、黄统一指挥。

（二）杨、李率所部已于二十五日由绥[4]东地区东进，三十日左右集中于柴沟堡、怀安附近地区，然后以迅速动作抓住并包围柴沟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4] 绥，指绥远省。

堡、怀来或张家口、宣化诸点之敌一个军左右之兵力，并相机举行攻击，吸引东面敌人向西增援。

（三）杨、罗、耿率所部已于二十六日由石家庄以北曲阳地区出发，十二月一日集中于易县西北紫荆关地区荫蔽待命，然后准备以五日行程进至涿鹿地区相机作战。

（四）程、黄所部务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完毕，待杨李在柴、怀、张、宣地区抓住几部敌人之后，迅即超越密云、怀柔、顺义线上之敌，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相机作战。由平谷至怀来的里程、时间，望程、黄查告。

（五）敌现在兴和有一个骑兵旅，柴、怀有一个师两个骑兵旅，张家口有一个师及一〇五军军部及十一兵团孙兰峰[1]司令部，宣化有一个师，下花园有一个师，怀来、土木、沙城、南口有一〇四军三个师及十六军一个师，共八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估计在柴、怀、张、宣被围，你们各部前进后，十六军两个师，三十五军三个师，有极大可能增援上去。如此，你们须准备和十三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作战。敌以火车、汽车运兵是很快的，你们的动作亦须注意迅速。

（六）只要你们在十二月份内能抓住扭打上述步、骑十六个师、旅于平张线上，并歼灭其一部，打得该敌不能动弹，不能西逃也不能东窜，那就是极大的战略上胜利。

（七）必须充分估计到在形势不利时，傅部直属各军可能西逃，那时你们就必须以前堵后追两项手段将其歼灭之。

（八）又必须估计在形势不利时，该线诸敌将夺路东窜，那时你

---

[1] 孙兰峰（1895—1987），山东滕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

们就必须以同样手段将其歼灭之。

（九）在你们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歼灭傅部的动员工作。

（十）该线粮食较为困难，望令北岳、热察[1]两区用尽一切方法解决你们全军两个月的粮食需要。

（十一）在林、罗、刘入关以前，平绥线[2]作战受军委直接指挥；在林、罗、刘入关以后，即交与林、罗、刘指挥。

（十二）林、罗、刘对于程黄行动有何意见，即告。

军委

二十七日二时

---

[1] 热，指热河省。察，指察哈尔省。

[2]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引李延年部前进打击其侧后[1]

（1948年11月27日）

粟、陈、张，并告刘、陈、邓[2]：

请粟陈张准备当黄维兵团[3]快要歼灭但尚未歼灭之际，对李延年[4]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其侧后打去，求得歼其一部。

军委

二十七日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4]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向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1]

（1948年11月27日）

一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

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你们应当赶快缴械投降。冯治安的四个师已经起义了[2]，黄百韬[3]的十个师已经消灭了，此外还有四个师被消灭了。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4]已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徐州的邱清泉、李

---

[1]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国民党军黄维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在宿县西南的狭小地带。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连续播出5篇讲话，劝该兵团投降。本篇一是毛泽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写的讲话稿。本篇二是毛泽东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名义写的讲话稿。

[2] 冯治安，原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11月8日，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率1个军部和3个师、1个团共2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冯治安飞往南京。

[3] 黄百韬，原任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司令官，1948年11月22日在碾庄附近战斗中毙命。

[4] 指李延年、刘汝明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和第八兵团。

弥、孙元良[1]也被我军阻隔，不能援助你们。蒋介石、刘峙[2]是完全没有办法的。你们可知道，前些天，在碾庄被围的黄百韬兵团不是等着徐州的增援吗？蒋介石一天数令催迫邱清泉增援，结果走了十一天，只进三十几里路，眼看着黄百韬被消灭。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少死些人，留着活命，替中国人民做点工作。人民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是知道的，无论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只要放下武器，就给以宽大待遇，不论官兵，一律不杀不辱。你们的王耀武、范汉杰、郑洞国[3]及其他一切被俘将领，都在我们这里住得好好的。其中许多人已被放回去了。还有许多人我们准备放他们回家。你们都是中国人，何必替美国人打仗呢？中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你们何必替蒋介石等少数反动派卖命呢？时机紧急，牺牲无益，你们应当立刻放下武器。南京政府已经摇摇欲倒，黄维兵团十一个师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赶快掉转枪口，和我们一道打到南京去吧！

---

[1] 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

[2] 刘峙，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3] 王耀武（1903—1968），山东泰安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范汉杰，原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8年10月在锦州战役中被俘。郑洞国（1903—1991），湖南石门人，原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0月19日率部在长春放下武器。

二

宿县南平集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所属四个军军长、十一个师师长、各团营连排长及全体士兵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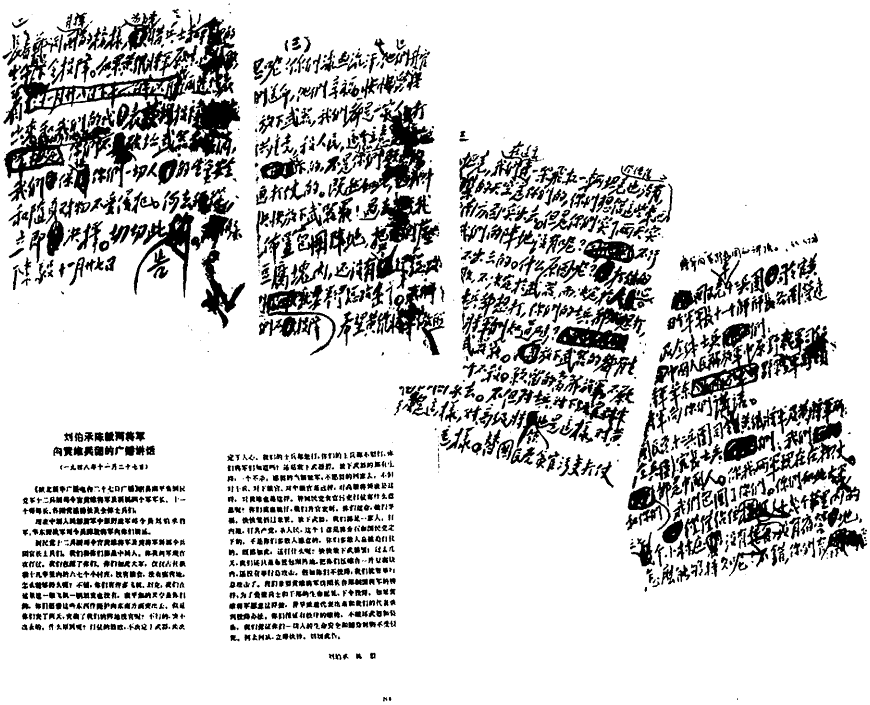
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将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将军向你们讲话。

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你们如此大军，仅仅占住纵横十几个华里内的六七个小村庄，没有粮食，没有宿营地，怎么能够持久呢？不错，你们有许多飞机、坦克，我们在这里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也没有，南平集的天空是你们的，你们想借这些东西作掩护向东南方面突出去。但是你们突了两天，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没有呢？不行的，突不出去的。什么原因呢？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还是放下武器吧。放下武器的都有生路，一个不杀。愿留的当解放军，不愿留的回家去。不但对士兵、对下级官、对中级官是这样，对高级将领也是这样，对黄维也是这样。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吧。放下武器，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吧！过去几天，我们还只是布置包围阵地，把你们压缩在一片豆腐块内，还没有举行总攻击。假如你们不投降，我们就要举行总攻击了。我们希望黄维将军仿照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为着爱惜兵士

和干部的生命起见，下令投降。如果黄维将军愿意这样做，着即派遣代表出来和我们的代表谈判投降办法。你们保证有秩序地缴枪，不破坏武器和装备，我们保证你们一切人的生命安全和随身财物不受侵犯。何去何从，立即抉择。切切此告。

刘伯承　陈毅

十一月二十七日



刘伯承陈毅两将军
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刘伯承　陈　毅

毛泽东撰写的《刘伯承陈毅两将军向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的手稿和油印稿。

请考虑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1]

（1948年11月28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韦、吉[2]：

（一）刘陈邓二十七日十七时电[3]、粟陈张二十七日十四时电[4]均悉。（二）假如今（二十八）日刘陈邓能完全解决黄维兵团[5]，粟陈张能包围蚌埠以北之李延年刘汝明[6]诸部，并能于今后数日加以歼灭，则整个淮海战役已起了决定性的变化，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告结束。（三）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是解决徐蚌[7]两处之敌，夺取徐蚌。（四）在完全解决黄维及李、刘在蚌埠以北诸部之后，全军须休整一个短时期，其时间依情况决定，大约须两星期左右。然后以主力取徐州，以相当大的一部取蚌埠、浦口、合肥及淮南、江北、运西、巢东地区诸城，直迫长江。（五）华野现共有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渤、鲁、广、特等大小十六个纵队，中野现共有一、二、三、四、六、九及王张[8]十一等七个纵队（王张纵应归还中野建制）。请你们在第二阶段结束之后，短期休整之前，立即考虑下一阶段作战的兵力部署问题，向我们提出意见，多少兵力打徐州，多少兵力出蚌浦。（六）假如李、刘主力能在蚌埠以北被歼灭，则蚌埠及蚌浦线敌军甚少，似有乘胜夺取蚌埠及占领蚌浦线一段或全段之可能。只要有此种可能，我即应

以至少两三个纵队早日渡淮南进，执行此项任务。即使蚌埠不能马上夺取，我亦应早日切断蚌浦间联系，使敌从他处可能调来之兵力无法到达蚌埠。执行此项任务之各纵，可在切断蚌浦联系之后，在蚌浦线上进行休整，休整完毕再攻蚌埠。

军委

二十八日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1948年11月27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的电报。电报说："我军已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双堆集附近十余村庄，廖运周率部今晨在战场起义。全部战斗至迟明日可以解决。已告粟陈张立即开始歼击李延年、刘汝明的作战部署。"

[4] 指1948年11月27日14时粟裕、陈士榘、张震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并告谭震林、王建安的电报。电报说："（一）为有力保证中野歼击黄维之作战，除以王张十一纵、七纵附特纵美榴、日榴、野炮十七门加入中野序列歼击黄维外，决集中六纵、二纵、苏北十一纵、十纵、十三纵、江淮两个旅，即开始围歼任桥集地区之九十九军、三十九军（有向固镇南撤息），并于今晚首先完成包围切断敌向南撤路。（二）今晚六纵主力由固镇以南包围固镇之敌，并以一部夺取控制新桥（固镇南三十里），断敌退路与阻击可能北援之五十四军。二纵由任桥集以西北、西南，十纵由正北，十三纵由任桥集东南包围任桥集地区之敌，并准备由四方

会攻聚歼该敌。苏北十一纵为预备队，控制花庄集、龙王庙地区。”

[5]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6]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7]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8] 王张，指王秉璋、张霖之，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程子华黄志勇部暂在原地待命[1]

（1948年11月28日）

程、黄，并告林、罗、刘[2]：

二十七日二十时电[3]悉。（一）为不使傅[4]军早日警觉起见，你们暂在原地待命，在三天内不要动。（二）现在问题是杨成武[5]是否能在柴、怀、张、宣[6]地区抓住一〇五军（即暂四军），如能抓住该军，则在下花园[7]之一〇一军（即新二军）一个师，在怀来之一〇四军（即暂三军）一个师，亦有被我杨罗耿[8]抓住之可能，否则这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1月27日20时程子华、黄志勇关于部队拟于28日夜开始移动，12月1日拂晓前到达平谷地区集结给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6] 柴、怀、张、宣，指河北柴沟堡（今怀安县县治）、怀安、张家口和宣化。

[7]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8]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些敌人均有东撤之可能。（三）一〇四军主力两个师已由怀来向东移至南口[1]地区。（四）你们各部现在位置即告。

军委

二十八日十二时

---

[1]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请考虑在歼灭固镇曹老集敌人以后可否渡淮作战[1]

（1948年11月28日）

刘、陈、邓，并粟、陈、张，谭、王：

（一）粟陈张在歼灭固镇、曹老集[2]一带之敌以后，请考虑以二、六、七、十一、十三等五个纵乘胜渡淮南进，切断蚌浦线，包围并相机夺取蚌埠。十纵则留在宿县休整，尔后即用谭王李[3]所率各纵及十纵协同中野解决徐州之敌。是否可以如此及渡淮作战有何困难望告，以便我们作最后决定。（二）黄维[4]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因此中野及华野谭王李各部虽然一方面应当争取休整两星期左右，但另一方面又应当迅速处理战后工作，以利应付意外。此点请你们注意掌握。

军委

二十八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曹老集，镇名，位于安徽省固镇县南部。

[3] 李，指李迎希，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参谋长。

[4]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给徐向前[1]的信

（1948年11月29日）

向前同志：

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前方指挥由周、胡、陈[2]担负。你病情略好能够移动时即来中央休养，待全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和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毛　刘　朱　周　任[3]

十一月二十九日

---

[1]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当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周，指周士第（1900—1979），广东琼海人。当时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胡，指胡耀邦（1915—1989），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陈，指陈漫远（1911—1986），广西蒙山人。当时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参谋长。

[3] 毛刘朱周任，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

歼灭黄维兵团是解决徐蚌全敌的关键[1]

（1948年11月29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谭、王、李[2]：

（一）二十八日十七时电[3]悉。从敌人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击，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此敌，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二）解决黄维兵团[4]是解决徐蚌[5]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李，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1月28日17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陈士榘、张震、邓子恢、李达的电报。电报说："经昨夜作战，已将敌压缩至东西十五里、南北四五里的长窄狭小地区。敌之基本意图，似仍为向东南突围，但突围不成，则只有死守待援。现我们从敌人固守着眼，正等待弹药到达，即于后夜开始攻歼敌人，采取集中火力，先打一点，各个歼灭的战法。我们六个纵队，从十九日涡阳阻击起，到今晨止，共伤亡不过六千人，士气很高。加上华野七纵及炮兵配合，全歼该敌确有把握，但须十天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原来根据敌人总突围及廖运周起义的情况，估计可以迅速解决战斗，此种情况业已改变。华野七纵因敌改成固守，故仍留用为总预备队。"

[4]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5]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因此，粟陈张在解决固镇、曹老集之敌以后，华野二、六、十、十一、十三等五个纵应立即集结休息，作为歼灭黄维的总预备队。渡淮南进一事，待黄维全歼以后再说。（三）望谭王李坚强阻击邱李孙[1]诸敌，务使该敌不能侵入宿县。北面情况如何，望告。

军委

二十九日六时

1948年，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黄维机械化兵团组织的汽车防线。

---

[1] 邱李孙，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包围张宣之敌务使不能逃跑[1]

（1948年11月29日）

杨、李，杨、罗、耿，程、黄[2]：

（一）杨李在包围张宣[3]之敌后，即应迅速完成阻击工事，务使敌人不能逃跑（注意不使敌人黑夜逃跑），以吸引东面敌人增援。如张宣敌在你们到达前即已向怀来逃跑，你们即应猛追到怀来，务必抓住一部敌人。（二）杨罗耿一闻杨李包围了张宣之敌，即应迅速前进包围怀来之敌。（三）程黄仍在现地待命，使敌放心西进增援。

军委

二十九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歼灭黄维后全力解决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部[1]

（1948年11月30日）

刘、陈、邓，并粟、陈、张，谭、王、李：

（一）粟陈张、谭王李二十九日各电[2]均悉。各项估计及意见均甚好。（二）固镇、曹老集之线敌人解决后，以江淮两个旅进淮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指1948年11月29日申时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的电报，以及同日10时、16时、21时30分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给中央军委，粟裕、陈士榘、张震和华东军区的3份电报。第一个电报说，黄维在由蚌埠北援无望情况下，似只有缩集死守，待徐敌南援。估计邱、李、孙兵团有倾巢南犯增援黄维就便南撤，或乘我主力围歼黄维兵团未解决战斗，及李、刘兵团南撤我主力南追之机，即集中二等部队向我攻击，主力乘隙向南，或向两淮突围可能。否则，黄维被解决之后，邱、李、孙处境更利我各个击破。我即遵示调整部署，除以江淮两个旅破击蚌浦段铁路，不让敌重新调整兵力投入蚌埠外，另部署力量阻击蚌敌可能北援，或西援黄维。我中野、华野目前阶段，均宜以全力争取实现继歼黄、李、邱之方针。为便于作战指挥与部队使用，不分割建制，提议以华野全部负责围歼徐州之敌，中野夺取合肥及蚌浦段，开辟淮南较适当。后三个电报，报告了阻击徐州之敌南犯的作战情况，并估计徐州之敌有经两淮撤退的可能。

以十三纵控制固镇、曹老集部署甚妥，望即执行。（三）二、六、十、苏十一等四个纵应以两个纵位于固镇以北休息，准备随时供刘陈邓使用，为解决黄维的总预备队，以策万全。其余两个纵是否即可照谭王李提议开至双沟、大王庄[1]之线，以便配合一纵阻止邱李[2]主力向两淮[3]逃跑之可能。请刘陈邓、粟陈张按情决定。（四）七纵炮兵已供刘陈邓使用，这里不再说了。惟炮纵应全部开去打黄维，以厚火力。（五）渤纵现到何处，该纵似亦应使用于双沟地区，对付邱李主力。（六）刘陈邓电台应速与谭王李电台沟通。（七）黄维解决后，我们现在倾向于集华野、中野全力解决邱李孙[4]，然后休整一时期，再合力举行江淮战役。

军委

三十日十七时

---

[1] 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部。大王庄，今名王集，镇名，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北。

[2]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3]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4] 孙，指孙元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程黄部仍按原计划准备西进[1]

（1948年11月30日）

程、黄，并告林、罗、刘：

（一）现在不论对你们或对你们所建议的已到平泉的两个纵队，均不能下立即向平张线[2]前进的决心，因为：一则杨成武[3]是否能包围张宣[4]敌人还无把握；二则即使包围张宣之敌（三个步师），并且杨罗耿[5]也包围了下花园[6]（一个师）及怀来（一个师）之敌，傅[7]部在你们强大兵力威胁下，是否敢用多兵向西增援亦难断定；三则萧陈[8]统一指挥杨罗耿及杨李[9]较为困难。因此，萧陈已到平泉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的电报。

[2] 平张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3]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4]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5]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6]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7]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8]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9] 杨，指杨成武。李，指李天焕，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部，仍应按原计划进入冀东，你们亦仍按原计划准备西进，不要变动。（二）只要杨李确实包围了张宣之敌，杨罗耿即去包围下花园、怀来之敌，你们即行向西出动策应。你们只要出至密、怀、顺线以西，估计即可遇到敌人。你们的作战地点在密云、南口[1]之间。

军委

三十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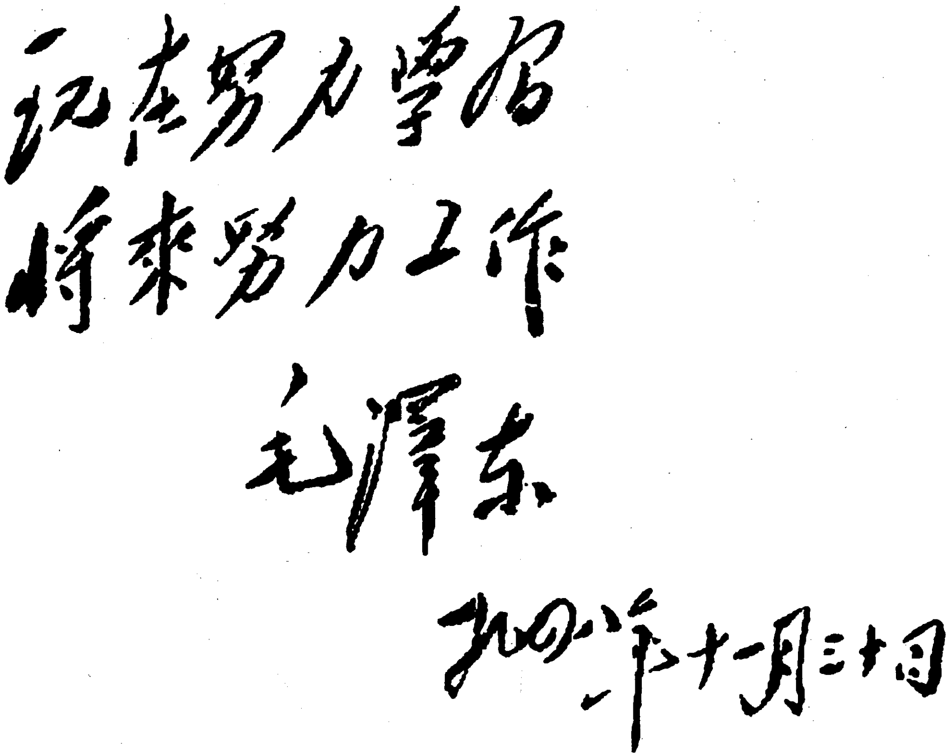
[1]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为张天义题词

（1948年11月30日）

现在努力学习，
将来努力工作。

毛泽东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现在努力学习
将来努力工作
毛泽东
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

毛泽东为张天义的题词。

给胡乔木的信[1]

（1948年11月30日）

我已要东北在今后两三星期内多发东北部队练兵消息，以表示我东北主力尚未入关，林彪尚在沈阳。你收到这些消息后，请酌发口播及文播。

---

[1] 这是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给胡乔木的信

(1948年11月)

乔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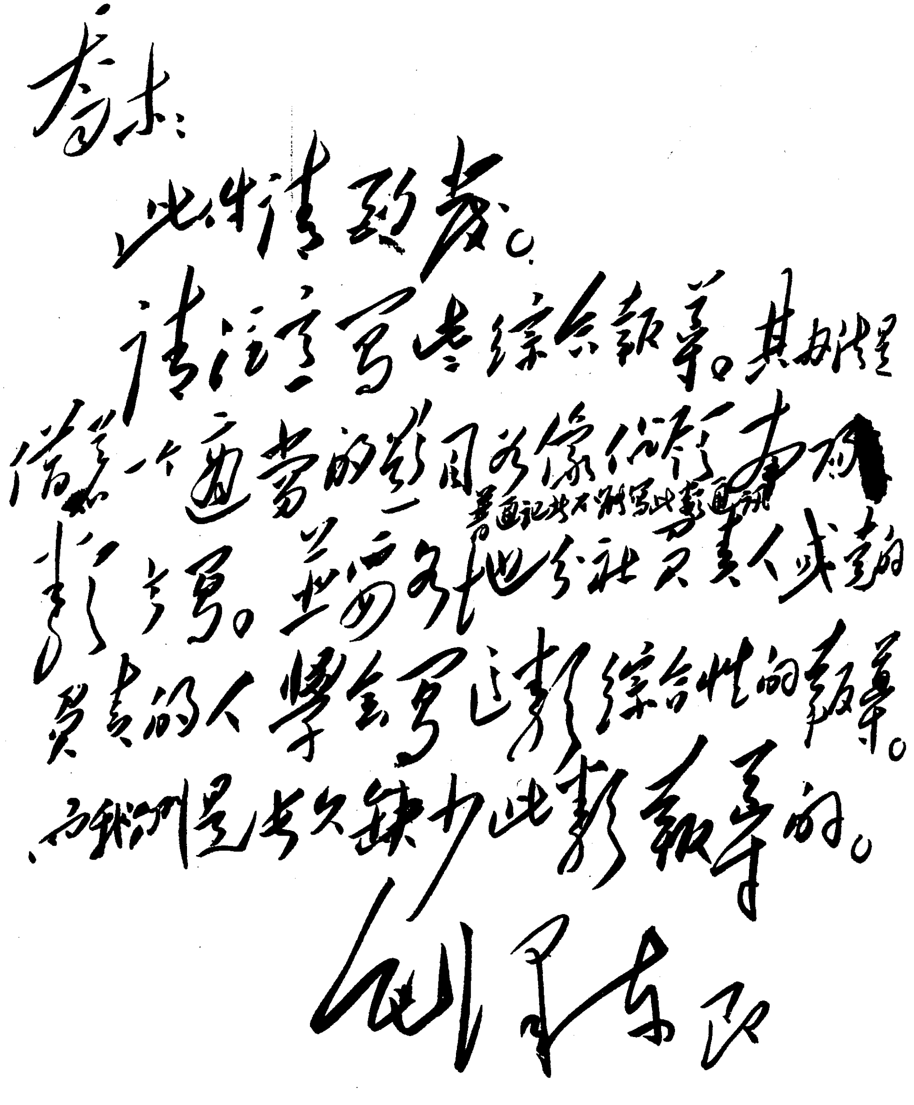
此件请酌发。

请注意写些综合报导。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1]之类去写。并要各地分社负责人（普通记者不能写此类通讯）或党的负责的人学会写这类综合性的报导。而我们是长久缺少此类报导的。

毛泽东　即

---

[1] 指1948年11月5日新华社发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的新闻。



乔木：

此件请刊发。

请注意写出综合报导。其好处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为像你所作了一本[illegible]普通记者不会写此类通讯报导这写。并要各地分社负责人或主要的负责的人学会写这类综合性的报导。而我们是长久缺少此类报导的。

毛泽东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

（1948年11月）

现在，当着全世界觉悟的工人阶级和一切真诚革命的人们对于苏联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三十一个周年举行欢欣鼓舞的纪念的时候，我想起了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个周年纪念的时候所写的著名的论文。斯大林在这篇论文中说："十月革命的伟大的世界意义，主要的是：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历史是按照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发展的。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

---

[1] 这是毛泽东给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所写的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论文。这篇论文发表在该刊1948年第21期。

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是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明显吗?

以苏联为首的世界革命统一战线，战胜了法西斯主义的德意日。这是十月革命的结果。假如没有十月革命，假如没有苏联共产党，没有苏联，没有苏联领导的西方和东方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还能设想战胜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们吗?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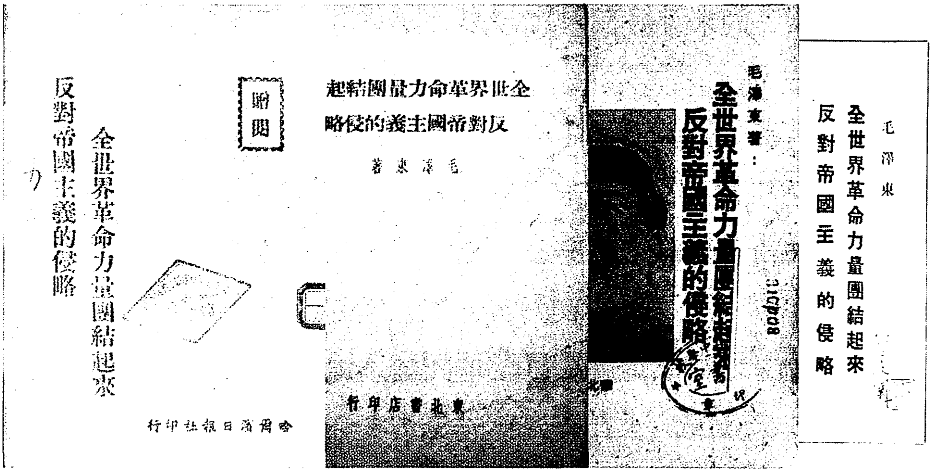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

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这个敌人的基础是虚弱的，它的内部分崩离析，它脱离人民，它有无法解脱的经济危机，因此，它是能够被战胜的。对于敌人力量的过高估计和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疯狂侵略，反对卖国、独裁和以内战屠杀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目标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两年时间内，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由防御转到了进攻。在两年作战中（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后的发展，尚未计算在内），人民解放军俘虏和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二百六十四万人。中国解放区现有面积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五；现有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人口四亿七千五百万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现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国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由于我党坚决地领导农民实现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现已在大约一亿人口的区域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给了农民，首先是贫农和雇农。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万人，增加到了现在的三百万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团结一切革命力量，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知道，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不怕

这些困难。我们认为困难是必须克服，并且能够克服的。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这一点，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确定了联合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写了一封给苏联的信，当作他的一份遗嘱。背叛孙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方面、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是国民党的蒋介石匪帮。但是人们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全部反动统治将被中国人民所彻底地打碎。中国人民是勇敢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勇敢的，他们一定要解放全中国。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哈爾濱日報社印行
附錄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毛澤東著
東北書店印行
毛澤東著：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毛澤東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部分版本）。

防止敌军向两淮或连云港逃跑[1]

（1948年12月1日）

粟、陈、张，谭、王、李，并告刘、陈、邓及华东局：

外国通讯社透露徐州敌有向连云港逃跑的企图，我们估计当黄维兵团[2]已接近歼灭，邱李孙[3]向南逃跑业已绝望时，其逃跑的方向以向两淮[4]或连云港两处为最大。因此你们对于这一点必须马上有所准备，其办法：（一）令渤纵迅速全部集中大许家、单集[5]地区；（二）从二、六、十、苏十一等四个纵中立即以两个纵开至双沟[6]、睢宁之线；（三）预先令鲁南、淮海各军区地方部队有所布置，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如何部署，盼告。

军委

一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3] 邱李孙，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4] 两淮，指江苏淮阴和淮安。

[5] 大许家、单集，均镇名，分别位于江苏省铜山县东部和东南。

[6] 双沟，镇名，位于江苏省睢宁县西北。

抓住胡宗南使其兵力不能他调[1]

（1948年12月1日）

彭、张，并告西北局：

（一）庆贺你们歼敌二万余人的大胜利。（二）你们进行整训是必要的，但是不要提出整个冬季的整训计划，只提出一个月的整训计划，一个月计划中分为两期，半个月为一期。两期完毕后，如有作战机会，即打一仗，如无作战机会，再延长整训时间，做第三期整训计划（半个月）。我们的目的是，你们既能整训，又能不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借以拖住胡宗南[2]使不能调至他处。（三）我们现在所要竭力争取的：一是尽可能不使傅作义[3]部（四十个师）向江南撤退，因此东北我军仅休息二十天即已令其出动，以便早日抓住平津敌人；二是希望你们抓住胡宗南，使他的兵力不能调至沪、宁一

---

[1] 1948年11月15日，西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16日在陕西合阳以东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大部。25日，在蒲城永丰镇地区对进入预定战场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军发起攻击，激战至28日，全歼该敌。西北冬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2.5万余人，俘虏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带。（四）我刘邓、陈粟两军[1]在徐蚌[2]区域之作战，除已歼敌十八个师外，现又包围黄维兵团[3]十一个师于宿县、蒙城之间，大约一星期内外可以解决。此敌歼灭后，即进行对于徐州附近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4]（二十二个师）之作战。假如这些敌人都能被我解决，则蚌埠淮阴以南、长江以北所余敌人不多，只有李延年、刘汝明、周喦、夏威[5]四部，共约二十四个师，且分散几处，较易解决。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就很难站住，从根本上（不是说全部）打倒国民党的任务，就有可能缩短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之。

军委

一日十二时

---

[1] 刘邓、陈粟两军，指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

[2]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

[3]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4] 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指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兵团司令官分别为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

[5]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喦，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夏威，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八绥靖区司令官。

杨成武部务必包围几部敌人[1]

（1948年12月1日）

杨、李，并告杨、罗、耿，程、黄[2]：

你们任务是务必包围几部敌人，以便调动东面敌人西援，故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你们包围几部敌人之后，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至要。

军委

一日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程子华黄志勇部立即向南口怀来前进[1]

（1948年12月2日）

程、黄，杨、罗、耿，杨、李[2]：

（一）程黄东十八时电悉。三十五军既已西进，程黄应立即出动，取直径向南口[3]、怀来前进，协同杨罗耿、杨李歼灭傅[4]军。（二）杨罗耿应照程黄电直出涿鹿。（三）杨李应照程黄电包围张家口之敌，并阻止敌退张北。

军委

二日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加强兵力确保切断张家口宣化敌之联系[1]

（1948年12月2日）

杨、李，并告程、黄[2]：

如果已把张家口包围，并把张宣[3]联系切断，你们应注意加强兵力，巩固这种切断，务使三十五军不能和张垣[4]敌人会合，这是最关重要的。

军委

二日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4]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华东野战军应派两个纵队堵歼西逃之敌[1]

（1948年12月2日）

粟、陈、张，谭、王[2]，并告刘、陈、邓[3]：

敌向西逃，你们应以两个纵队侧翼兼程西进，赶至敌人先头堵住，方能围击，不要单靠尾追。

军委

二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重点应放在隔断张宣两地之敌[1]

（1948年12月3日）

程、黄，杨、李：

（一）杨李二日十三时及二十四时电[2]悉。（二）杨李可照二日十三时电部署不变动，但须加强切断张、宣的兵力，因三十五军既然尚在宣化，我们便不怕张垣[3]之敌向西向北逃跑，重点应放在隔断张、宣两地之敌。（三）如三十五军已到张垣，杨李的重点即是阻敌向西向北。

军委

三日十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2日13时和24时杨成武、李天焕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程子华、黄志勇的电报。前电说，遵军委和程黄电令，作如下部署：（一）一纵切断并控制张宣公路，从东南包围张宣。（二）六纵以一个旅截断张垣至张北公路，该纵主力由西北面包围张垣。（三）二纵控制于洋河两岸，随时机动。后电说，“敌尚无西逃征候，眼前较紧张的还是张宣段。为便于机动，所以我们建议暂时仍按我们二日十三时部署不变，尔后依情况再变”。

[3]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1]

（1948年12月4日）

程、黄，杨、罗、耿，并告杨、李[2]：

估计暂三军尚在怀来及其以东地区。我杨罗耿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3]地区一线，隔断暂三军与张宣[4]敌之联系。只要暂三军及北平一带之傅[5]部与张宣之敌不能联系，即不怕张宣敌西逃。故攻占下花园一带，稳固地切断东西两敌联系最为重要。

军委

四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4]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5]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以利歼击[1]

（1948年12月4日）

粟、陈、张，谭、王、李[2]，并告韦、吉[3]：

此次对邱李孙[4]作战，我各纵应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分离各军，以利歼击。这就是东北打廖兵团[5]的办法。务必不要使敌结集成一个大集团，旷日持久，难于歼灭。

军委

四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谭、王、李，指谭震林、王建安、李迎希，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 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4] 邱李孙，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5] 廖兵团，指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兵团司令官廖耀湘。辽沈战役第二阶段战斗中，东北野战军于1948年10月26日将廖兵团包围于辽宁黑山、打虎山、新民地区，并在完成包围的同时，乘敌混乱收缩，实行穿插分割，经两日激战，即全歼该敌，俘虏敌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以下10万余人。

平张线上各兵团的作战任务[1]

（1948年12月4日）

程、黄，杨、罗、耿，杨、李[2]，并告林、罗、刘，聂、薄、滕[3]及东北一兵团萧、陈[4]：

（一）我杨李部已吸引及包围敌六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于张家口，并于东冬两日打退敌向我阵地数次进攻。（二）宣化、下花园[5]两处原有敌一个师，据杨李称，暂十师一日由怀来开宣化，是宣化有一个师又两个团，下花园有一个团。暂三军尚在怀来、南口[6]线。此种形势，对我极为有利。（三）各兵团任务如下：甲、杨李现在部署极好，即两个纵队在张家口以西，一个纵队在张宣之间切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聂薄滕，指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4]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5]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6]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张、宣联系，阻止宣化之敌向张家口集中（此点极重要）。但须注意迅速增强阻击阵地，准备打退敌人许多次的进攻，在阵地前消耗敌人，以利尔后集中兵力歼灭此敌。乙、杨罗耿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之（先歼下花园之敌）。以有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之联系，确实阻止怀来及其以东之敌向西增援。丙、程黄部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到达后，相机各个歼灭该线之敌。丁、待上述三方面任务完成后，集中全力解决张垣[1]之敌。戊、你们三部须每日互相通报一次，并告我们。

军委

四日十六时

---

[1]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歼灭强敌必须用强攻方法

（1948 年 12 月 4 日）

刘、陈、邓[1]，并告粟、陈、张，谭、王、李，韦、吉[2]：

江亥电[3]悉。

（一）黄维[4]实力被歼已近半数，据黄维自己表示，三十三个团中被歼已达十六个团，尚余十七个团。目前数目是过坳时机，只要你们再歼其三四个团，敌即处于数量上完全劣势地位，全歼该敌就较易了。

---

[1] 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谭、王，指谭震林、王建安，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李，指李迎希（1902—1981），河南商城人，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参谋长。韦、吉，指韦国清、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 1948 年 12 月 3 日亥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并邓子恢、李达的电报。电报报告了近日我军同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作战情况，提出："我们决定立即使用华野之七纵、十三纵（预备队）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即有重点地多面攻击。因敌紧缩顽抗，尚须时日才能全歼该敌。"

[4]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二）打黄百韬[1]和打黄维两次经验均证明：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歼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三）对于歼灭邱李孙[2]之作战，目前最重要的是乘其运动之际，我各纵大胆插入敌人各军（共九个军）之间，务必不使敌人结成一团，然后各个歼灭之。其中对于十二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七十二军等部，或者可以采用急袭方法解决；对于其他各军，则必须用强攻方法（即大分割、小分割、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步炮协同等）方能解决。东北我军在辽西打廖兵团[3]之所以能迅速解决，是因为我各纵大胆插入敌各军之间，而敌又指挥错乱（先向西遇挫，又向东南遇挫，又向东北），故能迅速解决。华野此次对邱李孙亦可能遇到此种情形，假定如此，那就可能迅速解决。但你们主观上必须准备在迅速解决各战斗力不强之敌以后，用较长时间用强攻方法去解决之。

（四）李延年部[4]已渡淝河向包家集进，你们如何对付该敌，望刘陈邓电告。

军委

四日十六时

---

[1] 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2] 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

[3] 廖兵团，指廖耀湘任司令官的原国民党军第九兵团。该兵团1948年10月26日被东北野战军包围于辽宁黑山、打虎山、新民地区，随后被全歼。

[4] 李延年部，指李延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六兵团。

一纵必须全部用于切断张宣联系[1]

（1948年12月4日）

杨、李：

各电均悉。准备和进攻之敌作多日顽强战斗，巩固地切断张、宣联系，不使宣化之敌向张垣[2]集中，是你们头等重要任务。你们使用于切断张、宣联系的兵力必须是一纵全部，必要时还应增强若干。如何，望复。

军委

四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1]

（1948年12月4日）

杨、罗、耿，杨、李[2]，并告程、黄[3]：

目前数日最大顾虑就是张垣[4]之敌乘我程黄部将到未到之际突围向东，而怀来、南口[5]之敌则向西接应。因此，除已告各点外，尚须作如下补充，望迅速确实坚决地执行之。（一）杨罗耿务于明（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动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不要忙于攻击宣化之敌。如下花园[6]只有一个团，则歼灭之；如有一个师，亦不要打，只包围之，等候程黄到怀南线[7]后再打。（二）杨李一纵务必固守张宣间阻绝阵地，如兵力不足，应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等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4]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5]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6]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7] 怀南线，指怀来至南口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加兵力。（三）如张宣之敌绕道向北平撤退，杨罗耿、杨李两兵团则应在敌运动中追堵包围之。（四）杨罗耿明（五）日是否能到宣怀线[1]，程黄何日可到怀南线，即告。

军委

四日二十一时

---

[1] 宣怀线，指宣化至怀来的铁路，即今京包线一段。

六纵应加强阻击李延年北进[1]

（1948年12月4日）

刘、陈、邓，粟、陈、张[2]：

（一）李延年[3]现使用七个师（其中有五十四军部队）于淮河以北，一部已到曹老集[4]。望令六纵加强阻击，务必不使该敌北进过远，妨碍我解决黄维[5]。（二）刘陈邓已使用十三纵突击黄维,该纵暂不能调动。（三）俟黄维解决，六纵、十三纵及中野全力均可使用于打邱李孙[6]。

军委

四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3]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4] 曹老集，镇名，位于安徽省固镇县南部。

[5]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6] 邱李孙，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对一个美国记者在香港的谈话材料[1]的批语

（1948年12月4日）

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

[1] 这个美国记者说，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

给刘少奇等的信[1]

（1948 年 12 月 4 日）

（一）此电可以不发。因济南在老解放区的包围中，人口亦未超过百万，军管会取消，以市府行使政权，是可以的。（二）但沈阳、平、津、沪、宁乃至徐、汴、郑等处则是另一种情形，必须要看群众发动情形，反革命被镇压情形及周围环境巩固情形而决定军管制时间的长短。军管制的利益正是因为它帮助人民群众实行民主的独裁。如果人民群众讨厌这种独裁，必是军管会脱离了人民群众，不去帮助人民镇压反革命，而去妨碍人民镇压反革命。如果我们的军管制确是帮助人民镇压反革命，人民决不会把我们的和蒋介石的两种独裁看成一样。主张在大城市过早地取消军管制，是危险的。

---

[1] 这是毛泽东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信的主要内容。

为防止蚌埠敌人威胁
应构筑多层坚强防御阵地[1]

（1948年12月5日）

刘、陈、邓，并告粟、陈、张[2]：

为防止蚌埠方面敌人向你们战场前进的威胁，你们应令六纵及其他可用兵力（例如苏北两个地方旅前准备出淮南者），预先构筑多层坚强防御阵地，此点万不可大意。

军委
五日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陈、张，指粟裕、陈士榘、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对怀来敌如何攻击依情况决定[1]

（1948年12月5日）

程、黄，并告林、罗、刘，杨、罗、耿，杨、李[2]：

四日二十一时电[3]悉。尔后作战方案，要待你们到怀来地区后，依当时敌情方能决定。目前应决定者：（一）杨罗耿应迅速控制宣化、怀来（不含）段，完成东西阻击工事，防止张宣[4]敌向东及怀来、南口[5]敌向西，并相机歼灭下花园、新保安[6]诸点之敌，然后可照你们意见，以一个纵包围宣化，以两个纵位于宣化以东。那时（不是现在）杨李除一纵仍在张宣间切断两处联系外，其二纵可由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指1948年12月4日21时程子华、黄志勇关于预定在张家口宣化地区作战的方案给中共中央军委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杨得志、杨成武等的电报。

[4]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5]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6]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部。

垣[1]西南移至张垣西北，与六纵在一起防止张垣敌向西北逃跑。（二）你们及詹苏[2]部可照来电部署，但对怀来敌如何攻击，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如怀来敌不多，即由你们负责歼灭之；如怀来敌较多需要杨罗耿主力配合，则尚待考虑。因张宣两地已集中傅[3]部主力（八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恐需两杨[4]全力（六个纵队）对付，方能防止突围逃跑。如是则你们对怀来之敌只应包围不要攻击，以便有充分力量攻击张垣（攻击时机大约需待林罗刘完成对平津唐[5]的阻隔及包围以后）及部署打援。

军委

五日七时

---

[1]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2] 詹苏，指詹大南、苏启胜，当时分别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

[3]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两杨，指杨得志和杨成武。

[5] 平津唐，指北平、天津和河北唐山。

阻止可能从张家口西逃之敌[1]

（1948年12月5日）

杨、李，李井泉[2]，并告杨、罗、耿[3]：

（一）大同之敌是阎锡山的，阎近拟空运太原，可让其运去。我北岳集团[4]可移兴和、张北地区，参加阻止张垣[5]敌可能向兴集[6]逃跑之任务。（二）兴集一带尚有些什么部队，姚喆[7]八纵在什么地方，请井泉查告。（三）请井泉在绥[8]东一带布置阻止张垣敌可能西逃，万一发生此种情况，协同杨罗耿、杨李歼灭逃敌。

军委

五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等的电报。

[2] 李井泉，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率姚喆第八纵队留在绥远。

[3]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北岳集团，指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赵振声。

[5]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6] 兴集，指内蒙古兴和和集宁。

[7] 姚喆，当时任绥蒙军区司令员兼第八纵队司令员。

[8]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关于杨李部部署的指示电[1]

（1948年12月6日）

杨、李，并告杨、罗、耿，程、黄，林、罗、刘[2]：

（一）杨李四日二十二时电，我们六日三时才收到。

（二）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3]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你们不是确实切断张宣联系孤立张宣两处之敌，反而提议将一纵控制于张宣两侧洋河两岸地区，让宣化之敌可能向张家口会合，使以后攻击张家口感到困难，你们不是将二纵一部加到一纵那里去确保沙岭子、八里庄[4]一带已占阵地，反而提议二纵马上加到张家口西北。

（三）你们必须明白，只要宣化敌四个师（一〇一军之二七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4] 沙岭子，镇名，位于河北省宣化县西北。八里庄，镇名，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南部。

师，一〇四军之二五〇师、二五八师，一〇五军之三一〇师）不能到张家口会合，则张家口之敌即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家口会合（据我们所知张家口是五个步兵师三个骑兵师），则不但张家口集敌九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尔后难于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冲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四个师，再歼灭张家口五个步师三个骑旅。

（四）因此，你们必须坚决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必须先得我们批准），不可违误。执行情形速告。

军委

六日三时半

围歼张家口宣化怀来诸敌的部署[1]

（1948年12月6日）

程、黄，杨、罗、耿，杨、李[2]，并告林、罗、刘[3]，华北局：

（一）杨罗耿五日二十一时电[4]悉。（二）杨罗耿全部到达下花园[5]地区后，即以一个有力纵队开至宣化、张垣[6]之间，与一纵在一起确实控制张宣间沙岭子、八里庄[7]一带阵地，并尽可能向张宣两方扩展，击破敌人一切打通张宣的企图，使张宣两敌各个孤立，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指1948年12月5日21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已令四纵于下半夜即出发，迅速夺取涿鹿、下花园。如涿鹿敌未逃，即以一部监视，主力直奔下花园。令三八两纵明日亦尽一切努力赶进。我们已到桃花堡，明日在四纵后跟进。”

[5] 下花园，镇名，今为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6]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7] 沙岭子，镇名，位于河北省宣化县西北。八里庄，镇名，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南部。

利尔后歼击。（三）待杨罗耿派出之纵队确实到达沙岭子、八里庄一带与一纵会合之后，杨李即可以二纵加到张垣北面及西北面，与六纵在一起加紧构筑阻击阵地，务须达到使张垣之敌任何时候都不能向北、向西北、向西逃跑。北岳集团[1]则位于第二线（由杨李选择适当位置，是否兴和一带适宜）。绥远[2]姚喆[3]八纵为第三线，由杨李电令其预先布置阻绝敌人西逃的一切可能。（四）杨罗耿其余两纵位于宣化以东，隔断宣化怀来两敌之联系。（五）张宣两敌无论是互相打通联系之企图，或向东突围或向西突围或绕道突围之企图，均必须坚决打破之，遇有此种情形发生即全军堵追歼灭之。（六）张宣两敌固守不动，则暂时围而不打，待程黄占领怀来及八达岭[4]，并待林罗刘主力到达（尚须两星期时间）及对平、津、塘、唐[5]部署完成之后，即开始攻击张宣之敌。（七）杨罗耿到达宣化、下花园地区后，杨李即受杨罗耿指挥。待程黄到达怀来后，即以程、黄、杨、罗、耿、杨、李七同志组织平绥前线委员会，以程子华为书记，罗瑞卿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平绥作战及粮食、弹药、处俘等项事宜。以全歼张、宣、怀等处敌人十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并收复张、宣、怀诸城为目标，争取一个月左右完成任务。

军委

六日六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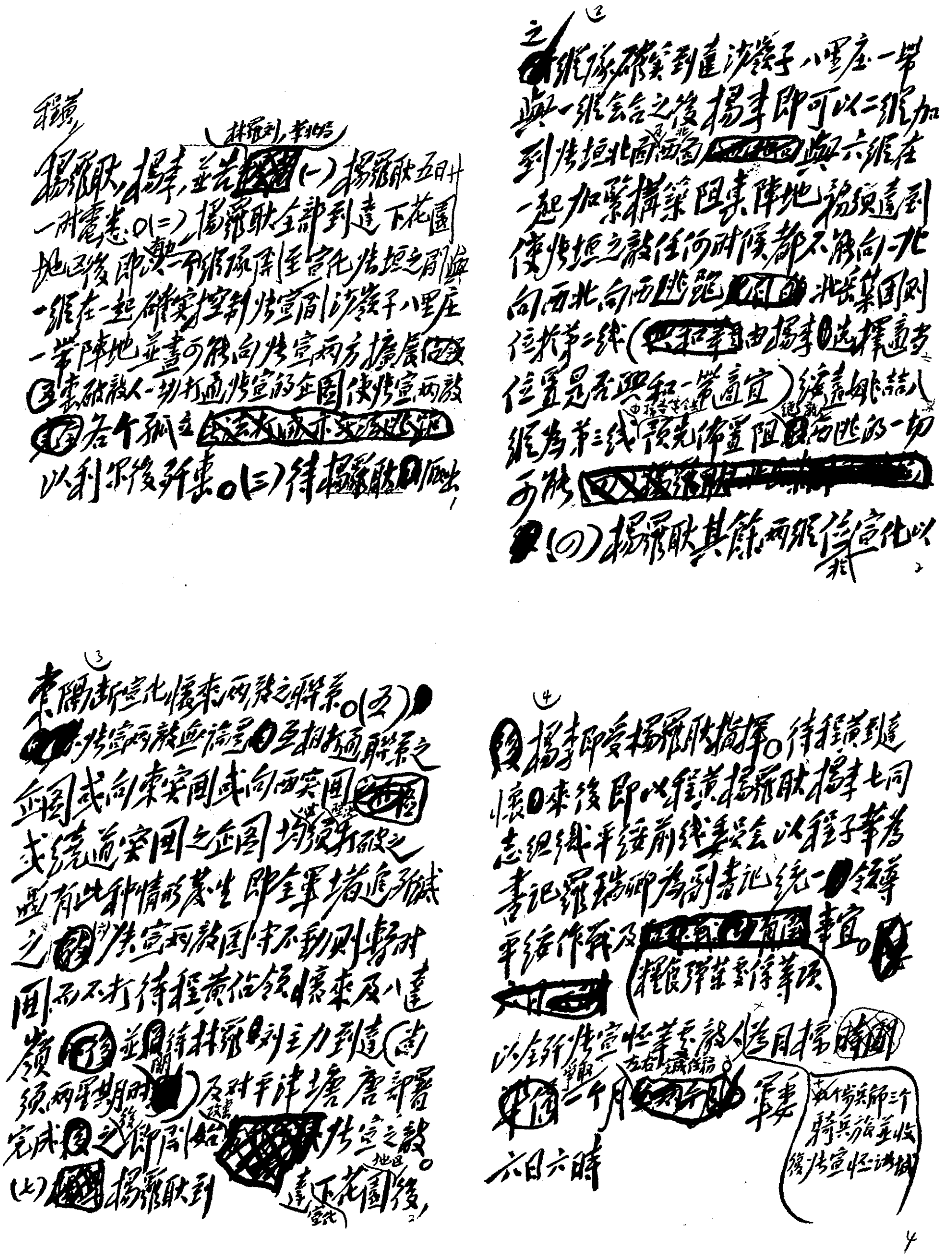
[1] 北岳集团，指北岳军区，司令员王平、政治委员赵振声。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姚喆，当时任绥蒙军区司令员兼第八纵队司令员。

[4] 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5] 平、津、塘、唐，指北平、天津、塘沽和河北唐山。



程黄，

杨罗耿，杨李，并告（林罗刘，华北局）：（一）杨罗耿五日廿一时电悉。（二）杨罗耿全部到达下花园地区后，即以一个纵队插至宣化、张垣之间，与一纵在一起，确实控制张宣间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并尽可能向张宣两方扩展，粉碎敌人一切打通张宣的企图，使张宣两敌各个孤立，以利尔后歼灭。（三）待杨罗耿一个纵队确实到达沙岭子、八里庄一带，与一纵会合之后，杨李即可以二纵加到张垣北面西北面，与六纵在一起，加紧构筑阻击阵地，务须达到使张垣之敌任何时候都不能向北、向西北、向西逃跑。北岳集团则位于第二线（由杨李选择适当位置，是否兴和一带适宜）。绥远姚喆八纵为第三线，由杨李去令预先布置阻截西逃的一切可能。（四）杨罗耿其余两纵位宣化以东，隔断宣化、怀来两敌之联系。（五）张宣两敌无论是互相打通联系之企图，或向东突围，或向西突围，或绕道突围之企图，均须打破之。遇有此种情形发生，即全军猛追歼灭之。如张宣两敌固守不动，则暂对其围而不打，待程黄占领怀来及八达岭，并待林罗刘主力到达南口（须两星期时间）及对平津塘唐部署完成之后，开始攻击张宣之敌。（六）杨罗耿到达下花园宣化地区后，杨李即受杨罗耿指挥。待程黄到达怀来后，即以程黄、杨罗耿、杨李七同志组织平张前线委员会，以程子华为书记，罗瑞卿为副书记，统一领导平张作战及粮食弹药等供给事项。以全歼张宣怀诸敌（十一个步兵师三个骑兵旅并收复张宣怀诸城）为目标，争取一个月左右完成任务。

军委

六日六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围歼张家口宣化怀来诸敌的部署》的手稿。

占领徐州及歼敌情况的通报[1]

（1948年12月6日）

林、罗、刘，并告东北局，彭、张、赵[2]：

鱼卯电悉。徐州于二日为我占领，人民极表欢迎。杜聿明[3]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4]三个兵团二十二个师，由徐州向安庆方向逃窜，现已为我华东主力全部包围于萧县、砀山、永城中间纵横约二十里之地区，准备以较多时间逐步分割歼灭该敌。由平汉[5]南段向徐州方面增援的黄维兵团[6]十一个师，为我中原主力及华东一部于宿县、蒙城、蚌埠、永城四点之间（双堆集[7]）包围歼击已有十天，因敌缩守纵横十里以内之一点，依靠空投供应，不易分割，故尚须若干天才能最后解决。蚌埠方面策应之敌，为李延年刘汝明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赵，指张宗逊、赵寿山，当时均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

[3]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4] 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5]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6] 黄维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维。

[7] 双堆集，镇名，位于安徽省濉溪县南部。

兵团[1]共十五个师（内有从葫芦岛撤来之六个师），曾被我由宿县以南地区打退到蚌埠，近因我抽兵打杜聿明，该敌又向淮河以北活动，但此敌不强，我可用一部钳制之。蒋介石现又有从汉口方面调几个军至蚌埠消息，但只要东北、华北我军能够抓住平、津、张、唐[2]之敌，西北我军抓住胡宗南[3]，则我华东中原两军于一个月内外解决淮河以北之敌，是完全可能的。此敌是蒋匪部队中比较最有战斗力的部分（已在徐州以东解决之黄百韬兵团[4]亦有相当战斗力），解决此敌则蒋匪已无主力，进一步解决淮河以南之敌（连苏中在内共有二十五师）以及将来到江南作战，就比较容易了。

军委

六日十八时

---

[1] 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指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和第八兵团，兵团司令官分别为李延年和刘汝明。

[2] 平、津、张、唐，指北平（今北京）、天津、河北张家口和唐山。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黄百韬兵团，指原国民党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官黄百韬，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在碾庄以东的大小院上战斗中毙命。

全力堵追张家口宣化向东突围之敌[1]

（1948年12月7日）

程、黄，杨、罗、耿，杨、李[2]：

（一）据杨李称，昨六日下午张宣[3]敌大举向东突围。（二）望杨罗耿全力在宣化、下花园[4]线坚决堵击。（三）望程黄星夜向怀来前进。（四）望杨李以一个纵队监视张垣[5]之敌，以两个纵队向逃敌猛追猛击。（五）杨罗耿速统一指挥杨李行动。

军委

七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4]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5]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程黄部协助杨罗耿歼灭东逃之敌[1]

（1948年12月7日）

程、黄，并告林、罗、刘[2]：

（一）你们几次给杨李电令都不合具体情况，都与军委隔断张宣[3]两敌联系的规定冲突。现杨李[4]已放任三十五军东逃，又不知杨罗耿[5]能否于新保安阻住该敌，你们自己则不以后卫军打密云，而以先头军打密云，致耽搁时间。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你们尚未赶到，三十五军及怀来之敌即已一起东逃，你们到后毫无事做，空劳往返。虽然如此，但你们仍须星夜赶进。希望杨罗耿能于六日夜或七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三十五军及一〇四军主力，而怀来之敌亦未跑掉，你们可协同杨罗耿歼灭该敌。（二）因程黄向西行动，已调动九十四军回至北平，请林罗刘以东北主力何时可集中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张宣，指河北张家口和宣化。

[4]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5]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东，何时可完成对切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塘沽（此三项任务必须同时达成，不可先后参差）之部署的大略计划，先行电告。

军委

七日二十时

华北部队应遵军委命令阻敌东逃[1]

（1948年12月7日）

程、黄，杨、罗、耿，杨、李[2]，并告林、罗、刘，聂、薄[3]：

（一）同意杨李部署，除以一个旅参加下花园[4]作战外，其余七个旅全部包围张垣[5]之敌（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6]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三十五军两个师竟敢乘车三百余辆毫无阻碍地东去，我一纵撤至铁路两侧坐视，不阻不打）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向东或绕道跑掉（主要注意不使敌西逃），如敌逃跑则坚决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二）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下花园，镇名，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区。

[5]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6] 宣，指河北宣化。

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1]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五日到达宣化、怀来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亦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使五日不能到达，六日上午应该可以到达（该部三个纵队于二日从紫荆关[2]南北出发，以四天至多四天半行程应当可以到达铁路线，该部过去南下时以三天行程即由铁路线到达紫荆关）。三十五军于六日十三时由张垣附近东进，只要杨罗耿于六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即跑不掉。（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3]一线，隔断东西敌人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

军委

七日二十时

---

[1]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2] 紫荆关，位于河北省易县西北。

[3] 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务将三十五军与怀来联系完全切断[1]

（1948年12月8日）

杨、罗、耿，并告程、黄[2]：

你们必须将主力（至少两个纵队）用在敌之逃窜方向，即东面，以一部位于敌之侧面，务将三十五军与怀来之联系完全切断，不得违误。

军委

八日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准备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之敌

（1948年12月8日）

林、罗、刘[1]：

七日二十一时半电[2]悉。

（一）张家口仍有敌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被我杨成武[3]包围。东逃之敌系三十五军军部及该军两个师，该敌乘汽车三百余辆，如无阻碍两天即可到北平。宣化有敌两个师，其中一个师属一〇一军，拟向张家口集中，昨（七）日被我杨成武部于张宣路上歼灭；另一个师属一〇四军，随三十五军东窜。怀来有一〇四军两个师，南口有十六军三个师。三十五军两个师及一〇四军一个师，六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1948年12月7日21时30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歼灭傅作义全部及南口之十六军，拟以先头部队之第三、第五两个纵队立即经平谷与顺义附近，以五六天行程插到南口附近，参加作战。届时如北平、张家口间战役结束，则我之先头两个纵队即转至北平、通县以南，防止平敌南逃。我后到之各纵的行动，拟依尔后北平敌情决定。如平敌继续退天津，则我各先到纵队均插至北平东南堵击敌人。如届时已判明敌守北平，则以我后到部队包围唐山和切断平津联系。

[3]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日下午为我杨罗耿[1]一个旅阻击于宣化、怀来之间，如杨罗耿主力昨（七）日能赶上包围该敌，则该敌跑不掉，且我杨罗耿部亦能独力歼灭该敌。否则，该敌将于昨日或今日会合怀来之敌逃至北平，程黄[2]到怀来后，亦将无事可做。

（二）你们想以第三、第五两纵去打十六军，在全盘计划上是不妥的。现傅作义[3]有十四个师、一个骑兵师集中北平、涿县、通县、顺义、南口区域（下花园、怀来之五个师未计在内），你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使这些敌人逃至天津，其方法是以四个纵队占领廊坊、香河之线，隔断平、津联系。只要此着成功，北平区敌人十四个师即无法逃脱。你们第二个任务是以一个纵队加上冀东地方兵团包围唐山敌人三个师，使这部分敌跑不掉。只要北平、唐山两区敌人跑不掉，天津、塘沽、芦台之敌（十个师）即少有单独逃跑的可能。你们第三个任务是以一个纵队隔断天津、塘沽间联系，以三个纵队攻歼塘沽、芦台线上之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两个师（另一个在天津）及从秦皇岛撤回的八十六军三个师共六个师之敌。只要你们除程黄外手里有了九个纵队，即可同时实行上述三项任务。只要你们手里有六个纵队，即可实行隔断平、津及包围唐山两项任务（以四个纵队隔断平、津，以两个纵队包围唐山。这里说包围唐山要两个纵队，是说没有兵力去打塘沽、芦台之敌，故要两个纵队并加冀东地方兵团方能完成包围唐山之任务）。如果情况紧急，北平敌人有向天津撤退的确实征候（现在尚无此种征候），而你们后续兵力未能赶

---

[1] 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分别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

[2] 指程子华、黄志勇分别任司令员和参谋长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

[3]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上，手里只有四个纵队时，那就只有首先使用于隔断平、津，使北平敌无法逃脱，以待后续兵力之到达。

（三）在平、津未隔断的条件下，如果你们除程黄外再使用两个纵队去打南口的十六军，并把十六军消灭了，那就有迫使北平之敌早日逃至天津、塘沽的危险。

（四）平、津之敌没有向西安、郑州、徐州逃跑的危险，因为我有徐周、彭张两军[1]可以阻止其向西安，有刘邓、陈粟两军[2]可以阻止其向郑州、徐州（我歼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等四个兵团三十四个师之作战可于十天内外解决，然后我军在陇海、淮河之间须有一时期休息）。

（五）平、津之敌没有向绥远[4]逃跑的危险，因为我有八个纵队在平绥路[5]。

（六）平、津之敌有向青岛逃跑的某种危险，因为我在天津、济南、青岛之间没有兵力。但此种危险不大，因为敌人由天津经济南到青岛，比较我军由徐州附近到青岛之路程要长些，我军可以由徐

---

[1] 徐周军，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彭张军，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的西北野战军。

[2] 刘邓军，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中原野战军。陈粟军，指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的华东野战军。

[3] 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4] 绥远，即绥远省，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5] 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州到胶济线去截击它。

（七）敌人逃跑的主要危险是海路，但一则津、塘港口快要封冻，二则船只不足，三则傅作义此时尚无此种准备。他的方针现在还是固守平、津、唐。张垣[1]有敌二万余被围（围而不打），亦使傅作义难下弃之不顾、单独逃跑的决心。

（八）因此，你们仍应静候后续兵力到达，准备实行隔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塘之计划。

（九）如果我能包围下花园、怀来之敌，那就是最好的形势。

军委

八日七时

---

[1] 张垣，即今张家口市。

如东进追敌来不及
则以八纵等协助包围张垣[1]

（1948年12月8日）

杨、罗、耿，并告杨、李，程、黄[2]：

七日二十时半电[3]悉。三十五军两个师及一〇四军一个师东窜，宣化已无敌，你们不用全力向东猛追逃敌，而使用了八纵及四纵一个旅向宣化方面本来不妥，但既已如此部署，假如我们又要你们将八纵及四纵一个旅回头向东再追逃敌，时间上似乎已来不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2月7日20时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给杨成武、李天焕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第三十五军两个师已逃过下花园，被我十二旅阻击及十一旅追击，抓住于新保安附近。四纵于正午占下花园，已令四纵1个旅及三纵向东猛追，配合十二旅，最好将敌包围于新保安或沙城、土木地区，使之不与暂三军接通。现最大顾虑为张家口、宣化之敌向西突围。因此，已令八纵及四纵十旅，逼近宣化，杨李务必插断张宣联系，并于八纵及四纵1个旅到达后，加强西面及西北面，割断张宣联系交给一纵担任，力不足时，可四纵1个旅加上去。因此，三兵团则不要以两个纵队向东追击。

如果你们亦认为时间上已来不及，并认为杨李以八个旅包围张垣[1]敌人四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无绝对防止其逃跑的把握，则八纵及四纵一个旅可迅速加入对张垣之包围，并便将来歼击，以免两头失塌。如果你们认为回头向东时间来得及，并认为杨李八个旅包围张垣有绝对防止敌人逃跑之把握，则可令八纵及四纵一个旅立即回头向东，此事由你们自己临机决定。

军委

八日九时

---

[1]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杨成武部应以全力包围张家口之敌[1]

（1948年12月8日）

杨、李：

（一）三十五军既已东窜，张家口之敌有向绥远[2]逃跑可能。（二）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以三个纵队（八个旅）全力包围张垣[3]之敌，务必不使该敌逃跑。（三）如果你们包围不力，部署不周，让敌逃跑，则你们应负严重责任。（四）部署情形即告。

军委

八日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采取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1]

（1948年12月8日）

程、黄，杨、罗、耿，杨、李[2]，并告林、罗、刘，聂、薄[3]：

（一）据杨罗耿本日八时两次电[4]称，三十五军已被我抓住于宣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似指1948年12月8日8时40分和10时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前电说：三十五军被我十二旅阻击，十一旅追击，已抓住于新保安地区。目前态势最重要的是两着：一为确实包围张垣，一为包围三十五军，并使其不与暂三军会合。我已严令各部完成任务，并即进至前面指挥。后电说：我们已令三纵全部到新保安以东。四纵十二旅原在东面，接军委电后已令八纵即从辛庄地区开新保安，接替四纵在该地区以西之包围任务。四纵即再以1个旅适时转向东面，待八纵到后，即全部转到东面。以三四两纵全部担负隔断新保安与怀来敌之联系。

化、怀来间之新保安[1]地区，决以三个纵队全部包围该敌。（二）三十五军既被抓住，怀来之敌亦有可能不跑，十六军还有以一部增至怀来之可能，果如此，则对全局极为有利。（三）程黄率步骑九个师进至怀来附近时，如怀来之敌（一〇四军两个师）未跑，则迅速包围该敌。其办法以一个师至多两个师位于怀来以西阻止敌西逃，必须以八个或七个师攻占怀来、南口[2]间一段铁路线，控制康庄、青龙桥、八达岭[3]诸要地，迅速向东构筑几层阻击阵地，准备击退傅[4]部大量兵力的增援。位于怀来附近之我军，则应构筑围城阵地，准备打退城敌的突围攻击，如敌突围则集力歼灭之，如敌固守则久困长围之。（四）如怀来之敌已逃跑，则你们应于怀来地区休息数日后向南口、昌平转进，相机包围十六军一部或全部，用上述同样方法完成包围及阻援部署。（五）杨罗耿对新保安之敌，杨李对张垣[5]之敌，均采取迅速构筑多层包围阵地、长围久困、待命攻击之方针。杨罗耿部署重点在东面，杨李部署重点在西北两面，务使各敌不能逃跑，以利我东北主力陆续入关，完成对平、津、塘、唐[6]诸敌之部署。

军委

八日二十时

---

[1]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怀来县西北。

[2]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昌平县西部。

[3] 康庄、青龙桥、八达岭，均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4]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6] 平、津、塘、唐，指北平、天津、塘沽和河北唐山。

关于歼灭怀来之敌的指示电[1]

（1948年12月9日）

程、黄，杨、罗、耿，并告杨、李，林、罗、刘[2]：

（一）三十五军等三个师由新保安东逃，我二兵团以六个旅兵力未能阻住，怀来敌两个师向西接引三十五军，估计该敌集合五个师必星夜东逃。

（二）你们必须用全力包歼该敌于怀来地区，以猛攻方式歼灭其两三个师，然后将其残部包围之。

（三）如该敌逃脱，你们应负完全责任。

（四）你们应随先头纵队行进，不要落在后头指挥。

军委

九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东北部队以三五两纵威胁北平钳制敌人[1]

（1948年12月10日）

林、罗、刘：

（一）我们八日七时电[2]说，你们五、三两纵不要向西。现据杨罗耿[3]九日十四时电称，敌三十五军三个师由新保安[4]向东，一〇四军两个师由怀来向西，向我三、四两纵猛攻，杨罗耿已严令三、四两纵以固守与出击手段，保持两敌间阵地，不使两敌打通，要求程黄[5]以一个军至怀来以西，与杨罗耿之四个旅会歼一〇四军两个师，程黄之另一个军则在怀来、康庄线钳制十六军等语。现十六军两个师已至怀来，另一师在康庄，九十四军已至南口[6]，十三军在通县、顺义等处，九十二军已至北平东郊，北平城内为三十一军一个师，北平西南良乡、涿州为一〇一军两个师（地方部队编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即《准备割断平津，包围唐山，歼击芦台塘沽之敌》。

[3]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5]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6]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二）如程黄部能照杨罗耿办法，以一个军协同杨罗耿四个旅歼灭一〇四军两个师，则敌三十五军可继续由杨罗耿加以包围，敌十六军、九十四军亦可由程黄加以阻隔。但怕傅[1]部再将九十二军加上去，我程黄部对付十六军、九十四军、九十二军的集力攻击，恐有困难。（三）在此情况下，你们以五、三两纵西进是有必要的，但据你们九日十一时电称，五纵减员千余，又是战斗力不强的部队，由遵化至怀来至少须七天时间，恐已来不及，三纵在丰润距离更远。请你们考虑：以五纵进至南口、怀柔之间，向南口、怀柔之敌举行佯攻，从北面威胁北平；以三纵进至通县以南，向通县及平津路[2]举行佯攻，从东面威胁北平，以求钳制南口、通县、北平、怀柔等处之敌。是否可行，盼考虑决定。

军委

十日二时

---

[1]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2] 平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歼灭一〇四军的作战应力求迅速[1]

（1948年12月10日）

程、黄，杨、罗、耿[2]，并告杨、李，林、罗、刘[3]：

（一）据杨罗耿九日十四时半及二十一时半两次电称：新保安[4]敌三十五军九日数次向东猛突，均被我击退，怀来敌一〇四军向西猛犯，亦仅占我沙城[5]以南一个村子。（二）请程黄照杨罗耿提议，迅速以一个军协同杨罗耿歼灭一〇四军（两个师），另一个军则隔断怀来、康庄[6]之间及康庄、南口[7]之间诸敌的联系，并相机歼敌一部。（三）杨罗耿三四两纵昨（九）日击退东西两路犯敌，确保自己阵地，应传令嘉奖。八纵主力可移至新保安东面与三、四纵会合歼敌，西面留一部即够。（四）除十六军至怀来、康庄，九十四军至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和参谋长黄志勇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5] 沙城，镇名，今为河北省怀来县县治。

[6] 康庄，镇名，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7]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口为你们所知外，九十二军已至北平东郊。因此，你们歼灭一〇四军的作战，应力求迅速，只要该军歼灭，程黄即可用全力阻击东面之敌。

军委

十日三时

复何基沣、张克侠电[1]

（1948年12月10日）

何基沣、张克侠、孟昭涤、过家芳、崔振纶、杨干三诸将军并转全体官兵：

十一月二十八日通电阅悉，极为欣慰。你们在徐州前线率部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极有助于革命战争的发展。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改造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以便早日出动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给在淮海战场起义的国民党军何基沣、张克侠将军的复电。

迅速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1948年12月10日）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1]，并告聂、薄、滕[2]：

（一）程、黄十日十四时十五分电[3]悉。敌一〇四军既已退回怀来，你们两个军全部用于南口、怀来间阻援及打援是完全正确的。

（二）我杨李兵团（一纵）数日前曾于张垣[4]、宣化间歼敌一个师大部并占领宣化，昨（九）日又英勇击退张垣敌主力多次突击，确保自己包围阵地（二纵）。我杨罗耿兵团昨（九）日英勇击退新保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聂、薄、滕，指聂荣臻、薄一波、滕代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3] 指程子华、黄志勇1948年12月10日14时15分给中共中央军委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的电报。电报说：敌一〇四军东撤，十六军军部及一〇九师、二十二师六十六团被歼。在此情况下，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的兵力可包围住新保安之敌。东路可能来更多援敌，首先打通南口、怀来联系，因此已令十一纵及詹大南、苏启胜部就地停止集结，准备参加康庄附近之打援战斗，其三十二师已向八达岭开进。

[4] 张垣，即今张家口市。

安敌三十五军、怀来敌一〇四军的两面夹击，完成了对三十五军的确实包围。我程黄兵团前曾攻占密云（十一纵），九、十两日又歼十六军军部及该军一〇九师又二十二师一个团（四纵），并控制怀来、南口间铁路线，完成了对一〇四军的包围。凡此均堪庆贺，应予嘉奖。

（三）至此，傅[1]部本身主力三十五军、一〇四军、一〇五军各全部及两个骑兵旅，已被我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怀来三处，又将九十四军、九十二军从天津吸引至南口及北平，使天津、塘沽、唐山仅各有一个军（塘沽尚有一个独立师），对于大局极为有利。

（四）被围各敌必多方企图突围，望你们严令各部迅速完成一切必要的阻击阵地，务使各敌不能逃脱。

（五）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力进行的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完成歼敌十八个师任务之后，紧接着进行第二阶段，于徐州、宿县、砀山、永城、蒙城之间，包围敌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2]等四个兵团三十四个师，大约再有若干天即可解决该敌。如果我东北全军协同华北主力，能够于不久时间内，抓住并歼灭平、津、张、唐一线傅、蒋[3]北线全军步骑四十四个师旅，不使逃脱，则将使全国革命过程大为缩短。

军委

灰亥

（此电望通告各纵）

---

[1]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2] 黄维、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3] 蒋，指蒋介石。

关于平津地区的形势及部署[1]

（1948年12月11日）

林、罗、刘：

昨日电悉。（一）张家口、新保安[2]之敌已被我确实包围，十六军被歼一半，怀来敌一〇四军已南逃，程黄[3]正追击中。此敌如歼灭，程黄全部即可用于包围南口[4]、昌平之敌，并从西面威胁北平。我西面兵力已完全够用。现九十四军、九十二军、十三军、三十一军及傅[5]系余部集中于北平为中心之地区，天津、塘沽、芦台[6]、唐山一带共只有三个军及独九十五师，唐山之敌有准备撤走消息，而且被我刘邓、陈粟[7]包围于徐州西南地区之敌三十四个师，有在十天内外全部解决之可能。此敌解决，蒋匪全局动摇，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3]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4]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5]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 芦台，镇名，今为天津市宁河县县治。

[7]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粟，指陈毅、粟裕，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必重新部署。有可能以现在上海集中待命之数十艘船只突然北上，作接走平、津、塘、唐诸敌之计划，时间决于十天内外。因此，我们昨电[1]要你们以两个纵队向西之意见应当取消。我们已于十日二十时电告你们停止该两纵行动。你们接此电后，请立即令该两纵各就现地休整待命，并准备于唐山之敌有确实撤退征候即迅速包围唐山，抓住蒋系一个军，使其他蒋系部队难于下撤退的决心。如果唐山敌在十天内不撤，而你们在十天内能集中五个至六个纵队，则最好同时动作，以一部隔断天津、塘沽间联系，以一部包围唐山，以主力歼灭芦台、塘沽之敌，控制海口于我手中，则全局胜算在望。请按上述意图筹划一切。（二）傅作义代表正在由涿州来平山途中，我们仍本前告策略和他谈判，要他抓住中央系各军不放，便于我先解决中央系。（三）傅作义近日指挥极为慌乱，解决平、津、塘、唐诸敌可能不要很久。

军委

十一日二时

---

[1] 即《东北部队以三五两纵威胁北平钳制敌人》。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

（1948年12月11日）

林、罗、刘：

一、张家口、新保安、怀来和整个北平、天津、塘沽、唐山诸敌，除某几个部队例如三十五军、六十二军、九十四军中的若干个别的师，在依靠工事保守时尚有较强的战斗力外，攻击精神都是很差的，都已成惊弓之鸟，尤其你们入关后是如此。切不可过分估计敌人的战斗力。我们有些同志过去都吃了过分估计敌人战斗力的亏，经过批评后他们也已懂得了。现在张家口、新保安两敌确已被围，大体上很难突围逃走。十六军约有一半迅速被歼。怀来敌一〇四军慌忙南逃，估计今日或明日可能被歼。该敌被歼后，你们准备以四纵由西南[2]向东北切断南口和北平间联系。估计此着不易实现，不是九十四军和十六军残部迅速撤回北平，就是九十四军、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集中南口、昌平、沙河镇区域集团防守。但四纵此举直接威胁北平西北郊和北郊，可以钳制这些敌人不敢动。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平津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3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的最后一个。这个战役歼灭和改编了52万多国民党军，解放了北平、天津、张家口等重要城市，基本上结束了解放华北的战争。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战役方针，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2] 这里说的“西南”，是指南口西南地区。

这些敌人再敢西进接援三十五军，则可以直接切断其后路或直接攻北平，因此，这些敌人大约不敢再西进。我华北杨罗耿[1]兵团以九个师包围三十五军三个师，是绝对优势。他们提出早日歼灭该敌，我们拟要他们暂时不要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他们此次以两个纵队围住三十五军，以一个纵队阻住一〇四军，两敌都被击退。

二、我们现在同意你们以五纵立即去南口附近，从东北面威胁北平、南口、怀柔诸敌。将来该纵即位于该地，以便将来（大约在十天或十五天之后，即在华北杨罗耿兵团歼灭三十五军之后）腾出四纵使用于东面。如此，请令五纵本日仍继续西进。

三、三纵决不要去南口，该纵可按我们九日电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从东面威胁北平，同四纵、十一纵、五纵形成对北平的包围。

四、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

五、据我们估计，大约十二月十五日左右你们的十纵、九纵、六纵、八纵、炮纵、七纵就可集中于玉田为中心的地区。我们提议，十二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数日内即取神速动作，以三纵（由北平东郊东调）、六纵、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等六个纵队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之敌，如果诸点之敌那时大体仍如现时状态的话。其办法是以两个纵队位于以武清为中心的地区，即廊坊、河西务、杨村诸点，以五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古冶诸点之间，隔断诸敌之联系。各纵均须构筑两面阻击阵

---

[1]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

地，务使敌人不能跑掉，然后休整部队，恢复疲劳，然后攻歼几部分较小之敌。此时，四纵应由平西北移至平东。我华北杨罗耿兵团应于四纵移动之前歼灭新保安之敌。东面则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以上部署，实际上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北平、怀柔、顺义、通县、宛平（涿县、良乡已被我占领）、丰台、天津、塘沽、芦台、唐山、开平诸点之敌一概包围了。

六、此项办法，大体上即是你们在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滦县线上作战时期用过的办法[1]。

七、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

八、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们准备令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已歼约一半左右）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

九、为着不使敌人向青岛逃跑，我们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

十、敌向徐州、郑州、西安、绥远诸路逃跑，是没有可能或很

---

[1] 东北野战军1948年9月在北宁线作战时，为不使义县、锦州、锦西、兴城、绥中、榆关（山海关）、滦县、昌黎之敌收缩集中，采用了先以一部分兵力分别包围和切断上述各点之敌，然后逐一歼灭的办法。

少可能的。

十一、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

十二、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

十三、敌人对于我军的积极性总是估计不足的，对于自己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虽然他们同时又是惊弓之鸟。平津之敌决不料你们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能够完成上列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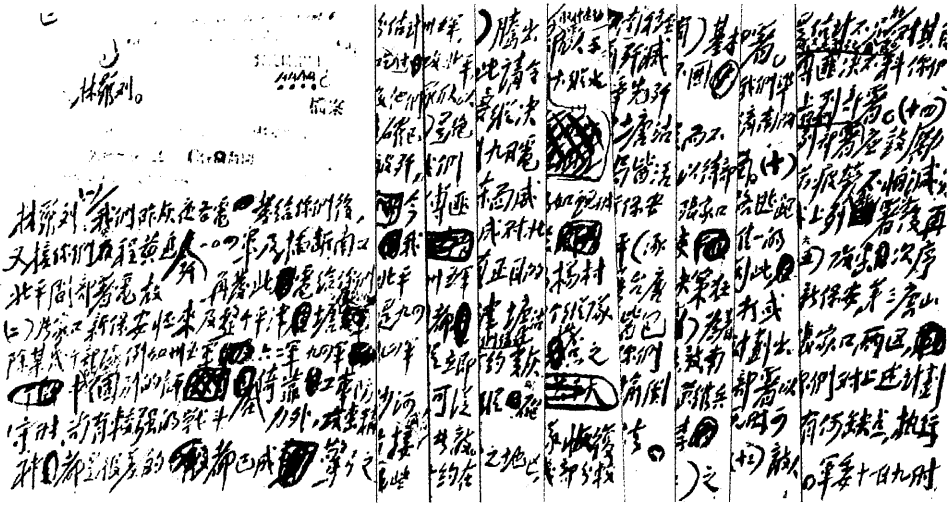
十四、为着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上列部署，你们应该鼓励部队在此两星期内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在完成上列部署以后，再行休整，然后从容攻击。

十五、攻击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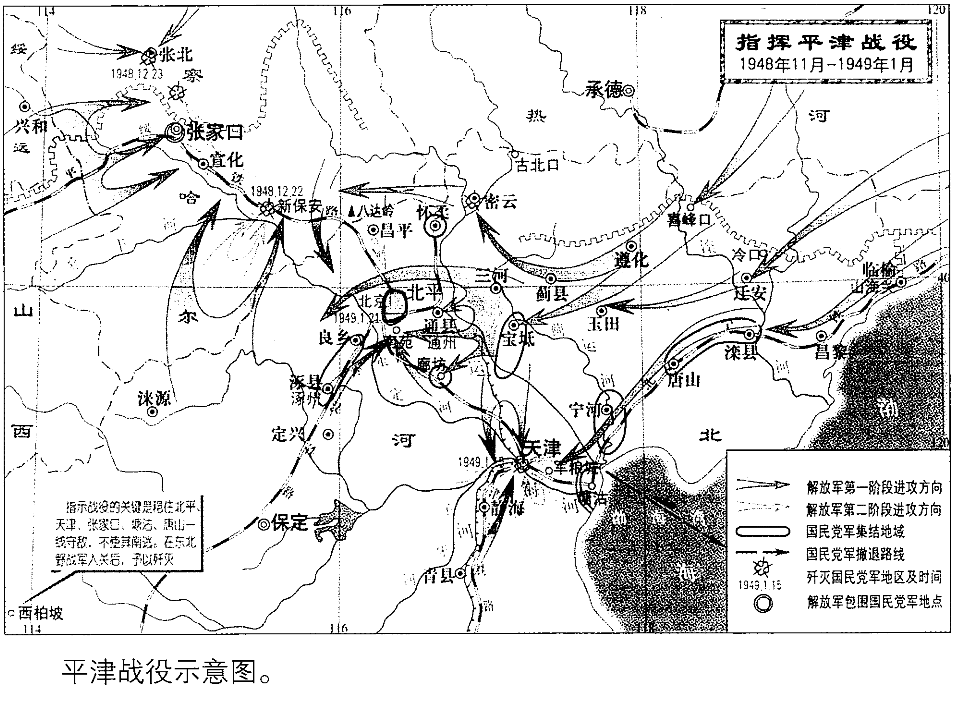
十六、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个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望考虑电告。

军委

十一日九时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手稿。



指挥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1949年1月
张北
1948.12.23
察
张家口
兴和
绥
远
宣化
1948.12.22
新保安
八达岭
怀柔
密云
古北口
承德
热
河
喜峰口
昌平
遵化
冷口
临榆
山海关
迁安
三河
蓟县
北平
1949.1.21
良乡
通县
通州
南苑
宝坻
玉田
滦县
昌黎
廊坊
唐山
涿县
涿州
宁河
天津
1949.1.15
军粮城
塘沽
静海
哈
尔
山
西
涞源
定兴
河
北
保定
青县
西柏坡
渤
海
114
116
118
120
40
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
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
国民党军集结地域
国民党军撤退路线
1949.1.15
歼灭国民党军地区及时间
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军地点

指示战役的关键是稳住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一线守敌，不使其南逃。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后，予以歼灭

平津战役示意图。

关于五纵三纵十纵的部署[1]

（1948年12月11日）

林、罗、刘：

灰十八时电[2]悉。（一）同意五纵本日继续向南口[3]附近开进。（二）三纵不应去南口，而应开至北平以东、通县以南地区。（三）十纵原地不动。（四）理由详另电。

军委

十一日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10日18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已令三五两纵全力向南口前进，抓住南口之敌和防止平敌继续北援，并在南口以南寻机歼敌。该两纵统归萧劲光、陈伯钧指挥。五纵本晚以强行军出发，估计12号早晨即可到南口附近。已令我十纵先头师本晚自玉田以东直接向北平、通县间急进，截断十三军退路，佯攻北平，牵制敌人和造成敌之混乱。该纵主力继续跟进。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确实围住三十五军全力防敌突围[1]

（1948年12月11日）

杨、罗、耿，并告程、黄[2]：

（一）程黄全部南下追歼一〇四军，怀来、康庄[3]线上空虚。（二）请令詹牛苏[4]部速进占怀来、康庄线，一部向八达岭迫近，并沿途建立阻击阵地，以防九十四军西进。（三）你们三个纵队主力对三十五军迅速完成诸层阻击阵地，确实围住该敌，抽出一部在沙城、土木构筑向东阻击阵地，以防九十四军的万一西进。（四）目前全力防敌突围，大约十天以后方能攻歼该敌，你们预作攻击准备是可以的，但不要实行攻击。

军委

十一日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康庄，镇名，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4] 詹牛苏，指詹大南、牛树才、苏启胜，当时分别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杨成武部须准备打退敌人多次进攻[1]

（1948年12月11日）

杨、李，并告杨、罗、耿[2]：

灰二十二时电[3]悉。（一）你们昨日又击退敌人一次进攻，甚慰。（二）你们必须准备对付敌人多数次攻进而打退之，特别是今后两星期内要注意。（三）两星期后杨罗耿攻歼三十五军，尔后即和你们集力打张垣[4]。

军委

真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2月10日22时杨成武、李天焕关于敌新三十二师向南天门我十六旅阵地进攻被我击退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区等的电报。

[4]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三纵到北平以东可试图切断平津路[1]

（1948年12月11日）

林、罗、刘：

真十五时电[2]悉。（一）既然五纵十二日晨即可到南口[3]以南，该纵即可使用于该方面，不要再变动。（二）三纵到通县以南、北平以东（不是北平以南）地区，可试图切断平津路[4]，但不要破坏。

军委

十一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11日15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东北野战军五纵先头师本日已到龙头（怀来、顺义间），明（12日）晨可到南口、昌平以南，会合四纵、十一纵堵击南口之敌。已令三纵改向通县、北平以南前进。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4] 平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华北部队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1]

（1948年12月11日）

聂、薄、滕、赵，华北局，林、罗、刘、谭[2]：

东北我军正陆续入关，攻击平、津、张、唐[3]诸敌之作战业已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战役，不但两区野战军应归林罗刘谭统一指挥，冀中七纵及地方兵团，亦应统一指挥。望华北军区即令七纵及冀中军区与林罗刘谭接通电台联系，向林罗刘谭报告情况，接受任务。冀中军区并应派员去蓟县林罗处接洽，华北军区、华北局亦应派员去蓟县将平津情况，准备接收平津的干部配备，及管理平津的各项政策告知林罗，同时加强电台通讯，使林罗知道华北所准备的一切重要事项。

中央军委

真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林、罗、刘、谭，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

[3] 平、津、张、唐，指北平、天津、河北张家口和唐山。

同意以程黄两纵及五纵包围南口昌平之敌[1]

（1948年12月11日）

林、罗、刘：

真十八时电[2]悉。（一）同意以程黄[3]两纵及五纵包围南口[4]、昌平之敌。（二）杨罗[5]包围三十五军毫无问题。张家口虽有敌五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杨李[6]以八个旅包围该敌似觉不足，但杨李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11日18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暂三军战斗结束后，暂时不打掉三十五军，将该敌包围起来，则能使傅作义难于下决心全力东退，而东退又不可能。故以两杨对付三十五军及张家口之敌，即以程黄所率两个纵队及第五纵仍以包围南口、昌平为宜。这样，就更使敌人不仅不能撤退，而且不能集中兵力防守北平。

[3]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4]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5] 杨罗，指杨得志、罗瑞卿，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日已打退敌人几次出击。绥远[1]李井泉姚喆[2]所率一个纵队已在集宁、卓资山[3]布防，王平[4]率北岳地方兵团位于张家口以西之南壕堑，蒙骑一部在张北附近。杨李正拟以姚喆、王平、蒙骑各部攻歼张北尚义两处傅[5]军一个骑兵旅及地方匪部，肃清察[6]北、绥东一切匪众，使张家口更陷孤立，估计亦无大问题。（三）我们原估计四纵、十一纵、五纵难于达到包围南口、昌平敌人之目的，假如达到了包围目的，当然很好。但如果该地敌人不增加兵力，则只有九十四军两个师及十六军一个师，我则有十二个师，未免使用兵力太多。可待包围完成、两面阻击阵地筑好以后，将一个纵队调至通县以南与三纵一起，从东面包围北平。

军委

十一日二十四时

---

[1]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2] 李井泉，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政治委员。姚喆，当时任绥蒙军区司令员兼第八纵队司令员。

[3]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4] 王平，当时任北岳军区司令员。

[5]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 察，指察哈尔，旧省名，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同意迅速包围南口昌平唐山等敌[1]

（1948年12月12日）

林、罗、刘并程、黄[2]：

各电均悉。（一）同意迅速包围南口[3]、昌平之敌，包围时注意以主力位于南口、北平间，只以一小部攻占八达岭[4]。（二）同意迅速包围唐山、芦台[5]之敌，如芦台敌已撤至塘沽，则包围塘沽。（三）新保安[6]确为三十五军两个师，三十五军之另一个师在北平，程黄全力可用于包围南口、昌平。

军委

十二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4] 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5] 芦台，镇名，今为天津市宁河县县治。

[6]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包围通县之敌切断平津联系[1]

（1948年12月12日）

林、罗、刘，程、黄[2]：

（一）程黄十二日十八时电[3]悉。（二）南口[4]之敌已向北平逃跑，程黄除以一个师控制南口、八达岭[5]外，四纵、十一纵、五纵应星夜兼程包围通县敌十三军（五个师），以三纵切断平津联系。（三）如通县之敌亦退入北平，则以三纵、四纵、五纵、十一纵全部包围北平。（四）如北平之敌亦向天津逃跑，则以一个纵队占领北平，以三个纵队向天津、塘沽猛追。

军委

十二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等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指1948年12月12日18时30分程子华、黄志勇关于南口之敌昨晚南逃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并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

[4]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5] 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

（1948年12月12日）

刘、陈、邓、粟、谭[1]：

（一）黄维兵团[2]歼灭后，请伯承同志来中央商谈战略方针。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李[3]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如粟、谭不能分身到总前委开会，则请伯承至粟、谭指挥所，与粟、谭见一面，了解华野情况，征询粟、谭意见，即来中央。我们希望伯承能于亥哿至亥有[4]间到达中央会谈。

（二）我们对今后作战方针大致意见如下：甲、在全歼黄、邱、李诸敌后，华野、中野两军休整两个月（分为四期，每半月为一期），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诸件（雨衣、货币、炮弹、治疗药

---

[1] 刘、陈、邓、粟、谭，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他们五人组成总前委，统筹淮海战役一切事宜。

[2] 黄维兵团，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3] 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4] 亥哿至亥有，即12月20日至12月25日。

品、汽船等）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乙、在江淮间现有诸敌未退至江南的条件下，两军协力以一个月至两个月时间举行江淮战役[1]，歼灭江淮间诸敌，占领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以东、大海以西诸城镇，主要是安庆至南通一带诸城镇，控制长江北岸。丙、然后再以相当时间，最后地完成渡江的诸项准备工作，即举行渡江作战。其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丁、华野、中野两军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浙江福建两全省、江西一部，并夺取芜湖、杭州、镇江、苏州、南京、上海、福州诸城而控制之。戊、东北我军协同华北主力，于明年一、二两月完成夺取平、津、张、唐任务，三、四两月休整，五月沿平汉南下，六、七两月执行江汉战役[2]，并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八月渡江。第一步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包括夺取武汉、岳州[3]、长沙、常德、宝庆、衡州[4]、郴州、九江、南昌、吉安、赣州在内；第二步夺取两广。己、华北主力协同东北我军夺取平、津、张、唐后，如那时太原尚未攻下，则协力夺取太原，然后以杨罗及杨成武两部[5]夺取绥远[6]、

---

[1] 江淮战役于1949年1月16日至24日举行。这次战役歼灭了残留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并向江南撤退的敌人，解放了江淮间广大地区。

[2] 江汉战役，因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的胜利，江汉（汉水）地域之敌害怕被歼，纷纷向长江以南撤退，故计划中的此次战役实际上没有进行。

[3] 岳州，即湖南岳阳。

[4] 宝庆、衡州，即湖南邵阳和衡阳。

[5] 指杨得志、罗瑞卿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杨成武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

[6] 绥远，即绥远省，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宁夏，与彭贺[1]会合。徐周兵团[2]则早日与彭贺会合，先肃清兰州、潼关线上及其以南以北诸敌，并夺取潼关、西安、天水、汉中诸城，然后入川。庚、争取于明年秋季至迟冬季修好津浦、平汉、陇海三路，以津浦供应你们，以平汉供应林罗[3]，以陇海供应彭贺。辛、上述计划是就现时敌我形势及将来敌方可能部署为基础来考虑的。在你们当面之敌及平津之敌被歼后，估计敌方部署将以较多的兵力位于江南，以第二部兵力位于湘、鄂、赣，以第三部兵力位于川、陕。壬、上述计划是从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考虑出发，采取稳扎稳打方针，和我们过去与陈、邓、粟三同志所谈者有些不同，请你们于伯承动身前加以考虑。

（三）此电只发刘、陈、邓，请小平负责于粟、谭至你处开会时，给粟、谭二人一阅，阅后焚毁，保守机密。

中央军委
亥文

---

[1] 指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西北野战军和贺龙任司令员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部队。

[2] 徐周兵团，指徐向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

[3] 指林彪、罗荣桓分别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东北野战军。

防止北平通县敌人逃跑[1]

（1948年12月13日）

林、罗、刘，程、黄：

（一）我们十二日二十三时电[2]谅达，请作如下改变：甲、以一个师控制南口、八达岭[3]，固守此点不变。乙、请立刻令三纵以两个师位于北平东南，以两个师位于通县东南，切断平津铁路[4]和通津公路，迅速构筑阻击阵地，务必死守两天，防止平、通敌人逃跑。丙、四纵、五纵、十一纵除留南口一个师外，其余全部星夜兼程，取直径开至北平东南及通县东南，和三纵在一起切断平津间及通津间联系，不要阻止通县敌人向北平集中，必须阻止平、通敌人向天津集中。丁、如通县敌人已向北平集中，则以一个纵队占领通县，其余全部切断平、津。戊、如平、通敌人均向天津退却，则我以一个纵队占领平、通，以三个纵队向天津猛追。（二）请林罗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的电报。

[2] 即《包围通县之敌切断平津联系》。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4] 平津铁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迅速派部包围塘沽、芦台[1]两点之敌，对唐山之敌则暂时置之不理。

军委
十三日一时

---

[1] 芦台，镇名，今为天津市宁河县县治。

巩固地控制南口八达岭一带[1]

（1948年12月13日）

杨、罗、耿，并告程、黄，林、罗、刘[2]：

（一）南口[3]敌人向北平逃跑。我们已令程黄主力开往北平、通县东南，切断平津、通津[4]间联系，只留一个师控制南口、八达岭。你们应即派员去南口与该师联络，要他们巩固地控制南口、八达岭一带，向北平方向构筑坚强阻击阵地，如遇敌人进犯，则坚决阻击之。你们与该师应接通电台联系，并送密本去。（二）詹大南[5]部应位于八达岭、怀来之间，同样构筑多层阻击阵地，詹部受你们指挥。

军委

十三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4] 通津，指北京通县和天津。

[5]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迅速包围塘沽以防平津等敌从海上逃跑[1]

（1948年12月13日）

林、罗、刘：

除三、四、五及十一等四个纵队使用于平通[2]东南，切断平津、通津联系（另以一个师控制南口、八达岭[3]）已见前电外，请令后到的三个纵队，全部包围塘沽一点，隔断天津、塘沽间及芦台[4]、塘沽间联系，向天津、芦台两面构筑坚固阻击阵地，不要分兵去围唐山，也不要分兵去围芦台。如塘沽之敌很多则监视之，不多则相机歼灭之。此举务望迅速，以防平、通、津、唐诸敌向塘沽集中，从海上逃跑。

军委

十三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平通，指北平（今北京）和通县。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4] 芦台，镇名，今为天津市宁河县县治。

准备阻击可能由天津经济南向青岛逃跑之敌[1]

（1948年12月13日）

华东局，并告粟、谭，林、罗[2]：

东北主力入关，正在部署切断北平、天津、塘沽数点间的联系，准备攻击平、津、塘（唐山敌人正在撤退）。如果敌人别处无路可逃，而由天津经济南向青岛逃走时，你们即须担负阻击之责，以便配合我追击大军歼敌于济南一带黄河北岸。你们在济南一带尚有多少兵力可用，能否堵住黄河南岸，吴化文[3]部现在何处，何张部可否用于此处，望预先筹划电告。

军委

十三日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吴化文，原为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年9月起义后任华东野战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歼灭津塘线之敌然后控制海口[1]

（1948年12月13日）

林、罗、刘：

（一）据唐山铁路局话报台十二日十五时称，唐山守军尚未撤完，共军尚未入市，老百姓很混乱等语。估计唐山敌昨（十二）日可撤完。（二）你们除以一个师进入唐山、开平[2]，协助冀东所派市委、市府维持秩序外，应以三个纵队迅速插入天津、塘沽间，歼灭津塘线[3]上之敌，控制该线，隔断津、塘联系。然后，相机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

军委

十三日四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开平，镇名，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东北。

[3] 津塘线，指天津至塘沽的铁路，即今京哈线一段。

堵住北平通县天津之敌的退路[1]

（1948年12月13日）

林、罗、刘，程、黄，并告杨、罗、耿[2]：

（一）在青龙桥、八达岭[3]、南口[4]、昌平地区敌军确实退走的条件下（是否确实退走请程黄查明），北平、通县区域的傅[5]军残部及中央军（共有十五个师），或者固守北平，或者退往天津，很少可能沿平绥路[6]西退。故我们要程黄只留一个师控制八达岭、南口线（该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其余全部迅速向东南移动，会合三纵、五纵切断平津路[7]、通津路。现在为稳当起见，可以留下一个纵队位于八达岭、南口一线，构筑多层阻击工事，即万无一失。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和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参谋长黄志勇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4]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5]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6] 平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7] 平津路，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面康庄[1]、怀来等处有詹大南[2]部控制，土木、沙城[3]有杨罗耿两个旅控制，故不要留下超过一个纵队的兵力。（二）程黄率一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向北平、通县东南地区移动。（三）请林罗刘即令五纵迅往平、通东南。（四）只要我有三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的力量（包括三纵在内）到达平、通东南地区，平、通敌人即被堵住了。（五）只要我有三个纵队插入天津、塘沽之间，天津敌人即被堵住了。（六）程黄留在南口地区之纵队可交杨罗耿指挥。所有从南口经张家口至卓资山[4]一带之我军，统归杨罗耿指挥。程黄兵团部可去指挥平、通东南地区的各纵。萧陈兵团[5]部可去指挥津塘地区的各纵。以上如林罗刘同意即照此实行。平绥前线委员会即取消。

军委

十三日五时

---

[1] 康庄，镇名，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2] 詹大南，当时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

[3] 土木，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中部。沙城，镇名，今为河北省怀来县县治。

[4]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5] 萧陈兵团，指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陈伯钧。

中央军委关于准备接收北平、天津、唐山的指示[1]

（1948年12月13日）

聂、薄、叶、黄，并告林、罗、刘[2]及黄克诚：

（一）据报南口敌退北平，唐山芦台敌亦正在撤退，平津两敌动向望令二局充分注意。

（二）荣臻、彭真、剑英、黄敬应时刻准备率领接收人员及工作干部乘车出发驰赴平津，如敌逃跑或有逃跑征候，应立即出发，如敌固守则在现地待命出发。

（三）你们应与林罗刘密切联系。

（四）此次接收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不要重犯接收石家庄初期所犯的那些错误。

（五）请林罗刘谭注意攻城部队及卫戍部队的纪律事项。

（六）请林罗刘谭指导冀东接收唐山的工作人员及卫戍部队，好好地接收及保卫唐山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和叶剑英、黄敬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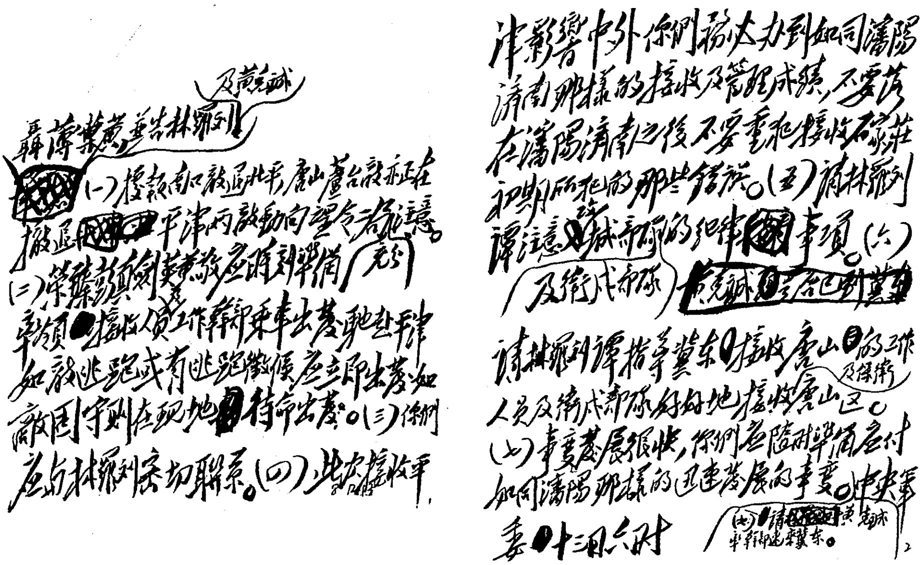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七）事变发展很快，你们应随时准备应付如同沈阳那样的迅速发展的事变。

（八）请黄克诚率干部速来冀东。

中央军委

十三日六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准备接收北平、天津、唐山的指示》的手稿。

全力阻击延迟敌人南逃[1]

（1948年12月13日）

聂、薄、滕、赵：

假如平津敌人沿平汉、津浦两路向南逃跑，你们应以一切可用力量部署阻击，迟延敌人，以便配合追击主力歼敌，请你们想到这一点，并以预拟办法电告。

军委

十三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治委员薄一波、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从东南面包围北平之敌[1]

（1948年12月13日）

林、罗、刘，程、黄[2]，并告聂、薄[3]：

（一）各电均悉。（二）黄程应照林罗刘十二日二十一时半电指示，速到北平附近指挥三个纵队。三个纵队均直向北平迫近。（三）程黄到达平北后，如北平之敌未退，则以两个师（不是一个师，也不是一个纵队）控制南口、八达岭[4]线，其余各部统由北平以西取直径绕到北平以南及东南控制平津路，从东南面包围敌人（不要去通县东南）。（四）程黄到北平附近后，如北平之敌正在溃退，亦照上述办法绕歼溃敌。在溃敌歼灭后，子华即率两个师占领北平，负责维持秩序（注意纪律），其余部队交林罗刘用电台直接指挥，或交萧陈[5]指挥，向天津追击。在此种情况下，南口方面即不要留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等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3] 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5]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和副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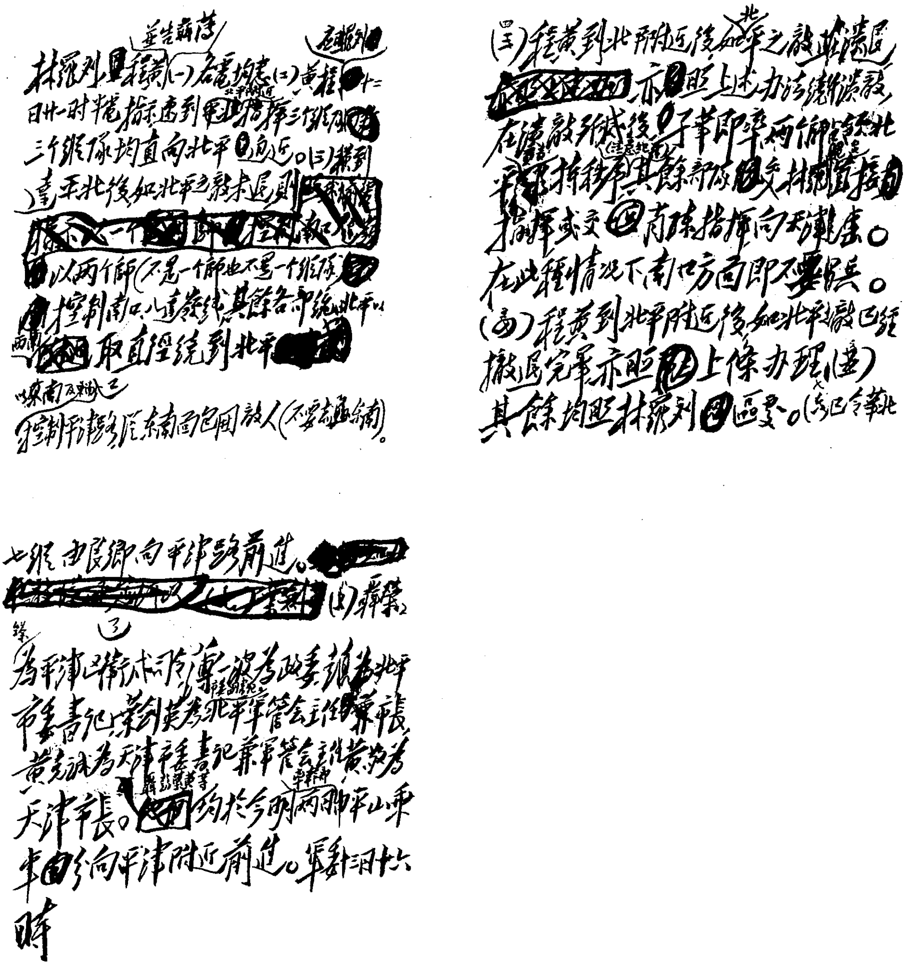
（五）程黄到北平附近后，如北平之敌已经撤退完毕，亦照上条办理。（六）其余均照林罗刘区处。（七）已令华北七纵由良乡[1]向平津路前进。（八）聂荣臻为平津区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长。聂、彭、叶、黄等均于今明两日率干部由平山乘车分向平、津附近前进。

军委

十三日十六时

---

[1] 良乡，旧县名，1958年划归北京市。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从东南面包围北平之敌》的手稿。

四纵应留南口八达岭防御[1]

（1948年12月14日）

林、罗、刘，并程、黄：

昨日十五时半林罗刘来电[2]已悉，部署甚好。北平、通县之敌是否撤退，我们至今还未得到证明。我们原来极担心平、通东南兵力不足，现知三、六、十三个纵已到或正向该地前进，敌人又不会经通津公路退却，则有三、五、六、十及十一等五个纵队位于平、通以南已很够用。四纵应留在南口、八达岭进行防御，待情况判明后再定该纵行止较为适宜。

军委

十四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等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13日15时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程子华、黄志勇、吴克华、莫文骅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1. 南口、昌平、沙河镇我军昨日皆已占领。2. 我三纵本晨已到达通县以南，并歼敌地方团一部。3. 我四纵可暂进至南口后，占领八达岭、南口阵地，进行防御，待查明平敌确实企图后，再定行止。4. 我十纵、六纵继续向通县、北平以南前进。我五纵、十一纵应继续向宛平、北平以南前进。5. 我九纵昨已占唐山，并继续南进中。"

围歼杜聿明邱清泉李弥的各纵只作防御不作攻击[1]

（1948年12月14日）

粟：

你们围歼杜邱李[2]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待黄维[3]歼灭后，集中较多兵力，再举行攻击。

军委

十四日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

[2] 杜，指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3] 黄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加厚对北平东南的阻击兵力[1]

（1948年12月15日）

林、罗、刘：

十四日各电[2]均悉。（一）三纵、十纵已插到北平以南及铁路上甚好。六纵现至何处？我们认为六纵仍应使用于北平以南铁路线上，加厚对北平东南的阻击兵力，以防北平敌人集中全力（十八个师）向天津突逃。（二）宛平[3]之敌是一〇一军两个师，均地方保安部队编成，由保定撤回者。我们认为你们既已令五纵、十一纵包围该敌，即应令该两纵迅速歼灭该敌，然后转至北平东南，加厚该方兵力，以便将来攻击天津时，能从北平东南抽出一部力量。此点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14日11时和20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前电说，东北野战军第三纵、十纵昨今两日已陆续到达北平、通县以南，廊坊以北地区。我在平津间、廊坊以北地区，数日内可达5个纵队（含华北第七纵），粮草需要量甚大，盼令固安、永清、霸县等地设法分担部分供应。后电说，由于我三纵、十纵本日已插到北平以南及铁路上，尚未发现敌人撤退，故已改令五纵、十一纵包围宛平之敌。

[3] 宛平，旧县名，1952年并入北京市。

酌办。华北七纵在程黄[1]歼灭宛平之敌后，可移至宛平地区防守。以上请酌办。

军委

十五日二时

---

[1]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

攻击三十五军需在完成对平津包围之后[1]

（1948年12月15日）

杨、罗、耿，杨、李[2]，并告林、罗、刘[3]：

（一）杨罗耿十四日十四时电悉。加紧完成对三十五军的攻击准备甚好。实行攻击时间需待东北主力入关，确实完成对平津两地的包围之后，大约在二十日左右。（二）杨罗耿以九个旅对敌两个师及一部杂军，自可保障胜利。惟三十五军歼灭后，张家口敌有突逃可能，杨李以八个旅包围敌五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有无确实阻敌把握，是否需要从南口[4]的东北四纵调一部分（例如一个师），增强杨李包围及万一敌突逃时的追歼兵力，尚义、张北之敌何时可肃清，蒙骑有多少兵力，现位何处，均请你们分别电复。

军委

十五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等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

（1948年12月15日）

请你们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等。

---

[1] 这是毛泽东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程子华、黄志勇电的主要内容。

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归林罗刘直接指挥[1]

（1948年12月16日）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2]，并告薄、滕、赵[3]：

（一）自明（篠）日起，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之作战，归林罗刘直接指挥。（二）除七纵及冀中军区已有电令归林罗刘指挥外，北岳军区在配合平绥线[4]及北平作战亦有与林罗刘发生联系之必要，除北岳地方主力已在张家口以西配合杨李作战归杨李指挥外，请薄滕赵查告北岳方面是否尚有军区机构，及在平西一带兵力配备情形，以凭决定。

军委

十六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等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薄、滕、赵，指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4]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铁路，即今京包线。

准备增加包围张家口的兵力[1]

（1948 年 12 月 16 日）

林、罗、刘，程、黄，杨、罗、耿，杨、李[2]：

（一）据杨李十五日十二时半电（此电已转发林罗刘），认为张家口敌人兵力在五万以上，在杨罗耿开始攻歼三十五军或三十五军已被歼时，该敌有极大可能突围逃跑，认为在攻击三十五军以前有增加一部兵力之必要。（二）我们对于张家口五万以上敌人无论如何不应让其逃跑，应当在杨罗耿攻歼三十五军以前增加一部兵力，待三十五军歼灭，杨罗耿兵团移至张家口以后，该增加之兵力即可调回。（三）现在问题是应当增加多少兵力，现东北四纵在南口、八达岭[3]地区，十一纵已至宛平[4]地区，如果增加一个师或二个师足以保障张家口敌人不跑，则可从四纵调出。但依杨李电看来，似乎仅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等的电报。

[2] 程、黄，指程子华、黄志勇，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和参谋长。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八达岭，长城关隘，位于北京市延庆县南部。

[4] 宛平，旧县名，1952 年并入北京市。

加一个或两个师还不能保障敌人不跑，要增加一个纵队才有充分保障。如果要将四纵全部开张家口，则要将十一纵开回南口、八达岭，才能保障南口、八达岭阵地。（四）请你们回答下列问题：甲、杨罗耿攻击三十五军大约需要几天时间。乙、南口、八达岭听说十分险要，是否有一个师固守，即无被敌攻破之危险。丙、如果杨罗耿能于两三天内歼灭三十五军，南口一带有一个师即能守住，则可考虑以四纵主力三个师开张家口，否则要十一纵返回南口、八达岭接替四纵任务，然后以四纵全部开张家口，或者以十一纵开张家口。请程黄、杨罗耿各以所知南口、八达岭情况电告。（五）请林罗刘就全般局势加以考虑。

军委

十六日八时

抽调两个旅参加夺取张家口战役[1]

（1948年12月16日）

周、陈、胡：

（一）是否可以从你们那里临时抽出两个旅，参加夺取张家口之作战？（二）由太原附近到张家口需要几天行程？以上二点盼复。

军委

十六日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和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电报。

向杜聿明邱清泉李弥部连续进行政治攻势[1]

（1948年12月16日）

粟裕，并告刘、陈、邓：

（一）黄维[2]被歼，李延年[3]全军退守淮河南岸。（二）我包围杜聿明[4]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三）向杜邱李[5]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军委

十六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的电报。

[2] 黄维，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该兵团于1948年12月15日在安徽省濉溪县南部双堆集附近地区，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黄维被俘。

[3]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4]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5] 杜，指杜聿明。邱李，指邱清泉、李弥，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同意林罗刘的军事部署意见[1]

（1948年12月16日）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杨、李[2]：

（一）林罗刘十六日十六时电悉。（二）即按林罗刘意见，以四纵全部开张家口归杨李指挥，位于张家口西面，防敌西逃。以十一纵位于八达岭、南口、沙河镇地区，接四纵防。以上即请林罗刘令行。

军委

十六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

（1948年12月16日）

（一）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二）具体策略现在不作决定，等候傅作义代表到三河与你们接谈后，将谈话内容电告我们，再行考虑。（三）傅作义主力三个军，一个被歼，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傅作义仅有三十五军一个师，一〇一军两个师，及一个骑兵师，北平绝对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只有陈长捷是亲蒋又亲傅的），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但在不损害本电第一条所述基本原则，亦即你们来电所说的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这一原则的范围内，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傅作义是战犯，傅集团内某些人是华北人民十分痛恨的），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四）但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此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五）至于其他敌方可能提出的条件，待他们提出后再说。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和傅作义谈判的原则与策略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的主要内容。

华北军一兵团不要去张家口[1]

（1948 年 12 月 17 日）

徐、周、陈、胡：

已有别部去张家口，你们部队不要去了。

军委

十七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和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电报。

应继续攻歼尚义一带之敌[1]

（1948年12月17日）

杨、李，并告杨、罗、耿[2]：

（一）十六日二十二时电悉，攻克张北甚慰。（二）你们应继续攻歼尚义一带之敌，务将察北[3]各杂部扫荡干净。

军委

十七日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察北，指原察哈尔省（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张家口、长城以北地区。

约在明年一月正式攻击天津北平张家口之敌[1]

（1948年12月17日）

林、罗：

（一）你们后面各纵陆续到达，大约月底可以完成对津塘[2]部署。除应争取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歼塘沽地区之敌及新保安[3]之敌外，对津平张[4]三敌的正式攻击，须待部队休整一时期方能开始，时间大约在明年一月中旬或下旬，如有特殊变化例如敌军投降则在例外。平津攻克后，全军须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向长江流域前进，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二）刘邓、陈粟两军[5]大约可于二十天内外歼灭杜聿明[6]部，他们亦须休整两个月，再举行江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

[2] 津塘，指天津和塘沽。

[3]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4] 津平张，指天津、北平和河北张家口。

[5] 刘邓、陈粟两军，指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

[6]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战役，歼灭江淮间诸敌，然后渡江南进，时间大约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三）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薄一波[1]四同志于本月底来中央商量明年整个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各军担任的方面及诸项准备工作），开会时间大约三天左右。（四）罗荣桓同志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商谈，往返及开会大约须耽搁两星期左右，望考虑电告，以凭决定。

中央
篠辰

---

[1] 饶漱石、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和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充分注意保护北平工业及重要文化古迹

（1948年12月17日）

林、罗、刘[1]，并告程、黄：

（一）丰台、门头沟、石景山、长辛店系重要工业区，我五纵、十一纵正在此区作战，望令他们充分注意保护工业。其办法是一切原封不动，用原来的工人、职员、厂长、经理办事，我军只派员监督，派兵保护。

（二）沙河、清河、海淀、西山系重要文化古迹区，对一切原来管理人员亦是原封不动，我军只派兵保护，派人联系。尤其注意与清华、燕京等大学教职员、学生联系，和他们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战时减少损失。

（三）十一纵既在石景山作战，并尚须协同五纵在丰台一带作战，似暂时难于去南口、沙河一带接替四纵任务。因此，四纵可留一个师在南口、沙河一带，纵队部率主力去张家口即很够用。该纵出发时间请林、罗、刘规定，大约一星期内外到达张家口即可。

军委

十七日十八时

---

[1]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

（1948年12月17日）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你们的孙元良兵团已经完了，剩下你们两个兵团，也已伤俘过半。你们虽然把徐州带来的许多机关闲杂人员和青年学生，强迫编入部队，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十几天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原、华东两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写的一个广播稿。

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我们这次作战才四十天，你们方面已经丧失了黄百韬十个师，黄维十一个师，孙元良四个师，冯治安四个师，孙良诚两个师，刘汝明一个师，宿县一个师，灵璧一个师，你们总共丧失了三十四个整师。其中除何基沣、张克侠率三个半师起义，廖运周率一个师起义，孙良诚率一个师投诚，赵壁光、黄子华各率半个师投诚[1]以外，其余二十七个半师，都被本军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的下场，你们已经亲眼看到了。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2]，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壁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

---

[1] 何基沣、张克侠，都是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1948年11月8日率1个军部和3个师、一个团共2万余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廖运周，是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一一〇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1948年11月27日率该师师部和两个整团共5500人，在安徽省宿县西南罗集起义。孙良诚，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1948年11月13日率该军军部和一个师共5800人，在江苏睢宁西北投诚。赵壁光，是国民党第四十四军第一五〇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中，于1948年11月18日率残部2000余人在江苏徐州东碾庄地区投诚。黄子华，是国民党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于1948年12月10日率该师师部和所属残部及第二一六师一部、第八十五军部分直属部队1万余人，在安徽省蒙城东北双堆集投诚。

[2] 长春自东北人民解放军1947年冬季攻势后，即被东北人民解放军包围。1948年10月19日，在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全部动摇的形势下，长春国民党军最高指挥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

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1]。

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

[1] 杜聿明（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邱清泉（国民党第二兵团司令官）、李弥（国民党第十三兵团司令官）3人，在人民解放军发出敦促其投降书以后，仍然负隅顽抗，结果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全军覆没，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只有李弥逃走。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1]

（1948年12月17日）

拟请伯承、陈毅二同志偕来中央一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迅速切断天津与新河塘沽等处联系[1]

（1948年12月18日）

林、罗、刘：

（一）谍息，天津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十六日致塘沽指挥所称：部队均将集驻塘沽西北之新河，共约九万人，该地为盐滩不毛之地，希转饬兵站速储粮三个月，食油三百万斤，以备固守等语。敌恐天津被围，津、塘敌十二个师分守两处不利作战，似正准备集中新河一带，控制海口。

（二）现在我活动于新河、塘沽以北地区之部队数量不多，既不能攻击，亦不能分割包围该敌，徒然引起敌人警觉集中对我。因此，请你们考虑：甲、如果你们数日内能集中两个至三个纵队，则可从速集中兵力向天津、军粮城[2]之间举行攻击，控制该线，并占领军粮城，迅速切断天津与新河、塘沽等处之联系，使天津之敌（五个师）不能向东集中。乙、如果你们目前数日还不能集中二三个纵队执行上述任务，则似宜将塘沽、新河以北地区之少数兵力撤回宁河以北，待兵力集中后再执行上述任务。如何，望酌办。

（三）大沽无码头，轮船不能靠岸，要用小船载人至深海才能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军粮城，镇名，位于天津市东部。

船，塘沽是天津出海的唯一口岸，故敌人不控制大沽而一定要控制塘沽。敌人从来没有打算从大沽退走。

军委
十八日六时

四纵速至张家口西面
协同华北第三兵团堵歼逃敌[1]

（1948年12月18日）

林、罗、刘，并告杨、李，杨、罗、耿[2]：

（一）杨李亥篠电称，归绥[3]敌人现正东进，准备至集宁、丰镇接应张家口敌人西逃，张家口敌人正在准备动作等语。（二）请林罗刘令四纵主力速即西进，以最快速度到达张家口西面，协同杨李堵歼可能逃跑之敌。（三）请杨李令姚纵[4]骑旅速回绥[5]东堵敌。（四）请杨李考虑可否从张垣[6]东面我军抽出一部加强西面防堵。

军委

十八日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4] 姚纵，指绥蒙军区第八纵队，纵队司令员姚喆。

[5]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6] 张垣，即河北张家口。

密切注视胡宗南部动向[1]

（1948年12月18日）

彭、张，并告林、罗、刘[2]：

（一）请你们密切注视胡[3]部动向，蒋[4]有调胡部增援杜聿明[5]之可能。（二）你们休整状况如何，是否可以于本月底或下月初举行一次作战，歼敌一部，借以钳制胡军，盼酌告。（三）黄维[6]被歼，李延年[7]退淮河以南，杜聿明部被歼三分之一，徐蚌[8]战场形势极好。但我军连战四十天，解决了敌人三十五个整师未休息，极疲劳，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蒋，指蒋介石。

[5]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6] 黄维，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该兵团于1948年12月5日在安徽省濉溪县南部双堆集附近，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黄维被俘。

[7]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8]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之间地区。

伤亦大。现杜部尚有不完全的十九个师（包括邱清泉[1]精锐在内）据守永城东北纵横十余里据点内顽抗。我军须就地休整十天，然后攻歼该敌，决战时间大约在下月上旬。（四）各方向蚌埠增援之敌，除葫芦岛、营口撤退之三个军外，近从武汉区增来三个军，如果西安天津两处敌人在十天内外不向蚌埠增援，则有充分把握全歼杜聿明。此点请你们两方加以注意。

军委

十八日十五时

---

[1] 邱清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

致高岗等电[1]

（1948年12月18日）

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会议。同时，还致电饶漱石，请他按时到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平绥线上的作战计划[1]

（1948年12月19日）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杨、李，薄、滕、赵[2]：

（一）林罗刘十八日十四时电悉。四纵已于十七日由南口[3]向张家口前进甚好。（二）关于平绥线[4]上之作战拟定计划大致如下：甲、在四纵到达张家口并部署完毕后，杨罗耿即发起攻击三十五军，准备五天左右解决战斗。乙、三十五军歼灭后，杨罗耿部就地休整十天左右，将俘虏即刻补入部队，并加以初步溶化，补充炮弹。在此十天左右，杨李及四纵不要攻击张家口，但须防止敌人突围逃跑。如敌逃跑，则歼灭之，如不逃跑，则继续围困之。丙、十天后，杨李及四纵举行对张家口的佯攻，其目的是吸引归绥[5]城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薄、滕、赵，指薄一波、滕代远、赵尔陆，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 南口，镇名，位于北京市昌平县西部。

[4]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5]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正向集宁、丰镇方向前进之敌人到达集、丰地区，而不是真正攻击张家口。丁、杨罗耿于歼灭三十五军并休整十天左右以后，即经大同以南荫蔽向归绥前进，以突然动作包围归绥留守之敌并攻占归绥。如果集、丰之敌回援归绥，则以一部包围归绥，以一部先歼回援之敌，然后攻取归绥。戊、在杨罗耿包围归绥之敌以后，如果杨李及四纵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歼灭张家口之敌，则可于杨罗耿攻击归绥之同一时间攻击张家口。如无把握，则等候杨罗耿攻取归绥，并相当休息，回到张家口附近时，再行协力攻击张家口。（三）以上计划是以全歼傅[1]部，不使归绥一带之敌退往河套区域和邓宝珊马鸿逵[2]等部相结合，致使尔后难于追歼这样一个目的来设想的。（四）这样做只要一个条件，就是林罗刘可以不需要四纵参加平津区域之作战；如果林罗刘需要四纵参加平津作战，则不能这样做。因为杨罗耿攻歼三十五军，休息走路，攻歼归绥一带敌人，又休息走路，回到张家口至少需要一个半月左右，就是归绥、张家口同时攻击也需要一个月左右。（五）上述计划是否可行，请林罗刘电告，并请杨罗耿、杨李提出意见。

军委

十九日九时

---

[1]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2]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调查能否炮击塘沽口岸敌船[1]

（1948年12月19日）

林、罗、刘：

请你们调查从大沽或塘沽附近是否可能炮击塘沽口岸的敌船，如能炮击则塘沽之敌跑不掉。

军委

十九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等的电报。

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

（1948年12月20日）

根据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央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的建议，对于目前解放区的农村妇女工作，特作如下决定：

（一）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进行了两年半的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再有一年左右时间，便可能在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这种胜利的获得，是依靠着党的正确领导、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与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而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也起了很大作用，成为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力量。妇女工作是有成绩的，特别是从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以后，解放区的妇女工作，获得了明确方针的指导，在执行了这一方针的地方，妇女工作有了显著的转变，进一步动员和组织了解放区广大农村妇女，参加了手工业、副业和农业生产，大力支援了战争。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各解放区发动了更为广大的妇女群众，积极参加了平分土地，消灭封建的斗争。在土地改革完成了的地区，农村阶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男女老少同样分得了一份土地；有不少的妇女当了区、村代表，以至于当选为村长、副村长或村以上的干部；妇女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一步；她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亦随

着有了根本的改变，开辟了妇女完全解放的道路。

可是解放区的妇女工作，也存在着若干缺点。有一些地区党的组织和妇女团体，对一九四三年二月中央发布的决定认识不足，没有全面地了解：组织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是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保护妇女特殊利益，争取妇女从封建残余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的中心关键；有一些地方甚至完全忽视了这一决定，因而没有认真地贯彻和执行。其次是有些地区，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土地改革和支援前线工作的过程中，未能有意识地注意解除存留着的一些对妇女的封建束缚，以满足妇女的特殊利益和要求，认为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和土地改革，就一切都自然会随着解决了；或者是机械地把一般工作与妇女工作割裂开来，以致妇女群众的某些特殊痛苦，未能及时解除，阻碍了妇女群众的充分发动。有些地区还存在有若干旧的、孤立突出地去进行妇女解放工作的错误偏向，造成了男女农民及青年老年妇女内部的对立，以致脱离了群众。后者从一九四三年以后，已大体纠正，只有少数地区尚未完全克服，现在也正在纠正之中；而前者则直到现在还是各地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产生这些缺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有些地区党和妇女组织中的部分干部，缺乏完整的群众工作观点，没有全面地认识妇女工作的重要性，不够深刻地了解妇女工作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部分，未能适当地把发动妇女积极生产与保护妇女特殊利益相结合。

此外，有些地区党的组织和妇女团体对于领导妇女群众支援战争与巩固部队的光荣任务注意不够。他们或者对于帮助与优待军人家属的工作，没有认真进行，或者对于一部分落后军属“拖尾巴”及其他各种妨碍部队巩固的行为，不进行适当的批评和教育，没有使妇女群众了解，没有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妇女群众的真

正解放，因而就不能充分启发妇女群众支援战争的热情。

由于没有及时地检查工作，总结经验，纠正偏向，以致上述这些缺点未能及时克服。

（二）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仍应以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生产视为妇女工作的基本环节。中央一九四三年二月决定中所提出的妇女工作基本方针，仍然是完全适用的。必须使全党和一切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以及妇女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懂得：在新民主政权之下，过去旧社会一切束缚虐待妇女，使妇女处于服从或屈辱地位的法律，都已不复存在了，新的保障男女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的地位完全平等的法律，在新民主政权建立的最初时期，就已经制定或是基本上已经制定了，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法律能够贯彻地实现。由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男轻女观念，和各样封建习俗的束缚，特别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妇女在经济上要依靠男子，不善于从事各种劳动，甚至鄙视劳动的弱点，妨碍了妇女迅速实现法律上所已规定了的权利。因此要贯彻实现妇女的权利，还必须进行必要的工作。首先是必须使妇女不仅与男子一样获得平等的经济权利与地位，在农村获得并保有同样的一份土地和财产，而尤其必须使妇女充分认识劳动的重要，把劳动看成是光荣的事业，而积极地去参加在体力上可以胜任的各种劳动生产工作，成为家庭和社会上财富的创造者。只有妇女积极起来劳动，逐渐做到在经济上能够独立并不依靠别人，才会被公婆丈夫和社会上所敬重，才会更增加家庭的和睦与团结，才会更容易提高和巩固妇女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也才会使男女平等的各项法律有充分实现的强固基础。过去几年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即是说，凡是妇女积极参加了劳动生产，视劳动为光荣，进行过男女平等的教育，反对过

封建束缚，又分得了土地的地方，妇女们的地位显得与过去是完全不相同。她们的心情很愉快，受人们尊敬，不少的积极分子被推选为代表或参加其他社会政治活动。而且必须认识：妇女参加劳动，不仅是妇女解放的基本关键；无论为着今天的支援战争，为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以及为着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都是极端需要而不能缺少的。

因此，我们在解放区农村中，要用一切努力，继续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农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至于恢复和发展各种生产的具体方针和要求以及各地的妇女应以参加何种生产为主（农业、手工业、副业），应根据当地党政统一的生产计划，男女劳动力的情况及妇女原有的生产习惯，因时因地而制订具体的方案。

为了安定和提高妇女参加生产的热情，各地在结束土改工作中，必须根据当地党端正政策处理土改遗留问题的方针，解决有关妇女的各项问题。要由政府明令保障妇女的土地权。在以家庭为单位发土地证件时，须在土地证上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全家成员有民主处理财产之权，必要时，还可单独另发土地证给妇女。同时又应在全体农民中，进行长期的宣传解释工作，使男女农民能全面地认识保障妇女土地权的重要性。

为了使农村妇女生产健全地向前发展，必须正确地贯彻“组织起来”的政策，大力动员妇女群众参加各种合作社（如农业变工互助组、纺织小组之类的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等）。在农业生产方面，妇女以参加户与户的合作、男女都可以参加的小型互助组为宜。在手工业及副业方面，妇女以参加各种供销合作社为宜。在方法上，必须实行自愿和两利的原则，发挥民主精神，鼓励群众的创造性，力戒过分干涉、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同时也不能陷于自流。

以生产为中心，并在生产过程之中，加强对于妇女的教育工作，提高妇女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动员妇女参加民主建政，推进妇婴卫生（如举办妇婴卫生干部训练班，组织中、西医药合作社等），保护妇女特殊利益。对于阻碍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首先是参加生产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必须有意识地有步骤地去消除之。不应以为只要妇女参加生产，在社会上存留的一些对于妇女的封建束缚就会自然而然地消除，不必再去进行什么工作了，这种自流主义，不注意妇女特殊利益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在生产过程中，应经过各种群众组织和会议，经常对全体农民进行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批评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指出一切束缚妇女的封建习俗，均必须废除。对于要保持旧的封建习俗，经常欺压妇女的少数落后分子，必要时尚须适当地进行斗争。但是必须了解，这种斗争是属于农民内部的思想斗争，与反对封建地主的阶级斗争应有严格区别。而且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教育全体农民，更有利于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及其他建设事业，建立真正民主和睦的家庭，并更加巩固和加强农民内部的团结。同时，也必须认识，这是改造农民思想的工作，是长期努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应反对自流，同时也应反对急性病。对于缠足、溺婴、买卖婚姻、童养媳等，应由政府颁布命令加以禁止，同时进行教育群众，力求贯彻。在解放区，过去有些地区的婚姻法，其中若干部分，违反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原则，应迅速加以修改。

在新解放区的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应根据中央对新区工作的指示，宣传党的政策（包含妇女工作政策），扩大党的影响，揭破敌人的一切造谣污蔑、武断宣传，安定社会秩序，在进行减租减息或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应发动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并领导和组

织妇女参加生产建设和支援战争。那些新的地区，在实行减租减息或分得了土地之后，劳动生产同样是妇女工作的中心环节。至于束缚妇女的封建传统习俗，在新区必然是很严重的，因此必须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男女平等的教育，启发群众觉悟，按其觉悟的程度，有意识有步骤地逐渐破除之。

（三）关于妇女群众的组织形式问题，过去有一些地区，曾经取消了妇女群众的单独组织，或者名存实亡，这是不适当的。根据中国妇女目前的具体情况，还是需要有单独的妇女群众组织，以便领导和推动妇女工作，团结和教育广大妇女群众，经常为妇女服务。

妇女代表会议是更广泛地、更民主地联系妇女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各地各级均应有此种组织。村级妇女代表会议，是这种代表会议的基础组织。其代表的产生，应由妇女群众民主选举，必须包含人民代表会的女代表、妇女团体的代表（如纺织组、合作社、识字班等的女代表）及广大妇女群众直接选出的代表（可按居住条件由一定数目的妇女选举）。这种代表会议的作用，是代表妇女群众的意见，讨论当地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及重要工作，传达民主政府及上级组织的政策法令或决议，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共同执行。同时应由代表会议选出委员会，贯彻决议，主持日常工作，并定期召开代表会议。这种委员会的名称，可根据群众意见规定。在群众对妇联会已经熟悉的地方，可称为妇联会的委员会。又为着充实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妇女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应运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如识字班、合作社、互助组等，去组织各种要求不同的妇女群众；同时也必须经常与广大无组织的妇女群众联系，并为其服务。

县以上，也应根据上述原则召开妇女代表会议，选出妇女联合会的委员会，领导妇女工作。

过去有少数地区的妇联会，不是从群众实际情况出发，在组织上形式主义地强调发展会员，过多地开小组会，长期不召开代表会议；在工作上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地完成所谓上级任务，而不是为群众服务；因而使妇联会在实质上脱离了群众，成为少数人包办的机关。这种不良现象，今后应努力纠正。

在新解放的农村，当着局面初步稳定以后，可以建立妇女组织。但是，事前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准备工作，根据群众需要及觉悟程度，逐步地建立妇女组织，团结和教育广大妇女群众。这种妇女团体必须以劳动妇女为基础。

（四）根据目前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大胆培养、放手使用和提拔大批的党与非党的女干部，到各种工作岗位上去，并加强各级妇女组织的干部。男女干部同等能力者，应当分配同等工作，给予同等培养和教育的机会，不得加以歧视；并应按女干部的特殊情况，更加注意提高其政治理论、文化水平及工作能力，帮助其解决特殊困难，举办保育院、托儿所或组织女干部变工互助带孩子，以减轻女干部的困难，而且可以作为开展社会上的儿童保育事业的起点。对农村新起的劳动妇女干部，特别要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加强教育，耐心培养，逐步提拔，并注意发展女党员。在新区特别注意培养本地的妇女干部。各级党校和政府主办的训练班，应有计划地吸收女干部学习，党的各级组织部、宣传部应把培养和教育女干部列入其业务之内。而女干部本身，则应在党的领导教育之下，自觉地积极工作，精通业务，加强团结，提高工作效率，努力学习理论、政策、文化知识、生产业务的知识和技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妇女的弱点，力求进步，加强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提高自己成为党的优秀干部的基本条件。

（五）从一九四七年全国土地会议以后，各级党委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一般地较前重视，有了若干改进，但尚未做到经常地有计划地去贯彻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妇女工作表现有上紧下紧，上松下松的被动现象。尚有少数党委，未曾克服对于妇女工作的轻忽自流现象。今后，全党必须全面地认识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斗争，是争取全国革命胜利不可缺少的力量，更加加强领导妇女工作，贯彻全党做妇女工作的方针。各级党委应把妇女工作列为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在布置检查和总结各种工作时，应把妇女工作包括在内。各级党报和通讯社，应当加强对妇女工作的宣传报导。县以上各级党委，应建立和健全妇委组织，并经常加以指导和帮助。区以下，经过支部领导妇女工作，并应确定专人负责。各级妇委的职责，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之下，研究妇女问题和妇女政策，检查妇女工作，并向党委提出建议，以指导及推动妇女工作。

党应更进一步地纠正党内外残存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和把妇女工作从整个工作中除外的取消思想，以及孤立突出地去做妇女工作的偏向。各级党的组织应加强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妇女工作，培植完整的群众观点，正确地掌握妇运政策，克服妇女工作中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妇女工作者更应实事求是，深入群众，埋头苦干，全心全意为妇女群众服务，把妇女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

（六）为适应全国革命发展的需要，集中妇女的战斗力量，解放区妇女团体，应当努力去联合全国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妇女，共同为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为此特决定由解放区妇女团体发起于一九四九年春季召开全国

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使全国妇女运动能在统一的方针领导下，更大地和更有力地向前发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

（1948年12月20日）

四纵要明（二十一）日才能接杨、李东南两面防务，因此杨罗耿以明（二十一）日开始攻击为宜。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攻击新保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的主要内容。

中原野战军各纵待李延年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1]

（1948年12月21日）

刘、陈、邓，并告粟、谭[2]：

（一）杜聿明[3]要求补足四百吨粮弹方能突围，近日阴雨，补给甚少，现蒋顾[4]正增加补给，判断其突围实施时机大约在亥有左右。蚌埠方面李延年[5]现仅以几支搜索队向包家集、何集[6]之线前进，估计在本月底下月初我军歼击杜聿明战况紧急之时，有再以八九个师向蚌埠西北行动一次之可能。（二）在上述情况下，你们应令中野各纵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待李延年第三次北进时担任南线防御，并准备于华野对杜聿明作战接近解决之际，放敌深入，围歼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电报。

[2] 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

[3]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4] 蒋，指蒋介石。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5]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6] 包家集，似为鲍集，位于安徽省怀远县东北。何集，村名，位于安徽省固镇县西南。

一部。（三）粟谭仍应坚持十天休整计划，即使杜聿明于此时期内突围，仍应以一部抗击之，待我完成休整计划并重新部署以后再举行攻击，并准备按照打黄维[1]的办法逐次解决之。

军委

马丑

---

[1] 黄维，原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中，该兵团于1948年12月15日在安徽濉溪县南部双堆集附近，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全歼，黄维被俘。

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1]

（1948 年 12 月 21 日）

林、罗、刘：

攻击塘沽的迟早，以我军由大沽[2]或塘沽附近是否可以炮击塘沽海港和完全封锁塘沽来作决定。如果不能完全封锁，该地敌人仍有由海上跑掉的危险（据外国通讯社报导，国民党有一批军舰在塘沽附近），则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如果塘沽海港能由炮火完全封锁，敌人无法逃跑，则可从容部署攻击，不必性急，大体上于本月底或下月上旬夺取塘沽即可。据过去数日所得情报，敌在塘沽有八个师，在天津只有五个师，侯镜如[3]亦在塘沽，侯镜如从葫芦岛撤回很悲观，他自己的九十二军又被调往北平，故你们可用送信劝降方法去试一试，至少可以使他发生某种动摇。假如你们能用炮火完全封锁塘沽，使他感到走投无路，此种方法可能发生更多的效力。此外，你们还可起草公开的劝降书，发来中央审查作口语广播，并在前线印发传单。嗣后，每攻一城都可采用公开劝降的办法，即军事攻势与政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大沽，位于天津市东部。

[3] 侯镜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兼津塘防区司令官。

攻势同时并举。

军委

二十一日二十四时

复廖运周等电[1]

（1948年12月21日）

廖运周、杨柳营两将军，并转一一〇师全体官兵：

十二月一日来电阅悉。你们在双堆集前线举义，脱离黄维兵团，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极为欣慰。你们是国民党嫡系部队，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对待你们将和其他起义部队一样，和一切人民解放军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在部队中施行革命的政治工作，改善官兵关系与军民关系，和人民解放军一道，为完成全国革命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联名给在淮海战役的双堆集前线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廖运周、杨柳营的复电。

立即将大部俘虏补入部队[1]

（1948年12月22日）

杨、罗、耿，并告林、罗、刘，杨、李[2]，华北局：

（一）二十二日十八时电悉。全歼新保安[3]之敌甚慰。（二）望你们仿照刘邓陈粟[4]在徐蚌[5]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三）休整十天，准备行动。

军委

二十二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新保安，镇名，位于河北省怀来县西北。

[4]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指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5] 徐蚌，指江苏徐州和安徽蚌埠地区。

华东野战军全军可多休整数日[1]

（1948年12月22日）

粟，并告邓、张：

（一）五十四军撤回南京，刘汝明[2]开合肥一带，李延年[3]第三次向北增援之可能性已大减。（二）你们可集中华野全军并多休整数日，养精蓄锐，然后一举歼灭杜聿明[4]。只要杜部不大举突围，你们应休息至下月初，约于子微左右开始攻击较为适宜。望酌办。（三）给养情况是否已有改善，弹药准备如何，望告。

军委

二十二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并告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的电报。

[2]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3]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4]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暂时不必普遍立条例[1]

（1948年12月22日）

一

对此问题，现在不宜规定得太细密，事实上办不到，勉强去做，是危险的。此件应重新考虑，目前只规定几条容易做而又最得社会同情者即够。

二

目前任何法律，都只宜规定大端，不可失之太密，否则是不利的。

书籍与报纸不同，暂时除没收国民党书店以外，可一概放任，遇有反动书籍可个别进行干涉，暂时不必普遍立条例。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新区图书出版发卖暂行办法》后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信的主要内容；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新区图书出版发卖暂行办法》的批语。

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

（1948年12月23日）

同意允许九十二军起义，可答应他们编为一个军，答应保护侯镜如，并仍为该军军长。该军最大作用是便利我军攻城，最好该军能于适当时机在取得傅作义信用的条件下，控制一两座城门，或于我军攻城时夺取一两座城门，或给我军伪装部队以进城的便利。关于保护侯镜如，请告塘沽前线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的主要内容。

包围大同归绥之敌[1]

（1948年12月24日）

林、罗、刘，并告杨、罗、耿，杨、李[2]：

（一）张家口敌人被歼，大同之敌准备逃跑，望杨罗耿改变休整十天计划，立即西进包围大同之敌，然后休整部队，夺取大同。为求迅速，应以两三个旅轻装急进，切断大同向归绥[3]的逃路，主力随后跟进。（二）杨李在张家口休整十天，即向归绥前进，包围归绥之敌。（三）东北四纵即归东北建制。

军委

二十四日二十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目前不要忙于包围胡宗南军[1]

（1948年12月24日）

林、罗、高：

二十四日十一时电[2]悉。（一）胡宗南[3]尚有二十八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又有青海回军（战斗力较强）在陇东配合，胡军退川退鄂亦尚未定。西北我军实力弱于胡军，更弱于胡马[4]联军，因此目前不能切断其退路，即增加徐向前[5]部亦无此可能，只有杨得志、杨成武、徐向前三部齐去才有此可能。蒋介石整个部署亦尚未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高岗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24日11时林彪、罗荣桓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平津和太原敌人全部歼灭，已成肯定的问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防西安敌人逃走。因此，我们建议西北野战军立即迅速全力插到西安以南，断敌退路。徐向前部全力向西安前进与彭德怀会合，杨得志部立即出发向太原前进，接替徐的围城任务。杨成武部待追击战结束后，亦转向太原前进。我东北部队待解决平津敌人后，以一部兵力、火力协助两杨攻太原。为了使西安敌人不过早逃跑，建议对杜聿明兵团的攻击等待我北面大军转到西安以南后再开始打。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胡，指胡宗南。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均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5] 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如以胡军调京沪[1]，则四川门户洞开，如以胡军守川，则他将以西安为第一线，不会轻易放弃西安，故目前不要忙于去包围胡军。（二）傅作义、阎锡山、杜聿明[2]三部解决后，我全军应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以刘邓、陈粟两军[3]出江南，以你们出湘鄂赣，以西北、华北（徐杨杨三部）两军出陕甘川，具体部署尚待一月一日至五日的中央会议上讨论。兹将我们亥文致刘陈邓、粟谭电[4]发给你们，请你们会谈一次，由罗高以你们共同意见带来中央。其中华北三部是否都出陕甘川，抑或以两部出陕甘川，以一部随你们第一步出湘鄂赣，第二步出两广，尚值得考虑。（三）张家口之敌歼灭后，四纵即归还你们建制。两杨就地休整十天拟即令其西进，第一步夺取大同、归绥[5]，第二步夺取后套，第三步夺取宁夏。以上三个步骤均须在冬季黄河封冻期内完成，若到春季即有甚多困难。徐部仍包围太原，待你们夺取天津后，即以两个纵队附一部炮兵协同徐周[6]夺取太原。（四）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委

二十四日二十二时

---

[1] 京沪，指江苏南京和上海。

[2]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3] 刘邓、陈粟两军，指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

[4] 即《对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

[5]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6] 徐，指徐向前。周，指周士第，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庆祝张家口的伟大胜利[1]

（1948年12月24日）

杨、罗、耿，杨、李：

庆祝于数日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军委

二十四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的电报。

防止天津敌人向南突围[1]

（1948年12月25日）

林、罗、刘：

为防天津敌人在塘沽敌人被歼时或被歼后向南面突围，请以一个纵队位于天津、静海之间。是否可能，盼告。

军委

二十五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陕北某权威人士谈战犯名单问题*

（1948年12月25日）

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励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攻击塘沽时间推迟至下月上旬为宜[1]

（1948年12月26日）

林、刘：

（一）转来七纵报告[2]已悉。（二）请调查大沽、塘沽是否不久就会封冻，在封冻以后是否可以从海上攻击塘沽。（三）攻击塘沽似以推迟至下月上旬为适宜。

军委

二十六日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25日林彪、刘亚楼向中共中央军委转报的七纵关于塘沽地形及攻击时间的电报。电报说，塘沽地形有如下情况：1. 东为渤海，南为海河，我无法四面包围，敌可背海顽抗，实难断敌退路，全歼敌人。2. 河沟很多，除铁路、公路与铁路东一条小道原有桥外，其余不易通过，而敌则可凭河沟坐守。3. 北宁路南有断续房屋，较好接近。西北直至海边均为草地、盐田，广阔平坦，不便部队展开及攻击。4. 市街北面地形很坏，断市内敌人之退路，与分割新港敌是困难的。5. 市内河沟池沼亦多，市街断续空地很多，便于敌人采取纵深据点配备。6. 目前作战形势需要打塘沽，而且要快，但从地形来看很不好打，必须有充分的准备，仓促过急会打莽撞仗，如海滩战斗代价大，时间很长，还不能歼灭敌人。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个大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二纵、九纵及炮兵均须明日集结完毕，故攻击时间推至月底打为宜，最好下月初。

推迟攻击两沽，严防平津两敌突围[1]

（1948年12月26日）

林：

寝电[2]悉。（一）既然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目前攻击两沽[3]亦有困难，自应推迟攻击两沽时间，并请考虑将迫近两沽之我军向后撤退，敌人见我不去攻击就不一定会逃跑。若干天后海边封冻，再考虑是否攻击。该敌只有五个师，即使从海上跑掉也不要紧。（二）平津两敌则应严防突围逃跑，四纵到后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足够则应调杨成武[4]部甚至杨得志[5]部参加平津作战。你应考虑平津两敌同时突围，我军同时歼灭两敌于突围之际的整个部署。（三）如果平津两敌确有突围征候，即应断然放弃对两沽之攻击计划，将对两沽主力移至平津之间，只以一部隔断津塘、津沽联系，改变目前平分兵力的形势（这是从平津敌不会突围这一点出发而作的部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26日林彪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平津敌突围象征甚多，塘沽、大沽目前水的阻碍太大，兵力用不上，故对两沽的攻击时间拟予推迟。

[3] 两沽，指天津塘沽和大沽。

[4]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

[5] 杨得志，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

（四）请令杨成武部在张家口休整待命，姚喆、王平[1]、蒙骑、察骑等部，可以准备插断归绥[2]、包头之间，但暂时不要出动。（五）杨罗部[3]或者仍去包围大同不变动，或者停止围攻大同计划，准备东进，请酌定。（六）不要放走傅作义[4]代表，并应停止其与傅作义通电。（七）平津敌可能乘我兵力分散，于数日内即突围，请你迅即作出对付敌人突围的整个计划电告。

军委

二十六日二十二时

---

[1] 姚喆，当时任绥蒙军区司令员兼第八纵队司令员。王平，当时任北岳军区司令员。

[2] 归绥，旧市名，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3] 杨罗部，指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

[4] 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迅速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防敌南逃[1]

（1948年12月26日）

林、刘：

永定河架桥情形如何？你们是否已派部队控制卢沟桥？假如平津敌向南面突围，你们如何对付？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平津敌向西面突围的可能性不大，北平敌突围向天津集中，然后会合天津、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因我有充分力量位于平津、两沽之间，故敌必不能成功。我们认为两沽之敌从海上逃跑，平津两处之敌则向南面突围会合于石家庄或德州，然后沿平汉路或沿津浦路南下，此种可能性较大。如果你们在永定河上架设多数桥梁的计划不能迅速实现，永定河变成了你们部署追击的障碍，则南面就是我们最空虚的方面，敌向此方突围的危险性就最大。同时，因为杜聿明尚未歼灭，我刘邓、陈粟不能部署堵击，此种危险性就更大了。因此：（一）请速以必要的兵力控制卢沟桥、静海等处；（二）请速在永定河上架设多数桥梁。

军委

二十六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准备堵击平津南逃之敌[1]

（1948年12月26日）

周、陈：

假如平、津之敌向南突围，你们是否可以一部控制阵地，以主力迅速东进到石家庄一带，堵击逃敌，以利东北我军赶到聚歼。你们可能抽出多少兵力，由太原附近到石家庄需要多少时间，均盼告。同时即请秘密进行准备。

军委

二十六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参谋长陈漫远的电报。

南方游击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

（1948年12月27日）

港分局：

（一）同意南方三区三个纵队[2]的建立及所提三个纵队负责人员的名单。

（二）各纵队的分散作战或集中作战，依敌情的集中或分散而灵活地决定，即敌人分散敌力薄弱时我应集中作战，敌人集中进攻情况严重时我应分散作战。

（三）从你们已有材料看来，各区游击部队在当地群众中生根的问题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必须克服错误倾向，批判“左”的和右的政策，深入地发展群众工作，并在部队内部队外建立群众性的党的组织，严防部队中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观点。

（四）每一个大游击区在有许多民主县政权建立之后，可以建立行署，统筹全区行政事宜，使根据地日趋巩固与扩大，但政权机关及军队后方机关的组织应适合游击战争环境，力求精简灵便，随时可以移动，切忌庞大臃肿、重形式务虚名而不顾及实际情况。

（五）一九四九年应是南方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广大发展的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电报。

[2] 指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桂滇黔边纵队，这三个纵队均于1949年1月正式组建。

年，三区均应建立电台并与中央发生联系。

（六）你们对于各游击区的军事政策、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仍极少向我们作报告，你们应十分重视这些政策问题，并经常向我们作报告。

中央
亥感

如傅作义南逃华北第一兵团三个纵队应到石家庄堵击[1]

（1948年12月27日）

周、陈、胡：

感十时电[2]悉。（一）假如傅[3]军向南突围（现时尚未确定），你们率三个纵队以五天行程赶到石家庄为最好。（二）八、十三、十五纵的人数及训练情形如何，留下八个旅假如不能保守榆次及东山各要点，则应在不能保守准备暂时放弃之，是否对于以后攻城极为不利，望告。

军委

二十七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和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电报。

[2] 指1948年12月27日10时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确保榆次及东山之石咀、罕山、淖马、山头数要点并打阎锡山可能出击部队，拟留七纵与晋中部队共8个旅（不充实），第一兵团率八、十三、十五3个纵队东去石家庄。由太原附近出发，以6天行程可到石家庄。

[3]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我们应对民主人士采取保护政策[1]

（1948年12月27日）

燕京是司徒[2]办的学校，陆志韦[3]当然和司徒有联系，但燕京教职员中左倾者不少，陆志韦态度亦较民主，我们应采保护政策。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叶剑英、赵尔陆并告林彪、罗荣桓、程子华、黄志勇，华北局电上加写的一段话。

[2] 司徒，指司徒雷登。

[3] 陆志韦，当时任燕京大学校长。

给刘少奇等的信[1]

（1948年12月27日）

关于青年团的决议和团章已看过。写得简明扼要，完全可用。有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下。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稿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章程》稿后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冯文彬信的主要内容。

关于攻击太原所需兵力的问题[1]

（1948年12月28日）

周、陈、胡：

（一）关于要你们准备以主力出石家庄堵击北平逃敌一事，业已电告。这只是一种可能情况的准备，不一定实行，但你们应有此项准备。（二）关于将来攻击太原的兵力问题，请你们按照敌我力量对比，确实计算后电告：是否增加杨罗耿[2]三个纵队即已够用，除杨罗耿以外是否还需加调兵力，及是否还需从林罗[3]处抽调一部炮兵（在平津攻克后）。

军委

俭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和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加强对被围之敌的政治攻势[1]

（1948年12月28日）

粟、谭，并告邓、张[2]：

亥宥电[3]悉。你们子微是否开始攻击，要看十天内敌方情况发展如何而定。现在杜聿明[4]部所处情况比较郑洞国[5]部在长春的情况还要坏得多，饥寒交迫，大批投降，正在日趋瓦解。如果敌方内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等的电报。

[2] 邓、张，指邓小平、张际春，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指1948年12月26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给各兵团、各纵队、师并报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军区政治部、总前委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围困圈内敌人处于绝境，一切条件更加有利于我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大量瓦解敌人。因此各部在短期休整中应即更进一步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尤其第一线部队），把它作为主要中心工作之一。这样不仅造成敌人更大批的逃跑、投诚，削弱其有生力量，且更加深入普遍瓦解敌军士气，便于尔后顺利歼灭。

[4] 杜聿明，当时任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

[5] 郑洞国，原任国民党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0月19日，在东北野战军包围长春攻克锦州、东北国民党军全军动摇的形势下，郑洞国率领所部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体官兵放下武器。

瓦解的过程有加速扩大的趋势，也许在十天或二十天之后出现长春那样的结果。你们现在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用各种名义（你们及各纵各师及敌方来降的官长）写信给敌方各级官长，并将这些信公开地散播，当作一个群众运动，公开地进行这一工作。在你们面前摆着三种可能性：（一）强攻解决敌人；（二）半瓦解半强攻地解决敌人；（三）敌人由瓦解发展到集体投降。请你们密切注视敌方动态，并随时告诉我们。刘陈[1]二同志已到此间。

军委

二十八日十三时

---

[1] 刘陈，指刘伯承、陈毅，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同意调两杨兵团参加平津会战[1]

（1948年12月28日）

林，并告杨、罗、耿，杨、李[2]：

平、津、塘[3]敌既然均有突围逃跑之可能，同意林之提议，杨李全部、杨罗耿主力均调平、津参加会战，请林即以命令规定他们的行动。

军委

二十八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平、津、塘，指北平、天津和塘沽。

放弃两沽集中夺取天津[1]

（1948年12月29日）

林、刘：

二十九日十一时电[2]悉。（一）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二）高岗、罗荣桓昨日到此。

军委

二十九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1948年12月29日11时，林彪、罗荣桓致电军委，电文如下：“1. 据我在塘沽附近各部队对地形侦察的报告，均说该地地形不利作战，除西面外其他皆为开阔宽广之盐田，且不能作战，涉之水沟甚多，冬季亦无结冰把握（因海潮起落关系），不便接近亦不便构筑工事。且敌主阵地在新港靠近海边码头，我军无法截断其退路。该处停有兵舰，敌随时可逃入军舰退走，故两沽战斗甚难达到歼敌目的。且因地形开阔，河沟障碍，我兵力用不上，伤亡大而收获小，亦必拖延平津作战时间。我在两沽附近的部队，皆认为改攻两沽不合算。2. 我原在两沽附近的部队，已大部西移到达天津附近。3. 我们意见目前我军一面准备防平敌突围，但由于我目前未攻两沽，敌多半不敢突围。在此情况下，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天津的准备。在我未攻击前，如敌突围则先打突围之敌，如我准备成熟肘，敌尚未突围，则发动总攻歼灭天津之敌。盼军委电示。”

同意杨罗耿部参战及军事部署[1]

（1948年12月30日）

杨、罗、耿，并告林、罗、刘[2]：

二十八日二十二时半电[3]悉。（一）同意你们三个纵队全部参加平津会战。（二）同意你们对大同、察北、张家口之部署。

军委

三十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1948年12月28日22时半，杨得志、罗瑞卿、耿飚致电军委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文如下："军委二十八日二十时电奉悉。现大同仅敌一万二千余，归绥敌以情况日趋紧张，其东犯之可能性不大。根据以上情况，以姚喆（八千多人）、王平（三千多人）两部共一万余人，担任截击大同之敌。以蒙骑十一、十六两个师，并察骑三个团，活动于绥东、察北地区清剿散敌。以詹部三个独立团，赶至于张家口，是可确保无虑。我兵团可全部东下，参加平津会战。当否？请速示复。并将我部集结位置，请林罗刘速示。"

将革命进行到底[1]

（1948年12月30日）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2]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

[2]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曾将原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合江、松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等9个省。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曾将东北三省行政区划调整为辽东、辽西、吉林、黑龙江、松江5个省，加上热河，统称为东北六省。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将辽东省、辽西省合并改称辽宁省，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吉林省仍照旧。1955年撤销了热河省，原辖地区分别划归河北、辽宁两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1]。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

---

[1] 石家庄于1947年11月12日攻克，运城于1947年12月28日攻克，四平于1948年3月13日攻克，洛阳于1948年3月14日和4月5日两次攻克，宜川于1948年3月3日攻克，宝鸡于1948年4月26日攻克，潍县于1948年4月27日攻克，临汾于1948年5月17日攻克，开封于1948年6月22日攻克。这些城市，都有大量的碉堡群或兼有高大的城墙，并设有多层外壕、铁丝网、鹿砦等副防御设备。人民解放军在当时既无飞机又无坦克，没有或仅有少量炮兵。在攻克上述城市中，人民解放军学会了一套攻坚战术。这些战术是：（1）连续爆破——以炸药对敌人各种防御设施进行连续爆破；（2）坑道作业——秘密掘进到敌人碉堡或城墙底下，用炸药炸开，随即发起猛烈突击；（3）对壕作业，亦即近迫作业——对着敌人的坚固工事，挖掘壕沟，荫蔽接近敌人，突然发起冲击；（4）抛射炸药包——利用抛射筒或迫击炮发射炸药包，破坏敌人防御工事；（5）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实行穿插分割等“尖刀战法”。

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1]。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

---

[1] 这里所说的“整旅”和“整师”，是说国民党军被整个歼灭了的旅和师。这里所说的旅，是指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后的旅，相当于整编以前的师；所说的师，指整编以前的师。

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

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1]。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

---

[1] “中间路线”，即所谓第三条道路。

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1]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

---

[1] 参见《伊索寓言》中的《农夫与蛇》。

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要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

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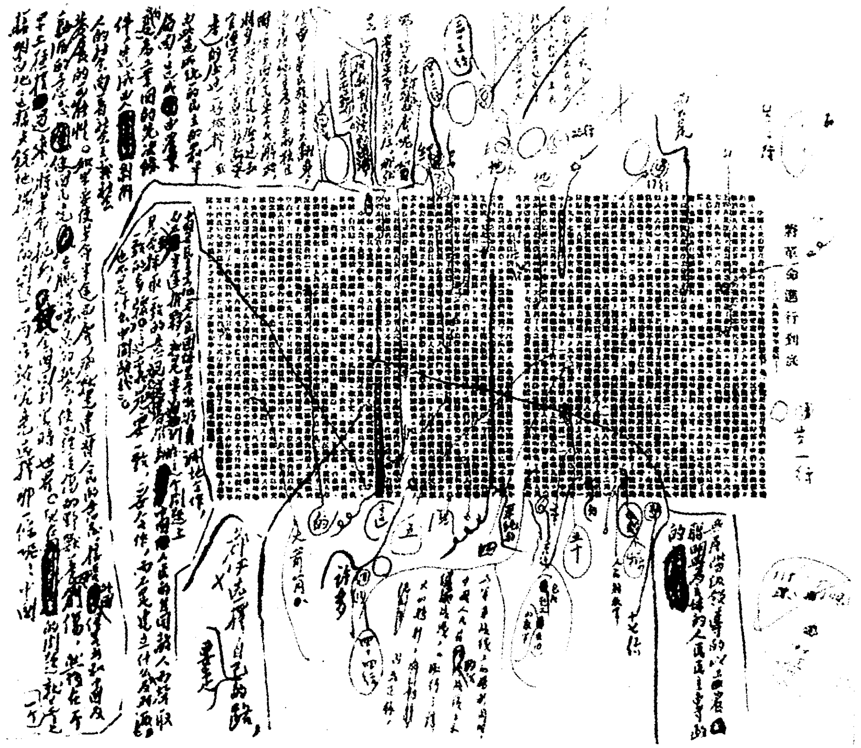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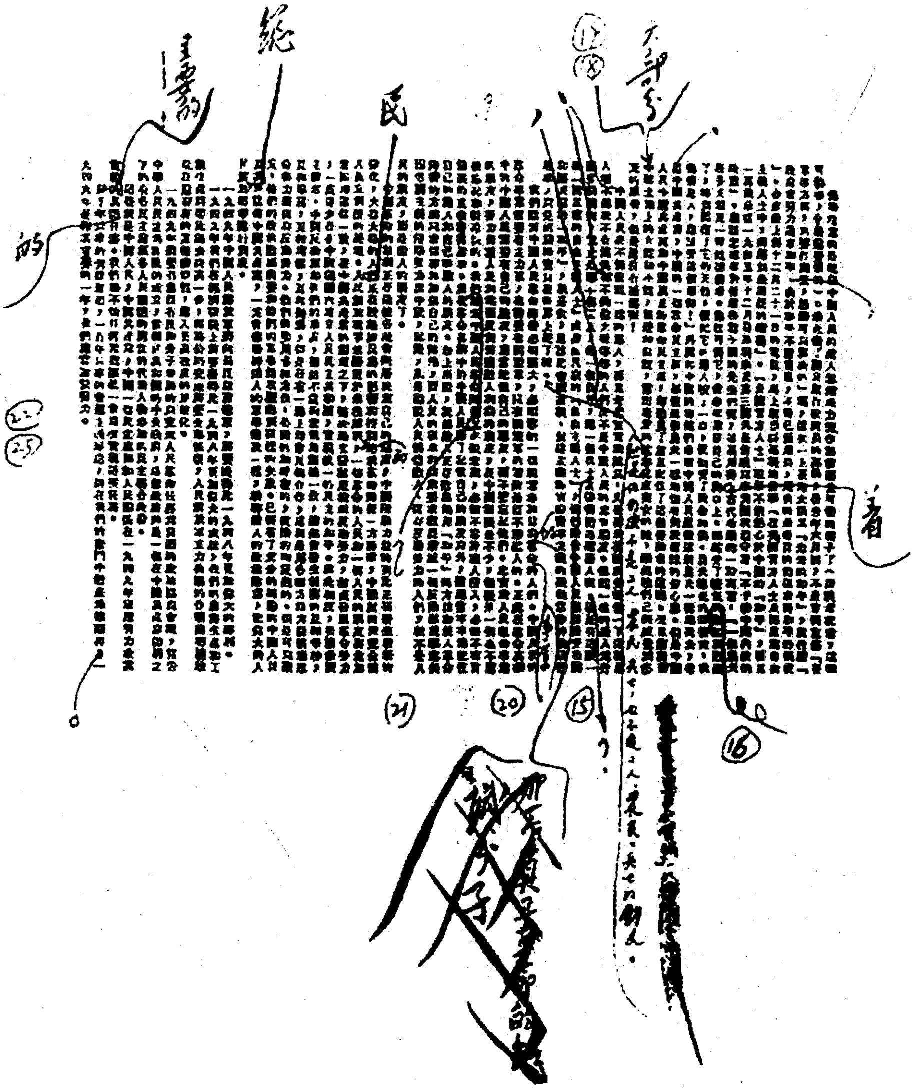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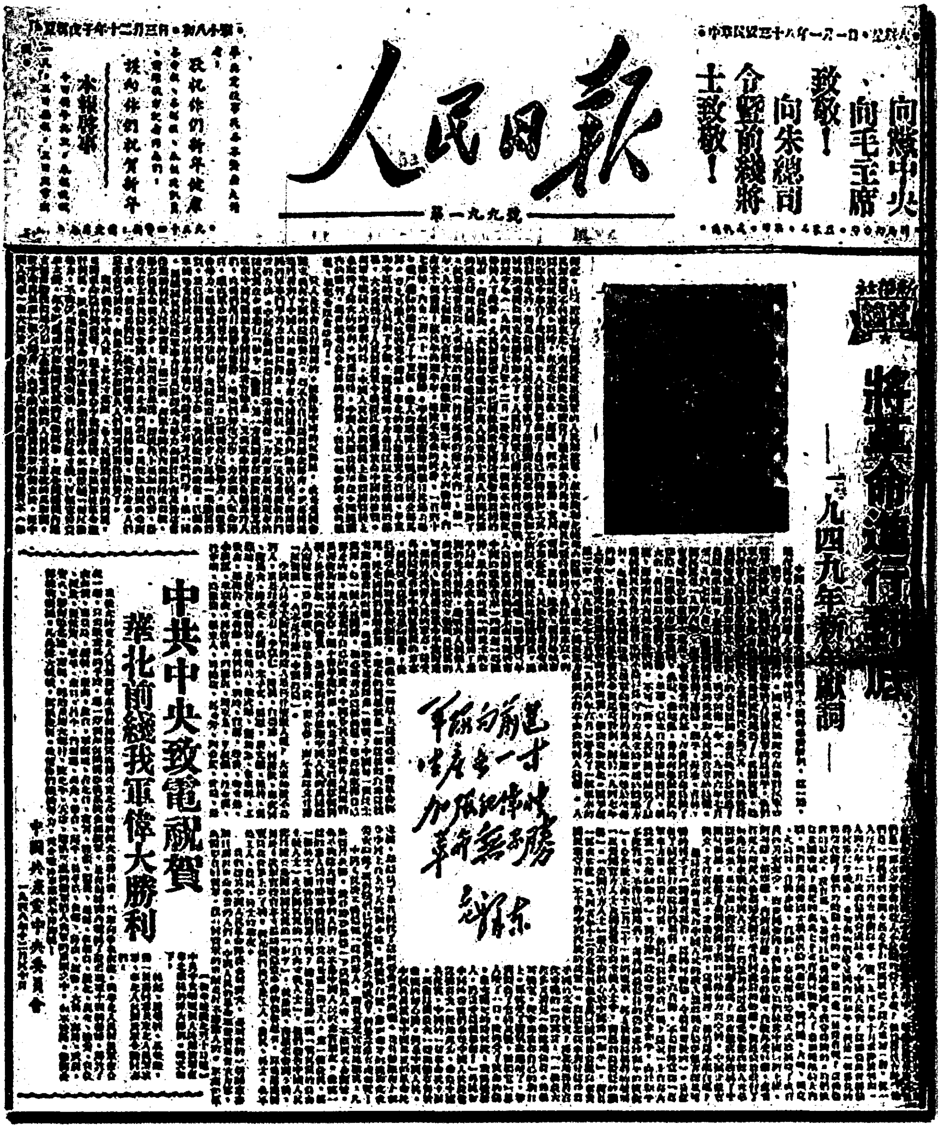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上半部分）。



绝
民
着
的
(21)
(20)
(15)
(16)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下半部分)。



人民日報

第一九九號

向黨中央、向毛主席致敬！向朱總司令暨前線將士致敬！

本報啓事

祝你們新年健康　祝賀你們新年

新華社社論

將革命進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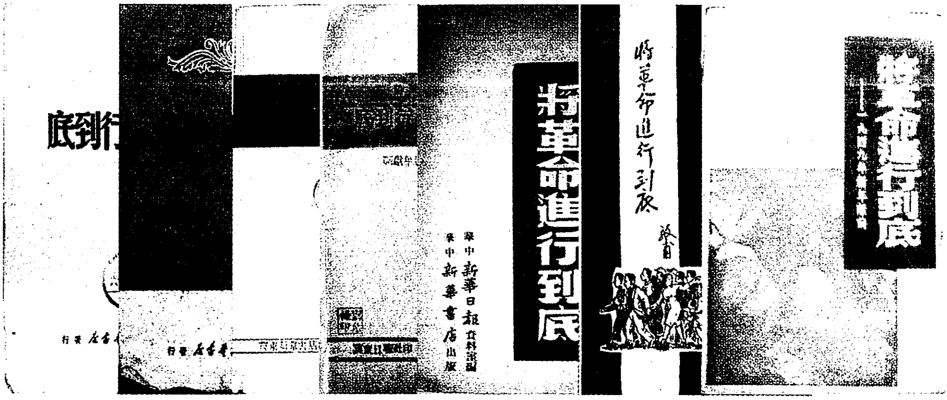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致電祝賀華北前線我軍偉大勝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軍隊向前進
生產長一寸
加强紀律性
革命無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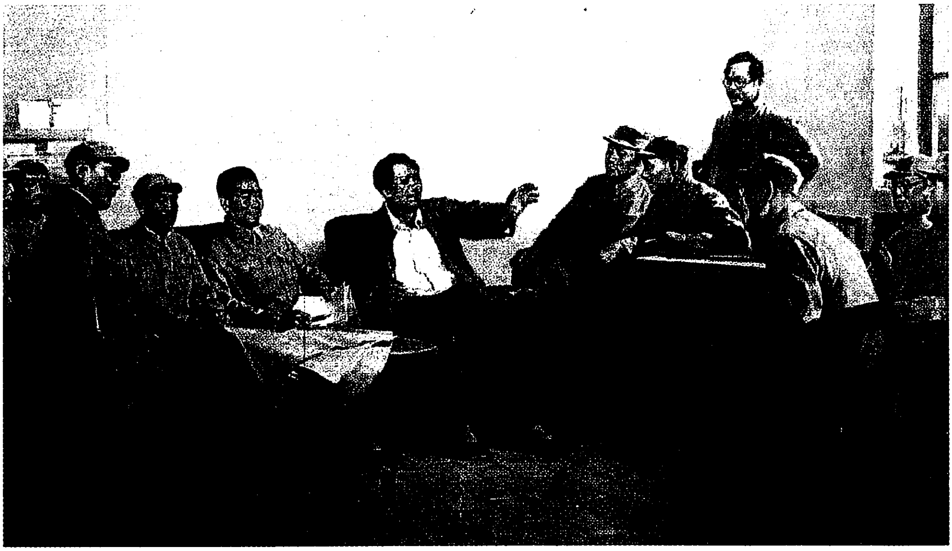
毛澤東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的新华社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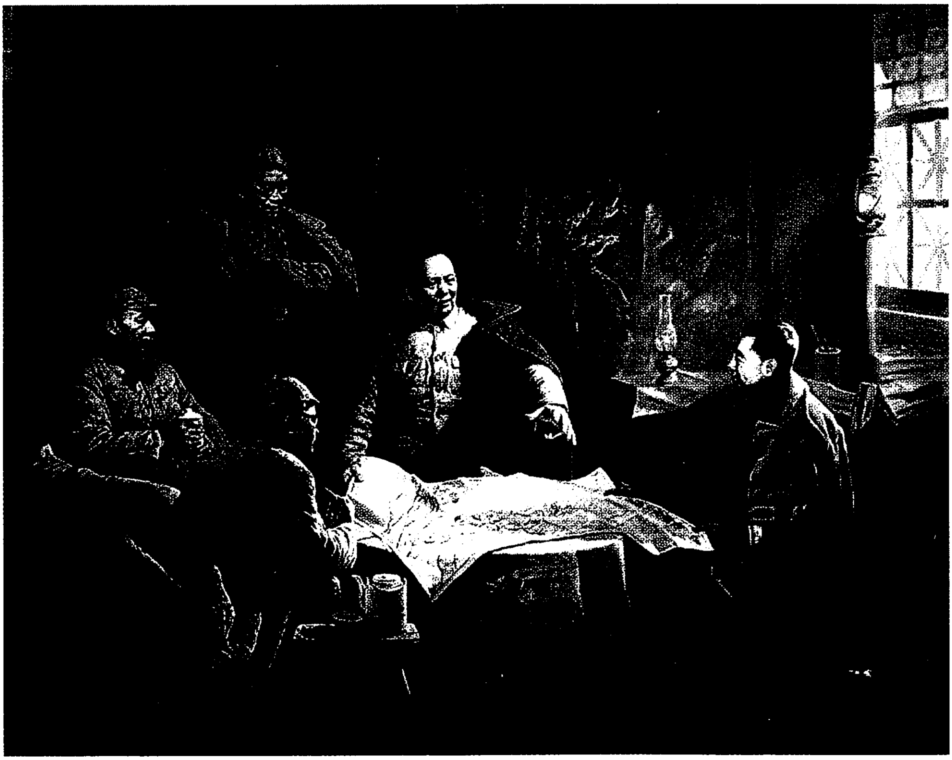

将革命進行到底
華中新華日報資料室編
華中新華書店出版
將革命進行到底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将革命进行到底》(部分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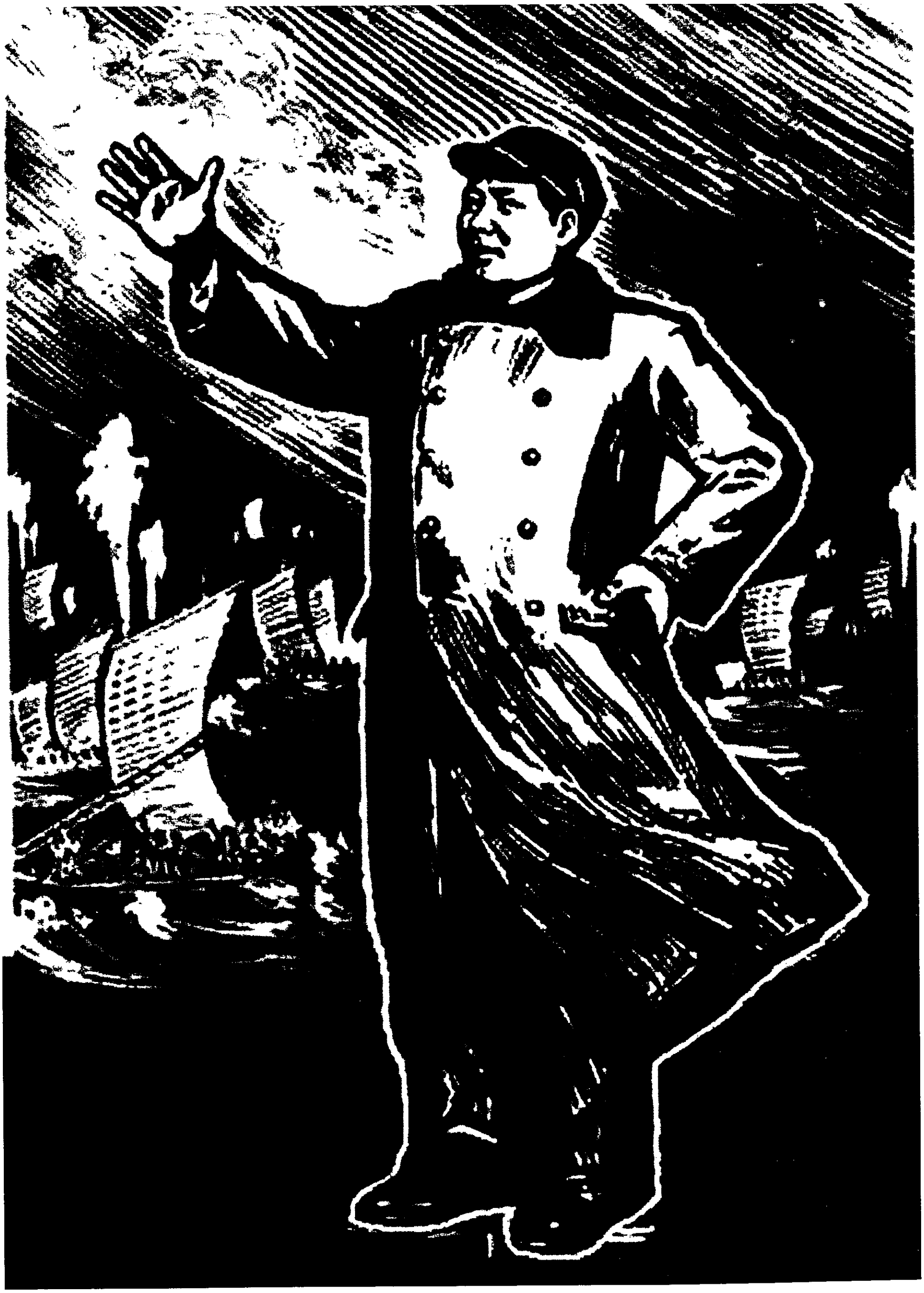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图为三大战役期间的毛泽东和周恩来。



《夺取全国胜利——毛主席和老帅们在一起》（油画）



《运筹帷幄》（油画）



《将革命进行到底》（版画）

各军原地休息然后渡江南进[1]

（1948年12月31日）

粟、陈、张，并告邓、张[2]：

俭午电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休整，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军委

十二月三十一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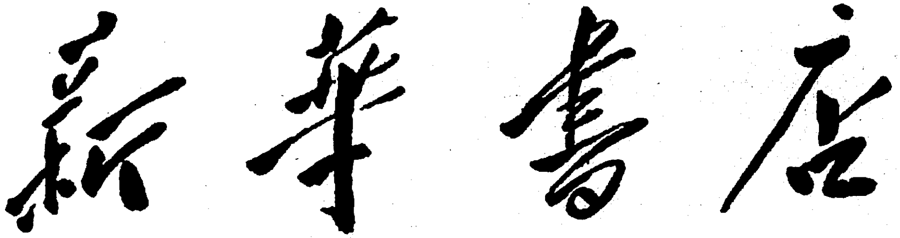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邓、张，指邓小平、张际春，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为新华书店题名[1]

（1948年12月）

新华书店



毛泽东第三次为新华书店题写的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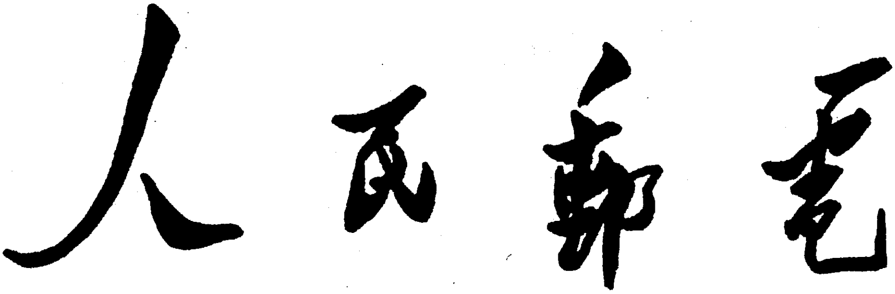
---

[1] 迎接全国的解放，毛泽东对出版发行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寄予无限希望，在西柏坡，他第三次为新华书店题写店名，写好后再三斟酌，感到满意后，交由中宣部出版组组长华应申派人送到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有关部门。全国解放后，北京及全国各地迅速建立了大批的新华书店，其店名都是以毛泽东第三次题写的“新华书店”为准，直至现在。

为《人民邮电》题写报头[1]

（1948年12月）

人民邮电



毛泽东为《人民邮电》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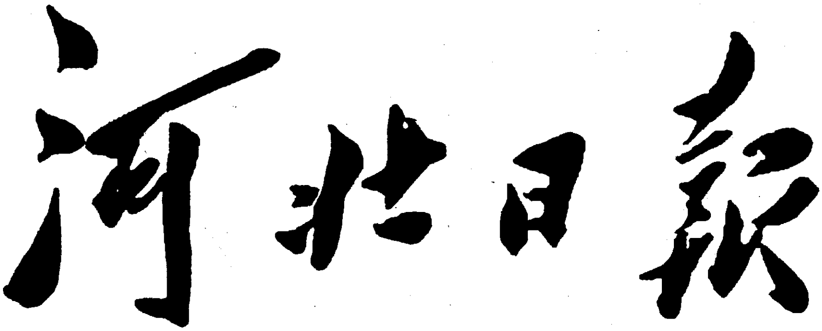
---

[1] 这是1948年12月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之际为华北邮政总局计划出版的《人民邮电》题写报头。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1]

（1948年冬）

河北日报



毛泽东为《河北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8年冬，毛泽东为《冀中导报》写了报头，题为《河北日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题写《河北日报》的报头。

为革命母亲夏娘娘[1]八十寿辰题词[2]

（1948年）

祝娘娘高寿八十。

---

[1] 夏娘娘（1870-1954），江苏武进（常州）人，原名黄友梅。1922年在中共武汉市的党支部、湖北地委及区委等机关担任掩护工作。曾三次被捕，受尽折磨，坚贞不屈，被誉为“革命母亲”。抗战爆发后出狱。后在北京病逝。根据生前志愿，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2] 1948年秋，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村里聚会，为夏娘娘庆祝八十寿辰，毛泽东主席为她题了“祝娘娘高寿八十”几个大字，并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一起参加了聚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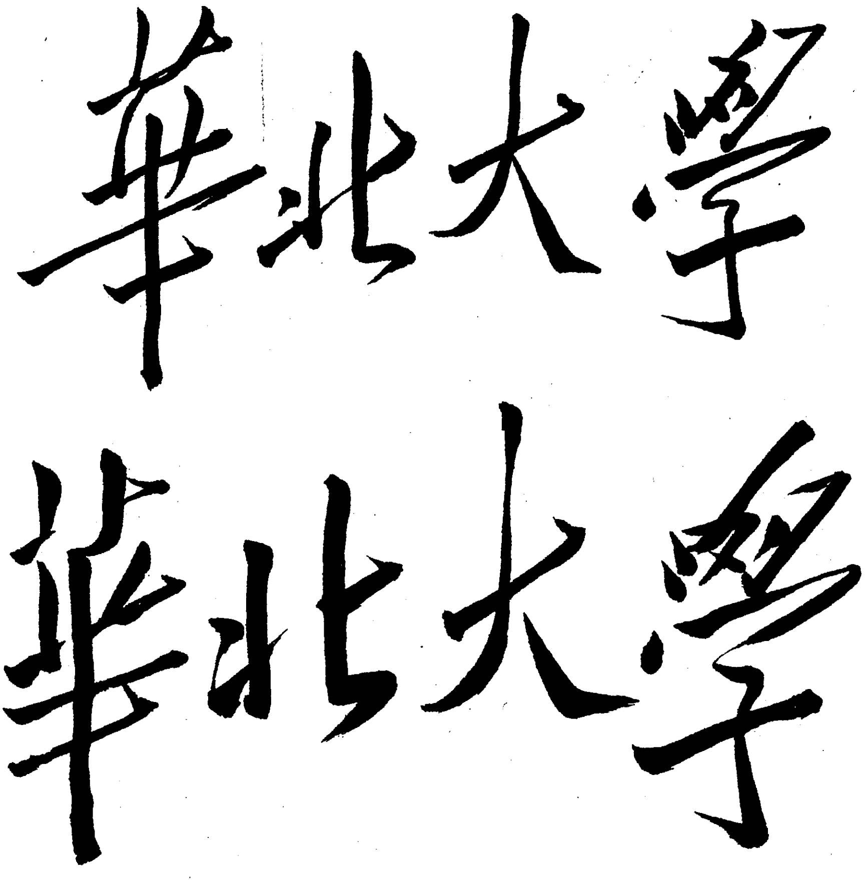
为华北大学[1]题名

（1948年）

华北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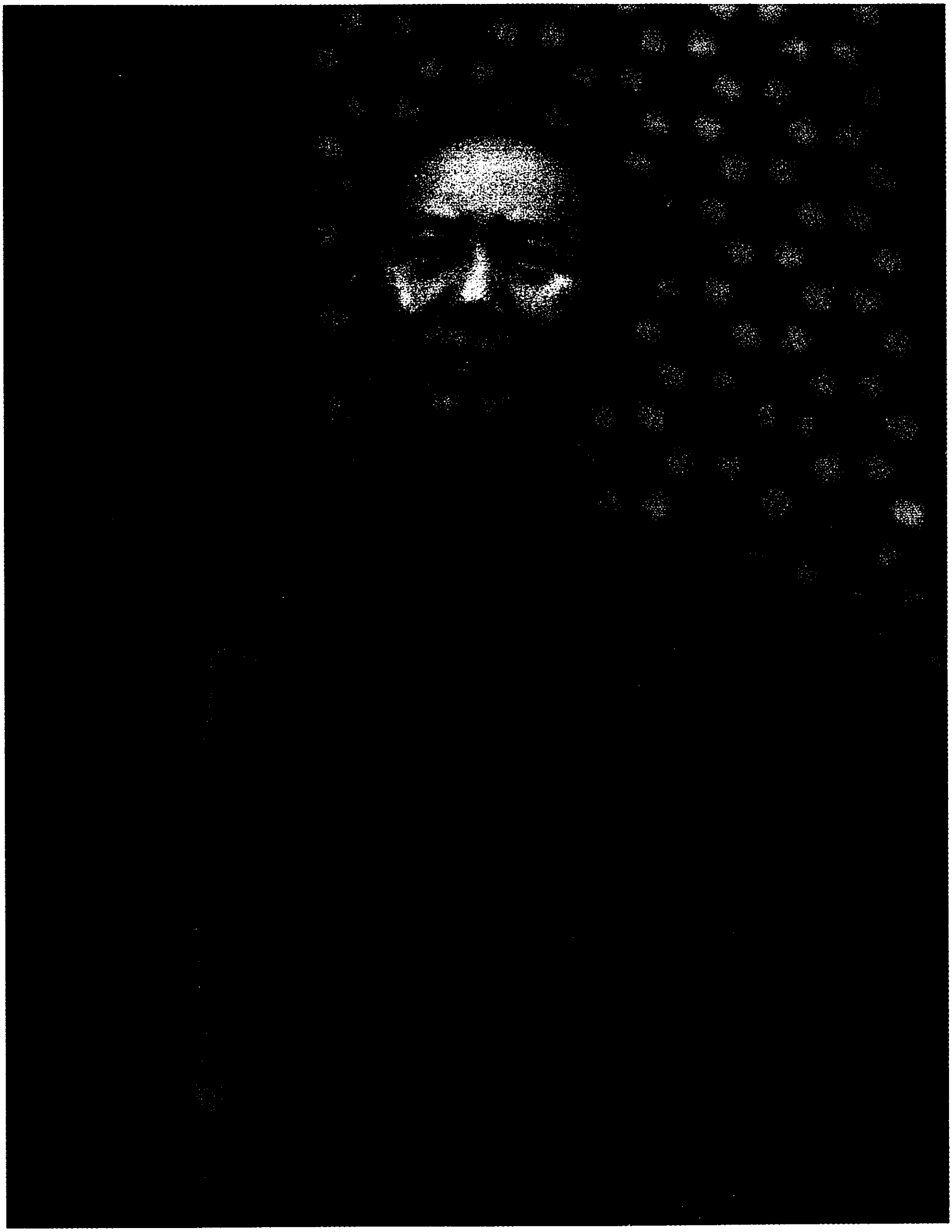
---

[1] 华北大学成立于1948年8月24日，是由华北联合大学改变继承而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



毛泽东为华北大学题写的校名。

1949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上。

复林彪电[1]

（1949年1月1日）

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属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通过北平市党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甲）（乙）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丁）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2]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戊）傅氏此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和傅作义谈判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2] 崔先生，指崔载之，当时任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致林彪电[1]

（1949年1月3日）

请令刘亚楼研究在攻击天津时，是否有办法使工业区避免破坏或减少破坏的程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评战犯求和[1]

（1949年1月4日）

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中国第一号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蒋介石在今年元旦发表了一篇求和的声明。战犯蒋介石宣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人们不要以为战犯求和未免滑稽，也不要以为这样的求和声明实在可恶。须知由第一号战犯国民党匪首出面求和，并且发表这样的声明，对于中国人民认识国民党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有一种显然的利益。中国人民可以由此知道：原来现在喧嚷着的所谓“和平”，就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地需要的东西。

蒋介石供认了匪帮们的整个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

“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这是首先重要的。“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于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中美双边协定[2]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国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国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一句话，“和平”而有害于这一切保护蒋介石反动国家的“独立完整”的办法，那就一概不可以。

“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和平”必须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和平”就是为了这个。打了两年半了，“走狗不走”，美国人在生气，就是稍为休养一会儿也好。

“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确保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统治地位，确保这个阶级和这个政府的“法统不致中断”。这个“法统”是万万“中断”不得的，倘若“中断”了，那是很危险的，整个买办地主阶级将被消灭，国民党匪帮将告灭亡，

---

[1] 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的《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于1946年12月20日在南京签订。蒋介石在这个协定里拍卖了中国的全部领空权。按照这个协定的规定，美国飞机可以在中国到处飞行、装卸和运转，完全控制中国的空运事业。美国飞机并在中国领土内享有“非营业性降落之权”，即军事着陆权。

[2] 《中美双边协定》即所谓《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1948年7月3日由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双方的代表在南京签订。这个协定规定：美国政府承允援助国民党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它所申请及美国政府所核准的援助；执行该协议的美方人员在中国享有与美驻华大使馆同等职员一样的优待及豁免；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任何战略物资，国民党政府必须按时供给有关这些物资的情报；国民党政府保证美国的商品来华倾销。

一切大中小战争罪犯将被捉拿治罪。

“军队有确实的保障”——这是买办地主阶级的命根，虽然已被可恶的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几百万，但是现在还剩下一百几十万，务须“保障”而且“确实”。倘若“保障”而不“确实”，买办地主阶级就没有了本钱，“法统”还是要“中断”，国民党匪帮还是要灭亡，一切大中小战犯还是要被捉拿治罪。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1]，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必须维持其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中国劳动人民则必须维持其被人压迫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这是战犯求和的终极目的。倘若战犯们及其阶级不能维持其实行压迫剥削的自由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和平有什么用呢？而要这个，当然就要维持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公教人员目前这样饥寒交迫的“自由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这个条件一经我们的可爱的蒋总统提了出来，几千万的工人、手工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几万万的农民，几百万的知识分子和公教人员，惟有一齐拍掌，五体投地，口称万岁。倘若共产党还不许和，不能维持这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那就罪该万死，“今后一切责任皆由共党负之”。

上述一切，还没有包括一月一日战犯求和声明中的一切宝贝。还有另一个宝贝，这就是蒋介石在其新年致词中所说的“京沪决

---

[1] 贾宝玉是公元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大观园是贾宝玉家里的花园。据说贾宝玉出生时口里含着一块玉石，这玉石是他的命根，系在颈上一时也不能离开，如果丢了便会“失魂丧魄”。

战”。哪里有这种“决战”的力量呢？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哪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怎样会不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呢？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多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什么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由此可见，求和决不是为了别的，完全是“为民请命”。

难道万事皆好，一个缺点也没有吗？据说缺点是有的。什么缺点呢？蒋总统说：“现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分人员受了共党恶意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受了共党的威胁，所以只看见敌人的力量，而就看不见自己还有比敌人超过几十倍的大力量存在。”新闻年年皆有，今年特别不同。拥有六千多万名军官和兵士的国民党人看不见自己的六千多万，倒看见了人民解放军的三百多万，这难道还不是一条特别新闻吗？

要问：这样的新闻是否在市场上还有销路？是否还值得人们看上一眼？根据我们所得的北平城内的消息是：“元旦物价上午略跌，下午复原。”外国通讯社说：“上海对于蒋介石新年致词的反映是冷淡的。”这就答复了战犯蒋介石的销路问题。我们早就说过，蒋介石已经失了灵魂，只是一具僵尸，什么人也不相信他了。

对孤守工厂区敌军可劝降以减少破坏[1]

（1949年1月6日）

林、谭：

子微电[2]悉。（一）刘亚楼[3]所提三条是正确的。（二）我们所顾虑的是工厂区，如果敌人占据工厂顽抗，我军必须歼灭该敌，即使工厂有所破坏也不要顾惜。但是，如果天津其他地域的敌军均已解决，仅剩下工厂区的敌军而又有可能采用劝降方法解决，则应试图采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破坏。

军委

鱼丑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部主任谭政的电报。

[2] 指1949年1月5日林彪、谭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同意刘亚楼针对天津之敌有的据守在外国人的房子内，外国人均在自己房门口插有外国国旗的情况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三点意见：（一）敌人已加以设防并据以顽抗的街道房屋，不管他是否过去租界，不管这个房屋是中国人的或是外国人的，不管他插有哪个国家的旗子，都一律同样加以进攻。（二）不能因为怕炮弹偶然落到外国人房屋里去，不敢向顽抗的敌人打炮。（三）敌人未加设防和未据以抵抗的，有外国旗子的房屋，则不必进入，但必要时可派人在适当位置实行监视。

[3] 刘亚楼，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

攻天津时需特别注意学校[1]

（1949 年 1 月 6 日）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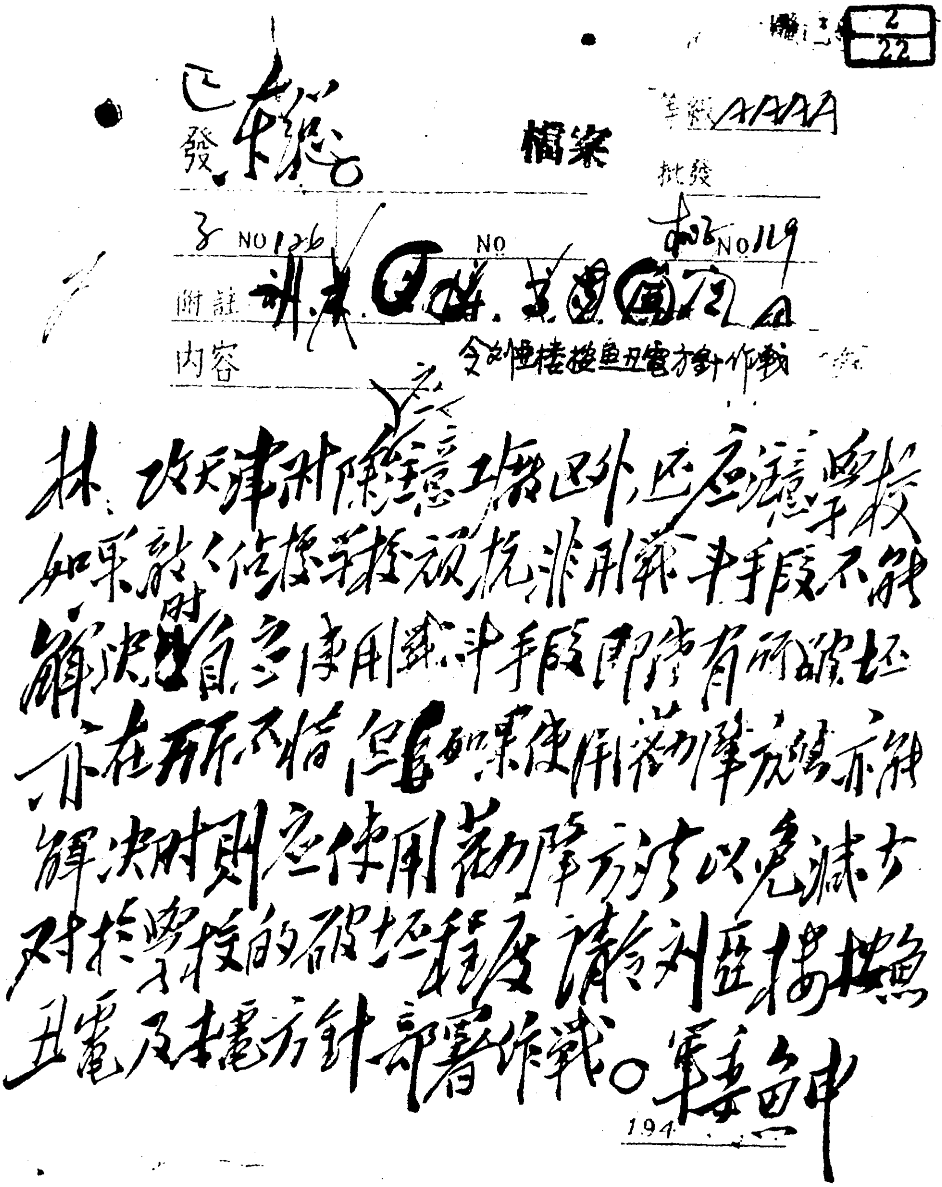
攻天津时除应注意工厂区外，还应注意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学校顽抗非用战斗手段不能解决时，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应使用劝降方法，以便减少对于学校的破坏程度。请令刘亚楼按六日三时电及本电方针部署作战。

军委

六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电报。



2
22

發　東總

檔案

等級 AAAA

批發

NO 126　NO　NO 119

附註

內容　令劉亞樓按照丑電方針作戰

林：攻天津時除注意工廠區外，還應注意學校。如果敵人依托學校頑抗，非用武斗手段不能解決時，自應使用武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勸降方法亦能解決時，則應使用勸降方法，以求減少對於學校的破坏程度。請令劉亞樓按照丑電及本電方針部署作戰。軍委

194

毛泽东致林彪电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欢迎民主人士工作致东北局、李富春、洛甫电[1]

(1949年1月6日)

东北局，**大连**刘昂[2]转富春、洛甫[3]:

（一）于李济琛[4]等一行到达沈阳后，可对先后到达东北的各方代表举行公开的欢迎大会，在大会上宣布**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已经到达的各单位及其已经确定的代表。连同大会的演讲词及大会报道一并报告中央，由新华总社发表。

（二）在开会前，须有很好的政治准备，做到他们中在大会上讲演的人能够坚决赞同我党新年献词的基本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新年文告及孙科的广播。你们要分别找郭沫若、谭平山、沈钧儒等及其他较有地位的进步分子谈清此点，并通过他们去进行工作（最好他们能座谈一次上面那些文告）。其中特别注意影响李济琛（谭平

---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刘少奇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黑体字排印的为周恩来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刘昂，女，时任中共地下组织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负责人，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下负责接送民主人士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工作。

[3] 富春、洛甫，即李富春、张闻天，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局组织部长。

[4] 李济琛，即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山、郭沫若可直接同李济琛谈，并可要谭平山找梅龚彬、吴茂荪、朱蕴山去影响李济琛。富春须预先找好上面那些文件，在李等到达大连后交给他们看)。大会上设法使李济琛、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章伯钧、蔡廷锴、李德全、马叙伦、彭泽民及其他重要人物均能讲话。东北我党政军可推一人致欢迎词，一人讲话。此外在取得他们同意之后，可由新华社记者发表对于他们的访问谈话。

（三）欢宴他们席位可依如下次序：李济琛，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蔡廷锴，章乃器，李德全，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学联），朱蕴山，邓初民，王绍鏊，许广平，丘哲，冯裕芳，许宝驹，洪深，侯外庐，曹孟君，施存统，孙起孟，吴茂荪，梅龚彬，沈志远，林一元，孔德沚(茅盾夫人)，李泽霖。

中央

子麻

复林彪电[1]

（1949 年 1 月 7 日）

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电[1]

（1949年1月7日）

准备对北平城内机场发炮攻击，促使城内敌军分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

（1949年1月8日）

甲　目前的形势

（一）军事方面，一年计划，半年超过[2]。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歼敌正规军一百四十八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结束时，又将歼敌六十几个整师。上述已歼及将歼两项共计二百一十个师以上，内有一百七十三个师以上是属于整师。一九四九年春季以后，国民党就只剩下一百六十几个师了，其中大部分是新编成的，或者是被歼后补充起来的，或者是战斗力不强的，只有一小部分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例如桂系和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2] 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提出："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每年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五年歼敌五百个旅左右，就能达到此项目的。过去两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一百九十一个旅，平均每年九十五个半旅，每月八个旅弱。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十五个旅左右。"这是当时的预计，后因军事形势发展迅速，故一年的歼敌计划到当年12月只半年即已超过，达到歼敌正规军148个师。

家[1]。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可能动员五十万人左右，除补充已有各师外，将编成若干新师，但是毫无战斗力。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但是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那末，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基本地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地打倒了国民党，中国尚有许多敌军待我们去歼灭，尚有许多地区待我们去占领和去工作。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二）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2]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在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群众中，有说服力地进行教育工作，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中进行解释工作，使大家懂得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的理由。国民党的所谓和平谈判[3]的阴谋必须继续地给以揭露和打击。

---

[1] 指国民党军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的军队。

[2] 这里说的自由资产阶级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3] 指1949年1月1日蒋介石提出的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保存国民党的残余力量，以取得喘息时间。

（三）到南方去作战的有利条件是：国民党军队已经没有主力了，我们则有强大的军队；国民党的威信已经丧失，特别是在南京和武汉被我们夺取以后，它将更加威信扫地，我党则有极大的威信；南方是曾经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一九二七年以后数年的土地革命的区域，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游击部队和游击区。这些都是有利条件。到南方去作战的不利条件是：最广大区域是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我党在那里的组织还不强大，那里的群众还没有发动。在这种条件下，军队的给养在头一个时期内将遇到许多困难；大城市夺取容易，但掌握它则将较掌握北方诸城要困难得多。这些都是不利条件。以上有利的和不利的条件我们均必须看到，并且必须明白地讲给准备到南方去的全体干部和战士们听，使他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好好地利用有利条件去克服不利条件，争取全国的胜利。

（四）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五）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这即是：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地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

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

（六）全党大多数干部，在过去几年，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有系统地学会了在农村工作中，在城市工作中和在军事工作中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有系统地纠正了右的和“左”的偏向。许多同志在过去长时期内没有学会的东西，一个年头内都学会了。这样，就使党的总路线[1]在全党内能够贯彻执行。这是一个最伟大和最根本的胜利。这是我党政治成熟程度的极大的增长。这样一件事就指明：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说是“偏向已经纠正了”，并不等于说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偏向，或者将来也不会再发生偏向。现在党内还是存在着某些偏向，将来也还是会发生偏向的，我们还是必须随时地注意纠正党内的偏向。

乙　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

（一）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

---

[1] 党的总路线，指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二）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

（三）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各野战军进一步地正规化，这主要地是加强炮兵和工兵，使用铁路、公路和水路的近代运输工具，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的状态，并加强司令部的工作。

（四）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五）一九四九年必须使全区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比较一九四八年确实地提高一步。我们区域的主要的铁路和公路均应修复和使用。我们区域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应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以免浪费人力物力，障碍生产的提高和对前线的支援工作。

（六）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后方勤务工作的组织性和效率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上加强起来，以便有效地支援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的大进军。这些工作包括军火工业的适当的生产计划，军火以外各项军需工业的调整或建立，军械制度的确立，各种供给标准的统一规定，卫生和通讯器材的统一分配，运输和仓库的前后分工以及后方勤务组织与系统的确定等项。

（七）一九四九年必须使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在军委政治部领导下，做出关于“新式整军运动”“党委制”“革命军人委员会”“连队支部工作”等项的总结，并制成条例或章程，以便普及全军，成为定制。

（八）一九四九年在各主要解放区内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必须是围绕着生产运动，利用群众的闲暇时间，一部分一部分

地去解决那些为数不多的尚未完成的分配土地或调剂土地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并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各主要解放区内健全党委制，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中原解放区是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长江以南诸省，在三年至五年内，不是分配土地的问题，而是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问题，必须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以后方能谈得上分配土地。

（九）一九四九年的干部教育计划，即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

（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教育计划（大学教育，各种专科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和成人补习教育）必须适合当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通讯社和报纸的工作亦是如此。文学和艺术工作亦是如此。

（十一）一九四九年的职工会工作，青年团工作和妇女工作，均应比一九四八年有更好的成绩。一九四九年的上半年应当完成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的工作。

（十二）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

（十三）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十四）关于在全党全军各级领导机关内，开展反对某些严重地

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必须按照中央规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底以前办理完毕。军队团委以上地方县委以上关于此事的决议，必须于四月份交来中央。有特殊原因要求推迟者，亦须于四月办理完毕，五月交来中央。

（十五）在一切新占领区域必须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对于上层知识分子入党尤须采取严格地审查的方针，在大城市内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宁少勿滥。

（十六）在一切解放区必须加强保卫工作，坚决地和一切暗藏的或公开的反革命分子作斗争。

（十七）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 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 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 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 批准军事计划；5. 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 决定外交政策；7. 其他事项。

1949年1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图为西柏坡。

复林彪、聂荣臻电[1]

（1949年1月9日）

八日十五时电[2]悉。你们应回答如下几点：（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乙）为避免平、津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纲领[3]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聂荣臻1月8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张东荪、周北峰昨晚抵此。据张谈，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如同意此方针，双方派代表协同拟定具体办法。

[3] 指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中央决定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织总前委[1]

（1949年1月10日）

林、罗、聂，平津前线各兵团，平津两市委、两军管会，华北局，东北局：

为着统一领导夺取平津，并于尔后一个时期内（大约有三个月）管理平津唐[2]及其附近区域一切工作起见，中央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两市委、两军管会关于上述工作均直向总前委请示，由总前委向中央负责。总前委与华北局为平行关系，有事用函电或当面商决。

中央
子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的电报。

[2] 平津唐，指北平、天津和河北唐山。

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在一起。

在中共中央对晋绥分局关于党代会以后综合报告上写的批注

（1949年1月10日）

（一）各地均应发挥此种民主精神，均应建立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制度。（二）各地新区外均应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首先是区、村人民代表会议，方能防止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49年1月11日）

傅作义及其左右在接到我们意见后，企图叫我们迁就他们所设的范围（迫我就范），而拒绝我们迫傅就范的方针，明明不能指挥中央军，要说能指挥。此外，并提出什么报纸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们是代表人民说话，向我们要求民主权利。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2]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3]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同时，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叫北平党将离城改编一点，在社会上及民主人士中适当地散播出去，使人们感觉我方做得仁至义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指周北峰，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土地处处长。张，指张东荪。

[3] 刘厚同，当时是傅作义部少将参谋、高级军事顾问。

复林彪、聂荣臻电[1]

（1949年1月11日）

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天津敌先头部队至迟须于十三号十二时以前开出，否则我军将于十四号开始进攻，并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于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案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对付天津守敌的方针[1]

（1949年1月12日）

林、聂：

（一）路透社称，天津四代表出城谈判[2]，回城后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尚好。

（二）天津既有单独谈判，即可单独处理，可以不包括在邓宝珊[3]的谈判之内。

（三）天津之敌如能接受你们所提限时缴械之条件，你们即可不经攻击而占领天津，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军委

十二日二十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

[2] 指1949年1月9日国民党天津市参议会代表丁作韶、杨云青、胡景熏、康相九四人出城谈判，提出天津和平解决的意愿。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刘亚楼同他们进行了谈判。

[3] 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按部署休整完成渡江作战准备[1]

（1949 年 1 月 12 日）

粟、陈、张，并告邓、张[2]：

（一）同意华野以一个兵团进驻蚌埠地区，其余各兵团分驻陇海南北适当地点，以就粮为原则。（二）华野、中野休整时间现定两个半月，由子删起至寅世止，每半月为一期，共为五期。望按此部署休整，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详由刘陈[3]面告。

军委

子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陈士榘和副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邓、张，指邓小平、张际春，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刘陈，指刘伯承、陈毅，当时分别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致林彪、聂荣臻电[1]

（1949年1月12日）

你们应根据我们一月十一日电当面向邓宝珊驳斥傅作义九日电[2]所持立场。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至于北平守军，可以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不是所谓由我军协助傅军解决抗不受命者，而是傅军协助我军入城解决一切敢于抵抗的部队。你们说这些话时应坚决明确。

估计天津守军十三日必不会按照我们所说的时间、条件出城，你们应准备于十四日攻击天津。

---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林彪、聂荣臻关于傅作义决定派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来电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聂电的主要内容。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副总司令。

[2] 傅作义1月9日通过北平平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中共地下党员）转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有关部队问题，“亟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须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订”。

致东北局电[1]

（1949年1月14日）

为着揭穿南京的和平欺骗，中央于本日发表在八个条件下愿意与南京进行和谈的声明。你们收到这一声明后，应即邀请各民主人士开座谈会，希望他们予以响应。欢迎大会可在这一座谈会商得一致意见后再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中央局等电[1]

（1949年1月14日）

为了揭穿和击破南京政府的和谈欺骗，中央于本日发表在八个条件下愿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与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没有丝毫的矛盾。望向党内加以解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工委、总前委、前委并转所属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1949年1月14日）

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全国规模的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以来，已经两年半了。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所有华东、中原、华北、西北、东北各人民解放区，无一不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蹂躏。解放区的中心城市延安、张家口、淮阴、菏泽、大名、临沂、烟台、承德、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地，均曾被匪军占领。匪军所至，杀戮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区域，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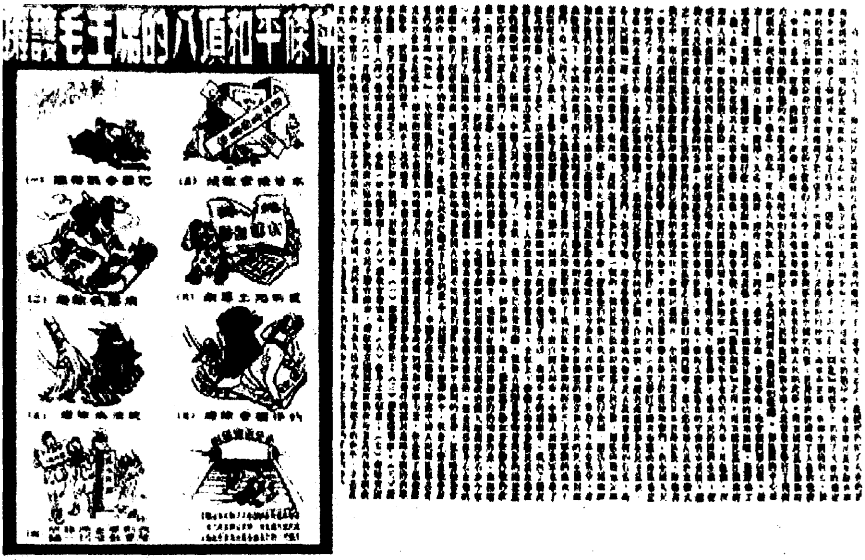
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其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的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扶植日本侵略势力等项正义的运动；滥发伪法币和伪金圆券，破坏人民的经济生活，使广大人民陷于破产的地位；用各种搜括的方法，使国家最大的财富集中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系统。总之，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其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之上所举行的国内战争，业已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决不能逃脱自己应负的全部责任。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自从日本投降以后，即尽一切努力向国民党政府要求防止和停止国内战争，实行国内和平。中国共产党根据此种方针，坚持奋斗，在全国人民的赞助之下，首先获得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国共两党会谈纪要的签订。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又签订了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并和各民主党派协作，在政治协商会议上迫使国民党接受了共同的决议。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道，为维护这些协定和决议而奋斗。但是可惜，所有这些维护国内和平和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为，均不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尊重。相反地，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不值一顾。国民党反动政府认为人民可欺，认为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可以随意撕毁，认为人民解放军不值一击，认为他们的数百万军队可以横行全国，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他们的援助是无穷无尽的。以此种种，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敢于违背全国人民的意志，发动了反革命战争。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地起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为着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而奋斗。自一九四六年七月起，中国共产党领导英勇的人民

解放军抵抗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然后又使自己转入了反攻，从而收复了解放区的一切失地，并且解放了石家庄、洛阳、济南、郑州、开封、沈阳、徐州、唐山诸大城市。中国人民解放军克服了无比的困难，壮大了自己，以美国政府送给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武器装备了自己。在两年半的过程中，歼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现在，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至此，中国人民才开始吐了一口气。现在，情况已非常明显，只要人民解放军向着残余的国民党军再作若干次重大的攻击，全部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为着保持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力量，取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的目的，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一月一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

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我们希望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大家起来争取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反对虚伪的反动的和平。南京国民党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亦应当赞助这样的和平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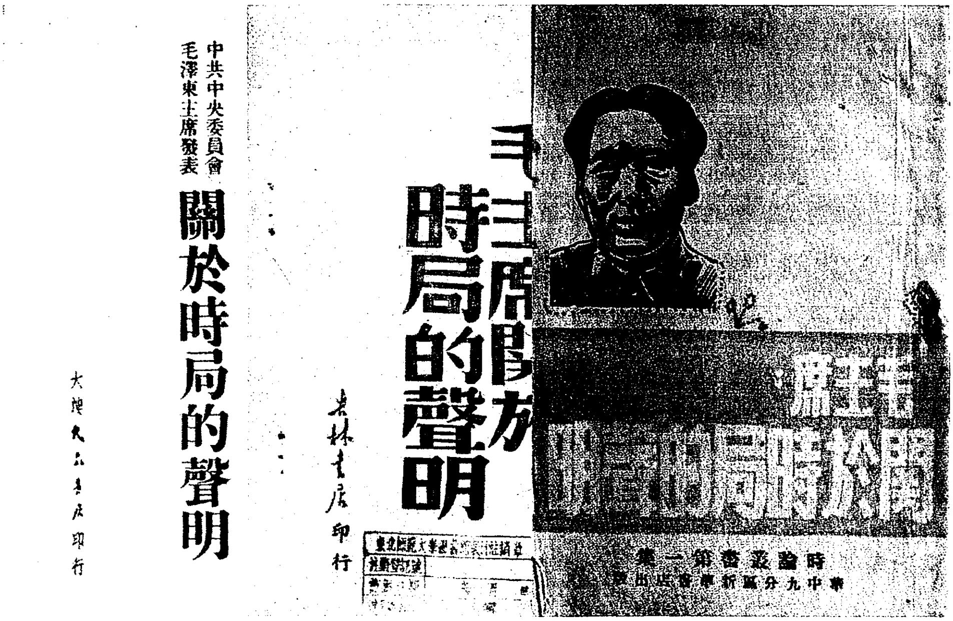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在这个声明里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成为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在这次谈判中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对八项和平条件作了具体规定。



中共中央毛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

擁護毛主席的八項和平條件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表示愿意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中共中央委員會
毛澤東主席發表
關於時局的聲明
大連大眾書店印行

毛主席關於時局的聲明
吉林書店印行

毛主席
關於時局的聲明
時論叢書第一集
華中九分區新華書店出版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部分版本）。

致各中央局等电[1]

（1949年1月15日）

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2]的。蒋方有宪法、法统、军队三条，我方亦有此三条。蒋提保持国家独立，我提废除卖国条约。蒋提保持自由生活方式及维持最低生活为一条，我则分提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两条。此外，我方的第一条（惩办战犯）及第八条（政协、联府、接收）是严正战争责任与不承认南京政权继续存在。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故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而给人民解放军及国民党区域被压迫人民一个打击国民党的武器，揭露国民党所提和平建议的虚伪性及反动性，望向党内干部及民主人士妥为解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2] 蒋方五个条件，指蒋介石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的五个条件：“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致傅作义公函[1]

（1949年1月15日）

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一月二十日下午十二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为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起草的致傅作义公函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15日）

邓宝珊可留他多住一天，将一个正式文件[2]交他带回给傅作义，此文件随本电发给你们，是准备于必要时公开发表的。

上电及致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致邓、周[3]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十四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施用炸药抵抗，而在十五日十五时致邓宝珊电内又谓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为人民均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仍须将致傅通牒交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指毛泽东为林彪、罗荣桓起草的给傅作义的公函，又称致傅通牒。

[3] 邓、周，指邓宝珊、周北峰。

同傅作义部谈判的补充意见和积极作好攻城准备问题[1]

（1949年1月16日）

林、罗、聂：

（一）删日及铣晨各电[2]谅达。关于应付傅[3]方谈判，再补充两点意见：甲、傅方要求军队出城，不要开得太远及各部驻地不要过于分散，这是惧怕缴械的表示。我们意见：第一步你们可以答应他们这样做，使他们放心出城。地点似可指定通县、香河、三河区域。第二步再照你们所拟办法，将彼军分散插驻我军各纵之间，实行整编。第二步办法现在不要过早提出。乙、关于补给，第一期由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

[2] 删日电，指1949年1月15日20时中共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的电报。电报说，你们应对邓宝珊、周北峰表示，在傅作义方没有事实表现以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铣晨各电，一是指194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的电报。电报说，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二是指1949年1月16日5时中共中央军委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电报。电报指出，告诉傅作义应下决心站在我们方面。

[3] 傅，指傅作义，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傅方负责，我方协助。第二期由我方负责，傅方协助。第三期全由我方负责。以上甲乙两项及删日、铣晨所提各项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妥当之处，望电告。（二）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他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于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以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系。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三）望将天津工业及文化机关受损失的情况查明电告。

军委

十六日十八时

致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16日）

对于傅作义所提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及由傅我双方组织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市政，然后过渡到完全由我接管，你们不要正面拒绝。我军事实上不能在数日内入城。敌军开出城外时，我军入城分布接管各处的若干天内，不但需要傅方协助维持秩序，而且必须责成傅方维持秩序。北平旧市政府及其下面各局、所，特别是警察、自来水、电话等机构，若干天内均可让其暂维现状，听候逐一接管。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傅作义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彭真、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注意防止北平敌人突围[1]

（1949年1月17日）

林、罗、聂：

塘沽敌迅速逃跑，证明傅作义所谓塘沽、绥远应与平津问题同时解决完全是缓兵之计，其所谓出城改编亦很有可能是缓兵之计或借出城改编为名乘隙逃跑，你们现应注意防止平敌突围。

军委

十七日十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

复斯大林电[1]

（1949年1月17日）

我决定暂时不来莫斯科。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来中国，地点似在石家庄为适宜。这里比较隐蔽，可以去到我们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们中央书记处五个同志一起谈许多问题（目前主要是政协问题、联合政府问题、外交政策问题）。假如你们同意这样做，来的时间以本月底或下月初为适宜。

---

[1] 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目前你留在中国是很必要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立即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负责的委员到你们那儿来。”这是毛泽东复斯大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东、中原两野战军首长等电[1]

（1949年1月17日）

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东、中原两野战军首长和全体同志电的主要内容。

给宋庆龄的两封信

（1949年1月19日、6月19日）

一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1]与汉年、仲华[2]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皓

---

[1] 梦醒，即廖梦醒（1904—1988），广东惠阳人，当时是宋庆龄的秘书。

[2] 汉年，即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上海、香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仲华，即金仲华（1907—1968），浙江桐乡人，当时在上海做统战工作。

二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1]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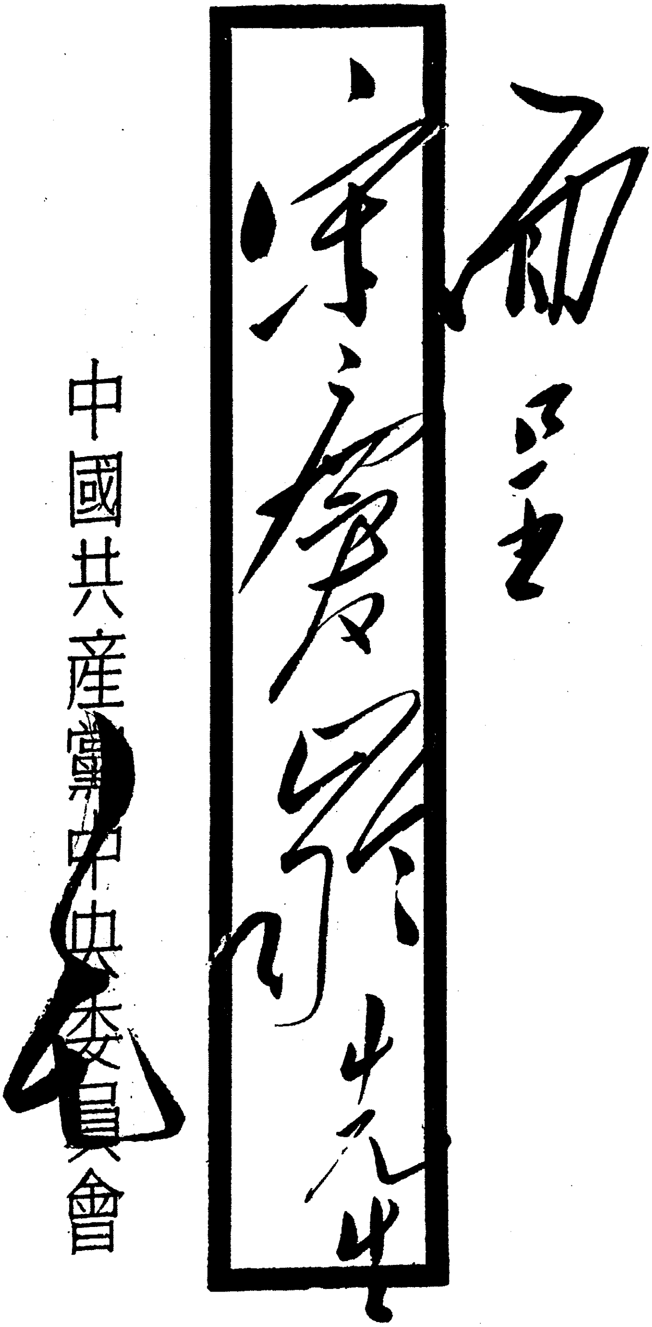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

[1]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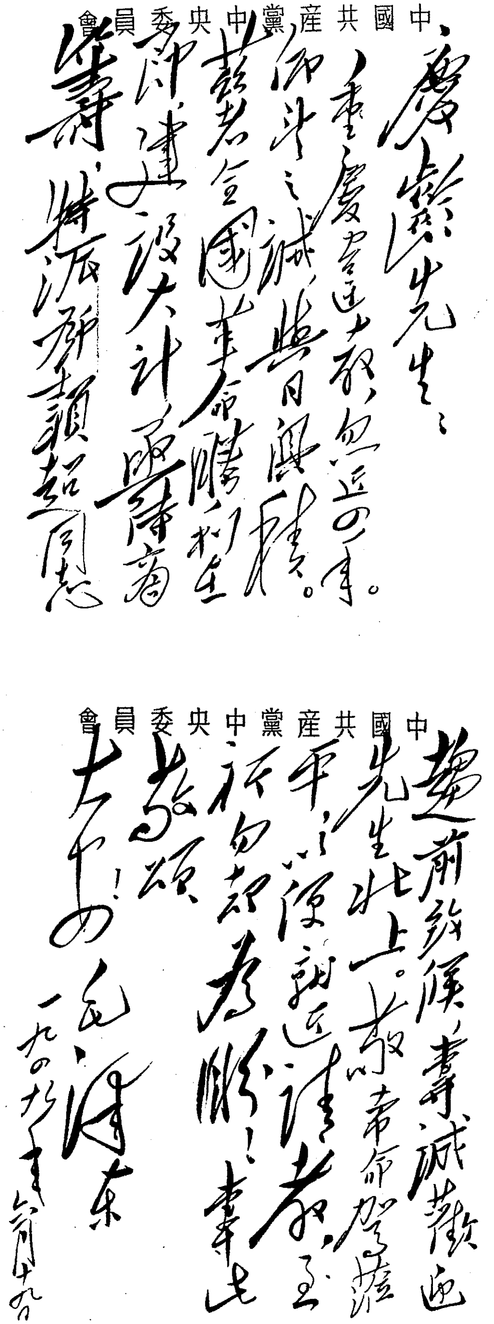


面呈

宋慶齡先生

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

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亲笔信（信封）。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
仰望之誠，與日俱積。
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
即，建設大計，亟待商
籌，特派鄧穎超同志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趨前致候，專誠歡迎
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
平，以便就近請教，至
祈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

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的亲笔信。

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1]

（1949年1月19日）

一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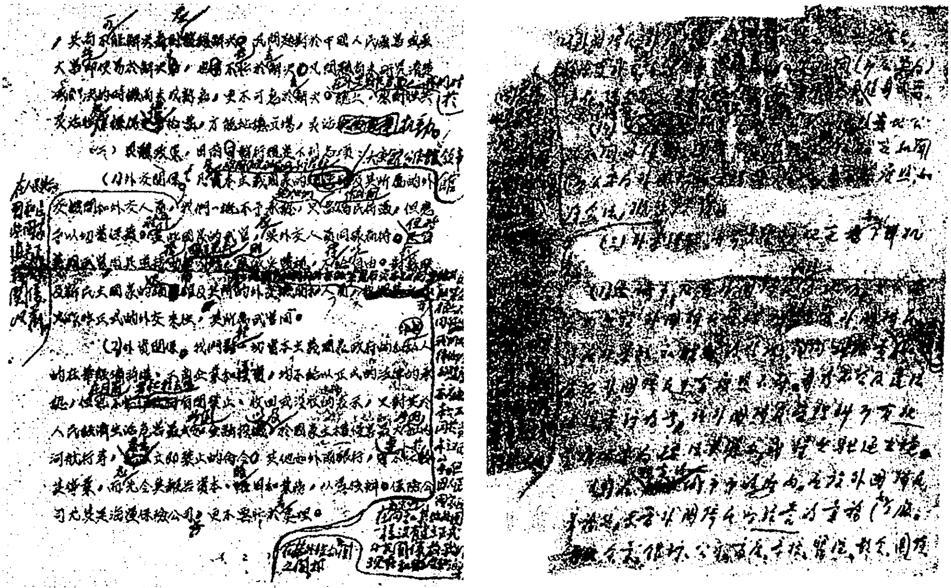
二

外交关系。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人员，因为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

---

[1] 这里选辑的两段文字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和改写的。

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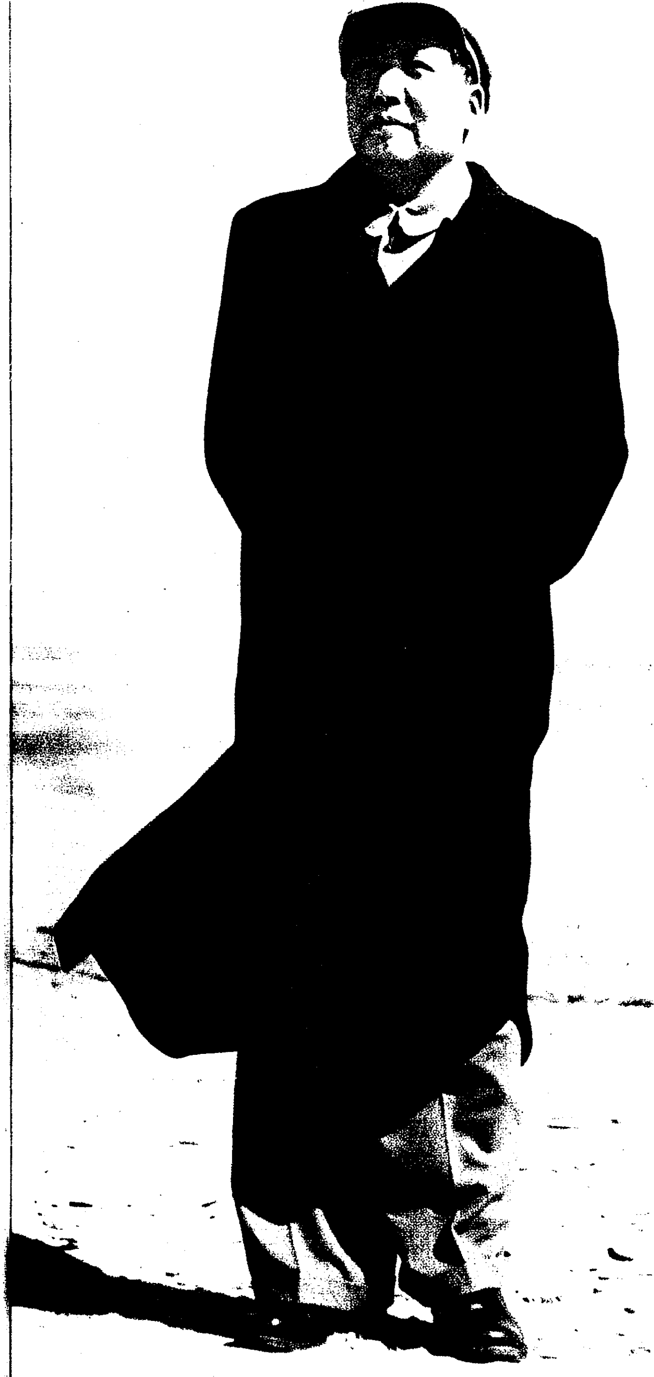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5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5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
（1949年1月20日）
给司徒美堂的信…………………………………………………………6
（1949年1月20日）
给陈嘉庚的信……………………………………………………………7
（1949年1月20日）
复林彪、罗荣桓电………………………………………………………8
（1949年1月20日）
复林彪、罗荣桓电………………………………………………………9
（1949年1月20日）
致中共天津市委等电 …………………………………………………10
（1949年1月20日）
复潘汉年电 ……………………………………………………………11
（1949年1月20日）
傅作义部队出城整编的部署的指示 …………………………………12
（1949年1月21日）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15
（1949年1月21日）
关于转发东北九纵和刘谭电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致林彪等电 …19
（1949年1月21日）

要把北平敌军改编当作一件大事来完成 ……………………………20

（1949年1月22日）

复林彪等电 ……………………………………………………………21

（1949年1月22日）

蒋介石“引退”真相 …………………………………………………22

（1949年1月22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 ………………………………24

（1949年1月22日）

复林彪等电 ……………………………………………………………26

（1949年1月23日）

复林彪等电 ……………………………………………………………27

（1949年1月23日）

解决太原问题的部署 …………………………………………………28

（1949年1月24日）

复林彪等电 ……………………………………………………………29

（1949年1月24日）

复李济深电 ……………………………………………………………30

（1949年1月24日）

致林彪、罗荣桓等电 …………………………………………………31

（1949年1月24日）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 ……………………………32

（1949年1月25日）

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 …………………………………………………34

（1949年1月26日）

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 ……………………………36

（1949年1月26日）

在《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上加写的话 ……39
（1949年1月27日）
在致吴克坚的电报上加写的话 ……40
（1949年1月28日）
致刘伯承等电 ……41
（1949年1月28日）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42
（1949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各民主人士对战犯名单意见致东北局电 ……48
（1949年1月28日）
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 ……49
（1949年1月31日）
北平解放 ……53
（1949年1月31日）
哀悼冯裕芳的唁电 ……56
（1949年1月31日）
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 ……57
（1949年1月）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 ……58
（1949年2月1日）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 ……65
（1949年2月2日）
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 ……67
（1949年2月3日）
复彭真、叶剑英等电 ……68
（1949年2月3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 ……………………………………69
（1949年2月5日）
复彭真、叶剑英、徐冰电 ………………………………………70
（1949年2月5日）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71
（1949年2月5日）
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 ………………………………75
（1949年2月7日）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78
（1949年2月8日）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 ……………………………………81
（1949年2月9日）
复彭真、叶剑英电 ………………………………………………82
（1949年2月10日）
复潘汉年电 ………………………………………………………83
（1949年2月10日）
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 ……………………………84
（1949年2月10日）
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的计划 ……………………………………87
（1949年2月11日）
中共中央关于苏联贸易机关在烟台设立分号事给华东局的电报 …91
(1949年2月11日)
东北野战军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 ………………92
（1949年2月12日）
关于归绥问题谈判的方针 ………………………………………94
（1949年2月12日）

不要轻敌甚为重要 ……………………………………………………95
（1949年2月13日）
任何外国或联合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97
（1949年2月13日）
致天津市委等电 ………………………………………………………98
（1949年2月13日）
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致杜镛和魏文翰电 ………………………99
（1949年2月13日）
致天津市委等电………………………………………………………101
（1949年2月13日）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等谈话方针问题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102
（1949年2月14日）
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应按时向太原出动………………………………103
（1949年2月15日）
把南北通船通航通邮诸事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04
（1949年2月15日）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107
（1949年2月15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11
（1949年2月15日）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112
（1949年2月16日）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117
（1949年2月18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124
（1949年2月18日）

致叶剑英等电……125
（1949年2月20日）
致叶剑英等电……126
（1949年2月20日）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27
（1949年2月21日）
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128
（1949年2月21日）
和傅作义的谈话……132
（1949年2月22日）
给周恩来的信……133
（1949年2月26日）
复华东军区电……134
（1949年2月27日）
致罗荣桓电……135
（1949年2月27日）
同意三个兵团攻击方向之区分的部署……136
（1949年2月27日）
防止敌袭扰我后方的部署……137
（1949年2月28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39
（1949年3月5日）
复沈钧儒、章伯钧电……159
（1949年3月10日）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60
（1949年3月13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65

（1949年3月13日）

十九、二十兵团按原计划集结……………………………………………175

（1949年3月17日）

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176

（1949年3月17日）

待谈判接触数天后决定是否攻占浦口浦镇………………………………178

（1949年3月19日）

第四野战军先头两个军的任务……………………………………………180

（1949年3月20日）

复陈毅、谭震林电……………………………………………………………182

（1949年3月20日）

致中原局电……………………………………………………………………183

（1949年3月21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184

（1949年3月23日）

嘉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188

（1949年3月24日）

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200

（1949年3月27日）

致林彪、罗荣桓电……………………………………………………………201

（1949年3月28日）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202

（1949年3月28日）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203

（1949年3月29日）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204
（1949年3月30日）

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205
（1949年3月）

复傅作义电……207
（1949年4月2日）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209
（1949年4月2日）

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210
（1949年4月3日）

同意太原作战方案……212
（1949年4月3日）

对桂系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采取具体步骤……214
（1949年4月4日）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216
（1949年4月4日）

应即派人进城接洽和平解决太原问题……221
（1949年4月5日）

关于如何对待桂系部队的问题……222
（1949年4月5日）

给周恩来的信……224
（1949年4月5日）

复白崇禧电……225
（1949年4月5日）

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227
（1949年4月7日）

为李宗仁电报写的按语……229
（1949年4月）
复李宗仁电……230
（1949年4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231
（1949年4月10日）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232
（1949年4月10日）
致总前委等电……233
（1949年4月10日）
攻击太原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234
（1949年4月11日）
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236
（1949年4月11日）
复总前委等电……240
（1949年4月11日）
致周恩来电……241
（1949年4月13日）
关于我军渡江时间的考虑……242
（1949年4月14日）
准备攻占安庆至南通一线北岸敌人据点……244
（1949年4月14日）
致总前委等电……246
（1949年4月15日）
复粟裕、张震等电……247
（1949年4月15日）

致总前委等电……248
（1949年4月16日）
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249
（1949年4月16日）
可在任何有利时间攻打太原……252
（1949年4月17日）
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254
（1949年4月17日）
南京方面和平协定须于二十日前表态……256
（1949年4月17日）
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257
（1949年4月18日）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60
（1949年4月21日）
复粟裕、张震等电……270
（1949年4月21日）
致总前委等电……271
（1949年4月22日）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272
（1949年4月22日）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274
（1949年4月22日）
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277
（1949年4月22日）
致总前委等电……280
（1949年4月23日）

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等电……281
（1949年4月23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282
（1949年4月24日）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287
（1949年4月2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289
（1949年4月25日）
复彭德怀等电……293
（1949年4月25日）
给胡乔木的信……294
（1947年4月26日）
在李涛送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295
（1949年4月26日）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296
（1949年4月）
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298
（1949年4月27日）
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299
（1949年4月28日）
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301
（1949年4月28日）
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302
（1949年4月28日）
复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信……304
（1949年4月28日）

复粟裕、张震等电……305
（1949年4月29日）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306
（1949年4月）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314
（1949年4月29日）
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320
（1949年4月30日）
高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应加强文电指示……321
（1949年4月30日）
复粟裕、张震等电……323
（1949年4月30日）
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324
（1949年4月3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325
（1949年4月30日）
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信……328
（1949年4月30日）
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以分置于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为适宜……335
（1949年5月1日）
为《人民晚报》题写报头……337
（1949年5月1日）
复徐向前等电……338
（1949年5月3日）
致总前委等电……339
（1949年5月3日）

致斯大林电……………………………………………………………340
（1949年5月3日）
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341
（1949年5月3日）
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343
（1949年5月4日）
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作题记………………………………347
（1949年5月5日）
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350
（1949年5月6日）
望刘金轩部向汉中方面行动切断胡宗南逃路……………………354
（1949年5月8日）
复粟裕、张震电………………………………………………………356
（1949年5月8日）
关于第四野战军应提早渡江及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357
（1949年5月9日）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359
（1949年5月10日）
复总前委等电…………………………………………………………362
（1949年5月10日）
致粟裕、张震等电……………………………………………………363
（1949年5月10日）
致东北局等电…………………………………………………………364
（1949年5月14日）
为张瑞岐题词…………………………………………………………365
（1949年5月16日）

复林彪、萧克等电……366
（1949年5月16日）
致林彪、罗荣桓、萧克等电……367
（1949年5月17日）
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368
（1949年5月17日）
电慰国民党起义伞兵……372
（1949年5月18日）
致起义海军官兵电……373
（1949年5月18日）
复郭沫若、许德珩等二十九人电……374
（1949年5月18日）
致总前委等电……375
（1949年5月19日）
第四野战军三个军在江西的作战部署……376
（1949年5月19日）
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378
（1949年5月20日）
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379
（1949年5月20日）
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电……381
（1949年5月20日）
致华中局等电……382
（1949年5月21日）
给柳亚子的信……383
（1949年5月21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杭州市委重组文件致华中局等电……………385
（1949年5月21日）

致香港分局电……………………………………………………387
（1949年5月23日）

致华中局、西北局电……………………………………………388
（1949年5月23日）

在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西北局等电上加写的一段话…389
（1949年5月23日）

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390
（1949年5月23日）

为《长江日报》题写报头………………………………………393
（1949年5月23日）

对张轸部按起义待遇加以改编…………………………………394
（1949年5月25日）

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396
（1949年5月25日）

致萧劲光、陈伯钧等电…………………………………………398
（1949年5月25日）

致各野战军电……………………………………………………399
（1949年5月25日）

同意第一野战军暂时停止前进…………………………………400
（1949年5月26日）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402
（1949年5月26日）

预筹对策防备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404
（1949年5月28日）

复林彪等电……406
（1949年5月28日）
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面临的两个问题须立即去办……407
（1949年5月28日）
致罗荣桓、黄克诚电……408
（1949年5月28日）
十三兵团进击宋希濂部的两个方案……409
（1949年5月29日）
祝上海解放……411
（1949年5月29日）
复第二野战军前委电……415
（1949年5月30日）
关于认真对待“左”倾错误的通知……416
（1949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417
（1949年5月31日）
为人民铁道报题写报头……419
（1949年5月）
给张澜的信……420
（1949年6月1日）
在中共中央对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入江南新区指示的批复上加写的话……422
（1949年6月1日）
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的部署……423
（1949年6月2日）
入川入闽行动时间等问题……426
（1949年6月2日）

各外国不应再与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关系……428
（1949年6月3日）
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429
（1949年6月9日）
给任弼时的信……430
（1949年6月9日）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职员工人工薪问题致华中局等电……433
（1949年6月10日）
给胡乔木的指示……435
（1949年6月10日）
复彭德怀电……436
（1949年6月11日）
致周恩来电……437
（1949年6月13日）
致华东局等电……438
（1949年6月14日）
复粟裕、张震、周骏鸣等电……439
（1949年6月14日）
充分注意敌人中间突破的战法……440
（1949年6月15日）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441
（1949年6月15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448
（1949年6月15日）
给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十九兵团的复电……451
（1949年6月16日）

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452
（1949年6月16日）
粮食困难行动时间可酌情推迟……454
（1949年6月17日）
第二野战军西进似以九月为宜……455
（1949年6月17日）
在薛愚的来信上批示……457
（1949年6月19日）
钳制马继援等部消灭胡宗南的作战部署……458
（1949年6月20日）
致华东局等电……460
（1949年6月21日）
复吴奇伟将军等电……461
（1949年6月22日）
对付敌军分向渭南泾北进攻的对策……463
（1949年6月22日）
复上海市委等电……465
（1949年6月23日）
复华中局电……466
（1949年6月24日）
复华南分局等电……467
（1949年6月24日）
给胡乔木的信……468
（1949年6月24日）
祝涅克索八十寿辰的贺电……469
（1949年6月24日）

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470
（1949 年 6 月 26 日）
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电……………………………………472
（1949 年 6 月 26 日）
对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473
（1949 年 6 月 27 日）
给周谷城的信……………………………………476
（1949 年 6 月 28 日）
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电……………………………………477
（1949 年 6 月 28 日）
论人民民主专政……………………………………478
（1949 年 6 月 30 日）
为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名……………………………………495
（1949 年 6 月）
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497
（1949 年 7 月 1 日）
为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题词……………………………………499
（1949 年 7 月 1 日）
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501
（1949 年 7 月 2 日）
哀悼季米特洛夫的唁电……………………………………503
（1949 年 7 月 3 日）
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504
（1949 年 7 月 4 日）
给程潜的信……………………………………507
（1949 年 7 月 4 日）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

（1949年1月20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2]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3]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4]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5]全部十二个军三十一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6]部两个

---

[1] 这个电报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2] 刘伯承，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4]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5] 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

[6] 冯治安，原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1]

（1949 年 1 月 20 日）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张云逸、粟裕、谭震林、陈赓[2]诸同志，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同志们：

淮海战役自去年十一月六日开始，至今年一月十日已完全胜利结束。在这六十五天作战中，你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南线的主力黄百韬兵团[3]全部五个军十个师，黄维兵团[4]全部四个军十一个师（内有一个师起义），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5]全部十二个军三十一个师（内有一个骑兵旅），冯治安[6]部两个

---

[1] 这个电报大部分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

[2] 刘伯承，当时任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张云逸，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当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谭震林，当时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指黄百韬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

[4] 指黄维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

[5] 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当时分别任司令官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第十三兵团和第十六兵团。

[6] 冯治安，原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司令官。

军四个师（内有三个半师起义），刘汝明[1]部一个师，孙良诚[2]部一个军两个师，宿县、灵璧守军各一个师，以上共正规军二十四个军六十一个师，加上其他部队，共消灭敌军兵力五十三万余人。你们生俘了战争罪犯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及国民党军其他高级将领多名，击毙了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你们击退了李延年[3]、刘汝明两兵团的增援，迫使他们向沿江一线逃窜，从而使淮河以北地区完全解放，使淮南一带地区亦大部入我掌握。你们在淮海战役中获得如此伟大的胜利，与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锦州、长春、辽西、沈阳诸役中的伟大胜利一样，证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已经无比地强大，因此我军能在一个战役中同时包围敌人的几个兵团，连续消灭敌人六十一个整师（内有四个半师起义）。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我参加此次伟大战役的一切指挥员、战斗员、前后方服务的工作人员、游击部队、民兵等全体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慰问。同时告诉你们：敌人的主力虽已消灭，敌人的残部尚图抵抗，南京伪政府尚在布置所谓“京沪决战”。南京伪政府发动反革命战争，残杀数百万人民，在所谓“剿匪”“戡乱”的伪令之下，压迫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民，无所不用其极。凡此种种，南京伪政府今已自食其果，主力被歼，众叛亲离，伪政府统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在此种形势下，南京伪政府乃由战争罪

---

[1] 刘汝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

[2] 孙良诚，原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官兼第一〇七军军长。

[3] 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官。

犯蒋介石、孙科[1]等出面，一面提出虚伪的反动的和平条件，一面布置所谓“京沪决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保存匪帮残余力量，取得美帝国主义援助，休养生息，然后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消灭人民解放军。此种阴谋诡计，现已完全暴露。现在全国人民对于南京伪政府业已完全丧失信任，伪政府已无继续存在之余地。伪府诸酋，虽欲恋栈，已不可能。为使全国人民早日获得和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业已向南京伪政府提出八个真正的民主的和平条件，等候南京伪政府答复。如果他们同意这些条件，你们即应和平地开入南京，代表中国人民接收南京伪政府的一切权力，听候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处理。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些条件，那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建议不过是一个骗局，你们即应命令南京伪政府投降。如果他们又不愿意投降，你们即应歼灭之。在等候南京伪政府答复我们的和平建议的期间内，你们的攻击暂以长江北岸为范围，准备渡江，但是不要立即渡江，以便给南京伪政府人员一个考虑和战的机会。

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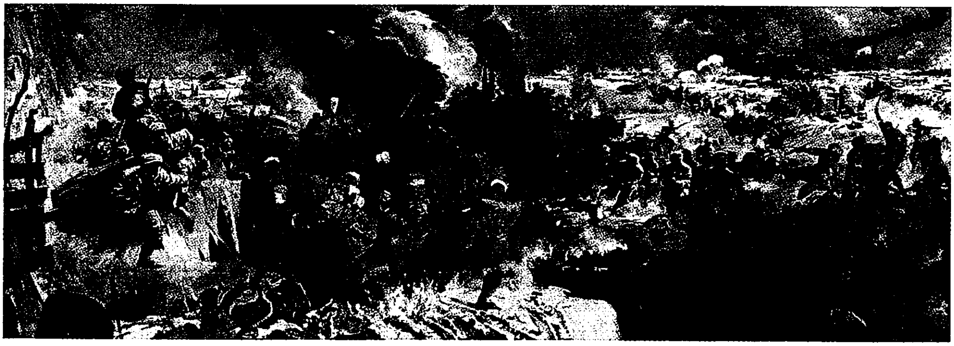
---

[1]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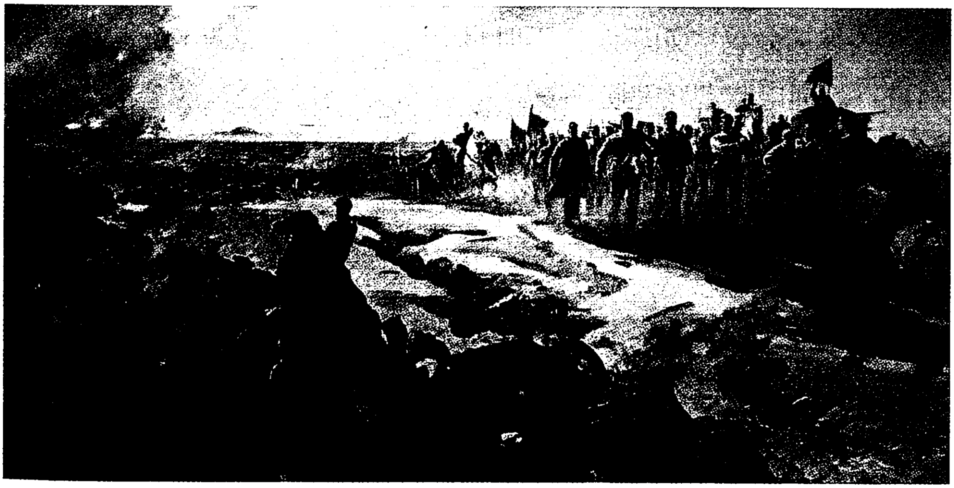
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而对于其他在伪党伪政府系统内服务之绝对大多数人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则应采取宽大政策，免予追究，并可分别优劣，量材录用，转为人民政府服务。对于那些过去犯有罪咎，现已彻底悔悟，愿从伪方自拔来归，或愿于伪方不愿和平解决时里应外合协助我军攻城歼敌者，应即准予将功折罪，并得依其情况酌予奖励。总之，你们应按照人民解放军总部早已宣布的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三项原则，妥为办理，不纵不滥，以竟全功。

现在长江以南一带地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兵、学、商各界广大人民群众，盼望你们前去，帮助他们获得解放，十分迫切，你们的责任还很重大。希望你们团结一致，继续努力，为完成解放南京及江南一带地方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淮海大战》（油画）



《淮海大捷》（油画）

给司徒美堂[1]的信

（1949年1月20日）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

[1] 司徒美堂（1868—1955），广东开平人，爱国华侨领袖。曾任美洲致公党主席。1949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给陈嘉庚[1]的信

（1949年1月20日）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

[1] 陈嘉庚（1874—1961），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1949年应邀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复林彪、罗荣桓电[1]

（1949年1月20日）

根据莫文骅报告[2]看来，北平出城谈判之十个代表是傅作义布置准备和我们和平解决的一个步骤。此种代表出城谈判，对于我们争取北平人心向我，瓦解敌军内部及促使傅作义出城改编是有益的。如该代表等再来要求见你们或见叶[3]时，应妥为护送招待，并接见他们，但要警惕其可能的破坏行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罗荣桓1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军委转去的第四纵队政治委员莫文骅的报告说：我与北平出来谈判之代表见面，他们之中以何思源为首，谈话中表示要给傅作义一条路走，不要逼得太紧，双方代表谈判应和平解决，以免北平打坏了，并要求见叶参谋长。我已将总部指示向北平出来之十个代表提出，当时大家认为满意，干脆、很宽大，特别是傅部撤出城外听候改编及保障其本人、军官家属财产安全。谈话后已将代表全部送回北平。

[3] 叶，指叶剑英。

复林彪、罗荣桓电[1]

（1949年1月20日）

同意你们规定北平守军各部开至沿平汉、津浦两线之间及三河、香河地区驻扎。但我军应重新部署，对敌军驻地取包围控制态势。并须对我军各部首长下达通令，使他们明了策略意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共天津市委等电[1]

（1949年1月20日）

你们对待外国人的每一具体步骤，均应事先向中央提出意见，经中央批准才能行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天津市委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及中共北平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复潘汉年电[1]

（1949年1月20日）

（一）中共对时局的态度已见毛主席十四日声明，任何方面均可照此声明去做。（二）南京集团是主要内战罪魁。李、白[2]对内战亦负有责任，如欲减免内战罪责，必须对人民解放事业有具体而确实的贡献。如李宗仁尚欲取蒋而代，白崇禧尚欲获得美援反对我军，则将不能取得人民谅解，可以断定无好结果。（三）如白欲派代表与刘、邓[3]联络，可到郑州市政府接洽。

---

[1] 这是毛泽东为周恩来、李克农起草的关于答复黄绍竑复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黄绍竑，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

[2] 李，指李宗仁。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

傅作义部队出城整编的部署的指示[1]

（1949年1月21日）

林、罗：

（甲）你们廿十日十一时半电、十九时电及转来苏静十九日廿二时电、北平党廿日十三时电均悉。（乙）你们应即告苏静[2]转告傅、邓[3]：（一）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一〇一军及骑四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十三军、九四军[4]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二）一〇一军可以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四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似较稳当。（三）如傅确已一切部署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二十二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傅作义部出城整编的部署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的复电。

[2] 苏静，当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人民解放军方面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谈判的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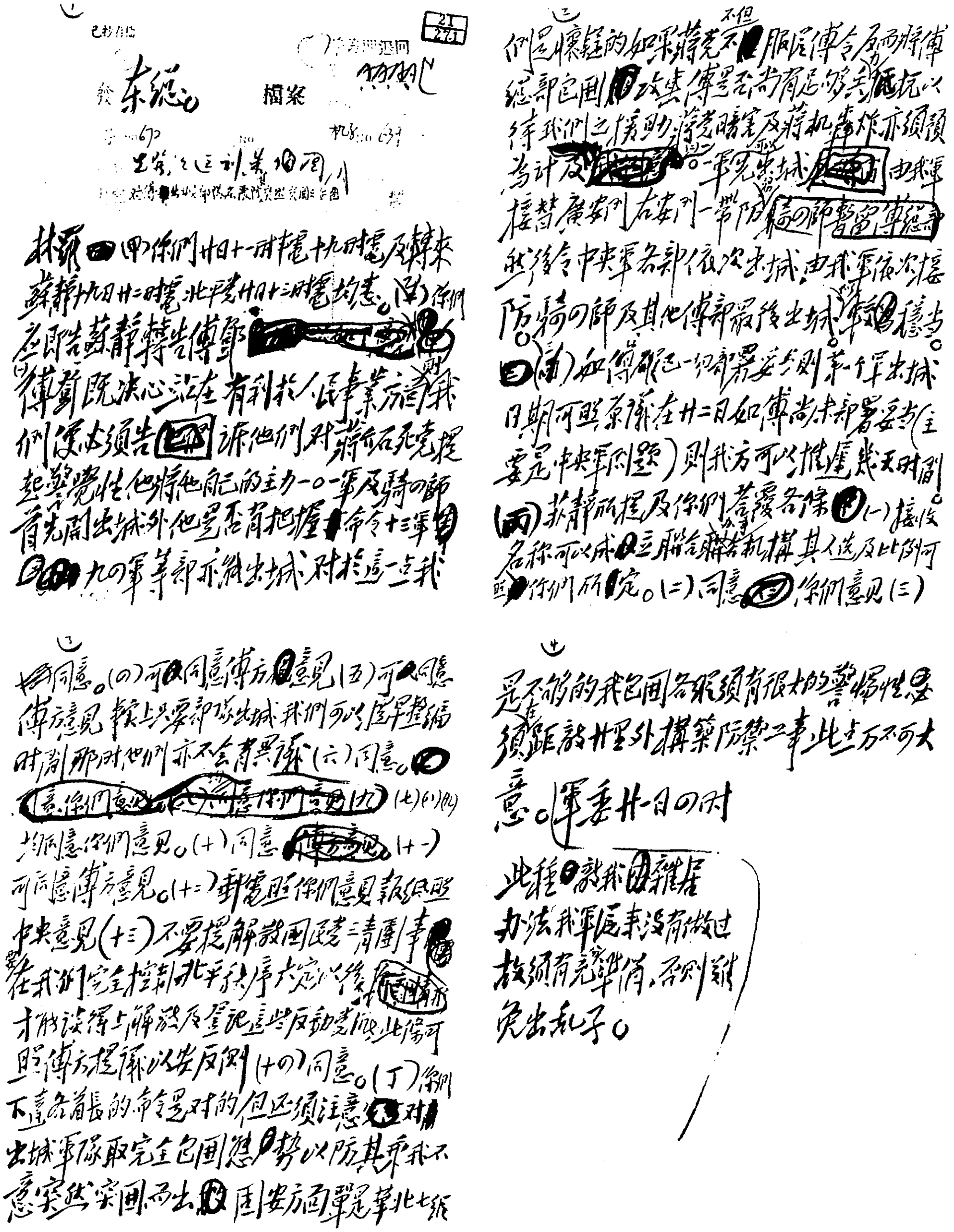
[3] 傅、邓，指傅作义、邓宝珊。

[4] 第十三军、九四军，均为驻北平的国民党军中央系部队。

间。（丙）苏静所提及你们答复各条：（一）接收名称可以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其人选及比例可照你们所定。（二）同意你们意见。（三）同意。（四）可同意傅方意见。（五）可同意傅方意见，事实上只要部队出城，可以提早整编时间，那时他们亦不会有异议。（六）同意。（七）（八）（九）均同意你们意见。（十）同意。（十一）可同意傅方意见。（十二）邮电照你们意见，报纸照中央意见。（十三）不要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事，要在我们完全控制北平，秩序大定以后，才能谈得上解散及登记这些反动党派，此条可照傅方提议，以安反侧。（十四）同意。（丁）你们下达各首长的命令是对的，但还须注意，对出城军队取完全包围态势，以防其乘我不意，突然突围而出。固安方面单是华北七纵是不够的，我包围各纵须有很大的警惕性，须在距敌廿里外构筑防御工事，此点万不可大意。此种敌我杂居办法，我军原来没有做过，故须有充分准备，否则难免出乱子。

军委

廿一日四时



①

21
271

发　东总　档案

林罗：（甲）你们廿日十一时电、十九时电及转来苏静十九日廿二时电、北平党廿日十二时电均悉。（乙）你们应即告苏静转告傅邓：（一）傅邓既决心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方面，则我们便必须告诉他们对蒋介石死党提起警觉性，他将他自己的主力一〇一军及骑四师首先开出城外，他是否有把握命令十三军、九四军等部亦能出城，对于这一点我

②

们是怀疑的。如果蒋党不但不服从傅令，反而将傅总部包围攻击，傅是否尚有足够兵力抵抗以待我们之援助？蒋党暗害及蒋机轰炸亦须预为计及。〇一军先出城，由我军接替广安门、右安门一带防务，骑四师暂留傅总部，然后令中央军各部依次出城，由我军依次接防，骑四师及其他傅部最后出城，傅部才稳当。（丙）如傅部已一切布置妥当，则第一个军出城日期可照原议在廿二日；如傅尚未部署妥当（主要是中央军问题），则我方可以推迟几天时间。（丁）苏静所提及你们答复各条：（一）接收名称可以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其人选及比例可照你们所定。（二）同意你们意见（三）

③

同意。（四）可同意傅方意见（五）可同意傅方意见，较上只要部队出城，我们可以随军整编时间，那时他们亦不会有异议。（六）同意。（七）（八）（九）均同意你们意见。（十）同意。（十一）可同意傅方意见。（十二）新闻照你们意见，报纸照中央意见（十三）不要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事，要在我们完全控制北平秩序大定以后，才能谈得上解散及登记这些反动党派，此条可照傅方提议以安反侧（十四）同意。（丁）你们下达各首长的命令是对的，但还须注意对出城军队取完全包围态势，以防其乘我不意突然突围而出，固安方面单是华北七纵

④

是不够的，我包围各纵须有很大的警惕性，并须在距城廿里外构筑防御工事，此点万不可大意。军委廿一日四时

此种敌我杂居办法我军历来没有做过，故须有充分准备，否则难免出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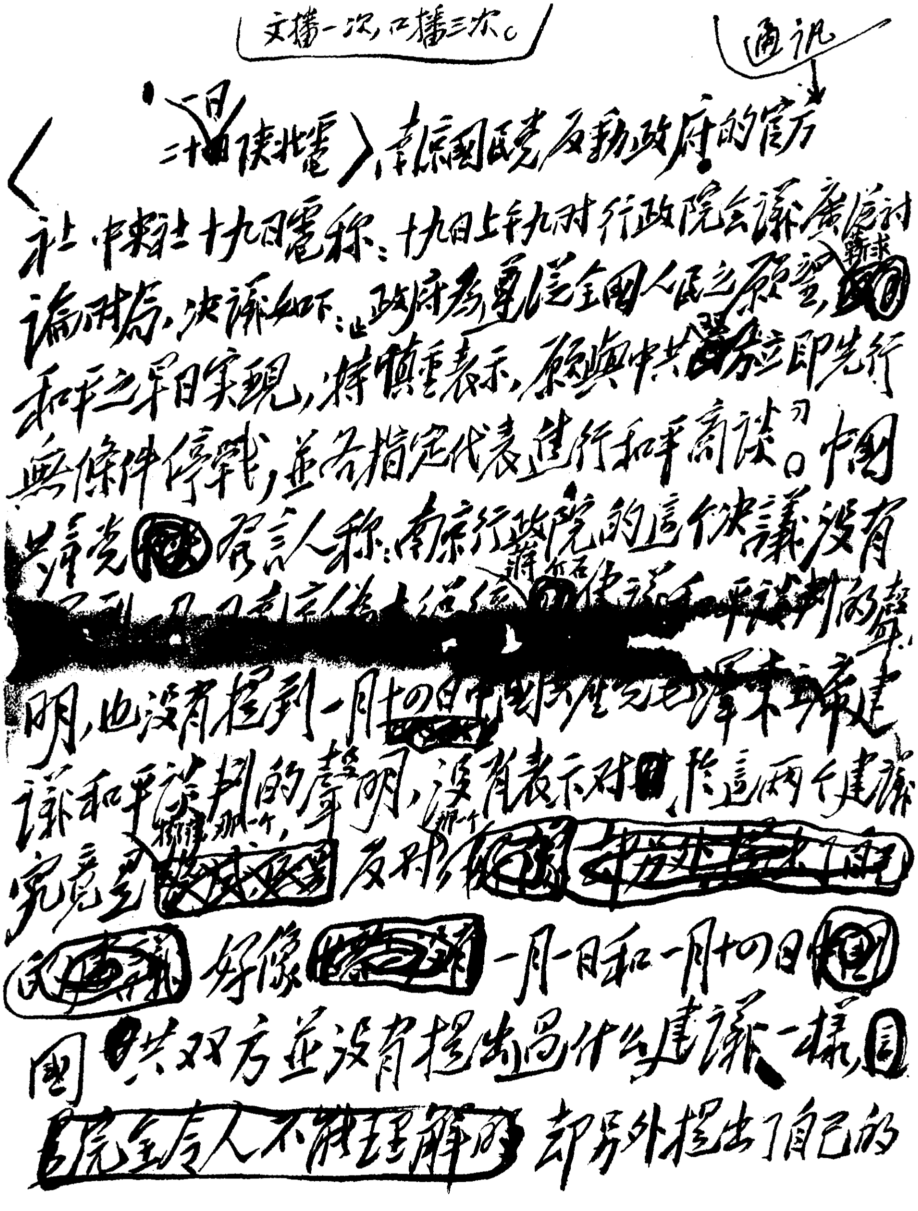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恒电的手稿。

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

（1949年1月21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一日电】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通讯社中央社十九日电称：十九日上午九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遵从全国人民之愿望，蕲求和平之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国共产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这个决议没有提到一月一日南京伪总统蒋介石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也没有提到一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建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究竟是拥护哪一个，反对哪一个，好像一月一日和一月十四日国共双方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建议一样，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实际上，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视中共一月十四日的建议，而且直接推翻了伪总统蒋介石一月一日的建议。蒋介石在其一月一日的建议中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过了十九天，同一个政府的一部分机构，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却推翻了这个政府的"总统"的声明，不是"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是"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了。我们要问南京"行政院"的先生们，究竟是你们的建议为有效呢，还是你们的"总

统”的建议为有效呢？你们的“总统”把“停止战事恢复和平”认为是一件事，声明必定开诚相见愿与中共商讨实现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们则将战争与和平分割为两件事，不愿意派出代表和我们商讨停止战争的具体方法，而却异想天开地建议“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然后再派代表“进行和平商谈”，究竟是你们的建议对呢，还是你们“总统”的建议对呢？我们认为南京伪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职权的，它没有资格推翻伪总统的建议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议。我们认为南京行政院的这个新建议是没有理由的，打了这么久这么大和这么残酷的战争，自应双方派人商讨和平的基本条件，并作出双方同意的停战协定，战争才能停得下来。不但人民有这种希望，就是国民党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这种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无理由的“决议”，不先行停战就不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则国民党的和平诚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决议”是做出来了，不先行停战就没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门从此关死了，而如果要谈判，则只有取消这个毫无理由的“决议”，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愿意取消自己的“决议”，那就是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并无与其对方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人们要问：南京方面果有诚意，为什么不愿意商讨和平的具体条件呢？南京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这样一个论断，难道不是已经证实了吗？中共发言人说：南京现在业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伪总统有一个建议，伪行政院又有一个建议，这叫人们和谁去打交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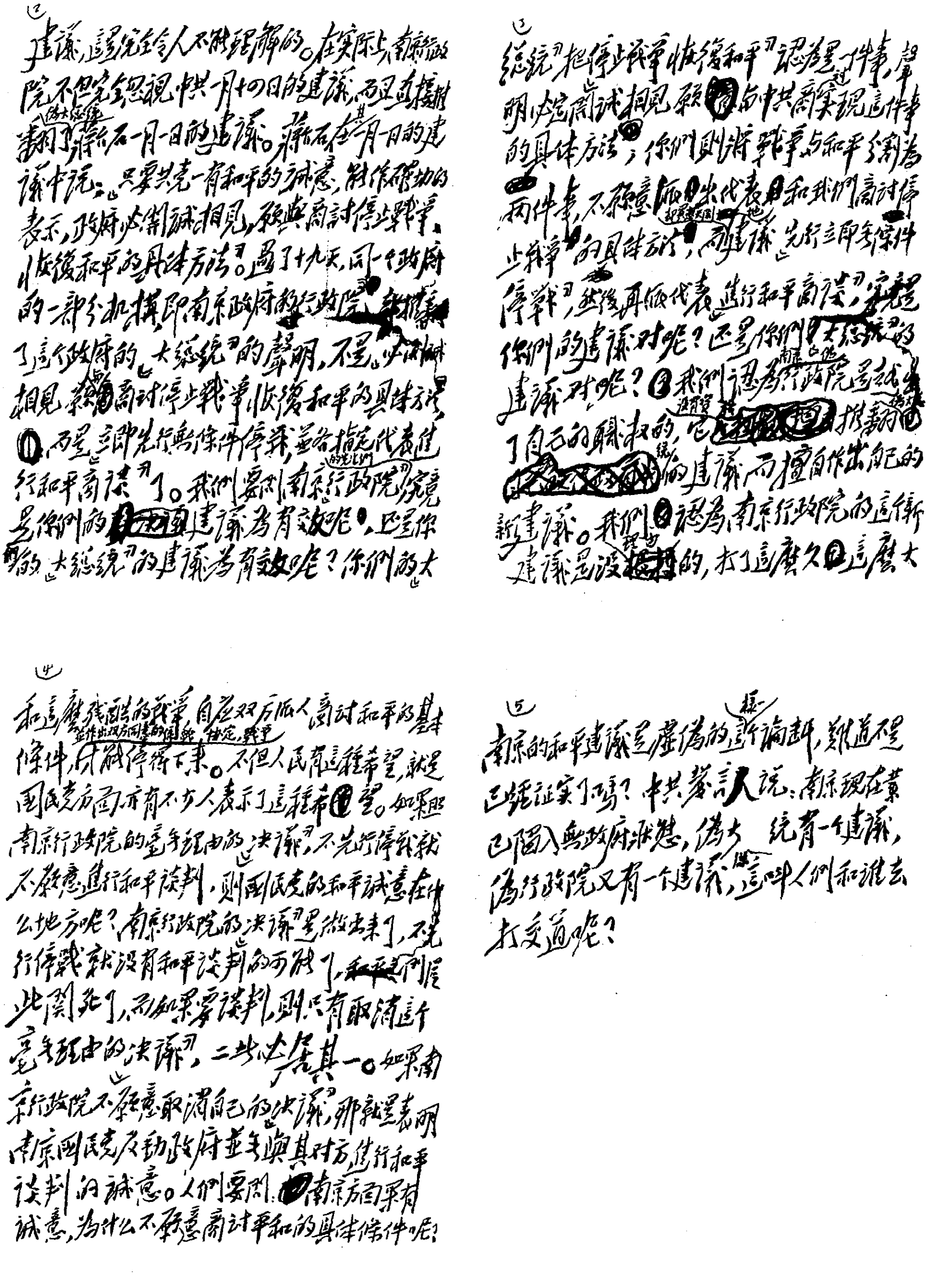


文播一次，口播三次。

通讯

（二十一日陕北电）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方
社 中央社十九日电称：十九日上午九时行政院会议广泛讨
论时局，决议如下：「政府为尊重全国人民之愿望，
早日实现，特慎重表示，愿与中共双方立即先行
無條件停戰，並各指定代表進行和平商談。」中国
共产党发言人称：南京行政院的這个決議没有
提到一月一日南京伪大总统[illegible]和平谈判的声
明，也没有提到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建
议和平谈判的声明，没有表示对于这两个建议
究竟是[illegible]反对，[illegible]
[illegible] 好像 [illegible] 一月一日和一月十四日
国共双方並没有提出過什么建议一样，
[illegible] 却另外提出了自己的

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手稿。



（2）

建議，這是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在實際上，南京行政院不但完全忽視中共一月十四日的建議，而且直接推翻了你們的大總統蔣介石一月一日的建議。蔣介石在一月一日的建議中說："只要共黨一有和平的誠意，能作確切的表示，政府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体方法。"過了十九天，同一個政府的一部分機構即南京政府的行政院，就推翻了這個政府的"大總統"的聲明，不是"必開誠相見，願與商討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具体方法"，而是"立即先行無條件停戰，並各指定代表進行和平商談"了。我們要問：南京行政院，究竟是你們的建議為有效呢，還是你們的"大總統"的建議為有效呢？你們的"大

（3）

總統"把"停止戰爭恢復和平"認為是一件事，聲明"必定開誠相見，願與中共商討實現這件事的具体方法"；你們則將戰爭與和平分割為兩件事，不願意派出代表和我們商討停止戰爭的具体方法，而建議"先行立即無條件停戰"，然後再派代表"進行和平商談"。究竟是你們的建議對呢？還是你們的"大總統"的建議對呢？我們認為南京行政院是越出了自己的職權的，推翻了"總統"的建議而擅自作出自己的新建議。我們認為南京行政院的這個新建議是沒有理由的，打了這麼久這麼大

（4）

和這麼殘酷的戰爭，自應雙方派人商討和平的基本條件，並作出雙方同意的協定，結束戰爭，使戰爭停得下來。不但人民有這種希望，就是國民黨方面亦有不少人表示了這種希望。如果照南京行政院的毫無理由的"決議"，不先行停戰就不願意進行和平談判，則國民黨的和平誠意在什么地方呢？南京行政院的"決議"是做出來了，不先行停戰就沒有和平談判的可能了，~~和平之~~門從此關死了，而如果要談判，則只有取消這個毫無理由的"決議"，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南京行政院不願意取消自己的"決議"，那就是表明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並無與其對方進行和平談判的誠意。人們要問：南京方面果有誠意，為什么不願意商討平和的具体條件呢？

（5）

南京的和平建議是虛偽的欺騙，難道還不是已經証實了嗎？中共發言人說：南京現在業已陷入無政府狀態，偽大總統有一個建議，偽行政院又有一個建議，這叫人們和誰去打交道呢？

毛泽东撰写的《中共发言人评南京行政院的决议》的手稿。

关于转发东北九纵和刘谭电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致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1日）

林、罗、刘、谭：

本日收到你们转来东北九纵一月十六日电及刘谭一月十九日电均已阅悉，甚为欣慰。已立即将这两个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前委及各军区并转所属，据以鼓励士气增强纪律。所有攻击天津各部队，凡战斗英勇、纪律良好者，应予通令嘉奖，并向我军致庆贺。

军委

一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政治部主任谭政的电报。

要把北平敌军改编当作一件大事来完成[1]

（1949年1月22日）

林、罗、刘：

二十一日二十一时电[2]悉。（一）为使东北全军于解决北平问题后能立即进入休整，应付迅速变动的全国局势起见，太原作战以华北部队担任为适宜，但你们须配属必要数量之炮兵。（二）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首长均看作一件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军委

二十二日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指1949年1月21日21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为防止北平敌开出后叛变逃跑或抵抗命令，已令华北七纵向保定前进，我驻廊坊之十纵移固安，插入敌各部之间，分割敌人，以便随时以我武力解决敌人。（二）北平和平解决大约可实现。太原作战是以东北部队担任，还是以华北部队担任，请军委指示。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2日）

（一）你们应同意与傅作义会面。（二）会面时间，以十三军、九十四军有一个军开出城外以后之时为适宜，如该两军抗不出城须面商协同作战事宜，则可以早日会面。（三）会面地点，以在前次你们与邓宝珊会面之处或其他适当地点为宜。（四）会面时你们对傅应有礼貌地接待他，并表示诚恳态度，如同你们最后一次对邓宝珊谈话所取态度那样。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蒋介石“引退”真相[1]

（1949年1月22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二日电】国民党政府伪总统蒋介石在二十一日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而把职务“依据宪法”交给伪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是美国政府久已内定在必要时机代替蒋介石的工具，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才支持他当了伪副总统。美国政府在去年十二月以来曾用各种方式再三催促蒋介石退到幕后去。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上海电称：杜鲁门曾于去年十二月直接致函蒋介石，问他“是否已考虑他辞职或继续执政的问题”。但是事实上蒋介石并没有宣布辞职。蒋介石宣布的是“因故不能视事”，暂时离开南京，他仍然是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介石所发的“引退”文告中说了一句“李代总统”，随即由中央社更正为“李副总统”，以免人们关于蒋介石的“总统”地位继续存在一点发生任何误会。蒋介石在“离职”以前对于继续反革命战争作了新的安排，以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和台湾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方天为江西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主席，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十九日作出“立即

---

[1]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先行无条件停战”的荒谬决议的同时，通知驻南京各国使节迁往广州。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实际权力仍然操在蒋系和蒋介石本人手里。一切迹象，都表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有任何愿意接受真正的民主的和平的诚意。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1]

（1949年1月22日）

东北局，并告各地：

子元电悉。同意你们关于招待和欢迎民主人士的布置，发表时，欢迎地点可以不宣布。此外，望注意：

（甲）我党对待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政治的及有关党的政策的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面解答，不加回避。除党的秘密和某些具体策略外，一切可以公开谈的都可以谈。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应据实相告，在强调说明各种重大成就时，并应指出困难和缺点，以及我们依靠群众力量，虚心学习等克服困难和缺点的方法。同时，请他们充分发表，并提出批评和意见，以加强共同努力的精神。

（乙）此间曾根据上述方针和态度对民主人士进行过以下工作：（1）依据他们的提议，由我党各部门负责同志作报告（已报告过战争、军事攻策、政权、土改、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2）举行座谈，除座谈上述报告外，还座谈过我党新年献词、主席八条文告（他们致东北民主人士两个电报即由此产生）及有关新政协诸问题，我们有负责同志参加。（3）他们可以和我任何负责同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并告各地的电报。

谈话，交换意见。（4）组织一部分同志进行日常的接触和交谈。（5）组织参观。（6）供给他们以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每人赠一册），党的公开文件及材料，解放区建设的材料、报纸及参考消息（无党内新闻）。（7）他们得自由与老百姓接触交谈。（8）民主人士间推有负责人，并有分组研究。许多工作进行均经其负责人与我方负责同志商洽。以上各项工作进行以来，民主人士均感收获甚大。（9）关心他们的生活及疾病。这些经验，供你们参考，可依据你们的具体环境加以运用。

（丙）上述方针，应在干部会议上明确地传达与讨论，使大家都能掌握其精神，主动地向民主人士进行教育宣传又耐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一方面保持积极主动，另方面要反对我们自己的无纪律无组织状态。

中央
子养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3日）

同意你们的意见，允许傅方成立结束办事处。其职务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系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至于结束办事处存在之时间，以上述职务逐步交与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其所属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之时为止，不要呆板规定在出城部队整编完毕后结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3日）

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至于停止战斗，恢复通车，双方派人联系（由井泉主持）等工作，则可立即开始进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告李井泉电的主要内容。

解决太原问题的部署[1]

（1949年1月24日）

林、罗、聂，杨、罗、耿，杨、李[2]，并告华北局及徐、周、陈[3]：

各电均悉。（一）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华北第一、第二兵团的大休整，应放在夺取太原之后。（二）杨罗耿、杨李待林罗派出接替所任防务之部队到达后，即开至石家庄附近休整半个月，即向太原开进。（三）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4]匪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如阎匪顽抗，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军委

二十四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的电报。

[2] 杨、罗、耿，指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徐、周、陈，指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1月24日）

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转来傅作义方面的电报中获悉，白崇禧派出的代表黄启汉、刘仲华到达北平的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罗、聂并告彭真、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复李济深电[1]

（1949年1月24日）

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复李济深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罗荣桓等电[1]

（1949年1月24日）

据息，北平郭宗汾[2]告阎锡山称，北平已于二十二日晨休战。并称，今后发电及郭个人自由能否获得，恐成问题。另据息，郭宗汾、王怀明、梁化之、杨贞吉、贾龙芝、程继忠、曹国忠、宫子清、赵恭（以上六名为阎军师长）等之家属，现均在北平。请你们注意对郭宗汾、王怀明及阎军师长在北平之家属拉一把。请叶剑英入城后经傅作义、邓宝珊介绍，找郭宗汾谈判和平解决太原、大同问题，郭宗汾在北平的电台亦让其存在，不要没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2] 郭宗汾，在北平解放前，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他曾任以阎锡山为主任的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在北平有电台与阎锡山联系。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1]

（1949年1月25日）

【新华社二十五日陕北电】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二十二日报道，这个反动政府的行政院已于二十二日推翻了它自己在十九日所作若不先行停战便不愿意进行谈判的那个荒谬决议，而重新决定派遣五个代表向中国共产党进行谈判。这五个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2]。中共发言人称：我们愿意在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声明的基础之上和南京反动政府谈判和平解决的问题。南京反动政府应负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部责任，全国人民对于这个政府早已完全丧失信任，这个政府早已没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只能是由即将召开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在194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

[2]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张治中（1890—1967），安徽巢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兼新疆省政府主席。黄绍竑（1895—1966），广西容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彭昭贤（1897—?），山东牟平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部长。钟天心（1902—1987），广东长乐（今五华）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水利部部长。

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1]的话，那末，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但是，南京反动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反映全国人民公意的八个条件，现在谁也不知道。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在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放出了许多虚伪的装腔作势的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全国人民应有清醒的头脑，决不可被那些伪善的空谈所迷惑。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2]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

[1]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的所谓“和谈”建议，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即：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2] CC派，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拥蒋集团。

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1]

（1949年1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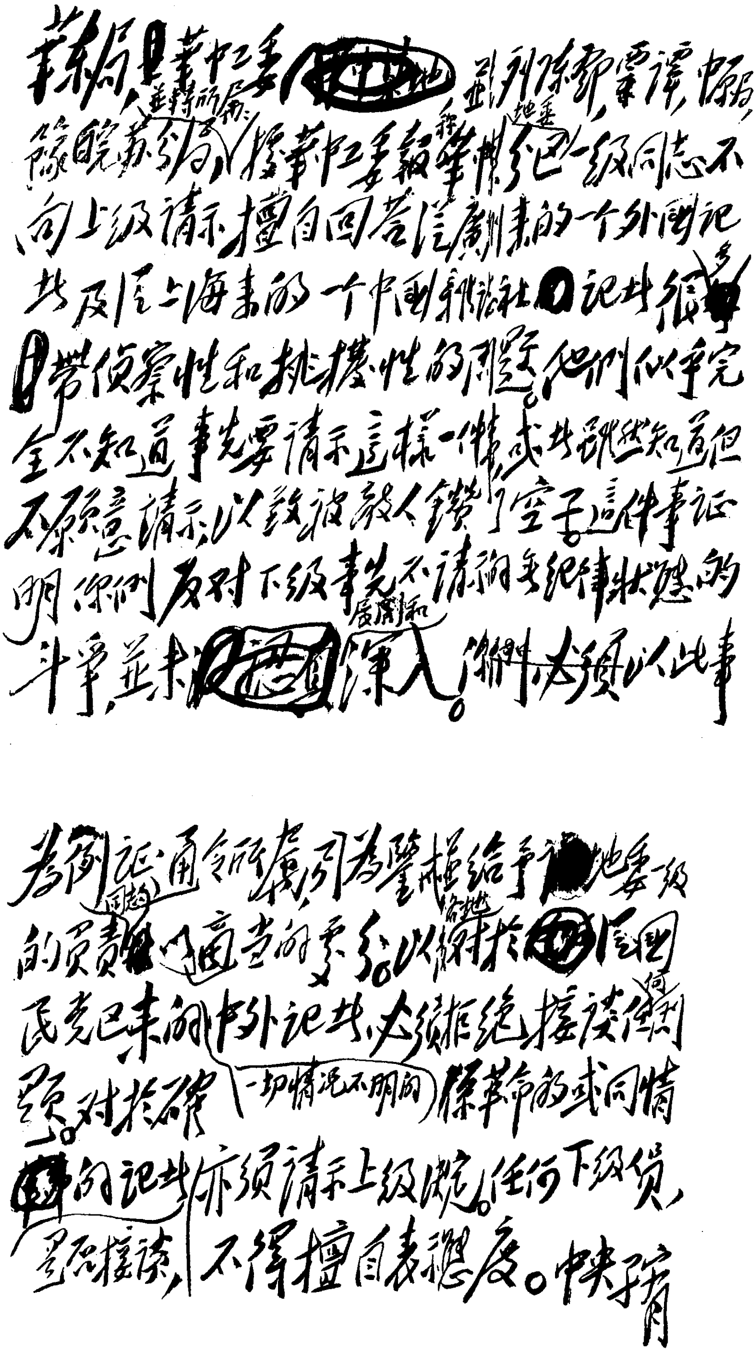
华东局，华中工委并刘、陈、邓、粟、谭，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并转所属：

据华中工委报称，华中某分区地委一级同志不向上级请示，擅自回答从广州来的一个外国记者及从上海来的一个中国杂志社记者很多带侦察性和挑拨性的问题。他们似乎完全不知道事先要请示这样一件事，或者虽然知道但不愿意请示，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这件事证明你们反对下级事先不请示的无纪律状态的斗争，并未展开和深入。你们必须以此事为例证通令所属，引为鉴戒。并给予该地委一级的负责同志以适当的处分。以后各地对于从国民党区来的一切情况不明的中外记者，必须拒绝接谈任何问题。对于确系革命的或同情的记者，是否接谈，亦须请示上级决定。任何下级人员，不得擅自表示态度。

可央
子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中原局及淮海前线总前委的电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的手稿。

不要在约法八章等之外再发任何口号

（1949年1月26日）

林、罗、谭[1]，并告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并转所属，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华社东北前线分社转来东野[2]政治部所拟口号十六条收到阅悉。我军入北平，只宣传约法八章[3]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4]，不

---

[1] 林、罗、谭，指林彪、罗荣桓、谭政，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2] 东野，即东北野战军。

[3] 指194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以林彪、罗荣桓名义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中宣布的“约法八章”。其要点是：（一）保护各城市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筑；（五）除首要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加俘虏和逮捕，凡有一技之长而无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民主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本军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八）无论在本军进城以前和进城以后，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须共同负责，维持全城秩序，免遭破坏。

[4] 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

要再发出任何口号。不论军队或党、政，都应如此。你们所拟十六条口号中有些已包括在约法八章内，例如“没收官僚资本”，而约法八章内很多重要内容十六条口号中又未提到，故很不完全，使人怀疑这些重要内容似乎不重要了。“实行土地改革”一条，实行于大城市附近的种菜地有很多不适宜的地方，乡村中的土地改革办法，决不能施行于大城市附近。“消灭封建势力”一条宣传出去，必致惊动许多老官僚、老军阀及大批藏在北平的土豪劣绅，以为就要动他们了，他们将大起恐慌，埋藏财物，对于我们将来逐步地用征税方法或其他适当方法去吸收他们适当分量的财富归公的政策，会要发生困难。目前时期，在大城市中，对于这类封建财富，以保存不动为有利。“把革命进行到底”“打到南京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两条口号，只应在军队中做实际教育，而不要当作标语写在北平、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里，也不要当作单纯的口号登在大城市报纸的广告上，也不要在我军尚未实行打南京时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市民会议上去叫出来。这样去写、去登、去叫这两个口号，就显得很不策略，因为我党正在根据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准备和南京的代表开谈判，借以击破美帝及国民党的和平攻势，并争取仿照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榜样去和平地解决南京等处的问题（假如有此可能的话）。其他几条口号，或则空洞无大意义（例如建设新北平），或则已包括在我党一月十四日声明中（例如召开新政协）。因此，你们只要将林、罗约法八章及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各点去做宣传就够了，不要另外提出一批口号。此外，在平、津这类大城市的墙壁上写大字标语是否适宜，亦值得考虑。我们觉得，以张贴一月十四日声明及约法八章的印刷品为适宜。

总之，在大城市工作的作风，决不能搬用在乡村工作的作风。

在大城市，凡事均须从新仔细考虑，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城市的情况。凡属处理较重要的新事件，均须事前向上级请示，以免犯了错误，收不回来，影响很坏。务望注意。

中央
子宥

1949年1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以米高扬为首的苏方代表团。

在《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上加写的话

（1949年1月27日）

（一）我军占领的城市在其秩序安定以前，不要忙于宣布对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这种急忙宣布处理是盲目的、没有效力的，易使敌人隐藏和使自己被动。在社会秩序已经安定，我们对城市情况已经大体明了，那就必须着手有准备地、有系统地处理这些反动组织。（二）如果我们一定要一切国民党、三青团的普通党员、团员一律登记，则纷扰太大，易于引起恐慌，故以不登记为有利。（三）我们有了党员、团员的名单，对其组织情况已全部明了，对其中的坏分子可以随时处分，故免于登记并无危险。

在致吴克坚的电报上加写的话[1]

（1949年1月28日）

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致吴克坚电上加写的一段话。吴克坚，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在上海负责党的地下情报联络工作。

致刘伯承等电[1]

(1949年1月28日)

白崇禧派来的代表，你们可以接见，探明来意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在商丘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1949年1月28日）

据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中央通讯社一月二十六日电称：“政府发言人称：政府为提早结束战争，以减轻人民痛苦，一月以来已作种种措施与步骤。本月二十二日更正式派定和谈代表[1]。日来只待中共方面指派代表，约定地点，以便进行商谈。惟据新华社陕北二十五日广播中共发言人谈话[2]，一面虽声明愿与政府商谈和平解

---

[1]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派定的和平谈判代表是：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5人。

[2] 1949年1月2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的谈话指出：“我们允许南京反动政府派出代表和我们进行谈判，不是承认这个政府还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而是因为这个政府手里还有一部分反动的残余军事力量。如果这个政府感于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人民的信任，感于它手里的残余反动军事力量已经无法抵抗强大的人民解放军，而愿意接受中共的八个和平条件的话，那末，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关于谈判地点，谈话中说：“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关于谈判代表，谈话中说：“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

决，一面则肆意侮谩，语多乖戾。且谓谈判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试问中共方面如不即时指派代表，约定地点，又不停止军事行动，而竟诿诸所谓北平完全解放以后，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须知全国人民希望消弭战祸，已属迫不及待。政府为表示绝大之诚意，仍盼中共认清：今日之事，应以拯救人民为前提，从速指派代表进行商谈，使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又据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六日上海电称：“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二十六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十六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等情。据此，中共发言人表示下列诸点：

（一）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1]，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

---

[1] 冈村宁次（1884—1966），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1925年到1927年，担任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1928年任日军步兵联队长，曾参加日军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1932年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1933年曾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7年至1945年期间，历任日军第十一军、华北方面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1945年12月延安公布的日本战犯名单中，被列为首要战争罪犯。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充当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为蒋介石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1949年1月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判无罪，释放回国。1950年又被蒋介石聘为“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高级教官。1955年以后，又纠集日本陆海军旧军人组织“战友联”（后改名为乡友联盟），积极参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活动。

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许可你们这样做。我们有权命令你们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依照我们将要通知你们的时间地点，由你们负责押送人民解放军。其他日本战争罪犯，暂由你们管押，听候处理，一概不得擅自释放或纵令逃逸，违者严惩不贷。

（二）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言人一月二十六日的声明中，获知南京的先生们要求和平谈判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据说都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感觉中共方面对于接受你们的愿望则是这样地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又不停止军事行动”，实在是“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我们老实告诉南京的先生们：你们是战争罪犯，你们是要受审判的人们。你们口中的所谓“和平”“民意”，我们是不相信的。你们依赖美国势力，违反人民意志，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这次残酷无比的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国内战争。那时你们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

劝告也不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账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你们提出了五条[1]，我们提出了八条[2]，人民立即拥护我们的八条，不拥护你们的五条。你们不敢批驳我们的八条，不敢坚持你们的五条。你们声明愿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的基础。这样难道还不好吗？为什么还不快点谈呢？于是乎显得你们很紧张，很热烈，很殷勤，很迫切，很主张“无条件停战”“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我们呢？显然是不紧张，不热烈，不殷勤，不迫切，“拖延时间，延长战祸”。但是且慢，南京的先生们，我们会要紧张起来，热烈起来，殷勤起来，迫切起来的，战争

---

[1] 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的“五条”，指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声明中所提出的关于和平谈判的五个条件，即：一、“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三、“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四、“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五、“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毛泽东当时即对这五条作了严正的驳斥，参见《评战犯求和》。

[2] 中国共产党的“八条”，指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所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个条件。参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时间一定可以缩短，人民的痛苦一定可以减轻。你们既然同意以我们的八个条件为双方谈判的基础，你们和我们会要一齐忙碌起来的。实行这八条，够得上你们，我们，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全国各界人民忙上几个月，半年，一年，几年，恐怕还忙不完呢！南京的先生们听着：八条不是抽象的条文，要有具体的内容，目前这一个短时期内还是大家想一想要紧，为此耽搁一段时间，人民也会原谅的。老实说，人民的意见是要好好地准备这一次谈判。谈是一定要谈的，谁要中途翻了不肯谈，那是决不许可的，因此你们的代表一定得准备来。但是我们还得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不容许战争罪犯们替我们规定谈判的时间。我们和北平人民正在做一件重要工作，按照八个条件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你们在北平的人例如傅作义将军等也参加了这件工作，经过你们的通讯社的公告，你们已经承认了这件工作是做得对的[1]。这就不但替和平谈判准备了地点，而且替解决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太原、归绥、兰州、迪化、成都、昆明、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台湾、海南岛等地的和平问题树立了榜样。因此，这件工作是应当受到赞美的，南京的先生们对此不应当表示不够郑重的态度。我们正在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在我们区域的和在你们区域的都在内，商量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准备第一个条件的具体内容。这个名单，大约不要很久就可以正式公布出来。南京的先

---

[1]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49年1月27日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文告并称：“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生们，你们知道，直到现在，我们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都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和正式公布这样一个名单，这是要请先生们原谅的。其原因，是你们的和谈要求来得稍为迟了些。如果早一点，也许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你们也并不是没有事做。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人[1]。特别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此事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倘有逃逸情事，必以纵匪论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我们认为只有逮捕这些战争罪犯，才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认真地做了一件工作。只要战争罪犯们还存在，就只会延长战争时间，加重人民痛苦。

（三）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

（四）八条中其他各条双方应行准备的工作，另一次再通知南京。

---

[1] 宋子文，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外交部部长、驻美特使等职。陈诚，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何应钦，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都是国民党CC派的主要头目。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市长。戴传贤，即戴季陶，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军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当时任国民党军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桂永清，当时任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

中共中央关于征求各民主人士对战犯名单意见致东北局电[1]

（1949年1月28日）

东北局：

（一）经新华社发给你们的战犯名单是否收到？请你们于数日内即征求各民主人士的意见，迅速电告。

（二）南京方面极为混乱，企图拉拢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站在南京方面的计划已告失败。

（三）北平和平解决，傅作义将功折罪，可以免除战犯罪名，此点可告民主人士，将来李宗仁、白崇禧等如能照此办理，亦可许其将功折罪，惟蒋系各主要战犯决不能宽待。

（四）五十五人声明影响极好，莫斯科一切报纸都登载了。

（五）民盟、民促、三党、救国会、致公党各项声明均到照发。惟民革的尚未收到。

（六）你们欢迎会稿件，速即发来。

中央

二十八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

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1]

（1949年1月31日）

【新华社陕北三十一日电】南京中央社一月二十九日转发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发言人声明，除删掉或窜改许多重要的字句之外，还有意地删掉许多包含着极重要意义的段落。关于日本战犯冈村宁次问题，中央社删掉了下面一段："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全国人民、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中的爱国人士，必须立即起来反对南京反动政府方面此种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下面的一段也被中央社删掉了："此事与你们现在要求和我们进行谈判一事，有密切关系。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结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关于内战罪犯问题，中央社删掉并窜改了下面一段："你们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选举伪总统，颁发'动员戡乱'的伪令，又是那样的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声明，即《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

听。那时，上海、南京和各大都市的官办的或御用的所谓参议会、商会、工会、农会、妇女团体、文化团体一齐起哄，‘拥护动员戡乱’‘消灭共匪’，又是那样地紧张、热烈、殷勤、迫切，又是什么人的劝告也不听。如今，过了两年半，被你们屠杀的人民何止数百万，被你们焚毁的村庄，奸淫的妇女，掠夺的财物，被你们的空军炸毁的有生无生力量，是数不清的，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帐必得算一算。听说你们很有些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次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得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你们是打败了。你们激怒了人民。人民一齐起来和你们拼命。人民不欢喜你们，人民斥责你们，人民起来了，你们孤立了，因此你们打败了。”上面这一段，中央社删窜成为这样几句：“如今，过了两年半，你们犯了滔天大罪，这笔帐必得算一算。虽说你们反对清算斗争，但是这一项清算斗争是事出有因的，必须清一清，算一算，斗一斗，争一争。”在谈内战罪犯问题的末尾一段中，原文是：“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立即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之在南京、上海、奉化、台湾等处者。其中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宋子文、陈诚、何应钦、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王世杰、吴国桢、戴传贤、汤恩伯、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1]等人。特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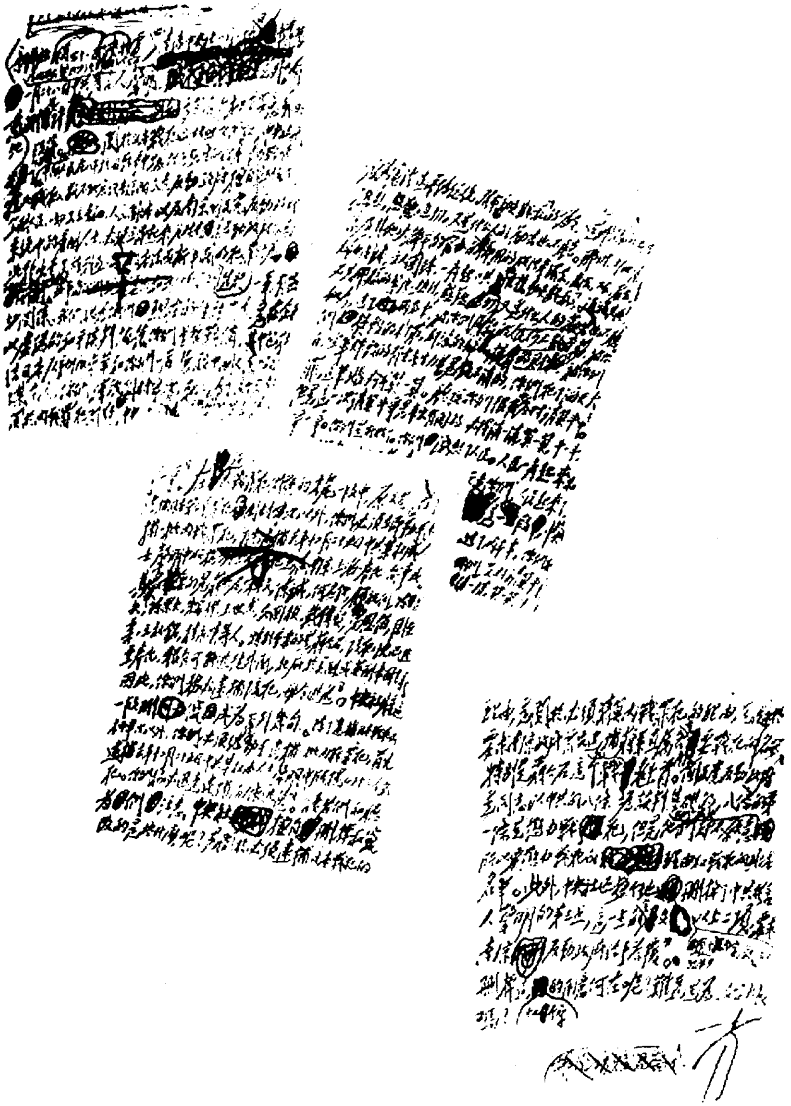
---

[1] 宋子文，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陈诚，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台湾省主席。何应钦，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部长。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陈立夫、陈果夫、朱家骅都是国民党CC派的主要头目。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部长。吴国桢，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上海市市长。戴传贤，即戴季陶，当时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队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周至柔，当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当时任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桂永清，当时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

重要的是蒋介石，该犯现已逃至奉化，很有可能逃往外国，托庇于美国或英国帝国主义，因此，你们务必迅即逮捕该犯，毋令逃逸。”中央社将这一段删窜成为下列几句：“除了逮捕日本战犯冈村宁次以外，你们必须继续动手逮捕一批内战罪犯，首先逮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声明中所提四十三个战犯。你们务必迅速逮捕，勿使逃逸。”读者们和听者们注意：中央社擅自删掉和窜改的是些什么呢？是关于必须逮捕日本战犯的理由，是关于必须清算内战罪犯的理由，是关于要求南京政府首先逮捕蒋系直属各重要战犯的名单，特别是蒋介石这个战犯魁首。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同意以中共的八条[1]为谈判基础的，八条的第一条是惩办战犯，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我们提起所以要惩办战犯的理由和战犯的具体名单。此外，中央社还整个地删掉了中共发言人声明的第三点，这一点的全文总共只有十七个字，即“（三）以上二项，要求南京反动政府给予答复。”删掉这十七个字的用意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文字太长吗？

---

[1] 参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述《中央社窜改中共发言人声明用意何在》的手稿。

北平解放[1]

（1949年1月31日）

【新华社陕北三十一日电】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北平的人民久已象亲人一样地渴望着人民解放军。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三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北平的和平谈判曾经进行了

---

[1] 这是新华社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从去年十二月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的一天就已开始接触，但是直至天津解放的前夜，傅作义将军还不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因而使谈判未获结果。开始时期傅作义还梦想着作绝望的抵抗，随后又梦想着率部逃跑到绥远，或太原，或青岛、上海，并与蒋介石信使往还不绝，对于与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采取敷衍的态度。傅作义直系主力在新保安和张家口被歼，以及国民党整个军事政治形势处于绝望境地，动摇了他的原定计划。一月十四日，中共毛泽东主席宣布八项和平条件，十五日天津迅速解放，十六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将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将军向傅作义送出关于北平和平解决办法的公函。这些事变，促使傅作义将军决心接受解放军的提议，谈判才得到进展。双方的谈判决定：为了便于移交和接管，在过渡期间，成立七人的临时联合委员会，人民解放军方面四人，傅作义将军方面三人，以叶剑英将军为主任。这个委员会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双方协议：开出城外的傅作义将军所部全军在大约一个月后开始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双方又协议在过渡期间，北平市内的各级行政机关、企业机关、银行、仓库、邮电机关、报社、学校、文化机关等，一律暂维现状，不得损坏，听候处理。北平的解放基本上结束了华北的战争。中国北部的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及河南一部，现在只有太原、大同、归绥、包头、五原、临河、青岛、安阳、新乡等少数地方尚未解放，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果不愿意跟随北平的榜样，就只有跟随天津的榜样。天津是在二十九小时内经过战斗解放的，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全部解决，其高级将领全部被俘，其中拒绝和平解决、坚持抵抗到底并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首要分子，将被审讯判罪。北平的解放对

于长江以南及其他地方的解放也指出了一个榜样。全国人民要求战争罪犯们统率的所有执行“戡乱剿匪”伪令，屠杀中国人民的一切反动军队，都能像傅作义将军及其所部一样地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条件，这将证明他们确有诚意实现真正的和平。傅作义将军在过去两年半中是积极执行“戡乱剿匪”伪令的一人，因此成为战争罪犯之一。但是，人们相信，既然他现在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条件，率部出城听候改编，那么，只要他今后继续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向走去，他就有希望取得人民的谅解，允许他将功折罪。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各大学学生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

哀悼冯裕芳的唁电[1]

（1949 年 1 月 31 日）

冯裕芳先生家属礼鉴：

裕芳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曷胜哀悼，特电致唁，尚希节哀。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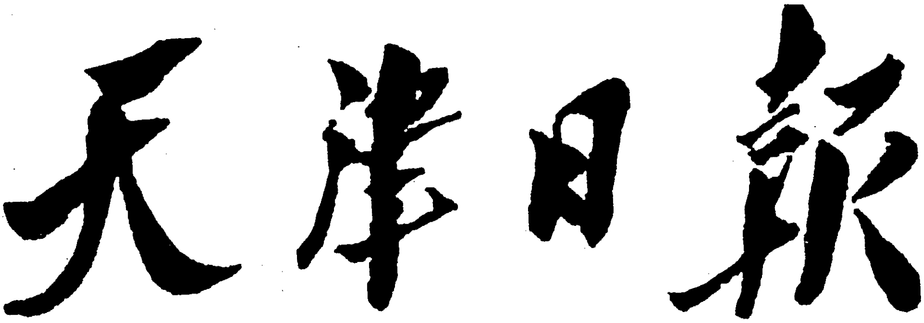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给冯裕芳先生家属的唁电。冯裕芳，广东琼崖人，曾在香港从事文化工作与民主运动多年。冯裕芳之弟即人民解放军琼崖军区司令员冯白驹将军。

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月）

天津日报



毛泽东第一次为《天津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应天津市长黄敬之请，毛泽东为《天津日报》题写了报头。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1]

（1949年2月1日）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北平的和平解决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国民党中央社于一月二十二日发表傅作义[2]将军的文告，该文告称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一月二十七日中央社又发表南京政府国防部的文告称：“华北方面，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傅总司令作义曾于二十二日发表文告，宣布自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休战。平市国军大部当即遵从总部指示，先后撤离市区，开入指定地点。共军已有少部开进市区。绥远、大同两地亦将实施休战。”

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述评，在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21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后，率20余万守军撤出北平市区接受改编。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1]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人民解放军十五日攻克天津，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即和傅作义将军的代表邓宝珊[2]将军、周北峰[3]将军成立了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往后数日又成立了细节方面的许多协议。周北峰将军是在一月八日由张东荪[4]教授引导出城和林彪将军等谈过一次的，这回出城是第二次。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一月十九日北平人民的十一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他们听了人民解放军方面的宽大处理政

---

[1] 陈长捷（1905—1980），福建闽侯人，原任国民党军津塘防区副司令兼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司令官。林伟俦（1905—1998），广东台南人，原任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区司令部副司令官兼第六十二军军长。杜建时（1906—1989），天津杨村人，原任国民党政府天津市市长。

[2] 邓宝珊（1894—1968），甘肃天水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3] 周北峰（1903—1989），山东永济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土地处处长，当时为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4] 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北平分部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

策，甚为满意。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军部招待了代表们，举行了畅谈和欢宴。代表们中的一个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是过去山东国民党省政府的主席，坚决反对过人民解放军，当北平市长时也是坚决压迫人民的，他是国民党系北方派的干员之一。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又一个代表是吕复，他是国民党法统内的立法委员。又一个代表是北平古物保管机关的康同璧女士。其余是官办的民众团体的代表。他们就是二十二日傅作义将军文告中所说“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那一句话中所谓“人民公议”的表现。不管这一切，他们总算是代表了真正的民意，这和过去大半个月内国民党CC系[1]在南方各省策动官方的参议会、商会、工会等起劲地叫嚣的所谓“和平攻势”，是截然不同的，人们切不可将这二者混为一谈。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的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因而被CC系死硬派战争罪犯潘公展[2]所反对。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

[1] CC系，指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拥蒋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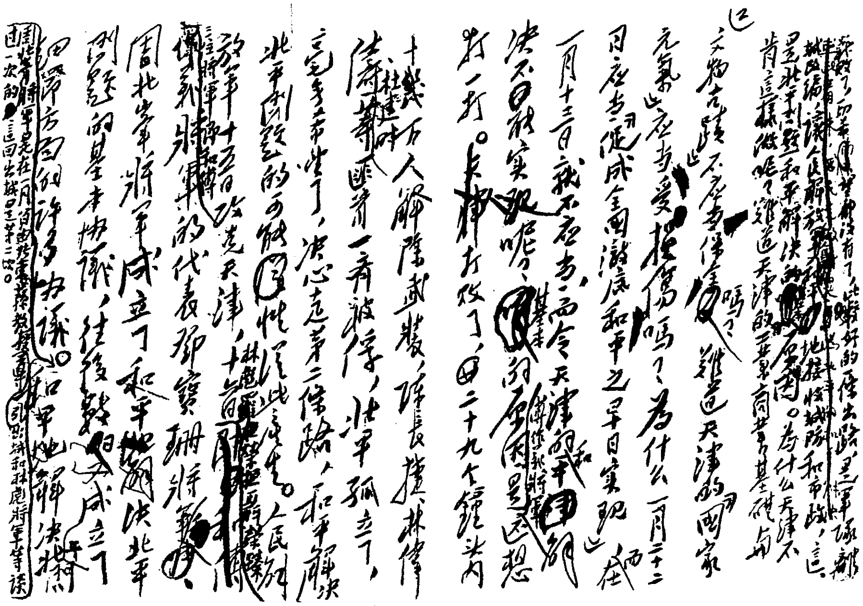
[2] 潘公展（1895—1975），浙江吴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南京政府为什么也同意这样干呢？这是全国革命高潮和国民党大崩溃的表现。他们不得不同意，就像他们不得不同意以共产党的八个和平条件[1]为谈判基础一样。在全国人民的逼迫下，他们孤立了，他们的二十万军队已经这样做了，他们无法不同意。这一同意是有巨大意义的，全国的问题就有合法（合国民党之法）理由遵循北平的道路去解决，他们丝毫也没有理由反对别地这样做了。尽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准备“抵抗到底”，但是他们将被完全地彻底地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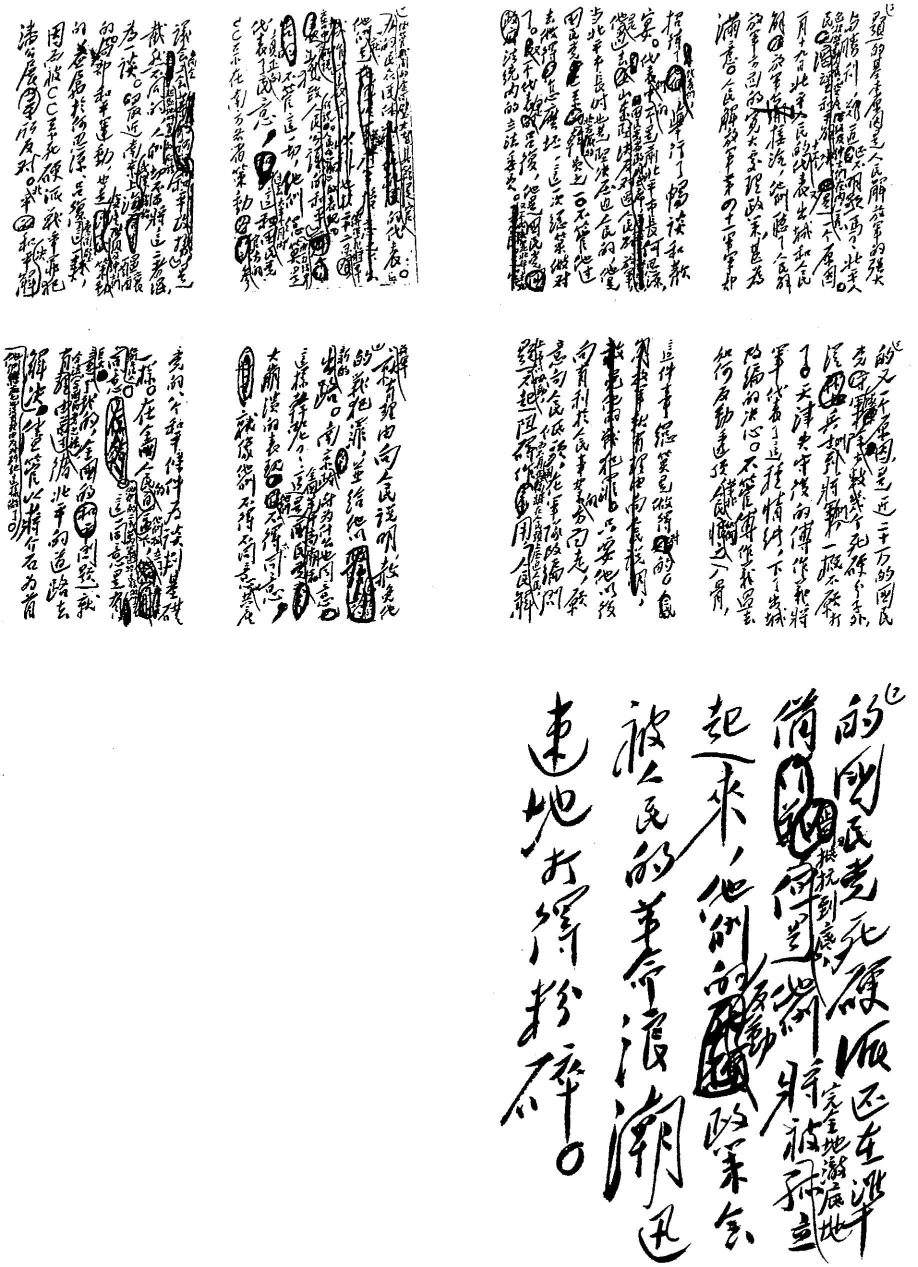
傅作义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图为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

---

[1] 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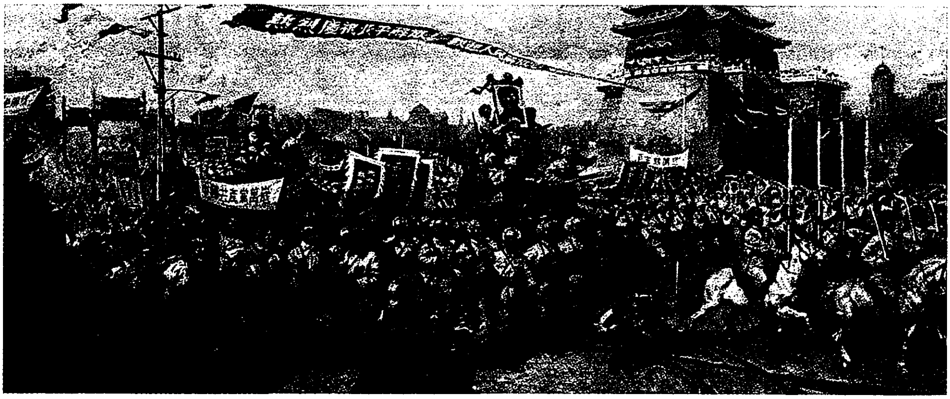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手稿（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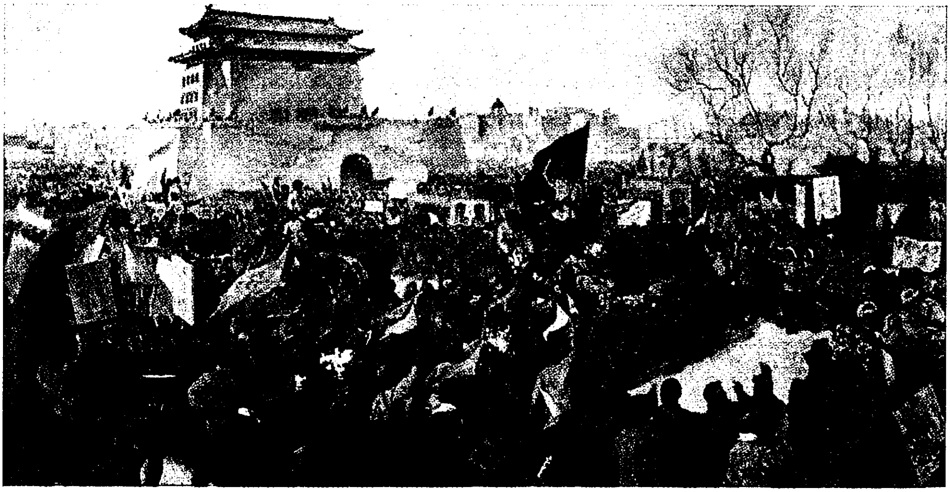


的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北平（抵抗到底的）[illegible]他们将完全地彻底地被孤立起来，他们的反动政策会被人民的革命浪潮迅速地打得粉碎。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的手稿（部分）。



《和平解放北平》（油画）



《北平解放》（油画）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1]

（1949年2月2日）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

---

[1]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是当时已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其他方面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在1949年2月1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1]，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二月二日

---

[1] 八条，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当时国民党政府已口头表示接受这八条作为谈判的基础。

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1]

（1949年2月3日）

（一）对傅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住在北平（城内或城外）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他处都是可以的。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二）南京公布有南京地方人民代表团八人一日飞平，不久并有上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代表团来北平，据说他们是得李宗仁同意，从事沪宁局部和平试探工作的。你们不要拒绝他们来平。他们到平后，你们应有礼貌地招待他们，探明来意，报告中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真、叶剑英等电[1]

（1949年2月3日）

北平电信局无线电台目前若干天内，可听其照旧与京、沪等地保持联络，但应派出军事代表前往监督，并防止其逃匿器材。飞机场应立即控制于我手中，对民航机暂时可在我方同意的条件下，有限制地降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

（1949年2月5日）

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太原如能照北平样和平解决，阎锡山又能作上述傅作义那样的表示，我们亦可照待遇傅作义那样待遇他。只要李、白能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一方面，依照北平办法解决京、沪、汉等处问题，我们即会以对待傅的态度对待他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真、叶剑英、徐冰电[1]

（1949年2月5日）

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法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彭真、叶剑英、徐冰电的主要内容。徐冰，当时任北平市副市长。

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

（1949年2月5日）

上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声明，到上月三十一日得到了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发言人的答复。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发言人在这个答复里，对于中共发言人所提出的各项问题，提出了狡辩。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重新逮捕日本侵华罪魁冈村宁次，准备押送人民解放军，并负责看管其他日本战犯勿令逃逸一节，该发言人说，这“是一个司法问题。这完全与和谈无关，更不能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对于中共要求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负责逮捕战争罪犯蒋介石等人一节，说是“真正的和平不应该有先决条件”。并且说中共发言人的声明“态度上似乎不够郑重”，而且是“节外生枝”。对此，中共发言人声明：在一月二十八日那种时候，我们还把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说成是一个政府，在这点上说来，我们的态度确乎不够郑重。这个所谓“政府”究竟还存在不存在呢？它是存在于南京吗？南京没有行政机关。它是存在于广州吗？广州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上海吗？上海既没有行政机关，又没有行政首脑。它是存在于奉化吗？奉化只有一个宣布“退休”了的伪总统，别的什么都没有。因此郑重地说起来，已经不应当把它看成一个政府，它至多只是一个假定的或象征的政府了。

但是我们仍然假定有那么一个象征的“政府”，并且假定有一个足以代表这个所谓“政府”发言的发言人。那末，该发言人应当知道，这个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现在不但对于和平谈判毫无建树，而且确确实实地是在不断地节外生枝。例如当着你们如此急切地要求谈判的时候，忽然判决冈村宁次无罪，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在中共要求予以重新逮捕以后，又把他送往日本，并且把其他二百六十名战犯也送往日本，这难道不是节外生枝吗？日本现在是什么人统治呢？难道是日本人民在统治而不是帝国主义分子在统治吗？日本是你们如此热爱的地方，以致使你们相信日本战犯们生活在你们统治的区域，还不如使他们生活在日本较为安全些，较为舒服些，较为能受到正当待遇些。这是一个司法问题吗？为什么发生这个司法问题呢？难道日本侵略者和我们打了八个整年这件事，你们也忘了吗？完全与和谈无关吗？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八条的时候，并没有发生释放冈村宁次这件事情。一月二十六日这件事情发生了，就应提出了，就与和谈有关了。一月三十一日你们接受麦克阿瑟的命令，又将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连同冈村宁次一起送往日本，就更与和谈有关了。为什么你们要求和谈呢？是因为你们打了败仗。你们为什么打败仗呢？是因为你们发动反人民的国内战争。你们在什么时候发动这次国内战争呢？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你们发动这次战争是打谁呢？是打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大功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区。用什么力量来打呢？除了美国援助之外，是在你们统治区域从人民方面捉来和刮来的力量。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

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八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我们提出这个项目是有理由的，是反映全国人民意志的。全国人民都要惩办日本战犯。即在国民党内，也有许多人认为惩办冈村宁次等日本战争罪犯和惩办蒋介石等国内战争罪犯一样是理所当然。无论你们说我们是有和平诚意也好，没有和平诚意也好，这两类战犯问题都得谈判，这两类战犯都得惩办。关于叫你们在谈判之前逮捕一批内战罪犯和防止这些战犯逃跑的问题，你们认为“不应有先决条件”。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这不是先决条件，这是你们承认惩办战犯一条为谈判基础之后自然产生的要求。叫你们逮捕，是怕战犯们跑掉。当着我们在谈判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们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你们闲得发慌，因此叫你们做一件合理的工作。这些战犯总是要逮捕的，任凭他们跑到天涯海角也是要逮捕的。你们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人们，你们是有很多的好心眼儿的人们，你们对于这些屠杀几百万同

胞的负责者应当没有什么爱惜，从你们愿意以惩办战犯作为一条谈判基础这一点来看，你们似乎也并不很爱惜这些东西。但是既然你们声明叫你们马上逮捕这些东西显得颇有为难之处，那末也罢，你们就防止他们逃跑吧，千万莫叫这些东西跑掉了。先生们，请想一想，当着你们辛辛苦苦地派出代表团和我们讨论惩办战犯问题的时候，战犯们已经跑了，那末，还谈什么呢？你们的代表团先生们的脸上还有什么光彩呢？你们那样多的“和平诚意”从何表现呢？怎么可以证明先生们是真的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而没有一点儿假呢？此外，该发言人还说了许多废话，这些废话是骗不了任何人的，我们认为没有答复的必要。南京或广州或奉化或上海的假定的象征的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注意，政府二字加上引号）的先生们，如果你们以为我们的这篇声明的态度又有些不够郑重的话，那末，请原谅，我们对你们只能取这种态度。

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1]

（1949年2月7日）

【新华社陕北七日电】据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中央社五日上海电称："甘介侯[2]声明，颜惠庆[3]、章士钊[4]等六人组织之和平代表团，将于二三日内飞往北平。邵力子[5]及渠两人则以私人资格随行前往策助。甘氏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等情。中共发言人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准备予以接待。如果照甘介侯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速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地点，以便政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声明的形式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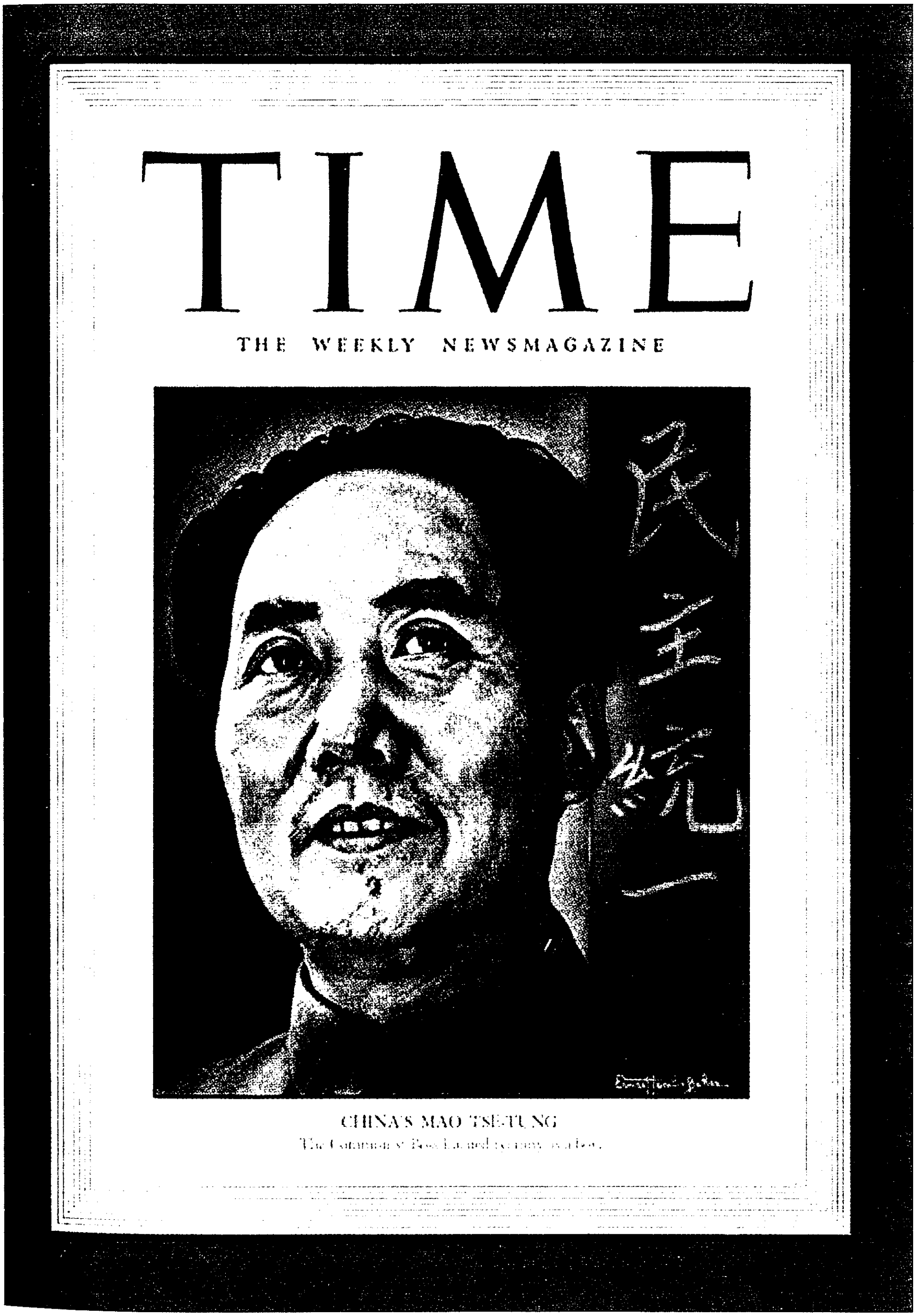
[2] 甘介侯，早年曾任大学教授、外交官员，当时是李宗仁私人顾问。

[3] 颜惠庆，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外交总长，国民党政府驻英、驻苏大使等职。

[4] 章士钊，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律师等职。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

[5] 邵力子，早年曾任上海大学代理校长，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西安事变后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遂留北平。

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商谈”，则中共早已声明，和平谈判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目前无从谈起，我们对于任何方面的人暂时均不准备接待。至于甘介侯这类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他只有资格在南京、上海一带出卖其“和平攻势”牌的美国制造的廉价商品，人民的北平不欢迎这类货色。对不起，请止步。如果甘介侯竟敢混入北平，贩卖私货，则北平人民很可能把他驱逐出境。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CHINA'S MAO TSE-TUNG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第一次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把军队变为工作队[1]

（1949年2月8日）

四日电悉。你们加紧整训，准备提前一个月出动[2]，甚好。望照此去做，不要放松。但在实际上，三月仍须整训，并须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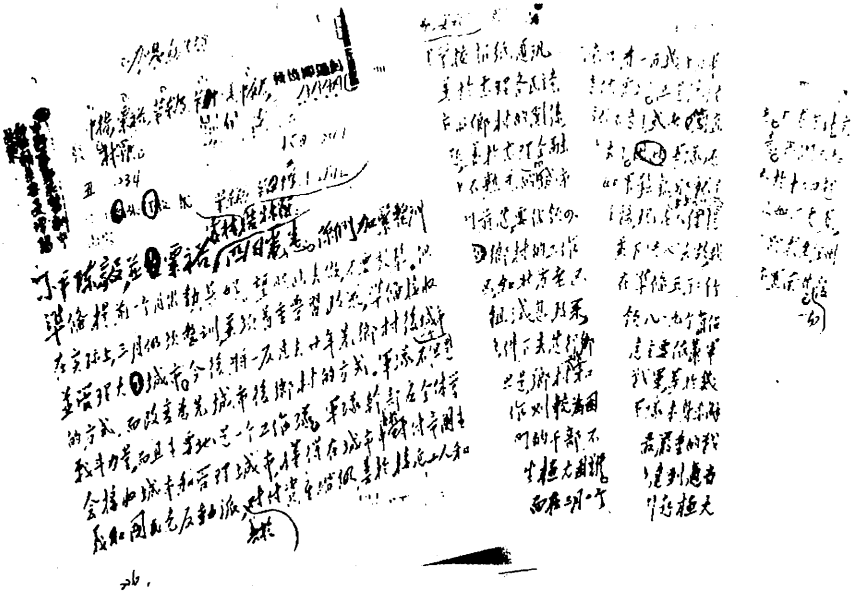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这个电报，同时发给其他有关的野战军和有关的中央局。这个电报估计到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因而及时地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不但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必须是一个工作队，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主要地要担负工作队的任务。这个方针，对当时新解放区干部问题的解决和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关于人民解放军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性质，参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的第二部分。

[2] 指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准备把渡江作战的行动由1949年4月提前到3月。后来由于同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又延至4月下旬。

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你们前进，要占领四五个省的地区，除城市外，还有广大乡村的工作要你们去做。南方乡村，因为完全是新区，和北方老区的工作根本不同。头一年还不能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大体上只能照原样交租交息。要在此种条件下去进行乡村工作。因此，乡村工作，也得从新学习。但是，乡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比较起来，是易于学习的。城市工作则较为困难，而又是目前学习的最主要方面。如果我们的干部不能迅速学会管理城市，则我们将会发生极大困难。因此，你们必须在二月处理其他一切问题，而在三月一个整月内，全部学习城市工作和新区工作。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松气，如果松气，那就是错误的。但是，军队变为工作队，现在已经要求我们这样提出任务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提出此种任务，并下决心去做，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既然严重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过去，则军队人数和装备的补充，以达到适当程度为宜，决不可要求太多、太好、太完备，以至引起财政危机。这一点，你们亦必须严重考虑。上述方

针，完全适用于第四野战军，请林彪、罗荣桓同志同样注意。我们已和康生同志谈了许多，请他于十二日赶到你们处，和你们会商。你们意见如何及如何处置，会商后请即电告。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1]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一切后方工作交山东分局负责。



毛泽东起草的《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手稿。

---

[1] 为适应淮海战役作战的需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1948年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淮海战役后，中央军委又作出决定，在渡江作战中，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和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1]

（1949年2月9日）

林、罗军决在平津地区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在此期内，须改编与溶化二十万傅作义军，修复津浦路津济段及平汉路鄚城驻马店段，并夺取太原。四月上旬你们开始渡江行动时，林、罗即由铁路先运两个军至三个军共约十二万至十八万人直达信阳，夺取信阳、孝感之线，威胁汉口，使武汉方面之敌不敢轻动。林、罗主力，亦于该时步行南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真、叶剑英电[1]

（1949年2月10日）

你们对南京代表团[2]所取态度是适当的。你们可向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彭真、叶剑英并告林彪、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2] 指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该团由当时南京人民和平促进会组成，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1949年2月6日至11日该代表团以私人资格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是。在北平期间，叶剑英等曾两次与他们接谈。

复潘汉年电[1]

（1949年2月10日）

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急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潘汉年电的主要内容。

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

（1949年2月10日）

林、罗，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徐、周[1]：

据杨罗耿潘丑鱼电[2]称，华北第二兵团一九三师干部学习感到重要，读文件已深入一步，普遍感到越学越有好货。特别是在此次时局与任务传达后，情绪很高涨，都说好像打了清血针。同时，并发现干部水平很低，营连干部中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共产党员，过了长江还过黄河，故今后对地理与名词常识的教育很重要等语。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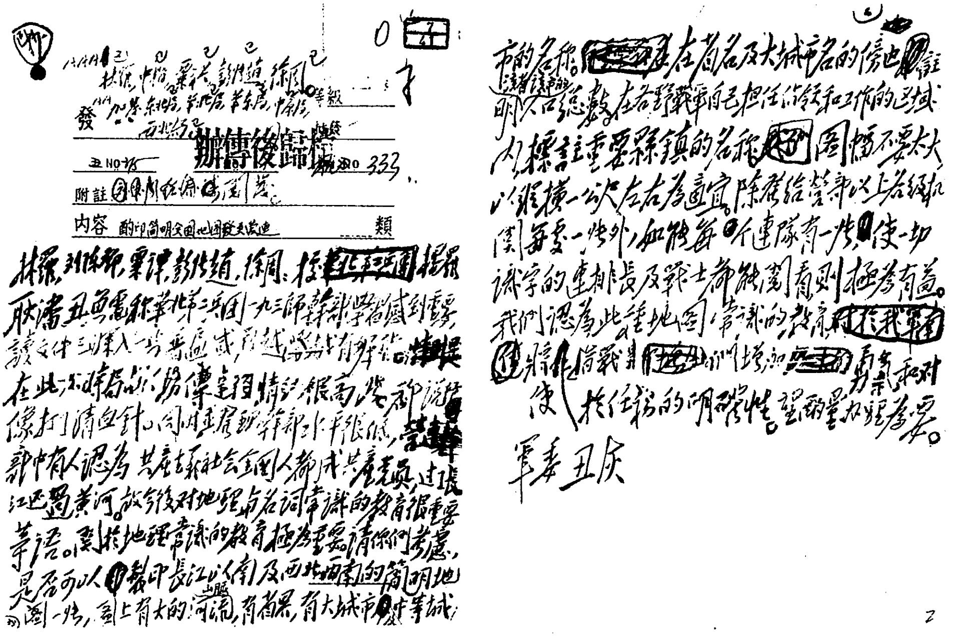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刘、陈、邓，指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代理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指赵寿山（1894—1965），陕西户县人，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徐，指徐向前，当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指周士第（1900—1979），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当时任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指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参谋长耿飚和政治部主任潘自力1949年2月6日反映部队学习情况的电报。

制印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张，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及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旁边注明该省该市的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占领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图常识的教育，将使指战员们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酌量办理为要。

军委

丑灰



林罗、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徐周

发 加鉴 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中原局、西北局　等级

办转后归档

丑 NO 75　编号 333

附注

内容 酌印简明全国地图发至连　类

林罗，刘陈邓，粟谭，彭张赵，徐周，并告~~华北三兵团~~：据聂荣臻丑鱼电称华北第三兵团一九三师干部学习感到需要，读文件[illegible]，在此次时局形势传达讨论[illegible]，像打了清血针，同时连营干部水平很低，干部中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全国人都成共产党员，过长江还要过黄河。故今后对地理名词常识的教育很重要等语。关于地理常识的教育极为重要，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印发中长江以南及西北西南的简明地图一份，图上有大的河流、山脉，有省界，有大城市、中等城市的名称，在省名及大城市名的傍边注明人口总数，在各野战军自己担任作战和工作的区域内，标注重要县镇的名称。图幅不要太大，以纵横一公尺左右为适宜。除发给营部以上各级机关每处一张外，如能每个连队有一张，使一切识字的连排长及战士都能阅看，则极为有益。我们认为此种地理常识的教育，对于我军将来作战，可以增加勇气和对于任务的明确性，望努力办理为要。

军委丑庆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对部队进行地理常识教育极为重要》的手稿。

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的计划[1]

（1949年2月11日）

刘、陈、邓，饶、康、曾，粟、谭，并告林、聂：

丑佳电[2]悉。（一）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等的电报。

[2] 指1949年2月9日刘伯承、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华东局的电报。电报说：（一）关于渡江时间，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二）关于战役部署。确定以华野四个兵团、中野一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中野另两个兵团除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五个军作为总预备队。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三）关于开进。华野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兵团则于三月半移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中野各部路程较远，拟于三月初旬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息，待机即向指定位置开进。（四）华野、中野指挥机关拟于三月初移至合肥及六安。（五）为适应紧迫的作战要求，安徽省委必须立即建立。对建立皖豫鄂三省委事，如中央认为此时尚非建立省委时机，而为作战需要，我们建议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领导皖西、江淮两区及豫皖苏之安徽部分。而将豫皖苏之河南部分交由中原局另组区党委管辖（但困难很多）。（六）关于出动时间。部队思想渡江无大问题，具体准备则有许多事项尚无着落，务请军委、华东局予以解决。（七）粮食是最困难的问题。主要是就地筹集，但仍须后方准备大量接济。（八）为保障华野、中野的行动，建议东北野战军即以三个军约二十万人迅速南下，于三月底运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

战[1]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二）饶康曾到后即开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齐电[2]方针（丑齐电中整训时间应缩短半月至三月半为止）部署一切。（三）你们丑佳电所列八条，除第八条以林罗[3]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余七条凡由华东及你们自己解决者，由此次华东局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者另电处理。（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4]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五）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

---

[1] 渡江作战，指解放战争时期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国民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强渡江河的进攻战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仍不甘心其失败，表示愿以中国共产党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企图通过“和谈”，实现“划江而治”，以便依托江南各省，争取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反扑。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共两党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曾数度命令人民解放军推迟渡江时间。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方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3个兵团9个军，第三野战军以4个兵团15个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在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于1949年4月20日夜起，至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5月27日攻占上海。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

[2] 即《把军队变为工作队》。

[3] 林，指林彪。罗，指罗荣桓，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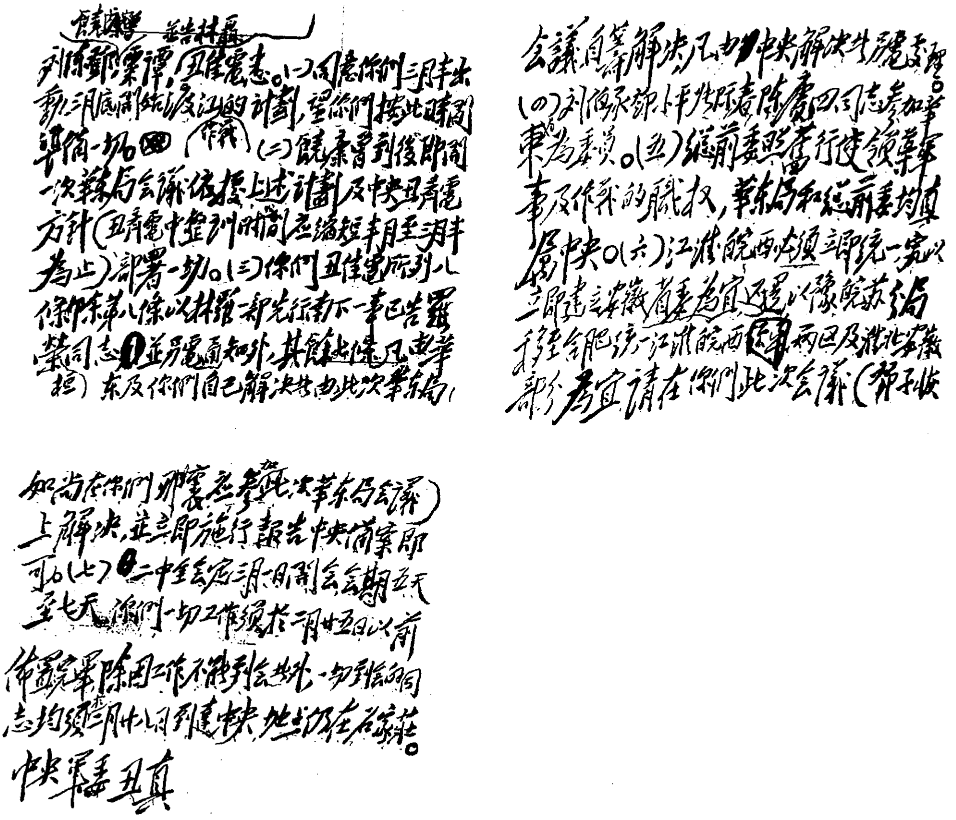
[4] 张际春，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六）江淮、皖西必须立即统一，究以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淮北安徽部分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邓子恢[1]如尚在你们那里，应参加此次华东局会议）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可。（七）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志均须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
丑真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



饶陈粟谭　并告林罗

刘陈邓粟谭，丑佳电悉。（一）同意你们三月半出
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据此精心
准备一切。（二）饶粟曾到后即开
一次华东局会议，依据上述计划及中央丑青电
方针（丑青电中曾列时间应缩短半月至三月半
为止）部署一切。（三）你们丑佳电所列八
条，除第八条以林罗一部先行南下一事已告罗
荣桓同志并另电通知外，其余七条凡由华
东及你们自己解决者，由此次华东局

会议自筹解决，凡由中央解决者另电告。
（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
东局为委员。（五）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
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
属中央。（六）江淮、皖西必须立即统一，究以
立即建立安徽省委为宜，还是以豫皖苏分局
移驻合肥统一江淮、皖西两区及淮北安徽
部分为宜，请在你们此次会议（邓子恢

如尚在你们那里应参加此次华东局会议）
上解决，并立即施行，报告中央备案即
可。（七）二中全会定三月一日开会，会期五天
至七天，你们一切工作须于二月廿五日以前
布置完毕，除因工作不能到会者外，一切到会的同
志均须于二月廿七日到达中央，地点仍在石家庄。
中央军委丑真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的计划》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苏联贸易机关在烟台设立分号事给华东局的电报[1]

(1949年2月11日)

华东局：

曾方艾鱼电[2]悉。苏联贸易机关派来烟台设立分号事，如系东北秋林公司，可告其在烟应与其他商店一样履行登记批准手续，开张后应照章按期报告资本账目、营业状况，并缴纳一定商业税。如系商务代表，可同意其在烟设立商务机关，待青岛解放后，可移至青岛，并允为其购、租房屋和仓库。同意你们将需要的货单给他们带回，并抄一份给我们。

中央

丑真[3]

---

[1] 这是周恩来给华东局的一份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1949年2月6日华东财经办事处曾山、方毅、艾楚南关于与苏联贸易人员谈话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苏联贸易机关派代表巴尔索夫到山东了解我方需求情况，并准备在烟台设立贸易机关分号，华东财办准备将我方需要采购的货物名称、种类开单子叫他带回去，但不作为定货单。鱼电，即6日电。

[3] 丑真，即2月11日。

东北野战军先出两个军迫近汉口钳制白崇禧部[1]

（1949年2月12日）

林、罗、聂，并告刘、陈、邓，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

为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2]三月半出动，三月底渡江之行动，决定林罗先出两个军约十二万人左右，于三月二十日以前到达郾城、信阳间地区，于三月底夺信阳、武胜关，四月十五日以前夺取花园[3]、孝感地区，迫近汉口，休整待命，钳制白崇禧[4]部不敢向南京增援，以利刘陈邓夺取南京。为执行上述任务，该两军应于二月十八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二月十九日由平津线[5]出发。请饶漱石邓子恢[6]二同志于电到三日内将济南经徐州、郑州至郾城的铁路运输能力计算电告，是否可以运十二万人及附属装备按时到达郾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电报。

[2] 1949年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同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

[3] 花园，镇名，位于湖北孝感市北部。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平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6] 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子恢，当时任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

以备决定该两军全部步行至济南车运，或者以一部车运先到，另部取道大名、郑州步行后到（由平津线经大名到信阳约九百余公里，连休息时间在内三月底可到）。

军委

丑文

关于归绥问题谈判的方针[1]

（1949年2月12日）

如能用谈判方法要董部[2]退入后套让出绥包[3]归我，以利铁路运输则为最好。董、邓[4]部给养不足，可考虑酌予补给。或者包头属彼，归绥属我，中间划一界线。但如傅[5]、邓以部队地盘太小给养无着为由，要求保有归绥，我方亦可暂时让步。此事已与罗荣桓[6]同志面谈，请林罗聂按此方针与傅、邓谈判。在解决鄂友三[7]匪部后，我方部队即不要再向彼方攻击。如董其武自己让出归绥，则可进占归绥，否则即暂在归绥、卓资山[8]间划一界线互不侵犯。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给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李井泉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2] 董部，指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董其武率领的第九兵团团部、第一一一军，第三一〇师、第二五八师、第二二八师，新编第七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第十三旅，骑兵第五旅、第十一旅等部。

[3] 绥包，指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

[4] 邓，指邓宝珊，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傅作义的和平谈判代表。

[5] 傅，指傅作义。

[6] 罗荣桓，当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7] 鄂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骑兵第十二旅旅长。

[8] 卓资山，镇名，今为内蒙古卓资县县治。

不要轻敌甚为重要[1]

（1949年2月13日）

小平、陈毅同志，并告饶、康、曾，粟、谭[2]：

（一）二月六日报告[3]收到，极好，即转发各处研究，指导所属纠正同类偏向。我们欢迎此种分析党内思想动向的报告。（二）中野及中原党百余高干会议刚毕，不需要再开会了。华野似宜于二月十八日左右再开一次高干会，检讨上次会议执行情形，加紧准备渡江，传达将重点放在城市的指示。会后你们即来开二中全会，于二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到达中央即可。（三）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我们说国民党基本上已被打倒，以后可能没有像辽西[4]、淮海那样规模的大作战了，绝不应当被引导到轻敌思想。敌人还是要挣扎的，我们还要打仗，不过往后的作战可能没有像辽西、淮海每次歼敌五六十万那样大的规模和局部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业已增加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的电报。

[2] 饶、康，指饶漱石、康生，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副书记。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粟、谭，指粟裕、谭震林，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第一副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2月6日邓小平、陈毅关于传达讨论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4] 这里指辽沈战役。

了。此点在会议时望着重说明，不使产生偏向为要。

中央
丑元

任何外国或联合国无权干涉中国内政

（1949年2月13日）

任何外国政府或联合国组织，绝对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澳大利亚外长关于由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建议，是荒谬的和侮辱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反动卖国集团发言人孙科、潘公展之流的可耻谈话，不过是表示他们一贯的卖国的立场。南京国民党卖国政府在其一月八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失败之后，仍在梦想新的国际干涉。但是任何这一类的企图，无论其出于何方及采取何种名义，都只能遭受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致天津市委等电[1]

（1949年2月13日）

据天津市委一月二十八日报告，此次我军进入天津后，连续发生汽车撞死市民事件，死六人伤一人，给市民影响很坏。我们意见除严格训练汽车司机外，对于受害市民，天津市委应以林、罗名义予以抚恤，并对肇事人员给以应得之处分，所有抚恤及处分经过，应使天津市民知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天津市委、总前委并告北平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为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致杜镛和魏文翰电[1]

（1949年2月13日）

一

彭、叶：

下电请由电报局发往上海为要。

中央
丑元

二

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杜镛先生、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翰先生大鉴：

二月七日来电已悉，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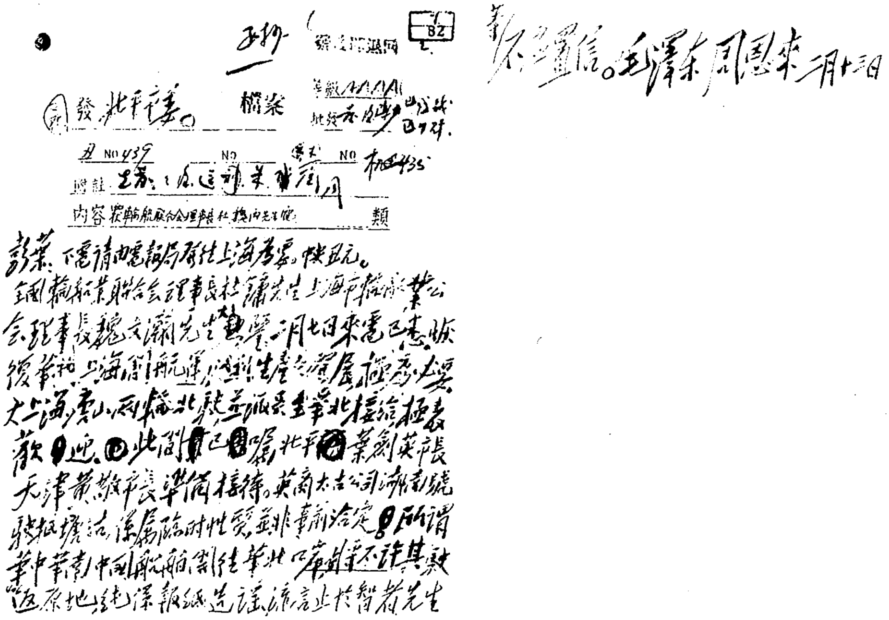
---

[1]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1月初，北平、天津相继解放，上海地区燃煤供应即将中断。全国轮船同业公会联合会（简称船联）向国共双方吁请，建议以面粉北运，交换煤斤来沪。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

为重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系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毛泽东　周恩来

二月十三日


發 北平市委

檔案

内容

類

彭棠：下電請由電報局發往上海為要。[illegible]

全國輪船業聯合會理事長杜鏞先生、上海市輪船業公
會理事長魏文瀚先生：二月七日來電已悉。恢
復華北上海間航運，以利生產，至屬極為重要。
大上海、唐山兩輪北駛，並派員至華北接洽，極表
歡迎。此間已囑北平葉劍英市長、
天津黃敬市長準備接待。英商太古公司湖南號
駛抵塘沽，係屬臨時性質，並非事前洽定。所謂
華中華南中國船舶開往華北口岸，將不許其駛
返原地，純係報紙造謠，流言止於智者，先生
等不應置信。毛澤東周恩來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和周恩来致杜镛和魏文瀚电的手稿。

致天津市委等电[1]

（1949年2月13日）

杜月笙[2]、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

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2] 杜月笙，即杜镛。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等谈话方针问题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1949年2月14日）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应按时向太原出动[1]

（1949年2月15日）

杨、罗、耿，并告杨、李，林、罗，聂、薄[2]：

十四日九时电[3]悉。两兵团如等候溶编国民党军，则需时将甚久，攻取太原后又要休整。因此，不要等候溶编，应派出溶编部队之干部率领溶编部队跟进。两兵团则于十九日按时出动，三月上旬到达太原附近，争取于三月中旬解决太原问题，然后休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向西安方向出动。

军委

丑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飚的电报。

[2] 杨、李，指杨成武、李天焕，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聂、薄，指聂荣臻、薄一波，当时分别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2月14日9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按原规定华北二、三兵团均应于19日或20日出发，但两兵团均各需溶编一个由北平出来的国民党军，现尚未到手。因此，时间似乎仓促一点，是否可稍为推迟。

把南北通船通航通邮诸事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949年2月15日）

彭、叶，并告总前委、天津市委、华北局，并发各局、各前委：

丑文[1]电悉。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各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2]），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对付特务，主要应从群众工作和内线工作方面去取得成绩，而不要从限制交通、通讯方面去求成绩。京、沪、汉等地的国民党必然会利用我们恢复交通、通讯派遣一些特务来平、津，并互相联络。但平、津方面增加了一些特务，京、沪、

---

[1] 丑文，即2月12日。

[2] 中航、央航，即国民党政府的两个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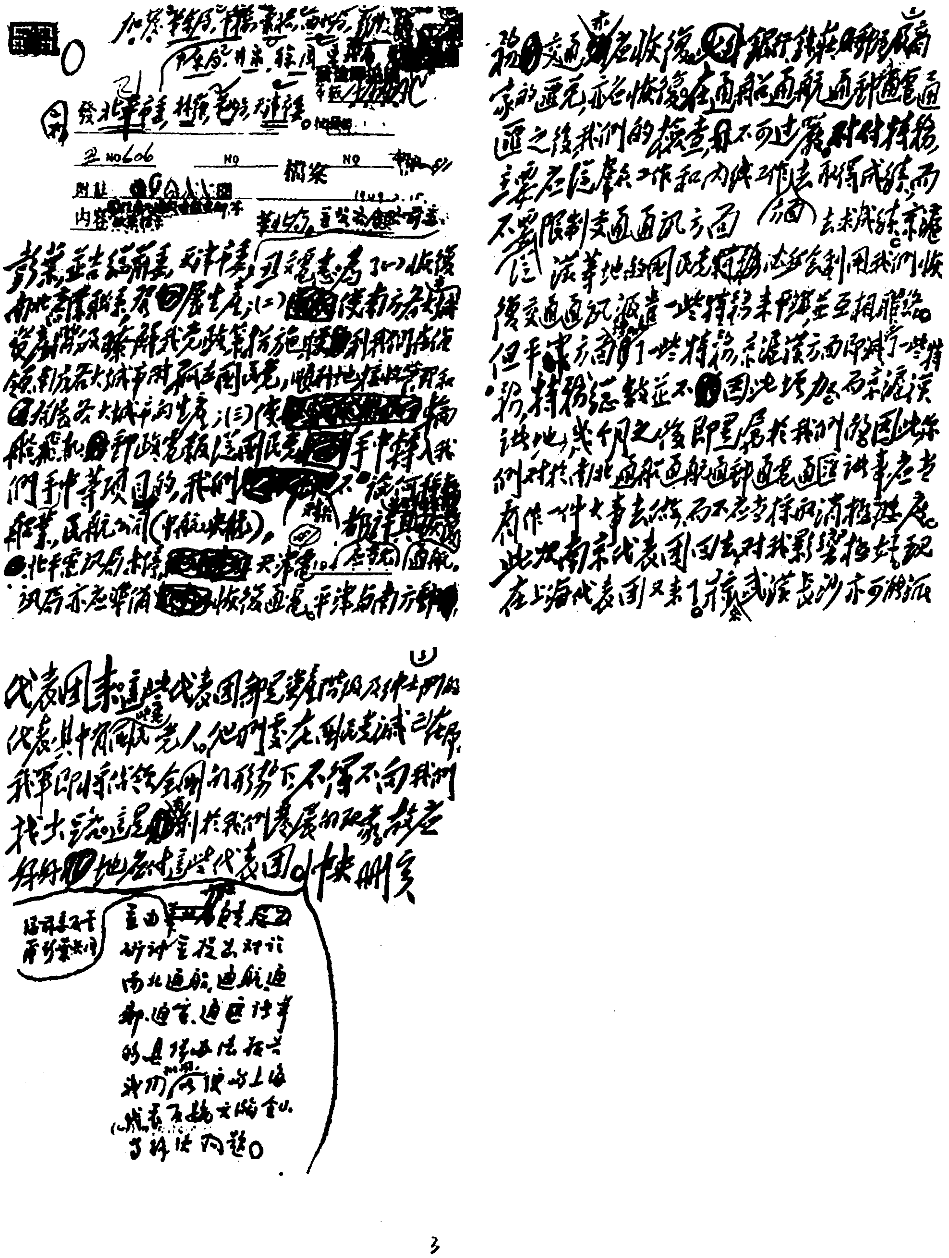
汉方面即减少了一些特务，特务总数并不因此增加。而京、沪、汉诸地几个月之后即是属于我们的。因此，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此次南京代表团回去对我影响极好。现在上海代表团又来了，将来武汉、长沙亦可能派代表团来。这些代表团都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的代表，其中有些是国民党人。他们处在国民党灭亡在即、我军即将占领全国的形势下，不得不向我们找出路。这是有利于我们发展的现象，故应好好地应付这些代表团。并由总前委及董薄[1]、彭叶共同负责研讨并提出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的具体办法报告我们批准，以便与上海代表及魏文瀚、金山[2]等解决问题。

中央
删亥

---

[1] 董，指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指薄一波，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2] 魏文瀚（1896—?），天津市人，当时任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被推为赴北平参加南北通航谈判的代表。金山（1911—1982），湖南沅陵人，当时是清华电影公司经理，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南北通航谈判工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把南北通船通航通邮诸事当作一件大事去做》的手稿。

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

（1949年2月15日）

国民党反动统治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要快。现在距离解放军攻克济南只有四个多月，距离攻克沈阳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宣传上的一切残余力量，却已经陷于不可挽救的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民党统治的总崩溃开始于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的淮海战役期间，这三个战役使国民党在去年十月初至今年一月底的不足四个月中丧失约一百五十四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一百四十四个整师。国民党统治总崩溃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伟大胜利的必然结果，但是国民党及其美国主人的“和平”叫嚣，对于促进国民党崩溃一事，也起了相当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一月一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除了傅作义将军协助人民解放军已经和平地解决了北平问题以外，各地希望和平解决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站在一旁发干急，深恨其儿子们不争气。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

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说，这是“我过去所一直亲自努力以求的东西”。据美国通讯社称，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蒋介石集团长期地不敢接受美国人的这个命令，其理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一项指示中说得很明白：“我如不能战，即亦不能和。我如能战，则言和又徒使士气人心解体。故无论我能战与否，言和皆有百害而无一利。”国民党当时发出这个指示，是因为国民党的其他派别已经在主张言和了。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白崇禧及其指导下的湖北省参议会向蒋介石提出了“和平解决”的问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今年一月一日发布在五个条件下进行和谈的声明。蒋介石希望从白崇禧手里夺回和平攻势的发明权，并在新的商标下继续其旧的统治。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禧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1]。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一月十四日的声明，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

---

[1] 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1月8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内战，遭到四国政府拒绝。美国政府在其1月12日答复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中，说明美国之所以拒绝国民党政府的要求，是因“殊难相信”“能达到任何有益的效果。这就是说，美国当时已感到再也无力挽救它所扶植的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灭亡。

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1]。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虽然国民党已经没有一个“全面”的“政府”，虽然许多地方都在进行着局部和平的活动，但是国民党死硬派却在反对局部和平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其目的就是取消和平，妄想再战；他们深怕局部和平的活动蔓延起来，至于不可收拾。以一个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而要求所谓“全面和平”的滑稽剧，在本月九日上海伪国防部政工局长战争罪犯邓文仪的一篇声明中，达到了高峰。邓文仪和孙科一样，推翻了上月二十二日李宗仁关于以中共的八项和平条件为谈判基础的声明，而要求所谓“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否则“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但是邓文仪没有说出在今天他的对方究竟应和什么人去谈判“平等的”“全面的”和平。似乎找邓文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乎不找邓文仪或者其他张三李四也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未免叫人为难了。据中央社上海九日电称：“新闻记者问邓文仪：李代总统是否已同意邓局长所发表之四项意见[2]？答：本人系在国防部立场发言，本日所发表之四项意

---

[1] 这是借用公元14世纪元朝人萨都刺所作《念奴娇·登石头城次东坡韵》词中的话。这首词的上阕是：“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纷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南京古称石头城。吴楚泛指长江的中下游。

[2]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于1949年2月9日在上海发表《和平与战争的发展》的书面谈话，提出所谓“四项意见”：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以言和，能战方能和”，“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见，事前并未呈经李代总统过目。”邓文仪在这里不但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的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民党政府的全面立场，而且事实上还创造了一个伪国防部政工局的小局部立场以区别于伪国防部的大局部立场。因为邓文仪公开反对并污蔑北平的和平解决，而伪国防部则在一月二十七日称赞北平的和平解决，是“为了缩短战争，获致和平，借以保全北平故都基础与文物古迹”，并称其他地方例如大同绥远等处[1]亦将依同样方法“实施休战”。由此可见，叫喊“全面和平”最起劲的反动派，原来就是最缺乏全面立场的反动派。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可以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他们梦想在“全面和平”的口号下鼓吹全面战争，即所谓“战要全面战，和要全面和”。但是，事实上他们既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和平，也没有什么力量实行全面战争。全面的力量是在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这一方面，不在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国民党方面。一方面，握有全面的力量，另一方面，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绝境，这种局面，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和国民党长期作孽的结果。任何郑重的人，都不能忽视今天中国政治形势中这个基本的事实。

---

[1] 在天津、北平解放后，华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几个残余的孤立据点，其中包括太原、大同、新乡、安阳、归绥（今呼和浩特市）等地。太原国民党军于1949年4月24日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歼灭。大同国民党军于4月29日接受和平改编。新乡国民党军于5月5日向人民解放军投降。5月6日，安阳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归绥于9月19日和平解放。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

（1949年2月15日）

八日及十四日十五时两电均悉。（一）同意你们对傅部彻底处理的方案；（二）为接收九十二军、十六军及十三军八十九师之目的，华北两兵团可以推迟至本月底或下月初执行太原作战任务。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的方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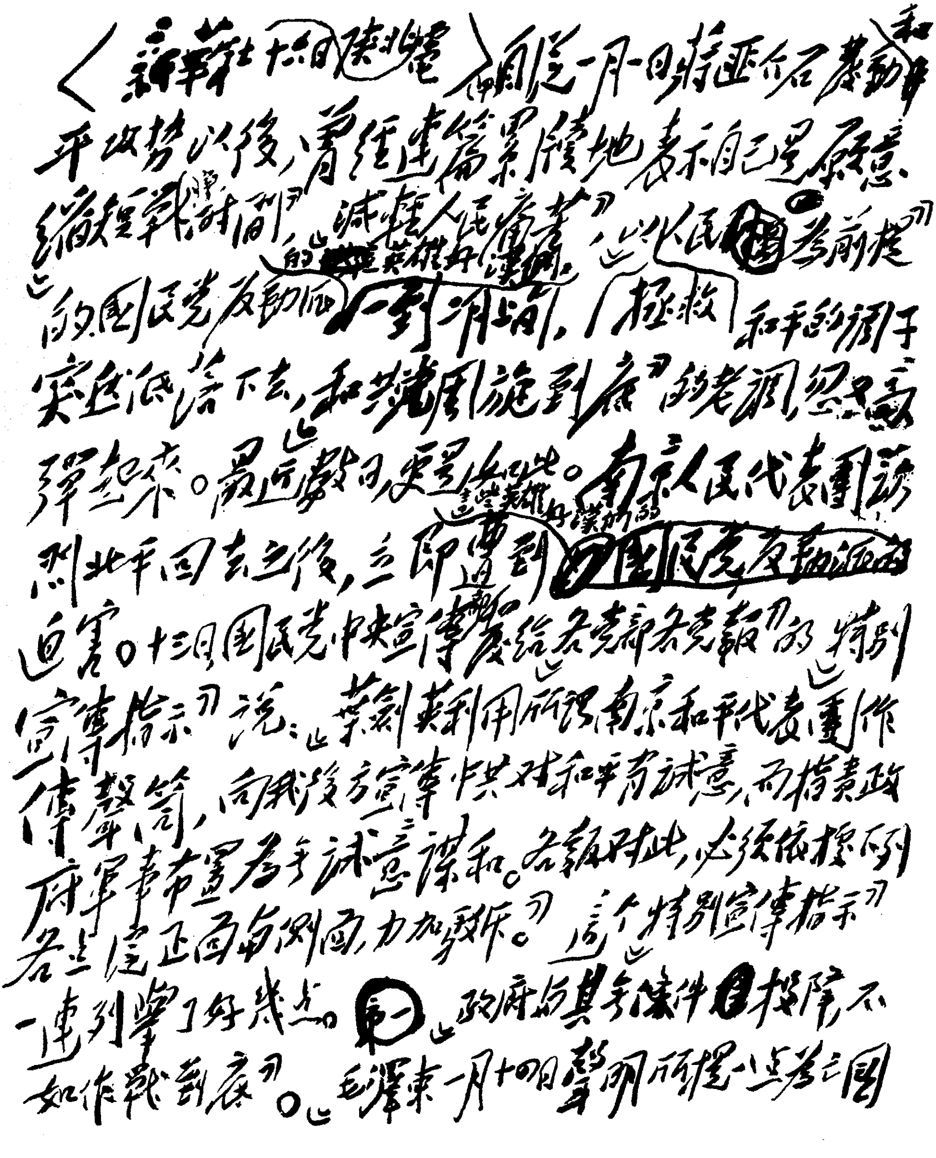
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

（1949年2月16日）

【新华社陕北十六日电】是自从一月一日蒋匪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二月上旬，和平的调子就突然低落下去，“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忽又高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上说：“叶剑英向我后方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报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应当“驳斥”的理由。“政府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两星期以前那种如丧考妣地急着要谈判的神气，再也不见了。所谓“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拯救人民为前提”这些传遍人间、沁人心脾的名句，再也不提了。假如中共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作风”，一定要惩办战争罪犯，那就不能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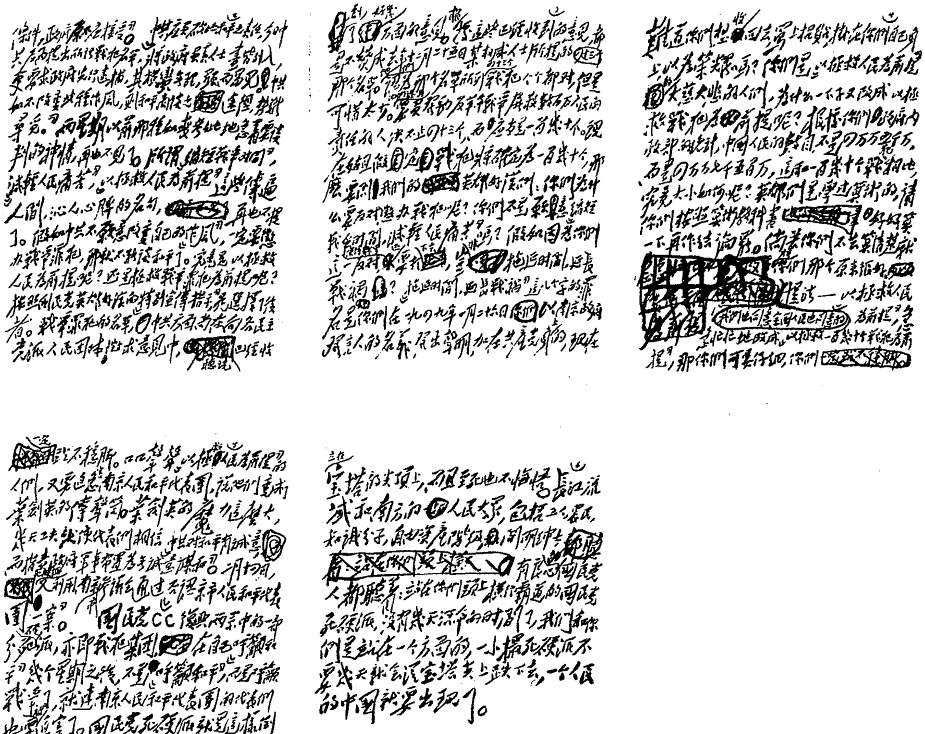
和平了。究竟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呢，还是以拯救战争罪犯为前提呢？按照国民党英雄好汉的《特别宣传指示》，是选择了后者。战争罪犯的名单，中共方面尚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征求意见中，现在已经收到了好几方面的意见。根据这些已经收到的意见，都是不赞成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的那个名单。他们认为那个名单所列战犯只有四十三个，为数太少；他们认为要负发动反革命战争屠杀数百万人民的责任的人决不止四十三个，而应当是一百几十个。现在姑且假定战犯将确定为一百几十个。那末，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你们不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的吗？假如因为你们这一反对，使得战争还要打下去，岂非拖延时间，延长战祸？“拖延时间，延长战祸”这八个字的罪名是你们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南京政府发言人的名义发出声明，加在共产党身上的，现在难道你们想收回去，写上招贴，挂在你们自己身上，以为荣耀吗？你们是“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大慈大悲的人们，为什么一下子又改成以拯救战犯为前提了呢？根据你们政府内政部的统计，中国人民的数目，不是四亿五千万，而是四亿七千五百万，这和一百几十个战犯相比，究竟大小如何呢？英雄们是学过算术的，请你们按照算术教科书好好地算一下再作结论吧。倘若你们不去算清楚就将你们那个原来很好、我们也同意、全国人民也同意的提法——“以拯救人民为前提”，急急忙忙地改成“以拯救一百几十个战犯为前提”，那你们可要仔细，你们就一定站不住脚。这些口口声声“以拯救人民为前提”的人们，在自己“呼吁和平”几个星期之后，又不再是“呼吁和平”，而是呼吁战争了。国民党死硬派就是这样倒霉的，他们坚决地反对人民，站在人民的头上横行霸道，因而把自己孤立在宝塔的

尖顶上，而且至死也不悔悟。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人民大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有良心的国民党人，都请听着：站在你们头上横行霸道的国民党死硬派，没有几天活命的时间了，我们和你们是站在一个方面的，一小撮死硬派不要几天就会从宝塔尖上跌下去，一个人民的中国就要出现了。



〈新华社十六日陕北电〉自从一月一日蒋介石发动和平攻势以后，曾经连篇累牍地表示自己是愿意“缩短战争时间，减轻人民痛苦”，“以人民利益为前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一到消滴，“拯救和平”的调子实在唱不下去，和“和共党周旋到底”的老调又重弹起来。最近数日，更是如此。南京人民代表团访问北平回去之后，立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英雄好汉们的迫害。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给各党部各党报“的”特别宣传指示”说：“莫谓共匪利用所谓南京和平代表团作宣传幌子，而我仍应宣传中共对和平有诚意，而指责政府军事布置为无诚意谋和。各级对此，必须依据下列各点从正面与侧面，力加驳斥。”这个“特别宣传指示”一连列举了好几点。第一，“政府之其余条件为投降，不如作战到底”。“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手稿。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的手稿。

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

（1949年2月18日）

“政府自抗战结束以后，即以和平建国方针力谋中共问题之和平解决。经过一年半之时间，一切协议皆为中共所破坏，故中共应负破坏和平之责任。今日中共反而提出所谓战犯名单，将政府负责人士尽皆列入，更要求政府先行逮捕，其蛮横无理，显而易见。中共如不改变此种作风，则和平商谈之途径，势难寻觅。”以上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所发《特别宣传指示》中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全部论点。

这个论点，不是别人的，是第一名战争罪犯蒋介石的。蒋介石在其元旦声明里说：“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意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的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

在蒋介石发表这个声明的前七天，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即有中共权威人士提出了四十三个战犯名单，赫然列在第一名的，就是这个蒋介石。战犯们又要求和，又要逃避责任，只有将责

任推在共产党身上一个法子。可是这是不调和的。共产党既然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那末，就应当惩办共产党。既然是“匪”，就应当“剿匪”。既然“发动其全面武装叛乱”，就应当“戡乱”。“剿匪”，“戡乱”，是百分之百的对，为什么可以不剿不戡了呢？为什么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以后，一切国民党的公开文件一律将“共匪”改成了“共党”呢？

孙科觉得有些不妥，他在蒋介石发表元旦声明的同一天的晚上，发表广播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孙科说：“回忆三年前，当抗战胜利的初期，由于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由于国家需要积极建设，由于各党派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尚有共同的认识，我们曾经集合各方代表和社会贤达于一堂，举行过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三星期的努力，更多谢杜鲁门总统的特使马歇尔先生的善意调协，我们也曾经商定了一个和平建国纲领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具体方案。假如当时我们能将各种方案及时实行，试问今日的中国应该是如何的繁荣，今天的中国人民应该是如何的幸福啊！可惜当时各方既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全国人民亦未能用最大的努力去促进这个和平运动的成功，遂致战祸复发，生灵涂炭。”

孙科比较蒋介石“公道”一点。你看，他不是如同蒋介石那样，将战争责任一塌括子推在共产党身上，而是采取了“平均地权”的办法，将责任平分给“各方”。这里也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也有民主同盟，也有社会贤达。不宁唯是，而且有“全国人民”，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一个也逃不了责任。蒋介石是专打共产党的板子，孙科是给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全国同胞每人一板子，连蒋介石，也许还有孙科，也得挨上一板子。你看，两个国民党人，孙科和蒋介石，在这里打架。

第三个国民党人跑上来说：不然，照我的意见，责任应全归国民党。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宗仁。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在八年抗战之后，继之以三年之内战，不仅将抗战胜利后国家可能复兴之一线生机毁灭无遗，而战祸遍及黄河南北，田园庐舍悉遭摧毁荒废，无辜人民之死伤成千累万，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到处皆是。此一惨绝人寰之浩劫，实为我国内战史上空前所未有。”

李宗仁在这里出的是无头告示，他也没有说国民党应负责任，也没有说共产党或者别的方面应负责任，但是他说出了一个事实，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不是出在别的地方，而是出在“黄河南北”。查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直至松花江，谁在这里造成这个“惨绝人寰的浩劫”呢？难道是这里的人民和人民的军队自己打自己造成的吗？李宗仁是做过北平行营主任的，桂系的军队是和蒋系军队一道打到过山东省的沂蒙山区的，所以他有确实的情报，知道这种“浩劫”的地点和情况。如果说，李宗仁别的什么都不好，那末，他说出了这句老实话，总算是好的。而且他对这场战争起的名称，不叫“戡乱”或“剿匪”，而叫“内战”，这在国民党方面来说，也算得颇为别致。

根据李宗仁自己的逻辑，在同一个声明里，他说：“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李宗仁知道八条的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而且也有他自己的大名在内。战犯的应当惩办，是“浩劫”的逻辑的结论。为了这一点，至今国民党死硬派还在吞吞吐吐地埋怨李宗仁，即所谓“毛泽东一月十四日声明所提八点为亡国条件，政府原不应接受”。

死硬派的埋怨之所以只能是吞吞吐吐，而不敢明目张胆，是有

原因的。当蒋介石还没有“引退”时，死硬派原来想批驳八条，后来蒋介石一想不妥，决定不驳，大概是认为驳了就绝了路了，这是一月十九日的事情。当着一月十九日早上，张君劢从南京回到上海，发表谈话，说了“关于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不久即可能发布另一文告，提出答复”这句话的时候，中央社即于晚间发出通报说：“顷播沪电张君劢谈话一稿，请于电文末加注按语如下：张氏谈话中所说政府不久即发布另一文告一点，中央社记者顷自有关方面探悉，政府并无发布另一文告之拟议。”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引退”声明，并无只字批评八条，并且把他自己的五条也取消了，改变为“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宪法、法统、军队等项都不敢再提了。因此，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二日敢于承认以中共的八条为谈判基础，国民党死硬派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出面反对，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一声“政府原不应接受”。

孙科的“平均地权”政策是否坚持不变呢？也不。一九四九年二月五日孙科“迁政府于广州”以后，二月七日发表演说，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他说：“半年以来，因战祸蔓延，大局发生严重变化，人民痛苦万状。凡此种种，均系过去所犯错误、失败及不合理现象种下前因，以致有今日局势严重之后果。吾人深知中国需要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一日不能实现，则中国之问题始终不能解决。追忆本党总理二十年以前以三民主义亲自遗交本党，冀其逐步得以实行。苟获实行，绝不致演至今日不可收拾之局面。”人们请看，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在这里，不是平分责任给一切党派和全国同胞，而是由国民党自己担负起来了。孙科将一切板子都打在国民党的屁股上，使人们觉得甚为痛快。至于共产党呢？孙院长说：“吾人试观中

共能以诱惑及麻醉人民，亦无非仅以实行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一部分，即平均地权一节为号召。吾人实应深感惭愧，而加强警惕，重新检讨过去之错误。”谢谢亲爱的院长，共产党虽然尚有“诱惑及麻醉人民”的罪名，总算没有别的滔天大罪，致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

孙院长的可爱，还不止此。他在同一演说里又说：“今日共党势力之蔓延，亦即系因吾人信仰之主义未能实行之故。本党在过去最大之错误，即系党内若干人士过分迷信武力，对内则争权倾轧，坐贻敌人分化离间之机会。及至八年抗战结束，本为实现和平统一千载难逢之时机，政府方面亦原有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纠纷之计划，不幸未能贯彻实施。人民于连年战乱之后，已亟待休养生息。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痛苦殊深，亦影响士气之消沉，以致军事步步失利。蒋总统俯顺民情，鉴于军事方法之未能解决问题，乃于元旦发表文告，号召和平。”好了，孙科这一名战争罪犯，没有被捕，也没有被打，即自动招供，而且忠实无误。谁是迷信武力，发动战争，及至军事方法未能解决问题，方始求和的呢？就是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孙院长用字造句也很正确，他说过分迷信武力的是他们党内的“若干人士”。这一点，对于中共仅仅要求惩办若干国民党人，把他们称之为战争罪犯，而不要求惩办更多的更不是全体的国民党人，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和孙科之间，在这个数目字上并无争论。不同的是在结论上。我们认为，对于这些“迷信武力”，使得“刀兵再起，民不聊生”的国民党的“若干人士”，必须当作战犯加以惩办。孙科则不同意这样做。他说：“现共方之迟迟不行指派代表，一味拖延，显示共方亦正迷信武力，自以为目前业已羽毛丰满，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全

国，故拒绝先行停战，其用心亦极显然。余兹须郑重提出者，即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这样看来，孙院长又有些不可爱了。他似乎认为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不算公平合理。他的这些话，和二月十三日国民党宣传部的《特别宣传指示》对于战犯问题所表示的态度，是一样地吞吞吐吐，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反对，较之李宗仁敢于承认以惩办战犯为谈判的基础条件之一，大不相同。

但是孙院长仍旧有可爱的地方，这即是他说共产党“亦正迷信武力”，是表现在“迟迟不行指派代表”和“拒绝先行停战”这两点上，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在一九四六年就迷信武力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夫“迟迟不行指派代表”者，是因为确定战犯名单是一件大事，要是“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少了，多了，都不合实际，“全国人”（但不包括战犯及其帮凶）不能接受，故须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互相商量，以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并且未能迅速指派代表，引起了孙科之流颇为不快。但是这也不能一口断定即为“亦正迷信武力”。大约不要很久，战犯名单就可公布，代表就可指派，谈判就可开始，孙院长就不能说我们“迷信武力”了。

至于“拒绝先行停战”，这是服从蒋总统元旦文告而采取的正确的态度。蒋总统元旦文告说：“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孙科的行政院，于一月十九日，做出了一个违反蒋介石上述文告的决议，说什么“立即先行无条件停战，并各指定代表进行和平商谈”。中共发言人曾于一月二十一日给了这个不通的决议以严正的批评。不料该院长充耳不闻，又于二月七日乱说什么中共“拒绝先行停战”，就是表示中共“亦正迷信武力”。连蒋介石那样的战争罪

犯，也知道停止战争，恢复和平，没有商谈是不可能的，孙科在这点上比蒋介石差远了。

人们知道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直到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他还说：“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目前已无和谈可言，政府必须打垮共党，否则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1]他就是国民党内迷信武力的“若干人士”之一。现在他站在一旁说风凉话，好象他并没有迷信过武力，三民主义没有实行他也不负责任。这是不忠实的。无论正国法，或者在国民党内正党法，孙科都逃不了挨板子。

---

[1] 这是孙科1947年6月22日在南京接见美联社、国民党中央日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时发表的谈话中说的，当时孙科任国民党政府副主席。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1]

（1949年2月18日）

（一）如果四人[2]问及李济深时，可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等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3]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ＣＣ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有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董必武、彭真、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上海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四人。

[3] 李、白、张、邵，指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

致叶剑英等电[1]

（1949年2月20日）

请告颜、邵、章、江，毛主席欢迎他们来谈，时间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并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彭真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剑英等电[1]

（1949年2月20日）

欢迎傅作义、邓宝珊和颜、邵、章、江一道来此一谈，请问傅、邓是否同意，如愿来时，亦如颜、邵等一样，不要带任何随从，并要对谈话地点保守秘密。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1]

（1949年2月21日）

关于傅作义、邓宝珊的工作问题，待他们来中央谈过后再考虑。关于过去同傅作义所订协定，请你们抄录一份完全的，字斟句酌，发表出去对内对外均无不良影响者，并交傅、邓看过，得其同意，然后发来中央审阅发表。至于傅自己的通电，我们希望他好好写一个，要有自我批评，要表示反对美帝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中共政策，愿受中共领导，如傅能发此通电，对于教育傅部及对全国均将有好影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的主要内容。

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

（1949年2月21日）

【新华社陕北二十一日电】桂系首领战争罪犯李宗仁、白崇禧的言论行动，究竟是否和蒋介石、顾祝同辈有区别的问题，引起了人们谈论的兴趣。

人们说，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起蒋介石谈和平，从同年同月二十二日起李宗仁谈和平，两个人都谈和平，这是没有区别的。蒋介石没有下过如像言论自由，停止特务活动等项命令，李宗仁下了这些命令，这是有区别的。但是李宗仁的命令全是空头支票，不但一样都没有实行，而且人民被压迫得更厉害了。南京方面连和平促进会也封闭了，上海方面屠杀了罢工工人，白崇禧则活像顾祝同。顾祝同命令刘峙炸毁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铁桥。白崇禧也正在命令张轸准备炸毁平汉路长台关淮河大铁桥及武胜关的隧道工程，积两年半之经验，黄河南北的人民深知桂系军队的野蛮，较之蒋系军队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骂蒋介石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听惯了，从来不申辩。人们骂李宗仁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李宗仁没有听得惯，急急忙忙起来申辩。例如李宗仁在一月二十七日经过中央社发表的“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这里，李宗仁不但

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后的李宗仁政府求洗刷，而且替一月二十二日以前的蒋介石政府求洗刷，人们知道“倡导和平”这件事，蒋介石在前，李宗仁在后。

蒋介石昨天是凶神恶煞。李宗仁、白崇禧及其桂系，昨天是凶神恶煞，今天则有些像笑面虎了。

蒋介石撒起谎来，大都是空空洞洞的，例如“还政于民”“我历来要和平”之类，不让人家在他的话里捉住什么具体的事物。李宗仁在这件事上显得蹩脚，容易给人抓住小辫子。例如，在他那个“致电毛泽东”里面说：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民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在逐步施实。“事实俱在，何得谓虚?”人们说：“事实毫无，何得谓实?”李宗仁说：“事实俱在，何得谓虚?”李宗仁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傻劲的人物。

但是李宗仁也有胜过蒋介石的地方。在应否惩办战争罪犯这个问题上，蒋介石及其死党从来不说可以惩办的话。他们或者不说话，例如在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的引退文告里对于中共的八条一字不提，或者表示反对态度，例如雷震、朱家骅、潘公展等人所发表的言论，根本反对将战犯当作问题来讨论。孙科也近似这些人，他说和谈条件必须“公平合理”，意思就是反对惩办战犯。李宗仁不是这样，他是又赞成，又反对，这就是李宗仁别致的地方。

李宗仁在其一月二十二日的声明里说：“中共方面所提八项条件，政府即愿开始商谈。”这即是说，李宗仁的政府愿意即刻开始商谈中共方面所提的惩办战争罪犯一项条件以及其他七项条件，他首先给你一点甜的东西吃。过了六天，李宗仁的腔调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代总

统，在其“致电毛泽东”里面说：“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谈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则何得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十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哎哟哟，李宗仁来得厉害，这一枪非同小可。但是李宗仁的枪法，仍然不过是小诸葛桂系教程里的东西。中国自有孙子兵法足以破之。夫“在双方尚未开始商谈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执行某项条件”者，是因为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自其兵败如山倒以后，即如丧考妣地要求谈判。中共说，好，待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即来谈。战犯们说，不行，非立刻开谈不可。中共说，你们闲得发慌，给你们一件工作做罢，你们去逮捕一批（自然不是全部）战犯。故事的过程就是这样。后来，中共又将逮捕改为监视，算是作了一个极大的让步，战犯们才安静下来，不再吵闹了。这是后话，不提。且说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又说，恩怨是非不要过分重视，即是说不要分清战争责任，不要惩办战争罪犯，哪怕黄河以南直至长江，黄河以北至松花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浩劫”（谨按，此语见之于李代总统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文告），那也算不了什么。如果你们一定要惩办战犯，则战犯们的拥护者会要报复的。这种报复，可能达到可怕的程度，即全国同胞中没有一个能吃东西了，都死完了。如此，你毛泽东和我李宗仁两个，将要被我们民族（谨按，既然都死完了，为什么还有民族，待考）判决为一千年那么长久时期内的犯罪者。还好，只有一千年受罪，一千零一年又是一条好汉，这算是李代总统的恩典。

人们请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反复无常的，又赞成商谈惩办战

犯，又不赞成实行惩办战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

和傅作义的谈话

（1949 年 2 月 22 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毛：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傅作义（以下简称傅）：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呢？

毛：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嘛。这些人我们以后还要用哩！

毛：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的起义。

毛：傅将军，你愿意做什么工作？

傅：我想，我不能在军队里工作了，最好让我回到河套一带去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

毛：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吗？那河套水利工作面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工作你还可以管，我看你还是很有才干的。

给周恩来的信[1]

（1949年2月26日）

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2]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主要内容。

[2] 二中，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复华东军区电[1]

（1949年2月27日）

你们对重庆号的处置是适当的。只要有可能就要争取邓兆祥、陆荣一[2]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以利争取国民党海军全部归顺过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华东军区电的主要内容。

[2] 邓兆祥、陆荣一，当时分别任重庆号巡洋舰正、副舰长，2月25日率该舰全体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

致罗荣桓电[1]

（1949年2月27日）

请你对动员学生参军一事加以适当注意，告诉进行此事的机关不要操之过急，绝不要直接去各学校动员，引起误会。华大现允先拨三千人，已很好，如不足七千人，暂时少一点也不要紧。湘、鄂、赣三省有广大的学生可以参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三个兵团攻击方向之区分的部署[1]

（1949年2月27日）

徐、周、陈：

二月二十六日电[2]悉。同意你们所提三个兵团攻击方向之区分，请按此区分规定三兵团的行军路线。

军委

二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参谋长陈漫远的电报。

[2] 1949年2月26日，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致电军委，电文内称："关于各兵团攻击方向区分，我们提议，我兵团及彭绍辉纵队由城东攻，二兵团由城南攻击，三兵团由城东北攻击，晋中部队在河西助攻。"

防止敌袭扰我后方的部署[1]

（1949年2月28日）

聂、薄，杨成武，钟赤兵[2]：

（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三）第二十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李兵团[3]部率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苏特纵[4]亦开该两处布防。在杨钟两部未到以前，聂薄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署对海上的防御，如有敌军偷袭应坚决击退之。（四）请荣臻、成武、赤兵、苏进四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五）钟苏电台即与军委电台联络。

军委

二十八日四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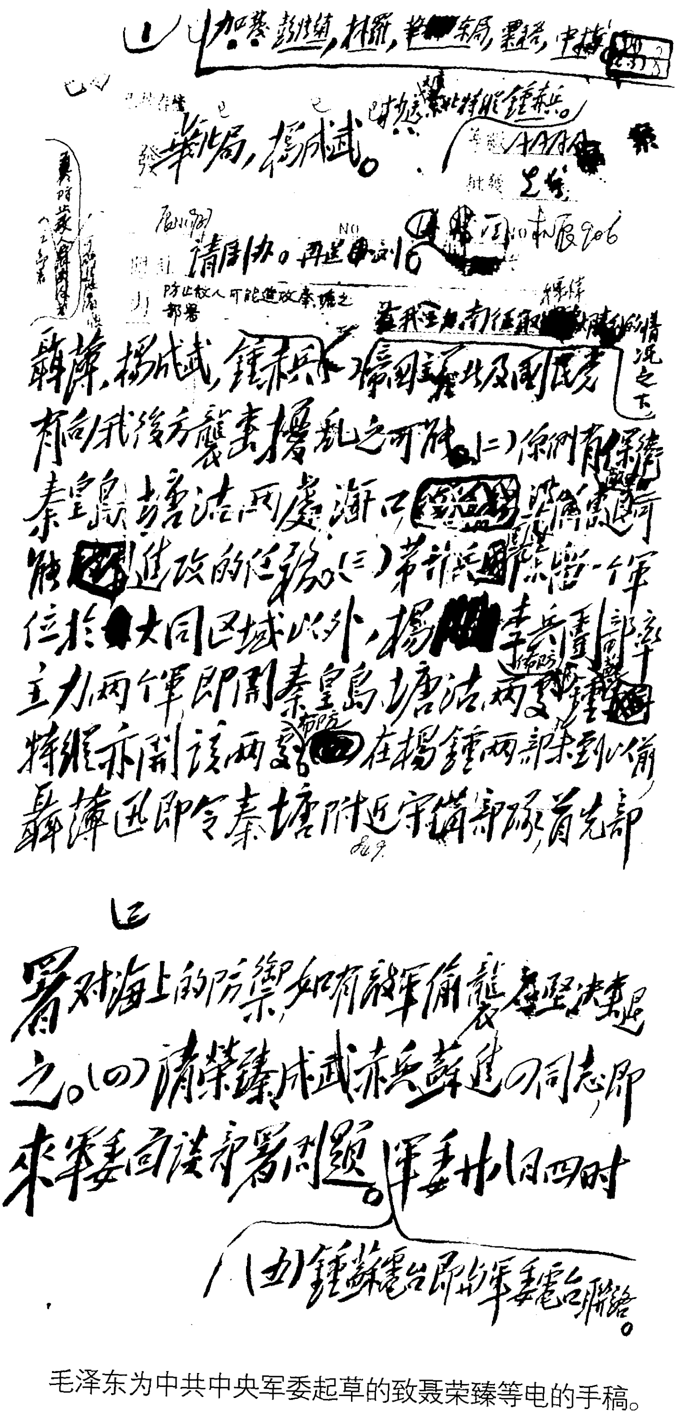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治委员薄一波等的电报。

[2] 钟赤兵，当时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政治委员。

[3] 杨李兵团，指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

[4] 钟苏特纵，指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政治委员钟赤兵、副司令员苏进。



加发彭德怀、林彪、华东局、粟裕、中央

发华北局、杨成武。同时发华北特纵钟赤兵。

请周阅。再送[illegible]

防止敌人可能进攻秦塘之部署

聂萧、杨成武、钟赤兵：（一）应注意在我主力南下作战的情况之下，[illegible]国主义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随时[illegible]进攻的任务。（三）华北兵团除留一个军位于大同区域以外，杨[illegible]李[illegible]部主力两个军即开秦皇岛、塘沽两处布防，钟特纵亦开该两处。在杨钟两部未到以前，聂萧迅即令秦塘附近守备部队首先部署对海上的防御，如有敌军偷袭，应坚决击退之。（四）请荣臻、成武、赤兵、萧进同志即来军委面谈部署问题。（五）钟萧电台即与军委电台联络。军委卅日四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聂荣臻等电的手稿。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

（1949年3月5日）

一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

---

[1]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举行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毛泽东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构成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党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在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往北平。

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按照北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是增加了，这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因此，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这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

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分子将受到镇压。

二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在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三

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

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四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关于恢复和发展生产

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五

南方和北方的情况是不同的，党的工作任务也就必须有所区别。南方现时还是被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在这里，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在乡

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和反对恶霸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完成减租减息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那个地区大约一年或者两年以后，就能实现减租减息的任务，造成分配土地的先决条件；同时必须注意尽可能地维持农业生产的现有水平不使降低。北方则除少数新解放区以外，是完全另外一种情况。在这里，已经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并且根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同时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六

我们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经济建设工作，党的经济政策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这就是说：

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这是进步的，这是和古代不同的。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由于受到几重敌人的压迫，得到了锻炼，具有了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古代有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现在被我们废除了，或者即将被废除，在这点上，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区别于古代，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是和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第四，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由于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或限制，

在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中常常采取参加或者保持中立的立场。由于这些，并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要从各方面，按照各地、各业和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对于资本主义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但是为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在和将来的利益，决不可以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须容许它们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有存在和发展的余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要限制资本主义，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认为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认为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这也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左”倾机会主义或冒险主义的观点。

第五，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必

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可能使得我们遇到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欲达此目的，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第七，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上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援助，其中主要地是苏联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七

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所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使得帝国主义者极为仇视这个革命，竭尽全力地帮助国民党。这就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深刻的愤怒，并使帝国主义者丧失了自己在中国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威信。同时，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大大地削弱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力量是空前地增长了。所有这些情形，使得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帝国主义者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者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他们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以正当的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

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八

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上海和长江流域的资产阶级，正在同我们拉关系。南北通航通邮业已开始。陷于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已经脱离了一切群众。我们正在准备和南京反动政府进行谈判。南京反动政府方面在这个谈判中的推动力量是桂系军阀，国民党主和派和上海资产阶级。他们的目的是使联合政府中有他们一份，尽可能地保存较多的军队，保存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利益，力求使革命带上温和的色彩。这一派人承认以我们的八条为谈判基础，但是希望讨价还价，使他们的损失不

要太大。企图破坏这一谈判的是蒋介石及其死党。蒋介石还有六十个师位于江南一带，他们仍在准备作战。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其交换条件是不打桂系和其他国民党主和派；一年左右也不去改编他们的军队；南京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员允许其加入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对上海和南方资产阶级的某些利益允许给以保护。这个谈判是全面性的，如能成功，对于我们向南方进军和占领南方各大城市将要减少许多阻碍，是有很大利益的。不能成功，则待进军以后各个地进行地方性的谈判。谈判的时间拟在三月下旬。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1]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

九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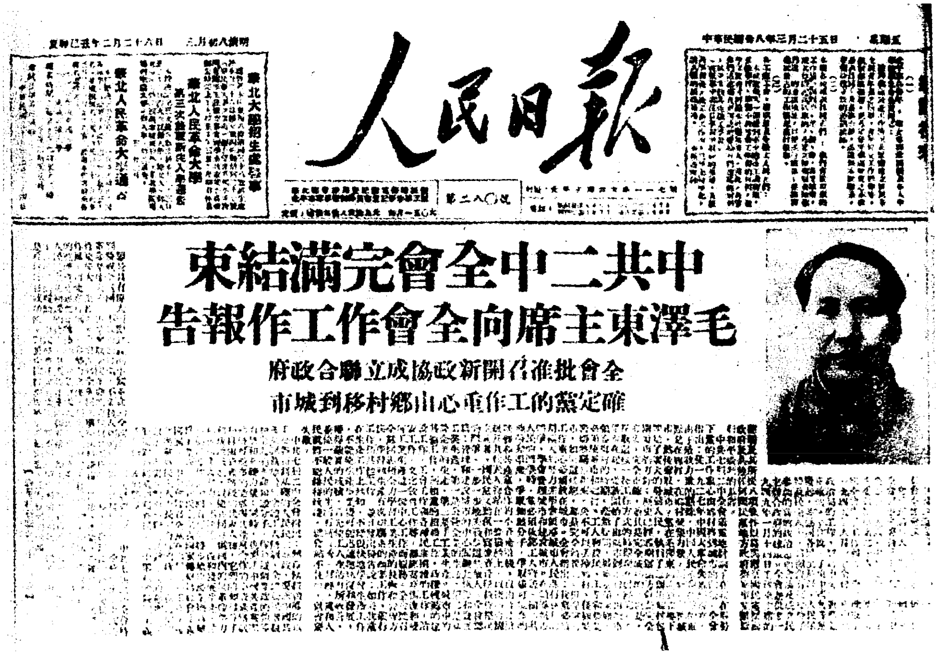
[1] 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从而战败铁扇公主的故事，见明朝吴承恩著的神话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九回。

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对他们的错误或缺点采取迁就态度，是不对的。对他们采取关门态度或敷衍态度，也是不对的。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我们党内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关门主义作风所养成的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确态度，在抗日时期并没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据地土地改革高潮时期又曾出现过。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现在中国第一次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民主联合政府即将成立，革命即将在全国胜利，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有认真的检讨和正确的认识，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

十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

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人民日報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 星期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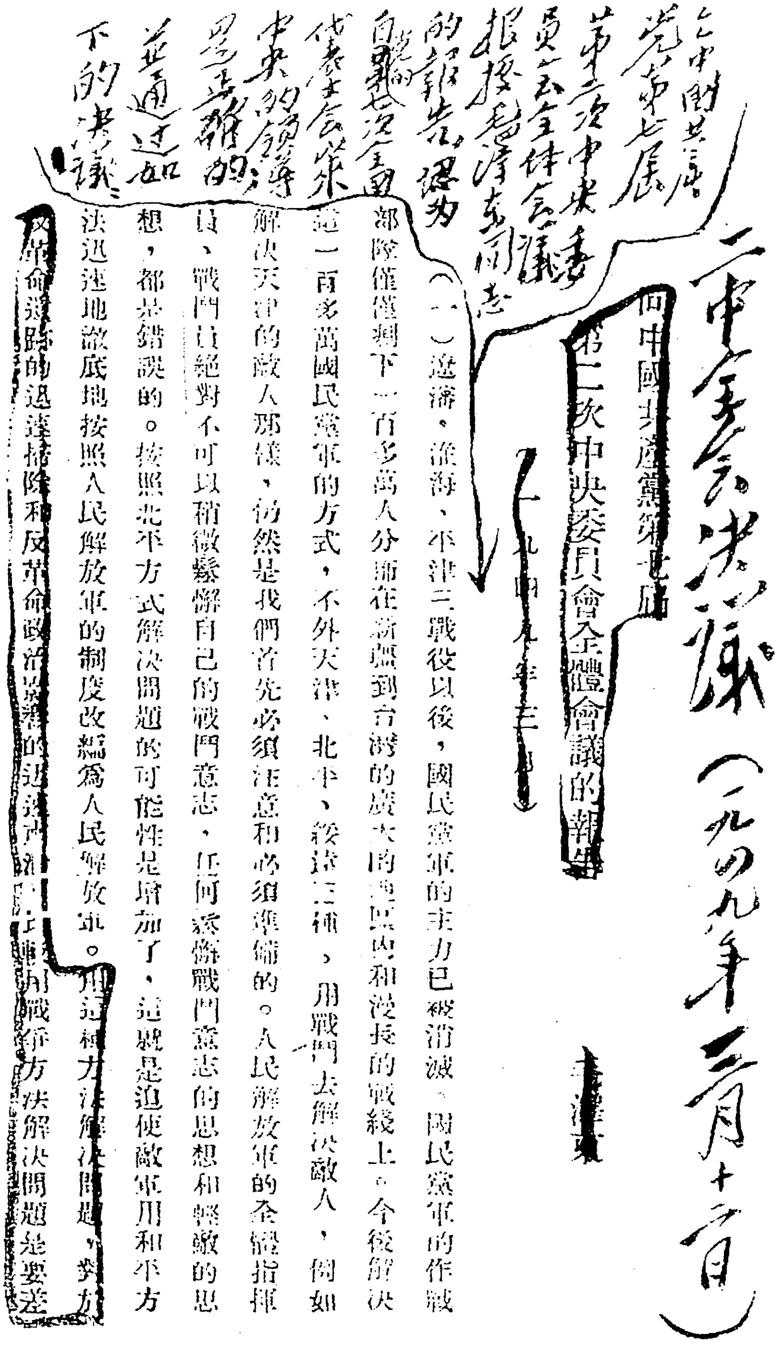
中共二中全會完滿結束

毛澤東主席向全會作工作報告

全會批准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

確定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图为《人民日报》刊登的有关消息。



二中全会决议（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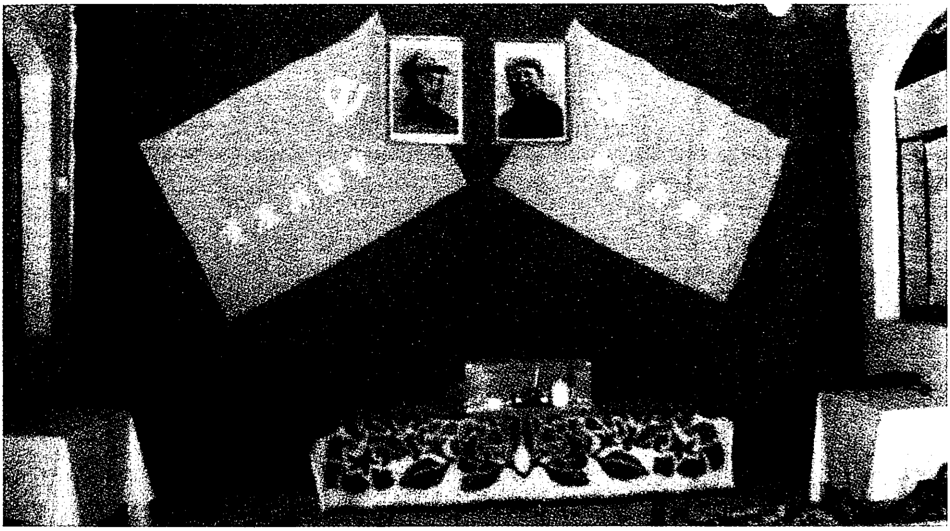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三月）~~

~~毛澤東~~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认为自党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并通过如下的决议：

（一）遼瀋、淮海、平津三戰役以後，國民黨軍的主力已被消滅。國民黨軍的作戰部隊僅僅剩下一百多萬人，分佈在新疆到台灣的廣大的地區內和漫長的戰線上。今後解決這一百多萬國民黨軍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綏遠三種。用戰鬥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和必須準備的。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揮員、戰鬥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鬥意志，任何鬆懈戰鬥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按照北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這就是迫使敵軍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徹底地按照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用這種方法解決問題，對於反革命殘餘的迅速掃除和反革命政治影響的迅速肅清，比較用戰鬥方法解決問題是要差~~

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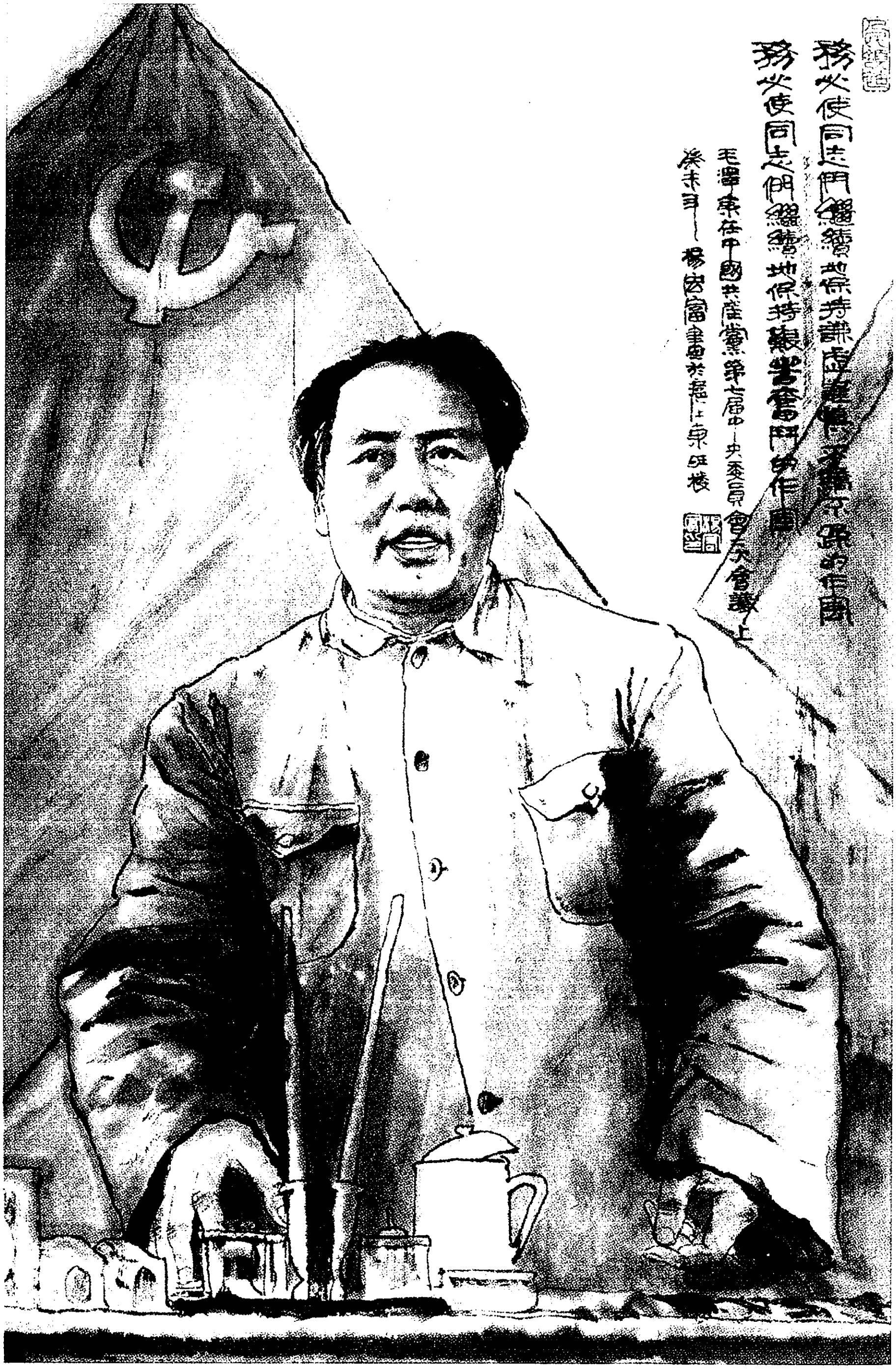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讨论部署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图为七届二中全会会场。

1949年3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

1949年3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作重要报告。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二次會議上
癸未年

《两个“务必”》（中国画）

复沈钧儒、章伯钧电

（1949年3月10日）

沈钧儒、章伯钧两先生：

寅虞电奉悉。贵盟中委在平设立临时总部，并举两先生为贵盟总部主持人愿与敝党保持密切合作，无任欢迎。兹托李维汉、齐燕铭两同志先行至平接洽，有事请与磋商为盼。

毛泽东

三月十日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1]

（1949年3月13日）

一、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好比是“班长”。要把这个班带好，的确不容易。目前各中央局、分局都领导很大的地区，担负很繁重的任务。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书记要当好“班长”，就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研究。书记、副书记如果不注意向自己的“一班人”作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不去研究怎样把会议开好，就很难把这“一班人”指挥好。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当然，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这里不过是一个比方。

二、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规定它几条，问题就解决了。有问题而不摆到桌面上来，就会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

长期不得解决，甚至一拖几年。“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过去大家不注意，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在这方面大有进步，友好团结关系大大增进了。今后仍然应该不断注意。

三、“互通情报”。就是说，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我们有些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有不同的语言，原因是学习还不够。现在党内的语言比较一致了，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对什么是“中农”和什么是“富农”，就还有不同的了解。

四、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各中央局、各前委处理问题的时候，除军事情况紧急和事情已经弄清楚者外，都应该这样办。这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我们做出的决定包括了下面干部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们当然拥护。下面干部的话，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听了以后要加以分析。对正确的意见，必须听，并且照它做。中央领导之所以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如果各地不来材料，不提意见，中央就很难正确地发号施令。对下面来的错误意见也要听，

根本不听是不对的；不过听了而不照它做，并且要给以批评。

五、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六、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伸着巴掌，当然什么也抓不住。就是把手握起来，但是不握紧，样子像抓，还是抓不住东西。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七、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例如，要进行土地改革，对于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这些数字就必须了解，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对于何谓富农，何谓富裕中农，有多少剥削收入才算富农，否则就算富裕中农，这也必须找出一个数量的界限。在任何群众运动中，群众积极拥护的有多少，反对的有多少，处于中间状态

的有多少，这些都必须有个基本的调查，基本的分析，不可无根据地、主观地决定问题。

八、“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早作准备。有些地方开干部会，事前不准备好报告和决议草案，等开会的人到了才临时凑合，好像“兵马已到，粮草未备”，这是不好的。如果没有准备，就不要急于开会。

九、“精兵简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应当简明扼要。会议也不要开得太长。

十、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论在地方上或部队里，都应该注意这一条。对党外人士也是一样。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

十一、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

十二、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1]？有些人不懂得要划清这种界限。例如，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就把延安说得好似“一无是处”，而没有把延安的官僚主义同西安的官僚主义比较一下，区别一下。这就从根本上犯了错误。其次，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

---

[1] 延安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安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毛泽东以此来比喻革命和反革命。

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例如，成绩究竟是三分还是七分？说少了不行，说多了也不行。一个人的工作，究竟是三分成绩七分错误，还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必须有个根本的估计。如果是七分成绩，那末就应该对他的工作基本上加以肯定。把成绩为主说成错误为主，那就完全错了。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

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除了开好代表大会以外，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1]

（1949年3月13日）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像王明[2]同志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具体运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

---

[1]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共10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党委制”已改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收入本书。这里选入的是第三、四、五、六、九5个部分。

[2] 王明，即陈绍禹（1904—1974），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1年11月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1937年11月回国，随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1956年后一直滞留苏联，并写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

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只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分割了吗？而且，我们说殖民地半殖民地归我们，可是有那么一个国家，提出不买你的货，而要直接到莫斯科去买货，这又怎么办呢？另外，如果是真理，那它就有点普遍性，就不能不超过一定的范围。比如，拿日本来说，按照王明的提法，它现在算归我们，将来美帝国主义撤走以后，它又该归斯大林管了，这岂不是笑话？当然，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的经验，自然会有人运用的。所以，不要做这种定义。斯大林做列宁主义的定义，是在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季诺维也夫[1]等的斗争中产生的。那时候在俄国，有马克思、列宁的影响，还有季诺维也夫及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所以要那样提。马、恩、列、斯在中国的威信很高，中国不发生这种问题。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在应当在全中国全世界很好地宣传马、

---

[1] 季诺维也夫（1883—1936），苏联“新反对派”首领。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曾参加1905年革命，1907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等职。1925年组织“新反对派”，后又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1927年被清除出党。1936年被处决。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撤销对他的判决，宣布他在法律、国家和人民面前无罪。

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有人说，斯大林的思想之称为学说，不称主义，是斯大林的谦虚。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释为谦虚，而是因为苏联已经有了一个列宁主义，而斯大林的思想是合乎这一主义的，并且把它贯彻到实际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一个列宁主义，再有一个斯大林主义，那就有了两个主义。同样，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政策等，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而我们许多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没有共同的认识。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

关于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帝国主义制度存在的时代，没有国际援助，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取得胜利。直到苏联实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斯大林还是这样谈问题，因为苏联在国内虽然胜利了，但国外来的干涉问题并未消除，现在仍然如此。估计形势，是我们必胜，社会主义必胜，这是整个的趋势和可能性。但要等到最后取胜了才算胜利，中国革命也是一样。而且胜利之后的巩固，没有外国无产阶级的援助，也是不行的。如果认为没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也可以胜利，那是不正确的，违背马列主义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应当宣传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要在全国人民中、在全党中广泛宣传。但同时我们不应当骄傲，从将来建设新中国来说，道路还是很长的，而革命战争的胜利仅是很短的历程，还只是事情的开始。

“毕其功于一役”

“毕其功于一役”，我是在流血的革命这一点上说的，就是说流血的革命只有这一次，将来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那一次就不用流血了，而可能和平解决。但这只是可能，将来是否不流血，还要看我们工作的努力情况。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至于说“政治上、经济上都毕其功于一役”，那是不能这样说的，王明同志这样说，那就错了。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1]及十

---

[1] 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

二月会议[1]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2]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

---

[1] 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自称代表国际路线，发言中根本否认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的错误意见没有能形成会议决议。

[2] 博古，即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这期间，犯过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1年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到重庆参加同国民党谈判。4月8日在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1]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而代之。其实，

---

[1]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领导红军继续长征。1937年11月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夏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1944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接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1]的“调和路线”[2]），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3]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4]。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

---

[1]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9月同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之外。1935年2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

[2] 1930年6月至9月，李立三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同年8月，周恩来、瞿秋白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派遣，从莫斯科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是会议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个别的策略上工作上组织上的错误”，表现了某些调和妥协的精神。这一点后来被王明等人上升为“调和主义”“调和路线”来反对。

[3] 指1934年1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4] 指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

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经过整风，微生物更大为缩小了，破除了迷信。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我同意要王明写个东西。博古、洛甫等过去都写过的。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定案，以后还有完全的自由，完全推翻或部分修改都可以，不是像过去那样强迫签字，定成铁案。是否要限制一点时间？我看要，像过去那样没有时间限制，恐怕不妥当。我看可限定一个月的时间，但这要王明自己说说意见。（王明说：一个月可以。）这中间搬往北平的时间不算进去。以后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凡属在党内犯了错误的，都要给他分配工作。不仅要欢迎他积极找我们谈，我们也要找他谈，向他做工作。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懂得要向傅作义[1]做工作，要向民主人士做工作，但只要一个人一挂上共产党员的招牌，就不向他做工作了，这是不好的。对于有错误的同志，我们还是要做工作。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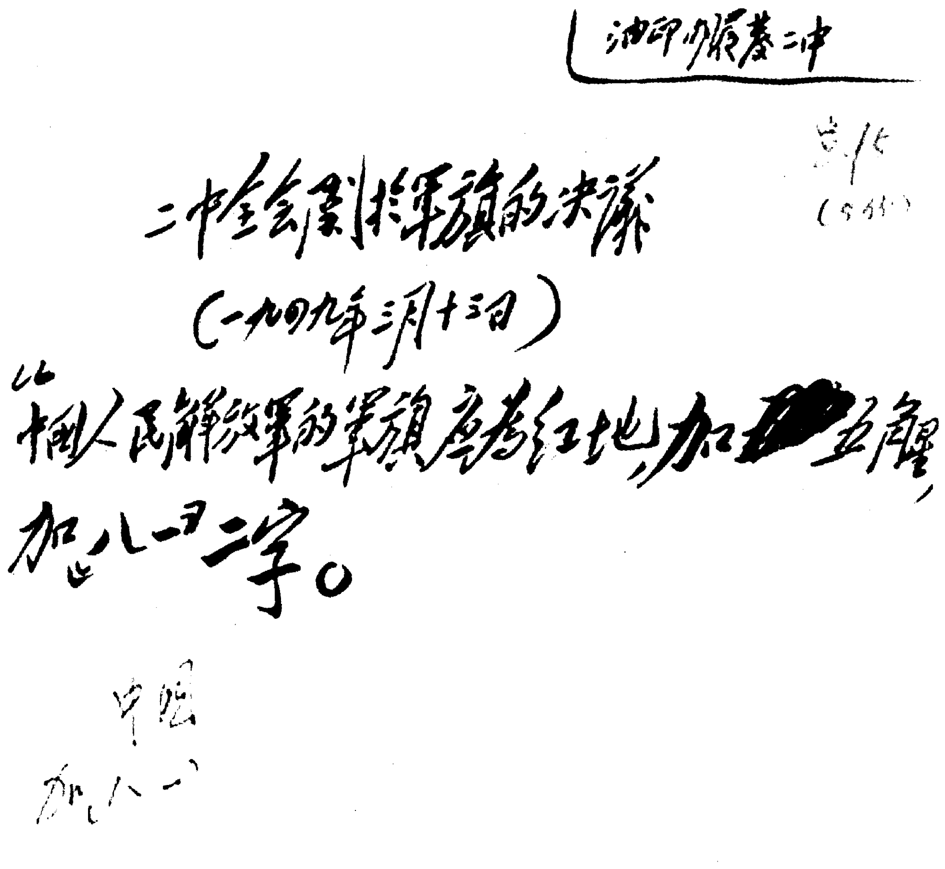
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代表会

---

[1] 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议就是苏维埃。自然，在内容上我们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是有区别的，我们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苏维埃”这个外来语我们不用，而叫做人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俄国人民创造的，列宁加以发扬。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民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制度。

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相配合的还有党的代表会议制度。这次二中全会，按其性质来说就是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不过，这种中央全会的形式更可以充分讨论问题，较之一两千人的大会解决问题更好些。



油印少份发二中

尚昆
（5分）

二中全会关于军旗的决议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illegible]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中国
加八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

十九、二十兵团按原计划集结[1]

（1949年3月17日）

徐、罗：

（一）同意仍按原计划十九兵团在榆次以西以南地区集结，二十兵团在太原东北东西黄水地区集结。

（二）同意以瑞卿为太原军管会副主任。

军委

十七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1]

（1949年3月17日）

林、罗、刘：

（一）华野中野两军决于四月十日渡江，向着湖口、芜湖、南京、镇江、上海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国民党军六十个师举行攻击。（二）东野[2]所负攻击武汉及湘鄂赣三省国民党军之任务业已确定，你们的两个军亦早于丑有出发，你们主力应于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发准备，于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个月内，全军出发完毕，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全军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完成兵力展开任务。请你们按此时间标准，规定全军出发准备工作及出发计划报告我们。（三）关于行进路上粮草的准备及供应，你们应即与华北局及中原局协商确定，以免迟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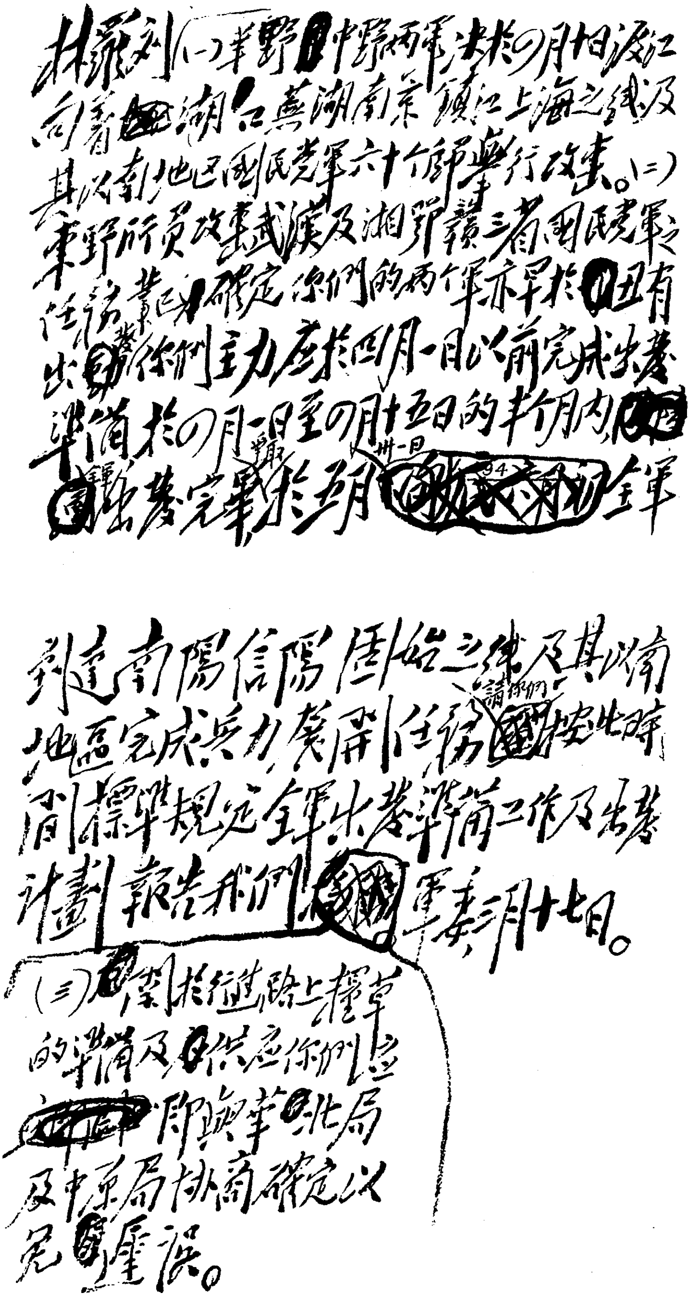
军委

三月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的电报。

[2] 东野，指东北野战军，1949年3月11日改称第四野战军。



林羅劉（一）粟野中野兩軍決於四月十日渡江向著蕪湖南京鎮江上海之線及其以南地區國民黨軍六十個師舉行攻擊。（二）東野所負攻擊武漢及湘鄂贛三省國民黨軍之任務業已確定你們的兩個軍亦早於丑有出發你們主力應於四月一日以前完成出發準備於四月一日至四月十五日的半個月內全軍出發完畢爭取於五月卅一日全軍到達南陽信陽固始之線及其以南地區完成兵力展開任務請你們按此時間標準規定全軍出發準備工作及出發計劃報告我們軍委三月十七日。

（三）關於行進路上糧草的準備及供應你們應即與華北局及中原局協商確定以免遲誤。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第四野战军主力应于四月一日前完成出发准备》的手稿。

待谈判接触数天后决定是否攻占浦口浦镇[1]

（1949年3月19日）

陈、饶、邓、粟、谭、张：

寅巧徐州电悉。（一）是否攻占两浦[2]，要待谈判接触数天才能决定。如谈判有成功希望，则不要攻占两浦，以利和平地解决接收南京问题。如谈判没有成功希望，则看军事上是否有必要攻占两浦。如攻占两浦为渡江作战所必须，则攻占之；如无此种必须，则可置之不理。（二）决定四月一日为南京代表到达北平并开始谈判之日期[3]（此日期要待三月二十五日才公开宣布），大约在四月五日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和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两浦，指浦口、浦镇，均为镇名，位于江苏省南京市西北，长江北岸。

[3]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26日决定：“（一）谈判开始时间：4月1日。（二）谈判地点：北平。（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4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加派聂荣臻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的基础。（四）将上列各项经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按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的必要材料，以利举行谈判。”

前即可判明谈判有无希望。你们大概可以在四月六日左右实行夺取北岸据点（不一定包括两浦）之作战，四月十日实行渡江。从四月一日起你们和我们的电台须昼夜密切联络，不使稍有间断。（三）除两浦是否攻占须看谈判情形及军事上是否必要才能决定外，不论谈判情形如何，对于攻占北岸据点及四月十日渡江均无妨碍。

军委
十九日二时

第四野战军先头两个军的任务[1]

（1949年3月20日）

萧、陈、解、潘，刘、邓、李[2]，并告林、罗、刘[3]：

东野先头两个军的任务，是协同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力量钳制白崇禧[4]部，使白部不能向东增援妨碍我中野、华野之渡江。因此决定：（一）萧陈解潘所部应即依照刘邓皓辰电[5]改变部署，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参谋长解方和副参谋长潘朔端等的电报。

[2] 刘、邓、李，指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5] 指1949年3月19日辰时刘伯承、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军委和萧劲光、解方的电报。电报说，第四野战军两个军南下行程较预定时间为迟。在此情况下我们考虑：四野十二兵团如仍以一个师出平汉路东侧，而以主力绕经枣阳、随县地区拉住桂系以掩护渡江军右侧背，这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赶不及。为此，建议十二兵团应改以主力或一个军出平汉路东（并争取四月七日赶到宣化店、河口之线），以一部或一个军出西侧，如能运用郑南铁路输送一部兵力则较快。另以王宏坤指挥之桐柏、江汉部队先期以四野面目出现，以迷惑吸引白崇禧部为有利。

要绕道太远，而要直迫信阳，沿铁路分两路并行南下，直接威胁并打击白部，并力求迅速行进。（二）萧陈解潘受刘邓指挥，一切依刘邓意旨行动。

军委

二十日二时

复陈毅、谭震林电[1]

（1949年3月20日）

我们不知道攻占两浦是否为渡江战斗所必要，请即查告。据我们想，似乎无此必要。如果无此必要，则除以一个兵团仍对两浦监视待命行动外，其他兵团可以提早于四月二日（南京代表到达北平之第二日）开始攻占北岸据点，至四月五日或六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四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渡江，这样对于谈判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陈毅、谭震林建议推迟渡江作战时间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陈、谭电的主要内容。

致中原局电[1]

（1949年3月21日）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十六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候。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不要去石家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1]

（1949年3月23日）

【新华社石家庄二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业已完满结束。全会到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缺席者二十人。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全会批准了一九四五年六月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全会并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与军事集团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着重地讨论了在现在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党在毛泽东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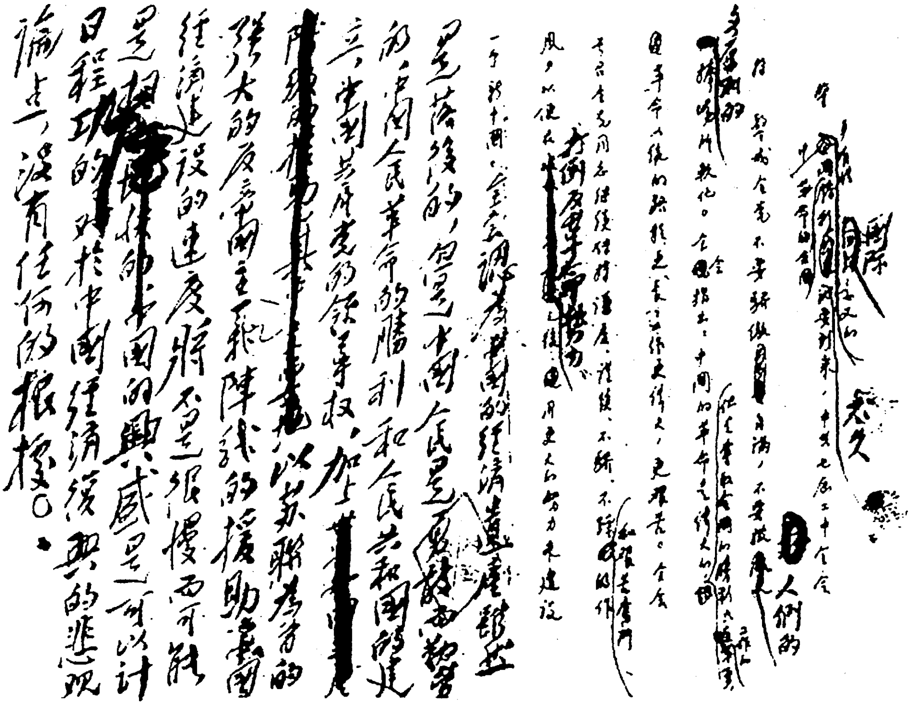
[1]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胡乔木起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上，重新改写了第一段，加写了末段一节。中间文字亦有重要改动。24日，在排出的清样稿上，又做了少许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即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新闻稿发表于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志的领导下团结了广大的劳动人民，执行了这个用乡村包围城市的方针;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但是，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从新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毫无疑问，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密切地联结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全会指出: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时，党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全会认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第一是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建设工作，工会工作和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治安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并且发出警告说：如果我党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党和人民就将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要失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中国共产党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

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作为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中国共产党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共同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从而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全会号召全党在思想上和工作上确立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无原则的迁就主义的态度，又要反对妨碍党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的态度。

鉴于具有伟大国际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不久就要到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特别警戒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全会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工作的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会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以便在打倒反革命势力之后，用更大的努力来建设一个新中国。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的手稿。

嘉勉重庆号巡洋舰起义[1]官兵

（1949年3月24日）

邓兆祥舰长，并转全体官兵：

热烈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的空军虽然炸毁了重庆号，但是这只能增加你们的起义的光辉，只能增加全中国爱国人民、爱国的海军人员和国民党陆军、空军人员的爱国分子的愤恨，使他们更加明了你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唯一道路。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者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号，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要随着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在人民解放军方面。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设自己的空军和海军，而你们就将是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祝你们努力!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1] 重庆号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中最大的一艘巡洋舰。1949年2月25日，该舰官兵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加入中国人民海军。同年3月19日该舰被国民党空军炸沉于葫芦岛附近。

1949年，从硝烟中走向和平的毛泽东。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到达北平。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受到社会各界代表的欢迎。图为毛泽东和叶剑英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叶剑英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到达北平时和徐肖冰、刘德源、石益合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西苑机场。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人民团体代表亲切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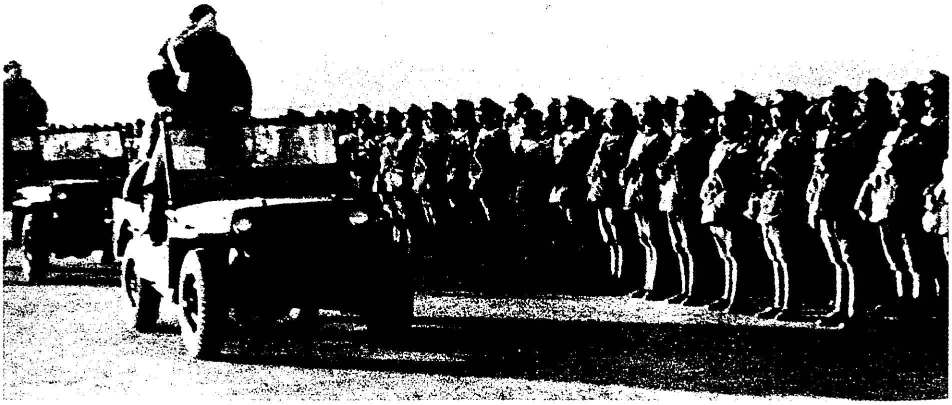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西苑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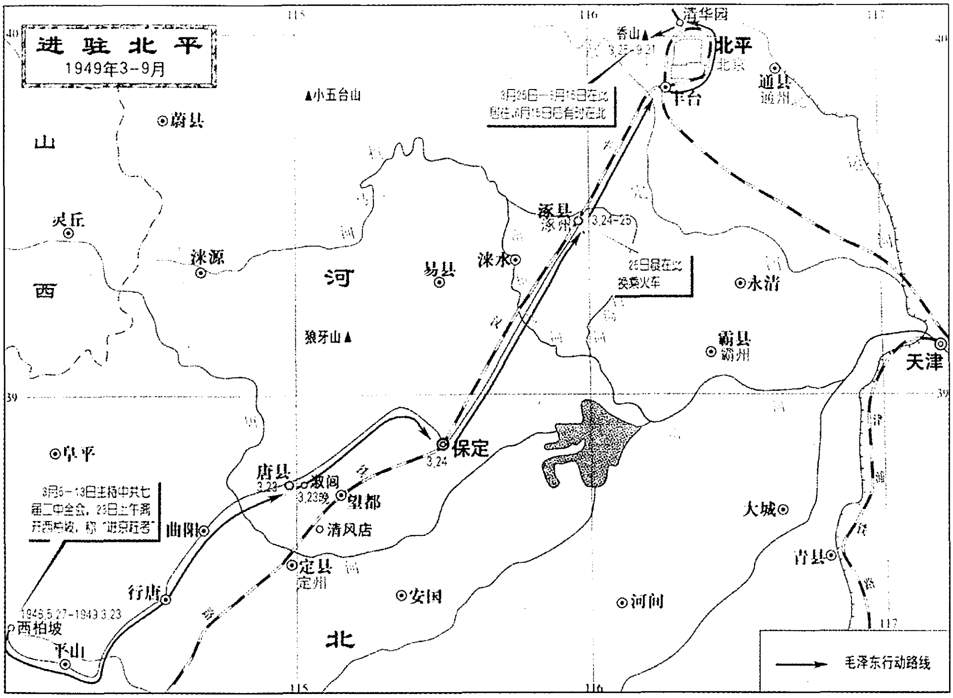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人民团体代表亲切握手。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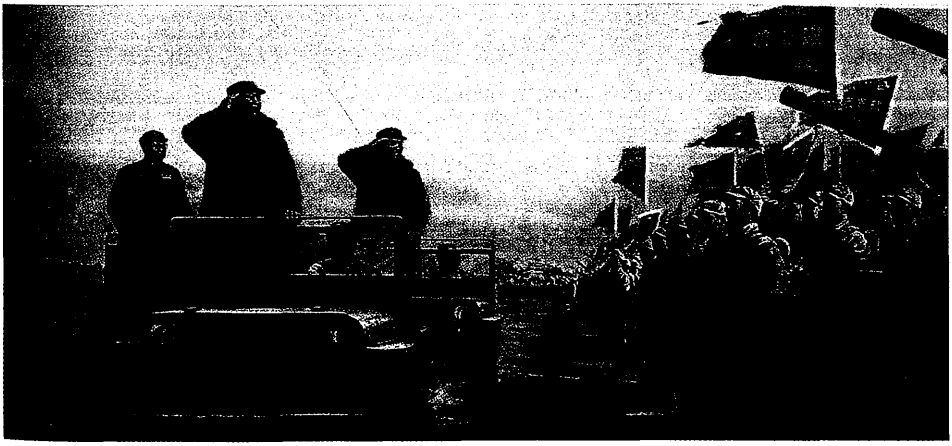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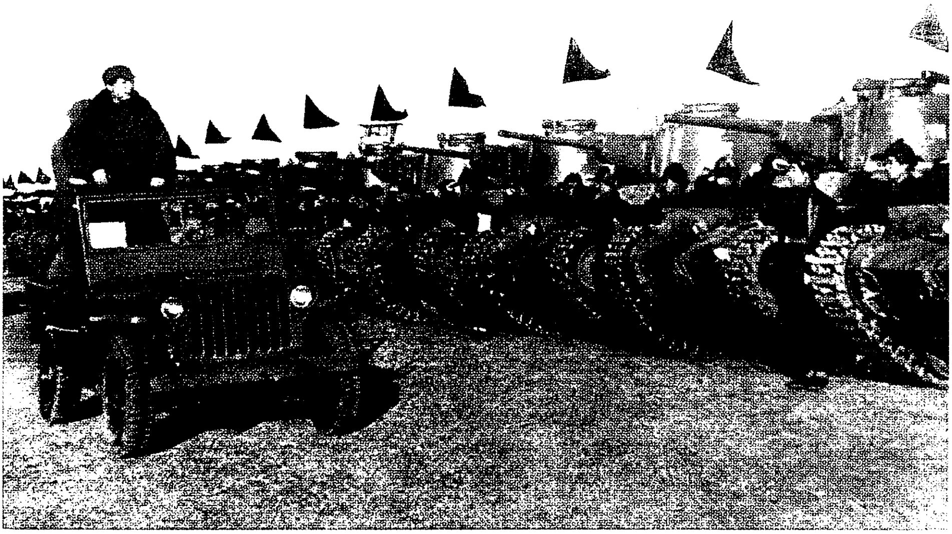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


进驻北平
1949年3－9月
清华园
香山
3.25－9.21
北平
北京
通县
通州
丰台
3月25日－6月15日在此
居住，6月15日后有时在北
小五台山
蔚县
山
西
灵丘
涞源
河
易县
涞水
涿县
涿州
3.24－25
25日晨在此
换乘火车
永清
霸县
霸州
天津
狼牙山
阜平
保定
3.24
唐县
3.23
淑闾
3.23晚
望都
清风店
3月5－13日主持中共七
届二中全会，23日上午离
开西柏坡，称“进京赶考”
曲阳
定县
定州
行唐
安国
河间
大城
青县
1948.5.27－1949.3.23
西柏坡
平山
北
毛泽东行动路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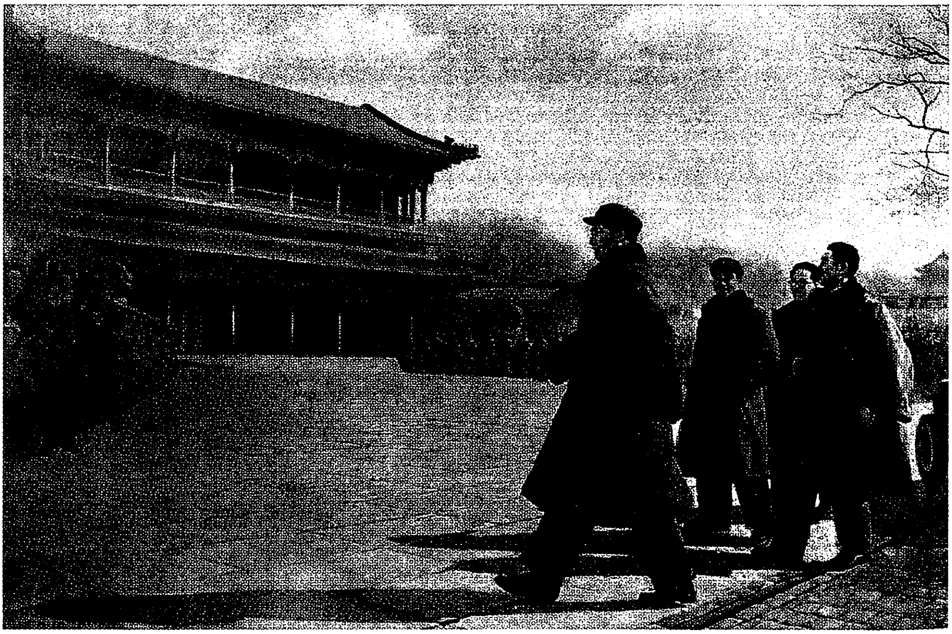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从西柏坡进驻北平路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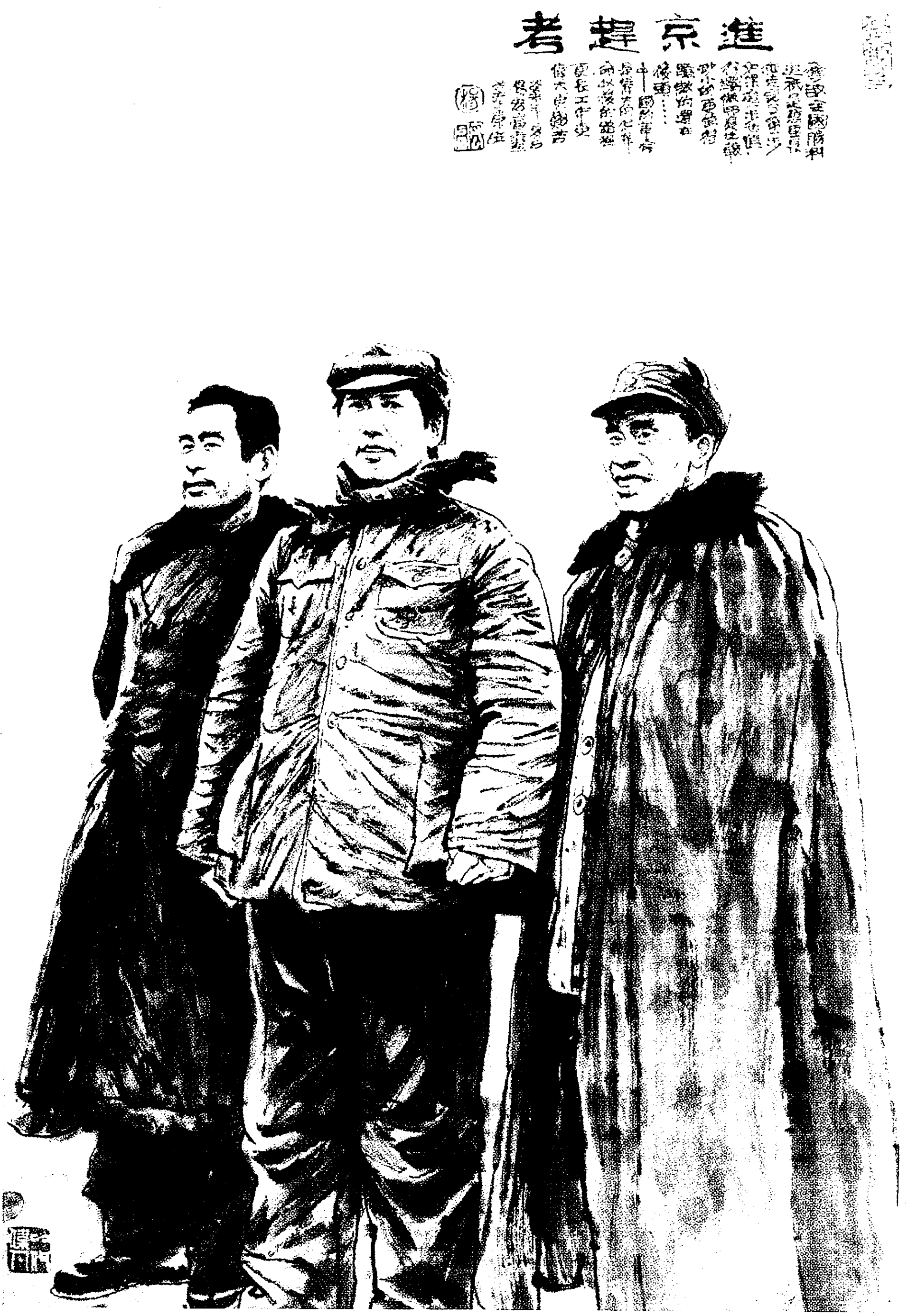
《人民力量的检阅》（油画）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检阅人民解放军装甲部队。



《东方破晓》（油画）



《进京赶考》(中国画)

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

（1949年3月27日）

宥申电悉。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及对北岸敌人的处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林彪、罗荣桓电[1]

（1949年3月28日）

为统一称号起见，你们的军委分会改称为前委（其全称为第四野战军前线委员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1]

（1949年3月28日）

同意你们主力于四月十一日开始出动，但须争取于五月三十一日到达南阳、信阳、固始之线及其以南地区，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到达沿江北岸并相机攻占汉口、汉阳及江北各敌人据点，完成渡江准备任务，待命于七月上旬渡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1]

（1949年3月29日）

同意你们推迟至四月十五日渡江。已定四月一日为我们和国民党开始谈判时间，四月十日左右结束，谈判成败要到那时才能清楚。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饶漱石、粟裕、谭震林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9年3月30日）

（一）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今日到北平，我们决定联合李、白反对蒋党，李、白对此计划已有初步认识，尚待我们深入工作。（二）决定要白让出花园以北地区，我军到信阳、武胜关附近时，如守敌南撤，则不要攻击或追击，让其退至花园及其以南，孝感、黄陂、黄安、阳逻、黄冈等地亦暂时不要去占，待东北主力到达后，再通知白崇禧连同汉口、汉阳等地一齐有秩序地让给我们。（三）麻城、浠水、黄梅、广济、太湖、安庆等处敌军分布情形如何，请刘、陈、邓即查告。这些地方的敌军一般应坚决歼灭之，扫清渡江障碍。惟麻城、浠水两处之敌，如不妨碍陈赓的进路，亦可以暂置不打，待后交涉要白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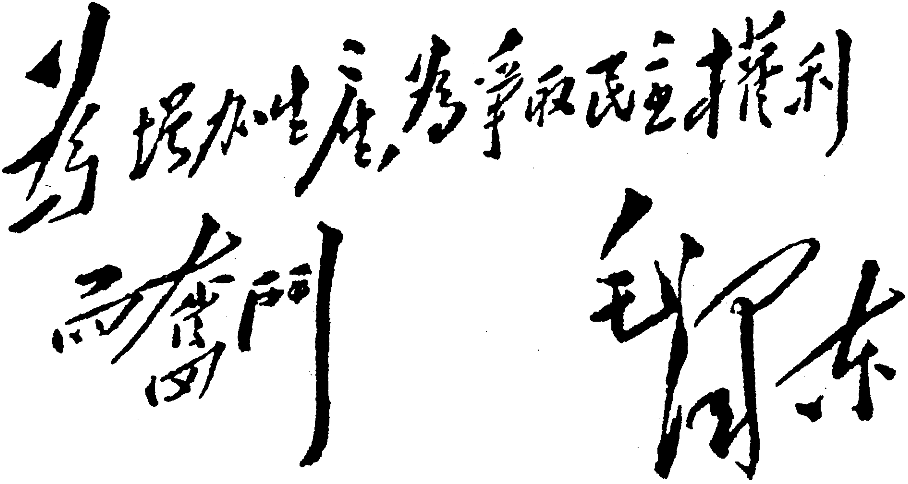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及萧劲光、陈伯钧电的主要内容。

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1]

（1949年3月）

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



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题词。

---

[1] 1949年3月24日至4月3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代表，并为大会题词。

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49年3月，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图为大会会场。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复傅作义[1]电

（1949 年 4 月 2 日）

傅作义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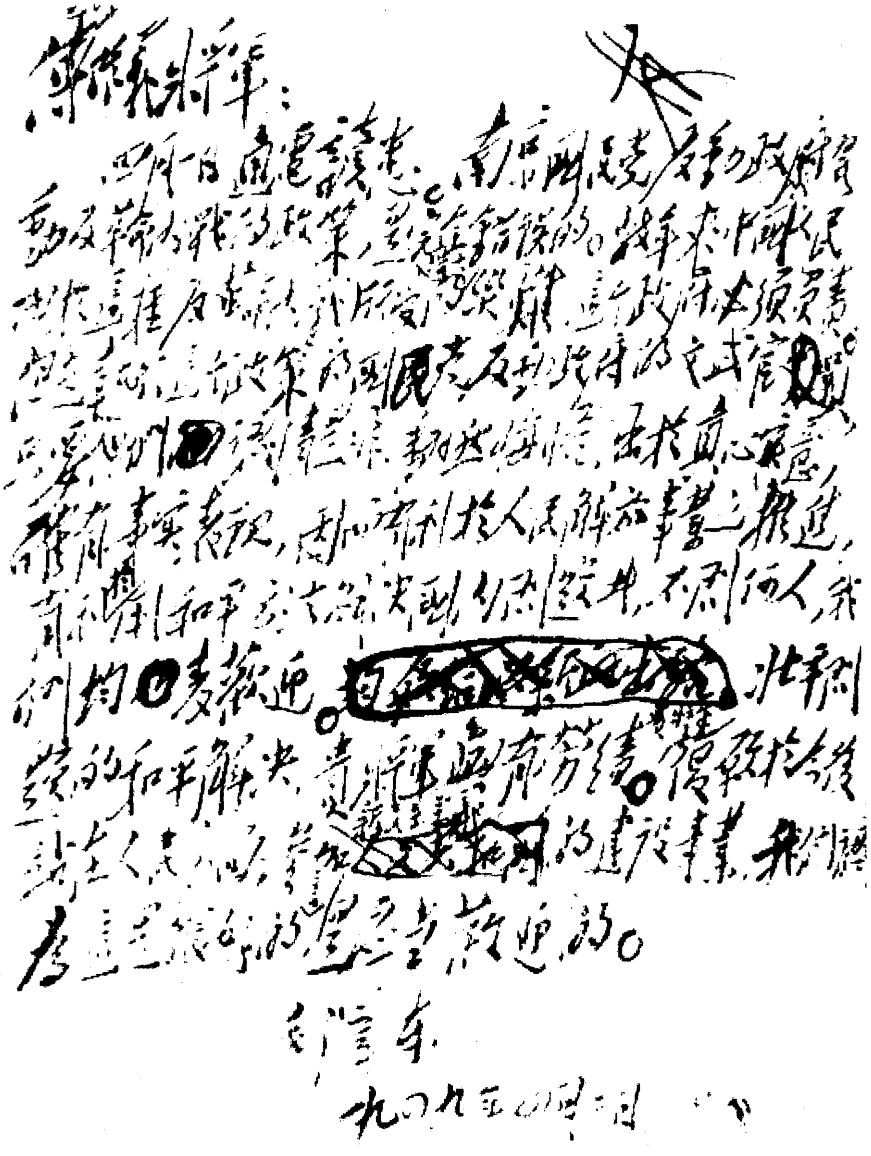
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

[1] 傅作义，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21日与人民解放军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率部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4月1日，傅作义通电全国，表明自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立场。



傅作义将军：

四月一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发动及推行的战争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战争责任不止蒋氏[illegible]，这个政府必须负责。[illegible]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illegible]，能有事实表现，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和平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illegible]人民[illegible]的建设事业，我们[illegible]的[illegible]欢迎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毛泽东复傅作义电的手稿。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1]

（1949年4月2日）

南京代表团本日到北平，提到李、白意见，要求我军勿攻安庆，驻安庆桂军可以撤退等语。我们认为不要攻安庆，让安庆守军向武汉撤退，如何？速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的主要内容。2日，刘伯承、张际春复电表示：“我们确定不攻安庆，最好让该城守军提早撤退，更利于渡江作战。”

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1]

（1949年4月3日）

美、加、英、法、挪、丹、冰、荷、比、卢、葡、意等国政府将于四月四日签订的北大西洋公约，是一个以挑动新的世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危害人类和平安全的条约。鉴于世界和平不可分割，东西各民族人民安危与共，并且事实上英美等国政府也正在力图将北大西洋公约的模型扩张到太平洋方面来，中国各民主党派，特对北大西洋公约及其他任何类似的侵略方案，表示坚决的反对。

中国各民主党派谴责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和其他保障国际和平的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侵略政策。中国各民主党派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势力反对新战争危险的奋斗，表示热烈的同情和忠诚的拥护。中国各民主党派坚信，这种奋斗将使策动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受到全世界和平人民的责备而陷于孤立，将使新的世界侵略战争的阴谋陷于破产。我们认为世界是人民的，不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的横行与猖獗，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连同他们本身在内，均将被人民所揭露，所抛弃。

中国各民主党派同时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郑重宣告：如果帝国

---

[1] 这是毛泽东及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等联合发表的声明。

主义侵略集团竟敢挑动这个危害全世界人民的反动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团结全国人民，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不朽遗嘱，采用必要的方法，与中国的盟友苏联和各国和平民主势力，携手并进，向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作坚决的斗争，打败侵略者，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永久的和平。我们认为，如果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的诸侵略国一定是失败者，反帝国主义的诸被侵略国一定是胜利者。这个前途，已经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向全世界人民指明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李济深
中国民主同盟负责常务委员　沈钧儒
章伯钧
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　黄炎培
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　马叙伦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常委　谭平山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彭泽民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央执行委员　李章达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代主席　蔡廷锴
中国致公党主席　陈其尤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

同意太原作战方案[1]

（1949年4月3日）

徐、周、罗：

（一）同意寅陷电所述太原作战方案[2]。（二）同时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

军委

卯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为统一领导太原前线各项工作，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1949年3月30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总前委讨论太原作战方案，报告如下：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其具体部署：1. 以二十兵团一个军，由城东北突破丈子头，迅速西进，占领新城以南之北飞机场；另一个军主力（两个师）及西北第七军之一个师，由兰村沿汾河西岸向南攻击，直插北机场以西之汾河铁桥，配合由丈子头西进之军，切断北机场以北之敌而歼灭之；另由西北第七军以一个师配合二十兵团，同时攻占牛驼村（城东北），继向北黄家坟敌进攻，并钳制该敌。2. 十九兵团以

一个军及晋中部队三个旅，由城西南汾河西攻击南屯义井，继向大小王村、大窊、南社村（均在城西）进击，控制该地区，配合二十兵团由汾河南进之军切断河西之敌而歼灭之；另十九兵团又一个军，攻击城西南汾河东之杨家堡、债老、军营、大营盘、狭村之敌；另十八兵团以一个师同时由山头向南攻击马庄与双塔寺间之阎家坟，配合十九兵团攻占狭村之军，切断双塔寺与大营盘以南之敌而歼灭之。3. 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之主力第一步暂不攻击，而以佯动配合南、北、西等区作战；待以上地区攻击得手和被切断之敌基本被消灭时，即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由城东大东门方向，十九兵团由城南首义门方向，二十兵团由城北工厂区三面攻城，晋中部队留河西配合攻城。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争取半个月攻下太原城，但仍作一个月之作战准备。以上方案彭总已同意。当否？请军委指示。”

对桂系应根据联桂反蒋方针采取具体步骤[1]

（1949年4月4日）

萧、陈、唐、解、潘，并刘、李、张，中原局，邓、饶、陈[2]：

（一）我们已和白崇禧[3]代表刘仲容[4]商定，黄冈、阳逻、仓子埠[5]、黄陂、花园[6]、孝感、汉川、蔡甸[7]、黄陵矶[8]之线及其以南地区我军暂不进占，使武汉不感震动，大商巨绅不致逃跑，将来我军进占该线及武汉地区时用和平接收办法，免遭破坏。此点望萧陈通知所属，望中原局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三区一体照办。其余宜昌至武穴线上长江北岸要地，凡我军已占者照旧，凡我军未占者一律暂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第一副司令员陈伯钧、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参谋长解方和副参谋长潘朔端等的电报。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4] 刘仲容，当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5] 仓子埠，今仓埠镇，位于湖北新洲县西部。

[6] 花园，镇名，位于湖北孝感市北部。

[7] 蔡甸，镇名，位于湖北汉阳县北部。

[8] 黄陵矶，镇名，今为湖北汉阳县县治。

进占，以利和平接收。萧陈并可设法与花园方面白部负责人作试探性的联络，并以情况电告。（二）李宗仁[1]代表黄启汉[2]昨江日由北平返南京，除传达上项意旨外，并传达我方允许安庆方面桂军向南京或向武汉撤退。请刘李张即作准其撤退之部署，并令前线派人与守军试行联络。（三）总之，我方对桂系即应根据联桂反蒋[3]方针开始着手采取具体步骤，由敌对关系改变为交朋友关系，对张轸[4]亦是如此。执行情形望告。

军委
卯支

---

[1]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2] 黄启汉，当时是李宗仁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3] 蒋，指蒋介石。

[4]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

（1949年4月4日）

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1]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基本上是第一部分人和第三部分人的混合物，第二部分人为数甚少。这个政府到今天为止，仍然是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工具。

四月一日发生于南京的惨案，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这是李宗

---

[1] 1949年3月12日，李宗仁在孙科辞职后，任命何应钦继任行政院长。

仁何应钦政府保护蒋介石、保护蒋介石死党、保护美国侵略势力的必然结果。这是李宗仁何应钦政府和蒋介石死党一同荒谬地鼓吹所谓“平等的光荣的和平”，借以抵抗中共八项和平条件，特别是抵抗惩办战争罪犯的结果。李宗仁何应钦政府既然派出和谈代表团前来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谈判和平，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八项条件以为谈判的基础，那末，如果这个政府是有最低限度的诚意，就应当以处理南京惨案为起点，逮捕并严惩主凶蒋介石、汤恩伯、张耀明，逮捕并严惩在南京上海的特务暴徒，逮捕并严惩那些坚决反对和平、积极破坏和谈、积极准备抵抗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推进的反革命首要。庆父不死，鲁难未已[1]。战犯不除，国无宁日。这个真理，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们愿意正告南京政府：如果你们没有能力办这件事，那末，你们也应协助即将渡江南进的人民解放军去办这件事。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借以立功自赎为好。免得逃难，免得再受蒋介石死党的气，免得永远被人民所唾弃。只有这一次机会了，不要失掉这个机会。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签一个协定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自赎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不签这个协定，情况也差不多，可以用局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可

---

[1] 事见《左传·闵公元年》。庆父是春秋时鲁国的公子，曾经一再制造鲁国的内乱，先后杀死两个国君。当时的人有“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说法。后人常常把制造内乱的人比之为庆父。

能还有些战斗，但是不会有很多的战斗了。从新疆到台湾这样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国民党只有一百一十万左右的作战部队了，没有很多的仗可打了。无论签订一个全面性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而签许多局部性的协定也好，对于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死党，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一句话，对于一切至死不变的反动派，情况都是一样的，他们将决定地要灭亡。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性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如果也愿意这样做，那末，就得在这几天下决心，一切幻想和一切空话都应当抛弃了。我们并不强迫你们下这个决心。南京政府及其代表团是否下这个决心，有你们自己的自由。就是说，你们或者听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话，并和他们永远站在一起，或者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站在一起，对于这二者的选择，有你们自己的自由。但是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进入北平的居住地。

1949年，毛泽东、朱德在香山双清别墅。

应即派人进城接洽和平解决太原问题[1]

（1949年4月5日）

彭、徐、周、罗：

阎锡山[2]已离太原，李宗仁[3]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4]），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等语。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于十五日前谈妥。进行情形望告。

军委
卯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当时正在太原前线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3] 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

[4] 指李宗仁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刘仲容于4月5日由北平返宁（南京）。

关于如何对待桂系部队的问题[1]

（1949年4月5日）

邓、饶、陈，刘、张、李，中原局，萧、陈[2]，并告林、罗、刘[3]：

（一）李白[4]代表刘仲华[5]江日由北平到南京，支日去汉口向李白传达我方意旨。微日李白另一代表刘仲容[6]去南京传达我方更加完全的意旨。张治中[7]等六人和谈代表团与我方代表团谈判已四日，颇有进展。（二）安庆守军限卯灰前撤退，安庆至黄冈线之守军亦限卯灰前撤退完毕，请刘张李即告前线我军将领，将上述二项分别派员径赴守军司令部通知对方，我们的人和对方的人见面时说，奉毛主席命令已与李白代表谈好守军撤退事宜，今后双方以谈判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等的电报。

[2]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司令员。

[3] 林、罗、刘，指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4] 李，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5] 刘仲华，当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6] 刘仲容，当时是李宗仁、白崇禧派往北平的私人代表。

[7] 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

法解决问题，问彼方是否已接到上级命令，如未接到此项命令，要求彼方速即去电询问，不能拖延时间。此项代表交谈，限于桂系人员，勿令蒋系人员知道。（三）黄安[1]、麻城、浠水、武穴等地彼方守军同样撤退，由我军进驻。（四）黄冈、团风[2]（不是阳逻[3]）、仓子埠[4]、黄陂、花园[5]、孝感、汉川、蔡甸[6]、黄陵矶[7]一线及其以南地区，一个月内我军不去进占。宜昌至黄陵矶一线江岸及其以北地区，凡我军已占者一律不动；凡我军未占者一律于一个月内暂不进占，一个月后用谈判方法和平接收。此点请刘张李通知桐柏江汉鄂豫三军区照办。萧陈对桂系守军可酌派适当人员联络，但切勿使蒋系守军知道。对张轸[8]亦可联络。（五）中原局应设法派人秘密至武汉方面与地方绅士及资本家联络，散布和平空气，稳定他们不要逃跑。华东局对江南各地如有门路，亦应如此办理。

军委
卯微

---

[1] 黄安，旧县名，即今湖北省红安县。

[2] 团风，镇名，位于湖北省黄冈县西北。

[3] 阳逻，镇名，位于湖北省新洲县西南。

[4] 仓子埠，今仓埠镇，位于湖北省新洲县西部。

[5] 花园，镇名，位于湖北省孝感市北部。

[6] 蔡甸，镇名，位于湖北省汉阳县北部。

[7] 黄陵矶，镇名，今为湖北省汉阳县县治。

[8] 张轸，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

给周恩来的信[1]

（1949 年 4 月 5 日）

陈赓兵团四月五日由麻城出发，经浠水、广济、黄梅，向宿松、望江前进，限四月十五日以前到达。请再告刘仲容不要忘记到南京后，叫李宗仁速即告白崇禧，将上述各地及安庆守军火速撤退，愈快愈好，至迟不得超过四月十日，否则守军将被歼灭。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主要内容。

复白崇禧电[1]

（1949年4月5日）

（一）支电敬悉。（二）刘仲容先生本日由平飞南京，并转汉口，向李、白二先生转达敝方各项意见。（三）我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谋部部长），因为贵方代表现不在此，而许多事项又需及时通知贵方，以利合作，奉毛主席命直接和先生通讯，倘荷同意，深以为幸。（四）支电所述立场系就贵方利益而言，但就人民利益而言，在贵方全部接受八项和平条件并经双方协力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这些条件的时间内，要求人民解放军停止前进是不合理的，因此是不可能的。白先生历次公开言论，我们均不能同意。（五）但是为着和李、白二先生建立合作关系之目的，敝方愿意立即实行下列各项处置：（甲）安庆及其以西直至黄冈（不含）之贵方部队，请迅即撤退，并限四月十日以前撤退完毕。（乙）黄冈、团风、仓子埠、黄陂、花园、孝感、汉川、蔡甸、黄陵矶一线及其以南地区，包括汉口在内，暂由贵部驻防，维持秩序。该线以北以东各地之贵部，望即向该线撤退。所有撤防各地，不得破坏。该线以西各地，暂维现状。（丙）整个华中问题的处置，听候双方代表团谈判解决。（丁）请通知安庆及花园等处贵部负责人员，如遇敝方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李涛起草的给白崇禧的复电。

线将领派员出来联络，请予接洽，勿生误会。并希各该贵部派员至敝军前线司令部取联络。（戊）以上各点敝方业已通知各该地军事首长遵办，希望白先生亦通知贵部照办，并盼见复。

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

（1949年4月7日）

邓、饶、陈[1]：

（一）长江水势一个月内（四月上旬至五月上旬）是否会有很大的变动，请即查告。

（二）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如果允许他们参加工作，采取何种方式为宜，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议室之类是否适宜，请考虑答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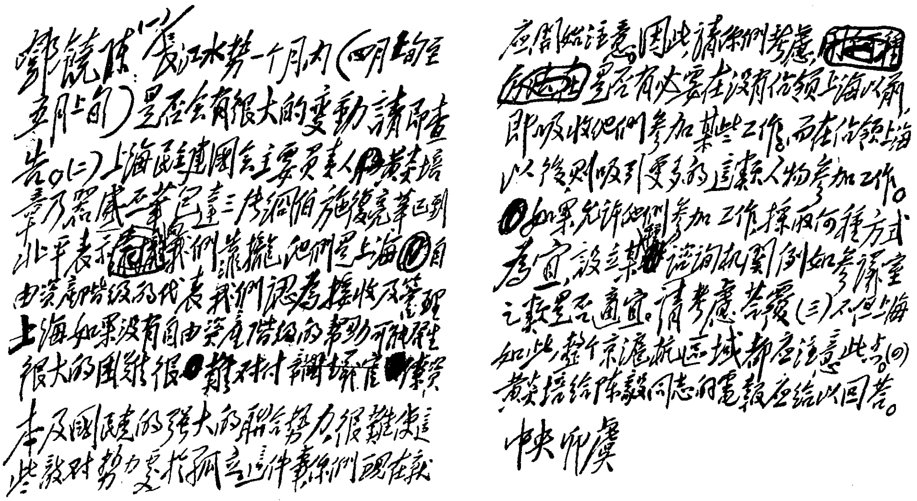
（三）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沪杭区域都应注意此点。

---

[1]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黄炎培给陈毅同志的电报[1]应给以回答。

中央
卯虞



鄧饒陳：（一）長江水勢一个月內（四月上旬至五月上旬）是否会有很大的变動，請即告。（二）上海民主建國会主要负责人黃炎培、章乃器、盛丕華、包達三、[illegible]、施復亮等已到北平表示[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擁護，他們是上海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我們認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沒有自由資產階級的幫助可能發生很大的困難，很難對付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及國民黨的強大的聯合勢力，很難使這些敵對勢力處於孤立。這件事你們現在就应開始注意。因此請你們考慮是否有必要在沒有佔領上海以前即吸收他們參加某些工作，而在佔領上海以後則吸引更多的這類人物參加工作。如果允許他們參加工作，採取何種方式為宜，設立某種諮詢機関例如參議室之類是否適宜，請考慮告覆。（三）不但上海如此，整个京滬杭區域都应注意此点。（四）黃炎培給陳毅同志的電報应給以回答。

中央卯虞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注意吸收自由资产阶级代表参加工作》的手稿。

---

[1] 指黄炎培1949年3月28日给陈毅的电报，其中说：“弟今已抵平，特向兄遥致敬意，握手欢迎，为期不远，珍重珍重。”

为李宗仁电报写的按语

（1949年4月）

李宗仁此电尚有许多阿Q语调，对于自己吹擂，颇饶兴趣，所谓“国共合作”毫无界限，尤使人们感到心头有些作逆，但是在根本上说来，李宗仁在全国人民的督促之下，似乎增长了某些希望和平成功的诚意。是否如此，且看将来。

复李宗仁[1]电

（1949年4月8日）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2]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

[1] 李宗仁，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后任代总统。

[2] 指李宗仁1949年4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李宗仁在电报中称：自“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在日益诡谲的世界风云下，“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9年4月10日）

一、兹制定铁路军运暂行条例，自即日起公布施行。

二、凡属人民解放军所属之野战军及各级军区机关部队及本委员会铁道部所属之铁路总局、铁路管理局、车站必须切实执行本条例，不得违反。

三、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各军事机关，各铁路局以前颁布之军运条例及办法，凡与本条例抵触者一律作废。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十日

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等电[1]

（1949年4月10日）

顷接白崇禧方面来电称：“关于安庆撤退事，暂有困难。因自该地发生战事以来，国防部曾令坚守待援，该地辖京沪区指挥，敝方不便擅令守军撤退。拟请贵方允许，暂留该地勿攻，敝方亦不出击，以待和谈解决。”

安庆既属国防部管辖，白崇禧自不便令撤，请令前线停止对安庆的攻击，以待和谈解决。如安庆畏我派人接洽动摇其军心，你们亦不必派人去联络，彼此暂维现状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并告总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0日）

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2]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2] 卯删，即4月15日。

攻击太原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1]

（1949年4月11日）

徐、周、罗，并告彭[2]：

（一）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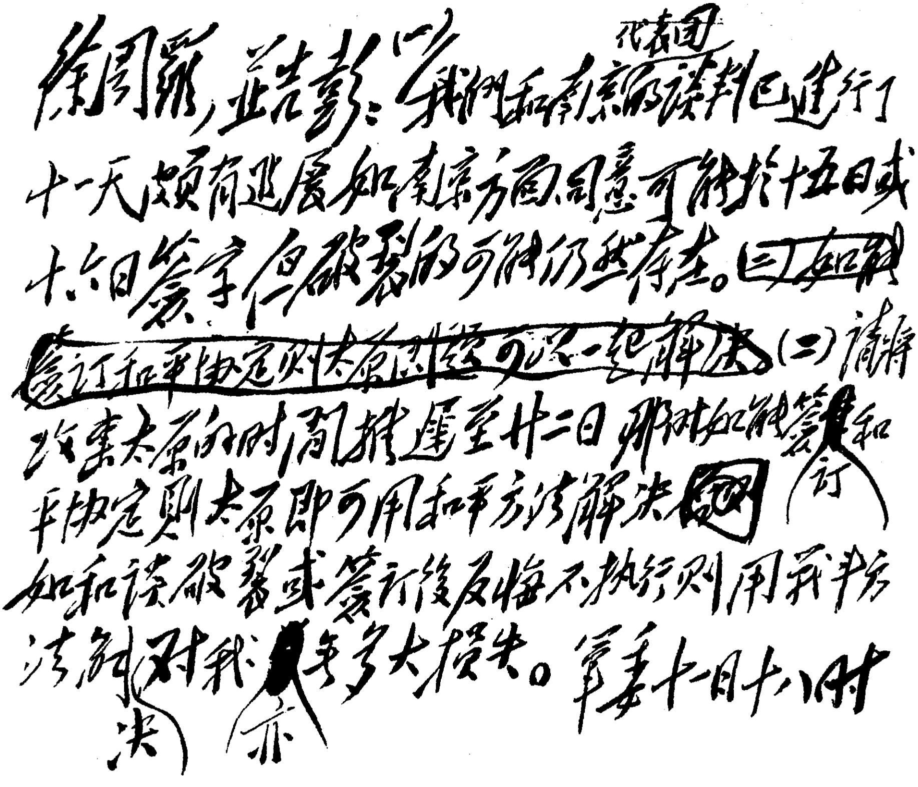
军委

十一日十八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徐周罗，并告彭：（一）我们代表团和南京的谈判已进行了十一天颇有进展如南京方面同意可能于十五日或十六日签字但破裂的可能仍然存在。~~（二）如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问题可一起解决~~（二）请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廿二日那时如能签订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军委 十日十八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攻击太原时间推迟至二十二日》的手稿。

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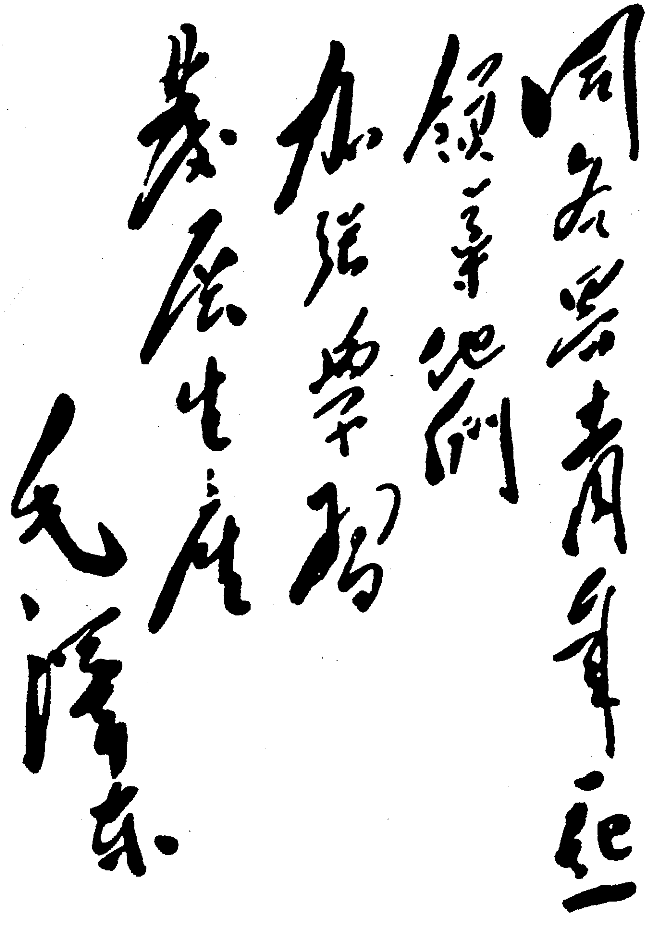
（1949年4月11日）

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

毛泽东

---

[1] 1949年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毛泽东为大会写的题词。



同各界青年一起

领导他们

加强学习

发展生产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题词。

1949年4月，毛泽东在北平香山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949年4月，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4月，毛泽东和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一起。

复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1日）

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9年4月13日）

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十三）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十三日至十七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的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向张治中表示，四月十七日必须决定问题。十八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十四日上午去，十五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于、居、童[2]，不要张群[3]）如愿来平，十五日至迟十六日必须到达，十七日必须举行签字式。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何、白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签，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叫他们全体留平。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邵、章[4]三代表及四个顾问[5]留在北平。今天晚上应举行各党派代表人物（十人）的会议一次。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国共代表团和平谈判进入正式阶段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李、于、居、童，指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

[3] 张群，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

[4] 张、邵、章，指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

[5] 指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屈武、刘仲华、李俊龙、金山。

关于我军渡江时间的考虑

（1949年4月14日）

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

（一）总前委卯文指示电[1]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二）渡江时间仍按四月二十二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四月二十五日（卯有），至迟四月二十七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四月十八日左右才能确定。

（三）昨（十三）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惟南京李、何、白、顾[2]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

---

[1] 指总前委1949年4月12日关于推迟一周渡江诸问题给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各兵团党委的指示电。电报指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所以必须向师以上干部说明推迟渡江的理由及应做的各项准备工作。

[2] 李，指李宗仁，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何，指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顾，指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

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1]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而我军损失，不过推迟七天或十天至多十二天（卯感）的时间。

（四）漱石[2]已到，此间情形他会经常通知总前委。刘晓[3]亦到。饶、刘正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待你们开始渡江时即返部。

军委
卯寒

---

[1] 于右任（1879—1964），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居正（1876—1951），湖北广济（今武穴）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童冠贤（1894—1981），河北宣化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刘晓（1908—1988），湖南辰溪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准备攻占安庆至南通一线北岸敌人据点[1]

（1949年4月14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2]：

（一）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3]）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二）请将除安庆、两浦以外一切北岸据点及中心据点的敌军兵力位置电告。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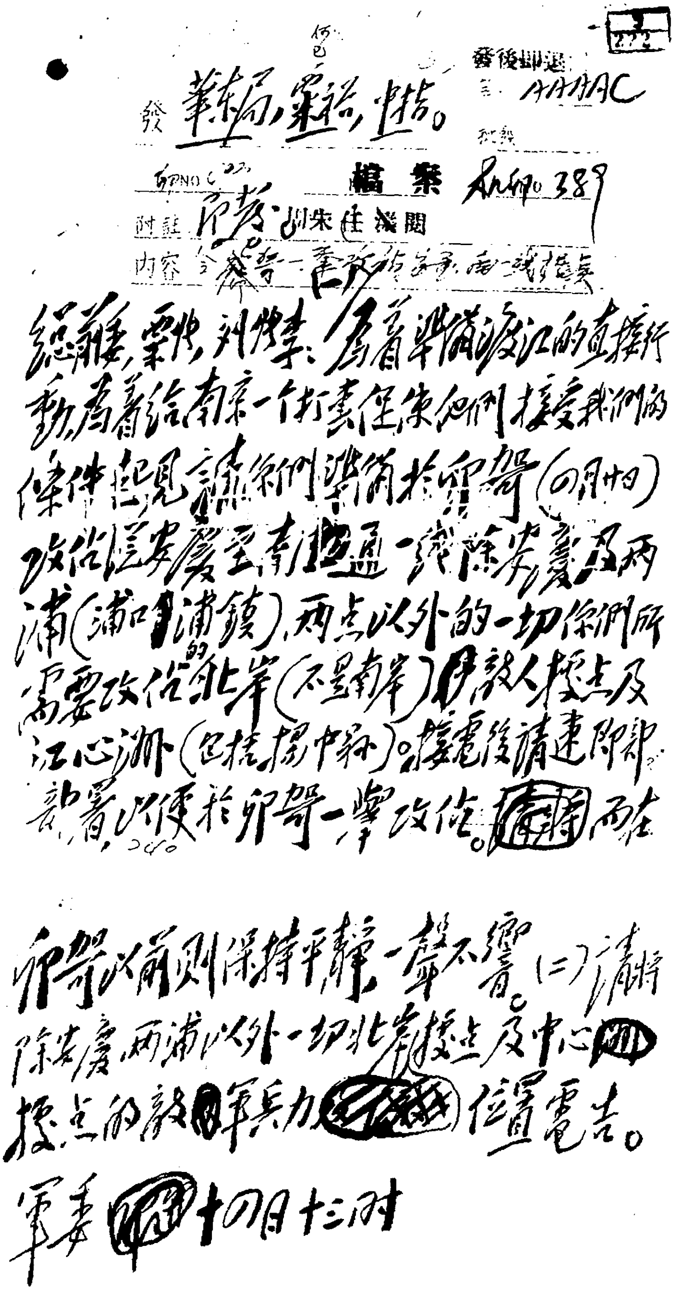
十四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浦口、浦镇，均为镇名，位于江苏南京市西北、长江北岸。



發後即退

發 華東局，粟張，中指。

檔案

附註

總前委，粟張，劉陳李：為着準備渡江的直接行動，為着給南京一个打擊促使他們接受我們的條件起見，請你們準備於卯哿（四月廿日）攻佔沿安慶至南通一綫除安慶及兩浦（浦口浦鎮）兩点以外的一切你們所需要攻佔的北岸（不是南岸）的敵人據点及江心洲（包括揚中縣）。接電後請速即部署以便於卯哿一舉攻佔。而在卯哿以前則保持平靜一聲不響。（二）請將除安慶兩浦以外一切北岸據点及中心洲據点的敵軍兵力位置電告。

軍委 十日十二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渡江战役总前委等电的手稿。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5日）

（一）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二）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十五）日交付南京代表团，彼方明（十六）日派黄绍竑飞宁请示，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三）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15日）

为着充分准备二十二日大举渡江，同意你们迅即攻占永安州，其他各北岸及江心据点亦可早日攻占，不必等到二十号。请总委通知谭震林。

---

[1] 4月15日粟裕、张震电告中央军委：敌人正沿江加强工事，如二十日同时攻占桥头堡，包括扬中县，则二十军必需提前4天攻占永安州，才便于船只入江。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16日）

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2]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2] 卯哿，即4月20日。

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1949年4月16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1]：

（一）总前委删辰电[2]悉。

（二）对敌北岸及江心据点，凡能于一夜夺取又利于夺取后第二夜即南渡者，则于渡江前一夜夺取之；凡不能于一夜夺取，又于夺取后需要较多时间做准备工作方利于南渡者，则应提前夺取之，望按实情处理。

（三）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已于昨（十五）夜提交张治中代表团，

---

[1]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张，指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2] 指总前委1949年4月15日辰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谭震林的电报。电报说：我们意见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故主张4月20日行动，对江北岸和江中敌据点，凡能一夜夺取者，则一夜夺取之，不能一夜夺取者，应留置之，用二三天时间夺取。今后军事行动，以在开动后能持续进行为更有利。

今（十六）日上午黄绍竑[1]飞南京请示。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卯哿[2]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

（四）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五）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3]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如何，请考虑电复。并将近日渡江准备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全军渡江等项见告为盼。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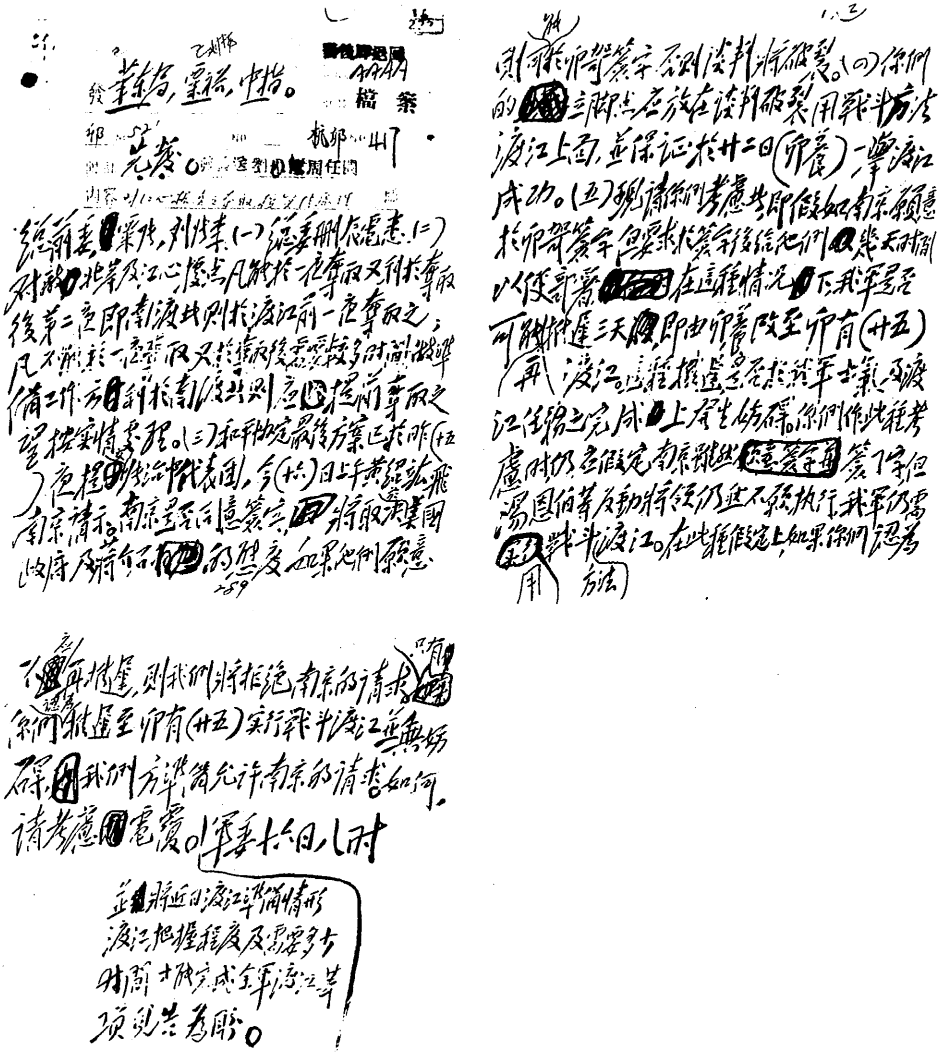
十六日八时

---

[1] 黄绍竑，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

[2] 卯哿，即4月20日。

[3] 汤恩伯（1900—1954），浙江武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發 華東局，粟譚，中指。

檔案

卯 52　　機卯 417

附註 先發。

總前委，粟張，劉陳：（一）總委刪（十五）電悉。（二）對敵北岸及江心據點，凡能於一夜奪取又利於奪取後第二夜即南渡者，則於渡江前一夜奪取之；凡不能於一夜奪取又於奪取後需要較多時間進行準備工作者，則於南渡以後奪取之，望按實情處理。（三）和平協定最後方案已於昨（十五）日提交南京代表團，今（十六）日上午黃紹竑飛南京請示。南京是否同意簽字，將取決於美國政府及蔣介石的態度。如果他們願意，則南京將於卯哿簽字，否則談判將破裂。（四）你們的立腳點應放在談判破裂用戰斗方法渡江上面，並保證於廿二日（卯養）一舉渡江成功。（五）現請你們考慮如下假如南京願意於卯哿簽字，但要求於簽字後給他們幾天時間以便部署，在這種情況下我軍是否可能推遲三天，即由卯養改至卯有（廿五）再渡江。這種推遲是否於我軍士氣及渡江任務之完成上發生妨礙。你們作此種考慮時，仍應假定南京雖然簽了字，但湯恩伯等反動將領仍然不願執行，我軍仍需用戰斗方法渡江。在此種假定上，如果你們認為不應再推遲，則我們將拒絕南京的請求；只有你們認為推遲至卯有（廿五）實行戰斗渡江並無妨礙，我們方準備允許南京的請求。如何，請考慮電復。軍委 十六日八時

並將近日渡江準備情形，渡江把握程度及需要多少時間才能完成全軍渡江等項見告為盼。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渡江战役总前委等电的手稿。

可在任何有利时间攻打太原[1]

（1949年4月17日）

徐、周、罗：

四月十四日电[2]悉。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军委

十七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的电报。

[2] 1949年4月14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致电军委，电文如下："1. 自赵承绶、曹近合与赵恭所派之杜某会面后，敌方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们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现据内线关系出来谈，敌方宣传北平国共和谈已得协议，汉口、京沪国共双方共管，太原敌军由孙楚率领开西安（由我方让出一条路），西北实业公司则有准备交代之说。又今日敌太原广播，其社论仍宣传其坚强意志，奋斗到底之方针。近日调整其部队，加强战备中。2. 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仓库区敌仍固守阵地（城东）。我军作成六条坑道，其中有一条已为敌挖通破坏，估计敌可能发觉，现我正在设法防范。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乘胜攻城，把握是较大的。3. 太原之敌，在我围歼外围敌几个师以后，则可能容易就范。如十六日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时间如何？请示。"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必须争取渡江一举成功[1]

（1949年4月17日）

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2]：

删戌电[3]悉。谈判至十五日（卯删）已告一段落。十六日至二十日（卯哿）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我们铣辰电[4]问你们是否可以由二十二日渡江改为二十五日渡江，是假定南京同意签字，并且假定二十日确实签了字而要求我方给以几天部署时间而说的，并非一定要改至二十五日。南京是否同意于二十日签字，决定于美国及蒋介石的态度，因此把握不大。南京方面认为我军渡江有很大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的电报。

[2]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4月15日戌时总前委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南京至安庆段各点，除金河口、小黄洲、江心洲等因守敌兵力集中，须费时三天以上才能夺取外，其余均可于4月20日一夜或二天便全部夺取。敌江防西段较弱，故突破较易。东段敌较集中，必须准备连续恶战数日，方能突破立足。对4月20日行动，是正式渡江作战之开始，抑或仅做到夺取江北桥头堡后，当需停顿一下，均请能于18日先期再加指示。

[4] 即《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

难，他们不相信我军能够大举渡江。我们估计他们二十日以前可能不理我们，要看一下我军能否于二十日以后真能渡江。假如我军真能于二十二日（卯养）渡江成功，则协定仍可能于二十三、四、五等日签订。故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二十二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军委

十七日三时

南京方面和平协定须于二十日前表态[1]

（1949年4月17日）

【新华社北平十七日电】今日为和平谈判的第十七天。四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代表团经过频繁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拟定了国内和平协议草案。十三日，双方代表在故宫举行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说明了中共的立场和协议草案的理由，南京代表团对协议草案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和意见。十五日，双方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中共代表团将最后修正草案交付南京代表团。协议全文为八条二十四款，不但采纳了南京代表团方面的意见，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亦从旁积极提供了意见。中共代表团于十五日的双方会议上宣布：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限期，南京代表是否愿意于协定上签字，须于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四月二十日为签字日期。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南京代表团派遣黄绍竑代表及屈武顾问飞南京，向南京政府请示，现正等候南京的答复。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

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1]

（1949年4月18日）

总前委，粟、张，刘、张、李，谭震林[2]（总委转）：

（一）总前委篠子篠未两电，粟张篠午电，刘张李篠戌电均已收到阅悉。（二）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须的，我们早已同意了。（三）总前委主张待渡江任务完成后，以陈谢三兵团[3]出徽州[4]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等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谭震林，当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

[3] 陈谢三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

[4] 徽州，旧府名，府治即今安徽歙县。

沿浙赣公路东进；以宋郭九兵团[1]监视芜湖、南京，主力位于南京以南；以陈赓四兵团[2]接替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南京；王谭七兵团[3]、杨苏五兵团[4]的任务照原规定不变等项，我们认为目前可以照此预拟施行。待粟张方面渡江后所遇敌情变化明了以后，如须有所变更，再按情况临时改变。（四）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中央军委

四月十八日九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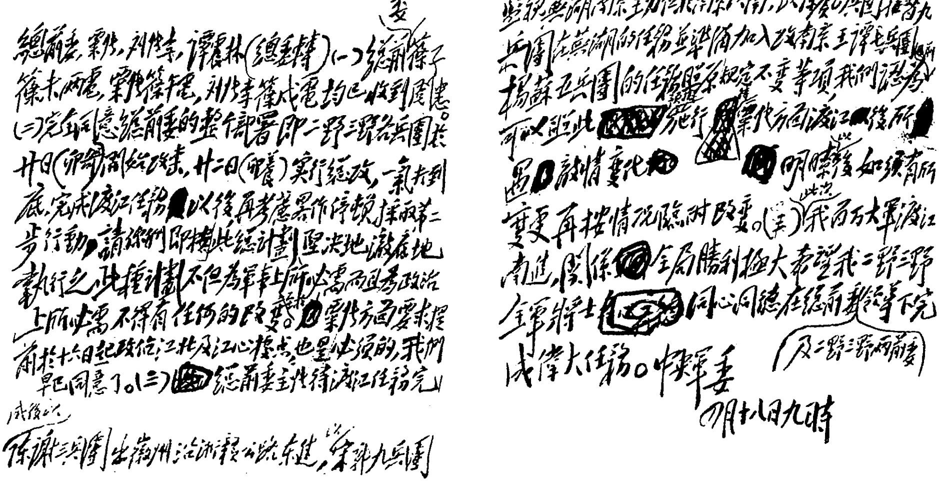
---

[1] 宋郭九兵团，指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

[2] 陈赓四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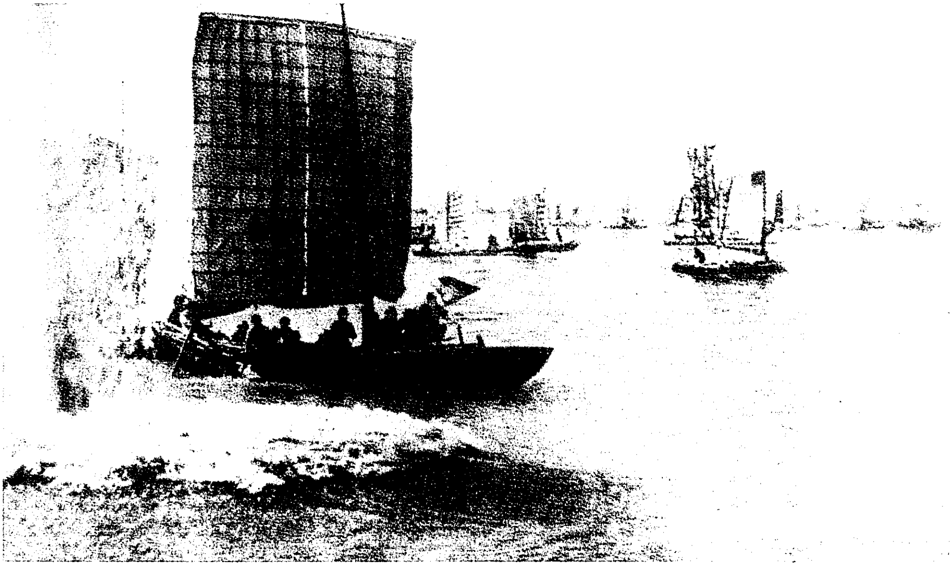
[3] 王谭七兵团，指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

[4] 杨苏五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


總前委，粟張，劉陳李，譚震林（總委轉）（一）總前委筱子、筱未兩電，粟張筱午電，劉陳李筱戌電均已收到閱悉。（二）完全同意總前委的整個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團於廿日（卯哿）開始攻擊，廿二日（卯養）實行總攻，一氣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務，以後再考慮略作停頓，採取第二步行動。請你們即按此總計劃堅決地澈底地執行之。此種計劃不但為軍事上所必需，而且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變。粟張方面要求提前於十六日起攻佔江北及江心據點，也是必須的，我們早已同意了。（三）總前委主張待渡江任務完成後以陳謝三兵團出徽州沿浙贛路東進，以宋郭九兵團監視蕪湖南京，主力位於南京以南，以陳唐四兵團接替九兵團在蕪湖的任務並準備加入攻南京，王譚七兵團、楊蘇五兵團的任務照原規定不變等項，我們認為可以照此施行。粟張方面渡江以後所遇敵情變化，明曉後如須有所變更，再按情況臨時改變。（四）此次我百萬大軍渡江南進，關係全局勝利極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軍將士同心同德，在總前委及二野三野兩前委領導下完成偉大任務。中央軍委

四月十八日九時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的手稿。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日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强渡长江天堑。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

（1949年4月21日）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2]。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负责人员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首蒋介石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官兵和国民党政府的工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各项问题亦无不是从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宜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用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以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

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

[1] 这个命令是毛泽东起草的。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这个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20日夜起，至21日，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接着，又分路向南挺进，于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5

月27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7月，开始进军福建。8月17日解放福州，10月17日解放厦门。林彪、罗荣桓等领导的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100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5月16、17两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湖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8月4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9、10月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军。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的华北各兵团，4月24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5月20日解放西安之后，同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8月26日攻克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9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领导的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11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12月下旬，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军，27日解放成都。到1949年12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2]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经过半个月谈判，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4月20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全文如下：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国政府帮助之下，违背人民意志，破坏停战协定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名义之下，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国内战争。此项战争，至今已达两年又九个半月之久。全国人民，因此蒙受了极大的灾难。国家财力物力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国家主权亦遭受了新的损害。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立场，违背孙中山先生的联俄、

联共及扶助农工等项正确的政策，以及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临终遗嘱，历来表示不满。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此次空前规模的国内战争以及由此而采取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外交等项错误的政策及措施，尤其表示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中业已完全丧失信任。而在此次国内战争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业已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所战败。基于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一日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停止国内战争恢复和平状态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曾于同年一月十四日发表声明，同意南京国民政府上项提议，并提议以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卖国条约，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等八项条件为双方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此八项基础条件已为南京国民政府所同意。因此，中国共产党方面和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派遣自己的代表团，授以举行谈判和签订协定的全权。双方代表于北平集会，首先确认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于此次国内战争及其各项错误政策担负全部责任，并同意成立本协定。

第一条

第一款　为着分清是非，判明责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双方（以下简称双方）确认，对于发动及执行此次国内战争应负责任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战争罪犯，原则上必须予以惩办，但得依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第一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

第二项　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凡属怙恶不悛，阻碍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不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或竟策动叛乱者，应予从严惩办。其率队叛乱者，应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予以讨平。

第二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冈村宁次大将宣告无罪释放，复于同年一月三十一日允许其他日本战犯二百六十名送返日本等项处置，是错误的。此项日本战犯，一

俟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即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新的中央政府成立，即应从新处理。

第二条

第三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应予废除。

第四款　《中华民国宪法》废除后，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应依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的决议处理之。

第三条

第五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法统，应予废除。

第六款　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及在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应即建立人民的民主的法统，并废止一切反动法令。

第四条

第七款　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切陆军、海军、空军、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地方部队，一切军事机关、学校、工厂及后方勤务机构等），均应依照民主原则实行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应立即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负责此项改编工作。整编委员会委员为七人至九人，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四人至五人，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三人至四人，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派出之委员一人为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派出之委员一人为副主任。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得依需要，设立区域性的整编委员会分会。此项分会双方人数的比例及主任副主任的分担，同于全国性的整编委员会。海军及空军的改编，应各设一个整编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向南京国民政府现时所辖地区开进和接收的一切事宜，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命令规定之。人民解放军开进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不得抵抗。

第八款　双方同意每一区域的改编计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项　第一阶段，为集中整理阶段。

第一点：凡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一切武装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宪兵、交通警察总队及地方部队等）均应集中整理。整理原则，应由整编委员会根据各区实况，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的地区，按照其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命令其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其驻在的大小城市，交通

要道，河流海港及乡村，当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前，应负责维持当地秩序，防止任何破坏事件发生。

第三点：在上述地区，当人民解放军到达和接收时，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根据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实行和平移交，开赴指定地点。在开赴指定地点的行进中及到达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应严格遵守纪律，不得破坏地方秩序。

第四点：在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武装部队遵照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的命令离开原驻地时，原在当地驻守的地方警察或保安部队不得撤走，并应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和命令。

第五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开动与集中期间，其粮秣被服及其他军需供给，统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和地方政府负责解决。

第六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军事机关（从国防部直到联合后方勤务总司令部所属的机关、学校、工厂、仓库等），一切军事设备（军港、要塞、空军基地等）及一切军用物资，应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根据各区实况，命令其分区分期移交给人民解放军及其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

第二项　第二阶段，为分区改编阶段。

第一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陆军部队（步兵部队，骑兵部队，特种兵部队，宪兵部队，交通警察部队及地方部队），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整编委员会应根据各区实况，制出分区改编计划，定期实施。改编原则，应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和正规编制，将经过集中整理的上述全部陆军部队编成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其士兵中老弱残废，经查验属实，确须退伍，并自愿退伍者，其官佐中自愿退役或转业者，均由整编委员会及其分会负责处理，给以回家的便利和生活的安置，务使各得其所，不致生活无着，发生不良行为。

第二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海军空军，在分区分期开赴指定地点集中整理后，即按原番号，原编制，原人数，由海军空军整编委员会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民主制度，加以改编。

第三点：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部队，在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应严格遵守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忠实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不得违犯。

第四点：在改编后，退伍官兵应尊重当地人民政府，遵守人民政府法令。地方人民政府及当地人民，亦应对退伍官兵给以照顾，不得歧视。

第九款　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一切武装力量，于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不得再行征募兵员。对其所有武器、弹药及一切装备，一切军事机关设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均须负责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藏匿、转移或出卖的行为。

第十款　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属任何武装力量，如有对改编计划抗不执行者，南京国民政府应协助人民解放军强制执行，以保证改编计划的彻底实施。

第五条

第十一款　双方同意，凡属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依仗政治特权及豪门势力而获得或侵占的官僚资本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船舶、公司、商店等）及财产，应没收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应负责监督第十一款所述官僚资本的企业和财产不许逃匿，或破坏，或转移户头，暗中出卖。其已经迁移者，应命其就地冻结，不许继续迁移，或逃往国外，或加以破坏。官僚资本的企业及财产在国外者，应宣布为国家所有。

第十三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第十一款所指的官僚资本企业和财产，即应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或民主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实行没收。其中，如有私人股份，应加清理，经证实确为私人股份并非由官僚资本暗中转移者，应予承认，并许其有留股或退股之自由。

第十四款　凡官僚资本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前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而为不大的企业且与国计民生无害者，不予没收。但其中若干人物，由于犯罪行为，例如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而为人民告发并审查属实者，仍应没收其企业及财产。

第十五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城市，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省、市、县政府应负责保护当地的人民民主力量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六条

第十六款　双方确认，全中国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有步骤地实行改革。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后，一般地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

第十七款　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所属的

地方政府应负责保护农民群众的组织及其活动，不得压抑或破坏。

第七条

第十八款　双方同意，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所订立的一切外交条约、协定及其他公开的或秘密的外交文件及档案，均应由南京国民政府交给民主联合政府，并由民主联合政府予以审查。其中，凡对于中国人民及国家不利，尤其是有出卖国家权利的性质者，应分别情形，予以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第八条

第十九款　双方同意，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其院、部、会等项机构，应暂行使职权，但必须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并协助人民解放军办理各地的接收和移交事项。待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即向民主联合政府移交，并宣告自己的结束。

第二十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各级地方政府与其所属一切机构举行移交时，人民解放军、各地人民政府及中国民主联合政府必须注意吸收其工作人员中一切爱国分子及有用人材，给以民主教育，并任用于适当的工作岗位，不使流离失所。

第二十一款　南京国民政府及其所属各省、市、县地方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和接收以前，应负责维持当地治安，保管及保护一切政府机关、国家企业（包括银行、工厂、矿山、铁路、邮电、飞机、船舶、公司、仓库及一切交通设备等）及各种属于国家的动产不动产，不许有任何破坏、损失、迁移、藏匿或出卖。其已经迁移或藏匿的图书档案，古物珍宝，金银外钞及一切产业资财，均应立即冻结，听候接收。其已经送往外国或原在外国者，应由南京国民政府负责收回或保管，准备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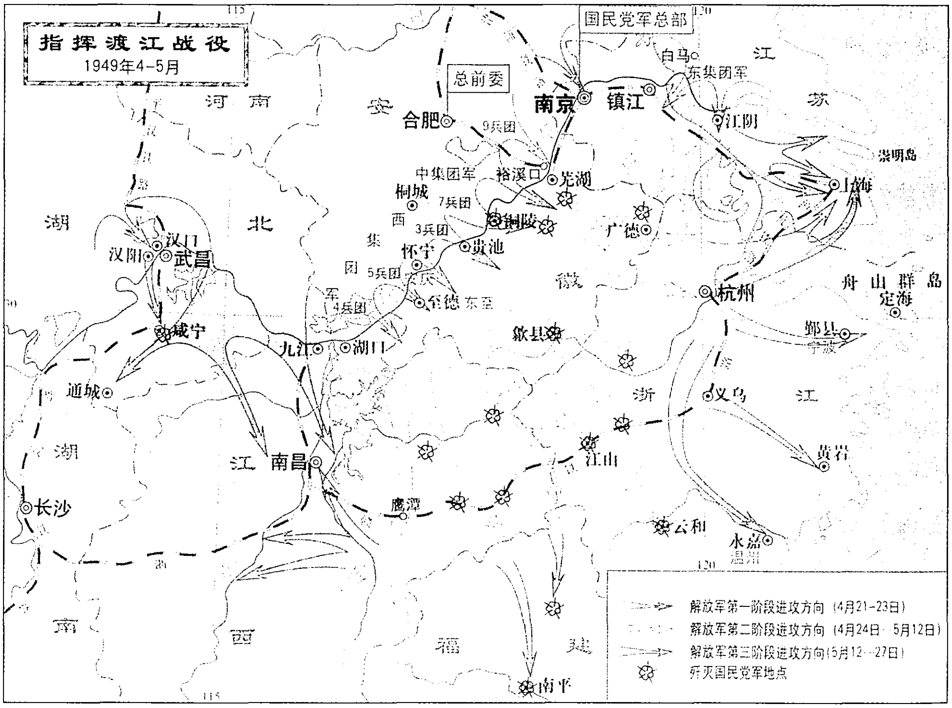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款　在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和接收的地区，即应经由当地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地方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委任的机构，接收地方的一切权力及国家产业财富。

第二十三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签字于国内和平协定并由南京国民政府付诸实施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提议：南京国民政府得派遣爱国分子若干人为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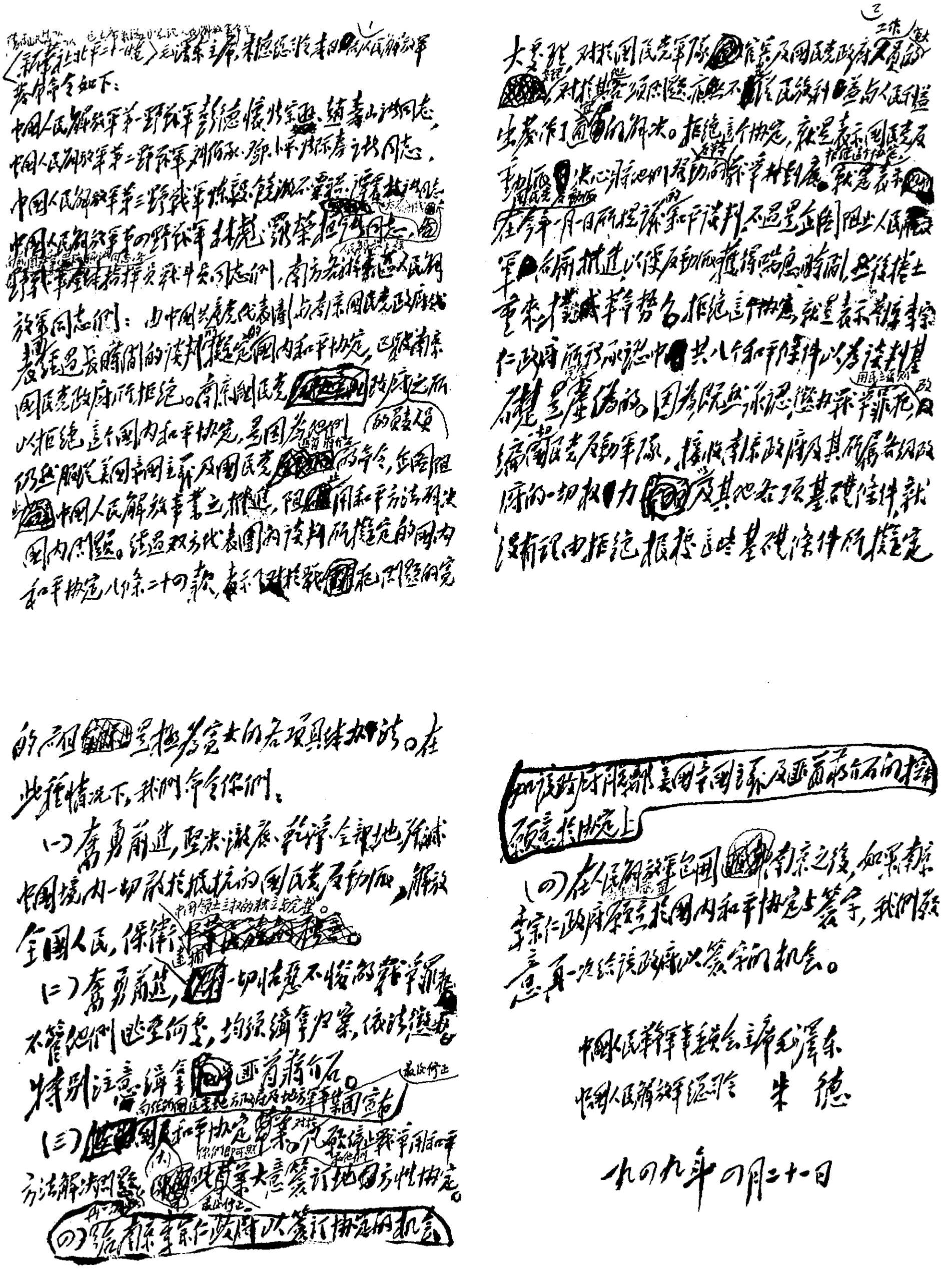
会议；在取得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批准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可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第二十四款 在南京国民政府业已派遣代表出席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负责向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议：在民主联合政府中应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方面的若干爱国分子，以利合作。

双方代表团声明：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我们特负责签订本协定，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完满地实现本协定而奋斗。本协定于签字后立即生效。


指挥渡江战役
1949年4-5月
总前委
国民党军总部
河南
安
湖北
湖南
江西
福建
徽
江苏
浙江
合肥
南京
镇江
白马
东集团军
江阴
崇明岛
上海
9兵团
中集团军
裕溪口
芜湖
桐城
7兵团
西集团军
3兵团
铜陵
贵池
怀宁
5兵团
安庆
4兵团
至德
东至
广德
汉门
汉阳
武昌
咸宁
九江
湖口
歙县
杭州
舟山群岛
定海
鄞县
宁波
义乌
黄岩
通城
南昌
长沙
鹰潭
江山
云和
永嘉
温州
南平
115
120
30
解放军第一阶段进攻方向（4月21-23日）
解放军第二阶段进攻方向（4月24日-5月12日）
解放军第三阶段进攻方向（5月12-27日）
歼灭国民党军地点

渡江战役示意图。



〈新华社北平二十一日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本日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命令如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illegible]同志，
[illegible]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南京国民党[illegible]政府之所以拒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因为他们仍然服从美国帝国主义及国民党[illegible]的命令，企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阻止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经过双方代表团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表示了对于战犯问题的宽大处理，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及国民党政府人员的宽大处理，对于其他问题亦都本着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出发作了适当的解决。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虚伪的。因为既然承认惩办战争罪犯，改编国民党反动军队，接收南京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及其他各项基础条件，就没有理由拒绝根据这些基础条件所拟定的而且是极为宽大的各项具体办法。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愿意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签订地方性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後，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愿意于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起草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手稿。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21日）

你们所说的外舰可能是国民党伪装的，亦可能是真的，不管真假，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并应一律当作国民党兵舰去对付。

---

[1] 4月21日，粟裕、张震致中共中央军委电，报告20日午两艘外国军舰侵入扬州东南的三江营口岸第三野战军防区，一被击沉，一被击伤。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张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22日）

（一）兹将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来函一件转给你们；（二）英国人要求我军对于英舰两艘营救被击损之英舰（紫石英号）船员一事予以便利，我们意见在英舰不妨碍我军渡江作战的条件下，可予以营救之便利；（三）对于英国人要求该二舰于营救事务完毕后，仍须开往南京护侨一事不能同意，应令该二英舰向下游开去。但如该二英舰不听劝告，仍开南京，只要不向我军开炮及不妨碍我军渡江，你们也不要攻击他们。

---

[1] 22日，从英国驻北平总领事包士敦给朱德总司令的信中获悉侵入长江人民解放军防地的均为英国军舰后，毛泽东于3时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这是该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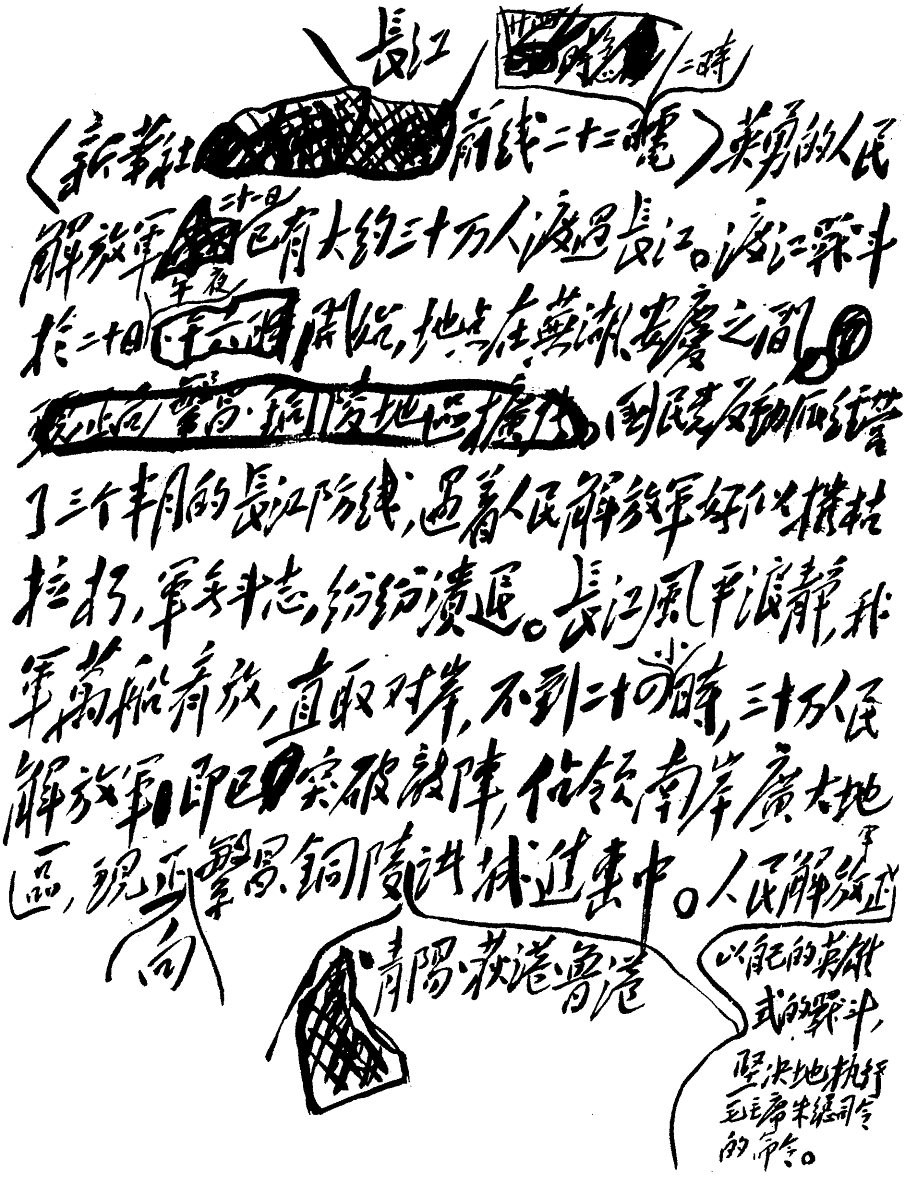
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1]

（1949年4月22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时电】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



〈新華社[redacted]長江前线二十二日二時電〉英勇的人民解放軍[redacted]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過長江。渡江戰斗於二十日午夜~~子六時~~開始，地点在蕪湖安慶之間。~~現正向繁昌、銅陵地區擴進~~國民党反動派經營了三个半月的長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軍好似摧枯拉朽，軍無斗志，纷纷潰退。長江風平浪靜，我軍萬船齊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時，三十万人民解放軍即已突破敵陣，佔領南岸廣大地區，現正向繁昌、銅陵、青陽、荻港、魯港扩進中。人民解放軍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戰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命令。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的手稿。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1]

（1949年4月22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二时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不含），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二十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地区，二十四小时内即已渡过三十万人。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三十五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二十三日可渡完。这一路现已占领贵池、殷家汇、东流、至德[2]、彭泽之线的广大南岸阵地，正向南扩展中。和中路军所遇敌情一样，我西路军当面之敌亦纷纷溃退，毫无斗志，我军所遇之抵抗，甚为微弱。此种情况，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锐不可当；另一方面，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和平协定，有很大关系。国民党的广大官兵一致希望和平，不想再打了，听见南京拒绝和平，都很泄气。战犯汤恩伯[3]二十一日到芜湖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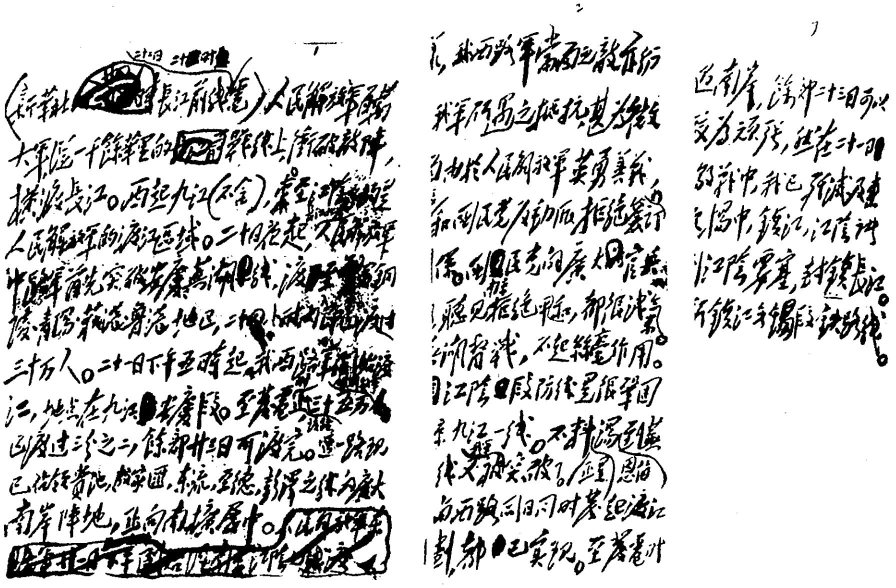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在194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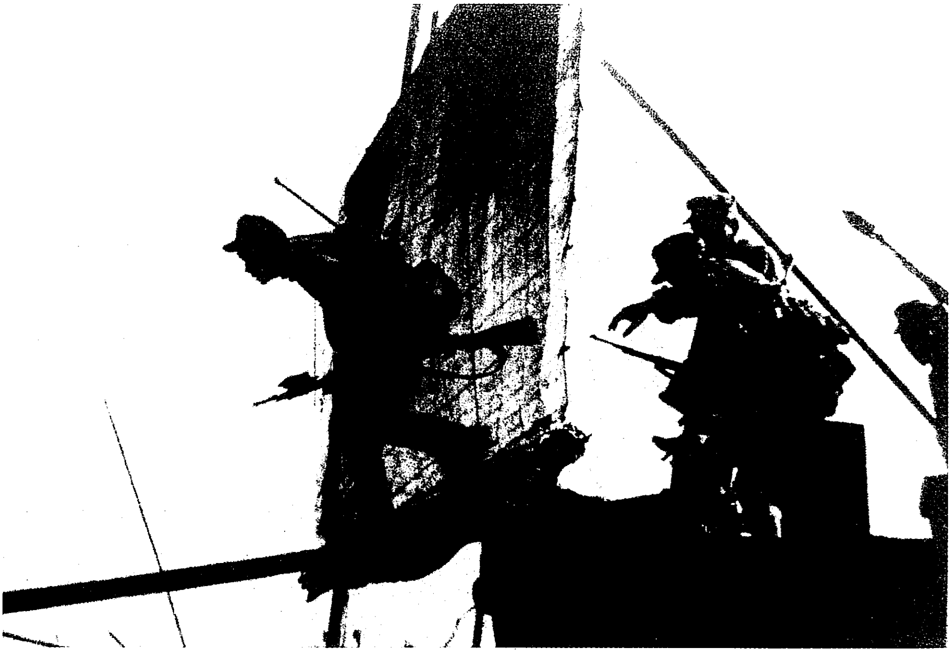
[2] 东流、至德，1959年合并为安徽东至县。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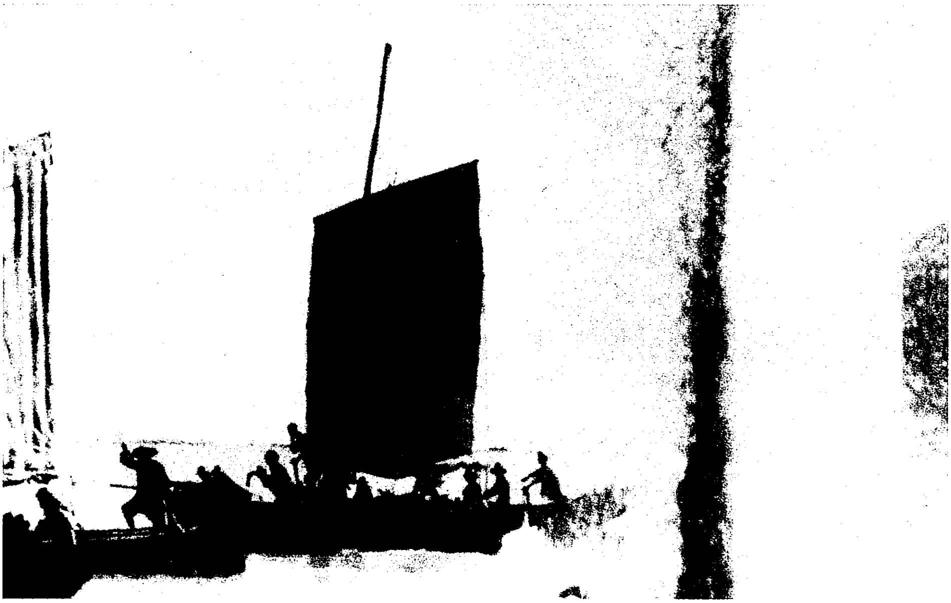
江阴段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于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军突破了。我东路三十五万大军与西路同日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时止，我东路各军已大部渡过南岸，余部二十三日可以渡完。此处敌军抵抗较为顽强，然在二十一日下午至二十二日下午的整天激战中，我已歼灭及击溃一切抵抗之敌，占领扬中、镇江、江阴诸县的广大地区，并控制江阴要塞，封锁长江。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线。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的手稿。



1949年4月，解放军突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



1949年4月，百万雄师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长江。

人民解放军战胜
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的联合进攻[1]

（1949年4月22日）

【新华社长江前线二十二日二十四时电】在镇江江阴段的渡江作战中，人民解放军曾于二十日及二十一日战胜英国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大队军舰的联合进攻，这件事值得全国人民极大注意。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二十日我军攻击北岸敌桥头据点及江中许多洲岛，准备大举渡江的时候，除和国民党陆军作战外，还要和国民党的海军作战。二十日上午，有两艘敌舰由东向西开来，向我泰兴县西北扬中县正北名叫口岸的北岸桥头阵地发炮，其目的是阻我向中心洲进攻及展开船只渡江。我军炮兵当即奋勇还击，敌舰一艘被毁，不久下沉。另一艘负伤，向西驶至镇江附近大部下沉。此时又有一艘敌舰从镇江方面向东开进，至口岸附近向我阵地发炮，我再还击，又将该舰击伤，该舰后向下游驶去。二十一日上午，又由东面来了两舰，一大一小。此时我即首先发炮，使其不敢迫近，又将该两舰击伤，狼狈向来路江阴方面逃去。由于这一次向敌舰作战胜利，方才将敌舰阻我渡江之计划打破，二十一日下午方得大举渡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述评新闻。4月30日，毛泽东又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阐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江。当我军和上述五艘敌舰作战时，江中尚泊有几艘敌舰和上述五舰相距不远，亦参加战斗，唯畏我炮火，不甚积极。直到二十一日夜间，我军还以为上述各舰都是国民党的军舰。到了二十二日，从各方面收集情报，方才知道上述诸舰中，竟有四艘是英国军舰。四艘英舰中，有三艘在战败后向江阴以东逃去，大概是逃往上海。另一艘英舰现搁浅于镇江附近不远的江中，要待我军占领镇江后才能将详细情形查清楚。在和上述诸舰作战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伤亡二百五十二人，阵地及武器被毁一部。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直接参加中国内战，致使人民解放军遭受巨大损失，英帝国主义政府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国民党反动派历来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同胞，现当日暮途穷之际，又复勾结英帝国主义的大队海军深入长江，图阻人民解放军渡江，此种卖国残民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4月23日）

英舰事件，现已震动世界各地。英美报纸，均以头条新闻揭载。请粟、张加强江阴方面的炮火封锁，一则使国民党军舰不能东逃。二则使可能再来之英舰不能西犯，如敢来犯，则打击之。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对英舰事件的处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等电[1]

（1949年4月23日）

大同敌应由你们负责去解决，如果解决太原不需要你们全部兵力，可以派一个军先出发包围大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华北局电的主要内容。杨成武、唐延杰、李天焕，当时分别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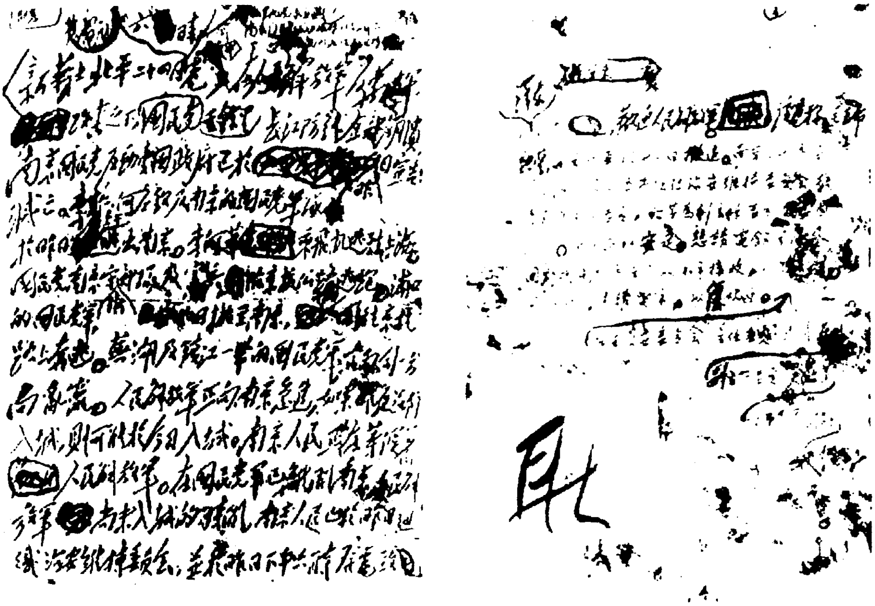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

（1949年4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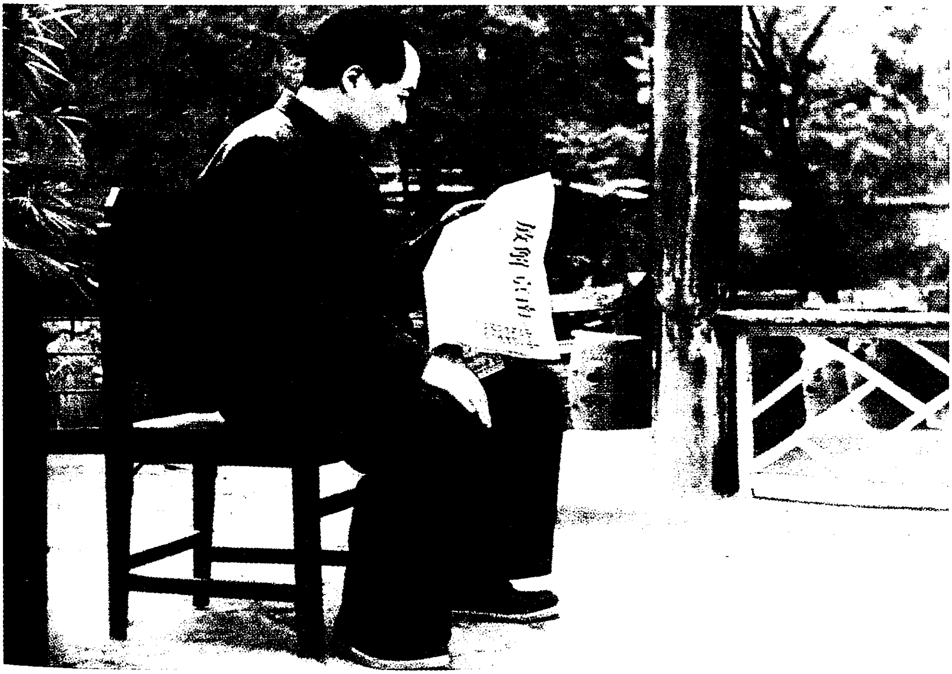
【新华社北平二十四日六时电】在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攻击之下，千余里国民党长江防线全部崩溃，南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已于昨日宣告灭亡。李宗仁、何应钦及南京的国民党军队于昨日上午逃出南京。李、何等乘飞机逃往上海。国民党南京守卫部队及宪兵，沿京杭公路逃跑。浦口的国民党军，于二十二日撤至南京，二十三日一同往京杭路上奔逃。芜湖及镇江一带的国民党军，亦向同一方向乱窜。人民解放军正向南京急进，如果昨夜没有入城，则可能于今日入城。南京人民正在等候着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军已离开南京，人民解放军尚未入城的时间，南京人民已于昨日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并于昨日下午六时发电致毛泽东主席，欢迎人民解放军。该电称，毛主席勋鉴：南京守军于二十三日撤退。南京人民为安全计，联合发起各界组织治安维持委员会，推青苑为主任委员，贻芳为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十三人。地方尚称安定。恳请电饬京陵外围野战军，对南京予以和平接收，以慰民望。何日入城，并请电示，以便欢迎。南京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委员马青苑，副主任委员吴贻芳及委员等同叩梗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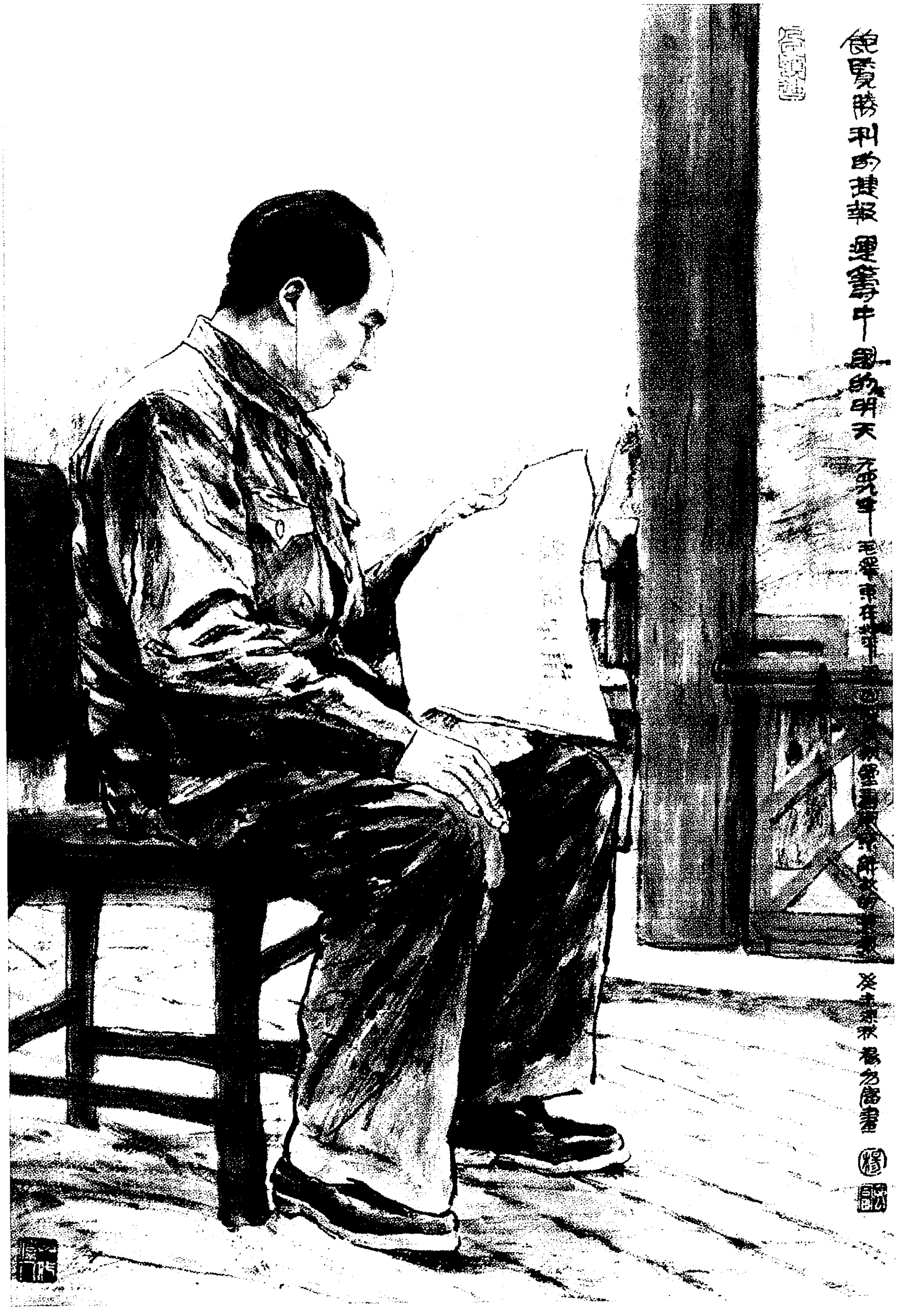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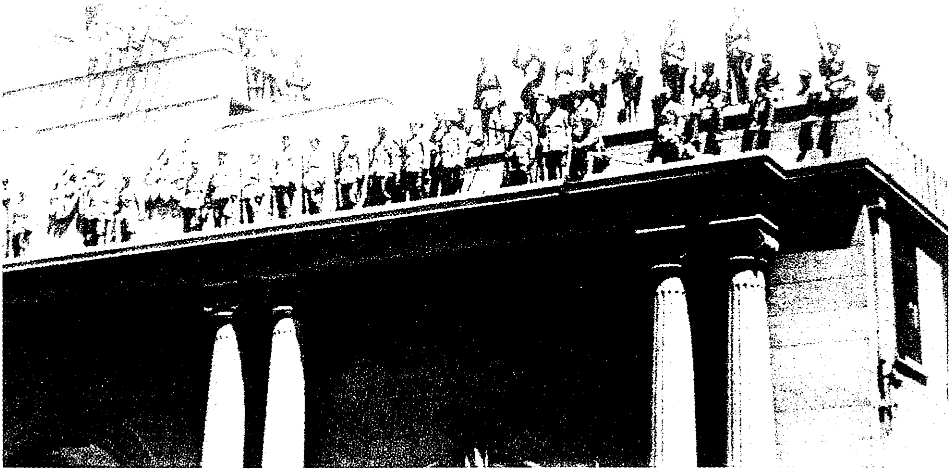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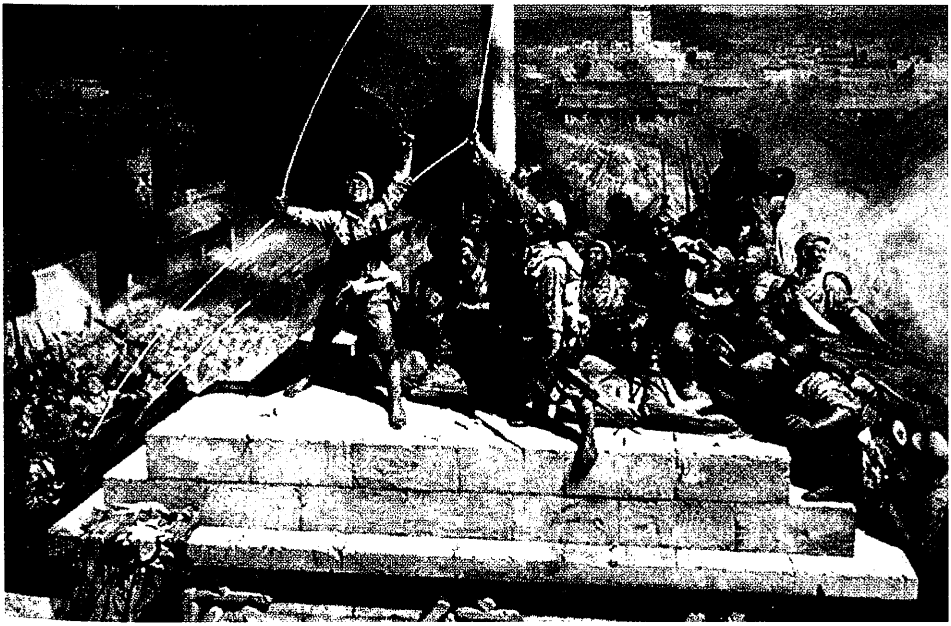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捷报。


饱览胜利的捷报 运筹中国的明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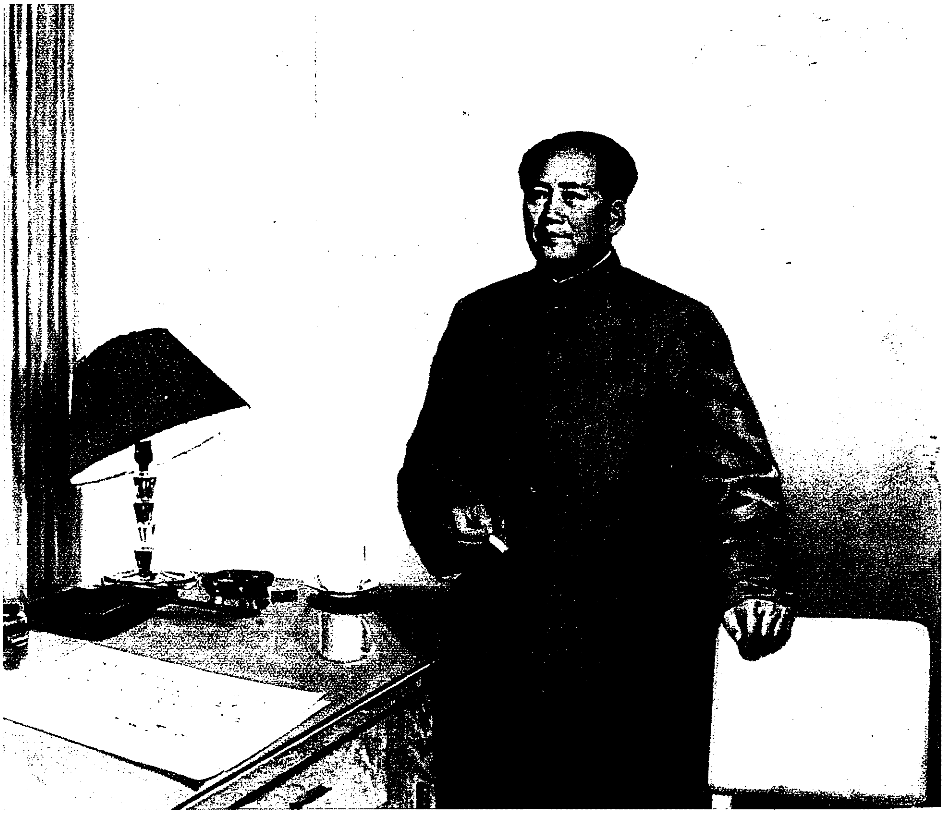
《饱览胜利的捷报　运筹中国的明天》（中国画）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红旗插上“中华民国总统府”，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灭亡。



《占领总统府》（油画）



《伟大的统帅指方向》（油画）

第十八第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1]

（1949年4月25日）

徐、周、罗，并告彭[2]：

卯敬两电[3]悉。（一）同意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4]四人为战犯，缉拿治罪。（二）二十兵团（全部）应尽可能迅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和第十九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电报的节录。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4月24日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两份电报。电报说："太原解放前受阎匪残害之惨，实属骇人听闻。而以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为首，对我十数次之宽大劝告、警告与通牒，不仅只字不理，反而烧毁民房，工厂，破坏财物，施放毒气，挣扎至最后。为泄民愤以警告敌人，我们拟公开宣布该四人为战犯，并令部队严予缉拿，并拟于该四犯就擒后，有计划地公布其罪状，发动人民控诉，然后召开庆祝太原解放与公审战犯大会，予以公审正法。"电报还说："1. 太原作战已结束。三个兵团之整训时间、行动任务及指挥关系，请军委确定见示。2. 我们拟于28日召开总前委会，总结太原作战，讨论部队整训及行动准备工作。"

[4] 梁化之，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特警处处长。孙楚，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戴炳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军长。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离太原去南京后，将防守太原的指挥权交给孙楚、王靖国和梁化之等人。

开平绥线[1]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整训。（三）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军委
卯有

---

[1] 平绥线，指北平（今北京）至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的铁路，即今京包线。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1949年4月25日）

国民党反动派业已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恶的战争立场。全国人民希望人民解放军迅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军队，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协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各界人民，不分阶级、信仰和职业，均望保持秩序，采取和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则采取和各界人民合作的态度。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

（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凡属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不受侵犯。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

（三）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其中，如有民族工商农牧业家私人股份经调查属实者，当承认其所有权。所

有在官僚资本企业中供职的人员，在人民政府接管以前，均须照旧供职，并负责保护资财、机器、图表、账册、档案等，听候清点和接管。保护有功者奖，怠工破坏者罚。凡愿继续服务者，在人民政府接管后，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

（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望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负责保护各机关资财、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如有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须予以惩办。

（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凡自动投诚报到，并将所有武器交出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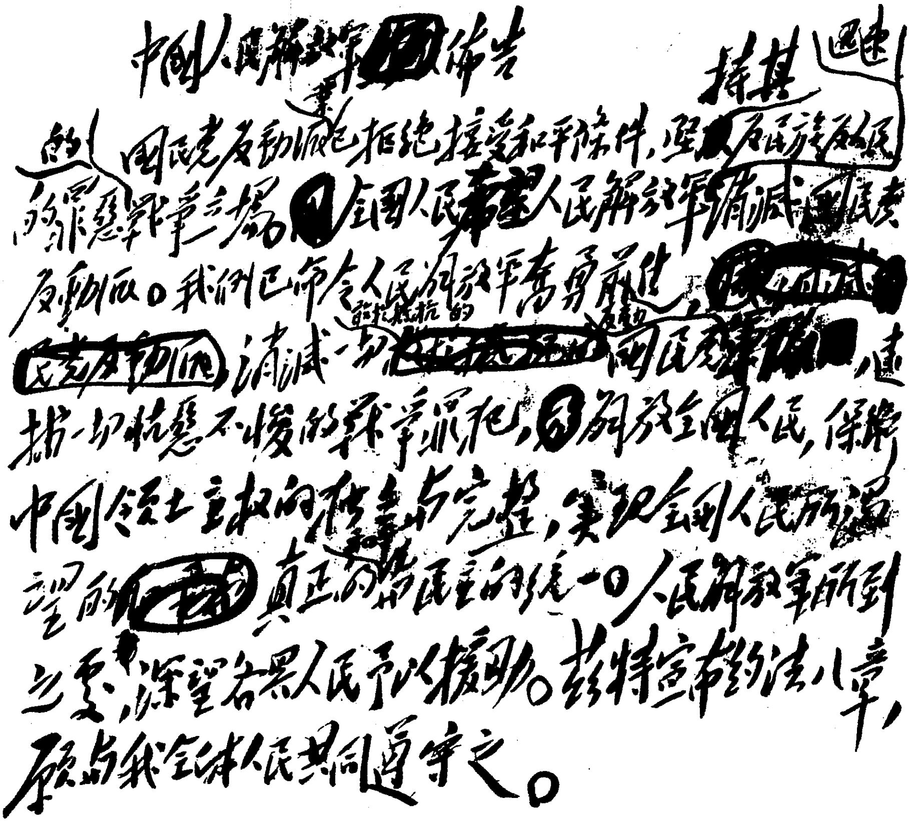
（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是废除这种制度，必须是有准备和有步骤的。一般地说来，应当先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并且需要人民解放军到达和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方才谈得到认真地解决土地问题。农民群众应当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各项初步的改革工作。同

时，努力耕种，使现有的农业生产水平不致降低，然后逐步加以提高，借以改善农民生活，并供给城市人民以商品粮食。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

（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一切外国侨民各安生业，保持秩序。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不得有反对中国民族独立事业和人民解放事业的行为，不得包庇中国战争罪犯、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罪犯。否则，当受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律制裁。

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许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希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朱德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国民党反动派拒绝接受和平条件，坚持其反人民的罪恶战争之立场。全国人民要求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我们已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实现全国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民主的统一。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深望各界人民予以援助。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手稿（部分）。

复彭德怀等电[1]

（1949年4月25日）

杨成武兵团需留华北暂不入陕，该兵团如损伤不大可迅开平绥线夺取大同，尔后即控制于该线，准备将来配合西北我军解决绥、宁问题。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尔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并告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给胡乔木的信[1]

（1947年4月26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应连播两三日。

尔后，凡解放一个大城市例如上海、汉口，应重新对该市重播一次。

---

[1] 这是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在李涛送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1949年4月26日）

（一）请朱、周、任阅，如同意，即照此确定。（二）请周交罗迈征求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意见。因军队是国家的主要部分，似有征求他们意见之必要。

书报上的错误必须更正[1]

（1949年4月）

一

北平解放报[2]编辑同志：

兹付上更正表一件，请予登载为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

本报四月二十五日登载毛泽东《五四运动》一文，有几处文字上的错误，更正如下：

（一）“二十年的五四运动”，“年”字下脱“前”字。

（二）“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获得了一支生力军”，“及”字是多余的。

（三）“它从封建主义社会看来，要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看”

---

[1] 毛泽东在文稿的撰写、印行上，一向严谨精细，一丝不苟，发现差错，毫不含糊，公开予以更正。他曾亲笔写过一些更正，这里选录其中两件。

[2] 北平解放报，是中共北平市委机关报，1949年3月创刊，同年8月1日停刊。

字是多余的。

（四）“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实现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两个“实现”，前面的“实现”二字是多余的。

（五）“而在乎口讲（仅仅口讲）什么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东西”，“而”字下脱“不”字。

二

四月二十五日广播的人民解放军布告，有两个错字：（一）第三条“当承认其所有权”，“当”字误为“均”字。（二）第七条“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村”字误为“民”字。以上两点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

新华社

四月二十六日

要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1]

（1949年4月27日）

总前委，粟、张，并告刘、张、李[2]：

（一）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以便在上海敌军假如迅速退走，上海人民要求你们进驻的时候，不致毫无准备，仓卒进去，陷于被动。（二）美国驻上海军舰为避免引起纠纷，有于二十六日下午撤退至长江口外之传说，是否如此待证。（三）如果美舰撤退，杭州又受威胁，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加以上海资产阶级不赞成在上海打仗，故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四）为着多有一些准备时间，不使国民党过早退出上海、我军仓卒进入上海，请粟张注意不要使我军过于迫近上海。同时，争取在数日内完成进驻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国民党迅速退出上海时，我军亦不至毫无准备地仓卒进去。（五）准备情形，望筹划电告。（六）何时进驻上海，须得我们批准。

军委

二十七日六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

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1]

（1949年4月28日）

林、罗，刘、张、李，萧、陈，并告中原局：

（一）和谈破裂，桂系亦从来没有在具体行动上表示和我们妥协过，现在我们亦无和桂系进行妥协之必要。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消灭桂系及其他任何反动派。但是，我四野主力还要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汉口附近，接收汉口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因此，白崇禧[2]和中央联络的电台暂时仍不割断，萧陈前线亦应遵守前定界线不要超越，以免刺激汉口敌军惊慌，撤走得太早。在此意图下，如果滠口[3]铁桥不十分重要，不十分难于修复，最好暂时不去抢占。但是如果滠口铁桥十分重要，被敌破坏后十分难于修复，则可以早日去抢占。但是抢占滠口后，白崇禧即可能放弃汉口汉阳两城，萧陈及中原局应准备早日接收汉口、汉阳。此事究以如何处置为适宜，本日已与林彪同志当面谈过，由林彪同志负责考虑答复，请萧陈及中原局向林再提供意见。（二）浠广[4]不在划定范围之内，该处敌军应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等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滠口，镇名，位于湖北黄陂县南部。

[4] 浠，指湖北浠水。广，指广济，旧县名，1987年改设湖北武穴市。

予消灭，不使决堤灌水。（三）从电到日起，萧陈归林罗直接指挥，解除刘邓张李[1]对萧陈的全般指挥关系，但在工作配合上刘邓张李仍得指挥萧陈。（四）无论怎样，萧陈及中原局应当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以免敌人退走，仓卒接收，毫无准备。

军委

卯俭

---

[1] 刘，指刘伯承。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张李，指张际春、李达。

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949年4月28日）

德怀[1]同志：

假如西野[2]方面暂时不打大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3]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须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如何，盼复。

毛泽东

卯俭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西野，指西北野战军，1949年2月改称第一野战军。

[3] 张治中，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率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4月15日，双方拟定“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之后，张治中等决定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

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对策问题

（1949年4月28日）

总前委，粟、张[1]，并告刘、张、李[2]：

（一）为使汤恩伯[3]在上海稳住一时期，以利我军先取杭州，然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我们认为，你们暂时不要去占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直接的威胁。

（二）美国军舰及一营陆战队，已于二十六日由上海撤至吴淞口外，美国只留下一艘载有医疗设备的军舰（医舰）在上海。英国的军舰伦敦号及永恒号亦和美舰一起退往吴淞口外，只留下驱逐舰黑天鹅号在上海（该舰被打伤，有伤兵留沪就医）。法国原有一艘军舰在上海，是否退出不明。英、美采取此种态度于我有利。

（三）我方对英、美侨民（及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现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亦极力想

---

[1]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此事请邓、饶、陈、刘[1]加以注意。

（四）美国援助国民党反共的旧政策已破产，现在似乎正在转变为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政策。关于侵入司徒雷登住宅[2]一事，美国可能向我南京当局提出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抗议。但是只要我方不继续发生此类事件，美国是不会将此事扩大的。

（五）英军舰紫石英号事件[3]，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英国连抗议也没有提。因此我们除借此作宣传教育人民外，实际上我们亦不必扩大这件事。

中央军委

俭丑

---

[1]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

[2] 1949年4月25日，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士兵擅自进入美国原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

[3]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3艘英舰逃走。

复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信

（1949年4月28日）

四月二十日来信收到。叫我给你们的刊物写点文章，我是高兴的；可惜我近日颇忙，不能应命，请予原谅。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29日）

我军既已占领苏州，似宜在苏州停止，让昆山、太仓、嘉兴暂时留在敌手；我军应在常熟集中重兵，密切监视上海情况，防敌经海路逃跑。一经发现敌有从海上逃跑象征，立即攻占吴淞，控制浦江出口。但须事先严戒部队，到吴淞后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至要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并告在南京的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

（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2]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3]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4]。
宜将剩勇追穷寇，[5]

---

[1]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即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并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

[2] 钟山风雨起苍黄，钟山即紫金山，在南京市的东面。苍黄，同仓皇。本句是说南京突然遭到了革命暴风雨的袭击。苍黄兼有变色的意思。这是修辞上的所谓“双关”。

[3] 虎踞龙盘，形容地势优异。三国时诸葛亮看到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市南）的地势曾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参见《太平御览》引《吴录》）石头即石头山，在今南京市西。

[4] 慨而慷，感慨而激昂。曹操《短歌行》：“慨当以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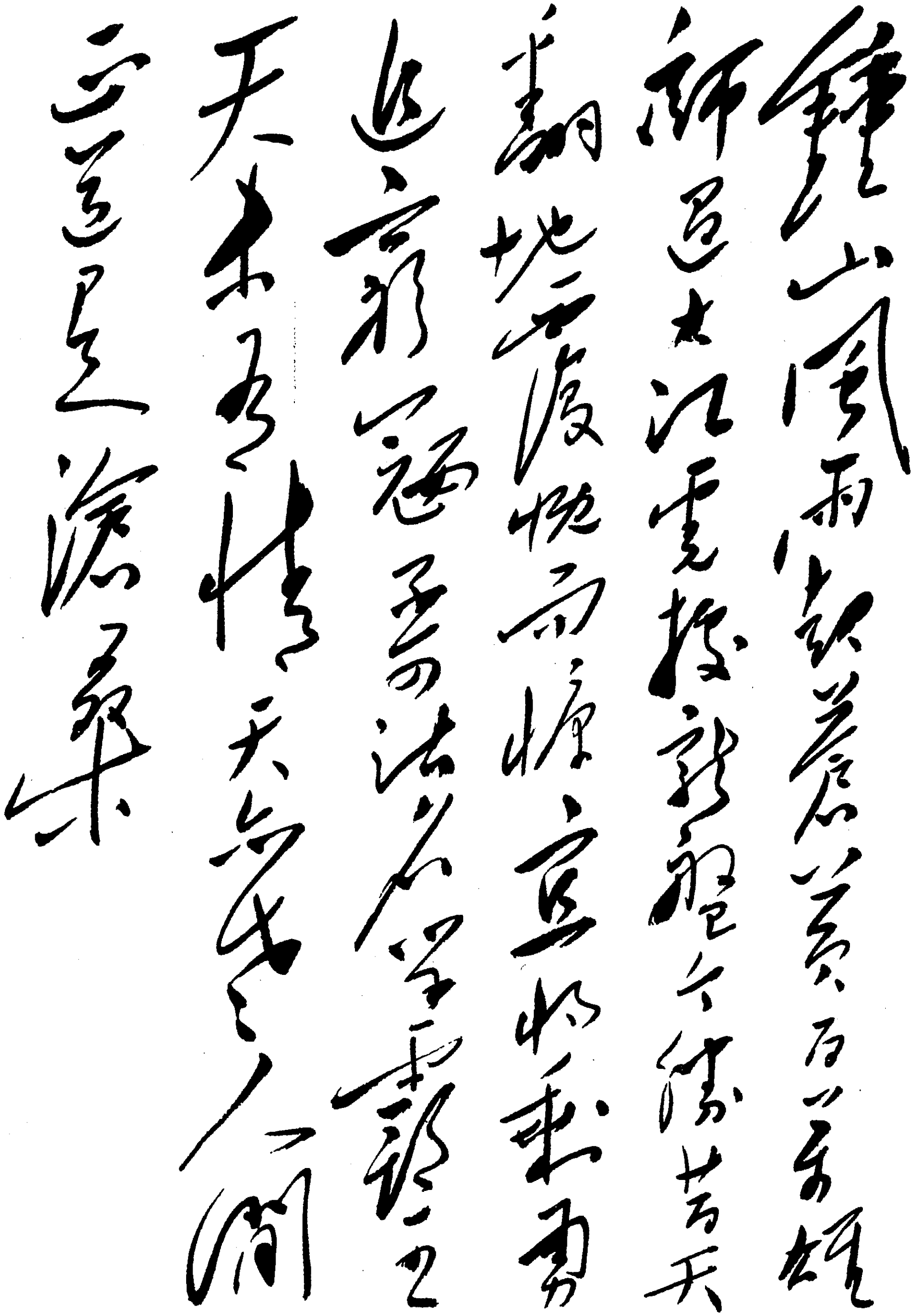
[5] 宜将剩勇追穷寇，剩勇，余勇。穷寇，走投无路的敌人。《后汉书·皇甫嵩传》：“兵法（指《司马兵法》），穷寇勿追。”这里改变了这种说法，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敌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掉，不要留下后患。

不可沽名学霸王。[1]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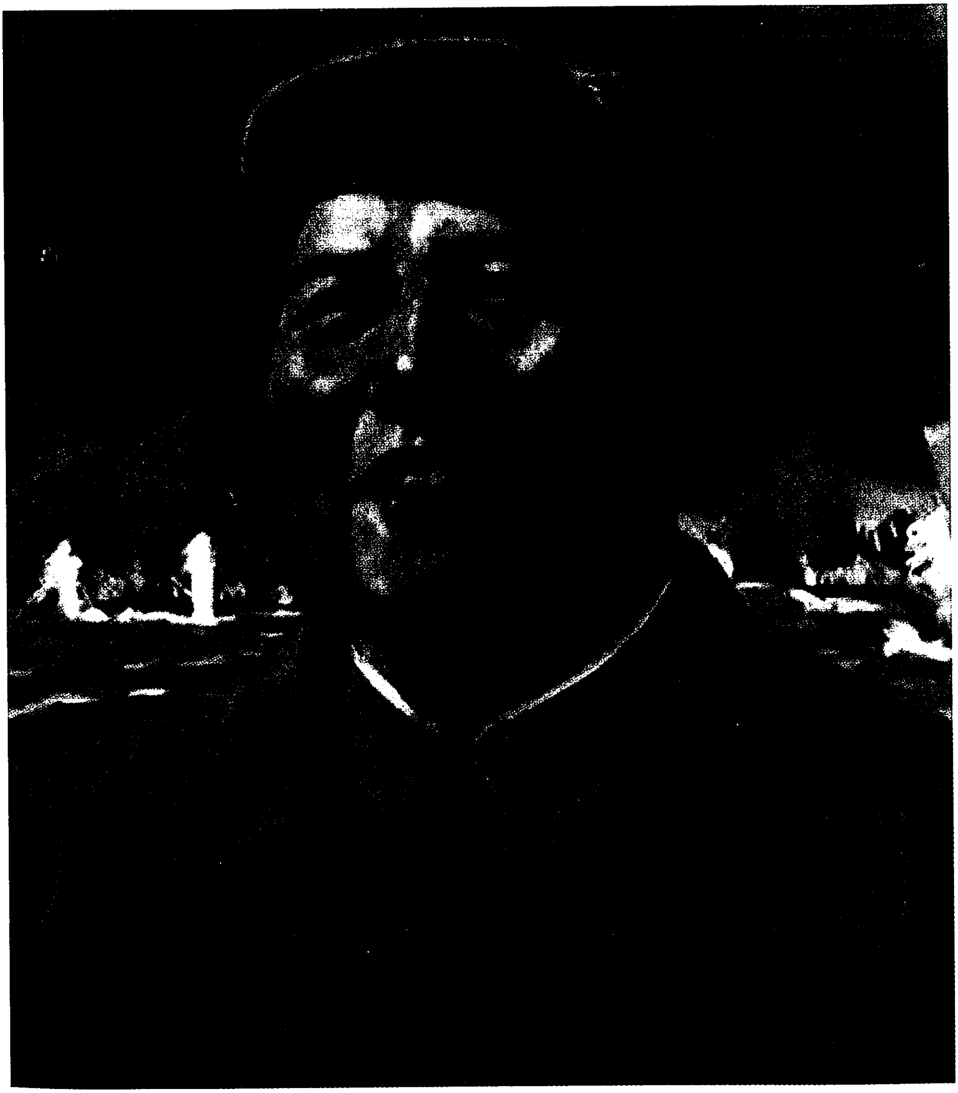
[1] 不可沽名学霸王，沽名，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秦朝末年，项羽（曾自封西楚霸王）和刘邦（后来的汉高祖）同时起兵反秦。刘邦先据秦都咸阳拒项羽。项羽歼灭了秦兵主力，拥40万大军入咸阳。他当时为了避免“不义”之名，没有利用优势兵力消灭刘邦，后来反为刘邦所消灭。这里是说应从项羽的失败得到教训，不可为了“和平”的虚名，给敌人以卷土重来的机会。

[2]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上句借用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诗句，原诗说的是汉武帝时制作的极贵重的宝物金铜仙人像，在三国时被魏明帝由长安迁往洛阳的传说。原句的意思是，对于这样的人间恨事，天若有情，也要因悲伤而衰老。这里是说，天若有情，见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残酷，也要因痛苦而变衰老；身受反动派压迫的人民，自然要彻底推翻反动统治，完成翻天覆地的革命事业。人间正道，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沧桑，沧海（大海）变为桑田，这里比喻革命性的发展变化。古代神话：女仙麻姑对另一仙人王方平说，他们相见以来，东海已经三次变为桑田（见葛洪《神仙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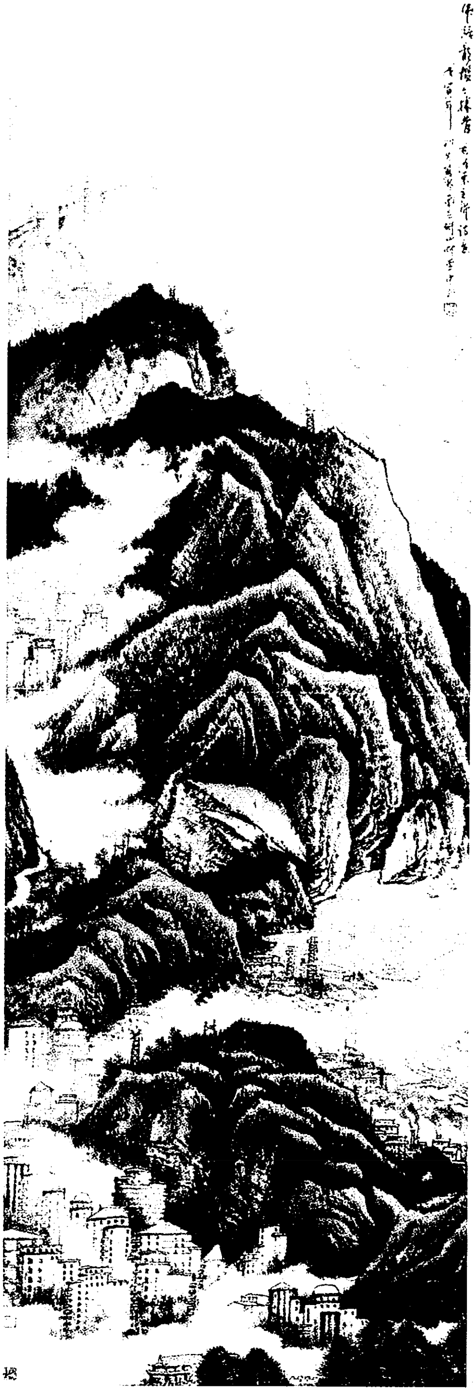


鍾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
師過大江虎踞龍盤今勝昔天
翻地覆慨而慷宜將剩勇
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
正道是滄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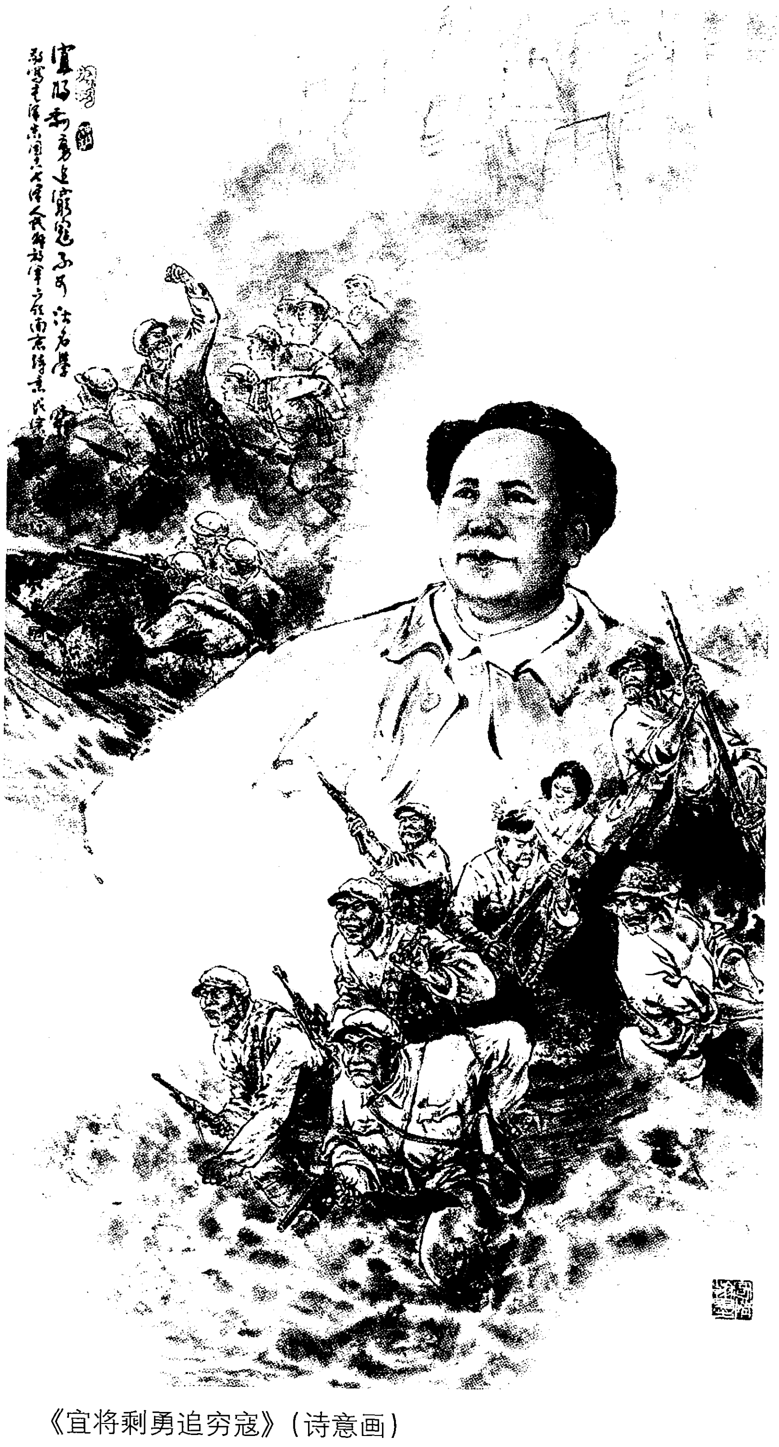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毛泽东赋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狮过大江》（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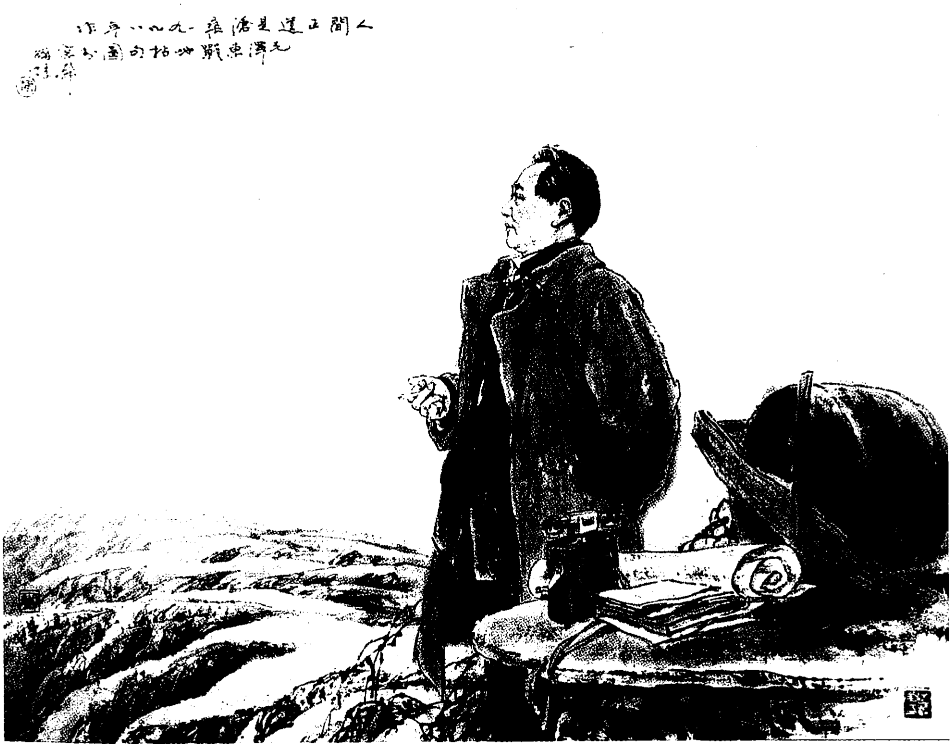

虎踞龙盘今胜昔　毛泽东主席诗意

《虎踞龙盘今胜昔》（诗意画）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敬写毛泽东同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意

《宜将剩勇追穷寇》（诗意画）

《人间正道是沧桑》（油画）


人間正道是滄桑 一九八八年作

《人间正道是沧桑》（诗意画）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

（1949年4月29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2]
索句渝州叶正黄。[3]
三十一年还旧国，[4]

---

[1] 和柳亚子先生，和，酬和。柳亚子于1949年3月28日作《感事呈毛主席》一诗（见本篇附录），这是毛泽东的答诗。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1948年1月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

[2] 饮茶粤海未能忘，粤海指广州。1926年5月，柳亚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同毛泽东初次晤面。“饮茶”句即指当时毛泽东同柳亚子的交往。按柳亚子在1941年《寄毛主席延安》诗中，曾有“粤海难忘共品茶”之句。

[3] 索句渝州叶正黄，渝州，即四川的重庆。毛泽东于1945年8月至10月曾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了40多天的和平谈判。当时柳亚子曾索取诗稿，作者即手书《沁园春·雪》相赠。

[4] 三十一年还旧国，旧国，过去的国都。作者1918年和1919年曾两次到过北京，到1949年北京（当时称北平）解放后再来，前后相距约31年。毛泽东自注：“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国之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

落花时节读华章。[1]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2]。
莫道昆明池[3]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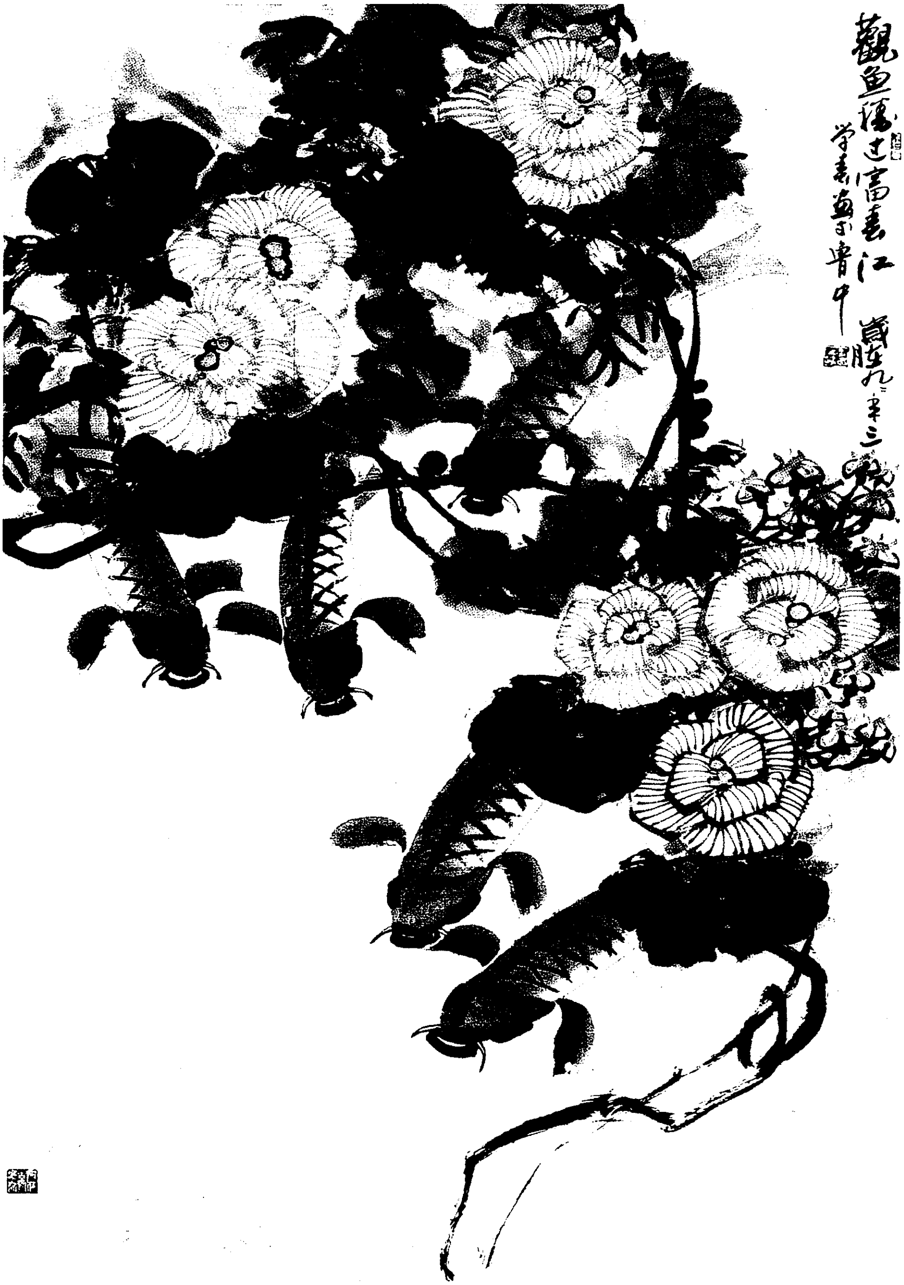
---

[1] 落花时节读华章，化用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落花时节又逢君”句。华章，美丽的诗篇，指柳亚子的诗。

[2] 放眼量，放大眼界去衡量，不必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以致“牢骚太盛”。

[3] 昆明池，北京西郊颐和园内的昆明湖。当时柳亚子住在颐和园内。

[4] 观鱼胜过富春江，观鱼，用《庄子·秋水》中庄子和惠施在安徽濠水桥上看水中游鱼的故事。富春江在浙江省桐庐和富阳两县境内，东汉时隐士严光（字子陵）曾在那里游钓，至今桐庐还有钓台遗址，但已离水面很高。这句诗的意思说，在颐和园的昆明湖观赏游鱼的快乐比在富春江的钓台更好。这是对柳亚子原诗“分湖便是子陵滩”而言。


觀魚勝過富春江
歲在九七年三
學素畫于魯中

《观鱼胜过富春江》（诗意画）

附录：柳亚子原诗

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
说项依刘[1]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2]
无车弹铗怨冯驩。[3]
头颅早悔平生贱，
肝胆宁忘一寸丹！

---

[1] 说项依刘，劝说项羽接受刘邦的领导。柳诗作时正值中共中央争取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希望民主人士共同努力。柳在此处表示他虽也是国民党元老，自觉无能为力。一说，用的是杨敬之到处讲项斯的好话和王粲去荆州依附刘表的故事。唐杨敬之《赠项斯》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三国志·魏书·王粲传》：“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柳表示说人好话、依附他人，他很难做到。

[2] 夺席谈经非五鹿，后汉戴凭驳倒许多讲经的学者，夺取了他们的讲席（见《后汉书·儒林·戴凭传》）。又说，前汉显贵受宠的五鹿充宗讲《易经》，曾被朱云驳倒（参见《汉书·朱云传》）。这里借指自己有夺席谈经的学问，决不是五鹿充宗那样依附权势、徒具虚名的人。

[3] 无车弹铗怨冯驩，战国时齐人冯驩投靠孟尝君田文。田文门下食客分三等：上等坐车，中等吃鱼，下等吃粗饭。冯驩列下等，他弹剑唱：“长铗归来乎，食无鱼。”田文把他列为中等，他又弹剑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参见《史记·孟尝君列传》）铗，剑，或说剑把。冯驩，《战国策·齐策四》作冯谖。

安得南征驰捷报，
分湖便是子陵滩。[1]［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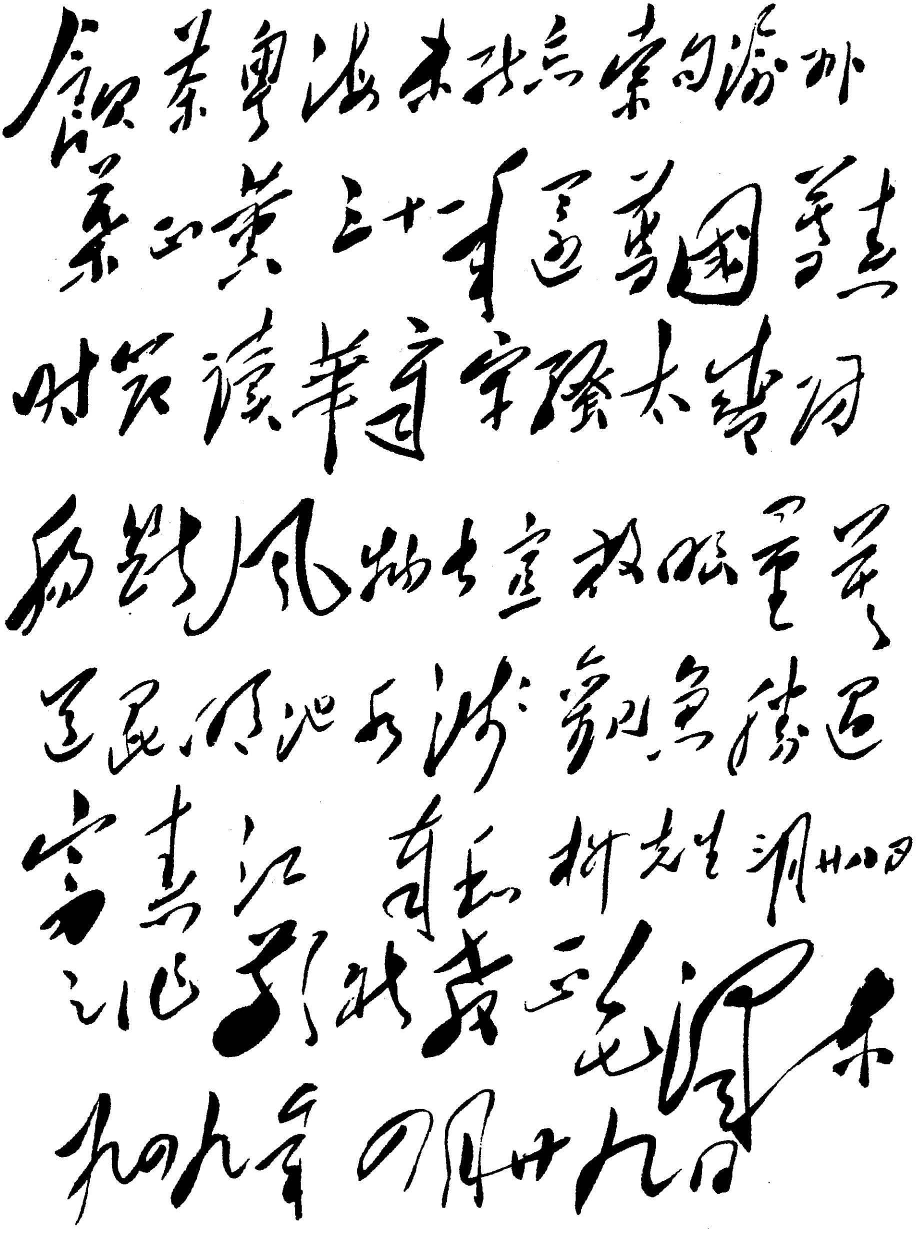
原注：分湖为吴越间巨浸，元季杨铁崖[2]曾游其地，因以得名。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3]思之凄绝！

---

[1] 分湖便是子陵滩，分湖在柳亚子家乡的吴江县。子陵滩，即七里滩，起自浙江建德梅城，迄于桐庐钓台，因东汉初严子陵隐居曾在此游钓而得名。这里柳指自己要回乡去隐居。

[2] 杨铁崖，名维祯，字廉夫，元末明初诸暨（今浙江诸暨）人，当时的著名诗人。

[3] 先德旧畴，先辈旧产。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
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
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
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
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
富春江 奉和柳先生三月廿八日
之作步其原韵 一 毛泽东
九四九年四月廿九日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1]

（1949年4月30日）

粟、张，并总前委：

艳晨电[2]悉。（一）歼灭诸敌甚慰。（二）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三）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3]从海上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军委

卯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并总前委的电报。

[2] 指1949年4月29日晨粟裕、张震给各兵团、各军并总前委、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逃向杭州被我逼入山区之敌已大部被歼，仅五十四军残部在逃。第三野战军第九和第十兵团负责肃清残敌。电报对在肃清残敌后，第九、第十、第七和第八兵团的作战部署作了具体规定，并指出要做好接受城市的准备工作。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高级领导机关对下级应加强文电指示

（1949年4月30日）

华东局，总前委，并告粟、张，刘、张、李，并告各局、各委：

（一）艳酉[1]电悉。处置甚好。

（二）南京电报局不得中央同意，擅自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是何人处理的，望即查明电复。

（三）我们认为，南京、上海两处暂时均不要停止外国记者发新闻电，南京方面应重新开放，让外国记者发电，并且不要检查。待他们发一个时期，看其情况如何，再由中央决定或全部停止外国记者发电，或准许好记者发电，停止坏记者发电。

（四）关于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指示，在你们高级领导机关方面来说，主要地是依靠写电报，发通令，而不是依靠开干部会，不是依靠口讲。一个负责人半小时可以写一个电报，一小时可以写一个通令，一天、两天、三天或四天工夫可以经过电台传达到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有文字为凭，有范围可守，又迅速，又使下级有所遵循。此种方法，毛主席已多次向饶漱石[2]同志提议过。而在你们方面，则对于若干项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方法问题，仍然不是靠文字，而是靠口头去向下面作指示。口头指示也是

---

[1] 艳酉，即29日酉时。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要的，也是有用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一则无文字可凭；二则范围不见得很明确；三则到会的少数人听到了，没有到会的多数人没有听到，有挂一漏万的缺点（只是说的只有口头报告，没有文字决议的干部会）。此次外交政策几天时间内出了很多乱子，就是因为你们过去对于这个问题对下面没有任何文电指示。对有些问题有了指示，但如果没有让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的领导同志同时普遍看到，或者指示中对一项问题不强调，不突出，不鲜明，不确定范围，则各地仍然不明白，或者不甚明白。现在鉴于南京方面闹出的乱子，如果你们还不采取打电报、发通令的方法，立即告诉各军、各师、各团，各省、各市、各县，那就在上海，在杭州，在苏州，在镇江，在无锡，在芜湖，以及在其他地方，又要重复出乱子。这种出乱子的责任，主要地不是在下面，而是在领导方面，事前告诫处理得不适当，或者没有去告诫和处理。过去你们对于山东及苏北的城市政策和工业政策，长期不发电报，不发通令，以致下面无所适从，各干各的，受了损失，也是一项教训。

中央军委

卯三十

复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4月30日）

据外国通讯社反映，二十七日上海敌军从海上运走约一万人，二十八日已停运。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1]

（1949年4月30日）

（一）凡在新区，嗣后对外宣传对内教育均以四月二十五日毛、朱所发人民解放军布告为标准，各局、各军均不要单独另发一般性的布告。以前各军所发约法七章或八章均取消不再发。（二）毛、朱四月二十五日布告除电台广播、报纸发表、单张印发张贴于一切新区城市及乡村俾众周知外，军内、党内均应印发作为教材迅速传达学会，一律照此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1]发表的声明[2]

（1949年4月30日）

我们斥责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声明[3]。四月二十六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丘吉尔先生，你“报复”什么？英国的军舰和国民党的军舰一道，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区，并向人民解放军开炮，致使人

---

[1]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也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3艘英舰逃走。英国当局曾由其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经过紫石英号舰长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进行多次谈判，要求将紫石英号放行。当谈判还在进行之际，紫石英号军舰于7月30日夜趁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借以逃跑。当人民解放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竟开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2] 这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在这个声明里，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3] 1949年4月26日，英国保守党首领丘吉尔在下院发言，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驶入人民解放军防区的英舰说成是“暴行”，并且要英国政府“派一两艘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去……实行武力的报复”。

民解放军的忠勇战士伤亡二百五十二人之多。英国人跑进中国境内做出这样大的犯罪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理由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并执行道歉和赔偿。难道你们今后应当做的不是这些，反而是开动军队到中国来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报复”吗？艾德礼首相的话也是错误的[1]。他说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艾德礼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艾德礼是在撒谎，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允许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人民解放军不希望任何外国武装力量帮助渡江，或做任何别的什么事情。相反，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直到现在还没有同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

---

[1] 1949年4月26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在议会中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执行和平使命，因为它们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许可。”同时，他在谈到英国方面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交涉的情况时，又造谣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让英舰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

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艾德礼埋怨中国共产党因为没有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不愿意同外国政府的旧外交人员（国民党承认的领事）发生关系，这种埋怨是没有理由的。过去数年内，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对我们的，难道艾德礼先生也忘记了？被击沉不久的重庆号巡洋舰[1]是什么国家赠给国民党的，艾德礼先生难道也不知道吗？

---

[1] 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19日赠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是国民党政府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1949年2月25日，这艘军舰的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国人民海军。同年3月19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出动重轰炸机多架，将其炸沉于中国东北辽东湾的葫芦岛附近。

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的信

（1949年4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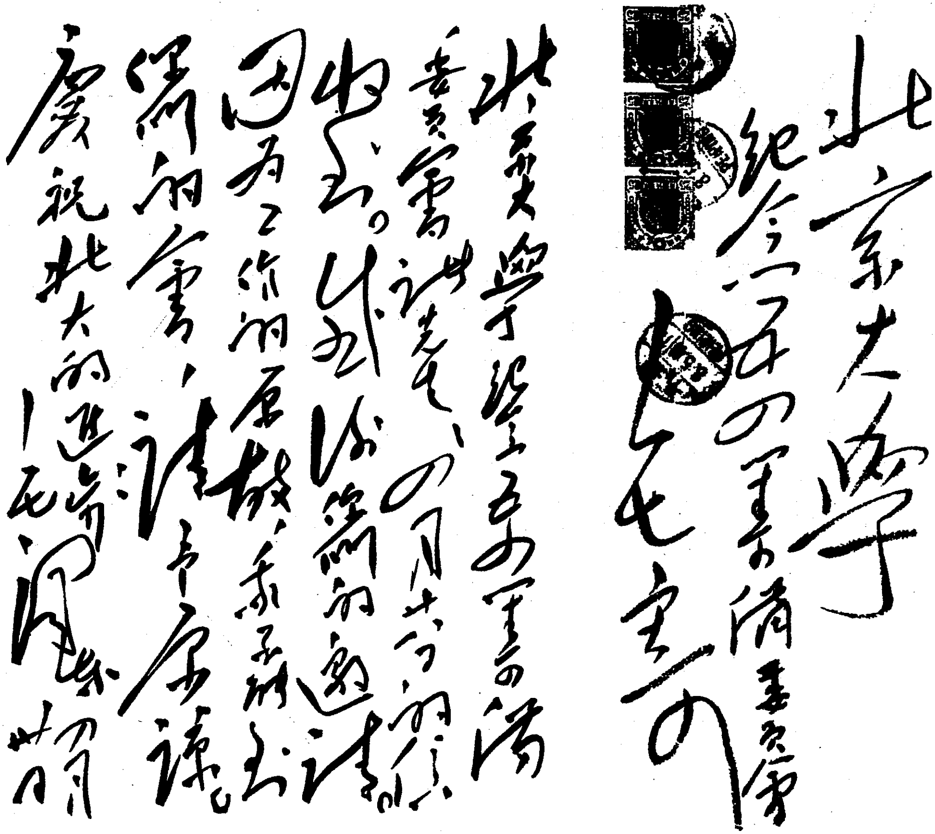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诸先生：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

庆祝北大的进步！

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先生們：

北京大學學生會五四籌備委員會諸先生：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謝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不能出席你們的會，請予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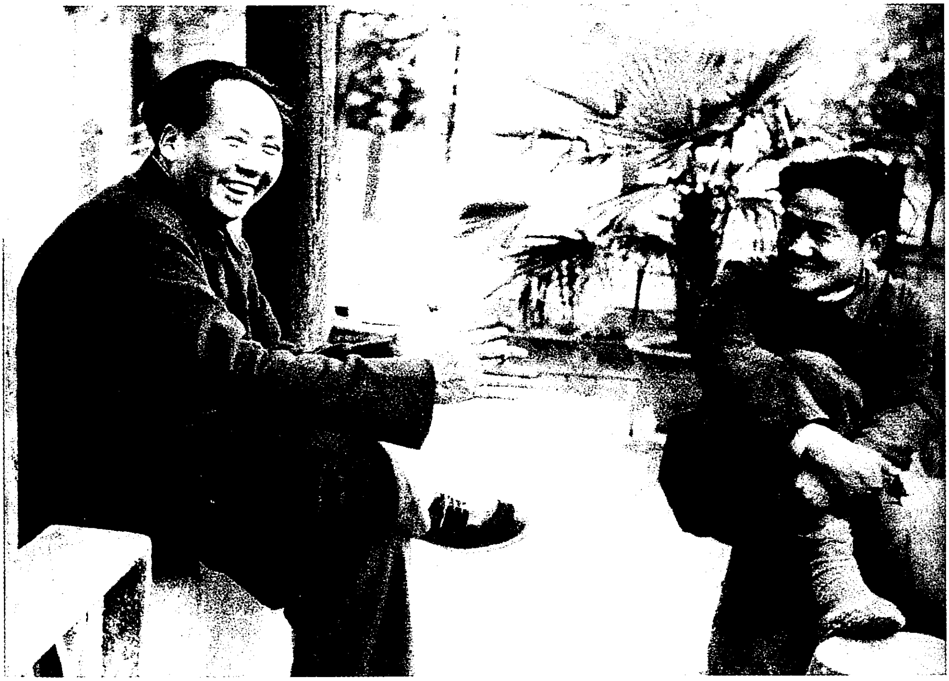
慶祝北大的進步！

毛澤東

四月卅日

毛泽东致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信的手稿。

1949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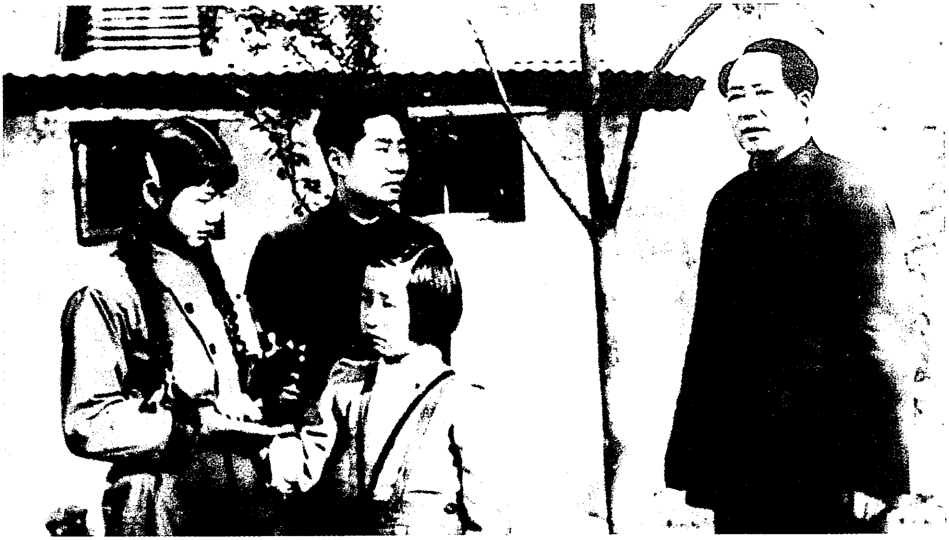


1949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在香山双清别墅。

1949年，毛泽东和江青、李讷、李云露、王博文在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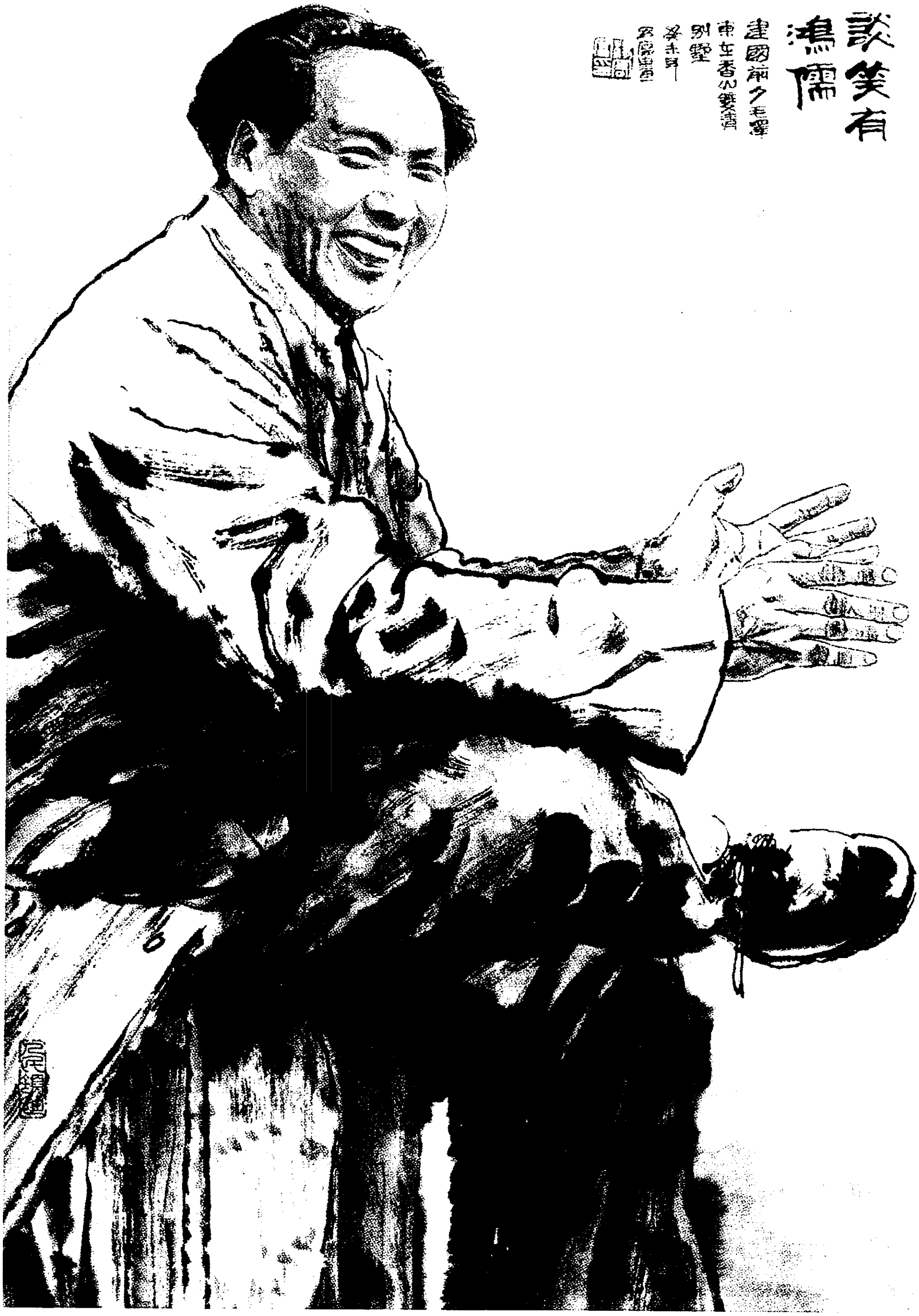
1949年，毛泽东一家在香山合影。

1949年，毛泽东和江青、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



1949年，毛泽东和毛岸英、刘思齐、李讷在香山。

1949年，毛泽东和江青在香山。


談笑有鴻儒
建國前夕毛澤東在香山雙清別墅
癸未年

《谈笑有鸿儒》（中国画）

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以分置于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为适宜[1]

（1949年5月1日）

总前委，刘、张、李，并告粟、张[2]：

（一）杭州、上海之敌所剩无几，东野[3]不日即可歼灭。（二）中野的任务在于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三区之敌，因三区之敌亦不甚多，故中野三个兵团似不需要集中使用，而以分置于三区为适宜，以便在敌军歼灭之后即可分别开辟三区的工作。是否可以如此，请考虑电告。

军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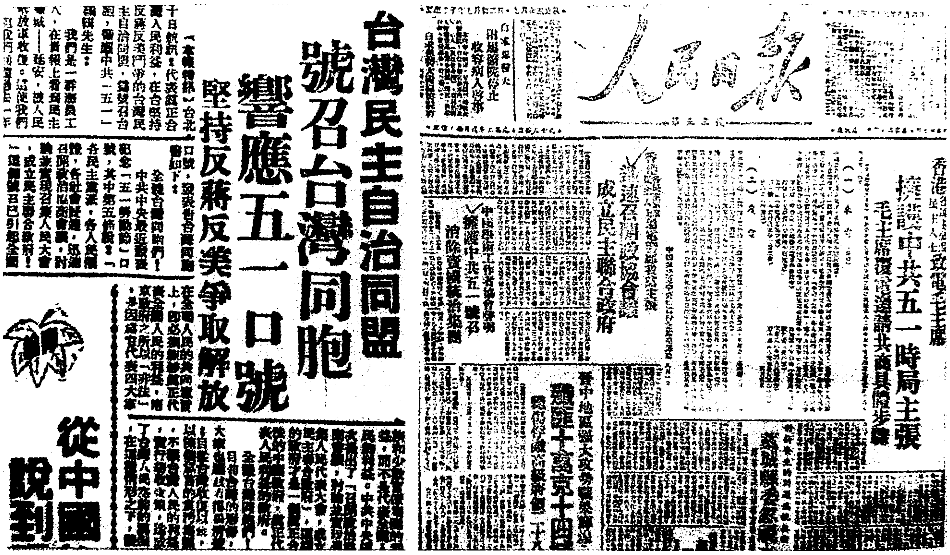
辰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东野，应为华野，即华东野战军，1949年2月改称第三野战军。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號召台灣同胞

響應五一口號

堅持反蔣反美爭取解放

從中國說到

人民日報

香港民主人士致電毛主席

擁護中共五一時局主張

毛主席復電邀請共商具體步驟

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擁護中共五一號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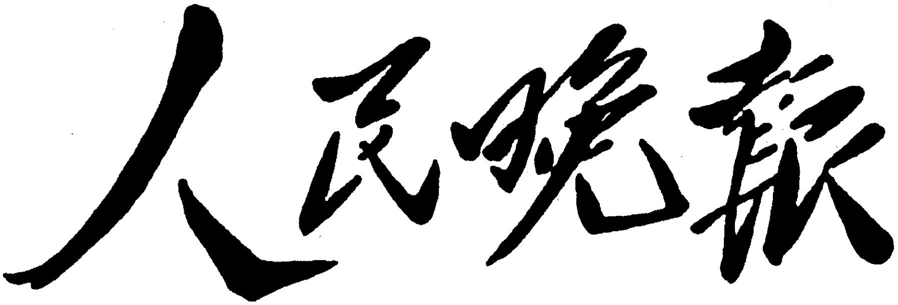
1949年，中共中央提出五一口号后，得到中国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坚决拥护。图为部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表的通电。

1949年5月，毛泽东在北平双清别墅接见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代表。

为《人民晚报》题写报头[1]

（1949年5月1日）

人民晚报



毛泽东为《人民晚报》题写的报头。

---

[1] 《人民晚报》是华北《人民日报》唯一的子报，1949年5月1日创刊，同年7月31日终刊，共出版91期。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头。

复徐向前等电[1]

（1949年5月3日）

（一）同意你过一时期去海边适当地点作较长时期之休养。（二）同意解除你在十八兵团的工作并在病愈后改做别项工作。（三）同意以周士第为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为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徐向前并告周士第、罗瑞卿、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华北局、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5月3日）

总前委转来第八兵团政治委员袁仲贤、司令员陈士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四月三十日电，报告三十五军未经请示擅自处理有关外交事件等，请你们转发华野、中野，各军、各师以资警惕。从三十五军在南京数天内所犯无政府无纪律错误行为看来，你们过去在准备渡江时期，对于外交政策及其他许多事项（例如军队在城市中看戏、看电影、洗澡、坐电车、坐公共汽车等事必须和各界人民同样买票，不许特殊，以及未得上级许可不得接受人民慰劳等）似乎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没有规定，你们应速规定，通令各军一体遵行。如果过去已有规定，三十五军故意违犯，则除检查该军工作做出结论通令各军外，应向各军重申前令，引起注意，不许再有违犯。如果各军对于像外交问题这样重大事件，可以不请示，不报告，由各军各地擅自随意处理，则影响所及，至为危险。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华东局，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致斯大林电[1]

（1949年5月3日）

现在我们有两大任务：军事任务与经济任务。解决军事任务，即最后消灭敌人，我们能够完成，因为我们有经验和有必需的力量。但解决第二个任务——并不比第一个任务次要，为前途着眼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很需要你们的帮助。不解决这一经济建设的任务，我们便不能巩固革命的果实，便不能完成革命。因此，请您满足我们的请求派遣苏联专家给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的主要内容。

推迟占领杭州上海的时间[1]

（1949年5月3日）

总前委，华东局并粟、张[2]：

（一）总前委陷辰电[3]悉。（二）谭王吉[4]已迫近杭州，不知来得及停止否。杭州城内除周喦[5]率少数人为后卫尚未退走外，军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等的电报。

[2]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4月30日辰时总前委给中共中央军委和粟裕、张震的电报。电报说，根据南京经验，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就仓卒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就军事上说，杭州、上海很快即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都未作好，加以上海、杭州干部尚在长江北岸，部队本身困难亦多，政策及入城守则尚未深入教育，连续行军作战尚未整理，大批俘虏尚未处置，如不经过10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因此，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为此建议：1. 七兵团应照粟张命令迫近杭州，先以有力部队截断敌之退路，尔后派人与守敌谈判投降，拖延一点时间，以便自己作入城准备。2. 推迟进占浏河时间。3. 华东局、三野前委及七兵团加紧进入上海、杭州的准备，限期完成，以免仓卒被动。

[4] 谭王吉，指谭震林、王建安、吉洛（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5] 周喦，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浙江警备司令部司令。

警察及省政府均已向宁波撤退，城内治安由临时组织的民警维持。在此种情形下，谭王吉似可以不即去占领杭州，暂时由原来已经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以救济委员会名义出现）、地方绅士吕公望等维持，以待我方干部之到达。是否可以如此，请粟张决定。（三）上海在辰灰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十天时间作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则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1]在十天内由海上退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地应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入被动。过去，你们在三个月准备渡江期间，没有抽出一个月时间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没有作很快占领诸城的精神准备和组织准备，吃了亏。现在只好在十天内补足此种缺点。乙、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只要汤恩伯不走，就应如此。占领浏河[2]的时间亦可推迟。我们前已电告你们，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请粟张注意。

军委

辰江二时

---

[1]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2] 浏河，镇名，位于江苏太仓县东北。

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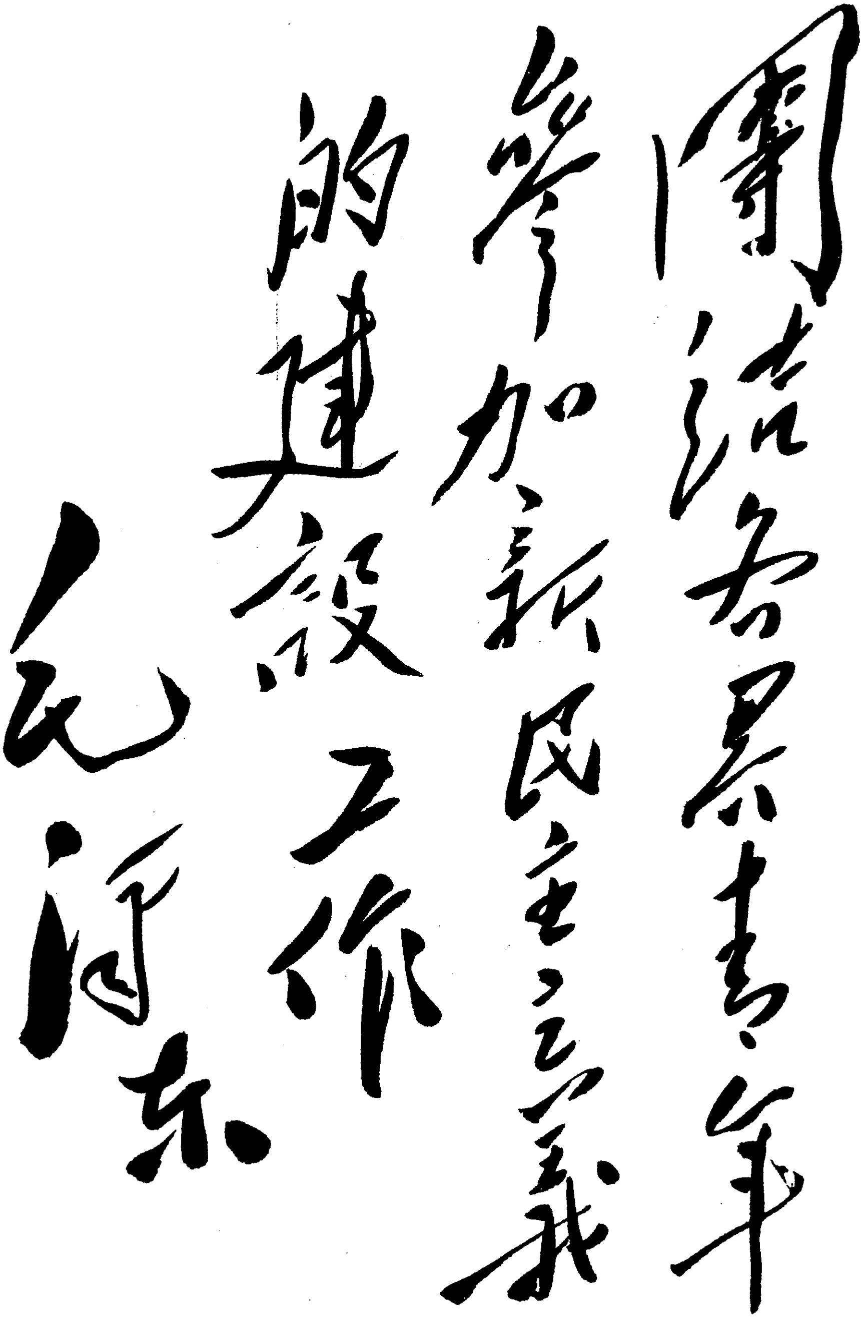
（1949年5月4日）

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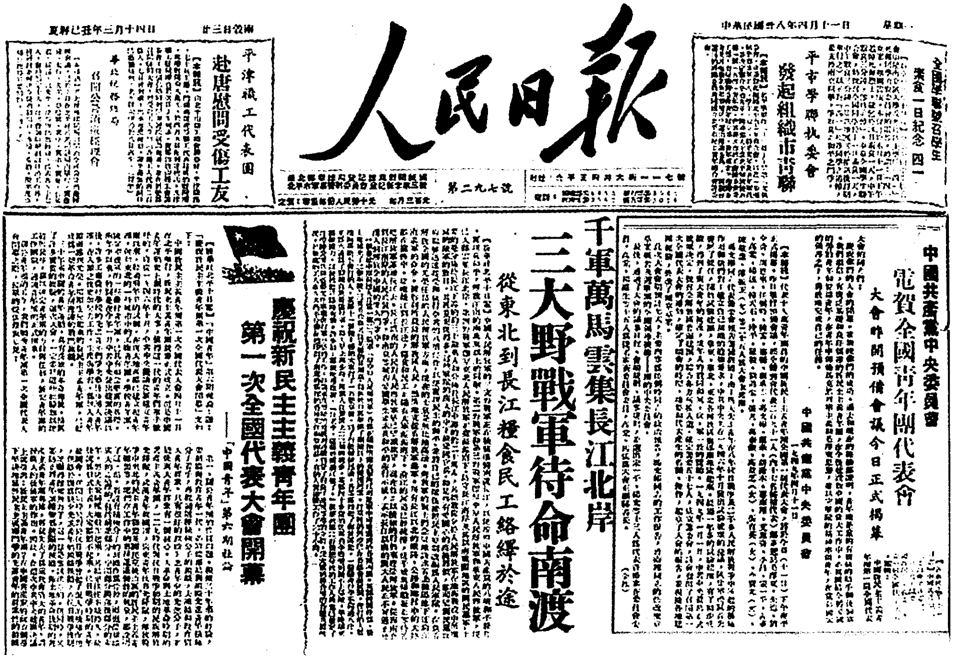
---

[1] 1949年5月4日至10日，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写的题词。



團結各界青年
參加新民主主義
的建設工作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题词。



人民日報

第二九七號

平津職工代表團 赴唐慰問受傷工友

平市學聯執委會 發起組織市青聯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電賀全國青年開代表會

大會昨開預備會議今日正式揭幕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千軍萬馬雲集長江北岸

三大野戰軍待命南渡

從東北到長江糧食民工絡繹於途

慶祝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

——「中國青年」第六期社論

1949 年 5 月，《人民日报》关于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报道。

1949年5月，毛泽东、朱德在北京接见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1949年5月，毛泽东来到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中间。

在柳亚子《羿楼纪念册》上作题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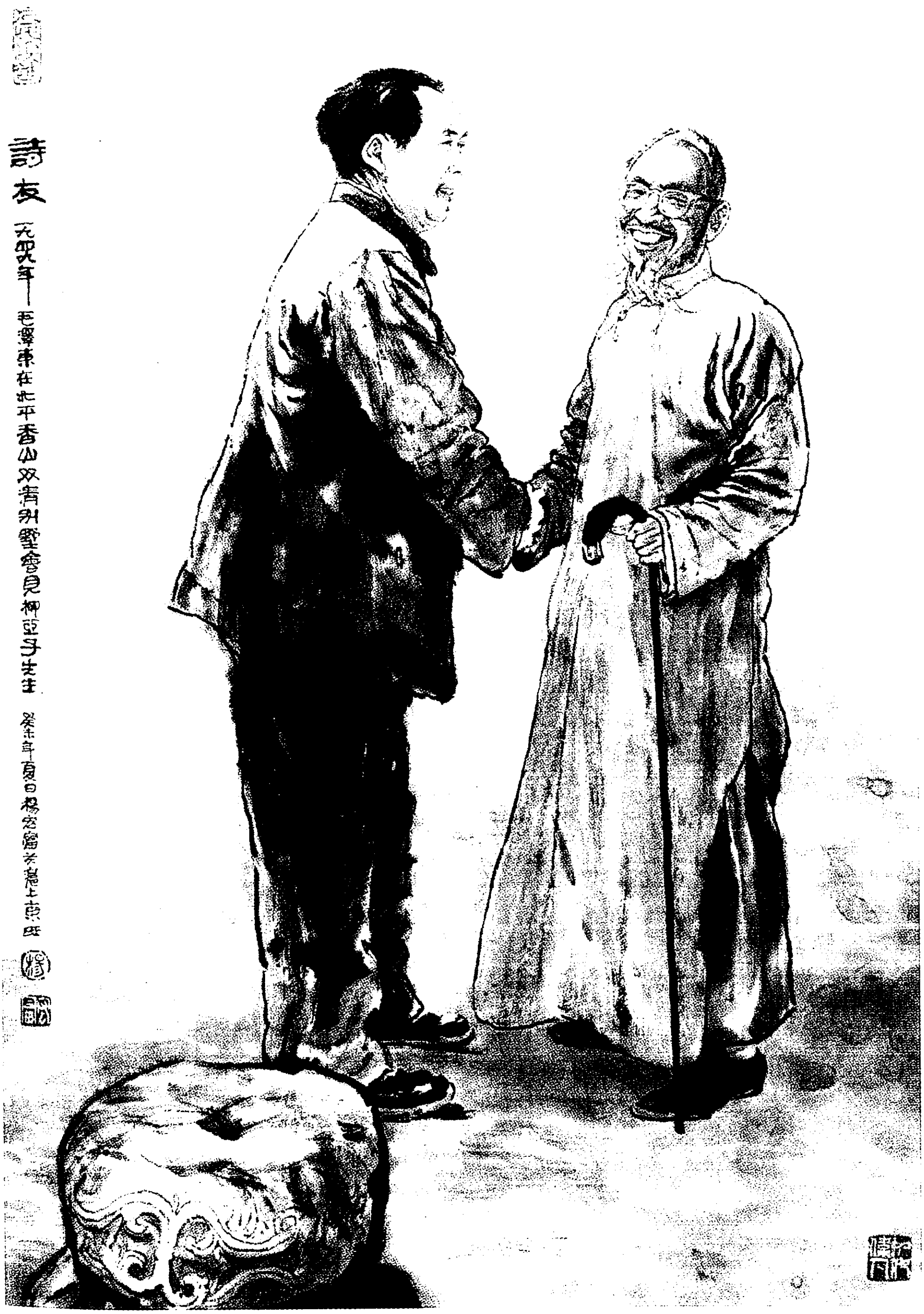
（1949年5月5日）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

[1] 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的毛泽东把柳亚子接到双清别墅叙谈。两位现代诗坛的巨匠，兴致勃勃地谈到古今不少诗人诗作，分手时，毛泽东应柳亚子之请，在他的《羿楼纪念册》上写了这个题记。

1949年5月5日，毛泽东和老朋友、民主人士柳亚子在北平重逢。


诗友
一九四九年
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会见柳亚子先生
癸未年夏日杨宏富

《诗友》（中国画）

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

（1949年5月6日）

粟、张[1]（转谭、王、吉[2]），并告陈、饶，刘、邓[3]：

（一）陈饶微电悉。

（二）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4]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逃走（据上海吴文义[5]几次报告，汤恩伯[6]正在运走物资），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三）为着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如果可以不

---

[1] 粟、张，指粟裕、张震，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谭，指谭启龙，1914年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政治委员。王、吉，指王建安、吉洛（即姬鹏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辰删，即5月15日。

[5] 吴文义，即吴克坚，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组织）委员。

[6]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占，则暂时不要去占。

（四）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暂时不要去占。

（五）此外，谭王吉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息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杭州、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

（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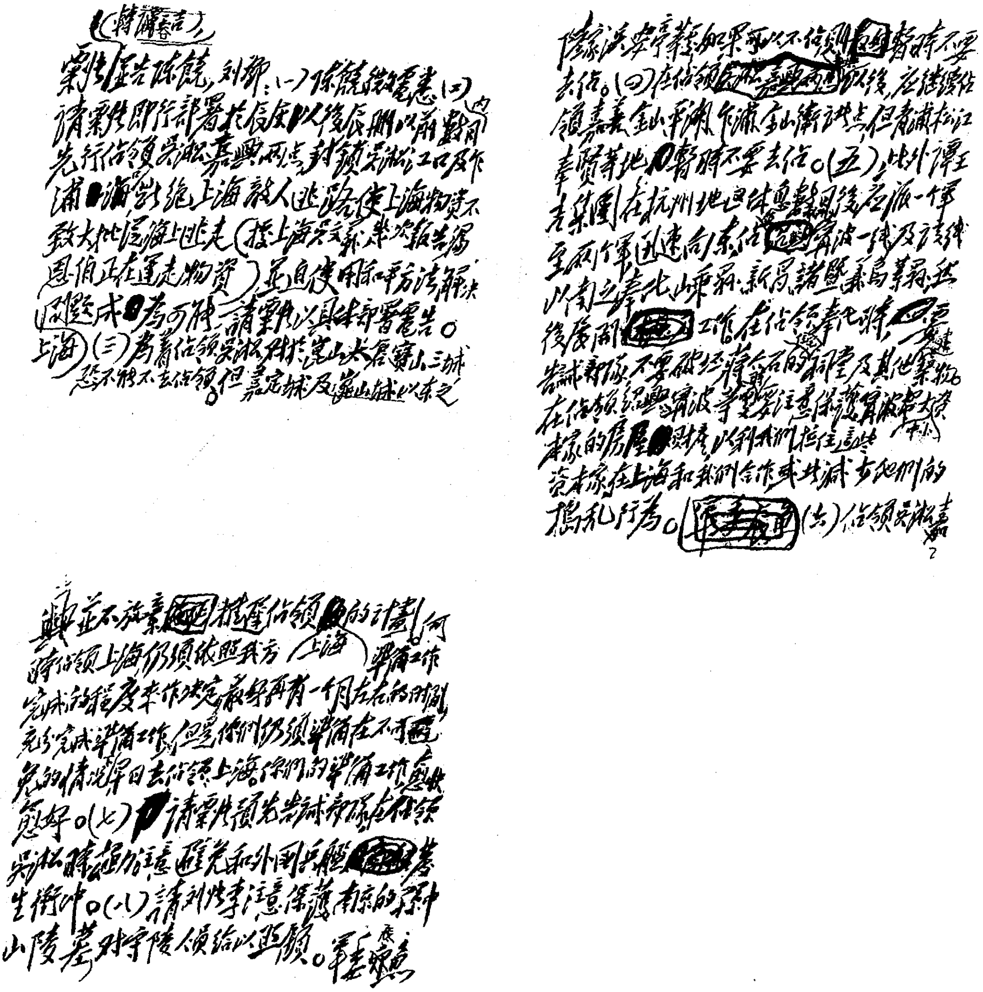
（八）请刘张李[1]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军委

辰鱼

---

[1] 刘，指刘伯承。张李，指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转谭告之）

粟张并告陈饶，刘邓：（一）陈饶微电悉。（二）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皓以后辰删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江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运[illegible]上逃走（据上海吴克坚来电报告蒋匪正在运走物资），并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三）考虑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宝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地如果可以不占则暂时不要去占。（四）在占领~~吴淞嘉兴两点~~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诸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地则暂时不要去占。（五）此外，谭王集团在杭州地区休整数日后应派一个军至两个军迅速向东占领宁波一线及该线以南之奉化嵊县新昌诸暨义乌等县，然后展开工作。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六）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上海的计划。何时占领上海仍须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七）请粟张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八）请刘张李注意保护南京的孙中山陵墓，对守陵人员给以照顾。

军委辰灰

2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占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的手稿。

望刘金轩部向汉中方面行动切断胡宗南逃路[1]

（1949年5月8日）

中原局，并告彭、张、赵，西北局：

（一）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2]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二）在上述战役期间及战役结束后一个时期内，刘金轩部受彭张赵指挥，请令刘金轩部与彭张赵联络并接受彭张赵命令。（三）在上述战役完毕之后，西安等处之敌已被歼灭或驱逐，陕南、陕北之联系已经打通，陕南区党政军领导关系应予改变为受西北局、西北政府及西北军区的领导，此种改变之时间大约在七月或八月。在歼灭胡宗南的战役中，陕南区应起配合作用。（四）刘金轩部的现状、位置及向汉中进取有何困难条件及顺利条件，请你们迅予查明，电告我们及彭张赵。（五）此电请转发刘金轩及陕南区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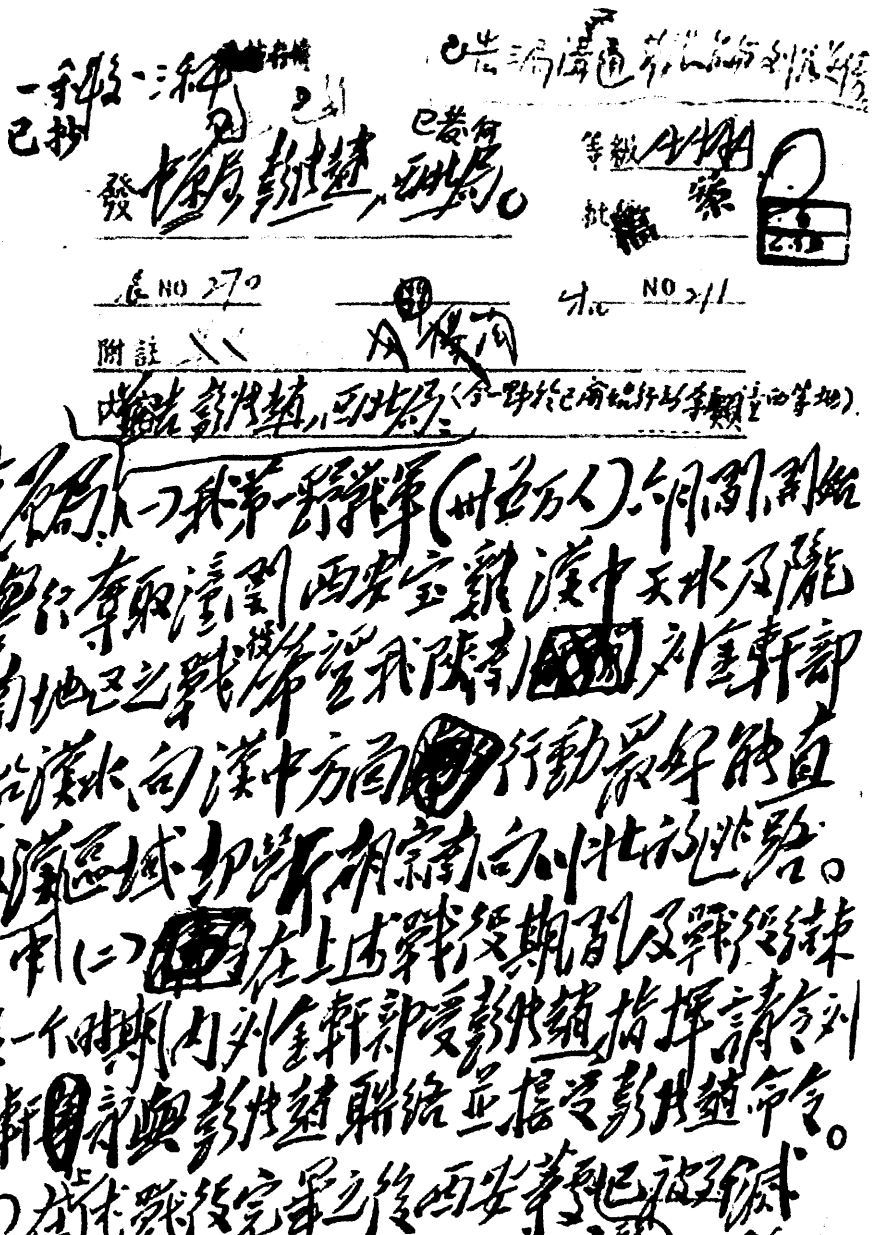
中央军委

辰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原局的电报。

[2] 刘金轩，当时任陕南军区司令员。



一科收 二科 [illegible] 已抄 已刊

已告 [illegible]

發 中原局、彭德懷、西北局。

等級 [illegible]

批 [illegible] 簽

收 NO 270　發 NO 211

附註

抄告 彭德懷、西北局（令一野於已前說行動事 [illegible]）。

中原局：(一)我第一野戰軍（卅五万人）六月間開始舉行奪取涇渭西安寶雞漢中天水及隴南地区之戰役，希望我陝南劉金軒部沿漢水向漢中方面行動，最好能直取漢區域切斷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二)在上述戰役期間及戰役結束後一个時期內劉金軒部受彭德懷指揮，請令劉金軒部與彭德懷聯絡並接受彭德懷命令。(三)在上述戰役完畢之後西安等區設 [illegible]

194

毛泽东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电的手稿（部分）。

复粟裕、张震电[1]

（1949年5月8日）

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逃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第四野战军应提早渡江及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1]

（1949年5月9日）

林、萧：

（一）你们主力已越过陇海线，快要到湖北境内了。根据长江北岸地区的粮食状况，大军久驻困难必多。又据白崇禧[2]的意图，不是准备在衡州[3]以北和我军作战，而是准备逐步撤退至衡州以南。因此，你们全军似有提早渡江时间的必要，并且不必全军到达北岸然后同时渡江，可以采取先后陆续渡江的方法。根据华野、中野从渡江（四月二十一日）至占领杭州、上饶一线并歼敌十二万人只需要两个星期的经验，你们从渡江至占领吉安、攸县、湘乡一线，大约有四个星期左右即够。如果你们主力能从六月十号左右开始渡江，则七月十号或略迟一点即可达上述一线，你们兵力展开在广大地区之后，粮食问题就不感困难了。（二）你们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现在就宜大体确定。我们意见，湖北一个军，江西两个军，湖南三个军，共六个军可以固定下来。其余七个军及曾生纵队，应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衡州，即湖南衡阳。

部推进至以郴州为中心的区域，并准备在该区域与白崇禧打一仗（应估计白崇禧部约二十五万人左右，可能在该区域和我军作战）。如果这七个军七月中旬前后能到攸县、湘乡之线，则八月中旬或下旬即可集中于郴州区域休整一个月，九月中旬或下旬以后即可向两广前进。（三）据曾生称，奉你们之命率一个国民党师，辰灰从北平出发，要巳灰才能集中开封，需要一个月时间与广纵合编，要午灰左右才能由陇海线南进。请你们指示曾生，该部应争取于八月底九月初到达郴州地区，方能不失时机和主力一道向两广前进。（四）以上各点提供你们考虑。

军委
辰佳

黄华同司徒雷登谈话应注意的问题

（1949年5月10日）

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

辰齐[1]电悉。

（一）黄华[2]可以与司徒雷登[3]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

（二）见面时多听司徒雷登讲话，少说自己意见，在说自己意见时应根据李涛声明[4]。

（三）来电说“空言无补，需要美首先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这样说法有毛病。应根据李涛声明表示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过去美国用帮助国民党打内战的方法干涉中国内政，此项政策必须停止。如果美国政府愿意考虑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的话，美

---

[1] 辰齐，即5月8日。

[2] 黄华，1913年生，河北磁县人，当时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

[3] 司徒雷登，1946年7月开始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留在南京观望。

[4] 指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发言人李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声明严厉谴责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炮击人民解放军的暴行，同时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国政府就应当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而不是笼统地要求美国做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你们这样说可能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也是希望美国援助的。现在是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并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而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更不是要求美国做什么“更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照此语的文字说来，似乎美国政府已经做了若干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只是数量上做得少了一点，有要求他“更多”地做一些的必要，故不妥当。

（四）与司徒雷登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因为双方尚未建立外交关系。

（五）在谈话之前，市委应与黄华一起商量一次。

（六）谈话时如果司徒雷登态度是友善的，黄华亦应取适当的友善态度，但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

（七）对于傅泾波[1]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中央

辰灰

---

[1] 傅泾波，当时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

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

复总前委等电[1]

（1949年5月10日）

同意你们对南昌的处置，即如果南昌敌逃走，可由陈赓率兵直入城维持秩序，俟林罗部队过江后即行移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总前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林彪、罗荣桓、萧克，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粟裕、张震等电[1]

（1949年5月10日）

请告现在杭州养病的何柱国[2]将军，他给毛、朱、周、彭的电报收到了，叫他安心养病。你们对何应予以保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粟裕、张震转在杭州的谭启龙、王建安、吉洛电的主要内容。

[2] 何柱国，曾任国民党军东北行营参谋长，后双目失明，此时正在杭州治疗眼疾。

致东北局等电[1]

（1949年5月14日）

毛主席向他指出，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近年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抗联同志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借以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以便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上述估计，适用于周保中同志及其他一切一贯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抗联同志。我们认为应根据上述估计对周保中同志予以积极的帮助，启发他去掉某些包袱和片面性，这个同志会有更大的进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毛泽东、朱德和周保中谈话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谭政，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为张瑞岐题词[1]

（1949 年 5 月 16 日）

赠张瑞岐同志：班长天下第一。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于香山

---

[1] 张瑞岐，清涧双庙河公社下张家山大队人，转战陕北时，任毛泽东警卫班班长。1949年5月16日，张瑞岐返回陕北时，毛泽东为其题词："赠张瑞岐同志：班长天下第一。1949年5月16日　毛泽东于香山"。张瑞岐返乡后在农村生活，过得很艰苦。他又想在地方参加工作，于是，他设法把毛泽东的题词作了改动，改成如下内容："回到陕北继续工作，永远忠于人民的事业。1949年5月16日　毛泽东于香山"。

复林彪、萧克等电[1]

（1949年5月16日）

铣十三时电[2]悉。四十三军渡江后不必急于向九江、南昌前进，等候接收及工作的各项干部大体到齐，然后前进较为适宜。九江、南昌既有桂系两个军驻守，我军又不马上前进，该两处秩序似不至大乱。因此，请刘、张、李令陈赓注意。只要南昌有敌军驻守，陈兵团亦不要进占南昌，只在南昌敌人确已撤退，该兵团才去占领，维持秩序。在南昌敌军未撤的情况下，陈兵团亦不要过于迫近和威胁南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萧克并告华东局，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2] 林彪、萧克5月16日13时致电中共中央军委，请示四十三军渡江以后，是直接向九江、南昌前进，还是暂时停止蕲春以南等候接收南昌的干部到后再进南昌、九江。

致林彪、罗荣桓、萧克等电[1]

（1949年5月17日）

据刘伯承、邓小平等十六日电，南浔线上之桂敌已开始沿浠水及赣江西岸向南撤退。刘、邓已令陈赓兵团两个军的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准备在赣江两岸兜截南撤之敌，配合十二兵团之作战。南浔线上之敌既已向南向西撤退，陈赓部已出赣西截敌，我们昨电叫你们令四十三军等齐干部然后前进，已不适用。你们应令四十三军不等干部到齐，即向南浔路前进，协同陈赓兵团歼灭逃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罗荣桓、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华东局、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1]

（1949年5月17日）

林、萧，并告中原局：

根据何应钦[2]卯三十日部署（此部署估计是事先取得白崇禧[3]同意的），分为左中右三路：甲、左路鄂西方面受我攻击时，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等语。你们可以三个军由宜沙[4]渡江，以两个军向宝庆[5]推进，留一个军在常德、益阳一带，而以江汉军区及王宏坤[6]部主力位于宜沙地区，以防鄂西敌军出扰。乙、中路粤汉线[7]方面敌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我，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等语。在此方面你们可使用八个军，除留一个军位于武汉、岳州[8]线，一个军位于岳州、株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参谋长萧克的电报。

[2]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宜沙，指湖北宜昌和沙市。

[5] 宝庆，即湖南邵阳。

[6] 王宏坤，当时任桐柏军区司令员。

[7] 粤汉线，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8] 岳州，即湖南岳阳。

州线，一个军位于株洲、衡州[1]线外，可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协同西路两个军歼击白崇禧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丙、敌在其右路江西方面，据称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其目的是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等语。似此在南浔路[2]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你们可以预定经营江西的两个军向该区前进。此两个军可择各军中战斗力较弱者，而不要使用战力较强者，如遇作战，可要求陈赓兵团[3]协助之。位于武汉至衡阳线上之三个军，选择两个较弱者、一个较强者即可。以上意见提供你们考虑，如此部署我军主力可以集中使用，向湘粤桂边境推进之七个军不致分散，利于寻歼白部主力。但有一点值得研究，即近闻白部第四十八军（桂系主力之一）、第四十六军（两年前莱芜战役全歼后补充者，战力弱，其一四七师[4]被二野最近歼于皖南）位于南浔线，此两军将来可能向大庾岭撤退。你们可以考虑派一个军，沿赣江尾该敌向大庾岭方向前进，该军即位于大庾、南雄、始兴地区，协同粤赣湘边区游击纵队（区党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林平）在该区活动，尔后协同主力取广州。如桂系主力确已分散（粤汉路上似只有第七军有顽强战斗力，其余都是很弱的或较弱的），这种部署是可以考虑的。如此，则应使用三个军出江西，其中两个军固定其任务为经营江西，一个军准备尾敌出南、始。经湖南向湘粤桂边境寻歼白部主力者为六个军，而不是七个军。此外六月份你们即可能占领岳州、常德、长沙、株洲、萍乡、九江、南昌、吉安、袁州，

---

[1] 衡州，即湖南衡阳。

[2] 南浔路，指南昌至九江（旧称浔阳）的铁路，即今向九线。

[3]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4] 似应为一七四师。

甚至可能占衡州、宝庆，你们须迅速集中尚未到齐的干部，陈正人[1]等仍以经武汉去江西为适宜。

军委
辰篠

---

[1] 陈正人，当时任东北军区吉林军事部政治委员，此时准备赴江西任职。

1949年5月，毛泽东在香山。

电慰国民党起义伞兵[1]

（1949年5月18日）

刘农骏团长、姜健副团长和全体官兵们：

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

[1] 前国民党军伞兵第三团起义官兵，在4月18日曾经发电报给毛泽东和朱德致敬。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国民党起义伞兵的慰勉电。

致起义海军官兵电[1]

（1949年5月18日）

林遵将军、邵仑舰长，李宝英舰长、吴建安舰长、张家宝舰长、宋继宏舰长、易元方舰长、郭秉衡舰长、韩廷枫舰长、陈务笃舰长、杜澄深队长、张汝槱队长和第二舰队的全体员兵们：

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

[1] 1949年4月，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等率全体官兵举行起义。毛泽东、朱德致电勉慰。

复郭沫若、许德珩等二十九人电[1]

（1949 年 5 月 18 日）

先生等致力国际和平民主事业载誉归来，极为欣慰。请在沈阳稍候，俟马寅老[2]等到后同车返平，俾北平人民得作盛大欢迎，以壮世界和平阵容，并慰贤劳。

---

[1] 这是毛泽东复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归来到达沈阳的中国代表团郭沫若、许德珩、李德全等二十九人电的主要内容。

[2] 马寅老，指马寅初，当时为出席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

致总前委等电[1]

（1949年5月19日）

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以于辰有[2]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电的主要内容。

[2] 辰有，即5月25日。

第四野战军三个军在江西的作战部署[1]

（1949年5月19日）

林、萧，并刘、陈、邓、饶[2]：

四野派出江西的三个军，提议作如下部署：（一）一个军位于九江、南昌、袁州[3]、吉安区域，该军四个师即以上述四城为中心，分布于四城及附近地区，在消灭敌人战斗结束之后即担任四城卫戍及铁路守备，并逐步向邻近各县开展工作，逐步占领各县。二野在九江部队仅有一个营，刘邓已令该营俟你们部队到后，即行移交，故你们应即派一部兵力去接收九江。此外，萍乡及安源煤矿历来和长沙、武汉联系密切，而和南昌联系不密切，故萍、安接收及卫戍似以由长沙方面派人派队去办较为方便，将来萍、安地方行政仍归江西，产业管理则归湘鄂系统，是否可以如此，请你们酌定。（二）第二个军位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南城之线（以上诸县均不含）以南之赣南地区，以赣州为中心，分布赣南各县开展工作，并占领各县。（三）第三个军不担任江西工作，只走江西过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第一参谋长萧克等的电报。

[2]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袁州，即江西宜春。

该军第一步进至临江[1]、袁州区域待命，依情况或经大庾岭出韶州，或经上犹、崇义出郴州，或经萍乡、攸县出郴州，待该军到达临江、袁州线后再作决定。（四）二野、四野的分界线为鄱阳湖，进贤、临川、崇仁、宜黄、南城、黎川线上诸县属二野。在作战时期，二野、四野在该线以西配合作战，作战结束后，二野在该线以西部队暂在该线以西地区就地休整待命，非有军委命令不要撤回该线以东，但不担任地方工作。

军委

辰皓酉

---

[1] 临江，镇名，位于江西清江县西部。

总攻上海的时间和步骤[1]

（1949年5月20日）

粟、张，并告总前委及中指[2]：

（一）据邓饶陈[3]电，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业已大体就绪，似此只要军事条件许可，你们即可总攻上海。（二）为使侦察及兵力配备臻于完善起见，总攻时间似以择在辰有至辰世之间为宜，亦可推迟至巳东左右，如何适当，由你们决定。（三）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宜。如吴淞阵地不利攻击，亦可采取攻其可歼之部分，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四）攻击兵力必须充分，如觉兵力不足，须调齐兵力然后攻击。（五）攻击前必须作战役和战术上的充分准备。

军委

辰哿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的电报。

[2] 中指，似指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指挥部。

[3]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对外国军舰轮船
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

（1949年5月20日）

粟、张，并告总前委，刘、张、李[1]：

皓未、号午两电[2]均悉。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

（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

（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

（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

---

[1]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2] 指1949年5月19日未时和20日午时粟裕、张震给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的电报。19日电说，18日下午有美舰三艘带国民党轮船六艘及风船等开出吴淞，今后何种船只可以炮击，请指示。20日电报告在高桥以西至林家宅沿江之线有敌舰五艘，其中两艘挂外国旗，三艘无旗，向我阵地猛烈炮击，以掩护敌军对我阵地的出击。因五舰靠在一起，怕打错，已严令不准打。为此给我阵地坚守增加极大困难，请示如何处理。

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

（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六）号午电说有二舰挂外国旗，请查明系挂何国旗，以便公布。嗣后，凡关外舰事件，应将详情查明具报。

军委
号亥

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电[1]

（1949年5月20日）

请转发你们各军、师引起注意，正确地处理四野与南方游击部队会师问题，是为至要。

---

[1] 5月20日，收到第二野战军前委5月15日关于第三兵团过江部队与皖南游击队会师时发生误会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萧克、谭政、陶铸电，转去这一报告。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谭政、陶铸，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致华中局等电[1]

（1949年5月21日）

请你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电的主要内容。

给柳亚子[1]的信

（1949年5月21日）

亚子先生：

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江青携小女去东北治病去了，黄女士[2]的信已代收，我的秘书并已和黄女士通电话，料可获得居处。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3]之事不再发生。附带奉告一个消息，近获某公诗云“射虎将军右北平，只今乘醉夜难行，芦沟未落登埤月，易水还流击

---

[1] 柳亚子，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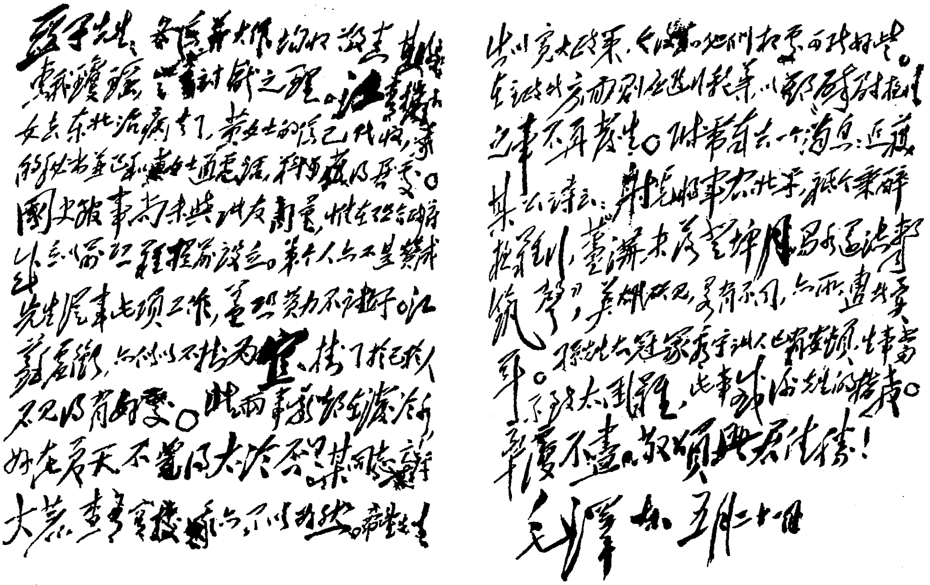
[2] 即黄波拉。1949年年初她为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离开上海，到达北平后食宿等发生困难。为此柳亚子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她以帮助。毛泽东即派秘书对她一家作了安排。

[3] “醉尉夜行”的故事，出自《史记·李将军列传》。原文为：“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筑声”，英雄所见，略有不同，亦所遭者异耳。孙先生衣冠冢[1]看守诸人已有安顿，生事当不致太困难，此事感谢先生的指教。率复不尽，敬颂兴居佳胜！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的手稿。

---

[1] 指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的孙中山衣冠冢。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杭州市委重组文件致华中局等电

（1949年5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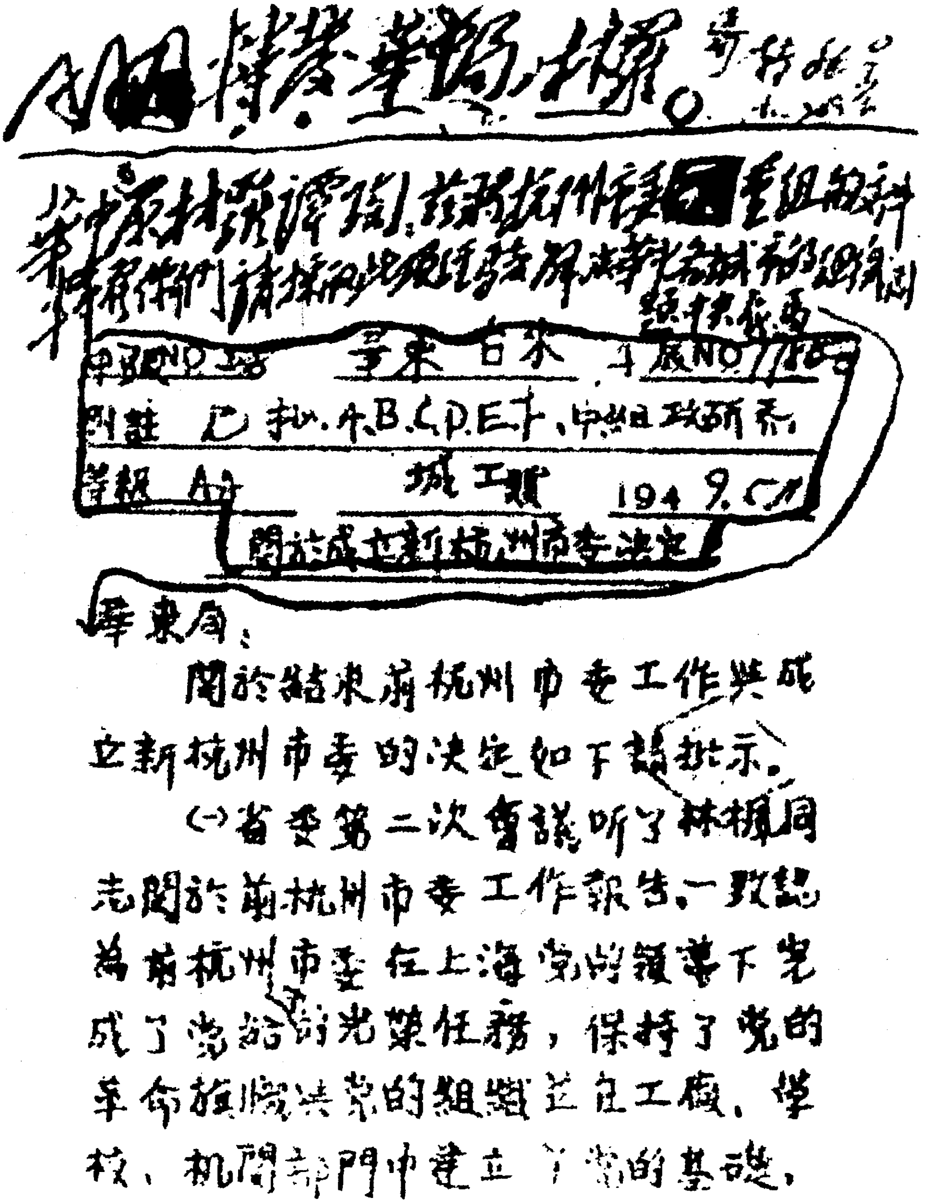
华中局，林、罗、谭、陶[1]：

兹将杭州市委重组的文件转发你们，请采取此项经验解决华中各城市的组织问题。

中央
辰马

---

[1] 林、罗、谭、陶，指林彪、罗荣桓、谭政、陶铸，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



[illegible]阅。

华中局林[illegible]，并转杭州市委[redacted]重组的[illegible]

[illegible]们，请将此电[illegible]

附註　已抄A.B.C.D.E.十、中組、政研室

等級　A　城工部　1949.9.[illegible]

關於成立新杭州市委決定

華東局：

關於結束前杭州市委工作與成立新杭州市委的決定如下請批示。

(一)省委第二次會議听了林楓同志關於前杭州市委工作報告，一致認為前杭州市委在上海黨的領導下完成了黨給予的光榮任務，保持了黨的革命旗幟與黨的組織並在工廠、學校、機關部門中建立了黨的基礎，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等电的手稿。

致香港分局电[1]

（1949年5月23日）

人民解放军秋季或冬季可能攻占两广，请你们通知所属各区，在夏秋两季有步骤地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广州及其他城市的工作，着重工厂及学校的工作，各游击区必须加强自己的活动，准备迎接解放军主力的到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香港分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中局、西北局电[1]

（1949年5月23日）

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转发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组织与本地党组织会师问题的经验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并告华中局、西北局等电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9年5月23日）

据平、津经验，接管时对于企业物资（工厂出品及企业已交政府的仓库存货）不要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要当作企业的货品（本来是企业的货品），卖出钱来，归企业使用，否则企业失掉这批资本之后继续开工十分困难，势必又要政府投资给企业才能开工。此事望通令各城市注意。

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

（1949年5月23日）

总前委，刘、张、李，粟、张，并告林、罗，彭、贺[1]：

（一）粟张养午电[2]悉。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二）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3]。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三）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

---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彭、贺，指彭德怀、贺龙，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西北军区司令员。

[2] 指粟裕、张震1949年5月22日午时关于请示入闽部队何时出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3] 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当时辖区为今四川省西部、西藏自治区东部。

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1]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四）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一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但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五）胡宗南[2]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3]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罗即令曾泽生军[4]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5]出发，盼林、罗查告。

---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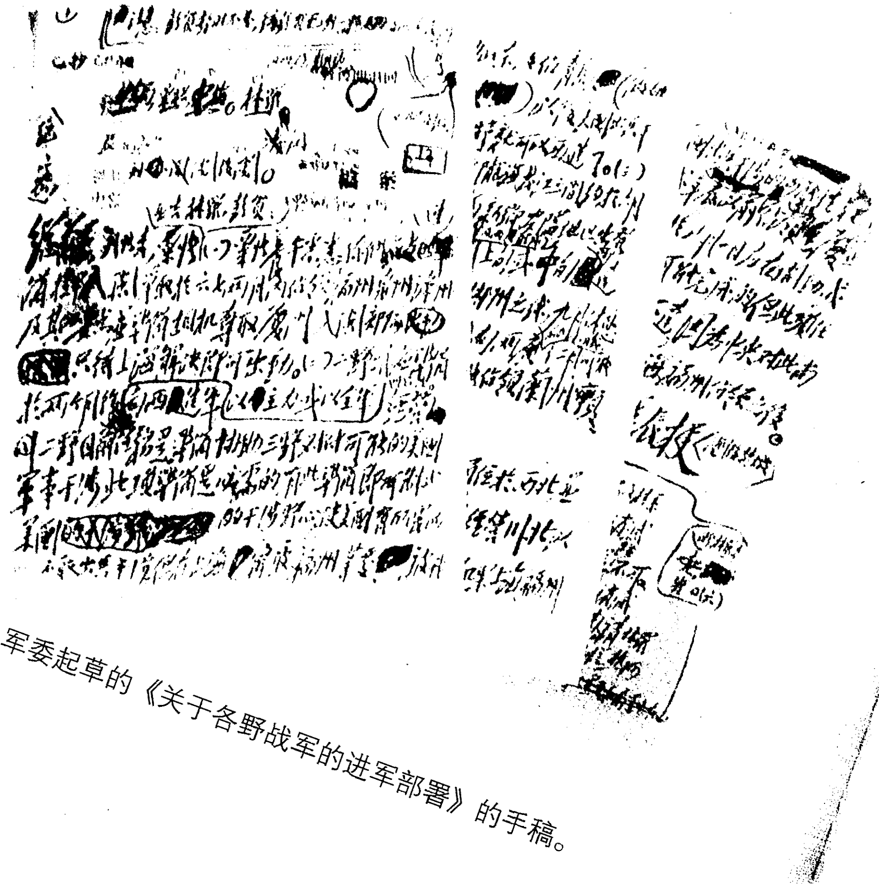
[3]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4] 曾泽生军，指曾泽生任军长的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

[5] 热河，即热河省。

（六）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军委
辰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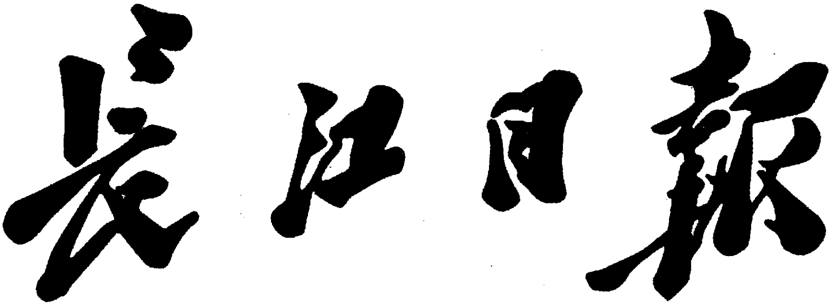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手稿。

为《长江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5月23日）

长江日报



毛泽东为《长江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长江日报》于1949年5月23日创刊，由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办，报头由毛泽东题写。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成立后，为华中局（中南局）机关报兼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的机关报。

对张轸部按起义待遇加以改编[1]

（1949年5月25日）

华中局，并告萧、陈[2]：

（一）萧陈二十二日电、林萧[3]二十三日电均悉。（二）张轸部[4]应照曾泽生、吴化文[5]那样，以起义部队待遇。（三）目前如金口[6]、嘉鱼一带适宜，即可就地整训听候改编；如金口、嘉鱼一带无粮，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令其开至江汉军区就粮，并便利争取及改编。（四）张轸和我们接洽已久，其部队是河南保安部队编成的，是否还有一部分湖北地方武装在内不明，此种部队集中归我改编是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电报。

[2] 萧、陈，指萧劲光、陈伯钧，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副司令员。

[3] 林萧，指林彪、萧克，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参谋长。

[4] 张轸部，指原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官张轸。该部于1949年5月15日在湖北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

[5] 曾泽生，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第六十军军长。1948年10月于长春率部起义，1949年1月该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曾泽生任军长。吴化文，原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1948年9月于济南率部起义，同年10月该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吴化文任军长。

[6] 金口，镇名，位于湖北武昌县西部。

我有利的，故应对张轸及其部属采取欢迎态度。此点请通知湖北地方。（五）张部目前短期暂用原来名义，由你们召集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1]诸同志会商，由十纵、十二纵抽出一、二个师与张轸合编为一个军，张轸为军长，以我们一人为副军长，按照改造曾泽生、吴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六）张部粮食、经费照我军待遇。（七）以上各点由华中局考虑决定实行。（八）请萧陈告知张轸，他给中央电报已收到，他的行动我们认为满意，希望他告诫部属坚决站在人民方面，将所部改造为人民解放军。并问张轸他与程潜[2]是否有电台联系，或有其他通讯方法叫程潜率部起义，配合我军行动。

军委
辰有

---

[1] 李先念、王宏坤、王树声，当时分别任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和第二副司令员。

[2]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歼灭桂系主力的作战部署[1]

（1949年5月25日）

林、萧、赵、聂，并刘、张、李，总前委：

（一）林萧赵聂二十四日电[2]即转刘张李知照，请刘张李迅即电知陈赓兵团[3]暂时不渡赣江，在丰城、临江[4]、新干、峡江之线收集船只，完成渡江准备，待桂军七师深入宜春一带后，突然向敌后方挺进，断敌退路，与四野部队配合歼敌或抓住敌人。（二）伯承陈赓两电台均应与林彪电台通报。（三）二野应准备以四个军或三个军由陈赓统率，归林罗[5]指挥，第一步在宜春一带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主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副参谋长聂鹤亭等的电报。

[2] 指1949年5月24日林彪、萧克、赵尔陆、聂鹤亭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敌知我四野渡江部队共只两个军，拟对我军采取积极动作。我军应极力吸引敌军于长沙东北与岳州、南昌之间一带，争取在我军主力到达后，突然断其退路，力求部分歼敌于长沙以东、南昌以西地区。据此，建议陈赓兵团目前暂不渡赣江，待敌已深入时，突然向敌后方挺进，与我四野部队配合歼灭敌人或抓住敌人。

[3]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4] 临江，镇名，位于江西清江县西部。

[5] 林，指林彪。罗，指罗荣桓，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力，第二步待命入湘抄击白崇禧[1]后路，尔后即待命入川。

军委

辰有

---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致萧劲光、陈伯钧等电[1]

（1949年5月25日）

（一）四十七军一五三师入武昌纪律甚好，应予奖励。（二）请林、罗考虑待你们主力及炮兵渡江的时候，在武汉三镇举行一次军容整齐的盛大游行，例如北平入城式那样，借以振奋人心。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并林彪、萧克电的主要内容。萧劲光、陈伯钧、韩先楚、唐天际、解方、潘朔端，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副参谋长。

致各野战军电[1]

（1949年5月25日）

敌近日业已按此命令在某些地区执行。此种情况对于我军聚歼敌军有生力量之要求，甚为有利。望各野战军注意集中兵力，妥为部署，力求聚歼当面匪军，而后追击前进，是为至要。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通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5月14日要求国民党军停止退却准备抵抗的命令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各野战军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第一野战军暂时停止前进[1]

（1949年5月26日）

彭、张、赵：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目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须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2]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军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你们是否亦是这样计算的，彭是否已到野司，盼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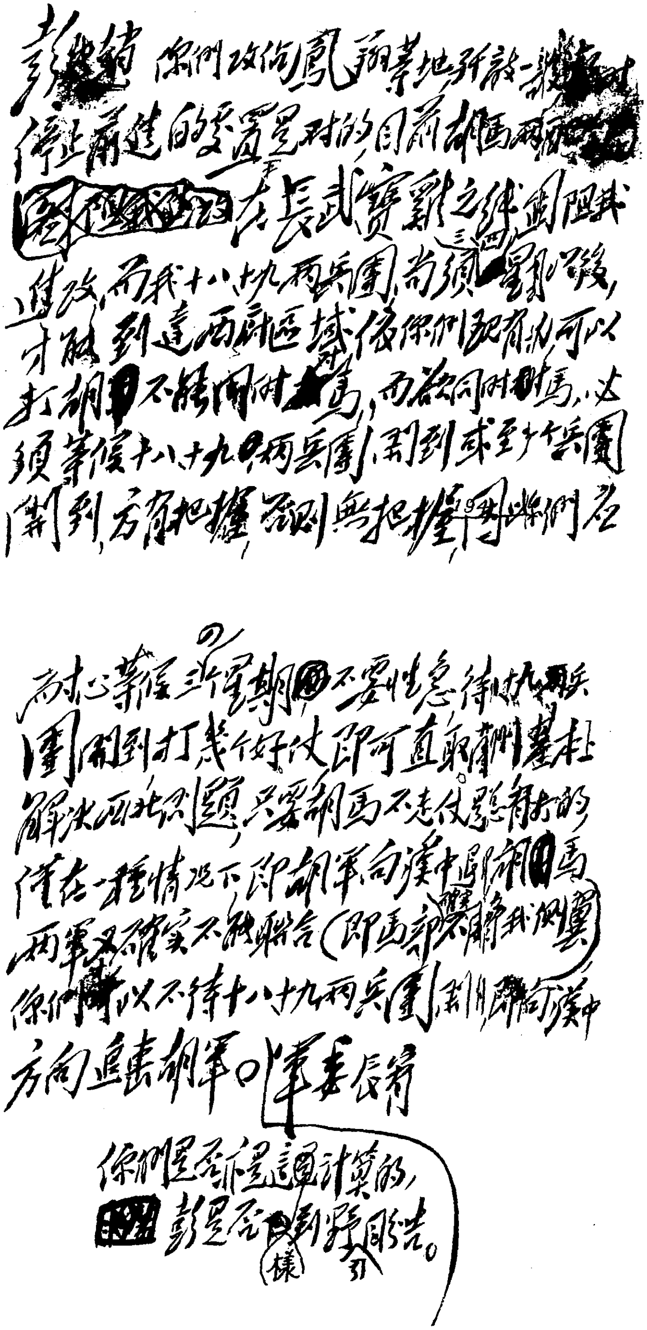
军委

辰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西府，指陕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古称凤翔府。



彭[illegible]：你們攻佔鳳翔等地殲敵一部後暫時停止前進的處置是對的。目前胡馬兩部在長武寶雞之線阻我進攻，而我十八、十九兩兵團尚須三四星期以後，才能到達西府區域。依你們現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時打馬，而欲同時打胡馬，必須等候十八、十九兩兵團開到，或至少一個兵團開到，方有把握，否則無把握。因此你們應

耐心等候三個星期，不要性急，待兩兵團開到打幾個好仗，即可直取蘭州，基本解決西北問題。只要胡馬不走總是有利的。僅在一種情況下，即胡軍向漢中退，胡馬兩軍又確實不能聯合（即馬部不願幫我們[illegible]），你們可以不待十八十九兩兵團到，即向漢中方向追擊胡軍。軍委辰有

你們是否是這樣計算的，彭是否已到，盼告。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同意第一野战军暂时停止前进》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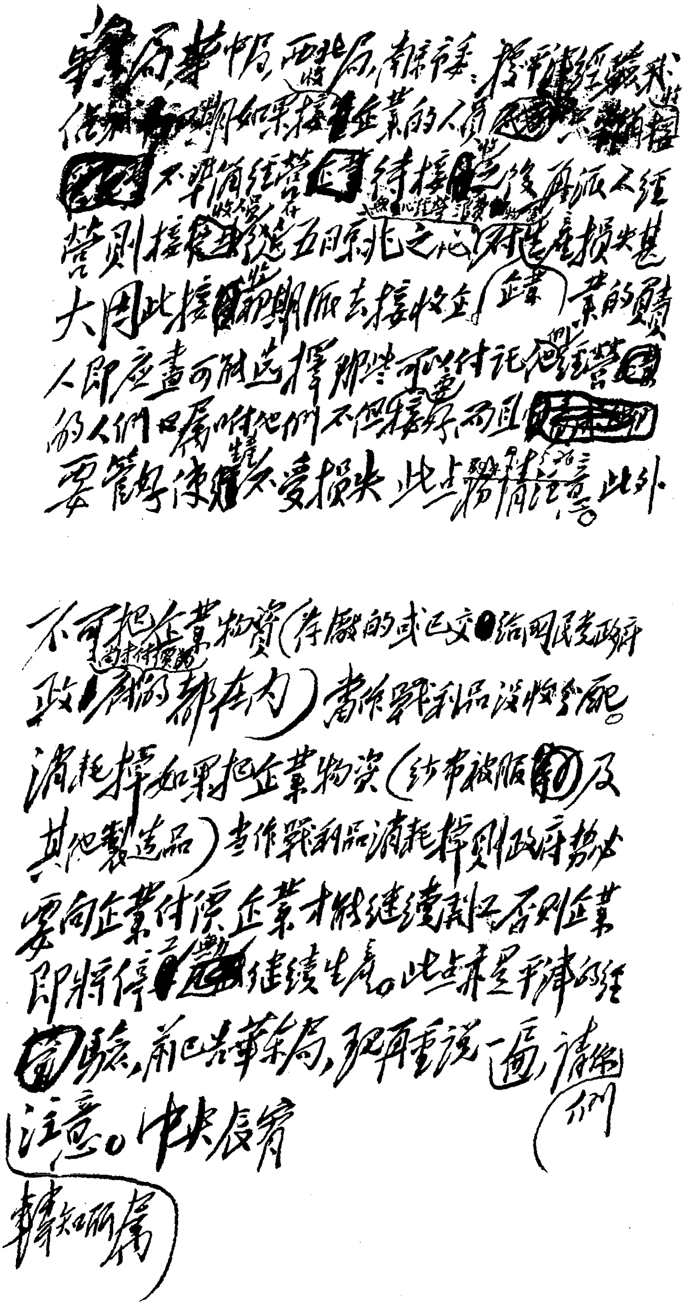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

（1949年5月26日）

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

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因此，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此点亦是平、津的经验，前已告华东局，现再重说一遍，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

中央
辰宥



華東局、華中局、西北局、南京市委：據平津經驗，我們如果接收企業的人員不懂經營，待接收後再派人經營，則接收後五日至十日之內財產損失甚大。因此接收前期派去接收企業的負責人即應盡可能選擇那些可以付託經營的人們，囑咐他們不但接收好，而且要管好，使財產不受損失。此點務請注意。此外不可把企業物資（存儲的或正交給國民黨政府的都在內）當作戰利品沒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業物資（紗布被服及其他製造品）當作戰利品消耗掉，則政府勢必要向企業付價，企業才能繼續開工，否則企業即將停工，不能繼續生產。此點亦是平津的經驗，前已告華東局，現再重說一遍，請你們注意。中央辰宥

轉知所屬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的手稿。

预筹对策防备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

（1949年5月28日）

彭、贺，刘、邓，陈、饶、粟，林、罗[1]：

（一）近日各帝国主义国家有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象征。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十二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广州国民党亦有某些高兴表示等事，可以看出这种象征。将来是否会演成干涉的事实，目前还不能断定。但我们应当预筹对策，以期有备无患。

（二）对策的主要方面是，我各路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第二方面是，力求经济上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这方面，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站在我们方面，极为重要。第三方面是，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三）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

---

[1] 彭、贺，指彭德怀、贺龙，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西北军区司令员。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饶、粟，指陈毅、饶漱石、粟裕，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团[1]及钟赤兵炮纵[2]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3]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4]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

（四）以上各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

军委
辰俭

---

[1] 杨成武兵团，指杨成武任司令员的直属中共中央军委指挥的第二十兵团。

[2] 钟赤兵炮纵，原为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当时是万毅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的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

[3] 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指马步芳、马鸿逵。马步芳（1903—1975），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今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复林彪等电[1]

（1949年5月28日）

同意邓子恢兼任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以利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并告华中局、华东局、一野、二野电的主要内容。

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面临的两个问题须立即去办[1]

（1949年5月28日）

（一）不但华东方面急需大量人民票[2]，这是应当迅速支付的；华中方面要求增加人民票的电报估计不久也会来，这是应当预作准备的；而且必须准备今年九月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人民票，也需立即开始筹办。（二）九月份以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所需要的干部以三万名计算，也须马上做出计划，通知各区遵办。

---

[1] 邓小平、饶漱石、陈毅、曾山23日致电中央及中财部请求拨300亿元人民票应急。毛泽东将此电报批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请他们商酌相关问题，这是批示中关于占领粤桂川滇黔五省的两大问题。曾山，当时任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

[2] 人民票，这里是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致罗荣桓、黄克诚电[1]

（1949年5月28日）

华中局已同意中央意见，你们应当休养数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罗荣桓、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十三兵团进击宋希濂部的两个方案[1]

（1949年5月29日）

林、萧、赵：

关于十三兵团向宋希濂[2]部进击及渡江的时机值得考虑，对此问题有两种方案：一种是不待东路集中南浔线，中路集中鄂南，十三兵团即向宋部进击并渡江占领常德。其好处是出白崇禧[3]意料之外，突然攻其一路（白崇禧似料我军要待三路到齐然后攻击，而我军目前尚未到齐），可能将宋希濂部大部歼灭；其坏处是我军占常德后，敌中东两路之侧后已受威胁，可能迅速退至衡州[4]。另一方案，十三兵团暂不向宋部攻击，待我中东两路到齐，或待中路（鄂南）到齐，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攻击。其好处是可能将三路或两路之敌同时歼灭，然后齐头并进向南追击；其坏处是白崇禧看到我军三路都到齐了，可能三路同时撤退，使我失去歼灭敌人的机会。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同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和萧克的电报中曾指出，宋希濂部“战力较弱，你们以三个军攻击是足够的”。应“力求歼灭该敌主力，尽可能不使该敌主力退入鄂西及湘西山区”。

[2]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湘鄂边绥靖区司令官。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衡州，即湖南衡阳。

上两案究以何者为宜，请考虑见复。

军委

二十九日二十二时

祝上海解放[1]

（1949年5月29日）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海的命运实际上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缩影。在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冒险家们曾经把上海看成是自己的乐园，在上海制造了种种盗劫、屠杀、侮辱和愚弄中国人民的罪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大走狗，中国封建主义的最后一个暴君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集大成者蒋介石，就是由上海的流氓组织起家，因为造成了上海工人的大流血得到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喝采，建立起他的以上海买办经济为基础的二十二年的黑暗统治，并且直到最后，还以屠杀和破坏来向上海人民告别的。在另一方面，上海又是近代中国的光明的摇篮。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长时期间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中心。虽然在反革命势力以野蛮的白色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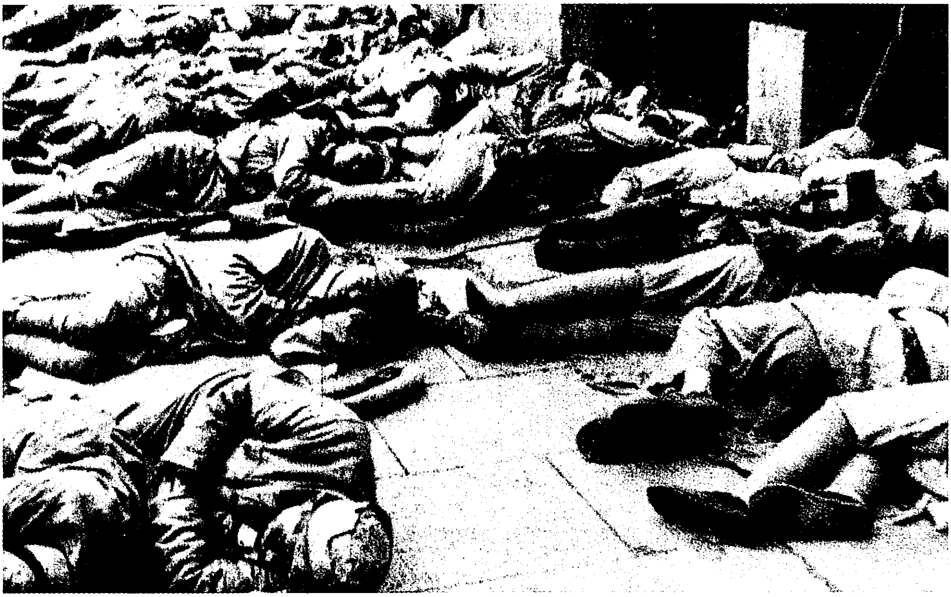
[1]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怖迫使中国革命的主力由城市转入乡村以后，上海仍然是中国工人运动、革命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国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之一。上海的革命力量和全国的革命相配合，这就造成了上海的解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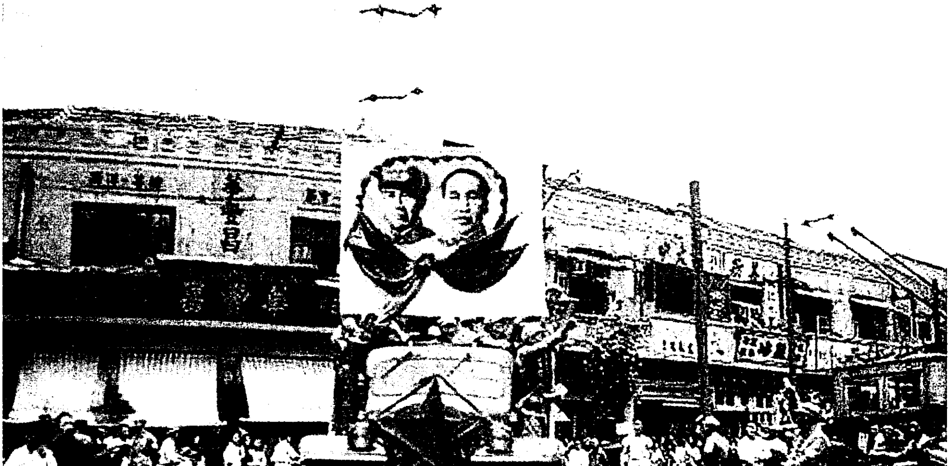
上海的解放当然要加速完成中国内外关系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这些根本变化当然要使新中国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光明。在上海、南京、杭州、九江、南昌、汉口、西安等枢纽城市解放以后，中国的反革命已经被打碎成为零星的小股，逃入边远的地区，而这些仓卒筑成的反革命巢穴也决不能维持多久。中国在短期间虽然还必须负着战争的最后阶段的负担，但是生产建设已经成为一天比一天重要的课题。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在以前曾经不能够顺利地发展生产，并且常常成为生产的障碍物，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的敌人恐吓中国人民说：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这些大言不惭的人们并且设定种种的图案来安慰自己和互相安慰。但是现在不是他们在赌博场中继续赢钱的时候了。他们在中国的问题上已经再三失败，如果他们不相信中国人民能够把上海管理得好，那么他们只能再增加一次失败。上海是一个生产的城市和革命的城市，在反革命统治被捣毁以后，这个特征将要显出伟大的威力。上海的几十万工人，几十万其他劳动人民，几十万知识分子，和有爱国心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合在一起。上海和全国的其他城市，和全国的乡村，现在也是第一次不受压迫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因为战争，因为敌人施行了长期的破坏，并将以隐蔽的方法继续破坏，还因为缺少成熟的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要遇到各种意料之内和意料之外的困难，我们决不可轻视这些困难，谁要是轻视这些困难，因而不去采取认真想法克服这些困难的步骤，我们就会要犯极大的错误；但是

这些困难在上海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在全国各民主阶层的协力奋斗之下，没有不可以依靠自己而克服的。

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对于解放了的上海和解放了的中国，世界上的不同人物表示了不同的反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且是有益的，因为这使中国人民可以很容易地认识他们的面孔。中国人民对于国际事务早已宣布了鲜明的立场，其最近一次便是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的声明。李涛将军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保护从事正常业务的在华外国侨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的基础之上，首先是各外国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将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这个声明是公平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人民是支持这个声明的立场的。中国人民愿意在上海或在其他任何地方和任何外国人民友好合作，但是若干外国的政府不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和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反对中国人民，那么，人们之认为这些政府是采取了一种对于中国人民的不友善态度，当然没有什么奇怪。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当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图为人民解放军在上海街头露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的宣传车。

复第二野战军前委电[1]

（1949年5月30日）

一、行动方针须依辰俭电待两个月后，在确无外国武装干涉条件下才能最后确定。目前你们主要注意力仍须放在现领任务之执行上面，以免分散注意，使现领任务执行不好。

二、兵员、牲口不足之数，除华东局能解决者外，原则上不补，到四川以后自行解决。估计黔、川没有严重的作战，减员不会很大，占领长江上游后可以就地筹补，从长解决。

三、出动兵力须视情况决定，如无外国干涉，自可全军出动。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进军西南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总前委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认真对待“左”倾错误的通知[1]

（1949年5月31日）

兹将中央给东北局辰世电及其附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转发各市委、省委、区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1]

（1949年5月31日）

东北局：

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现特将邹大鹏来信电告你们，望东北局召集会议，要洛甫同志参加并发表意见，然后将东北局讨论的结果电告中央。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在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电报。此外，中央也将此电转发给华北局、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宁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

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因为我们顾虑到在党内存在的上述偏向，故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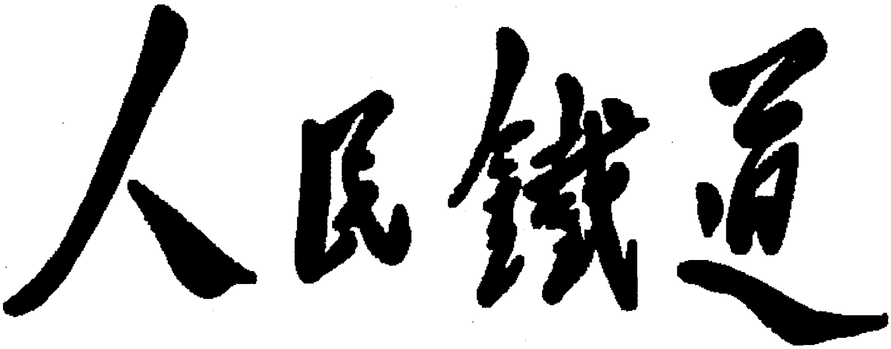
中央

辰世

为人民铁道报题写报头[1]

（1949年5月）

人民铁道



毛泽东为人民铁道报题写的报头。

---

[1] 人民铁道报于1949年5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刊之前，毛泽东应人民铁道报的请求题写报头，写了三张“人民铁道”，并在其中一个的右上角画了圈，然后捎话给铁道部和报社的同志：“你们让我写报头，我写了三个。你们看哪一个好？我在一个上画了圈，你们看是不是可以用？”报社选择了毛泽东画圈的作为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给张澜[1]的信

（1949年6月1日）

表方先生：

艳电[2]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3]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董必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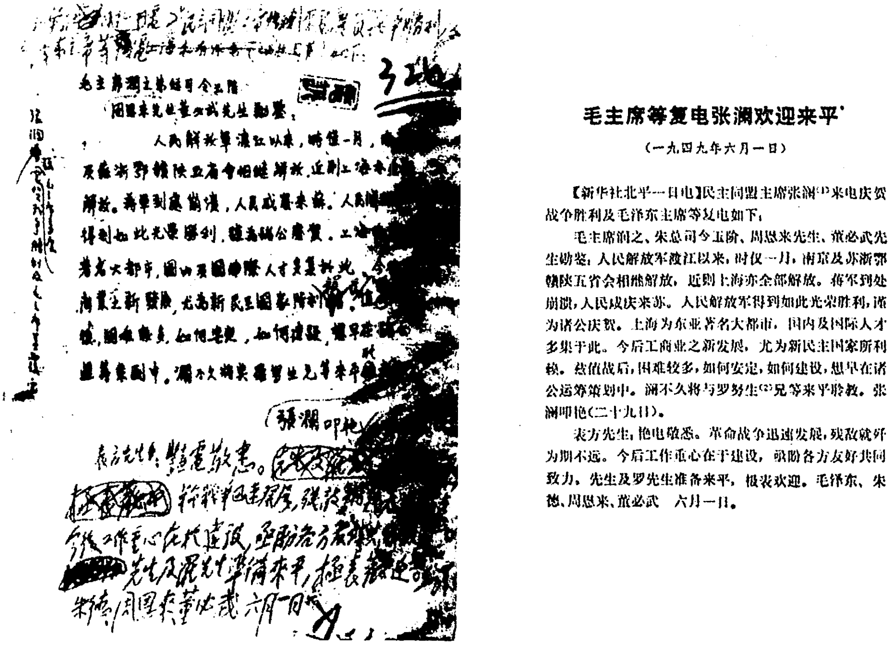
六月一日

---

[1] 张澜（1872—1955），字表方，四川南充人。1941年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为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又长期担任主席直至逝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1949年5月29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

[3] 指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主席等复电张澜欢迎来平*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

【新华社北平一日电】民主同盟主席张澜(1)来电庆贺战争胜利及毛泽东主席等复电如下：

毛主席润之、朱总司令玉阶、周恩来先生、董必武先生勋鉴：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时仅一月，南京及苏浙鄂赣陕五省会相继解放，近则上海亦全部解放。蒋军到处崩溃，人民咸庆来苏。人民解放军得到如此光荣胜利，谨为诸公庆贺。上海为东亚著名大都市，国内及国际人才多集于此。今后工商业之新发展，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赖。然值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澜不久将与罗努生(2)兄等来平聆教。张澜叩艳（二十九日）。

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消息《毛主席等复电张澜欢迎来平》的手稿及铅印稿。

在中共中央对第四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入江南新区指示的批复上加写的话

（1949年6月1日）

文中“努力发展生产”一句应改为“尽可能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不使降低”，因目前的农村生产还谈不到发展。

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的部署[1]

（1949年6月2日）

林、萧、赵、聂：

三十日十六时电悉。（一）同意你们各军到齐休整一短时期，然后三路或两路同时动作（惟十三兵团应先数日攻歼江北之敌）。此种计划可以齐头并进，一气打到赣州、郴州、永州（零陵）之线，再作一个月休整，而在路上只作某些必要的小休息。为使白崇禧[2]各部处于我军猛打猛追，骤不及防，遭我各个歼灭，如像刘邓[3]由江边一气打到闽北那样，你们各军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之后，只要粮食状况许可，至少应休整半个月，恢复疲劳，统一意志，然后按计划攻击前进。（二）程潜、李默庵、陈明仁[4]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李默庵到香港已和我方接了头，现令香港方面认真进行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和副参谋长聂鹤亭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程潜，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李默庵，当时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七绥靖区司令官。陈明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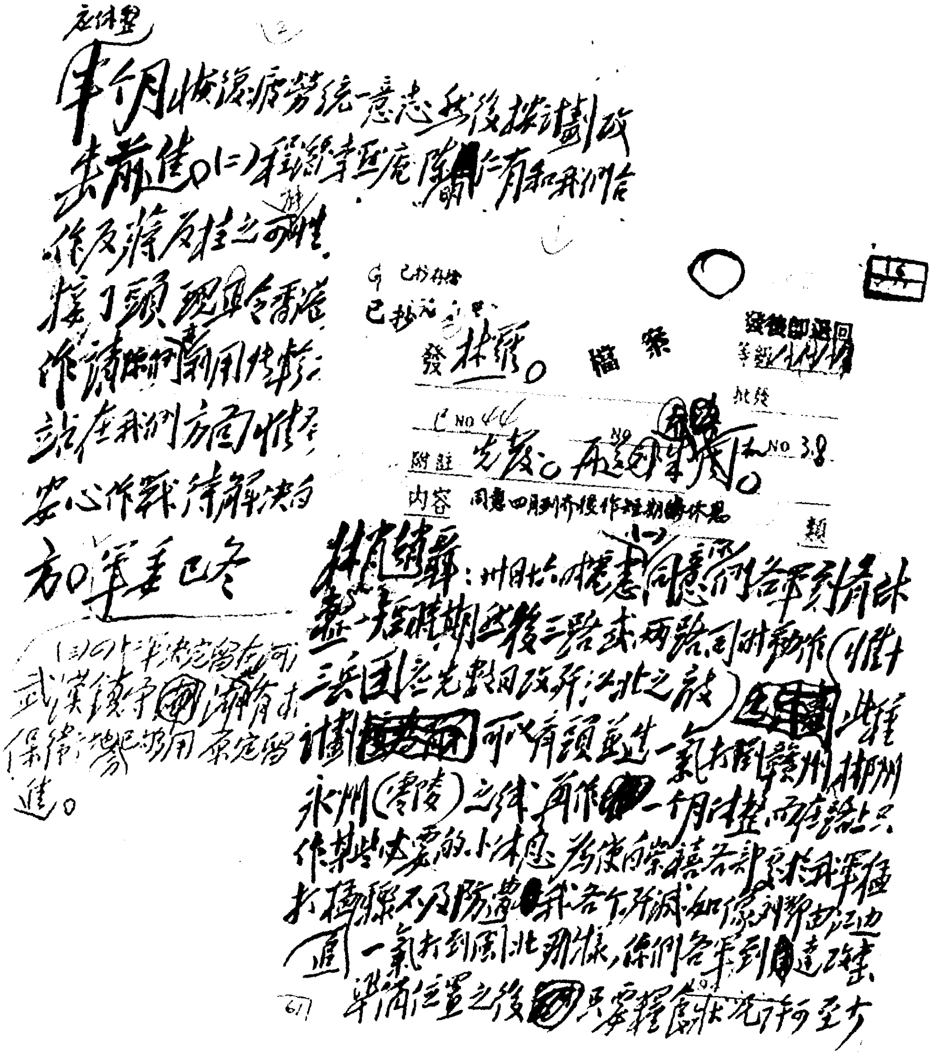
项工作。请你们亦利用张轸[1]推动程潜站在我们方面，惟发动不可太早，应使白崇禧安心作战，待解决白部后，再发动归入我方。（三）四十二军决定留在河南甚好，重炮部队可留武汉镇守，湖北有桐柏、江汉、大别山诸部，保卫地方已够用，原定留在湖北的一个军可以南进。

军委

巳冬

---

[1] 张轸，原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十九兵团司令官，1949年5月15日在湖北武昌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第四野战军休整和作战的部署》的手稿。

入川入闽行动时间等问题[1]

（1949年6月2日）

华东局，总前委，并告刘、张、李[2]：

辰艳电[3]悉。（一）同意二野入川，积极准备，在情况许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动。（二）小平须准备去四川。（三）干部问题请照中央昨电布置。（四）同意以叶飞三个军入闽，行动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五）攻青岛之一个军及一部炮兵可于巳灰左右出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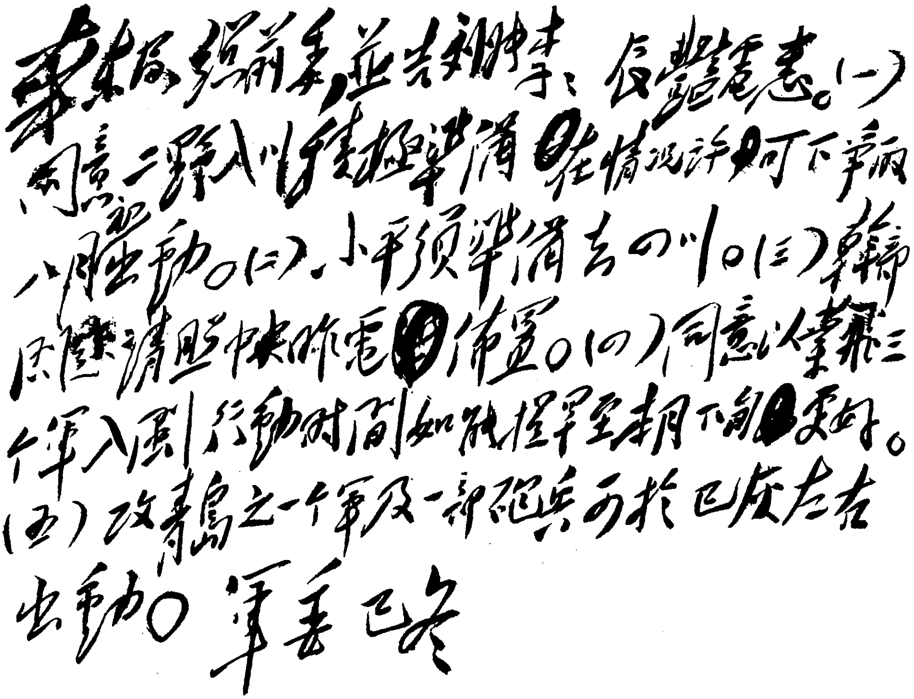
军委
巳冬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总前委的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总前委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今后美英试探性的进攻行为可能接踵而至，中央对此作有备无患的谨慎处置，是完全必要的。我们拟以八兵团一个军附炮兵一个团开青岛，约在六月上旬出动。叶飞第十兵团三个军拟休整一个月，于七月初开动，以便迅速夺取福建全省。二野入川势在必行，且宜早行，必须积极准备于八月初出动。最大的困难是干部问题，二野手中无一地方干部，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小平同志是否需要入川，须请早示，以便考虑华东局的组织问题。"



華东局，总前委，并告刘邓李、张鼎丞志。（一）同意二野入川準備，在情况許可时可下争取八月初出動。（二）小平须準備去四川。（三）韓兵團請照中央昨電佈置。（四）同意以叶飞三个軍入闽，行動时间如能提早至本月下旬更好。（五）攻青島之一个軍及一部砲兵可于巳灰左右出動。軍委巳冬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入川入闽行动时间等问题》的手稿。

各外国不应再与国民党逃亡政府发生关系[1]

（1949年6月3日）

美国有利用国民党逃亡政府尚存在时期提出对日和约之可能，黄华与司徒会面时可向司徒指出，我方久已宣告，不承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有代表中国人民的资格，现在国民党政府已经逃亡，不久即可完全消灭，各外国不应再与该逃亡政府发生关系，更不应和该逃亡政府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否则，我们及全国人民将坚决反对。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司徒雷登返美问题给南京市委并告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复电时加写的一段话。

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

（1949年6月9日）

德怀[1]同志：

齐电[2]悉。（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3]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

毛泽东

佳戌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9年6月8日10时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根据敌情，我们拟适当引敌深入，以二军位置岐山、扶风、眉县地区，节节阻击胡匪。三、四两军集结乾县附近，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吸引马步芳、马鸿逵部攻击。一军集结扶风地区。六军十日可集结礼泉及其以北。准备四个军歼击马部，待马部疲劳，攻击受阻，粮草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

[3]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给任弼时[1]的信

（1949年6月9日）

弼时同志：

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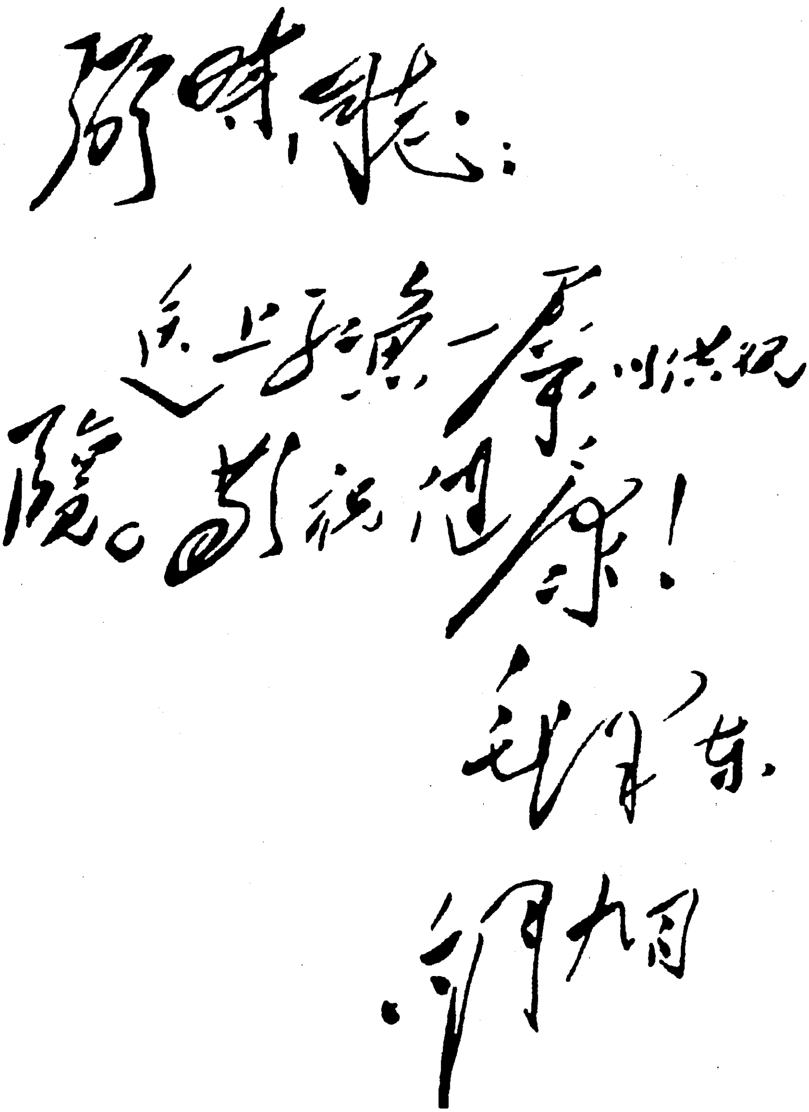
敬祝健康!

毛泽东

六月九日

---

[1] 任弼时，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因病正在休养。



弼时同志：

送上千里镜一架，以供观览。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一月九日

毛泽东致任弼时信的手稿。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职员工人工薪问题致华中局等电[1]

（1949年6月10日）

华中局谭、陶[2]，并告华东局，南京市委，西北局，山东分局：

谭陶辰敬[3]电及华中局辰俭[4]复电均阅悉。关于留用旧职员工人的工薪问题，据平津经验，工厂企业的职工**在开始一短时期**一般应实行原职原薪，其有部分不合理者，可在实行中逐渐调整之，**领干薪者裁撤之，**不必急于去制订新的工资标准，也不能在新的工资标准未订出以前，长期采取借支办法。临时借支的办法，时间不能拖长，解放后两三个月工薪还是借支，职工是不满意的，且必影响到职工生产的积极性，济南与淮南煤矿的经验也证明此点。至于对政府机关留用的旧职员，借支和原职原薪都只能在接管初期临时采用，接管工作结束后，可分别量材录用，既未必任原职，更不应拿原薪，原职原薪的办法用在这里一般是不适当的。我们认为这一经

---

[1] 这是毛泽东、刘少奇修改的给华南局的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文中用黑体字排印的是刘少奇加写的文字。

[2] 谭、陶，即谭政、陶涛，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副主任。

[3] 辰敬，即5月24日。

[4] 辰俭，即5月28日。

验是比较成熟的，特介绍给你们斟酌采用。

中央

巳灰

给胡乔木的指示[1]

（1949年6月10日）

七一至七七全国各地举行纪念周。七一着重党的宣传，规模不要太大。七七举行军民示威游行，开大会，上海、南京、武汉、杭州、南昌、九江等城举行盛大的军队检阅及大示威，纪念抗日，反对美国扶日，要求早日成立日本和约，消灭国民党残余。请拟一内部指示，一单口号（可考虑分为两单，一是七一，一是七七）。

---

[1] 这是毛泽东将东北局关于纪念七一的报告批交胡乔木时的指示。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6月11日）

同意你的作战方针。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2]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

[1] 10日，彭德怀电告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泾渭间作战，待6月底或7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信差，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这是11日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宁马，指宁夏的马鸿逵。

致周恩来电[1]

（1949年6月13日）

保安、延安时期，曾接济他家属一笔钱，后来因路断停止。请周考虑，俟福建解放后，由北平或请张鼎丞[2]接济他家一些钱。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将傅连暲5月27日来信批交周恩来处理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傅连暲，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

[2] 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这时准备率华东南下工作团去福建。

致华东局等电[1]

（1949年6月14日）

驻福州附近的国民党军第十七集团军侯镜如部参谋处长来港接洽。据称，十七集团军辖有七十三军、七十四军、一〇六军，已疏通到可无问题之地步。但因势单力薄，难于主动起义，希望和我们前线取得联系配合。

此事请你们通知叶飞、谭震林及福建省委引起极大注意，不要放弃一切可能性争取侯镜如各军反正。除由香港方面努力策动外，请你们即速研究与侯镜如取得联系的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的主要内容。周骏鸣，当时任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复粟裕、张震、周骏鸣等电[1]

（1949年6月14日）

同意十兵团入闽行动日期延至六月二十五日，如果准备工作尚未做好，延至七月上旬亦可。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充分注意敌人中间突破的战法[1]

（1949 年 6 月 15 日）

彭、张、赵：

各电均悉。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2]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泾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如敌采此战法，你们是否有固守西安的可能和决心，或者放弃西安引敌入西安然后歼击，何者为宜。又如马匪占领西安，我一二两军是否能集中歼灭胡[3]匪，首先打开一面的可能。均请电告。

军委

巳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同月 11 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注意先歼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2]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

（1949年6月15日）

诸位代表先生：

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全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向全国人民提议召开的。这个提议，迅速地得到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响应。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

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是如此巩固，以至于没有一个认真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大家认为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正确的方向。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唤起人们的注意，这即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反对中国人民。例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来进行分化工作和捣乱工作。这是必然的，他们决不会忘记这一项工作。例如，唆使中国反动派，甚至加上他们自己的力量，封锁中国的海港。只要还有可能，他们就会这样做。再则，假如他们还想冒险的话，派出一部分兵力侵扰中国的边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地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粉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中国的革命是全民族人民大众的革命，除了帝国主义者、封建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而外，其余的一切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一个广大的和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巩固，它具备了战胜任何敌人和克服任何困难的坚强的意志和源源不竭的能力。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还要如何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我们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帝国主义制度及

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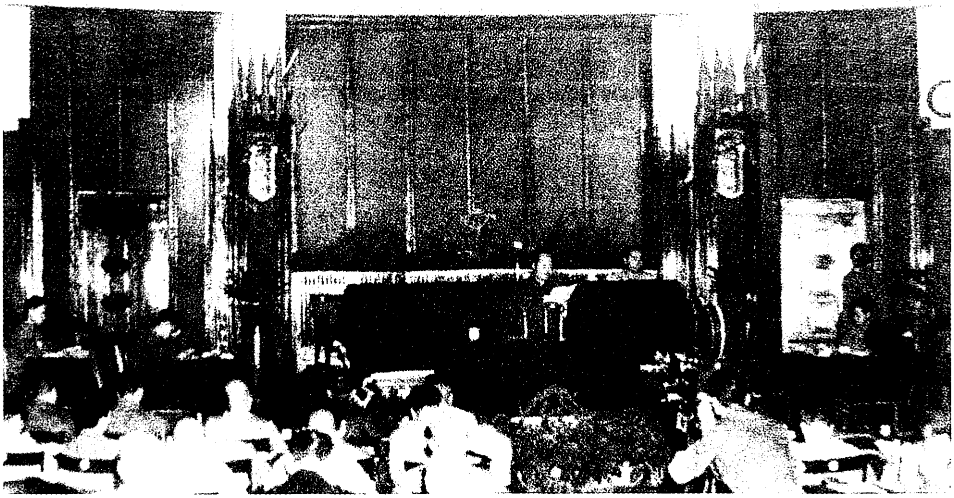
中国民主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的工作重点将是：（一）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动派的捣乱；（二）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

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民主联合政府万岁！

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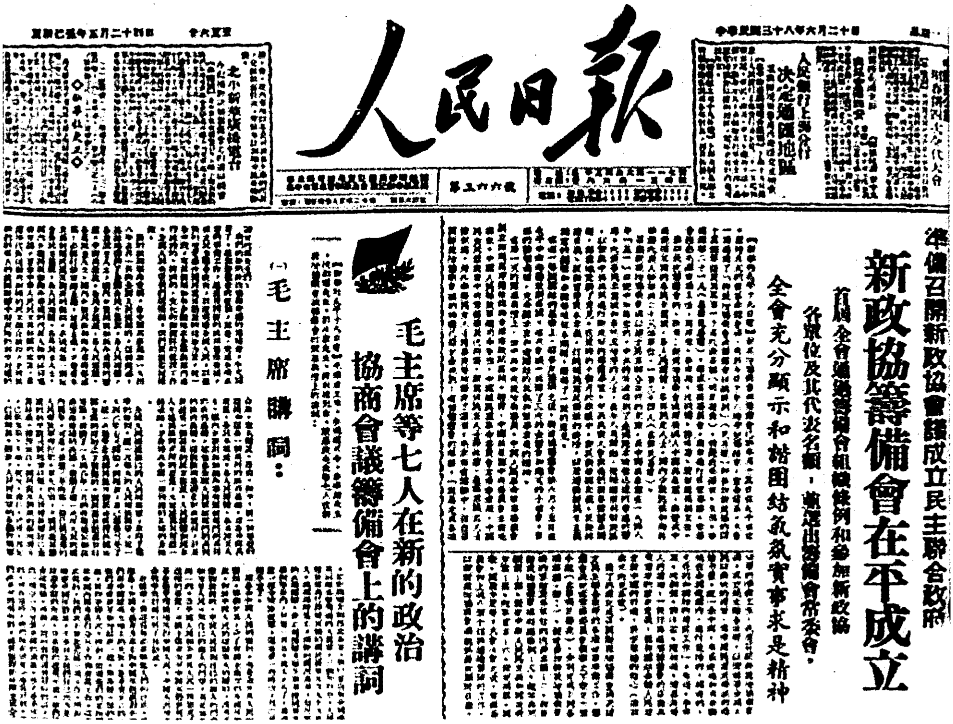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毛泽东在北平中南海主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图为毛泽东在开幕会上讲话。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1949年6月，毛泽东等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



人民日報

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決定通匯地區

準備召開新政協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新政協籌備會在平成立

首屆全會通過籌備會組織條例和參加新政協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並選出籌備會常委會。

全會充分顯示和諧團結氣氛實事求是精神

毛主席等七人在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詞

(一)毛主席講詞：

1949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消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

（1949年6月15日）

兹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如下：

第一　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制法：

一、旗面为红地，长方形，横直为五比四。旗杆套用白色，宽为旗面横长的十六分之一。旗杆为红黄二色相间之旋纹，上制黄色矛头。

二、由旗面的中心点向上下划一垂直中线，向左右划一水平中线，将旗面分为四个面积相等的长方格。

三、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位于上方近旗杆之长方格内。

四、将该长方格上下划十六等分，左右划二十等分，在上下八比八、左右六比十四处，定一点为圆心，以四等分长度为半径作一圆，用直线将该圆周的五等分点联成一五角星，星的上角顶点在圆

心垂直正上方。

五、“八一”用汉字，每笔均系等边长条体。旗杆在左时，该二字置于五角星的右下方，并由左向右横写。旗杆在右时，则该二字应位于五角星的左下方，并由右向左横写。

六、“八”字每笔长三等分，宽一等分，置于一小长方格内。该小长方格的上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七等分，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四等分，左边（如旗杆在右侧为右边）为由五角星之右上角尖（或左上角尖）向下所作之垂直线，右边（或左边）距垂直中线向左（或右）四点五等分。“八”字两笔的外侧六个直角尖端应紧接该小长方格的相当各边，内侧两个直角尖端相距约半等分。“一”字长为四等分，宽为一等分，该字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五等分，右边（或左边）即在垂直中线上。

各级军旗尺寸如下：

一、人民解放军总部　横一七〇公分，直一三六公分。

二、野战军（一级军区同）及兵团（二级军区同）横一六五公分，直一三二公分。

三、军（三级军区同）横一六〇公分，直一二八公分。

四、师（军分区同）横一五五公分，直一二四公分。

五、团（县指挥部或武装部同）横一五〇公分，直一二〇公分。

第二　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军徽用作帽花时，其制法及尺寸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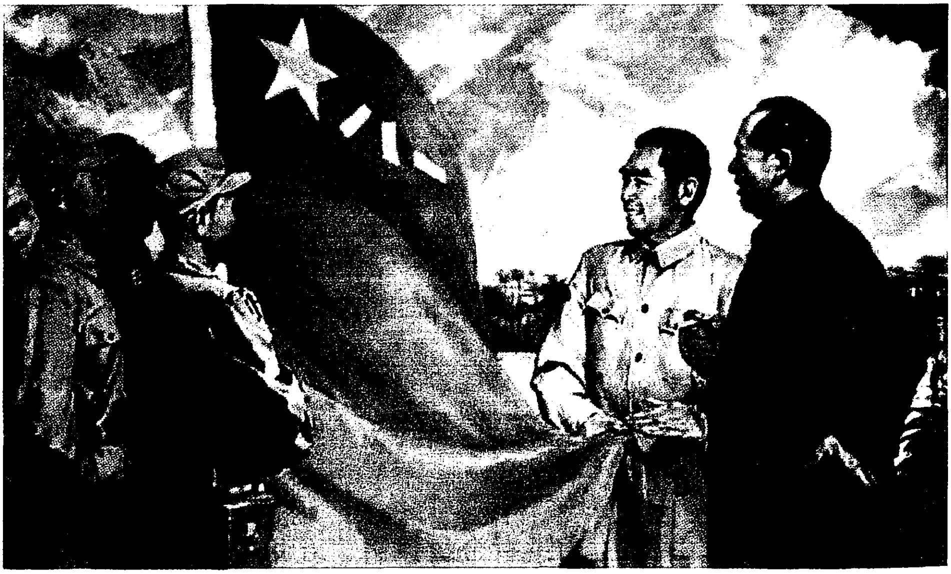
一、五角红星的圆周半径为十五公厘（略作二公厘高之凸形）每个角均为三十六度，外镶一点五公厘宽之金黄色边。

二、“八一”为宋体汉字，适当地直置于红星内。

军徽用于臂章、奖状、文书、车、船、飞机及建筑等物时，则按照上述尺寸比例放大或缩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第一面军旗》（油画）

给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十九兵团的复电[1]

（1949年6月16日）

张轸将军及前国民党军十九兵团全体官兵们：

五月二十三日通电读悉。我们对于贵部在华中前线的举义，表示欢迎。希望贵部官兵团结一致，努力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政治制度，改进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参加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行列。国民党军的残余力量现已为数甚少，欲图抵抗，势将迅速被消灭。我们号召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中凡属有爱国心的将领如贵将军一流人物，愿意率部脱离反革命营垒，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均表欢迎。他们过去的罪责，将因他们的有益于人民事业的行为而获得宽恕。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

[1] 原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兼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率部起义后，于1949年5月23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坚决脱离反动阵营，投入人民怀抱，拥护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和政策，并向人民领袖致敬。这是毛泽东、朱德于6月16日给张轸部的复电。

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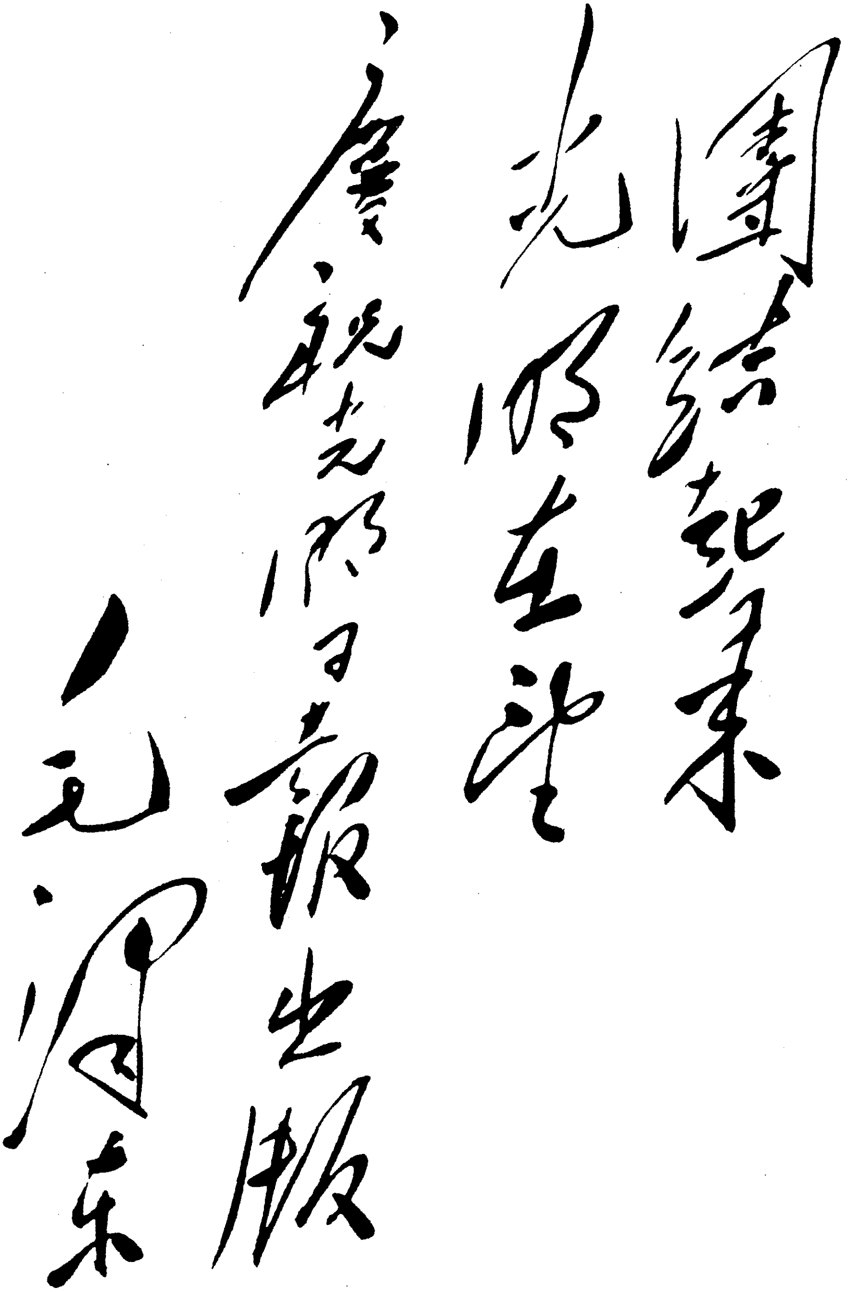
（1949年6月16日）

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庆祝光明日报出版。

毛泽东

---

[1] 《光明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16日。1949年6月，毛泽东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



團結起來
光明在望
慶祝光明日報出版
毛澤東

毛泽东为《光明日报》创刊的题词。

粮食困难行动时间可酌情推迟[1]

（1949年6月17日）

林、邓、萧、赵：

十二日电[2]悉。粮食困难恐不但鄂南、赣北如此，湘南、赣南可能有同样情形。大军前进必须依靠铁路、公路运输，行动时间如需推迟至七月上旬，可由你们按情酌定。并须估计到大军深入湘赣后，因等候后方运粮，行动速度可能颇慢。如何克服粮食困难，请你们用大力筹划。

军委

巳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6月12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粮食问题现成为影响行动的根本问题。赣西北、鄂南粮食已成为严重的困难，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依靠河南、湖北两地运粮到前方去。四野主力于6月初停止于长江与襄河以北就粮和休整，以待粮食的筹集，准备在6月底或7月初再发动作战。

第二野战军西进似以九月为宜[1]

（1949年6月17日）

华东局，并告粟、张、周及刘、邓、李[2]：

（一）同意巳删电意见，将华东军区及三野指挥机构设在南京，并以粟裕兼南京军管会主任及市委书记，唐亮为副主任、副书记，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来做准备西行的工作。（二）二野西进时机似以九月为较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那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七个军）九月可到郴州、赣州线，十一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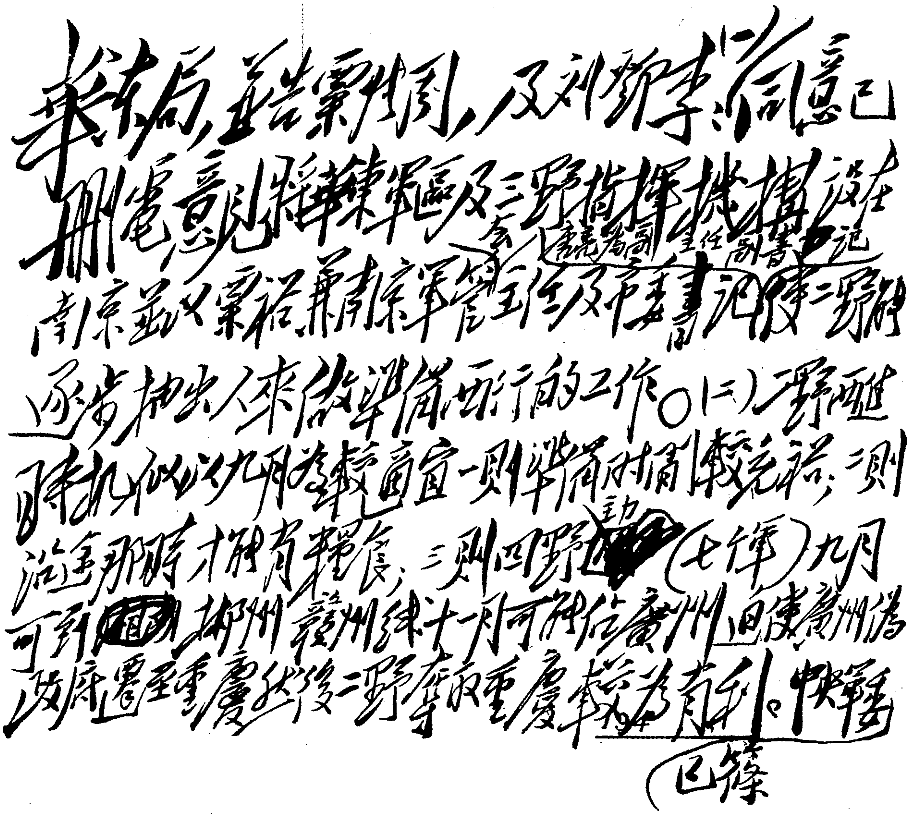
中央军委

巳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2] 刘、邓、李，指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華東局，並告粟張周，及劉鄧李：（一）同意巳刪電意見，將華東軍區及三野指揮機構設在南京，並以粟裕兼南京軍管會主任及市委書記，以唐亮為副主任、副書記，使二野能逐步抽出人來做準備西進的工作。（二）二野西進時機似以九月為較適宜，一則準備時間較充裕，二則沿途那時才能有糧食，三則四野（七軍）九月可到郴州贛州線，十一月可能佔廣州，迫使廣州偽政府遷至重慶，然後二野奪取重慶較為有利。中央軍委

巳篠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第二野战军西进似以九月为宜》的手稿。

在薛愚[1]的来信上批示

（1949年6月19日）

北大医学院与军委有房屋争执，请聂[2]令朱早观[3]查明处理，以结果告我。如无大碍，宜让与北大。

---

[1] 薛愚（1894—1988），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湖北襄阳人，当时任北大医学院药学系主任。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3] 朱早观，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钳制马继援等部消灭胡宗南的作战部署[1]

（1949 年 6 月 20 日）

彭、张、赵：

（一）根据马继援[2]拟向泾阳、三原进攻的情报判断，马匪不知我十九兵团将到三原，故有先击破我许兵团，灭除侧翼威胁的计划。当马继援向泾阳攻击时，胡[3]匪如何动作请你们注意侦察，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4]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二）当你们举行对胡匪三个军作战时，马继援全部及马敦静[5]一部因受我许兵团威胁是不能增援的，但你们应以一部由咸阳向马敦静佯动，使马敦静完全不能增援。（三）在你们歼灭胡匪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马继援，当时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王周两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第十八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王震和周士第。

[5] 马敦静，当时任国民党军宁夏兵团司令官。

个军的作战获得胜利后，只要我军损伤不大，尚有追击的能力，就应以王周两兵团主力迅速向凤、宝、千、陇[1]方向前进，以期继歼胡匪余部及甘肃王治岐军[2]并占领凤、宝、千、陇，以利尔后配合许杨[3]向两马作战。（四）两马兵力在胡匪主力（三个军）在户县以西地区被歼后，必不敢恋战，必将缩回长武、彬县、平凉地区固守待战，因为我杨兵团要本月底才能在三原集中，至快要下月上旬才能协同许兵团作战，故于王周两部本月底攻击胡匪主力于户西地区时，单独使用许兵团绕出彬县、永寿地区，切断两马退路，包围两马以利下一步作战似乎有困难，甚至不可能。故我们主张王周主力于歼灭胡匪三个军后，应一直向西歼其余部，占领凤、宝、千、陇，完成对平凉作战的战略开展，对两马则让其退回平凉，然后我以王、周、许、杨十二个军全力向平凉两马攻击，似较有利。（五）以上意见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电复。

军委

巳咢

---

[1] 凤、宝、千、陇，指陕西凤翔、宝鸡、千阳和陇县。

[2] 王治岐军，指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

[3] 许，指许光达。杨，指杨得志，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致华东局等电[1]

（1949年6月21日）

在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一）经营以上海为中心的苏、浙、皖、赣新占城乡广大地区；（二）占领福建及厦门；（三）帮助二野西进；（四）准备占领台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华东局，粟裕、张震、周骏鸣电的主要内容。

复吴奇伟将军等电[1]

（1949年6月22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二日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本日复吴奇伟将军一电。该电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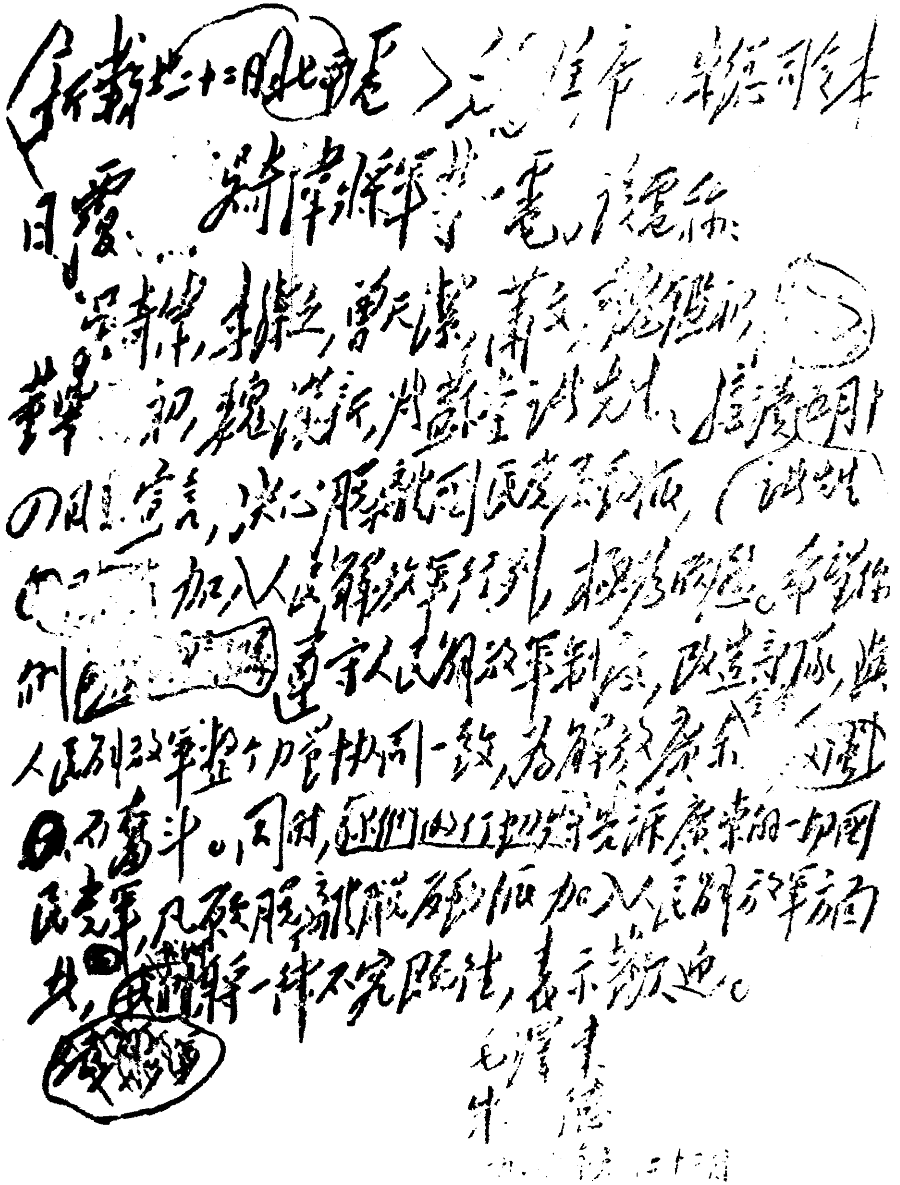
吴奇伟、李洁之、曾天洁、萧文、魏鉴贤、董举初、魏汉新、张苏奎诸先生：

接读诸先生五月十四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全省而奋斗。同时，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将一律不究既往，表示欢迎。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

[1] 1949年5月原国民党将领吴奇伟、曾天洁等在粤东闽西率部起义，并于5月14日发表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向华南进军。毛泽东、朱德复电对此表示欢迎。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



新华社北平十一日电　毛主席、朱总司令本日覆吴奇伟将军等电，全文如下：

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黄文清、饶纪湘、黄华、罗翘、魏汉新、冯鉴堂诸先生：接读四月卅日宣言，决心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极为欣慰。希望你们遵守人民解放军制度，改造部队，与人民解放军整个力量协同一致，为解放广东人民而奋斗。同时，请你们代为告诉广东的一切国民党军人，凡愿脱离反动派加入人民解放军方面者，我们一律不咎既往，表示欢迎。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复吴奇伟将军等电》的手稿。

对付敌军分向渭南泾北进攻的对策[1]

（1949年6月22日）

彭、张、赵：

巳养电悉。假如胡马[2]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3]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令杨兵团[4]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以上请酌情处理。

军委

养申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3] 许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许光达。

[4] 杨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复上海市委等电[1]

（1949年6月23日）

（一）同意你们巳巧电[2]为惩办布雷谣言制造者的各项处置。（二）帝国主义者正在采用利诱和威迫的两种手法，正在采取争取合法地位（以便从内部进行破坏）和继续援助国民党的两面政策，只有坚决而又适宜的斗争，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巩固自己和战胜敌人。（三）上海和武汉等地息息相关，你们在上海等地采取的各项措施，应随时通知林、邓[3]，林、邓方面在武汉等地所取措施亦应随时通知上海。（四）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机，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上海市委并告南京市委及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2] 指中共上海市委6月18日致中央电。电报中说，上海英美报纸和新闻单位散布国民党退出上海时在长江口布设了水雷的谣言，恐吓群众，上海市军管会将责令英商《字林西报》等英美报纸公开承认错误，并给以严重警告。

[3] 林、邓，指林彪、邓子恢。

复华中局电[1]

（1949年6月24日）

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即可以按照你们所设计的三个步骤去部署城乡工作，这样做并不违背二中全会而正是二中全会总方针的正确的执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中局并告华东局、二野及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复华南分局等电[1]

（1949年6月24日）

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请你们争取时间迅速地巩固这些胜利，扩大军队及地区，以迎接第四野战军的到来，并准备于十一月、十二月或明年一月间占领广州。你们应在东江、韩江及闽西三区放手招收大量青年学生，开办数千人的学校训练干部。同时按照可能性，抽调一千至二三千老的和较老的工作干部加以训练，为准备接管广州及其他大城市之用。同时应令香港训练干部，亦可招收一批广州学生来东江训练。总之，接管全省的工作干部主要地应由你们负责准备。加强广州地下市委工作的领导，积极发展党员，准备里应外合的条件。对桂林、昆明两城的地下党组织，亦应令当地加强注意力。

---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2日关于广东东江、韩江两边区战绩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香港工委电的主要内容。

给胡乔木[1]的信

（1949年6月24日）

乔木：

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拟一单纪念七七的口号（纪念七七，庆祝胜利，宣传新政协及联合政府，要求早日订立对日和约，消灭反动派残余力量，镇压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生产和文教）——此两件请于六月最近两天拟好，以便于六月二十八日发出，六月二十九日各地见报。写一篇七七纪念论文（带总结性），此件须于七月二日写好，三四两日修改好，五日广播，七日各地见报。起草一个各党派的纪念七七的联合声明——此件亦须于七月二日写好，以便交换意见。以上工作很繁重，都堆在你的身上，请你好好排列时间，并注意偷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给你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英美的外交——特务外交》[2]一文甚有用，请令全文播发，提起警惕性。

毛泽东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

---

[1]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新华通迅社社长。

[2] 此文载于194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祝涅克索八十寿辰的贺电

（1949年6月24日）

敬祝丹麦革命文豪及世界民主和平事业的伟大战士涅克索同志的八十寿辰。

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1]

（1949年6月26日）

彭、张、赵：

根据近日情报，马[2]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长[3]撤退，胡[4]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5]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种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6]全力及许兵团[7]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8]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3] 彬长，指陕西彬县和长武。

[4]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5] 宝凤，指陕西宝鸡和凤翔。

[6] 王周两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第十八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王震和周士第。

[7] 许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兵团司令员许光达。

[8] 杨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致吃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以上意见是否适当，请酌情处理为盼。

军委

巳宥

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电[1]

（1949年6月26日）

我们向你们提议召开会议讨论下列两篇文章：（一）《消灭麻痹倾向，扑灭特务匪徒》，（二）《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2]这两篇文章是新华社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社论，各地报纸谅必均已登载。希望你们不要一看了事，要召开会议针对社论所指出的问题，检讨自己的工作，并做出简明决议，指示全党实行。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必须提起高度的警惕性，并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千万不可采取轻忽态度，是为至盼。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前委，并请转发各市委，各省委，各区党委，军队的军、师、团委，地方的地委、县委，各级政府部门、财经部门、文教部门内的党组，职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内的党组以及宣传系统中（通讯社及报纸）的同志们电的主要内容。

[2] 这两篇文章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活动，不少地方的国家工矿企业接连发生火灾和被毁事件，要求提高警惕，保护人民祖国的财产。

对进军西北和川北的部署

（1949年6月27日）

德怀[1]同志：

二十六日电[2]悉。（一）如青宁两敌[3]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南坊、通润[4]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5]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6]后打胡王[7]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较打胡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9年6月26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十九兵团7月4日可在三原附近集结完毕，拟于7月8日开始向敌进攻。拟以十八兵团钳制王治岐军，十九兵团及一、二两兵团首先围歼马继援、马敦静部主力，然后以1个兵团相机向平凉追击，3个兵团向胡王匪进攻，如马匪继续西撤平凉、长武线防守时，拟以十九兵团位置乾县、礼泉、永寿监视马匪，集中一、二兵团及十八兵团围歼胡匪及王治岐部，夺取宝鸡、陇南，作解放汉中准备，如胡匪主力被歼，则乘胜追击至汉中、广元。

[3] 指青海马继援和宁夏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4] 乾、永、彬，指陕西乾县、永寿和彬县。常宁，镇名，位于陕西永寿县中部。南坊，镇名，位于陕西礼泉县西北。通润，镇名，位于陕西淳化县北部。

[5] 长、泾、凉，指陕西长武和甘肃泾川、平凉。

[6] 两马，指马继援和马敦静。

[7]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王，指王治岐，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属第一一九军军长。

王为费力，必须充分准备，从精神动员到作战技术都要力求准备充分，并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因此午齐开始作战，对于刚到数天的十九兵团说来是否早了一点，值得考虑，似不如推迟若干天，使十九兵团充分恢复行军疲劳，并使各部准备更好些，请酌定。（二）如两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十九兵团只须负担钳制两马任务（仍要小心），则午齐（或午灰）开始作战是可以的。（三）广州伪府正在作迁移重庆的准备，大批工作人员已去重庆。我林罗[1]七个军（其余六个军位于豫鄂湘赣四省任守备）可于八九两月到达湘粤桂边区，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广州、桂林等地。广州伪府迁渝时间，当在九、十月间。我刘邓[2]九个军，可于九月由现地出动，十二月前后到达并占领重庆、贵阳等处，以期歼灭伪府，开辟长江上游。为使伪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现有一派主张迁台，但不占优势），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四）你们在执行当前战役，占领宝、凤[3]、泾、凉后，看青宁胡王四敌主要是青宁两敌被歼程度如何，再决新的部署，如两马主力被歼，进一步解决兰州、青海、宁夏及甘肃西部已无重大困难，则可以按照二中全会时商定的计划，早日分兵为两支。第一支西进，担负解决甘宁青新四省（我们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

---

[1] 林罗，指林彪、罗荣桓，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一政治委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宝、凤，指陕西宝鸡和凤翔。

州，取得油源。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取得更大油源，这是极端重要的任务），这一支兵力的数量以能担负解决上述任务为原则。第二支南进，以占领成都解决川北为目的，出动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不可太早，宁可稍为缓一点，以期聚歼胡匪，不使逃入云南。现白崇禧[1]正在部署以桂系兵力退据云南，若再加胡宗南部，则我们解决云南势必要使用大量兵力，而使用大量兵力到云南去，例如五六个军，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现在预计以林罗一部由广西，刘邓一部由贵州合击昆明，总数希望不超过三个军。（五）如果青宁胡王四敌的主力特别是青宁主力不能在泾、凉、宝、凤及其以东地区被我歼灭，则你们暂时不能作大的分兵。那时，为了免除西进路上的侧翼威胁，可以考虑以主力先给胡匪以打击，然后西打两马，待两马主力歼灭后再分兵。（六）请根据上述意图部署一切，此电请给贺龙[2]同志一阅，并征求他的意见。

毛泽东
巳感

---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给周谷城[1]的信

（1949年6月28日）

谷城先生：

得书甚慰，如见故人。革命高涨，大家都是高兴的。前途尚多困难，惟有团结最大多数民众，方能战胜帝国主义的反抗。相期共同努力！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

[1]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当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教务长。

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电[1]

（1949年6月28日）

广东现有大量的人民游击部队和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如果曾生的两个有战斗力的小师整训得有成效，将来开入广东配合游击队工作可起大作用，加上你们的一个至两个军就可以解决广东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寻求两广纵队帮助解决广东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邓子恢、谭政、陶铸电的主要内容。

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1]、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

---

[1]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1898年光绪皇帝任用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参与政事，试图变法。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握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成为反动的政治派别。康有为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就是这样，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觉悟过来了，有些人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

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你们太刺激了。”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1]。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我们只反对妨碍我们做生意的内外反动派，此外并不反对任何人。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妨碍我们和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不是别

---

[1] 武松是中国著名小说《水浒传》中的一个英雄，他在景阳冈打虎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

人，正是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三个帝国主义国家并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也是这样。人民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是这样。请大家想一想，假如没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没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没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假如没有东方各被压迫民族正在起来斗争，假如没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人民大众和统治他们的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假如没有这一切的综合，那末，堆在我们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够胜利吗？显然是不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不可能。这件事，中国人民的经验是太多了。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之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

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它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为什么理由要这样做？大家很清楚。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

“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

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说是“施仁政”吧，但这是我们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们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

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件工作做好了，中国的主要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垄断资产阶级，就最后地消灭了。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1]。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本文不打算多谈经济问题，这里不来详说。

---

[1] 关于农业社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关系问题，参见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第七部分和第八部分。在这个报告里，毛泽东同志根据苏联的经验和我国的实践，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只许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许为资产阶级所私有的国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了。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他们实行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的一个阶级的独裁制度，一个阶级的极权主义。孙中山所说压迫平民的近世各国的资产阶级，正是指的这些人。蒋介石的反革命独裁，就是从这些反动家伙学来的。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这个学习很要紧。革命的人民如果不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他们就不能维持政权，他们的政权就会被内外

---

[1] 这是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注文中所说的话。

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的人民就会遭殃。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我们还有帝国主义站在旁边，这个敌人是很凶恶的。中国的现代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上的比重还很小。现在没有可靠的数目字，根据某些材料来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现代工业产值不过只占全国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

“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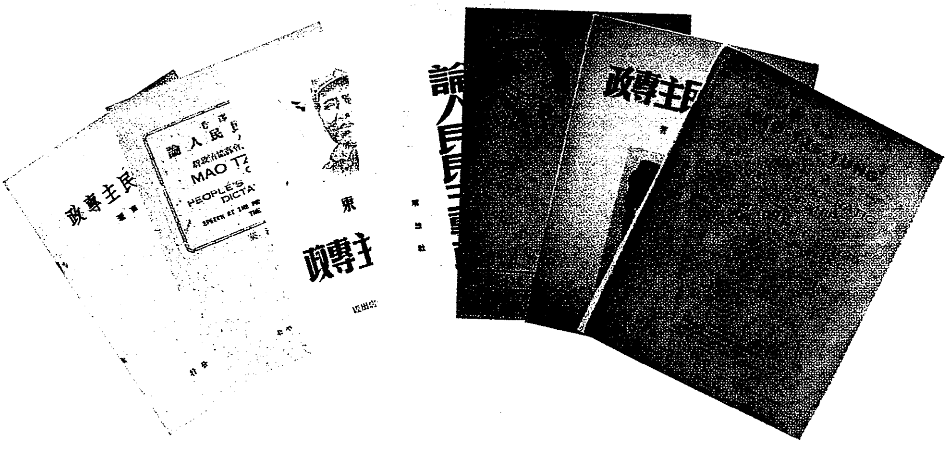
我们的二十八年，就大不相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我们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我们曾和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右的和“左”的。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

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苏联共产党人开头也有一些人不大会办经济，帝国主义者也曾等待过他们的失败。但是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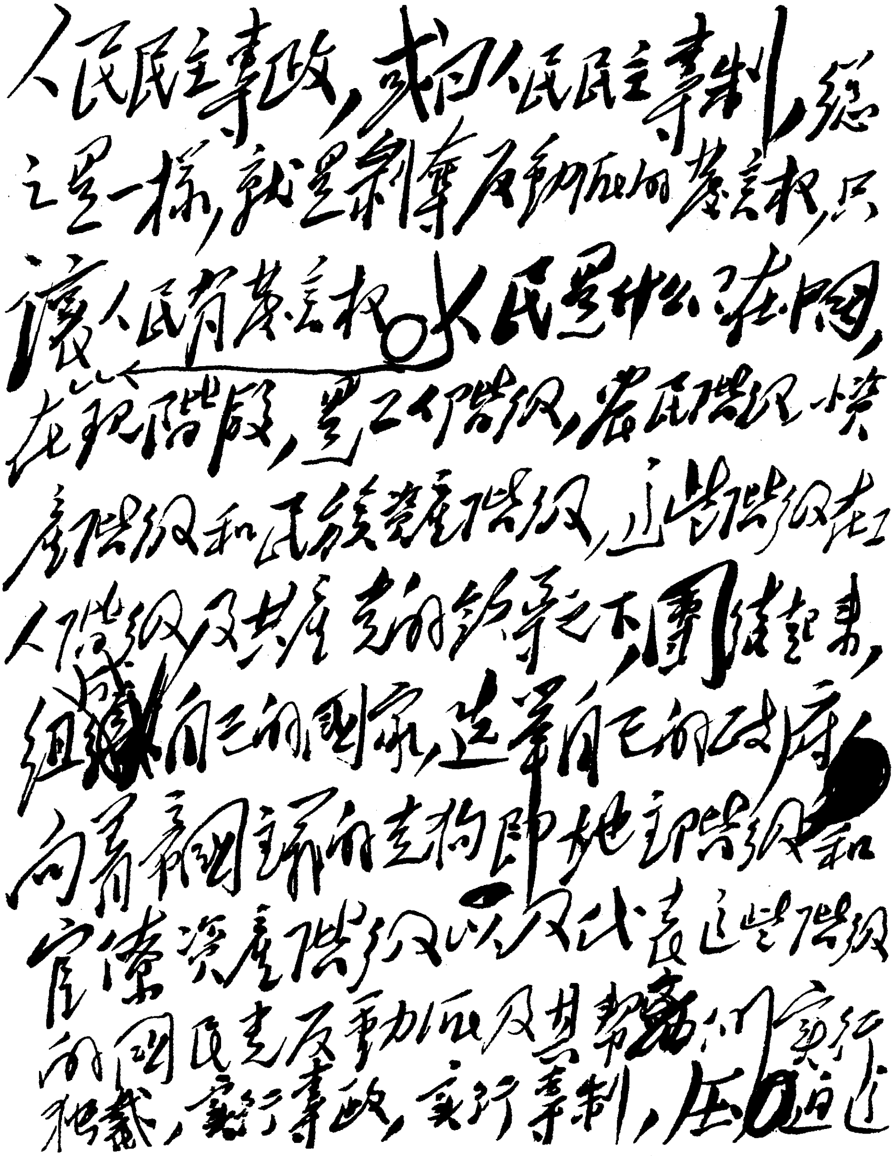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部分版本）。

毛澤东

論人民民主專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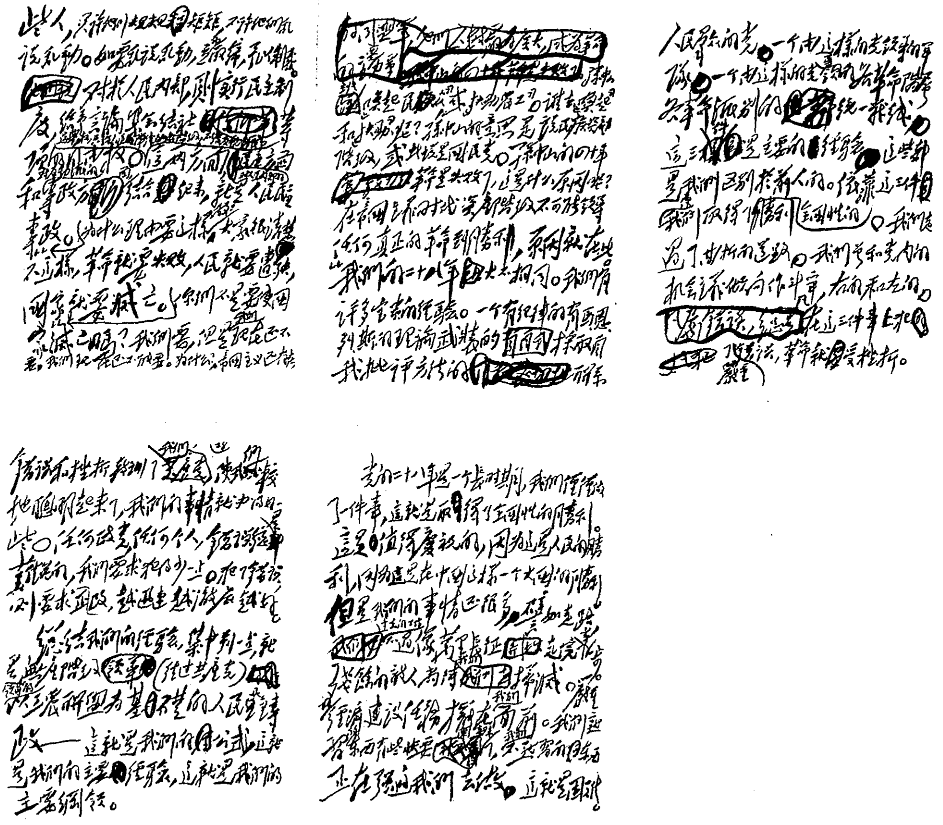
解放社

194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图为1949年7月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



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制，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独裁，实行专政，实行专制，压迫这

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手稿（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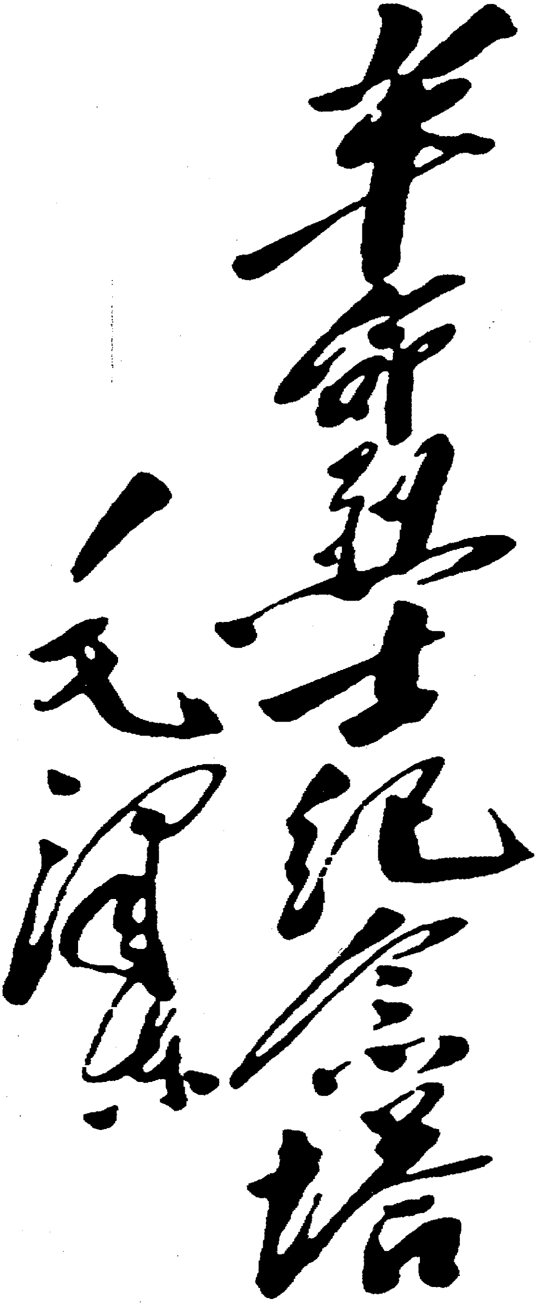
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手稿（部分）。

为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题名

（1949年6月）

革命烈士纪念塔

毛泽东



革命烈士纪念塔

毛泽东

毛泽东为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纪念塔的题名。

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

（1949年7月1日）

【新华社北京一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贺二月在北平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电文如下：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诸位代表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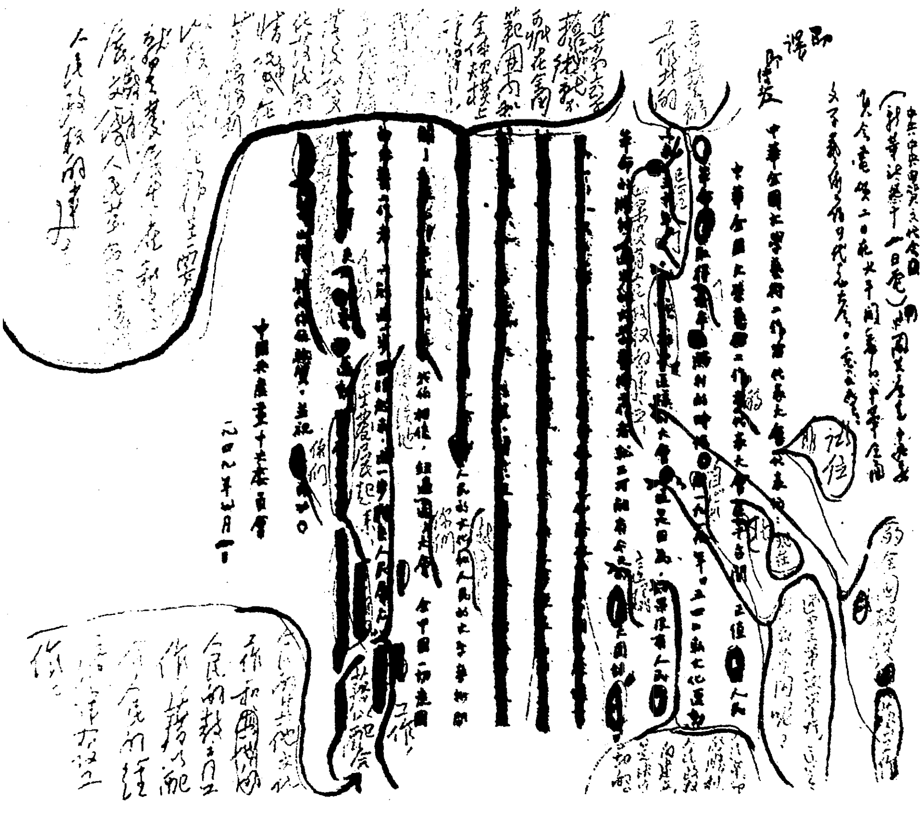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代表大会现在在北平召开，正值人民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时候。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

---

[1] 这是新华社根据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贺电编发的消息。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现当你们的会议开幕之际，特向你们致贺，并祝你们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电贺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手稿。

为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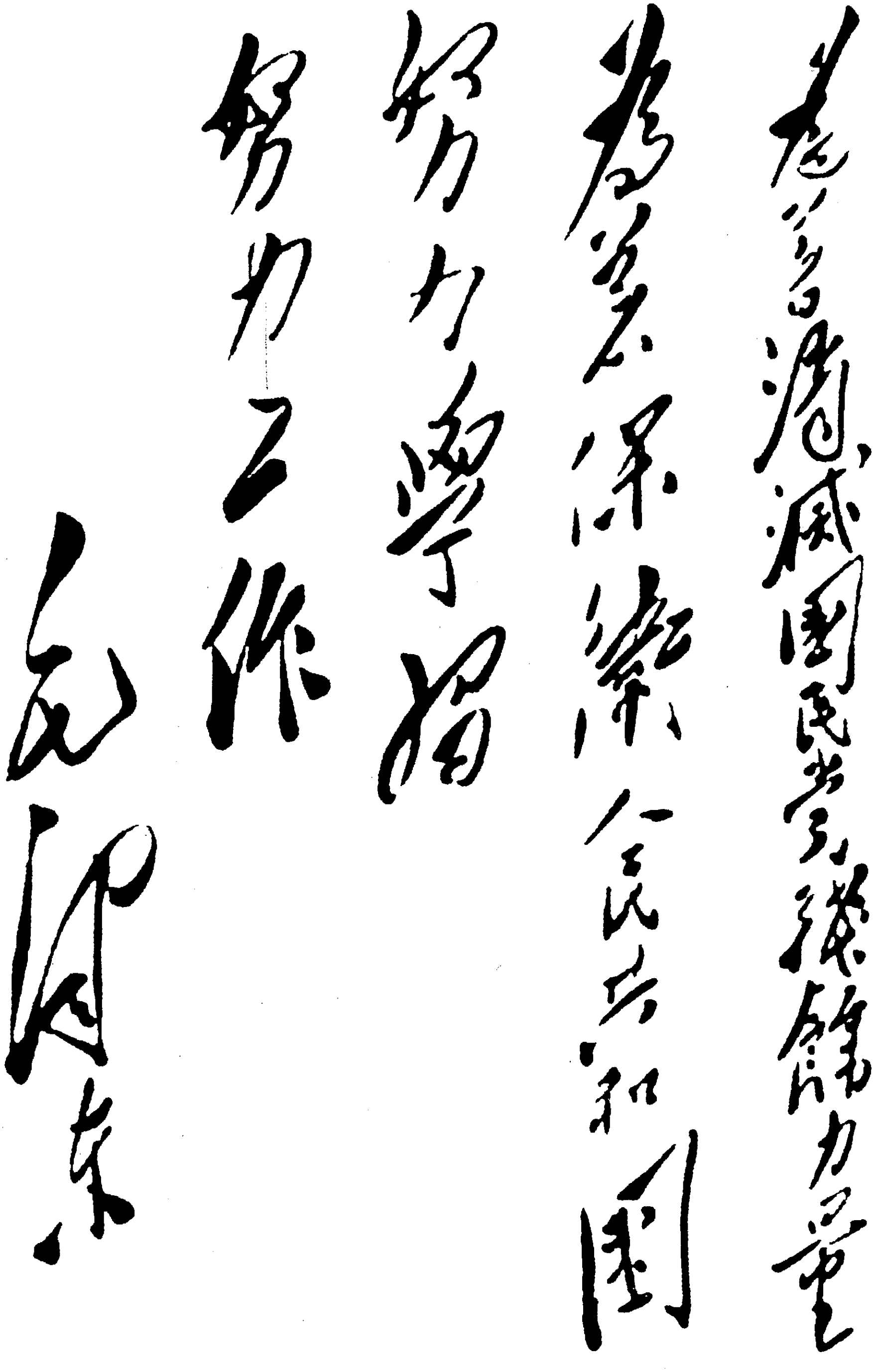
（1949年7月1日）

为着消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为着保卫人民共和国，努力学习，努力工作。

毛泽东

---

[1] 华北军政大学是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培养军事、行政干部的学校，它是在原晋冀鲁豫解放区抗大分校的基础上于1948年成立的，1949年正值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之际，毛泽东为之题词。



為消滅國民黨殘餘力量
為建設保衛人民共和國
努力學習
努力工作

毛澤東

毛泽东为华北军政大学成立一周年的题词。

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

（1949 年 7 月 2 日）

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毛泽东

团结起来
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
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
和政治地位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哀悼季米特洛夫的唁电[1]

（1949年7月3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诸同志：

惊悉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季米特洛夫同志因病逝世，不胜哀悼，特电致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日

---

[1] 国际工人运动卓越领袖、保加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乔治·米哈依洛维奇·季米特洛夫于1949年7月2日因病在苏联逝世。这是毛泽东给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唁电。

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1]

（1949年7月4日）

林、邓，并王、萧[2]：

（一）王萧陷电及程潜备忘录[3]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处理。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留其军队和干部加以编整教育等三项要求，原则上均可照准，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在即，此事进行要快。（三）为了妥善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党各项职务暂时均予保留，利用程潜名义发号施令，以利接收全省及筹措给养。因联合机构是解决编军等事的，由双方派员组成，程潜本人未必参加，似不如保留程潜职务，管理我军尚未到达地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的电报。

[2] 王，指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萧，指萧劲光，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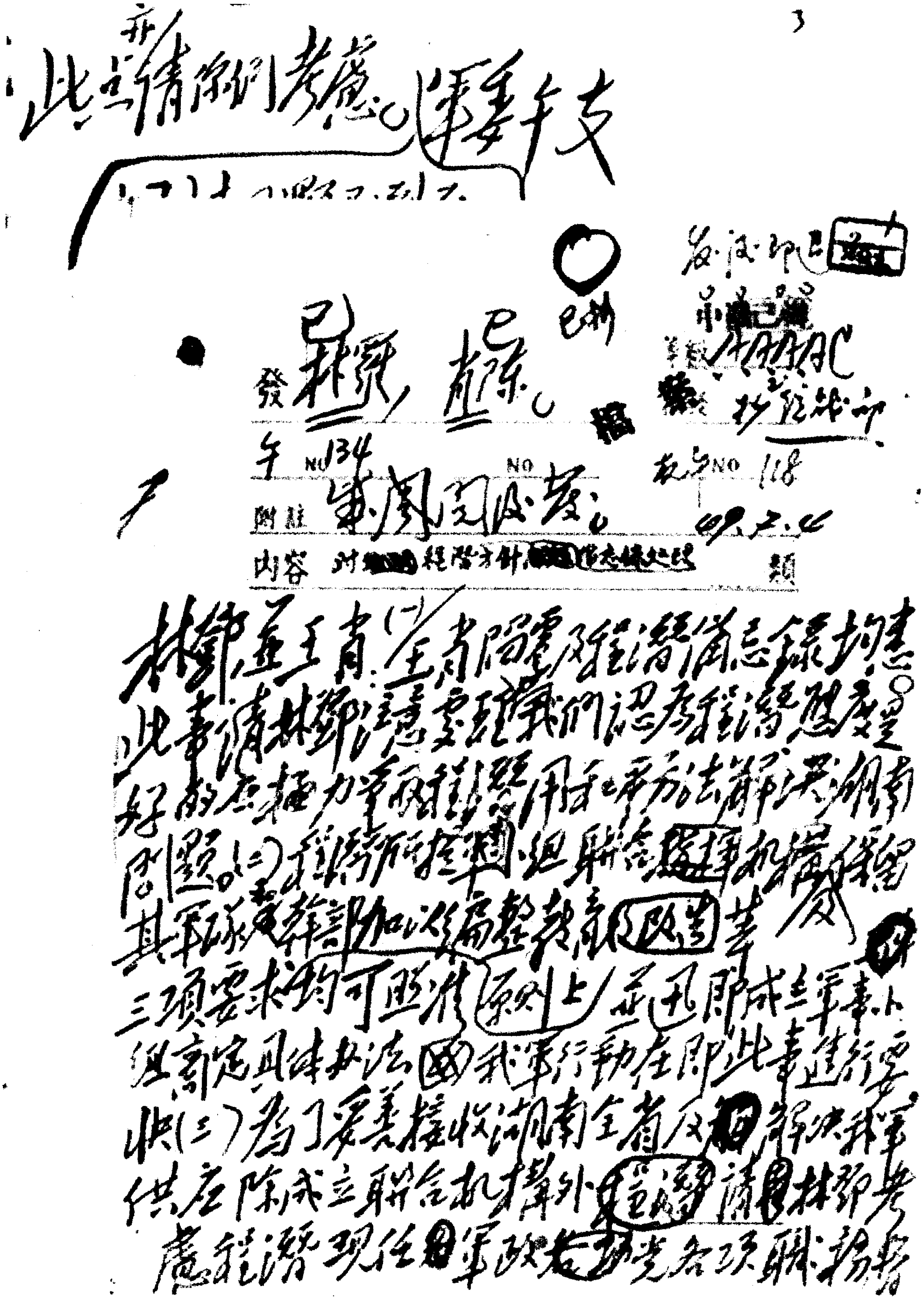
[3] 指1949年6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向中共湖南省工委递交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表示愿意站在反蒋、反桂、反假和平的立场上，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八条二十四款的原则，谋取湖南局部和平。湖南省工委派人将备忘录送到武汉，由王首道、萧劲光转报党中央和毛泽东。

的民政、军政事宜，使不陷于无政府状态。此点是否可行，请林邓斟酌电告。（四）如程潜发表声明反美、反蒋、反桂，似应予以率部起义之待遇，使程潜能起影响南方各省之作用。我们亦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俟南方各省平定，程潜则来中央政府担任工作。程潜是孙中山的老干部，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近年治湘措施表示进步，若得程潜真心站在我们方面，将有很大利益。此点亦请你们考虑。（五）李明灏[1]已到否。

军委
午支

---

[1] 李明灏，民主人士，1948年到解放区，当时任华北军政大学总队长。他和程潜、陈明仁都是湖南醴陵人，大革命时期，他在程潜兼任校长的陆军讲武学校任教育长，而陈明仁曾是程潜和李明灏的学生。由于这些联系，当时中共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乃派他以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去做程、陈的工作，推动程、陈起义。



此点亦请你们考虑。军委午支

發 林邓，已发 王陈。

年 NO 134 NO 发号 NO 118

附註 第一份已发。 49.7.4

内容 对[redacted]程潜方针[redacted]备忘录处理 類

林邓并王首：（一）全省陷落及程潜备忘录均悉。此事请林邓注意，要知我们认为程潜态度是好的，应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二）程潜所提组织联合机构，保留其军队，对其干部加以适当教育等三项要求均可照准原则上，并迅即成立军事小组商定具体办法，我军行动应即与此事进行[illegible]（三）为了更好接收湖南全省及解决我军供应，除成立联合机构外，请林邓考虑程潜现任军政各项职务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手稿。

给程潜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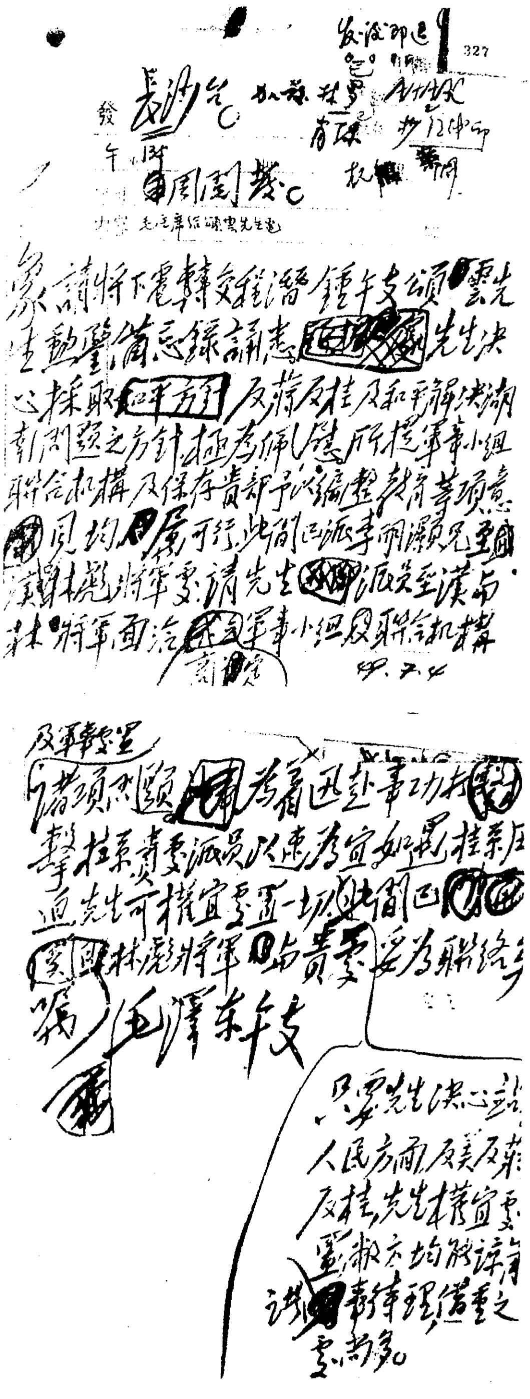
（1949年7月4日）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毛泽东

午支



327

发　长沙

午

毛泽东致颂云先生电

急

请将下电转交程潜。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军事小组及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此间已[illegible]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

毛泽东午支

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

49.7.4

毛泽东致程潜信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0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

（1949年7月4日）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3

（1949年7月6日）

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4

（1949年7月7日）

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9

（1949年7月7日）

九月或十月前闽粤赣边纵队须独力作战………………………10

（1949年7月9日）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12

（1949年7月9日）

四野应以一部向长沙湘潭推进…………………………………15

（1949年7月10日）

复左协中将军等电……………………………………………17

（1949年7月11日）

关于打胡战役的指示……………………………………………18

（1949年7月14日）

歼灭马步芳等部的部署…………………………………………20

（1949年7月14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题词 ……21
（1949年7月15日）
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 ……22
（1949年7月16日、17日）
军委关于对程潜的方针的指示 ……28
（1949年7月18日）
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 ……31
（1949年7月18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 ……32
（1949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武昌划归湖北省建制致华中局电 ……33
（1949年7月21日）
陈赓邓华两兵团进攻广东的部署 ……34
（1949年7月21日）
复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电 ……36
（1949年7月21日）
复华东局电 ……37
（1949年7月21日）
致周恩来电 ……38
（1949年7月21日）
关于李达去湖南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的批示 ……39
（1949年7月21日、26日）
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 ……40
（1949年7月22日）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等电 ……41
（1949年7月23日）

对举行平凉战役以及西进作战的意见 ……………………………42

（1949年7月23日）

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的行动计划 ……………………………44

（1949年7月24日）

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 ……………………………………46

（1949年7月24日）

陈赓邓华等兵团进军地区和路线问题 ……………………………48

（1949年7月25日）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 ………………………………………50

（1949年7月25日）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 ………………………………51

（1949年7月26日）

关于转发方方、魏金水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的批语 ………………52

（1949年7月27日）

为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大会题词 ……………………………………53

（1949年7月28日）

关于刘少奇可先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刘少奇、王稼祥电 ……54

（1949年7月31日）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 ……………………………………………56

（1949年7月31日）

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历史经验 …………………………………60

（1949年7月）

中央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69

（1949年8月1日）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 …………………………………………72

（1949年8月1日）

为《唐山劳动日报》题写报头 ……73
（1949年8月1日）
复栗裕等电 ……74
（1949年8月2日）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 ……75
（1949年8月2日）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致东北局电 ……76
（1949年8月3日）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 ……77
（1949年8月4日）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 ……78
（1949年8月4日）
对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的批语 ……79
（1949年8月5日）
复程潜电 ……80
（1949年8月5日）
致林彪、邓子恢等电 ……81
（1949年8月5日）
致华中局等电 ……82
（1949年8月5日）
争取程潜等站在我们方面有极大的政治作用 ……83
（1949年8月6日）
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额尔德尼等 ……85
（1949年8月6日）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 ……86
（1949年8月6日）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 ……………………………………………90
（1949年8月7日）
复华东局电 ……………………………………………………91
（1949年8月7日）
致方方等电 ……………………………………………………92
（1949年8月8日）
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 ………………93
（1949年8月10日）
给杨开智的信 …………………………………………………94
（1949年8月10日）
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95
（1949年8月11日）
复周世钊电 ……………………………………………………97
（1949年8月11日）
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98
（1949年8月13日）
复陈明仁电 ……………………………………………………99
（1949年8月13日）
为《铁军报》题写报头……………………………………………101
（1949年8月13日）
给胡乔木的信……………………………………………………102
（1949年8月13日）
复华东局电………………………………………………………103
（1949年8月14日）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04
（1949年8月14日）

复程潜、陈明仁等电……111
（1949年8月16日）
致陈云等电……112
（1949年8月17日）
别了，司徒雷登……113
（1949年8月18日）
致阿哈买提江电……120
（1949年8月18日）
给江庸的信……121
（1949年8月19日）
中央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规定……123
（1949年8月19日）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24
（1949年8月20日）
致东北局电……125
（1949年8月21日）
复彭德怀等电……126
（1949年8月22日）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127
（1949年8月22日）
贺美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电……129
（1949年8月23日）
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130
（1949年8月23日）
给黄炎培的两封信……133
（1949年8月24日、26日）

给胡乔木的信……135
（1949年8月24日）
复东北局电……136
（1949年8月24日）
复王首道等电……137
（1949年8月24日）
不论新区、老区均须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38
（1949年8月25日）
对攻打兰州的几点意见……140
（1949年8月26日）
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42
（1949年8月26日）
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给彭真的信……144
（1949年8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致东北局等电……146
（1949年8月26日）
复彭德怀电……148
（1949年8月26日）
致傅作义电……149
（1949年8月26日）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50
（1949年8月27日）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151
（1949年8月28日）
给吴玉章的信……158
（1949年8月29日）

致华中局电……159
（1949年8月29日）
致各中央局、分局电……160
（1949年8月30日）
“友谊”，还是侵略？……161
（1949年8月30日）
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165
（1949年8月30日）
关于欢迎出席新政协会议致程潜电……166
(1949年8月30日)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68
（1949年8月）
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之……169
（1949年9月1日）
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纪念题词……171
（1949年9月1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72
（1949年9月2日）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173
（1949年9月3日）
复彭德怀电……175
（1949年9月4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批语……176
（1949年9月）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179
（1949年9月4日）

给周恩来、聂荣臻的信……181
（1949年9月4日）
致陈明仁电……182
（1949年9月5日）
在审校《共同纲领》草案时改写的三段话……183
（1949年9月6日）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84
（1949年9月7日）
对赣州会议及进军华南的指示……186
（1949年9月8日）
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188
（1949年9月8日）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189
（1949年9月8日）
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192
（1949年9月9日）
复邓力群等电……194
（1949年9月10日）
复邓力群电……195
（1949年9月10日）
和张治中的谈话……196
（1949年9月10日）
复彭德怀电……197
（1949年9月10日）
祝波立特连任英共总书记二十周年的贺电……198
（1949年9月10日）

为《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199
（1949年9月10日）
给向振熙的信………………………………………………………201
（1949年9月11日）
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202
（1949年9月12日）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及邓小平电………………………203
（1949年9月12日）
复饶漱石电…………………………………………………………204
（1949年9月12日）
复叶剑英、陈赓电…………………………………………………205
（1949年9月12日）
致王首道电…………………………………………………………206
（1949年9月13日）
复谭戒甫电…………………………………………………………207
（1949年9月13日）
给周北峰的信………………………………………………………208
（1949年9月14日）
祝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召开二次大会的贺电………………209
（1949年9月15日）
祝加香八十寿辰的贺电……………………………………………210
（1949年9月15日）
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11
（1949年9月16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216
（1949年9月16日）

复邓力群等电……232
（1949年9月19日）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233
（1949年9月19日）
复傅作义电……234
（1949年9月19日）
复邓力群等电……235
（1949年9月20日）
用打拉两种办法迅速解决宁夏问题……236
（1949年9月20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答董其武等起义通电……237
（1949年9月20日）
聂荣臻将军、薄一波政委电贺绥远和平解放……239
（1949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问题给各中央局的指示……242
（1949年9月21日）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44
（1949年9月21日）
给张治中的信……263
（1949年9月21日）
给沈雁冰的信……266
（1949年9月23日）
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267
（1949年9月23日）
复彭德怀电……269
（1949年9月23日）

复鲍尔汉电……270
（1949年9月23日）
毛泽东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国都和纪年问题时的发言……271
（1949年9月25日）
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紧密合作……272
（1949年9月26日）
关于组织部分政协代表发言给周恩来的信……274
（1949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庆祝新政协召开和人民政府成立的指示……275
（1949年9月27日）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陶峙岳鲍尔汉……279
（1949年9月28日）
叶剑英将军奉命南下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281
(1949年9月28日）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283
（1949年9月29日）
为《新华月报》题写报头……285
（1949年9月29日）
为《新建设》杂志创刊题词……286
（1949年9月29日）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288
（1949年9月30日）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295
（1949年9月30日）
为《新华日报》第一次题写报头……298
（1949年9月）

为《黑龙江日报》题写报头……………………………………299
（1949年9月）
为《新建设》题名……………………………………………301
（1949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302
（1949年10月1日）
给侨胞的题词…………………………………………………336
（1949年10月1日）
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338
（1949年10月3日）
对程潜陈明仁所提要求和建议的处置意见……………………339
（1949年10月5日）
关于安排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看望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的电报…342
（1949年10月5日）
在马叙伦请假信上的批语……………………………………343
（1949年10月5日）
给黄炎培的信…………………………………………………344
（1949年10月5日）
答谢福斯特、但尼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345
（1949年10月6日）
同意第四野战军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347
（1949年10月7日）
中央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广州军管会等机构的电报…………348
（1949年10月7日）
转发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的批语…………………………………349
（1949年10月7日）

关于杨开智等工作安排问题的电报……………………………352
（1949年10月9日）
给谭政、陶铸的信……………………………………………353
（1949年10月9日）
同意聚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计划………………………………354
（1949年10月10日）
毛泽东、朱德致“长治”号舰全体起义人员电………………355
（1949年10月10日）
对新疆赵锡光、鲍尔汉、马良骏等祝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复电…356
（1949年10月10日、21日）
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358
（1949年10月11日）
十五兵团暂不进攻广州…………………………………………359
（1949年10月11日）
关于同意约鲍尔汉至酒泉商谈的电报…………………………361
（1949年10月11日）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362
（1949年10月11日）
慎重考虑围歼白崇禧部计划力求做到确有把握………………363
（1949年10月12日）
相机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365
（1949年10月12日）
关于草拟华东军政委员会名单给陈毅的信……………………369
（1949年10月12日）
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370
（1949年10月12日）

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372
（1949年10月13日）
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375
（1949年10月13日）
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378
（1949年10月13日）
在表扬歼灭白崇禧主力的部队的电报上的批语……………………379
（1949年10月13日）
给冯友兰的信…………………………………………………………380
（1949年10月13日）
给上海市纸业革新促进会的题词……………………………………382
（1949年10月13日）
为《南方日报》题写报头……………………………………………383
（1949年10月13日）
为了解罗章龙的情况致湖南省委电…………………………………385
（1949年10月14日）
中央关于发表广州军管会和市政府就职布告的电报………………386
（1949年10月15日）
中央关于新疆三区代表和彭德怀会谈问题的电报…………………387
（1949年10月15日）
同意分步骤在新疆进行军事工作……………………………………388
（1949年10月15日）
为《中苏友好》杂志创刊号题词……………………………………389
（1949年10月15日）
给张仲实的信…………………………………………………………391
（1949年10月15日）

致卫立煌电……392
（1949年10月15日）
给周世钊的信……393
（1949年10月15日）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95
（1949年10月16日）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电报……398
（1949年10月16日）
四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399
（1949年10月17日）
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400
（1949年10月19日）
关于高凌云师与陕北伊盟部队合编的电报……402
（1949年10月19日）
中央关于物色民主分子参加广西工作的电报……403
（1949年10月19日）
给斯大林的信……404
（1949年10月20日）
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405
（1949年10月20日）
对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祝贺新疆和全国解放的复电……412
（1949年10月21日）
关于写解放军进入新疆的短评给胡乔木的信……413
（1949年10月21日）
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和唁电……414
（1949年10月、11月）

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的批语……416
（1949年10月23日）
中央关于新疆问题致彭德怀电……418
（1949年10月23日）
祝贺“海辽”号轮起义致方枕流等电……420
（1949年10月24日）
在一则新闻稿上的批语……421
（1949年10月24日）
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422
（1949年10月24日）
中央关于召开西北局会议的电报……430
（1949年10月25日）
军委关于同意解除十兵团出击潮汕任务的电报……431
（1949年10月25日）
中央关于湖南临时省政府改组问题的电报……432
（1949年10月25日）
转发人民解放军入疆综合报告……433
（1949年10月25日）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35
（1949年10月26日）
复霍查同志电……437
（1949年10月26日）
复拉比·蒲哈利电……438
（1949年10月26日）
关于撤销迪化伪监委行署的电报……439
（1949年10月27日）

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致斯大林电……………………………440
（1949年10月28日、30日）
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442
（1949年10月29日）
关于董其武部改编问题给薄一波的信……………………………444
（1949年10月29日）
转发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报告的批语…………445
（1949年10月30日）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447
（1949年10月31日）
关于华中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致林彪等电………………………450
（1949年10月31日）
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写的序言…………………452
（1949年10月）
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453
（1949年11月1日）
对空军关于航校校址问题报告的批语……………………………455
（1949年11月1日）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村政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456
（1949年11月2日）
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关于长安县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458
（1949年11月2日）
中央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459
（1949年11月2日）
军委关于同意定海作战方案致粟裕等电…………………………461
（1949年11月4日）

关于改造和补充陈明仁部致林彪电……………………462
（1949年11月4日）
关于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的批语……………………463
（1949年11月4日）
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名……………………464
（1949年11月4日）
中央关于上报新疆等省政府名单致彭德怀电……………………466
（1949年11月6日）
中央关于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电报……………………467
（1949年11月6日）
对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报告的批语……………………468
（1949年11月6日）
对关于空军司令部名称和关防尺寸刊发问题的批语……………………470
（1949年11月6日）
中央关于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电报……………………471
（1949年11月7日）
邓华兵团可以分出一个师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敌军……………………473
（1949年11月9日）
中央关于毛泽东去莫斯科时间致王稼祥电……………………474
（1949年11月9日）
中央关于征询政协党外代表对华东政权机关意见的电报……………………475
（1949年11月10日）
向董其武部调派的政工干部必须加以训练……………………476
（1949年11月11日）
关于安排西蒙诺夫到广西前线参观的电报……………………477
（1949年11月11日）

致斯大林电……………………………………………………………478
（1949年11月12日）
祝贺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的电报………………479
（1949年11月12日）
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480
（1949年11月14日）
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481
（1949年11月14日）
给毛远翔的信………………………………………………………483
（1949年11月14日）
对创办三所军医大学报告的批语…………………………………484
（1949年11月14日）
给毛煦生的信………………………………………………………485
（1949年11月15日）
给毛泽青的信………………………………………………………487
（1949年11月15日）
欢迎仇鳌来京的电报………………………………………………488
（1949年11月17日）
给李介侯的信………………………………………………………489
（1949年11月17日）
给张四维的信………………………………………………………490
（1949年11月17日）
中央转发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电报的批语……………………491
（1949年11月19日）
致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驻港员工电……………493
（1949年11月19日）

答谢兰那地夫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494

（1949年11月19日）

答谢萨拉·博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495

（1949年11月19日）

复电感谢伊朗共产党……………………………………………496

（1949年11月19日）

关于同意工作方针致彭德怀电…………………………………497

（1949年11月19日）

为《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题词…………………………………498

（1949年11月20日）

关于任弼时治病问题致斯大林电………………………………500

（1949年11月21日）

军委关于张治中去兰州致彭德怀电……………………………501

（1949年11月22日）

中央关于要华中局对处理旧人员提出意见的电报……………502

（1949年11月22日）

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504

（1949年11月23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电………………………………………………506

（1949年11月23日）

在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49年7月4日）

同志们：

你们今天毕业了，我来看看，讲几件事情。

我们共产党有二十八年了，在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七个人、十一个党员[1]，第二年一九二二年不过一二百人。今天你们团校就有五百人，而且还全是干部，这说明是发展！你们不是学了唯物史观吗，这就是唯物史观上所说的发展。同志们，苏联共产党开始也只是列宁等几个人，今天成为联邦的大党。我们今天已是全国范围内第一大党，但还有些农村、工厂未有支部，再过几年之后将成为全国的党，联邦的党。

同志们！你们要记住，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个目的，没有目的前进，乱来是不行的。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很多次，拿洪秀全来说，他们就要搞个太平天国，他们的太平，意思就是没有人剥削人、压迫人，不打仗，天国不是旧国，是世界大同，同天上一样。但是他们不能做成功的，只有我们领导，和你们及广大群众在一起，共同斗争才行。

---

[1] 原记录稿如此。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其中包惠僧代表陈独秀参加会议），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二大时全国党员195名。

有人说共产党好，为什么不早一百年出来，不是可以早实行共产主义吗？你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是找不到共产党的，道理是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一百年前，只有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在封建社会就不可能有共产党的。

你们学了唯物史观后就要懂得，一步一步前进，有了条件，准备好力量，稳步地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时就不要人民解放军，不要共产党了。有人说，不要共产党那还得了？就是因为得了才不要的，才取消的。那时也有警察，今天的警察两种性质，国民党统治时是用来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所谓维持秩序是维持反动的秩序；而解放后我们的警察两种任务，一是镇压反革命，二是维持秩序。到那时他们任务则只有一个，就是维持秩序而不是镇压反动派了。有人害怕反动派不镇压不行，就是因为没有反动派了，你镇压他干嘛！

同志们，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

对不起，你们等了好久，我今天讲话完了。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49年7月6日）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1949年7月6日，毛泽东等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

（1949年7月7日）

自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我中华民族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伟大的爱国战争以来，今年的“七七”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一次纪念。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由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成立，我全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的种种要求，现在都已开始实现了。

三年来的人民解放战争，实际上是八年抗日战争的继续发展。我全国人民在十二年前首先向法西斯侵略势力的东方战线作战，奋斗八年之久，经历重大牺牲，终于与盟国共同取得了最后胜利。但是举世皆知，在战争结束以后，创巨痛深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而且遭受了新的严重的灾难。抗日战争要求民族独立，但是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做美国殖民地的奴隶。抗日战争要求民主改革，但是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强迫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法西斯恐怖。抗日战争要求在战争结束以后实现国内和平，以便恢复和发展国家的建设，但是美国政府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大规模的反人民内战，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比在日本侵略期间有过之无不及。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敢于如此倒行逆施，是认为他们的力量大

过人民的力量。但是他们计算错了。需要八年时间协同各国力量才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民，经过三年时间就基本上战胜了主要由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虽然仍图最后挣扎，但是已经不要很久就可以全部肃清。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成立，不久就可以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产生民主联合政府，着手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49年7月7日晚上，毛泽东冒雨出席北平各界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

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新国家的时候，当然要和一切愿意以平等友好态度对待我们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同时，我们当然要反对一切方式的侵略和威胁，这些是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在反对各种侵

略和威胁的时候，我们不能不特别提出日本的问题。中国是离日本最近，与日本关系最密切，并且是抵抗日本最早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处理日本问题必须征求中国的意见，决不允许由美国政府一意孤行，擅作决定。中国虽然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中日两国的人民却极愿意在日本按照波茨坦协定实行非军国主义化而且是民主化的条件下和平相处，建立经济的和文化的合作。不过，中日两国人民的这种共同愿望现在却受着阻挠，侵略中国的美帝国主义者正在控制着日本。美国政府和美国统帅部的对日政策不是执行波茨坦协定而是推翻波茨坦协定，不是使日本非军国主义化，不是使日本真正民主化，而是使日本反民主化，继续军国主义化。美国政府不愿意迅速签订对日和约，而企图无限期地拖延对日和约，无限期地占领日本，使日本不能与中国和其他外国建立和平关系，而只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显然地，美国政府的这种反动政策直接威胁着中国人民，也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而且很严重地剥削日本人民。当我们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力量认为必须引起全世界注意：为了最后实现抗日战争的目的，我们一致要求迅速签订对日和约；我们一致主张在准备对日和约的时候，必须严格地遵照波茨坦协定所规定的由四国外长会议准备的程序，并且必须由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民主联合政府派遣中国的全权代表。

在中国人民今后的道路上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止我们的前进。我们的奋斗从来不是孤立无援的。在国际民主阵营中间，有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这首先就是苏联，其次就是各新民主国家，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为独立而奋斗的人民，和全世界为和平民主而奋斗的人民。国际民主阵营的力量，愈来愈大地超过帝

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帝国主义阵营虽然全力援助国民党反动派，却没有力量阻止中国人民的胜利。帝国主义阵营虽然签订准备新侵略战争的北大西洋公约，却没有力量阻止苏联和平外交的胜利，例如在最近的四国外长会议上关于德国统一原则问题和对奥和约问题所成立的协议。帝国主义阵营虽然大吹大擂地实行所谓马歇尔计划，却没有力量阻止美英等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个爆发的时间已经很迫近了。世界的发展方向，决定于反帝国主义的和平民主力量，不决定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现已丧失主动，处于被动，正在向着埋葬自己的坟墓走去。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为打倒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李济深
中国民主同盟	沈钧儒
	章伯钧
民主建国会	黄炎培
无党派民主人士	郭沫若
中国民主促进会	马叙伦
中国农工民主党	彭泽民
中国人民救国会	史良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谭平山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蔡廷锴
中国致公党	陈其尤
中国人民解放军	朱德

中华全国总工会 李立三
解放区农民团体 刘玉厚
产业界民主人士 陈叔通
文化界民主人士 沈雁冰
民主教授 张奚若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廖承志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蔡畅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谢邦定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周建人
国内少数民族 乌兰夫
海外华侨民主人士 陈嘉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

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1]

（1949年7月7日）

在我夺取舟山群岛及台湾以前，可能继续封锁下去，故你们的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准备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而我们则仍有办法，克服困难。假如情况真是这样，则不仅有对我不利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总前委并粟裕、张震、周骏鸣电的主要内容。

九月或十月前闽粤赣边纵队须独力作战[1]

（1949年7月9日）

华南分局，方，魏、朱，并告四野，三野：

午江电悉。（一）同意你们的部署。（二）我第四野战军业已部署完毕，日内开始向白崇禧[2]进攻，待目前开始的战役[3]告一段落后，即可以有力一部进占赣州及赣南十七县，究竟何时可占赣州及赣南各县，现尚不能确定，大概九月或十月是可能的。（三）我第三野战军的有力兵团现正开始由上海南进，大约八九两月可占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如有必要，可由该兵团于歼灭闽西、闽南等处敌人之后，以一部协助你们歼灭韩江流域之敌并占领潮汕[4]。请三野转知叶飞张鼎丞[5]诸同志注意。（四）在我三野部队进占闽西、闽南，四野部队进占赣南之前，我闽西、韩江、东江各部须独力作战，依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适当机动处理，不要依靠外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分局书记方方、闽粤赣边纵队政治委员魏金水、副政治委员朱曼平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指第四野战军为在湘赣边境歼灭白崇禧集团，以第十二、第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共9个军，于1949年7月上旬发起的湘赣战役。这个战役7月19日结束，歼敌4600余人。

[4] 潮汕，指广东潮州和汕头。

[5] 叶飞、张鼎丞，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援。（五）请三野令叶飞电台与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电台（现在梅县）接通联系，请四野准备于八月或九月间令接受进占赣南任务之我军与方方台接通联系。（六）方方、魏金水午江电即转发三野、四野知照。

军委
午佳

依靠群众办好铁路建设事业[1]

（1949 年 7 月 9 日）

中国从前是被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修筑铁路多是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帝国主义国家借款修筑的每一条铁路，都是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目的相配合的。铁路成为帝国主义压迫、榨取我们的工具。当然，那时要想把铁路建设好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不受帝国主义统治了，我们有可能并且应该很好地恢复铁路和发展铁路。

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我们早就不相信它能办好铁路。在辛亥革命前就想修筑成渝铁路，并在辛亥那年闹过保路风潮，到现在已经三十八年了。这条铁路国民党政府只修了很短的一小段。这就说明靠国民党政府要办好铁路是不可能的。我们跟它是不同的，我们能够恢复铁路和建设好铁路。过去，我们是无产阶级，什么“产”都没有，怎么能修建铁路呢？今天，我们个人没有“产”，但我们有了国家，有了群众，有了干部，有了工程师……，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就有力量，就能够修好铁路。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二十二年前我们什么也没有，二十八年前甚至连共产党也没有。为什么过去没有的东西今天会有呢？就是因为人民需要。从前我当小学教员时，只是靠教书吃饭，没有想到

---

[1] 这是毛泽东向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暨全国机务会议全体代表和铁道部、铁道兵团、平津铁路管理局部分工作人员的讲话。

要搞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因为人民需要才成立的。二十二年以前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就到井冈山上，成立自己的军队——红军。那时人很少，枪也很少。开始时，大家都说不行，国内外敌人反对我们，说我们是“匪”。匪者非也，就是说是“不应当有的”。但是我们现在有四百万人民解放军，我们行不行呢？行得很。拿铁路来说，我们也要和国民党比一比，看谁把铁路办得好，是国民党办得好呢，还是我们办得好？这在目前，还不能完全得到证明。但我相信，大概一年左右，特别是在东北，铁路事业就可以走上轨道了。将来我们再逐渐改进和发展，一定能在全国把铁路办得比国民党好。

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二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要修成几十万公里铁路，我们主要要依靠群众，就是工人、工程师等一切有用的人。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最下层群众，这是基本的；但同时也要依靠各级领导，没有领导也是不行的。我们两者都要依靠。

我们快要成立联合政府，实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了。以后在我们面前困难是一定会有的，但不管困难有多大，只要我们注意依靠和团结广大群众，就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不管是共产党员或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想把中国搞好的人，都要团结他们，这样困难就可以克服，我们的人民铁路建设事业就可以从少到多，从二万多公里一步一步地发展下去。

蒋介石有那么多的军队、大炮，工人也比我们山沟里的工人多得多。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

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我姓毛，我只一个人，要当班长是不行的，要当司令更是不行的。因此，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依靠干部，也要依靠工程师等有用的人。我在这会议上向你们提出，不管是老干部或是新干部，都要懂得依靠群众和重视群众，这样你们所要组织的铁路工会，就能搞得很好了。

四野应以一部向长沙湘潭推进[1]

（1949 年 7 月 10 日）

林、邓、萧、赵：

（一）据报白崇禧[2]拟在攸县、茶陵、安仁地区与我作一决战，现四十六军军部及一个师已至安福，七军一个师已至莲花，四十八军一个师有向永新消息。这些是防我陈赓部[3]经攸、茶、酃[4]切断其衡阳后路的。如我军此次作战，能于袁州[5]、醴陵线上及其以南围歼一部桂军，则白匪所谓攸、茶、安决战，是不可能的。否则，你们须准备于该区作战。（二）在株洲、衡阳线以东，即攸、茶、酃、安地区作战，或在衡阳以南作战，是一个新的步骤，须在我军占领长沙、湘潭、醴陵、宁乡、湘乡之后，利用粤汉路[6]及湘桂路运输才能作新的部署。当我军于进至醴陵、萍乡地区时，长岳线[7]上之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3] 陈赓部，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4] 攸、茶、酃，指湖南攸县、茶陵和酃县。

[5] 袁州，即江西宜春。

[6] 粤汉路，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7] 长岳线，指长沙至岳阳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陈明仁鲁道源[1]两部必将迅速撤退。因此，你们应以尚未使用之一个军于适当时机经岳州[2]向长沙、湘潭推进，并接管这一线。该军现在即宜进至岳州以北地区，并准备迅速进占长沙，缩短该地区无政府状态的时间。

军委

午灰

---

[1] 陈明仁，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八军军长。

[2] 岳州，即湖南岳阳。

复左协中将军等电[1]

（1949年7月11日）

左协中将军及前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全体官兵们：

接读通电，贵将军等率部接受和平解决方案，使贵军及榆林一带人民咸庆解放，极为欣慰。尚望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改造官兵、军民关系，为参加西北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

---

[1] 原国民党二十二军左协中将军等接受和平解决该军方案，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嘉勉。

关于打胡战役的指示[1]

（1949 年 7 月 14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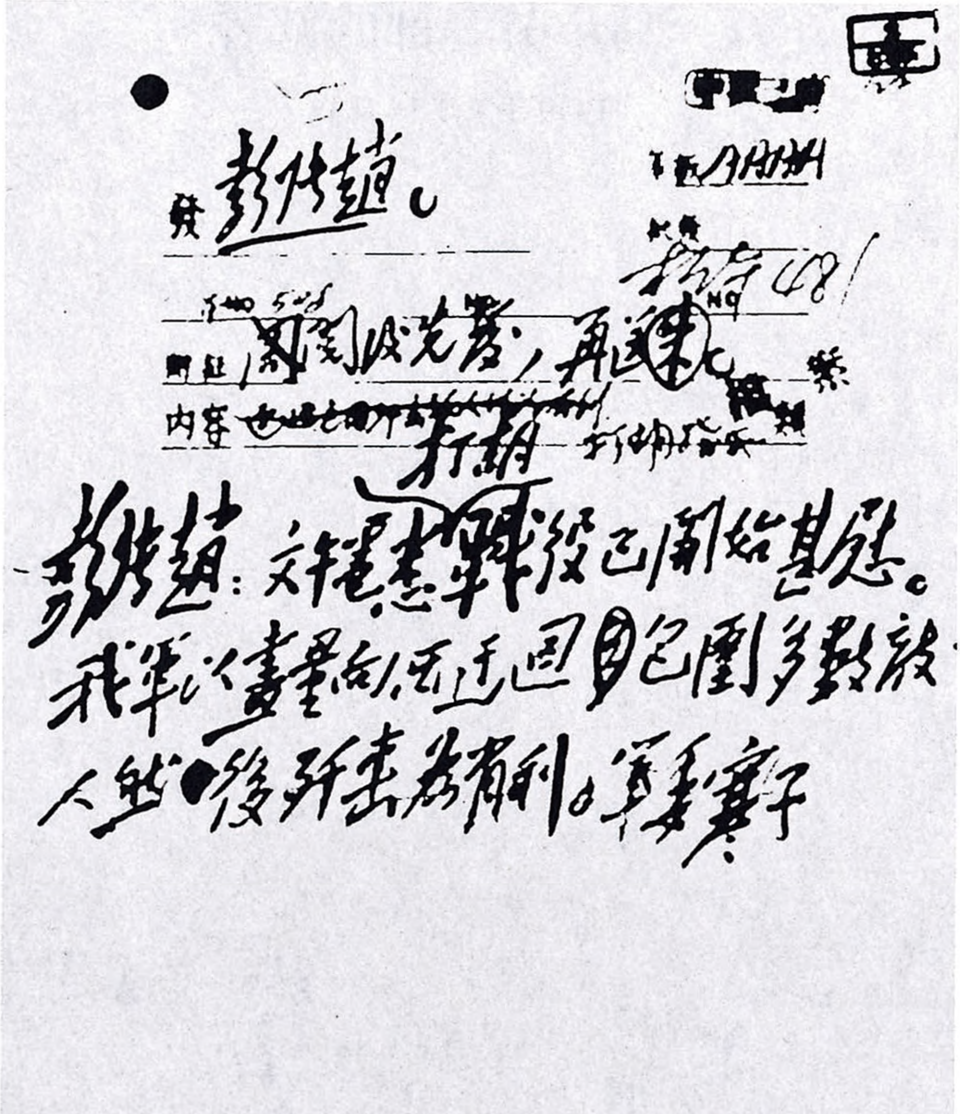
彭、张、赵：

文午电悉，打胡战役已开始，甚慰。我军以尽量向西迂回包围多数敌人，然后歼击为有利。

军委
寒子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發 彭張趙

事由 閱後發，再送

內容 打胡戰役

彭張趙：打胡戰役已開始甚慰。我軍以盡量集中迅速包圍多數敵人然後殲擊為有利。軍委寅寒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打胡战役的指示》的手稿。

歼灭马步芳等部的部署[1]

（1949年7月14日）

彭、张、赵：

（一）元日两电悉，歼胡四个军[2]甚慰。（二）马[3]匪既有反扑援胡消息，你们主力停止追击准备打马是对的。但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各军宜有几天恢复疲劳，然后发起攻击，并准备一直打到平凉，全歼一切被抓住的马匪。（三）一兵团如已追至宝鸡，即用该兵团歼灭宝鸡、凤翔之敌，然后由凤翔抄至马匪后面，如属可能亦是有利的，请相机酌定。

军委

寒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2]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6月，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联合向进占西安、咸阳地区的第一野战军反扑受挫后，被迫西移转入防御。第一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钳马打胡，后钳胡打马的方针，于7月11日发起扶眉战役。14日战役结束，共歼灭胡宗南部4个军4.3万余人，解放了陕中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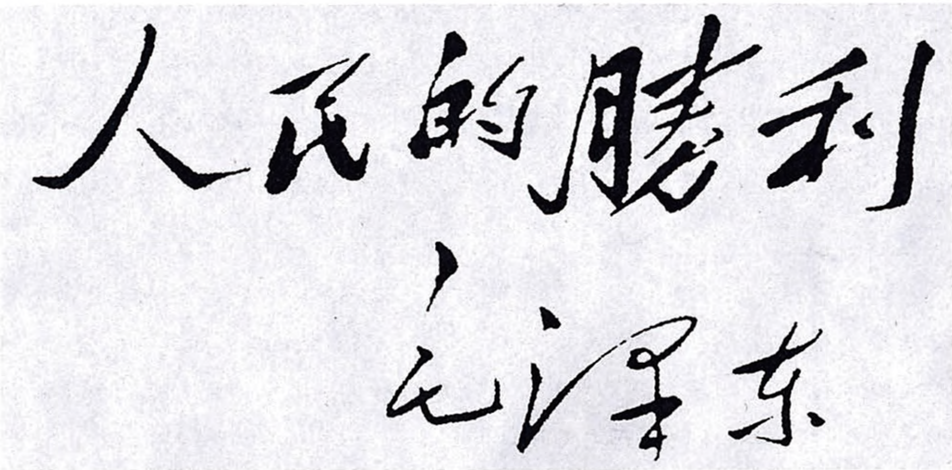
[3] 马，指马继援、马敦静，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陇东兵团指挥官兼第八十二军军长和宁夏兵团司令官。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题词

（1949年7月15日）

人民的胜利。

毛泽东



人民的勝利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战绩》一书的题词。

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1]

（1949年7月16日、17日）

一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2]：

十四日二十时电[3]悉。

（一）广东只有残破不全之敌军四万余人，而我则有超过四万人之游击部队，只需要两个军加上曾生[4]两个小师即够解决广东问题，至多派三个军加曾生部即完全够用，不需要派出更多兵力。

（二）判断白崇禧[5]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

---

[1] 这是毛泽东就追歼国民党军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领导人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的两封电报。

[2] 刘、张、李，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林彪、邓子恢、萧克1949年7月14日20时关于对南撤之敌的作战计划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

[4] 曾生（1910—1995），广东惠阳坪山镇（今属深圳市）人。当时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

[5]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白部退至湘南以后便只有十万人左右了，宋希濂、程潜[1]两部是退湘西、鄂西，不会往湘南。

（三）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2]。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四）歼灭白匪应规定我军的确实兵力，我们提议为八个军，以陈赓[3]部三个军、四野五个军组成之。此八个军须以深入广西、云南全歼白匪为目的，不和其他兵力相混。陈赓之另一个军在湘南境内可以参加作战，但不入广西，准备由郴州直出贵阳，以占领贵州为目标。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此点已和邓小平同志面谈决定（刘邓[4]共五十万人，除陈赓现率之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九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十一月可到，十二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5]率十万人左右

---

[1]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2] 关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1949年9月12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并告林彪、邓子恢、谭政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3] 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第二野战军。

[5] 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入成都，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1]四省。你们经营之范围确定为豫、鄂、湘、赣、粤、桂六省，但你们的五十军须准备去云南，如白匪主力退云南，则还须考虑加派一部入滇助战）。

（五）陈赓四个军到达郴州之道路，请考虑全部走遂川、上犹、崇义，分数路前进，未知该区有几条汽车路否？如有适当道路，似以这样走为好。

（六）专门担任经营江西的两个军，不应担任其他任务。专门担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应取道江西、大庾岭前进，而不走湘南，因湘南敌我屯兵太多，粮食必感困难。

（七）准备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八个军（四野五个军，陈赓三个军），进到郴州地区后，如能利用湘桂铁路运粮接济，最好全部取道全州，直下桂林、南宁，以期迅速。否则四野五个军取道广州、肇庆西进，迂回广西南部，陈赓三个军则经全州南进。或者以陈赓三个军协同四野专任经营广东之两个军共五个军，走大庾岭出广州，但陈赓不担任广州工作，只经过一下即出广西南部，而以四野五个军（其中包括五十军）由全州出桂林。

（八）曾生部应即速出动，走江西入广东。

（九）以上是否适宜，请你们考虑提出意见。

军委
午铣

---

[1] 康，指西康省。

二

林、邓、萧，并告刘、张、李，陈、饶、粟[1]：

午铣电[2]谅达，兹补充数点，请你们连同午铣电一并考虑电复。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个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

（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3]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速去广州。

（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

---

[1] 陈、饶、粟，指陈毅、饶漱石、粟裕，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午铣电，即本篇一。

[3] 袁州，即江西宜春。

置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

（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管他愿意同我们打也好，不愿意同我们打也好，近撤也好，远撤也好，总之，他是处于被动，我则完全处于主动，最后迫使他不得不和我们在广西境内作战。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1]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的强大游击部队，至少桂系要留下一部在广西，而以另一部逃入云南，那时我则以陈赓三个军配以你们的曾泽生军，就可以在云南境内歼灭之。到十一月间，我二野主力六个军已入黔、川，他想逃入黔、川也不可能。西北胡宗南部主力已于午文在眉县、扶风地区被我一野歼灭，其残部仅剩七万人逃往汉中一带。我一野决以九个军西入甘、宁、青寻歼马[2]匪，而准备于今冬或明春抽三个军出川北，协同二野经营西南，使西南残匪获得全歼。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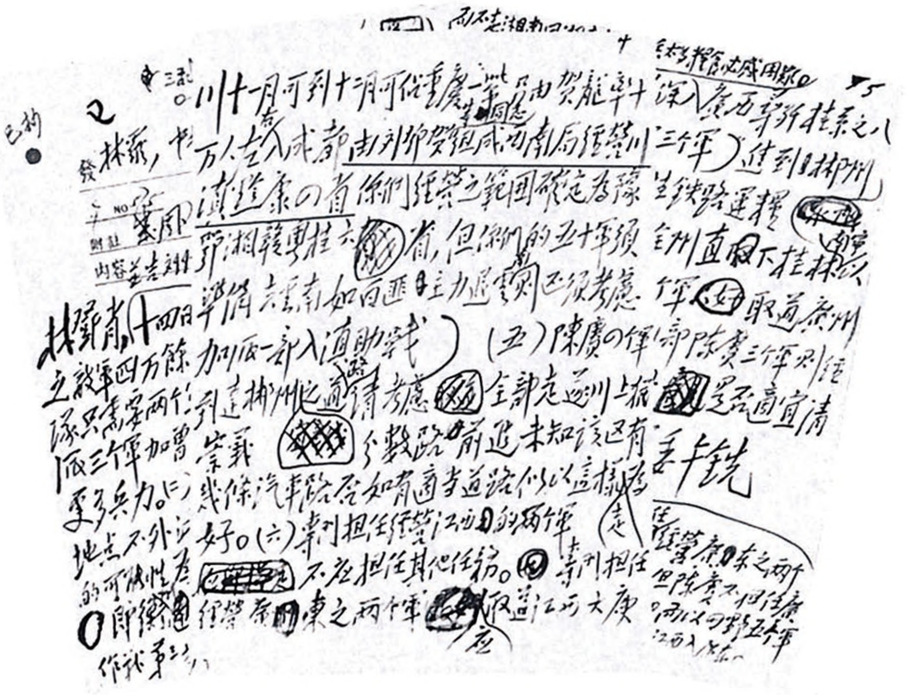
军委

午篠

---

[1]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2] 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和副长官。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的手稿。

军委关于对程潜的方针的指示

（1949年7月18日）

林、邓、萧、赵：

十七日二十三时半电悉。

（一）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干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办。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伪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为不久该部即可被我改编，而且挂了此名义，即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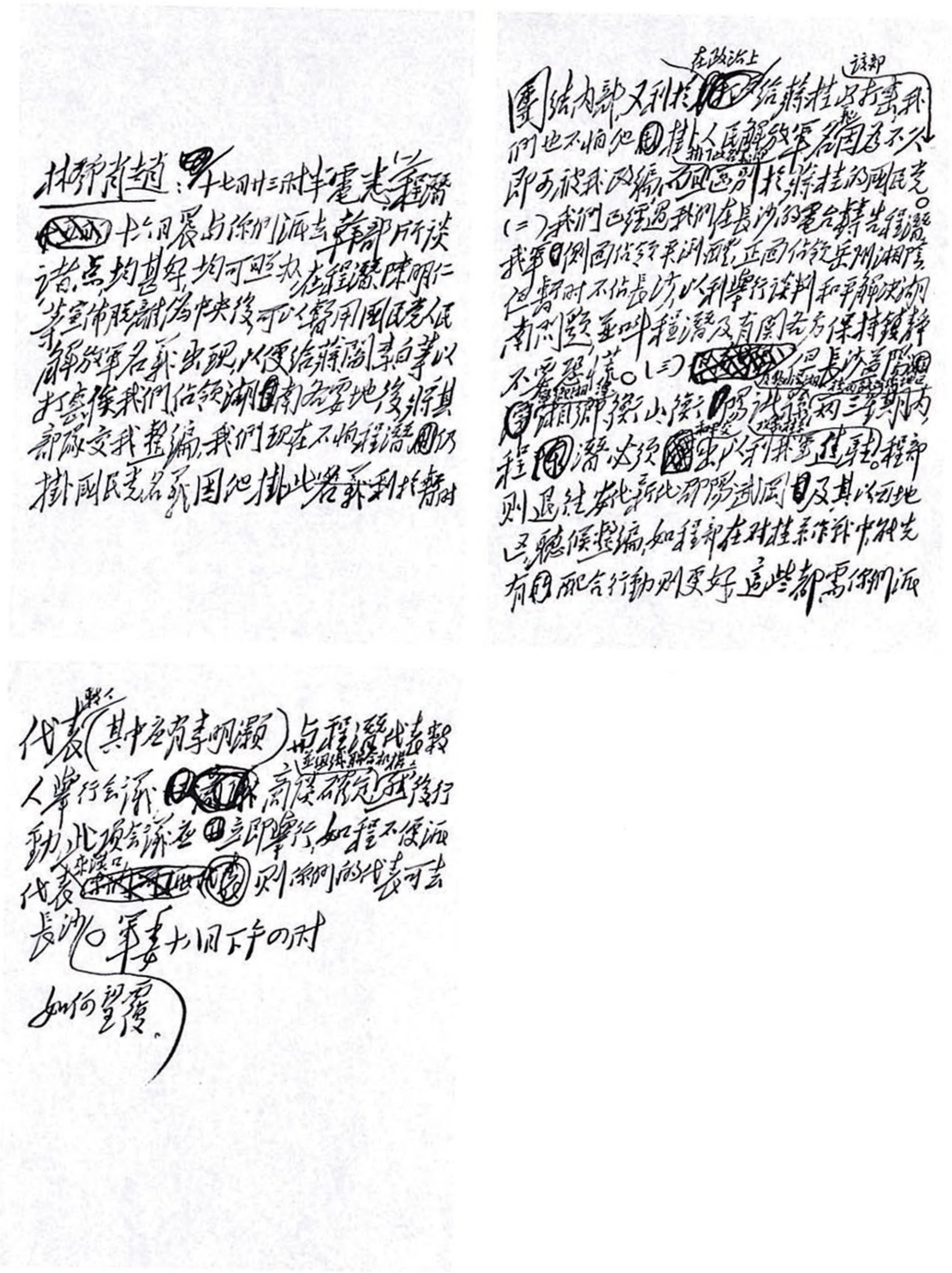
（二）我们已经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恐慌。

（三）但长沙、益阳、宁乡、湘潭、湘乡、衡山、衡阳诸县及粤汉、湘桂两路沿线地区两三星期内，程潜必须和平交出，以利我军进驻攻击桂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代表数人（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商谈确定，并组织联合机构，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

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如何望复。

军委

十八日下午四时



林邓肖赵：十七日十三时半电悉。程潜十六日晨与你们派去李部所谈诸点均甚好，均可照准。在程潜、陈明仁等宣布脱离广州中央后，可以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名义出现，以便给蒋阎李白等以打击。俟我们占领湖南各要地后，将其部队交我整编。我们现在不怕程潜仍挂国民党名义，因他挂此名义利于暂时

团结内部，又利于在政治上给蒋桂以打击。我们也不怕他挂人民解放军名义，因该部不久即可被我改编，而此名义区别于蒋桂的国民党。（二）我们已经通过我们在长沙的电台转告程潜，我军侧面占领平浏醴，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暂时不占长沙，以利举行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并叫程潜及有关各方保持镇静，不要惊慌。（三）但长沙[illegible]宁乡湘潭衡山衡阳[illegible]三星期内，程潜必须[illegible]以利我军进驻。程部则退往安化新化邵阳武冈及其以西地区听候整编，如程部在对桂系作战中能先有配合行动则更好。这些都需你们派

代表（其中应有李明灏）与程潜代表数人举行会议，[illegible]商谈确定，然后行动。此项会议应立即举行，如程不便派代表来汉口，则你们的代表可去长沙。

如何望复。

军委 十日下午四时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对程潜的方针的指示》的手稿。

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1]

（1949年7月18日）

如果属实，则你们应令十二兵团占领浏阳、醴陵，正面占领岳州、湘阴，但不要去占株洲，各部均不要太接近长沙，以便和程潜谈判和平解决湖南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程潜各部集中长沙是否属实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邓子恢、萧克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1]

（1949年7月19日）

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2]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3]（但可不占褒城），迫使南山[4]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的主要内容。

[2] 第一野战军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为追歼青海的马步芳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准备以第一、第二兵团出陇县，截击陇东；估计两马将总撤退，准备以第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猛追。

[3] 褒城，旧县名，今分属勉县和汉中市。

[4] 南山，指秦岭山脉以南的汉中、勉县、南郑地区。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武昌划归湖北省建制致华中局电

(1949年7月21日)

华中局：

七月八日电悉。同意[1]武昌划归湖北省建制。

中央

午马

---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为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陈赓邓华两兵团进攻广东的部署[1]

（1949年7月21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2]及华南分局：

（一）同意你们七月十七日电[3]（二十一日才收阅）整个部署方针。（二）陈赓[4]与邓华[5]分两路入粤是对的，但请注意桂东桂阳道路、粮食情况。如有困难，则陈赓之重武器及大行李可循邓华道路南进，而邓华则除南始[6]大道外，可在东侧找一条辅助路。（三）陈、邓入粤后，准备以陈兵团从北江、邓兵团从东江（可能须先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宋，指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此时已调任南京军管会副主任。张、李，指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指1949年7月17日林彪、邓子恢、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陈赓、邓华两部目前即向广东出动。但该两部统经赣州、南雄、始兴则太拥挤，陈赓以两个军经遂川、桂东准备出仁化、乐昌，到桂东后如见攸县、茶陵敌不退，则直向郴州、永兴前进，准备由南向北切断敌人退路；如到桂东后，敌已撤退，即经汝城向仁化、乐昌前进，其另一个军经崇义、上犹向始兴前进。邓华之两个军则经赣州、南康、南雄向翁源前进。

[4] 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邓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

[6] 南始，指广东南雄和始兴。

惠州）两路攻广州，而在攻广州之前，两兵团各须在北江、东江休整一短期（例如半个月至一个月），与华南分局会合，商定接管广州及全省的整个部署，并配备干部。以上请转知陈、邓注意。（四）陈邓两兵团速与华南分局方方[1]电台沟通联络，并与军委通电。（五）华南分局迅即由梅县移至南雄，迎接陈、邓，会商一切。（六）此间当令叶剑英[2]同志提早赴粤。

军委
午马

---

[1]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

[2]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和北平市市长。

复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电

（1949年7月21日）

布拉·罗加同志：

谢谢你对于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的祝贺。中国和古巴是两个距离很远的国家，但是两国人民斗争的基本目标确是一致的，这个情形，造成了两国人民的不可分离的国际友谊，如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友谊一样。祝勇敢的古巴人民和古巴人民社会党人对于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胜利！祝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事业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复华东局电[1]

（1949年7月21日）

邓小平已到，中央已开会讨论了他的报告并委托陈云向你们面达。上海问题，须从农村、精简、疏散三方面着手才能解决。用大力进行苏、浙、皖三省农村工作，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是首先重要的，否则上海及任何城市的困难问题都不能彻底解决。其次是精兵简政，节省国家开支，这也是很重要的，你们现在即可以开始做。又其次是疏散，这需要有可行的计划，请你们与陈云商量后提出一具体方案交中央讨论。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陈云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准备前往上海筹备召开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大区的财经会议。

致周恩来电[1]

（1949年7月21日）

据张表方本日称，龙云代表李一平要求与我方负责人见一面，好回港复命。我意请周接见一次，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如何，请酌办。

---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李达去湖南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的批示[1]

（1949年7月21日、26日）

一

据李六如[2]本日称，李达愿任教育厅长，但尚无人正式通知他。请周考虑即决定李达任湖南教育厅长，并通知他早日去湘接管学校。

二

已和李达谈过，他愿意去湖南工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将中共湖南省委致中央组织部的一份电报批送周恩来时的批示；本篇二是26日毛泽东收到李达来信后，给周恩来的批示。

[2] 李六如，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1]

（1949年7月22日）

英美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有矛盾，我们应当利用这个矛盾。请你们在确定的一般原则下在运用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东局、南京市委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等电[1]

（1949年7月23日）

我们认为华东局指出的各点是一切地方都应当注意的，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请转发下级唤起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转发华东局关于新区农村工作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第一、第二、第四野战军电的主要内容。

对举行平凉战役以及西进作战的意见

（1949年7月23日）

德怀[1]同志：

午哿电[2]悉。打胡[3]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4]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辰兄[5]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协助，包括几十架飞机的助战。少奇、高岗、稼祥现在彼处，只要你们进军计划确定，彼方即可考虑协助问题。关于定购大批汽车问题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购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49年7月2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一）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约5万人。（二）为解放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请向某方订购汽车1000至2000辆，供西北军用。（三）宁夏卢忠良、青海马继援各率三军准备退守平凉、陇县、泾川地区，配置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26日开始攻击。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4] 马，指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和副长官。

[5] 辰兄，指苏联。

来后，经东北、华北转至西北，然后我军利用这批汽车进军新疆，如此则时间可能拖得长些，要明春或甚至夏季才能入疆。一种是利用现在少数汽车及从兰州、西宁可能缴获之车辆即行入疆，到达后再从伊犁方向输入汽车及其他工业装备，如此则时间可以缩短。究以何者为宜，请加斟酌电告。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1]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宁、青、新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辰兄又能用空军协助，则占领新疆是不难的。此事请于平凉战役结束后与王震[2]等同志商酌，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午梗

---

[1] 平凉战役，即陇东追击战。1949年7月扶眉战役后，第一野战军决心乘胡宗南、马步芳两部彼此远离之机，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青宁“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州地区。7月21日至24日，我军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动。同月24日，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于陇东布防，企图阻止第一野战军沿西兰公路挺进甘肃、宁夏。但马步芳、马鸿逵为保存各自的实力，在我军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分别后撤。我军乘机向陇东实施追击，至8月10日，歼敌万余，解放了陇东广大地区。

[2] 王震，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赓邓华两兵团在湘赣粤的行动计划[1]

（1949年7月24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2]及方方[3]：

各电均悉。（一）同意陈赓邓华两兵团[4]南进时间推迟至三伏以后。（二）陈赓所提应将南进新任务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一点是很对的，陈邓两兵团及各兵团均应这样做。历次证明，越是将任务及执行任务中可能遇到的顺利条件及困难条件预先说得明明白白，越有利于任务之完成及克服各种困难。（三）该两兵团三伏过后即出动，以旅次行军方法，第一步进至桂东、汝城、上犹、崇义、赣州、南康、大余、信丰地区待命。那时，华南分局方方及由北平南下之叶剑英张云逸[5]等同志到达赣州举行会议。这个会议是很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宋，指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豫皖苏分局书记、第三野战军第三副政治委员。张、李，指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3]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

[4] 陈赓邓华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陈赓和邓华。

[5]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和北平市市长。张云逸，原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已决定调华南分局工作。

要的。应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占领广东的若干重要问题，主要是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成，作战步骤，接收及管理广东的各项政策，干部配备，争取和余汉谋[1]等用和平方法解决广东问题，货币问题，外交政策（主要是对香港），以及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干涉等。这个会议的时间应不迟于九月五日，请方方按时赶到赣州。林平[2]及其他什么人应到会，由方方决定。方方须提早结束闽粤赣边区工作的处理。（四）江西省委对接收赣州及赣南各县的准备工作，须迅速完成。（五）赣南国民党军沈发藻[3]等愿意脱离江西省主席方天，站在我们方面，江西省委及十五兵团留赣南工作之一个军须注意接洽联络，争取和平接收赣南及改编赣南敌军。（六）从目前起的一个半月内，即在九月中旬以前，四野主力各部争取进到醴陵、攸县、湘潭、湘乡、宁乡地区，并争取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以便在陈邓两兵团由赣南向广州前进时（大约在九月中旬），四野主力能向衡州[4]、郴州地区前进。目前天气极热，可令四野主力缓缓前进，每天走四五十里，走两天三天休息一天两天。（七）以上请林邓萧赵将有关各点，通知陈赓、邓华及江西省委。

军委
午敬

---

[1] 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2] 林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沈发藻，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编练司令部司令、第四兵团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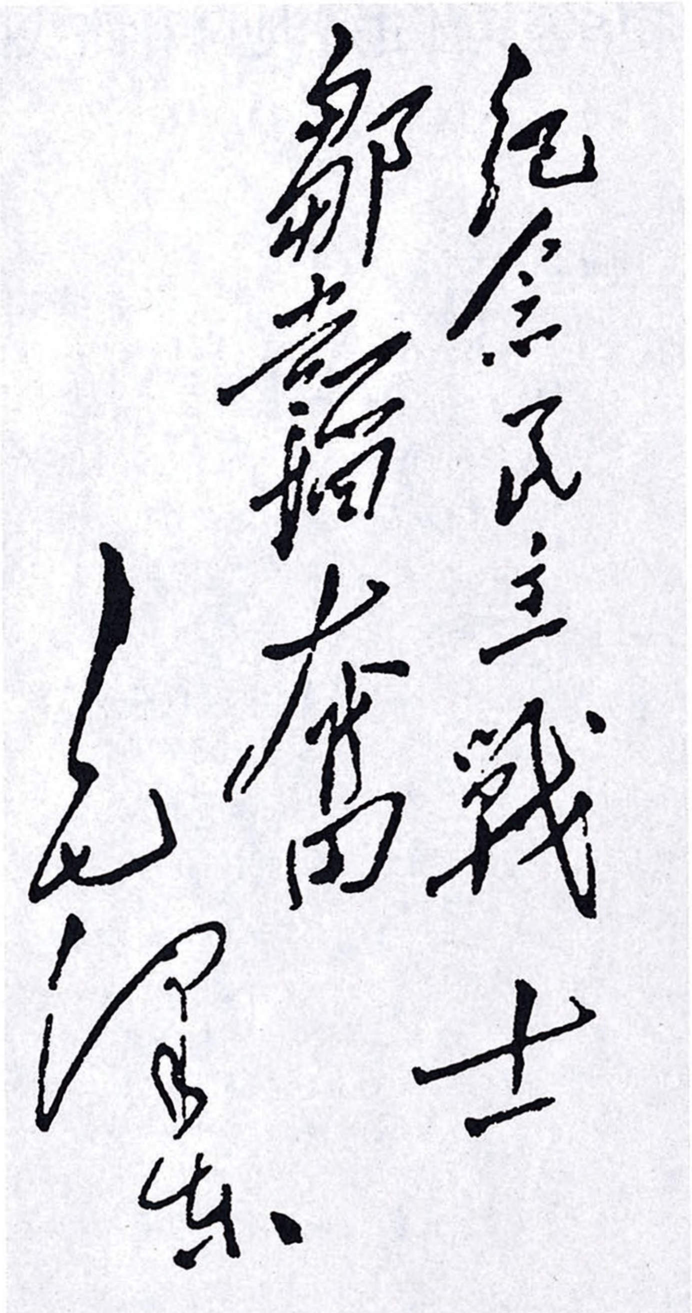
[4] 衡州，即湖南衡阳。

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题词

（1949年7月24日）

纪念民主战士邹韬奋。

毛泽东



纪念民主战士

邹韬奋

毛泽东

毛泽东为纪念邹韬奋逝世五周年的题词。

陈赓邓华等兵团进军地区和路线问题[1]

（1949年7月25日）

林、邓、萧、赵，并告刘、宋、张、李，粟、唐、周，华南分局：

（一）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2]悉，此电部署甚好，即可照此执行。（二）我们今晨发给你们一电，与你们此电精神是一致的。我们在该电中说，四野主力应争取于九月中旬以前到达攸县、湘乡及其以北各地。现距九月中旬尚有一个半月，你们照二十三日二十四时电部署休整，过三伏后再进，九月中旬以前是可以达到攸县、湘乡之线的。并且你们已令各兵团派遣先遣师进得更远，便于尔后主力的推进。（三）方方来电要求入粤我军有一路经三南、和平、河源出惠州，我们认为是必要的。在九月中旬以前，除先遣部队外，陈邓两兵团主力不要超过五岭[3]界线。自九月中旬起，准备陈兵团经从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7月23日24时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湘赣主力部队决在三伏内不作大的行动，各军进至指定地点休整。为扩大占领区及利于尔后之进军，各兵团均须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东退，以减少敌人对新区的抢掠及破坏。各先遣师应特别注意筹粮及修复道路。

[3] 五岭，指湖南、广东、江西、广西交界处的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和大庾五岭。

化南雄两路出北江，先占韶州[1]；邓兵团可经翁源、连平、和平分两路至三路平行南下出东江，先占惠州。在韶州、惠州集中干部，调整兵力，然后两兵团配合广东我军会攻广州（估计此时广州余汉谋[2]等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但九月五日，方方必须到赣州与叶张陈邓[3]会合，商筹全局。（四）韩江流域之胡琏、喻英奇[4]等部敌军，责成叶飞兵团[5]派一个军由漳州出潮汕[6]去帮助解决。邓华兵团不派兵出韩江。因邓部入粤只有两个军，占领广州后，主力应位于广州地区，一部在惠州，一部在韶州，一部出南路，不可能兼顾韩江。而陈兵团则须出广西。（五）方方要求派队解决会昌、寻乌地区之敌，这可由邓华留在赣南之一个军负责办理。

军委

二十五日上午七时

---

[1] 韶州，即今广东韶关。

[2] 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广州绥靖公署主任。

[3]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参谋长和北平市市长。张，指张云逸，原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此时已决定调华南分局工作。陈，指陈赓。邓，指邓华。

[4] 胡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编练司令部司令、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十八军军长。喻英奇，当时任国民党军闽粤边区“剿匪”总指挥。

[5] 叶飞兵团，指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兵团司令员叶飞。

[6] 潮汕，指广东潮州和汕头。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1]

（1949年7月25日）

借款协定，你们表示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是对的。我们亦正在研究协定的文字，明天或后天即有电报给你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个中国大学。我们正需要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设立这样一个大学是很必要的，但经费应讲明由中国负担为适宜。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

---

[1] 这是毛泽东复在苏联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团员的中共代表团，于6月21日自北平启程访问苏联，26日到达莫斯科。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1]

（1949年7月26日）

盛暑行军病员大增，极为悬念。你们已改为旅次行军及三伏休整，当可使情况改善。

---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23日关于部队疾病情形严重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转发方方、魏金水致中共中央军委电的批语[1]

（1949年7月27日）

请你们考虑邓华出三南之先遣师即由三南出梅县，配合当地我军歼灭胡琏部。该敌只有一万二千人，战斗力弱，我有一个师配合当地我军，可以解决该敌，然后直下潮、汕。

---

[1] 毛泽东将方方、魏金水21日致中共中央军委电转发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陈赓、邓华。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批语。

为戏曲改进会发起人大会题词

（1949年7月28日）

推陈出新。

毛泽东

关于刘少奇可先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刘少奇、王稼祥电

(1949年7月31日)

刘、王：

午陷各电均悉，答复如下：（一）少奇可先回国，留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二）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及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均同意。时间可定在九月政府成立后，人选准备亦要那时才能办好。（三）此外，我认为阿洛夫、米大夫[1]二人仍以留在中国工作为好，因为他们对中国情况已相当熟悉，他们已学了许多中国话，他们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的某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惟他们须统一在柯兄[2]领导之下，或留阿洛夫而米大夫不再来[3]，此事是否可行，请与柯兄商酌办理。

AH[4]

午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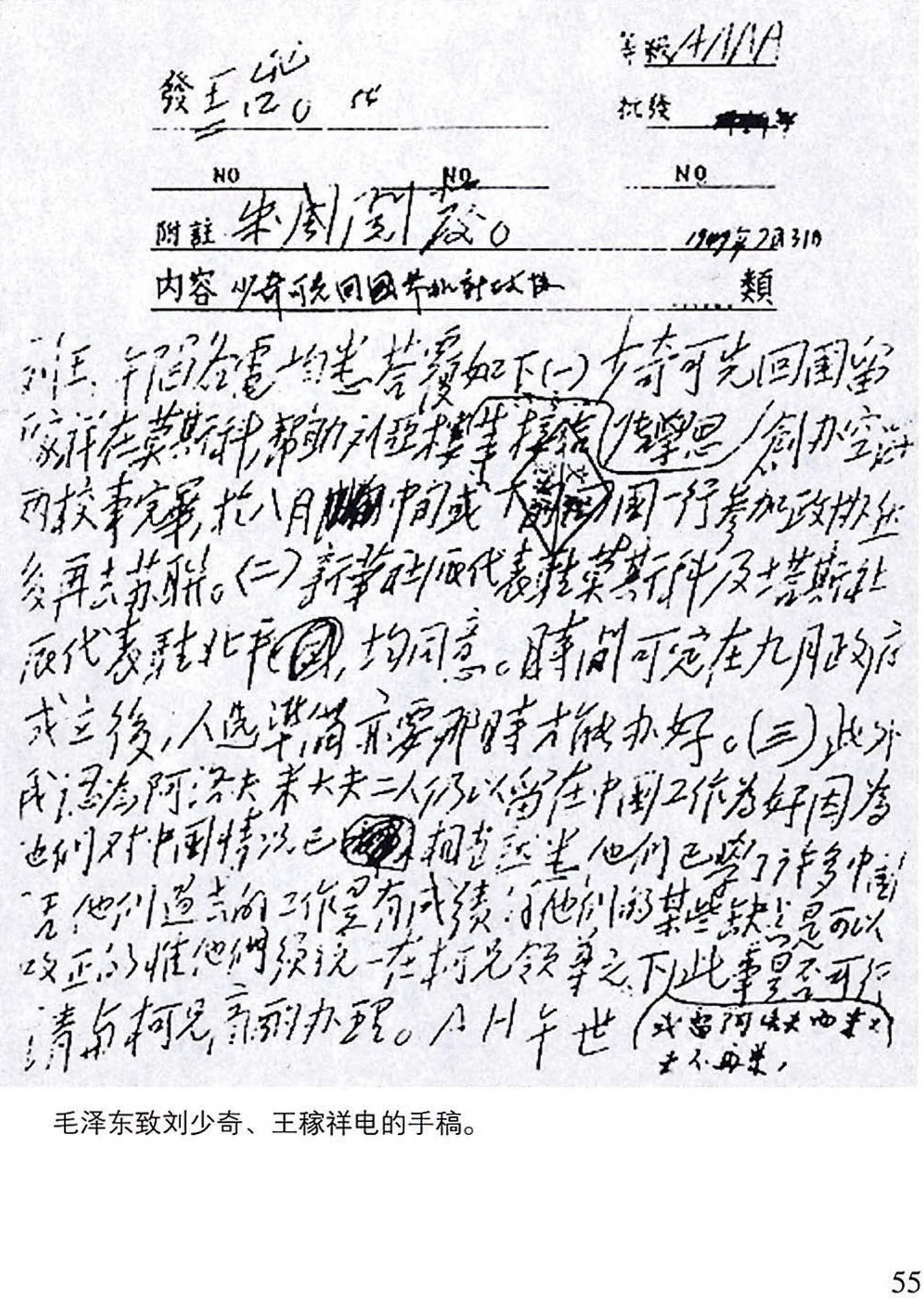
---

[1] 阿洛夫，指安德列·雅科夫列维奇·奥尔洛夫，是来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医生，并担任中共与联共(布)的联络工作。米大夫，指米尔尼柯夫，苏联著名内科医生，1945年12月来中国帮助工作。

[2] 柯兄，指柯瓦寥夫，当时担任来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组负责人。

[3] 此处楷体字排印的是周恩来修改时所加的内容。

[4] AH，毛泽东的代号。



發 王 刘。

號碼 4/1/1A

批發

NO　NO　NO

附註 朱周刘阅后發。　1949年7月31日

内容 少奇可先回国参加新政协　類

刘王：卅日各電均悉，答復如下：（一）少奇可先回国，留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创办空军学校事完毕，於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二）新华社派代表驻莫斯科及塔斯社派代表驻北平（京），均同意。時間可定在九月政府成立後，人选要那時才能办好。（三）此外，我们認為阿洛夫、米大夫二人仍以留在中国工作為好，因為他们对中国情况已相当熟悉，他们已学了许多中国话，他们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他们的某些缺点是可以改正的，惟他們須统一在柯瓦廖夫领導之下。此事是否可行（或留阿洛夫、米大夫二人，或留米），請与柯瓦廖夫商酌办理。中央 午卅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的手稿。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1]

（1949年7月31日）

一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从这次起义到现在，业已二十二年了。当时的青年人，现在已经是中年了。当时的中年人，现在已经是老年了。但是革命则终于胜利了。

二

这个军队的成分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革命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左右，而革命知识分子则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但懂得用革命精神教育军队，坚决地执行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及其各项具体政策，而且懂得革命的前途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二十二周年而写的社论稿时加写的三段话。本文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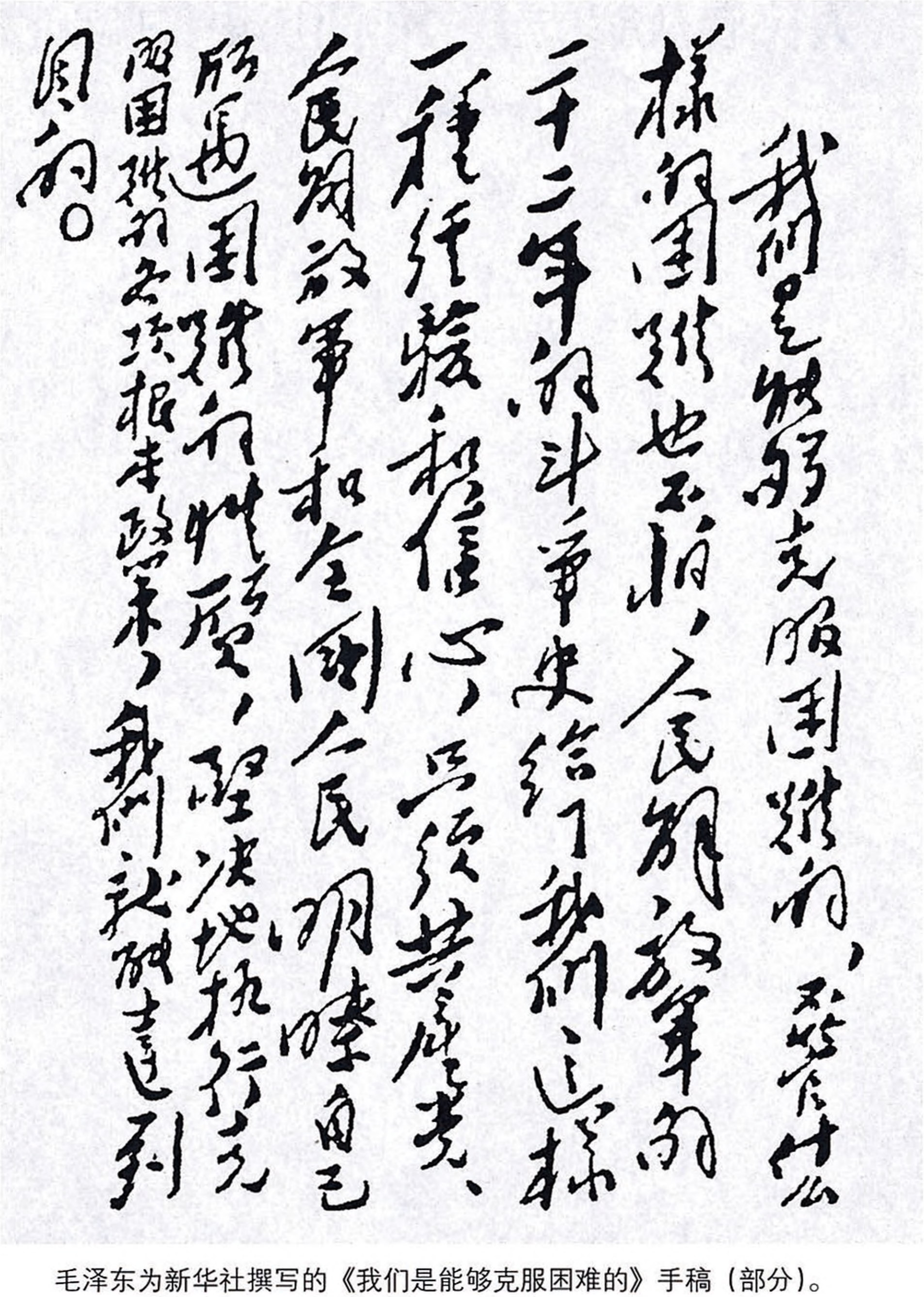
是什么，即是说革命将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稳步地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三

现在全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都深切地信赖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但是有些新解放区的人民（其中包括好心的热忱的知识分子），在天灾人祸和敌人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和个人生活困难面前感到了惶惑，这是因为他们还是刚刚被解放，还没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克服困难的斗争经验。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实行封锁政策的条件之下，还须加上一条疏散人口的工作。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管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心，只须共产

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了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不论什么样的困难也不怕，人民解放军的二十二年的斗争史给了我们这样一种经验和信心，只须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明确自己所遇困难的性质，坚决地执行克服困难的各项根本政策，我们就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手稿（部分）。

人民解放军二十二年的历史经验[1]

（1949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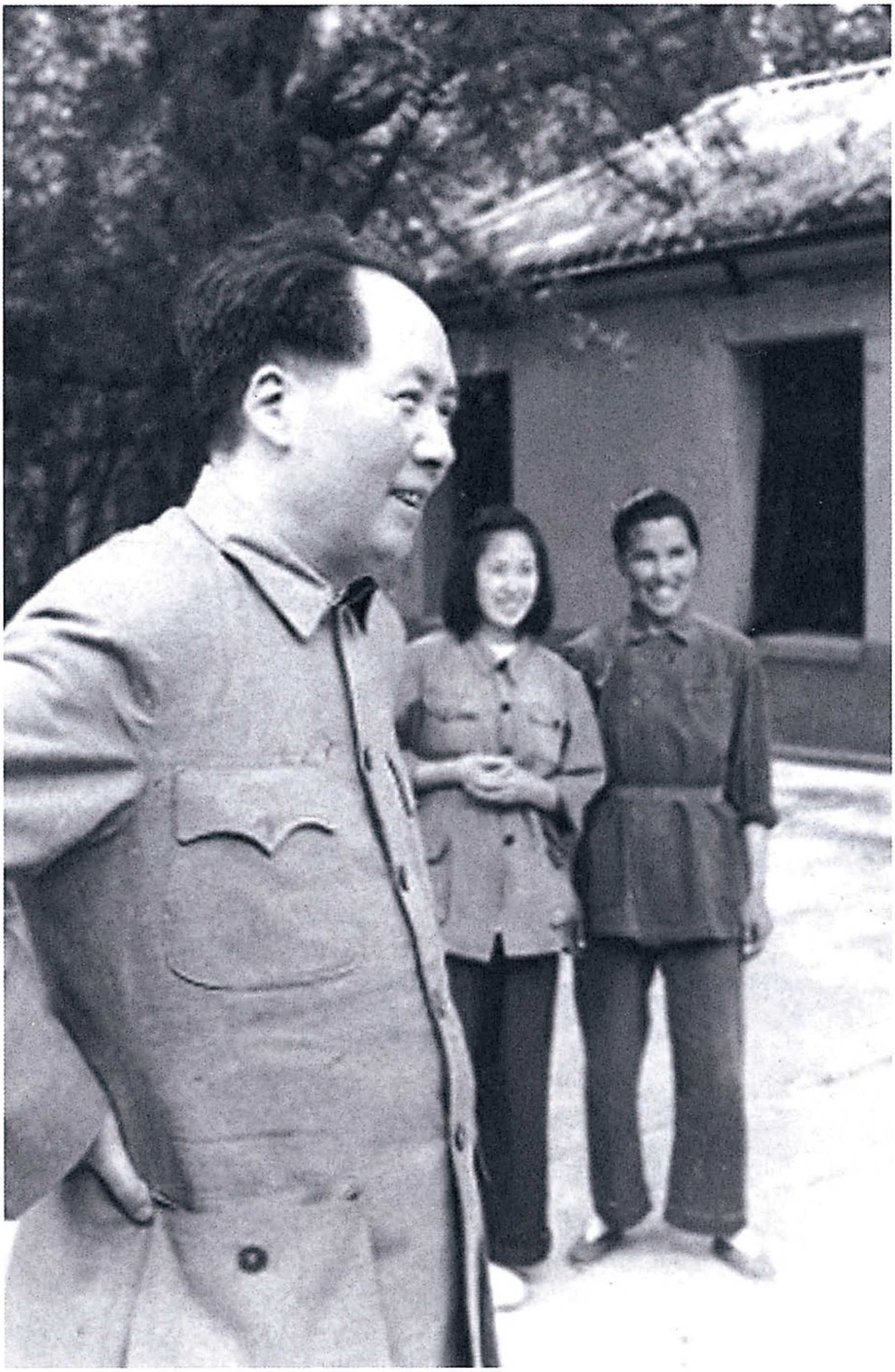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证明，只要坚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完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够打倒的，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是能够克服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广播稿《八一介绍》时加写的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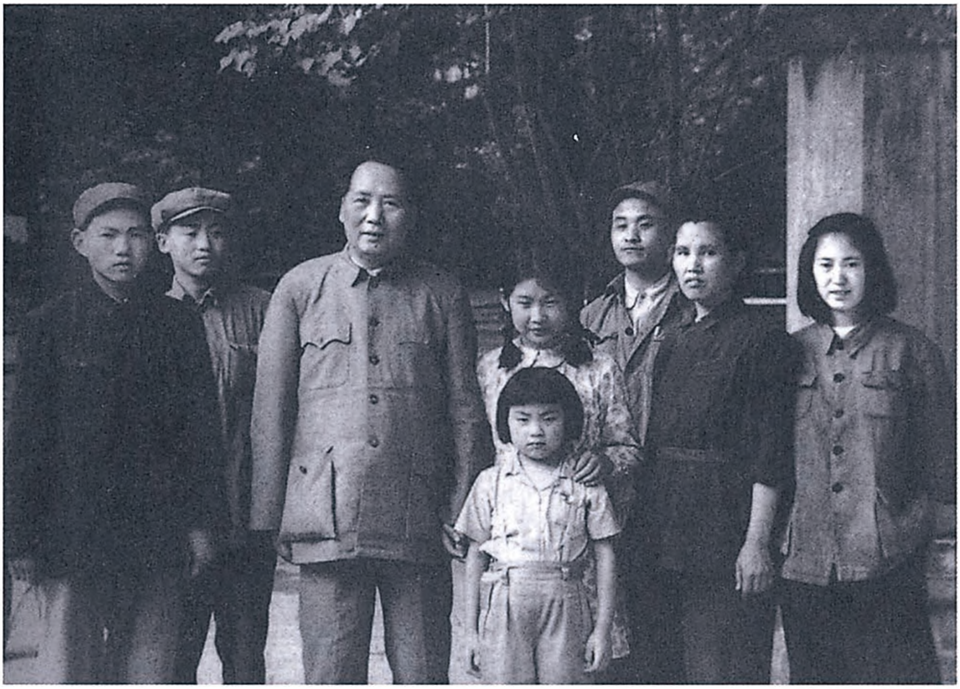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在北平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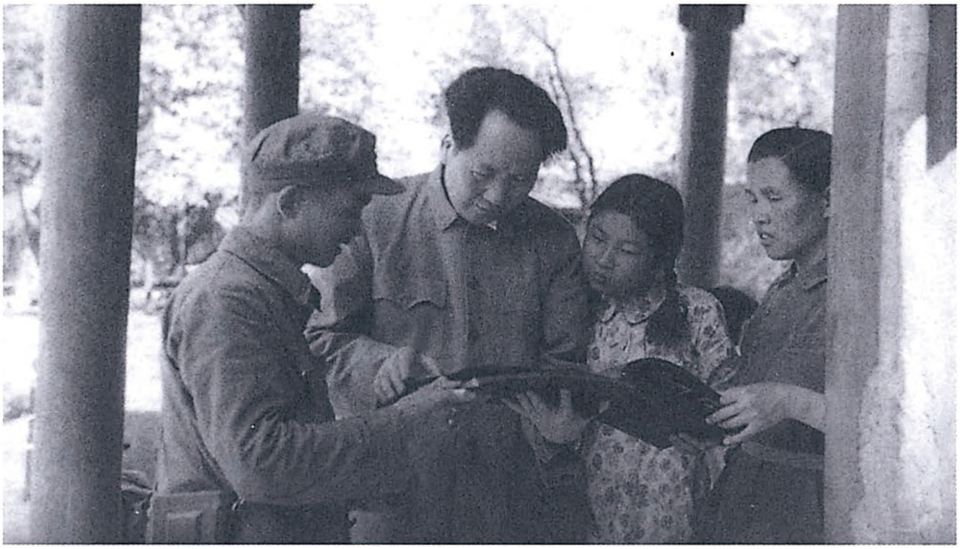


1949年7月，毛泽东和韩桂馨、李云露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及身边工作人员等在北平香山。



1949年7月，毛泽东和李敏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看照片。

1949年，毛泽东在北平。

1949年，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

1949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徐肖冰、侯波合影。

中央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

（1949年8月1日）

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华东局：

午陷电悉。

（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委员人选尚未定。其他干部，华中局及中央各准备一部分，华南分局应准备一部分。

（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南路、中区等几个区党委或地委，受华南分局直接领导。

（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委员人选待剑英、云逸与方方见面商量拟定后，报告中央考虑决定。

（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工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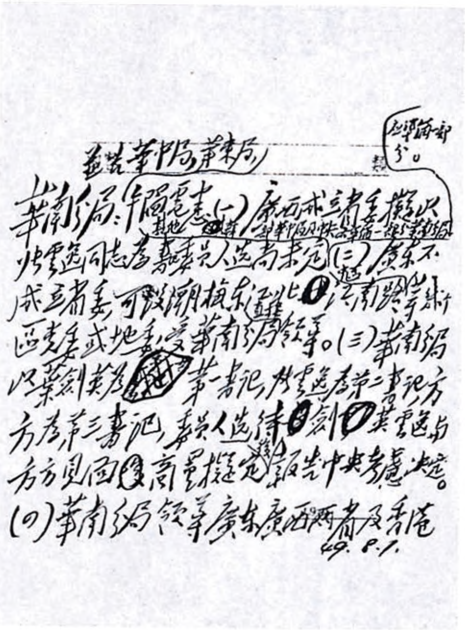
（五）华南分局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留北平），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正规军九十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能移至长沙。

（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

军一部共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三个军，第一步协助邓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五个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共八个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华南分局有以广东的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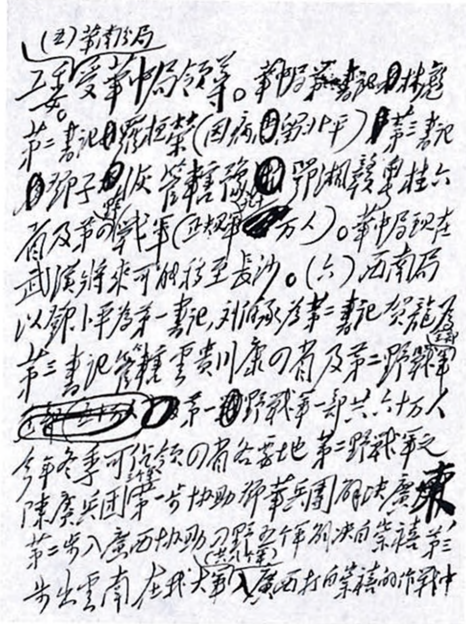
（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闽南，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原受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华南分局届时应指示各该省负责同志妥善接受新的领导，并使各地工作顺利进行。

中央
未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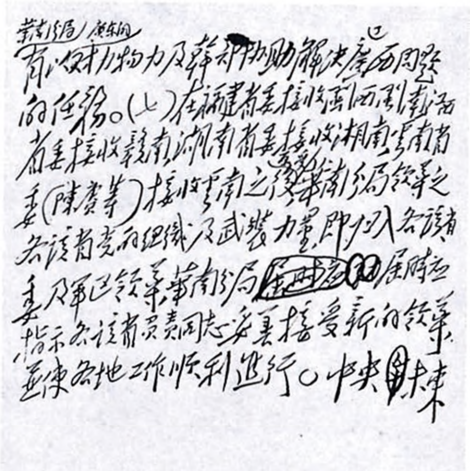

并告华中局、华东局

华南分局：（一）广西成立省委，拟以张云逸同志为书记，委员人选商定。（二）广东不成立省委，可设潮梅、东江、北江、西江、南路等若干区党委及地委，受华南分局领导。（三）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委员人选待叶剑英、张云逸与方方见面时商量拟定报告中央考虑决定。（四）华南分局领导广东广西两省及香港

49.8.1.


（五）华南分局

工委。受华中局领导。华中局第一书记林彪，第二书记罗荣桓（因病由邓子恢代），第三书记邓子恢，管辖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及第四野战军（共约一百万人）。华中局现在武汉，将来可能移至长沙。（六）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第一野战军一部共约六十万人，今年冬季可能占领四省各要地。第二野战军之陈赓兵团第一步协助四野兵团解决广东，第二步入广西协助四野各军解决白崇禧，第三步出云南。在我大军入广西打白崇禧的作战中


华南分局、广东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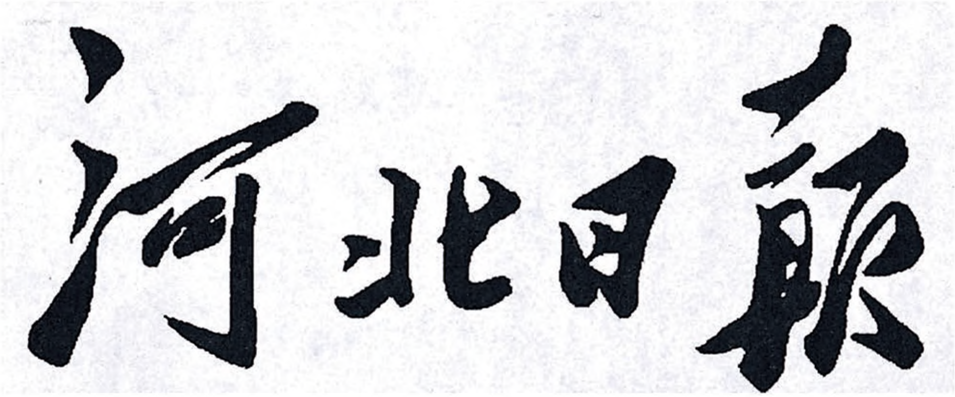
应以财力物力及干部协助解决广西问题的任务。（七）在福建省委接收闽西，江西省委接收赣南，湖南省委接收湘南，云南省委（陈赓等）接收云南之后，华南分局领导之各该省党的组织及武装力量即划入各该省委及军区领导，华南分局应随时指示各该省负责同志要善于接受新的领导，并使各地工作顺利进行。中央 未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华南分局、华中局、西南局的干部配备及其管辖范围的指示》的手稿。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1日）

河北日报



毛泽东为《河北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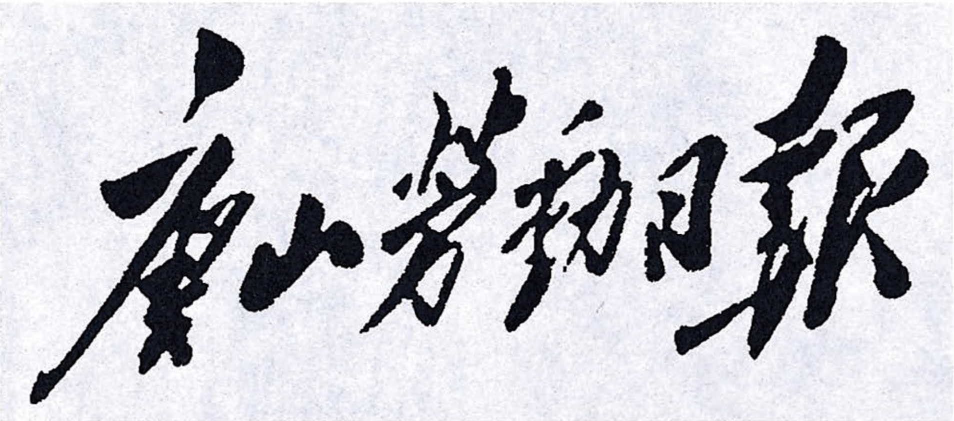
---

[1] 1949年6月，华北全部解放，中央决定恢复河北省建制，并开始筹办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为了便于区别中共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并祝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创刊，毛泽东第二次题写了《河北日报》的报头。

为《唐山劳动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1日）

唐山劳动日报



毛泽东为《唐山劳动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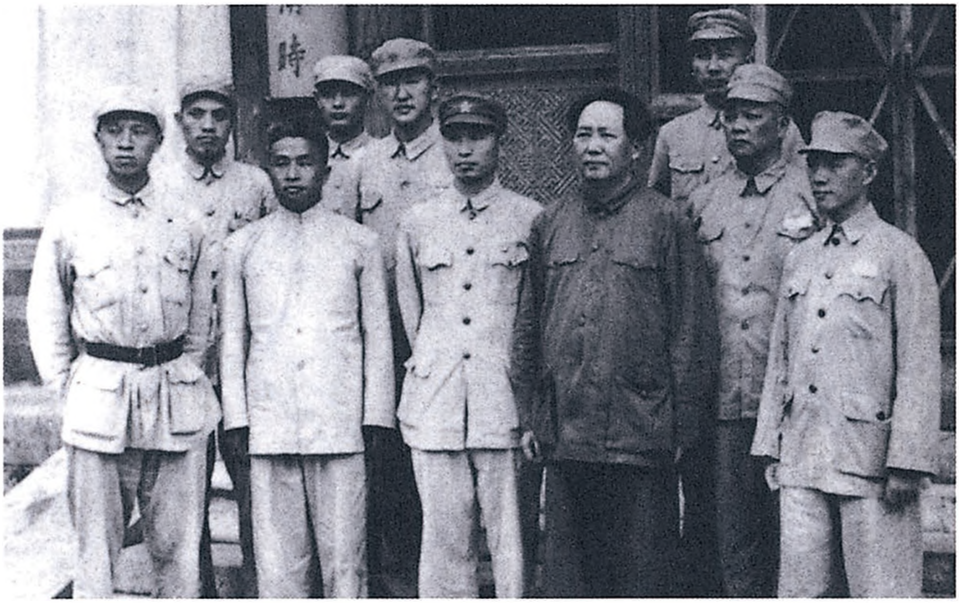
---

[1] 《唐山劳动日报》是中共唐山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40年1月1日。原称《救国报》《冀热辽日报》《长城日报》《冀东日报》《新唐山日报》。1949年8月1日毛泽东亲笔题写“唐山劳动日报”报头后，更名为“唐山劳动日报”。

复粟裕等电[1]

（1949年8月2日）

同意三十日电意见，张爱萍[2]海军系统暂时不迁青岛，并仍归华东系统即归粟裕指挥。你们积极准备攻台湾是正确的。必须从各方面准备攻台，打破干部中的畏难心理。



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人民海军初创人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粟裕并告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2] 张爱萍，当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1]

（1949年8月2日）

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陈明仁在谈判中提出的要求，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问题致东北局电

(1949年8月3日)

东北局：

七月三十日电悉。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委员候选人，在你们提出的四十二人中，除李六如、徐寿轩准备调离东北工作，及拟从陈龙和汪金祥两人中调出一人来中央工作外，其余三十九人我们均同意。但在此三十九人中，非党人士仅占四人，太少了[1]，应再补充几位党外人士，如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可留若干空额，俟政协会后，可考虑从此间派些民主人士去。此点很重要，应使党外民主人士不少于五分之一，如有四分之一则更好，希你们加以研究，并将结果电告，以凭最后决定。

中央

未江

---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1]

（1949年8月4日）

我曾以甘新路上的情况及何时可以向新疆进军电询彭德怀。接彭八月三日复电说，“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进取新疆的时间问题复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1]

（1949年8月4日）

我们完全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但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柯兄[2]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如斯大林同意先派人来华组织共同委员会，请柯兄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矿、煤油矿、军事等专家同来。

---

[1] 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2] 柯兄，指柯瓦寥夫，当时任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4月从东北到达北平，后接替阿洛夫负责中共与苏共的联系。

对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教育经验总结的批语

（1949年8月5日）

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野战军前委的同志们：

现在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负责人刘澜涛、胡锡奎二同志写的该校对于一万二千新学生短期班的教育经验的总结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注意这种经验。假如你们同意的话，请将这个文件转发给你们所属学校的负责同志，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以资传播和仿效。我认为这个总结里所说的方针和方法是正确的。文件本身也是写得好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复程潜电

（1949 年 8 月 5 日）

颂云先生勋鉴：

未江电示敬悉。为对抗广州伪府，为维持湖南秩序，为稳定军心，为便利谈判，为号召各方，所提设立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临时机构，并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派出临时性质的省政府主席及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官，均属必要，可即施行。省政府移交会议略延时日以期避免刺激军政人员，亦属有益无害。弟等并认为湖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不应为空洞名义，应行使必要之职权，除敝军已接收之地方外，其余地方，应由临时军政委员会指挥，庶使秩序易于维持。总之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贵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毛泽东
朱　德
未微

致林彪、邓子恢等电[1]

（1949年8月5日）

我们认为，程潜所提临时机构是必要的，应予同意。毛、朱复程潜电请林、邓即转去，林、邓亦应根据毛、朱复电意旨去电鼓励程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并告萧劲光、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致华中局等电[1]

（1949 年 8 月 5 日）

（一）我军接管长沙后，除成立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李明灏应参加为委员）外，湖南省政府及湖南军区两机构不要马上成立，即用长沙军管会名义统一指挥已占各县。（二）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中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电的主要内容。

争取程潜[1]等站在我们方面有极大的政治作用

（1949年8月6日）

华中局，并转湖南省委：

（一）林邓五日十二时电[2]悉，处置甚好。

（二）我军入长沙后，除反动报纸应当准备封闭外，程潜系统的报纸不应封闭，以便利用这种报纸，登载我们的消息及文件，分化程潜、陈明仁[3]系统中的党、政、军，给进步分子以武器，教育和争取多数中间分子，孤立反动派。同时请湖南工委和程潜商量，如果他在新化有报纸，希望他指示该报采用新华社稿件，以为团结和教育程部党、政、军多数人员，打击反动分子的工具。

---

[1]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

[2] 指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1949年8月5日12时给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政治委员金明、唐天际等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我们目前不要急切地进行对陈明仁的斗争，而以热烈的团结为主，便于今后商谈一切问题。政权要其逐步移交，名义上推迟一个月。岳麓山的控制和长沙部队的指挥关系，如目前不能立即解决，待见面后逐步解决亦可，但必须达到解决的目的。

[3] 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人。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4日和程潜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三）请你们考虑物色若干程潜系统中的开明分子，在程潜及本人同意的条件下，任命他们为长沙军管会的顾问。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即进行物色，并拟定名单电告。

（四）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1]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对于顺利地接管湖南及改造程、陈系统则有直接作用。你们对此要当作一件重要工作去做。程潜的临时机构，不忙很快取消，省政府接交可以推延一个月左右，使程潜有时间在其内部进行教育工作，利于将来的改编和改造。

（五）在将来接收省政府及改编军队时，除陈明仁应任军职外，应给程潜及其一派中的开明分子以位置，并吸收他们参加工作。其办法为组织湖南军政委员会，由两方面的人成立，以程潜为主席，以我们的人为副主席，湖南省政府亦照此方式组织，成为统一战线的临时过渡机构。此办法是否可行，请你们先作考虑，惟暂不对外透露，看一看程潜及其一派人的表现如何，再作决定。

中央
未鱼

---

[1]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额尔德尼等[1]

（1949年8月6日）

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的节录。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十世班禅，青海循化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西藏上层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1923年被迫离开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避居内地，因西藏地方当局阻挠，一直未能返回西藏，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去世。1949年6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继位后，仍留居青海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鉴于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历史地位和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意愿，和为了促进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支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的准备工作和护送工作。1951年12月29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从青海西宁起程，于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6月8日回到后藏日喀则。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

（1949年8月6日）

德怀[1]同志，并贺、习[2]：

（一）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我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你们准备如何部署？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3]。

（二）关于绥远[4]和宁夏问题，我们准备和傅作义合作去解决。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张治中，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赴北平和中共代表团进行谈判，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张治中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傅作义、邓宝珊，原分别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和副总司令，1949年1月他们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4]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因为绥远反动分子受阎锡山[1]及美帝勾结极为猖獗，傅的部下董其武[2]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以傅部五万人，我军姚喆、王平[3]两部二万人合编为两个军，以傅部董其武等为军长，我们的人为副军长。实行人民解放军的军政制度，汰坏留好，逐步改造。两个绥远省政府合而为一，以傅部董其武为主席，我们的杨植霖为副主席，省府委员亦用双方的人作适当配备。此项办法对双方都有利益，可以经过一个工作过程，达到彻底改造之目的。傅作义对此项办法表示满意，拟于数日后即令傅去绥远，和我们的人一道解决绥远问题。

（三）马鸿逵[4]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5]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

---

[1] 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

[2] 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6月与华北人民政府签订绥远和平协议，9月19日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电起义。

[3] 姚喆（1906—1979），湖南邵阳人，当时任绥远军区司令员。王平（1907—1998），湖北阳新人，当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

[4] 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5] 马如龙（1893—?），宁夏河州（今临夏）人。当时任国民党军宁夏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1]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2]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四）邓宝珊与马步芳将领均认识，于甘肃有声望，他是一个光杆，没有多少干部，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用邓宝珊，叫他去兰州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甘青军政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此两机构均以邓为主席，赵寿山、王世泰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此外，班禅[3]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五）陶峙岳[4]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5]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6]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

[1]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杨得志兵团，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

[3]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4]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率部起义。

[5]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当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6] 指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

（六）过渡机构存在时间究有多久，暂不作硬性规定，以便利解决反动军队及反动政权，便利解决土地问题及民族问题为原则。

（七）胡公冕[1]已来西安，请你们注意用他去收拾胡宗南[2]部。现在程潜、陈明仁[3]已在湖南起义加入我方，对蒋、桂、胡[4]各部必有影响，给我们以分化各部的机会。

（八）整个西北亦可考虑在将来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彭[5]为正，以张治中为副。

（九）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加考虑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午鱼[6]

此报加发华中局，湖南省委，刘邓张李，华东局及粟裕[7]。请你们注意研究此项问题，并应用此项方法于湖南等处。毛又及。

---

[1] 胡公冕（1887—1979），浙江永嘉人。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从事秘密兵运工作。

[2]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3]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起义。陈明仁，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4日与程潜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4] 蒋、桂、胡，指蒋介石和桂系首领、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以及胡宗南。

[5] 彭，指彭德怀。

[6] “午鱼”，应为“未鱼”，即8月6日。

[7] 粟裕，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复刘少奇、王稼祥电[1]

（1949年8月7日）

同意中国大学[2]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

[1] 中共代表团访苏期间，根据刘少奇与斯大林的口头协议及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建设的需要，中苏双方议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由苏方选派200余名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分期分批来中国工作；苏联帮助在东北办一所空军学校和一所海军学校，并由刘亚楼、张学思在苏联具体商谈；帮助创办一所大学。这是毛泽东复刘少奇、王稼祥电的主要内容。

[2] 中国大学，即后来在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复华东局电[1]

（1949年8月7日）

你们已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甚好。此种会议有很大用，可以依靠它去联系群众，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华东所属各城市均应举行，并应看重此种会议。

---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华东局关于上海市人民政府3日至5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情况报告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方方等电[1]

（1949年8月8日）

叶剑英八月九日由北平动身，经汉口转江西，九月五日前到达赣州。方方务须于九月五日到达赣州。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方方赴赣州参加华南分局会议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方方并告华中局及陈赓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解决河南土地问题[1]

（1949年8月10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六日电及转来河南省委八月一日电均悉。我们同意以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政策，作为解决河南土地问题的基点，对中农土地完全不动，而不要照土地法大纲[2]上关于中农土地的规定。在中央政府成立后，土地法大纲须要有所修改。除上述一点外，在南方及其他新区实行改革土地制度时，必须在某些政策上（例如不要使地富扫地出门等）及工作方法上（例如要开区乡农民代表会议等）改正过去在北方土改中做得不好的地方。而且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完全掌握全部农村运动的领导，绝不许再有过去那样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出现。除河南等若干地方外，最广大的新区，今年及明年的全年都不是实行分配土地的时期，而是准备分配土地的时期。但就在此准备期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必须完全掌握农村工作的领导职务，千万不要放松此种职务。一切重大决定，均须事先报告中央，获得批准然后实行。

八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

[2] 指1947年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给杨开智[1]的信

（1949年8月10日）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2]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3]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

---

[1] 杨开智，湖南长沙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岸青，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3] 展儿，即杨展，杨开智之女。

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1]

（1949年8月11日）

同志们：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2]以来，已经有一年了。那次大会规定的中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纲领和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实现的。一年来整个形势有很大变化，要求我们做很多的工作。这次工会工作会议要解决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

我们有许多经验，有做得好的经验，也还有做得不好的经验。立三[3]同志说，我们工作中有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今天我国有将近二千万的职工大军，但组织起来的太少。老解放区工会发展很少，新解放区刚才开始。除了破坏分子及资本家外，一切职工，即使政治上落后的人，即使国民党工会的工作人员，只要有改造可能的，都应包括在工会组织之内。对于落后的和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团结和教育的方针，从团

---

[1] 这是毛泽东在全国工会工作会议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2]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48年8月1日至22日在哈尔滨召开。大会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团结，联合全国各阶层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等问题，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会议并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

[3] 立三，即李立三，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

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我们在工厂中便会是少数，便会孤立。当然，破坏分子是不允许加入工会的，甚至一部分作恶有据的还要逮捕。我们对他们不加警惕是要犯错误的。开门是向着进步的工人、不很进步的工人和落后的工人（包括过去有毛病而有希望改造的），这样我们便有了充足理由去孤立反动派。国民党表面上是被打倒了，但实际上还没有被完全打倒。他们组织一贯道等会道门，在安徽、河南一带就有十万人。在工人中也有隐藏的坏分子反对我们。如果采取关门主义，便不能够孤立他们。正确的方针是争取中间派，落后分子也要尽可能争取过来。

做工会工作的同志应该抱主动的态度，主动地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和行政搞好关系（对厂长方面也应该强调主动，如像《桥》里面的宋厂长那样[1]）。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好生产，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呢？你们要做宣传工作，要向市委书记、市长做宣传工作，也要向我们做宣传工作，因为我们照顾的方面很多，不能像你们专心搞一门。

主动地团结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主动地搞好同各方面的关系，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消灭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

---

[1] 《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4月拍摄完成的一部故事片。这部影片讲述了东北解放战争中工人阶级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修复被破坏的松花江铁桥的事迹。影片中的宋厂长充分依靠群众，发动大家想办法，使遇到的各种困难逐一得到克服。

复周世钊电[1]

（1949年8月11日）

虞[2]电诵悉，极感盛意。目前革命尚未成功，前途困难尚多，希望先生团结全校师生加紧学习，参加人民革命事业，是所切盼。

---

[1] 这是毛泽东复周世钊电的主要内容。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虞，即7日。

在北平各界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949 年 8 月 13 日）

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

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以北平的情况来说，大约几个月后就可以这样做了。这样做的利益很多，希望代表们加紧准备。

全北平的人民，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及其潜伏的特务分子以外，一致团结起来，为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首都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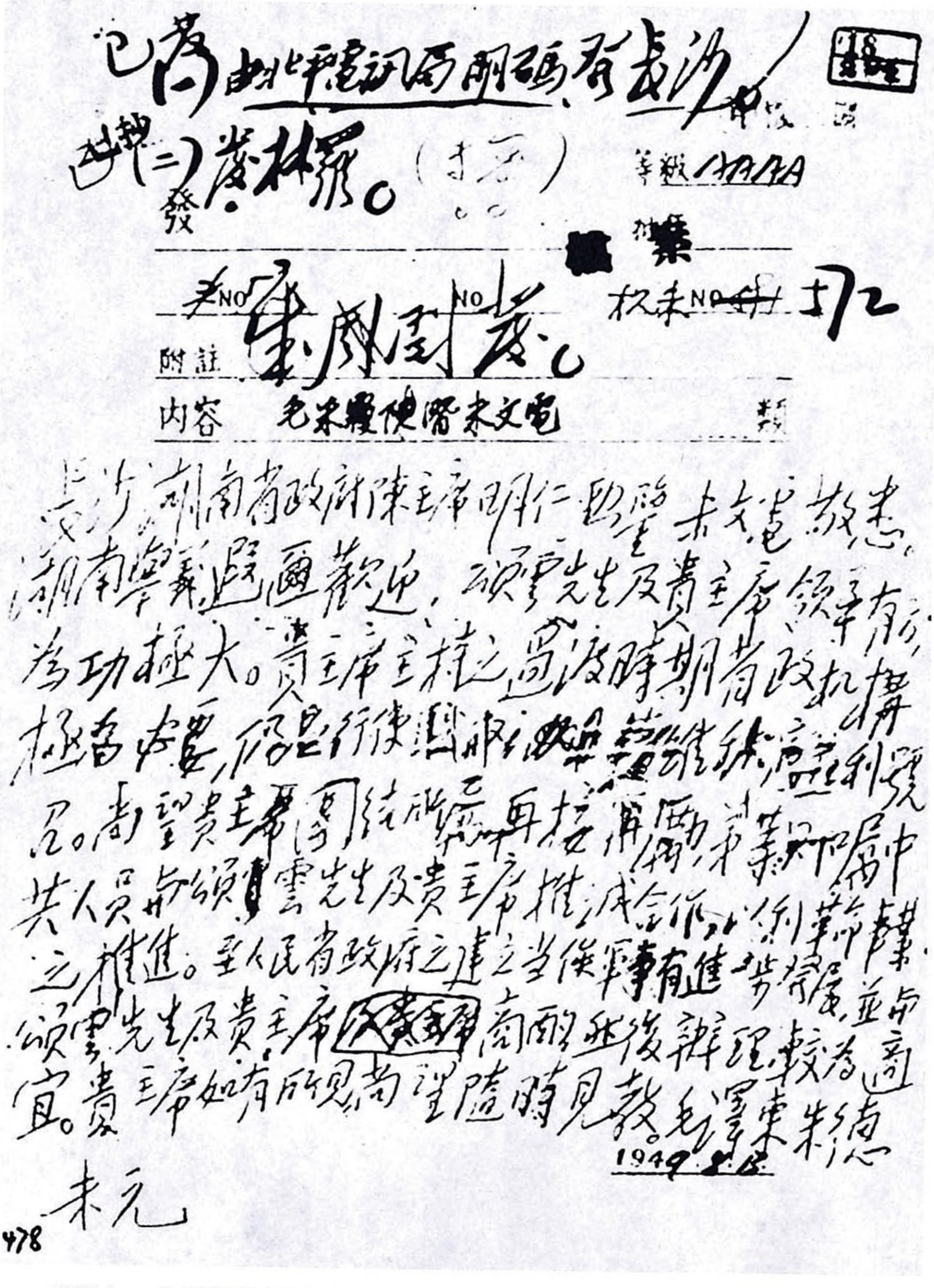
复陈明仁电

（1949年8月13日）

长沙湖南省政府陈主席明仁勋鉴：

未文电敬悉。湖南举义，遐迩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政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借维秩序，并利号召。尚望贵主席团结所属，再接再厉，弟等则嘱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至人民省政府之建立，当俟军事有进一步发展，并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商酌，然后办理，较为适宜。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

毛泽东
朱　德
未元



已发　由北平电讯局明码发长沙

（二）[illegible]　發

等级 AAAA

机要

NO　NO　机未NO 372

附註　朱刘周阅发

内容　毛朱复陈明仁未文电

长沙湖南省政府陈主席明仁勋鉴：未文电敬悉。湖南举义，通国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过渡时期省政机构，极为必要，仍望行使职权，维持秩序，以利民生。尚望贵主席团结所部，再接再厉，协同第四野战军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至人民省政府之建立，当俟军事有进一步发展，并由颂云先生及贵主席~~与贵主席~~商酌后办理，较为适宜。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毛泽东　朱德

1949.8.

未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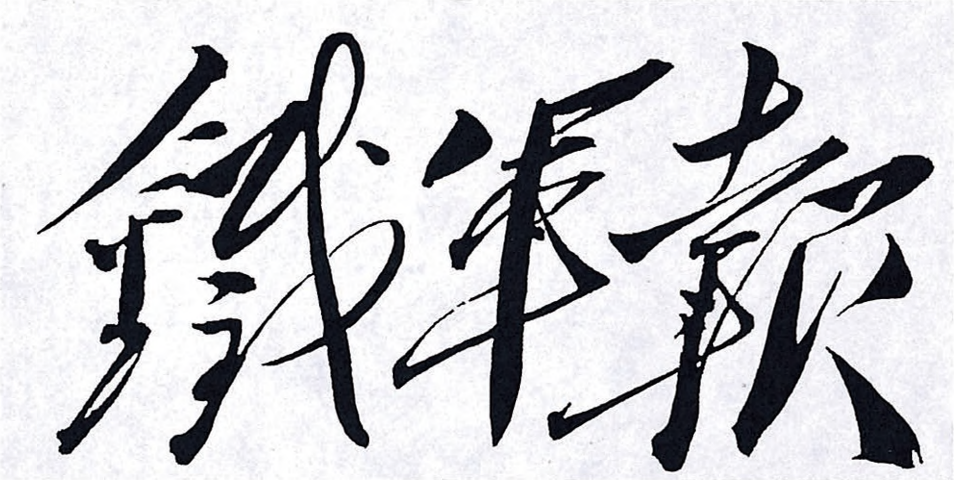
478

毛泽东、朱德复陈明仁电的手稿。

为《铁军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13日）

铁军报



毛泽东为《铁军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8年10月15日，铁道纵队政治部创办纵队党委机关报——《铁军》报。1949年5月6日，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由滕代远兼任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将《铁军》报改为铁道兵团党委机关报，并决定更名为“铁军报”。滕代远请毛泽东题写了报头，于8月13日开始使用。

给胡乔木的信[1]

（1949年8月13日）

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

---

[1] 这是毛泽东致新华社社长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复华东局电[1]

（1949年8月14日）

（一）二千四百亿元的用途；（二）为什么需要二千四百亿元之多，是否可以减少；（三）估计城市工商业家对此项公债的态度将如何，是否会拥护，如不拥护，是否有失败之可能；（四）利息四厘是否适当，为什么是适当的；（五）为什么规定明年十一月起还本付息，三年还清，期限是否太促，为什么要如此规定？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请对发行公债问题加以说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华东局电的主要内容。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

（1949年8月14日）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

帝国主义给自己准备了灭亡的条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众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内的人民大众的觉悟，就是这样的条件。帝国主义驱使全世界的人民大众走上消灭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时代。

帝国主义替这些人民大众准备了物质条件，也准备了精神条件。

工厂、铁道、枪炮等等，这些是物质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物质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从日本帝国主义得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制造的。

---

[1] 本文和《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4篇文章，都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

自从一八四〇年英国人侵略中国以来，接着就是英法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法国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英国、法国、日本、沙皇俄国、德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在中国领土内进行的战争，一九三一年开始的日本进攻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九三七年开始继续了八年之久的日本进攻中国全境的战争，最后是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这最后一次战争，艾奇逊的信上说，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物质帮助占国民党政府的“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美国供给了中国军队（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品”。这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买办制度，造成了官僚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

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都造反了，或者不愿意再跟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是一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事情是这样地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其中，也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

艾奇逊的白皮书表示，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目前这个局面是毫无办法了。国民党是那样的不行，无论帮它多少总是命定地完蛋了，他们不能控制了，他们无可奈何了。艾奇逊在他的信中

说：“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能力所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

按照逻辑，艾奇逊的结论应该是，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说：“……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

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自我批评的方法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然后，才有希望把已经缴械了和投降了的地主阶级分子、官僚资产阶级分子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成员及其帮凶们给以由坏人变好人的教育，并尽可能地把他们变成好人。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伎了。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艾奇逊公开说，要“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摆脱所谓“外国的羁绊”。这就是说，要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因为，据说，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外国的”，在中国没有根的，是德国的马克思（此人已死了六十六年），俄国的列宁（此人已死了二十五年）和斯大林（此人还活着）强加于中国人的，而且这个主义和这个制度是坏透了，提倡什么阶级斗争，打倒帝国主义等等，因此，必须推翻。这件事，经过杜鲁门总统，马歇尔幕后总司令，艾奇逊国务卿（即经手发布白皮书的一位可爱的洋大人）和司徒雷登滚蛋大使们一“鼓励”，据说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艾奇逊们认为这是在做“鼓励”工作，但是很可能被中国的那些虽然相信美国但是尚有爱国心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一瓢冷水，使他们感觉丢脸：不和中国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当局好好地打交道，却要干这些混账工作，而且公开地发表出来，丢脸，丢脸！对于有爱国心的人们说来，艾奇逊的话不是一种“鼓励”，而是一种侮辱。

中国是处在大革命中，全中国热气腾腾，有良好的条件去争取和团结一切对人民革命事业尚无深仇大恨，但有错误思想的人。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無可奈何的供狀
——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書皮
白皮書
的供狀
無可奈何的供狀
——評美國關於中國問題的白皮書
新華社社論

针对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评论，都收录在《评白皮书》中。图为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评白皮书》（部分版本）。

复程潜、陈明仁等电[1]

（1949年8月16日）

程潜将军、陈明仁将军暨全体起义将士们：

接读八月五日通电，义正词严，极为佩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已成全世界公认的定局。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残余匪党不甘失败，尚图最后挣扎，必被迅速扫灭，已无疑义。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

---

[1] 1949年8月5日原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副主任唐星、李默庵，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副司令官傅正模、刘进等发表起义通电。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他们的复电。

致陈云等电[1]

（1949年8月17日）

公债问题关系重大，请陈云立即回来向中央报告，加以讨论然后决定。同时，请饶、陈试探民建方面资本家的意见，电告我们。

---

[1] 8月15日，陈云复电中央，对发行公债的数额、用途、利率和还本付息的时间等问题作了说明。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陈云并告饶漱石、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别了，司徒雷登[1]

（1949年8月18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

[1] 司徒雷登（1876—1962），美国人，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兴办的燕京大学的校长。1946年7月11日，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内战。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望。同年8月2日，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一切努力都已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

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1]。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

---

[1] 陈纳德，美国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政府空军顾问，并组织“美国志愿航空队”（又称“飞虎队”，后改为第十四航空队），支持中国抗战。日本投降后，他率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一部分人员，组织空运队，帮助国民党进行内战。

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

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

欧洲马歇尔计划[1]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2]。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7月，英、法、意等16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这个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1951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

[2]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个民间传说。据传周朝姜太公曾在渭水河边用无饵的直钩在水面3尺上钓鱼，说：“负命者上钓来！”（参见《武王伐纣平话》卷中）“嗟来之食”，是指一种带侮辱性的施舍。齐国的一个饥民因为不吃嗟来之食而饿死的故事，参见《礼记·檀弓下》。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1]。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2]。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3]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

---

[1] 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和教授。1943年以后，由于痛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和腐败，积极参加争取民主的斗争。抗日战争结束后，积极地反对国民党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7月15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2] 朱自清（1898—1948），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文学家、教授。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积极支持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学生运动。1948年6月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当时他的生活非常困苦，这年8月12日终因贫病在北平逝世。在他逝世以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平价美援面粉。

[3] 参见《老子》第七十四章。

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致阿哈买提江[1]电

（1949年8月18日）

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先生：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的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此届全体会议除制定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自己的全国委员会外，并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谨此电达，并希赐复。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北平

---

[1] 阿哈买提江（1914—1949），新疆伊犁人。是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的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49年8月27日赴北平参加新政协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给江庸[1]的信

（1949年8月19日）

翊云先生：

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俊人[2]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先生事[3]，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率复。敬颂

道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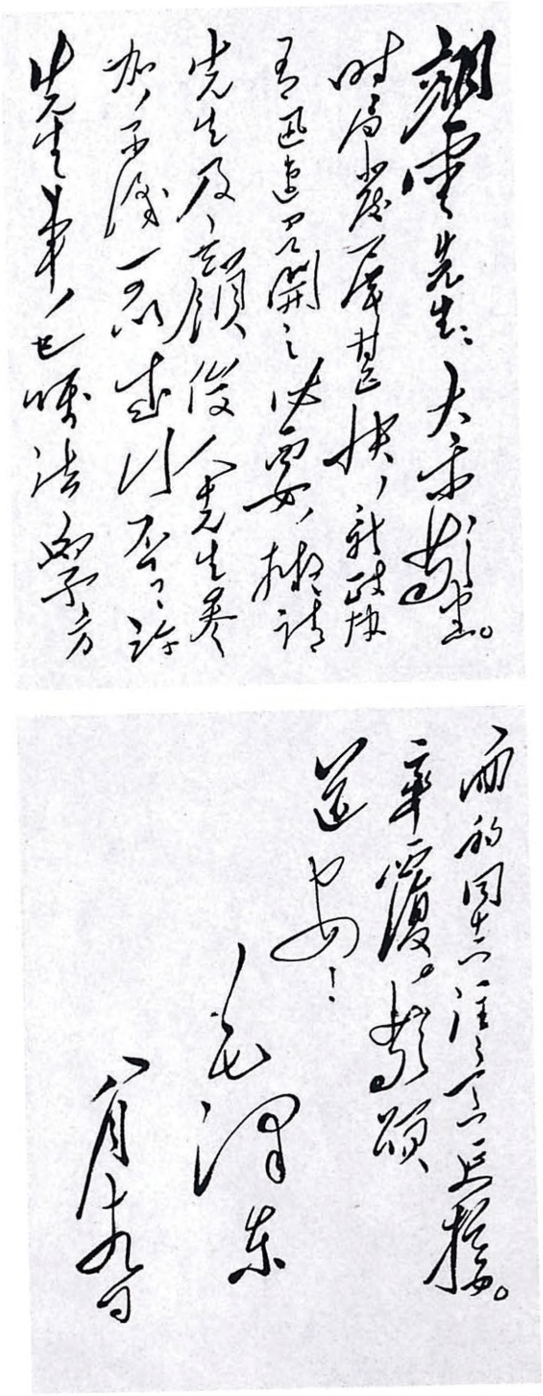
八月十九日

---

[1] 江庸（1878—1960），号翊云，福建长汀人，法学家。1949年春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等以私人资格北上同中国共产党商议和谈问题。同年秋，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 颜俊人，即颜骏人（1877—1950），名惠庆，上海人。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和国民党政府驻美公使、驻苏大使。1949年秋，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3] 指江庸向毛泽东推荐法学界的许藻镕一事。



翊云先生：大示敬悉。
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
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
先生及颜骏人先生参
加，再屈一劳，出山启之许
先生来，也顺法学方
面的同人一二同上程。
幸覆，敬颂
道安！
毛泽东
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江庸信的手稿。

中央关于三万人口以上城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规定[1]

（1949年8月19日）

各中央局、分局：

太原解放至今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成绩极好。各地除石家庄、上海、北平已报告开会外尚未据报开会，这是很不好的。兹规定：

（一）三万以上人口城市均须开各界代表会。

（二）会期：中小城市至少每月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两天。大城市每月或每两月一次，每次一天两天，至多三天。

（三）每次解决问题不要多，应集中在一两个问题上。

（四）代表应固定为半年改选一次，连选者得连任。在六个月内，不称职者临时改换，未吸收者逐步增加。

（五）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报告和决定的任务。

（六）此指示转达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一切城市勿误。

（七）你们应重视此事，总结经验，报告中央为要。

中央

八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和分局的电报。

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1]

（1949年8月20日）

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2]。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电的主要内容。

[2] 该命令中说：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

致东北局电[1]

（1949年8月21日）

请你们加以注意，使上海民族资本家有出路，并将东北过去及现在与友方交换物品的品名、数量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复彭德怀等电[1]

（1949年8月22日）

十九兵团何时向宁夏进军，待占领兰州后看情况决定。如果王震四个军确有把握占领青海，则十九兵团可在兰州休息十天或半月后即向宁夏，否则可略为推迟。入新疆部队至少休整一个月，必要时酌量增加休整时间，好作充分准备。入川部队待与贺面商后作最后决定，大体上以十八兵团入川是适宜的。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1]

（1949年8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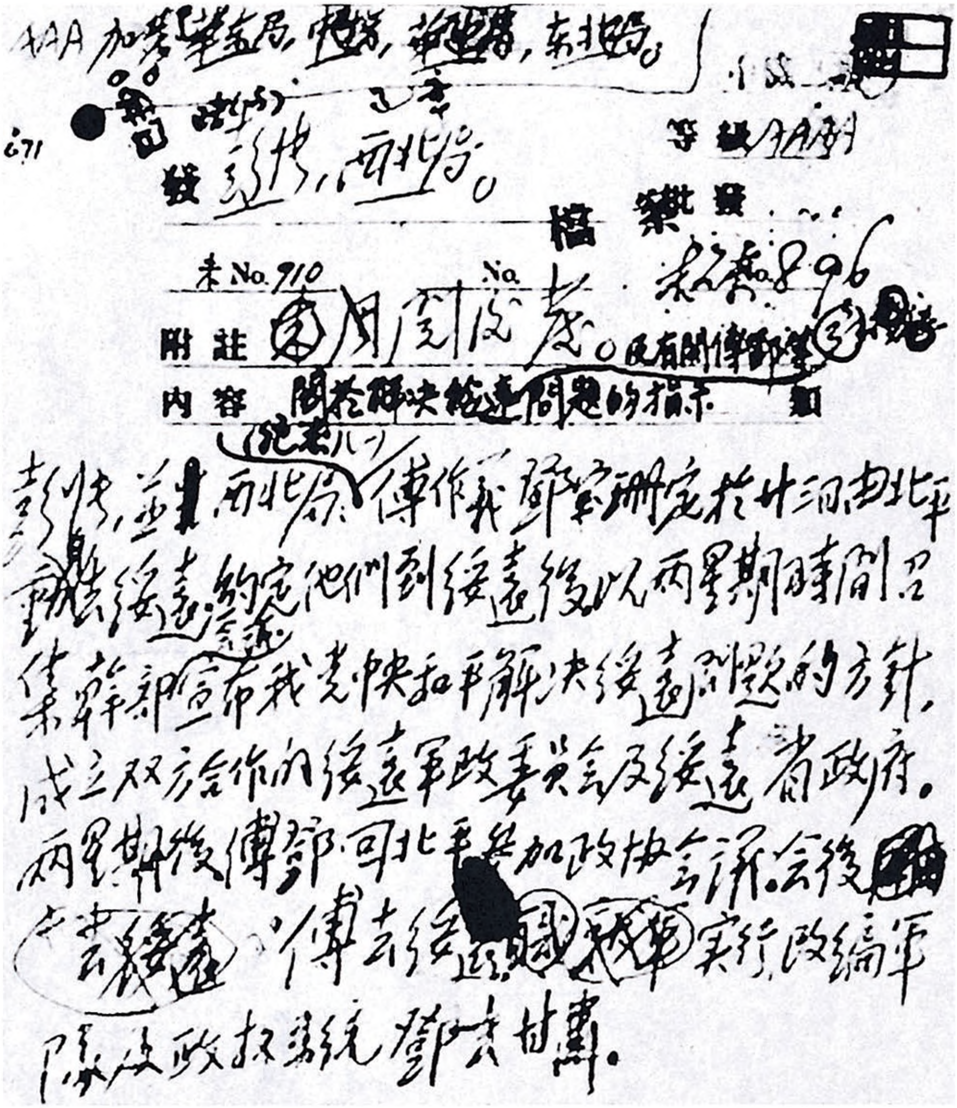
彭、张，并西北局：

傅作义、邓宝珊定于廿三日由北平动身去绥远。约定他们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集干部会议，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邓回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邓去甘肃。

邓去甘肃的问题，已约定待贺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时，与邓见面谈好后，随贺一道去西北，张治中也须那时才能去西北。

---

[1] 这是毛泽东致彭德怀、张宗逊并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AAA 加发华北局、中原局、华东局、东北局。

发 彭张、西北局。

等级 AAA

档案

来No. 910　No.　秘密No. 8 96

附注 周阅后发。

内容 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

彭张，并告西北局：傅作义、邓宝珊定于廿四日由北平赴绥远，约定他们到绥远后以两星期时间召集干部宣布我党中央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成立双方合作的绥远军政委员会及绥远省政府。两星期后傅邓回北平参加政协会议，会后傅去绥远实行改编军队及政权系统，邓去甘肃。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解决绥远问题的指示》的手稿（部分）。

贺美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电[1]

（1949年8月23日）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和但尼斯同志：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劳动人民热烈庆祝美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分子，在美国反动势力高压之下，为着国际和平，为着美国工人和美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着中美人民的真诚友谊，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都是一个重要的鼓励和援助。美国的未来，不属于外强中干的美国反动势力，而属于你们和美国人民。庆祝你们和美国人民的奋斗得到成功，庆祝中美两国工人阶级和两国人民的团结继续增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

[1]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美国共产党中央主席福斯特，祝贺美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1]

（1949年8月23日）

彭、张，并贺、习[2]：

各电均悉。（一）马步芳[3]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4]。王震兵团[5]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二）同意在定西或兰州开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请你们计算时间，贺龙同志如能于九月十五日赶到北平参加政协（政协准备九月十日开幕，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等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马步芳，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攻兰战役，即兰州战役。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8月21日发起兰州战役，26日解放兰州。第一兵团于临洮、临夏等地歼灭马步芳部新编骑兵军后，挺进青海，9月5日占领西宁。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2万余人，马步芳部基本被歼。

[5] 王震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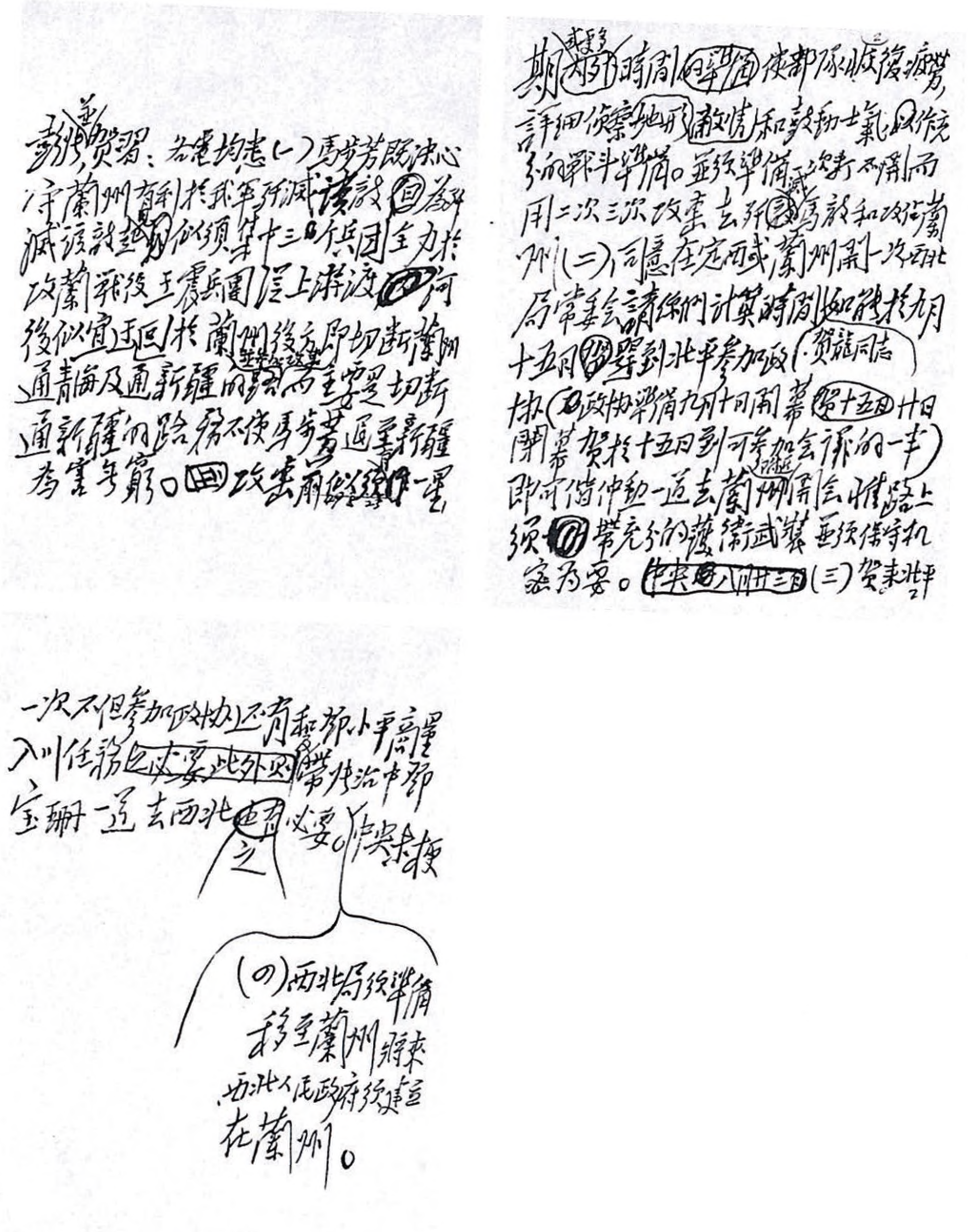
二十日闭幕，贺于十五日到，可参加会议的一半），即可偕仲勋一道去兰州附近开会，惟路上须带充分的护卫武装，并须保守机密为要。（三）贺来北平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1]商量入川任务及带张治中邓宝珊[2]一道去西北之必要。（四）西北局须准备移至兰州，将来西北人民政府须建立在兰州。

中央
未梗

---

[1] 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2] 邓宝珊，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



彭并贺习：各电均悉。（一）马步芳既决心守蘭州，有利於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於攻蘭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後，似宜迂回於蘭州後方，即切断蘭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逃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地形、敌情和鼓动士气，以便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敌人和攻佔蘭州。（二）同意在定西或蘭州开一次西北局常委会，请你们计算时间，如能於九月十五日赶到北平参加政协（政协准备九月十日开幕，至迟十五日开幕），贺於十五日到可参加会议的一半，即可偕仲勋一道去蘭州开会。惟路上须带充分的护卫武装，并须保守机密为要。（三）贺来北平一次不但参加政协，还有和邓小平商量入川任务。带张治中邓宝珊一道去西北之必要。仲实来接

（四）西北局须准备移至蘭州，将来西北人民政府须建立在蘭州。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的手稿。

给黄炎培的两封信

（1949年8月24日、26日）

一

任之先生：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1]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1949年8月24日发表的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二

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给胡乔木的信[1]

（1949年8月24日）

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

[1] 这是毛泽东在阅读1949年8月2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发表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后，致胡乔木信的主要内容。

复东北局电[1]

（1949年8月24日）

据华北经验，政府机构中设人民监察委员会置于人民政府委员会之下，对检查工作反对官僚主义有很大好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意对东北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的调整及分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东北局电的主要内容。27日，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推选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李富春、林枫、高崇民为副主席，林枫兼监察委员会主任。

复王首道等电[1]

（1949年8月24日）

八月二十一日电收到。我们欢迎此类简单明了的报告，而不欢迎冗长的沉闷的报告。

---

[1] 王首道8月21日给毛泽东、林彪、邓子恢的报告全文如下：“一五八师（原属四十六军）已归长沙分区。一六〇师（原属四十七军）已归常德分区。一六二师（原属四十九军）已归益阳分区，现尚在河南。”这是毛泽东收到王首道的报告后，复王首道并告林彪、邓子恢电的主要内容。

不论新区、老区均须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

（1949年8月25日）

华中局，并告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

（一）八月二十日电悉。望将各城各界人民代表会经验扼要电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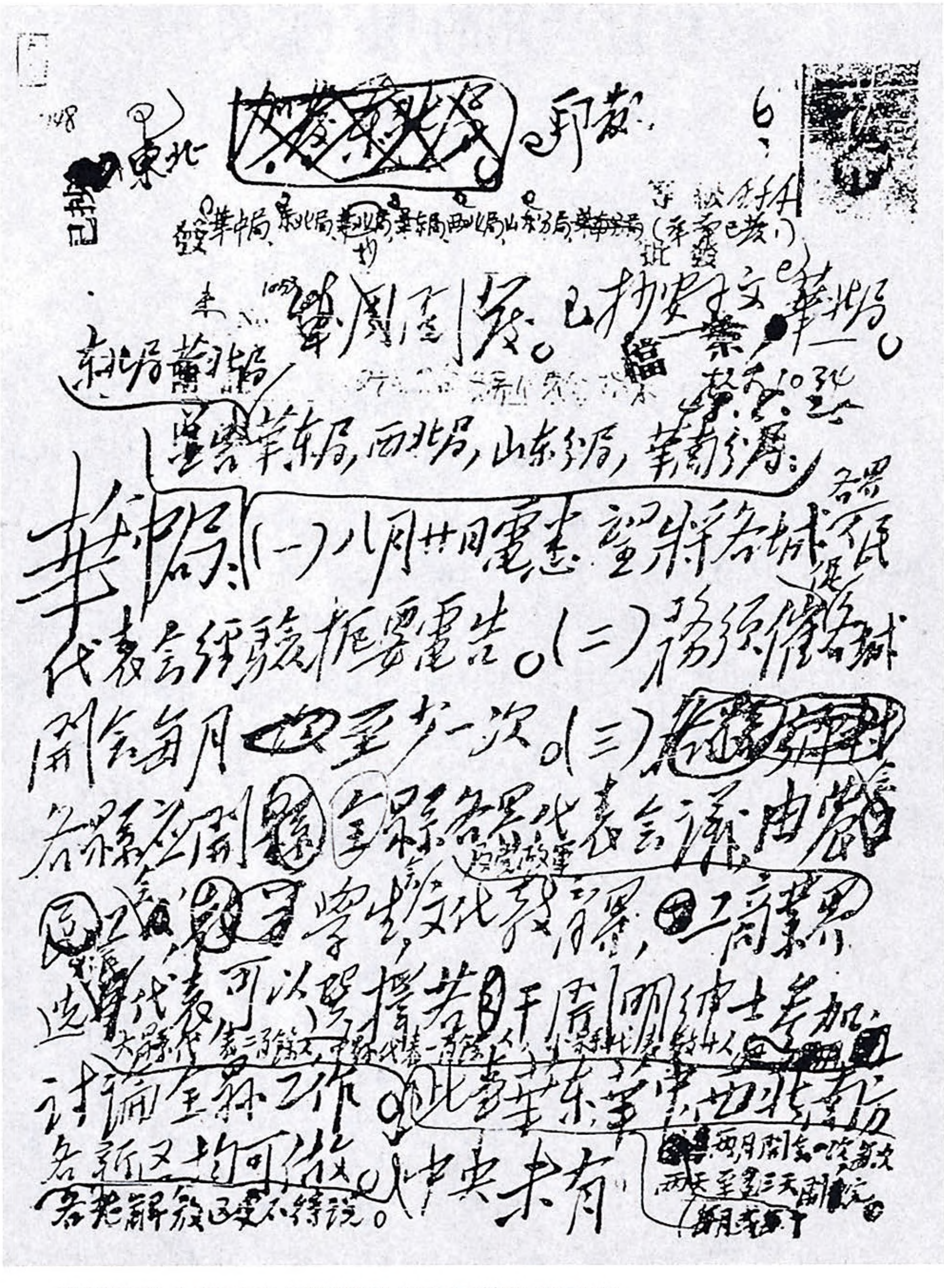
（二）务须催促各城开会每月至少一次。

（三）各县应开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两天至三天开完。此事华东、华中、西北、南方各新区均可做。各老解放区更不待说。

中央
未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中局等的电报。



东北 印发 6

发华中局、东北局、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华中已发）

华中局（不另发）已抄发东北局、华北局

并告华东局，西北局，山东分局，华南分局：

华中局：（一）八月廿日电悉。望将各城市人民代表会经验报告。（二）务须使各城市开会每月或至少两月一次。（三）在各县召开全县各界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及文化教育界、工商界选举代表，可以选择若干开明绅士参加，讨论全县工作。此事华东华中西北华南各新区均可做，各老解放区更不待说。中央未有

（大县代表二百余人，中县代表一百余人，小县代表数十人）

两月开会一次，每次两天至三天开完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等电的手稿。

对攻打兰州的几点意见[1]

（1949年8月26日）

彭、张，并告贺、习[2]：

二十四日电[3]悉。（一）如你们二十五日攻兰得手，则局面起了变化。（二）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的作战，全军将因此种流了血的侦察战获得有益的教训，而确定了再战的胜利。（三）如二十五日不得手，则请照你们二十四日电的决心，确定先打援，后打城。如此，则须令对城防御之四个军或三个军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并须预计打援及攻城两战所必需的充分的时间，估计至少要半个月，多则可能要一个月或更多时间。（四）为了要筹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粮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西北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8月24日21时彭德怀、张宗逊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遵照8月23日电示，决以3个兵团打兰州。宁夏马鸿逵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可能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再加周嘉宾、黄祖勋两部，共有13万兵力，据城坚守，我即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弹接济困难，不能持久，故决定乘马鸿逵部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海马步芳主力。如未解决青马军，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中5个军打宁马。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25日晨开始攻击。

及由西安接济食油、弹药及棉衣，请令十八兵团用全力向胡宗南[1]军所在的空隙地区举行袭击，确保天水及西兰公路[2]，以利运输。同时，在兰州附近周围二三百里区域有计划地筹措粮食。请西北局全力支援兰州前线的需要。

军委

二十六日一时

---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2] 西兰公路，指陕西西安至甘肃兰州的公路。

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8月26日）

华东局，并告各局，各野前委：

未敬[1]电悉。

（一）你们过去对城市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一项重大问题，没有发出指示，自己亦未在上海执行，故对此事处于被动地位，并因此使城市工作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已在上海开了一次各界代表会议，收到了良好效果，并已于八月二十四日给所属发了指示，你们因此就在此项问题上恢复了主动权。中央看了，极为高兴。除将你们电报转知各局、各野外，现在请你们严催所属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务于九月份一律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台上公开广播。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借此以使所属三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党的组织和各界人民代表亲密结合，经过他们去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以后一切三万人以上的城市至少每月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

[1] 未敬，即8月24日。

一次，每次一天至多二天就够，每次讨论和决定的问题有一个或二个就够。

（二）各县要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办法照中央最近致华中局并告各局的电报[1]办理。要各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领导办理，一改过去长期不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不良作风。此项全县各界人民会议，不论新区老区一律举行。新区在占领两三星期后即可举行，无须待乡村农会建立然后举行。举行此项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经过此种会议去发动农民群众。

（三）上述两项请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西北局、华中局、华南分局一律遵照办理。各野前委注意研究和协助。

中央

八月二十六日

---

[1] 指毛泽东1949年8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县均应召开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指示要求新老解放区各县每月或每两月至少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由农会、工会、学生会、文化教育界、工商业界及党政军选派代表参加，讨论全县工作。大县代表200余人，中县代表100余人，小县代表数10人，每次2至3天开完。

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给彭真[1]的信

（1949年8月26日）

彭真同志：

八月廿四日的报告收到阅悉，很高兴。已转各中央局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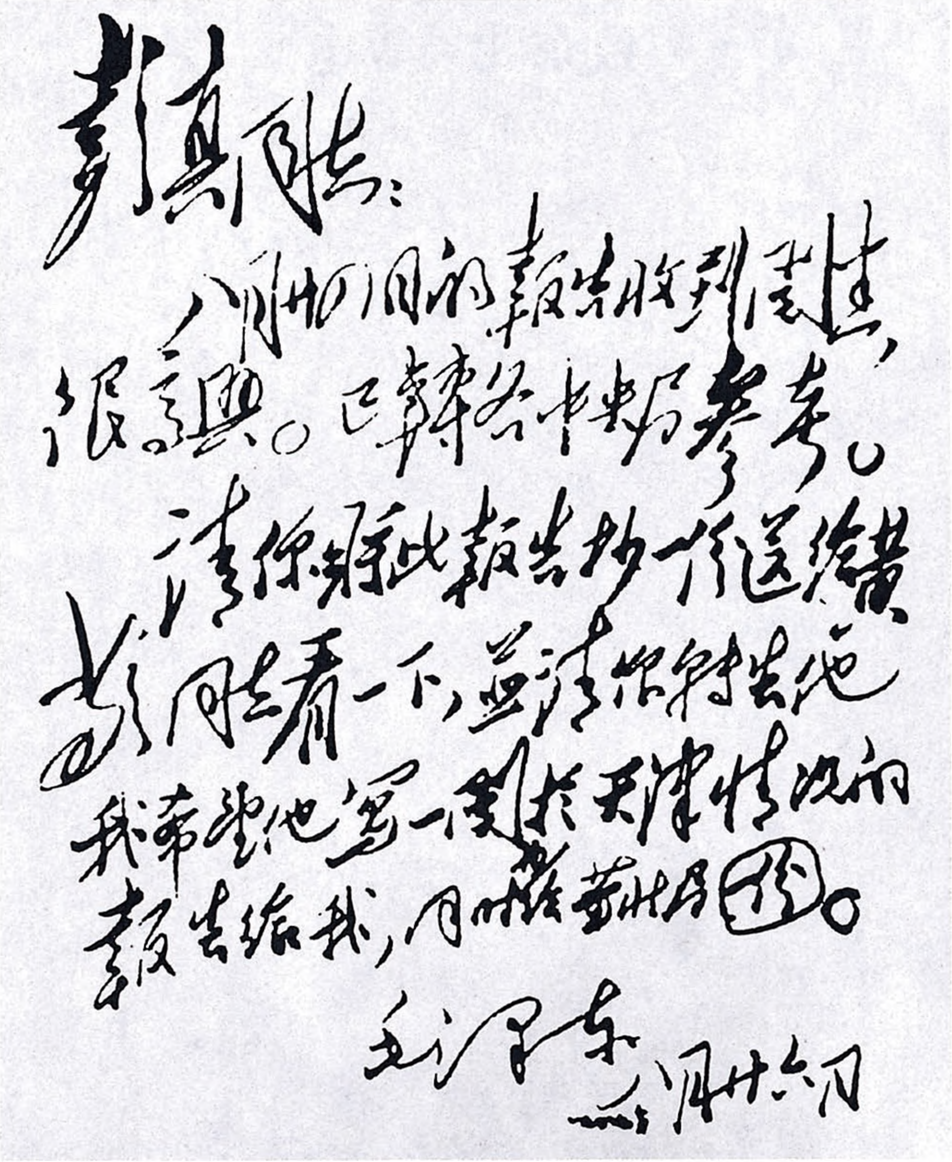
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2]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同时抄给华北局。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2] 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彭真同志：

八月卅日的报告收到了，甚好，很高兴。已转给中央各同志参考。

请你将此报告抄一份送给黄敬同志看一下，并请你转告他，我希望他写一个关于天津情况的报告给我，用电报发来。

毛泽东

九月廿六日

毛泽东致彭真信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北平工作情况报告致东北局等电

(1949年8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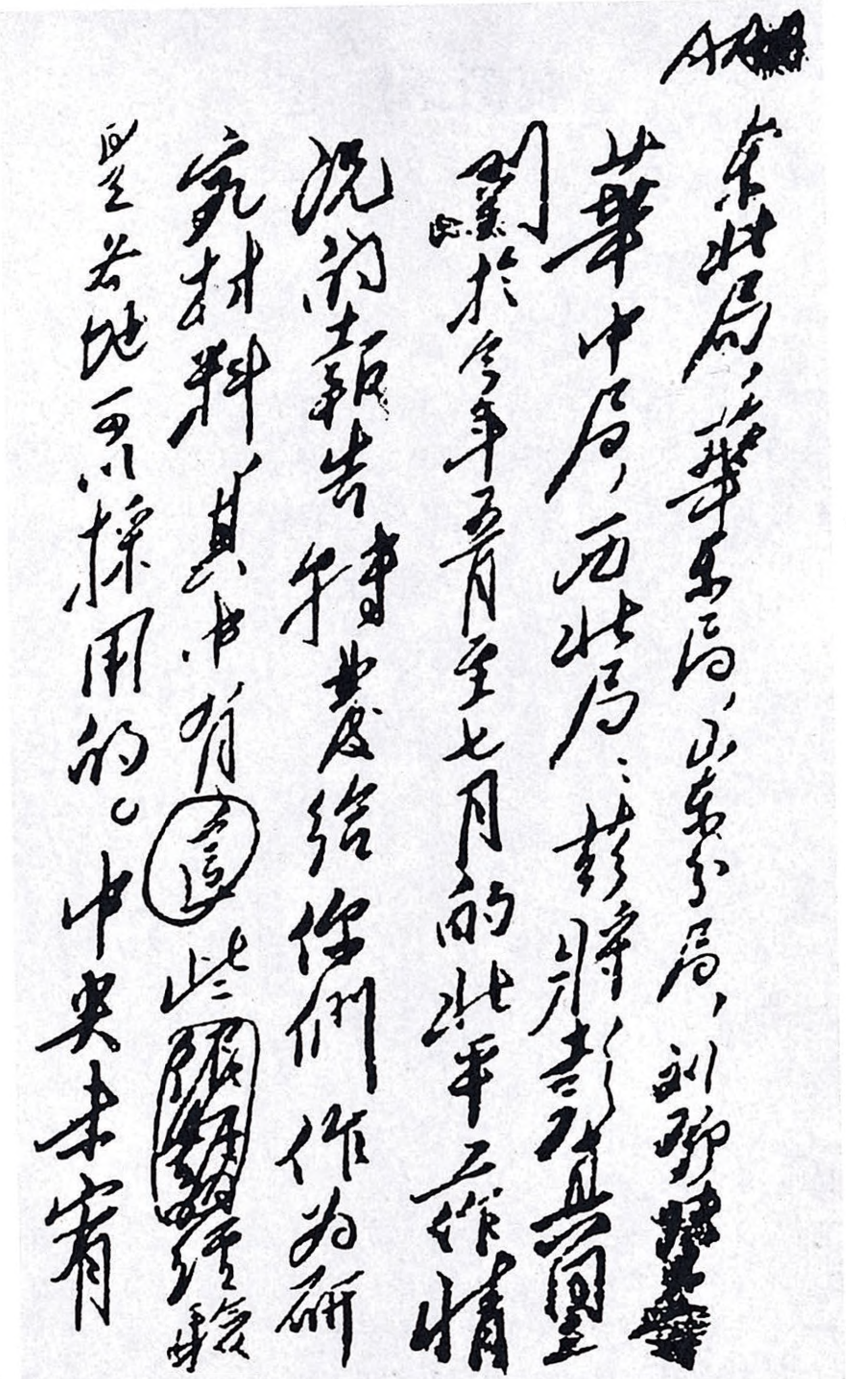
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刘、邓、张、李[1]，华中局，西北局：

兹将彭真同志关于今年五月至七月的北平工作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作为研究材料，其中有些经验是各地可以采用的。

中央
未宥

---

[1] 刘、邓、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



東北局，華東局，山東分局，劉鄧，華中局，西北局：彭、聶、彭真，劉於今年五月至七月的北平工作情況的報告轉發給你們作為研究材料，其中有些經驗是各地可以採用的。

中央未宥

毛泽东致东北局等电的手稿。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8月26日）

（一）完全同意二十五日二十四时电的部署[2]。（二）六十二军暂留临夏，必要时亦宜令其移兰州参战。（三）务请注意筹足至少一个月的粮食、弹药，准备持久坚决歼灭两马。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彭德怀25日24时电告：攻城部队25日拂晓对兰州守敌发起攻击，与敌恶战一天，敌我伤亡相等。马鸿逵部4个军8万人左右，正倾巢援兰州，似有放弃宁夏模样，如能经过傅作义迟延宁马10日或半月出动，对我有利。根据上述情形，我军拟留六十二军停临夏，一、二两军东移，参加攻击兰州之敌及便于适时打击增援兰州的宁夏马鸿逵部。

致傅作义电[1]

（1949年8月26日）

我军正攻兰州，马鸿逵有向兰州增援模样。毛主席意见，如有可能，请兄电劝马鸿逵勿去增援，准备和平解决宁夏问题，如去增援，则马部和平解决机会将更少了。

---

[1] 这是毛泽东应彭德怀来电要求起草的以聂荣臻、薄一波名义致傅作义电的主要内容。

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

（1949年8月27日）

历来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问题，只有我们能解释。对于必须集中的尽量集中，必须抓紧的要抓紧，例如对司徒雷登的外交问题。有人说我们只管政策不管事务。事务是管不胜管，而政策问题是关乎几十万、几百万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的。我们是抓紧大的人事、大的政策。我们要有些集中有些不集中才能搞好，所以有些地方要给地方以监督之权。鉴于蒋介石集权，我们是又集中又不集中，需要集中的则集中。

---

[1] 这是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关于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的一段讲话。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1949年8月28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

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他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这种情况，在一九四

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他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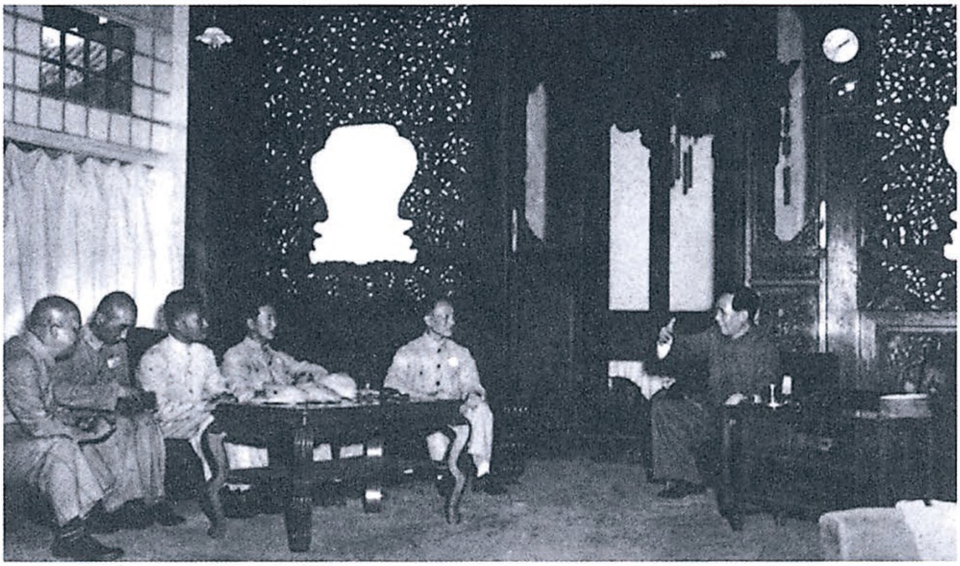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郎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1]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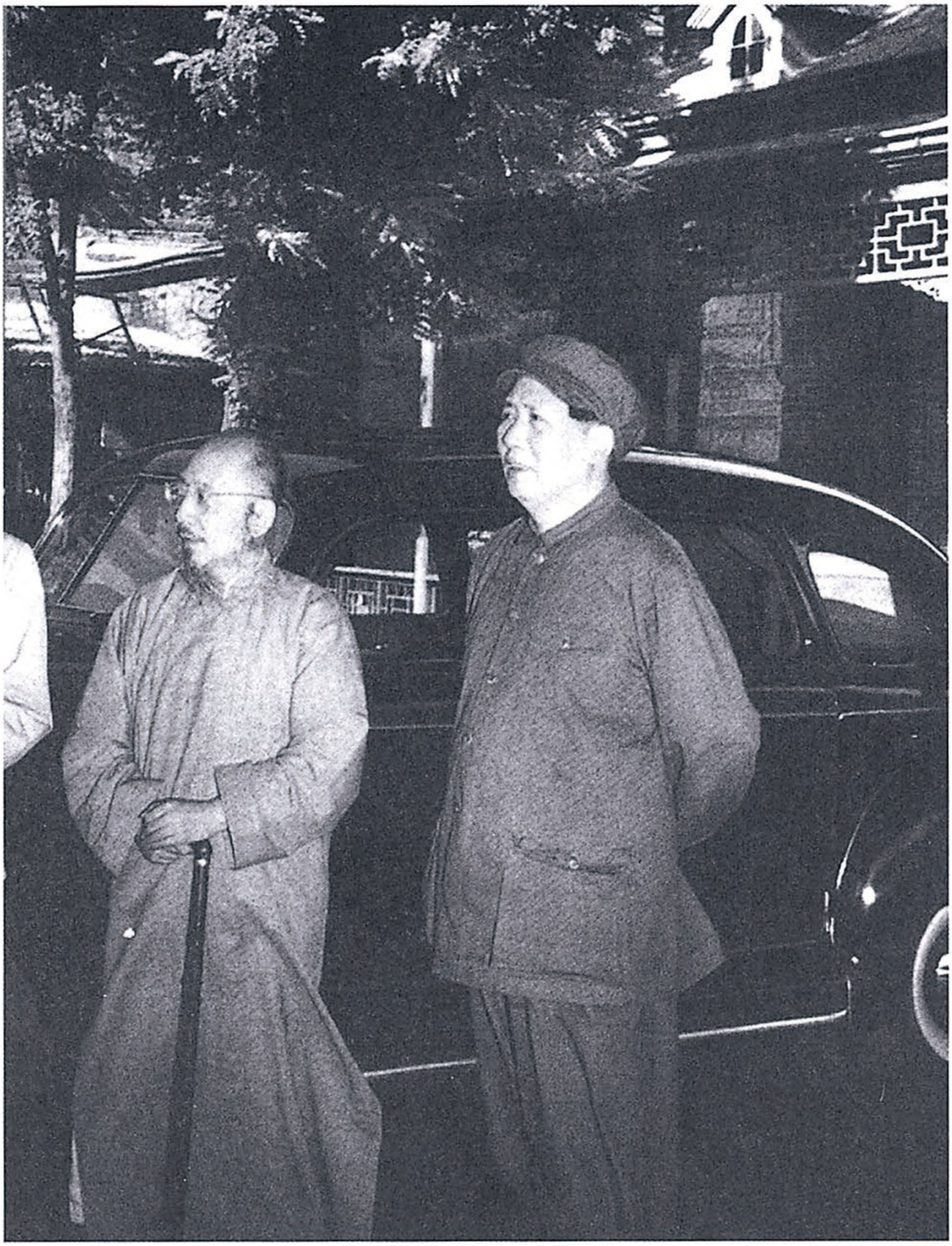
---

[1] 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5—1783）的殖民地起义军队总司令，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杰斐逊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曾任美国总统。林肯主张废除美国的黑奴制度，他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领导了反对美国南部各州奴隶主的战争（1861—1865），并在1863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接见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人员。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张治中在北平火车站迎候由上海北上的宋庆龄。



1949年8月，毛泽东和老朋友柳亚子在一起。

给吴玉章[1]的信

（1949 年 8 月 29 日）

玉章同志：

来信[2]已悉。当付郭、茅、马[3]三先生审议，提出意见。现已接复信，特付上，请予考虑，并请回答你对于他们的意见之赞成，或反对，或修改的意见。如果你同意的话，请付范文澜、成仿吾、黎邵西[4]三位一阅，或者座谈一次，以集体意见见告为盼！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

[1] 吴玉章，中国文字改革的倡导者之一。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2] 指吴玉章 1949 年 8 月 25 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信。

[3] 郭、茅、马，指郭沫若、茅盾、马叙伦。

[4] 范文澜，当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成仿吾，当时任华北大学副校长。黎邵西，即黎锦熙，当时任北平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中文系主任。

致华中局电[1]

（1949年8月29日）

野司转来四十三军病员情况的电报已阅悉，甚为怀念。未知其他各军是否也有相似的情形。你们是否已采取统一的办法克服这个困难，即是说是否需要推迟进军的时间，以便使部队多得休息，及是否需要普遍增加伙食费，使战士恢复体力，请将你们的意见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询问第四野战军的病员情况及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华中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各中央局、分局电[1]

（1949年8月30日）

（一）兹将华北局未俭电转给你们。请你们仿照此电，将你们区域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列举出来，指明哪些已开过各界代表会议，哪些还未开，会议开得好还是不好，你们处置如何等项报告我们。（二）老解放区村、区、县、省等级人民代表会议开会情况如何，新解放区县的各界代表会是否可以举行，均望电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分局并告各野战军电的主要内容。

“友谊”，还是侵略？

（1949年8月30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1]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

---

[1] 这里所说的“治外法权”，是指领事裁判权。

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1]。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2]。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3]。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

---

[1] 《望厦条约》是美国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4年7月，美国利用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处境，强迫中国清朝政府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这个条约共三十四款，其中规定美国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除割地、赔款外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包括美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

[2] 材料引自美国雷麦著《外人在华投资》一书第十五章。

[3] 指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北平和南京的汇文中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

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1]，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〇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

---

[1] 1946年12月2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等在北平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这个事件，曾经激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撤离中国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1月，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抗议，竟将主犯皮尔逊交给美国方面单独处理。同年8月，美国海军部宣布皮尔逊无罪释放。

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1]

（1949年8月30日）

彭、张：

看你们二十九日致王张[2]电，知马[3]匪分两路退却，且有退新疆可能。我们亦从伊犁方面获得同样消息。为此，请你们考虑青海宁夏两方面暂缓进兵，先占张掖、武威，再占青海、宁夏。如何？盼复。

军委

未三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王张，指王震、张希钦，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3] 马，指马步芳、马鸿逵，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和副长官。

关于欢迎出席新政协会议致程潜[1]电

(1949年8月30日)

长沙程颂云先生：

八月十九日电示今日收到，敬悉。尊见极好，完全同意。当接陈子良[2]兄未皓[3]电时，我即复电（经中共湖南省委转）请他仍照前议兼领省主席，与尊意吻合。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我公及仇亦山[4]、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

毛泽东

未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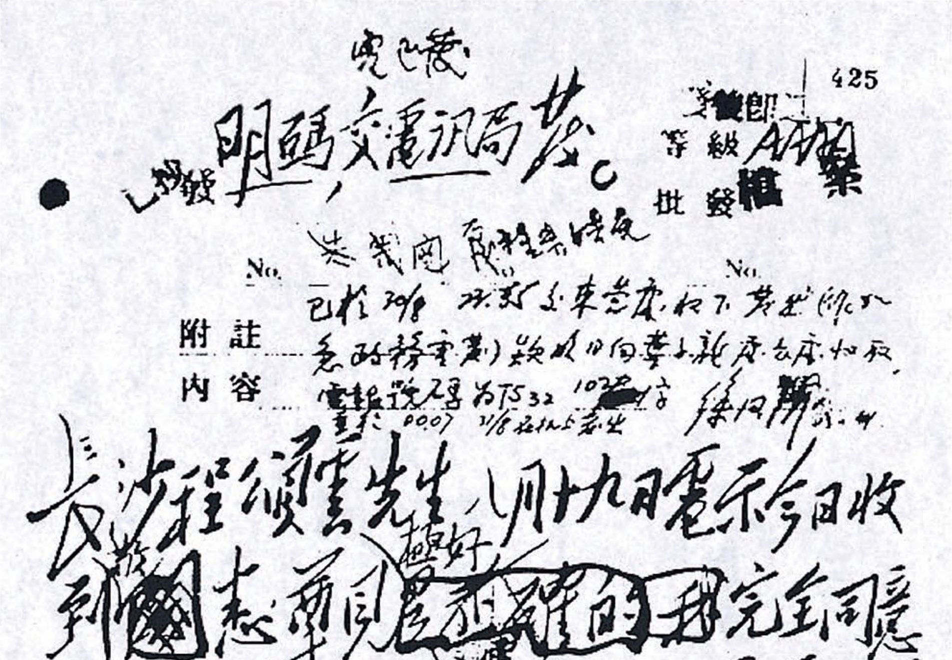
---

[1]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4日在长沙宣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

[2] 陈子良，即陈明仁，号子良，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4日与程潜一起在长沙宣布起义。

[3] 未皓，即8月19日。

[4] 仇亦山，即仇鳌，原任国民党政府湖南省政府委员，1949年参加湖南和平解放工作。



已发

425

明码交电讯局发。

等级 AA

批发

No.　　No.

附註内容

长沙程颂云先生：八月十九日电示今日收到，[illegible]志尊見甚好，我完全同意。当接陈子良兄未能辞，我即覆电（[illegible]经中共湖南省委转）请他仍照前议兼领省主席，与尊意吻合。新政协召开在即，拟请先生及仇亦山陈子良出席，共商国是，倘荷命驾，无任欢迎。毛泽东未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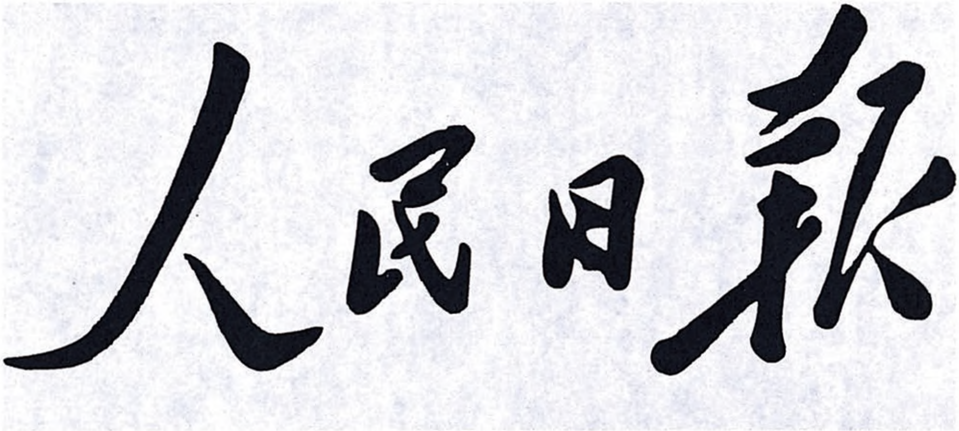
1949.8.30

毛泽东致程潜电的手稿。

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8月）

人民日报



毛泽东第三次为《人民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9年8月，《人民日报》改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毛泽东第三次挥笔题写“人民日报”，即今天所用的报头。

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之[1]

（1949年9月1日）

林、邓、萧、赵：

三十日电[2]悉。（一）你们歼灭宋希濂[3]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4]兵团主力在澧州[5]、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该部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该地区之黄杰[6]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7]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等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可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8月30日林彪、邓子恢、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白崇禧已改变在湘西寻我作战的计划。宋希濂已令所部出发，向石门、澧县、常德进攻，但该敌仍有中途改变计划的可能，而无论该敌是否前进，我军均拟攻歼该敌。

[3] 宋希濂，当时任国民党军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4] 程子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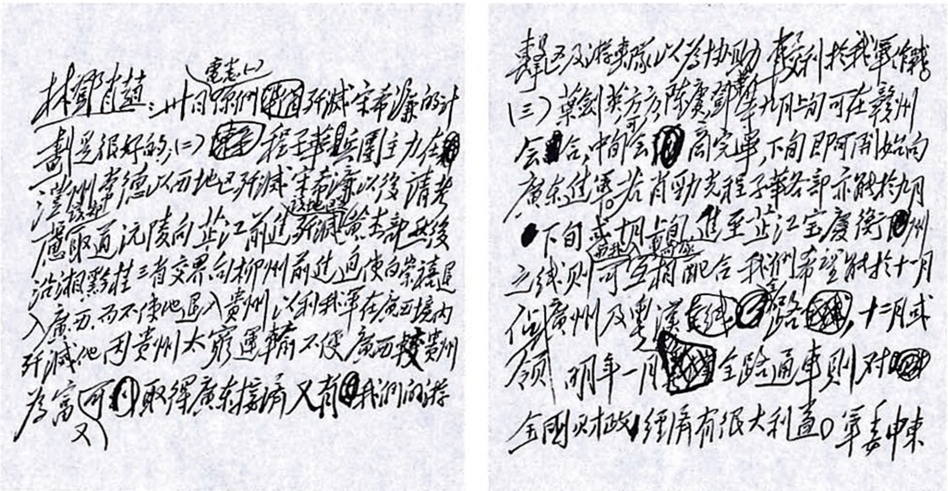
[5] 澧州，即湖南澧县。

[6] 黄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员。

[7]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劲光[1]、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2]之线，则可与我入粤部队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3]，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

军委
申东



林邓肖赵：二十日电悉。（一）你们歼灭宋希濂的计划是很好的；（二）程子华兵团主力在澧州常德以西地区歼灭宋希濂以后，请考虑取道沅陵向芷江前进，歼灭黄杰部，然后沿湘黔桂三省交界向柳州前进，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而不使他退入贵州，以利我军在广西境内歼灭他，因贵州太穷，运输不便，广西较贵州为富，又可取得广东接济，又有我们的游

击区及游击队以为协助，较有利于我军作战。（三）叶剑英方方陈赓邓华九月上旬可在赣州会合，中旬会商完毕，下旬即可开始向广东进军。若肖劲光程子华各部亦能于九月下旬或十月上旬进至芷江宝庆衡州之线，则可互相配合。我们希望能于十一月占领广州及粤汉全路，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全路通车，则对全国财政经济有很大利益。军委申东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迫使白崇禧退入广西以利我军歼灭之》的手稿。

---

[1] 萧劲光，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宝庆、衡州，即湖南邵阳和衡阳。

[3] 粤汉全路，指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纪念题词[1]

（1949年9月1日）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

冯玉祥将军逝世周年纪念谨致悼意！

---

[1] 1949年9月1日，中共中央为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题写挽词，周恩来致悼词。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为冯玉祥将军在泰山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9年9月2日）

同意你们未世亥电作战方针，占领青海、宁夏及永登休整一时期再分兵西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

（1949年9月3日）

饶漱石[1]同志：

陈云[2]同志已回，九月二日在中央会议上作了报告。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3]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多余人员设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岗位上去。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必须精密筹划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并有前途，否则不要迁移。对难民的迁移，亦须如此。着重节约那些本来可以减少的开支，但不要减少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着重反对浪费，从这里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封锁在目前时期对于我们极为有利，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万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满，应加以处理。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2]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托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主持工作。

[3] 上海会议，指陈云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上海主持召开的财政经济会议。参加的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5个地区的财政、金融、贸易部门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胜利和维持新解放区首先是大城市人民生活的方针，并就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提出了具体措施和步骤。

其办法是立即加以调查，分别自己有办法生活和自己无办法生活的两类，对于后一类人，应予收回，给以饭吃。现在无事做，也应给以饭吃，维持他们，使他们活下去，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就全局来说，全国养九百万至一千万人是完全有办法的。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积极利用城市的各界代表会议及各县的全县代表会议，将一切施政中的重大问题逐一提出自己有了准备的想过了的有了办法的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并交付讨论，征求他们的意见。此种会议，党员及完全可靠的左翼分子总共超过二分之一，能保证通过我们的意见即够，以便团结大批的中间分子及一部分必须拉拢的右翼分子，使他们向我们靠拢。此种会议，城市最好每月开会一次或三月开会两次，各县似以两月开会一次为宜。新区各县的各界代表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考虑选择上海附近一二个县亲自领导，开一二次会试试。以上各点，请以你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申江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9月4日）

向青、宁进军以适合情况解决问题，不使军队太疲劳为原则，早一点迟一点都可以。宁夏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请考虑利用马鸿宾[2]，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宁夏人少地狭，马部军政党可能有二十万人，加上十九兵团十万人，粮食问题必甚严重，请预为筹备。

---

[1] 9月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询问是否可于9月15日以前占领青海、宁夏。3日，彭、张复电说：15日占西宁有可能，9月底能占宁夏省会。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电的主要内容。

[2] 马鸿宾，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批语[1]

（1949年9月）

一

乔木[2]：

纲领共印三十份，全部交我，希望**今晚十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毛泽东
九月三日

你应注意睡眠。

---

[1] 毛泽东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作过多次修改，写了一些批语，这些文献资料没有全部保存下来。这里选入的5次批语，只是一个侧面的反映。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这5次批语都是写给他的。

二

乔木：

今[1]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然后付印。

毛泽东
即

三

即刻付印，一小时内交我。

毛泽东

四

照此[2]改正，印成小册子一千本。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指1949年9月3日。

[2] 指经毛泽东1949年9月6日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修改的底本是纲领草案（1949年9月5日，初稿）铅印件。

五

乔木：

即刻印**一百份**，于下午**八时**左右送交周副主席[1]。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1000份。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下午四时半

---

[1] 指周恩来，当时受中共中央委派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

（1949年9月4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前委：

（一）华北局转来察哈尔省委未世电[1]报告该省各界代表会的经验，很值得注意，请加研究。

（二）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

（三）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

[1] 指中共察哈尔省委1949年8月31日关于该省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报告。报告说，张家口解放初期未注意开各界代表会，工作走了弯路，从今年4月至8月，已开各界代表会4次。大同于今年5月初解放后，至今已开会3次。宣化仍未注意开代表会，继续用党内扩大的干部会议去传达和布置工作。已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对于联系城市各界人民，宣传和贯彻党的政策，启发各界人民的积极性，共同建设城市，均起了相应作用。缺点是存在形式主义，准备不足，缺乏中心内容，民主讨论不够。今后要使张家口、大同的代表会提高一步，会议代表的产生改以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聘请和推派为辅，并注意克服以往的不足。宣化立即着手建立代表会。人口在2万左右的城镇，亦拟建立各界代表会议。各县按照群众基础不同分别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界代表会议。区村两级建立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

（四）在新解放区，各界代表会的开始若干次，代表的产生可以推派和聘请为主，由可靠民众团体的民主选举为辅，以后，即可改为由各团体、各界的民主选举为主，推派和聘请为辅。总以既能保证会议由我党领导，又能养成民主精神为原则。

（五）二万以上不足三万人的城镇，亦可开各界代表会。

（六）尚未彻底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三级，均开各级代表会议，乡村开农民代表会议，而以县的各界代表会为中心。

（七）已完成土改的省、县、区、乡四级，均开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开始若干次，亦可开各界代表会议，以为过渡。

（八）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九）会议之前由党委（市委、县委等）召集代表中的党员开会一次，决定方针。能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则更好，但不要每次都如此。

（十）此电请转发各市、各县，各军、师。

中央

九月四日

给周恩来、聂荣臻的信[1]

（1949年9月4日）

程潜九月二日抵汉，四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程潜来京及到京后的具体安排计划致周恩来、聂荣臻信的主要内容。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人到车站迎接。8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在中南海会见并宴请程潜。

致陈明仁电[1]

（1949年9月5日）

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邀请陈明仁参加新政协会议致在长沙的陈明仁电的主要内容。10日，陈明仁到达北平，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欢迎。

在审校《共同纲领》草案时改写的三段话[1]

（1949年9月6日）

（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的地方政府及军事集团，如有愿意停止战争，承认错误，要求和平解决者，可以按照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五日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大意，用和平方法解决之。

（二）鼓励并欢迎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爱国分子及国民党残余力量统治区域的人民群众组织响应人民解放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维护社会秩序及保护国家财产的工作。

（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各级政权机会为各级人民政府。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

[1] 1949年9月29日正式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二章“政权机关”第十二条中，采用了毛泽东改写的第三段话。

开好县的各界代表会议

（1949年9月7日）

华中局，并告各局，各野：

八月三十日电悉。同意你们所提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议的各项意见[1]，并将此电转发各局、各野研究照办。关于召开县的各界代表会问题，自西北局提议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认为有益无害。而不召开各界代表会，要等到农协在乡村中建立了基础再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日中央复电（载在《政策汇编》）那样，则是很不利的。事实上，县的许多大政方针，例如剿匪、反霸、借粮、征粮、救济灾荒、修理堤坝、推动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协、减租减息问题、恢复和发展县范围内的工商业及文化教育问题、推行人民币及县的财政金融问题等，均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经过讨论，取得代表们同意，然后传达推行，比较不开这种

---

[1] 中共中央华中局在1949年8月30日关于召开县的代表会议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是：一、只由县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区、乡两级可开农代会，逐步达到以农代会做基础，吸收其他学生、妇女及少数工商业者、开明士绅（作为民主人士）参加。二、吸收开明士绅应具备以前中央所规定的条件，并经地委一级批准。三、在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较大县城可以城乡合并召开，吸收本城工人代表参加。若无此条件，则只吸收农民（注意吸收手工业工人）代表，不必为了开会去专事组织乡村工人推选代表，以免分散精力。

会，长期限于党内干部的讨论、传达和推行，要有利得多。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中，共产党员及可靠的左翼分子，应超过二分之一，保证决议的通过。中间分子及必须拉拢的少数右翼但不反动的分子，可让其占三分之一左右的数目，以便孤立反动派，利于政令的推行和群众的发动，且可发现问题及发现积极分子。省委、区党委和地委，必须积极帮助各县县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布置和领导此种会议。这是全县性的会议，县城及各区、各乡及县一级机构，均应有代表，在县委领导下，由县政府召开。这是县的会议，至于区、乡，则照你们意见召开区的及乡的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其余均照你们意见办理。此种会议，我们尚无经验，请你们注意收集经验，指导各地，并告诉我们。此电请你们及各中央局转发至县一级为盼。

中央

九月七日

对赣州会议及进军华南的指示[1]

（1949年9月8日）

叶、方、陈、邓诸同志，并告林、邓[2]：

（一）你们业已聚会于赣州，极为欣慰。你们会议内容应照中央迭次电示及面告剑英者扼要做出决定。（二）方方等同志领导的华南分局及华南各地党委和人民武装有很大的成绩，新的华南分局及即将进入华南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应对此种成绩有足够而适当的估计，使两方面的同志团结融洽，互相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以利争取伟大的胜利。（三）你们一面开会，一面即可命两兵团[3]开始向南进军。第一步进至韶关、翁源之线，准备在该线休息若干天，然后夺取广州。我们认为不应分兵去惠州，待夺取广州再占惠州为适宜。因为四野主力九月中旬即可向芷江、宝庆、衡州[4]之线前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的电报。

[2] 林、邓，指林彪、邓子恢，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治委员。

[3] 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

[4] 宝庆、衡州，即湖南邵阳和衡阳。

白崇禧[1]必然不战而向广西撤退（他决不会在湖南境内和我决战，所布疑阵是为迟滞我军前进之目的）。我陈邓两兵团应争取于十月下半月占领广州。陈兵团预计十一月进至梧州区域。四野主力则于同时进至柳州、桂林区域。十二月即可深入广西，寻找白部作战。刘邓[2]率二野主力，十一月可入贵州境内，十二月可入重庆。如此，则我各路军可以互相配合。你们对进军时间及攻击目标等项，有何意见，盼告。

军委

申齐

---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
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1]

（1949年9月8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及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消息。

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1]

（1949年9月8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中共中央委员会顷因各军事前线连续告捷，特致电前线各野战军、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表示祝贺。该贺电称：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及各界人民同胞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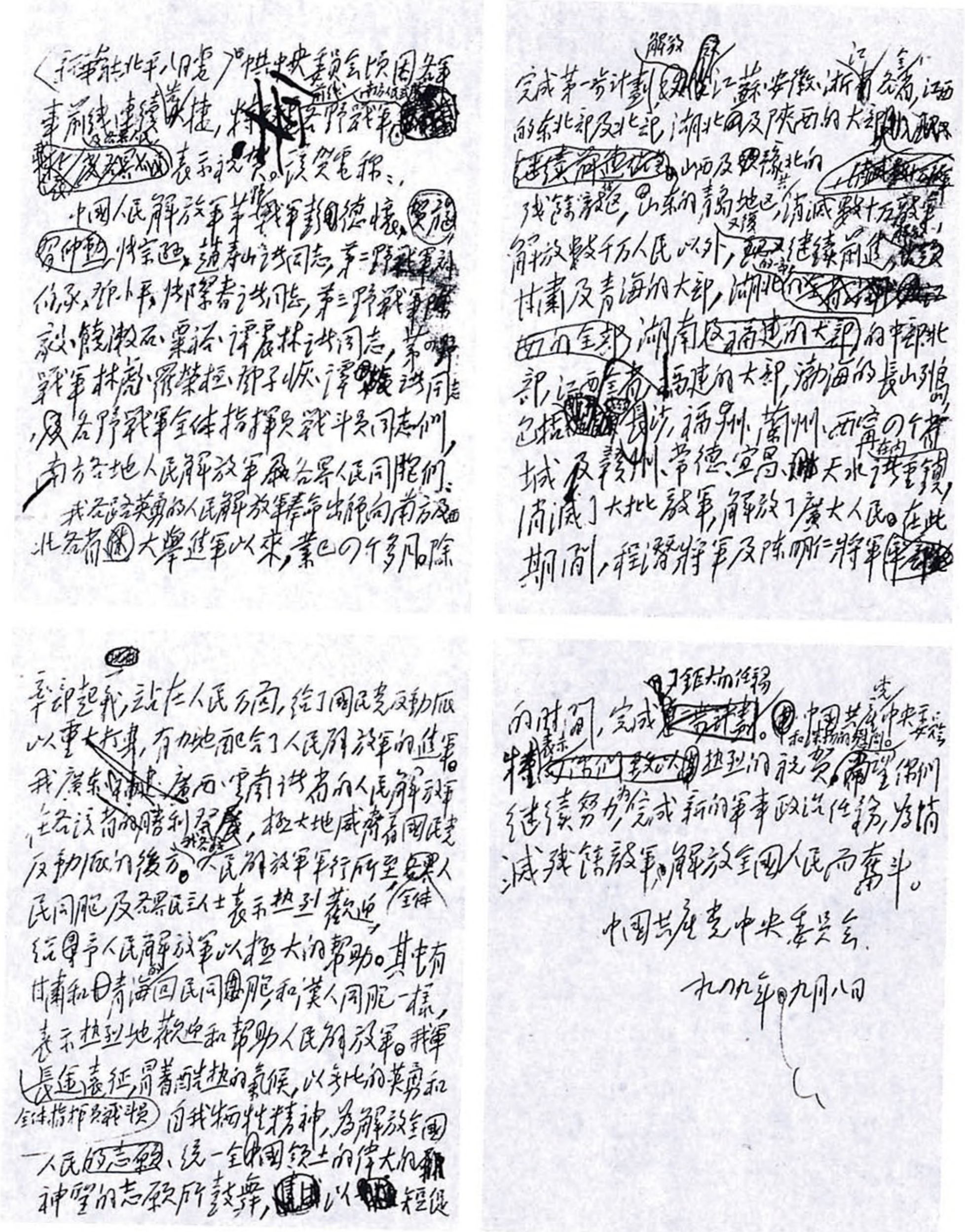
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大举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各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豫北的残余敌占区，山东的青岛地区，共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复继续前进，解放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在内，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

---

[1] 这是毛泽东以新华社电讯形式写成并发出的中共中央给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的贺电。

反动派的后方。我各路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全体人民同胞及各界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和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人同胞一样，表示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国领土的伟大的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表示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慰问。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中共中央委员会顷因各线我军连续奏捷，特致电各野战军及各地人民解放军表示祝贺。该贺电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张宗逊、赵寿山诸同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诸同志，第三野战军陈毅、饶漱石、粟裕、谭震林诸同志，第四野战军林彪、罗荣桓、邓子恢、谭政诸同志，及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及各界人民同胞们：

我各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奉命出师向南方及西北各省进军以来，业已四个多月。除完成第一步计划，解放江苏、安徽、浙江全省，江西的东北部及北部，湖北及陕西的大部，山西及绥远北部共残余据点，山东的青岛地区，消灭数十万敌军，解放数千万人民以外，又继续前进，解放了甘肃及青海的大部，湖北的一部，湖南的中部北部，江西全省，福建的大部，渤海的长山列岛，包括长沙、福州、兰州、西宁四个省城及赣州、常德、宜昌、天水诸重镇，消灭了大批敌军，解放了广大人民。在此期间，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给了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大打击，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进军。我广东、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人民解放军军行所至，各界人民同胞及民主人士表示热烈欢迎，给予人民解放军以极大的帮助。其中有甘肃和青海的回民同胞和汉人同胞一样，表示热烈地欢迎和帮助人民解放军。我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长途远征，冒着酷热的气候，以无比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为解放全国人民、统一全中国领土的伟大而神圣的志愿所鼓舞，以短促的时间，完成了这样巨大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新的军事政治任务，为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致电祝贺各线我军连续奏捷》的手稿。

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1]

（1949年9月9日）

林、邓：

关于进攻部署：（一）陈赓邓华两兵团[2]第一步进占韶关、翁源地区，第二步直取广州，第三步邓兵团留粤，陈兵团入桂，包抄白崇禧[3]后路。陈兵团不派任何部队入湖南境，即不派部去郴州、宜章等处。（二）程子华兵团[4]除留一个军于常德地区，另一个军已到安化地区外，主力两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三）另以三个军经湘潭、湘乡攻歼宝庆[5]之黄杰[6]匪部，与程子华出芷江的两个军摆在相隔不远的一线上。对衡阳地区之白崇禧部，只派队监视，而不作任何攻歼他的部署和动作。（四）这样一来，白崇禧部非迅速向桂林撤退不可，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判断白部在湖南境内决不会和我们作战，而在广西境内则将被迫和我们作战。因此，陈赓兵团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和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陈赓邓华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陈赓和邓华。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程子华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员程子华。

[5] 宝庆，即湖南邵阳。

[6] 黄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

不要派部出郴、宜。现在茶陵、攸县之我军，亦不要作攻歼衡阳白匪之部署，而应两路齐出芷江、宝庆，位于白匪西侧。然后，以芷江之两个军，先期突然出柳州，在柳州地区占立根据地。估计白匪三个军（第七军、第四十六军、第四十八军）及鲁道源[1]之五十八军在我主力威胁面前，不敢过早分散其主力。李品仙[2]防御柳州一带之兵力必不甚多。我军（两个军）可能在柳州以西以北区域即融县[3]、罗城、天河[4]、宜山、思恩、宜北区域建立根据地，并切断柳州通贵州的铁道线。陈赓兵团则于占领广州后，即经梧州向宾阳、南宁地区前进，位于广西南部。我在宝庆之三个军（主力）则于白匪向桂林撤退时，尾敌南进。（五）以上三路我军（共八个军），在进入广西后，第一步不是急于寻找白匪主力作战，而是立稳脚跟，查明情况，联系群众和结合我在广西境内的游击部队（桂南、桂北均有）。第二步，再各个歼灭白匪主力。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我们认为非用上述方法，不能消灭他。（六）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

军委

九月九日

---

[1] 鲁道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兼第五十八军军长。

[2]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桂林绥靖公署主任。

[3] 融县，旧县名，即今广西融安县。

[4] 天河，旧县名，1952年并入广西罗城县。

复邓力群等电[1]

（1949年9月10日）

如伊犁当局将迪化当局所提问题向我方征求意见时，你可以表示：（一）新疆问题的解决方案各方均可以提出，但最后须取决于北平中共中央；（二）谈判地点在兰州，中共中央的负责代表为彭德怀将军；（三）如迪化当局愿派代表去兰州谈判，我们表示欢迎。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和新疆当局接洽和平谈判事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在新疆伊犁的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复邓力群电[1]

（1949年9月10日）

为了快点与迪化当局接上头，你可以于日内进驻迪化，并迅即架设电台通报。

---

[1] 这是毛泽东10日8时，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邓力群电的主要内容。邓力群随即从伊犁秘密前往迪化，同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鲍尔汉、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商谈新疆和平解放问题。

和张治中的谈话

（1949年9月10日）

毛泽东：解放军将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你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叫他们起义为好。我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他们是一定照办的。

张治中：我早有此意，不过我在五月间曾接陶峙岳、包尔汉来电问候我的情况以后，音讯就断绝了，现在我还不知道怎样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我们已经在伊犁建立电台，你的电报可以先拍到伊犁再转迪化，我可以告知在伊犁负责的邓力群。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9月10日）

集中注意力争取于十一月初、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由你们自己做准备的事项，请你抓紧进行，除帐篷、水壶、粮食外，你未提皮衣、皮帽、毡鞋，这些是很重要且须立即准备的，是否需要我们帮助你们办皮衣，要多少，请即告。陶峙岳、赵锡光[2]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本日我们邀请张治中正式谈了，请他帮助解决新疆的问题，并在新疆方面担负工作任务（尚未提到具体职位)，他表示愿意听候驱策，做什么事也可以。

---

[1] 这是毛泽东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这个电报还提出：应设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辖西北5省，以彭德怀为主任，习仲勋、赵寿山、张治中、邓宝珊4人为副主任，办公地点在兰州或西安；以张治中为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王震及少数民族的2人至3人为副主任（或须加上陶峙岳)，以为新疆的过渡机关。

[2] 赵锡光，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省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

祝波立特连任英共总书记二十周年的贺电[1]

（1949年9月10日）

亲爱的波立特同志：

中国共产党热烈庆祝你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二十周年。在你的领导下，英国共产党在二十年来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把自己锻炼成为英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和英国与各国人民团结友爱的旗帜。中国人民坚决相信，英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英国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是中国人民在英国的最可靠的盟友，英国共产党的强大是世界和平和中英人民合作的重要保证之一。祝你健康，祝你和你的战友们的正义事业的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日

---

[1] 英国共产党定于11日庆祝波立特连任英共总书记二十周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表示祝贺。

为《中国儿童》创刊号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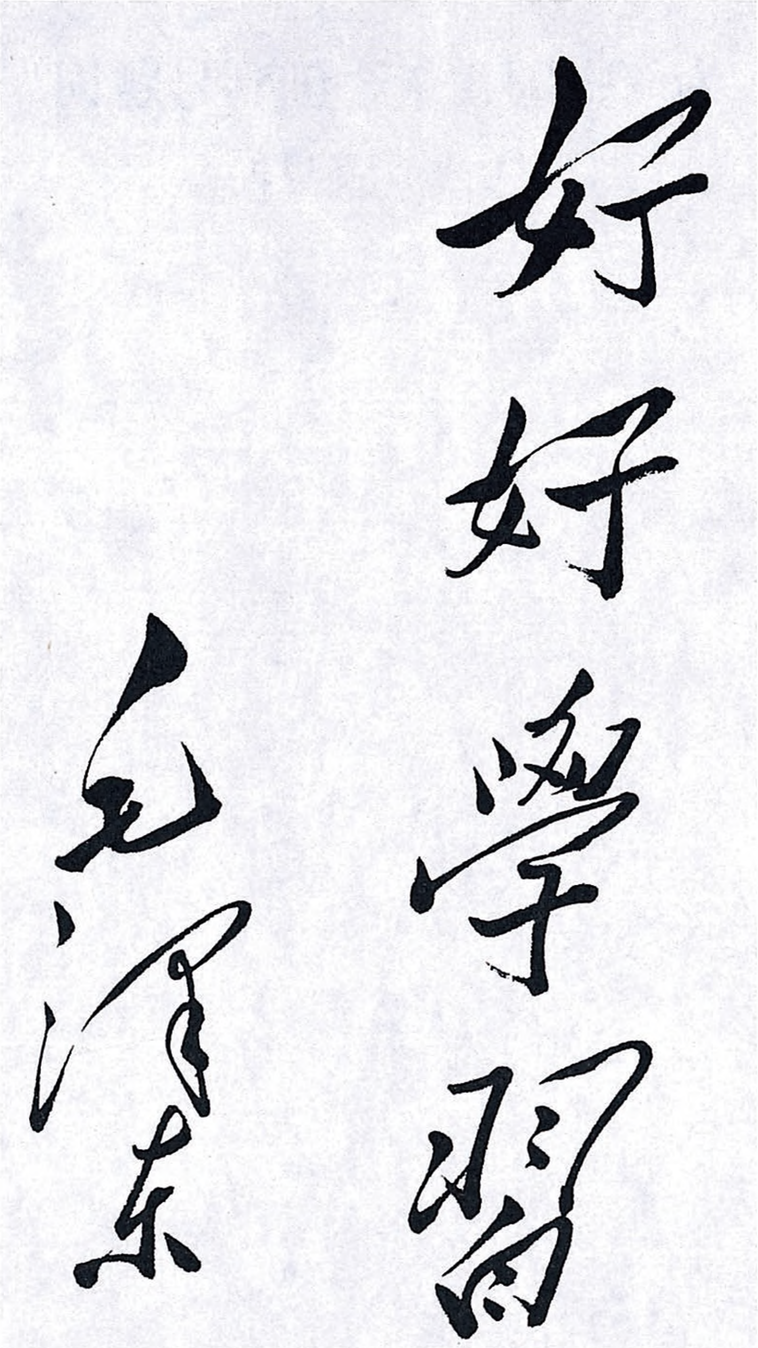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10日）

好好学习。

毛泽东

---

[1] 1949年9月，北京出版《中国儿童》（现名《中国少年儿童报》）创刊号，毛泽东题词：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儿童》创刊号的题词。

给向振熙的信

（1949年9月11日）

杨老太太[1]：

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2]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

[1] 杨老太太，即向振熙老人，毛泽东的岳母。

[2] 朱小姐，即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

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1]

（1949年9月12日）

邓、张、李，并告林、邓、谭[2]：

申灰电悉。（一）同意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二）如果白崇禧[3]占领贵州省城，无论二野、四野均暂时不要去打他。二野的两个兵团以主力一直进至重庆以西叙府[4]、泸州地区，然后向东打，占领重庆。以一个军留在乌江以北（以遵义为中心）。二野之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五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然后，四野以一部由广西向北，二野以适当力量分由云南、黔北向东向南包围贵阳之敌而歼灭之。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军委

申文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和参谋长李达的电报。

[2] 林、邓、谭，指林彪、邓子恢、谭政，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叙府，指叙州府，即四川宜宾。

致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及邓小平电[1]

（1949年9月12日）

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北局及邓小平[2]同志：

请你们研究饶漱石同志这个电报。我认为这个电报所表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们那里可以仿行。

毛泽东

申文

---

[1] 毛泽东的这个电文写在饶漱石1949年9月9日关于上海与华东近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之后。9月12日，在转发饶报告时，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第七点："因陈、刘已赴中央，对华东与上海各方工作均可面达。同时，我因疟疾初愈，请求批准将此电作为我对主席9月份的综合报告。"

[2] 邓小平，当时任第一野战军政治委员。

复饶漱石电[1]

（1949年9月12日）

饶漱石同志：

（一）完全同意你申佳电各项意见和办法。你们这样做，就有了全部的主动权。（二）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报告，此外不须做另外的综合报告。（三）关于华东局与上海市委分开及建立华东人民政府，待与陈、刘、粟[2]商量后就可以做，你们可马上进行准备工作。

毛泽东

申文

---

[1] 这是毛泽东对饶漱石1949年9月9日关于上海与华东近况给毛泽东的报告的复电。

[2] 指陈毅、刘晓、粟裕，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复叶剑英、陈赓电[1]

（1949年9月12日）

八日电[2]悉。两兵团第一步集结并休息数日，第二步齐头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并休息数日，第三步协力夺取广州。除此以外均同意。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叶剑英、陈赓电的主要内容。

[2] 叶剑英、陈赓9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华南分局赣州会议制订的解放广东的作战方案，提出依照中央军委意图先消灭北江、东江之敌，进占曲江（现属韶关市）、惠阳，创造和平解决条件，争取和平解决。同时，准备对付坚守广州顽抗之敌。因第四兵团与第十五兵团相隔过远，为求得同时展开，齐头并进，实行钳形合围，必须先行集结预定地区，9月底集结完毕。

致王首道电[1]

（1949年9月13日）

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先生来函称，拟于交通全复时北上观光等语。此人是我过去认识的，教了几十年书，请派人调查其政治背景告我。并向他说明我的意见：交通全复时可以来北平游历一次，仍然回湘在湖大任教，不作在北平久居的打算。如果他是这个意思，我是欢迎他来北平看一看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到北平一事致王首道电的主要内容。

复谭戒甫电[1]

（1949年9月13日）

惠函诵悉，极慰平生，交通全复时，倘愿北来游览一次仍返湖大任教，甚表欢迎。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湖南大学教授谭戒甫到北平观光一事复谭戒甫电的主要内容。

给周北峰的信[1]

（1949年9月14日）

一

毛主席说，绥远军政委员会贵方名单，除傅、邓、董、孙[2]四人外，还有些什么人，请电傅将军，速即电告，以便在董其武通电发表后迅即发表。

二

关于傅、邓二先生出席政协会议事，本日毛主席说：如因工作关系，可以在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之间到达北平出席。如能在二十日到平则更好。在绥远军政人员表明态度后，董其武、孙兰峰可能被邀参加政协。北峰兄参加政协事，毛主席认为是可以的，当与董、孙一道向筹备会提出。等情特达，请转告宜生、宝珊。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原绥远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出席政协会议的人员问题，起草的以薄一波名义致周北峰信的主要内容。本篇二是毛泽东起草的以薄一波、聂荣臻名义致周北峰信的主要内容。周北峰（1903—1986），山西永济人。北平和谈中傅作义的和谈代表。

[2] 傅、邓、董、孙，指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

祝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召开二次大会的贺电[1]

（1949年9月15日）

亲爱的维托里欧·维达里同志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大会的全体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热烈地祝贺你们的大会。庆祝你们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者和铁托叛徒集团的勇敢斗争中所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胜利。你们的胜利，对于国际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是一个重要的贡献和鼓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

---

[1] 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共产党定于9月16日、17日、18日召开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第二次党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电表示祝贺。

祝加香八十寿辰的贺电[1]

（1949年9月15日）

亲爱的马赛·加香同志和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烈地庆祝加香同志的八十大寿。

加香同志是十九世纪末叶以来的法国革命工人运动和法国人民爱国民主运动的活的象征。加香同志对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对于法苏人民的友谊的忠诚，对于中国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热烈同情，不但是法国工人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国际工人阶级的共同的骄傲。

祝加香同志健康！向加香同志和以多列士同志为首的法国共产党中央致兄弟的敬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五日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9月15日致电祝贺法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道报》总编辑加香80岁寿辰。

迅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

（1949年9月16日）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八月十三日在北平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毛主席又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毛主席的这个号召，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现在南京、天津、杭州、武汉等城市都已经或正在纷纷召开各界代表会议。

事实证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个城市解放后，在实行军事管制的时期，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要比临时参议会好得多，它可更广泛而有效地联系群众，并洗涤旧的政权机构的官僚主义的遗毒，使人民政权在群众中面貌一新。而成立临时参议会，则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国民党统治时代召开过的参议会而发生不良印象；并且因为它是一个咨议机关，而在组成的成分上又往往不容易做到有广大的代表性，因而也就不可能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它又要比各界、各业的座谈会能更经常而

---

[1] 这是新华社的社论。标题是毛泽东改的，原题为《迅速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宽广地联系群众，因为它可经常地定期召开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沟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而各界、各业的座谈会，虽然是城市刚刚解放时传布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并征询各方意见的良好方式，但它只是临时性质，缺乏固定的组织，不能解决与群众的经常的联系问题。经过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在会内会外的活动，可以把各阶层人民的意见集中起来，使人民政府能够更清楚地了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以及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更准确地规定施政方针和重要措施；同时，又可以把政府的施政情况和政策法令传达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取得群众的拥护，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行动纲领，吸引广大人民来积极地参加城市的各项建设工作。另一方面，经过各界代表会议，通过各界代表的讨论和工作，又可使各阶层人民由其本身利益出发的不同主张、要求和意见，得到充分的申述和沟通的机会，特别是诸如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房客和房主关系等这些涉及广大人民生活而又最易发生纠纷的重大问题，可以谋取一致的协议，使各界人民能在人民政府领导下更亲密地团结起来，而人民政府在今后施政方面也能更全面而妥善地照顾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所以，凡是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且真正开得成功的地方，人民政府的施政效率都有很大提高，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了。北平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各界代表会议以后，有些人说：他过去对于共产党要实现民主，是不大相信的；因为他所了解的民主是抽象的、形式逻辑的。而在参加过各界代表会议以后，才领会了民主制度的意义，领会民主和专政是怎样结合起来的，领会人民民主专政是何以成为必要的。

可是，直到今天，有些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对于各界代表会议的性质、意义和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人认为军事管制时

期不宜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否则便会妨碍军管会的职权，影响社会秩序的迅速建立。他们不知道虽然是在军管时期，还是应当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因为在军事管制时期，我们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是由外地调来的，他们暂时还与当地群众缺乏联系，了解与反映情况难免和实际有距离，而各界代表会议网罗当地各界人民代表参加，正可成为军管会、人民政府与当地人民联系的纽带。各界代表会议的召开，不但不会妨碍军管会的职权，相反地，只会增强政府的工作效能。因为实施军事管制的目的，是在于顺利地接管机关企业，建立革命秩序，发动和组织人民力量，肃清残余敌人，镇压反革命活动和恢复生产事业；而各界代表会议则正是能够团结人民，协助人民政府，促进上述目的的实现。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是由军管会和人民政府赋予的，它是过渡时期人民参与政权建设的机关，到了条件成熟时并可赋予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以便过渡到普选的全权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只要我们领导得好，是不会与军管制度发生任何冲突的。

那么，怎样才能把各界代表会议开好呢？根据各地已有经验，至少应该注意如下三点：第一，是开会以前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参加各界代表会议的人数，应当视城市大小和工作情况决定，但每个代表应该真正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在组成的成员方面，一方面应注意纯洁性和严肃性，禁止反动分子参加，否则便会影响人民群众对各界代表会议的威信；另方面又应注意其广泛性和灵活性，应该吸收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卫戍部队、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以便市内各种不同的人民群众都能经过他们的代表与人民政府发生密切的关系。工厂、学校、机关、部队的代表，如果条件具备，应尽可能经由群众大会推选，以增强其

代表性。在会议以前，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必须准备合乎实际情况的工作报告，以便与会代表了解和讨论政府的工作。同时必须事先与代表们协商，征求群众的意见，准备一个至数个与本市广大人民生活有关而又迫待解决的中心问题，例如解决粮煤供应、精简节约、疏散城市多余人口、调处劳资争议、沟通城乡贸易、取缔投机奸商活动、恢复和发展公私经济事业、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提交会议讨论，并务期得到确实结果，作出成文决议，以便贯彻实施。

第二，会议时间不要太长，但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吸收各界代表参加会议中的各项工作和活动，使大家都能贡献力量。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提案，应该允许代表们进行充分的讨论，启发大家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能够得到反映，而政府的施政措施也能得到代表们的了解。人民政府应该虚心倾听代表的意见，了解人民的生活和要求，对于一切善意的和正确的建议都应表示接受。但成立任何决议应十分郑重，不要草率从事。在讨论中，就应引导大家研究本市实际情况，了解施政重心，分别轻重缓急，以便对于各种议案作出切实可行的不同处理办法：凡必要的而又可能办到的即应该办，凡必要的但目前还办不到的即应缓办，凡不必要而又不可能办到的则不应办。

第三，要使各界代表会议得到确实的效果，在会后贯彻会议的精神和决议，便是十分重要的事。在会议闭幕以后，应该发动代表们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台和群众集会场合，向各工厂、学校、团体、机关，向他们所代表的单位和群众，进行传达和报告，并发动人民群众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和会中的重要决议，使会议的决议真正为群众所了解和接受，成为群众的行动。这就是说，要使各界代表的活动由会议中推广到群众中去，把一个代表会议化成无数的大

会、小会，使代表会议的决议成为广大群众自己的决议。这样，各界代表才真正尽到代表的职责，各界代表会议才能起到联系群众的作用，人民政府和各界代表会议与广大群众间的联系才会密切起来。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在三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律应当召开，在新解放区的县也应一律召开全县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人民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发生密切联系的机关，其重要性，和城市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样的。区与乡则召开农民代表会议，但应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老解放区，凡属条件成熟的地区，则应召开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凡属条件尚未成熟的地区，亦可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为过渡。总之，不论是过渡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是全权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召开。召开是正确的，不召开是不许可的。

1949年，毛泽东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亲切交谈。左起：彭泽民、蔡廷锴、李济深、谭平山。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1949年9月16日）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1]，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

[1] 指美国的独立战争。1775年起北美13个殖民地的人民先后进行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1776年7月4日发表了《独立宣言》，正式宣告脱离英国。英国战败后，被迫在1783年签订《巴黎和约》，承认美国独立。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

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是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

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1]。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

---

[1] 《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中说：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

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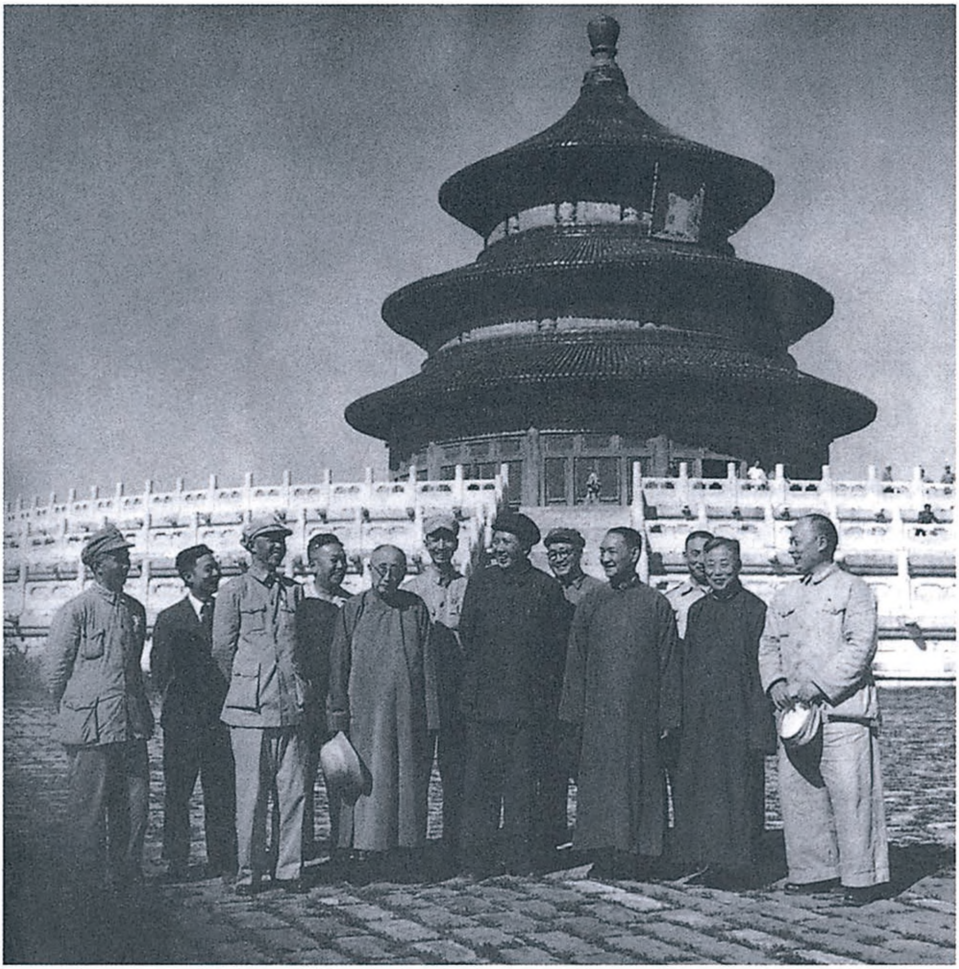
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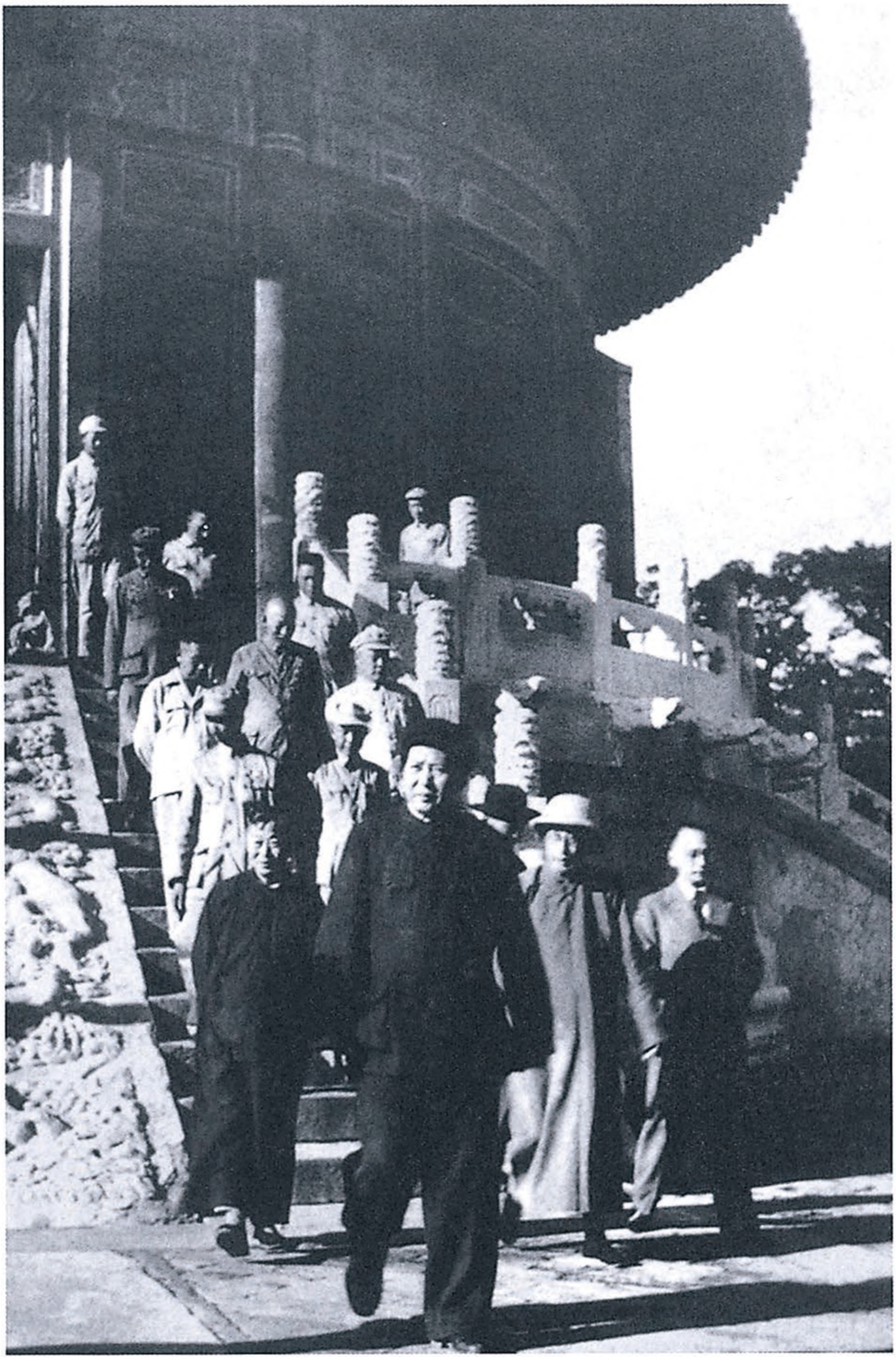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图为在天坛祈年殿前的合影。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游览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陈明仁在游览天坛时合影。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民主人士在天坛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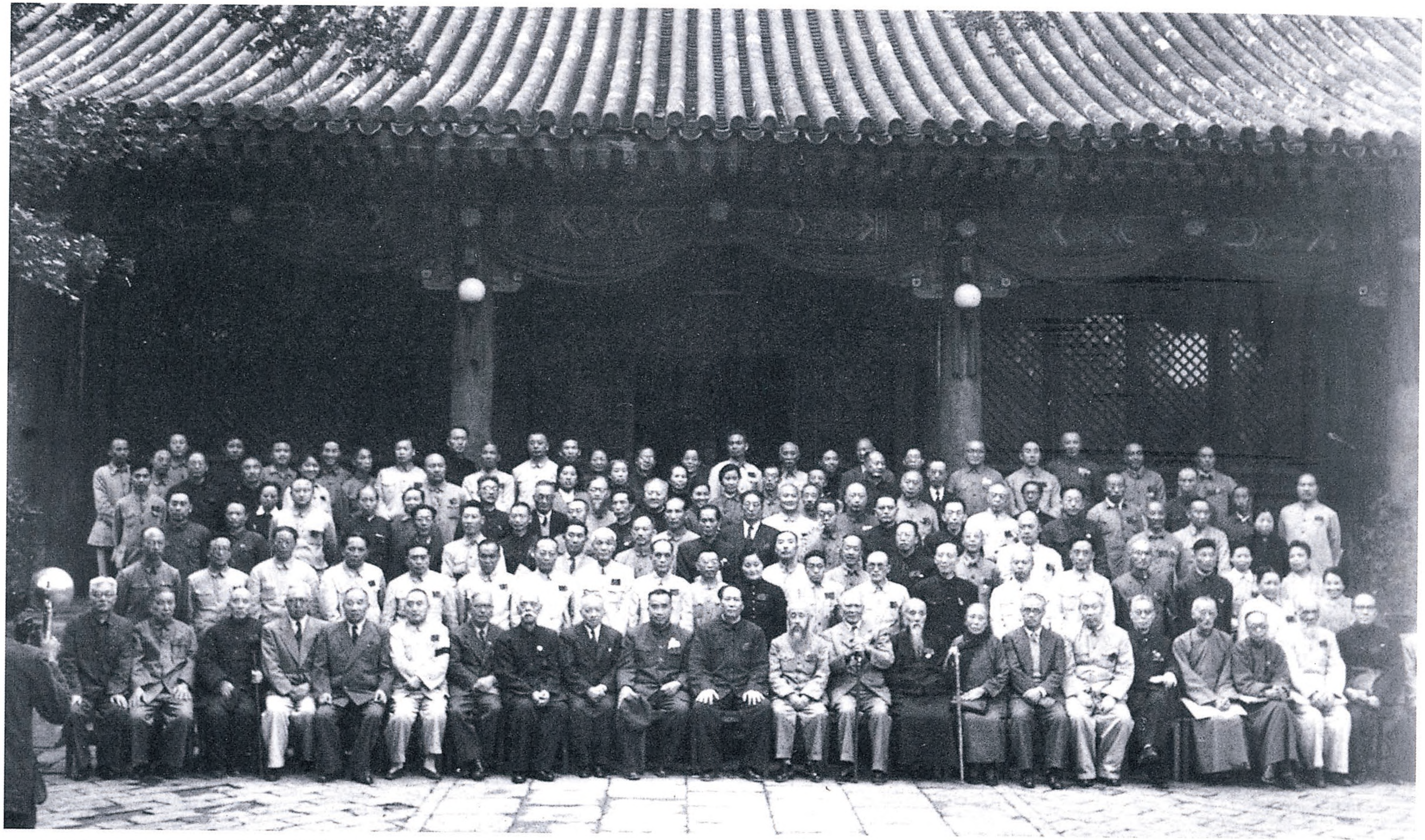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等游览天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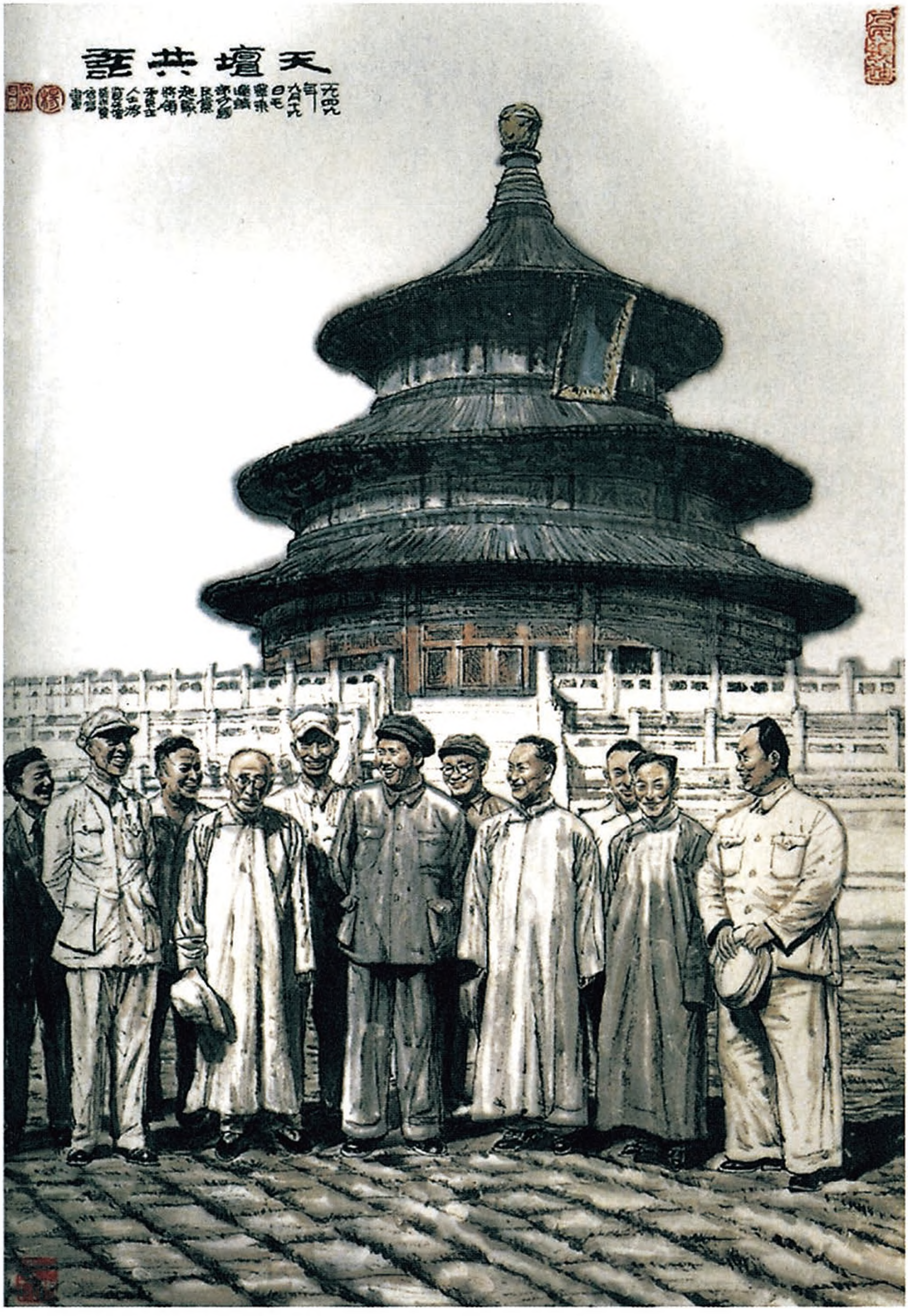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和李明扬、陈毅同游天坛。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天坛和售货员交谈。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天坛公园。



1949年9月17日，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会议的委员在中南海勤政殿合影。



《天坛共话》（中国画）

复邓力群等电[1]

（1949年9月19日）

新疆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并获得和平解放以后，中央准备考虑成立新疆军政委员会，统辖军政财经各方面工作。除中共方面的人以外，拟请张治中、陶峙岳、包尔汉及伊犁方面的人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机关，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兼新疆军政委员会主任。新疆省政府改组，包尔汉仍为主席，委员由中共方面及新疆各民族方面为主体，酌加张治中、陶峙岳方面的人。以上请你向包尔汉及迪化友人透露，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西北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张宗逊电[1]

（1949年9月19日）

顷接傅作义九月十七日电称，宁夏马鸿宾到包头，说八十一军军长系其子马敦静，与马鸿逵部系属两事。无论如何方式，只要解放军不打，能使八十一军成为人民的军队，他均乐于接受，请先停止作战，以便商谈。中央军委请彭、张即考虑处置办法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致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复傅作义电[1]

（1949年9月19日）

毛主席说：我们可以将马鸿宾部与马鸿逵部分别看待，但问题的解决必须在前线而不能在北平。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宁夏不能独异。无论马鸿宾或马敦静如欲解决问题，应速派代表至兰州第一野战军司令部找彭德怀司令员接洽，或到固原十九兵团司令部找杨得志司令员接洽。如马鸿宾能亲去兰州或固原一趟，则更好。彭德怀将军已知马鸿宾为人是和马鸿逵有区别的，他正想找马鸿宾接洽。如马能亲自去，或派代表去，必被欢迎，不会有任何危险。请傅宜生速为转知，以免误事。又西北前线对宁夏进军的时间已很迫近，宁夏代表应速去固原或兰州，不要再迁延了。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以薄一波名义复傅作义电的主要内容。

复邓力群等电[1]

（1949年9月20日）

蒋介石对新疆必然还要勾引，陶峙岳及其部下还可能观望一下，目前不要强陶立即派代表去兰州，因我军未入新疆，陶派代表去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我们已通知陶派代表，至于是否派及何时派则由陶自己决定，不要催他，事实上新疆局面以暂维现状等待我军入新时解决为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复邓力群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电的主要内容。

用打拉两种办法迅速解决宁夏问题[1]

（1949年9月20日）

彭、张、阎、甘：

十九日电悉。你们处置甚对，傅作义明日可返平，当与面谈拒马[2]入绥[3]。你们则靠自己力量，用打拉两种方法争取迅速解决宁夏问题。

军委

哿酉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参谋长阎揆要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电报。

[2] 马，指马鸿逵，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3] 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答董其武等起义通电[1]

（1949年9月20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本日回答绥远董其武将军等九月十九日的起义通电如下：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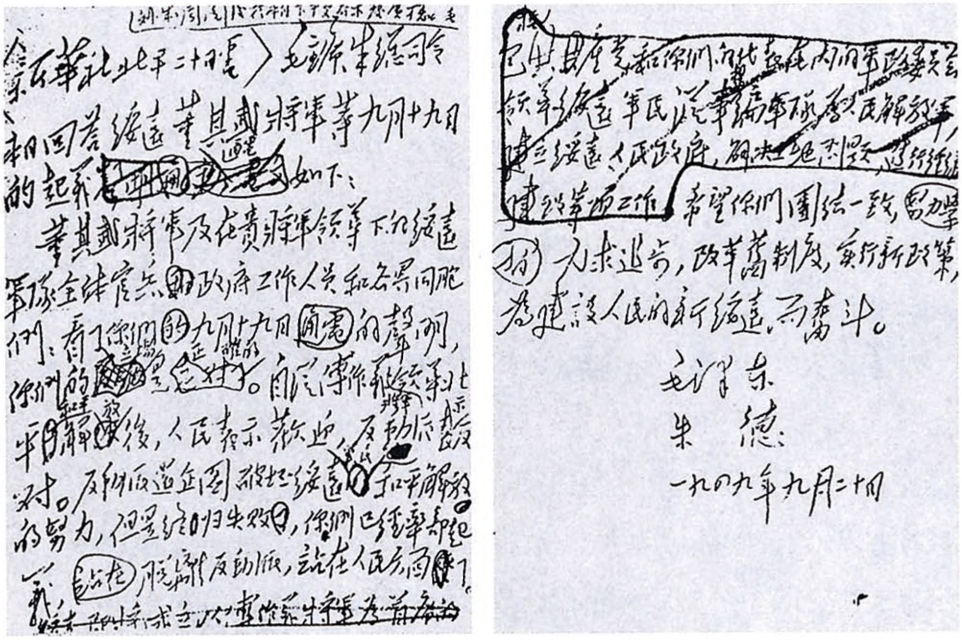
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

[1] 1949年9月19日原国民党绥远当局董其武将军发表起义通电。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毛主席朱总司令

本日回答绥远董其武将军等九月十九日的起义~~[illegible]~~通电如下：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看了你们的九月十九日通电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曾企图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了，你们已经率部起义，站在人民方面了。~~[illegible]~~

~~[illegible]你们代表[illegible]军政委员会[illegible]绥远军民[illegible]人民解放军[illegible]绥远人民政府，解决[illegible]建设等项工作~~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答董其武等起义通电》的手稿。

聂荣臻将军、薄一波政委电贺绥远和平解放[1]

（1949年9月20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于本日电贺绥远和平解放。该电称：

董其武将军及绥远起义全体将士和各级行政人员：

接读九月十九日通电，宣布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参加人民革命阵营，使绥远获得和平解放，我们欣慰之余，特致热烈的祝贺。从此华北全境之内，国民党反动派所妄图□为最后挣扎的据点宣告扫除，这对全华北今后建设的事业和华北军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事业，均极为有利。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派[2]残余集团，完全消减之期在□，开创中国五千年历史新时期的崭新人民共和国业已诞生。尚望团结。

部属与华北及全国解放区军民亲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弄清反动派一切残余势力，并以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教育部队，改造思想，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把绥远建设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区，把军队改编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为建设新绥远、新华北及彻底解放

---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9月20日给绥远起义的董其武的贺电，交由新华社发表。原题为《致董其武将军等贺电》。

[2] 此处为两个“反动派”，毛泽东圈掉了一个“反动派”。

全中国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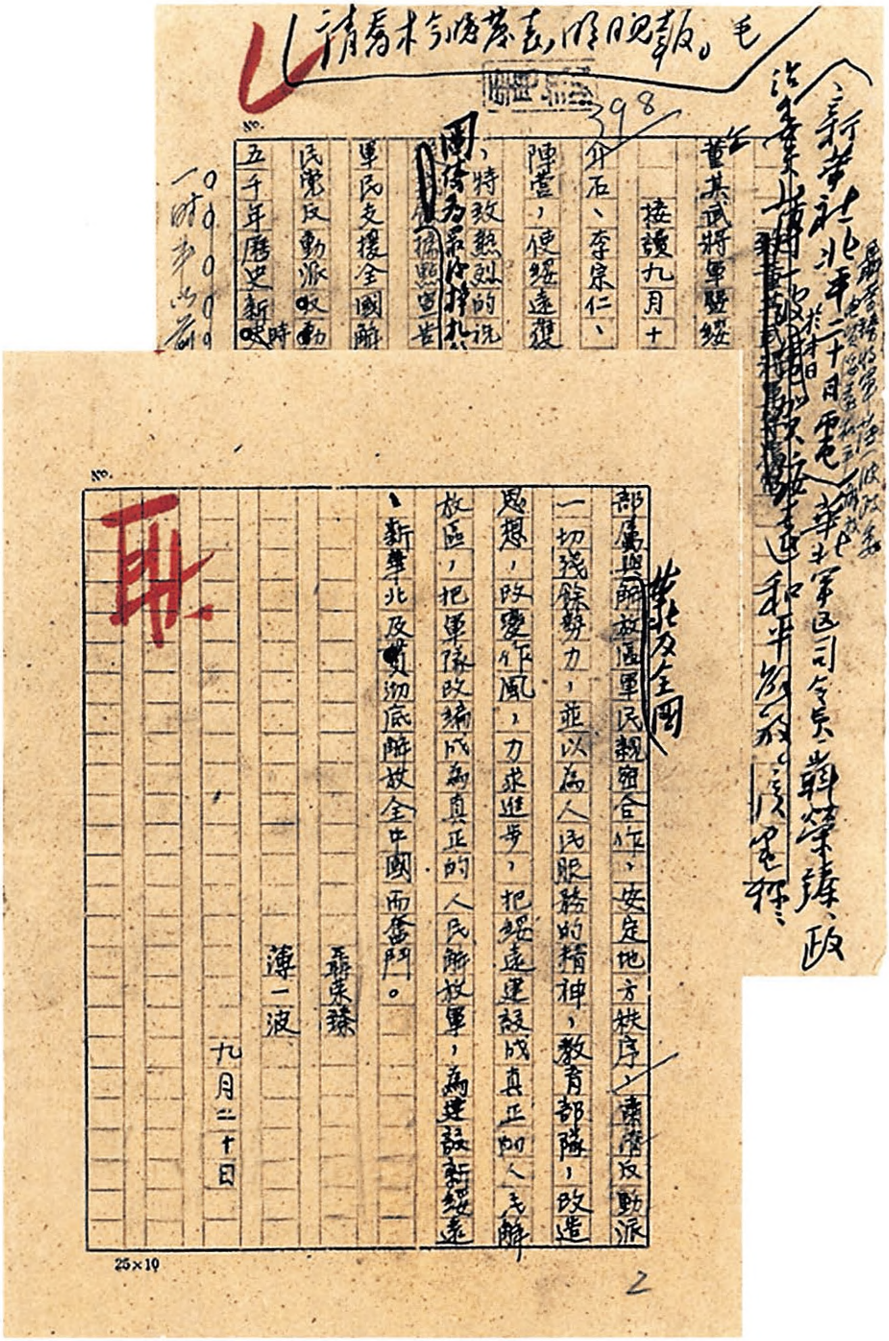
聂荣臻
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

请乔木今晚发表，明日见报。[1]

毛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此文给胡乔木的批示。



请乔木写篇短评，明日见报。毛

（新华社北平二十日电）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

398

董其武將軍暨綏

接讀九月十

介石、李宗仁、

陣營，使綏遠獲

，特致熱烈的祝

軍民支援全國解

民黨反動派收動

五千年歷史新

部屬與華北及全國解放區軍民親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肅清反動派一切殘餘勢力，並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教育部隊，改造思想，改變作風，力求進步，把綏遠建設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區，把軍隊改編成為真正的人民解放軍，為建設新綏遠、新華北及徹底解放全中國而奮鬥。

聶榮臻

薄一波

九月二十日

2

毛泽东修改的新华社电讯稿《聂荣臻将军、薄一波政委电贺绥远和平解放》的手稿。

中共中央关于留用旧人员问题给各中央局的指示[1]

(1949年9月21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各省委，**各野战军前委，平津两市委：**[2]

（一）在我新接收的城市中，对旧人员的处理应十分慎重。这些人员，除少数战犯、特务，及劣迹昭著的分子以外，一般均将其希望寄托于我们，其基本要求是吃饭。京、沪、杭解放后，把旧人员裁了二万七千余人，引起很大波动。北平和平解决后，遣散傅部军官一万七千人，均逃到绥远，怨天恨地，现在仍须由我负担解决。所有这些经验说明，旧人员一般地不能用裁撤、遣散方法解决，必须给以工作和生活的出路。

（二）党及人民政府有改造和在工作中养活这些人的责任，我们准备在全国解放后在一定期间内，包括新旧军政人员在内总共在工作中养活九百万到一千万人，这在财政上必然会有很大困难，但是可以解决的，而在政治上有十分必要。

（三）对已解放城市，如京、沪、汉、长沙、兰州等，及将解放城市，如广州、重庆、迪化、台湾等，接收之国民党旧工作人员，

---

[1] 这是毛泽东等修改的给各中央局的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此处黑体字为周恩来修改时所加的文字。

除作恶多端、严重贪污及依靠门子吃饭的分子等而为群众所十分不满者，应予撤职并依法办理外，一般均应予以留用。但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要同这些留用人员说明人民与政府的困难，适当降低待遇，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住。

（四）一切人民政府机关、财经机关，**特别是**企业机构，均须改变国民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的作风，**闲杂人员及庞大的机关应加以精简。但对**精简下来的人员，**不可踢开不管，而应**举办大的训练班，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薪水低的可少打折扣）发给，以保证他们及其家属的生活。学习成绩须认真加以考核，量材录用，学习好的优先录用。[1]

以上各点，望即遵照执行。

中央
申马

---

[1] 此段黑体字为刘少奇修改时所加的文字。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

（1949 年 9 月 21 日）

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这种全国人民大团结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我们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所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三年多的时间内，英勇的世界上少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美国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有的数百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和进攻。现在，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军已经打到接近台湾，广东，广西，贵州，四川和新疆的地区去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获得了解放。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援助人民解放军，反对了自己的敌人，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在这个基础上，召开了今天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唯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恢复了政治协商会议。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

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们的革命工作还没有完结，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运动还在向前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

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

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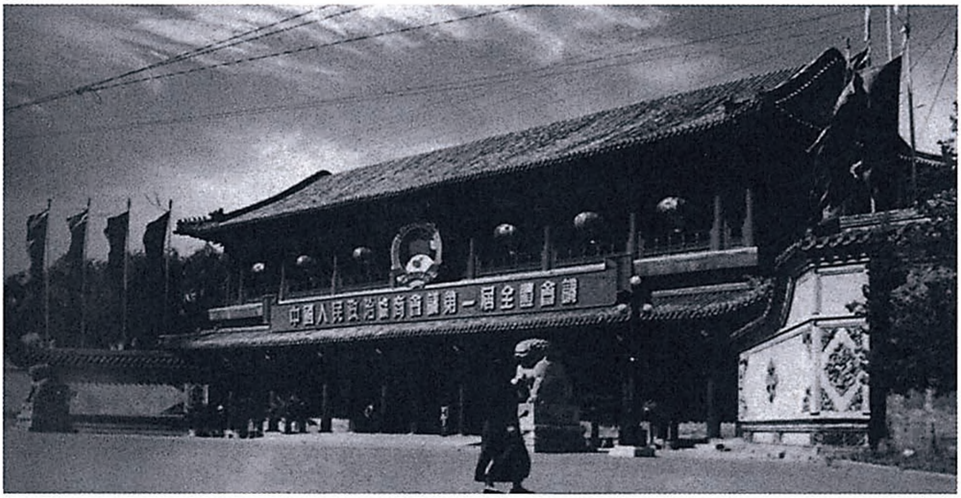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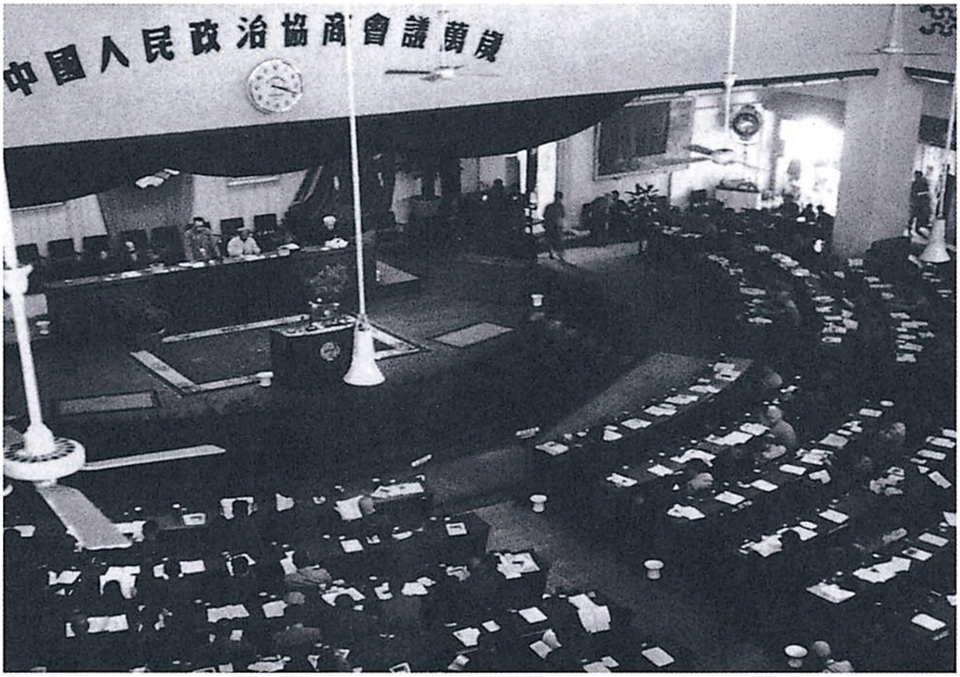
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

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时的中南海新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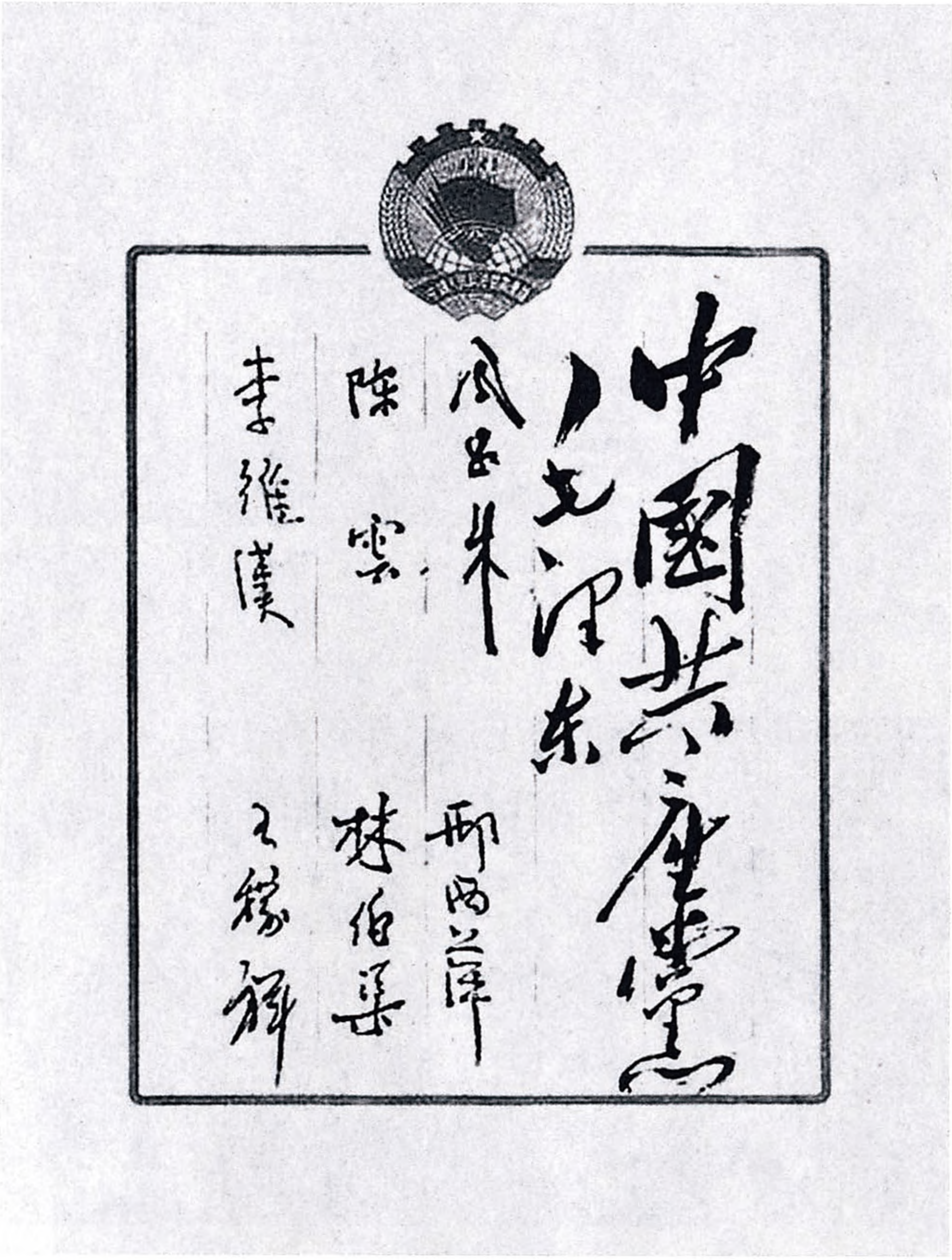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萬歲

1949年9月21日下午，毛泽东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时签名。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时签名。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时签名。



中國共產黨

毛泽东

周恩来 鄧穎超

陈云 林伯渠

李維漢 王稼祥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代表的签名册第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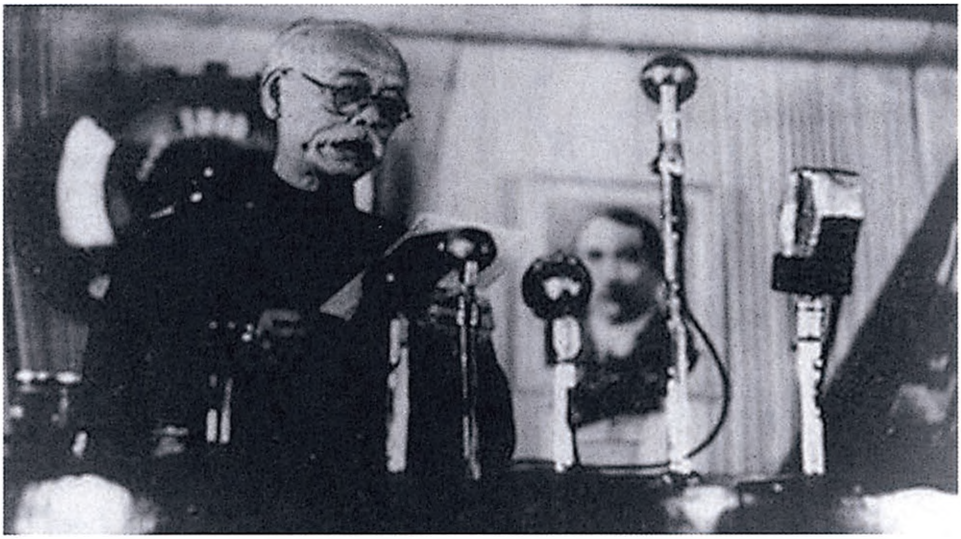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在大会主席台上。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开幕式时，执行主席在主席台上。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讲话。

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1949年9月，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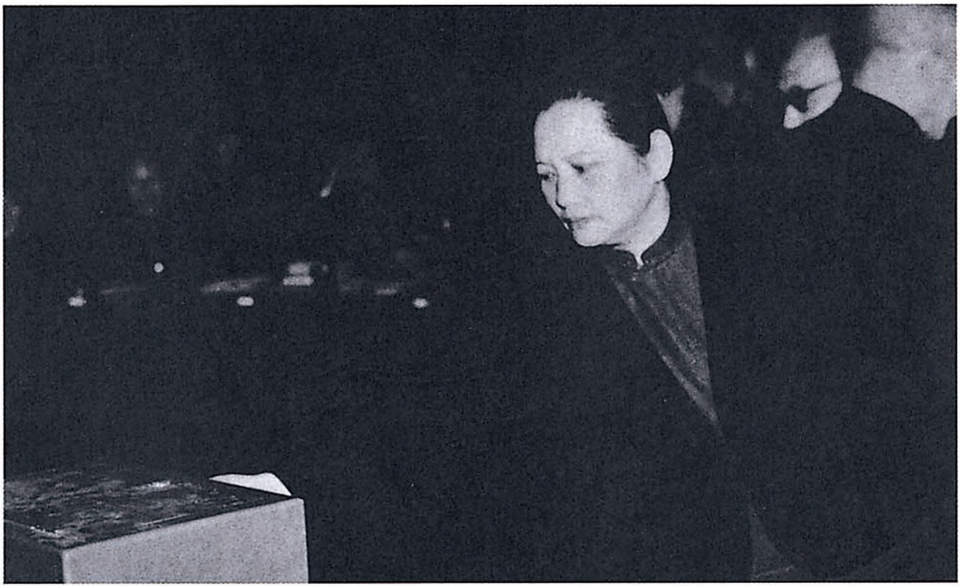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农工党首席代表彭泽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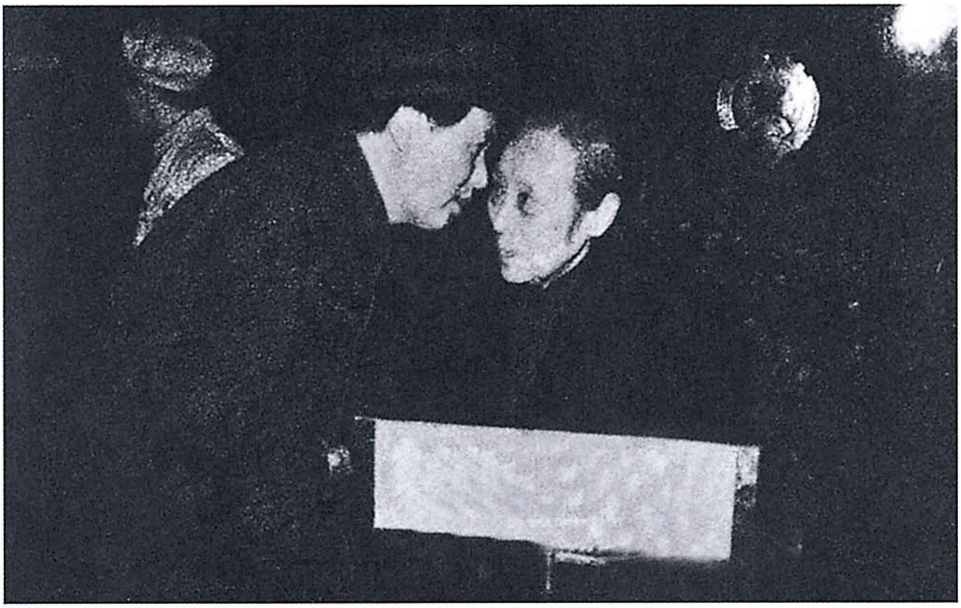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无党派人士代表李济深、何香凝在填写选票。

1949年9月，无党派人士代表郭沫若、马寅初在填写选票。

1949年9月，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投票。



1949年9月，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投票。



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和民主人士何香凝女士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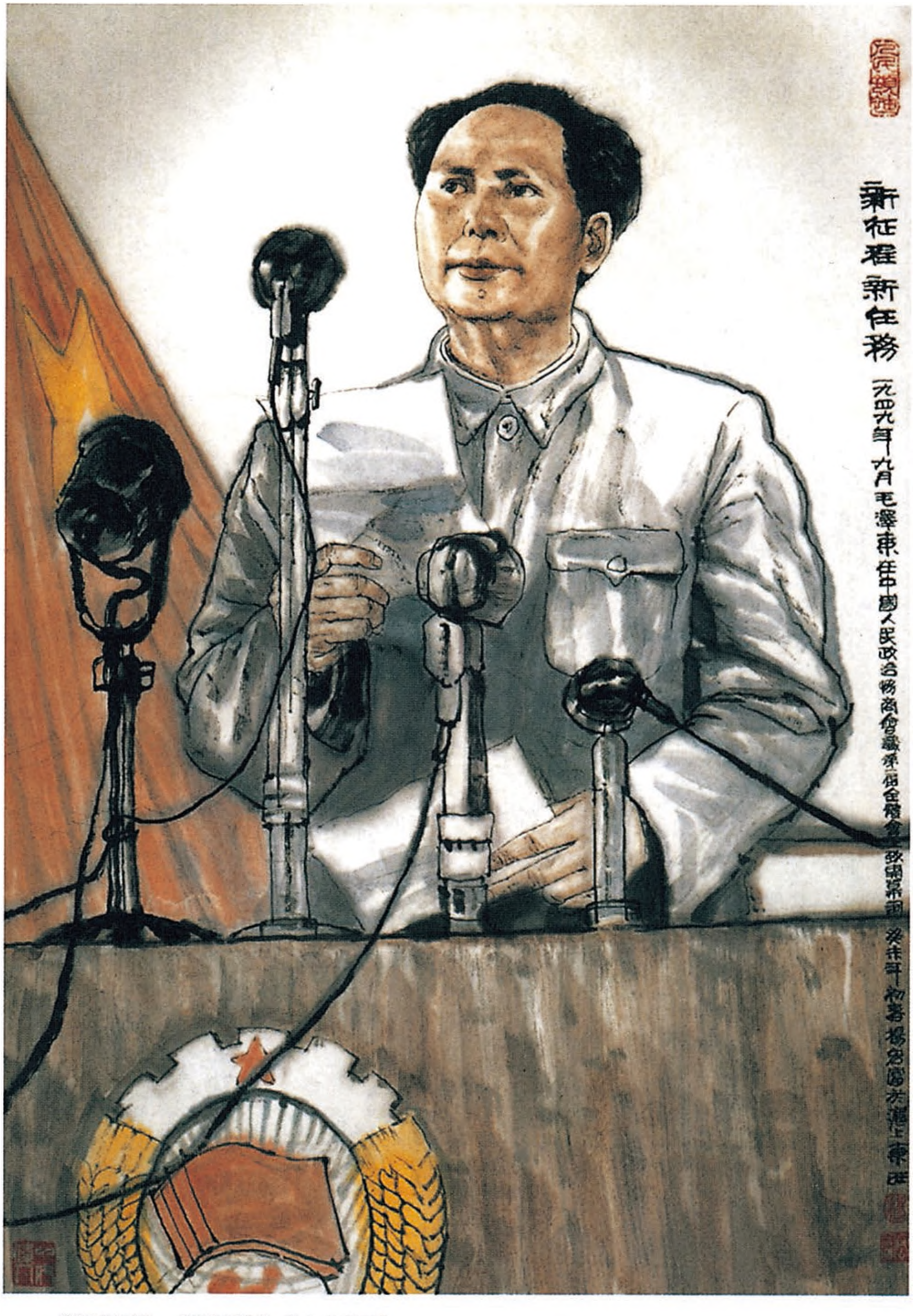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交谈。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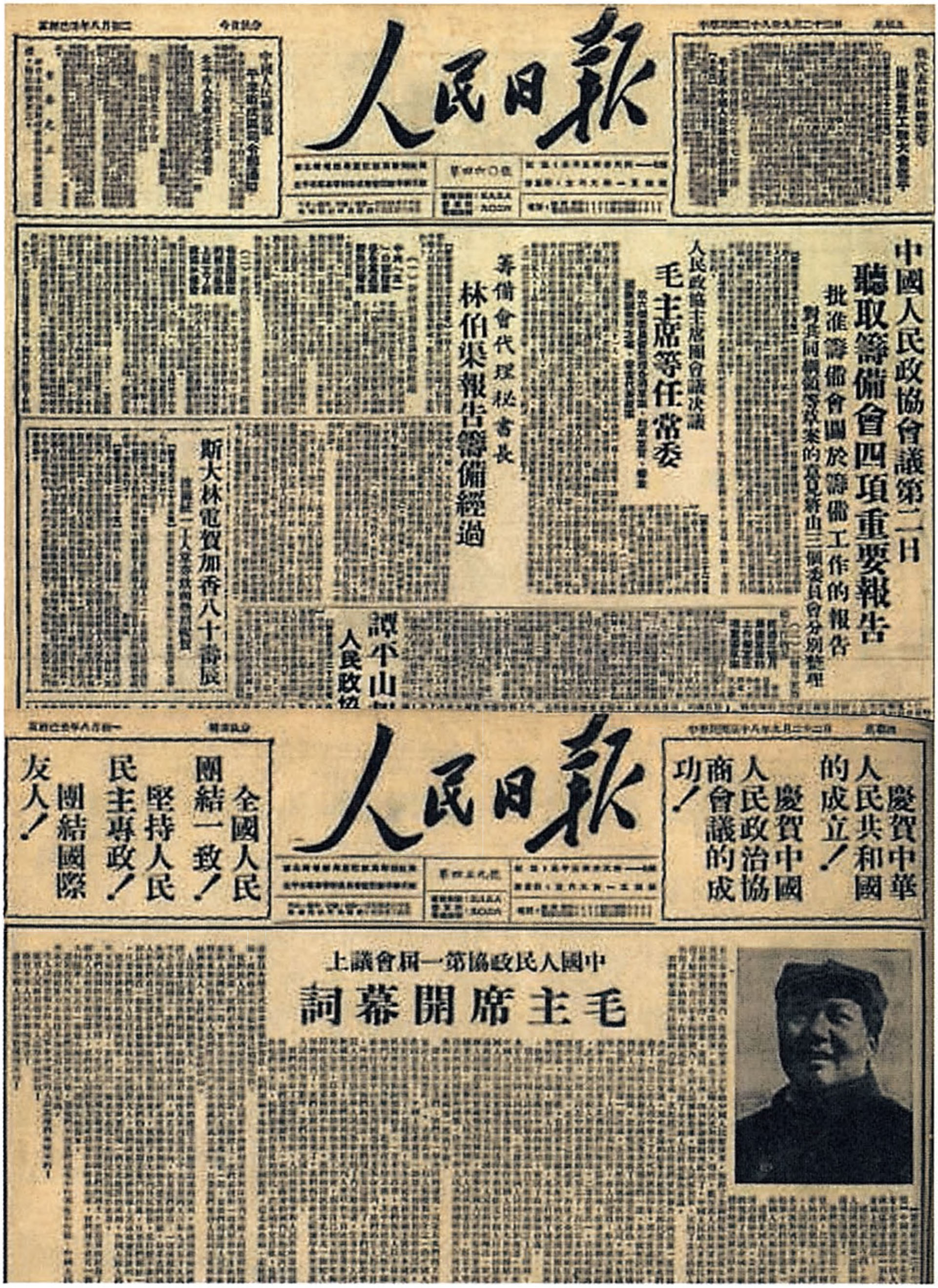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新疆代表团向毛泽东赠献民族服装。

1949年9月，贵州苗族群众代表向毛泽东赠送苗族的服装。

1949年9月，朝鲜族群众代表向毛泽送献礼。


新征程 新任務
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
癸未年初春

《新征程　新任务》(中国画)



人民日報

中國人民政協會議第二日
聽取籌備會四項重要報告
批准籌備會關於籌備工作的報告
對共同綱領等草案的意見將由三個委員會分別整理

人民政協主席團會議決議
毛主席等任常委

籌備會代理秘書長
林伯渠報告籌備經過

斯大林電賀加香八十壽辰

譚平山

人民日報

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慶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

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團結國際友人！

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會議上
毛主席開幕詞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報》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部分报道。

给张治中[1]的信

（1949年9月21日）

文伯〈白〉先生：

迪化方面复先生两电，今付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2]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与中共联络员邓力群[3]妥为接洽。邓力群（邓飞黄[4]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日至迪化与陶鲍[5]见了面，谈得还

---

[1]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县人。从1946年3月起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1949年春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参加国共和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他被挽留在北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当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率部起义。

[3] 邓力群，1915年生，湖南桂东人。当时是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联络员。

[4] 邓飞黄（1895—1953），湖南桂东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河南、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8月在湖南参加起义，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5] 陶，指陶峙岳。鲍，指鲍尔汉（1894—198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人；1946年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副主席，1949年参加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是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好。关于周黄两军[1]，自向甘凉肃[2]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3]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采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认真谈判，表示诚意。因我军已由兰州青海分两路向张掖疾进；而周、黄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大概是惧歼，图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有些不耐烦。(兄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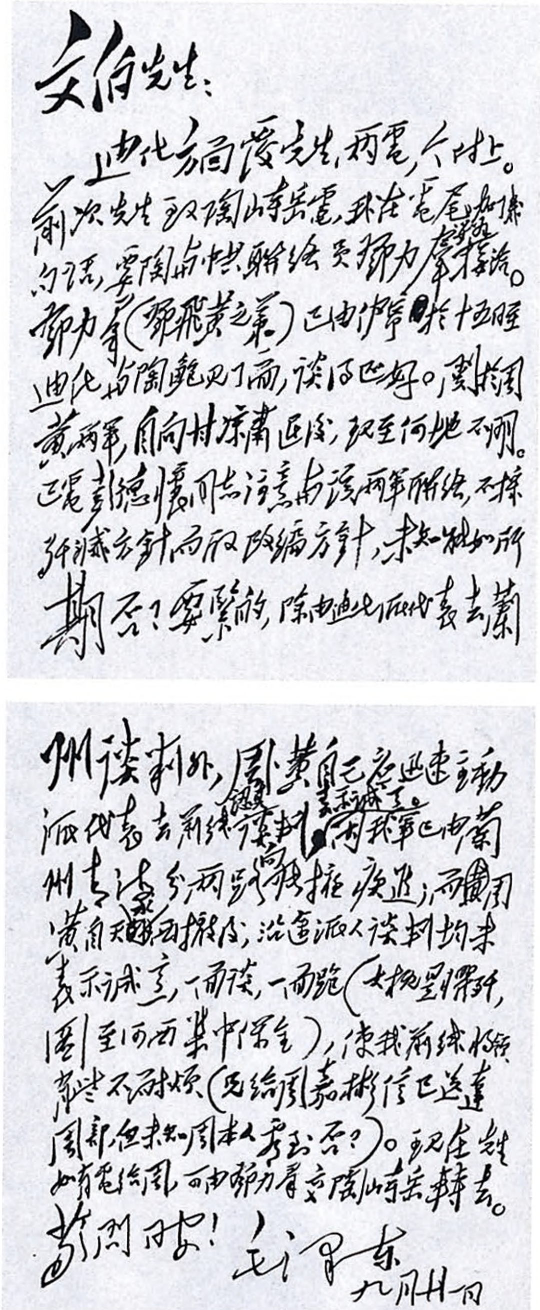
九月廿一日

---

[1] 指周嘉彬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一二〇军和黄祖壎任军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一军。

[2] 指当时甘肃省的甘州、凉州和肃州，即今张掖、武威和酒泉。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覆先生两电，今付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电，我在电尾加了几句话，要陶派一个联络员与邓力群接洽。邓力群（邓飞黄之弟）已由伊宁于十五经迪化与陶见了面，谈得很好。刘将周黄两军，自向甘肃退后，现至何地不明。已电彭德怀同志注意与该两军联络，不採歼灭方针而取改编方针，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紧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兰州谈判外，周黄自己应迅速主动派代表去前线接洽谈判，表示诚意。闻我军已由兰州去凉，分两路向我推进；而周黄自[illegible]撤后，迄遣派人谈判均未表示诚意，一面谈，一面跑（如杨呈祥部，周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线将领常常不耐烦（先给周嘉彬信已送达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现在先生如有电给周，可由邓力群交陶峙岳转去。

敬问日安！

毛泽东

九月廿一日

毛泽东致张治中信的手稿。

给沈雁冰[1]的信

（1949年9月23日）

雁冰兄：

示悉。写了一句话[2]，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3]兄写，不宜要我写。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

[1] 沈雁冰，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

[2] 指毛泽东1949年9月23日给《人民文学》创刊号写的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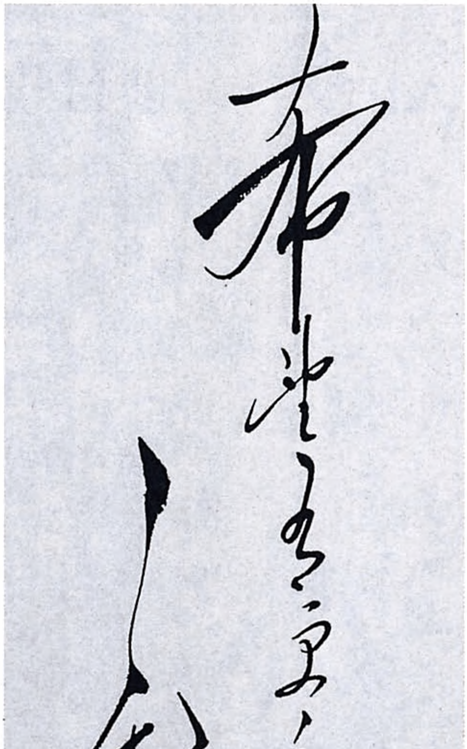
[3] 沫若，即郭沫若。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

（1949年9月23日）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号的题词。

复彭德怀电[1]

（1949年9月23日）

宁夏与绥远无关，你们应尽可能解决马鸿逵部，越彻底越好。酌量保存马鸿宾部，照我军制度改编。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马鸿逵、马鸿宾二部处理办法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复鲍尔汉电[1]

（1949年9月23日）

新疆局面的转变及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赖于贵主席鼎力促成。尚望联络各方爱国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之行动，为解放全新疆而奋斗。

---

[1] 这是毛泽东在收到鲍尔汉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的来电后的复电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在讨论国旗国徽国歌国都和纪年问题时的发言

(1949年9月25日)

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也有同样之斧头镰刀。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

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国都问题，还是改一个字好（按：指北平改为北京）。

纪年问题，老百姓要用（民国纪年）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法去处罚他们。如过去用中华民国多少年，但老百姓要用甲子年，他们还是用了。但我们政府一定要有一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就是耶稣也并不坏，耶稣和今天所推行之基督教、之帝国主义并不一样。

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紧密合作

（1949年9月26日）

彭德怀[1]同志，并告西北局：

二十五日电悉。（一）陶峙岳[2]派曾震五[3]来兰[4]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二）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十一月一日或十日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十一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四百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三十架至五十架运输机。（三）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

---

[1] 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陶峙岳，原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在新疆率部通电起义。

[3] 曾震五，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八补给区司令。

[4] 兰，指甘肃兰州。

八万人，号称十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1]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十一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2]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3]、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四）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鲍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鲍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族占多数（现在鲍尔汉省政府是汉人十名，维族等十五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鲍尔汉及迪化[4]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五）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三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方为主席，甘省府以邓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山为主席。(六）入川军事，待邓小平[5]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

---

[1] 刘孟纯，原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委员。1949年9月26日同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一起通电起义。

[2] 贺，指贺龙，当时任西北军区司令员。

[3] 习仲勋，当时任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4] 迪化，旧市名，即今新疆乌鲁木齐。

[5] 邓小平，当时任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关于组织部分政协代表发言给周恩来的信

（1949年9月26日）

周：

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即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

九月廿六日三时

中共中央关于庆祝新政协召开和人民政府成立的指示[1]

（1949年9月27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各兵团：

（一）中国人民政协的召开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各地应举行盛大热烈的庆祝。此项庆祝，除首都北平外，全国各地应结合国际和平斗争日的群众行动，于十月二日同时举行之。

（二）北平于十月一日举行庆祝人民政协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群众大会，并举行阅兵典礼。十月二日与三日举行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分会。各地、各团体应向这一大会发出贺电。北平于十月七日举行群众大会，庆祝世界和平中国分会与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

（三）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亦尽可能举行）和各兵团（军队以不妨碍战斗为原则）、各团体、各学校于十月二日均应尽可能组织广大群众的集会与游行，报纸出特刊，组织各界代表人物的谈话和广播，运用各种群众文艺形式，造成全国人民的狂欢，并普遍进行关于毛主席所指示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与团结国际友人这一总方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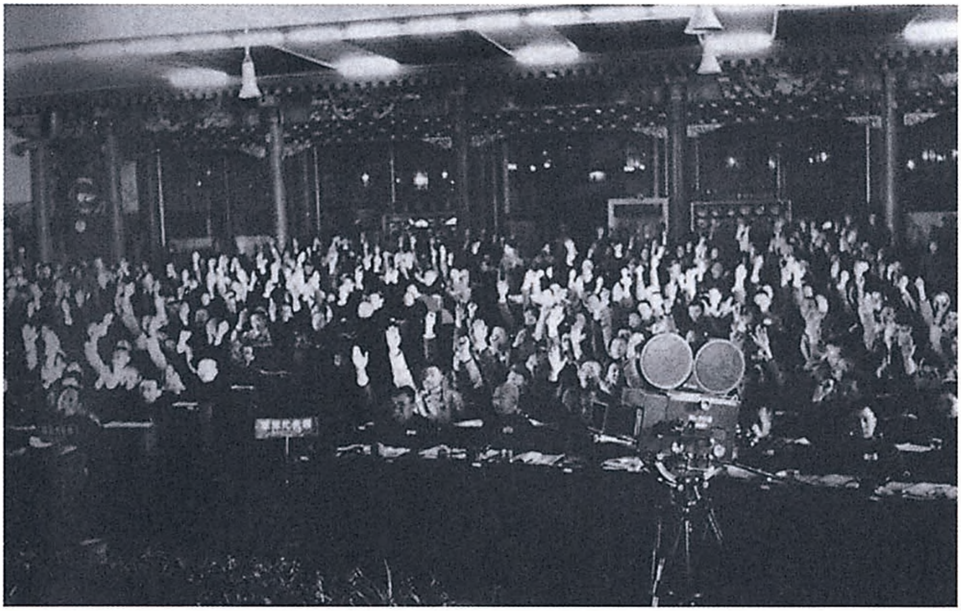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指示。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的教育。

（四）庆祝口号另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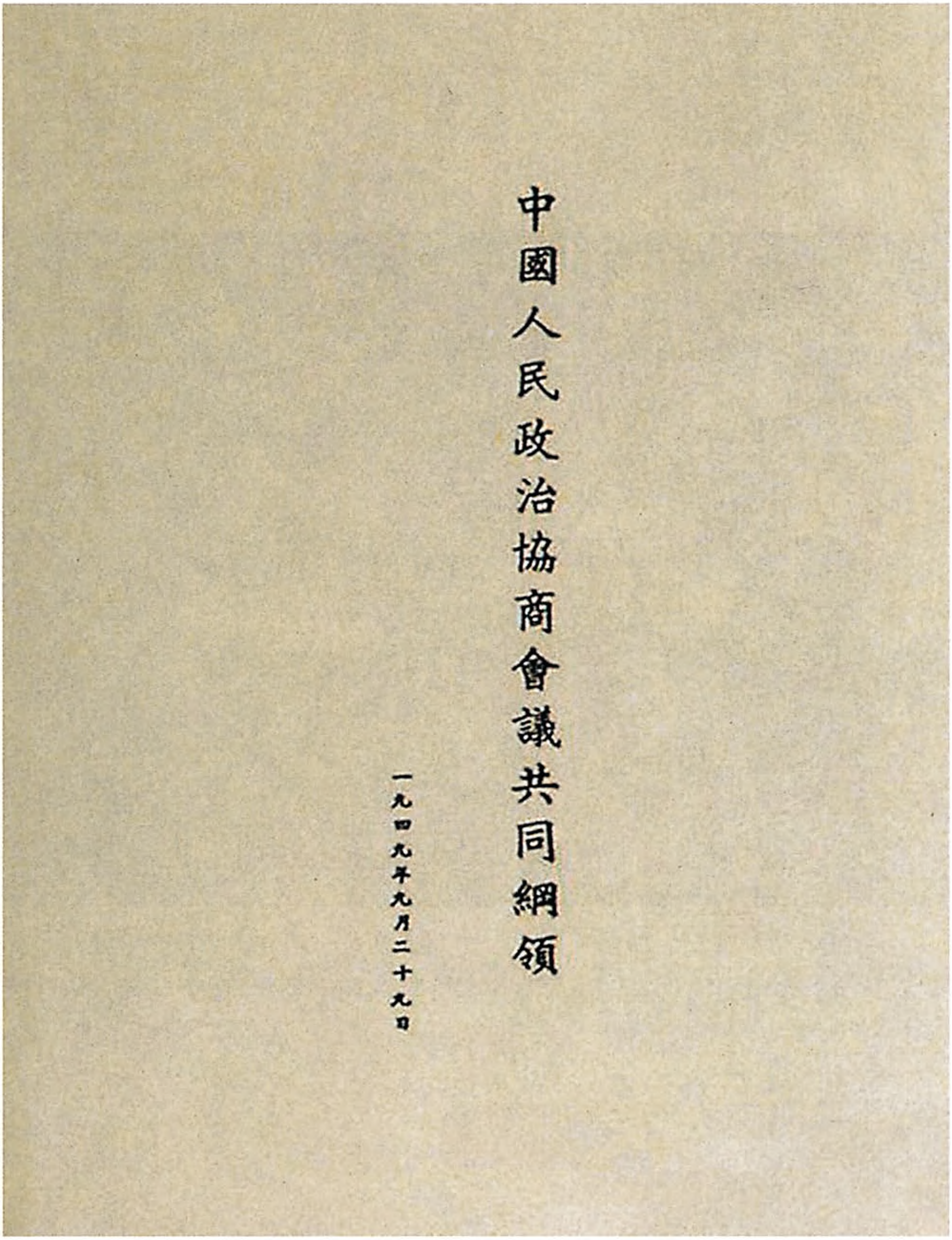
中央

申感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上。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陶峙岳鲍尔汉[1]

（1949年9月28日）

【新华社北平二十八日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本日复电回答新疆军政当局陶峙岳将军、鲍尔汉主席等廿五日及廿六日的通电。该电称：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鲍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九月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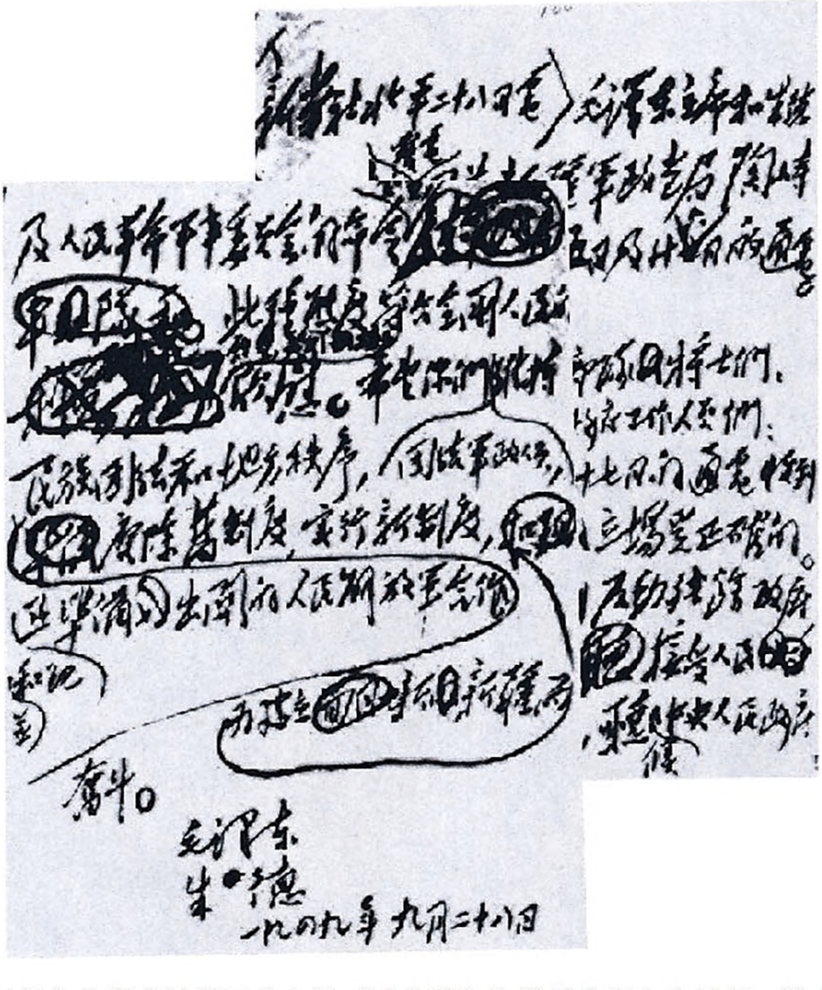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

[1] 1949年9月25日、26日原国民党新疆当局陶峙岳将军、新疆省政府主席鲍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分别通电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8项和平条件，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处置。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



新华社北平二十八日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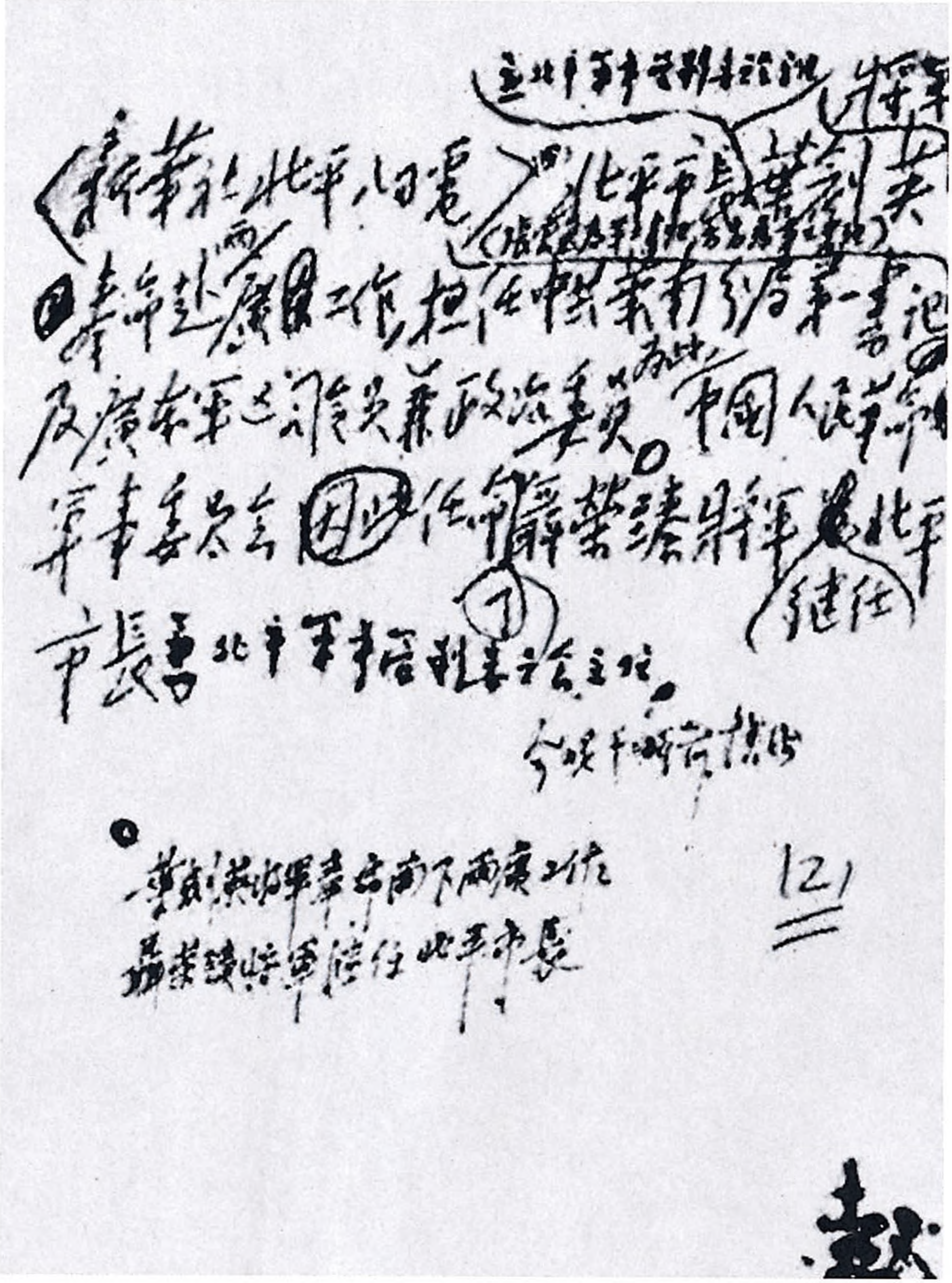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陶峙岳、鲍尔汉》的手稿。

叶剑英将军奉命南下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

(1949年9月28日)

【新华社北平八日电】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将军奉命赴两广工作，担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为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了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兼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新華社北平八日電）北平市長葉劍英（現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奉命赴兩廣工作，擔任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及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任命聶榮臻將軍繼任北平市長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今晚十時前播出

葉劍英將軍奉命南下兩廣工作

聶榮臻將軍繼任北平市長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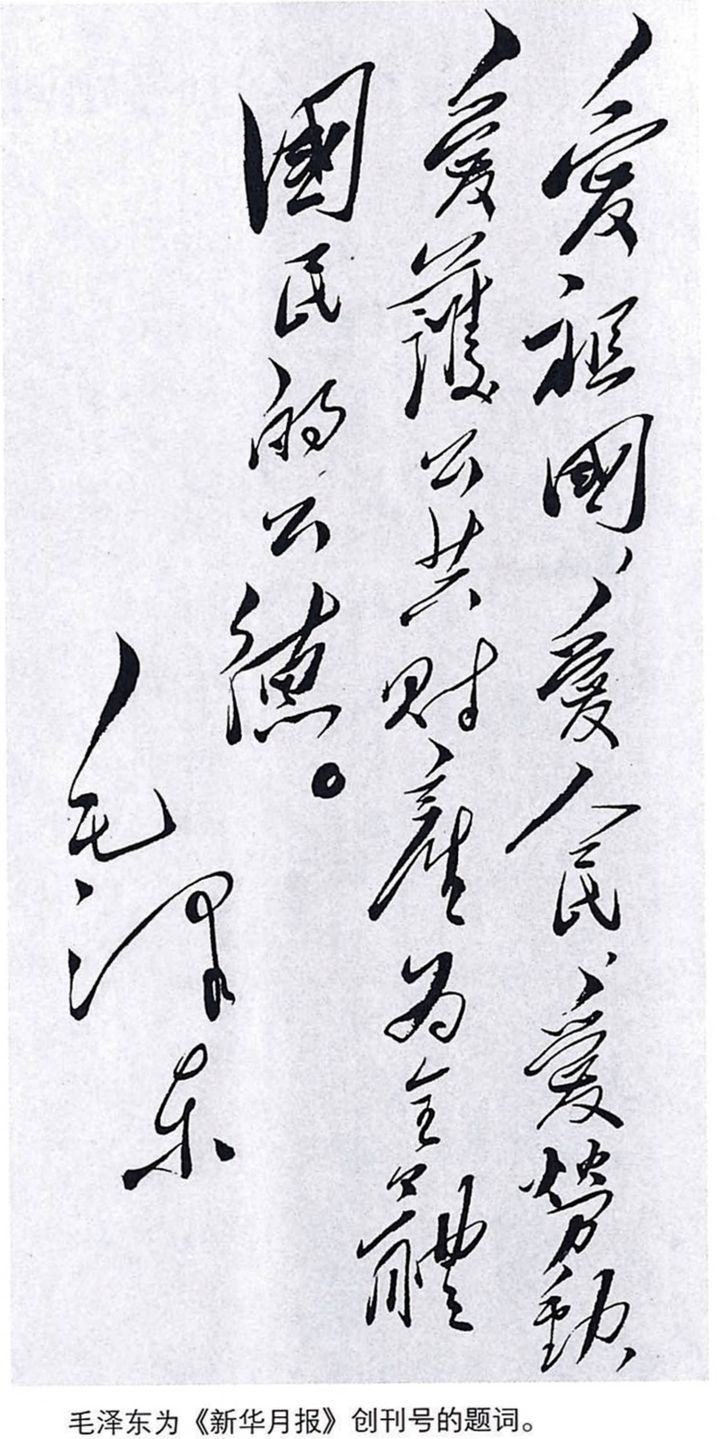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电讯《叶剑英将军奉命南下两广工作，聂荣臻将军继任北平市长》的手稿。

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

（1949年9月29日）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毛泽东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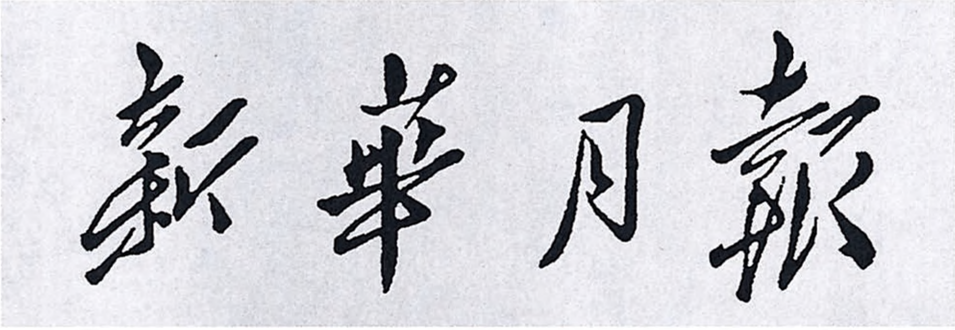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的题词。

为《新华月报》题写报头

（1949年9月29日）

新华月报



毛泽东为《新华月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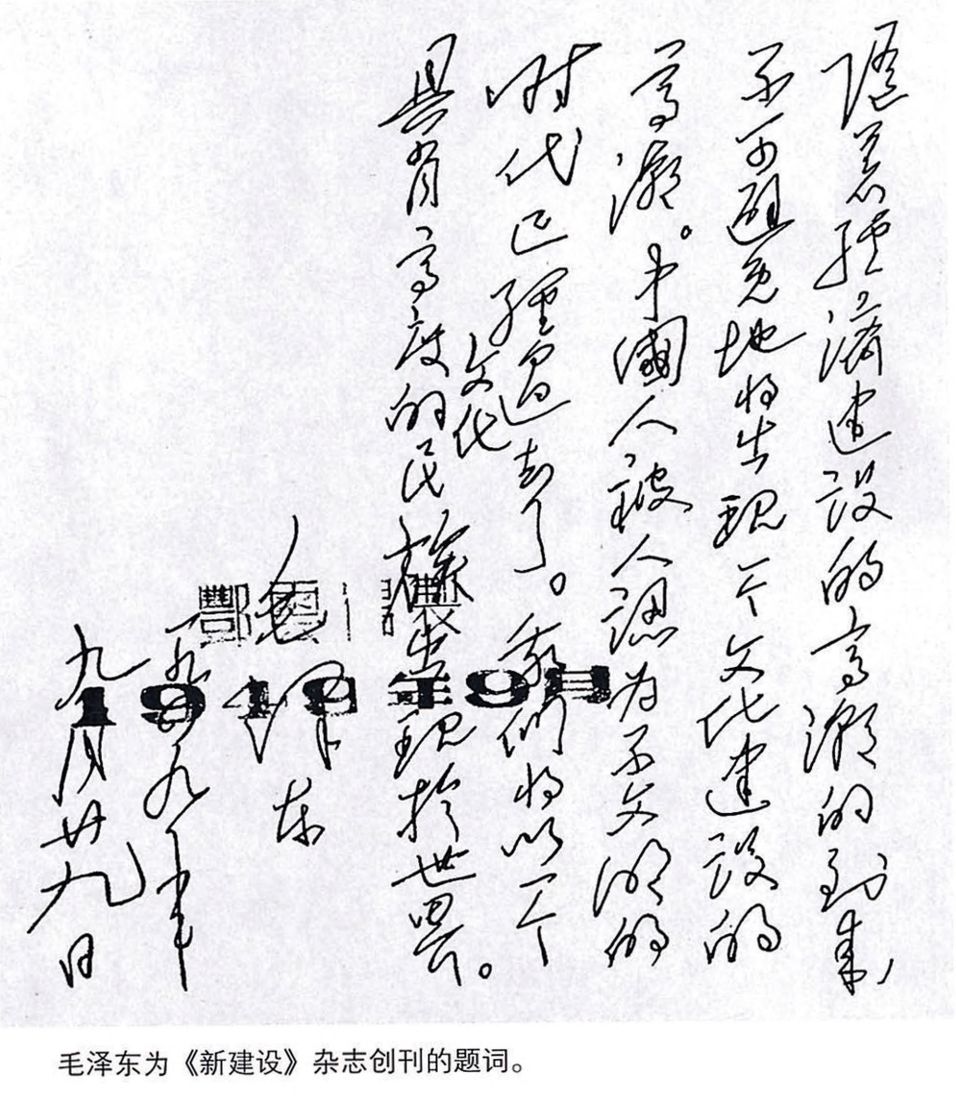
为《新建设》杂志创刊题词

（1949年9月29日）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



隨着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

不可避免地將出現文化建設的

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

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

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

九月廿九日

毛泽东为《新建设》杂志创刊的题词。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1]

（1949年9月30日）

全国同胞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这次会议，包含了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

这种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斗，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之后所获得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

[1] 这是毛泽东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1]我们的会议齐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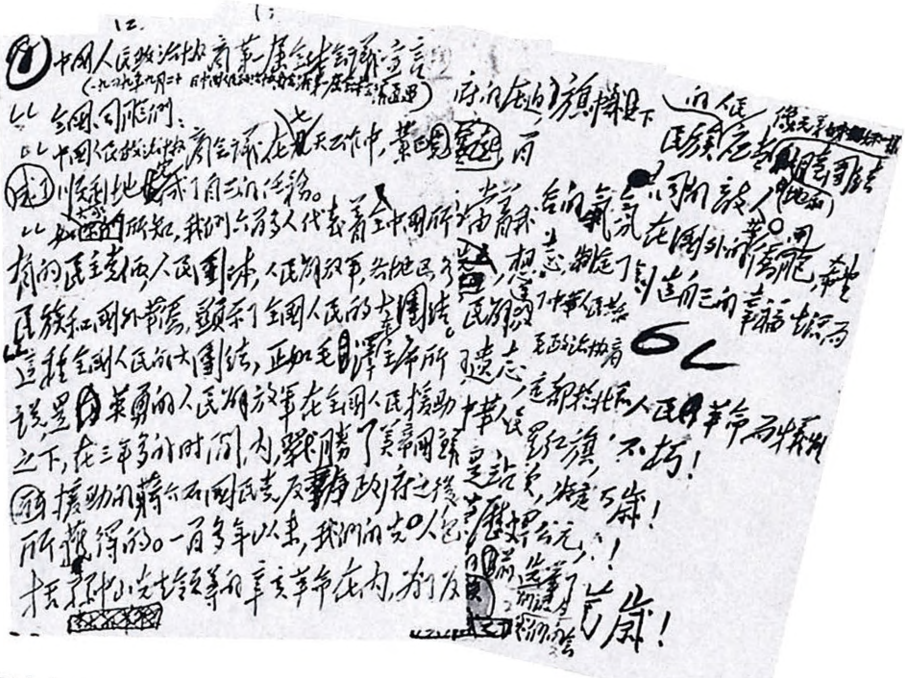
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中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它将指挥人民解放军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消灭残余敌军，解放全国领土，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它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将保卫人民的利益，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它将加强人民的陆海空军，巩固国防，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

[1] 此句是会议通过宣言时，代表们提议增加的。

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而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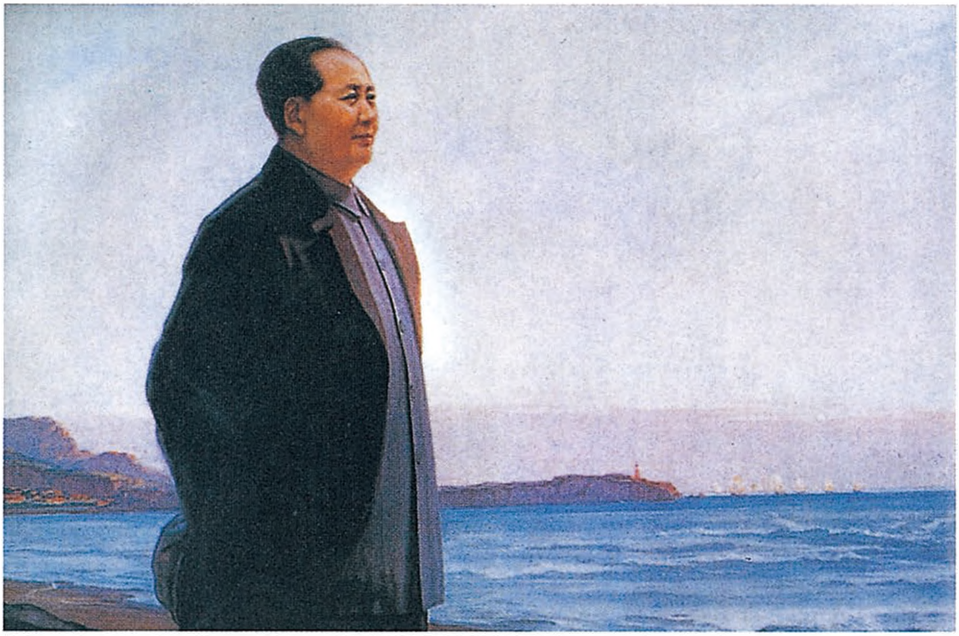
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在认真写选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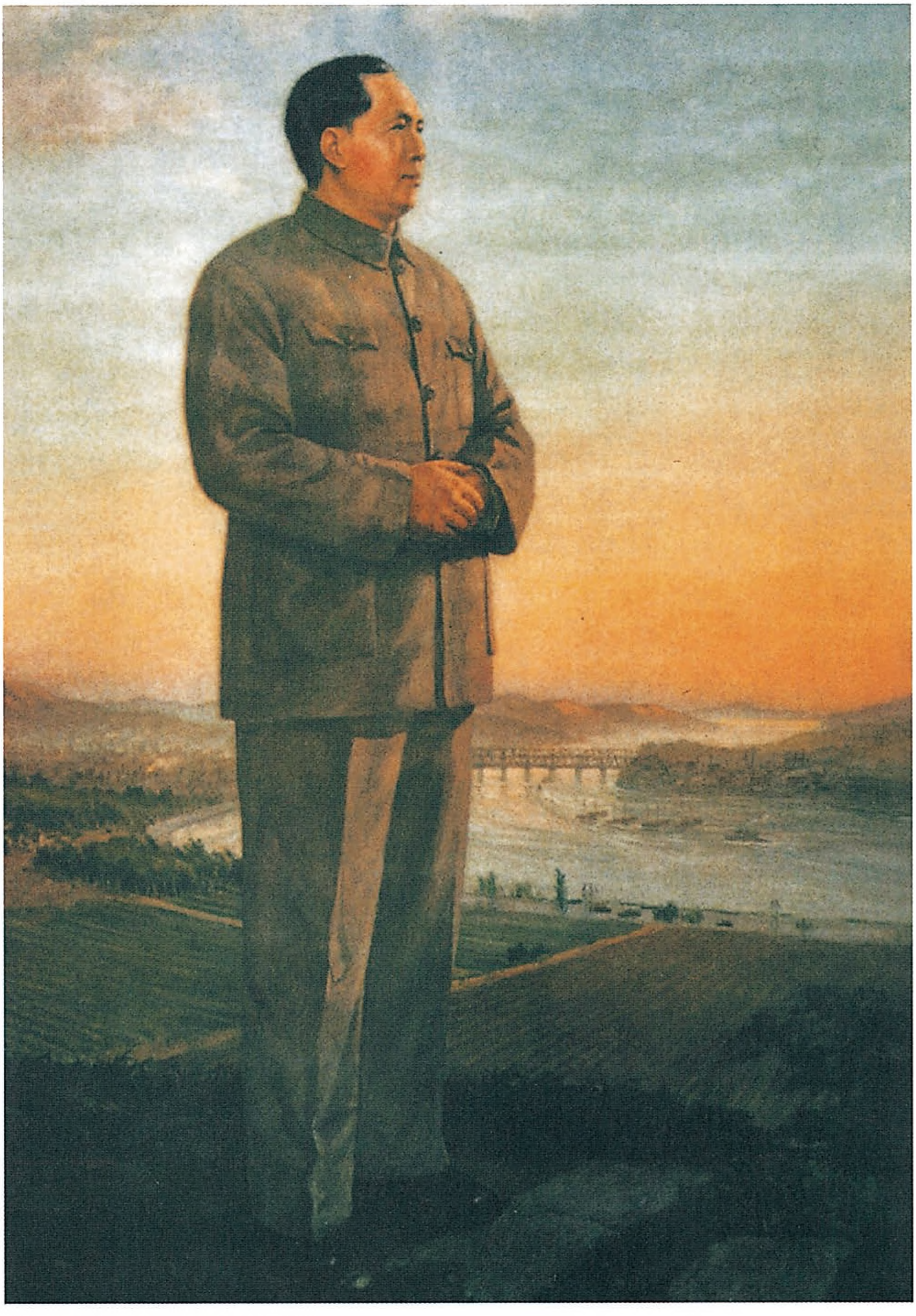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全场起立，鼓掌祝贺。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1949年9月30日，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主席台上。左起：刘少奇、朱德、毛泽东、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东方红》（油画）



《东方红》（油画）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

（1949年9月30日）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2]，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

[2] 一千八百四十年，指英国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年份。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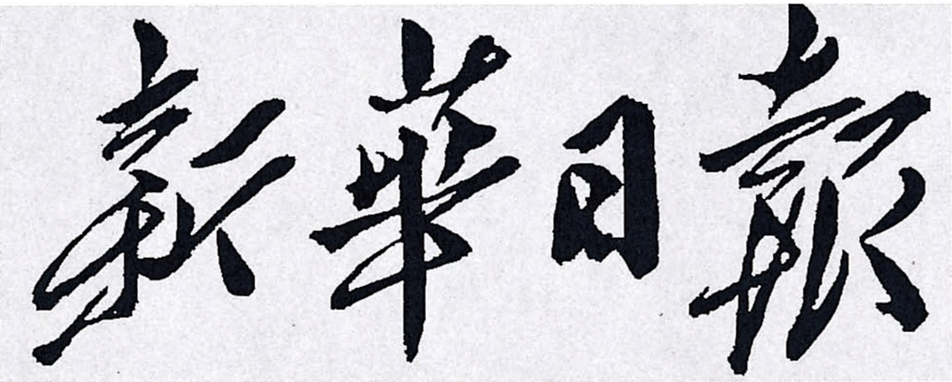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

为《新华日报》第一次题写报头[1]

（1949年9月）

新华日报



毛泽东为《新华日报》第一次题写的报头。

---

[1]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不久，在北京中南海举行的欢送南下干部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在南京出版《新华日报》的决定。随后，毛泽东第一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该报头于1949年9月17日正式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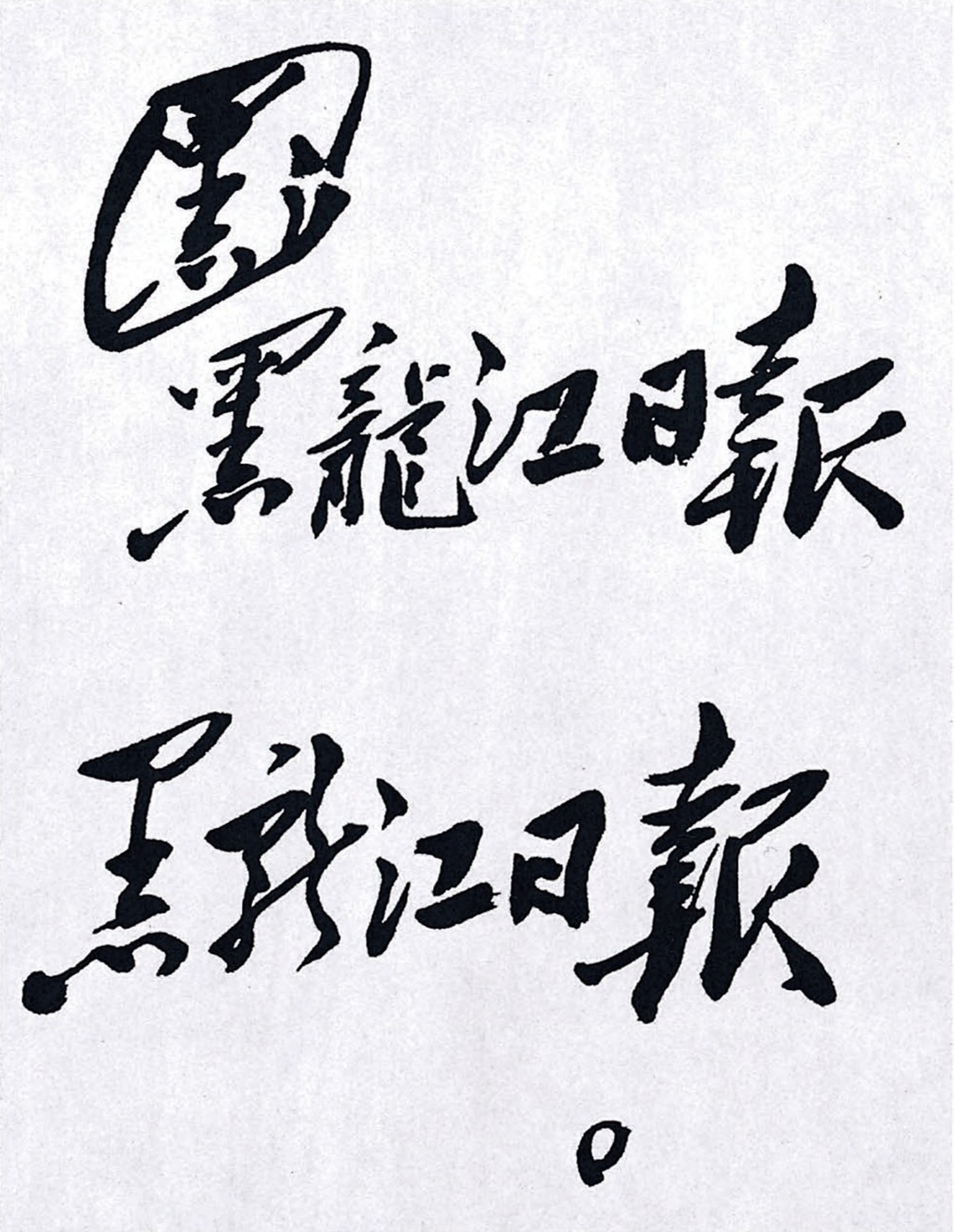
为《黑龙江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9月）

黑龙江日报

---

[1] 《黑龙江日报》创刊于1945年12月1日，是原哈尔滨特别市的《哈尔滨日报》和北安的《黑龙江日报》、松江省的《松江日报》、合江省的《合江日报》、嫩江省的《新嫩江日报》等报合并成的。1949年9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亲笔挥毫，为《黑龙江日报》题写了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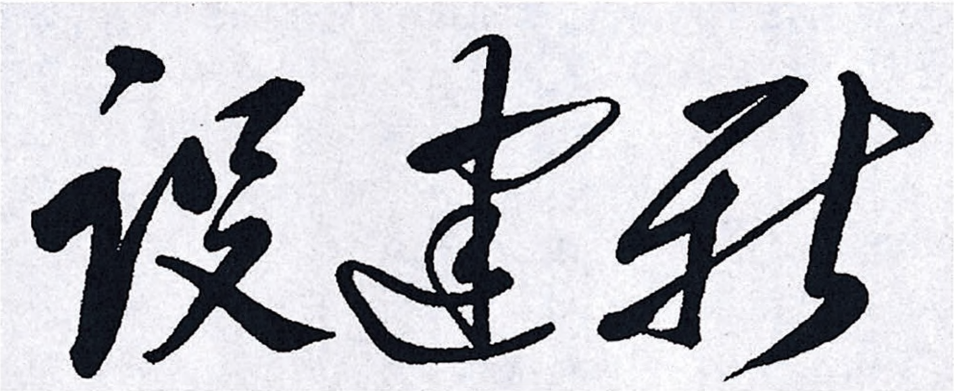

黑龍江日報
黑龍江日報

毛泽东为《黑龙江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新建设》题名[1]

（1949年9月）

新建设



毛泽东为《新建设》题写的刊名。

---

[1] 《新建设》杂志是1949年9月创刊的，它的前身是《中国建设》半月刊，简称《中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吴晗请毛泽东为《新建设》题写刊名，毛泽东写了3张，由张志让指导史济舟从中选出字体大小均匀的3个字，一直沿用到“文革”停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949年10月1日）

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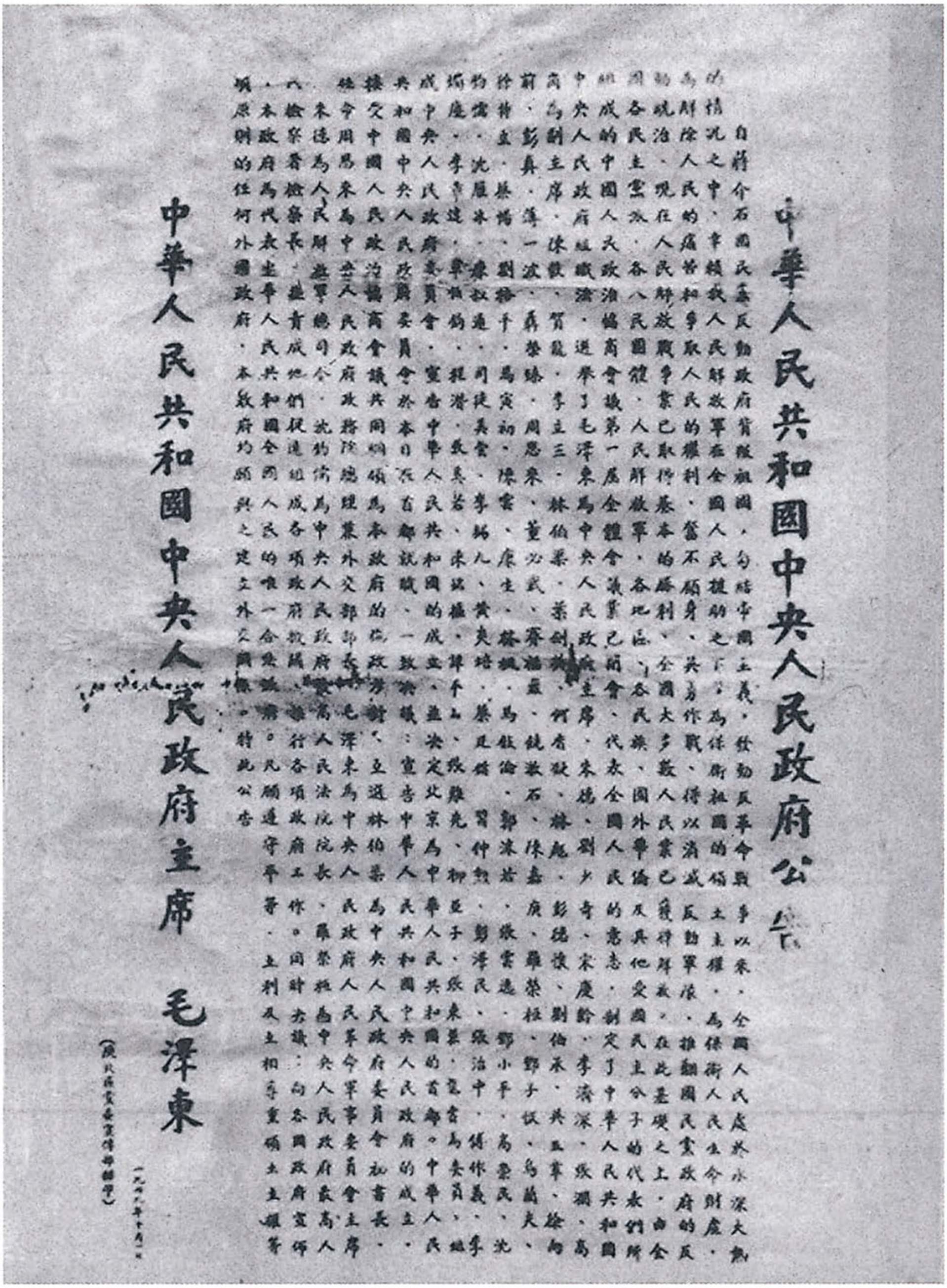
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员（部分）合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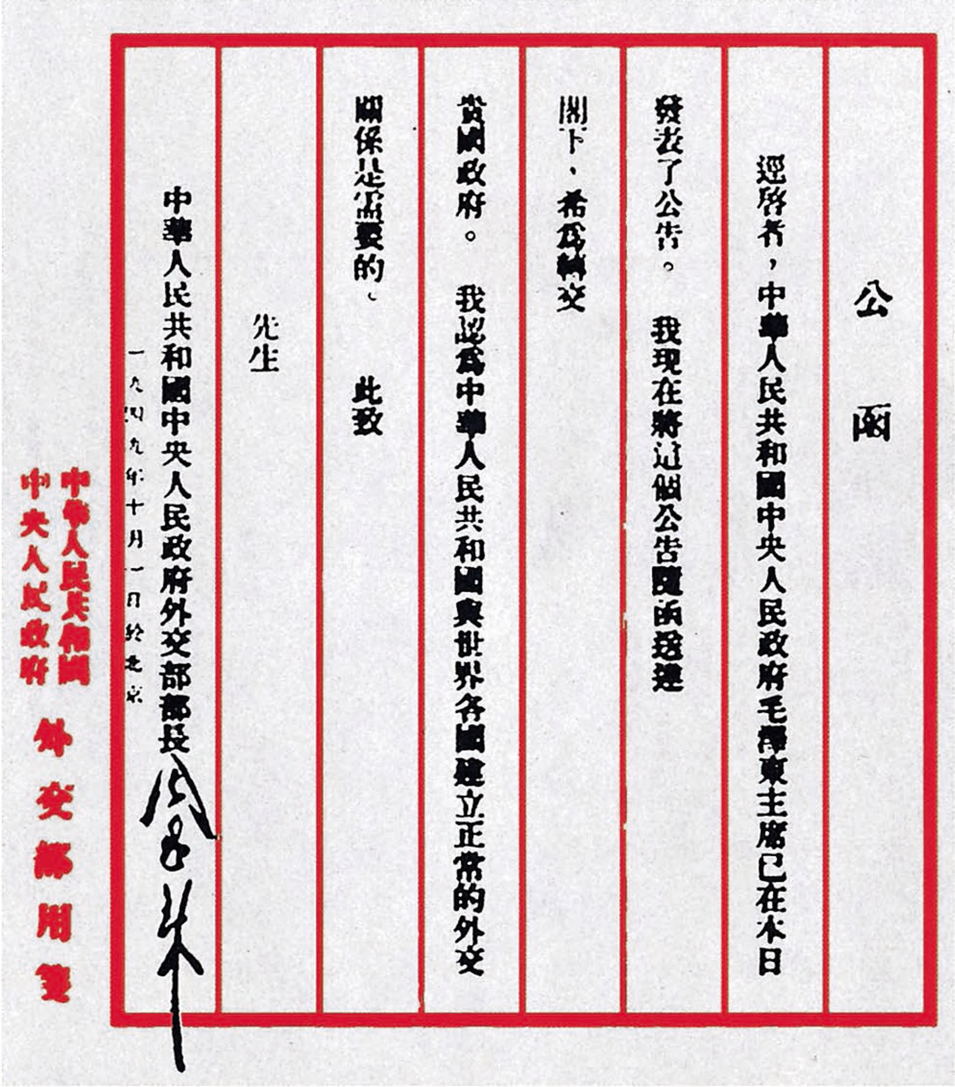
自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背叛祖國，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反革命戰爭以來，全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情況之中。幸賴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援助之下，為保衛祖國的領土主權，為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權利，奮不顧身，英勇作戰，得以消滅反動軍隊，推翻國民政府的反動統治。現在人民解放戰爭業已取得基本的勝利，全國大多數人民業已獲得解放。在此基礎之上，由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國外華僑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們所組成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業已集會，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陳毅、賀龍、李立三、林伯渠、葉劍英、何香凝、林楓、彭德懷、劉伯承、吳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聶榮臻、周恩來、董必武、賽福鼎、饒漱石、陳嘉庚、羅榮桓、鄧子恢、烏蘭夫、徐特立、蔡暢、劉格平、馬寅初、陳雲、康生、林彪、張聞天、鄧小平、高崇民、沈鈞儒、沈雁冰、陳叔通、司徒美堂、李錫九、黃炎培、蔡廷鍇、習仲勳、彭澤民、張治中、傅作義、李燭塵、李章達、章伯鈞、程潛、張奚若、陳銘樞、譚平山、張難先、柳亞子、張東蓀、龍雲為委員，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並在首都就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一致決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本政府的施政方針；任命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為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沈鈞儒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羅榮桓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項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決議：向各國政府宣佈，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特此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陝北區黨委宣傳部翻印）

毛泽东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公函

逕啓者，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已在本日發表了公告。我現在將這個公告隨函送達閣下，希爲轉交貴國政府。我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是需要的。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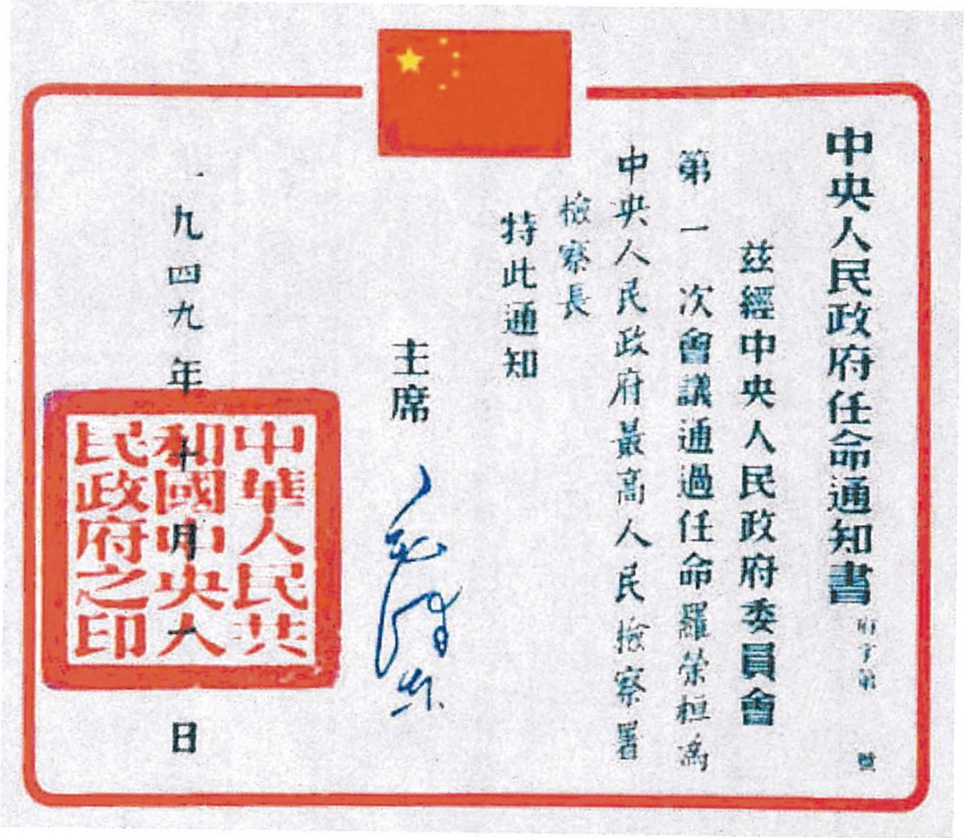
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長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於北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用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致各国政府的公函。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

府字第　號

茲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通過任命羅榮桓爲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檢察署

檢察長

特此通知

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　日

毛泽东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登上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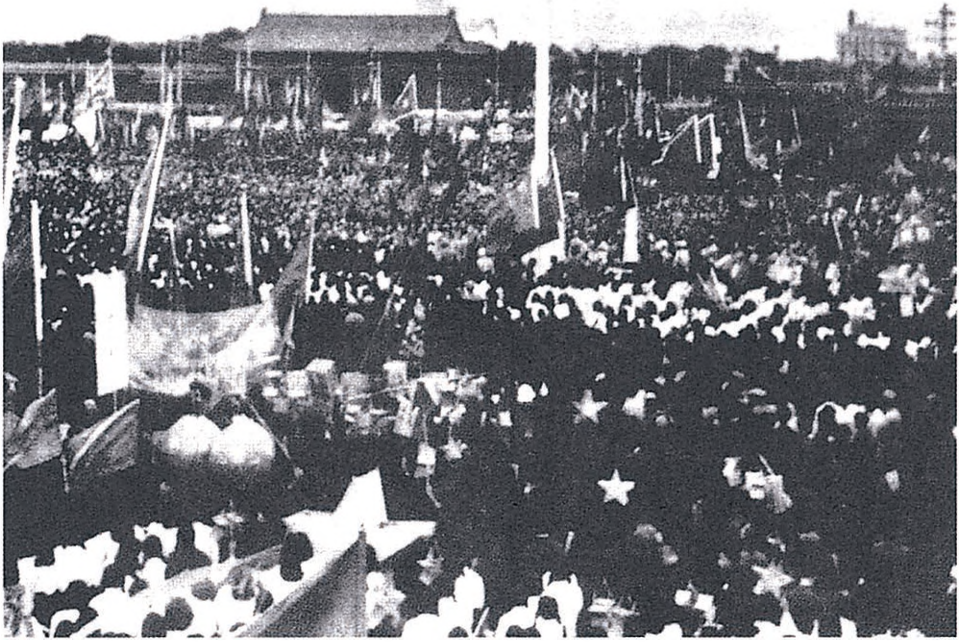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持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资料图片



雄壮的国歌在奏响，礼炮在轰鸣，毛泽东亲自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张澜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等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军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伯承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开国大典上。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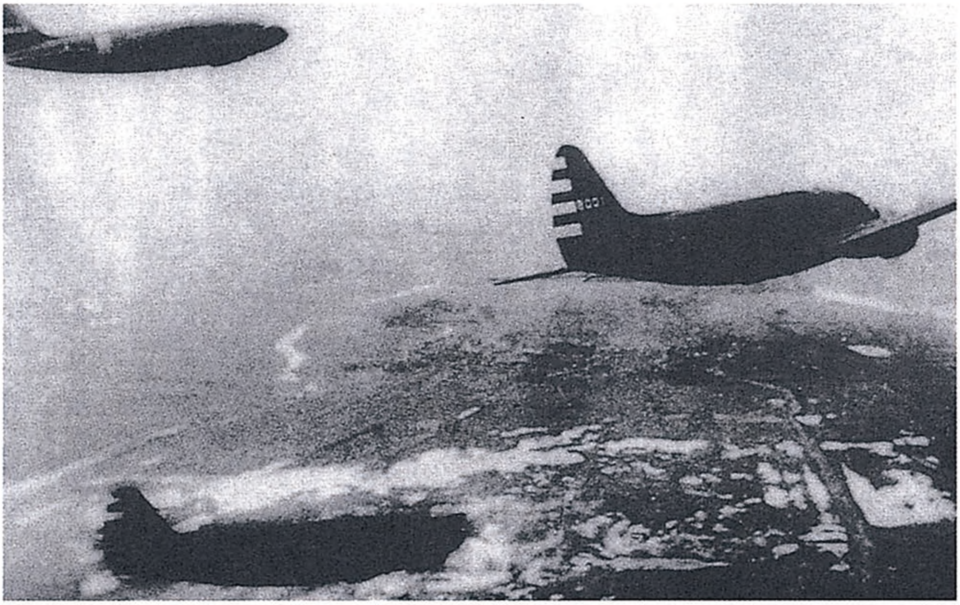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举行了阅兵式，有近2万名官兵参加了检阅，他们代表着40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方队接受检阅。

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向天安门广场行进。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34400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装甲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



1949年10月1日，空军的飞机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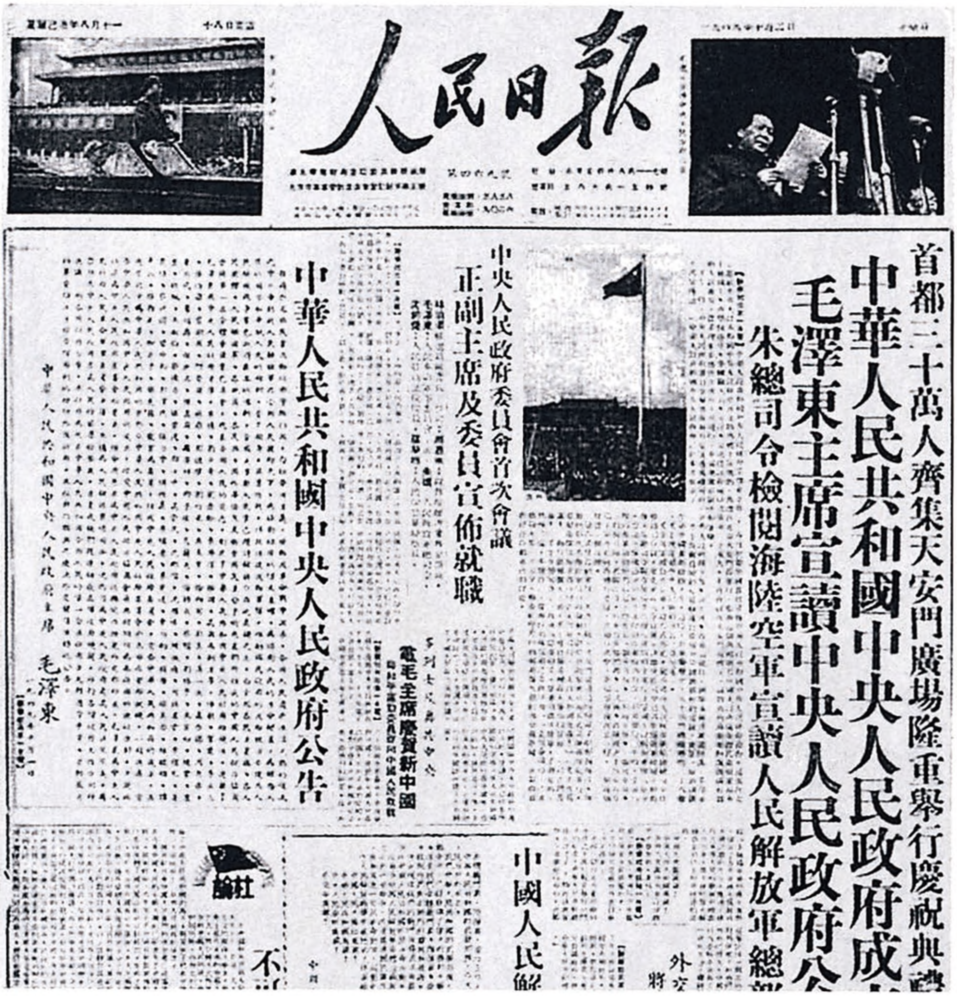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向接受检阅的飞机致意。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第一幅毛泽东巨像。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中央人民政府萬歲

1949年10月1日，首都30万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庆祝这个难忘的日子。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夜，整个首都一片欢腾。



人民日報

首都三十萬人齊集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慶祝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

毛澤東主席宣讀中央人民政府

朱總司令檢閱海陸空軍宣讀人民解放軍總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首次會議

正副主席及委員宣佈就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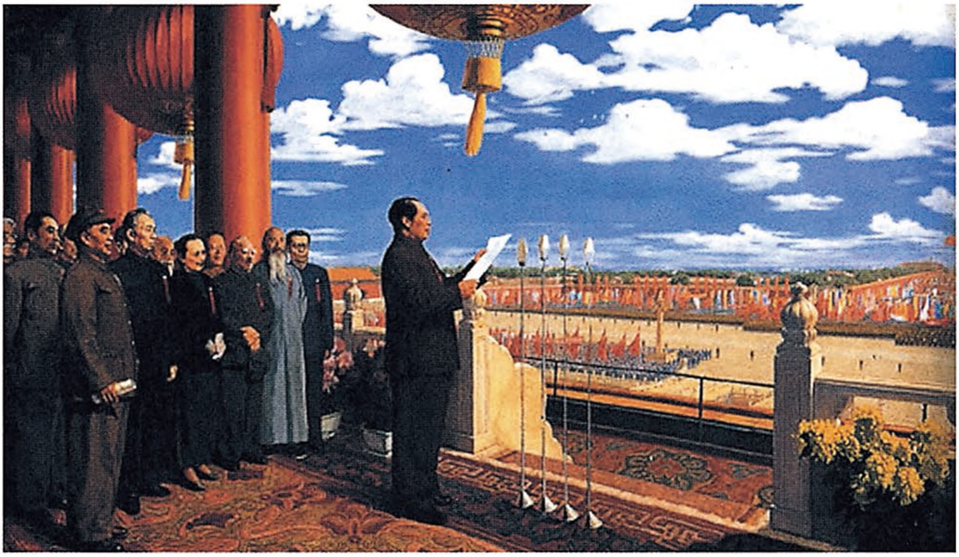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澤東

電毛主席慶賀新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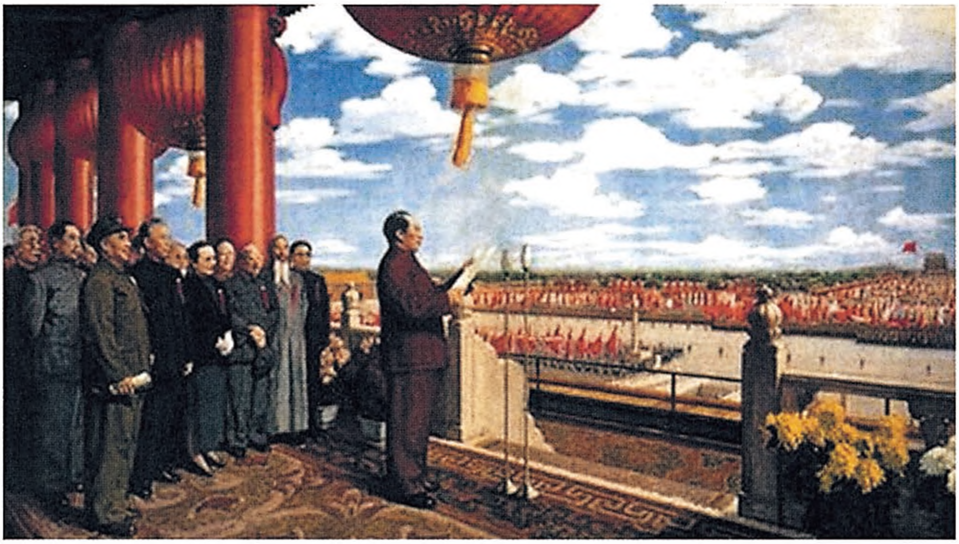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

社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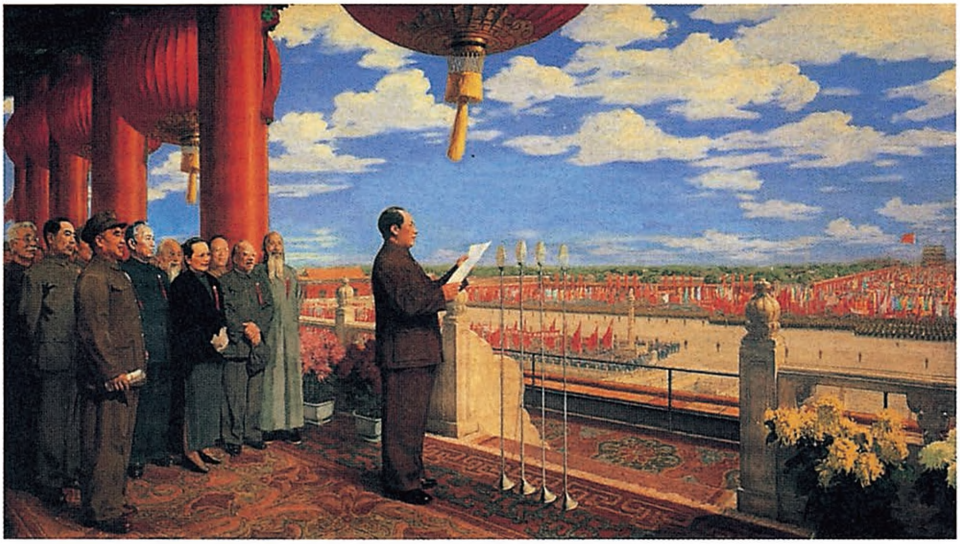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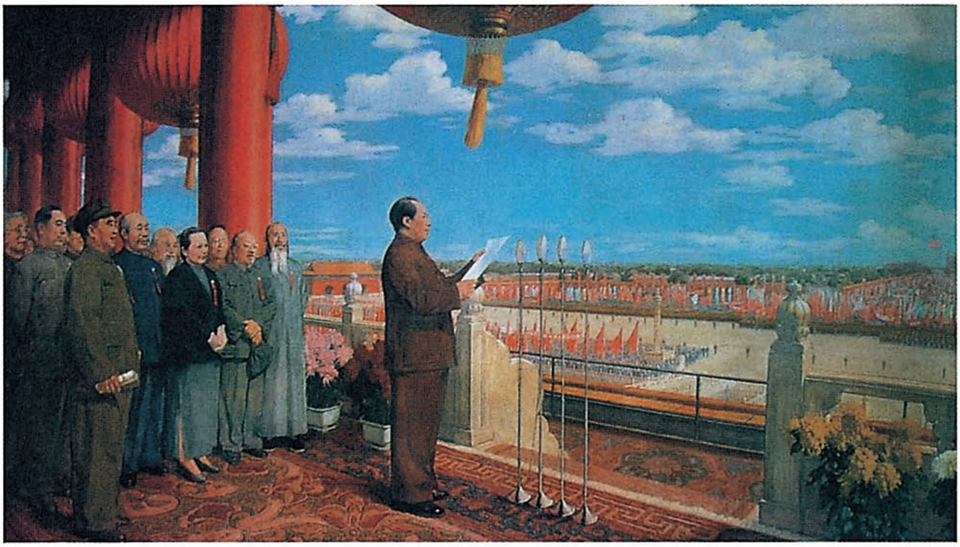
《开国大典》（油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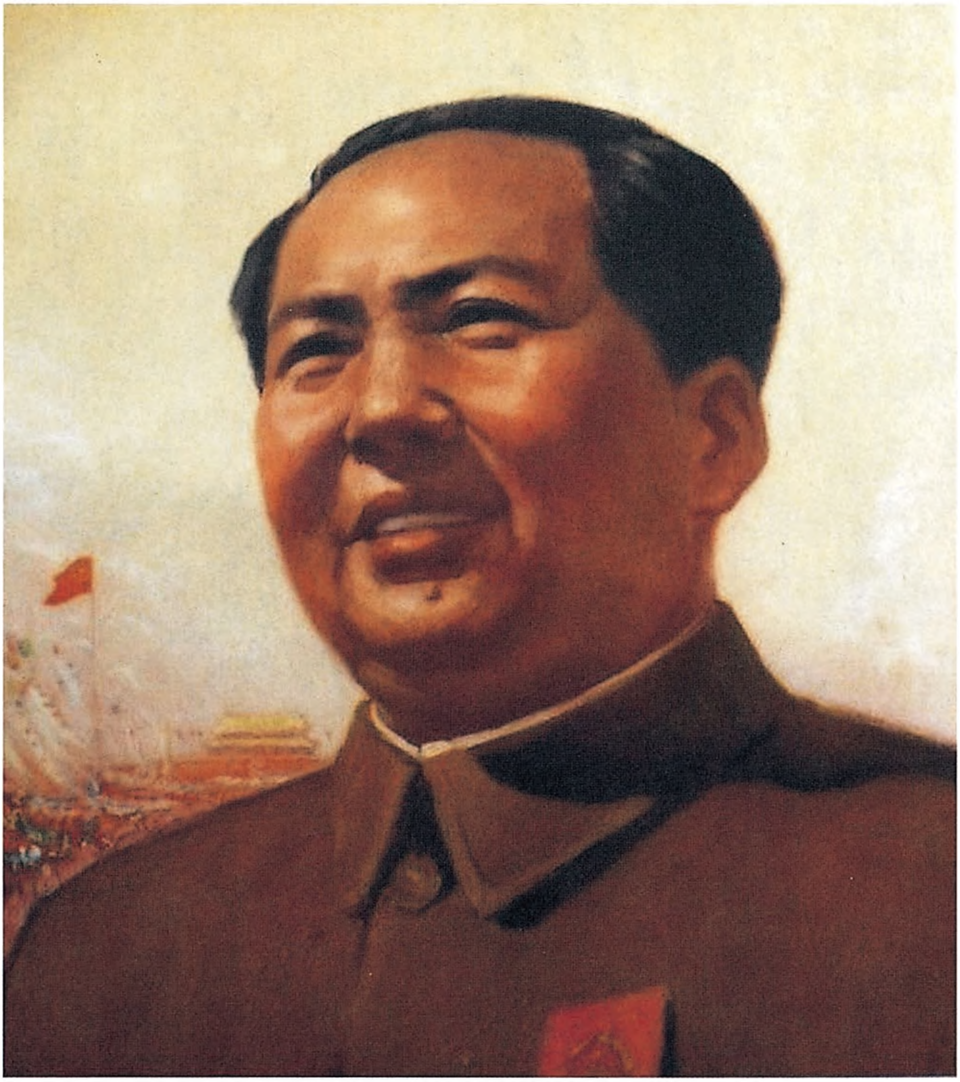
《开国大典》（油画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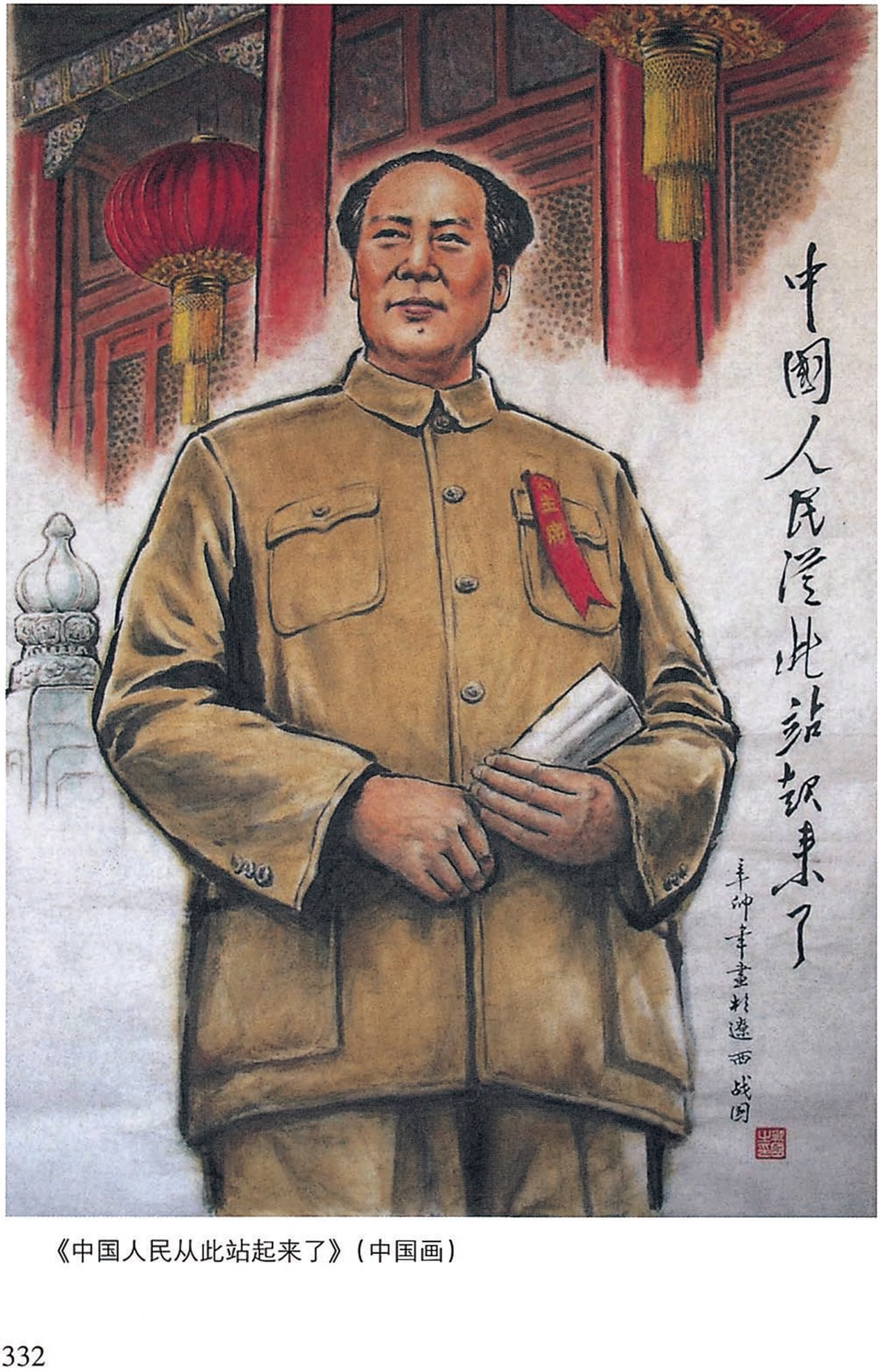
《开国大典》（油画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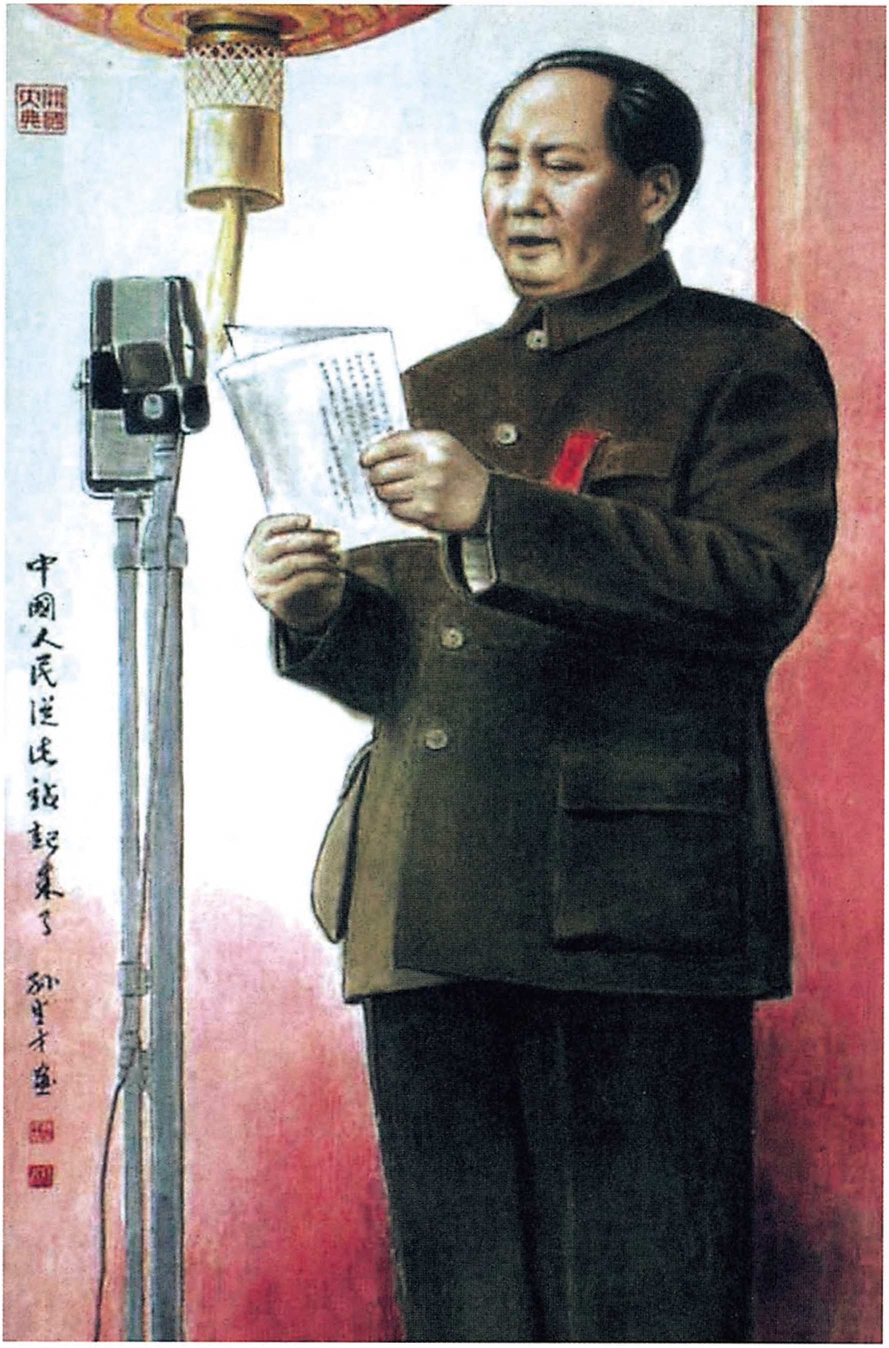
《开国大典》（油画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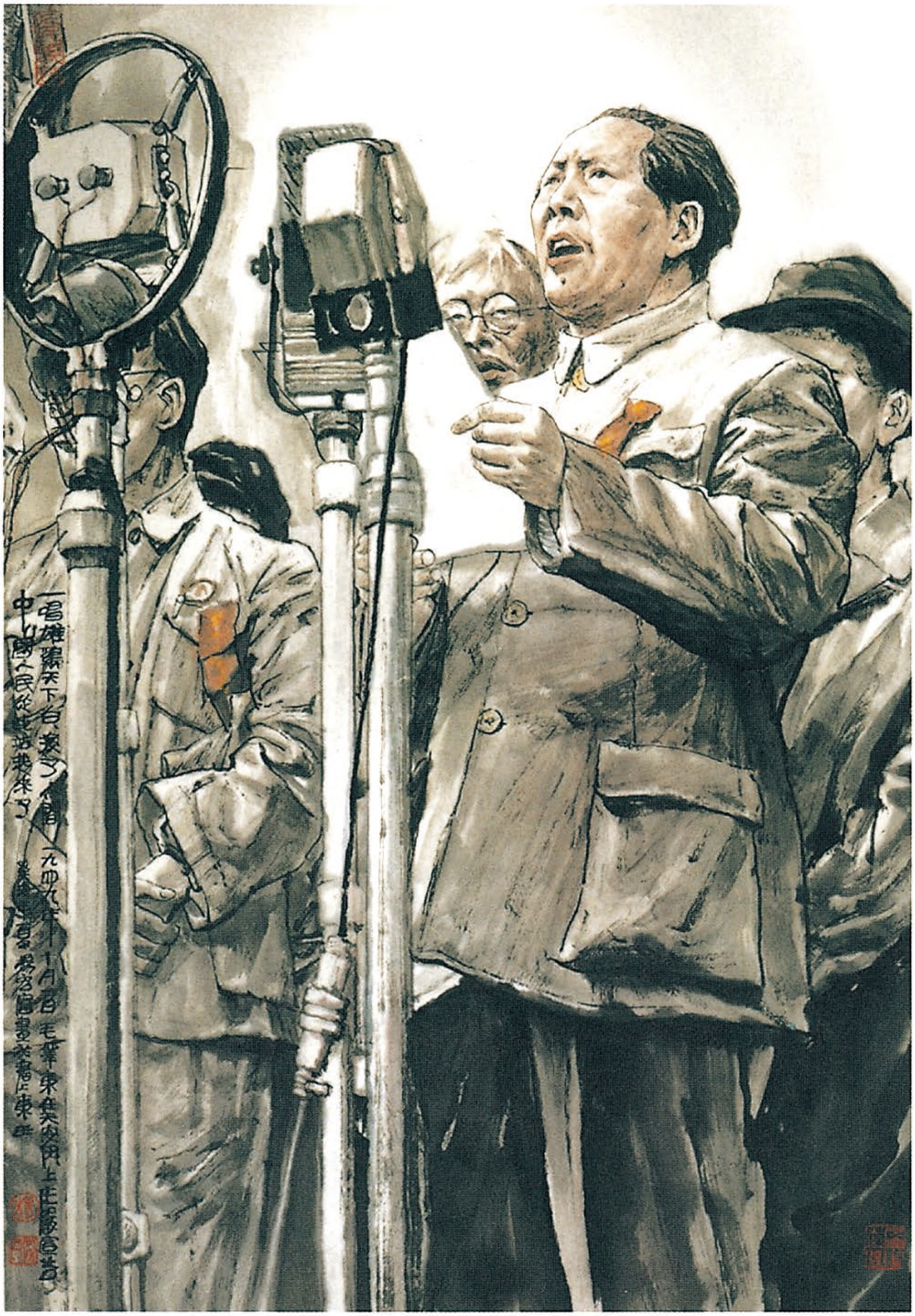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油画）


主席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来了
辛卯年画於遼西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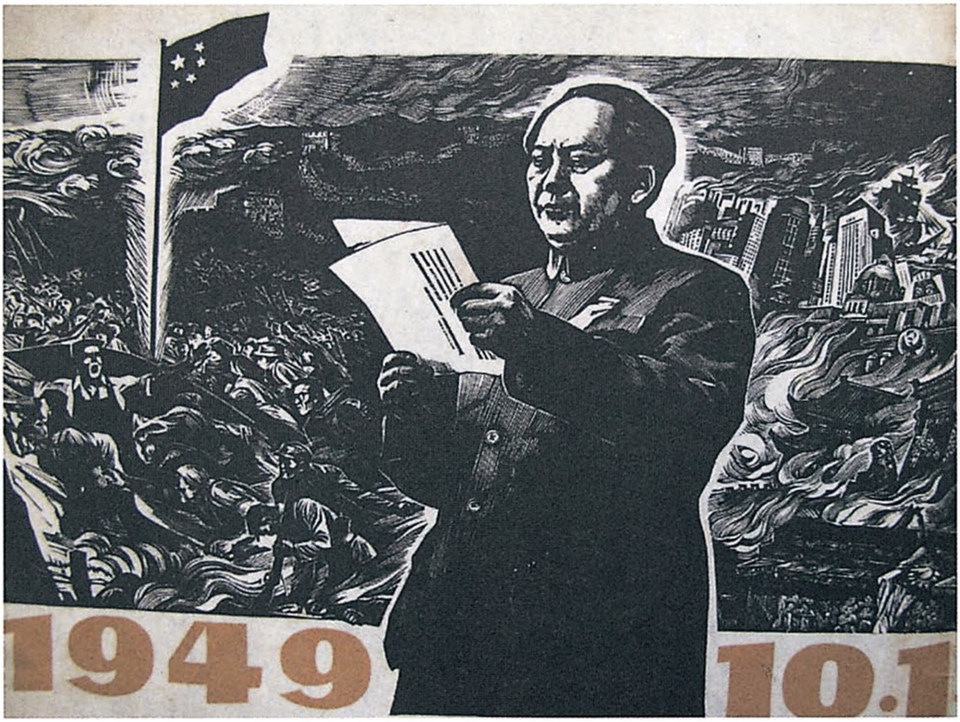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画）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孙星才畫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画）


一唱雄鸡天下白 换了人间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一唱雄鸡天下白　换了人间》（中国画）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版画）

给侨胞的题词[1]

（1949 年 10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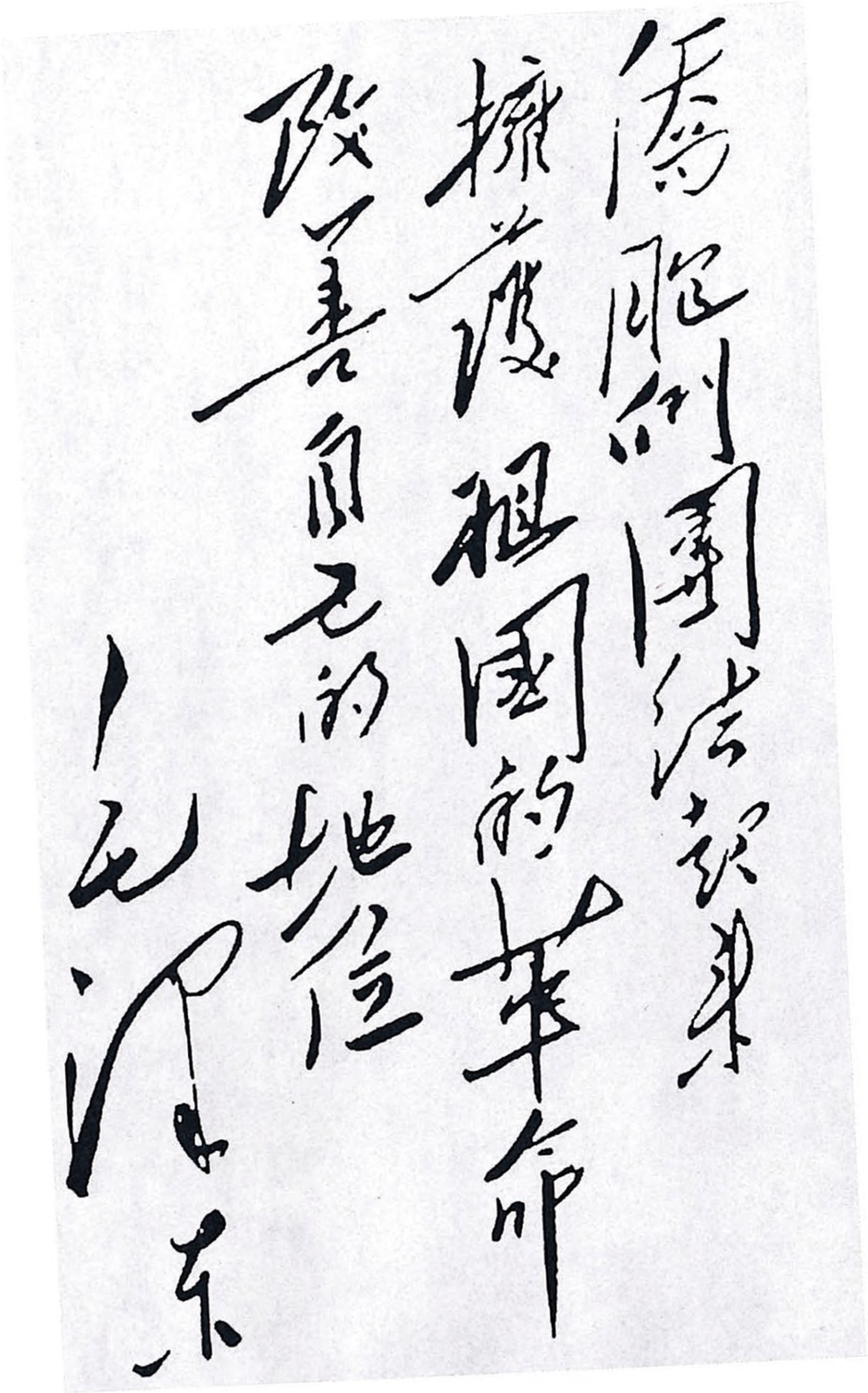
侨胞们团结起来，拥护祖国的革命，改善自己的地位。

毛泽东

1949年，毛泽东和华侨代表陈嘉庚、庄明理合影。

---

[1] 华侨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祖国的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之一。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毛泽东为侨胞们写下了这个题词。



侨胞们团结起来

拥护祖国的革命

改善自己的地位

毛泽东

毛泽东为侨胞的题词。

关于中苏建交的新闻稿[1]

（1949年10月3日）

【新华社北京三日电】在本月一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以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出毛泽东主席的公告后，苏联政府业已收到此项公告，并于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以葛罗米柯署名的照会电达周恩来部长，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葛罗米柯的照会如下：

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受苏联政府之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安德烈·葛罗米柯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二十一时四十五分钟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新闻稿，发表于1949年10月4日的《人民日报》。

对程潜陈明仁所提要求和建议的处置意见

（1949年10月5日）

林彪[1]同志，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程潜、陈明仁[2]按其现在的表现看来，似乎均有决心站在我们方面。在我和他们谈话时，李明灏[3]代其提出人枪太少，问是否可以给他补人补枪，并要求我们速派干部助其整训，要求在打白崇禧[4]及他处时，让其参加作战立功。（二）你们根据陈部现有人数给以两个军六个师的正式番号是适当的，军委已决定给以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二军、第五十三军及第二一四师至二一九师的番号。我已将此点向程潜、陈明仁、李明灏三人谈了，他们同意这样做。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程潜，原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明仁，原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1949年8月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3] 李明灏，原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员，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在华北军政大学任职，曾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并对促成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了贡献。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惟陈明仁觉得，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即用调训方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然后宣布缩编为两军六师。我认为陈明仁这点意见是合理的。十月十日左右，陈明仁李明灏二人由此动身经汉返湘，请待他们到达谈清楚后，再定宣布及实行的步骤。程潜在京多留若干天，然后返湘。（三）为使该兵团从陈明仁起，全体官兵安心供职，增强其彻底改造的决心，表示我们对程、陈及该兵团看成和自己人一样，我们认为如有可能，应在该兵团编整及纪律做得有些成绩的时候，给他们补充一批人枪，其来源可从对白崇禧作战的缴获中取得。这样一做，可以增强我们对该部的领导权及发言权。再则在湖南全省平定及土改实行以后，即在大约一年以后，如该兵团表现好，而我们的地方部队，例如独立师团等又可以集中时，可以考虑编一个军加入该兵团，使陈明仁有三个军。这对于改造该兵团是有作用的。以上各点大意我已向程、陈、李透露了。（四）程、陈、李提议，现在就可以取消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到北京任职，陈明仁专任军职不挂省主席名义。我向他们表示，军政委员会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取消太快，程、陈部下可能发生误会，对全国影响也不好。省府改组亦宜在全省平定，陈明仁率部向前线推进之时，方有理由实施。目前几个月内，陈的主席职衔仍应兼着，惟陈的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五）陈明仁几次提出想去前线打仗立功，我说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队未整训，马上去前线，逃兵必多。在作了初步整训之后，如有作战机会，上前线打几仗是很好的。此点亦请你们注意，有可能时，让其参加一、二次作战。（六）程潜、李明灏都说湖南有失业军官十五万人之多，纷纷找他们安插，是一大问题，他们不胜其烦。我说，此是一社会问题，国家有责任有步骤地给以谋生出路。叫他们回去时

和你们谈一下。此点亦请你们加以注意。（七）以上各点，你们意见如何盼复。（八）程、陈、李等对此次政协会议[1]观感甚好，表示有信心干下去。我告诉他们，补人补枪等事，要待人枪到了手才算数，不要向下面宣布，免引起失望。要他们将现有三万多人整训好，不存奢望，并对可能发生的种种困难和不满意之事，作充分的精神准备。我们方面则尽可能设法帮助他们，尽可能使他们满意些，减少他们的困难。双方这样做法就可能将事情办好。

毛泽东
酉微

---

[1] 政协会议，指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关于安排程潜、陈明仁、李明灏看望王耀武、杜聿明、黄维等的电报[1]

（1949年10月5日）

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

国民党散布谣言，说王耀武、杜聿明、黄维[2]等均被我们杀了。为揭破此点，程潜、陈明仁、李明灏[3]三人由京返湘路过济南时将留济南一二天看一看王、杜、黄等人，并可能到泰山、曲阜游览一下，请作准备，并妥予招待（陈、李约十月十日左右离京，程潜稍后离京）。如王、杜、黄等在青州，请先期调至济南。如何盼复。

中央

十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电报。

[2] 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在济南战役中被俘。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3] 程潜，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明仁，原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李明灏，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员，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在马叙伦[1]请假信上的批语

（1949 年 10 月 5 日）

请林老[2]去看马先生一次，要他静养。会议暂不要邀他。

毛泽东

十月五日

---

[1] 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2] 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给黄炎培[1]的信

（1949年10月5日）

任之先生：

三日惠示敬悉。盛意可感！在共同纲领发布之后，我似不宜迅即重复说一遍共同纲领里说过的话，如像经济问题等事。因此，除公告外，暂时不拟发表个人文件，这样似较适宜。此复。

敬颂大安！

毛泽东

十月五日

---

[1] 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答谢福斯特、但尼斯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49年10月6日）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但尼斯同志，和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

十分感谢你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热烈祝贺。请将我的谢意转达给美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转达给全美国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对中国人民怀有善意的人们。

诚如你们所说，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于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所进行的总的斗争的结果之一部分，在这个斗争中，美国的共产党人和一切真诚的民主分子是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

美国共产党人在援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而反抗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动对华政策的英勇奋斗中，享有一个特殊光荣的地位。尽管美国反动政府野蛮地迫害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非法地审讯美国共产党的十一位领袖，即但尼斯同志，威廉姆森同志，温斯顿同志，斯塔彻同志，戴维斯同志，温特同志，汤姆森同志，盖兹同志，波达许同志，格林同志和贺尔同志，但是事实毕竟表明了，正确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胜利的是美国共产党和美国进步势力的中国友人，而违反正义并因此可耻地失败了的则是美国现

在的帝国主义政府。这个事实，不能不鼓励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主力量，不能不教育全世界一切暂时尚处于反动派统治和蒙蔽下的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岁！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

同意第四野战军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1]

（1949年10月7日）

林、邓、谭、萧、赵：

（一）同意五日十二时电[2]五个军靠拢作战的部署。

（二）白崇禧[3]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军委

七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指1949年10月5日12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今后向广西进军仍以5个军采取较靠拢的并进，如敌与我决战，则我亦能作战；如敌退，则我仍能向前推进。如我兵力太分散，则遇作战机会而不能战，而遇敌退时，由于各路兵力不足亦无法堵住敌人。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中央关于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广州军管会等机构的电报

（1949年10月7日）

叶、方[1]，并告华中局：

西冬电悉。（一）广州军管会及广州警备机关名单除照你们所拟外，应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2]三个党外人士为军管会委员。（二）广州军管会及广东省政府均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三）你们拟定省政府名单时应注意吸收若干党外人士。

中央
酉虞

---

[1]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2] 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张醁村，无党派民主人士。吴奇伟，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起义；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转发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的批语

（1949年10月7日）

华中局，华南分局，二野前委，西北局，一野前委：

浙江省委这一报告[1]很值得注意，务请你们加以研究，避免重犯错误。这一报告的写法也是很新鲜的。

毛泽东

十月七日

---

[1] 指1949年9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给华东局并报中央的关于浙江省委5至8月份工作的综合报告。这个报告谈了军事、城市、农村、南下干部和当地干部会师4个方面的工作，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军事工作。对俘虏处理得很粗糙，除一部分精干者补入部队外，大批的就地遣散，造成了成群结队沿途抢劫，危害人民很大，许多无法回家者则散落乡间为散匪等。这是浙江匪特来源之一。如果我各野战军不为当时困难所屈，对俘虏不急即遣散，仍经过审训过程有组织遣散，此害可免。同时我入浙各军，由于被连续作战所牵制，未能及时展开清剿，以致给保安团队、县区自卫队及某些未被全歼的残敌以喘息整顿的时机。7月，大军南去，残敌遂向我攻击，造成一时被动。此外，将部分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工作也做得不及时。浙江迟到8月份才开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使工作遭到了不少损失。在新区，依靠一支主力部队来整顿地方武装，清剿散匪，巩固政

权，是不可少的步骤。二、关于城市工作。进入城市第一件事就是金融和物价，省委及各市委、市政府除用一部分力量去处理伪币、银元之外，应把主要力量放在整理税收、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工作上去，这才能逐步解决金融和物价问题。浙江的税收和城乡关系，直到8月份才走向正轨。职工工作，花的力量最大，但成绩不多，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缺乏做过工人工作的干部，加上开始不敢大胆放手地教育工人、组织工人，事前也未将干部集中训练一下，弄成了乱撞乱找，茫无头绪。经过7月份办工人训练班，才逐步使这一问题走向正轨。对资本家的合作，抓得不紧，做得不够，资方对我怀疑尚未完全去掉。在劳资问题上，不懂得应先与工人群众商量，主要在内部进行工作，当资本家破坏时，就应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关于贸易公司、铁路、邮政、电话局、银行等企事业单位进入市场闹独立性问题，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许多问题的处理上他们强调其直接系统，妨害了整个工作的进行。最好在一切工作未上轨道前，不要什么直接系统，一律通过当地党的领导。关于恢复生产问题，开始是盲目地叫着恢复和发展生产，由于遇上淡月大部分生产停顿，加上粮荒严重，粮价突出采购价之上，曾使生产陷于困境。加上整个工作未围绕生产这个中心，因此直到8月份，生产才开始好转。关于治安工作，杭州市反匪特斗争有成绩，主要经验是，大胆用敌方人，在生活上照顾，在政治上抓紧，使匪特活动得以事前破获；及时解决公安武装问题；大胆使用能吸收新事物、愿意埋头苦干、肯用脑子的干部去工作；整个保卫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关于接收工作，一般旧职员均能遵守初期原封不动听候接收的原则，因此接收工作可以有步骤地进行，但必须发给维持生活的用费。7月份后，因为财政困难草率遣散了一部分旧职员，影响不好。三、关于农村工作。浙江农村群众是在大革命风暴中，正如干柴遇烈火之势，对我希望很高。初期，因我农村干部少，部队也怕讲错了话，只是宣传约法8章，加上当时对匪特未及时镇压，群众中发生了若干怀疑。从7月下半月开始，大批工作队下乡，开展广泛的宣传运动，农村情况大变了。8月份开始在400多个乡发动群众，农民已普遍有反霸、减租减息的要求，老游击区则要求土改。农村工作所遇到的问题有，南下干部不敢大胆放手让群众行动，害怕犯错误；不相信当地干部及青年学生，以为文化高的人就不纯洁等。这些问题，在7月份召开的各地委会议上才大体解决。四、关于会师工

作。大体上已没有什么严重问题。目前关键问题在于游击区的党及干部，大多是渡江前后发展的，党内不纯比较严重；而南下干部中，主要倾向是过分夸大了这一面，存在对当地干部不信任及某些狭隘观点。因此，在双方团结上还存在一定的隔阂，县以上领导机关中尚比较好，中下级干部中问题还比较严重，亟待克服。

关于杨开智等工作安排问题的电报

（1949年10月9日）

一

首道同志：

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另电请派人转送。

毛泽东
九日

二

长沙上营盘街三十号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给谭政、陶铸[1]的信

（1949年10月9日）

谭、陶：

六日电悉。毛泽连、李祝华二人可许其来京一看，但请你们对他们二人讲明是许其来京看一看，随即回到湖南乡下去。

毛泽东

九日

---

[1] 谭政（1906—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同意聚歼白崇禧主力的作战计划[1]

（1949年10月10日）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2]：

十日七时电悉。（一）你们已抓住桂军四个师于祁阳以北，其余敌军亦正回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白[3]主力之可能。闻之甚慰。（二）完全同意你们的提议，陈赓兵团即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聚歼白匪。此计划如能实现可以大大缩短作战时间，请即径令施行。（三）邓华兵团及曾生林平[4]等部独力相机夺取广州。如何部署，由叶、方、邓、赖筹商电告。（四）现至湘潭之二野部队，必要时可令参加祁阳地区之歼白作战。

军委

十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曾生，当时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林平，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朱德致“长治”号舰[1]全体起义人员电

（1949年10月10日）

长治号全体起义的同志们：

庆祝你们的英勇的起义行动。由于国民党海军内的爱国官兵陆续起义，人民海军已在迅速发展。希望你们努力学习，积极参加建设中国人民海军和完成解放中国全境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

---

[1] “长治”号舰是原国民党政府军海防第一舰队旗舰，1949年9月19日在上海吴淞口外起义。

对新疆赵锡光、鲍尔汉、马良骏等祝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复电

（1949年10月10日、21日）

一

赵锡光将军：

一日电悉。新疆和平解放，全国欣慰。望南疆驻军全体官兵，团结一致，为改造自己成为人民军队而努力。

毛泽东
十月十日

二

鲍尔汉主席，并转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全体委员：

感谢你们的祝贺。望与人民解放军及全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推行共同纲领，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

马良骏先生，并转全疆回胞均鉴：

感谢你们的祝贺。希望你们协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团结各族人民，遵照共同纲领，实行真正的人民民主，为建设新新疆而努力。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十八兵团由贺龙统率入川[1]

（1949年10月11日）

宗逊，并告德怀[2]及西北局：

酉佳电悉。（一）昨日中央会议已决定十八兵团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3]同志统率入川。（二）向胡宗南[4]作战的兵力，除十八兵团外，尚须令刘金轩[5]部及七军予以配合。在占汉中一带后，刘金轩部除守卫汉中为中心一带地方外，是否以适当部分进入川边策应十八兵团，依那时情况再定。七军须准备进占陇南文、武、成、康[6]一带。（三）向汉中一带进攻的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请令有关各部于十一月下旬准备完毕。

军委

酉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贺龙，原任西北军区司令员。此时已被任命为将要组建的西南军区司令员。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5] 刘金轩，当时任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十九军军长。

[6] 文、武、成、康，指甘肃文县、武都、成县和康县。

十五兵团暂不进攻广州[1]

（1949年10月11日）

林、邓、谭、萧、赵，并告叶、陈[2]：

十一日十时电[3]悉。（一）关于调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接入桂一点，已于今晨答复你们同意这样做，请径令陈兵团执行。（二）关于不要迫使广东之敌退入广西一点，我们认为也是对的，因此十五兵团暂时不应进攻广州。除以一部位于韶关、英德一带外，主力似应由英德以北向西南攻占德庆、高要一带，割断两广联系，使广州处于孤立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广州一带之敌在我十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和第二参谋长赵尔陆的电报。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49年10月11日10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使广东之敌不退回广西，则我应暂不继续进攻广东，而以广东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作为吸引广东敌人的工具。同时，能使我集中更优势的兵力与广西之敌作战，首先达到歼灭广西之敌，然后在军政配合下，以四野部队解决广东之敌。因此，我们建议陈赓邓华两兵团皆不要继续南进，而以邓华之两个军监视广东敌人，并集中兵力经常歼敌之分散部队。陈赓部则西进，参加广西作战。只要广西敌被歼，很多敌人皆可争取和平解决。故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

五兵团与曾生林平[1]等部东西威迫之下，有可能发生内变，向我接洽投降或改编。如果是这样，则我仍可能早日解放广州，这对于以干部及某些物资接济广西是有利的。（三）关于十五兵团是否可以早日去占领德庆、高要一点，请叶方[2]与邓赖[3]商酌电告。（四）曾生林平等部似宜进至新丰、龙门、佛冈一带，不要去惠州以南。

军委

十一日二十四时

---

[1] 曾生，当时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司令员。林平，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叶，指叶剑英。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3] 邓赖，指邓华、赖传珠，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关于同意约鲍尔汉[1]至酒泉商谈的电报

（1949年10月11日）

德怀[2]同志：

十日九时电悉，同意你约鲍尔汉至酒泉商谈。

毛泽东

十一日二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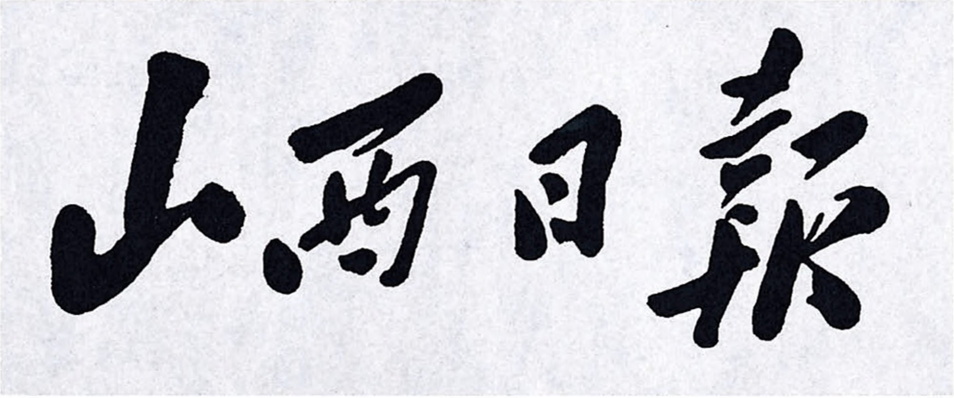
[1] 鲍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0月11日）

山西日报



毛泽东第一次为《山西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攻打太原时，创办《山西日报》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着——中共中央华北局责成华北局宣传部和华北人民日报社紧急组建山西日报社工作班子。部队从河北平山向太原进发前，从华北人民日报社、冀中导报社等单位调来的干部请当时在平山的毛泽东题写报头，毛泽东挥笔写下了圆润遒劲的“山西日报”4个字。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

慎重考虑围歼白崇禧部计划
力求做到确有把握

（1949年10月12日）

林彪[1]同志：

因为据你们十日七时电[2]，白崇禧[3]全力增援祁阳以北之敌，该敌已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有在湘桂边界聚歼白匪主力之可能，故我们同意你们以陈赓兵团[4]由现地直出桂林抄敌后路之意见。但据你们十一日十时电，敌原拟增援之兵力，现已停止于东安、冷水滩、零陵[5]之线，并未北进。似此，无论祁阳以北地区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均有可能令其主力退至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背靠云贵，面向广西东北部及东部，采取游击战术，不打硬仗，与我相持，我军虽欲速决而不可得。此时，因陈赓已入广西，广东问题没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指1949年10月10日7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由衡阳、宝庆线南退之敌军4个师已被我军包围于祁阳以北地区，其余敌军亦正回头北援，我军有在湘桂边区歼灭白崇禧部主力之可能。建议陈赓兵团由韶关、英德之线直插桂林、柳州，断敌后路，协同主力歼灭白部。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5] 零陵，旧县名，1984年并入湖南永州市。

有解决，广西问题亦不能速决。如我军向广西中部、西部及西北部迫进，则白匪退入云贵。如四野跟入云贵，则不能分兵解决广东问题。如四野不入云贵，则解决白匪的责任全部落在二野身上。因此请你考虑这样一点，即在桂林、柳州以北，祁阳、宝庆[1]以南地区采取围歼白匪的计划是否确有把握，如确有把握，则你们的计划是很好的；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为了使问题考虑成熟起见，目前数日内陈赓兵团以就地停止待命为宜。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三时

---

[1] 宝庆，即湖南邵阳。

相机占领广州和围歼白崇禧部

（1949年10月12日）

林彪[1]同志，并告叶、陈、方、邓、赖[2]及刘、邓、张、李[3]：

（一）你们十一日二十一时电[4]的意见很好，即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邓两兵团[5]仍继续向广州前进。但请陈邓注意先以必要力量直出广州、梧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邓，指邓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指赖传珠，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

[3] 刘、邓、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4] 指1949年10月11日21时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广东敌人不与我作正面战斗的情况下，我们仍主张暂不夺取广州，以免促成粤桂敌人之集中。目前只以邓华兵团留广东打运动战，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但如敌守广州或我军有可能在广州或广州以外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时，则陈赓邓华两兵团仍继续向广州前进，达到歼敌目的。在对粤敌企图未判明前和我军能否抓住敌人未证实以前，陈赓邓华两兵团目前仍继续照原计划向广州前进。

[5] 陈邓两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分别为陈赓和邓华。

州之间，切断西江一段，断敌西逃之路，不使广州敌向广西集中。如查明广州一带之敌向广西逃窜时，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入桂。如广州一带之敌并不向广西逃跑，则陈邓两兵团仍执行原计划占领广州不变。（二）祁阳以北被歼之七军、四十八军四个师，是桂系精锐。桂系正规军虽尚有四十六军三个师，四十八军一个师，及五十六军两个师（此军位于桂林、全州间），但都不是精锐。桂系以外各军更差。因此，四野以主力由祁阳、武冈之线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兵力已很充足。但如何进法，值得考虑。数日内可以看清白崇禧[1]的部署。如果白崇禧集中全力守零陵[2]、全州一带，你们可以集中兵力南进，试行抓住该敌。如白崇禧鉴于此次精锐被歼的教训（此次被歼是出于白崇禧意料的）向桂林、柳州之线大规模撤退，则我军似不宜集中前进，而宜分两路并列前进，以一路出柳州以北，以一路出桂林，两路互相策应，仍可随时集中作战，使白匪不能向贵州退却。（三）二野五兵团请令其迅向贵州前进，并令十八军先出贵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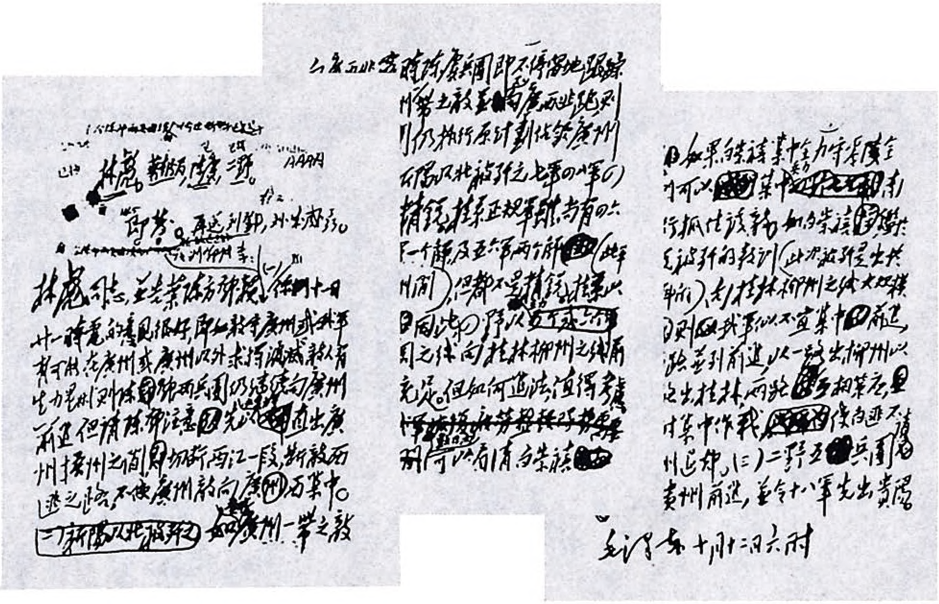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六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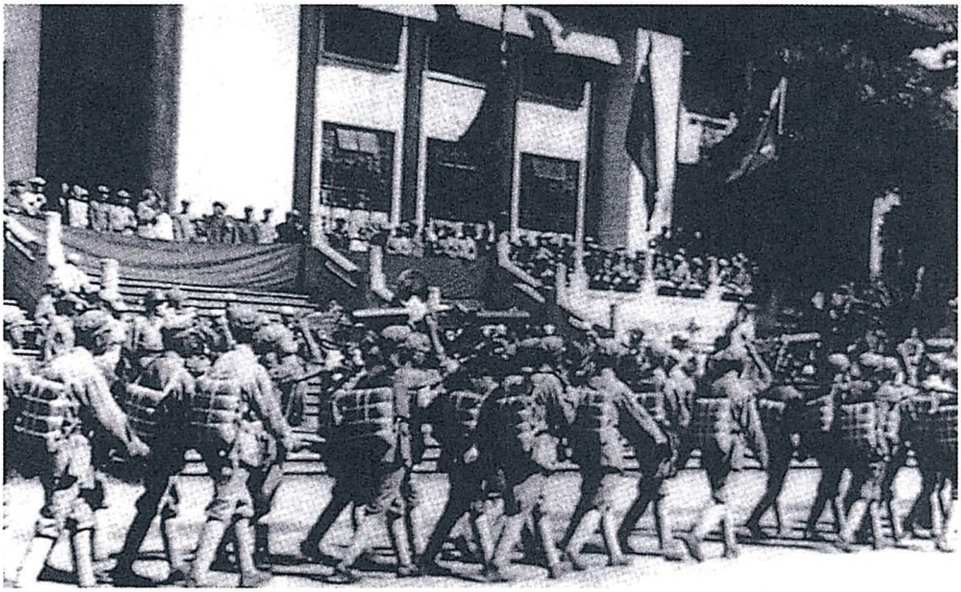
[1]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零陵，旧县名，1984年并入湖南永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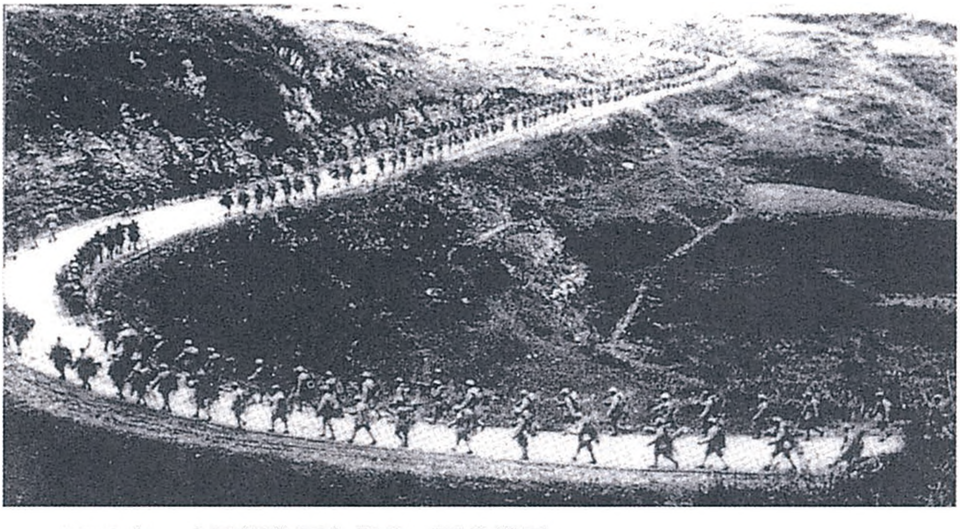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前线将领电的手稿。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取得衡（阳）宝（庆）战役的胜利，歼灭白崇禧等部3万余人。



1949年10月14日，人民军队占领广东。



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进军。

关于草拟华东军政委员会名单给陈毅[1]的信

（1949年10月12日）

陈毅同志：

请邀集刘晓粟裕[2]诸同志拟一个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名单草案，党员占半数多一点，党外民主人士占比较少数，共约三十人左右，于明（十三）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

[2] 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1]

（1949年10月12日）

彭、甘，并西北局：

九日酉时电悉。（一）伊宁民族军[2]必须有一人为新省[3]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4]至迪化[5]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6]商量后，再告。（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7]，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电报。

[2] 伊宁民族军，指1944年9月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3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组织起来的民族军。这支民族军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建立了以伊犁的伊宁县为中心的解放区，至1949年9月发展到1.4万余人。

[3] 新省，即新疆省，1955年撤销，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4] 指彭德怀。

[5] 迪化，旧市名，即今乌鲁木齐。

[6] 赛福鼎，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

[7] 民主同盟，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

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再告。

中央

十月十二日

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

（1949年10月13日）

一

德怀、仲勋[1]，林彪、子恢[2]，剑英、方方[3]，小平、伯承、贺龙[4]，一波、澜涛[5]，高岗、富春、林枫[6]，康生[7]：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

[3]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4]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1949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这时尚未到职。

[5]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6]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7]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据饶漱石[1]同志十月十一日电称，“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九月三十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会议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计：（一）我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工商业政策问题。（已在十月六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道。（三）县委书记关于松江工作与任务的报告摘要。（四）介绍松江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拟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如仍需由内部专门总结报告，请电示办理”等语。上述文件俟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你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二

漱石同志：

酉真电悉。（一）松江会议成功，极为欣慰。俟各项文件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各地。我已将你的来电转发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请他们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华东局所属则请你通令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全国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群众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请你抓住松江经验，要华东各地省委、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亲自出席若干县，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二）内部总结报告，不需要了。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在西北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

（1949年10月13日）

德怀[1]同志：

（一）关于由陕入川兵力，已与贺龙伯承小平一起确定为十八兵团，不牵动其他部队。（二）刘金轩[2]部及七军配合作战。战后七军位于陇南工作。刘金轩部除守卫陕南外，是否抽一部入川，那时再酌定。（三）歼胡[3]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泸[4]、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约在十二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四）二野主力两个兵团，现到常德、湘潭之线，大约十二月可到川南。二野陈赓兵团[5]本月可协同邓华兵团[6]占广州，下月入桂协同四野主力歼白[7]，大约明年一二月可入云南。（五）担负西北任务的三个兵团，以两个兵团（即第一第二兵团）担任地方工作，另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刘金轩，当时任陕南军区司令员兼第十九军军长。

[3] 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

[4] 叙，指叙州，即四川宜宾。泸，指四川泸州。

[5] 陈赓兵团，指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

[6] 邓华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邓华。

[7] 白，指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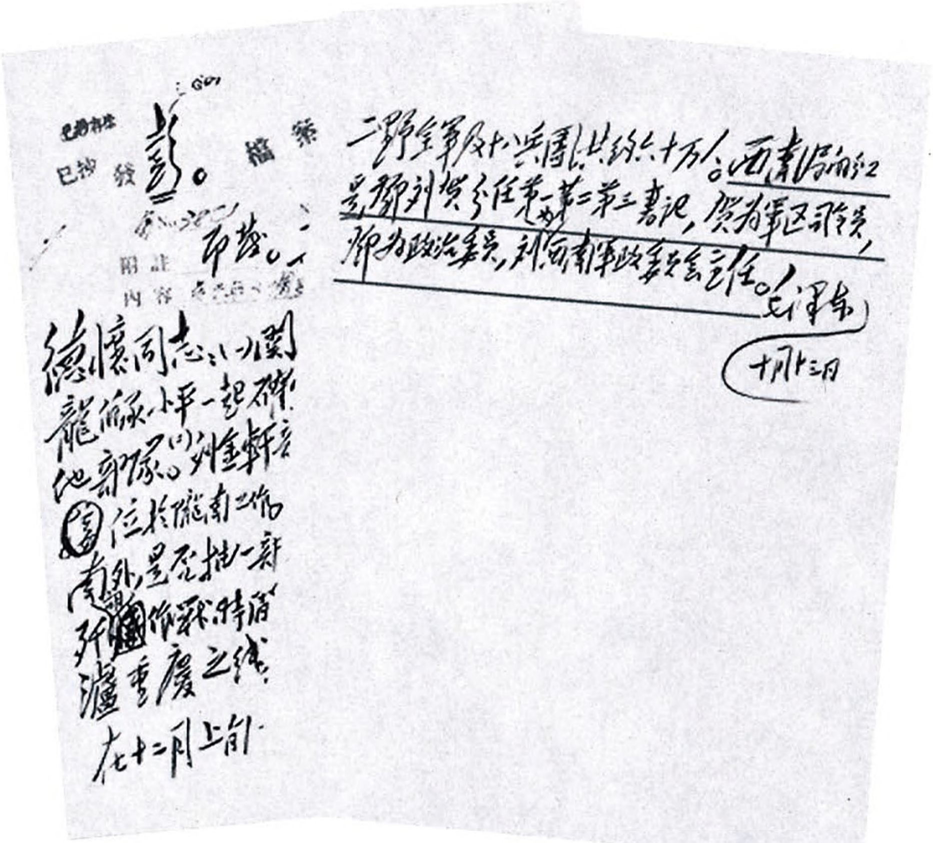
一个兵团（即十九兵团）待宁夏工作结束后，不担任地方工作，开至天水、宝鸡、潼关之线专门整训，作为国防机动兵力，以备不虞（此点在数月前已电告）。请准备适当兵力，于数月后，接任宁夏地方工作。（六）经营云、贵、川、康[1]及西藏的总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六十万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刘贺[2]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 邓刘贺，指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



已抄存

已抄 發 彭。 檔案

附註 印發。

內容

德懷同志：（一）賀
龍偕小平一起入[illegible]
地部隊。（二）劉鄧[illegible]
[illegible]位於隴南之[illegible]
南外，是否抽一部
分[illegible]作戰，待[illegible]
瀘重慶之線
在十二月上旬

二野全部及十八兵團共約六十萬人。西南局[illegible]
員鄧劉賀分任第一第二第三書記，賀為軍區司令員，
鄧為政治委員，劉為西南軍政委員會主任。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手稿。

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1]

（1949年10月13日）

林、邓，叶、陈：

据香港十月十日电称，“（一）据空军高级人员方面获息，蒋[2]电李白[3]，弃守广州，坚持广西；并表示，今后对李白做法，当不予干涉。（二）据熟悉桂系的人说，桂残军如退入桂境，当会大部逃散，丧失战斗力。现白匪正大量廉价售卖枪支给地主，拟大量组织地方反动势力，并在桂东演习坚壁清野，连谷种都要毁灭”等语。请加注意，务不使粤敌逃入广西。

军委

十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李白，指李宗仁、白崇禧，当时分别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和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在表扬歼灭白崇禧[1]主力的部队的电报[2]上的批语

（1949年10月13日）

程颂云[3]先生阅。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被歼灭者是七军两个师及四十八军两个师，地点在祁阳以北。消灭这些部队时白崇禧坐视不救，自己退到桂林，各军退到东安、零陵、冷水滩一带，听任七军四八军苦战四天被歼干净。

---

[1] 白崇禧，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指林彪、邓子恢、谭政等1949年10月12日表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四十一军和四十九军歼灭白崇禧主力的电报。

[3] 程颂云，即程潜，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

给冯友兰[1]的信

（1949 年 10 月 13 日）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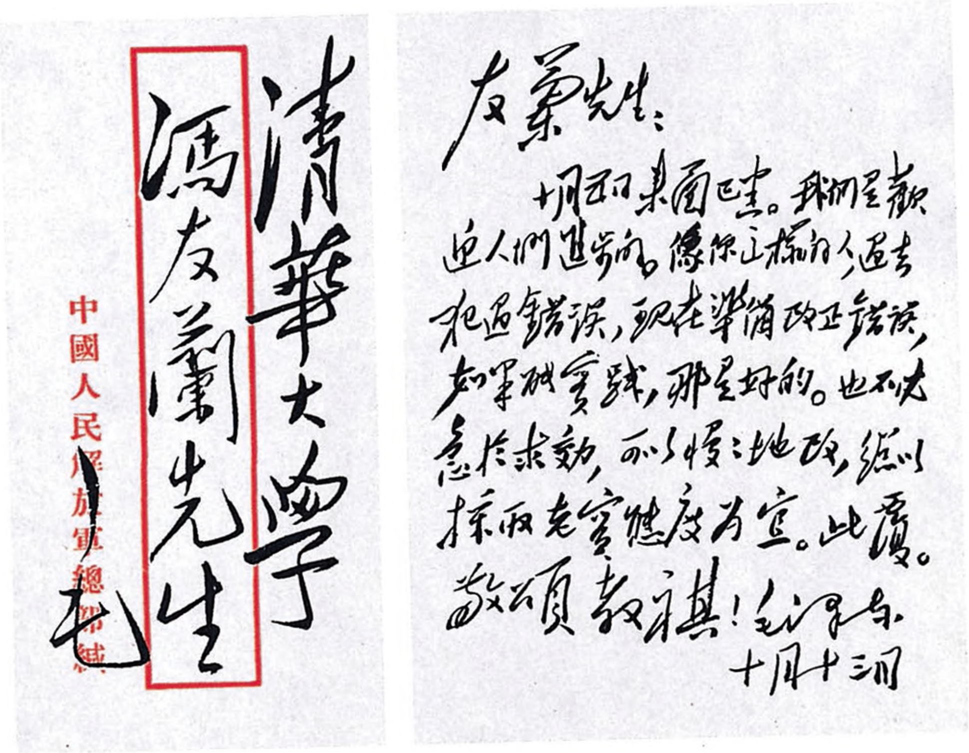
敬颂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冯友兰，当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清華大學
馮友蘭先生
毛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緘

友蘭先生：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覆。

敬頌教祺！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

毛泽东致冯友兰信的手稿。

给上海市纸业革新促进会的题词

（1949年10月13日）

你们提倡由纸的商业转变为造纸工业，改良土纸及推广土纸使用范围，都是好的。你们用土纸抄写我的几篇文章，我是感谢你们的。现在我给你们写了几句话，但请你们不要用为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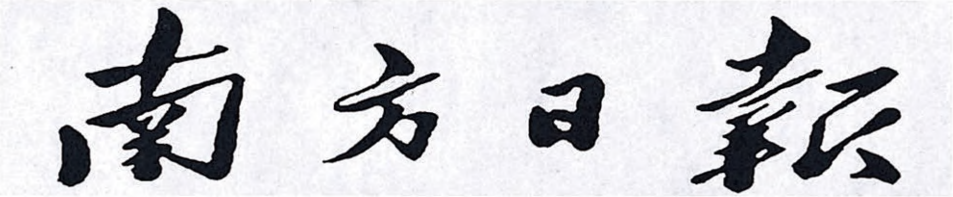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为《南方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0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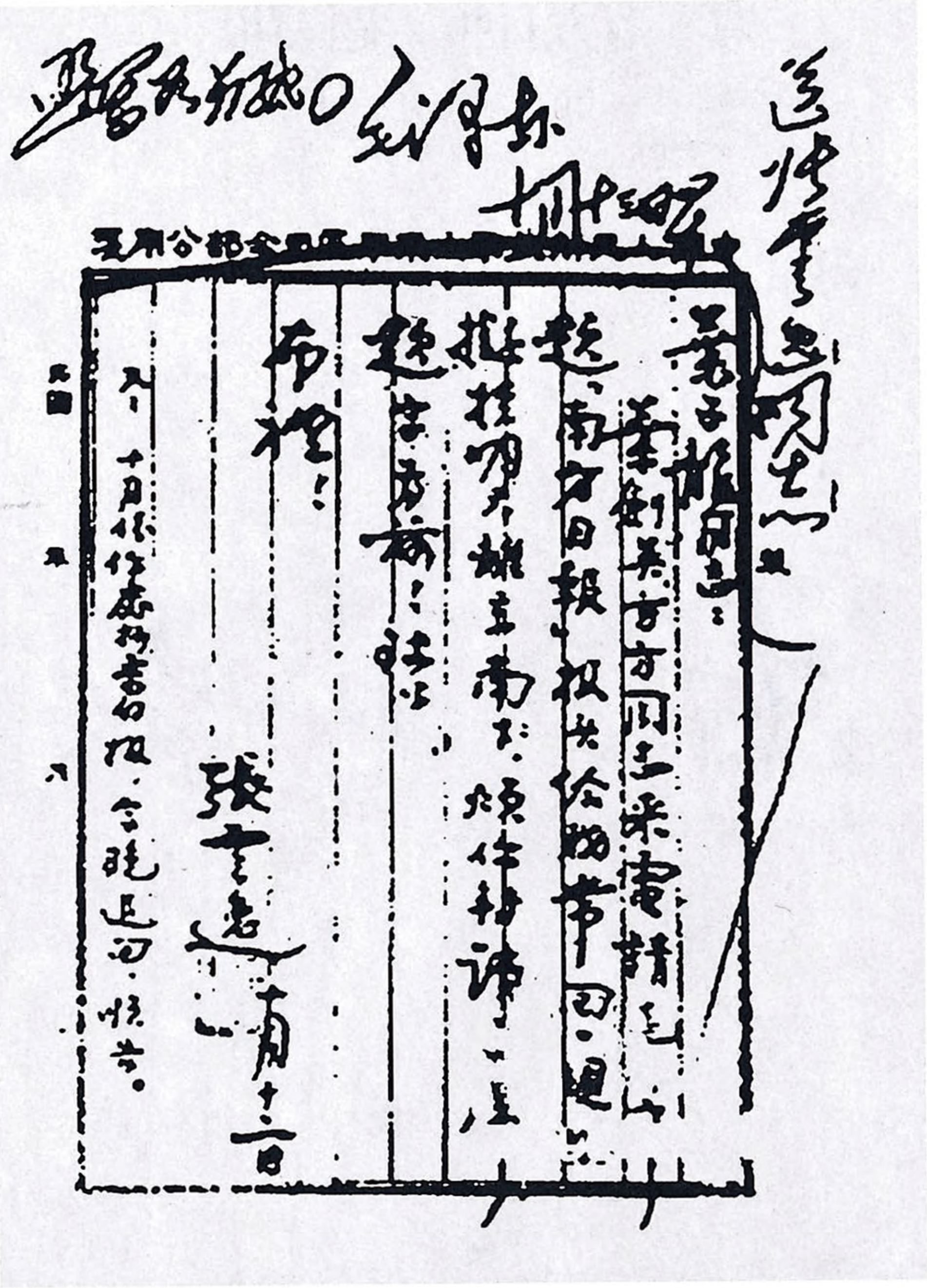
南方日报



毛泽东为《南方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9年10月12日，正在北京的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张云逸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即将诞生的《南方日报》题写报头。毛泽东欣然应允，第二天一早即把写好的报头字横竖数款交给张云逸，并在张云逸给叶子龙的信上批示“照写如另纸。送张云逸同志。毛泽东十月十三日早”。



送杨尚昆同志[illegible]

[illegible]　毛泽东　十月[illegible]日

主席：

叶剑英同志来电请毛主[illegible]题南方日报报头[illegible]带回。[illegible]桂林[illegible]日报、海南[illegible]题字[illegible]！

布礼！

張云逸　十月十[illegible]日

附：十月份作[illegible]书面报，今晚送回，[illegible]。

张云逸请毛泽东题写报头的信及毛泽东的亲笔批示。

为了解罗章龙的情况致湖南省委电

（1949年10月14日）

湖南省委：

湖南大学教授罗仲言即罗章龙来信，申述他自被开除党籍后十七年中从事教育和著述工作的成绩，说他并无危害党和革命的行为。请派人至湖南大学调查是否属实电告。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中央关于发表广州军管会和市政府就职布告的电报

（1949年10月15日）

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

我军即入广州。你们可以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照前定名单（增加李章达张醁村吴奇伟[1]三人）立即发表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就职布告，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叶剑英[2]为市长，李章达及我方一人为副市长，朱光[3]为秘书长）的就职布告。待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时再行追认。

中央
酉删

---

[1] 李章达，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张醁村，无党派民主人士。吴奇伟，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广东东部、福建西部起义；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3] 朱光，当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

中央关于新疆三区[1]代表和彭德怀[2]会谈问题的电报

（1949年10月15日）

力群[3]，并告彭：

十三日电悉。自治区[4]军政代表至彭处谈话，第一步是询问情况，在彭对情况未明了前难于提出初步方案。此次出席政协的赛福鼎阿里木江[5]二人，不久可由京乘飞机赴酒泉与彭见面，一切问题均可和赛阿二人商谈。故自治区暂时可以不另派代表去酒泉，待赛阿与彭谈话并回至伊犁后，如有必要再派代表为宜。

中央

十月十五日

---

[1] 指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的人民，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4年11月举行的武装起义后形成的三区人民自治区域。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力群，即邓力群，当时是中共中央派驻新疆的联络员。

[4] 指新疆三区。

[5] 赛福鼎，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阿里木江，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

同意分步骤在新疆进行军事工作[1]

（1949年10月15日）

彭、甘、许、王、徐[2]：

西文戌电[3]悉。我们认为你们分两个步骤在新疆进行军事工作及设置军事机关的意见是正确的，望照此妥慎办理。

军委

酉删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等的电报。

[2] 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许，指许光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王，指王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徐，指徐立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10月26日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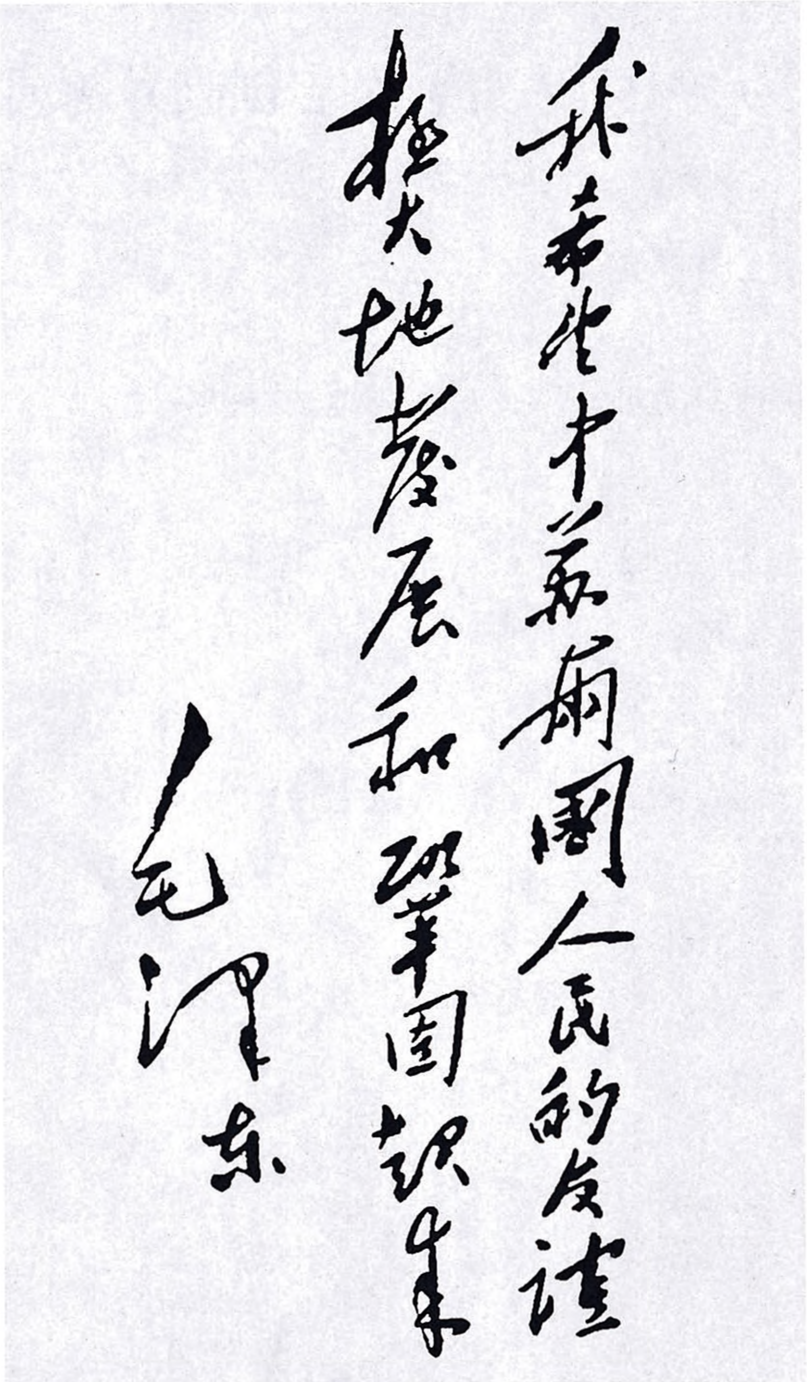
[3] 指彭德怀等1949年10月12日关于分两步进行改编陶峙岳部的工作给军委的电报。

为《中苏友好》杂志创刊号题词

（1949年10月15日）

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毛泽东



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苏友好》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给张仲实[1]的信

（1949 年 10 月 15 日）

张同志：

杂志[2]名称，请郭沫若[3]先生写为好。另写了一句话[4]作为杂志创刊号的题词。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

[1] 张仲实，当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理事。

[2] 指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

[3] 郭沫若，当时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

[4] 指毛泽东题写的“我希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极大地发展和巩固起来”。

致卫立煌[1]电

（1949年10月15日）

张枫[2]转卫立煌将军：

西江电[3]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毛泽东

酉删

---

[1] 卫立煌，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沈阳解放前夕回到南京，被蒋介石软禁。1949年初出走香港。他给毛泽东的电报是从香港发出的。

[2] 张枫，即饶彰风，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

[3] 指卫立煌1949年10月3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全文是：“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给周世钊[1]的信

（1949年10月15日）

敦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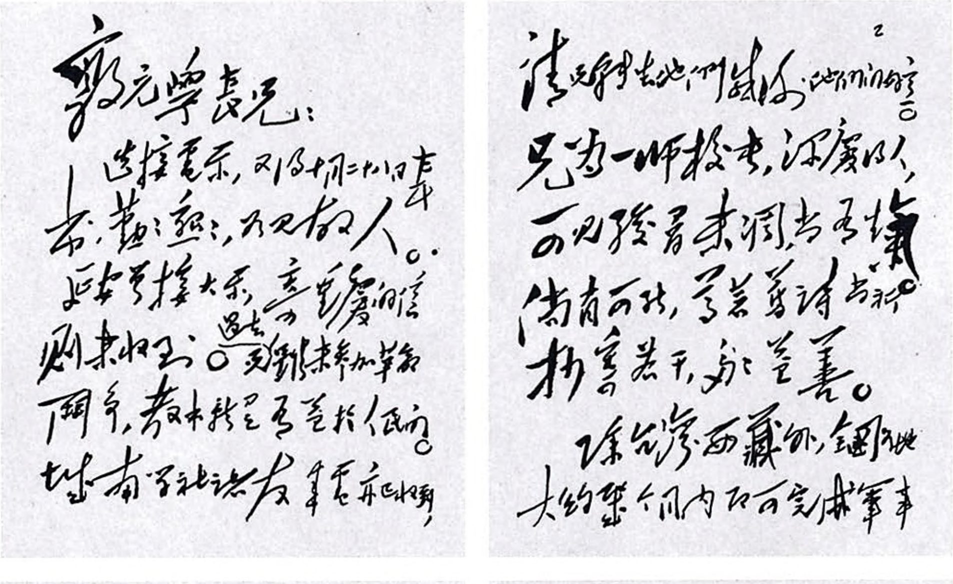
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

---

[1]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惇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来书，甚慰甚慰，不忘故人。延安曾接大示，亦曾复过回信，谅未收到。过去兄虽未参加革命阵线，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书并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谢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可否筹请书社物色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陆地大约数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任务。但大难甫平，民生困瘁，须有数年时间，才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信见示已收阅，[illegible]，请兄为我代致候意。他们工作问题，请告他们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顺此

奉覆，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49年10月16日）

罗申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贵大使的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我热烈地欢迎贵大使出任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在此，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接受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递交的国书。

1949年10月16日，罗申向毛泽东呈递国书。

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罗申大使向他递交国书后讲话。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49 年 10 月 16 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威廉·皮克总统和奥托·格罗提渥总理：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全中国的人民，热烈地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热烈地祝贺威廉·皮克先生和奥托·格罗提渥先生当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和总理。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表示德国历史的根本转变。人民大众代替独占资本家和大地主成为德国的主人。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德国，曾经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心的德国，现在已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而加入了人民民主国家的行列。这是以美国反动政府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分裂德国并恢复德国成为反动国家和战争基地的罪恶政策之决定性的失败，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

人民的德国和人民的中国同处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的最前线，当此民主德国宣告成立之际，我们特别感觉高兴。谨祝德国在人民民主力量领导之下恢复统一和日益强大，谨祝中德两国人民友谊日益发展。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六日于北京

四兵团应乘胜追击占领高要德庆等县

（1949年10月17日）

林彪[1]同志，并告剑英、陈赓[2]：

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我四兵团似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然后停下来休整待命，听候你的统一部署入桂作战。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灭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即是对于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是否可以这样做，请按情况酌定。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解放西南地区的作战方针

（1949年10月19日）

林彪[1]同志，并告叶、陈[2]：

十八日十二时电[3]悉。（一）你们准备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这一计划是很好的。（二）西南重心是四川，我二野主力必须于十二月占领叙府[4]、泸州、重庆一带，贺[5]率十八兵团则于一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布置明年春耕，方有利于生产建设。因此不论白崇禧是否退云南，我三五两兵团只准备以一个军

---

[1]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指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林彪等1949年10月18日12时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关于广西作战，我们准备以围剿与长追的办法，争取歼敌于果德、南宁以东地区。目前，桂林、全州以东、以北，敌我相距较远，我正面部队估计已甚难抓住和抑留敌人。因此，拟先以大迂回抄断敌退云南之路。二、如估计两广之敌、通四川之敌皆可能向云南退却，则我二野部队是否可以五兵团先占昆明，以三兵团占贵阳，夺取敌之后方，分割与隔断敌人，然后二野由昆明再向北解决四川问题为好。

[4] 叙府，今四川宜宾。

[5] 贺，指贺龙，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仍在西北，尚未到职。

（即十八军）进占贵阳，并经营贵州；其余五个军、两个兵团部及二野直属队，均由湘西分路直取叙、泸、渝（留一部于遵义一带），务于十二月达到该地区，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局。否则一百五十万人的财经问题将陷于极大困境。这里所说的一百五十万人，是指我军六十万人（其中二野全军五十万人，贺部十万人），张群[1]所属国民党川、滇、黔、康[2]四省军政人员据说有九十万人，主要是在四川。（三）根据你所说的大迂回方案，估计白崇禧部可能有一半或更多被我歼灭于广西境内，退到云南去的或者不很多。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3]等部，共有敌军十五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因为路远粮缺，往返不易，如去两个兵团（二十万人），有陷入困境之虞。估计陈赓以十万人入云南，采取各个歼敌方法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过时间略为延长些罢了。（四）请根据上述方针进行部署。（五）刘邓于明日或后日由京经汉赴湘，指挥二野向四川进军。三五两兵团，请令其补齐棉衣，进至湘黔边境待命。

毛泽东
酉皓

---

[1] 张群（1889—1990），四川华阳（今属双流）人。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2] 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3] 卢汉（1895—1974），云南昭通人。当时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率部在昆明起义。

关于高凌云[1]师与陕北伊盟部队合编的电报

（1949年10月19日）

彭、习[2]：

我认为习、张[3]酉灰电第二方案较好。高凌云仍当第二师师长。该师开回陕北与陕北伊盟部合编，加强战力，作为陕北伊盟警备部队，如此对外影响较好。左协中[4]在政协会后有进步，应在陕西给以适当位置（例如省府委员）。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酉皓

---

[1] 高凌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3] 习，指习仲勋。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

[4] 左协中，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8年5月率部在陕西榆林地区起义。

中央关于物色民主分子参加广西工作的电报

（1949年10月19日）

华中局：

你们十七日吸收李任仁[1]为广西副主任或副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云逸[2]正和李任仁谈此事。我军占领广西全省后还要物色其他民主分子参加工作。

中央
酉皓

---

[1] 李任仁，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委员。1947年冬在香港参加发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 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

给斯大林的信

（1949年10月20日）

斯大林同志：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时对他给以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日于北京

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49 年 10 月 20 日）

一

现在作战情况是这样：

第一野战军四个兵团（原来西北两个兵团，华北去了两个兵团），四十余万人，由彭德怀[2]率领。

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五十万人，由刘伯承、邓小平[3]率领，现正运动中，准备到西南去。现已到宝庆地区，正补棉衣，棉衣穿上后即去。

第三野战军四个兵团，六十万人，由陈毅、饶漱石、粟裕率领，主要是对付帝国主义。现一部正在金门、定海[4]地区作战，一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的节录。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4] 定海，今浙江舟山。

部正准备船只，准备攻台湾。这个野战军我们准备完全不动。

第四野战军由林彪[1]率领。这个部队比较大，北平南下时有八十万人，现在又加上程潜、陈明仁[2]的，李先念[3]的，华南的，已超过一百万人。这个部队现在所占的地区，大都是新区，只有河南、湖北才解放两年，算半老区，其他全都是刚解放不久的。这个部队对外国关系不大，只有广州一地，帝国主义要来的话只有英国，我们在广州驻有两个军，并有广东广大的地方军配合。

现在我们对付帝国主义有两个中心：一是上海，一是天津。青岛关系还不太大。现我们已在北宁线[4]集结了十五个师，上海地区全部靠三野。

进军西南的由刘邓三个兵团及贺龙[5]一个兵团，共六十万人，任务是经营云、贵、川、康[6]。贺龙部直下川北、川康边，刘邓部则从大别山到峨嵋山。估计今冬除昆明外，西南可全部解放。昆明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程潜，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与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陈明仁，原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与程潜在长沙率部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3] 李先念，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北宁线，指北京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一段。

[5]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此时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尚未到职。

[6] 康，指西康，旧省名，1955年撤销。

因陈赓[1]部需大迂回，时间较长。

西北的新疆问题。一野先头师十月十五日已到哈密，正与陶峙岳[2]交涉先去一个师，现陶很欢迎。进疆部队拟十一月至十二月到达北疆、南疆，否则再迟，一下雪，明年生产就不能布置，军队吃饭就成了很大问题。西南也同样，我们这样大的军队进去，吃饭是很大的问题。因此要看到我们这样大的军队是很大的生产力，明年必须很好地布置生产。

交通情况也决定我们的战略部署。我们拟今年底或明年一月将铁路全部修通。

海军自两只大军舰[3]来后，我们已占优势，现正训练中，他们很积极，他们认清了时局。两只大军舰起义都不是共产党员搞的，这证明中国的人心都已变了。

空军现在力量还很弱，上海、南京受敌人飞机威胁很大。

土匪问题，有个时候闹得很厉害。我军大举向前进军，这些土匪就像头上的小虱子一样，梳子梳过后残留下来了。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现在已打得差不多了。

整个作战情况及部署就是这样。至于战后军队组织，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时候，兵团根本就不要了，甚至军也可考虑不要，因为师减少了。干部到那时就可转出大批人来，现在到处缺人，因此

---

[1]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陶峙岳，原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在新疆率部通电起义。

[3] 指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和“长治”号两艘军舰，两舰先后于1949年2月25日和9月19日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队的这些人，一定要想法很好地转。另外，还有约四十万的旧军官，现在他们在要工作，大约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可做工作。我们原则上对这批人都要有个安置，不安置是不对的。对旧职员也要很好处理，使这些人都能有事做有饭吃。

现在我们有四百多万军队，再过几个月就会有五百多万，加上政府人员就有九百多万人。这样大的数字，非一般国家所能支持，但是我们必须准备支持一个时候才行。

二

关于部队转入生产问题。第七兵团王建安[1]部在浙江曾以一部分转入生产后，得到老百姓很大欢迎。将来部队大批转入生产时，还需要发些生产费，使他们发展生产或者与老百姓合作。这样，部队的生活就改善了，而国家的经费开始还是发给他们，待他们富到一定程度，就可少发或停发。这点各区要开始布置。

三

这次军委会增加了新人员、新的血液，这反映了我们的国防情况。过去我们军委从未开过会，前方忙着打仗，军委就我们几个人来搞。我们主要靠野战军、军区指挥。军队里面主要靠三大民主，

---

[1] 王建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

并实行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这“三教”使部队很快就能打仗，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政治工作也有一套。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其他部队也不少，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

我们军委会现在增加的几位，我们希望真正团结起来，来研究些问题。今后只要在北京的，我们经常开开会，出点主意。我赞成张文白[1]先生的提议，组织个国防研究小组，开始做些工作，由张先生当组长，刘斐[2]将军当副组长，蔡[3]先生、傅[4]先生当组员，聂荣臻[5]也可当个组员，还有我们的作战部长李涛，罗瑞卿[6]也可参加，以上共七个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参加工作，做些事情。需要什么材料，就向聂荣臻要。

现在我们的海岸线要开始建设，这个事情很重要。

---

[1] 张文白，即张治中。1949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脱离国民党政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2] 刘斐，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8月在香港与44名国民党知名人士通电与国民党政府决裂。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3] 蔡，指蔡廷锴，1930年任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军长。1933年参加组织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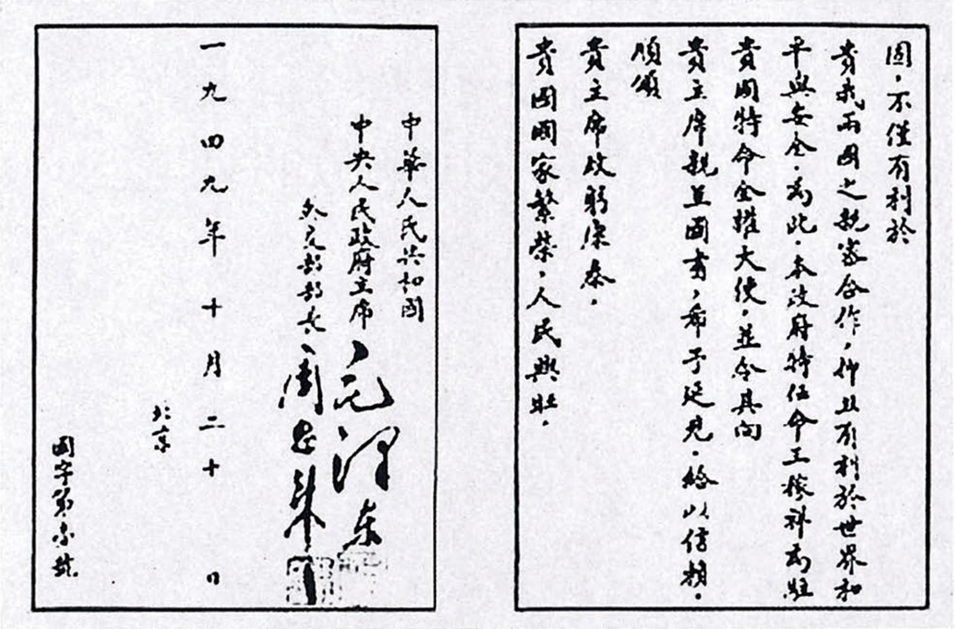
[4] 傅，指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5] 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6]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颐年堂
竹影扶疏翡翠亭
榴花照耀菖蒲岸

1949年10月20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图为毛泽东和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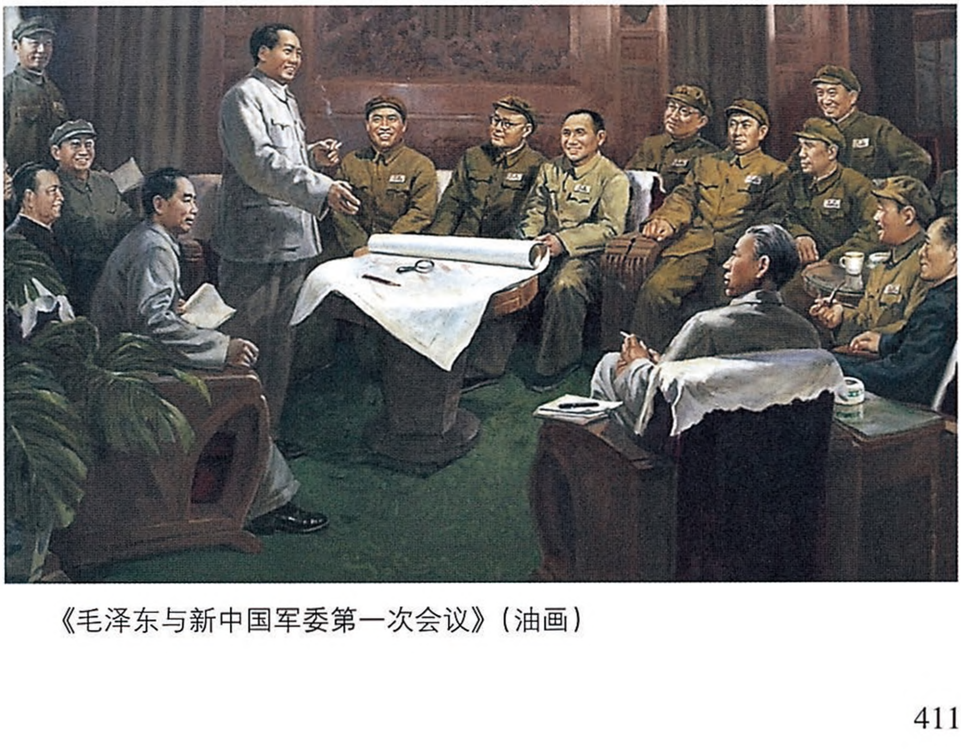
國·不但有利於
貴我兩國之親密合作，而且有利於世界和
平與安全·為此·本政府特任命王稼祥為駐
貴國特命全權大使·並令其向
貴主席親呈國書，希予延見·給以信賴·
順頌
貴主席政躬康泰·
貴國國家繁榮·人民興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外交部部長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
北京

國字第壹號

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国字第壹号”国书。



《毛泽东与新中国军委第一次会议》（油画）

对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1]祝贺新疆和全国解放的复电

（1949年10月21日）

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先生，并转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全体同志们和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全体同胞们：

感谢你的祝贺。伊犁、塔城、阿山三区人民的奋斗，对于全新疆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谨祝三区人民和全新疆人民团结一致，协同人民解放军，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

[1] 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临时代理主席。

关于写解放军进入新疆的短评给胡乔木[1]的信

（1949 年 10 月 21 日）

乔木：

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2]。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为好。关于人民解放军入新消息及评论，不要有“占领”字样，均称**到达**某地；评论中并应提到得到新疆军政当局同意并欢迎人民解放军迅速开进的。

毛泽东

十月廿一日下午三时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为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不幸遇难写的碑文和唁电[1]

（1949年10月、11月）

一

为民族解放及人民民主事业服务而牺牲的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志、伊斯哈克伯克·木奴诺夫同志、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同志、达力立汗·苏古尔巴也夫同志、罗志同志们的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二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新疆人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批代表，新疆省副主席阿哈买提江同志，新疆省伊犁、阿山、塔城三区民族军总指挥

---

[1] 据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唁电的起草时间是1949年10月22日。碑文和唁电中，有2个人的名字，因译音不同写得不完全一致。

伊斯哈克伯克同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同志，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列尔汉同志，和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的罗志同志，不幸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因飞机失事在来北京途中遇难[1]。这是新疆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一个巨大损失，我对此表示深沉的哀悼。阿哈买提江等五位同志生前为新疆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最后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而牺牲，值得全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阿哈买提江同志，伊斯哈克伯克同志，阿不都克里木同志，达列尔汉同志和罗志同志永垂不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1] 遇难时间应为8月27日。

在赛福鼎[1]入党申请书上的批语

（1949年10月23日）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此信由赛本人带交彭德怀[2]同志即存彭处。待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同志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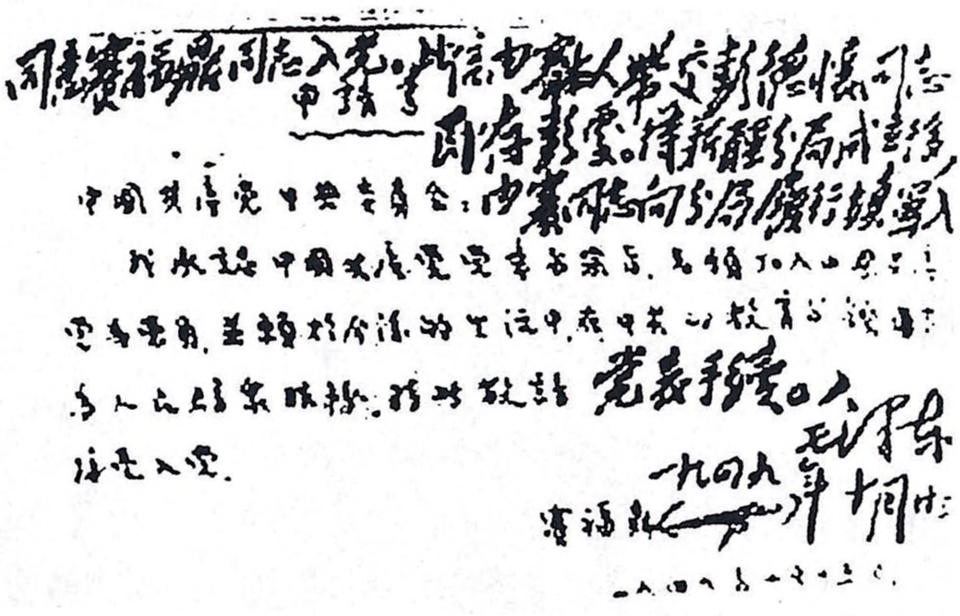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三日

---

[1] 赛福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他在1949年10月15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入党申请书。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同意赛福鼎同志入党申请书。此信由赛人带交彭德怀同志阅存，彭电。请新疆分局成立后由赛福鼎向分局履行填写入党表手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廿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承认中国共产党党章与党纲，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愿于今后的生活中在中共的教育下，彻底为人民大众服务，特此敬请准予入党。

赛福鼎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在赛福鼎入党申请书上的批语的手稿。

中央关于新疆问题致彭德怀[1]电

（1949年10月23日）

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一）出席人民政协的新疆自治区代表赛福鼎（维族）、阿里木江（乌孜别克族）、涂治（汉人）[2]本日乘机飞酒泉，和你谈话后回新疆。（二）自治区领袖阿哈买提江[3]等五人为出席政协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在西伯利亚失事不幸牺牲。赛福鼎等三人为第二批代表。赛福鼎为代替阿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关于在新疆各民族中建立共产党及推广外围团体的问题，另电通知。（三）关于民族军（一万四千人）与人民解放军配合工作问题，我们已与赛福鼎谈过。我们认为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钳制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十万人，对于中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赛福鼎，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代主席。阿里木江，当时任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塔城区分会主席。涂治，当时任新疆学院副院长。

[3] 阿哈买提江，逝世前是新疆北部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人民自治区域的领导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一万四千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此事如何具体进行，请与赛福鼎进行初步商谈。尔后，由分局逐步解决。

中央
十月廿三日

祝贺“海辽”号轮[1]起义致方枕流等电

（1949年10月24日）

海辽轮方枕流船长和全体船员同志们：

庆贺你们在海上起义，并将海辽轮驶达东北港口的成功。你们为着人民国家的利益，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脱离反动派而站在人民方面，这种举动，是全国人民所欢迎的，是还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本控制下的一切船长船员们所应当效法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

[1] “海辽”号轮是原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的运输轮船，1949年9月19日在由香港驶汕头途中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当局。

在一则新闻稿上的批语

（1949年10月24日）

乔木[1]：

此类新闻[2]，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台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3]。

毛泽东

十月二十四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送审的新华社1949年10月24日关于进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逮捕原国民党政府军队中反动分子的新闻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和绥远[1]负责人的谈话

（1949年10月24日）

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2]他们九月十九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3]。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

---

[1] 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1954年撤销。

[2] 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5月28日派代表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签订《绥远和平协议》。9月19日，率军政各界和蒙、汉各族代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电起义。

[3] 1949年9月19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9月20日，毛泽东、朱德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归绥远领导[1]，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2]任主任，乌兰夫[3]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八十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4]任副司令员，薄一波[5]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6]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

---

[1] 伊克昭盟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或间接领导。绥远和平解放后，经中共中央华北局与西北局商定，划归华北的绥远省领导。

[2]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3] 乌兰夫（1906—1988），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4] 姚喆（1906—1979），湖南邵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5]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6] 奎璧（1903—1986），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1]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二十二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

---

[1] 傅作义提出的四个原则是：一、坚持团结；二、肃清特务；三、纪律要整顿；四、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一、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二、恢复交通；三、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改造。

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

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一万二千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一万二千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二百万人民，十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三百万党员、四百万军队、四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

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

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1]。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2]。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

---

[1] 叶公好龙，出自汉朝刘向《新序·杂事》。这里是用以比喻口头上拥护统一战线，实际上又害怕搞统一战线。

[2] 大禹、伯鲧，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部落首领。鲧为禹之父。他们先后奉尧、舜之命治水。鲧采用筑堤堵水的方法未能治平水患，禹改用疏通江河、兴修沟渠的办法治理洪水获得成功。

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中央关于召开西北局会议的电报

（1949年10月25日）

西北局，并德怀[1]同志：

（一）同意西北局酉迥电，马鸿宾仍任宁夏副主席，邢肇棠改任青海副主席。[2]（二）贺[3]在京事毕，明日或后日动身回西北。他到西安后，请彭决定在十一月上旬在兰州或酒泉或西安开一次西北局会议，讨论各项问题，包括贺及十八兵团离开西北进入四川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及各省政府名单的最后确定问题等。

中央

酉有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2] 这里所说的关于马鸿宾、邢肇棠的任职意见，后来均有改变。马鸿宾，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宁夏起义，1949年12月2日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邢肇棠，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水利委员会主任，1949年12月2日任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3]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同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均未到职。

军委关于同意解除十兵团出击潮汕任务的电报[1]

（1949年10月25日）

华东局，并告华南分局：

同意十月廿二日廿三时电所提十兵团解除出击潮汕的任务，以便于攻克金门后迅即部署福建全省的剿匪工作。

军委

十月廿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

中央关于湖南临时省政府改组问题的电报

（1949年10月25日）

华中局，并告湖南省委：

（一）十月十六日电悉。谭余保[1]在北京时要求到地委去工作，我们已同意，并同克诚[2]谈过。因此，他以不担任省政府副主席为宜。（二）陈明仁挂名为主席的临时湖南省政府，目前一二个月内如尚无必要实行改组，则不必马上改组，仍照现时状态做下去，待一二个月后再行改组为我党占比较多数同时网罗各方民主人士在内的统一战线的省政府，那时可重新审定名单。（三）关于以中原人民政府作基础网罗党内外各方人物建立统辖六省[3]的军政委员会机构问题，将另电通知你们。

中央

十月廿五日

---

[1] 谭余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1950年4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3] 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

转发人民解放军入疆综合报告[1]

（1949年10月25日）

菲利波夫[2]同志：

现将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的先头部队的第一个详报[3]转发给你。这个报告是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在十月十八日由哈密发出的。那时，我军还只到达哈密、吐鲁番、鄯善等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1949年10月18日20时呈送的《入疆综合报告》。报告说，我军于10月12日从酒泉、玉门、安西之线出动。到10月18日为止，我军第四师第十二团已进至吐鲁番。第十团及师指，现在鄯善。第十一团之一部正向鄯善车运中，一部仍在哈密。军指及第五师师指和第十四团、第十五团仍在哈密。综合报告如下：一、我军入疆得到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二、张治中、陶峙岳的新疆起义部队有三种不同表现：一种是解放军来到前，反动分子组织和煽动国民党军放火，但解放军到后停止了这种现象；一种是解放军到达时，反动分子煽动国民党军队杀人、放火，企图阻止解放军前进；一种是自起义后始终维护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对这三种不同表现的部队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和态度。三、肃清特务分子、反动分子是保证新疆和平解放胜利的重要条件。四、新疆民族问题仍然复杂，但有党的正确民族政策，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团结新疆各民族，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五、部队纪律在群众中有好的称赞。

地。至十月二十日时，已进到迪化[1]和焉耆。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

[1] 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

（1949 年 10 月 2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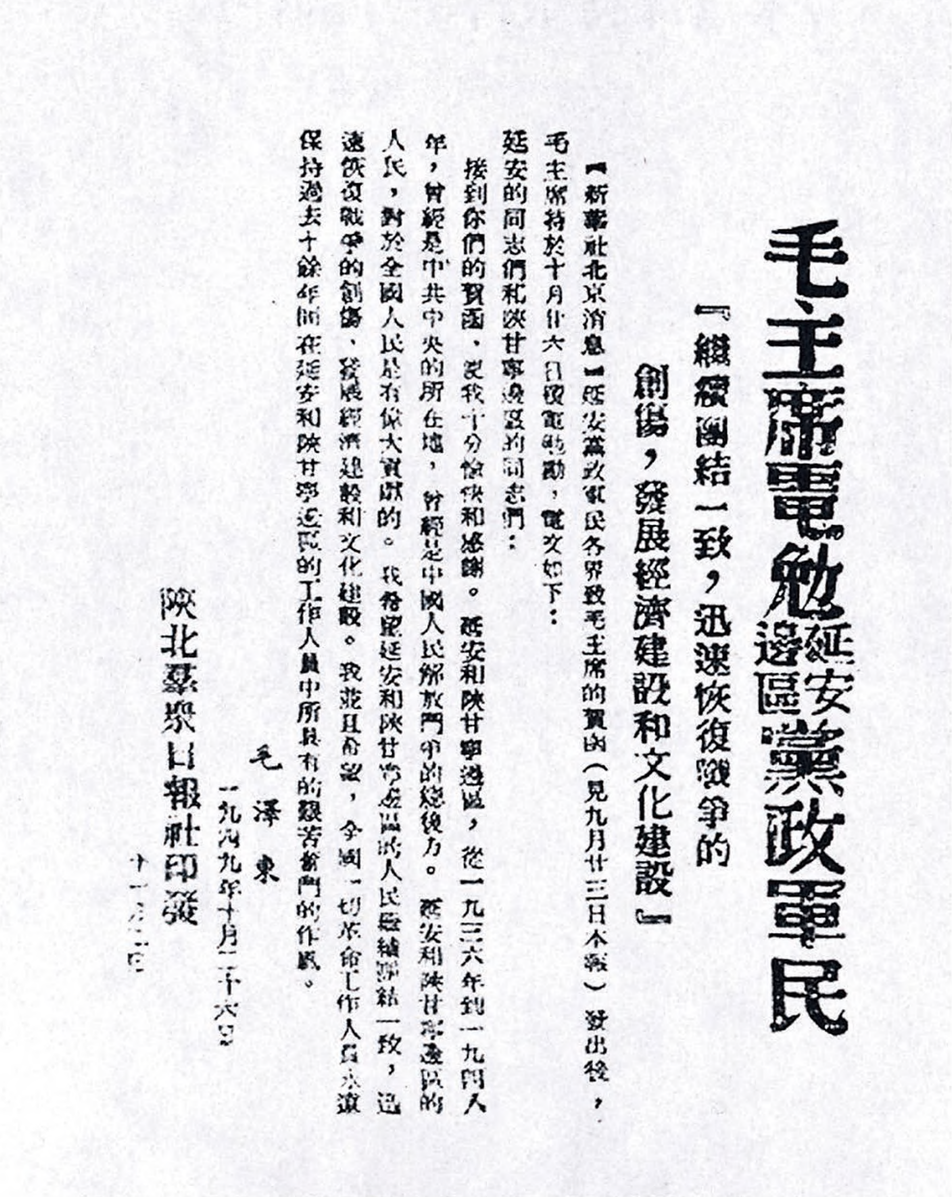
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

接到你们的贺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谢。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我庆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继续团结一致，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并且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

[1]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延安党政军民各界给毛泽东打电报，毛泽东 10 月 26 日复电。



毛主席電勉延安邊區黨政軍民

『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新華社北京消息】延安黨政軍民各界致毛主席的賀函（見九月廿三日本報）發出後，毛主席特於十月廿六日復電勉勵，電文如下：

延安的同志們和陝甘寧邊區的同志們：

接到你們的賀函，使我十分愉快和感謝。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的總後方。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對於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我希望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繼續團結一致，迅速恢復戰爭的創傷，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我並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餘年間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鬥的作風。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陝北群眾日報社印發
十一月二日

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复电给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各界的同志们。图为陕北群众日报社印发的号外。

复霍查同志电[1]

（1949年10月26日）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恩维尔·霍查主席：

深深地感谢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祝贺。我在此仅祝中国人民与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友谊日臻亲密。我相信，在你领导之下的英勇的遵循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必能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战胜帝国主义和铁托反革命集团的威胁，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霍查同志来电祝贺。这是毛泽东的复电。

复拉比·蒲哈利电[1]

（1949年10月26日）

拉比·蒲哈利同志和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同志们：

对于拉比·蒲哈利同志十月九日的贺函，谨表深切的感谢。

中国人民是从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压迫下求得解放的。因此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热烈的同情和坚定的信心。我相信，阿尔及尔人民在阿尔及尔共产党领导下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援助下，终将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阿尔及尔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阿尔及尔共产党中央来电祝贺。这是毛泽东的复电。

关于撤销迪化[1]伪监委行署的电报

（1949 年 10 月 27 日）

迪化临时人民政府鲍[2]主席：

西马电悉。迪化伪监委行署应予撤销。公物档案希派员接管，造册具报政务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原有人员之生活无着者，酌予维持。

毛泽东
西感

---

[1]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2] 鲍，指鲍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

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致斯大林电

（1949年10月28日、30日）

一

菲里波夫[1]同志：

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再则，前次苏联政府派来以马意斯基[2]（маїскиї）同志为领队的三十多人的防疫队，在东北进行防治鼠疫的工作，成绩甚大，东北人民及中国卫生工作者极为感谢，现他们正在返苏途中。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倘蒙允诺，不胜感谢！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2] 马意斯基，苏联医学家，当时任中苏医务人员组成的防疫队苏方队长。

二

菲里波夫同志：

十月廿九日来电收到。承你派送专门医生，防疫队和大量药品到北京来，甚为感谢。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卅日

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

（1949年10月29日）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2]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

---

[1]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袁仲贤（1904—1957），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代参谋长。周骏鸣（1902—2003），河南确山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

[2] 叶，指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陈，指陈庆先（1908—1984），湖北黄陂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参谋长。

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

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董其武部改编问题给薄一波的信[1]

（1949年10月29日）

一波同志：

十月二十八日信悉。绥远两个军及一个骑兵师，可以编入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并颁发番号；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惟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此点请与傅宜生[2]商酌。如果他认为此时发表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有不便处，则军事人员可以事实上先行到职，而正式委任则待政治人员商定后一同行之。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须由傅宜生亲自领导方能行得通，否则难免出乱子。

毛泽东

十月二十九日

---

[1] 董其武，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2] 傅宜生，即傅作义，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转发薄一波关于华北各城市各界代表会议报告的批语

（1949年10月30日）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同志们：

现将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同志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给我的一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这个报告总结了华北各城市所开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1]，写得清楚明确，可为一切各界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所取法。因此，请你们认真研究一下，并且印发给全党干部研

---

[1] 薄一波在这个报告中总结的召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的主要经验是：一、城市各界代表会议，一般都以当前生产上的重要问题为议题，如原料如何供给，产品如何推销，劳资关系如何调整，城市粮食如何供应等。二、会前进行充分的筹备工作，利用各种方式宣传解释各界代表会议的任务和代表的标准、职权等，广泛收集群众意见。代表一般由人民团体推选加政府聘请，推选代表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广泛的代表性。三、每次会议，应抓紧解决为广大群众所迫切要求解决的一两个问题。决议后一定要贯彻执行，不能执行的，不要决定；决定了但行不通的，应向代表和群众说明道理，加以解释，以示信于人民。四、谦虚征询各方面意见，解答问题，使每个代表都有发言的机会，是开好代表会的关键。认真报告人民政府的工作，尤其把财政公开出来，代表们甚为感动，认为“这才是真民主，是对人民负责”。五、会议后，各个代表向其所代表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部队和行业，分头报告和解释会议的决议，是很重要的，效果很好。六、各界代表会议一定要和当前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究（中央已印二千余份发给中央直属各部委社院校的同志们）；同时请你们用电报发给你们所属各市委省委区党委并转发到地委县委及一切中小城市的党委，引起全党干部的注意。同时，希望你们注意总结你们自己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报告中央，是为至盼。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

（1949年10月31日）

林彪[1]同志，并告子恢，剑英，陈赓[2]及刘、邓[3]：

关于兵力部署的几点意见：（一）我们已占领广州及广东的大部，广州、香港、澳门之间的海上残敌尚未肃清，陈赓兵团即将入桂作战，内外敌人可能窥伺广州。白崇禧[4]匪部如被程子华[5]、陈赓切断逃往云南、安南[6]的道路，有东窜入粤可能。因此在广西问题彻底解决以前，邓华兵团[7]（两个军）必须全力镇守广州（主力）、韶州[8]（一部）之线，不要进攻雷州半岛，更不要攻海南岛。华南分局决定邓华兵团迅速离开广州南进的计划是不妥当的。必须等候广西问题解决以后，从广西调出四野一个至两个军到广州、韶州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4]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5] 程子华，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

[6] 安南，即越南。

[7] 邓华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邓华。

[8] 韶州，即今广东韶关。

线，邓华兵团方能南进。（二）全国国防重点是以天津、上海、广州三点为中心的三个区域。二野入云、贵、川、康[1]后，三野只能防守华东，置重点于沪、杭、宁区域，以有力一部准备取台湾，没有余力兼顾华北。现在华北只有杨成武[2]三个军及其他六个二等师位于京、津、山海关一线，一旦有事，颇感兵力不足。除令一野以杨得志兵团[3]（三个军十万人）位于宝鸡、天水、平凉区域，有事可随时调动外，四野在广西问题解决后，拟以五个军位于两广，担任广州为中心之两广国防；以三个军位于河南，准备随时增援华北；其余各军，位于湘鄂赣三省并以主力位于铁道线上，可以向南北机动。在目前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四野除完成各省剿匪任务外，如能做到，甲、解决广西问题，乙、修通粤汉[4]湘桂两路（这是极重要的），丙、利用铁路运输完成上述国防部署，就是完美无缺的。请你们十分注意粤汉湘桂两路的修复和守备。（三）陈赓、程子华须同时向柳州、南宁动作，方能完成围歼白匪任务。现敌鲁道源[5]兵团似正准备由桂林以南转入柳州地区，估计是准备去云南的。而我陈赓部刚才解决粤敌，须休息若干天方能行动。程陈两部何时可以开始入桂作战，望告。（四）据有经验者称：由百色入云南的道路上瘴气（恶性疟疾）为害，不利行军。因此，陈赓部在解决广西问题后应准备循柳州、贵阳道路入滇，不一定走百色。

---

[1] 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 杨成武，当时任华北军区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3] 杨得志兵团，指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4] 粤汉，即粤汉路，指广州至武汉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5] 鲁道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

（五）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十月三十一日

关于华中成立军政委员会问题致林彪[1]等电

（1949年10月31日）

林彪，子恢[2]，湖南省委，并告刘、邓[3]：

（一）程潜程星龄[4]和我们谈得很好。我对程星龄谈的许多话，已托他向你们转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拉好对程潜、程星龄、李明灏、唐星[5]及其他进步分子的关系，争取他们和我党进一步靠拢，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

[3]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4] 程潜，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程星龄，程潜族弟，曾任国民党政府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参议，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在长沙参与程潜、陈明仁起义活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参事、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5] 李明灏，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8年到华北解放区，参加过北平和平解放的工作，并对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贡献；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唐星，原国民党政府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曾对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起义做出贡献，担任程潜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站在共同纲领基础上，打击反动分子，改造陈明仁[1]部，以利民众运动的发展。（二）陈明仁返湘后表现如何，陈明仁兵团的改造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程潜等一行已到汉口否？（三）请湖南湖北两省委各将统一战线工作及民众运动工作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四）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2]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拟以林彪为主任，邓子恢程潜为副主任，委员须网罗六省党内党外重要人物。现林彪已去衡阳指挥作战，请子恢考虑是否有必要召集王首道（或金明），陈正人，张玺，李先念[3]四人在一起商量一下，开出一张不包括两广的四十人左右的名单电告中央考虑；或者用电报叫湘赣豫三省委开出三省名单，加上湖北的名单，电告我们（两广名单由中央拟定）。此项名单，希望能于两星期内电告，但不要向外面泄露。（五）关于组织华中军政委员会[4]及请程潜当副主任事，我们已和程潜程星龄谈过。程潜表示愿就副主任，在林彪领导之下从事工作。

毛泽东

十月卅一日

---

[1] 陈明仁，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

[2] 指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

[3] 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金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副书记。陈正人，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张玺，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李先念，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4] 1949年12月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时名称为中南军政委员会。

为《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书写的序言

（1949年10月）

捷克共产党的同志们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献和我所写的关于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以捷克文出版，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引以为荣的。中国人民的斗争与欧洲人民的斗争，是一个共同事业的不可分离和互相援助的两个部分，虽然由于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它们的革命发展阶段也不同。欧洲的关心亚洲命运的一切读者们，由于阅读这些短篇的文件，特别是由于阅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六十条共同纲领，将获得关于新中国的基本常识。我相信，捷克的同志们为帮助欧洲读者认识新中国所作的努力，对于国际革命运动乃是一个可感谢的贡献。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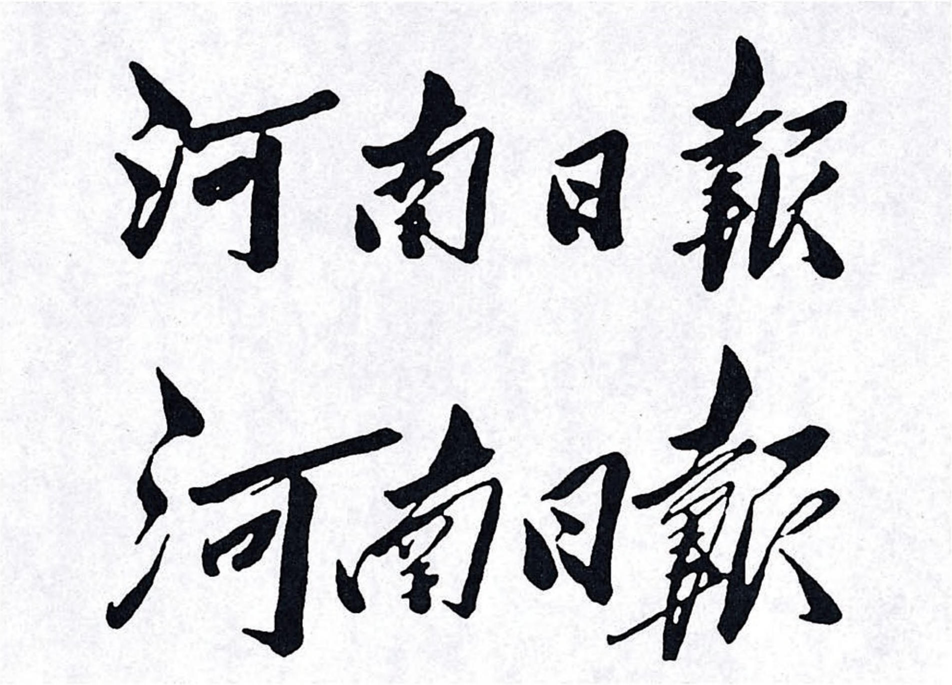
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1月1日）

河南日报

---

[1]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出席会议，大会期间请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10月下旬，毛泽东题写的《河南日报》报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河南省委。毛泽东共题写了4组“河南日报”字样，经河南日报编委会研究决定并报省委批准，选定了毛泽东圈定的第一组“河南日报”报头，并于1949年11月1日启用。1952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之际，河南日报编委会决定后报请省委批准，改用毛泽东圈定的第四组“河南日报”报头，一直沿用到现在。



河南日報

河南日報

毛泽东为《河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对空军关于航校校址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49年11月1日）

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在北京、济南两处办两个空军学校。[2]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聂荣臻1949年11月1日转呈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转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和参谋长王秉璋1949年11月1日的报告说：根据苏联航空专家在国内侦察太原、石家庄、保定、济南等各机场的所获情况及专家的意见，认为太原、石家庄办航空学校不适宜，北京、济南、保定三个地点办航空学校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缺点。济南的缺点是安全性没有十分把握。保定机场条件不错，缺点是房屋条件较差。北京南苑办一个学校目前很好，但在将来军航、民航进一步发展时，也可能感觉有点拥挤。聂荣臻的转呈报告说：航校还有两校地址未确定，现苏联专家意见拟在济南和北京南苑各设一校，请速确定以便筹划一切。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村政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49年11月2日）

一

华中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德怀同志：

兹将浙江省委十月廿七日关于几个带政策性的问题的意见[1]转发给你们。这些问题各省都有，值得注意，请转发所属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连同自己在反霸减租斗争中所得材料加以研究，以其意见汇报中央为盼。

中央

十一月二日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49年10月27日再给华东局并报毛泽东并各地委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反霸减租斗争中8个带政策性问题的意见。这8个问题是：一、减牛租问题；二、雇工增加工资问题；三、大租、小租是否同时减租的问题；四、对恶霸地主的工商业的处理问题；五、在强大农民运动威力下，对有的主要的恶霸地主向政府自首的处理问题；六、积谷、公谷、庙谷、祠堂谷的处理问题；七、反霸中没收的森林及公共森林的管理问题；八、一切公田、公地是否减租的问题。

二

饶漱石[1]同志转浙江省委：

最近关于农村中几个带政策性问题及以前几次报告，均由华东局转来阅悉，并且均已转发各地研究，参酌施行。我认为浙江省委的这些报告都是写得好和很有用的。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关于长安县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1]

（1949年11月2日）

各中央局分局：

请你们注意长安县的经验。并请你们转发所属注意仿行。

中央

十一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批转西北局的关于长安县各界代表会议经验的指示。

中央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

（1949年11月2日）

华中局，湖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据新华总社交来天津方面投书一件，内称，“前读《天津日报》刊载贵社本年九月十六日社论《六评白皮书》，内有一段云‘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在当时读悉之后，对于中共中央发布此种适合人情之指示，不胜钦仰。兹于近来先后接读长沙湖南盐务办事处很多同事来信云，他们机关在长沙解放后，延了好久始派人前往接收，并且两个多月未发给丝毫生活费用。直到最近，方将人事处理办法公布。计原有员工三百人，只留了四十多个，其余一律遣散了事，以致大部分人员顿告失业，均以目前谋事远较国民党统治时代困难万倍，无不感到今后生活无着。我常想到，长沙是和平解决的，并且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宣告成立，各级机关增加，该地原来旧有员工，必可全部获得留用机会。纵或机构改组，或原有人数过多，亦可另予安置。但照上述情况，不但我的理想落空，并且湖南此种处理人

事办法，颇与中共中央指示大相违背，难免令人失望。我认为，共产党人说话，向可兑现，遇有言行不符之处，必可纠正。特此函陈贵社，拟请转呈毛主席。如果此事系执行人发生偏差所致，则祈迅电湖南军政委员会及长沙军管会赶快收回成命，将遣散之旧有人员，分别询明各人意志，予以工作机会，发给生活费用，俾维信誉，而定人心。结果如何，盼于报端发表为祷！此上　北京新华总社。我因最近回籍（湖南），故不写通讯地点，亦不署名，请原谅（十月十日于天津）”等语。关于这一问题，应作如下处置：（一）关于投书内所称之湖南盐务办事处遣散多数旧人员一事，请湖南省委派人查明情况并拟具处理意见电告。（二）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最近西北局关于处理旧人员问题有一具体办法[1]，中央业已转发你们参考办理，请加注意，并转告所属注意为要。

中央

十一月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0月14日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指示。

军委关于同意定海作战方案致粟裕[1]等电

（1949年11月4日）

粟、唐、张、周[2]，并告华东局：

同意你们戌东电所述定海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你们采取慎重态度，集中优势兵力，事先作充分准备，力戒骄傲轻敌的方针是正确的。

军委

十一月四日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

[2] 唐，指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指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周，指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

关于改造和补充陈明仁[1]部致林彪[2]电

（1949年11月4日）

林彪同志，并告子恢[3]：

十一月二日电悉。你对陈明仁部所取方针[4]是正确的。六十二师俘虏兵如尚未分散，可以拨补陈部。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

---

[1] 陈明仁，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

[2]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

[3]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4] 林彪在1949年11月2日给毛泽东并邓子恢的电报中提出的对陈明仁部的方针是："加紧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改造，学习革命道理，提拔进步分子，改正错误思想，分批集训落后干部，而当前以政治改造为主。"电报中并说准备待广西战役结束后，抽出两三个东北来的独立师或一个完整的军与陈明仁部合编或混编，还说到陈明仁要求将俘虏的国民党政府军六十二师的官兵补充给他的部队。

关于收集和研究上海税收办法的批语

（1949年11月4日）

薄一波[1]同志：

请将此项情报[2]抄送黄敬[3]，并收集上海税收办法，加以研究。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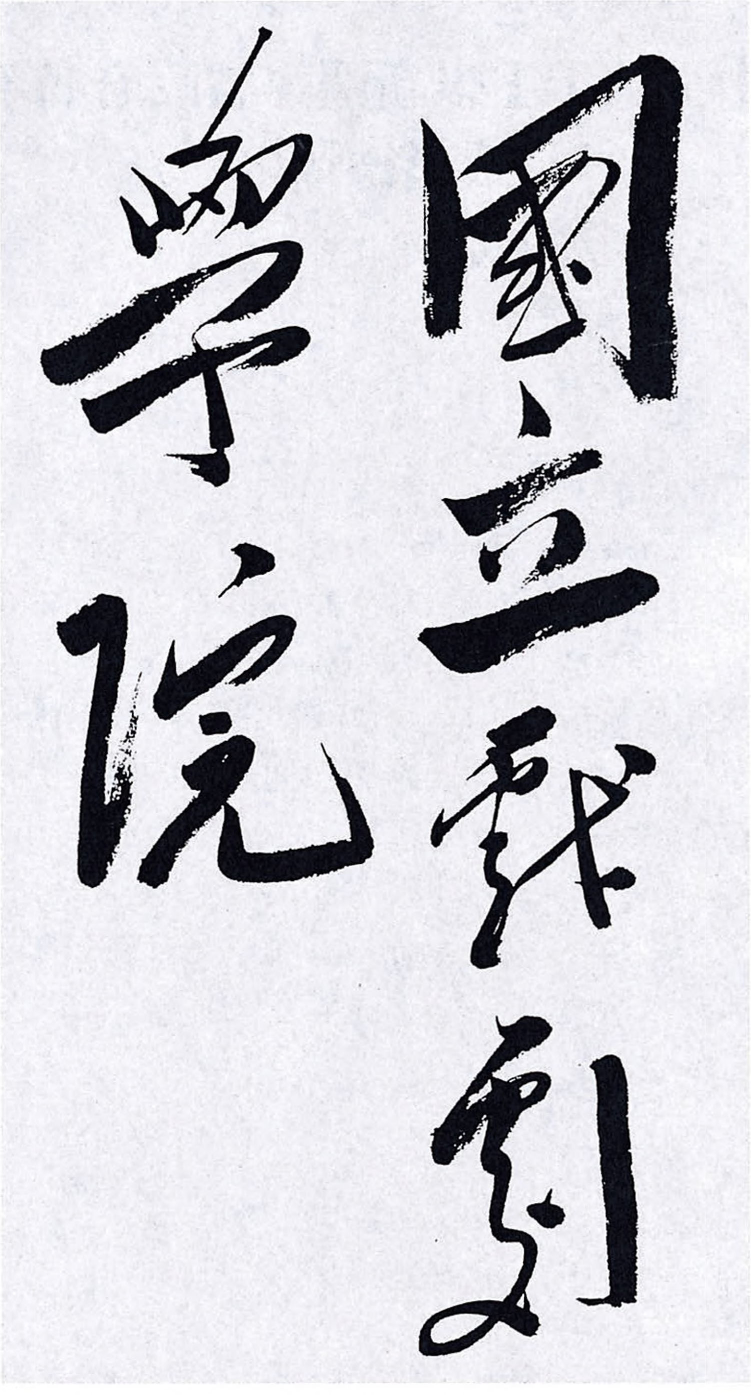
[2] 指中共上海市委在1949年11月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转述的英国侨民致英政府备忘录要点。转述的要点有：“英侨情况，现亦略好转。对身受政府一视同仁之待遇，无不感激。惟对某些税收制度及劳资问题，尚有意见。例如，税收方法、税率及制度，全国应一致。在天津之合并征收所得税及营业税，似非合理，更依照‘付税能力’强定工商业税，亦不科学，对工商业均有严重不良影响。惟上海之营业税法及印花税法，系参酌本市实际情况而定，人民无不称善。”

[3] 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名

（1949 年 11 月 4 日）

国立戏剧学院



毛泽东为国立戏剧学院题写的校名。

中央关于上报新疆等省政府名单致彭德怀电

（1949年11月6日）

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一）酉陷电悉。新疆情况经你研究后已大体明了，甚慰。（二）同意以曹力如[1]为新疆省政府第一副主席。（三）新疆省政府全部名单，请在此次兰州开会的西北局会议上，连同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省政府名单及西安兰州迪化[2]等市政府名单及西北军政委员会名单，作一次通盘考虑，列出一单电告中央最后决定，交中央政府通过以命令发表。（四）新疆省军政委员会问题张治中[3]曾表示不必列名，不要他担任此职不成问题。现应考虑者，新疆既有联合省政府又有联合军区，并以彭为司令员兼政委，似乎不必再设军政委员会了。

中央

十一月六日

---

[1] 曹力如，当时任陕西省陕北行署主任。

[2]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3] 张治中，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对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央关于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电报

（1949年11月6日）

华东局：

关于暂时不建立华东人民政府而建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以为过渡时期的政权机关及该委员会名单问题，陈刘[1]返沪后谅已转达我们的意见。现请你们迅即加以考虑并将具体名单于本月十五日前电告，以便连同华中及西北两项名单由中央作最后审定提交中央政府通过。我们认为建立此项华东临时政权机关的时机业已成熟了。

中央

十一月六日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刘，指刘晓，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部长。

对聂荣臻关于卫生部问题报告的批语

（1949年11月6日）

刘、朱、周、聂、尚昆[1]：

（一）卫生部错误检讨[2]，由尚昆印发中央及军委各部、委、会、社、院、校负责人参考；（二）卫生部所作关于卫生行政会议报告书及所附参考材料，牵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应由尚昆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及薄聂陆乔陈[3]，以待中央讨论，分别采取政府立法或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此次卫生行政会议上只能当作建议通过，不能作决定。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聂，指聂荣臻。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1949年11月3日对于工作方针、政策性的重大问题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等错误所作检讨的申明书。

[3] 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聂，指聂荣臻。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乔，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第二点请聂通知贺诚[1]。

---

[1] 贺诚，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对关于空军司令部名称和关防尺寸刊发问题的批语[1]

（1949年11月6日）

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海军亦照此定名。

暂可如此，将来再改。[2]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李涛1949年11月3日报告的批语。

[2] 李涛的报告说，空军司令部的全名方案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请主席决定，以便作为关防印文，并拟按兵团一级的关防尺寸刊发。

中央关于成立
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的电报

（1949年11月7日）

贺龙[1]同志，并告西北局德怀[2]同志及刘、邓[3]：

（一）同意贺龙同志六日意见。为了统一指挥十八兵团及其他临时配合作战部队，为了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此项机关似可称为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何人为副主任及委员名单，请贺提出先在此次兰州西北局会议上斟酌通过，电告中央作决定。此项机关，因无党外人参加，又是临时的，故可将党务工作归其管辖，而不必另外成立党委组织。至于对十八兵团及其他部队指挥作战，如觉用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名义不方

---

[1]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同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均未到职。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便，即可用西南军区司令员名义下命令。你们意见如何，盼告。（二）关于支援十八兵团等部向陕南及川西北进军的许多后勤工作及干部分配等事，应成为此次兰州会议的一项议事日程，决议事项盼电告。

中央

十一月七日

1949年11月7日，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举行鸡尾酒大会。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举杯庆贺。

邓华兵团可以分出一个师协同梁广纵队肃清南路敌军

（1949年11月9日）

林彪同志，华南分局，并告陈赓[1]：

据广东南路区党委六日电称，湛江只有敌四千余人，我有一个主力师配合南路纵队即可歼灭湛江之敌，全面解放雷州半岛，可以加强南路支援解放广西及琼崖的基地等语。我曾告诉你们，在广西问题解决以前，邓兵团[2]主力的任务在于保卫广州区域及广韶线[3]而不要去南路，这是正确的，你们亦已同意这样做。但如果去一个师，即可解决南路问题，则是可以的和必须的。由邓兵团（不是由四兵团）分出一个师（可以是一个最强的师）去南路，协同梁广纵队[4]肃清南路之敌，有很多好处。如果你们亦同意，即可作此部署。

毛泽东

十一月九日

---

[1] 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兵团司令员邓华。

[3] 广韶线，指广州至韶关的铁路，即今京广线一段。

[4] 梁广纵队，指粤桂边纵队，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梁广。

中央关于毛泽东去莫斯科时间致王稼祥[1]电

（1949年11月9日）

稼祥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略夫[2]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十二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中央

十一月九日

---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 柯瓦略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负责人。

中央关于征询政协党外代表对华东政权机关意见的电报

（1949年11月10日）

华东局：

九日电悉。你们既已召集三十几个党外政协代表征询对华东政权机关的意见，可以再征询一次，以其意见于十一月廿日以前电告，不得再迟。

中央

十一月十日

向董其武部调派的政工干部必须加以训练[1]

（1949年11月11日）

聂、薄、张、张：

戌江电悉。同意所提调任改编董其武[2]部两个军七个师之师以上政治干部配备全部名单。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3]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注意为要。

军委总政

戌真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给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和张致祥的电报。

[2] 董其武，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1949年10月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3]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关于安排西蒙诺夫到广西前线参观的电报

（1949年11月11日）

林彪、克诚[1]二同志，并告陈赓，刘、邓[2]：

苏名作家西蒙诺夫同志等一行是否已到衡阳及如何往广西前线参观作战事宜，望电告。请你们十分注意此事，妥为招待及护送，确保其安全而又能顺利获得参观军队生活，军队作战及地方群众活动等方面的实际材料，以利其为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写一部著作，如他们愿意继续随四兵团入滇应表欢迎，并一样妥为保护。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司令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政治委员。

[2]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致斯大林电

（1949年11月12日）

菲里波夫[1]同志：

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十二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2]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2] 柯瓦略夫，当时是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的负责人。

祝贺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1]全体员工起义的电报

（1949年11月12日）

中国航空公司刘敬宜总经理，中央航空公司陈卓林总经理，及两公司全体员工同志们：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在两公司总经理领导下，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特向你们表示祝贺、欢迎和慰问。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

[1] 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是原国民党政府的两个民用航空公司。1948年年底，这两个公司将营业机航基地从上海分别迁移到香港和广州。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乘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发布全体员工起义通电，同时飞回大陆的还有11架飞机。

须重视对定海作战的各项问题

（1949年11月14日）

粟裕[1]同志，并告陈、饶[2]：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五万人，并有颇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作战的失利[3]，你们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项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提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盼复。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

[1] 粟裕，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 陈、饶，指陈毅、饶漱石，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1949年10月下旬，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一部在缺乏充分渡海作战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发起金门战斗，遭受严重损失。1949年11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在攻击定海（即今浙江舟山）登步岛的作战中，对敌据岛顽抗及援军迅速登岛估计不足，遭到敌守军、援军和海空军的联合反击，被迫撤出战斗。

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1949年11月14日）

德怀[1]同志，西北局：

（一）据青海省委迭次反映，马[2]匪余党，在许多地方煽动群众，组织反抗。此次兰州会议[3]上请予以严重注视。除大力剿匪，省委、地委、县委集中注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外，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地方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二）西北局诸同志是否已到兰州，你们的会议何日开始？此次会议议程甚多，恐须开会一星期左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马，指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青海省政府主席。

[3] 指1949年11月在兰州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

右。今后西北政治中心定于何处，西安还是兰州，亦须有所决定。望以主要议程见告。（三）请令王震[1]台和我们通报。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

[1] 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给毛远翔[1]的信

（1949年11月14日）

远翔贤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很高兴。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

[1] 毛远翔（1924—1996），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房侄。当时在华中人民革命大学湖南分校学习。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湘潭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共长沙市南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等职。

对创办三所军医大学报告的批语[1]

（1949 年 11 月 14 日）

照办。[2]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第一问题两项似以第二项办法较妥。[3]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副部长傅连暲1949年11月12日报告的批语。

[2] 贺诚和傅连暲的报告提议创办3所军医大学：一、将华北医科大学（又名白求恩医科大学）改为军医大学，主要轮训团级以上干部。二、拟将上海伪国防医学院，改为上海军医大学，轮训团级以下卫生干部及招收新生培训。三、将东北之长春医科大学改为长春军医大学，训练海空军卫生干部与轮训团级以下卫生干部。

[3] 指贺诚报告中所提出的华北医科大学迁址建议。报告认为，该校现在石家庄，占用民房，群众意见甚多，应迁到北京或天津。其中第二项办法为迁至天津，与河北医学院合并，改为军医大学。

给毛煦生[1]的信

（1949年11月15日）

煦生先生：

前后三函奉悉，迟复为歉。先生仍以在乡间做事为适宜，不要来京。家计困难，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可能获得解决。先生过去在辎重营担任何职，记不清楚了，便时尚祈见示。毛紫奇[2]尚在人间否？敬颂

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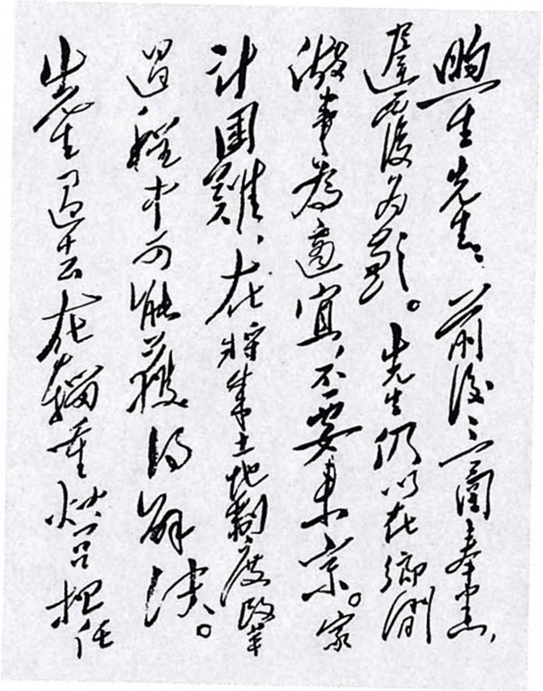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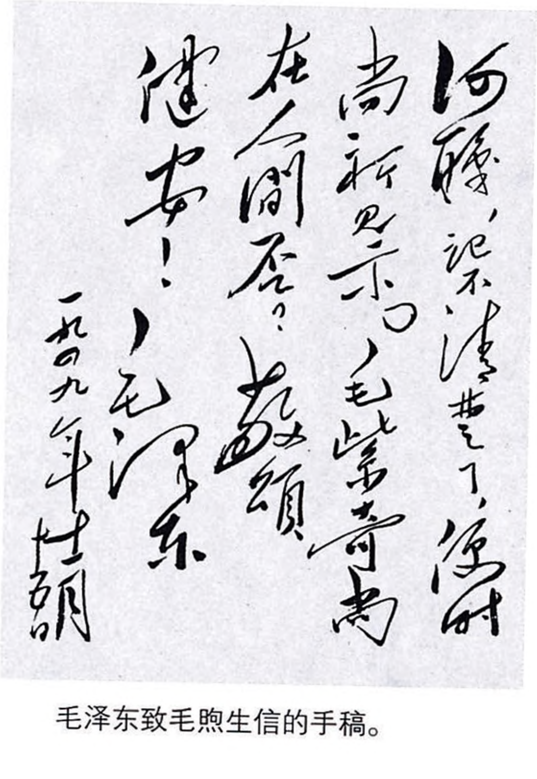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

[1] 毛煦生，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那时他在辎重营当文书。

[2] 毛紫奇，即毛子奇，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湖南起义的新军辎重营任营长。





煦生先生：前后二函奉悉，遥念殷勤，为感。先生仍以在乡间从事教育为宜，不要来京。家乡困难，应在将来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予以解决。先生可否在韶山学校担任何职，记不清楚了，便时尚祈见示。毛岸青在何处？敬颂

健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

毛泽东致毛煦生信的手稿。

给毛泽青[1]的信

（1949年11月15日）

运才弟：

来信收到，甚慰。

望努力工作。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

[1] 毛泽青（1916—1981），号咏才，又称运才，又名万才，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堂弟，毛泽建的胞弟。1937年10月到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学习，后在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后勤基层单位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辽宁省抚顺市市政工程处预制件厂支部书记、抚顺市政协委员等职。

欢迎仇鳌[1]来京的电报

（1949年11月17日）

一

长沙程颂云[2]先生：

汉口长沙两电敬悉，安抵极慰。仇亦山先生来京赐教，极表欢迎。惟仇先生体弱，冬季北上是否适当。为避寒计似以开春北来为宜，如无此种顾虑则可随时动身。请与仇先生商定见示为盼。

毛泽东

戌篠

二

湖南省政府仇亦山先生：

先后两电均敬诵悉。来京赐教，极表欢迎。何日命驾，尚祈电示。

毛泽东

戌篠

---

[1] 仇鳌，字亦山，湖南知名人士，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委员。

[2] 程颂云，即程潜，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

给李介侯[1]的信

（1949年11月17日）

介侯先生：

惠书敬悉，深感厚意。

耿侯[2]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

尊翁[3]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率复，顺祝
健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

[1] 李介侯（1899—1971），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人。早年毕业于湖南机械专门学校。当时在长沙经商。后在北京中国进口公司机械科、外贸部进出口机械总公司工作。

[2] 耿侯，即李耿侯（1889—1928），李介侯的胞兄。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湘潭（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中共湘潭（韶山）特别区委组织委员、韶山农民自卫军负责人。1928年在湘南牺牲。

[3] 指李介侯的父亲李漱清（1874—1957），乡村教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给张四维[1]的信

（1949 年 11 月 17 日）

长沙福寿桥三号张四维先生：

未阳[2]电悉，甚感好意。湖南需才孔急，似以在当地工作为宜。

毛泽东

戍篠

---

[1] 张四维（1892—1961），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2] 旧时人们在电报中常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方法表示发报时间。未阳，即8月7日。

中央转发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电报[1]的批语

（1949年11月19日）

---

[1] 指中共二野前委1949年11月12日给杨勇、苏振华、徐运北的电报。电报论述了在贵州新解放区工作的策略问题，主要内容有：一、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是对的，但不可笼统地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的方针。现在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以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二、市和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早开为好，以解决我们进入城市后遇到的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和乡村的借粮问题、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三、在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全部改编和掌握，但在执行的步骤和方法上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这一点。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执行这一政策的好处很多。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但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五、新区问题极其复杂，应从各方面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各负责同志：

兹将西南局十一月十二日致杨苏徐[1]关于论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电报转发给你们，请转发所属注意。我们认为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中央

十一月十九日

---

[1] 杨，指杨勇，当时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司令员。苏，指苏振华，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徐，指徐运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致宣布脱离国民党当局的前资源委员会[1]驻港员工电

（1949年11月19日）

前资源委员会香港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员工同志们：

十四日电[2]悉，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

[1] 资源委员会是原国民党政府垄断工业的主要机构。

[2] 指前资源委员会贸易处国外贸易事务所驻香港员工吴志翔等35人1949年11月1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等的电报。电报中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脱离关系，保护在港资产，听候人民政府接收。

答谢兰那地夫[1]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49年11月19日）

亲爱的兰那地夫同志：

你在十月十二日的贺电收到了，十分感谢你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热情的祝贺。全中国人民读到你的电报里所表现的印度革命人民的兄弟友爱，都将感觉欢欣和骄傲。印度人民是亚洲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民族之一，它的过去的命运和将来的道路和中国有许多类似之点。我确信，依靠勇敢的印度共产党和一切印度爱国者团结奋斗，印度决不会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及其合作者的绊羁之下。自由的印度将有一天要与自由的中国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大家庭的一员而出现于世界，这一天将要终结人类历史上帝国主义和反动的时代。祝印度爱国人民团结奋斗的胜利！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兄弟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

[1] 兰那地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复电感谢伊朗共产党

（1949年11月19日）

伊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亲爱的同志们：

对于你们的祝贺谨致深切的感谢。

中国人民以敬意注视着伊朗劳动党和伊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奋斗，并坚信这一奋斗将获得胜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关于同意工作方针致彭德怀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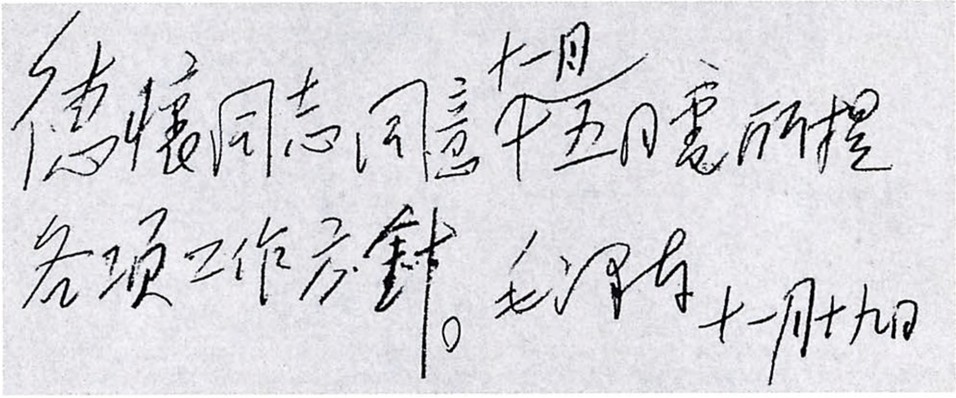
（1949年11月19日）

德怀同志：

同意十一月十五日电所提各项工作方针。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德懷同志 同意十一月十五日電所提各項工作方針。毛澤東 十一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手稿。

为《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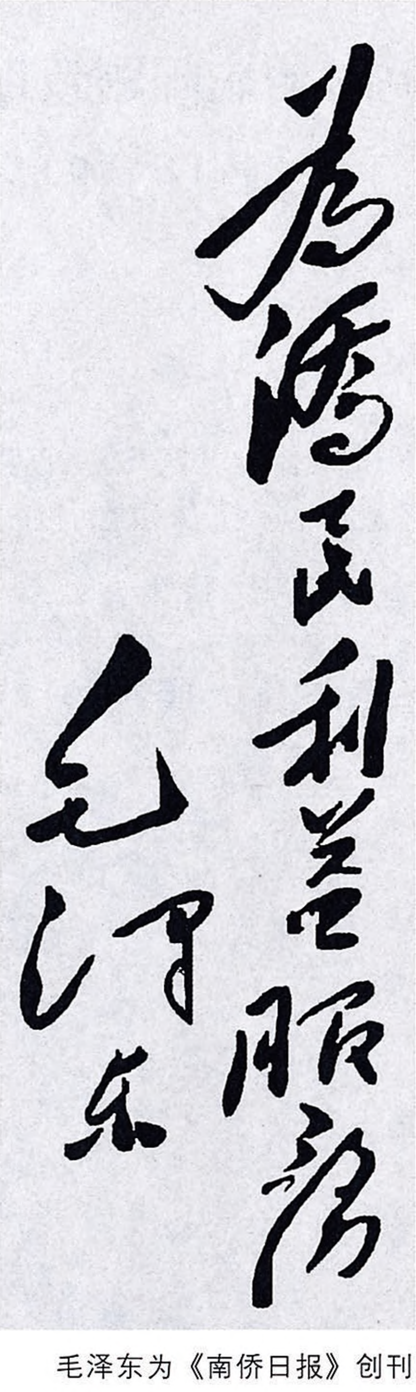
（1949年11月20日）

为侨民利益服务。

毛泽东

---

[1] 新加坡的《南侨日报》创刊于1946年，1949年值《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之际，毛泽东为其题词：为侨民利益服务。



为侨民利益服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南侨日报》创刊三周年的题词。

关于任弼时治病问题致斯大林电

（1949年11月21日）

菲里波夫[1]同志：

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同志患病甚重，苏联大夫认为他需要去莫斯科治疗，我们同意这种意见。未知是否可行，请予示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军委关于张治中[1]去兰州致彭德怀[2]电

（1949年11月22日）

德怀同志：

张治中于今（廿二）日上午九时由北京起飞，下午四时左右即可到兰州，请注意迎接。

军委

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六时

---

[1] 张治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央关于要华中局对处理旧人员提出意见的电报

（1949年11月22日）

华中局：

戌皓电悉。关于处理旧人员问题，请就你们提出的六项问题[1]逐一提出你们的意见。

中央

十一月廿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中局1949年11月19日给中央的电报中，对9月21日中央关于处理旧人员的各项原则的指示提出的六项问题。这六项问题是：一、中央指示中所谓“接收之国民党旧工作人员”是专指国民党政权人员还是包括经济、文教、交通、银行等方面的人员在内？如是包括国民党所属一切机关，那么对待政权机关与对待企业、文教机关以及这两种机关的旧人员是否还应有所区别？二、“一般均应予以留用”的原则，是说在原机关留用，还是包括调训、下乡工作、退休养老等？凡需政府拿钱养活的人是否都算作留用？三、“但是一不是原职原薪，二不是原封不动”，可否了解为专指本机关已不需要留用理应精简而额外留用的人员？还是不分留用任职与去职，养活的人员一律都适当地先实行减薪？四、“三个人饭五个人匀着吃，房子挤着

住”的原则，在企业机关是否可以了解为对于企业目前需用的留用职员仍按原职原薪个别调整，仅指对于精简下来的额外留用人员和调训人员才实行匀、挤？还是不分正式和额外的留用人员都一起匀、挤？五、受训人员“在受训期间照减低后的薪资打六折至七折”，所谓“减低后的薪资”是指国民党统治时期累进递减的折合薪资，还是指解放以后我们适当减低的薪资？六、办大的训练班，是分地域或性质集训还是分散在各大小单位原地训练？其经费负担采取统筹统支还是由各地自行解决？11月26日，华中局按中央的要求，对这六项问题提出意见上报中央。

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

（1949年11月23日）

德怀[1]同志，并告贺、习、刘[2]：

（一）复班禅[3]电略加修改即可发表。（二）经营西藏问题请你提到西北局会议上讨论一下。目前除争取班禅及其集团给以政治改造（适当地）及生活照顾外，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就现在情况看来，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的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因为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由青海去西藏的道路据有些人说平坦好走，班禅及其一群又在青海。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4]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打西藏大概需要使用三个军，如何分配及何人负责指挥现在还难决定。但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3]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4] 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他现在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49年11月23日）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接读十月一日来电[2]，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是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指班禅额尔德尼1949年10月1日从青海发给毛泽东和朱德的电报。电报中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期望西藏早日解放。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7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8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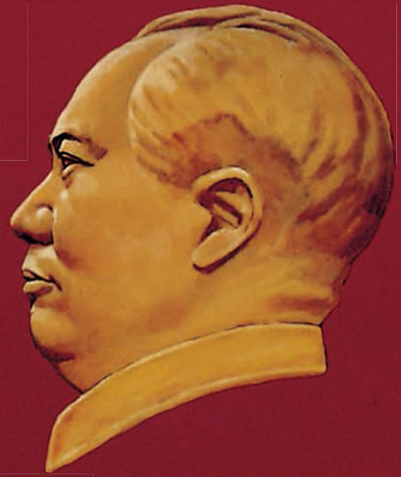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8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抓住时机歼灭白崇禧部十六个师……………………………………………1

（1949年11月24日）

中央关于伊克昭盟划归华北问题的电报………………………………3

（1949年11月24日）

中央关于协商委员会的职权致华东局电………………………………4

（1949年11月24日）

复印尼邦加劳工联合会电…………………………………………………5

（1949年11月24日）

关于向胡宗南部发动进攻的时间致贺龙电…………………………6

（1949年11月25日）

军委关于四野以七个师入川作战问题的电报…………………………7

（1949年11月25日）

答谢胡志明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9

（1949年11月25日）

关于各地修机场的经费问题的批语 ……………………………………10

（1949年11月26日）

贺李所部应受刘邓张李指挥 ………………………………………………11

（1949年11月27日）

吸引更多胡宗南部于重庆聚歼之 …………………………………………12

（1949年11月27日）

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3
（1949年11月27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倡导评奖运动的指示的批语 ……15
（1949年11月27日）
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题词 ……16
（1949年11月27日）
攻占重庆应依情况发展而定 ……18
（1949年11月28日）
给文南松的信 ……20
（1949年11月28日）
给毛宇居的信 ……22
（1949年11月28日）
给毛泽荣的信 ……24
（1949年11月28日）
给邹普勋的信 ……25
（1949年11月28日）
给徐悲鸿的信 ……26
（1949年11月29日）
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名 ……28
（1949年11月29日）
同意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等事项 ……29
（1949年11月30日）
为《甘肃日报》题写报头 ……31
（1949年11月）
中央关于为斯大林送寿礼致山东分局电 ……32
（1949年12月1日）

给旅大人民的信 ……………………………………………………33
（1949年12月1日）
对召开全国军费预算会议报告的批语 …………………………34
（1949年12月1日）
在中央同意华中局关于纠正乡村干部不良作风的决定的电报稿
上加写的一段话 ……………………………………………………35
（1949年12月1日）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36
（1949年12月2日）
给柳亚子的信 ………………………………………………………37
（1949年12月2日）
关于注意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批语 …………………………39
（1949年12月4日）
在邓拓关于人民日报工作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40
（1949年12月4日）
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 …………………………………………41
（1949年12月4日）
关于会商攻击舟山群岛办法致粟裕电 …………………………43
（1949年12月5日）
同意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 …………………44
（1949年12月5日）
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46
（1949年12月5日）
中共中央关于实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指示的通知 ………50
（1949年12月5日）
复卢汉电 ……………………………………………………………52
（1949年12月11日）

抵达莫斯科时的书面演说 ……54
（1949年12月16日）
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 ……63
（1949年12月18日）
关于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电报 ……66
（1949年12月19日）
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 ……67
（1949年12月21日）
对苏贸易应从统筹全局出发 ……70
（1949年12月22日）
可在先头阻止李弥余程万部向越南缅甸前进 ……71
（1949年12月29日）
关于四野前委改名等问题致刘少奇电 ……72
（1949年12月29日）
关于了解华东区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情况的电报 ……74
（1949年12月29日）
为了解上海工商业家困难的真实情况致陈云电 ……75
（1949年12月30日）
关于同意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的电报 ……76
（1949年12月31日）
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联 ……77
（1949年12月）
给张瑞岐的信 ……79
（1949年12月）
给李敏的信 ……80
（1949年）

为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题词 ……………………………………81
（1949年）
为新法学研究院题名 ……………………………………………83
（1949年）
为朱光题词 ………………………………………………………85
（1949年）
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 ………………………………………87
（1949年）
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 ………………………………………89
（1949年）
为《宁夏日报》题写报头 ………………………………………90
（1949年）
为《工人日报》题写报头 ………………………………………92
（1949年）
为《青海日报》题写报头 ………………………………………93
（1949年）
为《云南日报》题写报头 ………………………………………94
（1949年）
为《江西日报》题写报头 ………………………………………96
（1949年）
打油诗·二乔………………………………………………………97
（1949年）
为《人民海军》报题词……………………………………………101
（1950年1月1日）
为《人民海军》报题写报头………………………………………103
（1950年1月1日）

为《人民前线》题名……104
（1950年1月1日）
为起草中央致各野战军贺电致胡乔木电……105
（1950年1月1日）
答塔斯社记者问……106
（1950年1月2日）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08
（1950年1月2日）
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10
（1950年1月2日、3日）
关于同意江青到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113
（1950年1月4日）
关于周恩来赴苏时间和谈判准备工作致中央电……114
（1950年1月5日）
关于改订中苏条约注意保密问题致中央电……115
（1950年1月5日）
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致周恩来电……116
（1950年1月7日）
关于就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发表外交部声明的电报……118
（1950年1月7日）
关于照发拟就的致联合国声明的电报……120
（1950年1月7日）
关于从四野调人从事生产等问题的电报……121
（1950年1月9日）
关于要中央局转发中央对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指示的电报……122
（1950年1月10日）

关于修筑铁路等问题致陈云、薄一波电……123
（1950年1月10日）
关于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问题的意见……124
（1950年1月10日）
大力做好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126
（1950年1月10日）
拜谒列宁墓题字……130
（1950年1月11日）
为询问进攻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情况致粟裕电……132
（1950年1月11日）
关于土改准备工作致饶漱石电……133
（1950年1月13日）
关于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等问题致林彪电……134
（1950年1月13日）
关于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员等事致刘少奇电……135
（1950年1月13日）
关于向联合国派出我国代表等问题致刘少奇电……136
（1950年1月13日）
关于支持情报局刊物对野坂参三的批评致胡乔木电……138
（1950年1月14日）
关于同意与越南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致刘少奇电……139
（1950年1月17日、18日）
关于陕甘宁三省土改部署的电报……142
（1950年1月17日）
关于向民主人士解释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的电报……143
（1950年1月18日）

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电报…………144
（1950年1月18日）
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致联合国电…146
（1950年1月19日）
关于发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的电报……………………………148
（1950年1月19日）
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149
（1950年1月20日）
关于同意印度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电报…………152
（1950年1月20日）
关于起草复尼赫鲁的电文致刘少奇电………………………………153
（1950年1月20日）
关于中苏会谈和文件起草情况致刘少奇电…………………………154
（1950年1月25日）
在同胡阶森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上的批语………………155
（1950年1月29日）
五绝·赞“密使一号”　……………………………………………156
（1950年1月）
为问候胡志明致刘少奇电……………………………………………157
（1950年2月1日）
关于供给苏联战略物资问题致刘少奇等电…………………………159
（1950年2月2日）
关于刘斐等任职问题的电报…………………………………………161
（1950年2月3日）
对起义的伞兵第三团加强政治训练…………………………………162
（1950年2月4日）

中英建立外交关系上 应解决的先决问题 ……………………163
（1950年2月8日）
关于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等问题致刘少奇电……………164
（1950年2月10日）
关于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致林彪电…………………165
（1950年2月12日）
关于各地对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表态时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167
（1950年2月12日、13日）
关于修改《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社论致刘少奇、胡乔木电…170
（1950年2月14日）
为郭志成题词………………………………………………………172
（1950年2月）
为苏联留学生题词…………………………………………………174
（1950年2月）
积极防空保卫上海…………………………………………………176
（1950年2月17日）
关于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致刘少奇电…………………………177
（1950年2月17日）
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179
（1950年2月17日）
关于由李富春主持中苏贸易谈判等问题的电报…………………181
（1950年2月17日、20日）
关于回国后沿途接待问题的电报…………………………………184
（1950年2月23日）
离苏联国境时致斯大林电…………………………………………185
（1950年2月26日）

为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题词……………………………………188
（1950年2月27日）
为哈尔滨市委题词……………………………………………………190
（1950年2月27日）
为哈尔滨市团代会题词………………………………………………192
（1950年2月27日）
为中共松江省委题词…………………………………………………194
（1950年2月27日）
为《松江日报》题写报头……………………………………………197
（1950年2月）
接受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98
（1950年3月10日）
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致张治中电……………………………200
（1950年3月11日）
关于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的电报……………………………201
（1950年3月12日）
给郭士逵的信…………………………………………………………203
（1950年3月14日）
给龙伯坚的信…………………………………………………………204
（1950年3月14日）
给刘揆一的信…………………………………………………………206
（1950年3月14日）
给张辉周的信和题词…………………………………………………208
（1950年3月14日）
同意唐生智来京致黄克诚电…………………………………………210
（1950年3月16日）

为北京大学校徽题字……211
（1950年3月17日）
中央关于召开各区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军事、土改等问题的电报……212
（1950年3月18日）
关于救济苏北灾民的批语……213
（1950年3月20日）
致张治中电……215
（1950年3月20日）
关于确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的批语……216
（1950年3月28日）
关于进军西藏的口号问题的批语……217
（1950年3月29日）
为《中行职工》题名……218
（1950年3月）
为《郑州日报》题写报头……219
（1950年）
关于援助越南武器的批语……220
（1950年3月、4月）
纠正军队生产偏向是为至要……222
（1950年4月2日）
给马叙伦的信……223
（1950年4月2日）
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致陈毅电……224
（1950年4月5日）
为印发周恩来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的批语……226
（1950年4月9日）

给毛照秋的信……228
（1950年4月10日）
给张有晋的信……229
（1950年4月10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231
（1950年4月11日）
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234
（1950年4月12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37
（1950年4月13日）
给向振熙的信……239
（1950年4月13日）
给杨开智、李崇德的信……240
（1950年4月13日）
关于购买空军装备器材致斯大林电……242
（1950年4月13日）
给刘揆一的信……243
（1950年4月14日）
给熊子容的信……244
（1950年4月14日）
为解放军某部题词……246
（1950年4月14日）
关于武昌私营纱厂应予维持的批语……248
（1950年4月15日）
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249
（1950年4月15日）

为《人民空军》题名……251
（1950年4月15日）
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252
（1950年4月16日）
关于撰写纪念季米特洛夫的文章致契尔文科夫电……253
（1950年4月18日）
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254
（1950年4月）
给毛森品的信……256
（1950年4月18日）
给李淑一的信……258
（1950年4月18日）
给向明卿的信……260
（1950年4月19日）
给罗驭雄的信……262
（1950年4月19日）
给谭天佑的信……264
（1950年4月19日）
给马叙伦的信……265
（1950年4月19日）
给周邦式的信……267
（1950年4月19日）
给左作霖的信……269
（1950年4月19日）
给文运昌的信……271
（1950年4月19日）

给贺晓秋的信……………………………………………………272
（1950年4月19日）
军队分批复员以减轻人民负担……………………………………274
（1950年4月21日）
为《北大周刊》题词…………………………………………………276
（1950年4月21日）
关于目前几个月的工作方针致陈毅电……………………………278
（1950年4月23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减租总结的批语……………………………279
（1950年4月25日）
为南洋中学学生壁报题名…………………………………………281
（1950年4月27日）
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283
（1950年4月28日）
关于夏征问题给陈云、薄一波的批语……………………………285
（1950年4月28日）
对聂荣臻关于“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解释的批语…………………………………………………………286
（1950年4月28日）
关于部队缩编问题的批语…………………………………………287
（1950年4月28日、5月12日）
关于修改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稿给刘少奇的信………289
（1950年4月29日）
转发邓子恢关于起草土改条例的意见的电报……………………290
（1950年4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命令公布施行婚姻法中共中央通知全党保证执行…291
（1950年4月30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293
（1950年4月）
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题写匾额……296
（1950年4月）
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297
（1950年4月）
为《青年报》题词……299
（1950年）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的电报……301
（1950年5月1日）
在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中加写的话……304
（1950年5月5日）
给文涧泉的信……305
（1950年5月7日）
给张鼎的信……307
（1950年5月7日）
给林谷生的信……309
（1950年5月7日）
给毛贻华的信……310
（1950年5月7日）
给赵浦珠的信……311
（1950年5月7日）
给粟济世的信……312
（1950年5月7日）

给陈国生的信……313
（1950年5月7日）
为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题词……315
（1950年5月7日）
给毛逸民的信……317
（1950年5月8日）
给毛春轩的信……318
（1950年5月8日）
给陈峰仙的信……319
（1950年5月8日）
给杨庆兴的信……321
（1950年5月8日）
给周芝鳞的信……323
（1950年5月8日）
给蒋端甫的信……325
（1950年5月8日）
给张四维的信……326
（1950年5月8日）
给郭建人的信……327
（1950年5月8日）
给宋女士的信……328
（1950年5月8日）
给李静蓉的信……329
（1950年5月8日）
给龙亦飞的信……330
（1950年5月8日）

给方觉民的信……………………………………………………………331
（1950年5月10日）
给易克櫄的信……………………………………………………………332
（1950年5月10日）
盼告何时举行舟山群岛作战……………………………………………333
（1950年5月10日）
中央关于转发北京市委摘报的一封来信的批语…………………………335
（1950年5月11日）
总政关于三十二军政治部严重违反外交纪律事件的通报…………………336
（1950年5月11日）
关于来中央参加土改会议等问题致邓子恢电………………………………337
（1950年5月12日）
如实查报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338
（1950年5月12日）
在中央关于湖南减租问题给中南局的电报中加写的话……………………340
（1950年5月12日）
给文南松的信……………………………………………………………341
（1950年5月12日）
给毛煦生的信……………………………………………………………342
（1950年5月12日）
给叶健农的信……………………………………………………………344
（1950年5月12日）
给周文楠的信……………………………………………………………346
（1950年5月12日）
给君实的信………………………………………………………………348
（1950年5月12日）

给毛爱桂的信……349
（1950年5月12日）
给毛远悌的信……350
（1950年5月12日）
给毛远翔的信……352
（1950年5月12日）
给毛泽益的信……353
（1950年5月12日）
给邹赓鹏的信……354
（1950年5月12日）
转发邓小平关于整风、春耕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批语……355
（1950年5月13日）
关于审查藏文广播问题……356
（1950年5月13日）
对陈毅关于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报告的批语和复电……357
（1950年5月13日、14日）
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严禁村政权浪费的指示的批语……359
（1950年5月14日）
给毛宇居的信……360
（1950年5月15日）
给邹普勋的信……363
（1950年5月15日）
给黄炎培的信……364
（1950年5月15日）
为《内蒙古日报》题写报头……365
（1950年5月15日）

给朱琨的信……366
（1950年5月16日）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指示的批语……368
（1950年5月16日）
给周容的信……370
（1950年5月16日）
给周起鹗的信……371
（1950年5月16日）
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372
（1950年5月18日）
军队整编复员由中央复员委员会统一处理……373
（1950年5月19日）
给丁张秀清的信……374
（1950年5月19日）
关于调查川沙等三县征粮情况致陈丕显电……376
（1950年5月19日）
在关于帆船对敌舰作战情况报告上的批语……378
（1950年5月19日）
在沈阳市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公函上的批语……379
（1950年5月20日）
省以上各级党委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381
（1950年5月20日）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83
（1950年5月20日）
给毛桂昌的信……385
（1950年5月21日）

给黎锦熙的信……………………………………………………386
（1950年5月22日）
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的信…………………………388
（1950年5月24日）
关于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的批语…………………………………390
（1950年5月24日）
军委关于同意补充陈明仁、张轸部致邓子恢等电…………………391
（1950年5月24日）
给李济深的信……………………………………………………392
（1950年5月24日）
关于章士钊荐用李傥的批语………………………………………394
（1950年5月24日）
对私营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395
（1950年5月25日）
对衡山县县长给中央人民政府报告的批语…………………………397
（1950年5月25日、6月1日）
给刘亚南的信……………………………………………………399
（1950年5月27日）
收到综合报告致叶剑英电…………………………………………401
（1950年5月27日）
在中财委关于新解放区夏征公粮决定上的批语……………………402
（1950年5月28日）
对成立空军第四旅组织雷达网等问题的批语………………………403
（1950年5月28日）
关于部队编制原则问题的批语………………………………………404
（1950年5月28日）

关于编印《整党文件》给杨尚昆的信……………………406
（1950年5月29日）
对西南局所拟同西藏谈判的条件的批语…………………407
（1950年5月29日）
关于要安子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的信………………408
（1950年5月30日）
对关于解决攻台重要问题的批语…………………………409
（1950年5月30日）
为韩桂馨题词………………………………………………410
（1950年5月30日）
为《新建设》杂志题名……………………………………411
（1950年5月）
为六一儿童节题词…………………………………………412
（1950年6月1日）
在华北局关于调整工商业报告上的批语…………………414
（1950年6月2日）
关于中南局工作报告的电报………………………………416
（1950年6月2日）
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417
（1950年6月4日）
为了解人民解放军渡江后歼敌人数给李涛的信…………424
（1950年6月5日）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425
（1950年6月6日）
不要四面出击………………………………………………432
（1950年6月6日）

给黄炎培的信……………………………………………………436
（1950年6月6日）
给黄炎培的信……………………………………………………437
（1950年6月7日）
在陈云关于经济形势和调整措施的报告稿中加写的两段话………438
（1950年6月11日）
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时改写的一段话…………439
（1950年6月12日）
接受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40
（1950年6月12日）
接受瑞典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41
（1950年6月12日）
给陈铭枢的信……………………………………………………443
（1950年6月12日）
给熊十力的信……………………………………………………445
（1950年6月12日）
给王首道的信……………………………………………………447
（1950年6月14日）
为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幕题字………………………………448
（1950年6月14日）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450
（1950年6月14日、23日）
对聂荣臻军事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466
（1950年6月15日）
对中南军区党委关于部队整党工作指示的批语…………………468
（1950年6月16日）

给马叙伦的信……………………………………………………………470
（1950年6月19日）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73
（1950年6月24日）
接受丹麦驻华公使穆克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74
（1950年6月24日）
给张峻明的信……………………………………………………………475
（1950年6月27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476
（1950年6月28日）
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给刘少奇的信…………………………482
（1950年6月29日）
为《人民画报》题名……………………………………………………486
（1950年6月）
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488
（1950年7月2日）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89
（1950年7月3日）
粟裕来京接受重要任务…………………………………………………490
（1950年7月6日）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批语………………………………………………491
（1950年7月7日、8日、13日）
粟裕休养暂缓来京………………………………………………………495
（1950年7月10日、17日）
在程潜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信上的批语…………………………497
（1950年7月11日）

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实行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499
（1950年7月12日）
为李银桥题词……………………………………………………………500
（1950年7月12日）
同意对董宋珩罗广文两部实行混编………………………………502
（1950年7月15日）
关于北京农业大学领导问题的批语………………………………503
（1950年7月16日）
中央转发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的批语…………504
（1950年7月18日）
关于祝贺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电报和批语………………505
（1950年7月18日）
对关于在东北地区部署中苏空军作战部队报告的批语…………507
（1950年7月18日）
对吴耀宗等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的批语……………………508
（1950年7月19日）

抓住时机歼灭白崇禧部十六个师

（1949年11月24日）

林彪[1]同志，并告陈赓[2]：

根据四野二十二日谍息，白崇禧[3]决于二十三日起令其所部共十六个师由博白、郁林[4]、北流、容县、岑溪之线，向廉江、化县[5]、茂名、信宜之线攻击。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为此请你们注意：（一）陈赓所率四个军，除一个军仍照陈赓前提部署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左侧背外，主力似不要进入广西境，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同时以一部对付余汉谋[6]之配合进攻。（二）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宾州[7]、贵县、郁林之线，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三）白匪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我程子华兵团[8]即应分数路宽正面，第一步

---

[1] 林彪，当时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

[2] 陈赓，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白崇禧，当时任国民党军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郁林，旧县名，即今广西玉林。

[5] 化县，旧县名，即今广东化州。

[6] 余汉谋，当时任国民党军华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7] 宾州，镇名，位于广西宾阳西部。

[8] 程子华兵团，指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员程子华。

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四）以上是否可行，请按情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十六时

在歼灭白崇禧的同时，人民解放军在1949年11月至12月还取得了彻底歼灭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与成都战役的胜利。图为人民解放军进入成都。

中央关于伊克昭盟划归华北问题的电报

（1949年11月24日）

西北局，并告华北局：

戌梗电悉。关于伊盟[1]划归华北问题，原由薄一波同志与马明方[2]同志商定，由马回西北局转达征求你们同意后实施。因马去东北参观，故你们尚不知道此项决定。现据你们来电表示同意，即请径与华北局商定交接事宜，并注意要使交接双方都感满意，并恰当地处理奇子祥[3]问题及伊盟与傅董[4]关系为要。

中央

十一月廿四日

---

[1] 伊盟，即伊克昭盟，今属内蒙古自治区。

[2]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

[3] 奇子祥，即奇天祥，原国民党政府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保安司令，1949年11月5日率部起义。

[4] 傅，指傅作义，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在北平起义，并对董其武率部在绥远起义做出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董，指董其武，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央关于协商委员会的职权致华东局电

（1949年11月24日）

华东局：

戌梗电悉。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会应选出四十人左右的协商委员会，其职权为在各界代表会闭会期间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并为下届各界代表会准备议程及议案。请参考北京《人民日报》所载北京第二届各界代表会所选举的协商委员会。

中央

十一月廿四日

复印尼邦加劳工联合会电

（1949年11月24日）

印尼邦加劳工联合会：

热忱地感谢你们的祝贺。希望印尼人民在长期的奋斗以后，能够同样赢得自己祖国的独立和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关于向胡宗南[1]部发动进攻的时间致贺龙[2]电

（1949年11月25日）

贺龙同志：

据周士第[3]等来电，主张早日发动向胡宗南进攻，我意待你在西北局会议完毕，回到十八兵团再行发动进攻为适宜，你的意见，你何日能到十八兵团，盼告。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五日

---

[1] 胡宗南，1949年1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2] 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1949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这时尚未到职。

[3] 周士第，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军委关于四野以七个师入川作战问题的电报

（1949年11月25日）

林、谭、肖[1]，并告刘、邓[2]：

廿三日电悉。如刘邓需要，同意你们意见以七个师交刘邓指挥入川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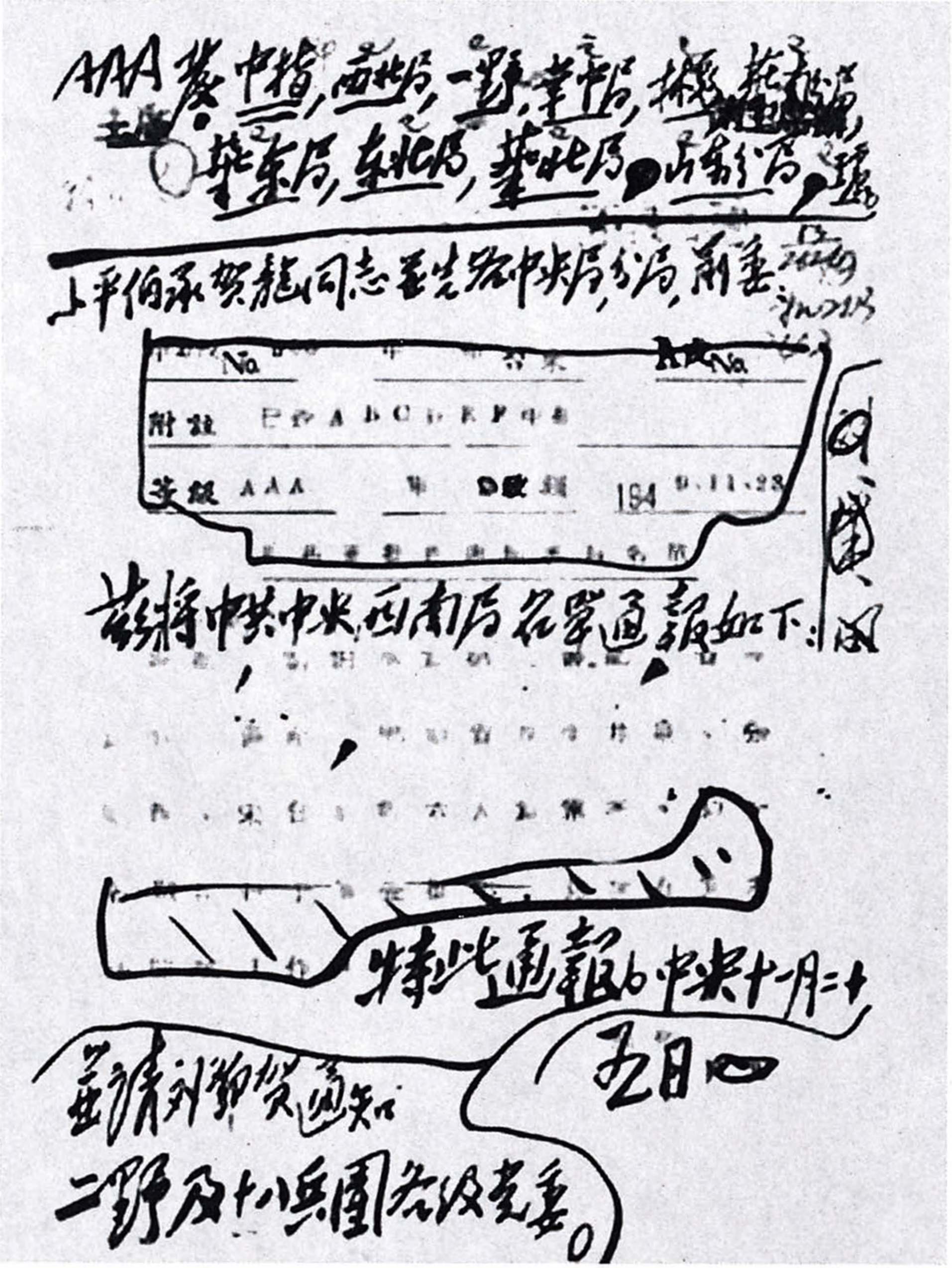
军委

十一月廿五日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肖，指肖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参谋长。

[2] 刘，指刘伯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



主席

AAA 发中指，西北局，一野前委，华中局，~~林彪~~ 华南分局，
华东局，东北局，华北局，山东分局，并转

小平伯承贺龙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刘、贺、邓

No.　　　　　　　No.

附注

发级 AAA

1949.11.23

兹将中共中央西南局名单通报如下：

特此通报。中央十一月二十五日

并请刘邓贺通知二野及十八兵团各级党委。

1949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南局名单的通报的手稿。

答谢胡志明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49 年 11 月 25 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胡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承来电祝贺，至深感激。中越两国同处反帝国主义斗争前线，随着两国人民解放斗争的胜利发展，两民族的友谊必将日臻亲密。敬祝中越人民巩固团结，并祝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民主事业彻底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各地修机场的经费问题的批语

（1949年11月26日）

荣臻、亚楼[1]：

各地修机场是一件大事，必须认真办理，只能用必不可少的钱，不能随意开大预算，请你们发一统一指示。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

---

[1] 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亚楼，即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贺李所部应受刘邓张李指挥[1]

（1949年11月27日）

刘、邓，贺、李：

（一）为协同一致上〈全〉歼川、康[2]各敌之目的，军委决定贺、李所部（十八兵团及其他）应受刘、邓、张、李[3]指挥，我们不直接指挥贺、李，以免分歧。（二）贺、李发给刘、邓之电报，同时发一份给我们。（三）以上望遵照为要。

中央军委

十一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李井泉的电报。

[2] 康，指西康，旧省名，1955年撤销。

[3] 刘，指刘伯承。邓，指邓小平。张，指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参谋长。

吸引更多胡宗南部于重庆聚歼之

（1949年11月27日）

刘、邓[1]，并告贺、李[2]：

据报蒋介石令胡宗南[3]以汽车八百辆运其第三军到重庆。请注意：（一）是否能吸引更多的胡宗南部到重庆。（二）我向重庆方面攻击之各军是否有必要稍为迟缓其行为，以利吸引较多之敌军据守重庆而后聚歼之。因为蒋介石自己在重庆，可能打一个聚歼汤恩伯于上海那样的好仗[4]。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

[1]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 贺，指贺龙，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李，指李井泉，当时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

[3]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4] 指1949年5月12日至6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举行的上海战役，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所部15万余人。

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49年11月27日）

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林彪[1]同志、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及华东局、西北局：

十一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同意你们所提广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分配及议事日程。（二）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会之前必须召开县的农民代表会议，由这个会议选举出席县各界代表会议的农民代表），华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四）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春季或夏季），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五省必须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会议及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五）上述（二）（三）（四）项，请华东局、西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

北局注意照办。

中央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倡导评奖运动的指示的批语

（1949年11月27日）

各同志：

兹将华北局十一月廿二日关于倡导评奖运动作为一项新的领导方式的指示转发给你们，请加注意，并转所属参考，依据当地情形斟酌采用。

中央
十一月廿七日

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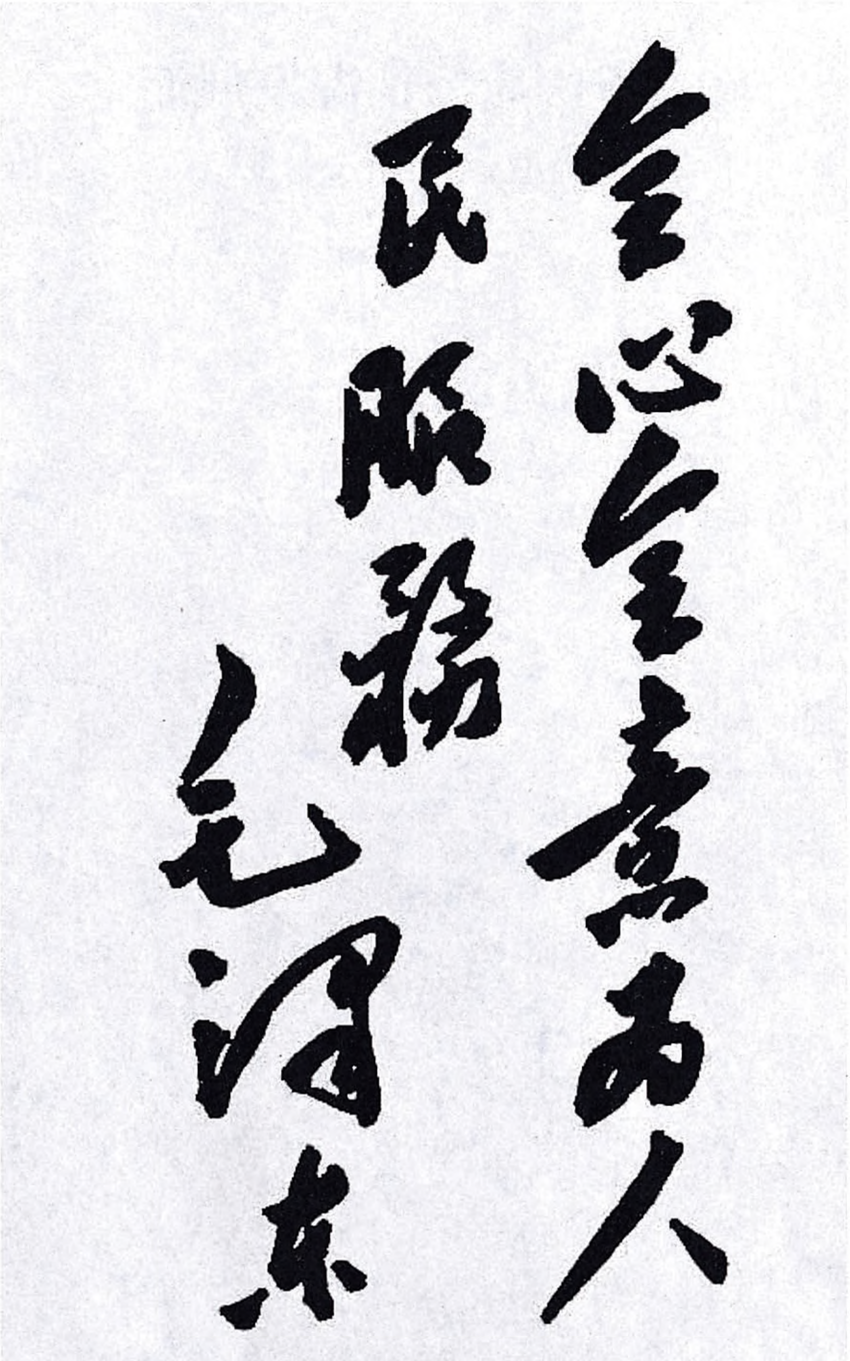
（1949年11月27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

[1] 中央军委工程学校的前身是1931年2月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央军委通信学校。此校1937年1月随中央领导机关迁到延安，通称“延安通校”，1948年扩建为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简称“华北电校”）。1949年11月27日为庆祝中央军委工程学校开学，毛泽东亲笔题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刊登在当时该校的校刊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工程学校的题词。

攻占重庆应依情况发展而定

（1949年11月28日）

刘、邓、张、李[1]，并告贺、李，林、谭、萧[2]：

感酉电[3]悉。我所顾虑者，是怕重庆敌人利用我西路三个军尚要十二月十号才能占领泸州，我十一、十二等军向重庆进得太早，

---

[1] 刘、邓、张、李，指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2] 贺，指贺龙，当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李，指李井泉，当时任川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林、谭、萧，指林彪、谭政、萧克，当时分别任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参谋长。

[3] 指1949年11月27日酉时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蒋介石调第三军援重庆系建筑在罗广文能守住长江南岸綦江、南川地区，孙震能守住由涪陵迄万县江防的前提上，如果我在南岸能基本歼灭罗广文，而孙震兵力又感单薄的情况下，蒋可能改变其计划。我西路3个军至迟12月10日可达泸州、合江江边，如我迅速渡江并控制泸州、松山之线，即胡宗南退滇之一条公路线被截断，因此敌一经发现我进到叙永、赤水，即将考虑加强川西与康东之沿线。我如能在江南歼罗，则重庆较易夺取，早点夺取重庆，使工业不受大破坏，则我可早日依托重庆供给大军经营全川。重庆城地形险要，如敌以较多兵固守，攻取费时。在敌薄弱时，至少我应在一段早点争取渡过长江，跨江南北机动较为有利。因此，我们意见仍以尽可能提前渡江，并视情况注意或夺取重庆为较稳当。

不敢据守，向上游或向成都逃掉。但如你们认为罗广文[1]被歼后，重庆已无多兵防守，势必早日逃走，不如迅速占领重庆，较为有利，则你们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如重庆之敌并无逃走之意，则十一、十二军于歼灭罗广文后，于重庆上游渡江占领江北一段，然后看情形再定攻城计划，似较适宜。请依情况发展酌定之。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时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军民庆祝西南解放。

---

[1] 罗广文，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官。

给文南松[1]的信

（1949 年 11 月 28 日）

南松兄：

来示读悉，极为高兴。

祝你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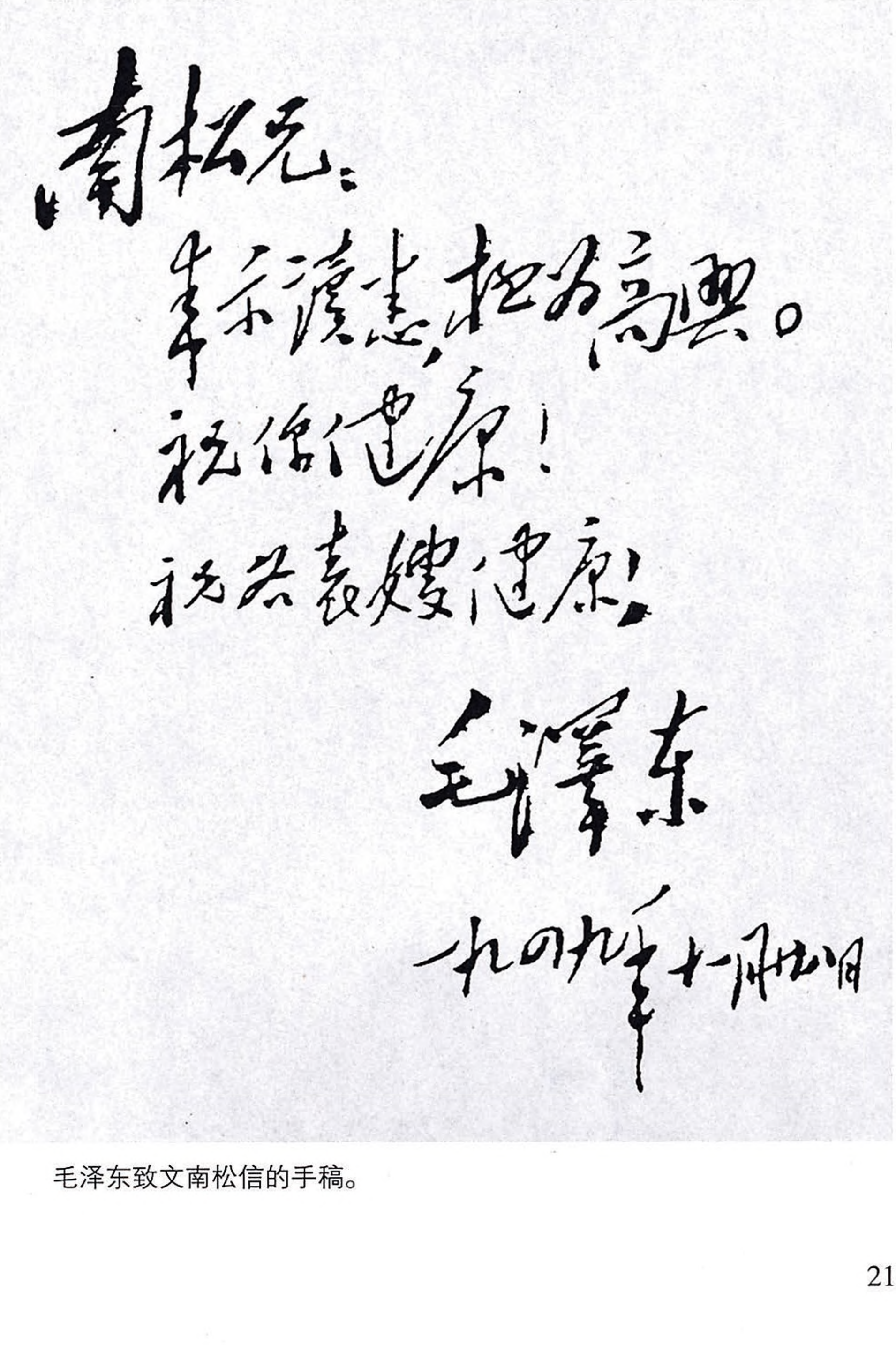
祝各表嫂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 文南松（1890—1951），湖南省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托（当时属湘乡）人，农民。毛泽东的表兄。



南松兄：

来示读悉，极为高兴。

祝你健康！

祝若表嫂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卅日

毛泽东致文南松信的手稿。

给毛宇居[1]的信

（1949年11月28日）

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2]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3]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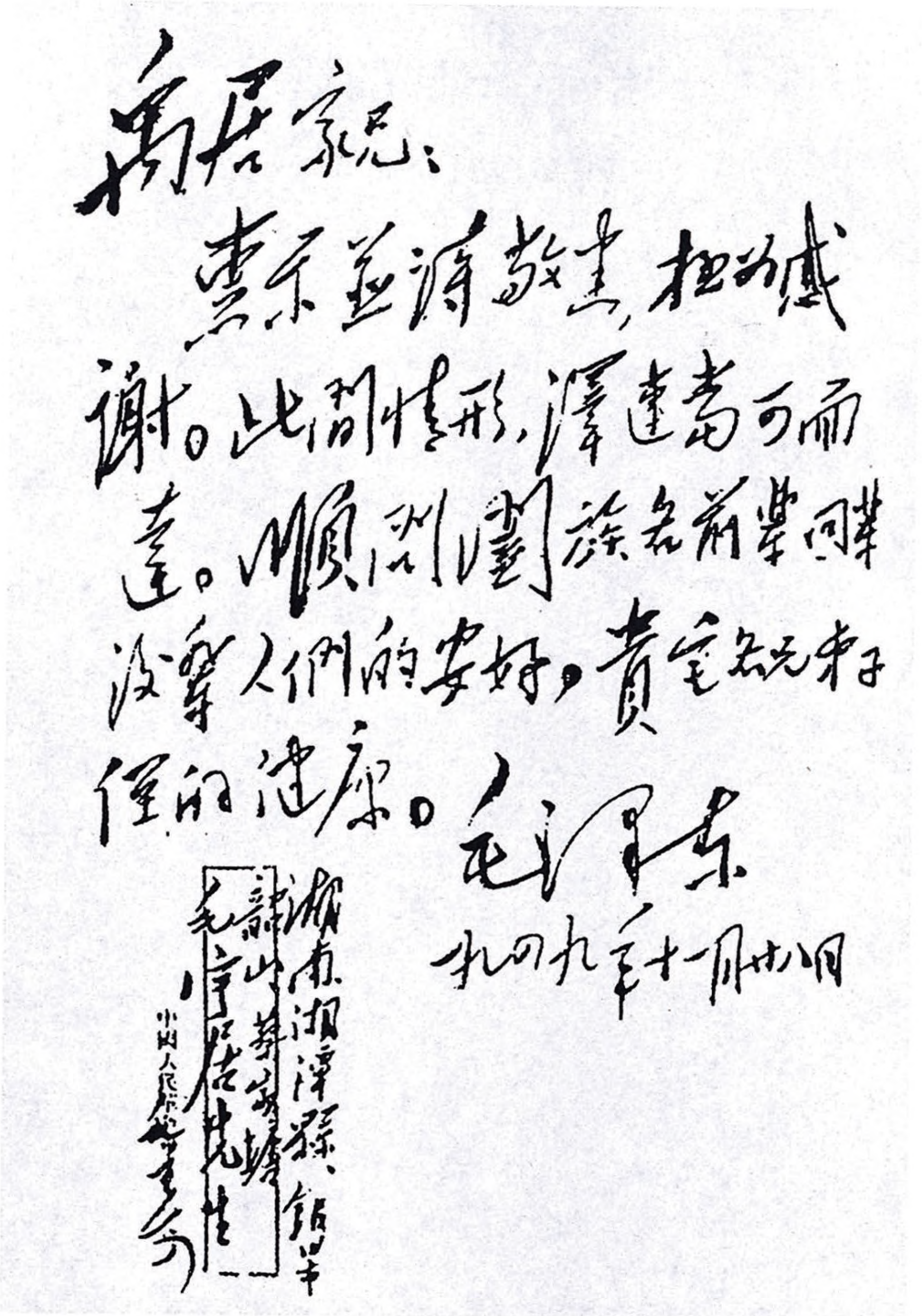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 毛宇居，亦作毛禹居。

[2] 指毛宇居为祝贺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所作的七律5首。

[3] 泽连，即毛泽连（1913—1995），号润发，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农民。毛泽东的堂弟。



宇居家兄：

惠示並清敬書，極為感謝。此間情形，澤連當可面達。順問闔族各前輩同輩後輩人們的安好。貴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八日

湖南湘潭縣、銀田寺

韶山蔣家塝

毛宇居先生

中國人民政府毛寄

毛泽东致毛宇居信的手稿。

给毛泽荣[1]的信

（1949 年 11 月 28 日）

宋五弟：

接到你的信，极为高兴。

我这里的情形，可问李祝华[2]、毛泽连二位便知。

托毛、李带上皮衣料一件，为弟御寒之用。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 毛泽荣（1897—1986），乳名宋五，又称逊五、胜五，湖南省韶山市杨林乡凤形村人，农民。毛泽东的堂弟。

[2] 李祝华（1909—1992），湖南省韶山市如意乡杨荣村人，毛泽东的堂表弟。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湖南湘潭清溪区第十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湘潭县供销合作社等单位工作。

给邹普勋[1]的信

（1949年11月28日）

亨二哥：

听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1] 邹普勋（1900—1957），乳名亨二，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南岸人，农民。毛泽东的邻居。邹普勋的父亲邹春培，是毛泽东的私塾老师。

给徐悲鸿的信[1]

（1949年11月29日）

悲鸿先生：

来示敬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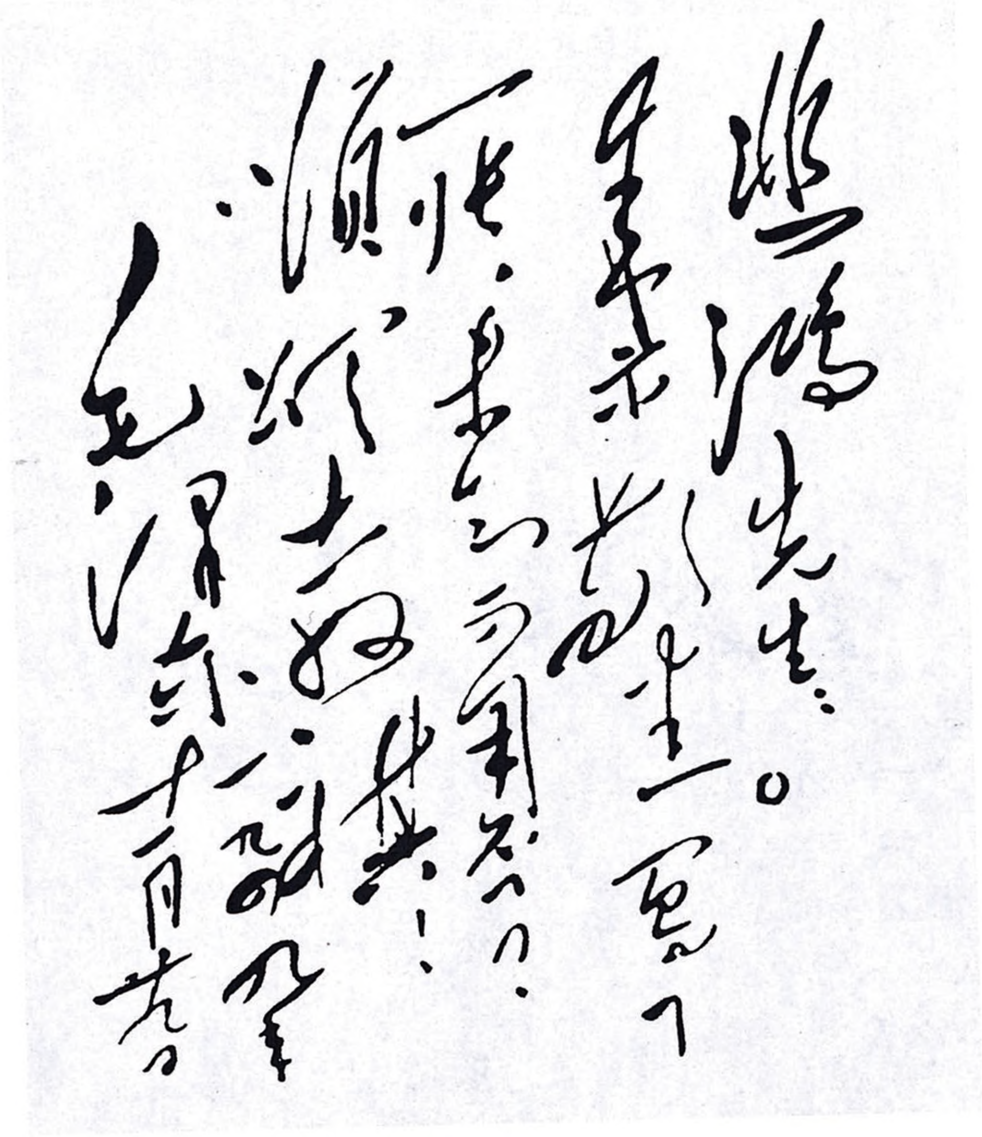
顺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

[1] 新中国成立之初，徐悲鸿敬请毛泽东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名。这是毛泽东给徐悲鸿的复信。



悲鸿先生：

来示[illegible]悉。写了一张，未知可用否？[illegible]大好，谢谢[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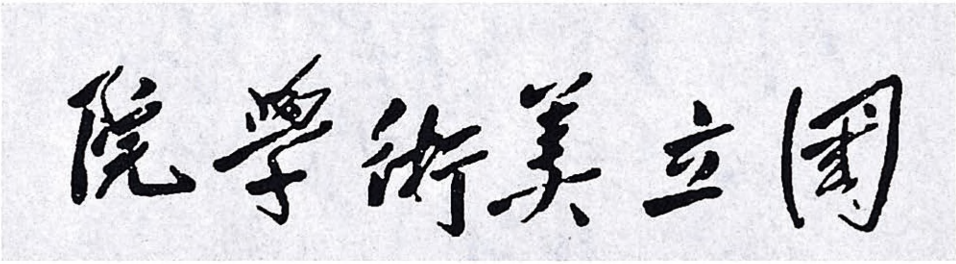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illegible]

毛泽东致徐悲鸿信的手稿。

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名

（1949年11月29日）

国立美术学院



毛泽东为国立美术学院题写的院名。

同意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等事项[1]

（1949年11月30日）

西北局，一野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十一月二十四日电[2]悉。同意西北局扩大会议[3]议决，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与原甘肃军区合并，以许光达兼军区司令员，原甘肃军区司令员徐国珍为副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以兵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的电报。

[2]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前委1949年11月24日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电报说：西北局扩大会议决定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以彭德怀兼军区司令员，习仲勋为军区政委，张宗逊兼军区副司令员，甘泗淇为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第二兵团兼甘肃军区，与原甘肃军区（不健全）合并，以许光达兼军区司令员，原甘肃军区司令员徐国珍为副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以兵团首长兼军区首长。

[3]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在兰州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和统战、财经建设以及干部教育等问题，作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

团首长兼军区首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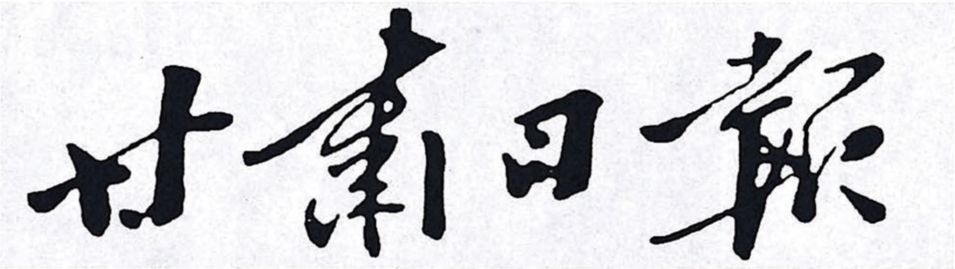
中央及军委

十一月三十日

为《甘肃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11月）

甘肃日报



毛泽东为《甘肃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9年8月26日，甘肃省会兰州获得解放，原有的旧报刊一律停办。9月1日，中共甘肃省委机关报《甘肃日报》在兰州正式创办并出版。同年12月，《甘肃日报》正式采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头。

中央关于为斯大林送寿礼致山东分局电[1]

（1949年12月1日）

山东分局：

斯大林同志今年十二月廿一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三日内（即十二月四日以前）购买每样五千斤共二万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十二月四日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中央

十二月一日下午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山东分局的电报。

给旅大人民的信

（1949 年 12 月 1 日）

旅大区党委同志们，并转旅大区人民：

由康敏庄同志带的签名书及礼品，均已收到，谢谢你们和旅大的人民！希望你们在生产建设上更加努力，创造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对召开全国军费预算会议报告的批语[1]

（1949年12月1日）

刘、朱、周、聂[2]，并告杨立三：

同意此件[3]所述意见。开会时请你们注意指导，因此事与全国财政预算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1949年12月1日报告的批语。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3] 指杨立三的报告。报告说：1950年全国军费预算会议确定于1949年12月10日在京召开。商定如下几个问题：一、修正、增补、厘定1949年4月颁布之统一供给标准草案，因为这个标准是依据长江以北地区情况制订的，在解放区范围扩展至全国的情况下，已不适应今日具体环境。二、商量起草军委总后勤部及大军区后勤部并尽可能地商量起草军、师、团后勤机关的组织系统、编制及组织条例、工作制度等。三、商量起草1950年供应关系。四、确定1950年夏、冬季各兵种服装制造任务与统一式样。五、讨论研究并拟出对低工薪制办法，提供军委作为今后改变供给办法的参考。

在中央同意华中局关于纠正乡村干部不良作风的决定的电报稿[1]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9年12月1日）

除在华中各省实行外，华东、西北、西南及其他有类似情形的地方均须注重纠正同类错误，尤其是乱打乱杀乱捉必须防止及禁止，决不能放任。

---

[1] 这一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改时原文是："华中局并告各局：十一月廿九日电悉。关于纠正乡村工作干部不良作风决定，经中央审查，认为可行，拟即由新华社公布。中央　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紧接在"新华社公布"之后。华中局的这一决定，后来发表在194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上。

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1]

（1949 年 12 月 2 日）

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举例说，概算草案中关于养活所有旧军队和旧公教人员的问题，这就是政策问题。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我们的情况概括地说来就是：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给柳亚子[1]的信

（1949 年 12 月 2 日）

柳老：

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到，因忙迟复为歉。车中信未见，厚意敬领。题字册[2]便时当代询，周公[3]确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文史机关事[4]大略亦因此，便当询之。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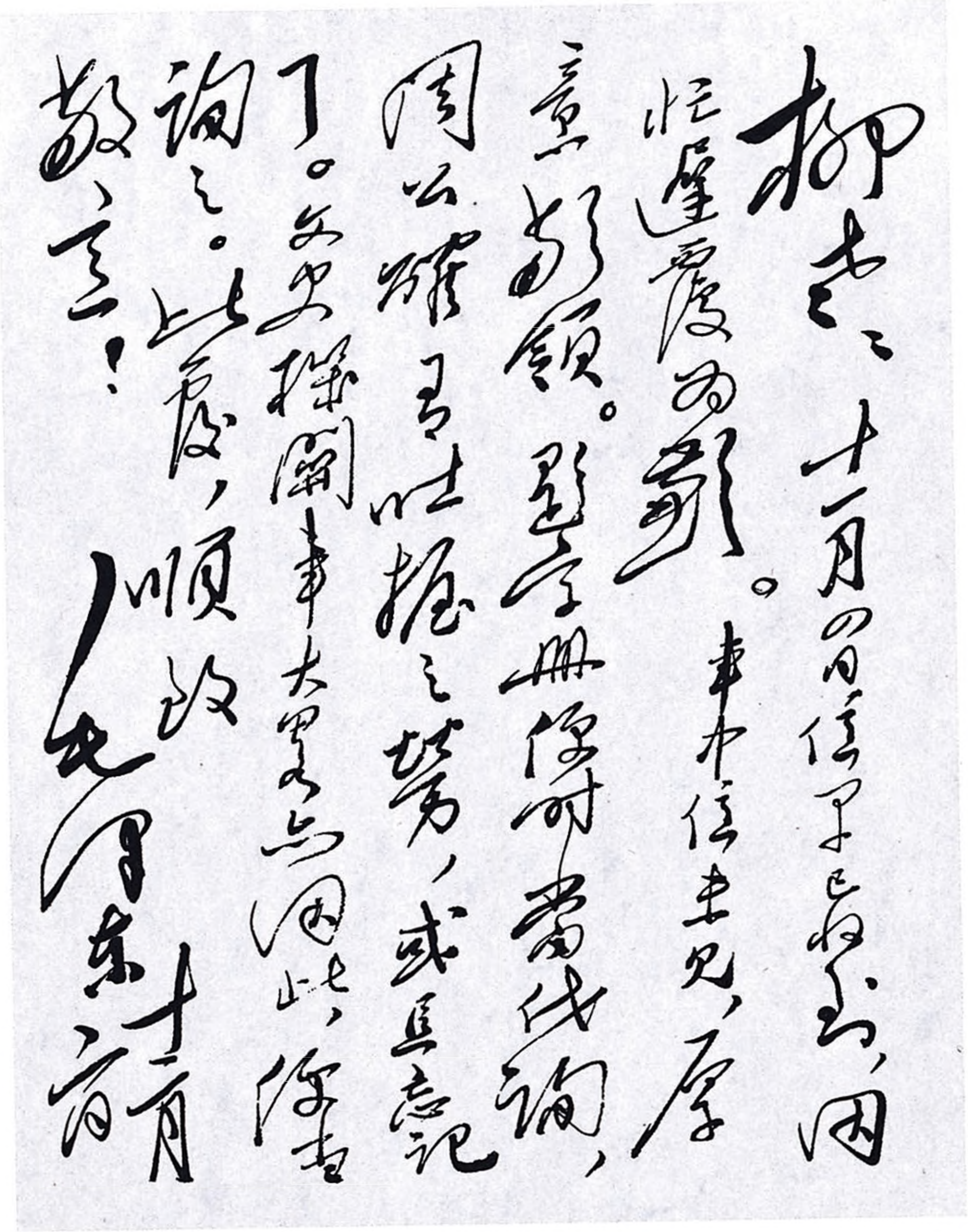
---

[1] 柳亚子，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2] 指柳亚子 1949 年 4 月送请毛泽东等题字纪念的《羿楼纪念册》之一。

[3] 指周恩来。

[4] 指筹备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馆一事。



柳先生：十一月四日信早已收，因忙迟覆为歉。来中信未见，厚意拜领。题字册保留当代询，周公惟有吐握之劳，或且忘记了。至于探阅事大要之点因此，作书询之。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毛泽东致柳亚子信的手稿。

关于注意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批语

（1949年12月4日）

荣臻[1]同志，并告李涛[2]：

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

[1] 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李涛，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

在邓拓[1]关于人民日报工作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1949年12月4日）

乔木[2]：

此事[3]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似乎是好的。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

[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3] 指邓拓1949年12月1日写给陆定一、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人民日报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他的改革意见。邓拓说，人民日报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二、游击习气积重难返，编辑部的领导实际上是多头的，而不是逐级的个人负责制；三、干部量多质低，并且使用不当，不能发挥积极性；四、行政管理工作对编辑工作配合不好。为了使人民日报担负起全国性报纸的任务，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邓拓提出如下建议：一、增调懂业务的领导骨干，加强领导。二、改组编辑部，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制度，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三、由副社长或正副总编辑一人专门负责上下联系工作，按领导意图主动组织思想性政策性较强的综合新闻和评论，并轮流组织各部门专门问题的通讯报道和论文。四、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五、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

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1]

（1949 年 12 月 4 日）

河南可于今年冬开始进行分配土地工作，明年可望初步完成。苏、浙、皖、鄂、湘、赣六省，可能还有广东，则须于明冬开始进行，后年可望初步完成。至于全部完成，则至少还需要一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

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有几个政策上的问题是二中全会已经确定了的，但是有些地方仍然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城乡关系中，哪一个是中心呢？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城市的手工业，对于农业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工业更不待说。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公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公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

关于会商攻击舟山群岛办法致粟裕[1]电

（1949年12月5日）

粟裕同志：

饶政委[2]带来之信及最近来电已悉，正交聂荣臻李涛刘亚楼[3]诸同志研究中。你十二月初赴江浙召开高干会完毕后请来北京与聂李刘商量作战办法。待商好后再定攻击舟山群岛的时间。大体上可以推迟至明年一月或二月间举行攻击。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 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李涛，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同意刘亚楼等关于各地机场修复问题的报告

（1949年12月5日）

华东局及华东军区，华北局及华北军区，华中局及华中军区，西北局及西北军区，东北局及东北军区，并告政务院周总理，中财委陈、薄[1]及空司刘、常、王、王[2]诸同志：

据空军司令刘亚楼等同志十一月二十八日电称：（一）空军司令部刚刚成立，暂时无法照顾到筹划全国各地机场建设的总预算。但我们认为，全国各军区及各级政府，目前主要应该是派定专人保护和管理各地现有机场及其现有设备，做到不再被破坏或偷窃；同时，可进行各地方本身所能负担之经费和人力（可动员一部分部队参加）范围内的修理工作。至于各地机场大的修复工作，由于目前国家经济困难，除华东外，可以暂缓一步，待空军司令部有力量来整个筹划这件事情时，提出计划，经军委批准后，再来进行。否则，必然形成无政府状态。（二）华东范围，则有不同之处，因那里需准备执行战斗任务。但也并不是在华东地区的所有机场，都要立

---

[1] 陈、薄，指陈云、薄一波，当时分别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2] 刘、常、王、王，指刘亚楼、常乾坤、王弼、王秉璋，当时分别任空军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即修理（如苏北就可以暂缓），而是首先修复与行将执行的战斗任务有关联的机场。其修建程度，亦可限于为执行战斗任务所需要的范围，以免经费开支过大。这种修复计划，据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报告，他们已经制就，并已向三野前委请示。在目前空军司令部无力量来审核这种预算的情形下，提议由空军司令部审核某地机场是否立即开始修理，而修理经费则由三野前委指定后勤机关审核之，然后报告军委批准之。（三）以上处理方法，如认为适当，请军委通知各军区及我们遵照执行，并告中财委等语。我们同意此种办法。请华东军区及各军区即照此办理，请中财委即照此支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经费而拒绝支付一切可以减省的经费。

中央军委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1]

（1949年12月5日）

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的胜利。人民解放军除在几个战线上必须专心致志追歼残敌以竟全功外，已有大量军队进入整训，或不久即将进入整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在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帮助国家的建设工作。”这里给了我人民军队除了保卫国防、巩固治安和加强整训这些伟大任务以外的一个光荣而巨大的任务。因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一生产任务是必须而且可能实现的。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是由于国内外反动派所发动的长期的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给了人民以严重的灾害，给了经济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的指示。

严重的破坏。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克服此种困难的方法，首先是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逐步地恢复与发展生产。而人民解放军则必须担负一部分生产任务，方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克服此种困难。

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是因为人民解放军绝大多数来自劳动人民中间，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各种生产技能，并曾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担负过生产任务，具有生产的经验与劳动的传统。人民解放军的广大的干部们和老战士们都懂得，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这一生产任务之所以可能实现，还因为在战争结束了的地区，人民解放军除了担负保卫国防、肃清土匪、巩固治安、加强训练等项任务之外，已有余裕时间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所有这些，都是人民解放军能够实现生产任务的条件。

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而其重点，则在于以劳动增加社会和国家的财富。因此，各军区首长，必须指导所属，从一九五〇年春季起，实行参加生产建设工作，借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节省一部分国家的开支。此种生产建设工作，应形成一种运动，以利推广。此种生产运动应订出较长时期的计划和具体的步骤。生产项目应在人民政府允许之下，以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各项建筑工程、各项可能从事的工业和运输事业为范围，禁止从事商业。军队领导机关应根据驻地情况，调查研究，今冬做好准备。

根据过去的经验，军队的生产运动，必须严格禁止开商店从事商业行为。干部中如有企图以走私、囤积、投机希图暴利的思想，或发现此种行为，必须迅速予以纠正和制止。因为这些不仅违背正确的生产方针，搅乱经济秩序，而且势必发生贪污腐化，毁坏自己同志，为法令所不容许。此外，在进行农业生产时，必须注意不要因开荒引起水患，不要因争地引起人民不满。

为了使军队正确执行生产任务，开展生产运动，兹规定：

（一）在师、军及军分区以上各级，成立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代表参加的生产委员会，其任务为掌握生产方向，审定生产计划，监督生产计划的实施，检查违法行为。

（二）建立军队的生产合作社，建立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在军队生产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之下，掌管全部生产资金、生产活动和生产结果的处理。合作社系统和军队指挥系统平行，相互密切联系，但不相混淆。

（三）实行公私兼顾原则，公平合理地分配生产红利，其中应有百分之四十为生产者个人所有，其余为该生产单位及国家所有，借以建立公私革命家务，一方面做到军队部分自给，一方面使生产者个人有所收获。此项个人收获，或自己留用，或寄回家用，或存储于合作社备用，由个人自己决定。

（四）在土地缺少地区，除参加各种可能的手工业、工业、水利事业、运输事业和建筑工程之外，军队首长可和当地人民政府商量并在农民自愿原则下，参加劳力、资金、肥料、农具，与农民伙种，使之增加产量，公平分配成果。但必须注意不得强制执行，不得与民争利。

（五）各军区部队的生产计划，须与各大行政区和各省人民政府

的生产计划相结合，统筹生产资金。所有军队生产资金均作为投资，必须计算利息和订定还期。所有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并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得违犯。

上述各项，望各军区首长严格注意，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一九五〇年的生产建设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并随时检查，纠正可能发生的错误和缺点。各地人民政府对当地军队的生产工作则有予以指导和协助的任务。

主席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五日

中共中央关于实施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指示的通知[1]

（1949年12月5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前委，各军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日发表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2]。你们看到后应即加以研究，就自己管辖范围内使一切可能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部队和机关积极地适当地实施起来，注意避免过去军队参加生产建设时所犯过的错误，区分前线和后方，区分具备了参加生产的条件的部队和机关与目前尚未具备此项条件的部队和机关，考虑地方条件和资金条件，适当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将使部队和机关的生活获得改善，使国家节省一部分开支，并将在全国人民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中央

十二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前委和各军区的通知。

[2] 即《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和会议代表合影。

复卢汉电

（1949年12月11日）

昆明卢主席[1]勋鉴：

佳电[2]诵悉，甚为欣慰。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现我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已进驻重庆，为便于具体解决云南问题，即盼迅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并望通令所属一体遵行下列各项：

（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

（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布告[3]与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刘邓两将军的四项号召[4]，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

---

[1] 卢主席，指卢汉，原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2] 指1949年12月9日卢汉关于宣布云南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给毛泽东、朱德的电报。

[3] 应为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4] 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的四项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二、国民党政府机关各类人员应即保护原机关学校财产、用具和档案，听候接收。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四、乡保人员应即维持地方秩序，为解放军办差事。

序，听候接收。

（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

（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又为向云南与全国人民正式宣布此次起义并取得各方谅解计，似以另发一通电，对过去作进一步检讨，再由我方电复并于互相同意后发表，较为妥当。专此，并希裁复。

毛泽东
朱　德
十二月十一日

抵达莫斯科时的书面演说[1]

（1949年12月16日）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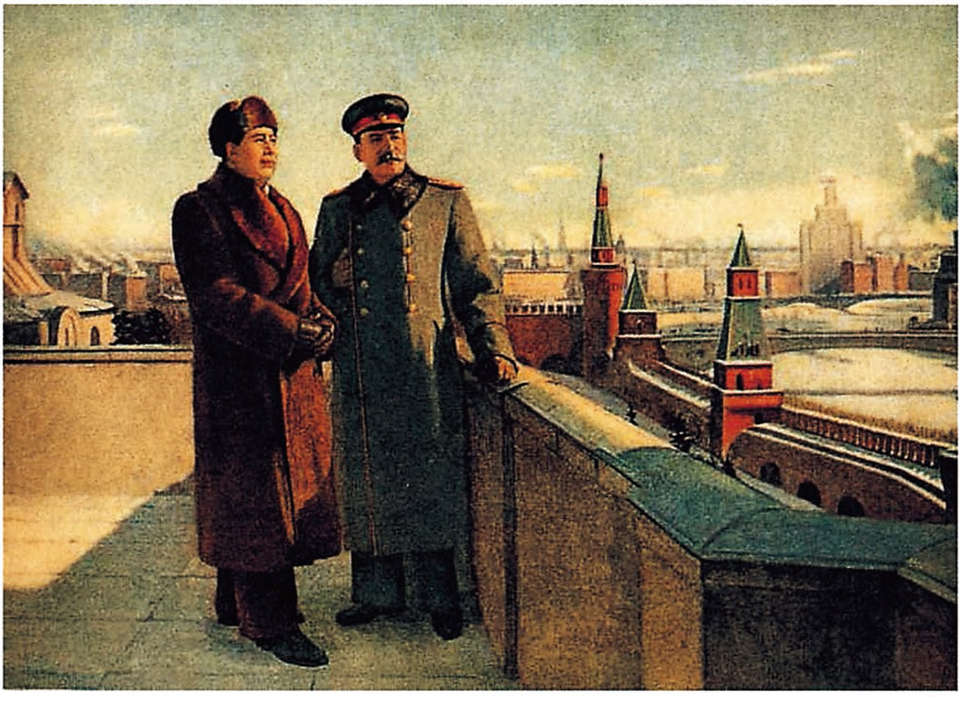
---

[1] 12月16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这是毛泽东在抵达莫斯科时在车站上的演说。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抵达边境车站满洲里站时的留影。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专列上和送行者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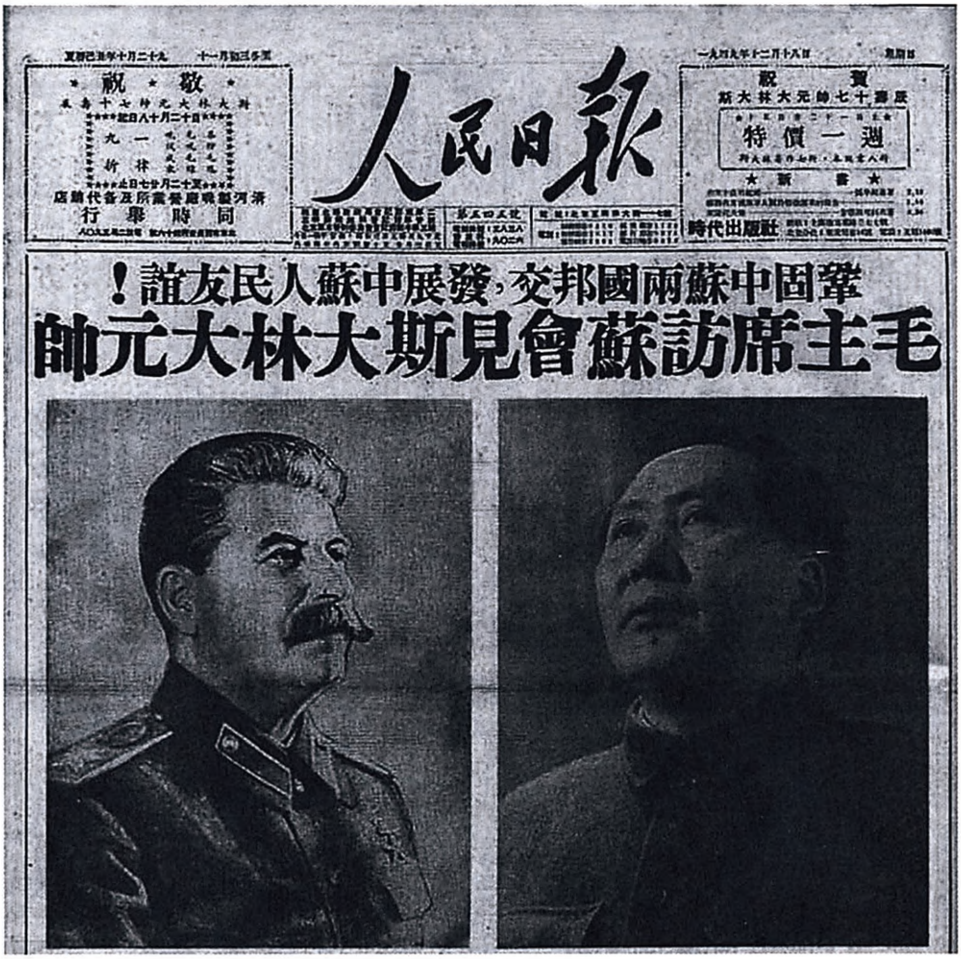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到达莫斯科火车站。



《我们伟大胜利的旗帜——斯大林和毛泽东》（油画）

访问苏联期间的毛泽东。

访问苏联期间的毛泽东。



敬祝

斯大林大元帥七十壽辰

自十二月十八日起

至十二月廿七日止

同時舉行

人民日報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祝賀

斯大林大元帥七十壽辰

特價一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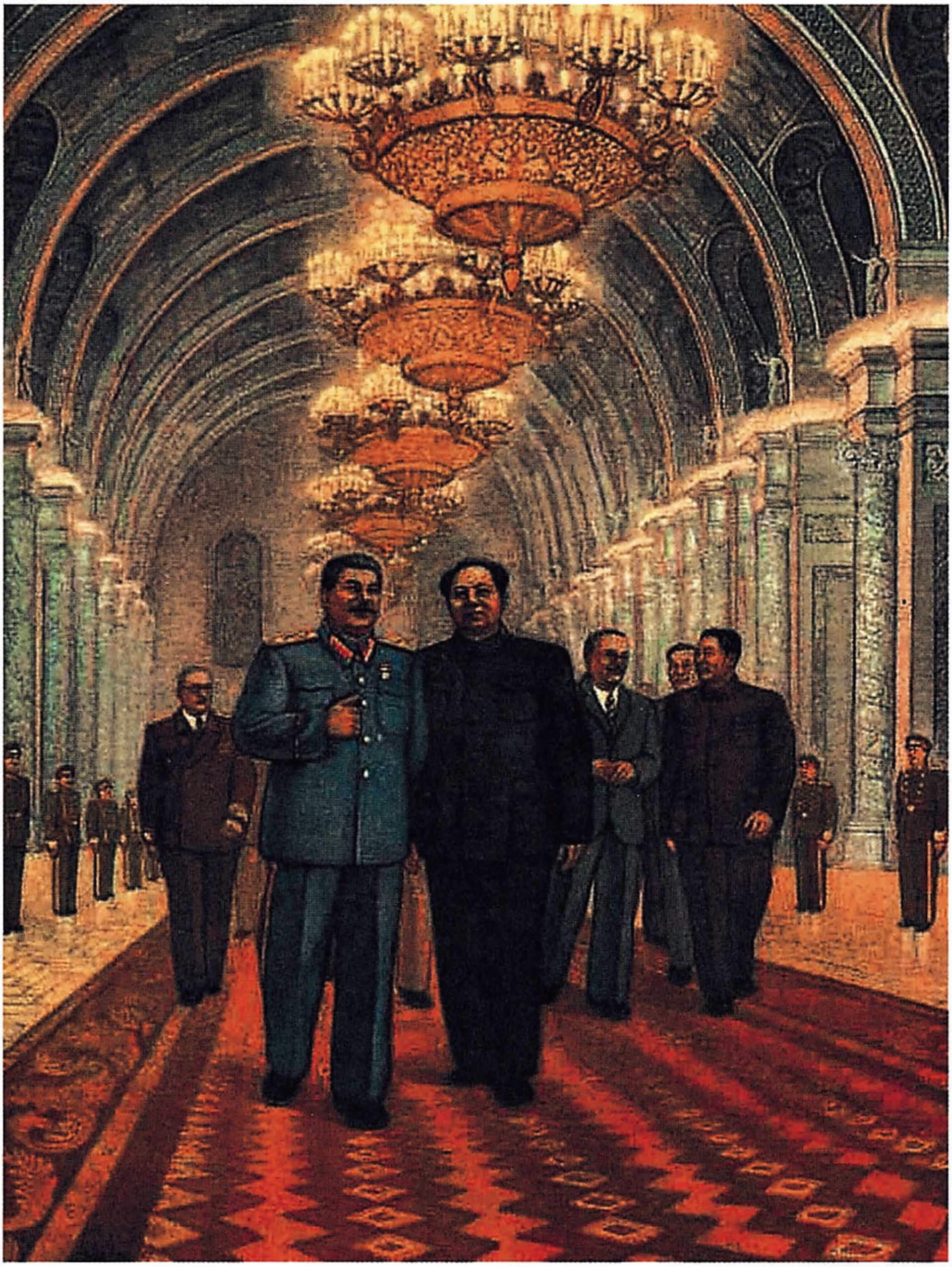
★新書★

時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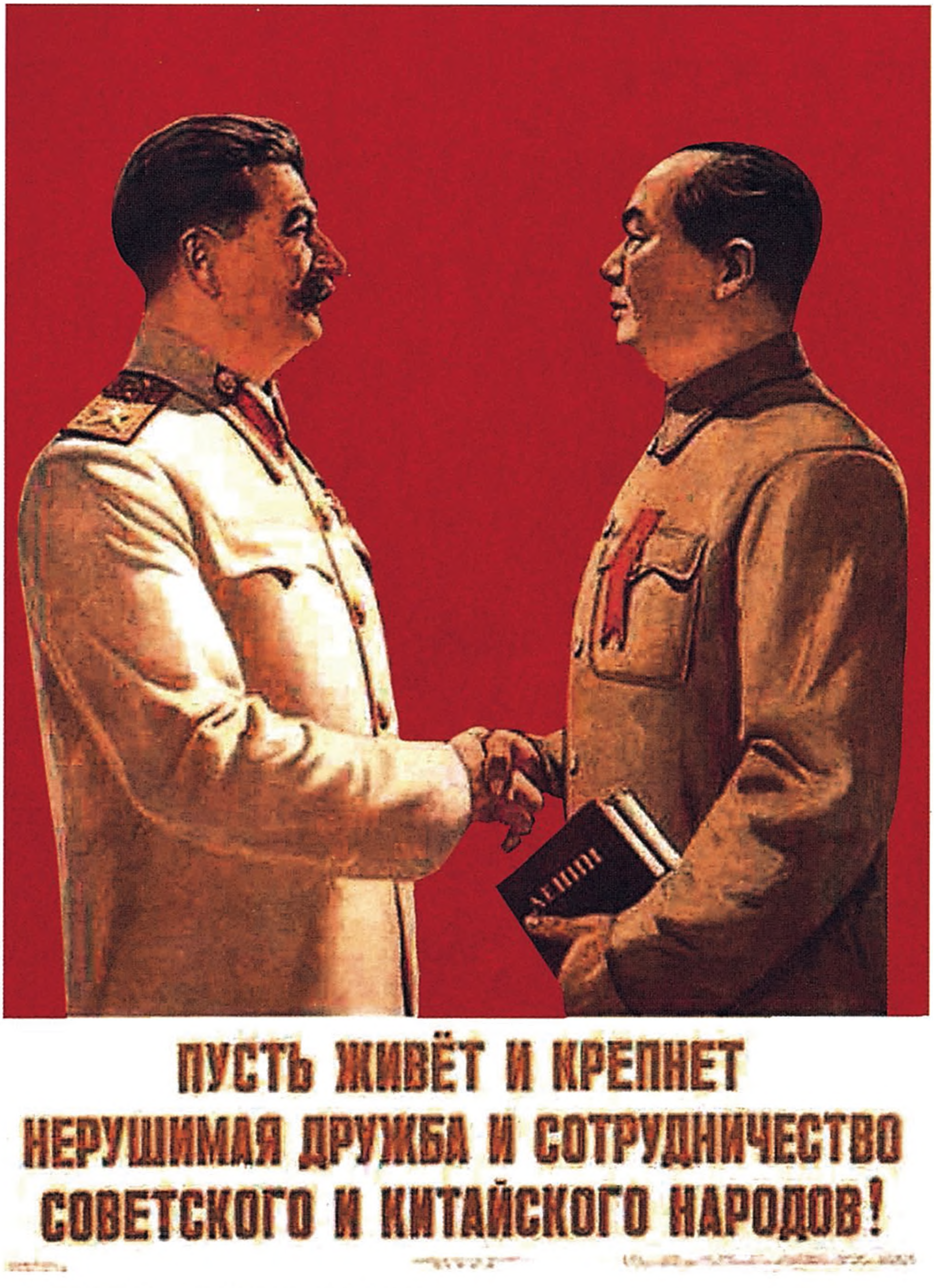
鞏固中蘇兩國邦交，發展中蘇人民友誼！

毛主席訪蘇會見斯大林大元帥

1949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报道。



《伟大的会见》(年画)


ЛЕНИН
ПУСТЬ ЖИВЁТ И КРЕПНЕТ
НЕРУШИМАЯ ДРУЖБА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ОВЕТСКОГО 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ОВ!

毛泽东和斯大林元帅（宣传画）

渡海作战必须注意的问题

（1949年12月18日）

林彪[1]同志（中央转）：

十日十四时电[2]悉。

（一）庆贺你们歼灭白崇禧的伟大胜利[3]。

（二）同意你的部署，即陈赓[4]略作休整即入云南，四野入桂各军休息二十天，大部分散剿匪，另以四十三军及四十军准备攻琼崖[5]。

（三）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华中军区司令员。

[2] 指林彪1949年12月10日关于广西战役情况和部队行动等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

[3] 指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于1949年11月上旬发起的广西战役。这次战役歼灭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17.3万余人（仅2万人逃入越南），解放了广西全境。白崇禧，1949年4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

[4] 指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

[5] 琼崖，即海南岛。

地，随即独力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十二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力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三野叶飞[1]兵团，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海南岛之敌，可能较金门敌人战力差些，但仍不可轻敌。请告邓、赖[2]及四十军、四十三军注意，并望你向粟裕[3]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四）湖南省政府可于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改组。但程潜[4]除任中南副主席外，其湖南军政委员会仍应存在，即使无具体工作，留一招牌亦有作用。此点程在京时，我已向他当面谈过，请加注意。

（五）关于城乡、公私、工商、劳资等相互关系，比重问题，已托邓子恢[5]同志向你转达，有何意见，望告。关于军队参加生产问题，请回汉口后统筹办理。

---

[1]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

[2] 邓，指邓华（1910—1980），湖南郴县（今属郴州市）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指赖传珠（1910—1965），江西赣县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

[3]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4]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原国民党元老、高级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主任。

[5]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华中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六）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于远方

关于同缅甸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的电报

（1949 年 12 月 19 日）

少奇、恩来同志：

（一）缅甸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应复电询问该政府是否愿意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同时请该政府派一负责代表来北京商谈建立中缅外交关系问题，依商谈结果再定建立外交关系。此种商谈手续是完全必要的，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应如此。如果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公开宣布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则我方亦应去电该国叫它派代表来华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同时可将电文大意公开发表消息，如此主动权仍然操在我手。你们对此意见如何？（二）你们对卢汉刘文辉邓锡侯[1]的处置是妥当的。（三）昨日我有一电答复林彪，谅收到。（四）国内外对我访苏反映如何，请叫乔木摘告。（五）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十八日电的回答。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

[1] 卢汉，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 年 12 月 9 日率部在昆明起义。刘文辉、邓锡侯，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 年 12 月 9 日率部在四川西康起义。

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1]

（1949年12月21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七十寿辰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个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七十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大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

[1] 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1日24时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本（廿一）日庆祝会除苏联各共和国代表讲话外有十三个国家的代表讲话，在这十三个国家中由我代表中国第一个致词，受到盛大欢迎，三次全场起立长时间鼓掌。新华社发表消息时请照塔斯社新闻稿发表。另将我的演说稿发表为盼。”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大会。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苏联国家大剧院。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致祝词。

对苏贸易应从统筹全局出发

（1949年12月22日）

中央：

（一）据稼祥[1]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二）二十一日来电已收到，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午三时

---

[1] 稼祥，即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可在先头阻止李弥余程万部向越南缅甸前进

（1949年12月29日）

少奇[1]同志：

请告刘邓[2]转知卢汉[3]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4]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

[1] 少奇，即刘少奇。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卢汉，原任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9日率部在昆明起义。

[4] 李弥、余程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和第二十六军军长。此时，这两个军正向越南、缅甸边境出逃。

关于四野前委改名等问题致刘少奇电

（1949年12月29日）

少奇同志：

廿八日电悉。（一）人民大学聘请教员问题，我已于廿四日将你上次来电抄送斯大林。（二）小丰满问题，廿五日晨问过斯大林，他说尚未收到你的电报。我当于明（廿九）日[1]将你来电抄送给他。（三）请告林邓谭[2]，四野前委应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南军区委员会（简称军区党委会），林邓谭所提委员二十人及正副书记均同意，惟须增加若干人，例如叶剑英张云逸李先念方方陈正人黄克诚[3]等，因为他们是各省军区的司令员政委，应当参加。此外，如林平曾

---

[1] 这里的“明（廿九）日”同文末所署的“廿九日”矛盾，疑有误。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3] 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云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陈正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军区政治委员。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政治委员。

生[1]等是否应增加，请林邓谭酌定，报告中央批准。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湘赣边纵队司令员。曾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司令员。

关于了解华东区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情况的电报

（1949年12月29日）

饶漱石[1]同志（中央转）：

请将下列各方面情况电告：（一）你们对上海外商征税比较对华商征税税率高低程度如何？（二）全国概算中分配华东之收入数额有完成把握否？（三）全华东区内县的人民代表会议共有多少县开过了，尚有多少县未开过？市的代表会议（三万人口以上的）是否均已开过？一九五〇年一二三月内，全华东区所有县市均应开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可以做到否？（四）此次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及结果如何？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为了解上海工商业家困难的真实情况致陈云[1]电

（1949年12月30日）

陈云同志：

上海市委亥江致中央电称，上海有许多大型中型工厂负债甚多，难于维持，要求政府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危险等语。上海工商业家是否确有这样大的困难，政府是否已允许贷款及贷给多少，资本家叫得那样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否有借此抵制公债的意图，你的看法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关于同意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方针的电报

（1949年12月31日）

林彪[1]同志（中央转）：

转来邓赖洪[2]廿七日电已悉。同意该电所取方针，即努力争取在旧历年前进攻海南岛，但以充分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卒莽撞造成过失。为此，邓赖洪应速到雷州半岛前线亲自指挥一切准备工作，并且不要希望空军帮助。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

[2]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赖，指赖传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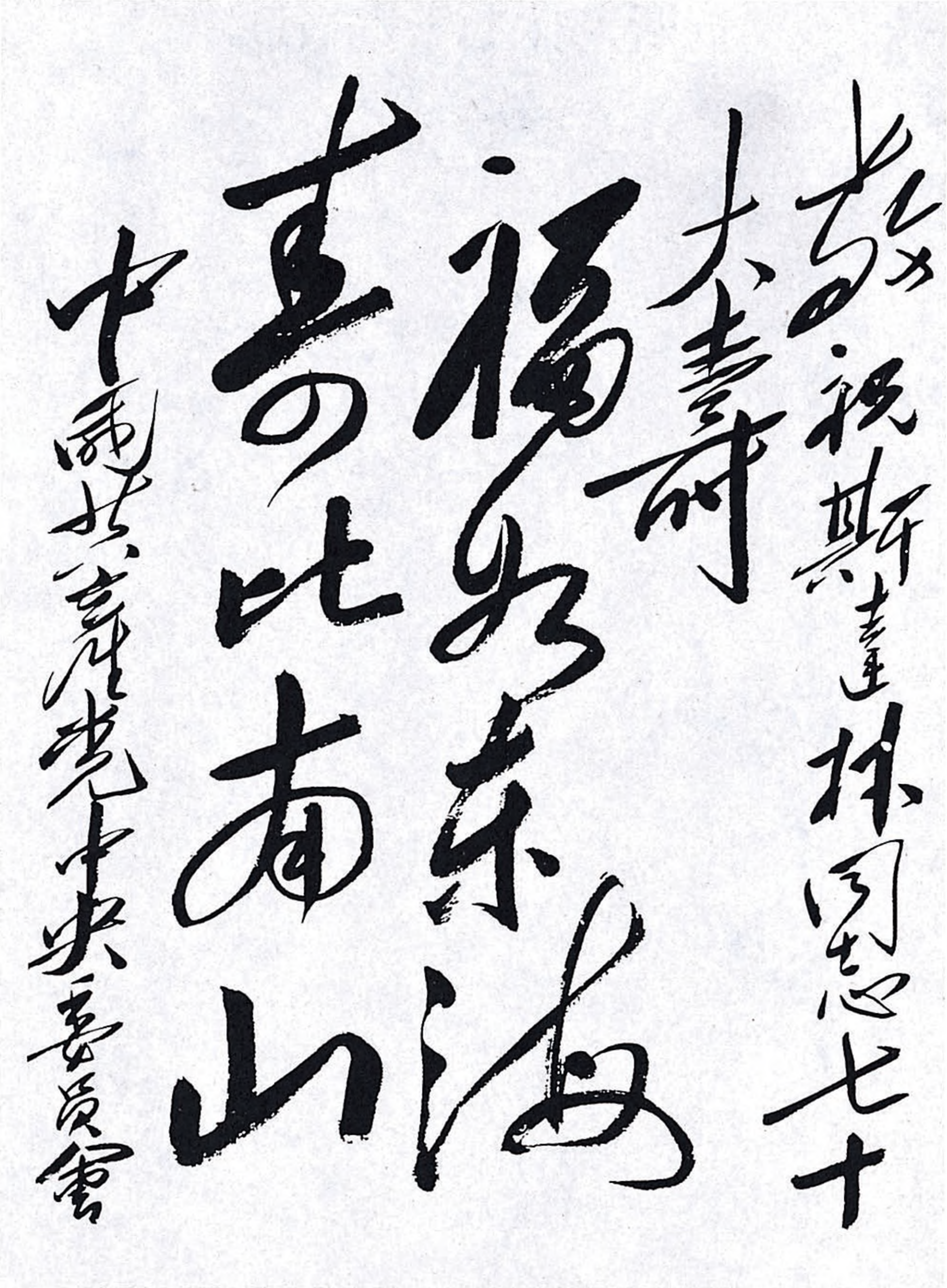
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联[1]

（1949年12月）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

[1] 这副寿联原件上款为“敬祝斯达林同志七十大寿”字样，下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斯达林，即斯大林。



恭祝斯達林同志七十大壽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會

毛泽东为斯大林七十寿辰写的寿联。

给张瑞岐的信[1]

（1949年12月）

瑞岐同志：

派马汉荣同志前来参加你的婚礼，祝你俩白头偕老，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顺捎上一百元钱，请收下。

毛泽东

---

[1] 张瑞岐，1944年12月28日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第二年担任警卫班班长。1949年离开北京返回老家，1949年12月30日，张瑞岐的婚礼在陕北清涧县袁家沟举行，毛泽东派马汉荣参加了婚礼，并写了这封信。

给李敏[1]的信

（1949 年）

娇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快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2]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

毛泽东

---

[1] 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小名叫“姣姣”，又叫“娇娇”。毛泽东给女儿李敏写的这封信用的便是“娇娇”。

[2] 贺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人，毛泽东三弟毛泽覃之妻、贺子珍的胞妹。

为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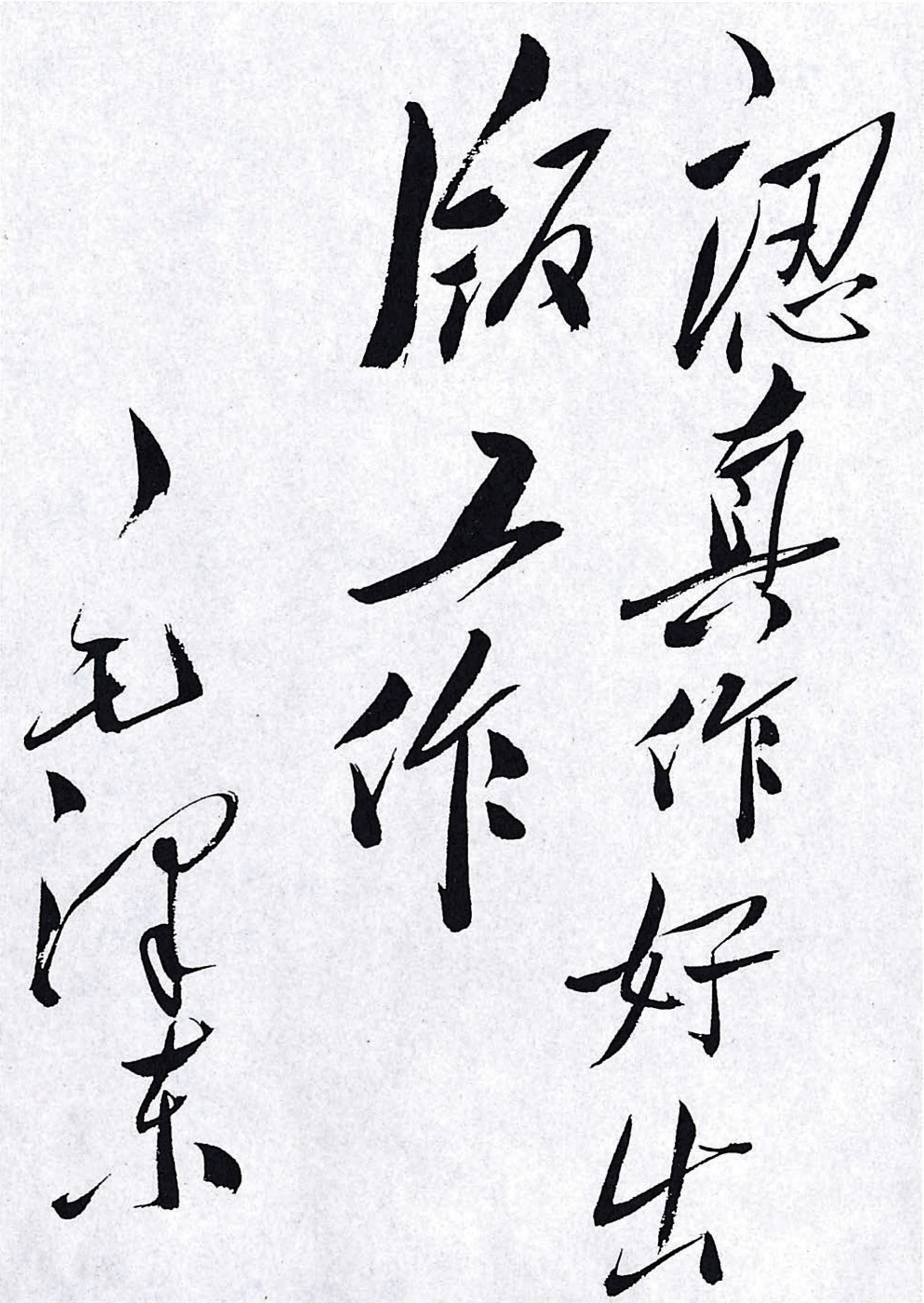
（1949年）

认真作好出版工作。

毛泽东

---

[1] 1949年年底在北京召开的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标志着新中国出版事业已经适应新的情况走向全国范围的统一，会议成立了新华书店总管理处。这是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的题词。



认真作好出
版工作

毛泽东

毛泽东为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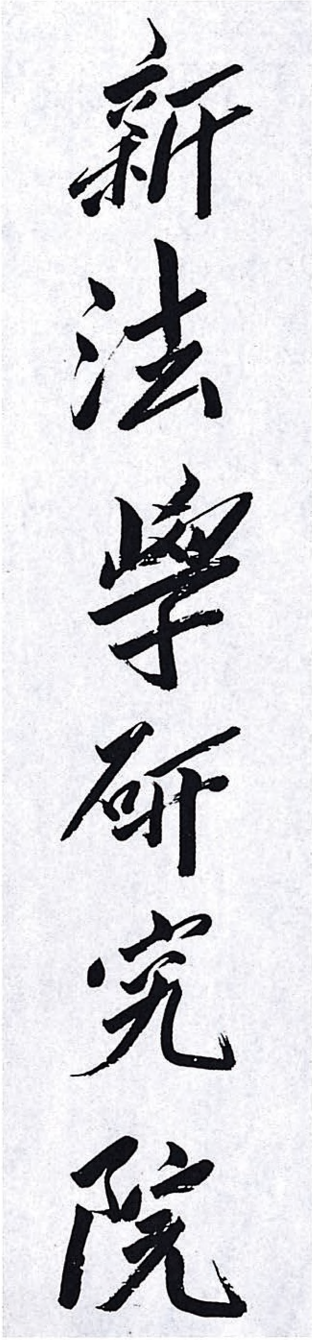
为新法学研究院题名[1]

（1949年）

新法学研究院

---

[1] 中国新法学研究院由国家司法部于1949年年底开办，1950年1月1日正式开学，1月4日举行开学典礼。



新法學研究院

毛泽东为新法学研究院题写的院名。

为朱光题词[1]

（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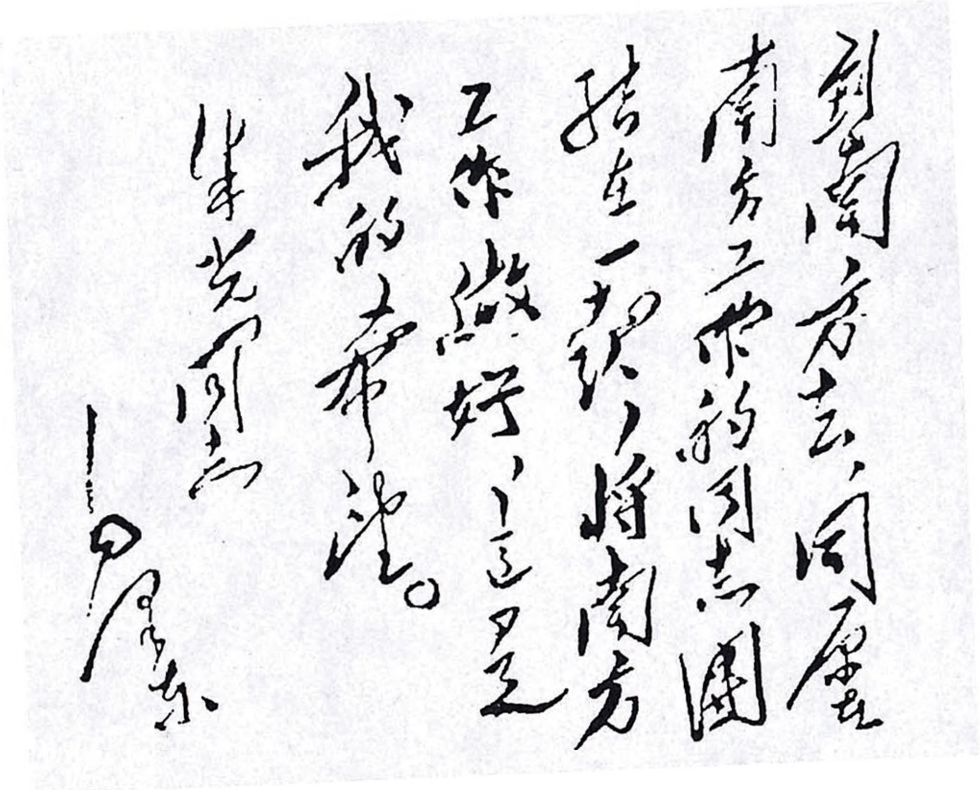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朱光同志

毛泽东

---

[1] 1949年8月，朱光奉命南下广州，参加广州的接管工作。朱光离开东北，进关南下途经北平时，来到中南海。朱德应朱光之请，即席书写了一帧《赠友人》诗相赠。尔后，朱光又应毛泽东之请，到其书房叙谈，毛泽东亲笔为朱光题词一幅。



到南方去，同居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

朱光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朱光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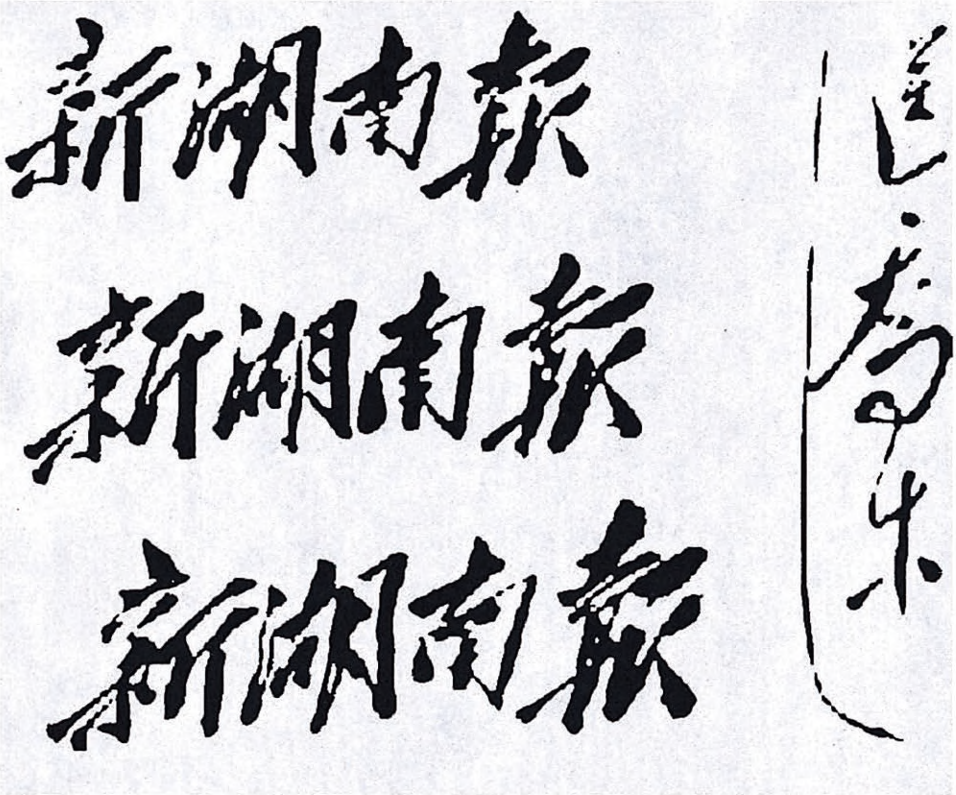
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1]

（1949年）

新湖南报

---

[1] 《湖南日报》原名《新湖南报》，酝酿于1948年年底，1949年三、四月间，郭小川专程到北京胡乔木处，请他转请毛泽东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这一报头启用于1949年8月15日《新湖南报》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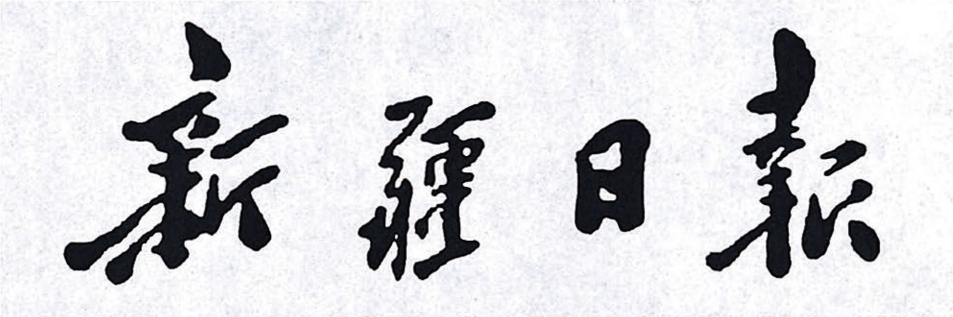

新湖南報
新湖南報
新湖南報

毛泽东为《新湖南报》题写的报头。

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

新疆日报



毛泽东为《新疆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新疆日报》是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1949年12月6日正式创刊时，毛泽东亲自为《新疆日报》题写了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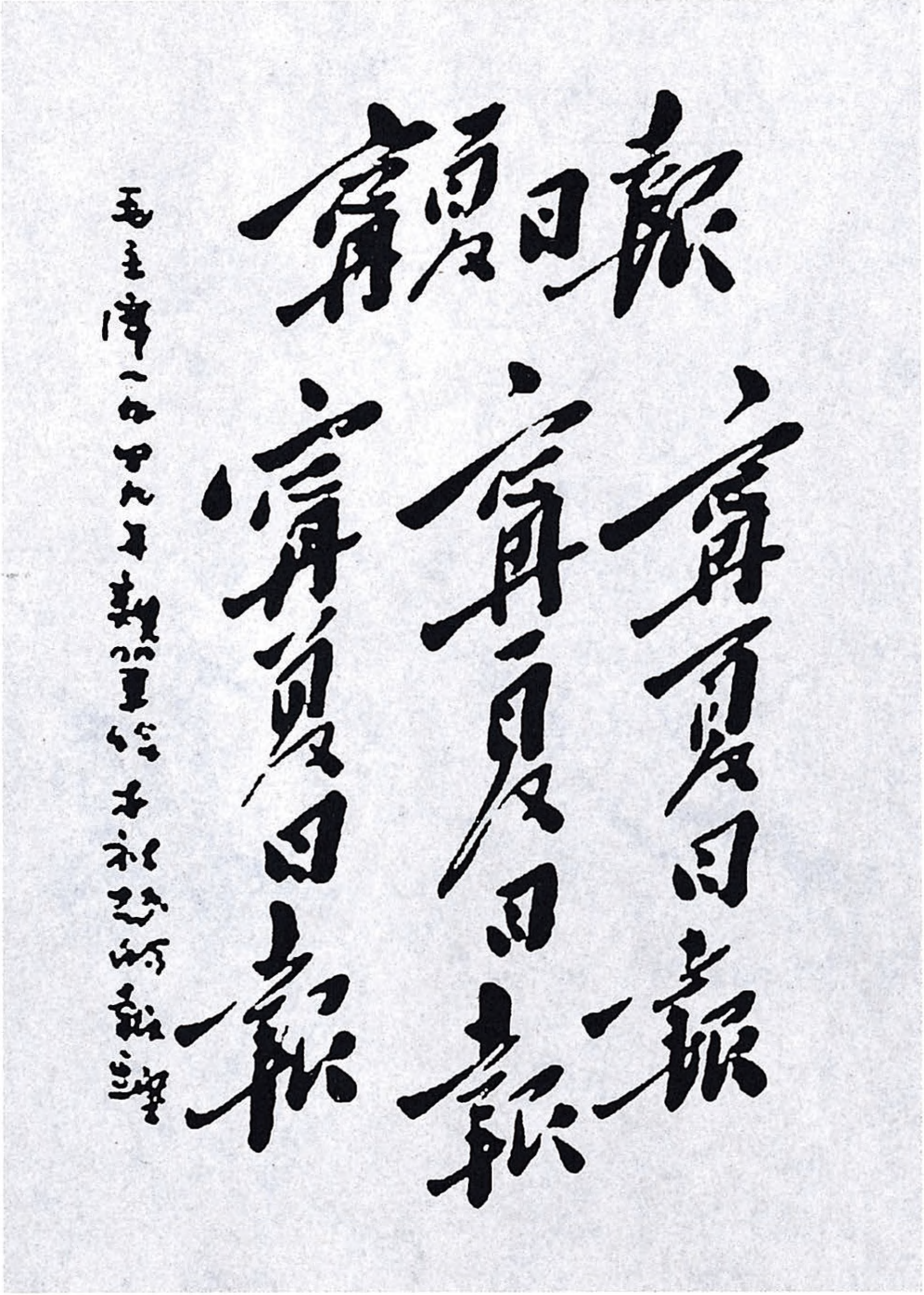
为《宁夏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

宁夏日报

---

[1]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宁夏省会银川，11月11日《宁夏日报》创刊，成为中共宁夏省委机关报。12月21日，《宁夏日报》启用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宁夏日报》报头，并沿用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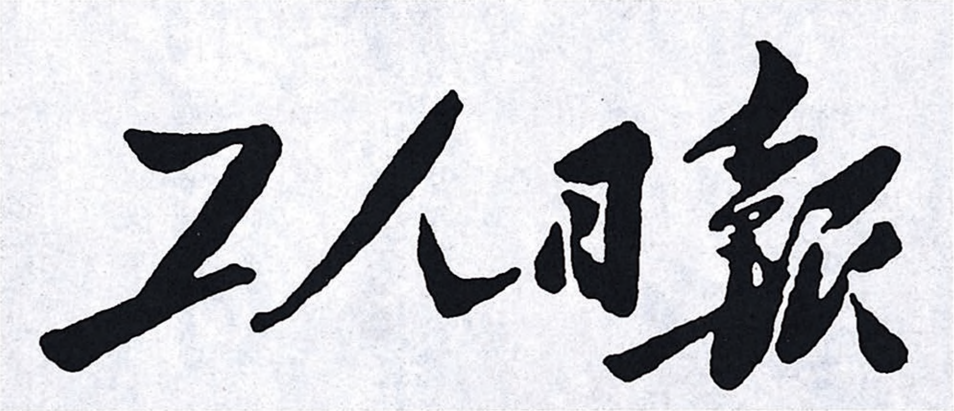

寧夏日報
寧夏日報
寧夏日報
寧夏日報

毛泽东为《宁夏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工人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

工人日报



毛泽东为《工人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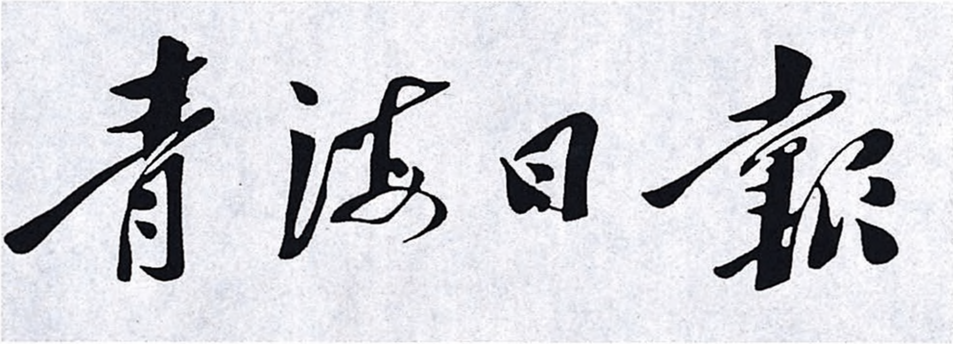
---

[1] 《工人日报》创刊于1949年7月15日，是一份以经济宣传为重点的全国性综合性中央级大报，主办单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毛泽东亲自为其题写报头。

为《青海日报》题写报头[1]

（1949 年）

青海日报



毛泽东为《青海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49 年 10 月 20 日，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创刊。1949 年 12 月 7 日，青海日报社第一任社长从省委带回毛泽东给《青海日报》题写的报头，12 月 9 日，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正式被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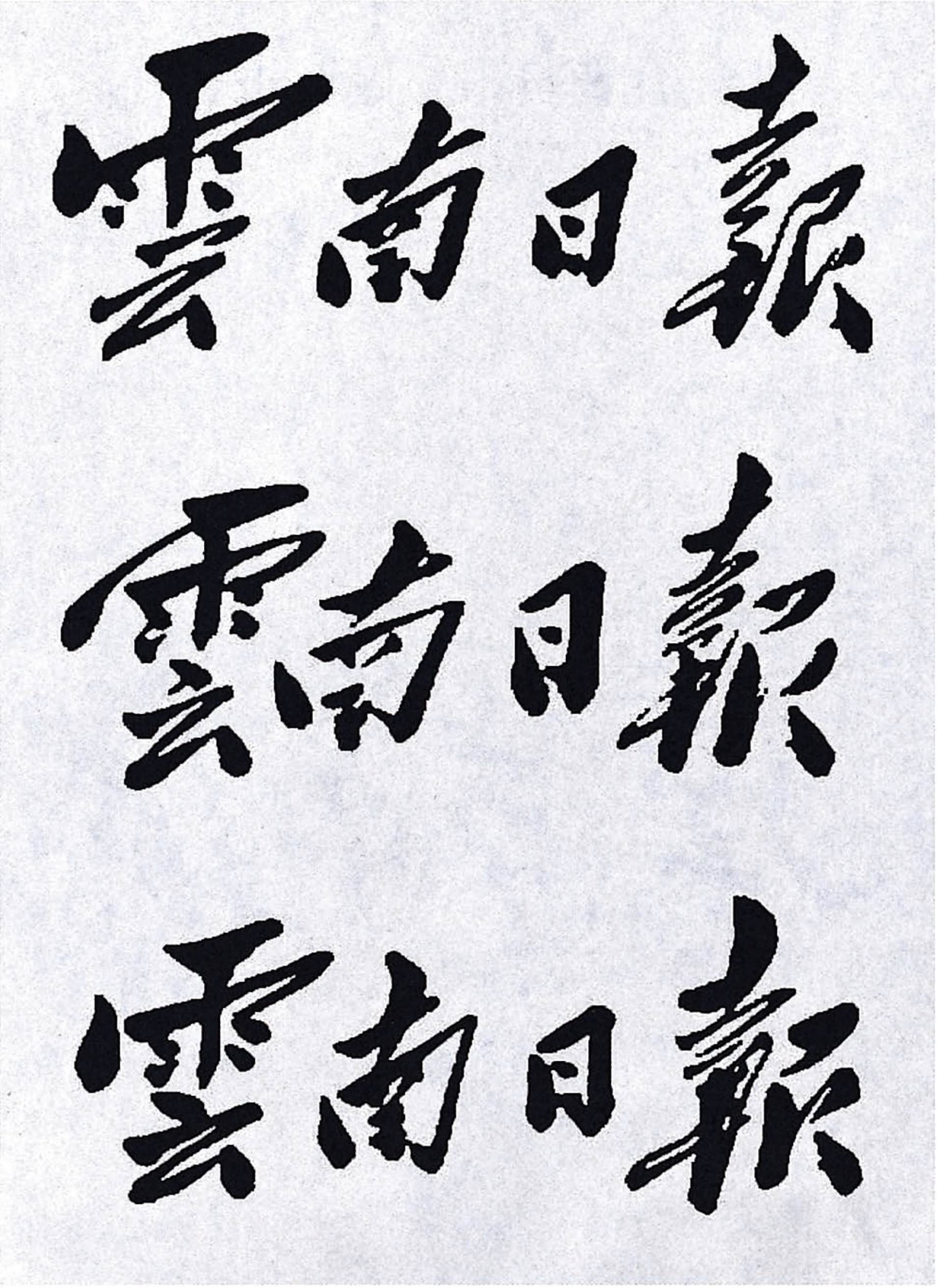
为《云南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

云南日报

---

[1] 1949年7月底，根据党中央在新区办报的决定，出版期仅为4个半月的《北平解放报》停刊，动员干部职工南下。在党中央的关心下，劳动大学、新华通讯社从北平总社等单位又抽调一批干部和报务人员加入南下办报的队伍。毛泽东亲自为将要创办的《云南日报》挥毫，书写了3个《云南日报》报头，墨迹苍劲有力。报社指定专人保护，南下带到云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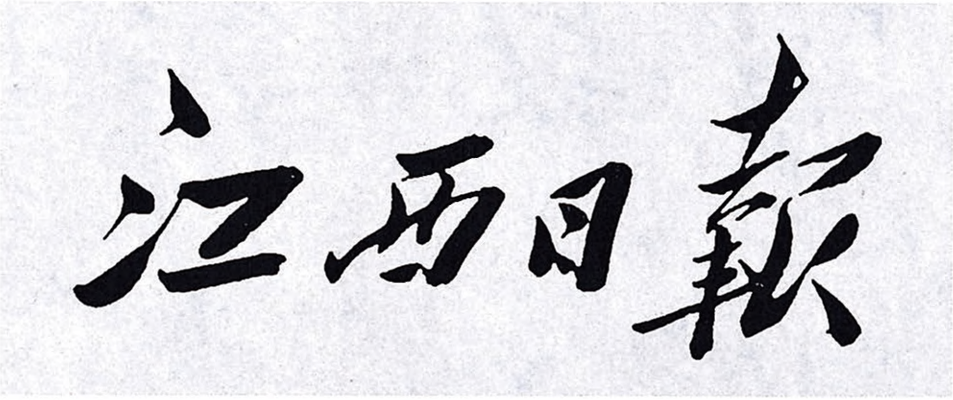

雲南日報
雲南日報
雲南日報

毛泽东为《云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江西日报》题写报头[1]

（1949年）

江西日报



毛泽东为《江西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中共江西省委机关报《江西日报》创刊于1949年6月7日，1949年10月24日启用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报头，并一直沿用至今。

打油诗·二乔

（194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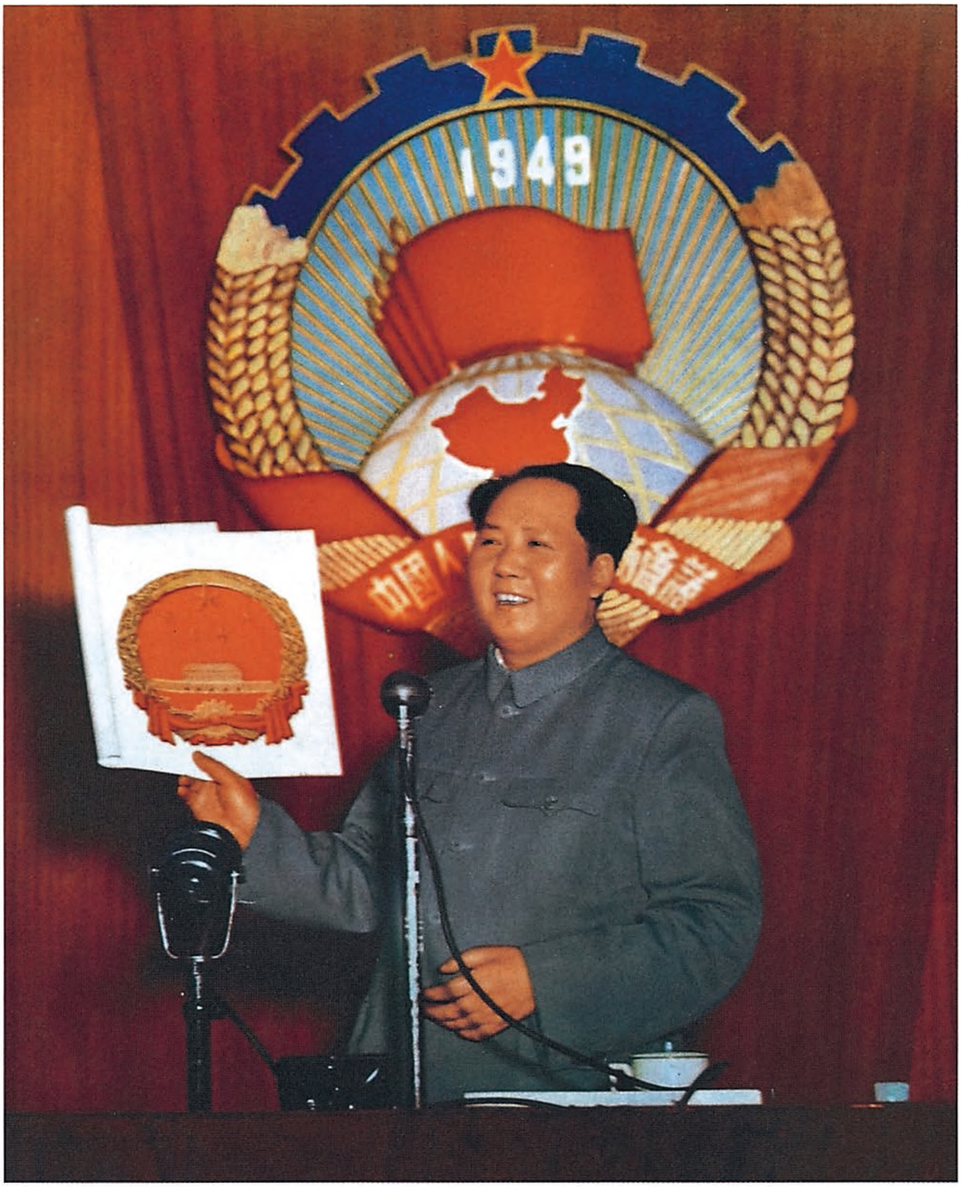
古有大小二乔[1]，
今有南北二乔[2]。

---

[1] 大小二乔，指三国时，东吴乔公的两个女儿，大乔为孙策之妻，小乔为周瑜之妻。

[2] 南北二乔，指“南乔”乔冠华，“北乔”胡乔木。

1950



毛泽东主持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为《人民海军》报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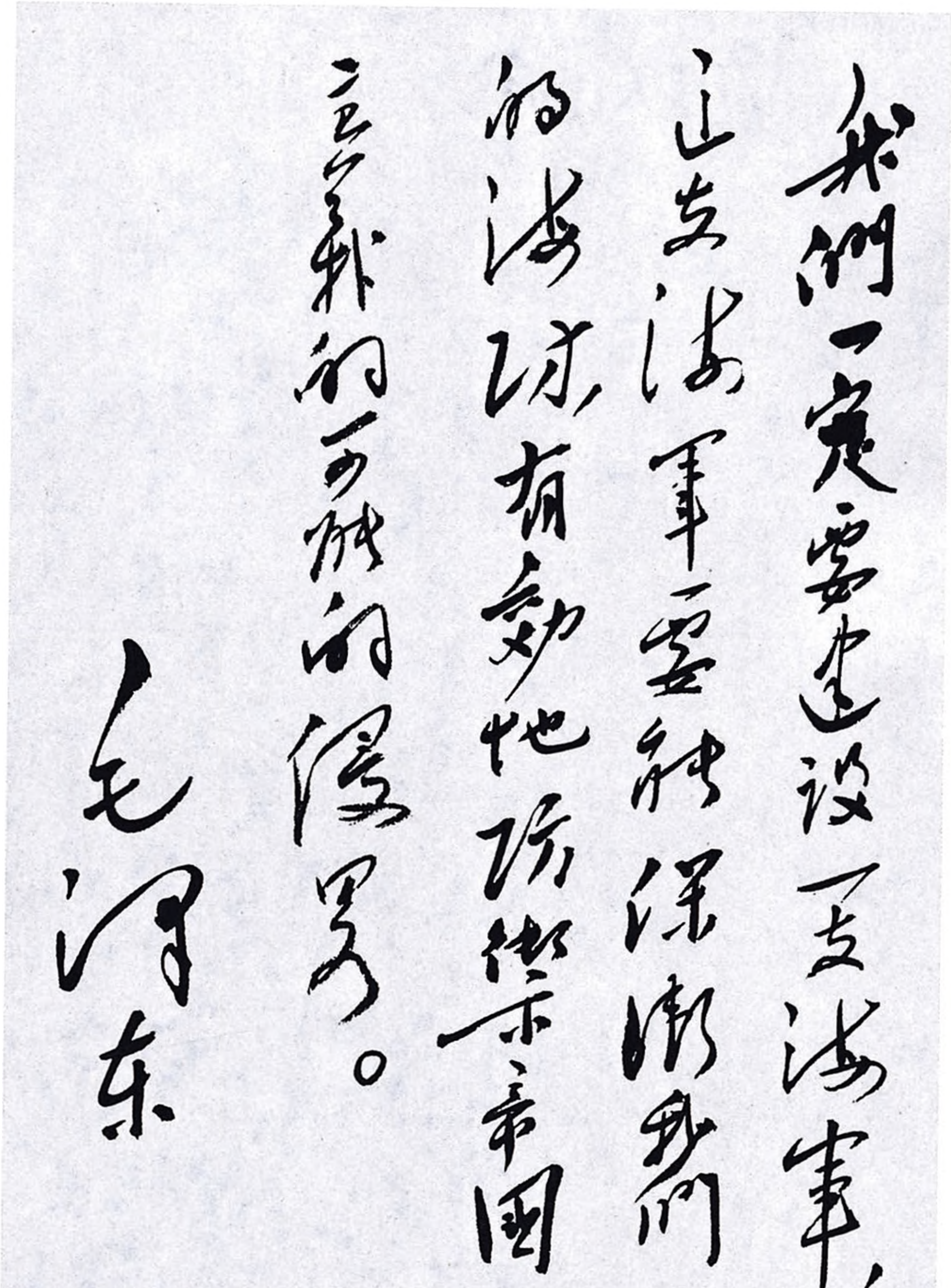
（1950年1月1日）

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毛泽东

---

[1] 1950年元旦，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区人民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出版发行《人民海军》报。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海军》报创刊号的题词，载于1950年1月1日《人民海军》报。



我們一定要建設一支海軍，這支海軍要能保衛我們的海防，有效地防禦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侵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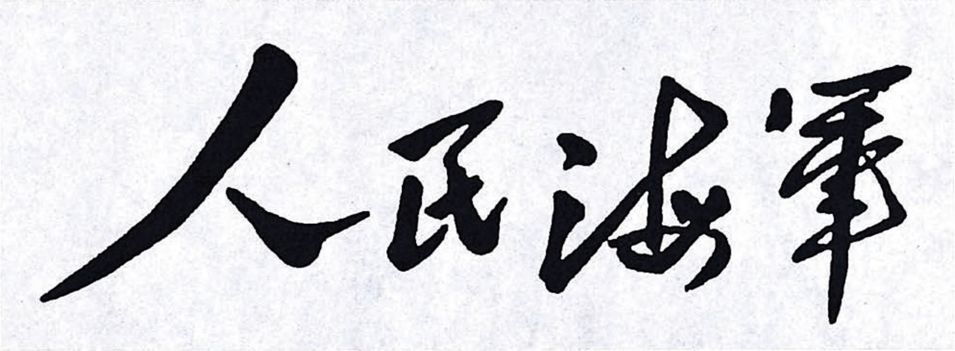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人民海军》报创刊号的题词。

为《人民海军》报题写报头[1]

（1950年1月1日）

人民海军



毛泽东为《人民海军》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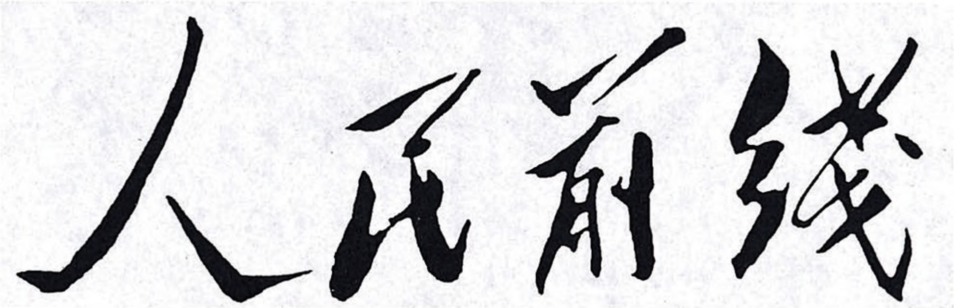
---

[1]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张爱萍等人，商讨了建设海军的事情。会议结束后，张爱萍等请毛泽东为海军报题写报头，并为部队题词。此后，毛泽东题写了：“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同时题写了“人民海军”4个字，共3张，毛泽东在一张上作了标记。《人民海军》报创刊采用的报头是取毛泽东标记那一张中的三个字和另外一张中的一个字，横排在一起，作为华东军区海军机关报的报头。题词也发表在1950年1月1日的《人民海军》报创刊号上。

为《人民前线》题名[1]

（1950年1月1日）

人民前线


毛泽东为《人民前线》题写的刊名。

---

[1] 《人民前线》是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机关报。1949年12月底前出版的报头和刊名，均为舒同题写。从1950年1月1日起编印的杂志刊名和随后出版的《人民前线》报报头，均为毛泽东题写。

为起草中央致各野战军贺电致胡乔木[1]电

（1950年1月1日）

少奇转乔木：

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西南全境（除李弥、余程万[2]二部及西昌胡宗南[3]一部外），西北全境，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致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

一月一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李弥、余程万，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和第二十六军军长。

[3] 胡宗南，1949年11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答塔斯社记者问[1]

（1950年1月2日）

【新华社北京二日电】 塔斯社莫斯科二日电：塔斯社记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先生的访问记。

记者问：中国目前的情势如何？

答：中国的军事正在顺利进行中。目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转入和平的经济建设。

问：毛泽东先生，您在苏联将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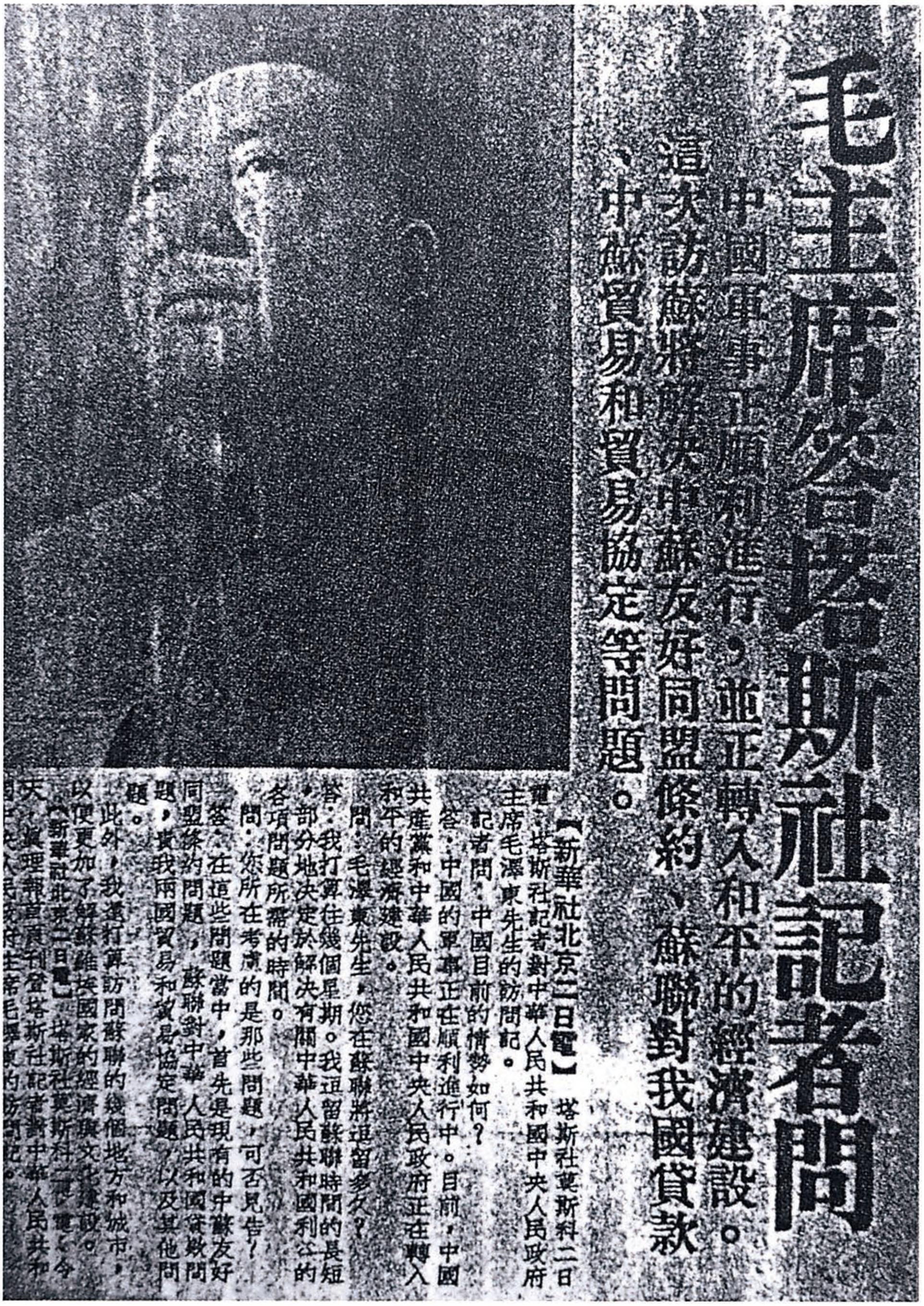
问：您所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可否见告？

答：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贷款问题，贵我两国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

此外，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

---

[1] 这是照塔斯社电讯稿译发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在1950年1月2日上午3时发给刘少奇一份电报，说：“本（二）日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请嘱乔木、陈克寒注意照塔斯社稿译发为要。”



毛主席答塔斯社記者問

中國軍事正順利進行，並正轉入和平的經濟建設。

這次訪蘇將解決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對我國貸款、中蘇貿易和貿易協定等問題。

【新華社北京二日電】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塔斯社記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先生的訪問記。

記者問：中國目前的情勢如何？

答：中國的軍事正在順利進行中。目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轉入和平的經濟建設。

問：毛澤東先生，您在蘇聯將逗留多久？

答：我打算住幾個星期。我逗留蘇聯時間的長短，部分地決定於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所需的時間。

問：您所在考慮的是那些問題，可否見告？

答：在這些問題當中，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貴我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此外，我還打算訪問蘇聯的幾個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了解蘇維埃國家的經濟與文化建設。

【新華社北京二日電】塔斯社莫斯科二日電：今天，真理報首頁刊登塔斯社記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的訪問記。

新华社1950年1月2日关于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书面谈话的报道。

由西南局担负
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

（1950年1月2日）

中央、德怀[1]同志，并请转发小平、伯承、贺龙[2]三同志：

（一）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到阅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二）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三）既然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共四个月时间可以通行，其余八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则由西康[3]入藏之时间恐亦相同。而如果今年五月中旬至九月中旬不向西藏进军，则须推迟至一九五一年才能进军。我意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

[3] 西康，即西康省，1955年撤销，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建议：（甲）请刘、邓、贺三同志于最近期内（例如一月中旬）会商一次，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乙）迅即占领打箭炉[1]，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丙）由现在（一月上旬）至五月中旬以前共四个半月内，被指定入藏的军队，应争取由打箭炉分两路，推进至西康、西藏的接境地区，修好汽车路或大车路，准备于五月中旬开始入藏；（丁）收集藏民，训练干部；（戊）闻西藏只有六千军队，而且是分散的，似乎不需要我在上次电报中提议的三个军，而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的兵力，即已够用，惟需加以特殊政治训练，配备精良武器；（己）入藏军队可定为三年一换，以励士气。（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才占领，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以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上午四时于远方

---

[1] 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

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50年1月2日、3日）

一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1]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

---

[1] 莫洛托夫（1890—1986）、米高扬（1895—1978），当时均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 指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1]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三）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2]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下午十一时

---

[1] 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2] 李富春，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二

中央：

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一月三日上午四时

关于同意江青到新解放区看一看的电报

（1950年1月4日）

少奇同志阅转江青：

一月一日来电已悉。同意你去新区看一看，但须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话，则应以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员的名义由中央组织部写介绍信给新区党的组织。因此还须和廖鲁言[1]同志谈好，并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区后注意只收集材料，不发表意见，并须顾到不要给当地党政以较多的麻烦。以上统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决定。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上午四时

---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

关于周恩来赴苏时间和谈判准备工作致中央电

（1950年1月5日）

中央：

一月四日七时半电悉。（一）周带十七人左右来此已说好，可以来，无问题。一月九日晚车由北京开车一点，亦已告知此间当局。（二）包尔汉、邓力群及伊犁贸易部长似以恩来到后两三天内即一月廿一日或廿二日抵达莫斯科为适宜，或与恩来同一天即一月十九日到达，请即决定告我。包、邓等来此所需交通工具，须由此间派飞机，还是由现在新疆之空运团指派一机担任，亦请决定电告。（三）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需准备的。既然是谈判，就须要展开谈一谈，将我们的观点说清楚。恩来动身后，请中央继续研究，随时以意见电告。关于贸易方面的材料，如果有五天内来不及准备好的，亦可于恩来走后继续准备，随时电告。

毛泽东

一月五日上午六时

关于改订中苏条约注意保密问题致中央电

（1950年1月5日）

中央：

请注意两件事：（一）改订中苏条约等项问题在政务院会议及政府委员会讨论时，请嘱到会人保守机密。（二）周[1]率十余人动身以前，或在旅途车上，应召集这些人宣布纪律，不许乱说乱动，一切要听指挥。

毛泽东

一月五日下午九时

---

[1] 周，指周恩来。

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致周恩来电

（1950年1月7日）

恩来，并中央：

对英印等国外交处置两电及一月五日八时出入口贸易电均悉。关于出入口贸易问题，务请注意统筹苏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缅越罗[1]澳加日美各国在一九五〇年全年出入口的种类及数量，否则将陷入被动。恩来离京后，请少奇陈云一波[2]注意此事为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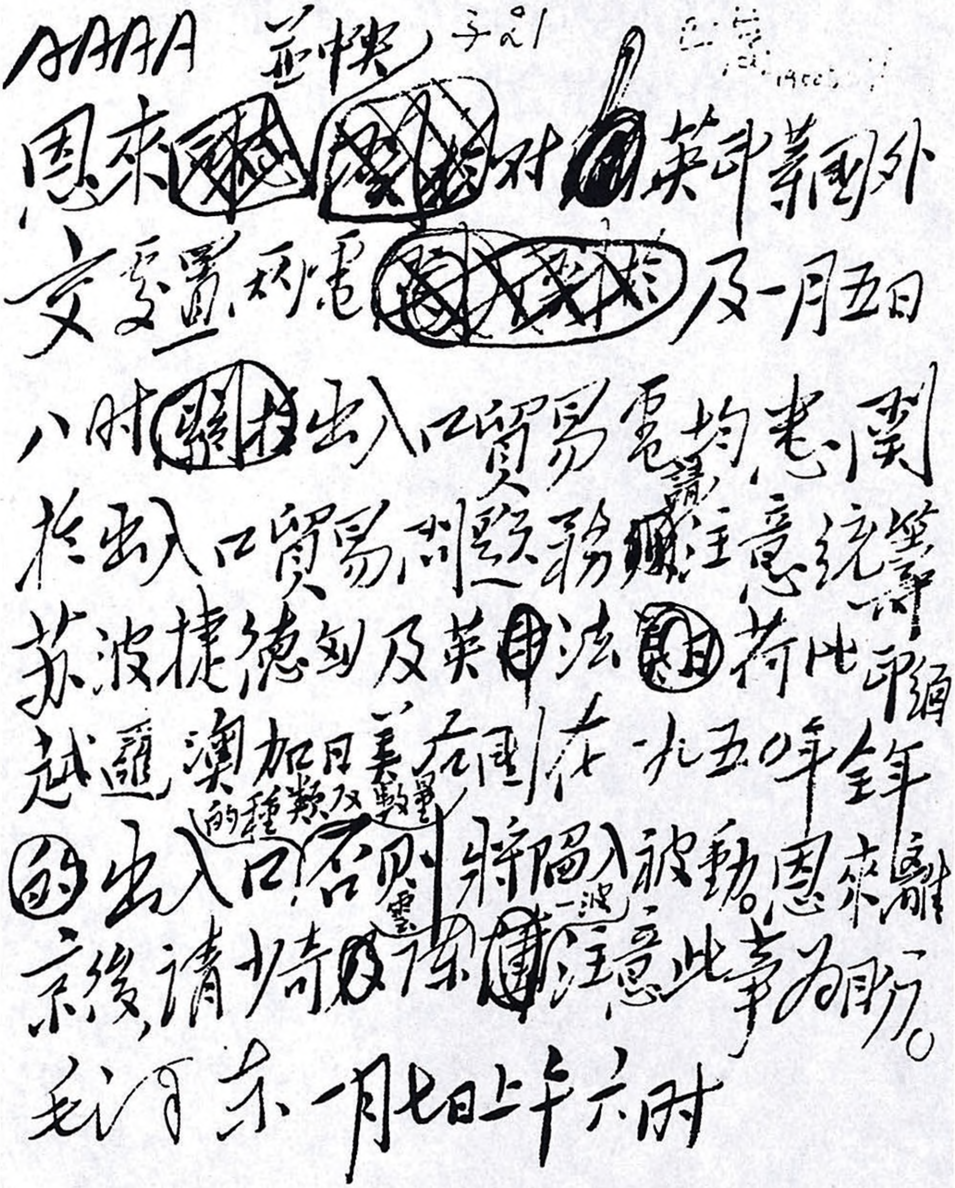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七日上午六时

---

[1] 罗，指暹罗，泰国的旧称。

[2]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AAAA 並告快 子21 已發 1950

恩來：對英印芬緬外交處置得宜電及一月五日八時出入口貿易電均悉。關於出入口貿易問題請注意統籌蘇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緬越暹澳加美各國在一九五〇年全年的出入口的種類及數量，否則將陷入被動。恩來離京後請少奇陳雲注意此事為盼。

毛澤東 一月七日上午六時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手稿。

关于就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安理会的合法地位发表外交部声明的电报

（1950年1月7日）

恩来，并中央：

今（七）日上午一时维辛斯基[1]来谈三件事：（一）可以满足我们购买飞机汽油的要求。（二）可以满足我们戡〈勘〉修小丰满水电堤坝的要求。以上二事的复信明（八）日可交给我。（三）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去一个声明，否认前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如果中国发了这个声明，苏联准备采取一项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据称还要当安理会今年的主席），则苏联将拒绝出席安理会。维辛斯基以此征求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表这样的声明。我并说，我的电报一月七日到北京，中国外交部周恩来外长署名的声明可能在一月八日或一月九日发出去。我问他，此项声明电除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联合国秘书长外，是否还需要同时发给苏英美法等安理会会员国？他说，可以发，苏联根据中国的电报就可以行动。此事他声明是以外长资格征求我的意见，我

---

[1] 维辛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已正式表示同意。请你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九日恩来动身前发出此项声明的电文，除发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附以致联合国电文。此事办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出。

毛泽东

一月七日上午六时

关于照发拟就的致联合国声明的电报

（1950年1月7日）

少奇、恩来：

兹拟就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十会员国政府（不给南斯拉夫）的声明电[1]，请照此发去为盼。

毛泽东

一月七日下午十二时

---

[1] 周恩来1950年1月8日致联合国声明全文如下：

成功湖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转安全理事会会员国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厄瓜多尔、印度、古巴、埃及、挪威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于北京

关于从四野调人从事生产等问题的电报

（1950年1月9日）

中央转林彪[1]同志，并东北局：

一月四日两电均悉。（一）完全同意由四野调十余万人至东北及热河从事生产，解决华中南地区土地不足的困难。上月路过沈阳时，我曾向高岗[2]同志提出从四野调两个军至东北从事生产，高岗同志表示同意。此事如东北局别无不同意之处，即可开始着手调动，以便赶上春耕。具体办法由四野与东北局直接商定，并告诉我们。四野一月三日电请将现驻河南的骑兵师调东北一事，即可并在一起办理。请中央将四野一月四日电转发东北局研究。（二）关于全国国防军的统一编制调整问题，我们尚无具体意见。拟于今年春季或夏季召开全国军事会议，讨论此事。四野根据剿匪、整训与生产的任务，提出战后野战军整编问题，以作必要的局部的适时的调整，是很好的，请将方案电告为盼。

毛泽东

一月九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关于要中央局转发中央对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指示的电报[1]

（1950年1月10日）

少奇同志：

一月四日中央发各中央局关于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的指示很好。请你们考虑可否要各中央局将此项指示电转发给各省委研究，并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些电报收到后，由你汇编告我。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这是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

关于修筑铁路等问题致陈云、薄一波[1]电

（1950年1月10日）

陈云、一波：

（一）一月七日电[2]悉，此项报告甚好，盼能继续。（二）各项计划均好，用军队修筑天兰天成成渝叙昆滇黔黔桂湘桂诸线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三）去年十月一日以后在中财委领导下开了多次专业会议，除铁路，钢铁，农业三项已见一月七日来电外，其他各项会议结果的要点我手边没有材料，请于数日内分项写一报告给我，未知你们能腾得时间否。如你们无时间，可否要你们的秘书写，经你们看过发来。不要太繁，每项几百字即够。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陈云、薄一波1950年1月7日关于财政经济的几项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关于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问题的意见

（1950年1月10日）

中央，并请转刘、邓、贺[1]及西北局：

（一）完全同意刘邓一月七日电之进军西藏计划。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对于进军西藏是有利的。（二）按照彭德怀[2]同志所称四个月进军时间是从五月中旬算起，则由一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尚有四个整月的准备时间（我前电[3]写成三个半月是写错了）。只要刘邓贺加紧督促张国华[4]及十八军等部，在时间上是来得及的。（三）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叫什么名称及委员人选，请西南局拟定电告中央批准。这个领导机关应迅即确定，责成他们负责筹划一切，并定出实行计划，交西南局及中央批准。西南局对其工作则每半月或每月检查一次。第一步是限于三个半月

---

[1] 刘、邓、贺，指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

[3] 即《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

[4] 张国华，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军长。

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1]藏交界地区。有些调查工作及干部集训工作，需待占康藏边界后才能完成，并为促成康人内部分化起见，务希于五月中旬以前占领康藏交界一带。（四）关于西北局方面应协助之事项，请西南局与西北局直接遇事商定，并请西北局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指导所属妥为办理。（五）关于中央负责之一部分侦察工作，请聂[2]令二局注意办理为要。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康，指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大力做好解放海南岛的准备工作

（1950年1月10日）

中央，转林彪[1]同志：

（一）一月六日电及转来邓、赖、洪一月五日电[2]均悉。（二）既然在旧历年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置几百个大海船的机器（此事是否可能，请询问华南分局电告），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三）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

[2] 指1950年1月5日13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和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给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并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琼崖敌总数估计10万至15万，且有海空军配合，故我第一批必须使用一个军的兵力同时登陆，每船按乘30人计，需1000只以上。但现船只很少，必须将一部帆船改装机器（至少突击一个团），以使操纵。部队无渡海作战经验，北方人不惯乘船，只经短时间教育训练，难收实效。根据上情，旧历年前要完成此次大规模渡海作战之准备工作，事实上来不及，必须向后推迟。但过旧历年后风向改变，帆船不能使用，如全部改装机器，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且耗费很大，如只装部分则又非利用下一个冬季北风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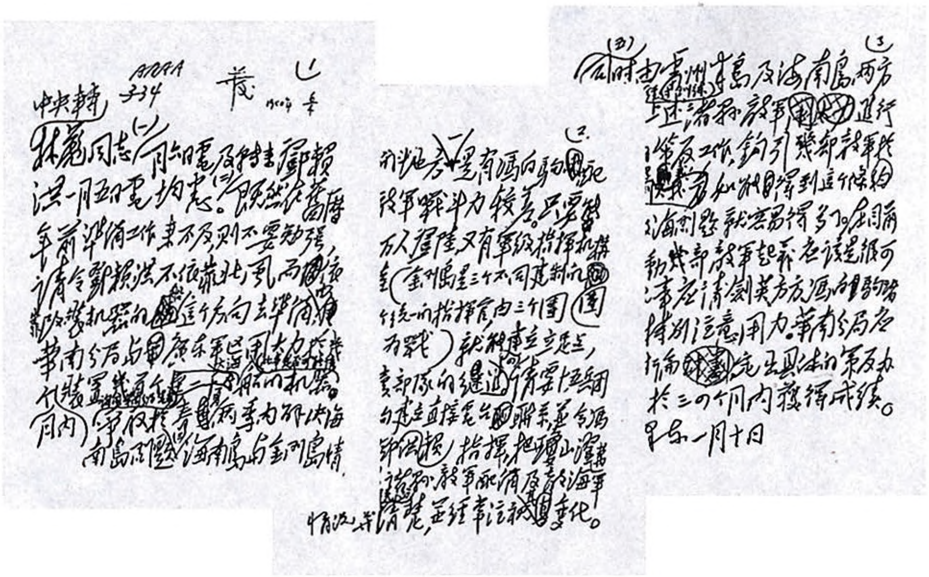
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1]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又无一个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长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继进。（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赖、洪指挥，把琼山、澄迈、临高、文昌诸县敌军配备及敌海军情况弄得充分清楚，并经常注视其变化。（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面派人（经过训练）向上述诸县敌军进行秘密的策反工作，勾引几部敌军于作战时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则渡海问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条件下，策动几部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此事应请剑英、方方[2]、冯白驹诸同志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加以讨论，定出具体的策反办法，并于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冯白驹，当时任第四野战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中央转

林彪同志：（一）一月六日电及转来邓赖洪一月五日电均悉。（二）既然在春季前准备工作来不及，则不要勉强，请令邓赖洪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这个方向去准备，并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两个月内装置几百个机器船只，争取於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主要是有冯白驹的配合，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能有一次渡海登陆四万人，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金门岛是三个不同建制的团，没有统一的指挥官，由三个团各自为战），就能建立立足点。（四）请要十五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指挥，把琼山澄迈诸县敌军配备及海军情况，弄清楚，并经常记录其变化。

（五）同时由雷州半岛及海南岛两方派遣干部对敌军进行策反工作，钩引几部敌军起义，如能得到这个条件，渡海作战就容易得多了。在目前动员敌军起义应该是很可能的，请叶剑英方面特别注意用力。华南分局应於三四个月内获得成绩。

泽东　一月十日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给林彪的关于解放海南的指示电。

1950年4月17日，人民解放军登陆海南岛，4月30日海南岛全部解放。图为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的场面。

1950年4月，人民解放军在海南岛战斗中进攻国民党守军滩头阵地。

拜谒列宁墓题字[1]

（1950年1月1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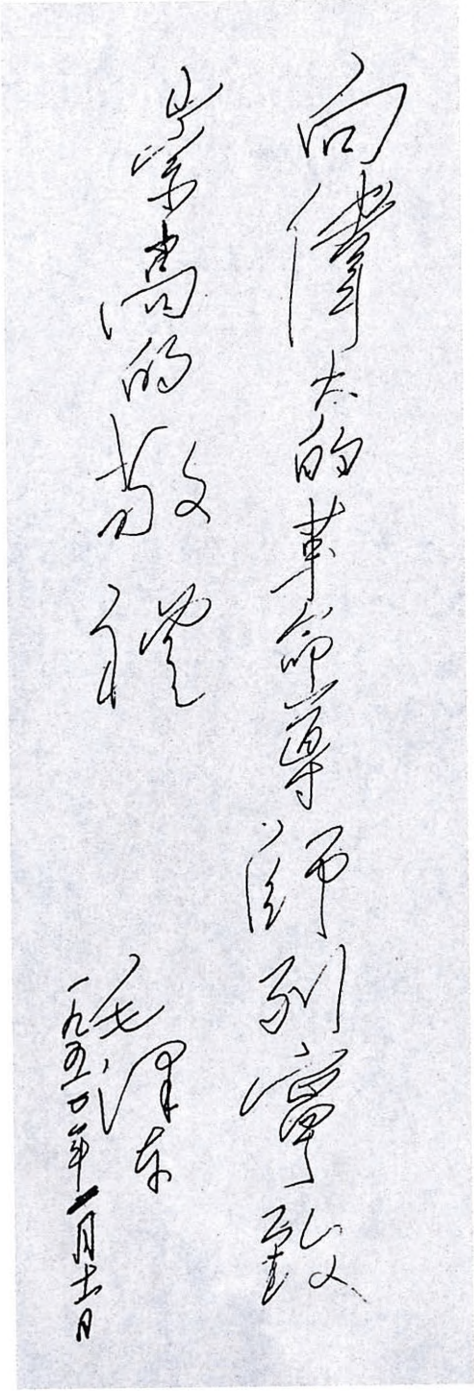
向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致崇高的敬礼。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

---

[1]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次年1月11日按计划拜谒列宁墓，并献上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向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致崇高的敬礼。献给列宁——革命的伟大导师。



向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致以崇高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拜谒列宁墓时的题字。

为询问进攻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情况致粟裕[1]电

（1950年1月11日）

粟裕同志（中央转）：

请回答下列问题：（一）你们对舟山群岛之敌有无办法进行策反工作，你们是否进行了此项工作，结果如何？（二）你们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三）叶飞[2]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四）你何时可到北京与聂荣臻刘亚楼[3]同志会商？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

[3]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关于土改准备工作致饶漱石[1]电

（1950年1月13日）

饶漱石同志：

（一）一月九日报告收到，阅悉甚慰。（二）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区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三）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必须在今年春夏秋三季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十分抓紧督促才能有成。（四）华东军政委员会似宜早日成立执行职务。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关于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等问题致林彪[1]电

（1950 年 1 月 13 日）

林彪同志：

（一）中南全区要在今年冬季进行土改，则今年春夏秋三季必须完成土改的各项准备工作，时间颇紧，必须妥为计划督促，才能有成。饶漱石[2]一月九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在今年一二三月农闲时间华东各省普遍开一二次区乡农民代表会议完成区乡政权的改造，作为土改先决条件之一，这是极重要的，否则即不能进行土改。你们是否已令各省进行此项工作。（二）饶漱石又说，华东全区多数市县已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未开的今年一二三月内可以普遍开一次。中南各省情形如何，是否可以于今年一二三月内普遍开一次市的及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三）中南局对华南分局的工作指导是否已密切抓紧，如同你们对湘鄂赣豫各省委那样。以上几点请加注意并电告为盼。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关于任命肖劲光[1]为海军司令员等事致刘少奇电

（1950 年 1 月 13 日）

少奇同志：

（一）我今（十三）晚去列宁格勒，两天可返莫斯科。（二）刘亚楼[2]及苏联顾问柯托夫等四人已交涉好可以来此，请通知聂荣臻[3]。（三）可即任命肖劲光为海军司令，此点亦请告聂荣臻。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肖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中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3]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关于向联合国派出我国代表等问题致刘少奇电

（1950年1月13日）

少奇同志：

（一）同意一月十三日电贯彻征用命令征用外国兵营，并准备着让美国将所有在华之旧领馆全部撤走。（二）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收或征用美经合署留沪物资[1]。（三）接管伪政府留港资产问题，请你于外交部及中财委提出办法后酌定，我对此事无意见。（四）维辛斯基[2]今晚来谈，建议我国向联合国去电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以代替国民党代表，因现在为国民党代表问题安理会斗争颇紧张，苏联支持我国声明主张开除国民党代表，美、英等多数国家反对开除，故中国有进一步表示之必要，惟时间可待一星期后再去电报。我同意他的建议，代表团首席人选请中央考虑电告，待恩来到此商决。（五）我今天不走，改于明（十四）晚十时动身去列宁格勒，十五日在列城留一天，十六日回来。同行者稼祥、伯达、师

---

[1] 指前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存放在上海准备用于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物资。

[2] 维辛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哲、汪东兴[1]，留叶子龙[2]及技术人员在寓工作。中央电报可照常发来。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下午十时

---

[1]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

[2]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支持情报局刊物对野坂参三[1]的批评致胡乔木[2]电

（1950年1月14日）

乔木同志：

我今晚九时动身去列宁城参观，要三天才能回来，而人民日报社论稿及日共政治局的决议尚未收到。如要等我看过，须到十七日才有复电，否则由少奇同志看过即可发表。我党应当发表意见，支持情报局刊物对冈野进的批评，而对于日共政治局未能接受此批评表示惋惜，希望日共采取适当步骤纠正冈野进错误。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下午四时

---

[1] 野坂参三，即冈野进，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关于同意与越南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致刘少奇电

（1950年1月17日、18日）

一

少奇同志：

（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起草了一个复文，请于明（十八）日广播发表，同时由内部电台发胡志明。（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下午十时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部长黄明鉴先生：

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意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建

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借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的友好和合作。特此电复并希察照为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二

限即刻到。少奇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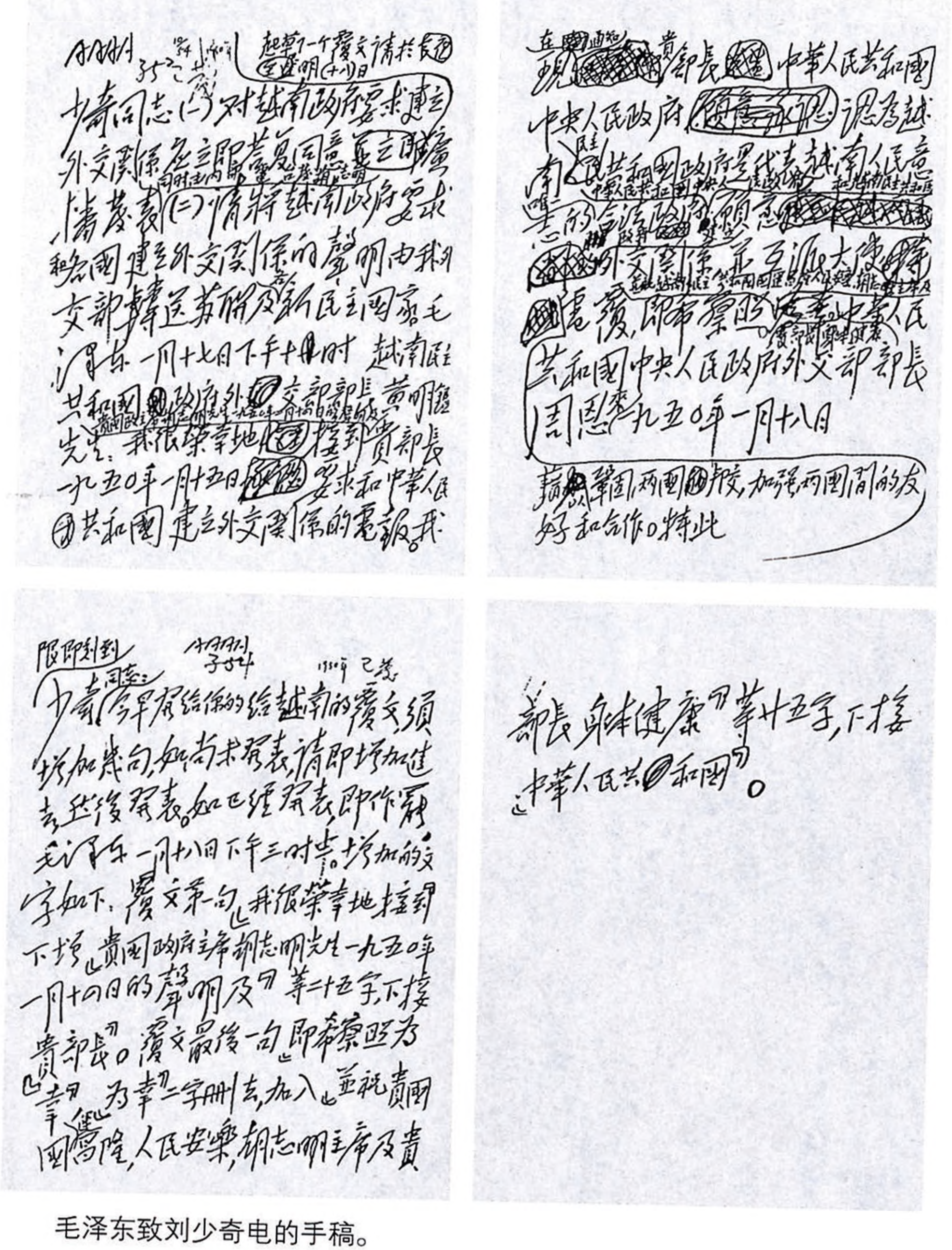
今早发给你的给越南的复文，须增加几句，如尚未发表，请即增加进去，然后发表。如已经发表，即作罢。[1]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半

增加的文字如下：复文第一句“我很荣幸地接到”下增“贵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先生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的声明及”等二十五字，下接“贵部长”。复文最后一句“即希察照为幸”，“为幸”二字删去，加入“并祝贵国国运昌隆，人民安乐，胡志明主席及贵部长身体健康”等廿五字，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

[1] 1950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起草的给越南政府的复文，是按他1月17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发回的复文稿刊印的。



少奇同志：（一）对越南政府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应立即答复同意，并请发表。（二）请将越南政府要求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由我外交部转送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下午十时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部部长黄明鉴先生：我很荣幸地接到贵部长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要求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我现在通知贵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是代表越南人民意志的合法政府，愿意……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藉以巩固两国邦交，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和合作。特此电复，即希察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八日

限即刻到

少奇同志：今早寄给你的给越南的复文须增加几句，如尚未发表，请即增加进去，然后发表。如已经发表，即作罢。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增加的文字如下：复文第一句"我很荣幸地接到"下增"贵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先生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的声明及"等二十五字，下接"贵部长"。复文最后一句"即希察照为幸"，"为幸"二字删去，加入"并祝贵国昌隆，人民安乐，胡志明主席及贵部长身体健康"等廿五字，下接"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手稿。

关于陕甘宁三省土改部署的电报

（1950年1月17日）

中央转彭、习[1]：

子删电悉。（一）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拟讨论的各项均妥。其中陕甘宁三省今冬只在部分地区进行土改，取得经验，推迟至明冬普遍进行土改，是比较妥当的。（二）包尔汉[2]主席于会后来莫斯科是可以的，惟时间上是否来得及，须待廿五六日才能决定，那时当有电报通知。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包尔汉，当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

关于向民主人士解释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的电报

（1950年1月18日）

少奇同志：

一月十七日电悉。（一）美国撤退在华的一切官方人员，此事对我们极有利，惟民主人士中害恐美病者可能对我们征用外国兵营等行动有所不满，请注意解释；（二）英国代办胡阶森[1]到京时我们提出些什么问题和他谈，请中央约外交部人员讨论一下，规定方针态度及具体内容，写成书面文件，并事先告我为盼。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

[1] 胡阶森，当时是英国政府指定的驻中国的临时代办，负责同中国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关于任命张闻天为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电报

（1950年1月18日）

少奇同志：

（一）今日下午四时半与恩来通电话（他已到斯维德洛夫斯克，廿日下午五时可达莫斯科），觉得章汉夫[1]资望方面有不够之处，可作副手，出席联合国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以洛甫[2]担任为适宜，现起草了一个致联合国电报[3]，如中央同意即请于明十九日发出并公开发表。（二）据恩来说，高岗、富春[4]都认为洛甫可充外交代表，惟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请你于发表之同时去一电给洛甫，说明因时间关系不及征求他同意，请他谅解，至动身去联合国的时间另电通知。（三）政府委员会完成任命手续可待将来第六次会议为之。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于明十九日邀集政席〈府〉各副主席及各

---

[1] 章汉夫，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

[3] 指《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致联合国电》。

[4]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党派主要负责人一谈。（四）因恩来即到莫斯科，故照会用李克农名义。（五）此照会和上次照会一样，于发出电报后，并分送在京苏捷波英法荷等国外交人员。（六）新华社发布新闻时，须介绍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委员，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及各项革命工作。（七）办理情形望告。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半

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合法权利致联合国电[1]

（1950年1月19日）

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秘书长赖伊先生，并请转达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代表团：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我曾向联合国发出照会，要求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将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予以开除，此抗议照会已承赖伊先生复电表示收到并转达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

现在我再通知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业已任命张闻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会议和参加联合国工作，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及其工作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我并要求你们，主席先生和秘书长先生，回答我的下列两项问题，即：

---

[1] 这个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驱除中国国民党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予以坚决反对，当时未能实现。直到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一）何时开除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出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我认为这样的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到现在还这样留在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是完全不合理的，应当立即开除出去。

（二）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何时可以出席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并参加工作。我认为应当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

以上各项，请予速复为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九日

关于发表驳斥艾奇逊造谣的谈话的电报

（1950年1月19日）

少奇同志，并告乔木：

（一）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二）《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一文写得很好，现正译成俄文，准备送交斯大林看。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上午五时

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1]

（1950年1月20日）

【新华社北京二十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例如他说："我们的利益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在提到中国时，他说：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时起，经过九国公约[2]之签订，以至联合国大会的最近的决议都是这一个原则，并且我们对它始终不渝。"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

---

[1] 这则电讯是毛泽东起草的。

[2] 九国公约，是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

就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胡乔木署长说：我们说的艾奇逊的最无耻的谣言还不是上面这些，而是他在中苏关系上所造的谣言。

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1]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2]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一九四八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似乎还有希望的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一九四九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

[1] 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

[2] 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

腐朽透顶、矛盾百出的帝国主义制度，是表现得这样的有趣：在艾奇逊低能演说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五〇年一月十四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据塔斯社一月十四日华盛顿电称：“前美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他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府，都是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

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

关于同意印度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电报

（1950年1月20日）

少奇同志：

（一）本十九日各电均悉。同意你的意见，先给尼赫鲁[1]去电，大意谓同意雁谒森[2]先生为临时代表，到北京谈判建立外交使团的初步与程序事宜。对英国答复则应当拖一下。外交部的同志们不了解拖一下的作用，认为“陷于僵局”，这是不对的，这里并没有什么僵局，主动权完全握在我们手中。拖一下的时间请你和李克农[3]商定之。（二）同意为西藏问题所拟发之声明。（三）空运团事待与周[4]商后答复。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上午一时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2] 雁谒森，曾任印度驻国民党中国大使馆秘书。

[3]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4] 周，指周恩来。

关于起草复尼赫鲁[1]的电文致刘少奇电

（1950年1月20日）

少奇同志：

今早一时电谅达。复尼赫鲁电全文的措词须加斟酌，因为此项复文即是对英国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复文的样本。请令外交部写一草稿电告我们看一下，此项复文迟数天发出并不要紧。为了研究这个复文，请令外交部将印度第一次来文、我第一次复文及印度第二次来文的三个全文清出发来。又我和英国来往电全文亦请发来。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上午七时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关于中苏会谈和文件起草情况致刘少奇电

（1950年1月25日）

少奇同志：

（一）周、李等一行廿日到此。廿一日，我们十二人参加列宁纪念会。廿二日，我们连师哲[1]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进行方法。廿三日，周王李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2]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廿四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3]交维辛斯基。现正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易货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二）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并以意见电告。请勿外传。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上午五时

---

[1] 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2] 米高扬，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维辛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罗申，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3] 这个条约草案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周恩来起草的。

在同胡阶森谈判中英建立外交关系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0年1月29日）

请周[1]复：胡阶森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兵营问题。见荷领事时，如彼提交换对印尼的承认，应允予报告上级考虑。

---

[1] 周，指周恩来。

五绝·赞“密使一号”[1]

（1950年1月）

惊涛拍孤岛[2]，
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3]，
曙光迎来早。

---

[1] “密使一号”，指华东局情报部门插入在台湾国民党军队核心高层中的地下工作者——吴石将军。吴石（1894—1950），1949年8月15日，福州解放在即，蒋介石手谕电招吴石速赴台湾，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一号”。吴石抵达台湾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6月10日，被叛徒出卖在台北从容就义。临刑前望着大陆的方向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1973年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2] 惊涛，暗指地下工作者时时身处在一种惊涛骇浪般的险恶环境之中。孤岛，指台湾。

[3] 虎穴藏忠魂，赞扬打入敌人内部的吴石将军的一片赤胆忠心。

为问候胡志明[1]致刘少奇电

（1950年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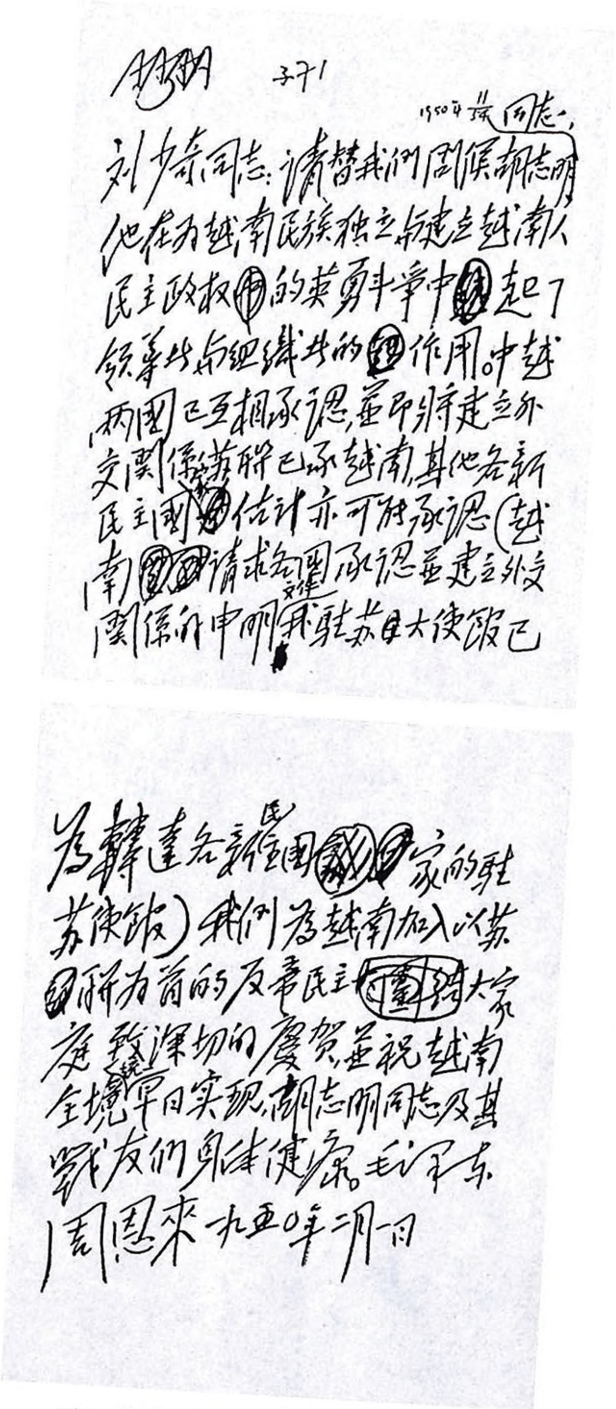
刘少奇同志：

请替我们问候胡志明同志，他在为越南民族独立与建立越南人〔民〕民主政权的英勇斗争中起了领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中越两国已互相承认，并即将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已承〔认〕越南，其他各新民主国家估计亦可能承认（越南请求各国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申明文件，我驻苏大使馆已为转达各新民主国家的驻苏使馆）。我们为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大家庭致深切的庆贺，并祝越南全境统一早日实现，胡志明同志及其战友们身体健康。

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二月一日

---

[1] 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总理。这时正在北京。



子71

1950年 同志，

刘少奇同志：请替我们问候胡志明同志，他在为越南民族独立和建立越南人民民主政权的英勇斗争中起了领导与组织者的作用。中越两国已互相承认，并即将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已承认越南，其他各新民主国家估计亦可能承认越南，请求各国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我驻苏大使馆已为转达各新民主国家的驻苏使馆）我们为越南加入以苏联为首的反帝民主大家庭致深切的庆贺，并祝越南全境统一早日实现，胡志明同志及其战友们身体健康。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五〇年一月　日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手稿。

关于供给苏联战略物资问题
致刘少奇等电

（1950年2月2日）

少奇同志急转陈、薄[1]：

在借款协定[2]中有一附件[3]，即我方负责供给苏联战略物资。苏方提出要求为钨、锡、锑、铅四种，其办法为在借款还款十四年（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三年）当中，中国以其剩余的矿砂卖给苏联，钨第一、二年每年八千吨，第三、四年每年九千吨，后十年每年一万吨；锡第一、二年每年七千吨，第三、四年每年八千吨，后十年每年一万吨；锑第一、二年每年六千吨，第三、四年每年七千吨，后十年每年八千吨；铅第一、二年每年五千吨，第三、四年每年六千吨，后十年八千吨。前四年出口列入每年商品交换单内，后十年可作为还款之用，价格按照世界商场价格计算。我们除告以铅为我入

---

[1] 陈、薄，指陈云和薄一波。陈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该协定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

[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所附的秘密议定书。

口货，无力外销，钨、锡、锑三项剩余愿首先满足苏联需要，再多则卖给新民主国家外，对具体数额，无把握回答。据估计，我钨、锡两项生产后十年每年担任各一万吨似可办到，头四年数额则不敢保证；锑的年产似从未超过七千吨，故所提要求，亦无甚把握。我们拟答以钨、锡两项头四年每年各减两千吨，如有多的剩余仍可卖给苏联，后十年每年各一万吨不变；锑则每年均减两千吨，成为四千、五千、六千。你们所知材料及对此意见如何，并有无新的意见，望立电复。

毛泽东　周恩来

二月二日六时

关于刘斐等任职问题[1]的电报

（1950年2月3日）

少奇同志：

我们意见，刘斐宜任水利部长，而不宜在章伯钧领导下任交通部长，贺耀祖可任交通部长，陈铭枢可任农林部长。唐生智黄琪翔可以分任湘粤两省副主席。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四时

---

[1] 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任命刘斐为中南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贺贵严（即贺耀祖）为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陈铭枢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部长，黄琪翔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唐生智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对起义的伞兵第三团加强政治训练

（1950年2月4日）

粟裕[1]同志（中央转）：

（一）前起义过来的伞兵第三团[2]，现在还有多少人，跳伞技术程度如何，他们中间的政治工作进行得怎样，有无党员的发展，一般的政治情绪如何，望电告。

（二）这批伞兵盼加强对他们的政治训练，我们需要以这批伞兵作基础训练一个伞兵部队，作为台湾登陆作战之用。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粟裕，当时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 伞兵第三团，指1949年4月15日在上海附近海域起义的国民党空军伞兵第三团。

中英建立外交关系上应解决的先决问题[1]

（1950 年 2 月 8 日）

估计英代办胡阶森即将到京，望告外交部于胡到后当其来访时提及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初步程序的事宜，即应告以其中最重要者为英国与蒋介石反动派残余的关系问题，因英国既已与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即不应同时再与国民党政府作任何外交来往，而英国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其他组织中竟继续承认国民党代表为合法，拒绝接受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这在建立中英外交关系上是不可能不解决的先决问题；其次，英国香港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在港的官方代表、机关及其所属的一切国家资财采如何态度，也须弄清楚，因这类事情也是属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关系的问题，等等，看胡阶森如何答复。至于收回英国兵营问题，可暂置不谈。

---

[1] 这是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致刘少奇电的一部分。

关于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等问题致刘少奇电

（1950年2月10日）

少奇同志：

（一）同意粟裕调四个师演习海战。（二）借款议定书[1]前言数句，意即为中国对苏联之报酬，不宜删去。（三）条约及协定[2]各件双方应于同日发表，日期另告。（四）伯达[3]为新华社写了一篇社论，经我们看过，明日可发给你们，请与乔木斟酌，于条约发表之日同时发表。

毛泽东

二月十日上午五时

---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这个协定的前言中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同意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要求，给予中国以贷款作为偿付苏联所同意交付给中国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之用。”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

关于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致林彪[1]电

（1950年2月12日）

中央转林彪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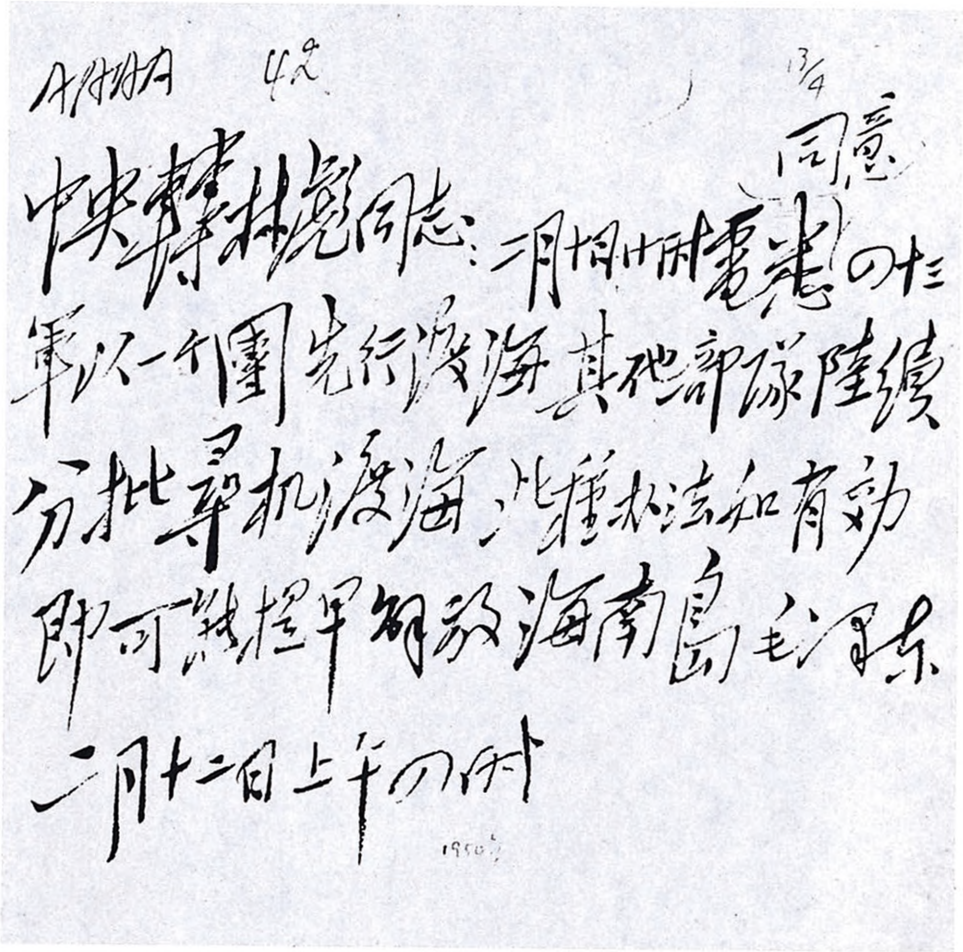
二月十日廿时电[2]悉，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上午四时

---

[1]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

[2] 指林彪等1950年2月10日20时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据邓华、赖传珠来谈，海南岛作战我军如一次以一个军登陆则船只问题极难解决，同时又无法对付敌之海空军扰乱。因此，他们建议在此时间内，采取先行偷渡的办法，到达海南岛后即与冯白驹部会合，打小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然后大部队再设法渡海。我们同意第四十三军一个团先行渡海，并同意其他部队陆续渡海。



42　13/4

同意

中央转林彪同志：二月十日廿一时电悉。四十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上午四时

1950年

毛泽东致林彪电的手稿。

关于各地对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表态时应注意的问题的电报

（1950年2月12日、13日）

少奇同志：

兹起草致党内电报一件，请于收到时加以斟酌迅即发出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

各中央局、分局、前委：

新的中苏条约和协定[1]即将于日内签订并公布，各地于集会讨论及发表意见时，应根据新华社社论的立场，不要发表不适当的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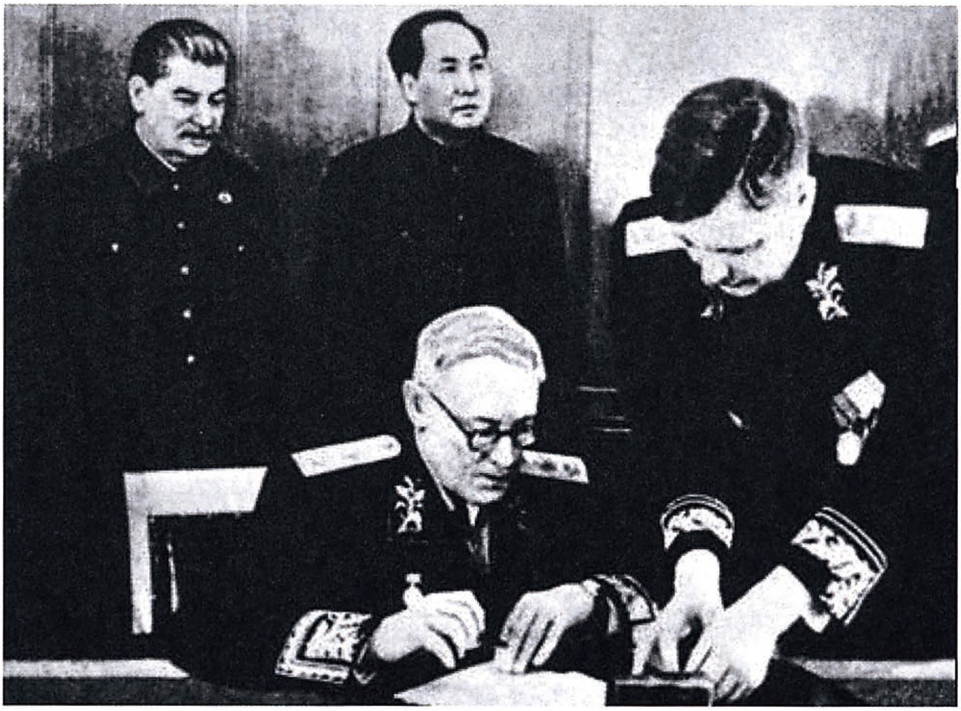
中央

二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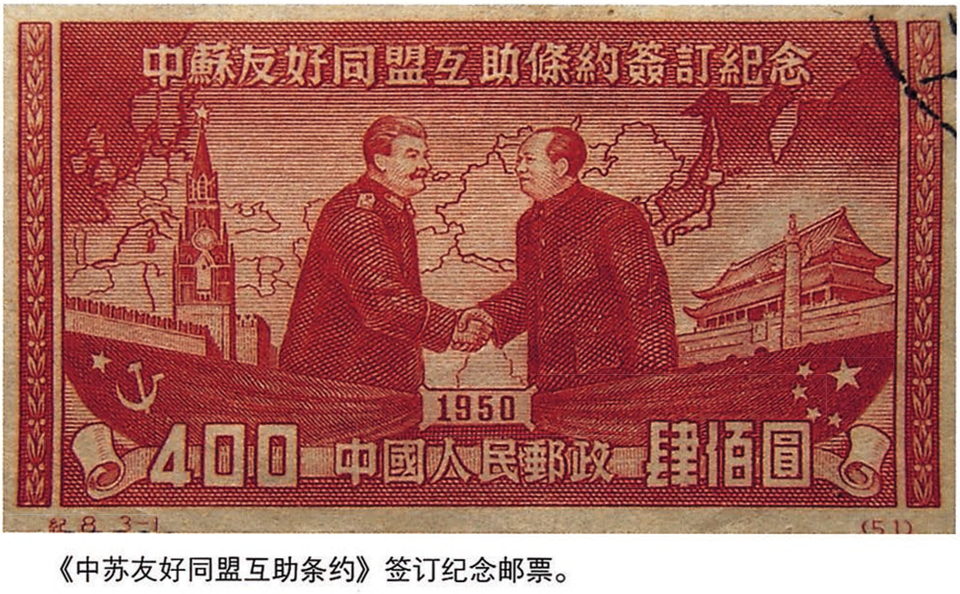
---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上述条约和协定于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仪式。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签订仪式上。



1950年2月14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紀念
1950
400
中國人民郵政
肆佰圓
紀8 3-1
(51)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邮票。

关于修改《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社论致刘少奇、胡乔木[1]电

（1950年2月14日）

（限即刻到）少奇、乔木：

请将新华社〔社〕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一文立即作如下之修改，然后随条约一道于今夜广播。（一）第一段，“中苏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十七字删去，又“中苏两国外长的换文以及与上述协定有关的议定书”二十二字删去，又“和中苏民用航空协定”九字删去，又“及其附件”四字删去，又“和民用航空协定”七字删去，第一段共删去五十九字。（二）第二段第一句“条约”二字下“及其他各种协定议定书和换文表明”十五字中，删去“各种”“议定书和换文”共八字，只留下“及其他协定表明”七字。（三）第三段“即一九四五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换文”十九字删去，又“这个条约及其他换文”一句中“换文”二字改为“协定”二字。（四）第七段“和中苏民用航空协定”九字删去，又“同时中国则出售给苏联以苏联所不足的战略原料用以偿付苏联的贷款，这点对于苏联方面也是有利的”四十三字删去。（五）第八段第一句“各种”二字改为“两个”二字。（六）第九段全删，即将“中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苏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乃是为了保障两国国防利益的一项必要措施，这项措施对于中苏两国说来都是有利的”五十三字删去。（七）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五时

为郭志成[1]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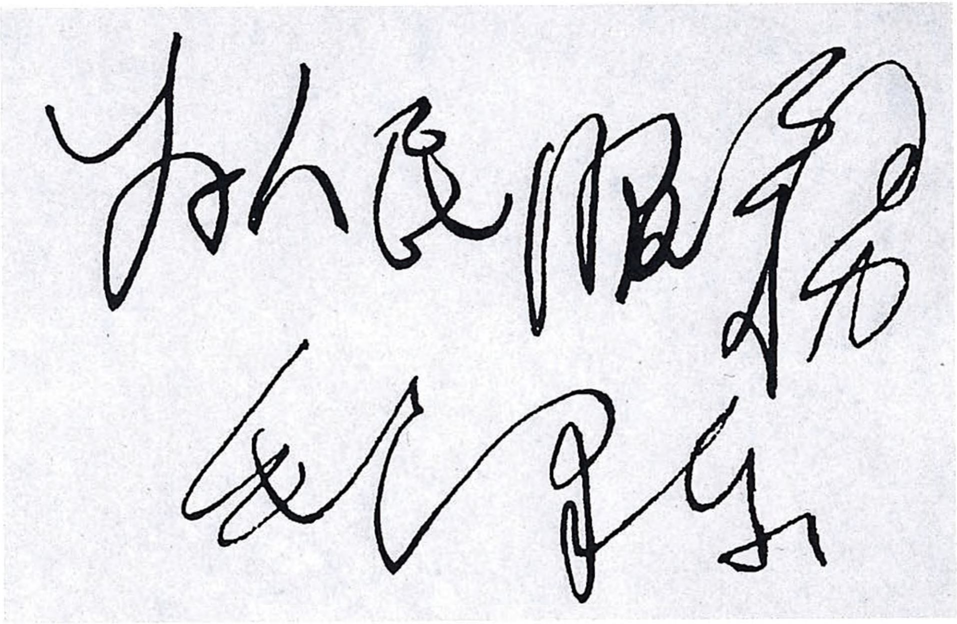
（1950年2月）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

[1] 郭志成，革命烈士郭亮之子。1938年周恩来找到郭亮13岁的儿子郭志成，把他送到延安。不久，郭志成和其他几位烈士子女抵达莫斯科学习。次年，周恩来、邓颖超在莫斯科亲切看望了郭志成。1950年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苏联接见了郭志成，并分别为他题词。1951年郭志成回国后，为祖国的电力工业奋斗了一生。



为人民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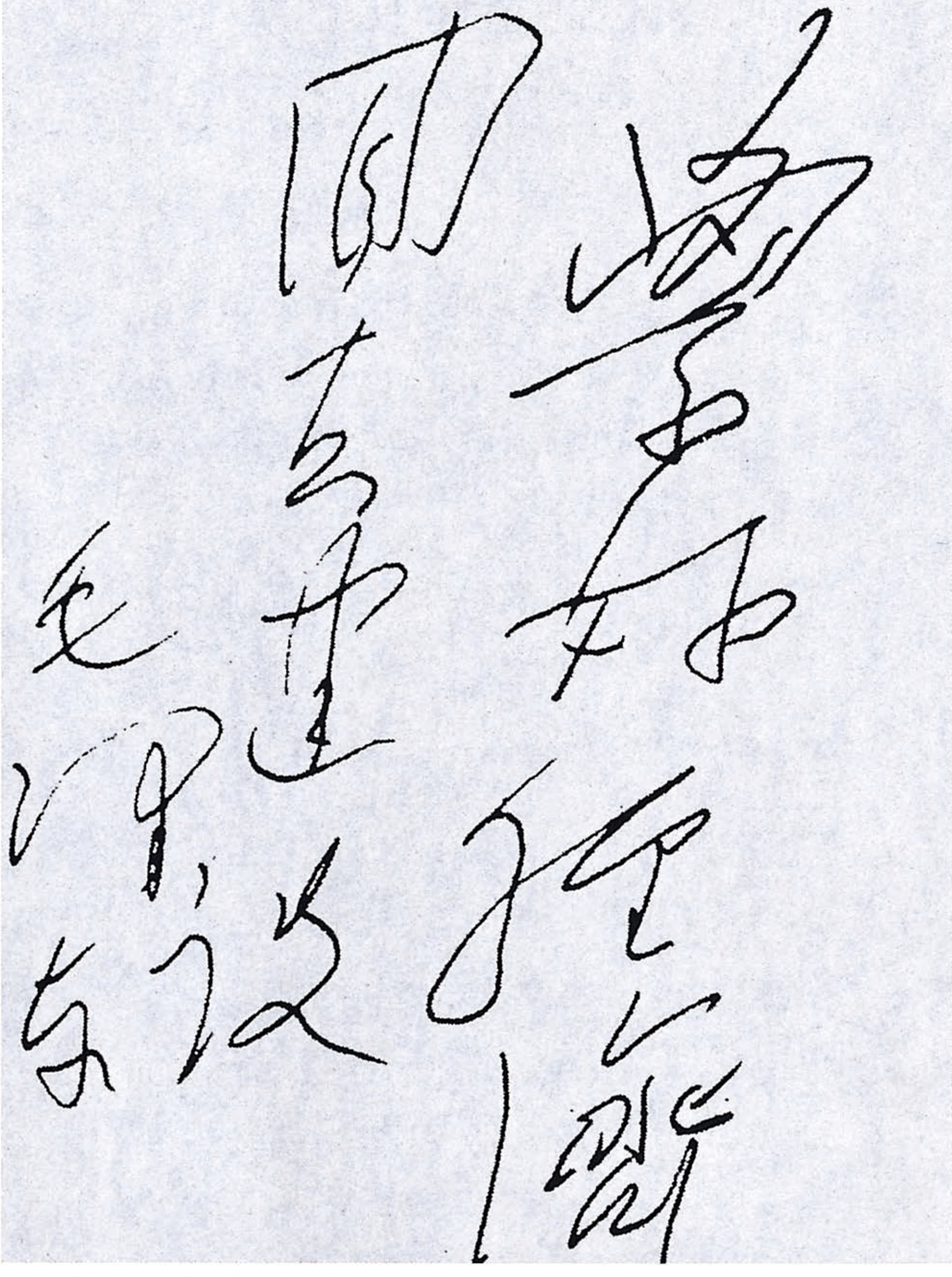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郭志成的题词。

为苏联留学生题词

（1950年2月）

学好经济，回去建设。



毛泽东

毛泽东为苏联留学生的题词。

积极防空保卫上海

（1950年2月17日）

少奇[1]同志即转饶漱石[2]同志：

丑文电悉。积极防空，保卫上海，已筹有妥善可靠办法，不日即可实施。上海工厂不要勉强疏散，尽可能维持下去。但对上述防空办法，务须保持秘密，以期一举歼敌。我们今夜动身回国[3]。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时

---

[1] 少奇，即刘少奇。

[2] 饶漱石，当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指毛泽东等访问苏联结束回国。

关于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致刘少奇电[1]

（1950年2月17日）

少奇同志：

关于新区土改征粮指示草案电收到。一般甚好，而且亟须适时发出。惟第四部分因涉及分配土地问题本身，可否暂缓发表。因斯大林同志曾在我向其报告土改政策时，提议将分配地主土地与分配富农土地分成两个较长的阶段来做，即使目前农民要求分配富农多余的土地，我们固不禁止，但也不要在法令上预作肯定。我们虽对中国半封建富农作了解释，并说明对资本主义富农并不没收，他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他的中心思想是在打倒地主阶级时，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时关于江南土改应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亦曾提到过，因此事不但关系富农而且关系民族资产阶级，江南土改的法令必须和北方土改有些不同，对于一九三三年文件及一九四七年土地法等，亦必须有所修改。故我们主张目前政务院只发表新区土改征粮指示的前三部分，而将第四部分留待我们归后讨论。如须修改，则可推迟至四月再行发表另一关于土改本身的文件。如同意，可向

---

[1] 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访问莫斯科期间给刘少奇的电报。

党外民主人士解释第四部分为今年秋后方始实行的政策，不妨从长计议，待毛主席归后再行决定及发表。

毛泽东
周恩来
二月十七日七时

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

（1950 年 2 月 17 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和中国代表团同人周恩来同志等这次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大元帅以及苏联政府其他负责同志，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久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够分离的。而这种团结，不但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要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的胜利。

留在苏联的时期内，我们曾经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等，看见了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看见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同志和联共党的教育之下所养成的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相互结合的作风，证实了中国共产党人历来的信念，即：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

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大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

中苏永久友好和永久合作万岁！

苏联人民万岁！

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

关于由李富春主持中苏贸易谈判等问题的电报

（1950年2月17日、20日）

一

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

（一）我们一行十四人于今十七日夜车离莫归国。离莫时将发表车站告别词，故应公开报道。我们准备在西伯利亚途中参观一两处工厂，抵沈亦将停留一两天，故行程较通常日期为长，亦可稍为错乱一般人的计算。

（二）我们走后，尚有贸易问题、新疆经济合作问题、民用航空问题、军事问题、专家合同问题留待解决，故将富春及东北、新疆各同志加上叶季壮（尚须开刀）、伍修权、沈鸿、李强、苏农官[1]等共二十二人，另刘亚楼[2]等三人均留下，并由富春、稼祥、亚楼、

---

[1] 伍修权，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沈鸿，曾任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工程师，1950年6月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财经计划局重工业处处长。李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电信总局局长。苏农官，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机要秘书。

[2] 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季壮、赛福鼎[1]组成代表团，富春负总责，继续商谈上述各项问题，约二十天左右可解决。届时，我们已回至北京，当可最后决定各项协定的内容及签字时间。

（三）各协定内容，民用航空协定已商妥，由刘亚楼负责在校正文字。新疆经济合作为石油及有色和稀有金属两件，原则已商妥，由稼祥、赛福鼎继续商谈。专家合同已由苏方提出草案，大体与去年交少奇同志带回者相同，惟加了须我方按月以卢布一千五百至三千付给各专家在苏的薪俸及政府机关的损失。军事问题，亦由亚楼继续商谈。其中最费事者为贸易合同及出入口货单的厘定，尤以货单的规格价目为最难确定。富春电告陈薄[2]各事，请仔细研究，价目不宜提得太高，致与苏联方面相差悬殊，颇能影响商谈，望告陈薄注意。

（四）我们在途中尚可与大使馆通电，中央有要事亦可经大使转告我们，并请中央直接指示富春等代表团。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七时

二

王大使[3]并告富春：

---

[1]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 陈薄，指陈云和薄一波。

[3] 王大使，指王稼祥。

十九日廿时电悉。同意关于专家及新疆二公司问题的两个代表团[1]的组织，均以稼祥同志为首，并隶属于以富春同志为首的总的代表团组织之下。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

[1] 这里所说的两个代表团，一个负责谈判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协定，另一个负责谈判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和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定。

关于回国后沿途接待问题的电报

（1950年2月23日）

王大使[1]，转刘少奇、高岗[2]二同志：

我们一行因沿途参观今廿三日可到伊尔库次克。计廿六日可到满洲里，尔后拟于海拉尔、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铁岭各停留一二小时至三四小时，到沈阳拟停留一二天。请高岗同志通知上述各地负责同志保守秘密，每处只要少数负责干部迎接招待，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尤其不要公开发表消息。尔后至打虎山、锦州、山海关、唐山、塘沽、天津，均拟略作参观，均要保守秘密。到北京下车时，亦只要有少数党内党外人士（一百人左右）至车站迎接，不要使多数人知道，待到北京后方才发表消息。请照此布置为盼。

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

[1] 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离苏联国境时致斯大林电

（1950年2月26日）

斯大林同志：

我们一行现已到达中苏两国的边境。当此即将离开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时候，谨对于您和苏联政府诸位负责同志的盛意招待，深致谢忱，并祝福苏联在您领导之下强盛不已。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途经哈尔滨时在哈尔滨车站。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途经哈尔滨时在哈尔滨车站。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和前来迎接的滕代远在哈尔滨车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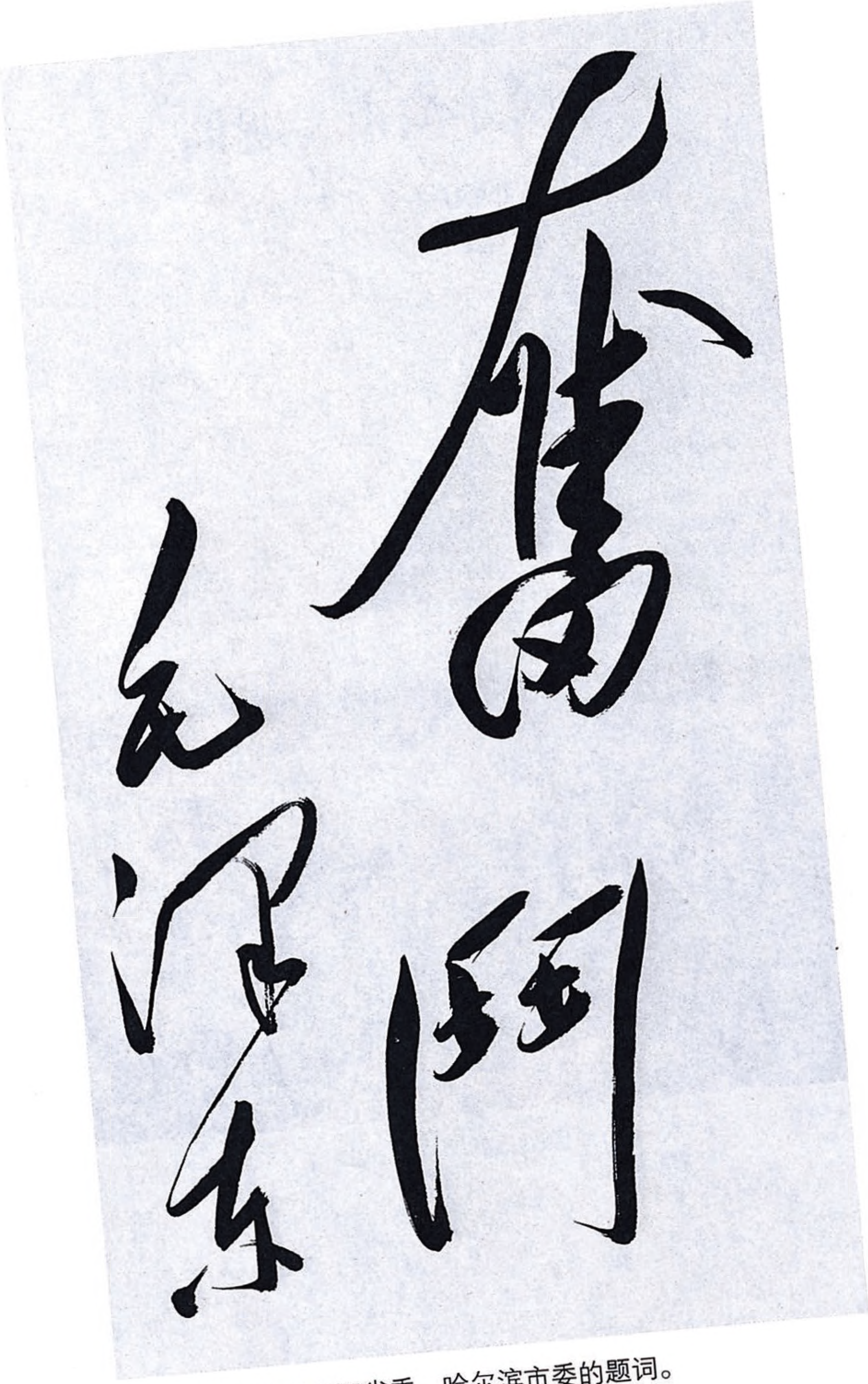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在哈尔滨的住处颐园街一号。

为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题词

（1950年2月27日）

奋斗。

毛泽东



奮鬥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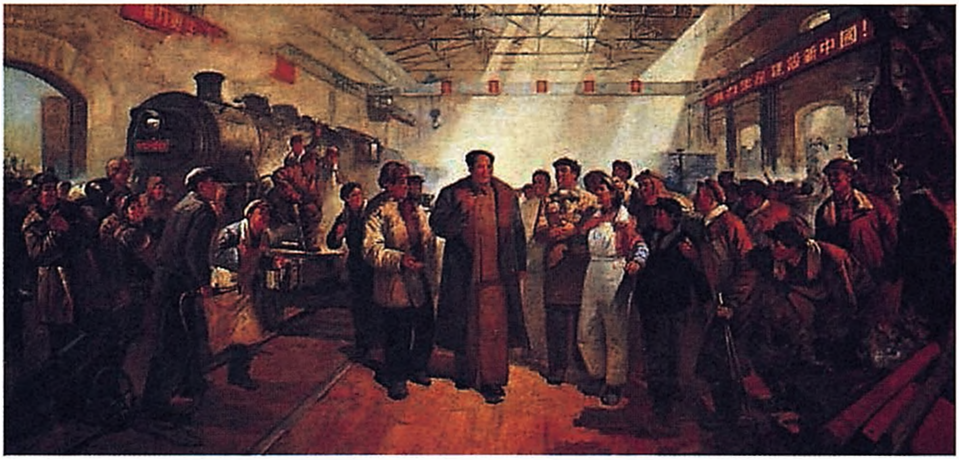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的题词。

为哈尔滨市委题词[1]

（1950 年 2 月 27 日）

发展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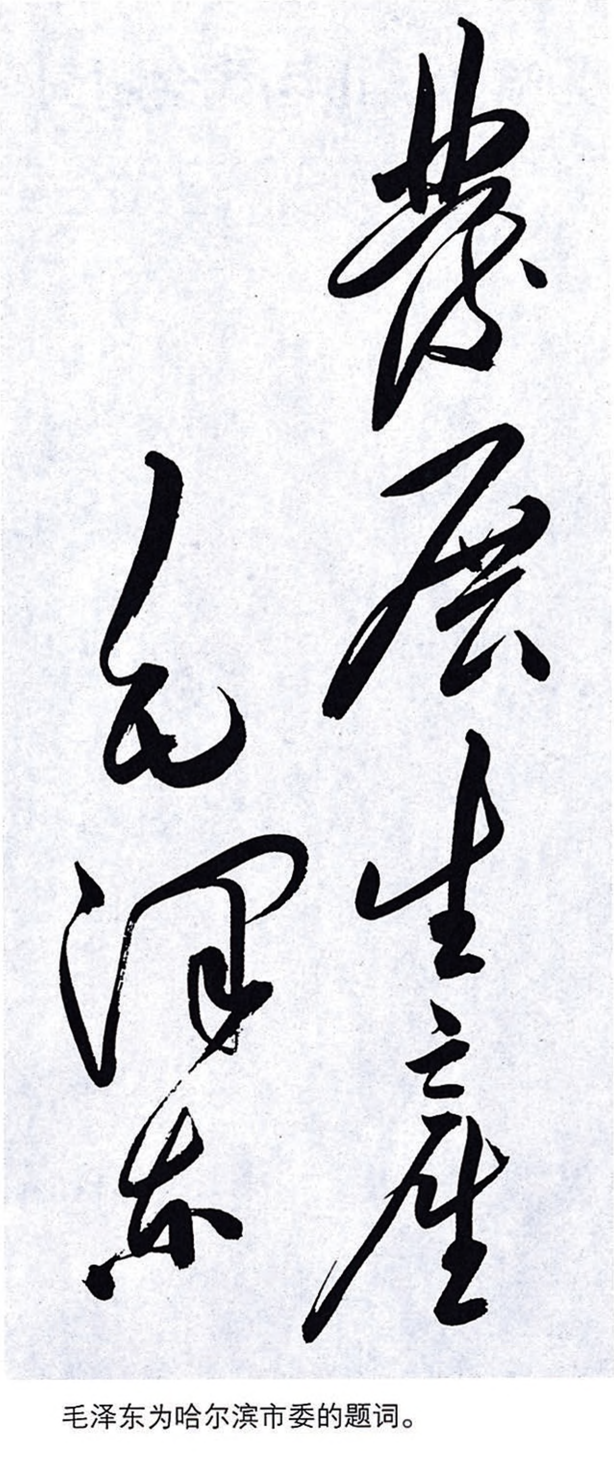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哈尔滨车辆厂》（油画）

---

[1]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发展生产，加速经济建设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1950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为中共哈尔滨市委题词“发展生产”，鼓励市委同志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发展生产

毛泽东

毛泽东为哈尔滨市委的题词。

为哈尔滨市团代会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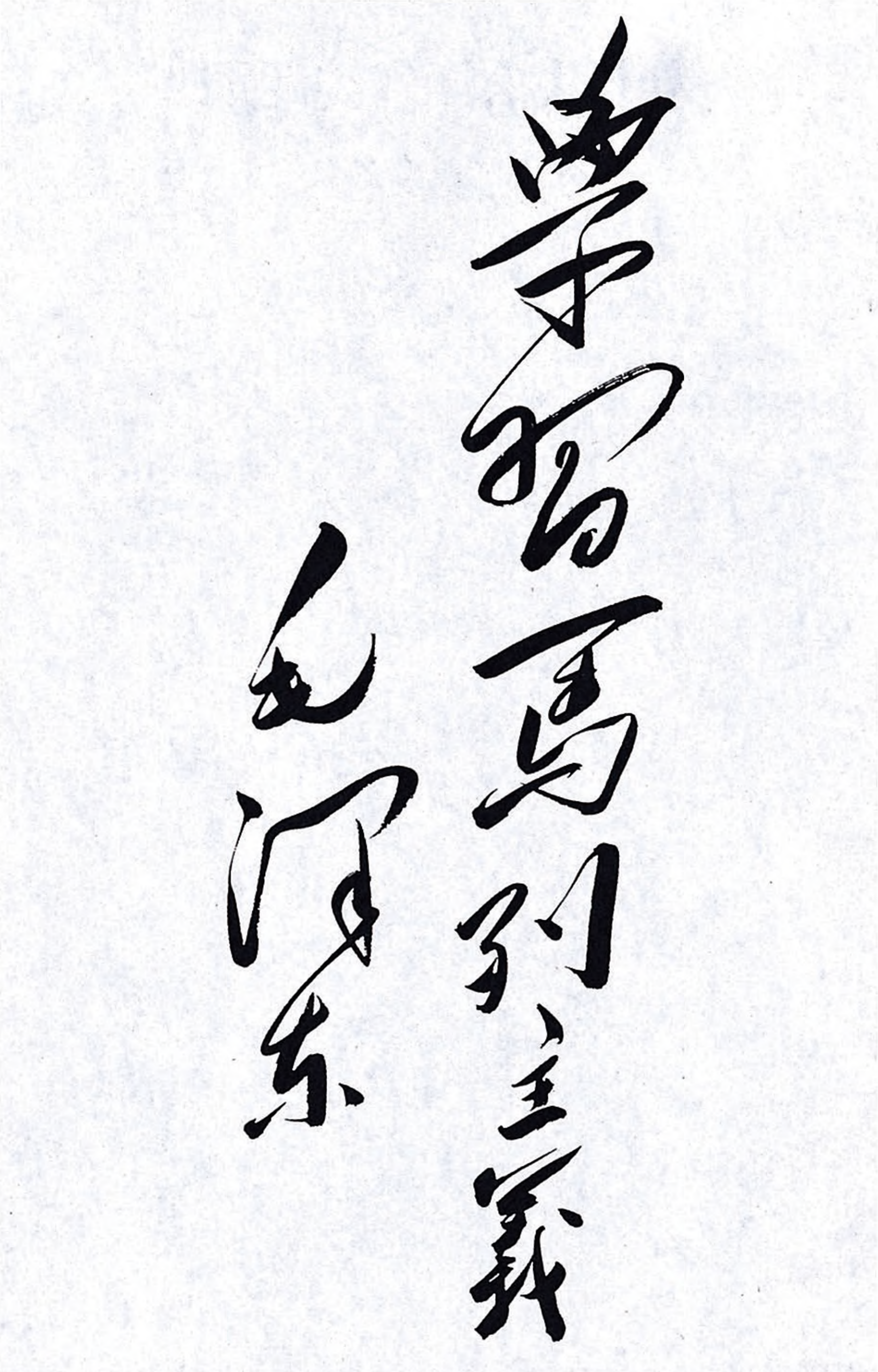
（1950年2月27日）

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

---

[1] 1950年2月25～2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哈尔滨市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了1949年哈市青年团的工作，交流了经验，讨论通过了《1950年市团工作纲要》。这是毛泽东为这次大会所写的题词。



學習馬列主義

毛澤東

毛泽东为哈尔滨市团代会的题词。

为中共松江省委题词[1]

（1950年2月27日）

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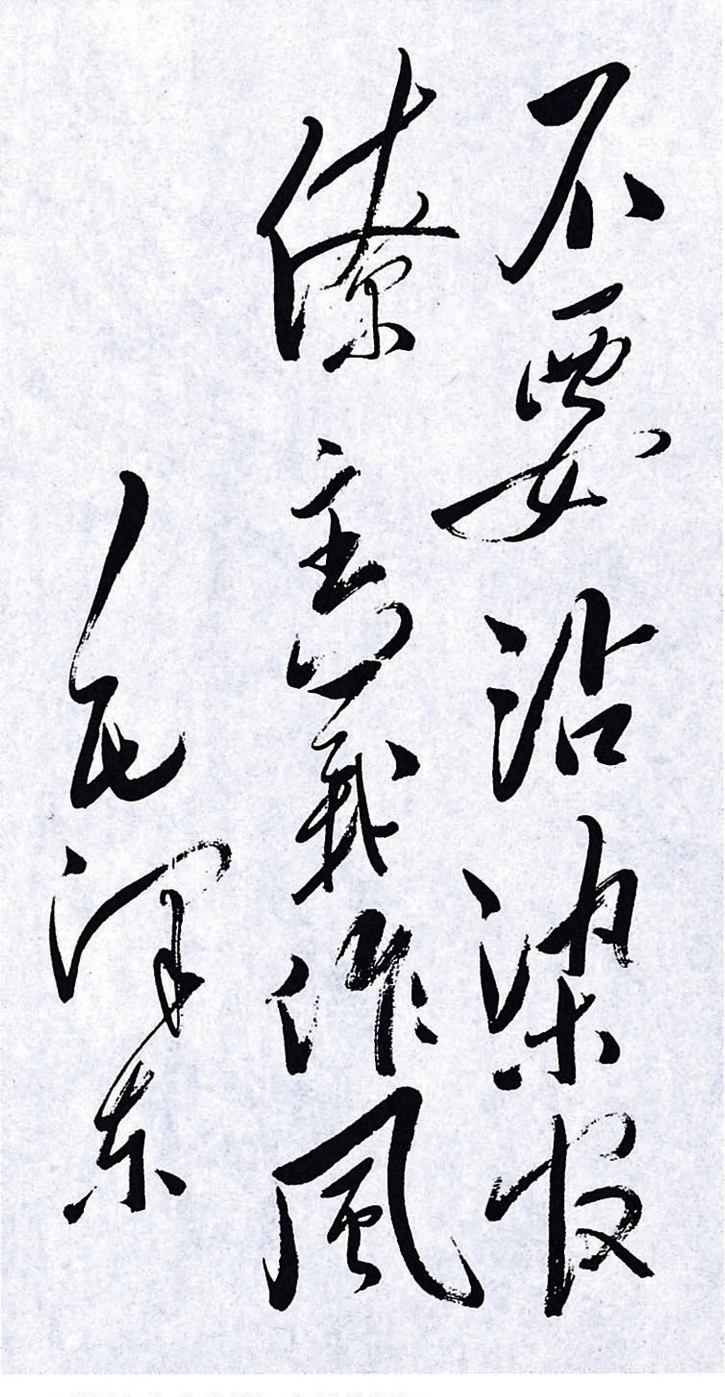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学习。

毛泽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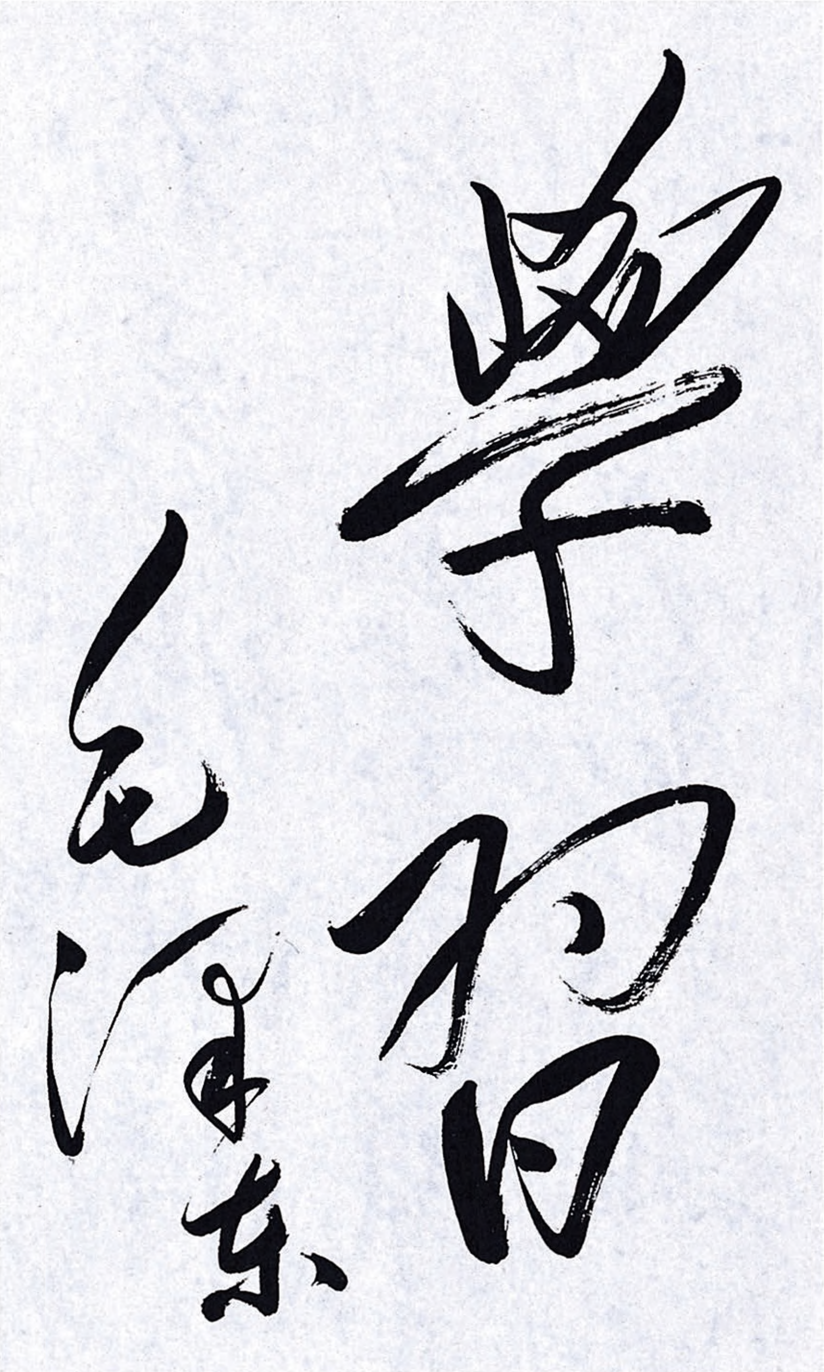
[1]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苏回国在哈尔滨逗留时为中共松江省委题词。



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共松江省委的题词。



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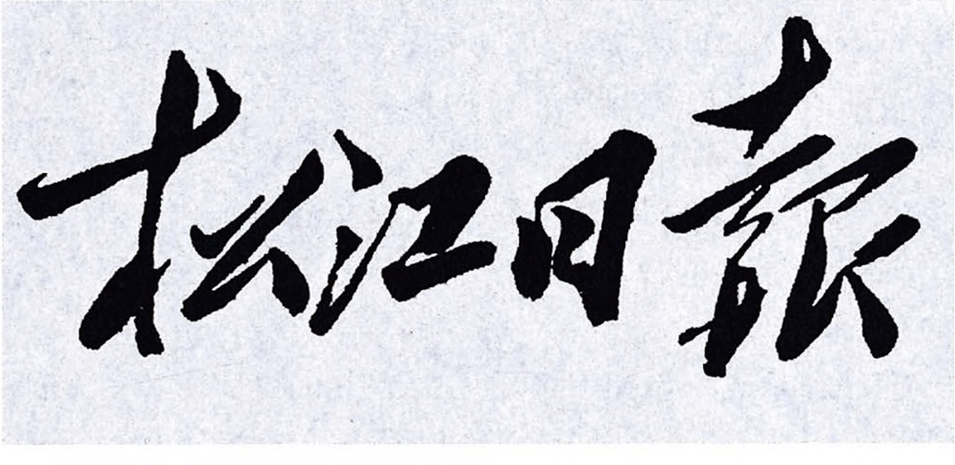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共松江省委的题词。

为《松江日报》题写报头

（1950年2月）

松江日报



毛泽东为《松江日报》题写的报头。

接受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3月10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世界反法西斯大战之后，罗马尼亚人民与国内外反动派所进行的坚决斗争及目前正在勤劳从事并已获得辉煌成就的经济建设工作，一向为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与钦佩。

今天，中罗两国政府及人民正在为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我相信，中罗两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方面的益加密切的合作，必将有利于两国人民，且将更加巩固与加强世界民主和平阵营的力量。

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各种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

1950年3月10日，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鲁登科向毛泽东递交国书。

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致张治中[1]电

（1950年3月11日）

张副主席文白先生：

寅微电敬悉，极感盛意。先生现正从事之工作[2]极为重要，尚希刻意经营，借收成效。

毛泽东
寅真

---

[1] 张治中，字文白，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指张治中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为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进行的工作。

关于征询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的电报

（1950年3月12日）

邓子恢[1]同志，并告林彪、饶漱石、叶剑英、彭德怀、邓小平[2]同志：

（一）子恢寅真电悉，同意你不随林[3]来北京开会而派李雪峰[4]来。（二）请就你们现正召开的各省负责同志会议中征询关于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电告我们，即是说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3] 林，指林彪。

[4]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部长。

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十一月有饶漱石、邓子恢、李富春[1]三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决定之后需要修改土地法及其他有关土改的文件，并颁布出去，以利新区各省土改干部的学习，方有利于今年秋后开始土改，否则将错过时机，陷于被动。因此，不但请中南局，而且请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讨论，并请将此电转发所属各省省委、各市市委加以讨论，将赞成和反对的意见收集起来迅速电告中央，以凭考虑决策，是为至要。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给郭士逵[1]的信

（1950年3月14日）

士逵先生：

去年十月五日来信收到，迟复为歉。先生处境困难，深为系念。工作问题，仍以就近设法等侯机会为宜，不宜远出省外，徒劳往返。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

[1] 郭士逵（1899—1960），湖南韶山银田人，后迁居湖南湘潭良湖乡，农民。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时，遭湖南军阀赵恒惕通缉，郭士逵曾帮助他脱险。

给龙伯坚[1]的信

（1950年3月14日）

伯坚先生：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革命，从事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名是湖南同志们起的，与从前报名偶合[2]，引起你的高兴，我亦与有荣幸。旧词无足取，不必重写。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顺颂大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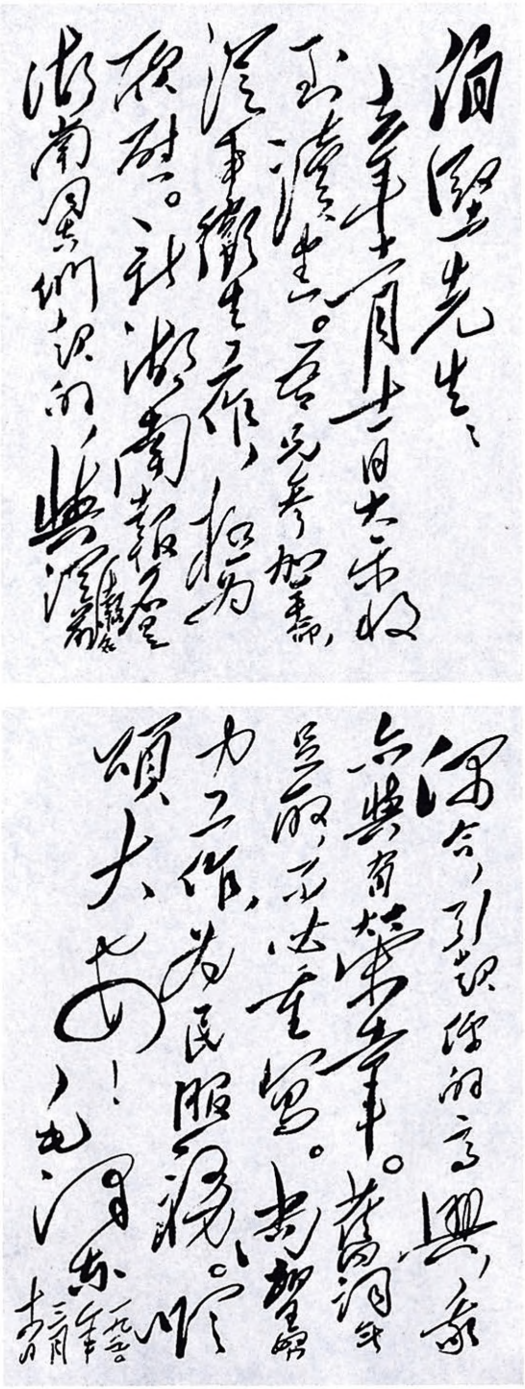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

[1] 龙伯坚，原名龙毓莹，五四运动时曾主编期刊《新湖南》。当时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卫生处处长。

[2] 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湖南省委创办的《新湖南报》与五四时期龙毓莹、毛泽东先后主编过的期刊《新湖南》名称相同。



伯坚先生：

去年十二月廿日大示收到，读悉。吾兄参加新湘卫生工作，极为欣慰。新湖南报登湖南图书馆认识的人，与湘潭[illegible]报名深合，引起你的高兴，余亦与有荣焉。兹润[illegible]已收，不必太客气。尚望努力工作，为民服务。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

毛泽东致龙伯坚信的手稿。

给刘揆一[1]的信

（1950年3月14日）

霖生先生有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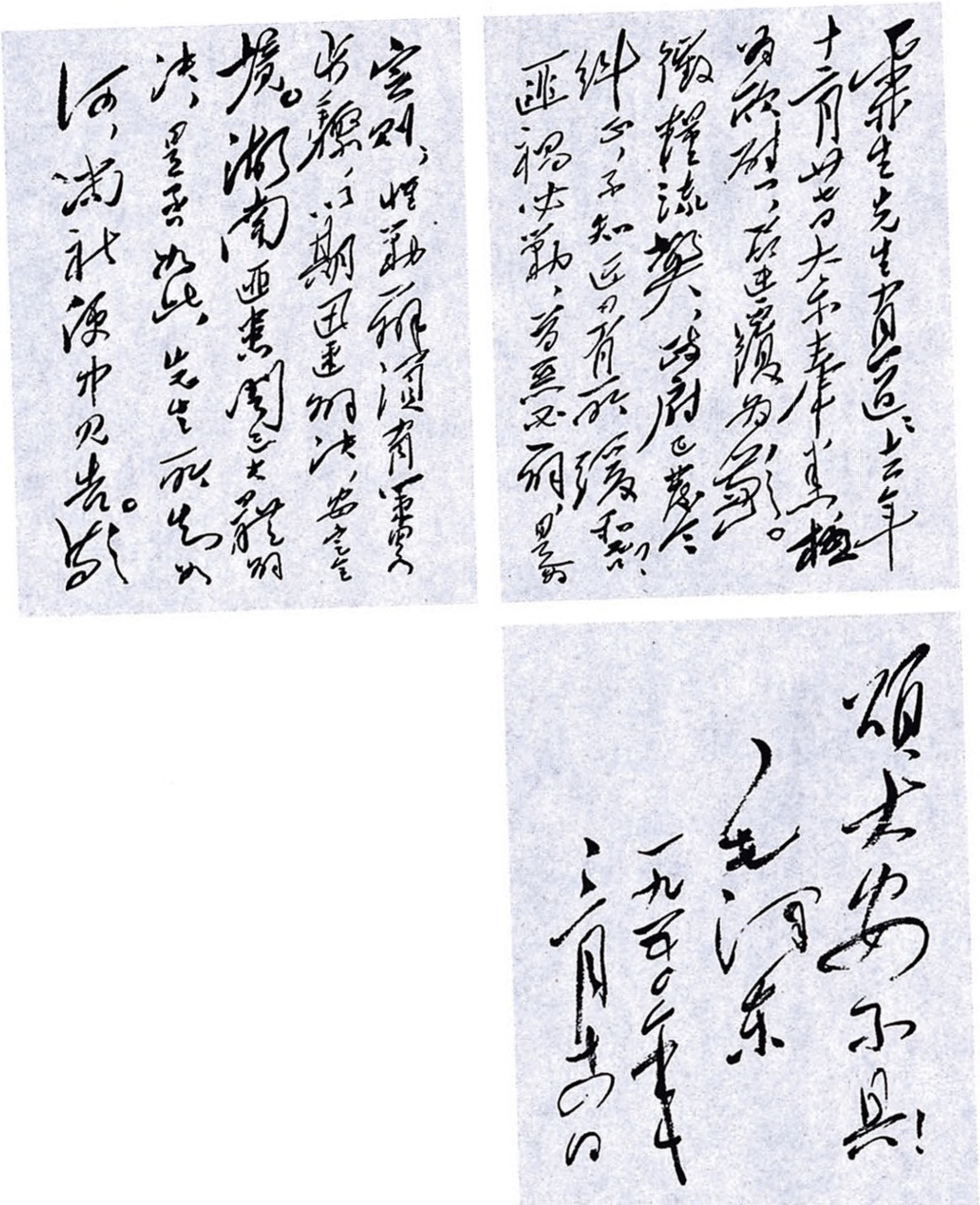
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大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

[1] 刘揆一，字霖生，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霖生先生有道：去年十二月廿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故迟复为歉。微[illegible]流[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纠纷，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匪祸[illegible]，当[illegible]宜对，惟剿匪须有雷霆万钧，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问题大约明决，是否如此，先生所见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此致

顺致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

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致刘揆一信的手稿。

给张辉周[1]的信和题词

（1950 年 3 月 14 日）

挥周学兄：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来信收读。北游之议甚伟，唯宜暂缓，目前仍就原地工作，不必远游。令孙亦宜就现地按政府规程入学。敬复。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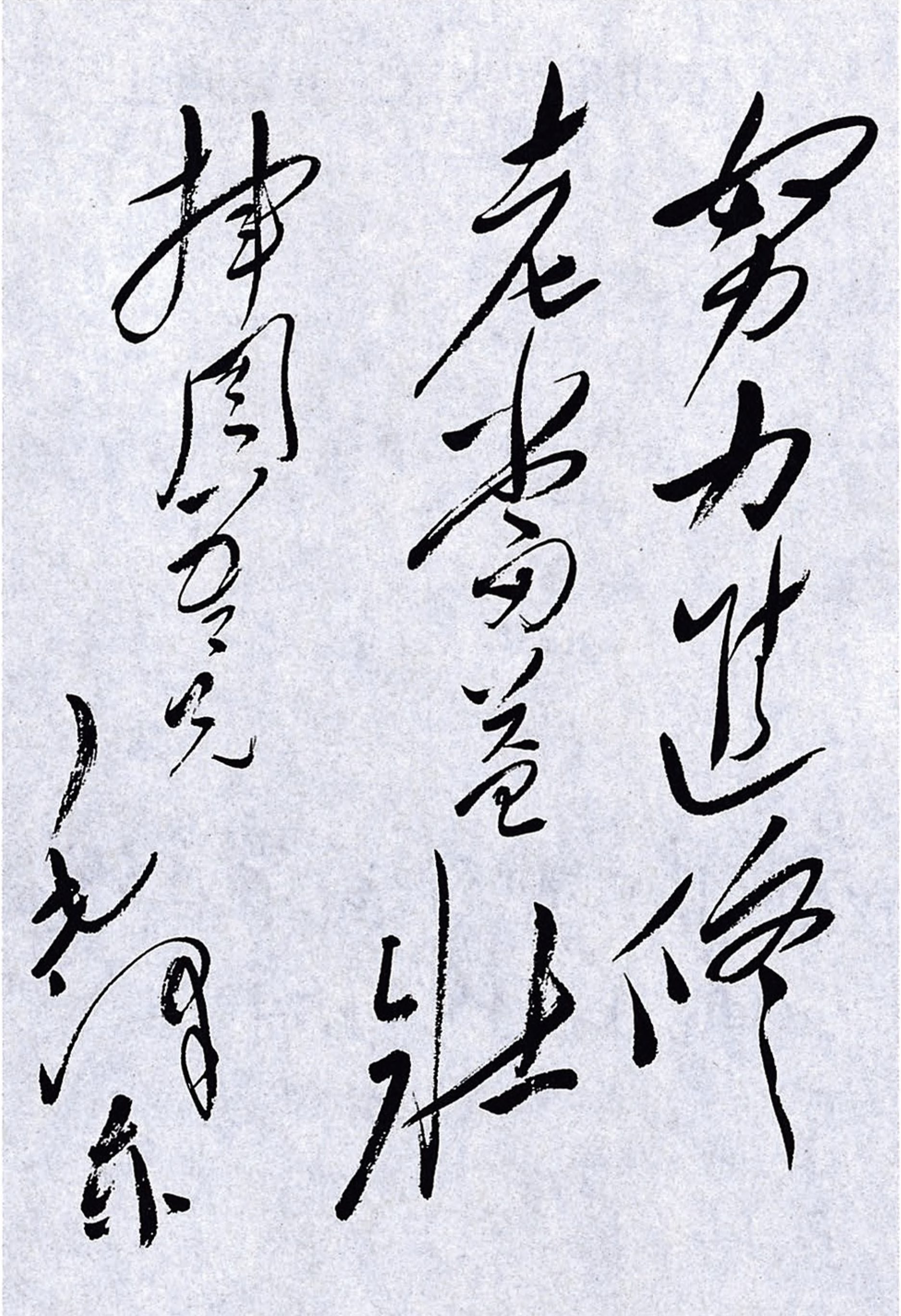
努力进修，老当益壮。

挥周吾兄

毛泽东

---

[1] 张辉周，即张挥周，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努力进修

老当益壮

辉周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张辉周的题词。

同意唐生智来京致黄克诚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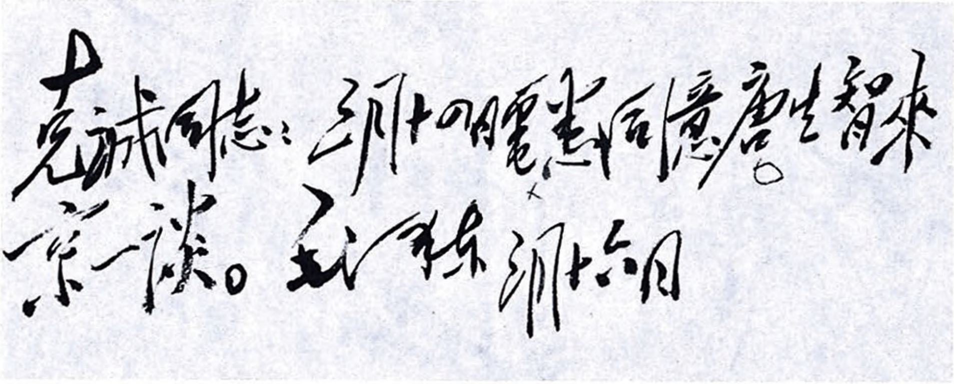
（1950 年 3 月 16 日）

克诚同志：

三月十四日电悉，同意唐生智来京一谈。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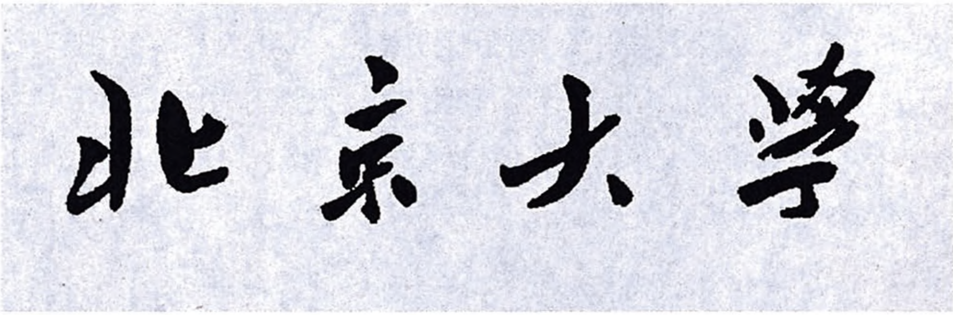
克诚同志：三月十四日电悉同意唐生智来京一谈。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毛泽东致黄克诚电的手稿。

为北京大学校徽题字[1]

（1950年3月17日）

北京大学



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校徽的题字。

---

[1] 1949年12月12日，经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同意，校委会秘书汪子嵩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请文书刘椿年楷书誊写后，送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处。信中邀请毛泽东在北大五十一周年校庆纪念日（12月17日，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之际为北京大学题写校名，以备制作新的校徽之用。1950年3月17日，中共中央秘书室将毛泽东为北大校徽的题字放在一信封内送给北大，并附言："寄上毛泽东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收查。"

中央关于召开各区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军事、土改等问题的电报

（1950年3月18日）

德怀、小平、漱石、方方、高岗[1]同志：

为讨论军事和土改等项问题，拟请各区负责同志来京开会一次，请你们五位于接电后数日内即动身来京（林彪粟裕[2]二同志已到京）。为此，西北军区会议须改期开会。彭来京用何交通工具望告，我们意见可乘火车。小平何日动身为宜望告确期，以便派飞机来接。剑英[3]刚从武汉回粤，请方方来京一次。彭邓饶方四同志可于三月廿四、五两日到京，高岗同志到京时间另电通知。

中央

三月十八日上午一时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3]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关于救济苏北灾民的批语

（1950年3月20日）

董老[1]：

此事[2]请你予以处置，并请以结果告我，二千万斤粮一千万斤盐是否可以照拨，并及时运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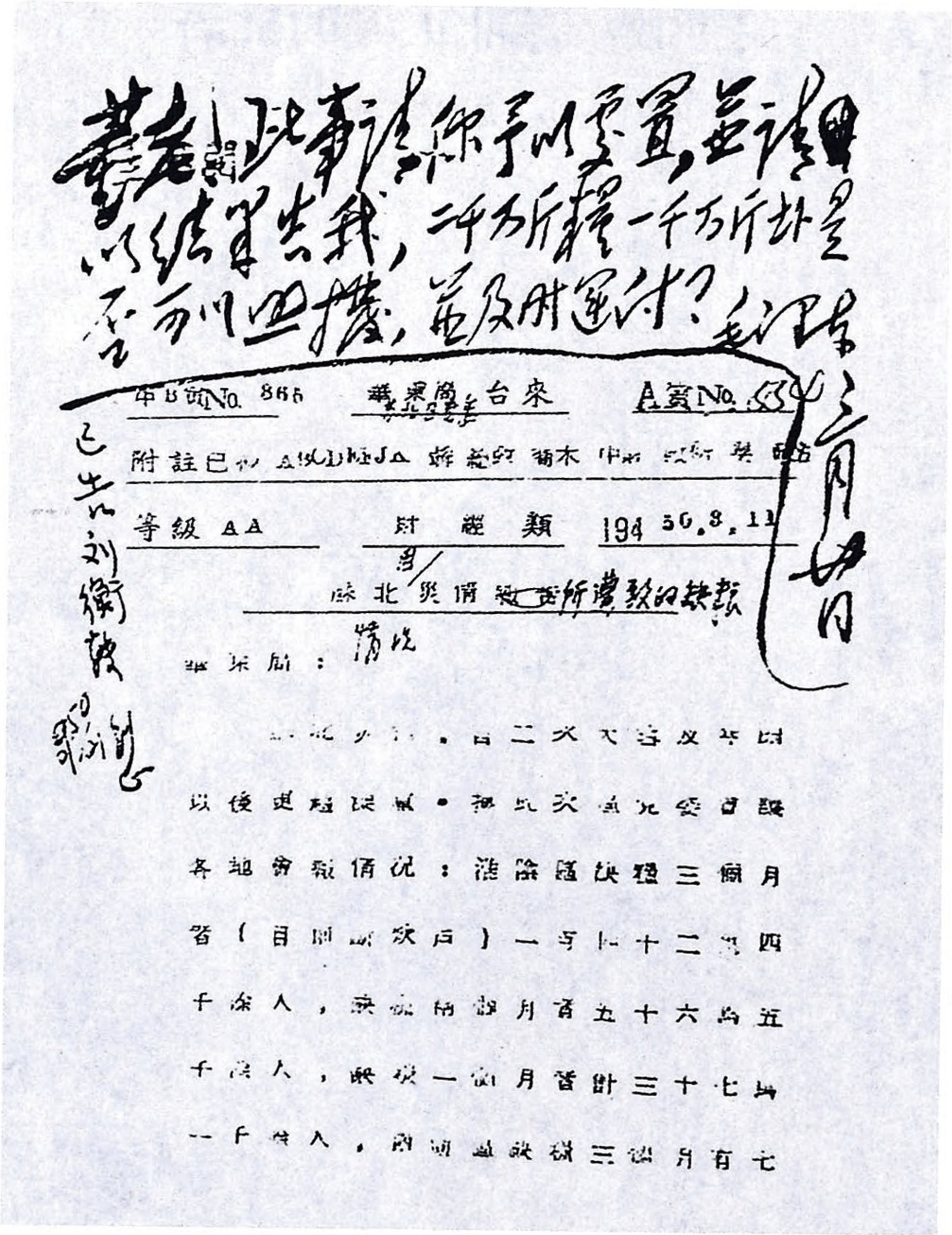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三月廿日

---

[1] 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苏北区委要求中央加拨粮食和食盐救济苏北灾民。



董老：此事请你予以处置，并请以结果告我，二千万斤粮一千万斤种是否可以照拨，并及时运付？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已告刘衡[illegible]

中B讯No. 866　華東局台來　A資No. [illegible]

附註已以 [illegible]

等級 AA　財經類　1950.3.11

蘇北災情所導致的缺糧情況

華東局：

[illegible]二次大[illegible]以後迄[illegible]據災[illegible]各地[illegible]情況：淮[illegible]缺糧三個月者（[illegible]）一百[illegible]十二萬四千余人，缺[illegible]月者五十六萬五千余人，缺一個月者計三十七萬一千余人，[illegible]缺糧三個月有七

毛泽东在一份关于苏北灾民缺粮情况的报告上的批示手稿。

致张治中[1]电

（1950年3月20日）

叶、方[2]，转张文白先生：

寅佳电悉。（一）同意先生来京面叙，何日启程盼告。（二）沿途护卫请剑英布置。

毛泽东

寅哿

---

[1] 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安徽巢湖人。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关于确定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的批语

（1950年3月28日）

粟裕[1]同志：

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是否如此，请考虑告我。

毛泽东

三月廿八日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关于进军西藏的口号问题的批语

（1950 年 3 月 29 日）

小平[1]同志：

口号[2]有些不适当，又太多，请你动手修改，或重拟一单。

毛泽东

二月廿九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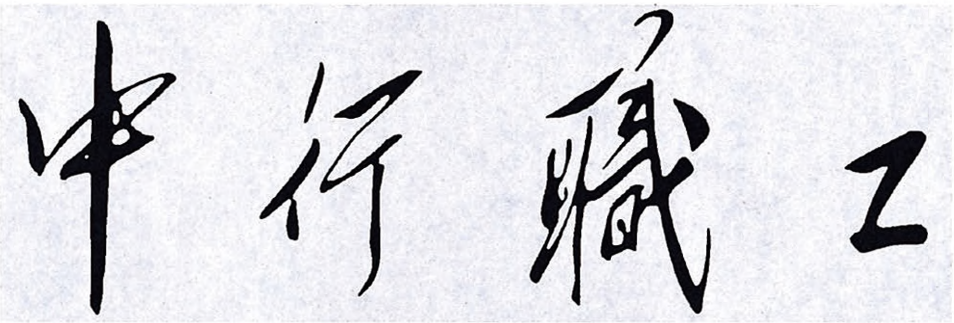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党委拟的进军西藏口号二十四条。

为《中行职工》题名[1]

（1950年3月）

中行职工



毛泽东为《中行职工》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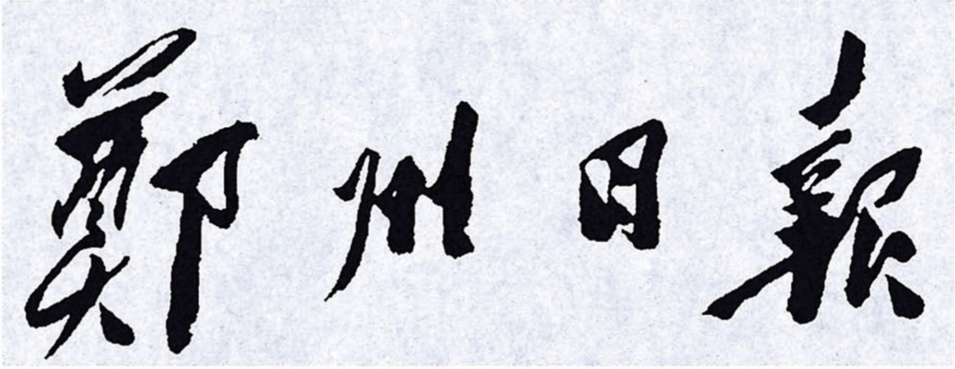
---

[1] 1949年12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至北京，为及时沟通信息，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决定创办《中行职工》。时任总管理处主管教育科的人事副主任张文秋提议请毛泽东题写刊名。3月的一天，张文秋和女儿刘思齐到中南海请毛泽东题写刊名，毛泽东欣然应允，并当场写了好几张。报总管理处领导批准后在北京正式开始使用。

为《郑州日报》题写报头[1]

（1950 年）

郑州日报



毛泽东为《郑州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50年3月30日，毛泽东访苏归来，收到郑州日报社请求书写报头的信，毛泽东欣然挥毫，在报社随信寄上的一张约四寸长、两寸宽的普通办公纸上，写下了“郑州日报”四个字。

关于援助越南武器的批语[1]

（1950年3月、4月）

一

所抽枪炮弹药应该是好的和合用的。[2]

二

你们所抽枪炮弹药应该是好的和合用的。[3]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1950年3月30日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1950年3月30日给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的电报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兼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和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中南军区副参谋长李聚奎的电报上写给刘少奇的批语。

[2] 中共中央的电报说："中央决定由中南、西南两区各准备一万支步枪，并配备与一万支步枪相适应之轻重机枪、迫击炮、山炮等武器，援助越南。"

[3] 中共中央的电报说："罗贵波三月二十四日电称越南需武器甚急，请即将已集中南宁待运之枪炮先行运去，其余物资及干部正商办中。"

三

少奇同志：

第四项[1]请你酌定电复。我意是可以的。

毛泽东

四月三日

---

[1] 邓子恢等电报所提意见的第四项内容是：“请中央考虑可否再抽调一部分山炮连、排干部及必需的炮手前往，以便帮助其组织练训。如同意请即复示。”

纠正军队生产偏向是为至要[1]

（1950年4月2日）

各中央局、各军区：

兹将华北军区三月卅一日关于纠正军队生产偏向指示电[2]一件发给你们，望转发所属参考并纠正自己部队中的偏向，是为至要。

中央军委
四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1950年3月31日关于纠正军队生产偏向指示的电报。

[2] 指示电中提出应当纠正的军队生产中出现的偏向是：（一）集中力量搞生产，放松了剿匪任务；（二）工具未准备好，劳动量过度；（三）管理松懈，引起战士逃亡；（四）生产动员时片面强调分红，对增加国家财富和减轻人民负担的精神强调不够。

给马叙伦[1]的信

（1950年4月2日）

夷初先生：

示悉。遵嘱写了几个字[2]，是否可用请酌。

此颂

日安！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马叙伦，字夷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2] 指毛泽东为《人民教育》杂志创刊号（1950年5月1日出版）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致陈毅电

（1950年4月5日）

陈毅同志：

卯支电[1]悉，所取方针和中央的方针是一致的，望妥慎去做。中央会议[2]六日可完，漱石[3]八日可动身参加上海十日开始的会议[4]，我们是支持你们的。

毛泽东

四月五日

---

[1] 指陈毅1950年4月4日关于公债、税收等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谈到解决公债和税收问题的方针和办法：一、动员党政和人民团体积极做好解释工作，并严办乘机捣乱的坏分子，对工作方式和税目方面的毛病进行检讨并加以改善。二、召开党内会议，说明债税任务新老解放区和城乡均应分担，共同克服困难。过去上海负担轻，是照顾了初解放和封锁等情况，现在负担略为提高，较之国民党统治时代和其他地区，不是独重，仍然照顾了上海的现实。并动员工农青妇团体研究工厂、学校、商店具体渡过困难的实例，以实例说服各方。三、召集财经各部人员开会，在不妨害中央财政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辅助的步骤，使上海工商业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并对失业失学问题商讨具体救助办法。

[2] 指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讨论军事和土改等问题的各区负责人会议。

[3]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4] 指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0年，上海人民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为印发周恩来关于中苏条约的报告的批语

（1950年4月9日）

此报告请周[1]印若干份，于今日印好，明日分发准备参加此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2]的一百七八十人，每人一份。

毛泽东
四月九日

此次政府委员会议，除周、陈、林、邓[3]四同志讲话外，张治中，程潜，张澜，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4]等六人似亦宜给以讲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1950年4月11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3]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4] 张治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话机会，请周酌定通知他们做准备。此外，为解释婚姻法，王明[1]似亦宜略作说明。

---

[1] 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给毛照秋[1]的信

（1950年4月10日）

照秋贤侄：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来信收到。家中困难，应在土地改革后在生产中去陆续解决。你父亲旭梅[2]健在，甚慰，请你代我致问候之意。祝你工作顺利！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

---

[1] 毛照秋（1903—1973），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毛泽东的族侄，当时在乡务农。1925年冬曾到广州，由毛泽东介绍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当兵，后回韶山任农民自卫军队长。

[2] 旭梅，即毛旭梅（1884—1956），毛泽东的族兄。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给张有晋[1]的信

（1950 年 4 月 1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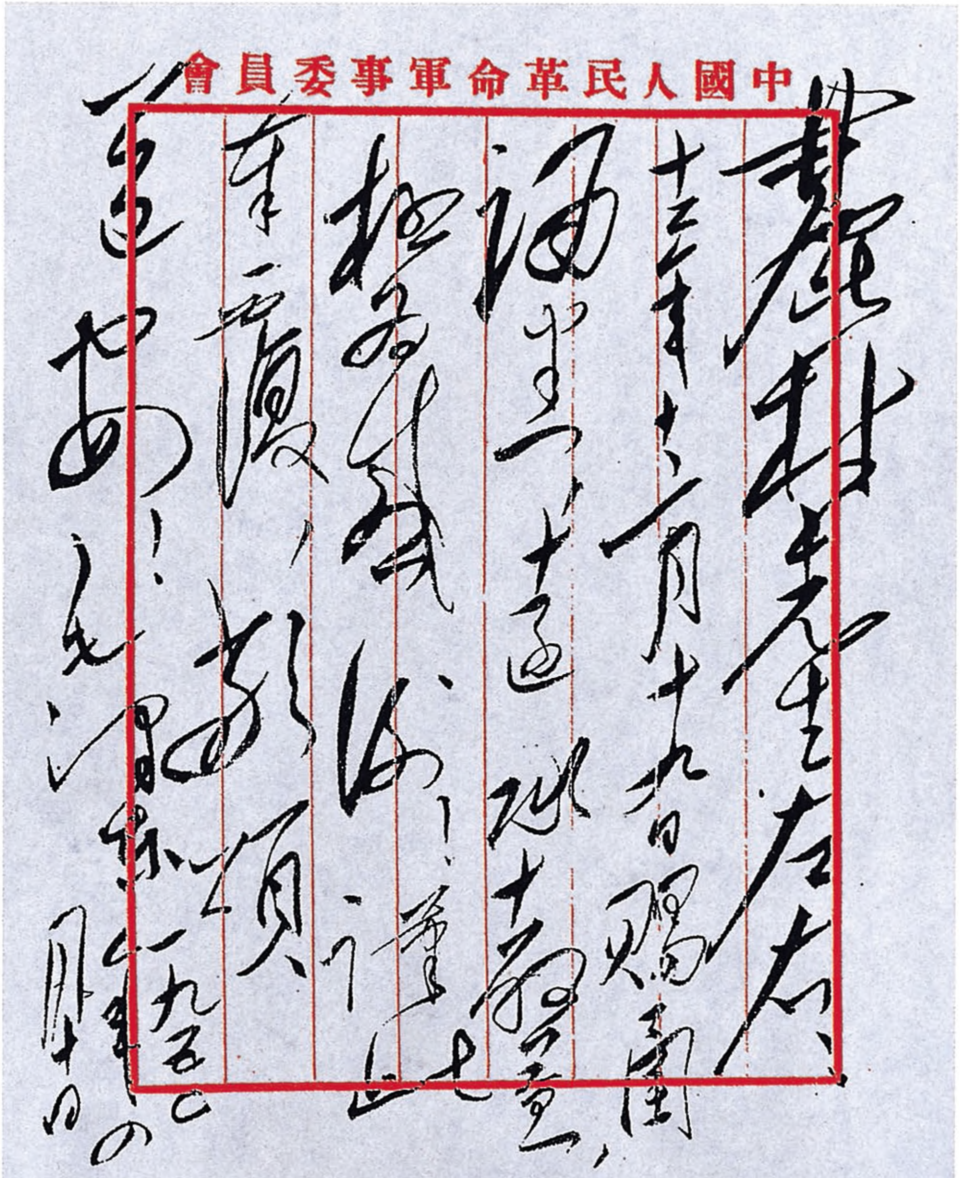
麓村先生左右：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赐函诵悉，远承教益，极为感谢！谨此奉复。敬颂道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日

---

[1] 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有晋先生左右：去年十二月十九日賜函，函中[illegible]，極為感謝！謹此奉復。敬頌

道安！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日

毛泽东致张有晋信的手稿。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50年4月11日）

一

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新闻稿的一部分；本篇二是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斯大林的建议，中苏合拍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刘白羽、周立波参加了这一工作。《解放了的中国》纪录片需用毛泽东的这一部分讲话，为此刘白羽、周立波在1950年6月27日从莫斯科拍电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对这一部分讲话作了修正，并在6月29日复电刘白羽、周立波说："廿七日电悉。我在政府委员会上的讲话修正如下，凡能修正者请照此修正，如不可能修正者则只好听之，请酌办。"后来，《解放了的中国》纪录片用了毛泽东这个修正稿的录音。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件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全国人民对此都有所表示。在座的同志们中间，今天有许多人说了话，都说是有伟大的意义的。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来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把他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座的许多的委员都发表了意见，都很好。现在没人再说话了，那么，我们付表决，就是说批准这个条约。

1950年，毛泽东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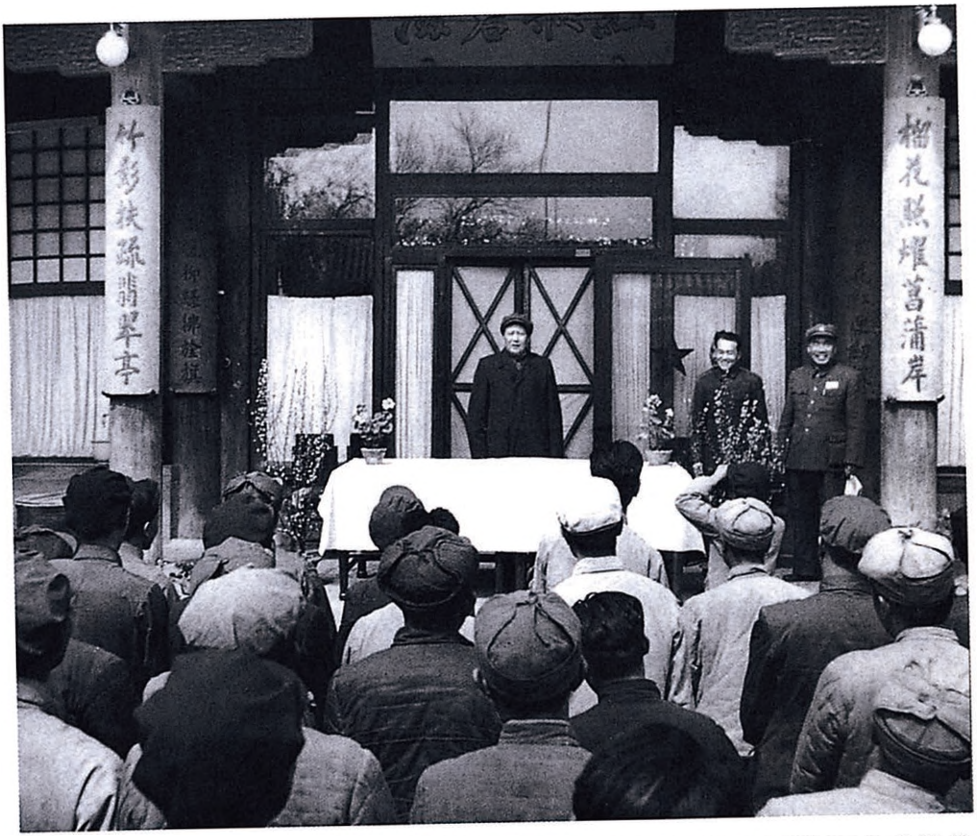
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1]

（1950年4月12日）

应积极地提出复员是为了返回家乡发展生产和建设民兵，回乡后应服从区乡政府领导，在人民中起模范作用，而不可乱来。

---

[1] 这是毛泽东1950年4月12日在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关于中南部队复员问题给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和陶铸的电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竹影扶疏翡翠亭
榴花照耀菖蒲岸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出席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代表。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出席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代表。

1950年4月13日，毛泽东和新闻工作者谈话。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4月13日）

毛泽东主席就陈云主任的报告[1]讲话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过去六个月在整理收支、稳定物价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财经委员会的方针是正确的。工作中还有一些缺点，应当注意改正。毛主席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毛主席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

---

[1] 指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作的关于财政状况和粮食状况的报告。

得其所”[1]，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

---

[1] 参见《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原文是：“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给向振熙[1]的信

（1950年4月13日）

向老太太尊鉴：

欣逢老太太八十大寿，因令小儿岸英回湘致敬，并奉人参、鹿茸、衣料等微物以表祝贺之忱，尚祈笑纳为幸。

敬颂康吉！

毛泽东

江　青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

[1] 向振熙，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母亲。

给杨开智、李崇德[1]的信

（1950 年 4 月 13 日）

子珍、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2]上寿，并为他母亲[3]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此问近佳！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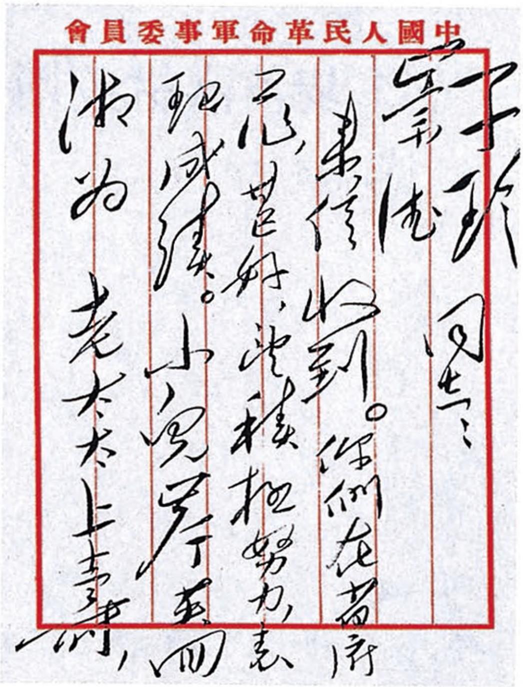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

[1]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李崇德，杨开智的夫人。

[2] 指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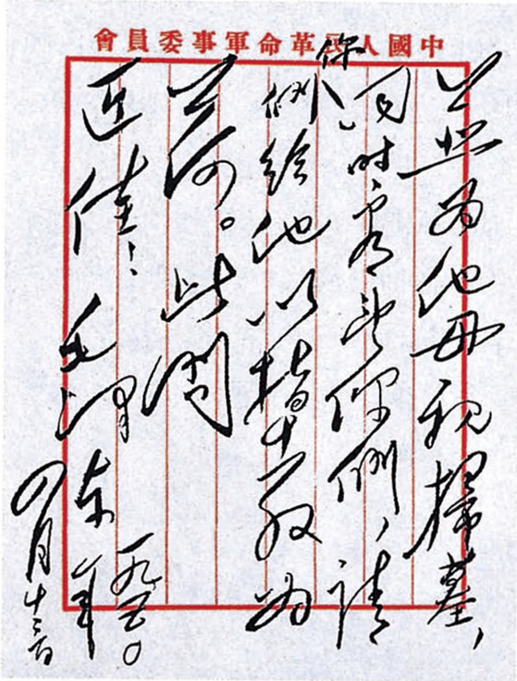
[3] 指杨开慧。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开智、崇德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青来湘为老太太上寿，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应当去看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盼。此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致杨开智、李崇德信的手稿。

关于购买空军装备器材致斯大林电

（1950年4月13日）

莫斯科

斯大林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预定一九五〇年六月间进行夺取舟山群岛的作战，八月间进行夺取金门岛的作战。上述两次作战将有已经训练出来的中国空军部队（两个驱逐机团，一个轰炸机团）参加。

由于其余的十四个空军团（根据种种条件所限，拟改变原来计划为七个驱逐机团，七个轰炸机团）要明年春天才能训练出来，夺取台湾的作战，准备一九五一年进行之。

为了保证中国空军部队在上述作战中的行动，请求你允许我们向苏联购买空军用的各种机械器材、特种车辆、备份零件、油料和弹药，并请按各个订货单内所规定的期限发货。

上述物资的订货单十四件，随函附上。

谨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给刘揆一[1]的信

（1950年4月14日）

霖生先生：

四月二日大示诵悉。退押一事，原是地方根据农民要求办理的，现已令其停止。敬复，顺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

---

[1] 刘揆一，字霖生，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给熊子容的信

（1950年4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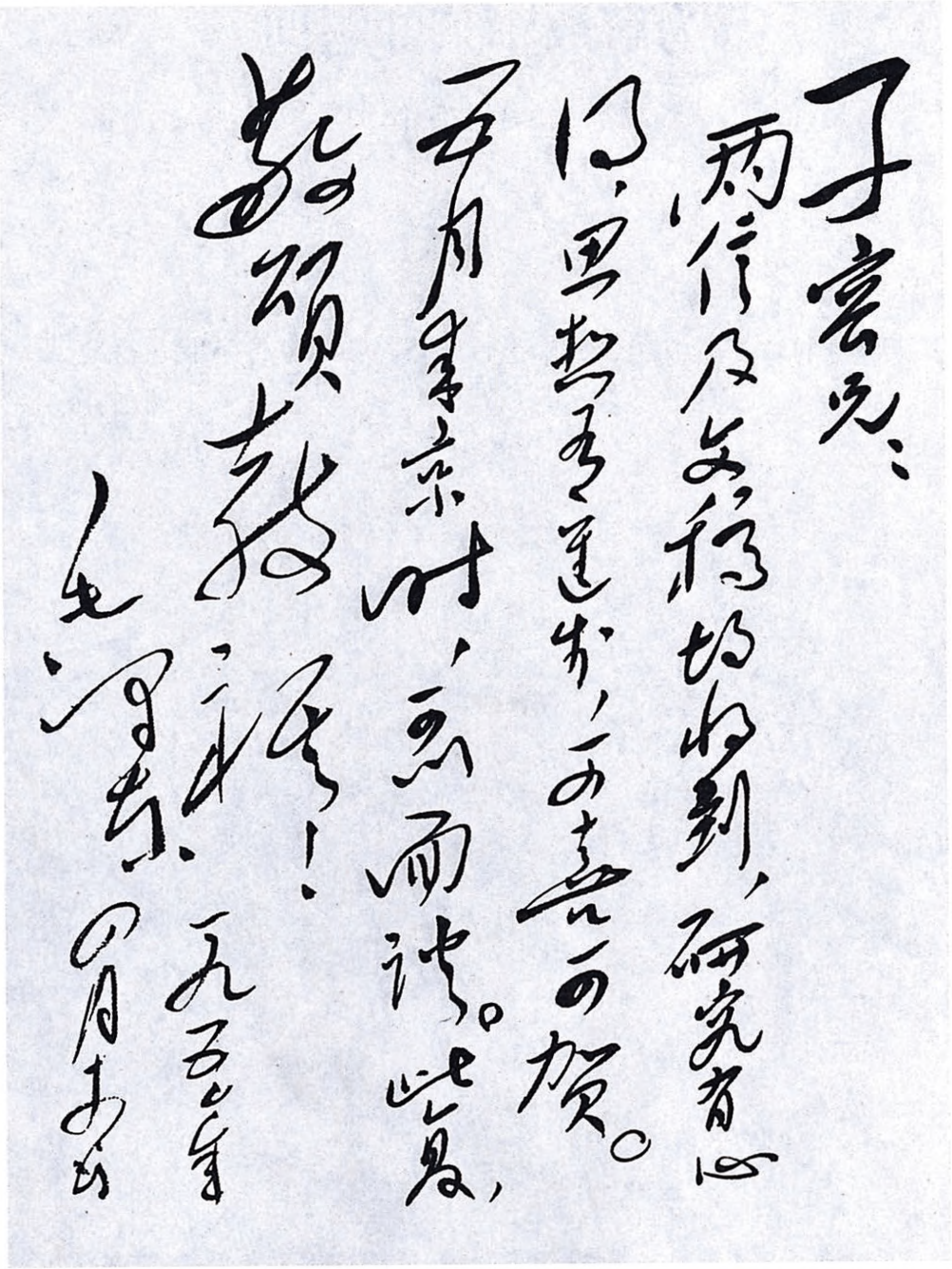
子容兄：

两信及文稿均收到，研究有心得，思想有进步，可喜可贺。五月来京时，可以面谈。此复，

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四日



子容兄：

两信及文稿均收到，研究有心得，思想有进步，甚为可贺。五月来京时，可面谈。此复，

敬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熊子容信的手稿。

为解放军某部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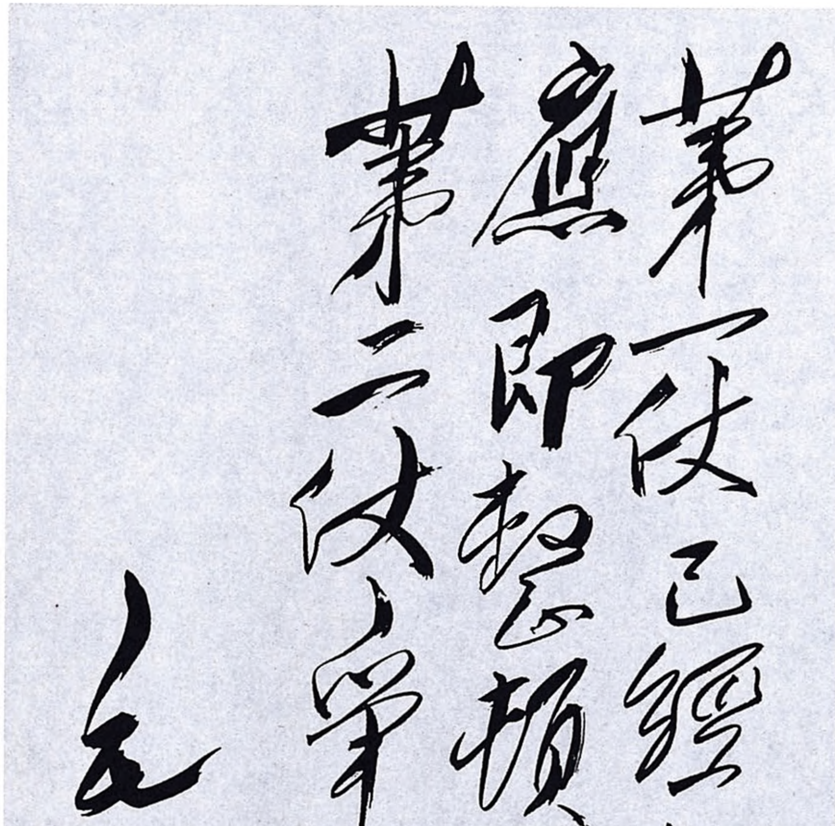
（1950年4月14日）

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

毛泽东

---

[1] 新中国建立后，各地残余的土匪、国民党反动势力仍然很猖獗，解放军的任务也很艰巨。1950年4月14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某部题词，鼓励解放军指战员发扬过去的传统，争取全面的胜利。



第一仗已經打勝了
應即整頓隊伍打
第二仗爭取全勝
毛泽东

毛泽东为解放军某部的题词。

关于武昌私营纱厂应予维持的批语

（1950年4月15日）

陈云[1]同志：

此件[2]所述厂家似应予以维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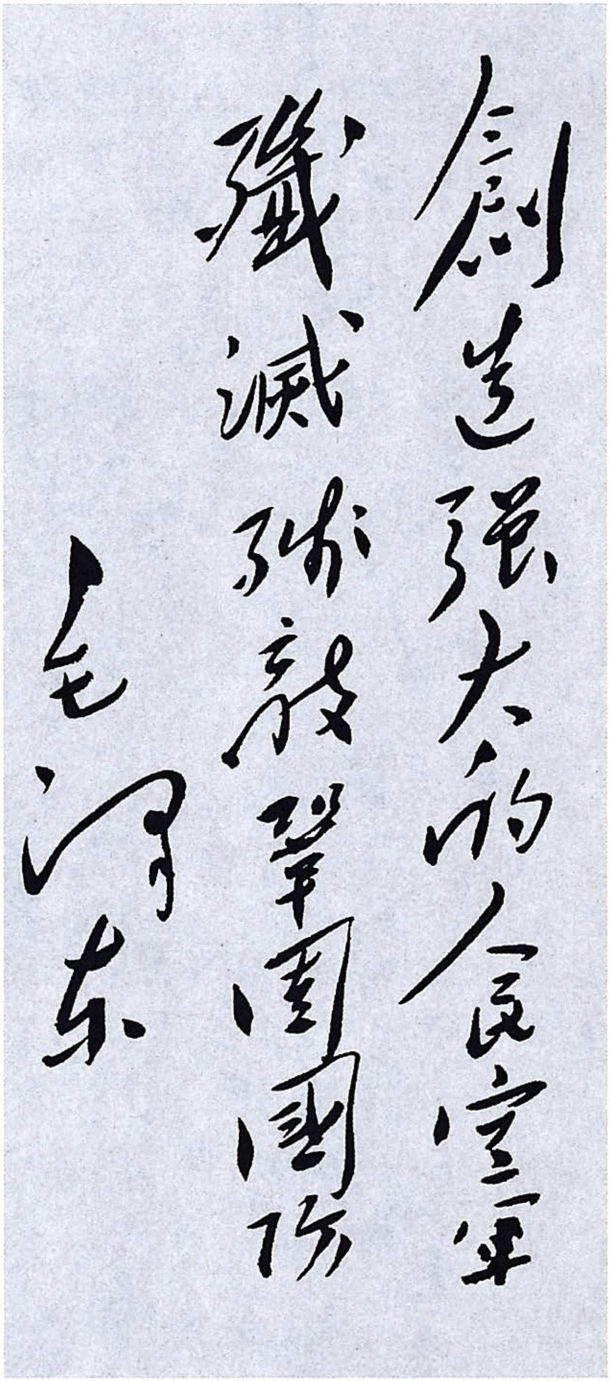
[2] 指中南财委1950年4月13日关于武昌私营纱厂现要停工急待解决的问题给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说，震寰纱厂、第一纱厂、裕华纱厂、申新纱厂等，因催收税债，紧缩发行，银根吃紧，成品卖不出去，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为《人民空军》创刊号题词

（1950年4月15日）

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毛泽东



創造強大的人民空軍

殲滅殘敵鞏固國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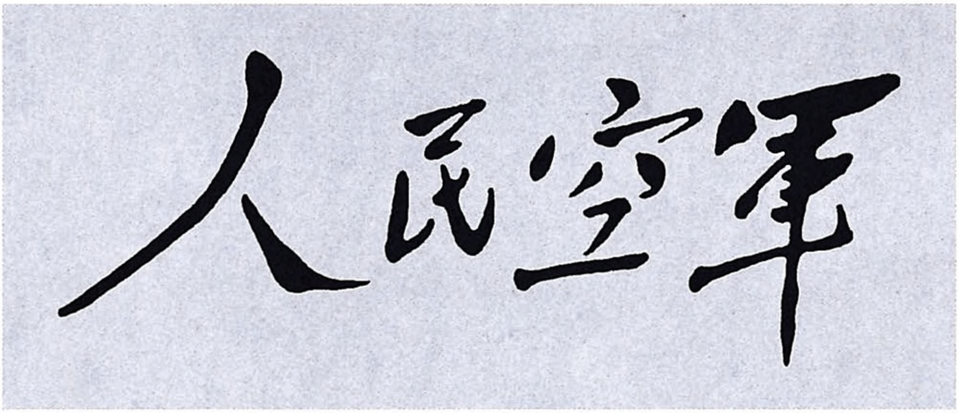
毛澤東

毛泽东为《人民空军》创刊号的题词。

为《人民空军》题名[1]

（1950年4月15日）

人民空军



毛泽东为《人民空军》题写的刊名。

---

[1] 《人民空军》杂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初创时期的机关刊物。1950年4月15日在北京创刊，半月刊。创刊之前，刘亚楼请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并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这一题词发表在《人民空军》创刊号上。1960年12月30日《人民空军》停刊。后改为《空军报》延续出版。

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

（1950年4月16日）

陈毅[1]同志：

删午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会议[2]情形，望随时电告。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二十二时

---

[1]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2] 指当时正在举行的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1950年4月15日开始，23日结束。

关于撰写纪念季米特洛夫[1]的文章致契尔文科夫[2]电

（1950年4月18日）

契尔文科夫同志：

去年十二月七日来电我由苏联回来后方才看到。兹依你的要求写了一篇短文[3]，但你的限期早已过了，是否还有用，请你酌定处置。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

[1] 季米特洛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曾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7月逝世。

[2] 契尔文科夫，当时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

[3] 指毛泽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书撰写的《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一文。

季米特洛夫与中国人民[1]

（1950年4月）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出版关于季米特洛夫同志生平活动的专集。我愿借此机会简略叙述一下季米特洛夫同志与中国人民的关系。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整个时期里，对中国革命十分关切。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的时候，曾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向中国人民宣布："我们坚决拥护你们的英勇的民族解放斗争，决意帮助你们结束一切帝国主义强盗及其中国走狗的压迫，帮助你们谋得完全的独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九三八年九月和一九三九年五月，共产国际多次号召全世界工人阶级从各方面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各国工人阶级响应了共产国际的号召，对正在抵抗日本进犯者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宝贵的援助。

季米特洛夫同志很早就开始注意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六年七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而写的专文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

[1] 这是毛泽东应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的要求，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书撰写的文章。

和在建立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必须同“左”倾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季米特洛夫同志所作的这些结论，对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正确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很大的帮助。

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革命著述，在中国受到普遍的重视。他的《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书，在我国发行很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版社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出版了一本《季米特洛夫文集》，其中收集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许多重要文章。

一九四二年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的时候，中央委员会要求全体党员学习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的结束语，他在这里谈到干部政策以及宣传工作必须通俗易懂的问题。所有党员对季米特洛夫同志报告中的这两点都极其注意。

季米特洛夫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如此热情支持过的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与之永别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已经豪迈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并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有这一切胜利，都是对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天之灵的最大慰藉。

季米特洛夫同志永垂不朽！

给毛森品[1]的信

（1950年4月18日）

森品学兄如晤：

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复为歉。钦明[2]兄为革命牺牲，不胜叹惜，亦是光荣之事。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风便尚祈随时惠示周行。敬祝健进。不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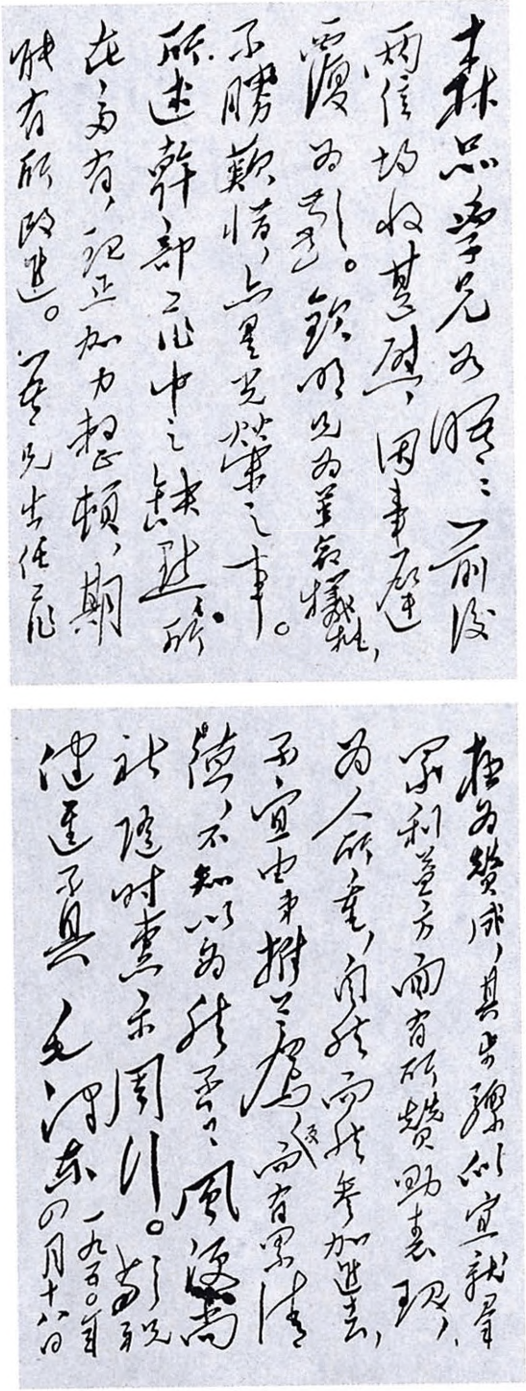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

[1] 毛森品，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

[2] 钦明，即毛钦明，毛森品之兄。曾与毛泽东同学。1928年牺牲。



森品学兄如晤：前後两信均收，甚慰。困事屡屡为乱。钦明兄为革命牺牲，不胜欷歔，惜占星光荣之事。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尊兄出任区

极为赞成，其出路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参加进去，不宜由中央推荐候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风涛高秋，随时惠示周行。敬颂健康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毛泽东致毛森品信的手稿。

给李淑一[1]的信

（1950 年 4 月 18 日）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2]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3]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健康！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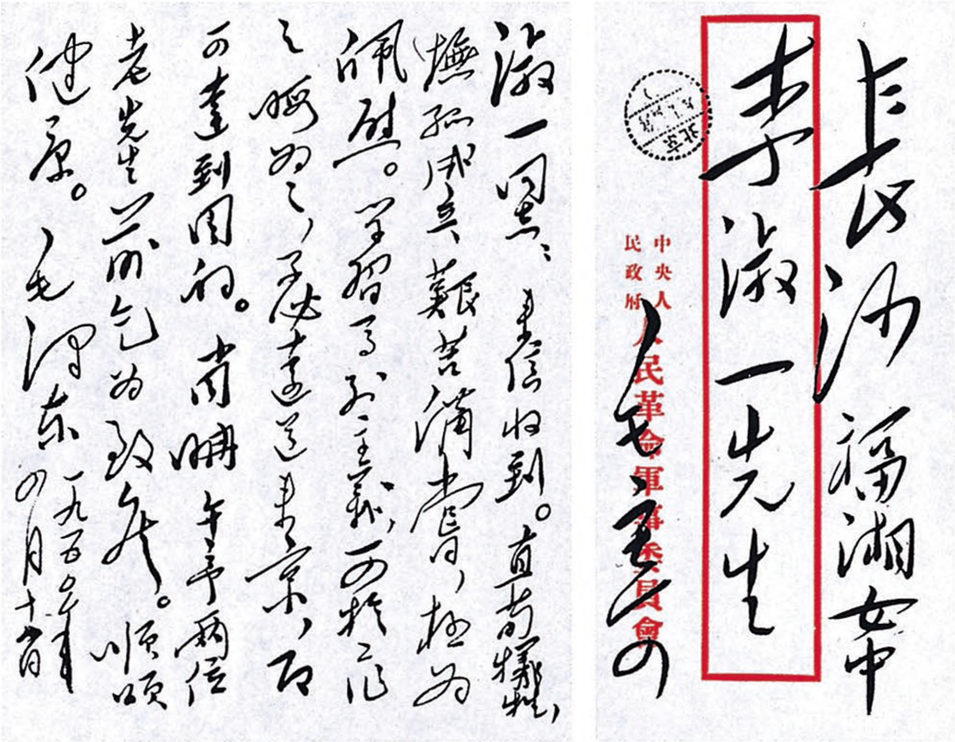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

[1] 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做教员。

[2] 直荀，即柳直荀，早年同毛泽东相识。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1932 年牺牲。

[3] 肖聃，即李肖聃，李淑一之父。午亭，即柳午亭，柳直荀之父。



长沙福湘女中

李淑一先生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寄

北京

淑一同志：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肯明、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毛泽东致李淑一信的手稿。

给向明卿[1]的信

（1950年4月19日）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十月十二日来信早已收到，因事迟复为歉。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被捕，光荣殉难。以上这些，先生可以报告湖南省委。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亦宜予以体谅。此复，敬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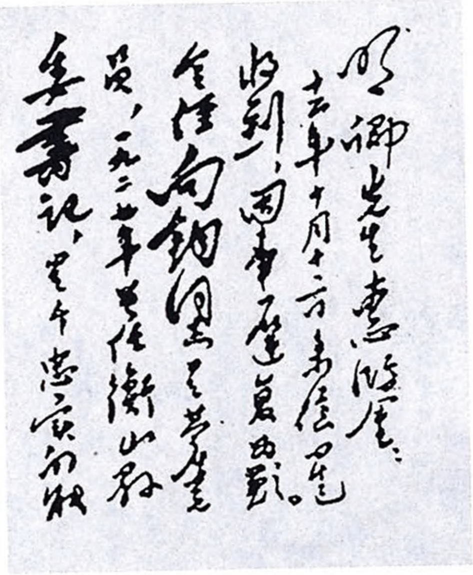
大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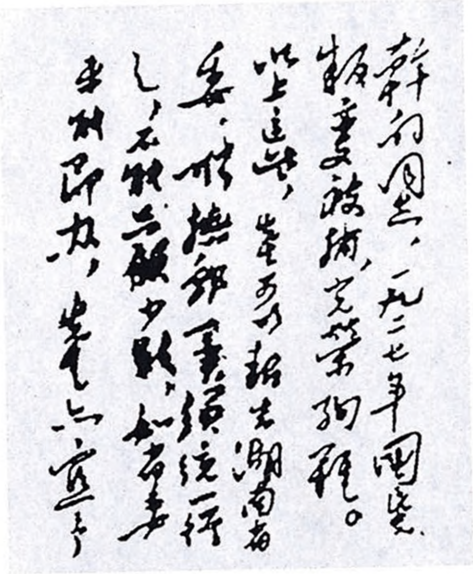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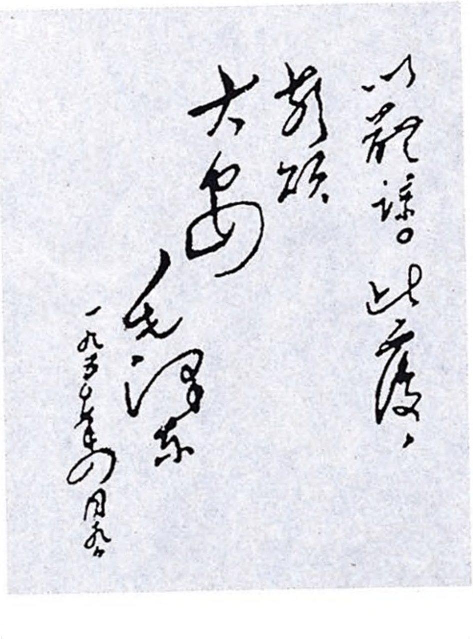
[1] 向明卿，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舅父。



明卿先生惠鉴：
去年十月十六日来信早已
收到，因事迟复为歉。
令侄向钧同志是共产党
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
委书记，是个忠实的战



斗的同志，一九二七年国民党
叛变被捕，光荣牺牲。
此点已悉，先生可以去湖南省
委，找统战部负责同志一谈，
之，不能安插职务，如有要
求可即办，先生以为宜否



以前谈。此复，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六日

毛泽东致向明卿信的手稿（部分）。

给罗驭雄[1]的信

（1950 年 4 月 19 日）

驭雄学兄教席：

二月十四日大示敬悉，深感盛意。所指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有，必须整饬。倘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来京一节，似可从缓，工作或学习均以就近从事为宜，未审尊意以为然否？

此复，敬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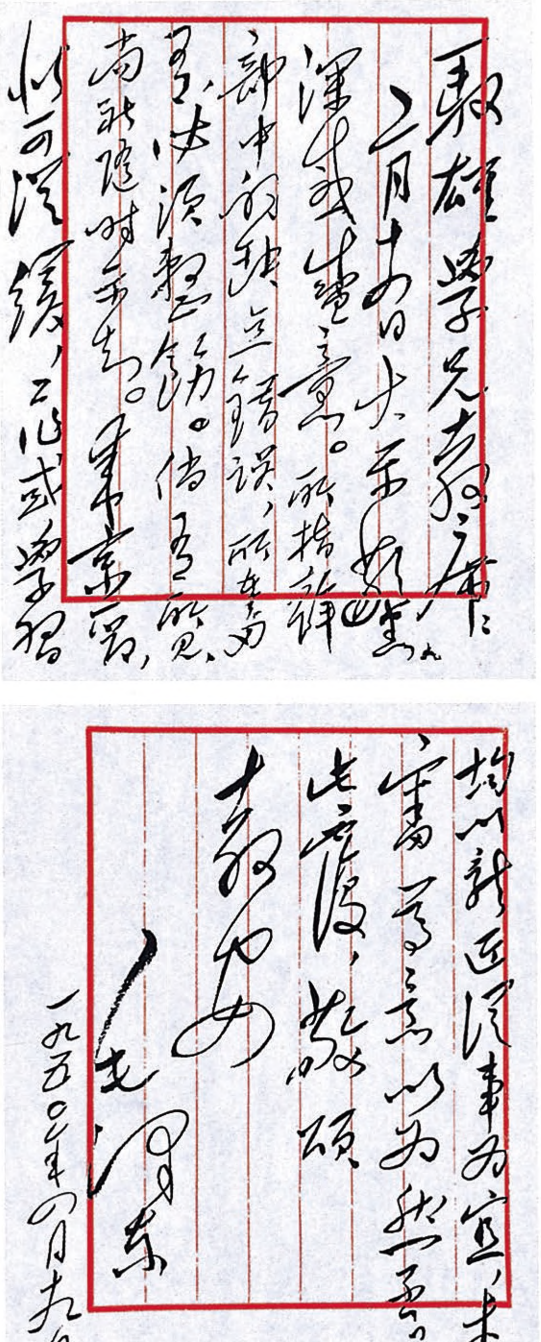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

[1] 罗驭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驭雄学兄左右：

二月十六日手书敬悉。谭咏生意见。所指该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是，必须整饬。信已转湖南，我随时乐为先生。来京留，此可从缓，工作或学习均以就近谋事为宜，来京需费高，以为然否？此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罗驭雄信的手稿。

给谭天佑[1]的信

（1950年4月19日）

天佑兄：

来信并附天民[2]同志照片收到，极为感谢。天民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深为悼念。尚望吾兄努力进修，多做与人民有益的工作。

此复，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

[1] 谭天佑，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竹鸡村人。当时在湘潭市大利生店分销处当店员，后曾在湘潭市副食品公司等单位工作。

[2] 天民，即谭天民（1907—1927），谭天佑的胞兄。原为乡村教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湘乡县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茶陵特委书记等职。1927年10月被国民党茶陵县政府杀害。

给马叙伦的信

（1950年4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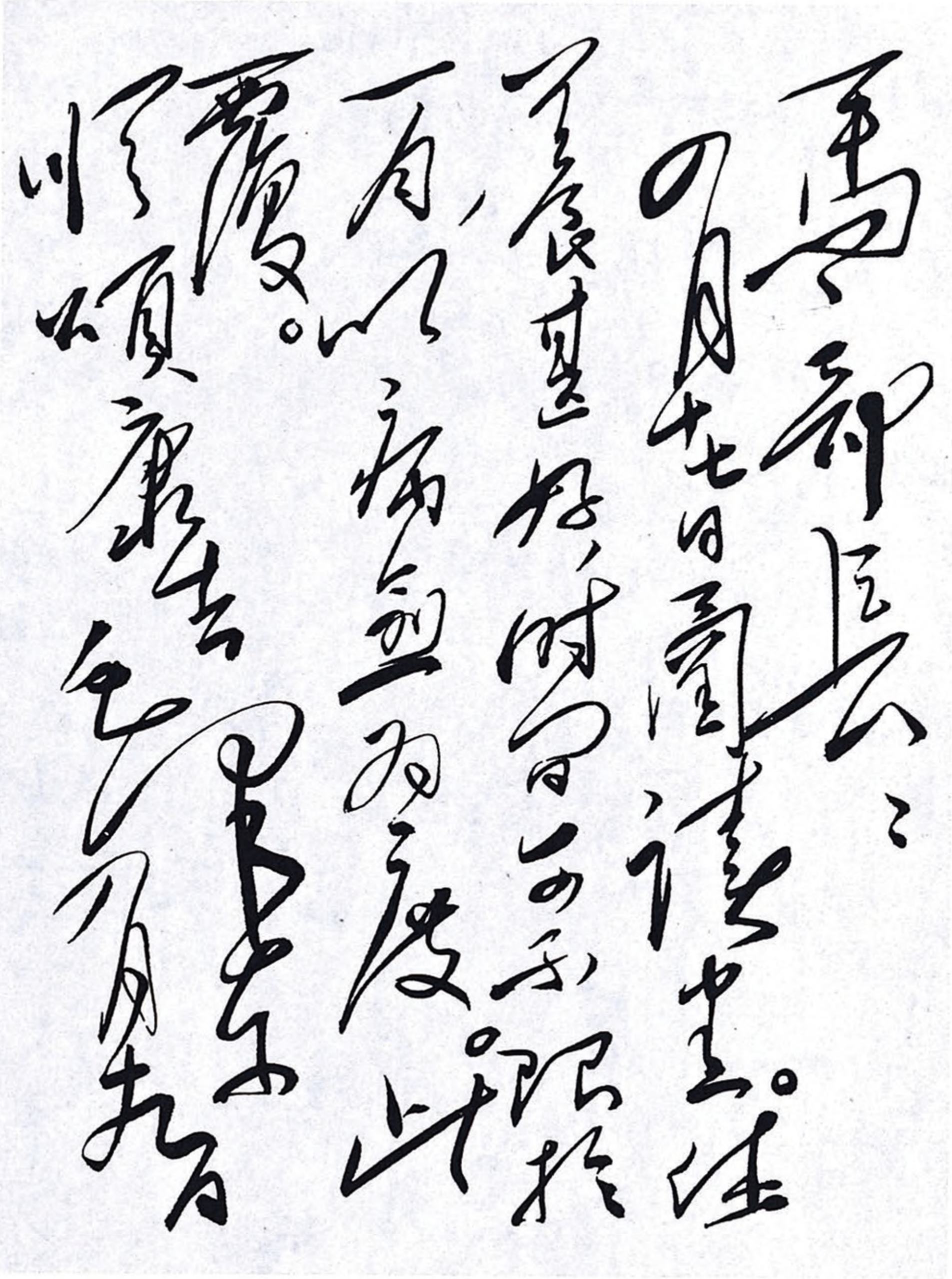
马部长：

四月十七日函读悉。休养甚好，时间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为度。此复。

顺颂康吉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马部长：

四月廿七日书读悉。住院甚好，时间可以长於一月，以病愈为度。此覆。

顺颂

康吉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马叙伦信的手稿。

给周邦式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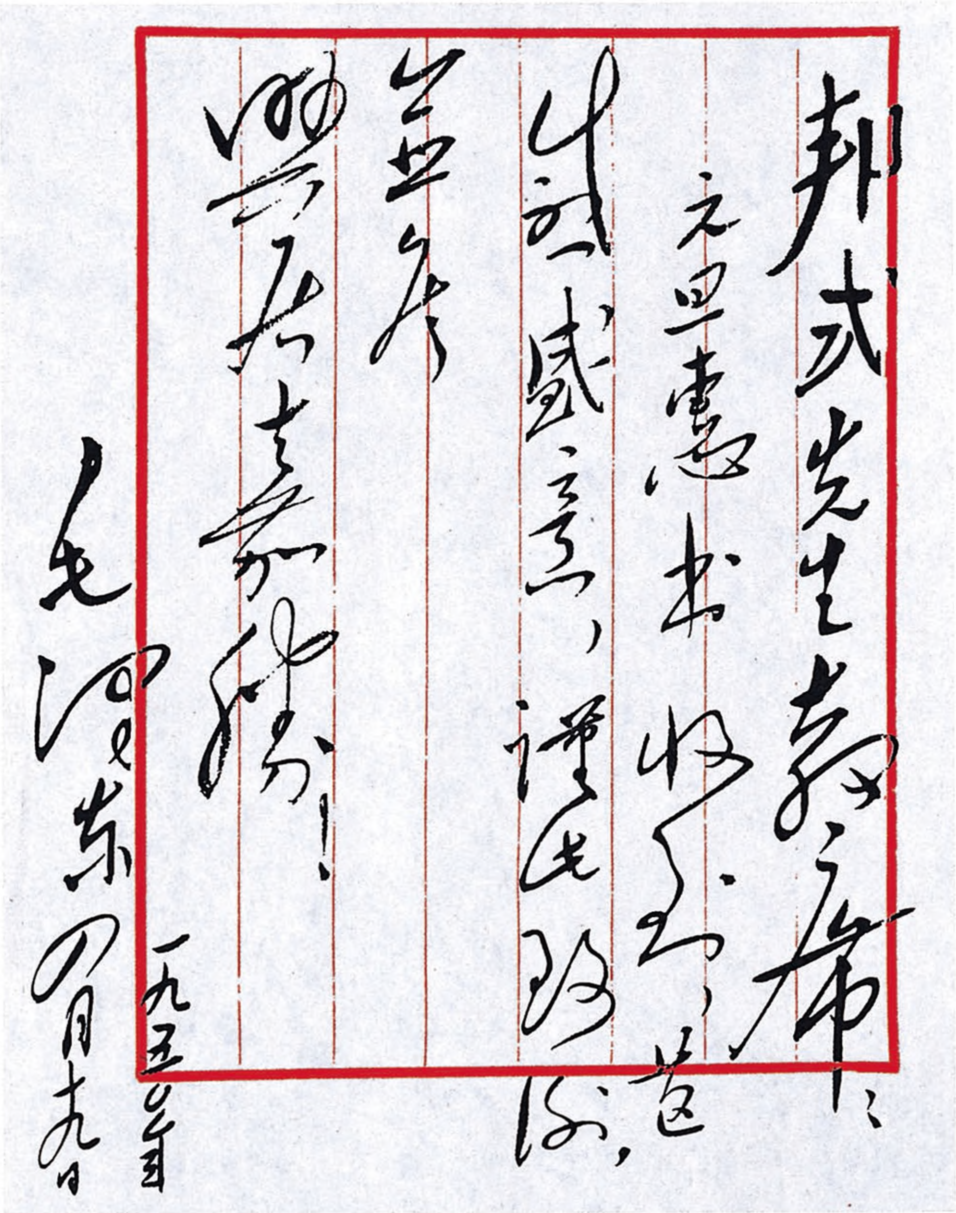
（1950年4月19日）

邦式先生教席：

元旦惠书收到，甚感盛意，谨此致谢，并候兴居嘉胜！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邦式先生教席：

惠书收到，甚谢盛意，谨此致复，并候兴居嘉胜！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

毛泽东致周邦式信的手稿。

给左作霖的信

（1950年4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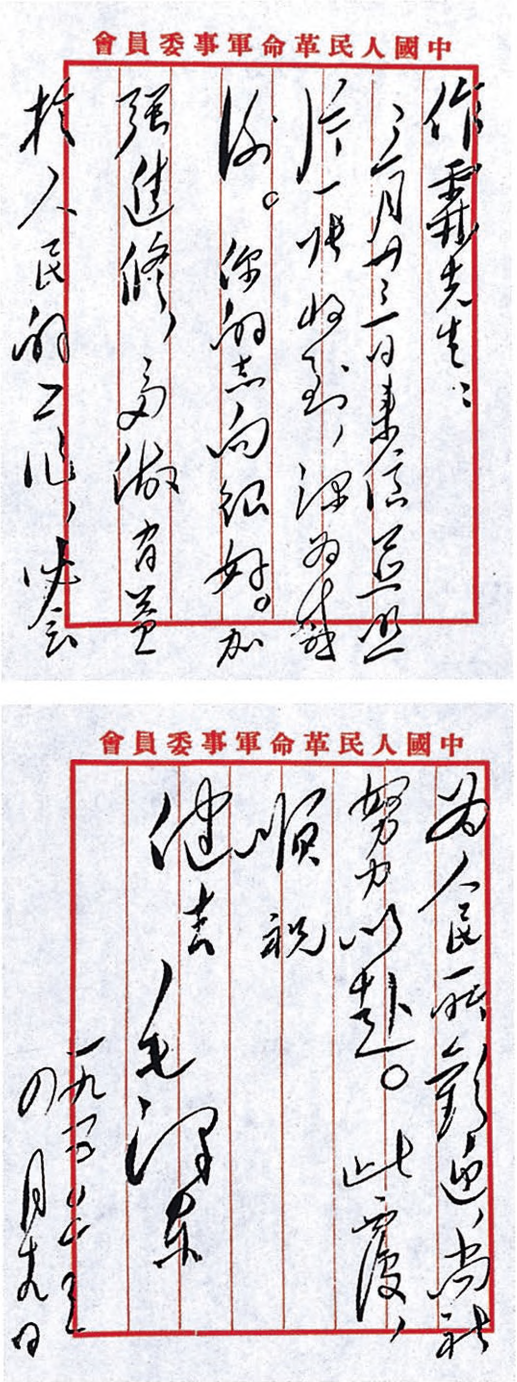
作霖先生：

三月廿三日来信并照片一张收到，深为感谢。你的志向很好。加强进修，多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必会为人民所欢迎，尚祈努力以赴。此复，顺祝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作霖先生：

二月廿三日来信及照片一件收到，深为感谢。你的志向很好。加强进修，多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必会为人民所欢迎，尚祈努力以赴。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廿九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泽东致左作霖信的手稿。

给文运昌的信

（1950年4月19日）

运昌仁兄如晤：

接到了你的许多信，感谢你的好意，因忙迟复为歉。吾兄健存，儿孙众多，可为庆贺。地方工作缺点甚多，应当纠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告。泽民泽覃[1]均已殉难，知注并闻。

顺颂

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

[1] 泽民，即毛泽民。泽覃，即毛泽覃。

给贺晓秋[1]的信

（1950 年 4 月 19 日）

晓秋贤弟如见：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接到晓明[2]一信，我分不清谁是兄谁是弟，请你来信说明。

此问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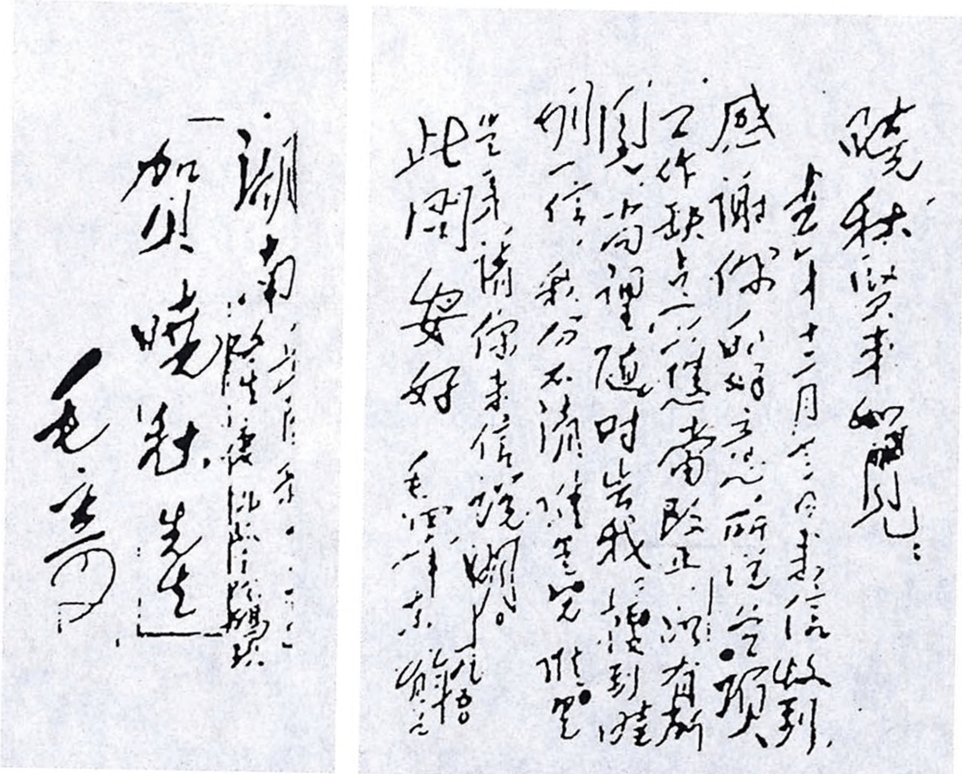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九日

---

[1] 贺晓秋（1986—1960），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光村人，后迁居湖南省华容县，农民。毛泽东的姑父的侄儿。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2] 晓明即贺晓明（1900—1959），贺晓秋的胞弟，农民。



湖南

贺晓秋先生

毛寄

晓秋贤弟如晤：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已转达当地政府，有所纠正。尚望随时告我，提到的一信，我分不清，待查明。望来，请你来信说明。此问安好

毛泽东

毛泽东致贺晓秋信的手稿。

军队分批复员以减轻人民负担[1]

（1950年4月21日）

邓、谭、赵、陶，陈、饶、粟，刘、邓、贺，彭、习、张[2]：

（一）四月十二日林彪[3]同志给邓谭赵陶关于中南区今年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的电报谅已收到。我们希望这个复员工作能于五月至八月四个月内做到，以便节省出九月至十二月共四个月的经费，减轻人民一部分粮税负担。请中南局专为此事开一次会议，详尽地讨论一下，并订出在四个月内分批复员而又不出乱子的具体计划和具体办法。此种计划和办法希望能在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审阅，并请电告四个月内分批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这项巨大工作有何困难，是否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二）请饶陈粟亦照上述意图做出华东区复员计划，亦于五月一日以前电告我们。华东区只留下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赵尔陆和政治部主任陶铸等的电报。

[2] 陈、饶、粟，指陈毅、饶漱石、粟裕，当时分别任第三野战军兼华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刘、邓、贺，指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当时分别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彭、习、张，指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当时分别任第一野战军兼西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第一副司令员。

[3]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

队及地方武装共一百万人。（三）请刘邓贺考虑一下是否可以亦照上述意图办理复员工作，只留下军队及地方武装八十万人而又不出乱子。（四）请彭习张考虑电告西北方面可以复员多少人，并是否可于四个月内办理完毕。

中央

四月二十一日

为《北大周刊》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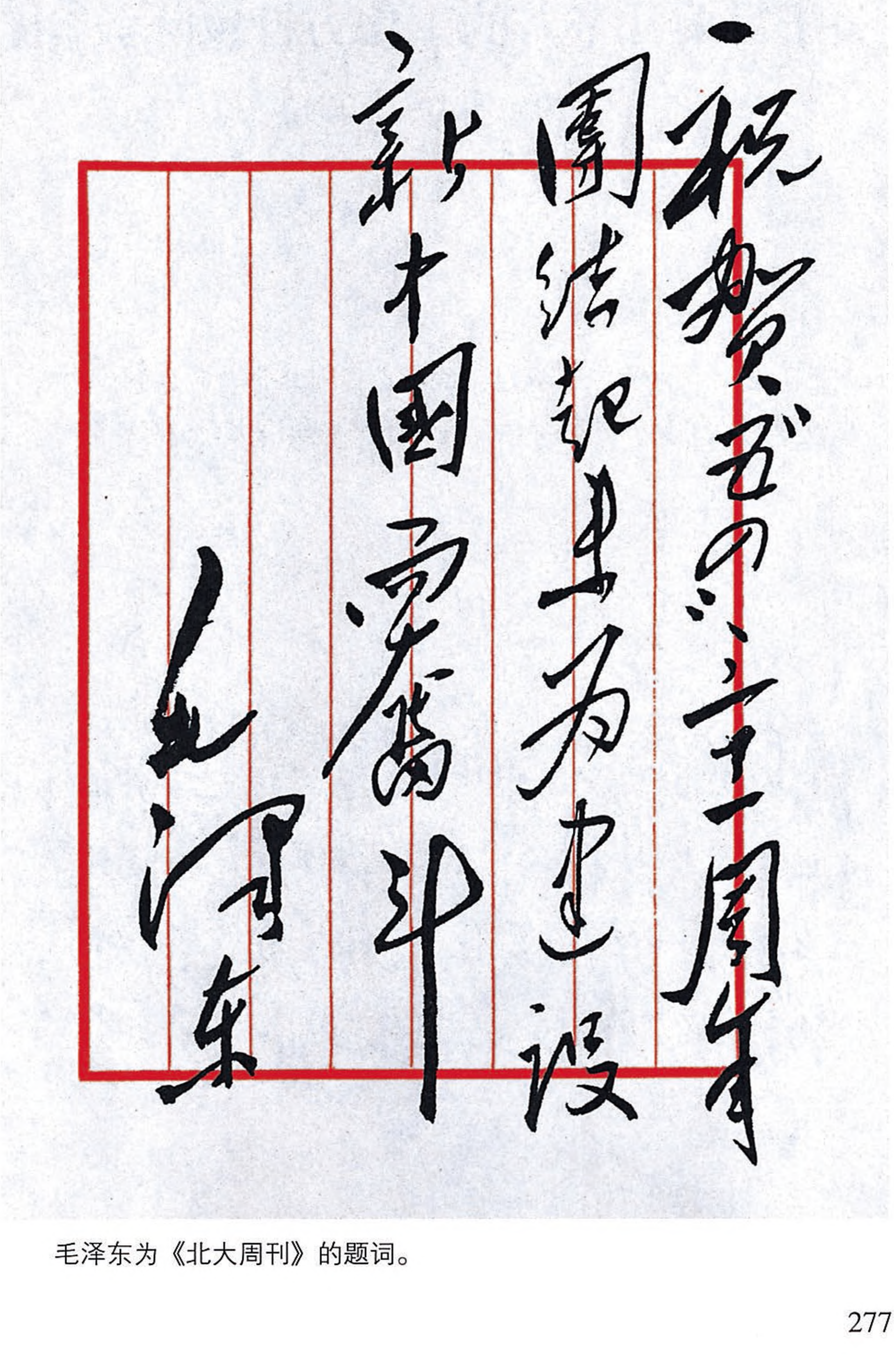
（1950年4月21日）

祝贺“五四”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

---

[1] 1950年是五四运动31周年，为了纪念五四运动，毛泽东为《北大周刊》写了这个题词。



祝贺五四三十周年

團结起来为建设

新中国而奮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北大周刊》的题词。

关于目前几个月的工作方针致陈毅[1]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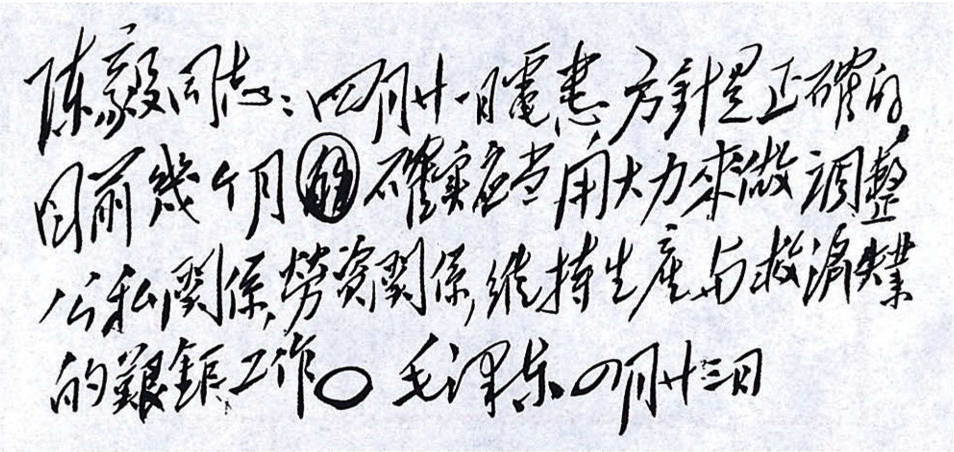
（1950 年 4 月 23 日）

陈毅同志：

四月廿一日电悉，方针是正确的，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

毛泽东

四月廿三日



陈毅同志：四月廿一日電悉方針是正確的目前幾个月不確實應當用大力來做調整公私關係勞資關係維持生產与救濟失業的艱鉅工作。毛泽东四月廿三日

毛泽东致陈毅电的手稿。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减租总结的批语[1]

（1950年4月25日）

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所属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

兹将中南局四月二十日关于减租总结电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特别是关于“有许多民主人士说我们说话不算话，上边的规定，下边可以任意改变，这种状况必须纠正”，“由于战争已经结束，乡村改革一点，已引起人们突出的注意，关起门来办事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由我们自己提出而由各民主党团举手赞成的一切政策，我们自己必须首先坚持执行”。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务望各地同志注意。

中央

四月廿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

1950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团校毕业典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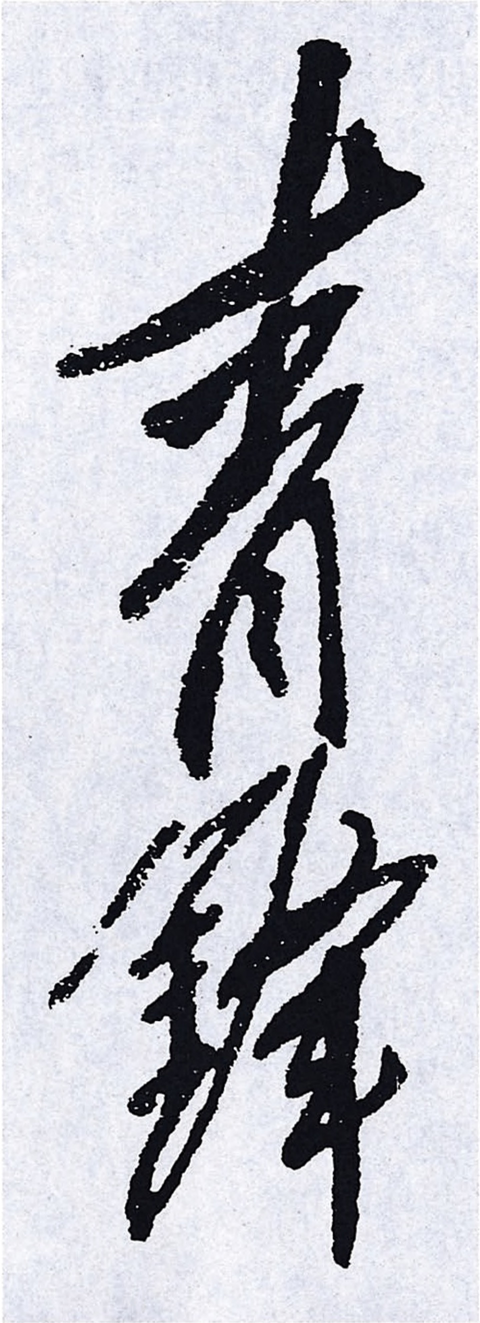
为南洋中学学生壁报题名[1]

（1950年4月27日）

青锋

---

[1] 1950年4月，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高一学生马恩凯等同学写信请求毛泽东为学生壁报题名“青锋”，意为“青年先锋”。毛泽东为他们题写了“青锋”二字，并在原信上批道：照写如另纸，毛泽东，四月廿七日。同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青锋社，毛寄。



毛泽东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生壁报题写的名称。

关于春耕、土改和干部整训工作的意见

（1950年4月28日）

漱石、子恢、小平、德怀[1]同志：

下列各点请予电复：（一）目前春耕状况如何，所属各省、区党委是否已集中主要注意力从事春耕生产的组织和领导，农民缺乏种子、肥料及食粮的问题是否可以得到解决，今年是否有争取一个丰收年成的希望，此事关系极为重大，务望注意。（二）华东局、中南局各担任起草一个土地法草案，是否已在着手，我们希望你们能于五月十日起草完成，五月十五日以前送到中央，是否能做到。除一个一般的土地法外，是否还需要发一个关于土改工作的指示，规定土改工作中的许多具体办法，你们是否正在准备起草此项指示。再则，此项指示由各区军政委员会各自发布为好，还是由政务院统一发布为好。总之不论土地法或土改指示，均希望你们能于五月十五日以前送到中央，以便中央及政务院能于五月下半月加以决定，六月一日公布。再则，华东局已经准备了为着土改目的而使用的七万二千个干部，并准备于土地法令公布后的几个月内加以集中整训及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学习土改，中南局及西北局关于此项干部的准备情况如何？（三）整训干部已经成了极端迫切的任务，各阶层人民相当普遍地不满意我们许多干部的强迫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尤其是表现于征粮、收税和催缴公债等项工作中的上述作风，如不及时加以整顿，即将脱离群众。你们对于此项整训工作是否正在筹划，有无关于整干的计划（步骤）及指示。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日

关于夏征问题
给陈云、薄一波[1]的批语

（1950年4月28日）

陈、薄：

浙江、苏南以不征夏收为好，如何请酌复。

毛泽东

四月廿八日

其他灾情严重区域是否征夏收，亦请考虑。

---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对聂荣臻关于“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解释[1]的批语

（1950年4月28日）

同意。

毛泽东
四月廿八日

---

[1] 1950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派驻越南党的联络代表罗贵波给军委发电，请求解释毛泽东关于“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思想。同年4月28日聂荣臻起草了答复罗贵波的电报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复同意。这个电报的内容是：所问“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的解释，答复如下：主席的这一军事原则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创建革命的根据地，巩固根据地，再依托根据地，扩大发展根据地，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政策，使巩固根据地与发展根据地相结合的原则，所谓波浪式的推进，就是根据地扩展到某一境地，就要暂时停止推进，而进行新区的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到新区已经可以作为依托再行推进。请参看“毛选”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关于部队缩编问题的批语[1]

（1950年4月28日、5月12日）

一

刘、朱、周、聂[2]阅后发。请聂于日内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将东北、华北、西北三区军队缩减为一百万人的具体计划，做好交我为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兼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1950年4月27日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兼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的电报。本篇三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5月5日报告的批语。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聂，指聂荣臻。

二

谭政同志：

关于在四个月内复员五十三万至六十万人的问题[1]，你们是否已经或正在召集会议讨论办法，结果如何，盼即详告。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三

刘、朱、周即阅，退聂办。[2]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

[1]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复员军队工作的指示说，中南军区打算今年复员53万至60万人。

[2] 聂荣臻的报告说："根据后勤报领经费，西北现为六十七万一千六百六十九人，东北为十八万八千五百零三人，华北为四十万六千四百二十人，总计三区一百二十六万六千五百九十二人；依作战部统计西北为六十六万三千人，东北为十六万五千人，华北为三十八万余人，此统计之差额包括家属、俘官与伤病员。华北准备（包括董其武部不动，及家属两万人在内）缩减至二十九万人，西北拟于本年八月底缩减至六十万人，东北因多为第二线兵团之新兵，年轻且脱离生产不久，复员较易等条件，拟要其缩减至八万人。三区共九十七万人，准备空出三万人的数额作为工农学校及一时不便处理转业之人员的机动额，以保证不超过预定之一百万的总数。"

关于修改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稿给刘少奇的信

（1950年4月29日）

少奇同志：

报告略有些修改，已送恩来阅后还你。陈云在请假中不看文件，没有送他看。

修改的主要点如下：不要说“今年是困难的最后一年”，因今后几年内都会有困难，而且仍将是相当严重的困难，不过将一年一年地减少罢了。其他说到困难“很快就可以过去”的话都删掉了。举东北为例一段合并到前面一段中去。国际形势一段说得策略一些。解释富农策略一段觉累赘，留待将来去说。纠正命令主义一段说得全面一些，并且不要太突出地去说财经干部。口号加了一句[1]。

如时间来得及，请于你讲后即刻付排，送清样给我再看一次，然后发表。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上午五时

---

[1] 这句口号是：全中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合作万岁！

转发邓子恢[1]
关于起草土改条例的意见的电报

（1950年4月30日）

饶漱石[2]同志：

兹将邓子恢同志四月廿五日电[3]转发给你，作为你们起草土改法令的参考，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四月卅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3] 指邓子恢1950年4月25日关于起草土改条例的意见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着重申述了主张动富农出租土地的理由。

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命令公布施行婚姻法中共中央通知全党保证执行

（1950年4月30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应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起公布施行。自公布之日起，所有以前各解放区颁布的有关婚姻问题的确切暂行的条例和法令均予废止。此令。

主席　毛泽东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制，提倡男女平等。

1950年4月，北京市民在收听宣传婚姻法的广播。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1]

（1950年4月）

一

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2]

二

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3]

---

[1] 这是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的批语。

[2]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一句话写的。

[3]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关于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问题写的。

三

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1]

四

这是不对的。[2]

五

完全错误的说法。[3]

---

[1]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一句话写的。

[2]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一句话写的。

[3]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这段话写的，即：“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

六

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1]

七

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

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2]

八

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3]

---

[1]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一句话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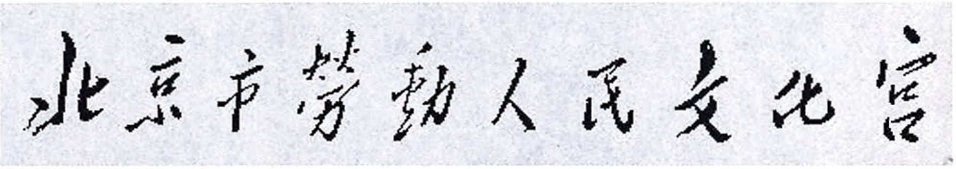
[2]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一句话写的。

[3] 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一句话写的。

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题写匾额[1]

（1950 年 4 月）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官



毛泽东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题写的匾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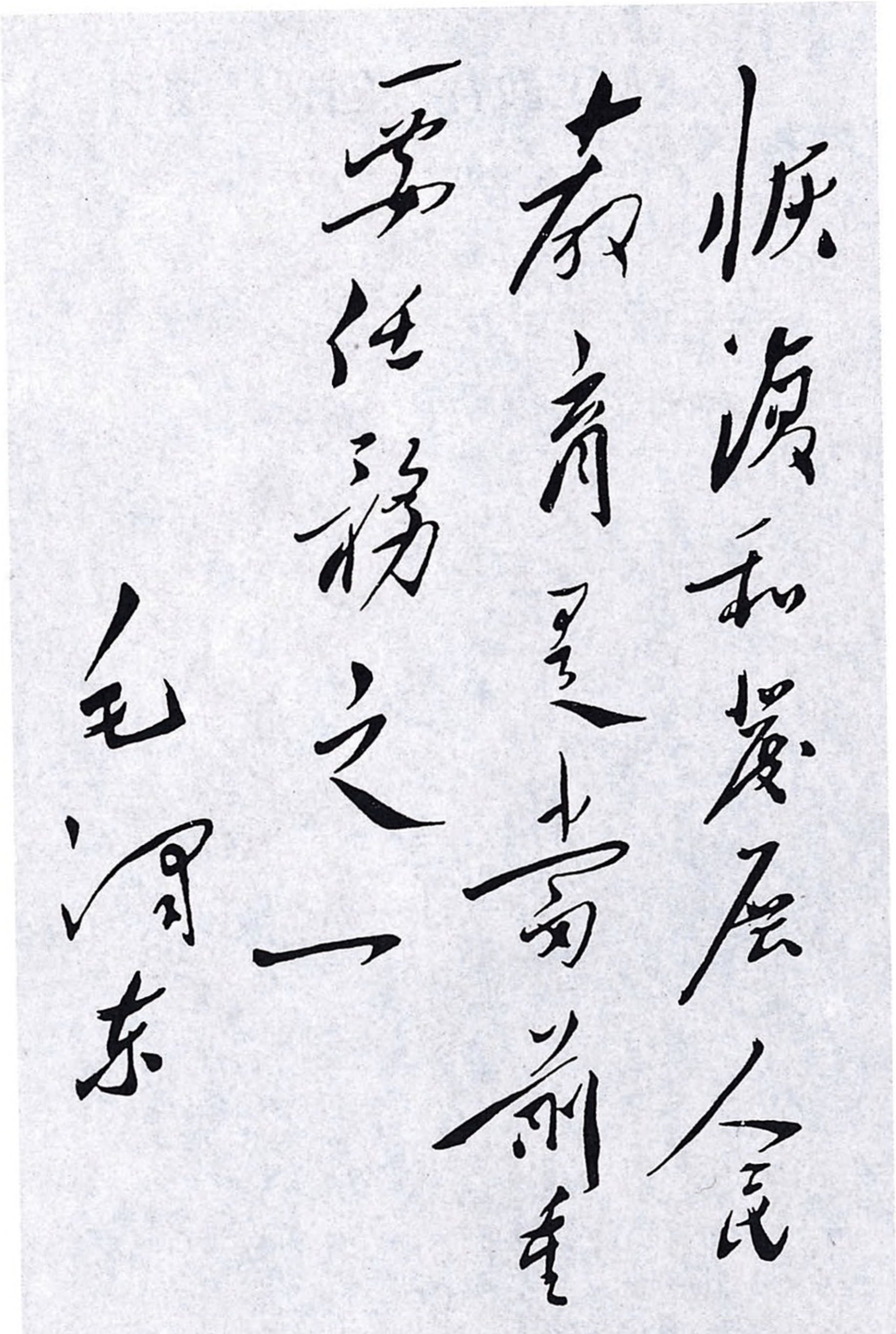
[1]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官，前身是皇室太庙。解放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把太庙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匾额由毛泽东命名并亲笔题写，于1950年4月30日揭幕，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

（1950年4月）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毛泽东



恢復和發展人民
教育是當前重
要任務之一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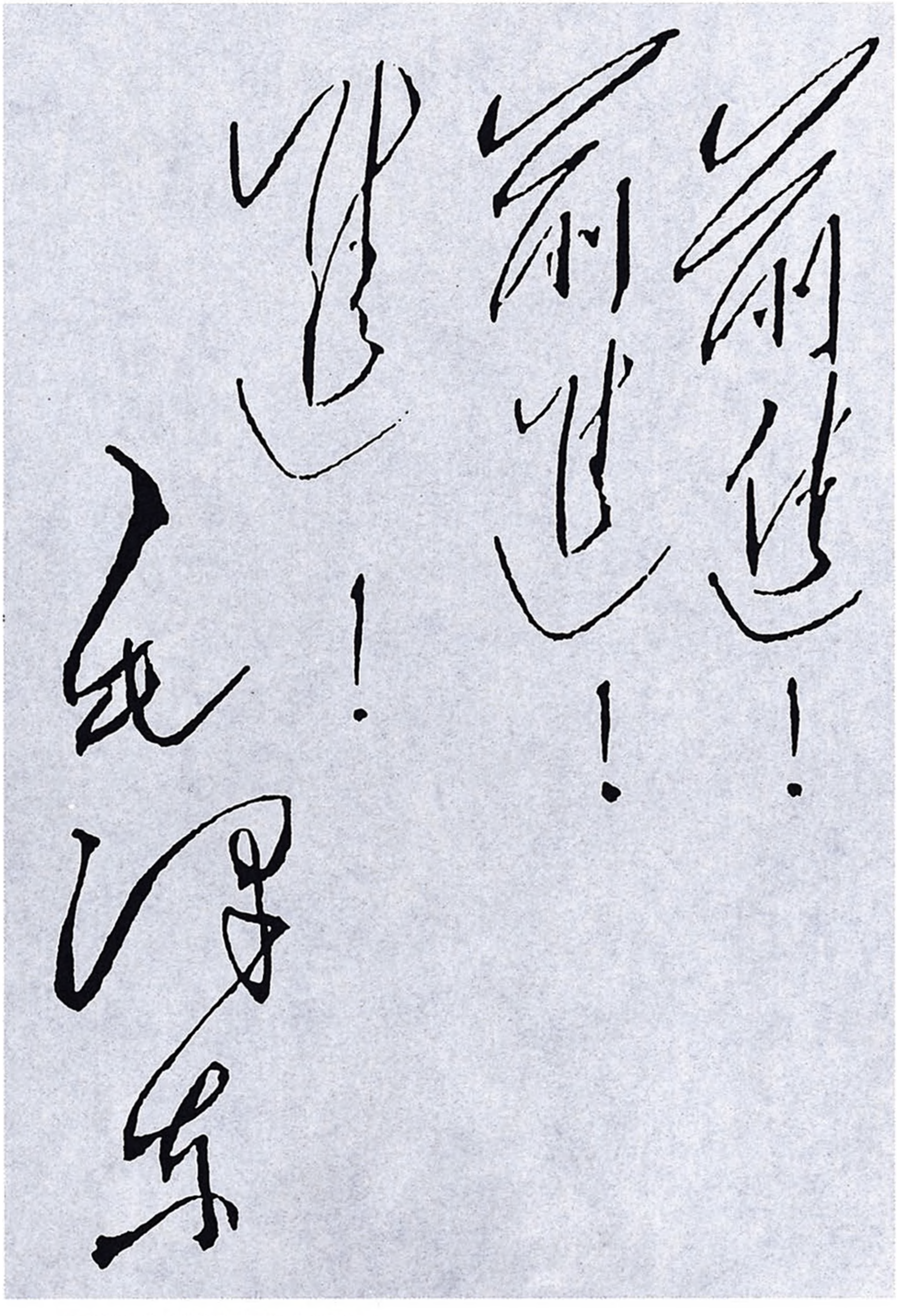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创刊号的题词。

为《青年报》题词

（1950年）

前进！前进！进！

毛泽东



前进！前进！进！

毛泽东

毛泽东为《青年报》的题词。

关于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问题的电报

（1950 年 5 月 1 日）

子恢[1]同志，并告漱石[2]：

四月廿五日电悉。（一）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二）但你们可根据你们自己的各项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由子恢同志于五月十五日以后中央开会时带来（子恢同志动身日期另外通知），在中央会议上作最后的讨论和决定。（三）如华东局是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则请华东局起草一个和华中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毛泽东

五月一日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195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1950年5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建国后的第一个劳动节。

在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暴动及处理群众性骚动事件的指示中加写的话[1]

（1950年5月5日）

绝对不可向群众开枪。

---

[1] 这句话加括号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指示的第二项中的一段话之后，这段话是：“对因灾荒严重，或因秋征负担过重，群众生活困难，致为反革命坏分子乘机煽惑，因而引起群众性的但非武装的抢粮骚动，我在场武装部队应首先竭力加以劝阻，使他们了解抢粮为违法而停止抢粮。如劝阻无效，则可对空中鸣枪驱散群众。”

给文涧泉[1]的信

（1950年5月7日）

涧泉表兄大鉴：

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2]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3]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4]兄连来数信，已复一信寄白蚌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5]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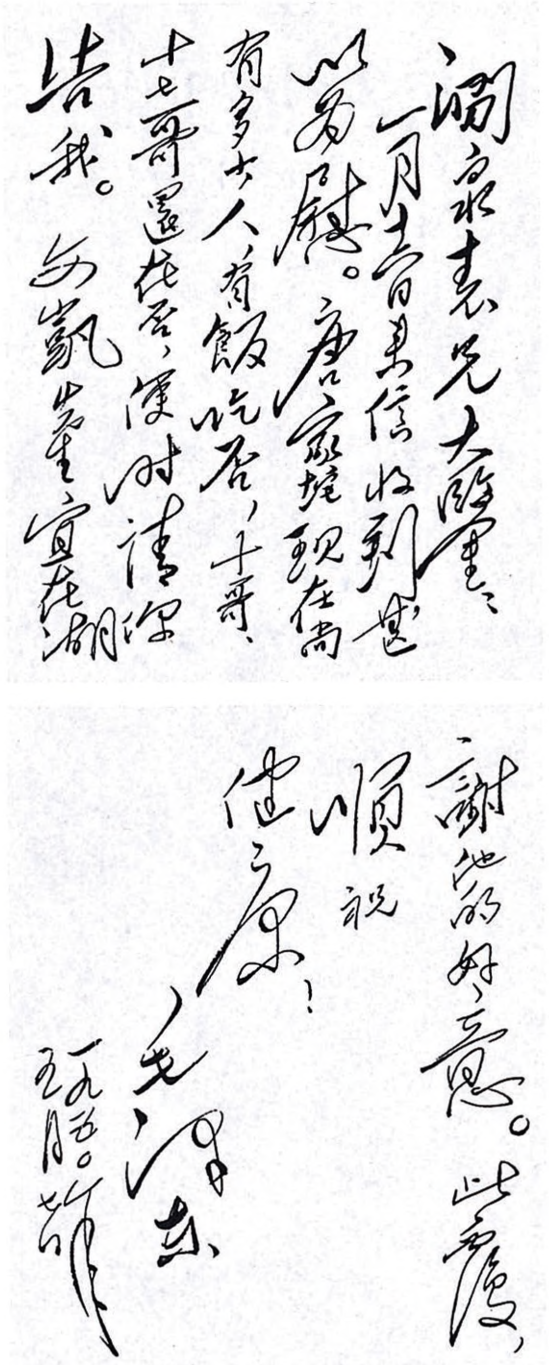
[1] 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

[2] 十哥，即文泮香，毛泽东的表兄。十七哥，即文枚清，毛泽东的表兄。

[3] 文凯，与文涧泉同宗。

[4] 运昌，即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5] 南松，即文南松，毛泽东的表兄。



涧泉老兄大鉴：

一月廿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唐家圫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七哥、十七哥还在否，便时请写告我。文凯先生宜在湖

谢他的好意。此复，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致文涧泉信的手稿（部分）。

给张鼎[1]的信

（1950年5月7日）

张鼎先生：

去年十月廿五日来信[2]，又毛泽覃[3]等照片，收到。感谢你的好意。入党事要在当地经过一定规章办理。

此复，顺颂

康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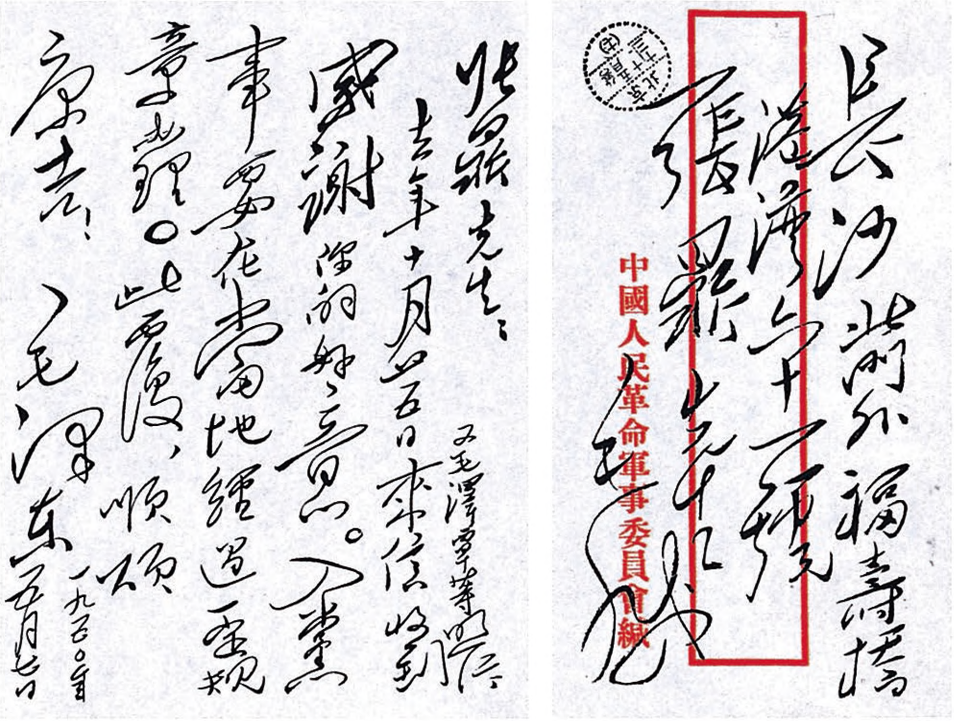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

[1] 张鼎，早年曾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主办的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

[2] 张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寄来他的“履历关系片断”，请求办理入党手续，并寄来他早年同毛泽覃等共青团支部成员的合影照片。

[3] 毛泽覃，毛泽东之弟，1935年牺牲。



張鼎先生：

去年十月廿五日來信及毛澤覃等件收到，感謝深厚的好意。令尊事要在當地經過一定規章辦理。此復，順頌

康吉！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五月廿日

長沙北門外福壽橋

[illegible]十一號

張鼎先生收

毛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张鼎信的手稿。

给林谷生[1]的信

（1950年5月7日）

谷生先生：

三月十日来信收到。林蔚[2]同志死事极可痛惜，将来自应与全国各地死难同志一同有所纪念。

此复，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

[1] 林谷生（1889—1960），湖南省韶山市永必乡长湖村人。大革命时期，曾在湖南省农民协会举办的工农干部训练班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沙市饮食行业工作。

[2] 林蔚（1898—1928），林谷生的胞弟。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入莫斯科军事学院学习。1926年回国，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务委员、省委秘书长等职。1928年3月在湖南醴陵被国民党军杀害。

给毛贻华[1]的信

（1950年5月7日）

贻华先生：

三月九日来信收到。工作事尚望就近设法解决，我现在难于为助，尚祈鉴谅。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五月七日

---

[1] 毛贻华（1904—1984），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人，后迁居湘潭城郊，木工。毛泽东的远房叔父。

给赵浦珠[1]的信

（1950年5月7日）

浦珠先生姻兄左右：

惠书及大作收到敬悉，甚为感谢。乡间减租土改等事，弟因不悉具体情形，未便直接干与，请与当地人民政府诸同志妥为接洽，期得持平解决。风便尚祈时示周行。唐家圫诸亲友并致问候之意。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

[1] 赵浦珠，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

给粟济世[1]的信

（1950 年 5 月 7 日）

济世先生：

一月一日惠书敬悉，极为感谢。征粮弊病甚多，政府已有令纠正，未知实际效果如何？剿匪取宽大政策期收速效，根治则有待于土地制度之改革。先生如有所见，尚祈随时赐示为盼。

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

[1] 粟济世，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给陈国生[1]的信

（1950年5月7日）

国生贤甥青览：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们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此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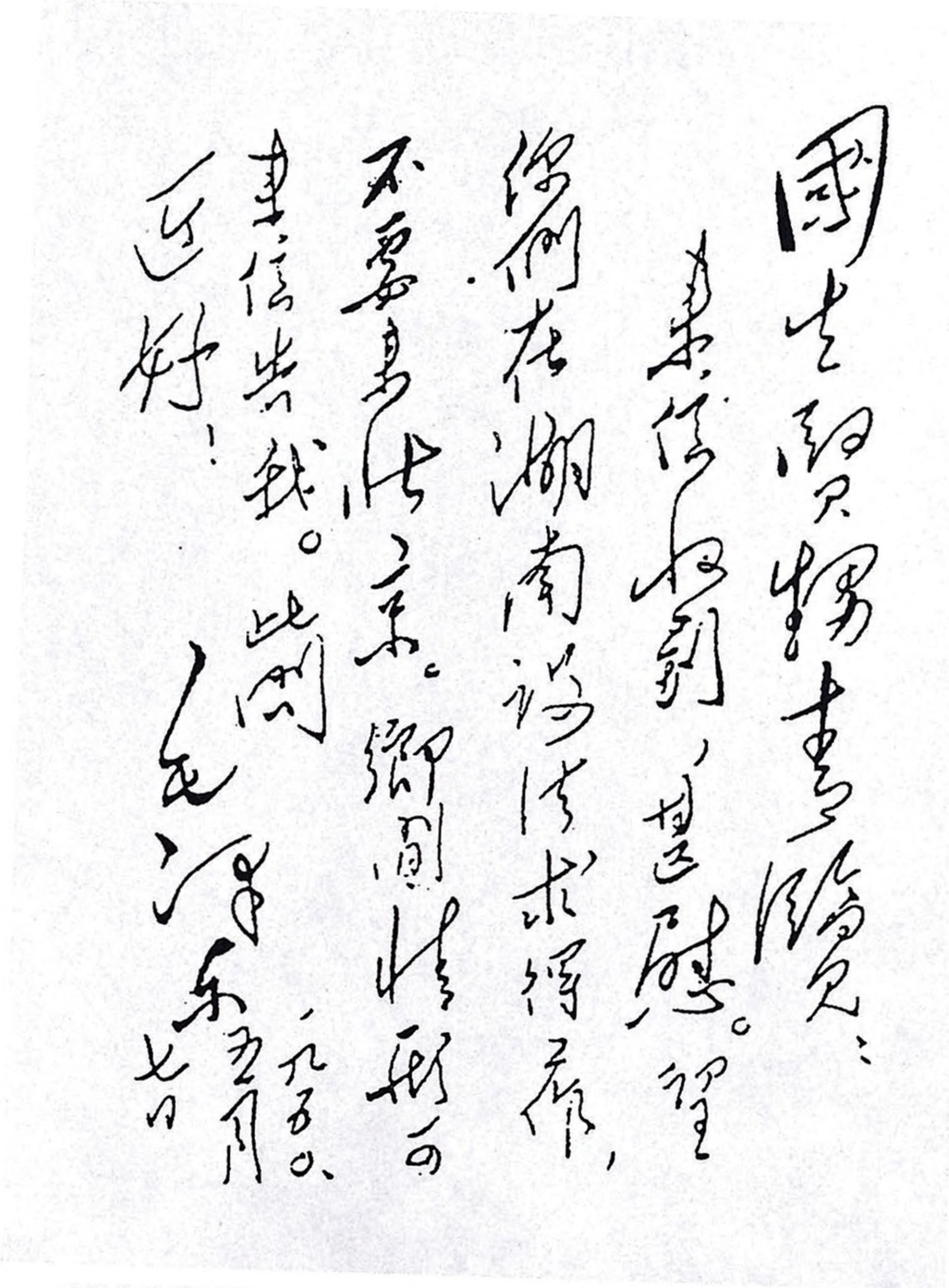
近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七日

---

[1] 陈国生，毛泽建的养女，毛泽东的外甥女。



國生賢甥：

來信收到，甚慰。望你們在湖南讀書得所，不要來北京。鄉間情形，來信告我。此問

近好！

毛澤東

一九五〇、五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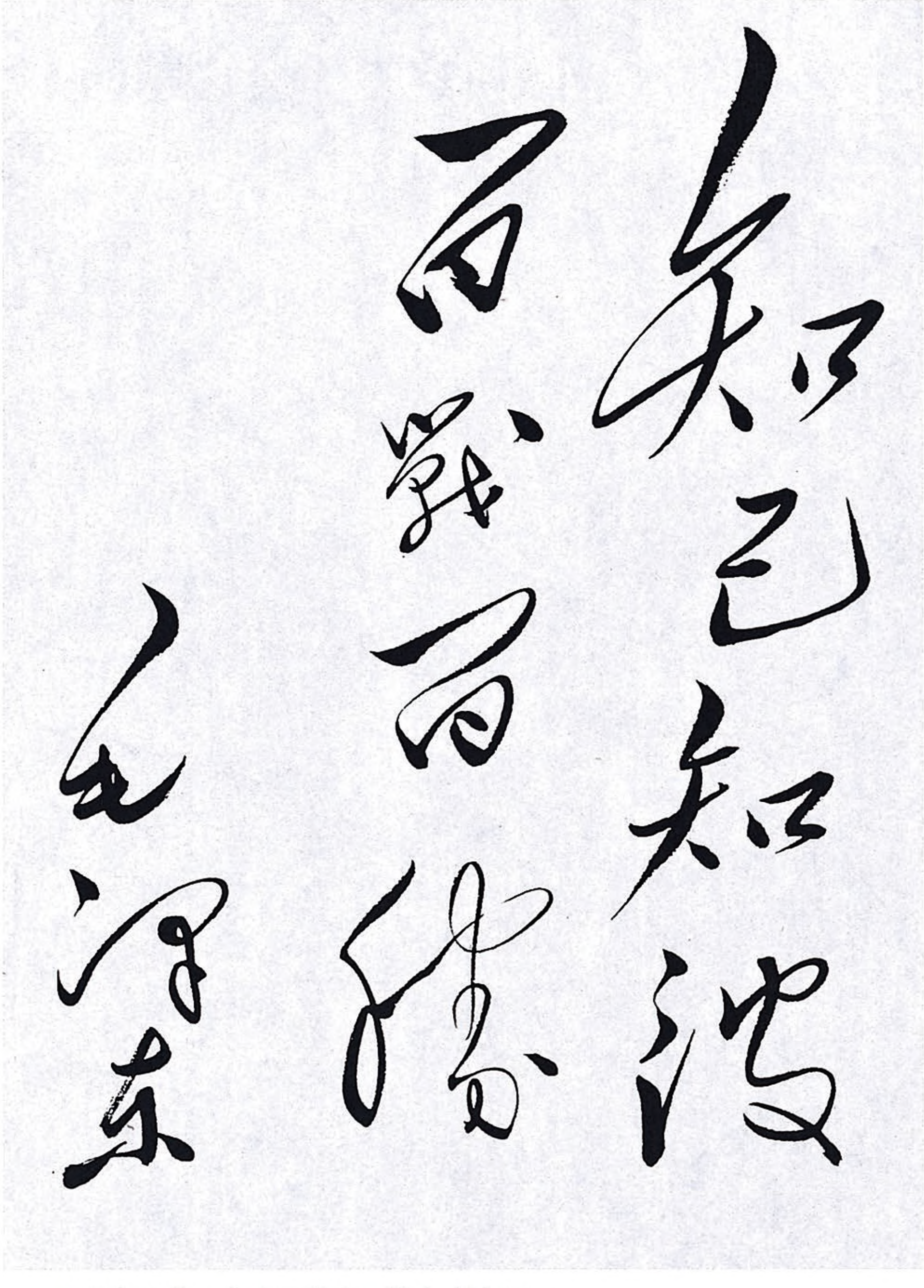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陈国生信的手稿。

为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题词

（1950年5月7日）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毛泽东



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毛泽东

毛泽东为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的题词。

给毛逸民[1]的信

（1950年5月8日）

逸民同志：

一月三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

[1] 毛逸民，当时任中共湘潭县第三区委宣传委员。

给毛春轩[1]的信

（1950年5月8日）

春轩叔祖大鉴：

去年十二月来信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浪秋、迪秋[2]诸位均宜在家工作，不要来北京，以免浪费时间。此复，顺祝

春安！

毛泽东

五月八日

---

[1] 毛春轩（1901—1951），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农民。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2] 浪秋，即毛浪秋（1924—1986），农民，毛春轩的儿子。迪秋，即毛迪秋，1925年生，毛春轩的侄儿，曾任中共韶山大队支部书记、中共韶山区委常委等职。

给陈峰仙[1]的信

（1950年5月8日）

怡君同志：

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希望你努力进修，为人民事业继续工作。齐秦情形不清楚，你可以写信去汉口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咨询或可得其梗概。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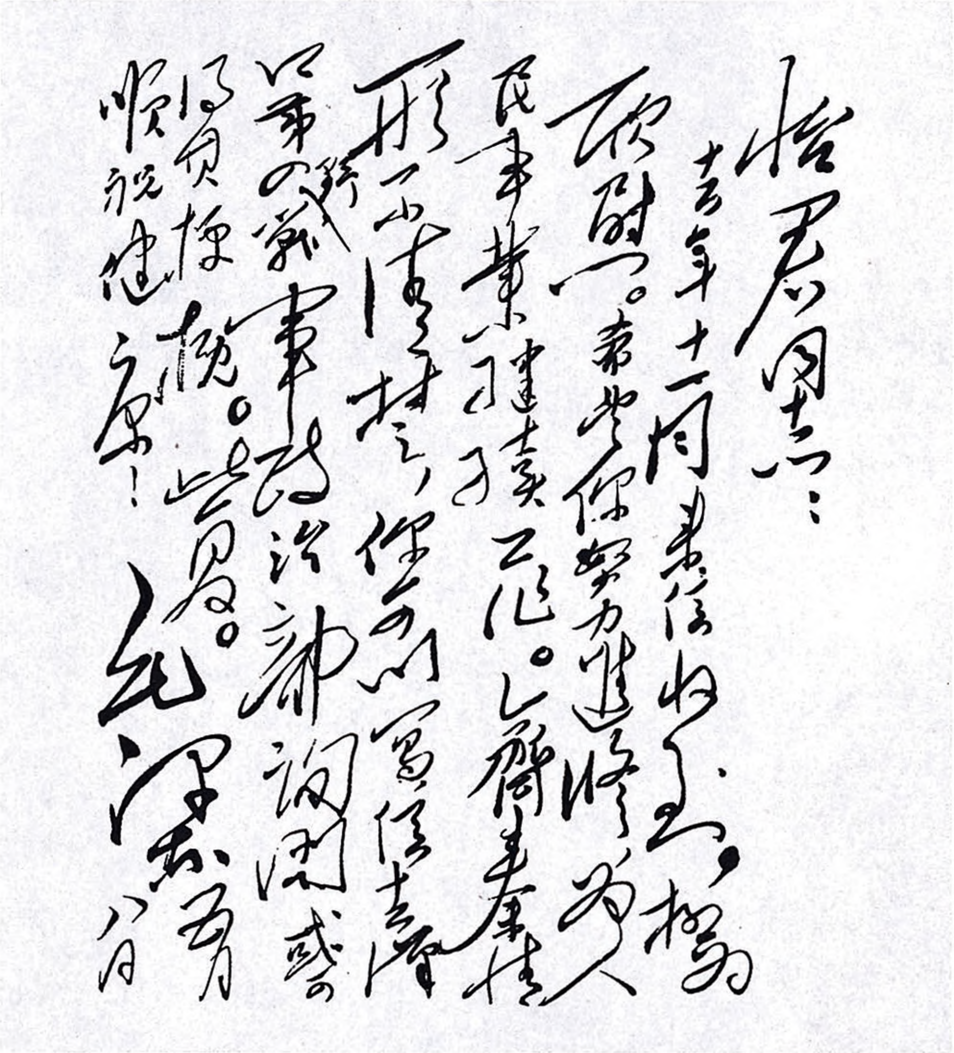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五月八日

---

[1] 陈峰仙，又名秦怡君（1904—1976），湖北黄陂罗汉寺东罗湾人。



峰仙同志：

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了，极为欣慰。希望你努力进修，为人民事业可建奇功。[illegible]问[illegible]情形不甚清楚，你可以写信去[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询问或[illegible]以便接洽。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五月八日

毛泽东致陈峰仙信的手稿。

给杨庆兴的信

（1950年5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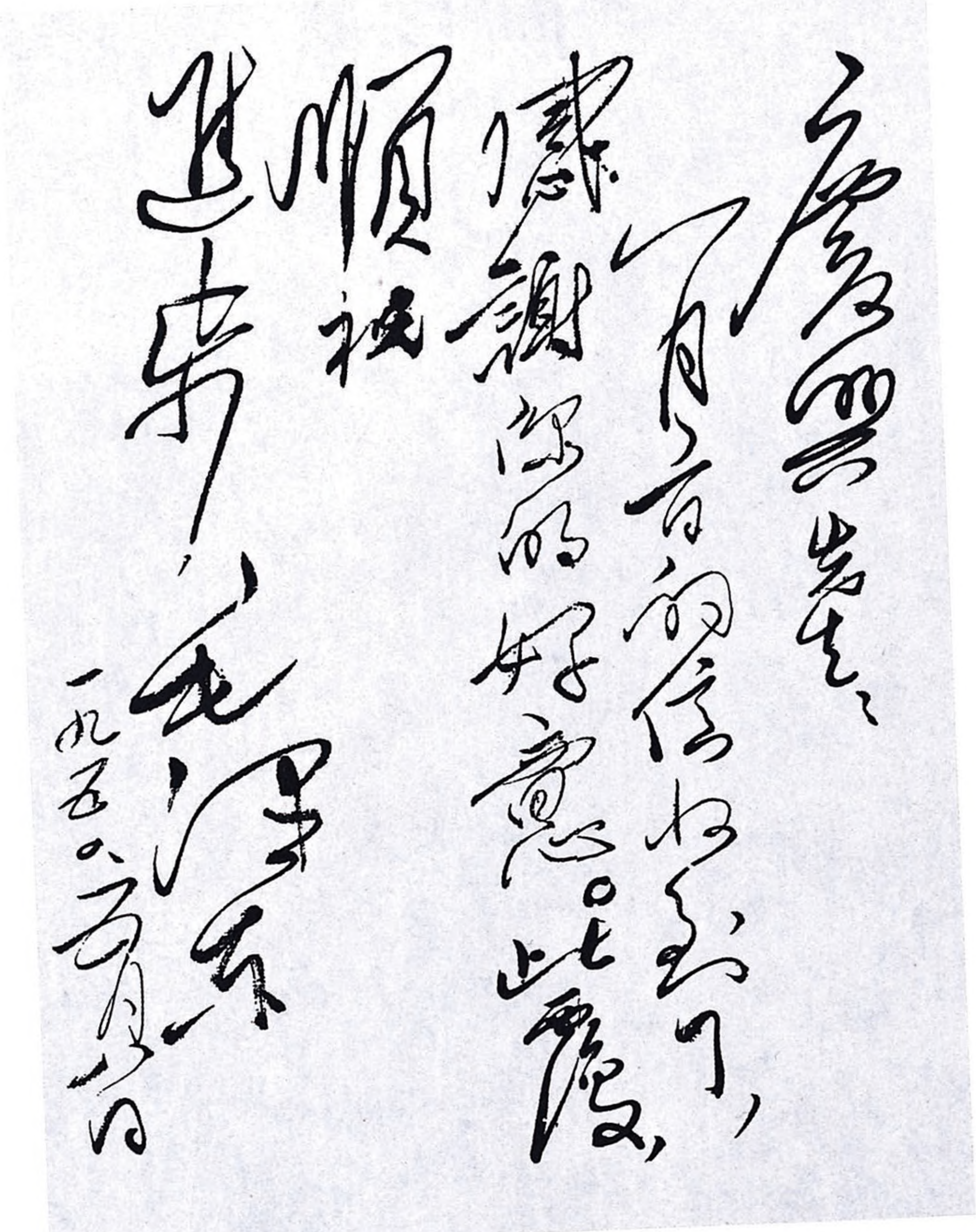
庆兴先生：

一月二日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八日



庆兴先生：

八月六日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〇、八月十日

毛泽东致杨庆兴信的手稿。

给周芝鳞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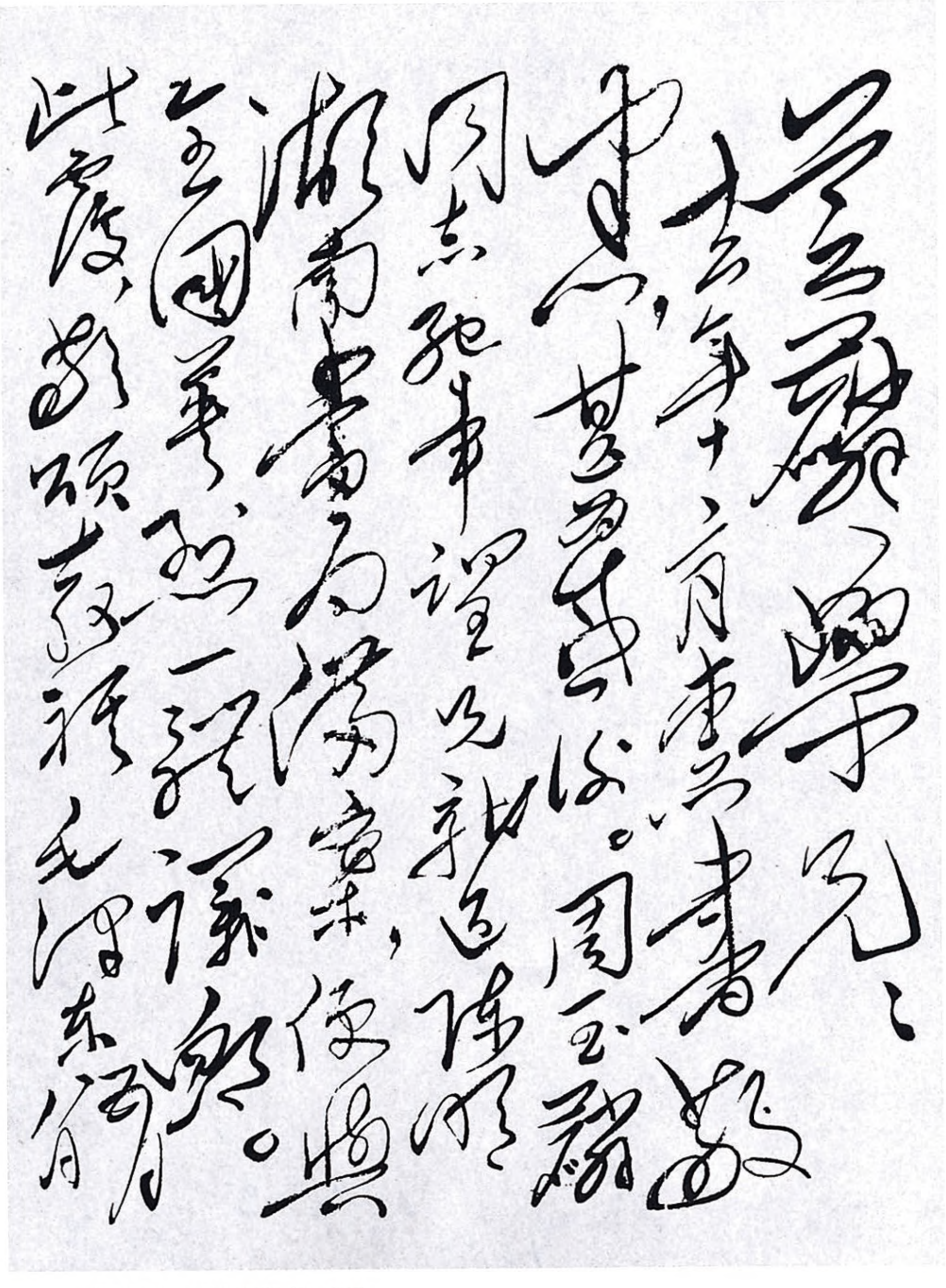
（1950年5月8日）

芝鳞学兄：

去年十二月惠书敬悉，甚为感谢。周玉鳞同志死事望兄就近陈明湖南当局备案，便与全国英烈一体议恤。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五月八日



芝麟学兄：
去年十月来书敬
悉，甚为感谢。周[illegible]
同志[illegible]来[illegible]见[illegible]
湖南[illegible]，使与
[illegible]一[illegible]。
此复，敬颂
[illegible]
毛泽东
[illegible]月

毛泽东致周芝鳞信的手稿。

给蒋端甫[1]的信

（1950年5月8日）

端甫先生：

承惠祝词[2]，极感盛意。谨此致谢，并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

[1] 蒋端甫（1900—1972），湖南省韶山市杨林乡新溪村人，乡村教师。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与之结识。

[2] 指蒋端甫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歌颂新中国和毛泽东的四首七绝。

给张四维[1]的信

（1950年5月8日）

四维兄：

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吾兄已在盐业公司获得职业，甚好，应就此项工作努力，取得成绩与信任，不要来北京。北京人浮于事，不好安置。前已复一信，未知收到否？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五月八日

---

[1] 张四维（1892—1961），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给郭建人[1]的信

（1950年5月8日）

建人兄：

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现在人民政府工作甚好，望于工作中加强学习，对于过去有所批判，以期日进有功。此复，顺颂

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

[1] 郭建人（1899—1975），湖南省韶山市清溪镇清溪村人，原为乡村教师，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湘潭地方执行委员会组织委员、湘潭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湖南农民运动特派员等职。“马日事变”后，任湖南工农义勇军中路军司令员，后脱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零陵县人民政府办事员、零陵县保险公司业务员等职。

给宋女士[1]的信

（1950年5月8日）

宋女士：

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毛泽庆[2]同志的情形不甚清楚，只知其在东北工作，听人说他已病故。他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同志，极为可惜。此复，顺祝
健吉！

毛泽东
五月八日

---

[1] 宋女士，即毛宋氏（1918—1960），湖南省湘潭市姜畲镇人，农民。毛泽东的族弟毛泽庆的妻子。

[2] 毛泽庆（1911—1947），祖籍湖南韶山。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参谋、合江省北满军分区参谋长等职。

给李静蓉[1]的信

（1950年5月8日）

灿英同志：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在莫斯科时曾看见志成[2]，情形是好的，大约不要很久可以毕业回国。你在湖南工作很好，如工作需要，不必来北京。

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五月八日

---

[1] 李静蓉，原名李灿英，郭亮的夫人。郭亮，湖南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28年牺牲。

[2] 志成，即郭志成，郭亮、李灿英之子。

给龙亦飞[1]的信

（1950年5月8日）

亦飞女士：

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王基永[2]同志殉难，极力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

[1] 龙亦飞，王基永的夫人。

[2] 王基永（1903—1930），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6月，在甘肃礼县被反动势力杀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被河南省民政厅追认为革命烈士。

给方觉民[1]的信

（1950年5月10日）

觉民学兄：

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极为感谢。所指工作中的偏向，现正注意纠正，吾兄倘有所见，尚望随时示知。吾兄从事教育工作极为有益，尚祈按照新方向加以改进，福利人民。

此复，顺颂
教祺。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

---

[1] 方觉民，早年曾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当时任湖南省新化县大复初级中学副校长。

给易克櫄[1]的信

（1950年5月10日）

克櫄学兄：

两次惠书均收到，甚感盛意。工作岗位已觅定否？总以就近解决为宜。教育法令尚多阙如，只能边做边象，故无从寄奉。此复，顺祝

健康！

并问王承淑先生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日

---

[1] 易克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盼告何时举行舟山群岛作战[1]

（1950年5月10日）

粟裕同志：

你们计划何时举行舟山群岛作战[2]，准备工作如何，盼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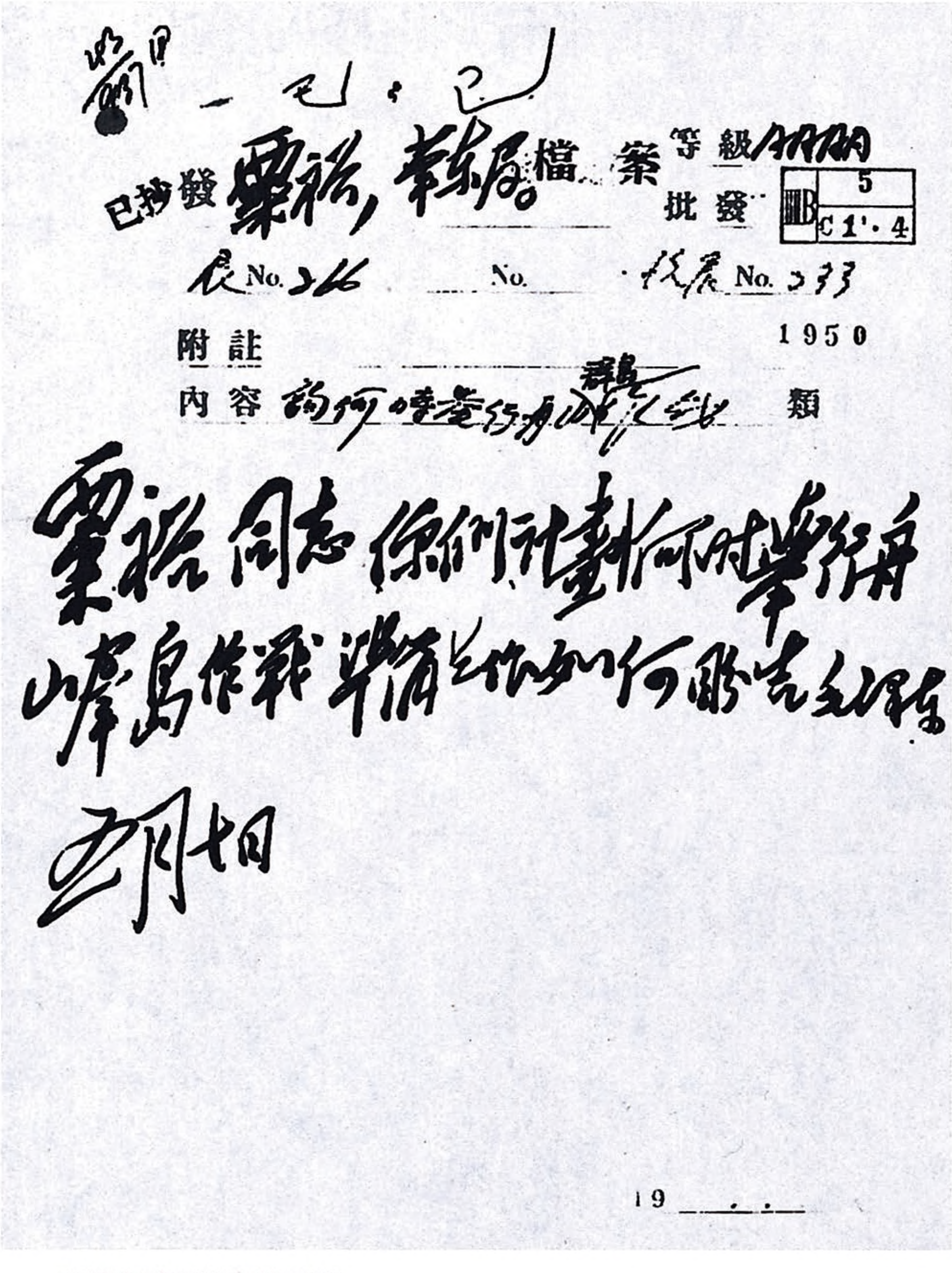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指解放舟山群岛本岛的作战。国民党军为了加强舟山防御，先后从台湾、金门等地抽调第五十二军、第十九军等增援舟山，使舟山守敌增至5个军16个师，连同海空军及特种部队在内，共12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前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增调第二十一军主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四军及炮兵一部，在第七兵团统一指挥下参加渡海作战，从而使我军参战兵力由4个师增加到12个师又10个炮团，总兵力已占很大优势。同时，我新组建的海空军各一部已进驻上海、宁波等地。1950年5月，正当我各部进攻舟山的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即将发起战斗时，舟山群岛国民党守军从5月13日开始撤退。5月19日，我军全部占领舟山群岛。



收到日

一　毛：已

已抄發 粟裕，華東局。檔案 等級

批發 5 C1'·4

局 No. 266　No.　校展 No. 333

附註　1950

内容 询何时登陆行动舟山群岛作战　類

粟裕同志：你们计划何时举行舟山群岛作战，准备工作如何，盼告。毛泽东

五月七日

19 . .

毛泽东致粟裕电的手稿。

中央关于转发北京市委摘报的一封来信的批语[1]

（1950年5月11日）

华东局，并转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地委：

接北京市委送来浙江工作同志张景鑫一信[2]，特转给你们。这种违反政策及命令主义的工作作风，是不能忍耐的，必须实事求是，彻底检查，切实纠正，并以结果报告中央。各省各县有同样情形的，必须检查纠正，并厉行整党整干，彻底纠偏。

中央
五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

[2] 此处有误。这封信是由参加南下工作团在中共浙江省宁波地委工作的原清华大学学生鲍洁如写的，信中反映了该地区农村工作中的一些违法乱纪情况。该信由清华大学张景鑫转交北京市委。

总政关于三十二军政治部严重违反外交纪律事件的通报[1]

（1950年5月11日）

各军区政治部，并转所属军师政治部：

据三野政治部五月九日电称，“三二军政治部于福建南平驻地，发生严重违犯外交纪律事件。该部驻地系教会剑津中学，其中有六、七美人传教及传教员。该部驻入后，先后有二十个同志与美人接谈（内部长二，科长二，其他均机关干部）。文工团并请三美人看戏和给翻译。此事件，该军负责同志直至最近才发觉。现已进行教育纠正。此事件是严重的，我们已去电该军首长，着其从思想上彻底认识此次事件之严重性，并作深刻自我检讨。该报告拟于《政工通讯》发表（原文并已呈送钧部），以引起全军注意”等情。望即通报所属以此进行教育，严戒再有违犯外交纪律事件发生。

军委总政治部

五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区政治部关于第三十二军政治部严重违反外交纪律事件的通报。

关于来中央参加土改会议等问题致邓子恢[1]电

（1950年5月12日）

子恢同志：

（一）土改法令起草情况如何，五月十五日是否可以送达中央。（二）请令湘鄂赣三省省委各派一个熟悉情况懂得政策的同志来中央参加土改会议，如省委书记不能来则派副书记或秘书长来，中南局亦需派一个适当的同志来。以上共四人，务于五月廿三日到达中央。（三）子恢同志自己准备于六月五日左右来中央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并参加中央最后决定土改法令草案之会议，何日动身，届时另电通知。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如实查报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

（1950年5月12日）

漱石[1]同志，并告子恢[2]：

五月九日电悉。（一）刘瑞龙、谭启龙[3]可于五月二十日到中央。（二）陈丕显[4]可以不来，但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5]（黄炎培报告苏南情况并陈补救办法之意见书，已送你处谅收到，请抄发陈丕显研究）。如材料不足，须经过调查研究，可于六月十日以前做好发来。特别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3] 刘瑞龙（1910—1988），江苏省南通县（今通州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谭启龙，1914年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4] 陈丕显（1916—1995），福建上杭人。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

[5] 黄炎培（1878—1965），江苏川沙（1993年并入上海浦东新区）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注意调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据黄炎培说，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三）你的四月份报告不要做了。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在中央关于湖南减租问题给中南局的电报中加写的话

（1950年5月12日）

目前春耕时期一切应以春耕为重心，减租斗争以不延误春耕为原则。

给文南松[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南松表兄：

正月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运昌[2]兄给我多次信，我回了一信，寄南县白蚌口，不知他收到没有？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十哥、十七哥[3]还在否？十一哥[4]健在甚慰，他有信来，我已回了一信，不知他收到否？你说乡里缺粮，政府不发，不知现在怎么样，还是缺粮吗？政府一点办法也没想吗？来信时请详为告我。

此复，即问

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

[1] 文南松，毛泽东的表兄。

[2] 运昌，即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3] 十哥，即文泮香，毛泽东的表兄。十七哥，即文枚清，毛泽东的表兄。

[4] 十一哥，即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

给毛煦生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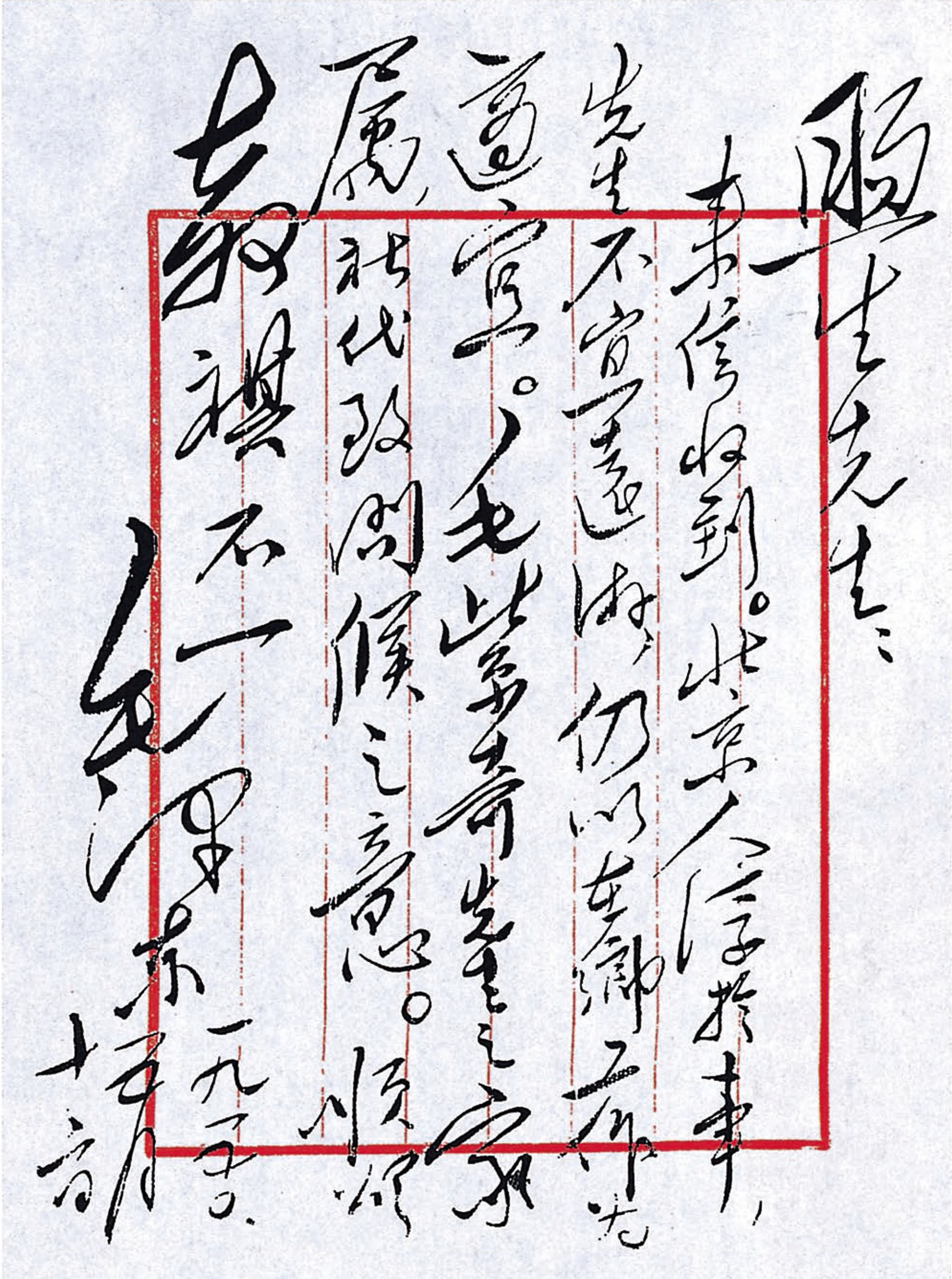
（1950年5月12日）

煦生先生：

来信收到。北京人浮于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工作为适宜。毛紫奇先生之家属，祈代致问候之意。顺颂
教祺不一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二日



煦生先生：

来信收到。北京入学於事，先生不宜远游，仍以在乡工作为適宜。毛紫青先生之家屬，請代致問候之意。順頌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〇 十二月[illegible]

毛泽东致毛煦生信的手稿。

给叶健农[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建隆学兄：

各次来函及电报均已收到。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先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此复，顺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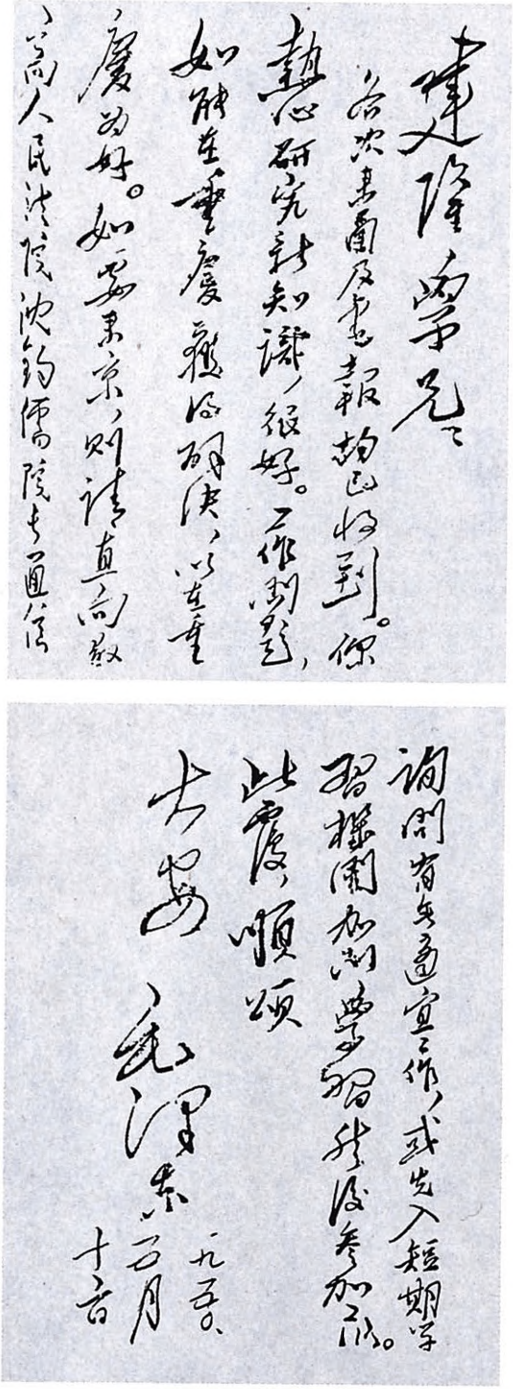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二日

---

[1] 叶健农，原名叶建隆，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建农学兄：

两次来函及书报均已收到。你热心研究科学知识，很好。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先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此复。顺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致叶健农信的手稿。

给周文楠[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2]还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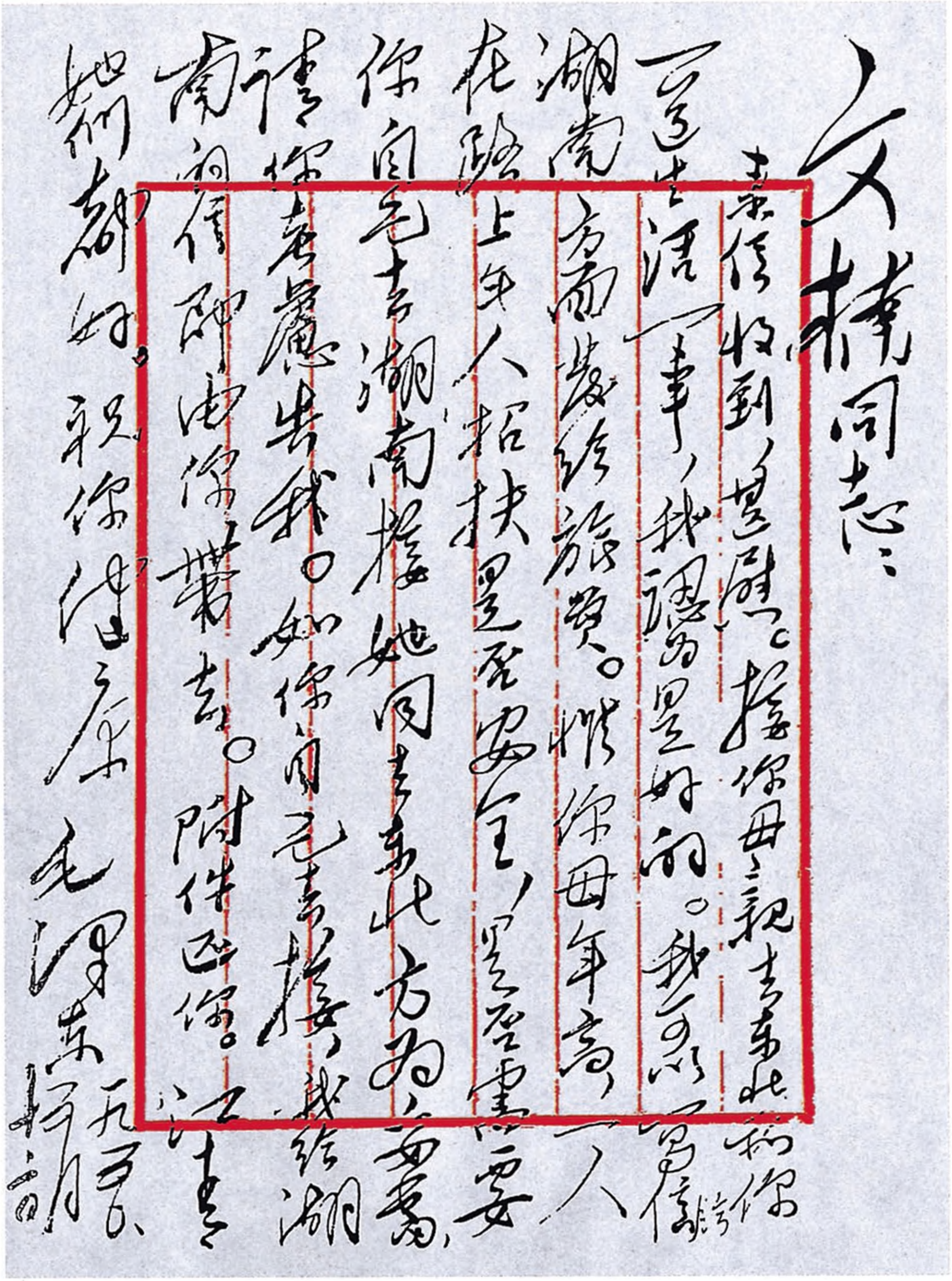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二日

---

[1] 周文楠，原是毛泽东之弟毛泽覃的夫人。当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

[2] 指周陈轩写给女儿周文楠的信。信中叙述了她自己在湖南韶山一人生活，无人照顾等情况。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去东北和你同住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已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宜，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写信，叫他帮助你。附件退你。江青她们都好。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十月廿一日

毛泽东致周文楠信的手稿。

给君实[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君实学兄：

来信收到。你是土改过程受打击的人，当此情况下，宜有以善处。生活困难，希望能就近获得适当解决。

此复，顺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

[1] 君实，可能是傅君实。傅君实早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给毛爱桂[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爱桂先生：

来信收到。令兄爱棠[2]于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军，在广东曾见过一面，以后即未见过。有人说已牺牲了，极为可惜。这是为国牺牲，是光荣的。此复，并候

合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李远明[3]先生同此不另。

---

[1] 毛爱桂，1914年生，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农民。毛泽东的族叔。

[2] 爱棠，即毛爱堂（1895—1927）。1925年赴广州参加革命，曾为广东省中共党组织工作人员。1927年在湖北武昌牺牲。

[3] 李远明（1895—1951），湖南省韶山市永义乡狮山村人，毛爱桂的姐夫。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李家曾给予资助。

给毛远悌[1]的信

（1950 年 5 月 12 日）

远悌贤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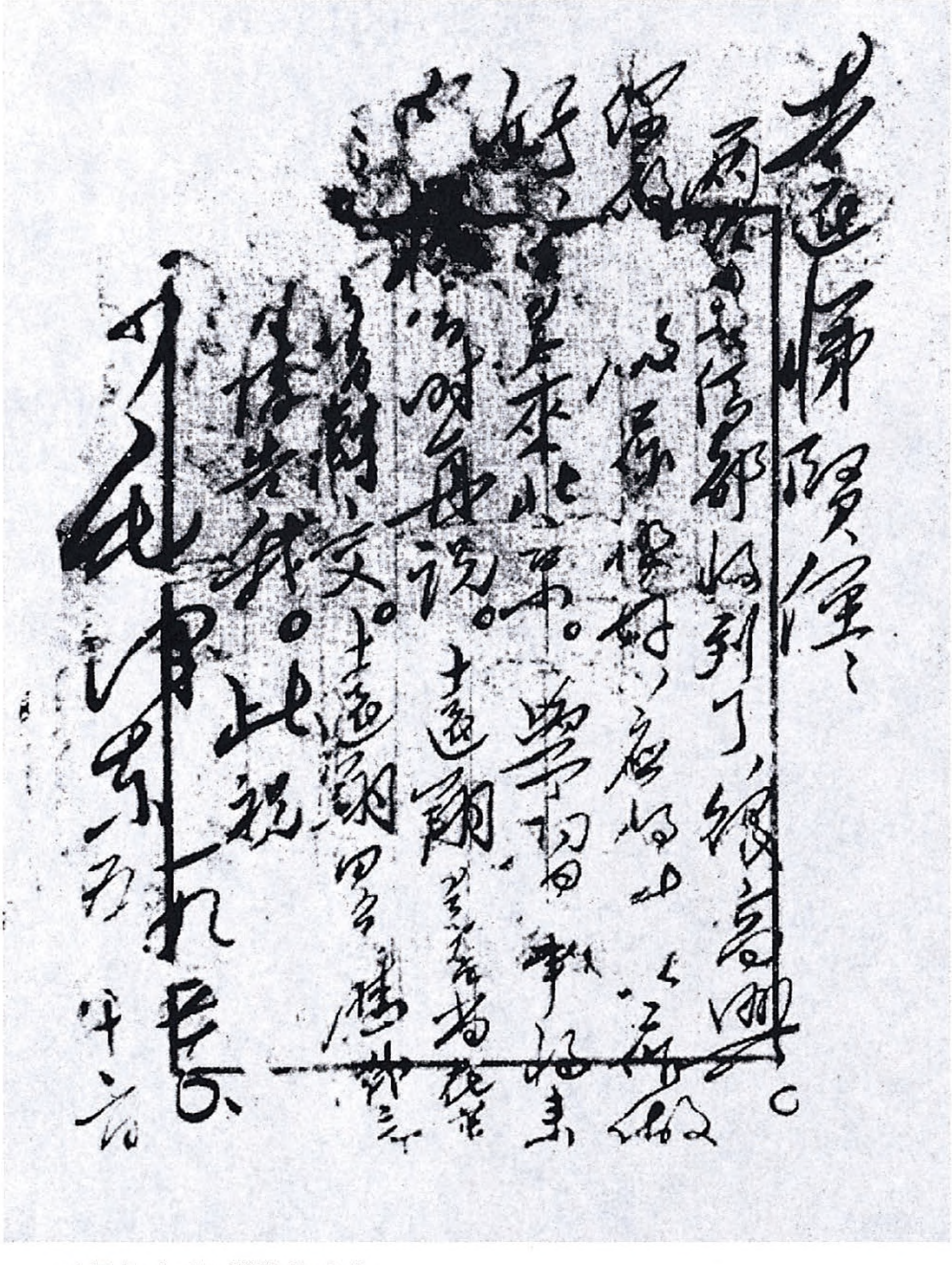
两次来信都收到了，很高兴。你做印厂工作极好，应将此项工作做好，不要来北京。学习事将来有机会时再说。远翔[2]是否尚在革大，有一信请转交。远翔略历我忘记了，便时请告我。此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

[1] 毛远悌，1924 年生，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房侄。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方面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工农印刷厂经理、湖南省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等职。

[2] 远翔，即毛远翔。



远悌贤侄：

[illegible]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illegible]家乡情形好，应[illegible]

好[illegible]来北京。学习事将来

[illegible]时再说。远翔[illegible]

[illegible]交。远翔[illegible]

[illegible]告我。此祝

[illegible]

毛泽东

十月[illegible]

毛泽东致毛远悌信的手稿。

给毛远翔[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远翔贤侄：

两次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应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北京，这里人浮于事，不好安置。你的文字已通顺，用力学习，当会有更大进益。

此复，即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你父母相片收到，请你替我问候他们。

---

[1] 毛远翔（1924—1996），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房侄。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湘潭银田区委书记、湘乡县凤音乡武工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长沙市南区委员会宣传部长等职。

给毛泽益[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泽益贤弟大鉴：

来信收到。贻全[2]亡故，深致悼意。借款事我记不起了，大概是有的。兹寄上人民币[3]贰佰伍拾万元，以应急需，收到时请告知为盼。此祝

合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

[1] 毛泽益，1929年生，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农民。毛泽东的房弟。

[2] 贻全，即毛贻全（1906—1949），毛泽益的父亲，乡村教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3] 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一万元等于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一元。

给邹赓鹏[1]的信

（1950年5月12日）

赓鹏兄：

去年十二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乡里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大家努力生产，会慢慢好起来的。泽民已去世，知注并闻。

此祝

合家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

[1] 邹赓鹏（1885—1952），湖南省韶山市大坪乡韶新村人。早年在韶山冲开染坊，并经营药材、杂货，与毛泽东家有商务往来，结识了毛泽东、毛泽民。

转发邓小平[1]关于整风、春耕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的批语

（1950年5月13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华南分局，上海市委：

兹将邓小平同志五月十一日来电[2]转发给你们参考。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此项步骤部署进行，即先整县委书记以上，再整广大干部。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指邓小平1950年5月1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电报中说：西南局“确定整风的主要方法是联系实际，从检查工作入手，充分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使干部提高一步的目的。整风对象着重于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其中又以县以上干部为主。在步骤上，地方拟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弄通他们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时间以半个月到二十天为度”。

关于审查藏文广播问题[1]

（1950年5月13日）

请李维汉[2]负责审查藏文广播并规定该项广播内容及方针。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3日关于转报甘孜情报站的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上的批语。甘孜情报站的报告中说：有藏人反映，北京藏语广播曾播出“西藏人民系受神权与贵族双重压迫，我们决来解放你们”这样的话。如果以武力解决西藏问题，这样说是可以的。否则，不必如此，特别是在西藏又具向内之心的情况下，应争取达赖。如此，则解放西藏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2] 李维汉（1896—1984），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陈毅[1]关于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0年5月13日、14日）

一

子恢，剑英，小平，德怀，一波，高岗，彭真，黄敬[2]各同志：

兹将陈毅同志五月十日来电[3]转发给你们作参考。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4]，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3] 指陈毅1950年5月10日给毛泽东、中央、华东局的上海三、四两月综合报告。

[4] 1950年3月和4月，上海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敌特活动表面化，税收、公债政策受到攻击，劳资关系紧张，人心浮动。这些情况以4月上旬为最紧张。上海市在解决上述问题稳定局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经验和采取的政策主要是：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

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二

陈毅同志，并告漱石[1]：

（一）五月十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二）六月征税减少一千亿的问题，待研究后由陈薄[2]答复你。（三）我们决定六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如何，盼复。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转发云南省委
关于严禁村政权浪费的指示的批语

（1950年5月14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委、区党委、直属市委：

村经费支用浪费是一极严重现象，云南省委发了严禁指示，西南局已通知所属遵行。望各地检查此事，按照情况采行为盼。

中央
五月十四日

给毛宇居[1]的信

（1950年5月15日）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2]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即颂

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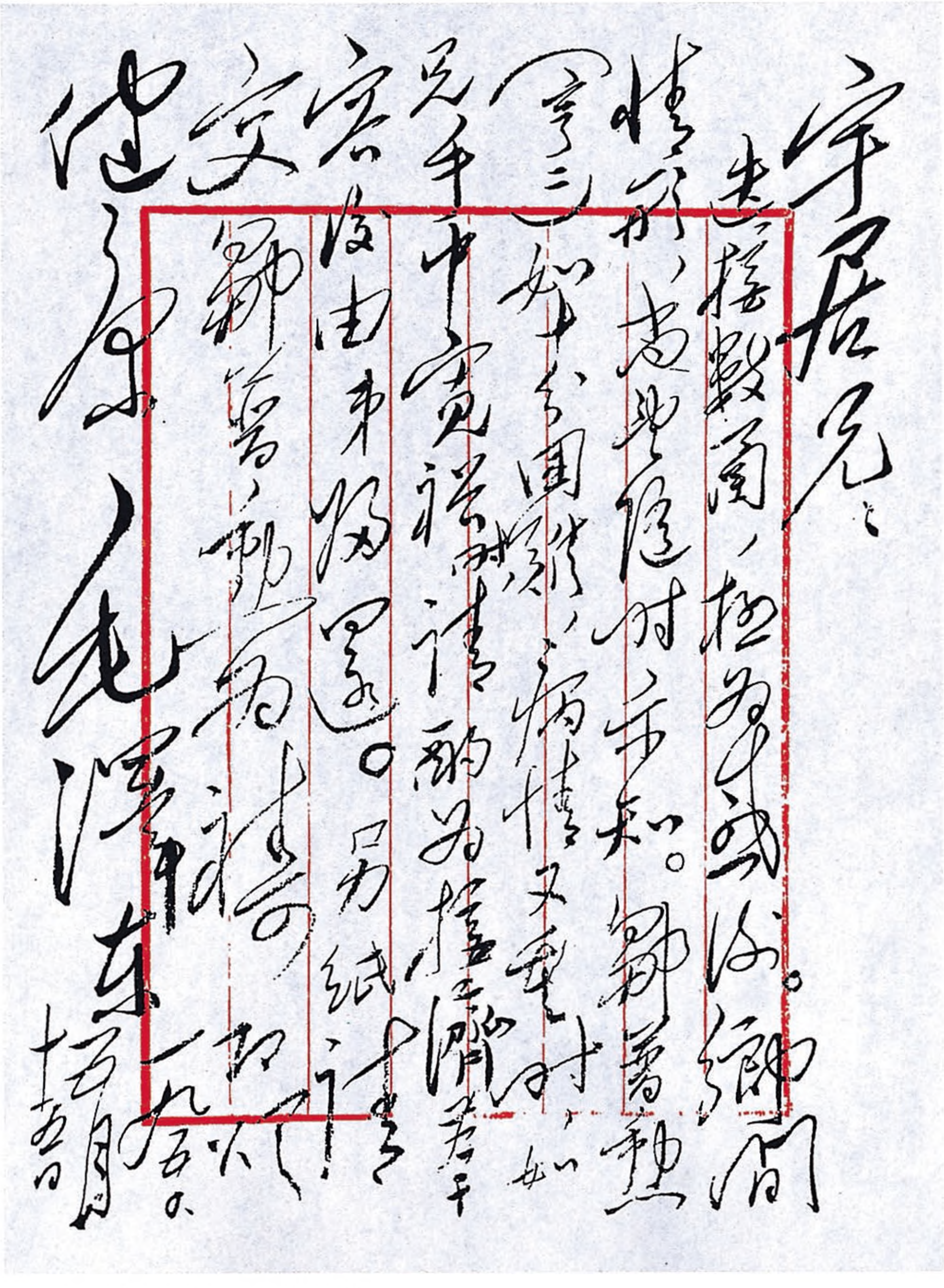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五日

---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2] 邹普勋，小名亨二，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宇居兄：

先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三）如生活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我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荷。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毛宇居信的手稿。

1950年，毛泽东邀请少年时代的好友张有成、堂兄毛宇居、表兄文枚清赴京叙旧。图为他们在中南海含和堂的合影。

给邹普勋[1]的信

（1950年5月15日）

普勋兄：

五月七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

---

[1]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给黄炎培[1]的信

（1950年5月15日）

任老：

粮税事，我告陈薄[2]后，已有复信，兹付上请阅。如有意见，请再告。原件尊处可抄存，然后还我。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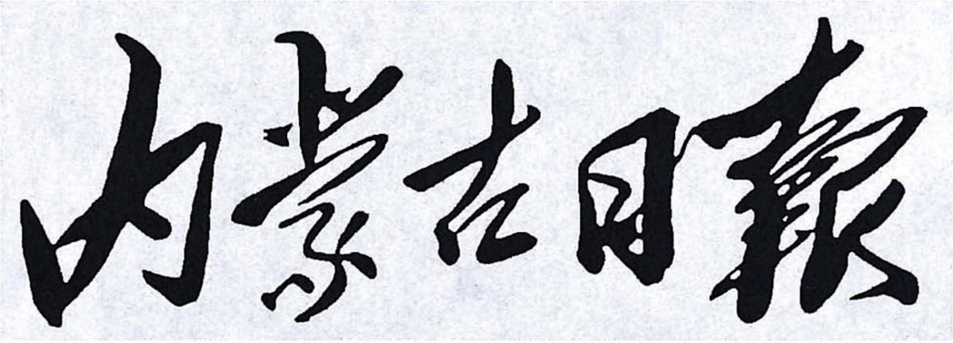
[1] 黄炎培，字任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为《内蒙古日报》[1]题写报头

（1950年5月15日）

内蒙古日报



毛泽东为《内蒙古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内蒙古日报》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机关报，创刊于1948年1月1日，用蒙、汉两种文字出版发行。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创办最早的一份省级党报。1950年5月15日，《内蒙古日报》启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头，一直沿用至今。

给朱琨的信

（1950年5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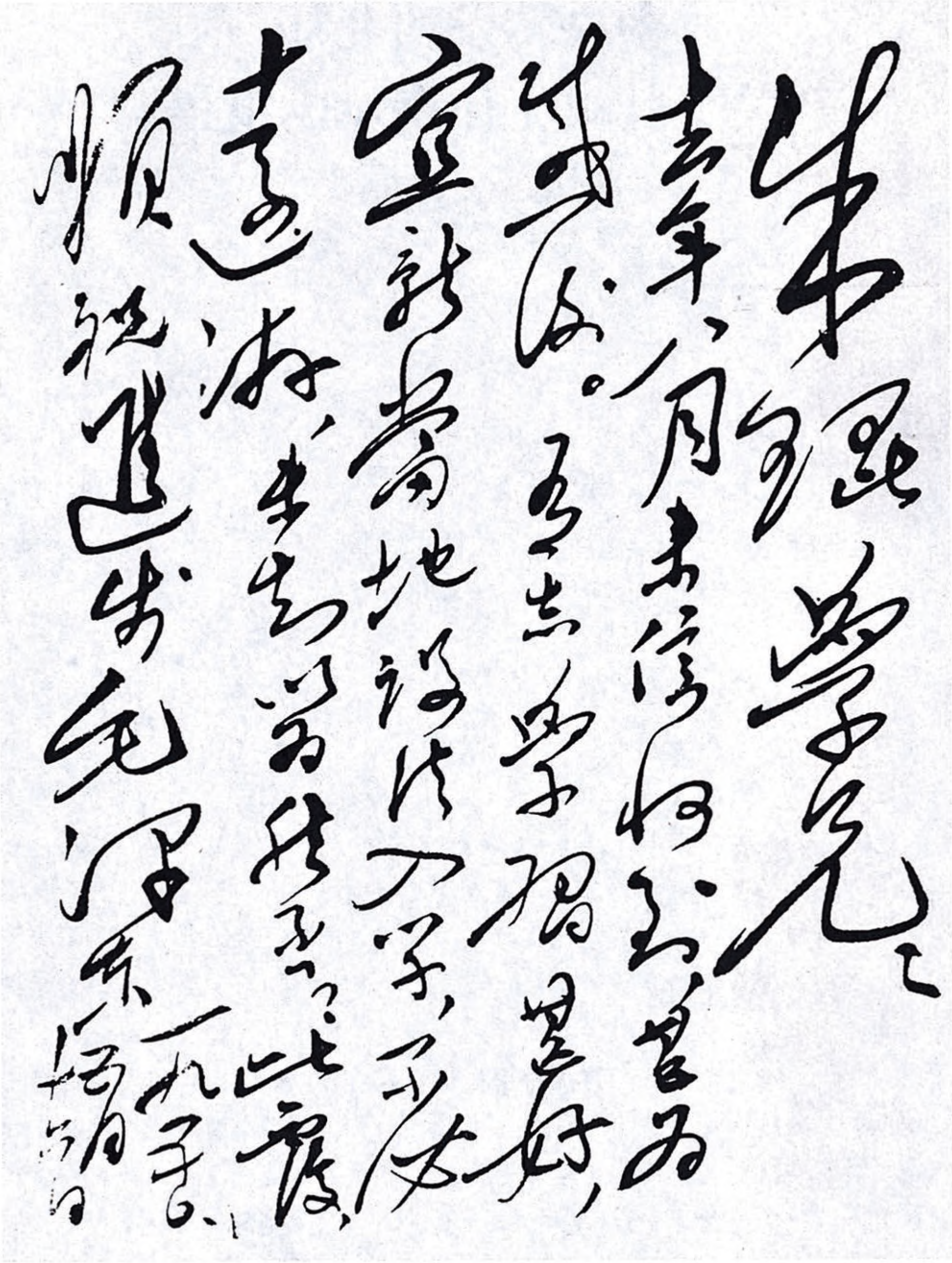
朱琨学兄：

去年八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有志学习甚好，宜就当地设法入学，不必远游，未知以为然否？此复，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六日



朱琨同学：

去年六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有志学习甚好，宜就当地设法入学，不要远游，来去花钱甚多。此复。顺致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

毛泽东致朱琨信的手稿。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指示的批语

（1950年5月16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北局：

兹将西北局关于甘肃工作的指示[1]转给你们，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情况，西北局对此采取了正确的对策。请你们注视自己区域情况的发展，并及时采取适当对策为盼。

中央

五月十六日

---

[1] 中共中央西北局1950年5月13日关于甘肃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最近甘肃平凉、海原、固原、皋兰等地连续发生群众性骚乱、匪特阴谋暴动事件，在西北回汉杂居地区发生此类事件，应引起严重警惕。指示提出，为扭转混乱局势，请甘肃省委迅速坚决执行下列六条要求：（一）省委即与野司商量，分派负责干部，配备必要兵力，到已经发生事故和可能发生事故的各地区协助工作，召集有各族、各界中上层代表人物参加的协商会议，商讨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解决办法；（二）组织起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参加的协商委员会，任用少数民族人士做工作；（三）拟订在全区内同敌特阴谋武装叛乱作斗争的通盘计划；（四）调集优势兵力，彻底消灭继续顽抗的匪特武装力量；（五）目前甘肃工作仍以全力清匪，肃特，团结各族人民，深入群众工作，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生产为基本方针，今年是否实行土改须慎重考虑；（六）抓紧整训干部，严格检查干部作风，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设立许多文化馆，为民众的业余生活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内容。

给周容[1]的信

（1950年5月16日）

赞襄先生：

去年八月惠书敬悉，甚感盛意，迟复为歉。组织问题[2]，未便率尔绍介，应就当地有所表现，向当地组织请求，听候解决。此复，即祝

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

---

[1] 周容，又名周赞襄，1920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毛泽东相识。

[2] 指周容请求毛泽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

给周起鹗[1]的信

（1950年5月16日）

起鹗先生：

去年十月来信收到，甚为感谢。菊年现名周文楠[2]，在沈阳人民法院工作。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适意，犹胜于失职〈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

此复，即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

---

[1] 周起鹗，周文楠的侄子。

[2] 周文楠，原是毛泽东之弟毛泽覃的夫人。当时任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庭长。

海南岛及沿海诸岛占领后的处置方法[1]

（1950年5月18日）

广东军区，十五兵团，并告中南军区：

据粟裕同志五月十六日致七兵团关于占领舟山群岛后的处置称："所有各岛敌之机场、码头、仓库、军营及各种交通、各种建筑设备，应妥为全部看管。特别敌海岸前沿阵地工事，副防御设备，及纵深要点工事，应指派专门部队警备看管，不准破坏。发现群众乘隙拆毁破坏各种建筑设备，应予以防范制止，并动员说服服从我军各项规定。至匪军[2]侵犯群众利益，搬用木料砖石，修筑工事等，亦需说服他们[3]，暂时忍耐，待秩序恢复，经我军许可后，再作处理"等语，我们认为这一处置是正确的。海南岛、广东临海中的各岛及沿海岸线亦应照此处置。过去你们是如何处理的，望告。

军委

五月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广东军区和第十五兵团并告中南军区的电报。

[2] 指原占领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

[3] 这里指说服舟山群岛上的群众在人民解放军占领该岛后，暂不拆毁原国民党军队修筑的工事，收回自己的木料砖石。

军队整编复员
由中央复员委员会统一处理[1]

（1950年5月19日）

张、甘，并告华东，中南，西南，东北各军区负责同志：

辰巧电悉。军队整编复员问题，中央已组成一委员会，周恩来同志为主任，聂荣臻同志为副主任，统一处理复员人数、时间、回家生产补助费、地方欢迎安置等项问题。西北方面应统一办理。集训一周到半月，时间太短，发半个月至三个月经费问题，亦尚须考虑，容后电告。

军委

五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司令张宗逊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电报。

给丁张秀清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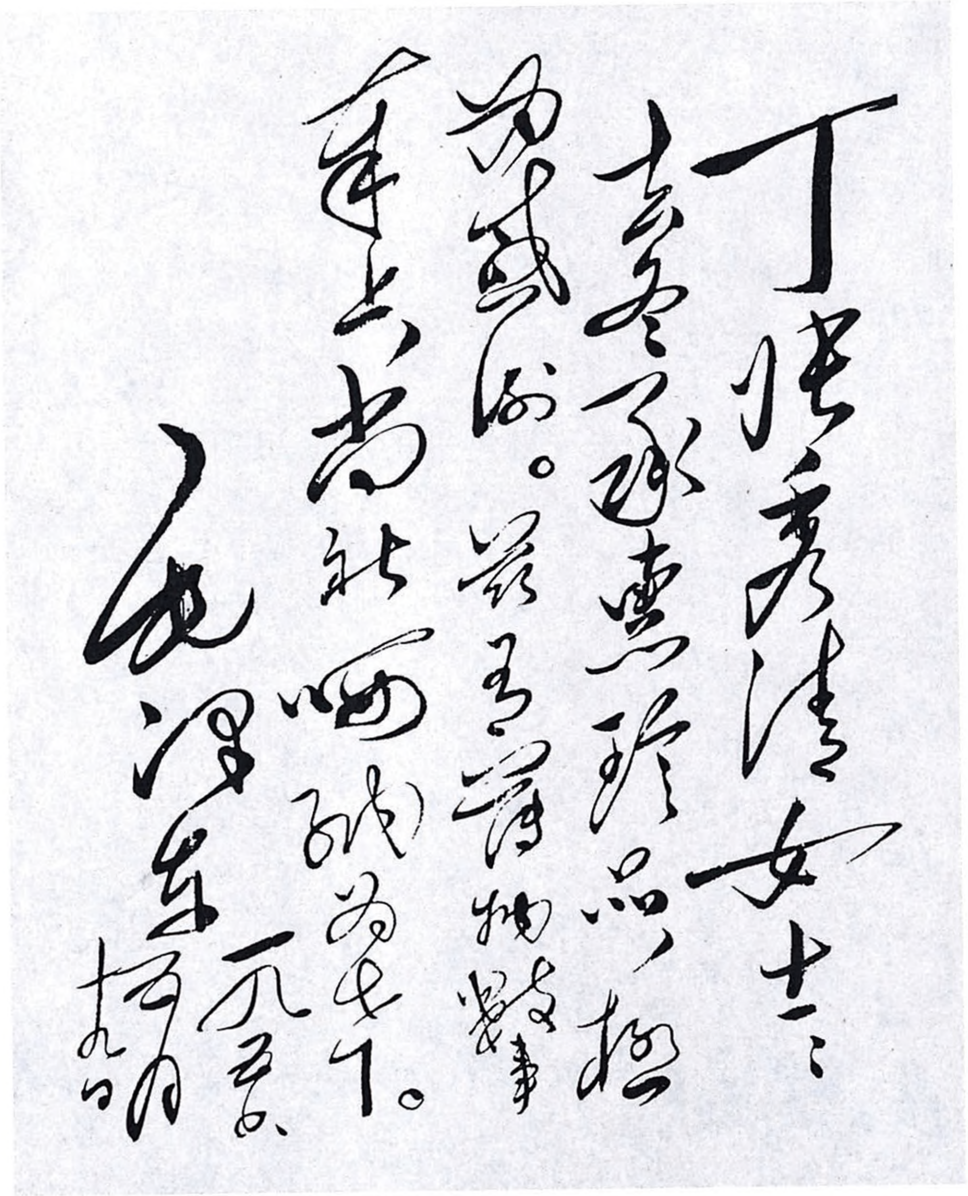
（1950年5月19日）

丁张秀清女士：

去冬承惠珍品，极为感谢。兹有薄物数事奉上，尚祈哂纳为幸。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九日



丁张秀清女士：

来函、惠珍品，极为感谢。[illegible]诗物数事，年上尚能[illegible]为下。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十九日

毛泽东致丁张秀清信的手稿。

关于调查川沙等三县征粮情况致陈丕显[1]电

（1950 年 5 月 19 日）

饶[2]，转陈丕显同志：

（一）删辰报告[3]收到，谢谢你，并已转给黄炎培[4]看，使他明了情形。（二）仍请你对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派专人去（或你自己去）作一次调查，对于黄炎培所说因征粮引起农民无力耕种等项作一切合情况的答复。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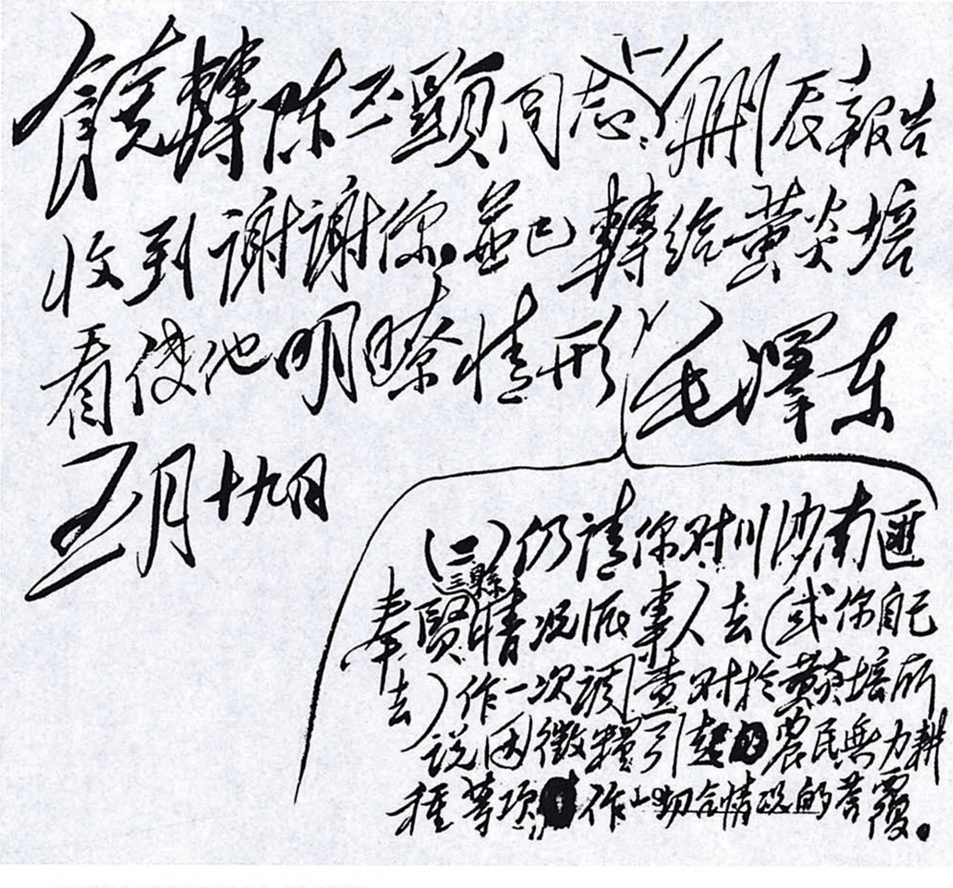
---

[1]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3] 指中共苏南区委 1950 年 5 月 15 日给毛泽东的 3、4 月份综合报告。报告谈到苏南各城市近期出现的物资滞销、生产缩减、不少私营工商业歇业、大量工人失业的情况和采取的对策，还谈到为帮助苏南农村 40 多万灾民解决口粮、种子、肥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

[4] 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饒轉陈丕顯同志：（一）卅辰報告收到，谢谢你，並已轉给黄炎培看，使他明瞭情形。毛澤东 三月十九日

（二）仍請你对川沙南匯奉賢（三縣）情况派專人去（或你自己去）作一次調查，对於黄炎培所說因徵糧引起的农民無力耕種等項，作一切合情况的答覆。

毛泽东致陈丕显电的手稿。

在关于帆船对敌舰作战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50年5月19日）

转三野，并抄送海司[2]：

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3]，应予学习和表扬。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1950年5月17日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的报告的批语。

[2] 海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

[3] 指邓华1950年5月17日给军委并四野司令部的报告中所说的第十五兵团四十三军某部的3只小帆船（四五十人）同三四艘敌舰作战的英勇事迹。

在沈阳市政府关于铸毛泽东铜像给新闻摄影局公函上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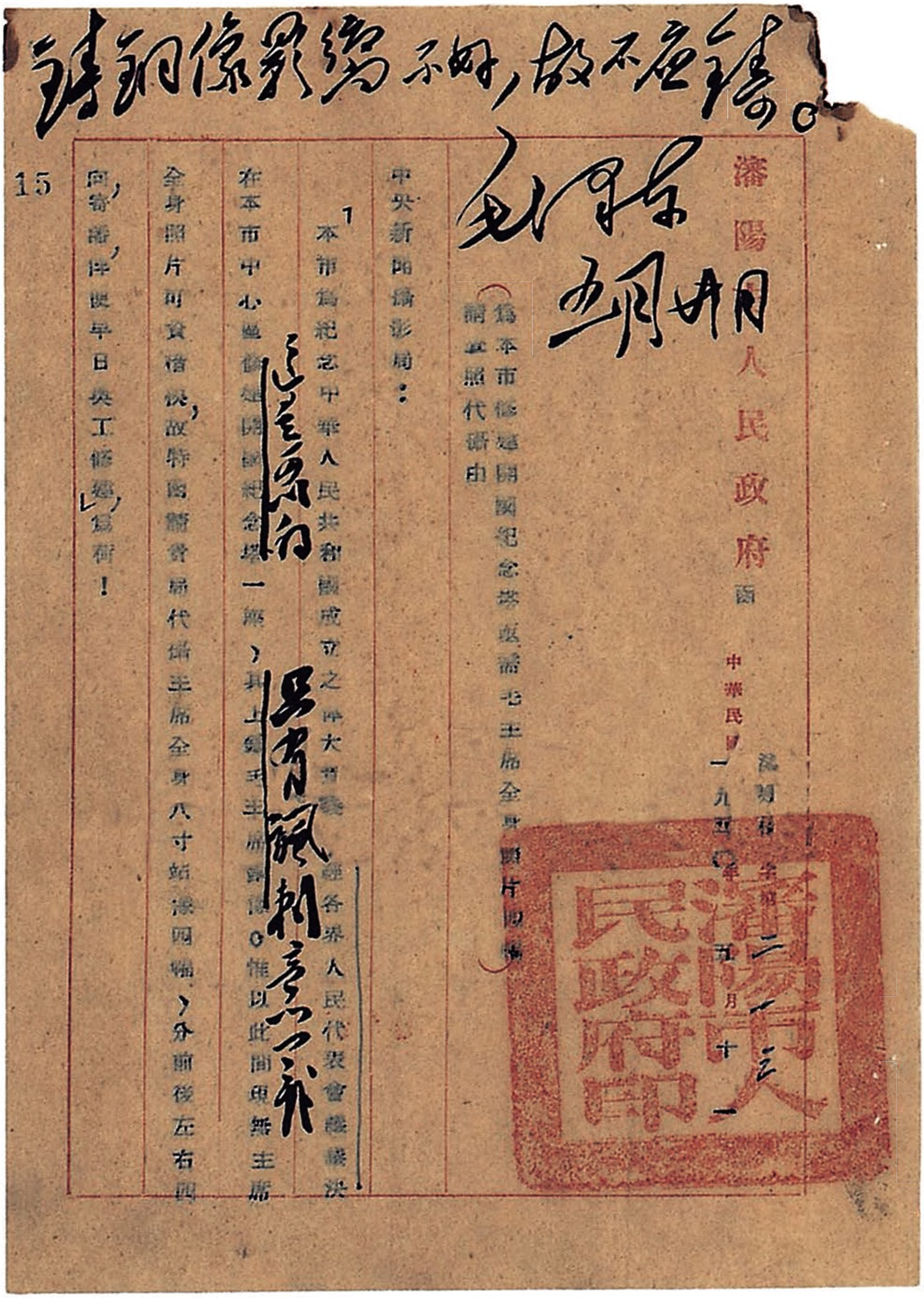
（1950年5月20日）

铸铜像[1]影响不好，故不应铸。

毛泽东
五月廿日

---

[1] 指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一事。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全身八寸站像四幅。毛泽东在来函中“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写：“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写：“只有讽刺意义”。



鑄銅像不好，故不應鑄。

毛泽东

五月廿日

瀋陽市人民政府函

瀋[illegible]秘字第二一三

中華民國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一

（為本市修建開國紀念塔並需毛主席全身照片四幅請寄照代辦由）

中央新聞攝影局：

「本市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偉大意義，經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議決在本市中心修建開國紀念塔一座，其上鑄毛主席銅像。惟以此間現無主席全身照片可資摹仿，故特函請貴局代攝主席全身八寸站像四幅，分前後左右四向，寄瀋，俾便早日興工修建，」為荷！

送主席[illegible]

[illegible]

15

毛泽东在沈阳市政府关于铸毛主席铜像给中央新闻摄影局公函上的批语的手稿。

省以上各级党委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1]

（1950年5月20日）

饶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小平，德怀，高岗[2]：

一、你托廖鲁言[3]带回的口头意见已收到，都是对的。其中说中央及中财委的政策方案都是正确的，但中央的业务机关分配给地方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布置有很多太重行不通，是指一些什么事，请列举具体内容电告以便纠正。三、嗣后凡有中央业务机关规定任务方案在地方上窒碍难行者，请各区负责同志一经发现立即电告以便改正。四、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五、此电请

---

[1] 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等的这个电报共五点，收入本书时略去第二点。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廖鲁言（1913—1972），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书长。

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毛泽东
五月二十日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
潘尼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5月20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印度共和国总统所授予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中印两国，国境毗连，在历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关系，近世纪来，又都为挣脱自己民族的厄运，进行过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同情与关怀是深切的。现在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而且与此而俱来的亚洲两大国家人民的真诚合作，必将大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印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加强两国合作的工作中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50年5月，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

给毛桂昌[1]的信

（1950年5月21日）

桂昌先生：

数次来信，均已收到，感谢你的好意。你家生活，应在土地改革中听候当地人民政府酌量分配土地，从努力生产中求得解决。此复，即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

[1] 毛桂昌（1894—1958），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后迁居湖南省沅江县，农民。毛泽东的远房叔父。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给黎锦熙[1]的信

（1950年5月22日）

邵西先生：

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2]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3]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顺祝
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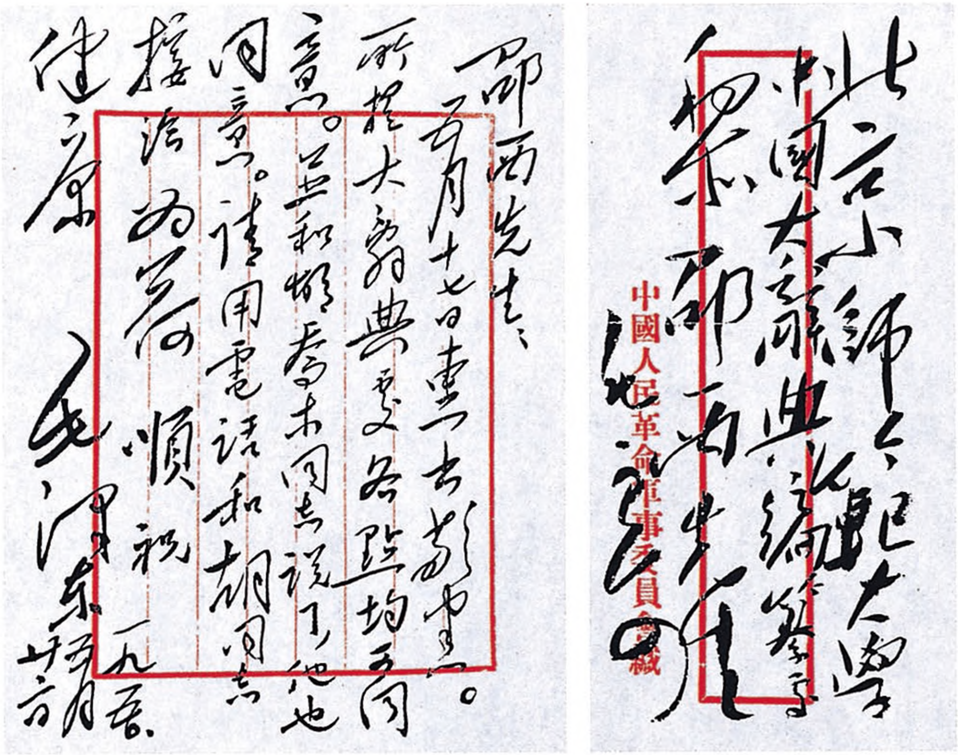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廿二日

---

[1] 黎锦熙，又名黎邵西，语言学家。当时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2] 指黎锦熙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关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3] 胡乔木，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劭西先生：

五月十七日惠書敬悉。所提大辭典要義各點均同意。已和胡喬木同志談了，他也同意。請用電話和胡同志接洽為荷。順祝

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三

五月廿六日

北京師範大學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黎劭西先生

毛澤東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手稿。

关于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给胡乔木[1]的信

（1950年5月24日）

乔木同志：

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中央已指定了一个三人委员会，你为主任，负责审查各地整风文电并起草复电；尔后则负责注意这个运动的发展，替中央起草指导文电，并注意报纸刊物的报道和指导（六月上旬应写社论一篇）。各地整风指示文件均须经中央审查，截至今日止，已到者有华东，西南，西北，内蒙，一野等处，请你即于两三日内总阅一遍，邀集安子文，肖华[2]谈一下，逐一起草复电（请叫尚昆[3]注意各地有关此类来电，抄送你和安、肖），或者还须总复一电。其原则是大体可用者即予同意，须作部分修改者则予修改。关于学习文件，有关全国者须予统一。复电要快，本月内（只有七天了），均须将起草，送书记处各同志看过，并用四A级电拍发等事办理完毕，以便全国整风能

---

[1]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于六月上旬一律开始。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上午六时

关于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的批语[1]

（1950年5月24日）

周[2]：

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请加注意。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书记张铁生1950年5月22日关于如何接待将来香港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给中央统战部和周恩来的报告上的批语。

[2] 周，指周恩来。

军委关于同意补充陈明仁、张轸部致邓子恢等电[1]

（1950年5月24日）

邓、谭、陶[2]，并告林彪[3]同志：

五月廿二日电[4]悉。你们补充陈明仁的计划是好的，张轸亦须予以补充，表示一视同仁。

军委

五月二十四日

---

[1] 陈明仁，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张轸，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5月率部在武昌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军长。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2] 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陶，指陶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3] 林彪，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

[4] 指邓子恢、谭政、陶铸1950年5月24日给军委并林彪的电报。电报说：“陈明仁部（第二十一兵团）现有人数二万四千余人，计划补充二万二千人，总共可达四万六七千人。与其起义以后兵团部成立时的人数比较，约多出一万人。张轸部也须给以补充，可否补充二三千人，以示一视同仁。”

给李济深的信

（1950年5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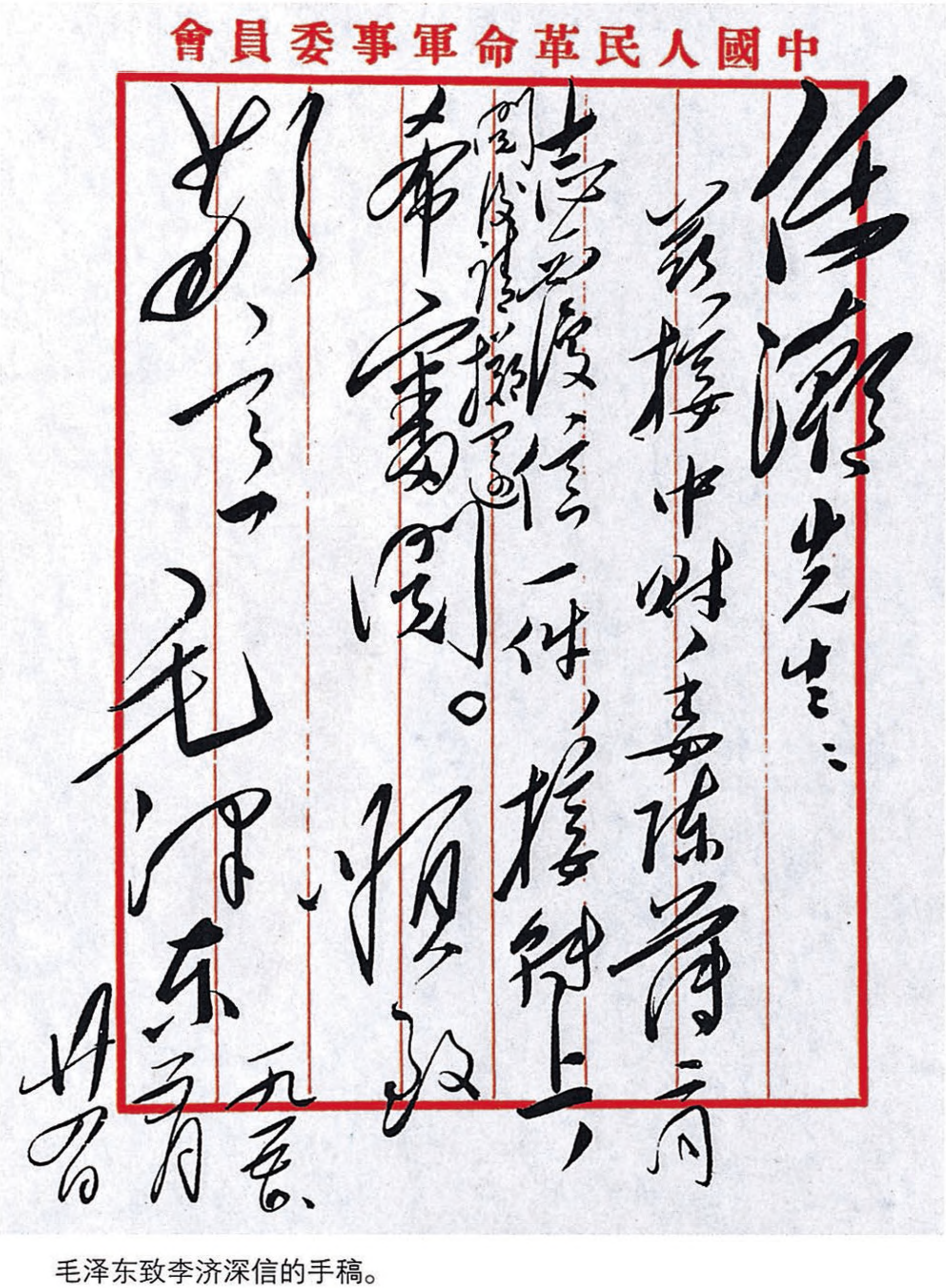
任潮先生：

兹接中财委陈薄二同志覆信一件，接〔特〕转上，希审阅。阅后请掷还。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廿四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任潮先生：

顷接中财委陈云同志关于侨汇问题的复信一件，抄转上，希察阅。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〇

三月廿日

毛泽东致李济深信的手稿。

关于章士钊[1]荐用李侊[2]的批语

（1950年5月24日）

一

请周[3]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

二

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4]

---

[1] 章士钊，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2] 李侊，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

[3] 周，指周恩来。

[4] 这段批语写在李侊自传第一页上。

对私营工商业
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1]

（1950年5月25日）

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到哪一天才需要全面进攻，取消资本家的那一部分呢？照苏联的例子，时间是很长的。他们一九二九年开始集体化，消灭富农经济，后来又搞快了，因此一九三〇年斯大林有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2]。所以必须慎重。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因为私营工商业比较落后，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我曾同几个资本家说过。其他则一般的应当一视同仁，有的是要逐渐才能办到的，如收购、采办、出口以及市场。工资问题将来也是要解决的。在私人工厂中，也可以有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也应当有生产竞赛。总的说来，这种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244页。

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这个利是超过对资本家的利益。裁员问题、失业救济问题，都应该是一样的，一视同仁，或者如陈云[1]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2]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

[1]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对衡山县县长给中央人民政府报告的批语

（1950年5月25日、6月1日）

一

送周总理，李维汉[1]部长，林老[2]阅，请统战部考虑是否应将衡山县来件[3]送符定一[4]先生一阅，并告诉他他去信中有些话写得不妥。

毛泽东
五月廿五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3] 指湖南省衡山县县长高怀亨1950年5月17日给中央人民政府的报告。这个报告对符定一（原籍衡山县）在给高怀亨的4次信中对农村减租退押问题所持的态度，提出了批评意见。

[4] 符定一，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二

维汉同志：

因衡山县长要回信，请用统战部名义回衡山一信，说明与符谈话情形，并指出衡山县长的立场是正确的。但退押事可以不提了，因湖南现已停止退押，符也没有钱可退，他现在确实很穷。

毛泽东

六月一日

1950年6月，毛泽东和他青年时代的老师符定一交谈。

给刘亚南[1]的信

（1950年5月27日）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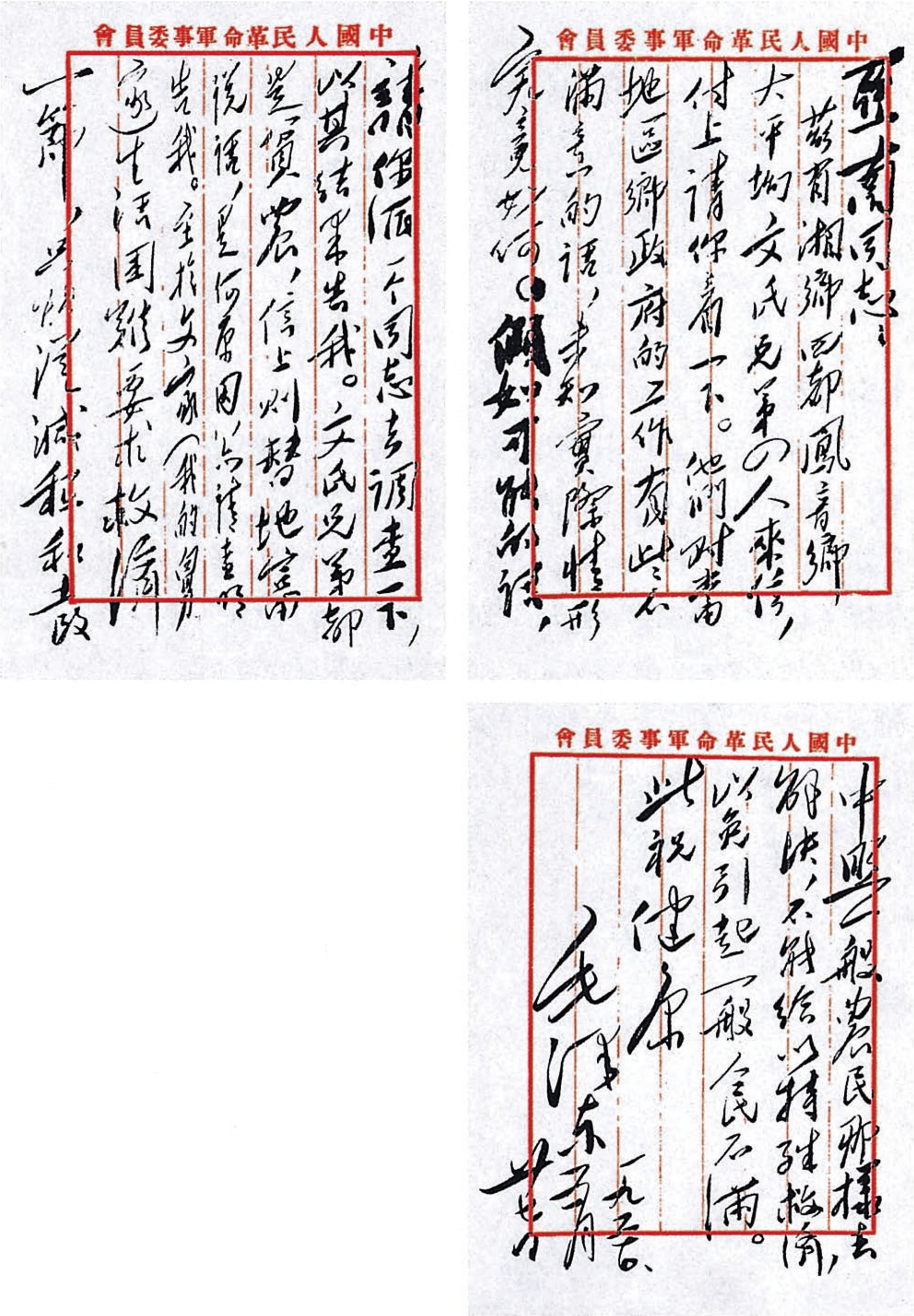
此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五月二十七日

---

[1] 刘亚南，当时任湖南省湘乡县县长。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亞南同志：

茲有湘鄉四都鳳音鄉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來信，付上請你看一下。他們對當地區鄉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滿意的話，未知實際情形究竟如何？顧如可能的話，請你派一個同志去調查一下，以其結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貧農，信上則替地富說話，是何原因，亦請查明告我。至於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難要求救濟一節，只能從減租和土改中照一般農民那樣去解決，不能給以特殊救濟，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滿。

此祝健康！

毛澤東

一九五〇、五月廿日

毛泽东致刘亚南信的手稿。

收到综合报告致叶剑英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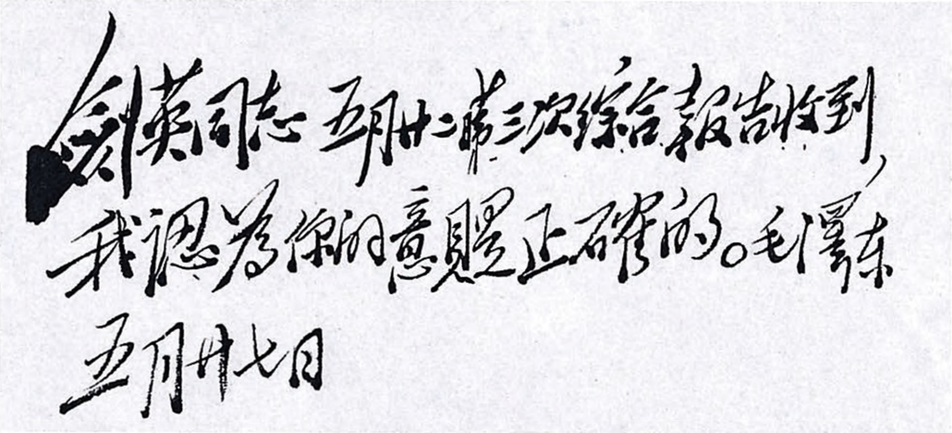
（1950年5月27日）

剑英同志：

五月廿二日第三次综合报告收到，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五月廿七日



剑英同志 五月廿二第三次综合報告收到，我認為你的意見是正確的。毛澤东

五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叶剑英电的手稿。

在中财委关于
新解放区夏征公粮决定上的批语

（1950年5月28日）

周[1]：

此两件[2]你是否看过？其中未规定不许各级层层摊派负担，并且说“各大区提意见报中财部备案即可”，是否又有层层加重的危险？是否有去一电叫各地不要层层加重之必要，请酌办。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早

---

[1] 周，指周恩来。

[2] 其中一件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5月23日关于1950年新解放区夏征公粮的决定。另一件不详。

对成立空军第四旅组织雷达网等问题的批语[1]

（1950年5月28日）

已阅[2]。请聂办。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1950年5月27日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并报毛泽东的信上写的批语。

[2] 刘少奇的信说：担任上海地区防空作战任务的苏联空军混成航空兵集团指挥官巴基斯基及罗申大使、柯托夫武官来我处谈了以下问题：（一）我们第一个空军旅，预定于6月15日至7月1日成立，飞徐州与南京，命名第四空军旅。“此为我们祖国第一个空军部队成立，应予重视。”（二）为了保卫我们的空军并其他目的，应即组织我们的雷达网。现在上海我们有十二架雷达机，要我们立即组织一个雷达营，600人，内须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者300，由他们训练3个月即可毕业，能够使用。

关于部队编制原则问题的批语[1]

（1950年5月28日）

同意各项原则[2]，即可照此拟定编制表。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5月28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为求得于本年10月份起，至攻台战役开始前，确实做到军队系统供给总人数不超过四百万，昨日特召集各军区参谋长和罗瑞卿、滕代远、肖劲光、刘亚楼、李涛、杨立三、萧华、萧克等，对海、空、公安等建设及各区人数通盘研究，并根据连日对编制问题讨论的意见，集中了一下。特将要点报告：（一）公安部队按总额四百万之百分四点五抽调，共十八万人。（二）铁道兵团保留一万八千人左右，仍称人民解放军，着军服，按军队供给制待遇，但在四百万总额以外，由铁道部事业费中开支，

实质上为铁道工程队。(三) 海军现有三万八千余人。预计攻台前须扩大至五万五千人。(四) 空军原有五万七千人。攻台作战前须扩大至十二万六千四百零二人。(五) 拟定四百万人之分配额为：华东九十九万人，中南九十八万七千人，西南七十八万八千人，西北五十九万人，华北二十九万人，东北九万人，军委直属及海空两军二十六万五千人。(六) 编制，依攻台两栖作战及我现有装备与生产条件，分为战时与平时两种。战时编制，以攻台作战所需之兵力与火力，尽可能保证充实。其他不参加攻台作战者，不分野战与地方，统一编制，其原则为保留架子，减少兵员，保留特种兵，减少步枪手，保留干部，减少战士。(七) 平时编制之装备，连轻机九挺，六〇炮三门；营属机炮连重机六挺，八二追击炮四门；团属九二式步兵炮四门，十二公分追击炮四门；师属山炮营炮十二门。野榴炮编团，战防炮编成团、营，机动配属。(八) 各级司、政、后部门机构统一，以便上下指导业务。机关编制原则，为横宽纵短，减少层次，官多兵少。(九) 动员计划部拟以人民武装部代替之。准备由民兵制过渡到征兵制。各级司令部设人民武装部门。(十) 野战军及兵团的番号，除华东攻台应组成野战军外，余即撤销。老区之省军区与军分区仍保留短小精干之机构，以便指挥、训练公安部队与民兵。(十一) 部队之供给系统层次，拟定为军委、一级军区、师、团、连五级。(十二) 具体编制表，俟以上原则批准后，即行拟定。”

关于编印《整党文件》给杨尚昆[1]的信

（1950年5月29日）

尚昆同志：

请将中央今年五月一日关于整党的指示，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五月），关于加强与党外群众合作的决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自我批评的决定，及华东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一野、华北局、内蒙分局等七处关于整党整干的最近来电，编在一起，题名为《整党文件（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中央编印）》，印成一本，于三四日内印好，共印一百五十本，发给三中[2]到会各人。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对西南局所拟同西藏谈判的条件的批语

（1950年5月29日）

李维汉[1]同志：

除第八条[2]应加“西藏领导人员”数字外，均可同意。

请你起草复电。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27日报送中央审查的与西藏谈判的条件共十条，其中第八条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后面加写了“及西藏领导人员”7字。

关于要安子文[1]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发言的信

（1950年5月30日）

子文同志：

三中全会因时间关系，党的组织问题及整党问题不可能有专题报告，希望你准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发言，将已发的《关于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2]中的要点讲一下。会后并请你考虑一下，是否可将你讲的要点，择其可发表者写成一篇文章（比今天在报纸上登的你的文章[3]长一点）公开发表。此祝

健康

毛泽东

五月卅日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即1950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

[3] 指安子文在1950年5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实行婚姻法与肃清封建思想残余》一文。

对关于解决攻台重要问题的批语[1]

（1950年5月30日）

聂：

待粟到后，召集有关人员会商解决。[2]

毛泽东

五月三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1950年5月28日给正在北京出席全军参谋会议的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的电报上，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批语。

[2] 粟裕的电报说：为使攻台兵力达到优势，我们欢迎四野有3个军至4个军兵力参战（如要求太多，恐影响中南防务）。唯攻台作战最重要的问题，还是第一梯队渡海之船只，登陆突破附防御，及打退敌人坦克之反击突破前沿等3个重要问题。请就近将上述问题，请示解决。

为韩桂馨[1]题词

（1950年5月30日）

努力学习，日进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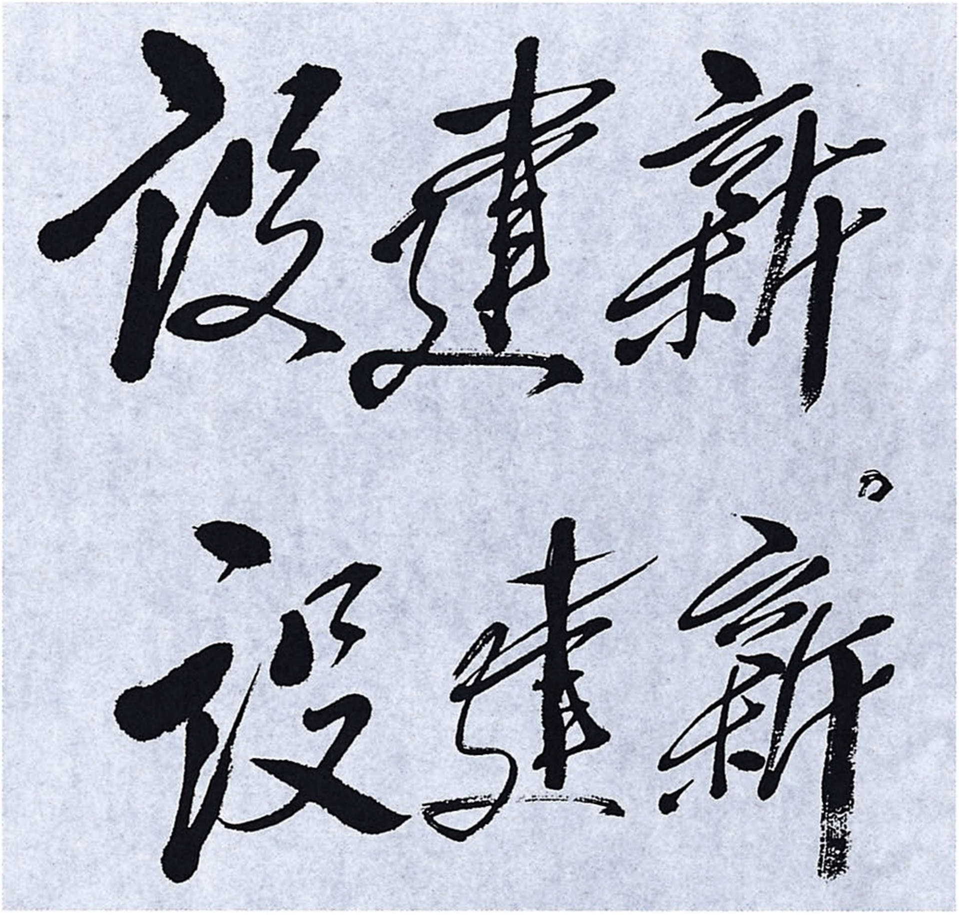
---

[1] 韩桂馨，毛泽东警卫员李银桥的妻子。1954年，韩桂馨因要上学不得不离开中南海。临走前，毛泽东高兴地为她题词："努力学习，日进有功。"

为《新建设》杂志题名

（1950年5月）

新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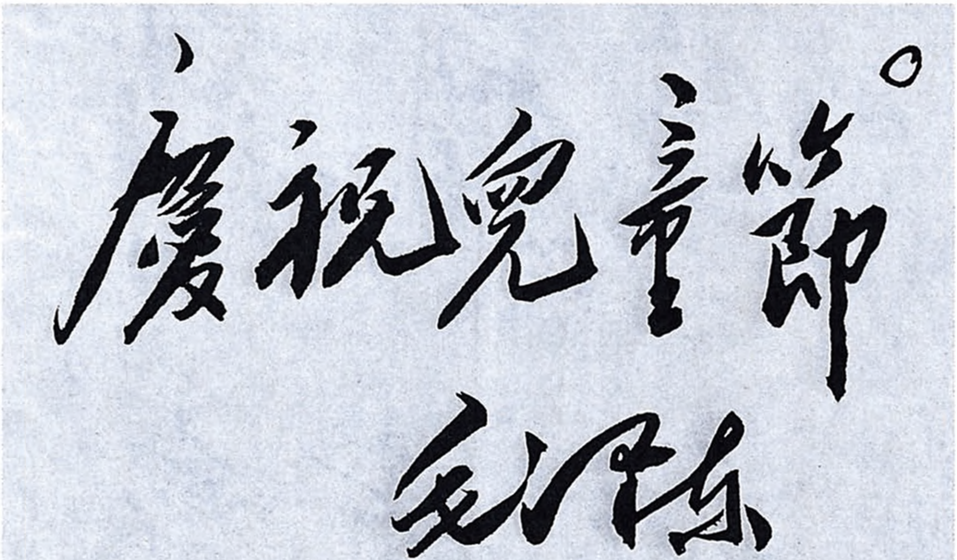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建设》杂志题写的刊名。

为六一儿童节题词[1]

（1950年6月1日）

庆祝儿童节。

毛泽东



毛泽东为庆祝六一儿童节写的题词。

---

[1]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采用6月1日国际儿童节。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际儿童节时，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儿童节。

1950 年六一儿童节，毛泽东接见少先队员。

1950 年，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中南海散步小憩。

在华北局关于
调整工商业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6月2日）

华北局：

五月卅一日报告[1]收到。我认为你们现在所取调整工商业和改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调整工商业和改善公私关系的政策问题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针对华北工商业不景气的情况和原因，提出了六条对策："第一，使干部透彻了解四个朋友必须合作、五种经济必须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办理的道理，纠正'左'倾情绪。目前主要关键在于正确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克服'先公后私'和'只公不私'甚至企图消灭商业资本的错误思想。第二，消除私人工商业者的思想顾虑，重申政府稳定物价政策，不使物价暴涨暴跌。采取一些措施鼓励工商业及早复业，维持正常的生产。第三，划分经营范围。国营贸易除了有关国计民生的粮、煤、油、布和生产工具等主要物资必须掌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外，其他商品应让给私人经营，并给以正当利润。第四，对私人工商业须有专门组织机构来领导。中央、省、县各级政府应设立专管机构，劳资协商会议、工商联合会要普遍建立，合同制要继续切实推广。第五，教育工人无论在公私企业中都要把维护、发展生产当成自己的责任，纠正不遵守劳动纪律、提出过高的工资和福利的要求。对经济工作干部，要加强政策教育，使他们不仅学会业务，而且提高对经济建设的总路线总政策的认识水平，以保证正确地执行党的经济政策。第六，提议除重工业和规模宏大的轻工业应归中央直接经营外，其余国营工业应委托省营较为有利。国营工商业利润应由政府统一规定。"

善公私关系的政策是正确的，望照此执行。

毛泽东
六月二日

关于中南局工作报告的电报

（1950年6月2日）

中南局：

五月廿五日子恢[1]同志关于三四两月的报告收到。我认为你们所取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及其他工作方针[2]是正确的。

毛泽东

六月二日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邓子恢1950年5月25日关于三、四两月的综合报告中提到的城市工作的方针和办法是：（一）减轻负担。对未完成公债任务的省市拟不再催收。税收拟请减征6亿，并停止城市附加税等。（二）调整公私关系。首先，停止国营贸易公司的零售商店，只保存一定限度的粮食零售，贸易公司的中心转到批发业、出口业及与友邻区的大批往来方面；贸易公司采取委托采购、联合采购、委托代销、委托转运和加工订货等方式与私资结合。其次，取消机关合作社，所有合作社转移给贸易公司接管。再次，部队的合作社一律停止做生意，停止用汽车搞运输，不与民争利。（三）确实保证交易自由，取消议价办法。严禁贸易公司任意限制私人采购，任意提高牌价等行为。（四）改善劳资关系。在劳资协商、维持生产、克服困难、渡过难关的口号下，领导工人主动团结资方，采取各种办法，同时鼓励资方改善管理，以维持生产，减少失业。（五）办理失业救济，主要是以工代赈。（六）用一切办法制止物价下跌，个别还要提高一点。主要靠贸易公司大量抛出货币，收购物资；同时着重运销土产品出口，搞好内外交流、城乡互助。（七）逐渐做到有计划地生产。

关于土地改革报告的修改[1]

（1950年6月4日）

一

少奇同志：

此件[2]看过，很好，很有用。有些修改，请再酌。说富农的部分长了，反而不清楚，有些则说得不大适当，故删去一大部。加上一九四六年以后一段经验，借以纠正一部分同志已经有了的一种错觉，说过去的“左”倾错误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土地法大纲》[3]上规定了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原故。如果没有这段说明，则不能纠正此种错觉。

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修改土地改革报告给刘少奇的信；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审阅报告稿时加写的三段文字。

[2] 指刘少奇准备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

[3] 《土地法大纲》，即《中国土地法大纲》，由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9月13日通过，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

房屋[1]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曾于一九四七年冬季叫乔木[2]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3]，其前面两章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

毛泽东
六月四日下午

---

[1] 这里的“房屋”指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作为人们生活用房的房屋，毛泽东把它列入生活资料。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第一章中曾经指出：“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

[2] 乔木，即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3] 这个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

二

除对极少数犯了重大罪行的地主，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及坚决反抗土地改革的犯罪分子，应由法庭判处死刑或徒刑而外，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的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

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十月这一时期内，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地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乃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主席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1]的文告，任弼时同志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2]。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就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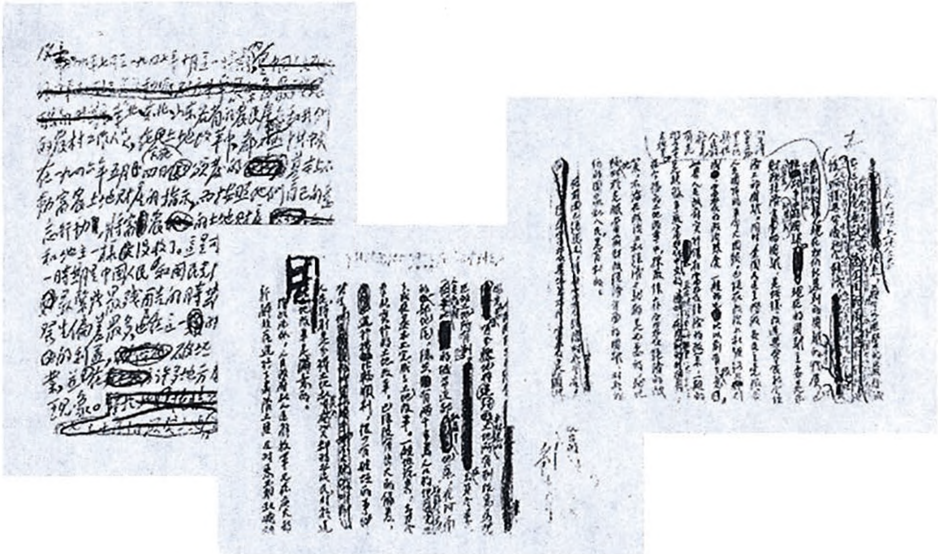
---

[1] 即《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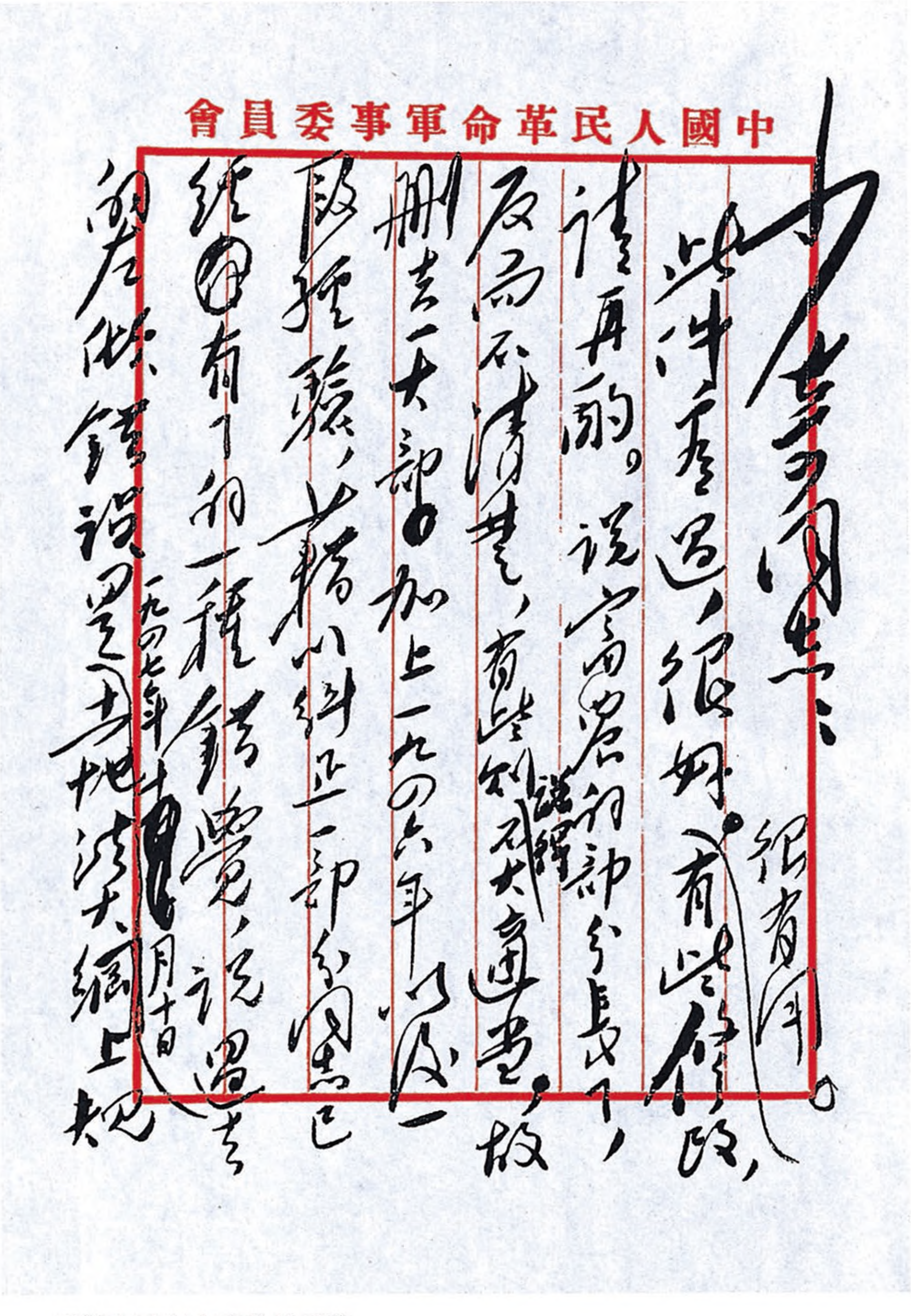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1948年1月12日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437页）。

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为了使我们的同志今后在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指出过去的经验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是处在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

各级农民协会的领导成分应该是纯洁的，不纯洁的地方应该发动群众加以改选。这里所谓纯洁，不是说对雇农、贫农、中农中之犯有某些错误者采取关门态度，拒绝他们入会。相反，应当欢迎他们入会，加以教育，团结他们。这里所谓纯洁，是指不要让地主、富农及其代理人加入农会，更不要让他们充当农民协会的领导人员。



毛泽东批阅修改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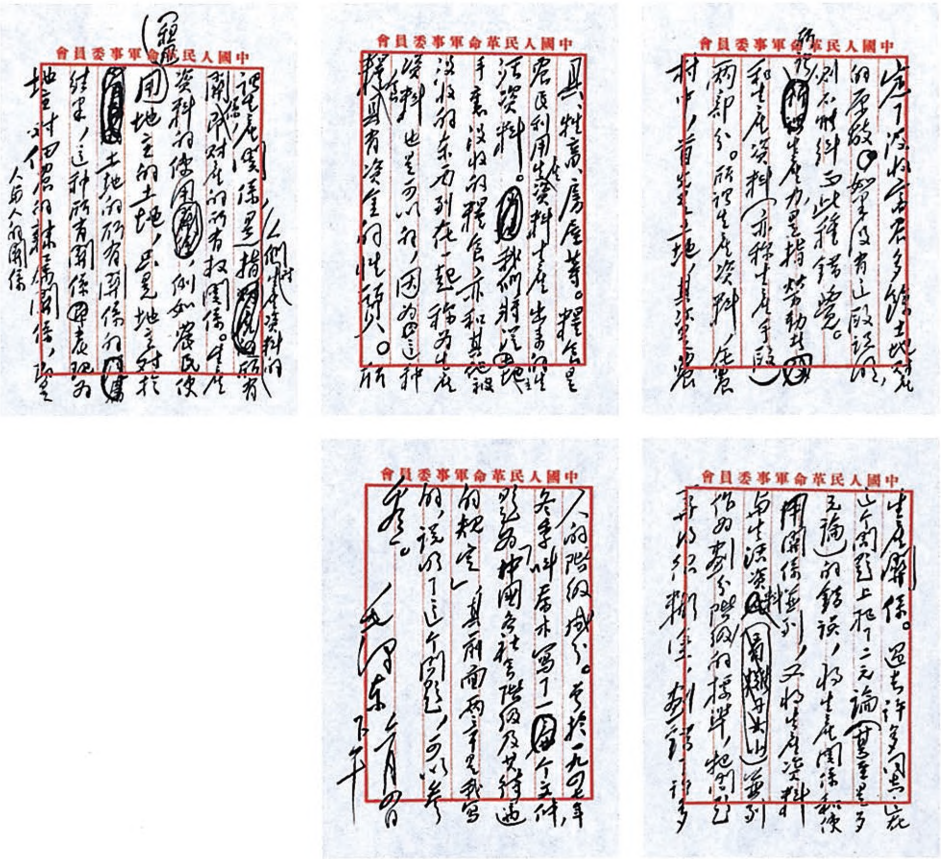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少奇同志：

此件看過，很好。有些修改，請再酌。說富農部分長了，講錯誤部分反而不清楚，有些地方不大適當，故刪去一大部，加上一九四六年以後一段經驗，並糾正一部分同志已經因有了前一種錯覺，說過去沒有做錯誤，是土地法大綱上[illegible]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手稿。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定了没收地主多余土地的的手段。如果没有上段说明，则不能纠正此种错觉。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具、牲畜、房屋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没收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讲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或称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关系，即是人与人的关系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剥削的多少、剥削的种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人的阶级成分。我于一九三三年冬季于瑞金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其前面两节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考。

毛泽东
六月四日
下午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手稿。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大会会场。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的土地委员会。图为刘少奇在会议上作报告。

为了解人民解放军渡江后歼敌人数给李涛[1]的信

（1950年6月5日）

李涛同志：

来件收到。我要的是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廿〔一〕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材料，不是从去年二月起的。请将去年四月起至现在止人民解放军消灭敌人正规军、非正规军的人数[2]各若干，速告我。来件所说去年四月至今年四月剿灭土匪七十八万人，是否即是非正规军，请弄清告我。复信请于今日下午四时送至我住处为盼！

毛泽东

六月五日上午八时

---

[1] 李涛，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

[2] 毛泽东在1950年6月6日《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文中讲到，从1949年4月21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13个半月内，人民解放军消灭了183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98万土匪游击队。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1]

（1950年6月6日）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2]，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书面报告。

[2] 指1950年2月14日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195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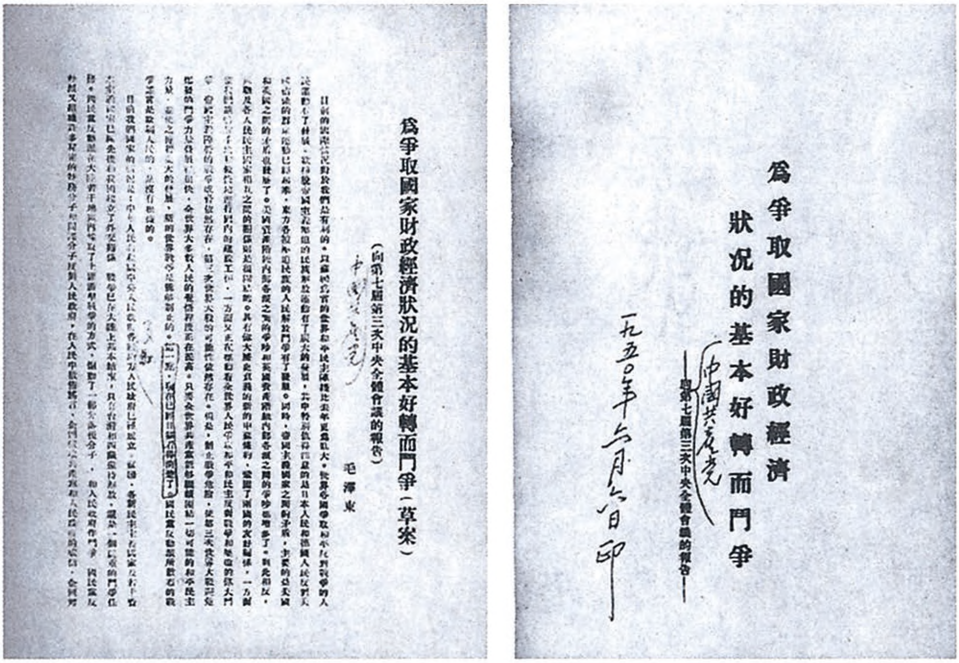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

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1]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草案）

（向第七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

爲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

—向第七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印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图为毛泽东的书面报告。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

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1]。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

---

[1] 从1950年冬开始，全国新解放的地区陆续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冬，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新老解放区约有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

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〇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

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〇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不要四面出击[1]

（1950年6月6日）

七届二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十月革命以后一个带世界性的大胜利。斯大林同志和许多外国同志，都感觉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我们有许多同志，因为在这个斗争中搞惯了，反而不那样感觉。关于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还要在党内和群众中间，做广泛的宣传。

在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面前还有很复杂的斗争，还有许多困难。

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这个伟大的成绩。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部分讲话对《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书面报告作了说明，解释了报告的战略策略思想。

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皇皇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这件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我们总要想各种办法来解决。

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就会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

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团结少数民族很重要。全国少数民族大约有三千万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改革。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

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图为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给黄炎培[1]的信

（1950年6月6日）

任之先生：

兹有整党文件[2]一本，送上一阅，可以了解情况。先生如有意见，希予示知。原件阅后请还我。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六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建议于1950年6月1日编印的《整党文件》，共收入中央关于整党的指示、中央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中央关于学习“斯大林毛泽东论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群众团结合作”的指示和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等12个文件。

给黄炎培[1]的信

（1950年6月7日）

任之先生：

介绍陈丕显同志和先生一谈。他是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是苏南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上次我给先生看的那份报告就是他写的。先生给我的意见书[2]一个月前就寄给陈同志看了，他表示对先生致谢意，但认为有些与事实未尽符合，谈时请详询之。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0年4月关于苏南征粮等项工作出现的偏差及补救办法写给毛泽东、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的两封长信。

在陈云关于经济形势和调整措施的报告稿[1]中加写的两段话

（1950年6月11日）

一

有些人提议由政府制订投资条例或公司法，我们认为有此必要，现正在起草中。

二

最近三个月来，中央劳动部召集了一次各省、市的劳动局长会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中央财政部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税务局长会议，详尽地讨论了有关劳资关系、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这三次会议均有私人工商业代表参加。我现在报告的，大都是这些会议的共同意见和结论。

---

[1] 这是陈云准备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作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作于1950年6月15日。

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日本情势的声明》时改写的一段话

（1950年6月12日）

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以来的历史，都是和历来的反动派，和各国帝国主义，和现在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一切妄想背道而驰。反动派的历史都是失败的历史，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反动派有时也显得很猖獗，取得一些镇压人民的“胜利”，但最后无不失败。革命人民有时也会遭受一些挫折，但最后无不胜利。全世界的历史都是这样写的，无一例外。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是最近的证据。

接受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6月12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波兰共和国总统所授予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

中波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久已存在。在世界反法西斯大战中，我们曾以无限的同情与关怀注视波兰人民的坚强英勇的斗争，今日对波兰人民重建祖国的辉煌的成就，更寄以极大的钦佩。

现中波两国政府及人民均正为世界和平的共同目标而继续努力奋斗，我相信，中波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益加密切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将会更加强与巩固了世界民主和平的阵营。

我热烈欢迎贵大使出任波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巩固两国友谊的工作中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贵国元首健康。

接受瑞典驻华大使阿马斯顿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6月12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瑞典王国国王所授予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中瑞两国人民之间已存在长期的友谊，在致力于世界和平的维护上，贵我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现在中瑞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巩固，且将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热烈地欢迎贵大使出任瑞典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贵大使加强两国合作的工作中，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50年6月，毛泽东在接受瑞典首任驻华大使阿马斯顿递交的国书后与其谈话。

给陈铭枢[1]的信

（1950年6月12日）

真如先生：

尊著[2]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

敬颂

健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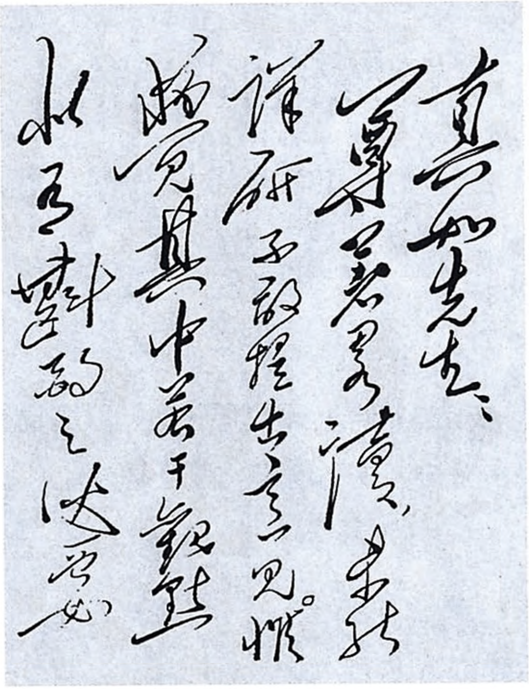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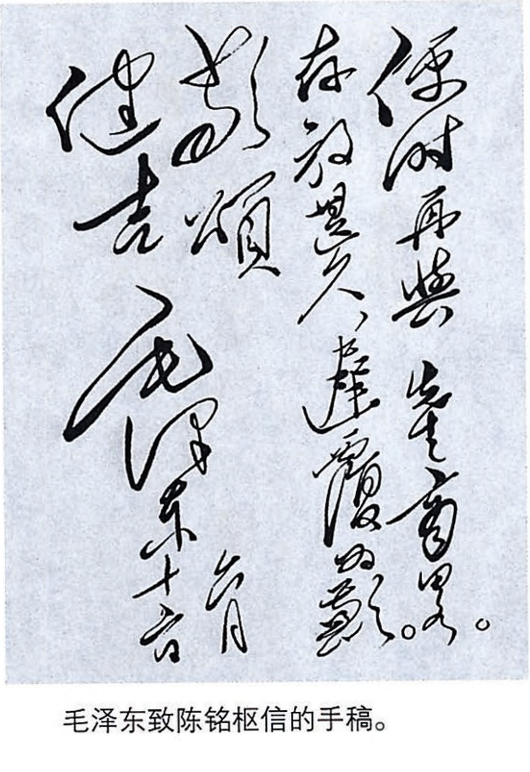
六月十二日

---

[1] 陈铭枢，字真如，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2] 指陈铭枢致毛泽东论佛法书。





真如先生：

[illegible]甚谢。详研[illegible]

俟时再与先生商量。[illegible]

[illegible]

健吉

毛泽东

[illegible]月十日

毛泽东致陈铭枢信的手稿。

给熊十力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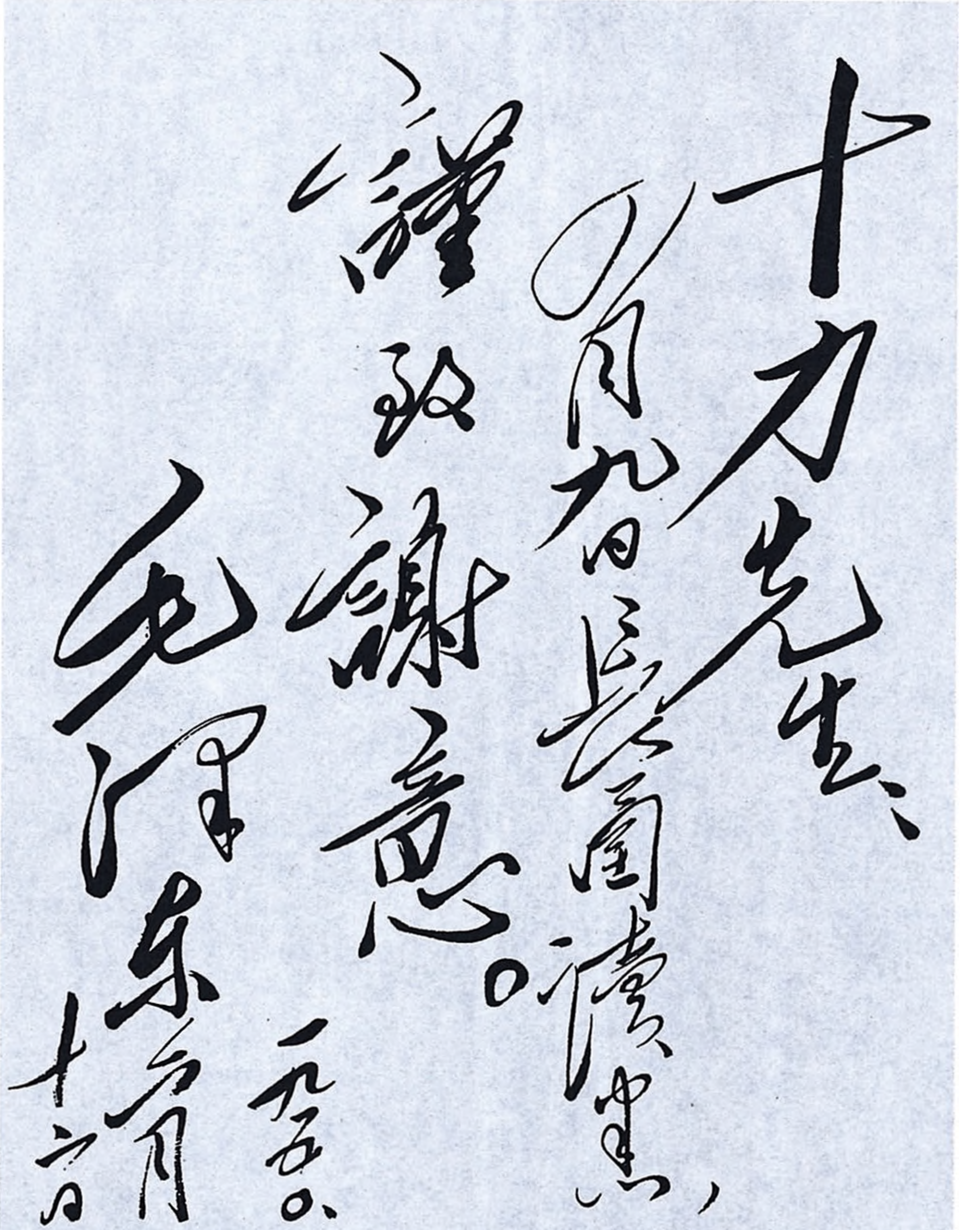
（1950年6月12日）

十力先生：

四月九日长函读悉，谨致谢意。

毛泽东

一九五〇、六月十二日



十力先生：

六月九日长函读悉，谨致谢意。

毛泽东

一九五〇、六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熊十力信的手稿。

给王首道[1]的信

（1950年6月14日）

首道同志：

毛泽覃同志的岳母周老太太[2]年已六十，住在湘潭韶山我的家里已有十余年，同当地人民的关系甚好，是一个好老人。她的女儿周文楠同志在沈阳法院工作，现回家去看老太太。老太太前有去东北依其女儿之意，但尚未作决定。如老太太去东北，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给以旅费的帮助。如可能，在通例上说得过去的话则帮助之，如不可能，则要她仍住现地不动，请与文楠同志商酌办理。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

[1] 王首道（1906—199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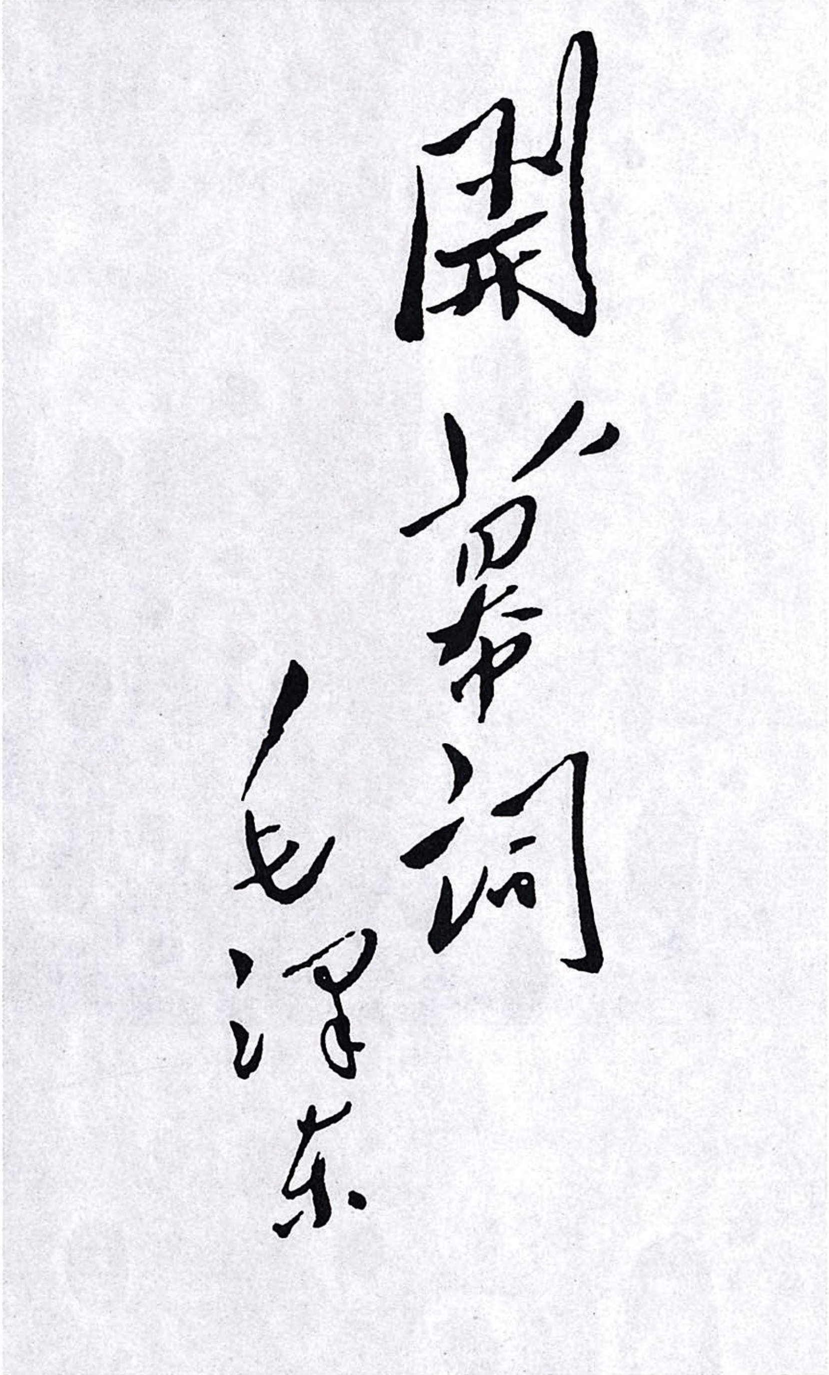
[2] 周老太太，即周陈轩。

为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幕题字

（1950年6月14日）

开幕词

毛泽东



開幕词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幕的题字。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0年6月14日、23日）

1950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

开幕词

诸位委员、诸位同志、诸位朋友们：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会。在这个

会议上，有会务工作、土地改革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军事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希望予以讨论。其中，以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希望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付之实施，首先使十余万正在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早日学习这个法案，以便在今年秋后大约有一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自然，其他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我相信，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的会议是会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进行巨大的工作，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正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闭幕词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

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四亿七千五百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

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

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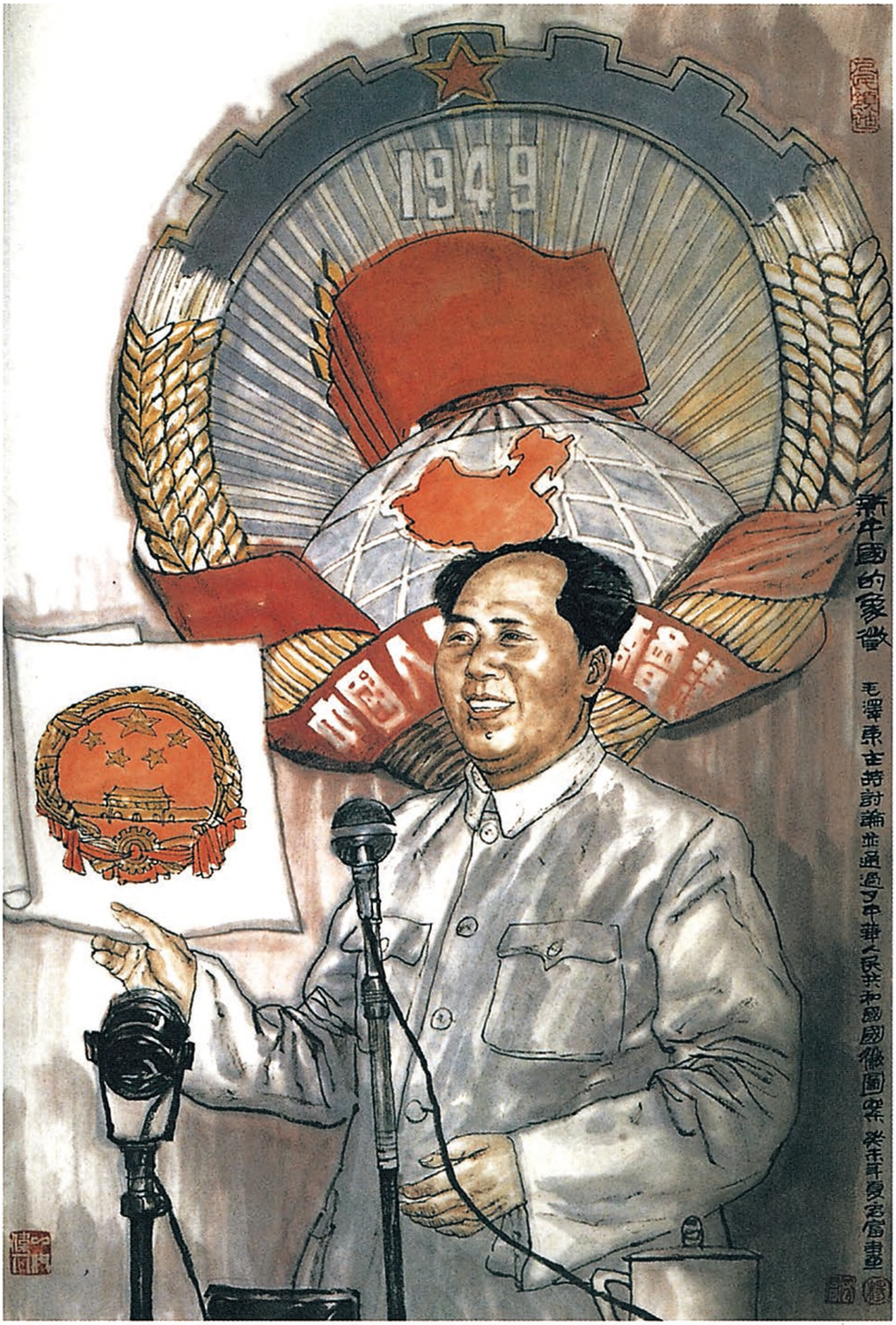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

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1949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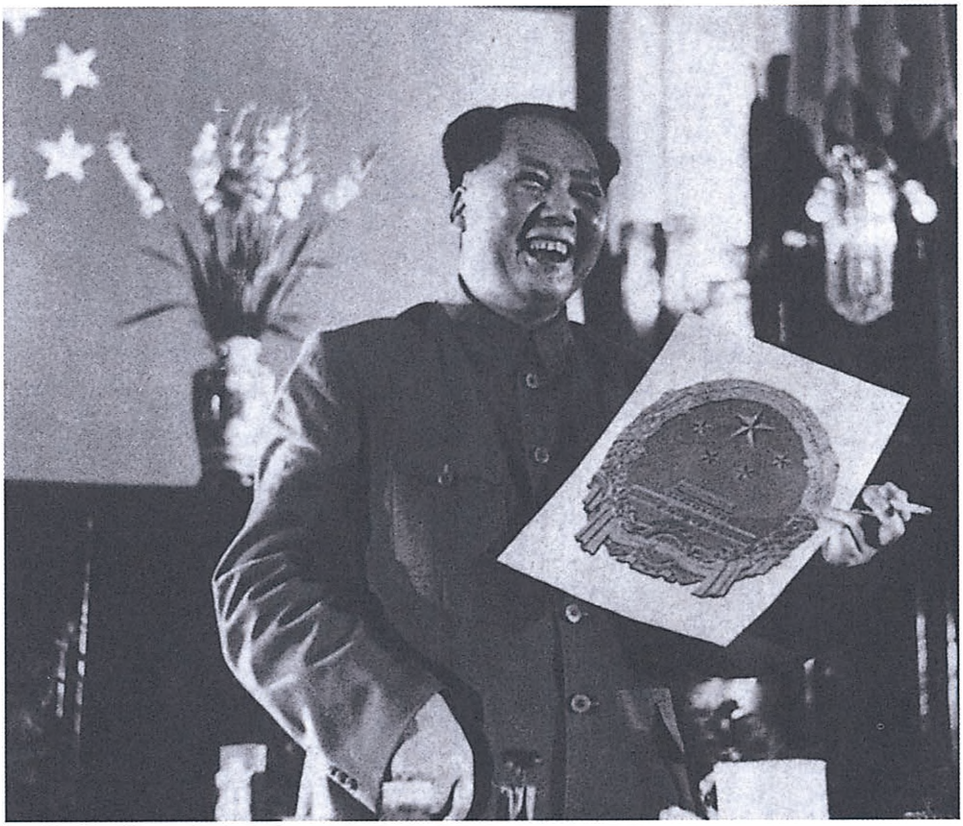
1950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手持拟议中的国徽图案，建议中央人民政府采用。


1949
新中國的象徵
毛澤東主持討論並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 癸未年夏宏富畫

《新中国的象征》（中国画）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讨论国徽图案。



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手持国徽图案的毛泽东。

1950年6月，毛泽东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讨论国徽图案。

1950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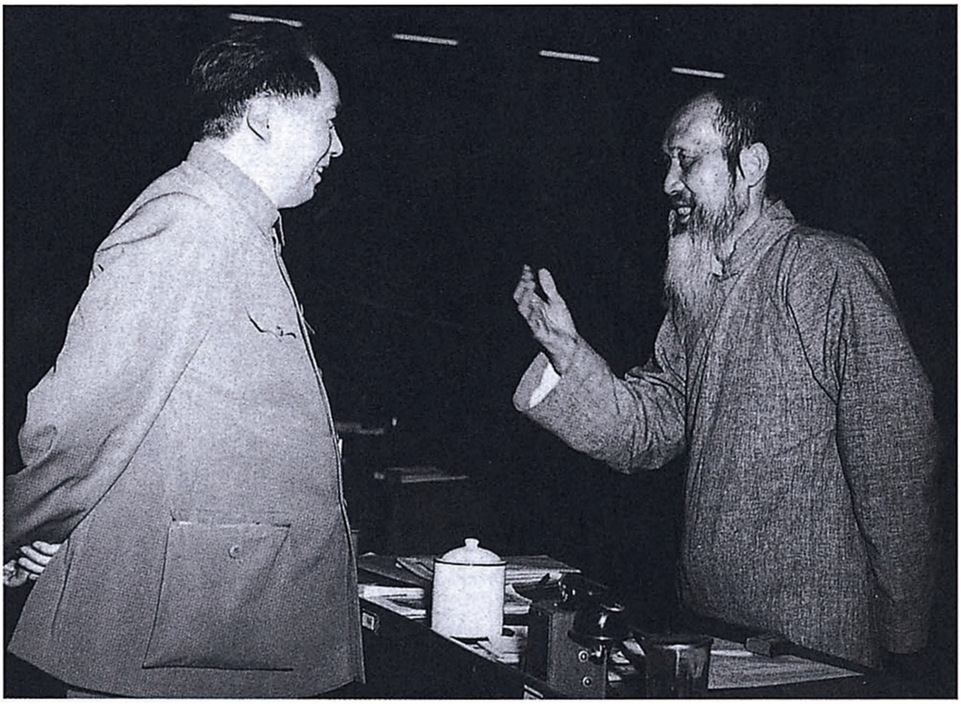
1950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1950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和胡乔木在一起。

1950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和新疆代表鲍尔汉交谈。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听取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汇报。



1950年6月，毛泽东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一起交谈。

1950年6月，毛泽东和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张喜若交谈。

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的毛泽东、朱德、宋庆龄。

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合影。

1950年6月，毛泽东和陈叔通（右二）、民建领导人黄炎培（右一）在北京。

对聂荣臻军事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0年6月15日）

一

周[2]：

此件请于十五日上午付印，下午即发给全委到会人。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一时

二

在这个时期[3]内，原在对方的许多爱国军人率部起义，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这对于迅速地瓦解敌军及较好地维持地方秩序，是起了作用的。

---

[1] 本篇二至五是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准备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时，加写的四段话。

[2] 周，指周恩来。

[3] 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作报告时这一段时间。

三

若从去年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之日算起至今年五月为止，则歼敌数为正规军一百八十三万人，非正规军及土匪九十八万人，共计二百八十一万人。

四

华东、中南、西南三区还没有详细的报告来。这三区荒地较少，军队垦荒不多，但种菜养猪等工作则已在普遍地进行。西南区的人民解放军因剿匪还是严重任务，其生产任务今年尚不能过多。

五

为此目的[1]，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包括起义部队在内，必须巩固地团结起来。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必须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看不起起义部队和地方部队，而要谦虚谨慎，耐劳耐苦，对敌人很勇敢，对同志对人民则很和气，借以团结全军全民完成自己光荣伟大的任务。

---

[1] 指将人民解放军提高一步，发展空军、海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建设，足以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行为，有效地保卫国家的安全，巩固国际的和平事业。

对中南军区党委关于部队整党工作指示的批语[1]

（1950年6月16日）

发给各军区党委参考。[2]

中南军区既能够一面办理复员工作，一面进行整党，则其他军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转发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关于部队整党工作指示写的批语。

[2] 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指示的主要内容：（一）战争胜利后，在干部中所产生的功臣自居、松弛懈怠和贪图享乐的思想情绪，更加助长了骄傲自满，不求进步，不尊重地方，不遵守政策，不爱护群众，不关心下级和战士等不良作风的发展。这种思想作风如不予以防止与清除，要使我们部队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建设成为一支现代正规化的国防军是困难的。同时要能很好参加土改工作，执行工作队的任务，也是不可设想的。为此，在中央和中南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一次普遍的、有领导有步骤的整风运动，从整风中达到有效地整顿我军的思想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是有极重大意义的。（二）整风的基本内容，首先是克服战后滋长着的功臣自居、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其次是克服战后滋长着的松弛、懈怠、不前进，再次是克服战后滋长着的贪图享乐情绪。（三）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政策纪律的重点，首先放在团以上领导干部，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团以下干部的整风学习和广大战士的思想教育。（四）整风学习的成绩好坏，在于能否克服各种不良的思想情绪，能否把工作作风与领导作风整顿好。

区亦可照此进行，不必等到秋后。

军委总政
六月十六日

给马叙伦[1]的信

（1950年6月19日）

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殊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以上请考虑酌办。

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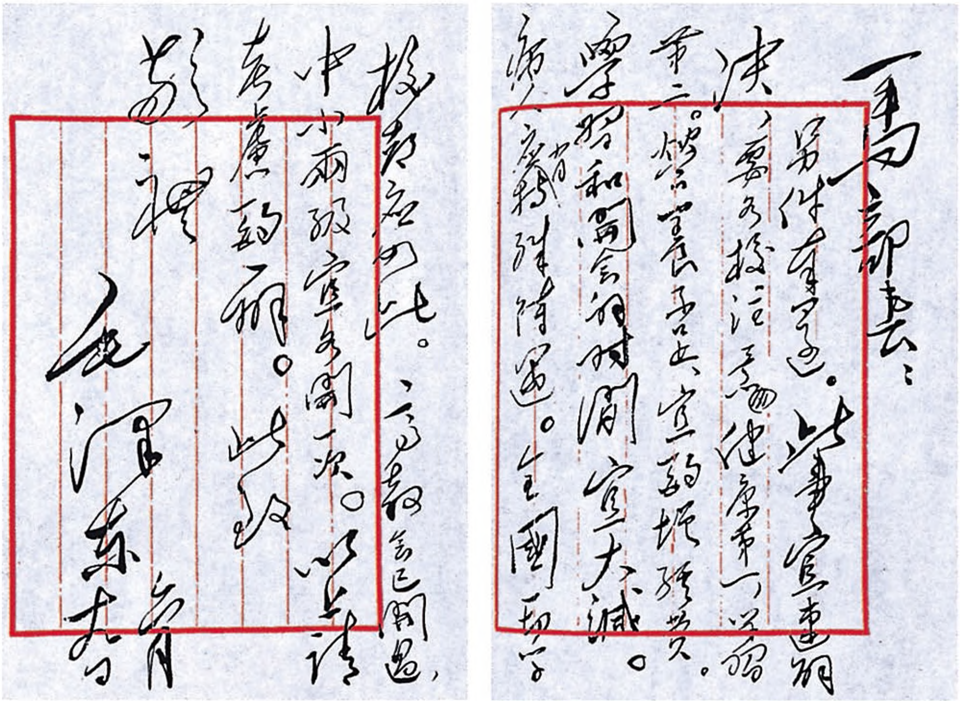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

[1] 马叙伦（1885—1970），字夷初，浙江杭县（今余杭）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教育部部长。



马部长：

另件奉还。此事宜速解决，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的时间，宜大减。病人宜另编班隔离。全国一切学校均应如此。高教会已开过，中小两级宜各开一次。此事请考虑酌办。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十九

毛泽东致马叙伦信的手稿。

1950年6月，毛泽东和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代表合影。

1950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代表。

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全体会议代表合影。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6月24日）

团长阁下：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团长呈递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团长的热忱祝贺。

自从伟大的苏军粉碎了希特勒的反动的国家机构以后，中国人民就高兴地注视着德国人民民主运动的发展。自从新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贵国总统威廉·皮克先生领导之下建立起来，即此就成为德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以后，中国人民就更加高兴，感觉自己增加了一个很好的和有力的朋友。恰好在这种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中国人民革命已经获得了全国的胜利，我国和贵国就迅速地建立了外交关系。毫无疑义，贵我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贵我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与巩固，并且将使世界持久和平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的大使衔的团长，并愿对贵团长加强两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接受丹麦驻华公使穆克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6月24日）

公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公使呈递的丹麦国国王陛下的国书，并感谢贵公使的祝贺。

中丹两国人民之间是存在着友谊的，在致力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和平的维护上，我相信贵我两国人民又有着共同的愿望。现中丹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无疑将使已存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我并且希望其将有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热烈地欢迎贵公使出任丹麦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公使，并愿对贵公使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给张峻明[1]的信

（1950年6月27日）

峻明先生：

六月二十日来信收到，甚为感谢。反映各种情况，极为高兴。湖南现正开始干部整风，几个月后，某些缺点或可改正，但究竟如何，还要看整风教育是否得力。乡间情形如有所见，尚祈随时示知为盼。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

[1] 张峻明，毛泽东的同学张超的侄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担任主事期间和他有过接触。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50年6月28日）

一

中国人民早已声明，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2]，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这对于中国和亚洲人民很有利益。美国对朝鲜、菲律宾、越南等国内政的干涉，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因为它

---

[1]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他就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所发表的声明的报告，委员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毛泽东发表了讲话，本篇一和二是讲话的一部分。

[2]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政府解放台湾。美国第七舰队随即奉命向台湾沿海出动。

没有人民的支持。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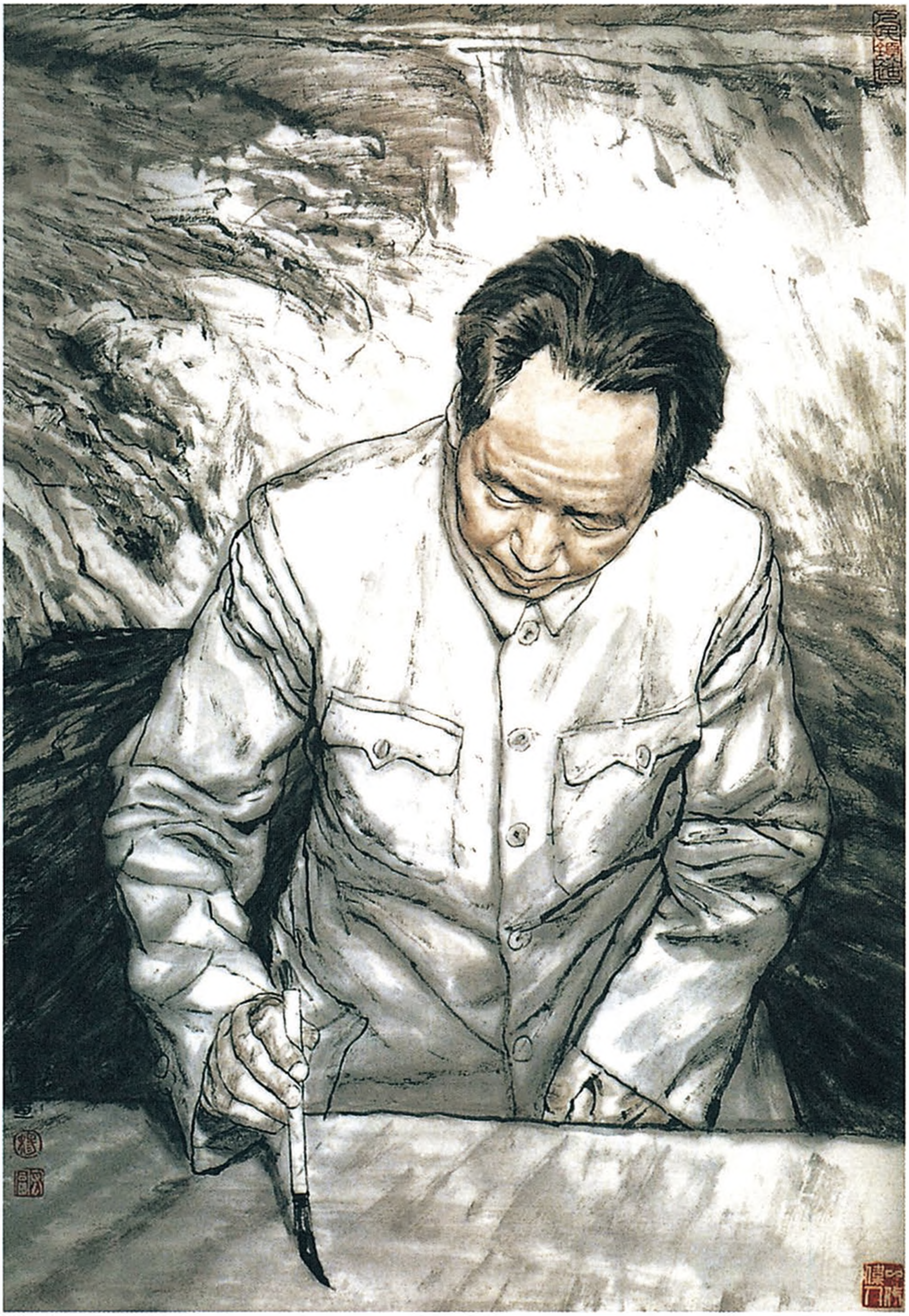
我们也要加强军事准备，目前的做法是减少陆军，增加海空军。减少陆军是因为要使国家财政的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向稳定。一九五〇年的概算中，关内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开支用在军事以及政府机关的行政开销，而且主要的是用在陆军方面，因此陆军是要予以缩减的。海军和空军应该加强，尤其是空军，更应该要加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对于头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应付，只得凭不怕死，凭勇敢，凭牺牲精神。然而在今天，我们有了建立和加强海空军的条件，因此也就应该着手建立起来。现在是把破烂的东西修理起来，并请专家，买飞机，以及尽一切办法搞好海军阵容。这一切就是说明，我们没有把战争忘记，我们是有准备的。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1950年6月，毛泽东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



《心潮逐浪高》（中国画）

为《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给刘少奇的信

（1950年6月29日）

少奇同志：

此件[1]已阅，请于今日下午八时前送交乔木[2]，连同土地法在明日发表。

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法国在拿破仑第一时代及其以前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国是经过资本主义侵入农村破坏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们这样的土地改革。德国意大利大体也是如此，但比英国还不彻底，还保存了许多封建遗踪。日本则封建的土地制一直严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国人进行一种极不彻底的“土地改革”，现在仍有严重的封建主义[3]。美国则从来没有封建主

---

[1] 指刘少奇1950年6月1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3] 日本曾于1945年12月和1946年10月在当时的美国占领当局——盟军总司令部的干预下，先后进行过两次土地改革（在日本通称为“农地改革”或“农地解放”）。第一次改革极不彻底，以夭折而告终。第二次则比较彻底，到1950年8月1日，日本农村自耕农田面积在农田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已上升到90.01%，佃耕农田面积的比重则下降到9.9%，封建的土地制度已基本上被消灭。

义，由欧洲移民进去一开始就生长资本主义的农业，故农村市场特别广大。只有林肯[1]时代解放美国南部几州的农奴[2]，是一种反奴隶制的斗争。各国历史既如此复杂，大都和我国现在这样先进行土改，后发展工业的情况不相同，故以不写国际历史一段为宜。国际历史和中国相同者，只有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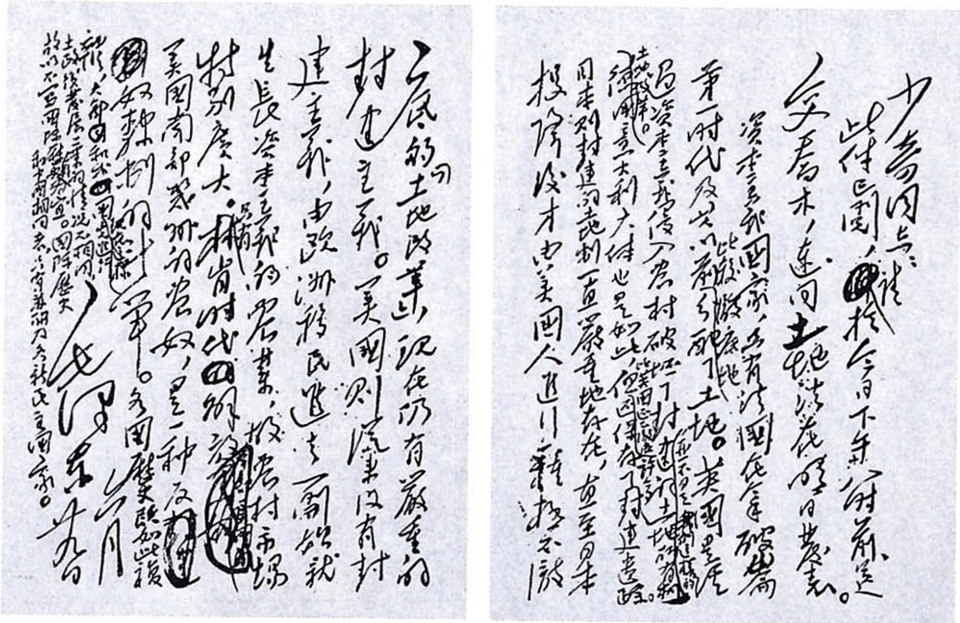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六月廿九日

---

[1] 林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他主张维护联邦统一，逐步废除奴隶制度，在1862年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

[2] 这里的“农奴”应为“奴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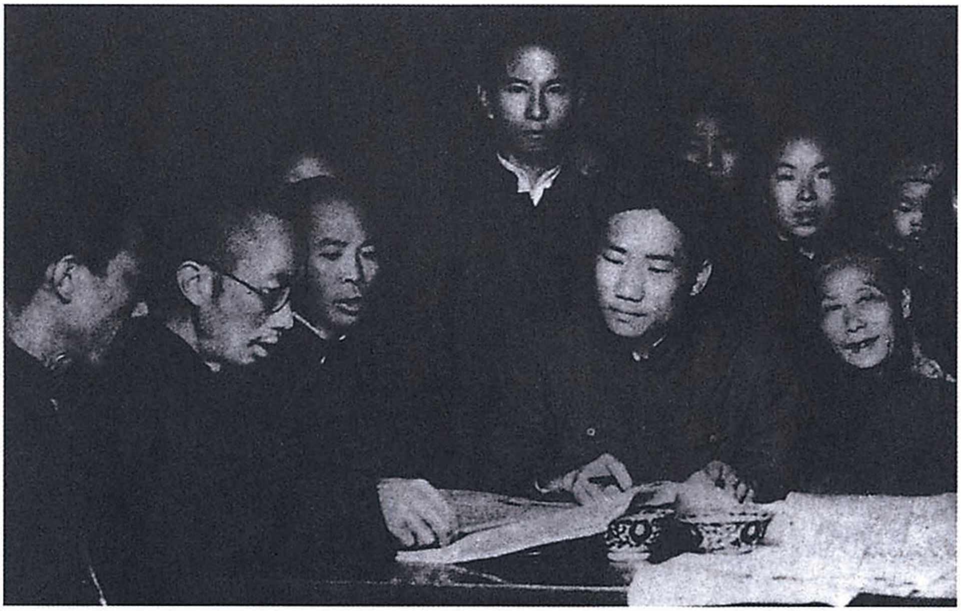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手稿。

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

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一公布就受到了数万万农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1950年起，中国广大农村开始了土地改革。图为农民在分土地。



1950年，毛岸英回湖南宣传土地改革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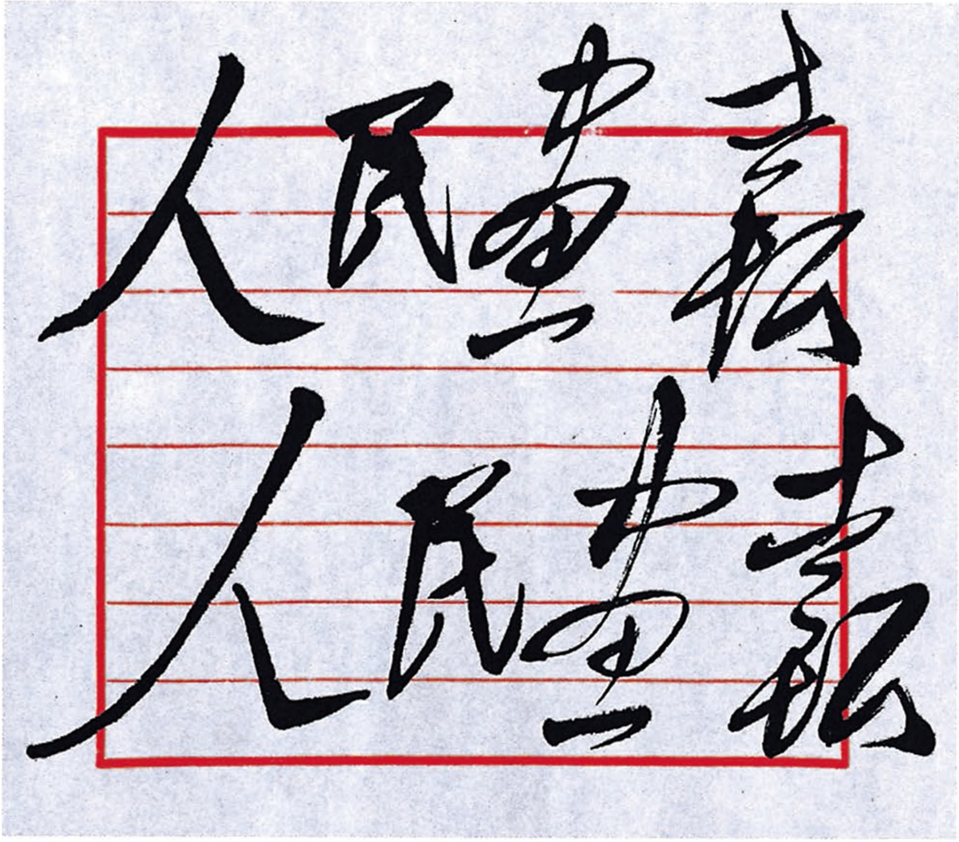
为《人民画报》题名[1]

（1950年6月）

人民画报

---

[1] 1950年6月，毛泽东为《人民画报》题写刊名。1950年7月20日，全国性的大型画报《人民画报》正式创刊。《人民画报》是我国第一家大量使用彩色胶片和实现彩色印刷的期刊。



毛泽东为《人民画报》题写的刊名。

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1]

（1950年7月2日）

越共中央，并告陈赓[2]：

同意你们六月二十八日电先打高平的意见，并可于陈赓和你们会面时作最后决定。以后你们如何作战，由你们自己根据具体情况作决定。我们如有意见，只是当作你们的参考材料，因为你们比我们熟悉情况。

中共中央
七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越共中央的电报。

[2]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此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7月3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小呼拉尔主席团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

中蒙两国人民之间原已存在有密切的关系，数十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挑拨离间，隔断了彼此间的来往。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已基本胜利了，中蒙两国的外交关系业已建立，我相信，这不但将使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与巩固，而且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粟裕来京接受重要任务[1]

（1950年7月6日）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2]：

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毛泽东

七月六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批语[1]

（1950年7月7日、8日、13日）

一

荣臻同志：

本日会议决议事项[2]同意，请即按此执行。原件存我处。

毛泽东

七月七日廿四时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7月7日关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的决议事项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50年7月7日夜关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的决议事项报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50年7月13日呈送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的批语。

[2] 指1950年7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的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的决议事项。共五项：一、部队调动部署。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限七月底全部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二、指挥机构组织。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肖华为副政委。三、后勤工作准备。四、兵员补充准备。统由总后勤部订出实施计划，限期完成。五、政治动员工作。总的是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政治动员，具体计划由总政治部起草一个指示。

二

同意，照此施行。

毛泽东
七月八日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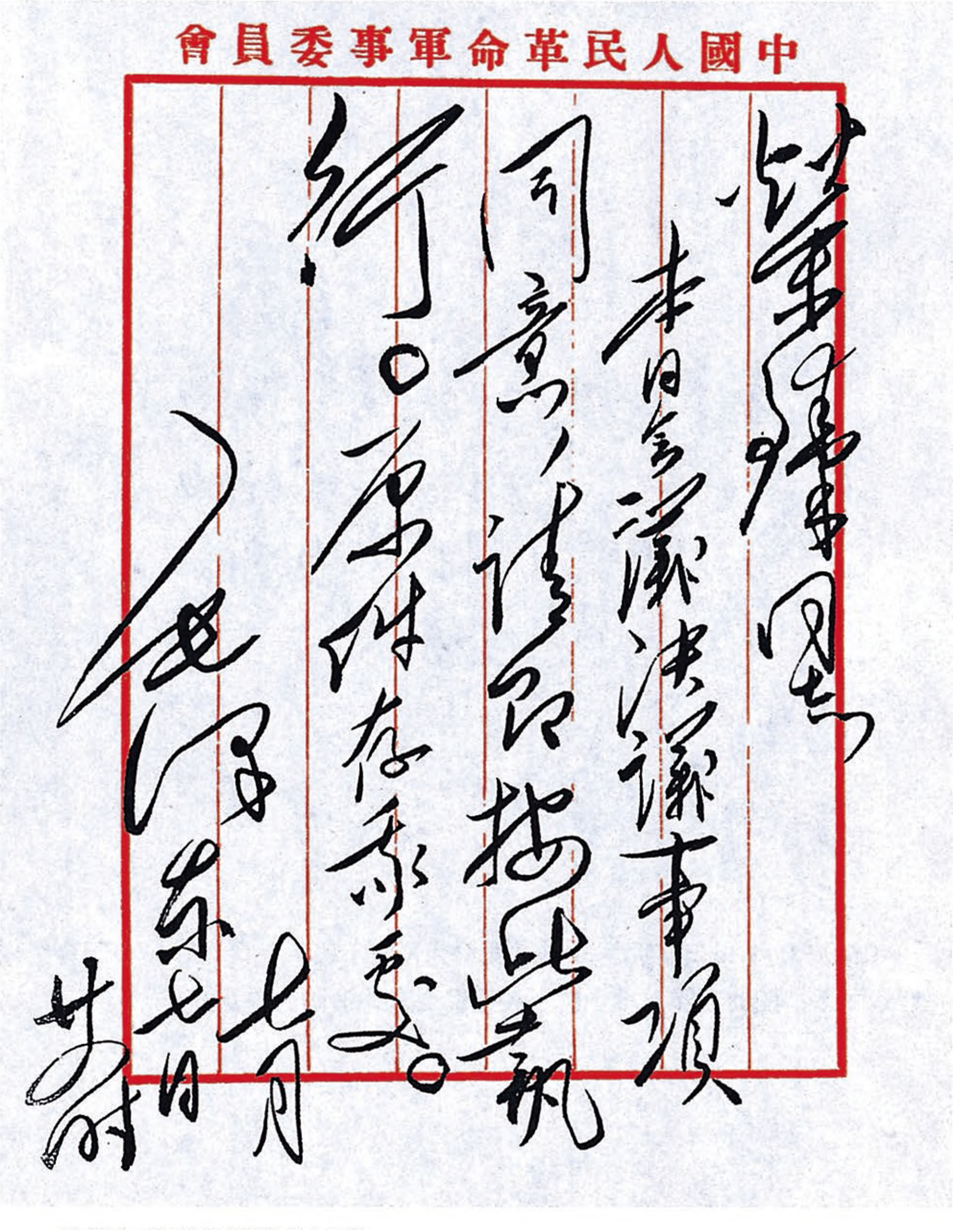
同意，照此执行。[1]

聂另抄存案并照办，原件还我。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以第十三兵团所属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二军，以及炮兵三个师等部队，共二十五万五千人左右，组成东北边防军，限八月五日前到达中朝边境地区集结。边防军指挥机构，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以第十五兵团部为基础组成第十三兵团部，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炮兵、战车、工兵、高射炮兵部队由万毅指挥。成立东北空军司令部，以段苏权任司令员。政治动员工作，总的是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决定》并对部队车运计划、集结地域、后勤工作准备、兵员补充准备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周恩来1950年7月13日向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呈送《决定》，并附报告说：“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请主席再次批准，交总参谋部作为各项实施之根据”。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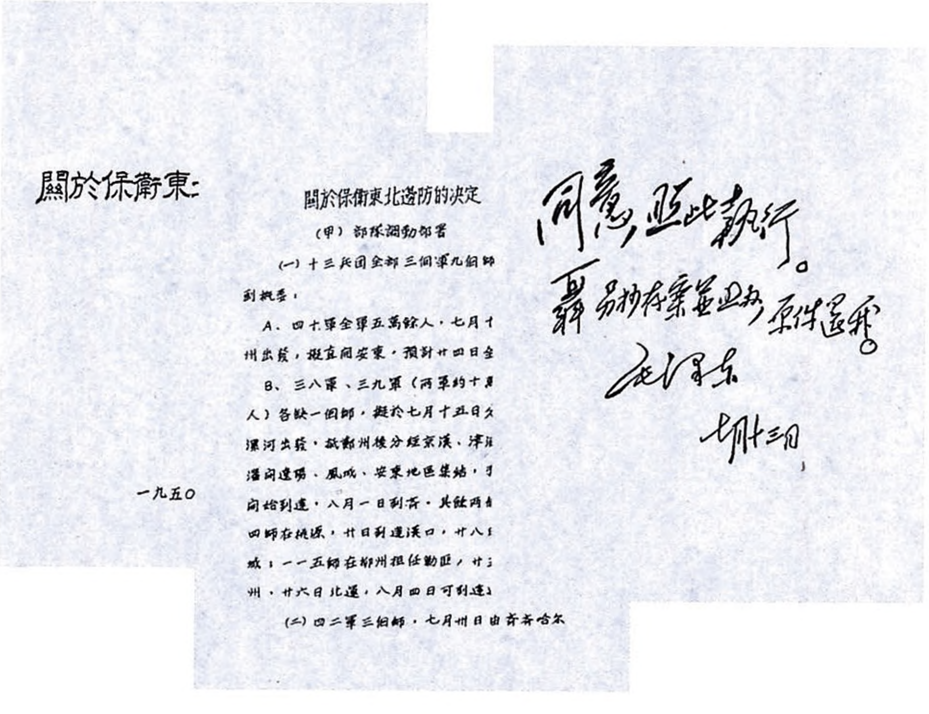
荣臻同志：

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照此执行。原件存尔处。

毛泽东

七月七日廿时

毛泽东致聂荣臻信的手稿。



關於保衛東

一九五〇

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

（甲）部隊調動部署

（一）十三兵団全部三個軍九個師

到概要：

A、四十軍全軍五萬餘人，七月十

州出發，擬直開安東，預計廿四日全

B、三八軍、三九軍（兩軍約十

人）各缺一個師，擬於七月十五日

漯河出發，經鄭州後分經京漢、津

瀋陽遼陽、鳳城、安東地區集結，

向始到達，八月一日到齊。其缺兩

四師在桃源，廿日到達漢口，廿八

城；一一五師在鄭州擔任勤務，廿

州，廿六日北運，八月四日可到達

（二）四二軍三個師，七月卅日由齊齊哈

同意，照此执行。

聂另抄存案并退我，原件退我。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为预防不测，毛泽东和中央下令组成东北边防军。图为毛泽东批示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粟裕休养暂缓来京[1]

（1950年7月10日、17日）

一

粟裕同志，并告陈、饶[2]：

来电悉。有病应当休养可以缓来，但仍希望你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

毛泽东

七月十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本篇二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唐亮、参谋长张震和副参谋长周骏鸣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二

华东局，唐、张、周转粟裕同志：

毛主席前电粟要他于八月上旬来京，依情况或留京休养或担任工作。现粟已去青岛休养，甚好。请粟于八月上旬来电报告身体情况。如病重则继续在青岛休养，不要来京，如病已愈则盼来京。

军委

七月十七日

在程潜[1]关于解决湖南夏荒问题的信上的批语

（1950年7月11日）

中南局、湖南省委：

兹将程潜所提关于湖南民食的意见发给你们。所称再拨二千万斤赈济米一点请即加研究，如有必要宜即照拨并宜速办。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

1950年，毛泽东和程潜在一起交谈。

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实行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1]

（1950年7月12日）

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及军区：

在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为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不应如主力一样为党委制，以便吸收起义将领参加一起工作，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兹将绥远[2]改造傅部[3]经验一件发给你们作参考，请你们指导所属有关部分注意研究此种经验。

军委

七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及各军区的电报。

[2] 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3] 傅部，指原隶属傅作义的董其武部。该部于1949年9月在绥远宣布起义，12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

为李银桥[1]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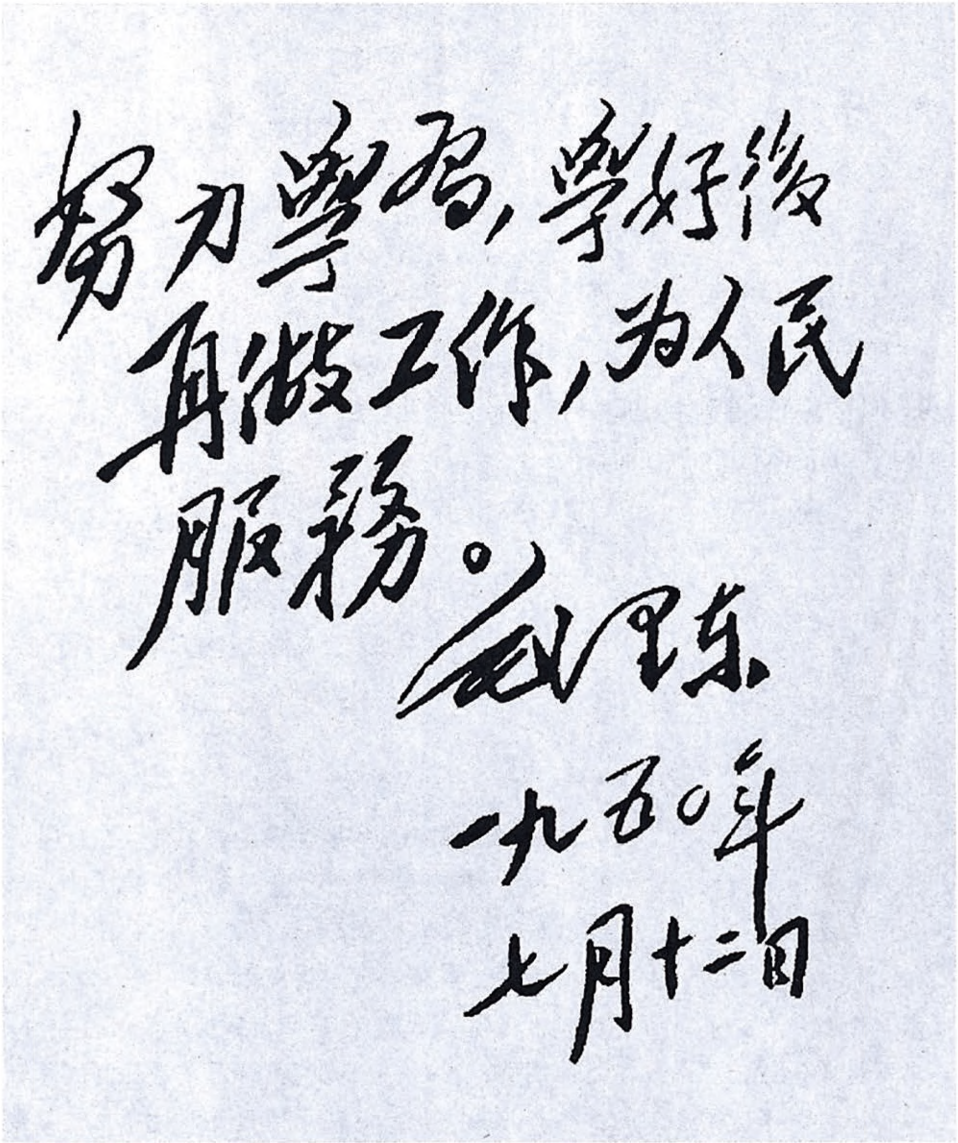
（1950 年 7 月 12 日）

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

---

[1] 李银桥（1927—2009），曾先后任毛泽东的卫士、副卫士长、卫士长。1950 年，当李银桥从报上看到中直机关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招生启事后，便向毛泽东汇报了去上学的想法。临行前，他拿出一个黑漆皮面的练习本，请毛泽东题词留个纪念。毛泽东提起笔，想了想，便在第一页上行云流水一般写出："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二日"。



努力學習，学好後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務。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

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为李银桥的题词。

同意对董宋珩罗广文两部实行混编[1]

（1950年7月15日）

粟、唐、周、张[2]，并告陈、饶[3]：

午寒电悉。既然董、罗亦有思想准备，我们同意你们的混编办法，但请你们注意混编时的政治说服工作，使董、罗及其干部感到满意，以便争取他们进步和安心工作。

军委

七月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电报。董宋珩、罗广文，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12月，董宋珩、罗广文先后率部在成都地区起义，起义后部队开到华东地区进行改编。

[2] 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唐，指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指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张，指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参谋长。

[3]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关于北京农业大学领导问题的批语[1]

（1950年7月16日）

一

这个报告里所表现的作风是不健全的，□□□思想中似有很大的毛病。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

二

必须彻查农大领导，并作适当的处理。此件应与□□□六月二日的报告一并讨论。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

---

[1] 北京农业大学主要领导人1950年6月2日写给刘少奇的《由米丘林莫尔干学说到团结问题的报告》，对别人反映他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对待摩尔根学派问题上犯有简单粗暴的错误，有所说明和辩解。毛泽东的第一个批语，就是写在这个报告上的。第二个批语写在1950年7月5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给李维汉的信上，随信附有北京农业大学一位助教反映该校主要领导人工作中的问题的一封信。

中央转发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0年7月18日）

各中央局，分局，各军区党委，并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及军师党委：

兹将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六月十一日关于匪特暗害阴谋及我保卫工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充分注意，指导所属加强保卫工作，彻底粉碎国民党匪特的暗害阴谋，有效地保卫一切党的领导同志、工作干部及党外民主人士，是为至要。

中央

七月十八日

关于祝贺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的电报和批语

（1950年7月18日）

一

德国统一社会党皮克[1]同志及中央委员会全体同志们：

承你们邀请我党派遣代表参加贵党七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三日的代表大会，我们极感荣幸。我们现已派本党中央委员王稼祥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前往柏林参加你们的大会，并致祝贺。

我在这里遥祝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完满成功，整个德国被帝国主义者强迫分裂的现象早日结束，完整的统一的民主的德国早日建立，德国整个民族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早日获得解放。

伟大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八日于北京

---

[1] 皮克，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

二

请周[1]于**今日下午**交外交部译好，并**电发柏林**，务使柏林于明十九日能收到，并抄一份给德驻京大使。原稿用后交胡乔木[2]发表。

毛泽东

---

[1] 周，指周恩来。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对关于在东北地区部署中苏空军作战部队报告的批语[1]

（1950年7月18日）

同意。[2]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常乾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副政治委员王弼和参谋长王秉璋1950年7月18日报告的批语。

[2] 刘亚楼、常乾坤等的报告说：根据东北现有机场状况并经过与顾问同志商讨结果，对于我空军第四混成旅及苏联即将派来的一个空军喷气式驱逐机师之部署，作如下之建议：我第四混成旅在南京、徐州地区编组完成后，即转移到东北地区；以两个驱逐团及混成旅部驻安东，一个轰炸团驻四平或海龙。苏联来的一个喷气式驱逐师，则准备以师部及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六个空军团配置在沈阳周围。上述各地机场、房屋、道路，据我们派人实地侦察，基本上都可利用现有的。

对吴耀宗[1]等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的批语

（1950年7月19日）

周[2]：

吴耀宗文件[3]是很有用的，请考虑用内部文件方式电告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委，并要他们注意赞助。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吴耀宗，当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

[2] 周，指周恩来。

[3] 指吴耀宗等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提出中国基督教会及团体的基本方针应是：肃清基督教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警惕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反动阴谋；培养一般信徒的爱国民主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这个宣言后来在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

1950年，毛泽东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人吴耀宗交谈。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8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9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9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2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给吴启瑞的信……1
（1950年7月19日）

关于苏联来华之空军师的驻地和我空军混成旅改装训练问题……3
（1950年7月20日）

要根治淮河……5
（1950年7月至9月）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整风工作报告的批语……8
（1950年7月21日）

同意华东军区对金门岛敌情的判断与截击部署……9
（1950年7月21日）

关于东北边防军统由东北军区指挥与供应的批语……10
（1950年7月23日）

反对南非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法案”……11
（1950年7月26日）

应先打小仗然后才有可能打较大的仗……12
（1950年7月26日）

同意四十三军的集结位置……13
（1950年7月27日）

关于炮兵观察队赴朝鲜前线考察问题的批语……14
（1950年7月）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十周年题词 ……16
（1950年7月）
为中央民族访问团题词 ……18
（1950年7月）
为《新体育》杂志题名 ……20
（1950年7月）
为《西江报》题写报头 ……21
（1950年7月）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22
（1950年8月1日）
关于从班禅集团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的电报 ……26
（1950年8月3日）
关于钱昌照建议的批语 ……27
（1950年8月3日）
军委转发十九兵团复员工作报告的批语 ……28
（1950年8月4日）
东北边防军应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29
（1950年8月5日）
给黄炎培的信 ……31
（1950年8月5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不要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指示的批语 ……32
（1950年8月6日）
关于公开批评宣化市错误问题的批语 ……33
（1950年8月6日）
对中财委关于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的批语 ……34
（1950年8月7日）

接受缅甸驻华大使吴敏登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36
（1950年8月7日）
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38
（1950年8月9日）
在一封反映大学毕业生分配中学用不一致问题来信上的批语 ……40
（1950年8月8日）
给粟裕的信 ………………………………………………………………41
（1950年8月8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区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初步总结的批语 …43
（1950年8月9日）
给蒋竹如的信 ……………………………………………………………44
（1950年8月10日）
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的指示 ………………………………………………45
（1950年8月11日）
对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 ………………47
（1950年8月12日）
同意周恩来拟同印度驻华大使会谈的内容 ……………………………48
（1950年8月14日）
关于边防军务必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致高岗电 …………50
（1950年8月18日）
询问向昌都进军的几个问题 ……………………………………………51
（1950年8月18日）
对王明来信的批语 ………………………………………………………52
（1950年8月18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组织人民法庭指示的批语 ………………………53
（1950年8月19日）

对上海党政群机关团体编制情况报告的批语 ……………………54
（1950年8月20日）
给徐海东的信 ……………………………………………………55
（1950年8月20日）
对配备第二线兵力报告的批语 ……………………………………57
（1950年8月20日）
力争今年占领昌都明年进军拉萨 …………………………………58
（1950年8月23日）
尽快筹备进军西藏所需高空运输机 ………………………………60
（1950年8月23日、24日）
给夏百源的信 ……………………………………………………62
（1950年8月23日）
给李漱清的信 ……………………………………………………63
（1950年8月23日）
给蒋浩然的信 ……………………………………………………64
（1950年8月23日）
给罗石泉的信 ……………………………………………………65
（1950年8月23日）
边界战役须有连续作战的思想 ……………………………………66
（1950年8月24日）
准备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 ……………………68
（1950年8月25日）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整风经验报告的批语 ………………………69
（1950年8月26日）
给徐悲鸿的信 ……………………………………………………70
（1950年8月26日）

帮助越南训练和装备新兵 ……………………………………71
（1950年8月26日）
中央关于中央局负责人来京开会的通知 ……………………73
（1950年8月27日）
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 …………………………………74
（1950年8月27日）
对选派干部去朝鲜战场了解情况报告的批语 ………………75
（1950年8月27日）
对华东局关于整理华东各级党刊的决定的批语 ……………76
（1950年8月28日）
关于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京谈判的批语 ……………78
（1950年8月29日）
关于催促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京的批语 …………………79
（1950年8月29日）
给陈寄生的信 ………………………………………………80
（1950年8月29日）
给郭梓材的信 ………………………………………………81
（1950年8月29日）
给越南民主政府的贺电 ……………………………………82
（1950年8月29日）
给谭世瑛的信 ………………………………………………83
（1950年8月31日）
对当前工作的指示 …………………………………………84
（1950年8月）
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88
（1950年9月1日）

关于中央系统整风工作领导问题的批语 ……………………………89
（1950年9月1日）
给黄炎培的信 ……………………………………………………90
（1950年9月1日）
对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等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信 …………………91
（1950年9月1日、3日）
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 …………………………………………94
（1950年9月5日）
关于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签名运动的批语 ………………………97
（1950年9月8日）
九兵团全部开到徐济线整训 ………………………………………98
（1950年9月8日）
请周恩来约谈柴君武指示任务和方法 ……………………………99
（1950年9月8日）
中央转发川南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报告的批语……………………101
（1950年9月9日）
中宣部转发东北局关于学校整风的指示的批语……………………102
（1950年9月9日）
中央转发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情况报告的批语…………………104
（1950年9月9日）
关于失业工人救济问题的批语……………………………………105
（1950年9月9日）
开展连队民主运动加强战斗力……………………………………106
（1950年9月9日）
在一封匿名信上的批语……………………………………………107
（1950年9月9日）

关于整党中应注意检查统一战线工作的批语……………………110
（1950年9月11日）
给陈郁的信……………………………………………………111
（1950年9月11日）
对关于铁道兵团领导关系报告的批语……………………………113
（1950年9月11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政府直属机关整风经验的批语…………………114
（1950年9月12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改造绥远起义部队的报告的批语…………115
（1950年9月12日）
关于检查督促政府各部门向中央报告工作的批语………………116
（1950年9月13日）
在薄一波送审的一九五一年预算草案上的批语…………………117
（1950年9月13日）
同意陆军大学设在南京……………………………………………118
（1950年9月13日）
复南非联邦杜邦城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电……………119
（1950年9月13日）
同意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在上海设办事处…………………………120
（1950年9月14日）
希望各军区党委报告第一期整风情况……………………………122
（1950年9月16日）
关于区域自治问题的批语…………………………………………123
（1950年9月16日）
粤桂等地军事部署及对剿匪等项工作的指示……………………124
（1950年9月16日）

军委关于广西我军注意不要超出国界的电报……………………126
（1950年9月16日）
关于抗议美机美舰对我侵袭问题的批语……………………………127
（1950年9月16日）
关于各大区在天津设联合办事处问题的批语………………………128
（1950年9月16日）
对云南军区关于复员军人复审工作报告的批语……………………129
（1950年9月18日）
给张维的信……………………………………………………………130
（1950年9月19日）
贺张维母王老夫人八十寿辰联………………………………………132
（1950年9月19日）
在华北局关于工农业情况和意见的综合报告上的批语……………134
（1950年9月20日）
给罗荣桓的信…………………………………………………………135
（1950年9月20日）
关于立即停止在韶山为毛泽东建房给黄克诚等的信………………136
（1950年9月20日）
在争夺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是很有利的…………………………138
（1950年9月21日）
中央关于华北局各项报告处理情况的电报…………………………140
（1950年9月24日）
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141
（1950年9月25日）
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题词………………………………………144
（1950年9月27日）

在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上的批语……152
（1950年9月27日）
转发关于长期作战问题致朝鲜同志电……153
（1950年9月27日）
对《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的修改……155
（1950年9月28日）
在宣传中不说打台湾西藏的时间……156
（1950年9月29日）
务使确有把握每战获胜……157
（1950年9月29日）
接受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彼得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58
（1950年9月30日）
为萌芽学校题名……159
（1950年9月）
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名……161
（1950年9月）
东北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166
（1950年10月2日）
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167
（1950年10月2日）
无法北撤的朝鲜人民军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170
（1950年10月2日）
关于我赴朝武官参观组的任务……171
（1950年10月4日）
对公安部队建设报告的批语……172
（1950年10月5日）

为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题词……………………………………………174
（1950年10月5日）
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题写校牌………………………………………………176
（1950年10月5日）
先歼东溪西南被围之敌再歼高平南逃之敌…………………………………177
（1950年10月6日）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78
（1950年10月8日）
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180
（1950年10月8日）
关于援助朝鲜事务的处理……………………………………………………183
（1950年10月9日）
开辟敌后战场在战略上是必须的有利的……………………………………184
（1950年10月10日）
中国同志必须随时检讨自己的方法和态度…………………………………185
（1950年10月10日）
同意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待机歼敌…………………………………187
（1950年10月11日）
关于全歼拉本兵团及七溪守敌………………………………………………189
（1950年10月11日）
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190
（1950年10月11日）
关于接济湖南教育界老人给王首道的信……………………………………191
（1950年10月11日）
关于九兵团提前北上致陈毅电………………………………………………192
（1950年10月12日）

十三兵团仍在原地训练……………………………………………………193
（1950年10月12日）
东北各部队和宋时轮九兵团仍在原地整训……………………………194
（1950年10月12日）
转发总政治部关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总结报告的批语………195
（1950年10月12日）
对航空学校是否迁移报告的批语………………………………………196
（1950年10月12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青年工作会议题词……………………………197
（1950年10月12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199
（1950年10月13日）
关于停止追击由七溪逃往那岭之敌……………………………………201
（1950年10月13日）
宋时轮九兵团到泰安曲阜区域集结待命………………………………202
（1950年10月14日）
朝鲜情况和对我军入朝参战的意见……………………………………203
（1950年10月14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205
（1950年10月14日）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保护问题的批语……………………………………207
（1950年10月14日）
可以通知法国派飞机投掷粮食及运走重伤员…………………………208
（1950年10月14日）
关于立即前运志愿军粮食致高岗等电…………………………………209
（1950年10月15日）

志愿军参战部队出动的时间……………………………………210
（1950年10月15日）
在中财委关于近日市场情况报告上的批语…………………………211
（1950年10月15日）
在外交部关于捷克打算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报告上的批语………212
（1950年10月15日）
请即派人到安东接引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213
（1950年10月15日）
请与苏联商量先调一个空军师保护首都空防………………………214
（1950年10月15日）
关于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动时间致彭德怀、高岗等电………………215
（1950年10月17日）
关于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入朝作战致邓华等电………………………216
（1950年10月18日）
在华北局关于绥远非党干部对我批评意见的报告上的批语………217
（1950年10月18日）
志愿军参战目前只做不说……………………………………………218
（1950年10月19日）
给刘天民的信…………………………………………………………219
（1950年10月19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及察哈尔省委关于调整城乡关系的报告的批语…220
（1950年10月20日）
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222
（1950年10月21日）
争取战机迅速完成战役部署…………………………………………224
（1950年10月21日）

控制妙香山小白山隔断东西两敌……225
（1950年10月21日）
对四十军行动部署的意见……226
（1950年10月21日）
关于四五天内不登志愿军消息给胡乔木的信……227
（1950年10月21日）
关于广播吴耀宗文章给胡乔木的信……228
（1950年10月21日）
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伪第六第八两师……229
（1950年10月22日）
立即占领妙香山杏川洞……232
（1950年10月22日）
十九兵团待命开东北……234
（1950年10月22日）
西藏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235
（1950年10月22日）
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236
（1950年10月23日）
对第一次战役的部署……240
（1950年10月23日）
诱敌深入利于歼击……243
（1950年10月23日）
捕捉战机最关紧要……244
（1950年10月23日）
九兵团须从速准备开动……245
（1950年10月23日）

六十六军赴朝作战问题……………………………………246
（1950年10月24日）
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247
（1950年10月24日）
志愿军司令部组成须有朝鲜同志参加……………………248
（1950年10月24日）
关于抗议美机侵入我国领空的批语………………………249
（1950年10月25日）
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250
（1950年10月25日）
必须准备与向鸭绿江进攻之敌作战………………………251
（1950年10月25日）
第一仗似以打伪军为主为适宜……………………………253
（1950年10月25日）
关于敌方对我军行动的反映致彭德怀、邓华电…………255
（1950年10月25日）
先抓住一两部敌军围攻吸引敌主力增援…………………256
（1950年10月25日）
军委关于伪一、六、八师行动情况的电报………………257
（1950年10月26日）
六十六军由志愿军司令部直接指挥………………………258
（1950年10月26日）
先歼伪第一第六第八师后打美英军………………………259
（1950年10月26日）
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对敌作战方针…………………………260
（1950年10月26日）

对三十九军作战行动的部署……………………………………262
（1950年10月26日）
歼灭伪第一第六第八师的作战部署………………………………264
（1950年10月26日）
对军委设立军事运输部门报告的批语……………………………265
（1950年10月26日）
九兵团北调整训和敌军行动情况…………………………………266
（1950年10月27日）
按新情况重新确定攻击目标………………………………………268
（1950年10月27日）
关于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致彭德怀电…………………………269
（1950年10月27日）
对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建议的批语……………………270
（1950年10月27日）
赞同聚歼伪军四个师的部署………………………………………271
（1950年10月28日）
第一次战役的关键有两点…………………………………………272
（1950年10月28日）
诱敌深入定宣泰龟泰川等区域以利歼击…………………………273
（1950年10月28日）
在起义军官较多的团以上部队均可组织军政委员会……………274
（1950年10月28日）
转发华北军区高干会情况报告的批语……………………………275
（1950年10月28日）
在袁仲贤关于梅农同申健谈西藏问题报告上的批语……………276
（1950年10月28日）

使用九兵团主力对付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之敌……………………277
（1950年10月29日）
以全歼当面之敌为目标是正确的……………………………………278
（1950年10月30日）
关于南朝鲜军队战斗特点的通报……………………………………280
（1950年10月30日）
九兵团的作战任务……………………………………………………282
（1950年10月31日）
关于将志愿军入朝作战注意事项等汇送宋时轮的批语……………283
（1950年10月31日）
为《解放军画报》题名………………………………………………284
（1950年10月）
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285
（1950年10月）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286
（1950年10月）
为抗美援朝题词………………………………………………………292
（1950年10月）
为《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题词…………………………………293
（1950年10月）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295
（1950年）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的第一阶段作战方针………………………296
（1950年10月）
以四十二军一部迅占宁远德川孟山诸点……………………………297
（1950年11月1日）

同意志愿军的作战部署……………………………………………298

（1950年11月1日）

伪首都师和美二师动向及我之部署………………………………300

（1950年11月2日）

关于三十八军等部的作战部署……………………………………301

（1950年11月2日）

全局关键在于隔断南北敌人联系歼灭美军第二师………………303

（1950年11月2日）

关于九兵团部署问题致彭德怀、高岗电…………………………304

（1950年11月3日）

关于发表北京大学教师联名给毛泽东的信的批语………………305

（1950年11月3日）

注意各个歼灭可能向我举行反攻之敌……………………………306

（1950年11月4日）

关于《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给胡乔木的信……………………307

（1950年11月4日）

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创造战场……………………………308

（1950年11月5日）

三十八军应尽可能争取歼灭伪七师一两个团……………………309

（1950年11月5日）

关于目前不宜以联合司令部名义发表战报的电报………………310

（1950年11月5日）

九兵团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311

（1950年11月5日）

关于九兵团行动问题的批语………………………………………312

（1950年11月5日）

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三周年给苏联的贺电……………313
（1950年11月5日）
对出版志愿军报纸请示报告的批语………………………………314
（1950年11月6日）
同意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315
（1950年11月9日）
对暂时放弃攻打金门任务报告的批语……………………………317
（1950年11月11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318
（1950年11月12日）
必须精心组织歼灭美军陆战第一师………………………………319
（1950年11月12日）
与朝鲜同志商谈应注意方式………………………………………320
（1950年11月12日）
给李漱清的信………………………………………………………321
（1950年11月12日）
朝鲜战局是可以转变的……………………………………………322
（1950年11月13日）
关于肃清广西匪患和增强广东兵力的电报………………………323
（1950年11月14日）
对《综合各方对朝鲜战争反映》电报稿的修改……………………325
（1950年11月14日）
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326
（1950年11月15日）
中央关于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的批语和复电……………328
（1950年11月15日）

关于转发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的电报……………………331
（1950年11月16日）
关于统筹两广对付美蒋进犯……………………………………332
（1950年11月17日）
广东广西的工作安排和兵力部署………………………………333
（1950年11月17日）
加强华东军区领导做好剿匪工作………………………………335
（1950年11月17日）
关于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报道的指示…………………………337
（1950年11月17日）
只要多打几个胜仗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338
（1950年11月18日）
及时补充兵力连续作战…………………………………………339
（1950年11月21日）
中央关于北京市委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的批语和复电………341
（1950年11月22日）
必须做到土改与剿匪相结合……………………………………343
（1950年11月22日）
加紧准备防空战胜敌人可能的空袭……………………………344
（1950年11月22日）
出国作战部队应加强同美军作战的思想准备…………………345
（1950年11月22日）
给郭耿光的信……………………………………………………347
（1950年11月22日）
给胡乔木的信……………………………………………………348
（1950年11月22日）

关于发布剿匪通报问题致中南、华东、西南军区电……………349
（1950年11月23日）
致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电……………………………………350
（1950年11月23日）
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352
（1950年11月24日）
集中四个军歼灭美军三个师的主力……………………………354
（1950年11月28日）
关于鼓励士气争取大胜致彭德怀等电…………………………356
（1950年11月28日）
中央转发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报告的批语 …………………357
（1950年11月30日）
利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358
（1950年11月30日）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359
（1950年11月）
为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题词………………………………………362
（1950年11月）
四十二军应从侧面威胁平壤……………………………………364
（1950年12月1日）
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365
（1950年12月2日）
增强南北阻援阻止敌人突围……………………………………367
（1950年12月2日）
西线各主力应准备继续作战……………………………………368
（1950年12月2日）

二十六军南下作战九兵团准备打增援之敌……………………369
（1950年12月2日）
主力宜在顺川肃川线作战……………………………………370
（1950年12月2日）
给黄念田的信…………………………………………………371
（1950年12月2日）
关于改变一九五一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373
（1950年12月3日）
围而不歼诱敌来援……………………………………………374
（1950年12月3日）
为了解就地取给粮草等情况致彭德怀、高岗电……………376
（1950年12月3日）
战争应从最坏方面着想………………………………………377
（1950年12月3日）
应迅速控制飞机场不使被围美军撤走………………………378
（1950年12月4日）
如平壤敌撤退则志愿军向三八线攻进………………………379
（1950年12月4日）
相机占领平壤…………………………………………………380
（1950年12月4日）
对全军立功奖励问题报告的批语……………………………381
（1950年12月4日）
解放平壤的两则电讯和播发此讯的批语……………………383
（1950年12月4日、5日、6日）
同意东西两线作战部署　……………………………………386
（1950年12月5日）

关于目前只宜强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批语……………………388
（1950年12月5日）
关于志愿军西线主力行动和中朝军队协同作战问题………………389
（1950年12月6日）
军委关于同意海南岛的海防部署致邓子恢等电………………………391
（1950年12月7日）
军委关于九兵团指挥所的防空荫蔽问题的电报………………………392
（1950年12月7日）
对华东军区剿匪经验通报的复电…………………………………………393
（1950年12月7日）
请求苏联帮助越南解决汽车和汽油问题…………………………………395
（1950年12月8日）
中央转发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经验的批语……………………………397
（1950年12月9日）
关于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致彭德怀等电…………………………398
（1950年12月11日）
在广州市机关物资疏散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01
（1950年12月11日）
对成立化学兵学校报告的批语……………………………………………402
（1950年12月11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403
（1950年12月13日）
关于志愿军兵力使用的意见………………………………………………404
（1950年12月17日）
我军能够战胜装备优良的美国军队………………………………………406
（1950年12月18日）

给陈叔通的信……………………………………………………408
（1950年12月18日）
中宣部转发西南局宣传部关于清匪反霸报道问题的意见的批语…410
（1950年12月19日）
关于镇压反革命………………………………………………411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
朝鲜作战必须作长期打算……………………………………419
（1950年12月21日）
对我国关于联合国大会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的修改……………………………………………………421
（1950年12月22日）
目前应使敌集中以利歼击……………………………………422
（1950年12月24日）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424
（1950年12月26日）
征调老战士补充志愿军部队…………………………………426
（1950年12月26日）
祝贺法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427
（1950年12月26日）
关于发表《实践论》等文章给胡乔木的信…………………428
（1950年12月28日）
关于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等文件给胡乔木的信…429
（1950年12月28日）
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430
（1950年12月29日）

加紧督促桂粤湘三省剿匪巩固广东防务……………………………432
（1950年12月29日）
转发中南军区秋季剿匪情况报告的批语……………………………433
（1950年12月29日）
在华南分局关于广州市预防空袭疏散物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35
（1950年12月29日）
给黄炎培的信…………………………………………………………436
（1950年12月29日）
给周世钊的信…………………………………………………………437
（1950年12月29日）
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439
（1950年12月29日）
为机要工作题词………………………………………………………441
（1950年12月29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第二次指示的批语……………442
（1950年12月30日）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工会工作报告的批语…………………………443
（1950年12月30日）
给王震的电报和复才旦朋杰、扎西才让的信………………………444
（1950年12月30日）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和给杨之华的信……………………………446
（1950年12月31日）
关于同意朝鲜新解放区借粮办法的电报……………………………448
（1950年12月31日）
军委关于查告志愿军伤亡失踪人数致彭德怀等电…………………450
（1950年12月31日）

军委为询问九兵团情况致宋时轮电……451
（1950年12月31日）
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名……452
（1950年12月）
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名……453
（1950年）
和郭沫若题齐白石画……454
（1950年）
为《公安建设》题名……456
（1950年）
给张有晋的信……458
（1950年）
为张子敬题词……460
（1950年）
为黄宝珣题词……462
（1950年）
为北京医院题名……464
（1950年）
关于同意广西剿匪计划致张云逸等电……467
（1951年1月2日）
中央关于同意华南分局对海南岛的工作计划的电报……469
（1951年1月4日）
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具有极大意义……470
（1951年1月4日）
同意对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471
（1951年1月4日）

关于修筑入藏公路的批语……472
（1951年1月4日）
中央对高岗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电报的批语和复电…474
（1951年1月4日）
关于处理生日贺电的批语……476
（1951年1月4日）
给李讷的信……477
（1951年1月4日）
对陈渠珍一案的处理意见……478
（1951年1月5日）
给黄炎培的信……479
（1951年1月6日）
为《人民周报》题写报头……480
（1951年1月7日）
对陶铸关于广西剿匪工作报告的批语和复电……481
（1951年1月7日、9日）
四十五军四十六军应集中整训应付万一……483
（1951年1月9日）
给饶漱石、陈丕显的信……485
（1951年1月10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报告的批语……486
（1951年1月10日）
关于志愿军九兵团改善装备的批语……487
（1951年1月10日）
同意中南军区集中兵力应付广东方面情况的电报……488
（1951年1月12日）

关于防御国民党军队进攻厦门、汕头的电报……………………489
（1951年1月13日）
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稿上的批语………491
（1951年1月）
关于青海骑兵支队配合十八军入藏问题致邓小平电………………492
（1951年1月14日）
关于改写给金日成的备忘录的批语…………………………………494
（1951年1月14日）
对出版《八一》杂志报告的批语……………………………………495
（1951年1月14日）
给徐悲鸿的信…………………………………………………………496
（1951年1月14日）
给李思安的信…………………………………………………………499
（1951年1月14日）
给戴毓本的信…………………………………………………………502
（1951年1月14日）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题词………………………………503
（1951年1月15日）
给马叙伦的信…………………………………………………………505
（1951年1月15日）
确保厦门并加强华东沿海防务………………………………………506
（1951年1月16日）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507
（1951年1月17日）

给吴启瑞[1]的信

（1950年7月19日）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并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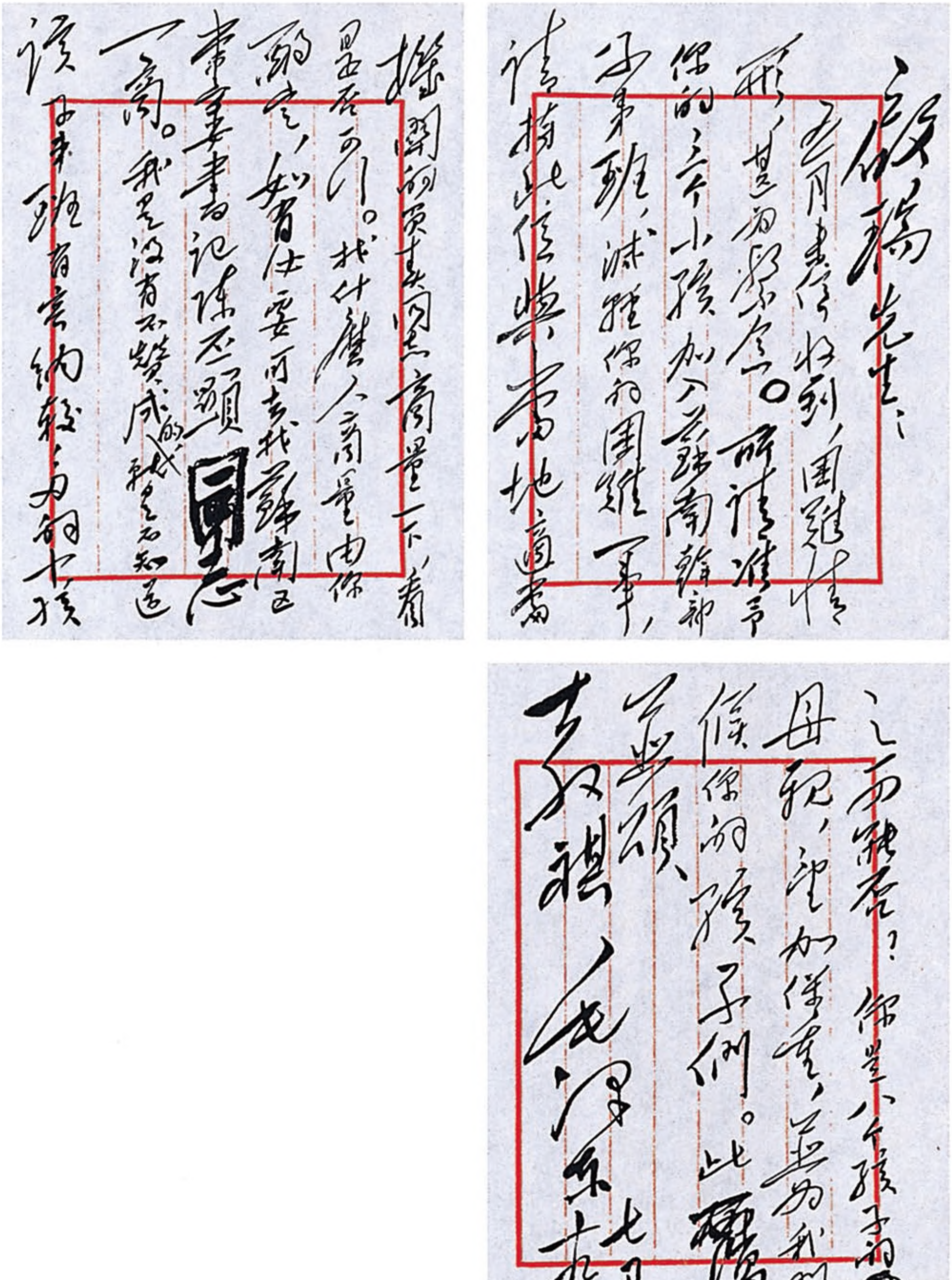
教祺！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吴启瑞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当时在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做教员。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保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此种保荐困难可，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我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能力的七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

并颂

教祺！

毛泽东

七月十日

毛泽东致吴启瑞信的手稿。

关于苏联来华之空军师的驻地和我空军混成旅改装训练问题

（1950年7月20日）

菲利波夫[1]同志：

在研究了我们出动到中朝边界上的部队之空中掩护问题，以及我国空军转入使用喷气飞机并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的问题之后，我们欢迎您的提议，并对您及苏联政府给我们的帮助致特别感谢之意。

我们拟将您派来掩护我们部队的喷气式空军师，驻扎在沈阳附近，两个团驻鞍山，一个团驻辽阳。这样驻扎，在与驻在安东[2]附近的我国空军混成旅所属驱逐团协同动作之下，可以解决掩护部队以及保护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的问题。

我国空军驱逐部队转人使用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提议按下列程序进行：

以巴基斯基[3]喷气式机团为基础，于最近两个月内建立起一个

---

[1]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2] 安东，今辽宁丹东。

[3] 巴基斯基，当时任援助中国的担负上海、南京、杭州地区防空任务的苏联空军混成航空兵集团指挥官。该部队1950年3月来华，同年10月回国。其装备的喷气式歼击机等，经中苏两国政府协商，全部移交新组建的中国空军部队。

改换飞机训练的机构。将准备移交给我们的喷气式飞机，所需之一百六十组飞行人员，分成两批训练。第一批是将我现有空军混成旅所属的六十组驱逐机飞行人员，派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当这一批改换飞机训练结束的时候（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五一年一月），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联合航校一九五一年一月份毕业生中选出第二批（一百组飞行人员），去进行改换飞机训练。

这样，我们就能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到四月间，完成新喷气飞机的接收工作。至于接收两个苏联空军师的一切器材，也只能在那时全部完成。

为了及时实现拟定的改换飞机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容纳六十个人学习的训练机构，并供给这个机构以教练用的飞机、器材、模型、挂图和最低限度必需数量的训练指导员及教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议派遣我国空军司令部的代表一人和空军顾问长空军少将普鲁特可夫同到莫斯科一趟。

以上各点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告知为盼。

谨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

要根治淮河

（1950年7月至9月）

一

周：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

二

周：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八月五日

三

周：

此电第三项[1]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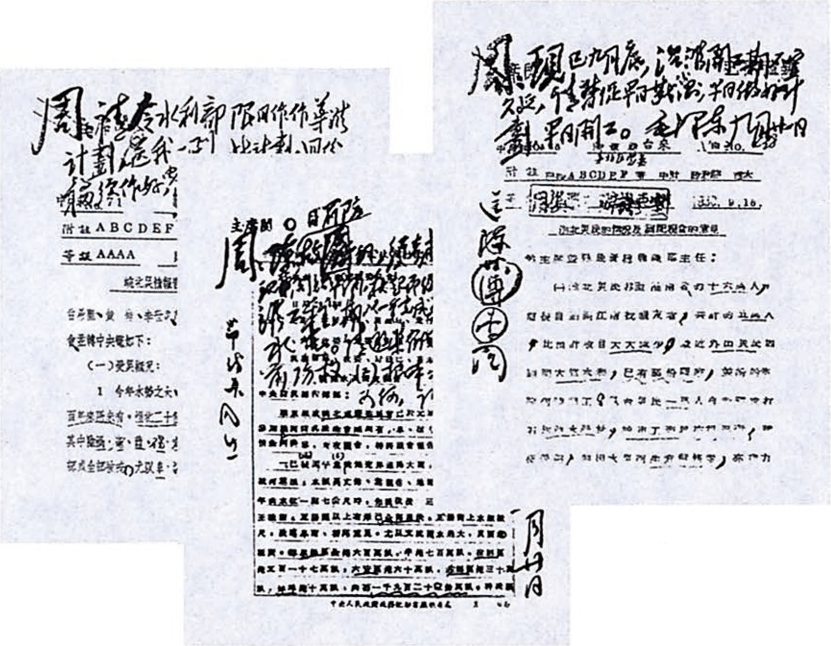
周：

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一日

---

[1] 指华东军政委员会1950年8月28日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给周恩来的电报。苏北区党委意见的第三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罕见的特大洪灾，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多次就治理淮河问题作了重要批示。图为毛泽东批示的部分文件。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

1950年，治淮工程拉开了序幕。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整风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0年7月21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兹将北京市委关于全党整风工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作参考。其中许多经验[1]我们认为〔是〕各省委区党委特别是各大中城市的党委值得采取，或部分采取的。

中央

七月二十一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1950年7月18日关于北京市整风工作计划的报告中提出的准备采取的做法。主要有：(一)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注意领导骨干与群众相结合。(二) 各单位的工作总结和思想作风检讨，一般均通过和依靠各该组织的领导机关来进行。上级要抓紧领导，但要防止包办代替和不必要的超越组织。(三) 用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检查工作、检查工作人员的作风，是正确的和很有效的。(四) 整风重点是自上而下地总结工作，检讨对中央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形、经验教训及工作作风。在干部作风方面，上级主要是检查官僚主义，中下级主要是检查命令主义。在同党外人士合作方面，主要是检查关门主义和忽视统一战线工作的倾向。(五) 政权和群众组织系统的整风中，总结工作应一律根据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进行检讨，党与非党干部一视同仁，但在检讨个人思想、作风时，党与非党人员，特别是与民主人士，应有所区别，不以党员的标准去要求非党干部，民主人士的整风学习完全听其自愿。

同意华东军区对金门岛敌情的判断与截击部署[1]

（1950年7月21日）

粟、张、周：

十八日十七时电[2]悉。同意你们对金门岛敌情的判断与截击部署。

军委

七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和副参谋长周骏鸣的电报。

[2] 指粟裕、张震、周骏鸣1950年7月18日17时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电报。电报说：综合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的十五日、十六日观察，大小金门敌调动频繁，似有撤退模样。估计有三种可能：先撤小金门，后撤大金门；或先撤大金门，后撤小金门；或大小金门同时撤。第十兵团已令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一军分别做好准备，严密掌握敌情变化与战机，按预定部署适时出击，求截歼敌一部。并令各该军在敌未撤前或撤小部时，勿轻举，兵团即组织前指亲去指挥。

关于东北边防军统由东北军区指挥与供应的批语[1]

（1950年7月23日）

同意。[2]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7月22日报告的批语。

[2] 周恩来和聂荣臻的报告说：调往东北的部队预计8月上旬可以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苏方限苏联空军喷气式师于8月3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点。这些部队到达后指挥与供应即成大事。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一）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二）东北军区高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三）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才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是否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边防军司令部。中南李聚奎到东北后即兼任军区后勤部长，所带之后勤机构即合并到东北后勤部中，因东北军区后勤部太弱，不能胜目前的大任。这样部队指挥既可免生脱节现象，供应问题也较容易解决。周恩来在报告上批注："主席：此事系聂及刘亚楼今日见面时谈及者，如主席同意请批交聂办。"

反对南非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法案”[1]

（1950年7月26日）

南非达兰士瓦州印度人大会主席约瑟夫·达杜博士：

六月十八日来电收到。

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你们对于南非联邦政府歧视中、印及其他亚洲人民的所谓“种族隔离法案”的合理的抗议。

毛泽东

北京　七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达杜的电报。“种族隔离法案”，南非议会1950年5月通过的《集团住区法》。这是南非联邦政府歧视和压迫有色人种的法案。它把占南非联邦人口2/3以上的非白种人（指非洲土著人、印度人和少数中国人等）禁锢在几个隔离地区以内。

应先打小仗
然后才有可能打较大的仗[1]

（1950年7月26日）

陈赓：

七月二十二日十三时电[2]悉。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能打稍为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军委

七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2] 指陈赓1950年7月22日13时给中共中央驻越共中央联络代表罗贵波并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西南局等的电报。

同意四十三军的集结位置[1]

（1950年7月27日）

邓、谭、赵、李、苏：

七月廿四日电悉。四十三军的集结位置，目前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即以主力位于雷州半岛，以一个师位于海南岛。

军委

七月廿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赵尔陆和副参谋长李聚奎、苏静的电报。

关于炮兵观察队赴朝鲜前线考察问题的批语[1]

（1950年7月）

一

聂[2]复：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将来再定，并须得到军委批准。[3]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特种兵负责人万毅、中南军区特种兵司令部政治委员邱创成和副司令员匡裕民1950年7月16日请示电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原则上同意组织观察队到朝鲜前线去作实地考察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复电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

[3] 万毅、邱创成、匡裕民的请示电说：为了在将来作战中能熟习美军作战规律，使我炮兵能发挥较大作用，要求军委批准万、匡带各参战师干部一部共约十余人组织一观察队，到朝鲜前线作实地了解。

二

军委原则上同意你们组织观察队到朝鲜前线去作实地考察，但须俟外交部与朝鲜大使交涉，并须斟酌去的时间，避免过早暴露目标。此项时间由军委决定示知。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十周年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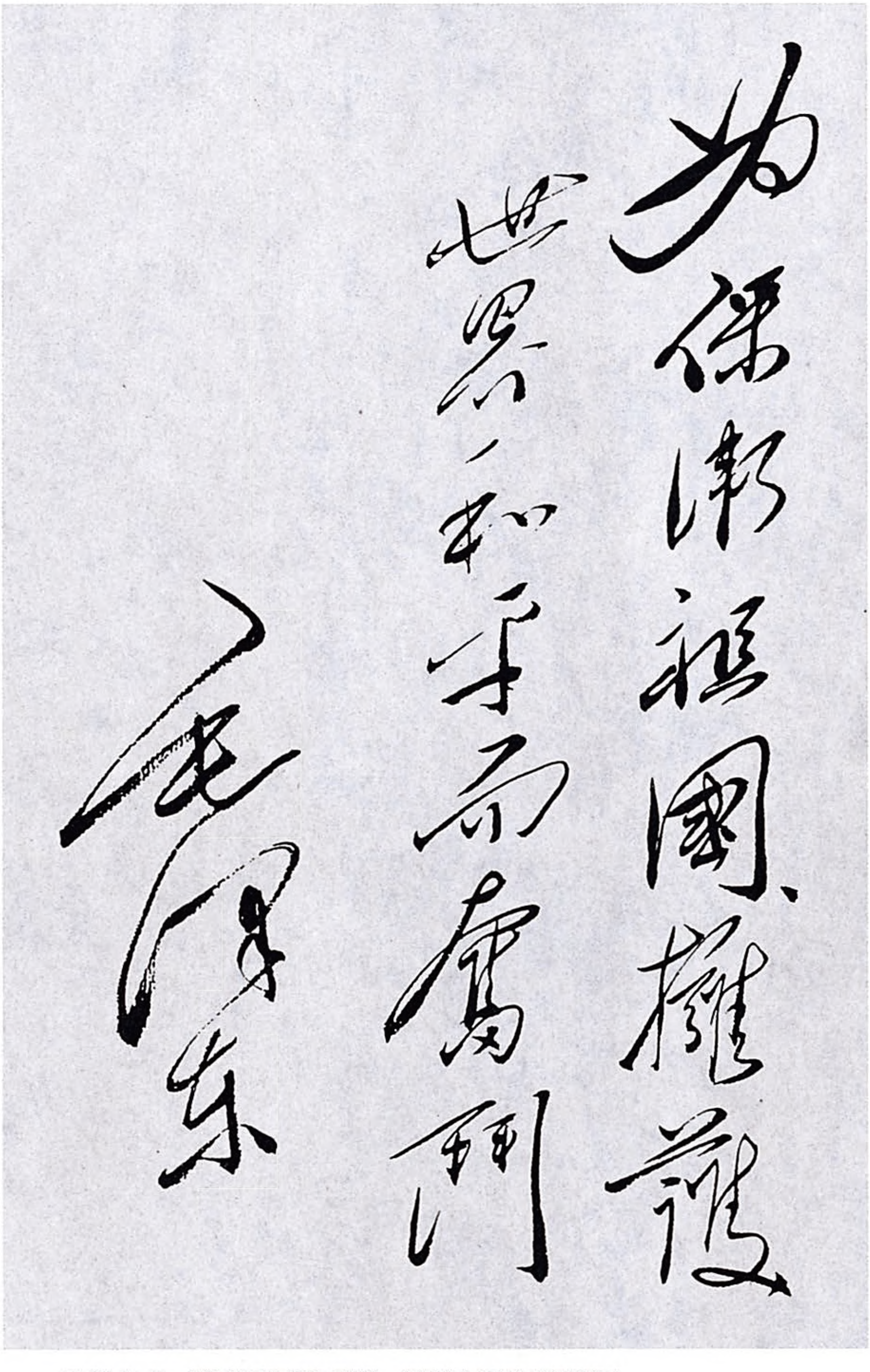
（1950年7月）

为保卫祖国、拥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毛泽东

---

[1] 1950年7月《美洲华侨日报》创刊十周年，毛泽东为之题词。



为保衛祖國、擁護世界和平而奮鬥

毛泽东

毛泽东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十周年的题词。

为中央民族访问团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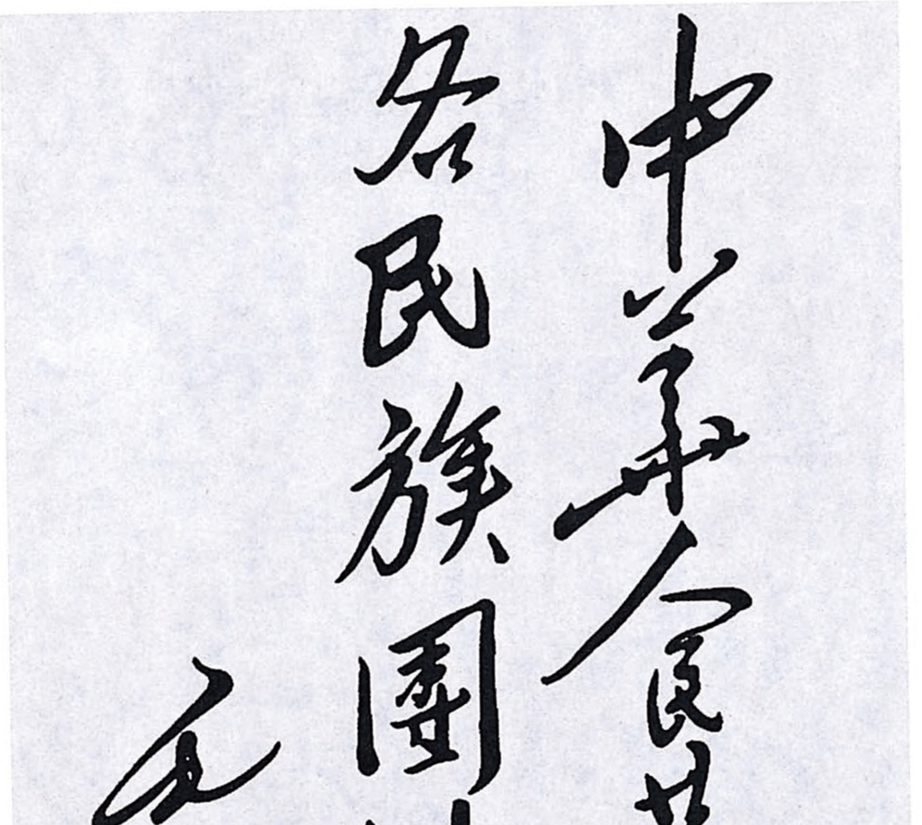
（1950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

毛泽东

---

[1] 为了实地考察少数民族的生活等情况，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加强民族间的团结，1950年7月至1951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了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访问团出发前，毛泽东为之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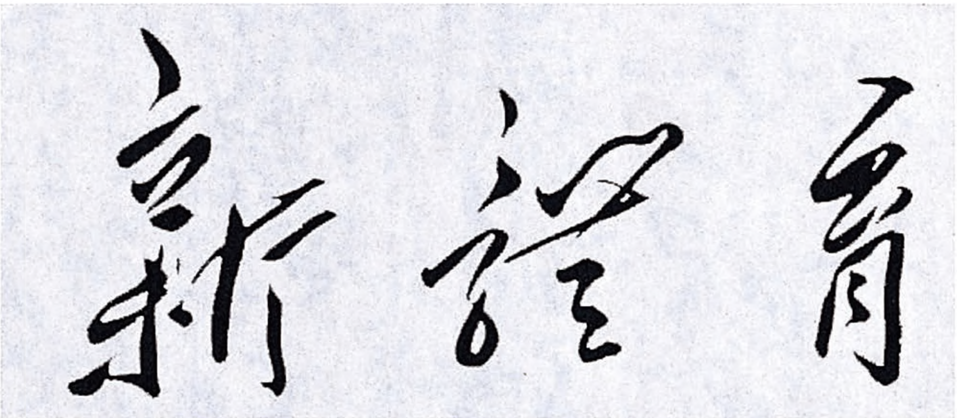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民族團結起來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题词。

为《新体育》杂志题名[1]

（1950年7月）

新体育



毛泽东为《新体育》杂志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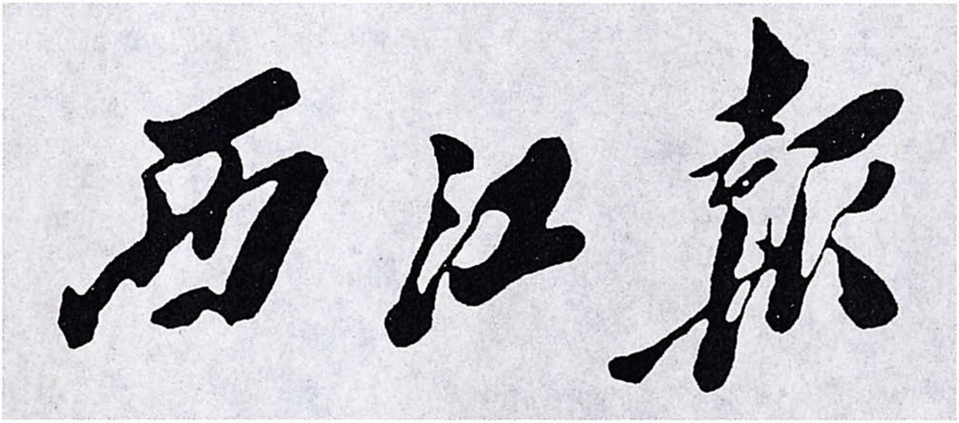
---

[1] 1950年7月，新中国第一本体育专业杂志《新体育》创刊，它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主办，由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毛泽东为《新体育》杂志题写了刊名。

为《西江报》题写报头[1]

（1950年7月）

西江报



毛泽东为《西江报》题写的报头。

---

[1] 1950年4月西江地委决定创办《西江报》，7月1日以西江地委的名义向中央办公厅报告，请毛泽东为报纸题写报头。不到一个月时间，便收到了中央办公厅的复函，并寄来了毛泽东的题字。这个报头一直沿用至今。后来改为《西江日报》时仍使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头，中间的“日”字，是从毛泽东题写的“南方日报”中移植过来的。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

（1950年8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除西藏、台湾等处尚待解放，各地残余土匪尚待剿灭之外，已经基本上结束。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今后人民解放军的任务，除必须解放西藏、台湾及剿灭残余土匪外，主要的就是要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可能侵略，维持国内治安，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要尽可能地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和其他工作。我全体人民解放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任务，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指示。

部，参加文化学习。为此，特规定下列各项：

（一）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自一九五一年一月正式开始。务求在三年之内，使一般战士及初级小学程度以下的干部达到高级小学的水平，使一般相当于高级小学程度的干部达到初级中学的水平，然后再继续提高。

（二）在连队的教育时间内，暂规定以百分之六十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以百分之三十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以百分之十的时间进行政治教育。但某些起义部队在一九五一年内其文化教育时间应酌量减少，而增加政治教育时间。全军连队教育的时间分配，如因情况变化而需要改变时，当以命令改变之。

（三）各部队应按在职教育与离职教育衔接并进的方法，而以在职教育为重点，举办下列各种文化学校：

（1）在职的半日文化学校，由团以上各级普遍举办。这种半日学校，应按情况设立初小、高小、中学或专修等班级。在工作繁重、入学干部众多的机关、部队，分为上午与下午两部上课。

（2）为离职干部办的速成小学和速成中学，暂由军及省军区以上各级举办。速成中学可分为普通初级中学与完全中学两种。一级军区可举办离职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

（3）连队采取学校的形式，进行基本上完备的初小教育与高小教育。

（4）各军政大学，在一年或一年半内，以文化教育为主。部队其他学校，除军委规定或批准者外，暂时不办，或改组为文化学校。

（四）一切在职干部与战士，凡需要学习与补习文化者，不论职别，均应无例外地依照文化课程的考试甄别，参加在职文化教育的

适当班次，并认真地进行学习。

各级干部，首先是经历多年斗争而文化水平甚低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凡能离职学习者，均应由各级领导机关有计划地分批或轮流抽调，经过考试，送入速成小学，或速成中学，或高级干部的文化补习班去学习。一部分优秀的青年战士，也可选调入学。

（五）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教育，应一律采取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教育方针。

学校课程，应参照普通小学、中学的课程予以精简、重编，保持其科学的系统，减去不必要的课程，增加必要课程的内容。小学以国文、算术为基本课，兼有少量的自然、历史与地理常识课。中学亦须着重国文、数学，但应辅之以自然、物理、化学、历史及地理诸课。此外，各种学校均须有一定的军事课及政治课。各种基本课程均应采用中央审定的课本。在中央未发审定的课本之前，可选用既有的课本。

一切文化学校均应建立正规与合理的考试、分级、编班、升级、留级、毕业及发文凭等项制度，制定各种必需的条例及规则，确立学生的自觉纪律，规定教员的责任。

各种文化学校的教育，以上课为主要方法，同时重视自修与辅导等活动，以利切实与迅速地进行教育与学习。

（六）各级在职与离职文化学校的领导人员和教员，由各一级军区统一调配。首先应从各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调用教员。不足之数，由一级军区筹划，从军政大学、人民革命大学、各地普通的大学、中学编余人员及失业知识分子中抽调或招聘之。干部学校的教员应力求优良称职。

（七）军队文化教育所必需的经费，应由一级军区政治部造出预

算，经上级批准，由各级供给部门负责及时供应。

（八）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应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为了教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得在团以上各级党委领导下，设立包括司、政、后勤及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与学校负责人在内的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计划文化教育的课程、时间、经费、设备及调配教员、学生等事宜。教育工作的实施，则由各级政治机关及学校负责人领导进行之。

（九）全军文化教育工作的管理机关为军委总政治部。全军文化教育的实施方案及其他必须统一处理的重大事项，军委总政治部必须按时予以解决。

（十）今年尚有五个月，凡没有担负作战任务及巨大工程任务的部队，除进行整风、生产、整编复员、军事训练及政治训练等项工作外，应对调动、招聘和训练教员，调收学生，筹办校舍、课本及其他教育用具等事，完成准备工作，务期明年一月能一律开学。同时，可立即开始进行重点试办，取得经验。

主席　毛泽东

关于从班禅集团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的电报

（1950年8月3日）

德怀[1]同志：

六月廿九日电悉。

我们对班禅[2]的地位，终须有适当安置，先就班禅集团内选择适当人员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是需要的，请物色候选人报告中央，以便在适当时候发表（你们先勿公布）。

计晋美[3]可以来京。

毛泽东

八月三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2]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3] 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曾任原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关于钱昌照[1]建议的批语

（1950年8月3日）

请陈薄李[2]从现正准备的一九五一年计划及某些工作的三年计划，将钱昌照建议[3]各项加以考虑。

毛泽东
八月三日

---

[1] 钱昌照，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

[2]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 指钱昌照写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意见。

军委转发十九兵团复员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0年8月4日）

各中央局及军区党委：

兹将十九兵团杨得志等关于该部复员工作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作参考。我们认为十九兵团的经验是很有用〔的〕，请加注意。

军委

八月四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等1950年7月27日关于十九兵团复员工作的初步总结。主要经验是：一、采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逐级深入，打通思想，稳步前进的方法，在部队中进行动员；同时向各级领导提出做到复员工作与加强军队建设两者并重，不可偏废。在此基础上，有领导地评选复员对象，也给部队以强有力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树立建设国防军的思想。二、复员人员离队前，以师（分区）、军直属单位、兵团直属单位进行集训，各级军政首长亲临慰勉，进行动员。讲明目前形势与任务，复员的重要意义，以及强调革命分工，加强国家军队建设，宣布我们的方针是妥善安置，各得其所，负责到底，并教育复员人员回乡后处处为人模范，遵守国家法令，保持解放军的光荣。

东北边防军应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1]

（1950年8月5日）

高岗同志：

八月四日电悉。（一）边防军[2]各部现已集中，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请高岗同志负主责，于八月中旬召集各军师干部开会一次，指示作战的目的意义和大略方向，叫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务使士气旺盛，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我们当令肖劲光、邓华、肖华[3]参加这次会议。（二）在上述方针下，部队的集结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的电报。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武装入侵朝鲜，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以美国军队为主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扩大侵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于1950年7月13日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下辖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团、一个工兵团，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安全的任务。后来，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没有正式建立，其部队统归东北军区直接指挥。

[3] 肖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0年7月兼任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1950年7月兼任东北边防军副政治委员。

部署由你按情况酌定。三十八军如以调驻四平铁路沿线为有利，可即照这样调动。

军委

八月五日

给黄炎培[1]的信

（1950年8月5日）

任之先生：

大示诵悉。麦去看蒋[2]，似乎是替台湾起些壮胆作用，别的似乎还谈不到。但我们的准备是必要的。

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五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1950年7月31日由日本飞抵台湾，同蒋介石会商如何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不要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指示的批语

（1950年8月6日）

各中央局：

兹将中南局关于在南方不要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的指示[1]发给你们参考。

中央

八月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0年8月1日给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根据中南许多地方在夏季生产中不适当地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致使下层组织强迫命令，耗费劳力，侵犯中农，破坏了正常生产的情况，指出：南方地区一般是人多地少，劳力并不缺乏，主要是缺地、缺钱、缺耕畜和生产情绪不稳定。所以应先集中解决合理负担及减租退租，搞好水利建设，保护与增殖耕畜，解决山货土产收购等问题，而不应强调组织生产互助组。在某些劳力缺乏的地区，也只能在群众自愿结合的前提下小心谨慎地进行互助合作的小规模试验。现时绝不宜广泛提倡，而应普遍禁止干部强迫群众搞互助。待以后土改完成并有一定的技术设备条件时，再来详细考虑。

关于公开批评宣化市错误问题的批语

（1950年8月6日）

薄一波、刘澜涛[1]同志：

宣化市此种行为[2]似应在报纸公开揭露，予以批评，借以教育全党。是否适宜这样做，请考虑告我。

毛泽东

八月六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2] 指在宣化市第三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会议主持人和有的党员干部不让出席会议的代表充分发言的错误行为。

对中财委关于全国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的批语

（1950年8月7日）

周、刘、朱、陈、薄、李富春[1]阅后发。

文尾两个问题[2]，特别是第二个问题，请周找有关人员一谈，予以解决。

又：政务院所属各部每次召集会议决定政策方针，都应如中财委所属某些部门一样，做出总结性报告，呈报我及中央书记处看过，经同意后，除用政务院、各委或各部自己名义公告执行外，有些须用内部电报通知各地。其方式就如这个电报一样。过去有些部

---

[1] 周，指周恩来。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1950年8月7日在进出口会议情况摘报中向中央请示的两个问题：（一）易货问题。在一般不许易货的原则下，准备允许冷货易货和与不通汇国家进行易货。这在争取进口物资上是有利的。（二）中南区公私双方一致要求允许汉口开放问题。根据目前我们航运设备能力有限，而汉口外销物资很多（主要是桐油、蛋品）的情况，允许有油柜和冷藏设备的外轮，经过特许，在指定时间、指定航线和严密监督管理下，到汉口装货，直放国外是有利的。

门这样做了，有些部门尚未这样做，请周通知所属一律照办。军委所属各部亦然。

毛泽东

八月七日

1950年，为满足国防需要，稳定市场金融，全国人民在增收节支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接受缅甸驻华大使吴敏登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8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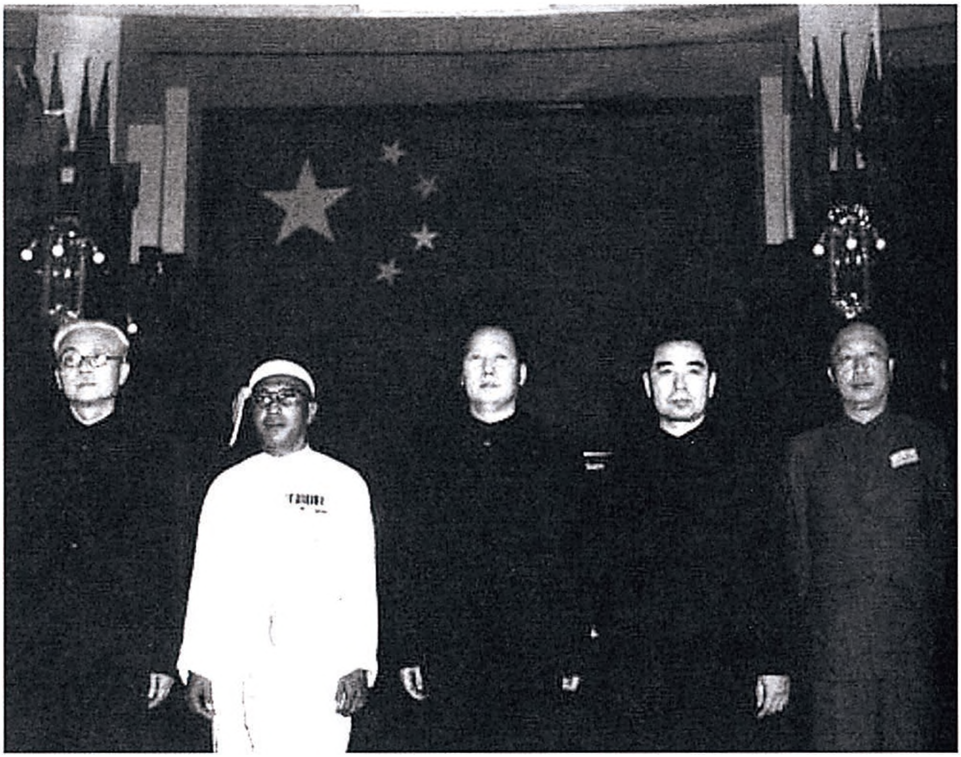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缅甸联邦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中缅两国，国境毗连，不但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两国人民间更存在着兄弟般的深厚友谊。近世纪来，中缅两国人民都曾为自己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进行长期而勇敢的斗争。因此，存在于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同情与了解，也是很深切的。现在中缅两国新的外交关系的建立，无疑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我并相信其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缅甸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50年8月7日，毛泽东等和缅甸联邦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吴敏登合影。

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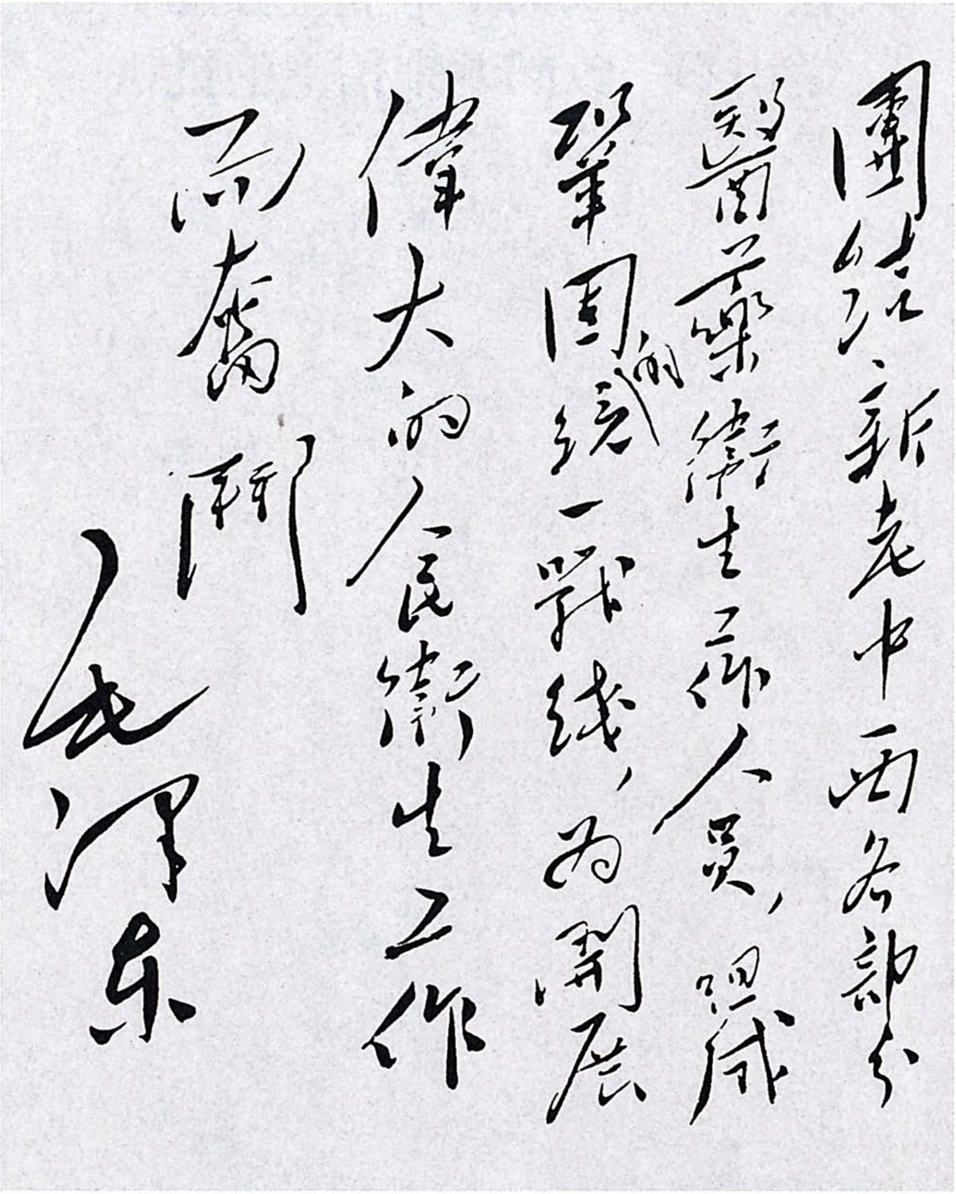
（1950年8月9日）

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毛泽东

---

[1] 1950年8月7日至1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新中国卫生工作的原则。这是毛泽东为这次会议的题词。



團結、新老中西各部分醫藥衛生工作人員，組成鞏固的統一戰線，為開展偉大的人民衛生工作而奮鬥

毛澤東

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

在一封反映大学毕业生分配中学用不一致问题来信上的批语

（1950年8月8日）

周[1]：

此事[2]是谁人负责，请加处理，将此信[3]发交处理机关的负责同志重加审查，并将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八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

[3] 指清华大学机械系应届毕业生潘承烈、范国宝、杨宗麟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1950年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中存在学用不一致问题。

给粟裕[1]的信

（1950年8月8日）

粟裕同志：

罗瑞卿[2]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

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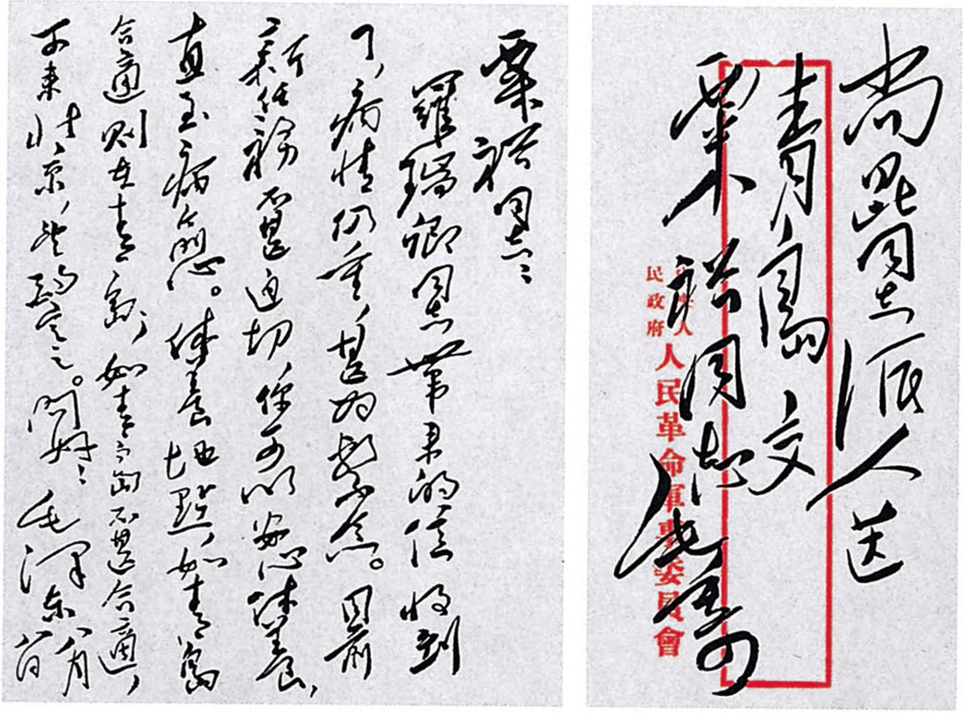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八月八日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7月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后来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没有正式成立。

[2]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粟裕同志：

罗瑞卿同志带来的信收到了，病情仍重，甚为系念。因前方任务不甚迫切，你应安心休养，直至病愈。休养地点，如青岛合适，则在青岛，如青岛不甚合适，可来北京，望酌定之。问好！

毛泽东

八月八日

由罗同志派人送

青岛交

粟裕同志

毛寄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泽东致粟裕信的手稿。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区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初步总结的批语

（1950年8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城市市委及省委区党委：

兹将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内各区开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发给你们参考。我们认为大城市的各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请各大城市市委考虑实行。

中央

八月九日

给蒋竹如[1]的信

（1950年8月10日）

竹如兄：

七月三十一日来信收到。顷询革大，据称该校研究班九月间可收留若干人。似此，兄如有决心，并能吃苦（该校火〔伙〕食不大好），可以来此入学研究。大作同时收到，甚谢！

顺颂

教祺！

毛泽东

八月十日

---

[1]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关于华东军区工作的指示[1]

（1950年8月11日）

陈毅同志，并告饶[2]：

同意八月八日来电所述各项检讨及各项方针和办法。我们认为这些检讨及所提方针办法是正确的，是适合华东我军的情况的，望即鼓励全体同志照此执行。台湾决定一九五一年不打，待一九五二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岛可决定在一九五一年四月以前不打，四月以后待命再打。军区机构是否搬上海的问题，请漱石同志考虑决定，我们认为如能实行陈毅同志每月去南京一次，或唐、张[3]每月至华东局汇报一次的办法。不搬是可以的。撤消三野前委，组织军区党委及其人选均同意。关于部队在三年内（一九五一年春季开始）加强文化教育一项任务问题，最近军委有训令发出，你们收到后请根据华东我军情况考虑实施办法。此外，三野前委在六月初决定并发出同时附一信请军委给以指示的那个关于继续实行六大方针的决定，不是用电报发来的，而是用信件送来的，到七月底我们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电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唐，指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指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

看到，耽误一个多月之久，已经不需要答复了。我们感觉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报告请示方面，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的关系，比较华东局和中央的关系，其密切的程度要差一些。此点请予以研究和改正，以便不但在若干具体事件的解决方面，而且在方针政策和工作计划的解决方面（这方面是更加重要的），你们与我们之间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军委

八月十一日

对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

（1950年8月12日）

周[1]：

此件[2]似宜先印若干份，在政府党组征求意见，并加以讨论，取得同意，然后发出。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1950年8月12日《中央关于调整若干工作关系问题的指示》（草案）。这个指示草案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立了统一的中央人民政府，过去在长期农村环境中所形成的农村观点和一揽子的工作方法必须彻底改变，而以集中统一的整体思想和分工合作的科学方法来代替。无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这一部分与那一部分，都应在统一方针、统一政策、统一任务和统一计划下，适当地分工，密切地合作，建立起既有统一领导又有科学分工的正确工作关系。具体地说，需要调整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关系：（一）中央政府所属的某些组织，如国营工厂，合作社，金融、贸易、税收机关及国立大学等，既属中央各部门领导又属所在地方党委领导之间的关系。（二）工会、青年团、合作社、妇女、文化等群众团体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与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三）城市内市和区之间的关系。

同意周恩来拟同印度驻华大使会谈的内容[1]

（1950年8月14日）

同意这样办。公约十章[2]待其代表团到时作为谈判条款似较妥，目前不要发表，也不要交印大使。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50年8月14日关于拟同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会谈的内容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中说："我拟于本星期三会见潘尼迦，只谈西藏为中国领土，我们很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退出西藏。印度与中国在西藏的商业贸易关系完全可以保持，这如同中国与印度在孟买的商业贸易关系应该保持一样。""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或民族性的代表，他们应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来商谈和平解决的办法。香港让他们通过也好，不让他们通过也好，西藏代表团总有办法到北京的。""关于我对西藏的公约十章，拟经西藏代表团来北京后再告印大使。"

[2]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27日拟成后经中央同意的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这十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关于边防军务必在九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致高岗[1]电

（1950年8月18日）

高岗同志：

（一）八月十五日送来你在边防军干部会议的报告收到了，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肖劲光[2]同志来告有关边防军的各项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三）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延长至九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九月卅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肖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0年7月被任命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后来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没有正式成立。

询问向昌都进军的几个问题[1]

（1950 年 8 月 18 日）

西南局：

你们关于向昌都进军各电均悉。今年如能进到昌都当然是很好的，问题是：（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长道路是否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及是否适于空投；（三）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军似有相当强的战斗力，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这方面你们有足够估计否。我们对于以上几点尚不清楚，请分析电告为盼。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电报。

对王明来信[1]的批语

（1950年8月18日）

刘、周、朱、任、尚昆[2]阅。

王明的声明书应在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清查是否尚有保存。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王明，即陈绍禹，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在1950年8月1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写信，要求中央明确指出他应在多长时间内写成声明书，对他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所写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进行检讨；并提出为了进行检讨，希望将1937年12月会议散会时收去的笔记本还给他，希望借用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和延安的《新中华报》。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任，指任弼时。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组织人民法庭指示的批语

（1950年8月19日）

各中央局，分局：

华东局关于组织人民法庭的指示[1]是正确的，望你们亦就需要情形发这样一个指示。

中央

八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0年8月17日关于组织人民法庭的指示。指示规定：（一）应在匪特活动较为频繁及定于今冬进行土地改革之县份，首先建立人民法庭。（二）应在各县县委副书记、县农协主任、副县长或县公安局长等干部中，择一人兼任县人民法庭审判长，另以一得力的专职干部任副审判长。（三）确定担任人民法庭工作的干部及人员，应由各省（区）进行短期的专门训练。（四）应在干部较强、工作基础较好之县，先由县长或县委书记甚至专员，亲自审讯及办理一二个案件，作为示范，并吸取经验，以教育干部。

对上海党政群机关团体编制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0年8月20日）

周[1]：

此电两项建议[2]值得注意，请考虑指示各地，省及大市照此办理，成为制度。又，各地整编总结，报来者少，请考虑去电催送总结。

毛泽东

八月廿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0年8月14日关于上海党政群机关团体编制情况给中央并华东局的报告中提出的两项建议。这两项建议是：（一）编余员工处理问题。整编中采取谨慎处理是非常重要的，但老弱残疾人员，应视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一般可早日给资遣散。工务局六七十岁有多年工龄的老工人，无家可归者以包下养老为宜。（二）编制委员会撤销后，凡有关编制问题，应指定专门机关继续负责指导，以巩固已得成绩，并坚持贯彻下去。否则时间一久，便又各自为政，自行扩充广泛招聘、制度松懈的倾向难免发生，这是值得注意的。

给徐海东[1]的信

（1950年8月20日）

海东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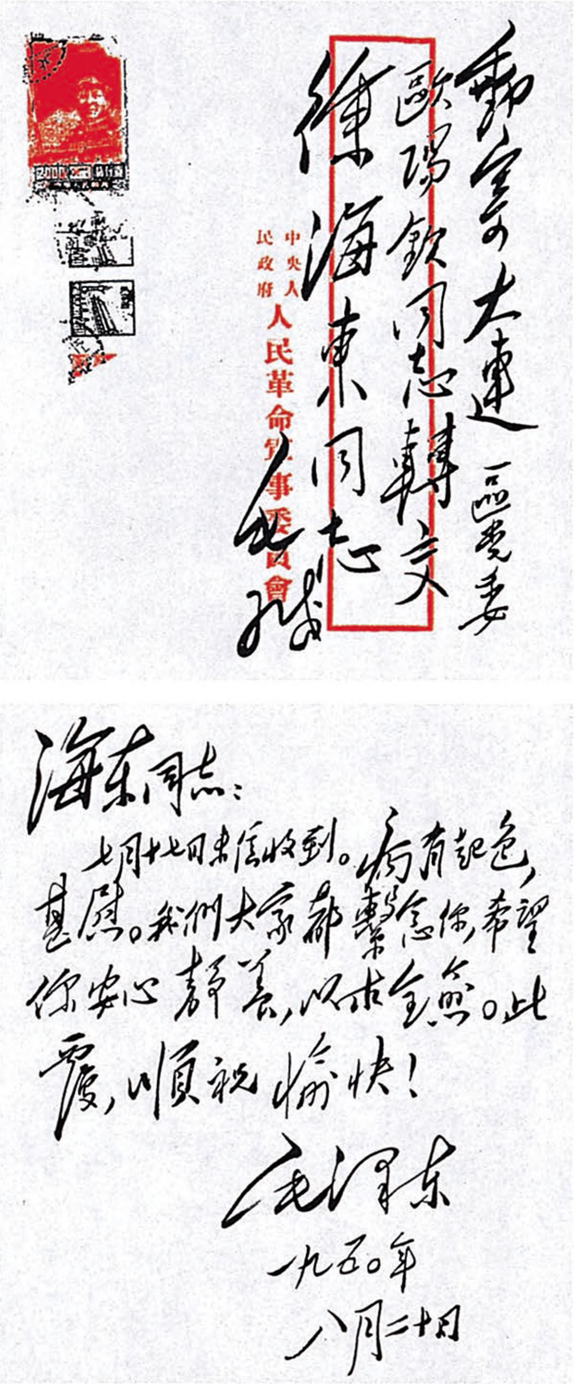
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全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日

---

[1] 徐海东，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第十五军团军团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久病，当时在大连休养。



郵至大連區黨委
歐陽欽同志轉交
徐海東同志

中央人民政府
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緘

海东同志：

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繫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全愈。此复，顺祝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
八月二十日

毛泽东致徐海东信的手稿。

对配备第二线兵力报告的批语[1]

（1950年8月20日）

德怀同志：

兹将聂荣臻建议[2]一件发给你。十九兵团是否可以照聂建议部署，请加考虑电复为盼。

毛泽东

八月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8月19日报告上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的批语。

[2] 指聂荣臻1950年8月19日关于在关内机动地区配备第二线兵力的报告。报告说：如美帝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继续打下去的话，虽然我们有了第一步部署，已将第十三兵团调至辽南，但仍恐不足以应付事变。因此建议，应于关内机动地区，再行配备第二线兵力，以为未雨绸缪之计。我们觉得除上海地区有第九兵团四个军可以机动外，应再有一个兵团集结起来，作为战略机动兵力，以策安全。这个兵团以第十九兵团为最合适。我们提议，于九月秋收后，将该兵团三个军集结起来，移至济南或郑州、洛阳地区休整，作为机动。因为济南一方面可控制山东半岛，同时也可作为第十三兵团的第二梯队，南面则与上海第九兵团互相呼应。郑州、洛阳虽嫌稍后，但便于训练，运输亦不困难。我们所以提议集结第十九兵团的另一理由：西北现有人口二千五百万，驻军六十万，显然太多，且该区情况亦较安定，抽出顾虑较少。

力争今年占领昌都明年进军拉萨

（1950年8月23日）

西南局，并告西北局：

八月二十日电[1]悉。（一）你们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力争留三千人巩固昌都的计划是好的，你们可以照此作积极准备，待本月底下月初判明公路已通至甘孜无阻，即可实行进军，期于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二）现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唯希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原不许西藏代表团来京，现已允许。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现我们正采争取西藏代表来京并使尼赫鲁[2]减少恐惧的方针。

---

[1] 指195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昌都之战，我们决定使用十八军四个主力团及两个营，战斗部队共一万三千人。此外，还有一个工兵团约两千人为战役的预备队。我们考虑，只要八月底能修通到甘孜的公路，十月上半月占领昌都是办得到的。早点占领昌都，有利于早点促进西藏的政治变化，而且前进一段，可使进占拉萨的军事政治准备确实一些。故决定力争今年占领昌都，并在占领昌都之后留三千人巩固昌都。这次支援入藏部队的物资准备是充分的，只是运输条件尚无最后把握，军用物资主要依靠牦牛运输及部队携带。现有飞机已陈旧，能行空投的最多只七架，如能增至三十架，那困难就少得多了。从长远着眼，西藏航空必须建立。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西藏代表到京时，我们拟以既定的十条[1]作为谈判条件，争取西藏代表签字，使十条变为双方同意的协定。果能如此，则明年进军拉萨会要顺利些。你们于占领昌都后只留三千人在那里过冬，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在西藏方面看来，可能觉得是我们向他们表示好意的一项措施。（三）三十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四）你们一万六千人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其中三千人须有过冬粮食，准备撤回的主力一万三千人至少须有往返期间三个月粮食，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仍望查告。（五）昌都等处可能购买一部粮食及肉类，你们是否已准备一批金银及藏民需要的货物如绸茶等带去。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5月27日草拟、后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即十项政策）。这十项条件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护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尽快筹备进军西藏所需高空运输机[1]

（1950年8月23日、24日）

一

第七项[2]请周[3]督促空司[4]尽速筹备，并以情况告我。三十架飞机要是高空使用的，驾驶员亦须适合此项条件，请加注意为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8月20日关于攻占昌都的准备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给李涛的信。李涛（1905—1970），湖南汝城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本篇三是毛泽东对李涛1950年8月24日关于筹组和购买高空运输机问题报告的批语。

[2]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8月20日关于攻占昌都的准备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的第七项。

[3] 周，指周恩来。

[4] 空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

二

李涛同志：

西南军区为进军西藏，需要三十架高空运输机，请询空司是否已着手筹备，飞机和驾驶员何日可以筹妥，最近三四个月内有希望否，问明告我，并加督促为盼。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三

周筹备，务于明年一月或二月或三月能有三十架（连现有九架）高空机。[1]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

[1] 李涛的报告说：关于筹组三十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援进军西藏的问题，经向空军司令部查询结果，最快亦须于一九五一年一月才可开始实现，上述时间还须保证向苏购买的飞机能于十一月到达才行。

给夏百源[1]的信

（1950年8月23日）

百源学兄：

惠书诵悉。张昆弟[2]兄死事弟亦不甚清楚，只知其工作地点是湖北洪湖区域，时间大约在一九三〇年左右。吾兄乡居灌园不是坏事，倘能就近赞助土改，即是有益于人民的。此复，顺颂

教祺。不一。

毛泽东

八月廿三日

---

[1] 夏百源，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张昆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30年在湖北洪湖地区牺牲。

给李漱清[1]的信

（1950年8月23日）

漱清先生：

惠书收到，极表同情，已将尊件转寄湘潭县人民政府酌量办理矣。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

[1] 李漱清，乡村教师。毛泽东在乡时，常去他家看书、请教。大革命时期，曾去广州协助毛泽东主办《政治周报》，后在湖南省农民协会清理逆产委员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返乡，继续执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给蒋浩然[1]的信

（1950年8月23日）

浩然先生：

来信收到，甚谢。尊府参加革命工作者甚多，令弟[2]为国牺牲，极为光荣。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

[1] 蒋浩然（1889—1972），湖南韶山市杨林乡联邑村人，其父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因商务往来交谊较厚。

[2] 指蒋梯空（1900—1927），原为乡村教师，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湘潭（韶山）特别区委宣传委员、特别区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等职。1927年11月在韶山被国民党团防局枪杀。

给罗石泉[1]的信

（1950年8月23日）

石泉兄：

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在地方上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较为适宜，不必来京。此复，顺问

康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

[1] 罗石泉（1888—1951），湖南韶山市杨林乡杨林村人，乡村教师。毛泽东的原配罗氏的堂兄。1925年参加韶山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湘潭（韶山）特别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商民协会执行委员。

边界战役须有连续作战的思想[1]

（1950年8月24日）

陈赓：

八月二十二日电悉。同意你们的作战计划。为了保证此役胜利，似应在干部中灌输连续作战的思想，以便对付谅山敌人来援而又可歼灭时的情况，以及在东溪、七溪敌人歼灭后高平之敌可能逃跑或向南增援的情况。判断敌方统帅部可能不预料我方现已能够集中二万余人在一处作战，可能以为仍不过几千人或一万人，因而从谅山派出三四个营或四五个营向东溪、七溪增援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如果敌只派出三四五个营增援，而又地形有利，我军战力充足，则我军于解决东溪、七溪后就有可能歼灭此援敌。如果此援敌被歼灭，则敌方统帅部可能迅速改正其对我方力量过低之估计，而命令高平之敌逃跑，或于我打谅山援敌时命令高平之敌放弃据点向南增援，夹击我军，则我军于歼灭谅山援敌后又有可能要向高平援敌作战，如不作战则只好让高平之敌逃跑。假如出现此种情况，则我军有于二十天左右时间内要打大小三四个仗之可能。因此，（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照你们估计的情况及计划在四十天内从容歼灭边界之敌，这样是很稳妥，很有利的；（二）照上面估计的情况，则须准备在二十天左右打大小三四个仗，如能打胜则是更有利的，但不知越军有此能力否？

军委

八月二十四日

准备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1]

（1950年8月25日）

邓、谭、赵，并叶、方[2]：

华南分局转来潮汕地委未寒电已悉。台湾敌人向潮汕[3]及海陆丰[4]举行登陆袭击是极有可能的。你们必须：（一）加强侦察工作，务使我军在敌举行登陆袭击之前，获得可靠情报；（二）加强兵力，请考虑从西面抽调一部兵力（例如一个强的师）及一部炮火加强东面，确保潮汕及海陆丰沿海防线，并派一个军级指挥部去担任指挥，遇敌袭击时能坚决歼灭之；（三）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集全力于准备作战。该区情况及你们意见盼告。

军委

八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和参谋长赵尔陆等的电报。

[2] 叶、方，指叶剑英、方方，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和第三书记。

[3] 潮汕，指广东潮州和汕头。

[4] 海陆丰，指广东海丰和陆丰。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整风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0年8月26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转所属分局及省市党委及军区党委：

下面是西北局的整风经验[1]，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其中有可以在你们区域采用者，请加采用为盼。

中央

八月廿六日

---

[1] 中共中央西北局1950年8月15日关于整风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的主要经验是：（一）各省市均采取总结工作的方法，办整风训练班和开三级干部会，整训县、区、乡干部。（二）自上而下整顿领导，结合自下而上检查工作的方法，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三）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领导上应态度明确，肯定是非，并及时加以解决，以消除顾虑，增强信心，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四）领导应集中力量注意解决各单位的主要问题，具体分析情况，研究改进办法，建立工作制度，克服不合理现象，使干部从具体工作的改进中得到思想上的提高。（五）为了克服工作中的忙乱现象，需要从总结实际工作经验中创造一套新的工作制度和办法，还需加紧培养百分之九十的新干部，使他们会做工作。（六）整风主要是整顿领导，对非党干部也应欢迎他们自觉自愿以共同纲领为标准检查工作，提高思想，但主要还是以党员领导干部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推动他们进步。

给徐悲鸿的信

（1950年8月26日）

悲鸿先生：

有李可染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财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

顺颂教祺

□信附陈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帮助越南训练和装备新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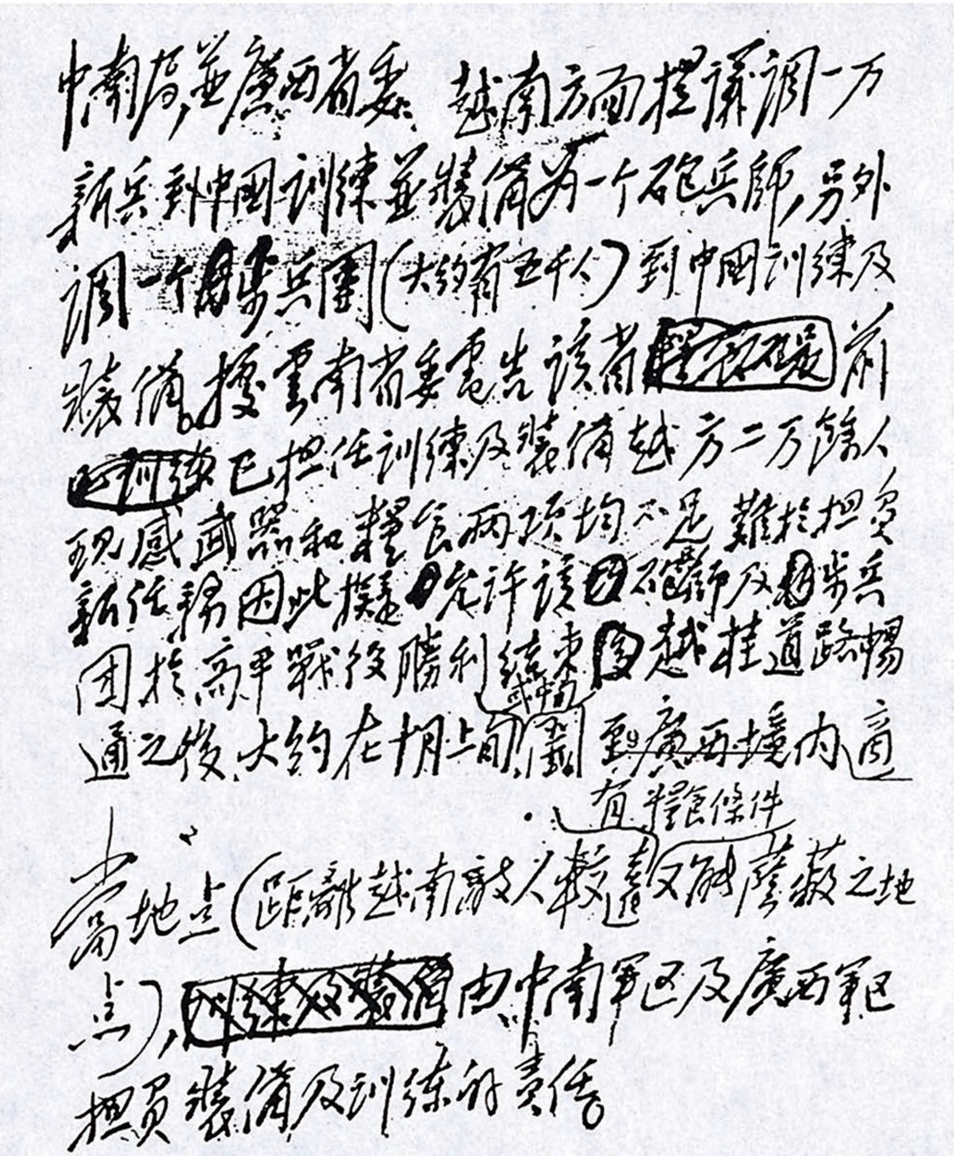
（1950年8月26日）

中南局，并广西省委：

越南方面提议调一万新兵到中国训练并装备为一个炮兵师，另外调一个步兵团（大约有五千人）到中国训练及装备。接云南省委电告该省前已担任训练及装备越方二万余人，现感武器和粮食两项均不足，难于担负新任务，因此拟允许该炮兵师及步兵团于高平战役胜利结束越桂道路畅通之后，大约在十月上旬或中旬开至广西境内适当地点（距离越南敌人较远有粮食条件又能隐蔽之西军区担负装备及训练的责任。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帮助越南训练和装备新兵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南局和广西省委的指示。



中南局并广西省委：越南方面提议调一万新兵到中国训练并装备为一个炮兵师，另外调一个工兵团（大约有五千人）到中国训练及装备。据云南省委电告，该省[illegible]前已担任训练及装备越方二万余人，现感武器和粮食两项均不足，难于担负新任务。因此拟允许该师及工兵团于高平战役胜利结束越桂道路畅通之后，大约在十月上旬开到广西境内有粮食条件的适当地点（距离越南敌人较远又较隐蔽之地点），~~训练及装备~~由中南军区及广西军区担负装备及训练的责任。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南局和广西省委的指示的手稿。

中央关于中央局负责人来京开会的通知

（1950年8月27日）

高岗、德怀、小平、子恢、漱石[1]同志：

为了事先商量几个重要问题，以利应付时局及制定三年计划，准备提交十一月或十二月开会的党的四中全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请你们五位同志于九月廿五日来京开会，会期五天左右。特此通知，请作准备为盼。

中央

八月二十七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

（1950年8月27日）

德怀[1]同志：

为了应付时局，现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四个军），但此事可于九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司令员。

对选派干部去朝鲜战场了解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0年8月27日）

周：

请令这些人和柴君武[2]一同来京，由你面授机宜，然后去朝工作。[3]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和参谋长解方的报告上写给周恩来的批语。

[2] 柴君武，后改名柴成文，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

[3] 邓华、洪学智等的报告说：兹选定兵团侦察科长崔醒农、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景仲、第三十九军参谋处长何凌登、炮八师副师长黄登保，以驻朝鲜大使馆武官名义，去朝鲜了解情况。另外，东北后勤是否也派人去，以及去朝鲜与大使馆接洽手续等，均请速示。

对华东局关于整理华东各级党刊的决定[1]的批语

（1950年8月28日）

乔木[2]：

此件似可转发各地，并要各中央局采取同样办法整理党刊。

毛泽东

八月廿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0年8月25日送中央宣传部审定的关于整理华东各级党刊的决定。决定中说，华东区现有党刊七十二种，一般编辑方针都不明确，大都与当前实际工作脱节，特别缺乏思想领导、政策领导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个别刊物还刊登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相符合的文章。为克服党刊存在的上述缺点，决定：（一）各级党委出版的党刊分定期与不定期两种。重新规定省委区党委以上党委机关出版定期党刊一种，华东局一级出版党刊三种，其他各地须出版党刊者，应经华东局批准。（二）分局以上党委机关出版的定期党刊，应尽量选登下面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报告，转载中央及中央局同本区工作有关的指示和决议，以及进行党内思想理论上的建设与批评，其主要对象为县团级以上干部。（三）省委区党委机关出版的定期党刊，应着重于交流情况、经验及刊登当地党内指示、决定，进行党内思想工作上

的指导与批评，其主要对象为县区及团营级干部。（四）地委出版的不定期党刊，应着重于交流经验，反映具体情况，以通俗文字摘登上级党有关本区的某些指示，其主要对象为区乡干部。（五）在同一地区省（市）委区党委机关有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两种以上党内刊物者，应即合并为单一的党刊。（六）凡有关政治性原则性的重要文章，须经同级党委书记或受委托的党委负责人审查后方得刊登，关系重大者须经更高级党委审查。（七）各级党委出版党刊的批准权属于华东局，不经批准不得擅自决定出版。（八）建立党刊的检查制度，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按月检查同级及下级党委出版的党刊。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从1950年开始，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在农村和城市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关于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京谈判的批语

（1950年8月29日）

周[1]：

请注意进攻昌都的时间[2]。请考虑由外交部适当人员向印度大使透露，希望西藏代表团九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诚意，应当速来，并希印度政府予该代表团的旅行以可能的协助。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950年8月24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说，预计十月中旬占领昌都。

关于催促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京的批语

（1950年8月29日）

周[1]：

去电申健[2]叫西藏代表团马上动身来北京，很有必要。电中请说明希望该代表团接电后迅即动身乘飞机至香港，转乘广九、粤汉、京汉火车，九月中旬到达北京。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申健，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负责办理西藏代表团经印度到北京谈判事宜。

给陈寄生[1]的信

（1950 年 8 月 29 日）

寄生先生：

惠书读悉，甚以为慰。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唯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

[1] 陈寄生，湖南溆浦人，长期担任中学教师，研究过少数民族历史。

给郭梓材[1]的信

（1950年8月29日）

梓材学兄：

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当地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尚祈斟酌。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刘天民[2]先生同此致候。

（刘先生来信没有收到）

---

[1] 郭梓材（1897—1964），湖南韶山市韶山乡朝阳村人，曾同毛泽东在私塾学习，在湖南新军当兵。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湖南湘潭建中猪鬃厂工作。

[2] 刘天民（1902—1977），湖南韶山市杨林乡善扶村人，郭梓材的妻子，和杨开慧关系密切。大革命时期曾从事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后长期作教育工作。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

给越南民主政府的贺电

（1950年8月29日）

胡志明主席阁下：

欣逢越南独立五周年纪念，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中国人民向阁下及越南人民致热烈的庆贺，并祝越南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在建设独立民主的越南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毛泽东

给谭世瑛[1]的信

（1950年8月31日）

世瑛学兄：

五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入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赡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于赡家，未知有此决心否？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

[1] 谭世瑛，毛泽东少年时的同学。

对当前工作的指示

（1950年8月）

一　打破封锁，改变半殖民地经济状态

力戒急躁，计划要切实可行。

帝国主义对我们各种斗争直到封锁，目的在迫我就范。打破封锁之道，最重要的是军事上迅速解放全中国，外交上及时主动一面倒，内部则强调自力更生，从长远建设着眼来提出问题。中央同意□□局对城乡问题意见，应迅速进行，决心把农村工作做好，并认真动员和做出调动干部下乡计划。另外，反封锁要在政治上抓理，绝不可仅由共产党作决定，而应与各界共同决定。最好通过各界代表会讨论决定。疏散难民应立即进行，疏散旧人员应慎重，给以生活之道，做到仁至义尽。工厂内迁不应从解决上海当前困难着眼，而应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长远计划来提出，做出计划，分别先后、公私，对私厂内迁，必须：（1）与各阶层共同讨论决定，大家负责。（2）必须自愿，不可强制，但应宣传动员。（3）自愿迁者予以真正帮助，不论公私工厂，均应求其内迁后有出路。（4）可迁而不愿迁者，倒闭了责不在我。学校可内迁一部，国民党中央各机构，也应适当安置在各地。精简节约应即实施，无作战任务之部队可分驻农村，加强农村剿匪和群众工作，减少地方武装。对精减人

员应注意安插，不可送走了事。节衣缩食以不病倒病人为原则。最后，应充分认识半殖民地经济不能希望一下改变，力戒急躁，一切计划，必须切实可行。

二　工作上政策上要争取主动，避免被动

对党内应从理论上反复教育，说明必须团结党外人士的重要意义，克服怕麻烦、不愿接近民主人士、对招待民主人士较为看不惯、认为“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的思想倾向，使全党了解团结争取党外人士，甚至把傅作义、程潜、张治中之流争取过来为我所用，这虽有小麻烦，但可以少打多少仗，少死多少人，对人民非常有利。要学会算大账，要善于批判地学习敌人的斗争策略，才能消灭敌人。今天我们力量强大，应有大气魄，一切能用的人都拿来用，虚心学习其长处，不怕他们造反。对大中学处理要非常慎重，不在人事上轻易更动，对资产阶级学者要慢慢加以改造。在学术上必须采取老实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充懂，否则必然大失威信，陷于被动。对党外人士要主动谈“过三关”问题。第一关是封锁，大约三个月以上；第二关是土改，要三五年左右；第三关是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也知社会主义迟早要实现，但仍力争时间，总要心里有个数才放心。

三　与党外人士合作的几种形势

（1）人民代表会议——大体上接收城市二三个月，了解了情况就可召开，主动把党的意见变成大家的共同决定，共同负责执行。

（2）共产党和各党派，各界人士的干部会议——约一月召开一次。除党内秘密外，一般政策问题，要争取主动普遍传达。开会时应由主要负责人出席，才能使人家重视。这种会可减少党外人士顾虑，并可以教育广大中间分子，及时给进步分子以斗争武器，孤立右派分子。

（3）军政委员会。

（4）顾问团。

四　改进工作办法与领导方法

领导机关对必要会见的人要见，必要的会议要开，但不可过多过长，陷于被动。要学会节约时间，集中力量解决重要问题，平时要充分利用通报、电报、社论来实现领导。对下面要定章程出“安民告示”，经常给予任务，定期检查，传达经验，表扬优点，批评缺点，使领导经常处于主动。

五　加强国际主义教育

向党内党外反复说明一面倒的真理。对苏联朋友表示热情、关心、友好的态度；苏侨来往采取护送制度；主动向其解释不同习惯；对缺点也可经相关负责人正面讲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侨民，愿走者尽量帮他们走，多走无害，但方式要讲究。

1950年8月，毛泽东会见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量。

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1950年9月1日）

陈毅[1]同志，并告饶[2]：

在此所谈各问题，你写电报时，为保密计，请用有线电发来，不要用无线电。嗣后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线电，不用无线电。只有非机密者用无线电。党政军均是如此。党政军对下面亦应如此，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均用有线电，以达保密之目的。在此敌我斗争日益尖锐之时，保密问题值得引起我们极大注意。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市长。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关于中央系统整风工作领导问题的批语

（1950年9月1日）

安子文[1]同志：

中央系统整风工作现在不知已开始进行否？是什么机关领导的？我认为应由中央组织部领导，由安子文同志负主责，由中央、军委、政务院、工青妇各系统各指定几个人组成委员会，领导整风工作。华北局此件[2]可印发各机关作参考材料。如何进行，盼告。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0年8月29日关于华北局秘书处支部整党整干经验给分局、各省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

给黄炎培[1]的信

（1950 年 9 月 1 日）

任之先生：

大示敬悉，承赠大作《红桑集》，极为感谢。南方各省有丰收之望，北方亦有此种情形，检陈华北局报告[2]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为荷。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 1950 年 8 月 29 日关于秋收、秋耕、秋种工作的指示。

对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等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信[1]

（1950年9月1日、3日）

一

少奇[2]阅后，送周[3]阅，请周就高岗所提各项问题，邀集有关人员会商一次，以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一日

二

高岗同志：

八月三十日来信收到。兹复如下：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1950年8月30日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高岗报告的复信。

[2] 少奇，即刘少奇。

[3] 周，指周恩来。

（一）友军[1]作战方面，可能发生如来信所说的困难。但估计一时尚不便改变，还须打一个时期（也有此种必要），到无可打了，损伤也大了，就会逐渐改取守势。友方人员的后备力甚大（已动员报名百万以上），装备是有的，故估计可以坚持颇久的时间。

（二）二千辆汽车，可以筹办。

（三）铁道纵队待需要时可调动，目前尚不需要。

（四）弹药北移有必要，请即办。

（五）整个空军攻防计划，是照顾了你所说的情况的，正在筹办。

（六）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你的意见是正确的。柴君武[2]可于九月上旬或中旬率少数人以大使馆员面目去实地调查作战情况，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专人研究，请即就东司[3]及十三兵团设立，并进行研究。林、粟[4]均病，两尚[5]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

[1] 指朝鲜人民军。

[2] 柴君武，后改名柴成文，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

[3] 东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

[4]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员。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两肖，指肖劲光、肖华。肖劲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950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员。肖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1950年7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副政治委员。

（七）对省级主要同志只讲边防，不讲其他。

（八）工业迁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

以上各项中，有几项须具体去做的，当由周副主席负责予以解决。

此复，及祝健康！

毛泽东

九月三日

有事请随时来信。

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1]

（1950年9月5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2]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他们动员的人力已超过一百万，朝鲜人民军队现在有十几万人，今后还能继续补充。朝鲜人民斗争很勇敢，美国飞机一面炸桥，朝鲜人民就一面修桥。开始时是白天炸黑夜修，后来则是随时炸随时修，飞机来了，朝鲜人民只在旁边躲一躲，然后还是照旧去修桥。战争开始时，美帝国主义原以为用空军一炸，朝鲜人民就会害怕，结果却碰了一个钉子。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统治和压榨之下，一旦站立了起来，就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他们。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的奴役之下，已经变得非常坚决了。东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也锻炼得非常坚决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

[2] 李承晚（1875—1965），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手去克服困难。在今天，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虽然增加了，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对于朝鲜人民的同情已经和正在不断地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时，世界的同情就在中国人民方面，越到后来，这种同情就越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朝鲜战争虽然持久不如速决的好，但持久了更可以教育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希特勒[1]的战线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日本东条[2]的战线是从中国东北到南洋，都比美国从柏林到朝鲜的战线短。在运输路线上，希特勒从柏林到莫斯科，也比隔着两个大洋要短。在战斗力上，美军不如德、日的军

---

[1] 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2] 东条，即东条英机（1884—1948），日本战犯。1941年至1944年担任内阁首相期间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侵略战争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投降后被捕，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队，这一点不仅郑洞国[1]知道，就是我们八路军也是早就知道的。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

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一九五一年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

---

[1] 郑洞国（1903—1991），湖南石门人。抗日战争后期曾任驻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副总指挥兼新一军军长。解放战争后期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1948年10月19日率部在长春放下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关于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签名运动的批语[1]

（1950 年 9 月 8 日）

周[2]：

此事不宜太急，太硬性，致失去团结较多的人的机会，造成对立，对吴刘[3]运动开展不利，请设法影响吴刘。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 1950 年 9 月 6 日关于吴耀宗、刘良模等发起的中国基督教会三自宣言签名运动的各方反映的报告上。

[2] 周，指周恩来。

[3] 吴，指吴耀宗，当时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刘，指刘良模，当时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组主任。

九兵团全部开到徐济线整训[1]

（1950年9月8日）

九兵团全部可以统于十月底开到徐济线[2]，十一月中旬开始整训。该兵团在徐济线整训期间仍归华东建制，唯装备及整训方针计划受军委直接指挥为适宜。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华东军区1950年9月5日关于九兵团北调执行办法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2] 徐济线，指徐州至济南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请周恩来约谈柴君武指示任务和方法[1]

（1950年9月8日）

一

聂：

要柴[2]先找周[3]一谈。[4]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9月8日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柴君武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的批语。

[2] 柴，指柴君武，后改名柴成文。

[3] 周，指周恩来。

[4] 聂荣臻的报告说：柴君武昨日返京，今下午约他一谈，因我方使馆人员不能下去，故了解情况不多，亦不深刻。现将书面报告草稿先呈上，如要面讯时请告时间。

二

周阅后，刘、朱、任[1]阅，退聂。[2]

请周约柴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十三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柴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3]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征求金[4]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任，指任弼时。

[2] 柴君武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从5个方面汇报朝鲜的形势和看法：（一）战局发展的3个时期。（二）现有敌人兵力番号位置判断。（三）人民军兵力番号位置。（四）观感。（五）朝鲜各收复城市工作。

[3] 李周渊，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4] 金，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中央转发川南区党委关于整风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0年9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下面这个整风经验[1]很值得注意，各地省地县三级整风务须吸取川南的经验，着重检查工作，端正政策。

中央

九月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9月4日向中央转报的川南区党委整风情况的报告。他们的整风经验，主要是报告中提出的使整风逐渐深入必须掌握的几项原则：1. 领导上下决心，保证整风需要的时间，不怕暂时影响工作，并应大力发扬民主，启发下级干部与群众检查领导，确定科以上党员干部整风为重点。2. 首长亲自动手，整风干部要集中，按机关系统建立学习分会。3. 及时了解研究情况，不断作思想动员及方法上的领导。4. 紧紧掌握密切结合总结工作的原则，不使整风分散精力去整个人生活细节或发生其他的偏差。各单位负责同志在整风开始时，必须作一明确的从总结工作中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使大家有明确的方向，从检查政策检查领导来联系自己。

中宣部转发东北局关于学校整风的指示的批语

（1950年9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大市委及省委宣传部：

关于学校整风问题，东北局九月三日指示[1]是正确的，请转所属学校党委参考。你们那里学校整风是否发生过如象沈阳农学院那

---

[1]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50年9月3日关于沈阳农学院整风情况给各省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其中讲到沈阳农学院平时领导干部间，党员干部与非党人员间，即存在着不团结现象。在这次整风中，主要党员干部均外出工作，未在党内及领导干部中首先进行整风，即发动非党教职员检查工作，结果形成群众整干部，干部之间闹对立，更增加了党群之间及干部之间的不团结。由于没有领导，所提意见多限于生活作风问题，没有引导教职员对贯彻教育方针和执行党的教育政策方面提意见。为此，东北局指示今后专科以上学校的整风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领导上必须弄清学校整风的主要目的是使党员干部善于团结全体师生正确地贯彻教育方针，把学校办好。因此，应以教学方针及党对学校教育政策的执行情形为整风重点，并总结经验。（二）整风应限于担任行政工作的党员干部，主要是领导干部。（三）领导干部在整风中可结合征求非党教职员的意见，条件准备成熟时，并可吸收他们参加检查工作，但对他们不要进行如干部那样的整风，主要是经常的团结教育问题。（四）严格防止及纠正在整风中那种离开原则，闹私人成见和宗派斗争的行为。

样的不良现象，望加注意并向中央作报告。

中央宣传部
九月九日

中央转发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0年9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区党委市委及地委：

兹将河南夏季征粮经验[1]一件发给你们，值得引起极大注意。今年全国秋征工作，必须党政全力布置，加强领导，务必避免河南淮阳区那样的极端恶劣现象，切勿大意，是为至要。

中央

九月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0年9月1日向中央转报的河南淮阳地区夏季征粮和匪特活动情况的报告。其中讲到淮阳地区夏季征粮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按比例负担，按任务评量，畸轻畸重，贫雇农负担加重，尾欠户多为贫农，不少地方发现卖牲口、当青苗、卖树、借债等情况，多数地主要赖不交夏征粮。已布置的解决办法是：对尾欠者可以减、免、缓交，卖东西者适当退还，秋粮多夏麦少者改征秋粮，地主要赖者给以处分。

关于失业工人救济问题的批语

（1950年9月9日）

李立三[1]同志：

（一）此件[2]可转发各地参考。（二）请考虑发一通知，叫各地调查解放前失业工人究竟有多少，以便考虑包括这批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我意只要有可能，他们是应当救济的。如果不太多，譬如说只有几十万人，是可以考虑救济的。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1] 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2]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0年8月30日关于上海失业工人救济工作情况给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

开展连队民主运动加强战斗力[1]

（1950年9月9日）

各大军区党委及政治部：

兹将中南所属四十八军开展连队民主运动计划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亦发动所属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四十八军的计划，可发给各军参考。

军委总政
九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转发中南军区第四十八军开展连队民主运动计划的指示。

在一封匿名信上的批语

（1950年9月9日）

一

这封信[1]表示对于党的组织状况和干部政策的一种看法，认为党内注重用庸才，不重用能干的人，对此很表悲观，希望改进。这封信的用意是好的，他所指出的有些情况值得注意；但根本看法是错的。党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群众的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平是和党的组织状况有联系的，此种状况当跟着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的发展而改变，也只能由此而改变，而且也不能由一次二次整风就会将大批农民出身的干部的文化及政治水平有极大提高。□□一类人看不起民主人士的观点，代表了农民的某些狭隘思想，经过教育和历史演进是会改变的。问题是在教育和更多的革命经验，而不是什么提倡“尚贤”“尚同”可以解决的。

毛泽东

---

[1] 指一个署名“毋名”的人在1950年8月30日写给毛泽东的信。

二

难道与农民的忠实革命无关吗？[1]

三

这封信的作者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于农民的狭隘思想很看不惯。其实，工农干部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

四

这个条件，责之于一般干部，未免有些苛刻。忠实是首先的条件，我们的干部一般是忠于人民的，作者却看不起他们。

五

这是书生见解。[2]

---

[1] 这句批语写在信中以下一段话的旁边："庸才观点已经形成一种有力的统治力量，不要误会这一事实和我们伟大的革命成果有矛盾，这与时间、地点与各种复杂条件有关，如果具体分析起来，今后在和平的经济建设事业中，这种观点如继续统治下去就成为致命伤，历史的教训毛主席要比我们体会深刻得多了。"

[2] 这句话是针对信中的"孔子对得意的门生颜回尚有怀疑，可见了解人之不易也"写的。

六

目前哪里有那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1]

---

[1] 这句批语写在信中关于应当由什么样的人做干部工作的一段话旁边，这段话是：“把一个最困难的工作，放在马列主义水平最低的一些同志身上，岂不是有意的让他们做错，我想这可能是问题关键中的关键。”

关于整党中应注意检查统一战线工作的批语

（1950年9月11日）

李维汉[1]同志：

如你认为有必要，请将此件[2]内关于整党中应注意统一战线工作的检查问题，摘录要点，起草一电报，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政府党组作一介绍，请各地党委注意，凡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工作的党要检查党的统战工作。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军委民航局党委1950年9月关于整党工作的补充指示。其中强调，民航机关处在统一战线的环境，这一次整党应以检查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为最重要的内容。

给陈郁[1]的信

（1950年9月11日）

陈郁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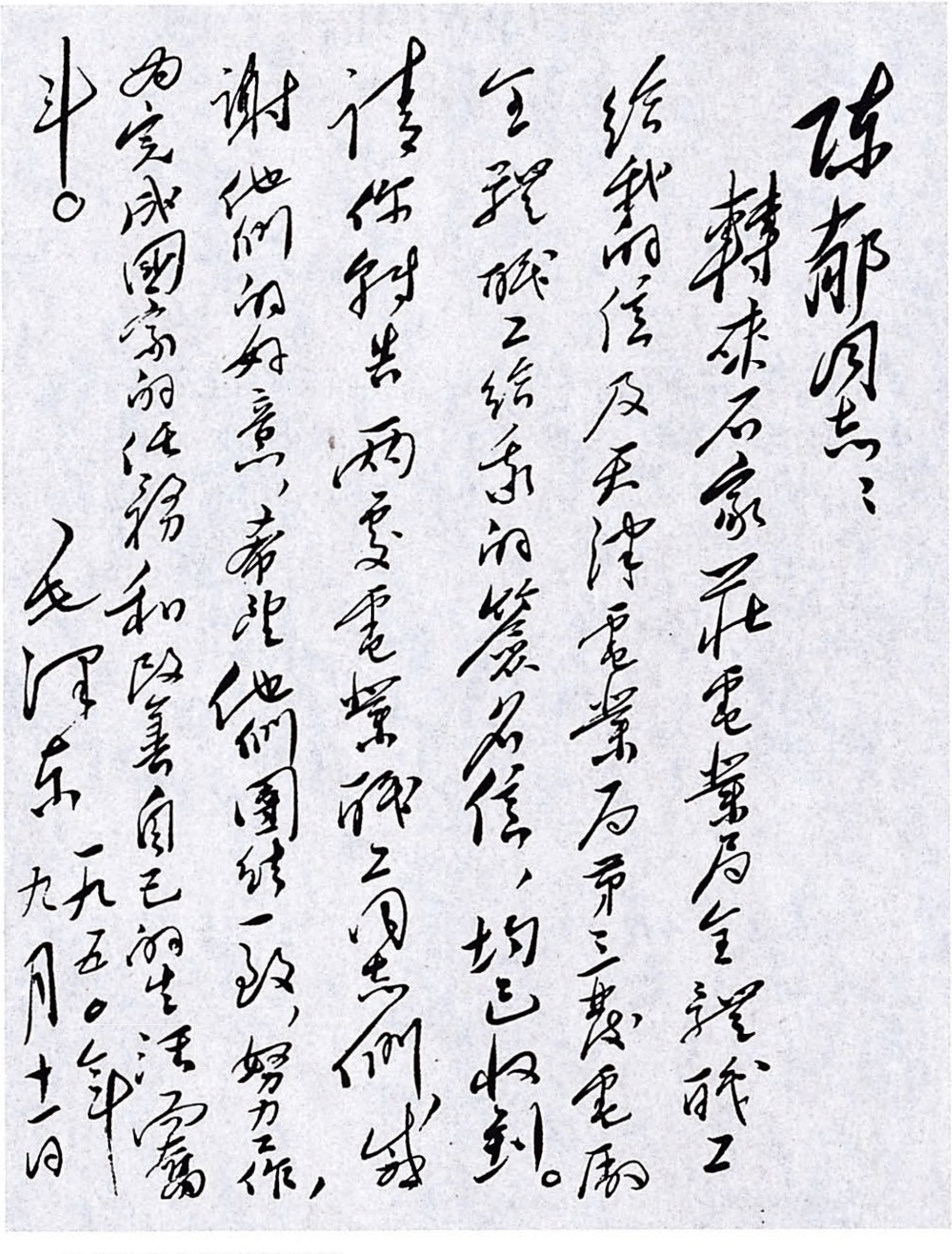
转来石家庄电业局全体职工给我的信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给我的签名信，均已收到。请你转告两处电业职工同志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

[1] 陈郁，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部长。



陈郁同志：

转来石家庄电业局全体职工给我的信及天津电业局第三发电厂全体职工给我的签名信，均已收到。请你转告两处电业职工同志们，我谢他们的好意，希望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完成国家的任务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

毛泽东致陈郁信的手稿。

对关于铁道兵团领导关系报告的批语[1]

（1950年9月11日）

同意[2]。军委办公厅起草一通知电，并告铁道部。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滕代远、副司令员吕正操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崔田民1950年9月11日报告的批语。

[2] 滕代远、吕正操等的报告说：铁道兵团去年5月16日奉军委电令，于6月以铁道纵队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种部队，是现代国家兵种之一，归军委建制，委托铁道部长领导。15个月来，铁道兵团在铁道部长领导下，完成了铁道抢修复旧的任务。关于司、政、后等机关工作，因机构不适宜，组织不健全，加以与军委各有关部门未建立领导关系，业务上得不到指示，问题不能解决，影响工作不小。为加强兵团的领导和正规化的建设，请求军委令各有关部门承认铁道兵团为军委建制。除工程与经费由铁道部负责外，其余各部门的请示报告、会议汇报、分发书报指示电报以及干部受训调动等，均与军委其他直属部队相同。

中央转发河北省政府直属机关整风经验的批语

（1950年9月12日）

各中央局：

整风中党员与非党员配合进行问题，河北省人民政府的经验[1]很可注意，望加研究参酌办理。

中央

九月十二日

---

[1] 中共中央华北局1950年9月12日向中央转报的河北省政府直属机关党与非党干部以科室为单位合并编组进行整风的经验主要是：一、这样做可以步调齐一，领导集中，使党政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加强党与非党干部的联系。党员干部在合并编组整风中，提高了自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这对改进党员的作风效果很大。二、有利党员与非党干部互相鼓励与启发，克服散漫和不认真的现象，使整风很快走上正轨。三、加强党支部在整风中的作用，解除党员与非党干部的各种怀疑和思想顾虑。四、教育党员以身作则，影响并带动群众，使他们消除顾虑，畅所欲言。领导上要紧紧掌握党内严党外宽的原则，严防党员对非党干部要求过高的现象。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改造绥远起义部队的报告的批语

（1950年9月12日）

西北局及军区党委，西南局及军区党委，中南局及军区党委，华东局及军区党委：

关于改造绥远傅部[1]及绥远地方的工作总结，华北局的意见[2]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做参考。你们所属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全般情况如何，望加以总结，向我们做一次专题报告。

中央

九月十二日

---

[1] 指原隶属傅作义的董其武部。该部1949年9月在绥远宣布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0年9月10日关于绥远工作近况和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综合报告。报告中说，由于坚持执行对起义部队团结改造的方针，8个月来绥远在改造起义部队和地方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存在的问题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除继续做好团结改造上层的工作外，要加强群众工作，给群众做出几件善政来；（二）在起义部队中采取有效办法加强政治工作，逐步树立党对部队的领导，达到改造和巩固部队的目的；（三）继续剿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安定社会秩序；（四）在整党整干中克服一些同志在改造起义部队问题上存在的“左”倾情绪和畏惧困难、失却信心的思想偏向。

关于检查督促政府各部门向中央报告工作的批语

（1950年9月13日）

周[1]：

政法系统各部门，除李维汉[2]管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与中央有接触外，其余各部门，一年之久，干了些什么事，推行的是些什么方针政策，谁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请查询。中财委所属各部门，经过中财委向中央反映，有些是慢一些，但大体是好的；也有若干部门，例如重工业，燃料，农、林、水利等还没有反映。文委系统状况，略同于财委。以上情况，请作一总检查，并加督促。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薄一波[1]送审的一九五一年预算草案上的批语

（1950年9月13日）

薄一波同志：

要有详细说明及两年比较，否则无法审查。因此（一）概算表须列出今明两年比较数字及明年比今年增减数字，表尾说明栏内亦要将今明两年的比较变化加以说明，方明历史演进；（二）各部分支出预算，须另造几张详表，指明每部分中的各项细目，例如军费的各项细目及两年历史比较，投资的各项细目及历史比较（例如工业投资的各项细目及两年的历史比较，其中如铁路投资要有每一条铁路的预算数字，水利投资要有每一条河流的数字，文教费要有每一项文教事业的数字及比较），其他类推。此项工作务请于九月廿五日以前办好送我。关于要有详细内容，还在八月政治局讨论此事我就向你提出了。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同意陆军大学设在南京[1]

（1950年9月13日）

同意陆大设在南京[2]。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9月13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关于陆大校址问题，曾拟以香山作为临时校址，先行开学，择地修建校舍，后拟将长辛店营房改作陆大临时校舍。今天约苏联军事顾问柯托夫、康略夫一同去看，他们均认为作陆大校舍太不合适，提议在长春、天津、南京等地另找地址。又据由华东方面来的同志谈，南京原国民党办的陆大校址设备颇全，可容3000人，现华东军政大学校部即驻此。同时南京附近尚有原伪各军校址数处，似可调整。我认为，为节省开支与时间，同时北京又无适当校舍，暂设在南京为好（利用伪陆大设备）。如主席同意，当派人去南京看房子，商量调整房舍。

复南非联邦杜邦城 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电

（1950年9月13日）

南非联邦杜邦城

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

A·I·梅尔

J·N·兴赫先生[1]：

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南非联邦政府歧视及压迫南非洲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及其他亚洲人民）的主张，并祝你们会议成功。

毛泽东

北京九月十三日

---

[1] 南非联邦杜邦城南非印度人大会会议联合书记A·I·梅尔与J·N·兴赫于8月17日致函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及中国其他人士和团体支持他们，反对南非联邦政府歧视及压迫南非洲的非白色人民。毛泽东表示完全支持。这是毛泽东的复电。

同意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在上海设办事处[1]

（1950年9月14日）

一

各中央局及各大军区党委：

接上海市委九月十二日电称，“六月初至八月底，市委接到各区委反映，有关各地区来沪购物受骗、贪污、将公款私存私营行庄等事件，达十一件之多。其中情况较为严重的，有太原煤矿购买钢丝绳，贪污一千万元，并受商人欺骗，以劣货抵充舶来品（已报告）。西北军区第三军运输处长徐飞，以五、六亿款项，化名分存私营行庄，经转告区行查出，而徐本人态度蛮横，强词夺理。他与平原军区代表张瑞卿向荣尔仁购厂，事先未和华东财委商量，即与荣订立合同，后因财经情况好转，荣即毁约，迄未解决。一野温同志来沪采购汽车材料，委托私人代办，商人以旧货翻新充数，本人则贪污腐化，住所不定。浙江制麻公司，中南区工商部，东北林务局等采购五金电器材料，均收取上千万佣金。四野后勤卫生部到广协书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党委的电报；本篇二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的给上海市委的复信。

局、商务印书馆买书，索取额外书籍，价值三十余万元。上述情况均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已分别抄转各有关单位查明处理，但因各地来沪人员甚多，又不愿与当地党政接头，沪商人刁滑异常，我方人员容易受其欺蒙。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除通知工商部门加强对外地来沪采购同志予以必要的照顾与帮助外，建议中央电告各地，以大战略地区为单位（包括大城市）在沪设立办事处，统筹各单位贸易和采购事宜，并与沪工商办事处取得联系，避免此间多头及商人谋取非利的弊端，是否有当？请裁夺”等情。中央认为上海市委的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即以大战略区为单位（包括大城市）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统筹各单位贸易采购事宜，并与上海工商办事处取得联系，避免各项弊端。对于各区过去派赴上海人员所犯错误，应予检查，给以必要处罚。

中央

九月十四日

二

上海市委：

九月十二日电悉，同意你们的意见，已令各中央局依照你们的建议在上海设办事处统筹采购，并与你们联系。

中央

九月十四日

希望各军区党委报告第一期整风情况[1]

（1950年9月16日）

各大军区党委，并告各中央局：

地方党的整风工作，业已普遍进行，并向中央发来了许多报告，提出了许多好的经验；但军队党的整风工作是否已在进行及如何进行的，除少数有反映外，大多数尚无反映。我们希望各军区党委务于九月底或十月初向我们发来一次报告，概述全区部队第一期整风情况，如何，盼复。

军委总政

九月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的给各大军区党委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

关于区域自治问题的批语

（1950年9月16日）

刘、周、朱、任、李维汉[1]同志：

区域自治问题，牵涉很广，有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甘肃、西康、云南、广西、贵州、海南、湘西等处，有的须成立内蒙那样的大区域政府，有的须成立包括几个县的小区域政府，有的是一个县或一个区的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此电[2]所称东藏自治区域，是与西康省政府并立的，还是属于西康之内的？其疆域如何？是否事前得到中央批准？请维汉查告，或去电询问。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任，指任弼时。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指中共西康区委1950年9月6日关于建立东藏自治区域人民政府问题给西南局并第十八军张国华、谭冠三等的电报。

粤桂等地军事部署
及对剿匪等项工作的指示[1]

（1950年9月16日）

邓、谭、赵、苏，并各军区党委：

九月十三日电悉。（一）同意你们对粤桂五个军的部署。甲、目前形势下，海南岛有四十三军一个师已足；该军主力仍可位于大陆，并可照你们部署以一个师开钦、防[2]。乙、你们于南宁西南地区集结一个师继续剿匪，并准备与四十三军调驻钦、防之一个师配合歼灭由越南窜入之残匪，是很必要的。唯请注意，这两师兵力不要太迫近越南边界，要距边界远一点，如匪军由越回窜，则诱其深入百余里或二百余里，然后我军以必要力量切断其来路，由西向东歼灭之，切忌打得太早，迫其逃入越境，麻烦甚大。为歼灭该敌，我两个师及地方部队，须指定一个能干的军级人员统一其指挥。丙、广州、佛山、花县、英德及其以东地区经常保持四个师是必要的。惠州及其以东，包括潮汕、海陆丰区域[3]须经常保持两个师，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赵尔陆和副参谋长苏静并各军区党委的电报。

[2] 钦、防，指广西钦州和防城。

[3] 潮汕、海陆丰区域，指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和海丰、陆丰地区。

以便及时歼灭可能由台湾方面乘机偷袭之敌。（二）你们对四十八军的部署是对的，该军收缩地方工作的时间如来不及，可以推迟至明年一月底或二月底集中完毕。（三）湖南之两个军，请你们考虑，在明年春季集中一个军于机动位置，明年夏季或秋季再集中一个军，是否可行，盼查明电告。（四）主力各军明年的剿匪工作、军事训练、文化训练和生产任务须作必要的调整，不使互相冲突。即是说，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明年彻底剿灭；文化教育须用大力推行；军事训练亦须占有一定时间完成一定整训任务，务使武器不生锈，装具不遗缺，战斗意志不降低。为达上述目的，则生产任务不能太多，应以改善部队生活为主，不以增加国家财富为主。如不减少生产时间，则文训与军训两项任务即不能完成。此问题为全军共同问题，除请你们考虑外，亦请西北、西南、华东、华北、东北各军区负责同志加以考虑，以其意见电告为盼。

军委

九月十六日

军委关于广西我军注意不要超出国界的电报

（1950年9月16日）

邓、谭、赵[1]，并告张、莫、李[2]：

你们十五日廿三时四十分电及张莫李十五日电均悉。张莫李所提意见是正确的，但须令我军注意不要超出国界。

军委

九月十六日十四时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

[2] 张，指张云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莫，指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李，指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关于抗议美机美舰对我侵袭问题的批语[1]

（1950 年 9 月 16 日）

周：

东北及上海、山东沿海（渔民发现的）均继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沿海事件，军委有材料。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关于上古龙村1950年9月12日发现美机一架的电报上写给周恩来的批语。

关于各大区在天津设联合办事处问题的批语

（1950年9月16日）

周[1]：

此件第二篇[2]所述天津情况，与上海市委所反映的上海情况相同，请与一波[3]商，适用上海建议[4]由各区派人在天津设联合办事处，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1950年9月14日《内部参考》第二二二号刊载的《各地公家采购人在津乱抓物资破坏统一采购》一文。

[3]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4]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0年9月12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各大战略区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统筹采购事宜的建议。

对云南军区关于复员军人复审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0年9月18日）

周[1]：

云南经验[2]很好，请摘转各地。留下精壮是很必要的。

毛泽东

九月十八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关于复员军人复审工作的经验。他们在复审中，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将副班长以上干部和精壮战士，全部继续留在部队。

给张维[1]的信

（1950年9月19日）

张维兄：

来信收读，甚以为慰。令堂大人八十寿辰，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2]，借致庆贺之忱。

顺祝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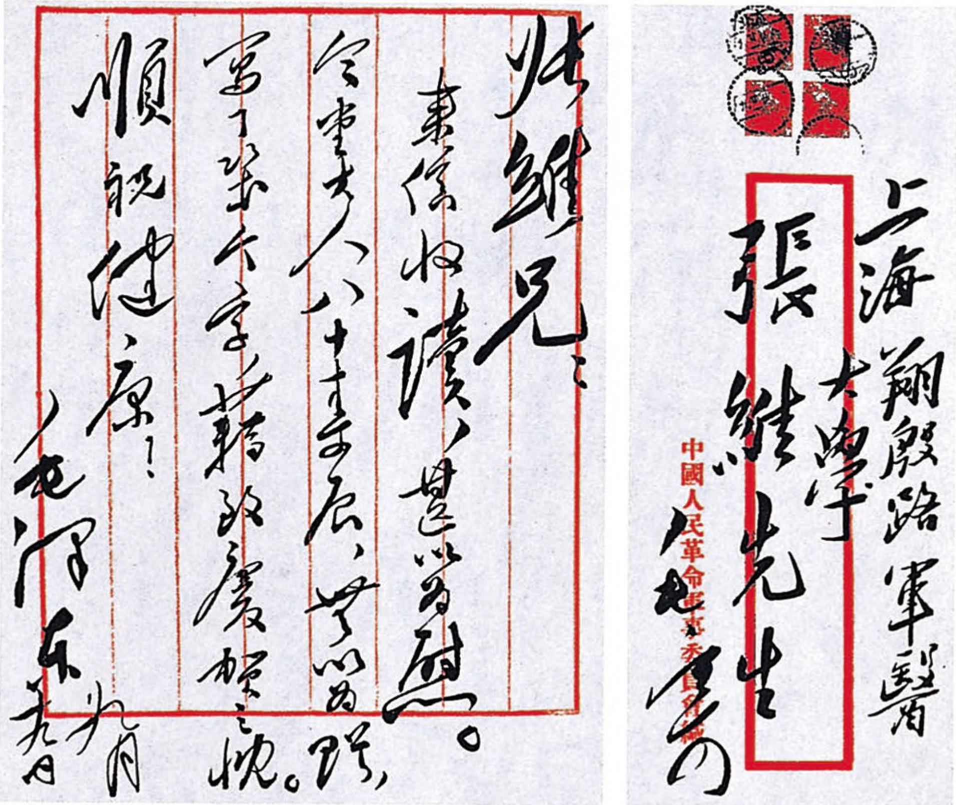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

---

[1] 张维，湖南浏阳人，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2] 指毛泽东写的“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



张维兄：

来信收读，甚以为慰。令尊大人八十寿辰，无以为贺，写了几个字，藉致庆贺之忱。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九月九日

上海翔殷路軍醫大學

張維先生

毛泽东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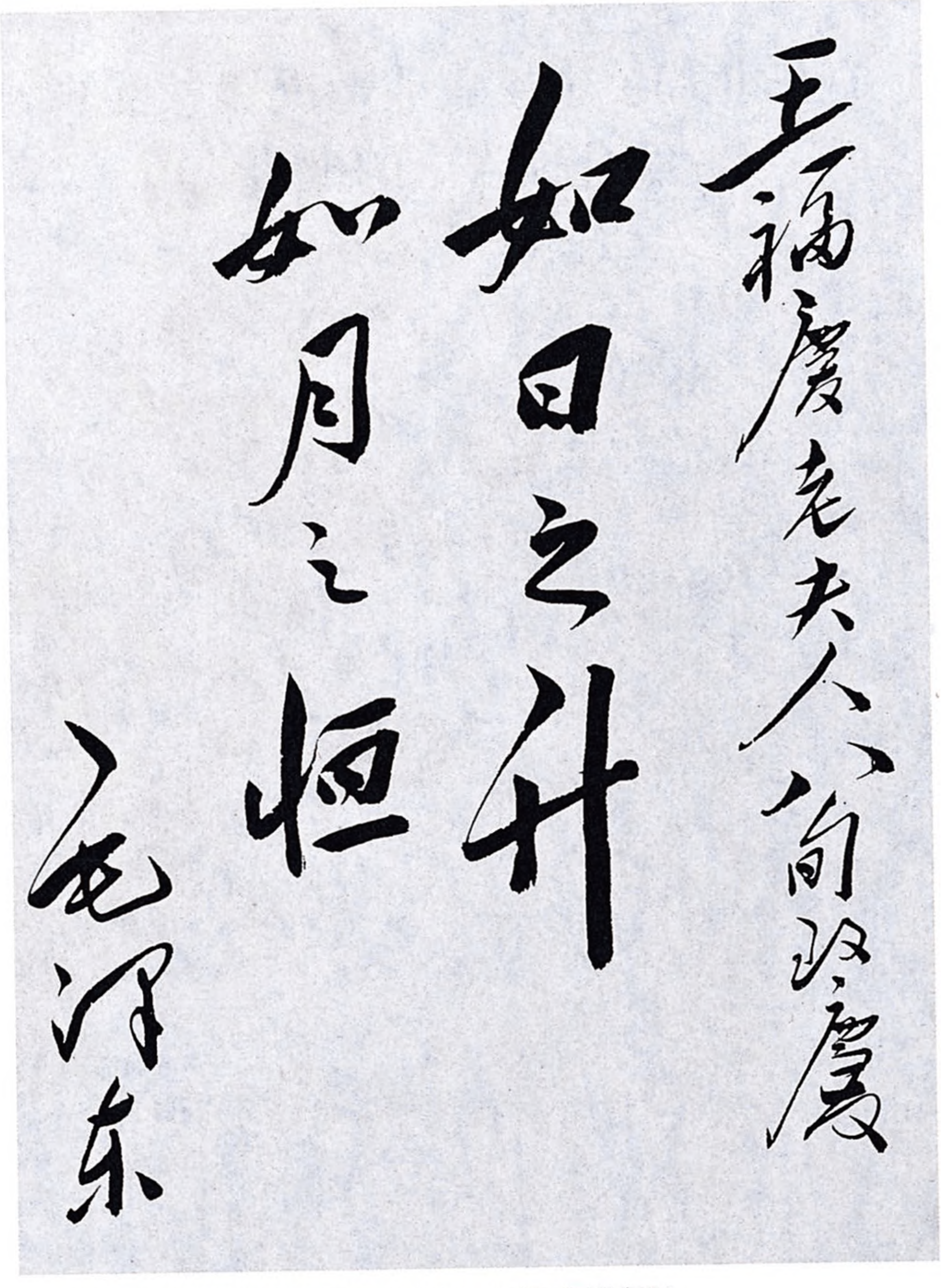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张维信的手稿。

贺张维母王老夫人八十寿辰联

（1950年9月19日）

王福庆老夫人八旬致庆：
如日之升，如月之恒。

毛泽东



王福庆老夫人八旬双庆

如日之升

如月之恒

毛泽东

毛泽东为张维之母王福庆老夫人八十寿辰写的贺词。

在华北局关于工农业情况和意见的综合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9月20日）

周、陈云、薄一波、刘、朱、任[1]：

我认为华北局的意见[2]是正确的，请陈、薄即根据华北局所提各项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拟出具体方案，于数日内向中央报告一次，并迅即推行。此事极为重要，不能久延不决。

毛泽东

九月二十日

---

[1] 周，指周恩来。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任，指任弼时。

[2] 指薄一波、刘澜涛1950年9月19日关于华北工农业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综合报告中，对解决华北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增大问题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采取适当的步骤停止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国营商店应依照高于市价的牌价大力收购粮棉，动员各级合作社、私商有计划地收购粮棉；大量收购农产品的同时，应组织工业品下乡，相应地完成回笼货币的任务。（二）适当地降低某些工业品的价格。除积极改善工厂经营管理，克服浪费与耗损，以降低工业成本外，国营商店要改善经营方法，减少流通环节，并在工商业中贯彻薄利广销的方针，加速商品与资金的流通。

给罗荣桓[1]的信

（1950年9月20日）

荣桓同志：

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

九月廿日

---

[1] 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关于立即停止在韶山为毛泽东建房给黄克诚[1]等的信

（1950年9月20日）

克诚、首道[2]，并告子恢[3]同志：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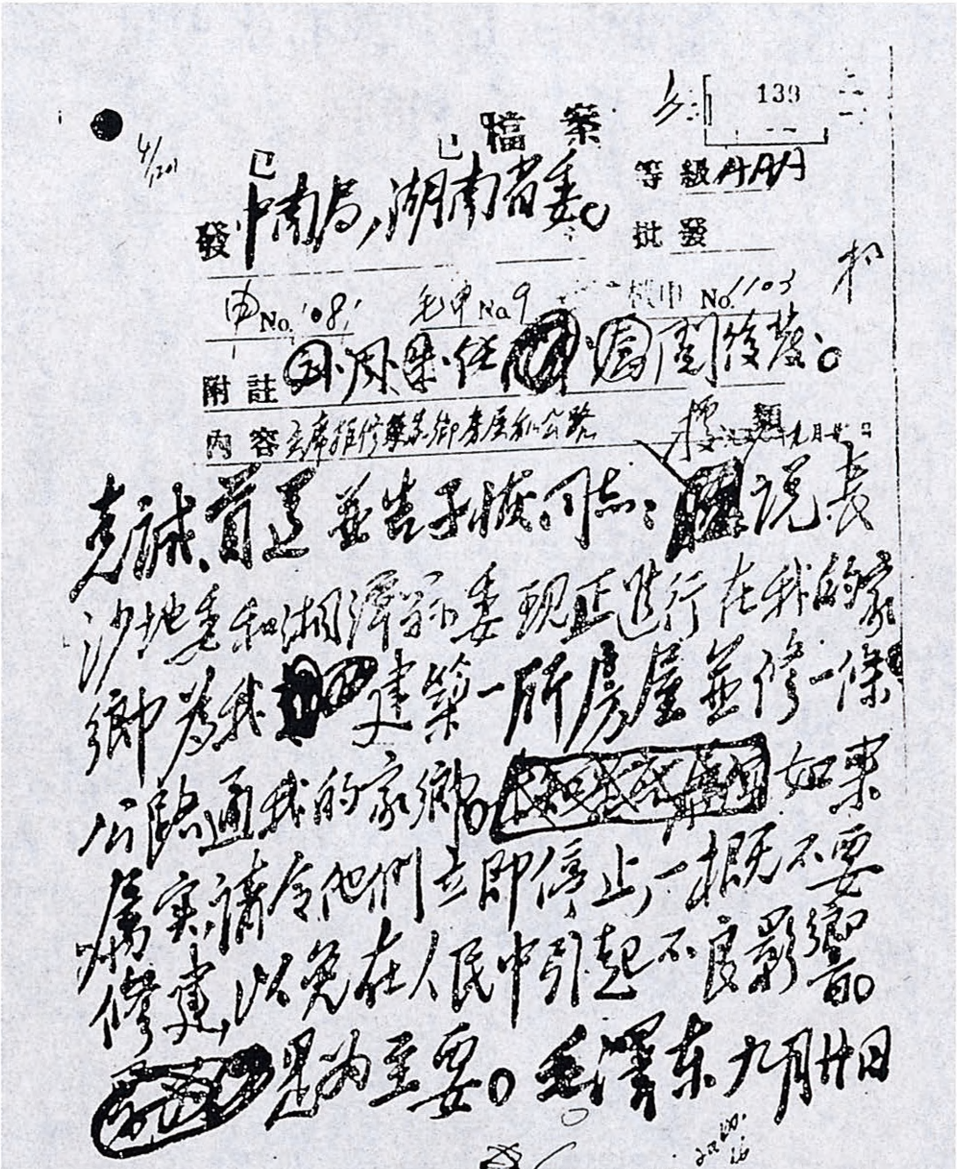
九月廿日

---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2] 首道，即王首道，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3]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133

檔案

發 中南局、湖南省委。

等級 特件

批發

由No. 08 毛中No 9 機中 No. 1103

附註 [illegible]

內容 主席指示停修家乡房屋和公路

克诚、首道并告子恢同志：[illegible]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illegible]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illegible]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illegible]是为至要。毛泽东 九月廿日

毛泽东致黄克诚、王首道并邓子恢信的手稿。

在争夺战中大量歼敌有生力量是很有利的[1]

（1950年9月21日）

陈赓，并告中南局，广西省委及韦国清[2]：

申哿电悉。（一）歼敌八百，缴获甚多，甚慰。（二）敌图重占东溪给我以运动战的机会，你们的部署是对的。如果等了多日而敌不来，则可考虑包围七溪歼击援兵的方法，可能打一个较大的运动战，敌人是一定会增援的，敌人还不知道我方的虚实。（三）敌人意图是极力争夺边境区域，这种争夺战，可能延长几个月。如能在争夺战中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那是很有利的。因此你们要注意训练几千新兵以便随时补充缺额。要储备我军几个月所需的粮食。粮食不足时广西省委应负责接济并运至友境。汽油及其必需物资亦由广西负责，随缺随补，由陈赓与云逸[3]直接商办。（四）为准备扩充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2] 韦国清，当时任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

[3] 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炮兵，应在现有炮兵部队中多安副职，随战随学，以使我方每次作战缴获炮类（只要有炮弹）就能迅即使用为原则。（五）俘虏久留费用甚大，遣送赴欧亦甚麻烦，请与胡、武[1]商量是否可以在训练一个短时期后（例如两个月），即向敌方遣送，借以扩大影响，瓦解敌军。此种俘虏遣送回去，即使再当兵，战斗力亦必大减，利于缴枪，如此反复多次，可以造成敌军瓦解潮流。俘虏必须留在越南境内，由广西送粮食去，万不可送俘虏来广西，前已电告你们了。

军委
九月二十一日

---

[1] 胡，指胡志明，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中央关于华北局
各项报告处理情况的电报

（1950年9月24日）

薄一波、刘澜涛[1]二同志，并告中财委：

你们关于华北情况的各项报告，均已收到阅悉，都是好的。其中多数，已转发各中央局参考。你们九月廿三日报告中所提关于农业方面的各项改进办法，除举办农民银行一项应请中财委考虑提出意见外，其余各项都是可行的。

其中有关农业部办理者，请你们直向该部洽商办理；有关水利部办理者，请你们向水利部接洽并帮助该部拟订华北全区水利计划，送政务院审查，纳入全国水利计划内一同办理。

中央

九月廿四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1]

（1950年9月25日）

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同志们：

中共中央向你们的会议致热烈的祝贺，并向你们的工作表示感谢和敬意。

你们在消灭敌人的斗争中，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斗争中，克服了很多的艰难困苦，表现了极大的勇敢、智慧和积极性。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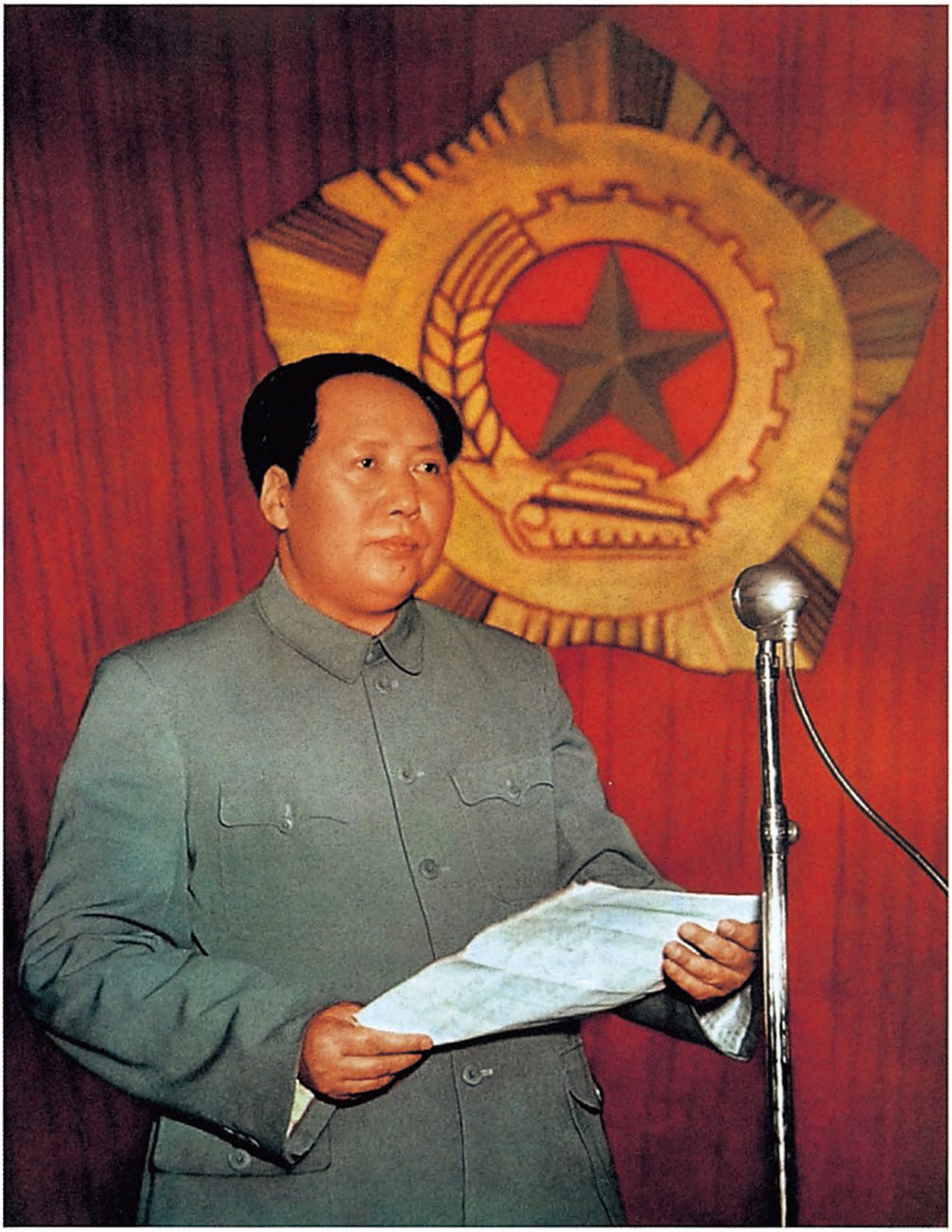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的祝词。

光荣称号。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第一个国庆纪念节日快要到来之际，你们在这里开会，是有巨大意义的。我们庆祝你们的会议获得成功，庆祝你们在今后工作中获得伟大的胜利。

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



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致祝词。

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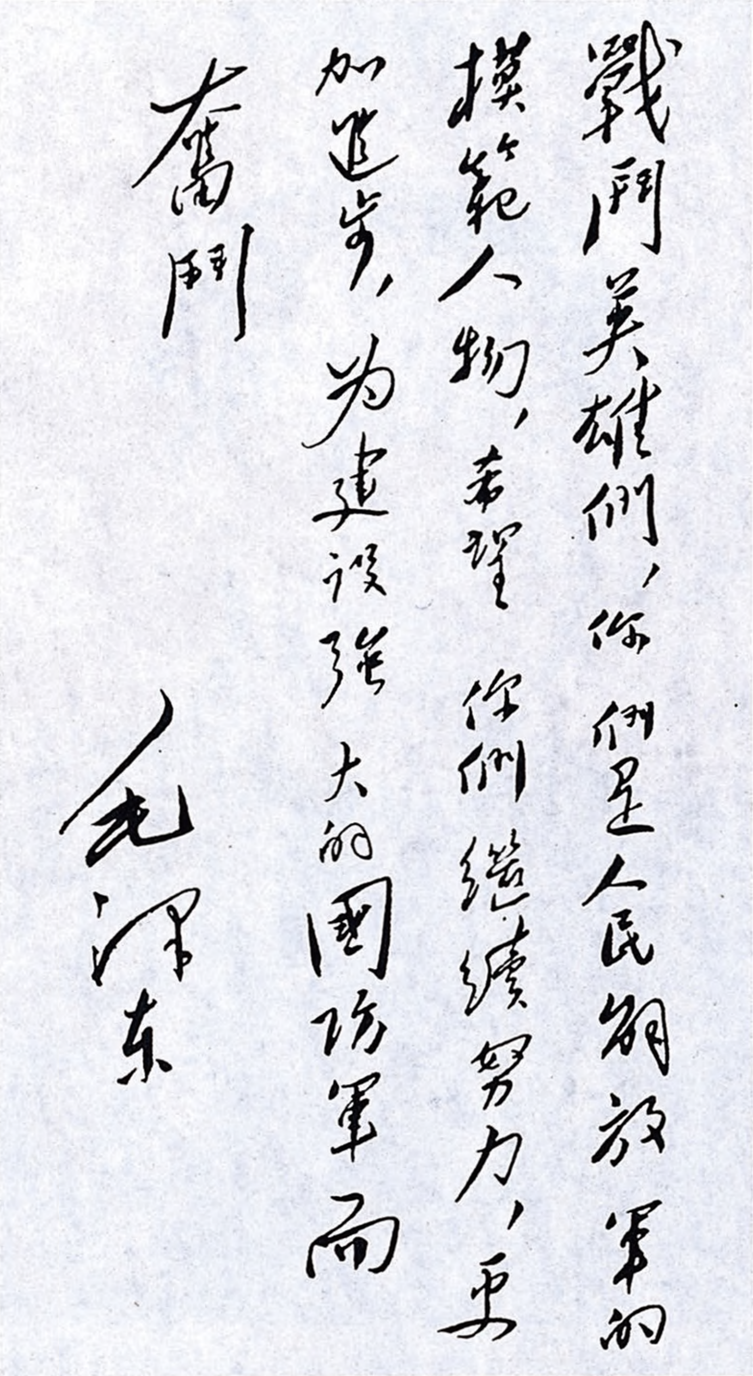
（1950年9月27日）

战斗英雄们，你们是人民解放军的模范人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更加进步，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毛泽东

---

[1] 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出席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并致贺词。这是毛泽东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题词，发表在1950年9月27日《人民日报》上。



戰鬥英雄們，你們是人民解放軍的模範人物，希望你們繼續努力，更加進步，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奮鬥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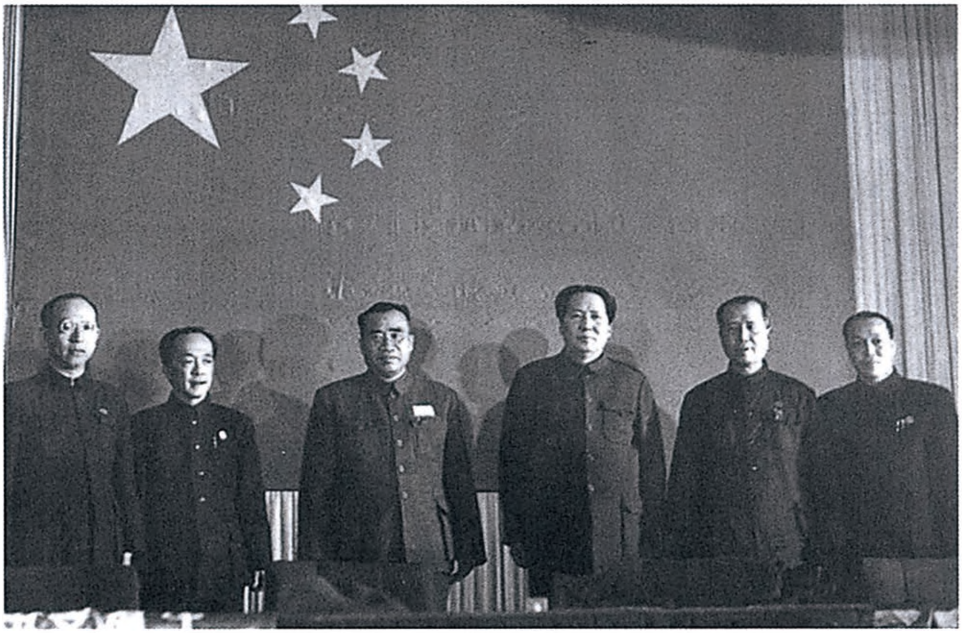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题词。

1950年9月，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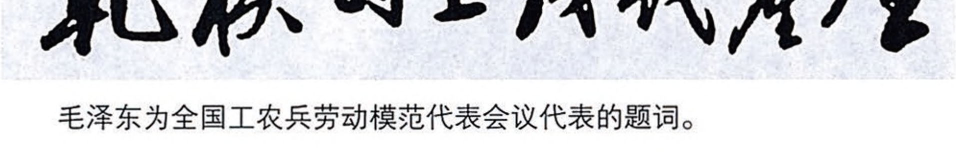
1950年9月，毛泽东和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代表合影。

194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0年9月，毛泽东和全国劳动模范战斗英雄合影。



1950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和《南侨日报》代表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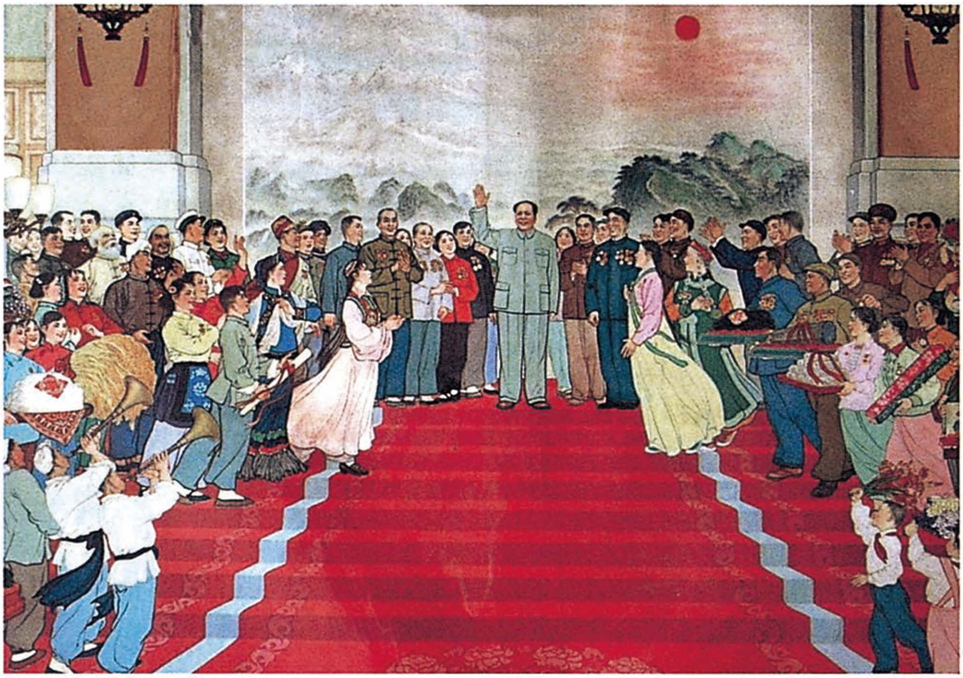


生產戰綫上的模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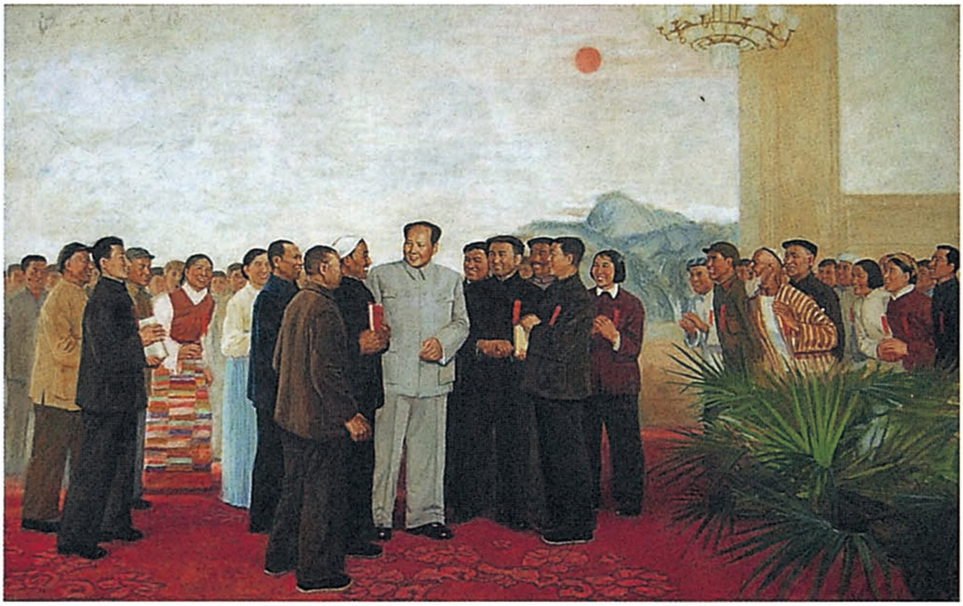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代表的题词。

1950年9月，毛泽东为全国战斗英雄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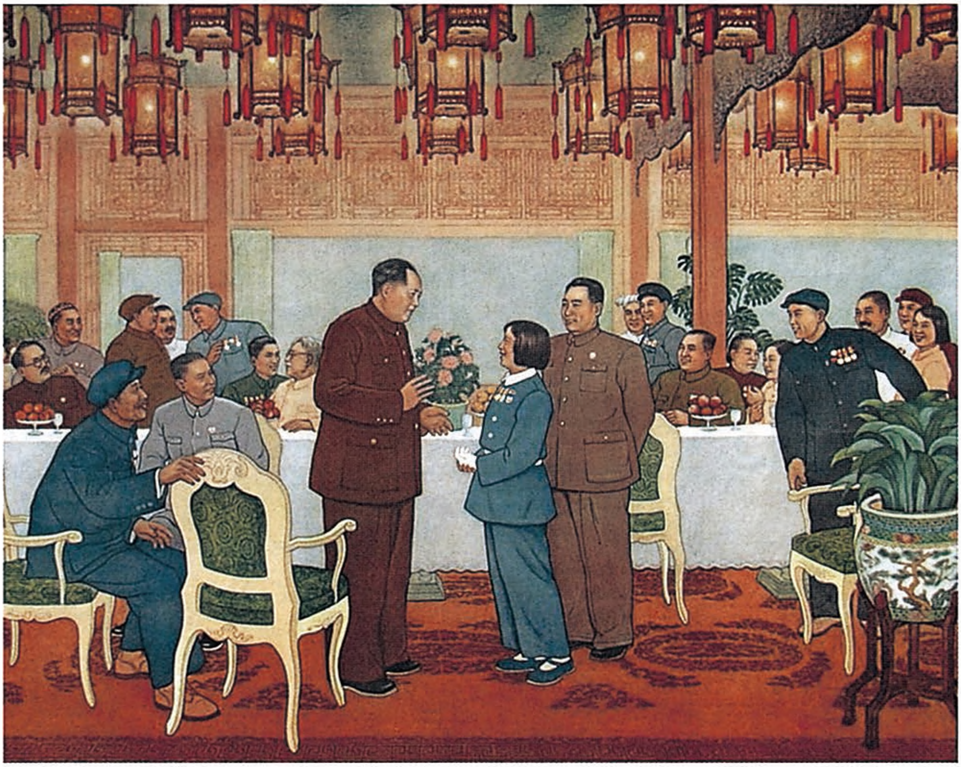
1950年9月，毛泽东为全国劳动模范李凤莲（中）、赵桂兰签名。



《群英献礼图》（年画）



《毛主席和英雄模范在一起》（油画）



《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年画）

在全国经济保卫工作会议总结上的批语

（1950年9月27日）

刘、周[1]阅后交罗瑞卿[2]同志：

除第廿一页下面一段注明删去是应当删去而将此种意思另外用电报通知以外，其余凡将党的领导作用删去而改为笼统字眼或改为单纯行政领导的地方，原稿是对的，删改是不对的，均应恢复原稿。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是危险的。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转发关于长期作战问题致朝鲜同志电[1]

（1950年9月27日）

高岗、邓华同志：

兹将九月二十日经倪志亮[2]转致朝鲜同志一电[3]转发给你们，阅后即销毁。朝鲜同志已同意此项建议。

周恩来

九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的电报。

[2] 倪志亮，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3] 指经毛泽东修改的周恩来1950年9月20日发给倪志亮并转金日成的电报。电报全文为：9月18日电悉。请转告金日成同志：我们认为你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在目前主力暴露于敌人阵前，相持不下，消耗必多，而敌人如果占

领汉城则人民军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因此，人民军主力似宜集结机动，寻敌弱点，分割歼灭敌人。在作战上，必须集中兵力，每一次作战以少数兵力及火力分路钳制多数敌人，而以多数兵力（3至5倍）及火力（2倍以上）的绝对优势，围歼被我分割的少数敌人（例如一个团）。作战最忌平分兵力，最忌只能击溃或阻止敌人而不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只要能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哪怕每次只歼灭敌人一个团一个营也好，积少成多，就可逐步将敌人削弱下去，而利于长期作战。如果美军火力配备强，一时难于突入分割，则宜考虑先以李承晚伪军为对象，集中主力，每次歼灭其一二个团，每月歼灭其一二个师，半年后即可尽歼伪军，剪去美帝爪牙，使美帝陷于孤立，然后各个歼灭之。在持久战的原则下，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困难方面。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和使用，必须处处长期打算，防止下级发生孤注一掷的情绪。敌人要求速决害怕持久，而人民军则速决既不可能，唯有以持久战争取胜。以上所陈，系站在朋友和同志的立场提出，供你们参考。是否有当，尚祈考虑见复。

对《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的修改[1]

（1950年9月28日）

对全军保密工作加以检查[2]，并规定整理办法，望于一个月内（即十月二十八日以前）将检查和整理情形向我们作一次专题报告，不得延误，是为至盼。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拟发全军的《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送审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2] 《关于重申保密纪律的训令》中说：为了杜绝今后失密事件的重演，有力地堵塞这一漏洞，决定在现正进行的全军整风运动中，立即将保密工作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检查，以便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保密教育。

在宣传中不说打台湾西藏的时间[1]

（1950年9月29日）

乔木同志：

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一九五〇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今年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各党派贺词中一九五一年任务我已全部删去，因其中有打台湾西藏一项。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

务使确有把握每战获胜[1]

（1950年9月29日）

陈赓同志，并告广西省委：

九月二十七日电悉。（一）同意采取谨慎态度，先打小据点，然后相机打可打之敌，务使确有把握，每战获胜，不打无把握之仗。（二）所需粮食，望与广西省委直接洽办。

军委

九月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接受保加利亚驻华大使彼得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0年9月30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

中保两国人民间是存在着深厚友谊的。保加利亚人民在伟大领袖季米特洛夫领导下对内外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以及目前经济、文化建设上的成就，一向为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与钦佩。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已经基本胜利了，中保两国的外交关系已经建立，我相信，这不仅将使贵我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发展与巩固，而且必将加强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的工作尽量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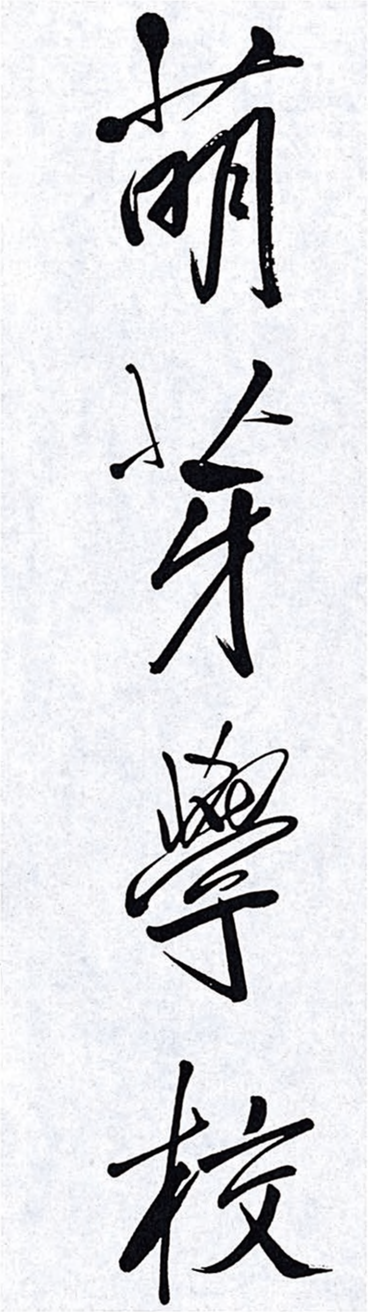
为萌芽学校题名[1]

（1950年9月）

萌芽学校

---

[1] 1950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并请毛泽东为萌芽学校题写校名，毛泽东高兴地写了“萌芽学校”4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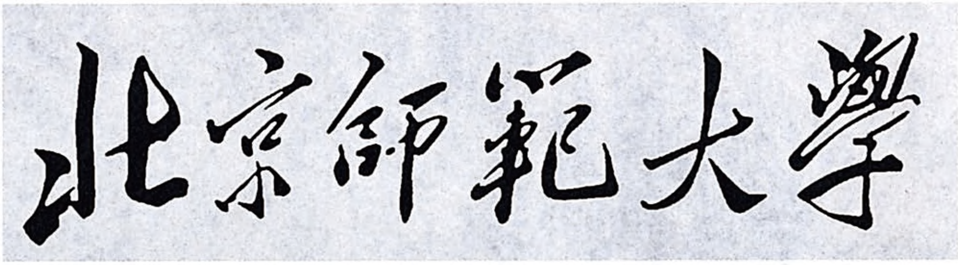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萌芽学校题写的校名。

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名[1]

（1950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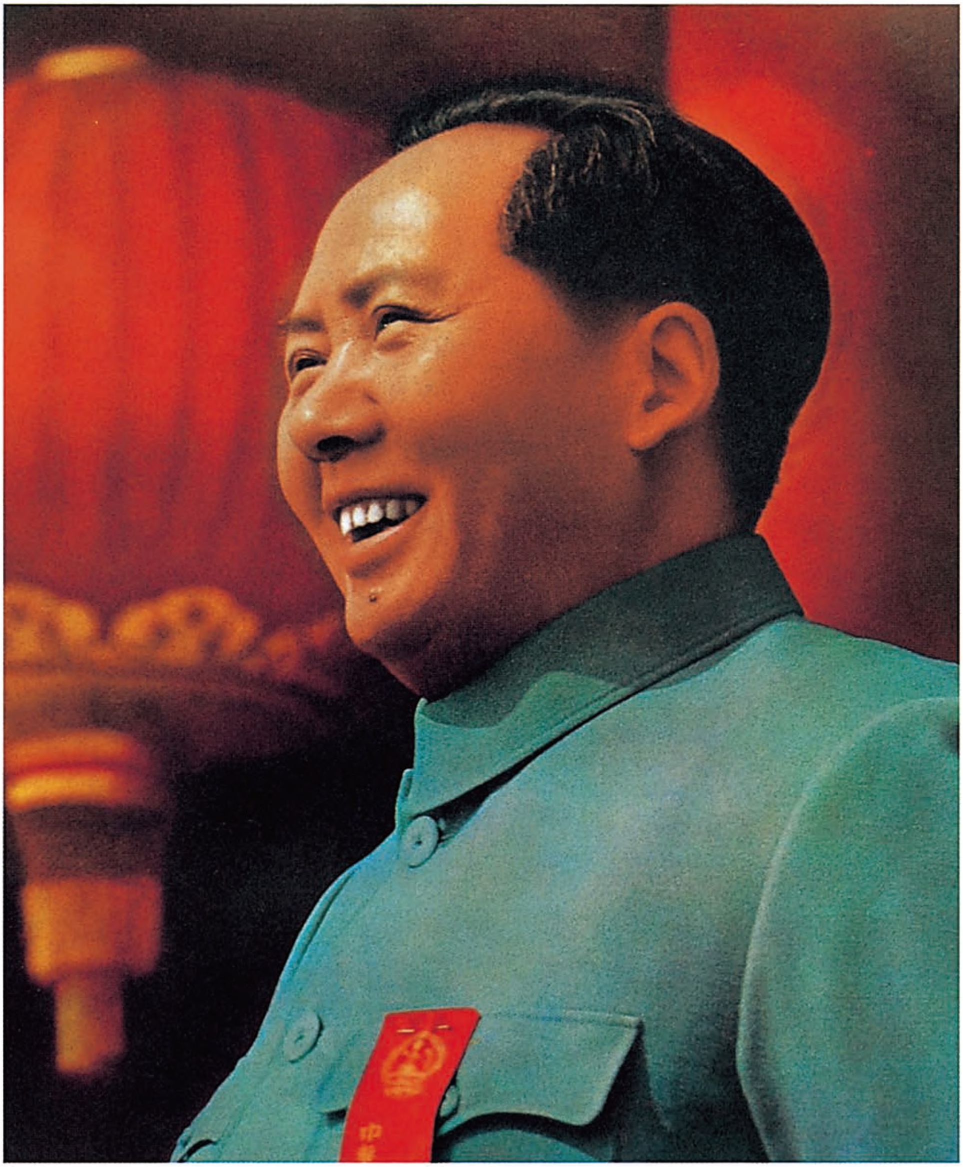
北京师范大学



毛泽东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的校名。

---

[1] 北京师范大学创建于1902年，当时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23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于1950年亲笔为北京师范大学题写校名。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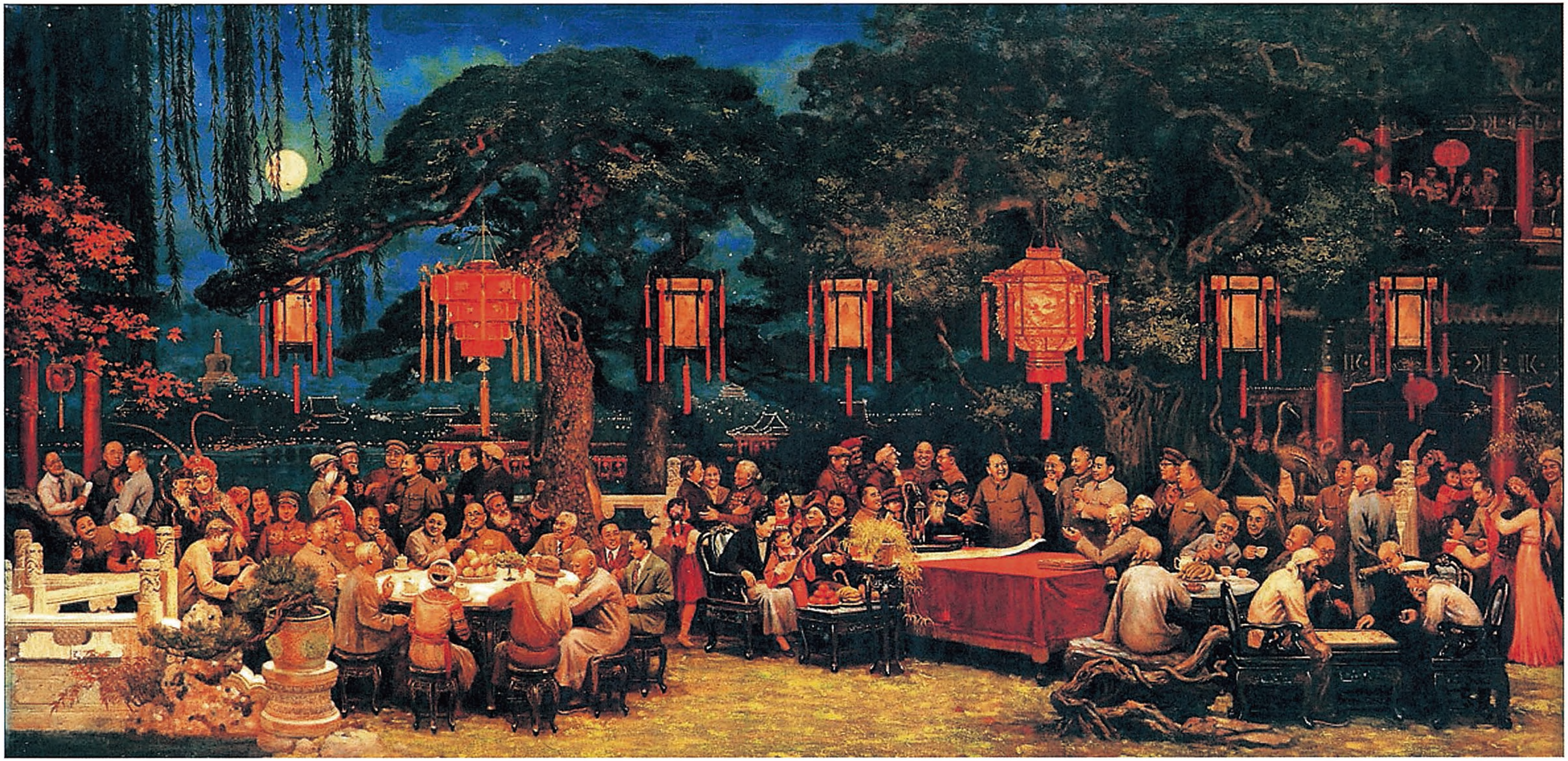
1950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的群众挥手致意。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主席台上。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国庆游行队伍。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国庆阅兵式上注视着受阅的空军战机。

1950年，国庆招待会上少数民族代表向毛泽东敬酒。



《良宵》（油画）

东北边防军随时待命出动[1]

（1950 年 10 月 2 日）

高岗、邓华同志：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2]作战；（三）请邓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军委

十月二日二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的电报。

[2] 指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

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1]

（1950年10月2日）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2]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

---

[1] 这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的一部分。这个电报后来没有发出。

[2]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1]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2]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3]），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

---

[1] 南满洲，指沈阳至大连铁路线以东的庄河、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2] 后改为10月19日出动。

[3]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

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1]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

[1] 津浦线，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的一段。北宁线，指北京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的一段。

无法北撤的朝鲜人民军 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1]

（1950年10月2日）

请告金日成[2]同志，除照今晨电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的电报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2]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关于我赴朝武官参观组的任务[1]

（1950年10月4日）

应分两个小组：一个调查平壤附近及平壤安东[2]线、平壤辑安[3]线的各种情况，一个调查平壤元山线及元山清津线及其以北山区的各种情况，平壤元山线至三八线之间的情况，如有可能亦应略作调查，但勿深入。

---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的电报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安东，今辽宁丹东。

[3] 辑安，今吉林集安。

对公安部队建设报告的批语[1]

（1950年10月5日）

一

请聂[2]与罗协同与各中央局负责同志面商解决，以结果告我。[3]

毛泽东
十月五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1950年10月5日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分别对罗瑞卿报告中“请求中央考虑是否多成立一个公安师置于华北或东北”和“关于已经决定成立之公安部队应该迅予组成并适当注意其质量一点，乘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到中央开会之际，是否便中向各同志提提”两句话的批语。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

[3] 罗瑞卿的报告说：全国正规公安部队原定18万人，编成21个公安师，一个公安警卫师，共22个师。现已编成11个师另1个团，尚差9个师又2个团，又1个铁道公安司令部。我们意见，中央与军委已经决定成立之公安部队，应该迅速组成，以便着手训练并逐渐接替内防的任务。公安部队的质量，根据本年3月主席在政治局指示“公安部队数量不宜太大，但质量必须精干”的原则，各地在调拨公安部队时，似宜有适当的注意，一般应调拨中等的部队，特别是成分较好一点的部队为宜。此外，请求中央考虑是否多成立1个公安师，置于华北或东北。

二

可以多一个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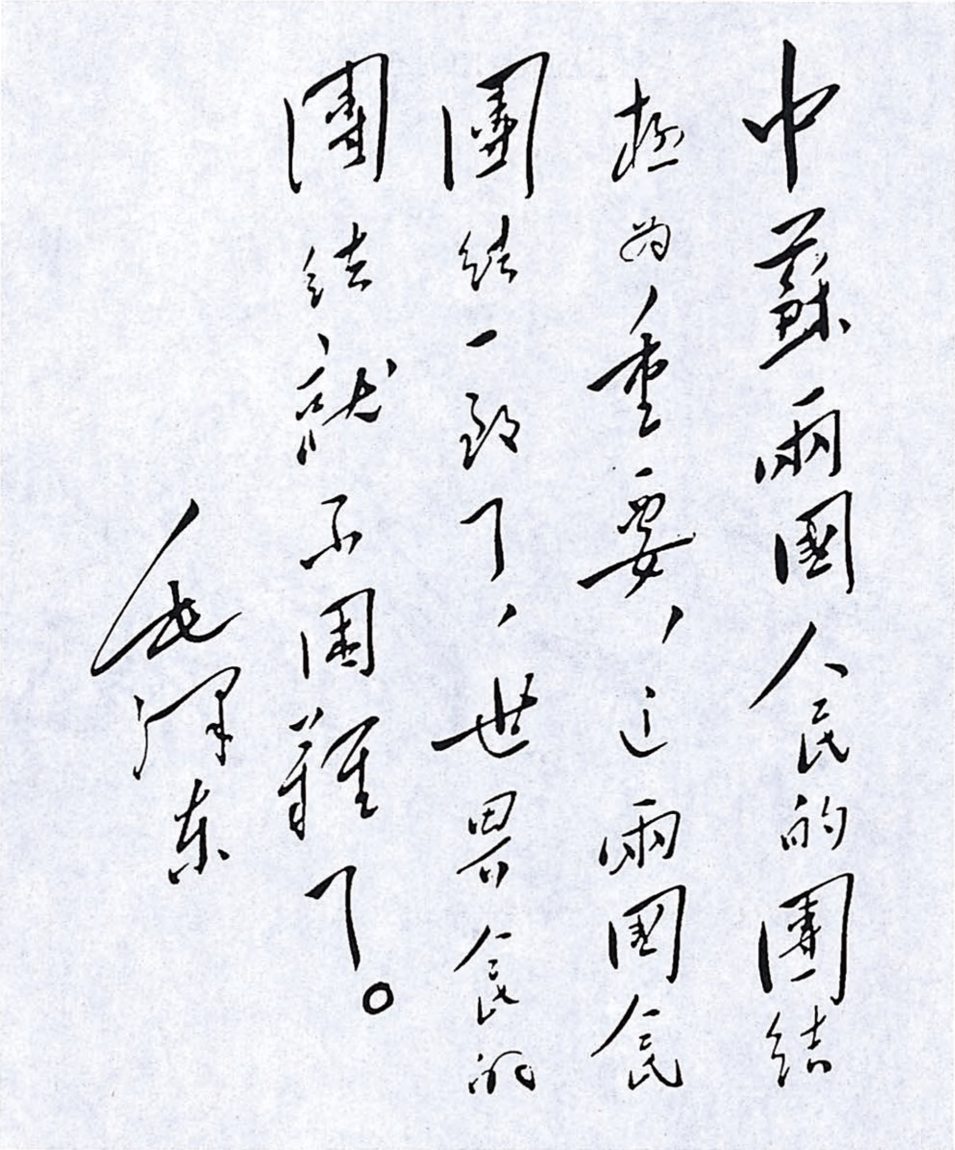
可同各负责人面商。

为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题词

（1950年10月5日）

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极为重要，这两国人民团结一致了，世界人民的团结就不困难了。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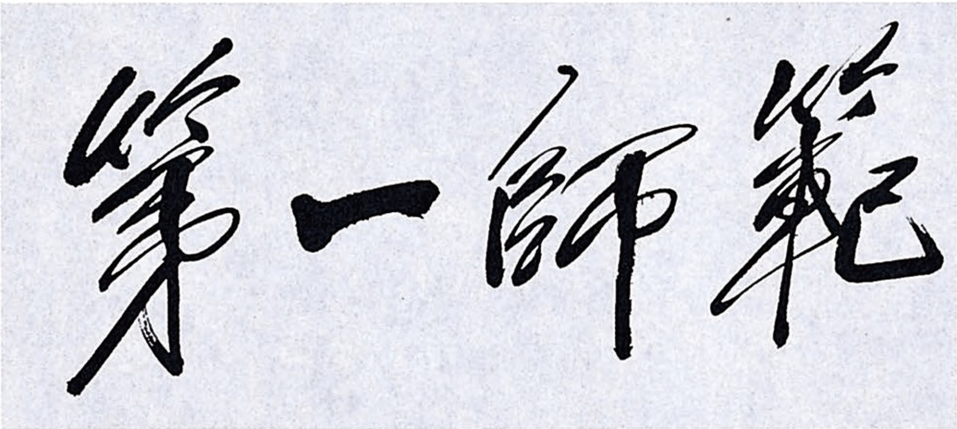
中蘇兩國人民的團結
極為重要這兩國人民
團結一致了世界人民的
團結就不困難了。
毛澤東

毛泽东为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一周年的题词。

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题写校牌[1]

（1950年10月5日）

第一师范



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题写的校牌。

---

[1] 1950年10月毛泽东的早年同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代表一师请毛泽东为一师题词。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为一师题写校牌：第一师范。

先歼东溪西南被围之敌 再歼高平南逃之敌[1]

（1950年10月6日）

陈赓：

十月四日两电均悉。（一）先集主力歼灭东溪西南被我包围之敌，然后再看情形围歼高平南逃之敌，此种计划是正确的。如果东溪西南之敌能在几天内就歼，高平逃敌又被抓住，谅山等处之敌又不出援，或虽出援而我军能分出一部予以阻隔，使之不能妨碍我军对东溪、高平两敌之作战，则你们可以取得两个胜仗。因此，你们除对东溪西南之敌必须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要估计到干部中可能发生此种情况）以外，并要对高平逃敌确实抓住，不使逃脱，并要对谅山等处可能出援之敌有所部署。只要对上述三点处理恰当，胜利就是你们的。（二）发表战报要说老实话，歼敌一个人，缴敌一支枪，即说一个人一支枪，不要说两个人两支枪，养成朴实作风。

军委

十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

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

（1950年10月8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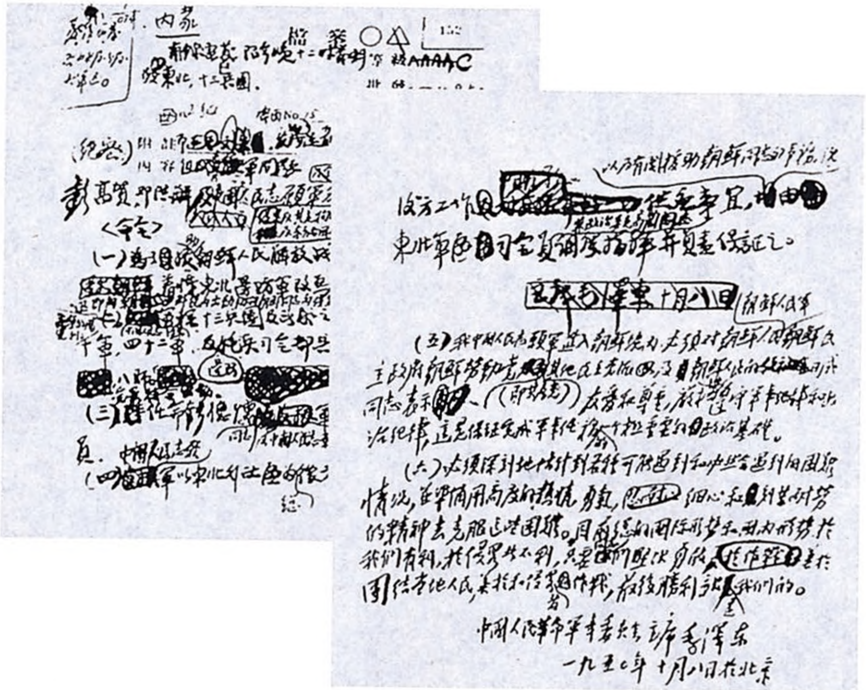
（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于北京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的节录。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志愿军的命令。

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0年10月8日）

倪志亮[1]同志转金日成同志：

（一）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二）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他在满洲[2]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四）请你即派朴一禹[3]同志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本日由北京去沈阳）

毛泽东

十月八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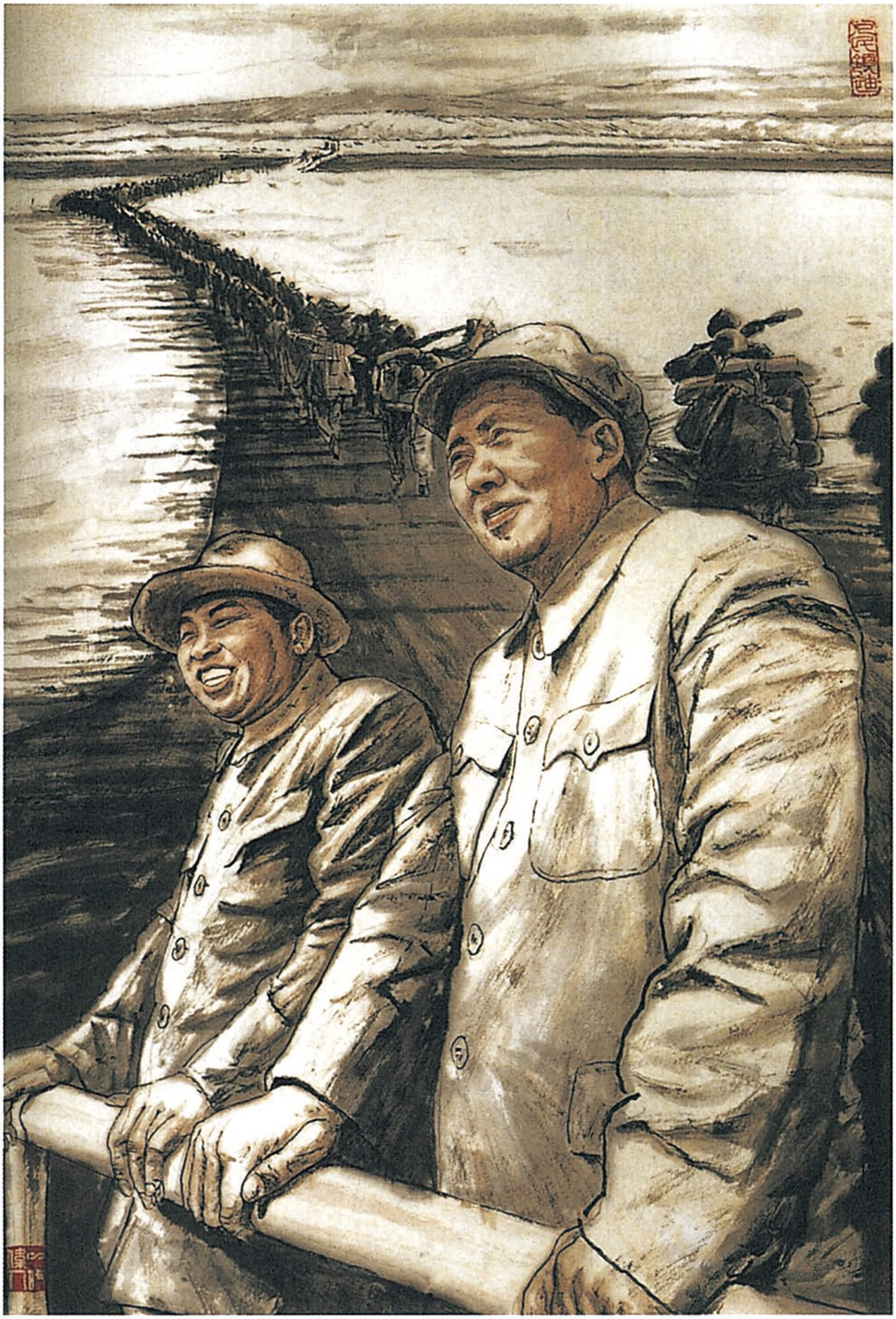
[1] 倪志亮，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2] 满洲，这里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3] 朴一禹，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朝鲜政府内务相。

1950年10月，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图为彭德怀在朝鲜前线。



《抗美援朝》（中国画）

关于援助朝鲜事务的处理[1]

（1950年10月9日）

倪大使，并告高[2]：

齐子电悉。（一）中央已委托高岗同志负责处理一切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问题，嗣后关于此类事务均向高岗同志直接接洽，由高岗同志答复。坦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问题请高处理。（二）使馆驻地同意你的意见。

周恩来
十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的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的电报。

[2] 倪，指倪志亮，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开辟敌后战场
在战略上是必须的有利的[1]

（1950年10月10日）

倪[2]转金，并告彭：

（一）庆祝人民军克复蔚珍、竹边[3]地区的大胜利。（二）现敌军大部北进，后方空虚，建议凡人民军无法北撤者均留于南朝鲜，开辟敌后战场，这在战略上是必须的而且是很有利的。如有人民军四五万人留在南朝鲜担负此项任务，则对北部作战将大有帮助。（三）敌似正在准备从镇南浦[4]至新义州一线可以登陆之海岸举行新的登陆作战，切断平壤至新义州的交通线，而这一交通线是必须保护的，请彭与朝鲜同志研究保护方法，如敌登陆则应坚决歼灭之。

毛泽东

十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倪，指倪志亮，当时任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3] 竹边，即竹边里，位于庆尚北道北部。

[4] 镇南浦，即今南浦，位于平安南道西南。

中国同志必须随时检讨自己的方法和态度[1]

（1950年10月10日）

陈赓：

十月七日及八日电悉。（一）越军大胜，极慰。（二）越军经此次胜利，必能提高一步。越军还年轻，只有从今后多次作战中才能逐步学会近敌作战的各项技术和战术。中国同志帮助他们要注意自己的方法和态度，使他们乐于接受，而不可将关系弄坏。中国同志必须随时检讨自己的方法和态度，只许做好，不许做坏。（三）战役结束后须休整二十天至一个月，总结经验，补充兵员，进行近战教育及政治教育，选定下一次作战的目标，做好下一次作战的计划。（四）这次胜利是在敌人统帅部没有预料越军一次能集中二万余人及战斗力提高的情况下取得的。敌人得了此次经验，必要谨慎些。越军围攻据点时，除老街等地十分孤立的据点外，其据点的守兵必增多，其增援队必加大，即要准备围攻一二千人的据点和打四五千人或者更多些的增援队。因此，越军亦须做出新的计划，即再集中和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装备二万人左右，其中应有包括山炮、野炮、反坦克炮、重迫击炮、榴弹炮等各种炮火的两个炮兵团。总之，在今后半年内外，越军须建设一个总数五万人左右的正规军，而有和法军地面部队一万人的两倍以上的火力（即法军一万人如有大小炮一百门，则越军五万人须有大小炮二百门以上），准备一次能歼灭法军一万人。当然，在这样的有力兵团建设成功的过程中，只要有可能，还须打多次规模较小的仗，锻炼部队的战斗力，而不要企图很快就打大仗。但是，目前就应做出一次能歼灭法军一万人的计划，方能在半年以后能够打大仗。此项计划，请你在此次休整期内和越南同志商量做出，并电告为盼。

军委
十月十日

同意四个军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待机歼敌

（1950年10月11日）

彭[1]，并告高、邓[2]：

十月九日、十日各电[3]均悉。（一）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二）已电华东调一个高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十月九日电，指1950年10月9日彭德怀、高岗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高射武器全军仅有一个团共36门，不能掩护数百门重炮放列，请由广州或其他军区再抽调一个团速来东北应用。我军出动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及轰炸机配合，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盼速示。十月十日电，指1950年10月1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志愿军各项出动准备不充分，对美帝坦克尤其空军顾虑很大。炮兵进入阵地运动时无空军和高射武器掩护，顾虑更大。请设法速调一至两个高射炮团。安东、辑安两铁桥无任何高射设置，战斗开始两桥将完全毁坏，交通亦将发生困难。按你预定指示15日出动，20日至迟22日4个军、3个炮兵师集结下述地区，相机适时歼敌一部。四十军集结云山，四十二军在孟山、德川，三十九军在熙川，三十八军在江界，炮兵司令部率两个师集结前川，另一师集结北镇、温井。原拟先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恐鸭绿江铁桥被炸毁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

射炮团于十月十四日从上海开动赴沈阳转赴前线，请高注意接转；（三）其他各项已另复。唯空军暂时无法出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关于全歼拉本兵团及七溪守敌[1]

（1950年10月11日）

陈赓：

九日电悉。为了争取边界战役的完满胜利，必须鼓励士气，全歼拉本[2]兵团及七溪守敌。当攻七溪时，谅山等处法军还是可能增援的，此点应预先估计到并作阻援或打援部署。

军委

十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2] 拉本，当时任驻越南七溪地区的法国军队指挥官。越南边界战役期间，曾奉命率由外籍部队组成的4个连增援部队，北上解救在谷社山区被越南人民军包围的法军。

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1]

（1950年10月11日）

外交部：

应告袁大使：（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九月三十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950年10月10日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关于接济湖南教育界老人给王首道[1]的信

（1950年10月11日）

首道同志：

张次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王首道，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关于九兵团提前北上致陈毅[1]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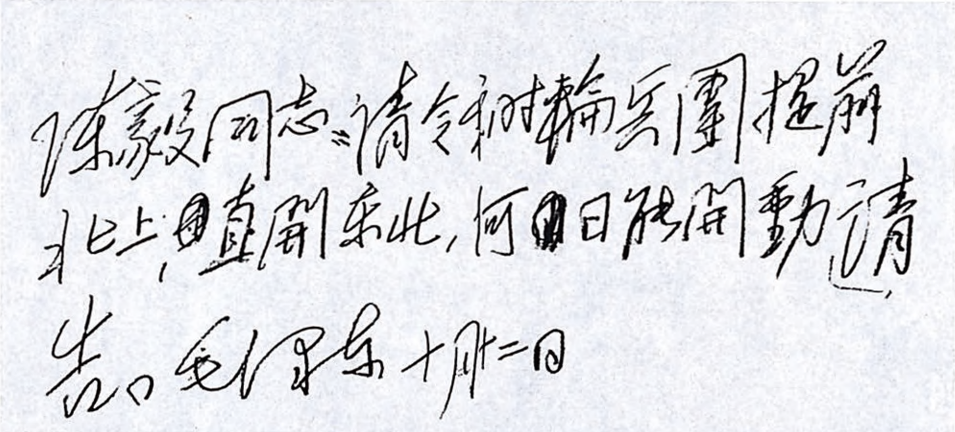
（1950年10月12日）

陈毅同志：

请令宋时轮[2]兵团提前北上，直开东北，何日能开动请告。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陈毅同志：請令宋時輪兵團提前北上，直開东北，何日能開動請告。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陈毅电的手稿。

---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十三兵团仍在原地训练[1]

（1950年10月12日）

彭、高，邓、洪、韩、解[2]：

（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廿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等的电报。

[2]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韩，指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东北各部队和宋时轮九兵团仍在原地整训[1]

（1950年10月12日）

饶、陈：

（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实行，东北各部队仍就原地进行整训，暂不出动。（二）宋时轮[2]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三）干部中及民主人士中亦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中央

十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和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电报。

[2] 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转发总政治部关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0年10月12日）

各大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各军区、各兵团、军、师党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

兹将总政治部关于此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总结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其中指出各点[1]，请你们研究并执行为要。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

[1]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0年10月10日关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总结报告指出，今后在部队思想建设上有两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这两个问题是：一、部队中相当普遍地发生着和平麻痹情绪。故规定各部队应以军、师为单位，首先在干部中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树立战斗队思想、新爱国主义思想及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动员，在战士中今年秋冬季教育应以检讨战斗意志、整顿战斗意志为中心。部队在目前的整风学习中更应以总结干部的战斗意志为主要内容之一。二、部队中英模立功运动贯彻不够普遍，尤其在干部中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次会议要求各部队今后应大力推行这个运动，各级部队对英模立功运动经常注意总结，并将英模会议作为一种巩固的制度。各种重要任务应先在党内和英模功臣中传达讨论，首先把这些骨干发动起来。对英模个人要时时帮助他们提高，不要只使用不教育。要经常宣传英模事迹，但不要抹煞群众的力量与功劳。中高级干部立功者亦应予以适当奖励。

对航空学校是否迁移报告的批语[1]

（1950年10月12日）

不要迁移。[2]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1950年10月10日报告的批语。

[2] 刘亚楼的报告说：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美帝特别企图在空军方面显其威风，对各种航空目标加以拼命的轰炸，尤其是对航空学校。估计到当前情况的发展，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我各航空学校的现有位置，均处在离前线或海岸不远的地方，而且在将特别引起敌人注意的主要交通线上（中长路）和经济、政治中心（沈阳、北京）。因此，尺等正在考虑我军各航空学校是否需要迁移的问题。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青年工作会议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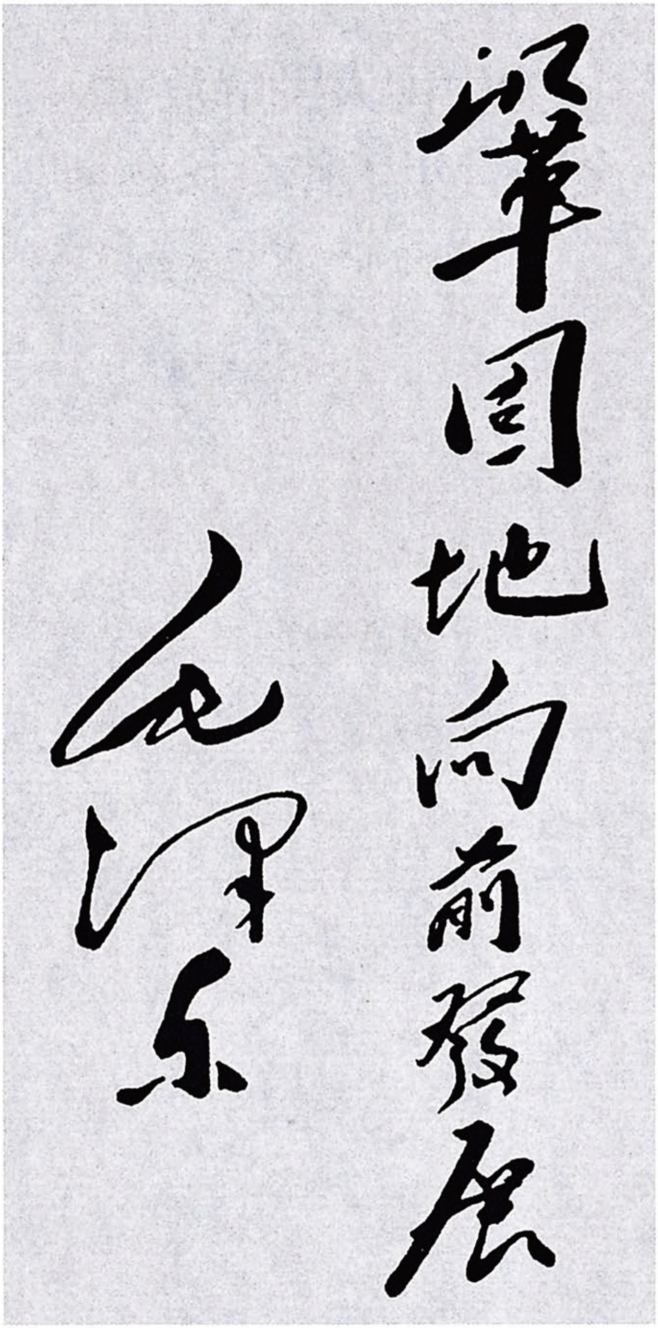
（1950年10月12日）

巩固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青年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会议题词。



蓬勃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的题词。

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当和必须入朝参战[1]

（1950 年 10 月 13 日）

周恩来同志：

（一）与高岗、彭德怀[2]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3]菲里波夫[4]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真日，即 11 日。

[4] 菲里波夫，指斯大林。

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只对上述第三、第四两点没有把握，因此，请你留在莫斯科几天，和苏联同志重新商定上述问题，并以电报速复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二十二时

关于停止追击由七溪逃往那岭之敌[1]

（1950年10月13日）

陈赓：

十二日电悉。七溪之敌既已逃往那岭，越军似应停止追击。如那岭之敌自动撤逃，则让其逃去；如不逃，则保存那岭据点，以便将来围点打援，较为有利。

军委

十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宋时轮九兵团到泰安曲阜区域集结待命[1]

（1950年10月14日）

陈毅同志：

十二日二十一时电悉。（一）宋兵团[2]后尾部队酉俭全部离开上海、常熟地区是可以的，宋兵团仍照前定计划在泰安曲阜区域集结整训一时期待命开东北；（二）高射炮团仍须即开东北；（三）上海人民代表会议何日开幕盼告。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电报。

[2] 宋兵团，指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朝鲜情况和对我军入朝参战的意见[1]

（1950年10月14日）

恩来同志：

甲、朝鲜情况：

（一）美第一师、美第二师、美第二十四师、英第二十五旅及伪军第一师集结汉城以北三八线上开城、金川地区作进攻平壤之准备。本日讯，美第二师拟开金川附近，准备立足。据此看来，美是否进攻平壤及何时进攻平壤，似乎尚未作最后决定。

（二）伪军首都师、第三师已到元山，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正在逐步向元山区域集中，从海上得到补给。

（三）美陆战第一师在汉城，美军二十五师在大田、水原线，美第七师在大邱[2]、釜山线，美第八军军部在大田，伪军两个师在南部各地被阻，朝鲜大部地区敌情是空虚的。

（四）金日成指挥的朝鲜各个尚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坚决对敌，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有五万余人，大部留在南朝鲜，人民军克复蔚珍港。

---

[1] 这是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

[2] 大邱，位于庆尚北道南部。

乙、彭德怀[1]同志在安东[2]研究情况后，认为如果我军能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二百公里之德川县山岳地区，而以其余三个军及三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之熙川、前川、江界地区，则第一，可能使美伪军有所顾虑而停止继续前进，保持平壤、元山线以北地区至少是山岳地区不被敌占。如此，则我军可以不打仗，而争取时间装备训练。第二，如元山、平壤两敌向北进攻德川等处山岳地带，则我军可以必要兵力钳制平壤之敌而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攻之伪军，只要歼灭一二个或二三个完整的伪军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彭及高岗[3]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

丙、高本日返沈阳积极布置各参战准备事宜，彭暂留京等候你的回电。

丁、主要的问题是看：（一）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定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二）苏联允许帮助我们的飞机、坦克、炮类及其他军事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而不打破我们预算计划（至少二十万万美元用于经济文化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

毛泽东

十四日三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1]

（1950年10月14日）

恩来同志：

本日来电收到。

（一）京政治局会议决定参加朝鲜战争并按此布置〔各〕方面工作。

（二）彭德怀同志明（十五）日返安东，在安东布置两三天即去德川与金日成会面。

（三）我已告彭德怀[2]，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

---

[1] 这是毛泽东给当时正在苏联商谈援助朝鲜问题的周恩来的电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四）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五）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先头军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二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二十六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十天时间，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六）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七）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八）马上请通知菲利波夫[1]同志。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二十一时

---

[1]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保护问题的批语[1]

（1950年10月14日）

共同纲领已予各种宗教以信仰自由的保护，不须要再说个人保护。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法舫法师1950年9月9日给巨赞法师的信上。当时法舫法师应聘在锡兰大学任教，主讲中国佛学，他在给中国佛学界著名高僧巨赞法师的信中，建议征得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和李济深副主席的同意，请他们担任中国佛教的保护者。

可以通知法国派飞机投掷粮食及运走重伤员[1]

（1950年10月14日）

陈赓：

十月十一日电悉。可以通知法国派飞机投掷粮食及运走重伤员。

军委

十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的电报。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协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

关于立即前运志愿军粮食致高岗[1]等电

（1950年10月15日）

高岗同志，并邓、洪、韩、解[2]：

（一）我人民志愿军决于十月十八日至迟十九日开始渡江前进，粮食等项则应立即前运勿延为要。（二）彭德怀[3]同志本日或明日返安东[4]。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上午一时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韩，指洪学智、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安东，即今辽宁丹东市。

志愿军参战部队出动的时间

（1950 年 10 月 15 日）

高岗、德怀同志，并告邓华：

（一）三八线上之美英伪军十三日已占金川，准备继续向平壤进攻，美陆战师准备从镇南浦[1]登陆协攻平壤，由中路前进原拟向元山集结之伪第六、第八两师有转向平壤攻击的消息。（二）我军先头军最好能于十七日出动[2]，二十三日到德川地区。休息一天，二十五日开始筑工事制敌先机。第二个军可于十八日出动，其余可在尔后陆续出动，十天内外渡江完毕，请酌办。（三）粮弹是否已开始渡江输送，请高电告。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上午五时

---

[1] 镇南浦，即今南浦，位于平安南道西南。

[2] 1950 年 10 月 18 日 21 时彭德怀在北京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电报给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并告贺晋年说，4 个军及 3 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 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 4 时即停止，5 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 日晚）准备渡 2 个至 3 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彭德怀面告。

在中财委关于近日市场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10月15日）

薄一波[1]同志：

投机风潮应估计会要来的，请速筹对付办法，并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在外交部关于捷克打算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10月15日）

外交部：

请告捷克同志，这些文件[1]暂勿印行，待几个月后中国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发行以后，再行选印。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

[1] 指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军事出版处拟在1950年底以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军事著作，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自由”出版处拟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中收入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

请即派人到安东接引彭德怀与金日成会面[1]

（1950年10月15日）

倪大使转金日成同志：

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2]接引彭德怀[3]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周恩来

十月十五日上午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以周恩来名义起草的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安东，今辽宁丹东。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请与苏联商量先调一个空军师保护首都空防[1]

（1950年10月15日）

恩来同志：

请再与苏方一商，可否从商定掩护城市的喷气式空军中先抽调一个师来北京，以保护首都的空防。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二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

关于志愿军先头部队出动时间致彭德怀、高岗[1]等电

（1950年10月17日）

彭、高，并告邓、洪、韩、解[2]：

（一）先头两个军请准备于十九日出动，明（十八）日当再有正式命令；（二）请彭、高二同志于明（十八）日乘飞机来京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下午五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韩，指洪学智、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关于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入朝作战致邓华[1]等电

（1950年10月18日）

邓、洪、韩、解[2]，并告贺副司令[3]：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日晚）从安东[4]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十九日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5]面告。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廿一时

---

[1]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洪、韩，指洪学智、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

[4] 安东，即今辽宁丹东市。

[5] 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华北局关于绥远非党干部对我批评意见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10月18日）

一波[1]：

行政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否党员事先都要讨论？除某些特别重要问题外，一般问题可以事先不要讨论，提到行政会议上与非党人员一起讨论，似要活泼些，请叫绥远试试这样做。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

---

[1]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

志愿军参战目前只做不说

（1950年10月19日）

邓、谭[1]，并告饶、陈，刘、邓、贺，习、马[2]：

十月十三日电悉。（一）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二）四十八军可以在明年三月再行集中，如有特别情况需要提早集中时再通知你们。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

[1] 邓、谭，指邓子恢、谭政，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饶、陈，指饶漱石、陈毅，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刘、邓、贺，指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和第三书记。习、马，指习仲勋、马明方，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和第三书记。

给刘天民[1]的信

（1950年10月19日）

天民女士：

来信收到，甚谢。

李耿侯已牺牲。李介侯现在北京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情况尚好，知注并闻。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

[1] 刘天民，湖南韶山市杨林乡善扶村人，郭梓材的妻子，和杨开慧关系密切。大革命时期曾从事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后长期做教育工作。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

中央转发华北局及察哈尔省委关于调整城乡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1950年10月20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省市区党委：

华北局及察哈尔省委的这一文件[1]是正确的，全国各省市区均应推行，请予注意为要。

中央

十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0年10月16日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调整城乡关系的报告所写的批语和察哈尔省委的这一报告。华北局认为：察哈尔省委继续认真贯彻中央调整工商业的各项规定，组织物资交流，调整城乡关系，并提出开展城乡贸易为继续调整工商业的中心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大力开展城乡和地区的贸易，推销农产品和工业品，是当前华北地区发展工农业生产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此，华北各地必须抓紧秋冬两季物资交流的旺盛季节，开展大规模的城乡和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活动。各级党委要加强对贸易

工作的领导，把组织物资交流提到领导议程上来，并教育干部重视和学会做生意。察哈尔省委的报告说，为了调整城乡关系，他们组织了有地区和市共同参加的城乡经济委员会，专门研究和解决城乡物资交流问题。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使工商业继续好转，还采取了以下措施：一、大力掌握物价，使工农业产品在价格上保持适当的比例；二、认真吸引私商下乡经营农副产品；三、活跃市场金融，允许私人依法经营银钱业，进一步贯彻借贷自由政策；四、工业上根据以销定产方针，通过产销会议，制定计划，进行生产；五、商业上继续贯彻薄利多销方针，公私商业和合作社均需积极改善经营。

志愿军打好出国第一仗[1]

（1950年10月21日）

倪、柴，即转彭德怀同志，并告邓、洪、韩、解[2]及高、贺[3]：

（一）伪首都师由咸兴向长津前进。伪三师似将进至咸兴。伪六师改由破邑[4]向北，目的地第一步在德川，第二步可能向熙川。伪七、八两师第一步向顺川、军隅[5]、安州，第二步可能向泰川、龟城。以上五个师的最后目的地是江界、新义州一线。截至此刻为止，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部署给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一等参赞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转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6个军兵力发起了第一次战役，以一部在东线阻击敌人，主力集中于西线，在清川江以北歼灭运动之敌。经12昼夜激战，歼敌15800余人，将敌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粉碎敌迅速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开始稳定了朝鲜战局。

[2]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韩，指洪学智、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3] 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4] 破邑，位于平安南道东南。

[5] 军隅，即军隅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南部。

前进。（二）估计伪首、伪三两师要七天左右才能进到长津，然后折向江界。我军第一仗如不准备打该两师，则以四十二军的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四十二军的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六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军各个歼灭伪六、七、八等三个师。（三）如伪六师（较强）由破邑（在铁路线上）至德川的路上能有朝鲜人民军一部作有力的阻击，则该敌可能要到十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才能占领德川，如果我四十军（全部）能于二十三日赶至德川、宁远地区，则可以绕至伪六师的后方（由东面绕至南面铁路线附近），让出正面给他军使用（三十八军或三十九军），如果太迟，则敌将先占德川。（四）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1]精心计划实施之。（五）这一仗可能要打七天至十天时间（包括追击）才能结束，我军是否带有干粮？望鼓励全军，不惜牺牲，不怕艰苦，争取全胜。（六）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一日二时半

---

[1] 彭、邓，指彭德怀和邓华。

争取战机迅速完成战役部署

（1950年10月21日）

邓华[1]同志，并告彭[2]及高[3]：

（一）你们是否已前进，我意十三兵团部应即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二）如部队渡河须有机构在安东[4]指挥，则可留适当同志率一部机构留在安东，你和其余同志率必要机构即往彭处为宜，望酌定。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一日三时半

---

[1]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控制妙香山小白山隔断东西两敌

（1950年10月21日）

彭、邓[1]：

（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2]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去为要。（二）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三）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一日四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妙香山，位于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交界处。小白山，属狼林山脉，位于慈江道、平安南道交界处。

对四十军行动部署的意见

（1950年10月21日）

彭、邓[1]：

（一）现得悉伪六、八两师二十日经德川向熙川推进。（二）我四十军欲先敌赶至德川时间上是否来得及，如不可能则似以在熙川附近地区部署伏击为宜，请酌定。（三）四十二军亦照你们原来部署为好。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一日二十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四五天内不登志愿军消息给胡乔木[1]的信

（1950年10月21日）

乔木同志：

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请注意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毛泽东

十月廿一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关于广播吴耀宗文章给胡乔木[1]的信

（1950年10月21日）

乔木同志：

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2]，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毛泽东

十月廿一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吴耀宗的《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一文。《人民日报》于1950年10月22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伪第六第八两师

（1950年10月22日）

彭、邓[1]：

（一）彭二十一日十六时电[2]悉。（二）据伪二军团长二十日十六时三十分称，第六师正集结顺川、新仓里[3]间，拟命其进抵新义州。第八师正集结江东、成川间，拟命其进抵满浦镇[4]。该军团参谋长同日命第七师主力集结成川、顺川间休整，但严禁进抵顺川。伪二军团指挥所在三登[5]。据此判断，如数日内，敌机尚未发现我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50年10月21日16时彭德怀给邓华并报毛泽东和高岗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应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线及其以南，构筑工事，保证熙川枢纽。隔断东西敌人联络，是异常重要的。请设法集中部分汽车，速运一个师，以两个团至熙川以南之妙香山，一个团至杏川、五岭线，先机构筑工事。另以一个师迅速进至长津及其以南，以德实里、旧津里线构筑纵深工事，保障翼侧安全和江界后方交通。我能确实控制熙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东面或西面一路。

[3] 新仓里，位于平安南道顺川郡东南。

[4] 满浦镇，位于慈江道江界郡西北。

[5] 三登，位于平安南道江东郡南部。

军开进，则伪六师将经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伪八师将进至军隅里[1]及其以北地区，伪七师则在顺川地区作预备队。如二十一日六、八两师继续前进，则本（二十二）日六师可能进到新安州，八师可能进到军隅里。因此我军行进路线必须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二十公里地区不走，而走以北路线，否则，就会过早被敌人发觉，敌将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而此次作战，则以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为最有利。请按此意图，速定部署，迟则恐来不及。（三）另据伪一军团长二十日十时称，美十军团长命令该军团之首都师，即由咸兴向北青、城津[2]推进，第三师集结咸兴。并谓美十军团部正向咸兴移动，其任务为指挥伪一军团作战（按：美十军团由原在汉城之美陆战第一师及原在大邱[3]之美第七师组成，海运元山登陆）。据此，似敌暂不去长津，于我有利。但彭电派一个师占领长津及派必要兵力控制妙香山、杏川洞[4]，仍甚必要，请速实行。还有小白山，也应派兵控制，确实隔断东西两敌。因我军在西面发起战斗后，东面伪军可能回援。（四）如果我军能同时包围伪六、八两师，则于战局最为有利，我四十军应担任包围一个师，三十九军应担任包围一个师。当战斗紧急时，除伪七师必然增援，我可继歼该敌外，现在平壤之伪一师，亦应估计可能增援，你们也要准备对付该师。东面伪军虽亦可能回援，因路远，难于赶到。平壤美军则

---

[1] 军隅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南部。

[2] 城津，即今金策市，位于咸镜北道西南。

[3] 大邱，位于庆尚北道南部。

[4] 妙香山，位于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交界处。杏川洞，位于慈江道熙川郡南部。

增援可能性更少。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二日七时

立即占领妙香山杏川洞

（1950年10月22日）

邓、洪、韩、解[1]，并告彭、高[2]：

（一）二十一日二十一时电[3]悉。（二）敌进甚速，请照彭电立即用汽车运一部兵力去占领妙香山、杏川洞[4]，先运几个营去也好。（三）无论用汽车运兵运物及步行的人马武器都不要再走宣川、

---

[1]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韩，指洪学智、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0月21日21时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给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据悉敌一部已于20日夜9时在新安州登陆，并悉敌还有在铁山登陆企图。为了钳制向长津方向前进之敌及可能由元山、平壤增援之敌，集中3个军各个歼灭伪六、七、八师。第一步计划拟以四十二军一个师附一个炮兵团坚守长津地区。该军主力首先控制小白山地区，视情况向孟山以南地区挺进。四十军全部进到德川、宁远地区。三十八军全部进到熙川地区。三十九军全部进到泰川、龟城地区。尔后视敌前进情况而各个歼灭之。三十九军全部东进后，新义州、定州地段空虚，为了保证交通运输，防敌登陆，建议调一个军到安东地区。

[4] 妙香山，位于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交界处。杏川洞，位于慈江道熙川郡南部。

定州、博川、军隅[1]线及龟城、泰川、球场线，上述地区，几天之后都可能被敌占，而应取该线北面的道路前进。（四）新义州、铁山、宣川地区应由你们派一部兵力固守。（五）调一个军至安东[2]问题，待商定后再告。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时

---

[1] 军隅，即军隅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南部。

[2]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十九兵团待命开东北[1]

（1950年10月22日）

张宗逊同志：

十月二十日电悉。（一）战事紧急，十九兵团部及主力两个军，须于接电后一个月内即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前，完成一切出发准备工作，待命开东北，另一个军则可于十二月内出发。（二）其余各项均同意。

军委

十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的电报。

西藏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1]

（1950年10月22日）

西藏为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无权过问，简单地答复之。

毛泽东

十月廿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关于西藏问题谈话的记录上的批语。1950年10月21日，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送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的备忘录，双方举行了会谈。潘尼迦在谈话中重申了备忘录中的意见，说在联合国有可能准许中国加入的时候，在西藏不会有任何强力反抗的情况下，中国在西藏采取军事行动是不值得的。章汉夫指出，中国参加联合国和中国解放西藏是两个问题。西藏是一定要解放的。我们希望西藏解放能以和平方式解决，因此，当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团抵印后我们即望其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我们要他们在9月20日以前到北京，但虽经一再催促，直到今日仍未来京。现在，我们还是希望西藏代表团快来北京。任何阻挠西藏解放、反对和平者，必须负责。

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1950年10月23日）

彭[1]，并告高[2]：

二十二日戌时电[3]悉。你的方针是稳当的，我们应当从稳当的基点出发，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下列几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伪三师将随伪六师后跟进，伪一师亦可能增援）。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作重新部署，新义州、宣川、定州等处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来占，伪首、伪三两师将从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长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铁路无兵保守向我敞开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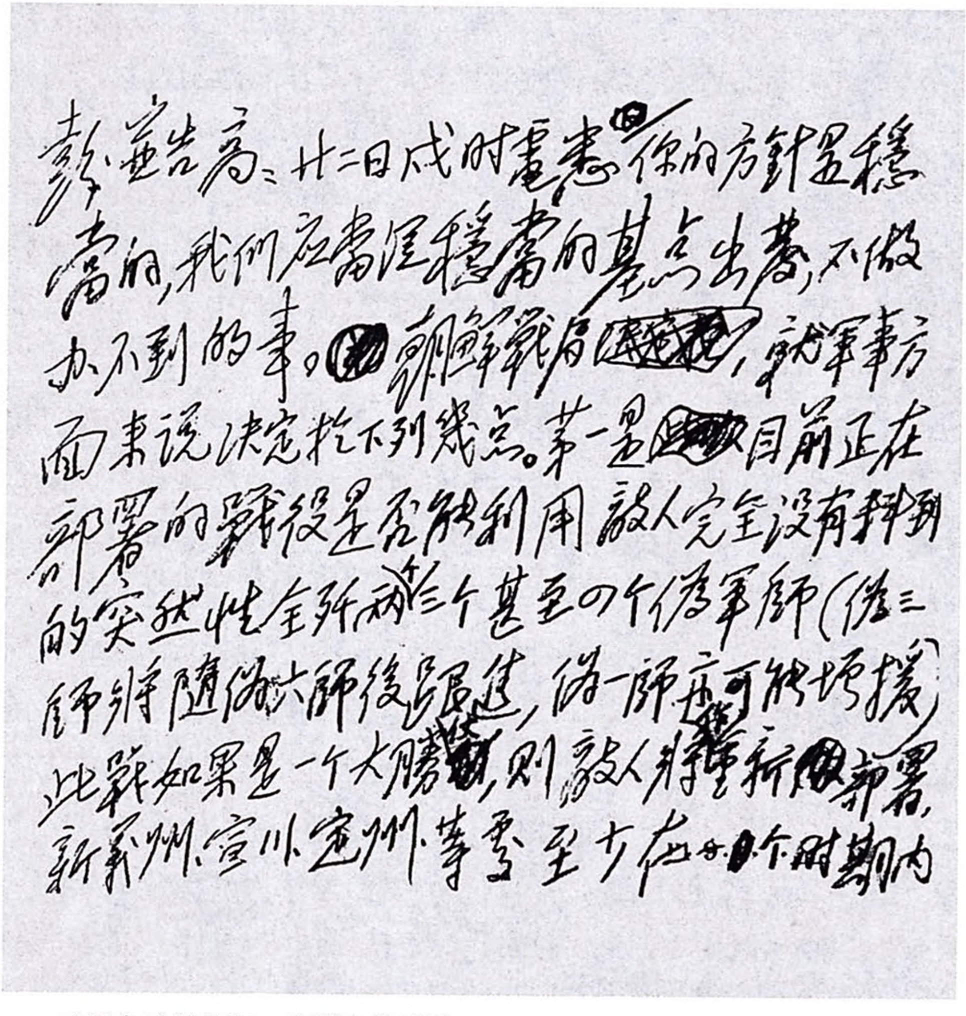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彭德怀1950年10月22日19时关于目前战役计划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提出：半年内我军的基本方针，是保持长津、熙川、龟城以北山区和长甸河口、辑安、临江线渡河交通，争取时间，准备反攻条件。目前战役计划一面以一个军钳制敌人，一面集中3个军寻机消灭伪军两三个师，争取扩大巩固元山、平壤线以北山区，发展南朝鲜游击战争。

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六、七、八师主力未被迅速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长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我无飞机无法进攻外，其余地方的敌人都可能被我各个歼灭，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从美国或他处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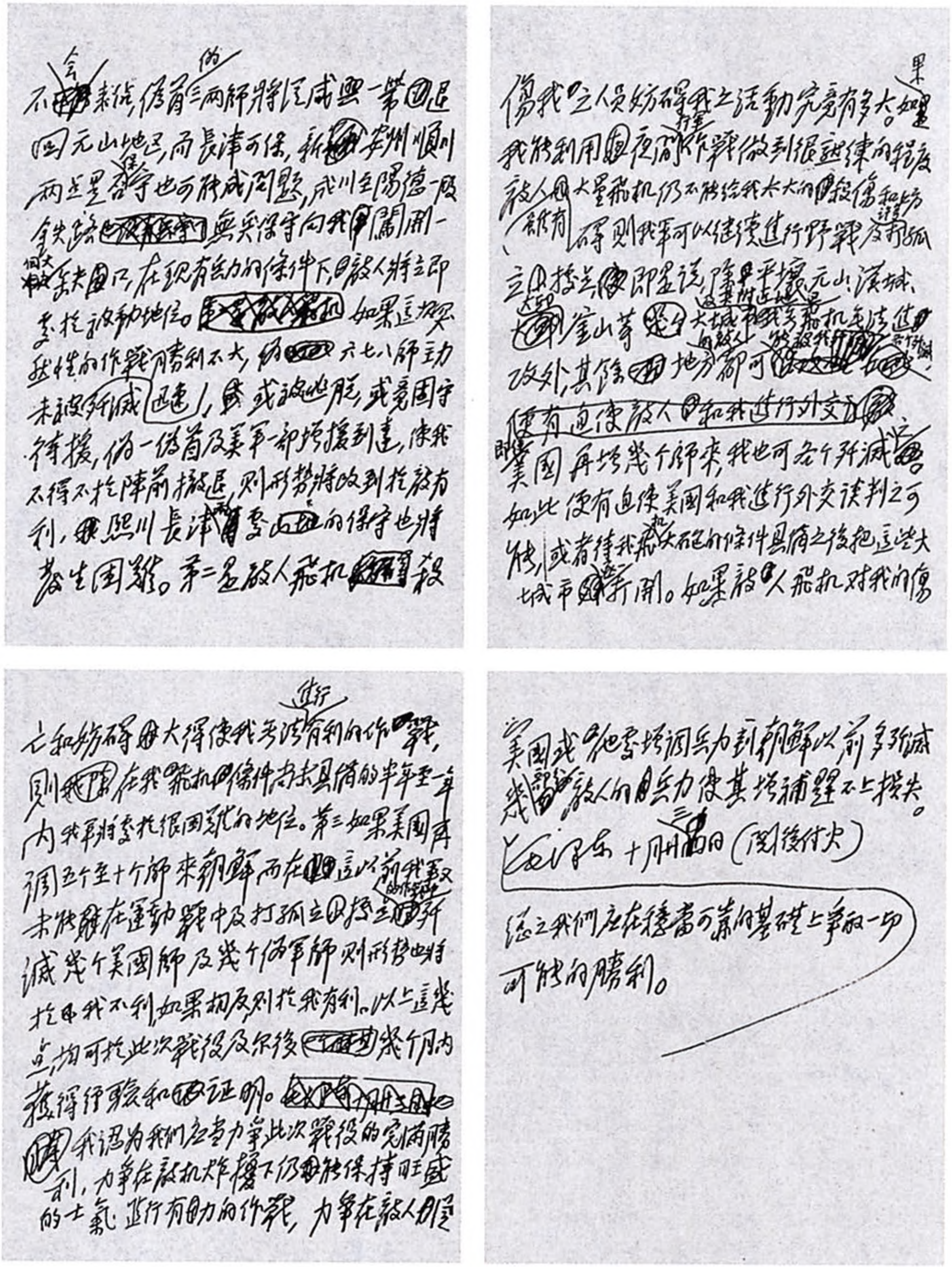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彭、高：廿二日戌时电悉，你的方針是穩當的，我们应當從穩當的基点出發，不做办不到的事。朝鮮戰局，就軍事方面来說決定於下列幾点。第一是目前正在部署的戰役是否能利用敵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殲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僞軍師（僞三師將隨僞六師後跟進，僞一師亦可能增援）。此戰如果是一个大勝仗，则敵人將重新部署，新義州、宣川、定州等處至少在一个时期内

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的手稿。



不会来援，伪首都、三两师将经咸兴一带退回元山地区，而長津可保，新安州、顺川两点是否保守也可能成问题，成川至阳德一段全铁路无兵保守，向我开辟一个大缺口，在现有兵力的条件下，敌人将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击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伪六七八师主力未被歼灭，或被逃脱，或竟固守待援，伪一伪首及美军一部增援到达，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到于敌有利，熙川長津两处的保守也将发生困难。第二是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打仗做到很熟练的程度，敌人虽有大量飞机仍不能给我太大的杀伤和妨碍，则我军可以继续进行野战及打孤立据点，即是说除平壤、元山、汉城、大邱、釜山等几个大城市外，其余地方都可[illegible]。即使美国再增几个师来，我也可各个歼灭之。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或者待我飞机大炮的条件具备之后把这些大城市逐一打开。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国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我认为我们应当力争此次战役的完满胜利，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力争在敌人從美国或其他国家增调兵力到朝鲜以前多歼灭几部分敌人的兵力，使其增补赶不上损失。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阅后付火）

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的手稿。

对第一次战役的部署

（1950年10月23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彭邓高二十二日各电均收到。（二）据所收最后情报，伪二军团指挥所二十二日由江东折返成川，伪六师、八师二十二日进至顺川、成川铁路线以北之北仓里、新仓里[3]地区，有两师并列经德川向熙川集中攻击的意图，如无阻碍，估计该两师明（二十四）日可能到德川或德川附近。因此，我车运控制杏川洞、妙香山[4]一带之部队，务须争取于二十四日拂晓，至迟于二十五日拂晓以前，到达上述地点，否则将失去先机。（三）作战部署，以四十军位于熙川正面及温井[5]、云山地区，三十九军位于云山、泰川地区，三十八军位于熙川东南地区，待敌向熙川攻击之时，然后分数路出发包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北仓里，位于平安南道顺川郡东北。新仓里，位于平安南道顺川郡东南。

[4] 杏川洞，位于慈江道熙川郡南部。妙香山，位于慈江道、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交界处。

[5] 温井，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东北。

围攻击之，这即是彭二十二日十时电及邓洪韩解[1]二十二日十二时电的意见，我认为是适宜的。总以利于以主力插到敌人的后面和侧面，全歼六八两师为原则。（四）敌首都师已确实向北青、城津[2]东进，暂时不去长津，而平壤之伪一师及英二十七旅均将向新安州前进。一个美军降落伞团（大约有二三千人）已在顺川降落。故我对伪六八两师的战斗发起后，第一步伪七师会增援，第二步伪一师及英二十七旅亦可能增援（美军已令英二十七旅向新安州）。如果把这一切敌人的主力各个歼灭，而举行追击时，在顺川地区可能遇到美伞兵团。此次作战，如能将上述一切敌人逐一歼灭，并控制新安州、顺川、成川、新邑[3]、阳德线铁路及其以南一带地区，并以一部伸出至谷山、遂安、伊川、新溪地区，使平壤、元山两敌互相孤立，不能联系，则我将处于主动，敌将处于被动。因此，此次战役必须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准备连续打几个仗。四十二军去长津者似以一个师附一个炮兵团即够，而以该军主力位于小白山作战役预备队似较适宜。是否可行，请彭酌定。（五）已令杨成武[4]抽调六十六军开安东[5]，先头师今日从天津出发，主力明日出发。到后，一个师担任维持新义州、定州线交通，主力在安东为彭邓的预备队。该军到后受彭邓指挥，请邓留人指示该军，将一切有关志愿军的暂

---

[1] 邓，指邓华。洪韩，指洪学智、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解，指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2] 城津，即今金策市，位于咸镜北道南部。

[3] 新邑，亦称破邑，位于平安南道东南。

[4] 杨成武，当时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5]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词口号及其他办法交给他们，并与该军沟通电台联系。（六）三十九军在新义州、铁山一带可以不留兵。（七）我各部派遣远出之侦察队均要伪装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时

诱敌深入利于歼击

（1950年10月23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敌进甚速，伪六师二十二日已到价川，小部到宁边，伪一师有一个团到军隅里。估计此两部今（二十三）日均可到宁边，明（二十四）日可更前进若干里。请速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荫蔽集结，以一部控制熙川，不要去云山、宁边与敌过早接触。三十九军即在龟城地区集结，亦不要去泰川。该两军侦察部队不要到定州、博川、宁边、球场去了，要注意避免和敌打响，要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地区让给敌人，诱敌深入，利于歼击。三十八军应迅速前进。（二）伪八师二十二日尚在德川以南之大坪里、北仓里[3]，走得较慢，但今（二十三）日可能到德川，或其附近。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十四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大坪里，位于平安南道德川郡南部。北仓里，位于平安南道顺川郡东北。

捕捉战机最关紧要

（1950年10月23日）

邓、洪、韩[1]，并告彭[2]：

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两三天内敌即可能发觉是我军而有所处置，此时如我尚无统一全军动作的处置，即将丧失战机。因此，你们应迅速乘车至彭处，与彭会合，在彭领导下决定战役计划，并指挥作战。何日动身，何日可到，望即告。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十七时

---

[1] 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韩，指洪学智、韩先楚，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九兵团须从速准备开动

（1950年10月23日）

陈、张[1]：

（一）请令宋时轮[2]同志即来北京。（二）宋[3]兵团须从速进行政治动员和军事训练，并准备先开一个军去东北。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

[1] 陈、张，指陈毅、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参谋长。

[2] 宋时轮，当时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宋，指宋时轮。

六十六军赴朝作战问题

（1950年10月24日）

高岗[1]同志，并告彭、邓[2]：

六十六军先头师到安东[3]后，请即令其前进控制新义州、铁山线（暂不去宣川），如敌来攻则阻击之，巩固该线于我手中。该军主力位于安东，在该军未与彭邓沟通电台通讯以前请你予以指挥。该军应即编入志愿军序列，请你将志愿军的各种办法指示他们。

毛泽东

十月二十四日八时

---

[1] 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安东，旧市名，即今辽宁丹东。

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

（1950年10月24日）

彭、邓[1]，并告高[2]：

今日情报，伪六师向楚山、北镇[3]方向进攻，伪八师经宁远到熙川后向江界[4]进攻，伪一师（战力颇强）已到宁边，似将向泰川、龟城进攻。请你们注意诱敌深入山地然后围歼之，敌人至今还不知道我情况。（请注意白头山制高点）

毛泽东

十月二十四日十七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北镇，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北部。

[4] 江界，当时为慈江道道治，位于慈江道中部。1950年10月19日，由于美军侵占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迁至江界。

志愿军司令部组成须有朝鲜同志参加[1]

（1950年10月24日）

彭：

（一）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组成拟即发布命令。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2]同志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为副司令，一人为副政委，如何请复。（二）如何发布作战公报，请与金商。其内容每次均须得你并报我同意，方式由朝鲜广播台先发表，新华社再转播，此事须妥为商好，以免两歧。

毛泽东

十月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关于抗议美机侵入我国领空的批语[1]

（1950年10月25日）

周、外交部：

请将此事[2]及十五、十六日所出同类事件，加入外交部已起草的抗议电[3]中，于二十六日夜拍去。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在新华社1950年10月24日电讯稿上写给周恩来和外交部的批语。

[2] 指新华社沈阳24日电所报道的“24日10时36分，有侵朝美军的军用飞机3架，侵入我辽东省辑安县之地沟村上空”一事。

[3] 指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名义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抗议电。抗议电针对美国军用飞机1950年10月13日到25日间不断侵犯中国领空的行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侵朝军队的军用飞机侵入我国领空的罪行，并立即撤退美国侵朝军队，以熄灭战争扩大的火焰。

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1]

（1950年10月25日）

十三兵团党委，并转各级党委，并告东北局：

（一）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应即改组为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其他机构；（二）彭德怀同志为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前已通知），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四同志均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二同志均兼副政治委员，解方同志为参谋长，政治部、后勤部及其他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三）党委组织亦照原名单加入彭朴二同志，以彭德怀同志为书记，邓华、朴一禹二同志为副书记。

中共中央

十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党委的电报。

必须准备与向鸭绿江进攻之敌作战

（1950年10月25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据昨（二十四）日情报，此次被美敌驱使向鸭绿江冒险进攻的敌军有下列各部：甲、伪六师，已到熙川及桧木镇[3]，拟向楚山；乙、伪八师，已到宁远、德川以北，拟经熙川向江界[4]；丙、伪一师,已到宁边、龙山[5]，似将向昌城；丁、伪七师，尚在江东、顺川间，拟到熙川为预备队；戊、英二十七旅，已过安州，拟向新义州。（二）我军第一仗必须准备和上列五部作战，并至少歼灭其中三个师，才能初步解决问题。（三）四个美国师（骑一师[6]、步二师、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在平壤为中心地区；两个美国师（陆一师、步七师）正在元山登陆中；两个伪军师，在北青、咸兴、元山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桧木镇，亦称桧木洞，位于慈江道楚山郡南部。

[4] 江界，当时为慈江道道治，位于慈江道中部。1950年10月19日，由于美军侵占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迁至江界。

[5] 龙山，亦称龙山洞，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西南。

[6] 骑一师，即美军骑兵第一师，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虽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一师的番号。

线（首都师、第三师）。（四）三八线以南极为空虚，只有一个土耳其旅（新到）及三个残破的伪军师。因此，人民军大活跃。据二十一日伪五师称，仅庆尚南北道一带即有人民军五万六千余，分在各地活动等语。只要北面打一二个胜仗，南面的活动将更高涨。（五）请令六十六军准备阻击或部署歼灭英二十七旅。（六）彭前报有敌在新安州登陆，各方均无反映，似不确。（七）请高在鸭绿江中准备多数船只以备桥梁破坏时用。桥梁破坏如不大应随破随修，并调查临江[1]一带船渡是否容易。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六时

---

[1] 临江，镇名，位于吉林浑江市东南。

第一仗似以打伪军为主为适宜

（1950年10月25日）

彭、邓，并高：

新得情况如下：（一）伪六师之第二第七两团经桧木洞[1]昨日到达接近江边之古场[2]，今日当可到楚山城，这就威胁我辑安、长甸河口[3]两处交通线，请速作处置。（二）八师两个团估计今日可到熙川。（三）美二十四师和英二十七旅一道已过新安州、清川江。据说美军战斗力比伪军为弱，但第一仗似以打伪军为主为适宜。（四）美二十五师维持平壤至大田交通线，美骑一师[4]守平壤、镇南浦[5]一带，以上两师均不能动，美第二师似在平壤南北，情况不明，伪七师主力尚在江东，其一个团附属于伪一师已到宁边。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六时

---

[1] 桧木洞，位于慈江道楚山郡南部。

[2] 古场，位于慈江道楚山郡中部。

[3] 辑安，旧县名，即今吉林集安。长甸河口，位于辽宁宽甸县南部。

[4] 美骑一师，即美军骑兵第一师，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虽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一师的番号。

[5] 镇南浦，即今南浦，位于平安南道西南。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图为志愿军第四十军主力向价川新兴洞、苏民洞地区发起进攻。

关于敌方对我军行动的反映
致彭德怀、邓华[1]电

（1950年10月25日）

彭、邓：

现在为止收到的一切消息中，只有伪六师谍报参谋称，据难民报告，十九、二十两日夜间有六十辆汽车载有八路军由新义州到昌城郡之新仓等语，此外任何方面尚无我军到达的反映。平壤和东京美军方面均认为几天内就可以到达鸭绿江，此外有些人认为金日成还想在江界组织最后抵抗。

毛泽东

十月廿五日六时半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先抓住一两部敌军围攻吸引敌主力增援

（1950年10月25日）

彭、邓[1]：

（一）敌已开始发现我军。昨（二十四）日夜伪某部称，敌主要为八路军,企图经云山、温井[2]山路集结北镇[3]。又空军夜间侦察报告称，敌军车辆正自江界[4]络绎南下等语。估计今明两日被敌发现必更多。（二）请考虑于明（二十六）日或二十七日先抓住一两部敌军围攻不使逃脱，吸引敌主力增援，是否妥当请酌定。（三）伪一师确到宁边、龙山[5]，请告三十九军注意抓住。伪七师主力尚在江东。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十七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温井，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东北。

[3] 北镇，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西北。

[4] 江界，当时为慈江道道治，位于慈江道中部。1950年10月19日，由于美军侵占平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迁至江界。

[5] 龙山，即龙山洞，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西南。

军委关于伪一、六、八师行动情况的电报

（1950年10月26日）

彭、高[1]：

（一）在富榆洞与我军接触的是伪六师第二团。该师之第七团，有一个营进至桧木洞，其余在熙川附近清剿。该师之第十九团，在熙川修机场。估计此两团今（廿六）日将向第二团增援。昨报该师去楚山，是参谋人员弄错。（二）伪八师之第廿一团，廿四日即从苏民洞向北，大约昨（廿五）日到了熙川一带。该师之第十团、第十六团昨廿五日还在松亭里及德川一带，大约今廿六日可能向熙川前进，可能留一部在德川保护机场。（三）伪一师自己有三个团即第十一团、第十二团、第十五团，又附属伪七师之第八团，故该师共有四个团。在利洞与我一二〇师接触的一个团如确系伪一师所部，则该师主力可能向利洞增援，请注意。

军委

十月廿六日二时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六十六军由志愿军司令部直接指挥[1]

（1950年10月26日）

彭、邓，并告高、贺、张[2]：

请直接指挥六十六军，给以任务和领导，迅速沟通电台联系，以利保卫新义州、铁山一带地区，阻止或歼灭英二十七旅等部的可能进攻。

军委

十月二十六日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的电报。

[2] 高、贺、张，指高岗、贺晋年、张秀山，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和副政治委员。

先歼伪第一第六第八师后打美英军

（1950年10月26日）

彭、邓[1]，并告高[2]：

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已在新安州一带渡过清川江，请令三十九军勿去龙山[3]、宁边[4]，暂时避开（如果可能的话）美英军，以免被其胶着，而应由泰川向云山及其以北方向前进寻伪一师作战，与四十军、三十八军配合，首先歼灭伪一、伪六、伪八等师，然后再打美英军。如伪一师与英美军在一起则暂时也不要打伪一师，待伪六、伪八歼灭后寻机再打该敌。如何，请按情况酌定。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五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龙山，即龙山洞，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西南。

[4] 宁边，位于平安北道东南。

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对敌作战方针

（1950年10月26日）

德怀[1]同志，并告高[2]：

十月二十五日戌时电[3]悉。（一）先歼灭敌人几个团，逐步扩大，歼灭更多敌人，稳定人心，使我军站稳脚跟，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二）伪六师之第七团确仍向楚山冒进。请高令五十军注意，从辑安及长甸河口[4]两处对岸阵地向楚山迫近警戒。惟该敌可能在楚山先我建立据点，五十军如要攻击，应先作好准备，应估计这部分敌人是较强的。（三）伪一师指挥所已到云山，其第十二团进抵温井里[5]附近。其第十五团在第十二团后跟进。其第十一团在云山以南。附属该师之伪七师第八团位置不明，估计亦抵云山一带。请告三十九军注意分割歼灭该师。三十九军应以有力部队隔断伪一师与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0月25日19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说：敌以坦克数辆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支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敌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故决定以军和师分途歼灭敌之一个团和两个团（今晚已开始），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是十分必要的。

[4] 辑安，旧县名，即今吉林集安。长甸河口，位于辽宁宽甸县南部。

[5] 温井里，即温井，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东北。

博川一带之美英军。（四）我四十军歼灭伪六师第二团后，其第十九团（分得很散）可能集中向温井方向前进，请令四十军注意。（五）伪八师两个团今（二十六）日可能到熙川，其另一个团（第十团）今日可能留在德川，请告三十八军注意。（六）我军第一个战役须确定以歼灭上述三个伪军师为目标，分为几个大小战斗完成之，然后再打美英军。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十四时

对三十九军作战行动的部署

（1950年10月26日）

彭、邓、韩、洪[1]，并告高[2]：

十月二十六日七时电[3]悉。美二十四师向碧潼，英二十七旅向新义州，这是过去几天的计划。今后几天则有三种可能：第一是伪一师被我围歼时向北增援伪一师；第二是照原计划进攻碧潼、新义州不变；第三是在博川一带观望形势。我应以第一种可能为基点，令三十九军迅速进至云山、温井[4]线，以有力一部隔断伪一师与美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韩、洪，指韩先楚、洪学智，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0月26日7时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给高岗、贺晋年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一）美二十四师约1.5万人，英二十七旅约五六千人，伪一师约1万人，共约3万余人，25日已进占古城洞、龙山洞、博川地区，上述之敌有沿泰川、龟城及定州铁路向新义州前进模样。（二）我三十九军在龟城、泰川线。（三）25日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北镇伏击伪六师二团一个营歼灭，本拂晓围歼温井之敌约一至两团，是否得手尚未报告。（四）我三十八军、四十军正在部署分途围歼熙川、温井、桧木洞地区之伪六、八师，得手后，集结3个军并六十六军主力围歼向新义州前进之美英军，预定地区在龟城、宣川线。

[4] 温井，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东北。

英军的联系，以主力配合四十军一部保证迅速歼灭伪一师（战力较强，且有四个团），然后改向南面防御，待伪六师、伪八师均被我歼灭后，看情况再定对美英军作战的部署。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十六时

歼灭伪第一第六第八师的作战部署

（1950年10月26日）

彭、邓，并告高：

（一）截至此时所得情报，伪六师正以其第七团主力、第十九团全部向温井[1]增援，利于我四十军各个歼击。（二）伪八师指挥所已到熙川，三个团已到一部，估计明（二十七）日可全部到熙川，我三十八军如在明日夜发起攻击，须以伪八师全部为目标而分割围歼之。（三）美二十四师称一师（指伪军）在云山被包围，美二十四师被阻不能前进，但决心歼灭共军等语。请令三十九军以有力一部钳制美二十四师，使其暂时不能向北面增援，以利全歼伪一师；三十九军主力并配合四十军一部以全歼伪一师为目标是很必要的，尽可能勿使该敌逃脱。（四）在伪一、六、八师歼灭后，请令四十二军以一个师占领宁远、德川、孟山，派出几个支队分路袭扰价川[2]（伪二军团指挥所在此）、顺川、成川等处，威胁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之后路，并使平壤美军难于北援。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三时

---

[1] 温井，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东北。

[2] 价川，位于平安南道北部。

对军委设立军事运输部门报告[1]的批语[2]

（1950年10月26日）

同意。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

[1] 聂荣臻的报告说：为适应今后繁重的军事运输任务，军委很需要设立专门的军事运输部门来掌管此事，经与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协商，提议任命吕正操为军委交通运输司令。周恩来副主席已同意此意见，特提请批示。

[2]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10月25日报告的批语。

九兵团北调整训和敌军行动情况

（1950年10月27日）

德怀[1]同志，并告高[2]：

十月二十六日十八时电[3]悉。（一）宋时轮[4]已来京面谈，九兵团定十一月一日起车运梅河口地区整训，前线如有战略上急需可以调用，如无此种急需则不轻易调用。（二）元山登陆之美军系由汉城移去之美陆战第一师，由大邱[5]移去之美步兵第七师及美第十兵团部，估计有三万人左右，号称五万不可信。该敌早已船运，因受元山港水雷威胁迟疑不敢登陆，现在始登陆。过去因该两师美军未登陆，伪三师须守备元山、咸兴一带，致伪首师孤军东进，该师长表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0月26日18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说：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与伪一师距离不远，如打云山被胶着很不利，故决以三十九军转移至云山西北钳制伪一师及美英等军，集中三十八、四十两军首先歼灭熙川六八两师，至快须28日晚才能发起战斗。美广播26日5万人在元山登陆如系事实，美帝准备大打并企图由咸兴、长津进占江界、惠山镇、中江镇，我应迅速再准备一两个军，位置临江、长白两点，备适时参与作战，以备打破敌人将我压回中国企图。

[4] 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5] 大邱，位于庆尚北道南部。

示恐惧。原拟俟美军登陆后接防元山、咸兴线，让伪三偕伪首一起东进。现在我军出现，其计划可能变更。是否将以伪三、伪首向长津进攻，以美军一部出长津以南策应，目前尚不能定，因平壤、元山间二百公里地区向我敞开着，元山本身亦受威胁。（三）伪八师今晨已从熙川逃至球场洞[1]，目前似只有伪六师尚有希望。在打伪六师时，伪八、伪一仍可能增援，请注意。（四）你们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七日十时

---

[1] 球场洞，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东部。

按新情况重新确定攻击目标

（1950年10月27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据此间所收情报均说伪六师之第二团被围并说已被歼，与来电所说不符，望查告。伪六师第十九团向温井[3]增援，其第七团在古场[4]被我切断后路；似此，如打得好，可能全歼伪六师；（二）伪八师只有一个营在熙川，主力已撤至球场[5]有向温井进攻说，似此，以熙川为攻击目标之部署已不适宜，请按新情况酌定。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七日二十二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温井，位于平安北道云山郡东北。

[4] 古场，位于慈江道楚山郡中部。

[5] 球场，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东部。

关于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致彭德怀[1]电

（1950年10月27日）

彭：

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待战役告一段落再发表为宜。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对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建议[1]的批语

（1950年10月27日）

周总理：

不要这样做。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指北京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

赞同聚歼伪军四个师的部署

（1950年10月28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你们两个新的部署电都是很好的，以一一八师及五十军一部围击伪七团于楚山、桧木洞[3]之间（请注意于两三天内包围而不歼灭，让其大唤大叫），吸引一、六、七、八等四个师北援，以便主力聚歼。你们的聚歼部署极为正确。（二）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桧木洞，位于慈江道楚山郡南部。

第一次战役的关键有两点

（1950年10月28日）

彭、邓[1]，并高[2]：

十月二十八日八时电[3]悉。（一）庆祝你们的初战胜利。（二）目前全战役的关键有两点：一是确实抓住古场[4]、楚山之伪七团不使逃脱，如此则伪一、六、八师非增援不可，有仗可打；二是我三个军全部到齐并完成战役展开，如此则我攻击时猛速有力，保证歼敌。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四时半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0月28日8时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伪第二团一个营随七团向楚山，第三营25日在温井以西全部歼灭。26日拂晓前4时包围于温井以东俘数十人。战斗结束后，因疲劳马虎未打扫战场，至昨（27）日才发现该敌遗弃汽车60余辆及其所有重武器，搜山中获俘数10人。详情清查中。

[4] 古场，位于慈江道楚山郡中部。

诱敌深入定宣泰龟泰川等区域以利歼击

（1950年10月28日）

彭、邓[1]，并告高[2]：

据志司报称，博川敌进占长山面，在泰川以南与我一一五师接触等语。果如此，则极好。请令一一五师北撤，在定州、宣川、泰川、龟城一带之友我部队，兵站人员，一律西撤，让该敌深入泰、龟、定、宣区域，以利尔后歼击。此种意图原是你们提出的，极为正确，望令上述各部执行（一一五师尚未执行）。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八日二十三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起义军官较多的团以上部队均可组织军政委员会[1]

（1950年10月28日）

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各军区政治部：

据西南军区政治部十月二十一日来电称：云南军区建议，在起义部队暂十二军及暂十三军的军师团三级，组织军政委员会。该项建议说，“为了便于团结和发扬暂十二、十三军留用军、师、团军官之积极性，和更好地组织他们进行工作，凡我军师团三级（有留用之单位）都组织军政委员会，吸收他们参加，形成行政上的集体领导。比较大的问题，先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即可通过该委员会执行。同时，并以此进行工作检讨和互相批评，以养成其组织性纪律性”。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可否望示等语。我们已批准此项建议。各军区所属部队凡有较多起义军官参加的军队，在团以上各级均可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利团结和改造。

军委总政治部

十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给华东、中南、西北和华北各军区政治部的电报。

转发华北军区高干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0年10月28日）

各大军区党委，并转所属二级军区党委及兵团级与军级党委同志们：

我们认为华北军区党委会十月廿六日向军委的报告[1]是正确的，这是按中央方针所作的具体计划和切实处置。请你们参照此文件，做出自己的具体计划和切实处置，并尽速报来，是为至要。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于北京

---

[1] 即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关于1950年10月20日至23日召开的华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会干部一致拥护中央和军委对朝鲜问题的决定。会议要求军队为适应新的形势，从各方面迅速地顺利地完成由和平到战争的转变，并确定了为实现这一转变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会议讨论决定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彻底克服和平麻痹思想；二、建立与改变组织机构，培养干部；三、加强战备；四、部队训练。

在袁仲贤[1]关于梅农[2]同申健[3]谈西藏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10月28日）

周，并外交部：

申健答得很正确[4]，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

---

[1] 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2] 梅农，当时任印度外交部次长。

[3] 申健，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

[4] 1950年10月26日梅农约请申健谈西藏问题，说中国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提交了印度政府关于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指出，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的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说，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

使用九兵团主力对付可能由咸兴向北进攻之敌

（1950年10月29日）

彭、高[1]：

东面伪首、伪三及美七师共三个师由咸兴向北进攻的可能性极大，必须使用宋时轮[2]主力于该方面方有把握，否则于全局不利。请你们考虑除第二十七军十一月一日由泰安直开辑安[3]或满浦[4]直上前线外，余两个军是否接着开通化、辑安地区休整待命，以备必要时使用，盼复。

毛泽东

十月二十九日上午六时

---

[1] 彭、高，指彭德怀、高岗，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辑安，旧县名，即今吉林集安。

[4] 满浦，位于慈江道江界郡西北。

以全歼当面之敌为目标是正确的

（1950年10月30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庆祝你们歼灭伪八师四个营的胜利。（二）你们三十日九时的部署[3]是很好的。我方对敌人数量、位置、战斗力和士气等项均已明了，我军已全部到齐展开，士气高涨，而敌人对我方情况则至今不明了（只模糊地知道我军有四万至六万人）。因此，你们以全部歼灭当面敌人伪一师、伪七师、英二十七旅、美二十四师及美骑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0月30日9时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解方给各军并报东北军区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为歼灭下杏洞、龙应洞一带之敌，以便我能迅速插至球场以南，切断越过清川江敌之退路，部署如下：一、三十八军应以主力沿公路向下杏洞攻击前进。应以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另以一个团轻装于公路东侧绕路向敌侧后插进，得手后迅速南下，务于31日或11月1日拂晓前进占球场以南院里、军隅里，截断进占云山、泰川敌退路。二、四十军一一九师应于31日拂晓前占领新兴洞（球场东北），截击南逃之敌。一二〇师主力应歼灭龙应洞之敌。三、我一二五师应于30日晚至迟31日晚行动，经杏川洞插至德岘、长坪，阻击西进或北进之敌，并准备继续向南挺进，占领德川，钳制与调动敌人。

一师[1]一部及伪六师、伪八师残部为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三十八军全军及四十二军一个师能确实切断敌人清川江后路，其他各军师能勇敢穿插至各部分敌人的侧后，实行分割敌人而各个歼灭之，则胜利必能取得。（三）在大作战时请注意使用六十六军，以厚兵力。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二十时

---

[1] 美骑一师，即美军骑兵第一师，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虽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一师的番号。

关于南朝鲜军队战斗特点的通报[1]

（1950年10月30日）

九兵团，十九兵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军区：

据志愿军司令部十月二十九日报告称，“我四十军与温井南朝鲜军数日战斗中了解敌战斗特点如下：一、敌战斗力弱。冲锋或反击，必须依赖火力支援，怕近战（怕刺刀、手榴弹）。二、攻击精神差。以小部队（一个班或多至一个排）向我袭击，攻不动则退守，只要我组织好火力发起冲锋即逃跑。三、炮火猛烈，步枪射击技术差。每当进攻与撤退前，必须以炽烈炮火掩护，昼则进攻，夜则退回，并宿汽车上。四、对已失阵地，立即以空军侦察及依地面炮火指示目标，以三四架飞机扫射轰炸。五、工事构筑简单，并缺乏工具。炮兵阵地多在开阔地或公路上，装备笨重，不能上山。六、每日天明后，均以一至四架飞机，在敌驻地周围几十里内低空盘旋，侦察扫射。七、特务活动积极，多化装难民，携带军图、短枪、手榴弹等，在我驻地打黑枪，焚烧弹药、汽车、村庄，以及向空军联络（以白手巾等）。八、对付敌坦克并不困难，敌一师十五联队，原配属五辆坦克，被我击毁四辆”等语。按最近数日几次小规模战斗已将南朝鲜反动军约一个师歼灭，正在继续逐步歼灭敌军中，歼灭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第十九兵团的电报。

各部分敌军，是有把握的。

军委

十月三十日

九兵团的作战任务

（1950年10月31日）

宋、陶[1]，并告陈、饶、张，彭、邓，高、贺[2]：

（一）九兵团全部着于十一月一日开始先开一个军，其余两个军接着开动，不要间断。（二）该兵团到后受志司指挥，以寻机各个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三师、美军第七师及陆战第一师等四个师为目标。该敌现位于城津[3]、咸兴、元山及以北一带地区，有分路向临江、辑安[4]方向进攻模样。（三）兵站事务须自设机构办理。

毛泽东

十月三十一日十时

---

[1] 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陈、饶、张，指陈毅、饶漱石、张震，当时分别任华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 城津，即今金策市，位于咸镜北道西南。

[4] 辑安，旧县名，即今吉林集安。

关于将志愿军入朝作战注意事项等汇送宋时轮[1]的批语

（1950年10月31日）

聂[2]：

请将志司、志政（包括前十三兵团司政）前后所发各项口号、动员令、入朝注意事项、作战注意事项等集成一起，即日派人送往宋时轮应用，为要。

毛泽东
十月卅一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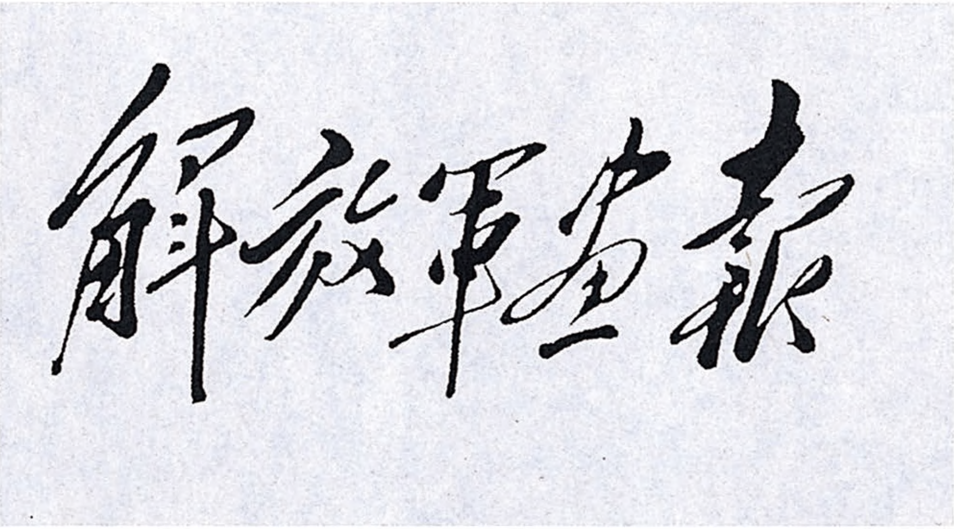
[1] 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为《解放军画报》题名[1]

（1950年10月）

解放军画报



毛泽东为《解放军画报》题写的刊名。

---

[1] 1950年8月军委总政治部决定以华北画社为基础，出版全军统一的画报。1950年9月，解放军画报社成立。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题写了“解放军画报”5个大字。1951年2月，《解放军画报》创刊。

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1]

（1950年10月）

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但不能听任美国侵入中朝边界而置之不理。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事宣传指示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浣溪沙[1]·和柳亚子先生

（1950年10月）

一九五〇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2]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3]，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4]，
万方[5]乐奏有于阗[6]，
诗人兴会[7]更无前。

---

[1] 浣溪沙，词牌名，唐教坊（音乐学校）里曲子的名称。

[2] 赤县，战国时称中国为赤县神州。

[3] 翩跹，跳舞轻盈状。

[4] 一唱雄鸡天下白，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

[5] 万方，古人称国族为方，《易经》有“鬼方”。

[6] 于阗，汉朝西域国名，在今新疆。

[7] 兴会，兴致、兴趣。

附：柳亚子原词

火树银花不夜天，
弟兄姊妹舞翩跹，
歌声唱彻月儿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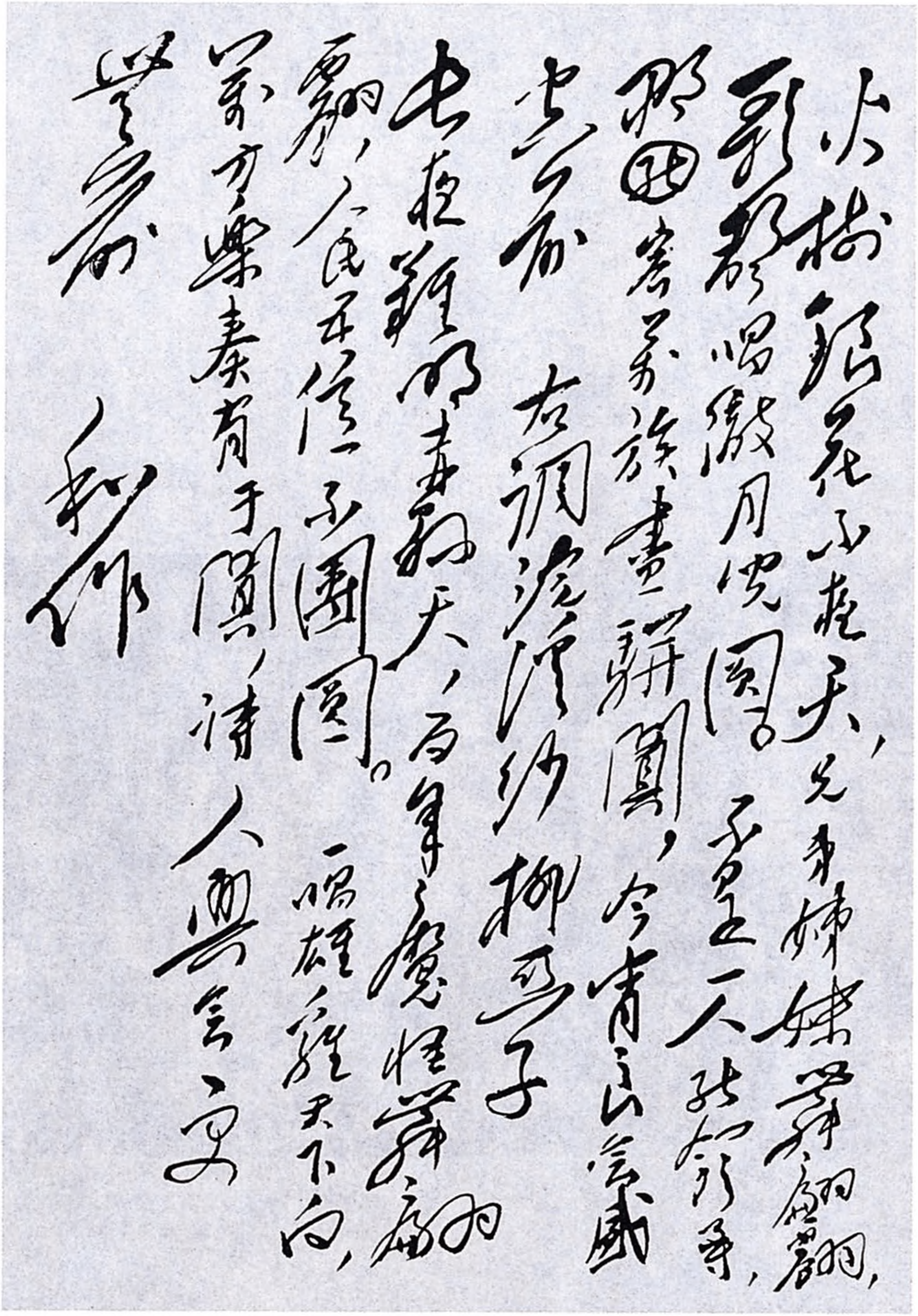
不是一人能领导，
那容百族共骈阗[2]，
良宵盛会喜空前。

1950年，毛泽东和朱德、柳亚子、余新清在北京。

---

[1] 新疆哈萨克族民间歌舞有《圆月》一歌云。

[2] 骈阗，聚会，会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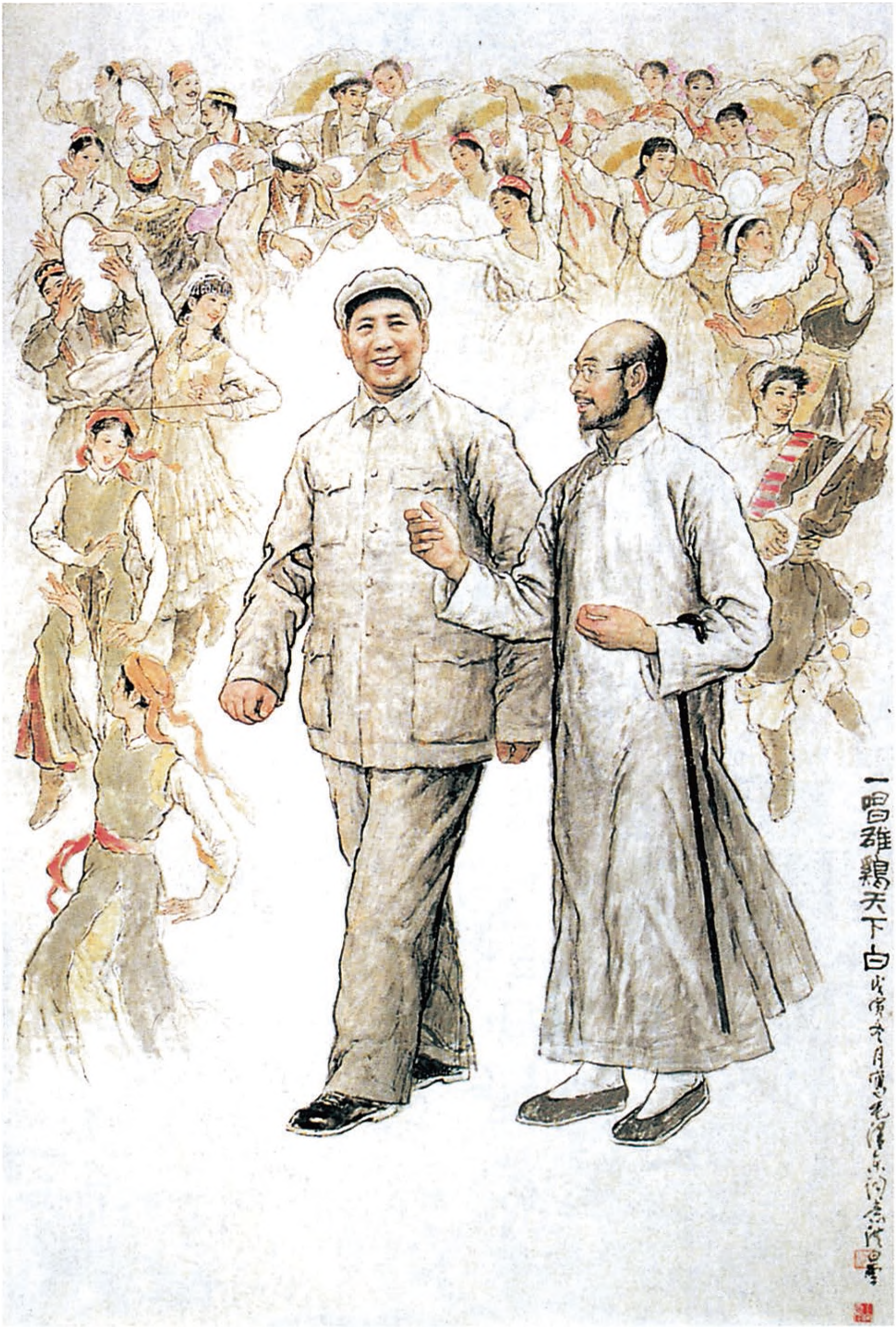
火树银花不夜天，兄弟姊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今宵盛会喜空前。

右调浣溪纱　柳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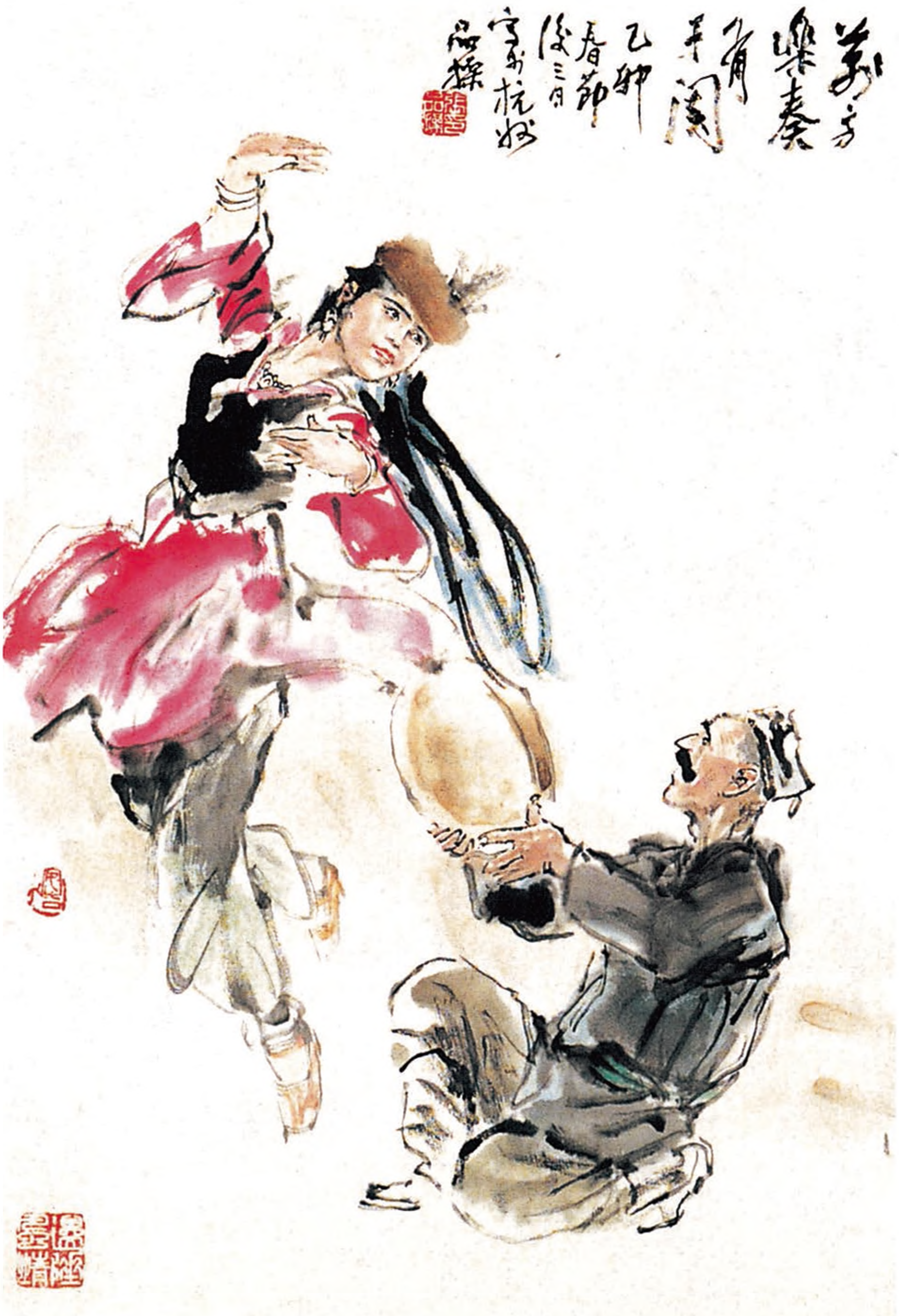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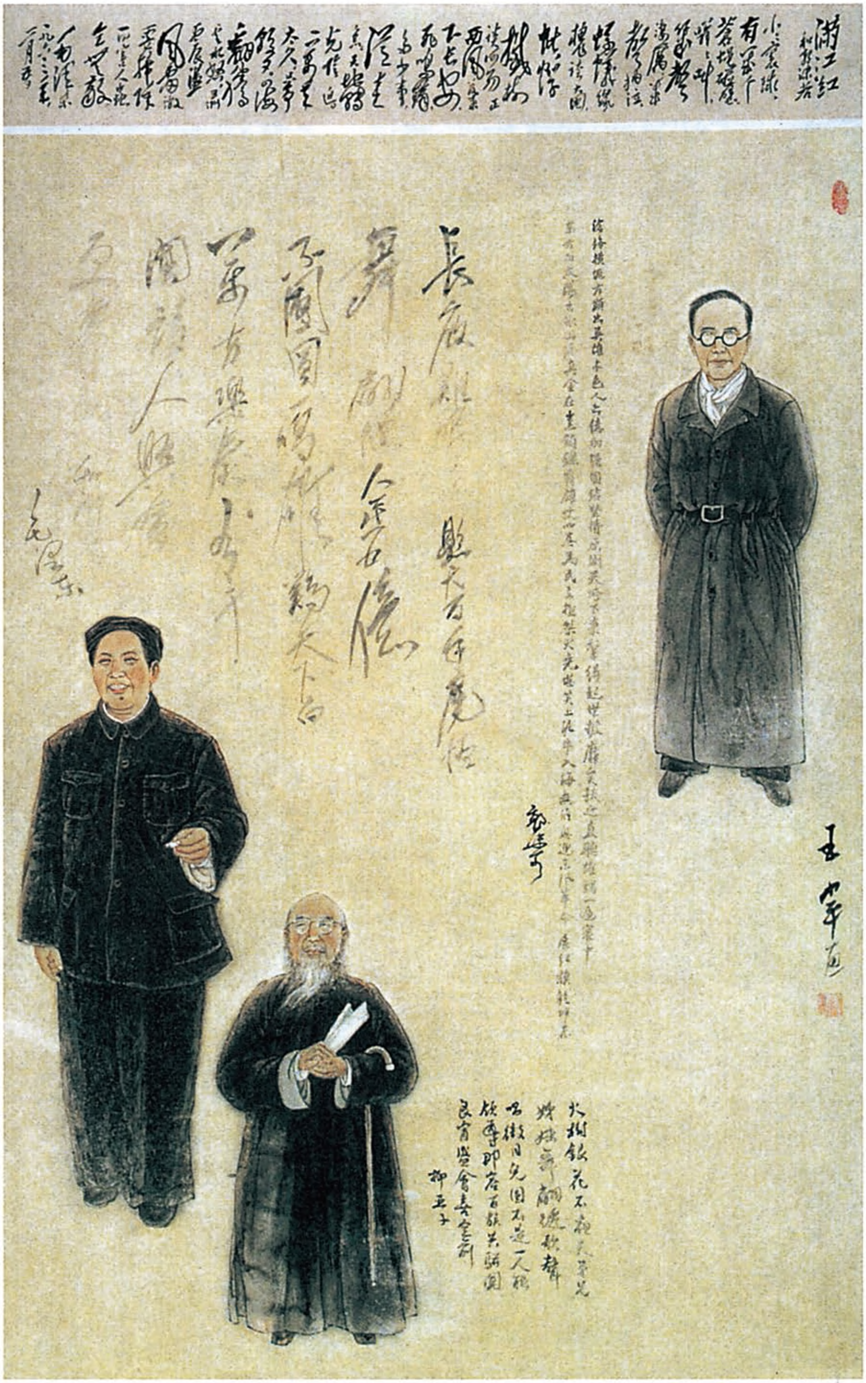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柳亚子词和《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一唱雄鸡天下白》（诗意画）


萬方樂奏有于闐
乙卯春節後三月寫於杭城
品操

《万方乐奏有于阗》（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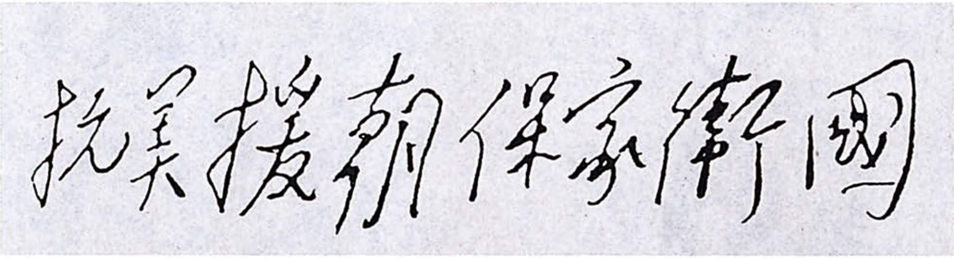

长夜难明赤县天
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毛泽东

《诗人兴会更无前》（诗意画）

为抗美援朝题词[1]

（1950年10月）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毛泽东为抗美援朝的题词。

---

[1] 1950年6月25日，美国帝国主义者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又纠集15个国家的军队直接投入这场侵略战争，并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后来，毛泽东又将这8个字亲笔书写出来。

为《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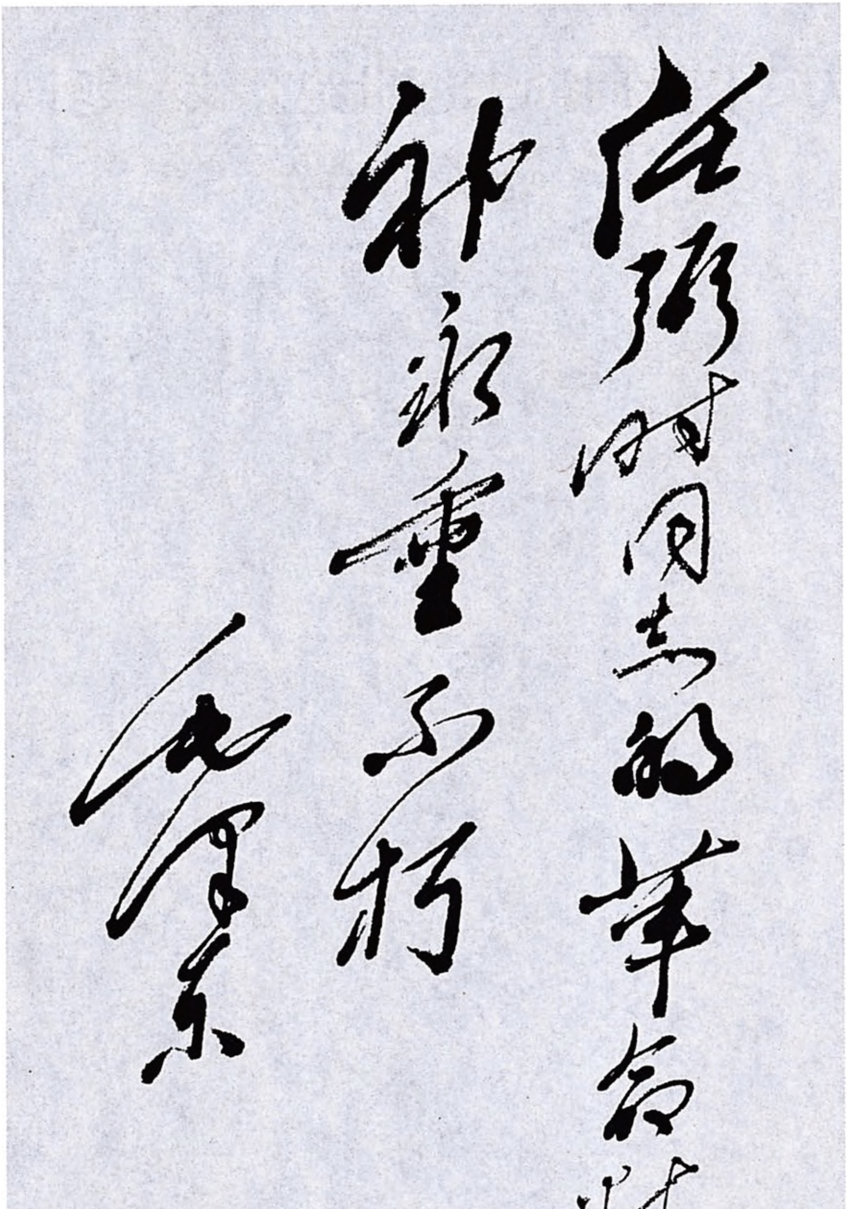
（1950年10月）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

---

[1] 195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任弼时同志在北京病逝。10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任弼时追悼大会，11月，出版了《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这是毛泽东为《纪念集》写的题词，并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



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毛泽东

毛泽东为《任弼时同志逝世纪念集》的题词。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1]

（1950年）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指示的团结朝鲜人民四项原则：

一、拥护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

二、严格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命令；

三、爱护朝鲜人民利益；

四、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缺点，增进团结。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的节录。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的第一阶段作战方针

（1950年10月）

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

以四十二军一部
迅占宁远德川孟山诸点

（1950年11月1日）

彭、邓[1]，并告高[2]：

请考虑以四十二军现至杏川洞[3]一带的一个师，迅速占领宁远、德川、孟山诸点，并以一个团前出至孟山以南，占领阳德、成川间铁路线，防止平壤、元山两方敌人的可能出援。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十九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杏川洞，位于慈江道熙川郡南部。

同意志愿军的作战部署[1]

（1950 年 11 月 1 日）

彭、邓，并告高[2]：

刚才收到你们十一月一日九时全军作战部署，甚好，甚慰。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二十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的电报。彭德怀等1950年11月1日9时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炮司和第一二五师首长并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等的电报中提出的志愿军作战部署。电报说：（一）清川江西之美伪军，以师（或团）为单位，分散于由龟城、定州迄球场、博川线上，造成对我各个分割包围歼灭敌人极有利之形势。（二）第六十六军以一部于龟城西钳制美第二十四师，另各以一部插到龟城、泰川公路上之南山洞一带，及龟城、定州公路上之云山桥一带，坚决彻底破路破桥，阻止敌之运输。军主力控制于适当地区，以便从敌侧后出击，围歼该敌。第三十九军1日黄昏攻歼云山之敌，得手后准备包围歼灭龙山洞、泰川之骑一师。第四十军主力1日晚包围宁边之敌，并组织攻歼之。得手后应向龙山洞、南灯洞挺进，切断敌退路，另留一部于云山东南上九洞防敌由云山逃窜。第三十八军迅速歼灭球场之敌后，以一个师沿清川江东岸向院里、军隅里攻进，而后积极钳制安州之敌，并阻击可能由顺川西援之敌。军主力渡清川江向博川挺进，断敌退路。第一二五师攻占德川后，师主力原地构筑

工事，坚决阻击由东由南来援之敌，以一部结合友军第七师向元山、顺川铁路线上积极活动。第四十二军主力，原地积极抓住当前之敌，并相机歼灭敌一部，以策应我西线作战。（三）伪军战力不强，已为近来数次战斗证明。美英军突击力更差，尤怕近战夜战和切断后路，只是飞机优势，对我阻力较大。因此，各军对运动中与立足未稳之敌，应发扬勇猛精神，迅速捕捉包围，敢于断敌后路，敢于逼近敌人，善于迅速组织短促猛烈火力兵力，猛攻敌人。各营均应组织轻重机枪，对俯冲敌机准确猛射，使敌之飞机炮火不能发扬威力，则胜利定有把握。望各军详细研究，周密布置，坚决执行，不怕牺牲。一切犹豫怀疑，应坚决反对，以致纪律制裁。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伪首都师和美二师动向及我之部署[1]

（1950年11月2日）

彭、邓：

（一）首都师主力仍在北青、城津[2]线及其以北，其十八团之第一营到咸兴西北之新兴里，请告四十二军注意。（二）美二师本（二）日从平壤及其以南地区向北移动，请告三十八军注意控制安州、军隅里[3]，阻止该敌北进，一二五师迅速以一部由德川向顺川、成川等处活动，威胁平壤。

军委

十一月二日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的电报。

[2] 城津，即今金策市，位于咸镜北道西南。

[3] 军隅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南部。

关于三十八军等部的作战部署

（1950年11月2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宋陶[3]先头二十七军主力（两个师及军部）照你们意见开辑安[4]，其一个师则依高岗同志建议迅开朔州从正面对付大安洞[5]之敌，保障后方交通线，俟任务完成后再开辑安归队。（二）请注意使用三十八军全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6]区域，构筑强固工事，置重点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及伪六、七、八师余部，并尽可能向南伸出直到平壤附近。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一二五师，则控制德川据点及顺川、元山间铁路线。我三十九军、四十军、六十六军及五十军主力，则担任逐步地各个地歼灭清川江以北以西之敌伪一师、美骑一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4] 辑安，旧县名，即今吉林集安。

[5] 大安洞，位于平安北道朔州郡南部。

[6] 军隅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南部。球场，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东部。

师[1]、美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等部。能于半个月内达成任务，即是很好的。以上请按情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十九时

---

[1] 美骑一师，即美军骑兵第一师，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虽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一师的番号。

全局关键在于隔断南北敌人联系歼灭美军第二师

（1950年11月2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各电均悉甚慰。全局关键在于我三十八军全军以猛速动作攻占军隅里[3]、价川[4]、安州、新安州一带，隔断南北敌人联系，并坚决歼灭北进的美军第二师，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

（二）伪八师全部及伪六师之十九团都在清川江北岸之胡沙洞、凤舞洞等处。只有伪七师在清川江以南之军隅里、松亭、价川等处。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二十二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军隅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南部。

[4] 价川，位于平安南道北部。

关于九兵团部署问题
致彭德怀、高岗[1]电

（1950年11月3日）

彭、高，并告宋、陶[2]：

（一）同意彭建议二十七军使用于新义州东北方向；

（二）九兵团其余两个军应位于沈阳附近休整待机。

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十五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宋，指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指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

关于发表北京大学教师联名给毛泽东的信的批语

（1950年11月3日）

乔木[1]：

此件[2]天津《进步日报》已发表，北京《人民日报》及《光明日报》似亦可以发表，请酌办。

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1950年10月北京大学教员曾昭抡等300多人联名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抗议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威胁中国的安全，表示决心贡献出最大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11月3日天津《进步日报》发表了这封信，11月4日北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了这封信。

注意各个歼灭可能向我举行反攻之敌

（1950年11月4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据伪总长四日十四时五十分令二军团称：“为适时地夺回德川、熙川，望第二军团担负此次攻击作战，并限五日十二时前提交新作战计划及攻击时间”等语。敌于收集各部略加整理后有向我军举行反攻之可能，请令我军各部注意，于其反攻时各个歼灭之，尤其注意德川方面。（二）目前敌各部甚混乱。美二师出动两个团，一在顺川以北，一在顺川布防，平壤空虚。美二十五师有一个野炮营在新安州，起掩护作用。请令我三十八军彻底击溃当面之敌，使其组织不成新防线。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二十二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给胡乔木[1]的信

（1950年11月4日）

乔木，并徐冰[2]同志：

此件[3]请乔木即印清样七份，印好后以四份分送毛、周、刘、朱，以三份交徐冰，请徐冰于今日下午再找李济深、黄炎培、罗隆基[4]三人一阅，取得同意，于今日下午七时以前退回我。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上午九时

---

[1]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 指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1950年11月4日关于全力拥护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4]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黄炎培，当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罗隆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宣传委员会主任。

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创造战场

（1950年11月5日）

彭，并告高：

（一）十一月四日十五时电[1]悉。同意你的部署，请你按当面情况酌量决定。（二）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元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2]、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目前是否能办到这一点，请依情况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一时

---

[1] 指1950年11月4日15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说：朝北反攻战役已结束。此次战役消灭敌人仅6至7个团，但对稳定朝北人心，使我军站稳脚，坚持继续作战，是有意义的。因消灭敌人不多，我军实力尚未完全暴露，美伪军还可能重新组织反攻。根据我军当前已很疲劳，粮弹运输困难，且冬寒将至等情况，我们拟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具体工作为：恢复疲劳，总结经验，继续动员，修宽公路，加强运输，储存粮弹，备雪深时支用。利用大山深沟荫蔽处，挖窑洞，打土坑，糊泥棚，解决居宿。准备一批必要干部和数营兵力，配合朝鲜人民军，组织几个支队，挺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内线要点上，构筑必要工事，如敌再进，让其深入后歼灭之。

[2] 球场，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东部。

三十八军应尽可能争取歼灭伪七师一两个团

（1950 年 11 月 5 日）

彭、邓[1]，并告高[2]：

（一）我三十八军对当前之敌伪七师部队似尚有机会歼灭其一二个团，请令该军尽可能争取之。（二）敌有可能乘我疲劳组织反攻一点亦请注意，令各部不要松懈。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上午三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目前不宜以联合司令部名义发表战报的电报

（1950年11月5日）

彭[1]，并告高[2]：

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话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战报起草后请发来看过，然后发表。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二时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九兵团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

（1950年11月5日）

彭、邓[1]，并告宋、陶[2]及高[3]：

（一）各电均悉，部署甚好。（二）江界、长津方面应确定由宋兵团[4]全力担任，以诱敌深入寻机各个歼敌为方针。尔后该兵团即由你处直接指挥，我们不遥制。九兵团之一个军应直开江界并速去长津。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二十二时

---

[1] 彭、邓，指彭德怀、邓华，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宋兵团，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

关于九兵团行动问题的批语

（1950年11月5日）

李涛[1]：

即以廿军开辑安江界待命。宋时轮[2]应去江界指挥。

廿七军暂在现地待命（南市〔洞〕、安东[3]一带）。二十六军及兵团部在抚顺一带休整。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

---

[1] 李涛，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

[2] 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安东，即今辽宁丹东市。

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三周年给苏联的贺电

（1950年1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斯大林元帅：

欣逢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三周年纪念，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谨向阁下及伟大的苏联人民致热烈的庆贺，并祝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日益发展，中苏两国人民在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亲密团结。

对出版志愿军报纸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50年11月6日）

报纸可以名为“志愿军”。标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批准出版字样。部队的番号采用代字。[2]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1950年11月6日请示报告的批语。

[2] 罗荣桓和萧华的请示报告说：志愿军政治部请示有关出版报纸问题，我们意见，为了更好保守军事秘密及不给敌人以可乘的借口起见，拟用朝鲜人民军所属某部名义出版（报头另加中文版三字）。所有部队番号均用代字，稿件内容一律经过慎重审查才刊登。

同意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部署[1]

（1950年11月9日）

彭、邓、朴，并告高：

（一）八日十五时电[2]悉。目前部署及下一步作战意图，均很好，请即照此稳步施行。（二）苏联汽车不久可到第一批，损车虽多，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的方针、部署等问题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的电报。

[2] 指1950年11月8日15时彭德怀、邓华、朴一禹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说：敌为牵制我主力，有沿清川江北进，配合其东线迂回江界的企图。我为以逸待劳，便于后方运输，拟仍以诱敌深入，各个歼击方针。西线部署为：以三十八军一个师沿清川江东岸节节抗击，引敌至妙香山地区，坚决扼守之；主力荫蔽集结于下杏洞、球场以东，德川以北之山地。四十二军主力掩护任务，待宋时轮兵团到后，靠一二五师集结德川东北、德岘、杏川洞、校馆里地区；待宋兵团打响后，协同三十八军主力由东北向西南出击，但不放松消灭伪军之一切机会。三十九军、四十军、六十六军主力位温井、云山、泰川、龟城地区，休息7天，搜索散兵，补充粮弹，修路。如敌不进，待宋兵团打响后调动敌人时，拟集中3个军出德川及其以南寻机歼敌，把战场推向前些，以利持久作战。现正准备修熙川经杏川洞至宁远的公路。此役缴汽车近500辆，大多数为敌机炸毁，所剩约十分之一二。从苏购车何时可到，盼示。

是可以补充的。以平均每天损车三十辆计，一个月损车九百辆，打一年仗也不过损车一万辆左右。并且损坏之车，有些可以修好，有些可以取回若干零件，又可缴获一部，故汽车是完全有办法的。（三）要修几条（不止一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后面各路均须修好修宽，请抓紧办理。（四）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共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请高贺[1]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粮弹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

毛泽东

十一月九日

---

[1] 高，指高岗。贺，指贺晋年，当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对暂时放弃攻打金门任务报告的批语[1]

（1950年11月11日）

同意，但在福建的三个军不能减少。[2]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0年11月11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在目前情况下，攻打金门的任务，似宜暂时放弃，以便集中人力、物力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如同意，则应明示华东解除明年攻打金门任务。同时，修建好5个机场妥为保护外，暂不增建。船只的修建亦暂时停止。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0年11月12日）

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并转所属省市区党委：

北京市委十一月十二日的报告[1]是正确的，你们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

中央

十一月十二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0年11月12日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情况给毛泽东、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本市抗美援朝运动的形势，群众的思想情况，以及已经萌发的偏向，提出把抗美援朝运动继续推向前进的四点意见：（一）首先应以肃清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影响，肃清部分群众中的崇美、恐美心理，孤立打击亲美分子为中心，不应强调动员群众参军，尤其不应勉强群众参军。（二）群众抗美援朝的具体行动，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应该以多数群众可能办到的事情来号召。例如，给前线志愿军部队写慰问信、寄慰问袋，慰劳军属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分担志愿军部队原来的工作，自愿捐款及参加战地各种服务工作等。（三）经过思想酝酿和扩大宣传，普遍号召工人高度发扬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努力生产节约；号召学生继续抗美宣传，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技术，准备为祖国服务；号召机关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做好工作；号召工商界积极贯彻政府政策，反对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在经济战线上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各阶层人民都须注意防特防谍，巩固革命秩序。（四）在郊区扩大抗美援朝运动。

必须精心组织歼灭美军陆战第一师

（1950年11月12日）

彭、邓、朴[1]：

美军陆战第一师战斗力据说是美军中最强的，我军以四个师围歼其两个团，似乎还不够，应有一个至两个师作预备队。九兵团的二十六军应靠近前线，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陶[2]完成任务。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与朝鲜同志商谈应注意方式[1]

（1950年11月12日）

德怀同志：

各电均悉。关于与朝鲜同志合作的各项意见都是适当的。商谈时请注意方式，采取委婉曲折的与温和的态度。并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即有些意见通不过，争论和分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要待打了很多的胜仗，中国同志的意见在事实上多次证明是正确的，那时才会被朝鲜同志所赞同和信服。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也是很自然的。此间拟向菲利波夫[2]同志有所建议，待有结果再告你。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给李漱清的信

（1950年11月12日）

漱清先生：

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1]，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日

---

[1] 李耿侯，李漱清的儿子。李贡侯（1906—1929），李漱清的儿子。1926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江西崇义县委宣传委员。1929年随红军大队行动时在江西崇义作战牺牲。李德深（1905—1928），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常宁水口山铅锌矿暴动。1928年随红军大队行动时在湖南耒阳作战牺牲。

朝鲜战局是可以转变的[1]

（1950年11月13日）

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1950年11月12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关于肃清广西匪患和增强广东兵力的电报

（1950年11月14日）

剑英、方方[1]同志，并告邓、谭[2]及张、莫、陈、李[3]：

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剑英前谈去广西帮助张莫陈李诸同志工作一时期，希望迅即前往，并在那里留住几个月，抓住工作重点限期肃清土匪，发动土改，端正政策，改善干部工作作风，确有成绩然后回来，否则不要回来。我们希望广西全省主要匪患六个月内能够肃

---

[1]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3] 张，指张云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莫，指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陈，指陈漫远，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指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

清，明年五月一日以前调出一个军去广东。剑英何日动身去广西望告。又广东必须在广大地区立即开始进行土改，拖延则是失策，亦望注意。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对《综合各方对朝鲜战争反映》电报稿的修改[1]

（1950 年 11 月 14 日）

一

总之，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志愿军入朝继续表示慌乱，毫无办法。

二

在英国大多数保守党、自由党及工党的报纸都不赞成与中国决裂，都主张慎重。

三

各新民主国家领袖和人民对中国志愿军抗美作战表示极为兴奋，我国的国际地位已因此举而大为提高，国内人心亦极为振奋，恐美空气大为低落，各方表示团结一致支持我英勇的人民志愿军。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综合各方对朝鲜战争反映》电报稿上加写的文字。

关于西南局综合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1950年11月15日）

一

小平同志：

十一月七日报告[1]阅悉，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按此施行。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二

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

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在这个报告里所提出的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你们注意研究，在你区有可采纳者则酌量采纳之。

中央

十一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1950年11月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

的综合报告。报告谈了西南局召集各区负责同志开会，传达和讨论中央会议关于形势、土改、武装建设、镇压反革命及保密等问题的指示的情况和意见。主要意见是：（一）应从战争作准备，积极支援朝鲜。先调三个军去，并把人员补足，第二批再调三个军去。除正规兵团充实编制外，立即开始扩大20万人的地方武装，以利巩固后方秩序和将来补充前线之需要。同时逐步地普遍地建立人民武装，数量最高不超过全县人口的5%。（二）加速土改步骤。12月起全区展开减租、反霸、退押运动，明年春耕结束后开始分田工作。准备明年2月前搞一土改实施细则，3月开始训练土改工作干部。（三）解决好民族杂居地区的减租、退押及土地问题。原则上应批准在这些地区进行土改，但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认真地实行了区域自治或成立了联合政府，第二，必须是少数民族人民（特别是彝族人民）大多数赞成并举手通过。在步骤上应坚持先汉后彝。原则上确定土改前对少数民族地主只减租，不退押，在少数民族中不提反霸。此外，还决定，广泛运用民族代表会议的形式团结、教育、争取少数民族和调解民族间的纠纷，在民族杂居地区的专署及县人民政府两级设立专署委员会及县人民政府委员会，吸收各少数民族各阶层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工作。

中央关于西南局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1]的批语和复电

（1950年11月15日）

一

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

我们认为西南局十一月十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特发给你们参照办理，并可转发给所属省市区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0年11月10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西南封建势力特别强大，而且又是蒋介石长期经营和最后失败的地方，匪特与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反革命活动一直很厉害。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从朝鲜仁川登陆以后，各地反革命的活动更为猖獗。由派遣和潜伏的匪特为领导，以反动的封建势力为基础，利用帮会流氓等，采取分散、隐蔽、小股活动、暴动等方式，从城市和农村、内地和边境，向我发动全面进攻。为此，拟定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计划是：（一）清理关押的人犯。对于罪大恶极当杀者要坚决处死，不得姑息犹豫。其他罪恶甚大者分别判处徒刑或关押。罪恶较轻者可在释放后加以妥善管制。（二）继续登记匪特。对于漏网的匪首、假自新的反动分子等应加以逮捕，及时予以杀、关、管的不同处理。（三）处决罪大恶极的恶霸。（四）处决一些烟犯和会门头子。（五）对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必须具体分析，讲究策略，区别对待，达到镇压反革命、瓦解分化敌人的目的。

党委作参考。

中央
十一月十五日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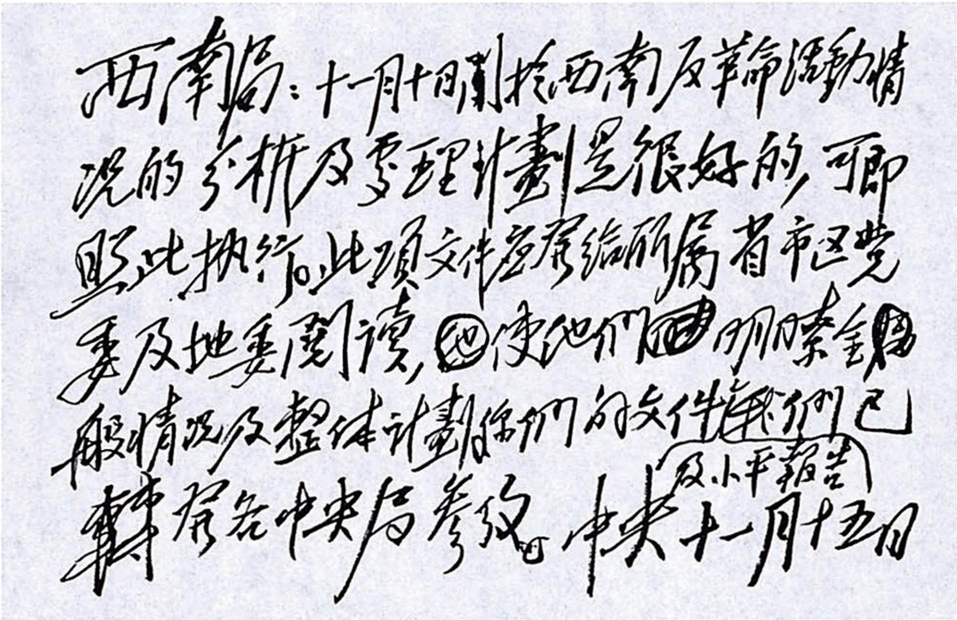
西南局：

十一月十日关于西南反革命活动情况的分析及处理计划是很好的，可即照此执行。此项文件应发给所属省市区党委及地委阅读，使他们明了全般情况及整体计划。你们的文件及小平报告[1]我们已转发各中央局参考。

中央
十一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1950年11月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综合报告。



西南局：十一月十日關於西南反革命活動情
况的分析及處理計劃是很好的，可即
照此執行。此項文件應發給所屬省市区党
委及地委閱讀，使他們明瞭全局一
般情况及整体計劃。你們的文件及小平報告我們已
轉發各中央局參考。中央十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西南局电的手稿。

关于转发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的电报

（1950年11月16日）

华南分局及广东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并告邓、谭、赵[1]：

兹将西南军区剿匪简报第四号转发给你们作参考。西南军区对于剿匪工作极为认真，剿匪中执行的各项政策亦是正确的，故取得了很大成绩。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则落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我提议广西军区从十二月份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总结战绩，纠正缺点，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如何，盼复。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

关于统筹两广对付美蒋进犯

（1950年11月17日）

剑英[1]同志，并告方方[2]及邓、谭[3]：

（一）你十一月廿一日动身去广西甚好。（二）广东必须迅速地和广泛地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你们布置如何盼告。（三）只要广东的土改完成，广西的土匪消灭，即使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四）你们必须统筹两广，将两广作为一个对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登陆进犯的统一的单位，不要只顾一省。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

[1]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3]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广东广西的工作安排和兵力部署

（1950年11月17日）

中南局、中南军区党委会，并告华南分局：

（一）军区党委会十一月十三日的报告收到了，各项计划及布置均很好，请即按此逐项坚决实施。（二）中南局关于广西工作的决议也是很好的，你们派陶铸[1]去广西帮助工作很有必要，陶铸是否已动身去了，如未应速去。我已电叶剑英[2]同志去广西帮助一时期，叶定十一月二十一日动身去，叶不宜离开广州过久，大概在广西住一个月左右即须东返，因此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三）为了对付敌人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必须准备使用五个至七个军。除广东现有三个军外，拟在五个月后从广西抽出一个军（位于梧州待机），使用陈明仁部[3]当作一个军，以上五个军确定用于广东。此外，准备于明年三月集中的第四十六第四十八两个军拟位于衡州[4]机动位置，依情况需要，可以使用于北方，也可以使用于广东。（四）为此必须用全力剿灭土匪，陈明仁部

---

[1] 陶铸，当时任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2]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陈明仁部，指由长沙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兵团司令员陈明仁。

[4] 衡州，即湖南衡阳。

应加紧训练一个月，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向广西出动参加剿匪，任务完成即开广东。陈明仁部到广西剿匪考验一次是很必要的。（五）广东修通几条主要公路很有必要，应立即办理，所需费用由政府开支。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加强华东军区领导做好剿匪工作

（1950年11月17日）

陈、饶[1]：

戍铣电悉。（一）你们决定加强华东军区的领导和集中进行工作，陈毅同志住南京主持军区工作，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亦逐渐将一部分支前机关分住南京，同时加强上海军事指挥，调王建安为司令，郭化若为政委，这些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即照此执行。（二）目前军事工作极为重要，除军队的整训，海空炮工各兵种的建设，公安部队地方部队与民兵的建设等项重要工作外，闽浙两省剿匪工作极为重要，特别是福建匪患必须使用四五个主力师用全力穷追猛打、限期肃清，该省剿匪成绩较他省为差，必须检讨原因。我提议从现在起，和广泛展开土地改革工作相配合（福建必须迅速实行土改），限六个月内剿灭一切成股土匪，责成叶飞、鼎丞[2]全力以赴，做出成绩。只要福建的土匪消灭，土改完成，即令蒋介石登陆进犯，也是容易对付的。（三）华东一切工作要以美国和蒋介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2] 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军区司令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鼎丞，即张鼎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军区政治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

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关于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报道的指示[1]

（1950年11月17日）

乔木：

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联在一起说，不应只提人民军而不提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如“新华社十五日讯”那样，这样的电讯发到前线和全国都没有好处。关于朝鲜消息，塔斯社的一些不关重要的电讯都不应转发，新华社应自己派人去采访发电，或在北京根据内部情报自己写电讯。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报纸应写社论鼓励志愿军。

《参考消息》上，无根据地乱安题目，帮助美国人恐吓中国人，也应加以整顿。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

只要多打几个胜仗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1950年11月18日）

彭、邓、朴[1]，并告高[2]：

（一）你们释放一批俘虏很对，应赶快放走，尔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二）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三）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及时补充兵力连续作战[1]

（1950年11月21日）

周[2]：

这是老报[3]，今天再看，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不是换班休整，而是有缺即补，连续作战。请加注意。十二月份，宋兵团[4]须补一批，估计五六千人，十三兵团也许还要补一点，估计四五千人，共约万人。明年一月起，大约每月须补一万一二千人。请按此筹划为要。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0天战情报告上写的批语。

[2] 周，指周恩来。

[3] 指1950年11月5日彭德怀和邓华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0天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军委和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电报中提出，为使各军能连续作战，建议军委将预定补充之兵员分批拨来，每一战役后立即补充，这样比轮番换班休整有利。

[4] 宋兵团，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

请电话询高岗[1]，对宋兵团所要求的棉帽、棉鞋、棉手套、棉大衣，是否已在前送，送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

---

[1] 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央关于北京市委镇压反革命活动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0年11月22日）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图为北京市民在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

一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

（一）关于执行中央在十月十日所发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有

几个中央局已有报告来，尚有几个中央局没有报告来，各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中有几处有报告来，大多数尚无报告。中央希望一切还没有做报告的中央局、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均于今年年底以前做一次专题报告，不要延误。（二）北京市委的报告[1]很好，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央

十一月廿二日

二

北京市委，并告华北局：

十一月十九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收到，内容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并望华北局转发华北各省委市委参照办理。

中央

十一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0年11月19日关于过去镇压反革命活动情形及今后计划的报告。报告概述了解放以来北京市用杀、关、管的办法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和成绩，总结了镇反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及打得又准、又稳、又狠的方针；采取适当步骤，分别主次先后，先搞特务，再搞反动党团，最后搞各种反动的封建势力；对特务则采取“先上后下，先大后小，先武后文，先行动后情报”的处理步骤。报告提出的今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计划，确定当前北京市镇反活动的重点是清理国民党特务案犯，处理外国间谍特务及反动会道门，并且分别拟定了判处反革命头子死刑的8条标准，以及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会道门的原则和政策界限。

必须做到土改与剿匪相结合[1]

（1950年11月22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广西省委，并告西南局，西北局：

在时局紧张的情况下，必须限期剿没股匪，加速进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和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我党我军方能取得主动，否则有陷入被动的危险。福建是和两广同样解放较晚，土匪甚多而尚未肃清的省份，过去福建省委认为今冬明春不能大规模地进行土改，现在他们接受了中央及华东局的意见，决定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地委书记及军分区司令会议，重新布置工作，将土改与剿匪相结合，扩大土改县数至三十六个县。此种计划很值得广东广西两省仿行，请邓谭、叶方、张莫[2]诸同志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转发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剿匪和土改工作报告时写的批语。

[2] 邓谭，指邓子恢、谭政，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和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叶方，指叶剑英、方方，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张莫，指张云逸、莫文骅，当时分别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

加紧准备防空战胜敌人可能的空袭[1]

（1950年11月22日）

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及军区：

据华南情报局十一月十九日息：“美帝近将派二千余空军人员赴台湾，图假蒋匪名义轰炸大陆。闻台匪现正为此批人员赶修房屋及进行其他准备工作”等情。这是完全可能的，你们应即加紧准备防空，特别是沪、宁、杭、榕、厦、穗、汕、青、济、京、津等处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的空袭，切勿麻痹疏忽，是为至要。

中央军委

十一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和各大军区等的电报。

出国作战部队应加强同美军作战的思想准备[1]

（1950年11月22日）

十九兵团党委，并告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军区：

（一）据志愿军司令部十一月二十一日电称，“调来参加出国作战任务的部队，有不少事前缺乏思想准备与必需的物资器材准备。如高射炮十四团，由关内只带来四十几辆汽车，最近调来五个高射炮营，每营只十八辆汽车又大部需要修理，思想无准备，冬装也未发，九兵团及六十六军，也有同样情况，这对作战是有影响的。请对于将开到东北参加出国作战之部队，先将东北、朝鲜气候及兵要情况、作战情况简要介绍，使其在思想上、物质上先有所准备，以免临时仓促”等语。你们应在十九兵团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要有同美国人作战的高度的思想准备，要准备克服各项可能的困难，只要能如此，美国人是可以战胜的，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至于装备等项，待你们到达山东后当为你们解决。（二）各军区，特别是华东、华北、华南，同样须对部队进行打美国人的教育，提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第十九兵团党委并告各大军区的电报。

斗志，准备随时打击侵略者。

中央军委

十一月二十二日

给郭耿光[1]的信

（1950年11月22日）

耿光先生：

惠书敬悉，甚感盛意。工作问题，以就近和熟悉先生情况之人筹商解决，较为适宜。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

[1] 郭耿光（1880—1956），湖南韶山市韶山乡朝阳村人，律师。当时在湖南湘潭城内居住。大革命时期曾对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表示同情。

给胡乔木[1]的信

（1950年11月22日）

乔木同志：

请你负责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指示，纠正写电报的缺点，例如：不要用子丑寅卯、东冬江支等字代替月、日[2]，要写完全的月、日，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署名一般要用完全的姓名，不要只写姓不写名，只在看报的人完全明了其人者允许写姓不写名，例如刘邓，陈饶等；地名、机关名一般必须写完全，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允用京津沪汉等省称；还有文字结构必须学会合乎文法，禁止省略主词、宾词及其他必要的名词，形容词和副词要能区别其性质等等。请你为主，起草一个初稿，再邀杨尚昆、李涛、齐燕铭、薛暮桥及其他你认为有必要邀请的同志开会一次或两次，加以修改充实，然后送交我阅。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子丑寅卯，是地支的第一至第四位。东冬江支，是诗韵上平声第一至第四韵的韵目。旧时拍发电报习惯用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依次代表一年的12个月份，用诗韵韵目中的“东冬江支”等依次代表每月的各日。

关于发布剿匪通报问题致中南、华东、西南军区电

（1950年11月23日）

中南军区，华东军区，西南军区：

（一）中南剿匪通报第二号[1]收到，甚好。（二）你们三大军区各有土匪若干万均待限期剿绝，建议华东军区仿照西南、中南两军区办法，每月发布一次内部的剿匪通报。你们三大军区的剿匪通报，除发给所属各省各军及我们外，同时发给其他两大军区以资观摩比较。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剿匪通报第二号，主要讲湖南军区部队于10月中旬重点进剿湘西南的靖县、绥宁及雪峰山地区的土匪，另以一部并湖北一个团配合西南军区酉阳军分区会剿川湘鄂边龙山地区土匪，至11月上旬止，经一个月进剿已基本上告一段落。

致彭德怀、邓华、洪学智电[1]

（1950年11月23日）

彭、邓、洪：

二十一日十八时、二十二日十二时两电均悉。我们对作战有如下建议，请考虑：（一）截至此时止，伪七、八师已进抵德川、宁远线，并向北继续推进，伪六师三个团亦由价川地区东移北仓里、假仓里。确息，美敌二师一部已接伪六师价川地区防务，美骑一师、二十四师、英二十七旅及伪一师均已进至球场、龙山洞、博川之线。（二）我在清川江东岸发起攻击后，应估计到美二师、骑一师向东增援的极大可能性（当然也有继续北进或原地停止及退据清川江桥头阵地的几种可能）。（三）根据这种情况判断，我三十九、四十两军在美二师、骑一师东援或据守桥头阵地的情况下，均难达成配合四十二军、三十八军歼敌伪七、八两师之目的，因而可能影响到下步的作战，也将因四十二军、三十八军所形成的迂回突击力量不够，使战局难以发展。（四）因此，建议以四十军东进与三十八军靠拢，增强我军左翼的突击力量，而以四十二军三个师全部首先歼灭宁远地区之伪八师，然后向孟山、北仓里进击伪六师，以三十八军全力首先歼灭德川地区之伪七师，以四十军对付球场、院里方面可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和副司令员洪学智的电报。

能向东增援之美二师和骑一师，以保证我三十八军、四十二军首先歼灭伪七、八两师，并对下一步对美敌作战造成战役迂回的有利条件。（五）如果四十军东移，则同时应令三十九军、六十六军、五十军向前推进至适当地区牵制美二师、美二十四师等东援。如四十军东移来不及时，则请令三十九军、四十军各以一个师积极行动，从正面抓住敌人，阻其东援。待歼敌伪二军团的作战得手后，配合主力共歼美敌。（六）如人民军第五军及四、七两师尚在宁边附近时，最好能照原计划向南出动，保障我四十二军左侧。（七）此外，东线九兵团歼美敌陆一师五、七两团的部署中，仅以一个师（六十师）迂回至黄草岭线，亦嫌不足，因为该师须同时担负阻敌（美陆一师之十一团）北援任务，亦请设法加强，以利歼敌（原在社仓里之人民军二、五两师如尚在原地时，亦望能令其向黑水里方面进击，以保证我向黄草岭迂回部队的侧翼安全）。（八）以上各项，是否可行，请按情况酌定。如因时间仓卒，可将战役发起时间推迟一两天。

军委

二十三日二十一时

准备随时扑灭空降敌人

（1950年11月24日）

彭、邓、朴、洪[1]，并告高、贺[2]：

（一）你们本日七时的作战部署[3]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2] 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 1950年11月24日7时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和洪学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并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中提出的作战部署是：一、以三十八军、四十二军围歼德川、宁远、孟山地区之敌。四十军插入德川、军隅里之间，首先歼灭伪二军团，对清川江西之敌分别钳制之。二、你们应以一个师于26日晚围歼社仓里、黑水里之伪二十六团，得手后即向黄草岭以南之上下通攻击前进，确实占领该线，阻击北援之敌；另以一个师由仓里向黄草岭、堡后庄攻击前进，歼灭美陆一师师指，得手后向古土水攻击前进，协同主力围歼古土水、柳潭里地区之美五、七两团全部。三、提议二十六军向图上之长津及其以东集结，准备围歼可能西援之美七师，并准备向利民洞、丰山一带美军进攻。

边移动，请注意扑灭。（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二时半

集中四个军歼灭美军三个师的主力

（1950年11月28日）

彭、邓、朴、洪[1]，并告高、贺，宋、陶[2]：

（一）庆祝你们歼灭伪二军团主力的大胜利。（二）目前任务是集中我四十二军、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歼灭美骑一师[3]、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三个师的主力。只要这三个师的主力歼灭了，整个局势就很有利了。（三）美骑一师（两个团）正向德川、顺川、成川之间调动，目的在巩固成川、顺川地区阻我南进。我四十二军应独力担任歼灭该敌。（四）美九军团指挥之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在球场、院里、军隅[4]、价川一带，我三十八军、四十军、三十九军应担任攻歼该敌。这是很重要的一仗，望令各军努力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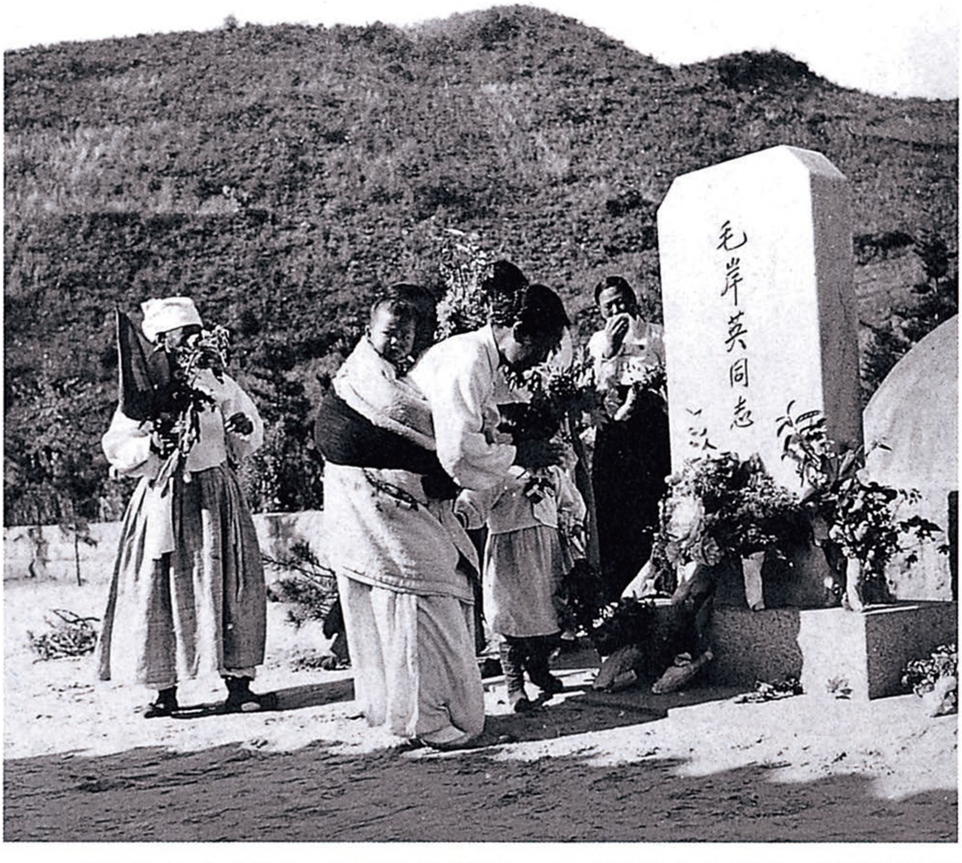
[2] 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3] 美骑一师，即美军骑兵第一师，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虽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一师的番号。

[4] 球场，位于平安北道宁边郡东部。院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北部。军隅，即军隅里，位于平安南道价川郡南部。

执行之。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八日五时半



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不幸牺牲，毛泽东从大局出发，将其遗体留在朝鲜。图为朝鲜人民在毛岸英墓前致哀。

关于鼓励士气争取大胜致彭德怀等电

（1950年11月28日）

彭、邓、朴、洪，并告宋、陶[1]，高、贺：

你们十一月廿八日午时给西线各军电及同日十五时给九兵团电均是很正确的。此次是我军大举歼敌根本解决朝鲜问题的极好时机，西线争取歼灭五个美英师及四个南〔朝〕鲜师，东线争取歼灭两个美国师及一个南〔朝〕鲜师，是完全可能的。整个战役准备打廿天左右，分为许多个大小作战，中间包括几次小休整，每次少者一天二天，多者三天四天，整顿队势，接着再打，这样就全体说来，牺牲反会比较少一些，比较更节省些。望你们鼓励士气，争取大胜。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廿四时

---

[1] 宋，指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指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

中央转发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0年11月30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兹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毛主席关于处理群众来信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我们同意报告中所提意见[1]，请你们对群众来信认真负责，加以处理，满足群众的要求。对此问题采取忽视态度的机关和个人，应改正此种不正确态度。望加检讨，并盼电复。

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报告中提出的加强对群众来信处理工作的组织领导的意见。报告指出，各中央局、省委、地委设立处理信件的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并建立起登记、研究、转办、检查、留案等必要的制度，是今后把这项工作做得更认真周到的关键所在。

利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

（1950年11月30日）

彭、邓、朴、洪[1]，并告高、贺，宋、陶[2]：

（一）请不要提出过冬休息的口号，只在两个战役之间作必要的休息整训。此种整训只要情况许可，在一个大战役之后，可以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情况许可则延长，不许可则缩短。部队整训宜在前线适当地点实施。打残破了的部队，可以在较安全的地点，但以在鸭绿江以南朝鲜境内由各军军部直接掌握和监督为有利。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二）此次作战规模很大，东西两线各军伤亡可能超过四万人，请高岗同志加速对新兵的征集训练工作，争取于十二月中旬有几万人补入部队。新兵征训情形望告。

毛泽东

十一月三十日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2] 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1950年11月）

颜斶齐王各命前[1]，
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
正和前线捷音[2]联，
妙香山[3]上战旗妍。

---

[1] 颜斶齐王各命前，颜斶，战国时齐国人。《战国策·齐策四》称，齐宣王召见颜斶，说："斶前！"斶也说："王前！"齐宣王不高兴。斶说："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与其）使斶为趋势（一作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这是比喻蒋介石要柳亚子听他的反革命主张，柳亚子要蒋介石听他的革命主张。

[2] 前线捷音，指抗美援朝战争传来捷报。

[3] 妙香山，在朝鲜西北部。

附：柳亚子原词

浣溪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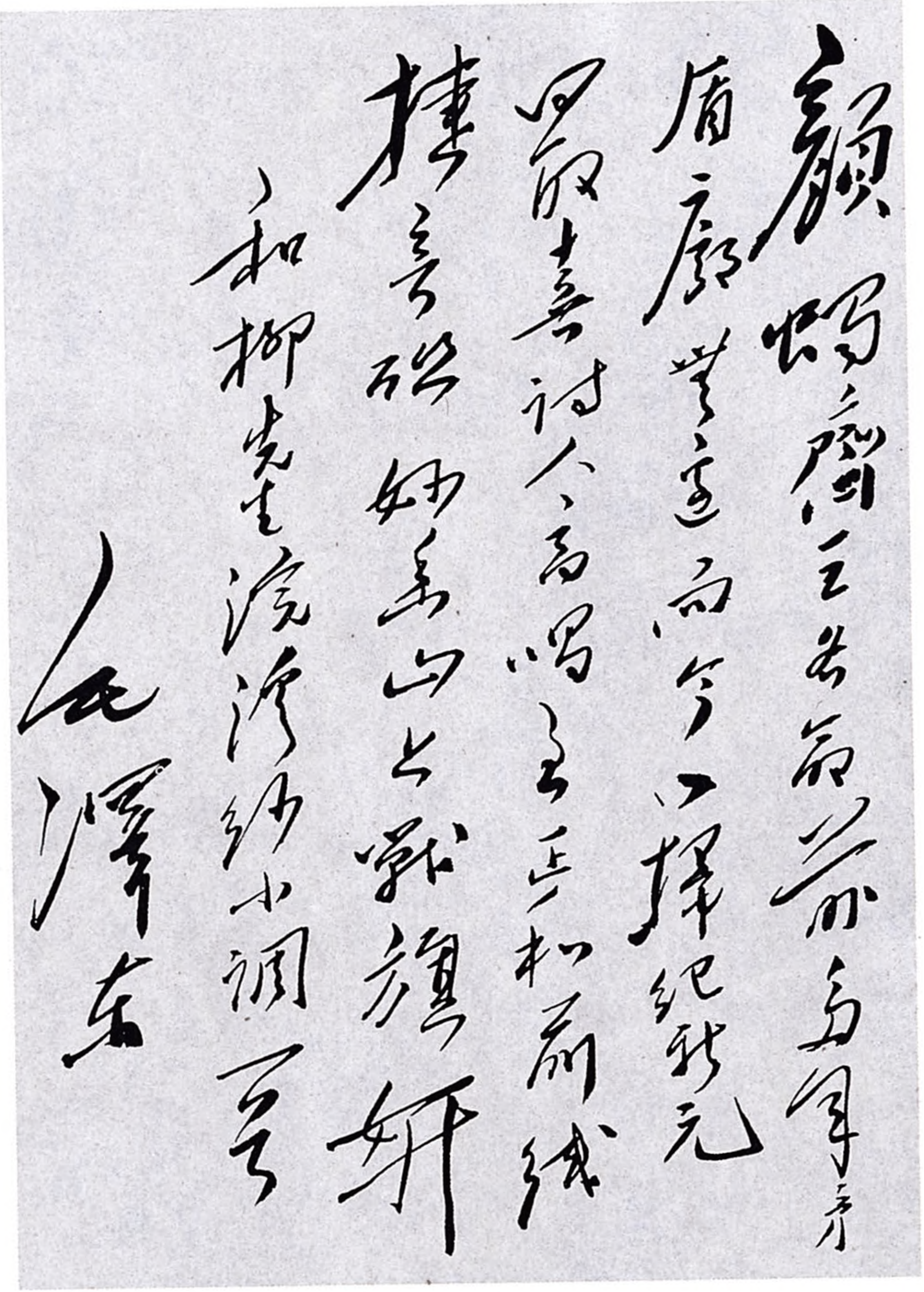
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演出《和平鸽》舞剧，欧阳予倩编剧，戴爱莲女士导演兼饰主角，四夕至五夕[1]，连续在怀仁堂奏技。再成短调，欣赏赞美之不尽矣！

白鸽连翩奋舞前。
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2]，
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

[1] 四夕至五夕，根据柳亚子的《北行日记》，这是指1950年10月4日晚和5日晚。柳亚子在这两个晚上曾接连在怀仁堂观看了《和平鸽》舞剧。

[2] 战贩集团仇美帝，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就竭力煽动新的世界战争，从而使他们的军火商得利，被称为战贩集团。1950年10月美国纠集十五国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侵入朝鲜北部，威胁中国东北，战争气焰极为猖獗。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发起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的宣传运动。本句的“战贩集团”和“美帝”同是“仇”的宾语（主语“我们”省略），跟下句的句式相同。



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
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
捷音联妙香山上战旗妍
和柳先生浣溪纱小调
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

为全军保卫工作会议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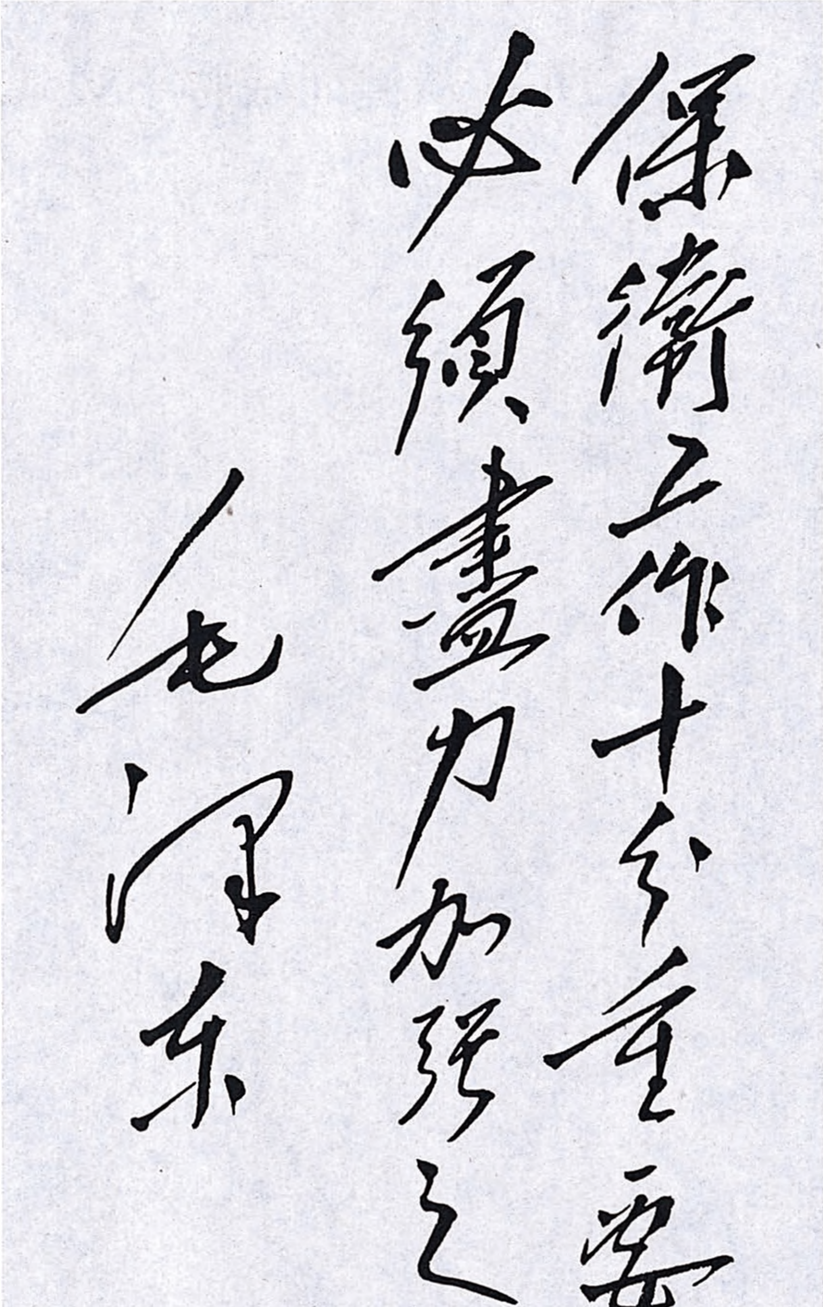
（1950年11月）

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毛泽东

---

[1] 195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毛泽东为这次会议写的题词。



保衛工作十分重要必須盡力加强之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全军保卫工作会议的题词。

四十二军应从侧面威胁平壤

（1950 年 12 月 1 日）

彭、邓、朴、洪并宋、覃[1]：

（一）伪二军团向三登[2]集中，美二十四师由平壤开三登一带，伪一师现到肃川，有开顺川、慈山[3]讯，美骑一师[4]在顺川、慈山并未过大同江。因此我四十二军亦不应过大同江，而应在大同江以东向成川、三登一带寻伪二军团残部及美二十五师作战，从侧面威胁平壤。请酌定。（二）美七师主力及伪三师一个团由惠山西犯，企图切断我厚昌、长津间补给线，请宋、覃令在厚昌之一个师向东迎阻该敌，务使该敌不能西进。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十二时

---

[1] 宋、覃，指宋时轮、覃健，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三登，位于平安南道江东郡南部。

[3] 慈山，位于平安南道顺川郡南部。

[4] 美骑一师，即美军骑兵第一师，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虽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一师的番号。

坚决站在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

（1950年12月2日）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先生，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先生、朱继圣先生，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四万二千九百八十九位爱国同胞们：

你们在十一月三十日给我的电报[1]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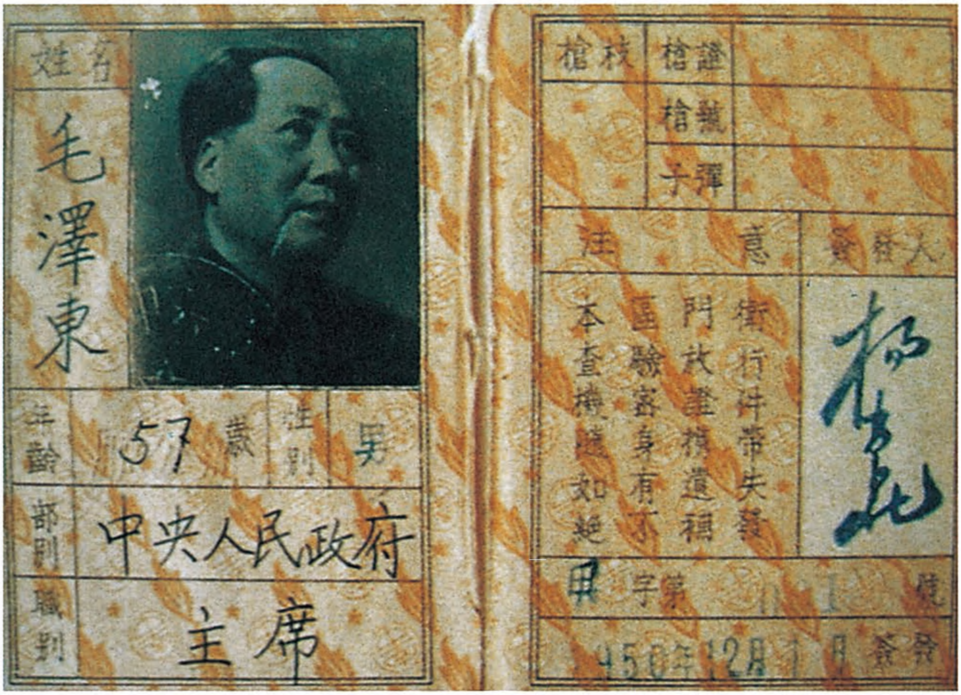
---

[1] 指1950年11月30日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给毛泽东的电报。

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日



姓名　毛澤東

年齡　57歲　性別　男

部別　中央人民政府

職別　主席

槍枝　槍證
槍號
子彈

注意

本區門衛
查驗執行
攜[illegible]准許
隨身攜帶
如有遺失
絕不補發

簽發人

甲字第[illegible]號

1950年12月1日簽發

毛泽东的持枪证。

增强南北阻援阻止敌人突围[1]

（1950年12月2日）

彭、邓、洪，并告宋、陶[2]：

伪一军团指挥部正向咸兴移动，首都师亦正准备车辆，估计亦向咸兴移动，美七师主力行动不明。可能伪一军团两个师（伪首都师、伪三师）全部将向陆一师方面增援。我二十六军主力应继续南下，位于适当地点，以便打援。望宋陶注意争取于今明两晚基本上解决被我包围之陆一师等部为最有利。在未解决战斗前，望切实注意增强黄草岭南北之阻援与阻止突围之力量。

毛泽东
二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和副司令员洪学智的电报。

[2] 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

西线各主力应准备继续作战[1]

（1950年12月2日）

彭、邓、朴、洪、解，并告高、贺[2]：

一日电[3]悉。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之敌确已退至肃川以南，则我西线各主力军应在肃川、顺川之线以北地区调整位置，休息四天至五天，整顿队势，补充粮弹，准备继续作战，配合东线，扩大战果。如果安州、新安州一带尚有敌人，则应待歼灭该敌后，再作调整。我四十二军则应待歼灭新仓里之敌后，再行停止。大约再看一两天，再下调整令为宜。

军委

十二月二日五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和朴一禹、副司令员洪学智、参谋长解方的电报。

[2] 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 指1950年12月1日彭德怀、邓华、朴一禹、洪学智和解方给中共中央军委、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电报说：根据敌退集平壤部署，拟于肃川南北线侧击溃敌时机已失去，着各军停止战役追击，各军照1日12时电令位置休息两至三天，整理组织，严密侦察警戒，打扫战场，准备继续作战，配合东线，扩大战果。

二十六军南下作战
九兵团准备打增援之敌[1]

（1950年12月2日）

彭、邓，并宋、覃[2]：

（一）庆祝我九兵团的两次歼敌大胜利。（二）据新华社驻通化记者报告，三十日下午，侵占惠山镇之敌军搬运物资，有撤退模样，惠山镇以西之新架坡镇敌军已于三十日午后撤退，敌军侵入惠山镇兵力约二千五百人等语。美七师似已从惠山镇撤退。我二十六军驻厚昌之一个师，除留一部仍驻该地向东警戒外，主力可以南下作战。（三）我九兵团除应加紧歼灭被围之敌外，并应准备与必然增援之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三师一部作战。

军委

十二月二日二十四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等的电报。

[2] 宋、覃，指宋时轮、覃健，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主力宜在顺川肃川线作战

（1950年12月2日）

彭、邓、朴、洪，并告高：

在调整部署，休息数天，并弄清敌人部署后，请考虑以四个至五个军攻击顺川、肃川线，以必要兵力突破并伸入该线以南钳制大部敌人，集中主力歼灭顺川、慈山[1]地区之一个美国师（现在是骑一师[2]），夺取顺川、肃川一线及其以南一块地区，然后在该线以南构筑防御阵地，以一部兵力（一个军左右）防守之，主力便可移至平壤、元山间作战。为此目的，六十六军似应在此战结束后才能东移。四十二军则可于休息数天后即向平壤以东三登[3]一带寻求小股敌军作战。以上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

[1] 慈山，位于平安南道顺川郡南部。

[2] 骑一师，即美军骑兵第一师，建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虽已改编为机械化部队，仍保留了骑兵第一师的番号。

[3] 三登，位于平安南道江东郡南部。

给黄念田[1]的信

（1950年12月2日）

念田先生：

惠书并承赠黄季刚[2]先生所为词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极为感谢，先生努力进修，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甚为佩慰。尚希不断努力，日进有功，是所企望。此复，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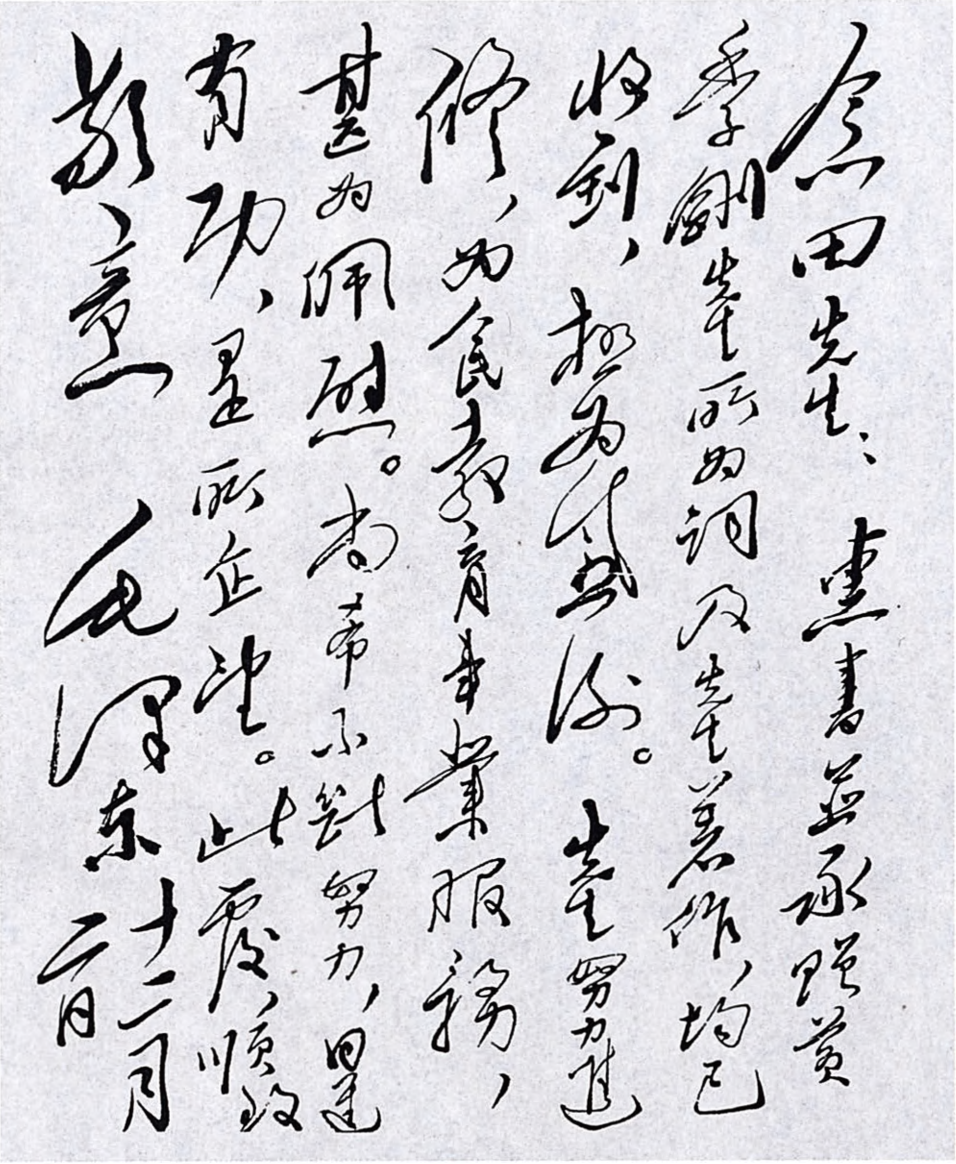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

[1] 黄念田，黄季刚之子，当时是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2] 黄季刚，即黄侃，音韵训诂学家和文学家。



念田先生：

惠书并承赠黄季刚先生所为词及先生著作，均已收到，极为感谢。先生努力进修，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甚为佩慰。尚希不断努力，日进有功，是所企望。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

毛泽东致黄念田信的手稿。

关于改变一九五一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的指示[1]

（1950年12月3日）

军委曾于本年八月一日颁布指示[2]，自一九五一年开始，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特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

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

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百分之八十，军事百分之十，政治百分之十。

丙、某些起义部队：须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百分之六十，军事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

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的指示。

[2] 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1950年8月1日发布的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

围而不歼诱敌来援

（1950年12月3日）

彭、邓、朴，宋、陶、覃[1]，并告高、贺[2]：

我九兵团数日作战，已取得很大胜利，不但在下碣隅里[3]地区将陆战第一团及其他数部增援队基本歼灭，而且在新兴里地区将美七师一个多团完全消灭。敌方在数日内可能增援的部队，只有两个李承晚师和美七师一个多团。如我军能将这些增援队各个歼灭，在朝鲜战局上将起很大变化。因此，（一）请宋覃考虑，将二十六军迅速南调，执行打援任务。（二）对柳潭里[4]地区之敌，除歼灭其一部外，暂时保留一大部，围而不歼，让其日夜呼援，这样便可吸引援敌一定到来，使我有援可打。如果柳潭里地区之敌被我过早歼灭则援敌一定不来了，他们将集中咸兴一带，阻我南进，对我下一次作战不利。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宋覃就当面情况统筹决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宋、陶、覃，指宋时轮、陶勇、覃健，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2] 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3] 下碣隅里，位于咸镜南道长津郡南部。

[4] 柳潭里，位于咸镜南道长津郡西部。

定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上午一时

为了解就地取给粮草等情况致彭德怀、高岗[1]电

（1950年12月3日）

德怀、高岗二同志：

（一）我军粮食草料就地取给（事后如数偿还）是否确有把握；（二）大同江现在是否结冰，何时结冰，能否在冰上通过人马车辆。以上二项，请彭查明电告。（三）由新安州、满浦两点通到平壤的两条铁路，是否已在抢修，何时可以修好，用两条铁路运送全部军用物资至平壤区域，是否充分可能。此点，请高查明电告。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十七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战争应从最坏方面着想[1]

（1950年12月3日）

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敌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是不可靠的，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

[1] 这是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1950年12月3日在北京会谈的谈话要点的一部分。中共中央1950年12月4日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通报了这次谈话要点。

应迅速控制飞机场不使被围美军撤走

（1950年12月4日）

彭、邓、朴，宋、陶、覃[1]：

（一）伪首、伪三两师因火车甚少其主力由步行撤退，何时到咸兴尚难定。敌已下令由下碣隅里[2]以飞机撤走被围之美军五、七两团，望宋陶覃迅速控制下碣隅里飞机场不使敌军撤走，并对五、七两团之南退部队予以歼灭，只留下其在柳潭里[3]地区之固守部队围而不歼，以利钓鱼。（二）请宋陶覃将黄草岭、古土水、下碣隅里、团水里至柳潭里一带详细敌我情况，防敌飞走部署及打援部署电告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十三时

---

[1] 彭、邓、朴，指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宋、陶、覃，指宋时轮，陶勇，覃健。

[2] 下碣隅里，位于咸镜南道长津郡南部。

[3] 柳潭里，位于咸镜南道长津郡西部。

如平壤敌撤退则志愿军向三八线攻进[1]

（1950年12月4日）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宋、陶：

（一）平壤敌似正准备撤退。（二）请派出几个有力侦察队附电台迫近镇南浦、平壤、三登之线进行威力侦察，观察情况，并增加敌人恐慌。该敌现在一夕数惊，极为恐慌。（三）请指定人民军一个三千至五千人的师及党政人员位于接近平壤地点，准备于查明敌人确已撤退时进平壤维持秩序。（四）我志愿军休息五天后，如平壤敌未退则准备先打平壤附近之敌，然后包围平壤，研究攻城办法。如平壤敌已退，则向三八线攻进。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副司令员洪学智的电报。

相机占领平壤

（1950年12月4日）

彭、邓、朴、洪[1]，并告高、贺[2]：

大体上可以确定平壤敌人正在撤退，其主力似已撤到平壤至三八线之间，其后卫似尚在平壤以北及东北地区。你们应于明（五）日派一个师或一个师的主力，向平壤前进，相机占领平壤。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二十三时半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2] 高、贺，指高岗、贺晋年，当时分别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对全军立功奖励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50年12月4日）

照办。[2]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和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0年11月5日报告的批语。

[2] 罗荣桓、赖传珠等的报告说：部队立功运动已开展很久，对战斗、工作、学习、生产等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全军范围内对立功与英雄、模范称号，尚无统一标准，亦无统一的奖励办法。为了适应部队正规化，激发部队人员在各种工作任务中之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立功运动更趋普及和提高，统一全军立功标准与奖励办法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经我们考虑后，综合作以下几点意见：（一）统一全军立功之标准拟分为四等（即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并根据平时与战时各种不同情况与任务拟定具体条件。（二）统一全军英雄与模范称号之标准拟分为三等（即一等、二等、三等），其标准主要是立功中比较突出典型人物，亦拟定具体条件。单位亦可开展立功创模运动，但其等级则不必区分过多，可根据其在战斗和各种工作中所起作用之具体情况加以区别。（三）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必须与行政

上之考核批准相结合，一般应以团以下的个人与单位为限，至于师以上的干部与单位立功一般应由行政上考核评定。(四) 为适应立功运动需要，统一奖励的方法，在中央人民政府未颁发全国性的勋章、奖章前，拟以军委名义先制发“战功”和“荣誉”奖章两种（并各分三等)，奖给在战时与平时立有各种不同等次功绩之人员。另拟定英雄纪念章与模范纪念章两种（亦各分三等)，奖给荣获各级英雄与模范称号者。至于单位奖励则可用奖状、奖旗、荣誉称号等形式。(五) 立功与奖励的具体业务分工：凡有关立功问题的组织动员、宣传教育等由各级政治机关负责；凡有关奖章与英模纪念章的颁发、审查、登记等由各级干部管理部门负责；凡属单位的奖励，则由各级军务部门负主要责任。

解放平壤的两则电讯[1]和播发此讯的批语

（1950年12月4日、5日、6日）

一

【新华社四日讯】本社记者从朝鲜战场发来的消息：在朝鲜人民军与我国人民志愿军大举反攻的情况下，美国侵略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李承晚[2]匪军的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等部，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各该部残敌，均向南面狂奔逃命。在此次作战中受打击较少的美侵略军骑兵第一师、步兵第二十四师，英澳第二十七旅及李承晚匪军的第一师等部，则交番掩护，节节南逃。英勇的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全线追击，业已占领安州、新安州、价川、肃川、顺川、成川、江东等城。东线方面，被朝鲜人民军及我国人民志愿军在咸兴北面长津湖一带地区所切断和包围的美侵略军陆战第一师、步兵第七师两个师的主力，已被歼灭一大部分，残敌继续被歼击中。又咸兴向北面增援的敌军，已被数次击溃，并受到了歼灭性的打击。侵占城津、清津及鸭绿江边惠山

---

[1] 这两则电讯是毛泽东起草的。

[2]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镇等处的美侵略军步兵第七师一个团及李承晚匪军的首都师、第三师等部，正在慌忙地向咸兴、元山方向逃窜。东西两线敌军，恐慌万状，急于逃命。平壤城内之敌，正在罪恶地屠杀人民，焚毁物资及该城发电设备，大火弥漫平壤城。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正向平壤方向攻进中。

二

乔木：

此件请即刻广播，并于五日见报。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一时

三

【新华社六日讯】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报道：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本日解放平壤。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略军以及李承晚匪军残部，向平壤以南溃退。朝鲜人民军和我国人民志愿军的正规部队，于十二月六日下午二时进入平壤城。

四

乔木：

即刻发广播，明（七）日见报。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

同意东西两线作战部署

（1950年12月5日）

彭、宋[1]，并告高[2]：

（一）彭十二月四日二十四时电[3]所述战役部署甚好，望即照此执行。十二月四日十八时电所述经验总结，亦是很好的。此次西线

---

[1] 彭、宋，指彭德怀、宋时轮，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2月4日24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并高岗、宋时轮、邓华、韩先楚的电报。电报说：东西两战场敌受严重打击，有退平壤、元山线构筑新防线可能，亦有退守三八线旧防线可能。本晚派3个师，一向顺川，一向肃川，一向成川以南推进威胁平壤，试探敌企图。如敌守平壤，拟一个军附人民军一至两个师（待商决）由北而南佯攻平壤，集中5个军首先消灭成川、江东、三登、遂安、谷山、新溪地区之敌。在攻击三登、江东之敌得手后，即以一个军控制江东，保障主力南进后路侧翼之安全，主力南进威胁汉城时，可能调动平壤之敌南撤，乘敌南撤在运动中追击侧击，4个军位置遂按地区机动作战。以人民军第五军团方虎山部队攻占阳德（敌约一个营）后，活动于元山、咸兴（请与金日成商决）间，吸引东北线之敌南退。宋兵团歼击被围之敌后，相机进占咸兴，如敌暂以重兵据守时，以一个军位于咸兴以北，主力进至社仓里东南及校馆里以南地区。我西线主力围攻平壤或南越三八线威胁汉城时，咸兴之敌可能南撤，乘其移动时寻机歼击。如敌放弃平壤、元山线时，我即追越三八线，相机进攻汉城。

歼敌二万余，是一个大胜利。金日成已回朝鲜，关于方虎山部队[1]的使用问题，请直接向金提出。（二）宋陶覃[2]十二月四日二十二时五分电[3]部署意见很好，望即执行。除歼灭被围之敌及准备打援外，如能以一个军的主力再歼灭社仓里[4]地区美三师的两个团，则意义极大。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七时

---

[1] 方虎山部队，指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军团长方虎山。

[2] 宋，指宋时轮。陶覃，指陶勇、覃健，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和参谋长。

[3] 指1950年12月4日22时5分宋时轮、陶勇、覃健给志愿军司令部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等的电报。电报说：二十六军现正接替二十军，担任攻击下碣隅里之任务。拟明晚发起战斗。二十军将下碣隅里攻击任务交待后，其五十八、六十师主力即进入黄草岭及以南地带，准备打击北援之敌。八十九师主力即进到隐峰里、上下通地带（五老里西北）。五十九师今晚仍参加对柳潭里南逃敌之作战。二十七军大部今晚正与柳潭里逃敌作战中。

[4] 社仓里，位于平安南道宁远郡东北。

关于目前只宜强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批语

（1950年12月5日）

安子文[1]同志：

（一）此件[2]决定不发，前已向你谈过，现检出还你。

（二）目前时期（一九五〇年）只宜强调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宜同时强调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免分散注意力。此种方针，大约要到一九五一年或更迟一些，才能改变。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可能指安子文1949年7月26日关于各地区贯彻中共中央1948年9月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决定的情况向毛泽东的报告。

关于志愿军西线主力行动和中朝军队协同作战问题[1]

（1950年12月6日）

德怀同志，并告高、宋[2]，并请彭转金日成[3]同志：

十二月六日十一时电[4]悉。

（一）在敌人已退出平壤的情况下，我西线主力可以在现地多休息几天，即可以休息到十二月十二号左右，从现地出动，以便准备得更好些。

（二）建议金日成同志及联合指挥部及志愿军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必须注意隐蔽防空的条件，不可大意。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指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4] 指彭德怀1950年12月6日11时给毛泽东和高岗的电报。电报说：金日成同志今晚由驻地起程，明拂晓前来我处（大榆洞）会谈。为便于指挥，志司即须南移。机关大（电台即有10余个），难找适当房洞。拟待金谈后，即移价川，或德川以南。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再来前方一次，商谈联合司令部之组成，进入三八线及其以南作战粮弹运输接济、铁道公路管制、就地筹粮办法及数量等。

（三）请高令铁路司令部赶速抢修至平壤的两条铁路及顺川至元山的铁路，以及大同江上被敌人破坏的几座桥梁。

（四）方虎山军团[1]应速向南朝鲜出动，不要派到元山方面去。

（五）在九兵团附近的朝鲜第三军团应受宋时轮同志指挥，向北青、咸兴线袭击正在退却中的敌人，不应到丰山方面去，因为丰山区域及其以北以东的敌人均已经退走了。此点请金日成同志对第三军团下达命令。

（六）在江界地区及定州地区集中的人民军两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朴一禹[2]三同志的指挥，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配合志愿军作战。

（七）请金日成同志速派党政人员入平壤，恢复政权，维持秩序。

（八）以上各项望分别电复。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二十二时

---

[1] 方虎山军团，指朝鲜人民军第五军团，方虎山任军团长。

[2] 金雄，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官。朴一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副政治委员。

军委关于同意海南岛的海防部署致邓子恢[1]等电

（1950年12月7日）

邓、谭、赵[2]：

十二月四日转报广东对海南岛海防部署及准备于敌入侵时的作战方案是正确的，望即转令广东军区照此执行。

军委

十二月七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2] 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

军委关于九兵团指挥所的防空荫蔽问题的电报

（1950 年 12 月 7 日）

宋、陶、覃[1]：

你们是否已注意你们指挥所的防空荫蔽问题，请将你们的防空情况电告。

军委

十二月七日

---

[1] 宋，指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指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覃，指覃健，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参谋长。

对华东军区剿匪经验通报的复电[1]

（1950年12月7日）

陈、唐、张、周，并告华东局：

十二月四日剿匪经验通报[2]，甚好甚慰。业已转发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军区及粤、桂两省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副主任唐亮，参谋长张震和副参谋长周骏鸣的电报。

[2] 指陈毅、唐亮、张震、周骏鸣1950年12月4日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剿匪经验的通报。主要内容是：当股匪被合围、合击给予歼灭打击后，残匪必然混乱、动摇、分散、隐蔽、潜入地下活动，故必须继之展开全面的群众性的驻剿、搜捕，结合土改，发动群众，猛力展开政治攻势，坚决深入挖根，便可一股一股地逐步肃清土匪。苏、鲁、浙各地所歼土匪，大部系搜剿、破案、缉获，福建大股匪特被歼后，近来集体及零星投诚者日众。唯我清剿股匪时，必须严密组织，不予匪特以流窜空隙，且由合围、合

击到驻剿、搜剿，又不可间断，否则将使我剿匪陷入被动地位。并应不断地教育部队，尤其是政策、纪律教育，保持部队情绪经常高涨，保证以坚决的精神对付散匪潜匪。在剿匪过程中，对部队困难，必须及时予以解决。其次当大陆匪特被打击后，匪方必然积极组织外部力量支持之，故对海匪必须实施有效的追剿，需要海空军配合，并将清剿海匪与清剿股匪密切结合。我们体会正确地掌握贯彻政策十分重要，重要匪首及坚决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才可以动摇匪特内部，支持群众的反匪斗争。我们当遵照22日指示，将具体剿匪经验通报各区，并参照各区经验来进行华东剿匪工作。

请求苏联帮助越南解决汽车和汽油问题[1]

（1950年12月8日）

菲利波夫[2]同志：

在胡志明[3]同志领导下的越南人民解放军今年七月在中国帮助之下，第一步装备了两个师，并于今年九月作战取得了第一次的胜利。第二步，从现在起，正在装备第三个师及两个炮兵团，连前总共有四万人，可以集中作战。将来再装备第四个师及第五个师。中国派了一百个顾问到越南，帮助他们工作。他们必须攻克北部主要据点河内、海防等处，即完全统一越南北部，才能向中部及南部作战。现在胡志明政府统治的主要地区即越南北部解放区，土地很宽，人口则只有约一百万，而脱离生产的军政党人员则共有十七万人。因此，他们在经济上无法自己维持，在很大的程度上必须依靠中国的帮助。军械、弹药、粮食、被服及其他物资经常要从中国运去，但这种运输有八百公里只能使用汽车和人畜力，而汽车和汽油是我们目前最缺少的，所以有极大的困难。为克服这种困难，如果可能的话，我请求你帮助越南一千辆六轮嘎司六三汽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车及工程车六辆，吊车四辆，和一年用的汽油五万四千大桶（七千九百四十一吨）及其他机器油料并备份汽车零件。详细货单俟得你复电同意后再经沙哈罗夫[1]同志转上。其中五百零五辆汽车请于一九五一年一月至三月运到。另五百零五辆则可于一九五一年六月至七月运到。

是否可行？望复。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八日

---

[1] 沙哈罗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总军事顾问。

中央转发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经验的批语

（1950年12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所属各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1]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

中央

十二月九日

---

[1] 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7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给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的经验，主要是发动学生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控诉美帝国主义，揭穿它的欺骗宣传，克服崇美、恐美思想，并召开全市学生代表的控诉大会和举行全市学生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大游行，激发反美爱国热情，推动抗美援朝运动。

关于美军准备从朝鲜撤退的情报致彭德怀[1]等电

（1950年12月11日）

彭、高、宋[2]：

（一）密息，美国陆军总参谋长柯林斯奉命到日本和朝鲜前线，和麦克阿瑟、沃克[3]及其他美军高级将领会商之后，认为联合国及美国的军队在朝鲜的态势已无希望。柯林斯认为，在目前朝鲜人民军及中国志愿军进攻的速度和范围的条件之下，由于美军在人力及装备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以及士气的极端恶化，美军不能组织长期的防御。柯林斯已将上述情况及其意见向美国联合参谋部作了报告。从柯林斯上述报告中证明，他已给予麦克阿瑟以适当的指示，命他准备船只，并集结军队于一定的港口，以便进行撤退等情。从外国通讯社的报导看来，汉城正在准备撤退。上述情报是否正确，大概不要很久就可证明，至迟在我十三兵团到达开城等处迫近汉城时，可以证明。为了不使部队松气，上述情报不要下达。（二）麦克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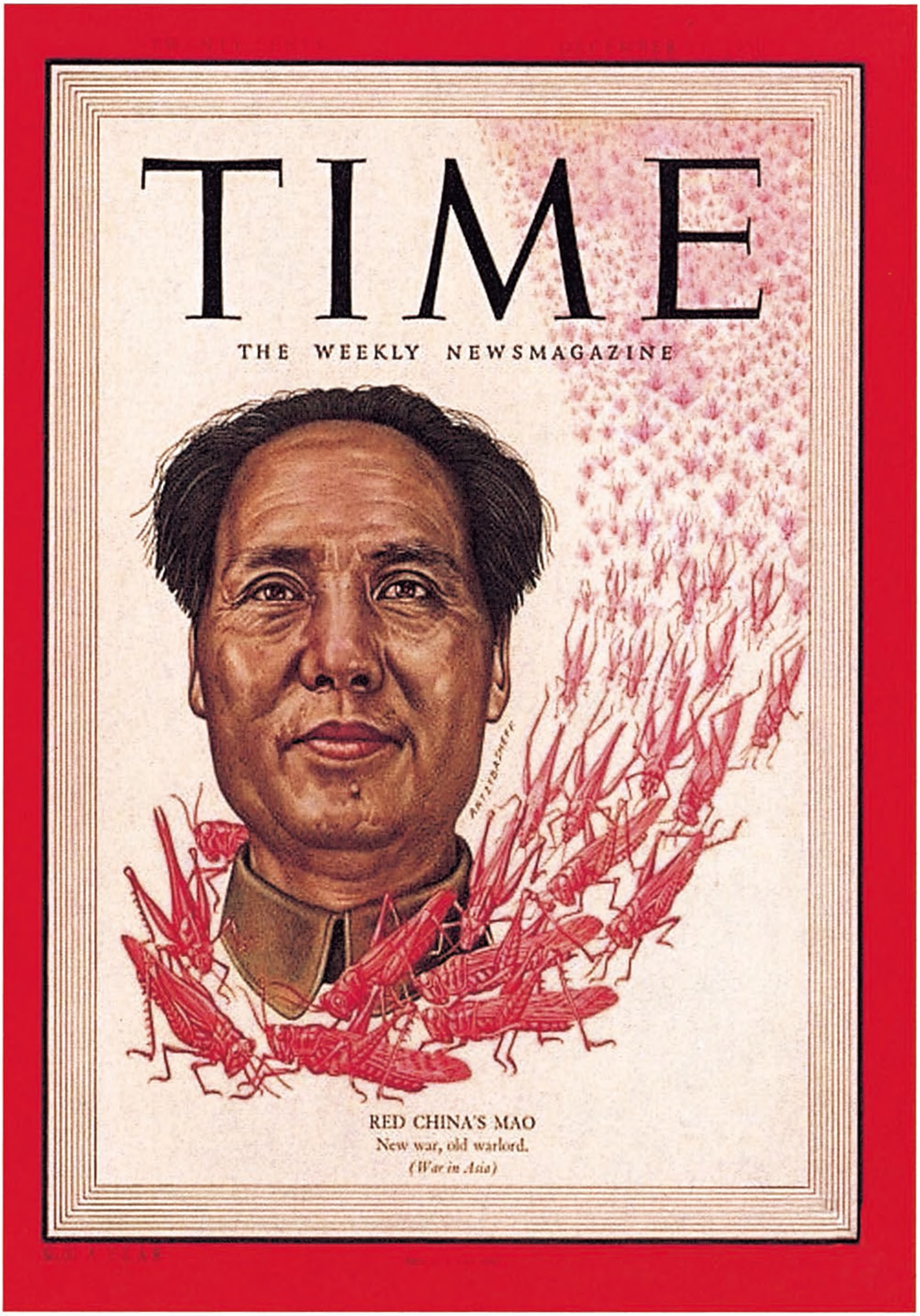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指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麦克阿瑟，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沃克，当时任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

阿瑟已集中大批船只及舰队于咸兴以南的兴南港，并公开宣布第十兵团（阿尔孟德少将所部）就要从该港撤退。元山之敌昨（十日）业已从海上撤退。据合众社十日电称，陆战师等部被围军队，昨（十日）有二百余辆卡车由陆一师师长史密兹少将率领，冲出包围，逃抵兴南港。似此，黄草岭地区被围敌之各部现已没有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官长了。许多通讯社报导，中国军队打得极为英勇，美军处境很惨，损失很大。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ARTZYBASHEFF
RED CHINA'S MAO
New war, old warlord.
(War in Asia)

1950年12月11日，毛泽东第二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在广州市机关物资疏散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12月11日）

周[1]：

广州这样做[2]，似不妥，请去电指示。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0年12月7日就广州市机关物资疏散情况向中南局并中央作了报告。12月12日，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语电示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及各中央局，指出：中央关于防空疏散的一切指示，均注明是预备性质，目前不向人民公开发动，只限于在党委常委中讨论。现时广州所进行的防空疏散工作已超越预备范围，必须立即纠正，并迅速将目前工作中心转到抗美援朝、剿匪、肃特、土改、练兵及海防方面。

对成立化学兵学校报告的批语[1]

（1950 年 12 月 11 日）

同意照周所拟[2]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克1950年11月2日报告的批语。

[2] 指周恩来1950年12月2日在萧克报告上批示的意见。萧克的报告说：在对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中，随时有遭受敌人毒气攻击的可能，而我军在这方面现在几乎完全没有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故必须立即成立化学兵学校。首先培养防毒人才，学习化学战术知识，然后进一步加强化学兵机构装备。报告并提出学校筹建的具体意见。周恩来在萧克报告上批示：拟原则同意，第一年人数可较少点，定为800名，200名由各大军区抽去年参军的南下工作团学生，600名征调志愿学生。

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

（1950年12月13日）

彭，并告高：

十二月八日十八时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三）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九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部目前即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关于志愿军兵力使用的意见

（1950年12月17日）

彭[1]，并告高[2]，及告宋、陶[3]：

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气候寒冷、给养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中央对此极为怀念。为了恢复元气，养精蓄锐，以利再战，提议该兵团在当前作战完全结束后整个开回东北，补充新兵，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再开朝鲜作战。在此期间内，即由西线六个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作战。每一战役，以歼灭美李军[4]一万人左右至多两万人为目标，兵力似已够用。因为在南朝鲜作战，补给线甚长，好打的战役机会，须经过精心选择和充分准备才能获得，太多的兵力也用不着。只有在进行最后决战的时机，才需要增加大的兵力。如果在两三个月内有使用更多兵力的机会，亦可照高岗同志提议，考虑将杨得志兵团[5]使用上去。但杨兵团亦须加强装备，补充人员（该兵团十一万人，能作战者约九万人）。如使用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宋、陶，指宋时轮、陶勇，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4] 美李军，指美国军队和李承晚指挥的南朝鲜军队。

[5] 杨得志兵团，指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该兵团，亦以在明年一月下旬或二月开动为适宜。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我军能够战胜装备优良的美国军队[1]

（1950年12月18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所属各分局、军区，各省市区党委、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军事学院：

兹将我志愿军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经验总结[2]，转发给你们，这是极重要的经验，望注意研究。在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中证明，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有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等的电报。

[2] 指1950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给各军转师、炮司、九兵团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所述的三十八军在第二次战役中的作战经验。其内容是：一、携带足够干粮是战役顺利进行的主要保证；二、山区路小且窄，团以上部队运动以平行道路并肩前进较好；三、到达攻击位置，军、师、团、营均应组织坚强的观察所，沟通电话，及时了解战场情况；四、迂回部队之先头应加强炮火，遇敌抗阻时，即以炮火轰击，配以小部队围歼或驱逐之，使主力继续前进；五、为彻底消灭敌人，部队应不怕疲劳，采取大的迂回包围，猛插敌后，断敌退路；六、部队发起攻击时，首先以精干部队突破敌阵地，抢夺敌炮兵，使敌失却支援，便我顺利歼敌；七、对突围之敌应采取头击、腰击、尾击3种打法，力求先将敌人打乱，再分股分段歼灭之；八、执行阻击任务时，为减少伤亡，力量部署应采取纵深配备，第一线兵力不应超过1/3；九、战后组织班排小部队分片搜山，并在交通要道设置拦阻部队，防敌零散逃窜。

够战胜的。

中央军委
十二月十八日

给陈叔通[1]的信

（1950 年 12 月 18 日）

叔老：

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2]两同志酌办。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

敬问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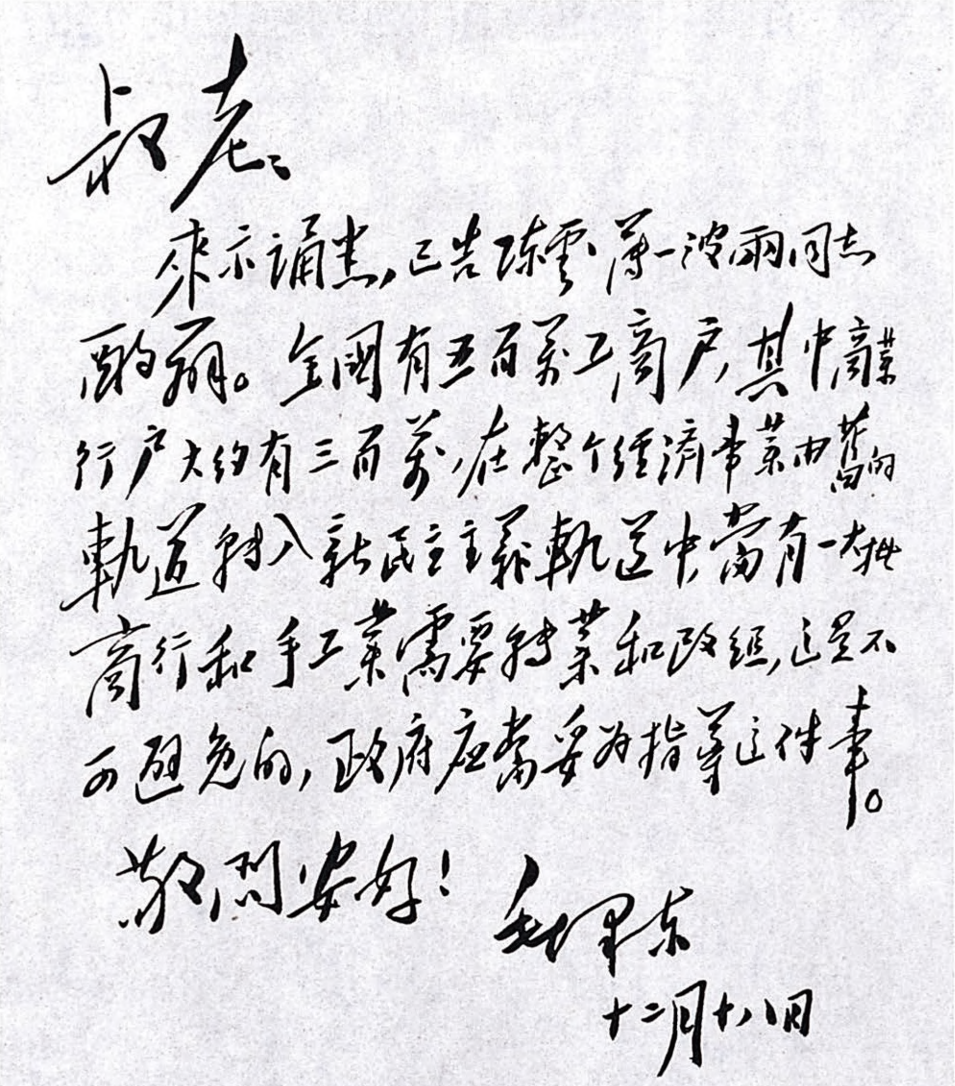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

[1] 陈叔通（1876—1966），浙江杭州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叔老：

來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两同志酌办。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業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業由旧的軌道轉入新民主主义軌道中當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業需要轉業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

敬问安好！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致陈叔通信的手稿。

中宣部转发西南局宣传部关于清匪反霸报道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50年12月19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宣传部，并转各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

兹将西南局宣传部对重庆《新华日报》关于报道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方面的检讨[1]发给你们。请对你们的报纸亦加以检讨。

中央宣传部
十二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1950年12月15日关于重庆《新华日报》等在报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所属各省区党委及宣传部并报中宣部的电报。这个电报指出，重庆《新华日报》等在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报道中，不加选择，不分轻重，不管经验是否成熟，连篇累牍刊载这些方面的消息，在报纸上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空气。这种做法对于分化、孤立、麻痹敌人有害无益，很不策略，而且容易使实际工作发生偏向，希望各地引起注意。

关于镇压反革命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1]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2]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方针问题致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2]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致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和华南分局负责人的电的一部分。

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1]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2]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应注意的问题致福建省委的电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2]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致华东、中南、西北、华北、东北各大军区的电的一部分。

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1]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2]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2]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的复电的一部分。

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由上面控制。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1]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办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2]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其原则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镇反工作报告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2]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经验报告所写的批语。

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1]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致川北区党委的指示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1]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的决定。

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1]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2]

（一九五一年九月）

看法妥当，让他们活动，注意观察，大有可为。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们应当当作一件大事去办，积极而又艺术地去做观察和侦察工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

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死缓”政策的解释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的电报。

[2]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要彻底消灭他。[1]

（一九五一年十月）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作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朝鲜作战必须作长期打算

（1950年12月21日）

德怀[1]同志，并告高岗[2]同志及宋、陶[3]：

十九日二十四时电悉。答复如下：（一）在你所述的情况之下，九兵团即在咸兴地区休整，只将重伤病员运回东北，抽出干部回东北带训新兵，较为妥善。（二）杨得志部[4]现已集中徐州、济南间地区，开了干部会，朱总[5]去讲了话。如有必需，三月中参战无问题。目前仍以在徐、济间整训一时期为宜。待要使用之前一个月可开至沈阳、安东[6]间，补一部新兵（该兵团九个师，平均每师只有六千余人，极不充实），如友方[7]装备那时已到，可将装备改换即开朝鲜参战。（三）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四）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诱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宋，指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指陶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

[4] 指杨得志任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

[5] 指朱德。

[6] 安东，今辽宁丹东市。

[7] 指苏联。

是必要的。（五）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即目前美、英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就此次战役说，如果发展顺利，并能找到粮食，则春川、加平、洪川地区可能寻歼较多的伪军。（六）在战役发起前，只要有可能，即应休息几天，恢复疲劳，然后投入战斗。在打伪一师、伪六师之前是这样，在打春川之前也是这样。总之，主动权在我手里，可以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七）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这个意见也是对的。（八）增加汽车，速运棉鞋、大衣、棉衣、被毯，极为必要。请高岗同志设法解决。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对我国关于联合国大会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的修改[1]

（1950年12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亟望朝鲜战争能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关于联合国大会非法通过“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的声明第六项内容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目前应使敌集中以利歼击

（1950年12月24日）

德怀[1]同志：

目前伪军及美军一部在三十八度至三十七度之间站住脚跟，组成防线，对于我军各个歼灭该敌，最为有利。目前伪军集中于我有利，分散则于我不利。因此不但我军于此次战役后收兵休整可以向后撤退一步，使伪军又能集中起来，构成防线，以利下一次歼击，而且对于原定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深入敌后分散敌人兵力的计划，值得重新考虑。该两兵团在此次战役后暂时和志愿军一同休整，不要南进，待下一战役后再行南进，似较适宜。究应如何，请你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第二次战役。12月24日，敌人全部退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图为志愿军在庆祝胜利。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

（1950年12月26日）

彭、朴[1]，并告金日成同志及高岗[2]同志：

（一）彭朴十二月二十六日给吴周转告金雄等同志电[3]，已阅悉，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

（二）在此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均应撤退至利于休整的适当地区，休整一个月至两个月，补充新兵，恢复体力，总结经验，筹备粮弹，修通道路，补齐衣被鞋袜，整顿纪律，改善中国同志与朝鲜同志的关系（那些以恶劣态度对待朝鲜同志的人们应受到严格批评，重者应予以撤职处分），改善

---

[1] 彭、朴，指彭德怀、朴一禹，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0年12月26日13时彭德怀和朴一禹给志愿军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等的电报。电报说：你们如果已经找到或可以找到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雄、方虎山和崔贤同志，请与之商量下述问题：(一）春川、洪川、襄阳、江陵、原州地区伪一军团、三军团已布防就绪，纵深相当大。该两军团（朝鲜人民军二、五军团）绕大山通过敌之纵深有无困难。(二）给养问题、弹药、部队疲劳等情况如何。(三）如通过敌纵深不易时，可否暂不南进，即配合此次战役胜利后，看情况再行决定。

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

（三）现在的形势和十一月间的形势相比已经改变了，十一月间决定派人民军两个军团深入朝鲜南部的计划，现在应加改变。现在敌人在三十七度至三十八度之间构筑防线，是有利于我军各个歼击的。美军主力守汉城区域，其一部守浦项、釜山区域，在这两者中间，直至春川、江陵之线则是伪军九个师，这样，就使我军能够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因此，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如果现在插入朝鲜南部，威胁敌人后方，就有分散敌人，使敌人变更部署，不敢在三十七度以北地区建立防线的可能，而汉城美军则有放弃汉城集结大田、大邱一带的可能，这样，将使我军作战发生很大困难，不易各个歼灭。因此，不但人民军二、五军团现在不要深入南部，而且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在此次战役后，应当后退几十公里进行休整，使美李两军感觉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此点要使朝中两国各主要干部充分明了。

（四）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征调老战士补充志愿军部队[1]

（1950年12月26日）

现美英军及李承晚军[2]合计尚有二十余万人，还须打几个大仗，才能彻底解决问题。我们为了扩大胜利的成果，彻底歼灭美帝在朝鲜的侵略军队，援助朝鲜人民争取独立、自由、解放，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造成收复台湾的有利形势，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保卫东亚及世界的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扩大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按照军委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决定分期征调一部分老战士，我们号召全体人民解放军（除新疆），每个连队征调二十人，必须使他们自觉自愿的参加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以巩固和提高人民志愿部队的作战力量，彻底战胜敌人。必须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明白，参加人民志愿军是我们人民战士的无尚光荣，也是我们锻炼自己、学习对美帝作战经验、为祖国立功的最好机会。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军委征调老战士补充志愿部队的政治动员指示》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这里指南朝鲜军部队。

祝贺法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1950年12月26日）

亲爱的杜克洛[1]同志和法国共产党全体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欢欣庆祝法国共产党的三十周年。

法国共产党在它的三十年奋斗中证明了自己是法国工人阶级利益和全法国人民利益的最忠实的保卫者。

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工人阶级正在团结全法国人民来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战争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法国人民成为美国独占资本的奴隶和牺牲品。

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法国共产党的奋斗是正义的，是必然会得到最后胜利的。

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共同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的团结万岁！

尽忠于法国工人阶级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的法国共产党及其领导者莫理斯·多列士同志万岁！

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人类的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

[1] 杜克洛，当时任法国共产党代理总书记。

关于发表《实践论》等文章给胡乔木[1]的信

（1950年12月28日）

乔木同志：

此两文已看过，可以发表。

第一天发表《实践论》。第二天发表《真理报》的评论[2]。分两天登报。

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苏联《真理报》1950年12月18日发表的编辑部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关于重新发表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等文件给胡乔木[1]的信

（1950年12月28日）

乔木：

（一）可将胡佛演说[2]以资料名义刊于《人民日报》第四版及世界知识上。（二）不但“领导方法决定”[3]，而且有许多其他文件，都有在报上重新发表一次的必要。此事请与陈伯达[4]商量一下，开出一个文件单，加以审查，然后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美国前总统胡佛1950年12月20日在纽约发表的关于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广播演说。

[3] 即毛泽东1943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打一个胜仗后休整准备春季攻势[1]

（1950年12月29日）

彭德怀同志，并告高岗同志：

十二月二十八日二十时电[2]悉。同意你的计划。此次战役如发展顺利，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其他各军，于战役完全结束敌人新部署亦已明了之后，即分置于粮运较为便利地区（不论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并告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的电报。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第三次战役，以9个军的兵力，向三八线已有防御准备之敌实施进攻。经连续进攻，突破了三八线敌军防御，前进80至110公里，歼敌19000余人，解放了汉城，将敌驱至三七线附近地区，粉碎了敌固守三八线，重整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

[2] 指1950年12月28日20时彭德怀给毛泽东并高岗的电报。电报说：前电示此役后三八线仍让敌占领，须看此役结果。如能歼灭伪军两三个师及美军一部，估计敌不仅不要三八线，还有可能放弃汉城，退守南汉江。如发展顺利，拟以六十六军或四十二军占领春川、洪川，以人民军一部占领襄阳、江陵，控制此四县间山区，以便分储粮弹，准备春季攻势。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在部队中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既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像平壤一样自动放弃，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志愿军集结4至5个军撤至三八线以北，就粮整补等。

三八线南北），部署休整两个月。所谓三八线在人们脑子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存在了。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休整，均无关系。但如不打这一仗，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菲里波夫[1]同志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他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他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问题。军委已通令全国军队（除新疆及西康[2]外），每连抽老兵二十人，如进行顺利，可于二月间集中第一批四万余人补充志愿军。敌军新指挥官李奇微中将已到汉城，代替已死的沃克中将，他一到就下令美伪军各部死守，不许后退，这对我军寻找伪军及一部美军歼击，甚为有利。假如他在此次战役后固守汉城不退，则对我更为有利。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固守汉城及三十七度线以北区域，只怕他退出该线而扼守大邱、釜山狭小地区。但后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你们要准备对付这一种情况。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

[1] 菲里波夫，即斯大林。

[2] 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加紧督促桂粤湘三省剿匪
巩固广东防务

（1950年12月29日）

邓、谭、赵、苏[1]：

（一）十二月二十四日关于总结秋季剿匪经验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甚慰，已发华东、西南、西北三区参考。（二）对桂粤湘三省剿匪仍望加紧督促，务于五月三十一日以前彻底完成剿匪任务，使广西的一个军（是否四十五军适宜）及二十一兵团能于六月上旬集中梧州地区待命调动入粤，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2]。湖南应准备以一个军至迟于五月间最好能在三四月间集中郴州、衡州[3]线上待命。总之广东有事须由四野负责独力应付，保证战胜可能入侵之台湾匪军，巩固广东防务，望按此方针筹划剿匪工作及兵力部署。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

[1] 邓、谭、赵、苏，指邓子恢、谭政、赵尔陆、苏静，当时分别任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三政治委员、参谋长和副参谋长。

[2] 指台湾国民党军队可能在广东登陆进犯。

[3] 衡州，今湖南衡阳。

转发中南军区秋季剿匪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0年12月29日）

陈、张[1]，贺、邓[2]，张、甘[3]：

兹将中南军区秋季剿匪经验[4]发给你们参考，请加研究，这些经验是很有用的。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张，指张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

[2]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3] 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司令员。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4] 指邓子恢等1950年12月24日关于中南区剿匪情况给毛泽东和军委的报告中总结的剿匪经验，主要是：1. 在剿匪部署上严格掌握重点进剿、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大股匪徒的方针；2. 在剿匪作战上采用奔袭、包围动作，黑夜雨天出动，出敌不意，予以歼灭；3. 执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4. 在军事进剿的同时，吸收各界人士对匪徒展开劝降，进行瓦解和争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剿灭各地匪特240万人。图为解放军剿匪部队在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

在华南分局关于广州市预防空袭疏散物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0年12月29日）

周[1]：

请电话告饶陈[2]，邓子恢[3]，停止疏散物资，保持安定状态。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给黄炎培[1]的信

（1950年12月29日）

黄先生：

近日土改情报数份送上一阅，请掷还。其中有关于松江区的过左行为的报导。另华东局指示电一件。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黄炎培，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给周世钊[1]的信

（1950年12月29日）

惇元兄：

嘱写的字[2]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

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3]一谈，大略是可以的罢。

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祝您及您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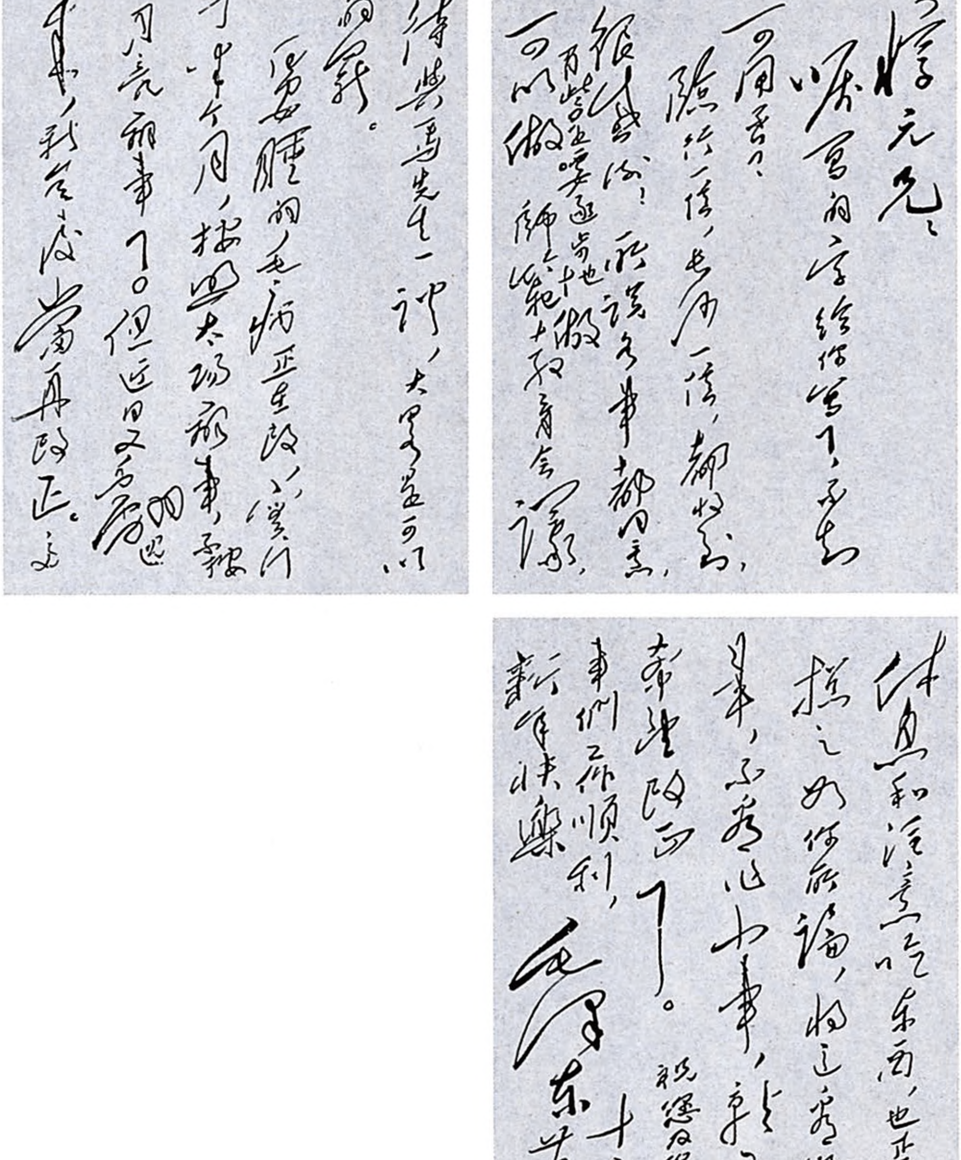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九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指毛泽东应周世钊的要求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书写的校牌“第一师范”和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3] 指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惇元兄：

[illegible]一两函，随给一信，也有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谈各事，都同意，有些要逐步地做，可以做。师范和体育会议，

[illegible]先生一诗，大有可以商榷。

[illegible]的毛病正在改，[illegible]了半个月，按照太极拳来，[illegible]了。但近日又有病，我当再改正。

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illegible]作大事来，不要当小事，希望改正了。[illegible]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祝您及[illegible]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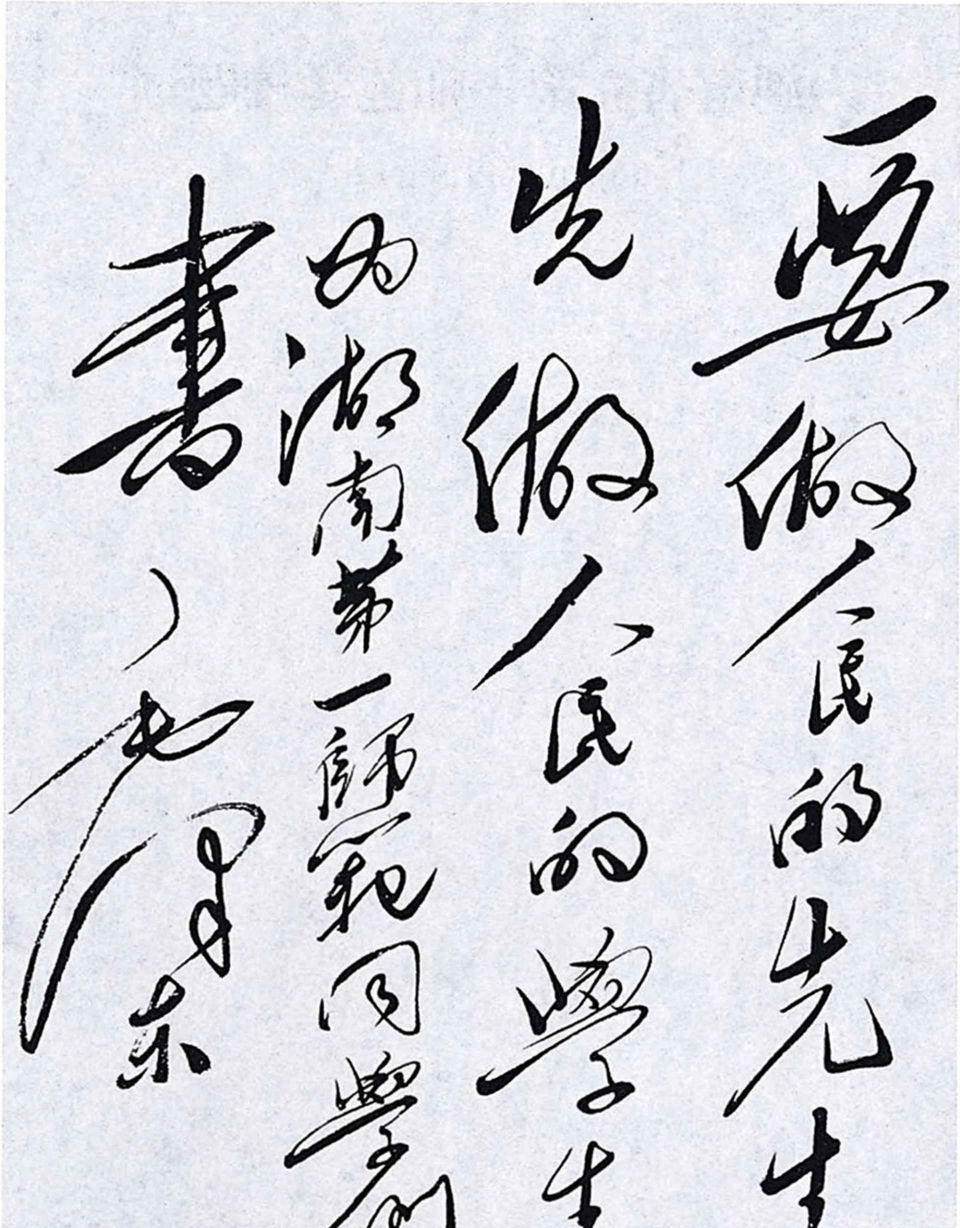
（1950年12月29日）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毛泽东

---

[1]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1914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第八班。1914年春至1918年夏在此求学四年半。1920年秋至1921年冬，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兼师范部国文教员。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亲笔为母校题写校牌“第一师范”，并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们题写了此联。



要做人民的先生
先做人民的学生
为湖南第一师范同学们书
毛泽东

毛泽东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题词。

为机要工作题词[1]

（1950年12月29日）

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配合正义战争的胜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争取完全的胜利而奋斗。

---

[1] 1950年春，机要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听取了工作会议报告，并亲切接见了参见会议的同志。同年12月29日毛泽东又为其写了这个题词。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第二次指示的批语

（1950年12月30日）

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各省市区党委：

我们认为中南局十二月廿六日关于镇压反革命第二次指示[1]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这是关于镇压反革命的全套策略问题，如果不在干部中弄清楚，并加以严密掌握，就有为反革命所利用，为民主人士所不满，为人民所不同意，使我党陷入被动的可能。目前几个月，肃反正在高潮，务望注意策略，达到团结各界人民彻底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中央

十二月三十日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第二次指示指出，镇压反革命的战线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两条重要战线必须密切配合，要使这几个方面的打拉策略步骤配合得宜，取得相互支援之效，而不可无策略地多面出击，引起全局紧张，孤立自己。因此肃反工作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狠、打得稳，要做到有准备、有重点、有区别、有分寸。

中央转发西北局
关于工会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0年12月30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华北局、东北局，上海、北京、天津三市委，华南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市区党委：

在一九五一年春季党的四中全会开会以前，请你们负责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作，准备向四中全会作报告。各地工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各级党委一般地说来注意得很不够，或者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不对的，必须改变这种情况。现将西北局十二月廿六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你们加以研究，定出自己的方针，并报告中央为盼。

中央

十二月三十日

给王震的电报
和复才旦朋杰、扎西才让[1]的信

（1950年12月30日）

一

王震司令员：

复才旦朋杰和扎西才让的信，望经前线部队转交。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联合发布的入藏布告（新华社于十一月十日重庆电），望告知前线部队广为散布与宣传。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二

才旦朋杰、扎西才让两位先生：

你们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很高兴知道你们同到达你们那里的人民解放军结成了朋友。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帮

---

[1] 才旦朋杰、扎西才让，当时均是西藏阿里地方政府的代表。

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对待西藏各界人民的办法，已经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的联合布告[1]内说得很详细，现在已命令前线部队将这个布告抄给你们，希望你们用各种方法把它散布开去，并多多地寄到拉萨方面去。你们对这个布告如有什么意见，请告诉我。你们所提出的五条请求[2]，其中第二条已在布告里说明白了。其中第一条，第三条，你们两个邦保[3]要同当地解放军军官进行和谈，我完全同意。至于西藏高级官员如要进行和谈，也可以把和谈的意思经过当地解放军军官转达给我。其第四条，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如果西藏官员都像你们一样同解放军合作，那么开进的部队就可以少一些。其第五条，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行动，只要不妨碍军事秘密，可以预先通知你们，这件事由当地军官同你们商量办理。

我感谢你们的来信，并问候你们和两个邦保的人民。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

[1]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部为正确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各项政策向西藏人民及进军西藏部队联合颁发的布告。这个布告刊登在1950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上。

[2] 指1950年10月10日才旦朋杰、扎西才让给毛泽东信中讲到的西藏阿里地区官员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军官提出的五条请求。

[3] 邦保，应为本保，藏语“官员”的译音。

关于同意朝鲜新解放区借粮办法的电报

（1950年12月31日）

一

金日成同志：

我们同意上述借粮办法[1]，请你及朝鲜政府审议批准，并出布告公布实行。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

[1] 指为保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粮食供应而拟定的朝鲜新解放区暂行借粮办法。这个办法是彭德怀1950年12月30日在报送毛泽东审阅的给金日成首相的信中提出的。办法规定：新区借粮实行粮多多借，粮少少借，采取累进办法。一般的按全年收入，贫农不超过5%，中农不超过20%，富农不超过30%，地主不超过50%（最高不超过60%），并发给正式收据。

二

德怀[1]同志，并告高[2]：

同意十二月卅日廿时电所述借粮办法，该电已转发金日成同志。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军委关于查告志愿军伤亡失踪人数致彭德怀[1]等电

（1950年12月31日）

彭、邓、朴、洪[2]，并告九兵团：

我志愿军全部从十月十九日入朝鲜境作战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包括西北两战役东北战役[3]战场上的伤亡失踪人数，冻死冻伤、病死及因病离队、在运动中炸死炸伤人数在内，每军数及全军总数，请查明电告为盼。

军委

十二月卅一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朴，指邓华，朴一禹，当时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指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3] 这里的西北两战役和东北战役，也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进行的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西北两战役，一指第一次战役，一指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的作战；东北战役，指第二次战役东线战场的作战。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和给杨之华[1]的信

（1950年12月31日）

一

瞿秋白[2]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

---

[1] 杨之华，瞿秋白的夫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

[2]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8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9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于党中央领导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1934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1935年2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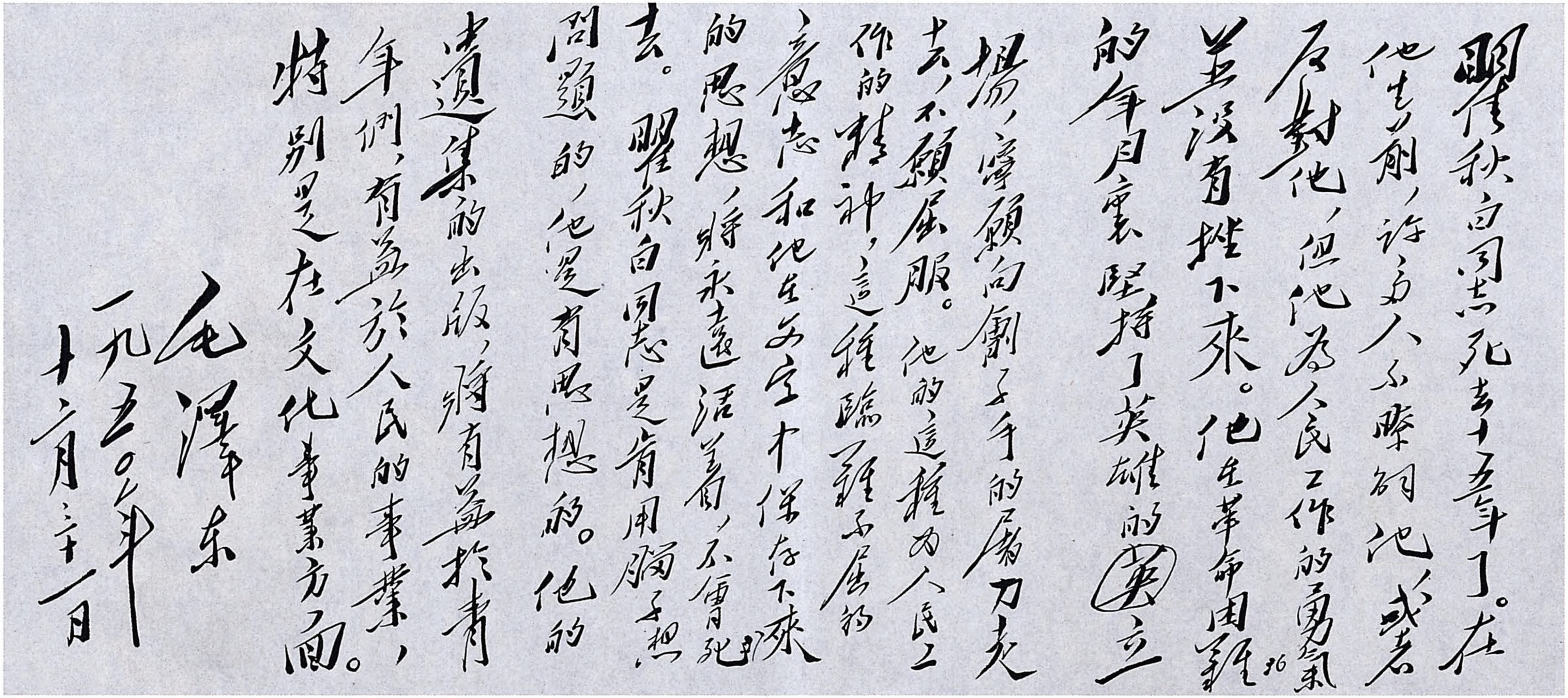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

之华同志：

来信收到。瞿秋白同志文集出版，甚好。写了几句话，不知可用否？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瞭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英~~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着，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毛澤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毛泽东为《瞿秋白文集》的题词。

军委为询问九兵团情况致宋时轮[1]电

（1950年12月31日）

宋时轮同志，并告彭[2]：

九兵团近日情况如何，是否都吃得上饭了，衣被鞋子是否解决了，伤病员处理情况如何，共有多少伤病员，此次东线作战减员总数多少，以上请查明电告。

军委

十二月卅一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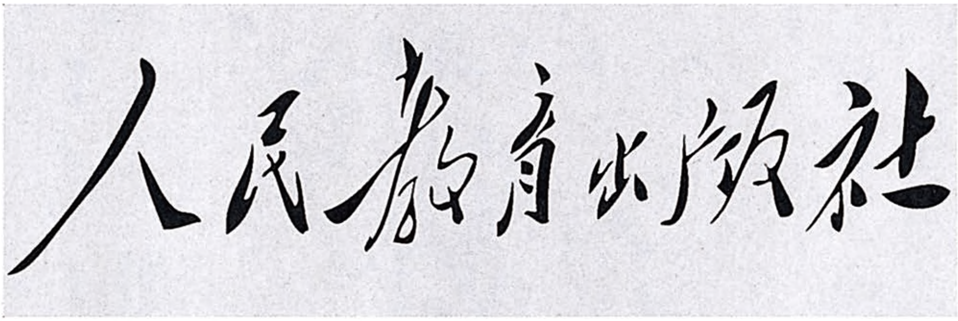
[1] 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名

（1950 年 12 月）

人民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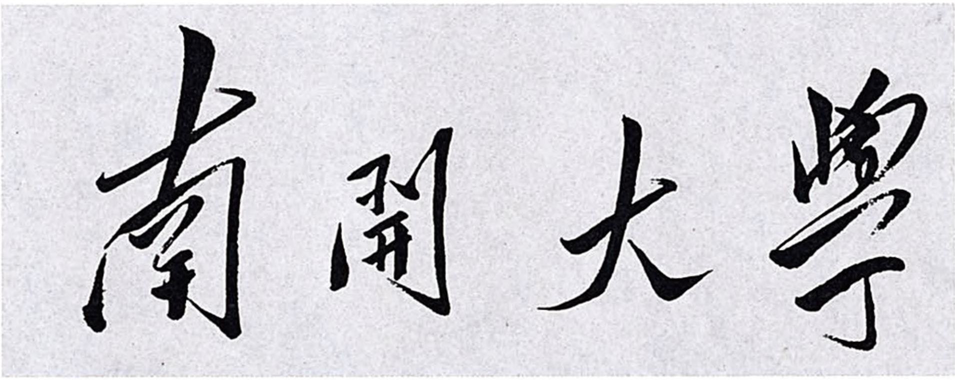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的社名。

为南开大学题写校名

（1950 年）

南开大学



毛泽东为南开大学题写的校名。

和郭沫若题齐白石画[1]

（19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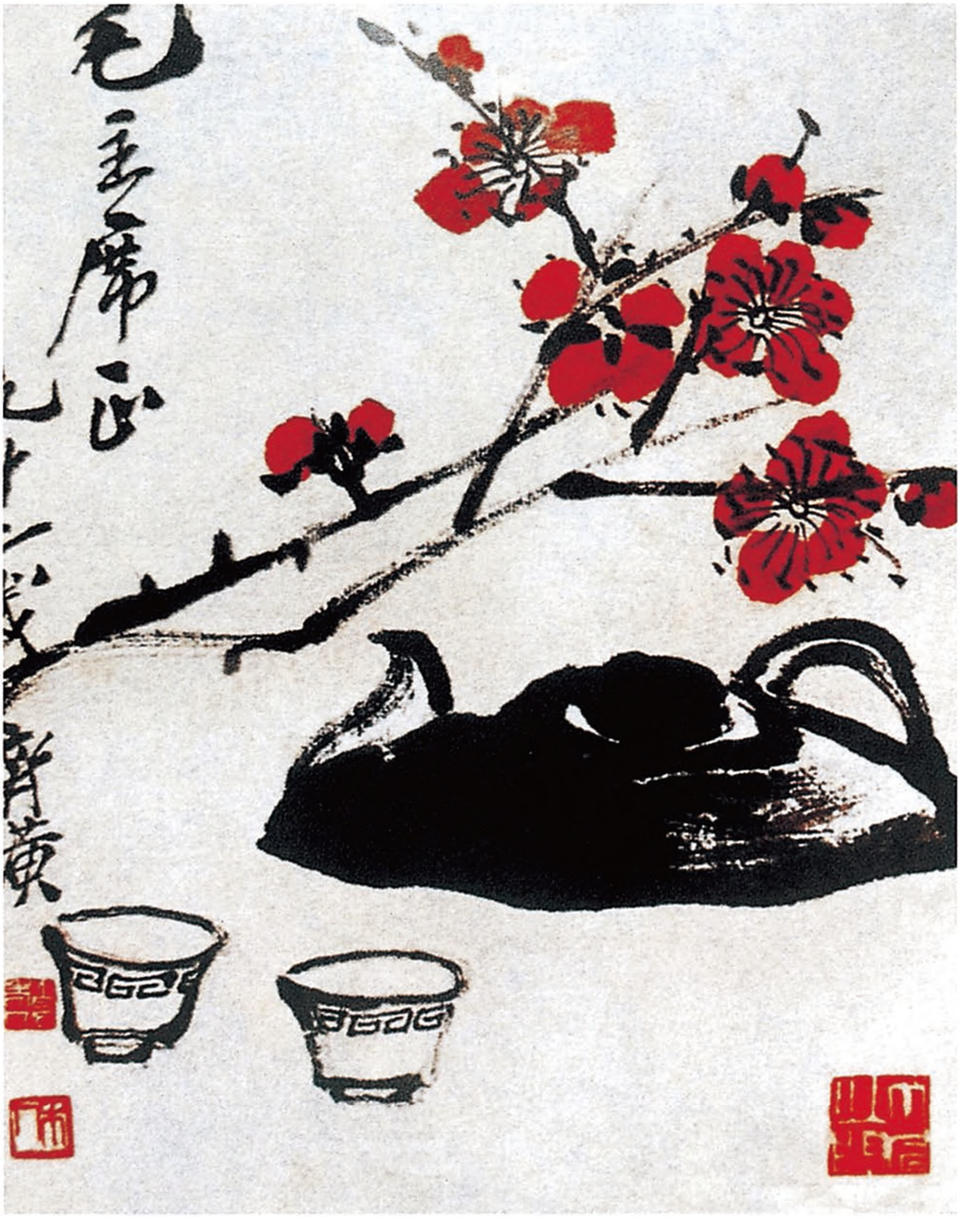
丹青意造本无法[2]；（毛泽东）
画圣胸中常有诗[3]。（郭沫若）

---

[1] 这是毛泽东和郭沫若在齐白石的一幅画上的题字。

[2] 丹青，中国古代绘画常用朱红、青色，故称画为“丹青”。丹青意造本无法，化用宋代苏轼《石苍舒醉墨堂》“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之句。

[3] 圣，谓所专长之事造诣至于极顶。画圣，绘画艺术大师。画圣胸中常有诗，化用宋代陆游“此老胸中常有诗”之句。



齐白石赠送给毛泽东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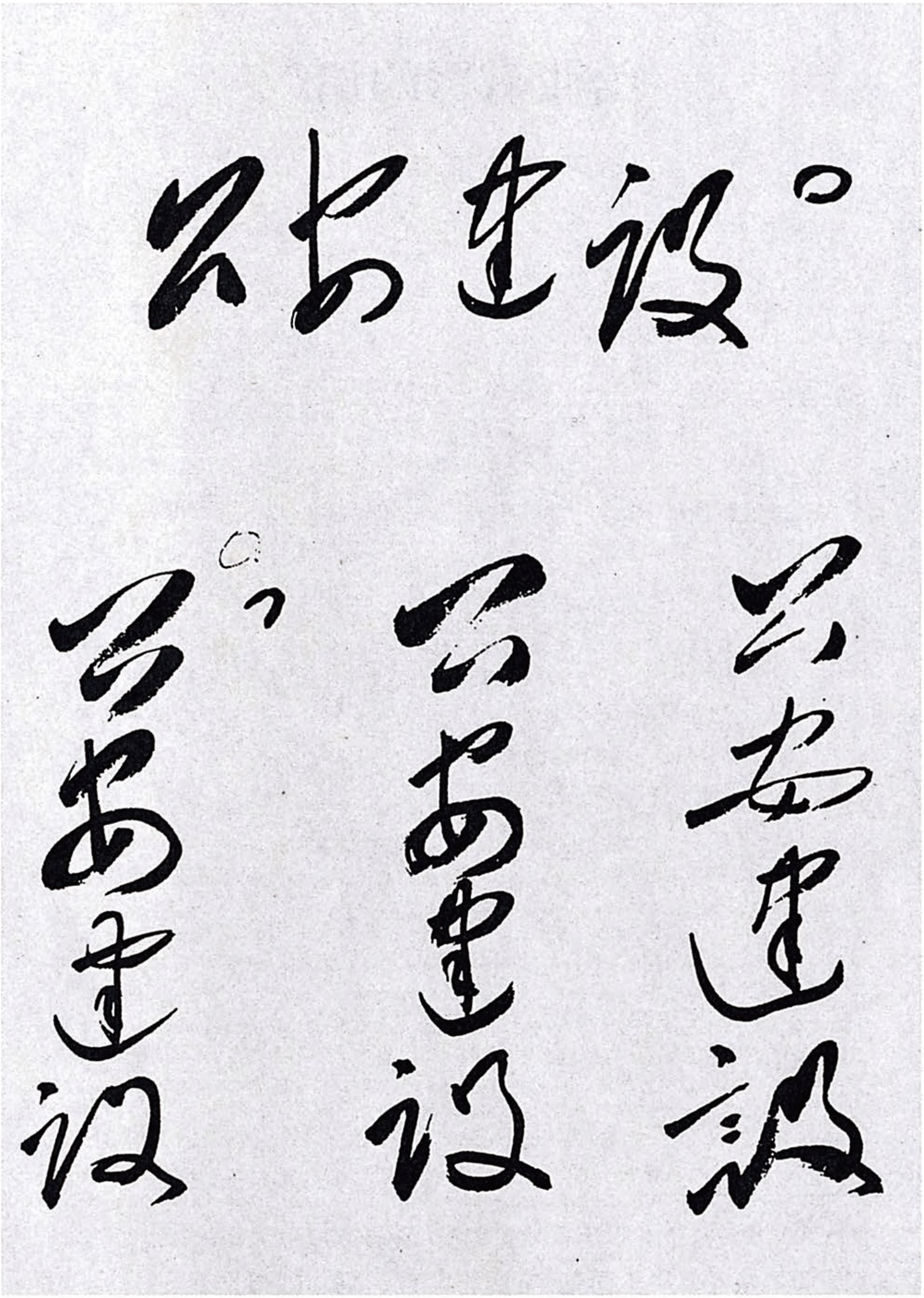
为《公安建设》题名[1]

（1950年）

公安建设

---

[1] 1950年6月30日，公安编印的内部刊物《公安建设》创刊。刊物的宗旨是贯彻公安保卫工作政策方针，业务指导，交流经验，提高干部政策业务水平，主要供县以上公安机关领导干部阅读。这是毛泽东为《公安建设》题写的刊名。


公安建设。
公安建设
公安建设
公安建设。

毛泽东为《公安建设》题写的刊名。

给张有晋的信[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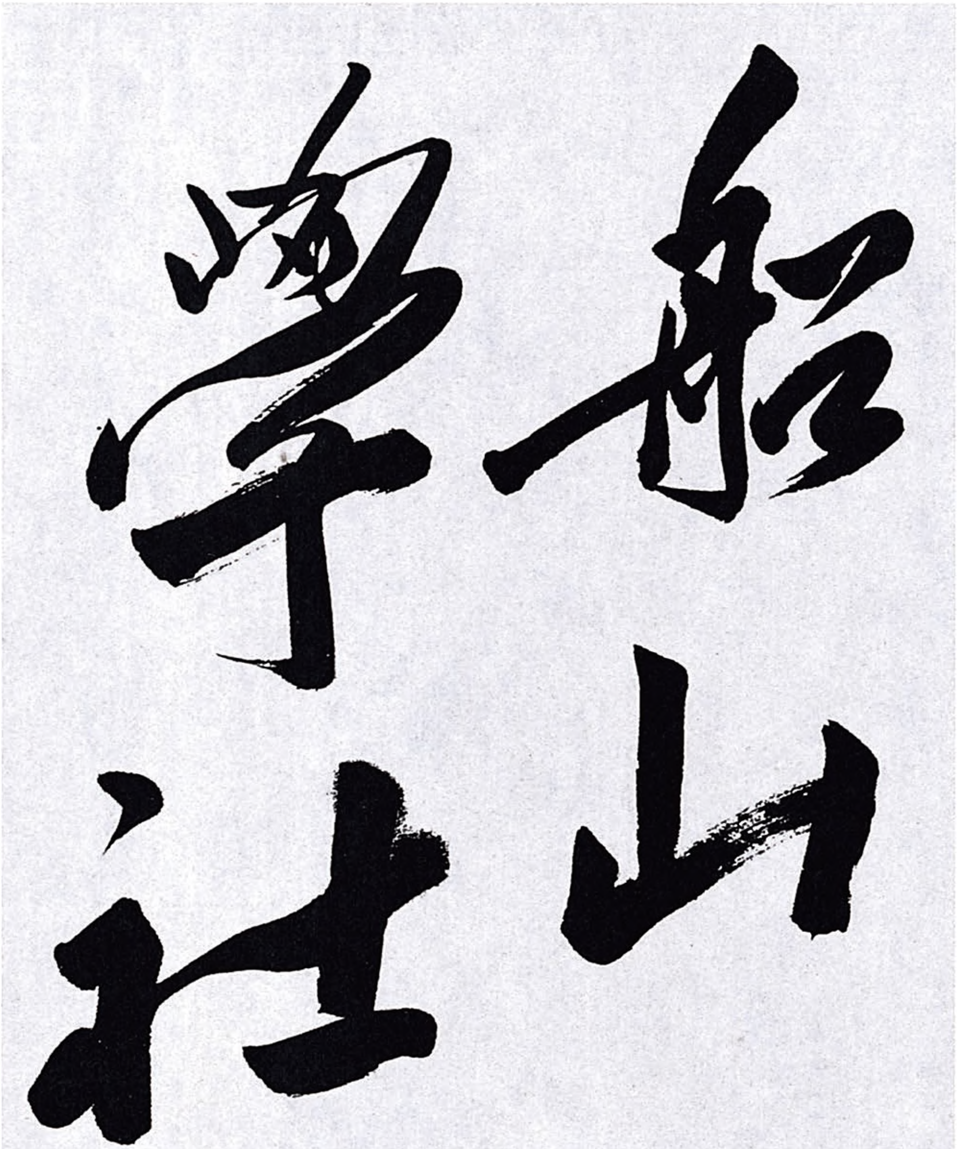
（1950年）

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此复，顺颂教祺。

毛泽东

---

[1] 1950年，张有晋与湖南教育界人士修建船山学社，纪念思想家王夫之。张有晋再次写信给毛主席，请他赐墨题写“船山学社”4个字。毛泽东欣然同意、挥笔题字，并回复：“遵嘱写了‘船山学社’四字，未知可用否？此复，顺颂教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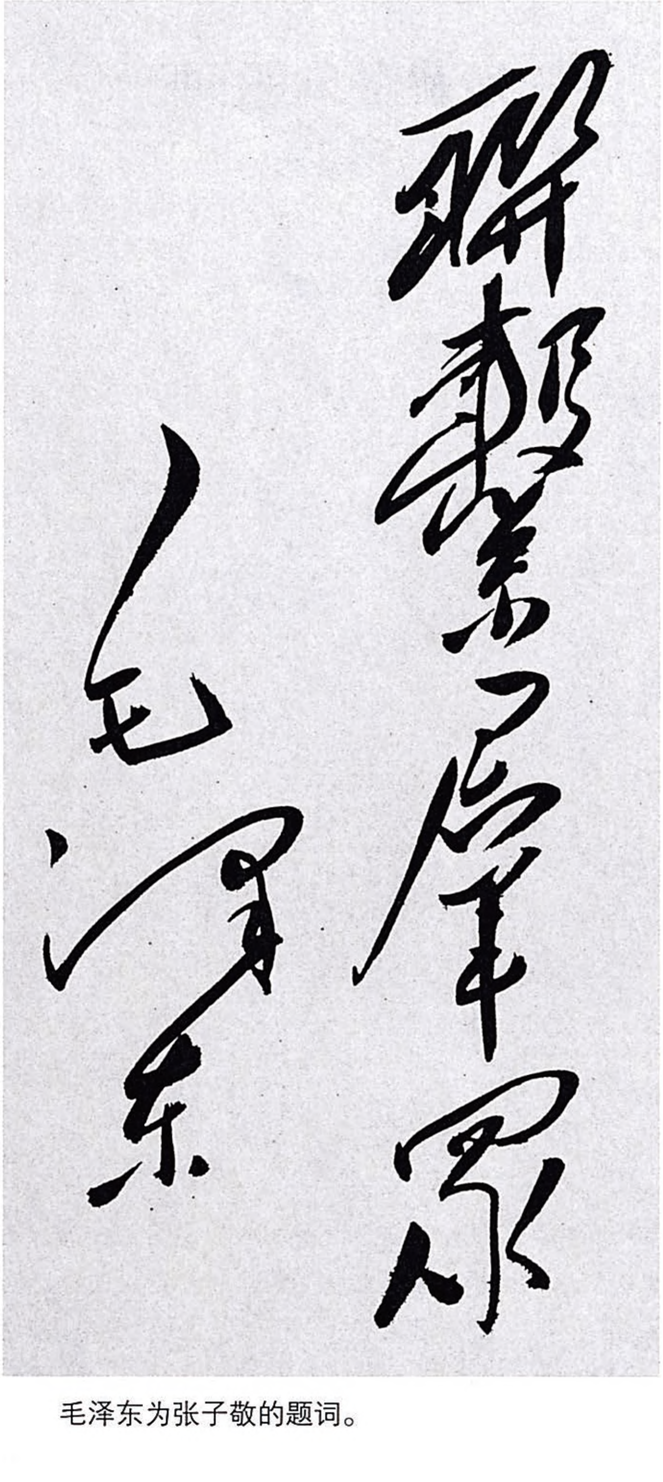
毛泽东题写的“船山学社”。

为张子敬题词

（1950年）

联系群众。

毛泽东



联系群众

毛泽东

毛泽东为张子敬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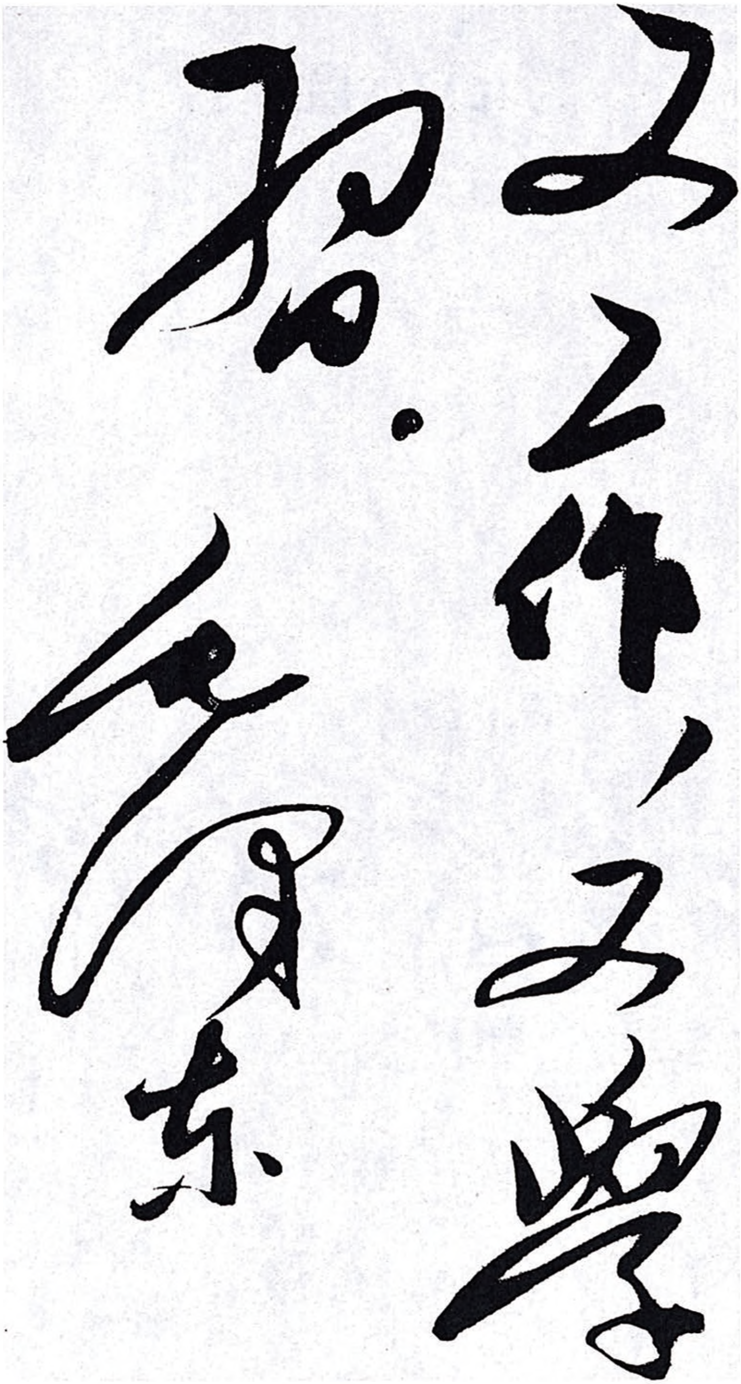
为黄宝珣题词[1]

（1950年）

又工作，又学习。

---

[1] 黄宝珣，耕耘出版社的创办人，1945年8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了她。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为她题词："又工作，又学习。"周总理题词："努力于人民出版事业，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耕耘出版社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并入三联书店，黄宝珣也"归队"参加工作。



好工作，好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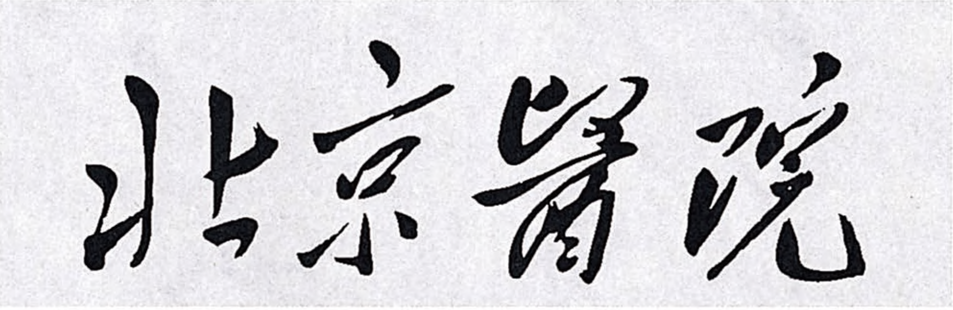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黄宝珣的题词。

为北京医院题名[1]

（1950年）

北京医院



毛泽东为北京医院题写的院名。

---

[1] 北京医院成立于1950年，前身是延安时期的中央医院，医院成立时，应工作人员请求，毛泽东为医院题写了院名。

1951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队伍。

关于同意广西剿匪计划[1]致张云逸[2]等电

（1951年1月2日）

张、李、莫、卢[3]，并告邓、谭[4]：

---

[1] 指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卢绍武1950年12月28日关于广西剿匪计划给中南军区党委的报告。报告中说，自1950年10月15日广西全省开始重点剿匪以来，由于在军事上集中兵力，正确地执行了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并部分地结合了反匪霸的群众斗争，同时党政军民相互之间积极配合，70天内歼匪55891人。除个别地区外，全省土匪气焰已显著下降。关于剿匪计划，决定自12月底和1月初先后展开两个重点区的剿匪。部署如下：第一，玉江、左江以南地区，共有匪万余人，以四十五军全部及二十一兵团的一个师，连同玉林、龙州、钦廉分区部队共17个团，统归四十五军指挥，以灵山县境及六万大山为中心，于12月底开始进剿，然后依据情况将重点移置十万大山和防城一带。第二，大小瑶山及其周围县境，有匪万余人，是广西匪患较严重地区，集中14个团的兵力，于1月10日开始进剿，预定至2月底完全消灭该区之土匪和初步地发动群众。

[2] 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李，指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莫，指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卢，指卢绍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参谋长。

[4]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俭电所述剿匪计划甚好，你们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甚慰。

毛泽东
一月二日

中央关于同意华南分局对海南岛的工作计划的电报

（1951年1月4日）

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

十二月廿二日电悉。同意你们对海南岛的工作计划，请你们认真督促海南区党委加紧实行。海南有老区为核心，土改工作似可较为加快，似可在一九五一年秋季完成一半，一九五二年春季全部完成。只要土改完成，海南就在基本上巩固了。

中央
一月四日

征调老兵补充志愿军具有极大意义[1]

（1951 年 1 月 4 日）

各大军区，并告志司[2]，九兵团：

兹将华东、中南两区十二月卅日对其所属的指示电发给你们参考。此次在全国范围内征调老兵（除新疆及入藏军），不但对志愿军的补充有极大意义，对整个人民解放军亦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样就使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各部分均有志愿人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这件事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请各大军区均认真进行这一征调工作，按时完成任务。

军委

一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各大军区的电报。

[2]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同意对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1]

（1951年1月4日）

子恢同志，并告黄克诚[2]同志：

十二月九日黄克诚同志关于湖南军大旧军官中反动分子的处理意见[3]我认为是正确的，不知你已回答否，如未回答，即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的电报。

[2]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黄克诚在给邓子恢并毛泽东的电报中提出，湖南军大中有千余名旧军官，大部系陈明仁部及其他起义的军官，其中有各色人员，也有坚决的反动分子。对军大的这批学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办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惩罚过多，因为他们的罪恶都是过去的，解放后并无罪恶。如果大批逮捕枪决，对湖南将引起极大惊乱，影响的人就太多了。

关于修筑入藏公路的批语[1]

（1951年1月4日）

一

周、聂[2]：

照西南意见[3]，玉树、黑河、拉萨线公路较易修，而西南则只修甘孜、昌都线，以西不修。请再研究，是否令西北负责修玉树、黑河、拉萨公路？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第一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950年12月9日关于修筑入藏公路给军委的报告上；第二个批语写在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1950年12月31日关于减派骑兵入藏问题给军委的电报上。

[2] 周，指周恩来。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950年12月9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的关于修筑入藏公路的意见。电报说：“从玉树经黑河到拉萨线，比较从昌都经三十九族太昭到拉萨线要易于修筑，因前者是高原的脊背较平。据报，后者则山大河多，困难特多。”“目前只修通甘孜到昌都段（或者再稍向前修一段）是可以的。从云南入藏的滇藏公路，已确定目前只修通大理到屹江段后，即不再继续修筑。至于南疆入藏之公路，目前暂时不修。”

二

周、聂：

由新入藏，据王震[1]称，修路即由部队担负，不另向中央支经费，只要五百辆汽车；五千骑兵亦不是一九五一年一次都去，今年只去千余。由青入藏，有两个问题，一是以现在玉树之八百骑兵为核心，招收若干青海藏人参加，能招收多少算多少，作为护送班禅[2]入藏的兵力，尔后即作班禅的卫队；二是修路是否有经费，如无修至日喀则的经费，可否令西北负责修至黑河？以上请酌议拟复。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王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在青海。

中央对高岗[1]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电报的批语和复电

（1951年1月4日）

一

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中央局和军区党委，并告军委空司，海司，炮司，防司，坦司，军事学院，军训部：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与苏联空军、炮兵、坦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对东北各省的指示电转发给你们，中央完全同意这一指示。你们各地凡有苏联军事人员之处均应采取此种态度。

中央

一月四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二

高岗同志：

你十二月廿九日致各省委及万毅[1]等同志关于与苏联军事人员建立良好关系的指示电，我们完全同意，望即照此实行。在关内各地亦应如此，中央已有指示，并将你的电报转告各地。

中央

一月四日

---

[1] 万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副司令员兼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

关于处理生日贺电的批语[1]

（1951年1月4日）

外交部：

此类来电均应复电致谢，但来往电均不要发表。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斯大林1950年12月25日祝贺毛泽东57岁寿辰的电报上。

给李讷的信

（1951 年 1 月 4 日）

小李娃：

你病了，我很念你。你好好养病，早日好了，大家欢喜。

下大雪了，你看见吗?

爸爸

一月四日

对陈渠珍一案的处理意见[1]

（1951年1月5日）

陈渠珍[2]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对他的处理应取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处理致使我们陷入被动。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1年1月5日给中南局并湖南省委的电报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2] 陈渠珍，曾任国民党政府湘鄂川黔绥靖分署副主任、湘西行署主任，1949年8月随程潜在湖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给黄炎培[1]的信

（1951年1月6日）

黄任老：

华东局一月四日给所属党委关于土改的指示电[2]一件，送请察阅，并请掷还。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六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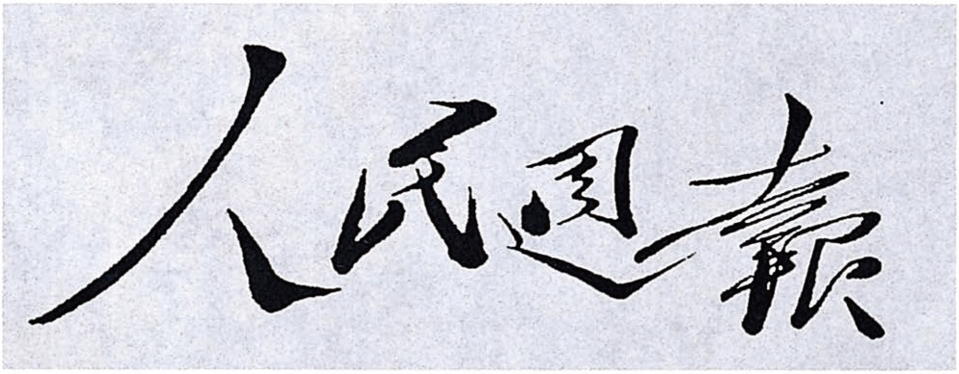
[1] 黄炎培，字任之，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1月4日关于土改问题给山东分局，各省区党委，上海、南京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华东第二次土改典型试验会议以后，各地放手发动群众已有成绩，千百万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中农已卷入运动，富农主动地想靠近我们，不法地主受到严厉镇压，地主阶级完全孤立，甚至天主教徒也大批参加斗争。在部分土改基本结束地区，已开始与参军运动结合起来，许多农民积极分子自觉地带头报名参军。但个别地区也开始产生了“左”倾偏向，主要表现在个别乡村开始出现乱捕、乱打、乱杀的行为。此外，个别地方还有打菩萨、毁教堂十字架等行为，及提升阶级、算老账的趋势。电报要求各级党委在土改全面展开时期，必须集中力量加强领导，注意及时检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纠正运动中的偏向，以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为《人民周报》题写报头[1]

（1951年1月7日）

人民周报



毛泽东为《人民周报》题写的报头。

---

[1] 《人民周报》是《人民日报》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的第一份子报。《人民周报》1950年10月8日创刊，1952年12月31日终刊，共出版118期。1951年1月7日出版的《人民周报》使用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

对陶铸[1]关于广西剿匪工作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1年1月7日、9日）

一

陈、饶，邓、贺，习、张[2]各同志：

兹将陶铸同志十二月卅一日电[3]发给你们参考，并请你们转发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派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3] 指陶铸1950年12月31日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最近时期广西剿匪工作的两条基本经验：一条是做到了更大集中兵力与更好组织党政民财力量的配合，另一条是镇压、收枪、反霸、地方武装建设等几项剿匪的主要政策更加明确，执行得更好。

所属剿匪尚处严重情况的地方和军队阅看。我们认为广西最近时期的经验是很好的，值得研究。

毛泽东
一月七日

二

陶铸同志，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

（一）十二月卅一日关于广西剿匪工作顺利进展的报告已阅悉，甚好甚慰，已转华东西南西北三区参考。（二）既然两大重点区[1]土匪可以在三月以前剿清，请考虑进剿西北部土匪是否可以只要廿一兵团去而不要四十五军去，以便将四十五军从剿匪中解放出来于三月间即开至梧州地区整训待命，准备应付广东方面的万一情况。

毛泽东
一月九日

---

[1] 指广西的玉江、左江以南地区（即由梧州、南宁至龙州整个沿江以南直至钦州廉州沿海）和大小瑶山及其周围县境两个匪患较严重的地区。

四十五军四十六军应集中整训应付万一

（1951年1月9日）

邓、谭、赵[1]，并告叶、方[2]：

一月六日电悉。（一）广西方面剿匪进展顺利，据陶铸[3]说三月以前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即可完成。似此四十五军应即于三月内集中梧州整训，湖南的四十六军应于二月内集中郴衡[4]线上整训，只要这两个军能于二、三月内集中上述地区，就可应付万一。（二）江西南部的四十八军情况如何，如有紧急需要，该军是否亦可向广东调动，盼告。（三）二十一兵团在广西南北两重点区剿匪工作完成后，如广东方面无紧急需要，应开到广西西北部剿匪以求锻炼，否则亦应集中梧州整训，究应如何届时再做决定。（四）广东剿匪工作现在是否已特别抓紧进行，何以很久没有剿匪成绩的报告，

---

[1] 邓、谭、赵，指邓子恢、谭政、赵尔陆，当时分别任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第三政治委员和参谋长。

[2] 叶、方，指叶剑英、方方，当时分别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3]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派往广西帮助领导剿匪工作。

[4] 郴衡，指湖南郴州和衡阳。

请叶方检查电告。

毛泽东

一月九日

给饶漱石、陈丕显[1]的信

（1951年1月10日）

漱石、丕显同志：

黄炎培[2]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陈丕显，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员会书记。

[2] 黄炎培，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工商界抗美援朝运动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10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希望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对于工商业家的爱国运动，加以充分的注意。兹将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工商业界抗美援朝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央

一月十日

关于志愿军九兵团改善装备的批语[1]

（1951年1月10日）

周、聂[2]：

九兵团要求改善装备，补足骡马，早补新兵，请考虑解决。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1950年1月9日关于部队的基本情况与要求给彭德怀、邓华并报军委的电报上。

[2] 周，指周恩来。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同意中南军区集中兵力应付广东方面情况的电报

（1951年1月12日）

邓、谭、赵[1]：

一月十一日电悉。即照你们的部署，从四月起集中六个军应付广东方面的情况，从六月起，再增加四十七军两个师。请督促各军按期完成此计划。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

关于防御国民党军队进攻厦门、汕头的电报

（1951年1月13日）

陈、饶，邓、谭，叶、方[1]：

（一）据一月八日可靠情报称：何应钦[2]代表蒋介石应麦克阿瑟[3]之召赴东京，携有已为蒋所核准之计划，准备用廿至廿五万兵力攻占厦门、汕头，拟与麦魔具体研究此项计划及预计效果。何匪赴东京翌日，郑介民[4]亦密飞东京，并携有大陆土匪武装分布及与台匪联络情况。该项情报又称：麦魔通知蒋贼可能在一月底宣布终止台匪出击大陆的限制等情。蒋匪进攻厦门汕头可能性很大，望迅速研究对策。（二）请陈毅同志考虑对厦门增加防御兵力，加强防御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2] 何应钦，国民党政府军高级将领，当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

[3] 麦克阿瑟，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

[4] 郑介民，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当时是台湾国民党国民党政府战略顾问。

工事，加强炮兵及高射炮，储备粮食弹药，派去得力指挥人员，并须预筹由大陆向厦门的增援计划，务达击退进犯匪军，确保厦门之目的。请通知叶飞[1]速筹对策电告。（三）汕头及海陆丰必须迅速部署两个军，其办法为从广东三个军中以一个军的全部（三个师及军部）集中于该区域，湖南的四十六军立即出动直开该区域，并设立指挥两个军的指挥机关。请邓谭筹划电告。（四）福建广东两省剿匪工作务须加紧督促，早日完成，不得迟误。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

在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稿上的批语[1]

（1951年1月）

美国并没有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

毛

---

[1] 这是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朝鲜战争宣传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稿时写的批语。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写在电报稿中他删去的“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狂妄打算已遭受严重的打击”一句旁边。

关于青海骑兵支队配合十八军入藏问题致邓小平[1]电

（1951年1月14日）

小平同志：

张宗逊[2]一月九日的电报你是否已看到，他提议以七百五十人及一千匹马的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粮食，配合十八军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以后供给问题全由你们负责解决。你们是否同意此项提议，望考虑电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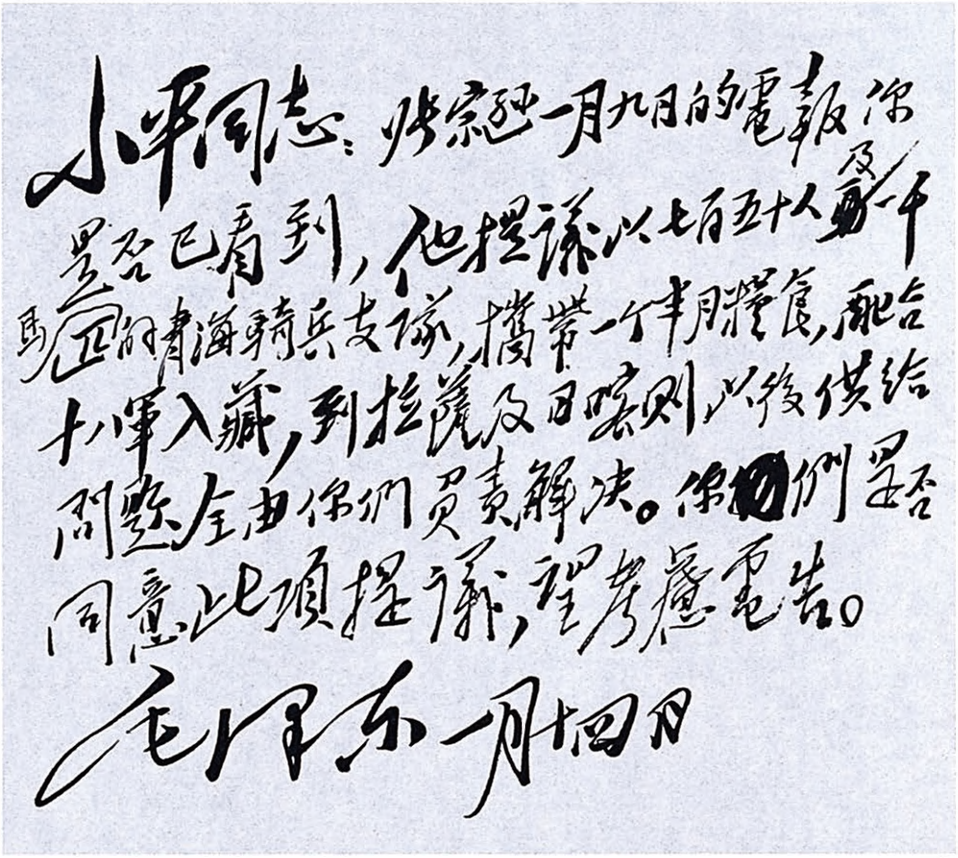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小平同志：张宗遜一月九日的電報你是否已看到，他提議以七百五十人及一千馬匹的青海騎兵支隊，攜帶一个半月糧食，配合十八軍入藏，到拉薩及日喀则以後供给問題全由你們負責解決。你們是否同意此項提議，望考慮電告。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毛泽东致邓小平电的手稿。

关于改写给金日成的备忘录的批语

（1951年1月14日）

周[1]：

我已告彭[2]，叫他和金[3]暂时不要来，他们定廿四日开干部会，不可能来北京。因此，请你改写一个给金日成的备忘录[4]，我看后用电报发去征求金同意。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

[4] 指关于朝鲜停战和谈判问题的备忘录。

对出版《八一》杂志报告的批语[1]

（1951年1月14日）

同意。[2]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和萧华1951年1月13日报告的批语。

[2] 罗荣桓等的报告说：为加强对部队的思想与工作指导，总结国防军队建设经验，总政拟出版一个全军性的综合杂志，定名为《八一》杂志，内容包括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干部管理工作、后勤工作，作为军委的机关刊物，对象主要是团以上干部。报告还提出了指导委员会、编辑委员会名单。

给徐悲鸿[1]的信

（1951年1月14日）

悲鸿先生：

十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永懋先生所为书[2]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应对石先生予以照顾。最好在先生所办的学校予以位置，如不可能则请持此信向中央文教委员会接洽酌定解决办法。

此复，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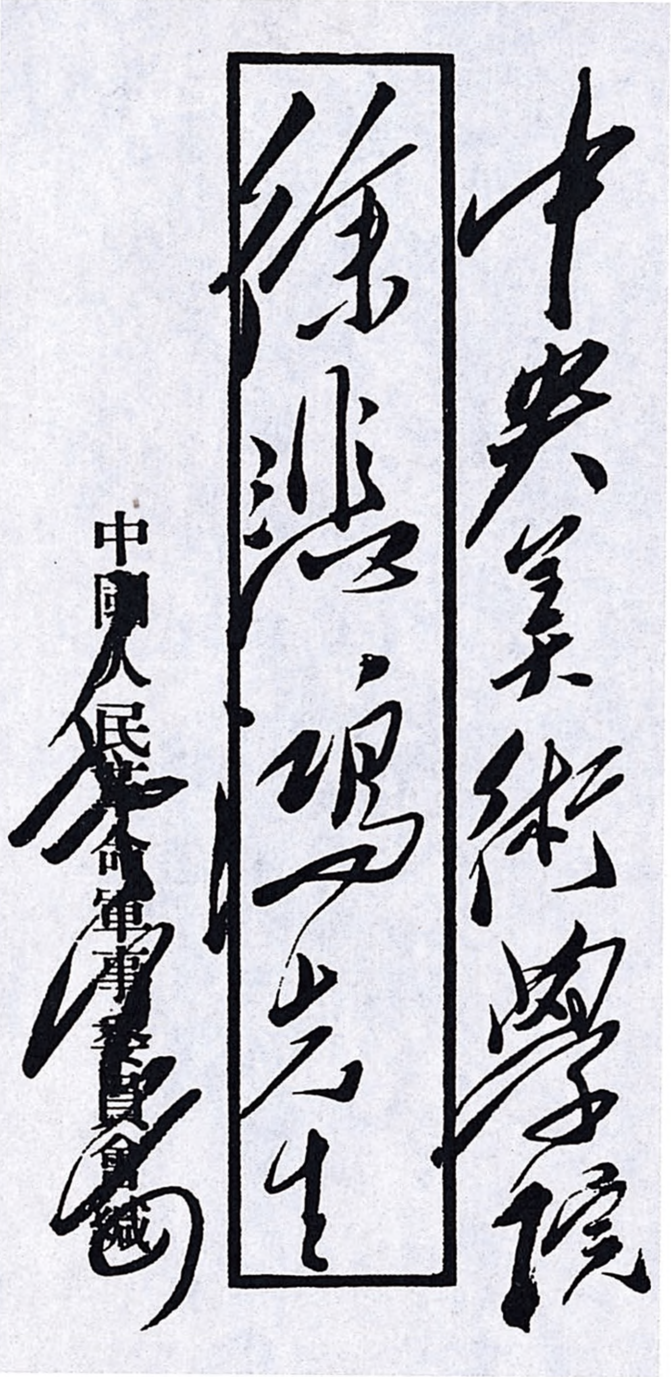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徐悲鸿，画家，当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2] 指在天津做过中学教员的石永懋所写的《论语正》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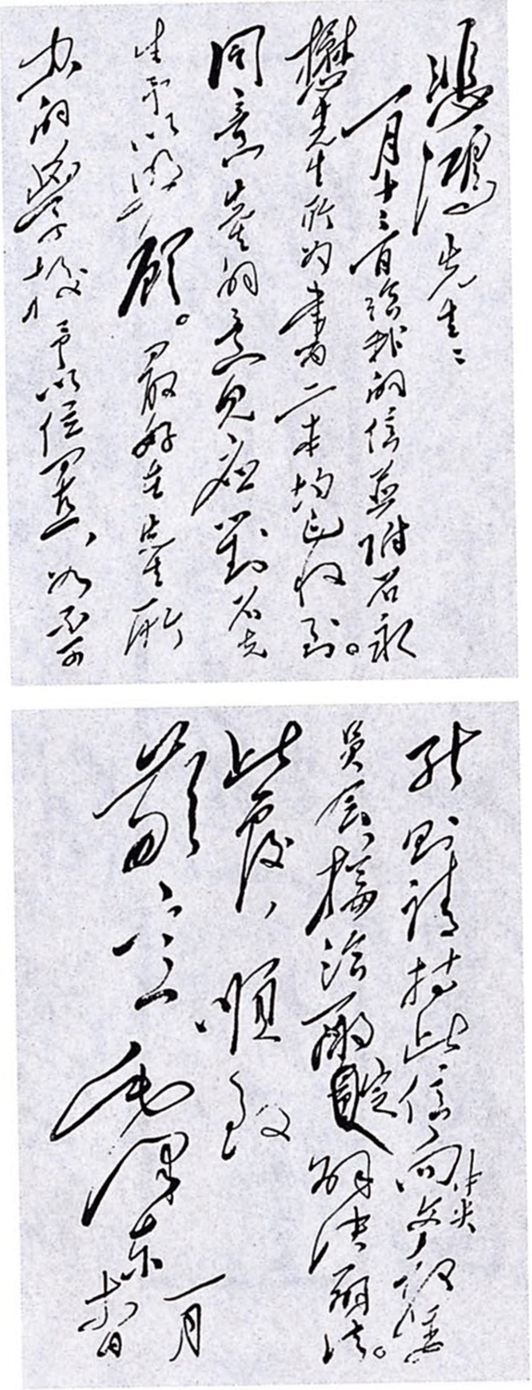
中央美術學院

徐悲鴻先生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寄

毛泽东致徐悲鸿信的信封。



悲鸿先生：

一月十三日给我的信并附石秋樵先生所为书二本均已收到。同意先生的意见，[illegible]石先生可以[illegible]。最好先生[illegible]为宜。[illegible]此信向中央[illegible]接洽[illegible]。此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一月[illegible]日

毛泽东致徐悲鸿信的手稿。

给李思安[1]的信

（1951年1月14日）

思安先生：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2]同学他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此复，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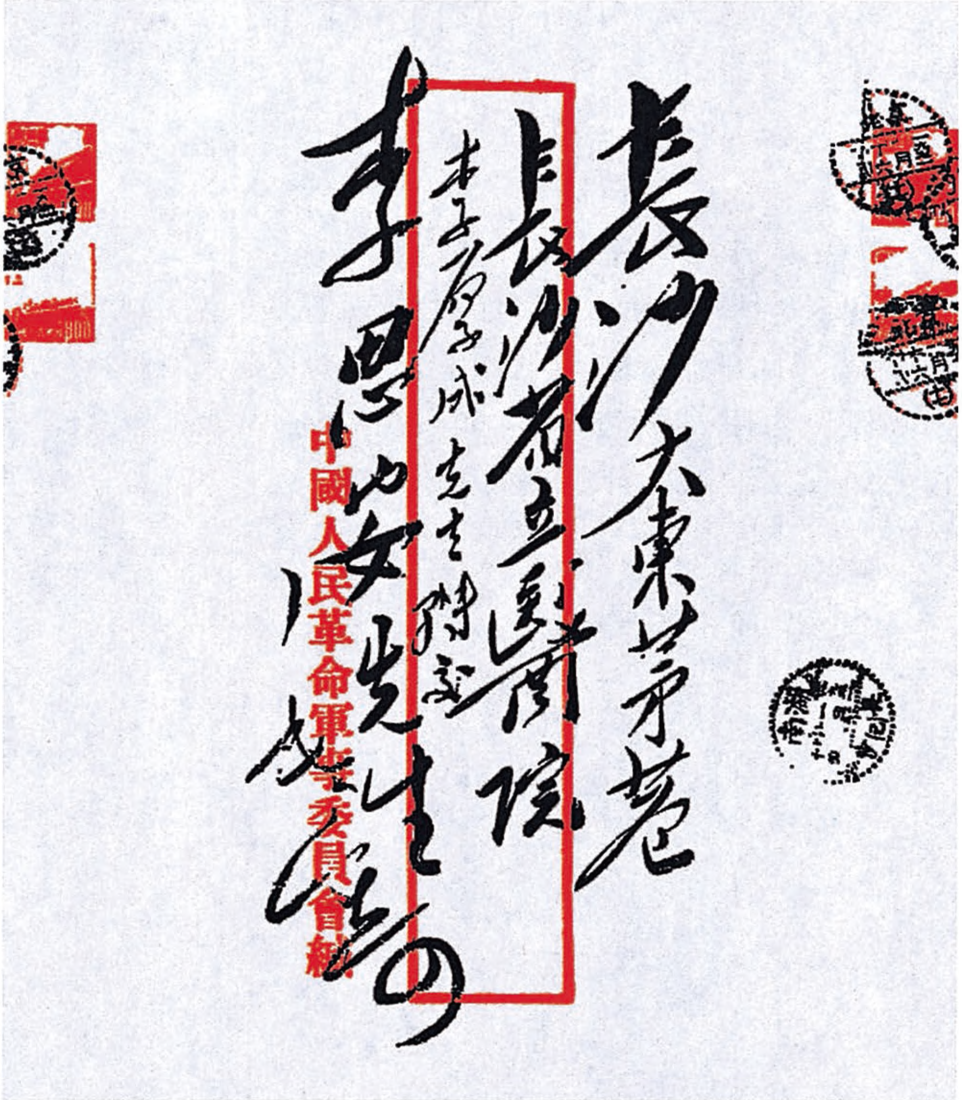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李思安，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去印度尼西亚教书，1950年回国，后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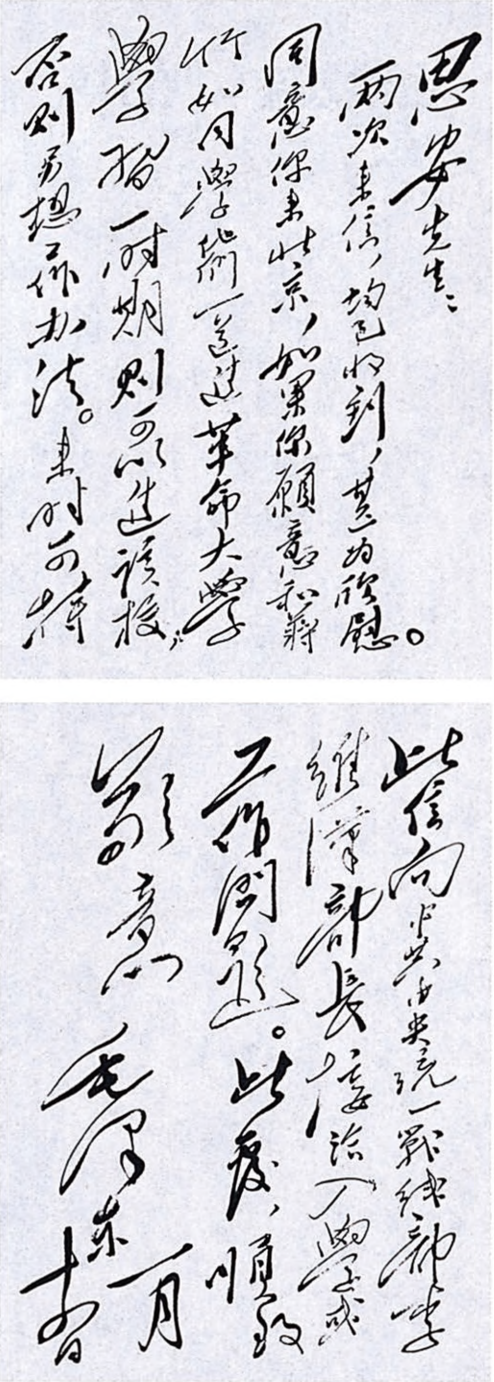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長沙大東茅巷
長沙省立醫院
李[illegible]成先生轉交
李思安先生
[illegible]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李思安信的信封。



思安先生：

两次来信，均已收到，甚为感谢。同意你来北京，如果你愿意和蒋竹如同学们一道进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则可以进该校，否则另想工作办法。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入学或工作问题。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十四

毛泽东致李思安信的手稿。

给戴毓本[1]的信

（1951 年 1 月 14 日）

毓本先生：

十二月廿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甚慰。假如你下了决心，又能吃苦，我同意你来北京进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时期，然后再做你所熟习的工作。或者不进学校，来京径做医务工作也好。来时可持此信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李维汉部长接洽。如果你在湖南已有工作，并能安下去，则以不来为好。此复，顺致

敬意

习梅[2]兄同此。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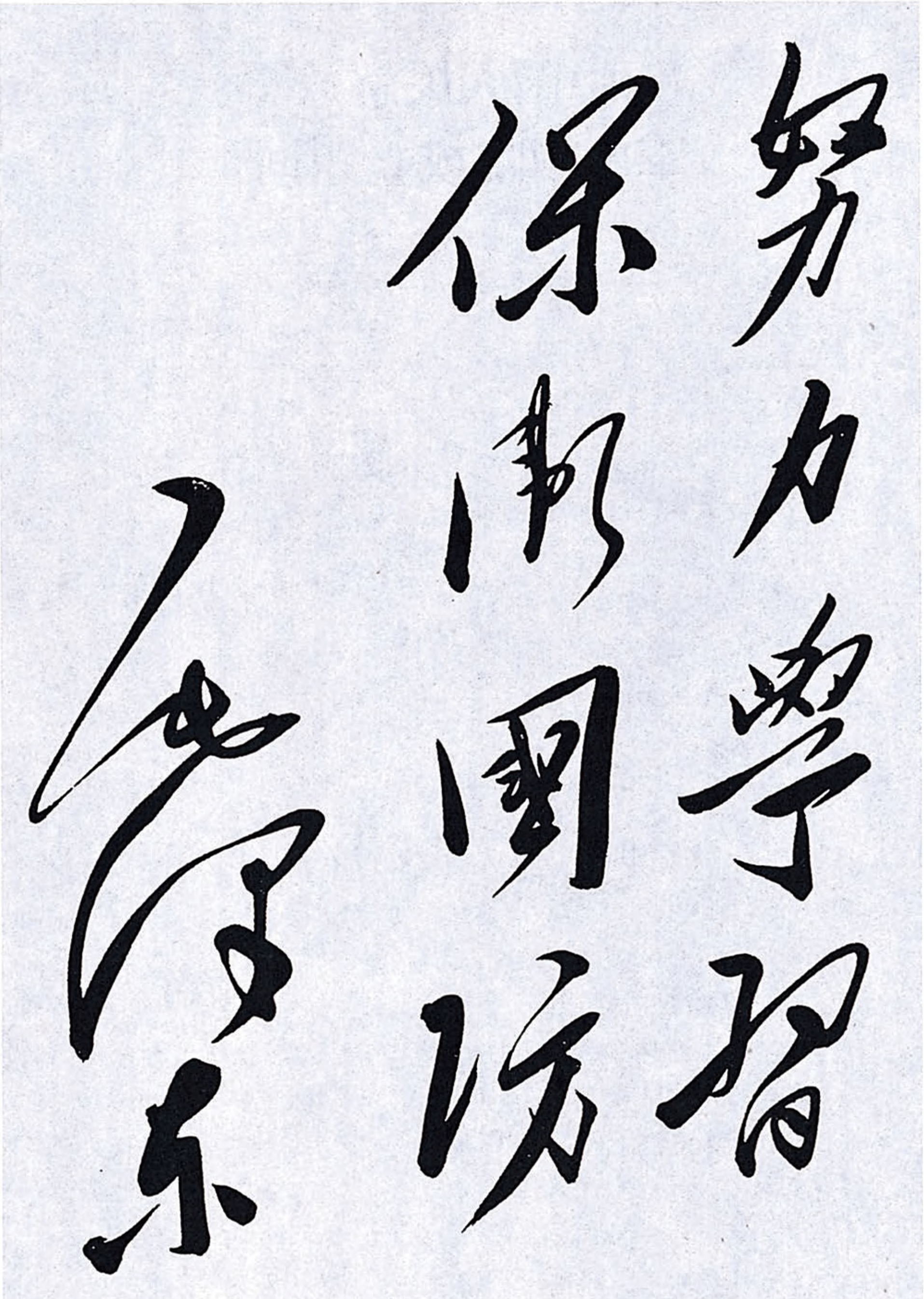
（1951年1月15日）

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1951年1月15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的题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今国防大学的前身。1951年1月15日于南京成立，刘伯承为第二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军事学院的任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军事学说和毛泽东军事思想；总结我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学习外国的有益经验；在我国现有军事、政治素质的基础上，训练合成军队的指挥员在现代条件下组织指挥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提高我军军事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的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努力学习
保卫国防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的题词。

给马叙伦[1]的信

（1951年1月15日）

夷初先生：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2]一件付上请察阅，其中第三项即谈到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请与各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

[1] 马叙伦，字夷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年团华东工委1951年1月11日关于学校工作给各地党委、团委并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的电报。其中第三项谈到，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学生体质孱弱，患病者很多。但解放以来，各地未能很好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之原则，因此造成公立学校之体格最差，大学比中学又差的现象严重存在，这点应引起十分警惕。应按华东高教会议的规定，适当减少正课时间，照顾学生健康需要。毛泽东在这一段话旁边写了批注：“这是正确的。”

确保厦门并加强华东沿海防务

（1951 年 1 月 16 日）

陈毅[1]同志，并告饶[2]：

寒午电悉。（一）同意你的第一步和第二步计划，福建有四个军已很够了。厦门必须确保，有三十一军全部位于厦门及其附近当能担负这个任务。该军战斗力如何盼告。（二）厦门必须多储粮弹，布置积极防空（不是消极防空），对守军指战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强纵深工事，务必长期确保厦门。（三）空军准备赴朝鲜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四）除福建首先是厦门为敌人进攻重点已有部署外，江浙两省沿海亦需准备对付敌人进袭，因此二十四军应在常州地区照常整训，不要去福建。华东全军除剿匪者外，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训，准备对敌。（五）请督促福建担任剿匪的四个师两个团积极动作，每星期要有成绩，成绩多者应受奖励，少者应受批评，犯错误应受处罚，务必早日肃清匪祸。（六）华东全军应完全自力担负歼灭蒋匪进攻部队，不要希望外援。（七）江浙散匪必须限期肃清。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电报

（1951年1月17日）

饶、陈，邓、谭，邓、贺，习、张，薄、聂、刘，高、贺，叶、方[1]诸同志：

顷接中南局转来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在

---

[1]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薄，指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刘，指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晋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湘西廿一个县中杀了匪首恶霸特务四千六百余人，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华北新区约有二千万左右人口是在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〇年两年内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分配土地的，匪首恶霸特务杀得太少，至今这些地方的地主威风还有很多没有打下来，贫苦群众不敢抬头。一贯道等会门甚为猖獗，有众二百余万。故现在须重新提出镇压反革命的问题。而在华北老区及东北老区则因对反革命镇压彻底，人民高兴，生产积极，匪患绝迹。当然，我们不应重复华北老区在一九四六年及一九四七年许多地方所犯过的乱捉乱杀错误，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新区必须注意这一点。只要不杀错，又注意策略（事先事后向各界人民多做宣传解释工作，注意时间地点，分期分批，分军队地方等等），对于真正的匪首恶霸及坚决的特务分子，必须在人民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坚决地处以死刑。特别是那些土匪猖獗，恶霸甚多，特务集中的地方要大杀几批。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现当反美土改两个高潮的时机，请你们抓紧此事，善为处理。湘西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附后。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2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0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同意青海骑兵支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1
（1951年1月17日）
在杨尚昆关于朱德患肺炎需要休养的报告上的批语……………………………2
（1951年1月18日）
致新疆省和田专区各族人民电…………………………………………………3
（1951年1月18日）
和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 ……………………………4
（1951年1月19日）
对彭德怀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8
（1951年1月19日）
华东应准备独力歼灭可能进犯之敌 ……………………………………………11
（1951年1月21日）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致中南局电 ………12
（1951年1月21日）
关于镇反部署致上海市委电 ……………………………………………………14
（1951年1月21日）
祝贺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15
（1951年1月21日）
关于建议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致邓小平电 …………………………………16
（1951年1月22日）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8
（1951年1月22日）
关于四十五军等部队行动部署致陶铸电 ……………………………19
（1951年1月22日）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给彭真的信 ………………………………………20
（1951年1月22日）
对河北阜平、曲阳灾区救济问题的批语 ……………………………21
（1951年1月22日）
给张澜的信 ……………………………………………………………22
（1951年1月22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抗美援朝和推销土产工作报告的批语 ………24
（1951年1月23日）
关于撰写介绍《实践论》文章给陈伯达的信 ………………………25
（1951年1月23日）
关于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和复张云逸电 ………………………26
（1951年1月23日、24日）
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局十一、十二月综合报告的批语 ……………29
（1951年1月24日）
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 …………………………………31
（1951年1月24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的批语 ……………………33
（1951年1月24日）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34
（1951年1月24日）
关于编印学校反美斗争文件给彭真的信 ……………………………36
（1951年1月24日）

关于转送张澜复信致邓小平电 ……37
（1951年1月24日）
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报告的批语 ……38
（1951年1月25日）
给傅作义的信 ……39
（1951年1月26日）
在印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的祝词 ……40
（1951年1月26日）
给齐白石的信 ……41
（1951年1月27日）
关于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审判反革命罪犯的批语 ……42
（1951年1月28日）
关于嘉奖西南剿匪部队的电报 ……44
（1951年1月28日）
给张澜的信 ……46
（1951年1月28日）
志愿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 ……47
（1951年1月28日）
关于不要到处修工事致张云逸等电 ……49
（1951年1月29日）
关于华东沿海构筑工事问题致陈毅电 ……51
（1951年1月29日）
军委查询十八军入藏物资准备情况的电报 ……52
（1951年1月29日）
军委关于对越南同志要取耐心说服态度的电报 ……53
（1951年1月29日）

关于统一领导完成广西剿匪和土改等任务致陶铸电 ……………54
（1951年1月30日）
关于注意玉树地委开展医疗贸易工作的经验致邓小平电 …………56
（1951年1月30日）
在华东军区关于修建水吉至建瓯公路的请示电上的批语 …………57
（1951年1月30日）
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 ……………………………………58
（1951年1月）
为《察哈尔日报》题写报头 ……………………………………59
（1951年1月）
为《钢铁小报》题写报头 ………………………………………60
（1951年1月）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61
（1951年2月1日）
关于颁布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的电报 …67
（1951年2月1日）
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 ………………………………69
（1951年2月7日）
中央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报 …………………71
（1951年2月7日）
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 …………………………………72
（1951年2月7日）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73
（1951年2月7日）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工会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致饶漱石电 …………75
（1951年2月7日）

为柳亚子居所题词 ……………………………………………76

（1951年2月7日）

关于转发山东分局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77

（1951年2月8日）

中央对华北局部署镇反及审查留用人员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78

（1951年2月10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补充指示的批语 ……………80

（1951年2月10日）

中央关于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土改工作的批语 ……………………81

（1951年2月10日）

转发陈丕显关于苏南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82

（1951年2月11日）

给马叙伦的信 ……………………………………………………83

（1951年2月12日）

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名 ………………………………………84

（1951年2月12日）

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致斯大林电 ………………85

（1951年2月12日）

给黄炎培的信 ……………………………………………………86

（1951年2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 ……………………………87

（1951年2月18日）

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 ……………………………93

（1951年2月18日）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95

（1951年2月21日）

给符定一的信 ……………………………………………………………96
（1951年2月21日）
中央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 …………………………97
（1951年2月22日）
在《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来信上的批语………………………………98
（1951年2月23日）
转发罗瑞卿考察广东、广西、江西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99
（1951年2月25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101
（1951年2月25日）
转发川西军区清匪报告的批语……………………………………………102
（1951年2月25日）
军委关于撤回新疆入藏部队问题致王震电………………………………103
（1951年2月25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市政建设计划的批语……………………………104
（1951年2月26日）
关于继续肃清福建一切股匪致叶飞等电…………………………………105
（1951年2月26日）
中央转发川东区党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106
（1951年2月27日）
中央转发川西区党委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情况报告的批语……107
（1951年2月27日）
中央关于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的电报…………………108
（1951年2月28日）
转发西南军区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109
（1951年2月28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的批语……………110
（1951年2月28日）
为人民出版社题名……………………………………………111
（1951年2月）
为《军学》题名………………………………………………112
（1951年2月）
关于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113
（1951年3月1日）
给胡乔木的信…………………………………………………115
（1951年3月2日）
关于修改《矛盾论》给陈伯达、田家英的信…………………117
（1951年3月8日）
转发罗瑞卿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118
（1951年3月9日）
给杨尚昆的信…………………………………………………120
（1951年3月9日、20日）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的批语………122
（1951年3月11日）
给戴毓本的信…………………………………………………124
（1951年3月11日）
给胡乔木的信…………………………………………………125
（1951年3月14日）
关于校对《矛盾论》给田家英的信……………………………126
（1951年3月15日）
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127
（1951年3月18日）

转发黄敬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129
（1951年3月18日）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130
（1951年3月18日）
转发西南公安部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总结报告的批语…131
（1951年3月18日）
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　……………………132
（1951年3月18日、30日）
给周世钊的信……………………………………………………134
（1951年3月19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城市镇反指示的批语…………………………135
（1951年3月20日）
转发薄一波、刘澜涛三月份综合报告的批语…………………136
（1951年3月20日）
对邓小平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不纯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137
（1951年3月20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39
（1951年3月20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就黄祖炎被刺杀对所属市、地委的指示的批语…140
（1951年3月20日）
给胡乔木的信……………………………………………………141
（1951年3月20日）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批语…143
（1951年3月22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的指示的批语…144
（1951年3月23日）

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几个大中城市镇反工作考察报告的批语……145
（1951年3月23日）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沧县地委镇反工作经验的通报的批语…………147
（1951年3月23日）
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致饶漱石电…………………………148
（1951年3月24日）
转发河北省公安厅关于天津专区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报告的批语…150
（1951年3月25日）
给李达的信…………………………………………………………151
（1951年3月27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反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53
（1951年3月27日）
给胡乔木的信………………………………………………………154
（1951年3月29日）
转发黄克诚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56
（1951年3月30日）
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158
（1951年3月30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的批语…………………159
（1951年3月30日）
转发空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检讨和决定的批语…………………160
（1951年3月30日）
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镇反给刘少奇等的信………………161
（1951年3月30日）
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162
（1951年3月30日）

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的电报……………164
（1951年3月30日）
关于播发许建国等在天津镇反大会上发言的电话稿…………165
（1951年3月31日）
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166
（1951年3月31日）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169
（1951年3月）
关于继续努力消灭残匪致叶飞等电…………………………170
（1951年4月1日）
给田家英的信…………………………………………………171
（1951年4月1日）
转发饶漱石关于镇反中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72
（1951年4月2日）
转发中南局传达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174
（1951年4月2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的批语……176
（1951年4月2日）
给李介侯的信…………………………………………………177
（1951年4月2日）
给张澜的信……………………………………………………178
（1951年4月3日）
给张云逸的信 ………………………………………………180
（1951年4月3日）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181
（1951年4月3日）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182
（1951年）
给毛宇居的信………………………………………………184
（1951年4月5日）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185
（1951年4月7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城市镇反经验报告的批语………186
（1951年4月7日）
为翻译《斯大林全集》给斯大林的电报…………………187
（1951年4月7日）
给田家英的信………………………………………………188
（1951年4月7日）
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189
（1951年4月9日）
给李维汉的信………………………………………………190
（1951年4月9日）
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91
（1951年4月10日）
关于镇反工作中两个突出经验的通报……………………193
（1951年4月10日）
转发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195
（1951年4月13日）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镇反工作计划的批语 …………………196
（1951年4月13日）
转发南京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197
（1951年4月13日）

防敌从元山登陆……………………………………………………198
（1951年4月13日）
给田家英的信……………………………………………………200
（1951年4月16日）
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指示的批语…………………201
（1951年4月17日）
转发天津市通过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进行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203
（1951年4月17日）
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204
（1951年4月17日）
转发山东军区关于镇反和审查不良分子的计划的批语……………205
（1951年4月17日）
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207
（1951年4月17日）
给胡南浦的信……………………………………………………208
（1951年4月17日）
转发罗荣桓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调查报告的批语……………209
（1951年4月19日）
对陈毅巡视福建工作报告的复电和批语…………………………211
（1951年4月19日）
转发河北省农业厅审查旧人员的经验的批语……………………213
（1951年4月20日）
给杨尚昆的信……………………………………………………214
（1951年4月20日）
转发师哲关于陪同费德林访问情况报告的批语…………………215
（1951年4月21日）

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216
（1951年4月22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镇反工作补充指示的批语……………………………219
（1951年4月23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工厂、企业、学校中开展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220
（1951年4月23日）
对订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情况简报的批语…………………………221
（1951年4月26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的批语……222
（1951年4月27日）
给司徒美堂的信…………………………………………………………223
（1951年4月27日）
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225
（1951年4月27日）
注意在第五次战役中给敌以尽可能大的打击…………………………226
（1951年4月28日）
给陈文新的信……………………………………………………………228
（1951年4月29日）
为炮兵学校题词…………………………………………………………230
（1951年4月）
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的批语………………232
（1951年4月30日）
转发二十三兵团党委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的批语…………235
（1951年5月4日）
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237
（1951年5月4日）

给张治中的信……238
（1951年5月5日）
关于同意苏联就美国对日和约草案所拟复文的电报……240
（1951年5月6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的批语……241
（1951年5月7日）
转发谭震林关于杭州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242
（1951年5月7日）
关于印发南京市公安局纯洁内部的计划的批语……244
（1951年5月7日）
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245
（1951年5月8日）
对中南军区关于华南海防战备报告的复电和批语……247
（1951年5月10日）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的批语……249
（1951年5月10日）
同意在朝鲜战争结束前推迟解放金门……250
（1951年5月10日）
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报告的批语……251
（1951年5月12日）
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的批语……252
（1951年5月15日）
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清理“中层”计划的批语……254
（1951年5月15日）

转发四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256
（1951年5月15日）
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257
（1951年5月15日）
关于争取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的批语……258
（1951年5月15日）
给王淑兰的信……259
（1951年5月15日）
为治淮工程题词……261
（1951年）
中央关于转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通知……263
（1951年5月16日）
转发邓小平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271
（1951年5月16日）
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的电报……273
（1951年5月16日）
关于鼓励部队继续剿匪致广西军区电……274
（1951年5月16日）
关于清理“中层”问题致高岗电……275
（1951年5月16日）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反宣传计划的批语……276
（1951年5月16日）
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277
（1951年5月16日）
在总政转发西北军区航空处镇反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一段话……279
（1951年5月17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等关于涡阳事件的电报的批语……………………280
（1951年5月19日）
转发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情况报告的批语……………………………………………………282
（1951年5月19日）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283
（1951年5月20日）
中央关于印发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的通知 …………285
（1951年5月21日）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的批语…286
（1951年5月21日）
关于同意目前收兵休整致彭德怀电…………………………………287
（1951年5月22日）
中央批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的通知……………………………………………………288
（1951年5月22日）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的批语……289
（1951年5月23日）
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水平………………………………………290
（1951年5月23日）
转发武威地委关于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报告的批语……………291
（1951年5月23日）
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292
（1951年5月24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298
（1951年5月24日）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300
（1951年5月25日）

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303
（1951年5月26日）

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草稿时加写和改写的话……………………………………………………305
（1951年5月26日）

给章士钊的信……………………………………………………………………307
（1951年5月26日）

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歼敌…………………………………………………308
（1951年5月27日）

关于华东各城市收回捕杀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致饶漱石电…310
（1951年5月28日）

为陈永康题词……………………………………………………………………311
（1951年5月28日）

关于同意阻敌和兵力调动计划致彭德怀电……………………………315
（1951年5月31日）

转发邓子恢关于城市工作报告的批语…………………………………316
（1951年5月31日）

对薄一波报批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央局的电报等文稿的批语…318
（1951年5月31日）

询问我军阵地构筑和防守情况…………………………………………320
（1951年5月31日）

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321
（1951年6月1日）

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的批语………………322
（1951年6月1日）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关于汉口特务纵火事件报告的批语……………323
（1951年6月2日）
关于三兵团休整和接防问题致彭德怀电………………………………324
（1951年6月2日）
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326
（1951年6月2日）
关于处理涉及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的批语……………328
（1951年6月3日）
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侧面登陆之敌……………………………………329
（1951年6月4日）
在审阅《人民日报》关于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社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330
（1951年6月6日）
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的批语…………………………………………………331
（1951年6月8日）
六七两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337
（1951年6月11日）
为了解敌占金化、铁原后的动态及我军部署致彭德怀电…………338
（1951年6月13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通县传达贯彻“死缓”政策的情况报告的批语…339
（1951年6月15日）
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患病的电报上的批语………………………340
（1951年6月16日）
对民主德国举行“德中友好月”的感谢电……………………………341
（1951年6月18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经验报告的批语…342
（1951年6月19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山西省直属机关审干情况报告的批语……………344
（1951年6月19日）
关于抓紧镇反和清理工作致陈毅电……………………………345
（1951年6月19日）
在胡乔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语…………………………………………………346
（1951年6月21日）
请苏联提供六十个师装备并在六个月内运至中国………………348
（1951年6月21日）
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现代化的骨干……………350
（1951年6月21日）
给李烛尘的信……………………………………………353
（1951年6月23日）
给李介侯的信……………………………………………355
（1951年6月23日）
空军应抓紧做好参战准备…………………………………356
（1951年6月24日、27日）
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犯人参加生产建设的报告的批语……………358
（1951年6月25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镇反工作指示的批语……………………………359
（1951年6月25日）
在符定一来信上的批语……………………………………360
（1951年6月26日）
请会商朝鲜和平谈判准备问题……………………………361
（1951年6月29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等问题…………………………………363
（1951年6月29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时间地点等事宜……………………………365
（1951年6月30日）
停战谈判代表以朝鲜人民军为主……………………………367
（1951年6月30日）
在审阅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369
（1951年6月）
对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总结部署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371
（1951年6月）
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372
（1951年6月）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的第二阶段作战方针…………………373
（1951年6月）
关于准备和谈会议有关问题致彭德怀电………………………376
（1951年7月2日）
停战谈判期间军事上应采取的对策……………………………378
（1951年7月2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380
（1951年7月3日）
关于共同筹备谈判会场及开会事宜致金日成电………………383
（1951年7月4日）
关于保障开城地区的安全致彭德怀电…………………………384
（1951年7月4日）
关于速去开城准备停战谈判事宜致金日成等电………………385
（1951年7月4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统战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387
（1951年7月6日）

关于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处理办法的批语……………388
（1951年7月7日）
空军部队不要进驻朝鲜北部机场…………………………………389
（1951年7月7日）
停战谈判不要提赔偿等问题………………………………………390
（1951年7月9日）
对总政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指示稿的批语和改写的话………391
（1951年7月9日）
关于对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的意见致李克农电…………………392
（1951年7月9日）
关于坚持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列入议程等致李克农电……………394
（1951年7月11日）
在薄一波关于傅作义情况的来信上的批语…………………………395
（1951年7月11日）
同意步兵师新编制……………………………………………………396
（1951年7月11日）
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和给胡乔木的信……………………397
（1951年7月）
关于同苏联谈判订购军事装备和兵工建设问题……………………406
（1951年7月12日）
关于容许新闻记者进入开城地区问题致李克农电…………………408
（1951年7月12日）
中央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推迟召开的电报……409
（1951年7月12日）
在胡乔木关于翻译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10
（1951年7月13日）

关于拍发、广播对李奇微的复文修正稿致李克农电……………411
（1951年7月14日）
关于同意李奇微划中立区的提议致李克农电……………………412
（1951年7月14日）
关于限定谈判代表团人数和划定中立区面积问题致李克农电……413
（1951年7月14日）
关于不必再发记者问题公报致李克农电…………………………414
（1951年7月14日）
关于修改和广播对李奇微的复文致李克农电……………………415
（1951年7月14日）
关于金日成、彭德怀电复李奇微原则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暂时
中立区的电讯稿……………………………………………………417
（1951年7月14日）
给黄炎培的信………………………………………………………420
（1951年7月15日）
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421
（1951年7月17日）
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的修改………………………………………422
（1951年7月20日）
关于做好尤金来华的接待工作致高岗电…………………………423
（1951年7月20日）
在关于修改谈判议程问题发言稿给李克农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424
（1951年7月24日）
停战前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完全必要………………………425
（1951年7月26日）
给张元济的信………………………………………………………426
（1951年7月30日）

九月战役的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428

（1951年8月1日）

在胡乔木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429

（1951年8月1日）

给张云逸的信………………………………………………………430

（1951年8月5日）

给李介侯的信………………………………………………………431

（1951年8月10日）

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432

（1951年8月11日）

对袁仲贤关于尼赫鲁催要毛泽东诗词的报告的批语……………434

（1951年8月20日）

对航空工业建设问题的批语………………………………………435

（1951年8月21日）

对敌实施战术反击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439

（1951年8月21日）

准备对付可能在镇南浦登陆之敌…………………………………440

（1951年8月26日）

以十月二十五日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441

（1951年8月28日）

对西安市在清理积案中组织罪犯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经验的批语………………………………………………………………442

（1951年9月1日）

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主席的贺电………………………443

（1951年9月1日）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致斯大林电……………………………444
（1951年9月2日）
在中央关于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给张经武的电报稿上
加写的一段话……………………………………………………………445
（1951年9月3日）
给毛宇居、文梅清、张有成的信………………………………………446
（1951年9月4日）
给张元济的信……………………………………………………………448
（1951年9月5日）
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的批语和修改………………………449
（1951年9月）
对南京市委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的批语…………………………452
（1951年9月8日）
关于荆嗣佑工作安排的信………………………………………………454
（1951年9月8日）
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456
（1951年9月9日）
在马寅初关于北京大学教员政治学习问题给周恩来的信上的批语……459
（1951年9月11日）
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的信……………………………………………460
（1951年9月12日）
给王自勉的信……………………………………………………………462
（1951年9月12日）
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兵力部署………………………………………463
（1951年9月13日）
致米丁电…………………………………………………………………465
（1951年9月20日）

给黄炎培的信……466
（1951年9月22日）
致邓子恢电……467
（1951年9月24日、25日）
关于印发纠正文字缺点的文件给刘少奇等的信……469
（1951年9月25日）
致饶漱石电……471
（1951年9月25日）
接受缅甸大使吴拉茂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72
（1951年9月27日）
对章士钊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情况来信的批语……474
（1951年9月29日）
中央同意新疆分局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检讨的电报……476
（1951年9月30日）
对刘亚楼等关于空四师空战报告的批语……479
（1951年10月2日）
关于更换谈判会址问题致李克农电……480
（1951年10月3日）
给徐冰的信……481
（1951年10月4日）
为马毛姐题词……482
（1951年10月4日）
对李维汉关于给班禅送礼等事的报告的批语……483
（1951年10月6日）
给谭熙春的信……484
（1951年10月7日）

给戴毓本的信……………………………………………………………………485
（1951年10月10日）
给贺晓明的信……………………………………………………………………486
（1951年10月10日）
给文炳璋的信……………………………………………………………………487
（1951年10月10日）
给雷瀚的信………………………………………………………………………489
（1951年10月11日）
在关于扩大中立区问题给李克农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490
（1951年10月12日）
在铁道部工程师韩伯林反映住房及房租问题的来信上的批语……491
（1951年10月12日）
中央关于由邓华转达中央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的电报…492
（1951年10月14日）
给陈叔通的信……………………………………………………………………495
（1951年10月14日）
关于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496
（1951年10月17日）
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498
（1951年10月17日）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499
（1951年10月23日、11月1日）

同意青海骑兵支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

（1951年1月17日）

宗逊[1]，并告仲勋[2]及贺、邓[3]：

一月九日电悉。同意你的提议，用青海骑兵支队携带一个半月的粮食配合西南军队入藏，到拉萨及日喀则后由西南负责解决给养问题。请即照此作准备，并请注意：（一）从青海藏人中招收少数志愿兵，例如二三百人马，给以训练武装，加入骑兵支队；（二）班禅[4]集团随军入藏的各项准备工作；（三）该支队受十八军指挥，并编入十八军序列。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

[1] 宗逊，即张宗逊，当时任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3]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4]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在青海。

在杨尚昆[1]关于朱德患肺炎需要休养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1年1月18日）

同意朱总司令休养计划，时间应长一点。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致新疆省和田专区各族人民电

（1951年1月18日）

新疆省人民政府转和田区各民族人民：

和田区军民联欢大会一月一日来电已悉。感谢你们积极拥军优属，并为抗美援朝与保卫世界和平的努力，祝你们永远的团结和进步！

毛泽东

子巧

和各中央局及大城市党委统战工作同志谈话纪要

（1951年1月19日）

□□□简述此次统战工作会议两项议题中第一议题反帝爱国统一战线的情况。谈及工商界、上层知识分子及宗教界均已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运动时，主席指出——

对佛教问题的处理，要研究一下，要使他们参加到运动中来。佛教改革如何做，要他们里面的开明分子商量一下。他们中有人说，他们没有信佛教的自由，庙都被占了。信佛教的人也不少，不要不理会。北京市恐怕要给他们腾出几个庙来，五台山关系蒙、藏两个民族，恐怕要重修一下。

主席问西北、西南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回答此运动已在大城市及部分小城市中展开。主席指示——

应该趁此时机展开，这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小城市如天水的商人最近曾有电报给我，说他们已经举行了游行示威。这次运动应普遍开展，普及到所有的工厂和农村，使得家喻户晓，大家都参加进来。

谈到运动如何进一步开展时，主席指示——

可找几位这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谈，好好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朝鲜战争中，特别美帝在仁川登陆后，谣言较多，思想混乱，当时我们在宣传上还做得不够。主席指示——

在宣传上应当采取攻势，对特务造谣，镇压一下好。

反美、土改、镇压反革命，是当前三大运动。

中南同志反映，在土改中，农民进城捉人影响工商业。主席指示——

不可不捉，不可多捉。匪首恶霸是要捉的，但应合法地捉。

中南和西南同志报告，武汉和西南设立了城市联络组和减租退押调处委员会，作为适当处理土改和减租退押及城市联络问题的机关。主席指示——

设立这样的机关好，在几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要设立（县城是否设立，可以考虑），并且民主党派参加，由市政府管理，可捉者捉之，不可捉者则不捉，双方兼顾，合理解决，以免发生无政府状态。退押是要退的，也可经过这类机关商量。退多退少，适当处理，能多退则多退，不能多退则酌量少退。

主席问到华东情况，回答苏南各地现在情况好一些。主席说——

黄炎培先生准备去苏南看看土改，我向他说：你去看看很好，可以听到各级领导干部、农民和地主富农三方面的意见。

各地同志反映，地方上有些同志对民主人士去视察尚不免有所顾虑。主席指示——

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视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

地方同志反映，对于民主人士的视察和批评，缺乏积极的欢迎态度。主席进一步指示——

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项从尧、

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才做。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情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十个指头有九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你们对民主人士不要估计不足。要知道除了恶霸、匪首和特务分子以外，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决不能置之不理，而要采取积极态度。这个办法屡试屡验，结果总是好的。一切消极态度都是不对的，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有人看到毛病要骂怎么办？共产党连帝国主义都不怕，还怕人家骂？对民主人士要进行教育，并让他们参加活动。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与闻，这是不对的。

关于统战会议的第二个议题，即各民主党派组织的发展问题，主席指示——

这一问题要好好解决一下，不然我们所做的和所讲的不一致，下面同我们不一致，就不好。去年说要巩固，今年说要发展，如果今年还只是一个巩固，那是不行的。因为社会上有他们的阶层和人物存在，所以就应当发展。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这个问题应当写出几条，指示一下，应该在运动中使民主党派进步，放手让他们去做，好处多坏处少。这是积极的有益的方针。

各地同志反映，关于民主党派发展问题，有些地方干部思想上还有若干阻碍，如果没有党委有力的支持，就不易贯彻。主席指示——

应该使全党了解，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可以进步的。这次绥远二十三兵团已经调到冀中，这个部队的军长师长都是原来的人，过去和我们打过很多仗，连这个部队都可以进步，为什么民主党派

和民主人士就不可以进步呢？我们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烦。要使他们了解抗美、土改、肃反是必要的，并且使他们参加。搞国家政权总是有麻烦的，怕麻烦就不要政权好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过去找他们来都不来，现在来了，你们又怕麻烦。

□□□提到，有关统战部门本身的工作还缺乏一个章程，此次会议准备拟出几条。主席指示——

对统战部的编制、任务、范围和做法均有所规定，这是好的。直到地委一级均应有统战部门的组织才好，如何办，也研究一下。

有同志反映，主席去年说过，注意统战工作的，在党内还是少数，这个状态，今年在若干地区没有多大改变。主席指示——

这个少数派是正确的，只要坚持土改与肃反，这就不是右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要用积极态度去组织民主人士、民主党派，教育他们，使他们参加斗争，带领他们共同前进，这对劳动人民是有益的，对进入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少数派会慢慢扩大，主要依靠好好说服人家。应当每年开两次统战会议，一次大的，一次小的，各中央局至区党委都应如此。不要怪别人，只怪你们自己没有招兵买马、积草囤粮。不要使自己陷于孤立，要好好做出成绩来给大家看。你们要很好地取得党委书记和组织、宣传等部门的帮助，善于经过党委和党委负责同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起来。你们当中要出些专家，要熟悉人物和历史，精通此中门道。

中南同志提出镇压反革命分子应与土改中反霸斗争有所区别。主席指示——

此一问题，□□□同志已经发了指示。江西四十七军向中央报告，在一个多月中，二十多个县里，杀了匪首□□□人，得到老百姓的欢呼。

对彭德怀[1]在中朝军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1951年1月19日）

一

德怀同志：

在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的报告稿收到。这个报告的内容很好，但为了避免由中国人对朝鲜的政策和工作作出决定的语气，为了避免泄漏军密的可能（许多事实和数字可以口说不要写出），并为了使行文更为简洁，现将你的报告稿在文字上和某些意思上略加修改发上，请再依据情况予以斟酌，并请事先送金首相阅正，商得其同意。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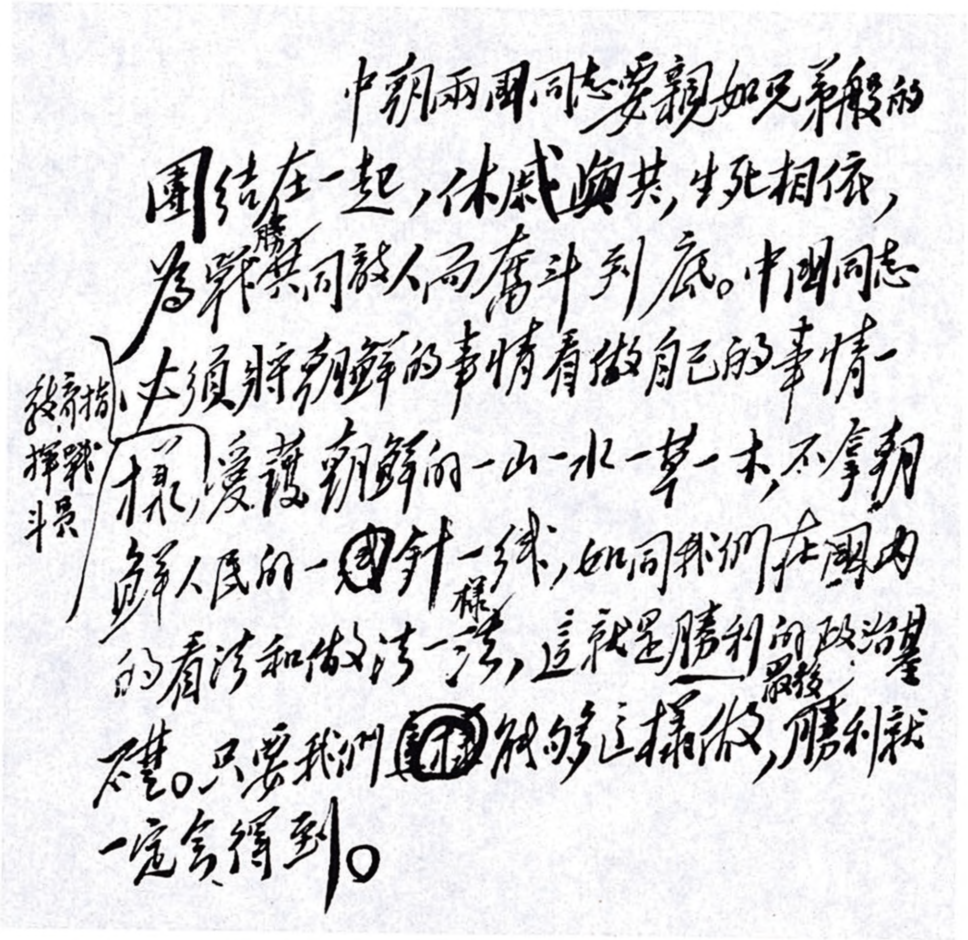
以金日成[1]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人民军，在朝鲜五年来的斗争中有了伟大的成绩，他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政权，建立了英勇的人民军，和苏联中国及其他人民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又正在和美国侵略军及李承晚[2]匪军进行着英勇的斗争。因此，一切在朝鲜的中国志愿军同志必须认真地向朝鲜同志学习，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

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的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会得到。

---

[1]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指挥官。

[2]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中朝兩國同志要親如兄弟般的團结在一起，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為戰勝共同敵人而奮斗到底。中國同志必須將朝鮮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教育指揮員戰斗員愛護朝鮮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鮮人民的一針一綫，如同我們在國內的看法和做法一樣，這就是勝利的政治基礎。只要我們能夠這樣做，最後勝利就一定會得到。

毛泽东起草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的手稿（部分）。

华东应准备独力歼灭可能进犯之敌[1]

（1951年1月21日）

（一）同意即将二十五军开往福建，使福建共有四个军。（二）浙江的二十一、二十二两军，上海附近的二十三、二十四军，照你们部署不变，浙江加紧督促剿匪，务于二、三两月内完成任务。（三）杨得志部[2]准备入朝参战，但二野三个军已集中河北，第二批三个军亦可于六月以前集中河北。如江浙有事，可给你们三个军使用。但你们应尽现有力量加强整训，准备独力歼灭台匪可能的进犯。

---

[1] 这是毛泽东致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并告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电的主要内容。

[2] 杨得志部，指第十九兵团，兵团司令员杨得志。

中央关于转发河南省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致中南局电

（1951年1月21日）

一

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请转发所属省市区党委：

我们认为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1]是正确的，特发给你们参考。我们希望各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有一个关

---

[1] 中共河南省委1951年1月13日给中央的报告说：河南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纠正右倾倾向后，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一重大的革命行动，在社会各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工农基本群众很高兴；地主阶级不再气焰高涨；民主人士中除左倾者积极拥护外，另一部分表示“摸不着底”，缄默寡言；工商界也表示沉默、小心，有“莫谈国事”之味；城市学生和机关新干部中，也有些震动。而有些地区的领导已为胜利所迷惑，开始出现不清醒的现象。根据上述情况，省委决定一般停止逮捕，杀人要更加讲究策略，严禁草率从事的现象。该放者经过一定手续，通过群众，迅速处理释放，有意识地把空气松弛一下。同时结合抗美援朝及土改等群众运动，广泛进行宣传工作，讲明政策，说明理由，稳定各阶层群众。但对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则继续追踪缉捕，务使归案。

于镇压反革命的总结性的报告。

中央
一月廿一日

二

中南局并转河南省委：

我们收到了河南省委一月十三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很好的，业已转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中南局亦将这个报告用电报转发湘鄂赣粤桂五省参考，请这五省每省写这样一个总结性的肃反报告。

中央

关于镇反部署致上海市委电

（1951年1月21日）

上海市委，并告饶、陈[1]：

你们一月六日关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二月的综合报告，由华东局转来，业已收到，甚好，甚慰。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今年一、二月份的几项中心工作，也是好的。其中说到你们准备在一月份中给予反革命分子以有力打击，望你们对此进行周密的侦察布置。布置好了，同时动作，做一次准确的逮捕。然后好好清理审讯，处决一大批真正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请你们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斟酌情形，妥善处理。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

[1]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祝贺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1951年1月21日）

隆哥[1]同志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同志们：

值此意大利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意大利共产党在过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以及在现在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战争计划、争取人民民主的意大利的斗争中，已经得到巨大成绩，因而使自己成为全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全意大利爱国人民的核心。我们坚信你们的正义事业在托里亚蒂[2]同志和意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定要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

[1] 隆哥，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总书记。

[2] 托里亚蒂，今译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关于建议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致邓小平[1]电

（1951年1月22日）

小平同志，并告漱石，子恢，仲勋，一波，高岗[2]各同志：

一月八日综合报告[3]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着重汇报了农村减租、退押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说，关于减租退押，目前主要还是防止束手束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和包办代替、命令主义，以免“煮夹生饭”和“吃回头草”。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关于城市工作，已专门召集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五月开，请按此部署工作。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1951年的毛泽东。

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

（1951年1月22日）

叶、黄、肖、林[1]，并告中南局：

一月十七日电悉。广东情况已明了，你们的部署是正确的，希望努力完成任务。此外，望注意镇反工作。凡与剿匪有关的匪首恶霸大特务，可由军区军分区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凡与剿匪无关的反革命重要分子，则由地方法院及军管会的军法处判处死刑；乡村普通恶霸及不法地主，则由农民斗争、监视及由人民法庭判刑，如此分三方面进行，可期迅速，又较妥当。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焰，伸张正气，望妥慎布置施行。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指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副司令员。肖，指肖向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林，指林平，即尹林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

关于四十五军等部队行动部署致陶铸[1]电

（1951年1月22日）

陶铸同志，并告邓、谭，叶、方[2]：

一月十五日电悉。四十五军争取早日结束剿匪待命开韶关广州线整训备战；廿一兵团确定在广西境内剿匪及驻防；四十九军争取在五月或六月以后能集中使用，望按此意图进行部署。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派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

[2]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关于编印土改材料给彭真[1]的信

（1951年1月22日）

彭真同志：

前次收集土改材料中，可择其不需要修改的若干篇，连同『在』江西省委一月七日指示[2]一件，印一本发党内及民主人士。需修改的，则不列入。篇数少点不要紧，有六七篇即可。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又有一件，是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的，浙江省委向所属的指示[3]，华东局和中央都加了案语转发华东各省及全国，此件待电报发出后，请你找来加印进去。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1月7日关于纠正土改中缺点给各地委的指示。

[3]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1年1月13日关于纠正错划阶级成分给各地委的指示。

对河北阜平、曲阳灾区救济问题的批语[1]

（1951年1月22日）

周[2]：

应当批准此项要求。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1951年1月14日关于阜平、曲阳两县灾情及解决办法给省人民政府转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等的报告上。报告说：河北阜平、曲阳山区，今年雹、水、风、虫各灾均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尤以阜平为甚。历史上山区人民衣着困难，灾后棉衣破烂、棉被缺少情况更严重。许多灾民衣不蔽体或以夹填棉，冰天雪地无法出门生产。阜平全县及曲阳山区均系老区之老区，华北机关曾长驻此地，群众与我血肉相关。中央前拨我省寒衣数量较之募得总数比例很小，可否再增拨棉被、寒衣各十几万套。同时，阜、曲两县山田滩地冲毁沙压，畜牧业远非战前可比，如不从长期扶植生产封山育林着手，则山地困难不易解决，故逐年贷款扶助生产实有必要。以阜、曲两县言，今年贷150万斤米，以本省全省山地生产贷款补助说，有2000万斤米之数，即可做出很多事情。如是三五年后，可以收很大效果，较之年年救济并不多费。

[2] 周，指周恩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给张澜[1]的信

（1951年1月22日）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2]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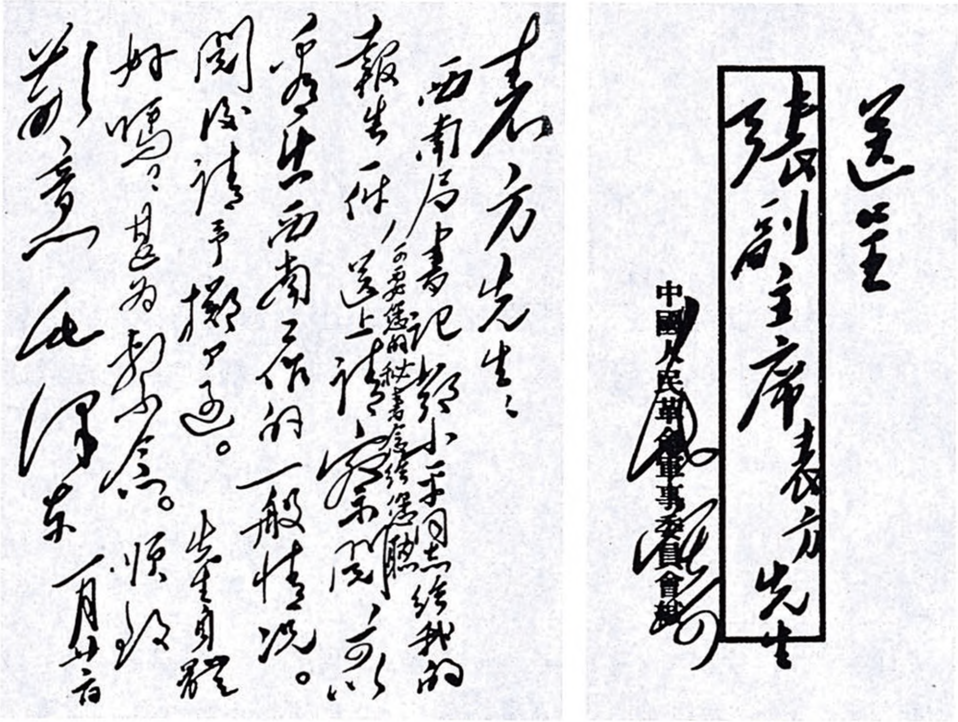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张澜，字表方，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所要送的秘书应给您阅）送上请察阅，系关于西南局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挂念。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日

送呈

张副主席表方先生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泽东致张澜信的手稿。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抗美援朝和推销土产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3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东北局，并请转发所属各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

华北局负责同志在下列报告中提出的两项经验[1]值得注意，特别是关于推销土产的经验，应在全国推行起来，请你们务必加以研究，仿照推行为要。

中央

一月二十三日

---

[1] 指薄一波、刘澜涛1951年1月2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总结的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推销土产两项经验。（一）关于抗美援朝运动，主要是将运动深入到各阶层，用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并给各种工作以新的推动力。（二）关于推销土产，已获得如下经验：1．国营商店、合作社和私商，应积极恢复和开辟新旧商业网，这是给土产找出路的最重要的一环。2．根据产、运、销三者有利，和双方遵守合同信用的原则，广泛推行代购、代销、运输等各种形式和各方面的合同。3．选择经济要地，建立有强大吞吐能力的货栈。4．经过合作社，在社员中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赊购存货业务。5．动员和组织私商经营土产，城市和地方党政要在各方面给以帮助。6．组织群众性的运输，克服运输力不足的困难。7．动员群众进行远距离的推销。

关于撰写介绍《实践论》文章给陈伯达[1]的信

（1951年1月23日）

伯达同志：

我还是和过去差不多，拟于一周后去附近地点正式休息一时期，行前当找你一谈。关于介绍《实践论》，《学习》上有了一篇[2]，我没有全看，你写文章时请翻阅一下。你文章写成时，如有时间，可以给你看一遍。

毛泽东

一月廿三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1951年1月15日出版的《学习》杂志第三卷第八期社论，题为《〈实践论〉——学习和工作的指南》。

关于转发广西镇反报告的批语和复张云逸[1]电

（1951年1月23日、24日）

一

陈、饶[2]及华东军区党委会，邓、谭[3]及中南军区党委会，贺、邓[4]及西南军区党委会，张、习[5]及西北军区党委会，聂、薄[6]及华北军区党委会，并请转发所属各军区、兵团及军的党委会：

请你们检查一次军队中军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及负责同志对于中

---

[1] 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3]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4]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5] 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6]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司令员。薄，指薄一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央一九五〇年十月十日关于纠正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中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是否引起了注意，是否传达了这个指示，自己在剿匪工作及帮助地方工作中是否有过这种右倾偏向及是否克服了这种偏向，将检查结果向军委做一次报告。根据广西方面的报告，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了警〈惊〉人的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不杀匪首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以致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广西于去年九月起开始纠正此种错误，三个月中，正确地杀了匪首惯匪及其他首要反动分子三千余人，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现将中南军区政治部一月十六日转来广西报告[1]一份转发给你们阅看，这是一篇极有价值的报告，希望你们认真研究，并做出自己的结论报告我们。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二

云逸同志，并告子恢、剑英[2]：

一月十六日电悉。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九万余，处决匪首恶霸三千余，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云逸同志患病亟须休养直到病愈为止，到广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1951年1月16日关于广西执行镇压政策前后情况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州后请叶方[1]妥为照料。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叶，指叶剑英。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局十一、十二月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4日）

漱石，子恢，剑英，仲勋，一波，高岗[1]同志：

兹将邓小平同志一月八日的报告[2]转给你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概况。其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现在华东、中南、西北各区正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的高潮，许多同志当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请你们按照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这个时间部署工作。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

（1951年1月24日）

邓、谭、赵、苏[1]，并告陈、唐、张、周[2]及剑英、漱石、陶铸[3]及广西军区：

一月十七日电悉。（一）过去未经你们察看设计，盲目地构筑工事，浪费甚大，是一教训。以后凡需支用经费，构筑工事、要塞，修建道路、房屋、仓库等项，均需经过你们派人察看设计，做出预算，经过中央审核批准，然后动手兴建，否则不予报销。（二）虎门要塞修建计划已定，费用照发。（三）榆林港是否照虎门那样建筑一个炮兵团的要塞，你们可设计作预算电呈考虑。（四）对海外守岛部队做出两个方案是对的。珠江口外各岛中必须坚守者，应有物质准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1905—1967），山西崞县（今原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苏，指苏静（1910—1997），福建海澄（今龙海）人，当时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唐，指唐亮（1910—198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指张震，湖南平江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参谋长。周，指周骏鸣，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参谋长。

[3]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备，也是对的。（五）汕头至大亚湾一线及其他海岸线与内地，根本不要修筑什么工事或要塞，敌来让其登陆，并须诱其深入，然后聚而歼之。军队须离开海岸线，驻在便于按照上述意图歼灭敌人的适当地点，从事整训，不要去守海岸线。为稽查特务潜入及打灭少数匪众登陆，应由保安队及地方武装担任。（六）修复公路上的桥梁是必要的，但只要普通军车能行即可，不要特别大修，按此规模修建的费用可以照发，否则不发。（七）敌人进攻，只有蒋匪，不会有外国人。蒋匪有五十万军队，其中海军、空军、军事学校、军事机关、地方部队、军人家属等占了二十余万，能作战的正规陆军最多三十万人，至少须留十万人守备台湾，故能动用侵粤侵闽侵浙者最多不过二十万人。即使他集中二十万人打一处，只要他登上大陆，我均可以两三个军至多三四个军各个歼灭之。在我们方面，只有虎门、厦门、舟山、吴淞四处及珠江口外某些海岛必须确保，不令侵入。其余一切海岸线，都不要守而要让他进来，以利聚歼。海南岛不是能养活十万以上军队的地方，敌在十万人以下登陆，我有一个正规师及冯白驹[1]部在岛上坚持，再将四十三军主力加上去，即可各个歼灭之。许多共产党员打了二十几年的仗，忽然把经验都忘了，到处修工事，畏敌如虎，你们应加教育，叫他们不要如此。（八）在厦门、舟山、吴淞三处修建阵地及福建、浦东等地修理道路桥梁，请陈、唐、张、周指示下面注意只择十分必要者好好设计修建之，务须避免浪费。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

[1] 冯白驹（1903—1973），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应注意之点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1月24日）

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1]同志：

华东局给福建省委电所说肃反应注意之点，我以为是对的。即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请你们转知所属注意为盼。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4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的总结[1]也写得很好，特转给你们研究，各地均可仿行，以期有计划地彻底地取缔一贯道及其他各种会道门，并消灭其中反革命重要分子。和作战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山西省委在准备和实行取缔一贯道的大规模

---

[1]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山西省取缔一贯道的工作，着手于1949年冬，经过一年的准备，于1950年11月中旬才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全面取缔。这些准备工作包括：（1）打入侦察，确切地掌握一贯道的全面情况；（2）选择重点试验，取得具体经验；（3）不断地进行宣传揭露，组织宣传攻势；（4）经过整风和党员训练班，批判麻木不仁的态度，端正政策思想；（5）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堵塞工作中的漏洞。凡此一切，都给全面取缔工作准备了条件。全省范围同于11月12日动手搜捕，10天内，各地均照预捕名单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取缔工作分3个步骤。第一步，捕捉职业道首，摧毁其领导机关，陷其整个组织瘫痪。第二步，对小道首教育训练，令其登记、悔过，分别情况，给予管制。第三步，经过深入的揭露工作，组织道众诉苦、控告，在有觉悟的基础上展开退道运动。

斗争中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故成绩甚大，值得全党研究。

中央
一月廿四日

关于编印学校反美斗争文件给彭真[1]的信

（1951年1月24日）

彭真同志：

请考虑，将学校反美斗争文件，清出若干件，例如西南局一月廿日的报告及早一晌〈向〉南京市委的一个报告[2]，印一本，发各民主人士及党内高级干部。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南京市委1950年12月7日关于南京学生反美控诉运动情况给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

关于转送张澜[1]复信致邓小平[2]电

（1951年1月24日）

小平同志：

你一月八日报告[3]我送给张表方先生看了，现将他的复信[4]转给你看。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张澜，字表方，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3] 指邓小平1951年1月8日关于西南局11、12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4] 指张澜1951年1月2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邓小平同志1月8日报告已详阅。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西南押租，系预防佃户不能缴纳佃租而为之预押，要到退佃时才退押，实在是一种剥削。今天土地权收归国有，主佃关系已不存在，当然应该退押。报告上说，等到退押浪潮过去，大部分退了的时候，及时转入清理，说服群众分别对待中小地主，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上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将来能够切实审慎照此做是很好的。

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月25日）

罗迈[1]同志：

此件[2]可印发到统战会议的各同志，并可要他们带回去给更多的同志看看。请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统战部一律定期召集，或有大事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开会，如苏南这次会议一样，并向中央统战部作报告，不开会不报告者认为失职。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中共苏南区委员会统战部1950年12月26日关于苏南区第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的情况给华东局并华东局统战部的报告。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召开的这次民主党派座谈会，就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和民主党派的工作交流了情况，统一了思想，加强了相互间的团结，到会各党派代表都非常满意。

给傅作义[1]的信

（1951年1月26日）

宜生兄：

廿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2]一份，送上请察阅，阅后请予掷还。廿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

[1] 傅作义，字宜生，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政治部1951年1月12日关于部队纪律和军民关系情况给华北军区并绥远军区、省委的报告。第二十三兵团是由董其武率领的原傅作义所属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的。报告谈到该部于1950年12月22日从绥远出发，1951年1月4日全部到达河北景县龙华镇一带，在遵守群众纪律和军民关系上有显著进步，当地政府和群众比较满意，部队也受到了教育。

在印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的祝词[1]

（1951年1月26日）

印度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印度人民是很好的人民。中国、印度这两个民族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几千年以来是很好的。今天庆祝印度的国庆节日，我们希望中国和印度两个民族继续团结起来，为和平而努力。全世界人民都需要和平，只有少数人要战争。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庆祝印度国庆，祝贺印度人民，祝贺你们的总统。

---

[1] 1月26日是印度的国庆日。这是毛泽东在印度大使举行的印度国庆会上的祝词。

给齐白石[1]的信

（1951年1月27日）

白石先生：

来信收到，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

[1] 齐白石，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关于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和审判反革命罪犯的批语[1]

（1951年1月28日）

一

刘、周、陈、彭真[2]同志：

此件[3]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事前召集政协常委及政府委员，法院，司法部，检察署，公安部人员开一次座谈会取得同意；在此次会上，应有人报告最近时期镇压反革命的情况。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刘少奇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起草中的几个问题的来信上的两条批语。第二条批语是针对刘少奇信中的一句话而写的，这句话是“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以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3]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修正草案）。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正式公布了这个条例。

二

在军管时期应当如此。

关于嘉奖西南剿匪部队的电报

（1951年1月28日）

贺、邓、张、李[1]并告华东，中南，西北各军区及福建，广东，广西军区：

你们一月六日送来的一九五〇年一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2]，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八十五万人，缴枪四十余万枝，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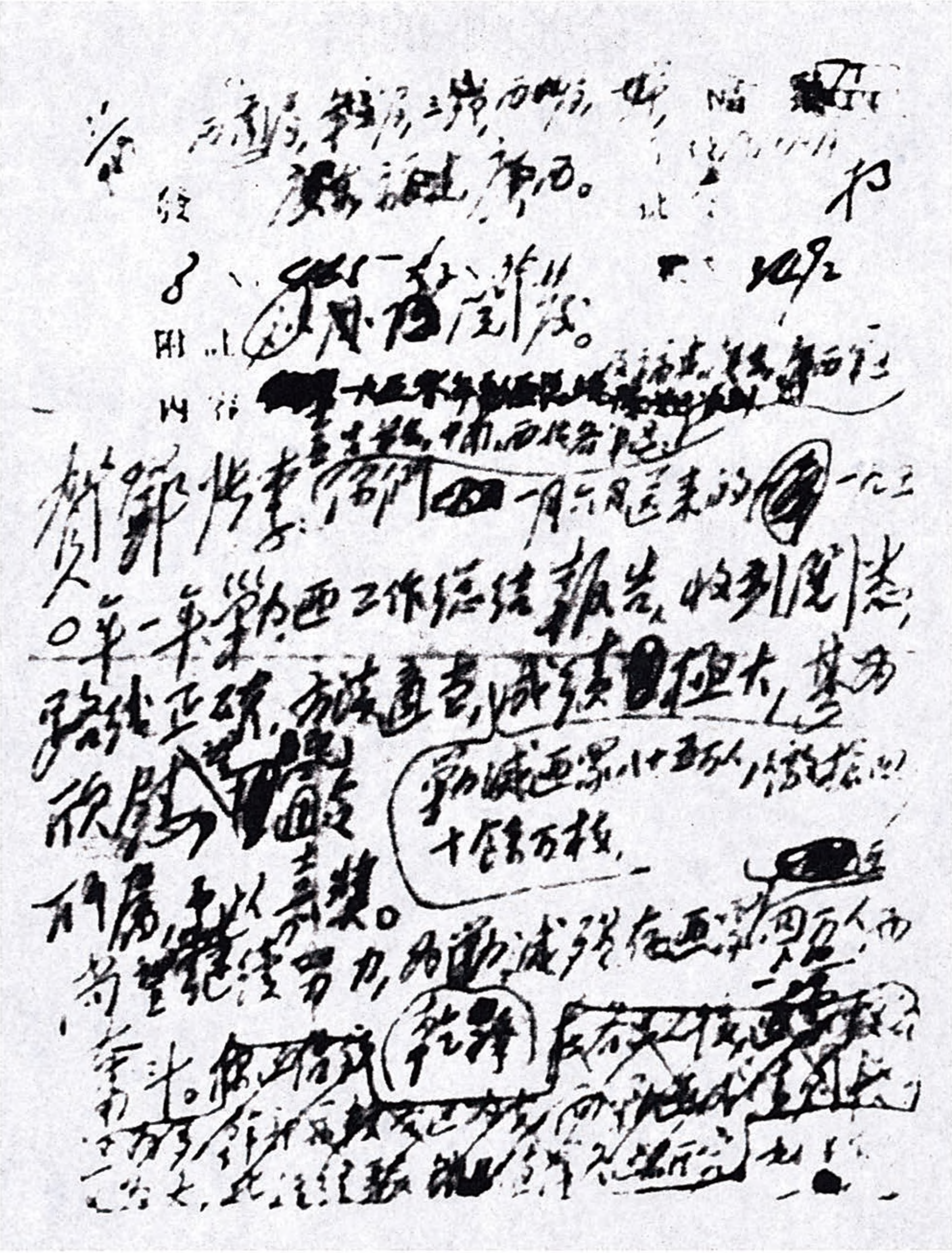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际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指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关于1950年剿匪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自成都战役结束后，即以全力剿匪作为全军的中心任务。一年来，全军不分上下，不分兵种，不分部队与机关、学校，均参加了这一斗争。剿匪斗争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1) 组织一元化的剿匪斗争。(2) 集中兵力，重点进剿。(3) 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和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4) 开展捕捉匪首运动与镇压匪首工作。(5) 争取少数民族参加剿匪。



毛泽东致贺龙、邓小平等电的手稿。

给张澜[1]的信

（1951 年 1 月 28 日）

表方先生：

西南去年剿匪工作，颇有成绩，消灭匪众八十余万，缴枪四十余万，残余匪众已不足四万，两三个月即可完全剿灭。送上西南军区最近由地面送来之总结报告[2]一件，假如您有精神的话，可以一阅。可以慢慢看，一星期内还我即可。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张澜，字表方，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关于1950年剿匪工作的总结报告。

志愿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1]

（1951年1月28日）

德怀同志：

（一）一月二十七日二十四时给我的电报及给各军准备作战的命令均已收到。

（二）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发起第四次战役，以歼灭两万至三万美李军，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为目标。

（三）在战役准备期间，必须保持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确保汉城，并吸引敌人主力于水原、利川地区。战役发起时，中朝两军主力应取突破原州，直向荣州、安东发展的计划。

（四）中朝两军北撤十五至三十公里，发表拥护有限期停战的新闻是不适宜的。敌人正希望我军撤退一段地区，封锁汉川，然后停战。

（五）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南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火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允许的。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六）我军没有补兵，弹药也不足，确有很大困难。但集中主力向原州、荣州打下去，歼灭几部分美军及四五个南朝鲜师的力量还是有的，请你在此次高干会议上进行说明。此次会议应即作为动员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会议。

（七）中朝两军在占领大田、安东之线以北区域以后，再进行两个月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然后进行带最后性质的第五个战役，从各方面说来都比较有利。

（八）宋时轮兵团[1]，应即移至平壤、汉城、仁川、水原区域休整，并担任巩固该区域，防止敌人在仁川及镇南浦登陆。在将来的第五次战役中，该兵团即担任西部战线之作战。

（九）执行第四次战役时，请你考虑将中朝两军主力分为两个梯队，各带五天干粮，第一梯队担任突破及一段追击，第二梯队担任又一段追击，以便能使战役持续十天至十二天，歼灭更多敌人。

（十）你的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十九时

---

[1] 宋时轮兵团，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不要到处修工事致张云逸[1]等电

（1951年1月29日）

张、莫、李、卢[2]，并告中南军区，广东军区，华东军区：

一月廿五日电悉，所提修建边防工事计划，根本不适合我军的作战要求。如敌来攻，海上者应当让其登陆，而不要阻止其登陆；越南者应当让其侵入，而不要阻止其侵入。不论敌从海上来，从越南来，均应当让其深入内地，不要怕失掉钦州、廉州、防城、龙州、南宁及其他城市，而应当让它进这些城市。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这就是我军历来战胜敌人的办法，为什么你们忘记了。你们计划到处设防，到处修工事，摆成被动挨打的姿势，使我军丧失主动，丧失歼敌的机会，是完全错误的。目前你们工作的重心，应是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有步骤地有把握地实行土地改革，严厉镇压反革命，大杀几批匪首，惯匪，恶霸，及罪大的会门头子与特务分子，这些，就是最重要的巩固国防的工作。广东方面，除虎门必须筑要塞及珠江口外某几个岛上应修必要的工事和堡垒之外，其他地方亦一概不修工事，不守海

---

[1] 张云逸，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张，指张云逸。莫，指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李，指李天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卢，指卢绍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军区参谋长。

岸线，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华东方面亦只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的某些必要地点修筑要塞和工事（这些是确定要修的），其余亦一概不修。广西地处大陆，距台湾很远，逃越匪部人数甚少，完全没有什么可怕，不应该修任何工事。

毛泽东

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华东沿海构筑工事问题致陈毅[1]电

（1951年1月29日）

陈毅同志，并告饶[2]及中南军区，广东军区，广西军区，华东军区：

鉴于广东方面过去时期未经中南军区勘察指导设计，到处做工事，结果无用，浪费极大，此次华东在厦门、平潭、舟山、吴淞四处修筑要塞或工事，在福建修南平同安公路，务请你们注意事先给以指导。第一，不要在指定地区不经研究设计随便修建，以致无用浪费；第二，在指定地区内亦只择最需要者做，不要到处做；第三，大陆海岸线及内地根本不要做；第四，大陆兵力，位于纵深地区，敌来应让其登陆然后相机歼击之，不要到处防守，不要阻其登陆；第五，建筑材料，必要者不可吝惜，照需要支给，但仍须防止浪费，注意废物利用，注意节省。

毛泽东

一月廿九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军委查询十八军入藏物资准备情况的电报

（1951年1月29日）

西南军区：

一月二十四日西北军区给你们的电报，你们谅已收到。该电第二项所述入藏部队必须携带之皮衣、皮帽、帐篷、饭锅、水桶、黑矾、大蒜、料袋、牛绳等二十余种物品，十八军是否业已准备好，望查告。

军委

一月二十九日

军委关于对越南同志要取耐心说服态度的电报

（1951年1月29日）

韦国清[1]同志：

一月廿七日电悉。（一）同意你所提的整训计划。（二）对越南同志的缺点要取耐心说服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接受你们的意见，而不要引起他们的反感。他们现有的缺点正是中国军队在幼年时期所曾经有过的，并不足怪，只有用说服态度帮助他们并在长期锻炼中才能使他们逐步改进。

军委

一月廿九日

---

[1] 韦国清，当时任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顾问团团长。

关于统一领导完成广西剿匪和土改等任务致陶铸[1]电

（1951年1月30日）

陶铸同志，并告广西省委，中南局及叶、方[2]：

一月廿七日电[3]悉。布置甚妥，照此执行。四十五军在三月间调走后，广西尚有四十九军，廿一兵团及地方部队，必须把一切股匪潜匪肃清，一切匪首捉起，一切非法枪支起掉。干部不足，即由四十九军，二十一兵团及地方部队中抽出大批干部，配合地方干部，用包干制办法，划分区域，负责到底，将剿匪、清匪，起枪，捉杀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直到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全套工作做完，方算完成任务。为要完成此任务，所有军队，必须统一于省委地委领导之下，实行领导的一元化。张云逸[4]同志现去广州休养，提议陶铸代理省委书记，不要回武汉，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派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

[2] 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指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3] 指陶铸1951年1月27日关于广西剿匪部署给中南局转毛泽东的报告。

[4] 张云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

或者回来报告一次立即去广西。总之广西极为重要，工作必须做好，上述提议是否适宜，请中南局考虑电告。

毛泽东
一月卅日

关于注意玉树地委开展医疗贸易工作的经验致邓小平[1]电

（1951年1月30日）

小平同志：

此件[2]，不知西北局发给你们没有，如未，可看一看，并请转告十八军同志注意**玉树**的经验。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指中共青海省委1951年1月12日向西北局转报的玉树地委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贸易工作的报告。青海省委指出：玉树地委的报告证明，在青海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医疗贸易工作是接近群众与联系群众的一种很好的工作方式，今后更应重视。

在华东军区关于修建水吉至建瓯公路的请示电上的批语

（1951年1月30日）

周[1]：

此件[2]请你与陈薄[3]商复。据称已四次请示未得复。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政治部副主任唐亮、参谋长张震、副参谋长周骏鸣1951年1月28日关于福建水吉建瓯新线公路不应停建给军委并报华东局并告华东交通部的电报。电报说：水吉建瓯新线公路修建，在军事上极为重要。就其目前加强闽、粤沿海战备，大批物资南运，尤觉该线之修筑刻不容缓。如按华东交通部转中央交通部指示，即行停工，造成损失尚属事小，而今后入闽战略交通，不能保障，事关重大。我们曾四次请示，迄未获复。

[3]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1]

（1951年1月）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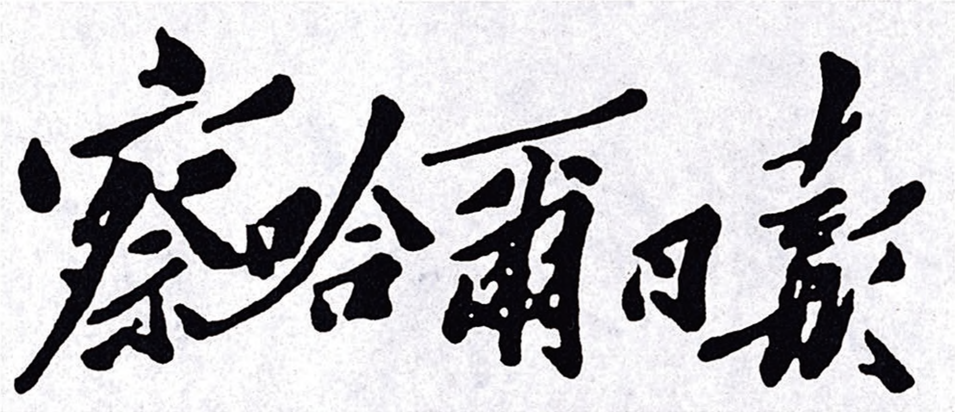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给江西、湖南省委的指示所写批语的主要内容。

为《察哈尔日报》[1]题写报头

（1951 年 1 月）

察哈尔日报



毛泽东为《察哈尔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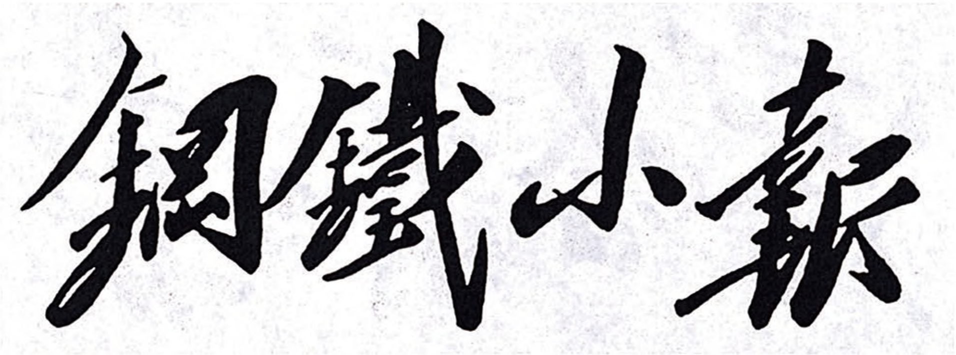
---

[1] 《察哈尔日报》，中共察哈尔省委机关报，1949 年 1 月 13 日在张家口创刊。1951 年元旦由四开四版扩大为对开四大版时，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报头。1952 年 12 月 16 日《察哈尔日报》随着察哈尔省制的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终刊。

为《钢铁小报》题写报头[1]

（1951 年 1 月）

钢铁小报



毛泽东为《钢铁小报》题写的报头。

---

[1] 《钢铁小报》，即《太钢日报》的前身，创刊于1950年1月8日。1951年1月，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报头。

中共中央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中的文字缺点的指示[1]

（1951年2月1日）

中央及军委各部委、政务院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地委、军区、兵团、军，及专员公署以上政府的党组负责同志及民众团体的党组负责同志：

《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

现在党政军来往电报及其他报告、指示、决定等文件，写得好的，确实不少。这些电报或文件，写得清楚明确，生动活泼，使人便于阅读，发生极大效力。但同时，尚有许多文电，在文字上存在着严重缺点，必须予以纠正。这些缺点之最常见者，有滥用省略、句法不全、交代不明、眉目不清、篇幅冗长五类。兹分别规定纠正办法如下：

（一）不许滥用省略。现在许多电报文件中，对人名、地名、年

---

[1] 中共中央这个指示，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当时这个指示没有公开发表，只以内部文件的形式印发给各级党委及所属部门。1951年2月25日，毛泽东就发表这一指示的问题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写信，说："可以印成小本发给党内外较多的人看，不要在报上发表，因此件并无给群众看的必要。而一般文法教育则应在报上写文章及为学校写文法教科书。"

月日、机关名、事物名，滥用省略，使阅者很费记忆和猜想的工夫，有时简直莫名究竟。这种现象，应依以下规定予以纠正：

甲、除对大家习知的中央某些负责同志，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某些负责同志，野战军（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有时（不是一切时间，也不是多数时间）在电报上下款可以写姓不写名，或姓下加职衔，例如“毛主席”“周总理”“陈饶”“彭习”等以外，一般情况，无论在电文中，或在上下款，须一律写姓名，不得只写姓不写名。必要时，还须在姓名之前加上职衔，例如“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

乙、地名一律用全名，例如“上海”“福州”“广州”“重庆”，不得写成“沪”“榕”“穗”“渝”，“福建”不得写成“闽”，“湖南”不得写成“湘”。仅在两个以上著名城市或著名省份联写在一起使人一看就明白的时候，例如“京津”“沪宁”“豫鄂湘赣”“粤桂边界”等，或者和其他文字结合在一起成为流行的特殊用语的时候，例如“沪东”“皖北”“津浦路”“天兰路”等，始得用简称。

丙、普通文电，均须注明月日。紧急文电，须注明月日时。正式公布文件，须注明年月日。凡月日时，概用普通数字，不得用地支[1]和韵目。例如“二月一日十四时”，不得省称“丑东未”。年份概用全数，不得省略。例如，“一九五一年”，不得写成“五一年”。

丁、机关名称，概用全名。例如，“东北局组织部及宣传部”不

---

[1] 地支，又叫十二支，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的统称，传统用作表示次序的符号，这里用作代表月份的符号。

得省称“东北组宣”，“空军司令部”不得省称“空司”，“全国总工会”不得省称“全总”。

戊、事物名称，除其省称确已为全国人民所普遍熟悉者，例如“中共”“反帝”，得于非正式场所使用外，其余，一律用全名。例如，“减租减息”“生产救灾”，不得省称“双减”“生救”；“土匪特务”（指土匪与特务），或“特务匪徒”（指特务为匪类），不得省称“匪特”。在一切正式文电中，则应尽量避免省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得省称“马、恩、列、斯”，美帝国主义不得省称“美帝”。

己、凡有特别生僻的语词，其意义为多数阅者所不能了解者，应作必要的注释。

（二）必须遵守文法。电报文句虽应力求简洁，但不得违背文法。必要的主词、述词、宾词，必须完备无误。单句、复句，必须分清。代名词，必须紧跟所代的名词。形容词、副词词尾，尽可能分用“的”“地”，加以区别（形容词是形容名词的，例如“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故在名词之前用“的”字区别之。副词主要是形容动词的，例如“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故在动词之前以“地”字区别之）。如此，方能使条理分明，意义确定。至于信件和公布的文件，不但文字应当完全，标点亦须正确。为解决此一问题，《人民日报》不久将连载文法讲座，望全党予以注意。并望地方县委、县政府以上，军队师以上负责干部，至少有一人学会文法，以便负责修正文电字句。

（三）纠正交代不明的现象。

甲、凡请示的文电，均须写明情况和自己的要求和意见（转发下级请示文电，亦应说明自己意见），并写明希望何机关或何人于何

时答复何项问题。凡答复的文电，均须写明系答复何机关或何人于何时提出的何项问题。凡指示的文电，对下级的要求，亦应规定明确。例如，应由何机关如何办理，或于何时报告办理情况等。总之，每件事都要交待六个“什么”，即什么事、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样子、什么原故。仅在绝对明了时，始可有所省略。

乙、为了便于交待清楚，除了综合性的报告及指示以外，必须严格执行一事一报制度，禁止在一个文电中包括不相干的几件事，禁止用党内的文电来兼代党外的文电。

丙、不论报告、请示或指示的文电，如为不但向着一人一机关，而且有兼告他人他机关之必要者，应于写明主管的人或机关之后，写“并告”二字，再接写他人或他机关，以明责任。

丁、凡转发文电，须全文转发或摘要转发者，应将受件的人或机关、为什么转发此文电的道理、转发的人或机关及转发的时间，写在该转发文电的前面，而将该转发文电列在后面，以清眉目；并须将转发文电的上下款及年月日照旧保留，不可省略。

戊、凡文电中引用他人他机关文电语句，首先须写明何人何机关于何时说的，然后写上引用的语句，在该语句前后作引号（方括弧），接着写上“等语”二字。如引用的语句的内容不是意见而是事情的叙述，则接写“等情”二字。下面再写自己的意见，以清眉目。

（四）纠正眉目不清的现象。除简短者外，一切较长的文电，均应开门见山，首先提出要点，即于开端处，先用极简要文句，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现在新闻学上称为“导语”，亦即中国古人所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唤起阅者注意，使阅者脑子里先得一个总概念，不得不继续看下去。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长的文电分为几段时，每段亦应采用此法。一个文电有几层意思或几

项要求时，必须注意按照条理，分清层次，以数目字标明段落和项目。

（五）凡文电必须认真压缩。各级领导同志责任重大，事务繁剧。向领导同志或机关请示或作报告时，必须反对两种倾向，即应请示报告而不请示报告的倾向和不应请示报告而随便请示报告的倾向。在写请示文电或写报告时，必须注意文字的简明扼要，条理清楚，便于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其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其结果，使领导同志对这些文电很难看，或者就没有看，等于白写。今后一切向上级机关请示或报告情况和对下级发布指示的文电，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但压缩是指分清条理，去掉空话，并不是说可以省略必不可少的词类，可以违背文法，也不是说可以不顾文字的形象性和鲜明性。有些写得好的报告，虽然篇幅颇长，却能引人阅读，使人不厌其长。有些写得不好的报告，虽然篇幅不长，却使人难看。这里的区别就在是否有条理，是否说空话和是否合文法。

以上各项，望各级党委切实执行。

为了顺利执行这个指示，请各级负责同志将本指示印发各机关所有负责起草及批阅文电的同志，在适当的会议上做传达，并在党内刊物上予以登载。

为求确实生效起见，中央责成中央办公厅及各中央局办公机关，按照本指示所提出的各项标准，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底，将本年度一月至四月份收受文电分别作第一次检查，对执行得好的机关予以通报表扬，对执行得不好的予以通报批评。以后每四个月作一次

检查，一九五一年共作三次检查，年终一次为一年的总检查。每次均须写出总结，经中央审定，通报全党各主要领导机关。

中央认为此种文字缺点的纠正，将使我们同志的头脑趋于精密，工作效能有所提高，故须予以重视，对已存缺点认真地加以改革。在对同志进行教育时，应选择几篇大体上合于上述标准的文件，作为范例，使人们阅读，并有人给以讲解，这是进行教育时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关于颁布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的电报

（1951年2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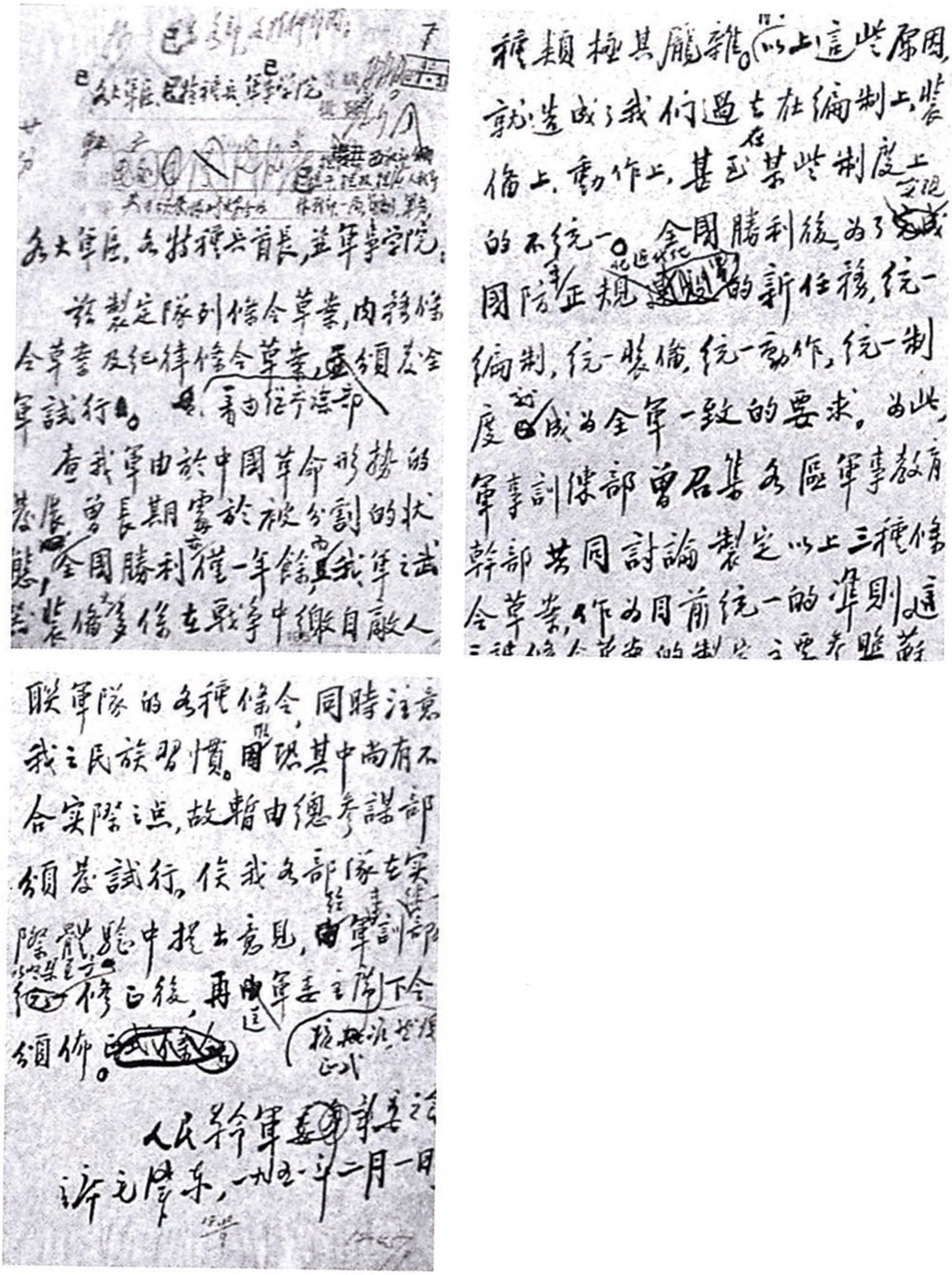
各大军区、各特种兵首长，并军事学院：

于制定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及纪律条令草案，委由总参谋部发全军试行。

查我军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曾长期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全国胜利亦仅有一年余，而我军之武器、装备大多系在战争中缴自敌人，种类及其庞杂。仅以上这些原因，就造成了我们过去在编制上、装备上、动作上，甚至在某些制度上的不统一。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近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一致的要求。为此，军事训练部曾召集各区军事教育干部共同讨论制定以上三种条令草案，作为目前统一的准则。这三种条令草案的制度，主要参照苏联军队的各种条令，同时注意我之民族习惯，故暂由总参谋部颁布试行，俟我各部队在实际体验中提出意见，经军事训练部以收集并予修正后，再送军委主席核准，然后正式下令颁布。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各大軍區，各特種兵首長，並軍事學院：

茲製定隊列條令草案，內務條令草案及紀律條令草案，頒發全軍試行。着由總參謀部

查我軍由於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曾長期處於被分割的狀態，全國勝利僅一年餘，而我軍之武裝備多係在戰爭中繳自敵人

種類極其龐雜。以上這些原因，就造成了我們過去在編制上，裝備上，動作上，甚至某些制度上的不統一。全國勝利後，為了國防正規化的新任務，統一編制，統一裝備，統一動作，統一制度，已成為全軍一致的要求。為此，軍事訓練部曾召集各區軍事教育幹部共同討論製定以上三種條令草案，作為目前統一的準則。適

聯軍隊的各種條令，同時注意我之民族習慣。因恐其中尚有不合實際之點，故暫由總參謀部頒發試行，俟我各部隊在實際體驗中提出意見，由軍訓部修正後，再由軍委主席下令頒佈。

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　毛泽东，一九五一年二月一日

1951年2月，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布队列条令草案、内务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图为关于颁布这三个条令给各军区等的电报。

在朝鲜战场轮番作战的兵力编成

（1951年2月7日）

恩来[1]同志，并告聂[2]：

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3]三个军，西南三个军（先开两个，另一个军于到达河北后教育两星期接着开），杨成武[4]两个军（在六十六军及五十军回来接防后开），四十七军（二月底集中岳州[5]，三月初开东北，训练两星期开前线）及董其武兵团[6]两个军（先补充一万人，武器方面似亦须有所改善，准备四月间开前线负守备任务），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个月至四个月（其中五十军、六十六军并同时担任天津、营口线守备，其他四个军位于平壤、沈阳之间休整），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补充计划，九兵团回华东再补，十三兵团需于撤到休整地点后即予补足。西南已到之两个军，杨成武两个军，董其武两个军，须令其立即开始出境作战的各项教育，应召集这些军的负责人来京

---

[1] 恩来，即周恩来。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3] 杨得志，当时任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4] 杨成武，当时任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5] 岳州，即湖南岳阳。

[6] 董其武兵团，指第二十三兵团，兵团司令员董其武。

开会授予任务。西南第二期三个军，须令其于二月准备完毕，三月开始出动，四月到达河北。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中央关于抓紧春耕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的电报

（1951年2月7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

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春耕期内，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除指导春耕，总结土改经验，训练土改干部，清理镇反积案，总结镇反经验等项工作之外，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〇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政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上列各项问题当然一次不能讨论完毕，应分开几次专题会议，各市委尤其应作此种专题讨论。下面是成都市委的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央

二月七日

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

（1951年2月7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华东局及福建省委，西南局，西北局：

一月二十六日中南局转来杜润生[1]同志一月十九日电已收到，我们同意杜润生所提的方法，即首先在各县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减租、退押、反霸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整顿基层组织，将此作为一个阶段，接着转入分田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也是最迅速的。土地改革的正确秩序，本来应当如此。华东、中南许多地方，凡土改工作做得最好的，都是经过了这样的秩序。过去华北、东北及山东的土改经验也是如此。我们所说广东土改工作应当加快进行，并不是要求广东同志违反这样的秩序，群众还没有起来，基层组织还不可靠，就要生硬地不成熟地进行分配土地的工作，而是要加快发动群众，整顿基层组织，接着进行分田。广东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抓紧发动群众、整顿基层这一个最基本的环节，所以现在一提到分田就感觉吃力，但现在这样去做还不算迟，还应该这样去做。

中央

二月七日

---

[1] 杜润生，1913年生，山西太谷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7日）

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广西省委：

（一）分局一月十九日关于粤桂两省肃反工作的报告[1]收到了，此种检讨甚好。请分局将这个报告发给粤桂两省所属各地委，市委，县委，有关剿匪工作的军队党委，及政府党组，引起大家注意。（二）报告的末尾说分局正在重新拟出具体的肃反办法，此项办

---

[1] 这个报告的时间应为1月29日。在报告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汇报了广东、广西两省的镇反情况、群众反映和匪特活动情况，检讨了镇反工作未能很好开展的原因。检讨的主要内容是：（一）不少地区党委领导重视不足，抓得不紧。分局有时对此大力推动不够，实际支持不足。宣传部门对反特宣传很不重视，对中央关于镇反宣传工作指示未作动员布置。公安部门具体组织力量也缺乏主动。（二）有些地区未能把镇反与土改很好结合，强调了土改，放松了镇反工作。（三）有些干部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仍认识模糊，不根据具体情况周密布置，便轻率盲动且又不及时请示报告，造成某些地区的紊乱现象。（四）广东大部分地区机械地运用宣传动员、大力突击侦调、统一行动三个阶段的划分，至今仍未全面行动，仍停留于第一、第二阶段。（五）在镇反工作中暴露了我侦察工作的严重弱点，材料不够确实，掌握敌情很差，造成乱捕、乱杀现象。

法是否业已拟好，望早日电告中南及我们。

中央

二月七日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工会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致饶漱石[1]电

（1951年2月7日）

漱石同志：

你一月三十日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2]很好已转发各地仿行。华东方面你可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省委市委及区党委，叫他们照做，改善工会工作。

中央

二月七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指饶漱石1951年1月30日关于华东工会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要顺利开展生产竞赛，必须解决和生产密切相关而为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发扬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树立面向生产的思想，使生产运动在工人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持久巩固下去。工会工作的好坏主要要以生产的好坏作标准，而且也只有当工会工作以领导生产运动为中心，并在发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工会工作才有丰富的生动的内容。

为柳亚子居所题词[1]

（1951年2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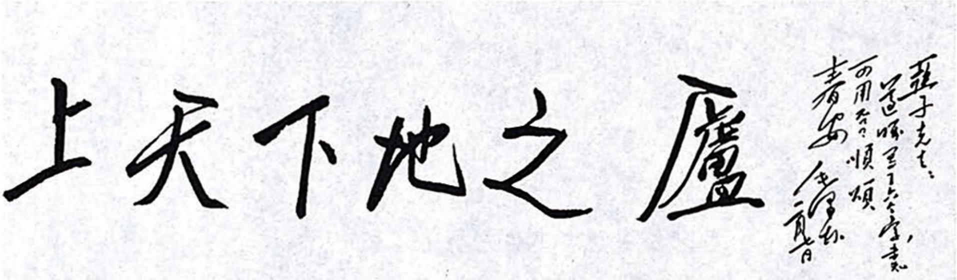
亚子先生：

遵嘱写了六个字，未知可用否？顺颂春安。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上天下地之庐。



上天下地之廬

亞子先生：

遵囑寫了六個字，

可用否？順頌

春安 毛澤東

二月七日

毛泽东为柳亚子居所的题词。

---

[1] 1951年，柳亚子一家迁至紫禁城西之北长街，毛泽东为其居所题词：上天下地之庐。

关于转发山东分局
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8日）

一波、澜涛、高岗、秀山[1]同志，并告漱石[2]及山东分局：

看了山东分局二月五日致华东局及中央的电报[3]，甚为高兴。漱石及山东分局所采方针办法，是完全正确的。山东分局在此电中所述恶霸匪首会门特务活动猖獗情形，在华北东北有同样情形的地区，务须给以同样的处理，应杀者均杀之，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务使反动势力彻底肃清，民气伸张，政权巩固。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秀山，即张秀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3]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电报中提出，山东属于老区，社会秩序比较稳定，但过去对地主恶霸土匪特务镇压不够，群众对我宽大无边不满。因此掌握目前时机，将真正为群众所痛恨的地霸匪首、反动道会门首要及特务分子坚决镇压一批，仍为十分必要。为了使各种镇压能博得群众同情，减少不必要的社会波动，将采取分批、分地、分机关的镇压办法及事前事后进行确当的宣传。

中央对华北局部署镇反及审查留用人员报告[1]的复电和批语

（1951年2月10日）

---

[1] 中共中央华北局的这个报告指出，由于1950年10月以前杀的反革命分子很少，在1500万人口的新解放区的土改中几乎没有杀人，因此朝鲜战争起来后，新解放区社会秩序极不安定。10月以后，各地都杀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予一贯道以普遍的严重的打击，因而人心振奋，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但还有些该杀的没有杀，该捕的没有捕，为此作了镇反的进一步计划，并提出了执行计划时应掌握的几点：1. 必须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行动开始后，要及时汇报，以便互通声气，及时指导。2. 明确镇反对象，第一是特务，第二是匪首和惯匪，第三是道门主要是一贯道，第四是恶霸地主，第五是还乡伪军政人员中反革命有据的分子。重点放在前三种。3. 老区、半老区和新解放区三种地区分别对待，不能混淆。老区只杀少数还乡的反革命有据的反革命分子和进行复辟的地主恶霸分子。半老区还不彻底，应捕杀一批。用和平方法土改的地区和绥远新区，要狠狠地杀几批。4. 该杀而轻判或错释了的反革命分子，可以翻案复判。5. 在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同时，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将狠狠地杀一批和广泛地团结一批结合起来。在处理较大的民主人士时，应报告中央批准执行。对起义军官应本起义前不咎、起义后有反革命活动者必须有确凿证据再行逮捕，并商起义将领后处理的原则办事。报告还指出，为了整顿我们的队伍，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在留用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普遍进行一次查历史、查立场、查工作的三查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取得经验，决定先在京津两市、各省省会和天津铁路局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考虑推广。

一

华北局：

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压反革命及对留用人员试行三查的报告，收到。同意你们的计划和办法，望坚决执行之。

中央
二月十日

二

华东局，山东分局，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北局，西南局，东北局：

下面是华北局二月九日关于重新部署镇压反革命的计划，可以看出华北存在的问题及应取的方针。华北局的报告中又提出了用整风方式审查留用人员及新知识分子的问题，这在华北是应该开始做了，在取得经验后再向你们通报。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各区则尚未到时机，还须等待一个时期，但亦应当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据湖北公安厅报告，已在省级机关中逮捕匪特、地霸、盗匪、反动党派、会门等一百六十名，其中省委占百分之二十二，省府占百分之七十四，中原大学占百分之三，军区占百分之一，内有处长五名等情，可见问题之严重，故必须开始引起注意。

中央
二月十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的补充指示的批语

（1951年2月10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

兹将华东局二月七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补充指示[1]转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所述的方针，策略和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中央

二月十日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镇反补充指示指出，华东地区过去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活动的中心，目前又处国防前线。因此抓住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的时机，在华东全境有计划地消灭人民痛恨的罪大恶极的匪首、惯匪、恶霸与真正有证据的重要匪首及会门头子，是完全必要的。目前除浙江、皖南抓人杀人较多的地区应当停一下，以便清理积案，总结经验，然后再杀第二批外，其他杀得不够的省（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根据各地经验，只要首先把镇压的锋芒，对准为群众所痛恨的匪首、恶霸及确有证据的特务、会门头子和解放后继续活动的国民党重要党团分子，就不致抓错杀错。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必须强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的原则，必须注意事前事后向各界人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注意掌握此紧彼松、此松彼紧、一紧一松的策略。

中央关于引导民主人士参加土改工作的批语

（1951年2月10日）

各中央局：

从西南局中南局两个报告[1]证明，对民主人士应采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有极大益处。

中央

二月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2月6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2月1日关于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问题给分局、各省市委、区党委并报中央的报告。西南局的报告中说，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党外人士，对提前土改一致赞成。这次会议得出经验，应该对民主人士多做工作，特别是吸引他们到农村去参加土改运动，这不但可以教育他们，而且能够减少许多叫嚣和运动的阻力。中南局的报告谈到，北京民主人士土改队领队李俊龙由湘返汉，向民主人士作了参观土改的报告，反映甚好。经验证明，对民主人士参加或是参观土改，我们必须主动，让他们下去做工作，使他们了解指导农民运动的难处及我们指导运动的观点和方法，明白告诉他们运动的真相及我们纠正偏向的决心和办法，对他们的家庭，又主动地依法予以照顾，这样做可换得他们主动和我们站在一边去反对无理叫嚣。

转发陈丕显关于苏南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11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下面是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给饶漱石[1]同志的报告[2]，发给你们作参考。我认为陈丕显同志的进一步镇反计划是完全正确的，那些镇压反革命尚不甚坚决和明确的地方，应当以此为法。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陈丕显1951年2月4日关于进一步镇反计划的报告指出，要加紧剿匪，再抓一批恶霸不法地主，捕杀一批职业会道门头子、典传师、大坛主，加强对特务的侦破和镇压，全面登记反动党团和特务，抓杀一批为群众所痛恨的罪大恶极者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者。

给马叙伦[1]的信

（1951年2月12日）

夷初先生：

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学文化三字照写[2]，不知可用否？注音问题采取慎重考虑的态度是对的，我亦尚无成熟意见。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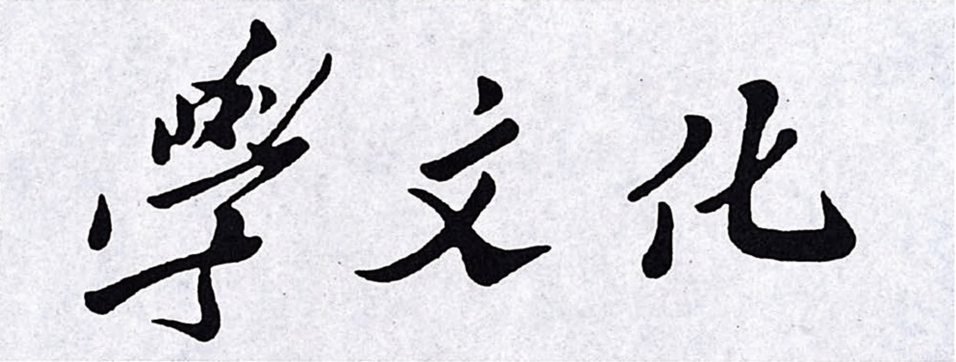
[1] 马叙伦，字夷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2] 指毛泽东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写刊名，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

为《学文化》半月刊题名[1]

（1951年2月12日）

学文化



毛泽东为《学文化》题写的刊名。

---

[1] 1951年1月，为提高广大工农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当时的首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筹办《学文化》半月刊，并致函毛泽东请其题写刊名。2月12日，毛泽东挥笔写了“学文化”三个字并复函云：“学文化三字照写，不知可用否？”随后，周恩来为《学文化》创刊号题词：“努力学习文化，好提高政治、技术水平。”该刊于1951年3月1日创刊。

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1年2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之际，请接受我对阁下、苏联政府与人民的衷心感谢与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谨此，祝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北京

给黄炎培[1]的信

（1951年2月17日）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

（1951年2月18日）

中央于二月中旬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各项重要问题，兹将决议要点通报如下。

一　二十二个月的准备工作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二　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通报。

三　土改

1. 农忙时一律停一下，总结经验。

2. 争取今年丰收。

3. 依靠县农民代表会及训练班。

4. 积极造成条件。凡条件不成熟者，无论何时何地不要勉强去做。

5. 土改完成，立即转入生产、教育两大工作。

6. 同意华东分期退押的办法。

7. 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

8. 土改后，增划区乡，缩小区乡行政范围。

四　镇压反革命

1. 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

2. 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

3. 注意“中层”[1]，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4. 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

5. 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

[1] 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分为外层、中层、内层。清理“外层”，是指清查隐藏在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军政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清理“内层”，是指清查隐藏在我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五　城市工作

1.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今年必须召开两次城市工作会议，议程如中央所通知，向中央作两次专题报告。

2. 加强党委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实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

3. 向干部做教育，明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

4. 工厂内，以实现生产计划为中心，实行党、政、工、团的统一领导。

5. 力争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工人生活。

6. 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

7. 全国总工会及各上级工会应着重解决下面的具体问题。

8. 党委及工会应着重典型经验的创造，迅速推及各处。

六　整党及建党

1.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必须加以肯定，并向各级干部讲明白。但是存在着问题，必须加以整理，并对新区建党采取慎重的态度，这方面也要讲明白。

2. 整党、建党，均须由中央及各中央局实行严格的控制，下面不得自由行动。

3. 整党，应以三年时间实现之。其步骤，应是以一年时间（一九五一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并训练组织工作人员。同时，进行典型试验。然后，根据经验进行整党，但城市可以在一九五一年进行

整党。整党时，首先将“第四部分人”[1]清洗出去。然后对“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区别，对其中经过教育而仍确实不合党员条件者劝其退党，务使这些退党者自愿地退出，不要伤感情，不要重复一九四八年“搬石头”[2]的经验。

4. 城市及新区建党必须采取慎重的方针。城市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乡村须在土改完毕始能吸收经过教育合于党员条件者建立党的支部，在头两年内乡村支部一般不要超过十个党员。无论在城市和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

七　统一战线工作

1. 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一九五一年召集两次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工作，并向中央作两次关于这方面的专题报告。

2. 必须向干部讲清楚为什么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理由。

3. 知识分子，工商业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

---

[1] 1951年整党时，把党员划分为四种人：一、具备党员条件的；二、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者有较严重的毛病，必须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够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四、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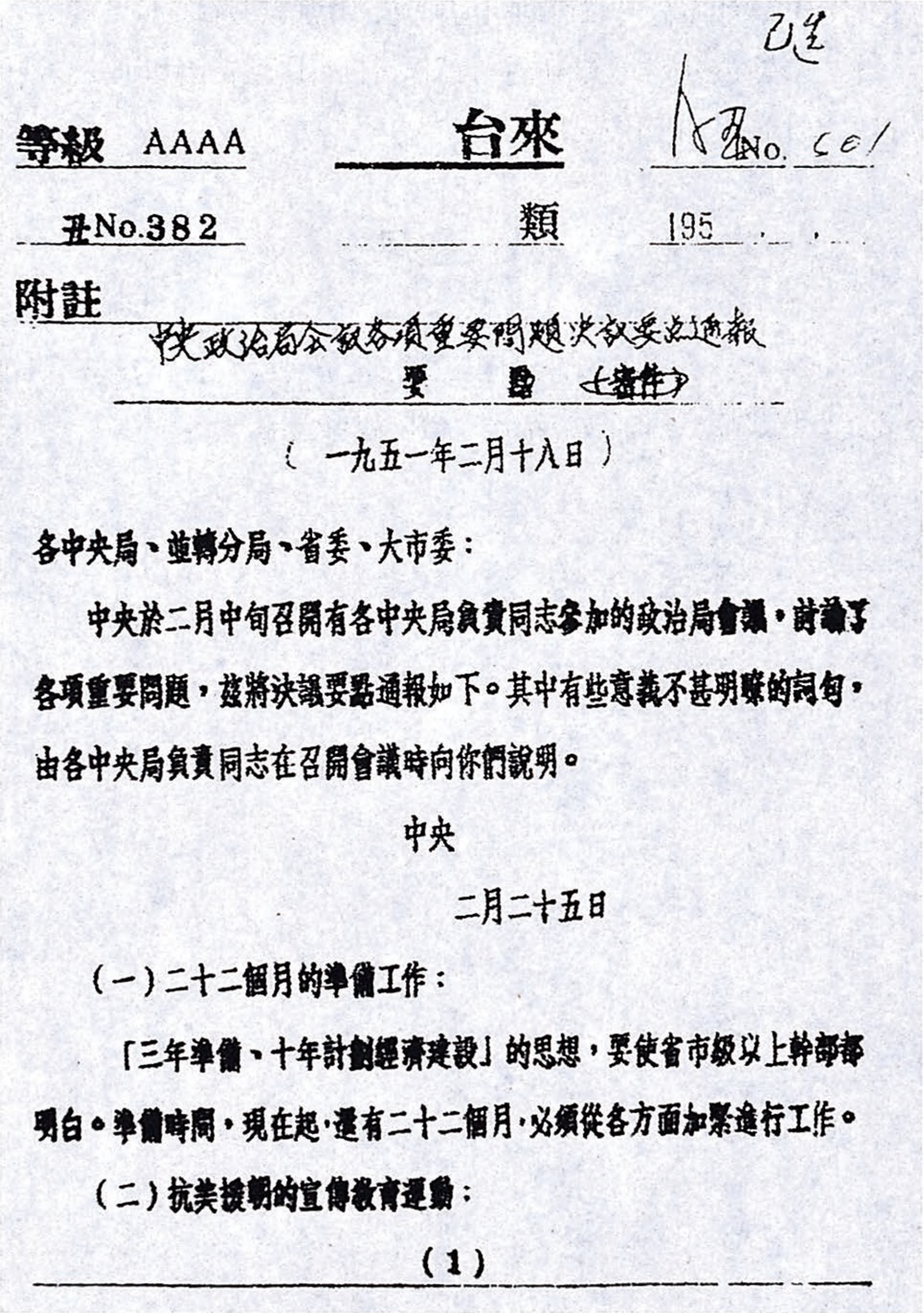
[2] 指1948年整党运动中曾经发生的“左”的偏向。所谓“搬石头”，即抛开原有的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的党籍。中共中央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明确规定整党的主要内容为“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及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使整党工作克服“左”的偏向，健康地向前发展。

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

4. 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

八　整风

一年一次，冬季进行，时间要短，任务是检查工作，总结工作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借以教育干部。



已送

等級　AAAA　　台來　　No. 501

丑No.382　　類　　195　.　.

附註

中央政治局会议各项重要问题决议要点通报

要　點　~~（密件）~~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委、大市委：

中央於二月中旬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各項重要問題，茲將決議要點通報如下。其中有些意義不甚明瞭的詞句，由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在召開會議時向你們說明。

中央

二月二十五日

（一）二十二個月的準備工作：

「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要使省市級以上幹部都明白。準備時間，現在起，還有二十二個月，必須從各方面加緊進行工作。

（二）抗美援朝的宣傳教育運動：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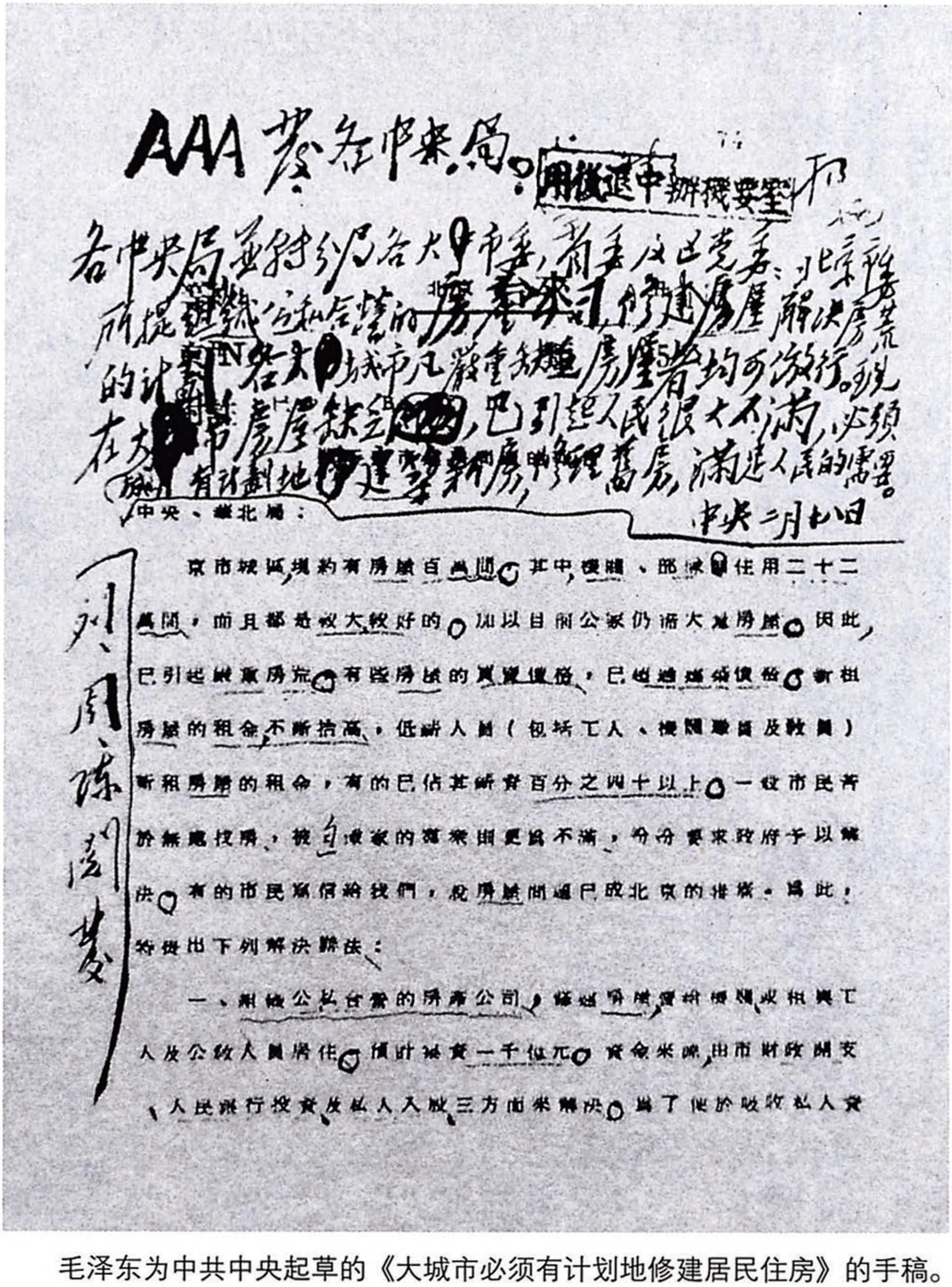
（1951年2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及区党委：

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中央

二月十八日



AAA 发各中央局。

用後退中辦機要室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大市委、前委及区党委：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中央　二月廿日

刘、周、陈阅发

中央、華北局：

京市城區，現約有房屋百萬間。其中，機關、部隊住用二十二萬間，而且都是較大較好的。加以目前公家仍在大量購買房屋。因此，已引起嚴重房荒。有些房屋的買賣價格，已超過戰前價格。新租房屋的租金不斷抬高，低薪人員（包括工人、機關職員及教員）新租房屋的租金，有的已佔其薪資百分之四十以上。一般市民苦於無處找房，被迫搬家的尤其因此更爲不滿，紛紛要求政府予以解決。有的市民寫信給我們，說房屋問題已成北京的[illegible]。爲此，特提出下列解決辦法：

一、組織公私合營的房產公司，修建房屋，供給機關出租與工人及公教人員居住。估計需資一千億元。資金來源，由市財政開支、人民銀行投資及私人入股三方面來解決。爲了便於吸收私人資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的手稿。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1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

消灭一贯道，第一要有充分准备，同时动作，方能一网打尽；第二要布置展览会，向群众作宣传工作。这两点是和消灭国民党特务组织时所应采的办法大体相同。除山西消灭一贯道的经验[1]已通报你们外，现又有察哈尔一个成功的经验[2]，值得参考。

中央

二月廿一日

---

[1]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1年1月9日关于取缔一贯道的情况给华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2月20日给中央并各省委、京津两市委的电报中总结的察哈尔省取缔一贯道的经验。他们的主要做法是：1950年11月至1951年2月5日，全省各地对一贯道道首统一进行搜捕。在搜捕前后，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各种形式（报纸、电台、漫画、展览会、诉苦会、群众会、公审会等），揭穿一贯道的反革命罪行，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水平。目前各地正集中力量进行甄别审讯，追捕漏网道首，号召退道，控诉道头，进行揭发宣传，以扩大战果。

给符定一[1]的信

（1951年2月21日）

宇澄先生：

来示敬悉。退押事及房契一件已交统战部李维汉部长，与先生商酌处理，请与统战部接洽，章先生信奉缴。

顺颂

日安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

---

[1] 符定一，字宇澄，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任校长时，毛泽东在该校读过书。

中央关于印发和组织学习三个镇反文件的通知

（1951年2月22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并转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及师以上人民解放军党委：

中央人民政府已于二月二十一日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在二月二十二日的报纸上已发表了这个条例及彭真[1]同志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并写了《为什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的长篇社论，以上三个文件，请你们迅即印成一本，广泛发行，并组织干部及民主人士普遍地进行学习，务使镇压反革命问题在全党及全国人民中获得正确的了解，批评各种错误的思想，以达坚决彻底地镇压反革命的目的。

中央

二月二十二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在《新民报》北京社社会服务部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2月23日）

富春[1]同志：

此事[2]请你处理一下，查明纺织工业部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并请该部负责人给我写一报告。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

---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新民报》来信中反映的纺织工业部漠视北京市田建发明的浆纱剂，使其得不到推广应用一事。

转发罗瑞卿[1]考察广东、广西、江西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5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同志，并转分局，各省委，大市委，区党委负责同志：

下面是罗瑞卿同志考察广东广西江西三省镇反工作的报告[2]，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2月23日关于广东、广西、江西三省镇反工作给公安部转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四点值得注意的经验：（一）镇反牵涉到统一战线中的人物按以下原则处理：对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群众痛恨者，照顾群众要求，坚决镇压；同时对统一战线人物进行充分工作，说服有关民主人士，使他们心服。对罪恶不多或有若干功劳，群众也可以说通的，则说服群众照顾统一战线，免予判罪，有些则免其死罪，但仍须判刑。（二）对全区性、全县性的恶霸必须全部杀掉，全乡性的恶霸必须一部分或大部分杀掉，不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有些恶霸必须先杀掉，否则群众不敢起来。（三）对散匪采取群众、民兵、武装、工作队互相结合的剿匪办法，彻底加以肃清。对逃到外县外省的匪首恶霸，必须以追到天涯海角的精神予以处死，这样才既不贻患于未来，亦可彻底打消群众的顾虑。（四）从江西和若干其他地方经验看，我们还留给了反革命一些逃匿的空隙：一是从乡下逃向城市，二是从陆上逃到水上，三是逃向边沿地区，四是躲藏在我们机关、学校、工厂、矿山内部。一下子把所有这些空隙弥补起来是困难的，但自觉地采取适当的步骤，扫除反革命逃匿的死角则甚为必要。

其中所说经验，请加注意并采用之。各中央局及各省对自己所属地区的镇反工作，亦须派得力领导同志出去巡视，帮助当地同志总结经验，加强领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镇反计划的批语

（1951年2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各大城市市委：

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说来，还未认真地严厉地大规模地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巢穴，必须有计划地布置侦察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罪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下面是北京的镇反计划，请你们研究仿办。其中说到拟先召集区以上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和各大工厂大学校，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次会，报告反革命情况及各种罪行和犯罪证据，提高大家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再分批执行，这是完全必要的，各地都应这样做。

中央

二月二十五日

转发川西军区清匪报告的批语[1]

（1951年2月25日）

华东、中南、西北、华北各大军区及中央局：

下面是川西军区的清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相结合进去，必须杀掉匪首、惯匪与恶霸，并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以上经验请加注意，凡你区尚有匪祸地区，请指导当地同志研究这些经验。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清匪报告写的批语。

军委关于撤回新疆入藏部队问题致王震[1]电

（1951年2月25日）

王震，并告西北局，西北军区：

丑养电[2]悉。先遣部队既如此困难，请考虑于开山后将该部队撤回新疆，尔后新疆即解除入藏任务，你是否同意这样做，盼告。

军委

二月廿五日

---

[1]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指王震1951年2月22日给军委、西北局、西北军区并请转西南军区的电报。电报说，新疆独立骑兵师入藏先遣部队，已进驻藏北僧可日区之札麻忙保。该区海拔在4000米以上，天气变化无常，时冷时热，空气稀薄，人马呼吸均感困难，病员逐渐增多。据先遣部队报告，该部135人，已病亡6人，现病34人，马匹病亡更加严重。我们除给入藏先遣部队以慰勉外，告其检查治疗，并令军区卫生部研究预防治疗方法，候开山后补送药品。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市政建设计划的批语

（1951年2月26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

兹将北京市委市政建设计划[1]一件发给你们，请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

中央

二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1年2月21日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市政建设方面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给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的选举业已完毕，拟于26日开会。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拟解决下列问题：（一）城区、郊区和村两级人民政府，一律经过区人民代表会议或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二）进一步改组全市工业，使之尽可能适合农民需要（同时照顾城市人民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公私力量开展城乡贸易。（三）组织公私力量，为增建新房1.5万至2万间而斗争（政务院拟建之1万间除外），以减少本市房屋恐慌。（四）指导、帮助并强制所有30人以上之工厂、作坊，特别是大工厂，单独或联合设立卫生所或小型医院，以解决工人治病的问题。（五）增加业余学校的技术学习，并扩大业余学校。（六）由公安局系统地报告两年来反革命分子在本市进行破坏活动之具体情况，以提高群众对反革命的仇恨，然后通过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决议。（七）关于下水道、道路等项市政建设，因限于经费，本年只能进行一些极必要的建设，并对已有的加以修整。

关于继续肃清福建一切股匪致叶飞[1]等电

（1951年2月26日）

叶、成、刘、陈[2]，并告陈、饶[3]：

二月二十日一月份福建剿匪简报，已收到阅悉。剿匪成绩甚大，极慰。望继续不懈，坚持到底，于三月底以前肃清福建一切股匪。如那时尚有残匪未清，仍须以地方武装及民兵继续坚持清捕，直至完全消灭匪众为止。在清匪斗争中，对于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必须在人民同意下坚决迅速地处以死刑，是为至要。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六日

---

[1]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

[2] 成，指成钧，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刘，指刘培善，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陈，指陈铁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副参谋长。

[3]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中央转发川东区党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 年 2 月 27 日）

华东局，中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

下面是川东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报告，我们认为这个报告完全正确。其中所说给胆怯同志撑腰，派干员出去检查，强调策略，严格批准手续几点，都是很必要的。

中央

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转发川西区党委
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2月27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及广西省委，华东局及福建省委：

下面是川西区党委关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他们称为四大运动）的报告，很可以作参考。这样做，才能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掌握基层，给土改扫清道路。这样做了，土改就很容易完成了。

中央

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关于向各界人士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的电报

（1951年2月28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各省军区：

请注意利用中央政府发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机会，结合当地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地解释镇压反革命的完全必要，使他们赞同我们的方针。中央司法部长史良所写的《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1]一文，写得很好，她是司法部长，又是民主人士，各地应注意利用此文说服那些存有错误思想的社会人士及胆怯的人们。将史良此文和中央的条例，彭真的报告[2]及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二日社论印成一本，广为传播，并组织党内外学习。

中央

二月二十八日

---

[1] 载于195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

[2] 指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1951年2月2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和惩治反革命条例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载于1951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转发西南军区
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1]

（1951年2月28日）

华东军区，中南军区，西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并告西南军区各负责同志及党委会：

下面是西南军区党委会二月十五日的报告，其中所述各项，值得十分注意。望你们自己及所属省军区，对于镇压反革命及管训旧军官两大问题，参考西南经验，作正确的处理。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军队中混入反革命分子问题，必须引起充分注意，并着手审查清理，以其结果上报。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关于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写的批语。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 关于摧毁一贯道的报告的批语

（1951 年 2 月 28 日）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退道款；五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一贯道在全国有几百万被欺骗的落后群众，各省凡有大批一贯道存在的地方，党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和适当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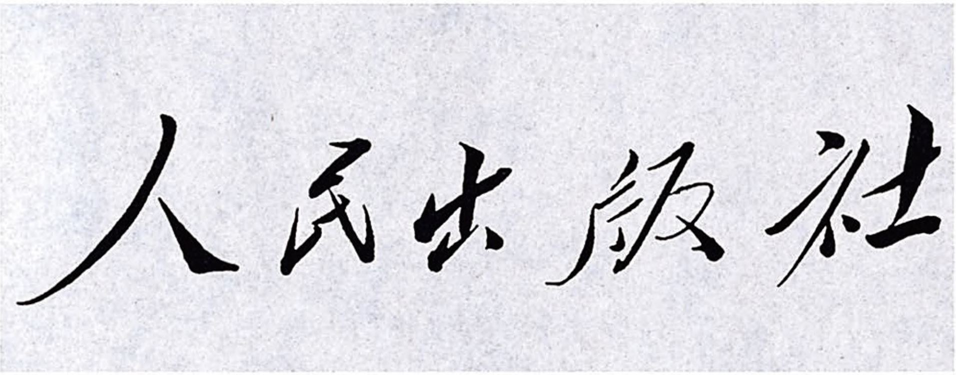
中央

二月廿八日

为人民出版社题名

（1951 年 2 月）

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为人民出版社题写的社名。

为《军学》题名[1]

（1951年2月）

军学

---

[1] 《军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刊。1951年2月，刘伯承决定在军事学院创办一个刊物，即《八一杂志》，并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不久，毛泽东在刘伯承的报告上批示：“中央军委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已定名为《八一杂志》，你们的刊物就叫《军学》好了。”随即，毛泽东为《军学》杂志题写了刊名。

关于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1]

（1951年3月1日）

一、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企图与我进行消耗战。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敌人当站住阵地之后，经过调整补充，便寻找机会向我作试探性的进攻，其目的在一方面不容许我在前线作必要的休补，另一方面则利用其技术条件消耗我军。同时，敌人对朝沿海的袭扰、运输线的不间断的轰炸，均甚为积极。我军补充物资只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能达前线，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途中被炸毁。在目前一个半月内，因我新军未到，老军未补充，敌人有重新进出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可能。

二、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中国志愿军已决定编组三番轮流的部队，即将现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一番志愿部队；将正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现在朝鲜即将补充的三个军（有两个军现在元山、咸兴地区休整）共九个军二十七个师作为第二番志愿部队，约四月上旬可全部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现在汉江前线的六个军的任务；将准备从国内调去的六个军及第一番志愿部队

---

[1] 这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的一部分。

中的四个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作为第三番志愿部队，准备六月中调用。上述十个军中的四个军，因打了五个月，必须补充休整，在第二番志愿部队接替前线任务后，即调至平壤、元山地区休补，兼顾海防。第一番志愿部队中其他两个军，则调回国内整补。在过去四个战役中，中国志愿军战斗的与非战斗的伤亡及减员已超过十万人，正将补充老兵新兵十二万人；今明两年准备再有伤亡三十万人，再补充三十万人，以利轮番作战。

三、根据一、二两月份的作战经验，我因有三个军在咸兴以北战役中损伤较大，从事休整，致现在前线作战的只有六个军，减员甚大，未获补充，因之我无后备力量，在战役胜利时不能扩张战果，在敌人增援时不能打敌援兵。同时，我军南进，后方线长，供应很困难，还须留兵守备。故在敌人未被大量消灭前及我尚无空军掩护条件下，我如过早逼敌南退，反不利我分割歼敌。鉴于此种情况，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于四月上旬达到前线以前，敌之陆军还较我占优势，我应避免进行战役性的出击，而以第二番志愿部队六个军及朝鲜人民军四个军在南汉江以北地区进行防御，迟阻敌人。但必须估计，在今后一个半月内，敌人有可能寻机进攻，逼我应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军拟让敌人进至三八线南北地区，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队九个军到齐后，再进行有力的新的战役。我们计划，在我第二番部队到达后，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军及李承晚军建制部队数万人，然后向南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

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给胡乔木[1]的信

（1951年3月2日）

乔木同志：

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2]《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发各地登载。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龙所写文章[3]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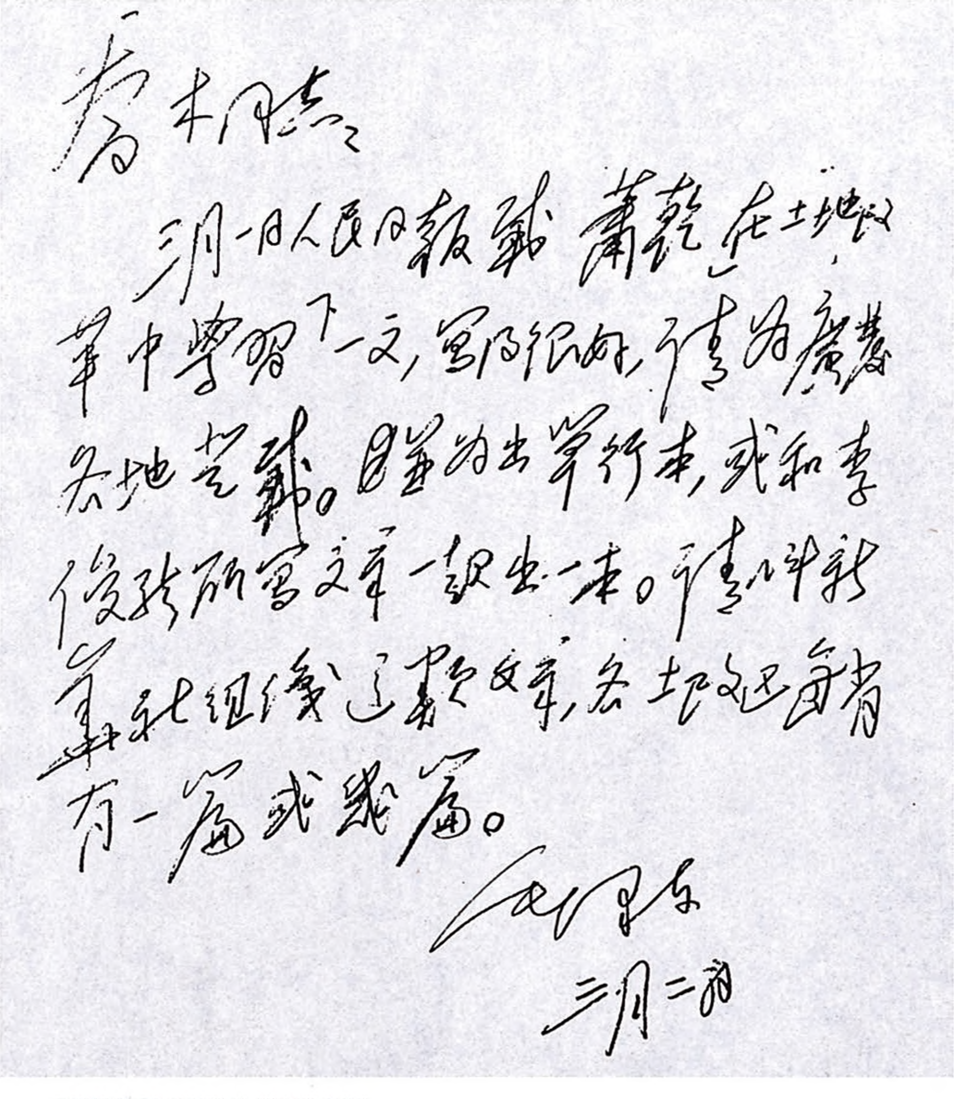
三月二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萧乾，当时任《人民中国》（英文版）副总编辑。

[3] 指政务院参事李俊龙写的《战斗中的湖南农民》一文，载于195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乔木同志：

三月一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各地登载。且并为出单行本，或和李俊珍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毛泽东

三月二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关于修改《矛盾论》给陈伯达、田家英[1]的信

（1951年3月8日）

伯达、家英同志：

《矛盾论》作了一次修改，请即重排清样两份，一份交伯达看，一份送我再看。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畅，还须修改。其他有些部分也还须作小的修改。

此件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为宜，因为太象哲学教科书，放入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

你们暂时不要来，待《矛盾论》清样再看过及他文看了一部分之后再来，时间大约在月半。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都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转发罗瑞卿[1]关于浙江省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及区党委：

（一）兹将罗瑞卿同志关于浙江情况的报告[2]一份转给你们，其中所述浙江各项镇压反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关于登记反动党团及特务分子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和采用。关于此项登记工作，凡未办及未办得好的，请你们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计划，并向中央作报告。（二）目前几个月，各地领导同志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向下面指导的重心，仍然是对那些优柔寡断的市委地委县委给以检查和督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3月4日关于浙江镇反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浙江登记反动党团、特务的工作成绩颇大，其中若干经验值得注意。他们不仅在大中城市作了这种登记，而且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亦做了这种登记工作，因而大大发挥了革命政治威力，暴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与政治积极性，保证了秋收、土改的顺利进行。反动党团登记必须充分地掌握材料，同时又要抓紧时机，坚决贯彻。登记工作必须坚持中央政策，不得随意扩大登记面，但又要按具体情况办事。登记工作又须分别内外，讲究策略，对不同的对象分别采取不同的办法。在登记后的审查处理阶段，先将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匪首、惯匪及其他有证据的政治反革命分子，将一般登记的反动党团分子的处理工作放在后面。

促，使他们坚决行动起来，严厉镇压反革命。当然，在那些已经实现了彻底镇压方针的地方，则要停一下，不要多捉多杀了。无论什么地方，都要有计划，讲策略，作宣传，不杀错，这些也是当然的。

毛泽东
三月九日

给杨尚昆[1]的信

（1951年3月9日、20日）

一

尚昆同志：

镇反工作的重要材料，请随时送给我。另件请传阅发出。

毛泽东
三月九日

二

尚昆同志：

凡各地镇反电报及综合报告，均请清出送我。此外，其他电报，你认为值得看的，也请清出送我。另报六份，请传阅办理。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上次我批发的关于西南财经机关清理反动分子的电报[1]，请抄发中央、军委各部门（包括各特种兵）首长及薄一波，叶季壮，滕代远，乔木，彭真[2]。

---

[1]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1951年3月8日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的总结报告。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叶季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滕代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彭真，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1]的批语

（1951年3月11日）

军委直属各军事领导机关及军事学院，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

请你们也照西南军区党委会一样，对于学习四个镇反文件及传达报告的问题，对于清匪问题（在有清匪任务的地方），对于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问题，此外还有在机关中部队中混入其他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及保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不论过去已有检讨或尚未有检讨，均一律重新作一次检讨，并对自己直属机关部队及各兵团军师，发出必要的指示并定期完成任务。我们认为在一切军事机关学校部队中引起注意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并作出正确的处理，是目前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凡对此任务忽视者，应当受到批评。你们的检讨及指示，应送军委一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

---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1年3月6日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给各军、各军区等单位并报军委总政的电报。毛泽东在转发这个电报时除写了上

述批语外，还在电报中多处加了批注。电报和批注如下：

自去年接到中央镇压反革命指示之后，我军区部队在西南局统一领导下是坚决地执行了这一指示的，因此在剿匪与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问题上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在军队内部缺乏专门研究布置，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尚未引起各级党委的普遍重视。（毛注：西南如此，各军区各省各军恐怕也有此种情形。）有的对反革命存在着“重案轻处”“重纪律犯轻政治犯”或“地方严部队宽”的倾向。对待旧机关旧职员的态度不够严肃，对其中有严重问题的分子注意不够。党内干部中轻敌麻痹遗失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军区党委认为上述缺点必须立即纠正，这不仅关系到清匪发动群众和社会治安，而且是直接关系到部队内部政治上组织上纯洁与巩固的重大问题。（毛注：正是这样。）为此决定：

一、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之惩治反革命条例、彭真同志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人民日报》2月22日社论、史良部长“坚决正确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专论等4个文件，各区必须认真地组织干部学习，并结合实际进行一次检查。师及军分区以上党委应将检查结果分别向党内党外干部进行传达报告。凡对反革命丧失警惕，重案轻处，甚至和平共处的倾向，务必得到揭发批判与纠正。（毛注：必须如此。）

二、继续加强清匪与捕捉匪首运动，密切结合群众斗争，防止因剿匪胜利而麻痹松懈。对现有管押的积案应立即组织清理，遵照惩治反革命条例迅速判刑。今后凡属处理土匪案件，应统由军队结合地方执行，并每月向大军区报告一次。

三、加强对留用旧军官、旧人员的工作。各部队与机关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毛注：很对，应进行一次普遍的清理。）对这些人员除继续进行团结争取改造外，对其中个别有破坏活动的分子也必须坚决逮捕法办。对伪装投降起义混入我军之一切反革命分子，应迅速加强审查侦破，弄清材料，分别处理。只有坚决地肃清与镇压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才能更好地团结教育多数。片面地强调教育改造，放松了对他们政治上的警惕是错误的。（毛注：很对，应当这样办。）

四、各地现有集训尚未处理的旧军官旧人员中的特务恶霸分子，应即作出计划，迅速分别处理，不得拖延。上述第三、四两项军区另有专门指示，望注意研究执行。

给戴毓本[1]的信

（1951年3月11日）

毓本同志：

临行一信，到兴城一信，均已收到。达到你所愿望的工作岗位，为你庆贺。已与习梅[2]兄见面，谈了许多乡情。他不久可进学校。

顺祝健进！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

[1]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给胡乔木[1]的信

（1951 年 3 月 14 日）

乔木同志：

三月十三日光明日报载有一篇天津通讯，题为《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　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写得很好，请予广播，并在人民日报转载[2]。同日该报还登了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一篇文章，题为《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3]。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1951 年 3 月 14 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题目改为《天津市天主教徒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

[3] 载于 1951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

关于校对《矛盾论》给田家英[1]的信

（1951年3月15日）

家英同志：

《矛盾论》的**原稿**请即送来。

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

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中央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省军区各兵团各军：

据报，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

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

中央
三月十八日

转发黄敬[1]关于天津镇反补充计划的批语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市委，省委，区党委：

各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过去几个月一般劲头很小。这主要是由于领导机关对反革命的严重性及镇反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而来。从二月起，先有北京市，现在又有天津重庆两市动起来了，这是好现象。大城市是反革命分子及其领导机关潜藏的最主要的巢穴，必须用很大的力量去对付，必须认真研究，周密布置，大杀几批，才能初步地解决问题。下面是天津的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天津准备于今年一年内杀一千五百人（已杀一百五十人），四月底以前先杀五百人。完成这个计划，我们就有了主动。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岛、广州、武汉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个几个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实的镇反计划。人民说，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军区党委及公安机关：

福建公安厅的这个报告[1]写得很好，有分析，有内容，方针正确，态度坚定，值得各地同志研究仿行。我们希望各省市都能写出这样的报告。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指福建省公安厅1951年3月1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给华东公安部并报中央公安部的报告。报告指出，福建省镇反工作去年11月以后有显著转变，但当时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地区镇压得不狠，个别地区未动。主要原因是领导思想上一下转不过弯子，存在“怕乱”“怕纠偏”等顾虑。在省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作了进一步动员，并采取一系列步骤后，各地镇反工作开展很迅速，收效很大。一般的步骤是：第一步先地委讨论，经党内外自上而下的充分动员，结合有重点的具体检查督促，达到明确思想，解决策略与材料来源等问题。第二步是结合土改等中心工作发动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开展群众性调查研究工作，结合公安部门既有材料，确定该捕对象，召开农代会核对补充材料，经一定组织审查批准，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党政军民力量，实行全区性的大逮捕。第三步是发动群众控诉，经人民法院或军法处依法判处，政府机关组织公审大会和群众大会公布处决。

转发西南公安部关于财经交通部门清理反动分子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1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在留任人员中清理反动分子，湖北省一级已有一个经验，现在西南方面又有了一个更完全的经验。可见这不但是应当做的，而且是现在就可以做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去解决。西南的经验是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的财政、经济、交通机关留用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九千余人中，逮捕了七十余人，管制了七十余人，管训了一百九十余人，清洗了八人，共计三百五十余人，占旧人员总数百分之三点九。此外，又登记了国民党及会道门分子五千七百余人，占旧人员总数百分之六十四。这个经验很值得研究。请你们对这方面的问题，加以考虑，定出实施计划，取得经验，加以推广。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组织民主人士
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

（1951年3月18日、30日）

一

漱石、子恢、小平、仲勋[1]同志：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2]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2] 吴景超（1901—1968），安徽歙县人，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当时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二

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请你们计划一下，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镇反工作，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下面是川西区党委的报告，请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给周世钊[1]的信

（1951 年 3 月 19 日）

惇元兄：

三月十四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您。一月二十九日的信及学生们的签名信也收到了。你的三项计划很好。进研究院很有意义，可以安心读几个月书。读完去东北华东考察一次也极好。第三项计划可能有些困难，如在两三年后实施也有可能办到。

我在乡下住，没有病，专为休养，暂不进城。容后面叙。

祝安好！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转发中南局关于城市镇反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市委及五万人以上的中等市委：

城市镇反工作极为重要。最近华北东北两区各大中城市均已动作起来了，反映极好。重庆亦已实行第一次大逮捕，反映如何，待报。中南局已于三月十六日发出城市镇反的指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参考。应在一切大城市中等城市及小城市（包括县城及大市镇）布置镇反展览会，此种展览会作用极大。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转发薄一波、刘澜涛[1]三月份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并告志愿军党委：

下面是华北局三月十日给中央的报告[2]，所述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及研究城市工作等项经验均值得注意。其中关于镇压反革命及抗美援朝两项经验比较完整，各地均可仿行。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2] 指薄一波、刘澜涛1951年3月10日给毛泽东的3月份综合报告。报告总结的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是：1．必须开好干部会议，把镇压反革命的策略和步骤交代清楚，不能一声喊杀就干起来。2．必须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杀，并且在杀的过程中继续发动群众，用一切可能的和有效的办法暴露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激发群众义愤。3．一定要让各阶层代表人物、民主人士参与其事。报告总结的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是：1．各级党委不仅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抗美援朝的政治内容，而且专门作了关于开展抗美援朝的决定，召开专门会议训练了干部和积极分子。2．要有固定的组织。3．要有具体计划。4．必须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5．宣传方式要多样灵活，不要老一套。

对邓小平[1]关于清查处理西南军政机关不纯问题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1年3月20日）

一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志愿军党委，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

兹将邓小平同志三月十三日的报告[2]转给你们，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加以研究。这个报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军政机关成份极为复杂的问题，中央直属各军政机关，各大区军政机关，各省市军政机关，均是如此，不过略有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必须立即开始研究清查和处理的办法，并有计划地布置清查处理工作。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财经机关九千余人中清理反动分子的经验，早几天我已通报你们了，请你们根据此项经验，着手布置清理自己所属的军事机关，财经机关，政法机关，和文教机关，先作重点布置，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邓小平1951年3月13日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西南军政机关成分复杂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云南党组织不纯问题。

取得经验，再行推广，尽今年一年初步地普遍地清理一次。邓小平同志报告中所提的第二个问题，凡新区的党都应注意，不可忽视。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二

小平同志：

三月十三日报告收到，你的意见是正确的，已转发全党仿行。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人民群众拥护镇反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凡工作好坏，应以群众反映如何为断。直至现在党内还有不少干部不了解坚决地正确地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你们应将镇反经验及群众欢迎镇反的反映随时通报各地，使此项经验及反映迅速传播，以利仿行，并使胆怯的同志振奋起来。下面是北京人民欢迎镇反的反映，可以看看。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就黄祖炎被刺杀对所属市、地委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20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兵团及军，并告志愿军党委及中央军委各部门首长：

下面是山东分局在黄祖炎同志被刺后向所属市委地委发出的指示[1]，中央认为这个指示是正确的，特转给你们，请你们连同中央三月十八日为此事而发的指示[2]一道加以讨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指导所属，坚决执行。中央严重地唤起你们注意，务须重视此事，切勿等闲视之。

中央

三月二十日

---

[1]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951年3月14日的指示指出：黄祖炎同志被刺牺牲，说明了阶级敌人当我坚决镇压反革命日益深入具体之际，用刺杀、暗害的恐怖手段来进行报复，企图以此混乱我内部，动摇我镇反的决心；这一事件同样也暴露了我组织内部的不纯和保卫工作的松懈无力。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山东分局在指示中提出了以这次血的事件教育全党、加强机关和首长的保卫工作等七点意见。

[2] 指中共中央1951年3月18日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给胡乔木[1]的信

（1951年3月20日）

乔木同志：

（一）宣传会议[2]可自五月五日至十五日开十天，如十五日以后四中全会还未开会再延长五天，否则不要延长。（二）理论教育决定[3]可先以草案发各地，通知照发。（三）选集提前发表的少数文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召开的，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会议作了报告和结论。会议于1951年5月7日开幕，23日闭幕，历时17天。

[3] 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1951年3月20日将这个决定草案下发各地。决定指出，现在国内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党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的复杂任务，全党有系统地学习理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更好的条件，也更加迫切需要。决定要求全党按照党员理解能力的发展程度，将学习分为三级：第一级学习政治常识，第二级学习理论常识，第三级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著作和毛泽东的理论著作。决定还对学习时间、考试制度、理论教员、学习顾问以及地委书记以上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

章[1]，待看后送你，四月或可发表一二篇。《学习》上不要发表我的文章。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指拟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前在《人民日报》《学习》等报刊上提前发表的毛选中的一些文章。实际上，这些文章从1951年7月1日开始在《人民日报》和《学习》杂志上发表，七八月间先后发表的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8篇。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的批语

（1951年3月22日）

华南分局，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

（一）华南分局三月十五日电报[1]中所述的决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中南军区对在粤各军发出指示，在指示中应指出军队干部必须和本地干部发生正确的关系，好好地帮助他们而不要看不起他们，这点极为重要。分局应召集有军队和地方两方干部在一起的会议，明确地指示任务和双方发生正确关系的重要性。（二）广东这种办法，请其他中央局考虑，是否在某些干部弱工作难于开展的地方，有采用广东办法的必要。

中央

三月廿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1年3月15日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领导工作的意见给中央并中南局、中南军区的电报。电报说，为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在不变更现行区域及不太多牵动干部的情况下，决定成立粤东、粤西两区党委和三级军区。军队经营地方的实施方法，采取军队就地兼任与军队调出干部参加地方工作两种。各野战军除就地参加兼任地方工作外，另决定每军调出干部500名至700名专任地方工作。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镇反问题中各民主党派有组织关系的登记，审查，逮捕，审讯等事，华东局于三月九日有一个文件[1]作了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各省市均可照办。

中央

三月二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3月9日关于镇反中如何对待民主党派成员给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指出：上海在反动党团特务的登记中，公安局曾动员各友党成员登记，甚至并无充分证据，即行逮捕友党分子。此事现已制止。华东其他各地亦有类似事件发生，应从速纠正。根据中央公安部指示，凡加入各民主党派者，一般不要登记，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波动。至于民主党派中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用侦察解决而不用登记解决，各地须切实遵照执行。各友党成员的历史问题，应由各友党作为审干问题解决，自行处理。各友党中现行犯可以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对其他有证据的特务分子及反革命分子，应由公安部门与统战部商定后，方可逮捕。对现行犯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审讯，应尽量争取其所属党派人士参加。

中央转发罗瑞卿[1]关于几个大中城市镇反工作考察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所属公安部门：

兹将罗瑞卿同志三月二十日关于镇反问题的考察报告[2]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即当作中央的意见予以执行，并据以检查镇反工作。当此镇反工作紧张时期，上级派出负责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3月20日关于几个大中城市的镇反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根据考察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了城市镇反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有些同志对城市反革命估计不足，认为城市与乡村不同，乡村有大量的土匪、恶霸，城市只有特务。第二，对城市镇压反革命可能引起的震动估计过高，加重了自己的顾虑，决心反复动摇，硬是杀不下去。第三，过于相信自己的一点侦察工作基础，忽视了广大群众反奸的伟大力量，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小手小脚，跳不出狭隘的圈子。第四，特情关系太滥，又缺乏严格的控制和监督。第五，大中城市的公安干部量小质弱，管理城市的经验深嫌不足，已有的经验也未很好总结，领导上一般的也应加强，否则应付复杂而尖锐的斗争确实是有困难的。为此，公安部门应更加主动地取得党委的领导，密切向党委请示报告；城市党委则要更加关心公安工作，要设法补充干部，并给以具体指示和帮助解决具体困难。

同志或工作组去各地检查和帮助工作有很大的作用，请你们尽可能派人出去为要。

中央
三月廿三日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沧县地委镇反工作经验的通报的批语

（1951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司，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省军区及地委同志们：

这是沧县地委的镇反经验[1]，请你们发给所有中央局委员，大军区委员，分局委员，省委区党委委员，省军区委员，大中市委委员，大中市委所属区委书记，每人一份，并请每人看一遍，至要至盼。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

[1] 中共河北省委1951年3月14日通报中介绍的沧县地委镇反工作的主要经验是：一、广泛深入教育干部和党员，明确敌我界限，在党内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斗争，统一思想。二、召开县的人民代表会议，贯彻镇压反革命的精神，通过代表将镇压反革命的精神贯彻到群众中去。三、广泛开展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

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致饶漱石[1]电

（1951年3月24日）

饶漱石同志转上海市委：

同意三月十五日上海市委的镇反计划。这次计划有具体执行的步骤，有时间，有准备杀关管的数目字，比过去大进一步了。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大捕大杀几批，首先要取得党内思想的一致，关于这一点，可参看沧县地委的经验。其次要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北京市委的经验。他们是先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一个一般拥护中央镇压反革命条例的决议，然后进行大逮捕。如果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久要举行，也可以这样做，否则可以先逮捕。北京市取得各界代表人物拥护的方法主要是一次一百多人的小型会议，又一次五千人的大会。前者除说明情况外，还陈列典型的证据和案情给他们看，结果引起群情愤激，一致要求坚决镇反。后者已于三月廿四日召开，主要由苦主登台控诉，以期争取五千个代表人物的拥护，会后即大杀一批。由北京的经验看来，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是可以取得他们拥护的，只要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

---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

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转发河北省公安厅关于天津专区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

此件[1]请一直转至地委，希望各地捉反革命都照天津专区（天津市不在内）的办法办理，以防滥捕。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五日

---

[1] 指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安厅1951年3月10日关于天津专区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的报告。报告说，天津专区于3月3日晚动员了区以上干部，各种武装，连村干部共万人以上的力量，以闪击之势，捕获敌伪党特军政及惯匪恶霸道首等重大反革命分子，做到了对象准确，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行动迅速，一网打尽，并无一错抓。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反动分子惊恐胆寒。他们的经验是：1．充分准备，周密组织，分工负责。2．凭票捕人，拘票注明姓名、年龄、特征、住址及犯罪性质，这不仅坚持了法定手续，而且抓得准确，避免了错抓乱抓。3．逮捕前宣布纪律，高度增强了干部的责任心，使完成这次艰巨任务未发生混乱，做到秩序井然。

给李达的信

（1951 年 3 月 27 日）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1]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2]，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照原。

---

[1] 指《新建设》杂志，《〈实践论〉解说》第一部分，发表在1951年出版的该刊第三卷第六期。

[2] 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的主要修改有下列几点：一、在《解说》中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解说》中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说：“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把这句话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反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2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北京的办法[1]很好，请你们均照这样做。你们如何做的，请写报告来。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1年3月20日给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谈到的召开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的做法。报告说，采取有各界代表参加的小型代表会议讨论镇反，是为了便于集中讨论，使各界人民代表了解真实情况与得到充分发言的机会，并激起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会议的报告要着重列举反革命罪犯的罪行，把典型案卷和典型罪犯的事实集中起来报告，这样虽然道理讲得少，却具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会上将反革命罪犯的罪证加以陈列展览，效果也很好。

给胡乔木[1]的信

（1951年3月29日）

乔木同志：

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2]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廿八日人民日报左下角一条新闻《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送讨论镇压反革命的录音》，亦请用文字广播。惟其中有几句是讲三月廿八日要求听众做什么的，广播稿应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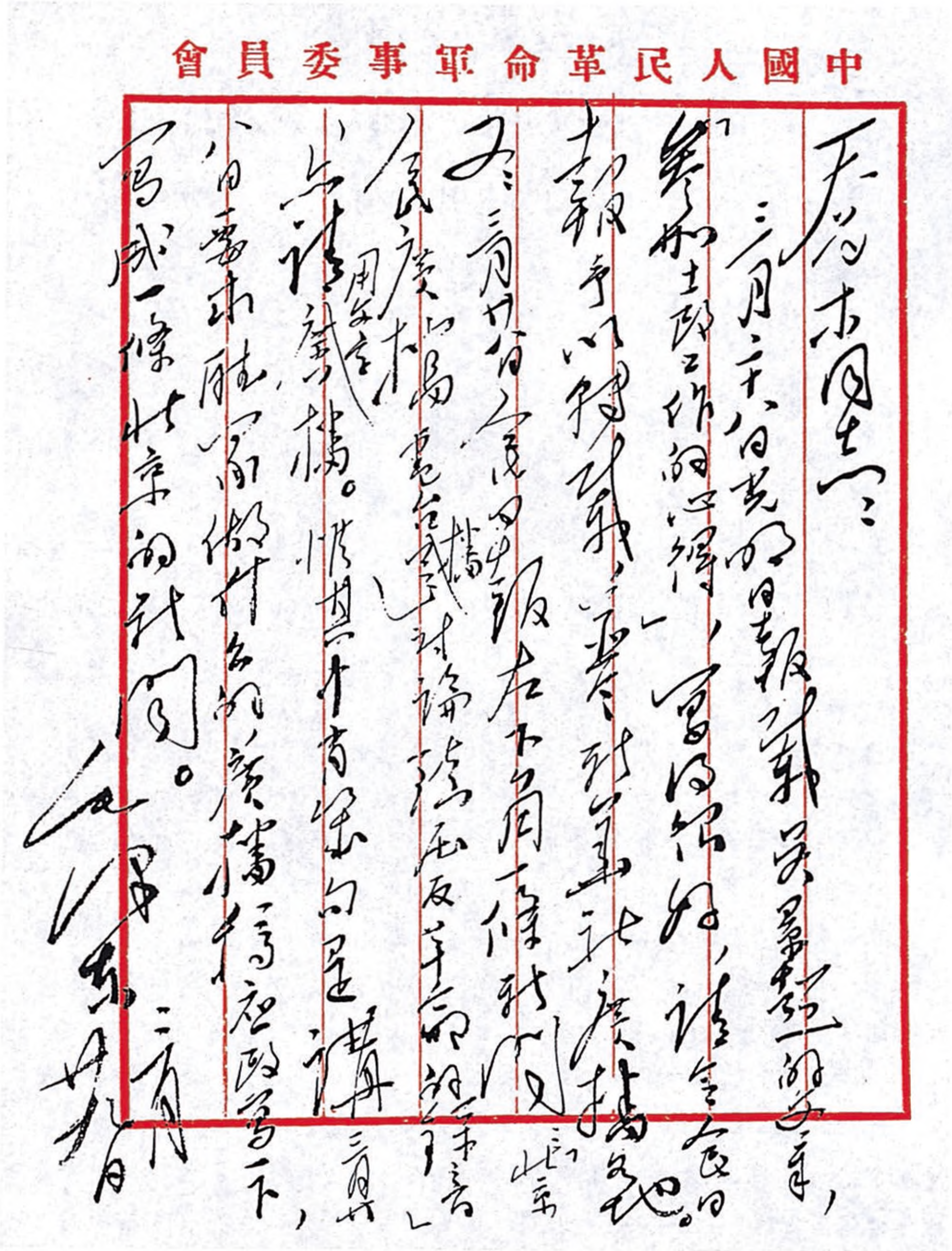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吴景超，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乔木同志：

三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载吴景超的文章，《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写得很好，请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又三月廿八日光明日报右下角一条新闻（北京讯）「人民广播电台播讲讨论镇压反革命的讲话」，亦请周鲸文广播机构。惟其中有些内容是讲三月廿八日要求融洽的修付各项，负责的稿改写一下，写成一条北京的新闻。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转发黄克诚[1]
关于湖南镇反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黄克诚同志，并告子恢，漱石，小平，剑英，仲勋，一波，高岗[2]同志：

我认为黄克诚同志三月二十三日的意见[3]是正确的。镇压反革命无论何时都应当是准确的精细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并且完全应

---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黄克诚1951年3月23日在给邓子恢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关于湖南镇反问题提出的意见。电报说，湖南全省执行中央10月镇反指示以来，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大多数人民是拥护的。这个坚决行动，打落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群众斗志，清醒了干部头脑，收获极大。但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下面干部劲头很大，如果继续坚决而猛烈地镇压下去，杀人将很大地超过中央规定的限度。今后，主要将是对付暗藏的反革命，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与隐藏的反革命斗争更需要精细，采取目前猛烈的办法，一定会发生混乱。因此，我们拟即收缩停止大捕大杀，转入经常工作，杀捕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

由上面控制。捕人要仿照天津专区发拘捕证，照证捕人的办法，不能乱捕。凡各地有如黄克诚所说“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者，应立即加以收缩，进行检讨，并作出结论。畏缩不前尚未开展者，则应当推动其开展。请你们严密注意这两种情况，好好掌握，不要出乱子。如你们认为有必要，请将此电转发各省市。

毛泽东
三月卅日

转发山东分局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

转发中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及地方军区，并告中央各直属部门：

对镇反工作宣传不足是普遍的现象。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报纸揭露太少。对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各界民主人士参加镇反工作，真正与闻其事，各地做得太少。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北京天津两市最近两星期来大有进步，对镇反大张旗鼓，广泛宣传，普遍揭露，利用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几千人乃至万余人的会议，利用报纸和广播电台，利用展览会，大肆宣传，使家喻户晓，使全体人民及各界民主人士均参加镇反工作，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效非常之大。中南局现亦发了指示，扩大镇反宣传，可为各地参考。

毛泽东

三月卅日

转发空军党委
关于镇反工作的检讨和决定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各大军区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并告中央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党委：

关于镇反问题，除已经作了必要的检讨和决定者外，凡未做者或做了尚不充分者均请你们照空军党委的办法做出同样的检讨和决定。此项文件中央各直属部门直送中央，各省军区经各大军区转送中央，务于四五两个月内普遍检查一次。不做此项检讨和决定者，应受到批评，并追究责任。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观土改、镇反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1年3月30日）

刘、周、陈、罗迈[1]同志：

今年还有九个月，应从北京天津两市组织四五批至七八批参观团或参观组，到南方各省（主要是华东、中南，如有飞机也应去西南）去参观土改和镇反工作。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一级人员凡愿去的都让他们〔去〕。是否可行，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

[1]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

（1951年3月30日）

看过，同意。

毛泽东
三月卅日

第十七页上删去两句[1]，因为不能或不愿加入那些人民团〔体〕的人们，例如资产阶级，富农，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并不都是不良分子或落后分子。

代表们讨论中或者有些好意见，可据以修改或充实这个报告。

---

[1] 刘少奇报告稿第三部分“关于发展新党员的问题”中原来的一段话是：“党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团体，例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会、农民协会、合作社、妇女联合会、文化工作者的团体等，都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也是党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场所。凡有这些团体组织的地方，那里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或其他劳动人民入党，必须是这些团体的团员或会员，不能或不愿加入这些团体的人，也就是说，人民中的不良分子或落后分子，一般的不应该接收他们入党。”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也就是说，人民中的不良分子或落后分子”。

又：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

关于召集各界代表人物开会通报镇反情况的电报

（1951年3月30日）

东北局：

三月十九日电悉。你们开座谈会讨论镇反工作的经验很好。在各城市及新区进行有计划的大批逮捕反革命之前及逮捕以后，要召集更多的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北京曾召集一次五千五百人的会，天津曾召集一次一万多人的会，均是各界代表人物，不是普通群众。在下面则应召集代表人物的和普通群众的两种会，使家喻户晓。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关于播发许建国[1]等在天津镇反大会上发言的电话稿

（1951年3月31日）

用电话告乔木[2]：

将三月三十日天津报纸所载镇压反革命大会上许建国的报告全文，黄敬[3]结论全文及王淑云[4]的控诉词（采用进步日报的稿子）加以广播，并将天津这次开会情〔况〕写一条新闻广播。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

[1] 许建国，当时任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公安局局长。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3] 黄敬，当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4] 王淑云，被恶霸迫害致死的搬运工人王士英、王士宏的妹妹。

关于彭友胜工作安排问题的信

（1951年3月31日）

一

友胜先生：

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的信写得太客气了，不要这样客气。你被划为贫农成分，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工作的问题，如果你在乡下还勉强过得去，以待在乡下为好，或者暂时在乡下待住一时期也好，因为出外面怕难于找得适宜的工作位置。如果确实十分困难，则可持此信到长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龄先生，向他请示有无可以助你之处。不一定能有结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历史和近来的情况。连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们提出确定的意见。如果你自己愿意走动一下，可以去试一试。去时，可将你在辛亥革命时在湖南军队中工作过并和我同事（你当副目，我当列兵）一点向他作报告，再则将你的历史向他讲清楚。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二

星龄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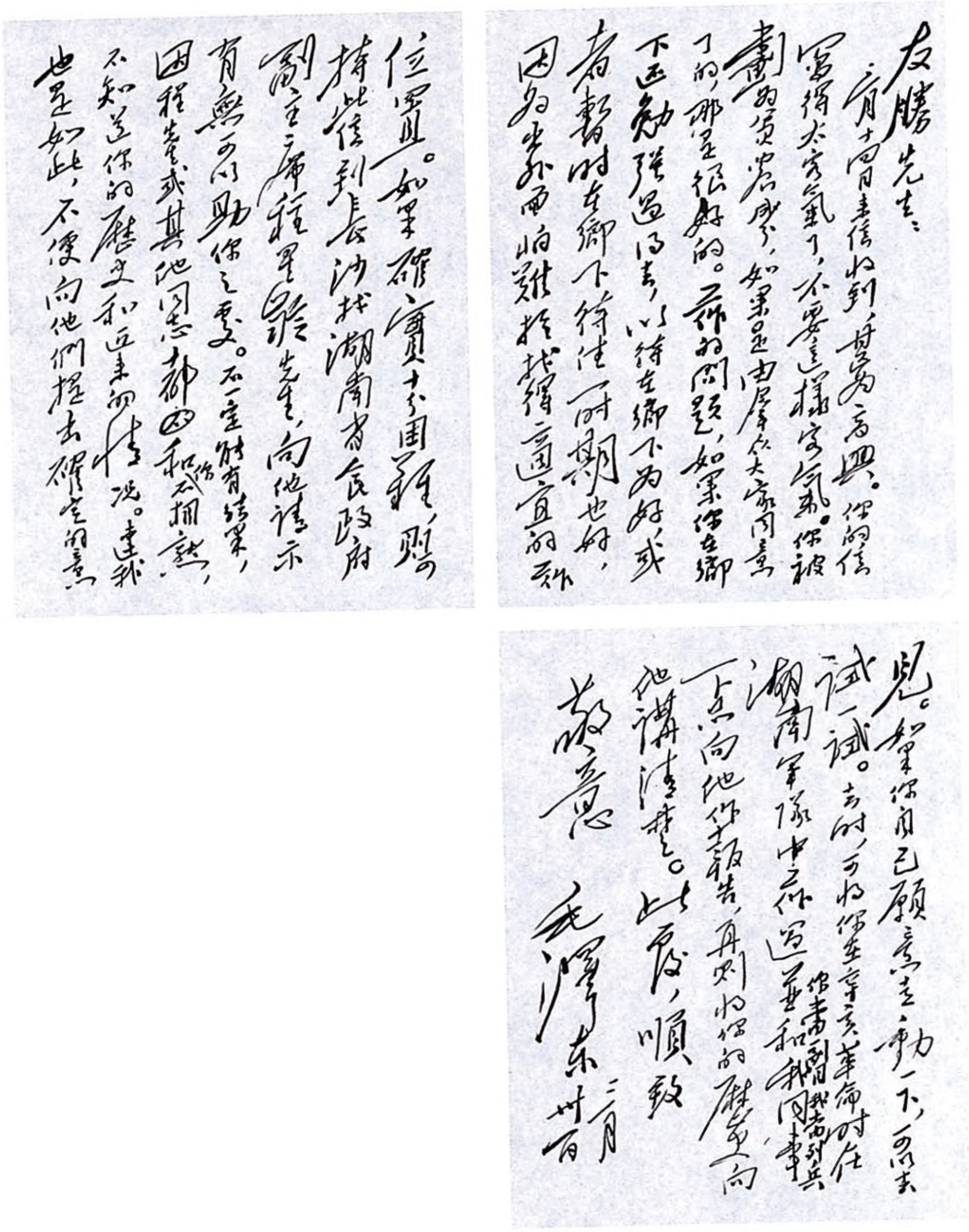
此人叫彭友胜[1]，据我过去的印象是个老实人，四十年的历史不清楚，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湖南军队充副目（即副班长），我在他那一班充列兵，后来在广州见过一面。现来信叫苦，我已复信叫他待在乡下，不要出外；如果十分困难，又出于自愿，不怕无结果，则可持我的复信到长沙找你，向你请示：是否可以对他有帮助。我在复信上已说明，不一定有结果，因为程先生他们不清楚彭的历史，连我也不清楚，不便提出确定的意见。他来见时，请你加以考察，如果历史清白，则酌予帮助，或照辛亥革命人员例年给若干米，或一次给一笔钱叫他回去；如有工作能力又有办法，则为介绍一个工作而不用上二项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三十一日

---

[1] 彭友胜，湖南衡东人，辛亥革命爆发后，曾和毛泽东在湖南起义的新军中共过事。



友勝先生：

二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為高興。你的信寫得太客氣了，不要這樣客氣。你被劃為貧農成份，如果是由群众大家同意了的，那是很好的。至於你的問題，如果你在鄉下還勉強過得去，以待在鄉下為好，或者暫時在鄉下待住一時期也好，因為出外面怕難於找得適宜的職位。如果確實十分困難，則可持此信到長沙找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程星齡先生，向他請示有無可以幫助你之處。不一定能有結果，因程先生或其他同志都~~因~~和你不相熟，不知道你的歷史和近來的情況。連我也是如此，不便向他們提出確定的意見。如果你自己願意去活動一下，可以去試一試。去時，可將你在辛亥革命時在湖南軍隊中當過兵和我同事（你當列兵，我當列兵）一点向他們報告，再則將你的歷史向他講清楚。此復，順致

敬意

毛澤东

二月廿日

毛泽东致彭友胜信的手稿。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的指示

（1951年3月）

一、旧技术人员是国民党的遗产，是很有本领，但还不能依靠，应争取团结。

二、全国大中学生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儿女，也是国民党的遗产，但经培养改造，其中有一部分能依靠，也有一部分不能依靠。

三、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培养技术干部的骨干，最重要的是培养我们党、军队中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是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可抽调大部分去训练。另一部分从工农速成中学、从工农子弟中培养一部分，即是说要这两类人经过培养后，团结上边这两种人。

关于继续努力消灭残匪致叶飞等电[1]

（1951 年 4 月 1 日）

叶、成、刘、陈，并告陈、饶，邓、谭[2]及鼎丞，剑英[3]同志：

三月二十五日的报告收到。你们在一二两月消灭股匪万余，成绩甚大，极为欣慰。尚望继续努力，消灭一切残匪。只要消灭了土匪，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在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改，厦门平潭的防御工事又做好了，福建的形势就改变了，台匪如敢进攻，你们就有完全的胜利把握了。广东现已集中了六个军，全省也在做这些工作。你们两省互相配合，力量是很雄厚的。

毛泽东

四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副司令员成钧、副政治委员刘培善、副参谋长陈铁君的电报。

[2]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3] 鼎丞，即张鼎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给田家英[1]的信

（1951年4月1日）

家英同志：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矛盾论》，请不要送去翻译，校对后再送我看。

已注好印出的各篇，请送来看。

毛泽东

四月一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转发饶漱石[1]关于镇反中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的报告[2]的批语

（1951年4月2日）

漱石同志，并告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德怀[3]同志：

同意漱石同志三月廿九日报告的各项意见。关于镇压反革命，目前重点仍在“外层”，但对“中层”“内层”的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华东局并规定了几项清理和处理的步骤和办法，都很正确和必要，请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加以注意。志愿军虽然处在作战的环境，亦须加以注意，保证各级首脑机关及各要害部门的安全和纯洁。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指饶漱石1951年3月29日关于目前华东几项主要工作进展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除汇报华东地区的抗美援朝、土改、春耕等项工作外，着重就镇压反革命中有关清理外中内三层问题提出了意见。报告提出，由于

主观力量不足，并为了收集更多的材料，华东地区目前镇反工作仍须集中力量首先做好外层，然后转向中内层。但目前对中层及内层的首脑机关和要害部门，必须及时加以清理，对某些已有材料或可疑的分子，必须及时进行处理，否则危险极大。对一切家属被斗被杀之党员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如其本人在政治上未经过考验及仍与恶霸家庭继续保持联系，则应一律调离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并须进行审查。对政权机关中现已自动坦白登记的反动党团特务普通分子，可暂留职考查，以便收集更多材料，为进行全面整风审干作准备，但必须立即调离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对区分部以上的反动党团特务骨干分子，虽属自动坦白、登记，亦应有计划地采取留职调训的办法，进行一面学习一面审查。对一切隐蔽在我党政军内部，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党团特务分子（不管其为主要或胁从分子），一经发现并获有确实证据，即应一律坚决镇压。

[3]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转发中南局传达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日）

子恢[1]同志，并告漱石，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剑英[2]同志：

子恢同志三月二十二日的报告收到了，同意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方针和计划。将土改过程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3]是很必要的，各新区均应教育干部照三个阶段的各项步骤去做，不要省略和跳跃。土改后，农村的任务规定为生产教育民主三项，也是对的，即除生产教育两项任务之外，还有一项建立民主生活的任务。在中南这样的地区，各省召集一次苏区代表会议是必要的，但请注意在报纸上公布消息时采用老红色区域的名称，不要用“苏区”这个名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3]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3月22日的报告中提出，土改必须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普遍进行清匪反霸退押减租，打掉地主政治优势；第二阶段，划分阶级，没收征收，消灭地主阶级；第三阶段，实行复查教育，发土地证。

称。在工厂企业内，凡未进行过控诉旧制度和克服官僚主义这两项工作的，均普遍进行一次，很有必要。在镇反问题上，报告内指出要强调加紧宣传、防止不准两点是很对的。防止不准的办法是，拘捕前由地委市委一级精细地审查名单，然后按名单进行拘捕。这即是说，将过去规定的县有捕人权，收回到地委一级来。报告内说“河南各县实行县开名单，交农代会讨论，专署批准，办法很好，应推广执行”，应当就是将县一级的捕人权收回到地委一级。天津专署的办法也是如此，这个办法是最稳当的。关于党政军首脑机关及要害部门的清理，应当在现在就定出计划，着手进行。西南的经验[1]已通报你们了。最近饶漱石同志的报告[2]规定了具体的步骤和办法，已发通报，请仿照去做。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指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1951年3月8日关于在财经、交通等部门清理反动分子问题给各公安厅并报中央公安部的总结报告。

[2] 指饶漱石1951年3月29日关于镇反中清理外中内三层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大张旗鼓经过群众进行镇反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地委：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必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方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市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泽东

四月二日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4月2日）

介侯兄：

请持此信去统战部找徐冰[1]同志，或其他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有办法为你妹妹[2]找一个免费的或半工半读的学校，如产科、护士或其他学校。我想，只要有可能，是应当替她解决学习和工作问题的。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徐冰（1903—1972），河北南宫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 这里有误，应该是李介侯妹妹的女儿（宋明）。李介侯在1951年3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现在中国进口公司机械科负责，我家眷已来到北京。北京方面的生活完满地解决了，一切都是由于你的帮助。可是，我父亲（即李漱清）把被人遗弃的我妹妹的女儿宋明，也交我家眷带到北京。我父亲来信请求你替她找一个免费的中学读书。拟请设法进入产科、护士等免费学校或半工半读的学校读书。

给张澜的信[1]

（1951年4月3日）

表方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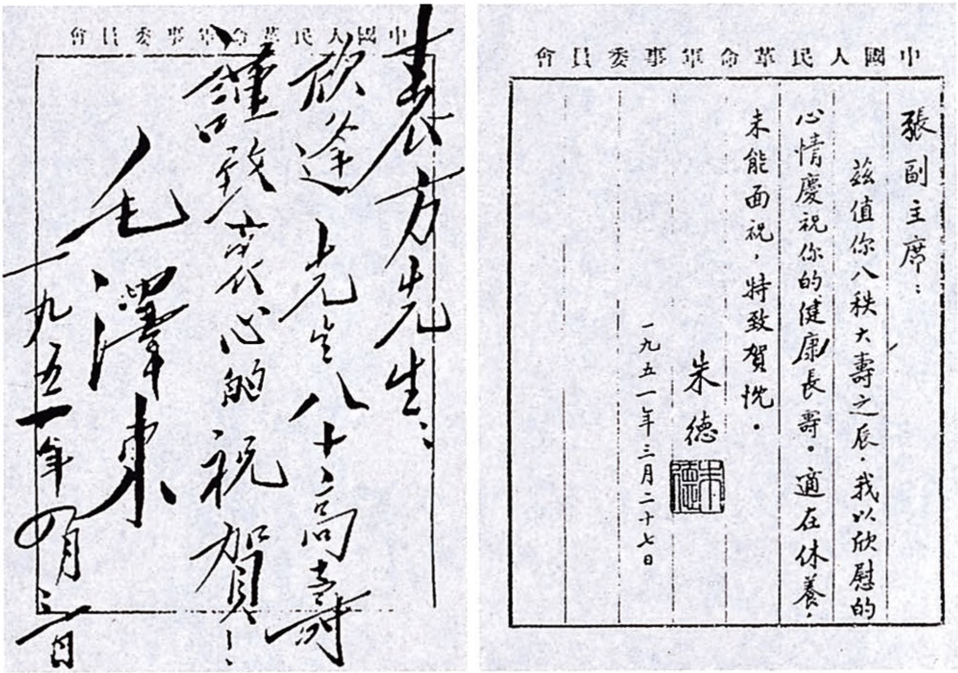
欣逢先生八十高寿，谨致衷心的祝贺！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

[1] 1951年4月3日，是张澜80岁生日，毛泽东为他专函祝贺寿辰，并请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亲临张澜住宅致以祝贺之忱，还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为张澜祝寿，到会数百人。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表方先生：

欣逢先生八十高壽，謹致衷心的祝賀！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張副主席：

茲值你八秩大壽之辰，我以欣慰的心情慶祝你的健康長壽。適在休養，未能面祝，特致賀忱。

朱德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朱德致张澜信的手稿。

给张云逸的信

（1951年4月3日）

云逸同志：

三月十四日的信收到了。病况甚为系念，宜注意充分休养，可作半年休养计划，以便安心调治，不为工作所牵挂，待病好再恢复工作。此复，即祝

健康！

毛泽东

四月三日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派遣工作组检查和帮助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3日）

陈、饶，邓、贺，习、张[1]：

请你们检查所属各省各分区有无广东那样的情况[2]，如有这种情况，请你们仿照广东办法，由各省军区派遣工作组分赴各分区各县加以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坚决而正确地执行镇反任务。地方镇反工作亦须由省级机关派遣工作组，分赴各专区和各县检查和帮助当地的镇反工作。此事甚为重要，请加注意为盼。

毛泽东

四月三日

---

[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指中共广东军区委员会派赴珠江、北江等地的工作组在工作检查中发现的上述地区某些县在镇压反革命中存在的严重右倾现象。如英德县关押53名罪大恶极者未加处理，其中有一匪首张玉周曾杀害我同志及革命群众，拘押年余，仍未处理，群众提出控诉也被置之不理，后经人民代表在县人代会上提出控诉始批准处决，但仍未执行。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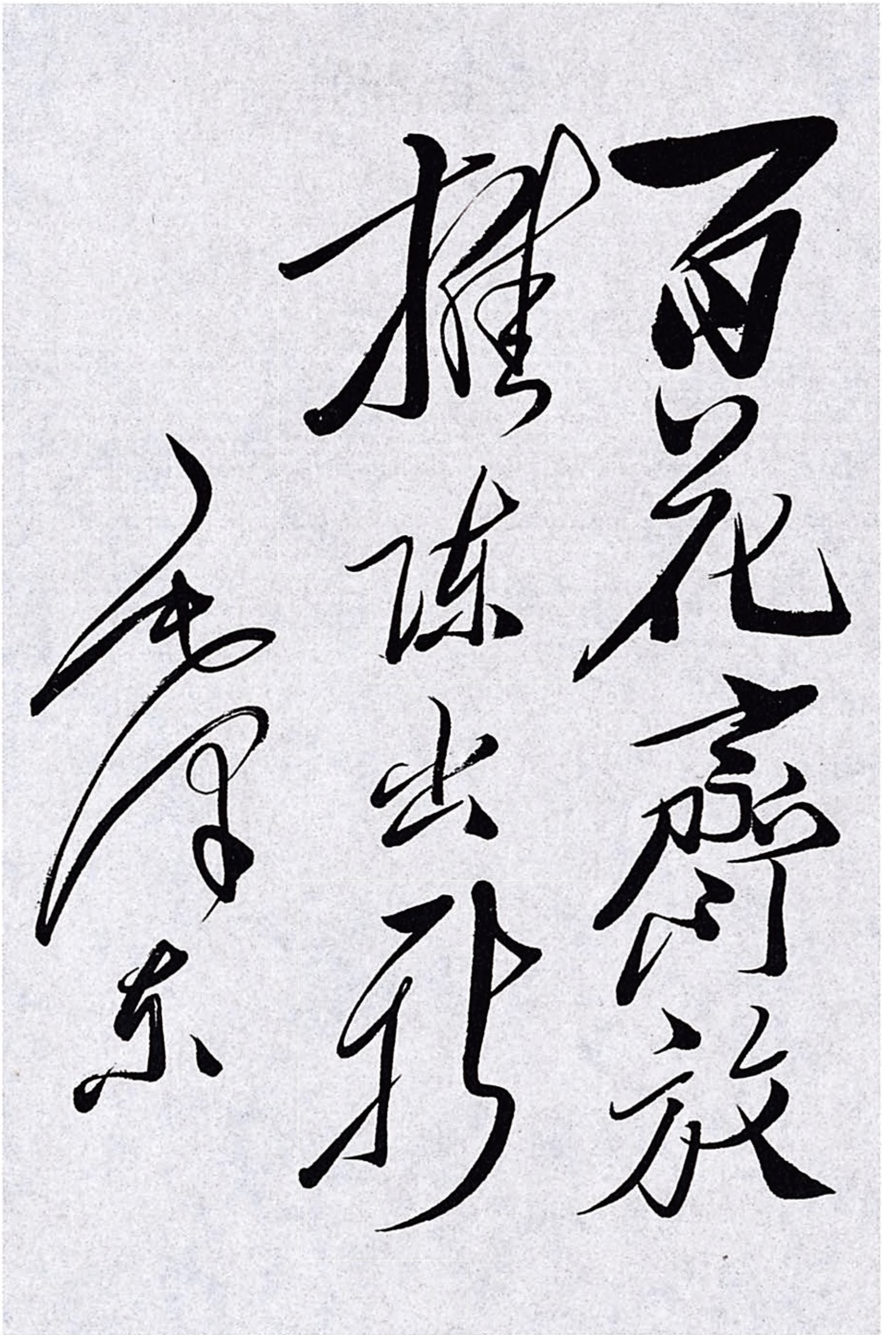
（1951年）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毛泽东

---

[1]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写了这个题词。



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

给毛宇居的信

（1951年4月5日）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1]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

复颂

兴居佳胜！

毛泽东

四月五日

乡友便祈致候

---

[1] 指毛宇居撰写的《毛主席轶事》。文中记述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热爱劳动、关心农民疾苦和勤奋学习等一些情况。

转发福建省公安厅关于镇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7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福建公安厅关于福建镇反工作的报告转给你们参考。福建有些地方情况特殊，反动派多，处决的比例较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别地自不应援例也杀这样多，但有些情况相似者，亦可仿照办理。福建方面最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发动最广大群众参加镇反工作和派遣工作组下去巡视镇反工作。关于工作组，我认为各省都应当注意，即由省级机关组织几个有训练有能力的工作组，分往各专区，直到县级去巡视，有偏差者帮助纠正，积案太多者帮助清理，不敢放手者帮助开展工作，发动群众不足者告知发动参加的办法。这样的工作组，对于坚决而正确地开展镇反工作，当有很大的帮助，请你们研究推行为盼。

毛泽东

四月七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城市镇反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城市镇反工作，山东有一个很好的经验[1]，华东局已给批准并转发华东各地参考。请你们也参考此项经验，正确地展开城市的镇反工作。

中央

四月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公安厅1951年4月3日关于全省统一行动逮捕反革命的经验报告。他们的做法是：（一）召开全省公安、司法、检察会议，统一部署，订出行动计划。（二）对材料的搜集与审查，事先均经城乡交流，互相查对，保证不错捕一人。（三）进行思想与舆论的动员。（四）以市公安局为主，结合驻军，组织行动指挥部，并对所有人员进行政策、业务、保密等的教育训练，制定行动守则，颁布纪律。（五）吸收民主人士参加城乡联络委员会，参与对某些人犯材料证据的审查。（六）为保证此次行动不发生内部意外事件，在行动前，将警察中的坏分子先行清洗和关押一批，将潜伏在工厂企业内部的罪证确凿、有现实危害可能的反革命分子先抓了一批。

为翻译《斯大林全集》给斯大林的电报

（1951年4月7日）

菲里波夫同志：

中共中央热烈地希望得到你的允许在北京将《斯大林全集》翻译为中文。我们认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人民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

为了迅速地和正确无误地进行这个工作，我们准备采取下列步骤：（一）组织一个专门的翻译和校订的委员会担任这一工作。（二）与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部密切合作，包括采取分工翻译互相校订的方法。（三）请联共中央指定在北京的适当的苏联同志帮助我们的工作。

如荷允许我们的要求，请即指定一位同志与我们联系，以解决各项技术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四月七日

给田家英[1]的信

（1951年4月7日）

家英同志：

（一）送来的文件，缺少《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军委给解放军的命令》一篇，请补印送校。

（二）请将《兴国调查》中《斗争中的各阶级》这一章的原文清出送阅，在我这里的印件中缺少这一章。

（三）已注文件，请速送阅。

毛泽东

四月七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

（1951年4月9日）

德怀[1]同志：

我尚在休养，对朝鲜战况不甚清楚，请将你对敌情的估计和我方企图撮要见告。关于十三兵团的任务，在新的战役中除以一部位于元山、咸兴防敌登陆外，主力（应补充新兵）似宜位于战场附近，担负歼灭敌可能降落的伞兵，协助各兵团作战，待战役完结该兵团始进入正式休整。这样是否妥当。又朝鲜人民军已补充否。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给李维汉[1]的信

（1951年4月9日）

罗迈同志：

此人[2]当过北洋政府时代的国会议员，在国民党时代似乎没有做过坏事，他有许多子女在人民政府工作。本人现六十九岁，来京住湘潭会馆，生活困难，要求照顾。请你派人找他谈一下，给以生活上的照顾。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李维汉，又名罗迈，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罗正纬，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创办人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该校读过书。

转发天津市委关于企业系统查出内奸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0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荣臻，伯承，陈毅，贺龙，宗逊，谭政[1]诸同志，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及省级军区各负责同志：

---

[1]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宗逊，即张宗逊，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据天津市委报告，在企业系统查出十三名混入党内的奸细，其中满玉华窃取了工会副主任职务，杨友亭窃取了天津市各界代表会的代表，市府救灾委员会委员，纺织工会执行委员，中纺三厂工会主任等要职等情。请你们密切地注意这个内奸问题，从天津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毛泽东
四月十日

关于镇反工作中两个突出经验的通报

（1951年4月1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大中城市〔市委〕，区党委：

据中央公安部三月廿二日报告称：最近一时期的镇反工作有两个突出的经验：第一，有计划有准备地大规模地在同一时间内搜捕大批反革命分子，从北京、天津、河北、平原、察哈尔的实际行动，证明这是一种搜捕社会反革命的有效的不可少的步骤。这种方式给敌人打击最大，给群众教育极深刻，社会波动亦不大。只要掌握准备充分、对象准确、组织严密、指挥统一、行动迅速、严明纪律、及时宣传等项原则，就可以保证不会抓错，而取得群众拥护与社会同情。第二，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城市的经验证明，召开城市中市级和区级的各界代表会和协商委员会扩大会，并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工商界的许多代表人物参加，以揭露反革命罪恶，宣传镇反政策，消除民主人士的思想疑虑，动员各阶层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方法，是成功的。综合这几个地方的经验：一、是负责首长亲自主持，公安机关作镇反情况报告，有准备地分类作案件介绍，只介绍重大案件和首恶人犯，不是报告所有人犯。用活人、活事讲解政策，激发对反革命的仇恨，取得各界人士的拥护。二、是会上展览反革命罪证、图片、案卷、供词和真凭实据，打消各种疑虑。三、会前要充分准备，会中要坚持原则。既定

处决的案犯，坚持不能变动。四、要上下结合，动员群众的力量，说服民主人士。五、要分别对待，对诚心拥护但有疑虑者要耐心解释，提高其认识；对别有用心者要用事实铁证使他无话可说。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应当推广等语。这两点总结很好，请你们注意照办。

毛泽东

四月十日

转发济南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济南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的报告[1]，很好，请各大中市委注意研究，照此办理。我希望各大中市委均有一个报告给中央。现已收到北京、天津、青岛、济南、重庆、兰州等六处的报告和上海、南京、杭州三处的计划，均很好。请各未报告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例如各省省城及汕头、梧州、衡州、宜昌、九江、安源、芜湖、无锡、苏州、宁波、厦门、石家庄、唐山这一类城市，均向中央做一个镇反工作的报告。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济南市委1951年4月5日关于济南市4月1日夜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大逮捕的情况给山东分局的报告。大逮捕后，济南市委组织大批干部深入群众宣传，多方收集了对这次镇反行动的反映。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镇反工作计划的批语

（1951年4月13日）

各大军区党委，并告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种兵司：

看了东北军区党委四月八日关于在东北军事系统内执行镇反工作的计划[1]，很高兴。这个计划很周密恰当，是对于这个严重问题做了认真的研究然后定出来的，请你们一致注意研究这个文件，作为在自己系统中进行镇反工作的参考。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中共东北军区委员会镇反工作计划的要点是：（一）组织全体干部学习镇反文件。根据文件精神检查干部思想，并将这些文件在全军传达、教育。（二）根据现有线索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布置与加强调查力量，进一步发现问题，充实材料，准备抓捕一批反革命分子，并在抓捕后抓紧审讯，以扩大战果。（三）审查的重点，军区党委应抓紧军工、后勤、特种兵与机要部门，各单位亦应根据自己的条件决定各自的重点。对案子和人员的审查，也应分主次，掌握重点。（四）处理原则：（1）过去有重大罪恶的与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查有实据者处死刑，恶霸地主送原籍交法院判死刑。（2）胁从分子，罪恶不大者，集中管训后资遣回原籍，交地方公安部门管制。（3）重大嫌疑分子集中管训，继续严格审查，弄清后再予处理。（五）各级政治部门必须把这一工作作为目前的中心任务，各个部门的审查与镇反工作应由首长负责。凡判处死刑者，须经军区首长批准，并组织公审借以教育群众。（六）必须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与人事录用制度，用人必须经过团以上机关审查批准，保卫部门应予加强。

转发南京市委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 年 4 月 13 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关于在镇反工作中有计划地统一逮捕和有计划地广泛宣传这两点，现在华北华东东北三大区均已实行，或者正在准备实行。请中南西南西北三大区亦研究这样做。如不能做到各大中城市同时动手统一逮捕，至少应做到一个城市统一逮捕（重庆兰州已是这样做了）。至于事前事后使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宗教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真正与闻其事，并向全体人民展开宣传讨论，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更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是南京市委的报告，可为参考。过去该市手面太小，不敢大张旗鼓杀人，现已彻底转变，做得很好，大有成绩，并且跑到许多城市的前面去了。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防敌从元山登陆

（1951年4月13日）

德怀[1]同志：

四月十日廿四时电[2]悉。（一）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二）为防敌从元山登陆，似须以四十二军主力位于元山城内及其附近，确保元山，请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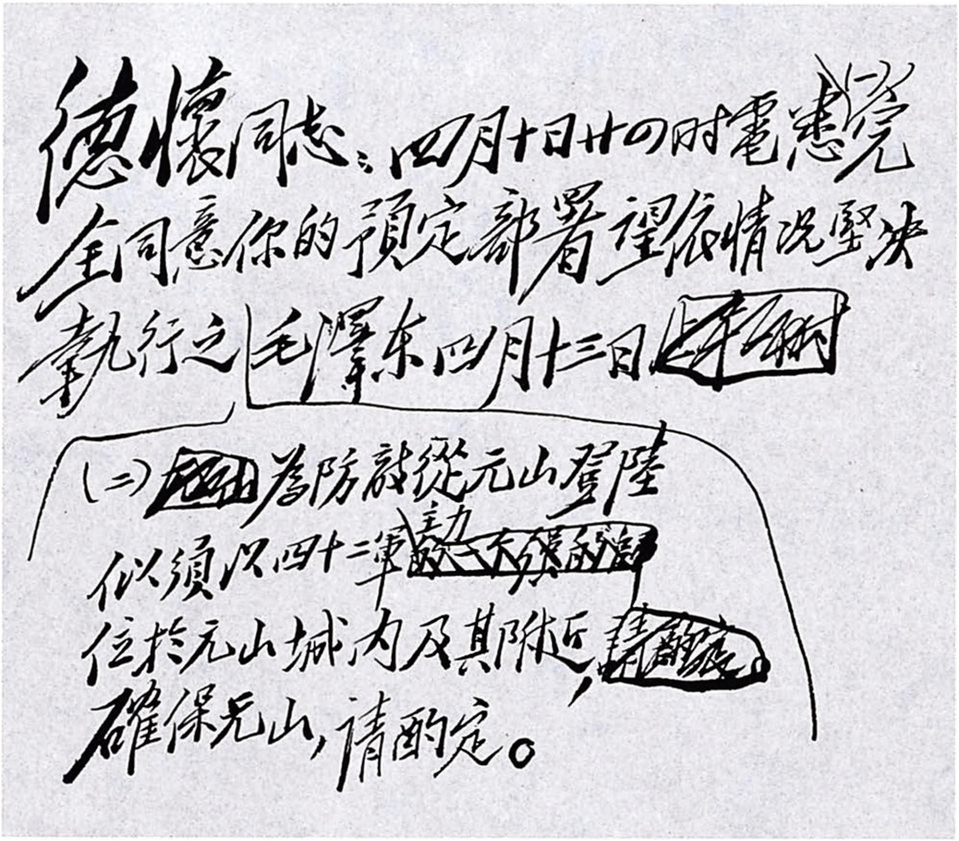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4月10日24时彭德怀关于第五次战役部署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我作战企图，拟从金化至加平线，利用这一带大山区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用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对西线敌人进行战役两翼迂回，第三兵团正面攻击，以各个分割歼灭敌人。力求在三八线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纵深发展。攻击时间，如敌进展快，我拟4月20日前后开始，各兵团4月15日可集结完毕，时间较仓促些；如敌进展不快时，待5月上旬出击。



德懷同志：四月十日廿〇時電悉（一）全同意你的預定部署望依情況堅決執行之 毛澤东 四月十三日

（二）為防敵從元山登陸 似須以四十二軍主力位於元山城內及其附近，確保元山，請酌定。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的手稿。

给田家英[1]的信

（1951年4月16日）

家英同志：

此九篇请送陈伯达[2]同志阅后付排改正。其中，和英国记者谈话，和中央社等记者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等四篇[3]，我已照原件修改，**请即照此改正**，新送来这四件稿子我就不必看了。

以上这些及昨付第二次看过的一大批，都可付翻译——惟其中的一篇，即《井冈山的斗争》，请送来再看一次。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

[3] 这4篇文章，后来都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前两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目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四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目为《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转发西北局关于加强镇反宣传工作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西北局这个指示[1]强有力地指出在镇反工作中展开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规定了五条办法，一切地方都应当这样做。凡属现在仍然小手小脚，不敢大张旗鼓作宣传，不敢吸引广大党外人士共同参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51年4月14日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给所属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指示中对加强镇压反革命的宣传工作，提出了五条办法：（一）各级党委均应组织所有干部学习有关镇压反革命的四个文件，各地负责干部须就文件精神结合本地区镇反情况、干部思想动态召开干部大会，作专门报告。（二）宣传内容掌握要点。对特务、匪首、惯匪、恶霸、一贯道的反革命活动历史罪与现行罪大大揭露，宣传人民政府支持群众要求，保护群众利益，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精神，宣传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政策。（三）宣传方法多种多样。最有效的：第一是控诉会，第二是展览会，第三是报纸、广播、文艺活动的全面配合。（四）宣传队伍不断扩大。全党动员进行宣传，经过政府委员会议、协商委员会议、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使广大党外人士与闻其事，并组织他们向群众宣传。在3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则应以公安部门为主，吸收党的宣传、统战部门及报纸、广播电台负责干部，组成镇反宣传委员会，作为推进这一工作的指挥机关。（五）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均应在接到这一指示的一星期内，专门讨论这一工作，订出加强镇反宣传工作的具体计划。

加镇反工作，以致引起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的地方，尤其要即刻改变作风，并且愈快愈好。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转发天津市通过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进行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区党委：

天津镇反工作做得很好，团结和教育了各界人民，一切地方均应照此[1]办理，坚决地打破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作风。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天津市公安局1951年4月9日总结的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进行镇反的报告中说，天津市于3月27日召开第三届各界协商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讨论镇压反革命问题，之后又于29日召开1.5万人的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会议，揭发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大会实况由电台广播，组织了50万市民收听。会议进行了5个小时，到会群众情绪一直高涨，会后各界反映很好。

转发宿县地委关于运用农代会布置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皖北宿县地委运用农民代表会议布置镇反工作，审查镇反工作及审查基层干部和党团员的经验，一切新区均应照此办理，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转发山东军区关于镇反和审查不良分子的计划[1]的批语

（1951年4月17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治委员向明1951年4月13日给华东军区党委并报总政、华东局的报告中提出的镇压反革命和审查不良分子的方针和办法。报告指出：必须严厉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对于已经掌握了材料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逮捕处理。在审查不良分子中，首要的是把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让一个反革命分子暗藏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报告要求对各种不良分子、雇用留用录用人员、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家庭被斗对土改不满者、一贯贪污腐化及违法乱纪者和一贯思想落后对抗组织者六类人员的审查，必须分清政治问题，阶级成分问题，社会成分问题，纪律问题和思想问题，作不同对待和处理，绝不能混同。除确属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处理者外，须按不同情况采取清洗、集训、调训、调离要害部位、给予纪律处分及教育争取等不同方法处理。我们的要求是绝不能让一个不能改造的不良分子留在或打入我们的部队，但也绝不随便抛弃一个还可以改造的不良分子。报告还指出，在方法上，要做好团党委以上领导干部的思想工作，使其认识到反革命活动的危害性，分清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审查不良分子的界限，掌握不同对象不同对待的方针。并在干部中连队中加强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提高阶级觉悟，站稳阶级立场。在组织执行上，必须是党委统一领导，首长亲自负责，组织保卫委员会主持，实行保卫部门与组织部门和军法部门相结合，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内部工作方法与公开工作方法相结合，审查处理与教育相结合等。

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并告军委直属各部门及各特司[1]：

山东军区布置镇反工作很认真，规定方针和办法也很恰当，可为各军区参考。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各特种兵司令部。

注意对付敌可能降落的伞兵

（1951年4月17日）

德怀[1]同志，并告高岗[2]同志：

四月十四日电[3]悉。你对于三十八军、四十二军的部署及开辟中间运输道路的计划，均甚好。但尚有一事请注意，即敌人若从中间各地降落伞兵，例如敌冒险以一个伞兵团在熙川、球场、德川区域降落，以一个伞兵团从破邑、谷山、遂安、伊川区域降落，到处乱窜，扰我后方，此种可能性很大，请速筹对策。五十军现在何处休整，是否可以用于这一地区的防卫。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1951年4月14日13时彭德怀关于海岸部署意见给中共中央军委并转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估计敌大举登陆与正面进攻是结合的，只有让敌登陆，离开其海军炮火的有效掩护，再行围歼之。以小部队担任沿海警戒，布置水雷、地雷，予登陆的敌人若干阻难，争取调动部队、部署战斗的时间。第三十八军、第四十二军原地加速整补，令其在元山、高原线离海岸20里至30里准备战场，看好地形，做必要工事。同时加紧修筑熙川至破邑的公路，修通德川至球场、龟城至球场的铁路。

给胡南浦[1]的信

（1951 年 4 月 17 日）

南浦兄：

一月十四日惠书敬悉，深感厚意。望仍在原地经营旅业，不必来京。谨此奉复。

并致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胡南浦（1881—1953），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私塾同学。当时在云南经营旅店，1952 年返回韶山居住。1951 年 11 月 19 日，毛泽东曾为其搬家赠送人民币 500 万元（折合 1955 年 3 月 1 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 500 元）。

转发罗荣桓[1]等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调查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19日）

中央军委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各大军区，志司，并转各省军区，军分区，兵团军师，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兹将罗荣桓罗瑞卿诸同志关于黄祖炎同志被刺案调查报告[2]一件发给你们研究。像王聚民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很早就有许多罪恶表

---

[1] 罗荣桓，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

[2] 指罗荣桓、罗瑞卿（公安部部长）、傅钟（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奇清（公安部副部长）、肖华（总政治部副主任）1951年4月12日关于黄祖炎被害事件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谈到了黄祖炎同志被害的经过，凶手王聚民的罪恶历史和行凶原因，以及从这一事件中应当记取的教训。关于王聚民的问题，报告说，凶手王聚民现年34岁，恶霸地主出身，1940年混入我军，1941年混入我党，土改时因家中被斗公开发表谬论，谩骂群众，诬蔑土改，但未作处理。1950年11月调惠民军分区后，企图借组织力量向群众倒算，遭到群众联名告发，除揭发其父亲的历史恶迹外，还揭发他在1938年曾向敌密告我两个地下党员，要求给予他处分。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唯恐影响其情绪，既未严肃处理，也未向山东军区报告。王聚民发觉群众控告后，情绪突变，军分区亦未引起警惕，3日后仍令其到军区开会，致使阶级异己分子王聚民乘机直接行凶报复。

现，全党全军如有类似这样的人，务须注意及时处理。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对陈毅巡视福建工作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1951年4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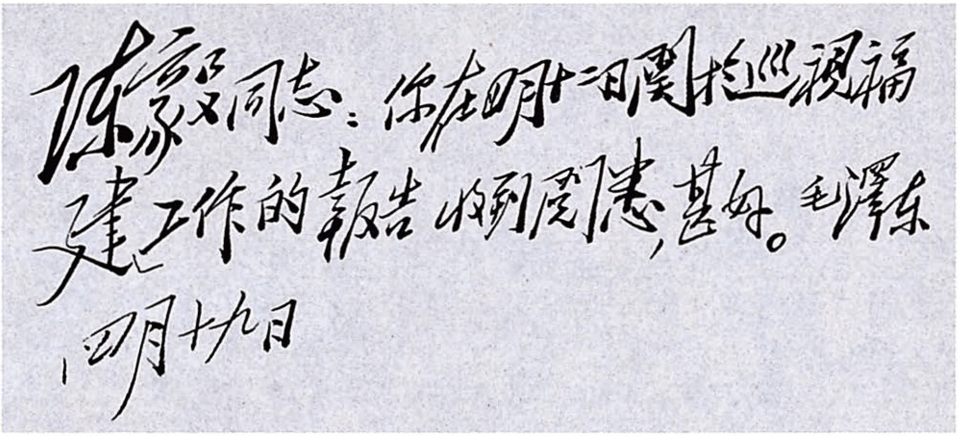
一

陈毅同志：

你在四月十二日关于巡视福建工作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陈毅同志：你在四月十二日关于巡视福建工作的报告收到阅悉，甚好。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毛泽东复陈毅电的手稿。

二

邓、谭、赵[1]并剑英[2]：

兹将陈毅同志关于福建军队整训、厦门防御部署及核减海防经费七百多亿等项情况的电报发给你们参考。广东现在集中了六个军，虎门修了防御工事，希望你们加以检查，做了〈出〉像福建那样的成绩。

毛泽东

四月十九日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转发河北省农业厅审查旧人员的经验的批语

（1951年4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志司，中央军委直属部门及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华北局这个关于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典型经验[1]极好。有了这个经验，就使我们对于全国现有参加工作的百余万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审查有了充分的把握，请你们充分地利用这个经验。

毛泽东

四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4月12日关于河北省政府农业厅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经验向中央的报告。主要经验是：1. 高级领导机关首先需要三查（查历史，查思想，查工作），也有条件进行三查。2. 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行政与支部彼此配合，动员全党及一切党外积极分子才能做好。3. 必须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提出三查的内容和目的，转弯抹角反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4. 在非党干部中进行三查要和党内有区别，工作方式要灵活，可多采用个别谈、小会讲的形式，避免陷于僵局。5. 必须抓住重点，即抓住问题严重的分子，抓住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要钻到生活细节中，更不要扭在次要人的身上。6. 妥善解决三查和工作的矛盾。

给杨尚昆[1]的信

（1951年4月20日）

尚昆同志：

此件[2]第（二）项所说“论忠诚与老实”“思想反省笔记”（华北革命大学学员反省的材料），这两个文件，请你向华北局要来送我一阅。

毛泽东

四月廿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4月12日关于河北省农业厅三查经过及经验的报告。

转发师哲[1]关于陪同费德林[2]访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1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同志并转各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下面是师哲同志的报告[3]，其中说到各地招待外宾的缺点，请加注意，尔后不要过分和不适当。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一日

---

[1] 师哲，当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

[2] 费德林，苏联汉学家、作家，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3] 指师哲1951年4月20日关于陪同费德林访问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到一些地方同志组织不必要的夹道欢迎和宴会。在浦口车站和上海站，为了让友人通过，让成千的群众不准行走。还有个别领导干部随便送礼物，不适当地题字，乱送不适当的材料和文件，在某些场合讲些有失立场和无分寸的话，造成不好影响。

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

（1951年4月2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一）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例如“有的人说，解放接收时原封不动包下来了，今天又来处理，是否有矛盾?”答复：“没有矛盾。镇压与宽大结合的政策，并无变动。以前包下来是为迅速恢复生产，安定工作。特务分子不积极生产，而积极破坏生产。今天既然已了解他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理?”（滕代远[1]同志在铁路工会的报告）。这样答复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

---

[1] 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二）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三）下面是李立三[1]同志给中央的信，其中所说工厂和矿山的恶霸应予惩办，这是毫无疑义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二日

---

[1] 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951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

转发中南局关于镇反工作补充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兹将中南局四月十七日关于镇反工作的补充指示[1]一件转给你们参考。这个指示全部说的是宣传工作，规定了具体办法和具体时间，请各地仿照办理。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

[1] 这个补充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统限于电到7日内成立镇压反革命宣传工作委员会。（二）各级党委之报告员工作业已建立者，4、5两月内每人应向群众作5次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报告。报告员工作未建立者，即应建立，并执行本条规定。（三）镇压反革命应成为五一节前各群众团体（工、青、妇、文等）主要宣传内容之一。（四）无广播的地方，注意在处决罪大恶极之反革命分子前，召开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公审会和控诉会、诉苦会。（五）中南人民出版社最短期内（不得超过10日）应将中央人民政府之惩治反革命条例编成一种通俗读物，制成纸型分送各省翻印。各省之出版部门亦应于最短期内组织编写通俗读物。（六）各地党报应密切配合作充分的报道和宣传。统战部并须组织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写文章或广播。（七）请各省委考虑目前这样小批不断处决的办法是否合宜，还是在适当时期整批地处决一次，以便集中较大力量作一次普遍而深入的宣传工作为得计。（八）今后除杀人出布告外，还应注意一并将被处徒刑和被释放者也在报上公布或张贴判决书，以示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之完整精神。

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工厂、企业、学校中开展镇反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这是华北局关于在工厂企业学校中开展镇反工作的指示，发给你们作参考。这方面的镇反工作是必须进行的。如经验不足，可先择重点进行，取得经验，作充分的准备布置，然后普遍进行。特别注意宣传和准确。

毛泽东

四月廿三日

对订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51年4月26日）

必须严格处理，教育干部。[2]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六如1951年4月24日简报的批语。

[2] 李六如关于军委订制200万件军用雨衣被奸商诈骗，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事件的简报说，此项雨衣是1950年10月至11月由华北军区后勤部代表军委后勤部通过中央轻工业部在北京、天津、青岛三地订制55万件，另由上海等地承制145万件。单就天津承制30万件说，由于奸商预知订制雨衣之消息，并乘我军需急迫即串通活动，大量抬高雨衣成本，致使国家财产损失近90亿元（人民币旧币）。如果按京、津、青三地订制55万件计算，国家损失140亿元（人民币旧币）以上；如果按全国订制200万件计算，国家损失更大。

转发华东局关于十六个大中城市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4月2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在大中城市中，在各工厂，各学校，各机关，各里弄（街巷或胡同）建立群众的肃反委员会，有检举控诉和监视反革命分子的权力，但除现行犯外无捕人的权力，各城市均可仿行。下面是华东局在十六个大中城市统一镇反行动的报告，可作各地参考。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给司徒美堂[1]的信

（1951年4月27日）

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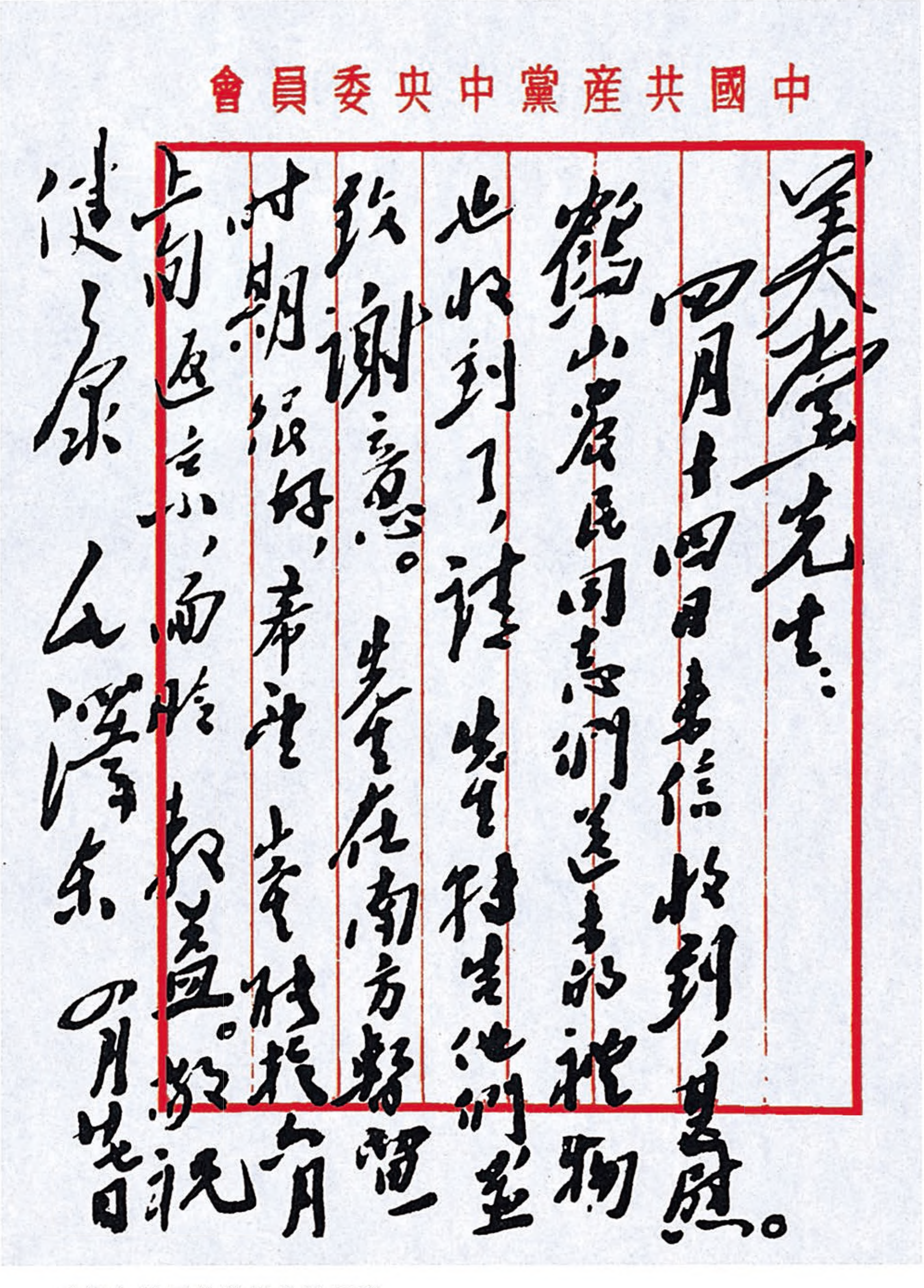
健康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

[1] 司徒美堂，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正在广东省鹤山县（今高鹤县）农村参观土改。



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

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于五月间返京，面聆教益。顺祝

健康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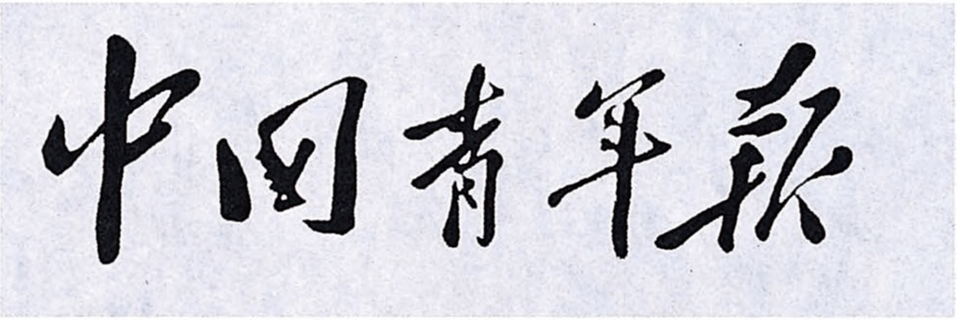
四月廿日

毛泽东致司徒美堂信的手稿。

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1]

（1951 年 4 月 27 日）

中国青年报



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报》题写的报头。

---

[1] 1951 年 4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创刊号正式出版，报头由毛泽东亲自题写。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

注意在第五次战役中给敌以尽可能大的打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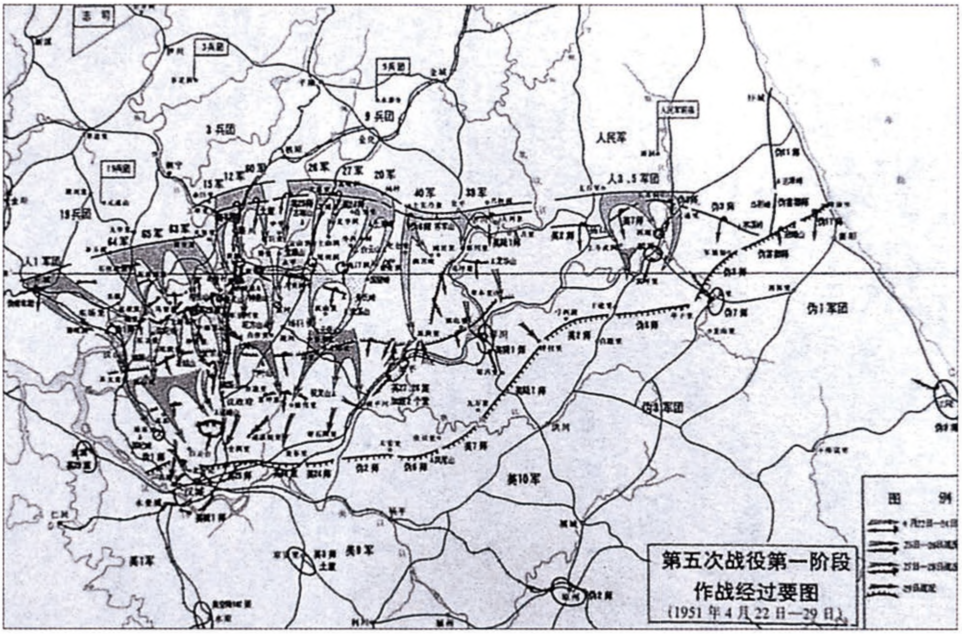
（1951年4月28日）

请注意在此次战役[2]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以尽可能大的打击，目前这几天似乎还有此种可能，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次战役作战方针的电报上加写的一段话。

[2] 指第五次战役。是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共投入15个军的兵力，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迫使“联合国军”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志司
3兵团
5兵团
9兵团
3兵团
19兵团
人民军
人3.5军团
15军
12军
60军
26军
27军
20军
40军
39军
64军
63军
人1军团
伪1军团
伪3军团
美10军
美9军
美1军
汉城
图 例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
作战经过要图
（1951年4月22日—29日）

1950年10月至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五战五捷，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南。图为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经过要图。

给陈文新[1]的信

（1951年4月29日）

文新同志：

你的信和你母亲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2]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

问候你的母亲。

祝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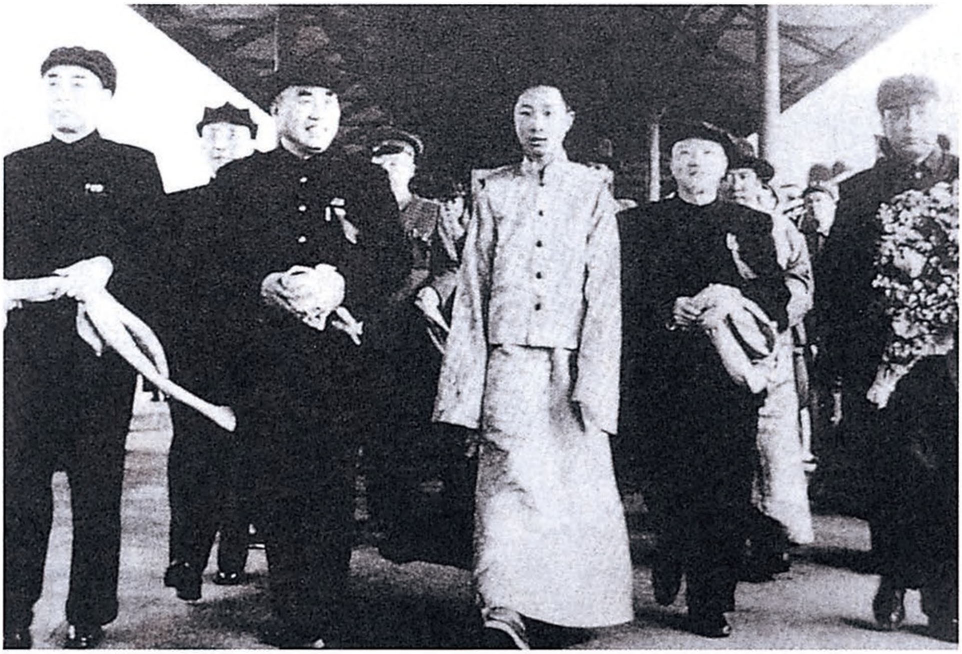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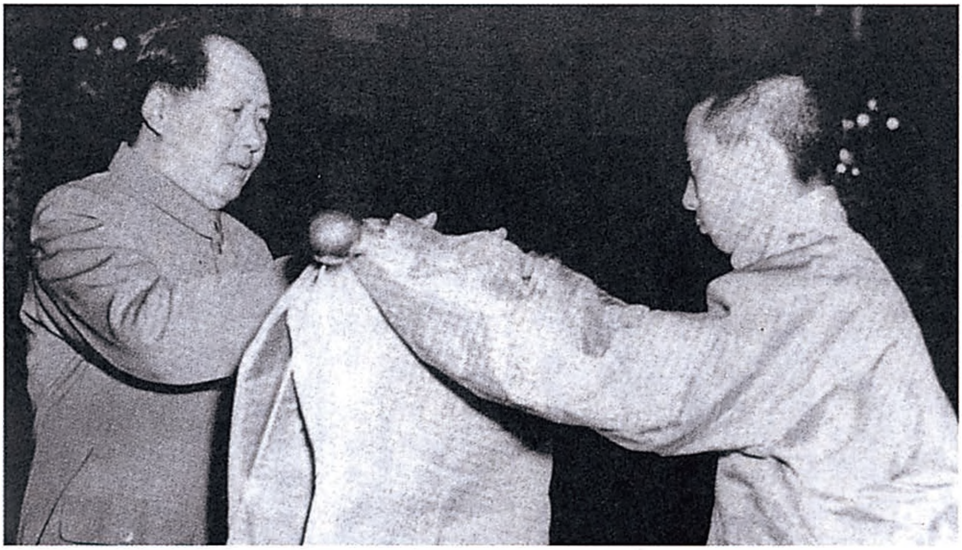
---

[1] 陈文新，当时是武汉大学农学院的学生。

[2] 即陈昌，新民学会会员，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1930年牺牲。



1951年4月，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和班禅额尔德尼一行到达北京，进行和平谈判。图为到车站迎接的周恩来、朱德、李济深等和班禅额尔德尼步出车站月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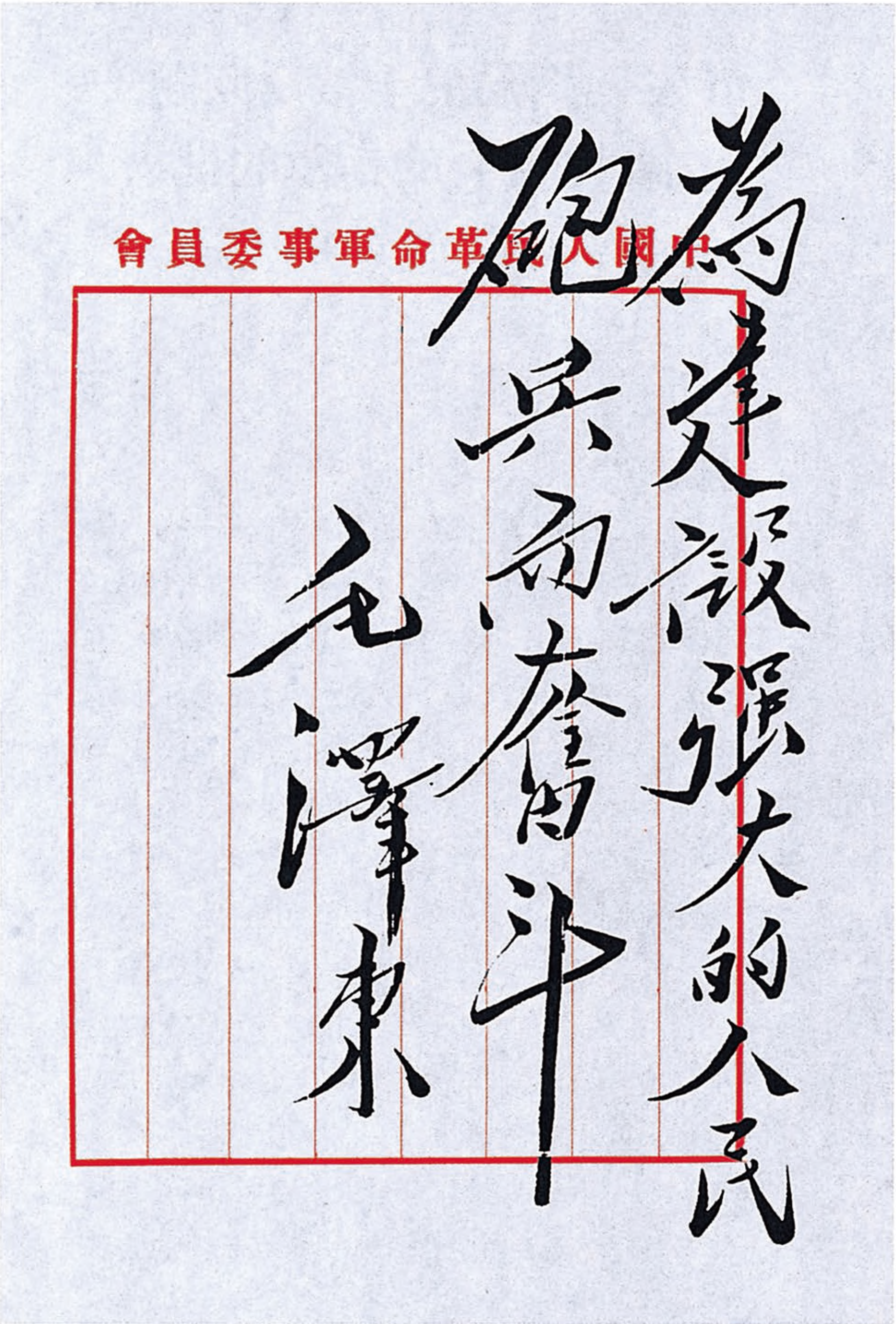
1951年4月，班禅额尔德尼向毛泽东敬献锦旗。

为炮兵学校题词

（1951 年 4 月）

为建设强大的人民炮兵而奋斗。

毛泽东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為建設強大的人民炮兵而奮鬥

毛澤東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的题词。

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4月30日）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大中市委：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这个问题，即将提到五月十日在北京开会的公安人员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你们有何意见，可告你们那里来京开会的公安人员带

来，或打电报来。下面是西南局给川北区党委胡耀邦[1]同志的指示，这个指示是合于上述原则精神的，特转发以供参考。

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

---

[1] 胡耀邦，当时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

1951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班禅额尔德尼敬献的哈达。

1951年5月1日，阿沛·阿旺晋美向毛泽东敬献哈达。

转发二十三兵团党委
关于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4日）

邓、谭，贺、邓，张、甘，王震[1]：

这是廿三兵团党委的报告[2]，可作你们改造廿一兵团廿二兵团及其他起义部队的参考。廿三兵团即傅作义[3]部，董其武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治委员，全部由绥远开至河北整训，现已基本上得

---

[1]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指中共第二十三兵团委员会1951年4月24日关于起义部队开展民主运动的总结报告。报告说：全兵团的民主运动，经过40天艰苦工作，已于本月10日全部结束。这个运动的结果，改变了部队的基本形势，创造了今后工作的有利条件。目前部队的主要情况是：（1）战士的阶级觉悟提高，许多战士已经站立起来，成为部队的主人翁和有生力量。（2）打垮了军阀主义思想体系，揭露了许多惊人的罪恶事实。（3）部队积极因素和进步力量占了绝对优势。（4）部队组织较前纯洁。（5）补充了1万名翻身农民，增加了部队新的血液，改变了部队成分。

[3] 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

到改造。廿一兵团及廿二兵团的改造情形，请邓谭及王震责成该两兵团党委向军委作一次报告。

毛泽东

五月四日

关于转发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4日）

此件[1]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局，作为在机关学校部队中清查反革命分子的参考，这个经验是很有用的。

毛泽东
五月四日

---

[1] 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1951年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大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情况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开展这一运动的目的，是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界限，解除很多学员思想中不必要的顾虑，使之安心学习；同时暴露和镇压隐藏在学员中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学员队伍，以利于争取改造大多数，巩固统一战线。这次运动的主要经验是：1．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不是搞思想意识、生活作风或学习态度等问题。2．主要首长作动员报告，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说明政策，召号有问题的人看清前途，相信政策，扫除顾虑，老实坦白。掌握的原则是：①自觉自愿不追不逼；②只搞属于政治性的问题；③不拘形式，写讲均可；④实事求是，不扩大也不缩小。3．及时解决群众的顾虑，统一认识，分清敌我，划清界限，分化和孤立反动分子，形成群众性的拥护镇压反革命的优势。4．组织强有力的领导机构，严格控制，统一计划，勤加检查，一致步调，并应适可而止。5．对罪恶很大又拒不坦白的分子，大张旗鼓，宣布罪状，作出结论，予以逮捕。对真诚悔过、不完全悔过和完全不悔过者，区别对待。

给张治中[1]的信

（1951年5月5日）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2]有邵先生[3]领导也就可以了，您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即颂

痊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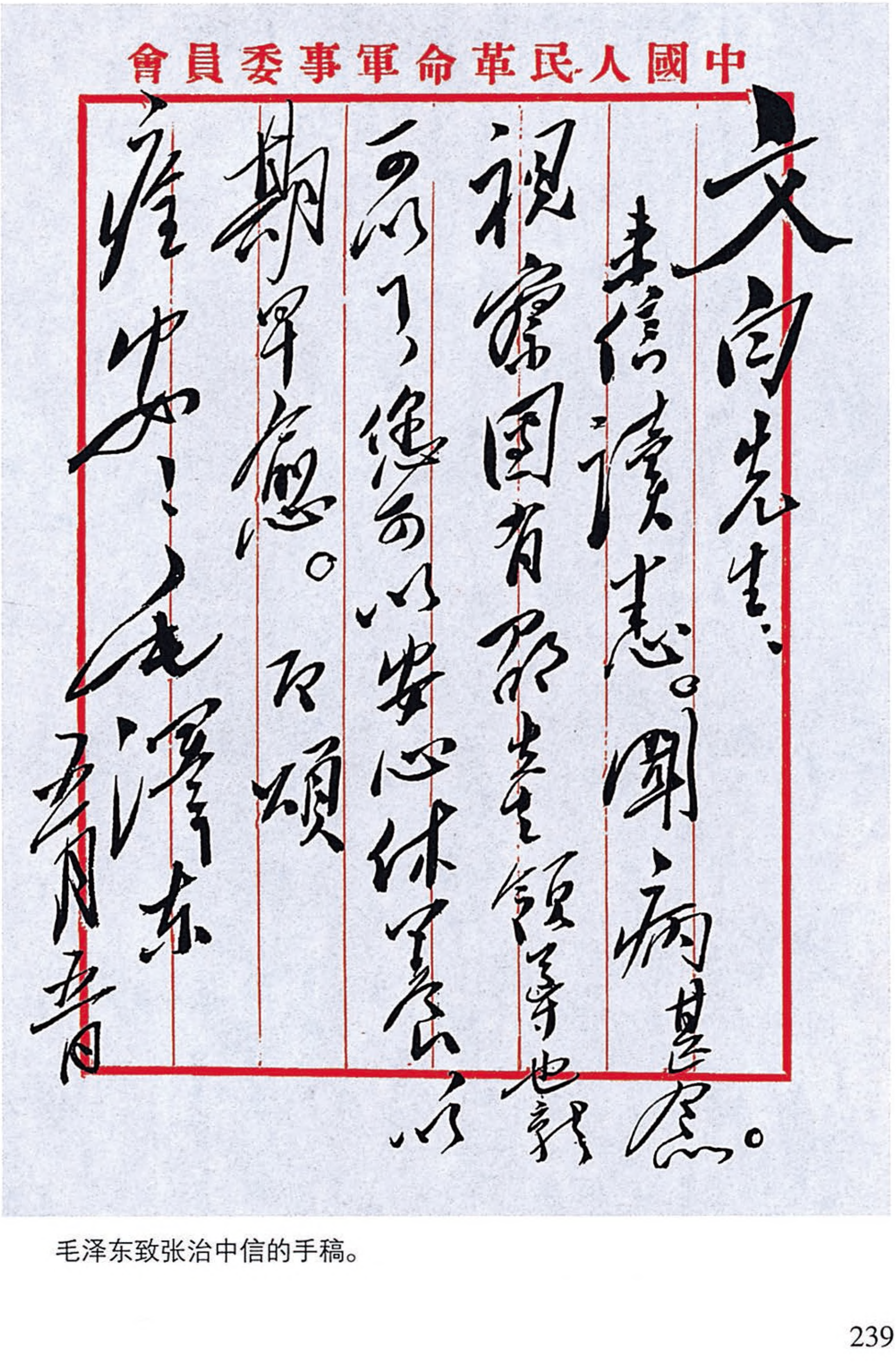
五月五日

---

[1] 张治中，字文白，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中央治淮视察团。原定张治中任团长。

[3] 指邵力子，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文白先生：

来信读悉。闻病甚念。视察团有邵先生领导也就可以了，便可以安心休养，以期早愈。此颂

痊安！

毛泽东

五月五日

毛泽东致张治中信的手稿。

关于同意苏联就美国对日和约草案所拟复文的电报

（1951年5月6日）

菲里波夫[1]同志：

你给我的五月六日的电报[2]收到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对美国政府对日和约草案的答复。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廿四时

---

[1]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2] 斯大林在这份电报中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苏联政府关于准备对日和约问题拟定的给美国政府复文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准备对日和约草案，不应由美国政府单独进行，而应由中、苏、美、英等国共同进行准备，并吸收所有对日参战国一起参与；对日和约应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和雅尔塔协定的基础上制定，并以日本应当成为和平民主的独立国家，限制日本武装力量使之不得超过自卫的要求，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对日本和平经济事业发展不加任何限制等作为指导原则。

中央转发华北局
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1951 年 5 月 7 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兹将华北局五月六日关于镇反问题的指示电转给你们。中央认为华北局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各地均应照此施行。兹定于六月一日起全国除现行犯外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专一级，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办理。各地一律照此执行。清理积案是目前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调集大批干部，在几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整理监狱，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在清理期内，各地除现行犯及由各中央局决定的少数地方外，一律停止捕人，待积案清理完毕后再捕应捕之人。兹定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一』日计四个月为清理积案时间，亦即停止捕人时间。在此四个月内，“中层”及“内层”重点审查必须认真进行，有少数要犯须逮捕者须报请中央局批准。

中央

五月七日

转发谭震林关于杭州镇反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1年5月7日）

---

[1] 指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谭震林1951年5月1日关于杭州市逮捕反革命分子情况给华东局转报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批转这个报告时，除写了上述批语外，还在谭震林的报告内写了6条批语。一、在报告概述杭州市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情况的部分，毛泽东在“汉奸七十五人”后批注：“有血债及其他引起群众痛恨的汉奸分子，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解决。”二、在报告谈到由于事前准备充分，审批手续严格，各方面力量组织得好，逮捕秩序很好，均未抓错这一段末尾，毛泽东批注：“应当这样慎重地做，有些地方草率从事是错误的。”三、在报告谈逮捕前后的宣传动员工作一段的末尾，毛泽东批注：“不做好宣传不要杀人。”四、报告谈到，虽然逮捕和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但反革命的坚决分子还在顽强地向我反抗，已经发生向我公安分局打枪、书写反动标语、制造谣言转移群众反特斗争视线等，对潜伏的反动组织只是开始发现，有了一点儿线索，还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在这里批注：“我公安机关对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侦察工作在许多城市都很差，应当在此次镇反中认真建立这个工作。”五、在报告说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镇压反革命工作，审查案卷，核实材料，讨论量刑问题这一段末尾，毛泽东批注：“各城市均应当这样做，不要怕麻烦。”六、报告还谈到杭州市确定5月份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工作，以工厂工人、学生、居民、农民为发动群众的主要对象，以小型的控诉会、公审大会作为发动群众的方式，对文化教育界、宗教界、各民主党派、工商界有意识地放后一步，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定的工作。毛泽东对此批注：“这样做很好。”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谭震林的报告很好，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特别是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审查反革命案卷一事，各地必须认真地做，坚决地打破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毛泽东

五月七日

关于印发南京市公安局纯洁内部的计划的批语

（1951年5月7日）

罗瑞卿[1]同志：

公安机关及警察内部旧人员的审查清理处置的问题，应为此次公安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应以一天的时间专门讨论此项问题。南京这个材料[2]很有用，可印发到会人员作参考。

毛泽东

五月七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南京市公安局1951年5月3日关于纯洁内部的计划给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并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的报告。

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1951年5月8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各兵团及志司，并告中央及军委直属各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

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下面是东北军区保卫部在军区系统逮捕第一批二百零四名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发给你们阅看，请东北军区即照上述原则处理。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

中央

五月八日

对中南军区关于华南海防战备报告的复电和批语[1]

（1951年5月10日）

一

中南军区司令部：

五月六日报告[2]收到甚慰。望继续督促广东军区及各军加紧备战整训及其他必要措施，特别注意指导各军审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纯洁内部。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1951年5月6日报告的复电。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发这一报告写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的批语。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的报告。报告说：3月份华南地区海防工作，完成了要塞的炮兵安置，调整了水警区的岛屿守备。部队方面继续进行战备练兵，进一步勘察战地沿海一带及附近地区的地形、道路，熟悉战场，研究作战方案，准备机动作战。

二

华东军区司令部：

兹将中南军区司令部五月六日报告一份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督促所属加强备战整训和必要的备战措施，并将情况上告。派人下去检查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
五月十日

转发广东军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反指示的检讨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0日）

各大军区党委会，并转各省军区及各行署军区党委会：

直到今天为止，关于各省军区和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向军委作镇反工作的报告的还很少。我们要求每个区省级军区（包括各行署〔军〕区）党委会必须一律向军委作此项报告一次，限于七月一日以前交齐，由各大军区政治部主任负责督促。届时不交报告者，将受到通令批评。下面是广东军区党委会的报告。这个报告揭发了很多极端严重的现象，认真负责地处理了自己的问题，特发你们参考，并予通令表扬。

毛泽东

五月十日

同意在朝鲜战争结束前推迟解放金门[1]

（1951年5月10日）

聂：

同意你的意见。[2]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5月10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在朝鲜战争未结束前，夺取金门之战以推迟举行为宜。估计攻占金门须经过剧烈战斗，各项物资准备必须充分。而在朝鲜战争未结束前，两方同时供应，力量恐来不及。因此所需船只以暂不集中和补造为好，以免形成很大浪费。"5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朝鲜战争未获决定性的胜利前，暂不举行攻夺金门的战役。为此，除现有的500艘机帆船仍应分地进行训练与保养外，所缺船只暂不建造。

对今后兵工建设方针报告的批语[1]

（1951年5月12日）

同意此项计划。[2]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5月11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归纳兵工委员会关于今后兵工建设方针问题的讨论意见如下：（一）大家一致认为今后的兵工建设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但这个方针必须根据整个国防建设计划来制定。因军委过去尚无此项决定，故在考虑兵工建设时亦较困难。唯根据目前国际情况的发展，我们考虑要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与维护大陆国防的安全，需要保持60个军180个师的国防军。这些军的装备，则需要根据朝鲜战争的经验予以改善。（二）国防军的装备，必须向着生产自给的方向努力。（三）各种武器的口径规格原则上需要与苏联取得统一，但马上全部统一是办不到的，必须采取逐步统一的原则。（四）在苏联同意与我统一口径规格的情况下，我们不拟采取一般订货与聘请若干顾问的办法，而采取请苏联“包干”的办法，如请苏联负责帮我们建立野炮厂，并配足技术人员，直到教会我们能够掌握该项技术为止。

转发中南局关于纠正镇反中关门主义倾向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兹将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指示电[1]发给你们，请仿照办理。中央公安部正在组织十五个视察组，每组三人，分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省区检查镇反工作，定于六月十五日由北京出发。请你们即派若干视察组先去各县市实行检查，迅速纠正已经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南方面杀人最多，宣传最少，极不相称，存在着很大的关门主义倾向，必须立即纠正。从中南局五月十二日的电报看来，中央和中南局历次指示在汉口这样的地方并未实行，等于说空话，必须立即派人下去检查，问明责任，纠正错误，不可一刻延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5月12日给分局、各省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说，现在各市在镇反中的神秘主义、关门主义、不要群众参与、不管行政、不要党外人士参与、单靠公安部门孤立镇反的倾向，还未认真加以克服。口头上说大张旗鼓，事实上不找具体办法，即如武汉市从中南局直属机关逮捕5个人，连中南局的工作人员及主管人员都莫名其妙，就是明证之一。此外，今后对案情处理，要组织审查委员会，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包括进步、中间分子），这对镇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我们对案犯是采取依法判罪态度，并无不可告人之秘密，而通过这些人可以扩大宣传，并可增加材料。

缓。此电请你们一直转发至地委，并请迅速转去。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转发苏南区党委关于清理“中层”计划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

清理“中层”问题现在即应开始解决。除中央对此问题即将发出指示[1]外，苏南区党委五月七日的计划[2]及华东局五月十二日给苏南区党委的指示电[3]，均很好。请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在接到中央指示后，参考苏南此项计划及以前通报的华北革命大学的经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2] 指中共苏南区委员会1951年5月7日关于在直属机关中开展镇压反革命学习和清理“中层”的计划。计划指出，清理“中层”不仅带有审干性质，同时还带有教育提高全体干部的目的，应取更加慎重和妥善的办法，通过群众性学习运动来进行。清理“中层”的计划，大体上分为组织学习、登记坦白和分别处理三个步骤。第一，首先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准备。各机关应以行政首长为主，会同组织、保卫部门，并吸收党外人士参加，成立机关学习委员会，领导镇压反革命的学习。第二，进行坦白登记。在坦白登记前，要进行忠诚与老实的教育。第三，分别处理。根据原有材料、新的材料组织审查，分清问题的性质与大小，适当加以处理，对坦白者一般不应逮捕。

[3]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5月12日对苏南区党委关于在区直机关开展镇反学习和清理“中层”的计划的指示。

验[1]，作出自己的计划报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刘澜涛1951年4月29日关于华北革命大学开展“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的经验报告。

转发四军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大军区首长，并告志司首长：

兹将四军党委对于镇反工作的总结报告转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责成你们的政治部负责督促所属各军，除已作总结报告者外，一律作一次总结报告。拖延不报者应去电催促。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转发察哈尔省万全县镇压反革命经验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各中央局，并即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地委，并请各地委将此件一直转发到县委和小城市的市委：

兹将万全县的经验[1]通报给你们，请你们仿照办理。全国各县市的镇压反革命工作是如何进行的，是否向群众大张旗鼓地做了宣传，是否举行了群众的控诉会，群众的反映如何，请每个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除已写的市）都向我写一个报告，交地委和省委转送给我。我希望全国二千余县委和市委的书记同志都和我直接通信一次。这些通信收齐后将发一通报，其中最好的经验将如万全县一样转发各地作参考。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中共察哈尔省委办公厅1951年5月5日通报的万全县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是：将14名死刑犯分别于群众发动较差的城内、五区太师庄、一区西红庙、四区旧堡4处执行，并召开联村群众控诉会，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4处参加控诉会的群众两万余人，情绪极为高涨。

关于争取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的批语

（1951年5月15日）

李克农[1]同志：

叫袁大使[2]密切注意尼泊尔的动态，加以研究电告，并应努力与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给王淑兰的信

（1951年5月15日）

王淑兰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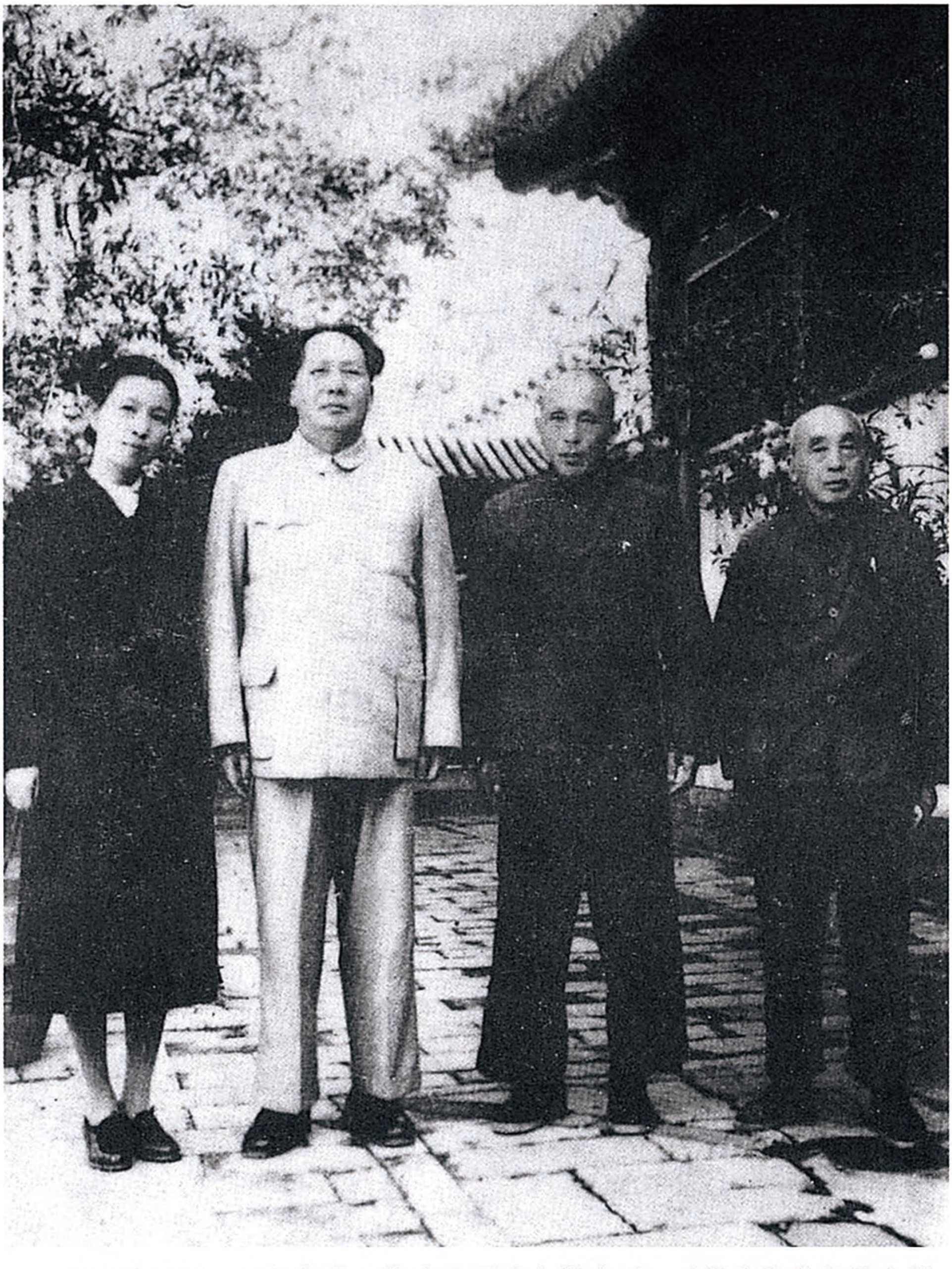
五月九日来信收到，欢迎文涧泉、文运昌两兄来京一叙。请持此电去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见刘道衡[1]同志，请他为两位文先生购买两快车头等火车票，并酌给路上用费，即可来京。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刘道衡（1892—1968），湖南衡阳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副部长。



1951年5月，毛泽东的两位表兄到北京做客时，毛泽东和他们的合影。（从左至右）江青、毛泽东、文涧泉、文运昌。

为治淮工程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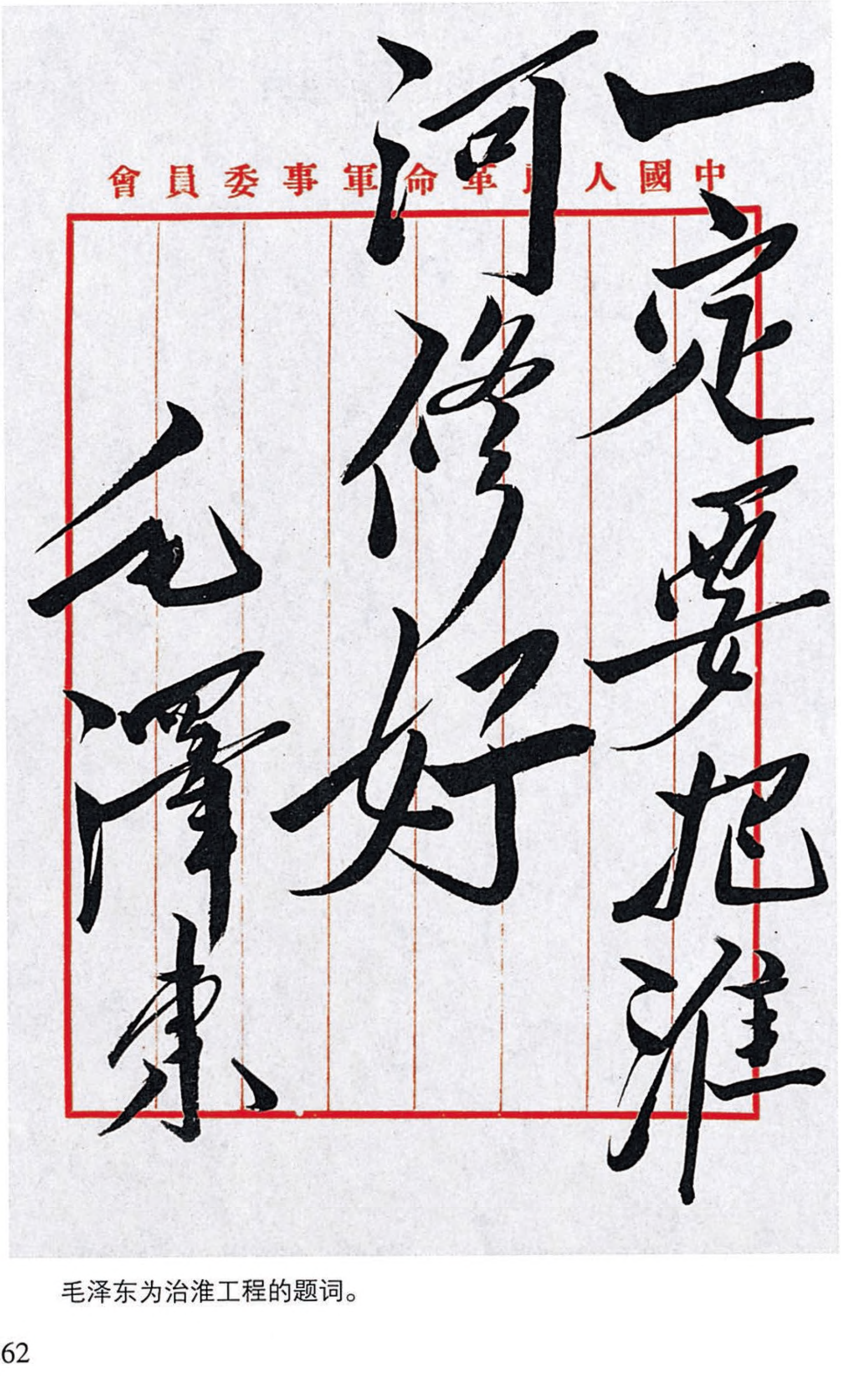
（1951 年）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治淮视察团授予河南省治淮总指挥部的锦旗的题词。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一定要把淮
河修好
毛澤東

毛泽东为治淮工程的题词。

中央关于转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1]的通知

（1951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及地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及军党委：

（一）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中央认为这个决议是适时的和正确的，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二）这个决议和本电必须转发给地委一级和军党委一级为止，这是机密文件，不得遗失；（三）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详情，由各公安部长、厅长、局长向你们传达；（四）这个决议和本电已发华东局三野和福建等三处，中南局和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五处，西南局和贵州云南等三处，西北局和一野新疆等三处，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等二处，东北局一处，志司一处，其他均请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和志司转发。

中央

五月十六日

---

[1]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于1951年5月15日通过，经中央批准后于5月16日正式下达。毛泽东对这个决议稿作了大量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通过，经中央批准。这是机密文件，地方发至地委一级为止，军队发至军一级为止，不得遗失。）

中央双十指示[1]颁发以来的七个月中，在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和全国公安机关积极工作之下，纠正了对待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逮捕和处决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敌焰大降，民气大伸，使镇压反革命工作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使人民的胜利和人民的统治进一步地巩固起来。由于中央和毛主席的密切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地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

现在一般地区，处决反革命罪犯的总数已达很大数量，需要迅即加以收缩。有些地区，逮捕了大批反革命罪犯，亟须加以清理。有些干部，随着群众反奸情绪的高涨，已开始发生了“左”的错误偏向，需要加以预防或纠正。同时，镇压反革命工作在城市开展的结果，又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并已开始牵涉到“中层”和“内层”。为了保证运动继续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特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原则和罗瑞卿同志的报告，作出如下决议：

（一）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特殊情况必须超过者，须经中

---

[1] 指中共中央1950年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但亦不应超过太多。西北方面根据那里的情况规定杀人不超过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这也是正确的。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特别是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此，才能获得社会的同情；才能避免我们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有利于国家的生产建设。同时，在处决反革命问题上，乡村已达人口千分之一（在西北地区为千分之零点五）、城市已达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者，应即停止大批地杀人。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二）现在全国积案未清的罪犯〔很多〕，必须有几个月用全力清理积案。因此决定：在今年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一』日的四个月内，全国各地，不论农村和城市，除现行犯和由各省（区）市党委呈请各中央局批准的少数人外，应一律停止捕人，以便集中精力清理积案。

（三）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关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其捕人和判罪应遵照中央五月八日指示[1]，一律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以昭慎重。

（四）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已经展开。但因运动发动较晚，有些城市镇压得还很不够，群众要求继续镇压，因此仍需大杀几批，并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经过此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以后，尚未破获的特务间谍分子的活动，必会更加隐蔽，因此公安部门必须进行更系统的侦察工作，并教育人民群众多方面地注意防奸工作。

（五）清理大批罪犯的积案，是最近几个月内的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各地必须通过党委，并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之下，从各方面调集大批的得力干部，采用突击方式，在六月至九月的四个月内，将积案基本处理清楚。其中最大部分，必须在六、七两月内处理清楚。如果不在夏季处理完毕，拖到秋冬冷季，必将产生严重后果。

在清理方法上，首先应清理该杀的和可以释放的。对于拟判一年以上徒刑的犯人，除不能劳动者外，必须一律组织他们参加劳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8日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

动。为克服监狱拥挤、营养不良、医药不足、发生疾病死亡等不良情况，应当仿照北京的办法，立即使他们离开监狱，参加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听候判决。对于判刑在一年以下的犯人，在多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可以采取缓刑或假释的办法，交群众负责管制。

（六）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凡已有这一工作的地区，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大。主要的办法，是由县一级，专署一级，省市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中央一级，共五级，分工负责，划分人数，指拨经费，调配干部和管押的武装部队，组织犯人劳动，从事大规模的水利、筑路、垦荒、开矿和造屋等生产建设事业。此事极为艰巨，又极为紧急，必须用全力迅速地获得解决。

（七）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在六月至九月内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八）对于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必须进行适当的工作，以减轻或消除他们和人民的对立情绪，并争取其拥护政府的措施。为此，第一，应向他们说明，政府的政策是只惩办反革命罪犯本人，并不株连其未积极参预反革命活动的家属，使其了解政府的宽大处置，并各安生业。第二，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财产时，必须留给其家属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财产。其财产较少者，一般可免予没收，以示宽大。第三，应有重点地布置侦察，进行监视，并对那些坚决反对人民和进行破坏的分子，予以必要的打击。

（九）对于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目前还十分不够。各地必须抓紧进行系统的侦察，求得弄清情况，逐步破案，以便争取于一年至一年半内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特务间谍分子。

（十）公安系统，包括警察和公安部队在内，必须于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过程中，如像南京公安局所提出的计划那样，认真地加以审查、清理和补充，使公安系统健全起来。

（十一）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十二）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

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捕杀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十三）为了使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完全遵守上述工作路线，避免犯错误和纠正已经发生的偏向，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省（区）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四级，均必须派遣多数的视察组，每组三人，向下一级至几级检查各地的镇反工作。各级工作组凡未派者，必须于六月内派出，不得迟延。视察和检查的标准是中央和各大行政区关于镇反工作的各项决议、指示和法令。

（十四）为了迅速地了解情况和及时地纠正错误，决定从六月一日至九月三十『一』日的四个月内，从县级起直至中央，共五级，必须每五天由下级公安机关的首长用电话、电报或其他方法报告工作情况一次，不得违误。

（十五）以上各项，要求各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区）市一级，于六月一日以前，订出具体计划，正确地施行之，并报告各中央局和中央备案。

（十六）决定于八月内召开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检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转发邓小平[1]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6日）

小平，子恢，剑英，漱石，仲勋，一波，高岗[2]诸同志，并请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负责同志：

小平同志的报告[3]很好，发给你们研究。我的意见附注在报告各段里面，并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邓小平1951年5月9日关于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向毛泽东并中央的综合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批注了9条意见：1. 在报告谈到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和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胜利

处，毛泽东批注："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2. 在报告谈到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坚持复查、减退、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的方针处，毛泽东批注："所有这些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3. 报告谈到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领导决定收缩，下面继续杀人处，毛泽东批注："中南区也发生此种现象，也是控制不严的结果，必须记得这个教训，千万不可重复。"4. 在报告谈到上述现象经过西南局几次指示，特别是毛主席的几次指示，4月底都已停止下来处，毛泽东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坚决一律都停止下来，方能控制。"5. 在报告谈到杀人批准权，除个别地委外，均已收到区党委处，毛泽东批注："必须无例外地一律收回到省委或区党委。"6. 在报告谈到镇反和土改后期，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处，毛泽东批注："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7. 在报告谈到西南全区干部从5月起进入整风，总结经验，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处，毛泽东批注："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风。"8. 在报告谈到许多同志以为抗美援朝影响工作，而群众一搞起来，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处，毛泽东批注："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9. 在报告谈到今春雨水太多，可能影响春耕，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示处，毛泽东批注："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

关于将捕人杀人的批准权一律提高一级的电报

（1951年5月16日）

子恢[1]同志，并告饶、邓、习[2]：

五月十一日电收到。为了不使步骤混乱难于掌握（目前中南西南两区已有难于掌握的形势，必须严重注意），捕人杀人的批准权必须一律提高一级，不许有例外。在土改区可由省派代表至专区，由专区派代表至县，掌握材料，用电话向专区请示批准捕人，向省请示批准杀人，这样对于捕杀少数人仍是便利的。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关于鼓励部队继续剿匪致广西军区电

（1951年5月16日）

广西军区司令部，并告中南军区：

你们五月七日电收到，四月份全省歼匪近三万人，残余匪众只剩一万五千人，甚慰。尚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关于清理“中层”问题致高岗[1]电

（1951年5月16日）

高岗同志：

清理“中层”问题中央将于数日内发一指示[2]，请你接此指示后将你们的指示作适当修改，然后发出实施。详由汪金祥[3]向你面报。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

[3] 汪金祥，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中央转发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反宣传计划的批语

（1951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

兹将察哈尔省委关于进一步普及镇压反革命宣传的计划[1]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计划是完全正确和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地均照此计划去做。

中央

五月十六日

---

[1] 中共察哈尔省委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各级党委宣传部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作为当前工作重心之一。（二）各区普遍召开一次各界代表会，各村普遍举行若干次各阶层的座谈会，专门讲解《惩治反革命条例》，联系本区、本村的镇压反革命工作，进行讨论，使群众明了政策。（三）大力组织群众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和防奸常识。（四）在镇压反革命的紧张阶段，应利用群众关心的每一个具体事件，经常向群众作报告。（五）各种对外宣传的报纸、刊物，均应发表专论。

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

（1951年5月1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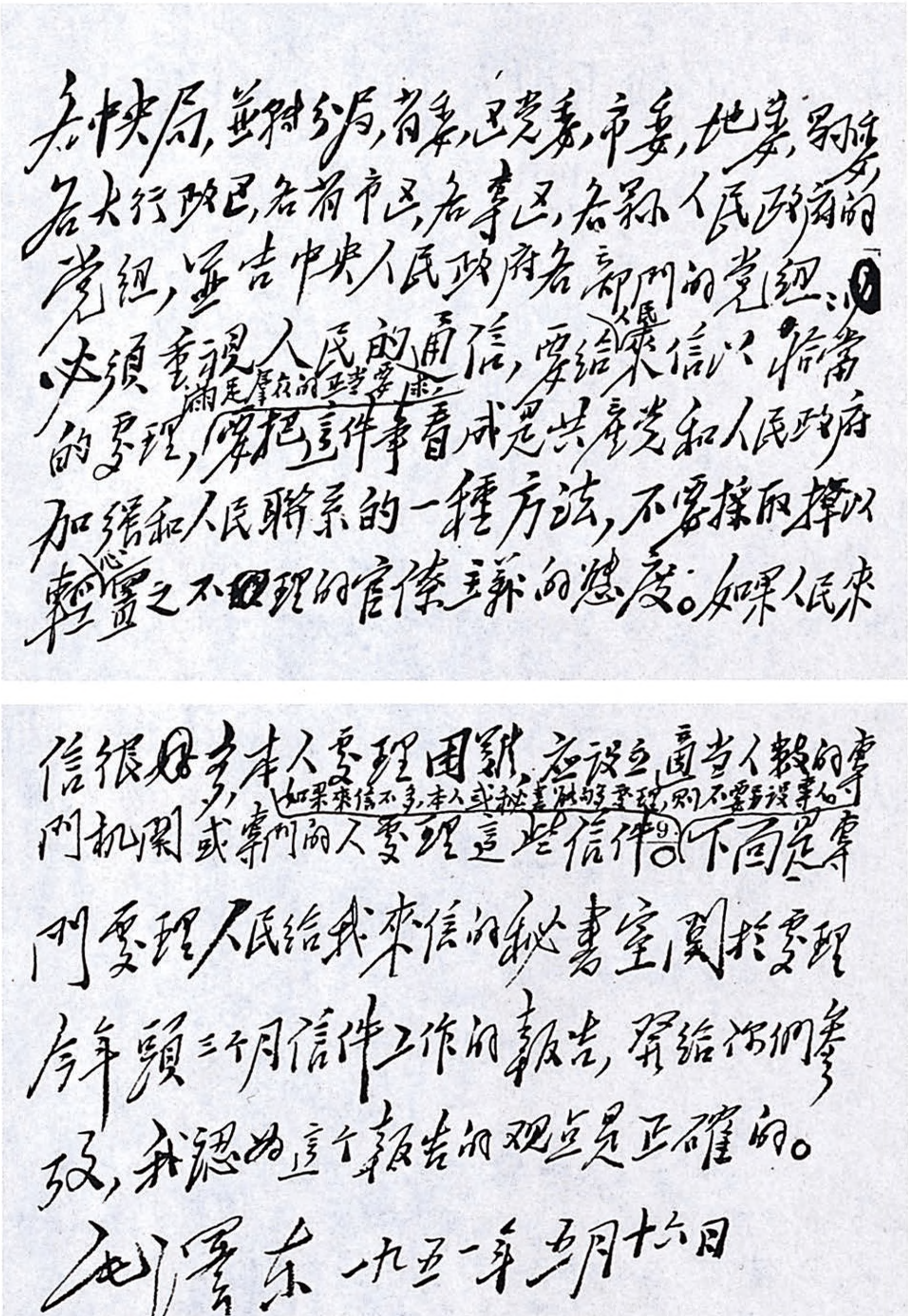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1年4月30日关于1月至3月处理群众来信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对这段时间收到的近两万封群众来信进行分类统计，概述了来信反映的问题以及对这些来信处理的情况。报告并说“还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这种情形，无法一一回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毛泽东对此写了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並轉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專区，各縣人民政府的党组，並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处理，滿足群众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方法，不要採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如果人民來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難，應設立適當人數的專門機關或專門的人处理這些信件。如果來信不多，本人或秘書能夠处理，則不要另設專人。下面是專門处理人民給我來信的秘書室關於处理今年頭三个月信件工作的報告，發給你們參考，我認為這个報告的观点是正確的。

毛澤東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起草的《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的手稿。

在总政转发西北军区航空处镇反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5月17日）

中央已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发给你们，望全军一体遵行不得违反。其中规定从六月一日起捕人杀人均要报请大军区批准，以昭慎重，望加注意。

中央转发华东局等关于涡阳事件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5月19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

请你们检查所属各县中是否有像皖北涡阳县那样的严重现象[1]，如有，必须给以坚决的处理，否则是很危险的。兹将华东局，皖北区党委和阜阳地委关于涡阳事件的电报三件[2]发给你们参

---

[1] 指皖北区涡阳县党政机关内部混入反革命分子和存在不纯分子的严重问题。据中共阜阳地委统计，涡阳县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不纯分子共83人，其中有血债、有罪恶的土匪、恶霸、特务及蒋伪分子有34人。

[2] 这三个电报是：中共阜阳地委1951年4月28日关于对涡阳县混入反革命分子处理情况给皖北区党委的报告；中共皖北区委1951年5月7日关于阜阳地委处理涡阳事件的意见给阜阳地委并报华东局的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5月15日关于处理涡阳事件给皖北区党委、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区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华东局的电报指出：（一）对于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镇压的决心还不够，表现在对那些血债累累的土匪、恶霸、特务，未坚决处以死刑。（二）对于党内问题，亦应严肃处理。对直接包庇敌人的县长等，均应开除党籍，依法交公安机关审判。（三）在对此事件的处理中，注意总结经验，通报全党，进行教育。今后还应切实注意该地组织内部的审查工作。

考。我们认为华东局的意见是正确的。

中央

五月十九日

转发无锡市委关于组织民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19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县委：

使民主人士与闻镇反工作要求一些具体形式。关于审查案卷方面，华东各地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组织了“反革命案件审查委员会”。无锡实行的结果很好，各地都应仿照办理。实行这种办法，民主人士真正得到了学习机会，去掉了怀疑，和我党更加靠拢，我党也就更加主动了。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1]

（1951年5月20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的一部分。

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中央关于印发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的通知

（1951年5月21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省级军区，军分区，兵团及军师党委：

兹将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1]发给你们，请你们照此执行为要。

中央
五月二十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5月21日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以便弄清情况，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提高我们组织的纯洁性。指示对清理的范围和重点，步骤和方法，对各类人员处理的政策，工作中注意防止的偏向，以及清理工作的领导问题，都作出了规定。

转发东北军区党委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5月21日）

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各大军区：

兹将东北军区五月十八日关于在军事系统进行镇反和清理工作的指示[1]发给你们参考。这是根据最近中央指示而规定的方针和办法，除时间一点外，各区均应当照此办理。

毛泽东

五月廿一日

---

[1] 中共东北军区委员会指示的主要内容是：（一）对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立即组织力量加强审讯工作，从审讯中证实已有材料，发现新的材料，弄清具体罪恶事实，然后按其问题轻重拟出名单、意见，实行分别处理，但严禁刑讯逼供。（二）对已有材料但尚不够逮捕条件的反革命分子及复杂分子，应继续收集材料，研究分析，如经查对证实，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调离重要部门，留部队继续审查，由军区集中劳动管训继续审查，或予以清洗的办法处理。（三）部队应进行一次有重点、有步骤、有对象的审查工作，把混入部队的各种反革命分子清查出来，面目不清者弄清，以纯洁内部。

关于同意目前收兵休整致彭德怀[1]电

（1951年5月22日）

德怀同志，并告高岗[2]同志：

廿一日廿三时电[3]悉。根据目前情况收兵休整，准备再战，这个处置是正确的。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彭德怀1951年5月21日23时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第五次战役为时一个月，进行东西两线作战，部队有些疲劳，需恢复和总结战斗经验。战斗发起后，第一线运输极端困难，且雨季已接近开始，数江湖沼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暴发，交通全断，顾虑甚大。此役未消灭美师团建制，敌夸大我之伤亡，还有北犯可能。根据上述，我军继续前进，不易消灭敌人，徒增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寻机歼敌。

中央批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的通知

（1951年5月22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地方军区，各级公安部门，及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党组：

兹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1]发给你们。中央批准这个决议，望你们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

五月二十二日

---

[1]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1951年5月15日通过的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指出，对反革命犯和普通犯人必须根据惩办与改造相结合的原则，并适应全国各项建设的需要，着手制订通盘计划，组织劳动改造工作。凡有劳动条件的犯人，应一律强迫其参加。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的批语

（1951年5月23日）

中南、华南、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中央局：

上海市委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意见[1]是正确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

[1] 中共上海市委1951年5月19日关于严防在控诉会上扩大打击面的通报中规定的几条意见是：（一）控诉会的控诉对象一律确定为被捕罪犯（并以罪大恶极的为主）。（二）控诉会不能变成斗争会，不能把打击面扩大到落后分子以及有关生活作风、思想观点方面。（三）控诉会不能在一个基层单位连续不断地召开。一般好好准备召开一次即可。如无具体控诉对象可不召开，以座谈讨论已破获的反革命案件等方法，提高群众的政治认识。

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水平

（1951年5月23日）

谭政[1]同志：

五月十七日电悉。（一）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2]是正确的。（二）希望你于秋季再去广州一次，检查各军的工作和海防工作。你去时最好再找一二个在朝鲜作战有经验的高级干部同去广州，向干部们作报告，提高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

[1] 谭政，当时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5月17日谭政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华南各军军事训练的方针。报告说，考虑到我们现在的练兵是战略练兵，必须从精神上有所准备，即是趁敌人未来以前，集中时间将必须学的赶紧学好，以便有备无患。因此，就不宜按和平时期办法按步施教。军委训练部所订计划内容太多，且规定不能更改，如按其实施则时间很难集中，重要的课目没有充分足够时间去教，极易产生形式主义。鉴于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经验，在我军技术战术教练上着重某些方面训练是有必要的，不应按平隙时间和按操典程序施教。

转发武威地委关于召开反革命家属座谈会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县委：

武威的经验[1]很好，全国各县市均应这样做，争取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孤立尚未消灭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

五月廿三日

---

[1] 指中共甘肃省武威地委1951年5月3日报告中所说的关于武威专署公安处召集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开座谈会的经验。

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

（1951 年 5 月 24 日）

1951 年 5 月 23 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图为双方代表在协议上签字。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

在，达赖喇嘛[1]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2]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宴会上致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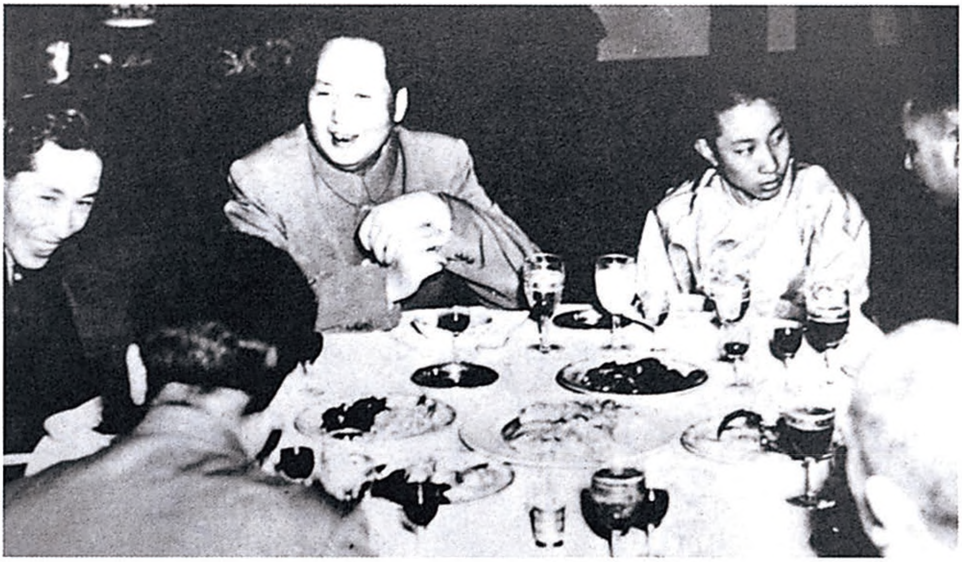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生，青海湟中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汉藏文本。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宴会上。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庆祝《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宴会上。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和阿沛·阿旺晋美在宴会上。

1951年5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向毛泽东献礼。

1951年5月24日，毛泽东和阿沛·阿旺晋美亲切交谈。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1年5月24日）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经阿沛·阿旺晋美[2]先生带给我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在你亲政以后，开始改变以往的态度，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先生为首的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举行谈判。你的这项举措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我希望你和你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认真地实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尽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和平开进西藏地区。我特派张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 阿沛·阿旺晋美（1910—2009），西藏拉萨人。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当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

经武[1]代表同你的代表们一道前来你处，以资联络。如你有需要他协助的地方，可随时与他接洽。附来礼物，至希收纳！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

[1] 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今炎陵）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

（1951年5月25日）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1]已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北京签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该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为此，特决定如下：

一、进军部署：

（一）西南军区之十八军除留两个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于甘孜、昌都地区担任修筑甘孜机场与甘孜、昌都段公路任务外，五十二师进军西藏任务不变。该师应以一个团进驻拉萨，两个团（缺一个营）进驻丁青、所乌[2]、嘉黎、太昭[3]地区，师部进驻太昭，另以一个营编成独立支队，由硕督[4]地区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之工布地区西进，担任宣传与侦察任务。

（二）西南军区之十四军一二六团应由德钦地区进驻察隅地区。

（三）西北军区之骑兵支队应由玉树进驻囊谦地区，并仍属西北军区建制。

（四）西北军区由新疆准备入藏之部队，除先头部队继续侦察到达噶大克[5]的道路外，主力继续修通公路，以备随时入藏。

二、物资补给：

（一）补给关系，除十八军与十四军入藏部队由西南军区负责补

给外，骑兵支队仍由西北军区负责补给。

（二）粮食，除十四军一二六团与骑兵支队分由云南与西北军区负责补给外，十八军入藏所需之粮食应以组织牦牛、汽车等运输为主，并在当地收买一部，不足数则由西南空司负责组织空投及其他方法解决之。

（三）修路：

A．甘孜——昌都——丁青——所乌——太昭——拉萨公路由十八军负责抢修，力争于明年年底完成。

B．西宁——黄河沿——玉树——囊谦——类乌齐——丁青公路由西北军区负责修筑，并将黄河沿——玉树——囊谦段继续修通。

C．敦煌——柴达木——黑河[6]——拉萨线为我对西藏将来油料补给的预定路线，应由西北军区派人进行实地勘测。

（四）机场，除十八军应迅速完成甘孜机场的修建任务外，并应在丁青一带选建一临时着陆场，在拉萨修建一普通机场。

三、此次进军系在和平协议下的战备进军，各部万勿以和平协议已成而松懈战斗意志与战斗准备，因协议虽然签字，但尚未付诸实施，同时帝国主义必会用各种阴谋手段来破坏我们和平解放西藏的实现，因此应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有应付意外情况的充分准备，同时必须加强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以保证解放西藏巩固国防任务的圆满实现。

四、各部接此训令后，应立即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并随时将准备情况报告军委。进军行动待军委进军命令颁布时实施之。

主席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其要点是：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二、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三、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四、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五、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六、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七、实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寺庙的收入，中央不予变更。八、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九、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十、依据西藏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十一、西藏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可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方法解决之。十二、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十三、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同时买卖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针一线。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并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邻邦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易关系。十五、为保证本协议之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员外，尽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员参加工作。十六、军政委员会、军区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军所需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十七、本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2] 所乌，当时是西康索克宗（县），今为西藏自治区索县。

[3] 太昭，旧县名，位于西藏中部，1960年改工布江达县。

[4] 硕督，旧县名，1960年并入西藏洛隆宗，改设洛隆县。

[5] 噶大克，即今噶尔雅沙，地名，位于西藏噶尔县东南。

[6] 黑河，旧县名，即今西藏那曲。

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

（1951年5月26日）

德怀[1]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草稿时加写和改写的话[1]

（1951年5月26日）

一

中央的这个政策[2]，不但对西藏是如此，对国内一切占少数的兄弟民族都是如此。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如果不是出于各民族人民以及和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们自觉自愿地去进行，而由中央人民政府下命令强迫地去进行，而由汉族或他族人民中出身的工作人员生硬地强制地去进

---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毛泽东在审阅社论稿时，除加写和改写了这三段文字外，还在李维汉为送审社论和新闻稿给自己的报告上，写有以下批语："这些可即动员一些人翻译藏文，校正勿误，连同协议和签字时的致词（藏文）印成一本，让他们带回去，并送十八军、西北在玉树区域的部队及王震入藏部队。"

[2] 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规定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行，那就只会引起民族反感，达不到改革的目的。

二

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人民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信仰是很高的。因此，协议中不但规定对宗教应予尊重，对寺庙应予保护，而且对上述两位藏族人民的领袖的地位和职权也应予以尊重。这不但是为和解藏族内部过去不和睦的双方，也为使国内各民族对藏族领袖引起必要的尊重。

三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的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而以自己的衷心尊重西藏民族和为西藏人民服务的实践，来消除这个历史上留下来的很大的民族隔阂，取得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的衷心信任。如果这些部队和工作人员中有违反民族政策和协议的行为，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则有批评的权利和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反映和报告的权利。这个原则，不但对藏族是如此，对一切兄弟民族都是如此。

给章士钊[1]的信

（1951年5月26日）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列席全国委员会会议人员的名单昨已确定，其中没有香港方面的人，与尊旨尚无不合。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海棠诗收到，谨谢厚意。

---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歼敌[1]

（1951年5月27日）

甲、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2]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内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如能提前于夏秋两季达到削弱敌人目的，即可于冬季打大仗，求得一次大量歼灭敌人。

乙、应加强政治工作，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

丙、组织上，完全同意“统一集中，减少层次，精干组织，提

---

[1]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整理的毛泽东指示要点的一部分。毛泽东1951年5月27日在听取解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关于朝鲜战场情况的汇报后，对志愿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作出指示。解方于当日整理毛泽东的指示，并电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

[2] 彭总，指彭德怀。

高效率”的原则。兵团最好取消，加强志司[1]与军（陈赓同志也同意这个方案），变为精干指挥所也可以。每军建制增加一个师，减掉三至四个军直，以加强新兵训练，军后勤机构则可抽出一部充实后勤。具体方案请彭总提出。

丁、入朝部队六个月左右换班，调到朝鲜北部或我国东北、华北休整三个月左右，再参加作战。西南第三番三个军已到华北，干部太缺，短期内不能出动。杨兵团[2]两个军已准备好可随时出动。

戊、除注意建设与加速空军出动外，目前重点是加强反战车武器与防空武器，部队则应大力提倡打战车，打飞机。

---

[1]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2] 杨兵团，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杨成武任兵团司令员。

关于华东各城市收回捕杀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致饶漱石[1]电

（1951 年 5 月 28 日）

漱石同志：

五月十一日报告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华东各城市的反革命分子应当再逮捕几批，到逮捕干净时为止。各城市的捕杀批准权，如你认为有必要，可以推迟一个月到七月一日再收回至上一级，以利继续捕杀。此外请注意你自己及各级主要负责人的安全防卫。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为陈永康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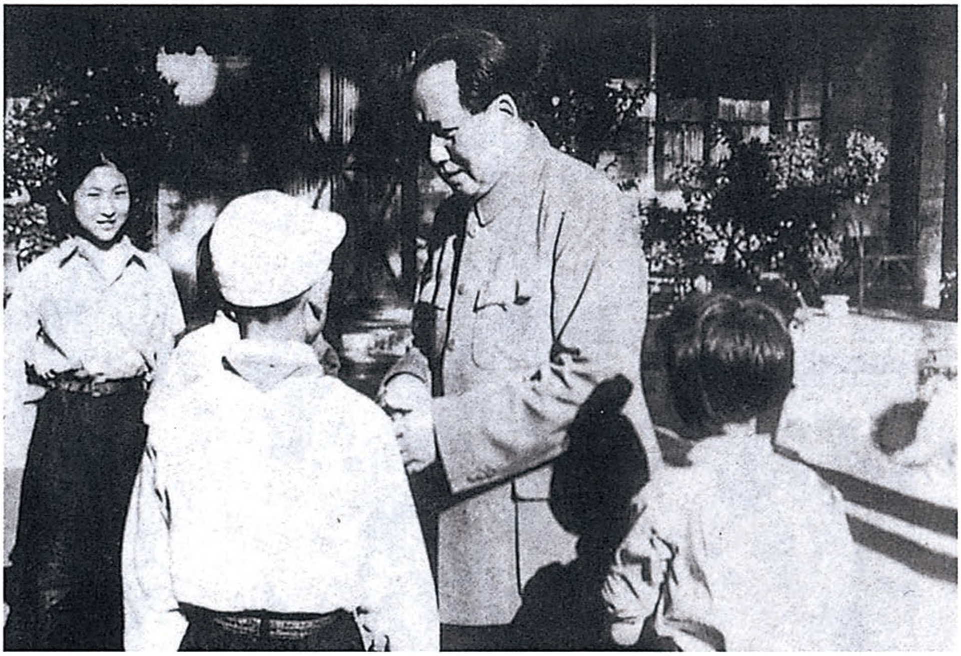
（1951年5月28日）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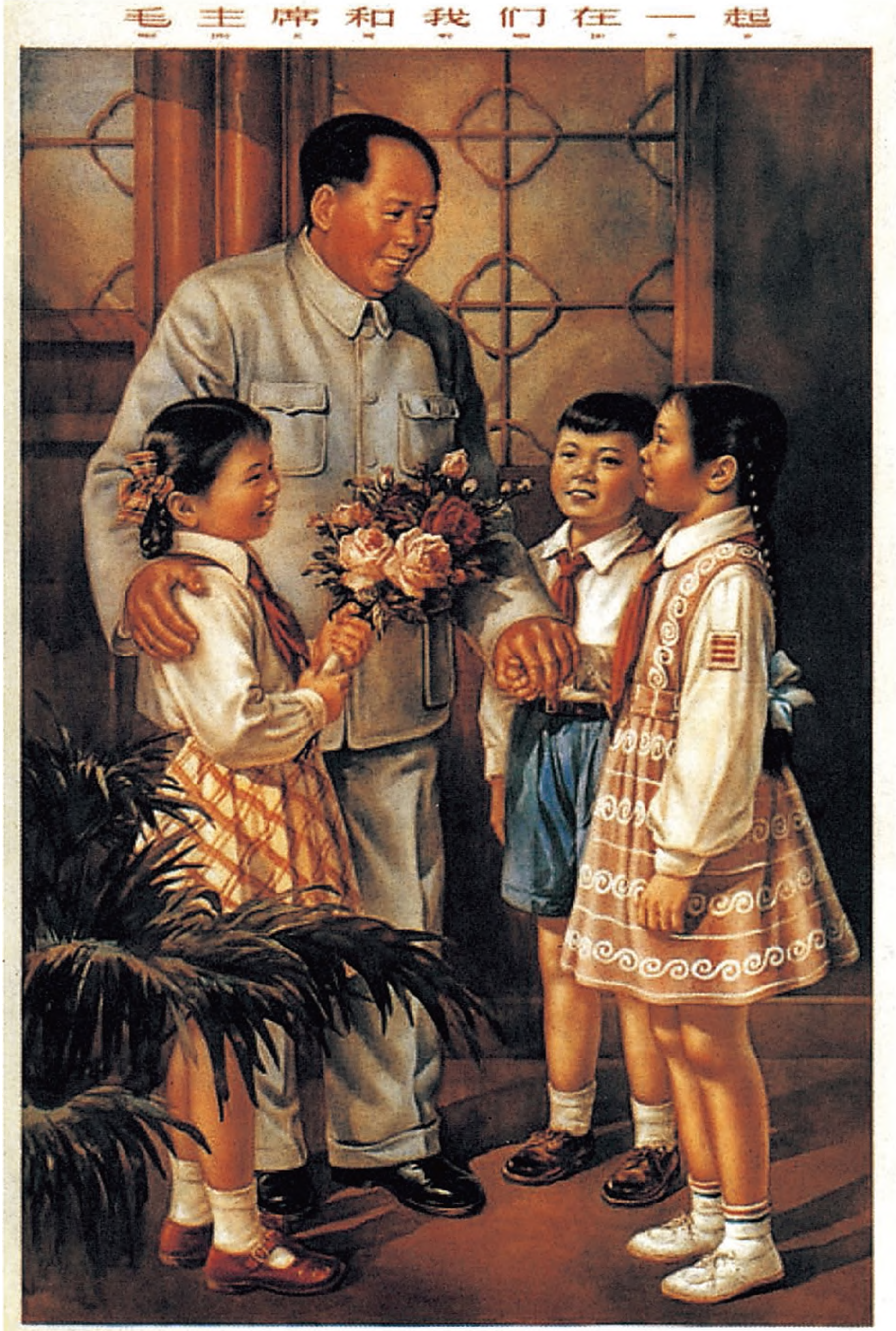
[1] 1951年5月28日，毛泽东亲笔为苏州金阊小学一年级学生陈永康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制作锦旗赠送给陈永康，同时向全国青少年发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号召。

1951年6月1日，少先队员代表向毛泽东献礼。



1951年6月1日，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一起。

1951年6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和李敏及其同学亲切交谈。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年画）

关于同意阻敌和兵力调动计划致彭德怀[1]电

（1951年5月31日）

德怀同志，并告高[2]：

各电均悉。（一）你令各军坚决阻止敌人于金化、铁原、朔宁一线及其以南地带的计划，将四十二军主力调至伊川以东地区、将四十七军调至南川新幕地区的计划，都是很对的，望坚决执行。（二）杨成武两个军可即调动入朝，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七军修飞机场兼顾海防，以一个军代替四十二军防卫元山方向的可能登陆。（三）为防止伪首都师由襄阳向北窜扰元山，必须使用一个有战斗力的师于高城通川之线，人民军有此力量否？（四）六十军一八〇师的情况[3]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二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该部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中，因处置失当，被敌机械化部队包围于芝岩里地区，遭受了严重损失。

转发邓子恢[1]关于城市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5月31日）

漱石，子恢，剑英，小平，仲勋，一波，高岗[2]同志，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邓子恢同志关于城市工作的意见[3]发给你们参考。工厂中，矿山中，码头上，街道上，必须发动群众对于素来欺压和剥削群众的反动分子举行坚决的斗争，分清敌我界线，给予这些反动分子以必要的打击，最严重者予以处决，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加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邓子恢1951年5月16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城市工作的意见主要是：在工厂矿山中，必须下决心用全力发动工人进行民主改革运动，以此来清扫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的下层封建基础。只有经过这一段运动，工矿才能成为人民的新企业，才能有大发展前途。在街道中也应经过一段群众的民主改革运动，才能肃清城市中的封建特务势力，肃清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在城市中的下层基础，使城市真正成为人民的城市。

以注意。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

对薄一波[1]报批的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给各中央局的电报等文稿的批语

（1951年5月31日）

一波同志：

（一）给各中央局的电报[2]已批发；（二）中央的公开通知[3]退还你，请添上政务院发布指示[4]的时间，连同指示送新华社发表；（三）农业税是否增加及是否号召捐献问题，还须等几天中央才能召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为发布政务院购棉储棉指示给各中央局负责同志说明情况的电报。

[3] 指中共中央1951年6月1日为保证政务院指示中提出的购棉储棉任务胜利完成给各级党委的通知。此通知当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4] 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1951年6月1日发布的政务院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我国棉花产量供不应求，棉农存棉不肯出售，造成纱厂因原料供应困难开始停工的情况。指出：此种情况，如不设法改变，将影响到全国军民衣着的供应和物价的稳定，影响到战争和全国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在全国棉农中开展一个爱国主义的售棉、储棉运动，劝告有棉花的农民在合理牌价下将存棉立即卖给国家，作为农民对于国家一种重要贡献的爱国表示。同时，国家贸易公司、合作社则应规定合理牌价，收购棉农的棉花，合作社、人民银行则应以有利于棉农的储蓄办法，吸收棉农的实物储蓄或折价储蓄。实行坚决的公私兼顾政策。这个指示亦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集会议讨论。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

询问我军阵地构筑和防守情况

（1951年5月31日）

德怀[1]同志：

请答复下列问题：（一）杨口、华川、涟川之线以北，文登里[2]、金化、铁原、朔宁[3]之线以南地带过去所筑阵地坚固程度如何，我军扼守此线不让敌进，而于该线寻机多打小歼灭战，以求逐步削弱敌人，可能性如何？（二）你是否正在部署在文登里、金化、铁原、朔宁之线以北，金城[4]、平康、伊川、南川店之线以南地带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扼守该线的可能性如何？（三）四十二军在阳德地区，四十军在沙里院地区做了工事否？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廿二时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文登里，位于江原道（南）杨口郡中部。

[3] 朔宁，位于江原道（南）铁原郡西南。

[4] 金城，位于江原道金化郡东北。

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

（1951年6月1日）

德怀[1]同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军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的问题。听说近来敌人的坦克增多了，我军必须增强反坦克武器，足以征服敌人的大量坦克，才能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的步兵。你对此事有何意见，我军现在配备的反坦克武器是否够用，哪些武器最有用，每团是否应配备一个专门的反坦连，望告。

毛泽东

六月一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中央转发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的批语

（1951年6月1日）

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并告西南局：

兹将云南省委关于初步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1]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凡新区有与云南情况相同或有某些相同之处者，可以参考这个决定，整顿那里的党的组织。

中央

六月一日

---

[1] 中共云南省委1951年5月21日关于初步整顿党组织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调整主要骨干和培养干部。所有地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一律由经过土改、三查、整党锻炼的外来干部担任。原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有的须重新调整和分配工作，将他们放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提高。同时把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农积极分子逐渐培养和提拔成为党的各种工作干部。凡地主富农出身和与地富关系密切的干部，必须坚决调离本地。（二）教育干部。在党内以各种方式（包括整风学习、工作总结等）认真进行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的整体观念的教育，党纲党章的教育，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掌握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水平。（三）审查干部。首先在党内划清敌我界限，把坏分子立即清洗出党。（四）整顿支部。目前先按照支部不同情况，分为继续活动、停止活动、解散三种处理。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关于汉口特务纵火事件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汉口特务纵火，毁房二千余间，受灾一万余人，这一严重事故，一切城市均应引起注意，应组织群众防特放火，在开群众大会时尤须严防。零陵和汉口两次特务放火事件，应引起一切城市的注意。

中央
六月二日

关于三兵团休整和接防问题致彭德怀[1]电

（1951 年 6 月 2 日）

德怀同志：

六月一日电收到。三兵团在阻击任务完成后撤至谷山地区整补，恢复元气，很有必要。但三兵团在华川至涟川一线阵地的防御任务极为重要，须有别部担负，是否由九兵团接防。

毛泽东

六月二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派出所同局捐献收款小组
献捐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图为国内人民正在为前线捐款。

加强国防力量捐献铁器

抗美援朝期间，国内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图为国内人民正在为前线捐赠物品。

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

（1951年6月2日）

德怀[1]同志：

（一）金日成同志六月三日晚可到北京，他可能提出作战方面的意见。因此你准备给金雄[2]同志的电报请暂时不要发出（此电也还须作部分的修改）。（二）看了志政六月一日二十时对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电[3]及三兵团政治部五月三十一日给十五军及六十军政治部的指示电[4]，这两个文件均很好。目前提高斗志，停止敌进，稳定局面，极为重要。（三）三兵团政治部的电报里说，“担任阻击的部队必须彻底地把休整的思想转变过来，认识阻击的意义”。这样指出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金雄，当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官。

[3] 指1951年6月1日20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关于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电。电报说：“目前政治工作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将各级干部动员起来，以坚定的战斗意志，转危为安的毅力，坚决对敌斗争。要说明敌人这次进攻完全是一种冒险行动，是试探性的，我们有强大的后备力量，敌人是胆怯的，切不要被敌人的虚张声势所迷惑。事实证明，凡是我军采取了坚决的抗击，不仅保持了阵地，并给敌人很大的杀伤，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各级政治机关应召集紧急会议，号召全体干部同志发挥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带领战士，勇敢机智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把暂时不利的局面转为完全有利。”

[4]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政治部1951年5月31日关于阻击作战动员工作的指示电。

很有必要。因此三兵团似应分为两种部队，一种是战斗力没有破坏或没有很大破坏的部队，留在前线担任阻击，继续作战，打些小胜仗，振奋士气，锻炼自己。一种是战斗力有很大破坏的部队，这必须调至谷山地区整补，以备再战。十九兵团则主力应留在前线作战，一部分残破部队则开至近后方整补。又志司五月二十七日的新兵分配数字，十九兵团占五万余人，三兵团只有几千人，是否须根据三兵团近日减员情况有所调整。

毛泽东

六月二日二十三时

关于处理涉及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的批语

（1951年6月3日）

罗瑞卿[1]同志：

凡关涉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只收集材料，不忙处理。

毛泽东

六月三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侧面登陆之敌

（1951年6月4日）

德怀[1]同志：

据国民党方面五月三十一日东京情报称“联军将从东线向西北推进。自元山起，至开城止一斜线，压迫共军撤至平壤之北。可能另组元山登陆部队，以促成共军提早放弃临津江以东地区”等语。此种阴谋应肯定是真实的。我全军应振奋精神，加速准备，粉碎正面之敌及从侧面登陆之敌。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审阅《人民日报》关于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社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6月6日）

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

关于修筑进藏公路的批语[1]

（1951年6月8日）

聂[2]：

是否有钱修这些路，请与陈云[3]同志商酌，可缓者应一律从缓。

毛泽东

六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张宗逊（第一副司令员）、甘泗淇（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揆要（参谋长）1951年6月7日给军委并报西北局的电报上的批语。张宗逊等在电报中谈到进军西藏的军事部署、补给、修筑道路等问题，提出：（一）建议今年继续修通张掖至西宁公路（360公里），以便于油料的补给。（二）立即准备1952年春开工修筑的黄河沿至玉树公路。（三）立即着手分段勘测玉树至囊谦及敦煌经柴达木、唐古拉山口、黑河至拉萨线。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3]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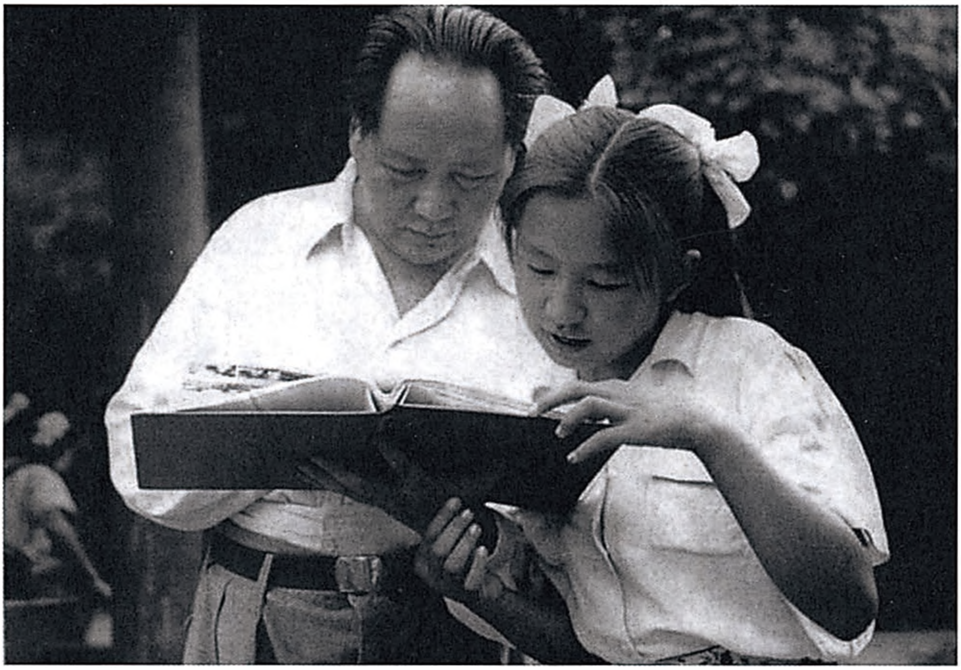
1951年，毛泽东和孩子们在观赏荷花。

1951年6月，毛泽东和李讷在中南海。

1951年6月，毛泽东和李敏在中南海划船。

1951年，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在北京香山。

1951年，毛泽东和李敏一起看影集。



1951年，毛泽东和李讷一起看影集。

1951年7月，毛泽东和李讷在北京香山寺。

六七两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

（1951年6月11日）

德怀同志：

（一）你六月四日二十时给金雄同志的电报[1]指示甚好，有了这个指示，你五月三十一日给金雄的指示草稿可以不发了。（二）已和金日成同志谈好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打稳扎的反攻。（三）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你意如何盼告。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四时

---

[1] 指1951年6月4日20时彭德怀给朝鲜人民军前线指挥官金雄的电报。电报说："敌人在各线的进攻虽已被阻，但估计敌人仍会拼命前进。我军为缩短供应运输线，争取反攻的准备时间，以及增加敌之困难和削弱其战斗力，在东线地区还须向后收缩一段为有利。因此，必须动员这一地区的党政民坚持对敌斗争，设法配合我军正面阻击，以逐渐削弱与疲劳敌人。"

为了解敌占金化、铁原后的动态及我军部署致彭德怀[1]电

（1951年6月13日）

德怀同志：

（一）敌占金化铁原后，动态如何，我军能否在该线至金城平康兔山线之间阻住敌人，我军部署如何，极念。（二）已令邓华[2]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十五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转发华北局关于通县传达贯彻“死缓”政策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河北省通县反映的情况值得注意。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在华南分局关于叶剑英[1]患病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1年6月16日）

尚昆[2]同志：

请查询广州是否有高明的医生及剑英病情告我。

毛泽东

六月十六日

---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民主德国举行“德中友好月”的感谢电

（1951年6月18日）

德国统一社会党转政治局
威廉·皮克同志和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德中友好月”，并承来电祝贺，至深感谢。谨向伟大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创造者和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皮克同志和乌布利希同志致敬，谨向光荣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为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德国人民致敬。中德人民友好万岁！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八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19日）

这是一次二万七千多人的大规模的审查经验[1]，很值得各地研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1年6月13日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情况及经验给山东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军政委员会整理“中层”的工作，是从4月5日开始的。基本方针为学习文件，开展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在策略上严格划清敌我及内外界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打击反动的首要分子，并严防“逼供信”的现象发生。现全部过程虽尚未完全结束，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已普遍展开。总计参加此次学习的人数，共有27302人。整个学习过程，大体上分作学习镇反文件、审查登记、开展坦白运动和审查调处四个阶段。报告说，整理“中层”的工作，是一件很复杂、细致的工作，领导上除了掌握每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特点及其相互关联，还必须充分注意下列几点：（一）必须在既定方针下采取抽丝剥茧、逐步推进的方法，即由一般学习到个人坦白，一般的填表登记到对反动党团特务及反革命武器证件的清查。（二）学习目的必须明确，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必须分清。对反革命分子也要分清罪大罪小，并反复说明人民政府的政策。（三）一切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必须适当照顾统一战线的特点。学委会应吸收有地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参加，除党的机密外，一般带重要性的问题，应在学委会讨论，并经常与党外人士商量。（四）各部门必须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学习。（五）对坦白分子应根据自觉自愿原则，防止任何形式的“逼供信”的做法。（六）选择与培养典型，组织示范是坦白运动的有效方法之一。典型报告之后，应即普遍掀起坦白热潮。

究仿行。请各中央局阅后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山西省直属机关审干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1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

兹将山西省直属机关六月七日审干情况的报告[1]发给你们，这是一个极好的经验，请你们仿行。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6月18日转报的山西省直属机关一周审干情况报告。报告谈到山西省直机关审干运动的几点经验：一、加强对小组长的具体领导，更多地了解小组长的疑难问题，帮助小组长做好每个人的思想工作。二、放手使用积极分子，在实际工作中进行培养与锻炼。对积极分子的条件要求不能过高。对积极分子除思想教育外，必须经常分配给他们适当的工作。通过他们联系一批新干部，打破领导上的闭塞情况。三、选择坦白较好的作典型报告，并让大家来评判其彻底与否，这样做对大家的启发作用大。

关于抓紧镇反和清理工作致陈毅[1]电

（1951年6月19日）

陈毅同志：

看了几个你们属下的镇反工作报告及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证明华东军区系统内的镇反和清理工作，业已活跃起来了，甚好甚慰。望你抓紧这个问题，贯彻到底，务达纯洁内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惟各单位的报告和你们对这些报告的批示，发给我们备案即可，不必要求我们每件再作指示，以免延迟时间。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在胡乔木[1]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中几处提法的请示信上的批语[2]

（1951年6月21日）

主席：

“三十年”[3]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一张一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一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十二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括号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是毛泽东的批语。

[3] 即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

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这样好。）

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十三人，惟李达说是十二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是十二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二十一日

请苏联提供六十个师装备并在六个月内运至中国[1]

（1951年6月21日）

菲利波夫[2]同志：

（一）高岗[3]同志回来传达你的各项意见，我认为都是正确的，应当这样做。其中，关于种植橡胶树的问题，我们准备立即开始筹划，希望苏联政府派遣代表来帮助我们进行这项筹划。

（二）我军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曾由高岗同志向你请求六十个师的装备，已蒙允诺。这是我军在朝鲜战场今年内至低的要求。据高岗同志回称，你认为我们的要求对于每个师的装备还不够强，提议每师须配备坦克，增加炮火。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帝国主义作战所必需的，我已电徐向前[4]同志完全照你们的意见具体商谈。

（三）据徐向前来电称，他已与苏总参谋部初步商谈，认为六十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徐向前，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

个师照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今年只能运来十六个师（内含朝鲜三个师），其余四十四个师须待明年至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样就使得朝鲜战场的需要与时间发生矛盾。

（四）为适应朝鲜战场的急需，我请你考虑照高岗交给徐向前办理的订货单，将六十个师的步兵武器及各种火炮、坦克、飞机、汽车及汽车零件和各种汽油药品等武器和器材，能于今年七月间开始，到今年年底运完，每月运六分之一，使朝鲜战场各师团暂照现行编制得到补充，以利战局。

（五）如能照我们的订单将武器于今年全部运来的话，按照苏总参谋部所提新编制的标准尚不足的武器，可于明年继续运来。同时，我们亦可根据运输武器的状况陆续抽调若干师团进行改编，逐渐地使六十个师按新编制装备起来。

（六）由于我们的订单的提出迟缓了三个月，误事甚大，而今天我又突然向你提出这样大的数目和在六个月内运到中国的要求，这会使你感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运输的问题不知能否做到？

请你按照可能的条件办理就好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现代化的骨干[1]

（1951年6月21日）

徐向前同志：

六月十六日及十九日的来电均收到了，所提各问题分答如下：

（一）高岗[2]同志交给你办理的军事订单是朝鲜战场今年内所必需的和至低的要求，因为朝鲜战场敌人各种火力的强大，使我军各种武器的损坏和损失甚大，不断需要补充，加上自参战以来到今年底，我们动员了一百一十万新兵，这些新兵都需要武器训练和带上武器上前线，这是与过去国内战争大不相同的。因此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请求苏联政府将订单中各种武器能于七月开始分批运来，每月运六分之一，年底运完，使朝鲜战场我军能暂照现行编制不断得到补充。

（二）苏总参谋部所提的编制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具体编制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给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的电报。此电同时发给斯大林。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可由张清化[1]送回再予以研究。唯在进行改编时，必须适合朝鲜战场的要求，照你的来电称今年只能来十三个师的装备，其余须待明后年才能陆续运到，这就使朝鲜战场上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故我已电菲利波夫[2]同志，请求他考虑将订单中的各种武器和器材按时运来，如（一）项所述。至于按照苏方所提编制的标准尚不足的武器则可于明年陆续运来。视武器运输的状况陆续抽调若干师团进行改编，逐步完成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此点望与苏总参谋部切实商讨。

（三）我们订货的目的既如上述（朝鲜战场的急需）则与我兵工生产毫无矛盾。你们代表团关于兵工生产问题继续商谈时可按苏总参谋部提出的编制意见作为根据，唯六十个师的新编制和装备，可能成为我军首先现代化的骨干，而我整个国防军原拟定为一百八十个师，因之我们的兵工生产是为装备这样一个数目的，并应当于三年到五年内完成之。

（四）当然，我们的要求能否办到，要按照运输的可能条件。这点苏联同志会切实计算的。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

[1] 张清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1951年5月25日，徐向前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即赴苏联访问。图为毛泽东在为徐向前饯行。

给李烛尘[1]的信

（1951 年 6 月 23 日）

烛尘先生：

六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您的提议[2]很好。惟时机值得考虑，似以等待一个时期再去进行为宜。此复，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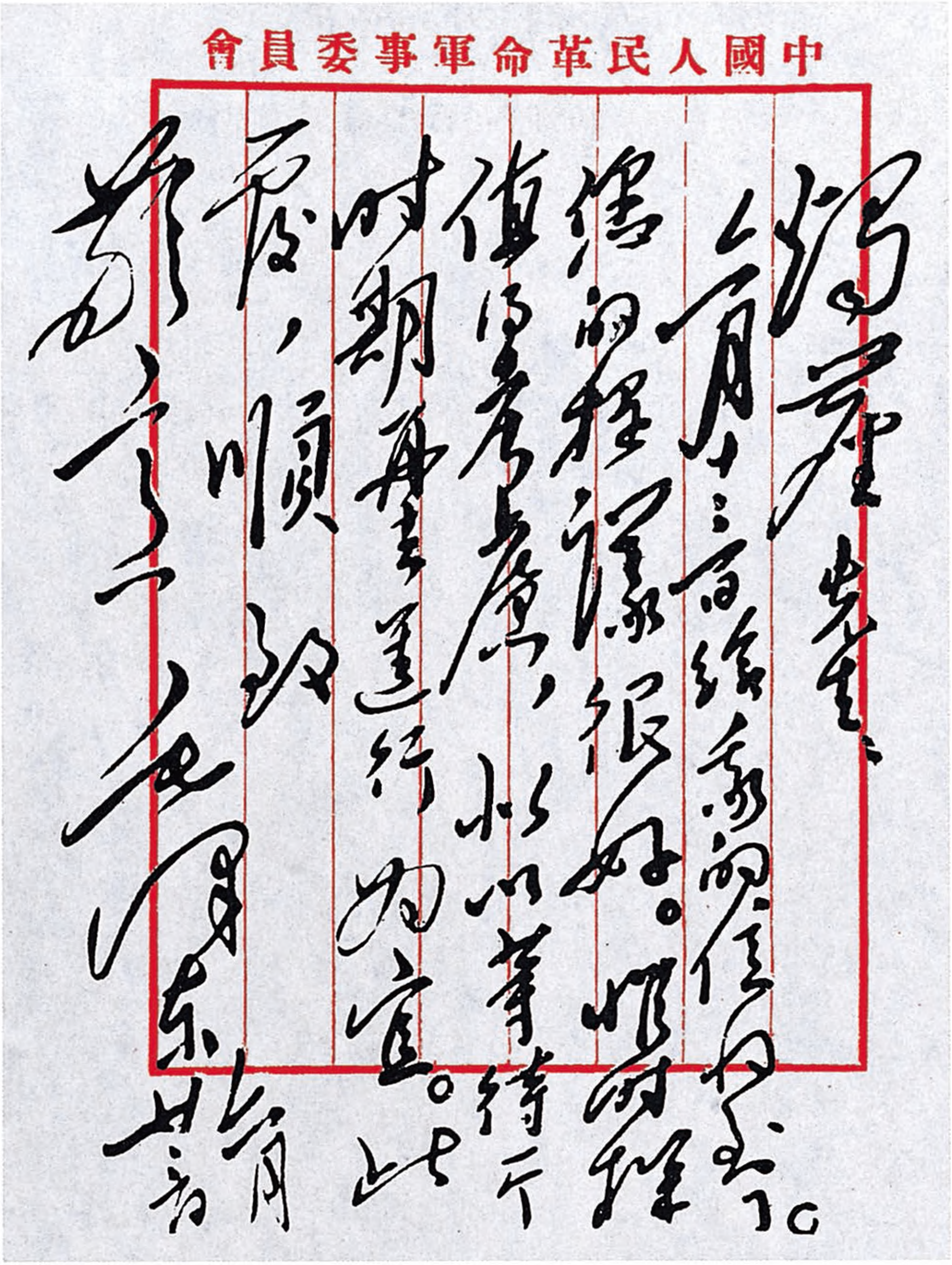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2] 指李烛尘在 1951 年 6 月 13 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过去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人士开展对台湾的宣传活动的建议。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烛尘先生：

六月三日给我的信收到。您的提议很好，非常值得考虑，似以等待行时期再予进行为宜。此覆，顺致

敬礼！

毛泽东

六月廿日

毛泽东致李烛尘信的手稿。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6月23日）

介侯兄：

李君[1]有空军技术，可持此信去空军领导机关试行接洽，看可以收录否？因我不明李君的政治经历，要他自己向空军部门去说明一切。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

[1] 李君，指李启炽，湖南韶山市杨林乡纯和村人。曾到美国学习飞行，1948年脱离国民党空军回乡。李介侯在1951年6月18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李启炽有“空军技术”，请“给予学习机会”。

空军应抓紧做好参战准备[1]

（1951年6月24日、27日）

一

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同志：

六月二十三日你们给我的报告收到了。我同意你们这个计划。望你们按此计划进行切实的准备工作，以便九月实行作战，是为至要。

毛泽东

六月二十四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的电报。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6月27日报告的批语。

二

同意[1]，请即抓紧办理。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七日

---

[1] 聂荣臻的报告说：“关于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今日下午召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谋长王秉璋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李涛等同志研究后，特请示如下：（一）现在空军参战部队由五个师增至十一个师后，必须提出紧急订货，拟由空军派一负责同志到莫斯科专办此事，不然空军出动即无保证。（二）原平壤以北为友方（苏联）所修的四个机场，尚差四十二万三千工。现第六十七军第二〇一师要归建，除已令第五十军第一五〇师于二十五日出发接替外，为了争取时间（一个师须四十五天方能完工），拟令现在安东的第五十军军部带第一四九师前往加强，争取七月份完工；安东地区防务则由东北军区负责调整。在我空军增加六个师参战的情况下，平壤及其以南的喷气式机场已不够用，必须增修二至三个机场才行。建议用周总理名义电金首相解决。”

中央转发罗瑞卿[1]关于犯人参加生产建设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并告中财委及中公部：

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六月二十四日的报告[2]，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按此报告所提处理犯人参加生产的办法办理，并迅速执行为要。

中央

六月二十五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1年6月24日关于劳改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劳改会议决定的犯人参加水利、铁路、公路等生产建设的办法。

中央转发华北局镇反工作指示的批语

（1951年6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完全同意华北局六月二十四日给各省的指示[1]，请你们注意此项问题，并照华北的办法处理之。

中央

六月二十五日

---

[1]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给各省委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其根本原因，一是传达不深入，简单从事。二是一部分党的领导机关不重视中央公安会议的决议，也不审慎地研究当地当时具体情况，盲目办事。如有的县本来已决定杀掉而又完全应该杀的人，也因收缩杀人权而停止下来。为纠正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上述偏向，各级党委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第三次公安会议的决议，有计划地召开各种会议传达、讲解公安会议的精神，务使家喻户晓，人人明白，以鼓舞广大群众镇反的信心和勇气，巩固并发展镇反成果。同时由于各县区镇反工作发展不平衡，各级党委必须组织力量，一个县、一个区、一个村地去具体检查，具体研究。检查的最好方法就是召开各级的代表会议。

在符定一来信[1]上的批语

（1951年6月26日）

请齐燕铭[2]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

[1] 符定一，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长，毛泽东在那里读过书。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的筹备情况并催促批准成立，以解决一些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还提出如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

[2]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请会商朝鲜和平谈判准备问题[1]

（1951年6月29日）

金日成同志，并告彭德怀[2]同志：

六月二十九日的电报收到了。

我认为一方面，人民军和志愿军应当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乘机获逞。另方面，你们两人应当马上会商一次，就和平谈判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并以你们考虑的意见和谈判代表的人选告我。至于假如李奇微[3]提出要求谈判的时候如何回答的问题，可在李奇微提出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

兹将葛罗米柯[4]同志与美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发给你们，请加研究。

毛泽东

六月二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 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1951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朝鲜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内阁首相金日成。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等问题

（1951年6月29日）

菲利波夫[1]同志：

（一）您在六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二十八日给我的两次电报均收到了。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第一，关于六十个师的装备的交货时间，只应当按照苏联的生产和运输的可能条件去规定，即是说在三年内完成六十个师的订货，而在一九五一年内完成十个师的订货。第二，您提出的那个中国现代步兵师的编制表，很好，就照这个编制表办事。中国军队有了按照这个编制表装备起来的六十个步兵师，就较现在的军队要强得多了。

（二）马立克的演说[2]，使我们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取得了主动。六月二十八日，我接到了罗申[3]同志交来的关于葛罗米柯[4]同志与美

---

[1]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2]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其中提出：“苏联人民认为，维护和平的事业是可能的，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3] 罗申，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4] 葛罗米柯，当时任苏联外交部部长。

国驻苏大使寇克的谈话要点，并在文尾说：每一方只有二人参加，并且这些代表应该是各有关部队指挥部的代表而不应该是政府的代表。这样，在中国方面是以志愿部队的代表身份参加这个谈判，而不使中国以交战国身份去参加。我认为这样做是很适当的。

本日金日成[1]同志来电询问，假如李奇微[2]要求会谈，应如何答复。我已电告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3]同志，一方面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得逞；另方面，要金日成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会商一次，准备在敌人要求谈判时，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至于如何回答李奇微的问题，要待接到李奇微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您对此事有何意见？假如谈判真能举行的话，很需要您密切地指导这次谈判，以免上敌人的当。

金日成同志的电报附上，供您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

[1]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2]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时间地点等事宜[1]

（1951年6月30日）

菲利波夫[2]同志：

敌军司令官李奇微[3]，已于本日发表通知，建议在元山港内一个丹麦船上由交战双方的代表举行关于停战的会议。并称，必须有适当的保证，方能实行停战。关于此事，有几点请您考虑示复，并请您直接通知金日成[4]同志：

（一）金日成同志似应于七月二日或七月三日发表答复李奇微的通知，在此通知内说明：同意举行双方代表谈判停战的会议，并建议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代表人数。

（二）关于谈判地点，李奇微建议在元山港内。查此港是北朝鲜的设防海港，敌军正阴谋于此登陆，似不宜同意在此港开会，可否建议以三八线上的开城为会议地点。

（三）为使我方代表对于会谈内容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似宜建议以七月十五日为开会日期。

（四）因为时间迫促与会议的重要性，我建议，请您直接与金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3]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4]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成同志通讯，密切地指导此次会议，同时将您的意见告知我们就行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十四时

停战谈判代表以朝鲜人民军为主[1]

（1951年6月30日）

金日成同志，并彭德怀[2]同志：

（一）本日我给菲利波夫[3]同志电报一份，兹同时发给你们参阅，大约明天（七月一号）可能得到菲利波夫同志的复电。（二）请你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的资格，准备于七月二日或三日发表一个回答李奇微[4]的声明。（三）因为时间紧迫和会议的重要性，我已要求菲利波夫同志直接和你通讯，密切指导此次会议，请你也经常和菲利波夫同志联络，有问题时直接向他请示。（四）此次谈判，是以你的代表为主，中国志愿军的代表为辅，因此请你对于为了使此次谈判获得较良结果的各项内容和方法加以考虑和准备。（五）你和彭德怀同志会谈的时间，可在对李奇微的通知发表回答以后，择定一天举行。我这里准备派我们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5]同志及其助手，于七月二日由北京动身，七月五日可到彭德怀同志那里，和你及彭商量并帮助此次谈判事宜。他是在内部帮助你们的，不公开出面。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4]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远东军总司令。

[5]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六）你的意见盼告。

毛泽东

六月三十日下午五时

在审阅杨耳[1]《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稿时加写的几段文字

（1951年6月）

一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被那些举人、进士们掌握的学堂也决不会容许真正的穷孩子插足进去。武训的“义”学，其实是不义之学。钱是残酷地括来的。一是强要来的，武训是一个以吃五毒威胁善良人民逼其出钱的恶丐；二是放高利贷（利息三分）；三是倚仗官势募捐。这三种钱的来源都是不正当的。所办之学，并不是所谓为了“穷孩子”，“为穷孩子”只是一句空话，实际是为富孩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会相信武训的“义”学里好像真有一群“穷孩子”在那里跳来跳去似的。

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

---

[1] 杨耳，即许立群，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根本问题了。

二

武训只是在他未提出“义”学口号以前受过苦，自从他提出“义”学这个漂亮动人的口号以后，他就一天一天被人尊敬，直至变为反动政府的宠儿，他就越行乞越有劲，一点也没有什么苦了。[1]

三

你看，武训装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会的尊卑秩序。他越装得像，就越能获得些举人进士的欢心，他就越有名声。他已经很富了，还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声，也就越富。武训是一个富有机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只有那些天真得透顶的人们才被他骗过。旧的反动著作家则将武训的骗术有意描写为“美谈”，武训的“我乞者不敢与师抗礼也”这件事，在“清史稿”武训传中也是大书特书的。

---

[1] 杨耳的文章中谈到，“穷人不识字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不是从争取到穷孩子能够读书的社会基本条件入手，而是以武训那样的‘苦行’，磕头讨钱去兴办‘义’学”。毛泽东审阅此稿时，在“苦行”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段文字。

对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总结部署镇反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6月）

一

在报告[1]说到“土改斗争、反霸、退租、退押斗争中逮捕地主恶霸的批准权是否要作另外的规定”处，毛泽东写有：（土改中逮捕地主恶霸的批准权应照今年春季土改时的办法去做——毛注）

二

在报告说到“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十年以上徒刑的犯人，均须进行室内劳改，不得置于室外”处，毛泽东写有：（此条请各地斟酌办理，如有良好管理，有些这类犯人亦可置于室外——毛注）

---

[1] 指中共江西省委1951年6月8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总结部署镇反工作等情况给区党委，南昌市委，各地委，并报中南局、中央，毛泽东的报告。

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1]

（1951 年 6 月）

在目前，多打小规模的歼灭仗，削弱敌人，降低敌人士气，逐渐地进行打大规模的歼灭仗。只要我各级指挥员精心研究情况，很好地布置兵力，组织炮火，每个军一次求得歼灭敌人一两个建制连到一个建制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并且在目前敌人冒进情况下，是最有利于我捕歼敌人的机会。

---

[1] 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1951 年 5 月 31 日 15 时下达各部队并报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关于阻击战的指示中转述的毛泽东的一段话。毛泽东在阅看这个指示并把它转发给斯大林时，对这段话作了修改。

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的第二阶段作战方针

（1951 年 6 月）

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1951年7月1日，毛泽东和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庆祝建党三十周年大会上。

1951年7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1951年7月1日，毛泽东和物理学家钱三强等在庆祝七一酒会上。

关于准备和谈会议有关问题致彭德怀[1]电

（1951年7月2日）

彭德怀同志，并金日成同志及高岗[2]同志：

（一）同意彭留在联司[3]主持作战及七月十日的干部会议，不去平壤开会。（二）同意邓华[4]同志代表彭出席和谈会议，请邓即日动身去平壤，务于四日晚上或五日晚上，到达金日成同志那里，彭对和谈的意见即告邓华带去。（三）李克农[5]率乔冠华[6]及其他助手，于七月二日廿二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7]，于七月四日傍晚由安东动身去平壤（不去联司），大约于五日早上，或五日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那里，和金日成同志及出席和谈的代表们（人民军的和志愿军的）会商有关和谈会议的一切问题，请金日成同志派人于适当地点接引他们。（四）请彭德怀同志命令位于开城地区的军队负责首长迅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联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

[4]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5]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6] 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

[7] 安东，即今丹东市。

速布置在开城开和谈会议的房屋（如果没有房屋就须使用帐篷）用具和食品等项，布置可靠的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敌方代表团的宿舍（可能有几十人，包括新闻记者），我方代表团的宿舍及开会的会场，均须布置得妥当一点。此外，还须为李克农、乔冠华等布置一所宿舍（距会场一二公里）。为此，请联司派一懂事的有能力的负责干部即去开城地区指挥上述布置事宜。开城情况如何，望速查告。

毛泽东

七月二日上午四时

停战谈判期间军事上应采取的对策

（1951年7月2日）

德怀、高岗[1]同志，并金日成[2]同志：

在和敌方代表准备谈判及实行谈判期间，大约有十天到十四天，请你们严格和充分地注意下列各点：（一）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高岗同志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尽这十天内外运入北朝鲜境内。必须准备着一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人员和物资就不能运输和调动了。（二）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三）杨成武[3]两个军及五十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三十八、三十九及四十二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四）请你们设想在停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人民军最高指挥官。

[3] 杨成武（1914—2004），福建长汀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战协定成立以后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并预筹对策。

毛泽东

七月二日二十四时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我方应提出的条款[1]

（1951年7月3日）

菲利波夫[2]同志：

关于敌我双方军事代表会谈时我方应提出的条款，我们认为主要有五条，即：

（一）“双方协议同时发布停火命令。双方海陆空军自停火令发布时起，在朝鲜全境实行停火及停止其他敌对活动。”此条敌方可能无异议。

（二）“双方陆海空军各自三八线撤离十英里，在三八线以南及以北各十英里的地区，成立非武装区。该非武装区之民事行政，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之状况，在三八线以北由朝鲜人民政府管辖，在三八线以南，由南朝鲜政府管辖。”此条敌方可提出某些异议，但我们这样提，是很公道的，敌方难于批评。

（三）“双方停止运输（包括陆运、空运、海运）军火、军队或补充部队，由朝鲜境外到朝鲜境内去以及由朝鲜境内运输到第一线部队中去。”估计敌方可能提出此项条文，故我方似应主动提出，或者此条的后一句不要。

（四）“设立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由双方各推荐未参加朝鲜战争

---

[1] 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

[2] 菲利波夫，即斯大林。

之国家之同等人数之代表组成之，负责监督第一、二、三条各项之执行。”估计敌方可能提出类似条文，故我方主动提出此条。但实行此条将会招致许多麻烦，敌方推荐的“监督委员”将在中朝国境线及北朝鲜的各交通要站检查我军的运输车辆。或者我方不主动提出此条，待敌方提出时再由我方接受之。究以何者为宜，请你酌定。根本拒绝设立监督机关，似不适宜。

（五）“双方释放战俘。在停战后四个月内，由双方各将对方战俘全部分批交换释放之。”敌方可能提出一个换一个，我方则应要求释放全部战俘。唯敌方俘虏北朝鲜人较多，并已补入南朝鲜部队内，此事可能引起争议。

以上是我们想到的在双方军事代表会谈中应当解决的根本的五条。此外，尚有：（一）“一切外国军队，包括中国志愿军在内，限期（例如在三个月至四个月内）分批自南北朝鲜撤退完毕。”这亦是很重要的一条。唯敌方代表可能认为此事属于政治范围，不应在此次会议中解决。请你考虑我方应否将此条提出。（二）“南北朝鲜双方的难民限期（例如在几个月内）遣回原地。”金日成[1]同志希望提出此条。但此事实行颇为烦难，南北朝鲜的代表可能在此问题上发生许多争论，以致影响到其他主要问题的决定。或者可以提出去，在争论不决时则将它推到将来的政治性的国际会议上去讨论。

以上各点，请将您的意见告我。

此外，我们已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2]同志率助手们于昨夜动身去朝鲜，约七月五日可到金日成同志处，和金等会商有关和谈各事，然后去开城附近，从幕后主持这次谈判。

---

[1]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附上金日成同志的意见，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

关于共同筹备谈判会场及开会事宜致金日成电

（1951 年 7 月 4 日）

金日成同志，并告彭德怀[1]同志：

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请你派出一位负责同志，随带若干工作人员及必要物品速去开城地区会同联司[2]参谋长解方同志筹备会场及开会事宜。如该地无房屋，就须带帐篷去。双方会议人员所需物品及会场设备，均须带去。一切均须于七月八日以前准备完毕。

毛泽东
七月四日上午四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联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司令部。

关于保障开城地区的安全致彭德怀[1]电

（1951年7月4日）

彭：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2]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毛泽东

七月四日上午四时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关于速去开城准备停战谈判事宜致金日成等电

（1951年7月4日）

金日成同志，并李克农、乔冠华[1]同志：

（一）金于七月四日十三时的电报，李乔于七月四日十二时由安东[2]发来的报告均收到了。（二）李乔及邓华[3]均可于七月五日拂晓到金处，请金召集李乔邓及南日、金昌满、金波、柴军武[4]等立即会商一次，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应于七月五日傍晚即由平壤出发于六日早上或晚上到开城地区准备各项事宜，早一点去较好。（三）如果你们同意早去，则给李奇微[5]的第二个通知就不要发了。但如果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

[2] 安东，即今丹东市。

[3]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4] 南日，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代表。金昌满，当时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动员局局长、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联络官。金波，应为金一波，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联络官。柴军武，又名柴成文，当时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5]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你们认为于七日上午我们仍有必要派若干人利用白天乘车去开城帮助会议工作则那个通知仍可于六日上午发表。究竟是否发表那个通知，请金于明（五）日再给我一电。但李乔南邓金金柴等同志，最好于五日夜车即去开城，愈早愈好。

毛泽东
七月四日二十一时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统战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7月6日）

此件[1]很好，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并请仿照办理，加强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中央

七月六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1年7月5日关于市委统战部召开统战工作会议情况给中央、华北局并报中央、华北局统战部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的收获，主要有：1. 使干部认识了在新环境下各界民主人士的积极作用和进步的可能性，并批判了以往存在着的对他们估计不足，武断片面肯定他们落后不会进步的错误思想。2. 纠正了对各界民主人士不敢领导和怕麻烦的思想。3. 解决了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一些思想问题，进一步了解了民主党派的性质、历史、作用和前途。4. 检讨了过去对统战工作不重视或认为统战工作只是统战部与少数领导同志的事的思想，明确了今后工作的任务，增强了对统战工作的信心。

关于纪念武训的学校、碑文和建筑等处理办法的批语[1]

（1951年7月7日）

可予同意。但应着重教育解释，其余可以从容处理。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1951年7月2日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上。华北局宣传部的报告中说："河北省委对现有武训纪念物提出了处理意见，向华北局请示。我们意见，首先对群众广泛进行教育，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然后再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一）凡私立武训学校（如北京武训小学），在对武训及电影《武训传》讨论渐趋成熟时，由他们自己提出更名和改组，我们同意批准，仍为私立学校。凡公立的武训学校（如平原武训师范），在教职员学生思想澄清后，更改校名。（按已改省立堂邑师范）（二）关于纪念武训的碑文、建筑等物，教育群众认清武训以后，由群众自觉地拆除。石刻、塑像、柱、碑要拔除，画像要涂抹，武训纪念林要改名，但武训墓和墓碑，我们认为应当保留。"

空军部队不要进驻朝鲜北部机场[1]

（1951年7月7日）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2]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1年7月3日报告的批语。

[2] 刘亚楼等的报告说：“估计到朝鲜战场最近可能出现停火局面这一情况，我们考虑是否需要在宣布停火前，以一部空军部队进驻北朝鲜各机场。如果认为可以而且需要以一部空军部队进驻北朝鲜机场，则提议立即开始进行准备工作。”

停战谈判不要提赔偿等问题[1]

（1951年7月9日）

金日成同志、李克农同志，并彭德怀同志：

（一）不要提赔偿问题，因为这样提出，一则可使英、法、美团结起来而不能孤立美国；二则美国可以发救济费的办法来作答复，而北朝鲜是不能接受美国的救济费的。

（二）如果金日成同志认为交换难民对北朝鲜不利，则可将南北朝鲜交换难民一项条文取消不要提出，但应准备南朝鲜提出此项问题时的对策。

（三）第二条中关于非武装区的民政事宜，同意写至“恢复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前的状态”为止，以下两句可删去。

（四）不必提出“禁止转交武器”的条件。

（五）同意增加解方[2]为代表。朝中两方的代表均应用真姓名，不要用假名。并须于本日（七月九日）发表公报，叙述人民军和志愿军的代表的官阶和姓名，请克农即刻起草发金及我。

毛泽东

七月九日上午一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解方，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对总政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指示稿的批语和改写的话[1]

（1951年7月9日）

一

作了一些修改，可即发出。

毛泽东
七月九日

二

我前方部队，必须鼓励士气，继续英勇作战，千万不可有丝毫的松懈，不要作此次可以和下来的打算，而应作此次和不下来、还须继续打、还须给敌人以大量的消耗和歼灭，然后才能和下来的打算。只有我们作了此种打算，才于争取最后胜利有益处，否则是没有益处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纪念建军二十四周年的指示稿上的批语和加写的一段文字。

关于对南日、邓华[1]两个发言稿的意见致李克农[2]电

（1951年7月9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3]：

七月八日廿三时电收到。（一）公报稿[4]可用，已予发表。（二）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5]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

---

[1] 南日，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首席代表。邓华，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3]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4] 指李克农发来的关于朝中方面联络官已到开城地区，为在开城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会议进行布置、准备的报道稿。毛泽东据此改写为朝鲜中央通讯社的电讯稿，并指示胡乔木：“即刻用英语广播，不必登报。”

[5] 指南日、邓华分别准备在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这两个发言稿于1951年7月1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毛泽东
七月九日十二时

1951 年 7 月 10 日，朝鲜停战谈判正式开始。图为朝鲜停战谈判的地方开城。

关于坚持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列入议程等致李克农[1]电

（1951年7月11日）

克农同志，并告金、彭[2]：

来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完全协议以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上午七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在薄一波[1]关于傅作义[2]情况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7月11日）

一波同志：

同意你的意见[3]。请妥慎处理，团结傅及其一切可以团结的干部，并加强对这些干部的教育。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2] 傅作义，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1月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部长。

[3] 薄一波1951年7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傅作义曾提出，在整风中是否要把他的历史问题向大家谈一下，薄告以不需要。

同意步兵师新编制[1]

（1951 年 7 月 11 日）

同意。[2]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7月11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经召集有关部门对友方（苏联）为我军拟订之1.3万人一个师的新编制进行过3次讨论，均赞成这个新编制，认为只有实行这个编制方案，才能使我军真正走向现代化，改变我们现在人多武器少、火力弱的现状。根据朝鲜战场作战经验，我军虽然英勇作战予敌重大打击，但如无现代化编制装备的部队，是难以完成歼灭战的任务的。实行这个编制，对我军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革，一定会有很多困难，但必须坚决实行。

对《武训历史调查记》的修改[1]和给胡乔木[2]的信

（1951年7月）

一

武训的歌颂者曾经指摘人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错误”地把“今天的尺度”去“衡量历史上的人物”；并且说，武训受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思想和行动的。经过人们指出武训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正是太平天国和北方捻军的农民大革命时代以后，某些歌颂武训的人们还是不甚心悦诚服，理由是那些革命军究竟不是起于武训家乡的，虽在武训家乡打过仗，总是外地人，其没有引起武训注意，还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的调查发现了武训家乡的革命军。他们不是太平军，也不

---

[1] 1951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并组织了一个13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20多天的调查。《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根据这次调查的材料由几个人起草、经毛泽东阅改而成的。调查记分作五个部分：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二、武训的为人；三、武训学校的性质；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五、武训的土地剥削。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是捻军，而是和捻军有联系的武训家乡的地方性的农民革命军。这种事实，使我们能够提供一个“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一些“历史上的人物”，作为大家判断的根据。有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答复：究竟是谁“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批判武训、蔑视武训的人们呢，还是宣传武训、歌颂武训的人们呢？

二

武训和宋景诗是势不两立的敌对者，武训和杨鸣谦[1]或杨树坊[2]才是“一文一武”一鼻孔出气的血缘亲属。非常合理，武训和杨鸣谦一同受到了满清王朝褒奖，武训被赐与“乐善好施”奖语，死后宣付国史馆立传。杨鸣谦死后受封为“銮仪卫”，“建立专祠，春秋公祭”，他的后代也获得“世袭云骑尉”的封号。他们不愧为替反动统治者服务，帮助满清王朝，对革命人民执行所谓剿抚兼施政策的两匹忠实的走狗！

三

武训宣传者们高兴歌颂武训的“孝行”和“友爱”，这事我们也作了调查。和这种歌颂相反，武训是一个不孝不友的人。为了不务正业，当流氓，武训早和他的家庭闹翻了。为了变卖地产，又曾和他哥哥大闹。七十九岁的郭继武说：“他娘他哥都没沾他的光，他娘

---

[1] 杨鸣谦，曾是柳林县民团团长，参加了镇压黑旗军的作战。

[2] 杨树坊，杨鸣谦的侄子，继杨鸣谦任柳林县民团团长。

死的时候还不是像一条狗一样。”有人说他娘死了他哥叫他回去发丧，他说没有“哭钱”不去，在武训正患财迷病的时候，这可能是事实。群众说，武训把要来的干粮拿去卖给人家喂牲口，却不愿给他的母亲和哥哥吃一口，他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四

武茂林是武训的远房侄孙，一生帮助武训干所谓行乞兴学，结果被杨树坊逼死。武鲁林是武谦的孙子，武克信的儿子，在武训晚年过继武训为孙，被杨家控以“抗不交学租”，县官捉去拷打重伤，放出来，第二天就死了。我们在前面说过武训不顾家，这是他少年和中年的事。到他老年，大约是对杨树坊控制过严不满，同时社会舆论也对他不满，还是请求杨家允许拨出了四十余亩地以作武家祭田的名义交给武鲁林的父亲武克信耕种，同时以每年交租钱十串给学校的条件满足了杨家。此事曾在官厅立了案（见《兴学始末记》，说是四十亩，武金兴告诉我们是四十余亩）。但杨家后来硬夺回去，否认祭田，肯定是学田，派武鲁林送重租，武鲁林出不起，发生争讼，因此人被活活打死，地被夺去。这就是武家“两条人命”的公案。群众对于此事一概同情武家。当武金兴向我们说到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和他都感觉难过。武金兴沉痛地说：“我们和杨家有仇！”

五

光绪十四年以后武训在堂邑方面所增加的财产是他的私产，并未捐入学校。许谨传就是替武训管理这部分私产的一个人。在武训

死后，许谨传的长子许功珏，曾被杨家以“抗不交学租”的罪名关进牢里过。根据这一点，就可知道武训生前没有交出的私产，凡是被地主们知道了的，在武训死后都被地主们以学田名义夺去了。武茂林手中也很可能有这种性质的财产。武训在光绪十四年以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分未交出而由武茂林管着，武茂林之死可能也和这点有关，不过我们未找到确实证据。

许谨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兴学始末记》所载靳鹗秋的呈文里有一段说：“赵郎砦、王二大砦等村，旧有善书会一道（原文如此，疑有误——笔者），武训捐助京钱二百余吊，每年所有零捐不在其内，许谨传等欲为武训立碑，武训不许。每年齐社一次，武训不论有何事故，必亲身到社，并遍阅每年所印善书簿记。又自取各善书若干卷随身携带，到处施放”。这个“善书会一道”看来像是个会门组织，许谨传是个头儿。武训则因出了许多钱，成了这组织的大头儿。由此可知，许谨传也是一个拥护武训那一套，并帮助武训工作的人，是武训的亲信人物之一。他很有些像武茂林，不过他干的是“善书”，不是“兴学”罢了。

六

于殿元诉状中所说的赵一琴，是当时临清的有声望的大绅士，是个举人。武训和于殿元“结拜生死之交”，要赵一琴主盟，赵一琴也肯出面为他们主盟，我们判断是和争夺临清学校管理权一事有关的。武训愿意赵一琴一派辅导于殿元在他死后接管这个学校，而不愿意靳鹗秋一派管这个学校。故靳鹗秋方面的人也不能否认武于结

盟赵为主盟一事，而只能说“巧与结盟”。

七

根据上述各种材料，使我们了解武训是一个在鲁西许多县里的流氓群中有势力的流氓头子，他与鲁西数县的地主特别是大绅士大恶霸相勾结，与县城府城省城的大小官员相勾结，使自己成为大债主、大地主和大名人。武训就是这样一个在流氓、地主、官僚三种集团中极为活跃，因而脱离一切劳动人民，并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的特殊人物。武训及其流氓兄弟们和地主阶级有矛盾，但在他生前这种矛盾还没有表面化，主要靠了官僚尤其省城官僚方面的维持。武训一死，他的学校先后瓦解，财产被地主霸占侵蚀，他的亲信都被打击。当地群众对于武训是嫌恶的，但对于受打击最惨的他的代理人，例如武茂林，则是寄与同情的。武训的始终不变的形象是行乞，武训和一切普通乞丐或流氓不同的特点是兴学。而这两点（行乞和兴学）互相结合在一起，就为一切时期的反动统治者所喜爱，而为之尽力宣扬。某些思想错误的人们也喜爱这样一个人物，而为之尽力宣扬。这样，就迷惑了许多天真的头脑简单的人们。因此，揭露武训和武训宣传者的真相，就成了必要的工作。

八

在武训死后，在鲁西及别地出现了一批吃武训饭的人。其中一人是临清的号称“武训第二”的王丕显，是一个借兴学发财的学

棍，这里不来详说。另一人是堂邑的武金栋。武金栋，堂邑武庄人，是武训的疏族，现年七十八岁，他就是现存的一个活武训。他在武训死后一意学武训，见有钱人就磕头，低眉顺眼，出口成词，到处募捐，很积了一笔钱。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到过南京，为国民党所赏识，捧为法宝。他和我们见面，还是口中念念有词。他对群众的态度很坏，当地群众很不满意他，在土地改革时把他当作了斗争的对象。我们找他谈话，柳林镇的群众很感诧异。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群众指着说："为啥这家伙又来了！"

九

根据要能作"满篇"八股文章的才能入学这一点看来，"崇贤义塾"的学生入学资格是很高的。因此，教师的资格也很高，须要进士、举人或拔贡才行。

十

"崇贤义塾"在一八九五年，即在该塾经班开办之后第八年，亦即武训死的前一年，才设立蒙班，四年以后，即一八九八年以后，这种蒙班就废止了。武训及和他合作的地主们对于设立这种程度较低的蒙班是不感兴趣的。武训及其合作者杨树坊之所以在这四年内开办了蒙班，是因为柳林镇上的商人们表示不满，他们的子弟不能上学，武训和杨树坊才勉强办了个蒙班，敷衍他们一下。在学生的成分方面，经过我们调查，不但经班学生中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也没有，就是蒙班学生中贫苦农民的子弟也很少。

十一

在经济方面，杨树坊想打武训财产的主意。武训这时单在堂邑方面，已集了很大一笔财产，计七千多吊，“义学”一办成就不得不受杨树坊的控制。所以此时杨树坊叫武训办“义学”，武训虽欲不办也不可能了。武训一死，杨家将学校霸为私产，专在财产的掠夺上做文章，学校学生有时少到只有几个人，后来有几年率性停办，毫无意于什么义学不义学，就证明了这点。以上是学校所以办成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时地主阶级也有教育自己子弟的必要。他们利用武训的债利、地租和捐款，就可以为他们的子孙建立一所学校，何乐而不为。《兴学始末记》中说：“堂邑、馆陶与临郡接境，自咸丰甲寅兵燹后，贫家不能读书者较之他郡尤多”（第三十六页）。这里所指的“兵燹”，就是一八五四年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曾经攻克过这一带好些县城。这里所指的“贫家”，就是地主阶级自己。这样，一方面杨树坊等地主阶级需要办学校，一方面武训已骑在老虎背上，打了三十年招牌，积了七千吊款子，也逼得不能不办，因此武训就替地主阶级，并在地主阶级主持下，办起学校来了。

十二

劳动人民的叛徒、大流氓、大债主兼大地主的武训，依靠封建统治的势力，剥削、敲诈劳动人民的财富，替地主和商人办成三所学校，这种情形，是合乎封建制度的规律的。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是地主阶级掌握主要的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有政权，有军队，保护这种生产关系。因而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

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才有这种可能。在中国的解放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全中国，就有这种可能了。武训生在满清时代，他甘心为地主阶级服务，以“为贫寒”的口号欺骗农民，而实际上为地主和商人办成了三所学校，这是合乎封建社会的规律的。

十三

我们将武训学校的调查集中在柳林镇，将武训高利贷的调查集中在临清镇。这是因为武训的学校，柳林是典型，而武训的高利贷，则临清是典型。

十四

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我们见到的七十四张文约内，有三十八张，都是三亩以下的数字；十亩以上的，只有五张。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

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三十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十五

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们也应当觉醒了*。

十六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十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关于同苏联谈判订购军事装备和兵工建设问题[1]

（1951年7月12日）

向前同志：

七月七日电悉。

一、关于编制问题，经军委研究后，同意苏方所提出之方案，并决定按此编制进行装备六十个师，只有个别单位的人员须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予以若干增减。

二、六十个师的装备，除两种迫击炮，七六山炮，四五战防炮，马匹、大车及通信器材均由我们自己装备不要苏联供给，餐车、面包炉只要十个师的以外，其他所有装备器材包括工兵、化学器材在内，均请苏方按照编制规定供给我们。弹药基数请其改为五个。

三、兵工生产问题，同意以苏联现有武器弹药器材为标准，统一口径，统一制式，现除请苏方派遣专家设计综合组来中国了解我们现有兵工工厂的情况，提出改装计划外，请你们在莫斯科将我们各兵工厂的现状材料告诉苏方，以便他们易于考虑改装与新建我国兵工生产的方案。同时，在商谈时应将新建工厂与改装原厂的计划

---

[1] 这是毛泽东给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正在苏联访问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的电报。这个电报由有关部门起草，经周恩来审改、毛泽东审定后发出。

结合起来，将供应目前的需要与供应将来的需要结合起来，并望随时将今后兵工建设的谈判情况电告。

四、谈判中几个具体问题确定如下：（一）对苏方业已答应的七种武器及其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四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二）炮的生产，一五二口径以上的重炮厂可以提出，但目前炮厂建设的重点应该是中小口径的炮（三七高射炮，五七战防炮，七六二野炮，八五高射炮，一二二榴弹炮）。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作最后确定。（三）光学厂的建设应向苏方提出。（四）通信器材须要苏方帮我建立一个真空管厂，与一个零件制造厂。（五）工兵器材除六十个师的装备外，战略工兵团应如何建设，亦请苏方提出意见。（六）钨与钼的精炼厂我们自己准备建设，请问苏方能否派专家代我设计，并在技术上帮我建立起来。（七）坦克装配厂，现已开始从修理厂扩大人手，可不再向苏方提出。

五、六十个师的装备及兵工建设谈妥后，应分别签订合同。兵工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六十个师的装备不能按以前的军事贷款计算，其偿还期限至少须八年后始能开始，十年还清（以前的军事贷款规定五年后即须开始偿还，八年还清）。今年十个师的装备运输计划同意苏方的意见。

六、其他详情由周恩来、聂荣臻[1]两同志函告。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

关于容许新闻记者进入开城地区问题致李克农[1]电

（1951年7月12日）

克农，并告金、彭[2]：

在谈判恢复后讨论记者问题时，我方可同意在议程问题取得完全协议后，容许双方同等数目之记者到达开城地区，但不得进入会场。记者数目须估计我方能到者。我方记者主要在前方组织，北京方面亦可组织苏波捷等国的一些记者去。估计议程还会有许多天争辩，才能取得协议，那时我方可以组织一些记者去。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廿四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中央关于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政协会议推迟召开的电报

（1951 年 7 月 12 日）

中南局，并告各中央局：

七月七日转来河南省委的电报收到了。因为朝鲜和战问题现在尚难确定，故四中全会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将推迟到八月以后，即九月或十月才能召开，你们及各省市在七、八两月，可以照常布置自己的工作。

中央

七月十二日

在胡乔木[1]关于翻译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1年7月13日）

乔木同志：

同意你的各项意见[2]。但委员会的主持人稼祥[3]既不愿担任，就由你暂时担任为好，每月召开一次会，将来再考虑用他人。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指胡乔木1951年7月10日关于党的翻译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会议讨论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的俄译、校阅问题。关于《斯大林全集》，已译成3卷，准备在5年内完成《斯大林全集》共16卷的翻译工作。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稿，拟由王稼祥、李立三、张闻天三同志校阅。提议组成党中央翻译工作委员会，由稼祥同志负责。但稼祥同志一再推辞，此事请中央决定。

[3]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他在胡乔木的报告上写了以下意见：“翻译工作委员会，由中宣部同志负责，比较便利于工作，我参加为一个委员，分配我一部分工作。”

关于拍发、广播对李奇微[1]的复文修正稿致李克农[2]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

七月十三日廿一时半来件[3]收到，待修正后发给你，你在收到修正稿以后即可发给对方。北京广播当在七月十四日二十时即下午八时左右。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一时四十五分

---

[1]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3] 指拟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发出的给李奇微的复文稿。

关于同意李奇微划中立区的提议致李克农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金、彭：

（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二）请你们立即准备在敌方代表团重来开城时注意解决下列几点：（甲）中立区的面积究以多少公里为适宜，为保障双方代表的安全，应考虑撤退当地居民问题，是否能迅速撤退（撤退时保障居民不受损害）。（乙）我方武装撤退后应否以非武装人员维持秩序。（丙）设立板门店双方联络员联合办事处问题。（三）给李奇微复文[1]已重写，另电发来。北京准备在今日下午八时才发广播。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七时

---

[1] 指李克农7月13日21时30分发来的拟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发出的给李奇微的复文稿。

关于限定谈判代表团人数和划定中立区面积问题致李克农[1]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金、彭[2]：

（一）在给李奇微的复文[3]里没有答复李奇微所提的将双方代表团的全部人员限制为一百五十人的问题，使你们留有机动的余地。如果美方代表团提出这个问题时，你们可以照你们的意见提出双方代表团工作人员各由自己规定互不干涉，但如美方坚持要规定同等人数，你们也可以同意这种规定，因为这是无关大局的。（二）在划中立区面积的问题上以能保证双方代表安全为原则。如果可以不要迁动大范围的居民则可以同意美方半径五英里的数目，否则可以划一个通板门店的走廊及一个开城附近的较小圆圈，以便只迁移小范围内的居民。究应如何，请按情况灵活决定。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十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经毛泽东重写的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于1951年7月14日给“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复文。

关于不必再发记者问题公报致李克农[1]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金、彭[2]：

七月十四日二时半的电报收到。关于记者问题的公报不必再发，因为主要的内容已经公布[3]，再发这个公报就重复了。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1951年7月14日，《人民日报》以《坚持双方协议原则并建议继续开会 南日将军函复美方代表》为题，刊载了新华社平壤13日电，其中谈到朝中方面对新闻记者问题的基本态度。

关于修改和广播对李奇微[1]的复文致李克农[2]电

（1951年7月14日）

克农，并告金、彭[3]：

（一）七月十四日十五时十分的电报[4]收到了。同意你的修改文句（从十三字至一百七十字），但在十三字下仍须加上“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一句，下接“我们同意你所提的……”。（二）北京仍在下午八

---

[1] 李奇微，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接替麦克阿瑟指挥侵朝战争。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3]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4] 指李克农1951年7月14日15时10分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仔细研究李奇微来文，发觉中立区与会址区域有大小及含义的不同。对于中立区，他要求双方停止敌对行动；而对于会址区域，则须摒除一切武装人员。与其改动他的建议，不如全盘接受他的，对我主动。因此，建议对复文13字至170字作下述更动：“……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具体问题，我们建议……”我们等你复示后，再将给李奇微的复文发出。

时广播，你处可注意收听。（三）请平壤广播亦照此修改。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下午六时

关于金日成、彭德怀电复李奇微原则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暂时中立区的电讯稿[1]

（1951年7月14日）

【新华社平壤十四日电】本社记者从朝鲜前线总部获悉：昨日美方代表团借口新闻记者未得我方同意仍然不来开城开会，以致会议又停顿一天。昨日下午，此间收到了李奇微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划中立区的新问题。金日成将军和彭德怀将军本日已予以答复。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辩，使和平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方在原则上同意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期间的暂时的中立区。有关此问题的一些具体事项，则交双方代表团去解决。同时对于新闻记者问题也给了美方以便利。这样，就解除了美方在最近提出的一切借口，使开城会议有可能重开。

金、彭两将军给李奇微的通知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电讯稿。

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签字）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

1951年秋，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人和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的合影。左起：王政柱、李贞、甘泗淇、朴一禹、彭德怀、陈赓、邓华。

给黄炎培[1]的信

（1951年7月15日）

任之先生：

七月十四日大示[2]收读。尊恙极念。完全同意休养一个月，如有必要，还宜延长一个月，以期全愈。时局诚如尊论。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3]，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敬祝痊安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1年7月1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近来，我头部时感发热、面红、眼红，如酒醉然；脚亦经常发热，觉酸，微肿，医生说是神经和心脏问题，嘱休养一下，拟告假一个月，易地休养。"信中还说："朝战和谈，恐曲折还多，敌方不愿继续苦战之意甚显，但又怕涉及撤军，更怕提及台湾等问题，会引起内部哗扰，它的单相思，似在停战而暂不撤兵，等武装日本有些眉目，然后抽调（也许就是马歇尔所说：今后可以抽调）。我方应付很稳练，很大方。""看来此事一时还不会有结果。"

[3] 指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1951年7月14日关于划分中立区等问题给李奇微的复文。

既然有权讨论停战
也就有权讨论撤兵[1]

（1951年7月17日）

我们提此条[2]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以毛泽东名义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2] 指在谈判中提出将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问题列入正式议程。

对毛泽东思想的表述的修改[1]

（1951年7月20日）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在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斗争》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

关于做好尤金[1]来华的接待工作致高岗[2]电

（1951年7月20日）

高岗同志：

菲里波夫[3]同志同意我们的要求，再派尤金同志来中国帮助我们做理论教育等工作，为时三个月。现尤金同志已于七月十五日动身，七月二十一日可到满州〈洲〉里，请即派妥人好好接待。他到东北后，请你和他恳谈一次。如他愿先来北京，则请派人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先在东北各城市向我们的干部作理论讲演，及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则请你给以布置，派出有能力的翻译人员引导人员及保护人员，在各处布置适当数目的干部听讲会及座谈会。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上午三时

---

[1] 尤金，苏联哲学家，当时任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图书》杂志主编。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菲里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在关于修改谈判议程问题发言稿给李克农[1]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2]

（1951年7月24日）

明廿五日只用第一个发言稿，并应坚持其中建议的立场不要让步，看对方如何表现，第二天上午还是如此。到第二天下午（廿六日下午）如对方坚持反对我方新建议时，再用第二个发言稿。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为了同美方谈判朝鲜停战谈判的议程问题，李克农根据谈判可能出现的情况，草拟了两个发言稿，送中央审阅。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关于发言稿的修改和使用问题起草了给李克农的复电，这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一电报稿时加写的。

停战前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完全必要

（1951 年 7 月 26 日）

德怀[1]同志：

七月二十四日电[2]收到。敌人是否真想停战议和，待开城会议[3]再进行若干次就可判明。在停战协定没有签订，战争没有真正停止以前，我军积极准备九月的攻势作战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7月2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美帝国主义处在矛盾状态中。我再有几次胜利战斗，打至三八线以南，然后我再撤回三八线为界，进行和谈，按比例逐步撤出在朝外国军队，坚持有理、有节，经过复杂斗争，争取和平的可能是存在的。如经过上述办法而不能达到和平，则继续打下去，最后赢得战争胜利是肯定的。从全局观点来看，和的好处多，战亦不怕。我军于8月中旬争取完成战役反击的准备，如敌不进攻，则至9月举行。最好是待敌进攻，我则依靠阵地出击为有利。

[3] 开城会议，指1951年7月10日开始的在朝鲜开城举行的朝鲜停战谈判会议。

给张元济[1]的信

（1951 年 7 月 30 日）

菊生先生：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2]，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以为慰。此复，敬祝

康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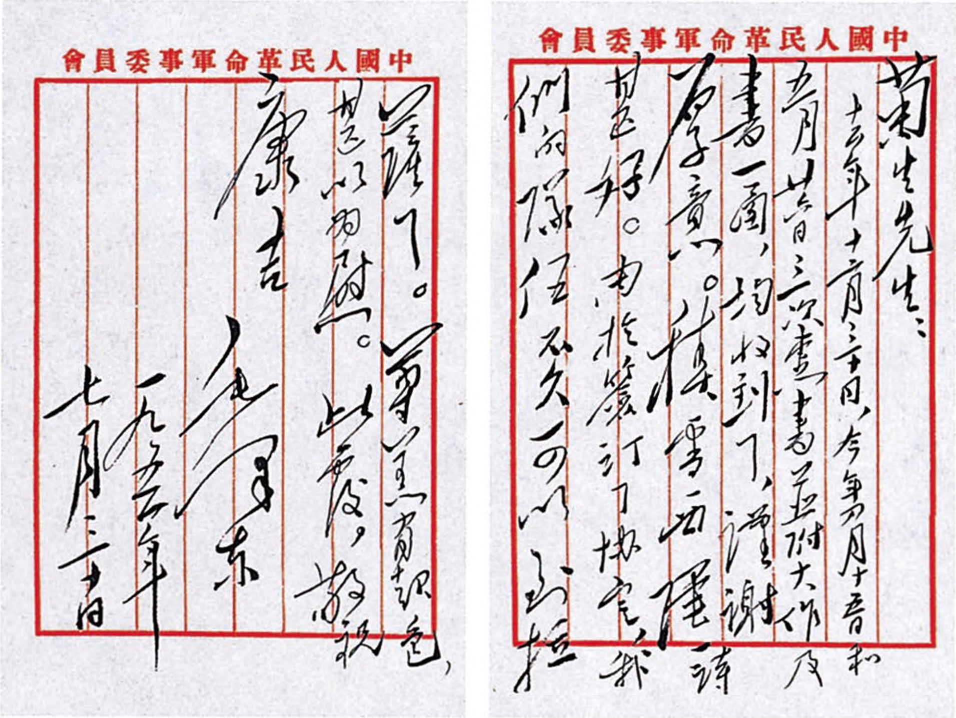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

---

[1] 张元济，字菊生，自清末起长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2] 指 1951 年 5 月 23 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菊生先生：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今年四月十四日和五月廿四日三次惠書並附大作及書一函，均收到了，謹謝厚意。積雪西陲詩甚好。西藏簽訂了協定，我們的隊伍不久可以直抵拉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薩了。尊恙已有起色，甚以為慰。此復，敬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毛泽东致张元济信的手稿。

九月战役的兵力部署和粮弹储备

（1951年8月1日）

德怀[1]同志，并告高[2]：

（一）以二十兵团替换九兵团一个军或两个军的部署甚好，但九兵团的主力仍以作九月战役的第二线兵力（第二梯队）为宜，不要调远了。（二）十三兵团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应在八月上旬调至第一线积极准备九月战役[3]，而从三兵团及十九兵团中抽出三至四个军接替海防兵力。（三）在最前线修建多数粮弹储备库，为九月战役储备充分的粮弹，使作战时能随缺随补，此点极关重要。闻你已在筹备，未知情形怎样。（四）以上各点盼复。

毛泽东

八月一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中国人民志愿军原拟定1951年9月对敌实施战役反击。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决定推迟执行战役反击计划（只加紧准备而不发动），准备对敌实施战术反击。

在胡乔木[1]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1951年8月1日）

请乔木另拟一电[2]，采用统一的“九三”纪念。

毛泽东
八月一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

[2]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于1951年8月2日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东北局并各中央局、各分局、各军区，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及志愿军政治部的电报。电报说：“同意规定九月三日为全国统一的战胜日本纪念日，除东北应改在此日庆祝解放外，全国军民及报纸均应于此日纪念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

给张云逸的信

（1951年8月5日）

云逸同志：

请陈毅同志带来的信收到，再休养一年很有必要，要安心静养，不要顾虑工作。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八月五日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8月10日）

介侯兄：

承你转来刘伯强、刘德三[1]二位的信，收到了。请你转告他们，在当地认真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日

---

[1] 刘伯强，湖南省韶山市如意乡杨营村人，当时在湖南省常德市总工会工作。刘德三，现名刘先瑞，刘伯强的胞弟，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第五十五军当兵。他们的父亲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

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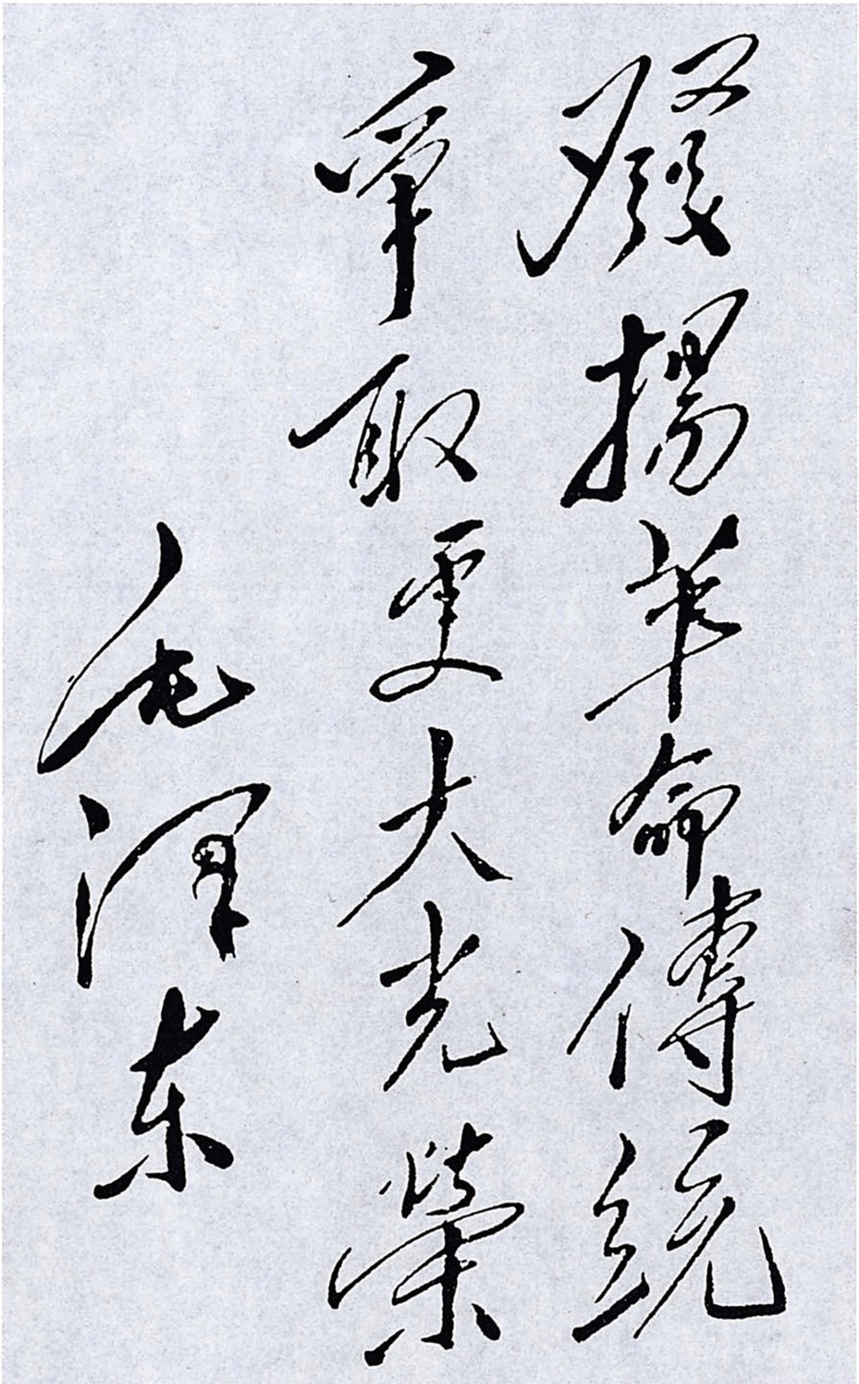
（1951年8月11日）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枣园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延安指挥中国革命长达13年。1949年10月，毛泽东接到延安老区人民祝贺新中国诞生的贺电，曾热情复电。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去延安革命老区，毛泽东给延安枣园人民写了这个题词。



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毛泽东

毛泽东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的题词。

对袁仲贤[1]关于尼赫鲁[2]催要毛泽东诗词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8月20日）

外交部：

不要送这种诗词。

毛泽东

八月廿日

---

[1] 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对航空工业建设问题的批语[1]

（1951年8月21日）

照办。[2]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8月21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经召集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负责同志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共同审核苏联航空总顾问波斯毕沃夫同志提出之计划，均表同意。（一）以利用现有工厂基础，即行改为飞机修理装配厂，并于3年至5年建成飞机制造厂。（二）选定沈阳、哈尔滨、南昌、株洲等地的5个工厂作为航空工业工厂建厂基础。（三）从备战观点上看，以上5厂的位置比较突出，但为加速建设必须就现有基础进行。至于纵深的建设，似应待以后更进一步的建设中再议。周恩来批示："拟予同意，并请李富春、何长工与苏联专家速依此计划将今年所需的航空工业建设经费以最低限度计算，提送财委审核。"

1951年8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越南人民访华代表团团长黄国越一行。

1951年8月，参加全国民族贸易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向毛泽东敬献锦旗。

1951年8月，毛泽东接见少数民代表。

1951年8月，毛泽东接见瑶族妇女代表。

对敌实施战术反击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

（1951年8月21日）

德怀[1]同志，并告高[2]：

你对邓华[3]同志八月十八日电丙项作战方案的意见如何。邓华说“在军事上我应有所准备，纵目前不进行战役反击，也当尽可能作战术的反击，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地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坚固程度”。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认真考虑，请你计划一下，九月份能否进行此种战术反击，如何进行法，须用多少兵力，胜利把握如何，敌人的反应将会如何，请就这几点考虑电告。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一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准备对付可能在镇南浦登陆之敌[1]

（1951年8月26日）

彭，并告高[2]：

我军已决定九月不作大规模反攻战斗，敌人又有企图在镇南浦[3]登陆的消息，因此，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及四十军均应位于原驻地，加强训练，并准备对付镇南浦方面的可能登陆。

军委

八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镇南浦，即今南浦，位于平安南道西南。

以十月二十五日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1]

（1951年8月28日）

同意。[2]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1951年8月27日报告的批语。

[2] 萧华的报告说：10月25日是志愿军入朝作战一周年，志愿军政治部8月18日来电提议，可否以此日作为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我们同意。

对西安市在清理积案中组织罪犯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经验的批语[1]

（1951 年 9 月 1 日）

送罗瑞卿[2]同志注意，推广西安办法。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1年8月31日出版的《内部参考》第一五六号上。这一期《内部参考》报道：西安市在清理积案过程中，组织一批未判决和已判决罪刑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一次《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学习，并展开了坦白、检举运动，收效很大，平息了未判决罪犯的情绪波动，使他们认识到人民政府判罪是有根、有据、有凭、有证，是分清轻重、分别对待的。不少未判罪的犯人都拿《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四条来检查自己，认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已判决罪刑的反革命分子，经此次学习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人民政府对自己的判刑，并且在劳动改造中积极生产。

[2]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主席的贺电

（1951年9月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胡志明主席阁下：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纪念，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人民，向阁下及越南人民致衷心的庆祝，并祝越南人民在阁下的领导下，为解放全越南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获得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1年9月2日）

斯大林大元帅：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的正义事业中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二日

在中央关于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给张经武[1]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9月3日）

发放的时机以在我入藏先遣支队及阿沛[2]等人到达拉萨，西藏政府讨论了中藏协定，并发出了拥护这个协定的通电之后为适宜，不要过早。

---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他在1951年8月31日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对西藏各寺院及乞丐发放布施的数目和方法，中央复电同意。

[2]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总管，当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代表。

给毛宇居、文梅清、张有成[1]的信

（1951年9月4日）

禹居、梅清、有成三兄：

接到梅清、有成二兄的信，想来京一游，我认为可行。如禹居兄有兴趣，亦可同来一游。来者以三兄为限，他人不要来。到京大约可住一个月至两个月，太久则不方便。如三兄同意这几点，即可偕我这里派的同志一道来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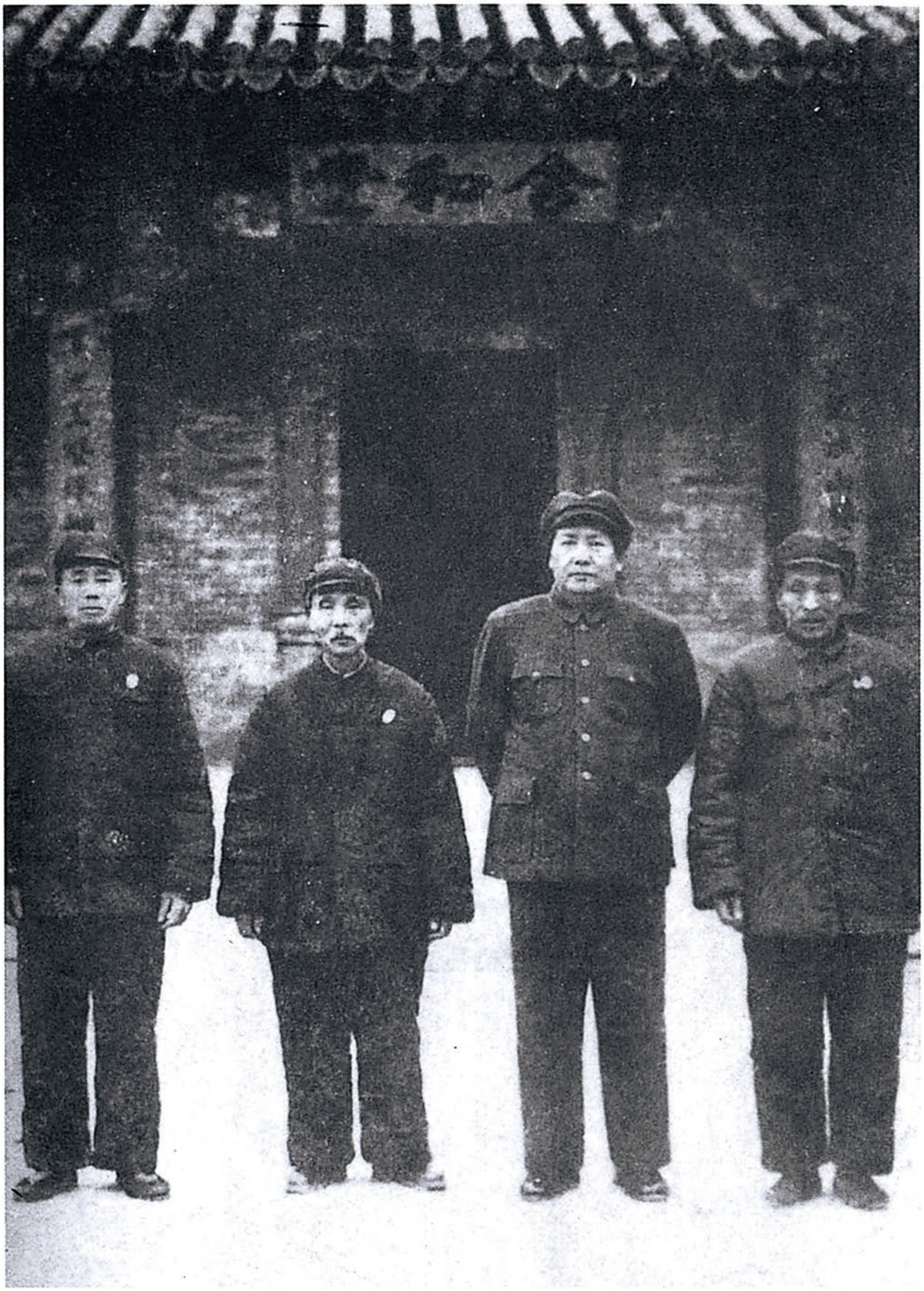
此祝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四日

---

[1] 张有成（1886—1953），湖南省韶山市大坪乡新联村人，木工。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1951年9月，毛泽东邀请少年时代的好友张有成（左一）、堂兄毛宇居（左二）、表兄文梅清（右一）赴京叙旧。

给张元济[1]的信

（1951 年 9 月 5 日）

菊生先生：

八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解放歌具见热忱慷慨。建议各事都好，编藏文小册子尤为急需，已告有关机构加力办理。我入藏先遣支队日内可到拉萨，沿途得藏人热烈欢迎，知注并以奉闻。此复

顺祝时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

---

[1] 张元济，字菊生，自清末起长期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曾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长。

对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的批语和修改[1]

（1951年9月）

一

瑞卿[2]同志：

已阅，略有修改，可以此稿发给到会人，征求意见，于星期六日来中央讨论一次。

毛泽东

九月六日上午三时

二

瑞卿、彭真[3]同志：

---

[1] 本文第一、二、三部分是毛泽东的批语，第四至第七部分，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已加修改，请你〔们〕再加斟酌，印发到会同志及政治局各同志。俟会议提出新的意见，再作一次修改，就可定案。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三

瑞卿同志：

已看过，略有修改。印刷时**注意校对勿错**。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四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

五

鉴于过去有些县区乡，因为党政组织不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发生了镇压不彻底的现象，或乱捕乱杀的错误，因此决定：一切

由于基层党政机关内部不纯以致反革命镇压不彻底的地区，或是犯了大错误的地区（这种地区在全国说来是少数），在县区乡党政组织没有整顿好和领导力量没有加强以前，除现行犯外，必须一律继续停止捕人杀人，等待县区乡组织整顿好了（包括在县区乡组织中清出可能有的反革命分子在内）和领导力量加强了之后，再去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对于此种地区，必须忍耐，不可性急。

六

在镇压反革命确实已经达到了彻底程度的县、区、乡及某些市区，即应结束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转入经常的对暗藏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工作。此类县区乡或市区的判定，由省（区）市级公安机关负责（经党委讨论通过），报告大行政区及中央公安部备案。

七

加强对领袖、对首长、对首脑机关及重要民主人士的警卫和保卫工作，同反革命的暗害活动作尖锐的斗争，经常保持充分的警惕性，必须引起十分注意。责成专署以上和师以上各级公安机关和保卫机关负责，收集各地反革命分子的暗害案件（包括已破案和未破案的）归于一类，加以清理，找出线索，研究处理办法，做出结论，报告中央公安部。

对南京市委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9月8日）

乔木[1]同志：

此件[2]很好，请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其管理宗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2] 指中共南京市委1951年8月20日关于宗教改革工作的报告。报告说，自4月以来，我们在各个基督教会中先后开展了控诉运动，举行金陵男、女两神学院扫毒展览，并继续进行了一个月肃清帝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政治学习，以后又连续举办了两期基督教青年学生的夏令会，建立了全市基督教徒学生三自革新运动促进会。7月中旬，我们即以进步教徒为基础，加上部分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处领导下组织了宗教工作队，分赴各城区，深入各教堂，普遍开展了以教堂为单位的包括80%以上教徒参加的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的运动。工作步骤是：首先使工作队直接与各教堂的全体教徒见面，反复进行反帝爱国实行三自革新的教育，启发教徒揭发与控诉教会的黑暗、专横、反动的事实，并树立教徒的主人翁思想，从而展开教徒与神职班的正面斗争，以确立教会中的进步群众优势。然后由宗教事务处召开教会人员的座谈会（已开3次），阐明教会树立民主作风与教会前途的重要关系，支持民主改革的要求，强调指出民主改革是牧师与教徒团结一致，坚决击败帝国主义进攻，争取教会生存的重要步骤，以减少上层分子的对立与抵抗。

教事务的机关，并于文前加上几句介绍的话[1]。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1951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南京市委的这个报告，并加了以下批语："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南京市委这个报告很好，其中关于进行基督教工作的方式和步骤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学习，特印发给你们研究，望各地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外事处、宗教事务处注意。"

关于荆嗣佑[1]工作安排的信

（1951年9月8日）

一

道衡同志：

荆嗣佑一信付上，请察阅。其中所述溆浦乡间对荆不尊重的事，请予查明酌办。荆在辛亥革命后曾当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员，四十年来他做过些什么事，是否和国民党反动派有过关系，我完全不明了，请你向程颂云、程星龄[2]诸人及沅陵地委问明，并决定是否帮助他在长沙解决工作问题。至于他要求去日本的事，现在没有此种可能。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荆嗣佑，曾留学日本，任过李宗仁的顾问、湖南省制宪会议主席。当时闲居在家，1951年后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

[2] 程颂云，即程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程星龄，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二

荆先生：

八月二十二日惠书敬悉。所述乡间情况，值得注意，已将来信转给中共湖南省委查明办理。先生出外工作一事，也要湖南省委酌情帮助。如先生有兴趣，可与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部长刘道衡先生通讯商酌。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

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

（1951年9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贺诚同志这个报告[1]很好，你们收到后，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引起各级领导同志注意。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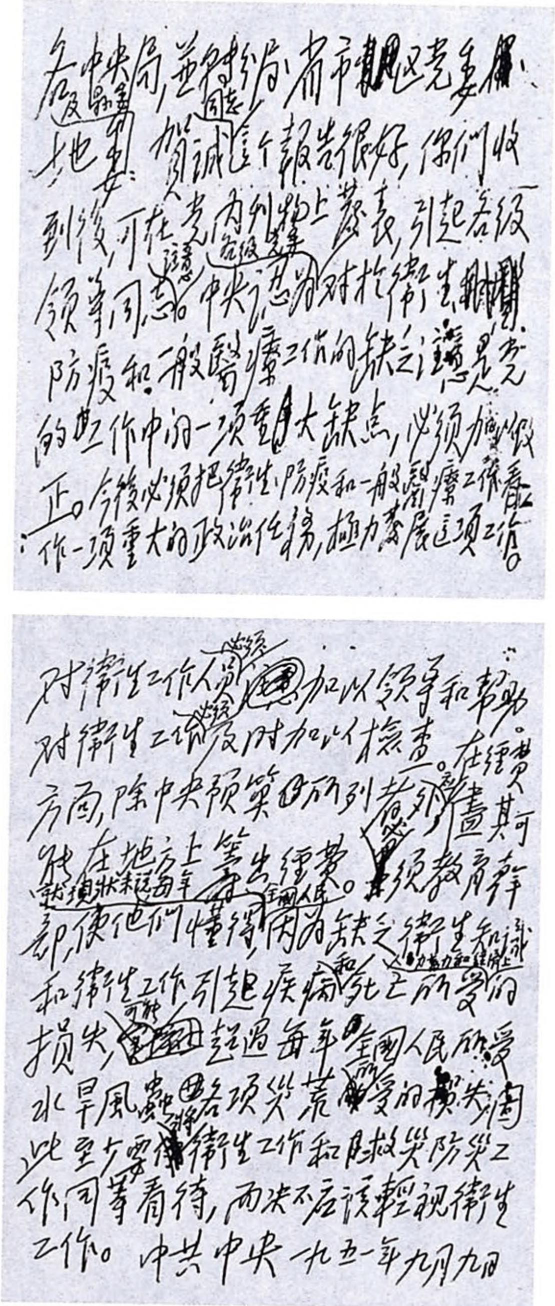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1951年9月7日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提出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但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其中大多是可以预防的。

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1951年，人民群众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地委：

賀誠這个報告很好，請你們收到後，可在党内刊物上發表，引起各級領導同志注意。中央認為對於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項重大缺点，必須加以改正。今後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在經費方面，除中央預算所列者外，須盡其可能在地方上籌出經費。必須教育幹部，使他們懂得，人民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手稿。

在马寅初[1]关于北京大学教员政治学习问题给周恩来的信[2]上的批语

（1951年9月11日）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

[1] 马寅初，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2] 马寅初1951年9月7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10位教师。"

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的信

（1951年9月12日）

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同志们：

八月三十一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们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们的建议[1]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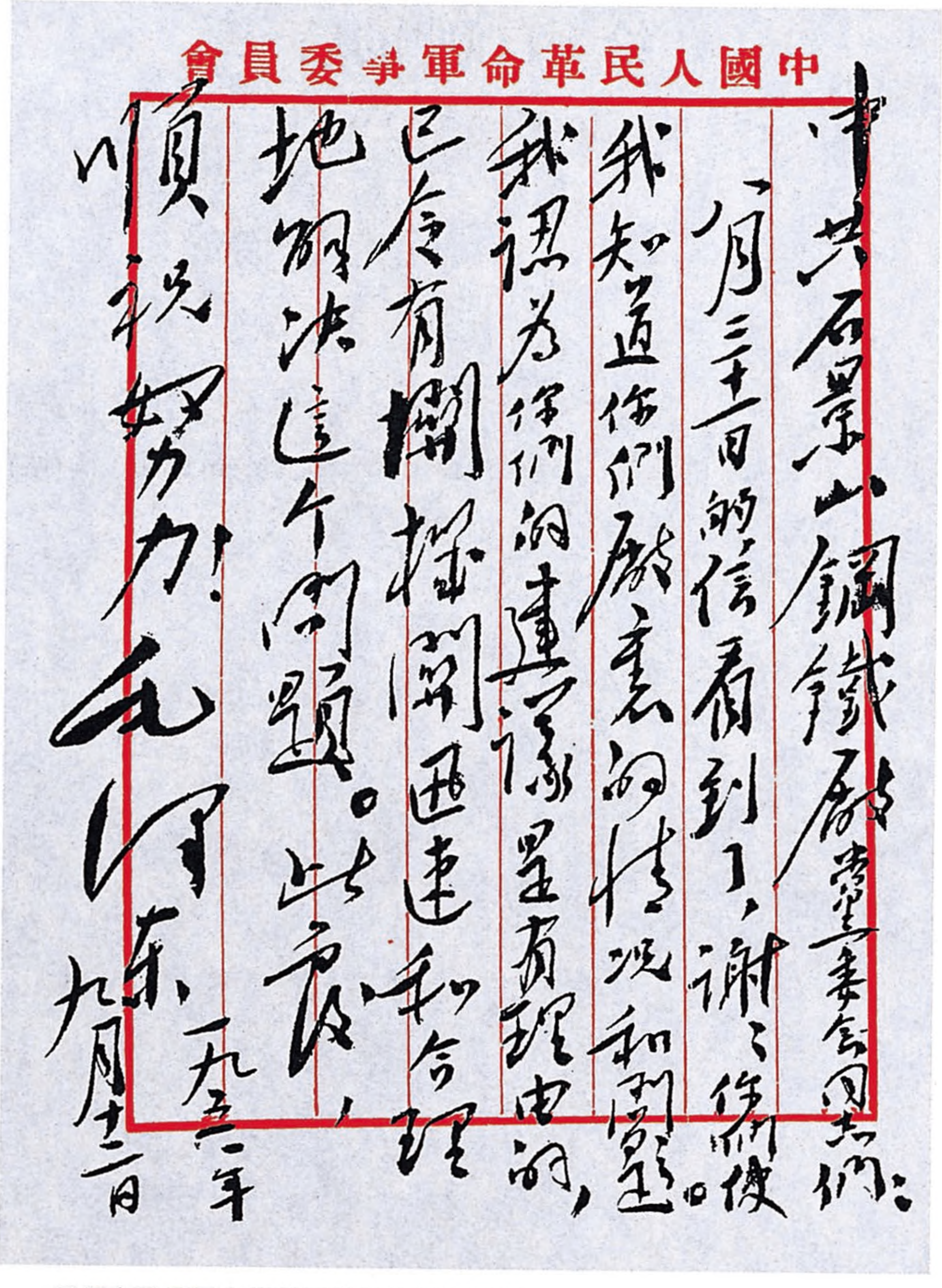
顺祝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

[1] 指中共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就当时厂内工资方面存在的不合理状况提出进行调整的建议。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中共石景山鋼鐵廠党委会同志們：

八月二十日的信看到了，謝謝你們使我知道你們廠裏的情况和問題。我認為你們的建議是有理由的，已令有關機關迅速和合理地解決這個問題。此复，

順祝

努力！

毛澤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一日

毛泽东致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信的手稿。

给王自勉[1]的信

（1951年9月12日）

王自勉同志：

八月二十七日的信看到了，谢谢你使我知道你们厂里的情况和问题。我认为你的建议是有理由的，已令有关机关迅速和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此复

顺祝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日

---

[1] 王自勉，当时任中共石景山发电厂总支部书记。

入藏部队的当前任务和兵力部署

（1951年9月13日）

小平[1]同志：

我先遣支队已到拉萨，张国华[2]所率部队不久亦可到太昭[3]、拉萨一线。关于这些部队一九五一年的任务是以修筑公路为主，还是以生产粮食解决给养为主的问题，张国华在京时曾对我说应该是筑路而不是生产。张并认为明年一年即可修通甘孜至拉萨公路。但据后来所得情报，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许需要两年至三年才能修通。似此，如果我军不从事生产，则给养将成严重问题，靠藏政府供给，或靠购买，则对藏民影响不好。因此请你考虑是否可以定为生产与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萨沿途所驻部队以一部分担任生产，以一部分担任筑路，在生产季节以较多的人从事生产，在其他季节则以全力筑路。此点在现在就应确定，以便在冬季有所准备。此外，关于兵力分布问题，似应在几个月内，在日喀则和日喀则到拉萨的中间地点各派一部分军队进驻，并在这些地方布置生产，使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2] 张国华（1914—1972），江西永新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

[3] 太昭，今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

班禅[1]能回后藏，并便于展开工作。原先决定明年不进驻上述各点的计划似应改变，惟进驻时间可在张国华到拉萨和西藏政府的关系完全弄好之后，即在三四个月之后为适宜。以上望复。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

[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致米丁[1]电

（1951年9月20日）

米丁同志：

来电收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周年，我们将于九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以电报发给你一篇由董必武同志写的文章[2]。此复

顺致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二十日

---

[1] 米丁，当时任苏联科学院院士、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主编。

[2] 指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为《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写的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年》。

给黄炎培[1]的信

（1951年9月22日）

黄副总理：

九月十五日大示[2]收到。

贵体康复，甚慰。

最近上海报告一份，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其中某些部分带有机密性质，请加注意。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廿二日

---

[1] 黄炎培，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1年9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昨晚从东北归来了，在大连住一个半月，身体确已恢复正常。最近半个月在大连、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参观了二十来个厂矿，很想整理所得资料，写一报告，如写成，谨当呈请赐教。"

致邓子恢[1]电

（1951年9月24日、25日）

一

子恢同志：

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偕同小平贺龙[2]同志一道早日来京。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

二

子恢同志：

九月二十五日电[3]悉。（一）向你的病故的老母致哀悼之意；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

[3] 邓子恢1951年9月2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我昨夜始回汉，因要了解一些工作情况，又因家母前日病故，要主持丧事，故拟于过国庆节后去京。可否，请示。"

（二）同意你于过国庆节后来京，如能于十月三日到京则甚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四时

关于印发纠正文字缺点的文件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1年9月25日）

刘、周、胡乔木、尚昆[1]：

此四件[2]，加上中央一信[3]，共五件，请尚昆印在一起，分送各中央局，并要它们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分发中央和军委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中央政府各党组。

请乔木同志看一遍。

刘、周如有时间，可看一下。如无时间，不看也可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1年5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文字缺点及今后办法的报告，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1951年5月15日关于纠正文件、电报等文字缺点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1951年6月27日关于检查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1951年8月10日关于文件、电报等文字缺点的初步检查报告，共4件。

[3] 指中共中央1951年9月25日为转发华北局等四单位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纠正文字缺点指示的情况报告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等的信。

尚昆写的信，自己就没有遵照中央那个指示[1]，有许多缺点，我已作了修改，请注意。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2月1日关于纠正电报、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

致饶漱石[1]电

（1951年9月25日）

漱石同志：

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于过国庆节后即动身，于十月三日到京。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接受缅甸大使吴拉茂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1年9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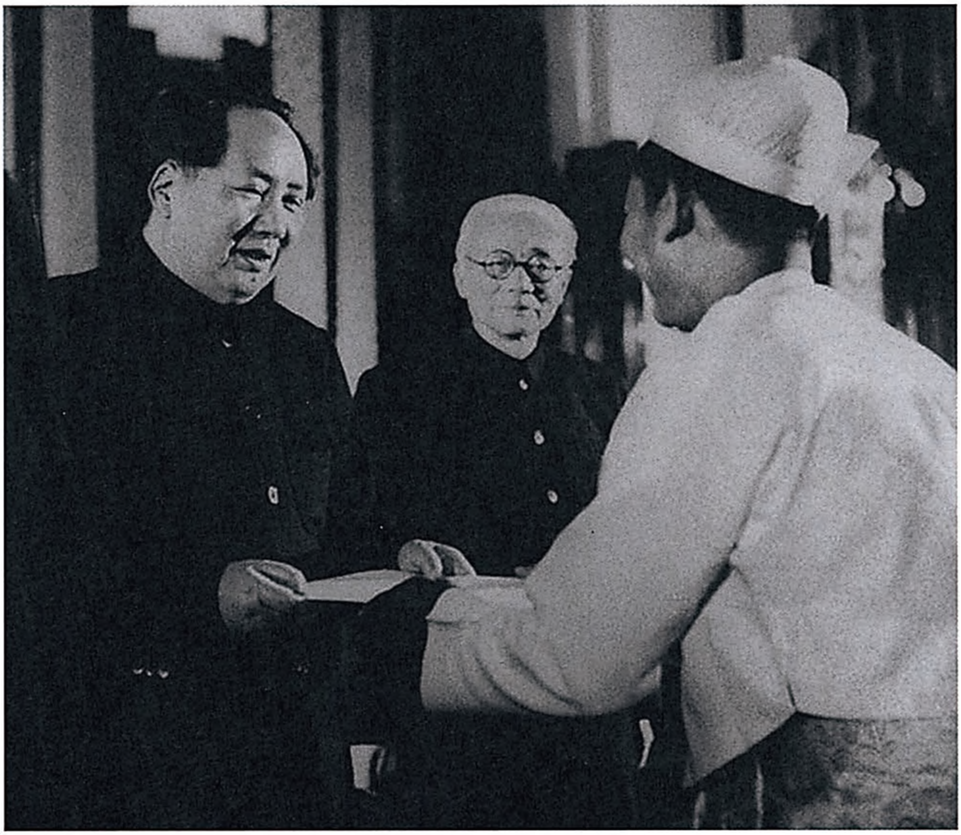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缅甸联邦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中缅两国在历史、文化上有着悠久而密切的关系；两国人民在长期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斗争中，更有了深切的同情与了解。我深信贵我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不但将使已存在于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增进与巩固，而且必将有助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定。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缅甸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51年9月27日，缅甸联邦首任驻华大使吴拉茂向毛泽东呈递国书。

对章士钊[1]反映张之洞、段祺瑞[2]遗属情况来信[3]的批语

（1951年9月29日）

一

请彭真[4]同志查明情形，酌量处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九月廿九日

---

[1] 章士钊，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

[2]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1884年任两广总督，开始兴办新式工业；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力主筹办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段祺瑞，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年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被任命为陆军总长。自1916年袁世凯死后到1926年，段祺瑞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等职。

[3] 指章士钊1951年9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反映张之洞、段祺瑞遗属生活窘困，所遗住宅，法院已判归政府没收，生活难以为继，要求政府给以特别照顾等。

[4]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

在来信说到“曩者传谈偶及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皆不是人民敌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顾”处，毛泽东批：“因时间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谓过去也不是人民的敌人。”

在来信说到段祺瑞“在派系私斗上虽有失德，却无反革命之举”处，毛泽东批：“有三一八惨案。”

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按其征讨复辟、对德宣战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诸节，皆不失为革命荦荦大端”一句中“晚年抗日南下”处，毛泽东批：“只此节可取。”

在来信说到段祺瑞所遗吉兆胡同住宅“所谓经敌人购买一节”，“乞公批交有司彻查，加以了解，能不没收最妙，万一不能亦希别筹照顾方式”处，毛泽东批：“此事可商。”

中央同意新疆分局对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检讨的电报

（1951年9月30日）

新疆分局，并告西北局：

九月廿八日关于检讨分局没有正确执行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的电报收到了，我们认为这一检讨是好的，望在今后工作中完满地实现之。

中央
九月三十日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献花儿童交谈。

195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宴请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对刘亚楼等关于空四师空战报告的批语[1]

（1951 年 10 月 2 日）

刘亚楼同志：

此件[2]已阅。空四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毛泽东

十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 1951 年 9 月 27 日报告的批语。

[2] 指刘亚楼、吴法宪（空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空军参谋长）1951 年 9 月 27 日关于我空军第四师 9 月 25 日在朝鲜同敌机进行多次空战的情况给军委的报告。

关于更换谈判会址问题致李克农[1]电

（1951年10月3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2]：

关于更换会议地址问题，经我们再三考虑，认为目前还应采用你们原先的主张，拒绝敌人这项无理要求，并准备与敌人拖一时期。因为敌人目前的政策是拖，我急他不急是无用的，到了敌人真想解决问题的时候，那时就可以扯拢了。因此，所拟复件[3]，便可简单，对于未了事件的处理，既不取消，也暂不提，看敌人如何反映〈应〉。复件现附上，可于十月四日上午送出。北京拟在四日晚广播，五日登报，请平壤亦同时发表。

毛泽东

十月三日十八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为金日成、彭德怀起草的关于更换会议地址问题给李奇微的复文。

给徐冰[1]的信

（1951年10月4日）

徐冰同志：

全汝真的信付上。她是覃理鸣[2]的夫人，其子患病，要求照顾。请你派人调查一下，全汝真在政治上是否有问题。如政治上纯洁，对其本人及儿子，似应予以照顾。请酌办。

毛泽东
十月四日

---

[1]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2] 覃理鸣，即覃振，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临时参议员。1924年国民党改组，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参加西山会议，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副院长等职。

为马毛姐题词[1]

（1951年10月4日）

毛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马毛姐写的题词。1949年4月20日夜，毛泽东、朱德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年仅16岁的马毛姐在家乡安徽省无为县参加了渡江第一支船队，因战绩突出，被授予“渡江英雄”称号。1951年10月4日，毛泽东派人接马毛姐到家中做客，还特意为没有正式名字的小英雄“马四姐”起名为“马毛姐”。毛泽东说：“‘马’是你家的姓，名字第一字就跟我姓了。”当毛泽东知道马毛姐上学了，便高兴地在一本笔记本上写道：“毛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四日。”

对李维汉[1]关于给班禅[2]送礼等事的报告的批语

（1951 年 10 月 6 日）

维汉同志：

送礼及相片题字[3]均照办。吃饭时间，由你处酌定得我同意后办理。塔尔寺[4]字不写。

毛泽东

十月六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3] 李维汉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以毛泽东的名义赠给班禅黄缎子架裟料、砖茶等礼物及毛泽东亲笔题字的照片。

[4] 塔尔寺，在青海省湟中县境内，是喇嘛教格鲁派著名寺院之一。

给谭熙春[1]的信

（1951年10月7日）

熙春先生：

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生活困难，甚为系念。毛禹居[2]兄现在此间，待其还乡时，当与一商援助办法。此复

即颂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

[1] 谭熙春（1882—1960），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竹鸡村人。当时在乡务农。1920年曾在长沙毛泽东等创办的文化书社当店员，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安源、上海等地从事过工人运动和党的通信联络方面的工作。

[2] 毛禹居，即毛宇居。

给戴毓本[1]的信

（1951年10月10日）

毓本同志：

九月九日来信收到。大有进步，甚以为慰。我同意彭习梅[2]兄入革大学习，但须他自己下决心。如他决来，可持此信和校方接洽入校事宜。此复

顺问近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

[1] 戴毓本，杨开慧在湖南长沙福湘女校、岳云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2] 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

给贺晓明的信

（1951 年 10 月 10 日）

晓林兄[1]：

九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承你告以许多事情，甚为感谢。你家分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向你祝贺。你在乡耕作甚好，不要来京。此复

顺祝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

[1] 晓林，系晓明之误。毛泽东应称贺晓明为弟。

给文炳璋[1]的信

（1951年10月10日）

炳璋同志：

七月五日来信收到，谢谢你。乡里来人说，你家生活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军队工作。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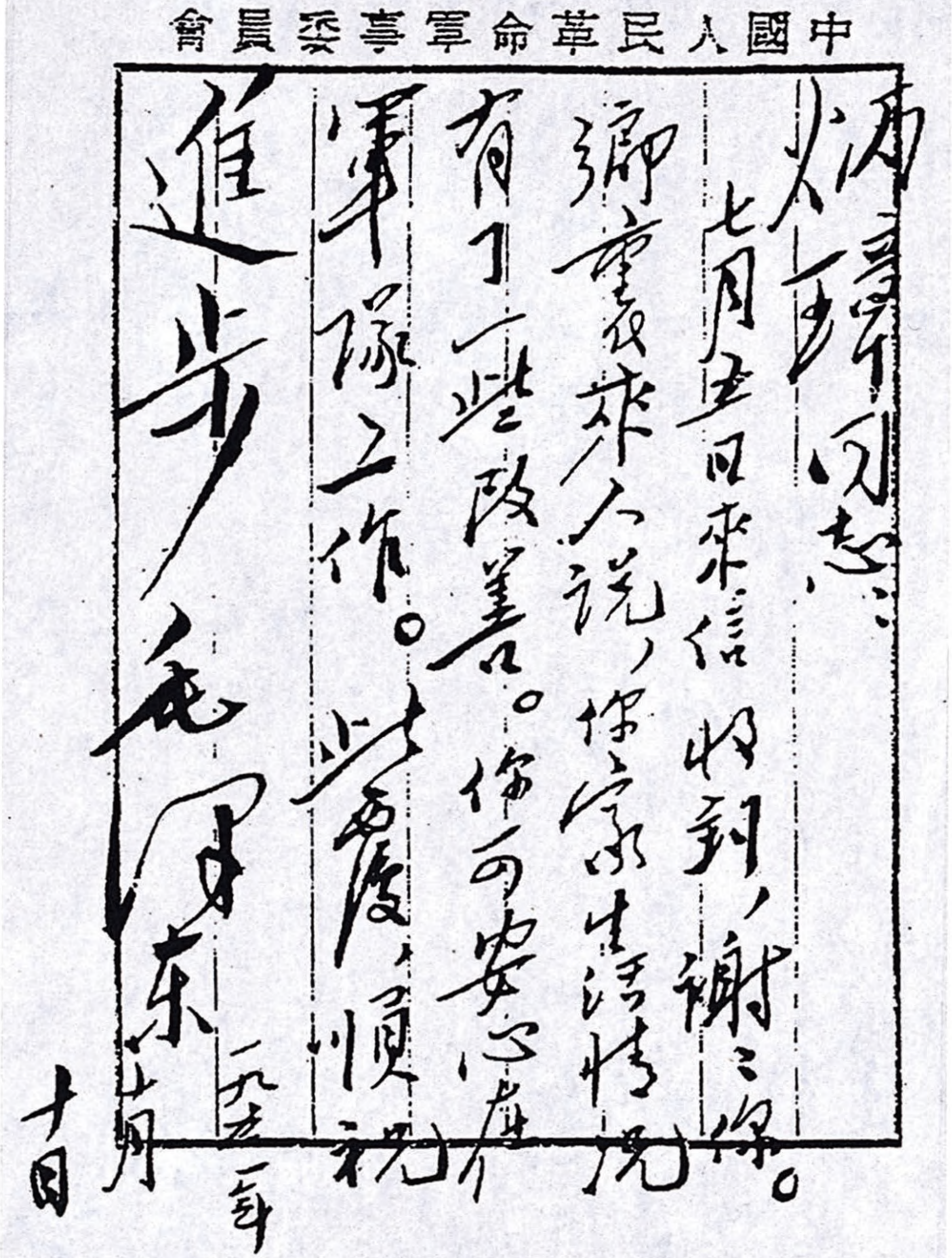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

[1] 文炳璋（1920—1973），湖南省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圫（当时属湘乡）人，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防空司令部通讯连工作，1954年转业，后在北京合成纤维厂工作。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炳璋同志：

七月廿日來信收到，謝謝你。鄉裏來人說，你家生活情況有了一些改善。你可安心在軍隊工作。此復，順祝進步！

毛澤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毛泽东致文炳璋信的手稿。

给雷瀚的信[1]

（1951年10月11日）

雷先生：

看到你十月八日给我的热情的信，甚为高兴。我为你的努力和进步表示庆贺！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一日

---

[1] 雷瀚，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著名教授、物理化学家、电气学家，在参加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游行活动之后，心情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于10月8日提笔给毛主席写信，汇报自己两年来的思想、工作和身体情况。这是毛泽东给雷瀚的回信。

在关于扩大中立区问题给李克农[1]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10月12日）

这样转弯[2]比由金彭[3]出面转弯要好得多，并且以早一点转弯为宜。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周恩来起草的毛泽东给李克农的电报中指出：“在联络官会议上可以相机表示，扩大中立区问题应由代表会正式讨论，但为准备代表会的讨论，不反对在联络官会上就此问题非正式地交换意见。”

[3]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在铁道部工程师韩伯林反映住房及房租问题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1 年 10 月 12 日）

彭真[1]同志：

此事[2]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2] 指韩伯林在信中反映的因北京市房屋紧张、房租上涨，一些公务员无房住和整天忙于找房以及房产交易所不能起解决房荒作用等问题。

中央关于由邓华[1]转达中央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的电报

（1951年10月14日）

志愿军党委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九月二十日的电报[2]早已收到，我们认为你们的总方针是正确的。邓华同志现来北京，中央已将最近关于志愿军战略方针，节约兵力，节约资材，节约经费及两岸迫近敌人可能登陆处筑工事等项决定告诉了他，由他向你们转达。希望你们联系实际情况规定具体执行办法，争取朝鲜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对于志愿军全体同志在志愿军党委和彭德怀[3]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奋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表示欣慰与慰劳。目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争取最后胜利。目前国内情况很好，全党及全国人民热烈支援你们。国际形势也于我们有利，敌人困难甚多。我们也有困难，有些是很大的困难，但是可能克服的。只要同志们继续努力，并和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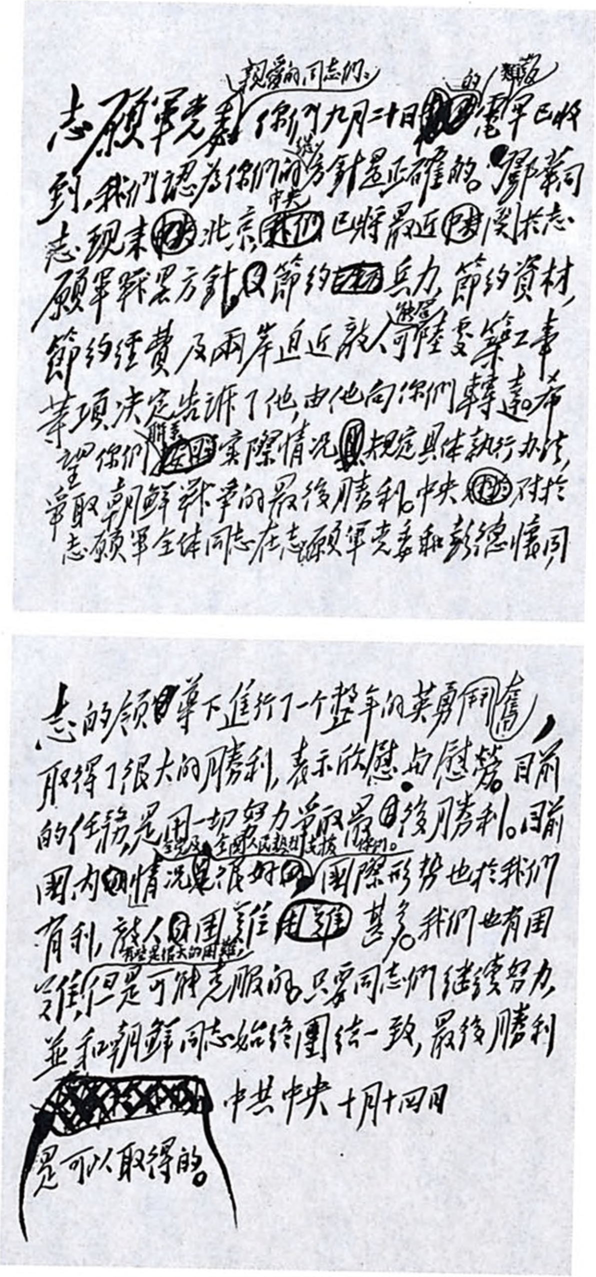
[1]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2] 指中共志愿军委员会1951年9月20日关于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谈到5次战役后部队阻敌的经验教训、整训情况、思想动态与后勤工作，并在持久作战的总的方针指导下对各方面的工作作了具体布置。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鲜同志始终团结一致，最后胜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共中央
十月十四日



志願軍党委，親愛的同志們：你們九月二十日的報告已收到，我們認為你們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鄧華同志現來北京，中央已將最近關於志願軍戰略方針及節約兵力、節約資材、節約經費及兩岸直近敵人的海岸陸地修築工事等項決定告訴了他，由他向你們轉達。希望你們根據實際情況規定具体執行办法，爭取朝鮮戰爭的最後勝利。中央對於志願軍全体同志在志願軍党委和彭德懷同志的領導下進行了一个整年的英勇奮鬥，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表示欣慰與慰勞。目前的任務是用一切努力爭取最後勝利。目前國內情況是很好的，全党及全國人民熱烈支援你們。國際形勢也於我們有利。敵人困難甚多，我們也有困難，有些是很大的困難，但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同志們繼續努力，並和朝鮮同志始終團結一致，最後勝利是可以取得的。

中共中央　十月十四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由邓华转达中央对志愿军战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的电报》的手稿。

给陈叔通[1]的信

（1951 年 10 月 14 日）

叔老：

十月九日惠示[2]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项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

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予掷还。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叔通 1951 年 10 月 9 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前曾面陈愿参加土改，本月全国委员会开会拟于 11 月出发”“按照原定办法须经所属机关批准，叔通属于人民政府委员会、全国委员会，应请批准。再全国委员会梅龚彬副秘书长亦愿参加，并拟约其同行”。

关于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

（1951年10月17日）

一

刘、周、朱、陈、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1]：

此件[2]请阅，阅后请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1951年10月14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

二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1]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便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

[1] 高岗在报告中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这里的关键是看我们对合作互助组领导的实际成效如何，即是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要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但必须强调自愿，不能对单干户有任何强迫和歧视。对单干户在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同样要帮助他们解决。人民政府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特别是在农具、技术指导与供销方面。为了更好地领导合作互助组的发展，必须培养合作互助组的骨干。省、县、区的党和政府的组织，应训练积极分子，推广经验，提高觉悟，巩固组织，并经常派人指导与检查合作互助组的工作。农村党的支部和党员要成为合作互助组的核心。

转发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的经验的批语

（1951年10月17日）

中南局，华南分局，华东局，西北局，并转所属省市区党委：

下面是西南局关于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1]，请你们加以注意，并仿照办理。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10月10日给各省、区、市党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总结了西南第二期土改中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参加土改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组织土改工作团，在其他工作不受重大影响条件下，必须动员必要的骨干参加，特别应坚决尽量动员一批高级干部参加，使他们不致坐失能够得到锻炼的良机。二、对民主人士参加土改，一方面要热烈欢迎、积极帮助，同时对他们的缺点错误要进行诚恳坦白的适当的批评，即把他们既当干部使用，又当干部教育。三、土改工作团下乡后，在土改工作上应当完全受当地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并与当地土改工作干部混合配备，组成工作组分散在各乡村工作；但亦应保持其原来土改工作团的一定的组织上的联系。四、为了有计划地动员和组织各系统党内外干部参加或参观土改，组成“西南参加土改工作筹备委员会”。各省、区如有必要亦可组织。五、土改告一段落或土改结束后，尽可能召集民主人士集体座谈经验，或向其中比较负责者个别征求意见，并听取负责人的一些意见。六、对于下乡土改干部的生活待遇及补助费等，除少数人经派出机关规定特别照顾外，一般都应一致，不应参差，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51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1 日）

开幕词

（1951 年 10 月 23 日）

1951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指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开幕词和闭幕词。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们：

我们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现在开会了。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之外，应邀列席的尚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解放军、工业劳动模范、农业劳动模范、老根据地代表、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工商业家、各种专家、宗教界、少数民族、华侨、妇女、青年、省市协商委员会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尚有许多政府工作人员。出席和列席人员中包括了许多为人民所公认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规模，充分地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战线上都有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在过去的一年中，在我们国家内展开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

镇压反革命三个大规模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住居的地区以外，即将于一九五二年全部完成。全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空前广泛地团结起来，向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着中国人民的伟大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从而鼓舞了朝鲜、中国、亚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使他们增加了保卫和平、反对侵略的信心。我们应当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表示庆贺和敬意！

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

在工业和农业战线上正在发展着的爱国增产运动，是我们国家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农村中实现土地改革和在工厂企业中实现民主改革之后，工人和农民即获得发展其爱国增产的极大积极性，并改善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可能。只要我们善于团结、教育和依靠工人和农民，我国就一定会要出现一个普遍高涨的爱国增产运动。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

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号召继续加强在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图为会议会场。

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

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胜利，我们是依靠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才获得的。在国内，我们是依靠了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巩固团结。在国际范围内，我们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由于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各方面工作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的敌人所没有料到的。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没有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没有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他们也看不到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时代，已由社会主义苏联的成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

主国家的成立，已由中苏两个伟大国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基础上的巩固团结，已由整个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团结以及世界各国广大和平人民对于这个伟大阵营的深厚同情，而永远宣告结束了。我们的敌人看不到这些，他们还想欺负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还想称霸世界。但是，同志们，我可以断定，他们的想法是狂妄的，是徒然的，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能欺负的，以苏联为首的伟大和平阵营是不能侵犯的，全世界和平人民是不能欺骗的。同志们，自从伟大的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世界上人民胜利的局面就确定了，现在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成立而使这个局面发展和巩固了。不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时期中，曾经发生过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称霸世界的事实，这种事实还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没有成立的时候。但是结果如何呢？难道还没有证明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的企图是狂妄的和徒然的吗？难道不是适得其反，想要称霸的帝国主义却得到了被打倒的结果吗？现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了，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提高了，整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起来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力量极大地削弱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国苏联的力量大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时候，再有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重走过去德、意、日三国侵略者的老路，则其结果不是完全可以料到的吗？总之一句话，今后的世界必须是人民的世界，世界各国必须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决不能再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横行霸道的世界了。我希望我国人民好好地自己团结一致，并好好地和我们的苏联盟友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一切人

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向着争取反侵略斗争的胜利、向着建设我们伟大国家的胜利、向着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胜利而继续前进。同志们，只要我们这样做，我相信，胜利决定地是我们的。

闭幕词

（1951年11月1日）

同志们，我们的会议已经胜利地完成了，我为这次会议的成功表示庆贺。如像我们在国际国内各项伟大斗争中团结一致一样，我们的会议也是团结一致的。而且我们的团结是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更亲密，一年比一年更加生气勃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一步一步地形成的，它是一个包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在内的几万万人的统一战线，它是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它是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它又是采用自我批评方法的，因此，它就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它就能够越来越有生气，越来越有力量，它就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同志们，我们已经总结了过去一年的经验，规定了今后工作的方针，并且补选了十八名委员，让我们领导全国人民继续前进，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吧！

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图为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讲话。

1951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和朱德握手。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雷洁琼委员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交谈。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艺术家周信芳在一起。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交谈。

1951年10月，毛泽东和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等在一起。

1951年11月，毛泽东和医学家黄家驷、工商代表荣毅仁在一起。

1951年11月，毛泽东和甘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马鸿宾（左一）、宁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马腾霭（左二）在宴会上。

1951年，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青年志愿军代表，在了解了志愿军战士生活后，为青年志愿军代表签字留念。

1951年，毛泽东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并为其签名。

1951年，毛泽东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在一起。

1951年11月1日，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式上，毛泽东在郭树德的《毛泽东选集》上签名。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0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给傅种孙的信……………………………………………………………………1
（1951年10月23日）
关于通过和发表抗美援朝决议问题给周恩来的信……………………4
（1951年10月24日）
致达赖喇嘛电……………………………………………………………………5
（1951年10月26日）
在罗瑞卿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上加写的两段话……………………………………………………………………8
（1951年10月）
对朝鲜战场兵力调整和补充报告的批语……………………………10
（1951年10月）
关于徐向前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批语……………………………11
（1951年11月1日）
中央印发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的通知……………………………………………………………13
（1951年11月5日）
祝贺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致斯大林电……………………………………14
（1951年11月5日）
致达赖喇嘛电……………………………………………………………………15
（1951年11月10日）

为张仙朋题词 ……16
（1951年11月10日）
关于同意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布置致彭德怀等电 ……18
（1951年11月11日）
为审阅中央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稿给刘少奇等的信 ……21
（1951年11月12日）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22
（1951年11月12日）
关于为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给周扬的信 ……23
（1951年11月13日）
为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 ……24
（1951年11月13日）
在中央给张经武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26
（1951年11月14日）
给马寅初的一封信 ……27
（1951年11月15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的批语 ……29
（1951年11月16日）
对中宣部、文委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报告的批语 ……31
（1951年11月16日）
关于张经武留藏工作的批语 ……32
（1951年11月16日）
对胡乔木关于院系调整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真的信的批示 ……33
（1951年11月17日）

转发中财委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的通报的批语…34
（1951年11月17日）
给李介侯的信 ……………………………………………………36
（1951年11月18日）
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书信…37
（1951年11月18日、12月15日、12月23日）
中央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40
（1951年11月20日）
关于谈判军事分界线问题致李克农电 …………………………43
（1951年11月20日）
空军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 ……………………………………45
（1951年11月20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的批语 ………46
（1951年11月21日）
给王首道的信 ……………………………………………………47
（1951年11月21日）
给李维汉的信 ……………………………………………………48
（1951年11月22日）
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的批语 ………49
（1951年11月25日）
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50
（1951年11月26日）
给薄一波的信 ……………………………………………………51
（1951年11月27日）
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52
（1951年11月30日）

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54
（1951年11月30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的批语 ……………………………………………………55
（1951年11月30日）
为湖南农学院题名 ……………………………………………57
（1951年11月）
为贵州大学题名 ………………………………………………59
（1951年11月）
中央关于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致薄一波、刘澜涛电 ………61
（1951年12月1日）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62
（1951年12月1日、2日）
给郑振铎的信 …………………………………………………67
（1951年12月3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把领导重点转到工业生产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决定的批语 ……………………………………69
（1951年12月4日）
给董必武的信 …………………………………………………70
（1951年12月4日）
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71
（1951年12月4日）
中央转发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反贪污的报告的批语 ………73
（1951年12月5日）

转发装甲兵司令部关于精简节约工作报告的批语 ……………………74
（1951年12月5日）
关于交换战俘的批语 ………………………………………………………75
（1951年12月7日）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 ……………………………76
（1951年12月8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一九五二年华东工作纲要的批语 ………………………78
（1951年12月8日）
给钟志刚的信 ………………………………………………………………79
（1951年12月8日）
中央批转罗瑞卿关于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80
（1951年12月9日）
转发总政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82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邮电部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84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铁道部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85
（1951年12月11日）
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86
（1951年12月11日）
给毛泽连、毛远悌的信 ……………………………………………………88
（1951年12月11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违背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检讨报告的批语…89
（1951年12月12日）
复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电 ……………………………………90
（1951年12月12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党政军各部门统一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91
（1951年12月13日）
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 ………………………93
（1951年12月13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报告的批语 ……………………95
（1951年12月13日）
对外交部转发张闻天关于我驻东欧使馆工作报告的电报的批语 …97
（1951年12月13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电 ……………………………………………………99
（1951年12月13日）
中央转发高岗关于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101
（1951年12月14日）
给杨立三的信…………………………………………………………102
（1951年12月14日）
中央关于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103
（1951年12月15日）
中央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的批语 ……105
（1951年12月15日）
转发陈毅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的批语…106
（1951年12月15日）
中央转发平原省委关于干部中贪污腐化情况通报的批语…………107
（1951年12月15日）
在罗荣桓等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
建议信上的批语………………………………………………………108
（1951年12月15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110
（1951年12月17日）
转发肖华关于总政实行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112
（1951年12月17日）
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113
（1951年12月17日）
审阅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的批语……………………115
（1951年12月18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批准权的六项规定的批语…116
（1951年12月18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118
（1951年12月18日）
对北京被服厂工人来信的批语……………………………………120
（1951年12月18日）
关于处理志愿军休养员打人事件的批语…………………………121
（1951年12月18日）
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的来
信上的批语…………………………………………………………124
（1951年12月18日）
军委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125
（1951年12月19日）
对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的修改………………126
（1951年12月19日）
中央转发文委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128
（1951年12月20日）
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29
（1951年12月21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三反斗争的电报……131
（1951年12月21日）
中央关于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报告的批语……132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134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135
（1951年12月22日）
给章士钊的信……138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局三反报告的批语和复电……139
（1951年12月23日）
关于印发华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批语……141
（1951年12月23日）
给陈玉英的信……143
（1951年12月23日）
中央批准西北局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指示的电报……144
（1951年12月24日）
对中财委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收购棉花经验报告的批语……145
（1951年12月24日）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报告的批语……146
（1951年12月24日）
关于部队三反和整编的安排问题致谭政电……147
（1951年12月24日）
转发联运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148
（1951年12月24日）

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149
（1951年12月25日）
在中央转发中办秘书室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话……………150
（1951年12月25日）
中央关于西南局决定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致各中央局电…151
（1951年12月26日）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初步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52
（1951年12月26日）
关于同意将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致陈毅电……………154
（1951年12月28日）
关于播发饶漱石的演说给新华社的批语 ……………………156
（1951年12月28日）
关于同意对付敌人拖延谈判的办法致李克农电…………………157
（1951年12月28日）
给黄炎培的信………………………………………………158
（1951年12月29日）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159
（1951年12月30日）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160
（1951年12月30日）
对编余部队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批语…………………162
（1951年12月30日）
对董必武等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复信…163
（1951年12月30日）
中央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 ……………………………165
（1951年12月30日）

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补充指示的批语……………167
（1951年12月30日）
关于回谢生日贺电问题的批语……………………………………168
（1951年12月30日）
给易南屏的信………………………………………………………169
（1951年12月30日）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170
（1951年12月31日）
转发志愿军四十二军党委关于节约计划报告的批语………………172
（1951年12月31日）
为《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一书封面题词……………………………173
（1951年）
为复旦大学题名……………………………………………………175
（1951年）
为《新农村》题名…………………………………………………176
（1951年）
元旦祝词……………………………………………………………179
（1952年1月1日）
对中南军区三反指示和谭政来电的复电和批语……………………180
（1952年1月1日）
在川北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183
（1952年1月1日）
转发志愿军二十兵团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184
（1952年1月2日）
答谢威廉·皮克祝贺生日的电报……………………………………185
（1952年1月2日）

祝贺威廉·皮克寿辰的电报 ……………………………………………………186
（1952年1月2日）
对组织空军部队到朝鲜战场作战的报告的批语……………………187
（1952年1月2日）
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188
（1952年1月4日）
转发江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190
（1952年1月4日）
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191
（1952年1月4日）
对聂荣臻关于山东回民支队整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92
（1952年1月4日）
关于大贪污犯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的批语和加写的话……………193
（1952年1月4日、6日）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 …195
（1952年1月4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200
（1952年1月5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的批语 ……202
（1952年1月5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三反中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批语………………203
（1952年1月5日）
关于起草惩治浪费条例和修改惩治贪污条例的批语………………204
（1952年1月5日）
对张劲夫关于浙江省直属机关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205
（1952年1月5日）

对中共济南市委报告的批示……………………………………206
（1952年1月6日）
对中南局关于近几个月内少开主要干部出席的业务会议的建议的批语…207
（1952年1月8日、11日）
关于军事系统三反报告一般由总政处理的批语…………………209
（1952年1月9日）
对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210
（1952年1月9日）
给罗元贞的信…………………………………………………………211
（1952年1月9日）
转发罗瑞卿关于公安部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212
（1952年1月10日）
转发空军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213
（1952年1月10日）
中央关于天津市委对干部超支问题所作分析的批语……………215
（1952年1月10日）
对山东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16
（1952年1月10日）
转发西康军区关于三反的紧急指示的批语………………………217
（1952年1月10日）
转发饶漱石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218
（1952年1月13日）
在中南局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220
（1952年1月13日）
在薄一波转报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报告的信上的批语…221
（1952年1月13日）

在习仲勋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电报上的批语…………223
（1952年1月13日）

转发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报告的批语…………………224
（1952年1月14日）

关于美机犯境我方应不示弱致李克农电………………………225
（1952年1月14日）

对集宁军分区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226
（1952年1月14日）

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227
（1952年1月14日）

关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应主动反击敌人的电报………………228
（1952年1月15日）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通报的批语………229
（1952年1月15日）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230
（1952年1月15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的批语……232
（1952年1月15日）

转发贵州军区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的批语………………233
（1952年1月15日）

对总政关于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三周简报的批示的批语…………235
（1952年1月15日）

对聂荣臻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建议的批语…236
（1952年1月15日）

转发华北军区十军党委关于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237
（1952年1月16日）

关于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问题的批语……………………………239
（1952年1月17日）
关于同意华东部队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建议的批语…240
（1952年1月18日）
在中央关于省以上部门驻外地机构的三反斗争由当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242
（1952年1月20日）
中央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的批语和修改……………………………………………………243
（1952年1月21日）
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通知的批语和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245
（1952年1月21日、2月3日）
关于全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然后整编的电报……………………247
（1952年1月22日）
对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248
（1952年1月22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报告的批语…………249
（1952年1月22日）
关于军委民航局三反斗争的批语……………………………………250
（1952年1月22日）
对纺织部关于经纬纺织机器厂盲目施工造成严重问题的检讨的批语…251
（1952年1月23日）
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252
（1952年1月23日）
对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五周简报的批语……………………………254
（1952年1月24日）

对山西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综合报告的批语……………………255
（1952年1月24日）
在第一航校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报告上的批语………………256
（1952年1月25日）
转发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257
（1952年1月25日）
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259
（1952年1月26日）
对华东一级机关三反运动简况报告的复电和批语………………262
（1952年1月26日）
对刘澜涛关于华北军区捉虎情况报告的批语……………………264
（1952年1月26日）
对华北局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作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的紧急指示的批语……………………………………………265
（1952年1月26日）
转发中南军区关于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的批语 ………266
（1952年1月27日）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268
（1952年1月27日）
对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269
（1952年1月27日）
吊唁乔巴山逝世致布曼增迪电………………………………………271
（1952年1月27日）
转发北京市打虎经验的批语…………………………………………272
（1952年1月28日）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预算报告的批语……………………273
（1952年1月30日）
对华北局关于山西省打虎数目的指示的批语……………………274
（1952年1月30日）
转发东北局关于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的电报……………………275
（1952年1月31日）
关于搜捕大老虎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致高岗电 ………………276
（1952年1月31日）
在中财委机关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二次报告上的批注…………279
（1952年1月）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处理部队生产基金和盈利问题的意见的批语…280
（1952年1月）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281
（1952年2月1日）
关于西北军区二月份应深入三反着重打虎的电报…………………283
（1952年2月1日）
对薄一波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284
（1952年2月1日）
对空军第三师战况报告的批语……………………………………286
（1952年2月1日）
中央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287
（1952年2月2日）
转发十军打虎经验的批语…………………………………………288
（1952年2月2日、6日）
转发李富春在中财委汇报会议上的打虎总结报告的批语…………290
（1952年2月2日）

转发安子文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292
（1952年2月4日）
转发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的几项决定和河北打虎任务的批语……293
（1952年2月4日）
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294
（1952年2月4日）
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致谭政电……………………………………297
（1952年2月4日）
对华北区二月底以前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 ……………………299
（1952年2月4日）
关于转发三个打虎文件的批语………………………………………301
（1952年2月4日）
关于注意领导生产问题………………………………………………303
（1952年2月4日）
答谢胡志明祝贺中越建交两周年的电报 …………………………304
（1952年2月4日）
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305
（1952年2月5日）
中央关于派彭真、罗瑞卿去华东、中南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306
（1952年2月5日）
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 ………………………………………307
（1952年2月5日）
对六十六军打虎报告的批语…………………………………………308
（1952年2月5日）
在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309
（1952年2月5日）

对劳动部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报告的批语……310
（1952年2月6日）
转发中财委关于财经工作几点意见的批语……312
（1952年2月6日）
对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313
（1952年2月7日）
对中南军区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314
（1952年2月7日）
中央对上海市委关于在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的批语……315
（1952年2月7日）
关于推迟公审违法资本家的批语……317
（1952年2月7日、8日）
对刘澜涛关于六十六军捉虎经验报告的批语……318
（1952年2月8日）
转发天津十一区打大虎的经验的批语……319
（1952年2月8日）
对军事学院两份三反报告的批语……320
（1952年2月8日）
关于纠正连队干部军阀主义作风问题……321
（1952年2月8日）
中央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322
（1952年2月9日）
中央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稿和毛泽东对此稿的说明……326
（1952年2月9日）

对高岗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328
（1952年2月9日）
对华北军区关于三反中被撤职干部的待遇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30
（1952年2月9日）
转发华东军区捉虎报告的批语…………………………………………331
（1952年2月10日）
对刘澜涛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332
（1952年2月10日）
对张宗逊等关于西北军区整编问题指示的批语………………………333
（1952年2月10日）
转发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335
（1952年2月10日）
对王鹤寿等关于东北工业部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338
（1952年2月10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地、县、区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
的指示的批语……………………………………………………………339
（1952年2月11日）
祝贺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致斯大林电……………………………341
（1952年2月11日）
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342
（1952年2月11日）
关于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的电报………………………………343
（1952年2月11日）
关于六十六军打虎经验的批语…………………………………………344
（1952年2月11日、12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的批语……………347
（1952年2月12日）
对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扩大会议几项决议的报告的批语……349
（1952年2月12日）
关于转载王芸生文章给邓拓的信……………………………………351
（1952年2月12日）
中央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352
（1952年2月13日）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增加打虎预算的报告的批语……………………353
（1952年2月13日）
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批语……………………………………………………354
（1952年2月13日）
关于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停止三反、全力对敌的电报………………355
（1952年2月13日）
朝鲜停战谈判能否成功系于美国政府有无诚意……………………356
（1952年2月14日）
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358
（1952年2月15日）
关于中央一级不准备审判中小贪污犯复习仲勋电…………………361
（1952年2月15日）
给毛岳乔的信…………………………………………………………362
（1952年2月15日）
对周恩来关于解决三反中业务停顿问题的意见的批语……………363
（1952年2月16日）

转发中南军区后勤部打虎经验的批语……364
（1952年2月16日）
对一九二师炮兵团部分同志关于三反斗争的建议信的批语……365
（1952年2月16日）
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366
（1952年2月17日）
军委同意志愿军三十九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的电报……367
（1952年2月17日）
关于同意西南区打虎新计划的复电……368
（1952年2月17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区打虎新预算报告的批语……369
（1952年2月17日）
关于派陈伯达去东北了解五反情况给高岗的信……371
（1952年2月17日）
关于中南军区应增加打虎预算致谭政等电……372
（1952年2月18日）
对罗瑞卿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报告的批语和复电……373
（1952年2月18日）
转发南京市委关于宣教系统打虎情况报告的批语……375
（1952年2月18日）
对劳动部关于劳动行政机关在三反中应注意的几点意见的批语…376
（1952年2月18日）
关于转发贸易部打虎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378
（1952年2月18日）
中央转发南汉宸等关于三反以来金融情况报告的批语……379
（1952年2月19日）

对聂荣臻关于朝鲜前线敌大面积空投带菌昆虫等的报告的批语…381
（1952年2月19日）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两个报告的批语……………………382
（1952年2月20日）
转发华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384
（1952年2月20日）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捉人封店问题致华东局电………………385
（1952年2月20日）
关于华南分局打虎部署复叶剑英电………………………………386
（1952年2月21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387
（1952年2月22日）
转发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批语……………………………………389
（1952年2月22日）
中央关于改派薄一波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390
（1952年2月22日）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391
（1952年2月22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393
（1952年2月23日）
关于上海市应抓紧完成三反打虎任务开展五反斗争的电报………395
（1952年2月23日）
关于同意罗瑞卿对三反中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意见的电报…396
（1952年2月23日）
中央关于县区乡三级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397
（1952年2月24日）

关于检查和报告西安市五反斗争实际情况致习仲勋电……………398
（1952年2月24日）
转发华东局关于上海奸商借公私合营损公肥私的报告的批语……400
（1952年2月25日）
对周恩来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报告的批示…………………402
（1952年2月25日）
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403
（1952年2月26日）
关于加强对陈嘉庚保卫工作的批语…………………………………404
（1952年2月26日）
中央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405
（1952年2月27日）
关于拍摄三反纪录片问题复高岗电…………………………………407
（1952年2月27日）
对宣传第一批女飞行员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08
（1952年2月27日）
对新乡地委打虎经验的批语…………………………………………411
（1952年2月27日）
中央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批语……412
（1952年2月28日）
对薄一波关于上海三反五反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413
（1952年2月29日）
对陈毅关于华东军区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414
（1952年2月29日）
对李富春关于起草追赃问题文件的来信的批语……………………416
（1952年2月29日）

对东北贸易部围剿大贪污分子大会的经验的批语……………………417
（1952年2月29日）
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语………………………………418
（1952年3月1日）
在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三反报道中发生错误的检讨上的批语……………………………………………………………419
（1952年3月1日）
对李富春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规定和追赃规定的报告的批语…421
（1952年3月1日）
转发薄一波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22
（1952年3月1日）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23
（1952年3月2日）
中央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公审办法的指示………………………425
（1952年3月2日）
转发刘澜涛关于华北破获两起大案的报告的批语…………………426
（1952年3月2日）
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报告的批语……427
（1952年3月3日）
中央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428
（1952年3月4日）
关于中央各部在三反中应指导下级的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批语…430
（1952年3月4日）
关于感谢苏联专家对鞍钢建设的援助复高岗电……………………431
（1952年3月4日）

对新疆党政军机关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432
（1952年3月4日）
关于谭震林、陈丕显任职问题的批语和电报……………………433
（1952年3月4日、9日）
对林业部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报告的批语…………435
（1952年3月4日）
在肖华关于军委直属部队开展打虎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436
（1952年3月4日）
转发华东军区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指示的批语……………437
（1952年3月4日）
关于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等的批语……………………………438
（1952年3月4日）
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报告的批语…………………439
（1952年3月5日）
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442
（1952年3月5日）
对二十二兵团清算贪污的时间界限的批语…………………………446
（1952年3月5日）
转发新华社关于南京市在五反中集中训练工商界高级职员的经验的批语……………………………………………………………447
（1952年3月5日）
转发中央政法干校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448
（1952年3月5日）
对聂荣臻、粟裕关于敌机在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方措施的报告的批语…449
（1952年3月5日）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450
（1952年3月5日）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所写的
批语和通知…………………………………………………………451
（1952年3月6日）
中央转发关于正确贯彻处理纪凯夫案件精神的两个文件的批语…453
（1952年3月6日）
对华东局第八号打虎战报的批语……………………………………455
（1952年3月6日）
在中央给邓小平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456
（1952年3月7日）
关于严格掌握广州五反等问题致叶剑英电…………………………457
（1952年3月7日）
在中央关于三反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458
（1952年3月7日）
对武陟等县关于追赃的几项政策规定的批语………………………459
（1952年3月9日）
在聂荣臻关于国内防疫工作报告上的批语…………………………460
（1952年3月9日）
对钟赤兵关于民航机构设置和领导关系的建议的批语……………461
（1952年3月11日）
中央对西北局关于开展五反的步骤和策略报告的复电……………462
（1952年3月11日）
给程潜的信…………………………………………………………464
（1952年3月11日）

给周世钊的信……………………………………………………………467
（1952年3月11日）
请苏联增派一个空军师协助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468
（1952年3月11日）
对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和五反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69
（1952年3月13日）
转发五台县委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报告的批语…………………471
（1952年3月13日）
中央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472
（1952年3月16日）
对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上报的防疫工作资料的批语……………473
（1952年3月16日）
关于要新华社向各地通报五反的好经验给杨尚昆的信…………474
（1952年3月16日）
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的批语…………………………………475
（1952年3月17日）
军委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指示的批语…476
（1952年3月17日）
接受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77
（1952年3月18日）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权五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78
（1952年3月18日）
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等问题报告的批语…479
（1952年3月20日）
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的批语…481
（1952年3月22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五反的报告的批语……………………………482
（1952年3月22日）
彭德怀回国治病陈赓去朝代理指挥……………………………………484
（1952年3月22日）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485
（1952年3月23日）
中央转发徐子荣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的批语…488
（1952年3月24日）
在中央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489
（1952年3月）
同意建立军事工程学院…………………………………………………490
（1952年3月26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批语和意见…………………491
（1952年3月27日）
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
见的指示稿的修改……………………………………………………493
（1952年3月27日）
给李达的信……………………………………………………………494
（1952年3月27日）
中央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495
（1952年3月28日）
对周恩来送审水利工作两文件的批示…………………………………496
(1952年3月29日）
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市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97
（1952年3月29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在三反五反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的批语···498
（1952年3月29日）
关于要新华社选送五反材料的批语······500
（1952年3月30日）
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修改······501
（1952年3月）
对西藏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502
（1952年4月1日）
在中央转发全总党组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503
（1952年4月1日）
为转发一封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来信的批语······504
（1952年4月3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的批语······505
（1952年4月4日）
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506
（1952年4月4日）
中央关于广州市五反工作的指示······508
（1952年4月5日）

给傅种孙[1]的信

（1951 年 10 月 23 日）

傅先生：

汤先生[2]追悼会需表示悼唁。遵嘱为数学杂志[3]写了题名，不知可用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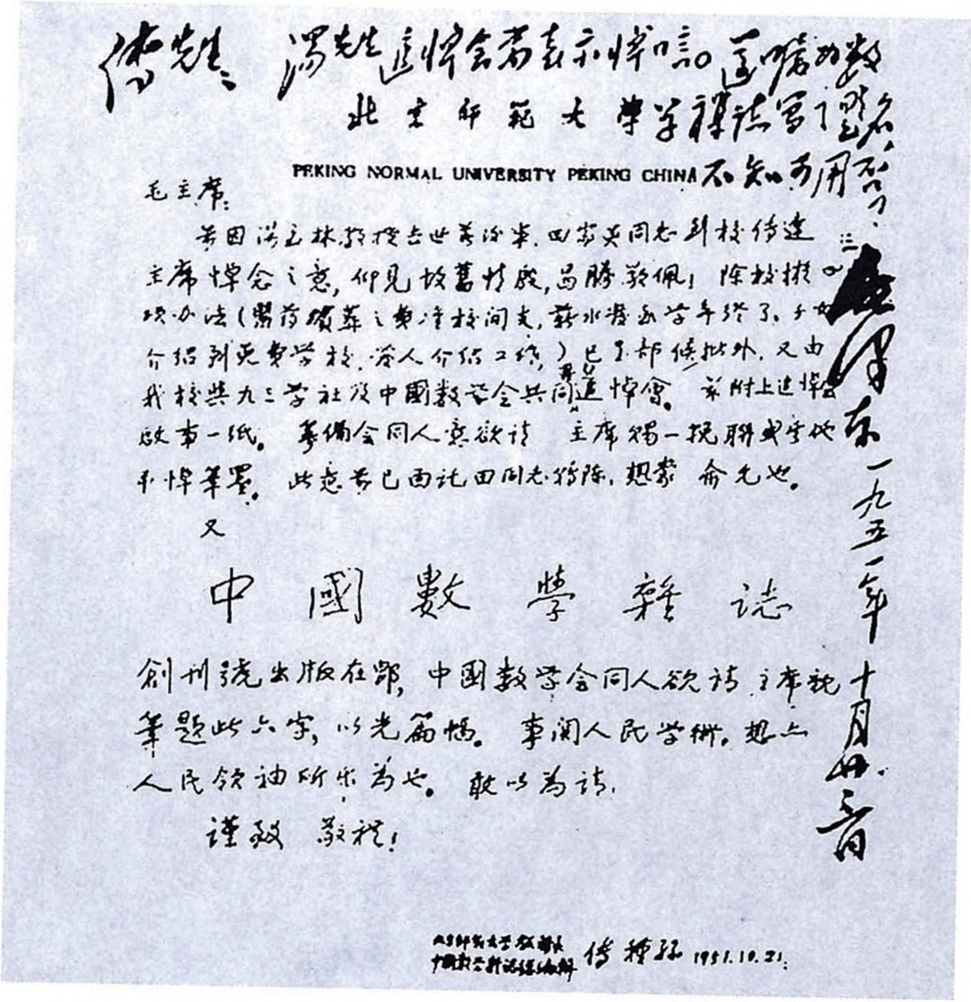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廿三日

---

[1] 傅种孙，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

[2] 指汤孟林，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他逝世后，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表示悼念。

[3] 《数学杂志》，1936 年 8 月 1 日在上海正式出版，是我国第一份全国性的数学普及刊物。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39 年至 1950 年被迫停刊。1951 年 11 月复刊，改名为《中国数学杂志》，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刊名，1953 年更名为《数学通报》，请郭沫若题写了刊名。1966 年因“文化大革命”停刊，1979 年 7 月复刊至今。



傅先生：汤先生追悼会当表示悼唁。遵嘱书数字，杂志写了题签，不知可用否？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卅日

北京师范大学
PEKING NORMAL UNIVERSITY PEKING CHINA

毛主席：

前因汤璪真教授去世善后事，曾劳吴同志到校传达主席悼念之意，仰见故舊情殷，曷胜钦佩！除校拟之办法（照前次殓葬之费由校开支，薪水发至学年终了，子女介绍到免费学校，家人介绍工作）已呈部候批外，又由我校与九三学社及中國数学会共同举追悼会，兹附上追悼启事一纸。筹备会同人意欲请主席赐一挽联或字以示悼笔墨。此意曾已面托田同志转陈，想荷俞允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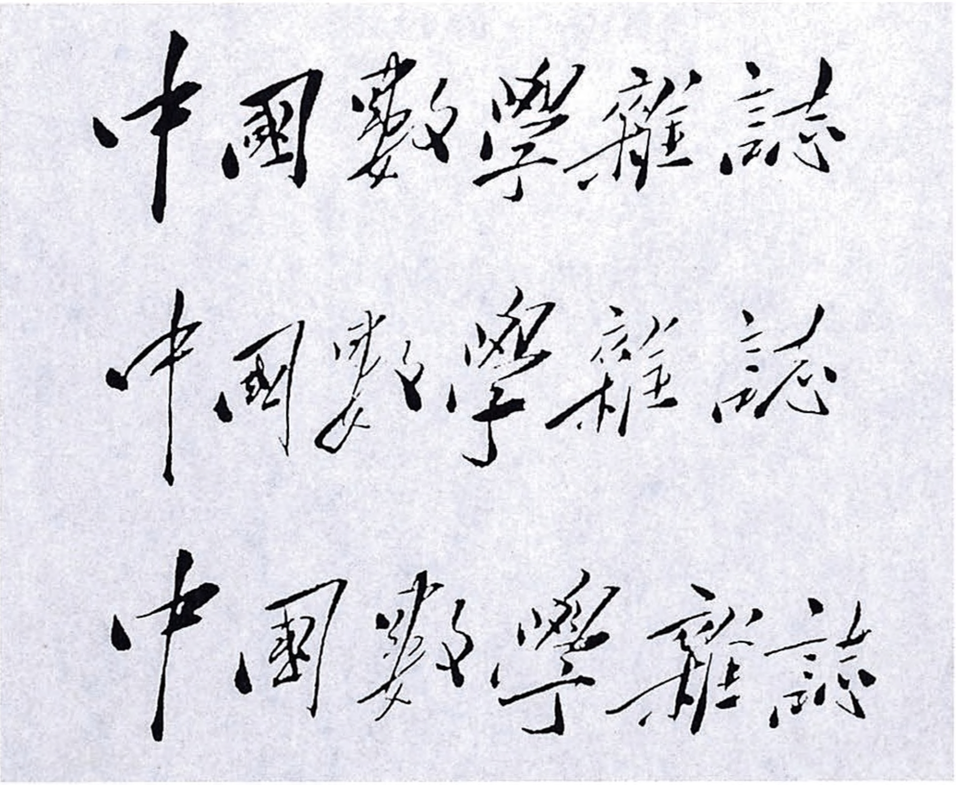
中國數學雜誌

创刊号出版在即，中國数学会同人欲请主席亲笔题此六字，以光篇幅。事关人民学术，想亦人民领袖所乐为也。敢以为请。

谨致　敬礼！

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
中国数学杂志总编辑　傅种孙　1951.10.21.

毛泽东致傅种孙信的手稿。


中國數學雜誌
中國數學雜誌
中國數學雜誌

毛泽东为《中国数学杂志》题写的刊名。

关于通过和发表抗美援朝决议问题给周恩来的信

（1951年10月24日）

周：

既然有各民主党派作了演说，抗美援朝决议[1]似乎还是今日通过明天发表为好。

毛泽东

即

---

[1] 指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抗美援朝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于1951年10月24日通过，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致达赖喇嘛[1]电

（1951年10月26日）

达赖喇嘛先生：

你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已经收到了。我感谢你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2]的努力，并致衷心的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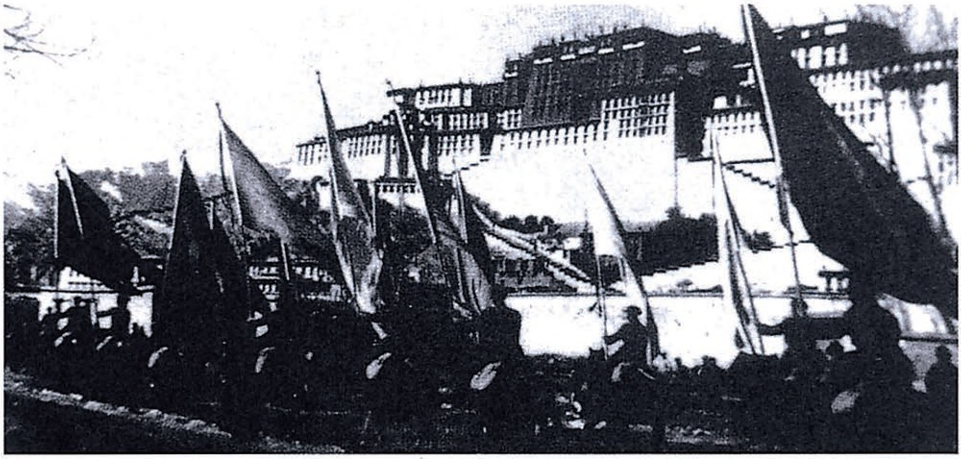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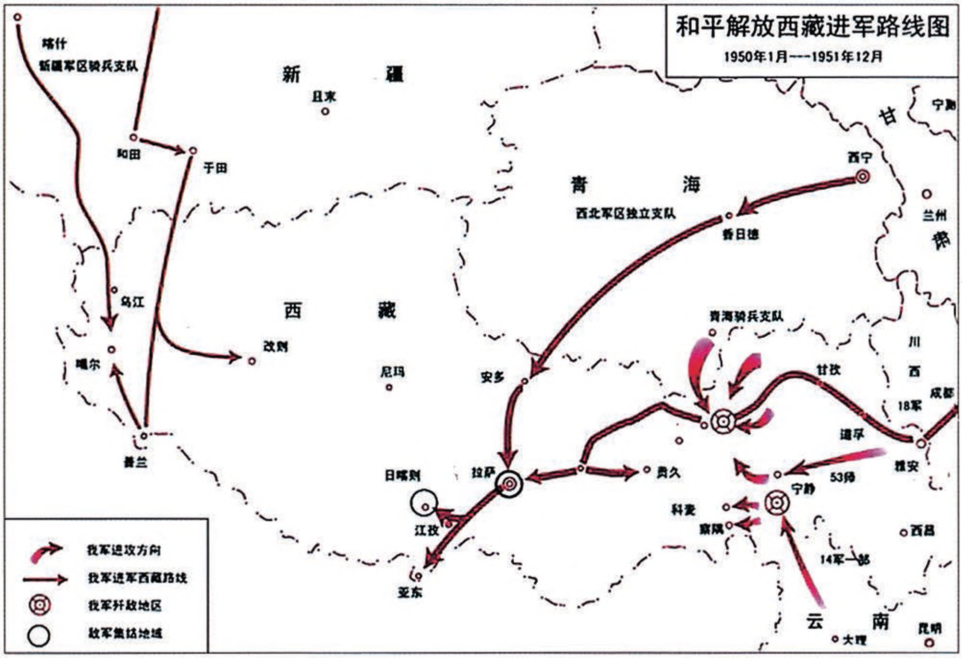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愿意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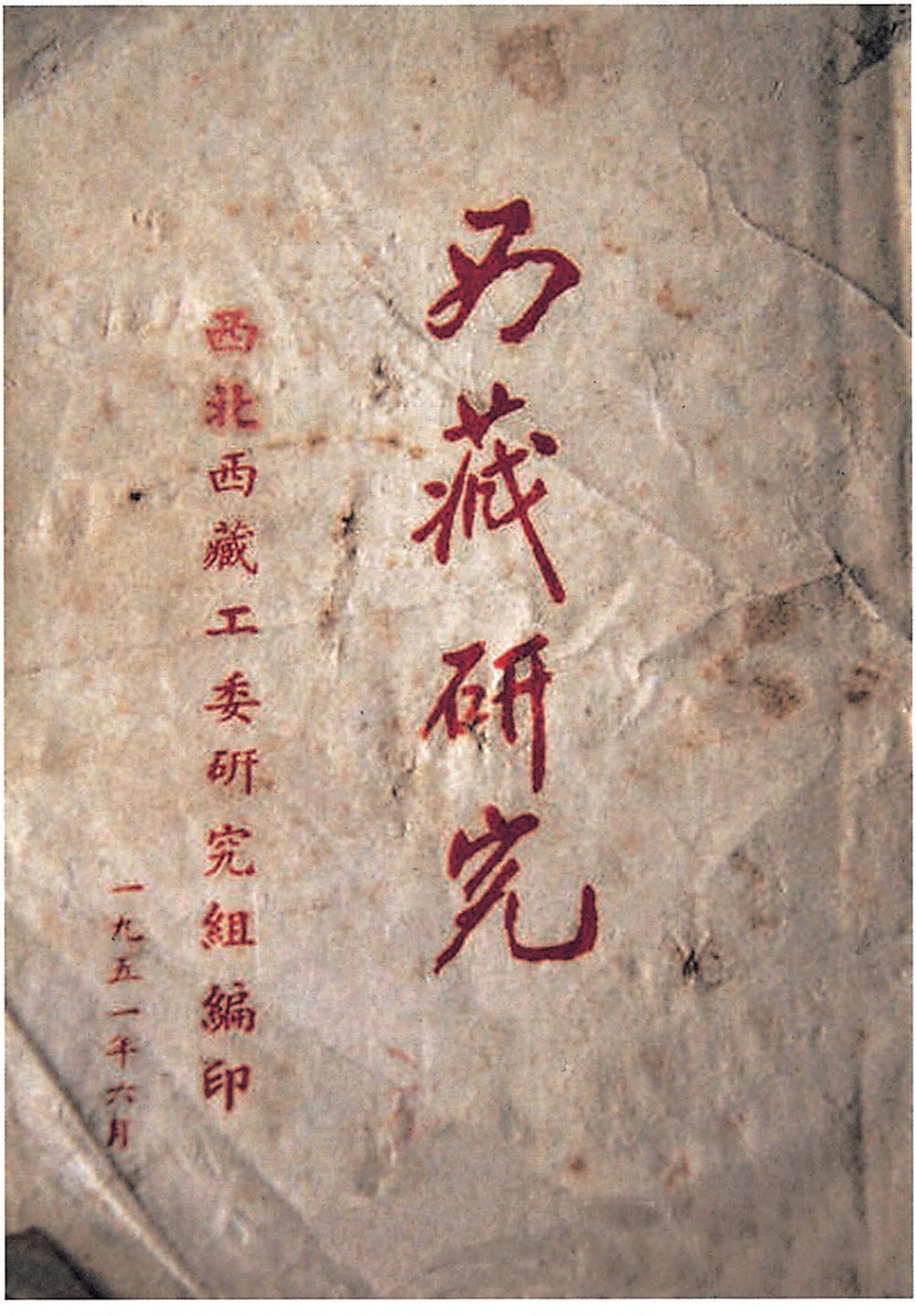
[2] 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即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实现了除台湾省和沿海一些岛屿外，全国各民族的大统一和大团结。


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路线图
1950年1月---1951年12月
喀什
新疆军区骑兵支队
新
疆
且末
和田
于田
青
海
西宁
西北军区独立支队
香日德
甘
兰州
肃
西
藏
乌江
噶尔
改则
尼玛
安多
普兰
青海骑兵支队
甘孜
川
西
成都
18军
道孚
雅安
53师
宁静
日喀则
拉萨
贵久
科麦
察隅
江孜
亚东
西昌
14军一部
云
南
大理
昆明
我军进攻方向
我军进军西藏路线
我军歼敌地区
敌军集结地域

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路线图。



西藏研究

西北西藏工委研究組編印

一九五一年六月

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发放的学习材料——《西藏研究》。

在罗瑞卿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1]上加写的两段话

（1951年10月）

一

委员们和诸位同志，我认为有使同志们明了目前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情况，并对这种反革命活动提高警惕的必要，否则我们就要上反革命的当。

二

当然，我举出这些材料，不是说反革命活动比较一年前还更严重了，当然不是这样，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准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作报告的草稿。

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

对朝鲜战场兵力调整和补充报告的批语[1]

（1951年10月）

同意[2]，请周[3]、聂办。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10月17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最近志愿军在阻击作战中是极为英勇顽强的，一个阵地虽遭敌发炮二三万发，工事被摧毁，但在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作战下，均反复争夺10余次（多达15次），致给敌打击极重，战果辉煌。鉴于第二十兵团的伤亡情况及正面较宽（含第二十六军正面70余公里）及第二十六军长时间未得休整等情况，为防万一，建议第二十兵团方面再增调一个军作为机动部队。另为适当地补充第二十兵团及第十九兵团（含第四十七军），拟将中南已训练了4个多月的新兵，调3万人于本月底以前集中到东北，准备敌攻势一被粉碎，即行补充。周恩来10月17日批示："与节约兵力无碍，妥否，请主席批示。"

[3] 周，指周恩来。

关于徐向前[1]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批语[2]

（1951年11月1日）

一

征求向前同志同意，如果向前同意的话，可以这样办。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二

向前同志：

前次见面时，我说可抄一些报给你看。后来我觉得你还是静

---

[1] 徐向前，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因病休养。

[2]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1951年11月1日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请示信上写的两条批语。聂荣臻在信中说："为加强华北军区工作，提议以杨成武为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同志免兼华北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养，不看电报为好，故未叫机要处抄给你。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中央印发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的通知

（1951年11月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及工会党组：

兹将关于清理厂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中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并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央

十一月五日

---

[1] 中共中央1951年11月5日发出的这一指示，分析了全国解放以后厂矿交通等企业进行民主改革和清理反革命分子的状况，指出了对这些企业内的残余反革命势力加以系统的清理，对国营企业内所遗留的旧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指示对清理工作的领导问题，政策界限问题，防止反革命破坏问题，保持生产正常秩序问题，以及后期的制度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祝贺十月革命三十四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1 年 11 月 5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

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四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我个人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您致衷心的祝贺。

请让我祝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正在开始的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种成就使全世界劳动人民获得了为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无限勇气。

请让我祝贺苏联的和平政策的伟大胜利，这种胜利挫败了战争挑拨者的可耻阴谋，团结了全世界的和平人类，使他们相信和平可以战胜战争。

请让我祝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益亲密的不可动摇的伟大友谊，这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友谊，是世界和平进步事业必然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　北京

致达赖喇嘛电

（1951年11月10日）

达赖喇嘛先生：

十一月四日来电悉，班禅额尔德尼先生入藏[1]事宜，已嘱西北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帮助，一俟准备停当，即可起程。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十世班禅，青海循化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各种原因，西藏上层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于1923年被迫离开西藏日喀则札什伦布寺，避居内地，因西藏地方当局阻挠，一直未能返回西藏，1937年12月在青海玉树去世。1949年6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继位后，仍留居青海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天，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朱德，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望西藏早日解放。鉴于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历史地位和西藏广大僧俗群众的意愿，和为了促进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与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共中央支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负责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返回西藏的准备工作和护送工作。1951年12月29日，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从青海西宁起程，于1952年4月28日抵达拉萨，6月8日回到后藏日喀则。

为张仙朋[1]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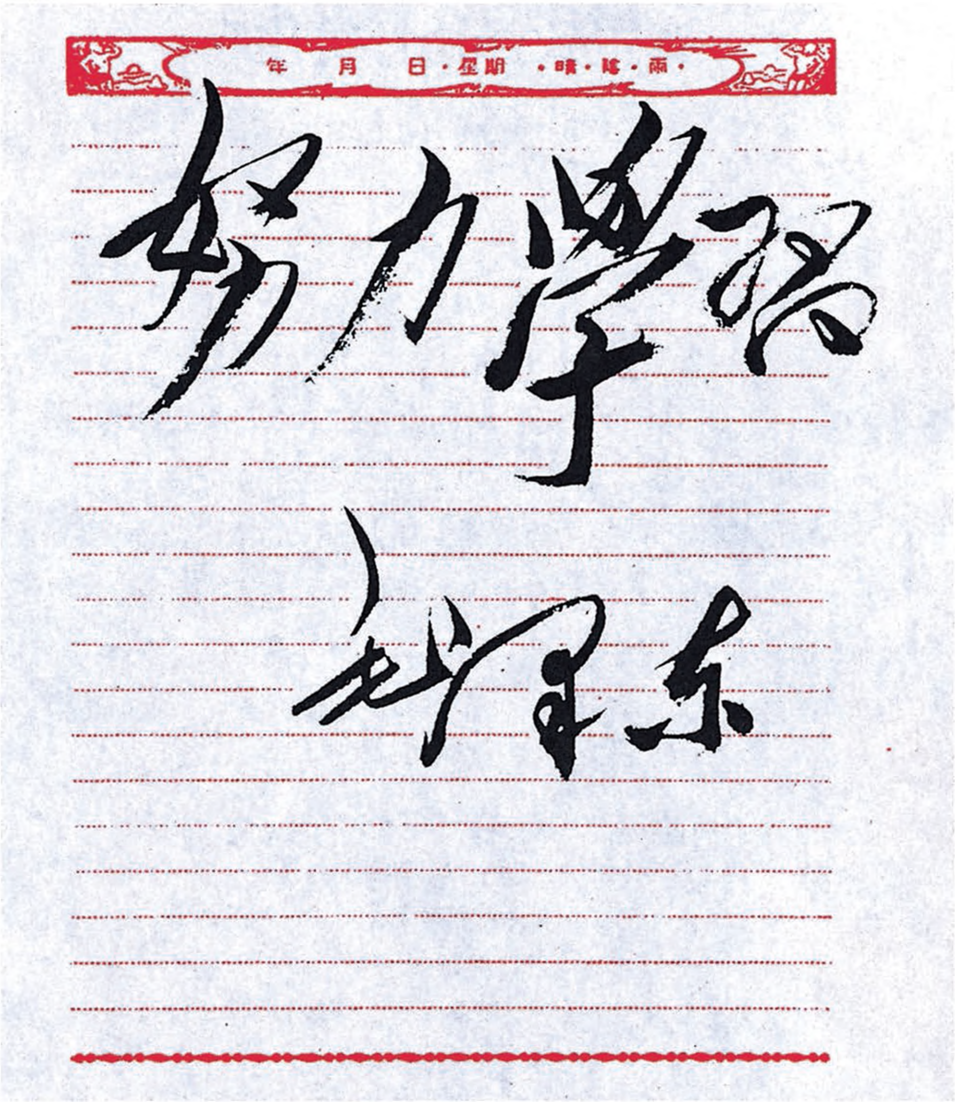
（1951 年 11 月 10 日）

努力学习。

毛泽东

---

[1] 张仙朋，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



年　月　日·星期　·晴·阴·雨·

努力学习

毛泽东

毛泽东为张仙朋的题词。

关于同意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布置致彭德怀等电

（1951年11月11日）

彭、邓、陈[1]，并志愿军党委诸同志：

十一月八日来电[2]收到。我们认为志愿军党委决定，各项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们在朝鲜，我们在国内，一致配合进行大规模的切实可行的精简节约，加上国内的增产运动，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确有把握完成任务了。我们和敌人进行的谈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成功，我们也确有把握使战争继续打下去，直到争取胜利为止，同时毫不妨碍国内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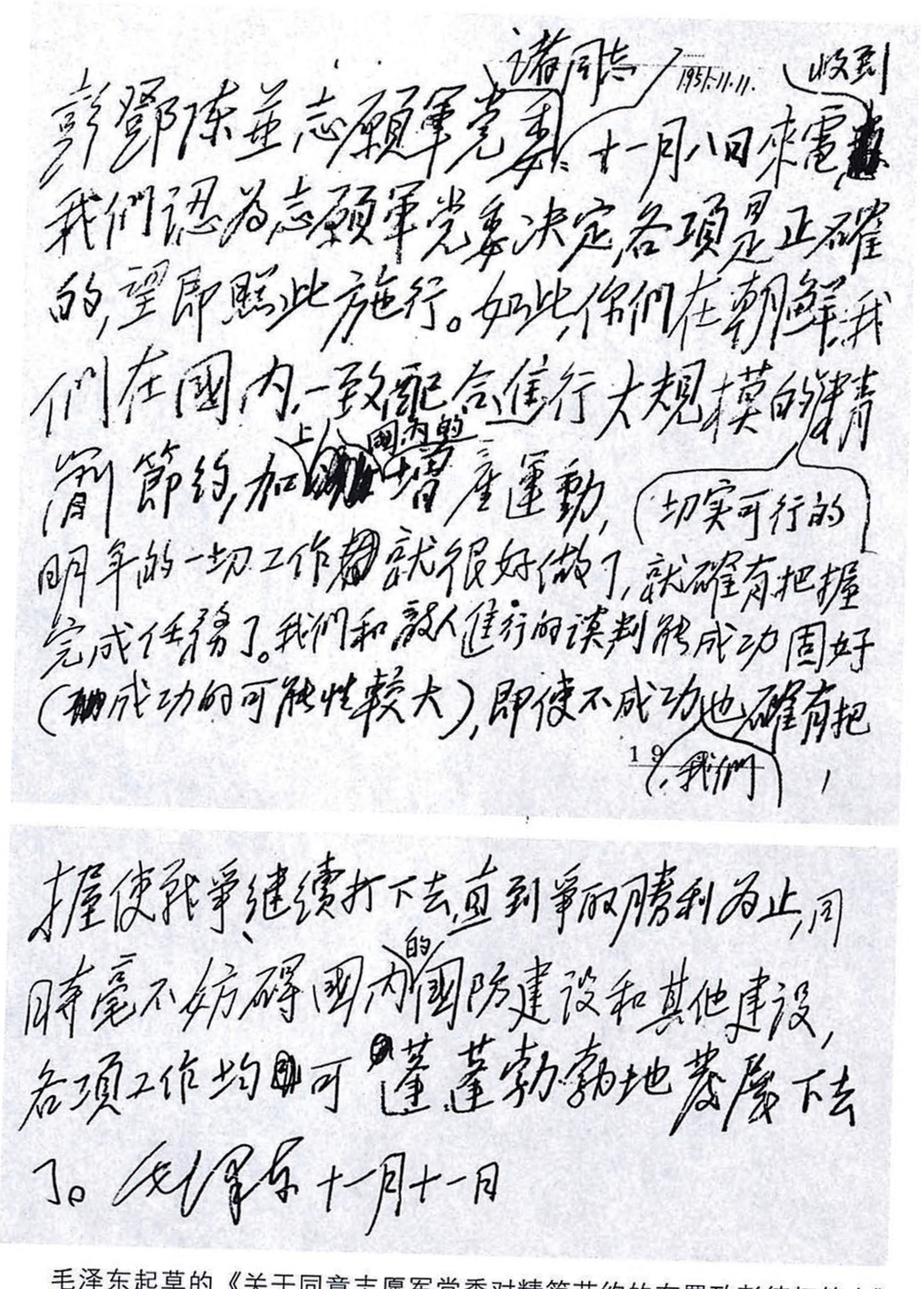
---

[1] 彭、邓、陈，指彭德怀、邓华、陈赓，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和副司令员。

[2] 指1951年11月8日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关于精简节约的布置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电报。电报说：听了邓华传达中央关于紧缩军队，节约增产，来克服财经困难，以利继续支援朝鲜作战与建设现代化国防和军事工业的决议之后，一致认为中央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就编制的整理问题、节约问题作了布置：裁并兵团、军、师直属机关；减少机关人员和勤杂人员；严格车、马配备；减少在朝人员，多余民工、徒手炮兵、老弱残疾人员精简回国；严格注意防空，不断改善运输、装卸、保管及分配方法，以减少途中与终点损失；号召全体指战员十分注意爱护物资，节约使用，并尽可能利用缴获物资武器；提高射击技术，精确瞄准，严格纠正浪费弹药的现象。

防建设和其他建设，各项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发展下去了。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



1951.11.11.

彭鄧陳並志願軍黨委諸同志：十一月八日來電收到，我們認為志願軍黨委決定各項是正確的，望即照此施行。如此，你們在朝鮮，我們在國內一致配合進行大規模的切實可行的精簡節約，加上國內的增產運動，明年的一切工作就很好做了，就確有把握完成任務了。我們和敵人進行的談判能成功固好（成功的可能性較大），即使不成功，我們也確有把握使戰爭繼續打下去直到爭取勝利為止，同時毫不妨礙國內的國防建設和其他建設，各項工作均可蓬蓬勃勃地發展下去了。毛澤東 十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同意志愿军党委对精简节约的布置致彭德怀等电》的手稿。

为审阅中央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稿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1年11月12日）

刘、周、朱、彭真、胡乔木、杨尚昆[1]同志：

此件[2]经彭真同志起草，并征求各中央局书记意见加以修改，又经陈伯达[3]同志作了一次修改，我看过，可用。

现送请你们审阅，如有意见，请即提出，如无意见，请尚昆再打清样二份，一份连原稿送陈伯达，一份送我，看一遍，即可发出。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稿。这个指示于1951年11月30日印发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各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青年团团委。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罗查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1 年 11 月 12 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大不列颠爱尔兰暨英国海外诸自治领国王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中巴两国人民间存在着长期的友谊。在促进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发展及争取亚洲及世界的持久和平上，贵我两国人民有着共同的愿望。中巴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不但将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日益增进与巩固，而且必将有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定。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巴基斯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关于为皖北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给周扬[1]的信

（1951年11月13日）

周扬同志：

（一）题字[2]照办了，但不要印给别处，因别处的任务不都是在农村。（二）在你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目前没有时间。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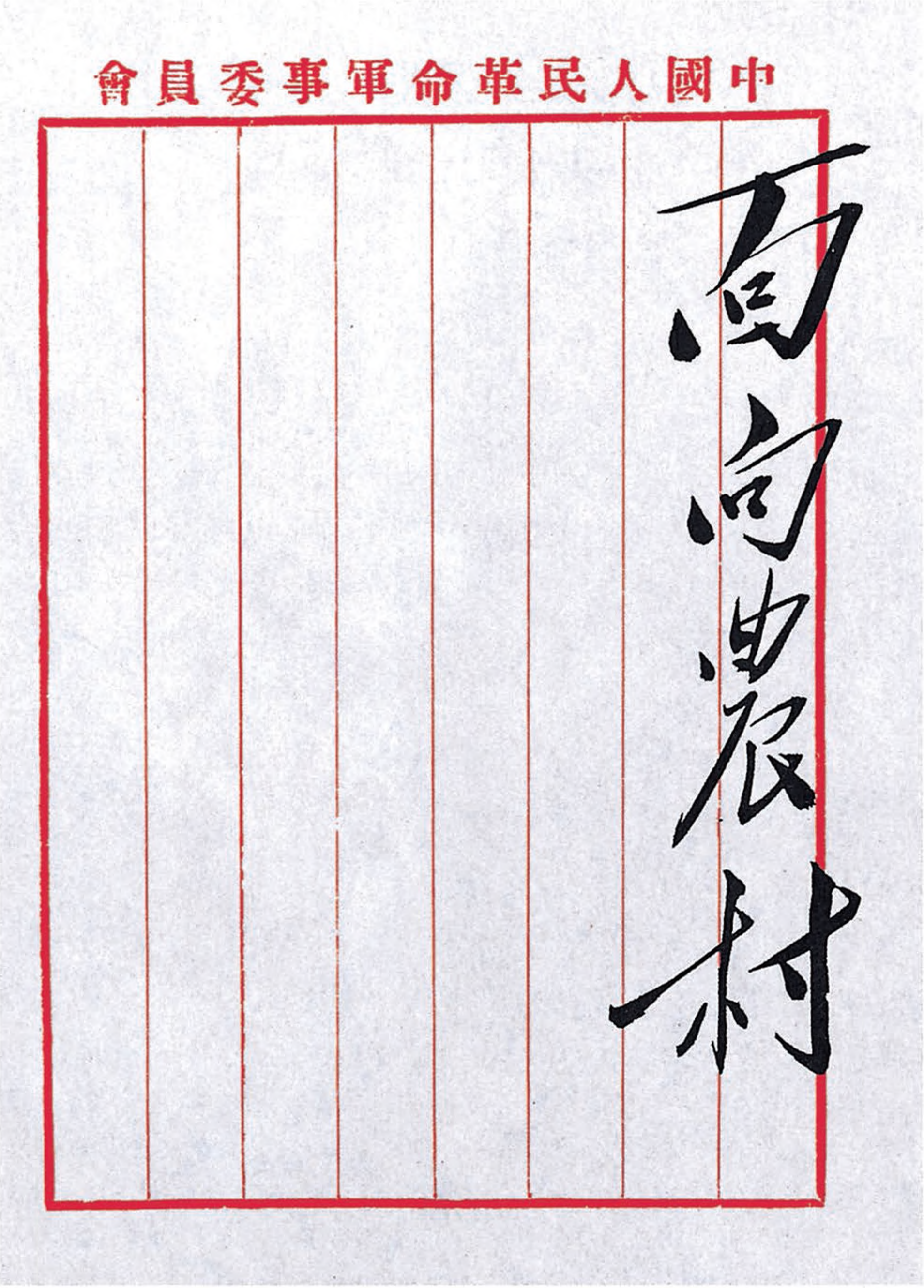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毛泽东为皖北区滁县专区文工团的题词“面向农村”。

为滁县专区文工团题词

（1951年11月13日）

面向农村。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面向農村

毛泽东为滁县专区文工团的题词。

在中央给张经武[1]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1951年11月14日）

因达赖送礼事[2]与你回中央一事有关，但中央认为你暂时应留拉萨帮助国华[3]等工作一个时期，何时回来将来再定，因此达赖送礼事亦应缓办。

---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2] 指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准备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送礼物一事。中央在给张经武的电报中，指示了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只要送毛主席一份礼物即够，且礼物不要多。锦旗外，送什么东西，由他们决定。但除供陈列的文物外，土产和用品都不要送（都是取之于民的东西），或尽少送。此外，向朱总司令、周总理送一面锦旗，对其他负责人均不要送。"

[3] 国华，即张国华，当时任驻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军长。

给马寅初的一封信

（1951年11月15日）

寅初：

关于学生健康问题前与先生谈过。此问题深值注意，提议采取行政步骤，具体地解决此问题，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认为（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一件附上，请查阅，其中第三项谈此问题）是正确的，请马副部长同志商酌处理为盼。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电报

“健康第一，学习第二”

——节录中共华东局一月十一日向中央报告关于学校工作的指示电文

“……（三）转入正常学习，又须防止过去加多课程硬赶功课的偏向。从此次参加军校学生之体格检查中，即可看出，由于国民党长期反动统治的结果，学生体质虚弱，患病者很多。但解放以来，

各地也未能很好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之原则，因此造成公立学校之体格最差，大学较中学又差的现象还严重存在，这点应引起十分警惕。应按华东局高教会议的规定，适当减少正课时间，照顾学生健康需要。……”

毛主席批语：这是正确的。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一九五二年工作计划的批语

（1951年11月1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华北局十一月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1]一份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作为自己订定工作计划的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1951年11月13日关于华北局扩大会议情况及1952年工作计划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谈到，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了1952年工作纲要、把领导重点放在工业上来、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和精简节约反对浪费四个问题，并通过了相应的文件。会议确定：（一）结合今冬明春的整风运动，进行一次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资产阶级影响的思想教育。（二）华北局、省委和省属市委，从现在起，把自己的领导重心进一步明确地转入工业生产。（三）华北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工业上来，但决不能放松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领导。省委仍需重视领导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地委和县委除了以一定力量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领导外，必须以极大的力量领导农业生产。（四）关于整党和整风，拟召开专门会议布置。（五）华北各省和内蒙都有部分灾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长时期注意救灾工作，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关于1952年的工作大纲，主要包括抗美援朝，城市工作，农业生产，精简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镇压反革命、继续取缔帝国主义操纵的“圣母教”，整党、建党、整风，培养干部、办好党校，加强人民代表会议，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等10项工作。

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中央希望各中央局自己，并且指导所属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当地的情况仿照华北局那样，都订出一个一九五二年的简单明了的工作大纲，电告中央及中央局批准施行，并且希望这种工作大纲的订出不要迟于本年十二月二十日。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对中宣部、文委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16日）

乔木[1]同志：

此件[2]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3]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4]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1951年11月15日关于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给中央的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文化教育委员会干部教育管理局局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

[3] 赖若愚，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

[4] 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关于张经武[1]留藏工作的批语[2]

（1951年11月16日）

张经武数日内应留拉萨，是否长留再考虑，请罗迈[3]电知。

毛泽东

---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达1951年11月15日建议组织中央西藏分局，并以张经武为主要领导人的报告上。毛泽东除写了上述批语外，还将这个报告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李维汉阅看。

[3]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对胡乔木关于院系调整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彭真的信的批示[1]

（1951年11月17日）

我认为可行，请周酌定，并通知各大区照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

[1] 1951年11月7日，胡乔木就院系调整问题给毛泽东等写信。信中说："兹送上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发展方案和北大、清华、燕京三校调整方案的两个报告，请审核指示。北京三校调整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组一调整委员会详商，其原则望中央早日核准以便进行具体商讨。"

转发中财委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的通报的批语

（1951年11月17日）

周[1]：

此件[2]转发给中财委系统以外的各部门党组研究。对那些问题

---

[1] 周，指周恩来。

[2] 指中财委分党组1951年11月13日关于交通部党组对团结民主人士问题检讨报告的通报。通报附有交通部党组11月6日给陈云并转周恩来的检讨报告。中财委在通报中指出：根据交通部经验，与民主人士和其他党外人士要合作好，必须：（一）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这不是句空话，共产党员应保证这句话不折不扣的实现，不论上级同级下级都应尽到自己职份内的责任，不能因为党内已有决定，而就不去同党外人士商量，该商量的必须商量，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经过的必须经过，而在工作中遇到党外人士有不同意见时，不应作硬性决定，除检讨自己意见有无不妥外，还应帮助说服党外人士始能作决定。（二）一切重要决定，应有应该参加的党外人士（如部长副部长等）参加决定。这决不只是形式的，而应该取得他们的实际同意，使他们真正感觉到有参加决定大事之权。许多事情需要党组事先商量，须要有党的明确领导，但这不是说，一切事先商酌好了，然后拿出去通过了事，相反，有些事可以不事先讨论，如同中财委的委务会议一样，大事亦可讨论，党内意见亦不必尽同，只要领导上掌握得好，这并不坏事，反而更活泼些。（三）有些日常处理的重要事情（如电报、公文）和上级来的指示，下级来的报告，均应使应该看到的党外人士看到，每天在做什么事情他们都知道。（四）用人也应与党外人士商酌，党外人士所举荐的人，更应慎重考虑，能用者尽量予以录用。以上4点，是年来我们与党外人士合作得来的初步经验。

严重的部，如内务部，要他们照交通部党组办法写出检讨申明书。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给李介侯的信

（1951年11月18日）

介侯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汤璪真[1]兄家属善后事，已与师范大学当局商妥，予以照顾。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

[1] 汤璪真（1898—1951），湖南省韶山市杨林乡云源村人，数学家。毛泽东在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曾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广州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候补理事兼北京市分社理事等职。1951年10月9日病故。丧葬期间，毛泽东曾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师范大学悼念。

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书信[1]

（1951年11月18日、12月15日、12月23日）

一

送刘少奇、胡乔木、安子文[2]同志阅，请安子文同志提出意见和处理办法。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

[1] 毛泽东1951年11月18日的批语，写在河北省委党校干部阴一刚、罗云路10月27日给毛泽东来信的提要上。来信对《华北建设》第一一八期上刊载的《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提出意见，希望毛泽东给予答复和指示。毛泽东12月23日的批语，写在刘少奇12月19日对毛泽东12月15日来信的复信上。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二

少奇同志：

游览情形好否？谅已到达杭州。

据安子文胡乔木等同志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1]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一件，安子文报告[2]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

---

[1] 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我们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曾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1951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也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195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后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等来信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毛泽东把信批给安子文，要他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毛泽东同意改正这一提法，并写此信征求刘少奇意见。刘少奇很快复信同意。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2] 指安子文1951年11月关于修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这一提法给毛泽东的报告。

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

此间各事均好，勿念。

祝你们安吉！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三

周、朱、陈、安子文、胡乔木、杨尚昆[1]同志：

此问题曾去信征求刘少奇同志意见，现得回信，请阅。我又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2]，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如同意，请尚昆办。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三日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草稿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将指示稿中叙述党的文件中几次提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说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后面的一句话改写为“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二）在指示稿的最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随电并将安子文同志为此问题向毛主席所作报告一件，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向中央来信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转发高岗[1]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20日）

各中央局，并请转发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军区，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政府各部门党组：

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十一月一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2]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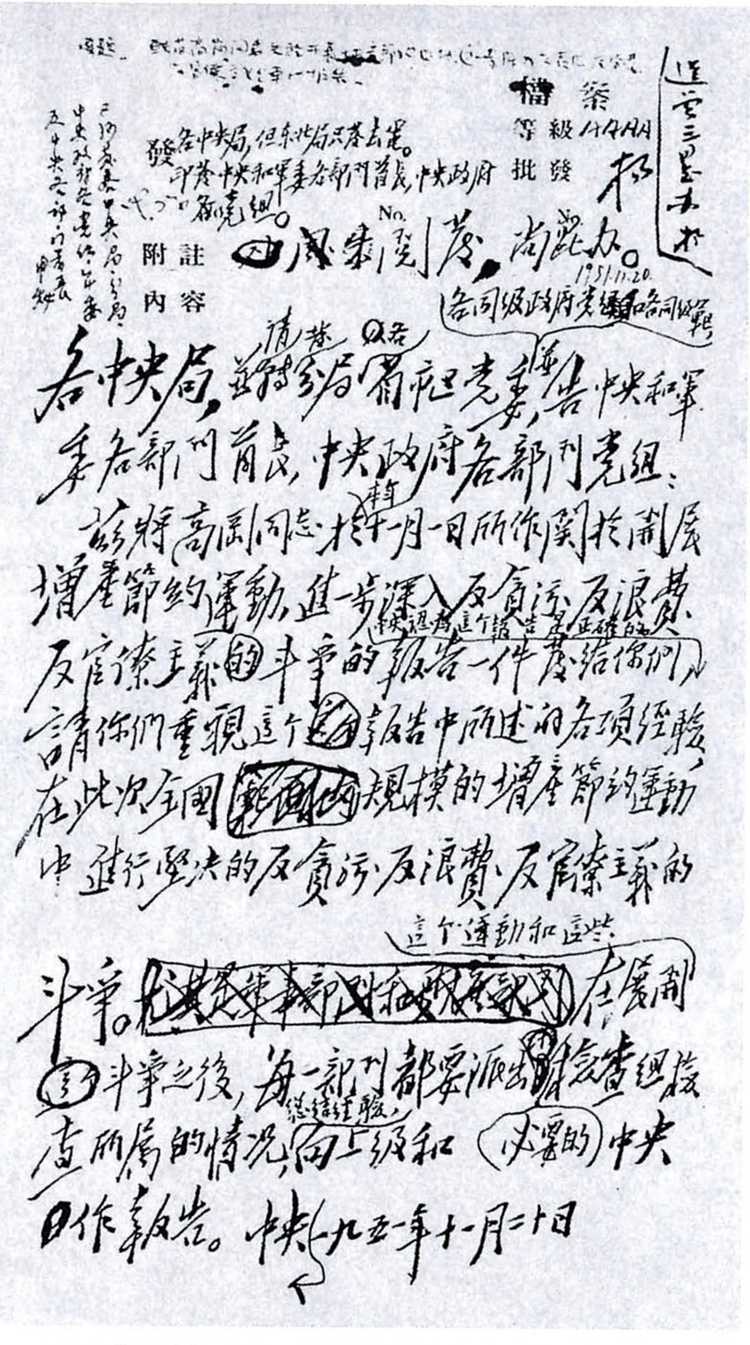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2] 高岗在这个报告中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于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有贪污行为的人，开始常常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抵抗和逃避反贪污斗争的锋芒。因此，领导上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针对群众的各种顾虑给以解释。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地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機密

等級 AAAA

發 各中央局，但東北局不發去電。印發中央和軍委各部門首長，中央政府各部門黨組。

批發

No.

附註 周、朱、劉、陳、尚昆办。1951.11.20

內容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市區黨委，告中央和軍委各部門首長，中央政府各部門黨組：

茲將高崗同志於十一月一日所作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的報告一件發給你們，請你們重視這個報告中所述的各項經驗，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在展開這個運動和這些鬥爭之後，每一部門都要派出檢查組檢查所屬的情況，總結經驗，向上級和必要的中央作報告。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1951年1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转发了东北局的一份报告，提出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关于谈判军事分界线问题致李克农[1]电

（1951年11月20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2]：

望即根据你们十一月十九日廿四时来电所提三条[3]在二十一日小组会上提出。惟二十天仍改回为三十天，即同意敌人所提的时间，因敌人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比敌人更急。我们的态度是能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李克农1951年11月19日24时电向毛泽东报送的协议修正案中提出的3条。修正案说："对于第二项议程'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兹达成以下协议：（一）确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由此线双方各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为原则。（二）双方小组委员会应立即根据前条原则，校正现有接触线，以确定双方同意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而军事分界线两侧各二公里之线，即成为非军事地区的南北缘。（三）鉴于敌对行动将继续进行至停战协议签字为止，如果代表团大会批准本协议及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地区的具体位置后的二十日内，全部议程已经达成协议，则不论双方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已经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地区应不再变更。如超过二十天，而全部议程尚未达成协议，则应按照停战协议及签字前的双方实际接触线所发生的变化加以修正。"

在三十天内成立协议固好，拖长时间也不怕。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十八时

空军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1]

（1951年11月20日）

亚楼同志：

意见[2]很对。必须迅速组织新部队参战，越快越好。圣诞节以前，有停战的极大可能。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1年11月19日17时报告的批语。

[2] 指刘亚楼等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根据昨天《人民日报》的消息看来，停战谈判最近可能会有头绪。我们正在设法，更加抓紧时机，尽量求得能使更多的空军部队得到实战锻炼机会，即使稍微冒一点险，也是值得的。具体的方法，就是完成了起码的作战准备工作以后，迅速投入战斗。每个部队不必打得太久，以便让出位置给别的部队去打。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21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

河北省委这个报告[1]很好，请你们加以研究，吸取其中有益的经验在各省推广施行。此件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看到各省省委都有一个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专题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

[1]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1年11月13日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给华北局的综合报告。报告说，今年的农业生产，贯彻了“生产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方针，并紧紧掌握了以下几个环节：（一）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深入贯彻发展生产的政策，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组织爱国丰产竞赛运动，作为推动生产的主要动力。（二）战胜自然灾害，是实现农业增产的关键性的问题。（三）加强对合作互助的领导，按照不同的生产情况，发展各种合作互助组织。（四）改进农业技术，加强技术指导。

给王首道[1]的信

（1951年11月21日）

首道同志：

请酌予此人[2]以生活上的照顾。据周世钊[3]校长说，此人一生办教育（曾在第一师范当过教员），似无劣迹。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一日

---

[1] 王首道，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2] 指李醒安，原名李廉翘，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教员。

[3]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给李维汉[1]的信

（1951年11月22日）

李维汉同志：

周世钊[2]兄等数人（又陈奎生[3]兄亦想参加），于革大毕业后，想去沈阳、大连、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参观学校教育，并经浙赣路返湘。我认为可行，如你也同意的话，请为他们办理旅行手续。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周世钊，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3] 陈奎生，1921年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楚怡、明德中学等校任教，1932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中央转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的批语

（1951年11月2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中央财委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所作关于一九五二年全国农业生产计划发给你们阅看。中央批准这个计划，你们可根据这个计划的方向规定自己的实施计划。此外政务院还将发表有关农业方面的适当文件。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1951年11月2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党组和文艺团体的党组：

（一）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三）中央这一指示和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并可给党外同情分子阅看。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给薄一波[1]的信

（1951 年 11 月 27 日）

一波同志：

总预算及**收入**、**支出**两方面的说明文件，请于修正完成后，**印成一本**，于廿八日开会[2]前印好（印十余份），**廿八日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四时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中央转发邓小平[1]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1月30日）

邓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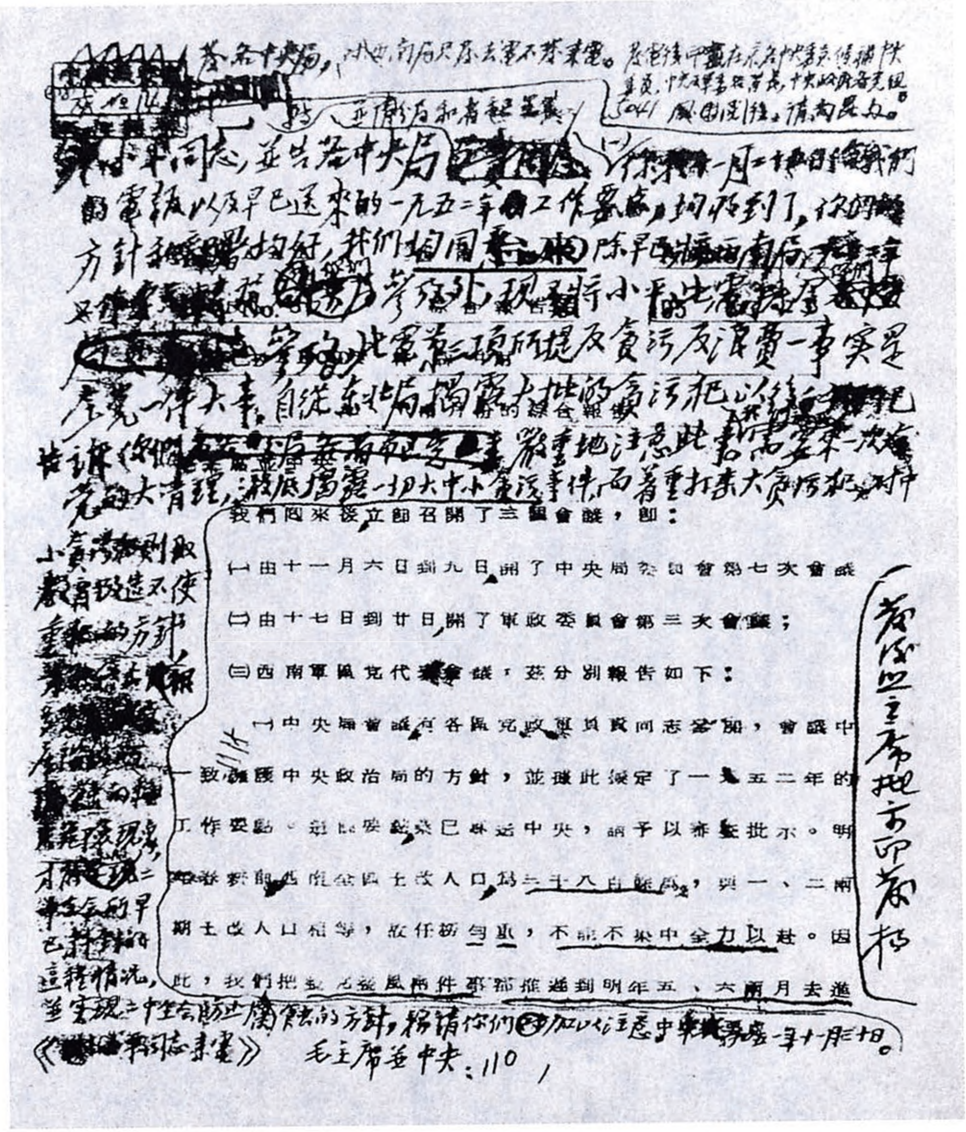
（一）你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我们的电报以及早已送来的一九五二年工作要点，均收到了，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二）除早已将西南局一九五二年工作要点转发你们参考外，现又将小平此电转发你们参考。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发各中央局，（西北局只发去电不发来电。）发党外中委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各部首长，中央政府各党组 5041 [illegible]，请尚昆办。

并 并转分局和省委区党委

小平同志，并告各中央局：（一）你们十一月二十日[illegible]给我们的电报以及早已送来的一九五二年工作要点，均收到了。你们的方针和部署均好，我们均同意[illegible]。[illegible] 现将小平的电报转发[illegible]。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illegible]告诉你们[illegible]严重地注意此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illegible]才能[illegible]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中共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卅日。

《[illegible]小平同志来电》 毛主席并中央：110

我們回來後立卽召開了三個會議，卽：

㈠由十一月六日到九日開了中央局委員會第七次會議

㈡由十七日到廿日開了軍政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㈢西南軍區党代表會議，茲分別報告如下：

㈠中央局會議有各區党政軍負責同志參加，會議中一致擁護中央政治局的方針，並據此擬定了一九五二年的工作要點。並將要點業已專送中央，請予以審查批示。明年我們西南全區土改人口爲三千八百餘萬，與一、二兩期土改人口相等，故任務甸重，不能不集中全力以赴。因此，我們把整風兩件事都推遲到明年五、六兩月去進

發除五主席批示印發稿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邓小平关于西南区党政军三个会议情况报告的指示》的手稿。

中央印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

（1951年11月3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青年团团委、各同级政府的党组和教育公安两部门的党组或党委：

兹将中央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遵照执行。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

[1] 中共中央1951年11月30日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1月30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1951年11月29日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发现了河北省天津地委和专署有严重的贪污浪费和破坏国家政策法令的行为。据初步检查材料证实，现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子善和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折款25亿元，宝坻县救济粮4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1.4亿元；从修潮白河的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22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和发给群众房地补价款合计45亿元；冒充修建名义，向银行骗取贷款40亿元。总计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投入地委机关生产，做投机倒把的违法活动。为贪图暴利，其曾利用蜕化干部从东北盗运木材达4000立方米；勾结私商张文义等以49亿元巨款从汉口贩卖大批马口铁，私商从中贪污中饱，破坏国家政策。张子善、刘青山日常生活铺张浪费，任意挥霍。只有账可查者，二人私用四五亿元，并向上下级及其亲友送礼（有的达一两千万元之巨）达1.3亿元。张子善为消灭证据，曾亲手焚毁约计1.5亿元的单据和其他单据178张。由于我们最近派人到天津检查和逮捕了与张、刘等勾结的私商，张子善已十分惶恐不安。根据其所犯错误和罪状，经华北局讨论，总理批准，决定即将张子善逮捕法办，刘青山归国后亦予逮捕。

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属的同类事件而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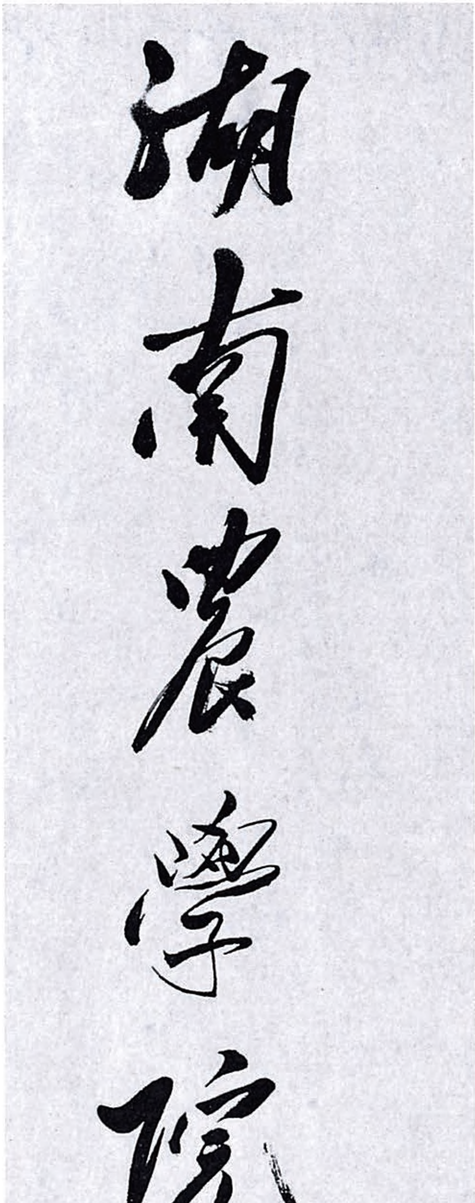
为湖南农学院题名[1]

（1951年11月）

湖南农学院

---

[1] 1951年3月9日，湖南省立修业农林专科学校与湖南大学农业学院合并组建“湖南农学院”，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校名。1994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湖南农业大学”。



毛泽东为湖南农学院题写的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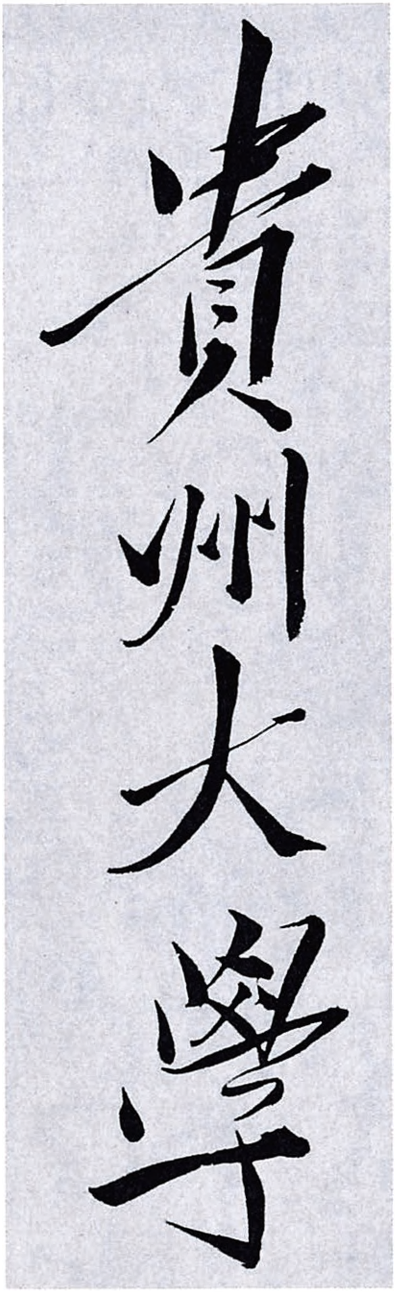
为贵州大学题名[1]

（1951年11月）

贵州大学

---

[1] 贵州大学创建于1902年，历经贵州大学堂、省立贵州大学、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国立贵州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10月定名为贵州大学。1951年11月，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



毛泽东为贵州大学题写的校名。

中央关于补报重大贪污犯的处理情况致薄一波、刘澜涛[1]电

（1951 年 12 月 1 日）

薄一波、刘澜涛同志：

你们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华北方面发现的贪污事件的报告收到了。在这个报告中没有说到对于那些重大贪污犯，党和政府是如何处理的，请你们将处理的情况补告我们，即对太原市区委书记赵城、区长任华，唐山市粮食公司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河北徐水县银行经理赵增非，山西交城县长张进才，辽东工业厅驻津办事处主任刘治宇，山西交通局保管科副科长赵以儒，华北军区后勤部汽车学校政治委员李晋吾，河北省供销社西北小组负责人（报告中无姓名）等重大贪污犯判处了何种罪刑，向我们作一补充的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中央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1年12月1日、2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首长，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一件发给你们，望你们遵照执行。关于阅读本决定的干部的范围，依照本决定第五项的规定[2]，请注意组织阅读和传达。志愿军方面应在适当时机由志司组织集体阅读，而不要将文件下达。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

[1] 本文第四、第五、第六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即本文第六部分。

二

周[1]：

此件请你重打清样两份，一份存你处，一份连原稿交我再看一次。打清样时请校对勿错。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三

周：

此件已作第二次修改，有些是我修改的，有些是采纳各同志的意见，请你加以斟酌。再打清样两份（校正勿讹），一份用电报发各地，一份印发中央一级各处及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均交尚昆办。

我第一次修正原稿一份，各同志修正稿六份，均还你（只有林彪[2]的未见交来），均请销毁。第一次发给各同志的原稿，亦请收回销毁。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四

这一计划的重点是用一切方法挤出钱来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务望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各同级军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而为实现上述计划而斗争。必须认识：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五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

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线来。

六

本决定一直下达到党的地委和军队的军党委。在省委或地委召集县委人员开会、在大城市市委召集区委人员开会、在省军区或军党委召集军分区和团级以上人员开会的时候，应将本决定发给他们阅读，最好是组织集体阅读，并向他们解释由他们所提出的疑问。其他干部相当于县委团党委和大城市区委一级者均应使其有阅读的机会（用集体阅读的方法），但不得让不可靠的分子阅读，不得在任何刊物上登载，并不得遗失。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给郑振铎[1]的信

（1951年12月3日）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2]先生经陈叔通[3]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4]，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顺祝
健吉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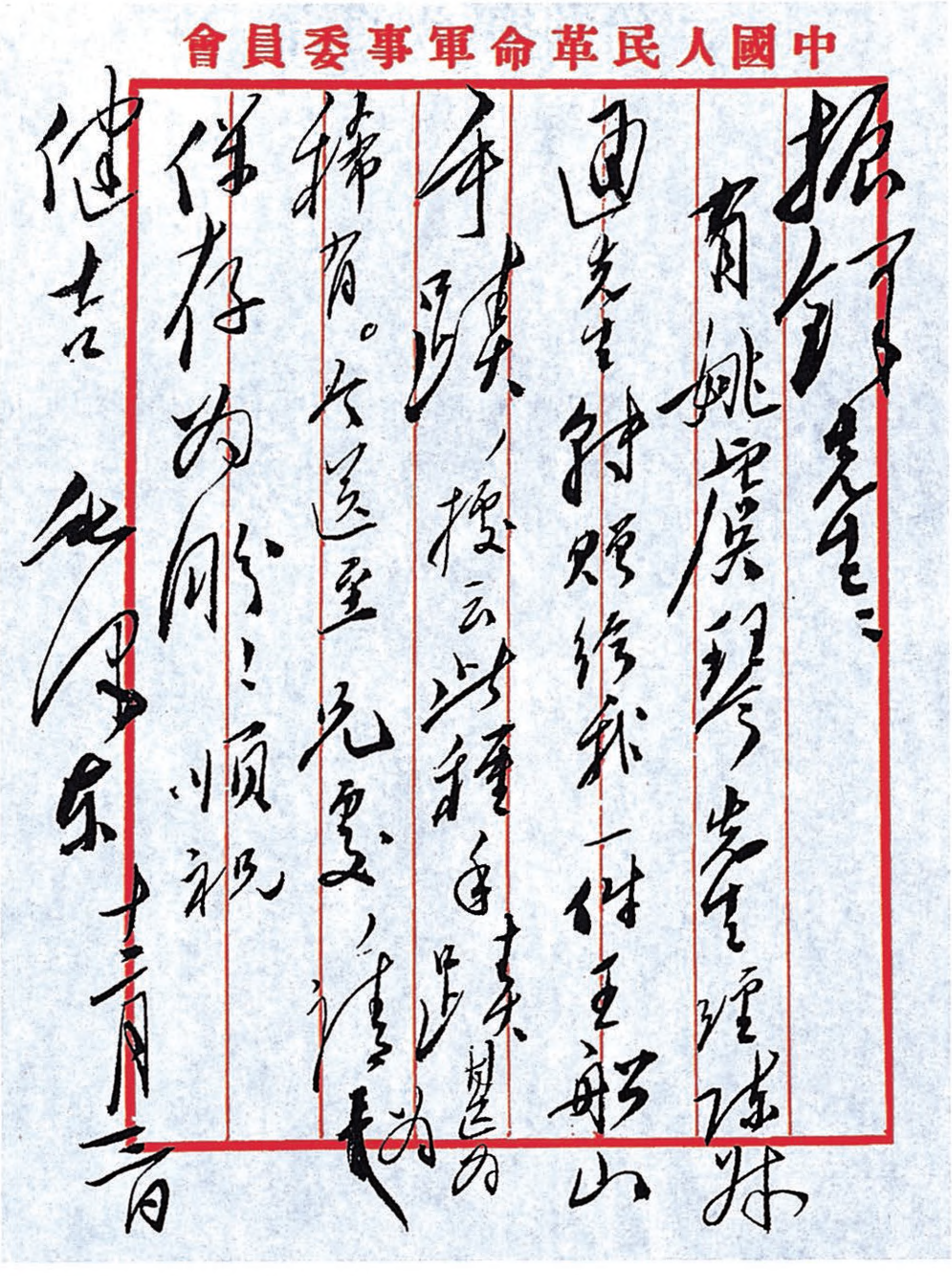
---

[1] 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2] 姚虞琴，画家。

[3] 陈叔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 指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的《双鹤瑞舞赋》。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振铎先生：

前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兹送至先生处，请妥为保存为盼！顺祝

健吉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毛泽东致郑振铎信的手稿。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把领导重点转到工业生产和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两个决定的批语

（1951年12月4日）

华北局，并告各中央局，并请各中央局转发所属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华北局送来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把领导的重点放在工业生产上来的决定及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均收到了，中央批准这两个文件，认为是正确的（只作少数文句的增加和修改）；（二）将这两个文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市区委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

给董必武[1]的信

（1951年12月4日）

必武同志：

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2]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发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可以连同你此信[3]和我答复你的几句话，一起抄发。

又及

---

[1] 董必武，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2] 指董必武1951年10月18日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信。董必武在信中指出，加强下级政权机关的工作，可以而且应该经由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各级党委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应经过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其中如有党员3人以上，应组成党组以保证党的领导。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

[3] 指董必武1951年12月3日关于县乡政权建设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他在1951年10月18日关于同一问题给饶漱石写信的背景情况作了说明，并对县乡政权建设问题提出了三点意见：一、下级政权机关的建立，党应经过上级政权机关领导着去做比较好些；二、县乡两级建政工作，目前县级建政是关键；三、县乡建政是一件大事，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1951年12月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速即转发所属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和各县委；各大军区党委和志愿军党委，并请速即转发所属政治、军事、后勤各部门，直到团级为止：

（一）中央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晨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及今后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意见的报告[1]，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二）中央责成你们在接到本指示三星期内，至迟在一个月内，有计划地初步地检查自己单位和所属下一级各单位工作人员的贪污现象，仿照北京市委所订各项办法，发动党内外最广大群众（包括各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三）中央责成你们大体上仿照北京市

---

[1] 中共北京市委在报告中说，市委决定大张旗鼓地广泛发动党内外群众自下而上的检举，来配合领导上的检查，开展全市反贪污运动。具体办法是：第一，由各单位负责人认真地自上而下进行检查，揭露贪污分子；第二，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第三，号召与发动全市所有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工会会员及其他各阶层人民，检举贪污分子；第四，抽调可靠干部，组织检查组，负责在本单位及上下级与同级间相互检查。

委的报告样式，在收到本指示后一个月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所有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均分别向中央和军委作报告；所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均按级向中央及其上级作报告。县委以上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均同时直接发中央。有电报的地方，用电报发来。无电报『告』的地方，从邮局寄来。军事系统二三两级军区的报告，除发其上级外，同时直接发军委。军区以下的报告，由军区收集转寄军委。志愿军各部的报告，由志愿军党委收集转寄军委。凡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凡推迟报告时间者，须申明理由。（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须组织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二十时

中央转发贸易部党组关于大张旗鼓地反贪污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即转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各大军区并请即转军事系统直到团级为止；志愿军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央贸易部党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四日关于发动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民主人士）大张旗鼓地公开地反对贪污现象和惩治贪污人员的报告，认为这一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二）请你们遵照中央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的指示[1]，参照北京市委和中央贸易部党组的分析和办法，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各地党委应统一布置这一斗争，使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同时动作起来。（三）本指示及中央贸易部党组的报告应给科长以上的党员阅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

---

[1] 即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转发装甲兵司令部
关于精简节约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军事学院，志愿军党委：

（一）这是我们所收到的军事方面的第一个精简节约的报告，特转发你们参考。（二）反贪污应和精简节约及反对浪费分开来做，须作全面的调查分析，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暴露一切贪污人员而加以分别的处理。装司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三）望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甲）精简节约反对浪费，（乙）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四）一切军事部门均应向军委作报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交换战俘的批语[1]

（1951年12月7日）

周[2]阅。

美国人宣布被俘的仅一七四人，其余一万多人列为“失踪”的，他们没有理由向我们索取每一个“失踪”的人。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情报司编的一份临时通报上，其中摘报了美国《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刊载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交换战俘的3条新闻。11月26日美国《新闻周刊》说，“上星期列为美国死伤人数的九九，二二六名中，目前失踪的人数为一〇，八三六名，另确知被俘的仅一七四人”。12月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有人建议做这样一笔交易来解决停战监督和俘虏交换问题，即美国放弃视察的要求，共方则交出所俘的联军。为了换取落在共方手中的美国兵，联军准备冒一下共方阴谋集结兵力的危险”。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有“这一点亦可注意”。

[2] 周，指周恩来。

中央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电报[1]

（1951年12月8日）

华东局、福建省委，并告各中央局，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福建省委办公厅十二月七日十五时电询问，可否将中央十二月四日发来之北京市委反贪污运动报告和中央的批示以绝密文件印发至县委，以便统一展开反贪污运动和统一执行关于反贪污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制度等语，兹答复如下：（一）应当发至县委，军队则发至团党委，并且应当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使更多的同志看到，使科长级以上的党员都能看到。这是半公开的文件，不是“绝密文件”。（二）中央于十二月四日转发的北京市委报告，十二月五日转发的中央贸易部党组报告，十二月七日转发的中央财政部，人民银行总行，中央轻工业部，中央水利部等各党组报告，以及尔后转发的各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概照上条办理。（三）所有地方县委以上均应向中央作报告，军队团级以上均应向军委作报告，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这点已在中央十二月四日指示中说清楚了。（四）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福建省委等的电报。

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贪污分子，浪费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当然大多数不是反革命分子（可能有一部分人即是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罪名是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但这个问题现在已极严重，必须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去进行斗争，一样的用死刑和徒刑等对待他们，并且一样的要查明情况，心中有数（犯贪污的占全体工作人员的百分之几，轻者重者最重者又各占百分之几），精密地掌握这一斗争。

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一九五二年华东工作纲要的批语

（1951年12月8日）

华东局，告各中央局，并请转所属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一）华东局十二月六日来电及一九五二年华东工作纲要[1]均收到，中央批准这个工作纲要；（二）将这个工作纲要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请加研究和参考，中央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作纲要。

中央

十二月八日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1952年的工作纲要包括10个部分，即：（一）抗美援朝。（二）增产节约，禁止浪费，严惩贪污，反对官僚主义。（三）城市工作。（四）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工作。（五）建政工作。（六）整党建党工作。（七）展开思想改造运动。（八）镇压反革命工作。（九）统战工作。（十）青年妇女工作。

给钟志刚[1]的信

（1951年12月8日）

志刚先生：

来信收到，谨致谢意。此复，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

[1] 钟志刚（1890—1956），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人，农民。毛泽东的私塾同学。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中央批转罗瑞卿[1]关于公安系统开展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9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即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转各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一）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关于在中央公安部及整个公安系统内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请各级党委严格指导各级公安机关，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公开地开展这一斗争。（三）将这个报告一直印发到县级和团级，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四）中央已决定：党中央各部门，军委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织，一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审查党的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扶持正气，打倒邪气，并选举党委会。在目前时期，关于纠正错误打击邪气方面，应着重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自我们占领城市以来，快三年了，大多数部门还没有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应一律在短期内召开完毕。然后由党政军三大单位分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亦规定在中央直属总党委领导之下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中央直属党代表大会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已于今年五月开过），任务同前。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的直属党组织，亦应照此办理，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督促进行。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转发总政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一）批准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及发展文艺工作的报告[1]，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并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遵照执行。

---

[1] 军委总政治部这个报告的要点是：（一）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方针是：要求全军普遍消除现有干部、战士中的文盲，将其提高到初小毕业的程度；将已具有初小毕业程度的干部、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毕业的程度；将已具有高小毕业程度的干部，提高到相当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二）全军人员的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首要，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皆以文化为重点。（三）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的执行，应由党委领导，首长负责。并在团以上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加强指导。文化教育的具体实施，则由各级政治机关领导进行。（四）在全军推行由西南军区十六军文化干事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五）为达到文化教育的效果与目的，在节约原则下，提供一些必要的物质保证。（六）1952年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于进一步提高部队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树立对美帝国主义长期斗争的思想，增强高度的战争意识，防止产生新的松气麻痹思想。（七）大量裁减那些不十分必要的报刊，集中力量办好必须要办的报刊。（八）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在全军开展一次文艺工作者改造思想的学习，以保证部队文艺工作提高一步。

（二）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分别轻重，惩治或批判一切犯有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罪行或错误的人员，并一定要获得结果。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中央转发邮电部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转发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

兹将中央邮电部党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因邮电事业普及全国，贪污问题又很严重，故应将此件转发县委，提起大家注意。

中央

十二月十一日

---

[1] 邮电部党组1951年12月7日的三反报告指出，邮电系统的贪污案件，除一般旧社会常有的类型外，尚有与专门业务相结合的专业贪污案，且极为普遍。贪污腐化现象滋长的原因，一是全国解放以后，反贪污反浪费尚未形成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加之党内生活、政治教育不健全，资本主义反过来引诱与腐蚀我们；二是县邮电局多原封未动，领导方面忽视了县局的改造与加强；三是对惩治贪污犯采取了姑息态度，片面地理解“不能轻易开除人”与“不能造成工人的失业”，客观上助长了贪污腐化的风气。

中央转发铁道部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转分局、省市区党委（无铁道的地方不必转）：

（一）兹将中央铁道部党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1]一份发给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写得比较好，值得研究。（二）请你们向所属各单位，亦用限期要报告的方法，推动这个斗争向前发展。

中央

十二月十一日

---

[1] 铁道部党组1951年12月7日关于三反的报告，具体分析了铁路系统贪污浪费的情况，作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先发动反贪污斗争的决定。报告指出，要通过这一斗争对贪污现象和大贪污犯以严重的打击，给浪费现象以大量的揭发，在群众中公开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教育，教育群众保护国家财产，严格划分公私界限，造成鄙视贪污浪费的新道德观念，对铁路队伍再一次从思想上进行整顿，为增产节约运动打下巩固的基础。具体办法是：1. 成立各级增产节约委员会领导反贪污斗争；2. 突破一点，抓住典型进行宣传教育；3. 深入动员，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自己坦白与别人揭发相结合；4. 搭配骨干组织检查组。

转发华北军区后勤党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直至团级，志愿军党委：

（一）兹将华北军区后勤党委会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是军事系统在中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

---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后勤部委员会1951年12月8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问题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并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报告说，后勤部门的贪污、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我们曾于1950年12月至1951年4月底，进行了一次反贪污反浪费运动，揭发了一批贪污分子，并分别给予军法、行政、党纪的制裁。但因为没有大张旗鼓地充分发动群众，同时在领导思想上也仅仅是从爱护祖国财产出发，还没有特别强调通过这次运动来加强全体干部的阶级观点，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立场。因此，某些单位执行极不深入，个别部门甚至不认识，致使运动过后又松懈下来。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没有联系到官僚主义作风，对于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腐化堕落分子，没有给以应有的批判和处理。因而运动之后，贪污、浪费、拐款潜逃等事件仍然不断发生。根据上述情况和中央指示，我们决定在后勤部门开展一个普遍深入的长期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首先以两个月时间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大张旗鼓地广泛教育发动群众，从自上而下层层带头展开反浪费入手，继而启发坦白，号召揭发，进入反贪污斗争，然后进入各级领导对于官僚主义的检查。

主义的号召下向中央反映情况的第二件。第一件是装甲司令部许光达等的报告，已发给你们了。

（二）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许多人本位主义极为浓厚，只顾小局，不顾大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必须在整个军事系统，特别着重在后勤部门，展开整党整风，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并号召一切指战员参加这个斗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给毛泽连、毛远悌[1]的信

（1951 年 12 月 11 日）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

慰生六婶[2]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在长沙住得太久。

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

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

[1]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毛远悌，毛泽东的远房侄子。

[2] 慰生六婶，毛泽连的母亲。

对湖北省委关于违背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的检讨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2日）

周、陈、薄、乔木、林彪阅。

（一）此报[1]是给中南局并告中央，是否即由中央予以答复[2]，或待中南局有所表示后中央再予答复，请陈薄酌定；（二）关涉人民日报之处[3]，请乔木查明，并确定办法，告我。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1年11月30日关于违背中央人民政府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给中南局并报中央转毛泽东的检讨报告。

[2]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中央就湖北省委检讨报告所拟的复电稿而言的。毛泽东在审阅这份复电稿时，还在最后加上“请你们令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予以转载，此项争论即告结束”一句。

[3] 中共湖北省委在检讨报告中说：“11月6日，人民日报经济栏提出对省委的批评，词严义正，我们非常感激，并已送去书面自我批评，公开自我检讨。但迄今已半月，并未刊出，不知是否该批评书有不当之处，望予指出。”在报告中“提出对省委的批评”一句旁，胡乔木注有：“此批评系一波同志在与子恢同志把意见谈一致以后告人民日报发表者。”在“并已送去书面自我批评”一句旁，胡乔木还注有：“此自我批评在11月25日才收到，27日由一波同志看过后退回，29日已发表在人民日报第三版党的生活栏，按原稿全文登出。”

复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电

（1951年12月12日）

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同志们：

感谢你们给我的电报。过去一年多以来，西北区各族人民在抗美援朝的爱国斗争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得到了很大的成绩。你们的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进一步团结各族人民，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很好的。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但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国各民族就开始团结成为友爱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战胜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祝你们的会议成功！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党政军各部门统一开展三反斗争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13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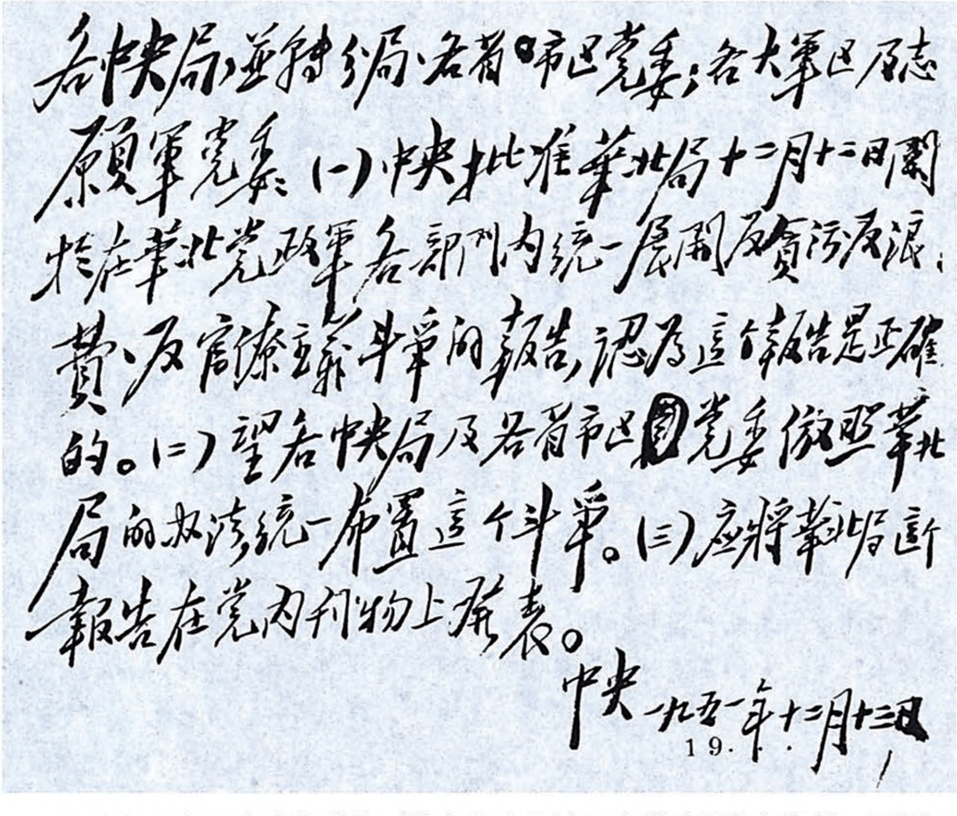
[1]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报告中对华北地区党政军系统及厂矿企业中的贪污和浪费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贪污浪费之所以严重，一是我们的国家和经济机关中有大量的从国民党官僚机关中接收来的旧人员，二是不少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的侵袭，滋长了享乐思想，发生严重贪污浪费行为，张子善、刘青山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更坏的是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抱着一种庸俗的迁就宽容态度，某些单位和部门甚至邪气压倒了正气。报告说，为了彻底肃清严重贪污浪费现象，必须在全区范围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场包括党内党外、上上下下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为此决定：一、首先通过各级党代表会议及各种干部会议，在党内，在一切政府机关、经济机关、军事机关中进行传达动员，说明方针，交代政策。然后在协商委员会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提出报告，进行动员，作出决定，以便有力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帮助党和政府开展这个斗争，揭发和检举贪污罪犯。二、为领导好这个规模广大的群众运动，各级均须建立包括党内外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精简节约检查委员会，党委的负责同志必须参加进去，直接领导，首长负责，亲自领导。三、对妨碍反贪污运动开展的各种错误思想，都应采取整风学习的方法，予以批评、纠正和驳斥。四、必须普遍开展这个运动，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例外，但在实际工作中要善于抓住重点，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雷厉风行，又要慎重分析。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一）中央批准华北局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在华北党政军各部门内统一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望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华北局的办法，统一布置这个斗争。（三）应将华北局这个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各省市區黨委；各大軍區及志願軍黨委：（一）中央批准華北局十二月十二日關於在華北黨政軍各部門內統一展開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斗爭的報告，認為這個報告是正確的。（二）望各中央局及各省市區黨委仿照華北局的辦法統一布置這個斗爭。（三）應將華北局這報告在黨內刊物上發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华北局关于在党政军各部门统一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

（1951年12月13日）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请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南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方针的报告[1]，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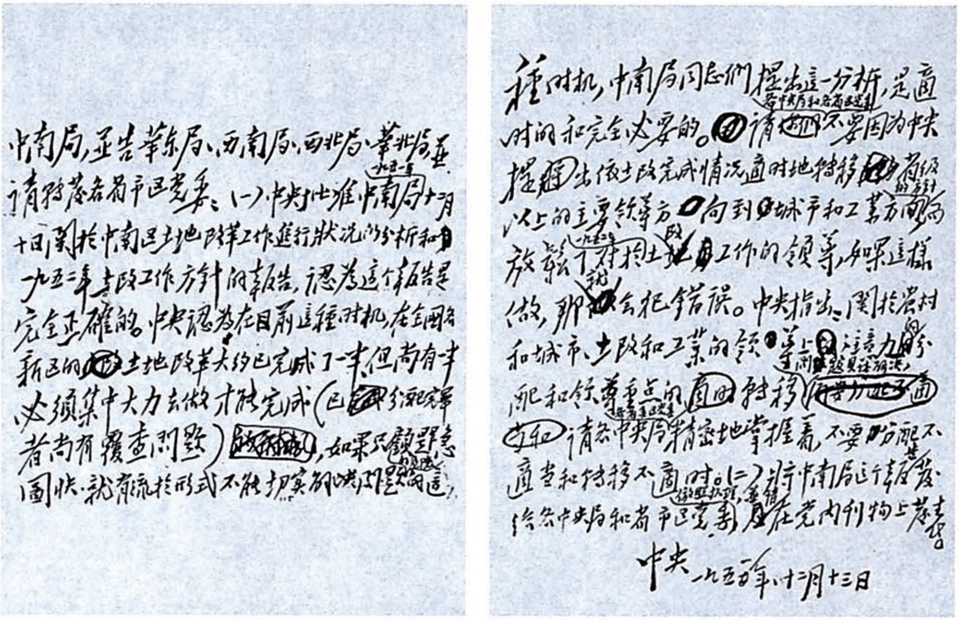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报告反映，目前土改工作中急躁情绪、松懈空气和精力分散现象弥漫各方。一是领导机关急于完成土地改革，赶建设；二是老干部急于离开农村，赶城市；三是新干部急于过关毕业，到机关当领导干部；四是政府各部门和人民团体迫不及待地要利用土地改革基础，实施一大堆计划；五是去年工作有点成绩、经验，成了不少同志的包袱，而真有经验的干部实际并不多；六是国内无战争，又有大批武装镇守四方，工作弱点一时不易暴露，多数人对此并不十分清醒；七是农民干部想早退坡，农民想早分田，地主也想早混关。这样，就形成不顾成效、不惜偷工减料以急赶任务的情形，从而形成今年工作中的最大危险。

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二）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的手稿。

转发习仲勋[1]关于西北地区反贪污斗争报告[2]的批语

（1951年12月13日）

仲勋同志，并告漱石、陈毅、子恢、谭政、剑英、小平、贺龙、一波、澜涛、高岗、德怀诸同志：

仲勋同志十二月十一日关于分析西北贪污现象和准备立即开展一个彻底的反贪污斗争的电报，已收到了。我认为你的分析、布置和其他意见，都是正确的。你于十二月八日召开的那次座谈会开得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2] 习仲勋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西北局扩大会议和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情况。报告说，接到中央12月4日指示后，特于8日召集纪委、检察署、法院、财委及人事部的负责干部座谈了一次。初步了解，贪污现象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很惊人的。检察署、法院、纪律检查委员会三单位已查出和受理的贪污案件，共损失国家财产80余亿元（旧币）。财经系统、公安、司法系统和军事后勤系统贪污现象较严重。各地基本建设工程中，驻京、津、沪等办事机关中，都有不少问题，一般党政机关的总务部门也有不少问题。凡大一点的贪污案件，都牵涉颇广，且多半与奸商勾结。贪污行为已毁坏了一批干部，并染坏了一批干部，已发现有县级、专区级重要干部贪污的。这些事实，说明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我们计划于12月下旬开始整风，各地都集中力量，在短期内进行，最迟于明年2月中旬结束，准备由开展反贪污斗争开头，紧接着检查各种浪费现象，最后联系具体实例，检查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极好。只开一天会，已使你了解情况，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以后动员群众，开展斗争，即将迎刃而解。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1]同志负责，现已全体动起来了。请各负责同志注意此种经验。我们大家都很忙，但对此事只须抽出几天时间，专心致志加以调查研究（要有人和钱的数目字，即使是估计的数字也好），弄出头绪，写一个指令，开一个干部动员大会，斗争就可以展开，以后继续推动斗争向前发展，就很容易办了。仲勋同志的报告，请你们转发到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各级军区去，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四时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对外交部转发张闻天[1]关于我驻东欧使馆工作报告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13日）

外交部：

这个文件[2]看过，很好，照发。

这个文件在我这里压了近一个月，这是我的不对。但你们不催也有责任，近几日还是因为你们催，我才从积压的文件堆中清出来看了。因为伍修权[3]同志起草此件的时间是十一月三日，文中“最

---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 指外交部分党委1951年12月13日为转发张闻天关于我驻东欧各使馆工作中存在的几个基本问题及其处理意见的报告给苏联及东欧各使馆并各支部的电报。电报指出：（一）目前各使馆的工作中心，是逐渐转向研究与报道驻在国内部情况及其国际关系。研究驻在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学习各种建设的经验和外交工作的经验。（二）为了加强研究驻在国的情况，首先必须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尊重与热爱驻在国的政府和人民，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三）各使馆应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党支部要教育党员努力达到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外交工作干部的4条标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四）关于使馆编制及内部组织，外交部正在研究，最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凡使馆干部及公务人员均有首先学好驻在国语文的义务。

[3] 伍修权，当时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

近将有统一使馆组织机构的规定发出”，如果这种“规定”已经发出，就须加以字面的修改。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51 年 12 月 13 日）

青海省人民政府转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的来电。我完全同意你的这种志愿，即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达赖喇嘛[2]紧密团结，为彻底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3]，驱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影响，巩固国防和建设新西藏而奋斗。并祝你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准备由青海玉树返回西藏日喀则地区。

[2]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3] 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毛泽东和班禅额尔德尼在一起。

中央转发高岗[1]关于工矿企业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4日）

各中央局，并转省市区党委，政府工业部门党组和工会党组：

高岗同志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关于在工矿企业中深入车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报告[2]，很好，特发给各地参考。根据这个报告，东北单是国营公营工业部门，在一九五一年，截至十月底止，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之外，就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一千多万吨粮食的财富，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深入了车间得来的，因而也就改善了工人的生活。这种经验应在全国一切工矿企业中传播，并按自己的条件适当地仿照实行。高岗同志的报告，应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十四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高岗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个报告中说：（一）自毛主席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作为今天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后，东北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更加提高，增产节约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截至10月底，各工业生产部门，除完成原有生产计划外，已为国家创造了价值1000多万吨粮食的财富。（二）厂矿企业的领导干部深入车间，面向车间，加强车间工作，是目前工业部门继续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关键。（三）为了搞好车间工作，应着重做好3件事：（1）做好车间的政治教育工作。（2）做好车间的技术管理工作。（3）做好工资与福利工作。

给杨立三的信

（1951年12月14日）

杨立三同志：

十二月十三日来信收到。我很赞同你的这种态度，对自己在所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全面的检讨；同时要对整个后勤工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当然要正确地肯定成绩。这样，你就有了主动。这样做，可以引起别的同志也都进行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别的同志也就有了主动，就可推动整个后勤工作的改革。据我所知，我军整个后勤系统长期缺乏这种民主的自我检讨和相互检讨，以致政治空气极不浓厚；党的生活极不健全；许多领导同志胸襟狭隘，思想不开展，作风不民主，只顾小局，不顾大局；后勤系统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极端严重，这种严重性至少不下于政府的财经系统和公安系统。所有这一切，均应以这次后勤会议为开端，彻底地进行批判和改革。因此，我很赞成你在来信中所取的态度，我看了你的信甚为高兴。如果你同意的话，请将你给我的信和我这封复信，一起印发给此次后勤会议到会的同志们阅看。印出来之后，同时发给我一份。

致共产主义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中央关于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1]

（1951年12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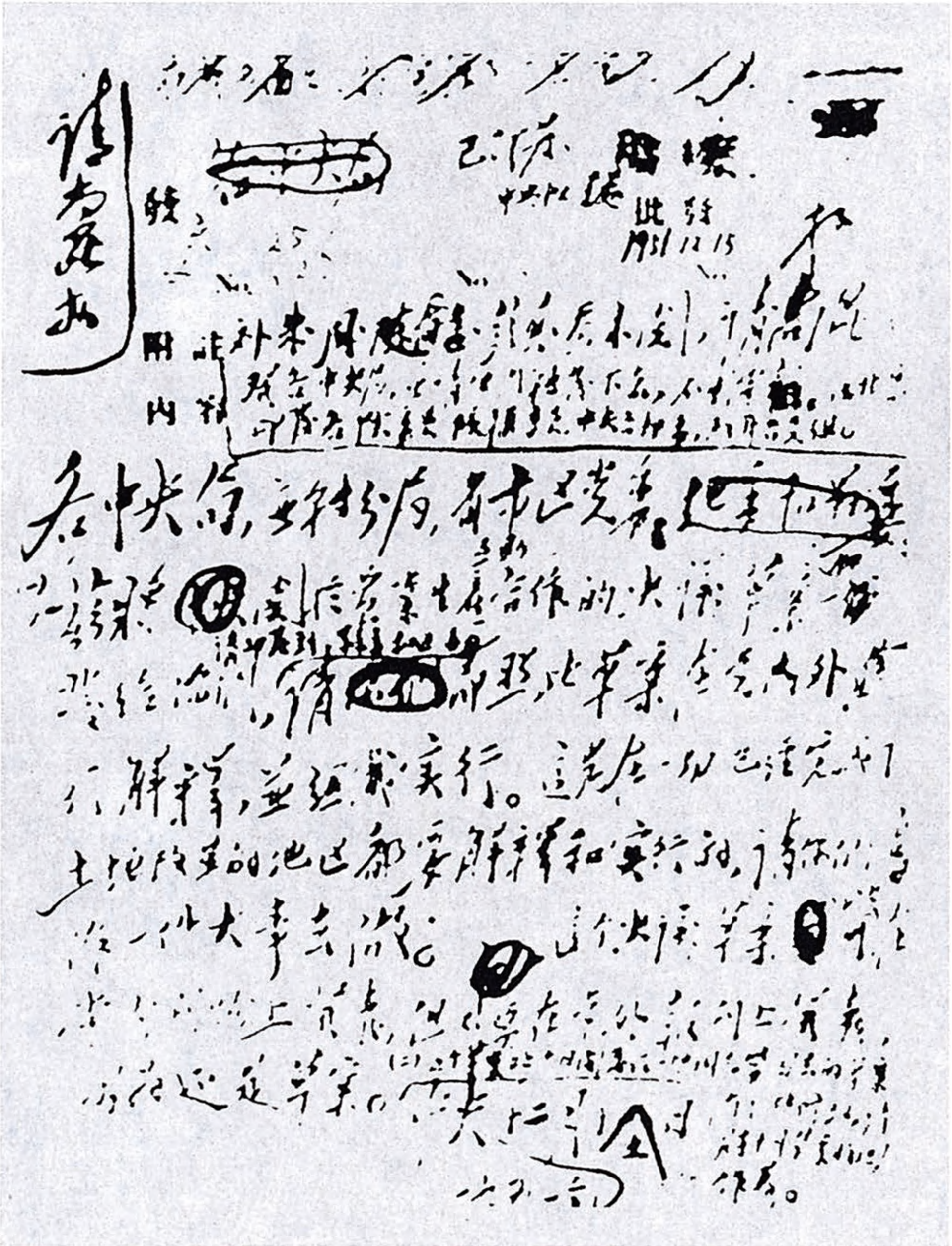
（一）兹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一件发给你们，请印发到县委和区委。请即照此草案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这个决议草案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但不要在党外报刊上发表，因为还是草案。（二）这个草案比十月间发给一些同志带回去的草案有了一些修改，请将十月草案收回作废。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批驳刘少奇反对农业合作化而起草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内通知。1951年7月，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批语，肆意指责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报告，并发给各地。刘少奇在批语中，反对毛泽东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把它污蔑为“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同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在12月15日，为印发决议草案写了这个通知，指示全党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1951年9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了在农村实行互助合作的集体道路。图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印发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通知》的手稿。

中央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的批语[1]

（1951年12月1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告志愿军党委：

今天接到志愿军党委十二月十四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给所属党委的指示，中央极为高兴，特转发你们参考。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尚且应该和能够精简节约，我全国党政军处在和平环境，当然更加应该和更加能够大量地彻底地实行精简节约。志愿军准备节约的许多项目，你们应当参照施行。

中央

十二月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1年12月15日关于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指示的批语。

转发陈毅[1]关于华东军区开展精简节约反对贪污浪费的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5日）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各中央局，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十二月十二日的报告[2]收到。我认为你在这个报告中所提的方针及办法都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1年12月12日关于华东部队精简节约、反对浪费给毛泽东并中央军委、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军区决定在1952年3月以前，以整编部队，办好转业建设和复员生产工作为主要中心；同时把开始进行反贪污、反浪费也作为中心工作之一，将两者既结合起来又分开来做。在3月之前，节约方面主要是严格执行供给标准和财经制度，停止一切不必要的修建计划，并严禁一切请客、送礼；对已发现的贪污浪费事件予以严肃处理，并在全军中结合整编动员进行初步的节约教育。至于群众性的反贪污、反浪费运动，则拟在3月以后结合整党来进行。

中央转发平原省委关于干部中贪污腐化情况通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平原省委这一文件[1]集中地暴露了地方干部中存在着严重贪污腐化情况，足以发人深省。望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希望各省市区党委都要发出这样一个文件。

中央

十二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平原省委1951年12月10日关于反贪污案件的检查、处理及今后发动反贪污斗争给各地市委并报华北局的通报。通报指出，据省纪委上半年统计，违法犯纪受处分的区以上干部中，因贪污、受贿、蜕化等而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撤销工作等各种党纪处分的占65%。据检察署对14个县的统计，1至8月的违法案件中，贪污渎职的占47%。贪污问题绝不是个别的人或个别部门的问题，已是较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罗荣桓[1]等关于军队高级干部任免和军委下发文件审批办法的建议信上的批语[2]

（1951年12月15日）

这样规定是适当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周、朱、林、聂[3]阅，退荣桓办。

---

[1] 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部部长。

[2] 这是毛泽东在罗荣桓、赖传珠（军委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徐立清（军委总干部部第二副部长）1951年12月14日关于军队干部任免、处分及以军委名义下发的文件审批办法的建议信上的批语。罗荣桓等在信中提出，（一）凡军以上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主席审查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阅。（二）凡师级干部之任免、处分及提升等级待遇等问题，报呈副主席批准，总参谋长阅。（三）凡以军委名义拟发之电报、指示、决定等文件，涉及有原则性的问题，均呈主席批准，副主席、总参谋长传阅，如一般问题则呈副主席批准。

[3]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聂应召集一次会议，将军委各部门文件及军委自己文件的核阅，规定一个办法。其中应包括紧急情况时，有些文件先发后看一项。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7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请各中央局转发分局及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在西南方面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请在党内

---

[1] 中共中央西南局给中央的报告分析了西南地区贪污浪费严重的原因，指出，虽然各级领导引起了若干警惕，并曾进行过一些反贪污斗争，也曾处分过一些人，但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借此形成一种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因此效果并不大，贪污之风并没有停止，而且继续在发展，特别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差。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决定：（一）依照中央指示，立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群众运动，并成立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和检查小组。（二）各级负责同志，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并指定专人负责，掌握此项运动。（三）认真地组织文件的阅读，充分地发动群众，把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和当前各项主要工作结合起来，并通过此项运动推动各项工作。（四）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结合起来，把本单位自行检查、专门小组的重点检查、各单位的相互检查结合起来，把号召贪污分子本人坦白和号召群众检举、揭发结合起来，有领导地开展群众性的对于贪污浪费的大检查运动。（五）对于案犯，必须要根据大、中、小加以严肃处理。（六）各地立即按照北京经验及西南一级机关计划，具体布置工作，并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按级报告制度。

刊物上予以登载，使科长以上的干部都有机会阅读。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西南局所规定的六项办法，也是正确的。

中央
十二月十七日

转发肖华[1]关于总政实行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17日）

军委总参谋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各特种兵司令部，并告总政治部，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肖华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关于总政治部在自己部门中实行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分析和布置的报告[2]，我认为是正确的，现将这个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肖华关于总政治部开展精简节约和三反斗争的报告，分析了总政机关在人员编制和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缩减机关编制人员的方案和实行节约的初步办法。这些办法包括合并住房、办公室、伙食单位、用车，严格事业费的开支手续，爱护国家财产，节约办公用品等。报告提出，这一运动拟与目前机关整党学习结合进行，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由领导干部带头，自上而下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扬民主，进行检查，然后订出由个人到部门的节约计划。

关于试办集体农庄的意见

（1951年12月17日）

王震[1]同志，并告仲勋、宗逊[2]同志，各中央局，各大军区：

（一）王震十二月十四日的报告[3]收到，我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除最后一条外，可以向分局扩大会和军区生产代表会议提出。（二）在你的计划中有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试办十个农民的集体农庄的计划，这个计划很好。中央在即将发出的关于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里，已将每省试办一个或几个集体农庄一点加上去了。这种集体农庄在目前当然只能是少数的，即每省只能办一个至几个。新疆因为是将军队垦出的一部分土地、军队修好的一部分

---

[1]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2] 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宗逊，即张宗逊（1908—1998），陕西渭南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3] 指王震1951年12月14日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的报告。报告中说，军区准备在1952年冬实行土地改革中，将过去两年分散的生产部队修建的小型水渠和所耕种的上万亩土地及建筑的房屋让出，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集体农庄10个（每处1万至1.5万亩土地），利用军队集体劳动的经验，认真试办农民的集体农庄。军队除担负警备任务外，集中屯垦经营大农场。

水利和房屋让给农民，如果又能给以机器援助，农民可能很乐意干。望将这方面的经验随时报告。（三）各军区和各地方，凡已有用机器耕种收割的国营农场和个别集体农庄（例如河北天津县廊房地方的农民集体农庄），或准备这样做的国营农场或集体农庄，均望将这看作一件大事，用力经营，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四）将王震的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各中央局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审阅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稼祥[1]同志：

此件[2]看过，可用。我只在第三页第一面上作了一点小的修改，其余都是少奇同志修改的。此件在我这里压了很久，近日还是因为你处催促才清出来看了，这是我不对；以后如压了文件，请注意催我。此件周、罗[3]已看过，请胡乔木[4]同志看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

[1]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指示草案。

[3] 周，指周恩来。罗，指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4]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秘书。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反革命分子批准权的六项规定[1]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

[1] 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的六项规定是：（一）八方面是指党、政、军、民和各民主党派5个方面的干部；宗教界中的骨干分子及社会知名人士；文教界的文教工作者，包括小学教职员以上，文艺、曲艺工作者中有影响的人士在内；工商界中的主要资本家及在工商界中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工矿交通企业，是指厂矿交通企业中的职员、干部。（二）凡逮捕上述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共产党内区委书记以上，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内相当于县长和省专处、局长以上干部，民主党派、文教界、宗教界、工商界中县以上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及500人以上的厂矿中所长、科长以上职员干部等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重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5地归大行政区批准，云南、贵州、西康3省，委托各该省区党委代大行政区审批。除以上所列人员外的反革命分子，全区均委托各省区（市）党委代大行政区审批。（三）工矿交通企业部门一般工人中反革命分子的逮捕权，由相当于地委级以上的市委批准。其中，专案和牵连人数众多的大案件，应由省区（市）党委亲自掌握逮捕权。（四）凡判处八方面和工矿交通企业职员干部中的反革命分子死刑，死刑缓期执行，一律报经大行政区审批。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一律由省区（市）党委批准。（五）工矿交通企业中控诉对象，斗争对象，事先亦应一律经过当地市委或人民政府相当党委批准。（六）在逮捕前，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各级党委要逐级详细审查。坚持可捕可不捕坚决不捕的原则，和只杀罪该处决中的十分之一二，以防止打击面过宽，波动过大，便于争取群众，孤立和打击其中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兹将西南局十二月十三日关于逮捕和判处八方面及工矿交通企业中反革命分子的批准权问题的六项规定转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各地均应照此办理。

中央
十二月十八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12月14日关于中南局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讨论和部署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基本状况，指出：工作浪费，以财贸、企业、机关等单位最为严重，城市又大于乡村；个人生活浪费，以负责一方、一个独立单位之大小首长为严重，且多为老干部。贪污者以财贸、企业、公安、各单位事务部门，有关生产的部门中干部居多，其中又以旧人员为多。报告认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就是审干、整党运动的开始和过去清理“中层”的继续深入。一方面，运动会遇到来自党内的某种抵抗力量，需要用最大决心和坚持性去推动；一方面运动自身会引来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冷静、慎重、严肃地加以指导。运动大体按3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坦白检举，第二步，清查处理，第三步，教育建设。整个运动中，必须加强两个方面的工作，以求密切有力地相互配合。一方面是有声势、有规模的群众运动，广泛的坦白、检举和批评自我批评；一方面是专门机关所领导的调查研究、处理和审讯工作。坚决开展运动，而又防止盲目性。惩治严重贪污浪费分子，而又保护、表扬、奖励模范干部人员和单位。在处理各种犯错误分子时，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区别对待。报告还指出，除必须核订精简节约计划，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执行外，清理小公家财产一事极关重要。处理的原则是：1. 老实逐级上报财产状况；2. 有报告者不没收，不报告者认为非法；3. 其资本属于挪用事业费，转移解放时接收的资产者，上报后经批准作为国家投资，用节约方法积蓄者，仍算各单位投资；4. 实行分级统一管理制，逐步走上统一经营下的投资分红制。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请即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请即转发所属各重要单位；并告志愿军党委：

顷接中南局十二月十四日报告及十二月十六日附告消息，我们甚为高兴。我们认为中南局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有分析，有决心，又有周详的办法，其中许多足以补充中央过去指示的不足。因此，请各地同志加以研究，采纳那些自己所未想到的意见和办法。请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印发给地委和县委，并在党内刊物上登载，要使科长以上的党员都能阅读，犯贪污罪浪费罪尚未逮捕和开除党籍者也要使他们有阅读的机会。

中央

十二月十八日

对北京被服厂工人来信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彭真[1]同志：

北京被服厂的工资情况，请你派妥人去切实调查和研究一下，如真如信中所说那样不合理[2]，应给予解决。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2] 北京被服厂工人在来信中反映，这次调整工资时，调整的不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工资，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的生活反而不如过去。

关于处理志愿军休养员打人事件的批语[1]

（1951 年 12 月 18 日）

一

罗荣桓、肖华[2]同志：

接到这样的信好几次了，应作必要的处理，请总政研究和决定办法。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

[1]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语，其一批在苏南区无锡市皇后戏院鞠惠黎的来信上，信中反映苏南康复医院的志愿军休养员到该戏院看戏时无端寻事，殴打职工的情况；其二批在江西省南昌市第五预备医院王心的来信上，信中反映该院休养员殴打护士、医生及无理关押院领导等情况。

[2] 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二

请总政查明酌处。这恐怕不只是南昌一处如此。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1951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北京。

在一封反映某些中央机关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1年12月18日）

尚昆[1]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2]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外交部亚洲司服务员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的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二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军委转发西北军区党委关于精简节约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19日）

各大军区，并转各级军区，并告志愿军及军委各部门：

兹将西北军区党委十二月十五日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浪费问题向所属发出的指示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个文件中说：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只有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真正做好整编工作。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请你们予以注意。这个文件又规定了许多具体办法，都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

军委

十二月十九日

对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稿的修改[1]

（1951年12月19日）

上述五种私商联营形式[2]，我们认为前三种均接受国营经济的领导，对我们是有利的。第四种则是错误的。最后一种按照共同纲领人民有结社自由的规定及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不能认为它不合法，所以应该允许其存在，但如果他们要进行投机倒把，走私漏

---

[1] 本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据中共中央关于农业贷款和私商联营的意见，私商联营的5种形式是：（一）公私联营。1949年上海联购棉花、天津联购麦子，是公私联营的。（二）私资联营。1950年7月进出口商实行统一报价、统一议价、统一收购和统一出口，这是在贸易部领导下的私资联营。（三）私资联合下乡采购。出现于1951年一二月间，也是在贸易部或工商局领导下的。以上3种私商联营形式，共同特点是在国营贸易机构领导下，可以比较有计划地实现国营贸易的销售价格、市场分配、物资调拨和对外斗争的各项政策。1951年三四月以后又发现两种私商联营，一种是在工商局、税务局领导下进行的工商业全部联营，并发动农民参加联营，不参加合作社。这种私商联营，在价格政策上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对农民和城市人民都不利，并且强迫不愿参加的商人也要参加，这显然是错误的。另一种是城乡资本家自动组织起来的联营，其目的主要是和国营贸易、合作社争夺市场，并对抗国家的价格政策。这是一种自发趋势，而且发展得相当广泛。其组织应认为是合法的，但其本质则是与国营贸易和合作社对抗的。

税，破坏国家所规定的价格政策等情事时，则应组织国营贸易和合作社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使他们不能为害。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第四种私商联营不但不能予以支持，而且应设法将其拆散。对于第五种，则应组织我们的经济力量与之作合法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

中央转发文委党组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中央文委党组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1]，很好，现转发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并请督促各地方文化教育机关的党组织仿照办理。

中央

十二月二十日

---

[1]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对已检查出的28起贪污案件分析，贪污案件主要发生在文教企业部门，其次是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贪污的方式主要是勾结奸商，营私舞弊，盗卖公物，侵吞公款，假造单据，擅改账目等。文教系统，因人员工作条件不同，其贪污总数和贪污人员的百分比，虽不如财经系统严重，但是由于在文教系统中，也有许多企业单位，而这些企业单位大多还没有实行企业化管理，许多接收的旧企业机关也没有经过民主改革，领导方面对这些企业单位，还没有加以认真的检查和管理，因此这方面的漏洞很大。我们准备以4个月时间进行三反工作。在此项工作中，根据首长领导，亲自动手，发扬民主，上下结合的原则，普遍地发动群众，采取教育、坦白、检查、检举相结合的方式来推进。在展开此项运动的同时，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仍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1日）

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志愿军：

兹将华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十五日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请各大军区和志愿军转发给较多的同志阅看。这个报告写得很好，有事实，有分析，有办法，有结论，有决心，全军都可参照实

---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1年12月15日关于军区高干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在分析华北军区部队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后指出，为了在军内党内进行一次彻底的思想整顿，并杜绝对国家资财的各种各样的盗窃行为，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公开动员，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斗争，并为了防止整编中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应先于整编工作进行。在三反运动的步骤上，先自上而下，层层带头，动员群众，发扬民主，上上下下，互相检查，开展反浪费斗争。然后进入号召坦白、群众检举的反贪污斗争。最后在反浪费反贪污的基础上，检查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掌握上，重点抓紧对后勤部门、特种兵部队和机关总务部门生产单位，但亦不放松全体部队爱护武器、爱护国家资财、爱护公共财物的教育和检查，从运动中取得经验，订立制度和群众公约，以巩固成绩，使厉行节约成为群众性的经常任务。会议要求，除军区各部门及特种兵按照华北局规定在12月21日以后作初步检查报告外，廿三兵团及各军、各军区应于12月底，师和团于1月15日以前交初步检查报告。

行。报告说：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贪污浪费现象，关于大张旗鼓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应先于整编工作去做。他们规定各军区各兵团各军应于十二月底交出一个初步的检查报告。师和团应于一月十五日前交出一个同样的报告。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应斟酌自己的情况，规定一个适当的部署。这种部署在西北军区和广西省军区是已经明白规定了的。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部队在整编前应进行一次三反斗争的电报

（1951年12月21日）

中南军区党委会，并告华东、西南两军区：

十二月十九日十二时四十五分电收到。根据华北军区、西北军区、广东军区和广西军区的报告，在应整编的部队和机关中，在实行整编之前应当和可以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许多单位已从十二月十日左右开始，到一月十日左右就进行了一个整月，就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广西军区那样做是很好的。对于你们要求“各省军区在明年一月中旬以内，各军分区在明年二月以内，应集中力量办理部队的转业与机关本身的编整”，并不妨碍。如有妨碍，即应予以调整。请你们密切掌握这一时间和精力的调整，务使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不妨碍编整工作。至于一切不在明年三月完成编整任务的部队及机关，自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特别是浪费现象，每一单位只须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发动检查和制止，即可以停止。这一斗争和镇压反革命比较有一点不同，即不致发生乱打乱杀现象，故不要怕发动起来不能控制。当然，要使这一斗争进行到彻底，领导上必须要有严格的督促和检查。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央关于批准和转发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2日）

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总党委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1]，请总党委即按这个报告所定计划施行。（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参考；并请考虑在各大

---

[1] 指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一书记周恩来1951年12月20日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在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一级机关的总党委，领导中央直属、军委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直属和中央一级民众团体的一切党组织以后，我们即召开了一次会议，研究部署当前的工作：（一）总党委目前的中心工作，是集中力量领导与组织中央一级各机关（包括党、政、军、民）的精简节约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每个大小单位去，并获得应有的成绩。（二）因为目前必须集中力量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普遍要求各单位在短期内召开党代表大会是有困难的。我们决定，除若干单位在有准备的条件下，可以在短期内结合三反运动召开党代表大会外，大多数单位的党代表大会，均须放在1952年3月以后去开。（三）为便利领导，对各系统党的组织作必要的调整。（四）提议以下列九人组成总党委，即周恩来（第一书记），安子文（第二书记），杨尚昆（第三书记），肖华、罗瑞卿、张经武、徐立清、龚子荣、曾三。并请批准以肖华为总党委的第四书记。

行政区一级直属党组织和各省市区一级直属党组织亦组织总党委，以期统一这些党组织的领导，定期召开各部门和各大单位的代表大会，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健全党的生活，提高工作效率，团结党外人员，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克服资产阶级对于党的侵蚀作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报告的批语[1]

（1951年12月2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甘肃省委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照甘肃省委的意见，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从发动到结束只需要一个月。甘肃省委这个意见是基本正确的。有些同志认为发动这个斗争很不容易，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结束。这种意见，不甚正确。当然，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包括许多大贪污案犯的调查、公审、判决、处理，许多基本建设工程重新审查其旧的浪费的设计、建立新的节约的设计，当然不是一个月所能完成，而需要更多的时间，有些可能拖得很长。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特别是一般的浪费现象，就一个机关来说，从调查、研究、批评、检查，到定出新的制度，停止浪费开支，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够了，许多机关已有这种经验。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央局的电报。

中央转发武汉市委
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22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继北京市委之后，在大城市中，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的、雷厉风行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他们做得很勇敢，公开揭露和惩处了一批敢于压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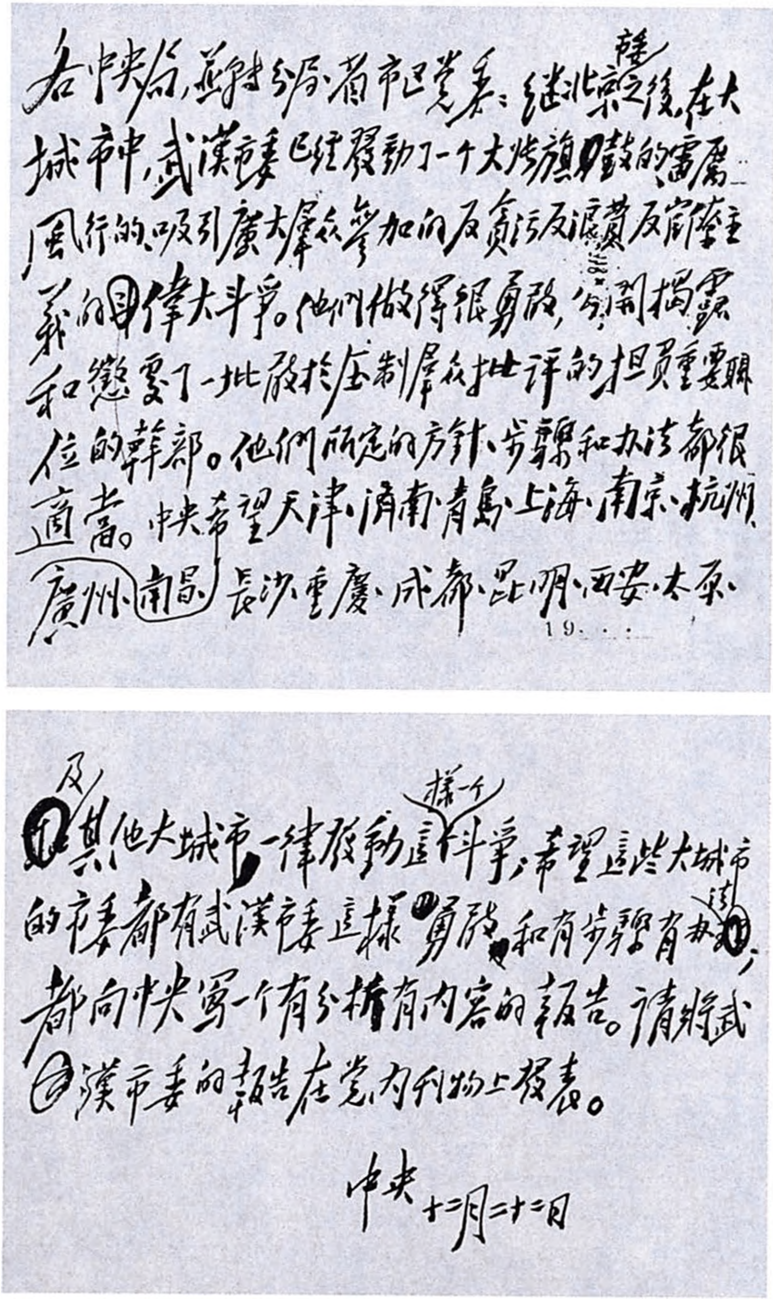
---

[1] 指中共武汉市委1951年12月19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给中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报告指出，官僚主义是贪污浪费的掩护物。它最突出的表现是压制民主，压制批评，以封建秩序和恶霸作风来对待群众。这是武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三反斗争中，为了发动群众，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必须批判和处罚那些胆敢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违反纪律的分子。并且必须从市委和市府做起，自上而下，进行老老实实的自我批评，打破一切不必要的顾虑，放下装腔作势的架子，倾听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关于运动开展的步骤，报告说，在12月内，作重新酝酿，学习文件，作动员报告，处理若干突出事件，组织一次大的公审会，1952年1月初开始发动广泛的检举和坦白运动，为第一步。然后，着重分析处理，为第二步。最后着重总结工作、健全制度，精简机构与调整干部，为第三步。预计1952年3月底可完成。报告还提出，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拟组织三种检查组。一是由各级首长负责，吸收若干人员参加的普遍检查。二是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检察署与法院的重点检查。三是下级对上级的检查。第三种检查人员拟由机关的工作人员或代表会议推选。

群众批评的担负重要职位的干部。他们所定的方针、步骤和办法都很适当。中央希望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希望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汉市委这样勇敢和有步骤有办法，都向中央写一个有分析有内容的报告。请将武汉市委的报告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二日



各中央局，並轉分局，省市區黨委：繼北京之後，在大城市中，武漢市委已經發動了一個大張旗鼓的雷厲風行的吸引廣大羣众參加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偉大斗爭。他們做得很勇敢，公開揭露和懲處了一批敢於壓制羣众批評的擔負重要職位的幹部。他們所定的方針、步驟和辦法都很適當。中央希望天津、濟南、青島、上海、南京、杭州、廣州、南昌、長沙、重慶、成都、昆明、西安、太原及其他大城市一律發動這樣一個斗爭，希望這些大城市的市委都有武漢市委這樣勇敢和有步驟有辦法，都向中央寫一個有分析有內容的報告。請將武漢市委的報告在黨內刊物上發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武汉市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给章士钊[1]的信

（1951年12月22日）

行严先生：

十二月二十日赐示敬悉。所教一节，近日稍忙，容后图之。

有江子愚[2]者从成都来信，附所作清平乐一首，颇觉不恶，寄上一观，请予掷还。先生如知此人生平，祈示一二。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二日

---

[1] 章士钊，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江子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中央关于转发华东局三反报告[1]的批语和复电

（1951年12月23日）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在报告中说，华东地区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毛主席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坚决号召全党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为此，华东局特作如下决定：（一）普遍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教育，务使全体党员干部及政府工作人员从思想上认识贪污、腐化是最可耻的行为。这一时期各地党内的整风，均应着重以检查贪污、浪费，克服资本主义影响和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二）在不妨碍生产及不影响税收的原则下，应在所有国营工矿企业、财经部门、政权机关中，无例外地展开群众性的民主检查运动。采取号召贪污分子自动坦白，发动群众检举控告，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揭发一切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三）充分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揭发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及官僚主义的典型人物和事件，并介绍表扬奖励那些廉洁奉公、保卫国家人民利益及积极为国家和人民创造财富的模范人物和事迹，使反对贪污浪费与表扬劳动模范成为长期性的群众运动。（四）为了保证运动顺利进行，必须采取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及全党动员、支部保证的办法，并须注意发扬民主，扶助正气，打击邪气，给干部群众撑腰，把从上而下的检查和从下而上的检举相配合，坚决反对只整下不整上的做法。（五）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六）应从检查贪污浪费、检查官僚主义作风过程中，切实整顿各级党政机关的组织机构，建立健全的组织生活，如定期召开各机关、各部门党的代表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建立经常检查制度等。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兹将华东局十二月二十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这个报告很好，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

华东局：

十二月二十日报告收到，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即照此施行。已将你们这个报告转发各地参考，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印发华南军区政治部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23日）

罗荣桓[1]同志：

此件[2]很好。建议：（一）印送各大军区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

---

[1] 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政治部1951年12月13日关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给所属的指示。指示对两年来部队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缺点进行了分析，明确指出：为着进一步加强部队中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团结，加强我军现代化这一组织基础，并动员全军知识分子为实现部队文化教育任务而奋斗，要求在全党全军特别是全体干部中，广泛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一）重视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地爱护他们，把他们当作党的宝贵财富之一；关心他们实际生活中的困难，并帮助他们有效地加以解决。教育大家认识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因素。从我军建设的过去、现在，特别是将来的发展上看，知识分子更有其重大作用。因此，团结争取改造知识分子，是党的一贯政策。一切对知识分子采取消极冷淡态度的，就违反了党的政策。（二）积极地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严肃地对待他们从小资产阶级感情出发的轻视工农、轻视具体实践的错误倾向，耐心地加以教育。（三）大胆地使用知识分子。对已经分配到一定岗位的知识分子，必须使之有职有权，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比较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该积极地加以培养，大胆地加以提拔使用，评级中正确地定级。

仿照办理；（二）在总政的刊物上予以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给陈玉英[1]的信

（1951年12月23日）

陈玉英同志：

十二月十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已有人告诉我，你过去在反革命面前表示很坚决，没有屈服。这是很好的。为了节省，你不要来京。你在长沙做工很好。你如果有困难，可告诉我，设法给你一些帮助。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

[1] 陈玉英，1926年冬至1931年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中央批准西北局关于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指示的电报

（1951年12月24日）

西北局：

十二月十八日的整风指示稿[1]，已收到，看过，认为是正确的，可即照此施行。

中央

十二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51年12月18日关于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说，西北局决定从现在起，有系统地普遍地发动全党和所有工作人员，向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作坚决严肃的斗争。大行政区机关和省、市级机关，现在就应立即动手，集中力量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这个运动。各专区和县也要在本月或明年1月开始。各机关、企业、团体，一般地都要先从开展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斗争入手，由此联系检查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并从而讨论堵塞漏洞，提高工作效率的各项必要办法和制度，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引导群众转到增产节约运动中去。正在进行整党工作的机关，应把这个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和整党结合起来，首先解决那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突出问题，然后进一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以至登记处理等。

对中财委转报的全国合作总社收购棉花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4日）

中财委：

我认为全国合作总社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报告[1]是原则上正确的。合作总社提议国家对棉花和粮食两种农产品都委合作社收购。除棉花一项，一九五二年，应全部委托合作社收购，由三个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已为毫无疑〔问〕，不须多说外；粮食一项，一九五二年由国家收购的近二百亿斤商品粮，似应按照合作社的组织能力，全部或大部委托他们收购。至于尚有约三百亿斤商品粮目前是由商人收购或农民自己运至城镇卖的，一九五二年尚不宜由合作社去收购。一则对商人挤得太快了，二则合作社目前恐怕也无此种能力，应当分作几年逐步实现这个计划。如能在三年至四年内做到全部商品粮的百分之八十由合作社收购，就是很好的了。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订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交中央审查决定。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

[1] 指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总结了1951年包收棉花的初步经验，提出改变过去由花纱布公司、合作社、私商三个头收购棉花的旧办法，实行由合作社一个头收购棉花的新办法。

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学校教师思想改造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4日）

各中央局：

西南局这个报告[1]很好，特发给你们参考，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适当时机，有准备地开一次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在会议中，仿照西南的办法，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推动大中小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华北和东北是否还要开这样的会议，亦请华北局和东北局加以考虑。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1年12月19日关于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讨论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给中央并各省市区党委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的收获，主要是使学校代表比较深刻地体会了教师思想改造乃是改革旧有学校教育的关键，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正确途径。这次会议的主要经验有三点：（一）发动积极分子带头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并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与人为善的批评。教育行政领导干部，特别要以身作则，进行有教育意义的自我批评。（二）采用民主方法，提倡自由辩论，展开分析批判。这样易于暴露各种思想观点，便于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三）领导上亲自作指示，各小组均有党员负责干部作骨干。这样就能够掌握情况与方针，引导会议正确地向前发展。

关于部队三反和整编的安排问题致谭政[1]电

（1951年12月24日）

谭政同志，并告陈毅、贺龙[2]二同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悉，其他文件亦收到。我的意见，已见复中南军区党委会电[3]，即是运动是要发动的，但不要使它妨碍编整工作，应由你们用电话和各军区密取联络，调节时间和精力。省军区，应赶在一月十日以前，用极短的时间，例如一星期至两星期，初步地检查贪污浪费的情况和开展初步的斗争，并向军委作一个初步报告。军分区则可赶在一月底以前展开一次初步斗争。一切受编整的部队都要有一短时间进行这一斗争。一切暂时不受编整的部队则可有较多时间去进行这一斗争，但也不要拖得很长，至多有一个多月也就够了，并须结合其他工作去做。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

[3] 指毛泽东1951年12月21日关于部队在整编前进行一次三反斗争给中南军区党委会的电报。

转发联运党委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24日）

各大军区，并转所属各单位；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联运党委这个报告[1]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并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人以为开展三反斗争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不对的。除复杂案件外，每一机关部队有半个月至多一个月就够了。联运党委所规定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是很对的。如果铁道兵团在朝鲜那样每天受轰炸和极为紧张的工作情况下能够这样做，那么国内的机关部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

[1] 联合运输司令部党委1951年12月19日在给军委总政的电报中说，铁道兵团领导机关自朝鲜返沈阳后，与东北铁道运输司令部合并，组成联合运输司令部。在东北局及东北军区的领导下，于11月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已开始发现了一些严重的贪污浪费情形。现正进一步深入动员与检查，于明年1月10日前作出初步总结报军委总政。团及分局以上党委，一律于明年1月15日以前，将检查结果用书面或电报报告联运党委和军委总政。

中央关于处理武汉市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的电报

（1951年12月25日）

中南局、武汉市委：

十二月二十四日电[1]悉。（一）罢免易吉光[2]，并由张平化[3]同志代表市委作自我批评，声明荐人不当，是完全必要的；（二）市长吴德峰同志既然有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行为或支持这种行为，对群众影响极坏，当然应向人民代表会议作自我批评，并公开发表。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五日廿三时半

---

[1] 指中共武汉市委1951年12月24日关于拟在武汉市第二届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上处理市政府领导人压制民主、打击群众批评的错误问题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

[2] 易吉光，当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秘书长。

[3]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

在中央转发中办秘书室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加写的话

（1951年12月25日）

在这个报告中所说关于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写致敬信、发祝贺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中央关于西南局决定停止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致各中央局电

（1951年12月26日）

各中央局：

据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十二月二十二日内部情况报道说，“西南区已停止了原订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均已开过党代表会议。川东、川西、川北、川南、西康及重庆市已作了一般号召。其他各地也将进入动员阶段。西南贪污浪费现象相当严重，据近来初步发现的材料：工业部约八百亿元，其中肖子言和陈松柏两大贪污案即达二百亿元。财政部初步检查为三百亿元，其中以粮食局系统最严重。川西粮食局贪污分子勾结奸商，将粮食支付书偷去给奸商到各库取粮，损失公粮十万斤。川北财政厅金库被贪污分子盗走一箱人民币，贪污分子还留一字条说：‘我生活困难，暂先支借一下。’建筑中的贪污浪费最普遍，据初步了解已达数百亿元。交通系统贪污浪费约五百亿元”等语。中央认为西南局停止原订整党学习计划，全力转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请各中央局也照这样做。

中央

十二月二十六日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初步情况的报告[1]的批语

（1951年12月26日）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1年12月24日关于三反运动开展情况给中南局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目前运动已开始发展起来，若干机关已出现热烈的批评揭发斗争热潮。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开始时，虽然经过党内外干部与群众的动员，并学习一段文件，但运动仍然发动不起来。其原因是许多老干部有点“满不在乎”，没有认真领导。其中部分同志是对三反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但多数干部是自己有不同程度的浪费现象，运动一开始将首当其冲，因此采取观望态度。有鉴于此，又重新动员，在干部中强调发扬民主，不要害怕批评，强调干部要带头，以自我批评精神来启发广大群众的热情。经过老干部一带头，运动迅速展开，形成热烈的批评运动。（二）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大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负责干部深刻作自我批评的，领导与群众间的矛盾迅速消失了，进而共同深入地检查一切铺张浪费及贪污现象；另一种是领导同志没有深刻自我批评精神，口头提倡民主，而实际又害怕民主的，群众一经起来，声势很大，压也压不住，相反斗争的火焰愈益集中到这些同志。（三）目前运动还大都集中在反浪费，发展较快的单位，领导与群众矛盾统一了，斗争火焰已开始转向揭发贪污。有贪污嫌疑的分子恐慌起来，大部分心里怕赔偿、怕处分、怕杀头。我们拟再发展几天，即公开宣布政策，号召坦白。（四）还有个别单位，由于领导人不正派，各拉拢一批小集团互相攻击，因而运动不能开展，形成混乱。这样的单位，我们拟暂时停止，准备其他单位告一段落，腾出手来派专人去，重新发动，彻底整顿这个机关。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很好，中南局在这个报告前面所说的话[1]也好，很值得看一下。请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12月24日在向所属转发湖北省委报告时加的批语。中南局的批语说：湖北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初步情况的报告说明，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放手、不坚决、不站到运动前头去领导运动，均会陷自己于被动地位；怕群众民主，一定会遭到群众反对。只有用发扬民主，而又适时引导的方法才能使运动向着健康的道路前进，才能既教育了群众又改善自己的领导地位。

关于同意将三反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致陈毅[1]电

（1951年12月28日）

陈毅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各中央局：

十二月二十五日长电[2]及十二月二十六日短电[3]，均已阅悉，很好，请即照此执行。我们的方针是必须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和整编工作结合进行，并力争于三月底完成第一期整编。抓得紧，配合得好，是可以完成的。但如因三反斗争妨碍了整编工作，则宁可稍为推迟若干天（例如半个月）去完成整编，决不可让被整编的人员带着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精神去转业和进学校，这一

---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1年12月25日关于华东军区高干会对整编、转业工作及1952年部队工作实施步骤的决定给毛泽东并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华东局的报告。

[3] 指陈毅1951年12月26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表示坚决拥护在整编之前进行一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并指出近日已发现某些部队不先反贪污即进行整编，他们胆敢违法犯纪瓜分财产，这样的人，带着浪费和官僚主义，甚至带着贪污去转业，在政治上必然造成极大损失与被动。华东部队预定1月份以反贪污浪费为主，结合整编，2、3月以整编为主结合反贪污浪费，3月后将反贪污浪费深入到建立财经工作制度诸方面去，并力求3月底整编40万至45万人的工作不受影响。

点，陈毅同志说得很好。华北西北两大军区，华南军区和广西军区，均有报告照这样做。李达、王新亭[1]二同志昨来北京面报，西南也是这样做的。请中南军区务必注意此点，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如果下级军区有不清楚者，务必明确地坚决地指示之，至要至要。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

[1] 李达，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新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关于播发饶漱石[1]的演说给新华社的批语

（1951年12月28日）

新华社：

饶漱石同志的演说[2]，我已看过，很好。只有一些小的修改。请你们即日拍还给饶漱石同志，于明廿九日或卅日在上海报上登载。新华社则于卅日以“上海电”发广播，在全国报纸上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2] 指饶漱石1951年12月17日在华东一级机关干部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后发表于1951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题为《为开展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

关于同意对付敌人拖延谈判的办法致李克农电

（1951年12月28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十二月廿八日一时来电[1]、两组简报[2]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述各点。并且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三时半

---

[1] 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8日1时关于第三项议程（机场建设问题）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4.4万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5万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对于对方第一次交来及第二次补交来的外俘下落的回答，我们觉得亦不必忙于交给他们。

[2] 指李克农1951年12月27日发来的第三项议程小组会简报和第四项议程小组会简报。当时，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的讨论已历时30天，第四项议程的讨论也已进行半月余，由于美方采取拖延政策未能达成协议。

给黄炎培[1]的信

（1951年12月29日）

黄先生：

十二月二十八日惠书[2]敬悉。

轻工业部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并已开始收效，甚为欣慰。讲演稿[3]很好，只须将第一面有四处括号内数字去掉，就可发表。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

[1] 黄炎培，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1年12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到轻工业部三反运动的一些具体情况，说在向商店查诘中，发现不少漏税、行贿、送回扣的情况，民建总会及北京市分会正在展开工商界思想改造运动，预备提出“消灭行贿、消灭回扣”的口号，回扣实是贪污，在北京社会根深蒂固，不扑灭，无以整饬各机关风纪。

[3] 指黄炎培1951年12月8日在轻工业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报告，题为《我们要彻底地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斗争》。后在1951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3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会十二月二十七日所发一周通报，很好，很正确，很有力量，在三反斗争中表现了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读之使人十分高兴。请你们于收到后即刻仿照办理，并即刻转发给各级军区直至团级，一概仿照办理。各级领导同志都要学贺龙[1]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各大军区都应发关于三反斗争的每周简报（一月份应发四次简报），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此电和西南军区的一周简报均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能够看到，越快越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午四时

---

[1] 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说，贺龙等主要负责干部亲自“上前线”，掌握运动，宣传政策，给群众撑腰，鼓励群众的斗争勇气，对运动的顺利开展起了决定作用。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3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一）批准华东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八日关于大张旗鼓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认为这个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的这个指示，分析了华东军区所属部队中贪污浪费的严重情况，指出华东部队贪污浪费的严重现象，多发生在南京上海的机关部队中，尤其在铺张浪费方面，华东军区机关实际上起了带头作用。军区党委过去对这些严重倾向，虽然一般地提出要反对和克服，也批办了大批贪污腐化案件，处罚了许多人，但没有广泛发动群众有系统地开展斗争，未能集中火力惩办大贪污、大浪费的事件，因此便不能制止贪污浪费的狂潮。前一段着重整编而忽视了在整编前进行一次三反斗争的必要性，而使12月初的高干会议没有充分讨论反贪污浪费问题。直到毛主席再次批电指示，才帮助我们将整编与三反结合起来。指示号召华东军区的全体同志认识华东地区如上海南京等城市，乃是全国资产阶级势力和影响最集中的地方，三年来对部队所起的腐蚀作用是极为惊人的。从华东部队的处境上，更应该首先发动一场激烈而严肃的反贪污浪费、反腐化堕落的思想斗争，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影响包围，才能保持我军的纯洁，巩固部队，加强国防建设。而能否提高认识并首先反对官僚主义，是能否战胜资本主义影响，肃清贪污浪费，做好整编工作的主要关键。据此华东军区党委决定对1952年1、2、3月的工作步骤加以改变。1月份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斗争为中心，结合进行整编，2、3月份以整编和转业建设工作为主，结合继续深入三反斗争。

（二）将这个指示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并转发所属各级军区一律仿照办理。必须这样做才能取得主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华东军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但现在已完全主动了。（三）批准华东军区党委会关于所属各部推迟报告时间的请求，只要团以上各级负责同志下定决心结合整编工作有力地深刻地发动三反斗争，第一次报告推迟至一月底是可以的。（四）将华东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指示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使广大干部都能阅读。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对编余部队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批语[1]

（1951 年 12 月 30 日）

朱、林、聂[2]：

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三十万至四十万，此事待周[3]病愈和中财委同志商量一下，再行酌定。如能办到，其利极大。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1951 年 12 月 29 日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2] 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

[3] 周，指周恩来。

对董必武等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复信

（1951年12月30日）

董必武、罗瑞卿[1]同志阅后，交彭真[2]同志阅办：

（一）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五机关合署办公以及开展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3]已收到，阅悉。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3] 指董必武、彭真、罗瑞卿1951年12月29日关于中央政法部门5个机关实行合署办公和动员三反的初步情况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内容有4条，其中第一、二、三条讲政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央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五机关合署办公的情况、好处和困难。第四条讲这次实行五机关合署办公和初步发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的我们党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一）党内有些本位主义的思想，常常不自觉地给党外人士的权位思想作了支柱，妨害内部工作上应有的统一领导。过去各部门间经常有些不从实际工作出发，单纯地搬“政府组织法”，闹工作关系问题的现象，甚至有所谓“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之说。（二）自由主义现象相当严重，对三反运动有袖手旁观的，也有强调自己业务与此中心运动对立的，对党组、党委决定，不合自己意见的不宣不传，各顾各的，不看整体，原则同意的事，办不办都不一定。（三）有些部门的民主人士负责人，对三反只要反贪污一反，他们对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两反很不积极。

（二）报告第四条第一项所说“利用民主人士打胜仗”的人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他们如何利用民主人民〈士〉去打仗的，请补报。这样的人已丧失作为一个严肃的共产党人的立场，必须按其情节轻重给以必要的纪律方面的党内处罚，请你们议定处罚办法（邀同本人参加）报告中央核办。

（三）报告第四条第二项所说对三反运动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党员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对于这样的人，应给以一个限期（例如十天），遵照中央决议，认真发动群众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否则即须撤职。如果本人有贪污实据，还须开除党籍；严重者须送法院惩办。

（四）报告第四条第三项所说只要“一反”，不要其余“二反”的民主人士，是些什么人，姓甚名谁，请补报。

（五）报告的其他部分，均同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中央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

（1951年12月3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并转第二第三两军区；志愿军：

（一）中央一级大行政区一级和省市一级共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例如党的宣传部、组织部，政府的财政部（厅或局）、公安部（厅或局），军区的司令部、后勤部，再加各民众团体，除每一民众团体只要总报告不要各部门的报告以外，所有一切工作部门，均应分别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政府中凡与党外人士在领导工作上合作的部门，用党组名义作报告。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四个月内，须每月作一次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这些报告各级党委应负督促之责。（二）其余照十二月四日二十时电[1]

---

[1] 指中共中央1951年12月4日关于批转北京市委展开反贪污斗争的报告的指示。

执行不变。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转发志愿军党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补充指示的批语

（1951年12月30日）

各大军区，各中央局：

志愿军亦定于一月展开全军的三反斗争，廿六军在最前线作战亦能展开这一斗争。有些人认为既要整编就不能同时进行三反斗争，这种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关于回谢生日贺电问题的批语

（1951 年 12 月 30 日）

外交部王炳南[1]同志：

请查斯大林生日我致贺电后，是否有回谢电，如有则此电[2]可发；如无，则不要发。对罗马尼亚亦然。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

[1] 王炳南，当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2] 指外交部为毛泽东起草的对斯大林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来电祝贺生日的答谢电。

给易南屏[1]的信

（1951年12月30日）

南屏学兄：

十二月二十六日来信收到，很高兴。划为中农成分，为你庆贺。旧日抄本承保存甚感，倘蒙赐还，尤所企望。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

[1] 易南屏，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结合三反进行整编给所属装甲兵党委的电报的批语

（1951年12月31日）

谭政同志，各大军区：

十二月二十九日华东军区党委批评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1]，很好。没有这种批评，彻底的三反斗争是不能完成的。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深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其实，如同华东军区党委所规定，一月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指军区及被整编的部队），结合三反，两者不但不妨碍，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整编做好。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下面各单位，有不执行此命令者，立即予以批评，严重者须以撤职相

---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在给华东装甲兵党委的电报中，批评他们为抓住整编将三反运动在战士与团以上机关分期分别进行的部署不妥，指出应以1月份1个月的时间，在装甲部队无例外地进行一次三反运动。领导机关要亲自分析本单位的贪污、浪费情况，进行具体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这样做，并不妨碍派人做整编工作，更不妨碍在3月底完成整编任务。

威胁。每天交流经验，表扬好的，批评坏的，使运动迅速发展。中南军区各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情况和各地一样严重，何以至今毫无动作，速即电告。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时

1951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养菊专家刘契的花园中赏菊。

转发志愿军四十二军党委关于节约计划报告的批语

（1951年12月31日）

各大军区，并告中央局：

四十二军的节约计划很好，请转发所属各军师参考。各军区和各军均应于短时间内定出节约计划报告军委。志愿军已走在前面，各军区和各军不要太落后了。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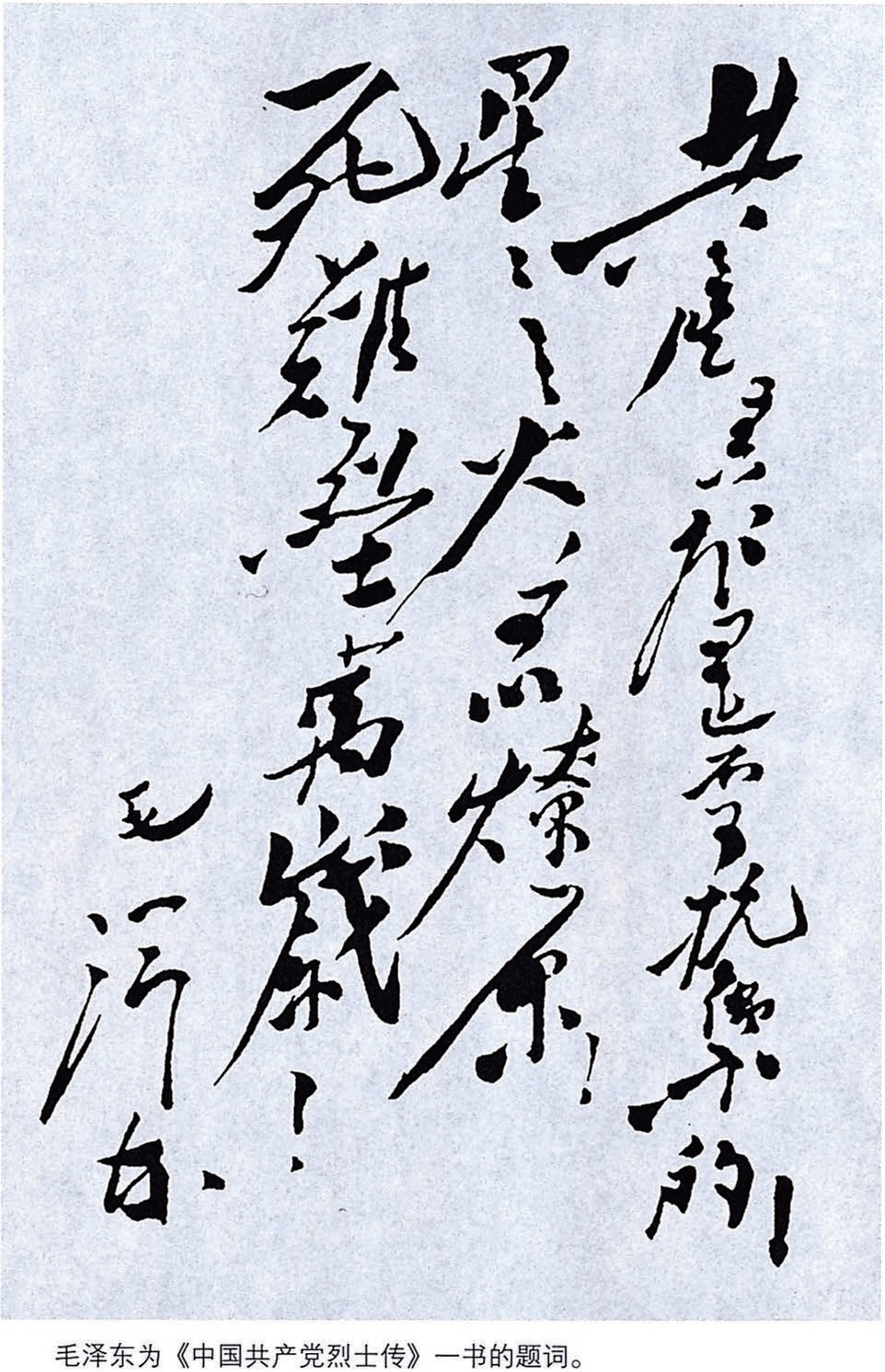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为《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一书封面题词

（1951年）

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死难烈士万岁！

毛泽东



共产党员是为了抗[illegible]

[illegible]

死难烈士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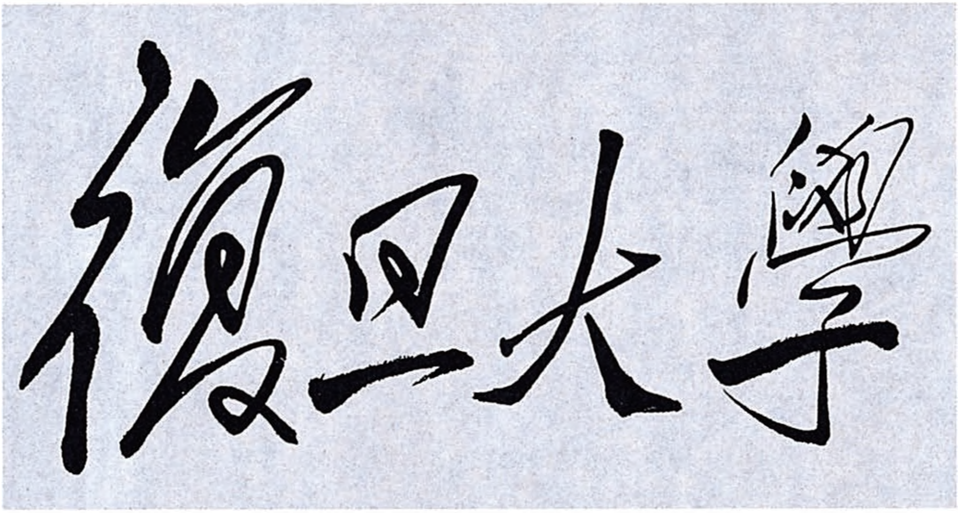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一书的题词。

为复旦大学题名[1]

（1951 年）

复旦大学



毛泽东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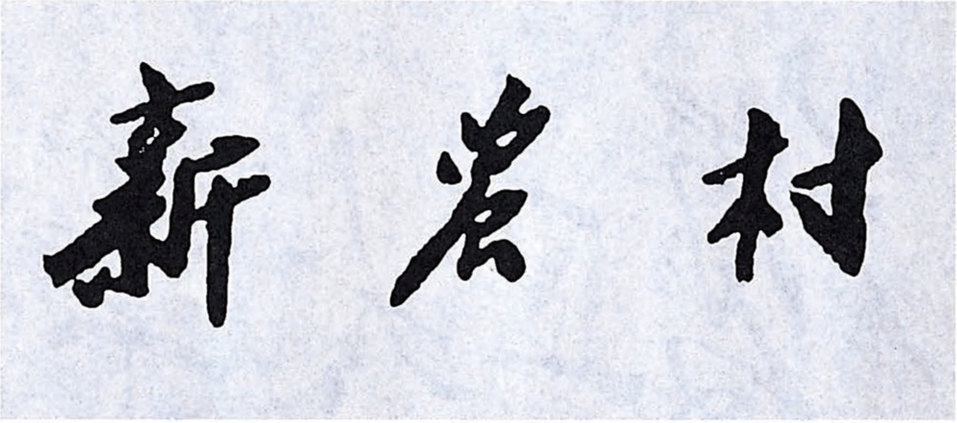
---

[1] 1951年应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之请，毛泽东亲笔题写了校名。

为《新农村》题名[1]

（1951年）

新农村



毛泽东为《新农村》题写的刊名。

---

[1] 《新农村》的前身为东北书店出版的《翻身乐》，1947年创刊，为月刊，1949年6月改名为《新农村》，为半月刊。由东北局宣传部的孟奚同志到北京找到时任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请毛泽东题写刊名。1958年9月9日，《新农村》更名为《好党员》。

1952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视察黄河。

元旦祝词

（1952年1月1日）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对中南军区三反指示和谭政[1]来电的复电和批语[2]

（1952年1月1日）

一

谭政同志：

此件[3]及十二日三十日十五时电[4]均阅悉。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但有两点不妥，我已批在文内，请考虑改正。此外，请注意：（一）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二）亲手抓紧直属部门，三天一会，五天一报，照西南的办法，做出成绩，取得

---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这组电报和批语中，其一是毛泽东给谭政的复电，其二、其三、其四是毛泽东在中南军区三反指示上的批注，其五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批语。

[3]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1年12月29日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给华南军区、各省军区、各军、海司、空司、高级步校、直属各大单位党委的指示。指示作出了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三反斗争作为当前中心工作等10项规定。

[4] 指谭政1951年12月30日15时关于将整编与三反斗争结合进行给毛泽东的电报。

经验，通报各处。盼望你们的捷报。

毛泽东
一月一日二时

二

这是很对的。——毛注[1]

三

这一条[2]不妥。一般机关人员从司令部政治部到连部，也有贪污人员，他们可以这一条为借口，只反浪费，不反贪污。必须使一切机关部队学校既反浪费，又反贪污，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毛注

---

[1] 这个批注写在中南军区党委三反指示第五项中以下一段话之后：“凡贪污浪费现象严重或其可能性较大的部门，应着重在贪污浪费方面作检查，并据此进行教育。例如对后勤各部门、各机关之总务部门，及其他负有采购、包工、订货、保管、分配的部门，与掌握了各种业务费的部门等。”

[2] 指中南军区党委三反指示第五项中以下一段话：“在贪污可能较少，铺张浪费可能较大的部门，则以反铺张浪费为主。例如，对一般机关行政部门，在一般机关人员及连队人员中，主要是进行节约和爱护国家财产的教育，普遍发动节约，造成群众性的节约运动。”

四

这样规定[1]不妥。各级军区和被整编部队均可以这一条为借口，注重整编不注〔重〕三反。应照华东规定：（一）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二三两月以整编为主，结合三反。（二）领导干部分工，以一人专管三反，他人助之；以一人专管整编；以一人照顾其他工作；而在三反高潮时应集中大力完成三反。——毛注

五

林彪[2]同志：

接到谭政此电及另一文件后，已将批评中南的电报停发，因为谭政的思想已扭转过来了。谭写的另一文件是基本正确的，有两点不妥处，我已批在文内，于今夜派专人送给谭政，并告诉他一些做法。你病如何，望好养护。

毛泽东

一月一日上午三时

---

[1] 指中南军区党委三反指示第九项中以下一段话：“这一运动的发动时间，可依整编转业任务而定，就是整编转业工作繁忙的单位，为了不致妨碍整编转业，应在整编转业工作布置大致就绪后发动，并与整编结合进行。”

[2] 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员。

在川北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日）

川北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报告[1]简明有力，说得中肯，发给各地参考，并在党刊发表。

毛泽东
一月一日

---

[1] 指中共川北区委员会1951年12月21日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给西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解放后不久即已开始的反贪污斗争的情况，总结了过去没有把这场斗争作为严重的任务大张旗鼓地展开的几条教训：（一）没有统一布置和在一切机关干部乃至人民群众中进行深入的动员，造成人们对贪污分子深恶痛绝的政治气氛。（二）没有与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反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三）对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革命品质与作风提倡不够，对忠心耿耿的干部表扬太少。（四）没有把党委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检察署和法庭健全起来，这些部门也没有把反贪污、反浪费与反官僚主义当作中心工作去做。

转发志愿军二十兵团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日）

各大军区，并告各中央局：

志愿军二十兵团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报告[1]很好，望即转发各军师，并在党刊上发表。志愿军已有两个军（二十六军和四十二军）及一个兵团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斗争和做了节约计划，国内则除六十六军外，还没有收到报告。原因何在，速即查报。

毛泽东

一月二日

---

[1]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党委1951年12月27日关于三反运动给志愿军党委、军委总政治部并华北局、华北军区党委的报告。报告说，因处在战争环境，领发、采购物资较多，管理不严，致使贪污分子趁机混水摸鱼，但是浪费和物资的损失远较贪污为甚和更普遍。为此决定全兵团自上而下，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战士，进行普遍的无例外的大检查，并根据机关和部队的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然后，根据检查结果订出三反的具体计划和节约公约，健全制度，并反复深入地进行教育，求得切实贯彻执行。

答谢威廉·皮克祝贺生日的电报

（1952年1月2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敬爱的威廉·皮克同志：

衷心地感谢您，我所敬爱的皮克同志，在我生辰之际所表示的十分亲切的祝贺。皮克同志，我和您的意见一样，只要苏联、德国、中国和各人民国家团结一致，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是可以制止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向您致同志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北京

祝贺威廉·皮克寿辰的电报

（1952年1月2日）

敬爱的威廉·皮克总统同志：

当您七十六寿辰之际，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我个人向您致衷心的祝贺。祝您在争取德国的统一、民主、和平与独立的事业中获得伟大的成功。祝您身体健康，祝您心情愉快，祝您万寿无疆！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北京

对组织空军部队到朝鲜战场作战的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月2日）

刘亚楼同志：

（一）同意你们的计划[2]；（二）应当在最近几天内精密地组织一次远程夜航轰炸，但不要经过板门店地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二十三时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2年1月2日13时报告的批语。

[2] 指刘亚楼等报告提出的意见。报告说：为了争取时机，尽量使更多的新组成的空军部队能得到战斗锻炼的机会，每个师或团在与自己数目相等的敌机群进行过5次或7次战斗后，就应调回后方，以便让出位置给其他新的部队作战。如果朝鲜战争长期继续下去，则这些参加锻炼但锻炼得不够成熟的空军部队，可以再调去安东。根据上述原则安排空军部队调防，并继续组织军事、政治、机械、后勤、训练等各种干部到安东进行战地实习，以便继续取得组织和指挥空军部队作战的见识和经验。根据空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去年夜晚出动袭击大和岛附近敌人之经验，现在停战谈判期限既过去，应该考虑是否需要用夜航轰炸机去轰炸金浦、水原之敌人机场以及仁川港口之问题。

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1月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中央财政部党组这个报告[1]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在干部会上应指名批评落后的单位及其领导人，指名奖励做得好的单位及其领导人，宣布撤职的名单及理由。中央直属总党委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召开党政军团群部长至处长级的数百人的扩大党委会，由薄一波安子文[2]等同志宣布中央决定，限期一月一日至一月十日，各院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党组1952年1月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财政部机关1951年12月5日以来揭发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发动群众的3条经验：思想教育、党员带头和首长作自我检查。财政部党组全体同志首先在党组内作了较深刻的检查，一部分同志且在党员干部中作了检查，随即由各司、局、处长在本单位当众作自我检查和启发报告，除少数单位因首长检查不深刻未收到应有效果外，绝大多数反映都很好。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安子文，当时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

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一月十一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并在会上指名宣布几个部是做得很好的，几个部是中等的，很多部是落后的，并指出部长姓名。同时宣布军委技术部长□□□，中央交通部办公厅主任□□□，重工业部局长□□撤职查办。这样一来，全场振奋。当日回去，连夜开会。元旦整日开会，很多部长、副部长到一下团拜会就回去，戏也不看了。至一月三日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动』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纷纷送来报告。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现规定每十天开一次，除重病不得请假。估计到一月底，中央一级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经验，供你们参考。此外，中央已指定薄一波同志（他是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用电话和各大区负责同志联络，在目前三反紧张时期，每三天至五天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中央此电，连同薄一波同志给毛主席的信[1]及中央财政部党组第四号报告[2]，均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

---

[1] 指薄一波1952年1月3日为报送财政部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提出了4个问题：（一）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私商勾结，使国家受损失，私商肥起来；（二）化大公为小公，挪用巨款，已成为有机关生产的部门的通病；（三）财经机关最可怕的还是掌握审批权限的部门发生官僚主义，一不小心即造成巨大损失；（四）中财委发动群众的主要一条经验是首长彻底作自我检讨。

[2] 即本篇所说的财政部党组1952年1月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

转发江西省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江西省委这个报告[1]很好，认真地和有力地解决了问题，和有些地方党委所作空泛无力的报告大不相同，请在党刊上予以发表。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1年12月31日转发的江西省委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全省贪污浪费的严重情况和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斗争的措施。这些措施是：(1) 省级机关拟召开代表会议，进一步深入动员，开展群众性大检查运动，在此基础上组织公审，处决几个突出的贪污犯，以打开局面。全省确定省、地级和6个重点市首先开展三反斗争，并把它作为年终整风鉴定的主要内容，作为整党的重要步骤。县级机关则先在财经企业部门开始三反斗争。(2) 抓住开展运动的决定关键，打通主要干部的思想，做到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紧密依靠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3) 监委、纪委、检察署和法院联合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办事机构，专门处理重大案件和接受群众控告、检举。(4) 各地小家务要坚决进行清理上报。(5) 县以上各级党委要定期向上级报告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

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1]

（1952年1月4日）

这个计划[2]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四十万军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四十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计划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2] 指1952年1月2日聂荣臻给毛泽东并朱德、周恩来和林彪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调拨与建设的计划。该计划将全国工程部队增至21个师，计21万人，另以19个师，计19万人，组成屯垦部队。

对聂荣臻[1]关于山东回民支队整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4日）

刘格平[2]阅后，送聂荣臻同志办。

（一）同意保留原番号，作为地方部队；（二）过去华北编散回民部队的经过望聂查明报告；（三）请刘格平同志经常注意，有对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处置不妥当的，向我直接提出意见。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刘格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大贪污犯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1952年1月4日、6日）

一

请薄一波[1]同志拟复[2]，同时告知各区。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指草拟中共中央对华东局1952年1月2日关于大贪污犯的逮捕权及判决权问题给山东分局并向中央请示的电报的复电。华东局的电报说：同意将一般的大贪污犯的逮捕批准权交地委及各直属市委；对有全省及全国影响的人士因贪污需加逮捕者，应报请省委或区党委批准，重要者应报请华东局或中央批准；对贪污犯之判处徒刑和死刑的，应经过司法机关并按惩治贪污条例办理。

二

各地如有需要杀几个贪污犯才有利于发动群众，亦可杀几个。[1]

---

[1] 根据毛泽东1952年1月4日的批语，薄一波起草了中央的复电，经毛泽东审改后于1月6日发出。毛泽东的这句话，加写在复电中“但在一月份内只应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贪污案件并进行审讯，而不必忙于处决”之后。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1]

（1952年1月4日）

目前全国各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虽然已经先后开展起来了，但是，这个运动的发展还很不平衡、很不普遍、很不深入。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各级机关中，运动发展的情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好的、较好的和不好的。区别这三种情况的标志是群众发动的程度。凡是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的，运动就开展得好；初步发动了群众但发动得不充分的，运动的开展就还不够好；群众基本上没有被发动起来的，运动就不能开展或开展得很不好。目前有不少的单位、不少的部门、不少的地区是属于第三种情况的，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一切关心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人，都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必须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在一切党组织，一切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一切国营和公营的工业、交通、银行、贸易的机关和事业，一切合作社组织，青年团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各级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和上述各方发生关系的私人工商事业，都应毫无例外地充分发动群众，把反对

---

[1] 这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形成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如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一样，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坚决进行到底。

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或根本没有发动的情况是从何而来的呢？这里的主要关键就在于领导；而领导问题的中心就是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动群众，把运动领导起来。目前有的地方，运动开展得很好，很有力量，就因为那里的负责首长，把这个运动当作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主动地采取战斗的姿态，亲自“上前线”，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的模样。反之，目前所以还有不少令人不满的情况存在，就因为有些首长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缺乏战斗精神，畏首畏尾，陷于被动，甚至于消极怠工的原故。

这些人既然身为首长（不管他是哪一级的首长），为什么却不负责任、不亲自动手去发动群众呢？事实告诉我们，目前有两种人是不能发动群众的。一种人是对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认识不足的。他们不了解，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他们不了解这些，却把这个运动视同等闲，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领导责任，委托在助手或秘书等人身上。群众看到领导人的这种态度，也就彷徨观望起来。这种人是政治嗅觉不灵敏而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他们现在应该猛醒过来，再也不应该犹疑了。

另一种人是自己手上不干净，他们害怕发动群众对自己不利，

因而多方掩饰贪污浪费的现象，找出各种借口，对运动的领导采取消极怠工、阳奉阴违的态度，有些甚至公开出面抵抗。事实上，他们在运动中已经处于极端被动的地位。如果他们仍不觉悟，并且继续采取怠工和抵抗态度的话，他们就必然成为群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障碍，成为群众斗争的对象。

事实上群众对于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群众是一定会在中央号召之下行动起来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是坚决领导和支持这种正义的群众斗争的。任何人也休要妄想抵抗这个神圣的斗争，任何负责人员也不容许忽视或放弃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以怠工。那末，正确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正确的态度是公开检讨、争取主动。如果自己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就应该认真地公开检讨自己的官僚主义，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继续领导群众。如果自己手上不干净，更应该公开地向群众坦白认错，毫无保留地向群众交代清楚，并且让群众毫无顾忌地揭发和检举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或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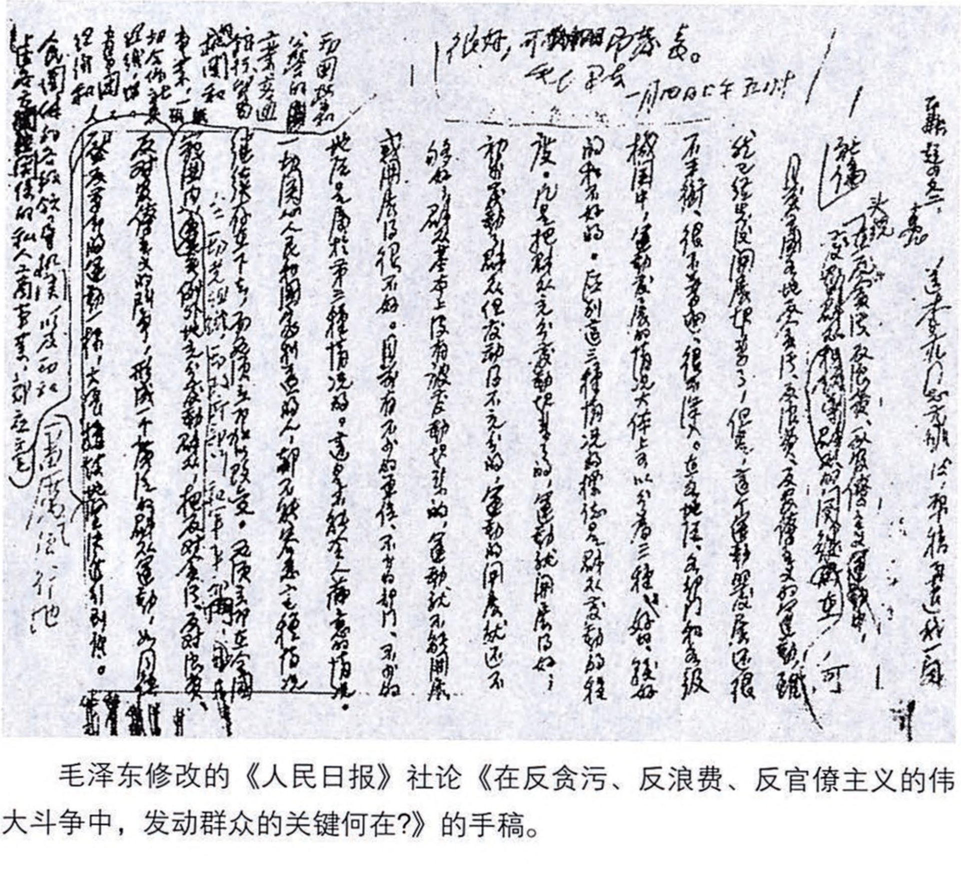
如果有人执迷不悟，胆敢违抗中央指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么高，资格有多么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阻碍群众运动的，就不但应该撤职，还应该受到法律处分；如果他是共产党员更应该受到党的纪律处分。

毛泽东同志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就已经强调地指示我们：“绝对不容许再有各自为政、闹独立性、破坏政策、破坏法令、侵害人民利益、各单位互相斗争、互相妨碍，以及干部中贪污赌博等现象再行发生。如再有这类现象发生，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

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对于“不称职的及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必须调动工作，有些特别严重的并须予以应得的处罚”。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阻碍群众运动的人，也不外这两种。采取官僚主义态度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不称职的人；因为自己手上不干净而不发动群众的，就是犯贪污腐化错误的人。对于这两种人难道还有丝毫理由不应该严申纪律吗?

当然，对于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该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的调查，实事求是地分别处理。同时，对于一贯忠心耿耿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有功，偶尔失足，错误不大而能迅速坦白检讨的，也应该考虑减轻处分或免予处分。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宽恕的了。对于这样的叛徒和毒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党的威信，而是提高党的威信。只有坚决地这样做，才能使我们的党和人民革命的队伍坚强和巩固起来，永不再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

这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对于每个革命工作干部，特别是对于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机关单位的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极重要的考验。它考验着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考验着我们对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定性和彻底性。在这个重大的政治斗争中，每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勇敢地站在最前列，坚决地领导群众起来斗争，迅速地取得完全的胜利。



很好，可[illegible]用发表。
毛泽东 一月四日下午五时

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关键何在?》的手稿。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并告志愿军：

（一）批准北京市委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

---

[1] 中共北京市委的报告指出，目前三反运动已进入高潮，现在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和贪占公家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有利条件牟取暴利的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骗国家财物的行为；有各种浪费和违反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鉴于以上情况，报告提出今后的计划是：第一，继续号召坦白和检举，最近几天主要是号召坦白。针对工商界最怕坦白后无限制地追缴漏税和罚款，宣布凡坦白者，除补缴1951年漏税外，不再罚款；否则，查出后将追缴解放以来全部漏税，并照章罚款。第二，号召全体市民和一切工作人员大胆检举。为便于群众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第三，从严法办一批贪污行贿分子，并公布一批各种类型的贪污案件，以推动坦白运动的开展。第四，继续逮捕抗拒、破坏三反运动的贪污、行贿分子。第五，各区召开代表会议，并召集街道和村民大会，进行动员宣传，使三反斗争家喻户晓，群起而检举。

这个报告是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作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在大城市，并可专为此事出版内部报刊。（三）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四）本指示及北京市委的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决定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中央直属总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华东军区组织检查团互相检查的办法[1]很好，望各党政军民系统仿照办理，迅速推动三反斗争的发展和完成。

毛泽东

一月五日

---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3日的指示中关于组织检查团检查三反工作的办法是：各大单位均需迅速组成检查团，按规定的分工在1月份互相检查，并以驻南京、上海的机关、部队为重点。检查的主要内容，是各单位对三反斗争重视的程度，对中央和军区党委指示执行的情况。检查的方法，主要是听取被检查单位领导人的汇报，查阅讨论布置三反工作的会议记录与文件，访问所属的下级单位负责人、一般干部、战士和勤杂人员等，了解反应，征集意见。每个检查团都要选择两三件重大的突出的贪污浪费案件进行彻底检查。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三反中报告制度的规定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党委一月三日给所属的指示[1]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必须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

毛泽东

一月五日

---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3日关于三反中报告制度的规定。规定要求团以上党委1月份作简报两次，月终作一次总结性的报告；2、3、4月月终各作一次关于继续贯彻厉行节约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

关于起草惩治浪费条例和修改惩治贪污条例的批语[1]

（1952年1月5日）

薄一波、彭真[2]同志阅。

请你们对贪污浪费轻重大小如何处理问题加以研究，于十天内将惩治浪费条例起草出来，并将惩治贪污条例加以修改，于**一月十六日**交我为盼。

毛泽东
一月五日

---

[1] 这一批语写在中共浙江省委1952年1月1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意见给华东局并报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对张劲夫[1]关于浙江省直属机关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5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

此件[2]很好，请在党刊上发表，使很多同志都能看到。

毛泽东

一月五日

---

[1] 张劲夫，当时任浙江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增产节约委员会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和浙江省委转报的张劲夫1951年12月26日向省委所作的关于省直机关开展三反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运动初期主要以反浪费为主，多数单位首长以身作则，各级骨干层层带头，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感动了许多人，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领导上也取得了主动，为进一步开展反贪污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报告还对今后进一步大力开展反贪污斗争和分别不同情况处理贪污浪费问题提出了意见。

对中共济南市委报告的批示[1]

（1952年1月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济南市委这个报告很好，请转发各大城市参考，并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济南市委关于开展三反运动部署的报告的批语。该报告的主要特点，一是内容全面充实，既扼要列举了各行各业暴露出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说明开展“三反”运动之有的放矢，又明确提出了从机关到企业到警备部队方方面面开展运动的部署要求；二是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清剿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抓住了运动的要害；三是开展运动的决心大，方法对，要求各级领导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务求达到目的，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中南局关于近几个月内少开主要干部出席的业务会议的建议的批语[1]

（1952年1月8日、11日）

一

薄一波[2]同志：

（一）请指示所属各部注意少开中南局来电中所说的那些会议；

---

[1] 毛泽东的第一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1月6日给中央的报告上。中南局的报告说，现在三反及土改、民主改革三大运动同时进行，工作非常紧张。这三大运动都须各级各部首长负责，亲自动手，而中央各部会议甚多，又要主要干部参加，致使三反运动大受影响。为此建议中央通知各部，在今后两个月至三四个月内尽可能少开或不开须主要干部出席的会议。第二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1月10日给毛泽东、周恩来并中央的电报上。电报说，中南工业部副部长兼军工局局长朱毅最近接到赴京开会的通知，因三反运动紧张，请求准其请假。电报再次提出请中央考虑1月6日电中所述意见，建议通知中央各部门将原定1月和2月半期间召开的业务会议不开或推迟。根据毛泽东这两个批示的精神，中央于同年1月14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通知，同意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尽可能不开或少开须主要干部出席的各种业务会议。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二）前几天所谈月底召集各大区干部会〈汇〉报三反，请暂不发通知。

毛泽东

一月八日

二

请周[1]拟复，似应同意。并通知各部。

建议以后政府各部召开全国会议均应经过总理批准。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

---

[1] 周，指周恩来。

关于军事系统三反报告一般由总政处理的批语

（1952年1月9日）

肖华[1]同志：

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党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

毛泽东

一月九日

---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甘肃省委关于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

甘肃省委对三反斗争抓得很紧，很认真，反映了真实情况。有些贪污情况比甘肃还要严重的地方，在其报告中却说成不甚严重，贪污人数甚少，款数不多，这是不真实的，请你们加以注意，不要被下面的不真实报告欺骗了。甘肃省委这个报告[1]可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九日

---

[1] 指中共甘肃省委1952年1月3日关于三反斗争给西北局的第二个报告。报告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全省贪污、浪费现象极为严重，各类人员贪污的方式极多，中央提出开展三反斗争是非常适时、万分必要的。但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对中央的精神领会不足，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警惕不够，对三反采取冷淡态度；在中下层干部中则有很多顾虑，怕这怕那。为此，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三反领导问题。会上批评了把贪污浪费看作“生活小节”“不是原则问题”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三反斗争是当前重要的政治任务，必须领导亲自动手，充分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给罗元贞的信[1]

（1952年1月9日）

元贞先生：

一月一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

[1] 罗元贞（1906—1993），广东兴宁人。早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毕业。精诗词，擅联语。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1年，他决定到山西大学任教。可是直到1952年元旦仍未启程。那时他读了流传的毛泽东《七律·长征》诗后，在这年元旦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将该诗“金沙浪拍悬崖暖”中的“浪拍”改为“水拍”。这是毛泽东1月9日的复信。

转发罗瑞卿关于公安部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公安部门；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罗瑞卿同志这个报告[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密切指导公安部门都照中央公安部的方针和办法在全国三十万公安人员中开展一个彻底的猛烈的三反斗争，将一切污毒洗干净。哪一处公安机关（包括警察）的斗争比不上中央公安部，就是那里的领导人不行，方针和办法不对，必须立即加以检讨和改正。中央公安部的做法也是一切机关部队所应仿效的。此件应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指罗瑞卿1952年1月8日关于公安部开展三反斗争给总党委、总检查委员会并报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一周来，公安部的三反斗争已经进入贪污分子坦白和群众性检举的高潮，形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三反斗争队伍。运动发展的步骤，是由上而下，先内后外，即先把领导人检查好，“脱裤子”，洗干净，群众满意了，领导人进入阵地并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斗争火力就立即烧到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身上。这样做的单位，沉重地打击了贪污分子，揭发了他们的罪行，发动了群众，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领导。

转发空军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兹将空军党委一月四日至八日共五天的三反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空军党委的方针和办法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无论什么贪污分子也能揭露出来，浪费和官僚主义均将一扫而光。像空军直属部门这样的大单位，除复杂案件外，大约有两星期左右即可解决问题。这是具体生动的报告，可供各单位参考，请在党刊上发表。空

---

[1] 指空军党委1952年1月4日至8日每天向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所作的三反情况报告。这些报告谈到，空军党委从党委常委至各部部长、处长，层层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带头检讨的做法，从而发动了群众，使他们打破顾虑，敢于揭发批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在运动已由首长带头转到广泛号召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人自动坦白，同时组织调查小组到商人中去调查材料，设立征求意见箱让群众进行检举。各支部均召开坦白大会，对已经坦白的，组织专门小组继续清查和收集材料；对尚未坦白的，继续作思想动员，进行个别谈话，打破顾虑。同时号召已经坦白者进行检举揭发，立功赎罪。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进一步采取大会与小会相结合，有意识地由普遍检举转入重点坦白与揭发，并且明确划分自己主动坦白和群众检举揭发的界线。为了将三反运动深入一步，又根据加强领导和加强与群众联系的需要，调整了三反领导机关的成分，撤换了一些阻碍运动发展的干部，配备了得力干部，并且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领导；对运动开展较差的单位，党委派负责同志深入单位进行帮助。

军党委在三反紧张期间每天反映情况的方法，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
一月十日

中央关于天津市委对干部超支问题所作分析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中央同意彭真同志在这个报告[1]中所述天津市委在干部超支问题上所作的三类分析，认为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请各级党委即照这种分析在党内外传达，以利开展三反斗争。此件应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月十日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彭真1952年1月9日关于天津市三反斗争给毛泽东并报中央、华北局的报告。这个报告是他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同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通电话后写的。报告中谈到，天津市对干部超支问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不可避免的超支，如煤火费、亲属多住几天的伙食费等。这种超支，既非贪污，也非浪费，而是由于制度有若干不合理。第二类是生活铺张性质的超支，如小灶标准过高等。它的性质是浪费，应当节约，但尚非腐化。第三类是腐化性的挥霍，即迹近贪污的浪费。经过这样分析，特别是进行检讨后，有些仅有第一、第二类超支，尤其是仅有第一类超支的干部，在三反斗争中就心平气和、理直气壮了。

对山东军区第二届生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薄一波[1]同志阅后送粟裕[2]同志：

山东军区关于部队生产问题所采取的方针我觉得是好的。军事系统的生产问题，暂时还只能这样办。这就是以大军区或二级军区为单位执行“管而不动，听候命令（即经批准才能开支）”的方针。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转发西康军区关于三反的紧急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10日）

此件[1]很好。真是雷厉风行，没有拖泥带水。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指中共西康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6日关于开展三反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一）团以上机关必须在5天内发动起群众，用7天时间进行民主检查（即个人坦白，群众检举和组织检查），5天做好结束工作；连队则3天发动起群众，5天进行民主检查，3天做好结束工作。（二）改变平时工作方法，大张旗鼓，雷厉风行，集中力量进行三反斗争，整编工作一律暂缓。（三）各军、分区、军直、教导团等3天一次向军区作报告。（四）三反运动是当前压倒一切的工作，各级组织务必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绝不允许拖泥带水，敷衍了事，要在一月份内做出显著成绩，彻底解决问题。

转发饶漱石[1]关于华东各地三反斗争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

（一）饶漱石同志一月十日的报告[2]很好，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各地都可采用。（二）机关生产在三反斗争中已名誉扫地，很多机关要求立即交出，但由政府马上接收还有困难，在目前几个月内仍应责成原机关负责管理，并不得抽动任何人员和财产，听候政府处置。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三）华东向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办法很好，北京天津也是这样做的，请各大中小城市都照这样做。对于一切犯法的资本家，无例外地均应抓住其小辫子，分别轻重大小，予以不同的惩治或批判。一部分罪大恶极者，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 指饶漱石1952年1月10日关于三反斗争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提出华东各机关三反运动的主要经验和方法是：（一）各部负责同志首先进行彻底自我检讨。（二）放手发扬民主，大胆启发群众展开批评。（三）领导要有坚定的决心，及时宣布限期展开斗争。（四）全面展开和重点审查相结合。对贪污分子要以财经机关，总务、采购、机关生产等部门为重点，切实进行审查。（五）大会坦白示范与小会深入检讨相结合。（六）党政机关内部的坦白、揭发与外部有关商人的坦白、检举互相配合，互相推动。

没收其资产。这是人民政府在全国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惩治资产阶级的犯法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请你们依据当地具体情况，精密地组织这一场斗争。在斗争中注意组织三反的统一战线，酌情照顾民主人士。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在中南局关于处理机关小家当的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请陈、薄、李[2]三同志商复，请薄主稿。

这不是中南一处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要研究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包括党、政、军、民在内。如一时不能拟妥，迟几个星期也可，可先用电话通知邓子恢[3]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1月4日的请示报告提出，目前机关小家当异常普遍，财产很大。中南一级机关各部都有，有些部处、科层层都有，大的拥有几十亿元，小的也有几百万元。中南各省也是省、地、县、区、厅、处层层都有，数目估计有二万多亿元，可能达到三四万亿元。这些小家当一般用于投资工业与手工业，补贴工作上的需要，补助某些干部的特殊困难与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福利。但是，用于铺张浪费，特别是用在少数干部身上，也占很大部分。而且机关生产实际上与商业投机有联系，为贪污受贿大开方便之门。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看，小家当利少害多，需要有步骤地予以取缔。

[2]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李，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3]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在薄一波转报李富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报告的信[1]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一波、富春同志：

这两信及富春一月十三日的信，均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指李富春1952年1月11日关于中国科学院三反运动情况给薄一波并转毛泽东的报告和薄一波1月12日为转送李富春的这一报告给毛泽东的信。李富春的报告说：科学院三反情况不坏，对科学人才有教育意义。关于下一步的布置，首先是确定对科学人才必须保护不伤的原则，已检讨者如不能过关，则帮助其过关，未检讨者（如所长）不必点名要其检讨。关于一些著名科学家的住房、汽车、暖气等问题，首先在党团员中说明这是政府批准的，不是浪费，更不是贪污，然后在适当时机向群众说明。其次，决定科学院进行三反运动的方针需与科学院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主要使科学家了解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的错误的危害性及其来源，即在科学院中也有此种问题。

科学院的三反运动，在科学家中主要的是启发思想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运动的继续开展分为两步：第一步进行思想反省与重点检查。思想反省，应组织党团员带头，揭露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启发大家，不要勉强非党人士进行反省。重点检查，主要是检查仪器的购买及科学事业费是否用得恰当，弄清事实，而不追究个人责任，不检讨个人生活。第二步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讨论今后工作如何改进，订出今年院及各所工作计划，结束三反运动。薄一波的信中谈了三反运动发展的两个问题：（一）在各工业、交通及财经部门中，三反运动已发展到检查科学家和旧专门家的资产阶级观点，我们认为很好，拟予推广。（二）多数机关在三反运动深入发展的基础上结合反对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进攻，自然而然地检讨到自己的思想，即分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我们仍让大家继续深入三反，但如果三反已彻底，而又自然而然地转到分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应很好地加以领导。

在习仲勋[1]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2年1月13日）

请李维汉、刘格平[2]二同志商复。习仲勋同志的意见[3]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刘格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3] 习仲勋1952年1月1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主要是：我入藏干部应根据实际情况做好民族工作，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内地藏族聚居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喇嘛寺的土地目前均以不动为好，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过早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提“反恶霸”口号，半农半牧区也不进行土改。

转发三反运动以来市场物价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陈薄李一月十一日关于市场物价的报告[1]很好，发给你们研究。过去一个多月的三反斗争在经济和财政方面已开始见效，国家的支出已开始表现正常，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已开始受到打击。望我党政军民各级领导同志坚持奋斗，彻底完成三反任务。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李，指李富春，当时均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们1952年1月11日关于三反运动以来金融、物价、市场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谈到，1951年12月份物价较上月下落1%，较9月底的指数下落2.3%，一反过去每月上涨1%的情况；同时货币流通量增加，存款增加，外汇金银黑市下落，出现了金融物价进一步稳定的局面。报告认为，这是开展三反运动以来所收到的初步成效。

关于美机犯境我方应不示弱致李克农电

（1952年1月14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

（一）一月十三日廿三时来电[1]及两组简报[2]均悉。同意来电所提意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二）新华社十三日讯，敌机一批十六架，于十三日十二时廿七分侵入沈阳、本溪、抚顺及辽东清原、新宾上空侦察。同日十二时七分，敌机四批，分别侵入辽东省桓仁、辑安、通化、宽甸一带上空侦察，其中一批飞机四架，余三批各为十六架。敌机这种行动，目的在迫我就范，故你们愈要坚定，不稍示弱。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四时半

---

[1] 指李克农1952年1月13日23时关于1月13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小组、第四项议程小组会议的情况和14日我方拟取态度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14日，对于三、四两小组，拟根据既定方针，继续与之周旋。

[2] 指李克农1952年1月13日报送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小组会议和第四项议程小组会议的简报。

对集宁军分区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4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我们愿意看见各级军区和各军有像集宁分区这样的检讨[1]，不愿意看那些好像太平无事的报告。集宁分区只说了浪费和生活腐化，还没有提到贪污事件。像一个军分区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望各地严格注意。一切没有切实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机关和部队，必须从头做过，做好了三反再做整编，三反一天没有做好即一天不进行整编。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集宁军分区1952年1月9日关于三反情况的报告谈到，军分区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由司令员代表分区及个人作检讨和启发报告，发动大家进行揭发批评。会上着重揭露和批评了分区领导利用职权，擅自开支，造成铺张浪费，以及存在严重官僚主义的问题。

对遵义军分区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4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遵义分区这个报告[1]比刚才转发的集宁分区的报告[2]接近事实得多。一个分区，一个军，一个小市，一个县，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这是决然无疑的。凡说那里只有浪费而无贪污，或贪污甚少者，必不可靠，千万不要相信。在一阵风停止浪费之后，必须立即穷追贪污。不能自己解决贪污问题者，上级应即派遣检查组下去督追，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在一个分区或一个军的范围内完成三反任务，至少须一个月，不能让其草草结束，请你们严格注意。在一个县，或一个小市，则时间还要长一点。就一个机关而论，则有半个月的猛烈斗争就差不多了。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遵义军分区1952年1月5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报告着重汇报了分区领导抓紧布置反贪污斗争的情况和所取得的初步成果。

[2] 指毛泽东1952年1月14日转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集宁军分区关于三反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应主动反击敌人的电报

（1952年1月15日）

李克农[1]同志，并告金、彭[2]：

一月十四日廿三时来电[3]及两组简报[4]均悉。你们方针很好，望主动积极反击敌人。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二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李克农关于1952年1月15日我方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第四项议程小组会上表态问题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说，在第三小组会上，我方将仍坚持既定方针，集中打击对方的挑衅行为，但也不避免谈及修建机场问题。在第四小组会上，我方拟再次历数对方提案各项的荒谬之点，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说理的态度，不给对方以撒赖的借口。

[4] 指李克农1952年1月14日17时和18时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报送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两份简报。简报分别汇报了当天举行的第三项议程小组会议和第四项议程小组会议的情况。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通报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央局：

看了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的报告[1]，甚为高兴，方针正确，劲头很大，望全军仿办。以此为标准去检查所属各单位的报告，凡属不痛不痒敷衍塞责者，其领导人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这类报告应立即予以批判。华东军区的三反快报很好，我已看了四期，望寄些给中南华北供其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3日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和经验给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并报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的通报。通报介绍了南京部队学习中央转发的北京三反经验，采用限期发动坦白检举、点名批评以至停职审查某些领导干部等办法，推进三反运动的情况和具体经验。这些经验是：第一，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领导者自我检讨，并亲自到群众中宣传鼓动，组织积极分子发言。第二，警惕和纠正官僚主义者用会场纪律、发言秩序以及尊重领导等为由压制民主，防止贪污、浪费分子趁机漏网。第三，对积极发言的人，不问动机如何，要让其发言。第四，对贪污、浪费不要忙于去区别。第五，运动初期重点使用几次撤职查办、停职审查以至逮捕等办法是必要的。

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西南军区党委一月十二日报告[1]很好，其经验和华东军区党委一月十三日报告[2]所述经验，大体相同。我们不怕贪污人数多，款数大，只怕不能发动群众斗争，不能把大中小各类贪污分子全部弄清楚。拿华东军区和西南军区这两个报告为标准去检查各级军区和各军的报告，就可以看出哪些是认真作检讨和认真发动群众斗争

---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三周情况简报。简报谈到，在西南局传达中央关于抓紧三反的指示后，军区党委随即电告各部队，并发出书面指示，军区首长还分赴各地督促和指导。各省军区大都作了紧急布置，由首长亲自上“前线”，以自我检讨结合动员报告，层层带头，普遍展开坦白检举，运动进展一般较快。军区直属机关部队于年初已全面转入重点反贪污的斗争。运动发展的规律，一般是先从揭发铺张浪费入手，进而揭发贪污；由搞一般的中小贪污而进到搞大贪污；从内部再发展到外部，即从反贪污发展到整治奸商。简报还指出各单位各部门普遍都有“小公”，即机关生产，这些“小公”绝大部分来路不正，对干部腐蚀极大，有立即取缔或收归公有之必要。

[2]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3日关于南京部队三反情况和经验给各级党委、各部队首长并报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的通报。

的，哪些是空话连篇，敷衍塞责的。对于这两类报告，必须表扬前一类，批判后一类，使三反斗争迅速开展。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中央同意华东局一月十三日电[1]所述划分浪费与贪污界限的四类标准（第一条略有修改），这和天津市委的三类标准是基本上一致的，望各地注意这种划分，以利开展三反斗争。

中央

一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1月13日给山东分局、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说，浪费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由于经验不够或全无经验而造成的浪费。如无经验的施工设计造成的损失（中央转发此电时，毛泽东将原电中以下文字“一二次一般为不可避免，重犯则为官僚主义”改写为“应严加检讨，不许重犯。第一次犯错误，可不予深责”）。第二，由于制度未建立或在短期内无法建立而造成的浪费。过去的可不追究，但应进行检查，建立制度，以便今后贯彻执行。第三，经过组织批准或决定的个人超支，以及机关生产在补助和提高集体生活方面造成的浪费。今后应加注意和改正，但对过去不必追究。第四，个人享受腐化、生活特殊及腐化性的挥霍。这是迹近贪污的浪费或由贪污而来的浪费，应特别加以审查和揭发。

转发贵州军区三反运动三日简报第一号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看了贵州军区一月十『一』日的报告[1]，又看了其他地方的一些报告，使人感觉许多地方（包括许多军事单位）的三反斗争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在这些报告中看不见贪污分子的大批暴露和群众斗争的猛烈爆发。贵州军区则大不相同，真正发动了群众斗争，暴露了大批的贪污分子。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很多机关压制民主，群众怨愤极深。有些机关官僚主义极为严重，领导者脱离群众，闹

---

[1] 指中共贵州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10日关于6日至9日三反运动情况给西南军区党委并报中央和军委的三日简报（第一号）。简报说，军区党委在接到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后，即采取紧急措施限期发动群众，截至9日晚，由各级首长带头，已初步把群众发动起来。一般做法是，直接召开全体军人大会，由领导干部作启发报告，自我反省，然后以伙食单位召开三反民主大会，把群众中的民主情绪调动起来，群众发言非常踊跃，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简报还说，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关键在党委重视，方针明确，首长带头进行反省坦白，并反复说明政策，消除顾虑。这样，局面就易于打开。

得不像样子。凡此一切，均须彻底揭发，才能解决问题。请你们以贵州的报告作标准去检查所属的报告，一切不痛不痒的报告，千万不要相信。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对总政关于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三周简报的批示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肖华[1]同志：

这个指示[2]不妥，不要发出。西南军区后勤系统清出百分之三十四的贪污分子是合乎事实的。目前的大多数机关部队的偏向是不愿或不知道认真去清查贪污分子。我对西南一月十二日的报告已另有批示[3]。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军委总政治部1952年1月14日对西南军区三反第三周简报的批示。批示指出：对于贪污行为和一般公私不分的错误行为，必须加以区分，并分别对待，不能把占公家的小便宜统统叫作贪污；简报说不少单位是百分之百的人员有大小不同的贪污行为，这样把贪污面扩大到所有人员身上，会减低反贪污斗争的严重意义，转移对真正大贪污犯的斗争火力，领导上将陷于被动，对群众也没有教育意义。

[3] 指毛泽东1952年1月15日对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对聂荣臻[1]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仍编为地方民族部队的建议的批语

（1952年1月15日）

同意所拟办法[2]。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送刘格平、李维汉[3]同志阅，退聂办。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指聂荣臻1952年1月15日关于原冀中回民支队改编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即在全军进行第二步整编时，将1950年8月调补六十八军开赴朝鲜作战的原冀中回民支队，从六十八军调出来，按照山东回民武装办法，组成地方性的民族部队。

[3] 刘格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转发华北军区十军党委关于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16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并告各中央局：

华北军区第十军党委会一月十一日的报告[1]，是我们所收各军报告中最好的一个，特发给全军参考。各军师团一律要照十军这样做，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各级军区检查各军三反情况时，即以十军这个报告为标准，凡照这样做的，就是好的；凡不照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党委1952年1月11日关于三反情况给华北军区党委并告各师、团党委的报告。报告说：军直各部坦白检举已由高潮走向深入，群众坦白检举有增无减，重点仍是军首长、部长、处长、科长及这些人的妻子和显著的贪污浪费分子。检举批评者，由一般干部至警卫员、小灶炊事员、司机、参谋、干事。许多首长不愿检讨反省的事，被赤裸裸地揭发出来。对严重的贪污浪费分子，已坦白者，继续收集材料，弄清是非；对不坦白或不彻底坦白者，令其离职撤职反省，同时找线索，派人外出调查。对于某些领导干部贪图安逸享乐，生活过分特殊，不深入下层，严重脱离群众等不良思想作风，下层干部战士非常不满，意见很多，准备让大家继续讲下去，把话说完。各师、团干部要到本单位去，发动群众对自己批评揭发。对主要干部及部门的检查，必须多打几个回合，才能彻底，严防一晃而过。军领导除在军党代表会议上检讨反省外，现又在司、政、后各部门军人大会上当面作反省，听取群众意见，效果良好。

这样做的，就是坏的。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关于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问题的批语[1]

（1952 年 1 月 17 日）

聂[2]：

中央诸同志不要题词，张经武亦不要题词。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1952年1月16日关于为西藏军区成立题词问题给聂荣臻的请示报告上。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关于同意华东部队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的建议的批语

（1952年1月18日）

陈毅[1]同志，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

一月十六日[2]报告收到。（一）三反斗争应当照你所说的三个阶段去做。但请注意在第二阶段中要集中精力尽可能查出一切大中小贪污犯，即是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不达目的，不应停止。二月十日转入整编，仍须以专门机构担负继续穷追大贪污案和处理未了问题。此点极为重要，请各大军区一齐注意。（二）我完全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制度，每月或每两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一天至两天，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这个建议极好，可以在“三

---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2年1月16日关于华东部队三反分三个阶段进行和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给毛泽东、军委总政、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华东部队的三反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动群众检查领导，造成领导与群众的密切结合。如不先检查领导，必不能发动指战员来进行三反。第二阶段是全面检查和坦白贪污。第三阶段是精简节约，衔接整编。为了保持群众的民主锐气，防止部队腐化，报告还建议把士兵代表会议规定为经常的制度，每月开会一至两天，通过领导者的检查报告和财经报告等。

反”后保持群众民主斗争的锐气。即请你和唐亮[1]同志起草几条简单的具体办法电告中央考虑决定，发布施行。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对此有何意见，望即商量电告。（三）将陈毅同志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1952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第二次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和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

---

[1] 唐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在中央关于省以上部门驻外地机构的三反斗争由当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1月20日）

（二）凡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政府及军区和军队在各大城市所设办事处采买处，均由所在城市的党委领导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有阻碍三反及不服从领导者照上条[1]办理。

---

[1] 指中共中央1952年1月20日关于中央各部门在各地的所属单位三反斗争由当地党委领导的指示的第一条。经过毛泽东修改的这一条规定：“凡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及中央军委各部门在各地的企业、公司、学校、办事处、采买处和研究所等，必须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及整党，并由所在地的党委领导。凡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如有阻碍三反运动或不服从当地党委领导者，由当地党委负责处理，并向中央作报告。”

中央对薄一波关于中央各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及今后意见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

（1952年1月21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师党委：

（一）批准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一月十九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2]（中央作了一些修改），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

[1] 本篇第二、第三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薄一波1952年1月19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三反运动情况和进一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必须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几个政策性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共同纲领规定的民族资产阶级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犯有贪污的国家工作人员，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刑事处分、行政处分或免予处分；对民主人士、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政策，基本上是坚定地团结他们，又使他们在这个运动中受到阶级斗争的锻炼等。报告还提出，在反大贪污犯的斗争高潮过去之后，拟转入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清算的阶段。

（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和党组（地方至县委为止，军队至师委为止），一律遵照办理。（三）此报告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月二十一日

二

在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应集中打击少数大的不法工商业家，对于罪恶不大的工商业家，应争取他们自动坦白、悔过自新，争取他们拥护政府的政策，至少使他们保持中立态度。对于作正当经营的工商业家，必须予以保护，并团结他们向不法商人作斗争。

三

对于贪污不满一千万元的国家工作人员，其情节较重者应判处一年以下的徒刑；其情节较轻，又能真诚坦白，酌情退赃，在群众面前公开悔过，并保证以后不再贪污者，一般可免予刑事处分，而分别给以行政处分，如撤职、调职、降级、记过等。其中有些对革命有功、偶然失足、情节甚轻者，可免予处分。还有些迹近贪污，但按实际情形不能叫作贪污者。所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应责成他们积极参加反贪污工作，争取为人民立功。这样规定，就可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免予刑事处分，以期更快地教育改造他们。

关于转发中南局组织部通知的批语和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1]

（1952年1月21日、2月3日）

一

安子文[2]同志：

请考虑将此件[3]加以按语转发全国。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

[1] 本篇第二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3]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1952年1月16日关于将整党报告改为三反报告给分局、各省市委、铁委、直属党委组织部并报中央组织部的通知。通知说，自三反运动在全区开展以来，地专以上机关的整党学习已难按原计划进行。农村和工矿因土改、民主改革工作繁忙，党员训练工作也不可能大量进行。因此决定将每月25日前的整党工作报告，在三反运动中改为三反报告。通知还要求各级组织部门在三反运动中要特别注意搜集每个党员和干部表现的具体材料，并注意发现觉悟较高、历史较清白、思想意识较正确的非党积极分子，为整党建党作准备。

二

（三）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当开除出党），对于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不应当有可惜的观点，这是毫不可惜的，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则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与此同时，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

关于全军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然后整编的电报

（1952年1月22日）

谭政、陈毅[1]二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

你们两个大军区规定一月份以三反为主，结合整编，我们亦已同意。现在看来不妥，必须以全力进行三反，三反完了再整编，全军不许有一人例外。时间照前通知延至二月十日。请你们至少每三天和各军区各军用电话通话一次，不要单靠电报。你们两大军区所属各军区和各军的三反报告，有许多单位劲头不足，空话太多，不能令人满意，请你们给以批评，严令他们限期检讨，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各大军区和你们清出的老虎都太少。像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军区系统估计至少有大老虎二百个以上，华东中南可能更多，千万不要让他们溜走了。望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告我为盼（中央一级估计至少可以打出七十只大老虎）。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对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2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一）华北军区一月二十日的报告[1]很好，这即是中央的意见，请你们一体遵行。（二）三反必须做彻底，做完再整编。凡于二月十日认真做好了三反并经各大军区批准，可以于二月十一日进入整编，否则一律不许整编。（三）请你们注意打大老虎。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0日关于三反运动给毛泽东并报军委总政治部、华北局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前一段三反运动的情况，提出了下一阶段集中力量捉大老虎的部署：（一）从政策上解脱一部分人。区分贪污、浪费界限，使有些领导干部下台，以便指挥作战；摘除一些小的公私不分、占小便宜的人的贪污帽子；对自动坦白，决心悔过，酌情退赃，贪污款在1000万元以下情节不严重的贪污犯，减轻或免予刑事处分。（二）分配任务。由各单位自报公议，于一周内提出拿下贪污1000万元的人数的任务，并力求超过。（三）规定战术。领导上研究重点人重点事，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通过群众运动，查账目、查单据、查商号、查关系，跟踪追击，内外夹攻，以求全歼。（四）严明纪律，不全胜不收兵。省军区结束运动，须经省委同意，华北军区批准；军分区结束运动，须经地委同意，省军区批准。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2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及省军区：

华北局所提出的问题（官僚主义）[1]应在此三反斗争中予以解决，并将解决的结果报告中央。

中央

一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1月19日关于华北局机关三反运动补课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补反官僚主义的课的问题。报告说，华北局机关的三反运动，原拟于本月15日大体结束，但经过征求各支部意见，发觉虽然大多数工作人员在三反运动中较深入、较彻底地检查了自己，获得很大成绩，但对领导上有意见，不满意。他们说，“我们这里只有两反”（指没有反官僚主义），“领导上层层带头检查不够”。对机关行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未作检查，尤为不满。我们研究后，认为上述批评是正确的，为了使三反运动由上到下做得更彻底、更深入，决定补上反官僚主义这一课。从常委、正副部长到处长、科长，分别在不同范围进行检查。然后由秘书长作检查及改进机关工作的报告，开展讨论，反掉一切应反的东西，建立起应该建立的新制度。最后召开党代表大会，完满地结束三反。

关于军委民航局三反斗争的批语

（1952年1月22日）

检讨[1]很好。只要尽情揭露和适当处理民航机构一切贪污浪费事件，并加以整顿，建立新制度，就算完成了此次三反斗争任务。对个人生活则加以约束，遵守制度，也就好了。此件抄送周、朱、陈、薄、李、安子文、刘景范、杨尚昆、肖华、钟赤兵、唐凯[2]诸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局长钟赤兵1952年1月21日写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报告主要检查了他在处理民航局前财务处长严重贪污案件上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以及他自己生活上的铺张浪费和违反财经纪律等问题。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李，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刘景范，当时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秘书长。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三书记。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四书记。唐凯，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兼财委主任。

对纺织部关于经纬纺织机器厂盲目施工造成严重问题的检讨的批语

（1952年1月23日）

周、朱、陈、富春[1]阅。此事[2]值得注意。如此盲目施工，危险极大。

毛泽东

一月廿三日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纺织工业部1952年1月2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检讨报告中所讲的部属新建经纬纺织机器制造厂因盲目施工造成严重问题一事。报告说，该厂自1951年5月施工，现已完成建筑工作总量的43%，经检查，主要的机工厂房，由于勘察设计不周，施工不善，工程落成时，大梁出现裂缝，280根柱子发生不平衡下沉6分至5寸的严重现象。

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

（1952年1月23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凡属大批地用钱管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哪一系统，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而且必定有大贪污犯（大老虎）。有些人以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化教育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这是不正确的。早几天还以为中央文教机关一个老虎也没有，经过最近两天的寻找研究，就发现至少可以捉到十五个贪污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因此，请你们注意，在每一部门、每一地区三反斗争激烈展开之后，就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于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各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例如中央一级，在一月十八日以前查出的一万名贪污分子（其中有很多人款数甚少，情节甚轻，迹近贪污，实际不能叫作贪污）中，只有十八名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至一月十八日，认为可以再查出五十名。最近两天又有增加。估计将来还有增加。这一经验务请你们注意。要向同志们指出：如果他们不愿意包庇大贪〔污〕犯，以致将来查出来（总有一

天会查出来）自己要受指责和处分，就应组织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搜尽一切暗藏的大贪污犯而奋斗。下面是空军党委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布置搜寻大贪〔污〕犯的报告[1]，可供你们参考。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三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1952年1月22日报告中布置的搜寻大贪污犯的办法是：一、重新调配组织力量，一面从问题大体上弄清楚的单位调一部分干部去增援问题较多的部门，另一方面各部门内部亦进行调整。二、要进行“搜山”，在普查的基础上进行抽查，发现线索然后跟踪深入。在普查中，后勤部着重注意以下4个方面：1. 查加工订货的数量、质量和交货时间。2. 查订单与货物的规格数目是否相符。3. 查银行存账。4. 与商人对账，从外面寻找线索，以便内外夹攻找老虎。已经逮捕的大贪污分子也要组织力量审讯，从中发现线索。三、确定重点，领导干部分工包干。

对西南军区三反运动第五周简报的批语

（1952年1月24日）

各大军区和中央局，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分局和省市区党委：

西南军区这个报告[1]很好，我们要求各地都这样做。每个大军区系统（包括各级军区和各军）至少有几百只大小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地方上每个大省也可能有几百只，每个大城市可能有一百只至几百只，上海可能有上千只。中央一级昨天还以为只有八十多只，今天会〈汇〉报就有一百五十只，可能达到二百只。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2日关于军区直属机关1月19日干部三反大会的情况给中央、毛泽东、军委的报告（即三反第五周简报）。报告说，会前，检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分头到各部门具体了解情况，商定准备当场宣布的未彻底坦白的大贪污犯名单及其犯罪事实，组织人员在大会上揭发检举。在1月19日召开的有2200余人参加的干部三反大会上，共检举了尚未彻底交代、态度不老实或反省不彻底的20多人。检查委员会主任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当场宣布了处理意见。问题严重而又拒不坦白的，有的逮捕，有的撤职反省，情节较轻能主动坦白并检举别人的，将功折罪，免予处分。

对山西省委关于三反斗争的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

山西省委这个报告[1]极好，务请同志们精读几遍，注意仿行，并在党刊上登载，使广大干部看到。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转发的山西省委1952年1月20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有：（一）全省三反运动已普遍展开，其次序是首先整顿各级非财经部门的机关和单位，然后从这些机关和单位抽出大批领导骨干投入到财经部门和工商界，并组织大批的检查组，上下互相检查。（二）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在三反开始前后都订有攻守同盟。因此，在运动发展中，要有意识地冲破贪污分子的各条防线。（三）全省三反运动发展很不平衡，不少机关或多或少走了一些弯路。解决的办法是：由省委委员带头，推动各级党政负责干部向所属机关干部群众作自我检讨；厅、局级党员干部在向机关干部检讨前后，要到省委作一次自我检讨；省委派出得力干部，监督与帮助落后的和问题严重的单位，委以一定权力，必要时可把那些障碍运动的“石头”搬下来；派检查组流动检查，推动各专区运动的发展，等等。（四）发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反偷漏、反盗窃、反暴利的斗争，作为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正面战场与三反运动密切配合。

在第一航校党委关于三反运动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2年1月25日）

少奇同志阅后，送杨尚昆[2]同志：

中央办公厅须要开一次这样的会，范围可在科级以上，认真检讨全厅工作，制止浪费，并定出追查大中小贪污的计划，一定要把一切贪污分子查出来。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党委1952年1月22日关于三反运动一周情况给空军党委转报总政治部、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了他们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由校首长带头作反省报告，并欢迎大家揭发批评错误，从而推动了全校三反斗争的迅速展开。

[2]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转发志愿军十九兵团党委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5日）

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

今天看了十九兵团党委一月二十一日关于三反的报告，很高兴。该兵团所属各军师的三反斗争虽然尚有许多单位做得不好，或者很不好，但有些单位做得好，少数做得很好。这种经验已使该兵团领导同志认识到不但浪费现象而且贪污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报告说："一般财经管理干部中，有些单位暴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有贪污，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这种认识是合于事实的。从我手头已收到的志愿军各兵团各军师有关三反的报告看来，有这种认识的还是少数，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从你们的指导文件看来，也是着重在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没有着重反贪污。当然，运动开始可以从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入手，以此作为运动的第一阶段，但第二阶段必须使各级领导者和群众将斗争的火力集中到反贪污的目标上去，以便从各级机关和一切部门中（不仅财经部门有贪污，司令部政治部等部门也有贪污）坦白检举和检查出惊人的成百成千的中小贪污分子。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一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照我推测，在一百多万志愿军中很可能捉到几百个大小老虎，你们应为

此目标而奋斗。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在未清出以前，还以为他们是可靠的同志。只有在清出以后才使人们大吃一惊，原来他们已成了暗藏的敌人。为了清出他们，必须对于有贪污嫌疑的人大胆怀疑，收集材料，试行探查，就可发现许多老虎。这是极为要紧的一个阶段。既已在第二阶段中清出了大批的中小贪污分子（这些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要采用教育改造方法从宽处理的），就有可能清出大小老虎，领导者必须指导群众不要松劲，不要住手，而要继续攻击，穷追务获，否则就是打败仗。凡说在朝鲜环境不可能有贪污的人，凡对清出一批中小贪污分子就认为已经满足已经胜利的人，必须加以批判。已收场者必须重来。一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两个月不足，再加一个月。大约有两个月至三个月时间，除某些复杂案件外，可以在全军彻底解决问题了。运动的第四阶段是在干部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建立各种制度，保证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不重犯，或犯了也易克服。你们的三反进到捉老虎的阶段，必须与东北局的三反斗争配合起来，有些案件还要与关内各大军区配合起来，才能彻底弄清楚。在运动中，兵团、军、师、团、营各级干部必须人人向群众作反省检讨，即所谓人人下水洗澡，以及限期展开、指名坦白等项方法，你们已经懂得，这里就不多说了。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1月26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北京市的斗争是成功的，这里已经形成了“五反”的统一战线，已使占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陷于孤立，约有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其中大多数是投机商人）即将予以惩办（少数已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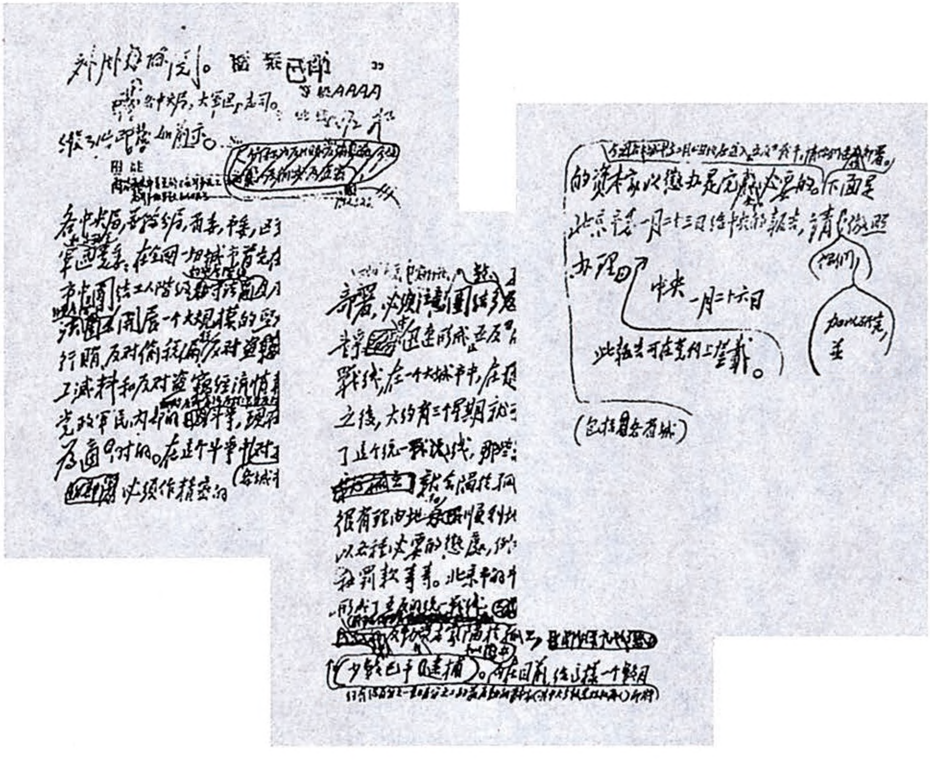
逮捕）。而在目前，给这样一个数目的资本家以惩办是完全必要的。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给中央的报告[1]，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仿照办理。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一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1月23日关于在工商界开展反行贿等斗争中争取多数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在工商界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和反盗骗国家资财的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经过艰苦和复杂的工作，靠拢我们的工商户已占多数，中间状态的是次多数，对运动持反对态度的是少数，约占工商户总数的6%。在违法工商户中，约有占工商户总数1%至2%的须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处分。报告说，经验证明，在工商界反行贿等斗争中，必须注意采用分别对待、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团结多数、反对少数的政策。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的手稿。

对华东一级机关三反运动简况报告的复电和批语

（1952年1月26日）

一

饶漱石同志：

华东局一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两个报告[1]收到，方针正确，成绩甚大，极为高兴。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1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汇报了华东一级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和经验。报告说，华东一级机关和大部分事业、企业单位的三反运动，均已进入坦白检举和召开商人会议内外夹击的阶段。三反开展较好的单位，由于领导干部思想一致，在群众面前作了较深刻的检讨，并广泛发扬民主，彻底发动群众参加三反运动，因而领导上取得了主动，斗争的锋芒迅即转向反贪污方面。各单位多采取大会和小会相结合的方法，号召坦白和检举。一面对于消极怠工、拒不坦白或和商人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的分子，坚决予以撤职、停职和逮捕；另方面对于彻底坦白自己又检举别人的贪污分子和自动坦白的小贪污分子公开宣布免罪，这样使运动迅速深入和发展。华东局1952年1月24日向中央的报告，主要是汇报了华东一级机关到1月23日为止已经坦白有贪污行为的人数，其中贪污一千万元以上者共113人。

二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华东局一月二十三日报告所述三反经验很完整，发给各地参考。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三

各同志：

华东局直属机关成绩甚大，已捉大小老虎一百十三只。[1]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华东局1952年1月24日关于华东一级机关贪污人数给中央的报告上。

对刘澜涛[1]关于华北军区捉虎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6日）

各同志：

刘澜涛同志这个报告[2]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华北军区过去成绩甚微，经过严词督责，最近五天突飞猛进，捉虎甚多，令人振奋。打虎要有一套战术，凡已普遍展开的，就要迅速总结经验，组织专门打虎部队，向大小老虎突击。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指刘澜涛1952年1月25日关于华北军区最近几天打虎的成绩和经验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总结的打虎经验是：（一）重新组织队伍。由懂政策、会算账、突击力强的人，以及一部分卸掉包袱的人，组成打虎基干队，由专人负责，精心计划。（二）要有强而纯的指挥部。指挥部要心中有数，善于找重点，找弱点，先攻破最弱的堡垒作为本钱，宣扬战果，以振士气而慑敌人。（三）专案专人，包打包查（查账）。捉到一个老虎后，应留下少数人去纠缠，主力则急速向纵深发展，继续追捕，不使别的老虎跑掉。

对华北局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作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的紧急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26日）

各同志：

华北局这一文件[1]应成为各地的共同方针。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1月26日关于各省市地委一律作出打虎计划、结束三反要经过批准的紧急指示。指示针对不少地方贪污分子揭发极少，三反就要收场，运动有轻轻滑过去的危险，决定：（一）各省委、地委、省属市委必须在群众三反运动的基础上，坚决地迅速地转入打大老虎的战斗，并确切估计情况，分析线索，作出打虎的具体计划，定出必成数、期成数，并根据情况发展，考虑追加数字。并且，即以此作为评定对三反斗争是否努力的主要标准。（二）地委、省属市委要结束三反斗争，必须经过省委批准；县级要结束，须经过地委批准。如结束后查出严重问题，批准机关及原请求结束机关要一并受到批评或处分。（三）各省委应将三反以来打虎战果和订出的新的打虎计划即报华北局。

转发中南军区关于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27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

中南军区一月二十五日的文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中南三反动手较迟，故对民主检查和反中小贪污两个阶段尚未做完的单位，必须做完，方能进入打老虎的第三阶段。各大军区和志愿军也须如此。但一切已做完第一第二阶段任务的，就应立即重组队伍，打老虎。但全军一切落后单位至迟均须于二月十日或十五日进入打

---

[1]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5日关于三反转入清查贪污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反铺张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民主检查做得比较彻底的单位，应即转入反贪污；民主检查尚不彻底的单位，必须限期完成，随后转入反贪污。二、所有大小贪污分子必须捉净，尤其对大贪污分子更不可放松，他们是反贪污斗争的主要目标。三、寻找大贪污犯有以下7条嫌疑踪迹：（1）生活阔绰，行为腐化，钱的来历不明；（2）与商人有超过正常的商业往来，额外接受他们的馈赠或互相馈赠；（3）给商人开护照、发通行证、着军装、配手枪，使之往来于各个市场，任其招摇撞骗；（4）以高价买劣货，掺假，短秤，偷工减料，先期付款、延期交货，欠款不追，不合情理地报损失、报拐骗；（5）向私人商店投资、贷款，向私人银行存款生息；（6）账目不清，立假账，涂改账目，未经负责人许可，私自烧毁账簿、单据；（7）拿公家钱、公家车辆为其亲属做生意。

虎阶段。中南文件所举七条寻找大老虎的嫌疑事踪，军事系统和地方系统都适用。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打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7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告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的决心和部署[1]均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二月份全军发动打大老虎，至少应打二千只至三千只。二月份不整编，全力做三反。凡未检举坦白者，仍进行检查坦白，发现大批中小贪污，但中心应转入打老虎。这种任务的转变，有的可以在二月一日转，有的可以在二月五日或二月十日或二月十五日转，但至迟不得迟于二月十五日，由你们掌握。争取在二月二十八日全军老虎打完，结束三反。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6日给毛泽东并华东局的报告中说，华东部队2月初转入正式打老虎，预计用10天到15天完成任务，争取打300只左右大老虎。

对朱德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27日）

刘、周、朱、陈、彭真[1]阅。同意这样做，请安子文[2]同志根据此项意见[3]用中央名义起草一个简单的指示（不要太长）。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3] 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1952年1月26日关于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对于反对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加强党的纪律性，巩固党的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和获得一定的成绩。但纪检工作赶不上实际的需要，主要是对重要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和对一般案件不能及时检查处理。产生上述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各级党委对纪律检查工作不够重视，没有积极领导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和委员一般均系兼职，无暇顾及或很少顾及纪律检查工作，加以办事机关还很不健全，专职干部的配备迄今不足半数，这样对于重大案件的检查，困难就更多。为了克服上述缺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一、责成各级党委加强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领导。党委会议上应定期讨论纪律检查工作，对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党委应给予及时的指示，在检查处理案件时，党委应给予纪检干部以有力的支持。二、健全办事机构，充实专职干部。三、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各级人民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分工合作，互相辅助。

吊唁乔巴山逝世致布曼增迪电

（1952年1月27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布曼增迪同志：

惊悉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乔巴山元帅的逝世，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您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沉痛的哀悼。乔巴山元帅是蒙古人民伟大的领袖，蒙古人民革命杰出的领导者与组织者，他的逝世不仅是蒙古人民极大的损失，也是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损失。乔巴山元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援助，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永垂不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转发北京市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 年 1 月 28 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北京市的打虎经验很好，请你们参酌办理。中央一级在一星期以前大家还只承认有几十只大老虎，一星期以来逐日增加，至昨天（一月二十七日）为止，已捉到和认为可以捉到的即共达四百只，计财经部门二百只，军事部门一百只，政法文教和党的部门一百只。这些都是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一千万元以上的小老虎未计入。北京市委的办法是：召集各单位首长开会，自报公议，规定老虎数目，责成各首长亲自动手打虎，限期具报。“如果哪个单位的首长认为本单位没有老虎，应签字向党和政府负责保证，领导上即派人复查”。据称此种办法甚为有效，许多原以为没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许多老虎。现在北京市机关企业暂定大老虎一百只，工商界三百只，共四百只，看来只会多，不会少。请你们参考中央和北京市两处经验，规定自己的打虎目标。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预算报告的批语

（1952年1月30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一月二十九日规定打虎预算[1]的精神很好，发给你们参考。一个大军区不会只有两百多个大老虎，但第一次规定这样一个数目是适当的，以后可以根据认识的深入逐步追加打虎任务。中央一级十二万人，清出贪污分子一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一百万元以下的小贪污分子，一般须从轻处理），已经清出或准备清出的大老虎四百只，这是经过多次严格督促、不断追加任务才达成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

[1] 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29日给各级党委和首长并报毛泽东、华东局的报告规定了华东各部队打虎的预算，预计华东部队在打虎阶段总共要打出大老虎266个，小老虎865个，中小贪污分子86850人。

对华北局关于山西省打虎数目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1月30日）

各同志：

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文件[1]都很好。华北局提出像山西这样的省应有大小老虎一千个至一千三百个，其中应有大老虎一百个至一百三十个以上。我以为这个数目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实际上可能大大超过此数。社会上即工商界中的老虎还不算在内。请各省市区党委根据自己的情况都作出一个打虎预算，报告中央局和中央。山西省委的几条打虎经验[2]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

[1] 华北局的文件，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1月30日关于山西省应捉到1000个至1300个老虎，其中应有10%以上的大老虎的指示。山西省委的文件，指中共山西省委1952年1月28日关于山西省反贪污战果给华北局的报告。

[2] 中共山西省委1月28日给华北局的报告中总结的打大中老虎的经验是：1. 利用与控制罪恶不大、愿意改悔的私商，秘密帮助我们调查其他不法商人。2. 派女同志做大中贪污分子家属的工作。3. 集中力量，揭破贪污分子之间以及贪污分子与私商之间的“攻守同盟”，这是捉大中老虎的具有决定性的步骤。

转发东北局关于寻找贪污线索的经验的电报

（1952年1月3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和各军：

据高岗同志电称，东北方面的打虎经验，在人物线索方面，要注意以下各点：“（1）本人曾做商人或工厂老板，而现在混入我国家机关或企业任事者（尤其要注意那些现在仍兼营私人工商企业的分子）；（2）家庭为工商业家，而本人在我国家机关或企业部门工作者，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干部（尤其要注意在其到国家机关或企业工作后，其家庭所经营的企业发展极快者）；（3）本人与私人工商业者关系密切、生活腐化、为群众议论纷纷者；（4）掌管小家务、生活腐化、挥霍无度者；（5）采购人员经常向某商行或某几个商行采购者（可从查账、查发票中发现）；（6）从采购或推销发单中发现同时期同样物资而价格差异过大者（可用不同部门购买或推销同样器材的发票作比较）；（7）从内部检举及外部工商业者坦白检举的材料中发现线索；（8）研究现已整出的五十六个大贪污犯，从中吸取‘捉老虎’的经验教训”等语。此种意见甚好，请加注意，以利打虎。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日

关于搜捕大老虎和检查处理违法资本家致高岗[1]电

（1952年1月31日）

高岗同志，并告各同志：

（一）一月二十六日的报告收到。你们清出了大小贪污分子十六万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绩，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

（二）根据中央一级十二万人中就有四百只大老虎的情况，东北全境各级党政军机关及企业的工作人员中可能不止五百只大老虎，可能一倍或几倍于此数；但你们暂定五百只为目标是适当的，待运动深入可以按照情况逐步追加任务。

（三）处理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不给刑事处分的小贪污分子，按照中央已通知的方针，除个别情节甚轻只要坦白悔过，酌情退款，保证不重犯，可以不给行政处分者外，一般都应分别给以行政处分，例如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项，以示严肃。处理时应仿照镇反中清理积案的方法，由领导机关对一批人加以分析比较，定出处理方案，交给群众会议（本人参加）讨论，增减修正，然后由领导机关核定公布。北京有些机关这样做了，影响很好。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四）对付资本家须有准备，准备不好，不要动手。各城市准备条件不一致时，不要同时动手。又须有步骤，先组织若干强干的检查小组，向最顽抗而有确据的若干家实行检查。不查则已，查必破案（有些须坚持数天之久才能破案，不破案不许撤回）。第二批再检查若干家，又均破案。这样便取得了经验，训练了干部，教育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及一部分大资本家，促使他们坦白，同时动员工人店员实行检举。然后再组织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和更多的检查破案。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争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大中小资本家站到我们方面，或者保守中立，使百分之几（北京是百分之六）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社会舆论也就完全变得于我们有利了。这时我们对于大约占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最反动的资本家（即行贿盗窃罪大恶极的资本家），在经过检查取得确实罪证之后，就可以给予惩处，例如逮捕、枪决（只是少数）、没收、徒刑、罚款等。北京有五万户工商业，百分之一是五百户，北京市党组织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斗争，经过几个检查步骤，还只逮捕近百名资本家。准备在二月份再经过几个检查步骤，陆续逮捕至三百名左右（不到百分之一），再看形势。这是一个逐渐了解，逐渐深入，逐渐分化，逐渐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斗争过程，没有城市党组织的紧张艰苦工作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大中小之间矛盾很大，我们打击百分之一左右的最反动资本家，又是着重打〔击〕投机商人而不是着重打击工业资本家（有一部分极坏的工厂主须给以打击），可能争取绝大多数资本家拥护我们，而不会怨恨我们，真正怨恨我们的只是极少数（百分之几）。这样也就可以用内外夹击的方法，把资产阶级安置在我们内部的堡垒即大贪污分子全部地清查出来。

（五）为争取广大市民及近郊农民热烈拥护我们，北京市政府曾

组织二百多个调查访问小组同时出动，代表市长到一切派出所和乡政府管辖区域，召集居民的大小会议和按家访问（派出所和乡政府工作人员实行回避），以三四天时间调查政府工作人员及警察的一切贪污违法行为，报告市政府处理，收效甚大。此项办法全国各城市都可仿行，并且每年应举行几次。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日

在中财委机关党组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二次报告上的批注[1]

（1952年1月）

这种官僚主义[2]，其罪恶的严重性，不是“不如贪污”，而是大于贪污。——毛注

---

[1] 毛泽东的这一批注，加括号写在1952年1月9日中财委机关党组报告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在中财委这样一个不直接掌管钱财，但掌握着审核财经开支大权的机关，反官僚主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官僚主义其罪恶的严重性虽不如贪污。”中财委机关党组报告原文紧接着有以下文字：“但它所造成的损失，则比贪污不知大多少倍。”

[2] 指中财委机关党组报告中谈到的计划局主要负责人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工作上陷于事务主义，把如何建立计划工作这一重大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不重视苏联专家的意见，不学习苏联和东北计划工作的经验，对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提出的开展计划工作的方案置之不理等。

对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处理部队生产基金和盈利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52年1月）

朱总司令阅，薄一波、粟裕[1]同志阅。军队的生产已闹得不像样子，看此电[2]可知。

毛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2]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5日关于鲁中南军区党委建议分配部队生产盈利问题的处理意见给山东军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军区不批准鲁中南军区分配部队生产盈利的建议是正确的。为了杜绝这类漏洞，华东军区决定：将部队生产基金及其盈利一律冻结，各部队首长、各级党委只有妥善保管经营的义务，不准私自动用；关于1952年部队生产基金和盈利的处理原则，各部队可总结经验提出意见，以便重新决定公布新的处理办法。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这就是'管而不动、听候命令'的方针。"

军委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1]

（1952年2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胜利地完成了解放中国大陆的伟大事业。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把它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物价保持了稳定，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恢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爱国革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开展着。全国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英勇奋斗所获得的这一切胜利，为我们祖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从来不满足于已得的胜利，我们总是在巩固胜利，发展胜利。同志们要知道，中国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而我们已做了的工作，还只是向这个方向刚才开步走。同志们要知道，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以及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内外的敌人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抵抗，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防，来保障祖国的建设；而发展工农业生产，又是加强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同志们还要知道，胜利了的中国对东方和世界和平的国际责任，而要更好

---

[1]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

地担承伟大的保卫东方和世界和平的责任，要依靠我们对祖国建设的努力。

我们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从创建之日起，就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英勇奋斗，艰苦奋斗。今天，我们人民解放军，将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协同全国人民，为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继续奋斗！

为此目的，除各特种兵和大部分陆军，应继续加强正规化、现代化的训练，警惕地站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保卫祖国国防外，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　　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过去曾是久经锻炼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我相信你们将在生产建设的战线上，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你们将以英雄的榜样，为全国人民的，也就是你们自己的未来的幸福生活，在新的战线上奋斗，并取得辉煌的胜利。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此令

主席　毛泽东

关于西北军区二月份应深入三反着重打虎的电报

（1952年2月1日）

张宗逊[1]同志，并告习仲勋[2]同志：

西北军区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二月全月应深入进行三反，着重反贪污，尤其着重打老虎，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你们叫三军“准备推迟二月六日转业集训的时间”，没有明确指令二月全月进行三反。你们全区各部清出的贪污分子均很少，一亿元以上大老虎还未发动去捉，并且连计划都还没有。望速做出打虎预算电告，并下动员令打虎。

毛泽东

二月一日

---

[1] 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习仲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对薄一波[1]在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2年2月1日）

一

有所修改[2]，请周[3]酌定，于上午十时以前退薄一波同志收。

毛泽东

二月一日上午三时

二

王丕业[4]和夏茂如[5]一样，是个建筑工程师。他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帮助人民政府检查出许多营造业奸商的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毛泽东对薄一波讲话稿所作的修改，加写的两段文字即本篇第二、第三部分，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

[3] 周，指周恩来。

[4] 王丕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

[5] 夏茂如，当时任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

偷工减料行为，追回金额共达八十余亿，算是做了赎罪的工作，但因他的贪污罪不是自动坦白的，而是被迫说出的，故应处以五年徒刑。又因其坦白尚彻底，并已立功赎罪，故予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孙建国[1]原是共产党员（早已开除党籍），又是革命军人，竟敢勾结私商，贪污受贿，本应严办，姑念他在此次反贪污斗争中完全自动坦白其罪行，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处以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另在行政上予以撤职处分。夏茂如、杭效祖[2]，则均应给以降一级使用和记大过一次的行政处分，以示惩戒。

三

政府现在规定：只要贪污的情节严重，并有了确实的证据，不管他本人怎样拒不承认，满一亿元或者不满一亿元，都可以定其为大贪污犯，判处死刑。

---

[1] 孙建国，曾任军委总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

[2] 杭效祖，当时任军委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

对空军第三师战况报告的批语[1]

（1952年2月1日）

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2]

毛泽东
二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和参谋长王秉璋1952年1月31日报告的批语。

[2] 刘亚楼等的报告说：志愿军空军第三师自1951年10月21日到1952年1月14日共86天在安乐空战，共击落击伤敌机63架，以较小代价获得较大战果。

中央关于饶漱石[1]病休由陈毅[2]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

（1952年2月2日）

华东局，并陈毅、粟裕[3]二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4]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的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

中央

二月二日上午二时

---

[1]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政治委员。

[2]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3] 粟裕，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4] 谭震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

转发十军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2日、6日）

一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十军这个经验[1]很好。原以为没有多少搞头的，回炉再炼，就清出了大批老虎，管理排长，指导员，股长等人许多都是贪污犯。望各军都向十军看齐。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党委1952年1月28日给华北军区党委、总政、各师党委的报告中总结的捉老虎的几条办法，即：（1）对三反不彻底的单位，重新发动群众，实行回炉补课。（2）详细分析群众检举材料，找出大贪污分子线索，然后调虎离山，由领导个别谈话，结合群众压力。（3）向群众反复表示对惩办大贪污分子的决心，各级领导分工包干，坐镇指挥。（4）找材料，对证据，经过斗争使其就范。（5）对不愿意彻底坦白的贪污分子，要猛打深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打破其幻想，使他们感到只有坦白交代才有出路。

二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在打虎阶段，又是十军的成绩最好，请各军和各军分区将十军的成绩和自己的成绩比较一下，立即作出结论来。十军截至二月二日止已捉一千万元以上老虎五十九只，预计还可捉三十只至四十只。十军“无生产无大建筑，过去被认为比较规矩”，尚且查出这多老虎，那些有生产有大建筑，或过去不大守规矩的部队和机关，老虎当然要更多。十军的政策观点[1]也是正确的。

毛泽东

二月六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军党委1952年2月5日关于打虎经验给华北军区党委、总政及各师党委的报告中谈到的政策观点，即：一、领导上必须有坚强的决心和最大的魄力，敢于大胆怀疑和顽强战斗，正确及时地了解敌我情况，保持头脑清醒（既不轻视敌人，又不急躁），适时纠正各种倾向（主要是右倾）。二、在突破老虎防线后，严防自满，要不疲倦地继续战斗，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三、党的三反政策要反复同群众见面，与贪污分子见面，只是讲还不能彻底解除贪污分子的顾虑和群众的怀疑，应用实际行动如通过公审大会把政策表现出来。四、反贪污斗争深入之后，容易产生冲动暴躁情绪和逼供信现象，必须在不损害领导积极性和群众热情的条件下，及时予以纠正。防止真老虎趁机逃走，尤应防止他们声东击西，转移目标。五、为了搞透，领导上必须确实心中有数。要分析贪污的来源和线索，弄清来龙去脉，这样既能保证贪污分子不致漏网，又可免于误伤好人。

转发李富春[1]在中财委汇报会议上的打虎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级军区和各军：

（一）李富春同志这个报告[2]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二）打虎必须从算账入手，许多同志忽视算账，专去逼供，这是不对的。（三）大老虎不限一亿元以上，富春报告中所说的六条[3]都应算作大老虎。（四）跟着清查经济内奸的发展，必能清出许多政治内奸，有

---

[1] 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李富春在中财委党组1月30日汇报会议上作的打虎总结报告。报告谈到了中财委及各财经部门1月份的打虎成绩和下一个战斗的目标、方法和步骤，并对大老虎的标准，查经济问题和查政治问题的关系，以及打老虎怎样才算搞得彻底和准确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3] 李富春在报告中提出的大老虎的6条标准是：（一）个人贪污一亿元以上者；（二）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三）满一亿元以上的集体贪污案的组织者、主谋者；（四）贪污在五千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如克扣救济粮、侵吞抗美援朝捐款者；（五）坐探分子，与私商勾结盗窃经济情报，或利用职位自肥，使国家损失在一亿元以上者；（六）全国解放时隐瞒吞没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价值在一亿元以上者。

些经济内奸本人即是政治内奸，务请同志们注意这点。但目前打虎尚未深入，应引导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清查经济内奸，只将政治性的问题记上一笔账，待到经济性的问题大体解决了，再将政治账上所记的问题提出来作一次清理，解决政治性的问题。（五）富春同志的报告可发给各打虎组织的领导人阅看。

毛泽东
二月二日

转发安子文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4日）

同意这个报告[1]的意见。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和省市区党委研究。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指安子文1952年1月29日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根据河北省通县地委在香河县进行农村整党结合三反的典型试验的材料指出，农村中贪污、浪费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因此在农村中普遍深入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对农村三反应明确规定：（一）农村整党和三反运动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进行对党员的登记、审查和处理。并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觉悟程度，使农村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明确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二）为了能够领导这样一场大的斗争，凡参加领导农村整党的干部，必须是经过三反斗争的人。没有经过三反运动的，一律要调回来进行三反；手面不干净的，必须认真进行自我检讨，洗干净；思想界限不清楚的，要加以教育，明确思想界限，然后再派下去领导整党。（三）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必须有强的领导，否则，一下子全面轰开，领导力量不足，势必重复1948年“搬石头”的错误。因此，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分批地进行，并首先解决贪污、浪费问题最严重的村庄。

转发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的几项决定和河北打虎任务的批语

（1952年2月4日）

各同志：

华北局关于河北省委的几项决定[1]及规定河北省打虎数目，请在你处党刊上发表。河北省（不包括京津两市）人口三千万，规定打小虎二千三百只，大虎二百只，这是适当的。请各省按照人口及其他特点规定自己的打虎计划。目前的特点，正像镇反初期同志们对于反革命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一样，是对于大贪污分子的存在估计不足，就是说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必须不断地给以批判，才能克服此种错误思想。其严重者须由各中央局、分局和军区党委作出单独的决定，如同华北局对河北省委所作的决定那样，并且要迅速，不要迟疑不决。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3日关于停止当时河北省人民政府一位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党内外一切职务，进行反省，并限期一星期内作出彻底检查的决定，以及为加强河北省委领导，新任命一位省委副书记和两位省委常委的决定等。

关于限期向中央报告打虎预算和县、区、乡开展三反运动的电报

（1952年2月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一）中南军区党委二月一日电所报中南军区直属机关部队计划打大老虎一百零六只，小老虎三百五十七只，我们认为是适当的，这是一个初步的预算，以后可以按照情况随时追加。请中南军区督促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迅速订出自己的打虎计划，报告中央。中南军区的计划发给各地参考。（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及其所属各级军区和各军，凡至今尚未做出打虎预算的，限于电到三日内做出此项预算，报告中央。并须准备随时自动追加预算，随时报告中央。（三）省级和地委级做此项预算时，可以包括县区乡三级可能打出的大小老虎数字；但全国各地二月份实行三反和打虎一般应限于到地委一级为止，一般不要发展到县区乡三级去。应待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诸级的三反基本完毕，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配备骨干，组织大批三反工作队，加以明确的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如同派遣土改工作队或整党工作队下乡土改和整党那样，派遣下去开展三反，才是适当的，否则可能发生大错误。此点务请同志们加以注意。有些省区已在县级及

区级展开三反的不必停止，但二月份重点仍应放在省地两级，兼及部分的县级。三月份应完成县级的三反，并准备好去区乡帮助县级领导区乡三反的干部，拟以四五两月基本上完成全国区乡两级的三反工作。果能如此，就是一个大胜利。东北局规定“县区两级目前只以本身力量发动坦白检举，待省市搞完后再抽出力量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可以的。华北局的方针也是这样。我们认为凡已经完成土改的地方或正在整党的地方，应即将原来的土改工作队中的若干人和整党工作队调至省城加以训练，转变为三反工作队，凡有贪污嫌疑的人都不许参加，待命（待各中央局和省委之命）下乡进行三反。但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在目前即派出少数工作组选择少数区乡进行贪污浪费的调查和进行三反的典型试验，则是完全必要的。你们对于此项工作步骤有何意见盼告。（四）平原省武陟县县级机关已初步清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老虎十八只，其中有一只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该县继续搜捉，还可能超过此数。此事应引起各级党委严重注意。凡说县一级无老虎或很少老虎的，应即以武陟县的证据驳倒他。（五）根据河北省香河县九个村的初步调查，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多者占村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少者占百分之十三，平均为百分之三十三。九个支书中七个贪污，九个村长中八个贪污。其中有一个村干部独自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是个小老虎。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的（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六）接高岗[1]同志一月二十六日的报告，全东北计划捉大老虎五百只，昨日（二月三日）据报，已增加至二千只。军委直属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系统早几天承认捉大老虎一百只，昨天追加了一百五十只，共计二百五十只。连同中央一级其他系统的三百只，共计五百五十只。此外尚有已经通报你们的华北的经验[1]。由此可以估计，每一个小省应有大小老虎几百只，每一个中等省和大省应有大小老虎一二千只至三千只。根据华北局的计算，其中应有大老虎百分之十以上。这些都包括党政军民学的工作人员在内，但不包括私人工商界和私立学校。东北、华北和中央一级的经验，可供你们做打虎预算的参考。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指毛泽东1952年2月4日转发的华北局关于河北省某些领导人停职反省的决定和打虎计划，规定河北省打小虎2300只，大虎200只。

关于增加打虎分配数目致谭政[1]电

（1952年2月4日）

谭政同志，并告各同志：

你们二月一日给所属的指示[2]很好，证明你们已摸到了门路，打虎是有希望的。但你们一月三十一日给我的报告[3]所述对各省任务的分配数目都太少，是不合实际的，必须指导他们逐步增加。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二十只，中小老虎一百八十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

---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1日关于打老虎部署给华南军区、各省军区、各军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一）凡群众斗争已经发动，中小贪污分子被大批挤出，大贪污分子已经露头的部队，领导机关的注意力即应转到打大老虎。（二）组织专门的打虎队。（三）打虎队与各单位群众的检举斗争既实行分工又互相配合。（四）用一切必要的方法分化贪污分子，打破各种攻守同盟。（五）正式宣告凡有老贪污行为至今隐瞒不报的，必须限期坦白，否则一经查出，加重处罚。（六）打虎阶段务必聚精会神，调集足够的干部，组织得力的指挥机关去进行作战。

[3]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1月31日关于三反运动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中南局的第五次报告。报告汇报了民主检查阶段的概况，反贪污斗争的初步收获，以及下一步打虎的部署，并给华南军区和广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西5个省军区分配了打虎数目。

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毛泽东
二月四日上午十时

对华北区二月底以前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4日）

薄一波、刘澜涛[1]同志，并告各同志：

二月二日报告[2]收到。你们这个报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至很高的程度。你们计划在二月底全区捉大中小虎一万一千多只，还只包括县以上的，不包括县以下的，只包括党政军民学内部的，不包括工商界的。华北没有政府，华北军区系统也不如有些军区那样庞大，尚能捉虎这样多，其他大区，应当更多。东北局二月二日来电说“东北地区的老虎估计会不少于两千”。这里未说明老虎的大中小。如包括大中小虎，则数字太低，东北当有大中小老虎二万只以上。华北县以上即有大中小虎一万多，如包括区乡，亦当在二万只以上。如东北所称二千是指大老虎，则比华北的一千二百只大老虎高得多。总之虎数增多，证明认识进步，信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华北事务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指薄一波、刘澜涛1952年2月2日关于华北2月份内捉虎计划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心增高，劲头增大，请各同志一起注意。薄刘电尾几点[1]都是对的。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指薄一波、刘澜涛2月2日报告最后部分讲的几个策略性问题，即：（一）乡村一级暂时一律不进行三反，待县以上单位搞清楚，腾出手来以后再搞。（二）情节十分严重，贪污数目虽不及一亿元，但使国家损失超过一亿元者，一律以大虎论。（三）因三反或因惩处不法资本家而使工厂、商店生产陷于停顿者，应指定负责人开工营业，不要因三反而使生产长期停顿。（四）应在时机成熟和必要时，杀一批，判徒刑一批，赦一批（亦应有行政处分），以促进大贪污犯分化和坦白。

关于转发三个打虎文件的批语

（1952年2月4日）

各同志：

这里有三个文件都很好，值得看一下。一个是二月二日东北局的报告[1]，其中所说打虎的十条经验都是好的。又一个是二月二日华东军区党委给所属的指示[2]，其中所说老虎类型之多，分布之

---

[1]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52年2月2日关于打虎计划的报告。报告中所说的10条打虎经验是：（一）要抓住重点。（二）迅速纠正某些部门领导人迟疑犹豫，缺乏打虎决心的错误倾向。（三）在群众中不宜提出贪污一亿元以上的是大老虎，免得引起大贪污分子将问题隐瞒在几千万元以下。贪污不足一亿元，但危害甚大者，亦应看作大老虎。（四）注意从坦白分子中追出材料，拉出一串。（五）坦白得好的老虎，可不予逮捕，并适当鼓励，从轻处理。（六）逮捕犯法的资本家应经省、市委批准，并报东北局。工厂主或商店主被捕，应指定代理人进行管理，继续生产或营业。（七）三反中遇有反革命分子兴风作浪，应沉着应付，不要因此转移打虎目标，待打虎告一段落后再予打击。（八）打虎期间工厂生产、铁路运输、收税征粮、贸易购粮等不能停顿，应留出力量领导生产。（九）在打虎时，群众和积极分子的压挤与负责同志的个别谈话、打通思想可以双管齐下，促其坦白。（十）不能仅仅在几个负责人的浪费与官僚主义上做文章，要引导群众去捉老虎。

[2]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日关于打虎问题给所属的指示。指示说：各机关各部门都是资产阶级进攻的对象，都会产生大小老虎，因而无例外地都要查、要打。最近，军区文化部、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都打出了各种类型的老虎。破大贪污案，要采取专案专人专办、包干清查的办法。专案专办又要与广大群众的检举相结合。

广，足以发人深省，引起打虎热情。第三个是二月一日中南军区党委给所属的指示[1]，说的都是内行话，证明他们已经摸到了门路，取得了经验。现在中央一级和大行政区一级都已有了丰富的经验，但省市一级和地委一级则还不能说都有丰富经验，特别是地委一级经验尚少，所以还有许多报告说不出内行话，而是属于“空话连篇”一型的。对于这类报告，必须立即予以批判。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1日关于打老虎部署给所属的指示。

关于注意领导生产问题[1]

（1952年2月4日）

（六）在三反期中注意领导生产，不要脱节，不要因此减产。如因三反忙不过来，致有部分的减产，也不要减产过大，并要在三反以后的增产中弥补三反期间减产的损失。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中如何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答谢胡志明祝贺中越建交两周年的电报

（1952年2月4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同志：

感谢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交二周年纪念时的友谊祝贺。我确信：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祖国独立与自由的坚决不懈的持久斗争，在您的领导下，在亚洲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下，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　北京

对山东分局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5日）

山东分局，并告华东局、华东军区及各同志：

一月三十日报告收到。你们清出了许多中小贪污犯很好，但你们打虎成绩还很小，你们还没有订出全省包括县以上党、政、军、民各系统的打虎预算（不包括社会工商界），你们对下面督促不严，没有批判干部中对大贪污分子认识不足的右倾思想，这些就是你们打虎无成绩的原因。像山东这样的大省，有党、政、军、民、学五个方面，有十几个大中城市，有很多分区和县城，一千万元以上的大中小老虎，应当不是几百只而是几千只，不是一二千只而是三四千只。其中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以十分之一计，应当不是几十只而是几百只。我提议分局立即召开一次打虎会议，规定打虎数目，限期完成任务。上面每天用电话催督一次，下面每三天用电话或电报汇报战绩一次。军区系统打虎也不起劲，应由分局负责统一指挥他们。无论何方面，凡打虎不力者立予批判，严重者撤销职务。当然凡未经过坦白检举阶段者，须先经过这个阶段，方能进行打虎。县以下暂时不应发动。内部的三反应和社会工商界的五反有适当的配合。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二月五日

中央关于派彭真、罗瑞卿[1]去华东、中南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

（1952年2月5日）

华东局、中南局、华南分局：

中央决定派彭真同志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派罗瑞卿同志去中南帮助上述同样的工作，重点放在广州。

中央

二月五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对浙江省委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5日）

浙江省委，并告华东局及各同志：

你们二月二日二十一时报告[1]收到，你们的认识和做法是基本正确的。你们说，浙江全省可能有一千万元以上的大小老虎一千只以上，这个数目作为初步认识是好的，以后应逐步增加。像浙江这样的省包括省、地、县、区、乡五级，党、政、军、民、学五面，可能有大中小老虎二千只至三千只，或者还要多，这还没有包括社会工商界在内。

毛泽东

二月五日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2年2月2日关于三反运动的第二次综合报告。报告说，根据浙江省三反运动的发展情况，我们已明确规定三反斗争是当前各级党委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除春季农业生产必须在不误农时原则下予以照顾外，领导精力必须毫无借口地集中于掌握三反运动。同时，省委为及时掌握各地情况，加强领导，决定省委各委员每人掌握一个地、市委，实行分类指导，以保证运动稳步健康发展。县以下的三反运动，在地委、专署机关的运动结束前，地委领导精力照顾不过来的情况下，必须稳步展开，不可到处点火。为此提出，每一个县三反运动的开展和结束，都要得到地委批准，地委结束三反要得到省委批准。对工商界中的五反运动，因斗争更加复杂，我们缺乏经验，加之三反正处紧张阶段，决定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

对六十六军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5日）

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

六十六军是入朝参战部队，回国也不很久。过去捉虎无成绩，经严督后重整旗鼓，两天即捉到中小虎二十三只。请你们严督各部各军限期大批捉虎，至要至要。

毛泽东
二月五日

在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1]

（1952年2月5日）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的复电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对劳动部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6日）

刘、周、陈、薄、富春[1]阅，退李立三[2]办。

应通令各级劳动行政部门照所拟办法[3]揭露和处理各种错误和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富春，即李富春，当时均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李立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

[3] 指劳动部党组1952年2月6日关于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进攻情况给中财委党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对付资产阶级侵蚀的几条建议，即：（1）在三反运动中要切实检查劳动行政部门中被资产阶级腐蚀和与资本家有密切联系的分子，对那些接受资本家贿赂，在处理劳资争议中袒护资本家、出卖工人利益的人，要比普通贪污分子加重处罚。（2）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在此次三反运动中应选择上述典型，召集大小会议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斗争，并召号所有工作人员坦白检举这种行为，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3）在运动过程中或运动结束后，要做一次组织上的清理工作，把那些受资产阶级侵蚀很深或与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开除或调出劳动行政部门。（4）在打虎阶段结束后，中央和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均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工作检查，批判在政策上、业务工作方针和做法上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并在此基础上制订新的工作方针和1952年工作计划。

犯法行为。应公开在报纸上予以揭露和批判。

毛泽东
二月六日

转发中财委关于财经工作几点意见的批语

（1952年2月6日）

此报[1]应转发各中央局照办。

毛泽东

二月六日

---

[1] 指中财委党组1952年2月4日关于同意中南财委党组的财经工作报告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三点意见：（一）今后财经工作的三个中心环节是计划（了解情况，确定政策）、基本建设（方针、设计、施工）和经营管理。在三反运动和企业民主改革运动中，彻底清除这三个环节中资产阶级的侵蚀与影响。在财经工作中严格划清无产阶级观点与资产阶级观点的界限。（二）在基本建设中，必须反对以小农经济、手工业的观点来处理近代化的工矿交通建设。要按科学办事，从早准备，才能快。地方工业的投资很大，必须提高计划性，克服盲目性。地方工业计划必须交中财委从全国着眼审核批准。（三）县以下的统计工作是否还是有重点地搞好，请加研究。计划统计干部要慎重选择，有计划地培养。要警惕资产阶级钻入计划统计部门。

对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

薄一波同志，并告各同志：

（一）同意这个报告[1]，并请各同志仿办。（二）请各中央局考虑在二月份仿照中央一级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办法，审判各大行政区一级的数名大贪污犯（一亿元以下的中小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其中有判死刑的，有判死刑缓期的，有判长期徒刑的，有判短期徒刑的，有判徒刑缓期的，有判免予处刑的（此项须给行政处分），借以推进打虎斗争。

毛泽东

二月七日

---

[1] 指薄一波1952年2月6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打虎总结及今后部署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2月1日公审大会对大贪污分子采取大压大放政策，为以后打虎造成了十分有利的形势，更大更多的贪污犯将在今后10天内大批就网。报告提出了几个策略问题：第一，对难于攻下的贪污犯，特别是带政治性的、经济内奸性的大贪污犯和老干部中的贪污犯，不应采取简单的猛、狠、压的办法，而应以斗智攻心为主，群众压力为辅。第二，必须从算大账到算细账，做到心中有数，没有做的必须补做。第三，领导干部必须一层一层地作自我检查，打扫干净再下楼。第四，充分利用一切直接、间接的后备力量。第五，实行专案专组、限期破案、包打老虎的办法。第六，集中使用力量，以部为单位，统筹调配。

对中南军区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

中南军区党委：

二月六日报告收到。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五倍，即不是一百零七只而是五百多只。中小虎不是一千一百多只，而是五千多只。这个数目可以包括大军区直属部门在内。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中央对上海市委关于在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1]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

---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2月4日关于在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从半个月来上海市部分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工厂的民主改革和三反试点工作看，工厂中的贪污浪费情况十分严重，是老虎集中的地方，开展三反已成为广大职工的迫切要求，也是当前工厂中进行一切工作的关键。因此决定所有国营、公营及公私合营的工厂，只要领导条件具备的，都要无例外地开展一次深入彻底的三反运动。在工厂中开展三反运动，不仅不与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相冲突，而且可以完全结合成为推动改革的一个基本动力。鉴于工厂既是一个紧张的生产机构而又是大老虎集中的地方，在工厂中进行三反，不仅要彻底肃清贪污浪费，消灭大老虎，而且要不妨碍生产并有利于生产，因此要特别注意掌握以下几点：1. 正确处理工人的偷窃与“揩油”行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办法应当是正面教育，建立制度，不究既往，杜绝今后。2. 慎重而严肃地处理工会经费、福利事业与合作社中的贪污浪费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则是既要彻底弄清是非，认真向群众交代，又不要打击干部的积极性，伤害许多可以改造与挽救的干部。3. 对有贪污行为的职员与技术人员，要采取团结争取多数、孤立打击少数的原则，并根据其技术高低和作用大小加以区别对待。4. 工厂中的贪污现象极为普遍，必须有重点、有意识地检查贪污和搜捕大老虎，防止盲目地泛泛地进行。5. 在工厂中进行三反，其内容较机关更为复杂，而干部条件又相对较差，因此要特别强调有准备有步骤地展开，不能机械地照搬机关的一套做法，不能简单从事、限期完成。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大城市党委：

中央认为上海二月四日关于在工厂中开展三反的文件是正确的，特给你们参照办理。

中央

二月七日

关于推迟公审违法资本家的批语

（1952年2月7日、8日）

一

彭真[1]同志：

北京市公审资本家，提议推至下星期举行，以便在下星期一以前我们再研究一下。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二

周：

我已要彭真将北京公审资本家事延期举行。张家口**目前不要公审**为宜。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对刘澜涛[1]关于六十六军捉虎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8日）

陈毅、谭政、贺龙、宗逊、高岗、德怀[2]诸同志，并告刘澜涛同志及各同志：

根据六十六军的打虎预算及已得成绩[3]，你们的打虎预算均须重做。各级军区和各军打虎预算和打虎成绩不及六十六军的，须说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其负责人一定有问题，不是思想右倾，或方法不对，就是自己是贪污犯。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宗逊，即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刘澜涛在1952年2月7日关于六十六军打虎成绩和经验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该军打虎预算为220只，内大老虎22只。截至2月6日，已打虎141只，内大老虎4只。

转发天津十一区打大虎的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8日）

各中央局，请转所属各大城市的党委同志们：

这是新华社天津分社二月六日的内部电讯[1]，报道天津第十一区的同志们向奸商进攻获胜的一件好消息。这是天津同志的有益创造，请你们加以研究，并予仿行。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新华社天津分社发的这篇内部电讯说，天津市第十一区节约检查分会采用突破一点控制全盘的方法向资产阶级展开猛烈的进攻，获得了很大成绩。他们选择问题最多的五金、橡胶、木行、汽车轮胎等7个行业，研究他们偷窃行贿的规律，在各行业中突破一点，从一点中得出材料去突破全行业。他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分化资本家，使用积极分子，即一方面发动工人、店员检举，并把资本家的亲信职员特别是会计争取过来，另一方面是争取一部分资本家起义。这是击破资产阶级的有效方法之一。

对军事学院两份三反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8日）

刘、朱、周、林、聂、罗荣桓、肖华[1]及军委各部门。请肖华同志以电话告刘伯承[2]同志：

（一）二月三日二月四日两个报告[3]看到了，很好。（二）军事学院包括各附属单位在内，可能有大老虎几十只至百余只，中小老虎几百只，请他注意搜捕。（三）像朱由芹[4]一类的人要严惩。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罗荣桓，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刘伯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党委1952年2月3日报送军委主席、副主席、总政治部的三反情况简报第三号，和刘伯承1952年2月4日关于朱由芹贪污腐化及对其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4] 朱由芹，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务部副部长，在三反运动中受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降级处分。1980年2月，军事学院党委对朱由芹在三反运动中的错误和所受处分进行复查，认为他在分管机关生产的工作中有一定的错误，但原处分的主要事实依据有很大出入。经总政治部批准，于1980年4月撤销了对朱由芹的开除党籍和行政撤职、降级处分，恢复准军级待遇。

关于纠正连队干部军阀主义作风问题[1]

（1952年2月8日）

有些连干军阀主义严重者，团营领导上须作充分准备，使连干在战士面前作好检讨，否则群众不平之气突然爆发，连干将无所措手足。连干中之错误严重不撤不足以平公愤者应予以撤换。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连队开展三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指示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中央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

（1952年2月9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春耕即到，各省级、专区级和县级除对春耕作出全盘布置外，并应指定专人负责经常领导春耕工作，争取今年丰收，不得疏忽。（二）春耕前及春耕中，区乡两级均不得进行三反斗争，应以全力从事春耕工作（有些新区还有土改工作）。区乡两级的三反应放在春耕完成以后去做，并应在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区党委的统一部署和统一号令之下进行。区乡两级已经发动三反斗争者，除县级以上党委为了典型试验的少数地点外，均应停止，以防发生混乱现象。

中央

二月九日

1952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郊区农村。

1952年，毛泽东和江青等在北京郊区。

1952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近郊访问农民。

中央关于中小贪污分子分别处分问题的补充指示稿和毛泽东对此稿的说明

（1952年2月9日）

一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党委和军师党委：

鉴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带着很大的群众性，中央已规定除对其中情节严重者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其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予刑事处分，而由其工作机关按其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以示严肃。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此外尚有一些迹近贪污、按其实际不能叫作贪污者，不应以贪污论。如此规定，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免刑事处分（即不送法院，不判徒刑），而只给以行政处分，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关于行政处分的项目，除中央已规定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等四项外，兹再增加警告一项，共为五项。估计有很多小贪污分子，例如五十万元以下而情节不严重者（此类人占全体贪污

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关于贪污一千万元以下而免予刑事处分者，如是党员团员，他们的党籍团籍问题，如何处理，中央尚无成熟的意见，请你们根据三反斗争中处理贪污分子的情况提出意见，电告中央考虑。关于一切应给刑事处分的人均须立即开除党籍团籍，中央已有通知，请你们一律遵行。关于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犯（即所谓大中小老虎），也应按其情节分为死刑、死刑缓期、无期徒刑、各种有期徒刑以及免予刑事处分而给以行政处分等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已于二月一日审判七名大贪污犯的事件中，给了方向的表示。

中共中央
二月九日

二

刘、朱、周、陈、彭真、林彪、聂荣臻[1]各同志：

此件主要目的，是行政处分中增加警告一项，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是否适当，请审示。

毛泽东
二月九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对高岗[1]关于东北打虎计划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9日）

高岗同志，并告各同志：

二月六日电[2]收到。（一）沈阳公审计划很好，请将各类处刑免刑犯人姓名、罪行和量刑轻重事先摘要电告中央，得复再行公审。公审应由最高法院东北分院主持，可以一审终结，不许上诉。应由最高检察署东北分署为起诉人，北京二月一日公审由各机关为起诉人，有些人认为不妥。（二）上述各点请各大行政区注意。（三）东北计划打大虎四千只，中小虎二万五千只，为全国六大区第一位。各大区虽然不能都向东北看齐，但要根据自己情况逐步提高预算，批判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四）各大行政区一级，省市区一级和专区一级军事机关应归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领导，统一制定和修改打虎预算，统一指挥打虎行动和研究打虎战术，但各级军事机关同时又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二者分工而又统一，利于配合打虎。（五）个别单位（例如华北第十军的几个师）已出现用迫〈逼〉供信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指高岗1952年2月6日关于东北打虎计划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东北全区计划打大老虎4000只，中小老虎2.5万只，并准备于2月15日左右在沈阳开一个几千人的公审大会，对各类案犯作出不同的判决，以推动运动的前进。

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毛泽东
二月九日

对华北军区关于三反中被撤职干部的待遇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9日）

安子文[1]同志：

此件[2]请你和肖华[3]等同志商酌拟处。我意这个提议是好的，应根据这个提议发一指示。

毛泽东
二月九日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

[2]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7日关于三反中被撤职干部的待遇问题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华北局的报告。报告提议对在三反运动中已被撤职或撤职查办的干部，应即停止其因职务而享受的一切生活和政治待遇，并提出了几条具体处理意见。

[3]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转发华东军区捉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各军区及志愿军党委，各中央局：

华东军区二月七日报告，该军区计划捉大虎一千只，小虎三千只，并定五天一小关，十天一大关，要各部交账，督促甚严。该军区二月五日小关收账，计捉到大虎一百零八只，小虎六百四十九只，挤出中小贪污分子九万七千多人。望各军区向华东军区学习，严格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毛泽东

二月十日

对刘澜涛[1]关于华北军区后勤部捉虎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各同志：

单是华北军区后勤部所属人员中就能捉到二百只或者还要多的大老虎，八百只以上的中小老虎，这对于那些对大贪污犯存在的情况估计不足因而对打虎预算定得很低的方面或部门，特别是有些军区的方面或部门，是一个大的教训。务请同志们以这类实例教育所属干部，增加打虎勇气。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

毛泽东

二月十日

---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对张宗逊[1]等关于西北军区整编问题指示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张宗逊、潘自力[2]同志，并告习仲勋[3]同志及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负责同志：

你们二月六日指示各部研究整编中的干部配备问题[4]，是不合时宜的，是错误的。这只会分散各级领导者的注意力，是对于三反斗争的一个打击。请你们立即重发指示全力进行三反。禁止下面谈整编，首先要禁止你们自己谈整编。西北军区系统是三反斗争中最不起劲和成绩最小的。西北以至全国各军区，不但二月要以整月进行三反，恐怕三月还要以一个月才能彻底完成三反。不完成三反不整编，这点早就通知了你们，为什么你们这样不热心于三反而在三

---

[1] 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2] 潘自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3] 习仲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

[4] 张宗逊、潘自力1952年2月6日给所属并报军委的关于整编中配备干部工作的通知说，2月份集中全力进行三反。为使3月份整编部队工作顺利进行，在不影响三反工作的条件下，各部应于2月20日后抽出一定干部，根据编制名额，进行整编中干部配备的研究工作，经党委讨论后于3月5日前将科团级以上各类干部的配备名单报军区初审。

反尚未进入高潮时期却这样热心于整编呢？

毛泽东

二月十日

转发济南市委
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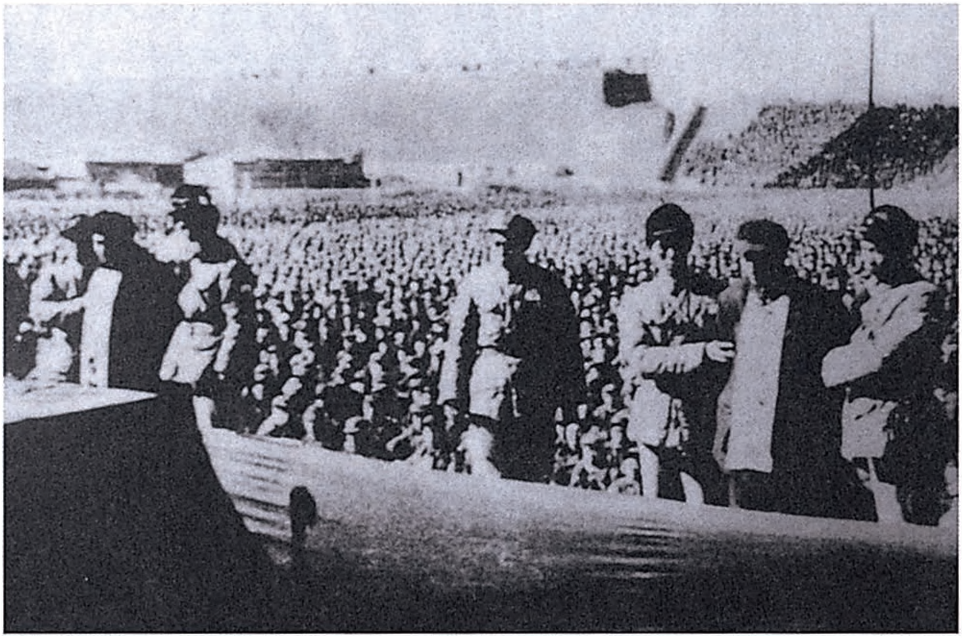
[1] 指中共济南市委1952年2月5日关于五反斗争中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报告。报告说，济南市工商业界的五反已进入全面检查阶段。根据一个多月的经验，搞好这一工作的基本环节，在于搞好基层工会工作，充分地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在坦白限期内和限期过后检查时，都要以厂店为单位举行劳资见面会议。这两个回合搞得好，可以使资方完全低头缴械，如政府的行政压力和分化瓦解工作再配合得及时得力，就可以完全打垮资产阶级的疯狂进攻，并使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生动有力的教育和发动。举行劳资见面会议的主要做法是：（一）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特别是要采用多种方法提高工人阶级对五反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激发他们参加这一斗争的积极性。（二）必须特别注意对高级职员的工作，争取多数直至全部职员积极投入五反斗争。这一着关系斗争的全局，十分重要。（三）劳资见面一般必须具备下列几个条件：（1）基层工会组织比较健全；（2）大多数职工已经发动起来；（3）对干部和职工进行了充分的政策教育和策略教育；（4）已经掌握了较全面的、充分的材料。（四）劳资见面前，应要资方先交出坦白书，做到知己知彼，心中有数。要严密地组织火力，并进行适当的宣传鼓动工作。要有统一指挥。第一次见面要在火力充分展开后适可而止，指出问题，令其准备再做坦白。会后要总结经验，重新组织火力，准备第二次见面。（五）检查队下去时，也要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好基层厂店劳资见面会议，使检查取得成功。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大中城市党委同志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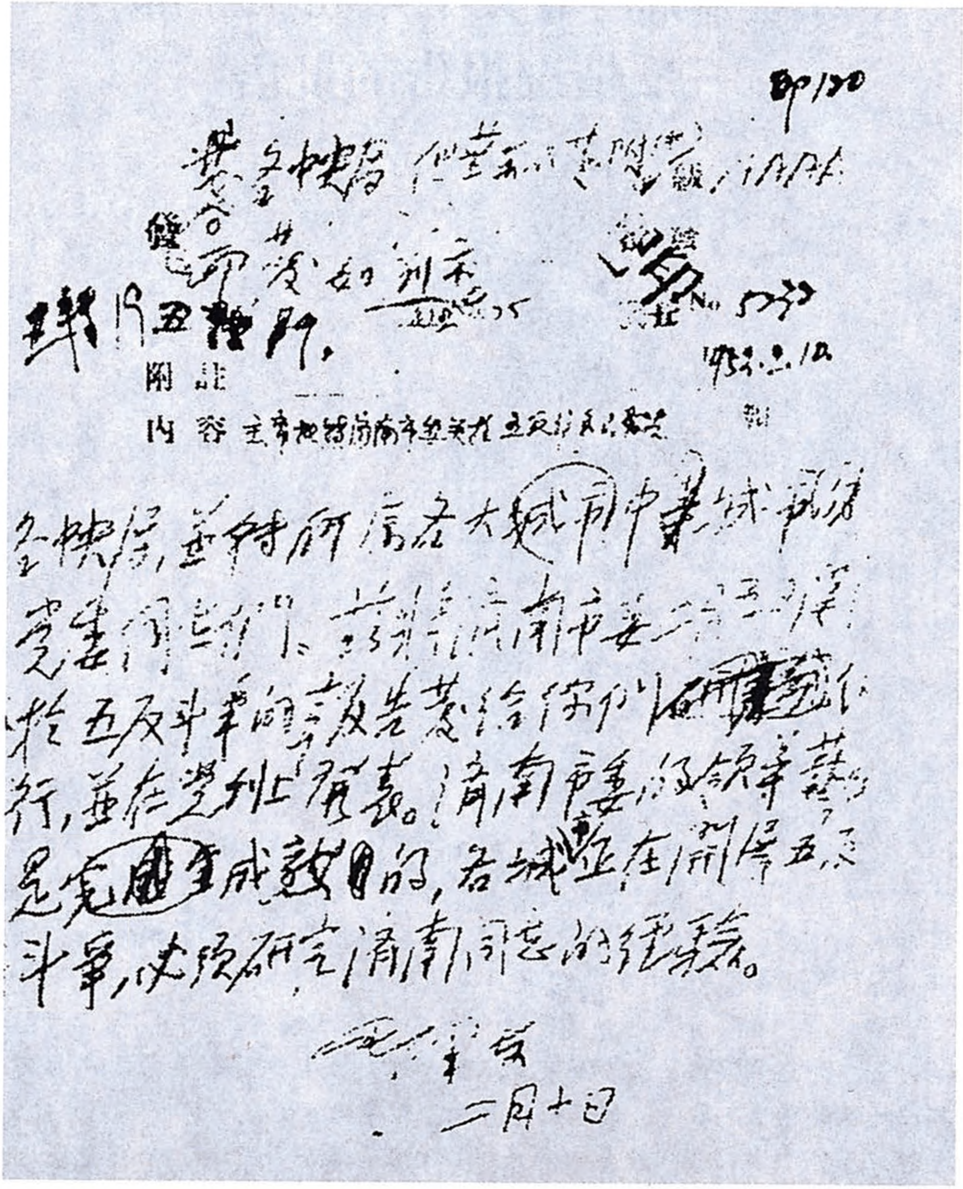
兹将济南市委二月五日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

毛泽东

二月十日



1951年12月，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图为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在保定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



印120

No 5232

1952.2.12

附注

内容 主席批转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大城市中等城市的市委党委和各部门：兹将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施行，并在党刊上发表。济南市委的领导艺术是完全成熟的，各城正在开展五反斗争，必须研究济南同志的经验。

毛泽东

二月十日

毛泽东起草的《转发济南市委关于五反斗争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对王鹤寿[1]等关于东北工业部三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0日）

各同志：

王鹤寿同志等的打虎经验[2]极有用，请你们仿行，并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二月十日

---

[1] 王鹤寿，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部长。

[2] 指王鹤寿、吕东、安志文（后面二人均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1952年2月4日关于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打虎情况给东北局、高岗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所总结的经验。报告说，现有的打虎材料表明，企业中不但掌管大批资财的部门有老虎，不直接掌管资财的部门和个人，只要有一定权限职责，管理不严，有漏洞就会有大老虎。从已查出的77个大贪污犯来分析：第一，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互相勾结，里应外合。第二，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其破坏性最严重。第三，已经暴露有过贪污腐化行为，而又经手过大批资财者，深究下去，往往就是大贪污犯。第四，大贪污案件较多的时期是：1948年末与1949年初南满解放、四野进关的接收时期；1950年末抗美援朝后的迁厂时期；1949年基本建设大批向外包工时期；1951年下半年处理呆滞材料时期（这一时期发现的老虎，往往与处理水泥、木材、钢铁、五金材料、电气材料、废料等物资相关联）。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地、县、区三反运动和土改工作配合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2月11日）

中南局，并各中央局：

中央同意中南局二月八日给分局各省委并告中央电中所说的各项意见[1]，并请西南局西北局考虑采行。关于在县区乡三级进行三反斗争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和不违农时，中央已有指示。在中南、西南、西北这些土改和复查今年还是严重任务的地区，中央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如将乡一级算入，三反运动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这是因为既须不违农时，又须先完成土改和复查，方能进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2月8日关于地、县、区进行三反要和土改工作相配合的指示说，要想将土改和三反两件事都做好，就非一先一后不可。如果同时并进，只有两相牵制，两相耽误。因此建议各省：一、集中力量做好省市级及部分地级的三反，做好大中城市的五反。二、一律主动地将县区级三反推迟到土改和复查运动结束后进行。三、县级力量一般较弱，地委主要精力也须集中在土改指导上。四、农忙季节必须不误生产，三反运动如将乡一级包括在内，势将成为贯穿全年的严重斗争。三反和土改这两件大事，做不好都不许收兵。五、如有人借口新区，认为县区问题不大，三五天即可搞完三反，绝不可信，必须据理反驳。

行认真的三反斗争。在东北华北华东三区则只须注意（一）不违农时，（二）待省地县三级三反基本完成腾出手来，（三）准备好下乡的三反工作队，就可以进行区乡三反，并争取在秋收前完成，这是完全可能的。

中央

二月十一日

祝贺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2年2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二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您表示深切的感谢与热烈的祝贺。

我们感谢两年来苏联政府和人民依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有关各协定的精神，给予中国政府和人民热诚的、慷慨的援助，这些援助大大帮助了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的巩固。

我们祝贺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日臻亲密。中苏两国强大的同盟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远东和平及安全的坚强保证，也是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胜利的保证。

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好团结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北京

转发华东局打虎预算的批语

（1952年2月11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分局、省市委、区党委及各级军区：

华东局二月八日给所属党委的指示，规定华东全区须打大虎五千只，中小虎二万只，不包括区乡，不包括军队，不包括工商界，只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经企业的。这是全国各大行政区打虎预算的最高数字。至今天为止，没有哪一个大行政区的预算比得上华东，华东局认为他们的计划“仅系大体估计和初步要求”，准备根据情况随时增加预算。华东这一计划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军区党委一个榜样，必须克服干部中对大贪污犯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按照自己的情况提高打虎预算。华东军区打一千只大老虎的计划，也是全国各军区中预算最高的。华东局文件中所说二月份打虎未净者推迟至三月完成以及区乡三反不违农时诸点，都是正确的。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关于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的电报

（1952年2月11日）

邓子恢、谭政、叶剑英[1]三同志，并告小平、贺龙二同志：

中南打虎应大致和华东看齐。华东局八日电告，不包括区乡、军队和工商界，单是县以上党政群及财政企业打大虎五千，中小虎二万。另外华东军区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由此看来，你们最近规定打大虎三千，中小虎二万，还是低了。军队方面，必须和华东军区看齐，打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以上，并迅速分配下去。地方应增多少，请考虑再告。刚才接到华南军区二月九日电，规定打大老〈虎〉四十，中小虎八百多，这个数目少了十倍，像华南军区系统有这样多的大小单位，至少应打大虎四五百，中小虎一二千。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关于六十六军打虎经验的批语[1]

（1952年2月11日、12日）

一

各同志：

六十六军的打虎经验[2]应成为全军各单位，特别是各军师和各军分区打虎斗争的模范。十军因发生逼供信错误已不是模范了。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

[1] 本篇这三个批语，其一是1952年2月11日对华北军区党委2月9日关于六十六军打虎经验通报的批语；其二是1952年2月12日转发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的批语；其三是1952年2月12日对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刘澜涛2月11日关于派人考察六十六军打虎情况与经验给毛泽东的报告的批语。

[2]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9日通报中所说的六十六军打虎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领导层层带头作自我检查，走下“楼”来指挥部队向贪污开火；（二）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领导上迅速克服对情况估计不足的右倾情绪；（三）在战斗中不断提高领导和群众的战术水平，攻破他们的道道防线。方法是：精密研究敌情，确定打虎对象；大会、小会、个别谈话相结合，阐明政策，反复攻击；组织打虎基干队；对订立攻守同盟的贪污集团实行分割包围，等等。

二

各同志：

六十六军的打虎决心和打虎方法[1]都是很好的，请你们收到后转发所属各单位，并印成小册子发给一切打虎小组当作课本去阅读。许多部门的领导者不愿意担负多打老虎的责任，打虎预算甚低。上级分派任务，勉强承认，信心不高。有些人知道虎多，办法很少，打不出来。都因为没有认真研究情况，照六十六军同志们的话来说，都是官僚主义作怪。六十六军一个军的打虎预算是二百多只，是他们自己主动规定的，不是上级分派的（上级分派的任务太小）。他们完成任务很快，是因为他们真正钻研了问题，想出了方法。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但随即纠正了。我希望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同志都有六十六军同志那样的主动性，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六军党委1952年2月7日关于打虎经验的报告中所说的打虎决心和打虎方法，主要是：一、在打虎深入过程中，不断克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的官僚主义。在领导思想上掌握“大胆怀疑，追加预算”八个字；战斗意志上掌握不搞尽贪污决不收兵，提出以战胜美帝国主义的顽强的战斗精神打老虎的响亮口号。二、找好老虎，“大会点名，公开宣战”。战斗准备要充分，要动员群众，宣布政策，组织首长挂帅的打虎队，特别是要调查研究敌情，找好目标。三、战术上，对大、中、小老虎所采取的“坚守工事防御”，有针对性地采取“攻坚战”。战术是：1. 反复讲政策，动摇敌心；2. 大会压、小会挤，结合干部谈话，内外夹攻，八方围歼；3. 调虎离山，放虎归山，打破共同防线；4. “勇敢加技术”，打要害，打弱点，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胜深追猛追，直至夺取核心工事。

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因此，六十六军的经验，不但军事系统的同志应该研究，党政民学各系统的同志都应该研究。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三

各同志：

请你们注意寻找这样的典型经验[1]。每一大区找着一个，就可以教育全党，推动整个打虎斗争。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下午四时

---

[1] 指刘澜涛1952年2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的六十六军打虎经验。主要是：一、领导上能具体仔细地分析情况，因而决心很大，信心很足，并能根据情况发展，大胆怀疑，追加预算，务求搞透搞净，不贻后患。二、不断地深入发动群众，及时召开大会，报告战绩，解释政策，介绍典型，以活的事实教育群众。三、普遍搞，重点“挤”，与首长挂帅的打虎队的突击相结合。四、心中有数，精打细算，抓住材料，穷追到底。

转发华东局关于华东直属机关打虎经验的通报的批语

（1952年2月12日）

各同志：

华东局的九条打虎经验[1]极好，文字亦生动易读。请各同志将此件连同本日通报的六十六军的经验一起印成小册，发给所属打虎小组阅看。华东局九条经验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不打倒“思想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9日向山东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华东军区党委和中央、毛泽东通报的华东直属机关九条打虎经验是：（一）严厉批判与坚决克服领导上的右倾思想和官僚主义，是开展打虎运动的首要环节。必须首先打倒“思想老虎”，才能使干部清醒头脑，擦亮眼睛，积极投入捉虎战斗。（二）打虎必须整顿队伍，加强阵容。对于领导弱、骨干少、老虎多的部门，上级领导必须亲临前线，深入虎穴，果断改组其领导机构，并派出督战官和组织打虎队去助战。（三）寻找虎窝和老虎线索，根据敌情，制订初战计划，分工包打。（四）从重点中发现弱点，然后集中火力猛攻最弱的老虎，力求初战大胜，为大举进攻创造有利条件。（五）善于经过查账等，并结合群众检举，找出老虎的弱点。（六）对已被抓住把柄的老虎，必须立即隔离，采取大会压、小会挤、内外追、个别谈话、领导开导、家属劝说、反复对证等方法，使其俯首投降。（七）必须充分利用老虎之间的矛盾，“以虎攻虎”，打破他们的攻守同盟，迫使老虎就范。（八）对于成群成窝的老虎，必须注意从老虎身上追老虎，突破一只，追出其他老虎线索，迅速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九）不要因集中全力打虎而放过中、小贪污分子。

老虎”，老虎是打不出和打不净的。目前全国县团以上干部大多数尚未完全从思想上解决打虎问题，请各同志严重注意这一点。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对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扩大会议几项决议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2月12日）

同意这个报告。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52年2月11日关于2月9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扩大会议的几项决议给毛泽东的报告。几项决议是：一、关于大老虎的标准和算法问题。规定：1. 贪污不满一亿元但对国家经济损失很大者，和贪污五千万元以上但性质严重者，均须经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批准，才能定为大老虎。2. 在全国解放时隐瞒侵吞国家财产或官僚资本未报在一亿元以上者，系指入城前后确定为应交人民政府而未交者；至于解放前隐瞒侵吞国民党或日伪财产者则一律不算；至于应没收之汉奸财产，作另案处理，也不能算大老虎。3. 在入城后历年来贪污之物、款折合人民币问题：物资，应按现在价格折合为人民币；现款（包括金银、股票、各种钞票在内），以当时折实单位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二、为加强中央各部门大贪污犯的审判工作，在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党组下设审判委员会，以吴溉之为主任，龚子荣为副主任，统一领导审判工作。三、统一北京市的

调查工作问题。1. 根据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规定对营造、五金、木材与木器、电料、汽车材料与修理、文具纸张、西药等行业着重检查的原则，采取以行业为单位全面的统一检查和有重点的统一检查相结合的办法。首先统一检查营造业，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派人参加，与中央各部门密切联系，互通情报，避免各自为政的现象。2. 其他行业一般均采取动员的方式，召开大小座谈会，动员工商户坦白与检举，由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负责组织，中央各有关部门可派人参加收集所需要的材料。3. 不许任何机关私自派人检查工商户，严禁私自传讯与打骂行为，与中央各机关贪污犯同案犯罪的工商户的逮捕与封闭、没收财产、追偿赔款等，均应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后，经北京市统一处理。

关于转载王芸生[1]文章给邓拓[2]的信

（1952年2月12日）

邓拓同志：

请将王芸生这篇文章[3]在人民日报上予以转载。文尾我修改了一点[4]。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

[1] 王芸生，当时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

[2]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3] 指王芸生在1952年2月9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人民日报》于同年2月13日予以转载。

[4] 毛泽东删去了王芸生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

中央关于公审大贪污犯问题的指示

（1952年2月1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党委：

二月下半月至三月上半月除大行政区在得中央批准后可以用公审方法审判一批内部的大贪污犯以外，工商界的大盗窃犯目前不忙于审处。各省市则内部的大贪污犯亦不忙于审处。至批准手续，华北局二月十日电[1]所述应经中央和政务院总理批准，中央认为为慎重计，在头几批审判，是必要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中央

二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10日关于贪污分子死刑案件批准手续的规定给内蒙古分局、各省委、京津两市委并报中央的电报。电报规定：(一) 各省市召开公审大会，审理死刑案件，均须经省委或市委反复讨论，各方考虑周到，一切判词、讲话准备齐全而成熟，然后由省委书记或市委书记签字送华北局审批。(二) 所有拟判死刑案件，除党内送审外，均须由省政府主席或市政府市长呈请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后执行。(三) 拟处决的贪污犯，当地党委和政府必须和该犯所属机关的主管负责人事先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决定。(四) 大贪污分子涉及政治问题者，暂时均不处理，放在三反后期或以后再办。

转发华东军区关于增加打虎预算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3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

华东军区增加打虎预算一倍，由大虎一千、中小虎三千，增为大虎二千余、中小虎六千余。请各大军区按照自己和华东军区人数和经费的比例，酌情增加自己的打虎预算。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中央转发东北局关于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2月13日）

各中央局：

东北局此电[1]所说在三反中注意维持经济工作和对付反革命活动两点，在全国都适用，请各中央局同样加以注意为要。

中央

二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52年2月11日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必须注意完成生产、贸易、税收、运输等计划和警惕、防止反革命破坏活动给所属并报中央的电报。

关于志愿军第一线部队停止三反、全力对敌的电报

（1952年2月13日）

彭、邓、陈、甘[1]，并告高、贺[2]：

二月九日十二日两电[3]收到，你们的处置是正确的。敌人很有可能乘我三反举行进攻，我军必须立即准备击退敌之进攻，第一线部队应完全停止三反，全力对敌。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指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陈，指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甘，指甘泗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指贺晋年，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副司令员。

[3]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1952年2月9日关于第一线军之第一线营连部队应加强战备工作给各兵团、各军党委并报毛泽东的电报，和彭德怀、邓华、甘泗淇1952年2月12日关于美伪军企图向我进攻望各部提高警惕给各兵团、各军首长并报军委、东北军区司令部的电报。

朝鲜停战谈判能否成功系于美国政府有无诚意[1]

（1952年2月14日）

一

周总理：

略有修改，请酌定。以你去讲为好。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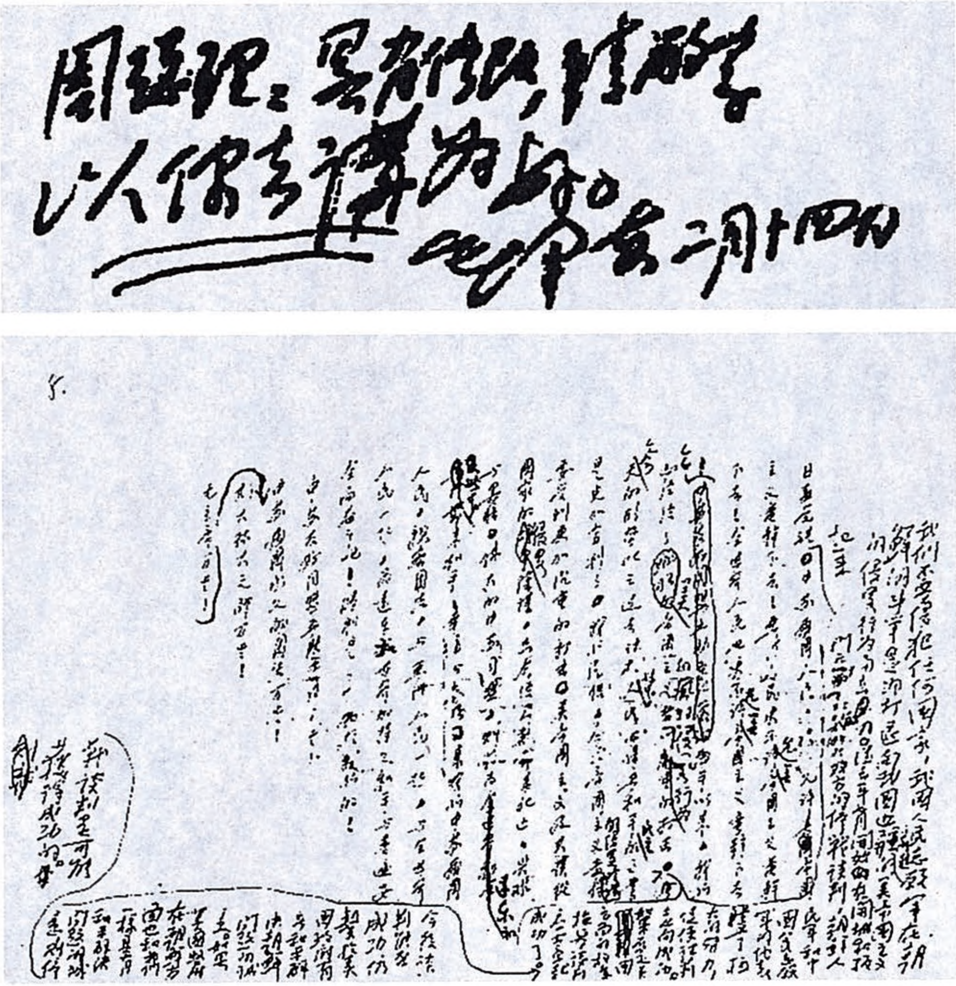
二

我们不要侵犯任何国家，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斗争是为打退向我国边疆前进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而去的。从去年七月开始在开城和板门店举行的敌对双方的停战谈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尽了极大的努力，促使谈判走向成功。如果不是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中苏友好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美国方面的故意拖延，谈判应当早就成功了。今后谈判能否成功，仍系于美国政府有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如果美国政府在朝鲜方面也和我们一样具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则停战谈判是可能获得成功的。



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稿时的批语和修改的手稿。

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

（1952年2月15日）

天津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告中央财委：

（一）中央同意天津市委二月十四日的报告[1]，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如果在一个短时间内出现了不正常状态，亦应迅速恢复正常状态。（二）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

---

[1] 指中共天津市委1952年2月14日关于在三反、五反期间维持正常的经济生活给毛泽东、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对天津经济已发生重大影响。批发商业成交较前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银根很紧；私人不买货，也无心卖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三反后，恢复将遇到更多的困难，生产、税收会受更多的影响。市委研究以上情况后，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对于五反中已逮捕的奸商的财产问题，过去只注意查账未注意掌握钱财，奸商在被捕前财产隐匿不少。一查封，资本家的代理人就躺倒不干，工人要求复工开业，但是没有原料，没有资金，机器破烂，困难很多，只好由财政局垫发工资。市委认为，一律查封不是好办法，必须防止资本家把钱抽空，影响五反的经济果实。

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在北京有一万户，在天津有一万几千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这一类工商户占全体工商户的绝大多数，在北京约占全体五万工商户的三万七千多户。他们中大多数只有偷税漏税问题，一部分有侵吞盗窃问题但不严重。对于这些人，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线，检举他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其违法行为之后，给他们做出结论，叫他们补税一年，有侵吞盗窃者退出侵盗财产，宣布免予罚款。这个“只退不罚”政策，可以安定绝大多数资本家，可以组成广大的五反统一战线。真正的五反统一战线，只有在对这类资本家做出几批“只退不罚”的结论，并予公布之后，才能形成。这种结论，大约在运动开展一个月的时候就应做出两三批，而在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内必须做完。北京天津两市必须于本月内做完。做迟了，很不利。（三）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资本家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故对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必须严守只退不罚（更不捉人）政策，并力争早做结论。有些人问题没有彻底弄清也就算了，如果要对这些人在这次斗争中彻底弄清一切问题，势必拖长时间，对整个局势不利。（四）剩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就是说，把他们捉起来，关几天，许其取保释放，随传随到。捉的目的只在打

落其反动气焰，不在于判徒刑，因为徒刑判多了是不利的。这类人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亦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不宜太多，尤其没收财产不可太多。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北京天津拟共只杀十人左右，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五）捉资本家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完全违法；第二，抗拒运动；第三，在资本家中人缘不好。如果只有前二条，没有后一条，我们将他逮捕，必定不得人心。所谓“人缘不好”，就是在多数资本家看来他是不正派的。（六）关于拨给加工定货任务问题及其他和恢复或维持正常经济生活有关问题，请中财委速予处理。

中央

二月十五日

关于中央一级不准备审判中小贪污犯复习仲勋[1]电

（1952年2月15日）

仲勋同志：

二月十三日电[2]收到。（一）中央一级不准备对中小贪污犯举行审判；（二）西北大行政区准备在二月审判一批贪污犯是好的，应选择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暂时不要审判一亿元以下的。并请先以量刑要点电告。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习仲勋1952年2月13日关于建议中央推迟召开原拟于2月16日召开的公审贪污犯（包括若干情节严重的中小贪污犯）大会给毛泽东的电报。

给毛岳乔[1]的信

（1952年2月15日）

岳乔兄：

二月八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则未收到。你的生计困难，甚为系念，但我不便有所介绍，仍望在原地自己设法解决。此复，顺颂
清吉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毛岳乔（1892—1957），湖南省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人，毛泽东的房兄。曾在湘潭城内经营粮行。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同他交往较多。

对周恩来关于解决三反中业务停顿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52年2月16日）

周总理：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1]，请速予调整。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上午二时

---

[1] 指周恩来1952年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的关于解决三反中业务停顿问题的意见。信中说，今日政务院会议后，同陈云、薄一波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照中央一级三反斗争的情况看来，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1/3或1/4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信中还说，要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给天津市委电报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另一面，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在全国至迟3月1日也可以这样做。

转发中南军区后勤部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16日）

各同志：

这个经验[1]很好，各处都可参考。特别是后勤系统要采用这个经验。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后勤部1952年2月11日关于打虎经验给谭政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必须明确认识后勤系统内到处是森林，到处有老虎，管钱多物多的出大老虎，管钱少物少的出小老虎，这已经成为规律。（二）打虎队一进虎穴就是反贪污，领导暴露有贪污的要立即撤换，由工作组长兼代。（三）要有决心，有气魄，不要姑息和怜悯，凡领导反贪污不力者要坚决换下来；有重大老虎嫌疑的领导者，要坚决撤换下来；对贪污有据拒不坦白者，不论其身居何要职，要坚决管起来（软禁在本单位或送军法处）。（四）要多组织力量，多开辟战场，展开兵力，消灭一切死角。每个突击队要按具体对象分配力量，订出战斗计划与捉虎任务，采用包干制，一包到底。（五）细心算账，周密调查是擒虎的有效办法之一。要认真地查账目、查合同、查订货、查工程、查人事、查生活、查历史。（六）对贪污分子周围的家属、工作人员和经常来往的亲朋故友，要周到地做工作，区别对待，或促其坦白，或动员写信，或当面劝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七）打虎队伍要两路作战，既要对付机关的贪污分子，又要对付与机关贪污分子有关系的外部奸商。经过内外夹攻，两路会师，他们的攻守同盟就会解体。在捉住内部老虎的同时，必然捉到一批外部老虎。（八）召开对贪污分子有押有放的大会，兑现政策，各单位趁热打铁，对贪污分子展开攻势，收效显著。

对一九二师炮兵团部分同志关于三反斗争的建议信[1]的批语

（1952年2月16日）

安子文[2]同志：

请你拟出一个对此类问题的处理办法，并在总党委讨论一次，斟酌妥当，然后提交中央。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

此件请抄发总党委各委员阅看。

---

[1] 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九兵团一九二师炮兵团政治处的12位同志，于1952年2月11日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两条建议：（一）捕捉大小老虎千万不要放弃捉公开的老虎。信中说，部队中的大贪污分子，一部分是从事后勤财经工作的；还有的是团以上的军政首长，他们用不着像一般贪污分子所用的方法贪污，可以依靠自己的权力任意支取公款或其他物资，明目张胆地贪污，建立私人家务，有少数人发了财。建议对此进行清查，有可能从中捉住一些大小老虎。（二）贪污浪费应该分清。将公开动用公款供个人享受算作“迹近贪污的浪费”，无疑是纵虎伤人。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

（1952年2月17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

（一）中南局二月十三日打虎新计划收到。这个大虎八千小虎四万二千余的新计划，把全国各大行政区的打虎水平，提到了目前时期的最高度，比过去所设想的计划接近于实际。请各中央局在适当时机酌量修改自己的计划。

（二）中南局率性将三反时间拉长些，分为四期，时间半年以上，配合各项工作来做，就整个大行政区来说，就包括县区乡三级的三反来说，尤其是就尚未完成土改任务的区域来说，是可以的，恐怕也只有如此做才能做到彻底。这样规定在各区是否适宜，请各中央局加以考虑。但就大城市大工矿区，铁道运输系统，国营贸易系统，税收系统来说，则必须在运动正式发动后两个月至多两个半月内基本做完，否则于经济不利。并且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发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军委同意志愿军三十九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的电报

（1952年2月17日）

志愿军党委：

转来卅九军二月十六日电[1]收到。该军主力停止打虎，转入战斗，处置很对。其他第一线各部凡发生同样情况者亦应如此处置。

军委

二月十七日

---

[1]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转报的三十九军党委1952年2月16日给志愿军党委、兵团党委的电报。电报说，今日5时30分起敌人向我全线阵地猛烈炮轰，出动战车40余辆，有大举进攻模样。为此，已令一一五师、一一七师暂停打虎，全力动员作战，粉碎敌人的进攻。

关于同意西南区打虎新计划的复电

（1952年2月17日）

邓小平、贺龙[1]二同志：

二月十三日电[2]收到，同意你们的新计划。待过一时期再行酌量增加。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

[2] 指邓小平、贺龙1952年2月13日关于西南区打虎战果及第二步打虎追加计划的报告。报告说，截至2月11日，西南区地方和军队系统已捕捉老虎10028只，第二步计划打虎必成数为1.7万只，期成数为2万只，内大老虎至少占1/10。

转发习仲勋[1]关于西北区打虎新预算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7日）

习仲勋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大军区、志愿军负责同志：

（一）二月十四日报告[2]收到，很好，转发各同志参考。打虎预算，中南局最近提了一个打大虎八千的预算，这在全国是最高的，你区和各区可参考中南计划酌量增加预算；但你区和各区预算公布不久，可在做一时期取得更多经验后再行增加。（二）各级军区的打虎预算和打虎工作，一定要受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和地委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利，你们已经注意这点，很好。（三）“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提得很好，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四）你们规定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判无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习仲勋1952年2月14日关于西北全区打虎新预算和应取措施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全区计划打虎13000只，其中大虎1300只。为实现这个计划，务必做到：第一，和右倾思想不断作严肃斗争。第二，党委统一领导，各系统各部门分工负责，两者结合，不可偏废。第三，密切指导，严密控制，坚持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撤职、逮捕、判徒刑，须经超两级批准。无期徒刑、死刑批准权，概归军政委员会。第四，捉虎要注意某些偏僻角落。最后，大区机关拟举行一次审判大会，公开处理几个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体现政策，以进一步推动打虎运动。

期徒刑和死刑概归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批准，这是适当的。但撤职逮捕只宜一般规定须超两级批准，在“打老虎”的紧张期间有些须迅速处理者，在证据确实的条件下，应给可靠的主持人及其组织以当场处理之权，然后再上报追认。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关于派陈伯达[1]去东北了解五反情况给高岗[2]的信

（1952年2月17日）

高岗同志：

为了解东北五反斗争情况，派陈伯达同志到沈阳看一看，有时间的话去长春哈尔滨两处看一下，一星期到十天回来再去上海一带。陈到后请你给他以指示。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关于中南军区应增加打虎预算致谭政[1]等电

（1952年2月18日）

谭政同志，并告剑英[2]：

二月十三日电[3]收到。你们军区打虎预算据中南局最近电告增至打大虎八百，这比你们过去的数字是增大了，但和华东军区的一千六百相比，仅及其一半。实际上华东军区大虎将来可能打至二千五百至三千。你们基本上应与他们看齐，但可稍迟一会再增加，并须启发下面同志自动增加，始不觉得太勉强。特别是华南军区系统可能打大虎一千以上，中小虎万数，而他们定得很低，勇气不旺。最近看了四十八军打虎渐多，应即以之教育全军。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3] 指谭政1952年2月13日关于目前华南军区打虎预算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华南军区第二次预算，加上驻两广各军及广西数字，计划共捉大虎183只，中小虎2164只。

对罗瑞卿[1]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报告的批语和复电

（1952年2月18日）

一

陈毅、贺龙、张宗逊、刘澜涛、高岗、彭德怀、杨立三[2]诸同志：

兹将罗瑞卿同志从汉口来报[3]一件发给你们阅看，请对你们那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贺龙，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刘澜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立三，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

[3] 指罗瑞卿1952年2月16日关于中南军区后勤系统三反工作的报告。报告说，中南军区认为，在打虎中必须派遣有决心、有办法的指挥官去后勤部门坐镇和领导；组织打虎队，订出计划，实行包干；采用查经济、账目、合同、单据、订货、加工、工程、生活、历史、关系等“十查”的办法查找老虎，再经群众大会猛攻、小会细算细查和个别开导，大体就能攻破。报告还说，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极为严重，不仅中南后勤如此，全国后勤大体如此，应引起严重注意。

里后勤系统的三反打虎工作，严密掌握，务期彻底。至要至盼！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二

罗瑞卿同志：

（一）二月十六日关于中南后勤系统的报告收到，很好，已发各区仿办。（二）你的任务是考察和帮助党政军民学整个三反打虎工作，不是专为公安系统，请加注意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转发南京市委关于宣教系统打虎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8日）

此件[1]很好，发各中央局转发文教系统仿行。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

[1] 指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1952年2月17日关于宣教系统打虎情况给华东局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打虎以来，文教系统是“清水衙门”“小贪污难免大贪污没有”等麻痹思想已一扫而空。文教系统已落网大虎6只，中小虎67只，现正在继续搜捕中。报告提出文教宣传系统打虎中应着重掌握的几个问题：（一）严格掌握政策，纠正单纯依靠群众压力解决战斗的错误思想，强调要深入动员群众，艰苦细致地调查研究材料，严格控制召开斗争大会，防止逼供信。（二）对高级知识分子既要洗澡，又要坚决帮助其过关。拟在他们对自己问题交代得差不多时转入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批判。（三）分类指导，抓好重点，照顾一般，根本没有骨干的单位，暂时搁置，腾出手来再搞。报告还说，拟在打虎结束时，与大专学校文艺部门开展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的同时，在宣传部内部开展一个彻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

对劳动部关于劳动行政机关在三反中应注意的几点意见的批语

（1952年2月18日）

陈、薄、李[1]，及彭真[2]同志：

中财委及政法委各部门，都应仿照中央公安部和中央劳动部的做法[3]，根据自己已得经验向各大行政区及省市的所属部门下达指

---

[1]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李，指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彭真，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3] 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1952年2月5日关于三反运动打虎情况及经验的报告，总结了他们重新组织打虎队伍，再一次发动群众，对反贪污斗争尚不彻底的重点单位，由领导亲自指挥，集中火力，迅速打开局面，拿下5个大贪污犯的经验。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1952年2月13日给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劳动部并各省市劳动局的指示，对劳动行政机关在三反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指示说，本部与各地劳动局在三反运动中初步暴露出来的事实，证明当前资产阶级向劳动行政部门的进攻，也是非常猖狂的。各地劳动行政机关在三反运动中除尽量揭发一般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并穷追老虎外，还要特别注意那些在处理劳资争议时接受资方贿赂、出卖工人利益的贪污分子。中央劳动部在清查工作结束后，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工作检查，并在此基础上来制订新的工作方针和1952年的工作计划。各地劳动行政机关也应如此。

令，指示他们进行反贪污和反资产阶级的进攻，指令内容要生动有力，不要一般化。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关于转发贸易部打虎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8日）

将这个报告[1]发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财政、金融、贸易、工业及后勤部门党组。大家注意肃清资产阶级的坐探及国民党派来的经济特务和政治特务。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

[1] 指贸易部党组、机关党委1952年2月18日关于打虎情况的综合报告。报告说，截至2月15日，贸易部已打大虎38个，其中由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派进来或拉过去的经济坐探，占半数以上。这说明贸易部和各总公司是资产阶级在经济情报上实行猖狂进攻的一个重点对象。由于这些单位掌握全国各种商品的商情、物价、贸易计划，又不直接经营业务，因此着重打击坐探，在这些单位就有着特殊重要性。估计各大行政区贸易部和区公司，大城市商业局和市公司也一定会有大批坐探。除坐探外，在收购与出售、基本建设方面也存在大批老虎。经分析，贸易部已打出的大老虎的最大来源是向社会招收的人员，其次是留用人员，此外还有一部分老干部。在老干部中，旧商人出身和过去长期经营机关生产的又占很大数量。据了解，全国各地国营贸易企业的人员成分，也大体是这样。要求中央通知各地，在这些方面严加注意。

中央转发南汉宸等关于三反以来金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9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银行负责同志这一报告[1]，如同中财委所说，除对国营和私营工业最近减产情况没有正确反映外，其余各项估计及所提意见都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注意这个报告建议各

---

[1] 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副行长胡景沄1952年2月14日关于三反以来金融市场情况给中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和李富春的报告。报告说，三反运动以来，金融市场的情况是：物价继续下落，财政情况益趋好转，国家银行存款继续增加，贸易略有缩小，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入超和外汇不足情况已有转变，工业生产正常进行，私营商业加速改组。在此情况下，银行拟采取下列措施：一、结合私营工商业的五反，请各地党政部门积极掌握合营及私营银行钱庄的五反运动，彻底整顿改造行庄。二、适应物价稳定的新情况，对私利率及时下降20%，货币储蓄月利率降至1.2%左右。三、根据目前物价稳定、货币不断回笼的情况，货币发行不应紧缩，银行可适当增加贸易放款，以活跃市场，扩大国营贸易阵地，用以扶持生产。四、在保持一定外汇库存情况下，应加强外汇的运用，以避免风险。五、银行的三反运动继续开展，下一阶段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修改章则制度，拟主要建立预算监理和集中信贷制度。六、本年公债可考虑不发，印制债券工作似可停止。

项中有关当地能做的几项，领导金融机关在三反和五反中予以解决。

中央

二月十九日

对聂荣臻[1]关于朝鲜前线敌大面积空投带菌昆虫等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19日）

请周总理注意此事[2]，并予处理。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指聂荣臻1952年2月18日给军委主席、副主席的报告中所述的朝鲜前方敌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等一事。报告说，除已派专家前往现场了解外，已将苍蝇等送回北京进行培养化验，确定带有何种病菌。据专家估计，以霍乱、伤寒、鼠疫、回归热四种病菌的可能性为大，如化验证实，即须火速大力进行防疫灭疫工作。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五反斗争的两个报告[1]的批语

（1952年2月20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2月17日关于分别处置贪污犯的计划的报告和关于五反斗争的经验及下一步工作部署的报告。前一个报告说，三反五反运动深入并进入最高潮后，对贪污犯和违法资本家更应严格控制逮捕名单，只捕那些非捕不可的；可捕可不捕的或者可以缓捕的，即不逮捕或暂不逮捕。逮捕人数，工作人员不超过总人数3‰，工商界不超过总户数10‰。后一报告说，工商界的五反斗争已进入最高潮，取得很大胜利，但有些大的严重违法的工商户，仍顽抗不交代。检查组经过总结经验，已开始采用以下四种方式进行检查：（一）调来检查。节约检查委员会把违法资本家叫来谈话，坦白了的即从宽处理。（二）兵临城下，劝其坦白。检查组到达后，给以充分考虑时间，只要讲了仍从宽处理。（三）经过上述方法仍拒不交代者，即进行全面检查，不查清不止。查出违法行为后，即从严惩处。（四）停战谈判，即在检查过程中，如发现被检查者已有动摇，即由较主要的负责人与之谈话，给以坦白和立功的机会。市委准备在2月底以前把90%的工商户基本处理完毕。做法是：对既未坦白又未被检举的约1万户，召集他们开会，号召当场交代，签名具结，然后宣布免予追究，既不补税也不退财。在已坦白与被检举的4万工商户中，迅速处理3.5万户，分别予以补税、退财，但不罚款。这样可以使90%以上的工商户安心经营，突出地孤立嫌疑重大或问题严重、拒不坦白的工商户。在已逮捕的资本家中，交保释放一部分，使他们现身说法，检举别人，立功赎罪。

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同意北京市委二月十七日的两个报告。（二）请各大中城市市委根据中央已发关于五反的指示去指导五反斗争，并吸取北京市的经验。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转发华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

（1952年2月20日）

华北局、各中央局，并告各大军区、志愿军：

华北局二月十七日新计划[1]收到，很好，发给各同志参考。其中说到追赃款及须有五天至七天的休整等项，是必要的，请同志们注意。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17日关于新的捉虎计划给分局、各省委、市委并报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华北全区捉虎已超过原计划数目，运动的发展要求立即追加任务，订出新的打虎计划。为保证新计划的顺利实施，报告规定了下列5条：（1）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组织力量，学习战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捉虎战役。（2）对于捉住的老虎，要挤净材料，查清赃物、赃款的下落，并迅速令其吐出全部、大部或一部。（3）各级党委和政府应抽出一定人员管理其他日常工作，特别是春耕和工矿企业生产部门的工作，使生产尽可能少受影响。（4）地委以上领导机关应随时纠正捉虎中逼供和硬凑老虎的现象。（5）各地在组织两三个战役之后，应有5天至7天的停顿，以清理案件，总结经验，整顿队伍，然后再战。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捉人封店问题致华东局电

（1952年2月20日）

华东局：

你们二月十九日答复南京市委二月十五日报告的意见[1]是正确的。在五反斗争真正开展、同志们头脑很热、很想多捉人多封店的城市，如济南、南京等，按照中央指示予以适当节制是必要的。在还没有开展的城市，如青岛、无锡、上海等，则不要强调节制，而应继续批判右倾思想，强调开展斗争。

中央

二月二十日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19日在批复南京市委2月15日五反报告的电报中指出：南京五反运动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成绩，主要由于在事前进行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政策宣传，坚持依靠工人、店员，团结中小户，分化和孤立违法资本家的原则，在执行政策上做到宽严分明，并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争取多数对我同情，这些都很好。但南京市委提出在运动中要摧毁的店户可能达到2%左右，逮捕的人数可能超过5‰，是不妥当的。南京应特别注意对违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工作，借以团结争取绝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

关于华南分局打虎部署复叶剑英[1]电

（1952年2月21日）

剑英同志，并告子恢[2]同志：

二月十九日报告[3]收到。打虎有进展，甚慰。你们的部署是对的。但你们一般成绩尚不算大，尤其财委和军区太小，须加强压力，研究战术。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一日

---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3] 指叶剑英1952年2月19日关于广州市打虎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邓子恢、中南局的报告。报告说，广州市五个单位共捉老虎1254只，其中大老虎219只。华南财委直属单位捉虎57只，华南军区直属单位捉虎196只。华南分局拟定的下一阶段的打虎部署是：（一）继续克服右倾思想。（二）仿北京2月1日公审大贪污犯的办法，争取2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一次公审大会。（三）批判有些同志急于求成、简单化的打虎方法，提倡从算大账到算细账，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四）采取以虎打虎的有效办法来对付攻守同盟。（五）迅速成批地按中央指示解放中小贪污分子。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2日）

北京市委，各中央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一）同意北京市委二月二十日报告[1]。将这个报告发各同志参考。（二）已告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即是对有些有小问题的工商户向他们当面指出，他们有小错误，这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犯，但因其问题不大，应归入守法资本家一类。这样处理，使守法面大一点，对我们有利。如同对五十万元以下的小贪污分子，除若干情节严重者外，算作占小便宜不算贪污一样，对整个三反五反斗争是有利的。（三）哪些是守法户，哪些是半违法半守法户，在实行处理时，除要资本家自报公议，并须由经理和会计分别签字于调查表格外，还一定要本厂本店工人店员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2月20日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给毛泽东、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对不法工商户采取发调查表，自填并具结，然后加以审查和处理的办法。对全市约有1万户的守法资本家，决定不补税，不退财，作出无事的结论；对全市约有3.5万户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工商户，宣布只退、只补、不罚。准备月底前将上述两类工商户的问题基本处理完，以便彻底孤立问题较大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和完全违法的4000多工商户，并从容地加以处理。

讨论通过。对有些有小问题的算作守法户，对半违法的采取只退不罚政策，一定要向工人店员先说清楚，使他们懂得这样处理的必要性。（四）在一个城市中公开向资本家和工人店员说明本市守法资本家有多少（在北京是一万四千户），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有多少（在北京是三万多户），其他严重违法及完全违法资本家有多少（在北京是二千多户），必须在五反斗争正式开展约一个月左右，在工人店员群众斗争已经充分发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线已经明确划清，工会组织已经整理，资本家在工会中的走狗已经驱逐出去的时候，必须在这种时候才能开始公开宣布几类资本家的大概数目字，并实行分批处理，使资本家摸到我们的底。到了这种时候，也必须这样宣布，使资本家摸底，并迅速处理，否则不利。目前，北京、天津、济南、南京、重庆已经可以和应当这样做了，并须在本月底及三月上旬对这两类资本家基本上处理完毕。沈阳和武汉大概可在三月上旬做，中旬处理完毕。不可再迟。上海要三月上旬才能正式大规模发动五反斗争，至快要三月下旬或四月上旬才能这样做。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其他城市，请各地同志酌情决定。（五）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我们也就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地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因此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

中央

二月二十二日

转发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的批语

（1952年2月22日）

谭政[1]同志，并告各大军区：

二月二十日报告[2]收到。（一）同意你们的部署。（二）请各大军区亦按中南所提部署去做，力争三月底完成全军三反任务，包括营连和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在内。四月一号起实行整编。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

[1]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

[2] 指谭政1952年2月20日关于中南军区打虎部署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南军区拟将打虎延至3月15日。争取在3月5日至10日前，地方军完成分区一级、野战军完成师团两级打虎计划。华南、各省军区、各军一级，则争取在3月15日前完成，如不可能则酌量延长。3月5日或10日后，地方军转入整县大队及独立团，依次转入连队。野战军则在完成军师团三级机关打虎任务后，转入营连两级。

中央关于改派薄一波[1]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的电报

（1952年2月22日）

华东局：

兹派薄一波同志来你处，其任务是在华东局的决定下考察及帮助上海方面的三反和五反工作。彭真[2]同志因事暂不能来。

中央

二月二十二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2] 彭真，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1952年2月5日中共中央曾电告华东局，决定派彭真去华东帮助三反和五反工作，重点放在帮助上海市委开展五反斗争。

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2日）

华东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一）同意华东军区党委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的报告[1]。（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仿照办理。（三）目前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再有一两个战役，即可基本解决问题，转入营连及县大队独立团的三反斗争。因此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

---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1日关于打虎战绩与今后部署的报告。报告说，华东部队打虎运动从1952年2月1日开始，经过发动打虎和限期坦白两个战役，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尚未最后完成任务，因此拟发动第三个战役，普遍搜山搜洞，以打大老虎为重点，捉尽所有老虎。为此要求：（一）已完成或超过原定任务的单位，应防止与克服收兵思想，继续打虎。一是把已打出的老虎来一次清查，将打伤了的和围住了的打死，将真假莫辨的审核清楚；二是根据“打尽老虎，肃清贪污”及在三反结束时向上级具结保证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追加预算，注意消灭空白与死角。（二）未完成原定任务的单位，应争取迅速完成任务，然后再按上条所述执行。（三）打虎战术一般应以专案专办为主，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发动检举立功，运用坦白彻底的大贪污分子现身说法等。（四）总结限期坦白阶段的经验，教育打虎队员和群众，调整力量，制订新的作战计划，做好新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五）除少数空白和死角单位外，一般应停止再挤，个别漏网者，可在普遍搜山中顺带解决。

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3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同意二月十九日中南局关于五反斗争策略和部署的报告[1]。（二）将这个报告发各中央局参考。（三）请各省委就省城的五反加以精密研究，作出结论，以便正确地指导省城及全省城市的五反斗争，务使五反在全国范围内不出大的偏差。（四）因为三反五反同时进行并要同时保证不犯错误，必须将县区乡三级的三反及县城和县范围内的市镇的五反，除少数典型试验外，一律坚决推迟到春耕完成以后去做。（五）省城以外的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石家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2月19日关于五反斗争的报告，分析了在三反五反斗争中中南区经济生活呈现的不正常状态及其原因，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决定恢复国营企业的工作能力，在不误三反和五反的前提下，中南区和省两级目前抽出1/5力量，3月初逐渐增加到1/4的力量办理业务。县区三反坚决推迟，下层经济网保持继续活动。收购土产要大胆投放，加工订货应尽力恢复。对资本家要加紧五反并注意打击他们消极怠工和对店员的进攻。同时为了保持经济生活的正常状态，减少失业，保证城乡交流，五反斗争应完全按照中央指示的缩小打击面、争取多数的方针进行。为了准确地执行五反政策，要妥善解决三反、五反的配合作战问题，避免发生各机关自行派检查组到商店查账、把资本家拉到机关来斗等混乱现象。

庄、苏州、衡州、汉中、遵义等处如何进行五反，目前尚无经验，请各省委区党委令各地委精心研究，请示批准，有计划地去做，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各中央局和省委还应派员帮助一二个地委研究一二个中等城市的五反部署，并以经验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二月二十三日

关于上海市应抓紧完成三反打虎任务开展五反斗争的电报

（1952年2月23日）

陈毅、谭震林二同志，上海市委各同志：

市委二月二十一日报告[1]收到。你们二月二十日的会议开得很好，我相信你们的打虎作战会开展起来。希望你们从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日，分为三期，每期五天，共十五天，抓紧检查督促，改进方法，基本上完成上海市各系统内部的三反打虎任务。从三月十一日起阵容整齐地正式开展上海市工商界的五反斗争。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九时

---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2月21日关于打虎不力问题给毛泽东并报华东局的检讨报告。报告说，上海打虎仅完成预定任务的26%，较各地落后，已严重影响到全国的五反运动。这主要是由于市委对这次严重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思想老虎未能及时肃清，以致贯彻不力，陷入战线太长、分兵把口的被动状态。2月20日全市召开了2000多人的打虎干部会议，由陈毅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上海打虎现状，指出努力方向，并当场宣布对一些领导干部给予撤职和停职反省的处理，逮捕法办了数人，教育意义很大。为了加强上海的工作，华东局还决定调一批省市领导干部到上海市担任各方面的领导工作。

关于同意罗瑞卿[1]对三反中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的处理意见的电报

（1952年2月23日）

罗瑞卿同志：

二月十九日电收到。同意你对付反革命分子的意见[2]。

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

[2] 罗瑞卿1952年2月19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对付三反中暴露的反革命分子的意见是：为了集中搞经济老虎，一般应采取先经济后政治的办法。对于破坏三反的反革命分子，则必须坚决采取措施，以扫除打虎障碍。

中央关于县区乡三级暂不进行三反和五反的指示

（1952年2月2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县区乡三级的三反，除省委地委为了典型试验之目的，可以个别地进行以外，一律待春耕完成以后再做，以免引起混乱，此点前已通知。（二）县区乡某些违法资本家中的五反，目前一律不要进行。已进行者，一律停止。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将根据情况另行通知。（三）中等城市例如四平街、营口、石家庄、新乡、苏州、宁波、宜昌、衡州、江门、梧州、宝鸡、汉中、自流井、遵义等的违法资本家中何时进行五反及如何进行五反，须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根据中央二月十五日指示[1]严格审查控制，逐一批准，以免混乱。

中央

二月二十四日

---

[1] 指1952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的处理意见的指示。

关于检查和报告西安市五反斗争实际情况致习仲勋[1]电

（1952年2月24日）

习仲勋同志：

中央宣传部同志们根据他们检查群众日报二月五日和七日的言论，有一个电报[2]给西北局宣传部，提出了批评。我不明了西安市五反斗争的实际情况，不知中央宣传部的批评是否适当。请你对西安市的工作加以检查，并以你的意见[3]电告为盼。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23日关于西安《群众日报》发生右倾错误给西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中央宣传部对《群众日报》2月5日刊载的西安市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报道以及会议通过的关于五反运动宣传提纲，2月7日刊载的西安市工商联五反运动扩大会议的报道和社论，提出了批评，认为上述报道和言论违背了中央历次指示的方针，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主张

五反运动不是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一次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事情；主张这场斗争所依靠的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自己；主张这场斗争的领导权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属于资产阶级；主张进行这一斗争的方针不是发动群众，而是由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

[3] 按照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的要求，习仲勋于1952年2月28日向毛泽东报送了检查西安市五反斗争的报告。习仲勋说：中央宣传部2月23日“对西安市群众日报的批评完全正确，这种批评很必要”；“群众日报2月5日和7日关于西安市两个会议的报道和言论以及西安市某些负责同志的发言，确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他们把某些策略片面地了解，拿去宣传，也就把五反斗争的基本性质和基本方针说走了样。其看法、说法，实质都是带有右的倾向，必须指正”。在西北局的帮助和指导下，西安市纠正了五反初期发生的右的倾向。

转发华东局关于上海奸商借公私合营损公肥私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5日）

请各地注意处理同类情况[1]。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24日通报中所说的上海市公私合营工厂中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情况。通报说，在三反中发现上海的10个公私合营厂实际上已变成为“合公营私”厂。它们完全丧失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成了资本家损公肥私的基地。通报要求各级党委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同时打垮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方面的进攻，将工厂中的领导权巩固地掌握过来。

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向志愿军出售伪劣医药用品，被判处死刑。

对周恩来关于荆江分洪工程会议情况报告的批示

（1952年2月25日）

周总理：

（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转发中直党委关于打虎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2年2月26日）

此件[1]很好，发各同志参考。强调要材料，要证据，普遍推行算大账算细账追赃款追赃物的方法，严禁逼供信的方法，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毛泽东

二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1952年2月25日关于打虎工作给总党委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前一段打虎的情况和做法，对今后的打虎方法，特别强调算细账和调查材料。指出前一时期不肯投降的老虎，一般都比较难打，需有更多的材料和证据，才能迫他缴械；对已承认犯罪事实的老虎与中小贪污分子要分出力量来甄别材料，并进行追赃工作。

关于加强对陈嘉庚[1]保卫工作的批语[2]

（1952年2月26日）

周总理：

请指示福建当局加强对陈嘉庚的保卫工作，或劝陈来京。如何，请酌处。

毛泽东

二月廿六日

---

[1] 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福建分社给总社的一份电报上。电报说，美蒋特务最近计划谋害陈嘉庚以嫁祸于我，破坏五反运动。

中央关于分步骤开展城市五反斗争的指示

（1952年2月27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兹将罗瑞卿[1]同志关于长沙市五反经验的报告[2]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长沙市在五反中的策略是正确的，其经验可在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仿行。（二）直到现在大多数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三反方面，未对五反作精密的研究，或虽有研究尚未向中央作报告，也未对下面作明确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第一，必须确定暂时不在县区乡搞五反。第二，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在自己所在地的城市（包括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对五反斗争作精密研究，每五天或七天找市委书记和市长开会一次，分析情况，决定策略，取得经验，推动斗争，并将情况和意见随时电告中央。从三月一号起，各中央局、分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罗瑞卿1952年2月24日关于长沙市五反经验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长沙市五反总的打击面大体上在3%到4%，不超过4%。像长沙这样的城市，在五反斗争的策略上，其打击面稍低于天津、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城市，似乎是适当的。

局、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报告的内容五反应多于三反。因为三反时间较久，情况较清楚，策略已熟，经验已多；而五反则时间短些，情况尚不甚清楚，策略尚不甚熟，经验尚不甚多。第三，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对所辖境内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大体应分为三个步骤开展五反斗争。例如河北省境内，第一步，在北京天津两个大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三月十号以前可以基本上解决问题。第二步，在唐山、石家庄、秦皇岛、保定四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开展五反，这是由华北局和河北省委领导的。他们计划在第三步开展通县、泊头、辛集、杨柳青、沧县、邢台、邯郸、汉沽、临清、胜芳等十个城镇中的五反，这是次于上列“四市”的“十镇”，也是中等城市，待“四市”取得经验以后再行开展“十镇”的五反，由省委和地委领导。对一般县城则坚决停止，以后再说。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必须仿照上述步骤规定一个对于大城市和所有中等城市（普通县城算作小城市，不在此内）开展五反的明确计划，给以具体指导，以免混乱。（三）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市委，凡未向中央作五反报告的，均于电到五日或七日内向中央作第一次报告，以后并要随时作报告。

中央

二月二十七日

关于拍摄三反纪录片问题复高岗电

（1952年2月27日）

高岗同志：

二月廿六日的电报[1]收到。你的意见很好。凯丰[2]电报中主张拍军队一点是正确的，已采纳，恩来同志已将提纲[3]作了修改（加上拍军队和拍民主人士），我已看过发出。凯丰电报中的其他部分则是不正确的，已托陈云陈伯达二同志向你及凯丰说明。凯丰有意见（不论意见正确与否）打电报给我是好的，他以后有意见还可打电报来。有意见不打电报则不好。以上请转告凯丰。三月中旬或下旬中央可能召开一次会议，那时你再来京，目前不要来。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七日

---

[1] 指高岗1952年2月26日关于凯丰向毛泽东反映对三反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的意见的经过情况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转述了凯丰对纪录片拟出现某些领导人的镜头有意见，要求向毛泽东反映，并说他有意见向主席提出，这是应该的。

[2] 凯丰，即何克全，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沈阳市委书记。

[3]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2月19日关于三反运动大型纪录片摄制提纲（草案）。

对宣传第一批女飞行员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

（1952年2月27日）

请周[2]调查一下是否可行，如可，请告肖华办理。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

---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52年2月27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肖华在报告中说，据空军报称，航空学校最近毕业了一批女飞行员，她们已掌握驾驶运输机的技术。为在三八节配合宣传中国妇女积极参加国防建设，拟在3月8日以3至6架运输机在北京上空散发传单，派代表在北京市妇联召集的纪念会上讲话，并作适当的文字报道和拍摄新闻电影。3月8日，在首都某机场举行了庆祝第一批女飞行员“三八”起飞典礼，12时15分飞机从机场起飞，13时10分飞临天安门上空，与首都人民见面。

[2] 周，指周恩来。

1952年2月，毛泽东等接见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1952年2月，毛泽东等和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合影。

1952年2月，毛泽东等和新中国国第一批女飞行员合影。

对新乡地委打虎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27日）

此件[1]可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2月26日关于新乡地委捉大老虎的重要经验的通报。通报说，新乡地委捉大老虎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使‘大老虎’作全面交代并实行对证。在交代贪污数目之外，应把何事、何时、何法与同何人，以及贪污后之出路与用途（这是‘大老虎’最怕的）交代清楚，并随时予以对证，这样才能甄别真伪，打击翻案，进一步逼其就范；同时也才能进一步发现线索，找出漏洞，扩大战果；并为处理作好准备。”

中央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批语

（1952年2月28日）

西南军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

西南军区党委二月二十六日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和部署[1]是正确的，发给各大军区仿行。志愿军可依自己情况酌量采行。

中央

二月二十八日

---

[1] 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6日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报告中说，2月底3月初打虎高潮势必下降，但少数老虎特别是死角与重点单位的老虎，还不可能完全打出来，因此必须贯彻把一切实有老虎都捉干净的方针，争取在3月10日前基本完成打虎任务，25日前完成处理与教育工作。各军区部队对所辖组织应该摸清底细，切实掌握转入处理阶段的时机。对若干重点单位与重点对象尤应组织专门力量包干到底，不受时间限制。处理阶段的工作要求是：（一）根据中央有关指示迅速处理一千万元以下的一般中小贪污分子，并从中继续发现大贪污分子，同时组织专门力量，做好对大贪污分子的核实、追赃及登记档案材料等定案工作，待中央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后，即行判处。（二）处理过程也是一个教育过程，教育应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内容。（三）普遍自下而上地订立个人与单位的1952年节约计划与必要可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民主制度。（四）适时地酌量抽出一些力量，主持某些主要的业务部门的急切工作，尤其是整编工作。

对薄一波[1]关于上海三反五反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29日）

薄一波同志：

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收到。你和华东局、上海市委诸同志共同决定将上海五反停止下来到三月二十号再行发动的方针及各项处置是完全正确的。这样既有利于现在的三反，也有利于三月二十号以后的五反，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形势。

毛泽东
二月二十九日上午一时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对陈毅[1]关于华东军区打虎情况和部署的报告的复电

（1952年2月29日）

陈毅同志：

二月廿五日的电报[2]收到。（一）因为你们打虎进展较速，你们的打虎突击可以在三月十日基本结束，转入打虎的正常轨道上去。但正式宣布须按具体情况，有些（可能是多数）转入正常，有些仍须突击。（二）中央正在考虑不单是五十万元以下而且是一百万元以

---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2年2月25日关于华东部队打虎情况及下阶段工作部署给毛泽东并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除少数单位未搞外，全军打虎工作已普遍发动起来，但发展极不平衡，决定再组织一次扫荡追搜，并在少数未搞的部门开展三反打虎，把运动进行到3月5日至10日作基本结束。这一阶段的工作部署是：第一，继续打一批老虎，不去追求数字，但要打可能漏网的老虎。第二，清理已有老虎，辨别真伪轻重。第三，划分和清理中小贪污犯，对拿用公款五十万元以下的一律列入教育范围，不作贪污犯办；贪污五十万元至五百万元之间的，应酌予行政处分；贪污五百万元至一千万元之间的，应考虑较重的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第四，正面提出纠正逼口供和随便“搬石头”的“左”的倾向，对被处分人员开始进行研究和清理。第五，连队三反着重教育，互相批评，只对最坏的采用“搬石头”的办法。第六，中央关于惩治贪污条例颁布后，即进行一次大的三反教育，此后即部署配合地方五反。

下的所谓贪污分子，一般不算作贪污而算作占小便宜或公私不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但少数情节恶劣者仍应算贪污。此点中央当另有通知。（三）军队不要举行公审。（四）连队三反尚无经验，可先在若干单位试行，连队的严重问题是军阀主义，也有贪污，应来一次改革，但做法应与机关有别，以教育为主，同时搬掉若干坏的。（五）最近西南军区党委有一个方针和部署的计划[1]，今日已发你处，请加参考然后确定你们的部署。（六）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二月二十九日

---

[1] 指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1952年2月26日关于三反和打虎的方针、部署的报告。

对李富春[1]关于起草追赃问题文件的来信的批语

（1952年2月29日）

周总理：

此件[2]须加修改，请你处理，并请与彭真[3]商酌，吸收北京市的经验。此外，关于百万元以下的人大部予以解脱，宜发一电示，亦请你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九日

---

[1] 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李富春起草的关于追赃问题的文件初稿。他在1952年2月27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个文件有两个重点：一是“严肃地贯彻中央政策，凡是确定为贪污犯者（五十万元以下者已决定不算贪污，我还主张一百万元以下者不算贪污），分别情况处理”。二是“赃款归谁接收，公款一律归国库，群众性的款物分别交还原主”。

[3]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对东北贸易部围剿大贪污分子大会的经验的批语

（1952年2月29日）

此项经验[1]很好，可在党刊上发表。

毛泽东

二月二十九日

---

[1] 指东北贸易部1952年2月21日召开围剿大贪污分子大会的经验。其主要之点是：第一，要根据材料掌握的情况与打虎队训练、组织的情况（每个打虎队都要配备坚强的能掌握政策的领导骨干），组织打虎高潮。第二，要掌握材料，在这个基础上再加强压力。掌握材料是围剿大会最实际的准备工作，是大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内外夹攻是掌握材料的好办法。如果事先没有搜集一定的材料，贸然召开这样的围剿大会，就很容易发生逼供情形。第三，发动与组织群众斗智斗威，压力与开导兼施，以促进其内心矛盾。充分发扬群众威力是大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二。第四，要事先在积极分子中规定纪律，说明打人与变相打人都是错误的，要严格禁止。这是大会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三。第五，对材料确凿的进攻对象要穷追务获，但一经突开，就应适时做巩固工作，立据对证、追赃，这样可以防止翻供，从巩固中再扩大战果。

关于在五反中不提反暴利口号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各同志：

西南局二月二十九日的电报[1]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暴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捣〈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为六反七反。

毛泽东

三月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2月29日对川西区党委关于五反中不法行为临时计算办法的批示。批示认为暴利的提法是很不妥当的，因为它不好计算，掌握不紧就容易形成以算剥削账的办法去算暴利，造成混乱，从政治上说也不够策略，事实上许多奸商愿意承认暴利，而不愿意承认盗窃。所以，暴利应列入盗窃国家财产或因此而使国家受到的损失为好。

在福建省委宣传部关于《福建日报》三反报道中发生错误的检讨上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各中央局：

我希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的宣传部都照华东局宣传部（前已通报）和福建省委宣传部一样检查一次自己的工作[1]，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1952年1月三反报道的意见和福建省委宣传部对《福建日报》三反报道发生错误的检讨报告。华东局宣传部指出，《福建日报》对三反斗争的宣传一般已引起重视，但集中火力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有计划地组织材料揭露其罪恶行为则很不够。主要表现在：一、没有转载过《解放日报》的三反社论。二、外地消息多，本地消息少，空话多，事实少，报纸不揭露重大典型事实。三、对资产阶级的罪恶揭露不够，在对贪污分子的报道中，没有同时揭发资产阶级如何行贿、勾引和腐蚀他们的事实。对上述情况，必须迅即予以检查纠正。福建省委宣传部的检讨报告说，华东局宣传部对《福建日报》在三反宣传上所犯错误的批评完全正确。《福建日报》发生这种错误，是因为省委宣传部和报社对三反的报道工作在一开始采取了很不认真、很不严肃的态度，我们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存在着麻痹思想和右倾思想。经过检讨，对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三反的报道宣传，作出部署：省委宣传部加强对三反报道工作的领导，报社对前一段的三反报道进行检查，调整和加强报道力量，最近一个时期集中力量报道省和福州市级机关的反贪污斗争和福州市的五反运动。

是否在三反五反斗争中管好了自己的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的工作？

毛泽东
三月一日

对李富春[1]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规定和追赃规定的报告[2]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请周[3]酌处。还要宽一点，富春说得还太严了。

毛泽东

三月一日

---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2] 指李富春1952年3月1日关于起草处理贪污分子的规定和追赃的规定给毛泽东的报告。

[3] 周，指周恩来。

转发薄一波[1]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1日）

华东部署[2]很好，各区均可仿行。

毛泽东

三月一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华东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2月28日关于华东三反五反情况及部署的报告中所述华东全区打虎汇报会议作出的五项决定，即：（一）大行政区、省、地三级内部三反规定到3月底完成，县一级规定在4、5、6三个月内分批完成，区、乡级争取在秋收以前完成。一面贯彻三反五反，一面维持经济，并只许做好，不许做坏，拖长时间是必要的。（毛泽东在这段话后面加写了以下文字："请各区照此办理。——毛注"）（二）三反必须搞彻底，不许有夹生饭。（三）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抽出1/3的人来维持生产、维持经济的方针。（四）以后不单独提打大虎战役，而是要把大中小贪污犯都清理出来。（五）全区打虎任务不再追加，力求有多少打多少，实事求是，防止逼供信。城市五反着重在既能痛惩资产阶级，又能很快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转发上海市委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日）

一

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罗瑞卿[1]同志：

兹将上海市委三月一日报告[2]发给你们参考。上海自确定暂停五反专力三反以来，成绩很大。所定各项打虎策略和注意维持经济秩序，都是正确的。各地如有三反五反不能同时兼顾者，应暂停五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1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华东局的报告。报告针对3个打虎战役后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今后打虎的几条办法：（1）在战术上强调攻心斗智为主，群众压力为辅。（2）加强使用俘虏工作，进一步发挥“以虎攻虎”的作用，加强对大贪污嫌疑犯的家属工作，特别要使用外部检举材料，以收内外夹攻之效。（3）暂不要作攻坚战斗，对某些大案采取专案专办，主力则应抛开他们前进，以迅速扩大战果。（4）组织打虎典型经验的报告。（5）做好追赃、退赃工作。（6）许多与五反关系不大而我们主观力量很弱的部门，暂停三反，待以后力量顾得上并做好若干思想准备时再搞。报告还提出，一面贯彻三反，一面必须维持经济。

反，先搞三反，待打虎基本胜利，腾出手来，再搞五反。

毛泽东

三月二日

二

应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毛注[1]

---

[1] 毛泽东的这个批注写在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1日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华东局的报告中一段话的后面，这段话是：“组成市和区两级的五反准备委员会，整理和分析现有材料，并对全市十六万三千工商户进行排队工作，把其中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具体数字和比例指出来。”

中央关于军事系统大贪污犯公审办法的指示

（1952年3月2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

军事系统的大贪污犯不要单独举行公审，要由中央局和大行〔政〕区政府主持统一举行公审。此种公审有一次即够。公审名单先报周总理批准。中南局三月一日电所说办法[1]，各大区可以仿行。

中央

三月二日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1日给中央并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拟于3月10日以前召开一次包括中南局、湖北省、武汉市和中南军区4个系统公审大贪污分子大会，打算对7至9名大贪污分子分别给以死刑、死刑缓刑、徒刑、徒刑缓刑、释放等处理，借以推动目前正在紧张进行的打虎运动。

转发刘澜涛[1]关于华北破获两起大案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日）

各中央局、大军区：

刘澜涛同志报告两件[2]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注意同类性质的巨大案件。这类巨案，可能各省都有，大城市尤多。

毛泽东

三月二日

---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政治委员。

[2] 指刘澜涛1952年3月2日关于华北三反、五反情况给毛泽东的两个报告。前一个报告说到河北省合作总社最近破获了一起集体贪污约达200亿元的巨案。该案以经营处长为首，串通会计科长、总会计师并勾结各地货栈和供销小组，以出货不上账的办法，将整车皮白布、粮食运出卖掉后进行集体贪污。后一个报告说到察哈尔省花纱布分公司突破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内奸网及操纵这一内奸网的核心组织——“昌记号”的巨案。“昌记号”是为掩护敌产和做投机买卖于1950年组成的黑字号，先后将23名旧人员派进国营企业当坐探，建立情报小组，控制了六大公司的物价股长，通过盗窃经济情报，骗取银行贷款，买空卖空，贩卖毒品、金银等，至1951年底获暴利达78亿元。

军委转发华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3日）

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兵团军师党委，并告各中央局：

兹将华北军区党委三月二日报告[1]一件发给你你〈们〉参考，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亦照华北军区那样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给以处理。在三反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必须号召各级干部关于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家庭亲戚朋友），用开会和写检讨报告的方式，交代清楚，这一点很重要，望照办。

中央军委

三月三日

---

[1] 指中共华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3月2日关于目前三反情况和今后部署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华北军区捉虎正处在高潮，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极不平衡。开展较迟和老虎多的单位，尚须全力捉虎，已分别追加任务；已基本搞透或接近搞透的单位，领导的主要力量应即转入或逐步转入善后处理和建设阶段。报告对后一阶段中贪污分子的甄别处理、追退赃款、民主补课、厘定制度公约、清交家务、总结巩固政治思想成果等，根据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处理意见。提出在民主补课中，排以上干部除做好书面反省报告外，并要交代清楚与资产阶级的各种关系。

中央关于在三反中检查和解决公安司法机关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

（1952年3月4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

（一）兹将罗瑞卿[1]同志关于长沙市公安局违法乱纪行为的报告发给你们及所属公安司法机关。请你们务必注意在此次三反中全面检查和彻底解决所属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惜将违法乱纪和贪污蜕化分子撤销职务，严重者判处徒刑。其最严重而有民愤者，应予枪决。

（二）王丕敏[2]应予枪决，公开宣布罪状，并赔偿受害者的损失。

（三）长沙市委市政府和湖南公安厅对于长沙市公安局如此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负有责任，应由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情况加以周密审查，分清责任轻重，给以适当处分，并将结果报告中南局和中央，同时通知全省党政机关，引为鉴戒。

（四）与此同样，各地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如发现有与长沙公安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王丕敏，原长沙市公安局局长。1952年4月，作为长沙市公安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主要责任者被处决。

局同样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当地党委政府和上级公安司法机关亦应受到适当的处分，以为放纵不法行为及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工作者的鉴戒。

中央

三月四日

关于中央各部在三反中应指导下级的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三反以来，除若干部门注意了给下级以三反和打虎的指导以外，大多数部门只顾自己打虎，忘了指导下级，同时也忘了本身业务。这种状况，应迅速改变过来：要一面打虎，一面维持业务，一面用电报电话与所属下一级至下两级联系，指导其打虎工作与业务工作。内务部的文件[1]，可为各部参考。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1952年3月4日关于打虎工作给各大行政区民政部部长，内蒙民政部部长，各省市、行署民政厅、局长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内务部和所属机关打虎的形势，对各级民政部门的打虎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并且规定了打虎报告制度。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内务部这个文件上。

关于感谢苏联专家对鞍钢建设的援助复高岗[1]电

（1952年3月4日）

高岗同志：

二月二十八日电[2]悉。拟俟陈云[3]同志回后，就苏联冶金设计院长对鞍钢的恢复与改建的设计工作的成就，以我名义电斯大林同志致谢。对设计院长赫列波尼可夫同志本人，拟由政务院送给感谢状一纸，如其很快回国，则此感谢状将另行补去。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指高岗1952年2月28日关于是否以毛泽东名义对参加鞍钢设计与改建的苏联冶金设计院院长给予奖励或致电感谢斯大林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

[3]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对新疆党政军机关三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刘、周[1]阅后，转王震[2]阅。

此报告中（二）条[3]（2）（3）两项似太严，还要宽一点。究竟如何才恰当，请周研究后找王震一谈。其他各条办法都好。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 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3] 王震1952年3月1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情况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的报告说，在新疆省级机关和军队中，三反已接近基本上解决问题的阶段。鉴于新疆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和起义军队等问题的特殊情况，对军委直属队及二、六两军，二十二兵团，第五军和本地民族干部三反斗争中的问题，拟分别不同情况在政策上区别对待。报告第二条是对二十二兵团三反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

关于谭震林、陈丕显[1]任职问题的批语[2]和电报

（1952年3月4日、9日）

一

刘、朱、周阅，交粟裕[3]办。

同意陈毅[4]同志提议：上海市委工作，由陈丕显同志负实际责任。华东局工作，在饶漱石[5]同志病假期内由谭震林同志代理书记；但大事仍应和陈毅同志商酌，取得陈毅同志同意然后处理。如刘、周、朱同意以上各点，即请粟裕以电话告陈、谭。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谭震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政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粟裕1952年3月4日下午给毛泽东转报陈毅当日上午长途电话内容的报告上。

[3]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司令员。

[4]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5]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二

陈毅同志，并华东局，上海市委：

三月六日电报[1]收到。同意在饶漱石同志病假期内以谭震林同志代理饶漱石同志职务，但大事仍须取得陈毅同志同意而后执行。上海市委因陈毅同志事繁，刘晓[2]同志病假，同意以陈丕显同志代理第一书记职务。

中央
三月九日

---

[1] 指陈毅1952年3月6日关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电报。电报说："经华东局各同志商谈和薄一波同志参加意见，共同建议在饶漱石同志离职休养期间，以谭震林同志代理华东局书记职务，以陈丕显同志代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我仍留上海参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工作并兼管华东军区工作。以上请批准。"

[2] 刘晓，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

对林业部关于一九五一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应给吉林〈松江〉、黑龙江两省党政负责人以处分，不知是否已有处分？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1952年2月22日关于1951年全国森林火灾情况给陈云并转周恩来的报告。报告中说，1951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森林火灾4270次，森林被害面积达3450万亩，损失木材677万立方米。森林被害面积相当于同期内造林面积的12倍。这些火灾以东北为最严重，主要是松江、黑龙江两省。东北所损失的木材占全国森林火灾损失木材数的99%以上。森林火灾绝大部分是由于群众烧荒引起，最主要的根源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孤立地强调春耕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怕布置防火工作妨碍了春耕，怕不准群众烧荒完不成丰产任务，因而忽视了护林防火工作。

在肖华[1]关于军委直属部队开展打虎运动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各同志：

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经验[2]很好，各部可以仿行。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肖华1952年3月2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谈到的军委直属部队打虎的经验。报告说，整个军委直属部队的打虎运动一般是健康的，但个别已发现“左”的逼供信偏向。为了继续扩大战果，并防止偏差，以保证运动的正常发展，军委直属总党委于3月1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了以下事项：一、要求各单位一般争取在3月15日以前圆满完成任务，彻底肃清残虎，并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二、向所有打虎队详细交代打虎政策，尤其对老干部中的贪污分子，必须靠党的政策去征服他们。提高打虎战术，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我们还规定了两条打虎纪律：1. 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2. 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三、对已经打出来的老虎，要进行复查定案、追缴赃物。

转发华东军区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指示的批语

（1952年3月4日）

各大军区和志愿军：

此件[1]很好。你们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布同样的指示。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指华东军区1952年3月2日对营连及县区武装三反工作的指示。指示说：连队三反运动的目的，除了肃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之外，还应明确提出克服军阀主义、加强官兵团结、增强斗志、提高战斗力。连队三反必须掌握稳健慎重、教育为主的方针。对全体人员应反复讲清道理，交代政策。在具体政策上，揭发应该彻底，处理应该从宽，应掌握“战士宽于干部”“连队宽于机关”的原则，缩小打击面，争取多数，以利教育。指示还对3种不同情况的部队规定了3种不同的做法。提出了运动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如：三反应服从当前海防、作战任务，不应影响部队的纪律，严防自杀、自伤、逃亡以及反革命分子的乘机破坏活动，切实执行政策，防止逼供信等。

关于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等的批语[1]

（1952年3月4日）

周总理：

请准备在辽东辽西两省全体军民中注射防疫苗。冀东冀中及京津也要作准备。是否有这样多的疫苗，望告。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沈阳3日讯资料（十五）《抚顺市郊发现大批昆虫》上。这份资料说：3月2日下午5时东北军区卫生部接到公安一师的报告，在抚顺市以南70华里的北大沟该师驻地发现大批昆虫等，当即派出检验人员驰赴现场采集标本。据调查该地有大批苍蝇、蜘蛛、跳蚤，还有一种不知名的黑色小虫，分布成集团状。据该部防疫处负责人称：美军在朝鲜撒布细菌用炸弹和纸袋两种方法，在抚顺发现的苍蝇、蜘蛛等可能是使用后一种方法撒布的。东北军区卫生部已派出30人的防疫队，配合当地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进行室内消毒，并将上述抚顺市以南地带加以封锁。

转发薄一波[1]关于上海市五反准备工作报告[2]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一

此件发各中央局转各城市市委参考。在任何城市进行五反，必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3月3日关于上海五反准备工作和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市的三反估计可以如期完成，五反准备工作近两三天与市委同志作了初步研究，作出如下部署：（一）上海共有工商业16.3万户。守法户占总户数的35%，半守法半违法户占总户数的60%，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占总户数的5%。（二）上海上层资本家包括同业公会的主委、区工商联主任以上的人员在内，共有500余人，根据具体情况，已分成应予保护的、一般保护的和坚决打击的三大类，正在征求各方意见。（三）五反内容必须明确规定。一些人对五反概念还比较混乱，有的是单纯地反暴利，有的是反逃汇套汇、反隐瞒敌产，而且反的年代很远，有的则是一切都反。（四）关于材料准备。已组织专人整理群众检举和资本家坦白的材料。（五）组织五反工作队或战斗小组，对他们加以训练，作为五反开始时的骨干。（六）五反运动的领导拟定以区为单位，加强区委的领导作用。市委集中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掌握政策，统一步调等。（七）在五反开始前准备出几个大案件的成熟材料，待五反中拿出来，为这场斗争全胜铺好道路。（八）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

须分析情况，确定策略，组织工人、组织干部（工作队）、组织指挥机关，并作出全盘计划，方能真正开展五反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修改自己的计划，决不能盲目地进行五反。市委须每天指导各区，几天总结一次经验。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须几天讨论当地五反工作一次，决不能满足于只发一二个原则指示。

毛泽东
三月五日

二

应按中央新的划分标准，划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违法半守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毛注[1]

三

不应当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毛注[2]

---

[1] 薄一波在上述报告中说，上海按与国家经济部门来往的多少和金额的大小，对国计民生利害关系的大小，及在资产阶级中间影响的好坏，对全市资本家加以排队，分为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4类。在这后面毛泽东写了这条批注。

[2]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说的一些人对五反的概念还相当混乱，“有的是单纯地反暴利”之后。

四

此两项应当反，可以归入反盗窃国家资财一类。——毛注[1]

五

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不同，必须以区为五反的单位，市则统一领导各区。——毛注[2]

六

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毛注[3]

---

[1]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谈到一些人对五反概念的理解时说的“有的是反逃汇套汇、反隐瞒敌产”之后。

[2]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谈到五反运动领导问题时的以下一段话之后：“上海地区太大，人口六百万，有二十一个区委，完全集中到市委，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3] 毛泽东的这条批注，写在薄一波上述报告中说的五反运动应“加强领导，规定纪律，严密控制”这句话之后。

中央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1]

（1952年3月5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加直发山东、青岛、南京、华南、云南、新疆：

（一）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建议“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2]，认为这是正确的。其中除第七第八两条由党内掌握不得发表外，其余各条将由政务院通过发表。各地党委所订处理标准和办法与此有出入者，照此修改之。各地如因特殊情况须作若干改变者，应报中央批准。这个文件所采取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

---

[1] 这个指示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删去了其中的第五部分，其余部分也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

[2] 指中共北京市委《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这个文件共有9条，中央批转时，毛泽东在第九条“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退1951年的，1951年以前的免予补退。但拒不坦白及情节特别严重者，得酌情令其补退一年半或二年，二年半或三年”之后，加写了以下一段话：“其他各项违法行为所得一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惟隐匿侵吞敌伪财产应自日本投降之日算起。其中隐匿侵吞敌伪财产的数量不大，并对国家无严重危害作用者，可以不予追究。”

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五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北京有摊贩四万户，将来要给以处理，但在此次五反中还来不及处理。各大城市也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北京天津两市正在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给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北京约占五万工商户中的百分之三十八，计一万九千户左右。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税〕较大的，有的竟达一两个亿。有些家庭商店人手多，不雇店员，比雇上二三个店员的小资本家贸易额大得多，因此偷漏税也多些。北京的资产阶级有三万一千户，其中雇佣工人、店员三人以下的有一万七千五百户，占百分之三十五。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这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都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

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即约五千户。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即约三万户。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即约一万二千五百户。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即约二千户。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即约五百户。将完全守法户和有些小问题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一百万元以下的和偷漏税二百万元以下的分别对待，即一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予补税，二百万元以下者，指出错误，免其一百万元的数目，补其一百万元以上的数目，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行贿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但行贿的人很多，在北京，除掉小额回扣不算行贿，被人勒索不算行贿以外，尚有一万三千多户，约占工商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即超过四分之一。其中，行贿一亿元以上者一百六十九户，五千万元至一亿元者一百七十二户，三千万元至五千万元者一百九十五户，一千万元至三千万元者六百四十二户，一百万元至一千万元者三千一百六十一户，一百万元以下者八千七百四十八户。中央原定补退罚者限于百分之四左右，补退罚捉者限于百分之点五左右，补退罚关者（包括杀几个在内）亦限于百分之点五左右，三项共计约百分之五（中等城市则小于这个比例，有的只占百分之三，有的还少些）。行贿者既如此之多，若只处罚少数人而对多数人不予处罚，则很不妥当，若均给处罚，则受罚者超过全工商户四分之一，打击面又太宽了。故于北京建议第六条中加上“情节轻微者除外”一句。北京拟于实行处理时

将行贿一百万元以下的八千七百多户免予罚款，而于通知书上载明行贿错误，给以警告处分。此点亦请你们注意。

（六）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迫〈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七）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这几点前已通知，现再重复说一遍。

中央

三月五日

对二十二兵团清算贪污的时间界限的批语[1]

（1952年3月5日）

周[2]：

还是王震规定的时间（派去政治委员和建立共产党时开始算起）[3]，你与王震谈时请以此告他。

毛泽东

三月五日

---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西北军区委员会1952年3月2日关于对二十二兵团贪污犯的处理意见给张邦英、张希钦并报中央军委、西北局的电报上。西北军区党委认为，清查处理二十二兵团的贪污犯，应从该部起义时查起，不宜一般地缩减这一时限。毛泽东不同意西北军区党委的这个意见。

[2] 周，指周恩来。

[3]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王震，在1952年3月1日关于新疆党政军三反斗争情况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的报告中说，对二十二兵团清查贪污的时间界限，在三反运动开始时，他曾提出“把清算贪污的界限划定从改编建立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以后算起”。

转发新华社关于南京市在五反中集中训练工商界高级职员的经验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下面是新华社南京记者发来的内部通讯[1]，说的是争取高级店员的经验，很好，特为转发，请各地仿行。

毛泽东

三月五日

---

[1] 新华社驻南京记者1952年2月25日写的这篇关于南京市在五反中集中训练工商界高级职员的经验的内部通讯，刊登在1952年第44号《内部参考》上。通讯说，最近南京市将粮油、营造、五金、水电等行业的账房、监工、工程师等高级职员集中起来进行短期学习，效果很好。不少高级职员在经过集中学习之后，解除了思想顾虑，成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检举了盗骗国家财产的案情巨大的事件。他们组织学习的经验主要是：领导思想上应当贯彻以团结教育为主的方针，着重消除他们因曾被奸商拖下水而害怕处分的思想顾虑，不能采取施加压力的方针和粗暴的做法。学习成员中要配备1/3在五反运动中表现较好、群众中有威信的高级职员和部分普通工人，对他们认真进行政策教育，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转发中央政法干校三反斗争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务请各级党委和政府党组加强注意力，肃清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的贪污分子，严惩大老虎。

毛泽东
三月五日

---

[1] 指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党委1952年3月3日关于三反斗争情况给政法分党组干事会并报总党委的报告。报告说，中央政法干校的三反运动是当作一个重要政治学习来进行的。学员多是来自全国各地县级政法部门的负责干部。从现有的不太完整的材料看，县级政法干部的贪污现象是普遍而严重的。其中有盗窃国家财物的各种贪污问题，而突出的则是贪赃卖法，敲诈勒索，盗卖枪支，卖放反革命罪犯，贩卖烟土、白面、金银等。在运动开始时，我们强调思想自觉，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划分敌我界限，但对敌情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春节后着重克服右倾观点，并从组织上整顿，同时加强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展第三阶段的战役。

对聂荣臻、粟裕[1]关于敌机在东北地区撒细菌和我方措施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5日）

照办。应严重注意这个问题，应用一切有效办法进行防疫工作。

毛泽东

三月五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对五反运动的指示[1]

（1952年3月5日）

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

[1] 这是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进展情况，适时提出的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5条基本原则。

为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所写的批语和通知

（1952年3月6日）

一

刘、朱、陈、周、彭真[1]阅。

此件很好，并须迅即发出。如各同志有意见，请批明交恩来修改。

二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兵团及军党委：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一件发给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你们，地方可发至县委，军队可发至师委，望一体遵办。

中央

三月六日

中央转发关于正确贯彻处理纪凯夫案件[1]精神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1952年3月6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

（一）中央同意湖北省委二月二十七日给中南局的报告[2]和中南局三月三日给湖北省委的答复[3]，认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正确的；（二）应将这两个文件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三月六日

---

[1] 1951年4月12日，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发生一起盗款案。当时任医务科员兼院长室文书的纪凯夫被诬为盗款人，先后两次被公安局逮捕。同年11月经上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组织联合检查组进行调查，弄清盗案真相，否定了对纪凯夫的诬陷。根据查清的事实，中南军政委员会对压制民主，侵犯人权和借端报复、阴谋陷害纪凯夫等的几名干部作了严肃的处理。

[2] 中共湖北省委1952年2月27日给中南局的报告说，在报纸公布处理纪凯夫问题一案后，群情极为振奋，党内党外民主空气大为发扬，正气得到伸张。但在反贪污斗争和镇反斗争中，发现某些贪污分子和特务嫌疑分子

趁机反攻，而某些领导干部由于怕犯错误，束手束脚，不敢大胆进行工作。为了进一步正确地贯彻中南局处理纪凯夫案件的精神，必须向广大干部进行教育，明确地把持宗派成见、蓄意陷害的错误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把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所犯的错误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但由于水平经验所限而犯的错误区别开来，把抵抗组织、坚持错误、屡戒不改的与勇于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对于前者均应严格予以纪律制裁，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是教育提高。对群众的反映和控告，各级领导机关均应认真重视，深入检查了解，根据实际情况按上述原则认真处理，决不可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态度和宗派成见从事，违者均应视其情节轻重受到应得的处分。对其中确是别有用心，乘机反攻，破坏抵抗运动者，应查明实情，公开揭发批判，教育群众，以利运动的开展。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密切联系群众，不敢违法乱纪，同时又敢于大胆负责，坚持原则，不致束手束脚，谨小慎微。

[3] 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3日在答复中同意湖北省委的报告及其所提处理原则，指出报告中所说的一些干部不敢大胆工作的现象，是对处理纪凯夫一案了解不正确的表现。各省如发生类似湖北省委所述的现象，望即按湖北省委报告所提原则及时处理，尤其在目前打虎斗争中，必须坚决克服借口此案讹诈打虎队的现象，坚决克服右倾分子淆乱是非的企图。当然，逼供信是需同样予以坚决克服的。

对华东局第八号打虎战报的批语

（1952年3月6日）

希望各中央局亦发这样一个带部署性的指示[1]。

毛泽东

三月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2月5日关于华东全区的第八号打虎战报。战报指出：一、估计到3月15日或20日前后，地委以上机关均可基本结束打虎阶段，转入三反的第四阶段，即普遍交代个人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结合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一步检查官僚主义，某些领导干部回炉补课；并在此基础上整理打乱了的组织，重新审查和制订各项制度，及时恢复和建立经常工作。为此，各地党委应立即指定专人进行组织整理的准备工作。二、各地打出的大老虎，除安徽外，均已在老虎总数1/10以上。安徽是否由于许多老虎尚未打透，请省委注意检查。其他地区也必须注意把一切打出的老虎打死、打透。三、最近各地反映老虎翻供的很多，请各地参照毛主席2月27日批转的新乡地委捉虎经验，对现有打虎战果的准确性加以严格检查，实事求是地甄别真假，以巩固战果，扩大胜利，并为处理做好准备。

在中央给邓小平[1]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3月7日）

（二）请各中央局严重地注意解决邓小平同志电报『告』所提出的那些同样的问题[2]。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邓小平1952年2月22日给毛泽东、中央并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电报中提出，三反五反运动开展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从外部来说，主要是工商业表现出暂时的显著的停滞现象，贸易额大大缩小，税收大幅度下降，许多私营工厂无事可做，大量的建筑工人失业。工商业的停滞使大量城市贫民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对三反五反已开始表示不满。特务亦借此兴风作浪。这些情况如不迅速设法解决，将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甚至影响五反的深入。从内部来说，主要是一些财经机构垮了。过去，许多事情都是留用人员或新招收的知识分子负责，三反以后他们中将有一大批不能继续再用，而暂时又无人接替工作；同时五反结果，有些被没收或被赔罚的私人工商业必须派人接管。目前骨干显得非常缺乏，这个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国家财经机关很难应付局面。

关于严格掌握广州五反等问题致叶剑英[1]电

（1952年3月7日）

剑英同志，并告子恢[2]同志：

三月三日报告[3]收到，财委军区两系统好转甚慰，望加紧督促，争取本月基本完成军队及广州的三反。同时请严格掌握广州五反，不使引起混乱。某些陷于停顿的经济活动，应大力注意恢复。其他城市，非有充分准备，不要轻易发动五反。

毛泽东

三月七日

---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3] 指叶剑英1952年3月3日关于广州市委系统、广东省政府直属机关、华南军区直属部队、华南财委直属单位和华南分局直属机关等五大系统打虎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邓子恢并中南局的报告。

在中央关于三反中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3月7日）

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1]

---

[1]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三反斗争中如何处理科学家、学者的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指示稿说："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方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以免造成偏向。"毛泽东在"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后加括号写了这句话。

对武陟等县关于追赃的几项政策规定的批语

（1952年3月9日）

此件[1]很好，请各级党委一律照办。

毛泽东

三月九日

---

[1] 指中共平原省委1952年3月4日关于武陟等县正确贯彻政策追交赃物赃款给各地委、市委、县委并报华北局的通报。通报介绍的武陟等县关于追退赃物赃款的几项政策规定是：“现存赃款、赃物，立即交出；不便于立即交出者（如投资尚未结账等），可先交证件；原物已消耗者可登记，开清单，确实挥霍掉者，本人申请，群众评议，听候领导处理。追赃中不准损伤他人（如亲属）财产，更不准封门，停业，不准逼供等。”

在聂荣臻关于国内防疫工作报告[1]上的批语

（1952年3月9日）

退聂办。

很好，照办。京津一带速办防疫。

毛泽东

三月九日

---

[1] 指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3月7日关于国内防疫工作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根据最近敌人扩大细菌战的情况，召集有关同志研究了国内的防疫工作，认为以下四件事需早作决定：一、东北变成防疫区后，华北特别是京津已成监视区，加以现在的季节正是惊蛰之后，防疫工作必须加强领导。因此，中央防疫委员会急需成立，以便适时地决定问题。此事最好请周恩来总理主持。二、京津应迅速进行防疫注射，并厉行群众性的清洁卫生运动。三、铁路交通的防疫工作最为重要，应在总的防疫委员会之下成立铁路防疫委员会。四、积极筹备疫苗药品。

对钟赤兵[1]关于民航机构设置和领导关系的建议的批语

（1952年3月11日）

周总理：

钟赤兵对民航局的建议[2]值得注意。现在民航事业行政和业务混杂，领导多头，飞机和工厂浪费，他提议予以改变。请召集一会议予以研究，决定适当解决办法。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

[1] 钟赤兵，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民用航空局局长。

[2] 指钟赤兵1952年3月10日关于民航局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是：（一）将民航现行机构分立为民航局和民航公司。前者为行政管理机关，尽量紧缩精简；后者为经营业务机构，按经济核算制来执行业务，在业务上财务上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二）将民航局拨归空军建制，以利统一领导。（三）现有人员和干部由空军统一调整，不适合的转业建设，多余飞机交空军，工厂设备交重工业部，以达到通盘筹划和充分利用之效。

中央对西北局关于开展五反的步骤和策略报告的复电

（1952年3月11日）

西北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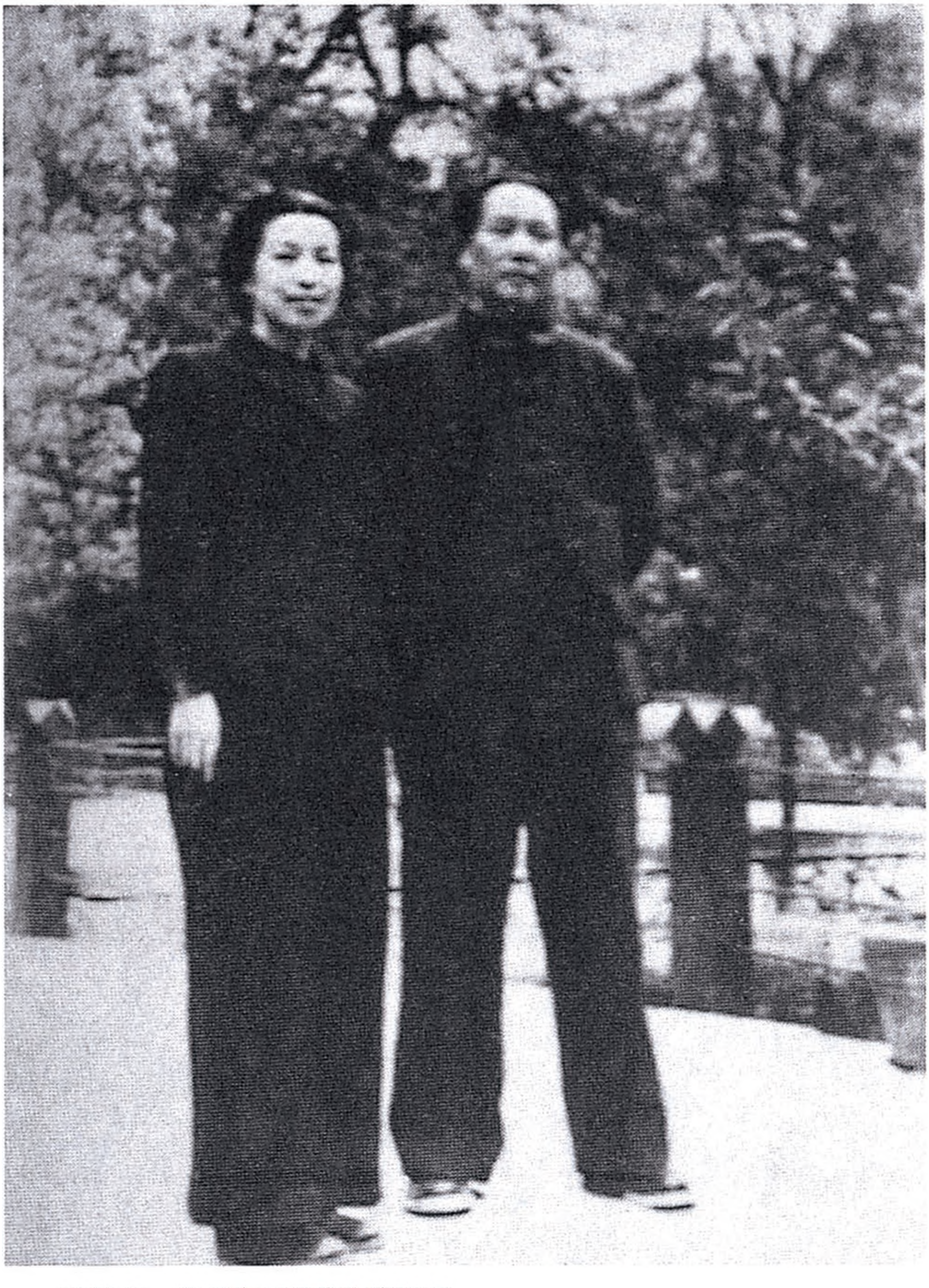
三月六日电[1]悉。你们对五反的部署和策略是正确的。惟西安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合计只占百分之四十，似不合实际。在北京，这两部分共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为什么西安的比例这样少，请再加调查研究。

中央

三月十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北局1952年3月6日关于西北各城市开展五反步骤和西安五反策略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西北各城市分三步开展五反，第一步先搞西安、兰州、银川等8个城市；第二步为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各地委所在城市；第三步为各县县城。西安市的五反，已重新部署。确定3月10日前先集中在几个问题大的行业，每个行业又先集中突破几户，攻下一批再攻一批，逐渐扩展。同时分批处理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团结多数，孤立少数。预定10日前作完结论。到15日前，把约占工商户55%的半守法半违法户处理2/3，并弄清一部分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15日以后集中力量总攻后两部分。1952年3月11日毛泽东将西北局的这份电报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参考。



1952年，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南海。

给程潜[1]的信

（1952年3月11日）

颂云先生：

三月六日惠书收到。在联席会议[2]上的发言，使我明了江湖利病所在，极为有益。此复。

顺致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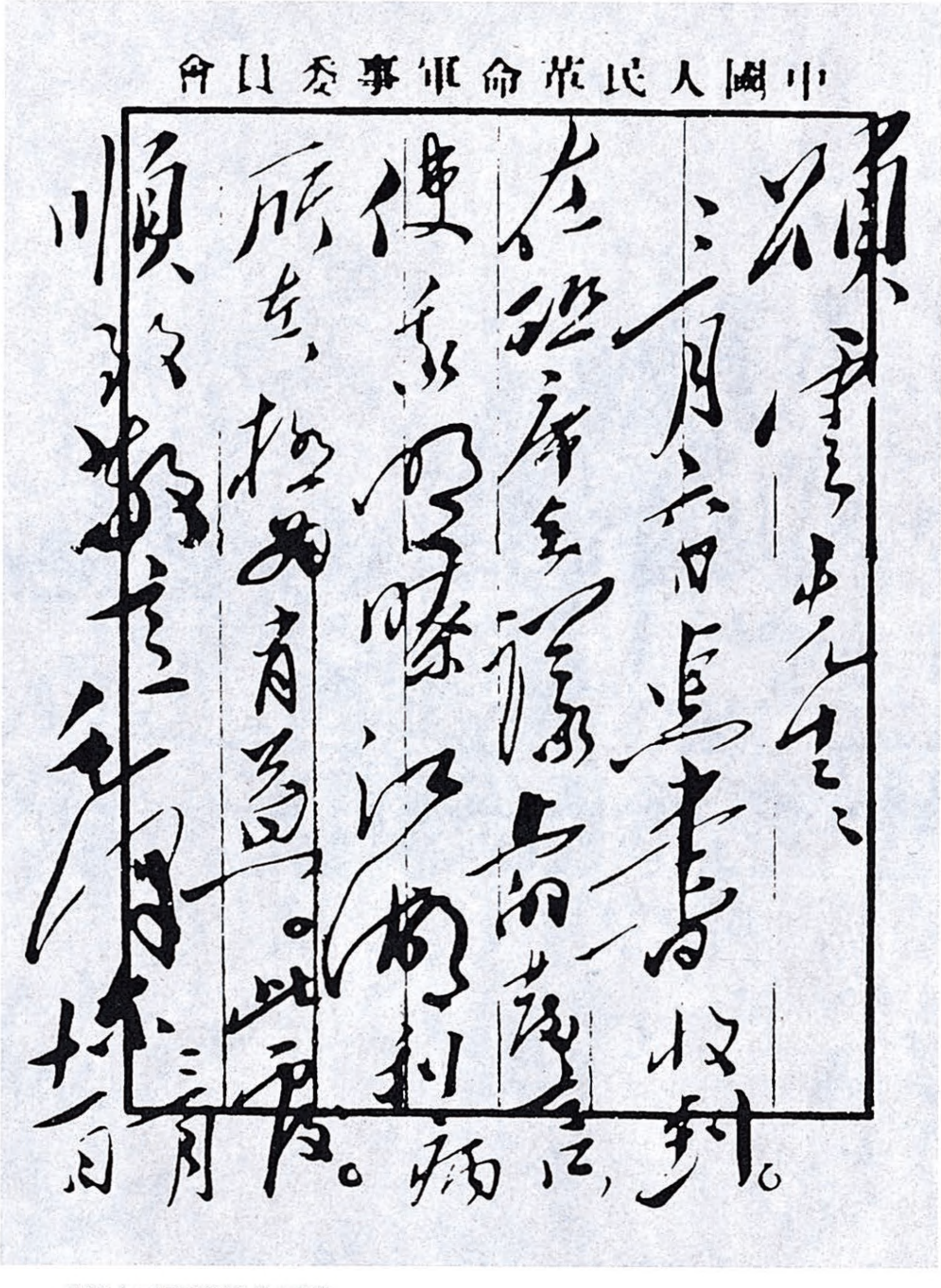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

[1] 程潜，字颂云，原国民党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中南军政委员会1952年3月召集的讨论荆江分洪工程计划的联席会议。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頌雲先生：

三月六日惠書收到。在政府會議上的發言，使我們瞭解湖南利病，所云極好有益。此復。

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三月十日

毛泽东致程潜信的手稿。

1952年，毛泽东和程潜在中南海。

给周世钊[1]的信

（1952年3月11日）

惇元兄：

三月六日来信及冬季由天津来信均已收到，甚谢。蒋竹如[2]兄前后多次来信均到，晤面时请为道及。你的学校计划很好，逐步做去，便可能成功。我休息仍不多，但身体尚好。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请苏联增派一个空军师协助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

（1952年3月11日）

菲利波夫同志：

美帝国主义飞机除在北朝鲜散布细菌外，最近又好几次侵入我国东北地区，散布细菌。敌机每次侵入都利用复杂气候条件或夜晚。我国空军喷气式驱逐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在复杂气候条件下以及在夜晚作战斗飞行，而罗波夫将军所指挥的两个苏联空军师，则担负着在北朝鲜上空与敌空战，掩护北朝鲜交通和协助中国空军部队作战之任务，因而不能兼顾到防卫敌机侵入。

对于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散布细菌之敌机，如果不给予应有的打击，则可能更加猖狂起来。因此，请示您允许再派能在复杂天气及夜晚条件下作战斗飞行的一个苏联喷气式驱逐师（两个团）进驻中国东北，以便布置在辽阳及东丰（沈阳东北）两个机场，担任拦击敌机之任务。可否，请予考虑示复[1]。

并致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

[1] 斯大林1952年3月12日复电毛泽东，同意增派一个喷气式驱逐师进驻中国沈阳地区。

对薄一波[1]关于上海工商户分类和五反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13日）

请周[2]研究。

此件[3]一般很好。惟五类中第二类宜增加，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你和一波通话时征询他的意见[4]。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周，指周恩来。

[3] 指薄一波1952年3月10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16.3万户工商户，按五类划分，第一类守法户，占工商户总数的15.3%；第二类基本守法户，占总数的36.8%，每户行贿、偷税漏税等在1000万元以下者均划入；第三类半守法半违法户，占总数的44.2%，这一类所占比例最大，每户偷税或盗窃等平均在1500万元左右；第四类严重违法户，占总数的2.8%；第五类完全违法户，占总数的0.9%。关于五反的部署，为照顾上海特点，避免生产下降或停滞，避免增加失业和减少税收，拟在掌握好排队材料和具体

对象，做到心中有数后，有步骤地有控制地分批地进行，预计一个半月基本解决问题。为迅速地逐步地形成五反统一战线，报告对五反的内容、界线、清算的时间等作了规定，并提出为了使生产不致因五反而停顿，做到一面生产一面斗争拟抓的几件事情。中央在1952年3月16日转发了薄一波的这一报告。

[4] 周恩来1952年3月15日写给毛泽东的报告说："已与一波通了电话。他认为照主席指示，将五反中上海工商户第三类向第二类移过来一部分的可能是有的，具体计算，当在五反执行中解决，大约第一、二类可达到全数百分之六十。"

转发五台县委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13日）

请各单位认真组织贪污分子退赃，做到有始有终，不要虎头蛇尾。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山西五台县委1952年3月3日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情况与经验给中央、华北局、省委、地委的报告。报告说，在反贪污运动中，发现不少贪污分子特别是较大的贪污分子，不愿意退赃，有的甚至公开抵抗退赃。这说明贪污分子的退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而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必须以更加果断的态度对待他们。关于发动退赃运动的经验，报告概括了以下几点：1. 必须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解决贪污分子不肯退赃的思想。2. 充分发动群众，做好家属工作，团结中小贪污分子，向顽抗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3. 反复交代政策，并通过典型示范体现政策。4. 利用贪污分子去揭露贪污分子的秘密（不肯退出的赃款赃物）的方法。

中央关于增加受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致上海市委电

（1952年3月16日）

上海市委，并告薄一波[1]同志：

三月十四日报告[2]及早几天薄一波同志的报告[3]均已收到。你们的计划很好。惟五反计划中我们希望从第三类[4]移一部分到第二类[5]，对坚决保护和一般保护的资本家数目能增加一些就好，望酌情处理。

中央

三月十六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14日关于一周打虎情况及今后三反与五反部署给毛泽东、中央并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打虎任务已基本上完成，决定基本结束突击打虎工作，把主要力量转入五反。待五反结束后，利用五反中间所得来的材料，内外结合地再来一次彻底肃清老虎的工作。目前正集中一切力量为五反第一战役做好各种准备工作。

[3] 指薄一波1952年3月10日关于上海工商户、上层资本家分类和行业排队及五反部署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4] 指半守法半违法户。

[5] 指基本守法户。

对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上报的防疫工作资料的批语

（1952年3月16日）

周总理阅后，送聂、粟[1]：

应通令东北军区、华北军区、华东军区及华南军区仿志愿军办法[2]组织防疫机构，进行清洁卫生工作。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

[1]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新华社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分社1952年3月15日报送新华总社的防疫工作资料中说，志愿军各部已普遍成立防疫组织，军、师、团为防疫委员会，营、连为防疫小组。各部均开展卫生教育和卫生建设周，搞好住区环境消毒及个人卫生，控制水源，清除垃圾等。各部皆组织捕虫队，捕灭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

关于要新华社向各地通报五反的好经验给杨尚昆[1]的信

（1952年3月16日）

尚昆同志：

请你告知新华总社负责同志，请他们将《内部电讯》中有关五反的最好的经验，随时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例如山东分社二月十三日关于济南五反经验的报道，即可通报各地。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有关三反的消息不要通报了。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华北疫病防治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17日）

周总理：

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1]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刘澜涛1952年3月15日关于华北疫病防治情况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1952年入春以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以河北、平原两省最为严重，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各级人民政府及时掌握疫情，组织力量防治，经过努力，大部地区疫病已经扑灭。但目前仍处于传染病流行季节，各地疫病仍未彻底根除，因此，必须防止麻痹思想，应继续组织力量，完全消灭现有疫病；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清洁卫生运动，进行全面预防工作，以保证人民健康和春耕抗旱工作的顺利开展。

军委转发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3月17日）

各大军区党委，志愿军党委：

兹将华东军区党委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并仿行。

中央军委

三月十七日

---

[1] 指中共华东军区委员会1952年3月15日关于健全各级节约检查委员会组织与工作给所属各部队党委的指示。指示说：华东部队的三反运动，除少数单位外，一般的将在3月末基本上结束，4月初即须转入以整编、转业为中心任务。为了便利党委对全盘工作的掌握，并加强对三反运动善后处理工作的领导，巩固与发扬三反运动的成果，必须健全各团（及相当于团）以上党委领导下的节约检查委员会。已建立的，必须加以调整；未建立的，必须立即建立。

接受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康萨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3月18日）

大使先生：

我异常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

两年多来贵我两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关系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经常关心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解放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并衷心为这些成就感到喜悦。我深信：贵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但将有利于两国经济的繁荣和友谊的增强，且将有助于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

我热烈欢迎阁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阁下在为巩固与发展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的工作中，尽量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权五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3月18日）

大使先生：

我异常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代表朝鲜人民，向中国人民所表示的好意。

英勇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在其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爱国战争中，表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高贵的牺牲精神，并取得了显然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为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我们两国的安全与远东的和平，正进行着共同的斗争。诚如贵大使所说，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互助的友好关系，是用共同斗争的高贵的鲜血凝结起来的。这种斗争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巩固团结成为一种保卫和平事业的巨大力量，只要中朝两国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就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两国的侵略计划，并且对保卫远东及全世界的和平有极其重大的贡献。

我热烈欢迎阁下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阁下为巩固与发展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的工作中，尽量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中央转发邓小平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等问题报告[1]的批语

（1952年3月20日）

西南局，并各中央局及山东、华南、新疆分局：

（一）中央同意邓小平同志三月十五日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

---

[1] 指邓小平1952年3月15日关于三反、五反、土改、经济四个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汇报了3月10日至12日有各省区负责人参加的西南局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研究这四个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一）关于三反。到3月底和4月上旬，全区县以上三反运动即可先后基本结束。区乡三反一律在县以上三反全部结束或在秋收以后再进行。学校三反必须进行，但可推迟一点进行。打虎较多的地区和部门，即应将运动转入核实战果阶段。除少数正在打虎高潮的单位外，应立即抽出1/3的力量搞业务，4月上旬将大部力量转到搞业务，力求在4月份内使各方面工作完全恢复正常状态。根据前一段三反运动中的缺点，应坚决纠正逼供和肉刑。（二）关于五反。前一段因领导力量集中在三反，认真进行五反的城市不多，较普遍的是以三反为中心附带搞了一下五反。会议关于五反的部署是：先集中力量进行25个城市的五反，然后再推及其他城镇。工商户不多的城镇，一律不搞五反，在民主改革中去解决问题。（三）关于土改。3800万人口地区的第三期土改，基本上可于春耕前如期完成，除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外，剩下的10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今冬明春可以搞完。现在土改中的分山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复查工作已决定推迟到今冬和明年去进行。（四）关于经济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各种经济机构如何迅速恢复工作的问题，主要又是干部问题，经济机关老虎最多，干部最缺。会议拟定了一些解决的办法。

正确的。（二）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分局参酌办理，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三月二十日

中央转发三十八军党委关于认真做好三反甄别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2日）

甄别工作值得全党全军注意。兹将志愿军经验[1]一件发给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参考，望指导所属认真切实地做好甄别工作。

中央

三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十八军党委1952年3月17日关于指导所属部队做好甄别工作给志愿军党委报告中所述的甄别老虎的办法。这些办法是：军师各派出两个工作组到连队检查，各团也组织两三个甄别工作组，由团营干部率领进行甄别老虎的工作，重点放在甄别连队和战士中的老虎。目前已经发现不少假老虎或不够标准的老虎。报告说，甄别工作的实践证明，由团营组织工作组加以训练，结合连队进行甄别的方法是正确的。但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打通连队干部的思想，解决干部中因怕弄出岔子、怕负责任、怕前功尽弃等思想造成的甄别工作的阻力；二是工作组应随时总结经验，加以整理提高，防止简单化。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五反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2日）

华东局、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东局三月九日关于五反的报告[1]很好。这个报告综合了五反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3月9日给毛泽东的第一次五反综合报告。报告概括了五反准备阶段与坦白阶段的十条经验：（一）运动开始前，须明确五反内容是反什么，不反什么。（二）五反发动的时机以在机关打虎运动基本结束后为有利。（三）五反的第一项准备工作是开展宣传攻势，进行舆论动员。宣传策略上必须掌握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投机商人和完全违法的大盗骗犯、大行贿犯，不要向所有的资本家同时开火。（四）五反的第二项准备工作是搜集材料，侦察敌情，分类排队，找出重点。（五）五反的第三项准备工作是建立坚强的指挥部，训练骨干，以市为领导中心，以区为作战单位，建立坚强的五反指挥部。（六）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以普通工人、店员为骨干，紧密团结中小职员，争取高级职员，向不法资本家展开斗争，这是取得斗争全胜的关键。（七）召开全市性的五反坦白检举大会，显示威力，体现政策。（八）利用坦白检举大会以后的有利形势，趁热打铁，召开各行业或几个行业的坦白检举大会，促使更多工商业户坦白和工人店员进行检举。（九）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掀起坦白检举热潮，使所有资本家无例外地在工人面前过一次关。（十）根据坦白检举的材料适时地、分批地对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作出结论，以团结争取多数，迅速形成五反统一战线。

的全面策略观点和部署计划，望各大中城市参酌仿行。

中央
三月廿二日

彭德怀回国治病陈赓去朝代理指挥[1]

（1952年3月22日）

同意[2]，请即派陈赓[3]去朝，彭来京治疗。刘朱周陈[4]阅，退聂办。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3月22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鉴于彭德怀有病，需回京治疗，建议派陈赓代理指挥志愿军。1952年4月12日，彭德怀回到北京。

[3]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正在国内治病。

[4]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

（1952年3月23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一）中南局关于加强私营厂店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

（二）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甲）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乙）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3月11日关于加强私营厂店的工人店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五反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是发动与锻炼私营厂店职工的良好机会。各城市市委和工会领导机关，必须通过五反运动，在充分发动店员工人的基础上，逐步整顿工会组织，纯洁与提高阶级队伍。

（丙）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1]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丁）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2]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戊）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己）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庚）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辛）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以上八项，你们有何意见，望告。其中关于工人监督生产一

---

[1] 五毒，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2] “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项，须待几个大城市选择几个大的和中等的厂店，在取得资本家同意后试办取得经验，方能由中央最后作出决定。请你们于五反进行中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并以自己意见随时电告。

中央

三月二十三日

中央转发徐子荣关于公安部门惩治和洗刷违法乱纪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4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公安部门及政府党组：

关于在政法系统中特别是公安部门和司法部门中彻底开展三反斗争，坚决惩治违法乱纪分子，中央已迭有指示。现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同志三月二十三日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望指导所属公安部门照此实施。司法部门的情况亦很严重，必须同样惩治，请你们同样注意。徐子荣的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三月二十四日

---

[1] 指徐子荣1952年3月23日关于公安部门的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的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坚决惩治和大批洗刷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反运动深入以后，若干城市公安局在派出所和人民警察中开展打虎运动，揭发出旧警察和留用人员中大量的十分严重恶劣的贪赃卖法违法乱纪的问题。不仅贪污受贿现象很普遍，而且利用公安工作职权，进行敲诈勒索、卖放反革命分子、包庇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活动，使少数派出所变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损失。对于这些严重问题，必须通过三反运动来一次全面的认真的检查和彻底的整饬。对于那些为数不少的中毒极深、贪污成性、罪恶甚多、民愤甚大的坏分子必须坚决实行组织整顿和依法惩治的方针，才能挽回在群众中留下的恶劣影响和纯洁人民警察队伍，使人民公安机关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有力武器。

在中央转发西安市五反策略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3月）

（二）五反中，市委和各区委及其所领导的一切力量，其工作方向，应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应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弄清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工商户即前三类工商户[1]的问题，并作出结论，组成五反统一战线这一方面，而只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2]方面；在后期，则反过来，以百分之八十的力量放在后二类工商户方面，而以百分之二十的力量处理前三类工商户的未了问题。决不可颠倒这个秩序，以致拖延时间，既不能迅速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又使经济生活不能早日恢复正常状态。望各地充分注意此点。

---

[1] 指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

[2] 指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

同意建立军事工程学院[1]

（1952年3月26日）

同意。[2]

毛泽东
三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粟裕1952年3月18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粟裕的报告说：两年来，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成绩亦大，其装备正日益增加和复杂。唯在技术上还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够满足部队的要求，且各特种兵武器的供应，不宜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求得逐渐能够自己修理与装配，以至于将来培养起军事工业设计工程人才。为此，有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借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之必要。前曾面报周副主席并蒙原则上同意，兹将研究初步结果所拟方案报告如下：（一）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二）院部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及若干处，另辖炮兵工程系、装甲工程系、普通工程（工兵及通讯）系、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等五个系。（三）开始一期可定三年毕业，以应急需。至第三期时为求得深造，则可延长为五年毕业。（四）为求得工业技术的帮助和学习的便利，院址拟设在哈尔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批语和意见

（1952年3月27日）

一

同意。略有修改[1]。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

二

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强索、受贿均是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似可不要再立“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一目。

三

事实上不是所有检举都要处理的，故此句不要。可将第十五条并入第十四条。

---

[1] 主要修改有两处。一处是对条例草案第二条的修改，原文为："一切国家的机关、企业、学校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人员，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及收受贿赂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毛泽东删去其中"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9个字。本篇第二段文字是对这一删改的说明。条例正式通过时，考虑到毛泽东的意见，将毛泽东删去的"及假公济私违法取利"改为"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另一处是对条例草案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修改。第十四条的原文为："对犯本条例之罪者，任何人均有向该主管行政部门、人民监察机关、人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及检举人认为适当的其他机关或首长实行检举之权。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毛泽东删去其中"收受检举的机关或首长，应即作适当的处置，不得拖延、推诿或置之不理"一句，并将条例草案第十五条的文字"凡对检举人施行打击、报复者，应依其情节轻重，予以刑事处分或行政处分"，并入第十四条。本篇第三段文字是对这一删改的说明。条例正式通过时，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于1952年4月21日由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全文刊载在1952年4月22日《人民日报》上。

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的修改[1]

（1952年3月27日）

有的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种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因为民主党派内部本来是包括各部分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

[1] 本篇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给李达的信[1]

（1952年3月27日）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你！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请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不满足广大工人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希望，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处暂仍回原。

---

[1] 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得到毛泽东本人的关心和赞赏。1952年3月，李达将第二部分打印稿寄呈毛泽东审正。这是毛泽东给他的回信。

中央关于严查走私巨案的指示

（1952年3月28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北京破获地下电车公司三年来私售车票至一千一百余万张。北京锦州沈阳天津上海均破获私商勾结干部大量偷运物资或走私贩毒。太原西安破获大批贩毒制毒犯。所有这些，均不及衡阳铁路局破获走私案之巨大。衡阳破获的走私案牵涉到一千八百多人，走私物资值七千亿元之巨，其中有很多违禁物品。中南方面已通令各省市严查此类走私巨案。望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研究衡阳经验，特别是各大铁路局和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大城市必须注意严查此类巨案。衡阳路局郭维城刘慎之两同志的报告[1]是有价值的，望加研究。

中央

三月二十八日

---

[1] 指衡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维城、管理局政治部主任刘慎之1952年3月20日给中南局并铁道部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衡阳铁路管理局在三反中清查走私武器、黄金、白银、毒品等的情况，指出：衡阳铁路南邻香港、澳门、海防3个大港口，中连云贵烟土产区，北接长江及各主要铁路干线，通渝、汉、沪、京、津各大埠，解放前走私极为猖獗，解放后并未显著敛迹。走私为害之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同时亦是政治破坏、军事破坏，更严重的是毒害人民的生命。报告建议中央早下决心，乘三反五反之威，内部外部一网打尽，订出有关走私案犯具体处理办法，以便遵行。

对周恩来送审水利工作两文件的批示[1]

(1952年3月29日)

同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九日

---

[1] 1952年3月29日，周恩来送审水利工作的报告说："送上一九五二年水利工作决定及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两个文件，请审阅批准，以便公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经李葆华与顾问布可夫去武汉开会后，又亲往沙市分洪地区视察，他们均认为分洪工程如成，对湖南滨湖地区毫无危险，且可减少水害。工程本身关键在两个闸（节制闸与进洪闸）。据布可夫设计，六月中可以完成。中南决定努力保证完成。我经过与李葆华电话商酌并转商得邓子恢同志同意，同时又与傅作义面商，决定分洪工程规定修改如现稿。这样可以完全解除湖南方面的顾虑，因工程不完成决不分洪，完成后是否分洪，还要看洪水情况，并须得政务院批准。至北岸分洪的根治办法及程颂云所提意见，当继续研究。"

中央转发薄一波[1]关于上海市五反策略和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3月29日）

薄一波同志，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薄一波同志三月二十五日关于五反的策略和部署[2]很好，各城市均应仿行。上海五反的重点首先放在占六十二万人中的四十三万人方面，是正确的。尤其不误生产，极为重要，各城市凡误生产者，均应立即改变做法。

中央

三月二十九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3月25日关于上海五反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所述的第一战役的经验和第二战役的部署。上海五反第一战役的经验是：（一）五反要与生产相结合，五反必须维持生产。（二）把五反政策向工人、店员、高级职员及老板彻底摊牌，让他们都摸到政府的底。（三）五反斗争必须从诉苦运动入手，通过诉苦发动群众，形成五反统一战线。（四）五反斗争过程也即是争取高级职员的过程，高级职员争取过来了，问题就接近解决了。（五）要学会利用矛盾，分化资本家。（六）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发挥资本家亲戚朋友中的党团员和其他积极分子的作用。关于五反第二战役的部署是：第二战役可如期在4月1日开始。拟选择2000个重点户进行检查，非重点户则以区街或行业为单位，对资本家和工人店员分别进行发动。党的领导力量主要仍应放在重点户和大户身上，只分出一部分力量来进行一般的动员。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在三反五反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的批语

（1952年3月29日）

上海市委，各中央局、分局：

中央同意上海市委三月二十五日关于在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1]，望各中央局分局指令所属机关派在上海工作

---

[1] 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3月25日关于三反五反工作中严格执行各项纪律的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本市各机关团体，如欲逮捕三反中有关人犯，必须经市委批准，交市公安局与区委联系后依法执行。中央及华东各地在沪各单位，则须经华东局批准后，与市委接洽办理；华东以外各大行政区所属各单位，除经当地最高机关之批准外，并须来市委接洽办理。（二）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如因三反而须传讯本市有关人员，须经市委批准，再与区委联系后，由公安分局以传票传至公安分局讯问，对被传之人，未经补办扣留手续，不得扣留过夜。（三）关于三反中退赃、追赃问题，华东局已有指示，其中所示退赃、追赃方式是完全正确的。但上海目前正处在五反时期，不宜由各单位径自进行追赃，无论本市外埠任何机关团体，凡须在本市追赃时，必须携带材料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联系与接洽，由其斟酌情形，分别先后，予以查明核实，再将结果复告有关单位，至于被追出之赃款、赃物，则由该处统一交存人民银行，对收赃、存赃等有关三反人员之调查讯问，亦应即日停止。本市五反全面展开后，追赃问题即能解决，各机关团体负责追赃之人员，并可参加本市五反检查组织，配合进行。（四）凡因三反追赃而须将私人资财加以冻结、扣押，或对私人产业加以查封、没收时，一律必须经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后，由军管会军法处或市人民法院依法执行。

的人员注意执行。同时全国各城市在三反五反中均应照上海的办法规定严格纪律，切实制止混乱现象。

中央

三月二十九日

关于要新华社选送五反材料的批语

（1952年3月30日）

尚昆[1]同志：

请询新华社是否已将五反材料中的精彩部〔分〕发给各大中城市参考。例如这一期的前三条消息[2]就都是可以发的。

毛泽东

三月卅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新华社编的《内部参考》第70号（1952年3月29日）刊载的3条消息，即：《上海五反第一战役即将结束》《天津几个大工业资本家已被保护过关》《天津召开市协商委员会安定资本家的心》。

对李达《〈实践论〉解说》的修改[1]

（1952年3月）

一、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

二、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满清政府，当然就带有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而认为……

三、“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像，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像。”

---

[1] 这是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的三点修改。本文第一部分是在《解说》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本文第二部分是在《解说》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本文第三部分是对《解说》说“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一句的修改。

对西藏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1]

（1952年4月1日）

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在中央转发全总党组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1]

（1952年4月1日）

在资本家同意下，可以实际上参加管理，而不要有管理的名义，在名义上仍是监督而不是管理。

---

[1] 毛泽东的这段话加括号写在中央批语稿的以下一段文字之后："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中央已有指示，现在只提监督生产和经营，不提参加管理。"

为转发一封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来信的批语

（1952年4月3日）

这是上海劳动局一个同志关于工人监督生产问题的意见[1]。请尚昆同志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总党组、中财委及其所属各部门党组，并从陆地寄送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参考材料。

毛泽东

四月三日

---

[1] 指上海市劳动局干部蒋立1952年3月25日送请毛泽东审阅的关于私营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的建议。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一）对私人资本主义仅靠国家政权机构和国营经济机构自上而下的监督非常不够，必须同时依靠发动私营企业中工人群众对资本家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将两方面的监督密切结合才能奏效。（二）现已发布的几个有关法令文件，对工人监督生产经营的权力，均无明确规定，因而工人群众的监督显得软弱无力。这是资产阶级得以盗窃国家资财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严格建立私营企业中工会及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刻不容缓。（三）只要把工人监督权明确规定在共同纲领范围之内，不会发生对资本家限制得太死太大的弊端。今天私营企业中工会和工人的政治觉悟已有一定的基础，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业务已有一定的熟悉，只要赋予明确的权力，建立较完善的制度，加上健全的领导，工会和工人是能够胜任的。（四）关于建立私营企业工人监督生产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提出了9条意见，包括工人监督生产的性质、职权范围、组织系统、纪律和奖惩等内容。

中央转发上海市五反第一期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4日）

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上海市委四月二日关于五反的十条经验[1]很好。这是五反以来最完备的一次经验总结，望一切正在推行五反或准备推行五反的城市党组织，注意研究，一体遵行。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四月四日

---

[1] 上海市五反第一战役从3月21日开始，至3月31日结束，对74家重点户进行了检查。所取得十条经验是：（一）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的仗。（二）五反必须结合生产。（三）明确交代政策，破除各种顾虑。（四）从诉苦运动着手，充分发动群众，引向五反斗争。（五）争取高级职员是取得五反胜利的重要关键。（六）对资本家充分利用矛盾，多方实行分化。（七）充分运用党在资本家中间的影响和力量。（八）在政治上打掉资本家的“威风”，要他们全面交代违法事实，务求详尽确实，务求说清违法事实来龙去脉，数字务求详尽准确。（九）充分发动群众与严密控制相结合，这是保证运动正确发展与彻底胜利达到“反而不乱”的关键。（十）巩固胜利，妥善收兵，做到有始有终。

中央转发中宣部关于《学习》杂志所犯错误的检讨的批语和对检讨的修改[1]

（1952年4月4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

（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2]，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央宣传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

---

[1] 本篇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在中央转发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学习》杂志（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编辑的刊物）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中加写的话。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52年3月29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检讨报告说，《学习》杂志在1952年第一、第二、第三期发表了一系列的带有严重错误性质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是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而认为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从而达到了根本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仍有其一定的积极性的结论，这样就公开地违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在中央宣传部的刊物上连续地发表违反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文章，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个严重的教训。

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四月四日

二

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1]，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写的《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一文，原载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学习》杂志1952年第四期转载时，题目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

中央关于广州市五反工作的指示

（1952年4月5日）

罗瑞卿[1]同志，华南分局，并告中南局：

瑞卿同志四月三日关于广州五反的报告[2]收到，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上海五反的十条经验已发你们谅已收到，请加研究仿行，特别注意五反中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广州五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罗瑞卿1952年4月3日关于广州五反概况和预定部署给毛泽东、中央并报中南局的报告中提出，根据广州工商业的情况，把主要的打击对象即第四、第五两类工商户控制在总户数的4%左右，是适当的，也是有利的。理由是广州的商人特别是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大商户，许多都是一只脚在港澳，一只脚在广州，有些是人和主要资金都在港澳，而他们所经营的事业，目前多数还不能完全代替，如打得太重，他们索性就不回来了。因此对这种人应该有意识地放宽尺度打得轻一点，使他们感到继续下去还有利可图，这样就可能争取一部分回来继续营业。关于五反的部署，报告说，五反重点试点工作，有4个行业已近于结束，下一步准备召开一次4万人的斗争大会，一方面动员大规模地展开五反，另一方面宣布4个行业的五反结果。大会以后，即着手铺开80个行业的五反，4月底基本解决问题（主要是前三类工商户的问题，后两类户只求解决一部分），5月间将剩下的100多个行业的五反全部铺开。预定从现在起以两个月时间结束广州五反。报告还谈到，对于群众发动以后更加注意争取高级职员和利用矛盾分化资本家的工作，以及不因五反耽误生产等问题，正根据中央指示进行研究和布置。

反必须注意给香港澳门的中国工商户以好的影响，你们注意了这一点是完全对的。广州五反中我们掌握的真实材料甚少，是很大的缺点，必须在斗争过程中从争取高级职员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点上上海的经验也是很有用的。上海还有一条经验是先搞大户以利经济，此条在你处是否适用请加研究。又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这就需要严格控制和训练工作队，以十天为一期，先作充分准备，限期完成任务。

中央
四月五日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1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2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伊

排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期部署的报告的批语……………1

（1952年4月5日）

对中央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3

（1952年4月5日）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5

（1952年4月6日）

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9

（1952年4月8日）

中央对华北局一份情况通报的批语 ………………………………11

（1952年4月8日）

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期经验报告的批语 …………12

（1952年4月8日）

对徐子荣关于公安人员贩运盗卖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4

（1952年4月8日）

关于转载《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文给邓拓的信…15

（1952年4月8日）

对湖南宁乡农民检举周震鳞问题来信的批语 ……………………17

（1952年4月8日）

对曹彦昆献赠《清明上河图》画卷的批语 ………………………19

（1952年4月8日）

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在近期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的指示 ………20
（1952年4月9日）
对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21
（1952年4月9日）
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 ………………………22
（1952年4月11日）
西藏工委处理非法“人民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 …………………24
（1952年4月11日）
目前只作政治斗争 ……………………………………………………26
（1952年4月12日）
对当前西藏工作的几点指示 …………………………………………27
（1952年4月13日）
争取达赖和噶厦同意将两司曹撤职 …………………………………29
（1952年4月15日）
对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和在中央复电稿中加写的话 …31
（1952年4月15日、16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的批语 …33
（1952年4月15日）
处理非法“人民会议”要又坚决又慎重 ……………………………34
（1952年4月16日）
关于揭露两司曹的罪恶和将其撤职的问题 …………………………36
（1952年4月16日）
祝贺贝鲁特六十寿辰的电报 …………………………………………38
（1952年4月16日）
在总参关于赴朝参观团的补充规定稿上加写的话 …………………39
（1952年4月16日）

坚持解散非法“人民会议”和将两司曹撤职 ……41
（1952年4月17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 ……43
（1952年4月16日、17日）
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关于党内外干部普遍交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报告的批语 ……48
（1952年4月17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中发动工人把关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50
（1952年4月18日）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批语 ……51
（1952年4月18日）
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 ……53
（1952年4月21日）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复李克农电 ……54
（1952年4月22日）
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 ……56
（1952年4月22日）
中央同意西藏工委关于藏政官员人选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电报 …58
（1952年4月22日）
五反宣传不要用军事术语 ……59
（1952年4月23日）
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 ……60
（1952年4月）

对施复亮的报告的批语 ……64
（1952年5月5日）
中央对中南局关于防止追赃时发生错误的指示的批语 ……66
（1952年5月8日）
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67
（1952年5月9日）
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69
（1952年5月9日）
中央对华北局关于正确结束三反运动的指示的批语 ……72
（1952年5月9日）
中央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报告的批语 ……73
（1952年5月10日）
对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74
（1952年5月14日）
对志愿军火炮筹补方案的批语 ……75
（1952年5月14日）
给陈嘉庚的信 ……76
（1952年5月16日）
关于成立后方勤务学院的命令 ……79
（1952年5月16日）
对叶恭绰等要求保全袁崇焕祠墓的信的批语和复信 ……81
（1952年5月16日、25日）
处理同藏族有关的工作均须事前报告中央 ……83
（1952年5月19日）
中央关于印发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84
（1952年5月20日）

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致达赖、班禅电 ………85
（1952年5月23日）
对美蒋妄图骚扰华南沿海的情报的批语 ……………………………86
（1952年5月24日）
对中办秘书室关于群众来信反映失业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87
（1952年5月31日）
为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员工题词 ………………………………………88
（1952年5月）
为北京育英学校题词 …………………………………………………90
（1952年5月）
对马光斗所作搞好劳资关系报告的反映的批语 ……………………92
（1952年6月2日）
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 ………………93
（1952年6月6日）
在《统战部长会议中所反映的问题简报》第一号上的批语…………94
（1952年6月8日）
中央关于谭震林等任职和军队整编问题复陈毅电 …………………95
（1952年6月9日）
接受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97
（1952年6月9日）
接受芬兰驻华公使克诺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98
（1952年6月9日）
给黄炎培的信 …………………………………………………………99
（1952年6月10日）
给易礼容的信…………………………………………………………100
（1952年6月10日）

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101
（1952年6月10日）
对聂荣臻关于中南军区南迁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03
（1952年6月11日）
中央转发出版总署关于发动交代关系和思想检查的总结报告的批语…104
（1952年6月11日）
对空军司令部五月份战果报告的批语…………………………106
（1952年6月11日）
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107
（1952年6月14日）
关于来京开会问题致赛福鼎电…………………………………108
（1952年6月19日）
为了解苏共关于中央机构设置的经验致斯大林电……………109
（1952年6月20日）
关于美国邀请印尼等五国视察美军巨济岛战俘营问题的批语……111
（1952年6月21日）
中央转发朱德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112
（1952年6月23日）
给毛泽连的信……………………………………………………114
（1952年6月23日）
对原国民党军官费帖要求就业问题的来信的批语………………116
（1952年6月25日）
中央转发安子文关于中央机关三反处理阶段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117
（1952年6月30日）
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119
（1952年6月）

对新疆农业区土改和牧区工作两个决议稿的批语……………………121
（1952年7月2日）
关于解决军队干部子女入学入托问题的批语…………………………123
（1952年7月7日）
给张有成的信………………………………………………………………124
（1952年7月7日）
对彭德怀关于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报告的批语………………………125
（1952年7月8日）
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126
（1952年7月10日）
给毛宇居的信………………………………………………………………129
（1952年7月11日）
给邹普勋的信………………………………………………………………130
（1952年7月11日）
同意志愿军兵员补充、部队轮换和整编结合进行的方案…………132
（1952年7月11日）
对达赖喇嘛来信的批语和复信……………………………………………133
（1952年7月11日、8月18日）
对全军后勤组织和整编问题的批语………………………………………135
（1952年7月12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的批语……137
（1952年7月14日）
对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的批语………………………………………………138
（1952年7月18日）
中央同意习仲勋关于新疆情况的分析和工作方针报告的电报……139
（1952年7月20日）

关于检查财政机关及后勤部门对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情况的批语…140
（1952年7月21日）
对吴晗再次要求入党的来信的批语……………………………………141
（1952年7月22日）
在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142
（1952年7月27日）
朝鲜战争结束前不要进行对大陈岛的作战……………………………143
（1952年7月27日）
对总后关于赴朝调查野战救护等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44
（1952年7月30日）
关于“八一”发贺电问题给徐冰的信…………………………………145
（1952年7月30日）
对关于向军委主席报告工作情况问题的批语…………………………146
（1952年8月2日）
对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147
（1952年8月3日）
同意海军后勤建立垂直系统的意见……………………………………148
（1952年8月3日）
对刘少奇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报告的批语………………………149
（1952年8月4日）
对八九两月全国卫生运动具体要求的指示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151
（1952年8月4日）
在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指示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152
（1952年8月4日）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53
（1952年8月4日）
关于军费减少问题……156
（1952年8月6日）
应基本谢绝黑水地区群众对军队的慰劳品……160
（1952年8月11日）
祝贺朝鲜解放七周年的电报……161
（1952年8月13日）
对烟潍铁路修建方案的批语……162
（1952年8月14日）
给陈毅的信……163
（1952年8月15日）
关于同意向东南亚国家出售大米的批语……165
（1952年8月16日）
对肖向荣摘报的总后情况简报第一号的批语……166
（1952年8月17日）
对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草案的批语……167
（1952年8月18日）
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168
（1952年8月18日）
给毛宇居的信……170
（1952年8月21日）
对增修两个机场报告的批语……172
（1952年8月22日）
关于向朝鲜赠送冬服的批语……173
（1952年8月23日）

对总政关于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的报告的批语……………………174
（1952年8月24日）
对聂荣臻关于中南军区部队二期整编工作报告的批语……………176
（1952年8月24日）
在总政关于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177
（1952年8月25日）
关于同意苏联提出的旅顺口换文和移交中长路公告的电报………181
（1952年8月30日）
给赛福鼎和帕哈太克里乡农民的信………………………………182
（1952年8月30日）
对军事学院关于遗失文件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84
（1952年9月1日）
为《四川日报》题写报头……………………………………………185
（1952年9月1日）
对赵尔陆关于二机部初建情况报告的批语…………………………186
（1952年9月2日）
对柯托夫关于空军飞行事故问题报告的批语………………………187
（1952年9月2日）
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致斯大林电………………………………188
（1952年9月2日）
对全军整编情况和在朝作战部队轮换计划的批语…………………189
（1952年9月2日）
对黄炎培一篇讲话稿的复信、批语和修改…………………………191
（1952年9月5日、13日）
关于同意中、苏、蒙对修中蒙铁路的意见的电报…………………198
（1952年9月6日）

对习仲勋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批语…………199
（1952年9月9日）
对军马疫病防治问题报告的批语………………………………………200
（1952年9月9日）
对空军消灭飞行事故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01
（1952年9月9日）
关于提倡做提要的批语…………………………………………………202
（1952年9月10日）
关于解决华北各地职工疾病问题的批语……………………………203
（1952年9月11日）
中央同意中财委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的方案的批语……204
（1952年9月13日）
关于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等致周恩来电…………………205
（1952年9月13日）
给章汉夫的信……………………………………………………………207
（1952年9月14日）
关于不能接受墨西哥对战俘问题的三点建议的电报………………208
（1952年9月16日）
在中央转发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的电报稿上
加写的话…………………………………………………………………209
（1952年9月16日）
关于朝鲜前线阵地播音问题的批语……………………………………210
（1952年9月17日）
对水利部关于汉江黄家场决口后情况报告的批语…………………211
（1952年9月17日）

给李达的信……212
（1952年9月17日）
给李贡人的信……214
（1952年9月17日）
为爱晚亭题名……215
（1952年9月）
关于较重要外交复文的送审问题的批语……217
（1952年9月17日、18日）
对轻工业部七八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批语……219
（1952年9月18日）
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本分卷问题致周恩来电……220
（1952年9月19日）
关于实行小仓库制问题的批语……221
（1952年9月20日）
致阜新发电厂工程队职工电……222
（1952年9月21日）
关于发表周恩来离莫斯科时在机场的谈话给章汉夫等的信……223
（1952年9月21日）
关于由东北帮助朝鲜收容孤儿和办工业大学复高岗等电……224
（1952年9月23日）
关于高岗早日来中央工作的电报……225
（1952年9月23日）
对章汉夫检讨的批语……226
（1952年9月24日）
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227
（1952年9月25日）

对王观澜关于开凿胶莱运河建议的批语……228
（1952年9月25日）
对《社会情报辑要》第三十一号的批语……229
（1952年9月25日）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呈递国书时的答词……230
（1952年9月26日）
中央转发安子文关于整党建党工作报告的批语……232
（1952年9月28日）
给黄炎培的信……233
（1952年9月29日）
为天兰路全线通车题词……235
（1952年9月）
在国庆宴会上的讲话……237
（1952年9月30日）
谢觉哉摘要转报的中央湖北灾情视察组报告的批语……241
（1952年10月2日）
给毛宇居的信……242
（1952年10月2日）
给谭熙春的信……243
（1952年10月2日）
祝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的电报……244
（1952年10月2日）
关于胡志明去莫斯科和致苏共十九大贺电致刘少奇电……246
（1952年10月4日）
给齐白石的信……247
（1952年10月5日）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电报……………………249
（1952年10月5日）
对罗瑞卿关于一起杀人案的判处意见的批语……………………250
（1952年10月6日）
对聂荣臻关于志愿军第二步反击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报告的批语…251
（1952年10月7日）
为《后勤通讯》题名……………………252
（1952年10月7日）
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的谈话要点……………………253
（1952年10月8日）
给宋庆龄的信……………………255
（1952年10月10日）
给毛爱桂的信……………………257
（1952年10月10日）
对铁道部队建设报告的批语……………………258
（1952年10月12日）
关于国民党军队给其在大陆残余力量空投装备问题的批语………259
（1952年10月13日）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260
（1952年10月13日）
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265
（1952年10月15日）
对海军党委综合报告的批语……………………267
（1952年10月16日）
对总后关于追加一九五二年国防建设费预算的报告的批语………268
（1952年10月18日）

关于中央同意刘少奇、王稼祥在苏休养的电报……………………269
（1952年10月19日）
对民主同盟工作的意见…………………………………………………270
（1952年10月19日）
给罗元鲲的信……………………………………………………………271
（1952年10月22日）
对军委办公厅关于贯彻反官僚主义问题报告的批语……………………272
（1952年10月23日）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273
（1952年10月24日）
中央转发中纪委报告的批语………………………………………………276
（1952年10月24日）
对颁发八一奖章荣誉奖章条例报告的批语………………………………278
（1952年10月24日）
视察黄河时的谈话…………………………………………………………286
（1952年10月29日）
为袁仲谦题写碑文…………………………………………………………291
（1952年10月）
为《团结报》题写报头……………………………………………………293
（1952年10月）
祝贺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致斯大林电……………………………………294
（1952年11月3日）
对改善志愿军部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情况报告的批语………………295
（1952年11月10日）
对杨成武关于苏联顾问可否参加部队党委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和对军委复电稿的修改…………………………………………………296
（1952年11月7日、11日）

关于罗瑞卿传达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给各同志的信…………298
（1952年11月13日）
美帝国主义要打下去就只有失败……………………………………299
（1952年11月15日）
对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301
（1952年11月16日）
为全国各级军校毕业证书题词…………………………………………303
（1952年11月16日）
中央关于印发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批语………………………………305
（1952年11月26日）
对贺诚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的批语…………………307
（1952年11月26日）
在中央对全总党组报告的批语稿中加写的话…………………………308
（1952年11月26日）
对成立军委兵役法研究委员会报告的批语……………………………309
（1952年11月27日）
在中央转发的中财委党组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给邮电部的指示中
加写的话…………………………………………………………………310
（1952年11月）
各地应设立捕歼空降特务的武装据点…………………………………311
（1952年12月2日）
对《一九五三年兵工生产会议备忘录》的批语 ………………………313
（1952年12月2日）
对聂荣臻关于今冬动员新兵三十五万人的计划的批语………………314
（1952年12月2日）

对华东局关于上海国棉二厂团结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经验通报的批语……………………………………………315
（1952年12月2日）
在外交部一份外交工作汇报上的批语……………………………318
（1952年12月3日）
接受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19
（1952年12月3日）
致班禅额尔德尼电…………………………………………………320
（1952年12月4日）
部队每年应进行点验一次至二次…………………………………321
（1952年12月6日）
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轮换到朝鲜战场锻炼的批语……………322
（1952年12月6日、19日）
为第二届爱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324
（1952年12月8日）
关于志愿军必须火急准备粉碎敌人登陆计划的电报……………326
（1952年12月9日）
对中宣部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的情况报告的批语…………………………………………327
（1952年12月10日）
在邓华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上的批语………328
（1952年12月）
对肖华关于朝鲜要求提供为加强瓦解敌伪军工作所需的印刷宣传器材等的报告的批语……………………………………330
（1952年12月10日）

对陈伯达等关于筹备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31
（1952年12月10日）
对中宣部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
具体事宜的请示报告的批语……………………………………332
（1952年12月10日）
对有关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等问题的批语…………………333
（1952年12月11日、27日）
中央关于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致刘少奇电………………335
（1952年12月12日）
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336
（1952年12月12日）
对肖克关于军训部与苏联顾问合作问题的总结报告的批语………337
（1952年12月14日）
给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全体职工的信…………………………338
（1952年12月14日）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39
（1952年12月15日）
对海军党委反官僚主义布置的批语……………………………341
（1952年12月16日）
中央转发安子文两个报告的批语和毛泽东给安子文的信…………342
（1952年12月19日）
对薄一波关于乡镇摊派名目繁多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45
（1952年12月19日）
对统战部关于查询苏南破坏寺庙情况的电报的批语……………346
（1952年12月19日）
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347
（1952年12月20日）

对东北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文件的批语……………………………350
（1952年12月21日）
给易南屏的信…………………………………………………………352
（1952年12月21日）
对中央转发三年来侨汇、华侨投资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354
（1952年12月22日）
对薄一波关于修建福建铁路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56
（1952年12月23日）
对高岗报送的在苏共十九大文件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的批语……358
（1952年12月25日）
同意反登陆作战准备等项军事部署…………………………………359
（1952年12月27日）
中央和军委关于加强防敌进攻福建沿海的指示……………………361
（1952年12月28日）
关于采用会议简报办法的批语………………………………………363
（1952年12月28日）
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364
（1952年12月28日）
关于解决志愿军坑道部队日用品供给问题的批语…………………365
（1952年12月28日、1953年1月30日）
对总干部部关于检查与苏联顾问关系的报告的批语………………367
（1952年12月28日）
对西藏工委关于成立农牧部未报中央的检讨的批语………………368
（1952年12月29日）
对权五稷祝贺毛泽东生日电报的批语………………………………369
（1952年12月29日）

接受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郭佐文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70

（1952年12月29日）

中央转发妇联党组关于当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71

（1952年12月30日）

感谢苏联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移交中国致斯大林电…373

（1952年12月31日）

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374

（1952年12月）

为《广州日报》题写报头……………………376

（1952年12月）

为蔡协民烈士遗像题字……………………378

（1952年12月）

为《人民装甲兵》题名……………………379

（1952年12月）

为《中国工运》题名……………………380

（1952年）

为罗元鲲旧居题字……………………382

（1952年）

转发肖向荣关于各军事部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的总结的批语……387

（1953年1月1日）

关于确定康藏公路线路问题的批语……………………389

（1953年1月1日）

在罗瑞卿关于敌人破坏我企业生产的综合报告上的批语…………391

（1953年1月2日）

对曾山、姚依林关于商业问题的来信的批语……………………392
（1953年1月4日）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396
（1953年1月5日）
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399
（1953年1月7日）
给黄炎培的信…………………………………………………………400
（1953年1月8日）
对安子文关于原察哈尔省农村整党工作的报告的批语………401
（1953年1月9日）
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的批语……………………………403
（1953年1月13日）
关于抗议敌方屠杀战俘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电报…………………406
（1953年1月13日）
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407
（1953年1月13日）
关于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讲话……………413
（1953年1月14日）
军委对中南军区关于海防检查及今后建设意见的报告的批语……414
（1953年1月14日）
对总政关于一九五二年敌军工作报告的批语……………………415
（1953年1月14日）
对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的批语…………416
（1953年1月15日）
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418
（1953年1月15日）

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的意见……………………………………419
（1953年1月16日）
对军委关于秘密文件的保密工作细则的批语……………………420
（1953年1月21日）
对李克农等关于俘虏管理工作请示的批语………………………421
（1953年1月21日）
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422
（1953年1月26日）
关于对印度遣俘提案的态度问题的批语…………………………427
（1953年1月28日）
关于编印公安局长违法乱纪事例的小册子的批语………………428
（1953年1月30日）
给后勤学院的训词……………………………………………430
（1953年1月31日）
为《八一杂志》题名…………………………………………431
（1953年1月）
关于转发《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一稿给新
华社的信……………………………………………………432
（1953年2月2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扩军工作的报告的批语…………………433
（1953年2月2日）
在军队干部评级工作总结和实施军衔制度报告上的批语…………434
（1953年2月2日、11日、14日）
关于加强上海防空工作的批语…………………………………436
（1953年2月4日、9日）

对安子文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438
（1953年2月6日、7日）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440
（1953年2月7日）
关于讨论一九五三年国家概算表等问题的批语…………………451
（1953年2月8日）
对空军配合志愿军反敌登陆作战报告的批语……………………452
（1953年2月8日）
中央转发安子文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报告的批语……………453
（1953年2月9日）
对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455
（1953年2月9日、13日）
关于揭露对方破坏协议、击伤我方代表团工作人员等问题的电报…458
（1953年2月11日）
军委转发陈毅关于华东军区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电报的批语…460
（1953年2月13日）
关于检查改进政府部门工作问题的批语……………………………461
（1953年2月13日）
中央转发罗瑞卿关于在公安系统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
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的批语……………………………………462
（1953年2月14日）
中央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正式决议的通知…………………464
（1953年2月15日）
对薄一波关于私营轮船公司合营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65
（1953年2月15日）

我在此次旅行中所收集的意见……………………………466
（1953年2月15日至26日）
为人民海军题词……………………………………………472
（1953年2月21日）
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488
（1953年2月23日）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494
（1953年2月28日）
关于移载台湾大道通讯社两条消息的批语………………495
（1953年2月28日）
对陈云病况报告的批语……………………………………496
（1953年2月28日）
为《抗美援朝专刊》题名…………………………………497
（1953年2月）
关于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请邓小平多管一些的批语………498
（1953年3月3日）
中央转发习仲勋关于文委分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的批语…500
（1953年3月3日）
在日侨回国工作简报上的批语……………………………502
（1953年3月3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的批语……………503
（1953年3月4日）

中央转发薄一波[1]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期部署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5日）

薄一波同志，上海市委，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

（一）同意薄一波同志三月三十一日的报告[2]，并将这个报告发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3月31日关于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和五反第二战役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大资本家大工商户约有12000户，其户数占总户数的7.4%，但职工人数则占70%，其在经济上的比重则又远超过其人数的比重。关于五反第二战役，决定实行普遍发动群众和重点检查相结合，具体部署是：（一）争取解决2000个重点户，其中1500户是普通重点户，另500户是390个上层资本家的工商业。对普通重点户，用两种方法解决，对拒不坦白或坦白不彻底的准备检查500户到800户，用政府压力和资本家相互劝说、检举的方法解决其余部分。对390个上层资本家所有的500户，一面在工厂商店中发动工人店员检举，一面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一般保护过关，少数予以严办。（二）用市委的一半力量去解决中小户问题。以区街或行业为单位进行，要求搞清3万户。对6万多户家庭商业和独立手工业户，采取一般号召，用登记、节约检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方式解决一部分。（三）继续做到一面五反，一面维持生产。决定在4月份内继续投放货币，进行收购，加工订货，并适当开放银行贷款，以维持生产。（四）充分运用第一战役的经验。

给各处参考。（二）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过去有些同志重视中小，轻视大的。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组织问题上亦认为重点宜放在中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小应予组织起来，在五反中应将其问题迅速弄清，早日组成五反统一战线，以壮声势，孤立五毒[1]深重的大投机商人，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大资产阶级除掉少数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以外，我们必须用大力向他们的企业中进行工作，加强工会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五反中照天津和上海的办法按其情况有分别地适当地对待各类大资本家。此点务请各大中城市加以注意。

中央

四月五日

---

[1] 五毒，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5种违法行为。

对中央关于干部交代同资产阶级关系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2年4月5日）

一

刘、周、朱、陈[2]阅。

不用我前起草的那件，改用此件[3]。

---

[1] 本篇第二、第三部分是毛泽东加写的；第四部分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中共中央1952年4月5日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给各中央局、分局，转省、市、区党委，并各大军区、志愿军的指示。指示说，各机关、部队在三反中基本上完成打虎任务以后，除允许不交代者外，应结合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工作，号召工作人员进行一次普遍交代自己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借以划清思想界限，提高干部认识，并达到对所属工作人员进一步了解的目的。

二

干部中有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有关系者，亦须在此次交代清楚。

三

对于在政府中工作的某些民主人士及军队中某些起义人员应令其交代者，必须先由各单位党委或党组开出名单，经过讨论决定，并经上级批准，方能令其交代。

四

大多数无问题或问题不大者，只用填表或写材料的方法交代，不用开会的方法交代。对一部分问题复杂严重者，可用开小型会议的方法交代。对最严重者务必集中力量审查清楚。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1]

（1952年4月6日）

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

---

[1]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

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看来不但是两司伦[1]，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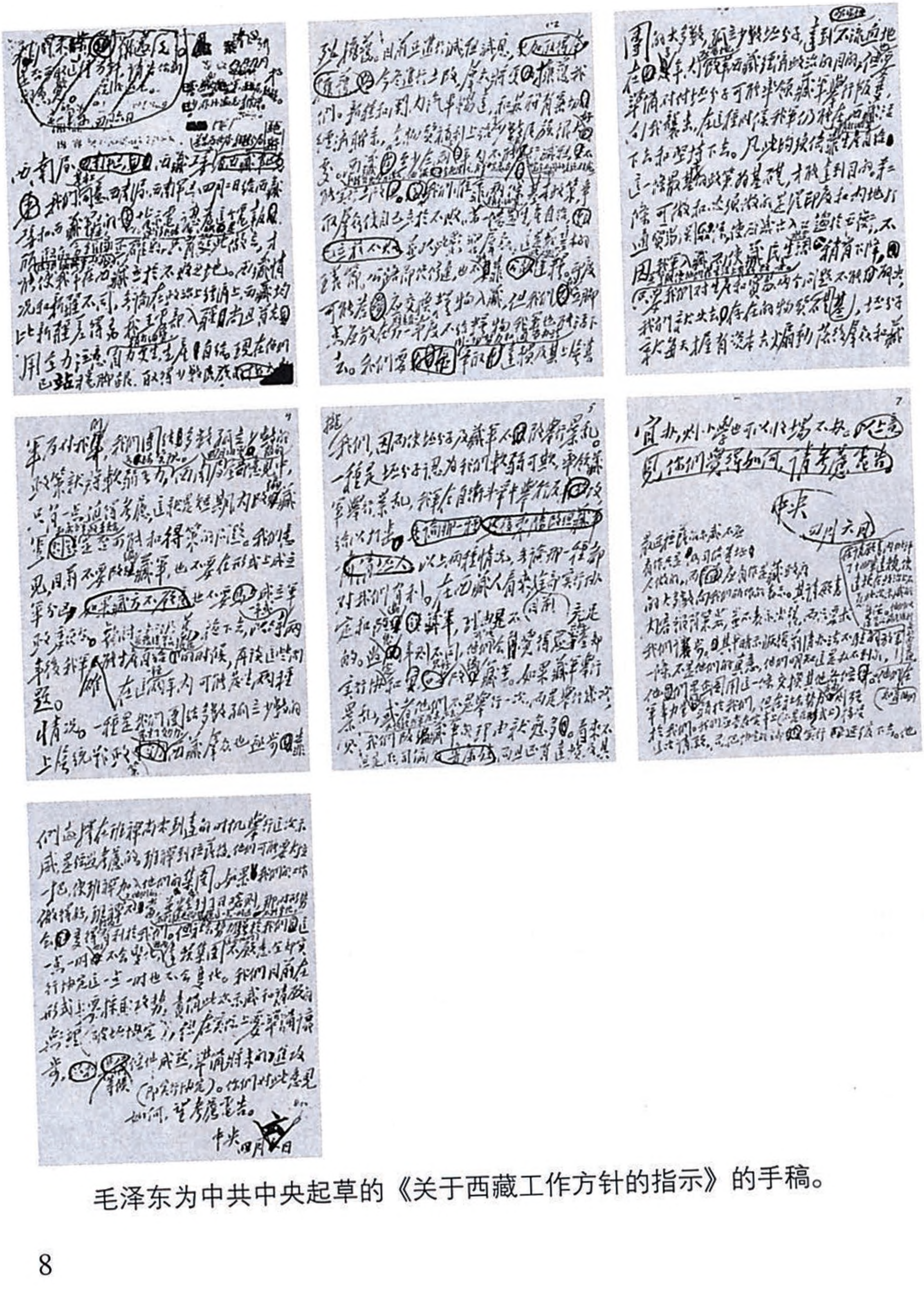
[1] 司伦，又称司曹，是达赖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职。当时的两司伦是反动农奴主鲁康娃和洛桑扎西。

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

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的手稿。

有关西藏的重要问题由中央处理[1]

（1952年4月8日）

西南局、西藏工委：

四月七日十一时西南局来电[2]收到。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3]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

中央

四月八日下午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指示。

[2]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2年4月7日11时关于拉萨骚乱事件的处置请中央直接给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发指示的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尔后，我们的意见，则拟只报中央，不直接答复西藏工委”。

[3]　拉萨骚乱事件，指1952年3、4月发生在拉萨的“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人民会议”是一个由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和操纵于1951年11月下旬组织起来的非法组织。他们在司伦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等的支持下，起草“请愿书”，反对改编藏军，提出人民解放军“迅速撤出”西藏，破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并组织反动武装“解放大队”。1952年3月11日，他们组织武装包围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驻地，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提出“请愿”。4月1日，开枪袭击曾任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的住宅。4月17日，两司伦私自将驻防日喀则的藏军炮兵代本调入拉萨，以策应骚动。原驻拉萨的藏军占据拉萨周围的制高点，“解放大队”暗藏武器进行活动，流氓喇嘛滋事寻衅。他们还密令各宗（县）截断人民解放军粮食运输，以待机攻击驻藏人民解放军。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对达赖喇嘛采取支持和爱护的态度，对所谓“人民会议”的非法活动的幕后策划者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予以彻底揭露，对于受蒙蔽参加所谓“人民会议”的一般成员不予以追究，争取、团结、教育西藏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官员。4月27日，达赖喇嘛撤销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代理司伦职务。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和西藏地方政府分别发布告，宣布“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中央对华北局一份情况通报的批语

（1952年4月8日）

一

此件[1]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四月八日

二

工商联委员的成分，在大城市应以大资本家为主，这和中小城市是不同的。因为中小城市大资本家很少，中小资本家很多，故大资本家所占委员数目不能太多，但亦应尽可能吸收一批大的参加。——中央注[2]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4月5日关于华北区十二个省属市工商联和同业公会改造问题给各省、市委并报中央的情况通报。

[2] 这段话加括号写在上述情况通报中关于改造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以下一段话之后："应在运动中本着能充分代表各行业及大、中、小户利益的组织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造工作，在改选时应特别注意到吸收五反中比较好的大资本家参加。"

中央转发薄一波[1]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期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8日）

薄一波同志，华东局，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薄一波同志四月六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报告[2]是正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指薄一波1952年4月6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策略及经验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五反第二战役从4月1日开始，6天以来，乘先行突破74个重点户的威力，进展极为顺利，有急转直下之势。鉴于面对面斗争的火力太强，斗争后太伤感情，对今后继续团结资本家不利，因而规定第二战役的策略是："检查少数，俘虏多数，严阵以待，不战而胜。"第二战役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普遍运用了不战而胜的策略。其办法是：首先将资本家情况材料搞清楚，并把检查队掌握在手，陈兵不动，而分一部分力量到各厂店依靠工会进行诉苦控诉，充分发动群众并争取高级职员，准备好随时都可以投入战斗的一切条件。另外则分行业分区召开老板会议，交代政策，实行分组评议，互评互挤。然后选择适当时机，表扬坦白较好的工商户，免予检查；对态度极不老实不肯交代的才派检查队进入厂店检查。这样先礼后兵，效果很大。第二战役要解决的2000个重点户，将有1700百户或者更多一些用不着检查即可以解决问题。报告还说，第二战役的另一个特征，是放手使用已经彻底坦白而又愿意立功的违法资本家。由他们包打全市或本区同业，由于他们是内行，能找到要害，作用甚大。

确的，发给各地仿行，请各城市在五反中都注意这些新策略。

中央
四月八日

对徐子荣[1]关于公安人员贩运盗卖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8日）

富春同志阅后，送徐子荣同志：

前次富春同志提议组织处理毒品问题专案机关及其他问题专案机关，请即提出名单，并找徐子荣同志一商。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2]是好的。

毛泽东
四月八日

---

[1] 徐子荣，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副部长。

[2] 指徐子荣1952年4月8日关于公安人员贩运、制售毒品、盗卖没收毒品及包庇毒贩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三反运动以来，揭发出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很多严重的贩毒犯罪行为。这些恶劣现象不仅给党和人民政府以及人民公安机关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而且会更加助长社会上毒焰的疯狂泛滥。为此，必须于三反运动末期，配合铁路、交通、海关等部门大张旗鼓地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清毒运动。公安人员不论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都是严重的犯法行为，必须一律严肃对待，大体上依照惩治贪污分子的办法，根据其犯罪程度、情节，分别予以惩处，不予宽恕。一般应放在处理贪污分子问题之后集中处理这批犯罪分子，以便造成痛恶贩毒的可耻行为的风气，根绝这种恶劣现象。

关于转载《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文给邓拓[1]的信

（1952年4月8日）

人民日报邓拓同志：

本日光明日报登载的《三千多种商品牌价为什么能够降低?》一稿可在人民日报转载[2]，并请告新华社予以广播。

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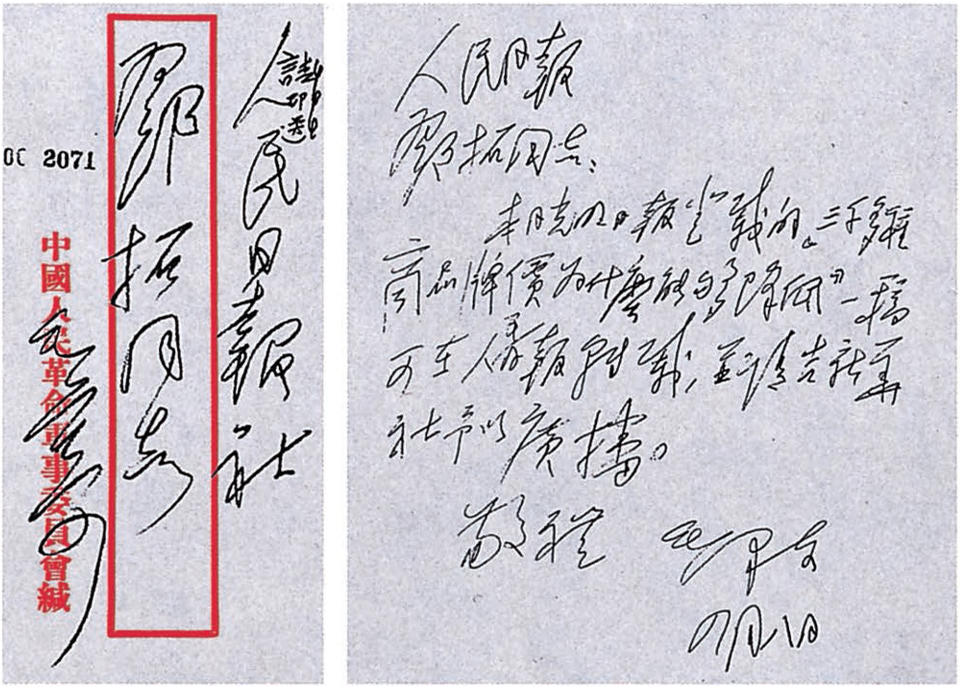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八日

---

[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 《人民日报》1952年4月15日转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降低商品牌价的重大意义》。



人民日報社　請即送

鄧拓同志

毛澤東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0C 2071

人民日報

鄧拓同志：

本日光明日報上載的“三千多種商品降價為什麼能夠降價”一稿可在人民報轉載，並請告新華社予以廣播。

敬禮

毛澤東

八月十日

毛泽东致邓拓信的手稿。

对湖南宁乡农民
检举周震鳞[1]问题来信的批语

（1952年4月8日）

一

周总理阅后转李维汉[2]同志阅存。此事[3]不应当依照农民的意见处理。

毛泽东

四月八日

---

[1] 周震鳞，湖南宁乡人，1903年与黄兴组织华兴会，曾任同盟会湘支部长，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护法斗争，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49年随程潜在湖南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南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湖南省宁乡县二区竹山乡全体农民1952年3月13日给毛泽东写信，检举周震鳞解放前剥削压迫人民，贪污民财，解放后私藏枪支，将押金抵田强迫佃户受田，疏散财物，抵抗减租退押，要求将其女儿从北京押回斗争，要他退还押金等。

二

这些坏事是可能的，但周是老同盟会员，一向不附蒋，现是政协委员，应予以保护。

毛泽东
四月八日

对曹彦昆[1]献赠《清明上河图》画卷的批语

（1952年4月8日）

复曹彦昆一信致谢。将曹信交齐燕铭[2]同志一阅。画件请齐燕铭同志考虑是否可以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适当处理，以免虫蚀和霉坏。

毛泽东
四月八日

---

[1] 曹彦昆，当时在四川荣县任职。

[2]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在近期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的指示

（1952年4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

西北局定于四月下旬开西北局委员全体会议。各中央局分局如果在最近期间未开会议者，最好在四月下旬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因为在五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可能召开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及某些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中央

四月九日

对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9日）

贺、傅[1]二同志阅后，送彭真[2]同志周总理酌办。

我认为拨五百亿元办理本件[3]所讲的卫生工程，并建一隔离病院是必要的，是否可行，请周召集一次会议予以决定。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贺，指贺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傅，指傅连暲，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副部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3] 指贺诚、傅连暲1952年4月7日关于北京市防疫工作会议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北京市、中央和军委直属单位的防疫情况及会议决定的几个问题，并提出了以下几个请示解决的问题：一、建议北京市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对防疫工作再作一次动员。二、为改善环境卫生，拟将全市污水沟的12处明沟改为暗沟，修整陶然亭污水苇池为游览湖池，施工预算为500亿元，望中央批准拨专款解决。三、为防止急性传染病蔓延，建议北京市建一所拥有200个床位的隔离病院。

对反动分子的斗争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

（1952年4月11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本日复你们四月八日请示一电刚发[1]，接到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的电报[2]，甚为高兴。你们的方针和步骤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和步骤，望即坚决而镇定地付诸实行。

中央

四月十一日

---

[1] 中共中央对西藏工委4月8日电的复电，因情况变化，后来没有发出。

[2]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4月10日21时关于对付拉萨反动分子的计划给中央并西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处理拉萨骚乱事件的具体部署是：（一）决心以政治斗争形式出现，公开向达赖提出撤销两司曹职，坚持实现我们4月1日所提四点。如此做法估计可能发生以下三种情况：第一，达赖和噶厦可能顺利同意撤职。第二，两司曹可能孤注一掷，发动军事反抗，则予以坚决军事回击，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争取获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胜利。

第三，两司曹可能躲藏在布达拉宫，操纵达赖，拖延时间，向我讨价还价，或阴谋继续组织力量，进行反抗。如此则抓住噶厦，请求达赖迅速下令解决，撤职查办。（二）具体工作：1. 11日召集三大寺堪布会议，以拉萨市治安混乱理由，坚决要他们停止4月14日起“小召”仪式，改为各寺自行举行，我们则分别到各寺放布施，并适当进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则通知噶厦备案。2. 13日由张经武用中央代表名义，将要求撤职的决定，用书面送给达赖，要求于14日午前宣布命令并出布告。3. 召集噶厦会议，说明中央政策和态度，并分头争取僧俗贵族及西藏和谈代表。同日召集贵族军官会议，讲明政策。4. 军事部署12日前准备完毕。

西藏工委处理非法“人民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

（1952年4月11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在收到并已答复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的电报以后，接到你们四月七日关于张经武[1]同志参加噶厦[2]会议经过情形的电报。据此完全可以看出，不但达赖[3]等中间派，而且两司曹[4]这样的反动派，都不敢承认此次叛乱及所谓“人民会议”是合法的。因此你们四月十日二十一时电所取方针，撤掉两司曹，解散“人民会议”，追究主谋分子、（即你们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亦即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5]等人），是完全必要和完全适当的。经武在噶厦会议上指出“人民会议”为非法的三条理由（举行叛乱，破坏团结，反对达赖），并指出除主持此次叛乱事件的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及国民党特务分子以

---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2] 噶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3]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4] 司曹即代理司伦。司伦是达赖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职。两司曹，指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

[5]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当时任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

外，一律不予追究，以安定多数人，都很正确。惟所谓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应即是指鲁康娃、洛桑扎西、索康等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亦即过去达扎[1]反动派的重要分子，其人数可依事情逐步弄明去作决定，不要自缚手足。为了完成军事准备及利于持久，你们要加紧储粮集弹，筑工事，此外油盐及柴火也要储集，至要至要。

中央
四月十一日

---

[1] 达扎，即达扎·阿旺松饶，曾为西藏摄政，是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的核心人物。1951年，达赖喇嘛亲政后，其摄政职务即行停止。

目前只作政治斗争

（1952年4月12日）

西藏工委，并报西南局：

四月十一日电[1]悉。

中央四月六日电[2]所说妥协政策目前不要提，需待目前的政治斗争得到确定胜利后看情形再决定。目前你们只作政治斗争，对改编藏军、成立军分区、成立军政委员会等事根本不要谈。否则可能被反动派认为我示弱。

中央

四月十二日下午三时

---

[1]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4月11日关于张经武、谭冠三与噶厦及两司曹会谈情况给中央并西南局的报告。

[2] 即《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对当前西藏工作的几点指示

（1952年4月13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一）四月十二日二十三时电所告中央代表给达赖的通知[1]收到。这个通知是基本正确的。如已送出，即照那样。如未送出则请你们略加修改，即在叙述两司曹罪恶事实的三条中，第二条说两司曹反对成立军分区、反对改编藏军及说解放军把藏军打得头破血流等语应删去，而改为“不执行协议[2]规定。他们对协议中几项重要规定例如改编军队等都持反对态度，他们完全不了解全部协议条文都是对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前途和幸福有利的。他们也不是对协议中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是根本反对实行协议”。这样写法较能争取多数，也埋伏一笔我们可能在某些条文的实行步骤和方法上接受合理的意见。

（二）在张经武同志和达赖见面时，在你们和阿沛[3]及其他人员

---

[1] 指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给达赖喇嘛的通知。通知列举了两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一贯破坏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具体事实，提出了撤职查办两司曹等要求。

[2]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3]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

谈话时，暂时均不要说妥协政策的话。目前只举行政治斗争，准备军事反击，将来是否要提妥协政策及何时提出、如何提出，均待看清楚此次政治斗争的结果之后再由你们报告中央作具体决定。但目前也不要强调军队马上要改编、军政委员会和军分区马上要成立。如果他们问什么是“实行步骤和方法的建设性意见”，你们可告以请大家想一想，凡是有利于汉藏团结和妥善执行协议的意见都是建设性的意见，如果有这类意见，我们愿意听取，也愿意磋商；但不要轻易表示自己的具体意见，以免陷入被动。

（三）看样子，拉萨的藏军恐非逐步加以改革不可。其他地区的藏军可以慢点改革。并且要一部分一部分地做，不要同时一起做。改革的步骤，是在阿沛等爱国派当政后，逐步撤换一些最反动的军官，而将其余的军官分批调出受训，逐步使藏军中有靠拢我们的军官，用这种办法逐步达到改编藏军的目的。

中央

四月十三日

争取达赖[1]和噶厦[2]同意将两司曹[3]撤职

（1952年4月15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四月十四日十二时的电报[4]收到。

（一）你们还没有将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送交达赖，先由经武[5]向达赖和噶厦作口头通知，详细说明对两司曹撤职查办的理由和我们的意图，是很适当的。

（二）达赖既然尚在犹豫，还没有下令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同时噶厦又将为此事召开会议，则我们应当等候噶厦会议的结果，然后再定是否将通知书交给达赖。如果他们决定采取辞职的方式使两司曹下台，则要求撤职的通知书就不要送出，为着撤两司曹的会衔布告也用不着了。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 噶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3] 两司曹，指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

[4] 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4月14日12时关于张经武13日下午与达赖面谈等情况给中央并西南局的报告。

[5] 经武，即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三）充分使噶伦[1]及其他文武官员及三大寺[2]喇嘛明了两司曹的罪大恶极，军事叛乱行为及非法“人民会议”的不能容许，并经过噶伦去影响达赖，使他造成撤掉两司曹的决心（如果两司曹不辞职，就应撤掉他们），是很必要的，这就需要有几天甚至更多的时间。横直我们已集中了军队，不管反动派用文的和武的方法和我们作斗争，我们都能战胜他们。因此通知和布告这两个文件暂时都不拿出去。如果将来要出布告，最好让达赖一人出面。可由噶伦拟稿，我们加以修改，然后说服达赖取得同意，然后发出，较为自然，而不使达赖及藏府中各中间派分子感到是一种屈辱。这点很重要，请加注意。

中央

四月十五日上午四时

---

[1] 噶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中司伦之下的行政官职。

[2] 三大寺，即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是西藏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主要寺庙。

对薄一波[1]关于上海五反报告的批语和在中央复电稿中加写的话

（1952年4月15日、16日）

一

请恩来同志拟电答复，并转发各地参考。电中似有错字。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早

二

此外，工人监督生产一事极为重要，而各地反映甚少，似未认真研究。望立即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为要。[2]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受中央委派在上海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这段话加写在中央1952年4月16日给薄一波、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复电稿的最后。

三

必须在此次五反后实行工人店员监督大中厂店的生产和经营，此事一定要实行，并不能延缓。望各大中城市党委迅速研究具体办法，电告中央为要。——中央注[1]

---

[1] 这一段文字加括号写在薄一波1952年4月13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基本总结及第三战役部署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经研究，在工厂企业设备较好、技术较进步、生产量大、工人多、并保证不挪用原物料定金和加工费的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实行加工订货；但必须有工会作保证，这就自然提出工人监督生产的问题。拟沿用劳资协商会议形式，或采用新创的加工订货保证委员会的形式来实行监督。总之，要工人代表、高级职员和资本家共同签字，共同负责。”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的批语

（1952年4月15日）

上海市委四月十二日的报告[1]很好，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仿行。

中央

四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4月12日关于争取违法资本家立功赎罪的经验给华东局并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五反第一战役中，74个重点户在检查队认真检查、职工检举、家属规劝之后，终于低头认罪。但由于怕受到严厉处分，惶惶不安，无心生产，其所属厂店的部分工人、店员也多怕失业。为迅速扩大五反统一战线，给第二战役造成有利条件，我们于4月3日召集这些违法资本家开会，宣布他们的五毒罪行是严重的，虽是经过检查斗争才交代，亦作为自动坦白，从宽处理，只退补不加罚，免于刑事处分。如能积极检举，协助检查其他不法工商户，立功赎罪，退补还可酌减。今后应保证不再重犯五毒，并规规矩矩服从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积极从事生产。听到政府宣布可以从宽处理，违法资本家如获大赦，争先恐后登台揭发自己的五毒罪行，一致感谢政府宽大处理，表示愿意立功赎罪。这次会议，使他们转变了以前紧张和恐惧不安的心境，稳定了生产情绪，以具体事例说明了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会后我们迅即将他们分配到全市各业去立功检举和劝导坦白，以活的榜样来启发其他工商户，效果良好。

处理非法“人民会议”要又坚决又慎重

（1952年4月16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一）四月十五日十七时的电报[1]收到。你们处理所谓“人民会议”的方针、步骤和办法，我们认为是适当的。

（二）在处理“人民会议”的过程中，必会发生许多新情况，请你们在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时随时向我们作报告，其中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然后执行。你们已经有了确定的总方针，在采取具体步骤时就须要又坚决、又慎重，才能准确地打中敌人的要害，争取广

---

[1]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4月15日17时给中央并西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根据西藏的情况，决定对所谓“人民会议”的处理采取“扶持爱国主义者进步势力，争取团结中间势力（包括稳定动摇分子），完全孤立反动分子的方针，在这次政治斗争中，只坚决打击两反动司曹，把他们打下政治舞台。对其他分裂主义的头子，如索康等，暂采取麻痹态度。”对所谓“人民代表”“则采取宽大的方法，彻底清算其亲帝分裂主义，举行武装叛乱，反对和平协议，反对汉藏团结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并要趁机向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履行登记手续，写悔过书，悔过自新，免予惩办。公开出面代表及个别重要头子，如卸职机巧堪布等，则交政府看管，或是分别处理，随传随到，以便追寻帝特线索和反动组织的内幕，做为一件重要反动案件来处理。对被迫受骗参加的人员，一律宣布不予追究。”

大的群众。因此，宁可花费一些时间和中央交换意见以后再去动手为有利。

中央

四月十六日上午六时

关于揭露两司曹[1]的罪恶和将其撤职的问题

（1952年4月16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四月十五日二十四时的电报[2]收到。（一）十五日布达拉会议决定取缔“人民会议”[3]，并由达赖[4]出布告。如果能实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达赖出布告以前，应向“人民代表”的多数及文武

---

[1] 两司曹，指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

[2]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4月15日24时关于西藏全体高级官员会议的情况给中央并西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今日，全体高级官员在布达拉举行紧急会议。噶厦官员首先见两司曹，将14日噶厦会议的两项结论性的意见向他们提出：“汉藏是要团结的，协议是要执行的；‘人民会议’是非法的是要解散的。”“噶厦商定，用达赖的名义出布告，取缔‘人民会议’。”报告中还说，“全体官员一致通过，明上午，全体官员到我们住地来讲情”，要求不要撤两司曹的职，“人民会议”可以解散。

[3] “人民会议”，是一个由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和操纵于1951年11月下旬组织起来的非法组织。他们在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等的支持下，起草“请愿书”，反对改编藏军，提出人民解放军“迅速撤出”西藏，破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并组织反动武装“解放大队”。

[4]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僧俗官员经过噶厦[1]及你们先行揭露两司曹及帝特分子的反动罪恶，使布告一出，能得多数人拥护，而不感到突然。布告由达赖一人出名，经武[2]不要联名。（二）在噶厦官员们到你处为两司曹说情请求不取撤职办法而由两人自动辞职的时候，同意你们的意见“耐心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说服他们一致同意，要达赖下命令撤职”。这是因为中央代表的书面通知刚才送去，不好马上改口的原故；也是因为撤职较辞职打击为重，对于惩治反动、影响群众更为有力的原故。但是请你们注意达赖及噶厦多数的态度，如果他们再三再四地请求以辞职方法使两司曹下台，而觉得撤职办法他们接受不了的话，你们应当准备同意采取辞职的处置。因为他们已在“人民会议”问题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向我们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我们如果一定要取撤职办法，则可能引起达赖及中间派不满，显得我们整得太过分了。此事请你们和阿沛、计晋美、平措旺杰[3]三人详商，究以何种方法为妥，并告我们为盼。

中央

四月十六日上午八时

---

[1] 噶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2] 经武，即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3]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当时是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平措旺杰，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昌都分工委副书记、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祝贺贝鲁特六十寿辰的电报

（1952年4月16日）

波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同志：

值您六十寿辰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我个人的热烈祝贺。波兰人民在您的领导下已从纳粹匪徒洗劫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日益繁荣、自由、幸福的国家。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侵略者的可耻失败，并显示了和平、民主阵营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祝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争取世界和平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并祝您健康、长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北京

在总参关于赴朝参观团的补充规定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4月16日）

一

军长师长凡无重病者都要去参观，不许不去。[1]

二

四月廿五日左右启行，五月初到达朝鲜参观实战，不许推迟。[2]

---

[1] 这句话加写在军委总参谋部1952年4月16日关于赴朝参观团的补充规定稿第一条的后面，第一条原文是：“（一）入朝参观人员仅限于野战军和特种兵的军长、师长（不含地方军区），目前部队工作则由各副职干部及政治干部主持之。”

[2] 这句话加写在补充规定稿第五条的后面，第五条原文是：“（五）各大军区参观团名单，务请于四月廿日前电告。”

三

（六）入藏十八军不在参观之列。[1]

---

[1] 这是为补充规定稿增写的第六条。

坚持解散非法“人民会议”[1]和将两司曹[2]撤职

（1952年4月17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四月十六日二十四时的电报[3]收到。说情的人们没有说两司曹辞职的话，说的还是挽留两司曹的话，只说解散“人民会议”，意在以解散“人民会议”交换两司曹不辞。因此，你们在几天内还不要松口，仍然坚持一要解散“人民会议”，二要将两司曹撤职。等到达赖[4]的布告已经发表，“人民会议”已经解散，然后再看说情的人们是否提出以辞职换撤职。如果他们不提辞职，则你们仍坚持撤职。

---

[1] “人民会议”，一个由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支持和操纵于1951年11月下旬组织起来的非法组织。

[2] 两司曹，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

[3]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4月16日24时关于藏政官员向我求情的情况给中央并西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今日下午藏政官员“共二十人到我处，替两司曹讲情”，“几次要求免予撤销两司曹职务”。“我们则加以耐心说服，进一步揭露两司曹的罪恶，这是政治路线的斗争，不是个人恩怨的斗争。特强调从拥护达赖执政、西藏人民利益、汉藏团结和保证执行协议等立场出发，请他们同意中央方面提出的意见，要达赖下令撤职。”

[4]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如果他们提出辞职，则你们就可以看势转弯同意辞职。西藏贵族们是善于干政治斗争的，你们也要学会这一套。也许他们要将交换条件（即两司曹留任或辞职）讲妥才出布告，你们应主张解散和撤职同时做，也可以先解散后撤职。如果他们一定要以留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应采坚决不同意态度。如果他们以辞职和解散相交换，则你们可以和他们妥协，同意辞职办法。望相机处理。

中央

四月十七日十二时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2年4月16日、17日）

一

恩来同志阅后，送彭真[2]同志：

此件[3]少奇同志修改了一些，我又作了较多的修改，觉得可以用。如你们同意这些修改，请于付印时将清样校正清楚。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上午五时

---

[1] 毛泽东对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作过不止一次的修改。本篇第三部分是毛泽东对说明稿关于制定惩治贪污条例的根据部分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2] 彭真，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

[3] 指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

二

周总理，彭真同志：

再作了一些修改，觉得较好些，请再阅。如可用，即可付印分发。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三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经过多次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作了修改，已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一三〇次政务会议通过。现在我把制定这个条例的根据和这个条例本身作如下的报告，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批准。

这个条例，是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八条严惩贪污的规定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所揭露的事实和所蓄积的经验而制定的。

“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和工人阶级领导下，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最近这一时期，全国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制止贪污分子的违法乱纪，制止来自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捍卫和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得到了伟大的胜利。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完全违法乱纪的大贪污犯和

工商界中一部分完全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是拥护共同纲领的广大群众对于违反共同纲领的不法行为的斗争；是广大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对于一部分堕落腐化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劣作风的斗争；是按照共同纲领和国家法令进行合法的私人工商业经营道路对于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违法经营道路的斗争。简单讲，除了对大贪污犯和大盗窃犯的斗争以外，这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两种作风和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家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三大运动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

在这次运动中，人们把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简称为“三害”；把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简称为“五毒”。五毒是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目前向国家和人民举行猖狂进攻的主要形式，而三害在目前则主要是由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猖狂进攻所引起的结果。

当然，三害也还有其他的历史来源，就是说它还是旧社会一切剥削者和反动统治者遗留下来的污毒，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则是目前承袭并且支持这些污毒的主要的社会阶级基础。

由于我们三年来忙于镇压和消灭美蒋匪帮的残余势力，忙于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忙于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对于这些污毒还没有来得及加以系统的扫除，而资产阶级中的盗窃分子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则恰是利用了我们这一个空隙，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放肆地发展了他们的犯法行为。

但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中的一切人都在毫无差别地犯了法。在过去这一时期，就各大城市的情况来看，小资产阶级（这里指的是一般不雇工人店员的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和资产阶级的总数中，守法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但有轻微违法行为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约占百分之五左右，他们是带有很大投机性的或完全投机的资本家；而其投机性最猖狂最恶劣的，约占工商户总数百分之一左右，数目还不算很大。这最后一部分人就是所谓大盗窃分子，已经不是我们的朋友，而是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予以法律制裁。上述比例数中，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占工商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中的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也有不少资产阶级分子，并且有一些大工商业者。

在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之下，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侵蚀之下，就产生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许多贪污分子。其中最严重最恶劣的大贪污分子也是少数。这些大贪污分子也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而是盗窃国家和人民财富的罪犯，因此，除坦白悔改并有立功表现者外，必须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并予以法律制裁。

当“三反”和“五反”运动尚未开始的时候，在国家工作人员中所存在的贪污现象和工商界中所存在的盗窃现象是很严重的。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有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有毛主席所教导的久经锻炼的坚强的领导骨干，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所以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一声号令之后，“三反”和“五反”运动就立即在全国展开，广大劳动人民，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积极工作干部迅速团结在一起，响应国家的号召，最后还有洗了手的工作人员

和工商业者也和我们团结起来，组成了“三反”和“五反”的伟大的统一战线，这样就使国家机关中的大贪污分子和社会上的大盗窃分子完全陷于孤立，受到严厉的打击和制裁；不法资产阶级分子与国家人民背道而驰的倾向，得到了有效的制止和纠正。同时，资产阶级自身，因为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监督，有自己内部守法的、进步的、积极的部分，对于违法的、落后的、消极的部分所开展的斗争，因而得到了一次普遍的教育。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财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想也获得改造了，或者正在改造中。

现在为了对贪污分子和盗窃分子分别予以惩治，为了巩固“三反”和“五反”运动已得的胜利，并继续和一切贪污与盗窃行为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制定一个法律就是完全必要的了，这就是今天要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中央转发轻工业部关于党内外干部普遍交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17日）

中央直属总党委，三个分党委[1]，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并转地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师党委；地方转政府党组和各人民团体党组：

（一）兹将中央轻工业部党组四月二日关于在该部党内外干部中发动普遍交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轻工业部的这种交代和检查暴露了许多严重问题，其经验很值得重视，请你们一律仿行。（二）必须把发动党内外干部除某些民主人士外，普遍交代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当作三反运动的一个阶段来做。要由首长负责，注意动员工作，说清楚普遍交待在三反运动中的重大意义，使党内外一切应当交代问题的干部解除各种顾虑，愿意认真交代。轻工业部“在普查方式上普遍填表，逐个由本人报告，小组讨论通过”，“在次序上先易后难，使没有问题或

---

[1] 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党委和军委直属机关党委。

问题较少的先通过，问题较严重复杂的放在后面，着重审查重点的人和事”，这些办法很好，请你们照做。此外应注意事项，均照四月五日中央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1]办理。（三）请你们督促所属各部门在较短期内完成此项审查交代工作。中央原规定每一单位用七天至十天完成任务，有些单位如觉时间不够，可略为延长。（四）地委以上各级党委均应为此事写一专题报告，总结经验，按级送中央审查。在此事进行中请你们选择典型经验随时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四月十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2年4月5日关于干部交代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的指示。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中发动工人把关的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2年4月18日）

此件[1]很好，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仿行。

中央

四月十八日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4月17日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中发动工人把关的经验给中央并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在处理违法工商户时，普遍发动工人、店员、职员把关，查出了多数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隐瞒的违法事实。主要经验有：一、把关之初，先简单扼要地向工人、店员、职员明白交代政策，讲清楚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资本家蒙混过关的手段等。二、注意分别对待。对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坦白得差不多了即“放关”。对半守法半违法户，特别是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则须充分发动工人、店员，争取团结上层职员，彻底查清五毒。对于应予保护的资本家，应在工人方面、资本家学习小组方面分别做好准备工作后，再保护过关。三、在斗争形式上，对于问题严重复杂而又不须保护的较大的工商户，可以户为单位把关，对于工人、店员不多的中小户，可把若干户联合编组，由工人、店员联合把关。四、对于工人群众提出的有关缩短工时、改善待遇等要求，可以先把问题提出，待五反大体结束后再通盘处理，以便先集中力量清除五毒。五、对群众觉悟较差、力量较弱的厂店，应派干部和积极分子去领导把关。

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的批语

（1952年4月18日）

此件[1]很好，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仿行。

中央

四月十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4月15日关于上海五反第二战役经验给所属并报中央的通报。通报说，上海五反运动仅以40天时间即可能解决占工商户总数60%的工商户（其职工占职工总数80%）的问题，其中值得各地注意的经验是：（一）抓住两头，解决多数。首先抓住了12000个重点户与大户，不仅其职工占职工总数的70%，而且在生产、税收上都占了极大比重，故在经济上政治上有其极大的意义。同时又抓住了违法轻微的家庭商业户、独立手工业户。这样就能在短期内解决上海工商户的60%。（二）“兵临城下，不战而胜”“俘虏多数，检查少数”“进军劝降”“大胆运用俘虏”，这是迅速解决问题的重要关键。（三）在方法上，以资本家相互间面对面斗争的互助互查小组会，结合职工的控诉、检举以及与资方进行背对背斗争的大会，这样既发动群众揭发了资本家，又不致造成劳资间的严重对立与仇视。在资方已彻底坦白低头之后，再向工人检讨，过职工关，这样并未减低职工的作用，而对五反后继续生产则有很大的好处。（四）及时宣布宽大处理被检查的严重违法与完全违法的74户工商户，宣布对他们不罚、不予刑事处分，起了极大的政策示范作用。

（五）严格控制五反运动的各方面，使运动反而不乱。控制了新闻报道，使五反运动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外松内紧的形势，这对于稳定市面，安定人心，起着极大作用。控制了因三反定案而牵连的五反问题，使运动的步骤阵容整齐不乱，又未降低三反定案的要求，只是时间上按照五反步骤来进行。

对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反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2年4月21日）

彭真[1]同志：

送来关于学校思想检讨的文件都看了。看来除了张东荪[2]那样个别的人及严重的敌特分子以外，像周炳琳[3]那样的人还是帮助他们过关为宜，时间可以放宽些。北京大学最近对周炳琳的作法[4]很好，望推广至各校，这是有关争取许多反动的或中间派的教授们的必要的作法。

毛泽东

四月廿一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2] 张东荪，原为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抗美援朝时，因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被免去政府委员职务，但从宽处理，不逮捕法办，并照发工资。随后民盟中央决定开除他的盟籍。

[3] 周炳琳，当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4] 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4月20日报送毛泽东并中央的北京高等学校三反简报中说，为了帮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炳琳更好地解除对思想改造的顾虑和端正对三反的态度，北大党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派人同他谈话。在张奚若、马寅初同周谈话和周的女儿（共产党员）做工作后，周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进一步作思想检讨。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复李克农电[1]

（1952年4月22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彭[2]：

四月廿二日二时半来电[3]、两组简报[4]和附件[5]均悉。同意在廿二日两组会议上的方针，继续采取强硬态度。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和迫使敌方让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还应准备在谈判中和敌人拖几个月。关于停止行政会议，将谈判公开，可就对方完全脱离了我方三月廿一日的折衷调整方案，并利用行政会议的机密性质来进行欺骗和蒙蔽两点理由，准备于廿三日提出停止行政会议，恢复公开谈判。望就恢复公开谈判的宣传准备工作进行布置，并于今日下午电告我们。至如何提出停止行政会议的具体决定，今晚当告知你们。

毛泽东

四月廿二日七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李克农1952年4月22日2时半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请示在当日召开的朝鲜停战谈判三、四两组参谋会议上应取的方针。电报说：（一）根据目前谈判的形势，继续召开三、四组联合参谋会议恐难解决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对方的压力，迫使对方作较大的让步，势非取消这个行政性会议的形式不可。自行政性会议开会以来，对方并未作过任何让步，却利用这一秘密形式蒙蔽其国内群众，欺骗其同盟国。取消行政性会议并不妨害我们将来的行动自由，而对方过去几次的态度转变都是在公开的压力下明转的。如决定取消行政性会议，谈判走向公开，就应该比较快地这样做。（二）对第三组参谋会议拟更坚决地强调我方对中立国提名问题的立场，反对对方限制修建机场的无理要求。（三）对第四组参谋会议则继续驳斥对方4月1日的调整原则及其7万战俘概数，更加强调其对战俘全部自愿遣返的原则为我方所不能接受。

[4] 指李克农1952年4月21日14时和17时30分先后报送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关于朝鲜停战谈判当日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的简报和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的简报。

[5] 指李克农1952年4月21日在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参谋会议上的发言和第四项议程参谋会议上的发言。

中央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1]

（1952年4月22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和地委及其财经委员会和财政机关；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师及其后勤机关：

（一）全国解放之后，由于财政开支的某些标准不能适合于现状，由于中央财政机关在用钱方面应当用的有时卡得太紧，由于地方财政制度尚未全部建立，由于乡、镇收支尚未统筹调整，因此使地方财政发生了若干困难。这是使地方财政机关和后勤机关发生违犯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的一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各级财政领导机关和后勤机关方面，也有自己的原因，不能完全推之于上面没有完备正确的制度。自三反以来各地深入检查的结果，在各地方财政系统中和军队后勤系统中发现了许多严重违犯财政制度与财政纪律的事情。例如：化大公为小公，扣留应该上解的结余，虚开预算，打埋伏，随意增派公粮，乡村的摊派现象更是十分严重。这些现象不但造成财政上紊乱，贪污浪费，而且严重地脱离了群

---

[1] 本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众。这些情况应当在此次三反运动结束的时期做一次综合性的检讨，这对于总结经验、整顿财政纪律和建立完备的财政制度将有很大的帮助。

（二）三月间江西省委财委曾作了书面检讨，他们说，实际征粮数目比他们曾用电话报告的数目多了五亿斤。这个检讨报告曾经转发各地方财委参考。此外中南财委也做了一次检讨，也已发各大区。现又接到广东省财政厅的检讨报告一件，特再转发你们参考。

（三）中央责成各大区、省（区）、市和专署的各级财委（共三级），军队的师和军分区以上的各级后勤部门，均仿照中南区、江西省和广东省所作检讨报告的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检讨。此种检讨应是全面的，真实的，没有隐瞒的。在检讨之后，就使自己立于主动地位，理直气壮地好向下级说话。否则就会留下包袱，总有一天要重新进行检讨，那就将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并要受到指责和处分。

（四）上述检讨报告，限于五月底以前按级交到中央财委和军委总后勤部，不得违误。

中央

四月二十二日

中央同意西藏工委关于藏政官员人选等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电报

（1952年4月22日）

西藏工委，并告西南局：

四月廿二日二时电报[1]收到。我们认为你们对三个问题的处理和答复是妥当的。

中央

四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时

---

[1]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4月22日关于藏政官员会议情况给中央并西南局的电报。电报说，藏政官员会议决定将于23日向西藏工委提出3个问题。我们拟作如下口头答复：一、中央与地方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为保证彻底执行协议，中央方面提出：藏政官员应是爱国主义分子，有能力，有威信，忠实于达赖和西藏人民；人选应与中央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由达赖任命。二、中央进藏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如果违反协议，保证藏族官民完全有权向中央控告，并有向中央提出任何有关建设性意见的权利。三、对于藏政官员违反政策纪律或地方政府制度的事情，当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辨明是非，合理地处理。不能抽象地讲“中央一定要支持地方的意见”，而要看问题处理得是否恰当。

五反宣传不要用军事术语

（1952年4月23日）

以后五反中不用军事术语，如第一战役第二战役等，中宣部已发通知。[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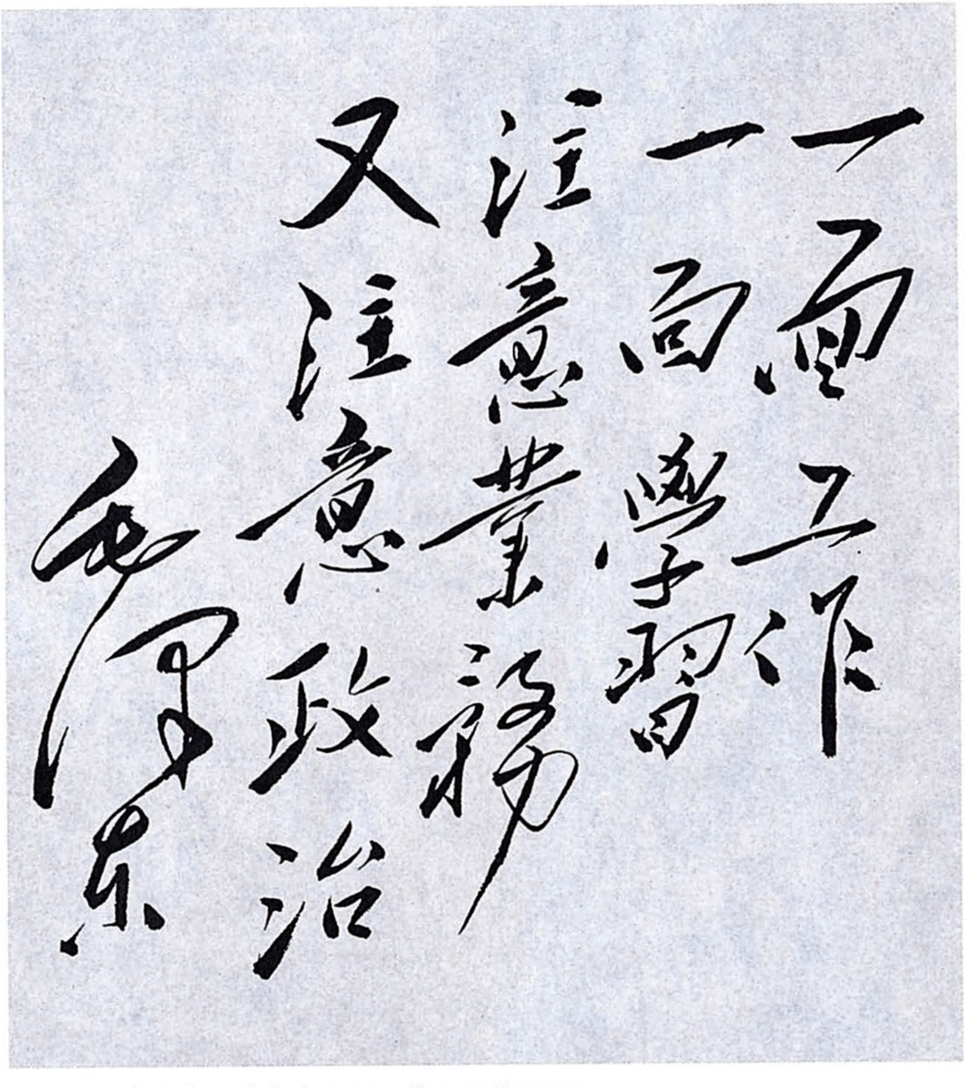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的这句话，加括号写在中央给上海市委关于五反第三期部署等问题的复电稿的末尾。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4月17日发出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宣传部的通知中说：在关于五反斗争的公开消息中，用许多军事术语是不妥当的，并且暴露我们的策略。今后在关于五反斗争的公开消息、文章、广播中，务望注意不要用军事术语。

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

（1952年4月）

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注意业务，又注意政治。

毛泽东



一面工作
一面學習
注意業務
又注意政治
毛澤東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题词。

1952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的群众队伍举手答礼。

1951年5月1日，毛泽东和少年儿童在天安门城楼上。

对施复亮[1]的报告[2]的批语

（1952年5月5日）

一

刘周[3]阅后，送彭真[4]同志处理。

这是施复亮给劳动部的报告，由李立三[5]送来的。其中所述的问题应予迅速妥善解决，请彭真同志注意，并请彭告黄敬[6]注意，在五月份内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

五月五日

---

[1] 施复亮，当时任民主建国会常务委员。

[2] 指施复亮1952年4月22日写的《五反后北京工商界的情况和问题的简报》。简报反映的问题是：一、经营管理权问题。二、工人监督问题。三、工资问题。四、房产所有权问题。五、补税问题。六、劳动纪律问题。七、小企业的劳资关系问题。八、资金问题。九、分红与利润问题。十、职工福利问题。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4]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5] 李立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

[6] 黄敬，当时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市长。

二

退李立三同志。

施复亮文件已阅，已告彭真同志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这些是普遍的问题，中央已指示各地注意妥善解决。施复亮另有关于他对民建会性质任务的新的提纲一件也收到了，尚未研究，便时请告施。

毛泽东

五月五日

中央对中南局关于防止追赃时发生错误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5月8日）

此件[1]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

中央

五月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5月4日关于防止追赃时发生错误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指示。指示说，许昌专区向农民干部出身的贪污分子实行追赃时，直接派人到农村强迫家属拆房卖地偿还赃款，影响极坏，有损无益，绝不可再做这种错误事情。今后在定案追赃工作中必须按以下规定执行：（一）要先定案后追赃，绝不能盲目要钱而不问案情之真假大小。赃款可以证明贪污，但有钱不一定就是赃证。（二）不准直接派人到贪污分子家庭特别是劳动人民家属那里去逼赃。案情确实者，令本人自取；在远地者，通知当地政府协助调查，并说服自送；家属坚决不承认者，即应重新审查案情，不再追赃，待取得确切证据后，诉之于当地法院，实行法律判处。家属成份系工农，承认得赃但无力偿还者，可以减免，不许拆房子、拉耕牛、拿农具。（三）贪污分子供称赃款存投于商店而又无证件、五反中商人又坚不承认者，同样应采取慎重怀疑态度，不应草率肯定，硬追硬逼，引起不良后果。这样做的结果，老虎数字要大降一批，对此不必害怕。该降的让它降下来，这就是实事求是。死守原数，一个不准降低，坚持逼供信错误，对党危害更大。

中央转发罗瑞卿[1]关于华南军区纠正三反定案中右倾思想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5月9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

罗瑞卿同志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华南军区纠正在三反定案斗争中许多干部的右倾思想的报告[2]，很值得注意。各处如有同类偏向，必须立即纠正。必须将一切真正的贪污犯，贪污嫌疑分子和弄错了的人按照中央历次指示和政府法令认真地如实地加以判处和审查清楚，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对赃款凡能追出者必须一律坚决追出，惟不得累及无辜家属，不得派人到农村追赃款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受中央委派在中南区帮助三反五反工作。

[2] 罗瑞卿1952年4月25日给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华南军区党委4月21日报告：军队对于追赃定案工作认识不足，抓得不紧，以致大批老虎翻供，右倾偏向普遍增长，三反胜利成果将有被断送的危险。在实际定案工作中，领导心中无数，一任贪污分子“自供”，甚至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对待定案工作。贪污分子乘机翻案，有赃不退。产生右倾偏向的原因，是对退赃定案工作关系三反的全部胜利认识不足，并对中央文件精神作片面宽大的理解，产生姑息怜悯贪污分子的心情。目前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是和平定案，诱虎翻供，不认真甄别，草率结论，以及对追赃无信心、不积极等。对这些问题华南军区正采取相应的补救办法。

(除个别确有大赃存在农村社会舆论认为应追者外)，不得硬追那些本来追不出的部分。所有这些，均请各级军区党委和各级地方党委注意掌握，务使三反斗争完全胜利结束，不受虎头蛇尾的右倾思想所影响。罗瑞卿同志报告中所定二条纪律[1]，全党必须一律实行，保证三反胜利。

中央

五月九日

---

[1] 罗瑞卿报告中说的两条纪律，一是“凡不按照原则办事，‘放虎归山’者，经查出后以包庇纵容贪污分子论，应受到纪律处分”；二是“领导不力，对第三阶段的处理工作马虎草率因而造成损失者，亦应论处”。

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1952年5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及其他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

（一）谭震林同志五月五日报告[1]一件，杭州市委五月六日报告[2]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1952年5月5日关于华东地区五反后所引起的新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反五反的收获很大，但其副作用也必须注意补救。由三反五反引起的新情况，可概括为“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十六个字。农产品价格下跌已影响到农民所需的春耕资金，工业品价格下跌已打击了再生产的能力。资本家退补的负担很重，普遍惶惶不安，对今后如何经营感到无所适从。为了在五反后使资本家对生产与经营有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资本家退财补税的限额应定得恰当。二、退财补税的时间必须照顾市场的银根情况，不要影响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三、工人监督生产，目前只作典型试验。四、五反后加工的工缴费与订货收购的价格，必须照顾到资本家的合理利润。

[2]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2年5月6日关于杭州市五反情况和经验给华东局并中央、毛泽东的综合报告。

一件，上海市委财委五月六日报告[1]一件，现均转发你们。中央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望各地对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二）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2]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三）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四）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

---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2年5月6日关于上海市五反后情况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中财委、中央，并报华东财委、华东局的报告。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

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五）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六）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七）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八）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请即电告为盼。

中央

五月九日

中央对华北局关于正确结束三反运动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5月9日）

此件[1]很好，发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仿行。

中央

五月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2年5月7日关于正确结束三反运动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指示。指示说，三反运动已经持续了近5个月，目前正处在结束阶段。但要彻底完成三反任务，还须做很多工作。现就处理贪污分子中的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望加注意：第一，各地对尚未处理的贪污分子应系统地进行一次审查，根据不同情况，迅速作出处理。第二，在处理时应注意：（一）追退赃款赃物，乃是定案处理的先决条件，绝不能因为迅速处理而放松追赃核实工作。追赃核实时，一要实事求是，二要适可而止，三不得牵连其家属及亲友，停止向家属追赃的做法。（二）结论应根据本人已承认或确认无误的材料来作，不能按怀疑的材料去作。作结论后又发现材料证实以前否认的贪污问题的，可加重或从重处分。（三）过去追得远、算得多的，定案处理时应统一按中央规定，认真甄别，该下降的均应下降，确实弄错的即应平反。第三，为争取较快地完成处理工作，从华北区至县级一律建立处理委员会，由党委一名常委负主要责任，并吸收各有关部门的必要负责人参加，定期开会讨论。所有三反中重要问题的处理，都先经委员会研究，做出决定，送党委审核批准。

中央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2年5月10日）

中央直属总党委；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

（一）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二）兹将中央重工业部关于追赃定案艰苦斗争的经验[1]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加以研究，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五月十日

---

[1] 指重工业部党组1952年5月5日给中财委党组、政务院党组并报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中总结的退赃定案的经验。报告说，退赃定案是十分细致、艰苦和负责的工作，领导上必须坚决掌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及时地和不断地克服各种偏差思想，这是正确定案的主要关键。对若干案件干部中曾多次发生“怕降级”和“想升级”的情绪，在审理过程中，曾通过深入调查对证和反复研究讨论加以克服。目前不能定案的人数比重仍甚大，定案的主要关键，是商人是否承认行贿与贪污犯退赃问题。

对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2年5月14日）

此件[2]很好，应通报各地。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和办公室主任贺诚1952年5月12日报告的批语。

[2] 指周恩来、贺诚的报告。报告说：（一）朝鲜之主要问题仍是鼠疫，东北之主要问题仍为脑炎。鼠疫与脑炎虽继续发生，但未流行，防疫工作已取得成效。因暑热季节还未到来，且敌人仍在扩大撒虫范围，仍应作传染病有流行可能的估计，不能过分乐观、麻痹大意。（二）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在继续开展，主要任务是捕鼠、灭虫、改善环境卫生。预防注射在志愿军及全国各地已经进行。（三）四月份研究工作的重点为东北脑炎问题，宣传工作的重点是筹备美帝细菌战罪行展览。（四）四月份召开的各大行政区及志愿军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会议，对下述几个问题作出决定：坚持今年的防疫工作到秋后；明确不同地区的防疫对象；加强防疫研究工作；做好展览会布置工作；另成立防疫队、新增防疫病院床位；设立卫生防疫站及消毒站。

对志愿军火炮筹补方案的批语[1]

（1952年5月14日）

恩来同志：

此事[2]解决办法，除你所说的几个炮团调去以外，请考虑（一）从国内守备各军调一部分，（二）从在朝二线各军调一部分。是否可能，请与彭、聂、粟[3]商讨决定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此外，向友方购炮，是否可能，请再研酌。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1952年5月14日报告上写给周恩来的批语。

[2] 指彭德怀转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万毅、苏进，副政治委员邱创成1952年5月13日关于志愿军火炮损失情况及筹补方案。方案提出：（一）从新改装步兵师中抽调新进口的炮兵装备全部补充志愿军。（二）志愿军按每师装备1个炮兵团，需补充野炮、榴弹炮共计1250门。如向苏方订货需外汇56235830卢布。

[3] 彭，指彭德怀。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给陈嘉庚[1]的信

（1952年5月16日）

陈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写了集美解放纪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先生近日身体如何，时以为念！

顺致敬意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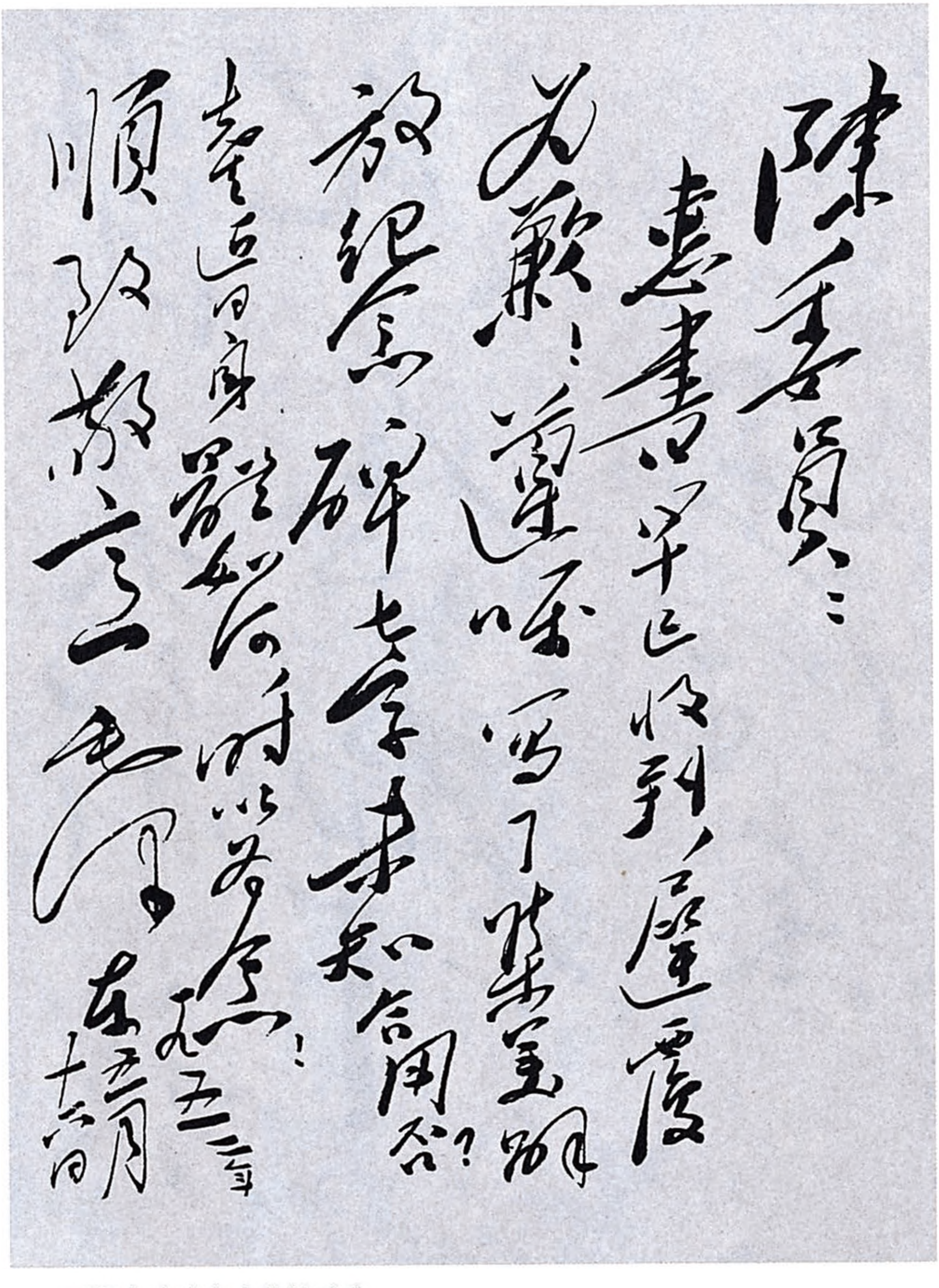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

集美解放纪念碑

毛泽东

---

[1] 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陳委員：

惠書早已收到，遲覆為歉！遵囑寫了集美解放紀念碑七字，未知合用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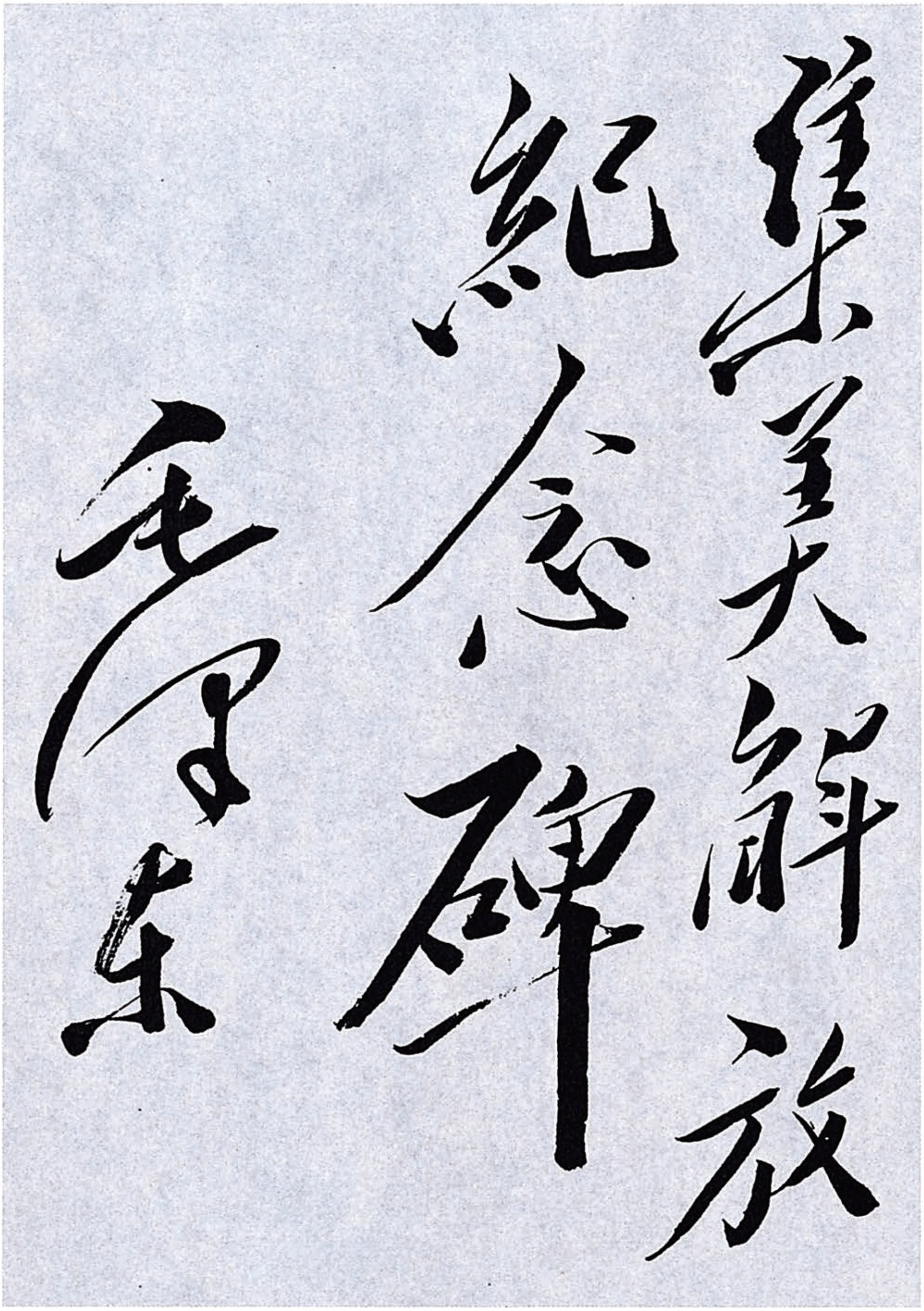
先生近日身體如何，時以為念！

順致敬禮！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致陈嘉庚信的手稿。



集美解放
紀念碑
毛泽东

毛泽东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写的碑名。

关于成立后方勤务学院的命令[1]

（1952年5月1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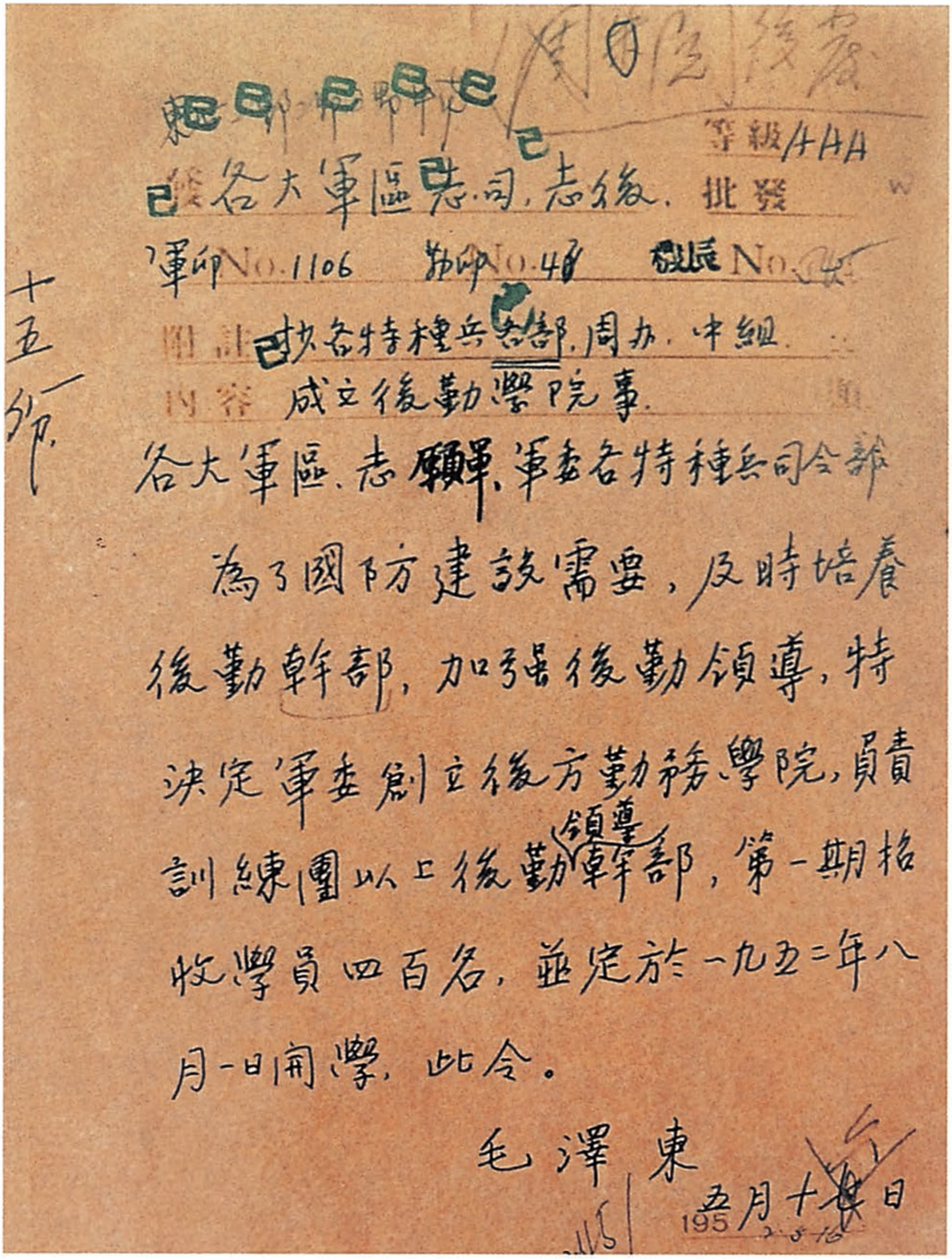
各大军区、志愿军、军委各特种兵司令部：

为了国防建设需要，及时培养后勤干部，加强后勤领导，特决定军委创立后方勤务学院，负责训练团以上后勤领导干部，第一期招收学员四百名，并定于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开学，此令。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签发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的命令。



等級 AAA

發 各大軍區、志司、志後　批發

軍印 No.1106　特印 No.48　機長 No.

附註 抄各特種兵司令部、周办、中組

內容 成立後勤學院事

十五份

各大軍區、志願軍、軍委各特種兵司令部

為了國防建設需要，及時培養後勤幹部，加強後勤領導，特決定軍委創立後方勤務學院，負責訓練團以上後勤領導幹部，第一期招收學員四百名，並定於一九五二年八月一日開學。此令。

毛澤東

五月十六日

1952.5.16

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决定创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方勤务学院。

对叶恭绰[1]等要求保全袁崇焕祠墓的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2年5月16日、25日）

一

请彭真[2]同志查明处理。我意如无大碍，袁崇焕祠墓应予保存。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二

誉虎先生：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3]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

---

[1] 叶恭绰，字誉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2] 彭真，当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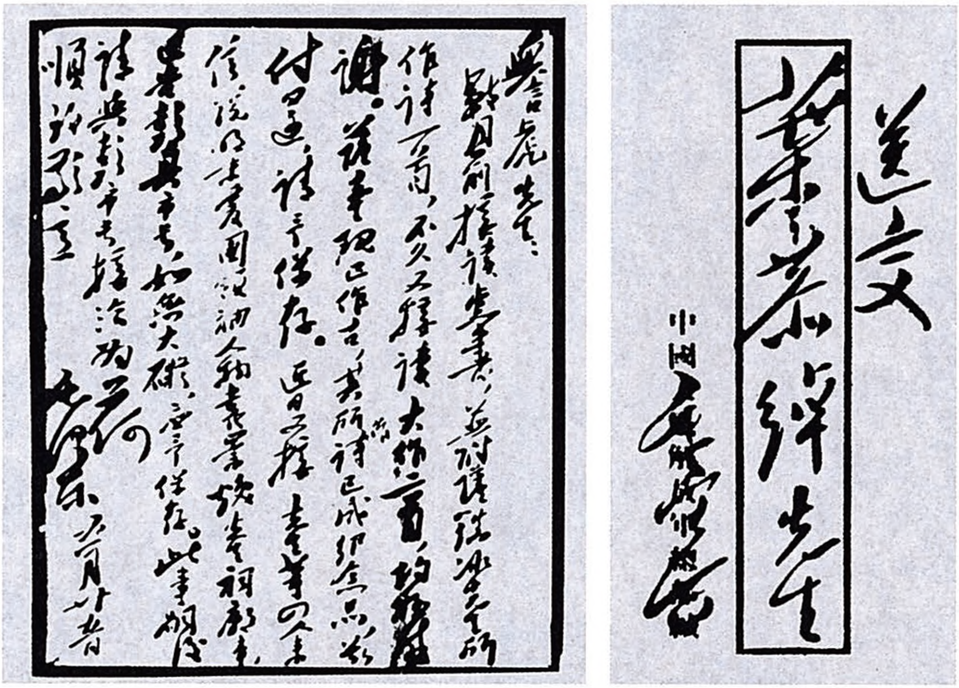
[3] 萨镇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海军总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1]，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市长接洽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送交

叶恭绰先生

毛泽东致叶恭绰信的手稿。

---

[1] 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和章士钊四人1952年5月14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保全北京城内袁崇焕祠墓。

处理同藏族有关的工作均须事前报告中央[1]

（1952年5月19日）

再一次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此点工委应向所属各机构发一严格的通知，责令遵行，不得忽视。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52年5月19日关于西藏三大寺统战工作和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给中共西藏工委的复电稿上加写的文字。

中央关于印发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5月20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党委，各大城市市委：

兹将中央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一件发给你们，希望你们认真研究，严格执行。

中央

五月二十日

---

[1] 中共中央1952年5月20日关于争取五反斗争胜利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规定：定案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务要作到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工商户分类的标准，应以其违法所得数目和违法情节作为同等重要的条件，单纯以违法所得数目作为区别界限是不全面的。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目，必须按照中央5月9日指示所规定的控制比例重新计算定案。对违法工商户一般只退财补税，少数才予罚款。除对国计民生有极严重危害或破坏作用者、违法行为属于罪大恶极者、确系敌伪产业为人非法窃取者三类外，一般不予接管或没收。凡在五反运动中发现的带有反革命性质或其他政治性的案件，除现行破坏分子外，均先处理经济问题，然后再交公安或其他适当部门处理。凡五反运动中发现的贩运走私毒品之类的案件，应按中央禁止贩毒指示专案办理。

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致达赖、班禅[1]电

（1952年5月23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们五月二十三日的来电。值此西藏和平解放周年节日，你们来电表示愿为逐步彻底实现《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努力，极为欣慰。我庆祝你们和全体西藏人民更加亲密团结起来，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并庆祝你们的成功和健康！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均为西藏宗教领袖。

对美蒋妄图骚扰华南沿海的情报的批语

（1952年5月24日）

请周[1]考虑中南军区迅速迁至广州[2]，并加强对海南岛的部署。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1] 周，指周恩来。

[2] 当时中南军区机关的驻地在武汉市。

对中办秘书室关于群众来信反映失业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5月31日）

周总理：

失业问题仍颇严重，此件[1]请一阅。似宜由中央劳动部或直接由政务院召开一次**失业问题处理会议**，由各大城市及各省派员参加，订出可行的处理办法。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52年5月27日关于1至4月份群众来信反映失业情况和要求解决职业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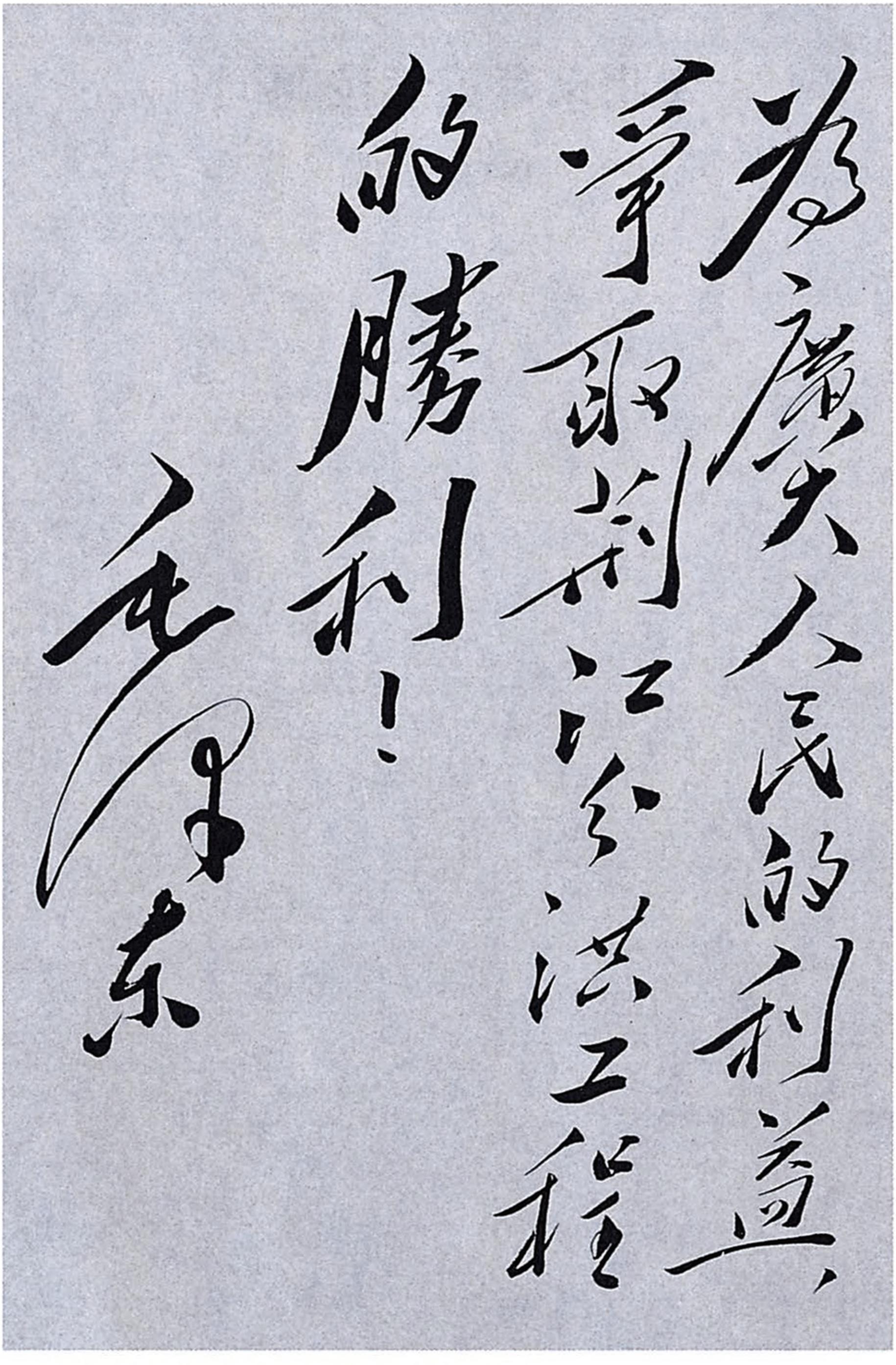
为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员工题词

（1952年5月）

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毛泽东

三年恢复时期，水利建设也取得了卓越成就。1952年10万解放军和20万工人、农民、技术人员参加了荆江分洪工程的修建工作。



为廣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勝利！

毛泽东

毛泽东为荆江分洪工程全体员工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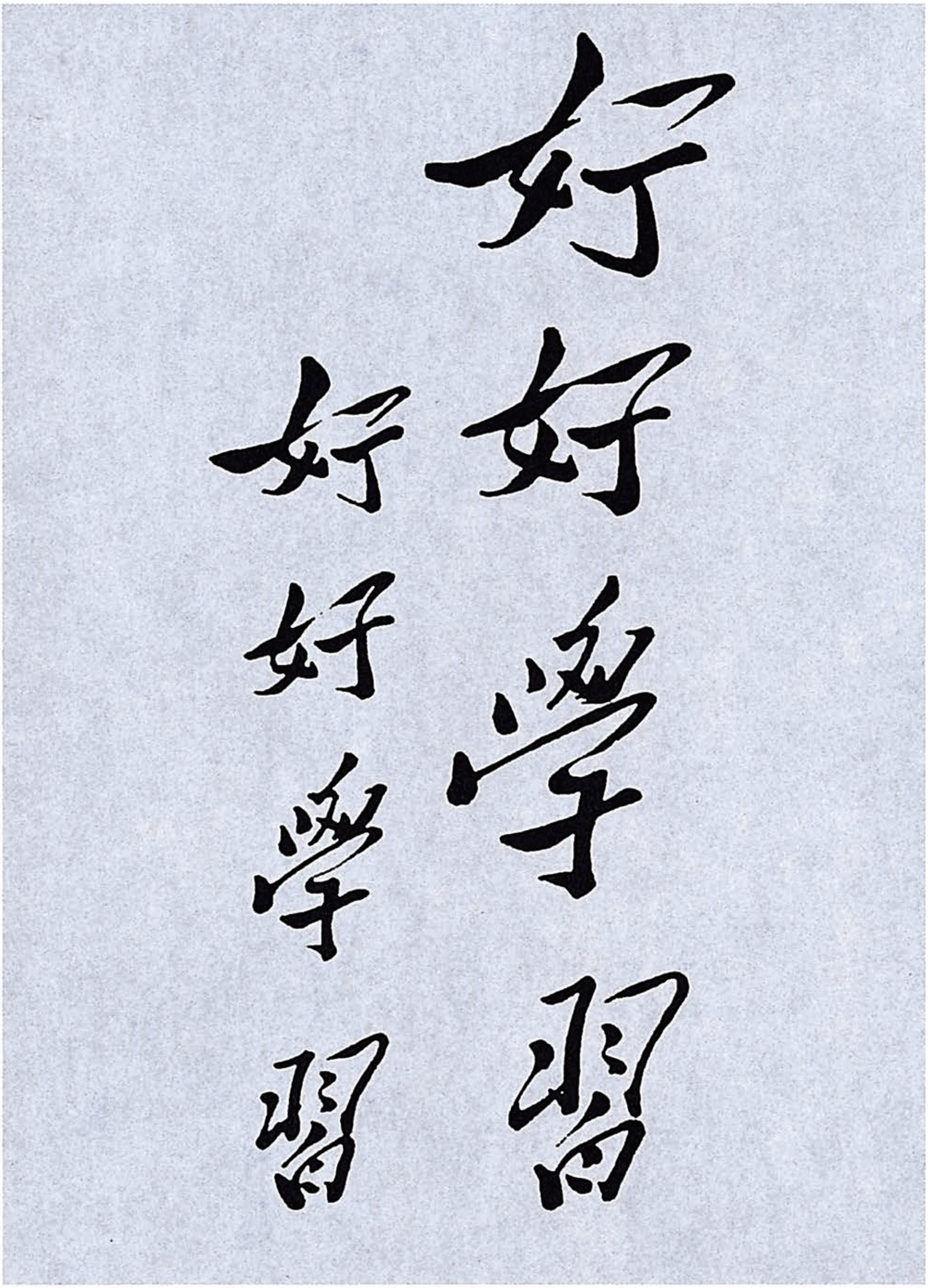
为北京育英学校题词[1]

（1952年5月）

好好学习。

---

[1] 北京育英学校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前身是中共中央直属育英小学校，1948年建校，后随党中央一起迁入北京。1952年六一节，毛泽东亲自为育英学校题词“好好学习”。



毛泽东为育英学校的题词。

对马光斗所作搞好劳资关系报告的反映的批语[1]

（1952年6月2日）

彭真[2]同志：

除资本家有三权外，应同时告诉资本家不得向工人报复，否则法办，以免引起资本家嚣张，工人丧气。

毛泽东

六月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报送中央的一份材料上。这份材料说，1952年5月6日，北京市劳动局副局长马光斗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作了关于如何搞好劳资关系的报告，资方和工人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资本家听了都很满意，认为政府明确规定了他们有三权（指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用人权），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但有些人竟因此气焰嚣张，对工人店员进行讽刺、打击或威胁；有些资方想找理由歇业，辞退工人；有些利用亲信打击五反中的积极分子。大多数工人店员见资方得意嚣张，对政策表示怀疑和不满。

[2]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

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1]

（1952年6月6日）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这个部的负责人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中间阶级的错误观点。

在《统战部长会议中所反映的问题简报》第一号上的批语

（1952年6月8日）

周总理：

此件（二）项关于南京的情况[1]可看一下。在南京这类城市，补退的数字、时间、比例均值得考虑一下。

毛泽东

六月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1952年6月7日《统战部长会议中所反映的问题简报》第一号第二项中所述南京市的工商业情况。《简报》中说，南京市的工商业，畸形现象较为严重。全市共有2.5万工商户，但实力很贫乏；在1.01万多工业户中，3个工人以下的约9000户，50个工人以上的只有38户。23个主要商业行业中，资金在5亿元以上的仅7户。全市私营工商总资金共3200亿元，五反中经几次审核降低，现拟退补800至900亿元。五反以来，已经批准歇业和自动歇业的有2100多户，如再照数退补，最低还将有1300多户歇业。失业者将有1.3万多人。南京的失业问题素来很严重，现完全靠政府养活的有1.1万多人，经常需要救济的有4万多人。

中央关于谭震林[1]等任职和军队整编问题复陈毅[2]电

（1952年6月9日）

陈毅同志，并华东局，上海市委：

六月八日来电[3]收到。同意你的各项意见。谭震林同志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饶[4]治病期间代行主席职权，待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即可就职。同意上海市府党组书记仍由潘汉年[5]同志担任，方毅[6]同志改任副书记。同意上海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仍由刘长胜同志担任，钟民同志改任副书记。军队整编转业应加紧督促，

---

[1] 谭震林，当时因饶漱石患病休养，经中央决定代理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职务。

[2]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陈毅1952年6月8日关于谭震林等任职和军队整编转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表示拥护毛泽东及中央确定的边打边建边稳的方针及各项工作部署，但认为军队整编问题还抓得不够紧，建议中央在三反五反以后进行号召和督促，并提出在整编中要防止大批裁员，而以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为宜。

[4]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因病离职休养。

[5] 潘汉年，当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6] 方毅，当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兼市政府党组书记。

达到“转业给饭吃、走向生产”之目的，防止用大批裁员的办法，这些意见是正确的。

中央

六月九日

接受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6月9日）

大使先生：

我异常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波兰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热忱祝贺。

两年来中、波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关系都有了显著的发展。中国人民对于波兰人民在贝鲁特总统的领导下重建祖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动人事业非常钦佩，并衷心地为你们这些卓越的成就感到喜悦。我深信：贵我两国人民更进一步的密切合作，不但将有利于两国间友谊的增强，且将对我们共同争取的世界和平事业有所贡献。

我热烈欢迎阁下出任波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阁下在为巩固与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工作中，尽量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接受芬兰驻华公使克诺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6月9日）

公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公使呈递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对贵公使转达贵国总统对于中国人民繁荣幸福的祝贺表示感谢。

中芬两国人民间友谊的增强，以及两国经济、文系关化更进一步的发展，将对我们共同切望的世界和平事业有所贡献。

我热烈地欢迎贵公使出任芬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并愿对贵公使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给黄炎培[1]的信

（1952年6月10日）

任之先生：

六月八日惠书收到。一八四〇年是林则徐[2]领导广州民众反抗英国进攻的那一年，即所谓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不是说陈胜吴广[3]，先生记错了。中国现代的革命，首先和最主要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故可以上溯到反鸦片战争的林则徐及广州的“平英团”，上溯到二千余年前去纪念陈胜吴广，则太远了，那是古代的农民起义，不是现代的革命。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六月十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林则徐，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40年鸦片战争时，任两广总督，是清朝官员中抵抗派的首领。

[3] 陈胜、吴广，是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

给易礼容[1]的信

（1952年6月10日）

礼容兄：

六月九日来信收到。参加土改有收获，甚好。承告以各事，甚谢。

人们说你近年政治上进步不大，这种批评是值得注意的，我从去年的一次谈话中亦有此感觉，主要的是劳动人民的立场还没有站稳。此次参加土改，可能对你有帮助。政协全委会每周或每两周有一次学习座谈会，许多老先生都在学习，建议你去参加，请你自己酌定。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六月十日

---

[1] 易礼容，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劳保部部长。

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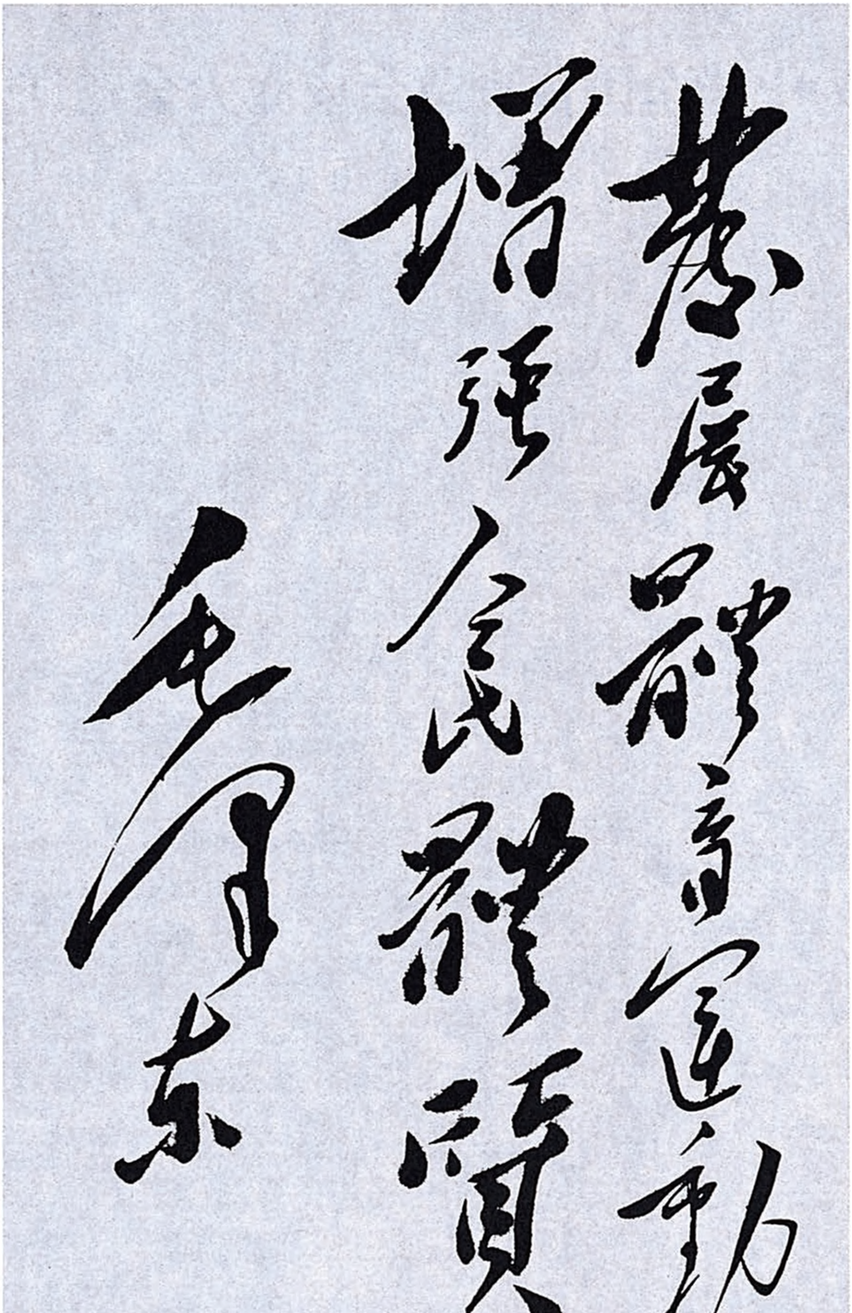
（1952年6月10日）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成立大会于1952年6月20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發展體育運動
增強人民體質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

对聂荣臻[1]关于中南军区南迁问题[2]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6月11日）

周林[3]阅，退聂办。

（一）以四十三军移驻海南岛，四十六军移驻雷州半岛，即足以对付海南局势。四十四军仍位惠州一带不要动。这样可以东西机动，如海南岛有事再将四十四军调去不迟。

（二）赵尔陆[4]调出为军工部长，不要去广东。

以上两点已与谭赵[5]谈过。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指中南军区机关驻地拟由武汉市迁往广州市。

[3] 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员。

[4] 赵尔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参谋长，1952年8月7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5] 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赵，指赵尔陆。

中央转发出版总署关于发动交代关系和思想检查的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2年6月11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

兹将中央出版总署党组关于该署在二千五百余人中发动交代关系和思想检查的总结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此件很好，可作参

---

[1] 指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陈克寒1952年6月4日关于发动交代关系和思想检查及定案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个月来出版总署及所属单位工作人员交代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及思想检查工作的情况，总结了工作中的收获和经验教训。收获主要有4条：（1）领导上对工作人员政治面貌和思想情况有了大概的全貌的了解，积累了一些领导群众思想运动的经验；（2）在工作人员中初步划清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打击了歪风，扶植了正气，群众的政治觉悟普遍地提高了一步；（3）批评和自我批评展开，机关里有了原则空气，自由主义市场缩小，内部团结增强；（4）党团和群众关系得到改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1）必须领导上真正重视，事前做好准备工作，并在工作进行过程中步步抓紧；（2）做好思想动员工作，说明交代关系和检查思想的目的和意义，这是取得胜利的关键；（3）事先指明交代关系和思想检查工作应该用文的方式，决不能因袭打老虎的一套；（4）选择交代关系和思想检查较好的典型，适时地举行典型报告会，并在会上当场作出结论，予以鼓励，以启发其他群众，这是推动运动深入的有效方法；（5）每个小组必须有骨干分子掌握领导或起核心作用。

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各地交代和检查两项工作尚未完毕的，务望抓紧做完。

中央

六月十一日

对空军司令部五月份战果报告的批语

（1952年6月11日）

粟裕[1]同志：

空军作战成绩不佳，请你与空司同志研究改进方法，务于短期内改变敌我形势。刘亚楼[2]回京后，应去前线指挥。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干部子弟学校应逐步废除[1]

（1952年6月14日）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6月11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上写的批语。北京市委的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无助学金。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关于来京开会问题致赛福鼎[1]电[2]

（1952年6月19日）

赛福鼎同志：

你的身体是否宜于坐飞机，请你和医生商量决定，如不宜高空长航则不必来京，如身体许可则来京开会。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

---

[1]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2] 这个电报写在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1952年6月1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上。王震的电报中说，赛福鼎患高血压病相当严重，医生检查不宜高空长航，特报告请示。

为了解苏共关于中央机构设置的经验致斯大林电

（1952年6月20日）

菲利波夫[1]同志：

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即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2]，为此，我们要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使他了解联共（布）中央在这方面的经验。请你允许张闻天同志和你所指定的苏联

---

[1]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代号。

[2] 中共中央1952年6月20日给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电报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中央拟将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一些干部调到中央工作，并拟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为此，我们研究了前年中国党的组织工作参观团在苏联参观后有关联共组织工作经验的报告，但我们对于联共中央的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三个机构的组成、职权和关系还不清楚，我们想了解联共中央有关这三个机构的经验作为我们建立中央机构的参考，请你去找马林科夫同志或联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作一些谈话，在谈话中，请你问明这三个机构的性质、任务、组织成份、职权、工作、会议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共和国和直属州的党机构等，以及你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事项，然后向中央作一报告。”

同志作这样的谈话，不胜感谢！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关于美国邀请印尼等五国视察美军巨济岛战俘营问题的批语[1]

（1952年6月21日）

周总理：

除向驻京各使馆有所表示外，对我驻五国大公使似亦应有所指示。

毛泽东

六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印尼代办钟庆发1952年6月18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上。钟庆发的报告说，美国邀请印尼视察美军巨济岛战俘营的正式要求于6月14日送达印尼政府，18日印尼外交部长在同他谈贸易问题时，询问中国政府对美国邀请印尼等五国视察美军巨济岛战俘营一事有何反应。因此，他建议我国政府对此事发布一个严正声明。

中央转发朱德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

（1952年6月23日）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党委并转各省军区和各军党委：

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关于全党纪律检查工作的总结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可在党刊上登载。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

中央

六月二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朱德1952年6月22日关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总结报告。报告说，三反运动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一次有领导的、发动群众的、全体规模的、有系统的纪律大检查运动，使广大干部受到了教育和考验，证明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犯有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受到了应得的处分。同时，暴露出我们在纪检工作和干部工作中存在的相当严重的缺点和应当吸取的教训：第一，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发现了党员干部有违犯党纪的错误，不是正面地及时地提到原则高度予以批评

指正，对于犯有严重错误不宜继续担任原来工作的高级干部，没有坚决地从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使党纪松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更加发展。第二，某些党的组织平时对干部的了解很差，不听群众的反映，不深入检查他们的工作，一些坏干部利用这些缺点骗取信任，以达到个人的目的。第三，有些部门用人单纯强调技术，忽视政治，放松党的领导和党内的思想斗争，造成了干部中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形。因此，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自由主义，就成为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第四，必须加强纪检工作，健全党内的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充分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发动对党员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揭发和检举，经常向党员进行遵守纪律的教育。第五，在处理党员违纪案件中，要克服姑息养奸和简单化两种倾向。第六，在三反斗争的建设阶段，各级组织可适当地进行一次遵纪守法的教育，使党员干部逐渐地养成奉公守法的习惯。

给毛泽连[1]的信

（1952年6月23日）

润发贤弟：

五月八日的信收到。

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诊得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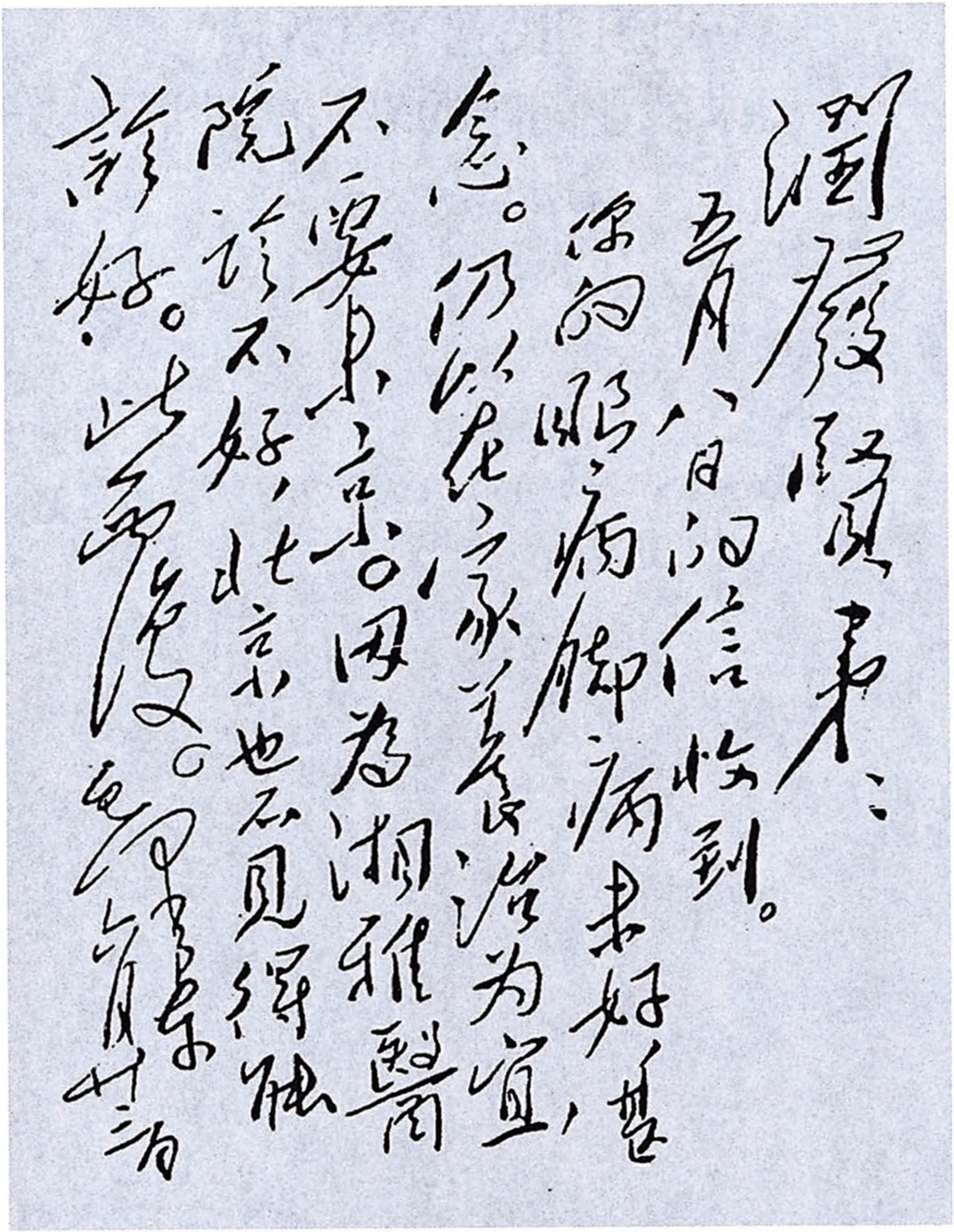
此复。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

[1]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润莲贤弟：

八月的信收到。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治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治好。此即复。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

毛泽东致毛泽连信的手稿。

对原国民党军官费帖要求就业问题的来信的批语

（1952年6月25日）

周总理：

此信[1]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

---

[1] 指原国民党军官费帖1952年6月16日关于要求就业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到一些国民党下级军官陷于失业，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文教局办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请求劳动局介绍工作等，都遭到拒绝，走投无路，要求国家予以收容和改造，不使流浪社会。

中央转发安子文[1]关于中央机关三反处理阶段工作情况报告[2]的批语

（1952年6月30日）

中央直属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并告各中央局：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第二书记。

[2] 指安子文1952年5月29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三反运动处理阶段的情况和问题以及下一阶段工作的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处理阶段工作的中心环节，不在人民法庭的审判，而在于定案追赃，尤其在于定案。为了定案追赃，有领导地传讯工商户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通过传讯对证核实了不少材料和问题。这次在打虎运动基础上进行的普遍交代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比历次整风、审干都深入彻底，通过交代，深刻地教育了领导和干部，了解了干部的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划清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使领导摸着了底。处理阶段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实事求是，不枉不纵。必须认真调查，慎重研究，分别对待，严格控制，贯彻政策，才能取得胜利。下一阶段工作的基本关键在于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建设工作，从根本上杜绝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的重新生长。思想建设的基本要求，是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组织建设，是按精简组织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的原则，普遍进行一次整编。制度建设，主要是根据三反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和健全财政、基建等各种制度，制度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建立和健全民主制度。

（一）同意安子文同志五月二十九日的报告。（二）将这个报告由地面交通送各中央局参酌仿行。（三）此件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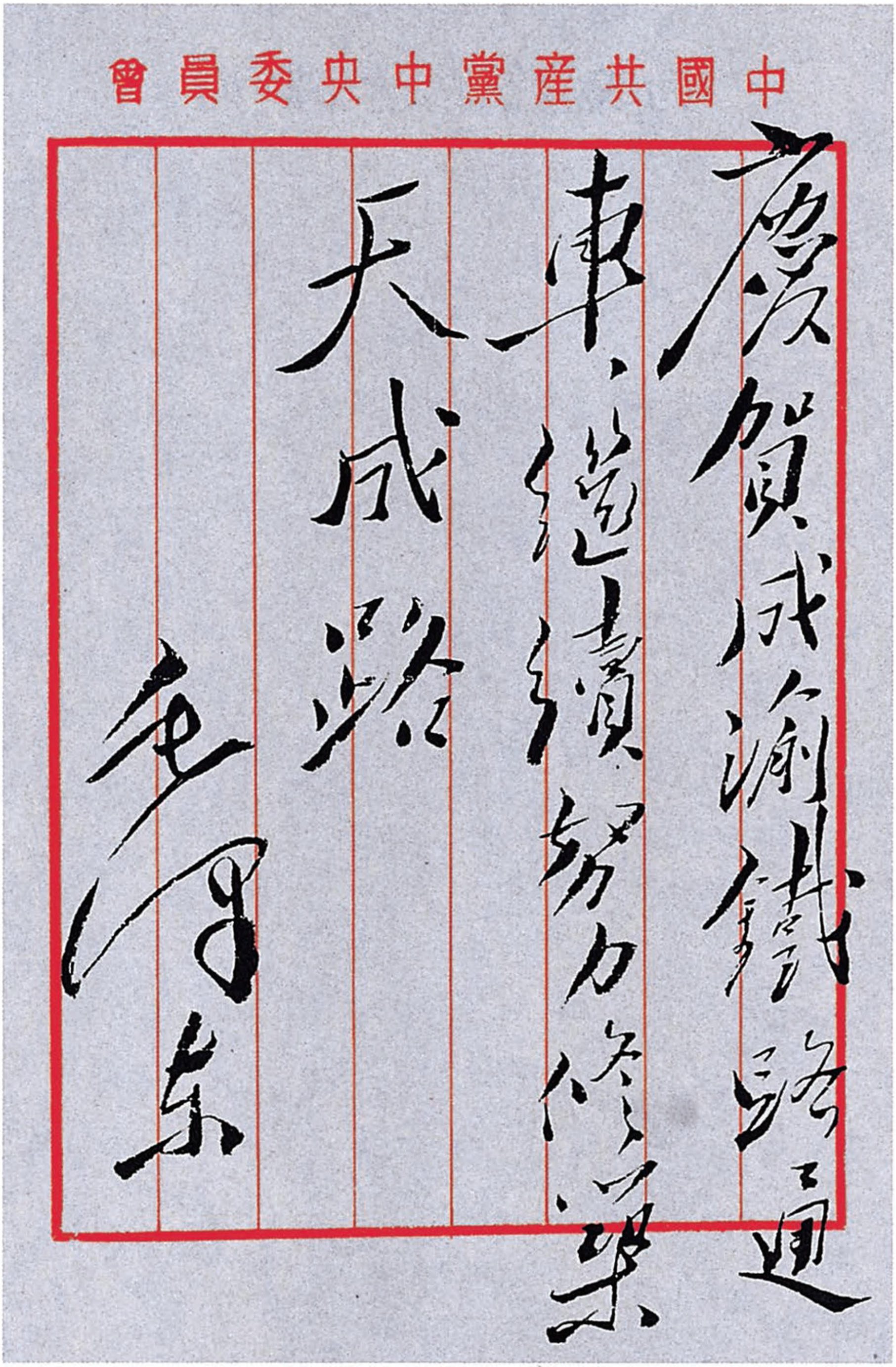
六月三十日

为成渝铁路通车题词

（1952年6月）

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毛泽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慶賀成渝鐵路通車，繼續努力修築天成路

毛泽东

毛泽东为成渝铁路通车的题词。

对新疆农业区土改和牧区工作两个决议稿[1]的批语

（1952年7月2日）

---

[1] 指1952年7月准备提交新疆党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新疆农业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决议》草案和《关于在新疆牧区工作的决议》草案。前一个决议草案指出，根据新疆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在农业区必须坚决地实行土地改革，同时对土改又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为了保证土改的胜利，决议对组织最广泛的反封建统一战线、正确地划分阶级、有分别地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不断地教育农民群众等问题，以及保护宗教土地、保护畜牧业和外侨土地问题等土改中的具体政策，作出了规定。后一个决议草案在肯定新疆解放以来牧区工作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牧区工作中所犯的一些原则性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是：企图在牧区划分阶级，宣传社会改革，准备消灭牧主经济；不顾牧民的觉悟程度和是否自愿，企图组织畜牧合作社；对于匪特煽动的群众性的叛乱着重军事清剿，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做得不够；在镇反中捕人太多，打击面过宽。总之对牧区工作不是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而是企图实行一种危险的冒险政策；不是根据畜牧经济的特点实事求是地去规定若干可能的改良，而是机械地搬用农业区土改的办法去改革畜牧经济。决议确定了牧区工作的总方针是：安定社会秩序，保护与发展畜牧业，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地改善牧工和穷苦牧民的生活。并在此总方针下实行一系列政策，包括："广泛地开展牧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包括部落头目、宗教首领及牧主），只打击那些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保存牧主经济，对牧主经济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逐步取消牧主封建特权，鼓励牧主的生产积极性，使牧主经济逐渐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等等。

此两件请周总理今晚即阅，明三日或四日至迟五日由尚昆[1]派人乘飞机直送迪化[2]交习仲勋、王恩茂[3]二同志收，务于七月六日或七日送到勿误。原件应抄存一份。

毛泽东

七月二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迪化，即今乌鲁木齐市。

[3]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委员、中共新疆省南疆区委第一书记。

关于解决军队干部子女入学入托问题的批语

（1952年7月7日）

同意这个计划[1]，预算请交杨立三[2]与戎子和[3]二同志速予审复。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指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2年7月4日给聂荣臻、彭德怀的报告中提出的解决军队干部子女入学入托问题的计划。这个报告由彭德怀转报毛泽东。计划说：1952年拟开办子弟学校19所，吸收1.18万个儿童入学；托儿所今年拟解决3万个儿童入托问题。

[2] 杨立三，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

[3] 戎子和，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给张有成[1]的信

（1952年7月7日）

有成兄：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此复。顺问
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

---

[1] 张有成，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

对彭德怀[1]关于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7月8日）

刘朱周[2]阅。

请彭办。

同意第二个意见[3]，请叫肖向荣[4]起草一个指示。

毛泽东

七月八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

[3] 彭德怀上报的军委为进一步明确公安部队隶属关系而召集的一次会议的记录中说，这次会议提出了解决隶属关系的两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即毛泽东批语中所说的第二个意见）是：维持1951年12月10日中央和军委批准的关于公安部队隶属关系的决定中所确定的双重领导关系，但须明确以军区的领导为主。就是说，公安部队的教育、部署、作战指挥等均归军区，各级公安司令部在同级军区领导下进行工作；上级公安司令部对下级公安司令部的领导，主要是在业务方面，并应同时通知军区。在供应上，一切均归大行政区的后勤部门统一办理。在执行这个方案时，对原已建立公安司令部指挥上的垂直系统的东北和华北两区，由军委公安司令部仍兼华北公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华北各省公安部队，由东北军区通过东北公安司令部指挥东北各省公安部队。

[4]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1]

（1952年7月10日）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廿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

[1] 这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训词。毛泽东指定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学员宣读。

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力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的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

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

给毛宇居[1]的信

（1952年7月11日）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2]一信，请代转交。接毛泽连[3]的信，六婶[4]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5]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现在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否〈告〉。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李漱清[6]、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2]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3]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4] 六婶，毛泽连的母亲。

[5] 张有成，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

[6] 李漱清，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前是韶山的进步教员，毛泽东常去他家看书、请教。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给邹普勋[1]的信

（1952 年 7 月 11 日）

普勋兄：

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

秋收以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出远门否？

顺祝

安吉！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邹普勋，毛泽东的邻居。

毛泽东和他的师友在中南海留影。从左至右为：邹普勋、李漱清、毛泽东、张干、罗元鲲。

同意志愿军兵员补充、部队轮换和整编结合进行的方案[1]

（1952年7月11日）

同意[2]，请与彭德怀同志商酌办理[3]。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粟裕1952年7月10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粟裕的报告说：为使志愿军之兵员补充、部队轮换和实施第二期整编三者间的矛盾得到适当解决，故拟将三者结合进行。关于志愿军兵员补充问题，拟以4万人解决志愿军秋季补充问题。关于志愿军整编问题，如朝鲜停战，则按照原定第二期整编计划实施；如朝战继续，在不影响作战的原则下逐渐部分地实施整编。将中南之四十五、四十六军各编为两个强师。以其中三个强师编成一个军，与四十二军两个师轮换，四十二军留一个师在朝鲜作补充。另以一个强师与四十二军回国之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军。

[3]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1952年7月11日批示："四十二军三个师仍保存为有利，余无意见。"

对达赖喇嘛[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2年7月11日、8月18日）

一

转民委办。

似应复一信，由代表们带回去。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黄金五两，红花一桶，哈达一条，请田家英[2]同志清出送存民委。

二

达赖喇嘛先生：

五月十四（藏历水龙年三月二十日）来函及礼品均收到。感谢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你的好意。

西藏地方政府和僧俗人民都希望建设西藏工商业，发展西藏经济，是很好的。中央人民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渐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

随函附送十六〔毫〕米电影放映机一部（附《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民族大团结》影片各一部），黄缎二匹，请查收。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八日

对全军后勤组织和整编问题的批语[1]

（1952年7月12日）

同意这几个文件[2]，并同意周总理所指的几点意见[3]。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1952年6月报告和周恩来1952年6月27日批示的批语。

[2] 指杨立三呈送的1952年6月3日召开的研究全军后勤整编问题会议的情况报告和《全军后勤组织原则与领导关系的决定（草案）》《各级后勤部门暂行编制系统表》及说明等文件。杨立三的报告说：6月3日召集各大军区后勤部及军委海、空军后勤部负责同志开会讨论后勤整编问题。会议所拟定的后勤组织原则、领导关系、组织系统以及整编方法、整编时间及总后勤部之工作、干部调配等结果如下：全国后勤工作应在总后勤部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为适应国防建设的需要，在总的方面是联的，即总后勤部对陆、海、空军全部都管，分为3个系统，陆军、海军与空军供应到部队；在各大军区，只有在战时，战区才临时组织联合勤务指挥部，统一领导与指挥该战区的后勤工作。各级后勤指挥机关的建制，在整个后勤工作方面受上级后勤部领导，同时在其本身业务范围则是受各级指挥机关领导与监督；总后勤部直接与各大军区后勤部及军委海、空军后勤部发生关系，自己不直接供给部

队；统一后勤组织系统编制，包括组织系统、序列、部门名称等，财务部直接归军委领导，马政局归总参谋部领导，后勤部增加军需生产部。这次整编只整编国内，志愿军整编需在停战后才能进行。

[3] 周恩来1952年6月27日在杨立三报告上批示：后勤系统整编属于第二期（七八月）整编计划，原拟俟朝战停后，将志愿军后勤系统与国内后勤系统合并整编为联勤组织，定额为10万人上下。至5月中旬，确定地看出朝战将继续拖下去，而国内后勤不能再等待志后一道整编，故乃同意总后先开整编会议，商讨整编方案。这次会议他们只讨论了组织原则、领导关系、编制系统，但尚未商定编制人数，因之，现在只能批准他们草拟的原则和编制系统。要等待他们根据批准的原则和编制，确定各级后勤人数和干部配备后，才能送请军委主席核准其全部组织。现送上的这两个文件，已经彭德怀、聂荣臻、粟裕和总政治部、总干部部同意。我研究后，除觉得财务部目前就划出直属军委似嫌较早外，其他也提不出更多的意见。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日本人民争取独立的道路》的批语

（1952年7月14日）

少奇同志：

此件应以庆祝为主题，故改换一个题目，并于最后加了一段鼓励和庆祝的话。[1]很大的篇〔幅〕不很切题，但也勉强可用，不好作大改了。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

---

[1] 毛泽东将社论稿的题目改为《庆祝日本共产党的三十年》。在社论稿末尾，他加写的一段话是："光荣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在其三十年历史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个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自己的，这个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这个党是学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的。因此我们有根据相信，这个党是能够领导日本人民革命获得胜利的。当此日本共产党建党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谨以兄弟般的友谊致其深切的庆贺之忱。"这篇社论刊载于1952年7月15日《人民日报》。

对军事建设五年计划的批语

（1952年7月18日）

刘、朱、周、陈、彭、聂、粟[1]同志：

聂、粟所拟军事五年计划及附件已阅过，基本同意，可即照此部署，请彭主持。此件抄本周处已有，现将我的一份送刘、朱、陈、林[2]四同志阅，阅后退毛。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中央同意习仲勋[1]关于新疆情况的分析和工作方针报告的电报

（1952年7月20日）

仲勋同志，并告西北局：

你于七月十六日晚写的报告[2]今天收到阅悉。我们认为你对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望即照此去做。

中央

七月二十日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习仲勋1952年7月16日关于新疆情况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针给毛泽东并中央、西北局的电报。电报内容同1952年7月关于新疆农业区土改和牧区工作的两个决议草案基本一致。

关于检查财政机关及后勤部门对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情况的批语

（1952年7月21日）

薄一波、杨立三[1]两同志，并告刘、周、朱、彭德怀[2]同志：

自几个月前中央发出指示[3]，要求专署以上各级财务行政机关及军队军以上各级后勤部门向中财委及总后勤〔部〕作出违反财政纪律的自我检讨，限期上送，请你们饬专人检查一次，将已作检讨者与未作检讨者列成一张表，送给我及中央同志阅看，并提出处理意见。

毛泽东

七月廿一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杨立三，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部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3] 指中共中央1952年4月22日关于地方各级财委和军队后勤部门应作违反财政纪律的检讨报告的指示。

对吴晗[1]再次要求入党的来信[2]的批语

（1952年7月22日）

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

毛泽东

七月廿二日

---

[1] 吴晗，当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指吴晗1952年7月21日为再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给毛泽东的信。他在信中提到1949年1月3日曾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请求，同年1月14日毛泽东给他回信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请恩来同志面告。"1952年7月以后，吴晗又多次提出入党要求。1957年3月，吴晗被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转发薄一波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7月27日）

（二）同意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七月二十六日关于检查违犯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1]，并将此项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责成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于九月间再行检查一次，看各级应做检讨的财政和后勤部门是否都将检讨做好送来。

（三）此件和附件[2]应在党内刊物上登载。

---

[1] 薄一波的报告说：自195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地方财政机关及后勤部门应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指示后，截至7月25日止，已收到报告286份，其中地方44份，军队242份。西北区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还没有送报告来。报告列举了地方财政机关、军队后勤系统、中央各企业部门违反财政纪律的主要表现。

[2] 此件，指中共中央1952年7月27日转发薄一波关于检查违反财政纪律的初步总结报告的批语，本篇是其中的第二项和第三项。附件，指薄一波7月26日报送毛泽东并中央的总结报告。

朝鲜战争结束前不要进行对大陈岛的作战[1]

（1952年7月27日）

彭副主席：

同意你的意见[2]，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朝战结束后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此项作战，亦须慎重考虑。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1952年7月24日报告的批语。

[2] 指彭德怀报告中所提出的意见。报告说：“进攻上下大陈岛时，美海空军亦可能参加，为慎重计，须待朝鲜停战实现后举行为宜，请主席考虑批示。”

对总后关于赴朝调查野战救护等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7月30日）

德怀[1]同志：

这个报告[2]很好。其末条七项建议是否可行，请你和有关方面同志商处。

毛泽东

七月卅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1952年7月28日关于赴朝鲜调查野战救护、卫生防疫和反细菌战等项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概述了志愿军入朝以后后勤部门在抢救、治疗、收转伤病员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解决问题的建议：1. 连队增加卫生员人数；2. 军、师、团均建立防疫组织；3. 医院、医疗队装备救护车辆；4. 扩大志愿军卫生部的编制；5. 师以下各级卫生机关直接归同级军政首长领导；6. 师休养所编制应与军的医疗所（队）相等；7. 派毒气专家及化学部队到前方担任防治工作。

关于“八一”发贺电[1]问题 给徐冰[2]的信

（1952年7月30日）

即送徐冰同志：

（一）共产党不另发贺电，即在这个贺电上签名；和过去一样，先列政协全国委员会，次列中共，次列各民主党派。

（二）你交我的修正稿，我又修改了几处。因中共列名，原文说到中共的地方都去掉了。

（三）请『求』再征求各党派代表们同意，即可发表。

（四）对志愿军不要发贺电。

毛泽东

七月卅日上午二时

---

[1] 指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给部队发贺电。

[2]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对关于向军委主席报告工作情况问题的批语[1]

（1952年8月2日）

照此办理，应速实行。[2]

毛泽东
八月二日

请尚昆[3]将此件抄送刘、朱、周、彭、聂、粟[4]及军委各部门首长。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7月30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提出以下办法：（一）反映情况。按各部门和各特种兵业务的区分，分别研究有关本部门的情况，择其要者，加以综合，定期写成简要的报告。（二）报告工作。定期地将自己部门所作的工作，所处理的问题，所拟定的计划，经过研究之后，择其要者写成专题报告或综合报告。（三）随时请示。遇有紧急的、重大的事件，随时将情况及处理意见，分别向军委主席或副主席或总参谋部请示。组织这项工作，按照临时请示事项、情况简报、工作报告3种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置。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4]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聂，指聂荣臻。粟，指粟裕。

对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1952年8月3日）

一

一波同志：

此报告[1]很好。有些小的修改。

毛泽东

八月三日早五时

二

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

---

[1] 指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作的关于1951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1952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编成的报告（修正草案）。

同意海军后勤建立垂直系统的意见[1]

（1952年8月3日）

同意这个意见[2]。

毛泽东
八月三日早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1952年8月2日10时转呈报告的批语。

[2] 彭德怀在转呈报告中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刘道生1952年7月26日关于海军后勤组织问题的报告提出意见："海军后勤建立垂直系统，直属军委联勤，不经大军区，减少层次似适宜，请核示。"

对刘少奇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报告的批语

（1952年8月4日）

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1]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

（一）此件[2]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

[2] 指刘少奇转送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1952年7月17日草拟的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意见说：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

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作出决议，付之实施。

毛泽东
八月四日

对八九两月全国卫生运动具体要求的指示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

（1952年8月4日）

一

周总理、贺诚[1]同志再阅。已于文尾加了一段[2]。

毛泽东
八月四日

二

以上部署[3]，准备在今年初冬召开全国防疫会议，予以检查，并规定一九五三年的防疫计划。同时在北京开一次全国卫生防疫展览会，比较各区卫生防疫成绩的优劣，并对优胜者给奖。此事当另有通知。

---

[1] 贺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

[2] 即本篇第二部分。

[3] 指中央防疫委员会1952年8月4日关于八九两月份卫生运动具体要求的指示中提出的工作部署。

在中央转发华东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指示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8月4日）

自三反以来，中央为全盘改革司法工作曾发出多次电报，但各地除华东外，反映不多，许多地方既不报告执行情况，也不提出不同意见，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这是很不妥当的。今特重申前令，望即依限[1]报告。

---

[1] 中共中央1952年8月4日转发华东局关于司法改革工作指示的批语规定，各省、市、区以上党委，凡尚未向中央作司法改革工作报告的，务于9月份内向中央作第一次关于司法改革工作计划和执行情况的报告。

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1]

（1952年8月4日）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过去只是讲“物价基本稳定，收支接近平衡”，意思是说，物价还不能稳定，收支还没有平衡。收入少，支出多，这是个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在去年九月开了一次会，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十月，我又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增产节约。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到十二月开展了“三反”运动，接着又开展了“五反”运动。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去年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和国内建设的费用大体相等，一半一半。今年不同，战争费用估计只要用去年的一半。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的要点。

练一回。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到什么时候？我说，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

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

一、要死人。他们为扣留一万多个俘虏奋斗，就死掉了三万多人。他们的人总比我们少得多。

二、要用钱。他们一年要用一百多亿美元。我们用的钱比他们少得多，今年比去年又减少一半。“三反”“五反”清理出来的钱，可以打一年半。增产节约出来的钱，就可以完全用在国内建设上。

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

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美国的战略重点是欧洲。他们出兵侵

略朝鲜，没有料到我们出兵援助朝鲜。

我们的事情比较好办。国内的事我们可以完全作主。但是，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美国的参谋长是他们自己的人。所以，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

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

大家要好好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在座的人的合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团结和划清敌我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除了划清敌我界限之外，在内部还有个是非界限。两者相比，是非界限是第二种界限。比如贪污分子大多数还是个是非问题，还是可以改造的，他们与反革命不同。

各民主党派和宗教界要进行教育，不要上帝国主义的当，不要站在敌人方面。拿佛教来说，它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基本上是和封建主义联系着。因为土地问题，反封建就反到了和尚，受打击的是住持、长老之类。这少数人打倒了，“鲁智深”解放了。我不信佛教，但也不反对组织佛教联合会，联合起来划清敌我界限。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

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关于军费减少问题[1]

（1952年8月6日）

我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军费减少的问题。

我们的军队是不是减弱了？没有减弱，而且是增强了。所指军费减少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整个预算扩大了，有一部分经费过去列在了军费中，现在不列在军费中了。为什么不列在军费中？因为不应该列在军费中。比如军工厂，它是属于工业建设的，但过去放在了军事建设中。军队进行文化教育（不是讲军事教育），应该放在国民教育预算中，过去也放在军费预算中了，这个数目是十万亿元[2]（去年军费是五十八万亿元，今年就应该是四十八万亿元），这一部分去年算在军费里边，今年不算了。现在拿五十四万亿元作军费，这个数目没有减少。

此外，全军进行了三反打“老虎”、反对官僚主义及贪污浪费，大大节省了不应该用的钱。

为什么军队节省了一大批钱出来？还因为土地改革以后，地方武装减少了近一百万人。

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师、四十几万人，变成了人民解放军水利工

---

[1] 这是毛泽东1952年8月6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指人民币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新币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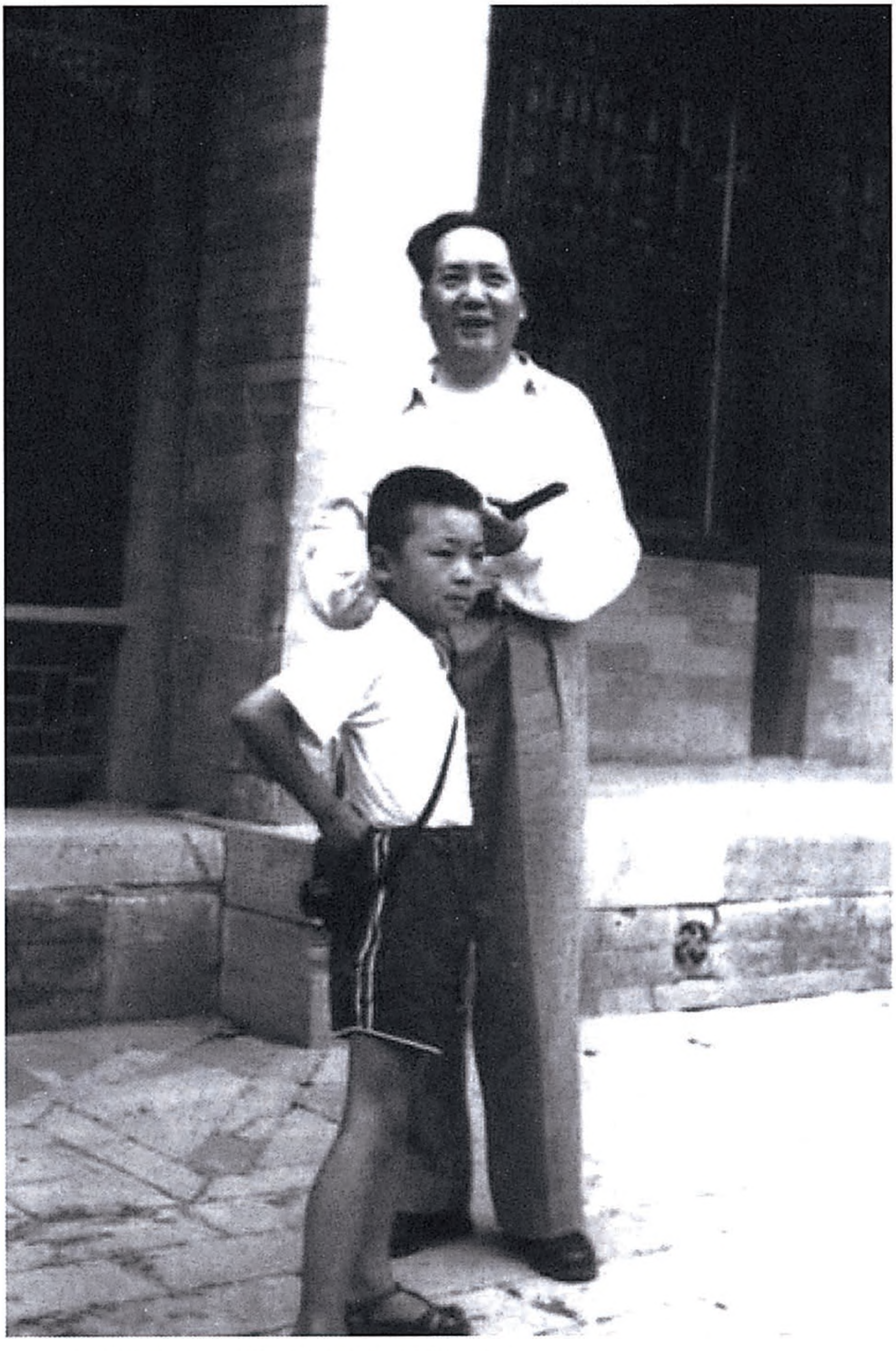
程师、铁路工程师、工程建筑师、林垦师、种橡胶的师，等等。比如荆江分洪工程的三十万人里边，就有十万人民解放军战士。程潜[1]将军的三个师，有两个师在进行水利建设。还有修建房子，现在我们不要包商了，就是用人民解放军的建筑工程师。

人民解放军的人数减少了，但是装备增强了，我们买了新式武器。在这个意义上讲，和平更有保障了。因为我们军队的力量增强了，保卫和平的力量也就增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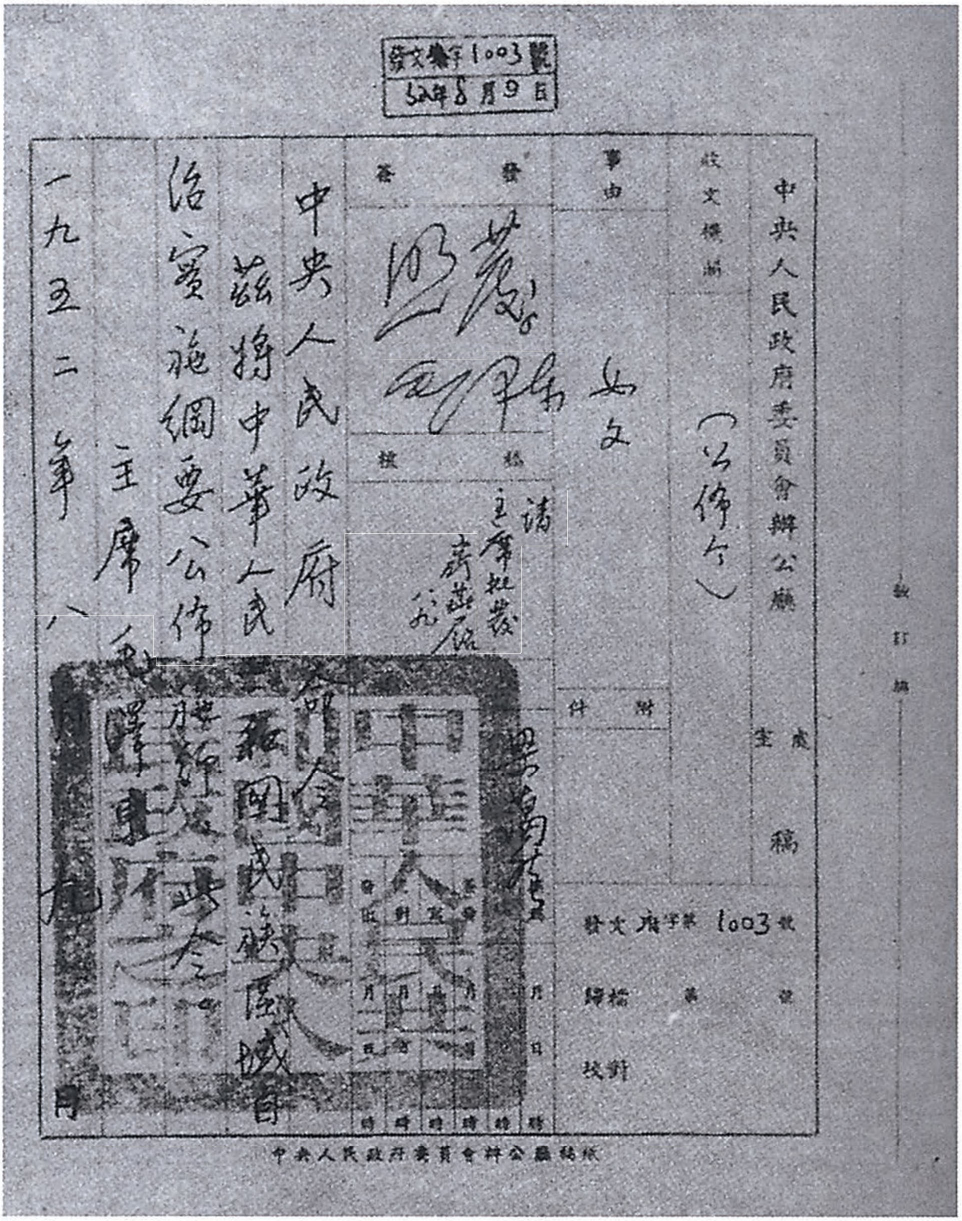
1952年8月9日，毛泽东和李敏、毛远新在香山听李讷讲故事。

---

[1] 程潜，原国民党军将领，1949年8月与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1952年8月，毛泽东和毛远新在一起。



發文廳字第1003號
52年8月9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
主處 稿

收文標號

（公佈令）

事由
如文

簽發
照發
毛澤東

核稿
請
主席批發
齊燕銘

附件

發文 廳字第 1003 號
歸檔 第 號
校對

中央人民政府
命令
茲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公佈施行
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八月九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辦公廳稿紙

裝訂線

1952年8月9日，毛泽东签发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它对增进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友爱合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应基本谢绝黑水地区群众对军队的慰劳品[1]

（1952年8月11日）

二、黑水群众在土司头人剥削下生活甚苦，加以一九三四年我军经过所给予损失甚大，为减轻其负担，对以前损失除考虑酌量救济以扩大我影响外，此时应基本上谢绝慰劳，只可对其慰劳品中约十分之一左右，当作人民的好意收受下来，并于数日后即向『送』群众还礼，以此种办法增进军民间的友谊。

---

[1] 这是毛泽东1952年8月11日审阅军委总参谋部一个电报稿时修改的一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黑水，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内，红军长征时曾经过这里。

祝贺朝鲜解放七周年的电报

（1952年8月13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同志：

值此朝鲜解放七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谨向您、兄弟的朝鲜人民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祝贺。

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解放、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对拯救世界和平的事业作了巨大贡献。

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祝在战斗中不断成长的、牢不可破的中朝两国友谊永远巩固，并祝朝鲜人民在解放战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三日北京

对烟潍铁路修建方案的批语

（1952年8月14日）

同意彭德怀[1]同志的意见，即先修兰〈蓝〉村莱阳烟台线及龙口烟台威海卫线，待此两线成后，再修潍县莱阳线或他线。修时应绕道多作隧道。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给陈毅[1]的信

（1952年8月15日）

陈毅同志：

来信收到。休养两个月很有必要。你参加中央再一次会议之后，即可去适当地点从事休养。俟身体康复，再返华东工作。你的工作岗位现时仍以留在华东为适宜，因为留华东作用更大，那边还很需要你工作。此复。即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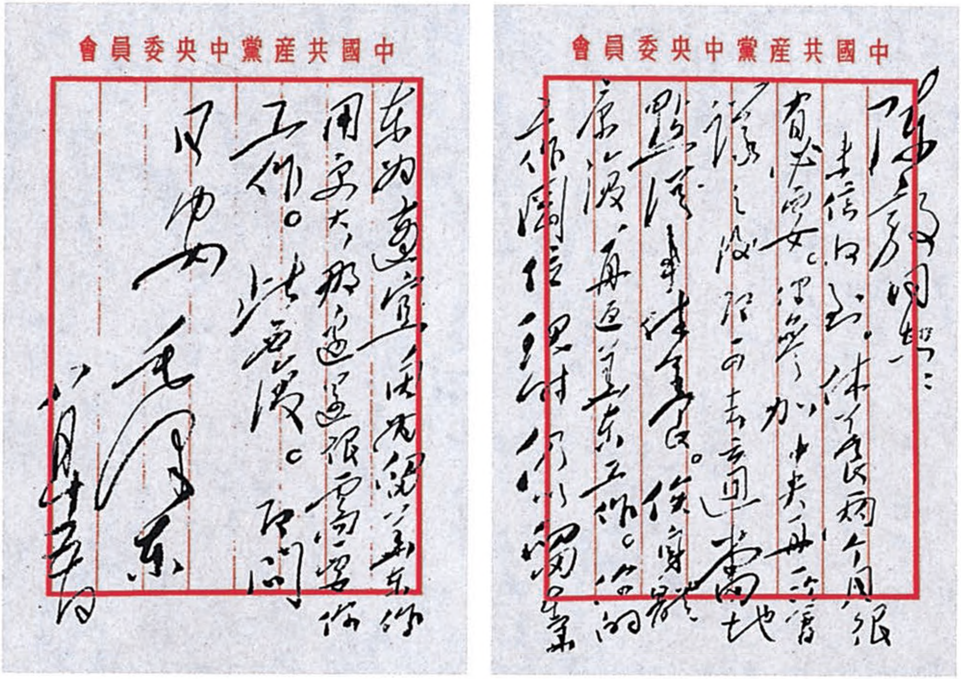
日安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陈毅同志：

来信收到。休养很有必要。你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即可去适当地点疗养。待身体康复，再回华东工作。谭震林同志现时仍留华东为适宜，他现在华东的用处大，那边还很需要他工作。此复。问近好！

毛泽东

八月廿五日

毛泽东致陈毅信的手稿。

关于同意向东南亚国家出售大米的批语

（1952年8月16日）

刘、朱、彭、邓[1]阅。

同意售米给锡兰、印度、印尼的计划。锡兰来京代表团首席如是其国贸易部长，我方到车站迎接者应以同等资格之人出面。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对肖向荣[1]摘报的总后情况简报第一号的批语

（1952年8月17日）

这种情报[2]有用，军委各部门均应做，由办公厅统一管理。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

[1]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2] 指肖向荣1952年8月16日报毛泽东的总后勤部情况简报第一号摘要。主要内容有：（一）8月在京召开志愿军财务、军需会议的准备工作情况。（二）军委各部门关于编制1953年度各项军费预算的座谈会情况。（三）志愿军补给工作的中心关键——汽车保证问题。（四）志愿军所需药品的订购问题。（五）卫生部所属天津医材厂缩减职工的安排问题。（六）改进文电处理办法和提高干部素质问题。

对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草案的批语

（1952年8月18日）

刘[1]阅，退邓[2]办。

同意这个决定[3]。加了一句[4]。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刘，指刘少奇。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3] 指送审的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说：中央人民政府自1951年7月成立文史研究馆，吸收了不少社会夙有声望的文人耆宿。华东、中南某些地区也设有类似组织，安置了一部分年老贫困的知识分子。估计全国各省、市有不少此类年老失业的知识分子需要照顾，因此决定：全国各省及中央或大行政区的直属市均设置文史研究馆（大区、专、县及省属市不必设立），如某些省、市原已成立类似机构的，必要时可更换名称，不必重复设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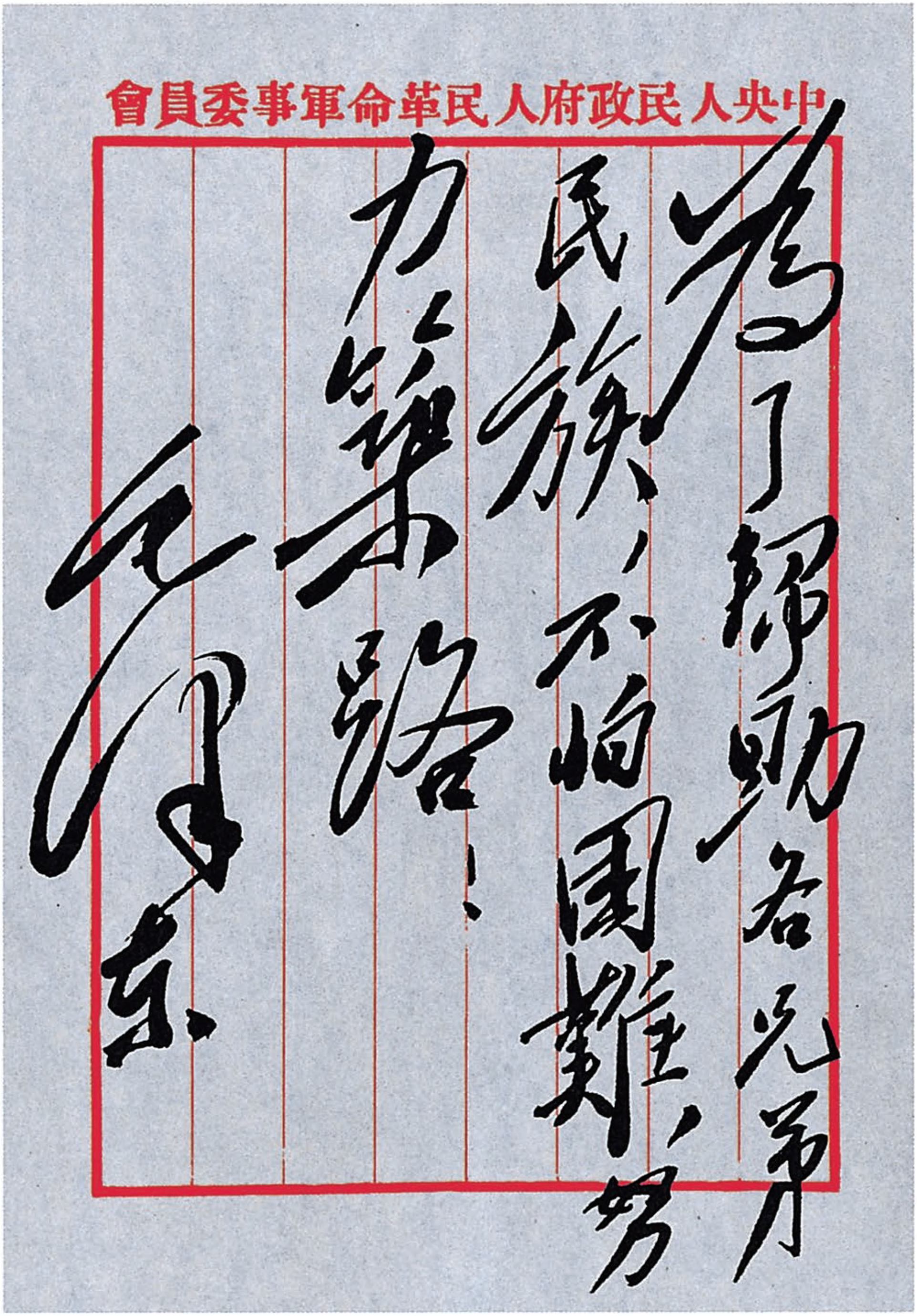
[4] 毛泽东加写的一句话是："某些省市无设立此项机构之需要者，亦不必设立。"

为康藏公路开工题词

（1952年8月18日）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毛泽东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難，努力筑路！

毛泽东

毛泽东为康藏公路开工的题词。

给毛宇居[1]的信

（1952年8月21日）

宇居兄：

来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前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但请你向他们二位说清楚：（一）须他们自己下决心，出远门难免有风险；（二）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还家乡。如他们同意这两点，则可于阳历九月间动身北来。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刘道衡部长处接洽，领取来京路费，办理乘车事宜。介绍信一件，请予转致李、邹二位。其余要来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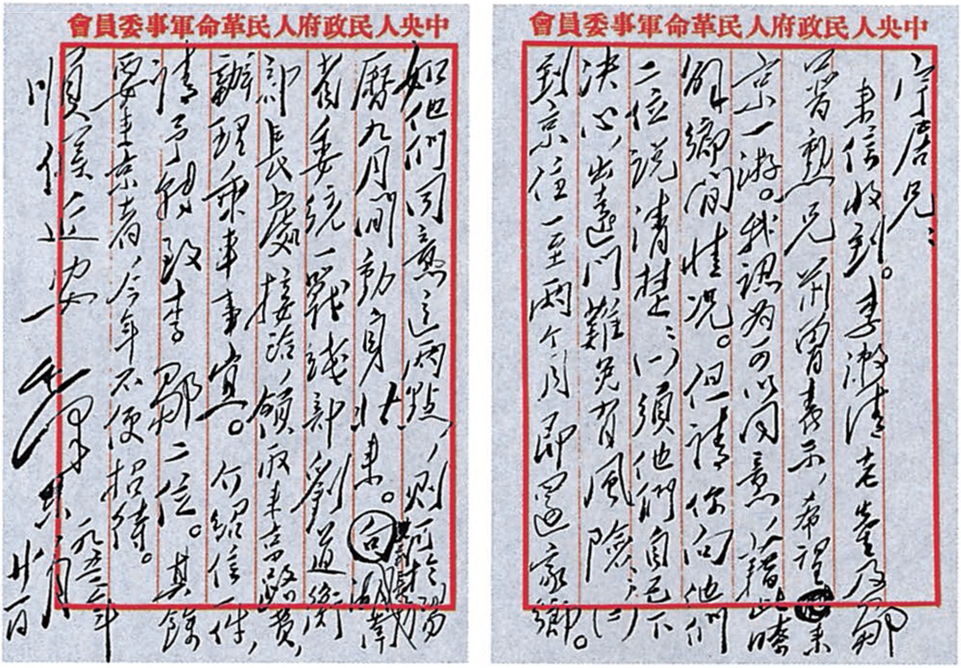
顺候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

[1] 毛宇居，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房兄和私塾老师。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宇居兄：

來信收到。李漱清老先生、鄒普勳先生前曾表示，希望來京一游。我認為可以同意，藉此瞭解鄉間情況。但請你向他們二位說清楚：（一）須他們自己下決心，出遠門難免有風險；（二）到京住一至兩個月即回家鄉。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如他們同意這兩點，則可於陽曆九月間動身北來。向湖南省委統一戰線部劉道衡部長處接洽，領取來京路費，辦理乘車事宜。介紹信一件，請予轉致李鄒二位。其餘要來京者，今年不便招待。

順候近安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八月廿日

毛泽东致毛宇居信的手稿。

对增修两个机场报告的批语[1]

（1952年8月22日）

应当加修两个机场，费用照支，动工要早。[2]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8月22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苏联方面要求在安东附近增修两个喷气式飞机场，以便于在此驻扎的苏联空军罗果夫部队的机动和充分发挥力量。经与空军参谋长王秉璋研究，认为现在安东、大东沟、大孤山、凤凰等地共有4个机场，驻扎中苏空军6个作战师，比较拥挤。为作战时能同时起飞较多的飞机，是需要增加机场的，但时间很急促，入冬即不能修，并需款约2200亿元（人民币旧币）。

关于向朝鲜赠送冬服的批语[1]

（1952年8月23日）

彭[2]：

卅万套冬服，可作赠送。

毛泽东

八月廿三日

---

[1] 1952年8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朝鲜今冬有60万人没有冬衣，希望中国帮助解决，至少帮助解决一半。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于8月18日、22日先后两次将朝方要求电告彭德怀。毛泽东在看了洪学智8月22日的电报后写了这个批语。8月28日，外交部草拟以周恩来名义给中国驻朝临时代办甘野陶的电报，答复朝方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在审阅这个电报稿时加写了以下文字：“请告朝鲜政府，此三十万套棉衣作为赠送，不要付款，也不要记帐。”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对总政关于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的报告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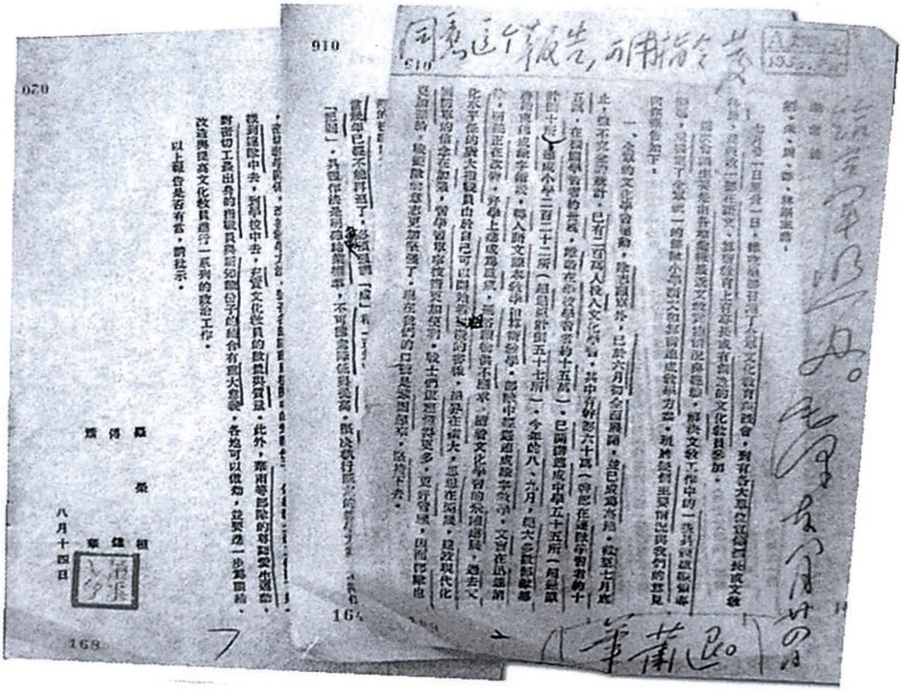
（1952年8月24日）

同意这个报告[1]，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办。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肖华1952年8月14日关于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主要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的报告。报告说，会议再一次强调了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重点的方针，并照顾到可以培养为干部的青年优秀战士，明确排以上干部在三五年内的努力目标是普遍达到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国内部队从现在起到明年5月，皆应把文化教育当作部队工作的中心任务，并开展文化练兵中的立功创模运动。



同意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总政照办。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毛泽东批示的总政治部关于文化教育座谈会的报告。

对聂荣臻关于中南军区部队二期整编工作报告[1]的批语

（1952年8月24日）

陈明仁[2]部应当留一个师，不应编掉，也不要编为炮兵团。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8月23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说，中南军区部队的二期整编方案，拟将第二十一兵团尚余的原陈明仁起义部队的1个师编为该兵团所属3个炮兵团。聂荣臻在报告中提出，“惟目前火炮装备条件不够，不可能按照将其三个炮兵团装备起来，势必再将其编掉，在政治上这是值得考虑的。因此，我们认为现二十一兵团尚有原起义的一个师，在这次整编中仍应作为一个师编留较为适宜”。

[2] 陈明仁，原国民党政府军将领，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

在总政关于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1952年8月25日）

肖华同志：

此件[1]很好。请用中央和军委联署名义起草一个电报，致各大军区、志愿军、各特种兵、军事学院，并告各中央局分局，批准这个报告，对所提四项建议[2]责成各地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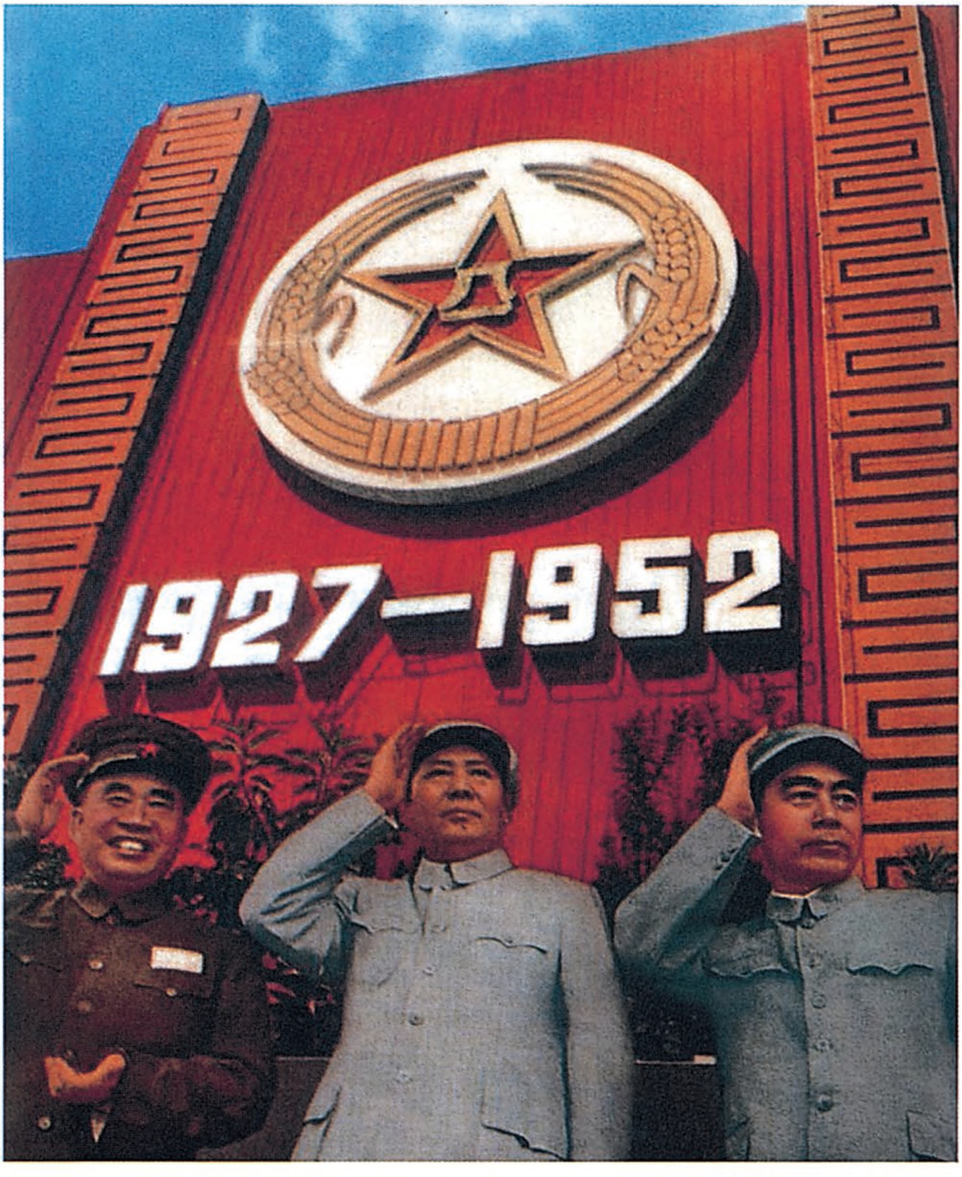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八月廿五日

---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肖华1952年8月23日关于“八一”建军节二十五周年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这次大会基本上是胜利的、成功的。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科学水平和政治文化艺术教养，增强指战员的体质，培养革命军人的高尚品质，养成紧张、活泼的精神，以加强部队的战斗力，今后应当注意：（一）竞赛要建筑在各级领导重视及平时训练工作的基础上。（二）部队体育运动必须是有组织、有领导、有制度的。开展体育运动，应成为各级军政机关领导任务之一。（三）为达到普及与提高的目的，总政治部暨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及其他重要单位，必须成立专业体育工作队，或体育训练班，将优秀的运动选手和有培养前途的人员，集中到体育工作队中去。（四）文化艺术工作仍应继续贯彻“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五）今后像这样的运动会，建议全军或以大军区为单位，坚持每年开一次，使之成为一种制度。

[2] 实际上是五项建议，见本篇注[1]。



1952年8月，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在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上。

1952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全军体育运动大会上。

1952年8月，毛泽东、朱德等在全军体育运动大会上。

1952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观看全军体育运动大会的比赛。

关于同意苏联提出的旅顺口换文和移交中长路公告的电报

（1952年8月30日）

恩来同志：

八月二十八日电[1]收到。我们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旅顺口的换文[2]。也原则上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移交中长路的公告[3]。

毛泽东

八月卅日廿四时

---

[1] 指周恩来1952年8月28日关于中苏代表团第二次会谈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正式换文的时间为1952年9月15日。

[3] 指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公告于1952年9月15日宣布，中国长春铁路应于1952年12月31日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完毕。

给赛福鼎[1]和帕哈太克里乡农民的信

（1952年8月30日）

一

赛福鼎同志：

根据你的意见，对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的农民同志们的来信，写了一封回信，烦为转交为荷！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卅日

二

喀什区疏附县帕哈太克里乡全体农民同志：

感谢你们今年三月在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时写给我的信。你们已经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中获得解放，希望你们在爱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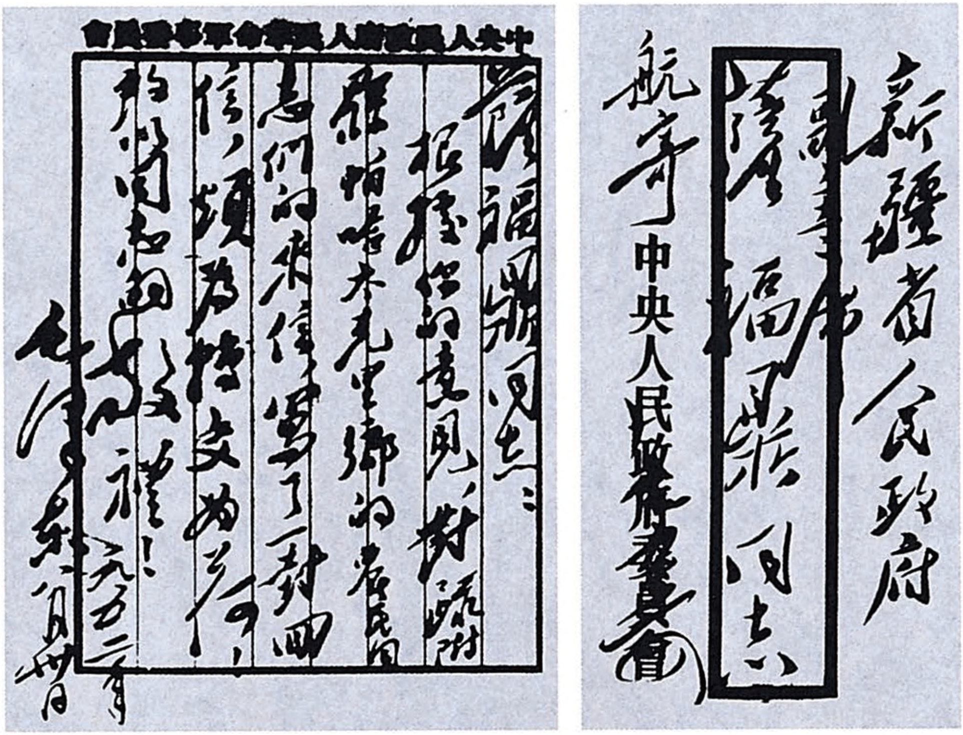
---

[1]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丰产的口号之下，更加团结，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赛福鼎同志：

根据你的建议，对疏附

县帕哈太克里乡的农民

们的来信写了一封回

信，请为转交为荷！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八月卅日

新疆省人民政府

副主席

赛福鼎同志

航寄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毛泽东致赛福鼎信的手稿。

对军事学院关于遗失文件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9月1日）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八日报告[1]阅悉。大力整顿，已有成绩，免予处分。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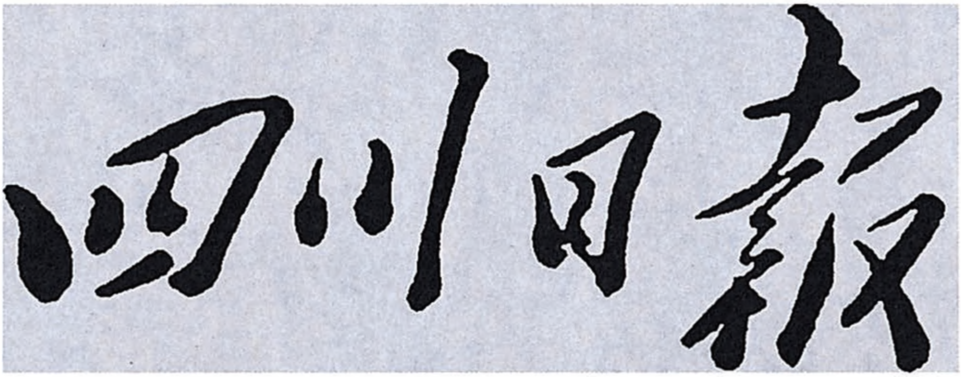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1952年8月28日关于遗失文件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处理经过和整顿措施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5月进行文件大清查，发现严重失密现象。院领导除责成保密处继续追究外，一面在全院进行保密教育，一面对失密事件普遍追究责任，分别轻重，给予行政与刑事的处理。在组织分工方面，院党委决定，一方面在行政上继续整顿保密工作，另一方面从学院党委直至支部，都设立保卫保密委员，负责掌管保密工作。同时，按照军委命令，将文件划分密级，规定不同的发行、阅读与保管办法，并修订保密规则和文件收发手续。报告最后说，年余来学院领导对保密制度检查不严、纠正错误不力，造成了失密的错误，除今后督率所属严格执行保密制度外，请给院长以应得的处分。

为《四川日报》题写报头[1]

（1952年9月1日）

四川日报



毛泽东为《四川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52年9月1日，《四川日报》创刊。这是毛泽东为创刊号题写的报头。

对赵尔陆[1]关于二机部初建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9月2日）

退赵尔陆同志。

此件[2]已阅，很好。注意保密与肃特，极为必要。

毛泽东
九月二日

---

[1] 赵尔陆，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2] 指赵尔陆1952年9月1日关于二机部初建等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报告说：原隶属重工业部的航空、兵工、坦克3个工业局的领导机构与所辖工厂已正式拨交二机部领导。目前工作重心拟定为建立、健全与调整机构，调配干部，充实工厂，熟悉情况，并为迎接新的生产建设任务准备条件。据初步了解，在机关和工厂中，尚存在组织不纯、控制机密不严的严重情况。此事已向各级干部强调提出，以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并责成各局领导即行全面了解情况，研究对策，以“纯洁内部、严格制度、加强保密设备”作为进行这一工作的3个环节，确实达到保障国家机密与军事工业安全建设的目的。

对柯托夫[1]关于空军飞行事故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2年9月2日）

完全同意这个建议[2]，由聂[3]总参谋长组织实施。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

---

[1] 柯托夫，苏联专家，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顾问。

[2] 柯托夫1952年8月27日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报告，列举了1952年1月1日至8月1日我国空军所发生的飞行事故的严重情况，分析了造成这些事故的基本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消除我国空军飞行事故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对飞行事故的认识、加强军队和飞行纪律、拟定对事故责任者给予应得的处分等12条。

[3]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2年9月2日）

斯大林大元帅：

在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的时候，请接受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的热烈的祝贺与衷心的感谢。

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苏联军队歼灭日本军队的主力——关东军，帮助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苏联在中国的恢复与建设过程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使中国人民的力量获得迅速的巩固与壮大。

现在，当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日本侵略势力又重新抬头的时候，中国与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是共同制止日本和其他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

对全军整编情况和在朝作战部队轮换计划的批语[1]

（1952年9月2日）

同意这个报告及轮换计划[2]。明年三月至六月四个月内换七个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8月30日报告的批语。

[2] 指聂荣臻报告汇报的全军整编情况和在朝作战部队轮换计划。报告说：关于全军整编情况，部队整编按1952年1月5日批准的计划进行，到现在为止，全军现有人数为430万人，其中尚有20万人要在第二期精简整编中续作处理。全国正规部队，在整编前有53个军，185个师，整编后仅有36个军部、115个师。根据现在整编情况来看，按照去弱留强的原则，已将可能进行整编的部队大体都进行了整编。关于在朝作战部队轮换计划，主席对部队采取轮换作战的指示意图，主要是要使国内部队不失时机地获得对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锻炼，以求提高现代作战经验，同时也可以照顾到出国作战较久的部队能得到必要的休整。根据主席批示以军为单位进行轮换的原则，我们提出部队轮换作战计划：入朝轮换作战的部队应选调较强的部队，力求迅速实施，并按在朝部队出国作战时间的长短为次序，在不影响前方作战和国内防务的原则下分期进行。第一期轮换4个军，第二期轮换7个军，从而将在朝现有部队，除入朝较晚的4个军暂不轮换外，其余全部换回国内休整，并能依进口装备的到来逐一进行改装，分别配置到东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华北等地担任防务。在朝作战的部队轮换后，保留15个军45个师。

军是否觉得太紧一点而须延长时间，可到那时再定。

毛泽东
九月二日

对黄炎培一篇讲话稿的复信、批语和修改[1]

（1952年9月5日、13日）

一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

---

[1] 1952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同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对民主建国会的工作谈了几点意见。9月4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在他向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的讲话中，传达和阐发这些意见，并将拟就的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话要点送毛泽东审阅。次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复信，并将修改过的讲稿退回。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给黄炎培的复信。本篇第二部分是毛泽东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9月7日，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这一讲话。会后，他将这篇讲话送《人民日报》发表。9月12日，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将这篇讲话的清样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黄炎培“开头引过主席的指示，没有说明经过情形，恐读者不易明白。我们已请民建会补发消息”。毛泽东对清样作了一些文字性的修改后于次日退回。本篇第三部分是毛泽东退清样时写的批语。本篇第四部分是黄炎培在讲话中转述的毛泽东3月15日同他谈的对民主建国会工作的3点意见。

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1]，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

[1] 五毒，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1]，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二

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

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讲稿中的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

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

---

[1] 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右”即“如上”。

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三

请黄副总理审阅，退还邓拓同志：

（一）在文首加了一句，即可不要补发消息了。[1]（二）应于明日（十四）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并由新华社予以广播。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二时

四

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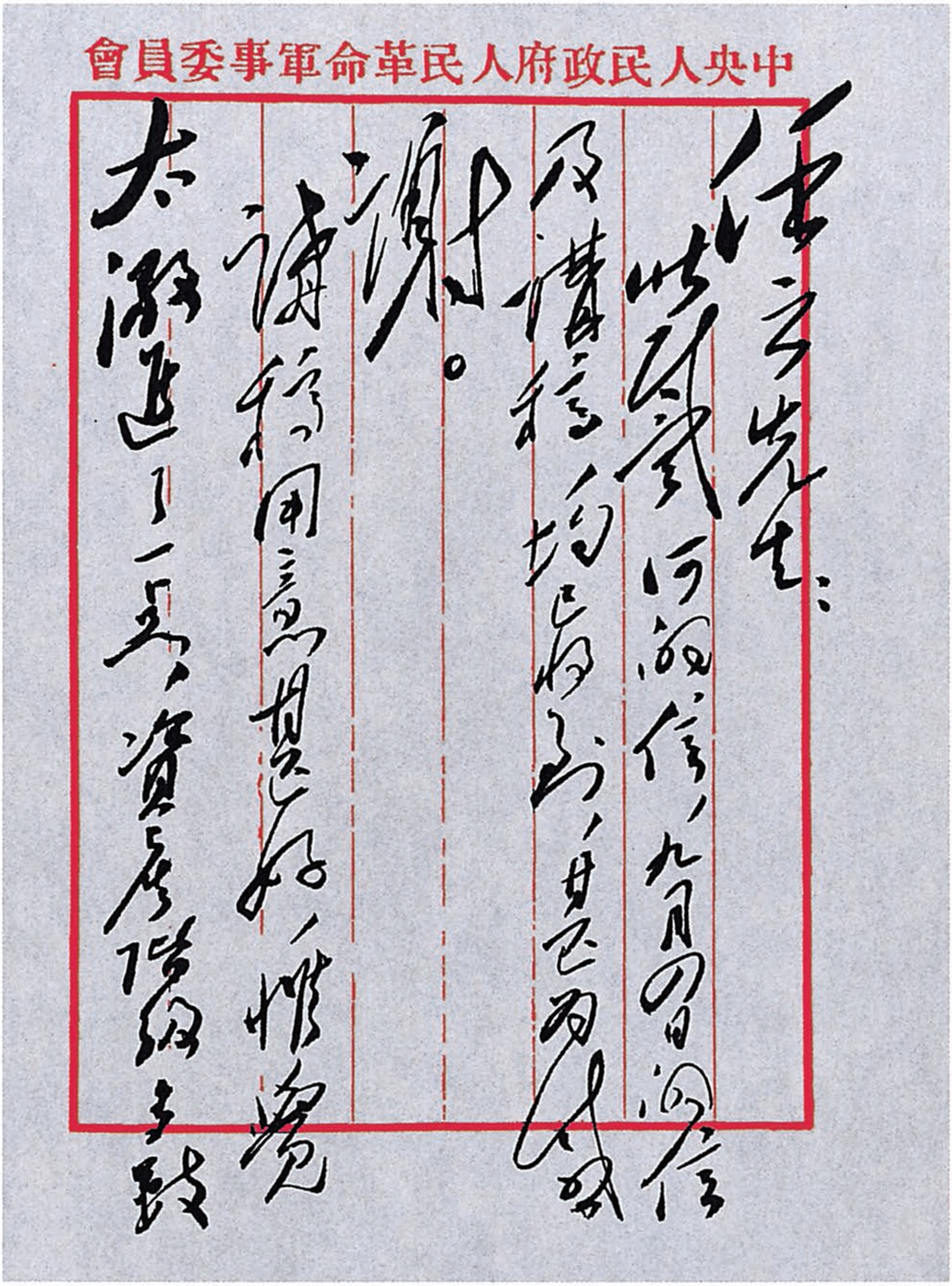
---

[1] 毛泽东在审阅黄炎培讲话的清样时，将讲稿第一句“毛主席给我们的指示”，改写为“今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和我谈话时，曾对我们的工作有所指示”，并在批语中告诉邓拓不要补发消息了。

方面发展。

二、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

三、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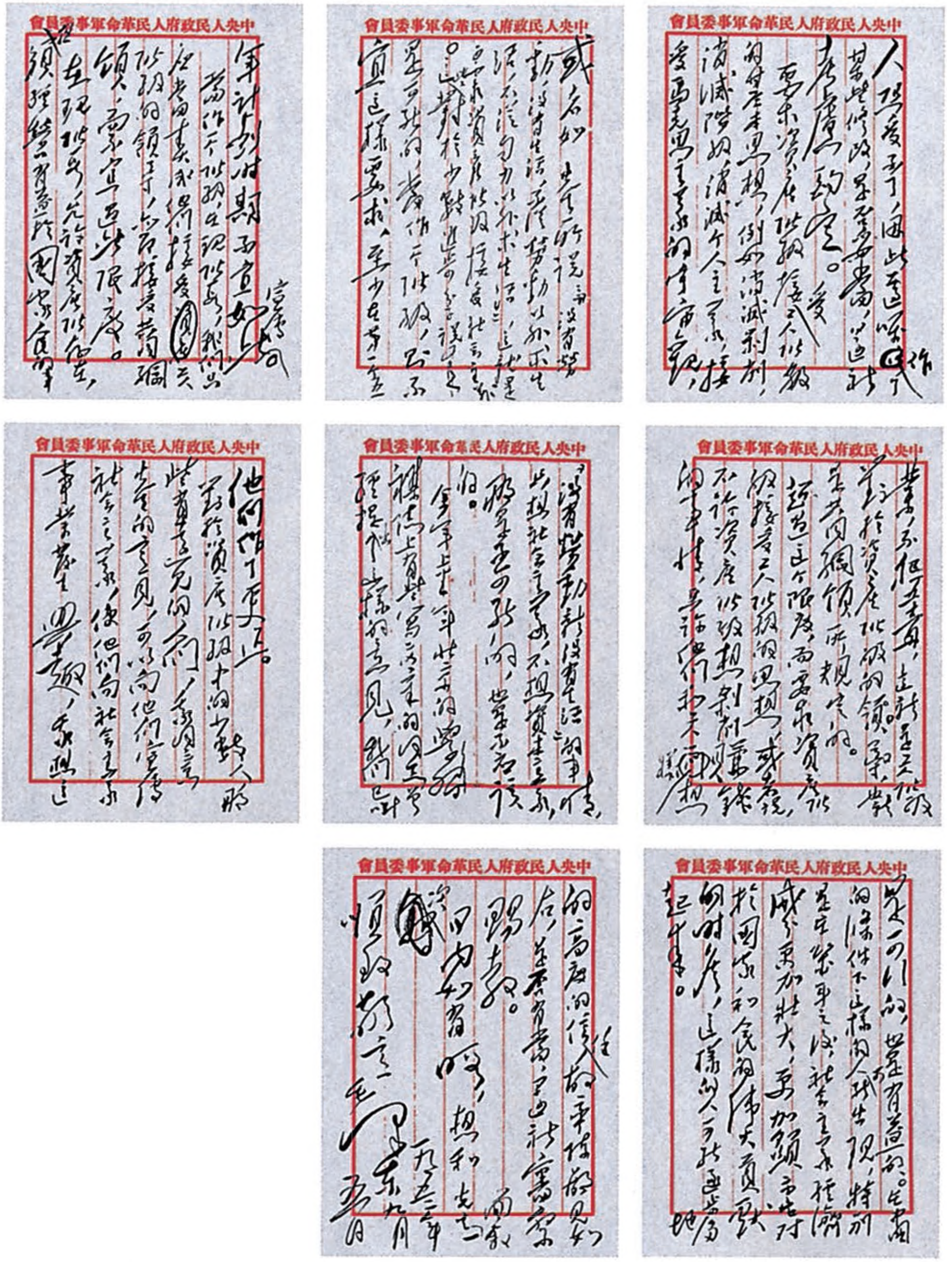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任之先生：

收讀何遂信，九月四日兩信及講稿均已讀，甚為感謝。

講稿用意甚好，惟覺太激進了一點，資產階級大致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部分）。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部分）。

关于同意中、苏、蒙对修中蒙铁路的意见的电报

（1952年9月6日）

恩来同志：

九月四日电[1]收到。同意你们关于中苏蒙铁路的意见，并同意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协定。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指周恩来1952年9月4日关于同意苏蒙两国提出的中苏蒙三国对修中蒙间铁路协定的报告。报告说，协定草案的中心问题有四：（一）双方（中国为一方，苏、蒙为一方）对修铁路至中蒙边境；（二）双方均按一五二四公厘宽轨修筑；（三）今年开始勘察设计，1953年动工，1955年内完成；（四）该路由内燃机车牵引，具备每昼夜对开十二次列车的能力，将来经协议提高到每昼夜对开二十四次列车。关于协定公布时间，我们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待铁路修成后再行公布。

对习仲勋[1]在中共新疆省第二届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9月9日）

习仲勋同志的报告[2]很好。惟在说到宗教的时候，他说，“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这和历史情况不全适合，故将这一段作了一些修改[3]。其他地方，有一些小的修改。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2] 指习仲勋1952年7月15日《在新疆省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传达中央指示及对检查新疆工作的意见》。报告肯定了新疆分局工作中的成绩，指出了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主要是牧区工作中的方针性错误。

[3] 毛泽东删去习仲勋报告中“封建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只是利用了宗教，而非由他们创造了宗教。因之，宗教不会随着封建剥削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这段话，加写了以下的话：“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

对军马疫病防治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52年9月9日）

此件[2]甚好。请邓小平[3]同志一阅，交彭德怀[4]同志处理。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方勤务部部长杨立三、总后方勤务部兽医局副局长任抟九1952年9月5日报告的批语。

[2] 指杨立三等的报告。报告说：牲畜和军马防疫卫生工作做得很不够，甚至还没有引起各方应有的注意，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牲畜与军马的防疫卫生与人的防疫卫生有多方面的关联，全国牲畜的健康与否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而军马的健康与否更直接影响着战斗力。我们感到对军马危害较大的疫病，有锥虫病、骨软病、炭疽与破伤风、鼻疽，而鼻疽是我们认为非常严重而目前尚不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治的最大问题。防治鼻疽的关键，在于有一定数量并具有相当程度技术能力的兽医人才。报告最后提出，需要尽快地加紧培训兽医人才，改变全国农学院校中兽医系之现状。

[3] 邓小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4] 彭德怀，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对空军消灭飞行事故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2年9月9日）

同意[2]。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9月9日报告的批语。

[2] 聂荣臻的报告说：空军建立两年半来，在飞行训练中连续发生大小事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今年8月下旬至9月上旬召开空军消灭飞行事故会议。会议认为，必须彻底消灭飞行事故才能打好空军建军的基础，并提出了消灭事故的办法：（一）必须严格照条令办事，加强纪律。（二）加强业务学习，由外行变为内行；克服官僚主义，认真组织检查。（三）责成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制定严格认真的检查飞行事故的制度，加强党政工作与训练工作的配合。要求苏联军事顾问从各方面帮助空军部队和学校消灭事故，同时我空军干部必须虚心向顾问学习。（四）肃清空军内部及外部反革命破坏活动。

关于提倡做提要的批语[1]

（1952年9月10日）

尚昆[2]同志：

这种提要[3]办法很好，办公厅也可照做。

毛泽东

九月十日

---

[1]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写在1952年9月9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二〇七号上。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写的新闻提要。这种提要文字简短，一目了然，便于事务繁忙的领导干部用较少的时间了解较多的情况。

关于解决华北各地职工疾病问题的批语[1]

（1952年9月11日）

一波[2]同志：

请与华北局同志商量，是否可以为解决工人疾〔病〕问题，召开一次专门会，决定实施办法？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2年9月10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二〇八号上。这一期《内部参考》刊载有《华北各地职工的疾病情况严重》的报道。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

中央同意中财委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的方案的批语

（1952年9月13日）

中财委党组：

（一）基本上同意你们关于清偿解放前人民存款问题的方案[1]，但尺度还须放宽些，望根据放宽的尺度制订一个具体清偿办法，再送中央核阅。（二）此事应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可待周总理回国后举行。

中央

九月十三日

---

[1] 中财委党组的方案提出，现在全国财经情况已经根本好转，为了维护社会信用，给银行贷款存款创造有利条件，决定无论抗战前或抗战后，凡解放前存款一律归还。方案还根据存款的不同情况规定了以下处理原则：（一）首先照顾大多数小额存款户，适当照顾大额存款户，偿还倍数采取对小户多大户少的分级递减折扣办法。（二）偿还倍数按目前银元牌价计算。（三）所有存款一律还本金不还利息。（四）采取分期偿还办法，先还小户，后还大户，小户凭单据一次还清，大户登记分期归还。

关于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等致周恩来电

（1952年9月13日）

恩来同志：

（一）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准备讨论朝鲜问题，墨西哥提出解决俘虏问题的三点建议。（即第一，双方俘虏已表示愿意返国者应予交换；第二，其他俘虏由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给予暂时避难的权利，这些俘虏应按照以后确定的办法予以遣返；第三，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后，这些俘虏的母国应该向他们提供一切保证和便利，以便他们能够马上返国，如果在朝鲜局势完全恢复正常以前，有些俘虏要求遣送返国，有关政府也应该同样办理，并应给予他们回国的种种便利。）看来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是英国策动的，墨西哥的这个提议可能也是英国策动的，美国对前者表示愿意讨论，对后者尚未表示态度，我们对此二者应取何种态度，请与苏联同志商定。（二）印度和缅甸从侧面表示愿和我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并表示希望你访问印、缅一次，其本意是尼赫鲁[1]想来访问中国，然后希望中国总理还礼访问印度。此事是姚仲明[2]大使返〈反〉映的，我看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2] 姚仲明，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很有可能提出来谈，如印、缅正式提议我们不大好拒绝，究竟是否可以和印、缅签订上述协定，亦请和苏联同志一商。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廿二时

给章汉夫[1]的信

（1952年9月14日）

汉夫同志：

周总理电告有关中长路的公告及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2]，即将于十五日或十六日在莫斯科签字，当日发表，第二日登报。请约邓拓熊复[3]同志一商，立即起草一篇社论[4]，并于十五日下午送我一阅。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章汉夫，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有关中长路的公告，即《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1952年9月15日）；有关苏军延期撤出旅顺的换文，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部长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1952年9月15日）。

[3]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4] 这篇社论的题目是《发展中苏同盟的强大力量》，载于1952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关于不能接受墨西哥对战俘问题的三点建议的电报

（1952年9月16日）

恩来同志：

九月十四日电[1]悉。墨西哥三点建议[2]是美国策动的，英国表示不满意，说要有所补充，或另提英国的方案。墨西哥建议是将俘虏分散到各国分配工作“不能违背他们的意志”云云，这个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二时

---

[1] 指周恩来关于1952年9月12日和斯大林谈话情况的报告。

[2] 指墨西哥提出的解决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三点建议。

在中央转发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的电报[1]稿上加写的话

（1952年9月16日）

中央希望西北西南中南每个有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地区的县委及地委都和甘肃靖远县委及定西地委一样，于切实检查所属区乡的工作情况后向中央写一个报告。此电及附件可在党刊上登载。

---

[1] 指中共中央1952年9月16日批转甘肃定西地委关于执行民族政策的检查报告给西北局并告西南局、中南局的电报。本篇是毛泽东在这份电报稿末尾加写的一段话。

关于朝鲜前线阵地播音问题的批语[1]

（1952年9月17日）

肖华[2]同志：

阵地播音极为重要，是否已普遍筹备了播音设备及播音人员？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政治部1952年9月4日关于“八一五”前后前线对敌政治攻势情况给兵团政治部和志愿军政治部的报告上。报告谈到在阵地宣传方面，喊话已发展到对话和播音，共播音10次，播放材料24篇，我前沿干部战士对此非常欢迎。

[2]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水利部关于汉江黄家场决口后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2年9月17日）

邓、薄[2]：

请商水利部提出根治汉水计划，考虑是否可以列入明年预算。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洞庭湖、荆江北岸、汉水三处同治，财政上是否可能？

---

[1] 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1952年9月16日关于汉江黄家场决口后的情况报告，讲到黄家场在9月14日凌晨2时半发生决口，已组织300只船进行抢救，绝大部分人已被救出，仍有少数被淹死。沔阳县有8个区被淹，共计面积约80万亩，淹掉田里的部分棉花及豆子，灾民约30万人。湖北省人民政府已运去赈粮抢救。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给李达[1]的信

（1952年9月17日）

鹤鸣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几信也都收到了。爱晚亭三字已照写如另纸。

《矛盾论》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无论什么矛盾，也无论在什么时候，矛盾着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这里“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八字应删，在选集第一卷第二版时，已将这八个字删去。你写解说时，请加注意为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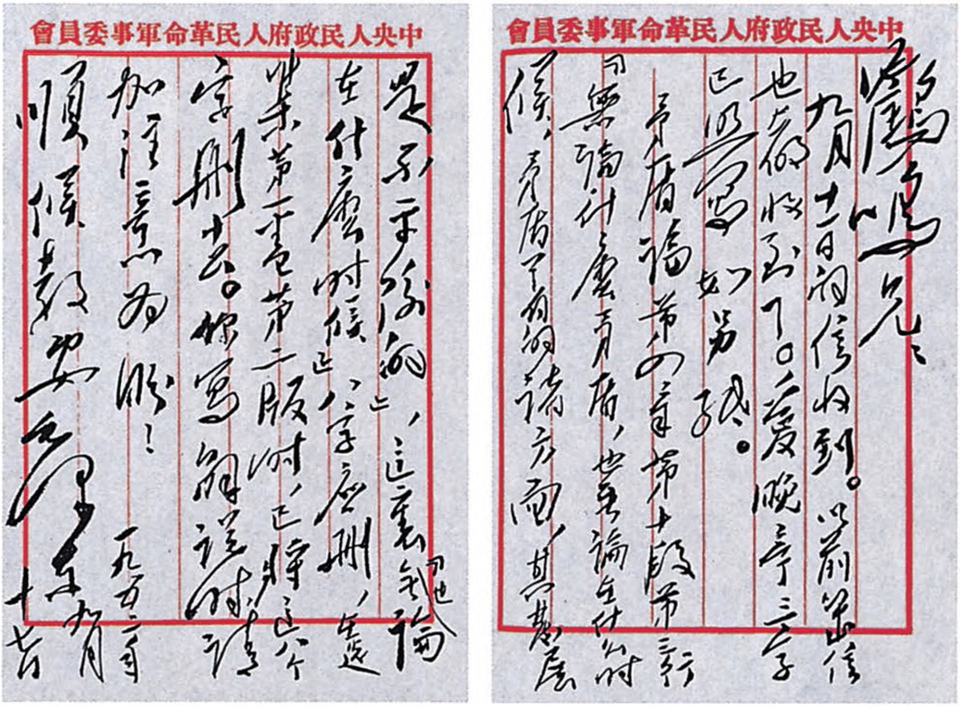
顺候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

[1] 李达，字鹤鸣，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鶴鳴兄：

九月十一日的信收到。以前幾信也都收到了。愛晚亭三字已照寫如另紙。

矛盾論第四章第十段第三行「無論什麽國家，也無論在什麽時候」，[illegible]方面，[illegible]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是否筆誤，這裏「也無論在什麽時候」八字應刪。選集第一卷第二版時，將這八個字刪去。你寫解說時請加注意為盼！

順候教安！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毛泽东致李达信的手稿。

给李贡人[1]的信

（1952年9月17日）

贡人先生：

惠书敬悉。嘱件已转程颂云[2]主席酌处。此复。

顺颂

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

---

[1] 李贡人（1877—1960），湖南韶山市杨林乡纯和村人，后迁居湖南湘乡市金石镇。曾长期在长沙一些中学或专门学校任教。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 程颂云，即程潜（1881—1968），湖南醴陵人。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李贡人于1952年9月7日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因生活困难，想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请毛泽东将其介绍给程潜批准。9月17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程主席酌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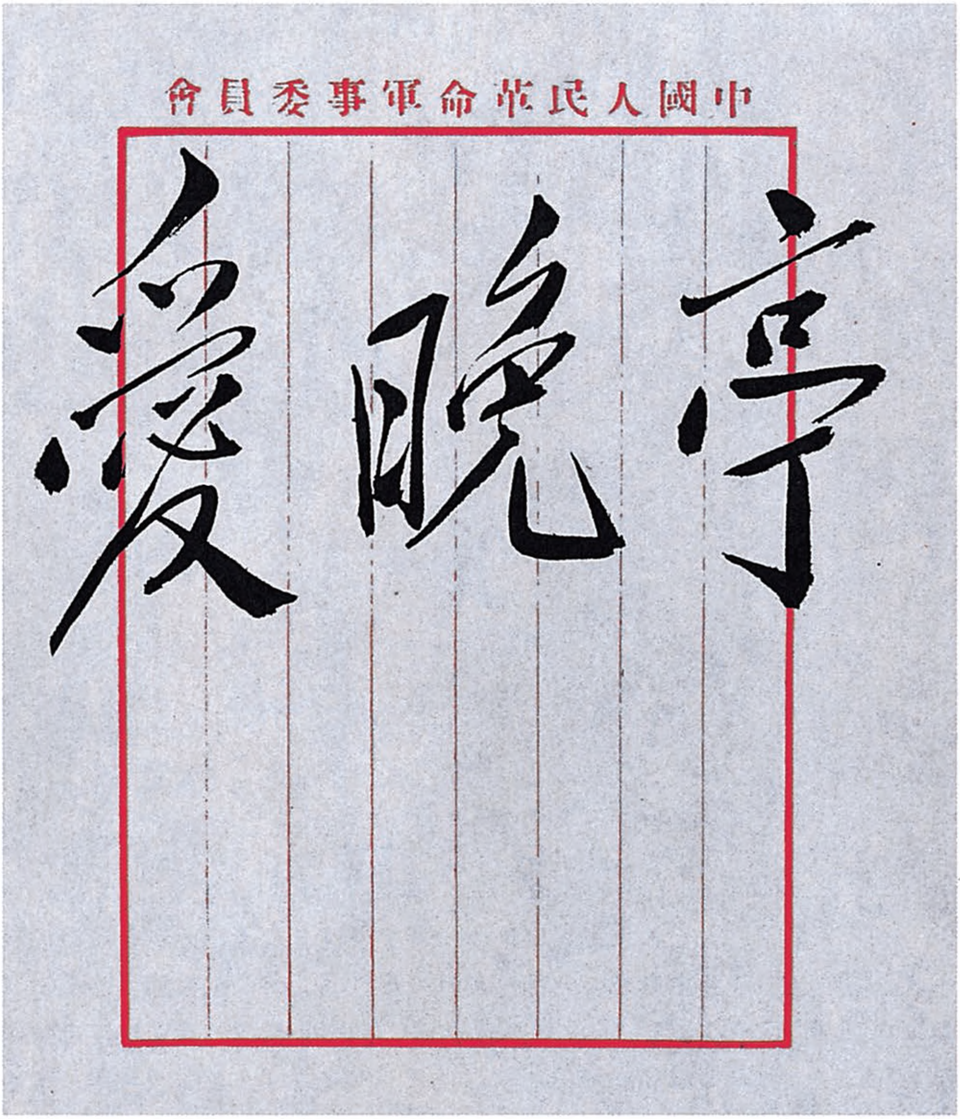
为爱晚亭题名[1]

（1952年9月）

爱晚亭

---

[1] 爱晚亭，位于岳麓山下清风峡中，亭坐西向东，三面环山。出岳麓书院后门，沿石径行200米，便是爱晚亭。清乾隆五十七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创建。原名红叶亭，后湖广总督毕沅据唐代诗人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改为爱晚亭。毛泽东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求学，常与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一起到岳麓书院，与蔡和森聚会于爱晚亭下，纵谈时局，探求真理。因为这个缘故，1952年湖南大学重修爱晚亭时，校长李达致书毛泽东，请求题写亭名，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请求。现在的爱晚亭亭匾，就是由毛泽东亲笔手书制成的。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爱晚亭

毛泽东为爱晚亭题写的亭名。

关于较重要外交复文的送审问题的批语

（1952年9月17日、18日）

一

小平[1]同志：

此电[2]所说，与我们商定者不符。外交部发此电未先送审，请你查询告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1952年9月13日关于朝鲜拟派技术人员、技能者600余人来我国实习事给中国驻朝使馆的复电。复电表示，因我国各业各工厂生产繁忙，来人多安排有困难，以少派为宜。

二

周、邓[1]阅，送章汉夫[2]同志：

外交部最近**有些较重要的**外交复件未送中央审阅，对朝鲜的复电与中央的决策及我们面告朝鲜同志者不相符合，是不妥的。以后请加注意，除例行事务外，凡较重要的外交复文，均须送总理及我审阅之后，再行发出，以免出乱子。此事去年（或者是今年上半年?）有一次即告诉过你，要事不送审是不对的，你曾作了自我检讨，如何又忘记了?

毛泽东

九月十八日

---

[1] 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

[2] 章汉夫，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对轻工业部七八两月工作综合报告的批语

（1952年9月18日）

薄一波[1]同志：

这种报告[2]很好。请指令中财所属各部党组务必每两个月做综合报告一次，中财并应指定一人负责检查督促。

毛泽东

九月十八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财委党组1952年9月17日转报的轻工业部7、8月份工作综合报告。报告谈到管理体制调整以后轻工业部管辖的重点行业的种类，1953年的基建、生产控制数字草案和今年7、8月份的生产情况，并对卷烟专卖、改进轻工产品质量、统一规格标准、安全生产等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关于《毛泽东选集》俄译本分卷问题致周恩来电

（1952年9月19日）

恩来同志：

毛选第二卷俄文译本可以照尤金[1]的意见分为两卷，第三卷如太厚也可以分为两卷，请告尤金同志。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

---

[1] 尤金，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当时任《苏联图书》主编。

关于实行小仓库制问题的批语

（1952年9月20日）

薄一波[1]同志：

此件[2]值得注意。请要粮食部党组，将此件及此件内所说“中南局指示的两步入库办法”及此件末称河南的“小仓库建设办法”一并收集研究，定出一整套办法发给全国遵行。

毛泽东

九月廿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1952年9月17日转发的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9月8日关于实行小仓库制给各地委、专署的指示。指示说：河南省历年公粮入库工作中，由于仓库集中，入库时间集中，送粮路途远，入库计划不周，民工组织不善和夏征时天气炎热等原因，均发生过严重的人畜伤亡、粮食入库后倒运现象严重、耽误生产等问题。其关键是整个入库制度有缺陷。中南局指示的两步入库办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环节所在。河南省根据这一指示精神结合省内情况，决定对现有300余个较大仓库充分利用，其周围30里群众送粮当日可以往返的乡，由现有大仓库直接接收，不设小仓库，其他的乡按两次入库办法，先以乡为单位集中入小仓库，再根据调粮计划，利用农民空余时间组织义运入大仓库。义运里程仍为50里，超过50里的按规定发运费。

致阜新发电厂工程队职工电

（1952年9月21日）

高岗[1]同志转阜新发电厂工程队全体职工同志：

九月十七日电[2]悉。庆祝你们在透平发电机安装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望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扬积极性，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一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指阜新发电厂工程队全体职工关于胜利完成2.5万千瓦透平发电机及一号锅炉安装工作给高岗并转毛泽东的电报。

关于发表周恩来离莫斯科时在机场的谈话给章汉夫[1]等的信

（1952年9月21日）

章、伍[2]：

此谈话[3]应和回国新闻一同发表，请告新华社注意收听此项新闻，务必收清，一同发表。

毛泽东

九月廿一日

---

[1] 章汉夫，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伍，指伍修权，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3] 指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准备在1952年9月22日他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离莫斯科时在机场发表的谈话稿。这个谈话刊载于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关于由东北帮助朝鲜收容孤儿和办工业大学复高岗[1]等电

（1952年9月23日）

高岗、林枫[2]同志：

九月二十〔二〕日电悉。关于由东北帮助朝鲜收容两万六千孤儿和办一个两千人的工业大学，不须由外交部商谈，即由你们负责和朝鲜派来的人进行具体商谈妥善解决之，所须费用报中财委支付。

毛泽东

九月廿三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

[2]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关于高岗[1]早日来中央工作的电报

（1952年9月23日）

高岗同志：

请你早日来中央着手建立由你担负的工作，何时可来，盼告。习仲勋[2]同志明日可到北京担负中宣及文委工作。周总理陈云[3]同志明日可回京，并告。

毛泽东

九月廿三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11月15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2]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2年8月7日被任命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同年9月26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对章汉夫[1]检讨的批语

（1952年9月24日）

刘、周、邓[2]、章汉夫同志阅，存周处。

（一）锡兰代表所提两点[3]，不应拒绝，具体安排请周总理处理。（二）章汉夫同志检讨尚好，这是第二次[4]，仍不拟给予处分；如将来再犯，再议处分。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廿四日

---

[1] 章汉夫，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3] 指锡兰贸易代表团1952年9月22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的两点希望：一、希望中国政府将来派代表团去锡兰；二、希望代表团这次能会见毛泽东。

[4] 参见《关于较重要外交复文的送审问题的批语》一文。

对《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的批语

（1952年9月25日）

邓拓[1]同志：

此件[2]已阅，可照这样写。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上午七时

---

[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

[2] 指邓拓1952年9月24日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的提纲草稿。毛泽东对这个提纲草稿作了两处修改：一、将“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二、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句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

对王观澜[1]关于开凿胶莱运河建议的批语

（1952年9月25日）

一波[2]同志：

此件[3]请中财委参考。

这条河如果能修通并能走大船，那是好的，但不知头五年有此财力否？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

[1] 王观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副部长。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3] 指王观澜1952年9月24日关于建议中央考虑在胶东半岛颈部的胶州湾与莱州湾之间开凿胶莱运河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王观澜在报告中说，这条运河如开通，不但经济上有很大利益，在国防上亦有极大好处。

对《社会情报辑要》第三十一号的批语

（1952年9月25日）

尚昆[1]同志：

此件内所说台湾广播称赞梁漱溟[2]，请找有关部门，设法找到这篇广播送我为要。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梁漱溟，当时任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9月26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印度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两年多来，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关系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相信：贵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在共同谋取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将会更加增进与巩固。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印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对贵大使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元首健康。

1952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外国朋友。

中央转发安子文[1]关于整党建党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2年9月28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同意安子文同志这个报告[2]，并发给你们阅看。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九月廿八日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指安子文1952年9月27日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自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后，各省、市委都先后制订了具体计划，并开始进行了工作。一部分过去未进行三反的县、区机关，现在大都开始分批地用整风的方法将整党与三反结合进行。农村支部的整党，去冬已进行了典型试验，现在各地又开始进行整党结合三反的典型试验。其结果表明一般应该解决3个问题：（1）进行共产党员标准的教育，普遍提高党员觉悟，加强农民党员的积极性，改善党群关系。（2）明确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贯彻党在农村中的政策——不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道路。（3）严肃处理违法乱纪品质恶劣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妥善处理消极分子及落后分子。

给黄炎培[1]的信

（1952年9月29日）

任之先生：

九月廿二日大示[2]收到，甚谢。因与财经机关商酌，迟复为歉。

先生所提税收，劳资两问题，确是应当注意调整的。据财委同志报告，有些已经调整，有些正在调整，有些则尚待研究调整办法。

上次我和先生谈的关于中小工商业的几点意见[3]，过于简单，不便发表。此类问题，宜由财经机关征询各方意见，加以处理，较为适宜。

大函及几个附件我已交付陈云薄一波[4]诸同志负责研究去了。我处亦收到工商业者不少信件，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工作缺点的反映。

近日颇忙，稍待当约先生面叙。

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2] 黄炎培的来信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由于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1952年所得税照1951年税额在9月底应先缴1/3感到有困难。信中还谈到上海工商界的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入手。来信还附送了9月10日毛泽东同他谈中小工商业问题的谈话记录，请毛泽东审阅。

[3] 毛泽东1952年9月10日在同黄炎培谈话中，问及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情况，特别是中小工商业的情况。当毛泽东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必须找出解决方法时，谈了以下几点意见：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三五家、七八家、一二十家从业务的联合逐渐地趋向资金的联合，从此成为“公司”的方式。二、从中小工商业的产生来说，大都依靠大工商业而来，尤其是小工厂依靠大工厂而产生。但在情势变化以后，尤其是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大的对于小的，可能失掉了提挈的作用。政府贷款和加工定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这是无可如何的。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定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例如加工定货，大工厂在监督指导之下，酌量一方需求情况，一方接受能力与合理的酬报，分配给予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予它们经售，从此小工商业得以恢复活动。当然，实行时还须商定出种种适当办法来。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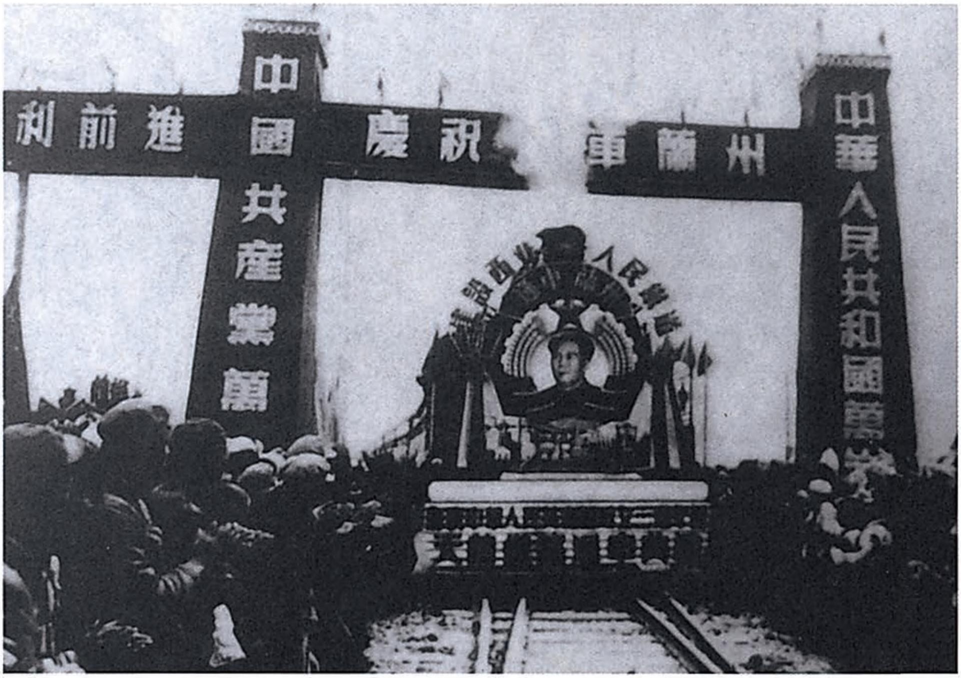
[4]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为天兰路全线通车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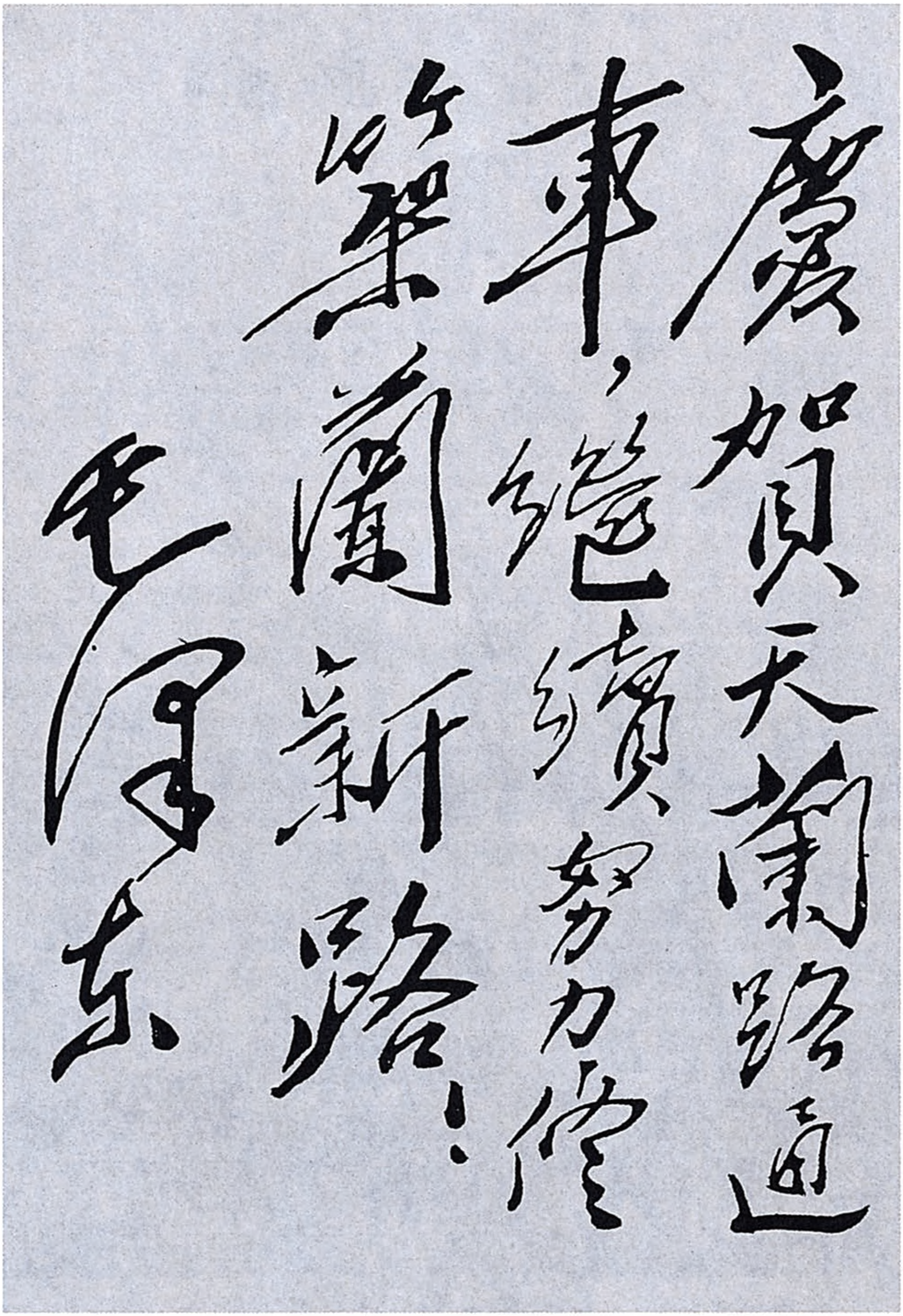
（1952 年 9 月）

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毛泽东


利前進
中國共產黨萬
慶祝
車蘭州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

1952 年 9 月 29 日，人们在庆祝天（水）兰（州）铁路正式通车。



慶賀天蘭路通車，繼續努力修築蘭新路！

毛澤東

毛泽东为天兰路全线通车的题词。

在国庆宴会上的讲话

（1952年9月30日）

亲爱的朋友们：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日到来了！

过去的一年，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国际的和平，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我希望在今后的一年我们能做更多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各民族人民及海外华侨大团结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中苏友好团结万岁！

中蒙友好团结万岁！

中国与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友好团结万岁！

亚洲各国人民友好团结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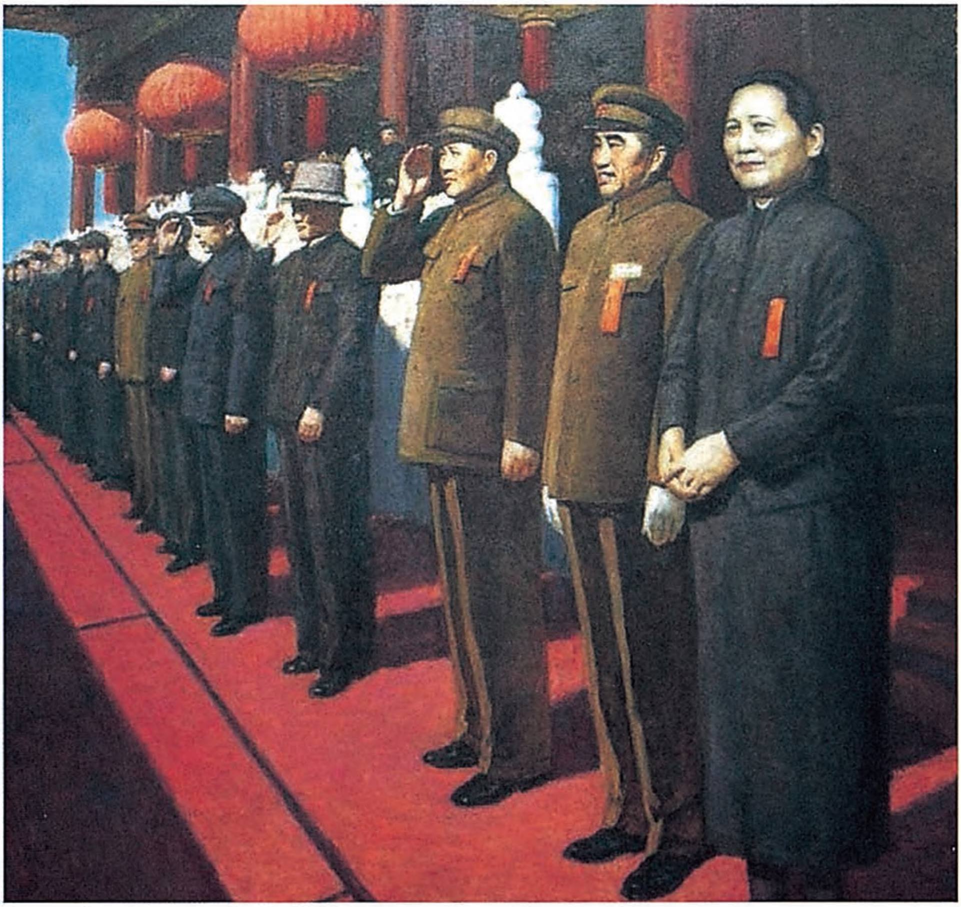
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成功！

全世界人民的友好团结万岁！

为了各位的健康，干杯！

1952年10月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2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游行队伍举手答礼。



1952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庆祝建国三周年。图为以此为背景创作的油画。

谢觉哉[1]摘要转报的中央湖北灾情视察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0月2日）

小平[2]同志：

湖北和皖北今年灾情颇重，必须统筹救济，请你加以注意。

毛泽东

十月二日

---

[1] 谢觉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给毛宇居[1]的信

（1952年10月2日）

宇居兄：

李邹[2]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贶，甚为感谢。

毛泽连[3]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4]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

顺问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2] 李，指李漱清，辛亥革命前是韶山的进步教员，毛泽东常去他家看书、请教。邹，指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3]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4] 泽荣，即毛泽荣，又名逊五，毛泽东的堂弟。

给谭熙春[1]的信

（1952年10月2日）

熙春同志：

九月二十三日的信收到，甚以为慰。北游事，今年不要来，明年如有可能，再作决定。

祝你阖家清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

[1] 谭熙春，湖南韶山市韶山乡竹鸡村人。曾在长沙毛泽东等创办的文化书社当店员。

祝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的电报

（1952年10月2日）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召开，对于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以及全世界的人民保卫和平的伟大共同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祝会议圆满成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1952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台湾省籍高山族代表。

关于胡志明[1]去莫斯科和致苏共十九大贺电[2]致刘少奇电

（1952年10月4日）

刘少奇同志：

十月三日来电[3]收到。（一）联共同意胡志明同志秘密去莫斯科，现已定六日乘专机起飞，八日可到莫；（二）同意对贺电的修改文字，惟“个别国家”宜改为“各个国家”。

中央

十月四日

---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2] 原拟的毛泽东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后来改为中共中央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祝词，由刘少奇在大会上宣读。

[3] 刘少奇在1952年10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建议对毛泽东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贺电稿作几处文字修改，其中一处是在“正确地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前面，加上“根据个别国家的具体情况”几个字。毛泽东在刘少奇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上写了以下批语：“请陆定一同志照此修改，于塔斯社发表大会开幕消息的同时，发表这个贺电。此外，人民日报宜写社论一篇。”

给齐白石[1]的信

（1952年10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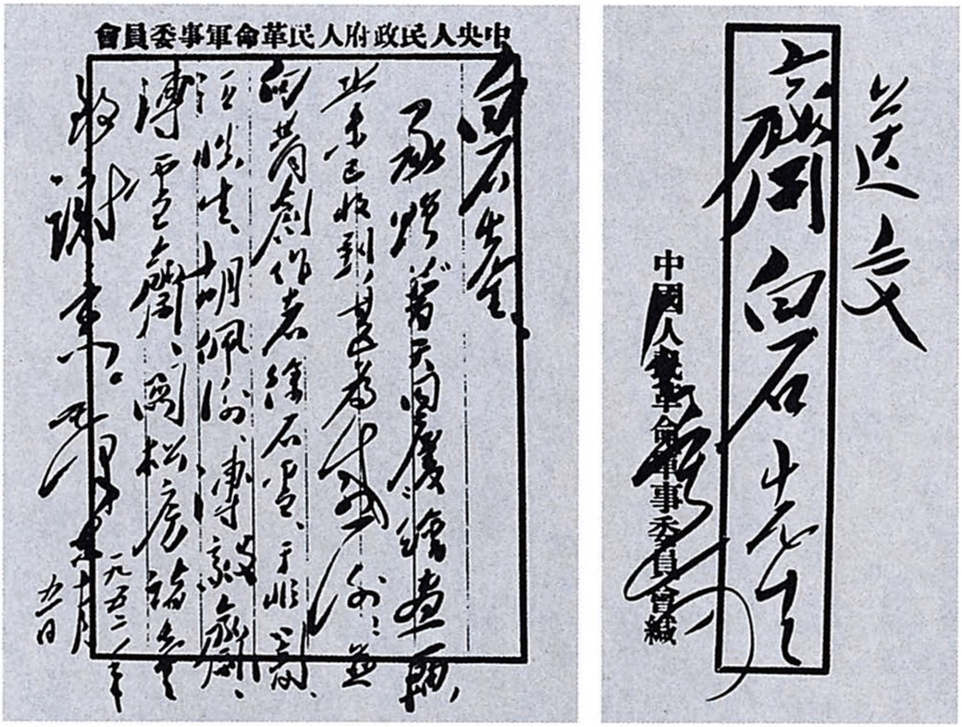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

[1] 齐白石，当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幅，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六月五日

送交

齊白石先生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齐白石信的手稿。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电报

（1952年10月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谨向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致以衷心的祝贺。

德国人民在争取缔结和约与恢复德国统一的斗争中，在经济、文化的发展及国家政权的巩固上所获得的胜利，对于德国人民的繁荣幸福以及世界的和平事业起了巨大的作用。谨祝德国人民为建立统一、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德国而进行的斗争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北京

对罗瑞卿[1]关于一起杀人案的判处意见的批语

（1952年10月6日）

周邓[2]阅，退罗瑞卿同志，并请罗转告蓝副检查〈察〉长[3]，同意他维持原判，对王剑朋[4]处以极刑立即执行。

毛泽东
十月六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3] 指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蓝公武。

[4] 王剑朋，曾任广州市人民政府企业管理局局长，三反运动中，因被揭发有贪污问题而受到监管。监管期间，他有计划地扼死监管他的警卫人员，并杀死检举他的人。广州市人民法院决定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广州市公安局和人民检察署对此提出异议，主张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经中央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复议，决定维持原判，立即执行。

对聂荣臻[1]关于志愿军第二步反击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0月7日）

聂：

待作战告一段落后，请用军委名义起草一个贺电给志愿军各部，以资鼓励。

毛泽东

十月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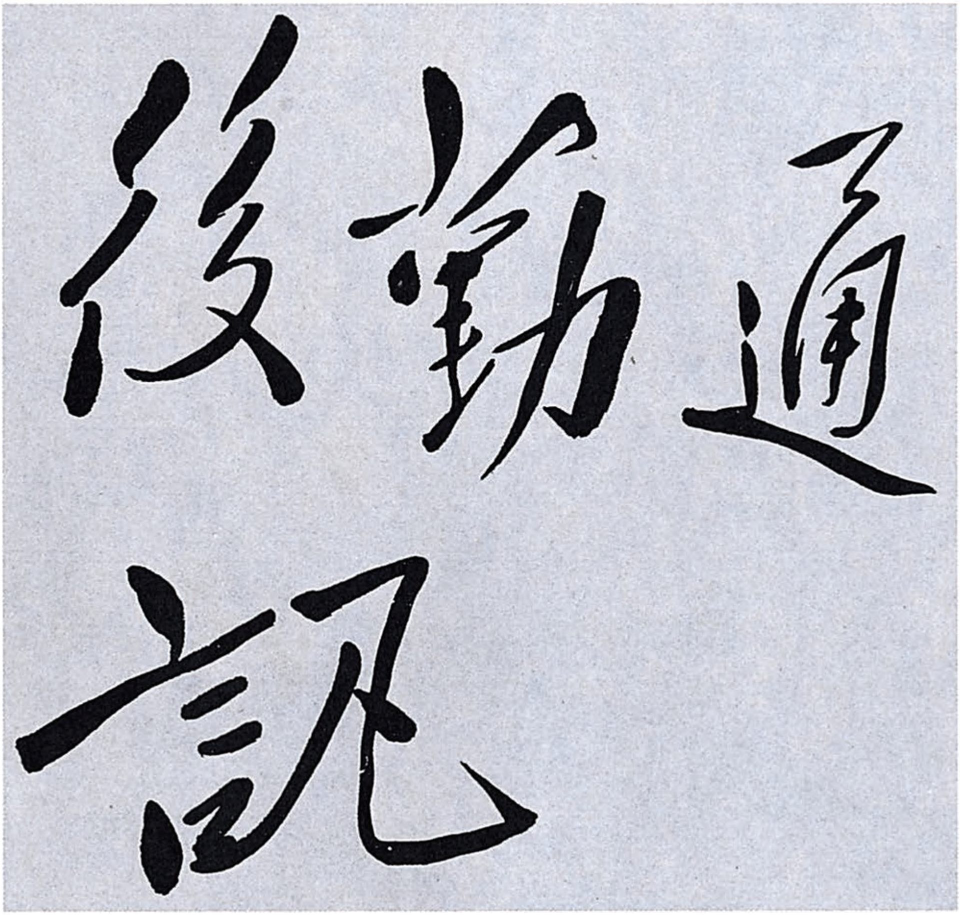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为《后勤通讯》题名

（1952年10月7日）

后勤通讯



毛泽东为《后勤通讯》题写的刊名。

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的谈话要点[1]

（1952年10月8日）

一、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二、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三、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2]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四、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

---

[1] 毛泽东这个谈话要点，是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引述的。

[2] 指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

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亲切会见西藏国庆观礼代表。

给宋庆龄[1]的信

（1952年10月10日）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2]，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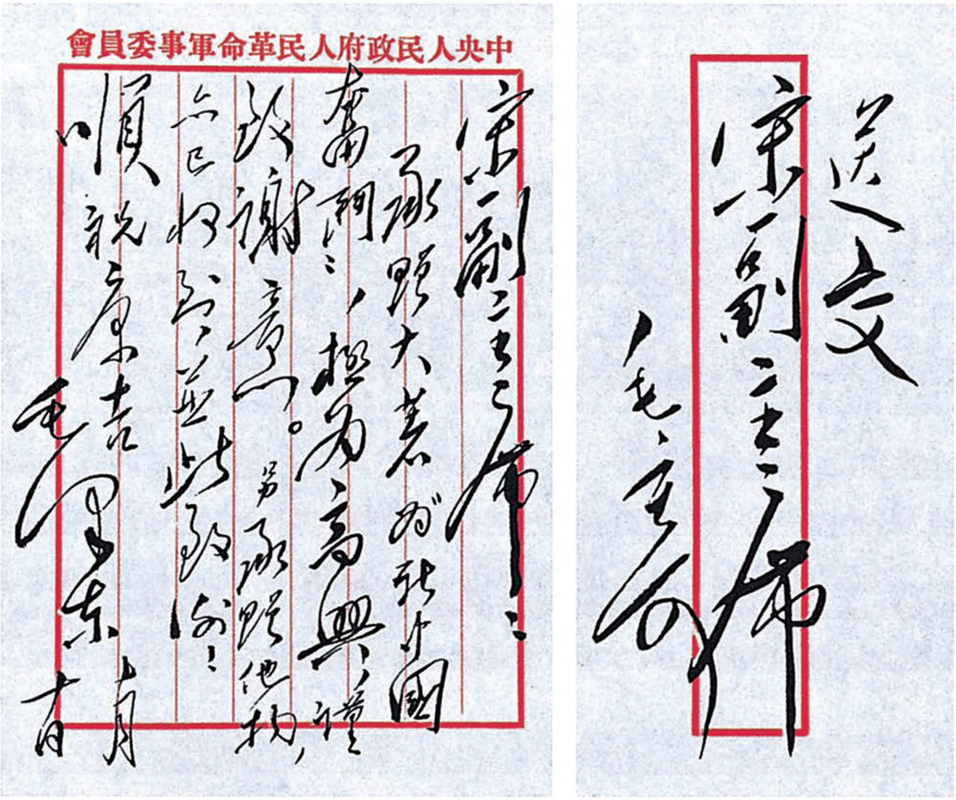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十日

---

[1] 宋庆龄，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为新中国奋斗》是宋庆龄于1952年出版的一部文集，为宋庆龄最早的一部文集，该书由周总理亲自题写书名。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宋副主席：

承赠大著为新中国奋斗，极为高兴，谨致谢意。另承赠他物，亦已收到，并此致谢！

顺祝康吉

毛泽东

月　日

送交

宋副主席

毛泽东

毛泽东致宋庆龄信的手稿。

给毛爱桂[1]的信

（1952年10月10日）

毛爱桂先生：

你的来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要你儿子出来搞一点随时随意的工作，我亦十分高兴。可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

---

[1] 毛爱桂，毛泽东的邻居、族叔。毛爱桂的儿子毛泽林不久后通过组织部门介绍到株洲糖烟酒公司参加了工作，尔后又调回韶山粮食局。这是唯一的一例，毛泽东亲笔回信向当地政府推荐安排工作的亲友。

对铁道部队建设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0月12日）

请彭处理。似只能这样做。[2]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1952年10月11日报告上写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批语。

[2] 聂荣臻在报告中，针对苏联驻中国总军事顾问柯托夫1952年9月29日的建议，重申了对苏联前驻中国总军事顾问克拉索夫斯基的答复意见。柯托夫的建议说：除现有之志愿军铁道兵团外，应在每一个一级军区组成1个铁道团，并应考虑到在必要时团可以扩充为师；在总参谋部下组成铁道部队司令部；组成军事修复工作部，领导驻朝铁道部队之工作；批准铁道部队条例；任命铁道部队司令员。聂荣臻的报告说，7月份克拉索夫斯基曾提出建设铁道部队的建议，当时已作了口头答复，其要点是：（一）铁道兵团建制已确定属军委。（二）在朝鲜的铁道兵团部队归铁道军事管理总局统一指挥，将铁道抢修、抢运、防空三者结合起来，是有效的办法，不再需要另行组织军事修复工作部。（三）不拟在各大军区立即组成一个铁道团。（四）抽调铁道技术人员有困难。（五）铁道兵团现在朝鲜抢修任务甚重，尚不能按每年抽出一定时间进行训练。回国后当可抽出一定时间进行训练，提高技术。

关于国民党军队给其在大陆残余力量空投装备问题的批语

（1952年10月13日）

彭[1]：

似宜指示西北军区及西北局，让敌空投装备充足，并集中兵力向夏、洮区域进攻，并让其深入占领一块地方，然后我军集中兵力包围歼击为有利。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1]

（1952年10月13日）

一、据最近派人检查和各部队的报告来看，自今年五、六月以后，在部队训练上，表现出两种相反的现象：第一，文化教育普遍抓得很紧，因此，掀起了全军文化学习的高潮，并取得很大成绩，这一方面是好的。第二，军事教育和军事纪律普遍放松，因此，产生了部队生活散漫，技术降低，体力减弱和严重的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等现象，这一方面是严重地不应该的，是必须立即纠正的。

为提起全军的严重注意，兹例举下述若干虽然不是普遍的，但却是极为严重的事实：如某营的演习，集合时间延长到一小时零八分钟；某师的测验，老战士中有十分之六连枪炮的口径和正确瞄准的要领都忘记了；某营点验，一小时内晕倒数十人；炮马集中饲养，无人调教管理，致马蹄变形，马体虚肥，不能驮挽；某师通知部队煮洗子弹袋，有某连队竟疏忽大意到连子弹一起放到锅里去煮；各级干部离职学习的比例过高，华北达百分之六十八，西北某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指示。

些部队还高于华北，有的师竟达百分之九十，致军事教育和军事生活形成无人掌管的状态；换装部队虽经过三个月的战备教育，但接着半年来没有继续执行百分之三十军事教育的方针，致学到的东西不能巩固，动作十分生疏，甚至有的炮手不会退弹，用大锤敲打；尤以不爱惜武器装备，任其风吹雨打，日晒夜露，油漆剥落，木质裂缝和损坏武器、装具、马匹的现象，则更为普遍和严重。根据上述现象，已足以说明在最近期间部队军事生活和纪律松弛现象的严重性，和由此而必须影响到战备观念的薄弱和战斗力降低的危险。

二、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各级干部中长期存在的游击性的习气，缺乏严格的军事管理的要求，缺乏严肃的内部秩序的建立；不是按统一的规定来组织部队的工作日程，常常是由个别首长的一时兴趣来决定或改变这些规定；以及长期存在的对于武器和装备的保管与爱护的不注意和不认真；甚至个别的指挥人员，因为害怕严肃认真的管理可能在民主大会上受到战士的批评，或多或少地产生有意放松的现象。其次，则是由于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有的人对于“以文化教育为这一时期（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底为止）的部队训练中心”这个方针，任意加以解释，或者说“军事必须服从文化”，或者说“文化学习为主，工作为辅”，或者笼统地提出“文化教育是当前全军的中心工作”；而大多数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则只习惯于单打一的工作方法，而不善于照顾全面，适当地组织力量，使其他工作和中心工作很好地互相配合；甚至有的部队为了表现其成绩或急于求成，则任意延长文化教育时间，提出过高的要求，或增加许多课外的作业，超越制度范围，随心所欲，各行其事。

三、应当及时地严格地指出，上述各种现象的产生是不正常的，无论何时都是不应该的和不许可的；特别是在目前我们尚有大规模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仍占领我们的台湾、沿海及边沿经常需要防敌袭扰，以及新装部队对技术和装备的掌握尚不能熟习等等情况下，上述各种现象对我军战斗士气的保持和战斗力的提高是有危害的。

因为“以文化教育为部队训练的中心”这个方针，尚需继续到明年五月底以前，因此，主动引起全军对于上述偏向的注意和加以坚决的纠正，这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特指出下列各点，望各部队严格遵守执行：

第一，凡属能够进行以训练为主的部队，必须保持百分之三十的军事教育时间，百分之二十的政治教育时间的比重，并注意加强军事、政治教育的内容，防止敷衍应付现象；对于统一规定的时间配当，任何人都要视同法律，不经军委批准，不得修改；违者应受到纪律处分。其不能以训练为主，如担任剿匪、作战、警卫、看守犯人等任务的部队，则以其可能进行教育的时间，按军事百分之三十，政治百分之二十，文化百分之五十的比例，组织教育，不应有所偏废。

第二，换装部队在换装之初，必须首先进行三个月期间以军事教育为主的军事训练，力求在此期间内，熟悉各种武器装备的掌握和使用；在三个月后进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时间内，仍应保持百分之三十的军事教育时间，继续加以巩固和提高，并严格注意武器装备的保管和爱护。

第三，离职学习文化的军事干部，各级均以不超过一半为限，其留在部队的军事干部，则应以统率部队，组织部队的军事教育，

加强对部队的军事管理工作为主，不应再强调以文化学习为主，以保持部队的军事领导。

第四，凡指定将担负入朝军事任务的部队，应在出动之前的三个月，即停止以文化教育为主，而改以军事教育为主的训练任务，以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并保证充分的战斗士气为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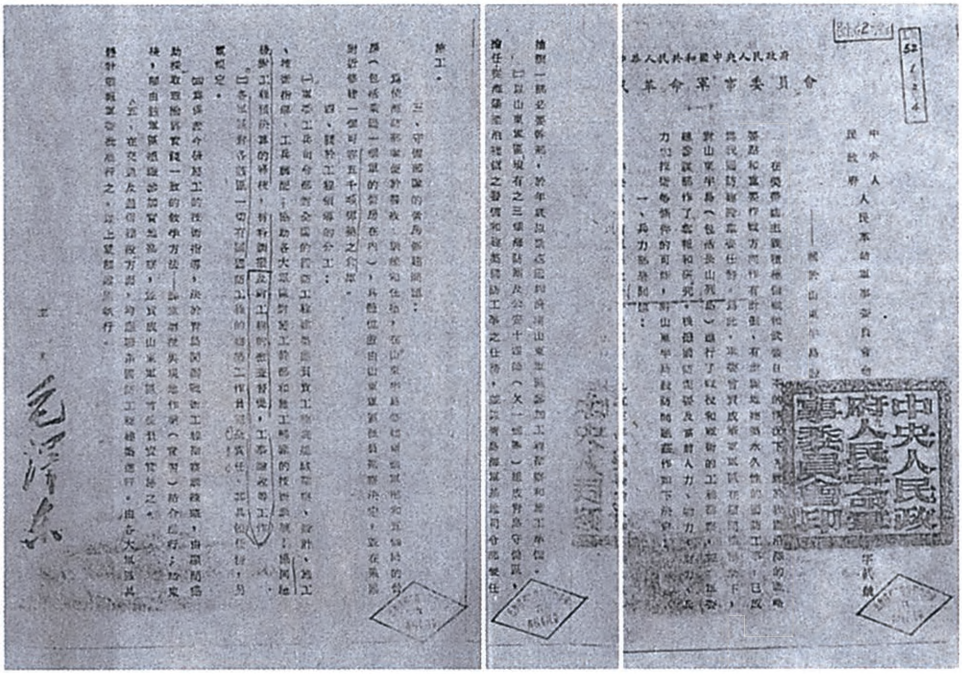
第五，所有部队，应在各大军区的统一规定下，在十月三十日以前，以师为单位，进行一次点验，检查所有武器、装具、马匹，并进行详细登记；同时并进行一次整顿纪律的工作，以严格执行命令指示，严格军风纪，严格遵守制度，和严格保管和爱护武器、装具、马匹等为内容的教育，对于严重违反纪律和损坏武器、装备的行为，应予认真的追究责任，和给予应得的处罚。

第六，从一九五三年六月一日开始，部队训练的中心转入以军事训练为主。为迎接这个训练，各大军区部队应在干部训练上有所准备。因此，应采取分期轮训干部的办法，从明年一、二月间开始，实行军事干部的轮训，预习部队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为开展部队军事训练准备条件。其具体办法由军委军训部另行规定之。

第七，还必须着重提出，一切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养成具有照顾全面的整体观念，既要抓紧当前的中心工作，又不要放松即使不是当前的中心、然而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要只求简单、单纯，抓住一件，放弃其余；也不要对于某一件工作进行任意解释，作不适当的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应注意，当一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集中全力，争取运动的迅速展开，这是必要的；但在运动的进行中，又应及时地了解情况，发现偏差，加以纠正，不要单凭群众的情绪和下级的要求，甚至是领导者本人的兴趣，加以放纵，或不敢纠偏，因而失去领导的责任。

第八，各大军区应该作出执行这个指示的计划，并将你们的计划和贯彻下去的情况，随时向军委报告。

主席　毛泽东



1952年10月，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布的关于山东半岛设访的命令。

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1952年10月15日）

震林[1]同志：

陈云[2]同志所得青浦县小蒸乡的情况[3]，很值得注意，兹寄上请阅，并请抄寄苏南区党委。

据薄一波[4]同志说，他在上海时，已知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华东局决定退还农民一部。不知此事结果如何？两区共退了多少？解决了多少人的问题？今年收成如何？征粮数是否大大减轻了？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建议你们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在开会前，由你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往浙江，一个往苏南，直到几个县的乡村，调查十几个乡，专门调查农民公粮及其他负担的实情，以为会议讨论的

---

[1] 震林，即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

[2]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3] 指陈云1952年10月14日报送毛泽东的关于青浦县小蒸乡农民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一名学生暑假回家时，遵陈云之嘱作了一点调查后写成的。材料反映了由于接连三年农作物歉收、征粮比率过高和人多地少，造成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

[4]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根据。

总之，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1]，大大减轻民负。

望将你的意见告我。

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五日

---

[1] 政务院1950年2月规定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为“不到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七。地方人民政府附加公粮不得超过正粮的百分之十五，即国家征收公粮一百石，地方附加公粮不得超过十五石”。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晚解放区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一九五二年应施行统一全额累进税制，累进税率从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止（一律不准再征附加税）”。这样，就减轻了大多数农民的负担。

对海军党委综合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0月16日）

肖劲光同志：

十月十五日的综合报告[2]收到阅悉。希望在下一次综合报告中看到各项缺点的改进情形。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52年10月15日呈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综合报告的批语。

[2] 指肖劲光呈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综合报告。报告说：海军于8月份抽调人员分赴各地进行了40多天的工作检查，所反映的情况如下：一般的优点为，海军战士们能以高度热情和积极性进行苦学苦练，并已初步掌握了技术，提高了文化，依靠这些力量执行护渔、护航、剿匪的任务，取得了不少成绩。在缺点方面，概括来说，业务技术学习还不够，尚未提到战术高度，急须提高；组织机构仍不健全，工作不踏实；幼稚无知的骄傲自满情绪普遍存在；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很严重。海军党委为克服与改正这些严重问题，已采取了解决措施，以后当将工作进行的情形及改进的结果继续报告主席。

对总后关于追加一九五二年国防建设费预算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10月18日）

尽可能在本年度军费中调整开支，不追加总预算。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

---

[1]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1952年10月15日给军委的报告提出，1952年国防建设费预算需追加5500多亿元，请中央批准从国家财政预算中拨款。

关于中央同意刘少奇、王稼祥[1]在苏休养的电报

（1952年10月19日）

刘少奇同志：

（一）十月十八日电报[2]收到；（二）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3]二同志即去莫斯科；（三）中央全会可待你们回国后再召开。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2] 指刘少奇关于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收获和体会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

[3] 王光美，刘少奇的夫人。朱仲丽，王稼祥的夫人。

对民主同盟工作的意见[1]

（1952年10月19日）

同意这个意见[2]。据吴晗[3]向我表示，民盟中央和北京支委各种会议，只谈人事，不谈工作，使他们感到极为苦闷。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此件中所说“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是必要的。其他民主党派恐亦须解决此问题。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1952年10月19日关于民主同盟的工作向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2] 指李维汉在给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民盟目前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民盟今后的活动，要找出怎样参加和配合国家的文教建设工作的办法，以发挥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民盟内外条件已有新的变化的情况下，要使其领导机关中各派的关系得到必要的调整。具体说应做好以下几点：（一）帮助进步分子端正政策；（二）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三）领导成分适当调整；（四）积极参加学习。这几项如果做得好，民盟是可以在团结上、发展上和工作上都获得更多进步的。

[3] 吴晗（1909—1969），浙江义乌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北京市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

给罗元鲲[1]的信

（1952年10月22日）

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2]，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

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3]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此复。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廿二日

---

[1] 罗元鲲，号翰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员。

[2] 指罗元鲲托李漱清交给毛泽东的两篇文稿。一篇是罗元鲲的自传，一篇是罗写的《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

[3] 指毛泽东书写的“袁吉六先生之墓”。袁吉六即袁仲谦，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国文教员，1932年去世。

对军委办公厅关于贯彻反官僚主义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2年10月23日）

此件[1]请周[2]一阅。关于军委设审计机关问题，似有必要；如同意，即请彭[3]主办；如有意见，请与彭商处。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2年10月21日关于贯彻反官僚主义问题给彭德怀转毛泽东的报告。肖向荣在报告中说，处理文件上的拖延积压，主要原因是制度上存在若干缺点。“为了审查一件预算，从最初的编造机关起到最后的批准机关止，中间最少十几重层次，不知多少干部被压在没有必要的事务里，实在有加以改革之必要。最好是在军委设审计机关，凡经军委批准之工程，即可由原单位直接送审计机关审查，审计机关即有批准之权，不要层层审查，既拖延时间，又浪费人力。”

[2] 周，指周恩来。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重大胜利[1]

（1952年10月24日）

彭、邓、杨、甘各同志，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军区，军委各部门及军事学院各首长：

我志愿军协同人民军从九月十八日开始对全线敌军的战术性的反击作战，在一个月内，歼灭和击伤敌军三万人以上，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和军委向你们及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第二副司令员杨得志、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及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的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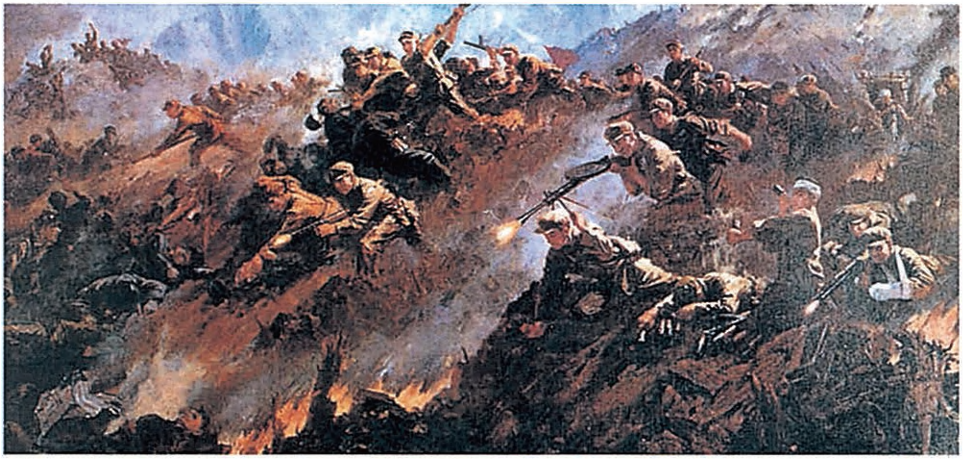
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现当志愿军出国作战两周年之际，希望你们总结经验，更加提高组织性，提高战术和节省弹药，更加亲密地团结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作战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共及军委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1952 年，停战谈判期间，美军发动了上甘岭战役。图为上甘岭阵地一角。



《英雄阵地上甘岭》（油画）

中央转发中纪委报告的批语

（1952年10月24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区）市党委：

（一）批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1]；（二）将此报告发给各级党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遵

---

[1] 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党纪案件的经验和今后开展纪律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为了贯彻中央认真地、严肃地、慎重地处理党纪问题的方针，对已经处理的案件进行一次复查是必要的。复查要有重点，要抓住弄清事实这一中心环节。在处理党纪案件和复查中掌握以下几项原则：第一，根据党员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及其对错误的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态度，来审查和确定处分的轻重。第二，明确问题性质，划清是非界限，反对似是而非，乱戴帽子。第三，对处理工作采取一些有效的控制办法，包括统一处分标准，允许本人申辩，经过必要的手续等。报告还指出，根据中南处理纪凯夫等案件的经验，开展群众性的纪律检查运动的关键，在于广泛地开展党内外的民主运动，发扬自下而上的批评，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为此，各级党委及其纪委应当认真地及时地处理党员和群众的来信，支持党内外群众对干部违法乱纪现象进行的斗争。发现对来信拖延不予处理、敷衍了事和压制民主、报复控告人的行为，应抓紧处理并分别情况给予批评和处分。同时，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与支持下，通过典型案件的揭发和处理，在一定时期中开展以反对某种违犯纪律的现象为主的群众性纪律检查运动。

照办理；（三）此报告可在党刊上登载。

中央
十月二十四日

1952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天津新港视察。

对颁发八一奖章荣誉奖章条例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0月24日）

周总理：

此件[2]请你处理。

勋章、奖章等应当由政府颁发，请与有关同志商定。

毛泽东

十月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荣桓、副部长赖传珠和徐立清1952年8月的报告上写给周恩来的批语。

[2] 指罗荣桓等的报告。报告说：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奖章以中央人民政府名义颁发为妥。在目前开始制定颁发时，种类不宜过多，将过去提出的几种奖章、纪念章缩减为八一奖章与荣誉奖章两种，而对英雄与模范可暂不发纪念章，拟以其他奖励代替之，并重新起草了以国家名义颁发的奖章条例草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八一奖章条例（草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荣誉奖章条例（草案）》。请您审阅修正，如属可行，请以军委名义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查通过。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图为毛泽东在济南珍珠泉观鱼。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视察黄河。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视察黄河。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视察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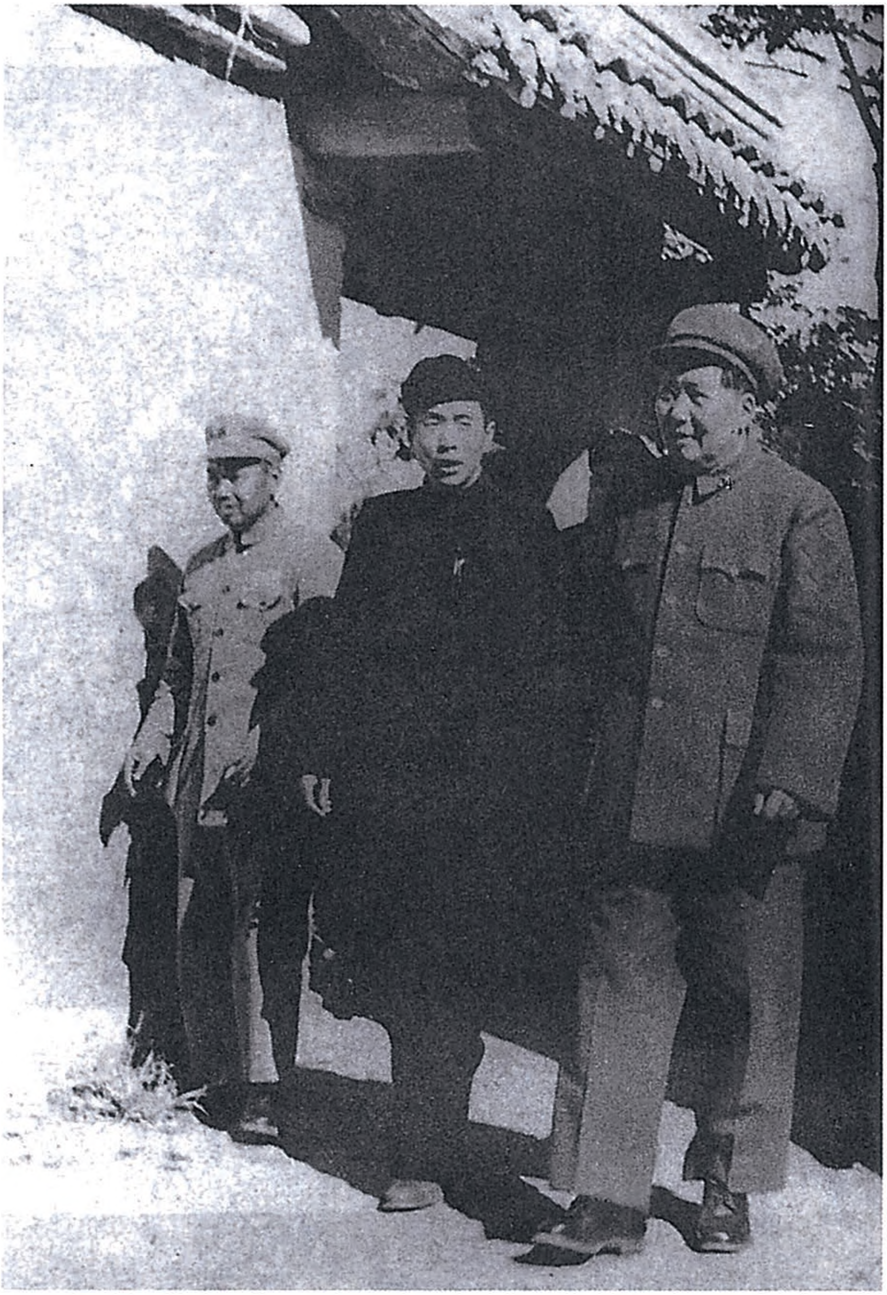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泰安火车站。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孔庙大戏殿观看龙柱。右一为杨尚昆。

1952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济南。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山东曲阜参观孔林、孔庙。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游览孔林。左为许世友。



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原鲁南军区司令、徐州卫戍区司令兼徐州第一任市长、书记张光中等陪同下，登上徐州云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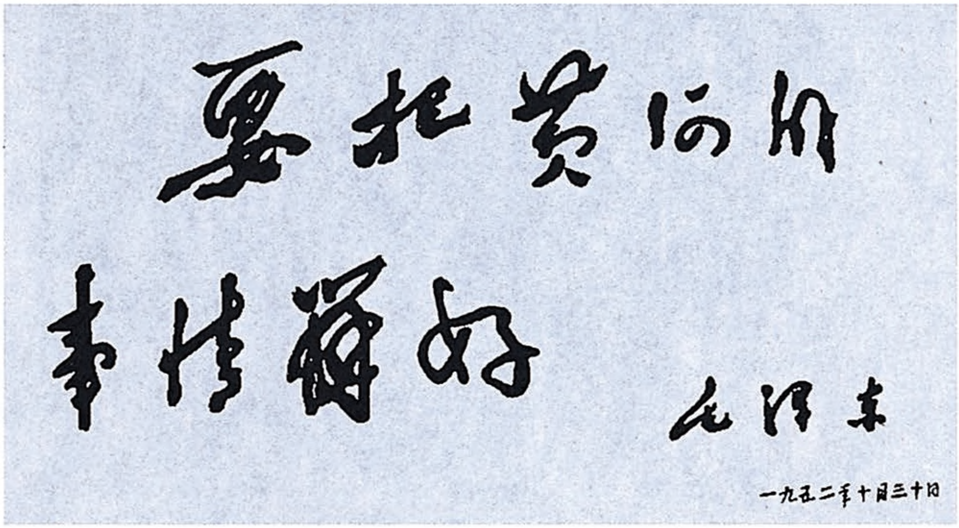
视察黄河时的谈话

（1952年10月29日）

老根据地的人民出了大力，我们要注意帮助他们。

这个大水库（三门峡）修起来，把几千年以来的黄河水患解决啦，还能灌溉平原的农田几千万亩，发电一百万千瓦，通行轮船也有了条件，是可以研究的。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水来是可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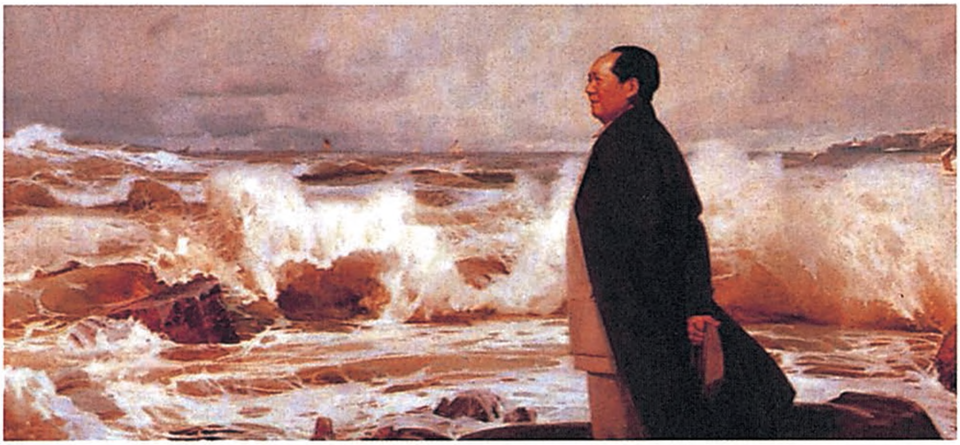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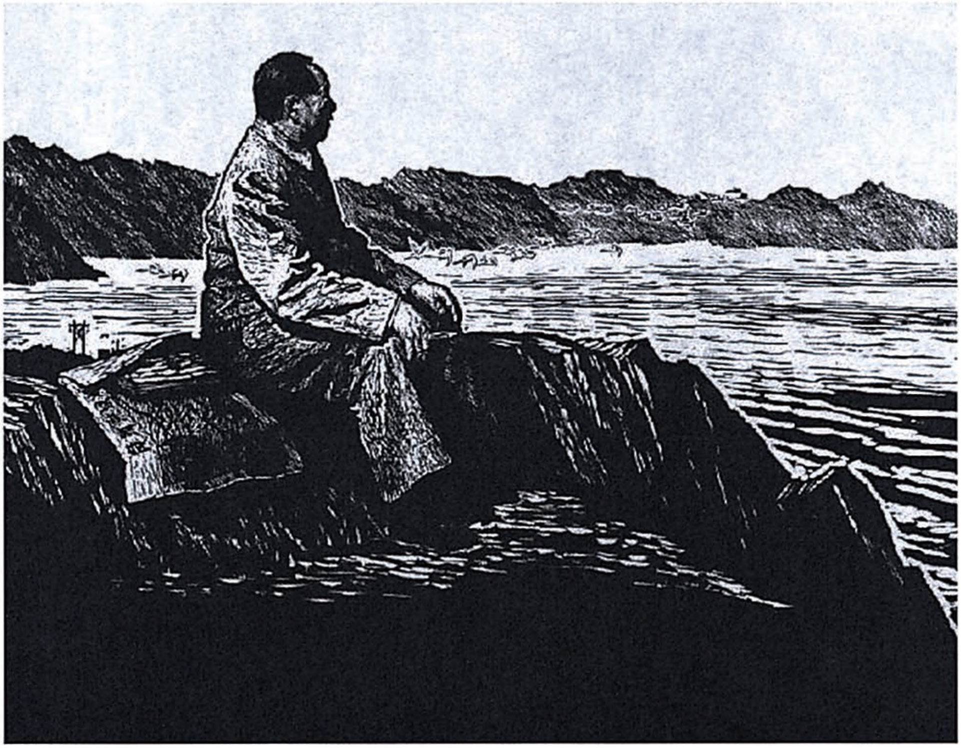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三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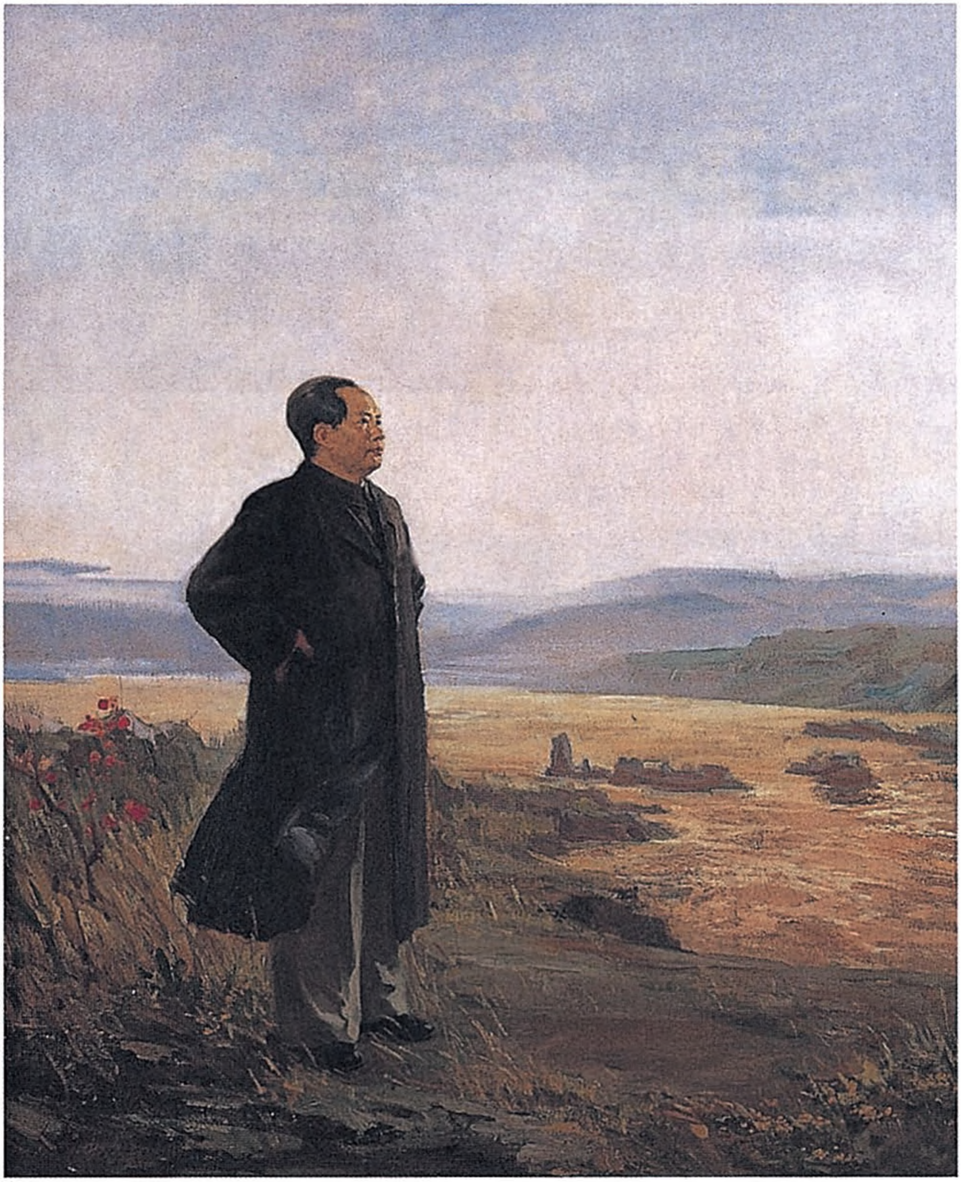
毛泽东题写的“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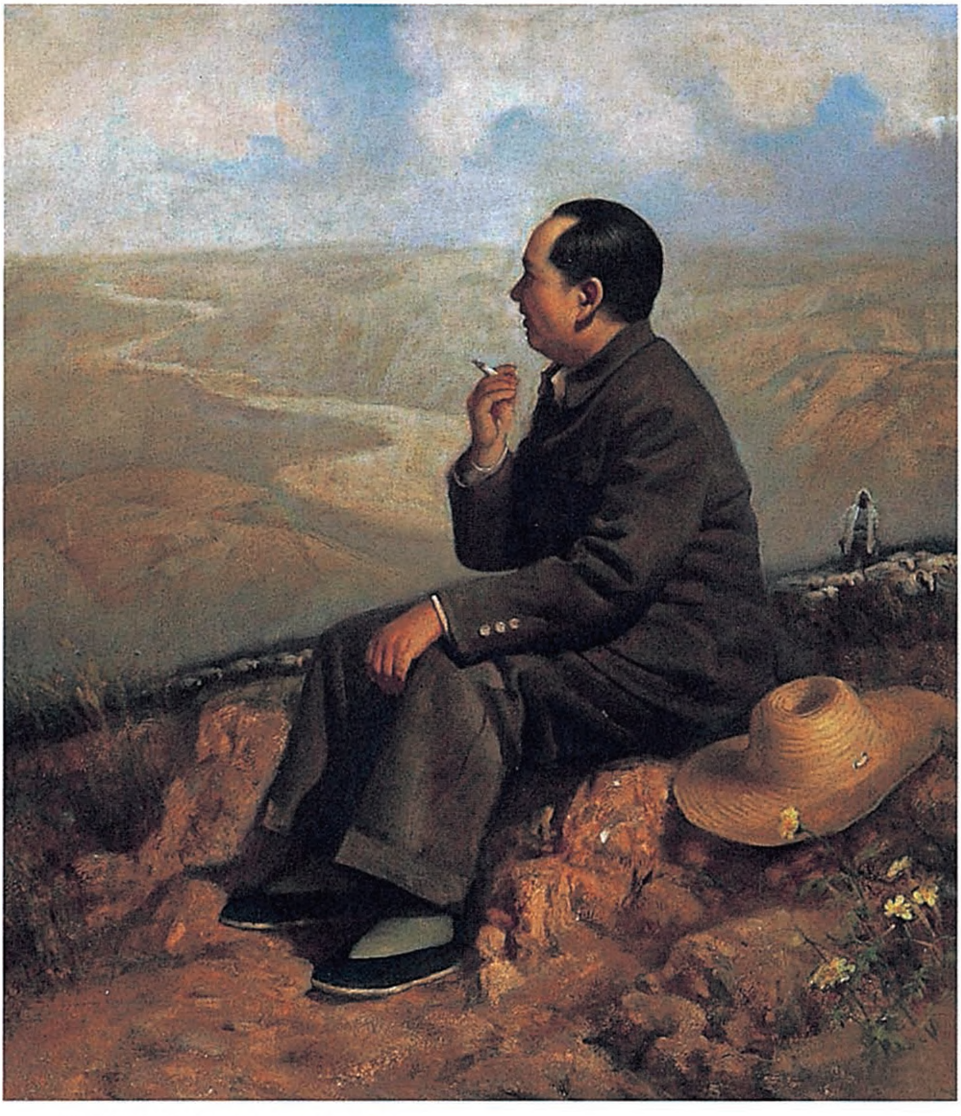
《毛泽东视察黄河》（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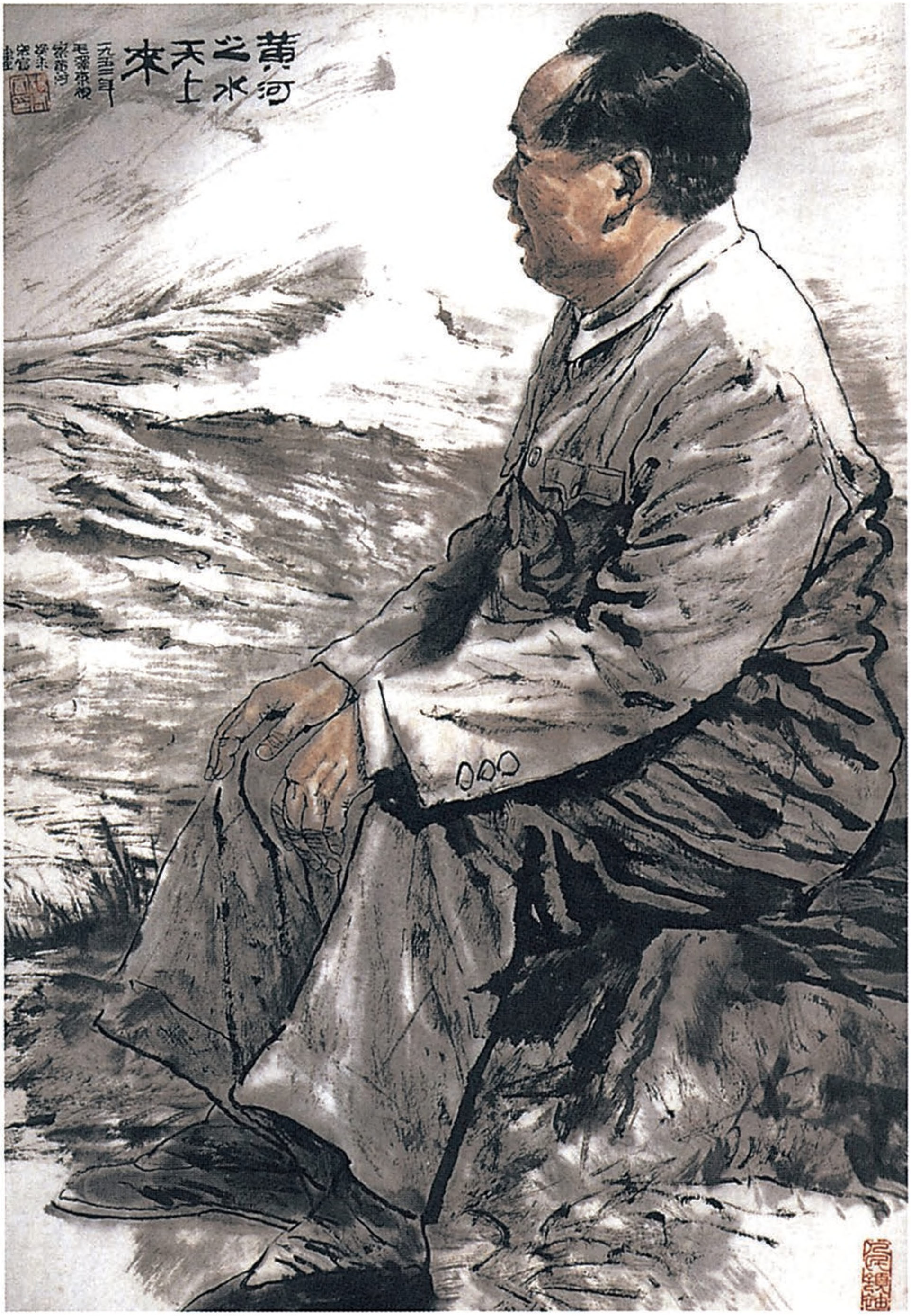
《毛泽东视察黄河》（木板画）



《毛主席视察黄河》（油画）



《毛泽东视察黄河》（油画）


黄河之水天上来
一九五二年
毛泽东视察黄河
宗信画

《黄河之水天上来》（中国画）

为袁仲谦题写碑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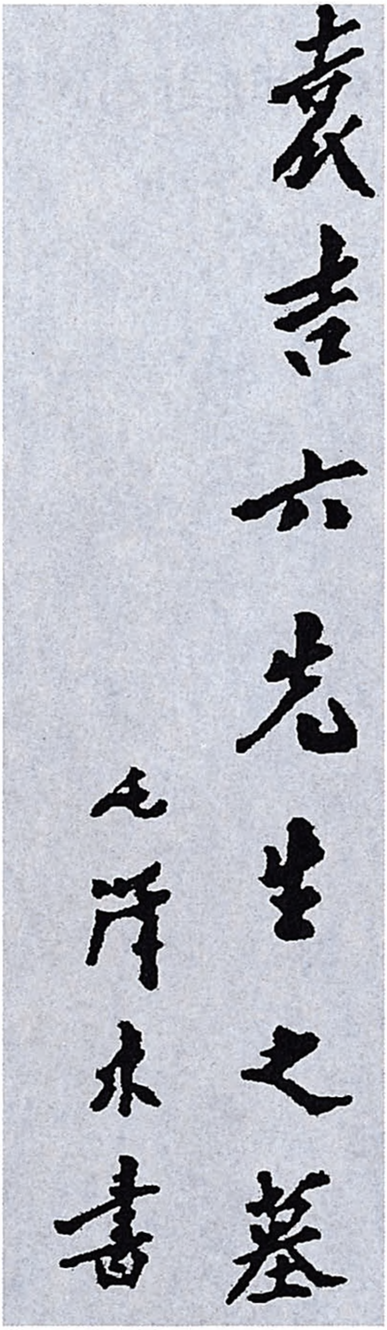
（1952年10月）

袁吉六先生之墓。

毛泽东书

---

[1] 袁仲谦，即袁吉六，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国文教员，1932年去世。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袁的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碑文是：袁吉六先生之墓。



袁吉六先生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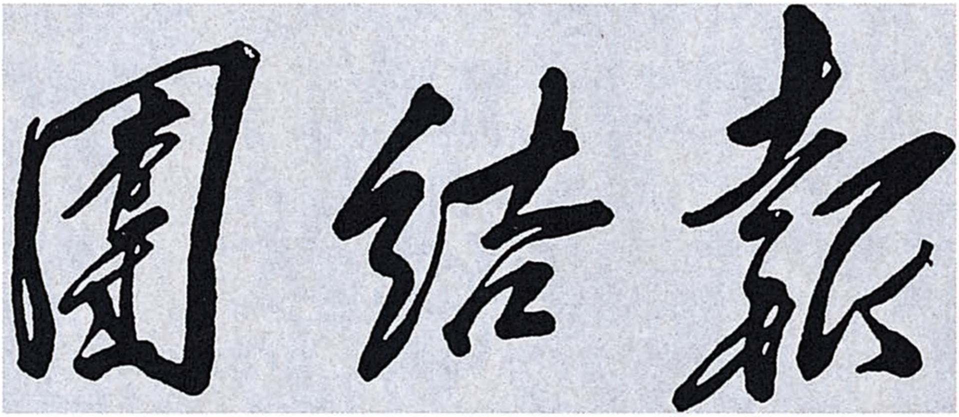
毛泽东书

毛泽东为袁仲谦题写的墓碑碑文。

为《团结报》题写报头[1]

（1952年10月）

团结报



毛泽东为《团结报》题写的报头。

---

[1] 《团结报》是中共湘西自治州委机关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日，它的前身是湘西日报。创刊不久，毛泽东亲笔为该报题写了报头，于1952年10月28日启用，一直沿用至今。

祝贺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致斯大林电

（1952年11月3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

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谨向光荣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及您致衷心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欢欣祝贺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从事共产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给即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以新的、强有力的鼓舞。

我们祝贺苏联人民在维护与巩固国际和平不懈斗争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使战争挑拨者的阴谋一再遭受失败，千百倍地增强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信心。

祝保卫远东与世界的和平事业的胜利，并祝中苏两国牢不可破的伟大的友谊更加巩固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　北京

对改善志愿军部队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1月10日）

肖华同志：

此件[2]可印发中央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各级军区阅看。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1952年9月10日报告上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批语。

[2] 指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的报告。报告从物资供应、伙食、文娱体育活动等方面汇报了部队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改善的情况后说，志愿军政工会议明确了以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作为今后政治工作上的重要环节，全军上下愈益重视，部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已日趋改进，尤其是在目前战士的物资供应问题已大体解决，文娱活动已大大开展。

对杨成武[1]关于苏联顾问可否参加部队党委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和对军委复电稿的修改

（1952年11月7日、11日）

一

周[2]：

似应允许顾问参加党委会议。此件[3]可转各处参考，并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以上请酌定，如必要请找聂[4]及肖华肖向荣[5]一谈。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

[1]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司令员。

[2] 周，指周恩来。

[3] 指杨成武1952年11月4日关于同华北军区的苏联顾问团进行交谈的情况给毛泽东并军委总参谋部的报告。

[4]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5]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二

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1]

---

[1] 这是毛泽东在军委1952年11月11日关于苏联顾问参加部队各该级党委会议给杨成武并告各大军区等的电报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关于罗瑞卿[1]传达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问题给各同志的信

（1952年11月13日）

各同志[2]：

此事[3]因为我过去说时，没有如同在十一月十二日的会议上那样，明确说明此种意见的性质（尚不是决议），传达范围和什么人不要传达，故有些同志在相当范围内传达了。此事不应由他们负责，而应由我负责。罗瑞卿同志因此事请给处分，应无庸议。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指周恩来、朱德、陈云、薄一波、邓小平、邓子恢、高岗、谭震林、彭德怀、黄克诚、刘澜涛、罗瑞卿、杨尚昆、习仲勋、胡乔木、陈伯达、安子文。

[3] 指毛泽东1952年9月下旬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所说的10年至15年内在中国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

美帝国主义要打下去就只有失败[1]

（1952年11月15日）

美帝国主义要打就让它打下去，打下去就只有失败。上个月仅在一个四平方公里的地方[2]，他们就死掉了两万人。其中在两个很小的阵地上，战争来回进行了二十多天，结果是杀伤了敌人达一万八千人。我们志愿军不仅可以打运动战，现在也能打阵地战。我们在山腰上挖了许多的壕洞，就像“北京饭店”一样，敌人攻到山顶还不能占领我们的阵地。这个“北京饭店”后面还有一个“饭店”，敌人攻上来，我们退到后面，等他们进入阵地，就给以杀伤。如此反复几次，敌人伤亡极大。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设备很简单，现在住的都是“北京饭店”，又能防守，又能打击敌人。

美帝国主义打起仗来有四个不利。一是死人。过去我们与美国军队的死伤比例是一比一点八，现在则是一比二点五。二是用钱。要打仗就得用钱，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用钱为我们的八倍至九倍。钱从哪里来呢？只有收税。三是战略。东西两线不能兼顾。四是吵架。人民向他们吵，国内两个党派吵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也吵架。我们没有战略的困难，没有吵架。既然打仗总要有死伤和用钱，但我们死伤的要比美帝国主义少（一比二点五），用钱也比美帝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指朝鲜上甘岭地区。

国主义少（一比八至九）。死人、用钱都只能算半个不利。所以美帝国主义有四个不利，我们只有一个不利。

美方代表团在十月八日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改变的”。你是三个“的”，我是一个“打”，总要迫使美方把它提出的方案改变为“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对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2年11月16日）

一

略有修改。周、陈、小平[2]再阅。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早

今（十六）日看完，明日发出。

二

目前已在广大区域内形成了公私关系的紧张形势，失业人员已在大量增加；许多中小工商业者、家庭商店及摊贩，已在埋怨我们。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三、四是他在指示稿中加写的话。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三

也使中小工业家、手工业者和农村家庭副业的产品找到较多的销路，不使他们发生困难。[1]

四

在零售方面，公私商业的比重，就全国平均数来说，目前仍应按今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如有增减，应报中央批准。

五反运动使工商业者受到一次教育，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情况。毛泽东及时调整工商业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发展。

---

[1] 这句话加写在中央指示稿的以下文字之后："在目前保持私商的营业额，不但无害于国营商业的领导，而且可以补助国营商业的不足。"

为全国各级军校毕业证书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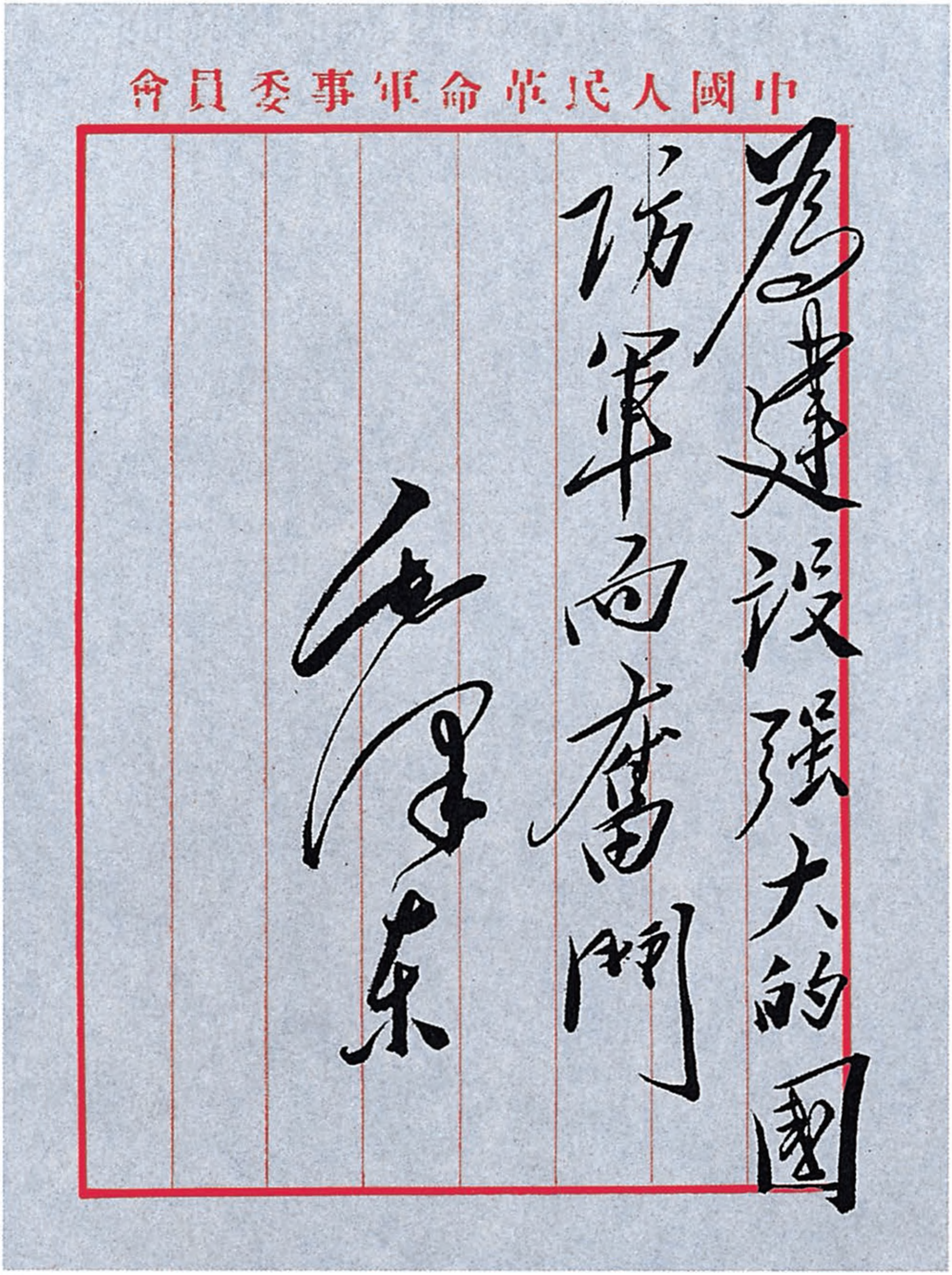
（1952 年 11 月 16 日）

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的请示，为全国各级军事学校毕业证书的题词。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奮鬥

毛澤東

毛泽东为全国各级军校毕业证书的题词。

中央关于印发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批语

（1952年11月26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军区党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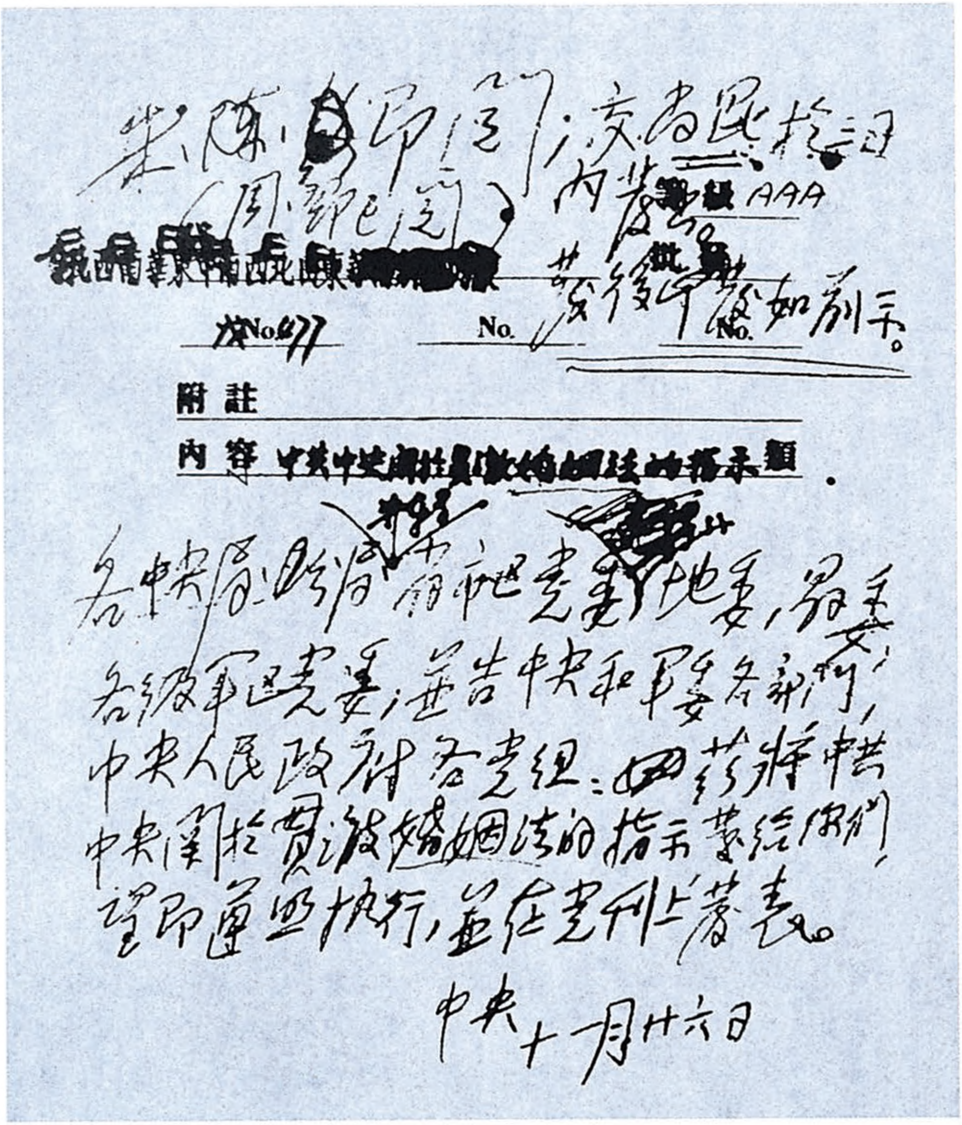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1]发给你们，望即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十一月廿六日

---

[1] 1952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强调指出以下几点：（一）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教育，树立对婚姻法的正确认识。在思想上划清封建主义婚姻制度与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界限。（二）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一种反封建的民主改革，但它不同于农村中的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婚姻制度的改革纯全是人民内部的事情，需要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而不能采取粗暴急躁的态度与阶级斗争的方法。（三）以1953年3月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从1952年12月开始，各地应即为贯彻婚姻法运动做好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四）建议各级人民法院建立专门的婚姻法庭，负责处理婚姻案件。（五）各县（市）所辖的区人民政府以及未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建立婚姻登记处，正确地办理婚姻登记工作，这是贯彻婚姻法、保障婚姻自由的一项重要工作。



朱、陈、[illegible]、邓阅，（周、彭、邓阅）交尚昆于今日内发 AAA

~~東北西南華東中南西北山東~~

发后中发如别示。

發No.477　No.　No.

附註

內容 ~~中共中央關於貫徹婚姻法的指示題~~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军区党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兹将中共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发给你们，望即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十月廿六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的批语。

对贺诚[1]关于召开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1月26日）

贺诚同志：

（一）题词[2]可写，请你们拟出几个简单语句送我择书；（二）此次会议[3]准备工作甚为重要，应和习仲勋、胡乔木[4]同志商酌，并在文委党组加以讨论。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

---

[1] 贺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2] 指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毛泽东题词的全文是："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3] 指定于1952年12月上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这次会议拟总结爱国卫生运动及三年来卫生建设情况，并评奖爱国卫生运动模范，举办带有评比性的卫生展览。

[4]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

在中央对全总党组报告的批语稿中加写的话[1]

（1952年11月26日）

“技术一边倒”的提法，虽有不恰当之处，但这只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这一口号的简称，因此不要当作一个问题来批评，正式的口号应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1952年11月1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五金冶炼工会筹委会1952年11月1日关于石景山钢铁厂生产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有“技术一边倒”的提法，似有纠正的必要。中共中央对全总党组报告的批语原稿中说：“技术一边倒”的提法，确有不恰当之处，但在目前尚无害处，暂时不必公开批判。毛泽东加以修改，成为本篇这段话。几个月后，中共中央于1953年4月26日发出了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的指示，指出“技术一边倒”的提法是不恰当的，应以“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来代替。指示说：“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边的问题。”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并不排斥可以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中技术上某些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技术一边倒’的口号的片面性和它的不能服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好像表示我们完全拒绝这种必要性似的”。

对成立军委兵役法研究委员会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1月27日）

同意成立兵役法研究委员会。[2]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2年11月26日报告的批语。

[2] 肖向荣的报告说：为了准备兵役制度的实行，由人民武装部协同顾问同志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草案）》。11月25日总参谋部第五次例会提议成立“军委兵役法研究委员会”，以聂荣臻为主任，粟裕、黄克诚等12位同志为委员。

在中央转发的中财委党组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给邮电部的指示中加写的话[1]

（1952年11月）

这是目前应当注意的主要方面。

---

[1]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在中共中央转发中财委党组1952年11月20日对邮电部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时，加写在指示中“以纠正目前普遍发生的单纯任务和单纯营利的观点和作法是必要的”之后的。中财委党组的指示说：“邮电部提出立即采取措施向广大干部职工讲清楚邮电事业应从对国家和人民所负的责任和作用上来检查自己是否完成任务，而不应单纯从盈利和积累国家财富上着眼，以纠正目前普遍发生的单纯任务和单纯营利的观点和作法是必要的。但不要机械地把邮电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分开，而应统一起来看，否则又要发生另外的偏差。”

各地应设立捕歼空降特务的武装据点

（1952年12月2日）

罗瑞卿[1]同志：

文件五份，图一份，请加研究，退回叶子龙[2]。这些材料中，多数你处是有的。

从东北的材料看来，已发现和剿灭的是长白山区的五处（五个县所属）；此外敌尚企图在小兴安岭山区和闾山区空降，目的是建立游击根据地和派人侵入城市爆炸和暗杀。另据悉，马良[3]在草地已准备机场，美机可能在那里着陆。另据朝鲜所获敌机特务所供，敌机在新疆西部、新蒙边境、甘孜附近、西康[4]西南部都曾着陆接送特务。这件事在各苏新国家[5]内都是有的，苏新已唤起注意，捕捉特务。

由此判断，敌在我全国各省的森林、沙漠、草原等无居民区，例如大巴山、大别山、武夷山、罗霄山、五岭[6]、秦岭、绥、蒙、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

[2]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3] 马良，当时盘踞于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界处的土匪头目。

[4] 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5] 指当时的苏联和各新民主主义国家。

[6] 五岭，指位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边境的大庾、骑田、萌渚、都庞和越城五岭。

豫西、湘西、云、贵、川、康、甘、青等地，都可用直升机和大运输机在夜间空降或着陆，除已知者外，说不定有许多**我们并不知道的**。在非山区也可空降特务。据说北京、天津附近即已空降过。

请你考虑由公安司令部对此事专门作一次布置，例如在长白山区，小兴安岭区，闾山区（似即地图上之醫吾闾山[1]），内蒙草地，大巴山区及其他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许多处，责成每个大军区和每个省各设若干这样的据点，专为对付敌人空降而设。无事则在山里生产和学习，有事即报信和捕捉特务。如有必要，应召集各区的一些人来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

美国制定了所谓“共同安全法”，每年拨款一亿美元专为此类用途，空降特务即系由此而来。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

[1] 醫吾闾山，即医巫闾山，简称闾山，位于辽宁北镇、义县、阜新交界地区。

对《一九五三年兵工生产会议备忘录》的批语

（1952年12月2日）

尚昆[1]同志：

在你们正在拟制的分工条例[2]中，应增加一项：**各委、部、会讨论重要问题**时，应做出简明纪录送阅。军委已由肖向荣[3]这样做，很有用处。此件是封永顺[4]做的，也很好，比做长报告送阅，经济得多。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这个分工条例后来形成为中共中央1953年3月10日发出的《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中规定，政府各部门“将会议所讨论的或所决定的重要事项，用最简明的文字记录出来上报”，可以作为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一种方式。

[3]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 封永顺，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械部副部长。

对聂荣臻[1]关于今冬动员新兵三十五万人的计划的批语

（1952年12月2日）

朱、彭[2]阅，退聂办。

同意今冬动员卅五万人，应即布置施行。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2] 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对华东局关于上海国棉二厂团结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经验通报的批语

（1952年12月2日）

陈、薄[1]：

此件[2]有用，似可由你们通报各厂仿行。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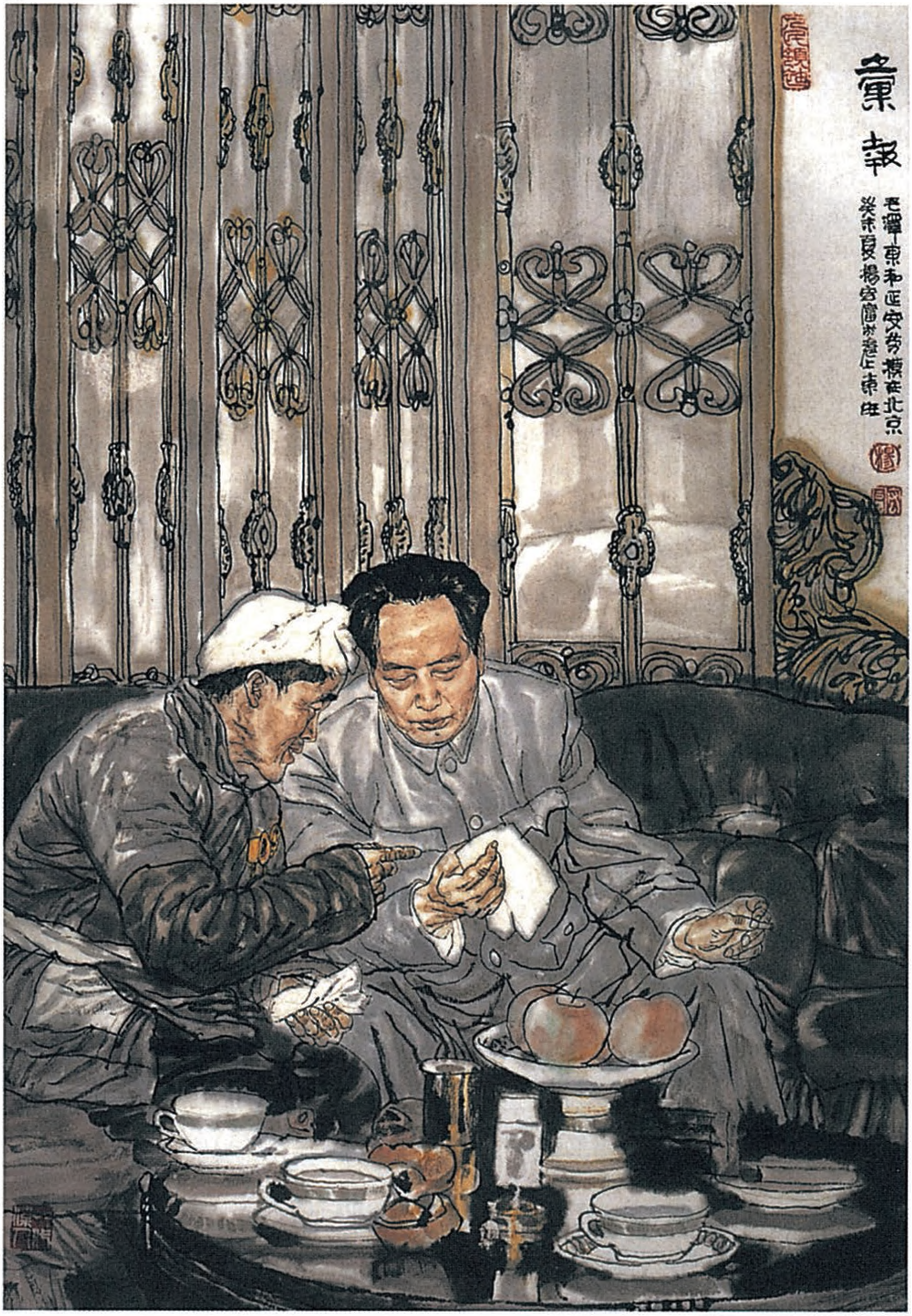
---

[1] 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1952年11月24日向所属通报的上海国棉二厂团结技术人员解决生产关键问题的经验材料。其基本内容是：工厂的领导干部将生产中的关键问题交给技术人员，依靠技术人员经过科学实验加以解决。他们明确规定，“凡有关技术问题，工程师室应负完全责任”，并向车间干部宣布，凡生产上有关技术问题，应接受工程师的指导，有关技术措施的决定，应先送工程师室审查，使工程师有责有权。因而开始改变了过去生产管理上无人负责的现象，使生产技术上的问题得到及时的解决。

1952年，毛泽东和劳动模范杨步浩在一起。

1952年，毛泽东和劳动模范杨步浩在一起。


彙報
毛澤東和延安勞模在北京

《汇报》（中国画）

在外交部一份外交工作汇报[1]上的批语

（1952年12月3日）

周总理：

印度调停朝鲜及我答复经过，应于日内公开发表，不宜太迟。可用新闻方式历叙各次答复内容，而着重最近一次。至于印方最近又来长文，因印荒谬提案已在联合国通过[2]，似无答复必要。以上是否适当请加考虑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

[1] 指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两周外交工作汇报》第二期（1952年11月16日至29日）。关于朝鲜停战问题，这一期汇报中说：“对印度和印尼提出的解决朝鲜俘虏问题的建议，于11月24日及29日由章副部长和周总理分别答复，指出其意见和美国的‘自愿遣返’实质上一样。答复前，他们都急欲知道我方态度，答复后又立辩其建议和美国的不同，尼赫鲁并要赖嘉文大使向我表示印度政府将进一步澄清此问题。”

[2] 联合国大会1952年12月3日第三九九次全体会议，根据印度提案通过了关于遣返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决议。1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皮尔逊的复电中指出，联合国大会根据印度提案所通过的这个以战俘遣返问题为中心内容的非法决议案，是完全以美国方面一直无理坚持的、被公认为违背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公法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或“不强迫遣返原则”，亦即实质上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为其基础的。

接受瑞典驻华大使魏斯特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12月3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呈递的瑞典国王的国书，并感谢您的祝贺。

我对于您出任瑞典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表示欢迎。

我也很高兴地接受您对于努力加强中瑞两国友好关系所提的保证。我深信您在这方面的愿望和努力必能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支持。

谨祝瑞典国王健康及瑞典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

致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52年12月4日）

张经武[2]代表，转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藏历水龙年[3]九月十六日）关于九、十两月份的工作报告阅悉。感谢你对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帮助，并庆贺你在爱国团结工作上的成就。后藏为西藏的一部分，后藏地区在建设方面需要中央帮助之处，请就近与张经武代表商洽，经他通盘拟议后报中央审核。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张经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3] 藏历水龙年，即1952年。

部队每年应进行点验一次至二次

（1952年12月6日）

聂荣臻、张宗逊[1]二同志：

西北此种点验[2]办法很好。各军区是否都在进行点验？嗣后每年应进行点验一次至二次，定为制度。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

---

[1] 聂荣臻、张宗逊，当时分别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

[2] 点验是对部队的人员、装备、物资等进行清点和检验，目的在于了解部队的实力和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促进行政管理和战备工作的进一步落实。西北军区1952年12月1日关于部队点验工作的报告中，列举了点验工作中发现的不少严重问题：一、部队人员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部分干部工作方法单打一，抓住文化学习放松了行政管理工作，造成部队斗志涣散、战备观念薄弱。二、管教不严，军纪废弛，发生上级打骂下级，下级不服从命令，吵嘴打架现象。三、损坏、遗失、不爱护武器、弹药、公物的现象严重。四、人员保健、马匹保养方面存在问题。五、部分单位对文件登记保管不严，致有遗失文件现象。六、对条令很不熟习，军事素养差，职责不明。报告还说，在这次点验工作中，也发现了比较好的单位和个人。

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轮换到朝鲜战场锻炼的批语

（1952年12月6日、19日）

一

彭[1]阅，退聂[2]办。

同意这个计划[3]。政治、后勤两系统，请聂告两处负责人拟出一个计划来。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

二

彭阅，退肖华。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3] 指聂荣臻1952年12月5日在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中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到朝鲜进行实战锻炼的具体计划。

同意这个计划[1]。只是数目还觉小一点。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

[1] 指肖华1952年12月18日在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中提出的总政治部关于组织政治工作干部分批轮换到朝鲜战场取得政治工作经验的具体计划。

为第二届爱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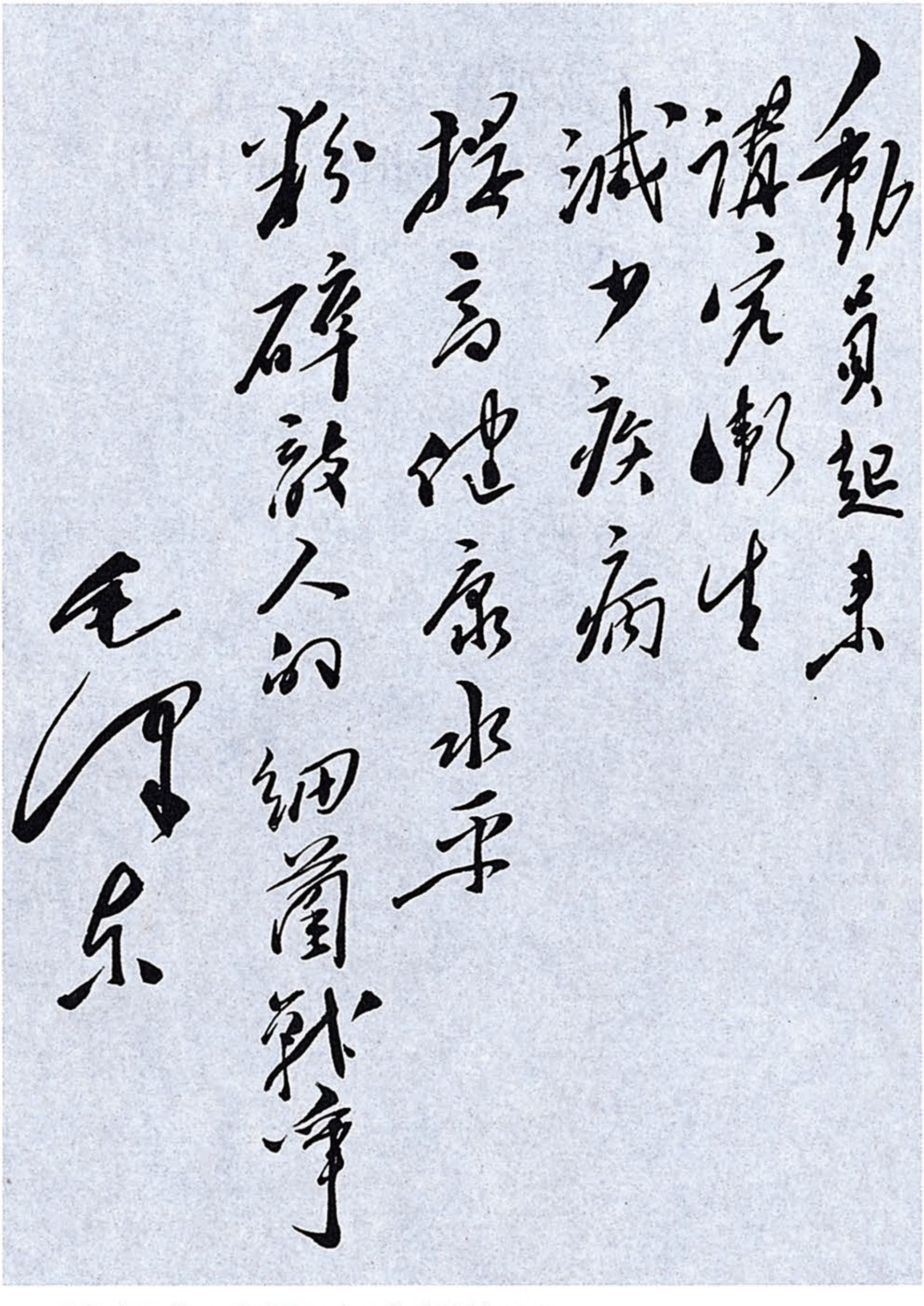
（1952年12月8日）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粉碎敌人细菌战为第二届爱国卫生工作会议写的题词。



動員起來
講究衛生
減少疾病
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

毛泽东

毛泽东为第二届爱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

关于志愿军必须火急准备粉碎敌人登陆计划的电报

（1952年12月9日）

邓华[1]同志：

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

---

[1] 邓华，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对中宣部关于在京高级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2年12月10日）

周总理阅后，送乔木[1]同志：

此件[2]已阅，很好。前次谈到由中央补发公开发表的学习指示一事，我想不必补发这样的指示了，在报上发布学习总结性的新闻报道即可。

毛泽东

十二月十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12月9日关于在京20余单位的高级干部学习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在邓华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上的批语[1]

（1952年12月）

一

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二

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

[1] 毛泽东的这三段批语，写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的方针任务的报告上。前两段批语写在报告中关于美国有可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分析登陆的几种可能性的话旁边。第三段批语写在报告中以下一段话旁边：“照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运输供应已有相当保证，而能与敌人进行更持久的斗争了。（如敌在西海岸登陆，则运输会很困难。）”

三

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对肖华[1]关于朝鲜要求提供为加强瓦解敌伪军工作所需的印刷宣传器材等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2月10日）

此件[2]已阅，退肖华办。

同意尽量满足朝鲜同志的要求。

毛泽东

十二月十日

---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肖华1952年12月8日关于朝鲜为加强瓦解敌伪军工作要求我国提供帮助（解决几名英语干部以及宣传器材、文娱教育用品和图书资料等）给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的报告。

对陈伯达[1]等关于筹备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2月10日）

乔木[2]同志：

将此件[3]抄送各中央局宣传部长一阅，使他们初步了解中央准备成立红色教授学校的意图及其伟大的意义。

毛泽东

十二月十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副院长。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指陈伯达、杨献珍、陈昌浩1952年12月5日关于他们12月4日同马列学院分院苏联教授谢甫磋夫等谈话要点给中央的报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马列学院分院教学情况、在分院培养教员和筹备马列主义教师学校等问题。同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将陈伯达等的上述报告转送中央各同志、各中央局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并写了如下的一段话："中央最近决定设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为各大学、各党校和各地党委训练马列主义各科师资和理论工作人才，其性质任务略如苏联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八年的红色教授学院，而与中央党校性质的马列学院相区别。"这所学校后来没有单独设立。1953年2月10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分设两部，以第一部专负培养马列主义师资之责，主要是培养高等学校和党校的马列主义教师。原马列学院为第二部。

对中宣部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具体事宜的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52年12月10日）

均同意。陈昌浩[2]的工作，可以即行改变。

毛泽东

十二月十日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2年12月9日在报告中说，关于成立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两事，特向中央请示两点：一、关于负责人选，提议以黄松龄任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校长，并即行负责筹备这一学校的成立，尽可能争取在明年3月开学。筹备工作由凯丰会同安子文负责指导，成立后亦由凯丰领导。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提议由师哲任所长，陈昌浩、姜椿芳任副所长。惟陈昌浩的工作变动是否须俟刘少奇回国后再定，请中央指示。编译所的工作亦由凯丰负责领导。二、以上两机关名称是否即定为马克思主义教师学校和马恩列斯著作编译所，亦请中央决定。

[2] 陈昌浩，当时任马列学院副教务长。

对有关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等问题的批语

（1952年12月11日、27日）

一

周朱[1]阅，退彭[2]、聂办。

同意这个部署[3]，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聂荣臻1952年12月10日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的报告中提出的有关防敌在志愿军侧后登陆等问题的具体部署。报告说，遵照毛泽东对朝鲜今后战局发展之判断和决心，于9日下午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共同研究讨论了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朝鲜铁路的修建与改善，国内新兵动员，以及辽东、山东两半岛的设防问题，并制订了具体部署。

二

铁路争取四月底完成龟城、球场、德川线，并于球场、德川间高山修汽车路及大量仓库，先行捣〈倒〉运通车。龟城、球场间另需保持一条宽的公路。熙川、德川间争取加修一条宽的公路。原有两条公路争取加宽。满浦、球场间线路争取大大改善。[1]

三

照办。[2]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七日

---

[1] 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写在聂荣臻报告中以下一段文字旁边："朝鲜铁道的修建与改善，与滕代远、吕正操研究后，拟先修龟城至球场段（八十七公里）和球场至德川段（卌七公里半），同时改善辑安至球场原有线路。"

[2] 聂荣臻的报告说：对铁道部所提关于修建朝鲜铁路的意见，拟作如下处理：（一）同意修建球场、德川线，并改善顺川、价川线。（二）工程部队，由铁道部与中财委直接商定，在农业师或其他工程师中抽调解决之。（三）拟由改装师中抽三至四个高射炮营担任掩护修路任务。

中央关于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致刘少奇电

（1952年12月12日）

张闻天[1]同志，转刘少奇同志：

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2]（不是代表大会），请你于十二月下旬或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议程。饶漱石、陈毅、刘长胜、李富春[3]、张闻天五同志则请于一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以便出席会议。

中央

十二月十二日

---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

[2]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后来推迟到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

[3]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刘长胜，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他们是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成员。

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1]

（1952年12月12日）

邓、杨：

兹接友方特别通讯[2]如下，望提起严重注意，加紧准备打敌在我后方登陆，务必完成任务。明年二三两月是紧急时间，我军应在本月及一月加紧准备作战，特别注意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

总参谋部

十二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的电报。

[2] 1952年12月11日特别通讯中称，侵朝美军企图在1953年2月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准备占领全部北朝鲜直抵鸭绿江。

对肖克关于军训部与苏联顾问合作问题的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52年12月14日）

彭[2]阅，送肖向荣[3]同志：

请将此件[4]发军委各部门及各大军区、志愿军、各军事学校、各兵团参考，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肖克1952年12月9日报告的批语。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3]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 指肖克1952年12月9日关于军训部两年来与苏联顾问合作问题给毛泽东并军委总参的总结报告。

给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全体职工的信

（1952年12月14日）

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全体职工同志：

我很高兴地读了你们十二月二日的来信[1]。祝贺你们在平炉炼钢生产上的最新成就[2]。你们以高度的劳动热情和创造精神，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创造了超过资本主义各国水平的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的新纪录。这不仅是你们的光荣，而且是我国工业化道路上的一件大事。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完成一九五三年度炼好优质钢的新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

[1] 来信向毛泽东汇报了1952年11月22日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创造了6小时9分钟炼一炉钢的平炉炼钢全国新纪录的喜讯。

[2] 指鞍山钢铁公司炼钢厂给毛泽东写信报喜的前一两天，四号平炉生产一炉钢时在炼钢时间和炉底面积利用系数等生产技术指标方面创造的新纪录。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年12月15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获得了极大的巩固与发展。由于中国人民的不断努力，并在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兄弟般的援助下，新中国在各方面均获得了成就，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我深信：我们两大国家伟大友谊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有利于中苏两国的繁荣，并且在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必然会起着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1952年，毛泽东接见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

对海军党委反官僚主义布置的批语

（1952年12月16日）

彭、聂、黄、肖华、肖向荣[1]同志：

海军党委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布置[2]是很必要的。请你们考虑先在军委各部门择期举行党委扩大会，其内容可大体相同于肖劲光所规定的那样。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做出决定。俟军委做有成效时，再推广至各大军区。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1952年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海军党委拟于明年一月十日召开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民主检讨，反官僚主义，重点检查全军工作的思想领导、重大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有关克服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并研究如何完成一九五三年任务。"

中央转发安子文[1]两个报告的批语和毛泽东给安子文的信

（1952年12月19日）

一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兹将安子文同志十二月五日关于目前整党和建党工作的报告[2]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各项意见都是正确的，请即据此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安子文1952年12月5日关于目前整党和建党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提出，目前农村整党建党中必须妥善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是：（一）农村整党结合三反的问题，一般以不提三反，而把它贯注于整党工作之中作为整党内容的一部分为好。（二）教育党员明确农村发展方向，反对当富农，反对雇工剥削的问题，在农村已是一个严重问题。但在反对党员的富农思想与剥削行为时，必须有明确的界限，必须十分注意防止发生“左”的偏向。（三）根据目前农村党的组织状况，把受组织处分的党员的数字控制在党员总数的15%到20%是恰当的。（四）完成农村整党的基本保证，是各级党委有效的坚强领导和整党工作队严格地遵守政策和纪律。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简单急躁、整得过火的问题。关于建党工作，报告指出只注意发展新党员的数量而忽视其质量的急于求成的单纯任务观点，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各级党委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工作条件与力量来进行建党工作。

指导当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和建党工作，务使少犯错误。安子文同志这个报告请发至县委及整党工作队，并登党刊。

中央

十二月十九日

二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一级各直属党委：

兹将安子文同志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东北局管理和审查干部的经验的报告[1]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东北局管理和审查干部的经验值得全党注意；其所发现的问题是各区各省市都存在的，必须认真处理。中央已决定于一九五三年春季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检查和总结干部管理工作方面的经验，并仿东北办法布置对干部的审查工作。请你们根据东北的经验联系自己在管理和审查干部工作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先作准备，使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

---

[1] 安子文1952年12月18日关于东北局管理和审查干部的经验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东北局组织部于11月中旬召开干部工作会议，检查总结了干部管理工作。东北全区3年来大胆提拔和培养了大批干部，完成了各种任务，他们的干部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同时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在执行干部政策上存在的偏差是，单纯强调业务能力，忽视政治品质；凭个人喜恶和亲戚朋友关系提拔使用干部；喜欢知识分子，讨厌工农干部；强调资历，不敢大胆提拔年轻干部；歧视妇女干部。二、党的干部队伍严重不纯。三、在高级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中，有些人历史上存在问题，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安子文认为，东北局组织部的这个报告很好，为引起各地注意，请求中央转发各地。

议能够顺利地完成任务。

中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三

安子文同志：

十二月五日关于整党建党报告，十二月十八日关于东北审干经验报告，均已收到看过，均很好，并已于今日批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整党报告我拖延了阅看时间，是一损失。此事各地这两三个月正在紧张地进行，你的报告待发到县区乡，恐须一个月时间，似宜由你或你的助手用电话经常与几个中央局组织部长联系，叫他们也用电话与下级联系，迅速纠正偏差，方为适宜，请加考虑。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对薄一波[1]关于乡镇摊派名目繁多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2月19日）

周[2]阅，退薄一波同志。

似乎仍宜发一个指示，总结一下过去的情况，并指出方向，即将此信[3]中所指各项原因及解决乡财政三原则以及统计表第一页说明中所述几项特点写上，不要太长，也就可以了。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周，指周恩来。

[3] 指薄一波1952年12月18日关于乡（村）镇摊派名目繁多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乡（村）镇摊派名目共计六大类三百三十六种。分析原因有以下六条：（一）乡政权未改造，上级政府又抓得不紧，致使摊派十分严重。（二）中央及大行政区各系统各自布置工作，扩大编制，扩大事业，但不指明经费由何处开支。（三）中央有些部门为了开展“业务”，而加重人民的负担。（四）有些则是财政制度没有明确规定，应禁的未禁，应开支的不报销，只有摊派之一途了。（五）有些摊派如会餐费、典礼费、开会费等，大多是上行下效，受了上级铺张的影响。（六）有些摊派是由于地方干部过分热心，过多地过早地举办一些力不胜任的事。所有这些名目繁多的摊派，经过三反运动及半年来整理村财政，已有一些改进。

对统战部关于查询苏南破坏寺庙情况的电报的批语

（1952年12月19日）

李维汉[1]同志：

此件[2]望加衔发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统战部加以注意。估计此类事各地皆有。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1952年12月11日关于查询苏南破坏寺庙情况给华东局统战部的电报。电报说江苏有一些佛教徒反映：浦东“今年春天以来，拆像毁寺之风大炽，几所名胜寺庵全遭破坏”；浦南的净心庵亦被摧毁无遗。电报要求华东局统战部查明真相，如情况属实应即纠正并作适当处理，并应注意其他地方有无类似情况发生。

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1]

（1952年12月20日）

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军委各部门首长：

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

一、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2]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3]），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二、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

三、为此目的，我军必须：

（甲）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各同志的电报。

[2]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共和党人，当时已当选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1953年1月20日正式就任。

[3] 指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1952年12月2日通过印度关于遣返朝鲜战俘问题的提案。提案的主要内容是：以不得“强迫遣返”战俘为由，允许不把全部战俘遣返回家，并规定将没有遣返的战俘交给联合国。

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

（乙）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

（丙）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

（丁）我正面各军过去作战成绩很大，在一九五三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

（戊）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

（己）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一九五三年四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

（庚）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1]同志为西海指副司令员，西海指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四、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

---

[1] 梁兴初（1913—1985），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第三十八军军长。

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中共中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对东北农村工作会议有关文件的批语

（1952年12月21日）

周、朱、陈、薄[1]阅，尚昆办。

此件[2]经廖鲁言、陈伯达二同志研究过，其修改之点伯达和我谈过，并得高岗同志同意。你们如无时间，只看东北局报告[3]及中央复电即可。

请尚昆将中央复电一件，修改或批注的张明远报告一件，章程等草案四件[4]，共六件，送往东北局，其中张明远报告等五件均原文送去，不要重抄。另请尚昆将东北局给中央报告一件，中央复电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张明远1952年10月28日在东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贯彻执行农业合作化决议，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报告。

[3]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1952年11月19日关于10月27日至11月10日召开的东北区农村工作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这次会议的收获和缺点，反映了会议在讨论东北局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中“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扶助贫困的农民，团结个体的农民，限制富农的剥削”问题上的争论，请中央予以指示。

[4]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农村工作会议通过的《东北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章程》《农村供销合作社信用部组织通则》《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和《农村私人借贷暂行条例》等4个文件。

一件，张明远报告一件，东北农业合作社试行章程草案一件，**共四件**，印送东北以外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一日

给易南屏[1]的信

（1952年12月21日）

南屏兄：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六日惠书及抄本两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体弱多病，不宜外出，更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三百万元，借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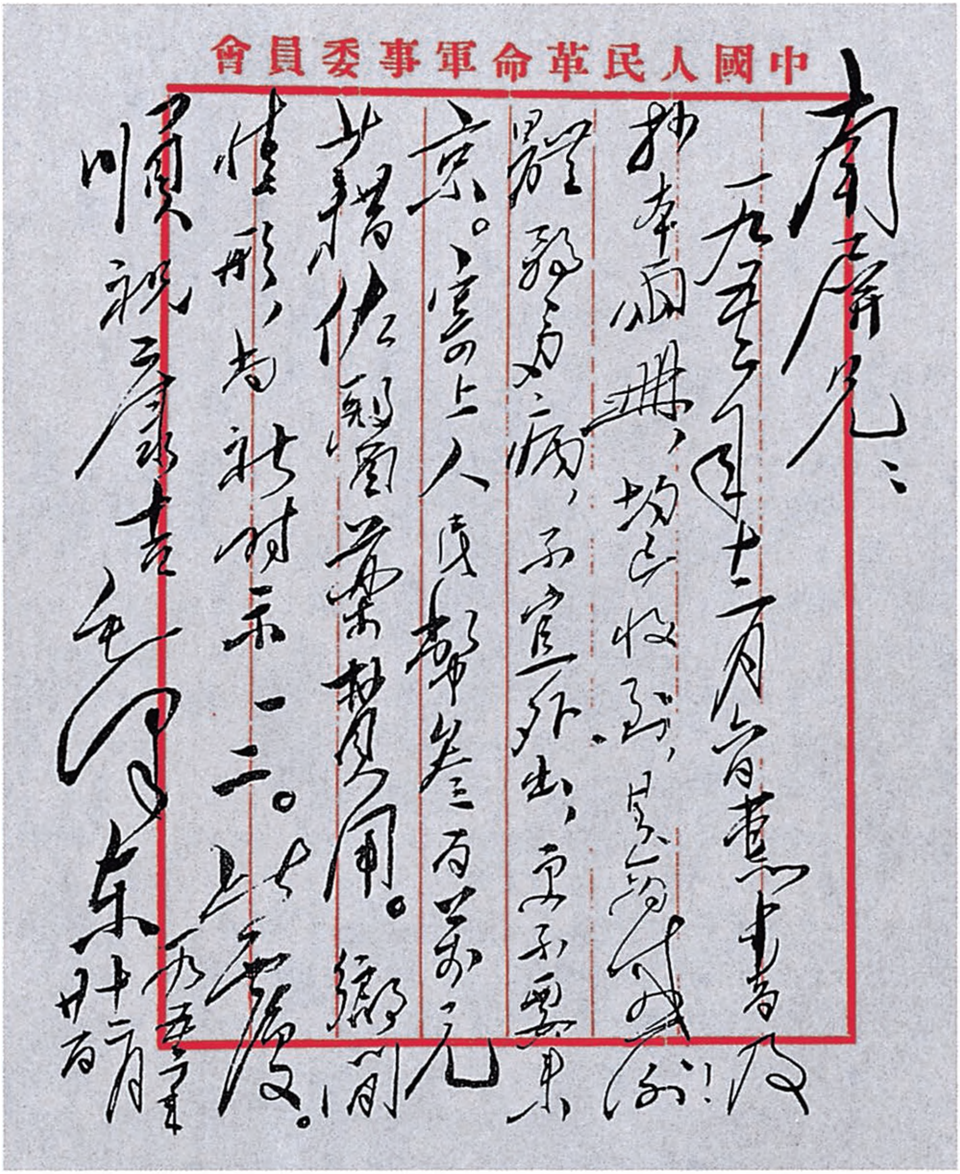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一日

---

[1] 易南屏，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称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的同学。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南屏兄：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惠书及抄本两册，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体弱多病，不宜外出，亦不要来京。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以稍佐医药费用。乡间情形，尚祈时示一二。此复。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日

毛泽东致易南屏信的手稿。

对中央转发三年来侨汇、华侨投资情况报告[1]的批语稿的修改[2]

（1952年12月22日）

华南分局，福建省委，并告中南局、华东局：

---

[1]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央侨委1952年12月10日的这个报告说，3年来侨汇收汇情况已达战前水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与劳动阶层小笔的赡家费，投资只占极少数。在侨汇工作中，由于在个别地区我们对私营侨汇业的组织工作较差，对侨眷所收侨汇处理上有严重的偏差，华侨汇款的潜在力量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对华侨投资的辅导工作也做得很不够。各地没有辅导华侨投资的强有力的专管机构，使回国华侨资金的出路问题不能具体地及时地解决。今后开展侨汇工作，主要是如何组织国内外侨汇业冲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发动华侨汇款的积极性和保障侨汇的所有权，指导侨汇出路及正确指导华侨资金回国的问题。为此，提出以下意见：（一）必须坚决贯彻中央“不得侵犯侨汇”的指示，保障侨眷的侨汇所有权，解除侨眷顾虑。（二）华侨回国投资，实质上是华侨的资金内移。为更广泛地团结国外华侨资产阶级与华侨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吸收华侨、侨眷的小量资金，应当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如适当容许华侨回国经营商业，建立华侨信托公司等。（三）加强对反对帝国主义限制侨汇斗争的领导，设法沟通、保持和扩大汇源。（四）侨汇和回国投资问题牵涉面很广，需要有许多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党政有关机关应当重视和搞好这一工作，特别是侨区的党政机关应把侨汇问题列为他们重要的工作之一。

[2]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兹将人民银行党组及中央侨委会党组关于三年来侨汇、华侨投资及现存问题的报告转发你们。中央批准这一报告，请你们指导所属严格执行。对于过去在此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予以切实纠正。

中央

十二月二十二日

对薄一波[1]关于修建福建铁路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2月23日）

周[2]、薄：

（一）照昨晚所议，以先修南厦路[3]为宜；但时间应提早，请考虑能否于三年内修好，以利军事运输。（二）陈嘉庚[4]下月来京，可与之商酌韶厦路[5]与南厦路之利害，将南厦路之军事经济理由告诉他，取得他同意。因此他的来信可以不复。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三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周，指周恩来。

[3] 南厦路，指江西南昌至福建厦门的铁路。

[4] 陈嘉庚，福建厦门人，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5] 韶厦路，指广东韶关至福建厦门的铁路。

中國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参謀長、政治部主任會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1952年12月24日，毛泽东和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会议的人员合影。

对高岗报送的在苏共十九大文件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的批语

（1952年12月25日）

周、邓、陈、薄、曾山[1]同志阅。退高岗同志：

此件[2]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中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1] 曾山，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部长。

[2] 指高岗报送的他在学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的讨论会上的发言。发言结合马林科夫报告中讲到的苏联商业工作中存在的很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3个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为改善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三条意见：（一）很好地研究居民需要，加强产、运、销与商品分拨的计划性；（二）理清贸易企业的财产和账目，核定各级公司的资金，制定一些主要定额；（三）加强政治工作，培养与表扬模范，建立超额奖励制度，从而改善商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后来发现，高岗报送的这个发言稿，实际上是当时国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刘明夫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

同意反登陆作战准备等项军事部署[1]

（1952年12月27日）

邓华同志：

（一）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电报[2]收到，同意你和金日成同志商定的各事。

（二）你和杨得志[3]同志等在志司[4]商定的各项军事部署的电报[5]均已收到，我们均同意。其中有个别事项，例如一三八师的使用，二十一军开进的时间等，由彭副主席[6]在电话中和你们商定。铁路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的电报。

[2] 指邓华1952年12月2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24日9时半，金日成首相召集朝鲜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在会上介绍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场今后作战的指示，和志愿军党委执行中央指示的具体措施，并提出关于反登陆作战的几个问题，请示金日成首相的意见。金日成首相与政治局同志商议后，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对朝鲜形势的看法和决定，并同意志愿军党委的具体措施，同时对有关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

[3] 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

[4]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5] 指邓华、杨得志1952年12月17日发布的《朝鲜反登陆作战部署》、1952年12月23日发布的《关于粉碎敌登陆进攻部署》、1952年12月23日发布的《西海岸作战命令》等。

[6] 彭副主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仍按龟城、球场、德川线修筑为宜。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央和军委关于加强防敌进攻福建沿海的指示

（1952年12月28日）

华东局、华东军区、福建省委、福建军区，并告中南军区：

（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据报一个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二、三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

（二）我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不要依赖任何外援）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

（三）为此必须：

（甲）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预储充分的粮弹饮水，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不许再犯南日岛那样的错误[1]，否则须予负责者以应得的处罚。

（乙）预计敌攻岛屿的几种可能，决定明确的增援计划。

（丙）预计敌在大陆上某些可能登陆的海岸要点，做好若干非永久的战术性的防御工事，例如最近我以一个排坚守海岸工事，赢得

---

[1] 南日岛，位于福建沿海。解放后，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多次窜犯该岛，均被我军击退。1952年10月，蒋军6000人再次侵犯南日岛，我守岛部队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后续部队增援两个营，因指挥不当，遭受严重伤亡，全岛一度被蒋军占据，岛上的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亦受到严重损失。

时间，以一个连增援，歼灭了登陆敌人百余那样。这种以排以连以营为单位的战术性的若干防御工事，是必须做的，不是要你们做大规模的和永久性的大陆海岸防御工事。而在选定必守的岛屿上则必须是永久性的和十分巩固的工事。

（四）张鼎丞[1]同志即回福建担任省委书记和省府主席，叶飞[2]同志专任军事。在张鼎丞同志未到福州前，由他人暂行主持省委省府工作，叶飞同志立即抽出身来全神贯注于对敌作战方面。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

你们的部署望即告。

中央　军委

十二月二十八日

---

[1] 张鼎丞，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四书记兼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

[2]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副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张鼎丞回福建以前主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

关于采用会议简报办法的批语[1]

（1952年12月28日）

陈云、薄一波、曾山、贾拓夫[2]四同志：

近来政务院、军委、文委均采取会议简报的办法，很有用，极简单明了，使人一看即知道会议要点，比做长篇报告还有用些。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仿行，先用此种简报，长篇报告则放在后头，在中央会议上也可省去许多口头报告的部分。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尚昆[3]阅。请尚昆邀集各处办公厅主任商定一会议简报的办法。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2年12月23日召开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会议的简报上。

[2]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曾山、贾拓夫，当时均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1]

（1952年12月28日）

彭：

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2]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1952年12月26日的报告上写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批语。

[2] 指1952年12月26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给聂荣臻的报告。报告中谈到，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兵役机构，不建立就不能实行兵役法，兵役机构应在兵役法颁布的前一年建立。

关于解决志愿军坑道部队日用品供给问题的批语[1]

（1952年12月28日、1953年1月30日）

一

彭、聂、黄克诚、杨立三、肖华[2]同志阅，存肖向荣[3]同志处。

解决坑道内部队一万至两万人经常的蔬菜、黄烟、遮水和娱乐设备等项问题，使他们安心作战，甚为重要。请彭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并作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一名干部1952年12月19日关于解决志愿军坑道部队供给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建议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黄克诚、副部长杨立三和张令彬1953年1月24日关于1952年冬季对志愿军供应情况报告上写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的批语。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3]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二

刘、朱、周、高、小平[1]同志：

此件可阅，志愿军的日用品已得到较好解决。

毛泽东

一月三十日

---

[1] 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对总干部部关于检查与苏联顾问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1952年12月28日）

彭阅，肖向荣办。

这个报告[1]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的）首长们参考。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八日

---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2年12月27日关于检查和苏联顾问关系问题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总干部部顾问卡苏林在今年7月对我们的工作曾提出一次批评性的意见。总干部部遵照毛泽东今年10月20日指示，于12月8日召开了本部各部长及有关处长座谈会，征求苏联顾问对我们工作的意见。我们在会上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顾问表示很满意，并对我们干部工作的成绩、缺点和今后工作谈了不少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很好，可以作为我们今后改进工作的方向。报告还说：一年多来，我们同顾问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重要工作都是主动找顾问商量，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工作态度上相互之间都是诚恳的，如有不同的意见，都是提出商量或予以解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但在实行的步骤上及某些组织形式要照顾我军的实际情况。”

对西藏工委关于成立农牧部未报中央的检讨[1]的批语

（1952年12月29日）

邓小平同志阅，送交李维汉同志：

根据中央过去规定，我党委和军队一切与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都须报请中央处理，不归西南处理；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并未遵守这一条规定。请引据规定原文[2]给以再次指示。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中共西藏工委1952年12月24日向中央并西南局的检讨中说：西藏农牧部是在西藏工委1952年10月29日向西南局报告，经西南局于同年11月6日批准后成立的。“由于我们疏忽，故只报告了西南局而未报告中央，这是欠妥当的。”

[2] 指中共中央1952年4月8日关于同西藏方面商谈、处理重要问题均由中央解决的指示中所作的规定，即：“同意西南局意见拉萨骚乱事件由中央直接处理。中央并决定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关于西藏党和军区的内部事宜，包括编制、部署、整训、生产、修筑、支援等项仍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主管。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

对权五稷[1]祝贺毛泽东生日电报的批语

（1952年12月29日）

此件[2]亦应复函致谢。

来往函电，一律不得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权五稷，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

[2] 指权五稷1952年12月26日祝贺毛泽东生日的电报。

接受罗马尼亚驻华大使郭佐文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2 年 12 月 29 日）

大使同志：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感谢您的祝贺。

三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了中罗两国的繁荣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加强了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

在乔治乌–德治同志的领导下，罗马尼亚人民正在胜利地从事社会主义的建设，并已不断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一向为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与赞扬。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罗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中央转发妇联党组关于当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2年12月30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妇委及妇联党组，并告中央各部门：

---

[1] 全国妇联党组1952年12月25日关于当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主要是：（一）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由妇女单独组织的互助组，这不应提倡，也不应强令拆散，而应通过解决互助合作组织中男女同劳同酬同等民主权利后逐渐进到男女共同组织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二）生产运动中各地涌现出不少妇女劳模，但多不易巩固。今后除对劳模加强教育外，更重要的是使劳模专业化，发挥特长，减少兼职，少参加一般性会议与活动，并注意多培养集体模范。（三）妇女在互助合作组织中得不到同劳同酬，没有平等的民主权利。解决妇女这一问题的最合理办法，是在制度上按农业季节生产之缓急，劳动之轻重巧笨，田地好坏远近，将不同劳动分别定出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标准数量与质量及标准工分，不论男女，做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报酬。还要建立民主生活制度，批评轻视妇女的封建观点。（四）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矛盾也应加以解决。（五）用农村组织起来后劳动力有剩余的论调，来限制妇女参加农业生产，降低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应通过投入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果园和其他副业等来解决。

全国妇联党组在其关于当前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应予批准，并在全国农村中予以施行。除在党刊上发表外，还应印成小册子发到农村中去。

中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卅日

感谢苏联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和财产移交中国致斯大林电

（1952年12月3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

在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期间，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铁路建设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兄弟般的友谊援助将永志不忘。兹值苏联政府根据一九五〇年的协定和一九五二年的公告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和政府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及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苏联和中国伟大友谊的日益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1]

（1952年12月）

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上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草案后来经过修改，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于1953年11月24日下发。

1952年年底，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胜利完成，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越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1952年年底，经济恢复后，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开始繁荣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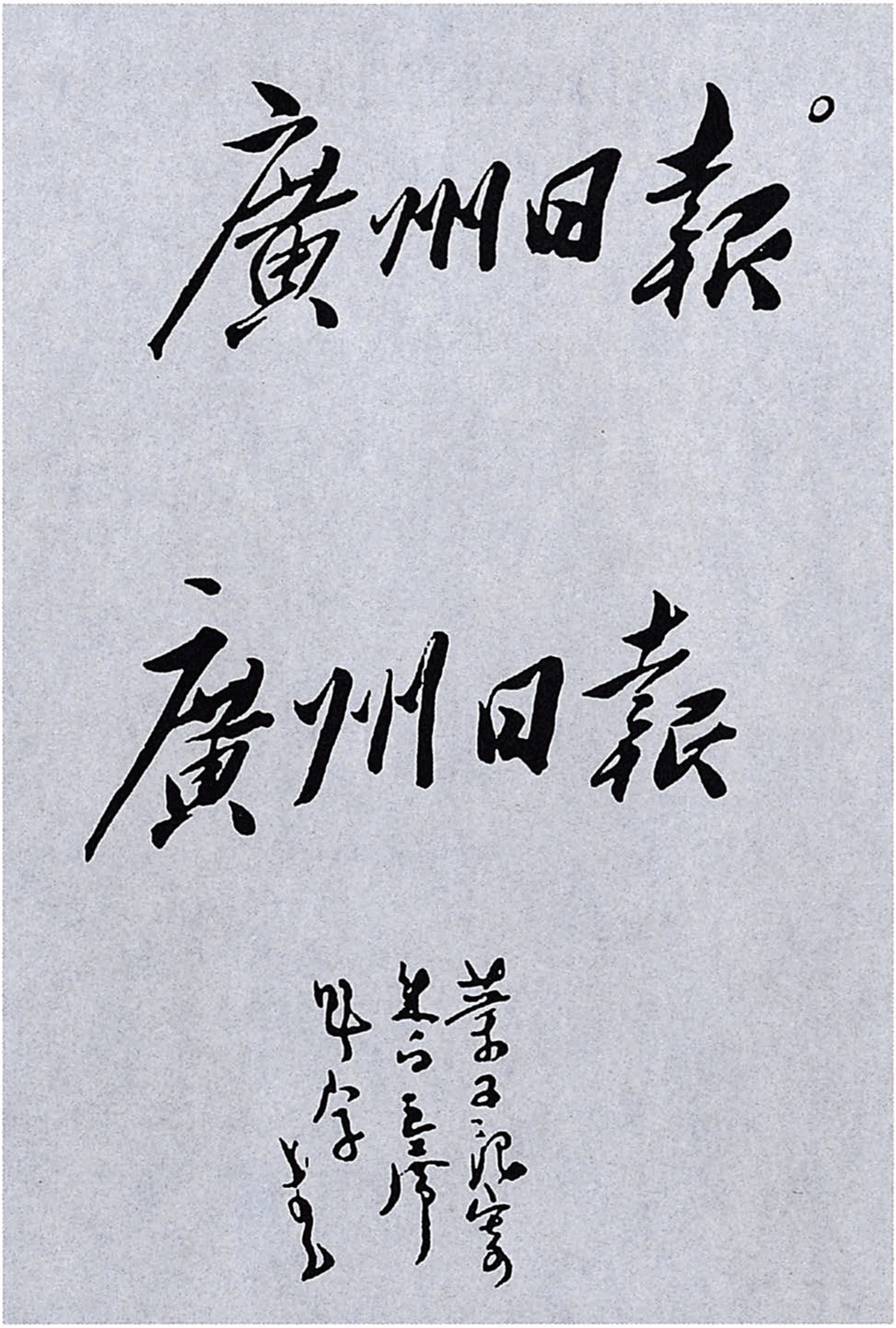
为《广州日报》题写报头[1]

（1952年12月）

广州日报

---

[1] 《广州日报》是中共广州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52年12月1日，报头是毛泽东题写的。



廣州日報。

廣州日報

葉陶二同志
其[illegible]
[illegible]
毛澤東

毛泽东为《广州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蔡协民烈士遗像题字[1]

（1952年12月）

蔡协民烈士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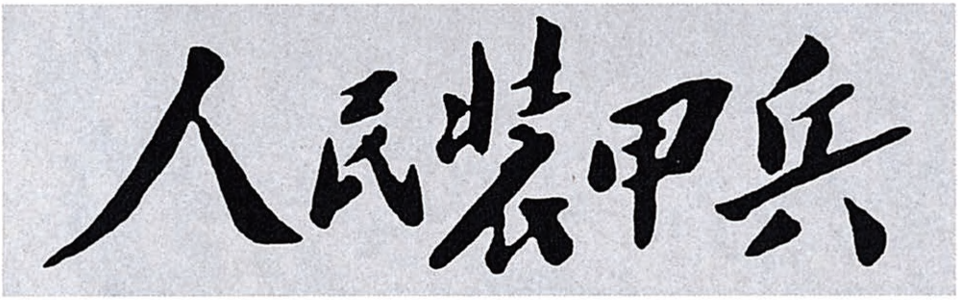
---

[1] 蔡协民，湖南省华容县人，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军委书记，革命烈士。1934年在漳州被杀害，牺牲时年仅33岁。1952年12月，毛泽东亲笔在烈士遗像上题字“蔡协民烈士遗像”，以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怀念。

为《人民装甲兵》题名[1]

（1952年12月）

人民装甲兵



毛泽东为《人民装甲兵》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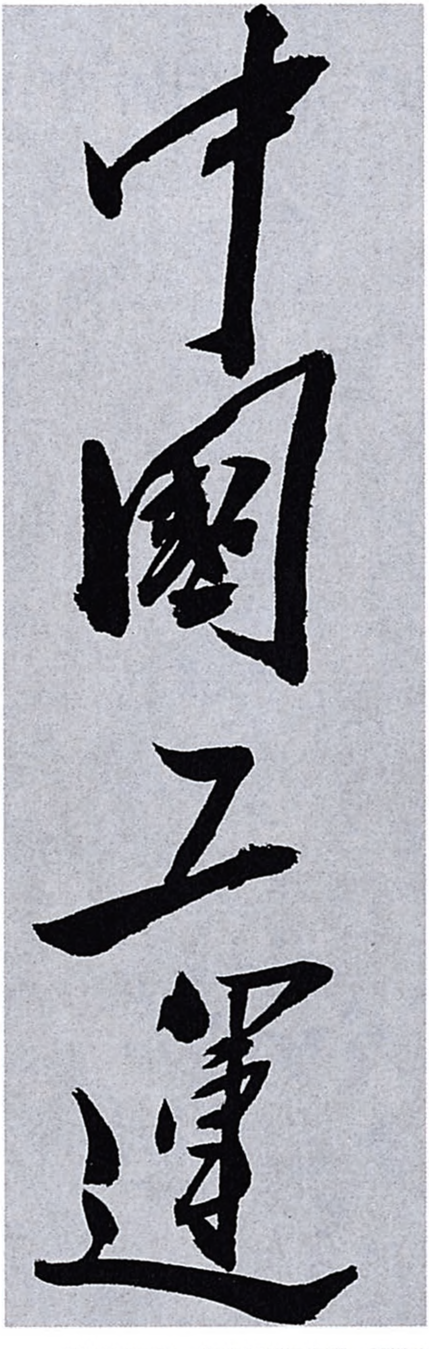
---

[1] 《人民装甲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关刊物。1951年4月1日在北京创刊。1952年12月，毛泽东题写了刊名。1992年2月停刊。

为《中国工运》题名

（1952年）

中国工运



毛泽东为《中国工运》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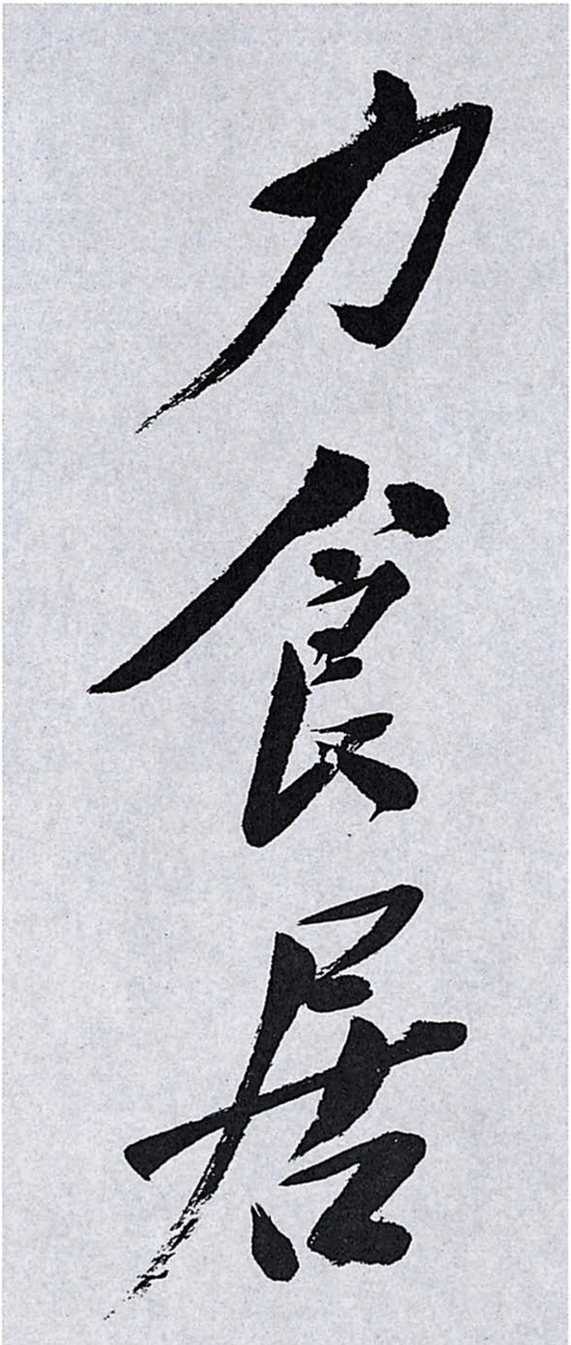
为罗元鲲旧居题字[1]

（1952年）

力食居

---

[1] 罗元鲲，号翰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教员。1952年，毛泽东函邀罗元鲲赴北京叙师生之谊，并合影留念，还亲笔为他的旧居书写“力食居”匾。



毛泽东为罗元鲲旧居的题字。

1953

1953年，毛泽东投票选举人民代表。

转发肖向荣[1]关于各军事部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的总结的批语

（1953年1月1日）

一

这个总结[2]很好，发给军事系统一切有顾问的单位。继续团结所有顾问，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以利于在将来有把握地战胜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凡未送检讨报告者，应迅速送来。嗣后每年检讨

---

[1]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2] 指肖向荣1952年12月31日关于各军事单位检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在中苏友好月中，各军事单位均邀请本部门的苏联顾问举行了座谈会，检讨与苏联顾问的关系。从已报来的材料看，各单位和顾问的关系基本上是融洽的，遇事均和顾问商量。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思想上对“争取顾问帮助”“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认识不深刻，行动上对顾问有不够尊重的表现。各单位提出的今后改进的意见，主要有：各部门、各兵种的党委会议，以及有关布置工作、检查工作较为重要的会议，吸收顾问或首席顾问参加；首长及部门的负责人，定期向顾问介绍我军情况及本身工作情况，并向顾问征求意见等。毛泽东在转发这个报告时拟了以下标题“关于各军事部门与顾问的关系的总结”。

二次。一九五三年应于七月间检讨一次。此件并发给政府系统各有顾问的单位以为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

二

彭[1]阅，肖向荣办。（一）发给各有顾问的单位；（二）印发政府各部门党组，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宣部。

---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确定康藏公路线路问题的批语

（1953年1月1日）

一

周、邓阅，退彭办。

采取南线为适宜。[1]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

二

同意此项意见。[2]

毛泽东

一月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1952年12月30日关于选择康藏公路的线路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关于康藏公路由昌都至拉萨的线路，中央交通部共踏勘6条，其中以南线和中北线较好。现对定线问题有两种

不同意见：（一）中央交通部、中财委、西南军区均主张采取南线，即由昌都经吞多、松宗、通麦、则拉宗、太昭至拉萨，全长1150余公里。理由是，该线沿途大部分是农业区，物产较丰，人口亦多，施工时可以解决一部分粮食问题，石料、木料均可就地取材，对将来经济开发作用亦大；大部分是沿溪线，海拔较低，气候较温和，可常年施工和通车；离国境线较近，修通后可加强国防。但该线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路线较长，沿途牦牛少，工地运输较困难，与川、康、甘、青后方联系较远，将来油料运输线较长。（二）西藏军区主张采取中北线，即由昌都经丁青、沙丁、太昭至拉萨，全长920余公里。理由是，该线离国境线较远，敌人不易切断和破坏；便于开发昌都、三十九族地区，与川、康、甘、青后方联系较近，西北油料运输较便利，并可促进西藏与西南、西北的贸易；较南线短200余公里，沿途牦牛较多。但该线的缺点也较多，沿途要翻越4500米以上大山6座，工程浩大；冬季不能施工，完工后不能保证全年通车；沿途粮食、木料很少，不能就地解决。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1952年12月29日关于康藏公路定线问题给彭德怀、邓小平的报告上。报告明确提出了“确定走南线较宜”的主张。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和教育部长马叙伦、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在庆祝元旦的宴会上。

在罗瑞卿[1]关于敌人破坏我企业生产的综合报告上的批语

（1953年1月2日）

安子文[2]同志：

这十八件重大事故[3]，应作为审查的根据之一。

毛泽东

一月二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

[2]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

[3] 指罗瑞卿1952年12月29日关于敌人在我企业生产过程中进行破坏的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列举的十八件重大事故。报告说，这十八件重大事故中有一部分初步判明为反革命破坏。

对曾山、姚依林[1]关于商业问题的来信[2]的批语

（1953年1月4日）

---

[1] 曾山，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副部长。

[2] 指曾山、姚依林1953年1月2日关于商业问题给毛泽东并周恩来、高岗、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目前全国商业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不易出售或一时出售不了的商品积压过多，占住了一大批资金，不但阻碍腾出资金转入工业建设，同时影响中央商业部本身的资金周转。造成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一是某些生产事业的盲目开展，二是国营贸易为维持私营工业而负担了一些政治性的收购任务。主观上的缺点，主要是情况不清（没有把各种商品的产销情况、居民需要情况及其发展变化规律摸清），经营管理不善（大部分公营商店与公司还是供给制的而不是经济核算制的）。必须克服这两个主要毛病，摸清情况，改善管理，才有可能达到腾出资金，降低费用，挤出一大批钱来转到工业建设。这次1月5日即将召开的全国各省商业厅长会议，准备从思想上、做法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在1953年中，我们也要把主要力量放在做好这两件工作上。为此，国营商业必须从1953年起，转一个较大的弯子。在销售上要尽可能多卖钱，但又要注意不致把私商挤垮；在收购上，大力克服过去工作中的盲目性，停止收购滞销产品。做好这两件事情，除了国营商业本身努力改善工作外，还必须请求中央及各地党委、政府给予领导并改进工作，使这个弯子能够顺利地转过来，把各方面都安排妥善。

周、朱、彭、彭真、高、邓、陈、薄[1]、曾山同志：

我认为曾山、姚依林二同志在这封信上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这个问题牵涉很广，牵涉到一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须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然后动员全党协力执行决定，才能使我们的商业工作克服目前极大的盲目性和被动状态，而走上正轨。提议在商业厅长会议后由中财委为党中央起草一个商业工作的指示或决定，并在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

毛泽东
一月四日

---

[1]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1953年，毛泽东和女儿李敏、李讷在中南海滑冰场。

1953年，毛泽东和女儿李敏等在中南海滑冰场。

1953年，毛泽东和李敏、李讷、毛远新在一起。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1953年1月5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并告中央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收到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1]，现转发你们（原文一万八千字，现压缩为六千字）。中央认

---

[1] 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1952年11月17日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写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区、乡、村等基层组织干部（某些县以上干部也在内）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已发展到极为普遍和极为严重的程度，但是不少领导机关，对于基层干部这些严重的错误，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熟视无睹，漠不关心。有些党政领导机关，在群众向他们控诉或采取其他办法向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作斗争时，还无原则地姑息，替干部辩护。报告在列举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后指出：事实证明，官僚主义作风，是滋长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温床；反对官僚主义，是纠正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关键。应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整党工作，对它们坚决地开展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采取思想教育与纪律惩戒相结合的方针进行处理，对于混进我各种组织的坏分子及完全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报告还提出了开展这一斗争的9条具体办法。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给下面布置工作，必须同时不厌其详地交代政策、交代办法。必须有布置，有检查，有指导。每次工作总结均应总结干部作风。

为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地暴露党政组织中极端严重地危害人民群众的很多坏人坏事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是很好的，是完全必要的。这件事应当唤起我们各级领导机关的注意。这个问题，不但是山东的，而且是全国的。我党在三反中基本上解决了中央、大行政区、省市和专区四级许多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和浪费两个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许多领导者和被领导的机关人员相脱离的这一部分官僚主义的问题，但对于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为远一点的下情，不了解县区乡三级干部中存在着许多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坏人坏事，或者虽然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有一些了解，但是熟视无睹，不引起义愤，不感觉问题的严重，因而不采取积极办法去支持好人，惩治坏人，发扬好事，消灭坏事，这样一方面的官僚主义，则在许多地区，许多方面和许多部门，还是基本上没有解决。即如处理人民来信一事，据报山东省政府就积压了七万多件没有处理，省以下各级党政组织积压了多少人民来信，则我们还不知道，可以想象是不少的。这些人民来信大都是有问题要求我们给他们解决的，其中许多是控告干部无法无天的罪行而应当迅速处理的。山东如此，各省市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没有接到像山东分局这样集中反映的报告，但已有不少的材料可以判断，有很多地方是和山东的情况相似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就我们党政组织的领导任务和领导方法来说，这是交代工作任务与交代政策界限、交代工作作风没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即没有和工作任务一道，同时将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反复地指

示给中下级干部的问题。这是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县区乡三级干部没有审查，或者审查工作做得不好的问题。这是对县区乡三级尚未开展整党工作，尚未在整党中开展反命令主义和清除违法乱纪分子的斗争的问题。这是在我们专区以上的高级机关工作人员中至今还存在着不了解和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和不关心基层组织情况这样一种官僚主义，尚未向它开展斗争和加以肃清的问题。如果我们的领导任务有所加强，我们的领导方法有所改进，则危害群众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可以逐步减少，就可以使我们的许多党政组织较早地远离国民党作风。而混在我们党政组织中的许多坏人就可以早日清除，目前存在的许多坏事就可以早日消灭。因此请你们仿照山东办法在一九五三年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山东的文件请你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在党刊上登载。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各级党委应有决心将为群众所痛恨的违法乱纪分子加以惩处和清除出党政组织，最严重者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此外，山东文件中全部精神贯注在揭发坏人坏事，这样做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唤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但在开展反坏人坏事的广泛斗争达到了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就应将各地典型的好人好事加以调查分析和表扬，使全党都向这些好的典型看齐，发扬正气，压倒邪气。我们相信，山东和各地这种典型的好人好事是一定不少的。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

给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1]

（1953年1月7日）

总高级步兵学校宋校长[2]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你们的学校已经结束预备性的文化教育阶段而正式开学了。我祝贺你们在今后的学习和教学工作中胜利地完成军委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

我们的国家正在为着实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而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而我国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则继续占领我国的台湾，并继续侵略朝鲜，威胁我国的安全。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工作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和教学。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的训词。

[2] 宋校长，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

给黄炎培[1]的信

（1953年1月8日）

任之先生：

昨谈违法乱纪事项的有关文件[2]，兹付上，阅后请予掷还为荷！

顺致敬礼

毛泽东

一月八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1953年1月5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及连同指示转发的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

对安子文关于原察哈尔省农村整党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1月9日）

同意此件[1]所提意见，即由组织部指导各地组织部照此处理。第一批整党完毕，应有一个停顿时间（例如一个月），进行总结和布置，然后再开始第二批整党。

毛泽东

一月九日

---

[1] 指安子文1953年1月7日关于检查原察哈尔省农村整党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原察哈尔省农村整党工作开始较早，第一批1124个支部，于1952年11月开始，12月中旬已先后结束。经检查，该省的整党工作虽有一定的收获，但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有不少村庄，不仅没有整好，而且整坏了。主要的问题是：（一）整党准备工作做得不够，自上而下地存在着急躁情绪和所谓“任务观点”。（二）农村整党的目的不明确，在整党政策的执行上发生了很多错误。（三）农村整党错误地搬用了机关三反的作法。（四）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与自满自足的恶劣作风，对错误不敢正视，致使整党中发生的严重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报告提出：原察哈尔省农村整党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在其他地方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为了使农村整党工作达到“只准整好，不准整坏”的要求，我们拟通知各地，在第一批农村整党结束后，必须认真地进行总结，教育整党干部，整编整党队伍，并拟定下一批整党计划。凡没有总结或总结得不好的地方，则不准仓促草率地开始第二批整党。

周、邓、朱[1]阅，退安子文办。

---

[1] 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

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的批语

（1953年1月13日）

刘、周、朱、陈、高、彭、邓、邓、董老、林老、习、彭真、一波、安子文、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1]各同志：

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集中或分散的问题，在山东表现得颇严重，在向明这个报告[2]中算是解决了。此问题，不但在山东有，在各地也是有的，在中央也是有的。在过去的中央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1952年11月17日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写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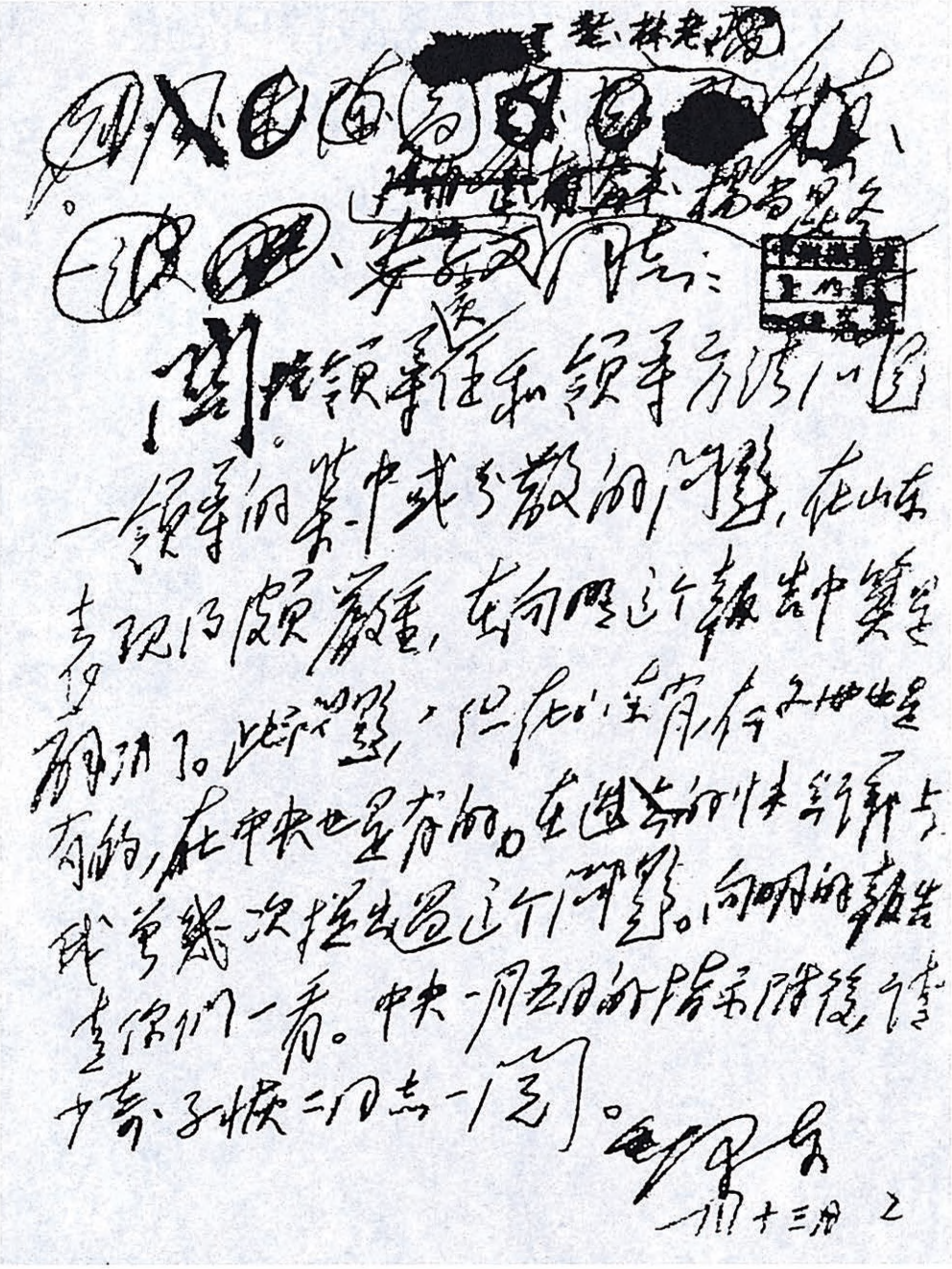
会议上，我曾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向明的报告请你们一看。中央一月五日的指示[1]附后，请少奇、子恢二同志一阅。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3年1月5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董老、林老、杨尚昆、安子文阅：

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

领导的集中或分散的问题，在山东表现得颇严重，在向明这个报告中算是解决了。此问题，但在全省各处也是有的，在中央也是有的。在过去的时候我曾几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向明的报告送你们一看。中央一月五日的指示附后，请少奇、子恢二同志一阅。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责任和领导方法问题的批语》的手稿。

关于抗议敌方屠杀战俘问题的处理意见的电报

（1953年1月13日）

丁国钰[1]同志：

一月十二日廿三时来电[2]悉。（一）同意来电所报抗议稿，应即于十四日送交对方。（二）今后此种性质的例行抗议可以按惯例办理，不必每次请示。但如案情较重大，情况较复杂，应有着重表示而不能按惯例办理者，则必须拟稿请示，待批准后，方可发出。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廿四时

---

[1] 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2] 指丁国钰1953年1月13日请示处理抗议敌方屠杀战俘问题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电报针对敌方公布我被俘人员1名在1月9日吊死于尚武台第五号战俘营一事，草拟了抗议书，请示批准。

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1]

（1953年1月13日）

现在办选举、搞选举法是不是合适？对于这个问题，经过几次会议交换意见，从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看，是比较明确、比较清楚了。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作点解释，归纳起来大体有四个。

一、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根据的一个方面，是《共同纲领》的规定[2]。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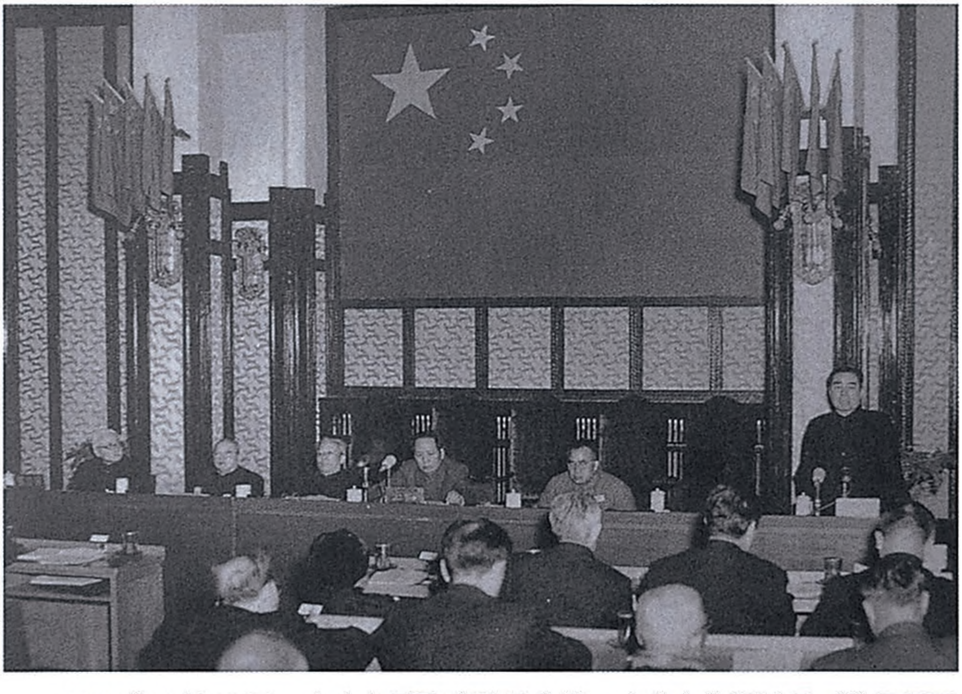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一向它们要民主，那个政府就说：我们总是要搞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民主的。清朝政府是这样说的，但就是不给。蒋介石听了我们的建议以后，也并不是明讲他不要民主。有一次，我在重庆，国民党发表了一个声明，上边有这样一句话：“政权属于人民，并非本党所有”，下边又讲了一句：“奋斗不能无责，责必须我们承当。”按前头一句似乎对人民有好处，按后头一句又成了他们的好处了。奋斗不能无责嘛！那就是说，首先要由他们来承当这个奋斗的责任。蒋介石说要还政于民，那时候我们说：慢一点还。他就是不听，一定要还。结果，真是达到他的“目的”，还政于人民了，他自己跑到台湾去了。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图为大会主席台。

同时考虑的，还有一个政协的问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还要不

要再搞一届，然后召开全国人大？陈叔通[1]委员说，再搞一届至少还要两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今年不办就要明年办，或者后年办。与其明年办，就不如今年办。如果过两年再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后召开全国人大也不好办，不如索性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根据这些条件和考虑，还是抓紧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比较好。

二、这样做有什么作用?

陈叔通委员讲，做了这个工作，可以使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确实如此，北京郊区乡政府民主选举的结果，百分之五十的乡长被选掉了，因为这百分之五十的人做了坏事，人民不高兴他们。为了发扬民主，对政权组织，特别是县、乡两级，来一次全国普选，很有必要。这对促进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有积极作用。就是对于抗美援朝也有好处，傅作义[2]委员说可以加强抗美援朝。前天我看到艾森豪威尔[3]的一篇讲话，他说：中国要办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你办选举他要侵略，你不办选举他也要侵略，问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经济建设搞得更好，抗美援朝的力量更加增强，那是可以使它放弃侵略的。所以，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

三、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

我们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已经做过的几件事情

---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3] 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当时已当选美国总统。

来，困难要少一些。例如，比抗美援朝，就没有那样困难；比土地改革，也不会有那样困难；比镇压反革命，比“三反”“五反”，比三年经济恢复，也不会有那样困难。周恩来总理讲，我们国家今年的财政基础，比一九五〇年增加了两倍半。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

四、这样做对于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有利？

刚才周恩来总理说，在我国，人数多的民族是汉族，人数多的党派是共产党，人数多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多的人民团体是工会、青年团、妇联、农民协会，这是就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言的。这样一来，是不是少数民族、人数少的阶级（比如工人阶级人数少，资产阶级更是人数少）、人数少的党派、人数少的团体在政权组织中就没有份了，没有饭吃了呢？你们人多就称王，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决议草案[1]上讲了，三年以来取得的成绩，是由于“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那末，是不是从今年起，或者从明年起，就不要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了呢？不是的，还是要的。为什么要呢？过去三年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有好处。所以，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如果说，三年以后还要团结，那末，十年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没有了，是不是因为他过去当过资本家，现在虽然爱国，也不要他呢？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他爱国嘛！

---

[1] 指将在本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是不是跟过去政协一样？不会完全一样，应该有所变化。它既要照顾多数，又要照顾少数。单纯照顾少数的政府在历史上是有的，像清朝政府、蒋介石政府，那完全是照顾少数。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我想，他们中间的多数，甚至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可能是会被人民选举的。但是，你要我写保票我不能写，因为那是人民的事，人民选举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应该有适当的安排。所以，对于这一条，用不着担心。

有人说，从你们的社论[1]看起来，我们就没有份，因为那篇社论里说：要“好的”和“必要的”，那就只有共产党有份。我说，共产党里面也有许多不好的和不必要的，人民不满意，就会选掉他。少数民族、人数少的阶级、人数少的党派、人数少的团体里面，也有许多是好的和必要的。对社论中的那种说法也要加以分析。自从那篇社论发表以后，各大城市都有一些反映，希望到会的各位在各民主党派里边做些解释工作。

有人问，没有选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还有没有别的安排办法？有。还可不可以做政府工作？可以。政府的部长、副部长是不是都要选成代表？不一定，也不必要。如果各部部长、办公厅主任，甚至连科长都要选成代表，那下面的人就会说，你们开干部会就可以了，还要我们来干什么？所以

---

[1] 指《人民日报》1953年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社论在谈到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政府时说：“从现在起，就应当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告诉人民认真地准备这次选举，以便把人民所真正满意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做代表和人民政府的委员。”

多数的代表还应当是下面的人，像郝建秀、李顺达[1]这些劳动英雄。他们来了，开完会就回去了。没有被选上的人，可以安排做政府工作。总之，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个：凡是爱国者（只要有这个资格）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图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

[1] 郝建秀，1935年生，山东青岛人，当时是青岛国棉六厂工人。1951年因创造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即“郝建秀工作法”，被授予全国工业劳动模范称号。李顺达（1915—1983），山西平顺人，1943年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组织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互助组，带领群众，因地制宜，改造山区，由穷变富。1944年、1946年两次获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称号。1951年、1952年先后获一等劳动模范奖章和爱国丰产金星奖章。

关于召开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的讲话[1]

（1953年1月14日）

就全国范围来说，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因此，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这是中国人民流血牺牲，为民主奋斗历数十年之久才得到的伟大胜利。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和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结束时作的结论。

军委对中南军区关于海防检查及今后建设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1月14日）

华东军区：

此件[1]对于你们有参考价值，望加研究仿行，特别是组织考察团和慰劳团甚为重要。

军委

一月十四日

---

[1]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3年1月12日关于海防检查及今后建设意见给毛泽东、军委并叶剑英的报告。报告说，去年10月间接到毛泽东《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后，中南军区除对所有部队进行普遍的点验外，特地组织了3个海防检查团，于11月初分赴粤东、粤中、粤西地区，协同沿海各军、各军区及海军、公安等机关，对海防岛屿守备情况作了一次大检查。经过这次检查，进一步了解了海防工作的情况，发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如何加强海防已获得一些底蕴。报告针对海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高守岛部队斗志和战斗力，加强岛屿守备和海防建设的9条办法，其中包括组织海岛守备部队慰问团等。

对总政关于一九五二年敌军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3年1月14日）

退总政。此件[1]很好。敌军工作必须加强。大中型播音机应多制。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周、朱、彭[2]阅。

---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肖华1953年1月10日关于一年来朝鲜战场上的敌军工作向毛泽东并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1952年下半年我军曾连续地有重点地向敌伪军发动了4次政治攻势（六·二五攻势，八·一五攻势，中秋节攻势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圣诞节攻势），以前那种火线上只见敌人传单到处飞，广播、喊话频繁，而我们活动较少的情况已经扭转过来。目前，供给部队以较充分的现代化宣传工具，已成为开展对敌宣传的重要问题。播音用的播音机宣传效果很好，但现有的多属小播音机，声音只能达到3华里以内。250瓦的效力好，可以压倒敌人广播，最为部队欢迎。播音机除用于对敌宣传外，也是我们自己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的一个工具。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对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工作要点[1]的批语

（1953年1月15日）

高岗、邓子恢[2]同志：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四日收到的你们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去年十二月的工作情况与今年第一季度的初步工作要点的报告，我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照此进行工作。此件并已送各政治局同志阅看。此复。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

---

[1] 高岗、邓子恢的报告中说，自1952年12月开始，国家计委除组织40余人分赴各地厂矿了解情况，并邀请各工业部门作一些专题报告外，主要是配合中财委计算了五年财政收入与投资指标，与重工业等部门初步研究了五年基本建设的主要工程项目与投资控制数字。对于1953年第一季度的工作，报告提出了四项。（一）编制五年计划纲要。根据陈云副总理的意见，将中财委去年起草的五年计划轮廓，会同有关部门，着重研究以下问题：(1)在原来五年财政概算的基础上，根据国防经费增加的情况，研究企业利润和税收的可靠程度及其增加的可能，以便重新分配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的投资；(2)由于建设经费的减少，研究有关各部在建设方面应确保的和应削减

的工程项目；(3）五年内工农业产品可能增加的数量，以便正确规定各种经济事业发展的速度和比例；(4）五年内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需要数量，以便使教育部门和需要单位更好地配合。在此基础上草拟关于五年计划纲要的说明，于1月底写出送中央审改。(二）协同中财委汇总1953年的计划，以便在2月底前呈送中央人民政府审核批准。(三）初步建立各局的工作机构，研究工作方法，总结编制五年计划纲要与汇总1953年计划的经验，以此来教育计委的全体干部钻研和逐步学会计划工作。(四）在学习方面，机关全体干部对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学习即将结束，现正准备学习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资料中一些重要文件。

[2]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子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

（1953年1月15日）

周、邓、陈、薄[1]：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2]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

---

[1] 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陈，指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薄，指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向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的意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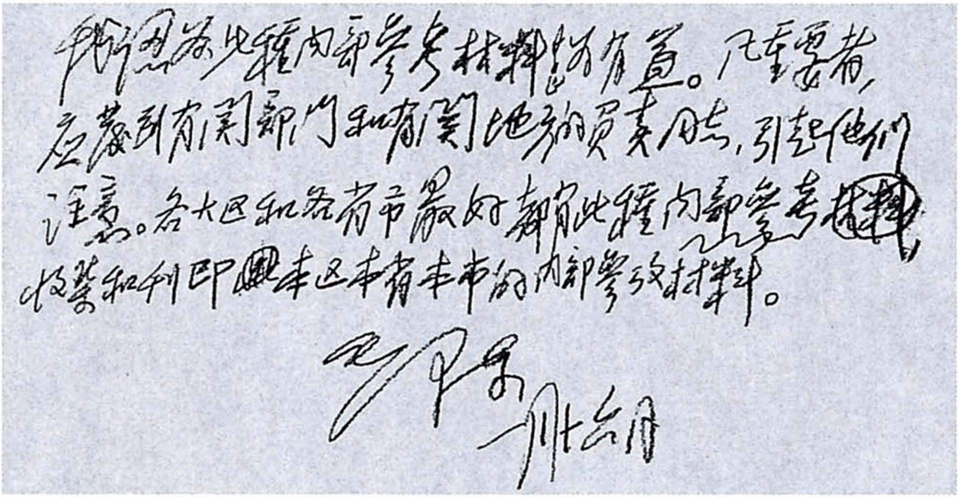
（1953年1月16日）

送新华总社。

我认为此种内部参考材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集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材料。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我認爲此種內部參考材料甚爲有益。凡重要者，
應發到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的負責同志，引起他們
注意。各大區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種內部參考~~材料~~
收集和刊印[illegible]本區本省本市的內部參考材料。

毛澤東

一月十六日

毛泽东填写的对新华社《内部参考》的意见的手稿。

---

[1] 这是毛泽东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征求意见表上填写的意见。

对军委关于秘密文件的保密工作细则的批语[1]

（1953年1月21日）

周、刘、邓[2]阅，退肖向荣办。

同意这个文件。党、政保密，同样应『发』颁布法令，建立制度。请肖向荣同志将军委保密法令全文抄送邓小平同志研究办理。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3年1月21日关于军委秘密文件的保密工作细则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2] 周，指周恩来。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对李克农[1]等关于俘虏管理工作请示[2]的批语

（1953年1月21日）

管理俘虏工作甚为重要，必须加派干部和兵力，并准备对敌空降作战，一个也不能让敌人劫走。如果被劫走了这批俘虏，我们就没有本钱和敌做交换俘虏的谈判了。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2] 指李克农、甘泗淇（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黄远（军委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1953年1月16日关于俘虏管理处工作的几个问题给周恩来、彭德怀的请示报告。这些问题包括：俘管处的领导关系问题，特殊俘虏的处置问题，俘管处的驻地问题，外文干部问题，以及运输工具、教育工具问题。

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1]

（1953年1月26日）

中国的拼音文字字母和七百简体字材料这两个材料，已经送传毛主席看过。他翻阅了简体字。他认为这种工作不必太急，不要因为人家催就操切办事。事情关系很大，影响到几万万人，是长远的事情。不要受了外界压力，轻易作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可以多征求意见。已经有了方案，可以作为继续研究改进的材料。

关于简体字：毛主席认为现在的简体字不够简，有些字与原字只差一两笔，有些字笔画仍多。笔画形状仍然不顺利，写起来别扭。如“氵”可以用“讠”代替，有了写两点的时间，就比点三点要快。做简体字可以更多利用草体。草体难记。但是可以把一些草体字规律化，作为基本形体，类似日本的片假名，字的基本形体数目少，规律化，学习书写起来就方便。这样就和现在汉字的秩序不同，汉字的数量必须大大缩减，那就要把两三个汉字合并为一个，即一个字可以代用好几个字。如圆周的“圆”即用“元”。一元、二元、花园也用“元”字。这样才叫简化，可以利用假借，以外利用

---

[1] 这是首都文字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对毛泽东关于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及一些问题的回答的传达。

简单容易的草体，不用笔画仍繁难的草体。汉字的数目减少，字的笔画也大大减少；难于减少的，利用假借，这样就能做到确实简化了。笔画少，写着就顺利。

他举了个例子：如“氵”字旁，用一笔作“乚”。要把字形规律化，就不能按原来通行的，因为原来的简体字并没有什么规律。

关于拼音文字：毛主席认为我们用的拼音字母，笔画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还难写。

毛主席认为何必搞成方块，方块字千年来害人不浅。字母的笔画要向一面倒，“永字八法”要废除，那样写法不合现代化的要求。现在这些字母有的笔画多，有的写着不顺，笔画方向复杂，纠缠太多，向四面八方发展，所以难写。汉字就因为笔画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本就是打破方块体式的。

因为原来汉字笔画可恶，所以非打碎不可。主席赞成把注音字母多改一些，也赞成改用两拼，以便代替汉字。比如现在这套字母就不好代替汉字。因为有些字母和音书比汉字还难写，比赛不过，这种拼音字母就要落选。

又如注音字母也不能代替汉字，三个字母写不到一起，与汉字合，显不出来简单。拼音字母如果不比汉字简易，在群众中立足就会有困难，主席对这套字母不满意，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简单笔画和草体，笔势要一边倒，这样才能为人民所接受。“注音字母”谁都没考虑它做文字。要制作拼音文字，就是再费一年时间，也算是很快的了。如果照现在的样子拿出来，恐怕人人会阻碍它。在制作字母方面要花工夫。

总起来说，主席希望文字要能真正做到简单，如果不简单，就不能推行。因为文字主要是要写，不仅要数量少，而且要便于写。

例如，“云”不好写，改作“ㄊ”也难写，草书“e”稍顺一点。我们的字母一定要比日本字母好，不要比它坏。现在的注音字母和简体字，还不如日本假名，要多征求各方意见，加以改进。

这次郭沫若主任在莫斯科曾经谒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很关心我们的文字改革，问道：“你们的文字改革搞得怎么样了？”郭老提到，在方言不统一情况下，汉字仍然有用处。斯大林说，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话，对于文盲，汉字是无意义的。郭老说一定要改。

改革文字是费时间的，费十年时间也可以，不必求快，但一定要好。

现在无人要求废除汉字，但也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替汉字辩护。汉字学起来还是困难。我们的儿童学字的时间，要比拼音文字国家多两年。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就发生问题。比如五年一贯制的语文课本第一册的程度比拼音文字国家的浅得多，但是大家仍嫌生字多，教学起来，学生觉得吃力，各方面都提意见。我们小学生的语文水平和欧洲国家比相差太远。我从大连回来，火车上看到李立三的孩子（三年级学生）看俄文大仲马的小说《侠隐记》，三天可以看完。中国的三年级学生根本不能看这样深的书。算术，外国小学一年级就有文字题，我们到三年级才有。这妨碍教育多大！如果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比别人多学两年，损失简直无法计算。所以不能不改用拼音文字。如果考虑到打字、印刷、打电报等问题，而也使国家工作效率受到很大的损失。发电报，人家用电动打字机，排字，人家也用机器，在这上面耗费的时间的损失不能计算。至于字典难编，尤其余事。但是鲁莽的方法，认为汉字可以立刻废除，也是不对的。首先要有妥当的方案，其次要有实行的步骤，过去把文字改革想得太容易，现在又反转过来替汉字辩护，都是不对的。毛

主席剧烈地攻击方块汉字，认为汉字千年来害人不浅，必须改革。《中国语文》出了半年，但是很少看到充分说明文字必须改革的文章。比如说，就没有一篇比较汉字与拼音文字教科书等的优劣的文章。反对方块字，要拿出真凭实据，汉字的电报、打字和印刷等都可以拿出来和拼音文字作比较。不这样做，有时候连提倡文字改革的人都有点动摇。这主要因为我们改革文字的主要理由说得不清楚，文章的逻辑不强。

我们的纲领是文字必须改革，决不能有不用改革或怀疑改革的话，但是如何改革，改革的理由是什么，必须说清。

提倡文字改革是对的，缺点在于没有作详细的调查研究和比较，在文章的背后没有事实来支持它。往往是议论多，科学的研究少。比如打字问题要收集最熟练的、相当熟练的、不熟练华文打字员的成绩，拿来和英文、俄文的同样的打字成绩作具体的比较，这样才能说服人。

所谓字的笔画要“一边倒”就是笔势要顺。比如“水”字就不好写，方向变化多。“三”字方向虽顺，起大太多，也不算好写，像“水”则必须改造。

一边倒，不是每字笔画都是一个方向，如“千”字就可以不改。因为它和阿拉伯数字“4”相似，比“干”好写。主要是不要起笔太多。要写起来流利，并不是说任何由右向左的方向都不要了。笔画的组织也要简单。

毛主席的意思是要大改，这样的工程就要复杂一点，必须与代用字一起考虑。

拼音文字要和汉字配合得上，不能设想某日公布后立即就要实行，要准备它跟汉字掺用一个时期。拼音方案，简体字中有些符

号，就用拼音字母代替也好，特别是虚字，如“的”字就可以用字母代，虚字要极简单，每字一笔两笔，不一定必须有通行简体的才简化。例如“的”字本来就没有简体，但用的次数最多，必须简化。

有些难写的地方名称也要改，比如盩厔、鄜县、鄠郿等，都可以用拼音字母代替。

关于对印度遣俘提案的态度问题的批语[1]

（1953年1月28日）

周总理：

似不宜再和印度谈此事，除非印度从联合国撤回原提案，方有资格再谈此事。究宜如何，请令外交部研究见告。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情报司抄送的一条消息上。消息说："东京军中电台二十七日八时广播：合众社伦敦电称，此间印度权威人士今天说，印度驻北京大使已受令去探听共产党中国是否愿意考虑印度提案的一项修正草案。"

关于编印公安局长违法乱纪事例的小册子的批语[1]

（1953年1月30日）

刘、周、邓阅，送交罗瑞卿同志：

像湖南桃江县公安局长高富江、甘肃通渭县公安局长苏朋这一类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可能还有一些，以前也有湖南邵阳某区乱杀多人、平原内黄公安局长违法乱纪等重大事件发生。请你考虑收集这些生动例证，加上一篇导言，印成一本小册子[2]，发给各

---

[1] 这个批语写在最高人民检察署党小组1953年1月14日关于湖南省益阳专区桃江县在镇反复查中刑讯逼供，辗转株连，造成假案的严重事件给政法分党组并中央的报告上。

[2]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公安部编印了题为《反对刑讯逼供，反对违法乱纪》的小册子，并于1953年11月1日发出通知，指出编印这本小册子，是为了在公安系统内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教育全国公安干部，提高思想、政策和业务水平。这本小册子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是关于乱捕乱押、刑讯逼供、夸大化、制造假案方面的案例；第二部分，是关于反对违法乱纪、国民党旧警察作风和管制工作上的强迫命令、乱管错管方面的案例。在这本小册子的卷首，刊载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有中央公安部写的导言。毛泽东在批语中提到3个县公安局长的案例，即《湖南桃江县“保产党”案》《甘肃省通渭县“袁俊山特务”案》和《前平原省内黄县公安局副局长刘俊德等蜕化堕落敌我不分》，均收入了这本小册子，作为它的第一部分。

省县公安厅长局长阅读，并于各省召开公安局长会议时当作教材，对全国所有公安局长进行一次教育，使他们具有作为一个公安局长的起码常识，以免再有这样毫无常识的人当公安局长。

毛泽东

一月卅日

给后勤学院的训词

（1953 年 1 月 31 日）

后勤学院李聚奎院长和全体学员、教职员同志们：

我祝贺你们在预科学习和教学上的成绩，并希望你们在今后圆满地完成军委所给予你们的学习和教学的任务。

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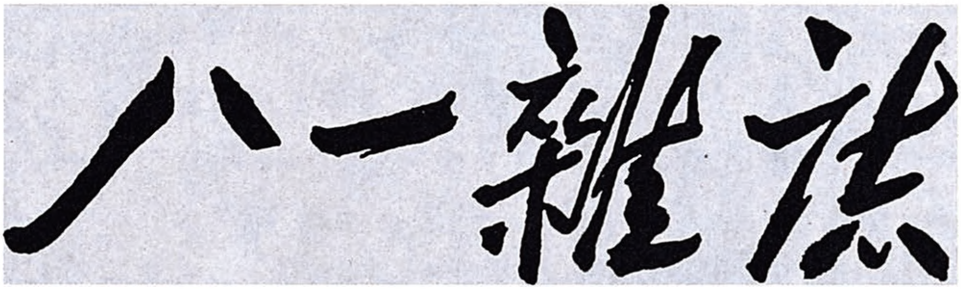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为《八一杂志》[1]题名

（1953年1月）

八一杂志



毛泽东为《八一杂志》题写的刊名。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刊物，1951年4月20日在北京创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下，由八一杂志社编辑出版。设有刊物指导委员会，由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罗荣桓等27人组成，朱德为书记，聂荣臻、罗荣桓为副书记。下设编辑委员会。朱德撰写发刊词，毛泽东于1953年1月题写刊名。初为不定期刊物，供团级以上干部阅读，1958年10月改为半月刊，扩大发行到排级干部。1960年12月22日停刊，共出版192期。

关于转发《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一稿给新华社的信

（1953年2月2日）

新华总社：

一月卅日《内部参考》载《河北省农村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情况严重》一稿，很有用处，请将此稿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的同志们阅看，作为参考。并请令知各省市新华分社仿照河北分社的办法，从各省市方面采访此类消息，刊入《内部参考》。河北省委负责同志林铁、薛迅[1]等集中地揭露了该省基层组织中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证明中央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指示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但大多数省市还无这样的反映，故请你们注意在各省市采访这同一主题的消息，并将其中最典型的消息通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以促起他们的注意。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薛迅，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扩军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2月2日）

各中央局、各大军区：

此件[1]请华东、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加以注意，以利在本区扩军运动中，纠正偏向，完成任务。

中央

二月二日

---

[1]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3年1月24日关于扩军工作给华北局并各地委的报告。报告中说，目前河北省的扩军工作，已进入审查、集中、巩固新兵的阶段。从集中到县的部分新兵的审查情况看，全省完成扩军任务已有充分把握。但在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一些落后地区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脱节，普遍发动与个别动员脱节。有的单纯强调自愿，忽视义务教育，把自愿看成自发，“坐等兵来”。在宣传中，只说大道理，不联系实际，也有的乱讲，甚至错误地宣传三不归（不死不归，不残不归，不打完帝国主义不归），形成对部分军属和新兵的思想压力。有的追求所谓“全民报名”形式，放松了对骨干分子的培养，障碍了扩军工作的开展。

在军队干部评级工作总结和实施军衔制度报告上的批语[1]

（1953年2月2日、11日、14日）

一

少奇同志：

此件[2]请你予以审查，有须修改者加以修改，还我为盼。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本篇第一个批语，写在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3年2月1日关于全军干部评级工作总结给毛泽东的报告上。第二个批语，是毛泽东看了刘少奇2月9日对这个报告的审改意见后写的。第三个批语，写在赖传珠、徐立清1953年2月10日关于军队实施军衔制度问题给周恩来转呈毛泽东的报告上。

[2] 指军委总干部部1953年2月1日报送毛泽东的全军干部评级工作总结。

二

退赖徐。同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

三

照办。退赖徐。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

刘、周、朱、高、黄克诚[1]阅。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关于加强上海防空工作的批语[1]

（1953年2月4日、9日）

一

聂、黄：

为了防御台匪空军向上海一带的可能的攻击，上海空军及防空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加紧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为此请与空司、防司[2]筹商应敌计划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毛泽东的这两个批语，其一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关于1952年11、12月份部队发生严重事件给毛泽东并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上。其二写在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3年2月6日关于加强上海防空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2] 空司，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防司，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

二

同意这个部署。高射炮弹药问题，请周总理注意。

毛泽东
二月九日

彭、周、朱、刘、黄克诚阅，退肖向荣。

对安子文[1]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2月6日、7日）

一

即送李维汉[2]同志：

此件[3]请即付印，在七日大会上散发，使出席者和列席者每人得到一份，并准备安子文同志出席讲话。修改处请饬一专人加以校对，不要错误。

毛泽东

二月六日下午十时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3] 指安子文将于1953年2月7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发言稿，题为《我们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各级机关中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坚决斗争》。这个标题是毛泽东拟的。后发表于1953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二

我所说的上级领导机关，是指党和政府的中央一级机关、大区一级机关、省（市）一级机关、专区一级机关和县级机关，这五级机关内都有不少的官僚主义，它们只注重布置工作，不注重检查工作。有些领导机关则有强迫命令的作风，甚至包藏有违法乱纪分子。[1]

三

李维汉、徐冰[2]同志：

今天下午三时有安子文批评官僚主义的报告，请通知中央一级（党政军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部长副部长等干部一律参加，非病不许缺席。

毛泽东

二月七日上午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安子文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2]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1953年2月7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这一次会议就要结束了，报告、讨论和决议都很好。我祝贺会议的成功。

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表讲话，谴责美国破坏停战谈判，表达了中国人民将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打败美帝国主义的问题。我们准备打的时间要长一点，最后就是要打败它，前途是胜利的。我们已经打了两年多了，在社会上可能有些人觉得不耐烦了，觉得还是早一点结束好，停战谈判只剩下一个俘虏问题了，争执也很小了，何必为一两万俘虏还要那么坚持下去呢？这不只是一两万俘虏的问题，不能因为我们人口多，觉得丢掉几万人不要紧，俘虏一个也不能丢掉，一定要争。这个仗要打多久时间，我看我们不要作决定。它过去是由杜鲁门[1]，以后是由艾森豪威尔[2]或者美国将来的什么总统来决定的。这就是说，他们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我们完全胜利！[3]

第二，关于学习苏联的问题。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工人群众、农民群众，他们中间都有一些人是有抵触的。

---

[1] 杜鲁门（1884—1972），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至1953年任美国总统。

[2] 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3] 这次讲话，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作了报道。关于讲话中的第一点，新闻稿的文字如下：“第一，要加强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中朝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图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继续加强。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他们应该懂得，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在封建时代，唐朝兴盛的时候，我国曾经和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唐三藏[1]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时候，特别是中日战争我国失败到辛亥革命那一段时间，就是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那一段时间，全国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学习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学习他们的科学，有一个很大的高潮。那时，我们的先辈（在座的也有）很热诚地参加学习西方的活动，许多留学生到日本、到西洋去。那一次学习，对我们国家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现在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一批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批宝贵的遗产。但是我讲的古代和近代这两次学习外国，比较现在我们学习苏联的规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效用，那是要差得远的。那末，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请他们的顾问来，派我们的留学生去，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采取真心真意的态度，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对于那些在这个问题上因不了解而产生抵触情绪的人，应该说服他们。就是说，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第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

---

[1] 唐三藏，即玄奘（602—664），唐代著名高僧，俗称唐僧。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前往印度研习佛教典籍，历经10余年回国，译出佛经75部，共计1335卷。

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这些事情，这些坏人坏事。今天安子文[1]同志的报告很好。我现在要着重讲的，是官僚主义在中央机关的情形。我们中央机关几十个部门，包括党、政、军。党就是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计算起来，就有一百几十个单位。应该说其中有很多的部门，不是少数的部门，存在着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应当说中央机关中有许多部门的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据我所知，比如外交部，在“三反”运动中搞了一个多月的讨论，展开批评，驻各国的大使都回来参加，这大半年以来，工作大有进步，官僚主义大大减少。又比如公安部，在“三反”运动以后工作也有很大的进步。再比如改组后的重工业部，现在分为三个部，一个重工业部，一个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第二机械工业部，比那个老重工业部好得多了。还有，水利部、高等教育部是官僚主义比较少的，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也是有进步的。是不是还有别的单位呢？比如邮电部，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也犯了错误，就是用违反政策的方法来搞所谓增产。早在前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邮电部一个什么局长，就发命令招揽生意，让大家给中共中央打致敬电报、写致敬信，结果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万份电报，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人民真正出于内心打来的，有多少是强迫人家打来的，要查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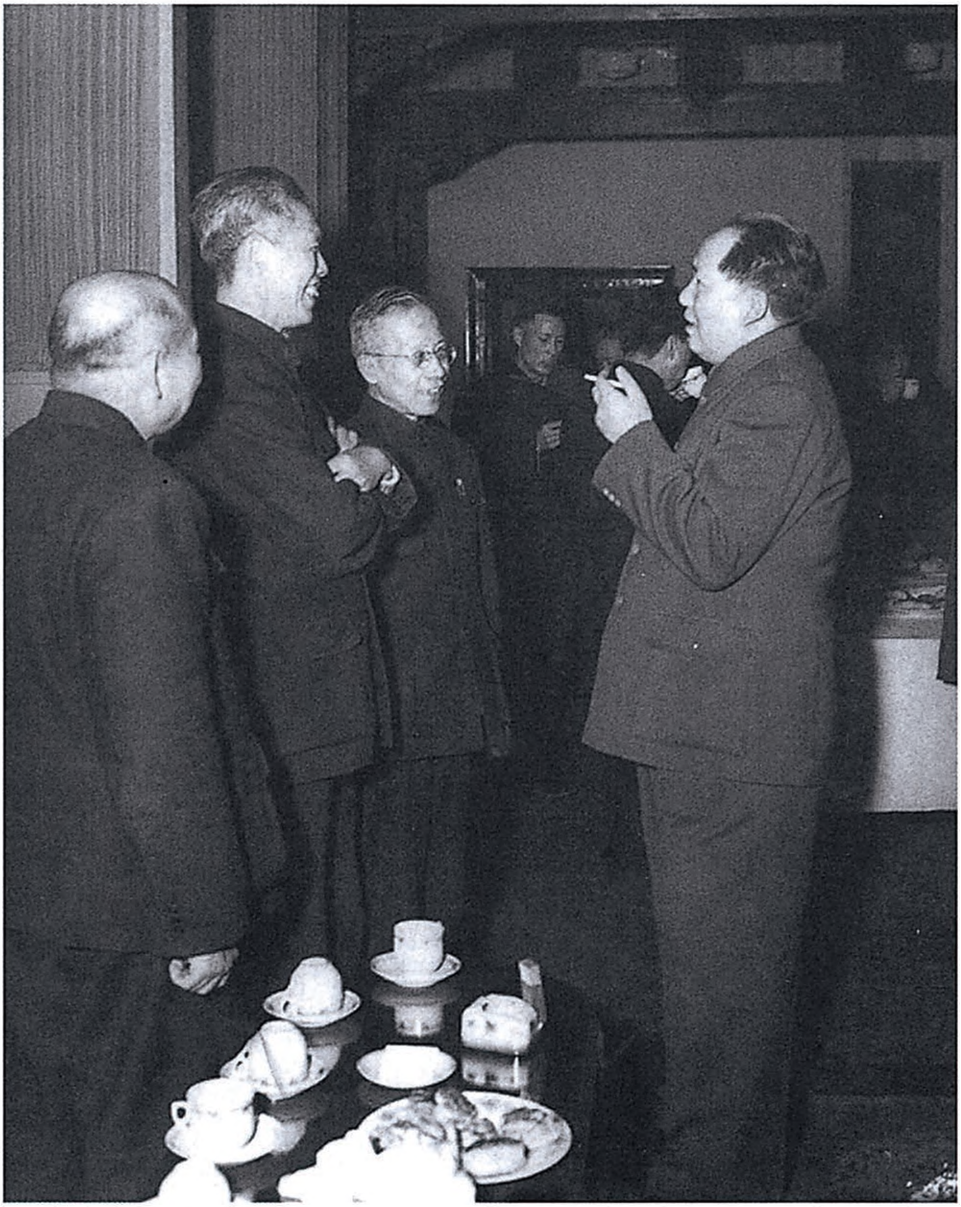
一查。这就在人民面前把共产党表现得不像样子，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其他还有一些部门，工作是做了很多，但是问题也很不小。是不是这样，我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我想，如果我讲错了，你们可以批评我。我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我的缺点就是没有经过详细的检查。过去，也没有在这样的大会上具体地指出来。这是你们可以向我批评、向我开炮的。我准备在今年夏秋冬三季之内，对每一个部都能够检查一次。我在上面所讲的这些部门，哪一些比较好，哪一些比较差，哪一些是中间状态，说的不见得那么十分准确，因为没有经过仔细的检查分析，没有吸收那些部门的群众和干部参加检查。总而言之，我们政府几十个部门，无论是财经、文教部门，还是政法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么繁重的任务，就应该克服官僚主义。要知道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是跟我们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没有去过问，没有去检查，或者缺乏检查。我想，这个工作应该从中央人民政府开始，从共产党中央开始，从军委和各部门开始。中央机关每一个部门都有部长、副部长、办公厅主任、司长、局长，这些主要干部，少的有八九个，多的有几十个。他们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检查了的回来，没有下去的再下去，又回来，又下去，这样每一个人包括部长在内都到底下去过，一直检查到基层单位。比如工业部门应该检查到工厂，农业部门应该检查到乡村；军委系统的，像海军应该检查到长山列岛、舟山群岛、万山群岛、海南岛，陆军应该检查到连队；邮电部门应该检查到乡村的邮政代办所；公安部门应该检查乡村的公安员、城市的派出所。部长亲自下去，不是要你去检查所有的公安派出所、邮政代办所，而是要你检查若干部门和基层单位。

这次会议以后，要从我们中央开始，带头下去检查。这样才能带动大行政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我们才有资格责备下面，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也不是讲每一个部长都要下去，有些年老力衰不能去的，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少壮派都要去，你是少壮派嘛！重点在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克服了，下面的命令主义、违法乱纪一定会克服。这些毛病去掉了，我们的五年计划一定会成功，民主制度一定会发展，帝国主义一定会打垮，我们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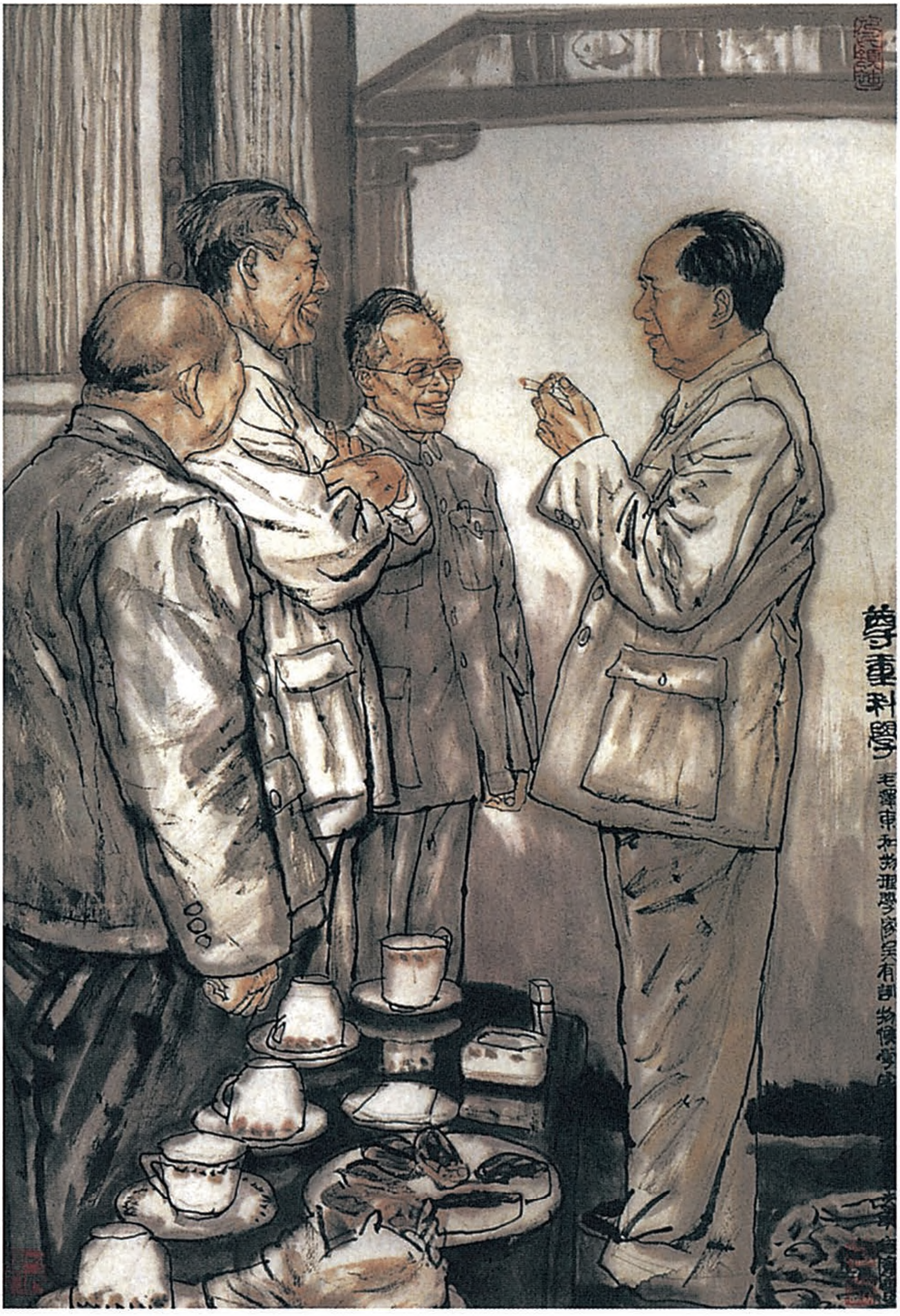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

1953年2月，毛泽东和林学家梁希在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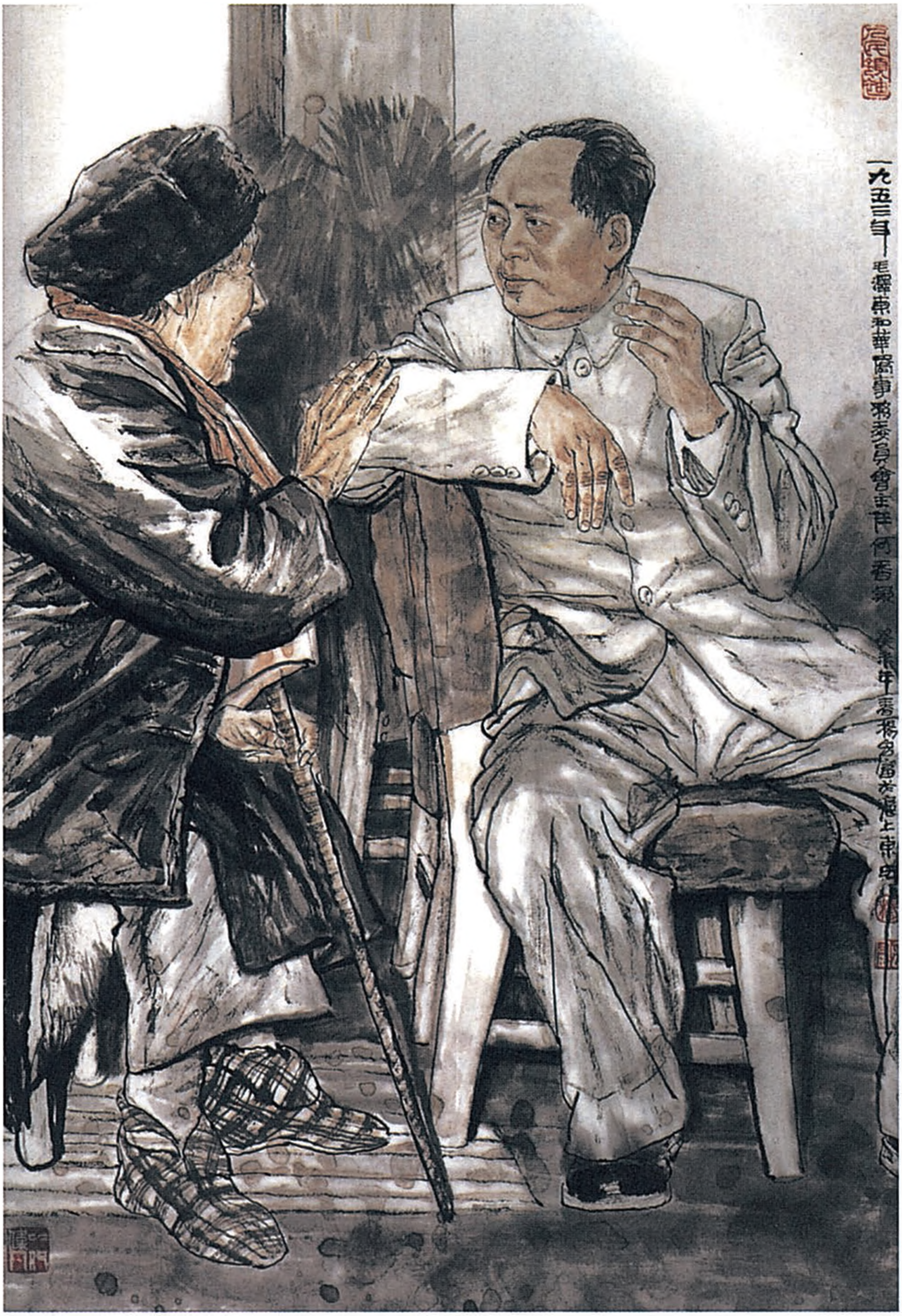


1953年2月，毛泽东和核物理学家吴有训、气象学家竺可桢交谈。


尊重科學
毛澤東和物理學家吳有訓

《尊重科学》（中国画）

1953年2月，毛泽东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何香凝交谈。


一九五三年
毛泽东和华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香凝

《毛泽东与何香凝》（中国画）

关于讨论一九五三年国家概算表等问题的批语[1]

（1953年2月8日）

周总理：

概算表可在今晚你们宴会[2]后约九至十时找少数人一谈，如可能也谈一下报告书[3]。下午三至五时我已应黄炎培、陈叔通、李烛尘、盛丕华[4]四人之约谈一下公债问题，他们要求谈一下，好像很迫切。

毛泽东

二月八日一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53年2月7日关于讨论1953年国家概算表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2] 指周恩来定于1953年2月8日下午举行的招待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的宴会。

[3] 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的关于195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

[4] 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李烛尘，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盛丕华，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副市长。

对空军配合志愿军反敌登陆作战报告的批语[1]

（1953年2月8日）

照办。[2]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黄克诚1953年2月5日19时报告的批语。

[2] 黄克诚的报告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王秉璋来总参谋部汇报到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讨论空军配合志愿军反敌登陆作战问题的情况，提出几个问题：（一）空军配合作战有3个时机。一是敌人大舰队满载兵员由基地向登陆海面开进时；二是敌舰接近登陆地区海面，由大船只转移到登陆艇实行登陆时；三是敌登陆后我地面部队举行反击和敌军空降时。根据敌我空中力量对比，拟在第一时机避免作战，第二时机争取作战，而准备在敌人登陆后我地面部队反击和敌人空降时，不顾一切牺牲以全力作战。（二）一线机场数量少、飞机很拥挤且防空力量不强，万一敌机轰炸将造成很大损失，联司要求在一线再建六个机场，空司意见先加建两个。（三）联司首长设想在发现敌人队伍运动实行作战后，利用夜色派轰炸机轰炸敌空军水原、金浦两基地，使敌人飞机不能起飞。但空司同志认为，依照我空军情况，很难达到目的，并会引起敌空军轰炸我一线机场，故不主张轰炸敌空军水原、金浦两基地。（四）空司拟将空十二师抽出休整，以未参加战斗之师参加战斗。

中央转发安子文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3年2月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

中央批准安子文同志一九五二年二月七日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

---

[1] 安子文关于目前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说，1952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按计划在没有党组织和党员很少的地方接收新党员。目前在土改后的新区，一般的省已有1/3的乡建立了支部，建党工作做得较好的苏南地区有70%的乡建立了支部。在全国500人以上的公、私营工矿企业中和专科以上的学校中，已都有了党的基层组织。这样不仅加强了党对这些地方的领导，而且经过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提高了对党的认识，从而加强了非党群众的积极性与进取心，推动了各项工作。今后仍必须加强党的工作薄弱地方的建党工作，如国家机关中的经济、企业部门及某些文化、卫生部门。关于农村整党工作，报告说，各地第一批整顿的4万个支部已陆续结束，有些地方已开始第二批整党。农村整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政策，在反对党员剥削行为中有“左”的偏向，组织互助合作中有急躁情绪和形式主义的偏向，在对党员的审查与处理中有畸轻畸重的现象，拟在第二批整党中注意纠正。此外，在这次农村整党中，各地都选调了一批专职组织员，这批干部大都是经过选择与训练的较好的党员干部，又经过一个时期的整党工作的锻炼，建议各地在农村整党任务完成后，对这批干部不要分配其他工作，由中央局或省委集中学习半年或一年，继续加以提高，而后分配他们到党的工作薄弱的地方或部门去工作。

况向中央所作的报告，并将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遵照执行。中央认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和办法是正确的。

中央

二月九日

对薄一波[1]关于一九五三年国家预算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53年2月9日、13日）

一

表和报告[3]印发给明天到会各人，请他们带回去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写在便条上，于十一日带来。

二

胡乔木[4]同志：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1953年2月9日对薄一波关于195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及1953年国家预算编成的报告（草稿）的批语。第三、第四、第五部分是毛泽东在审阅薄一波报告稿时加写的话，其中第四部分后来删去了。

[3] 表，指1953年国家概算表。报告，指薄一波将于1953年2月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作的关于1953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稿。这个报告稿经过征求意见、加以修改后发表于1953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4]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请与齐燕铭[1]联系，看是否有修改意见，收集起来，于明日（十四日）加以修改，送我一阅，准备于十五或十六日发表。请通知人民日报写一社论。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三

这个新阶段是以过去三年恢复阶段中所获成绩为基础的。过去三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艰苦奋斗和一致团结，使得我们解决了恢复经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已比国家初建时的那种残破不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的经济一般已经恢复到过去最高年产量的水平，其中大多数项目则已超过了这一个水平，有些并已超过得很大。这样就给了我们以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可能，就给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一九五三年是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第一年。

四

个人所得税是一切财政制度上了轨道的国家都实行的，这不但是为了国家的收入，而且是为了养成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的关心的一种物质的表现。

---

[1] 齐燕铭，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副秘书长。

五

公债一方面是人民的储蓄，一方面又是人民对国家关心的一种表现，它是爱国主义的。

关于揭露对方破坏协议、击伤我方代表团工作人员等问题的电报

（1953年2月11日）

丁国钰[1]同志，并告金、彭[2]：

二月九日廿一时来电和二月八日廿三时半简报及附件均悉。同意来电所作的估计。关于处理方面，你们所提的办法是可以采取的，但在精神上，应首先揭发对方，予以打击，并争取主动。因此，在联络官会议上，你们应指出对方有意破坏协议、轰炸扫射我方代表团车辆，并击伤代表团工作人员三人，对方对这一事件至今未作任何交代，反来要求我方提供对方清楚地知道的材料，明明是有意刁难，企图寻找借口，推卸责任。在我方一月廿三日的抗议中，我方已经提出关于对方这一破坏协议行动的全部主要事实，无可置辩地证明了对方有意破坏协议，企图杀害我方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严重责任。现在，为了彻底粉碎对方任何企图抵赖事实、推卸责任的诡计，我方更提出弹片等物证。对方必须立即承认事实，并作

---

[1] 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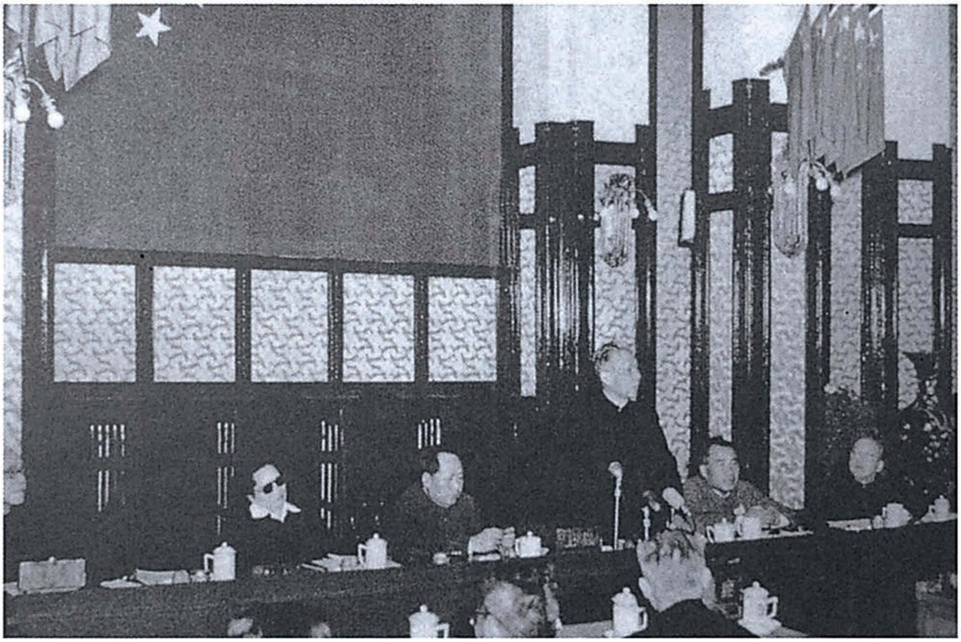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出明确的交代，其任何借口、拖延均不能卸脱或掩盖这一责任。

上述精神，你们可在会议中引申事实，予以发挥。此次联络官会议可由朱然、柴成文[1]两同志出面，以便进行斗争，同时注意在新闻上予以配合。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十五时



1935年2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决定成立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图为大会主席台。左起：林伯渠、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李济深。

---

[1] 朱然，朝鲜人民军上校，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联络官。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联络官、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长。

军委转发陈毅[1]关于华东军区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电报的批语

（1953年2月13日）

陈毅同志，并华东军区党委，并告各大军区、志司和军委各部门：

（一）二月十一日陈毅同志给唐亮同志的电报[2]收悉。我们同意这些意见。（二）请各大军区及军委各部门立即注意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其办法就是经常不断地派有威信的负责人员下去检查工作，对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违法乱纪的干部展开批判和斗争，最典型者予以惩处。望对此事加以讨论，并作布置。

中央军委

二月十三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2] 指陈毅1953年2月11日关于华东军区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意见给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并报毛泽东、中央、总政的电报。电报同意军区党委规定的本年2、3、4月工作纲要，同时指出把反官僚主义斗争推到三四月去做一节是不妥当的。脱离中心工作任务去孤立地空反官僚主义，达不到深入实际的目的。目前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等正是要大做才对。军区党委每一个月只要能比较彻底地检查三四个部门，彻底痛打一番官僚主义，对全盘工作即可推动，并不需要把一切工作停下来专搞新三反。

关于检查改进政府部门工作问题的批语[1]

（1953年2月13日）

刘、周、朱、高、小平、子恢、薄一波、曾山、贾拓夫、彭真、习仲勋、罗瑞卿、胡乔木[2]各同志阅，退安子文[3]。

政府大多数部门的主要缺点是缺乏思想和政治领导，有些部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中央将在今年对各部逐一加以检讨。请安子文同志领导政府党委抓住几个部门先作检讨。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安子文1953年2月12日关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曾山，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3]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长。

中央转发罗瑞卿[1]关于在公安系统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报告[2]的批语

（1953年2月14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3年2月10日关于在公安系统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给毛泽东、中央并政府党组、政法委分党组的报告。报告说，3年来，全国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在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三反运动中经受了严重的考验，从政治上组织上建设和整顿了自己。但是，镇反运动的伟大胜利，也掩盖着我们工作上和组织上不少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也的确出现过和存在着不少坏人坏事。最突出的是存在着乱捕、乱押、刑讯逼供、夸大化、造假案和国民党旧警察作风等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在农村的区乡公安人员中则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这些严重情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并长期得不到纠正，主要原因是各级公安领导机关有严重的官僚主义，放松了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工作，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因此在公安系统内开展一个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十分必要。采取的具体措施是：第一，结合当前的各项工作开展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并通过这个斗争揭露和克服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第二，凡是经过认真审查、经过上级批准确定的假案，均须迅速地严肃负责地加以平反和处理。第三，各级党委和各级公安机关，必须严格遵守捕人、杀人和管制的权限规定以及行使侦察权限的规定。第四，在公安系统内有计划地加强政策、纪律教育，严禁刑讯逼供。第五，各大区、各省市公安机关应于1953年4月间向中央公安部作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专题报告。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各公安机关；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认为在公安系统内按照中央一月五日指示[1]，有计划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中央批准罗瑞卿同志二月十日的报告，并将此报告转给你们，望督促公安机关按照报告所述方针和步骤妥善实施之。

中央
二月十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3年1月5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

中央关于印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正式决议的通知

（1953年2月15日）

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所发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经一年多的实施证明是正确的，应即作为正式决议，将“草案”二字删去。只将该草案第十一条内“并有机器条件”六字改为“和有适当经济条件”八字。[1]此决议可即照此印行单行本。

中央

二月十五日

---

[1] 中共中央1951年12月15日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第十一条中这一段话的原文是：“国营农场应当推广，以发挥它的示范作用，并给互助组和合作社以技术上的援助和指导。在农民完全同意并有机器条件的地方，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例如每省有一个至几个，以便取得经验，并为农民示范。”1953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又对这个决议作了修改，并于1953年3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薄一波[1]关于私营轮船公司合营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2月15日）

周总理：

此件[2]请予处理。可以同意一波意见；但合营是不可免的，应于再贷款一次后，加紧准备合营的条件，主要是干部。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薄一波1953年2月14日关于私营轮船公司合营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及长江私营轮船公司现有船只9万吨，但大多因机构臃肿，货源缺乏，经营不善而不能维持，要求贷款合营。经中财委研究，认为这些轮船公司应该整理，但不应操之过急，假使我们号召在自愿原则下公私合营，可以肯定大多数私营轮船公司都会来的，而我们在干部和资金方面一时都准备不及，会陷于被动。因此，决定仍采取先贷款（但要派人监督其用款是否适当），过一时期后，再考虑合营。

我在此次旅行中所收集的意见[1]

（1953年2月15日至26日）

关于劳保条例[2]

谭震林[3]反映：有几条行不通，此种重大法令希望先征求地方意见。

关于流通税

谭震林同志认为行不通，天津市委认为行得通。

关于营业税

天津同志反映，认为中财部最近的一个补充指示是行不通的，他们压着未行，正请示中。

关于今年预算收入

管文蔚[4]同志认为从一九五三年国民收入六百多万亿元中要收二三三万亿元的税和利润，恐怕是不可能的。在我说明今年经济情况会比去年好些，因此预算可能完成之后，谭震林同志说：国营可

---

[1] 这是毛泽东1953年2月15日至26日外出视察工作时在京沪线沿途收集到的意见。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政务院1953年1月2日第一百六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若干修正的决定》。这个文件，对政务院1951年2月26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作了修订。

[3] 谭震林，当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

[4] 管文蔚，当时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能超过些，私营可能减少些，二者相抵可能完成。我说：今年预算不外三种可能：（一）可能超过；（二）可能完成；（三）可能完不成。我们应当争取完成甚至超过；但对工商各税，应依据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征多少税的原则去做，而不应做杀鸡取卵的事。“不偏肥偏瘦，要多级多等”不只是一句话，而是要照着做（有许多同志怀疑这不过是一句话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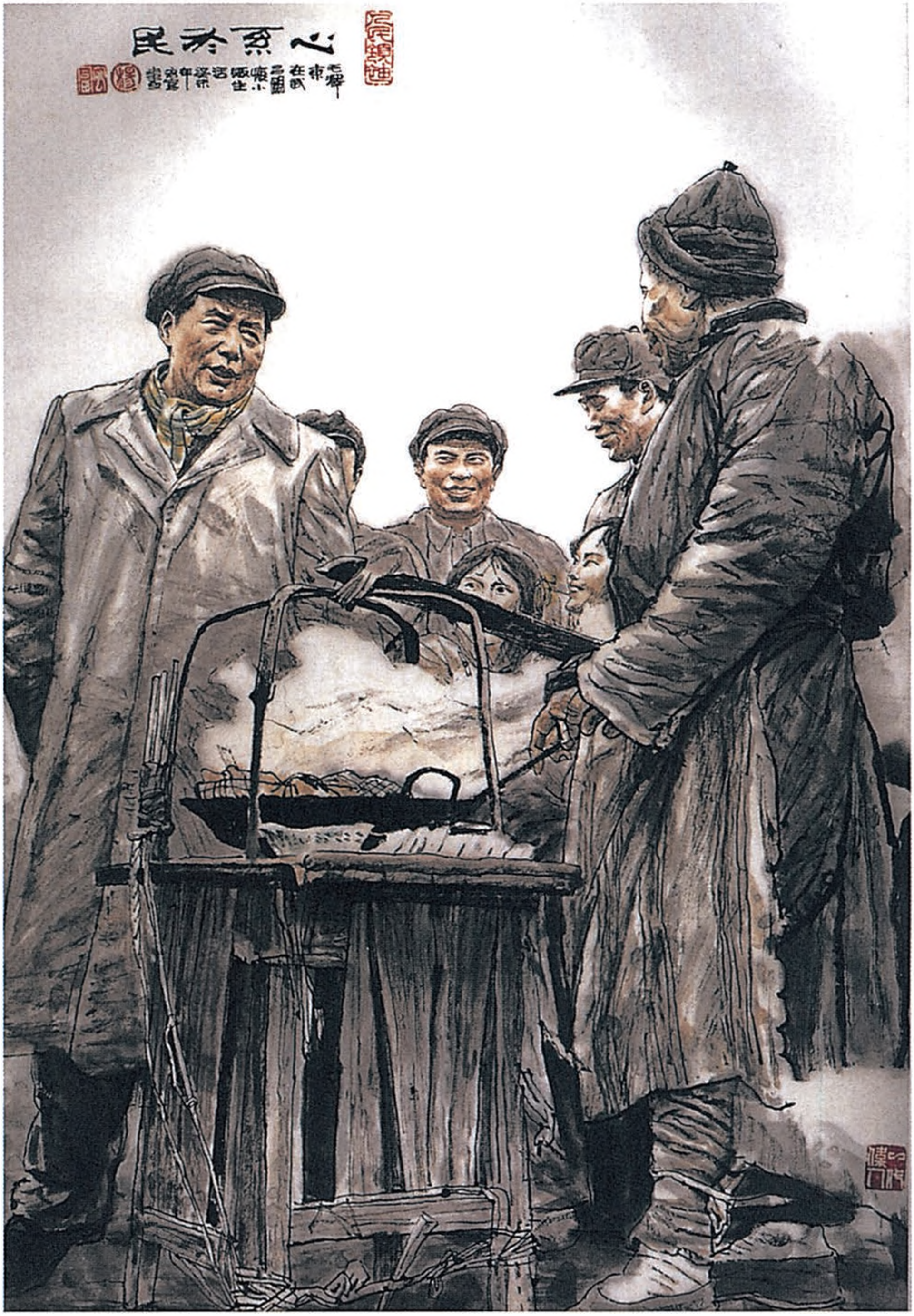
1953年2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湖北。

1953年2月，毛泽东赴武汉途中。

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蛇山和群众在一起。

1953年2月，毛泽东在李先念（左二）等陪同下视察湖北农村。

1953年2月，毛泽东在武汉蛇山和商贩交谈。



《心系于民》（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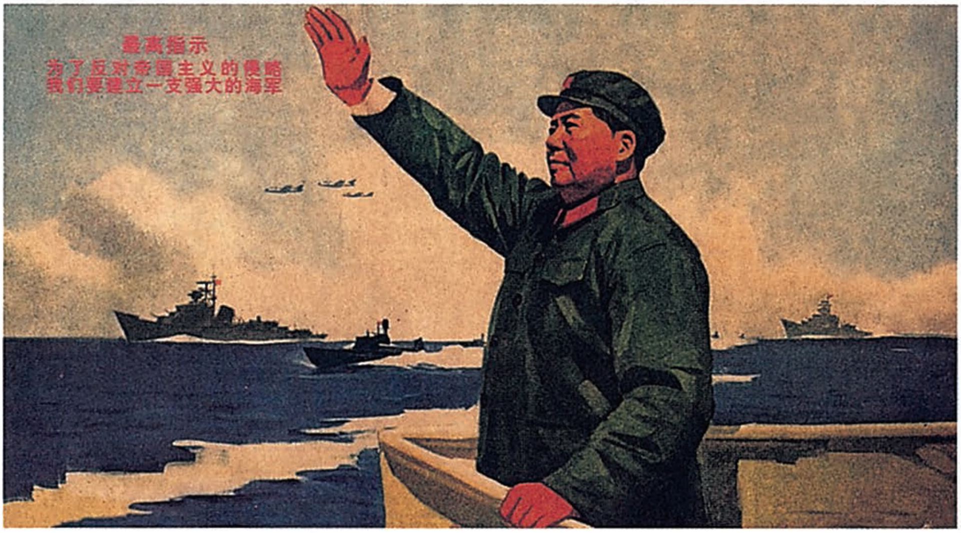
为人民海军题词[1]

（1953 年 2 月 21 日）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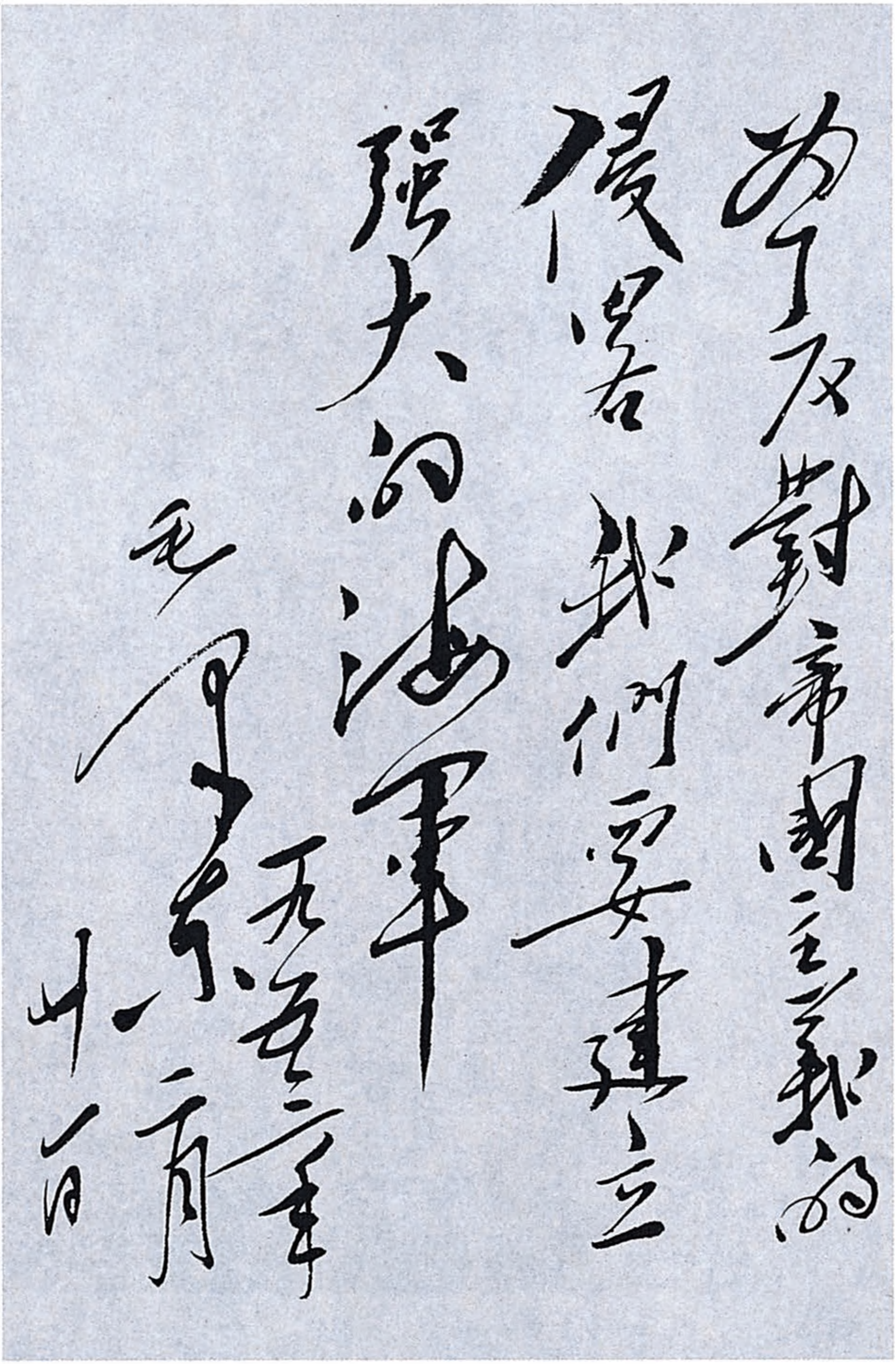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二月廿一日


最高指示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宣传画）

---

[1] 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先后乘坐“长江”“洛阳”“南昌”舰从武汉到南京。这是毛泽东在视察期间为人民海军写的题词。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
侵略我们要建立
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
五三年
二月
廿一日

毛泽东为人民海军题词。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长江号”舰艇。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长江号”舰艇。

1953年2月，毛泽东和“长江号”舰艇指战员合影。

1953年2月，毛泽东在“长江号”舰艇上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的汇报，提出了兴建三峡大坝的远景设想。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洛阳号”舰艇时和指战员合影。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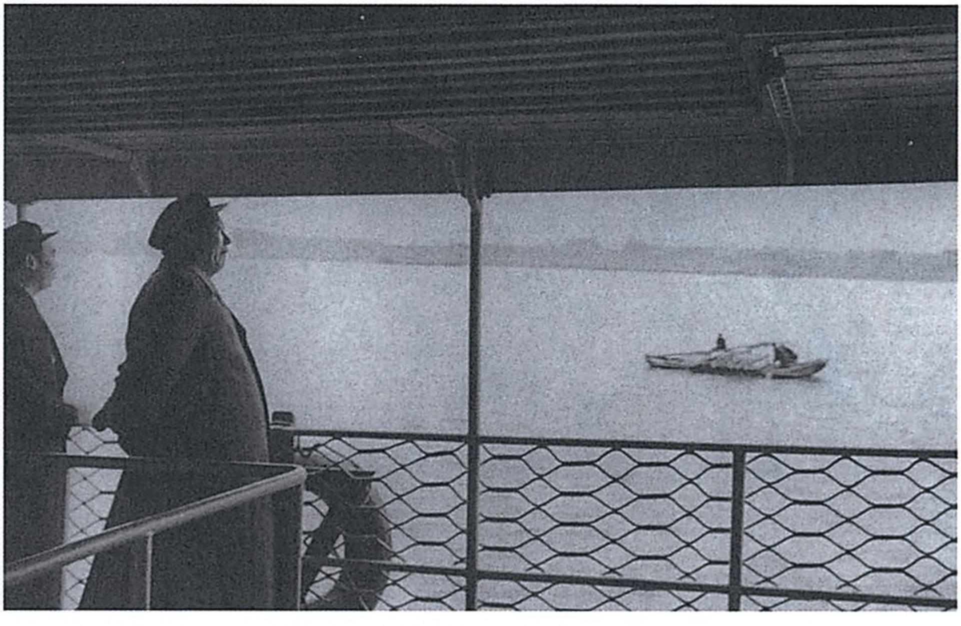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

1953年2月，毛泽东、陈毅、张爱萍视察海军“南昌号”舰艇。

1953年2月，毛泽东、陈毅、张爱萍视察海军“南昌号”舰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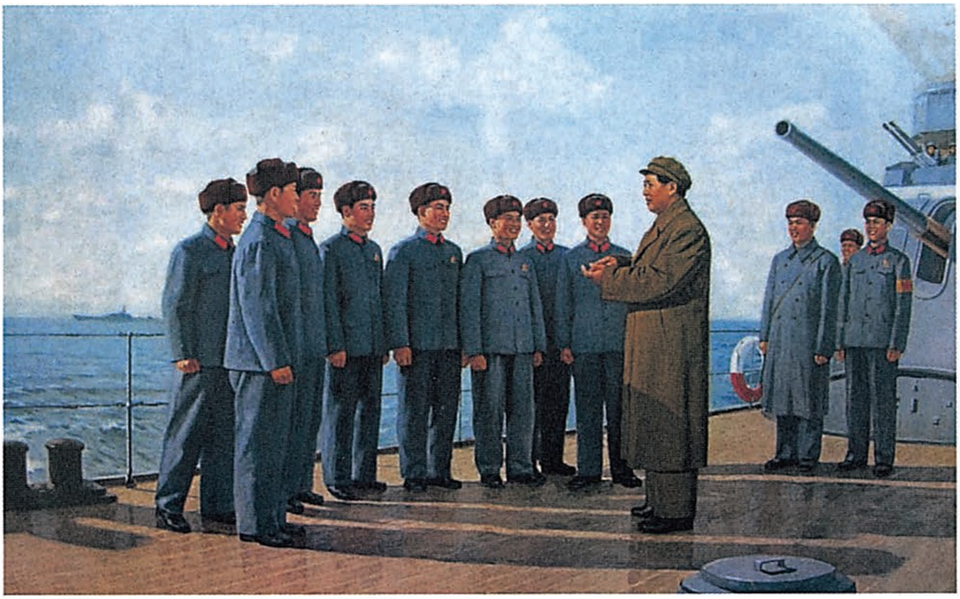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南昌号”舰艇。

1953年2月，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视察“南昌号”舰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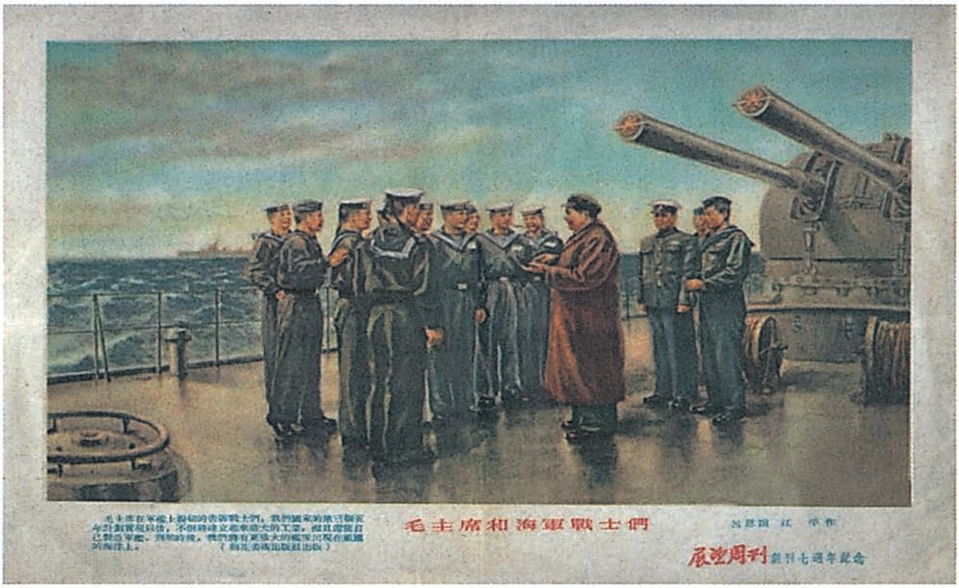


1953年2月，毛泽东乘轮船在长江上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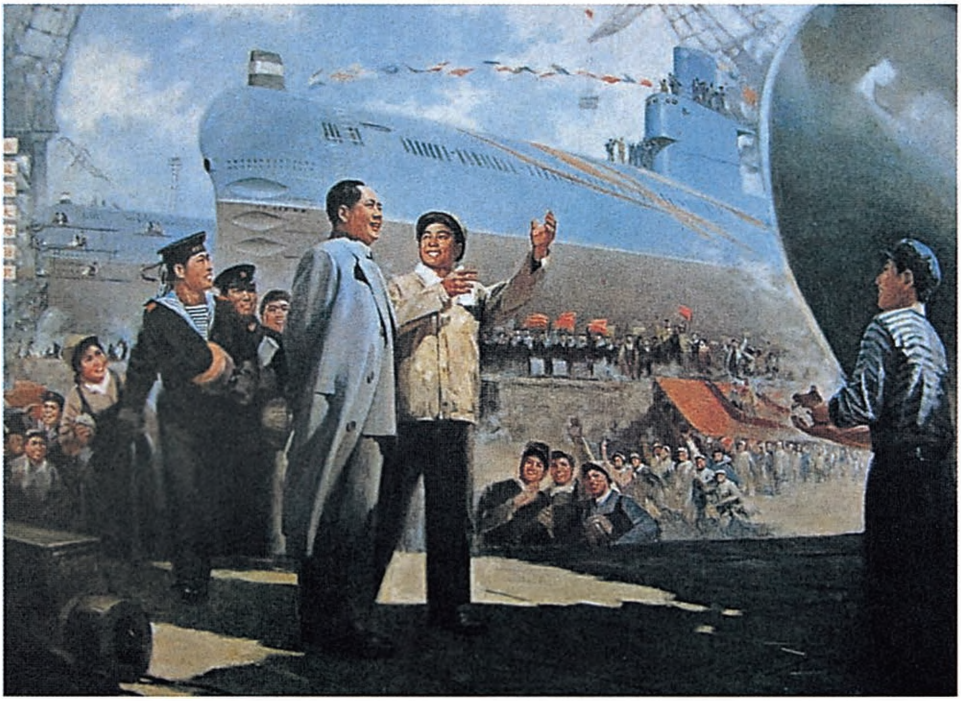
1953年2月，毛泽东在轮船上向岸上群众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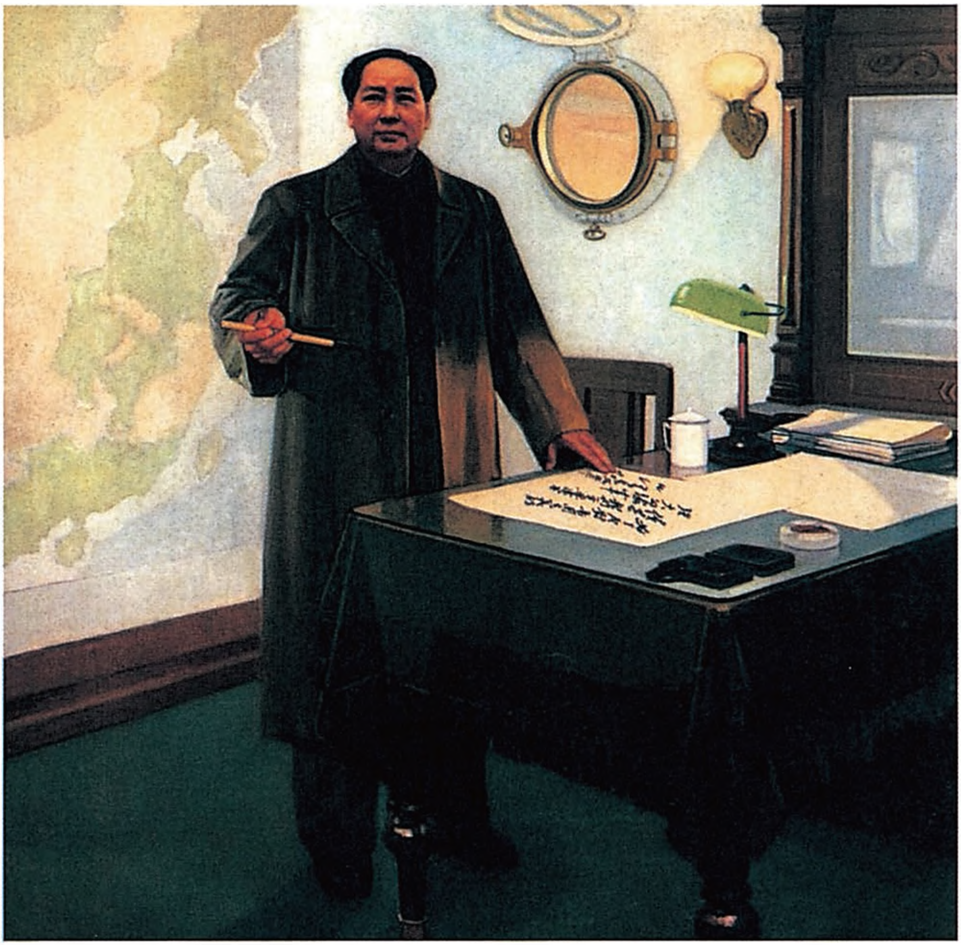
《幸福的航程》（油画）


毛主席和海軍戰士們
展望周刊 創刊七週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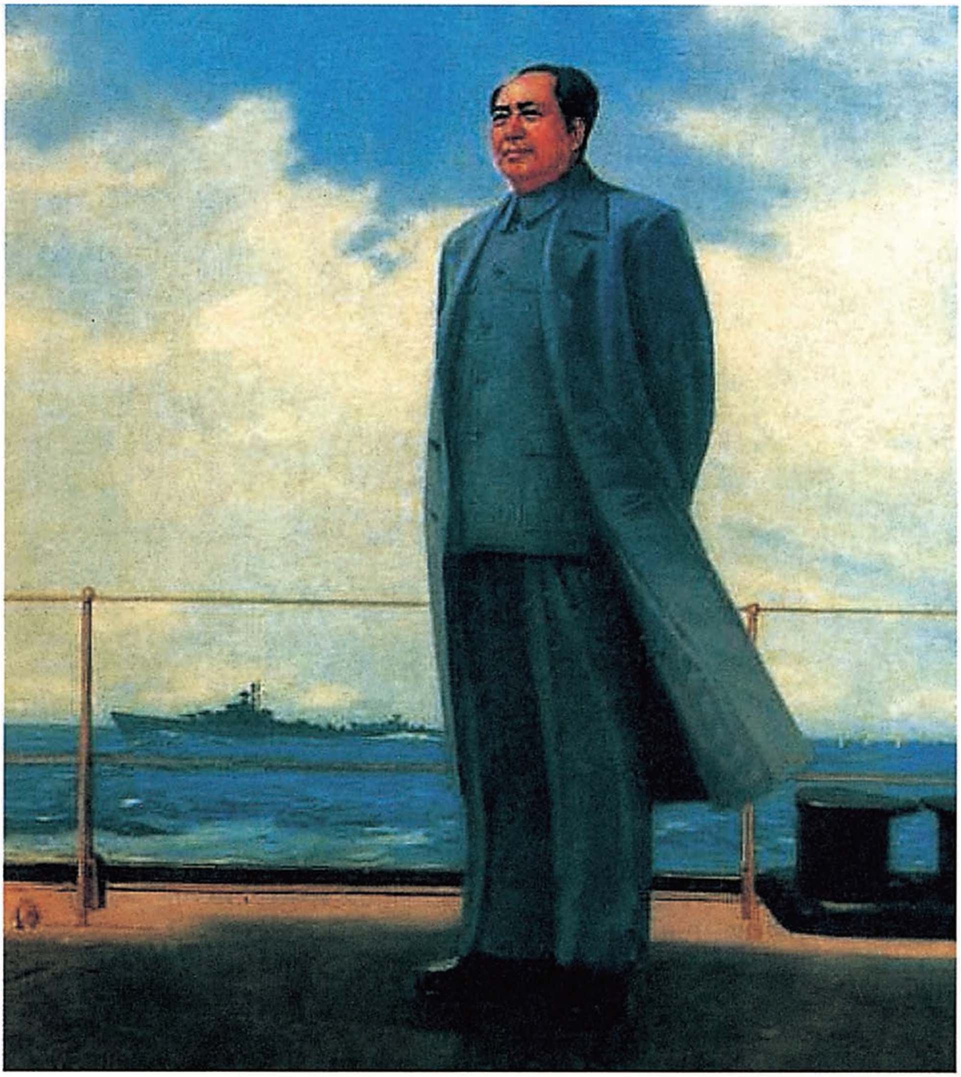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海军战士（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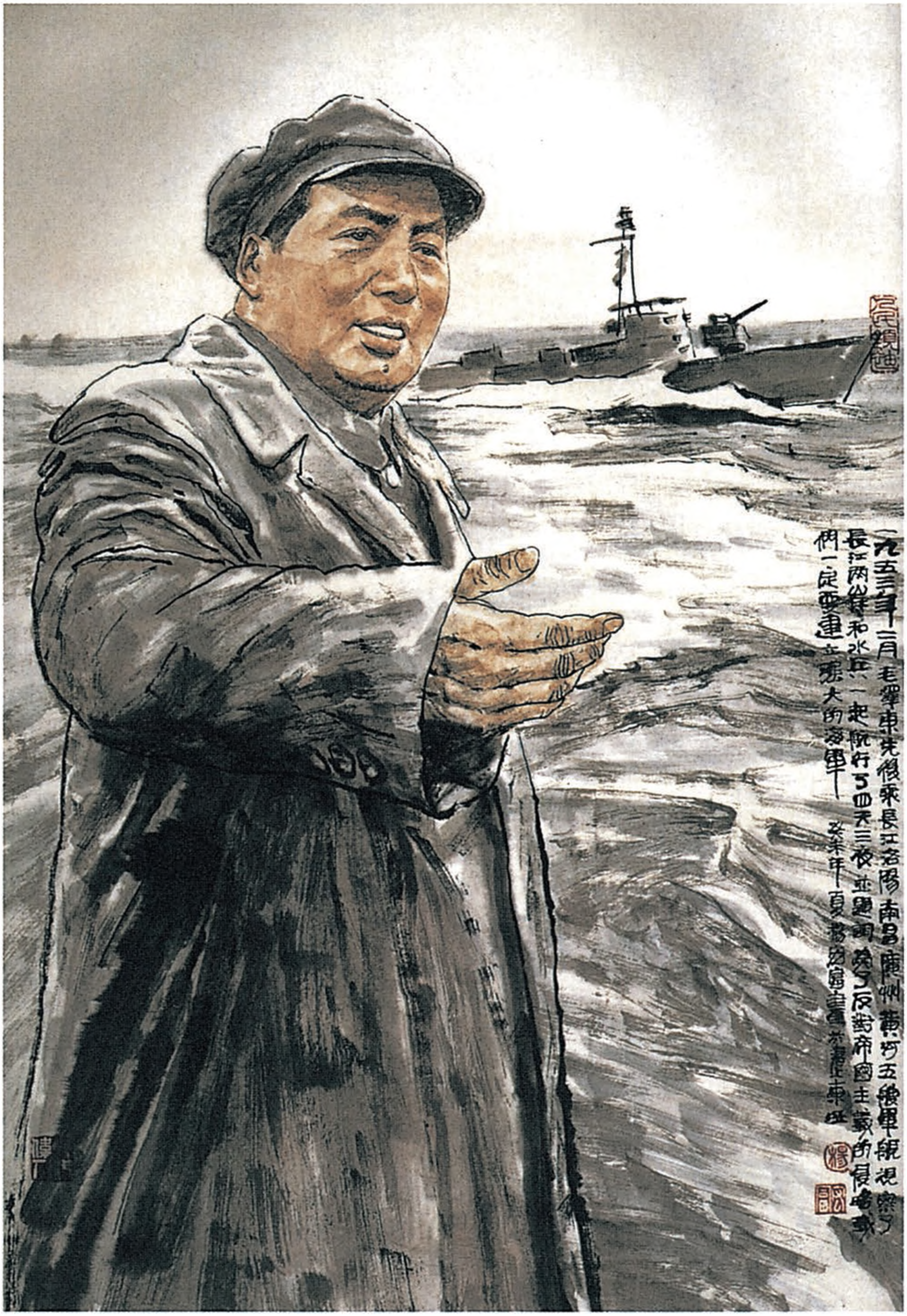
《筑起海上长城》（油画）



《海军建设的伟大纲领》（油画）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军舰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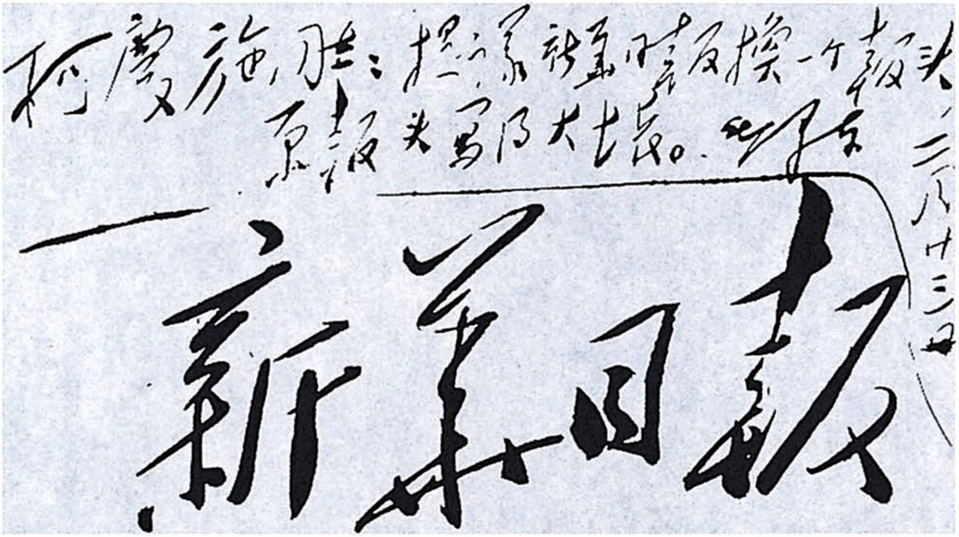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二月毛澤東先後乘長江洛陽南昌廣州黃河五艘軍艦視察了
長江兩岸和水兵一起航行了四天三夜並題詞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
們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軍
癸未年夏

《视察海军》（中国画）

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1]

（1953年2月23日）

新华日报



柯慶施同志：想了一下，新華日報换一个報头，原報头写得太坏。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新華日報

毛泽东为《新华日报》题写的报头。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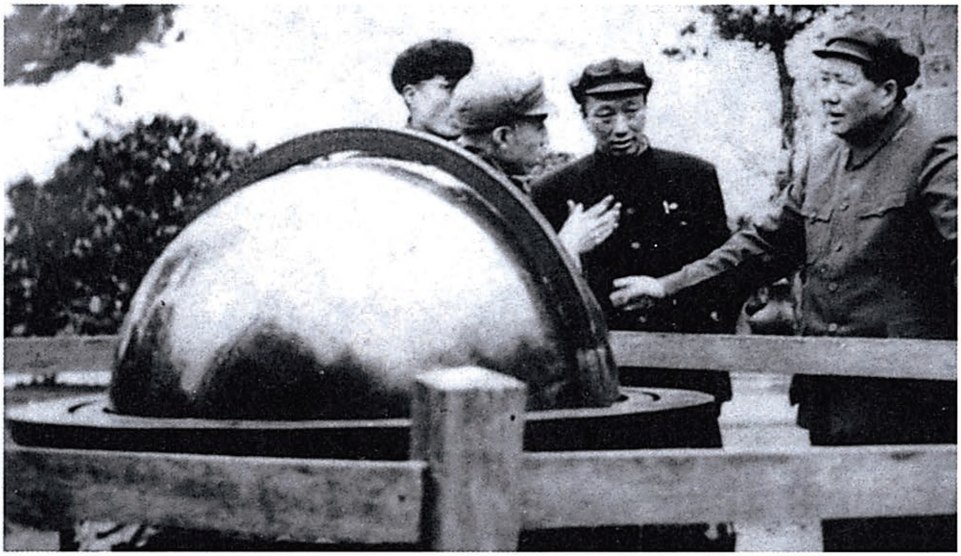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拜谒中山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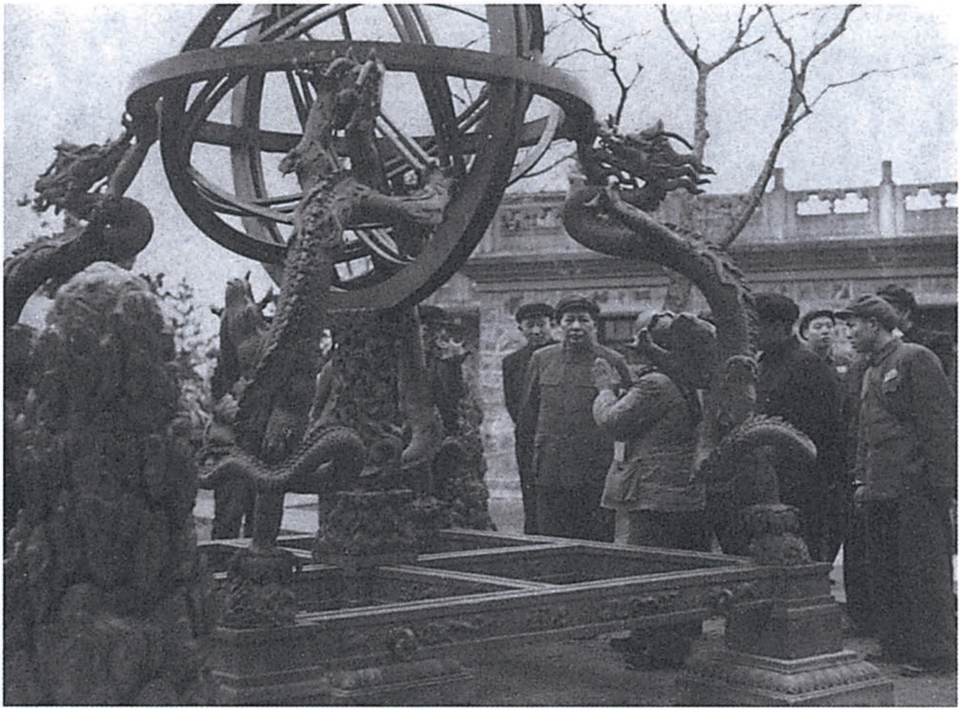
毛泽东拜谒中山陵，向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坐像敬献鲜花。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和陈毅、罗瑞卿在中山陵台阶上小憩。

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和陈毅、杨尚昆等在南京视察时合影留念。



1953年2月，毛泽东参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953年2月，毛泽东参观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南京时和农民群众在一起亲切交谈。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南京郊区农村视察。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刘伯承陪同下视察南京军事学院。

1953年2月，毛泽东在南京视察时和陈毅（右）、谭震林（左）在一起。

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1]

（1953年2月28日）

（二）中央同时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和军委各部门必须尽速召开会议，发动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刻揭发领导方面的官僚主义，并规定改正的具体办法。中央认为在很多部门中极端缺乏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状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这是官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研究加强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的办法。（三）各部门检讨的结果须报告中央。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转发劳动部1953年2月22日关于检查官僚主义的报告的批语稿上加写的话。

关于移载台湾大道通讯社两条消息的批语

（1953年2月28日）

新华社：

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1]，可移载《参考消息》，这是蒋匪向美国人说的，表明他无力进扰大陆和海南岛，和半个月前蒋匪向美国通讯〔社〕发表的谈话为同一性质。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

---

[1] 指新华社1953年2月26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十四号上刊登的台湾大道通讯社的两条消息。一条消息说："中共军队的华中和华东司令部已合并成为一个所谓海岸战区，由四野司令员林彪将军指挥。这个战区将由第四野战军的五个军和第三野战军的两个军（第八军和第十军）来防守。"另一条消息说："共产党占领的海南岛的防御力量已经大为加强，在三个月以前，它的防守兵力即已增加了一倍。""除了地面驻军之外，在岛上的两处飞机场约有五十架各种类型的飞机，另外还经常驻有小型和大型的海军舰艇共三十艘。"

对陈云病况报告的批语[1]

（1953年2月28日）

杨尚昆、刘、周、朱[2]阅，存尚昆处。

请尚昆照昨晚所谈，与陈云同志商处，并代我致慰问之意。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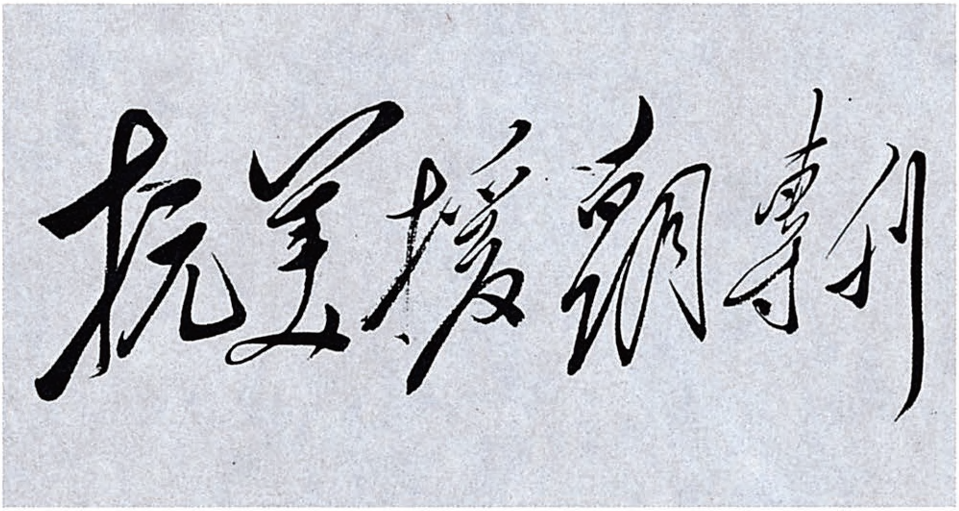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1953年2月27日关于政务院副总理陈云的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陈云的病，入院治疗后虽已有了进步，但苏联大夫认为必须比较长期的休养（四至六个月），并建议去苏联疗养较为有益，我亦认为这样好。”

[2]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

为《抗美援朝专刊》题名

（1953年2月）

抗美援朝专刊



毛泽东为《抗美援朝专刊》题写的刊名。

关于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请邓小平[1]多管一些的批语[2]

（1953年3月3日）

一

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

毛泽东

三月三日

二

拟电下一段[3]不要，因原件并非拒绝处理小事，而是说不要将

---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这两个批语写在邓小平1953年3月2日关于送审为中央代拟的同意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1953年上半年工作要点的复文稿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

[3] 指为中央代拟的复文稿中的一段文字：“惟其中‘零打碎敲，就案办案的手工业工作方法’一句可删去，因为监察工作常常总是发生什么事情就要处理什么事情，不能置之不理，所以这样提法是不够恰当的。”

重心放在处理小事上。

毛泽东
三月三日

中央转发习仲勋[1]关于文委分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2]的批语

（1953年3月3日）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习仲勋1953年3月2日关于文委分党组布置反官僚主义斗争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官僚主义作风在中央一级文教机关和领导干部中，是极为普遍而严重的。主要问题是：一、上面要求过高、过急，迫使下面发生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如在扫除文盲方面，我们曾经希望在几年之内完成全国扫盲任务。由于计划订得过高，教学方法上又照搬部队一套，突击扫盲，结果出现了假毕业等现象。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因要求过急，形成许多学校普遍紧张，教授支持不了，学生消化不了，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二、有些地方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需要调整。如有的研究机关人员成份复杂，业务头绪繁多，党的领导极为薄弱，必须先从组织上加以整顿，才能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三、机关内工作忙乱、效率很低的现象普遍存在。真正“饱食终日”一事不做的人还是少见，多半属于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或是糊糊涂涂的官僚主义。根据上述问题，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加强政治思想领导，改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具体做法是：第一，要把反官僚主义与当前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不采取暴风骤雨的方式，而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第二，对官僚主义要加以分析，对具体事具体人，要抓住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第三，重点放在党内。党员干部应多作检讨，不要把做错事的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第四，一面反对官僚主义，一面倡导和推行钻研实际、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并注意合理分工，树立领导核心，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等。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习仲勋同志这个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供你们在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中作参考。

中央

三月三日

在日侨回国工作简报上的批语

（1953年3月3日）

周总理：

日侨坚决不愿回国者，不要强迫，已有因强迫引起自杀的事。此报告[1]“送干净”的口号，可能引起强迫遣送行为，请加注意。

毛泽东

三月三日

---

[1] 指中央日侨事务委员会关于日侨回国工作的简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的批语

（1953年3月4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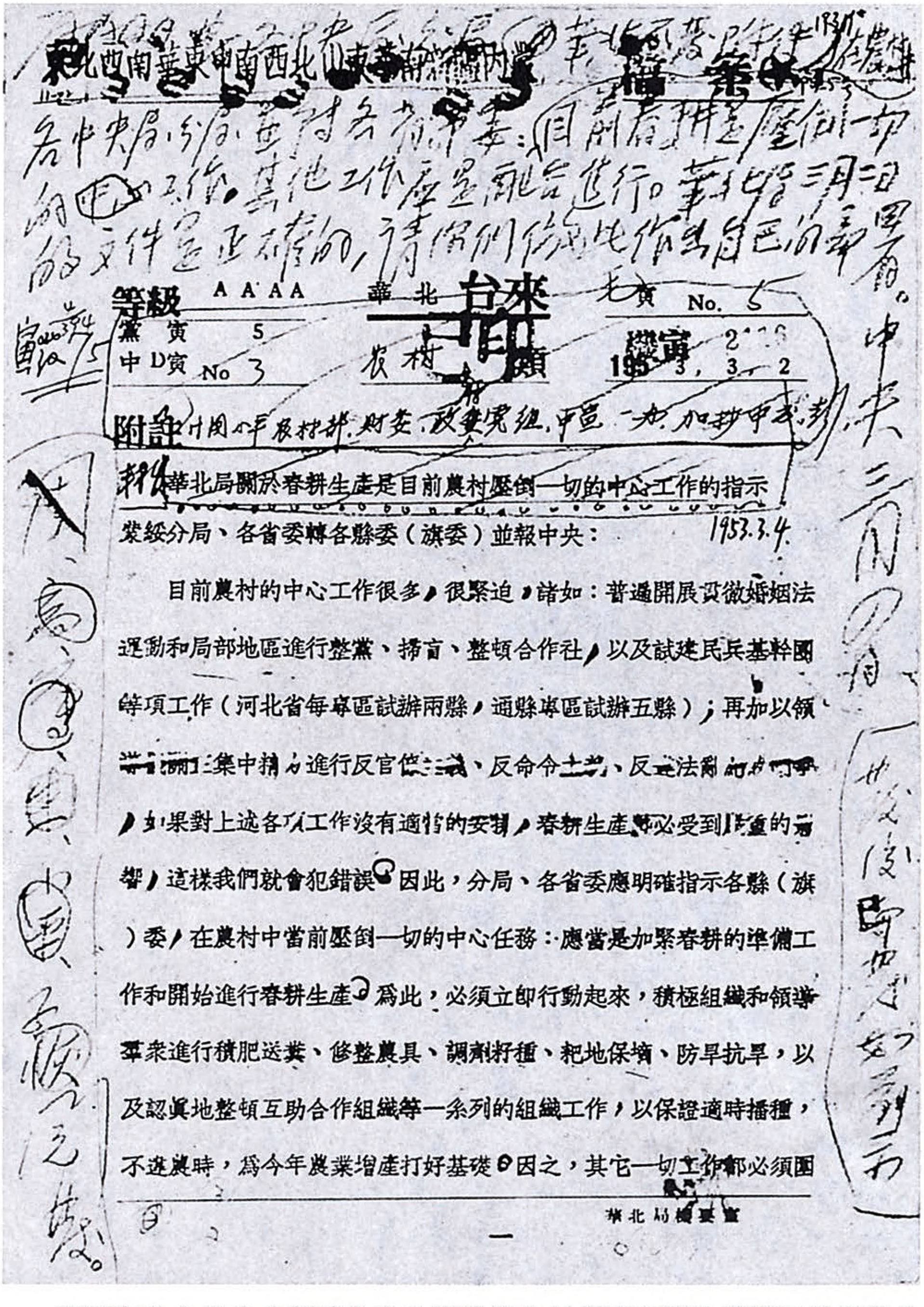
在农村目前春耕是压倒一切的工作，其他工作应是配合进行。华北局三月二日的文件[1]是正确的，请你们仿此作出自己的部署。

中央

三月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3年3月2日关于春耕生产给蒙绥分局、各省委转各县委（旗委）并报中央的指示。指示中说，目前农村的中心工作很多，很紧迫，领导机关又正集中精力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如果没有适当安排，春耕生产势必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分局、各省委应明确指示各县（旗）委，在农村中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应当是加紧春耕的准备工作和开始进行春耕生产，为今年农业增产打好基础。其他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并结合春耕生产来进行，凡是影响与阻碍春耕生产这一中心任务的，均应改变、推迟或缩小原来的计划，以切实保证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目前春耕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应当配合进行。华北局三月四日的文件是正确的，请你们仿此作出自己的部署。中央 三月八日

等級 AAAA　華北　來電　No. 5
黨寅 5
中D寅 No 3　农村　類　機密
195 3，3，2

附註

標題 華北局關於春耕生產是目前農村壓倒一切的中心工作的指示　1953.3.4.

蒙綏分局、各省委轉各縣委（旗委）並報中央：

目前農村的中心工作很多，很緊迫，諸如：普遍開展貫徹婚姻法運動和局部地區進行整黨、掃盲、整頓合作社，以及試建民兵基幹團等項工作（河北省每專區試辦兩縣，通縣專區試辦五縣）；再加以領導上集中精力進行反官僚主義、反命令主義、反違法亂紀的鬥爭，如果對上述各項工作沒有適當的安排，春耕生產勢必受到嚴重的影響，這樣我們就會犯錯誤。因此，分局、各省委應明確指示各縣（旗）委，在農村中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應當是加緊春耕的準備工作和開始進行春耕生產。爲此，必須立即行動起來，積極組織和領導羣衆進行積肥送糞、修整農具、調劑籽種、耙地保墒、防旱抗旱，以及認真地整頓互助合作組織等一系列的組織工作，以保證適時播種，不違農時，爲今年農業增產打好基礎。因之，其它一切工作都必須圍

華北局機要室

一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春耕生产指示的批语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2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润东出版社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3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1

（1953年3月4日）

转发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

（1953年3月4日）

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4

（1953年3月4日）

对李克农病况报告的批语…………………………………………6

（1953年3月4日）

慰问斯大林病情的电报……………………………………………7

（1953年3月4日）

对肖华关于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8

（1953年3月5日）

中央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延期举行的通知…………………………9

（1953年3月5日）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10

（1953年3月6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斗争经验的批语 ………………13

（1953年3月6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继续开展新三反的报告的批语 ………………15

（1953年3月6日）

对军委准备在沈阳市建立中心血库的批语 ……………………16
（1953年3月6日）
在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贸易政策的复文稿上加写的话 ……17
（1953年3月7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18
（1953年3月8日）
给黄炎培、陈叔通的信 …………………………………………20
（1953年3月8日）
最伟大的友谊 ……………………………………………………24
（1953年3月9日）
对财政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报告的批语 ………29
（1953年3月10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30
（1953年3月10日）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32
（1953年3月10日）
军委关于同意西北剿匪部署的电报 ………………………………33
（1953年3月10日）
中央关于新三反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 ……………………………34
（1953年3月14日）
关于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给高岗的信 ……………………35
（1953年3月14日）
对胡绩伟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现象调查报告的批语 ……………36
（1953年3月15日）
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反官僚主义报告的批语 ………………………37
（1953年3月15日）

关于公开报道典型材料问题的批语 ……………………………………39
（1953年3月15日）
在华南分局关于新三反给所属的指示上的批语 ……………………41
（1953年3月15日）
悼念哥特瓦尔德逝世的唁电 ………………………………………………42
（1953年3月15日）
在军委关于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43
（1953年3月16日）
批判大汉族主义 ………………………………………………………………44
（1953年3月16日）
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分散的特点 ………………………………46
（1953年3月17日）
对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甘肃临夏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的批语和附注 ……………………………………………………………………47
（1953年3月19日）
关于向陈云建议用毛巾蘸热水擦身的批语 ………………………………49
（1953年3月19日）
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51
（1953年3月19日）
关于减少军队专职体育运动员问题的批语 ………………………………55
（1953年3月21日）
对《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现象严重》一文的批语 ……56
（1953年3月21日）
关于处理日本渔轮侵入我渔区捕鱼问题的批语 ……………………57
（1953年3月21日）
同意所提战俘交换方针 …………………………………………………58
（1953年3月22日）

关于准备同意讨论交换重伤病俘问题的电报 ……………………59
（1953年3月23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修改 ………61
（1953年3月24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贯彻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的指示的批语 …………64
（1953年3月24日、4月4日）
中央关于如何在县区乡进行新三反的指示 ………………………68
（1953年3月25日）
祝贺陶里亚蒂六十寿辰的电报 ……………………………………71
（1953年3月25日）
关于通报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的批语 ……………72
（1953年3月27日）
给黄炎培的信 ………………………………………………………73
（1953年3月27日）
给林志钧的信 ………………………………………………………74
（1953年3月27日）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新三反的报告的批语 ……………………75
（1953年3月29日）
关于妥为处理四川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的批语 …………………77
（1953年3月30日）
关于减少中央及各部委所发全国性电报的批语 …………………79
（1953年3月）
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 …………80
（1953年4月2日）
对中南行政委员会关于整顿小学的指示的批语 …………………82
（1953年4月2日）

关于检查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批语 ……………………………………84
（1953年4月3日、7日）
接受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87
（1953年4月3日）
朝鲜停战后铁道兵须以大部修路一部进行技术训练 ………………88
（1953年4月5日）
给黄炎培、陈叔通的信 …………………………………………………89
（1953年4月5日）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的批语和修改 ……………………………90
（1953年4月）
印发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93
（1953年4月9日）
关于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习做领导工作的批语 …………………98
（1953年4月10日）
关于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中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的批语 ………………………………………………………………………99
（1953年4月10日）
中央转发钱瑛关于广东发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严重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00
（1953年4月11日）
对安子文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的报告的批语…………………104
（1953年4月13日）
给程潜的信 ……………………………………………………………105
（1953年4月20日）
对财政部关于全国农业税法会议请示的批语和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107
（1953年4月16日、21日）

给李烛尘的信……………………………………………………………109
（1953年4月21日）
要做好举行夏季战役的攻击准备……………………………………112
（1953年4月23日）
对西南局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规定的批语…………………113
（1953年4月26日）
关于修改工会工作文件的批语………………………………………115
（1953年4月26日）
关于同意推迟军衔评定工作的批语…………………………………116
（1953年4月26日）
给李烛尘的信……………………………………………………………117
（1953年4月26日）
在中央关于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稿中加写的话…………118
（1953年4月28日）
对天津市委关于发动职工讨论生产计划的经验的批语……………122
（1953年5月）
给毛泽荣的信……………………………………………………………123
（1953年5月2日）
关于解决任务与政策的矛盾的批语…………………………………126
（1953年5月3日）
关于搜集敌战俘营中我伤病人员情况的电报………………………127
（1953年5月4日）
关于大批减免西南灾区公粮和农业税的批语………………………128
（1953年5月5日）
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的信………………129
（1953年5月6日）

对贾拓夫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的批语……………………………130
（1953年5月6日）
关于就战俘遣返方案同印度协商的意见……………………………132
（1953年5月6日）
中央关于基本同意西北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的布告的电报………133
（1953年5月8日）
对中央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的指示稿的批语……………………135
（1953年5月10日）
给张澜、黄炎培的信……………………………………………………136
（1953年5月13日）
给黄炎培、陈叔通的信…………………………………………………137
（1953年5月15日）
给黄炎培的信……………………………………………………………138
（1953年5月17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上的指示……139
（1953年5月17日）
对陈叔通来信的复信和批语……………………………………………142
（1953年5月18日、19日）
关于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问题的信和批语 ……………………145
（1953年5月19日）
对邓子恢报告中关于基本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间的传达问题的批语……………………………………………………………………147
（1953年5月19日）
对总政布置调查美军虐待俘虏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48
（1953年5月21日）
给马叙伦的信……………………………………………………………150
（1953年5月22日）

关于邀请刘澜涛参加中央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批语……………152
（1953年5月24日）
关于付印三大条令草案的批语……………………………………153
（1953年5月24日）
在中央会议中应有军委议程………………………………………154
（1953年5月27日）
关于修改顾问工作守则给王稼祥的信……………………………157
（1953年5月27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新疆分局关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的批语……………………………………………………………………160
（1953年6月2日）
对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的批语…………………162
（1953年6月4日）
关于印发有关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的批语……………………163
（1953年6月5日）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加强集体领导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的批语…164
（1953年6月8日）
对陈叔通、黄炎培来信和附件的批语和复信……………………165
（1953年6月14日）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68
（1953年6月1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69
（1953年6月15日）
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175
（1953年6月17日）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177
（1953年6月21日）

在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报告上的批语……178
（1953年6月22日）
给毛泽连的信……180
（1953年6月23日）
中央转发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181
（1953年6月24日）
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183
（1953年6月28日）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86
（1953年6月30日）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192
（1953年6月）
今冬明春农闲季节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195
（1953年7月1日）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巴特尔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96
（1953年7月2日）
为迁移马克思墓捐款给波立特的信……197
（1953年7月4日）
对苏联一篇文章中批评“对立的统一”提法的批语……198
（1953年7月）
给符定一的信……199
（1953年7月7日）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202
（1953年7月8日）
给张澜的信……204
（1953年7月8日）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206
（1953年7月9日）
关于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致李克农电…………207
（1953年7月9日）
中央关于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贷款问题复西南局电………209
（1953年7月10日）
关于缩减在辽东等地修建国防工事计划的批语……………211
（1953年7月11日）
给邹普勋的信……………………………………………212
（1953年7月11日）
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事项未经允许不得下达………………213
（1953年7月13日）
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题词………………………………214
（1953年7月15日）
对全总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工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批语稿的修改……………………………………………216
（1953年7月）
在黄克诚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的报告上的批语………218
（1953年7月17日）
关于停战后工作安排和志愿军参加各委员会代表人选的问题……219
（1953年7月20日）
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安排等问题的指示…………………222
（1953年7月21日）
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225
（1953年7月22日）
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仍应提高警惕………………………227
（1953年7月25日）

在中央关于处理湖东县劳改队看守打死群众事件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228
（1953年7月27日）
对彭德怀谈话稿的修改意见……229
（1953年7月27日）
关于朝鲜停战后空军作战等问题的批语……230
（1953年7月27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32
（1953年7月29日）
给黄炎培的信……237
（1953年7月30日）
答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祝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电报……238
（1953年7月31日）
给李济深的信……239
（1953年7月31日）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批语……241
（1953年7月）
关于不要劝龙云献出其公馆内浮财的批语……243
（1953年8月2日）
对黄克诚关于英国商船要求我护航的报告的批语……244
（1953年8月4日）
在中央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通报中加写的话……245
（1953年8月5日）
总政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246
（1953年8月5日）

对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复格罗提渥的信稿的批语和修改……248
（1953年8月10日）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49
（1953年8月）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252
（1953年8月12日）
为祝贺朝鲜解放八周年致金科奉电……260
（1953年8月12日）
在中央给罗贵波、邓一凡的电报稿上的批语……261
（1953年8月14日）
在刘景范来信上的批语……262
（1953年8月16日）
给叶恭绰的信……263
（1953年8月16日）
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265
（1953年8月17日）
对“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口号的意见……266
（1953年8月21日）
征询对告我方被俘人员书的意见……267
（1953年8月22日）
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269
（1953年8月26日）
对中央转发陕西省委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271
（1953年8月27日、30日）
给李漱清的信……273
（1953年8月27日）

给毛宇居的信……275
（1953年8月27日）
给邹普勋的信……277
（1953年8月27日）
在审阅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时加写的话……278
（1953年8月28日）
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279
（1953年）
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280
（1953年8月）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282
（1953年9月2日）
对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的批语和修改……284
（1953年9月4日）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286
（1953年9月7日）
给文涧泉的信……290
（1953年9月8日）
给张四维的信……293
（1953年9月8日）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报告提纲……294
（1953年9月）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295
（1953年9月12日）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303
（1953年9月12日）
关于感谢苏联政府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电报……308
（1953年9月15日）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311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
对军委办公厅摘要报送空军安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322
（1953年9月20日）
悼念布曼增迪的电报……323
（1953年9月24日）
在朱德总司令国庆阅兵命令稿上加写的话……324
（1953年9月26日）
关于阅处高岗起草的致苏联政府文件的批语……325
（1953年9月27日）
关于一切文电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的批语……326
（1953年9月27日）
给沈钧儒的信……327
（1953年9月27日）
给易礼容的信……329
（1953年9月27日）
关于更改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厂址问题的批语……330
（1953年9月28日）
为《工学》报题写报头……331
（1953年9月）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335
（1953年）

粮食统购统销问题……………………………………………………338
（1953年10月2日）
给毛月秋的信………………………………………………………341
（1953年10月4日）
给马叙伦的信………………………………………………………345
（1953年10月5日）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电报…………………………347
（1953年10月5日）
在印尼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上的批语…………………………348
（1953年10月5日）
在李大梁来信上的批语……………………………………………349
（1953年10月5日）
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的批语…………………………351
（1953年10月11日）
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值得注意………………………………352
（1953年10月11日）
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几个问题的提纲……………………353
（1953年10月12日）
为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题词……………………………………355
（1953年10月15日）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357
（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
关于重要土特产和副食品的经营问题………………………………366
（1953年10月16日）
对华南分局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政策的意见的批语………368
（1953年10月16日）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决议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370
（1953年10月16日）
给李漱清的信……372
（1953年10月16日）
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373
（1953年10月18日）
对朝中停战代表团首席委员发言稿的修改意见……375
（1953年10月20日）
给杨尚昆的信……377
（1953年10月22日）
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379
（1953年10月23日）
给文九明的信……382
（1953年10月25日）
接受印尼首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85
（1953年10月28日）
不怕破裂也不把门关死……386
（1953年10月29日）
给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的信……388
（1953年10月29日）
关于李克农回国后停战代表团工作安排问题……389
（1953年10月31日）
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的修改……391
（1953年10月31日）

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394
（1953年11月4日）
对李维汉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395
（1953年11月5日）
关于中央警卫团不应设立文工团的批语…………………………397
（1953年11月5日）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致马林科夫电……………………398
（1953年11月5日）
拟公布美军细菌战战俘供词…………………………………………400
（1953年11月8日）
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报告的批语…………402
（1953年11月8日）
关于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配备干部问题………404
（1953年11月10日）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柯尼希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08
（1953年11月12日）
中央转发天津市委统战部关于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的报告的批语……………………………………………………………409
（1953年11月20日）
关于签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问题的批语…………………411
（1953年11月21日）
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步定稿）》的批语 ……………………………………………………412
（1953年11月）
关于揭露美军对朝中军民暴行问题…………………………………413
（1953年12月1日、3日）

接受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孙士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16

（1953年12月2日）

给黄炎培的信…………………………………………………………417

（1953年12月3日）

给袁希洛的信…………………………………………………………419

（1953年12月3日）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421

（1953年12月4日）

关于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给杨尚昆的信………………………422

（1953年12月4日）

关于通过公债条例及批准中朝协定给周恩来的信……………………424

（1953年12月5日）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426

（1953年12月7日、13日）

给戴毓本的信…………………………………………………………434

（1953年12月9日）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436

（1953年12月9日）

对胡乔木关于在他暂离期间由凯丰列席中央会议等问题的请示的批语…………………………………………………………440

（1953年12月10日）

对统战部召集人物安排工作会议请示报告的批语……………………441

（1953年12月12日）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崔一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42

（1953年12月12日）

接受丹麦驻华公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43

（1953年12月12日）

对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445

（1953年12月13日、22日）

关于看望徐悲鸿夫人的信……………………………………………449

（1953年12月13日）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52

（1953年12月15日）

对金门作战建议的批语………………………………………………454

（1953年12月19日）

同意目前不打金门……………………………………………………455

（1953年12月22日）

为《人民工兵》题名…………………………………………………456

（1953年12月23日）

给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的贺信……………………………………457

（1953年12月24日）

为《铁道兵》题名……………………………………………………459

（1953年12月25日）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460

（1953年）

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461

（1953年）

青少年的教育…………………………………………………………463

（1953年）

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纪念碑题词…………………………………464

（1953年）

为华北烈士陵园题词……466
（1953年）
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题词……468
（1953年）
为韶山学校题名……470
（1953年）
在转发邓子恢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报告时加写的话……475
（1954年1月4日）
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476
（1954年1月）
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的建议……478
（1954年1月7日、8日）
宪法起草工作计划……482
（1954年1月15日）
关于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的电报……487
（1954年1月18日）
关于高岗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问题致刘少奇电……488
（1954年1月22日）
同意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的电报……490
（1954年1月23日）
关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词的修改意见致朱德电……491
（1954年1月25日）
关于由杨尚昆转达四中全会文件修改情况和有关意见给刘少奇等的信……493
（1954年1月27日）

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致马林科夫电……………501
（1954年2月11日）
关于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改给刘少奇等的电报和信………………502
（1954年2月17日）
关于宪法草案初稿修改情况给刘少奇等的信………………………505
（1954年2月24日、26日）

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1]

（1953年3月4日）

彭副主席[2]阅后，送罗瑞卿同志：

在北朝鲜境内亦应实行安置反伞特据点的办法，可将此件中所述办法[3]电告联司[4]，并请联司和人民军总部商量，由志愿军和人民军分担，在北朝鲜境内各山头上安置多数据点，专任反伞特斗争，定期总结经验，加强斗争技术战术，灭尽一切伞特。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等1953年2月23日关于各地布置反伞特斗争的情形给毛泽东、彭德怀和聂荣臻的报告上的批语。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罗瑞卿等在反伞特斗争的报告中所述的办法。报告说：国内各地均于12月下旬及一二月份举行了由公安部队召集的反伞特会议，以建立反伞特便衣武装据点为主要内容，全面布置了反伞特工作，包括设立据点、建立各级指挥机构、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派对空监视哨等。由于各地情况和部队任务不同，在反伞特布置上也各有特点。目前各地应该迅速解决据点部队装备问题，争取早日建起据点，提高据点部队的业务，深入检查反伞特工作的执行情形，开展群众性的反伞特斗争，以彻底歼灭降落的伞特，粉碎敌人的阴谋。

[4] 联司，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

转发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3年3月4日）

习仲勋[2]同志：

---

[1] 指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梅益1953年2月12日关于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央广播事业局最近召集了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总结了提高广播宣传质量的经验，并且讨论和布置了今年的任务。3年来，全国广播工作有很大成绩，但还存在许多弱点。第一是力量太分散。台数多，电力小，中央台的输出力既不足以普遍达到全国各地，更不足以负担开展有力的国际广播斗争的任务。第二是干部奇缺。编辑、播音干部很少，其政治文化水平一般比不上同级的报纸干部；技术干部也少，如不集中，全国无法组成一个包括设计、土木、天线、装线、供电的完整的基本建设的班子。第三是广播节目一般是量多而质不高，在运动中能起作用的台较多，日常能起作用的台较少。第四是广播收音网由无到有，发展很快，但不够健全和巩固。第五是广播工业有很大发展，但没有统一的管理和统一的生产计划。根据上述情况，1953年广播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中央台的基本建设；调整人力，精办节目，提高广播宣传的质量；整理与巩固广播站和收音站；统一制订广播工作的生产计划，统一管理全国工厂与修理服务机构。

[2]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似可先将梅益报告由中宣部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其宣传部，然后再发你所说的中央指示[1]，请加酌定。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向毛泽东报送梅益的报告时所说的准备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对广播工作领导的指示。

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1]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3年3月4日）

熊复[2]同志：

此事[3]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4]。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胡风，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 熊复，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3] 1953年2月25日，有人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中国文协1953年1月29日召集文艺界负责人座谈讨论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及他个人的感受，说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使他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

[4]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熊复于1953年4月8日就此事向毛泽东写了调查报告。报告中说，胡风于去年7月来京，找周扬和丁玲，并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问题，当时周总理指示要中宣部负责处理。中宣部先后召

集了四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作了全面的批评，希望他能够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进行自我检讨。胡风口头上表示愿意考虑，实际上仍然多方为他的错误思想辩护。因此，中宣部指定何其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林默涵（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在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的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都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也有少数读者对于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两年来，在一般的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着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倾向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对李克农病况报告的批语[1]

（1953年3月4日）

尚昆[2]同志：

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1953年2月21日关于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的病况给周恩来的报告上。报告说，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症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慰问斯大林病情的电报

（1953 年 3 月 4 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
亲爱的约·维·斯大林同志：

获悉您患重病的不幸消息，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本人怀着最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的病情好转，恢复健康，以慰中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祝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四日于北京

对肖华[1]关于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的报告[2]的批语

（1953年3月5日）

肖华同志：

分组下去检查很好。惟每组每次检查时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时间似太长，以半月至二十天回来报告为适宜，过几个月再去检查一次。如以一个半月时间而论，可分三次去，每次半个月尽够了。

毛泽东

三月五日

坐飞机、火车、汽车，半个月可看看许多地方。

---

[1] 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2] 指肖华1953年3月5日关于派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报告中说，为了贯彻中央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拟采用分批派遣干部深入部队检查工作的办法，以推进全军开展这一运动。总政治部第一期检查工作的人员共分五组，各组检查工作时间为一个月至一个半月。检查重点为各军区的主力部队及文化教育工作。

中央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延期举行的通知[1]

（1953年3月5日）

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志司，并转各省市区党委：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延期，确定日子待后通知，但本月内确定不能开会。

中央

三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1953年3月6日）

一

我们伟大的盟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大元帅不幸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晚九时五十分（莫斯科时间）逝世。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旗志哀；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同志：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主席同志，光荣的列宁、斯大林的党，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定将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兄弟般的始终如一的信任和支持。中国人民一定会以最大的坚定性，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永远紧密地团结一致，巩固并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提高警惕，加倍努力，打击战争挑拨者，为苏中两国人民的永久利益和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奋斗到底。我相信，全世界一切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都将和我们一道，遵循斯大林同志指示的方向，把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担当起来。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于北京

1953年3月6日，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到苏联驻中国使馆吊唁斯大林。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斗争经验的批语

（1953年3月6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

河北省的经验[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希望各省市委仿照河北省委的榜样，在一九五三年内结合各项工作，有领导地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3年3月5日向所属通报的河北省委领导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斗争的经验。通报说，河北省各级领导机关，过去严重地存在着不很注意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不揭发坏人坏事的现象。在中央发出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和华北局不断督促之后，河北省委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并于1月下旬召开地委、市委书记会议，由省委书记林铁主持，严肃地处理了易县台底村干部的违法乱纪案件和石家庄植物油总厂因领导干部官僚主义导致火灾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的案件。之后，省委、省人民政府和有些地、市委连续处理了一批严重违法乱纪、破坏人民利益的典型案件，惩办了严重违法乱纪、欺压人民的坏分子。这些典型案件的处理，都通过《河北日报》公开发表，对干部和群众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河北省委这种严肃认真地处理违法乱纪典型案件的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进一步密切与巩固了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群众揭发坏人坏事的勇气。河北省委领导这一斗争的经验是：第一，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第二，实行自我批评，毫不留情地揭发坏人坏事。第三，加强检查工作，派得力干部深入厂矿、机关和农村进行重点检查和处理典型案件。第四，通过报纸，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

开展新三反斗争，并请在春季三个月内选择几个典型案件，由省委书记亲手主持，开展斗争，在报上揭露，以为全省倡导。

中央

三月六日

中央转发华北局关于继续开展新三反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3月6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区党委、地委和县委：

华北局三月一日的文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登党刊。华北局对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做出第一个总结，并作了有分别的部署，望你们都仿照这样做。

中央

三月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1953年3月1日关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报告。报告中说，华北地区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运动开展得很不平衡，许多领导认识不足，注意不够，仍处被动。为此，华北局提出：结合当前工作，继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斗争；并采取有领导、有重点地逐步深入的办法，切忌急躁情绪和急风暴雨方式；首先组织各系统的领导机关干部学习有关文件，联系思想，结合实例，进行检查；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应有不同的检查重点；3月初再召开一次省市处理人民来信会议，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情况。

对军委准备在沈阳市建立中心血库的批语[1]

（1953年3月6日）

此事请彭[2]注意，督促有关机关予以审查，起草复电。是否需要建立如此巨大的血库，请加斟酌。

毛泽东

三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办公室对东北局批转沈阳市委关于为抗美援朝动员献血计划的摘报上。摘报说：中央军委决定在沈阳市建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中心血库。根据抗美援朝前方的需要，拟先由机关、部队、学校开始，动员献血，计划每天300人，采取6万毫升。沈阳市委要求将动员献血与抗美援朝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在动员中必须严格遵守自觉自愿原则，反对单纯任务观点和强迫命令作风。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在中央关于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贸易政策的复文稿上加写的话[1]

（1953年3月7日）

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混合使用银元和人民币者，亦照南胡所提比价[2]作出合理调整。

---

[1] 毛泽东这句话，加写在中央给中财委并中国人民银行的复文稿中以下一段话之后：“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金融、贸易政策应采取稳步前进而对少数民族（包括本地商人及上层分子）有利的方针。切忌躁进，尤其不可将内地办法搬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中央同意南、胡所提的第二方案，请即照办。”南、胡的第二方案，是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副行长胡景澐1953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解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货币问题的第二种办法，即在目前基础上，通过稳定人民币与银元、杂洋比价来稳定货币市场，以开展物资交流，从而使少数民族逐渐转变喜爱硬币心理，建立人民币威信，在将来条件完全成熟，少数民族完全同意的情况下，水到渠成地统一货币流通。

[2] 指南汉宸、胡景澐报告中提出的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按一万元（指旧币）兑换银元一元计算。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3年3月8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先生：

饶西·彭措札喜[2]带来的你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写给我的信及你的相片均已收到。你对祖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所表示的亲爱，你为西藏僧俗人民谋求幸福生活，做好各方面工作的决心，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为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奋斗的道路上，你达赖喇嘛先生和班禅额尔德尼[3]先生和西藏僧俗人民永远会得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帮助。

自然，在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我们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帝国主义和反动破坏分子也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因此，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国防，巩固汉藏民族之间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严防帝国主义间谍特务和其他反动破坏分子的阴谋活动，并克服我们建设祖国和为西藏民族谋福利的道路上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西藏僧俗人民的幸福前途。你和西藏人民如果在这一方面遇到困难，中央人民政府会帮助你获得妥善的解决。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饶西·彭措札喜，达赖喇嘛的姐夫，当时在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任职。

[3]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西藏的宗教和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宗教一样，是已经受到尊重和保护，并且还将继续受到尊重和保护。只要人民还相信宗教，宗教就不应当也不可能人为地去加以取消或破坏。

张经武[1]同志不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他为西藏僧俗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你是一致的。你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和他商议，他会尽力地帮助你。希望你多找机会和他面谈，如有需要直接告诉我的事情，亦可由他转达。

附送最近相片一张，以志纪念。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

给黄炎培、陈叔通[1]的信

（1953年3月8日）

黄任老、陈叔老：

此件[2]请阅，并予掷还。如有意见，请告。

任老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可将要协商，要公平，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等带原则性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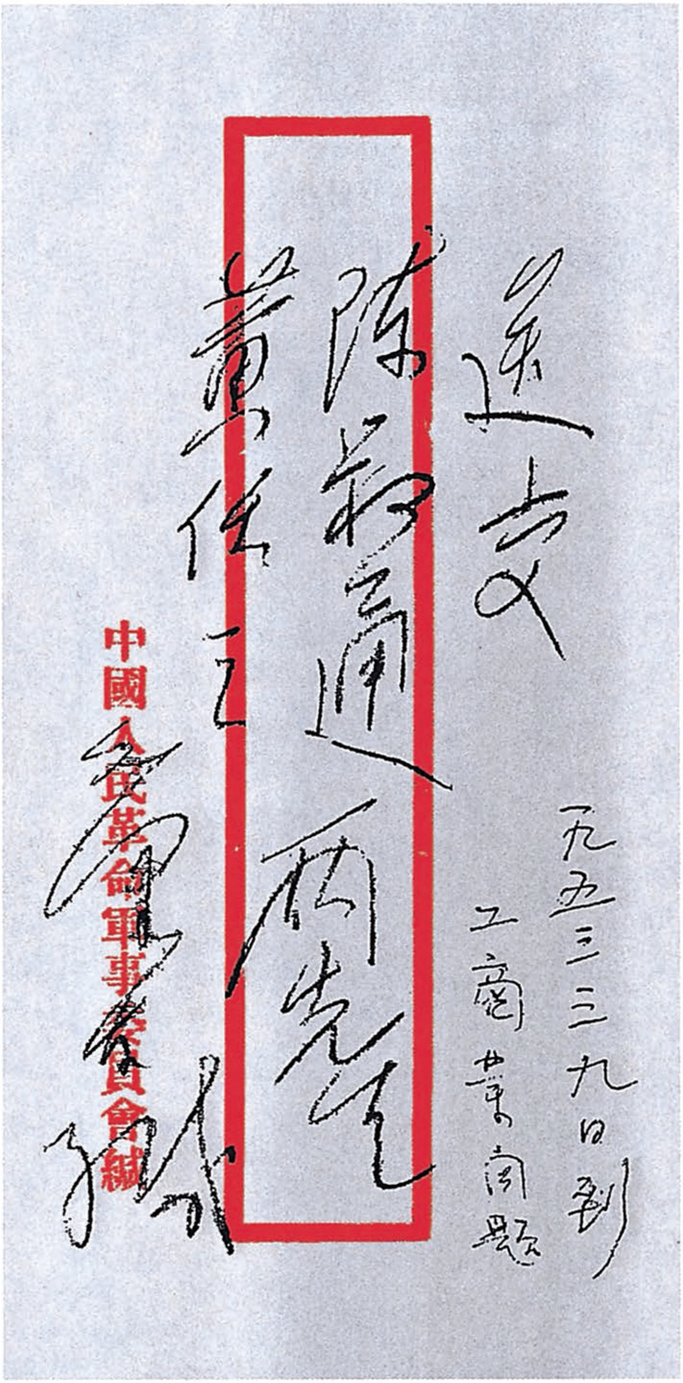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做好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春节前后曾由税务总局召开了一次由各大区及主要城市税务局长参加的会议，汇报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会议认为，3年来税收工作有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如负担上的偏高偏低，做法上的简单从事，作风上的生硬粗糙、强迫命令。会上批判了拿典型套任务，要任务不要政策的错误做法和观点，特别是批判了五反以后征收工作中所发生的许多违法乱纪事件，指出这些错误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造成了政治上很大损失，使工作陷于被动，今后必须坚决纠正。会上我们也检查了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指出要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在检查工作的基础上，对1952年所得税的汇算清交工作，包括政策与任务的关系、所得税税收计划以及税收工作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具体处理的原则和政策。

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的说一说，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实在太普通，是普通常识范围内的事，因为我们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显得这些话好像颇为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要由财政部税务机关及其他机关逐一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敬礼！

毛泽东
三月八日



一九五三三九日到

工商業問題

送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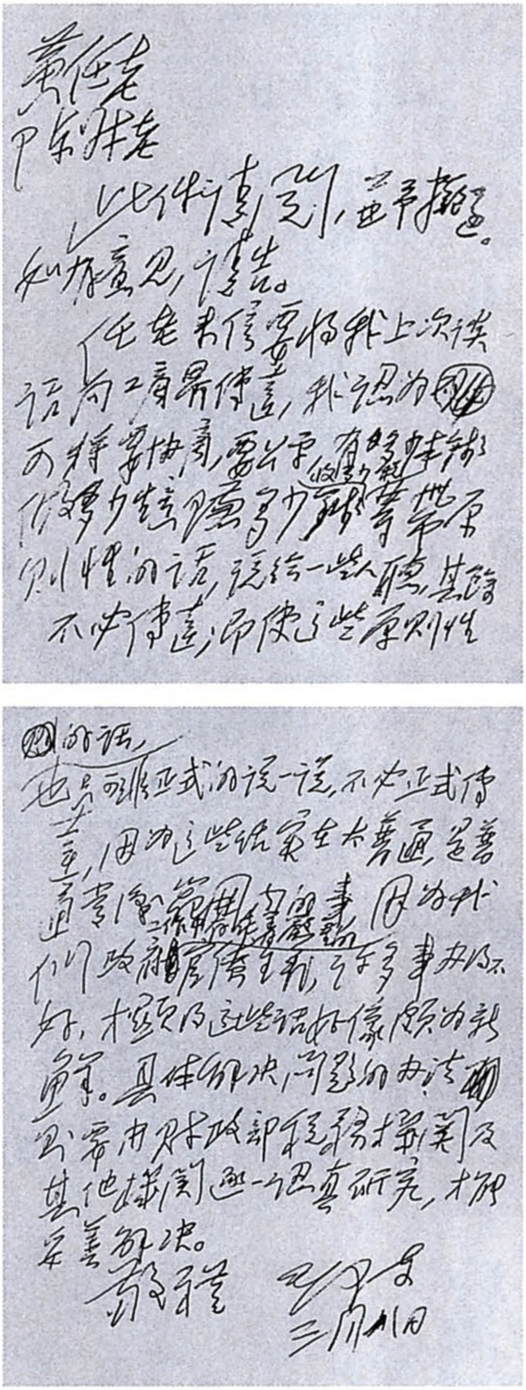
陈叔通
两先生

黄任之

毛泽东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黄炎培、陈叔通信的信封。



黄任老
陈叔老：

此件看过，无甚意见。如有意见，请告。

任老来信要将我上次谈话向工商界传达，我认为这样要慎重，要少说，有[illegible]像要多少[illegible]帮助政府等带原则性的话，说给一些人听，其余不必传达，即使这些原则性的话，也只可非正式的谈一谈，不必正式传达，因为这些话完全是普通道理，[illegible]因为我们政府的官僚主义，许多事办得不好，才使得这些话好像很新鲜。具体解决问题的办法，须由财政部[illegible]机关及其他机关邀人认真研究，才能妥善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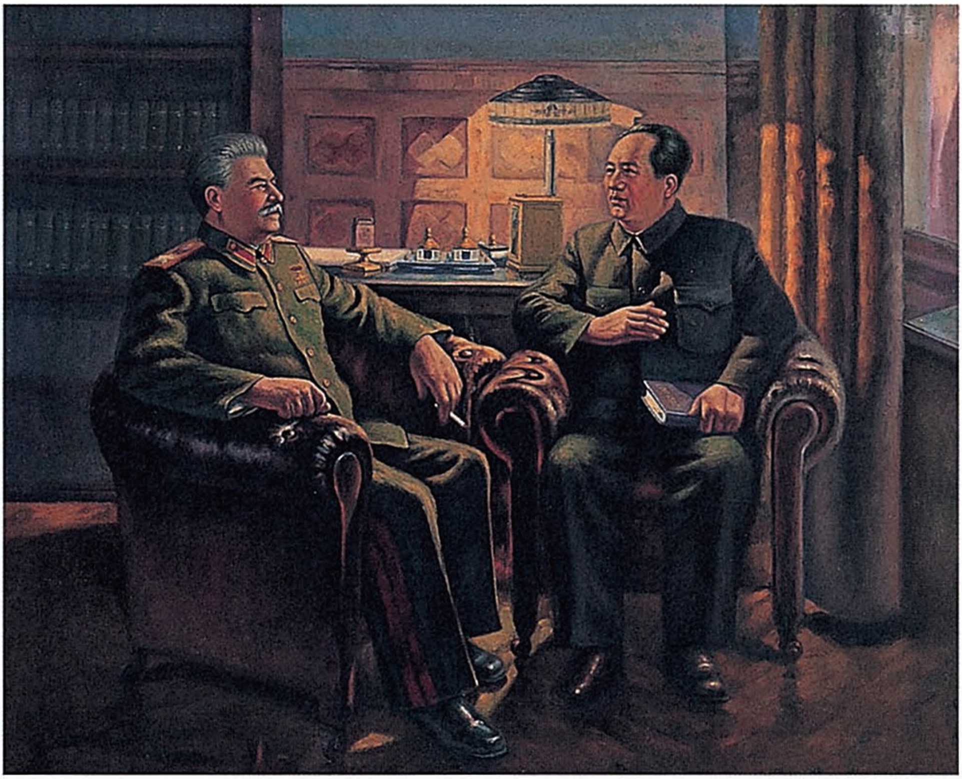
敬礼

毛泽东
三月八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陈叔通信的手稿。

最伟大的友谊[1]

（1953 年 3 月 9 日）



《伟大的友谊》（油画）

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大的导师，不朽的列

---

[1] 这是毛泽东悼念斯大林的署名文章。

宁的战友——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同志与世长辞了。

斯大林同志在理论的活动上和在实际的活动上所给予我们当代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斯大林同志代表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新时代。他的活动引导苏联人民和各国劳动人民转移了全世界的局面，这即是正义的、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事业在世界大规模的范围内，在地球上人口三分之一——八万万人以上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而且这种胜利的影响，正日益普及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斯大林同志的逝世，使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感到了无可比拟的沉重的悲痛，激动着全世界的正义的人们的心。这就是表明，斯大林同志的事业和他的思想掌握了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而且业已变成了无敌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引导那已取得胜利的人民由胜利进入新的胜利，同时也将引导那一切还在邪恶的资本主义旧世界压迫下呻吟的人们能够对于人民的敌人进行勇敢的冲击。

在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同志指导苏联人民，把他和伟大的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这不只是苏联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胜利。第一，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第二，这个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不能设想，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能够有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全人类的命运的，而这些胜利的光荣应当归于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全面地划时代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列

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首先胜利的理论；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地贡献了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贡献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理论，贡献了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的理论，贡献了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还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斯大林同志这一切创造性的理论，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进一步地把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使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为解放和幸福的斗争及其胜利达到空前未有的规模。

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的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是给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一篇宝贵的遗嘱。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

从列宁逝世以来，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物。我们围绕着他，不断地向他请教，不断地从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斯大林同志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得到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和各国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几年以前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现在，我们失去了伟大的导师和最真挚的朋友——斯大林同

志。这是多么的不幸呵！这个不幸所给予我们的悲痛，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的。

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为着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苏联共产党是列宁斯大林亲手教养起来的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最有经验的和最有理论修养的党；这个党在过去和现在是我们的模范，在将来也还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完全相信以马林科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是一定能够继承斯大林同志的遗志，而把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且发扬光大的。

毫无疑义，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团结，更加强大。

三十年来，斯大林同志的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榜样，推动了世界的大踏步前进。现在苏联已达到这样的强大，中国人民革命已获得这样的伟大胜利，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建设已有这样的巨大成就，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压迫反侵略的运动已有这样的高涨，而我们的友谊和团结的阵线又是这样的巩固，所以，完全可以断言，对于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都是不怕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将被我们所粉碎，一切卑鄙的挑拨都是完全没有用的。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之所以是牢不可破的，因为我们的友谊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全世界各国一切爱好和平、民主及正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

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原则上，因此，也就是牢不可破的。

显然，我们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

让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战争贩子们在我们伟大的友谊面前颤抖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万岁!

伟大的斯大林的英名永垂不朽!

对财政部关于一九五二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报告的批语[1]

（1953年3月10日）

一波同志：

此件[2]很好。应当（一）用中央名义将此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地委县委，各大中小城市市委；（二）由中财部以命令下达税务系统的各单位。一个中等县就有八百多财经干部，县委和这些干部对税收政策都不甚摸底，有很大偏差，故须下达至县委。至于小城市，例如临清、泊头等处只要有市委组织，也应下达。以上都请你办。此件已送黄炎培、陈叔通阅，他们表示同意。

毛泽东

三月十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薄一波1953年3月8日关于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中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各大区及主要城市税务局长均参加。会前税务总局曾作了若干城市税收工作的调查研究，准备充分。这次会开得很好，解决了不少问题，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一般合乎主席所指示的“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收多少税”的精神。因此，有转发各地参考的必要。

[2] 指薄一波随信报送的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3月4日关于各地汇报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准备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3年3月10日）

达赖喇嘛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六日及九月三日（藏历水龙年七月十四日）的信和礼物。

西藏地方政府及人民，在你领导之下，协助人民解放军的入藏部队，加强团结，并争取协议的逐步实现，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

你所派的致敬团和参观团代表都肯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办事处已正式成立，办事处的人员也努力工作。

中央对西藏的政策除已明确地写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者外，我在接见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时曾又简要地告诉过他们。这些简要的话，柳霞·土登塔巴已经在他对西藏的广播[2]中谈到，想你已经知道了。

建设新西藏所需要的帮助，凡属能够办到的，中央当尽可能地办到，但因交通阻隔，有些事情一时无法办到，只好等待以后再办。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的代表们在这里所提出的要求，中央人民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柳霞·土登塔巴，1952年10月任西藏致敬团团长率团来北京，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2年11月22日，他在对西藏的广播讲话中，转达了毛泽东同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谈话的要点。

政府就是本着以上这种精神处理的。兹不赘述。以后你和班禅额尔德尼[1]需要中央帮助之处，均可告诉张代表[2]或请张代表用电报转告我。

祝你领导西藏地方政府和人民逐步地建设，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并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随函附送：扩音机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转一个、附带片子十二张，黄缎四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衣筒一件。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指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1953年3月10日）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二年八月三日（壬辰[1]六月十二日）的来信和礼物。

你回藏后，努力为汉藏两族之间的团结及西藏内部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并为当地僧俗人民的利益做了工作，使我感到很大的欣慰。在爱国和团结的基础上，相信我们的友谊会与日俱增地巩固和发展起来。

随函附送扩音器两个，附带喇叭四个，电转一个，留声机片子十二张，又黄缎三匹，长白山人参一个，貂皮衣筒一件。并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

---

[1] 壬辰，即1952年。

军委关于同意西北剿匪部署的电报[1]

（1953年3月10日）

西北军区，并西南军区：

西北军区三月八日电悉。同意甘青剿指[2]之剿匪部署及西北军区之意见。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主要是物质补给困难和少数民族对我不了解的困难，遇到这些困难时，必须鼓励部属想尽一切办法克服之，务达全歼各匪，不可半途而废。

军委

三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并西南军区的电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于1952年11月成立的甘青剿匪指挥部，彭绍辉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负责指挥所属部队，在西南军区和空军配合下，剿灭盘踞甘（肃）、青（海）、（四）川边藏族居住地区的马良武装股匪。

中央关于新三反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1]

（1953年3月14日）

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各中央局、分局，并转各省市委：

（一）上海市委三月二日及华东局三月九日两电均悉。中央同意华东局对上海市第一次党代表会议着重新三反的综合报告的批示。以后此种会议每半年应开一次，会期可缩短些。（二）今年三、四、五月应着重在大区一级，省市一级和专区一级共三级，检查领导机关和各业务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将检查县区乡三级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作为典型试办，取得经验，以利推广。今年六、七、八、九月应配合大选工作在县区乡三级着重检查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同时继续检查大区省市和专区的官僚主义。望你们按此方针进行部署，并注意和各项具体工作相结合，不要孤立地进行新三反。

中央

三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关于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给高岗的信

（1953年3月14日）

高岗同志：

此件[1]请你与铁道部同志商谈审查，以其结果告我。

我意只要工程方面无特别严重困难，较原拟南昌、抚州、瑞金、厦门线为好，闽北、闽南均可满足。惟贵溪至朋口线国民党时期似未留下戡〈勘〉测材料，须重新做，完成时间可能要延长一点。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震1953年2月18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的报告。报告说，关于修筑通往福建的铁路线路问题，铁道部原拟的线路是：从南昌以南的南塘起，经南城、南丰、广昌、石城、瑞金、长汀、朋口、龙岩、漳平、华安至嵩屿，全长922公里。华东军区又提出如下线路：从浙赣线的贵溪站始，经光泽、邵武、顺昌、南平、沙县、永安、连城、朋口、龙岩、漳平、华安至嵩屿，此线长约1000公里。两个方案相比较，铁道部所拟的方案，距海岸线深远，纵深较大，不易受战争影响。华东军区所提的方案，线路经过福建大部地区，照顾了福建交通不便的情况，在军事上从华东支援作战较近，将来续修至福州的铁路亦较近。究竟修筑哪一条线路为好，请审查指示。后来通往福建的这条铁路，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赞同的华东军区的方案修筑的。

对胡绩伟[1]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现象调查报告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饶漱石、安子文同志：

此件[2]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我意可以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同意，请考虑是否需要征得山东分局的同意，请酌量处理。嗣后各地有此类好报告，请你们择要发表。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

[1] 胡绩伟，当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2] 指胡绩伟1953年2月21日关于山东省级机关分散主义现象给邓拓并转胡乔木、安子文的报告。报告说：在去年12月山东分局扩大会议之前，省人民政府总的领导十分薄弱，形成各厅局各自为政的严重分散现象，很多重大的指示决定，各厅可以不经批准擅自发出。分局委员会本身的党委制也很不健全，同样存在严重分散现象，多数分局委员对全面工作关心不够，没有把参加分局全面领导当作是委员的重要任务，分局开会讨论不是自己管理的问题时，常常兴趣不大，意见不多。分局扩大会议以后，分散现象虽有根本改变，但分局的统一领导还是不强。而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将会受到很大影响。胡绩伟的这个报告，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2日批转给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后来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反官僚主义报告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黄克诚、德怀、子恢、小平、仲勋[1]同志阅，退薄一波[2]同志办：

此件[3]请你们一看，教训很大。

请黄克诚同志指导总后勤部及各大军区后勤部、志愿军后勤部、各特种兵后勤部，仿照第二机『机』械部办法，彻底检查仓库物资，反对官僚主义。请仲勋指导中央卫生部及各有物资的部门

---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3] 指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1953年2月20日关于开展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给中财委并报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检查中初步发现了以下问题：（一）库存物资严重积压，至1952年底为止，积压各种物资及原材料总数达21980余亿元。其中7个直属仓库所存物资约值12000多亿元。（二）1953年的国内供应和国外进口计划均有盲目性。（三）编制计划中也有错误。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为反对官僚主义，改进今后工作，除对官僚主义继续深入检查外，必须建立眼睛向下，面向实际，面向群众的工作作风，在具体工作中认真执行一般号召与典型示范相结合的工作方法。

（如电影局），检查官僚主义情形。请子恢指导农林水三部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请一波指导财委所属其他各部仿机机〈械〉二部办法彻底检查自己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关于公开报道典型材料问题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刘景范[1]同志：

简报上的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如本号凤城县的好事例[2]及各地的不好事例，凡典型性的，都应当公开报道。请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同志商酌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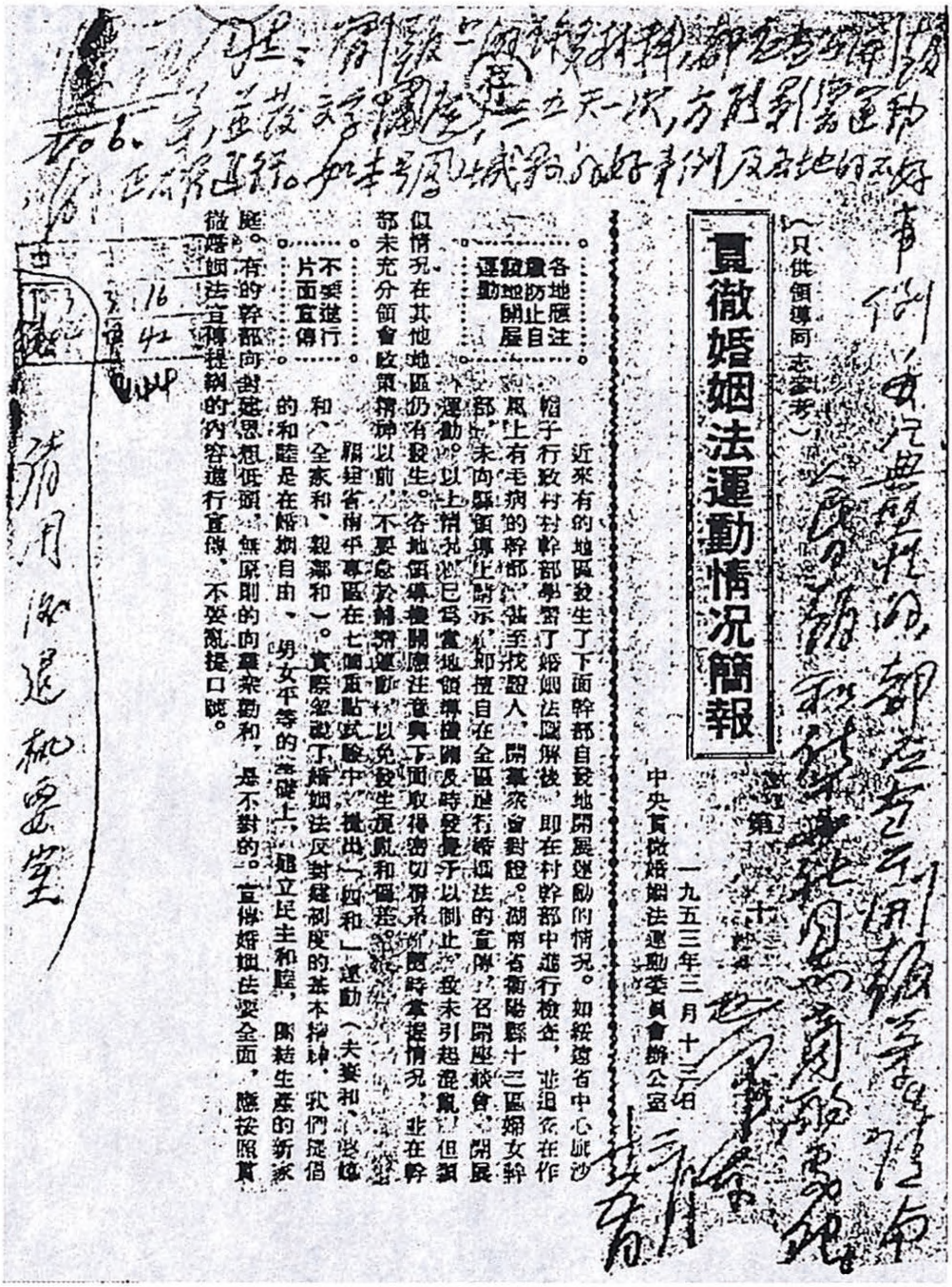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

[1] 刘景范，当时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2] 指辽东省凤城县在贯彻婚姻法试点中向群众进行深入宣传的经验。这个事例刊载在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办公室1953年3月13日编印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一号上。



景范：[illegible]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正常进行。如本号所载湖南的好事例及各地的不好事例，[illegible]

请用[illegible]退秘书室

16
41

貫徹婚姻法運動情況簡報

（只供領導同志參考）

第十三期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中央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辦公室

各地應注意防止自發地開展運動

近來有的地區發生了下面幹部自發地開展運動的情況。如綏遠省中心城沙帽子行政村村幹部學習了婚姻法回村後，即在村幹部中進行檢查，並組織在作風上有毛病的幹部，甚至找證人，開群衆會鬥爭。湖南省衡陽縣十三區婦女幹部，未向縣領導上請示，即擅自在全區進行婚姻法的宣傳，召開座談會，開展運動。以上情況，已爲當地領導機關及時發覺予以制止，故未引起混亂。但類似情況在其他地區仍有發生。各地領導機關應注意與下面取得密切聯系，隨時掌握情況，並在幹部未充分領會政策精神以前，不要急於鋪開運動，以免發生混亂和偏差。

不要進行片面宣傳

福建省南平專區在七個重點試驗中，提出「四和」運動（夫妻和、婆媳和、全家和、親鄰和）。實際忽視了婚姻法反對封建制度的基本精神。我們提倡的和睦是在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民主和睦，團結生產的新家庭。有的幹部向封建思想低頭，無原則的向群衆勸和，是不對的。宣傳婚姻法要全面，應按照貫徹婚姻法宣傳提綱的內容進行宣傳，不要亂提口號。

毛泽东

毛泽东致刘景范信的手稿。

在华南分局关于新三反给所属的指示上的批语

（1953年3月15日）

饶漱石、安子文同志：

最近有许多关于新三反的文件，文尾多有希望中央指示的话，均请你们予以批复。有些重要的文件，可在中组部的党内刊物上发表，有些则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如已付给你看的山东分局及胶州地委的文件）。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此件[1]写得很好。

---

[1] 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3年2月23日关于新三反给所属并报中南局、中央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广东地区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情况，对华南地区的新三反作了如下布置：（一）必须以反对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为重点，首先从分局、省、广州市反起，逐步推到行署以下。要学习有关文件，有重点地进行检查，并将检查过去与改进今后工作密切结合。（二）由省到县应立即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处理典型事件，并迅速加强政府监察和党的纪检部门的干部，组织力量，集中揭发，造成浓厚的空气。（三）县级以下必须结合当前工作进行。（四）要区别问题性质，切忌简单粗暴。对过去因执行政策有偏差而处理错误的问题，需予纠正，但不能把这些偏差与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混为一谈。

悼念哥特瓦尔德[1]逝世的唁电

（1953年3月15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主席团：

我以非常悲痛的心情，获悉哥特瓦尔德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哥特瓦尔德同志不仅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而且也是世界和平民主事业的卓越斗士。他的逝世，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于整个世界和平民主阵营，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自己的名义，谨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我深信：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捷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进一步增强以我们的共同盟邦——伟大的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事业中，哥特瓦尔德同志的辉煌贡献将永远鼓舞着中捷两国人民奋勇地胜利地前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五日　北京

---

[1] 哥特瓦尔德，即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生前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在军委关于同意中南军区一九五三年工作计划的复电稿上加写的话

（1953年3月16日）

（三）将此电[1]及中南军区司令部二月二十三日来电[2]发给各大军区及志愿军党委会，关于允许下级批评上级所犯错误，用向上级提意见的方式表现出来，请照此办理。

（四）将此电及中南军区二月廿三日电发给军委各部门研究，并加以检查，所犯错误应加改正。

（五）关于军委各部门所发文件有些互相矛盾一事，不但与各部门有关系，也与军委过去在这方面缺乏统一调节的工作有关。今后军委当建立这种统一调节的工作。

---

[1] 指军委1953年3月16日关于同意中南军区1953年工作计划的复电。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司令部1953年2月23日给军委的电报。电报说，在中南军区党委1953年1月7日至17日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省军区的同志对编制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省军区机关的编制定额太少，省军区除机关本身外，还代管了一些单位，而临时任务又不断增加，比如新兵的动员和训练，接收志愿军伤员，安置残废人员，而对这些人员的管理、教育与供应都没有专门机构，在原有编制定额中也不包括。建议在定编制时应考虑上述情况。

批判大汉族主义[1]

（1953年3月16日）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的一部分。

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

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分散的特点[1]

（1953年3月17日）

即使在互助合作组织普遍发达的农村，也要照顾这种分散的特点，因为目前的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还是小型的组织，并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使用落后工具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经济特点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对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甘肃临夏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报告的批语和附注

（1953年3月19日）

一

送李维汉[1]同志再阅，在附件中添了一个附注[2]。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二

有些地方民族平等基本实现了，民族隔阂基本消除了，在这些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2] 即本篇二。毛泽东为中央写的这个附注，加括号写在中央转发的西北局1953年2月20日给甘肃省委的复文中“根据临夏县的检查报告，目前存在于汉族干部和汉族群众中主要的是残余的大民族主义倾向”一句话之后。

地方可以说大民族主义只是残余了。但在民族平等还未基本实现，民族隔阂还未基本消除的地方则大民族主义还是严重地存在，不能说只是残余。再则目前时期主要的危险思想是大汉族主义，不要笼统提大民族主义。——中央

关于向陈云[1]建议用毛巾蘸热水擦身的批语[2]

（1953年3月19日）

一

陈云同志：

此件请阅。每天用毛巾蘸热水擦身，先热后冷，又冷又热，锻炼皮肤毛血管又收缩又扩张，每擦一次，可经半小时，多至一小时，擦完全身发热。每天一次至两次，擦一二年可收大效，似可试试。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因病在休养。

[2] 本篇一是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贺诚、副部长傅连暲1953年3月18日关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林彪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上的批语。报告中说：林彪“现在能同医生合作，并提出希望医生为他解决出汗及容易感冒的问题。苏联内科专家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他已同意，过几天即可试行”。本篇二是对报告中“苏联内科专家建议每天用水和酒擦身，锻炼皮肤抵抗力”一句的批语。

林彪同志长期不听医生的话，现在听了，情况有好转。

二

用酒似不甚好。

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1953年3月19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

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1]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

---

[1] 1953年3月20日，胡乔木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指示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并对中央应负责任一项提了几点建议。其中谈到：“任务多的问题，除各部委的责任外，还与中央书记处批发电报的状况有关，因为也有一些下面认为过重的任务是由中央批准过的（至少电报是用中央名义发的），如批发的人较为集中，各部发的电报又有严格限制，并保证凡经中央批发的电报决不致先后不符彼此不符，这方面的情形也会好些。”毛泽东阅后在旁边写了以下批语：“此点请各同志注意，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

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

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关于减少军队专职体育运动员问题的批语[1]

（1953年3月21日）

肖向荣同志：

各项均同意。惟运动员3000人至是〈是否〉可以减少的问题，请由肖克、肖华[2]二同志会同政府有关此事主管人员，商量一次，加以研究，作出统筹计划，送周总理、彭副主席和我核阅。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3年3月13日关于军委第十六次例会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谈到了军以下各部队以参谋长为第一代理人的问题，军训部的干部配备问题，军事体育问题，以及军队中的抚恤工作改由后勤部门主管的问题。关于军事体育问题，报告说，肖克提出军事体育属军事训练部门，其内容应与军事训练相结合。但目前情况，主管军事体育的军训部本身无此种力量，而在政治部系统内又有3000名专职球员。会议决定由总政治部和军训部研究，对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请主席考虑部队专职体育运动员是否要3000人，因地方亦有3000专职球类队员，合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2] 肖克，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肖华，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违反政策现象严重》一文[1]的批语

（1953年3月21日）

薄一波[2]同志：

上海税务局应加整顿，对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应作适当处置，争取主动，免被资本家告发，陷于被动。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

[1] 这篇文章载于《人民日报》1953年3月18日编印的《党报通讯》第四期。文中说，上海市税务局自去年开展劳动竞赛以来，不断发生为“完成任务”、为“争取红旗”而预借货物税、营业税等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商人们反映：“你们搞劳动竞赛是为了光荣，我们却要早付钱。”更严重的是有些税务局竟用侵犯人权的非法手段去强征税款。这种行为已引起商人极大不满，有的商人在市场上公开谩骂政府。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关于处理日本渔轮侵入我渔区捕鱼问题的批语[1]

（1953年3月21日）

三艘渔轮，可一起放还，只没收其渔〈鱼〉类。俟将来东京日本水产公司渔轮再来侵渔时，再决定没收其渔轮不迟。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3年3月13日关于侵入我渔区的3艘日本渔轮的处理意见给周恩来的报告上。

同意所提战俘交换方针[1]

（1953年3月22日）

恩来同志：

三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两电均收到。我们同意所提方针。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2]同志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即将已达成协议的俘虏按比例交换，而将未达成协议的俘虏交给如印度一类的中立国管理待后解决。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唯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的电报。

[2] 谢明诺夫，即斯大林。

关于准备同意讨论
交换重伤病俘问题的电报

（1953年3月23日）

丁国钰[1]同志，并告金、彭[2]：

（一）三月二十一日十二时电悉。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主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3]上台后在五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4]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湾〈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对方可能拒绝接受我方文件甚至拒绝召开联络官会议的情况，你们应就事论事，在会内外据理力争，予以痛斥，但不要逼对方正式表示是否要最后破裂，对方亦不会作此种表示。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

---

[1] 丁国钰，当时参与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2] 金，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4] 杜鲁门，美国前总统。

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二）关于克拉克[1]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

[1] 克拉克，当时任侵朝的“联合国军”总司令。

对《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3月24日）

一

子恢[1]同志：

指示[2]和社论[3]都看了，只改了几个字。互助合作社决议，改了三处[4]，请你看过后，派人走送高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彭德怀、邓小平[5]等同志一阅（一天轮完），如果你及他们都同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1953年3月16日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稿。这个指示于1953年3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 指1953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

[4] 即本篇三、四、五，文内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5]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意，请叫廖鲁言[1]同志将修改处抄正，再送报社发表。互助合作决议修改处，陈伯达[2]同志已看过。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社论，陈伯达同志有些意见，请与他再加斟酌。

二

这个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成为正式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3]

三

中央估计了它们的两方面的性质，即私有的性质和合作的性质。初级互助组的组员，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完全私有的，但也带了共同劳动的性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常年互助组则使这种萌芽进一步生长起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其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

---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政务院副秘书长。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 这是毛泽东为正式颁布《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写的说明。

础上，农民有土地私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农民得按入股的土地分配一定的收获量，并得按入股的工具及牲畜取得合理的代价这些条件来说，它保存着私有的性质。就其在农民以土地入股后得以统一使用土地，合理使用工具，共同劳动，实行计工取酬，按劳分红，并有某些公共的财产这些条件来说，它就比常年互助组具有更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四

在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是农业生产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农业生产工作而为它服务的。任何妨碍农业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必须避免。

五

（十三）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对湖北省委关于贯彻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的指示的批语

（1953年3月24日、4月4日）

一

子恢[1]同志：

湖北此件[2]很好。第七页上所说十项协议[3]你处如有，请给我一阅。请你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4]，将湖北文件转发各地，要各省也召开手工业代表会议，如何？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二

邓子恢同志：

湖北手工业协议，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请予酌处。

毛泽东
四月四日

---

[1]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3年3月2日关于贯彻全省手工业代表会议精神给所属的指示。指示说，湖北自解放以来手工业有很大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把小生产者当作资本家，把劳动者内部雇佣、师徒关系当作劳资关系，因而造成关系紧张，影响生产。加之盲目强迫组织联营和合作社，在处理公私关系上某些措施不当，致使部分手工业者不敢大胆雇人，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都使手工业品供不应求的情况更加严重。为解决这些问题，决定：（一）对各个城镇的手工业情况进行分类排队，确定具体方针，哪些可以适当发展，哪些可以维持现状，哪些需要转业。（二）划分手工业阶级界限，宜宽不宜严。对雇有辅助工及学徒，有部分剥削，但其所得主要靠自己劳动的，应算作小生产者。有的虽雇有数个工人，业主参加主要劳动，房屋工具都是租赁的，剥削比重并不大，亦不能算为资本家。处理劳资、雇佣、师徒关系的总的方针是以搞好生产和团结为主。（三）关于工人和学徒的工资、工时和福利问题，应按代表会议通过的十条协议执行。手工业不能一般采用大工厂的工资、工时及劳保制度，各行业的旧习旧例，凡基本符合生产要求和劳资两利的，都可原则保留。（四）当前对手工业应提倡自产自销，提高质量，打开销路，加工订货只作为对销路有困难的行业的辅助办法。（五）宣传手工业的前途，解除某些人以为国家工业化一下就可以消灭手工业的想法。（六）以市或专区或县为单位，开好城镇和有关工作单位的干部会议，学习手工业代表会议文件，统一思想，研究办法，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贯彻。各城镇党委要把此项工作当作今年上半年中心任务之一。

[3] 指1953年2月召开的湖北省手工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师徒、雇佣、劳资之间几项问题的协议，于1953年4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十项协议是：

第一项：学徒主要任务是学好技术，因而必须端正劳动态度，遵守劳动纪律，听从师傅在生产上的分配与指导。除了生产之外，也应做和生产有关

的杂活，帮助师傅增加生产。但师傅不得打骂和虐待学徒及强迫学徒做与生产毫无关系的事情，也不能干涉学徒的政治文娱活动，并须打破保守思想，传授学徒技术，提倡教得好，教得快，教得全。提倡尊师爱徒，提倡师傅以教好技术为光荣，学徒以学好技术为光荣。

第二项：新收学徒，老板可以自由收请不受限制，但在确定收学徒时须通知工会，并在当地劳动部门备案。新收学徒之待遇（除伙食外），一般的第一年内每月给予现行工薪分十至十五分的津贴，有些行业情况不同者，或高或低，双方协商解决，以后在学习期间（第二年、第三年）按其技术及生产进度逐渐增加，其他福利依照旧有习惯。

第三项：现有学徒今后主要是学好技术，师傅教好技术，师徒双方负责订立合同，要求在学习期满时，能够掌握一定的技术，如因其他原因，虽到出师年限，学徒尚无技术者，可以继续帮师，学习技术，工资双方协议。

第四项：学徒因公致病之医药费用，经医生检查证明，小病、轻病及短期病症由师傅负担，大病、重病及长期病症，如师傅全部负担有困难时，可由工人申请，从工会会员困难补助金中酌情补助一部分。

第五项：学徒三年出师之旧例可以保持，但应尽可能提前教好技术。出师后如因生产发展店内用人，双方自愿可以留下工作，工资另行协商。如店内不用人，师傅应本团结互助精神，根据旧有习惯，帮助学徒就业。

第六项：劳动者内部的雇佣关系，应本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协商解决之精神，处理一切问题。医药费按各行业之合同，如无合同即按习惯解决。其他问题根据工会法处理，如有实际困难，双方协商解决。

第七项：劳资关系中如有纠纷，应本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原则协商解决，必要时可经过劳动部门调解、仲裁或经法院判决。

第八项：雇请临时工人期满后可以辞雇，不作解雇处理。

第九项：工作时间，在半机器工厂及手工工场中，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十小时；零散的厂店、作坊，每日工作时间一般不超过十二小时。

第十项：休息日连同新旧假期在内，一年暂定四十五天至七十天，各地各业可结合具体情况协商规定（固定假日，春节三天，元旦一天，国庆节二天，五一节一天，工资照发，其他根据旧习）。另外，基层工会干部之会议活动，每月不得超过两个生产日，一般工人活动不能占用生产时间。

以上十项协议须经政府审核、批准、备案后实行。

[4]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子恢替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手工业问题的电报稿，毛泽东先后作了两次修改，并加拟了“中共中央关于应当重视手工业的指示”的标题。1953年3月31日，毛泽东第一次审阅这个电报稿时，将原稿“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仅次于农民多数的一种经济成份，是今天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一句，改写为“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不可缺少的一种经济形式”；在原稿“在农业使用手工业工具时期尚未结束以前”一句后，加括号写了“这种结束要有几十年时间”；在原稿“由于农民目前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肥料等）与生活资料（如布、手巾、鞋袜、烟等）百分之六十、七十”之后，加写了“有的竟至百分之八十左右是依靠城乡手工业品供应”，接着又加括号写了“即是说目前农村依靠近代工业供应的物资，只占农村需要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十、或二十左右”。4月2日，毛泽东再次审阅了这个电报稿，在原稿第三项“对于手工业中存在着劳资、雇佣和师徒三种不同的关系划分不清，处理不当，对于组织联营和合作社，采取强迫命令等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手工业者的生产情绪，不敢大胆雇请工人、学徒，增加资本，扩大生产，这些均应加以注意，有步骤地分别加以解决”之后，加写了“但在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些手工业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对于工人和学徒存在着待遇恶劣的情形，亦应当予以妥善的处理”。

中央关于如何在县区乡进行新三反的指示

（1953年3月25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此件[1]极好，可以发到县委阅看（并登党刊），并可普遍仿照施行，有利无弊。胶州专区所辖各县中已有五个县正确地解决了新三反的问题。其办法是由县委召集县区乡三级干部开会，到会人数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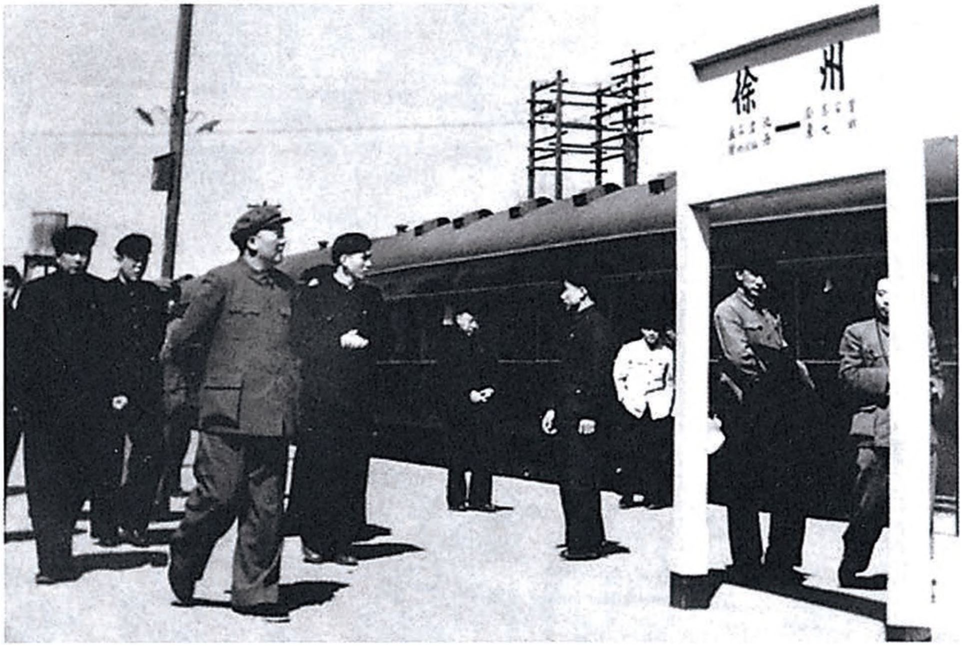
---

[1] 指中共胶州地委1953年3月14日关于通过县、区、乡干部大会布置和检查工作进行新三反的情况给山东分局的报告。报告说，我区诸城、五莲、藏马、胶南、胶河五县，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均召开了一次县区乡干部大会，结合总结冬季工作，布置春季工作，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整风方法，贯彻了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具体做法是：1. 各县县委通过冬季工作总结，联系具体事实深刻地检讨了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检讨了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造成的部分区乡干部的命令主义，批判了个别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并从党的政策、原则、群众利益出发分析其危害性和危险性。2. 县委诚恳的自我检讨和虚心听取下面的批评，启发教育了到会干部，区乡干部也很自然地进行了检查和检讨。许多干部除检讨自己的强迫命令外，大胆批评揭发了区乡干部中的强迫命令和少数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3. 对干部中作风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典型范例，适时进行介绍，领导加以表扬，以教育干部，树立榜样。4. 从实际出发，布置冬季各项任务，在贯彻中注意交代任务，交代政策，交代工作方法，交代作风，并具体帮助干部研究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解决工作贯彻中的困难。

者一千四百人，少者七百多人。他们不是专为新三反而开会的，而是为了检查过去工作，布置今后工作而开会，就在这个会中展开了新三反斗争，由县委先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引导区乡干部向县区提出批评，并广泛地展开了自我批评。会议不但批评了坏人坏事，又表扬了好人好事，使人们知道去掉命令主义之后如何去做工作。开会时间十二天至十五天，是用整风方式进行的。这样做，受损伤的人很少，而团结教育觉悟起来的人则很多，各地都可以这样做。由省委指导地委，由地委指导县委好好地去做，做得愈有准备有秩序些就愈好。至于极少数最典型的坏人坏事，则须经过详细调查研究，作专案处理，并予以揭露，教育党和人民。

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五日

1953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徐州火车站。



1953年3月25日，毛泽东在徐州火车站的站台上。

祝贺陶里亚蒂六十寿辰的电报

（1953年3月25日）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亲爱的陶里亚蒂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我个人，在你六十寿辰之际，谨向你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最热烈的祝贺。

从你青年时代起，你就把你的全部生命贡献给意大利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依靠你的英勇的奋斗和卓越的领导，意大利共产党已经成为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光荣旗帜，成为意大利强大的政治力量，成为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堡垒之一。你对于意大利革命事业、国际工人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的光辉的贡献，使你不仅受到意大利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

为了意大利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压迫下获得解放的事业的胜利，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事业和进步事业的胜利，敬祝你健康和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关于通报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的批语

（1953年3月27日）

薄一波[1]同志：

此件[2]有教育意义，应由中财部（加一报头，说几句话）发给各大区及省市财委及其财政管理局。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

同时北京印发如前示（尚昆知道）。

---

[1]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2]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3月25日关于上海市税务机关征税中严重违反政策的情况给华东财委并财政管理局、上海市财委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上海市税务局在市委和财委的领导与督促下，努力完成了去年税收任务，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财政部门领导上有重任务轻政策的思想，对税局强调任务多，交代政策少，因而不仅在一般税务干部中，即在各级税务局领导干部中，都有一部分人把任务和政策对立起来，存在着要任务可以不要政策的思想。最近，《党报通讯》第四期就反映上海市税务局某些分局有严重违反政策的现象。有的向私商强迫预借营业税、货物税；有的连不应征税的货物也征了税；有的为了催交税款，甚至发生押人、吊人、轮流审讯等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而这些行为市税务局领导干部发现后未予纠正。

给黄炎培[1]的信

（1953年3月27日）

任之先生：

三月廿六日的信及附件收到，甚谢。此种材料有用，已转付有关同志阅看。五反以来延未解决的问题，今年大致可以获得解决，但尚须大家努力。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七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给林志钧[1]的信

（1953年3月27日）

志钧先生：

惠书及悼斯大林大元帅长诗收到，充满对人民的感情，极为钦佩。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廿七日

---

[1] 林志钧，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中央转发山东分局关于新三反的报告[1]的批语

（1953年3月29日）

---

[1] 指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953年3月26日关于新三反问题给各地委、市委并报华东局、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山东省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斗争，已在紧密地结合当前工作逐步深入开展。但各地进展情况不平衡，有些地区没有抓住典型的违法乱纪案件，大张旗鼓地加以处理，因此斗争还停留在泛泛检讨阶段，效果不大。为使这一斗争全面地健康地深入展开，提出如下意见：（一）各地必须结合中心工作处理违法乱纪的典型事例，这是当前开展新三反斗争能否深入的决定环节。同时，各地应着手调查好人好事，在斗争达到一个适当阶段的时候，予以表扬。对典型的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要采取登报、通报等办法公之于众，以发扬正气，压倒邪气。（二）通过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和布置工作，领导上进行自我检查，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批判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揭发和讨论违法乱纪案件，并表扬好人好事。这样全面体现政策的会议，效果很好。各地应总结推广这一经验。（三）今年参军运动及春耕生产工作均紧密地贯彻了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的精神，既提高了群众觉悟，又推动了当前的各项工作，对这些经验要加以总结，写出专题报告。报告提出，当前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斗争，除应切实掌握以上三个环节外，并要严格防止以下两种偏向：第一，要防止界限不清，打击面过宽的偏向；第二，要防止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以命令主义反命令主义、以违法乱纪反违法乱纪的错误。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

山东分局此件指出各点均很好，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

三月廿九日

关于妥为处理四川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的批语

（1953年3月30日）

邓小平[1]同志：

此件[2]值得注意。你前次所谈万县事件和江津事件，均是当地犯了错误。万县材料见早几天的内部参考，是三反五反中地书曾戎

---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 指中华全国合作联合总社西南区办事处1953年3月20日关于西南区合作社调整商业后的严重情况给全国合作总社的报告。报告中说，自中央发出调整商业的指示后，西南全区一般的停止了非社员交易。四川省截至3月初的不完全统计，共撤销屠案、理发店、食堂、缝衣店等2207个，加工生产单位1334个，两项比调整前共减少56.77%。各地合作社除个别地区外，营业额普遍下降。由于这样收缩，造成了合作社业务上的混乱和社员的不满。四川省江津县五区合作社猪肉没有卖完也不敢卖，干部分来吃了。更严重的是有些合作社连供应农民的生产资料也减少了。不少干部无原则迁就私商，致使私商气焰嚣张，乘机扰乱市场。四川省江津县县长竟命令合作社与国营公司干部向私商作公开检讨，强制合作社限期收拾加工部门，要工商联统一领导合作社与国营公司，不少私商乘机杀价收购、高价出售。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在进行调整时，对中央调整商业的精神未能认真贯彻，对各地公私比重缺乏详细具体的调查了解，缺乏通盘的计划和步骤，有些领导干部单纯地认为调整商业是消极的收缩，这就更助长了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

犯了严重的乱打乱捕及迫死许多人的错误所引起的，应当彻查平反。合作社问题则不止江津，而是全四川各地，犯了大规模撤退的错误。以上请你以电话与西南局一商妥为处理。

毛泽东
三月卅日

关于减少中央及各部委所发全国性电报的批语[1]

（1953年3月）

中央在79天中发文统计。饶、安、习、周、朱、彭、高、邓、邓[2]阅，退毛。

还是太多，要减少。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3年3月22日关于中央及中央直属各部委自1953年1月1日至3月20日所发出的全国性电报的统计报告上。报告说，中央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电有128份，中央直属各部、委署名发各地的指示、通报电有98份，以上两项共计226份，以79天计，每日平均不及3件。

[2] 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指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的指示的电报[1]

（1953年4月2日）

中南局，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委，中央人民政府内务、公安、卫生部党组及其他各委部党组：

湖南省委三月十四日电及中南局三月二十一日来电均悉。中央同意湖南省委及中南局的请求，将群众性的戒烟运动推迟执行。并认为凡对生产有妨碍的工作，不论是中央哪一个部门部署的，只要当地党委认为有必要推迟进行，均可提出请求，推迟进行。此外，根据主观主义设想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何上级的命令指示，必须加以废止或修改者，地方党政有权提出意见。遇到这种情况，地方党政从实际出发提出意见，是正确的；不提意见，将不正确的命令指示，违反群众意见，硬着头皮往下推，则是不正确的。当然，除了遇着紧急情况，地方党政有权得先行处理，然后报请上级追认外，一般事件，最后如何处理，均应报告中央或

---

[1] 这是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同意推迟执行群众性戒烟运动指示的电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电下发时，毛泽东加拟的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

其他原决定的上级机关批准，然后执行。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

对中南行政委员会关于整顿小学的指示[1]的批语

（1953年4月2日）

---

[1] 指中南行政委员会1953年3月31日关于整顿小学的若干问题给各省市政府并转各专署县府并报政务院的指示。指示说，整顿巩固、保证质量，是中央对目前整个文教工作的总的方针。中南区的小学教育，过去3年来有很大发展，这是各级教育干部积极努力的成绩，必须加以肯定。但由于领导上缺乏计划性，工作带有很大盲目性，目前情况相当混乱，质量多数低劣。因此，必须加以认真的整顿。（一）对在校学生数的整顿，一要核实学生数目，二要处理流动生、超龄生和不及龄生。（二）对现有教职员工的整顿。原非从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从积极分子、进步青年中调到学校而又不适合于这一工作者，应让其或劝其返归原来岗位去生产或工作。年老或体弱多病已不宜再任教职者，应劝其退休。文化水平太低，不能胜任教职者，应劝其转业，其中一部分年轻者可吸收到初级师范学校去学习。现行反革命分子不宜留校者，应由公安部门鉴别，提出处理意见，再妥商处理办法，报经专署负责机关批准施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不宜留校者，由县（市）政府查实处理。（三）对小学编制和工资标准，应根据中央规定的控制数字，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认真研究。本着精简、公平的精神，定出合情合理的指标，务求切合实际。（四）尽可能从本地机动田中给每校调拨半亩至一亩地，作为校田，由师生课余劳作，以保持勤劳的优良传统。（五）本着民办公助精神，对入学儿童可酌收学费。收费多少根据年级高低和其家庭经济情况来定。确系贫苦者，应予减免。所收学费，不入国库，一部交由县统一掌握使用，一部留校使用。（六）从7%的地方附加中，固定4%为小学经费，专充支付教师工资之用。校舍修缮，尽可能由当地人民设法，或出工出料，或自愿捐款，如必须由政府解决经费者，可增加地方附加至10%，从中拨给，而不得从4%中抽拨。

周总理、习仲勋[1]同志：

此件你们觉得如何，我看很好，请习交教育部加以研究，有不妥当处酌加修改，由政务院转发各大区省市仿照施行。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关于检查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批语

（1953年4月3日、7日）

一

周恩来、习仲勋、胡乔木、彭德怀、黄克诚、贺诚[1]各同志：

白学光同志这个报告[2]，深刻地揭露了军委卫生部的领导方面

---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贺诚，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2] 指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白学光1953年3月27日关于军委卫生部领导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给军委卫生部部长贺诚、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的报告。报告指出，过去部队卫生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第一，摊子摆的太多，部领导忙于直属单位的行政事务，对全军的卫生业务以及直属单位的业务工作缺乏指导，甚至根本没有指导。第二，领导不集中。贺诚部长经常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几个部长很少在一块研究工作，虽然有分工，但形成分家的现象，这样有些问题推来推去就误了事。第三，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一是医疗事故多；二是严重浪费；三是成分复杂，各单位领导水平不高；四是许多干部（不论政治、行政、业务）不安心在卫生部门工作，卫生部缺乏政治思想领导，不能很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针对以上问题，白学光建议：第一，紧缩组织。第二，贺诚部长回到军委卫生部坐镇。第三，认真地开展反官僚主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第四，希望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党委加强对卫生部门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实一批必要的骨干。

所犯的极端严重的官僚主义。根据白学光的报告看来，军委卫生部对全军卫生工作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什么领导，这是完全不能容忍的，必须立刻着手解决。提议：（一）请彭、黄主持，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次，邀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及白学光同志到会，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二）政府卫生部与军委卫生部的部长副部长不要兼任，另物色适宜的同志（不一定要学过医的同志）充任军委卫生部部长副部长。以上请彭、黄酌办。

因为白学光的揭露，使我想到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是否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有多大差别。我怀疑政府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可能和军委卫生部的领导工作同样是一踏糊涂，既看不见政治领导，也看不见认真的业务和技术领导，只是没有白学光这样一个人作出这样有条理有根据的揭露，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请习、乔参考白学光的报告，严肃地检查一次政府卫生部的工作，看和军委卫生部好得多少？并对存在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案，付诸施行。

无领导，无政治，也不认真管业务的部门——专门吃饭、做官、当老爷的官僚衙门，除军委卫生部外，可能还有别的部门，请你们在此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撕破面皮，将这些彻底整垮，改换面目，建立真正能工作的机关。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

二

尚昆[1]同志：

此件请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发至各总部下面的一切部，卫生部还要发部长各副部长及处长各一份），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毛泽东

四月三日

三

尚昆同志：

第一页上“讨论施行”，是“付诸施行”之误，印错了，请发一更正的通知。

毛泽东

四月七日

嗣后，一定要校对清楚，不要再错。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接受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4月3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中国人民与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亲密的互助合作中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新中国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所获得的一切成就，以及目前正在开始的大规模国家建设计划的实施，都与苏联人民、苏联政府的真诚的、兄弟般的援助分不开。

我深信：中苏两国人民伟大的友谊与团结定将在两国人民共同的努力下，继续无限地发展与巩固起来。我们的友谊所产生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必将对于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起着无比巨大的作用。

大使同志，我极为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朝鲜停战后铁道兵须以大部修路一部进行技术训练[1]

（1953年4月5日）

朝战停后，十一个师，须以大部修路，一部（骨干）可属参谋部管，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与主力合并，以应作战需要。恩来意见[2]请注意。

毛泽东
四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1953年3月30日关于铁道兵部队建制问题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上写的批语。彭的报告说，关于铁道兵部队直属军委归参谋部管，不属铁道部建制的建议，待朝鲜战争结束可予同意。平时人数少，保存骨干进行技术训练，以备战时按需要扩大。

[2] 1953年4月3日周恩来在彭德怀的报告上批的意见是："现在铁道兵团共有十一个师，建制属铁道部，但供给托后勤代管。即使朝战停止，铁道部队在国内修路仍有极大作用，特别是内蒙、西北、东北修路更需要他们，因此，此事似应从长计议。"

给黄炎培、陈叔通[1]的信

（1953年4月5日）

任之、叔通先生：

许涤新的报告[2]颇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四月五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1953年4月2日关于一、二月份工商情况的报告。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的批语和修改[1]

（1953年4月）

一

刘、周、陈、乔木、罗迈[2]阅。

请考虑提交政协常委会（可扩大些，多邀几个人）通过，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名义发表[3]。

毛泽东

四月七日

---

[1] 本篇三是毛泽东在审阅庆祝五一节口号时加写和改写的几条口号。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庆祝195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1953年4月20日经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四十八次会议通过后，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1953年4月21日《人民日报》上。

二

邓小平[1]同志：

（一）略有文句上的增减。

（二）政协会谈此件时，应邀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及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先谈一下，或在一起谈也好。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上午九时

三

十九、向革命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致敬！

……

三十三、男女盐民及盐业工人们，为提高盐的质量而努力！

三十四、男女船民们，为水运畅通发展城乡物资交流而努力！

……

三十六、**国家贸易工作者和合作社工作者们，经常了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完成国家收购和销售计划，**贯彻经济核算制**，降低商品流转费用，**加速资金周转**，**努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消费者和社员们**服务。

---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四

新华社吴冷西[1]同志：

此件请于四月廿一日广播，四月廿一日见报。

毛泽东

四月廿日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印发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1953年4月9日）

程子华、张启龙两同志关于供销合作社目前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1]，邓子恢同志关于供销合作社问题的意见[2]，此两件印发中央到会各同志及曾山、贾拓夫、姚依林[3]、程子华、张启龙各同志阅看，准备下星期讨论此问题。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指中华全国合作联合总社主任程子华、副主任张启龙1953年3月24日关于调整商业与实行新税制后各地合作社出现严重危机等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由于不少地区对中央调整商业指示精神领会不全面不正确，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主义手段，不根据具体情况就撤销零售点，不合理地限制经营额和减少经营品种，加上新税制的实施，致使全国合作社经营额普遍下降，造成合作社的严重危机。各地合作社被迫紧缩机构，大批“精简”或准备大批“精简”干部，致使合作社在组织上和干部思想上发生极度混乱。现在，合作社干部普遍不安心。全国合作总社虽已极力阻止各地合作社进行这种“精简”，但情况仍很严重，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不是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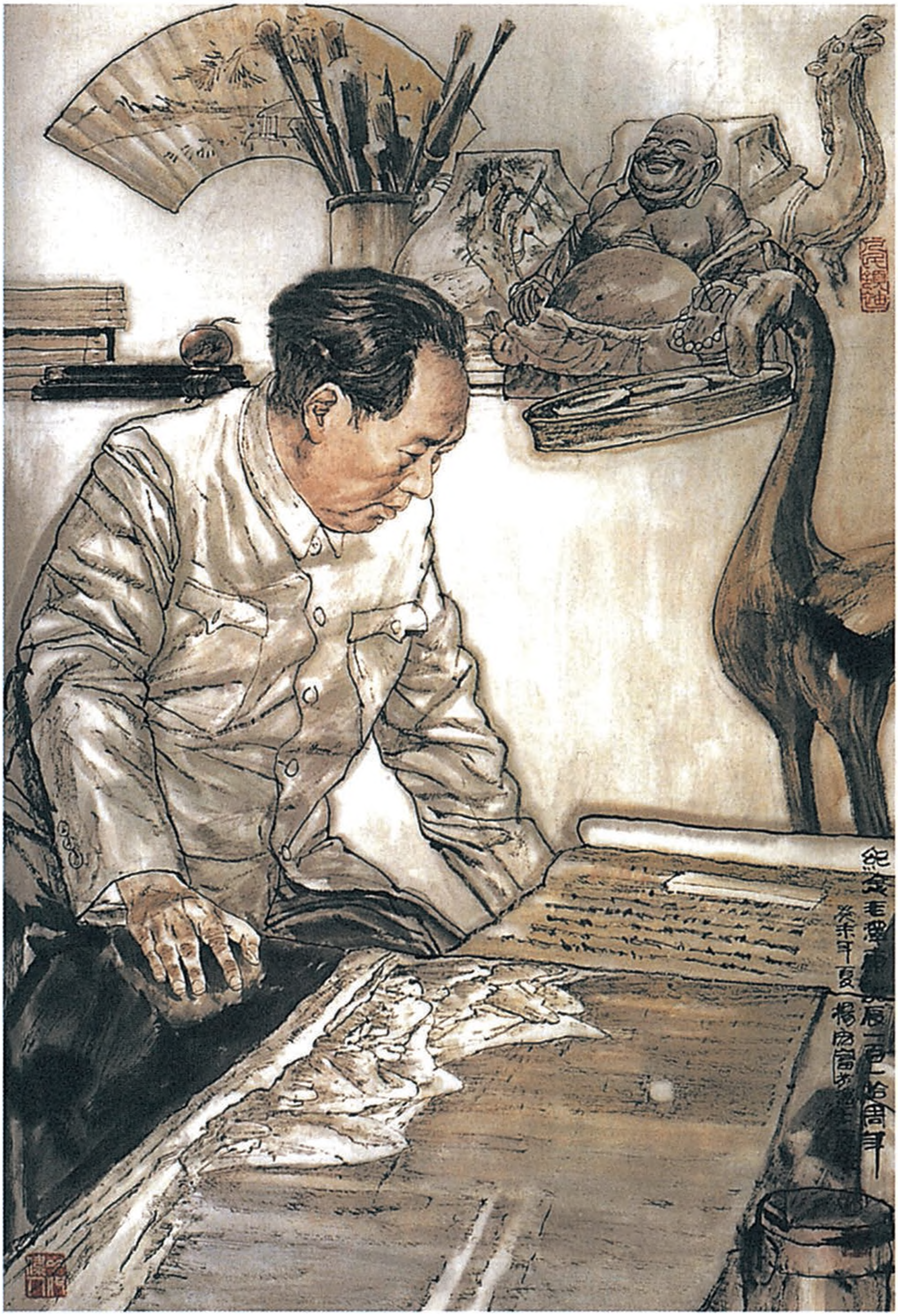
社单方面的问题。因此提出如下建议：一、请各级党委注意这一严重情况，并立即制止合作社正在进行的“精简”，对已“精简”的干部要进行妥善处理。二、准许合作社立即恢复在调整商业中不应撤销的零售点、业务机构和加工部门，并恢复合作社必须经营的商品数额。三、停止与制止国营商业部门在不正确地执行调整商业指示中所采取的某些削弱和损害合作社的错误措施。四、请迅速修正新税制中某些不利于合作社而利于私商的规定。五、合作社雇用的临时工要允许保留。

[2]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邓子恢1953年3月31日关于供销合作社几个基本问题的意见给毛泽东并转中央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报告。报告中说，我认为程子华、张启龙的报告应由中央转发各地办理，先停止合作社目前大批裁员、大量撤销零售网点的状态，以避免合作社日趋瓦解的趋势。关于供销合作社的几个基本问题，我有如下的见解和意见：一、合作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群众性的经济组织，它的基本任务是通过供销工作，组织几万万个体农民与国营工商业相结合，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从而改善工农联盟，为国家工业化准备好市场、原料与政治基础。二、合作社的业务方针，应该是一方面替社员大量推销多余农产品与土特产品，另一方面适时供应社员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方面应与国营贸易公司、出口公司及附近工矿企业建立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必须与中小城镇及当地手工业工厂、作坊相结合。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三、合作社的经营系统，依据我国具体情况，应当是：（1）以县社及基层社为主体，加强县区社独立经营能力，真正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基层社为社员服务，上级社为下级社服务的方针。（2）必须允许合作社自成一个经营系统，建立自己的批发站，并允许直接向各地国营工矿订货，当然更重要的是与各地手工业结合。四、应该采取平行批发站制，允许合作社各级批发站向就近国营工厂、公营工厂直接进货、订货，取消贸易公司对合作社的限制。这是目前改变合作社危机的救急之道。

[3] 曾山，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姚依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副部长。

1953年4月，毛泽东参观中央美术学院画展。

1953年，毛泽东观赏中国古画。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癸未年夏

《研读史籍》（中国画）

关于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习做领导工作的批语[1]

（1953年4月10日）

此件发给各同志阅看。就是要这样和被领导的单位密切联系，抓紧检查，全盘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改正错误，表扬成绩，使工作任务能按计划完成，才算有了合乎情况发展的领导。目前，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无领导的现象太多了，必须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学得做领导工作的能力和方法。领导者无领导，这是官僚主义者，不是领导者。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党组1953年4月3日关于反官僚主义的检查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当前最突出的官僚主义表现是：部、各地区局与勘探队上下脱节，情况不明，大事不摸底；工作指导上控制不紧，检查不严，严重缺乏思想性，以致好事得不到发扬，坏事得不到改正，存在放弃领导，甚至发生分散主义的现象。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准备采取派出调查组，分工负责与局、队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并推动局、队揭发官僚主义等措施。

关于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及宣言中删去“毛泽东思想”字样的批语[1]

（1953年4月10日）

彭真[2]同志：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毛泽东

四月十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董必武1953年4月3日关于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召开成立会的问题给彭真并政法党组干事会的信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中央转发钱瑛关于广东发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严重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4月11日）

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兹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同志关于在广东方面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并请你们根据此件加以检查，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将自己过去所发命令指示中犯有错误的部分，迅速加以纠正。因为报告中所指各项不能容忍的坏事，或类似的坏事，除了个别事件，例如盐民、渔民问题及种蔗问题，只是在广东及其他若干省区存在以外，其余各项是带普遍性的，几乎每省（市）都有，只是件数多少不同而已。这些事件，很多是发源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其次就是省人民政府和专署的有关部门。而发生了这些事我们还不知道，有些甚至部长也不知道。由此可见，问题的性质是很严重的。中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钱瑛的报告要给各司局长同志看），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务必迅速加以检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纠正各项不能容忍的错误。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一日

1953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看古碑文。

1953年4月12日，毛泽东和李敏在中南海瀛台。

1953年4月12日，毛泽东和女儿李敏在中南海。

1953年4月15日，毛泽东和李讷在北京西郊赏梅。

对安子文[1]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4月13日）

刘、周、朱、彭、邓、邓、饶[2]阅。

此事[3]因涉很广，今年工作太多，以推迟至一九五四年举行为宜。

退安子文同志办。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 安子文1953年4月11日关于清理登记全国革命烈士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草拟了一个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办法（草案），并于3月31日召开了一次会议，对这一办法草案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中央革命烈士清理登记委员会的名单，请中央审批。

给程潜的信

（1953年4月2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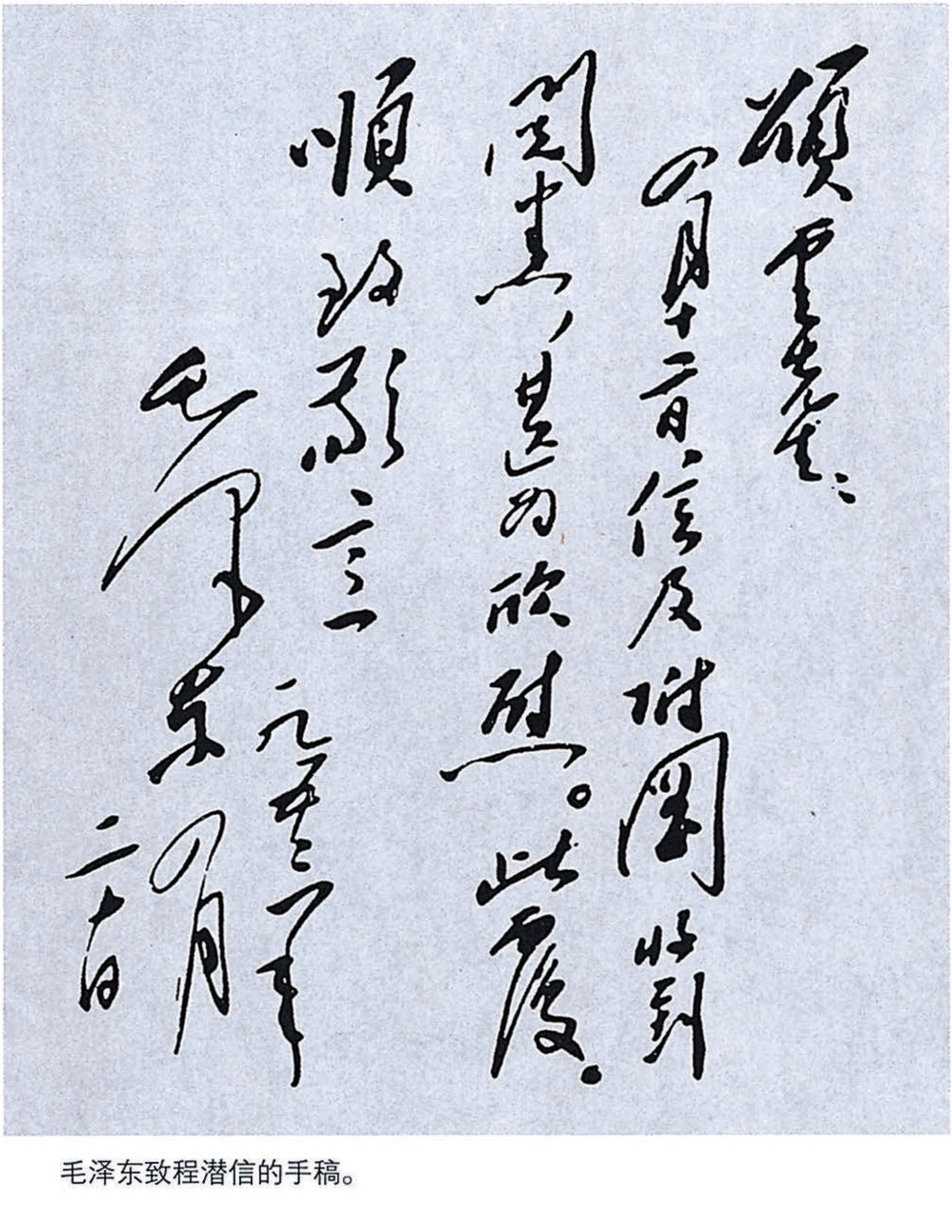
颂云先生：

四月十二日信及附图收到阅悉，甚为欣慰。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



颂云先生：

四月十五日信及附图收到，阅悉，甚为欣慰。此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日

毛泽东致程潜信的手稿。

对财政部关于全国农业税法会议请示的批语和对中央指示稿的修改[1]

（1953年4月16日、21日）

一

即送周总理、邓子恢同志：

此件[2]应请中央农村工作部加以审查，如有不同意见，应召集戎子和[3]同志至中农部开会商定，然后替中央起草一个给财政部的指示，于数日内交中央几个同志看过发出，因财政部的会议四月廿日就要开了。

农业税中存在的问题很严重，据湖北报告，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春荒断粮。大概全国农业人口中有四千『千』万人左右到春季都要闹荒，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年年如此。必须从今年征粮中开始认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党组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税法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3年4月21日对财政部党组的指示稿时修改的两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党组1953年4月9日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农业税法会议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

[3] 戎子和，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真解决此问题。今年是否应比去年加征十六亿斤和发四十亿斤公债，也值得再考虑。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二

（一）一九五二年公粮实收数为三百四十八亿斤，有些地方如河南、苏北等地由于查田定产偏高，农民负担显得过重。去冬今春，长江黄河之间受寒流侵袭，有些地方番薯和春季作物受损颇大。今年全国雨量如何，目前尚难断定。有些地方，发生旱灾是可能的。因此，今年国家概算中所列征粮计划能否完成，公债发行应否实施，均须从长考虑。但目前就宣布不增加农业税和不发公债，改变国家概算计划，则为过早，应当看几个月再行决定。你们可按各地实际情况，适当地部署夏征，保证农民不要负担过重。确实困难户，实行减免。

三

（六）征粮中的社会减免问题，关系极大，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必须认真减免农业税，望经此次农业税会议拟出具体可行办法，并望多注意对穷困的偏僻山区加以特殊照顾。对约百分之十的农户实行减税免税问题是整个农业税政策中的极端严重问题，过去几年都做得不好，今年一定要做好。

给李烛尘[1]的信

（1953年4月21日）

烛尘先生：

四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来信收到，阅悉，甚谢。你做了许多调查工作，你的建议[2]对于解决现存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我已将你的信发给许多有关同志去看去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一日

---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2] 指李烛尘到一些工厂作了调查之后向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解决工商业方面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税负、资金等问题的建议。

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53年4月15日至4月23日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大会的代表。

1953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等接见中国妇女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3年4月，毛泽东接见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要做好举行夏季战役的攻击准备

（1953年4月23日）

彭：

此件[1]似可批准，使他们好作攻击准备。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可则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请酌办。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

[1] 指1953年4月20日邓华关于在朝鲜战场举行夏季战役反击的几点意见给杨得志等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说，这次恢复谈判，停下的可能虽比过去要大，但拖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即使敌人迫于整个形势不能不停，但真正停下来还需要相当时间。且敌人狡猾，想采用军事压力来配合谈判中的讹诈，多得一点东西；也想争取一点时间，完成某些战略措施。根据这一估计，我们必须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做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方针，加强各种准备，不能麻痹松懈。要继续完成东、西海防工事，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登陆和进攻。同时，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以积极行动来配合谈判，目前个别战术反击仍应进行。现东、西海防工事4月底大致可以完成，而举行夏季反击，打击的重点尽量放在美国及其外国仆从军头上。这次反击，口不宜张大，力求全歼，采取集小胜、多胜为大胜的方针。反击时间预定6月初开始到7月上旬结束，一切准备工作必须于5月底完成，而后视情况再定动作。

对西南局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规定[1]的批语

（1953年4月26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4月11日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及政府系统请示报告制度的规定给西南行政委员会各党组、西南局各部委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在大区一级加强政府系统的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对于更好地保证中央所规定的方针、政策、计划、任务的正确贯彻执行，以及避免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的发生，是很重要的。为此，特作如下规定：（一）为了加强对政府各部工作的直接领导，决定撤销行政委员会党组干事会，并健全与加强各委、局、院、行的党组与党组小组的工作。财经、文教、政法、民族、监察各党组均直接归西南局领导。（二）政府各党组及党组小组严格执行如下的请示报告制度：各党组、党组小组每月向西南局作定期综合报告一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专门性质的问题，应另向西南局作专题报告，报告内容应着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及有关政策的问题，并力求简短扼要。请示与报告要严格分开，不要混在一起，需要请示的问题须另行专题请示，并严格执行“每一请示只限一个专题”的规定。凡属重大问题及政策性的指示，须先经中央局审查批准，重要者西南局报请中央批示。（三）为了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除西南局加强统一领导之外，西南局各同志实行分工负责的制度，需要西南局进行讨论的问题，应经过分工的各同志提交西南局常委会议讨论，各有关业务部门须事先做认真的准备，并供给西南局各同志以必要的参考资料。

周总理：

　　此件似可转至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叫他们对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及省市政府，仿照办理，以期统一地作一次改革。请考虑酌办。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关于修改工会工作文件的批语[1]

（1953年4月26日）

饶漱石[2]同志：

我同意胡乔木[3]同志所作的修改，请你和工会负责同志再加斟酌。乔木在这封信上所指的缺点[4]，我也有此感觉。现在距开会尚有一段时间，是否可加以补充，亦请你们考虑酌定。我今天有些感冒，明天不一定到会。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胡乔木关于工会工作的四个文件的修改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2] 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3]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胡乔木在信中指出，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有一个重要的缺点，就是对目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说得不多，只是一般的纲领性的说明，对工作中有哪些要推广的好的经验，有哪些需要批评的错误的倾向，有哪些须加以澄清的争论，或者说得过于简单抽象，或者简直没有说，因此减少了应有的力量。

关于同意推迟军衔评定工作的批语[1]

（1953 年 4 月 26 日）

彭[2]：

推迟至年底好。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1953年4月22日关于请中央审批大军区以上军官的军衔问题给彭德怀的报告上。报告建议各大军区以上首长之军衔等级，能于5月5日前审批下来，以便着手进行正兵团级以下军衔等级的研究，彭德怀在这个报告上写了以下批语："今年各项工作均挤在一起，颇为紧张，军衔评定工作推迟至年底不知如何？"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给李烛尘[1]的信

（1953年4月26日）

烛尘先生：

四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

工作虽多，可以安排一下，一段时间内只处理一个主要问题，这样也就会不觉得太忙了。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四月廿六日

---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在中央关于派人下去检查工作的几项规定稿中加写的话

（1953年4月28日）

在一般情况下（特殊者除外）下去检查的干部应该通过而不是超过被检查地区或单位的领导机关去进行检查。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等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主席台上。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等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主席台上检阅游行队伍。

1953年5月1日，毛泽东在首都人民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

对天津市委关于发动职工讨论生产计划的经验的批语

（1953年5月）

天津市委关于发动工厂全体职工讨论国家计划的经验[1]，值得普遍推行。

---

[1] 指中共天津市委1953年4月14日给华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中总结的天津市国营和地方国营工厂发动群众讨论1953年度生产计划的经验。主要有：一、针对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及薄弱环节，动员全体职工讨论计划。二、从制订组织技术措施计划（工人叫改进办法计划），推动增产节约和提高质量，并将它作为制订计划的根据。三、在修订计划中，进行革命任务及建设形势的宣传教育工作。有的局、厂还结合修订计划进行了反对虚假隐瞒、骄傲自满、官僚主义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保守落后思想和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四、发动大量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深入车间、小组，订计划时采用典型示范的办法。

给毛泽荣[1]的信

（1953年5月2日）

泽荣贤弟：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赠食品，均已收到，谢谢你。

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罢，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难，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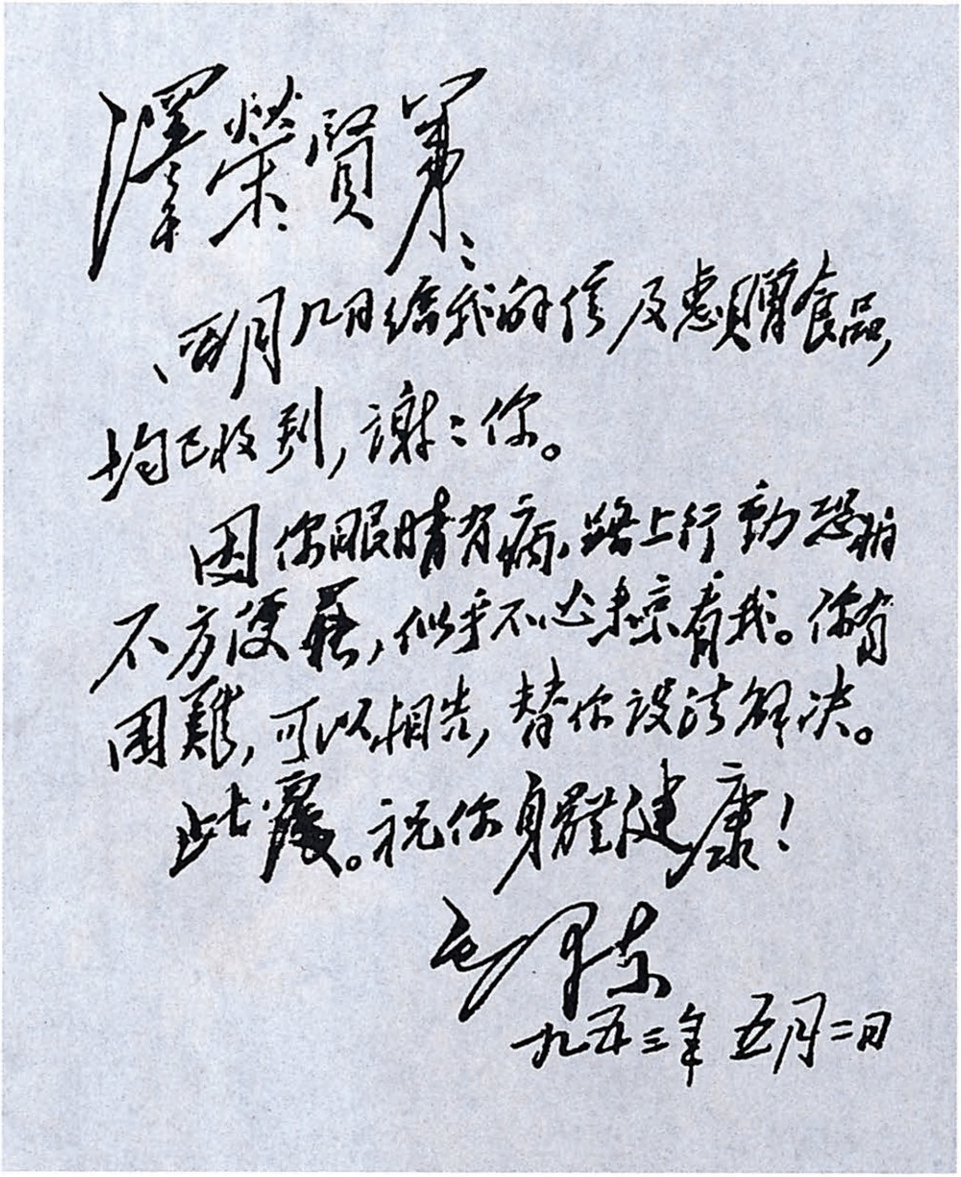
此复。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

[1]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澤榮賢弟：

四月九日给我的信及惠贈食品，均已收到，謝謝你。

因你眼睛有病，路上行动恐怕不方便，似乎不必来京看我。你有困難，可以相告，替你设法解决。

此復。祝你身體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

毛泽东致毛泽荣信的手稿。

1953年，毛泽东等和毛泽荣合影。左起：江青、李敏、毛远新、毛泽荣、毛泽东、李讷。

关于解决任务与政策的矛盾的批语[1]

（1953年5月3日）

根据此件[2]，只要认真去做，任务与政策的矛盾，是可以解决的。就是说，只有彻底执行政策，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1953年5月3日转发华北区税务管理局关于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报告的摘要给所属并报中财委、总理、中央的通知上。

[2] 指华北区税务管理局1953年4月20日关于1952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中说，1952年所得税的汇算清交工作，我们按照中央指示的多赚多征，少赚少征，不赚不征的方针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强调注意干部作风，防止强迫命令现象。在做法上，采用查征户（指重点征税户）逐户查账；民评户（指采用民主评定方式确定征税等级的户）各划类型等级，扩大典型户，并进行广泛的反复协商；对自报及评议提出的亏损户，未经查清一律暂不征收。因此这次工作比过去都稳当细致，工商业者一致反映良好。在这次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一）工作有布置，有检查，上下通气，认真贯彻政策。对政策不仅逐级认真传达，使之为大家掌握，并且组织领导干部参加工作队、检查组，深入现场指导实际工作。（二）抓住重点，加强查征，慎选典型，改进民评，因而税收增加，工作主动。（三）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进行协商。

关于搜集敌战俘营中我伤病人员情况的电报

（1953年5月4日）

李克农[1]同志，并金首相、彭司令员[2]：

五月四日零时卅分来电和简报均悉。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和发言稿。你们五月三日十六时四十分简报称，据归俘谈，济州岛敌第八战俘营中仍有大批我病伤人员。按第八战俘营是坚持遣返的战俘营。望立即就归俘此项报告进行详细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在必要时反击敌人。

毛泽东

五月四日五时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2]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关于大批减免西南灾区公粮和农业税的批语[1]

（1953年5月5日）

薄一波[2]同志：

像报告内所说的那些地方，应当放手大批减，大批免，不应再有犹豫。

毛泽东

五月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政法党组转报的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副部长王一夫1953年4月25日关于西南灾情和公粮征收中的一些问题给谢觉哉并报政法党组及彭真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造成西南灾荒的主要原因，除了贫瘠山区生产落后，收入微薄外，还有征收农业税超过群众负担能力的问题。一般干部存有超额完成任务的思想，本应减免的不减免，也有评产时有意提高产量，造成超征。目前西南山区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所存大批陈粮与死角粮不能使用，另一方面山区许多灾民没有粮食需要救济，群众对此非常不满。报告提出，为解决这一问题：（一）对山区公粮应当少征，提高农业税起征点，发还超征公粮。（二）将仓储陈粮、死角粮无息贷给临近的灾区群众，解决灾民口粮困难；收购可以推销的土特产，将陈粮、死角粮作为收购资金；用死角粮就地以工代赈，进行农田水利交通等建设。

[2] 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

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1]等的信

（1953年5月6日）

陈云、一波、富春[2]同志：

五月二十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下，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3]应参加），均应有所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开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六日

---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 杨立三，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后勤部副部长。

对贾拓夫[1]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的批语

（1953年5月6日）

高岗[2]同志：

此件[3]看过，可用。我只作了一些文字性质的修改，请即送贾

---

[1] 贾拓夫，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3] 指贾拓夫准备向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的关于工业情况的报告稿。这个报告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国民经济的恢复。到1952年，我国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多已超过历史最高年产量，胜利地完成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我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已有增长。在现代工业中，国营工业的比重已达到百分之六十左右。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现在不但有必要、而且已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走上国家计划的轨道。（二）新的建设任务。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在于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基础，并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在这一总的目标下，相应地发展轻工业，积极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有步骤地促进其合作化，正确地发挥私营工业的作用，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三）目前国营厂矿企业管理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为了把管理工业的水平提高一步，目前应特别注意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建立与健全责任制度，大力提倡学习苏联和推广先进经验，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

拓夫同志照此去讲。

毛泽东

五月六日上午十二时

刚才又接到恩来同志的修改稿，他比我看得更仔细，我同意他的修改意见，请高统一加以修改，再交拓夫去讲。毛泽东又及

1953年5月，毛泽东和朱德接见工会七大代表。

关于就战俘遣返方案同印度协商的意见[1]

（1953年5月6日）

恩来同志：

请于今日晚间（距板门店开会要提前一较长时间为宜），找印度大使到你处，正式告他我方将于七日十一时提印度为中立国委员会五国之一，并将新方案交给他。并告他，我方四月二十六日方案仍然保留，如美方对我新方案态度恶劣，我们仍将回到老案，那时并将提名印度一国为接管战俘的唯一中立国。希望印度暂时不要在这两个方案中宣布单独欣赏第二方案，而对第一方案则认为不妥，因为美国甚狡猾，如它不接受我第二方案，则我仍将回到第一方案去。实际上，将战俘送到印度去，不会使印度发生很大麻烦，相反，可能大多数战俘会迅速被遣返，剩下的不过少数。印度最近一星期对我第一方案采取暂不表示态度的方针是好的，希望今后也不要将第一方案堵死。亚洲国家应当团结互助，帝国主义对我们总是没有好心的，中国对印度则是信任的。以上请酌处。

毛泽东

五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中央关于基本同意西北军区甘青剿匪指挥部的布告的电报

（1953年5月8日）

西北局，西北军区政治部，并转甘、青省委，并告西南局：

基本上同意西北局五月二日修改补充后的甘青剿指布告。只是（一）第三条[1]“幡然归来”，改为“诚意回来”，较为通俗易懂；（二）第五条[2]最后一句：“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应删去，不绝匪首自新之路。

中央

五月八日

---

[1] 经西北局补充修改后的布告第三条，原文是：“一切因受骗或被迫为匪的部落头人，僧俗群众，只要幡然归来，各安生产，一律既往不咎，并保障其生命财产及以往之地位。”

[2] 经西北局补充修改后的布告第五条，原文是：“无论匪首匪众，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投诚自新者，一律从宽处理；凡脱离匪众，并积极协助剿匪者，允许将功折罪；对坚决为匪到底者，则坚决消灭之。”

1953年5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观看波兰马佐夫舍歌舞团演出，向伴奏的乐队挥手致意。

对中央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53年5月10日）

周总理：

为了得粮，使富农、小贩得些好处是可以的，文尾数句[2]可删去。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1953年5月10日关于限期完成购粮计划给东北局并告各中央局，中财委、中央商业部、粮食部党组的指示稿上。

[2] 指中共中央指示稿中最后一段话，这段话是："中央同时同意你们采取卖粮买货者给以九七折优待办法，但对个体农民结合合同方式集中卖粮二吨以上者给以百分之五的优待，是否会有利富农、小贩，而使零散卖粮的农民得不到好处？请考虑。"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段话。

给张澜、黄炎培[1]的信

（1953年5月13日）

张副主席、黄副总理：

五月五日惠书[2]及周孝怀[3]先生意见书，收到，阅悉；并已转付有关各部门负责同志阅看。其中有些问题，已请周总理酌处。便时尚希转告孝怀先生。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

周书奉还。

---

[1] 张澜，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张澜、黄炎培1953年5月5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信中说："周孝怀君从上海来信，大意是：希望政府考虑明令三反五反总结束，安慰受冤，释放无问题被拘者，扭转人心。附笺还谈到农业税等问题。我们会商一下，认为这些都在政府慎重处理之中，孝怀此函，自是一片忠爱热诚的流露，将原笺送陈，以供参考。"

[3] 周孝怀，当时任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

给黄炎培、陈叔通[1]的信

（1953年5月15日）

任之、叔通先生：

此两件有些材料，可以一阅，请予掷还为盼。私营问题的中心，和公营一样，是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这个问题解决了，劳资关系等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给黄炎培的信

（1953年5月17日）

任之先生：

五月十六日惠书[1]及附件[2]收到，甚谢。解决问题，应当由各有关方面先行协商，然后由政府加以择决；并且希望在不久时间内，对工商界未解问题作成一个草案，此事大概是可能的。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七日

---

[1] 指黄炎培1953年5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于4月13日至30日召开了12个地方组织的工商情况汇报会，从汇报中看出各地工商业情况已有显著的好转，但好转的情况不平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建议注意两点：一、必须有组织有领导地帮助各地工商业解决一切问题，这里所谓有组织、有领导，就是包括党委、政府、工会、税务、银行、工商联、民主团体等，把这些单位集合在一处，在党政根据总的方针指导下，任何问题都不难解决。二、处理任何问题，只有环绕着一个中心——搞好生产来活动，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2]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的地方工商情况汇报会根据各地材料汇集的《资料简报》和《资料提要》。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上的指示[1]

（1953年5月17日）

毛主席指出，办好学校，首先要解决学校的领导骨干问题，而且首先要解决大学的领导骨干问题。同意总理意见，从宣传部门与青年团抽调一批干部，去充实大学的领导。关于中、小学的领导骨干，应该由地方在几年内逐渐加以解决。毛主席认为训练与提高中学领导骨干很重要，东北的经验是好的。毛主席说：有了坚强的校长，就会产生好的教员。

毛主席对教材问题特别重视，认为目前三十个编辑太少了，增加到三百人也不算多。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一点，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教材。确定补充一百五十个编辑干部，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解决配备。

所谓教学改革，就是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改革。因此应该改编教材，编辑教学法。

关于整顿小学问题，毛主席认为，“整顿巩固、保证质量、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好，但是整不要整过了头。

---

[1] 这是对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高教、教育两部的请示报告上的指示的传达。

□□同志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教育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把全国小学都办成一样，不可能整齐划一，不应该过分强调正规化。农村小学可分为三类：一、中心小学；二、不正规的小学；三、速成小学，编速成教材。农村小学应该便于农民子女上学。毛主席同意□□同志的意见，并指出应该容许私塾式、改良式、不正规的小学存在。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只要不进行反革命宣传，就可以给他一本教科书去教。甚至和尚、尼姑，只要不宣传迷信，也可以让他们教书。

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

关于超龄生问题，中央同志都认为不能把超龄生送出学校。毛主席说：“你们对七八岁儿童这么爱好，对超龄生就可以不管？”并且说：“应首先把超龄生教好，让七八岁孩子迟几年上学并不大要紧。”这就告诉我们先教育超龄生，对发展生产有利。适龄儿童迟几年上学，影响不太大。

小学城乡比例一样，不对。城市小学比例应该大些。

关于小学经费问题，毛主席指出，税种税率必须统一，收支也必须由国家统一掌管。不能像过去那样，搞什么教育经费独立，指定一定的税作教育经费。毛主席同意中央统一支拨，预算由省市县拟造。

民办小学，毛主席说，可以容许。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钱。学田，也可以允许留，但是要在有机动土地的地方，并有可能拿出来的条件下，才能给学田。

学费也可以收。

小学教育，应该强调劳动教育。关于五年一贯制问题，毛主席认为既然贯不下去，只好缓行。五年一贯制的文件，并不错，只是

实行过早，应该推迟。

毛主席对青年健康非常注意，指示增加大、中学生助学金。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毛主席认为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毛主席说，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少学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一方面克服忙乱现象。因此，决定大学生增加到十七万元，高中生除少数有钱子女外，一律发给助学金。初中生也增加助学金。

关于设置重点中学问题，毛主席认为要办，具体数字要按实际情况办。可以研究一下。留苏预备学校十所，要分配到各大区。办留苏预备学校，并不是说排除其他学校学生投考留苏；同时，留苏预备学校学生也并不一定全体一律留苏，还要经过考试和审查。重点学校一百五十至二百所。

毛主席指出：“培养工人出身的干部要特别着重一些。”周总理指示，可以从部队机关抽调干部学习。

初中招生，毛主席和□□同志都认为，能多招一些，就多招一些。今年还是招六十五万人。

对陈叔通[1]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1953年5月18日、19日）

一

叔通先生：

五月九日惠书[2]及附件数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承示各点，我以为是正确的。此复。

顺致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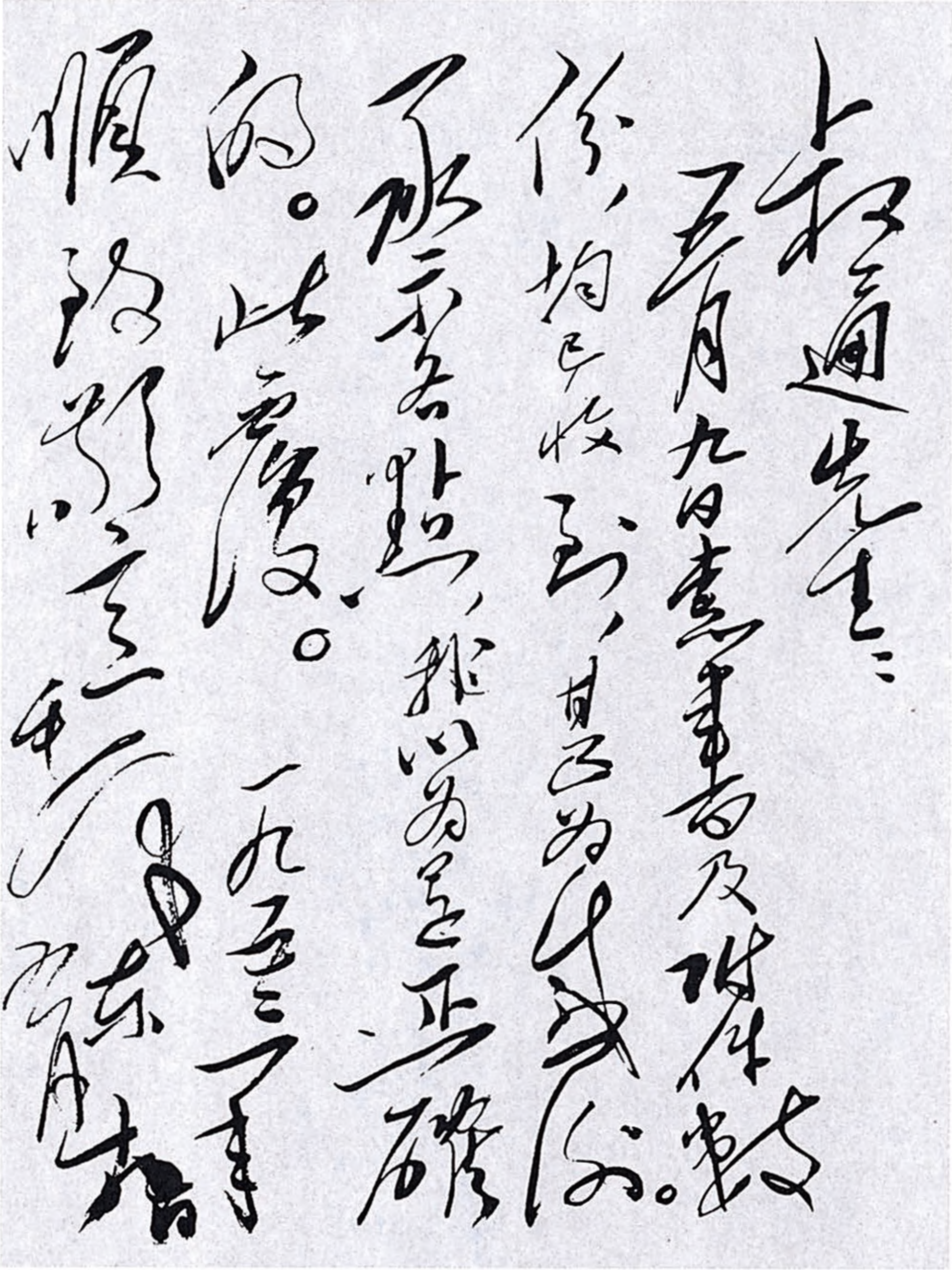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八日

---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叔通1953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送呈上月召集六省工商联秘书长汇报资料一份，又参考资料第十期至第十二期共三份，请备查阅。现在是到了要求得解决的阶段。税收方面，政府已作很大的努力。劳资关系，经过这次总工会第七次大会，必有很大的改善。同时，资方应该改造思想，求其在己。至于资金问题，只要公私、劳资关系搞好，可能有办法，即游资、睡资亦可能投入。打通销路，积压亦得到解决。依赖贷款不是办法。总的说来，国营要加强领导，私营要先了解政策。”



叔通先生：

去月九日惠书及附件数件，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示各点，我以为是正确的。此覆。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

毛泽东致陈叔通信的手稿。

二

周总理、小平[1]同志阅，交李维汉[2]同志：

此数件阅后，请维汉登入《零讯》。原件用后还我。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关于用中央名义发文件、电报问题的信和批语[1]

（1953年5月19日）

一

少奇同志及尚昆[2]同志：

（一）华南分局报告及方方[3]的检讨，应加印分发彭真、习仲勋、高岗、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洛甫、贺龙[4]及其他参加中

---

[1] 本篇一是写给刘少奇、杨尚昆的信；本篇二是在杨尚昆关于处理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等文件的情况和意见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杨尚昆在报告中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每次是由我整理的，送少奇、恩来两同志审查后，用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的，遵照来示精神，今后亦应送你阅后再发。过去未送，是应由我负责的。现将五月十四日政治局会议决定的通知送上，请即审阅，以便发出。"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方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4]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局第二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

央会议的同志，准备讨论。嗣后，有关较重大的问题的文电，都应如此办。（二）贺龙同志未离京前，应邀他参加中央的各次会议。（三）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二

少奇、恩来、德怀[1]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

（一）请负责检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过检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我出巡及患病请假时间内者不算在内），以其结果告我；（二）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三）十四号通知照发。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对邓子恢[1]报告中关于基本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时间的传达问题的批语[2]

（1953年5月19日）

邓子恢同志：

此事[3]有通知各地之必要，请考虑加按语转发此电，或另拟一电，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东北局1953年5月16日关于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时应注意事项给所属的电报上。

[3] 中共中央东北局在给所属的电报中说：各地在传达邓子恢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时，对其中“十年至十五年或更多些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一语，在中央未指示如何传达以前，只可传达到县委书记一级干部，并应嘱咐他们暂不下达，亦不向群众宣传，以免引起部分群众不必要的思想混乱。

对总政布置调查美军虐待俘虏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5月21日）

一

周、彭[1]再阅，加了一条[2]。

毛泽东

二

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

---

[1] 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毛泽东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3年5月20日关于调查美军虐待俘虏暴行工作的初步布置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报告稿上加写的第四条，即本篇二。

三

各组调查采取实事求是方针，不夸大，不缩小。[1]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53年5月21日关于调查美军虐俘暴行工作的意见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

给马叙伦[1]的信

（1953年5月22日）

马部长：

此件[2]由胡乔木[3]同志从尊处转来，因给一些同志传阅，耽阁〈搁〉了很多时间，兹特奉还。如要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请照修改样式[4]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廿二日

---

[1] 马叙伦，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任。

[2] 指送审的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的新闻稿。这个新闻稿经毛泽东审改后分两次刊载于《中国语文》1953年5月号和6月号上。

[3]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

[4] 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主要是新闻稿中转述的他对文字改革意见的一

段文字。这段文字的原文是：“林汉达秘书主任根据胡乔木委员的叙述，传达了毛主席对文字改革工作的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不可操切从事，要继续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见。毛主席认为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虽然简单了，但笔划还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难写。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复杂的方块形式，那样的体势不便于书写，尤其不便于速写。汉字就因为笔划方向乱，所以产生了草书，草字就是打破方块体势的。毛主席认为拼音文字无论如何要简单，要利用原有汉字的简单笔划和草体；笔势基本上要尽量向着一个方向（‘一边倒’），不要复杂；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见加以改进，必须真正做到简单容易，才能推行。毛主席指出：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毛泽东将这一段文字的开头改写为：“接着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可以作为本会研究的基本方向的。即是说，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关系到几万万人”，以下文字除删去文内两处“毛主席认为”和两处“毛主席指出”外，未作其他改动。这段文字的全文刊载于《中国语文》1953年6月号，题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讨论记录摘要》。林汉达传达的毛泽东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中所说的“去年拟出的拼音字母”，指1952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拼音方案组召开的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一个汉语拼音字母表，其中声母24个，韵母37个。

关于邀请刘澜涛[1]参加中央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的批语

（1953年5月24日）

尚昆[2]同志：

嗣后中央讨论经济工作（工业及其他）的时候，请邀刘澜涛同志到会，并将文件预发他看。星期一讨论高岗同志的两个议程[3]，请即照此办理。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1] 刘澜涛，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讨论的两个议题：（一）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目前国营机械工业的情况及今后工作部署的指示（草稿）。（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关于同意苏联方面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建议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关于付印三大条令草案的批语[1]

（1953年5月24日）

肖克同志：

（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如内务条令11页）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部长肖克1953年5月15日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报告的批语。

在中央会议中应有军委议程

（1953年5月27日）

彭德怀[1]同志，并黄克诚[2]同志：

在中央会议中，每月或每两月，应有一次军委的议程。例如早几天克诚同志要和我谈的后勤会议的情况，即可向中央会议作一次报告，其办法是用文字简明地写出来，交杨尚昆[3]同志印发各同志，列入议程，开会时由黄再作简单说明。其他各部门重要事项，准此类推。如同意，请照办。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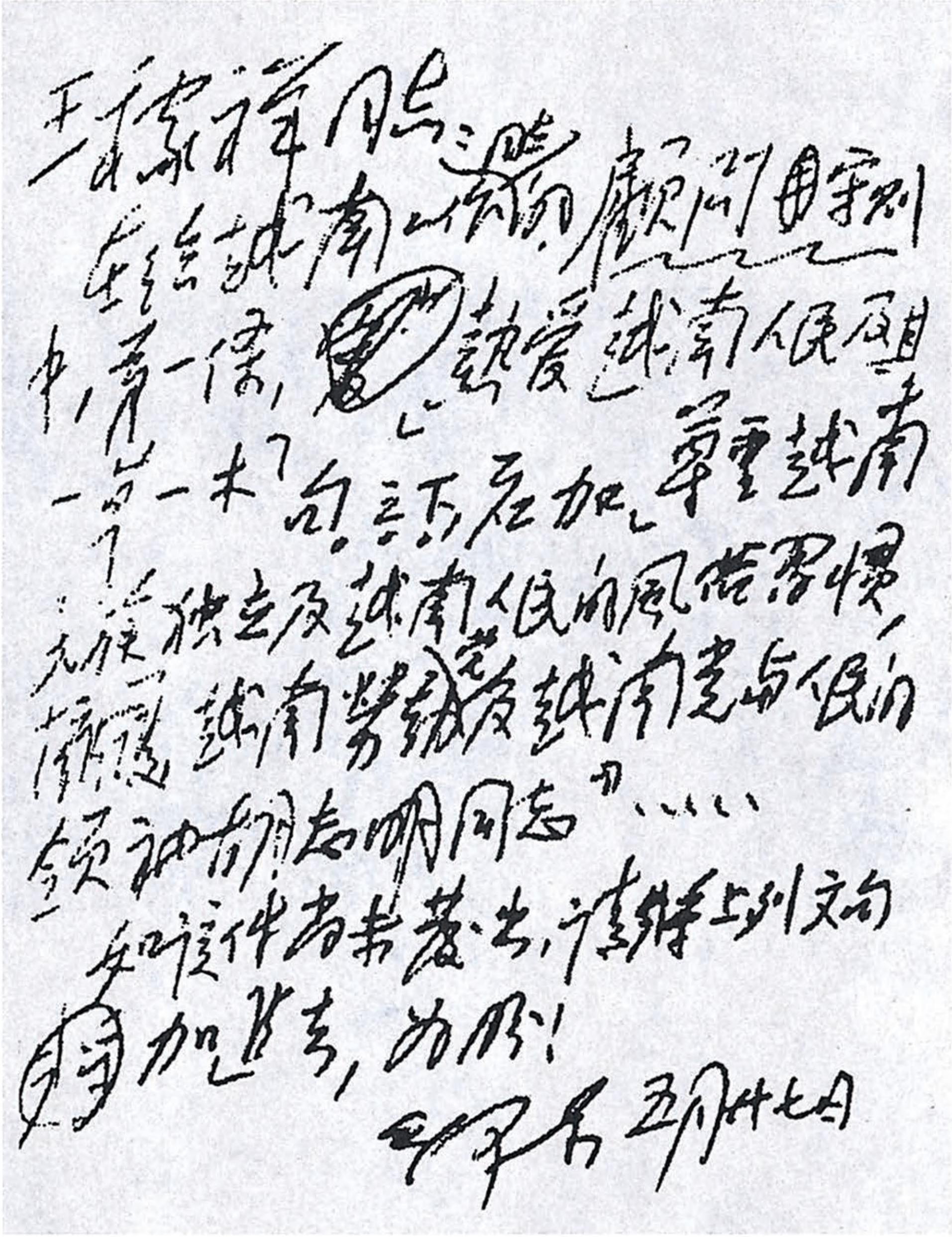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七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王稼祥同志：

在给越南的顾问团守则中，第一条，"热爱越南人民及其一草一木"句子下应加"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

知道你们要发出，请将上列文句增加进去，为盼！

毛泽东 五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王稼祥信的手稿。

1953年5月，毛泽东观看空军航校教学模型展览。

关于修改顾问工作守则给王稼祥[1]的信

（1953年5月27日）

王稼祥同志：

在给越南工作同志的《顾问守则》[2]中，第一条，“热爱越南人民及其一草一木”句之下，应加“尊重越南民族独立及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拥护越南劳动党及越南党与人民的领袖胡志明[3]同志”。

如该件尚未发出，请将上列文句加进去，为盼！

毛泽东

五月廿七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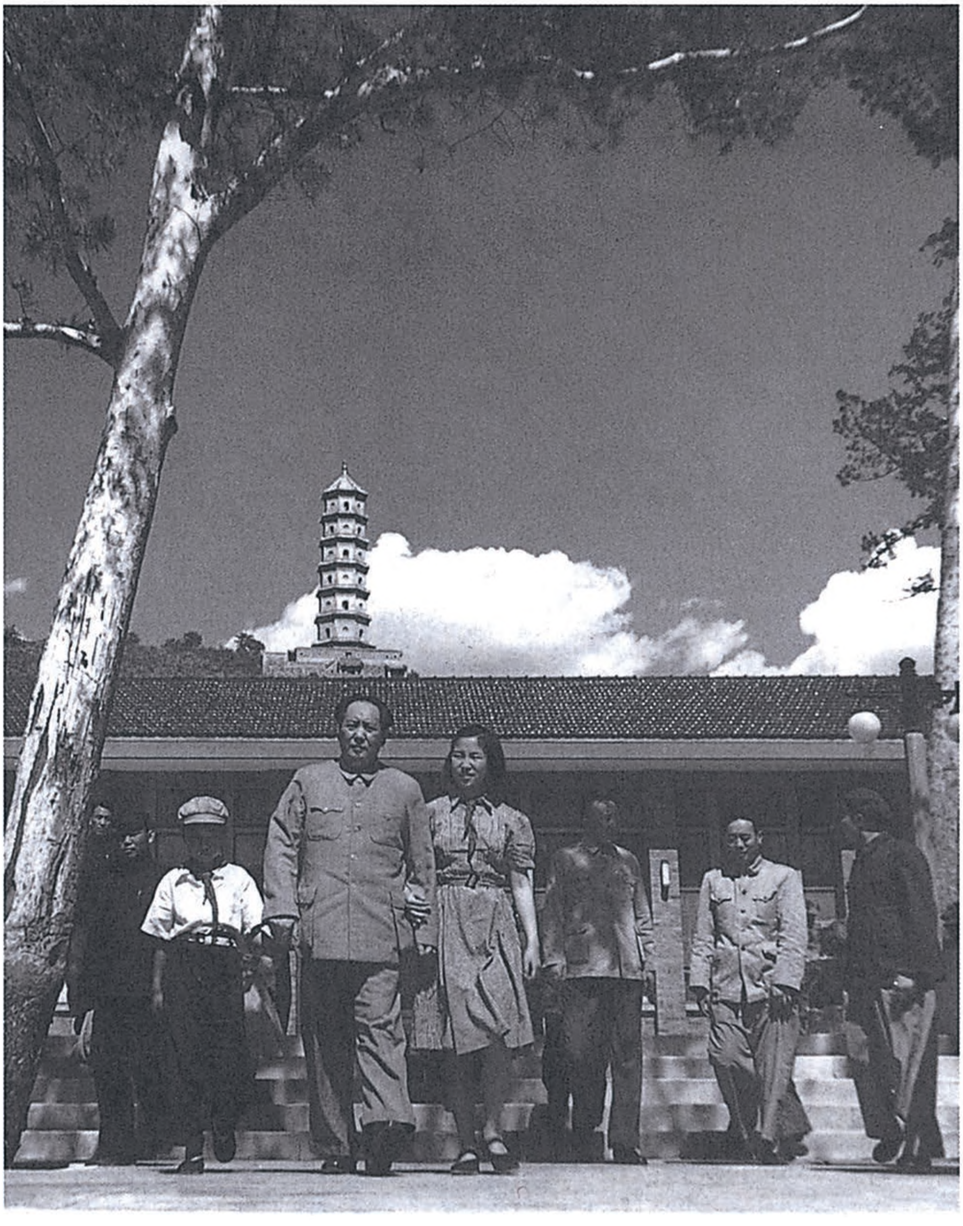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53年5月制订的驻越南顾问团工作守则。

[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刘松林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

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和李敏、李讷等在北京玉泉山散步。



1953年5月30日，毛泽东和李讷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北京玉泉山散步。

中央转发华北局、新疆分局关于加强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的批语

（1953年6月2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一）这里有两个文件，发给你们参考。一个是华北局关于加强华北行政委员会各部门向华北局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华北局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规定[1]，又一个是新疆分局关于加强省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分局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分局对省人民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2]。（二）对于这个问题尚未作出决定的大区及省市，望迅速作出决定报来。

中央

六月二日

---

[1] 中共中央华北局1953年5月21日给华北行政委员会党组并蒙绥分局、各省委、各市委，各人民团体党组并报中央的这一规定中说：根据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的精神和华北的具体情况，为了加强华北局对政府工作的领导，保证党中央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的正确贯彻执行，避

免与克服分散主义和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决定撤销华北行政委员会总党组，再行精简华北行政委员会机构，并规定了政府各党组向华北局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华北局各同志分工负责，加强对政府工作的领导等。

[2] 中共中央新疆分局1953年5月20日做出的这一决定提出：为了切实加强政府向分局的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分局对政府工作的领导，防止和克服可能发生或曾经发生的某些无组织、无纪律及各自为政的现象，规定：省人民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首先经由分局讨论决定或批准，然后通过政府去贯彻执行。政府系统各部门党组，应定期向分局作综合报告，省政府主席、副主席（党员）应负责向分局作政府系统各部门工作的综合报告；政府系统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必须事先报告，并经批准后始可召开，凡属确定方针、政策性等重大问题者，均应将会议精神与决定等报告分局；撤销省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担任政府工作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进行分工，直接向分局负责。进一步健全每周一次的分局党委会议，坚持与改进集体阅报与办报制度。分局书记实行具体分工负责，充实办公厅工作，并改善工作制度。

对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的批语

（1953年6月4日）

彭德怀[1]同志：

此件[2]还你。未细看，望了一下，有几处修改[3]。另关于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军校管理部1953年5月1日制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

[3] 毛泽东对这个教育计划稿作了三处修改：一是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话中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删去；二是将这一条中“了解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一句，改为“了解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和道路”；三是在“每天学习时间定为九小时半：正课六小时；复习射击教练、队列教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半”一句中的“九小时半”处划了横线和问号，并在旁边批注：“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二小时。”

关于印发有关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的批语

（1953年6月5日）

尚昆[1]同志：

此五件[2]请印发各同志。总题目为：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二月间关于新税制问题的几个文件。

毛泽东

六月五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关于新税制问题的五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向明等关于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物价调整草率造成市场混乱的情况的电报；北京市委关于新税制施行的反映；毛泽东关于新税制问题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的信；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的回信；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吴波等关于新旧税制的利弊及此次物价波动的原因的报告。

中央转发华南分局关于加强集体领导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的批语

（1953年6月8日）

各中央局、分局，转各省市委：

中央批准华南分局六月一日关于加强分局集体领导与各个部门分工负责的决定[1]，并将此件发给各省市委参照办理。

中央

六月八日

---

[1]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在决定中说：华南地区正处在由改革到建设的转变时期，为了做好当前的转变和今后的各种建设工作，关键在于加强分局领导——建立强有力的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在分局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强各个部门，特别是对政府工作的具体领导，将各种工作，尤其是财经、文教与政法工作，真正抓起来，克服过去曾经存在着的某些分散和无组织的状态。为此，分局做出了几项具体的规定。

对陈叔通、黄炎培[1]来信和附件的批语和复信

（1953年6月14日）

一

周总理、李维汉[2]同志：

此两信及两附件[3]可一阅，并可登入《零讯》。这是资方集中表示意见的一次，大都是应当注意解决的。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3] 两信，指陈叔通、黄炎培1953年6月12日关于全国工商联、民主建国会召开工商问题座谈会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和黄炎培1953年6月13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后民主建国会召集京津两地工商界举行座谈会情况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两附件，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后的座谈会情况的通讯和6月13日关于私营工商界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的建议。

二

任之先生：

六月十三日惠书及附件收到，甚谢。民建会通知所述各点[1]，是适当的。私营企业问题已交财委研究。此复。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

---

[1]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3年6月12日座谈会通讯中记述的由黄炎培根据会上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归纳的几点看法。（一）由于朝中方面的重大努力，以我方建议为基础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终于签订了，这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对于这样的胜利形势，我们的信心自然愈加提高，但不应盲目乐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建设，一方面还要加强国防。（二）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及现已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是“严明界限，分清敌我”这一正确的政策，在国内外贯彻执行的结果。今后，我们要从现在的胜利走上更大的胜利，就必须人人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都坚持这一政策。（三）我们应该把抗美援朝的革命精神贯彻到我们国家建设的所有工作环节中去，在工商业界，就应该更加提高经营积极性，克服困难，改进业务，配合国家经济建设，以期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加速完成。（四）在国际情况新的变化之下，不论商业、工业和一切私营企业，必须严肃地遵守国家法令，警惕五毒，根据国家经济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作用。（五）必须加强学习，学习时事，学习政策法令，民建会员尤须以正确的行动来加强在工商业者中的骨干作用。

三

叔通、任之先生：

六月十二日惠书[1]及附件收到，甚谢。此事，现正研究中，大约可以获得若干解决方案。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

---

[1] 陈叔通、黄炎培1953年6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最近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北京、天津等12个城市的工商问题座谈会，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工订货、收购包销问题，劳资问题，小工业及手工业问题，税务问题，均已送交财政经济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大家一致认为，由于中央及各级工商联合会、各地民主建国会和中央及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够，问题是不可能一次就彻底解决的，新问题还会发生，最好中央及大中小城市经常举行不定期座谈，以协商方式交换意见。各地有这样做的，效果都很好。因此建议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指示各地工商行政部门及有关各方面参照执行。

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3年6月15日）

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

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

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

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

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逐步

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6月15日）

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什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的时间多长？考虑来考虑去，讲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比较合适。根据几年来的经验，大概十年到十五年是一定需要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包括两部分性质：（一）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现在我国工业很落后，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工业与农业的比重，现在说工业已占百分之二十八，是否真达到了，我还有些怀疑。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一，或者达到百分之六十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百分之四十二。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百分之七十。（二）社会主义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何时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间不好定，因此也不要宣布。但是，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十

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肯定可以完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

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

“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要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过渡时期是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用逐步过渡的方法。这对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合作化，比较容易懂。如何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好多人不懂。我认为，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不是说到第十六个年头上突然没收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根据过去四年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是逐年增长的。私营商业，可以逐年挤掉。零售每年挤掉百分之五，九年挤掉百分之四十五，加上现在已挤掉的百分之三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达到挤掉百分之七十五；零售过渡时间长，但有十年也基本挤掉了。批发的主要部分挤掉也快，只要六七年即可办到。向两边挤：（一）商业资本家向工业挤，他们剩下的钱可以搞工业；（二）店员我们接收过来，先救济后就业。私营工业，社会主义因素也可以逐年增长。两种国家资本主义，都有社会主义因素。高级的是公私合营，是半社会主义性质，或者社会主义因素更多一点。低级的是加工订货，两头和中间都卡住了。两头即原料和购销已卡掉；中间有工缴费、品种规格检验、工会、党支部、劳资协商等，也卡得很厉害。今年我们忙不过来，明年就要抓一批私营大厂，我们派干部去。不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十五年原封不动，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逐年增长的。不要总把资本主义经济看成一块铁板，看成是不变化的。

每个城市要好好做几个大资本家的工作，我自己也在做。几年

来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或者说多数，是可以教育的。他们是民主人士，可以教育。荣毅仁[1]说，资本家分三种人，一是自愿进社会主义的，二是被拉进社会主义的，三是被社会主义扫掉的。他希望头两种人多些。

“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这是公司企业拿来相比较。有所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因此，在对它们的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核算、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等方面，公私企业大体上相同，总目标是增产节约，减少成本。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因为所有权的关系，不能讲完全相同，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你看工人嘛，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不能抹杀它们之间的不同，但也可大体相同，基本上做到差不多。如果说不可能做到大体相同，那就是没有看到上面有政权在工人阶级手里，下面有党和工会的组织嘛，而只看见资本家！那就会将工人阶级分成两部分嘛！如果私营企业生产不能增长，工资不能提高，工人生活不能得到改善，同国营企业相比，岂不是一部分工人倒霉，一部分工人神气？

资本主义企业的数量不可忽视，其作用是不小的。它有工人和店员三百八十万，而国营企业也只有工人和店员四百二十万，超过它不多。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很多，目前少不了它，而我们又有办法逐年把它改造为社会主义企业。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企业是不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现在，我们飞机、坦克、汽车、拖拉机等都不能造，就想把资本主义企业一脚踢开，是不对的，不应急躁冒

---

[1] 荣毅仁，当时任申新纺织公司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进。我们应该第一要向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做工作，第二要向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做工作。统筹兼顾完全必要，以便我们集中主要精力做国营企业的工作，集中力量搞国防，搞重工业。对资本主义企业不是置之不管，而是要做教育工作，使资产阶级削尖脑袋要来找我们，可以逐步改造。

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和商业的改组是不相同的。对私营工业的改造，是采用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加强党支部和工会的工作，加强对资产阶级基本部分的教育。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向商业资本家做教育工作是可以的，但目的是逐年把它挤掉，使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家，我们把店员接收过来。

要把资产阶级看成是一个敌对阶级，不这样看就要犯错误。另方面，要看到资产阶级分子是可以改造的。不要忘记一个政治条件，就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因而我们有本领有能力来改造他们。对五种反革命分子，用了强制的办法去改造，也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反动会道门头子一百零八万正在改造嘛！对资产阶级分子则可用文明的方法加以改造。如果这方面估计不到，就会很怕资产阶级。另外，不要忘记一个经济条件，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胜。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这一点已经清清楚楚地给人民看到了。这是资本家自己讲的嘛！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好些？就是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技术提高很快，生产发展很快，又快又好。这说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胜。我们还要有生产改革，主要提高技术。斯大林讲，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1]斯大林是讲“高度

---

[1]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改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9页。

技术”，我们的技术还是低度的。但是，我国在提高生产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扩大生产和满足人们的需求，这几年的工作不能说没有成绩。我国的国营工厂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提高了，增加了工人，增加了机器。总之，劳动生产率要提高，人和机器要增加，产品的数量和质量要提高，其中主要是技术要提高，这需要做许多工作。

我们已经有了半社会主义的公私合营的经验，这给了资本家一个榜样。过去我们是汉文帝的办法，西向让三，南向让再，不得已做了皇帝。[1]今后公私合营每年都要发展。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在经济上大为优胜，就有可能吸引大批资本家要求合营。现在有了政治条件和经济优势这两条，使得资本家不能不服我们，不能不接受我们的领导，愿意同我们合作，愿意接受合营。现在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统一领导，免得政出多门。

---

[1] 汉文帝刘恒原封为代王。据《史记·孝文本纪第十》记载，在吕后去世、吕氏亲族叛乱被平定后，朝廷众大臣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代王西乡让者三，南乡让者再”，最后推辞不过，“遂即天子位”。乡，即向。

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1]

（1953年6月17日）

金日成同志：

鉴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一些有关停战事务问题需早作准备，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机场。根据停战协定，我区共须修建五个机场，即：板门店、新安州、新义州、兴南、清津。为了工程准备、施工、管理等工作的方便迅速，最好兴南、清津两机场请朝鲜方面负责，若有困难，中国当予协助。板门店、新安州、新义州机场则以中国为主负责修建，请朝鲜予以协助。各机场的管理机构仍以朝中两方同志联合组成。至于停战后朝鲜空军返回朝境内所需机场，则拟由中国空军司令部、空联司[2]与朝鲜空军司令部共同研究计划报您批准后实施之，所需器材及施工部队，中国将尽力予以协助。

（二）铁路。拟在停战后首先修复新幕至开城段，和新高山至平康段，其他线路则仍按朝中协议进行。为保证停战小组及中立国视察小组工作的需要，拟由中国调拨清油机车、公事车、软席车等入朝备用。这些车辆徽号，应改为朝鲜徽号。车中的招待人员，中国拟选派一批去协助。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空联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和朝鲜人民军空军联合司令部。

（三）通信。各中立小组均拟设三套器材：有线电话、无线电话、电台，电台及无线电话机由中国负责调配，有线电话的线路的修复建设，已派志司[1]通讯处长张凯与中国军委通讯部科长张文东两同志前去平壤与朝鲜政府有关部门商办。

（四）开城、板门店及各口岸中立国人员住房的修建，如材料与人工有困难时可由中国协助解决。中立国人员食宿用具等物，中国已作准备。翻译、招待、警卫人员拟以朝鲜同志为主，中国选派一批人去协助。

（五）停战小组与中立国各委员会所需的汽车、司机、汽油等可由中国负责抽调。

上述各项，若你同意，我方即将进行布置。各项工作的管辖关系，待彭德怀[2]同志来平壤时与你面谈。如何，盼复。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

---

[1]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停战签字必须推迟

（1953年6月21日）

彭德怀[1]同志：

六月二十日二十二时电[2]悉。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指1953年6月20日22时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15000人。

在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报告上的批语[1]

（1953年6月22日）

写得还好。

文字应通俗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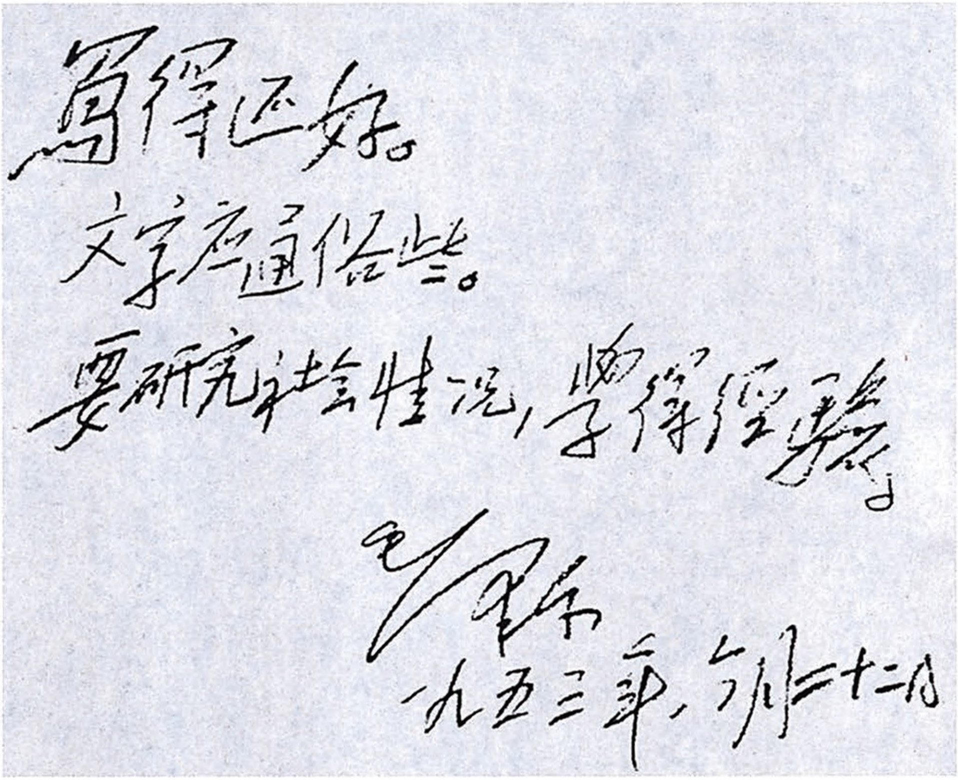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张仙朋1953年回乡探亲时写的山东省福山县宫家岛乡调查报告上。毛泽东为了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曾指示他的卫士们在回乡探亲时每人写一份探家报告，并亲自进行批改，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和文化水平。



写得还好。

文字应通俗些。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

毛泽东在张仙朋调查报告上的批语的手稿。

给毛泽连[1]的信

（1953年6月23日）

润发贤弟：

五月八日的信收到。

你的眼病脚病未好，甚念。仍以在家养治为宜，不要来京。因为湘雅医院诊不好，北京也不见得能诊好。此复。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三日

---

[1] 毛泽连，号润发，毛泽东的堂弟。

中央转发莱阳地委
关于物资供应工作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53年6月24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农业部党组，合作总社党组，并转各地委县委及政府农业部门和合作社党组：

中央曾经发出指示，在农村工作中，一方面，必须照顾小农经济特点，党和政府不可对农民干涉太多，即必须废止各项主观主义的和命令主义的办法；另一方面，为了适当地和有力地指导农业生产，党和政府必须按照农民和国家的需要和可能，进行必要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现有山东材料一件，证明中央此种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山东莱阳地委根据合作社供应农具、肥料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认真领导合作干部，依照农民的需要和可能情况，深入群众，进行耐心的宣传解释，使群众亲眼看到新农具的好处，结合技术传授，教会群众如何使用，代群众修理，解决了群众使用新农具中所发生的困难，并在工作中进行自我批评，改正已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因而使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的供应工作，在克服了强迫摊派

---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央转发莱阳地委关于物资供应工作总结报告给各中央局等的批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之后，转而成为群众所需要所欢迎的工作。从事此项工作的干部，去掉命令主义之后也变为群众所喜欢的干部。这一经验是很值得各地重视的。推销农具、肥料等工作中的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是必须反对的。因为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需要，千篇一律地把根本不适合当地群众需要的东西，或者把虽属对群众有利，但群众尚未学会使用新农具的技术，尚未证明化学肥料的好处，而一时尚不愿接受的东西，强迫群众接受，结果把好事办成坏事，这是必须反对的。但这绝不是说党和政府不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推广新式农具、化学肥料等工作。一切对群众有利的，可用的，能为群众所接受的事情，还必须积极地去办。办法不对，要改办法。

今后各地合作社干部必须学习莱阳的经验，学会使用新式农具肥料的技术，下乡去当农民的技术教员，将教技术和销货物结合在一起去进行。今后县、区、乡干部也要认真学习农业技术，充当农民的教员，方能有效地领导农民群众。望各地参照莱阳地委的方法改进农村工作。

兹将莱阳地委的报告及山东分局的批示转发你们研究仿行。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对《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的批语和修改[1]

（1953年6月28日）

一

（一）现在的资本主义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和社会主义经济『兼』联系着的并受其领导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

（二）对于党和工人阶级仍以国民党时代的态度对付资本主义企业的批判。

（三）对于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解释。在此原则下的“公私兼

---

[1]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是提交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在中央统战部1953年5月向中央报送的《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程中，毛泽东曾提出将其改写为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正式决议，但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本篇收入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两个批语和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一是在胡乔木1953年6月27日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稿的意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1953年6月21日打印件的封面上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修改稿）》加写的说明。

顾、劳资两利”方针的解释。

（四）排挤应改为逐步消灭。

（五）对于商业劳资的安排。

（六）改为『中央』中国共产党第某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草案，加以修改。

（七）集中于党中级〈央〉及各级党委，日常工作委托统战部。

（八）修改过去法令，创制一些法令。

工人提高政治水平问题。

第六种经济形态。

还有相当力量，应警惕。

二

即送尚昆[1]办。

此件及附件印发上次参加讨论此问题的各同志，并列入星期一的议程。印件应于今日下午送到各人手里，并通知他们阅读。

毛泽东

六月廿八日上午四时

三

一九五三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先在党刊上登载，交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各级党委讨论，俟收集意见，准备提交将来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或其他适当的会议上去讨论和决定。其中有许多当前要争取时机迅速解决的问题应予即行解决，要做的工作应即动手去做。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1]

（1953年6月30日）

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

青年团要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但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当中，要有自己的独立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九五二年我同团中央的同志谈话，出了两个题目要团中央研究，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两个题目，都包含了如何照顾青年的特点。各地方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满意就在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的特点，搞些独立的活动。党和团的领导机关，都要学会领导团的工作，善于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照顾青年特点，组织和教育广大青年群众。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无论工厂、农村、军队、学校的革命事业，没有青年就不能胜利。中国青年是很有纪律的，他们完成了党所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朝鲜议和，土地改革结束，国内工作的重点正在转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学习。青年团要学会领导青年，

---

[1] 这是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谈话。

和成年人一道，在农村把农业搞好，在城市把工业搞好，在学校把学习搞好，在机关把工作做好，在军队把国防军练好，成为现代化军队。

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如果对青年长身体不重视，那很危险。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学习，要学会成年人已经学会了的许多东西。但是，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的负担都不能过重。尤其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青年，劳动强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样。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跳跳蹦蹦，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

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

我提议，学生的睡眠时间再增加一小时。现在是八小时，实际上只有六七小时，普遍感到睡不够。因为知识青年容易神经衰弱，他们往往睡不着，醒不来。一定要规定九小时睡眠时间。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强迫执行。青年们要睡好，教师也要睡足。

革命带来很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现在要保证大家身体好，保证工人、农民、战士、学生、干部都要身体好。当然，身体好并不一定学习好，学习要有一些办法。

现在初中学生上课的时间也多了一些，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积极分子开会太多，也应当减少。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工农兵青年们，是在工作中学习，工作学习和娱乐休息睡眠两方面也要充分兼顾。

两头都要抓紧，学习工作要抓紧，睡眠休息娱乐也要抓紧。过

去只抓紧了一头，另一头抓不紧或者没有抓。现在要搞些娱乐，要有时间，有设备，这一头也要来个抓紧。党中央已经决定减少会议次数和学习时间，你们要监督执行。有什么人不执行，就要质问他们。

总之，要使青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有些领导同志只要青年工作，不照顾青年的身体，你们就用这句话顶他们一下。理由很充分，就是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地成长。我们这一代吃了亏，大人不照顾孩子。大人吃饭有桌子，小人没有。娃娃在家里没有发言权，哭了就是一巴掌。现在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四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个别人可能不称职，也不用怕，以后可以改选掉。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青年团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要有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同时又要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老早就有了的，马克思

主义历来就是这么讲的。这是从实际出发。青年就是青年，不然，何必要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你们现在有九百万团员，如果不注意青年的特点，也许就只有一百万拥护你们，八百万不拥护你们。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多数，同时注意先进青年。这样，可能有些先进分子不过瘾，他们要求对全体团员都严一些。这就不那么适当，要说服他们。团章草案规定的义务多了，权利少了，要放宽一点，使多数人能跟上去。重点要放在多数，不要只看到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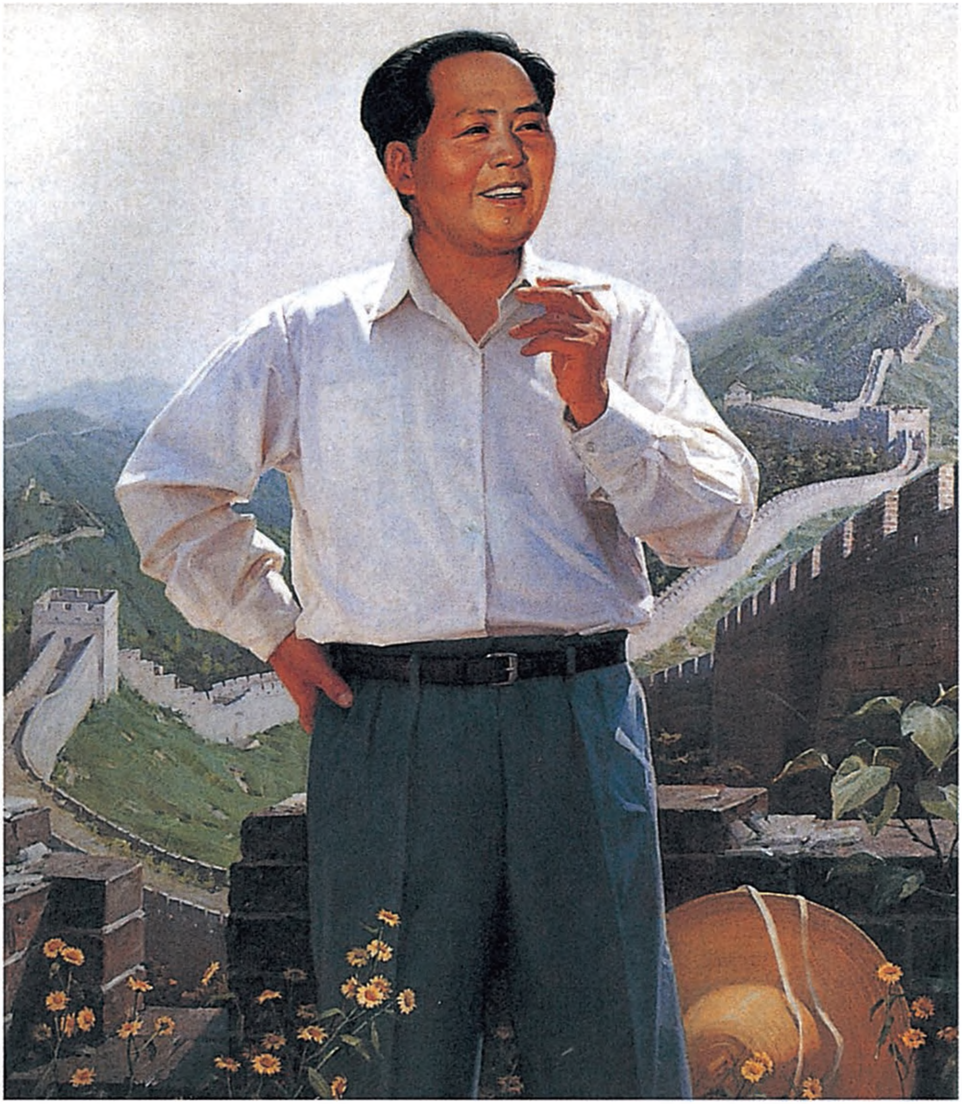
你们的团章草案规定，四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算自动脱团，这太严了。党章还规定六个月，你们也规定六个月不行吗？办不到的事，或者只有一百万人能办到，八百万人办不到的，都不要在团章上规定。原则性要灵活执行。应当是那样，实际是这样，中间有个距离。有些法律条文要真正实行，也还得几年。比如婚姻法的许多条文，是带着纲领性的，要彻底实行至少要三个五年计划。“不要背后乱讲”这一条，原则上是对的，但是不必写在团章上。反对自由主义是长期的，党内自由主义也还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后骂一句话，事实上办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敌我界限要分明。

威信是逐渐建立的。过去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骂人，我们不禁也不查，军队还是没有垮。我们只抓住一些大的，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队伍就慢慢上了轨道。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现在团中央威信已经相当高。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有“小广播”，是因为

“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让人家“小广播”，他还会说没时间，要休息了。但是问题总是会有的，不要以为一下都能解决，今天有，将来还会有。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十五年。一年一小步，五年一大步，三个大步就差不多了。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讲基本上完成，是谨慎的讲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谨慎一点好。

中国农业现在大部分是个体经济，要有步骤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要坚持自愿原则。不去发展，就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右倾。搞猛了也不行，那是“左”倾。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我们历来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准备但无把握之仗。过去打蒋介石，开始有些人犯主观主义错误，后来经过整风，反掉了主观主义，就打了胜仗。现在是打社会主义之仗，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全国人民的总任务。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作出适当的规定。



《毛主席在长城》（油画）

对青年团二大的指示

（1953年6月）

团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中，三十岁以下的只有七个，太少了，女的也太少了。老一点的成熟一点的党员参加领导是需要的，但必须增加些青年，不要搞成老年人专政，不要搞成青年老年团。

要一批一批地割韭菜，不割就不好吃了，老干部还有一万吗？可以再调出五千。

团代会的报告，有人反映有些空，是不是要求的高了。我看是满意的。三十岁以上的人不满意，二十五岁以下的看不懂。

几个文件党把的紧紧的，我看在党的领导下，团要有独立活动。几个文件都是讲中心工作，一天天干巴巴的，搞的太严了。纪律要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要有纪律，那就不要用纪律了。

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中心工作，守纪律，青年向成年学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青年要有自由活动的一面。一方面老成，另一方面不老成，天天老成是不好过的。有严格的一面，也要有不太严格的一面。

要教育青年活泼点，不是少年老成，而是生动活泼，这是原则问题。这是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问题，不然要脱离群众。

太政治化了，太老成化了，变成青年成年团了。搞的下面没条件了（指系统领导），没有独立活动了。

今天我们指导你们搞独立活动，监督你们搞独立活动。

“向歧视妇女现象作斗争”，斗争太多了。婚姻法的贯彻得十年到十五年。要教育不要斗争。

“不要自由主义！”（文件中的一句话）社会上要允许自由主义，党内要反对自由主义。背后讲是发表意见的一种方式。在广大群众中禁止这一条是办不到的。

“对上级指示，不执行不发表意见”（文件中一句话）。指示要执行，至于不发表意见，我们这个会议也有一部分发言，一部分不发言。

对青年不要管得太紧，小孩子打架，只要不打瞎眼睛，出点血没关系。鲁迅的儿子批评鲁迅说你不像个爸爸。

叫我讲什么？我就讲打架、闹。

1953年6月28日，毛泽东和李讷等在北京安定门外看孩子们捉蝉。

1953年6月28日，毛泽东和孩子们在北京安定门外小憩。

今冬明春农闲季节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1]

（1953年7月1日）

各地在今冬明春的农闲季节内，除完成乡选任务外，应集中力量解决区乡新三反问题，并着重地注意解决落后乡问题。但在新区至少须要两三年时间才能全部解决这个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3年7月1日批转福建省委关于落后乡的工作报告给各地的指示稿时加写的一段话。

接受蒙古驻华大使奥其巴特尔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7月2日）

大使同志：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感谢您的祝贺。

三年多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巩固。中蒙两国政府去年签订的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不但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大大地促进了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幸福。

蒙古人民已经在建设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一向为中国人民所深切关怀和赞扬。我深信：中蒙两国人民之间日益紧密的团结必然会加强我们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力量，并使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巩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蒙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为迁移马克思墓捐款给波立特的信[1]

（1953年7月4日）

亲爱的波立特同志：

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来信收到了。

我们极为同意你们对卡尔·马克思墓的处理办法。为表示我们对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的生平和工作的关怀，中共中央认为帮助这一工作顺利进行是自己的光荣任务，特为移墓所需费用募款七千美元（折合二千五百英镑）。此款请苏共中央代为转去。致以

兄弟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四日

---

[1] 毛泽东给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波立特的这封信，是中共中央1953年7月4日用电报发给苏共中央，请他们转交的。

对苏联一篇文章中批评“对立的统一”提法的批语[1]

（1953年7月）

陈伯达[2]同志阅，退乔木。

我认为这种批评[3]是错误的。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1953年7月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本期《学习译丛》末篇第100页至101页提到对于“对立的统一”的批评，请参考。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学习译丛》1953年第六期刊载苏联Л·巴热诺夫的文章，题为《评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文内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等名词是不妥当的。斯大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即对立的斗争。在我们的哲学著作中所见到的对立的“同一”或对立的“统一”等名词，是黑格尔的表述方式的残余。在哲学著作中应当用“对立的斗争”这个名词，因为它最确切地表达了这一法则的实质。在斯大林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是把这一法则说成对立的斗争法则。作者应当根据斯大林的精确的措词来阐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因为这样的措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

给符定一[1]的信

（1953年7月7日）

宇澄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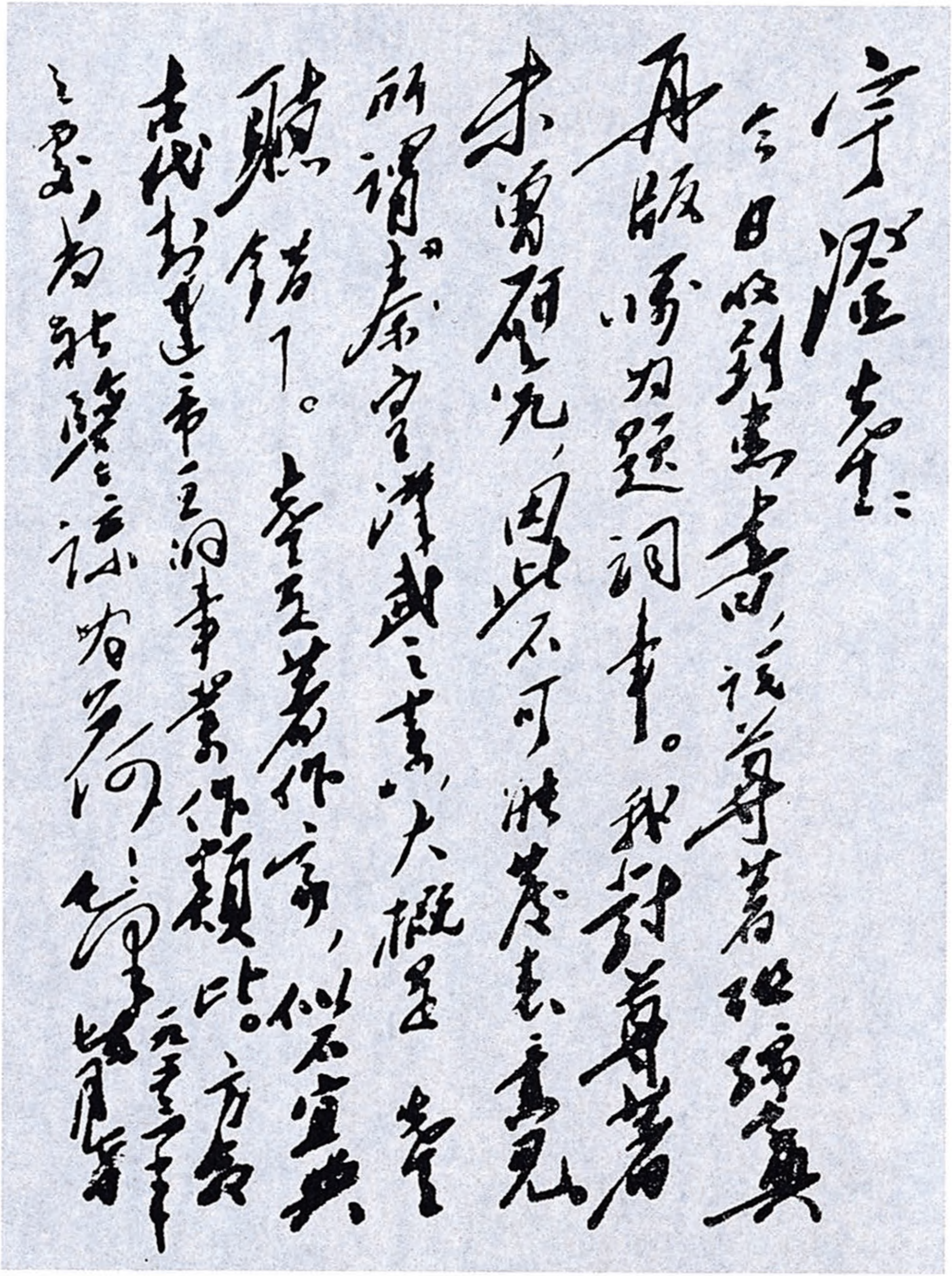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

[1] 符定一，字宇澄，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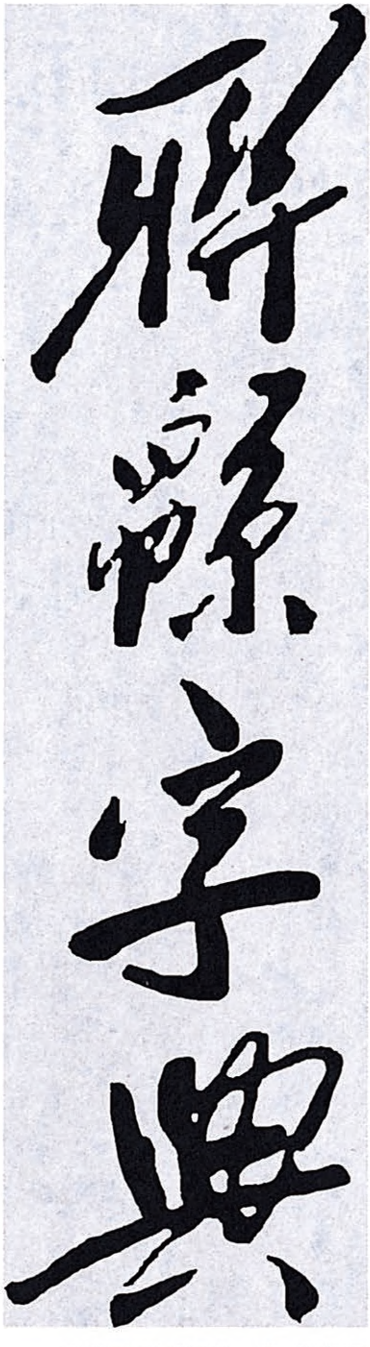


宇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读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序及题词本。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表示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誉赔错了。先生著作家，似不宜与我封建帝王的事业作类比。方命之罪，为歉。祝
吟安

毛泽东
五三年

毛泽东致符定一信的手稿。



毛泽东为符定一的《联绵字典》题写的书名。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1]

（1953 年 7 月 8 日）

彭司令员，并告金首相、李克农[2]同志：

七月七日午来电悉，并转发平壤。同意将修正军分线[3]问题暂不向对方提出，而推迟到十八日左右看军事进展情况再定。如果到十八日左右原定的军分线无甚变动，即可不提此问题。如果届时攻夺金城以南的任务基本上完成，即应提出修正军分线，使之符合于当时实际情况。对方若坚持不肯，我们可以退一步，主张以新占地区为非军事区，而将军分线划在这个地区内，若对方继续坚持反对，我们还是要争至适当时机，仍在六月十七日的军分线上确定下来。自复会至十八日左右期间，可就有关停战协定的实施的其他各种问题与对方进行讨论，并尽可能取得对方对这些问题的肯定答复。因此，停战签字日期如无新的变化亦须推迟到七月二十日以后。

我们的方针仍然是掌握主动，争取停战。如果能争取停战签字，则不论李承晚[4]参加停战与否或参加了而在停战后还要进行破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

[3] 军分线，即军事分界线。

[4] 李承晚，当时任大韩民国总统。

坏，我们均可以停战协定的签订来瓦解“联合国军”阵营和美李军队的士气。如果不能签字，则主动权仍在我们手中，可以继续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击敌人。

毛泽东
七月八日三时半

给张澜的信

（1953 年 7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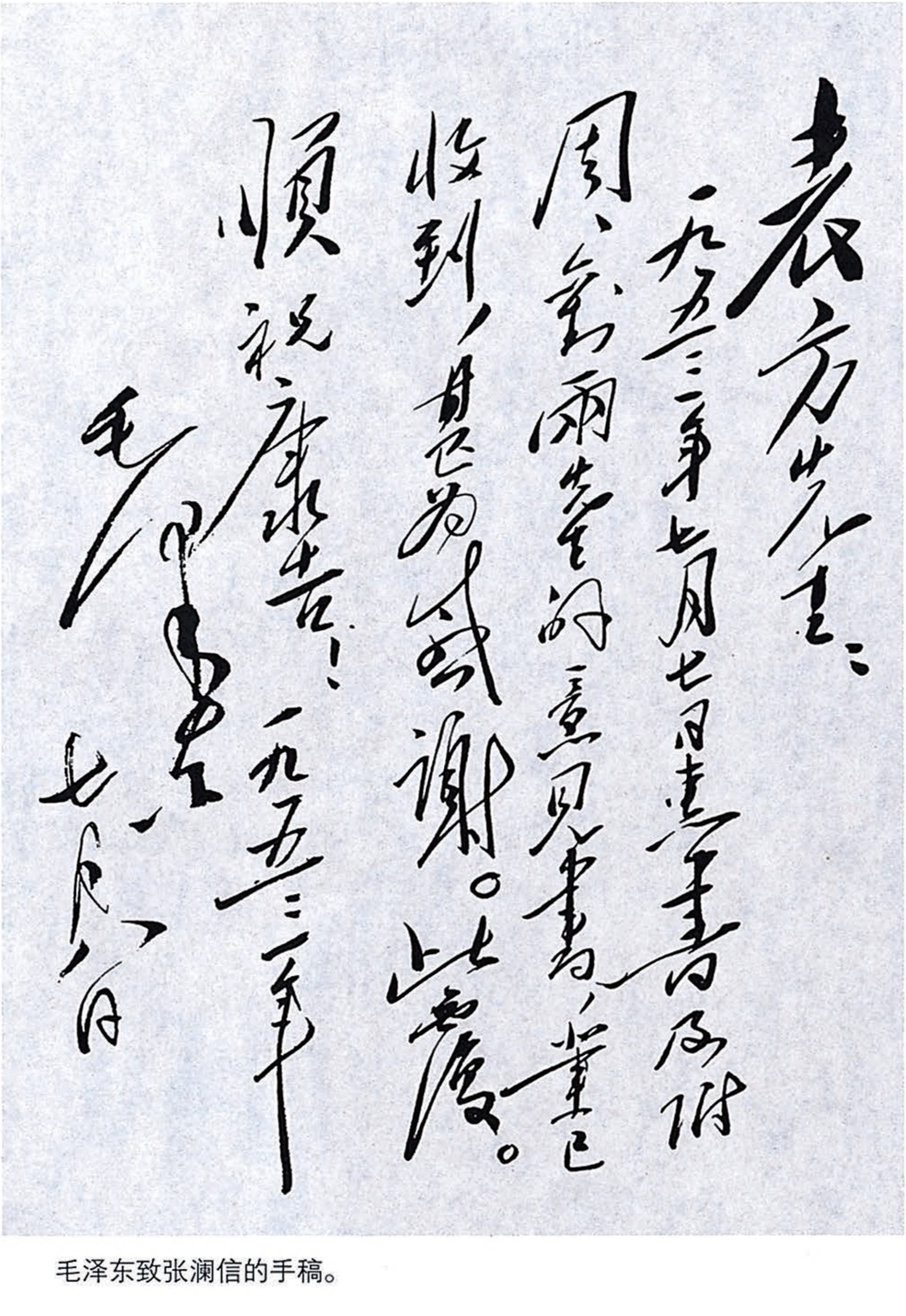
表方先生：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惠书及附周、刘两先生的意见书，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此复。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



表方先生：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来书及附周钦雨先生的意见书，业已收到，甚为感谢。此复。

顺祝

康强！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

毛泽东致张澜信的手稿。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1]

（1953年7月9日）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一个文件上的批语。

关于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致李克农[1]电

（1953年7月9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七月八日二时来电悉。此次复会后的谈判应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应讨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各种保证，然后再谈签字前的准备工作。因此，十日会上的发言不要提及各种小会，而应表示在停战协定的实施保证尚未商妥前，无法进行签字准备工作。修正军分线问题不应在现在提出，而要按七月八日三时半去电办理。二万七千人[3]提交政治会议问题现在讲出过早，应争到快要进行签字时再提出。发言稿我们已加修改，现发来，准备在十日会上争取先发言提出。如果对方答复蛮横或强词夺理，应当场予以驳斥。如果答复属解释性质，态度不坏，即应表示我们需考虑，建议休会。如果对方提出问题，表示带回研究，并建议休会。根据新闻反应，华盛顿正

---

[1]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

[2]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指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悍然破坏双方已经签字的停战协议，强迫扣留2.7万余名我方被俘人员一事。

指示克拉克[1]再来一信。如果十日会上，在我方尚未能抢先发言之前，对方即已宣读此信，则不问其内容如何，我们仍应首先宣读发言稿，然后视对方来信内容如何予以简单答复，告以改日再予全面回答。如果与二十九日内容基本相似，应表示不能完全满意，请对方研究我发言并提出答复。若来信比前信较有具体保证，则表示将带回研究。若来信强调进行签字准备工作，则应重申我发言稿末了一段，请对方郑重考虑，提出答复。

毛泽东
七月九日廿二时

---

[1] 克拉克，当时任侵朝的“联合国军”总司令。

中央关于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贷款问题复西南局电

（1953年7月10日）

西南局，并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一九五三年五月九日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关于农业贷款问题的报告和西南局的意见阅悉，中央同意西南局的关于在贷款问题上对待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各项意见[1]。惟对土地改革后确已从事农业，并服从政府法令的地主分子，如其生产确有困难或遇疾病等意外灾害时，在当地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在农业贷款

---

[1] 中共中央西南局1953年5月9日给中财委党组并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关于贷款给小土地出租者、富农和地主的问题，意见是：（一）农贷不贷给地主和富农，这一原则应坚持。至于可否贷给小土地出租者，我们以为应从具体情况出发，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确有困难者，可以贷给农贷，否则应以其他方式解决他们的困难，免使农贷变成社会救济。（二）地主在生产和生活中确实存在困难者，我们不应采取不理态度，不理对整个社会不利，要根据不同情况具体进行。（三）对待富农问题，应该很好地进行分析。一般说，因西南土改中对富农经济采取保存的政策，富农无法生产和生活的情况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富农生产上没有问题，他们的生产情绪不高也可能是事实。因此，对富农基本上是稳定其生产情绪的问题，如有个别划错成分或遭到意外灾害者，当可按特殊情况具体处理。

中，亦可予以适当照顾。如当地群众反对贷款给地主分子，则不要贷给他们。

中央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

1953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农村。

关于缩减在辽东等地修建国防工事计划的批语

（1953年7月11日）

黄克诚[1]同志：

赞成你的缩减计划[2]，这是很必要的，望照此部署。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指黄克诚1953年7月1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缩减在辽东等地修建国防工事的计划。报告中说，鉴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如财力、物力、技术、技术领导均缺乏，领导干部和施工部队又无近代筑城经验，5年完成原计划确有很大困难。因此，拟对整个计划重新研究一下，采取稳步修建的方针，即前3年少修，求得锻炼干部，取得经验后再逐年增加。

给邹普勋[1]的信

（1953年7月11日）

普勋兄：

七月一日的信收到。你的生活提高一些，甚慰，为你庆贺。

秋收以后，如你愿意来北京一游，可以偕李漱清[2]先生一道来京住个把月。李漱清先生去年来信想来北京一次，但不知他今年尚有此种兴趣否，他的身体能出远门否？

顺祝

安吉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涉及广大群众利益的事项未经允许不得下达[1]

（1953年7月13日）

鉴于今年未经中央正式决定，即已将拟于七月一日增加工资的计划普遍传达下去的情况，今后关于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事项，凡尚属拟议，未经正式决定并允许下达者，一律不得下达。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政治局会议决定事项的通知稿时改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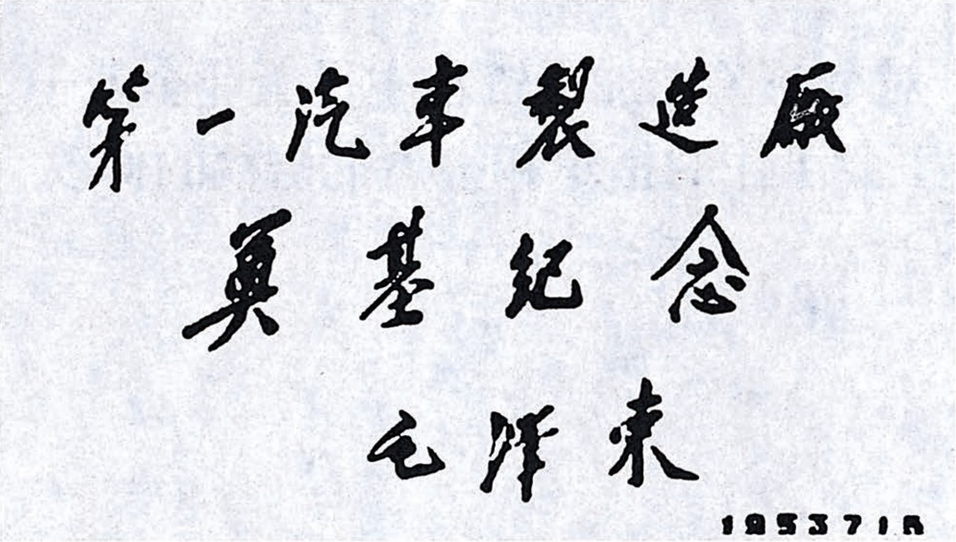
（1953年7月15日）

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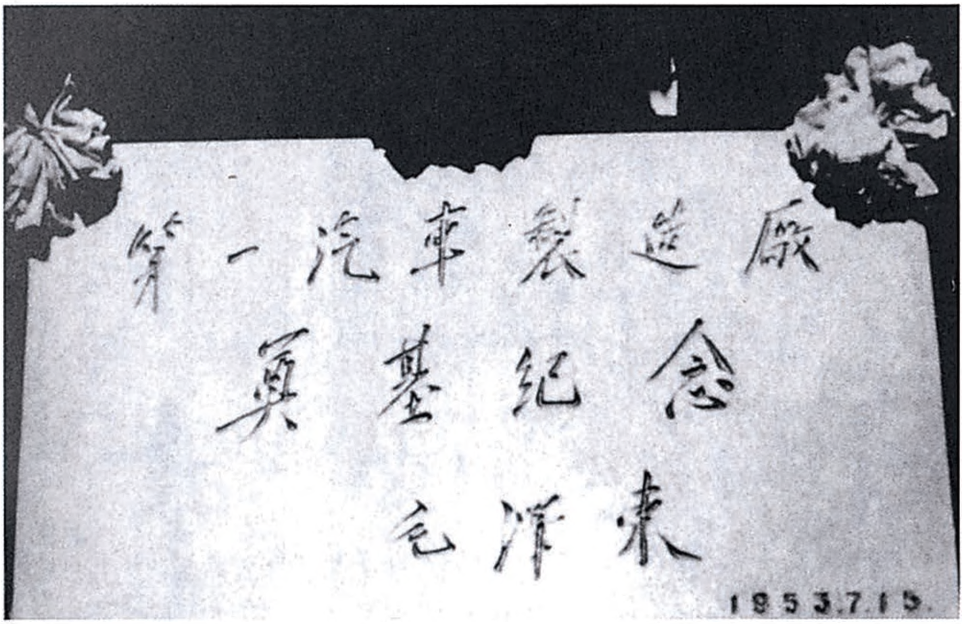
---

[1] 1953年6月，毛泽东亲自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1953年7月，第一汽车制造厂隆重举行奠基典礼。毛泽东题词“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放置在厂区中心广场。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



第一汽車製造廠
奠基紀念
毛澤東
1953 7 15

毛泽东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的题词。



第一汽車製造廠
奠基紀念
毛澤東
1953.7.15.

1953 年 7 月 15 日，我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毛泽东为奠基仪式题词。图为刻有毛泽东题词的汉白玉基石。

对全总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工会工作的指示和中央批语稿的修改[1]

（1953年7月）

一

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工会工作，必须贯彻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改造还不是指取消资本家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那种最后的改造步骤。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的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解放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它主要地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的，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是这一部分利润，在整个企业盈利中不过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占了四分之三左右的盈利的主要部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所作的修改。这个指示是全总党组1953年7月14日报送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央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资本主义工业企业中的工会工作的指示的批语稿所作的修改，这个批语稿落款时间为1953年7月20日。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这里包含了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一个小的成份）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下的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即是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带了若干（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社会主义性质的。必须指出，目前并不是一切或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工厂已经做到了这一步，还没有，还需要几年的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的。

二

指示中所指出的“四马分肥”的比例，是适合于多数资本主义工厂企业的，但是如果某些工厂资本家所得超过指示中所指出的比例，只要他们的所得部分是依靠正当经营而不是依靠五毒或其他不法行为，也是可以允许的。资方所得，不及此比例的工厂企业要达到此比例，须在向工人说清楚取得工人同意后，方能实行。

在黄克诚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3年7月17日）

退黄克诚同志，处置[1]很好。

毛泽东

七月十七日上午五时

要防敌以另一部在他处登陆。

---

[1] 指黄克诚1953年7月16日19时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的报告中关于歼灭登陆之敌的部署。报告中说，今晨4时50分，蒋军两个团附坦克一部在其海军掩护下，在福建南部的东山岛登陆，与此同时，敌伞兵300名在飞机30架掩护下，在东山岛的后林地区降落。截至12时30分，我守岛部队公安八十团两个营（缺一个连），已退守该岛的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东山、五里亭山，与敌展开激战。为粉碎登陆之敌，福建军区今晨5时已按原定计划将漳浦地区待机的三十一军二十二团调往东山增援（57公里），其先头部队已乘汽车于今日上午10时赶至陈岱，并即进入东山岛，现该岛东北、西北要点均在我控制中。在东山岛后林地区降落的伞兵，已被我大部消灭。中南军区在潮汕地区的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亦按原定计划赶往增援，其先头团可于今日19时赶至梅州，增援该岛，准备歼灭登陆之敌。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除已告情报部门严密掌握敌情变化，通讯部门确实保证中南、华东军用电话畅通，中南、华东通令各海防部队提高警惕防敌可能袭扰外，并已告中南四十一军、华东二七二团，到达后应即坚决消灭登陆之敌，使其今后不敢狂妄行动。

关于停战后工作安排和志愿军参加各委员会代表人选的问题[1]

（1953年7月20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彭司令员[2]：

六月十九日来电，并六月十六日及七月十八日两电均悉。一般同意来电各点意见。停战委员会中国代表应由丁国钰及柴成文[3]二同志担任，杜平[4]同志负责中国的停战委员会代表内部与志司[5]联系事项。红十字小组的南、北、中三组，以及朝中方面参加该项小组工作的人员，均应集中进行联合训练。他们因需与敌方人员在一起工作，且需到南朝鲜去，故训练必须加强。他们的访问工作结束后，应全部参加解释工作组以资运用经验。红十字小组及解释组准备带去的告被俘人员书等文件，待审阅后另电告。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

[4]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领导工作。

[5]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遣俘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同意以王健[1]担任。所有伪俘遣返问题的处理，均由朝鲜人民军负责，故我们应将凡在我手中的伪俘派遣得力人员移送朝方，并将有关这些伪俘的全部情况，详告朝方。至于外俘，则由志愿军统一处理。此议须取得南日[2]同志同意。关于不愿遣返的外俘问题俟黄远[3]回北京汇报后再作决定。

停战后的朝中领导核心，不应采取统一两党的形式来组织，致妨碍兄弟党各自的独立组织系统。停战后，谈判代表团改为停战代表团，内部仍应朝中各保有同等人数的代表团，依照谈判开始时与金首相[4]的协议，由李克农同志负总的责任，一切问题由朝中双方代表集体协商解决。中方代表即由李克农、杜平、乔冠华[5]三同志担任。此议如你们同意，当再征求金首相意见。

中方参加五个口岸[6]的工作人员，如尚未解决，望速与志司直接商洽调遣，以免迟误。关于供应、行政、机场、铁路等问题，已由总后、外交部、公安部、空司、联运司[7]等负责处理，并已与你们直接联系。

此外，印度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印拟派一个三至四人的小组于停战后经东京去朝鲜访问“联合国军”司令部，人民军、志

---

[1] 王健，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办公室主任。

[2] 南日，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

[3] 黄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部长。

[4]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5] 乔冠华，当时参加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领导工作。

[6] 五个口岸，分别在朝鲜新义州、满浦、新安州、清津、兴南。

[7] 空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联运司，即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

愿军司令部，接触实况，以便准备工作。我们考虑此事似不便于拒绝，但我方拟只让其访问平壤总部，志司可派人参加，而不让其至志司。（二）美向印表示，印度部队只须二千五百人，我们认为可提出三千人。望将此二问题，与南日同志研究，并电告你们的意见。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日

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安排等问题的指示[1]

（1953年7月21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七月二十日二时及二十一日一时半来电均悉。

一、关于军分线[3]，应与志司[4]联系并取得其同意，按实际情况与对方确定之。

二、关于不直接遣返的剩余战俘，由对方指定在板门店以南对方管理下的非军事区拘留问题，原则可以同意，但应声明对方必须注意如下三点：

（一）我方绝不承认李承晚[5]政府所谓不容许印度、波兰、捷克人员和印度武装部队、印度红十字会及我方解释代表进入南朝鲜境的声明，因为这是违反职权范围的规定的。我并将通知印度、波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军分线，即军事分界线。

[4]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5] 李承晚，当时任大韩民国总统。

兰、捷克、瑞士、瑞典五个中立国家，告以在接管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工作上，他们有权通过南朝鲜，并有权受到“联合国军”包括南朝鲜军的保护。

（二）要求对方告知我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总数，其中包括已被追回的经南朝鲜强迫扣留的战俘的数目。我并须声明在此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中，除哈利逊[1]将军已经声明将不予释放的真正战俘之外，凡李承晚、蒋介石所派特务均不得继续混充战俘营管理员、教员、翻译或其他职司，并不得跟随战俘来到非军事区。

（三）对停战协定（七）（八）（九）（十）等款只能作临时补充协议，仅在处理此项战俘时适用，并规定只有真正战俘才能被准许进入上述被指定的非军事区看管战俘地点。其他任何人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人员、印度部队、印度红十字会人员和我方解释人员及双方代表之外，一律不许进入该非军事区。我方将提出对案，今晚电告。

三、关于除第十二款外的全部停战协定条款生效日期，我们应主动按照对方所提出、经我方同意的六十三款，定在签字后十二小时内停火生效期间以后，其开始时间应为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人员在停火后进入朝鲜，并自板门店到达各自后方口岸后开始执行监督与视察任务的时间。此项停战协定全部生效的时间与停火生效的时间之距离约为五天，望你们再加以精确计算后提出。

四、签字日期估计各种准备工作，包括校正军事分界线，印地图及修建等在内的完成时间，不会早于七月二十六日。如你们估计有此可能，可与对方定签字日期为二十六日。我们应坚持金、彭及

---

[1] 哈利逊，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方面首席谈判代表。

克拉克[1]不参加签字仪式，而应将文本送签。至参加仪式人数，既然金、彭不到场可以同意对方所提的数目。

五、关于停委会[2]的办事细则尚待审查，望你们提出审查意见电告。

六、关于战俘遣返总数的交换，同意来电意见，我方除旧俘外，另加新来伪俘一千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九时

---

[1] 克拉克，当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2] 停委会，即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

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

（1953年7月22日）

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

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杨士杰同志的报告[1]极好，中央一级，大区一级，省市一级，专区一级和县一级，共五级科长以上负责干部，均应当好好地读一遍。县以上党、政、民各级机关所发统计报表，在农村中已泛滥成灾，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为此，中央责成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主要责成国家统计局），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在接到本指示以后，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

---

[1] 指杨士杰1953年5月23日关于检查农村统计报表情况给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报表繁多复杂的混乱状况，确已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一）表格繁多，分量过重。（二）内容复杂，毫无重点，面面俱到，无奇不有，用处却极少。（三）要求过高，脱离实际，时限太急，无法填报。（四）上面乱发，下面乱填，捏造、估计，很不真实。农村表格太多，是官僚主义、分散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农村“五多”的重要项目之一。因此，要把纠正这种混乱情况当作“新三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重要内容，与反对农村的“五多”同时进行。除必要的普查项目外，一般采用开调查会辅之以典型抽查的方法。要建立正确的统计报表制度，并严加控制，删繁就简。

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处理滥发统计报表一项问题，应联系“五多”问题中其他四项问题去处理。城市中的滥发统计报表问题，亦应同时注意处理。

本指示及附件应登党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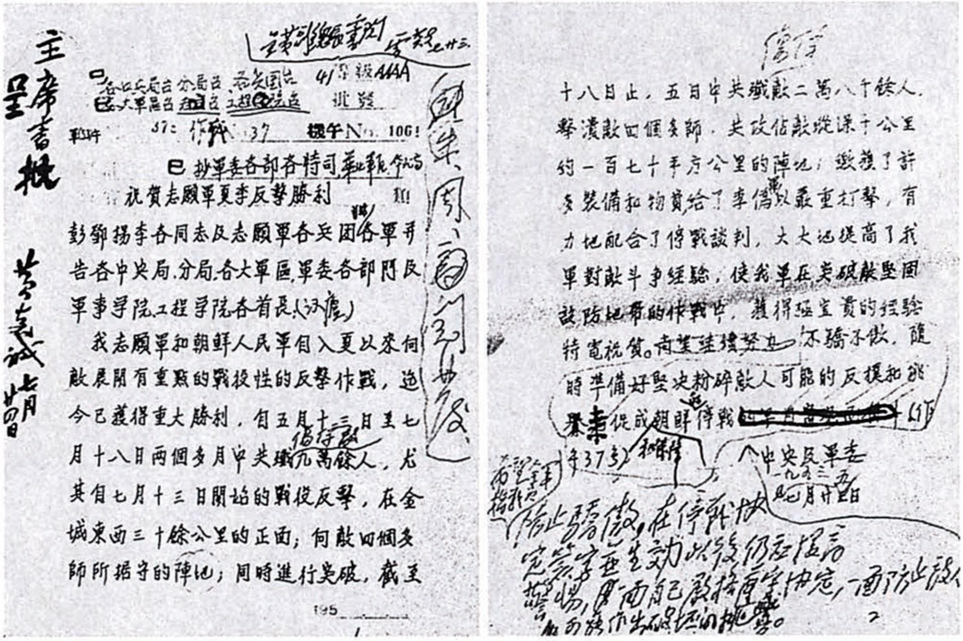
中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停战协定签字后志愿军仍应提高警惕[1]

（1953年7月25日）

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



呈主席審批

祝賀志願軍夏季反擊勝利

彭鄧楊李各同志及志願軍各兵团各軍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各大軍區、軍委各部門、軍事学院、工程学院各首長

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自入夏以來向敵展開有重點的戰役性的反擊作戰，迄今已獲得重大勝利，自五月十三日至七月十八日兩個多月中共殲傷俘敵九萬餘人，尤其自七月十三日開始的戰役反擊，在金城東西三十餘公里的正面，向敵四個多師所据守的陣地，同時進行突破，截至

十八日止，五日中共殲敵二萬八千餘人，擊潰敵四個多師，共攻佔敵縱深十公里約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陣地，繳獲了許多裝備和物資，給了李偽軍以嚴重打擊，有力地配合了停戰談判，大大地提高了我軍對敵斗争經驗，使我軍在突破敵堅固設防地帶的作戰中，獲得極寶貴的經驗，特電祝賀。~~尚望繼續努力~~不驕不傲，隨時準備好堅决粉碎敵人可能的反撲和挑釁，促成朝鮮停戰

中央 軍委
一九五三年七月廿五日

希望全軍指戰員防止驕傲，在停戰協定簽字并生效以後仍应提高警惕，一面自己嚴格遵守協定，一面防止敵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釁。

1953年7月25日，毛泽东签发电报祝贺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战中取得胜利，并要求全军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后仍要提高警惕。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和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胜利的电报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在中央关于处理湖东县劳改队看守打死群众事件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

（1953年7月27日）

全国共有劳改犯人□□□万人左右，与民争利事各地一定还有，如不检查纠正，类似安庆湖东县三星圩事件[1]，势必还要发生。为此通知你们，望加注意。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53年7月7日关于湖东县三星圩事件给安徽省委并山东分局、各省市委并报中央的通报中说，湖东县三星圩劳改队农场干部在当地发生水灾后，不但不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主动破堤放水，反而不顾群众死活，阻止破堤放水，乃至发展到劳改队看守鸣枪，造成流血事件。

对彭德怀谈话稿的修改意见[1]

（1953年7月27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

七月二十六日二十四时来电和简报均悉。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彭司令员既不出席签字，谈话稿可改在二十八日下午五时金首相告全国人民书发表后再行广播。现将此稿所做改动电告你们：标题应改为“彭德怀司令员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发表的谈话”，标题下应加注“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于朝鲜前线”。原稿第一段应改为：“朝鲜停战协定已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在板门店签字。自协定签字后十二小时起，在朝鲜的一切敌对行为已经完全停止，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了。”第五段原稿最后两句“现在谈判双方业已达成了光荣协议，签定了今天的停战协定”应改为：“谈判双方最后才达成了光荣协议，并在昨天签订了停战协定。”原稿第八段、第九段、第十段、第十一段的第一句“在停战协定签字的今天”，皆应改为“现在”两个字。

以上均望照改。具体广播时间二十七日晚电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三时半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关于朝鲜停战后空军作战等问题的批语[1]

（1953年7月27日）

照办。[2]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黄克诚1953年7月27日19时报告的批语。

[2] 黄克诚的报告说：空军司令部请示朝鲜停战后空军作战的有关问题，我们的意见，敌机如仍继续侵越北朝鲜及我东北领空，是敌破坏停战协议的行为，我则拟坚决给予歼灭打击。为此，我空军仍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战斗。报告还就空联司机构的撤销等问题提出建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图为彭德怀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3年7月27日，美军上将克拉克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3年7月29日）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1]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

---

[1] 指资本家对其企业的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

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1]。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2]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

---

[1] 这里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

[2] 李立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

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九万亿元[1]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

---

[1] 这里是按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九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给黄炎培[1]的信

（1953年7月30日）

任之先生：

临行一信，近日一信，均已收读。时局好转，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先生读马克思著作有心得，可为祝贺。天热，可在海滨多待一些时候。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卅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答谢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祝贺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电报

（1953年7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衷心感谢苏联各族人民和您们在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所表示的祝贺。

朝鲜停战的实现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所作的不懈努力，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束起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将与伟大的苏联人民、英雄的朝鲜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永远团结在一起，为巩固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的事业而继续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北京

给李济深[1]的信

（1953年7月31日）

任潮先生：

七月廿八日惠书[2]，并转来李玉麟、陈文运、丁锦、李炳之、张联棻五位先生的长信[3]一封，业已收读，甚为感谢，便时尚祈转达五位先生为荷！

顺致敬意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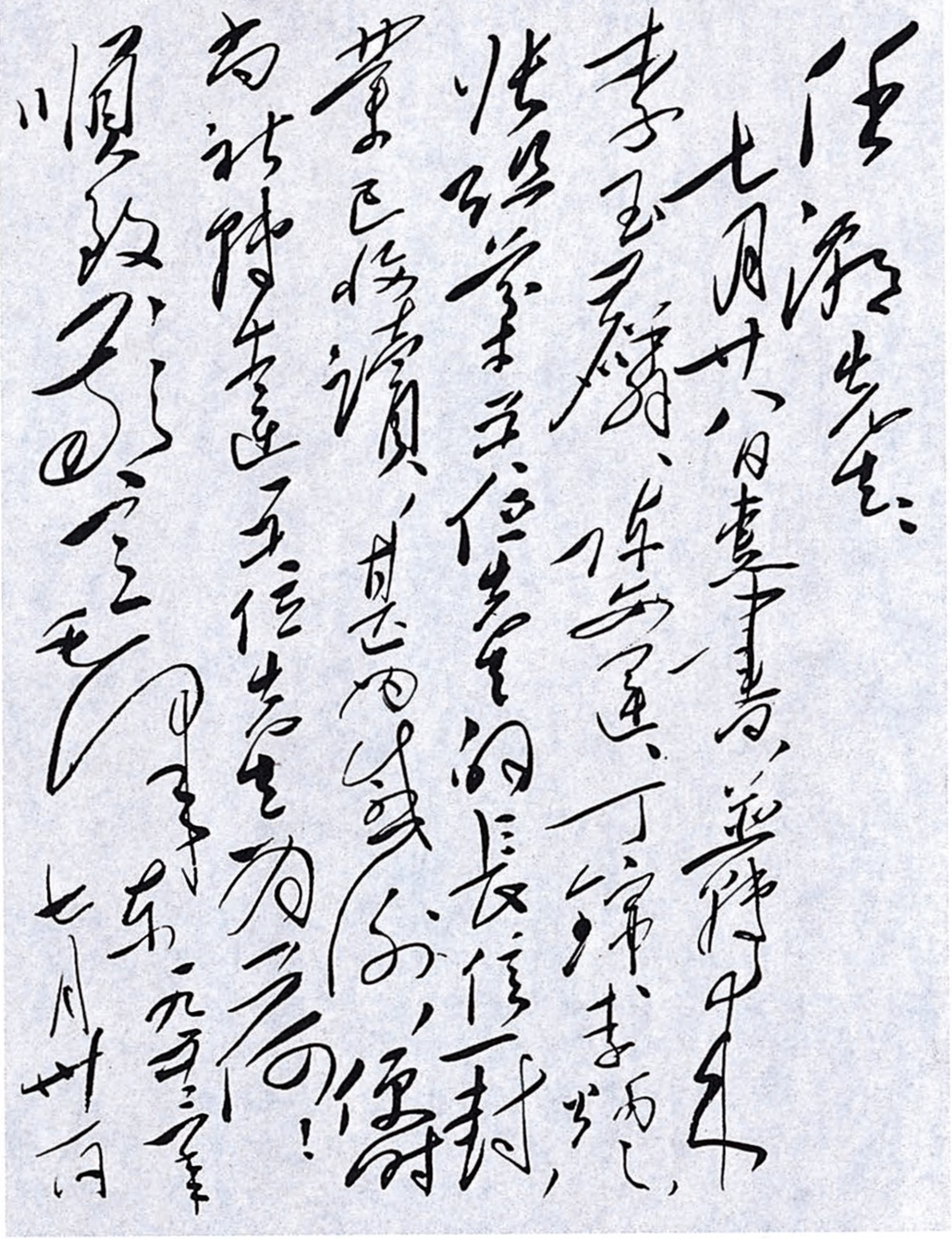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七月卅一日

---

[1] 李济深，字任潮，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2] 指李济深1953年7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兹有李玉麟同志等五人，都是我的旧同学、同事。去冬，主席着办失业军人就业，蒙主席照顾，他们都得派在各部服务，生活也得到安定，非常佩服和感激主席。迩届八一建军节，他们在无限感佩中，对于时事作野人献芹的贡献，托代转呈。"

[3] 李玉麟，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将军府戢威将军。陈文运，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库伦办事大员。丁锦，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陆军部参事。李炳之，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将军府祐威将军。张联棻，曾在北洋军阀时期任北洋政府参谋本部第三局局长。1953年八一建军节之际，他们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谈了他们对《共同纲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识和感想。



任潮先生：

七月廿八日惠書，並轉來李玉麟、陳安運、丁錦、李炳之、張難先等五人信，先生的長信一封，業已收讀，甚為感謝，尚祈轉達五位先生為荷！

順致

敬意

毛澤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卅日

毛泽东致李济深信的手稿。

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批语[1]

（1953年7月）

（一）通过两个文件[2]，由中央和政务院速发通知。

（二）鉴于今年情况，嗣后应依正式命令办事。

（三）应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党组1953年7月4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处理办法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除这3条批语外，毛泽东在报告上还批有“计时和计件”“适当照顾农民”“灾荒和朝战”等文字。

[2] 指中共中央1953年7月9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1953年7月30日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和年终双薪问题的宣传指示。中央指示中说，今年国内农村灾情相当严重，截至5月，受灾面积已达一亿一千多亩，灾民有4000余万人，须予以必要的救济；抗美援朝战争虽有暂时停火希望，但停战并不等于获得和平，志愿军还无法迅速撤回，国防费用还不可能有多大减少；加上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

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中央宣传指示中说：中央决定今年国营企业中不进行普遍的工资调整，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实行年休假制度，完全是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的。但是由于这些措施使工人群众的一部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不能得到满足，如果采取简单命令的方法来执行，一定会有许多困难。因此，必须依靠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来贯彻这些措施。只要向所有干部和工人群众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宣传解释工作，这些措施的执行就不仅不致引起工人群众的不满，而且能更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和劳动热情。

关于不要劝龙云[1]献出其公馆内浮财的批语[2]

（1953年8月2日）

不但不要劝他献出，他自己愿献，也不要接收，免处被动。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龙云，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齐燕铭1953年7月20日关于龙云在土地改革中的退押赔偿问题的处理意见中以下一段文字旁边：对龙云在其公馆"'震庄'内所存古玩珍藏汽车等浮财，云南省委统战部意见拟在其自愿原则之下，劝其献给政府。我们以为不动为好，他如愿自己出卖时听之"。

对黄克诚[1]关于英国商船要求我护航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8月4日）

请周[2]酌处。似只能这样办[3]。

毛泽东

八月四日

---

[1] 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周，指周恩来。

[3] 黄克诚1953年8月4日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说：据华东军区报告，现有英国轮船数艘因遭蒋军袭击逃至我福建闽江待避，英商要求福建军区护航并准予在我领海内航行。此事经我们考虑，似可通知有关部队，在这些商船遭到袭击，我舰艇和岸炮可能和有把握的情况下，可主动地予以支援。

在中央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通报[1]中加写的话

（1953年8月5日）

报告[2]中“一切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个人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均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改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改为“资产阶级思想”。

---

[1] 指中共中央1953年8月5日转发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张子意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基本总结的通报。

[2] 指张子意1953年6月25日在西南文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西南文委机关反分散主义斗争的总结报告。

总政转发中南军区党委关于召开高干会议检查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1953年8月5日）

各大军区、志愿军、各特种兵、各学院、各学校、各直属部门的党委会和政治部：

兹将中南军区党委会七月九日关于在该军区高干会议上检查工作的报告摘要[1]转发你们，其中所提出的问题，极为重要，是全军所共有的问题。请各军区、各兵种、各部门同样研究这些问题，并予以解决。中南解决问题的方针是正确的，各处均可参照执行。

军委总政治部

八月五日

---

[1] 指中共中南军区委员会1953年7月9日关于在高干会议上检查工作的情况给毛泽东并军委、总政治部、中南局的报告的摘要。摘要中说，为了总结与解决反官僚主义斗争中提出来的一些问题，用以提高领导、教育干部、改进工作、改善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和上下级关系，军区召开了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意见是：（一）关于连队工作忙乱与领导问题。造成连队工作忙乱，除工作安排的原因外，还有领导机关作风的问题，即加重连队负担的所谓“五多”（临时任务

多，会议多，指示文件多，向下面要的书面报告、表册统计多，连队组织形式多）。这是各级机关部门不明了下情的一种通病。因此，解决连队的忙乱问题，必须从克服机关部门的主观、片面、急躁，改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着手。（二）关于老战士问题。老战士是连队的骨干，可是现在对待老战士的态度很不好，有错误不教育，进行讽刺打击，有的因年龄大不提拔，不吸收入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对老战士须有一个适宜而积极的政策，使其发挥积极性，成为新兵中传统作风的传播者。对老战士的复员应有计划地分批实施。（三）关于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在工农战士中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风气虽然已经消失，但在干部与领导机关里却没有完全解决，对知识分子仍存有成见，盲目的不予信任。对此已指示各部检查纠正。（四）关于自杀和思想斗争问题。许多领导机关对待自杀事件是很不严肃的，只从自杀者方面找原因，不从领导方面找原因，所以得不出真正的经验教训。通过这次会议的检讨，得出以下几点：第一，对落后分子，要采取循循诱导、逐步改造的方针，不可操之过急。第二，要爱护病人，给病人以关心体贴与勤勤恳恳的照料，反对冷酷无情。第三，对待机关人员中一些不合婚姻法规定的男女间的恋爱关系，要采取适当的办法去处理，不可强行拆散或开会斗争。第四，要使连队干部学会运用思想斗争这个武器去进行思想教育，注意方式和效果。（五）关于军民关系、军队与地方关系问题。部队解除工作队的任务后，同人民同地方的关系逐渐疏远，过去的一些好的制度事实上已经取消或接近取消。必须在部队经常进行依靠人民爱护人民的教育；定期检查纪律，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经常同地方机关联系，征询和听取他们对军队的意见；农忙季节要以必要人力帮助农民劳作。

对周恩来关于中德贸易问题复格罗提渥[1]的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8月10日）

一

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日

加了一句[2]，请考虑是否可以？

二

只是我们感觉帮助的数目太小，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有许多困难，不能以更大的数目帮助你们的缘故。

---

[1] 格罗提渥，当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2] 即本篇二。这句话加在周恩来信中以下一句话之后：“为了中德人民的友谊，为了战胜美国帝国主义和西德法西斯匪徒给德国人民造成的暂时困难，我们认为帮助德国人民是我们的责任，并引以为荣。”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

（1953年8月）

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二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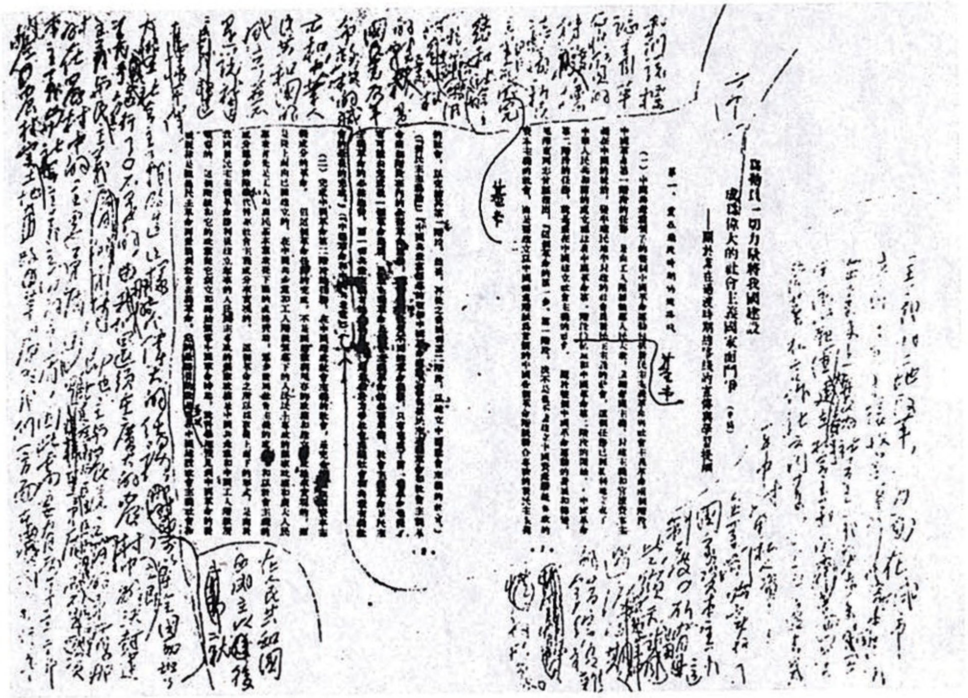
---

[1] 本篇一是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这个表述出现在周恩来1953年8月11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中。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的上述结论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三是毛泽东在修改《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三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毛泽东修改过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手稿。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

（1953年8月12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周总理的结论也作得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如“五多”，大家都可能犯，什么时候都可能犯。“五多”的错误也可以变成“五少”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

“三反”“五反”运动，是对党内资产阶级思想的很大打击。但是，当时仅仅给了贪污浪费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基本打击，而对在路线问题上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解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

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

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1]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就思想状况来说，党内有三种人：有的同志是坚定的，没有动摇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一部分同志，基本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夹杂着一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少数人是不好的，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对薄一波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样的批判才是对的。我们说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党内的反映，那是在和资产阶级决裂时期发生的。在和资产阶级合作的三个时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目前这个时期，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党内一部分人，他们动摇了。薄一波的错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犯的。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在全国加以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

---

[1] 张子善，曾担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由于受资产阶级腐蚀，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

“三反”[1]，都是地方上先搞的。中央各部乱发指示。本来中央各部发出的东西，应当是上品，现在是次品，并且有大量产品根本没有使用价值，大批报废。大区和省市的领导机关，是制造思想产品的地方工厂，也要出上品。

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我们依靠谁？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产阶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早已讲清楚了：“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决议还说，在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上，必须确定：国营工业生产第一，私营工业生产第二，手工业生产第三。重点是工业，工业中的重点是重工业，这是国营的。在我国目前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逐渐引向国家资本主义。

二中全会决议讲，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不注意这一点，薄一波就是代表。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发展生产上，但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二者必须兼顾。福利不可不谋，不可多谋，不谋不行。现在，不顾人民生活，不顾人民死活的干部还不少。贵州有一个团曾经占了农民的大量田地，这是严重侵犯人民利益的行为。不顾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重点还是要放在生产建设上。

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问题，二中全会也讲得很清楚。决议上说，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要从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不能任其泛滥。社会主

---

[1] 老“三反”，指1951年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新“三反”，指1953年开展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

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限制和反限制，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现在，新税制讲“公私一律平等”，这就违背了国营经济是领导成份的路线。

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二中全会决议分明说：“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上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这是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当作新闻，其实是旧闻。薄一波写了《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他说：个体农民经过互助合作到集体化的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经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这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现在有两种统一战线，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这是基础。一种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农民是劳动者，不是剥削者，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是长期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农民是有矛盾的。我们应当按照自愿的原则，把农民由个体所有制逐步引导到集体所有制。将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

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当时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不赞成，轻工业部也不满意。财经贸易系统的一百一十万干部和职工，绝大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是不好的。这些不好的人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清除；一部分是犯错误的革命者，包括党员和非党工作人员，应当用批评教育的方法来改造他们。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

我们现在要反对主观主义，既反对盲目冒进的主观主义，也反对保守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犯过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右的也有“左”的。陈独秀、张国焘是右的，王明是先“左”后右。延安整风的时候，集中反了教条主义，附带反了经验主义，二者都是主观主义。理论与实际不结合，革命就不能胜利。整风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正确的。这次对薄一波实行坚决的彻底的批评，是为了使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行。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有主观主义。急躁冒进或保守，都是不按实际情况办事，都

是主观主义。不反掉主观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会成功。民主革命时期，对主观主义的错误，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了，团结了全党执行正确路线的同志和犯过错误的同志，大家从延安出发，奔赴各个战场，全党一个劲，取得了全国胜利。现在，干部比较成熟了，水平提高了，希望不要用很长的时期，基本上把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掉，努力使主观与客观相适合。

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是巩固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我们历来是反对分散主义的。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中央给各中央局、各将领发出指示，规定凡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必须事先请示中央。五月间，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对外宣传的指示。同年七月一日，在纪念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着重反对分散主义。一九四八年，中央发的反对分散主义的指示更多了。一月七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三月，又发了补充指示。同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作了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九月二十日，中央作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中央作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

集中与分散是经常矛盾的。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比如，在天安门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拆除北京城墙这些大问题，就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次要的问题，可以由政府部门的党组去办，一切问题都由中央包下来就不行。反对分散主义，是最得人心的，因为党内大多数同志是关心集体领导的。对待集体领导的态度，党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关心集

体领导。第二种人不甚关心，认为党委对他最好不管，管也可以。“最好不管”是缺乏党性，“管也可以”是还有党性。我们要抓他“管也可以”，对缺乏党性要说服教育。不然，各部都各搞各的，中央管不了各部，部长管不了司局长，处长管不了科长，谁也管不了谁，于是王国甚多，八百诸侯。第三种人是极少数，他们坚决反对集体领导。认为最好永远不管。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强调要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多数服从少数，这个少数是代表多数的）。有意见请提，破坏党的团结是最没有脸的。只有靠集体的政治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保证党的队伍的不可动摇的团结一致。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最后一点，要提倡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

要坚忍。如抗美援朝，我们打痛了美帝国主义，打得它相当怕。这对我们建设有利，是我们建设的重要条件。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军队受到了锻炼，兵勇、干智。当然，我们牺牲了人，用了钱，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们就是不怕牺牲，不干则已，一干就干到底。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我们的县城只剩下一个，但我们并没有退出边区，吃树叶就吃树叶，就是要有一股狠劲。

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中国是大

国，党是大党，也没有理由看不起小国小党。对兄弟国家人民要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要有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对外贸易方面，有些人骄傲，妄自尊大，这是不对的。要在全党特别要在出国人员中进行教育。要苦学苦干，在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那时，我国强大了，也要谦虚，永远保持学习的态度。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总之，要坚持谦虚、学习和坚忍的精神，坚持集体领导的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的胜利。

为祝贺朝鲜解放八周年致金科奉电

（1953年8月12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同志：

值此朝鲜解放八周年之际，请接受我对全体朝鲜人民及您的衷心祝贺。

祝战胜了美国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英雄的朝鲜人民，在努力防止侵略战争之再起和建立和平、统一、独立的新朝鲜的事业中获得伟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于北京

在中央给罗贵波、邓一凡[1]的电报稿上的批语

（1953年8月14日）

退王稼祥[2]同志照发。第三条中的一句[3]，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

八月即日

---

[1] 罗贵波，当时任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邓一凡，当时任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副团长。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3] 中共中央1953年8月14日给罗贵波、邓一凡的电报稿第三条中这句话的原文是：“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毛泽东审阅时将这句话中的“恩格斯”“斯大林”“及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

在刘景范[1]来信上的批语

（1953年8月16日）

高岗[2]同志阅，退刘景范同志。

对此人[3]要慎重。这类一贯不满我们的人各地都有，如此人没有秘密活动，只是公开表示他的反动意见，还宜先从教育入手，批判他，孤立他。此外，周总理的意见[4]是值得注意的。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

[1] 刘景范，当时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2]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 指刘景范1953年7月20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信中谈到的给监委写信的吉林省工业厅某职员。信中说，该职员在信内肆意诽谤和污蔑我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无理要求，显系反革命分子的恶意攻击和破坏活动。据了解，该职员过去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解放后一贯对共产党不满，拟与公安部协商查处。

[4] 周恩来在刘景范来信上批的意见是："景范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但此人敢于公开来信，除你所谈的政治背景外，还须注意到他所说某些具体事情，特别显著的是吉林省工业厅管理下的三个从上海迁过去的公私合营工厂问题。"

给叶恭绰[1]的信

（1953年8月16日）

誉虎先生：

承赠清代学者画像一册，业已收到，甚为感谢！不知尚有第一集否？如有，愿借一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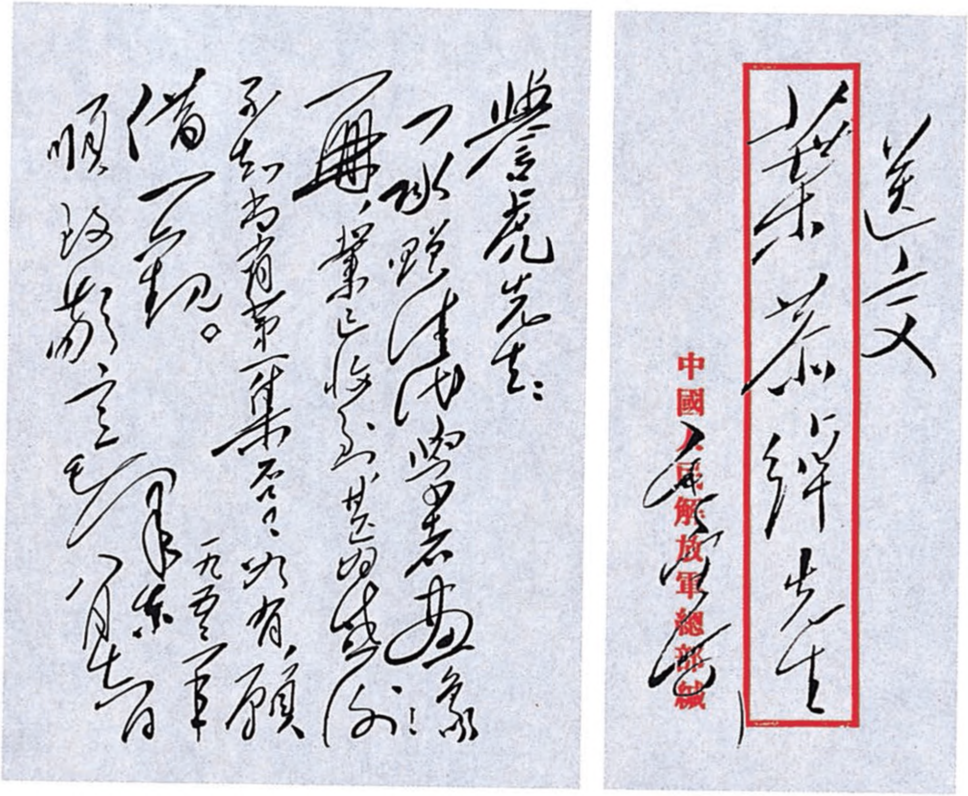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六日

---

[1] 叶恭绰，字誉虎，当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



誉虎先生：

一函暨清代學者象傳，業已收到，甚為感謝！承示尚有第二集，如有，願借一觀。

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日

送交

葉恭綽先生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緘

毛澤東

毛泽东致叶恭绰信的手稿和信封。

关于海军执行运粮任务问题[1]

（1953年8月17日）

劲光同志：

八月七日电[2]悉。健康情况好转并已开始工作，甚慰。

关于五舰队运粮任务减免问题，经海司[3]、粮食部、交通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后，已本兼顾救灾和海军建设的原则予以解决，即海军在长江中下游运粮的舰艇，再运输一次即解除运粮任务；现在上游尚能担任运粮任务的舰艇，须继续运粮至八月底始可解除运粮任务。以上除已通知有关单位执行外，特告。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电报。

[2] 指肖劲光1953年8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据华东海军报告，他们以五舰队全力担负运粮任务。因为船只损坏严重，华东海军要求将剩余的重庆到宜昌段一万余吨运粮任务减免。请主席考虑，如果情况许可，减免此任务甚好。

[3] 海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

对“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口号的意见[1]

（1953年8月21日）

但在指出“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时，不要使工人们觉得今后好像只要生产，不要福利了，而要说明这句话不如“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这样说较为确切些。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引用毛主席或中央其他负责同志言论应注意事项的规定》时加写的一段文字。1953年7月22日，中国公路运输工会主席、全总执行委员安力夫给全国总工会党组并中央写信，提出用传为毛泽东讲的“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的口号，来表明生产与福利、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是不够完整不够确切的，提议用“要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来代替这种说法。7月30日，全总党组就此向毛泽东并党中央请示。中央为此做出了上述规定。规定中说：“‘生产长一寸’这句话，毛主席是说过的，而‘福利长一分’这句话，则是别人加上去的，把这两句话连接起来，编成口号，把它当作全是毛主席讲的，加以引证，乃是一种在政治上不严肃的表现。”毛泽东加写的文字紧接在这段文字之后。

征询对告我方被俘人员书的意见[1]

（1953年8月22日）

金首相：

兹发上告我方被俘人员书草稿[2]，准备于九月中旬以后由我方解释工作代表带往战俘被看管的地点，发给我方不直接遣返的被俘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名义发给朝中方面不直接遣返被俘人员的公开信草稿内容是：“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的同志们：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对方谈判中，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一贯坚持在停战后你们有返回各自祖国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权利，并曾于1952年4月6日发表声明，完全欢迎你们回到祖国怀抱。现在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你们返回祖国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容威胁你们并阻挠你们实现返回祖国的愿望。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对于祖国的想念和被俘后的不幸遭遇。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过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或有其他类似行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你们的自愿，不应由你们自己负责。我们特此郑重负责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在对方战俘营中有何种上述行为，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一切归国人员，均将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度过和平生活。兹派代表前来慰问你们，通知你们返回祖国的有关事项，并迎接你们返回祖国。我们和朝中两国全体人民都在关怀着你们，切望你们归来。”

人员。如您同意此稿，请即电复，以便印好备用。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给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1]

（1953年8月26日）

军事工程学院陈院长[2]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当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顾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对于我国的国防事业具有极重大的意义。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

[2] 陈院长，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陈赓。

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

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办好学院，尊重顾问，努力学习，为完成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给予你们的光荣任务而奋斗！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对中央转发陕西省委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

（1953年8月27日、30日）

一

少奇同志：

此件[2]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二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

陕西省委关于一九五三年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传达的报告很好，特转发给各地党委参考。中央八月二十八日紧急指示[3]中曾规定关于全国财经会议的传达，时间要短，三天至五天就够，至于详细讨论及检讨本地财经工作，应在春节前后去做。所谓春节前后，

时间是很宽裕的，各地可以自行规定适当时间，以不妨碍今年工作为原则。

中央

一九五三年八月三十日

---

[1] 本篇二是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传达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指中共陕西省委1953年8月22日关于传达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精神给马文瑞并西北局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8月20日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了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向下传达的内容、方法步骤和时间问题：（一）传达的内容，确定以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和几个问题的决议草案为限。（二）在方法上，根据财经会议精神，联系我省实际情况，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出今后意见。在步骤上，首先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进行传达，组织阅读文件，进行综合讨论，然后由省委委员分工主持，分为若干小组，联系文件精神检查工作。而后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进行传达，以便由下而上进一步检查工作，解决存在问题。（三）关于传达时间，省委扩大会议拟于8月25日开始；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拟在10月下旬召开。

[3] 指中共中央1953年8月28日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

给李漱清[1]的信

（1953年8月27日）

漱清先生：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乡间情形，便时尚希告我一二。并望保重身体。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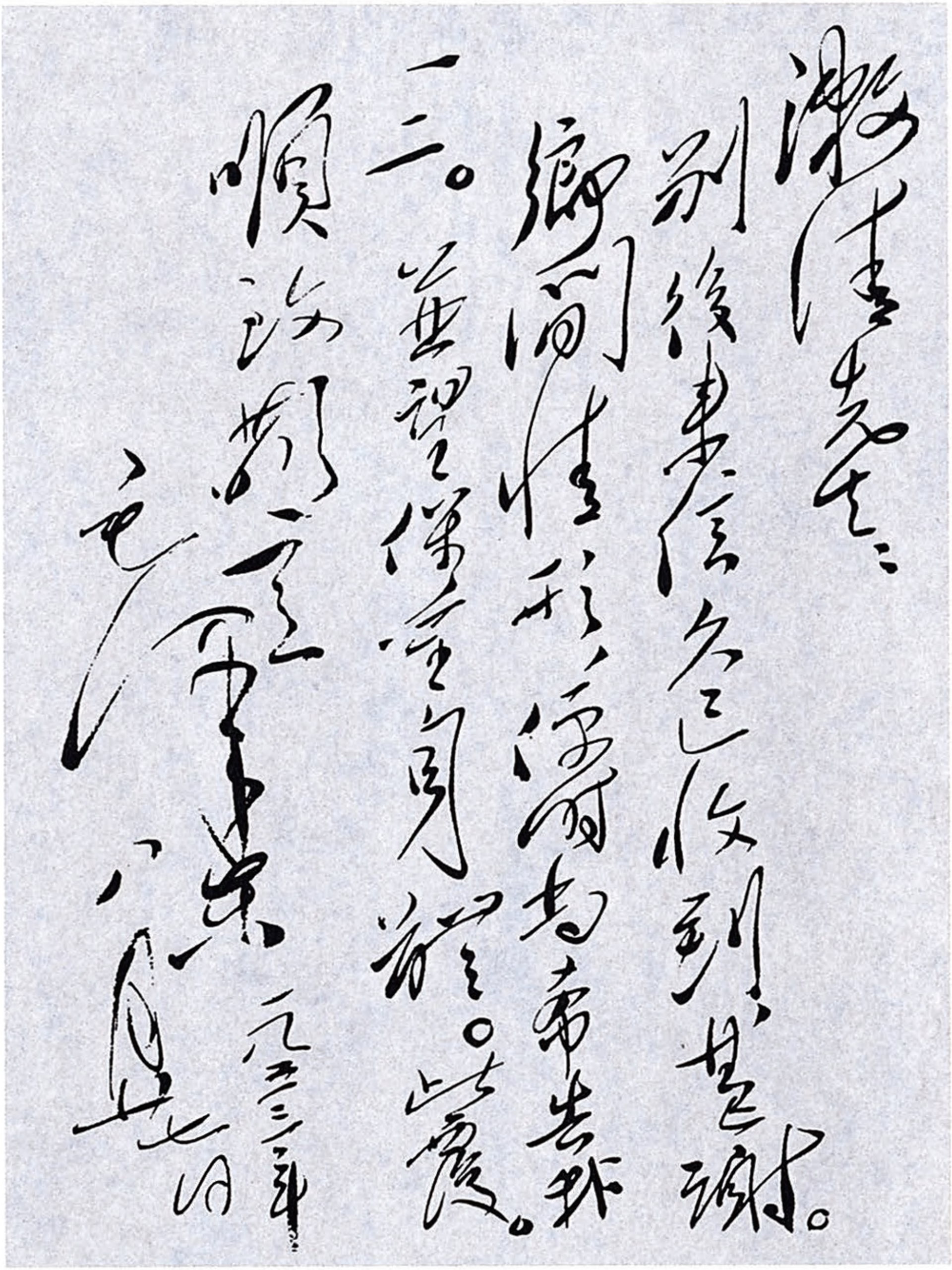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

[1]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漱清先生：

别後來信各已收到，甚謝。鄉間情形，仍請時常告我一二。並望保重身體。此覆。

順頌期安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八月七日

毛泽东致李漱清信的手稿。

给毛宇居[1]的信

（1953年8月27日）

宇居兄：

别后来信久已收到，甚谢。尊恙已愈，甚慰，尚祈注意珍摄。乡间生产、贸易、公粮等项情形，暇时望告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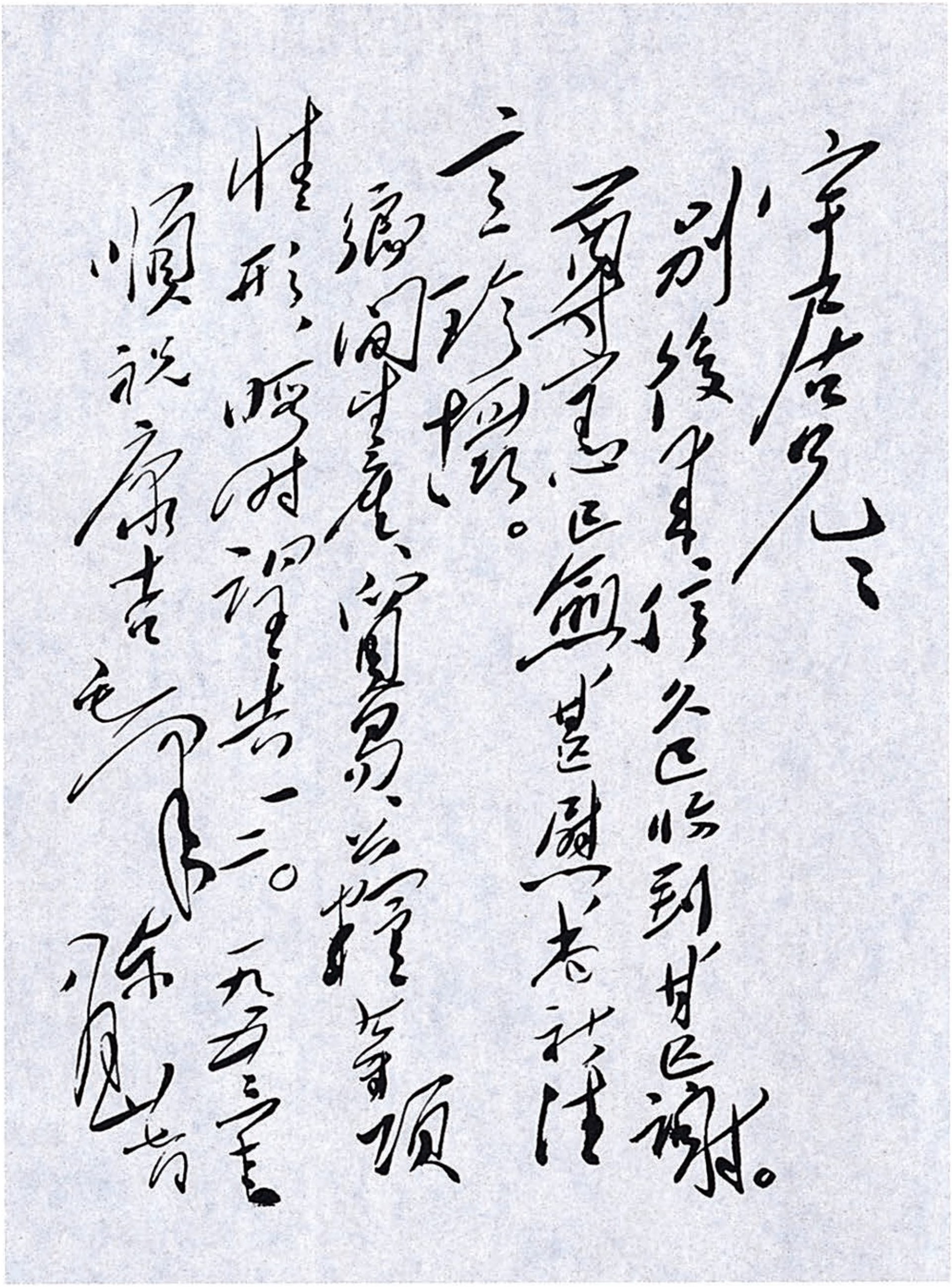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宇居兄：

別後來信久已收到，甚謝。前寄書已領，甚慰。老者社請之珍攝。鄉間生產、貿易、公糧等項情形，暇時望告一二。

順祝康吉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

毛泽东致毛宇居信的手稿。

给邹普勋[1]的信

（1953年8月27日）

普勋兄：

前后数信，均已收到。

托件办妥，甚慰。

你的病宜静养，不宜劳作，望加注意。

致李漱清、毛禹居[2]两位的信，烦便时转交为盼！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七日

---

[1]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

[2]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毛禹居，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在审阅中央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稿时加写的话

（1953年8月28日）

中央各部委党组与各级党委，收到本指示后，望在十天内传达到各有关系统一切适当单位的负责同志，使他们一体知晓坚决执行，并望从九月十五日起，每半月将执行情况扼要上报中央一次，今年共须有七次报告。

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1]

（1953年）

缩短主观主义时间的办法

（1）批判分散主义，实行集体领导。

（2）将各财经、文教、政法部门一个一个列入议程，加以讨论，作出决定，每次都要有简的文件，每年每一部讨论两次。

（3）主要干部亲到现场检查工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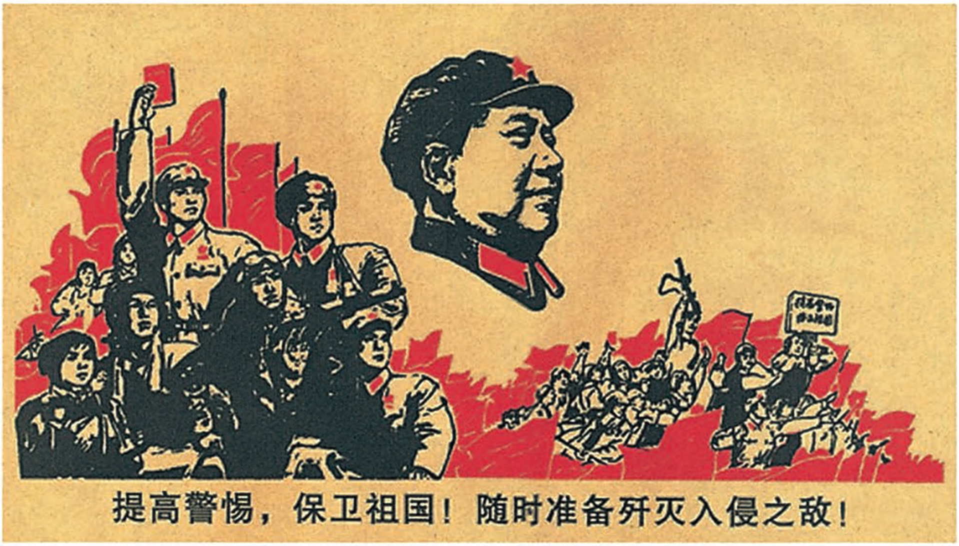
[1] 初步分析，毛泽东这篇手稿写于1953年6月至8月全国财经会议期间。

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1]

（1953年8月）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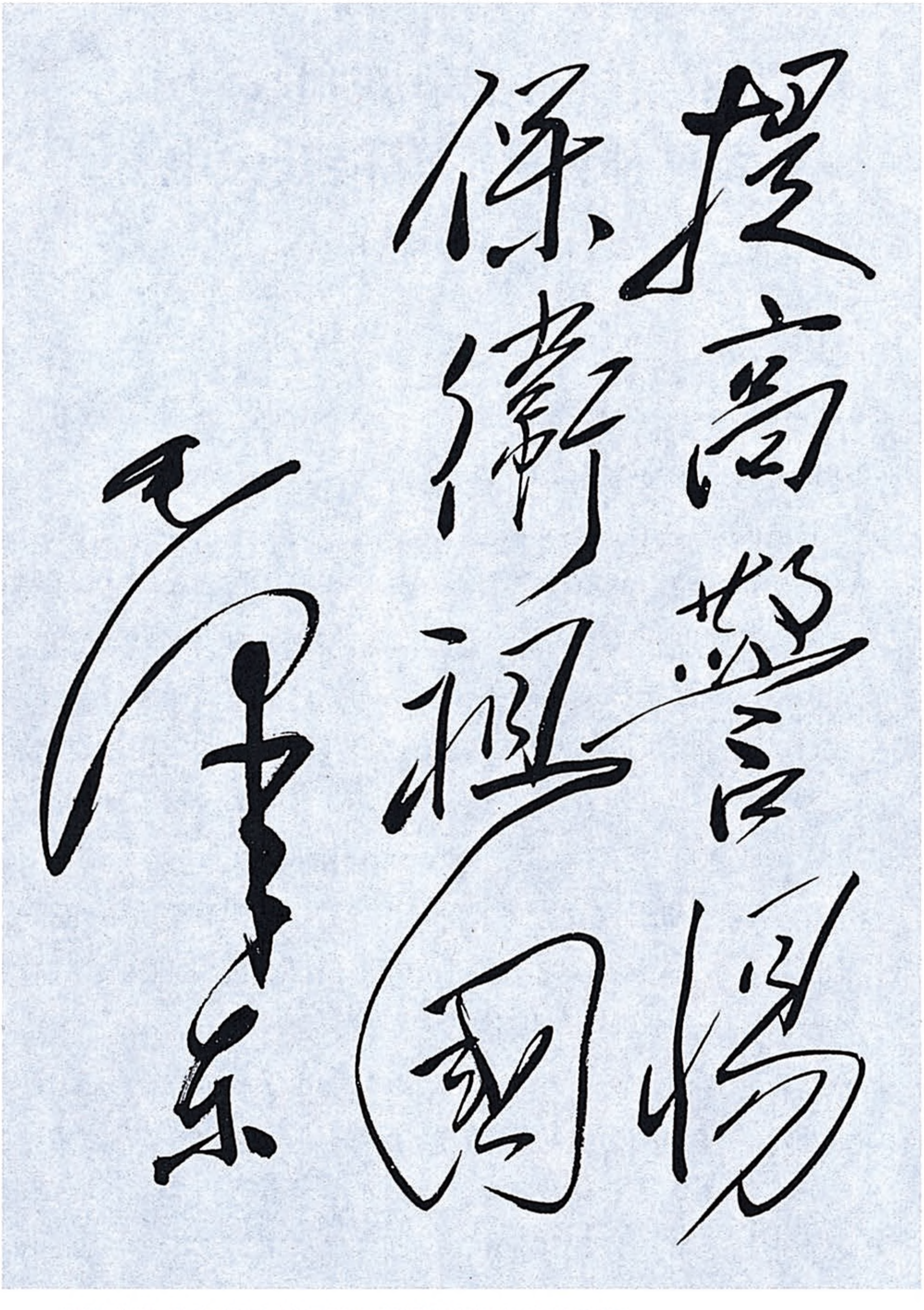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宣传画）

---

[1] 这是毛泽东为1953年8月10日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的词。



提高警惕

保衛祖國

毛澤東

毛泽东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的题词。

为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八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

（1953年9月2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当此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武装部队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艰苦战争中以及在最后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自始至终获得了苏联人民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因为苏联武装部队的参战，和中国人民一起，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苏联牢不可破的友谊已经并正在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伟大的友谊现在已成为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坚强保证。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的，就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帮助，乃是中国经济迅速恢复和走上有计划建设道路的重要因素。

最近，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显然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新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新的重大的成就。这一新的重大的成就业已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开始和缓，同时，也将有助于日本人民要求与远东各国建立正常关系的努力，以便防止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之再起。

中苏两国在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事业中永久合作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日于北京

对陈云[1]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六次会议上的报告要点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9月4日）

一

预算的收支基本仍是正确的。[2]

二

政策与任务必须一致，此点继续执行不变。[3]

三

但是所谓工业为重点，并不是说对目前的民生不加照顾，相

---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2] 这个批语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关于财政预算方面的错误、缺点”一段文字的上方。

[3] 这个批语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关于修正税制办法中的错误”一项的上方。

反，是应当照顾的。[1]

四

有什么阶级存在，就有什么阶级的思想。[2]

五

我们的一切工作，围绕一个总目的，这就是要达到：在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正确地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过程中，稳步地完成过渡时期建设和改造我们国家的伟大任务，即是说，我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须要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只要我们大家了解，做法适当，我们是有信心逐步地完成这个任务的。[3]

---

[1] 这段文字，加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以下一段话之后："目前的重点是只能放在国家工业建设，只有走这条路，达到改善民生的目的会更快些。"

[2] 这段文字，加写在陈云报告要点中以下一段话之后："这并不是否认目前存在着的中国资产阶级有他们自己一套的资产阶级思想。"

[3] 这段文字，加写在陈云报告要点的末尾。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953年9月7日）

（1）过去三年多，做了一些工作，但忙别的去了，用力不多，现在起要多做些工作。

（2）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

（3）《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1]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4）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

（5）公私合营、全部出原料收产品的加工订货和只收大部产品，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私营工业方面的三种形式。

---

[1] 《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6）〔私营〕商业亦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这方面经验较少，尚须研究。

（7）占有大约三百八十万工人、店员的私营工商业，是国家的一项大财富，在国计民生中有很大的作用。私营〔工商业〕不仅对国家供给产品，而且可以为国家积累资金，可以为国家训练干部。

（8）有些资本家对国家保持一个很大的距离，他们仍没有改变唯利是图的思想；有些工人前进得太快了，他们不允许资本家有利可得。我们应向这两方面的人们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地（争取尽可能快些）适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即使中国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部分地是为资本家谋利的——这样就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了。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有一个表：

所得税	34.5%
福利费	15%
公积金	30%
资方红利	20.5%
〔总计〕	100.0%

（9）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10）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11）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在过去几年中已有很大的进步，相信再有三年至五年，这种进步将更

大，所以三年至五年内基本上完成将私营工商业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有可能的。国营企业的优胜，则是完成这一任务在物质方面的保证。

（12）没有所谓“小五反”，也没有所谓“突然”，这点应当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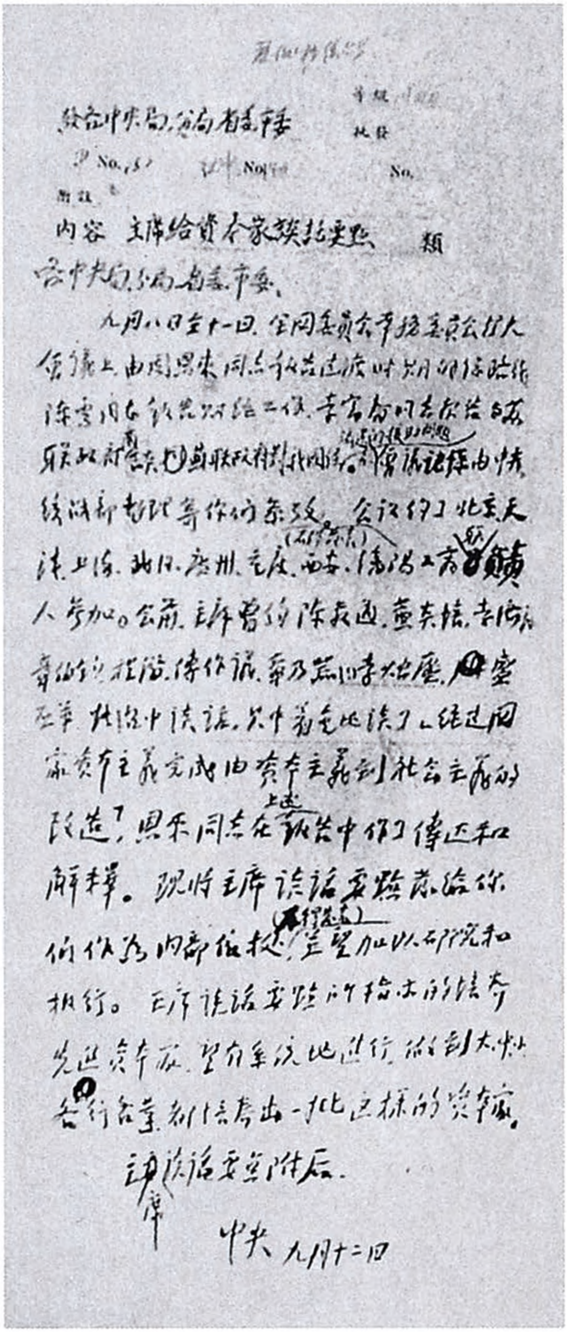
（13）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4）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1]，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

（15）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

---

[1]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从走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来说的。



[illegible]

发给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　　等级 [illegible]

机号

No.　　No.　　No.

附注

内容　主席给资本家谈话要点　　类

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

九月八日至十一日，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同志报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陈云同志报告财经工作，李富春同志报告苏联对我国[illegible]的问题，李维汉同志报告统战部[illegible]等条改。会议除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重庆、西安、沈阳工商界负责人参加。会前，主席曾约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illegible]、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illegible]在丰泽园中谈话，其中着重地谈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周恩来同志在上述报告中作了阐述和解释。现将主席谈话要点发给你们，作为内部文件（不得登报），望加以研究和执行。主席谈话要点所指出的请各先进资本家，望有系统地进行，做到大、中、各行各业都培养出一批这样的资本家。

主席谈话要点附后。

中央　九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批发的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谈话要点通知。

给文涧泉[1]的信

（1953年9月8日）

涧泉兄：

惠书收到。

承告乡情，甚谢。

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2]求学事，我不便介绍，应另想法。此复。

顺祝康吉，并候各戚友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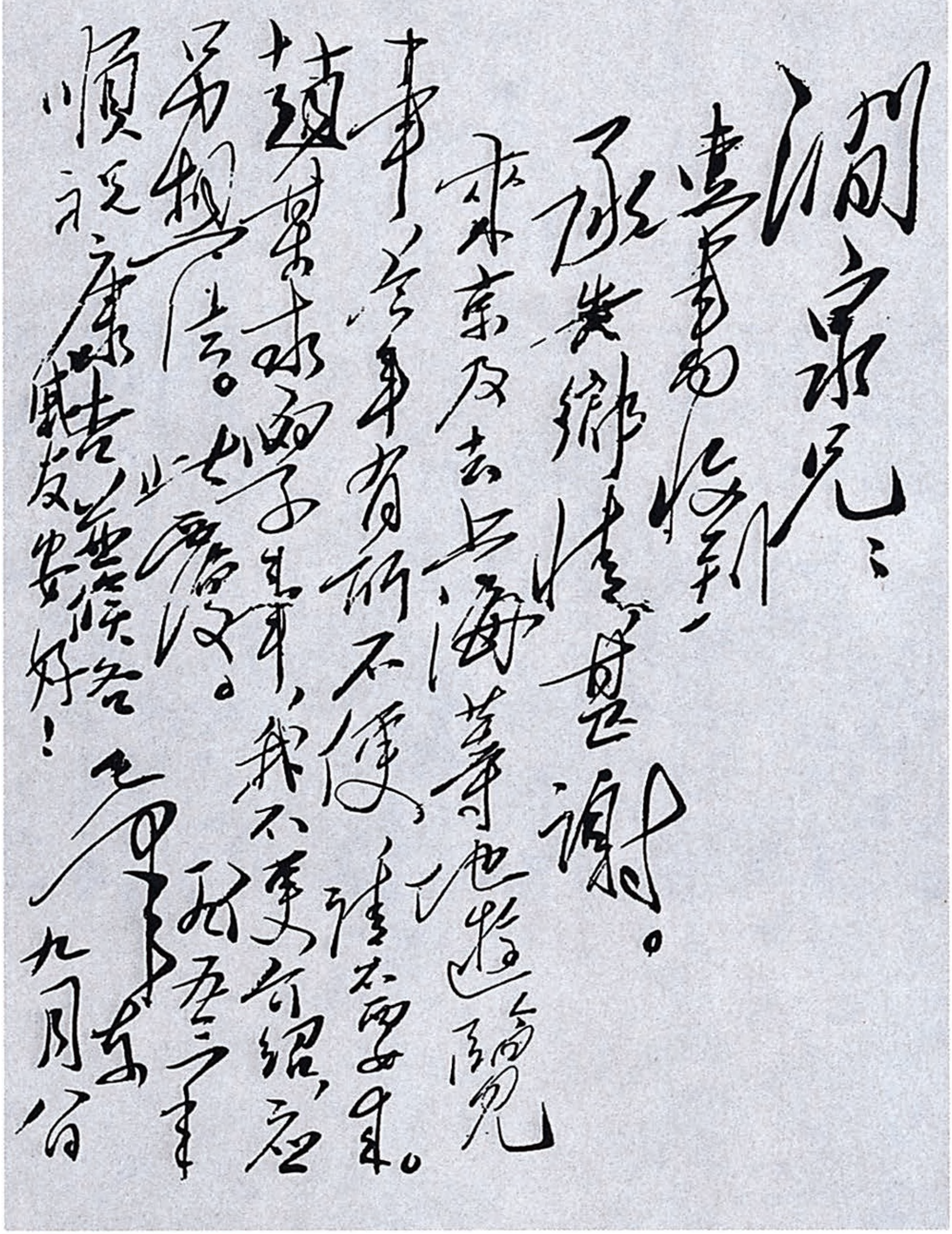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

[1] 文涧泉，毛泽东的表兄。

[2] 赵某，可能是毛泽覃的妻子赵先桂的亲属。



涧泉兄：

惠书收到，承告乡情，甚谢。来京及去上海等地游览事，今年有所不便，请不要来。赵某求两学生事，我不要介绍，应当相信。此覆。顺祝康吉，并候各戚友安好！

毛泽东

九月旬

毛泽东致文涧泉信的手稿。

1953年，毛泽东和外祖文家表兄嫂等在中南海合影。

给张四维[1]的信

（1953年9月8日）

四维兄：

八月十七日的信收到。

有成[2]兄病逝，深为悼念。

你来京事，今年仍不要来，将来再说罢。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

[1] 张四维，毛泽东少年时的邻居。早年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农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省盐务运销局工作。

[2] 有成，即张有成，张四维的表兄。早年曾同毛泽东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农民运动。1952年在湖南逝世。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报告提纲

（1953年9月）

英雄的人民战争。

（1）能不能打？（2）能不能守？（3）能不能保证供应？（4）能不能打败细菌战。

胜利：（1）三八线；（2）军事经验；（3）政治觉悟；（4）推迟了大战的时间。如敌人再要打，我们现在就更可以打了。

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

死人，用钱。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1]

（1953 年 9 月 12 日）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了。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

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今后，敌人还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种办法来捣乱，比如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他们在台湾、香港和日本这些地方，都设有庞大的特务机构。可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经验，只要发动群众，依靠人民，我们是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的。

我们现在的情况，同一九五〇年冬季的情况不同了。那时候，

美国侵略者是不是在三八线那边呢？不是，他们是在鸭绿江、图们江那边。我们有没有对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经验呢？没有。对于美国军队熟悉不熟悉呢？不熟悉。现在这些情况都变了。如果美帝国主义不推迟新的侵略战争，他说，我要打！我们就用前三条对付他。如果他说，我不打了！那末我们就有了第四条。这也证明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我们是不是去侵略别人呢？任何地方我们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打仗要用钱。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当然，能够不打仗，不用这些钱，那就更好。因为现在建设方面要用钱，农民的生活也还有困难。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点，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说话了。他们要求“施仁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似的。我们赞成不赞成这种意见呢？我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就是因为抗美援朝要用钱。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

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

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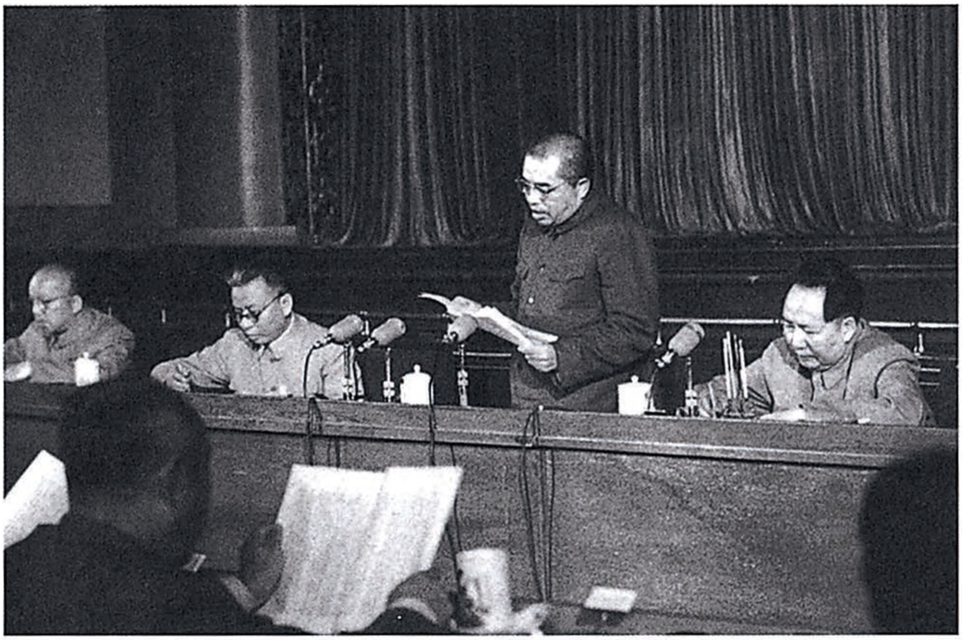
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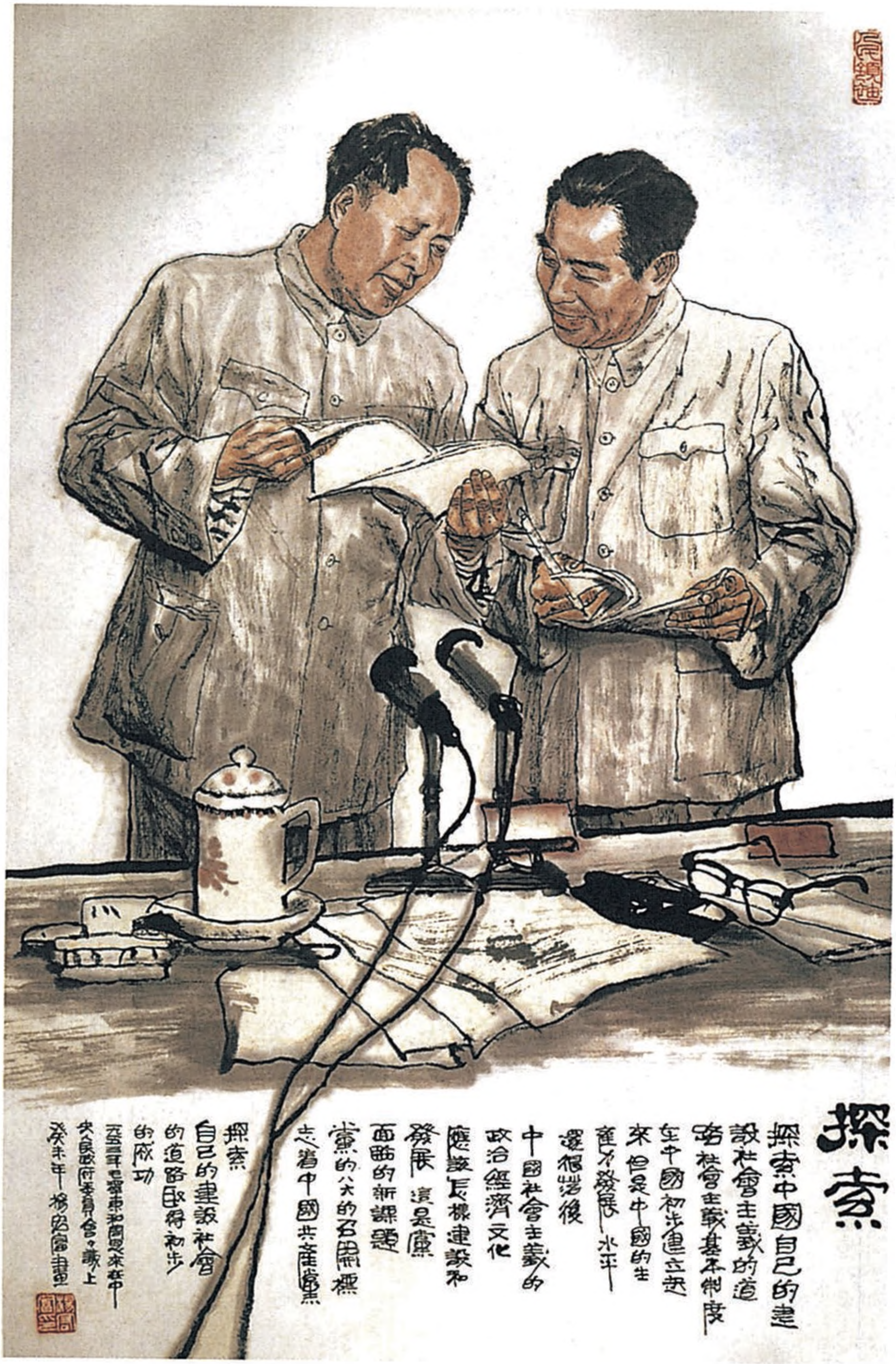
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

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

1953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探索
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 但是中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落後
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應該怎樣建設和發展 這是黨面臨的新課題
黨的八大的召開標誌着中國共產黨探索自己的建設社會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功
五三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
癸未年 楊留富畫

《探索》（中国画）

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1]

（1953年9月12日）

彭德怀司令员并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了彭德怀司令员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辉煌战绩及在这个基础上坚持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并获得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表示完全满意。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们在这一正义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并对你们致热烈的祝贺和慰问。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正在美国侵略军大举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逼近我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地开往朝鲜，支援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国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在两年零九个月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承着祖国人民的意志，与朝鲜人民军一道，在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援之下，在以伟大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各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同情和支持之下，顽强战斗，坚持谈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疯狂侵略，揭露了敌人残暴好战的真面目，使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道义上都遭受了严重失败而不得不接受停战。中国人民志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慰问电。

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业绩，树立了中朝人民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榜样，表现了我们和平民主阵营的坚强团结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尊敬和赞誉。

朝鲜停战的胜利，根本粉碎了美国帝国主义并吞全部朝鲜进而侵略我国东北的狂妄计划，保卫了中朝两国及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打败了侵略者的凶焰，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中国人民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及其军队一道，以自己的胜利的榜样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阴谋是必须击败和能够击败的；只要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侵略战争，坚持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争端，那么，和平就一定能够得到保证。

朝鲜停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运动的胜利。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还只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问题在朝鲜人民自己处理自己问题的精神下的和平解决，尚有待于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去协商解决。中国人民是一贯主张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人民愿为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做坚强的后盾。

鉴于美国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正在进行着种种预谋，企图阻挠和破坏政治会议，并进一步破坏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体同志必须提高警惕，继续努力，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加强战斗力量，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更紧密地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坚守阵地，防止来自对方的任何侵袭和挑衅行动。

全国人民将以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继续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将尽力来帮助英雄的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平生活。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在祖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之下，必能不负祖国人民的期望，为保障朝鲜停战协定的彻底实施，为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为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久友谊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

1953年9月，毛泽东和李讷一起赏荷花。

1953年9月，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扑克牌。

关于感谢苏联政府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电报[1]

（1953年9月15日）

一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举行的会议上，满意地听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代表李富春同志所作的关于与苏联政府商谈苏联政府对我国经济建设援助问题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中国的九十一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五十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的和技术的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电报，对苏联政府援助我国经济建设表示感谢。本篇二是毛泽东给张闻天的电报。

两个国家在一次商谈中解决了九十一个企业的建设问题，解决了长期的援助问题，这在历史上是创举，完全体现了伟大的斯大林所说的真理："这个合作的经验表明，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能像苏联那样给予各人民民主国家以真正的帮助和技术精湛的帮助。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帮助是极度便宜的，技术上是头等的。问题首先在于这种合作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

在商谈过程中，苏联政府根据它三十多年来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对于我国五年计划任务提出了各项原则的和具体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这种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愿以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来加强苏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和友好同盟，以利为世界和平事业的共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于北京

二

张闻天[1]同志：

今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以我的名义致马林科夫同志关

---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于感谢苏联政府援助我国建设问题的电文，现随电发去。请你面见马林科夫同志，并以中文为正本，俄文为副本亲递上述电报，以资郑重。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五日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

（1953年9月16日至18日）

（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的批判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1953年9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

什么“中国没有阶级”，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进步在哪里？他哪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

---

[1] 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数人是哪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哪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1]，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

---

[1] 参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周座谈会去讨论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

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1]“三盈三虚”[2]“三月而诛少正卯”[3]，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共产党及其他）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4]。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哪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

---

[1] 参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 参见王充《论衡·讲瑞》。

[3] 参见《史记·孔子世家》。

[4] 参见《论语·季氏第十六》。

盟，工农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哪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

“谏”，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哪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1953年9月，毛泽东接见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1953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王波清在一起。

对军委办公厅摘要报送空军安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3年9月20日）

这种摘要办法很有用。

毛泽东

九月廿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1953年9月18日给毛泽东、彭德怀的报告上。报告说："空军党委1953年9月10日关于空军安全会议情况报告，已经直呈。因原文较长，兹送上一份摘要。"

悼念布曼增迪[1]的电报

（1953年9月24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

我以悲痛的心情获悉冈奇金·布曼增迪同志逝世的消息。冈奇金·布曼增迪同志是蒙古人民革命运动杰出的战士、乔巴山元帅的亲密战友，他为蒙古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生命。

冈奇金·布曼增迪同志的逝世是蒙古人民的重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自己的名义，谨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蒙古人民致最深切的哀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

[1] 布曼增迪，即冈奇金·布曼增迪，逝世前任蒙古人民革命党政治局委员、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在朱德总司令国庆阅兵命令稿上加写的话

（1953年9月26日）

我国人民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之间的友谊，亦已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

在世界范围内，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我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亦正在一天一天地发展着。

这一切都证明，在国际上我们不是孤立的。

关于阅处高岗[1]起草的致苏联政府文件的批语

（1953年9月27日）

周总理：

此件[2]是高岗同志根据他于今年去苏时和苏联当局的谈话起草的一个致苏联政府的文件，请你加以审查，以说帖方式，于你休假以前，交与库大使[3]，请他转致苏联政府。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2] 指高岗起草的给苏联政府的文件。主要内容是对1952年8月11日签订的《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与改建鞍山钢铁公司方面以技术援助的议定书》所规定的设计和设备交付期限，提出我方的意见，请苏联政府予以考虑，以便我国于1956年和1957年相当地增加轧钢能力，并基本上消灭炼钢能力和轧钢能力的不平衡现象，从而保证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钢材的供应。

[3] 指苏联驻华大使库兹涅佐夫。

关于一切文电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的批语[1]

（1953年9月27日）

彭[2]，并告肖向荣[3]同志：

（一）此件[4]照办。（二）军委及所属各部门各系统文电，至今仍只写月日，不写年份，仅见刘少文写的这个电报，写了“一九五三”，也缺一个“年”字。请你们通知所属，嗣后一切文电均必须将发文年月日写齐，不可只写月日，不写年份。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四部代部长刘少文1953年9月23日关于西藏地区某些机构精简问题给彭德怀并报中央的报告上。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3] 肖向荣，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 指刘少文为中共中央及军委起草的1953年9月27日关于西藏地区某些机构精简问题给西藏工委并西南局、西南军区的电报。

给沈钧儒[1]的信

（1953年9月27日）

沈院长：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2]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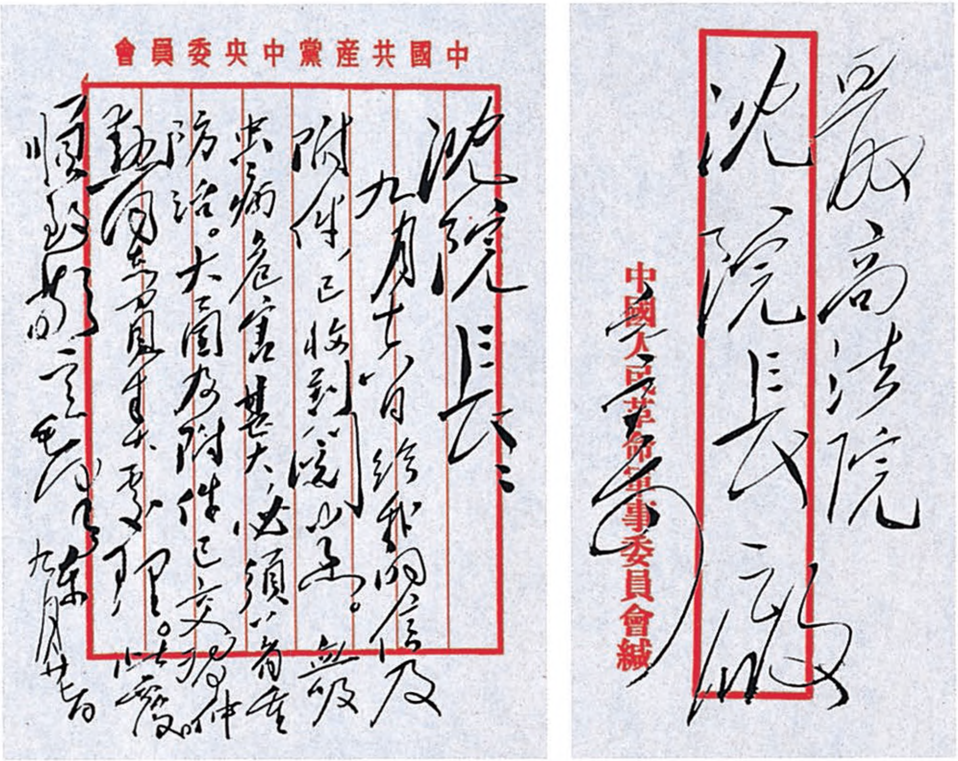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

[1] 沈钧儒，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沈院长：

九月十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谢谢。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此复。

顺致敬礼！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最高法院

沈院长启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

毛泽东致沈钧儒信的手稿和信封。

给易礼容[1]的信

（1953年9月27日）

礼容兄：

杨家[2]生活问题，待接到杨开智[3]兄的信以后，可以由我处解决。淑一[4]能间〈经〉常去去看视两位老人[5]则更好。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

[1] 易礼容，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和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劳工部部长。

[2] 指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娘家。

[3] 杨开智，杨开慧之兄。

[4] 淑一，即李淑一，杨开慧的同学。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任教。

[5] 两位老人，指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关于更改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厂址问题的批语[1]

（1953年9月28日）

刘、周、朱、陈、邓[2]阅，退李富春同志办。

同意改在郑州地区。军事方面在洛阳建设营房，亦应注意维护古物。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副主席李富春、贾拓夫1953年9月6日关于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的厂址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委托苏联设计的拖拉机厂及矿山机械厂，过去中央曾决定其厂址在洛阳，但据第一机械部派人至当地调查后报称：洛阳为古墓葬群之地，内战时军阀土匪又在当地挖过许多地道、地洞和地下仓库。因此，对厂房基础极为不利，不宜建厂。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召集有关部门研究后，也认为该地是极重要的古文化遗址，应予保护。因此建议在郑州附近另选厂址。后因郑州水位高、风沙大等，仍去洛阳选址。1954年2月2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发文，正式决定拖拉机厂在洛阳市涧河西部建设。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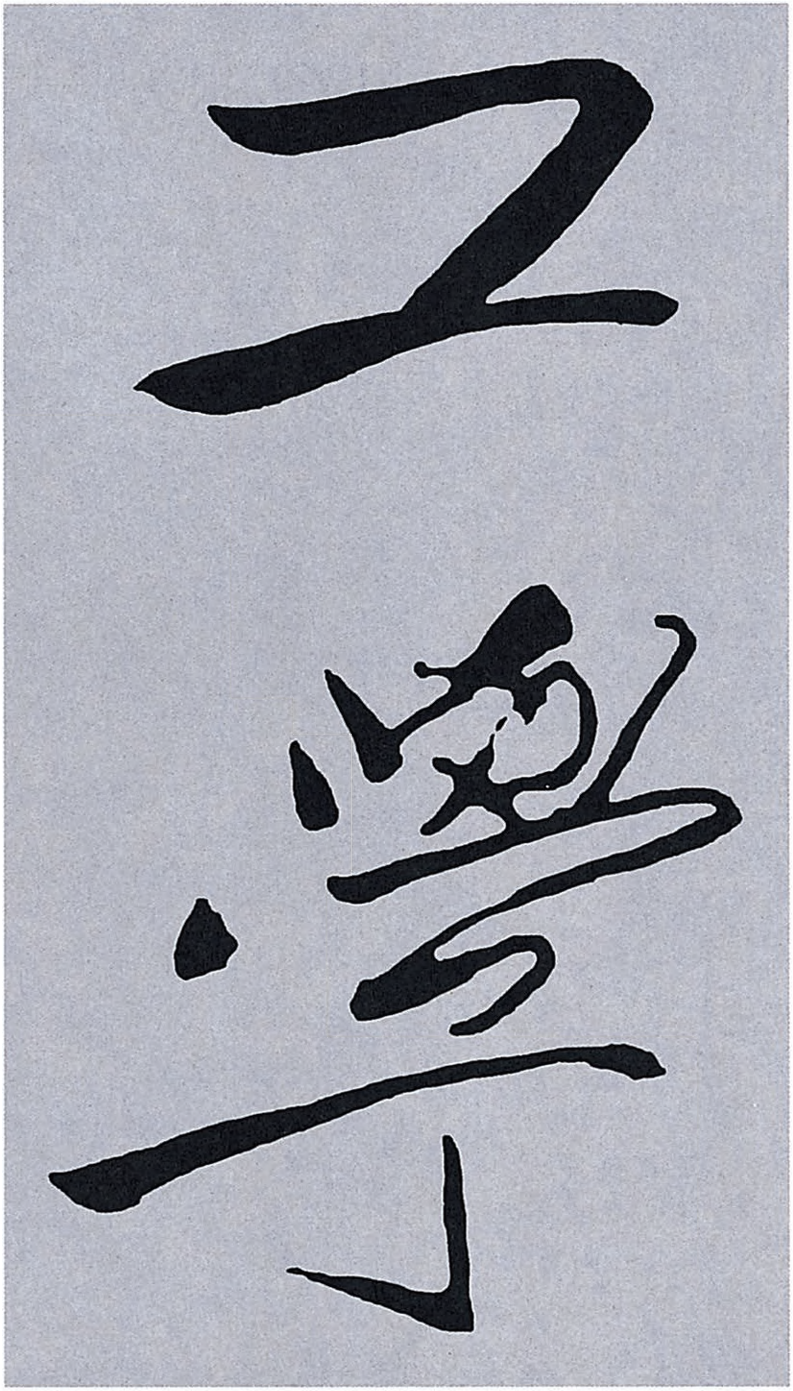
为《工学》报题写报头[1]

（1953年9月）

工学

---

[1] 《工学》，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校刊，1953年9月1日《工学》报创刊，毛泽东亲笔题写报头。



毛泽东为《工学》报题写的报头。

1953年10月1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

195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少先队员张筠英亲切交谈。

1953年10月1日，毛泽东向参加国庆四周年大会的群众游行队伍举手答礼。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1]

（1953 年）

和“余粮收集制”的不同。

国家和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农民的关系问题，和百分之十左右缺粮户问题。

“共产要来了”?

和大中小粮贩子的关系。

合作社代替粮商。

农村之底有六：

（1）小农；

（2）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

（3）每年二千万至四千万的灾民；

（4）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

（5）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

（6）互助合作运动。

（1）水利；

（2）肥料；

---

[1] 这是毛泽东在1953年9月至10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一份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讲话提纲。提纲开列的问题，毛泽东10月2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大多讲到了。

（3）种子；

（4）病虫害；

（5）农具；

（6）耕作法。

所谓“保护农民”的错误思想，应加分析和批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

依靠党、团、缺粮户。

一时工业品供应不上如何办。

一切必要配售的地方均应配售。

统一管理，分工负责。

大员下去。（**2600亿斤细粮**）

城市节约问题（苏联曾在大城市每人每天只配五两，我国现为老秤十两新秤十二两）。

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体系构成的两个重要分支部门：

（1）私人资本——国家资本主义；

（2）小私有制农民的征收，征购。

主体——国营工业；

一翼——国家资本主义；

又一翼——农村的互助合作和粮食的**征购**制。

价格应从长远计算。

不要城乡同时紧张？

（李富春，饶漱石）

暂时不要去讲。

全党动员作宣传（**大张旗鼓**，**但不登报**）。

节约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

计划供应。

可能出的乱子：

（1）农民不满（扁担暴动）；

（2）市民不满（因为配售）；

（3）对外影响不好。

粮食统购统销问题[1]

（1953年10月2日）

一、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2]，详细办法以后讨论。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十一月中或十一月底作准备，从十二月到明年一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二、党内、党外对农村工作有很多议论。党外梁漱溟[3]说农村情况很不好，党内也有要保护农民利益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从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2] 指政务院副总理陈云1953年10月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

[3]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来没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这可答复梁漱溟，也可答复党内的一些同志。

（一）小农经济。这个经济不好，但是个现实。

（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共约有四千八百万左右的农民缺粮，其中老区情况较好，新区比较严重，要五年才能解决。

（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灾有六种：水、旱、风、虫、霜、雹，这个问题几十年才能解决，但搞得好可以减少。

（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根据整党和“新三反”的材料，这些乡的坏干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异己分子钻进来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是好干部蜕化的。

以上四条都是不好的方面，以下两条是好的方面。

（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缺粮户和灾民也拥护政府。不拥护政府的人中包括地主、富农在内。我们在农村的基础就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

（六）互助合作已经发展起来。老区已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区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其中也有部分是假的。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这第六条。

这不是讲技术的“底”，而是讲政治的“底”。要使党内、党外

的人心中有数。

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现在也要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

三、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涉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欢欣鼓舞的人的问题，也涉及缺粮户的问题，这就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的问题。实行粮食征购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贫农、中农、缺粮户中都有这样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缺粮户可以作我们的同盟军，也可以作中农的同盟军。

四、配售问题。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至于名称，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

五、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因为召集各中央局及主要省市负责同志开的会议十二日才能开完，但有关机关可以进行讨论，并准备布置。

给毛月秋[1]的信

（1953年10月4日）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

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2]（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3]（唐家坨）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

---

[1] 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过接待工作。

[2] 毛翼臣，是毛锡臣之误。毛锡臣是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3] 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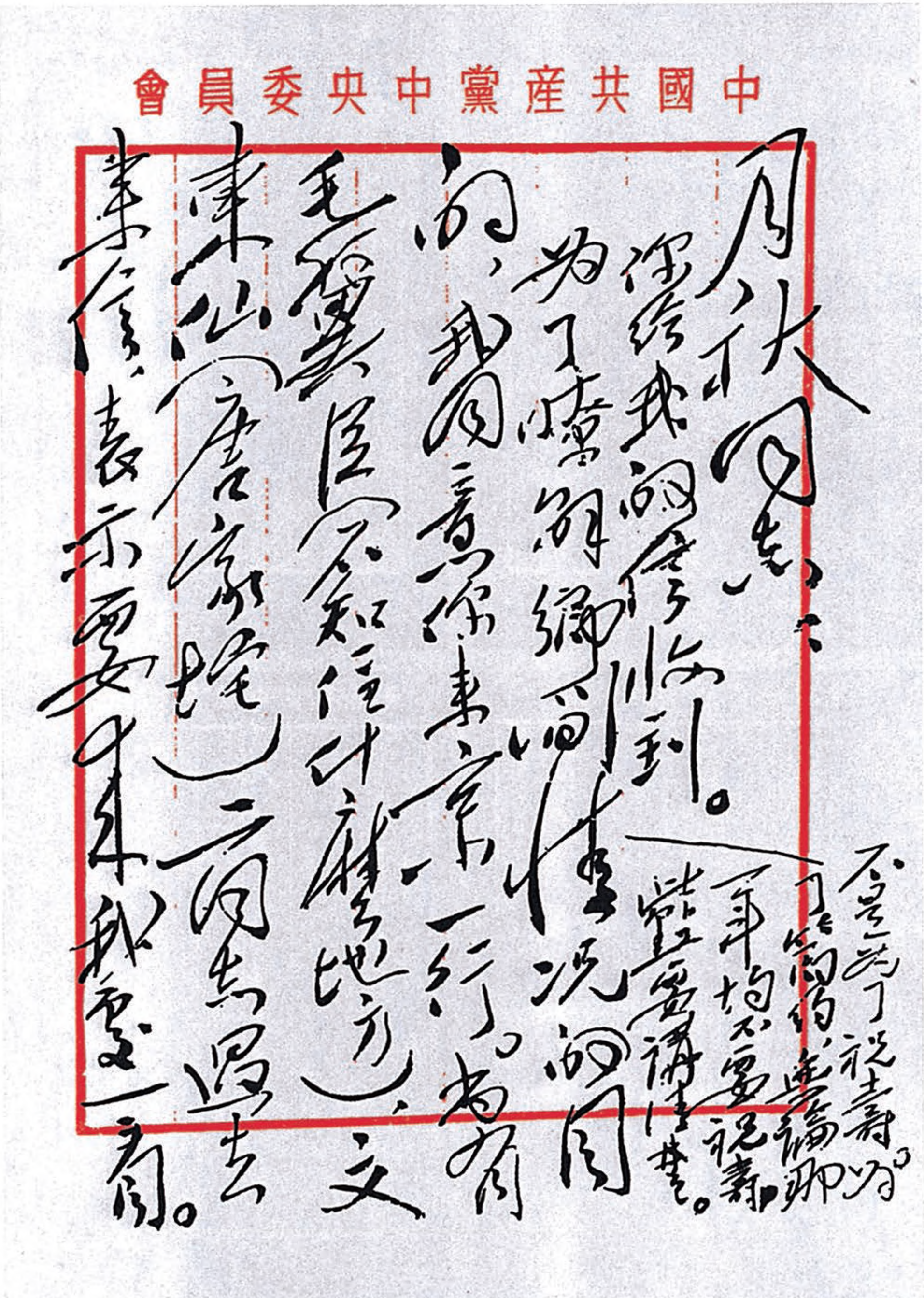
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

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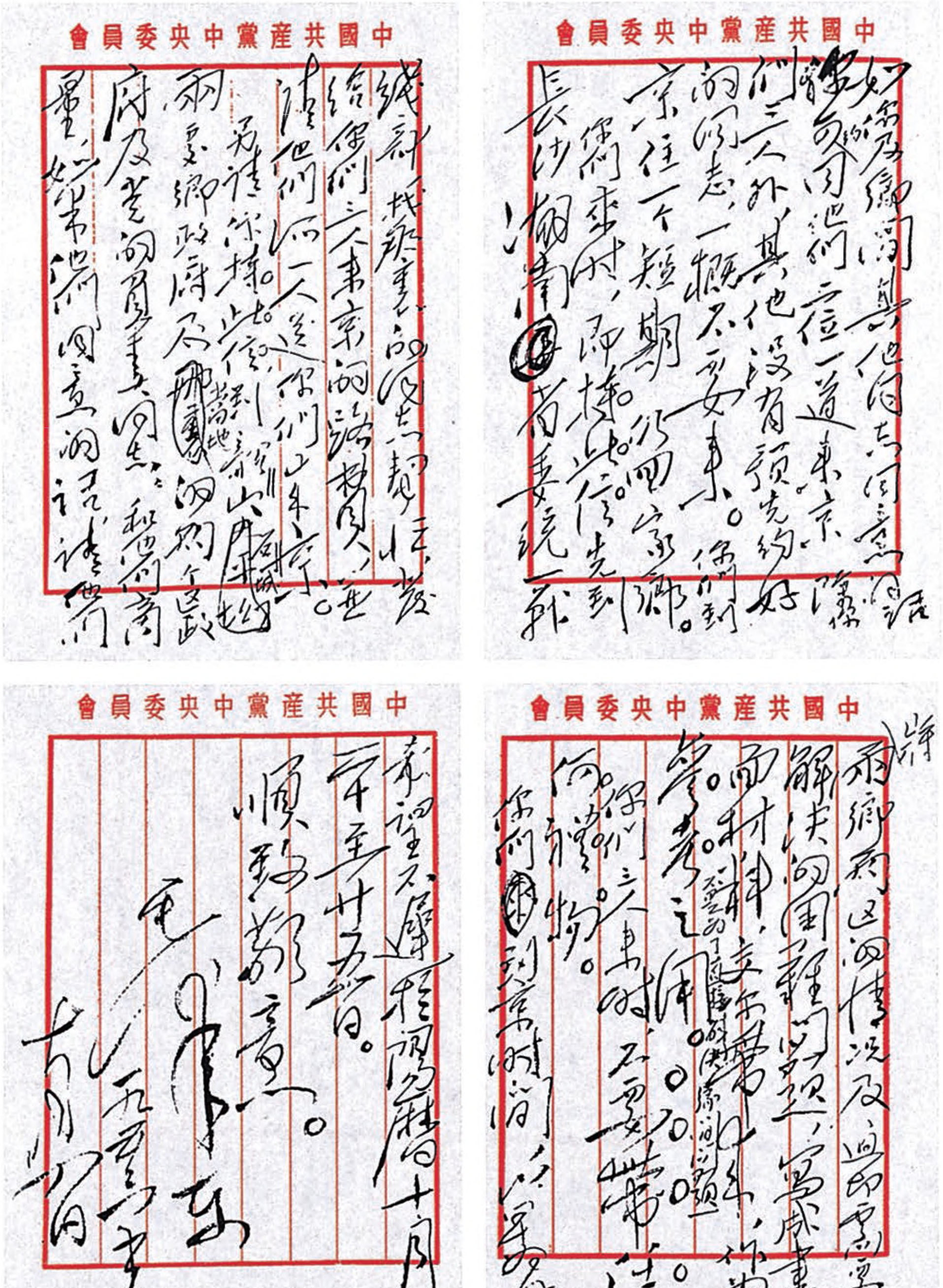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为了懂得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另有毛泽荣（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唐家坨）二同志写过来信，表示要来年秋季一看。

不是为了祝寿为同宗的、每编卯年均不要祝寿。望要讲清楚。

毛泽东致毛月秋信的手稿。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毛泽东致毛月秋信的手稿。

给马叙伦[1]的信

（1953年10月5日）

夷初先生：

闻病甚念。务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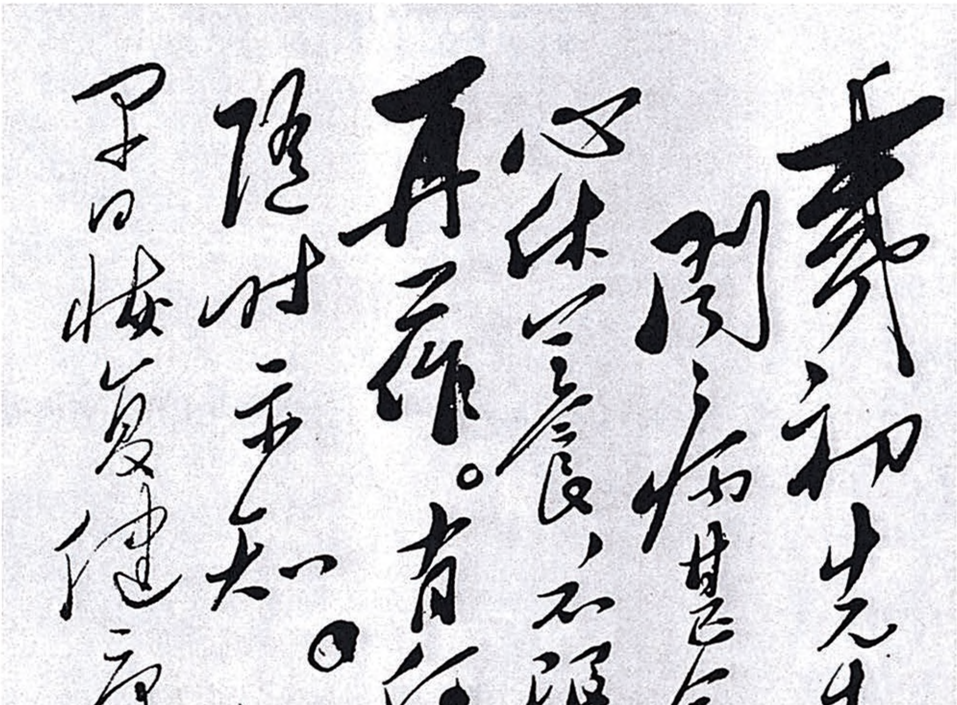
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十月五日

---

[1] 马叙伦，字夷初，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部长。



夷初先生：

闻病甚念。请安心休养，不限时日，病愈再来。有何需要，请随时示知。敬祝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十月五日

毛泽东致马叙伦信的手稿。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电报

（1953年10月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亲爱的总统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四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谨向爱好和平的全德人民和您本人致以最衷心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十分愉快的心情注视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四年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德国人民在苏联的援助下反对国际反动势力挑衅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以及苏联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中所获得的重大成果，对于巩固欧洲和平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祝德国人民在争取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德国人民在这个事业中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深厚的同情和全力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五于北京

在印尼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3 年 10 月 5 日）

外交部：

各方贺电，应复电致谢。

毛泽东

十月五日

在李大梁[1]来信上的批语

（1953年10月5日）

此件请李维汉[2]同志酌处。

据王季范[3]先生称：此人希望政府予以招待。请派人了解情况，酌量处理。

毛泽东
十月五日

此人系民国初年湖南第一师范心理学教员。

---

[1] 李大梁，当时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王季范，当时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

1953年，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老师、表兄王季范等在北京合影。

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结论的批语

（1953年10月11日）

尚昆[1]同志：

（一）此件[2]用代电发出；（二）文内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为“毛泽东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请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周恩来1953年8月11日在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值得注意[1]

（1953 年 10 月 11 日）

彭德怀同志：

此件值得注意，请饬查是否确有此项包括金门、二陈[2]等地之协定。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络部1953年10月6日关于美蒋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的报告上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批语。

[2] 二陈，指浙江沿海的上大陈岛、下大陈岛。

关于粮食征购、配售和管理等几个问题的提纲[1]

（1953年10月12日）

一

数目：706亿斤；面大小；一次或多期；征价；标准＝控制、评议；运输；征购分开；免购区；指示；物资供应；公债；宣传总路线；少出乱子；明年预购；生产中心；时间安排；配售；暂不登报；统一管理；干部下乡和落后乡。

二

统一管理：

（1）由中央公布控制数目，各大区保证完成，负责管理，组织供应；

---

[1] 毛泽东草拟的这个提纲，本篇一写在邓子恢1953年10月10日关于在中南传达中央粮食方针的情况简报第一页上。本篇二写在情况简报最后一页的背面。初步分析，第二部分关于统一管理的七条意见，是对第一部分所列的“统一管理”这一问题的展开论述。

（2）各区需粮交大区，区省间分配掌握，东北各掌一部；

（3）除上外，粮均归中央，包括出口，供给，储备，备大荒，机动等项；

（4）地方发〔生〕自己不能克服的困难，中央予以援助；

（5）中央认为需要和可能调出粮食，经慎重考虑决定后，地方应照调，地方小困难应服从全国性的大困难；

（6）粮价由中央统一规定，中心点及以下的定价原则；

（7）供应标准，全国应大体一致，各地可提意见。

为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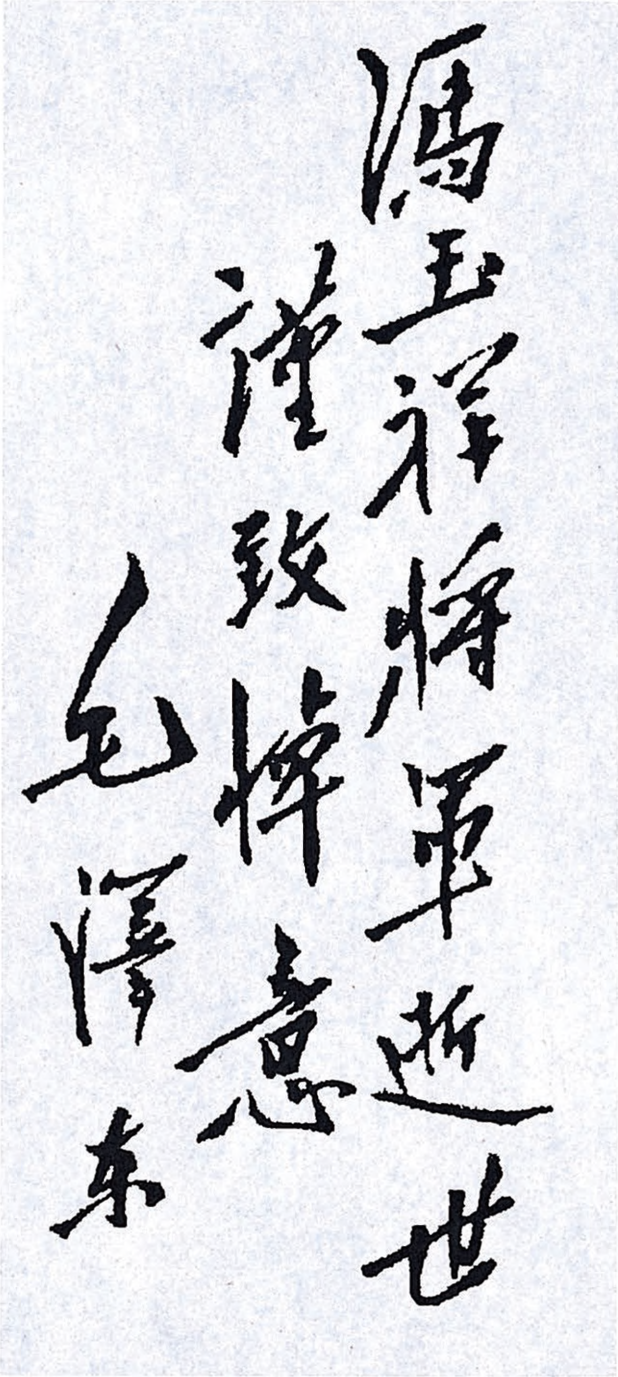
（1953年10月15日）

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毛泽东

---

[1] 为了纪念冯玉祥将军一生爱国的历史功绩，党中央决定将他的骨灰葬在泰山。1953年10月15日，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在他的陵墓前隆重举行。毛泽东第二次亲笔题词：冯玉祥将军逝世谨致悼意。



冯玉祥将军逝世

谨致悼意

毛泽东

毛泽东为冯玉祥将军骨灰安葬仪式的题词。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1]

（1953年10月15日、11月4日）

一　十月十五日的谈话

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

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个到两个合作社，至少一个，一般一个到两个，至多三个，根据工作好坏而定。要分派数字，摊派。多了冒进，少了右倾。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就是自流了。可否超过三个？只要合乎条件，合乎章程、决议，是自愿的，有强的领导骨干（主要是两条：公道，能干），办得好，那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责成地委、县委用大力去搞，一定要搞好。中央局、省市委农村工作部就要抓紧这件事，工作重点要放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摊派而不强迫，不是命令主义。十月开会后，十一月、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北方还有三月，有四五个月可搞。明年初，开会检查，这次就交代清楚。明年初是要检查的，看看完成的情形怎样。

---

[1] 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这是毛泽东在会前和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两次谈话。

个别地方是少数民族区，又未完成土改，可以不搞。个别县，工作很坏的县，比如说落后乡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县委书记很弱，一搞就要出乱子，可以暂缺，不派数字，但是省委、地委要负责帮助整顿工作，准备条件，明年秋收以后，冬季要搞起来。

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较快地搞起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的。

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

总路线，总纲领，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十月开会，要讲一下。

“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于富农和富裕中农的。为什么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带一点，应加研究。互助组也要帮助鳏寡孤独。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一二百户的社算大的了，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户。在大社之下设几个分社，这也是

一种创造，不一定去解散大社。所谓办好，也不是完全都好。各种经验，都要吸取，不要用一个规格到处套。

老区应当多发展一些。有些新区可能比有些老区发展得快，例如，关中可能比陕北发展得快，成都坝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发展得快。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东北其实不是老区，南满与关内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可能江苏、杭嘉湖一带赶过山东、华北的山地老区，而且应当赶过。新区慢慢来，一般可以这样讲，但有些地方干部强，人口集中，地势平坦，搞好了几个典型，可能一下子较快地发展起来。

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合理摊派，控制数字，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东北一番、一番半或两番，华北也是这样。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高。

发展合作社，也要做到数多、质高、成本低。所谓成本低，就是不出废品；出了废品，浪费农民的精力，落个影响很坏，政治上蚀了本，少打了粮食。最后的结果是要多产粮食、棉花、甘蔗、蔬菜等等。不能多打粮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区，要多产蔬菜，不能多产蔬菜，也是没有出路的，于国于民也都不利。城市郊区土地肥沃，土地平坦，又是公有的，可以首先搞大社。当然要搞得细致，种菜不像种粮，粗糙更不行。要典型试办，不能冒进。

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

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二　十一月四日的谈话

做一切工作，必须切合实际，不合实际就错了。切合实际就是要看需要与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在力很大。如果不去发掘，那就是稳步而不前进。脚本来是走路的，老是站着不动那就错了。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不管哪一年，都是错的。“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倒错了的，应当查出来讲清楚，承认是错误，不然，那里的乡干部、积极分子，就憋着一肚子气了。

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

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克服“五多”以及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社外都有矛盾。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半社会主义的，社外的个体农民是完全的私有制（个体农民在供销社入了股，他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变化，他也有一点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互助组跟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同，互助组只是集体劳动，并没有触及到所有制。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所有的土地、大牲口、大农具入了股，在社内社会主义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要逐步解决。到将来，由现在这种半公半私进到集体所有制，这个矛盾就解决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是稳的，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将来也叫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要叫集体农庄）。一般讲，互助组还

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

有一个时候，曾经有几个文件没有提到互助合作，我都加上发展互助合作或者进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这样一类的话。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就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那个时候，也确是有些干涉过多，上面“五多”，条条往下插，插得下面很乱。“五多”哪一年也不行，不仅农村不行，工厂也不行，军队也不行。中央发了几个文件，反对干涉过多，这有好处。什么是干涉过多呢？不顾需要和可能、不切实际、主观主义的计划，或者计划倒合实际，但用命令主义的方法去做，那就是干涉过多。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一万年也是要不得的。不仅是对于分散的小农经济要不得，就是对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但是，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做干涉过多。检查工作，应当用这个标准。凡是主观主义的，不合实际的，都是错误的。凡是用命令主义去办事，都是错误的。稳步不前，右了，超过实际可能办到的程度勉强去办，“左”了，这都是主观主义。冒进是错误的，可办的不办也是错误的，强迫解散更是错误的。

“农村苦”“不大妙”“措施不适合于小农经济”，党内党外都有这种议论。农村是有一些苦，但是要有恰当的分析。其实，农村并不是那样苦，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他们的生活比起国民党时代总是好得多了，总是分了田。灾民是苦，但是也发了救济粮。一般农民的生活是好的，向上的，所以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农村人口中间，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农对政府不满。说“农村苦，不得了了”，我历来就不是这样看的。有些人讲到农村苦，也讲到农村散，就是

小农经济的分散性；但是他们讲分散性的时候，没有同时讲搞合作社。对于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搞互助合作，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总路线，概括的一句话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接着又开了这次互助合作会议，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动。鉴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运动缩了一下，所以这次会议要积极一些。但是，政策要交代清楚。交代政策这件事很重要。

“积极领导，稳步发展”，这句话很好。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但是，也有好处。比如打仗，打了一仗，休整一下，再展开第二个战役。问题是有些阵地退多了一些，有一些不是退多了，而是本来可以发展的没有发展，不让发展，不批准，成了非法的。世界上有许多新生的正确的东西，常常是非法的。我们过去就是“非法”的呀，国民党是“合法”的呀。可是这些非法的社，坚持下来了，办好了，你还能不承认吗？还得承认它是合法的，它还是胜利了。

会上讲了积极领导，稳步发展，但是也要估计到还会有些乱子出来。你说积极、稳步，做起来也会是不积极领导，或者不稳步发展。积极、稳步就是要有控制数字，派任务，尔后再检查完成没有。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那是不行的，那就是对社会主义不热心。据检查，现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减了产，办得不大好，这就是没有积极领导的结果。当然有少数社没有办好，减了

产，也是难免的。但是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减了产，那就是问题。

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1]。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

县干部、区干部的工作要逐步转到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这方面来，转到搞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县委书记、区委书记要把办社会主义之事当作大事看。一定要书记负责，我就是中央的书记，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各级书记，都要负责，亲自动手。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在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之事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是办社会主义。各级农村工作部的同志，到会的人，要成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专家，要成为懂得理论、懂得路线、懂得政策、懂得方法的专家。

城市蔬菜的生产和供应，都要有计划性。大城市和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很集中，没有蔬菜吃，哪能行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城市郊区，蔬菜生产搞互助组，供应不好解决，可以不经互助组，就搞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甚至搞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提出来了，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三万二千多个，一九五七年可以发展到七十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一百万个，也许不止一百

---

[1] 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这次会开得有成绩。现在不开，明年一月再开，就迟了，今年冬天就错过去了。明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开会，要检查这次计划执行得怎样。这次会决定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并且决定下次会检查这次会决议的执行情形，这个办法很好。明年秋天还要开一次会，讨论规定明冬的任务。

关于重要土特产和副食品的经营问题

（1953年10月16日）

陈云、小平[1]同志：

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逐步抓过来归国家和合作社经营，实有必要。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请你们邀集叶季壮、曾山、姚依林、程子华[2]等同志，专为此事谈一次，定出今年两个月及明年的购销计划。例如油脂（植物油和动物油），油料（大豆、花生、芝麻、菜籽、茶籽、棉籽等），商品毛猪，商品屠宰牛、羊，蛋类，以及大中城市的蔬菜（关于菜农生产的合作化，我已告陈伯达、廖鲁言[3]于本月底互助合作会议上加以讨论）等类，逐步走上国营和合作社营，目前就要有计划，动手做起来。像五千万头商品毛猪，国、合仅仅做了百分之

---

[1]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叶季壮（1893—1967），广东新兴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部长。曾山（1899—1972），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部长。姚依林（1917—1994），安徽贵池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副部长。程子华（1905—1991），山西解县（今运城）人，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

[3]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六，即三百万头（其中一百九十万头出口），这是太少了，明年至少加一番，达到百分之十二，即六百万头。如外贸及内贸有销路，还可加大。大中城市蔬菜必须管起来，生产合作化和供销合作化（后者加国营控制），应是同时进行，过去这一方面我们全没有管。油脂、油料比普通粮食还有价值些，目前绝对大部分还在私营手里，今冬及明年必须由国、合管起来。当然目前几年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但三分之一或一半能由我们管就好。

我们对德国应当全力帮助，我想可以答应三亿二千万卢布的生意，只是向他们声明：（一）明年上半年办不到，下半年准备用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德国货多给我们需要的日用品（他们有的，或能产的），少给我们暂时不能用的机器（也要准备来一部分政治积压，甚至欠账）。**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此事请你们与外贸同志再加考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二十四时

朝鲜是赠送，德国是易货贸易，是不相同的，因为德国未打仗。但德国却和朝鲜一样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民主阵营内只有这两个国家是被分割为二的，波、捷、匈等国都是统一的。

对华南分局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政策的意见[1]的批语

（1953年10月16日）

陈云[2]同志：

恐须允许广东及广西只在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地方用征购办法，大体上即同意用“重点区试办”（来电末段）〔的办法〕去做；而在

---

[1] 指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3年10月7日给中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具体执行粮食征购配售等方针的意见。报告中说，中央为解决今后全国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决定采取征购、配售的方针和由国营、合作社包购包销的办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考虑到华南地区的以下情况：（一）两广结束土改较迟，目前农村土改遗留问题及稳定生产关系尚未全部获得解决，农村党的基础薄弱，领导精力还没有很好转到生产上去，如即实行粮食的全面征购，对今冬明春开展冬种和增产运动可能产生不良影响。（二）根据今年7月到明年6月两广粮食的产销情况与今年第三季度广东省完成粮食购销计划的情况，满足两广内地市场供应是较有把握的。（三）广东省今年粮食即使实行征购，增购的数量不会太多，但如果收购的动员组织工作做得不好，反会影响收购或造成更紧张更被动的局面。（四）从今年夏收后粮食上市与超额完成收购计划的情况看，由于市场管理加强，粮价一般保持稳定。在具体执行上我们意见可否在两广地区暂缓执行，即推迟到明年夏收后再执行，或在今冬明春先选择重点区试办。

[2] 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配售方面，则在广州等大中城市办理。如何，请酌。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决议的通知和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

（1953年10月16日）

一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地委，县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兹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予认真执行。除迅速发至县委和城市区委外，可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二

必须使他们懂得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将我们的国家

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1]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中加写的一段文字。

给李漱清[1]的信

（1953年10月16日）

漱清先生：

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

[1]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接见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代表的谈话[1]

（1953年10月18日）

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例如鄂伦春族还不到两千人，我们也要和他们团结。只要是中国人，不分民族，凡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爱国和团结的，我们都要和他们团结。团结起来，按照各民族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工作。有些地方可以做得快一点，有些地方可以做得慢一点，不论做快做慢都要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国民党势力大就压迫人。他们不仅压迫少数民族，还压迫大多数汉人。国民党是做坏事的。坏事是不应当做的。我们的干部有了错误就要批评。我们在西藏的工作有什么缺点和错误，请你们讲，你们不同意的和你们认为不利于人民的都可以讲，便于我们纠正。有了缺点就马上纠正，这是我们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

过去两年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了解以及汉

---

[1] 这篇谈话，是西藏国庆观礼团团长朵噶·彭错饶杰1954年6月25日至27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藏语向西藏僧俗官员、人民的广播讲话中引述的。

藏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是有进步的，西藏地方对中央以及藏族和汉族之间都是一天一天靠拢的，相信将来会更加靠拢。

整个中国现在还很落后，需要发展。这是因为过去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压迫的关系。他们现在已被我们赶走了，这四年来我们就有很大进步。在国家经济恢复以后，今年开始了第一个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预计在三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大工业就建立起来了。苏联在三十六年前赶走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坏人，建设了三十六年才有现在的成绩。我们建设起来比苏联还要快些，因为我们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人口很多，有五万万几千万，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也很广大，有三个五年计划就能建设得很好了，对西藏就会有更大的帮助了。

中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们的一定会帮助你们。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和进步都是有希望的。

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只是帮助。这点是在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里写了的。但是要做，还得一个时间，而且要根据你们的志愿逐步地做。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能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的，不做也不好。可以做得慢一些，让大家都高兴，这样反而就快了。

总之，我们的方针是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对朝中停战代表团首席委员发言稿的修改意见[1]

（1953年10月20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十月十九日十九时三十分来电及附件均悉。附件[3]应作如下修改后发表：

自“你方更派遣了长期在你方战俘营中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特务”到“实属卑鄙之极”一段改为：“你方更派遣了长期在你方战俘营中迫害我方被俘人员的国民党反动残余的特务充当你方的代表和译员，出现于解释帐篷之内，公然破坏职权范围和解释与遣返工作细则的许多规定，对解释工作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干扰，以威胁我方被俘人员，使其不敢申请遣返。必须强调指出，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根本不属于朝鲜交战的一方。过去你方即已利用这个匪帮残余集团的特务破坏分子在你方战俘营中对我方被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停战代表团首席委员李相朝准备在军事停战委员会上发表的抗议稿。

俘人员进行各种残暴的迫害以便达到强迫扣留战俘的目的。现在你方更公然派遣这些特务破坏分子充当你方的正式代表进入解释场所，来阻挠破坏解释规则的实施，威胁我方被俘人员，并借此将他们强迫扣留。这彻底证明你方在你方强迫扣留战俘的罪恶阴谋已大白于世之后，更不惜完全破坏一切国际公法的原则，公开以使用匪类特务破坏分子进行破坏活动作为你方处理国际事务的主要手段。这是一切正义人类所不能容忍的。”抗议末一句改为：“对此，我向你方提出最强硬的抗议，并坚决要求你方立即停止上述明目张胆、破坏国际公法、违反协议的一切非法罪恶行为!”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

给杨尚昆[1]的信

（1953年10月22日）

尚昆同志：

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2]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此事（印发结束语）在今日下午领导小组开会时，请告诉刘、饶[3]及胡乔木[4]同志一声。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5]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毛泽东

十月廿二日二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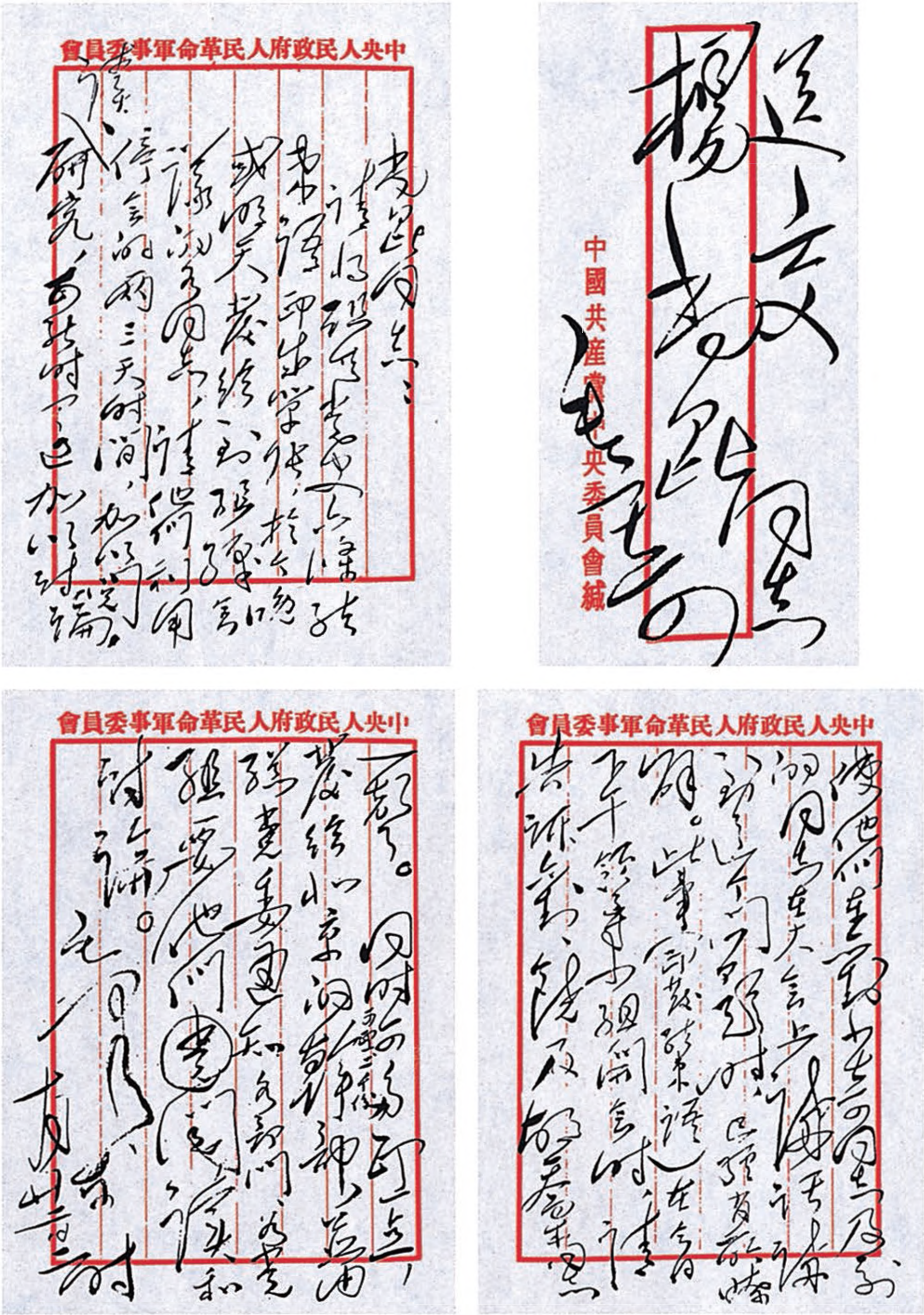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于1953年9月至10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3] 刘，指刘少奇。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4]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5] 总党委，指中央一级直属机关总党委。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送
杨尚昆同志
毛泽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杨尚昆信的手稿。

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10月23日）

一

尚昆[1]同志：

请将刘、饶、安[2]三同志在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用打字打十多份（校对勿讹），**准备交**各中央局分局组织部长各带去一份，你处存二份，今日下午我进城时**交我一份**备用。星期六可以不开会。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三时

二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刘，指刘少奇。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指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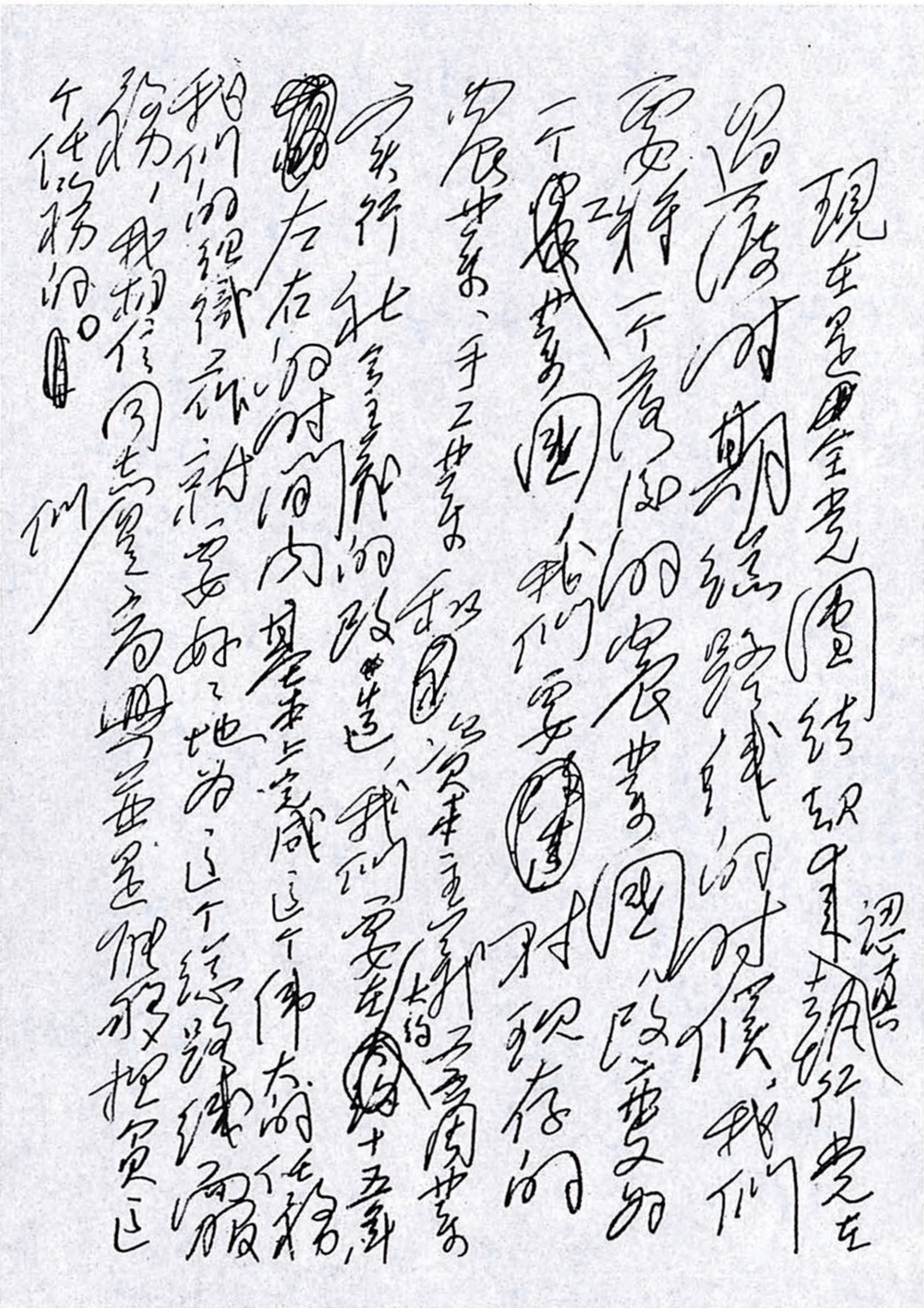
三

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2]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刘少奇1953年10月22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的话。

[2] 这是毛泽东审阅饶漱石1953年10月22日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的话。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积存的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部门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服务，我们的同志们是高兴并是很愿担负这个任务的。

毛泽东修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加写的一段话的手稿。

给文九明[1]的信

（1953年10月25日）

九明同志：

十月二日的信收到。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自备路费，由我补发。毛泽荣，小名宋五，是我的兄弟，住在限门前，他多次来信想来京一行，请你找他一路同来。他没有出过门，请你帮忙他。他的路费亦由自备，由我补发。你们来时如可以不找省委统战部则不找，如无路费，可以持此信找统战部同志帮忙。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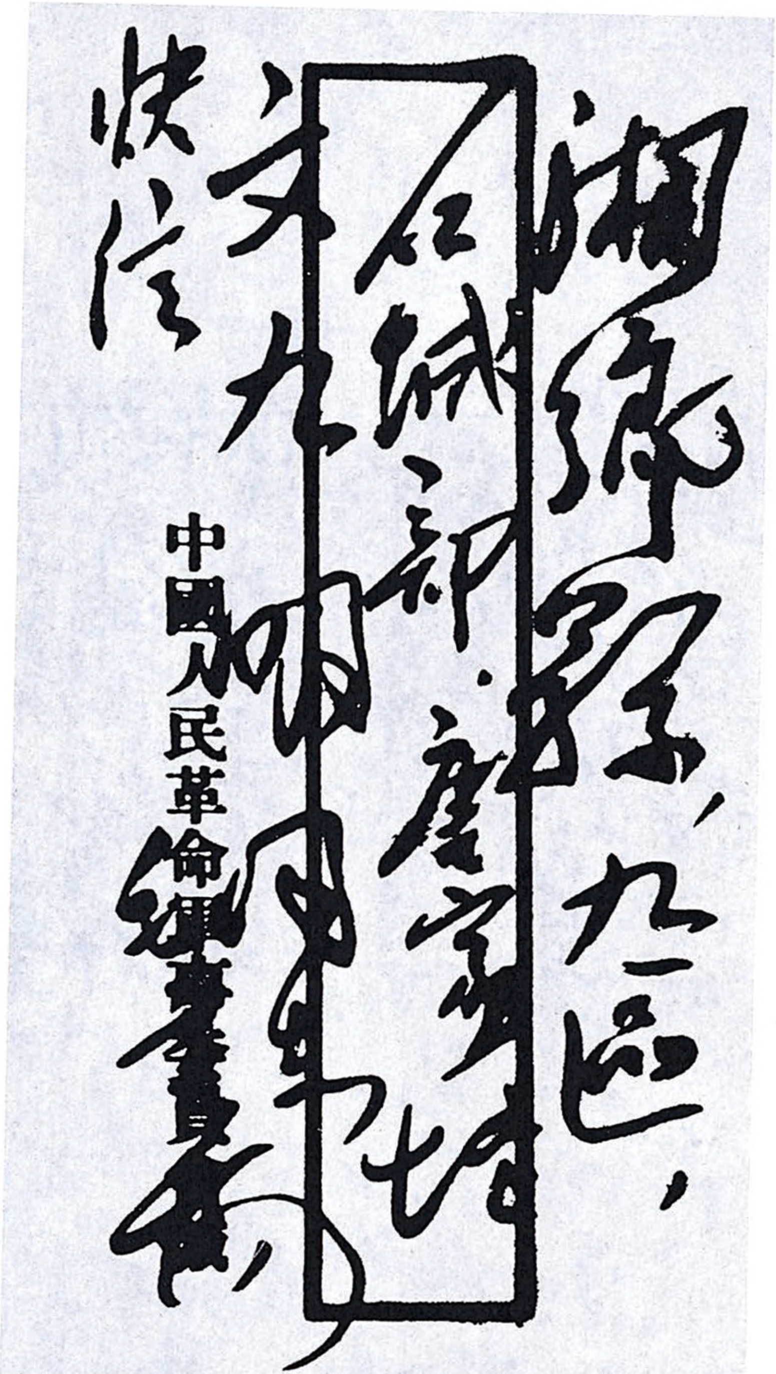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廿五日

能于十一月上旬到京为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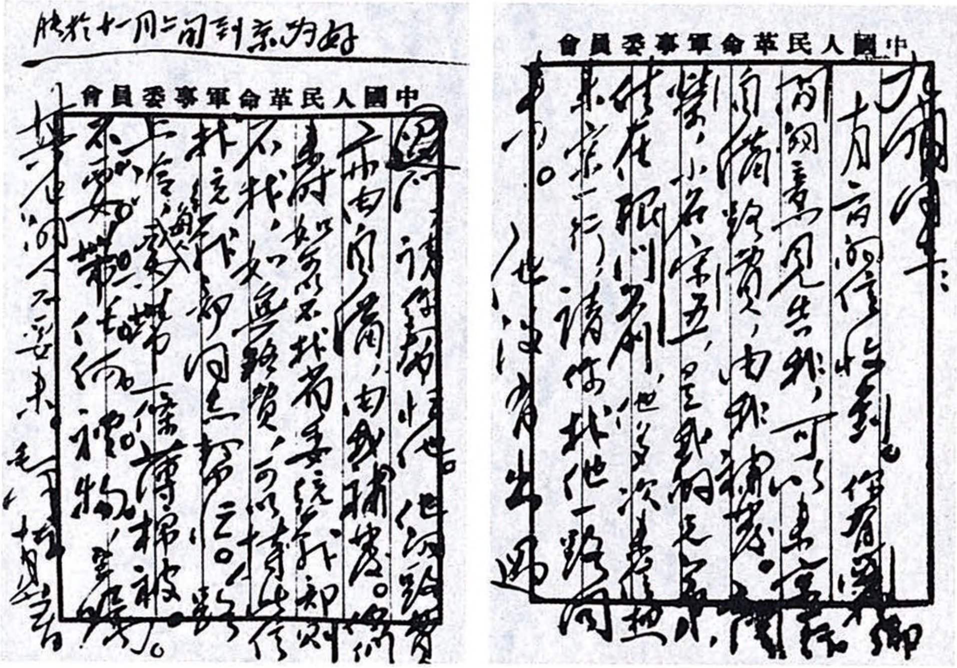
[1] 文九明，毛泽东的表侄。



湘鄉縣九區，
石城鄉唐家坨
文九明先生
快信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泽东致文九明信的信封。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毛泽东致文九明信的手稿。

接受印尼首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0月28日）

大使阁下：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所呈递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对贵大使所转达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政府和人民的祝贺，表示深切的感谢。

中印两国人民之间长期存在着的友谊，由于贵我两国新的外交关系的建立，三年来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我相信：今后在贵大使的努力下，中印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的友好合作关系将日益密切，这种友好关系的增进对于各国人民所努力争取的亚洲及世界的和平将有所贡献。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贵大使为加强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谨祝贵大使在工作中获得成功。

不怕破裂也不把门关死[1]

（1953年10月29日）

李克农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十月二十八日二十时来电和电话中所谈情况均悉。美方自己发动谈成员问题的实质，反诬我方离开议程，片面决定以我方议程为正式议程。对此，在二十九日会上应指出双方会谈[3]首先应就议程达成协议，不应先广泛拉扯问题的实质。对方先扯实质问题反诬我方离开议程问题，明明是企图转移目标，破坏程序。在目前的讨论中我们应坚持解决议程问题，除在必须进行反击时外，不要与之就实质问题展开讨论。如对方再扯实质问题，我们仍坚持回到议程问题并表示要他们考虑建议休会。在讨论中要保持强硬态度，不怕破裂也不把门关死。遇对方无理之处要当场回击。二十八日会上对方侮辱中朝两国和苏联，二十九日要提严重抗议，指出其不是和平协商的会谈态度，而是破坏会谈的态度，是严重的失言，要他们收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李克农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彭司令员，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指朝中方面代表和美方代表从1953年10月26日开始在板门店就召开政治会议问题进行的会谈。

回。但不要当场等他们收回，就可谈议程问题。二十九日可就此事专发一公报[1]。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

[1] 195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朝中方面参加关于政治会议问题双方会谈的代表团发表的公报。

给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1]的信

（1953年10月29日）

邹普勋、谭熙春、毛锡臣同志：

你们三位的信都收到了。熙春、锡臣（龙头山的）想来北京一次，普勋想再来北京一次，我想可以。现天气已冷，可在明年开春（阴历三月间）来，如果你们愿意早来，亦可在阳历十二月中旬来。由你们三人结伴同行，自己出路费，路上买车票等事亦由自己经理。到京住一个月即回家。如果你们同意，即可照这样办。

此外，我弟毛泽连[2]（东茅塘的）要求来京治眼病，请邹普勋兄告诉他，亦可同来。除你们四人之外，别人都不要来。如有不得许可，自己来的，不便招待。锡臣、熙春二位不另复，即请普勋兄转致。此问

近安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

---

[1] 邹普勋，毛泽东少年时的私塾同学和邻居。谭熙春，早年和毛泽东在安源搞过工人运动。毛锡臣，毛泽东的叔祖父。

[2] 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关于李克农回国后停战代表团工作安排问题[1]

（1953年10月31日）

金首相，并告李克农[2]同志、志司、志政[3]：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李克农1953年10月28日19时关于他回国后朝鲜停战代表团工作安排给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及志司、志政请示报告。报告说：（一）遵照中央指示，以杜平、乔冠华、丁国钰、柴成文、黄华五同志为党委委员，建议以杜平为代理书记，乔冠华为副书记，并建议代表团政治部主任郑文翰、代表团后勤部部长王历同志参加党委，为候补委员。（二）关于军事停战委员会及行政会议的重大对外问题，必须经朝中双方代表团研究讨论并经中央批准始能作最后决策向对方提出，朝方代表团组成为李相朝、奇石福、崔龙汉、朱然、田东赫等五人，我方为杜平、乔冠华、黄华、丁国钰、柴成文等五人。（三）代表团党委内部拟作如下分工：杜管全局，乔负责对外谈判业务，杜兼管不直接遣返战俘工作的内部工作，黄管政治会议双方会谈工作，丁、柴管有关军事停战委员会及观察小组与后方口岸工作，丁兼管中国代表团党政工作，柴兼管后勤及机要、通讯、机场、汉江口等工作。（四）自11月1日起，代表团对志司、志政、东政、总政及总参、总后之文件和电报一律由杜签署，对业务方面向北京及平壤的请示报告均由杜、乔共同签署。

[2]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负责人。

[3]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志政，即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

现转发来李克农同志十月二十八日十九时来电。克农同志因过劳久病，需回来稍事休息，我们已决定令他于下月初旬动身回北京。并同意来电所作各点安排。他在开城的工作由杜平[1]同志总的代理，对外谈判业务由乔冠华[2]同志负责，一切工作经朝中双方代表团协商进行。以后关于对外谈判的请示报告各电均应由李相朝[3]、杜平、乔冠华三同志签署分发平壤及北京，复电仍由北京发出。特此电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

[1]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参与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领导工作。

[2] 乔冠华，当时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协助李克农工作。

[3] 李相朝，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

对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的修改[1]

（1953年10月31日）

一

要过更好的日子，一定还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农业来说，只有在农村中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才能使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一步一步地和普遍地获得提高。

二

农村里一切明白道理的人都应当积极加入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3年10月19日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点稿时修改的四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中共中央的宣传要点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实行统购粮食。它的目的是保障全国城市农村人人有饭吃，保障国家按总路线实行经济建设，保障我国能够一步一步走社会主义的路。《宣传要点》主要讲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的路？（二）什么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总路线？（三）实行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要统购粮食？

质的互助组，加入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将来就可以再进一步实行集体农民公有制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就是集体农场）和供销合作社，实现集体生产和富裕生活。工人在城市里建设，农民在农村里建设，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要不是这样，所谓工农联盟，就不能发展和巩固，而且有使已经建立的工农联盟归于破裂的危险。

三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使中国由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变成工业发达的国家。由非社会主义的工业变成社会主义的工业。这就一方面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工业（新的工厂，新的矿山），另一方面要将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加以社会主义的改造。这里最要紧的是多炼钢铁，多产煤炭、煤油和电力，多造机器。只有工业发达了，国家才能多造新农具和农业机器来帮助农民发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才能多修铁路公路把城市和农村联接起来，才能多修水利来发展农业，才能用大量的便宜的化学肥料、杀虫药剂、药品、糖、布匹、自行车、收音机、电影等各种日用东西来供给农民。

四

农业怎样改造？就是按照农民自愿（不能单靠行政命令，尤其不能采用强迫办法），一步一步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由办带有社会主

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到办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办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场）。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大家务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

中央关于批判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

（1953年11月4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地委，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抓紧了关于党的总路线在干部中的教育，及时地批判了干部中存在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及各种糊涂观念，这在目前及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都是完全必要的。湖北和中南党内的这种思想情况，在各地都是存在的，请你们务必对党员首先是干部抓紧进行教育和批判，并将情况和结果向中央作报告。

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四日

对李维汉[1]在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1953年11月5日）

退李维汉同志：

（一）同意于十日发表[2]；（二）我只在第七页、第十页、第十三页、第十四页上增改了几个字；（三）请送一份给高岗[3]同志阅；如周总理在十日前回京，应送他看一遍。

毛泽东

十一月五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 李维汉1953年10月27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于1953年11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 高岗，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再：会议应通过决议[1]，拥护你的报告及陈叔通的开幕词。

---

[1]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关于接受和拥护陈叔通主席开幕词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李维汉副主任讲话的决议，载于1953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陈叔通1953年10月23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题为《为实现国家总路线，正确地发挥私营工商业的积极作用而奋斗》，载于1953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

关于中央警卫团
不应设立文工团的批语[1]

（1953年11月5日）

刘、朱、彭、罗瑞卿、周[2]阅，尚昆[3]处理。

根本不应设此文工团，三反后又发生此事是不应当的。肖华只负批发电报的错误，根本的错误在公安机关。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53年11月2日关于处理电报中的错误问题给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检讨报告中说：最近，我在处理电报中犯了错误，7月9日批发公安部为中央警卫团抽调文工团队员的电报，当时只注意到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问题，而未考虑到电报可能发生的政治影响，后经彭德怀副主席指出，才发觉错误。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罗瑞卿，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周，指周恩来。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六周年致马林科夫电

（1953年11月5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六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谨向您致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苏维埃国家就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全世界被剥削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前进道路。苏联人民最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中所获得的日益辉煌的成就和威力，鼓舞着全体进步人类充满信心为争取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苏联的和平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的立场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努力，证明苏联的利益和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国善良人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的强大堡垒，而帝国主义者的反苏诽谤不过是他们奴役人类的卑鄙计划的一部分。

中苏两国人民已在过去三十六年的丰富历史经验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当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苏联的慷慨援助下，沿着苏联所胜利地走过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光荣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无间，和两国友好的无上珍贵。

为了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发展的利益，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利益，愿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永远巩固，不断发展！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五日　北京

拟公布美军细菌战战俘供词[1]

（1953年11月8日）

金首相：

美国最近在联合国大会就细菌战问题重起风波，诬我以酷刑逼细菌战俘造假供状。我们拟将美细菌战俘十九人供词公布，并在公布之前，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名义发表关于这十九份供词的公报。公报、供词、录音及各俘照片均将于十一月九日以飞机送平壤。我们拟于十一月十日上午北京时间十一时将公报广播，十一日见报。自十一日起连续广播各俘口供并连续在广播后之次日见报。拟请平壤亦照此日程公布上项公报和供词。以上各点均请电告您的意见。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1953年11月，毛泽东和金日成亲切握手。

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3年11月8日）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十月廿九日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的报告[1]，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意见是正确的，现发给你们，请迅速研究照办。今年只有一个多月了，明年第一季度即将到来，务望你们抓紧今年最后一个季度的增产节约工作，并迅即动手布置明年第一个季度的各项工作，争取今年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已定的任务，并在这个基础上争取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工作和可做的基建工

---

[1] 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当前增产节约情况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说，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逐步深入，干部和群众的情绪甚高，9月份的生产情况已有好转。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央五个工业部24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已有19种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某些产品的质量已有提高，成本亦有降低。在增加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财政上的困难情况正在得到克服。今年的基本建设计划可能完成得比原来预料的85%左右要更多更好些。为了把运动推进一步，各级领导的重点是应用大力帮助目前运动开展得不好或尚未开展的单位，使他们迅速把全体职工（包括技术人员及科室工作人员）发动起来，使增产节约计划与各项具体措施结合起来，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同时注意把目前生产同明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及明年第一季度生产的准备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两个年度之间生产工作上的中断或脱节现象。

作不低于今年第四季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

关于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配备干部问题[1]

（1953年11月10日）

德怀同志：

军事会议[2]快要开了，你是否准备写一个书面报告，要写，现在就要着手了。我觉得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书面报告为好（讲时可加发挥），使人好去传达，免致传错，会上讨论时也眉目清醒些。如你无暇写，可要肖向荣[3]照着你的意见去写。请酌定。

对于我们配备干部不满意，不但是那个写信的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我估计有相当一些人有意见。我认为我们配备的干部一般是正确的，对此不满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们对于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当提拔的可能有些未提拔，他们可能认为一方面军的人提拔得太多，而二、四太少和照顾不周，值得注意。请你找赖传珠[4]、徐立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信。

[2] 指在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3] 肖向荣，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4] 赖传珠，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清[1]、肖华[2]、甘泗淇[3]四同志一商此问题，可将那封无记名信给他们看，要他们对此加以注意，并征求他们的意见，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加以改变。

军事会议的末尾，有一段时间让人们对军委几年的工作加以评论，将下面对军委及军委各部相互间的不满意见尽量讲出来，然后加以分析批判，以期弄清问题，统一意志，极有必要。这样做的结果估计会是好的，不会损伤什么同志。如你同意，这个问题应列入议程，并在你的报告中提到。我记得军委召开会议的通知内已将检讨过去工作的意思写上去了。如这样做，请叫各部门同志作精神准备。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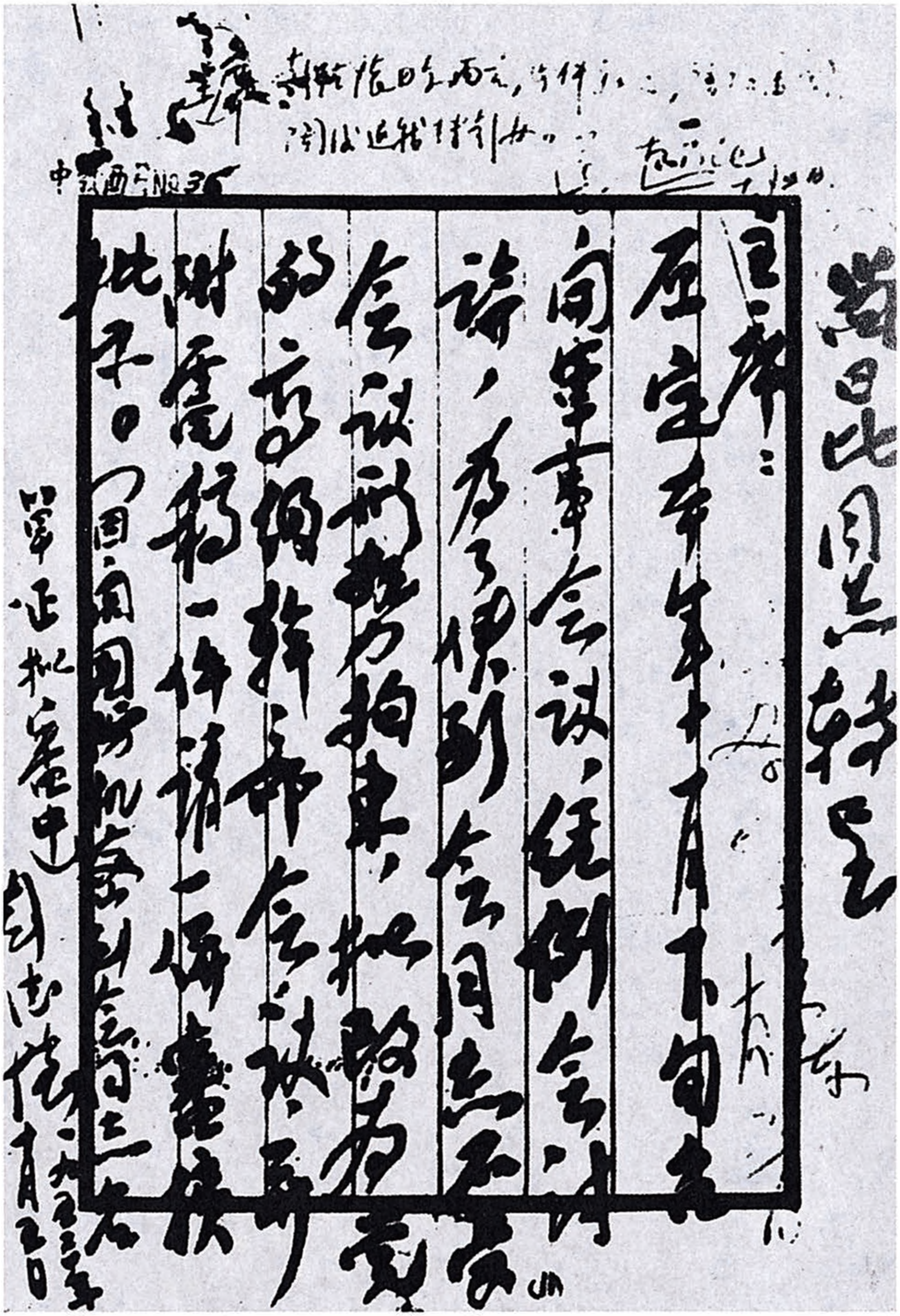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日

---

[1] 徐立清，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

[2] 肖华，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3] 甘泗淇，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



[illegible]

中[illegible]NO.3

主席：

拟定本年十月下旬召开军事会议，统[illegible]会讨论，为了使到会同志会前[illegible]会议[illegible]，拟[illegible]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文件，附原稿一件，请一併审核批示。

[illegible]照此[illegible]转呈

[illegible]正批后[illegible]

彭德怀关于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给毛泽东的请示信。

1953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

1953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中南海。

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柯尼希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1月12日）

大使同志：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衷心感谢您的祝贺。

四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了极大发展。在两国外交使团改为大使馆后，不但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将更加增强，并且对于巩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有着极大的意义。

德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工作及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重大成就，已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为全德和平及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和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相信：在伟大苏联的援助下，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下，德国人民为建立统一、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德国的正义斗争，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德国人民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的支持。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德中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中央转发天津市委统战部关于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的报告[1]的批语

（1953年11月20日）

---

[1] 指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1953年11月14日关于天津市资本家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反映给华北局统战部并中央统战部的综合报告。主要内容有：一、国庆口号中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资本家波动很大，正面是歌颂拥护，但背地里牢骚满腹，其中尤以中小资本家为甚。资产阶级对总路线是不满的，但又无可奈何。他们要求保持现在的秩序，不甘接受“逐步过渡”，回忆起1950年“黄金时代”，不胜依依，言下悲叹：“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资产阶级不愿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认为加工订货已经“不太自由”，公私合营就要被“溶解掉”。二、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态度大致可划分几类：第一类是中上层中长期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认为总路线是大势所趋，自己先走了一步，“自动走吧，何必让人家用鞭子赶呢”。第二类是中小企业，这是资产阶级的多数，认为总路线“大势所趋，但又无可奈何”，对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甘心的，对当前改进生产，扩大经营抱着消极态度。第三类是小业主，认为总路线与己无关，手工业搞合作化还可以干几年，万一没有出路，可以再当工人。第四类是商业资本家，怨天尤人，非常不满。三、总路线口号公布以来，中小工业联营并厂、商业转业已经冒头。并厂的动机复杂，有“创造条件的”，有丢包袱的，有互为利用的，有和国家抗衡的。企业内部人浮于事，矛盾很多。商业资本家认为转业分上中下三策，上策转投资公司，中策转入公私合营工厂，下策转入工业，争取中上策，不得已求其下。

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此件值得注意，发给你们参考；（二）请你们注意各地资产阶级的动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和教育。

中央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关于签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问题的批语

（1953年11月21日）

周总理：

（一）各件[1]均看过，同意；（二）同意签字、宴会、晚会等各项安排；（三）签字时似应有我国公职民主人士到场，如是，则各件应先给他们一阅，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一日

---

[1] 指周恩来1953年11月21日报请毛泽东审阅的中朝两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中朝两国政府谈判公报、中朝关于铁路的议定书、中朝关于技术人员的协定、中朝关于留学生的协定、中朝关于民航的换文和中朝关于难童的换文七个文件。

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步定稿）》的批语[1]

（1953年11月）

可用。略有修改[2]。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为1953年12月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准备的讲话稿的批语。

[2] 毛泽东对彭德怀《四年来军事工作总结和今后建军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步定稿）》的修改主要有：（一）在标题之下增加了副标题“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党的全国军事会议上的报告”和署名“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二）将原稿中两处“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改为“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三）将“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时”，改为“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略我国台湾，并使侵朝战争威胁到我国东北边境的安全时”。（四）将“按照毛主席历来的军事方针，就是发挥党委员会集体领导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改为“按照毛主席历来的军事方针，就是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将“至于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是错误的”，改为“在有党委制存在的条件下，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那就是不对的”。

关于揭露美军对朝中军民暴行问题[1]

（1953年12月1日、3日）

一

金首相，并告杜平[2]同志：

美国已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所谓我方对“联合国军”士兵及朝鲜平民暴行的正式报告。外电称此事十一月三十日在联大进行讨论，美国并企图通过一个决议“谴责”我方。关于此事，我们须予反击。中国方面现准备由郭沫若同志以抗美援朝总会主席名义，用答复苏联文学报记者的形式，在联大进行讨论之时发表谈话，主要是揭发美国对朝中军民的暴行。我们意见朝鲜亦可考虑发表一个类似的文件。关于美国军队对朝中军民暴行的正式调查报告，我们也应发表。中国的调查报告已准备好。朝鲜方面关于美军虐俘的报告已见初稿，但尚须仔细校正。请派人即往开城与杜平洽商，关于美军对一般军民的暴行报告则尚未见到总的东西，拟请您指定负责同志立即进行整理、编写并校正，以便中朝报告可以先后公布。

---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两份电报。

[2] 杜平，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代理书记。

此外，我们已派人去碧潼对已遣返的东场里战俘进行关于美方实施特务恐怖破坏政策来强迫扣留战俘的调查，并拟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写出此项报告。拟请朝鲜亦即派人进行同类调查。

关于暴行及强扣战俘的调查，请朝鲜方面经过开城杜平同志与北京经常联系。

对以上各点您意见如何，请电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

二

金首相，并告杜平同志：

十二月二日来电[1]悉。关于美军对朝鲜一般军民暴行，我们意见，应将朝鲜祖国阵线过去所发表的四个公报中的材料重加编订成为一个总的调查报告与美方虐俘暴行报告同时再予发表。因美方这次诬蔑我方的所谓暴行报告是包括了所谓对俘虏及对一般军民的

---

[1] 指金日成1953年12月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关于揭发美军对朝中战俘暴行问题，我们方面准备以祖国战线名义发表。凡在统计数目中有不确实者拟均不公布。为校正美军虐俘报告初稿已指示外务省派人即往开城洽商，调查美方实施特务恐怖政策强迫扣留战俘一事，现由我方战俘调查委员会进行此项工作。今后有关暴行及强扣战俘的调查问题已指定南日同志经过杜平同志与北京经常联系。至于美军对一般军民的暴行报告问题，我们曾于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以祖国战线名义发表调查美军暴行公报共四次，并已转达联大，再收集材料亦不能超出上项范围之外。是否有重复发表的必要，仍请您电复为盼。

“暴行”在内的，是包括了全部朝鲜战争时期的。因此，我们亦须就美方在全部朝鲜战争期间（连一九五二年的残暴轰炸在内）对朝中战俘和一般军民的暴行提出全面报告作为有力的反击。如果我们不再发表其对一般军民的暴行，则不仅反击不够有力，且可能为美方钻空子。对此您意见如何，仍请电告。

我们现将来电转发杜平同志，并望杜平同志即与北京和平壤进行联系。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接受芬兰新任驻华公使孙士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2日）

公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公使呈递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对贵公使所转达的芬兰共和国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人民及我个人的祝贺表示感谢。

三年多来中芬两国间的经济与文化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我相信：今后在贵公使的努力下，贵我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日益密切。这种友好关系的增进不仅将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且将对全世界人民所努力争取的世界和平有所贡献。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芬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在贵公使为加强中芬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谨祝贵公使在工作中获得成功。

给黄炎培的信

（1953年12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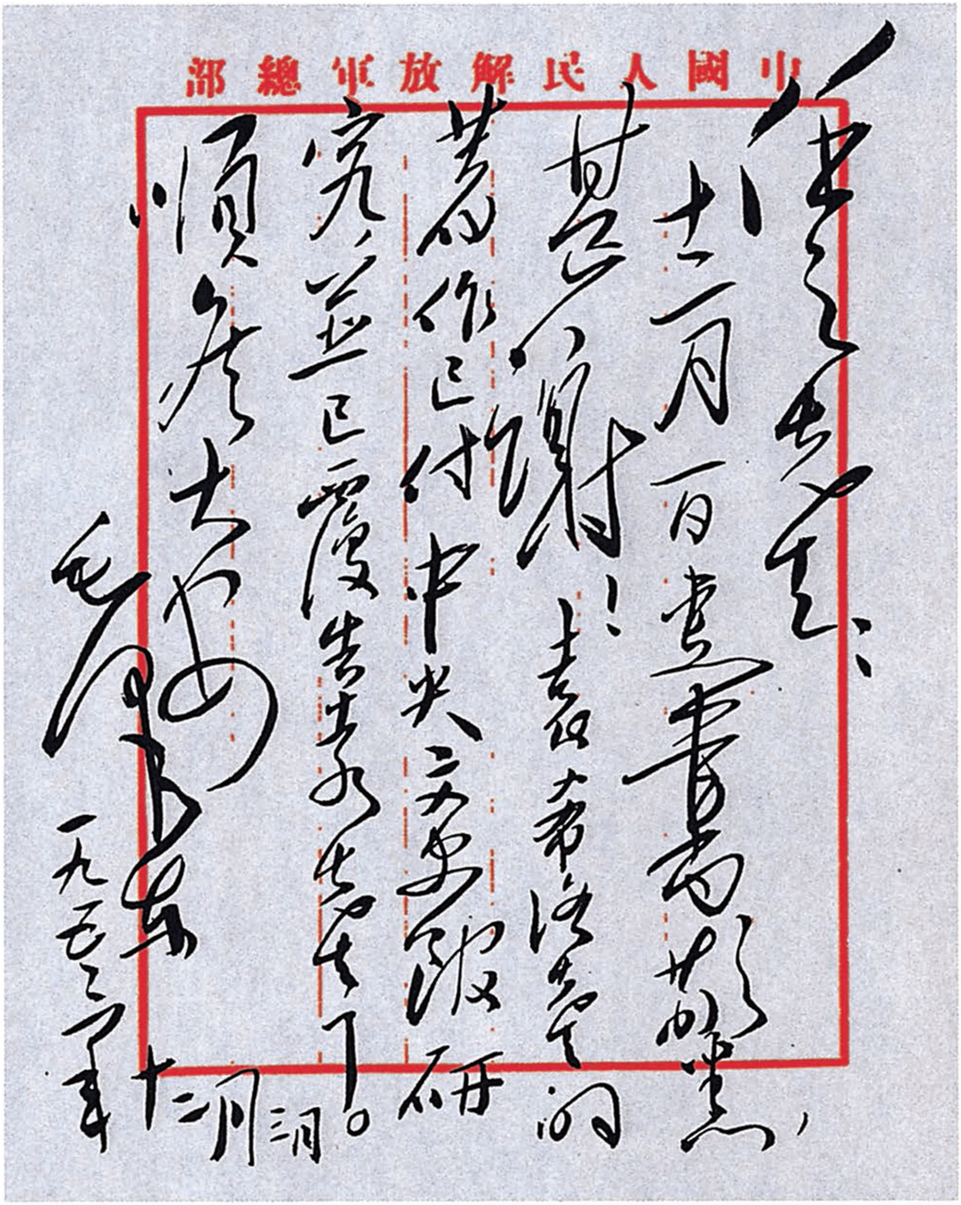
任之先生：

十二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文史馆研究，并已复告袁先生了。

顺候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

任之先生：

十一月一日惠书敬悉，甚谢！袁希洛先生的著作已付中央宣传部研究，并已覆告袁先生了。

顺候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给袁希洛的信

（1953年12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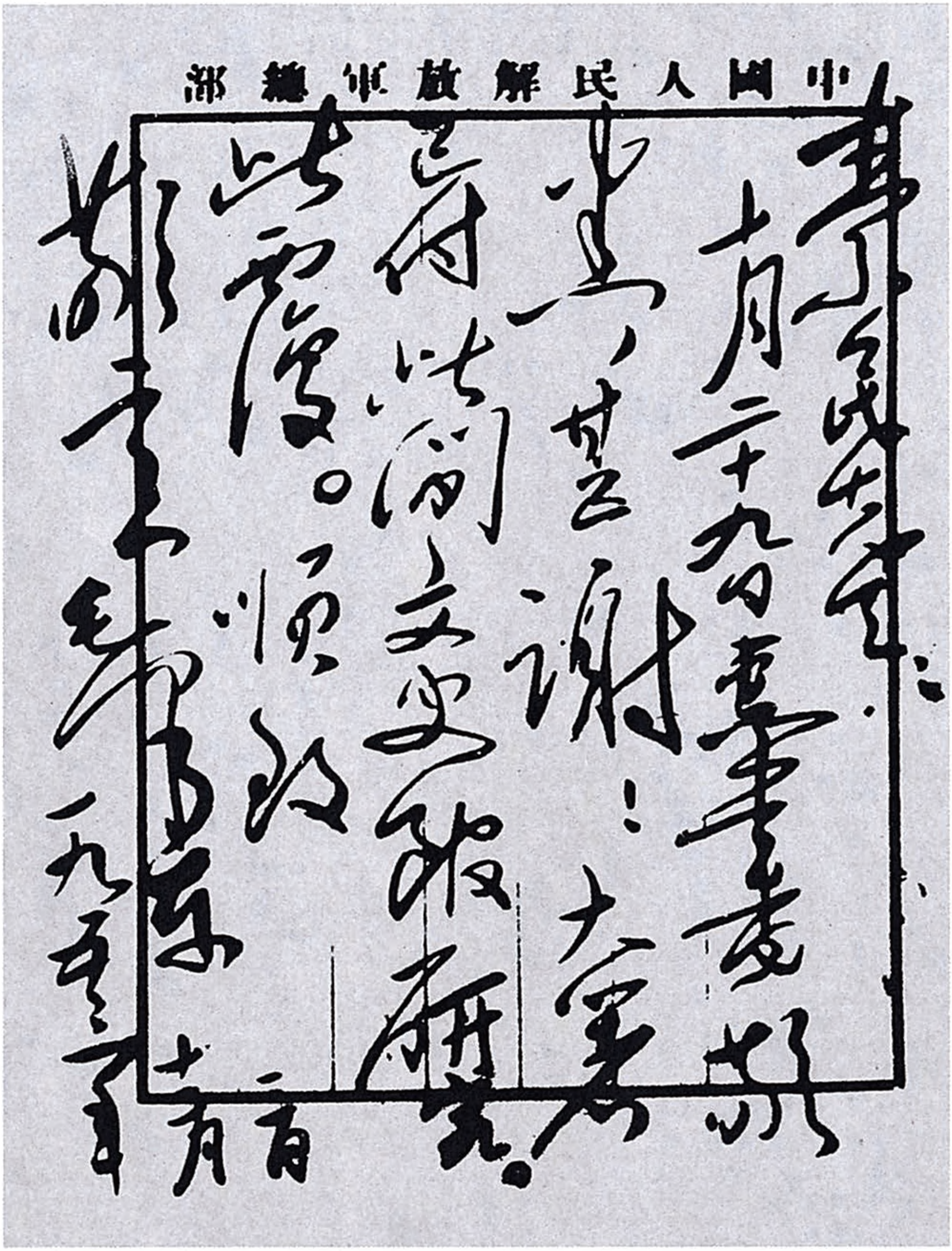
素民先生：

十月二十九日惠书敬悉，甚谢！大著已付此间文史馆研究。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三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

希洛先生：

十月二十九日惠書收到，甚謝！大著已付有關文史館研究。此復。順致

敬禮！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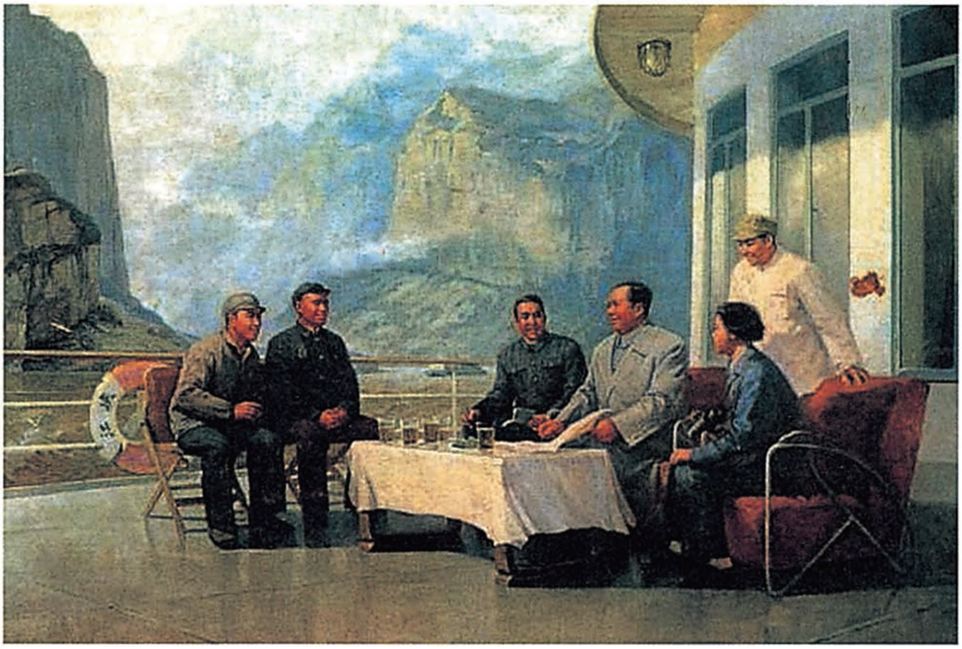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一日

毛泽东致袁希洛信的手稿。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

（1953 年 12 月 4 日）

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胜利的航程》（油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文件给杨尚昆[1]的信

（1953年12月4日）

尚昆同志：

今天会议文件[2]，除科学院一件外，我均已看过，请电话督促各同志均于会前看一遍，以便讨论。科学院一件，推至下次。

今晚应加上彭德怀[3]同志准备在军事会议上作的报告一件，加以讨论、通过，并拟临时约刘伯承、叶剑英、聂、黄、张[4]五同志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1953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讨论的文件。主要有：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党组关于过去工作检查和改进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党组关于1953年出版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中共中央批准高等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的报告的指示，及中国科学院党委关于1953年工作情况的报告。

[3]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4] 刘伯承，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司令员。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指张宗逊，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列席。请告各同志看文件。开会时间，待我起头〈床〉再定，也许要推迟一二小时。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六时

关于通过公债条例及批准中朝协定给周恩来的信

（1953年12月5日）

周总理：

公债及批准中朝协定两事[1]，仍以于数日内召集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为适宜，时间可在下星期任择一天。命令及条例[2]待会后再公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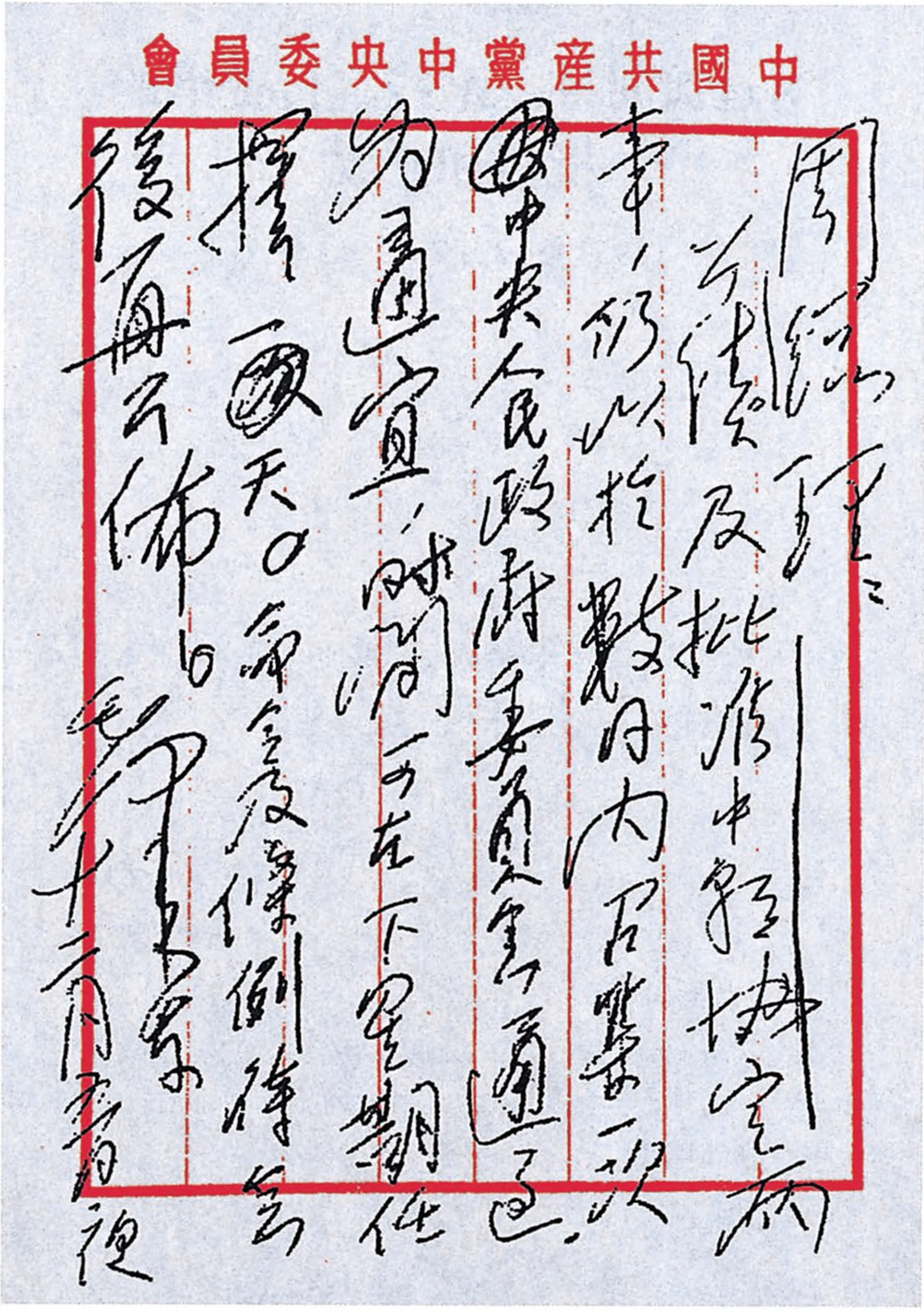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夜

---

[1] 指批准并公布《一九五四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

[2] 命令，指毛泽东为公布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而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命令。条例，指1954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这两件均于1953年12月10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周总理：

公债及批准中朝协定两事，似以于数日内召集一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为适宜，时间可在下星期任择一天。命令及公债条例待会后再行发布。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夜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手稿。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批语和修改

（1953年12月7日、13日）

一

乔木[1]同志：

宣传大纲请你们于数日内写好，先经你及凯丰、伯达[2]几位同志看过，最好座谈一下，于十二月十一日[3]以前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下午七时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胡乔木1953年12月9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总路线宣传与学习提纲的第六次稿今日上午约请伯达、凯丰、胡绳、熊复、许立群、于光远、马洪等同志讨论后，认为尚须作相当的修改，现正由凯丰同志修改，后日（十一日）可以送上。"毛泽东10日夜阅后写了如下批语："如来不及，十二日交我即可。"

二

乔木同志，告尚昆[1]：

此件[2]已看一遍，比前好多了。我作了一些增改[3]，请你邀伯达、凯丰看一下，看是否妥当；如有意见请告我；如无意见即送尚昆照扩大名单印发各同志阅看。最好**今天即能印发**，并请各同志**明天**（十四）**即看一遍**，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估计还会有些修改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早

三

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不是的，那时，我们还须在广大的农村中解决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那时在农村中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按毛泽东的要求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草稿。

[3] 毛泽东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所作的修改，主要有四处，本篇三、七是毛泽东加写的，五、六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

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有两年至三年时间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那时我们一方面在农村实行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一方面在城市立即着手接收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之变为社会主义的企业，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银行，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并已在过去几年中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开始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所有这些显示着我国过渡时期头几年中的错综复杂的形象。

四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

五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

---

[1] 这是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引述的经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这一表述，同周恩来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中所引述的毛泽东关于这一总路线的表述，在文字上略有差别。

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中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六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由于上述的矛盾，这些企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资金很多浪费，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影响到工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影响到国家计划受到破坏。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个广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

要，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

七

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1]，苏联的贝利亚[2]），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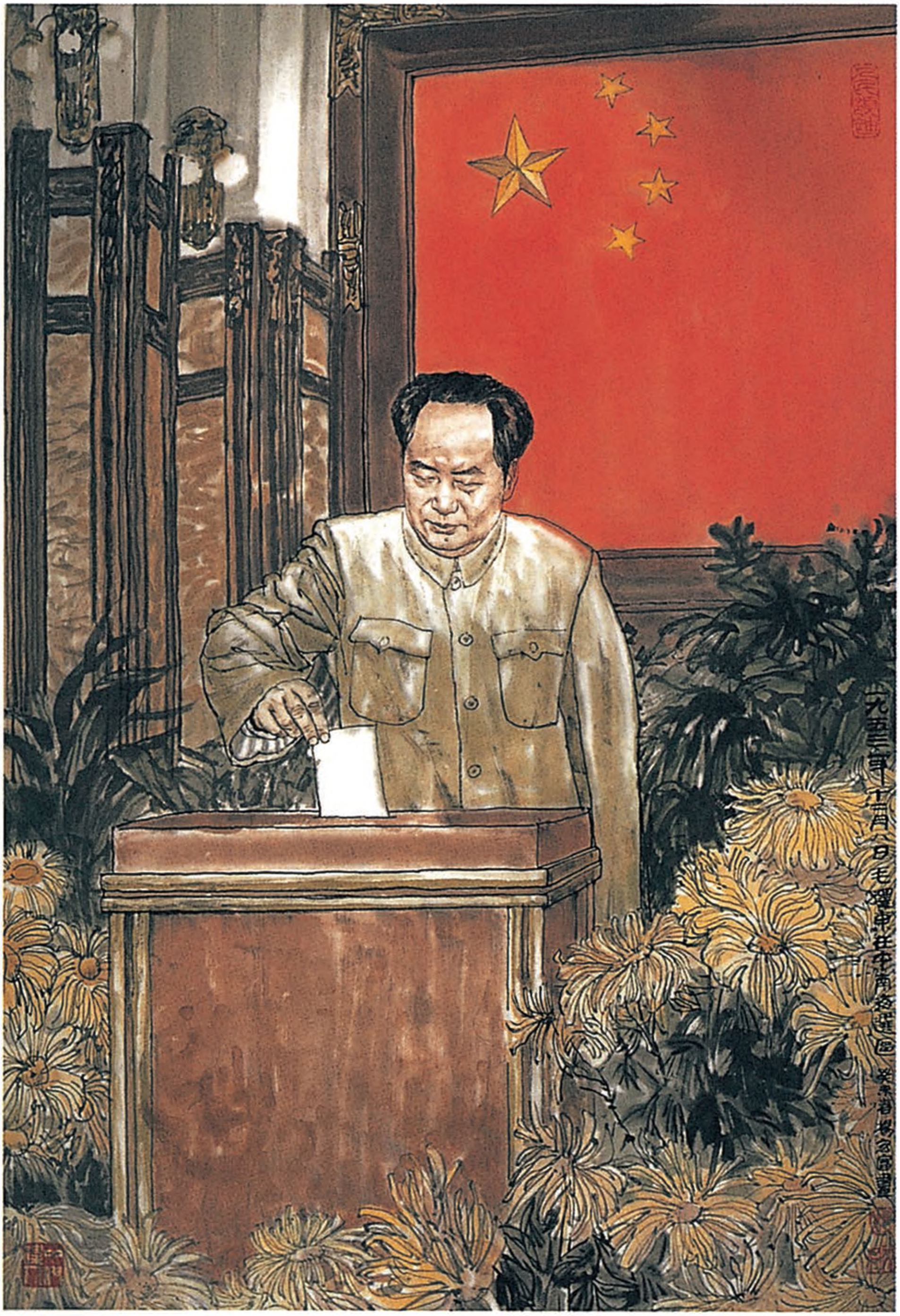
---

[1] 张国焘，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1935年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938年4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离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

[2] 贝利亚，曾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因反党和反国家罪行，于1953年6月被清除出党，同年12月被处决。

1953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12月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起步入勤政殿投票站投票。图为毛泽东投票选举西单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3年12月，毛泽东接见西单区委书记杜若。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八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選區

《毛泽东在中南海选区》（中国画）

给戴毓本[1]的信

（1953年12月9日）

毓本同志：

九月来信收到，迟复为歉。你在工人医院工作甚好，希望你在那里坚持工作下去。到一个新地方可能有困难，那你就应当坚持地逐步地去克服那里的困难，过一个时期就可能顺利起来。这样，对你和国家都是有益的。此复。顺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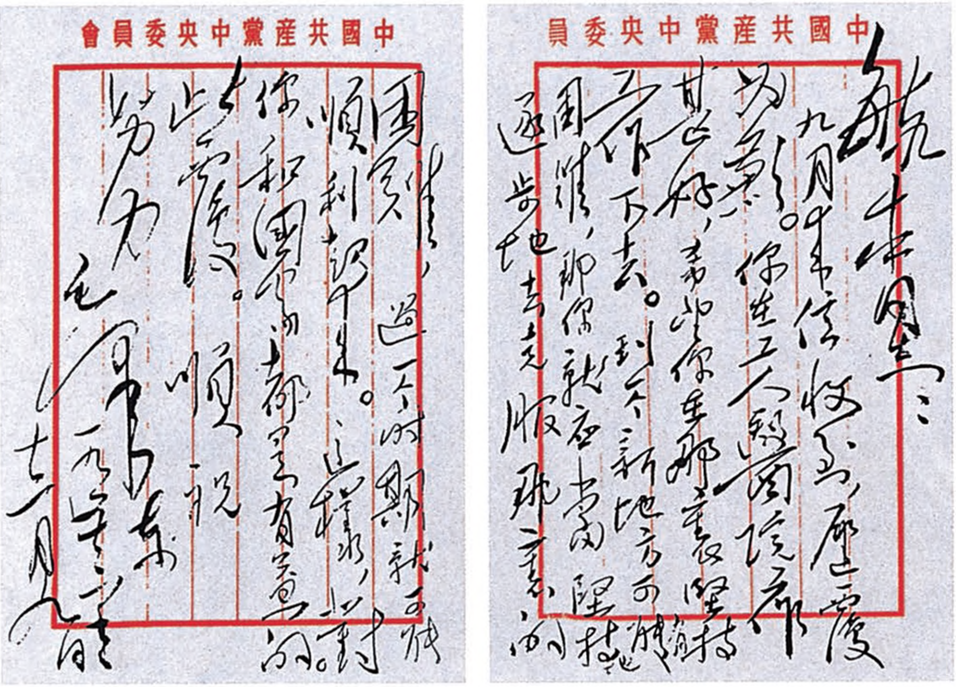
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九日

---

[1] 戴毓本，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在唐山工人医院工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毓本先生：

九月十日信收到，历次为念。你在工人俱乐部甚好，希望你在那里坚持工作下去。到一个新地方，可能遇到困难，那你就应当坚持地逐步地去克服现在的困难，过一个时期就会快顺利起来。这种情况，对你和周围的人都是有益的。此复。顺祝

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九日

毛泽东致戴毓本信的手稿。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统战人士安排问题[1]

（1953年12月9日）

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这样做，一切矛盾不能解决，公私、劳资、资资、劳劳、国劳（公公）的矛盾，不可终日。

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三类方法：第一类，苏联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破坏。第二类，发行公债购买，十年买完，但谁出钱买公债、谁付息？资产阶级也不会那么满意。第三类，我们现在的办法，十三年，工人付给资本家利润，资产阶级可养活起来，一段时间，企业还归他们管着。我们出了钱，资本家还会调皮？

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是列宁提出的，但苏联没有怎么搞起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是否在商业方面多搞了一点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现在的办法，不仅使资产阶级不搞破坏，还要使他们的生产增长。还有，我们现在对私营工商业“一下吞不了”。三年半的经验，我们找出这条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道路。

---

[1] 这是毛泽东1953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有个资本家拿出七亿元[1]钱给了和尚，把四十几个手表摆着看。这是一个例子，值得注意，是阶级要灭亡的心情，把钱乱花掉。我们要向他们的子女做工作，向他们的左右做工作，向他们本人做工作，消息要灵通，多做工作。

公私合营，实际上百分之九十是社会主义。对私营企业国家可投资一部分，这很便宜，而国家新建企业多费劲。把公私合营企业当作我们自己的，这很有味道。

新城市堵住资本主义商业，要按需要和可能尽力争取做到。如果我们来不及堵住，那里又有需要，有一点资本主义商业，也没有什么特别可怕。问题是我们没有大力去堵住。

根据地下工厂大量发展的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让不让私人资本主义发展，这要由我们的政策来决定。但政策决定于需要，如果社会对私人资本主义有需要，那还是要发展。私营工厂，十人以上的可能有残留，十人以下的可能有发展，还可能有新生的。社会有需要时，让它发展，想办法管起来，以后再合营。十年搞掉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这没有什么急躁冒进。改造十人以上的私营工厂可能不要十年，也许只要七年。

已过了四年，天下小变；再过四年，天下大变，包括人、经济、文化、社会舆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明年一定要比较稳，后年大进一步，突飞猛进还在后两年。撑着石头打炮泅，淹不死人。

基本上赞成这个计划，准备修改。大致控制数字，还要看发展。总之，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每年到这里讨论三四次，至少两次。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给资方分红利，十三年准备支出五

---

[1] 指人民币旧币，旧币1万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起流通的人民币新币1元。下同。

十万亿元给资本家。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购买，比较行得通。工人付给红利，养活资本家。工人和我们党内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这还不是仁至义尽？“新民主主义那么好”，资本家称赞的，就是这一条。

私营企业要多少年才实行国营？可能有先有后，要看发展，看看他们的生活、社会、人心等。今天政府会议上李烛尘[1]讲话，对实行国营表现新的积极性。要培养这样一批人。实行国营，资本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可当工人，就是拿工钱吃饭。

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

大体维持现有统一战线，还是缩小或者很大缩小？

（周恩来：共产党和最可靠的人的比重，要占绝大多数，这方面比过去增多，由他们掌权，管业务。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起义人员的作用比过去小了，在这个少数中，资本家可比往日多一点，其他方面可少一点。）

削掉一小部分太烂了的人，还可以安排他们在统一战线组织里。理由是安排这些人没有坏处。要正确认识统战组织成分不纯的问题。瑞金时代组织最纯洁，但有一个缺点，形式纯洁，却孤立了自己，政权不稳定，要搬家。搬到延安，组织不纯洁了，表现了灵活性。说共产党没有灵活性，我不相信。从延安起组织不纯，不纯，日子就好过了。到了北京组织又不纯了，许多人反对，特别是青年娃娃。要他们看《水浒传》，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清朝政府最厉害，能用汉人。

---

[1] 李烛尘，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统战人士除个别人外，尽量安排他们当人大代表，担任政府职务，但安排他们管业务要谨慎。这不影响共产党及共产党同情者的掌权。

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

统一战线中，工农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劳动人民的联盟，对这第一个联盟没有争论。同劳动人民的联盟，时间会很长，农业要全部变成国营农场，工农才会只是职业上的区别，无工人农民之分。第二个联盟，也就是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资产阶级问题。资产阶级是一个敌对阶级，但不同于别的敌对阶级，它同我们合作。不善于区别能合作和不能合作的敌对者，就会犯路线错误。

一九四九年农村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那时农村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革命。就中华民族来说，首先是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现在新的矛盾产生了，农村里产生新的资本主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区乡干部有余粮。当然他们不是资本主义分子，但不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倾向便要发展。所以要大大宣传总路线，宣传农业集体化。那时，城市也不能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国营经济才接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摊子没有摆开，没有做出榜样，优势没有形成。现在是应该也有可能大大宣传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

对胡乔木[1]关于在他暂离期间由凯丰[2]列席中央会议等问题的请示[3]的批语

（1953年12月10日）

刘、周、朱、陈、高、小平、仲勋、尚昆阅，退少奇处理。

（一）乔木暂离时期，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二）文字问题待会谈。

毛泽东

十二月十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3] 胡乔木1953年12月7日在给毛泽东、刘少奇的请示信中提出：一、“在我即将离开北京并暂时离开宣传部工作的条件下，凯丰同志似有能经常列席中央会议的需要”，“因宣传部负着每天指导宣传工作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工作，而仲勋同志现在对宣传部工作过问的可能很少，所以希望中央对此能予以格外的考虑”。二、少数民族文字问题和汉字改革问题的两个文件均已印发，关于少数民族文字问题，拟由政务院以指示形式发布，希望能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通过。汉字改革问题较为复杂，盼中央能对所提改革办法作一原则指示。

对统战部召集人物安排工作会议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53年12月12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要明年九月才召集，安排会议太早了不好，以在明年春末夏初时为宜。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1953年11月17日给刘少奇并报毛泽东、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为了统盘研究中央及各省、市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具体方案，拟于1954年1月间召集一次人物安排工作会议。会议内容包括：审查各省、市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委员会和统一战线组织中民主人士所占比例及具体的人事安排方案；拟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第二届政协中民主人士的比例、名单及选出地区和单位的初步方案。

接受朝鲜驻华大使崔一
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12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呈递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国书，并衷心感谢您的祝贺。

三年多来，中朝两国人民在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结成了极深厚的友谊。最近我们两国间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更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了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牢不可破的友好互助关系。我们之间日益坚强的团结无疑地将对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继续作出贡献。

我确信：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国家兄弟般的援助下，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勇敢而勤劳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在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及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得到新的光辉的成就。

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并发展中朝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互助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接受丹麦驻华公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12日）

公使先生：

我高兴地接受阁下所呈递的丹麦国王陛下的国书，并对您的祝贺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对于中、丹两国人民间商业及文化关系的发展，甚为重视，并相信这种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两国人民友谊，以及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帮助的。

我欢迎阁下出任丹麦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并愿对贵公使旨在加强贵我两国友好关系的工作予以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贵国国王陛下健康。

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合影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於北京

1953年12月12日，毛泽东和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与会人员合影。

对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3年12月13日、22日）

一

即退陈伯达[2]同志，尚昆[3]同志。

第（七）节[4]加得好，但还应发挥一点，可引用过去决议中的

---

[1]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草案），曾提交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的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讨论和征求意见，12月16日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下发，并在1954年1月9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本篇一、四是毛泽东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和决议发表前写的批语，其中：一写在决议（草案）的第三次印稿上；四写在邓子恢1953年12月18日为送审决议最后修改稿给毛泽东的信上。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决议稿起草过程中加写的第七点，主要内容是：在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运动中，要继续切实注意和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中指出的“要满腔热情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的指示，必须执行适当照顾单干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的政策，发挥单干农民可能的生产潜在力量，给以必要的贷款和可能的技术援助，帮助他们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而避免受富农、高利贷主和投机商人的剥削。

一些话。改好，即送尚昆同志印发扩大人数那些同志看，最好今天能印发，请他们明天（十二月十四日）准备提出修改的意见。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早

二

现有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成为引导农民过渡到更高级的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农庄）的简便形式。也就是说，这是自然地不免〈勉〉强地吸引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形式，使个体农民和加入了互助组的农民在他们进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组织的时候不感到突然，而是事先有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准备的，因而能够避免由于突然上升而引起的种种损失。

三

中央认为各级党委有必要更多和更好地注意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准备逐步试办和逐步推行的条件，继续贯彻“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从而带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目前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方面注意太少，缺乏领导或没有领导的状态，必须加以改变。

四

刘、周、陈、朱、小平[1]阅，交邓子恢[2]同志处理。

在报上发表，并写一社论[3]，同时广播。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二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3]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于1954年1月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是《正确地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1953年，毛泽东视察高碑店时，和人民群众在一起，并作重要讲话。

关于看望徐悲鸿[1]夫人的信

（1953年12月13日）

一

静文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2]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

田家英同志：

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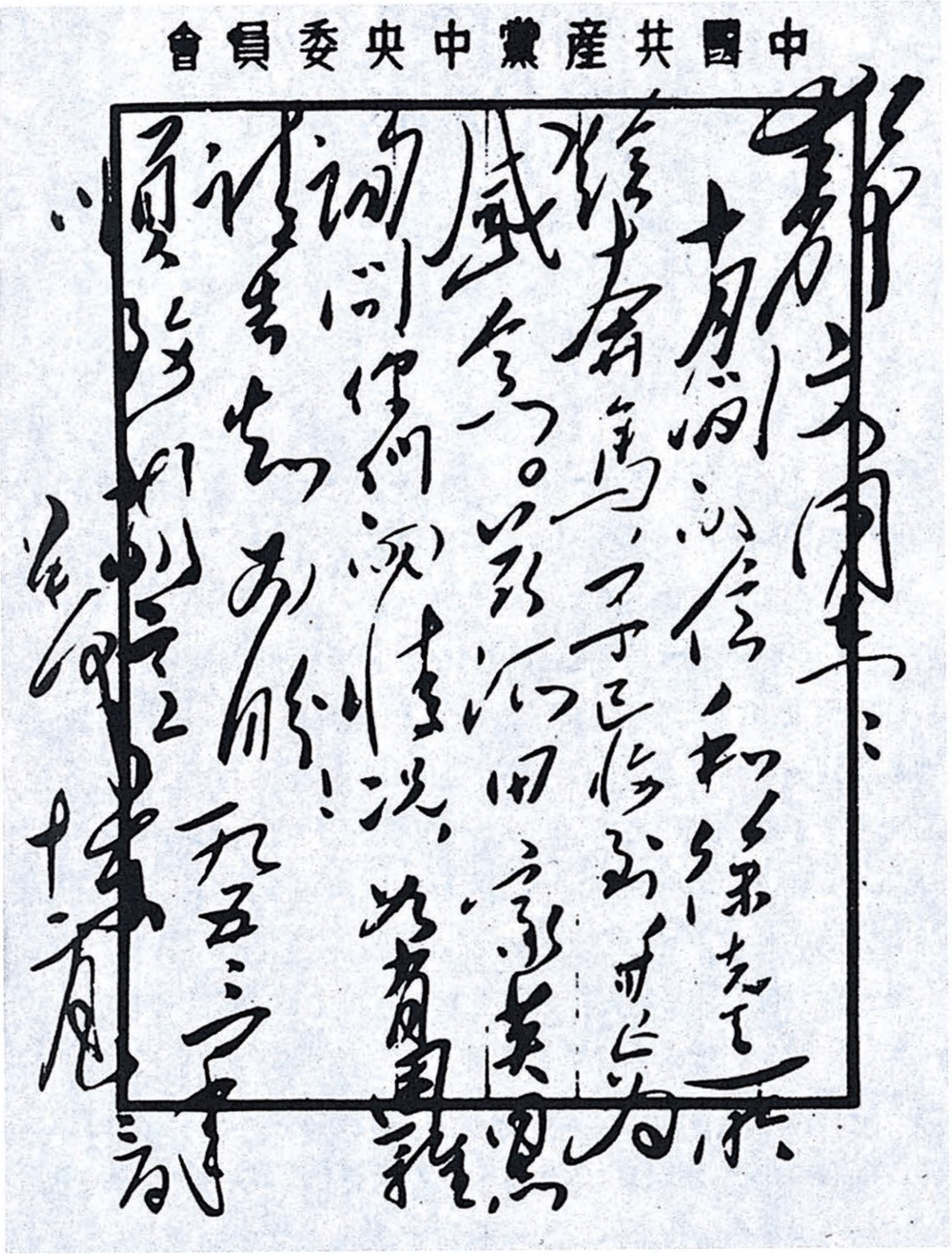
---

[1] 徐悲鸿，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1953年9月26日因患脑溢血病逝。

[2]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静文同志：

十月四日信和徐先生[illegible]奔马[illegible]收到，[illegible]。[illegible]询问你们[illegible]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日

毛泽东致廖静文信的手稿。

接受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3年12月15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高兴地接受您呈递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四年来获得了巨大的进展并日臻巩固。中国人民一贯重视苏联的友谊，今天在从事大规模国家经济建设事业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苏联伟大友谊的无上珍贵。中国人民一定永远以始终不懈的努力来不断加强中苏两国间的亲密的友好同盟和全面合作。我同样确信：我们两大国家间的牢不可破的同盟和合作不仅完全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对于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对于保障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事业起着无可比拟的巨大作用。

大使同志，我极为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苏两国友好互助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上获得完全的成功。

1953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对金门作战建议的批语[1]

（1953年12月19日）

退彭。此意见[2]可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部长张震1953年12月16日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信的批语。

[2] 指张震信中提出的意见。信中说：敌人在金门已修筑了较坚固的地下工事，攻占金门想在一天或一晚解决战斗的可能性不大。如时间拖延较久，就须将台湾可能增援计算在内。再有，华东海军在上、下大陈岛未打下前不能全部参战，如制造大量机帆船不但有很大困难，而且也不合使用。作战物资所需甚巨，如第一线机场无保证，仅靠一条公路运输，困难很大。从使用兵力看，还须南下三个军。我总觉得，金门等于下围棋的一个死子，攻击主动权在我手中，只要我准备充分，任何时候都可发起攻击。在条件尚未充分具备时，以不过急发起战斗为好。彭德怀、聂荣臻将此信送呈毛泽东。

同意目前不打金门[1]

（1953年12月22日）

刘、周、朱、彭、陈毅[2]同志阅，请彭处理。

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3]，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部副部长王尚荣1953年12月19日关于攻击金门费用概算报告上写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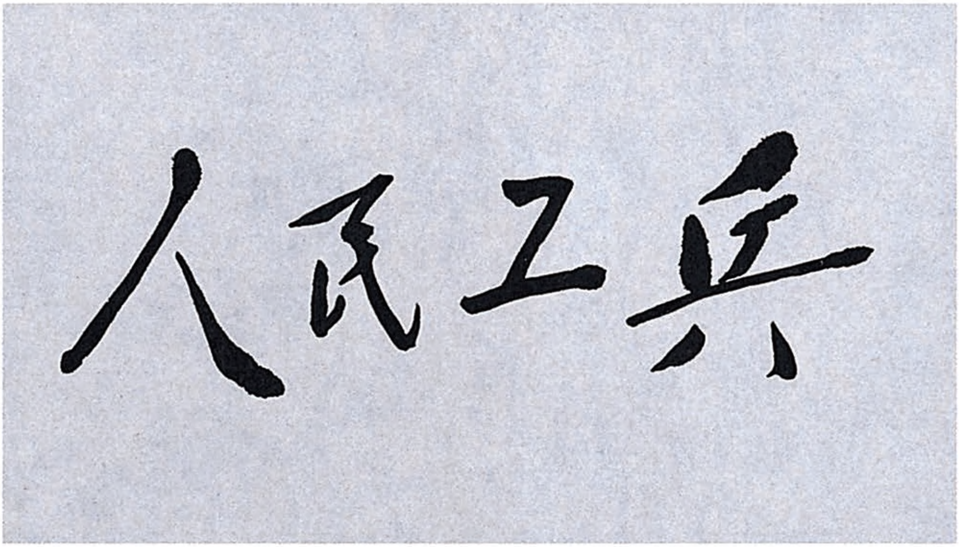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华局第二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员。

[3] 指人民币旧币，一万元相当于人民币新币一元。

为《人民工兵》题名[1]

（1953年12月23日）

人民工兵



毛泽东为《人民工兵》题写的刊名。

---

[1] 20世纪50年代，工程兵为更好地开展政治工作，创办了《人民工兵》杂志，毛泽东亲自题写刊名。

给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的贺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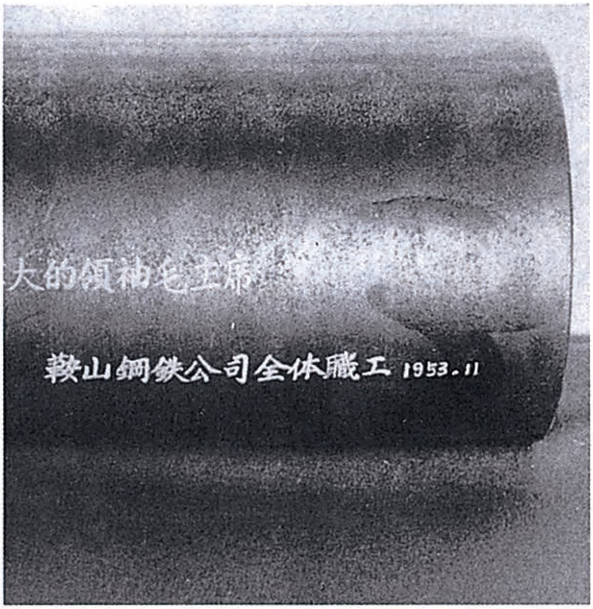
（1953年12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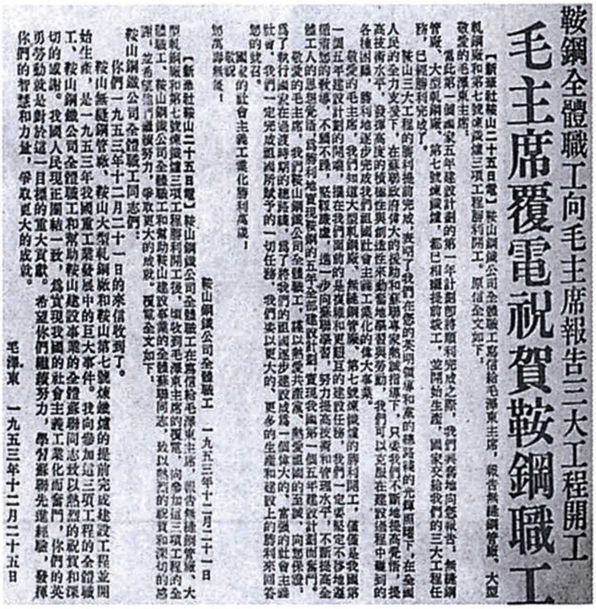
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同志们：

你们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收到了。鞍山无缝钢管厂、鞍山大型轧钢厂和鞍山第七号炼铁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一九五三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参加这三项工程的全体职工、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和帮助鞍山建设事业的全体苏联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发挥你们的智慧和力量，争取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鞍鋼全體職工向毛主席報告三大工程開工

毛主席覆電祝賀鞍鋼職工

【新華社鞍山二十五日電】鞍山鋼鐵公司全體職工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報告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和第七號煉鐵爐三項工程勝利開工。原信全文如下：

敬愛的毛澤東主席：

當此第一個國家五年建設計劃的第一年計劃即將順利完成之際，我們興奮地向您報告，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第七號煉鐵爐，都已相繼提前竣工，並開始生產，國家交給我們的三大工程任務，已經勝利完成了。

鞍山三大工程的勝利提前完成，表明了我們在您的英明領導和黨的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在全國人民的全力支援下，在蘇聯政府偉大的援助和蘇聯專家熱誠指導下，只要我們不斷地提高覺悟，提高技術水平，發揮高度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來勤奮地學習與勞動，我們可以克服在建設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困難，勝利地逐步完成我們祖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偉大事業。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知道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第七號煉鐵爐的勝利開工，僅僅是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的開端，擺在我們面前的是複雜和更艱巨的建設任務，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地遵循着您的教導，不驕不躁，堅持謙虛，進一步向蘇聯學習，努力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全體工人的思想覺悟，爲勝利地實現鞍鋼的五年全部建設計劃，實現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而奮鬥。

敬愛的毛主席，我們鞍山鋼鐵公司全體職工，謹以熱愛共產黨、熱愛祖國的至誠，向您保證：爲了執行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爲了將我們的祖國逐步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富強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一定完成祖國所賦予的一切任務。我們要以更大的、更多的生產和建設上的勝利來回答您的號召。

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勝利萬歲！

敬祝

您萬壽無疆！

鞍山鋼鐵公司全體職工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新華社鞍山二十五日電】鞍山鋼鐵公司全體職工在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報告無縫鋼管廠、大型軋鋼廠和第七號煉鐵爐三項工程勝利開工後，頃收到毛澤東主席的覆電，向參加這三項工程的全體職工、鞍山鋼鐵公司全體職工和幫助鞍山建設事業的全體蘇聯同志，致以熱烈的祝賀和深切的感謝，並希望他們繼續努力，爭取更大的成就。覆電全文如下：

鞍山鋼鐵公司全體職工同志們：

你們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來信收到了。

鞍山無縫鋼管廠、鞍山大型軋鋼廠和鞍山第七號煉鐵爐的提前完成建設工程並開始生產，是一九五三年我國重工業發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向參加這三項工程的全體職工、鞍山鋼鐵公司全體職工和幫助鞍山建設事業的全體蘇聯同志致以熱烈的祝賀和深切的感謝。我國人民現正團結一致，爲實現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你們的英勇勞動就是對於這一目標的重大貢獻。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發揮你們的智慧和力量，爭取更大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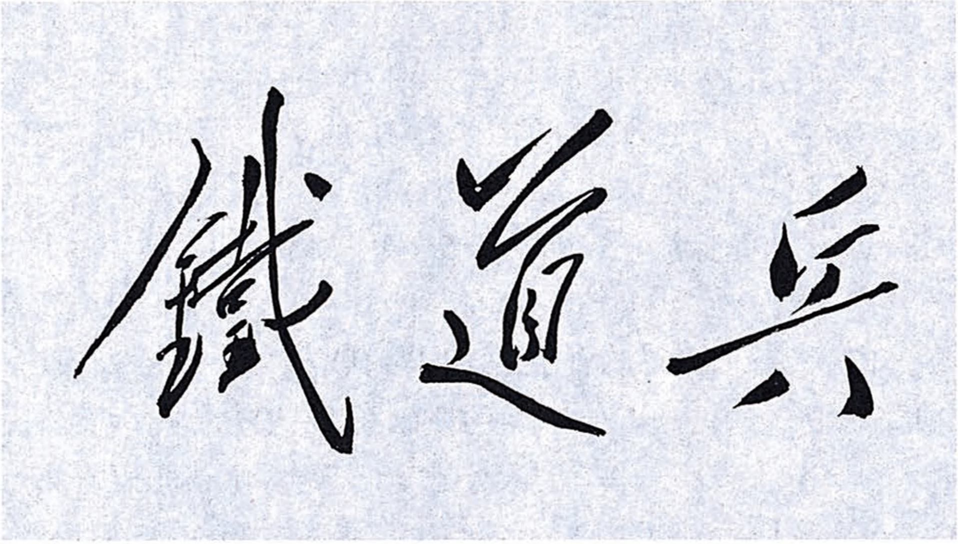
毛澤東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953年，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炼铁厂七号高炉胜利建成。图为1953年11月，鞍钢全体职工献给毛泽东的一段无缝钢管和毛泽东给鞍钢职工的祝贺电。

为《铁道兵》题名[1]

（1953年12月25日）

铁道兵



毛泽东为《铁道兵》题写的刊名。

---

[1] 1953年12月25日，毛泽东专门接见了即将出任铁道兵司令员的王震，并亲笔为《铁道兵》报题写了“铁道兵”三个大字。

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1]

（1953年）

（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中国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个革命，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算起，经过了二十八年，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世界形势的改变，国内形势的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以苏联为首的国际革命力量的支援，而取得了胜利。这是继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胜利。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产生了许多人民民主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形势。这三个胜利，产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具有八亿多人口的政治和经济的强大的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是大大削弱了。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各种不可能克服的矛盾，资本主义阵营是不巩固的，经过一些时间以后，势必发生分裂和冲突，并且可能引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社会主义和民主的阵营则将互助团结、日益繁荣、日益强大、日益巩固。

---

[1] 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手稿上有“一九五三年”字样。毛泽东这篇文稿只写了第一条，没有写下去的原因不详。

对学校领导骨干、教材等问题的指示

（1953 年）

1. 领导骨干：大专院校，中学必须有骨干。骨干配备大专由中央组织部负责，中学由地方负责，从宣传部门，青年团干部下去。有了好校长就有好教师。

2. 教材问题：集中力量编，语文、历史等原则问题，由陈伯达同志等解决。

3. 整顿小学：防止过“左”，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要照顾农村特点。私塾也要让其存在。小学有三类：（1）中心小学、完全小学；（2）一般小学；（3）速成小学。小学问题主要便利农民子弟入学。教师只要不是现行犯，不作反革命宣传就可存在。对超龄学生不应赶出，首先教好。民办可办，不要求太严，群众需要自愿，学费可收。五年一贯制暂缓执行，提早了。小学生不能都升学，这不叫失学，要加强劳动教育。

4. 学生健康，高中大部分要有助学金，要增加营养，减轻负担。

5. 教育工作重点和关键：重点是高等学校和高中，关键问题是师资。中学要重点办好一批。如何办好高中，这是我们的重点任务。

6. 招生要注意成分。

7. 速成识字法，在农村有局限性。应是群众自愿的业务教育。

8. 中央教育部任务：（1）方针计划；（2）教材。

9. 总的方针和工作重点：过去主要毛病是盲目冒进，不能适应建设，我们任务是培养干部和逐渐适应生产发展，目前在培养干部。

青少年的教育

（1953年）

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很懂得这个事情，他提倡孩子要活泼，要顽皮。他说“驯良之类并不是恶德，但发展开去，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1]。在有些地方要让我们的后一代学我们；但有些地方就决不要后代再学我们，再学我们就糟糕。我们总是中孔夫子的毒太深了。不仅学校如此，就是托儿所也要很好注意。现在不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还好，一送到托儿所就“机械化”了。在这些方面，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用很多方法，把我们的青年、儿童变得朝气蓬勃，生龙活虎一样。有这样的人民，建立这样一个国家，那我们中国就了不起。要懂得人在幼年、青年的时候，正是性格、品质慢慢形成的时候，如果在这方面不会教育他们，将来的损失就很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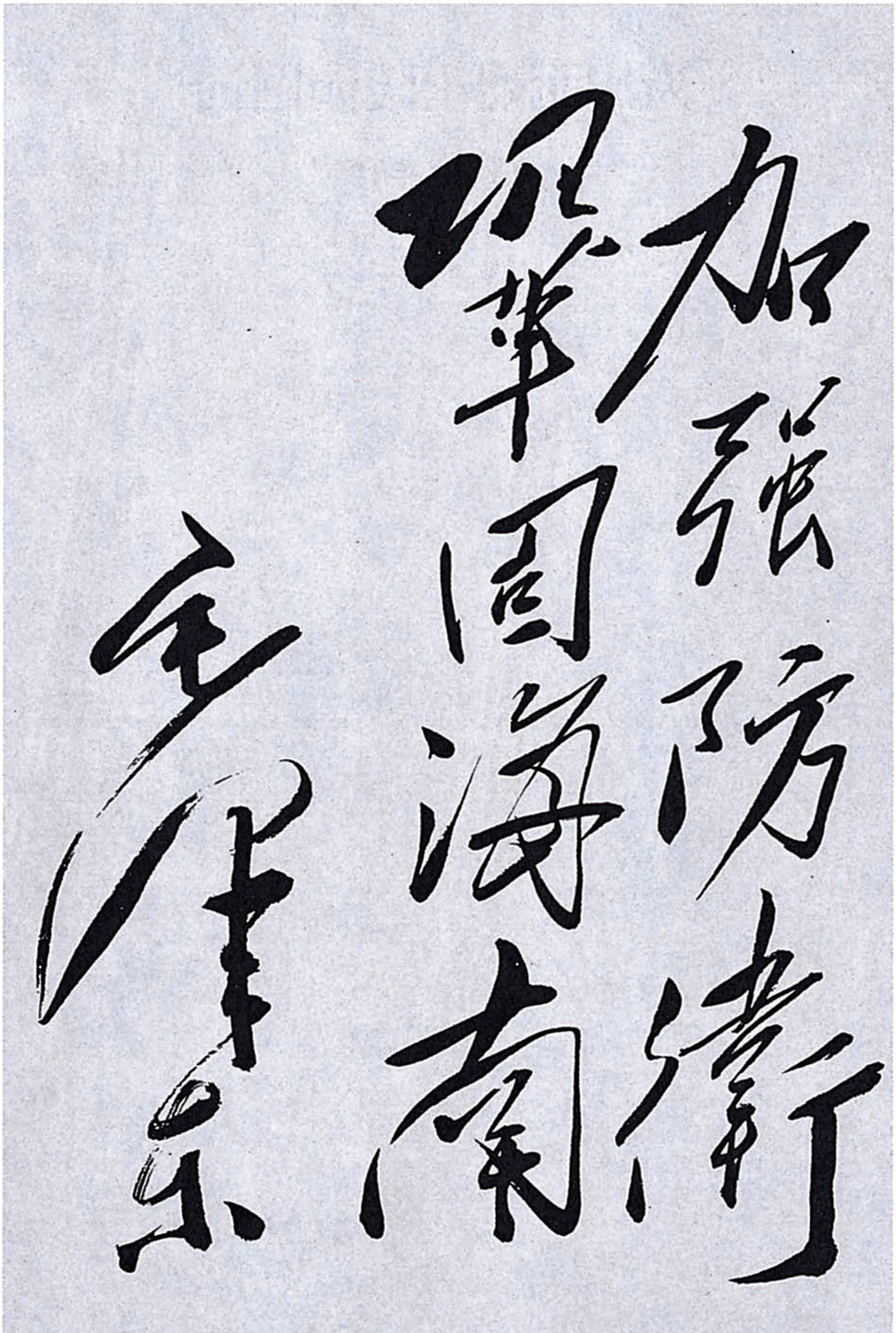
[1] 参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4页。

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纪念碑题词

（1953 年）

加强防卫，巩固海南。

毛泽东



加强防衛

鞏固海南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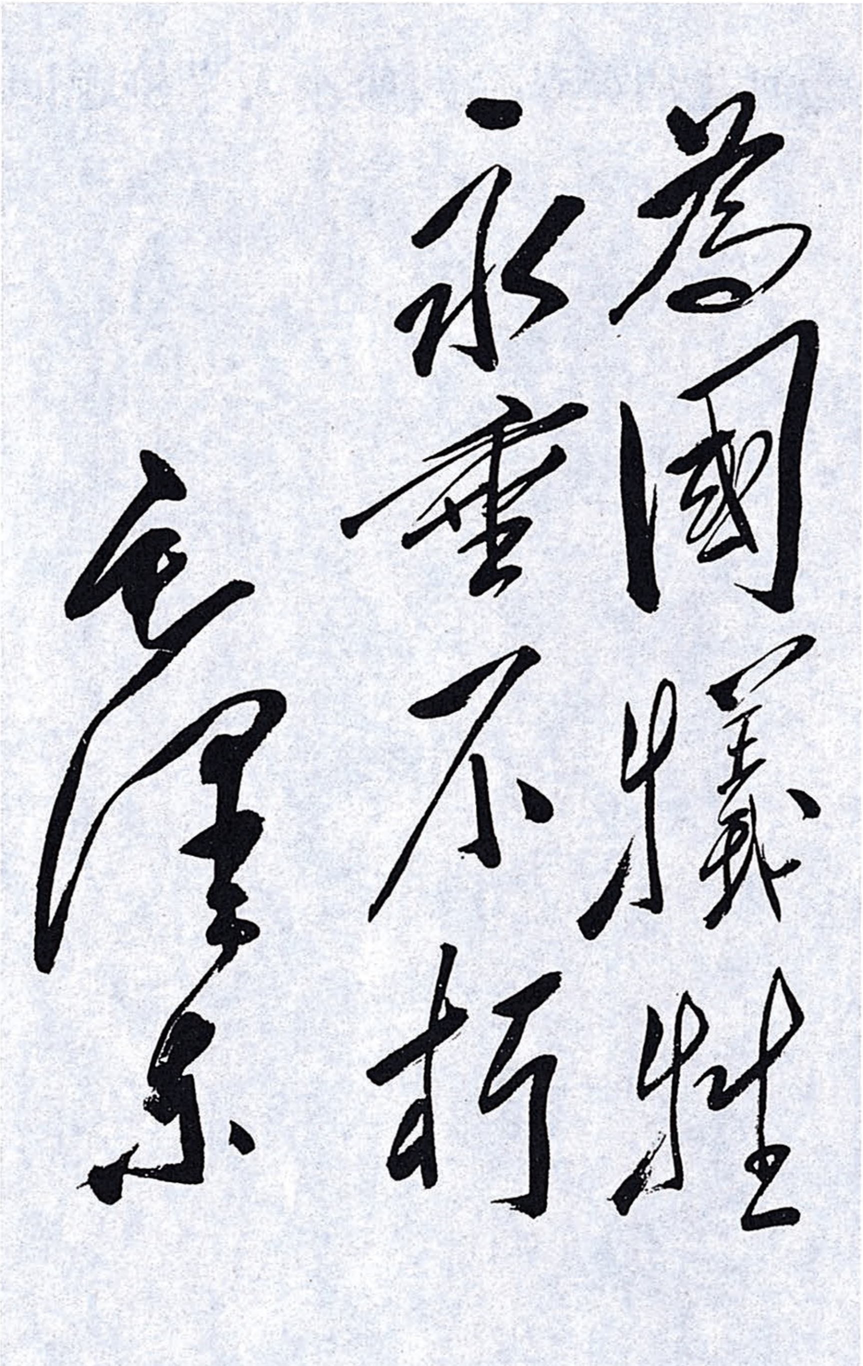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海南岛海榆中线公路纪念碑的题词。

为华北烈士陵园题词

（1953 年）

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毛泽东



為國犧牲
永垂不朽
毛澤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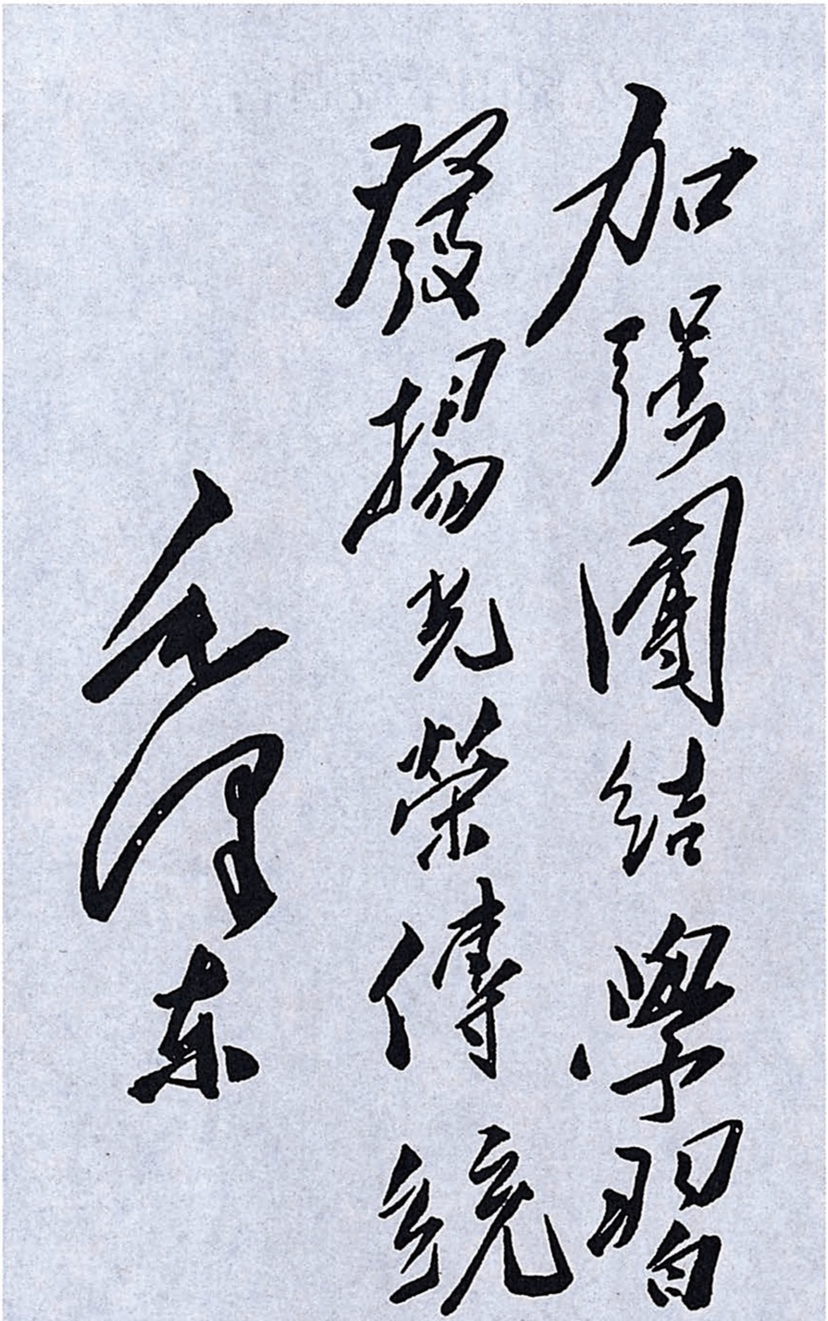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华北烈士陵园的题词。

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题词

（1953年）

加强团结学习，发扬光荣传统。

毛泽东



加強團結學習
發揚光榮傳統
毛泽东

毛泽东为河北清苑革命残废军人学校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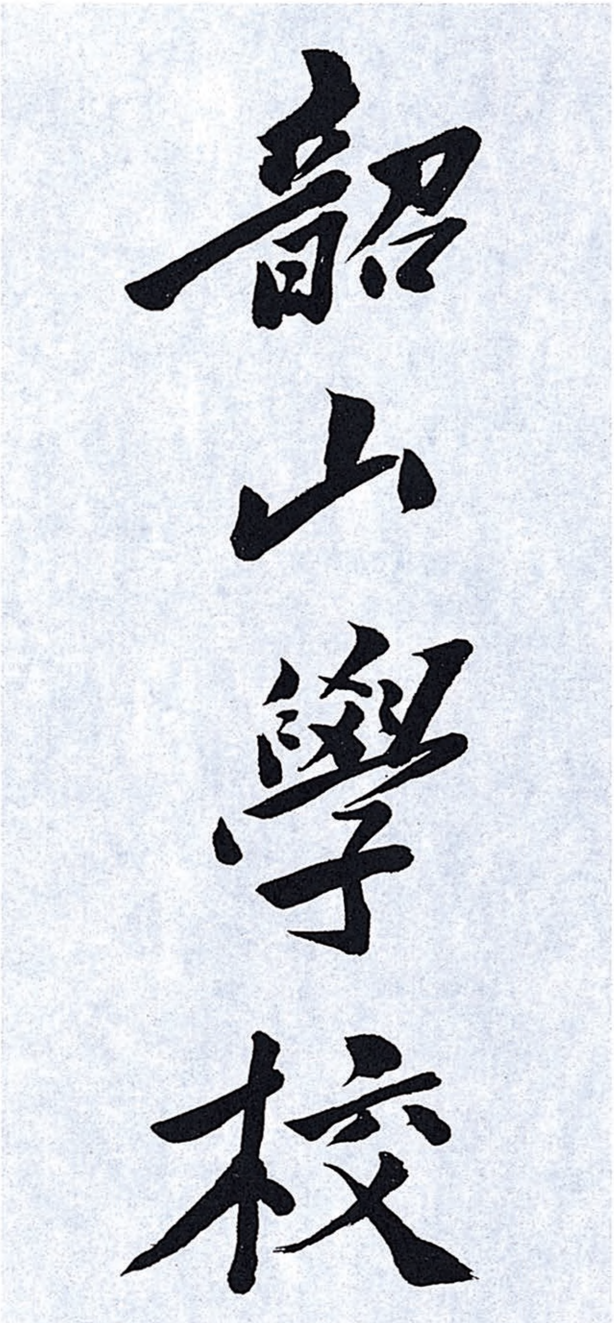
为韶山学校题名[1]

（1953 年）

韶山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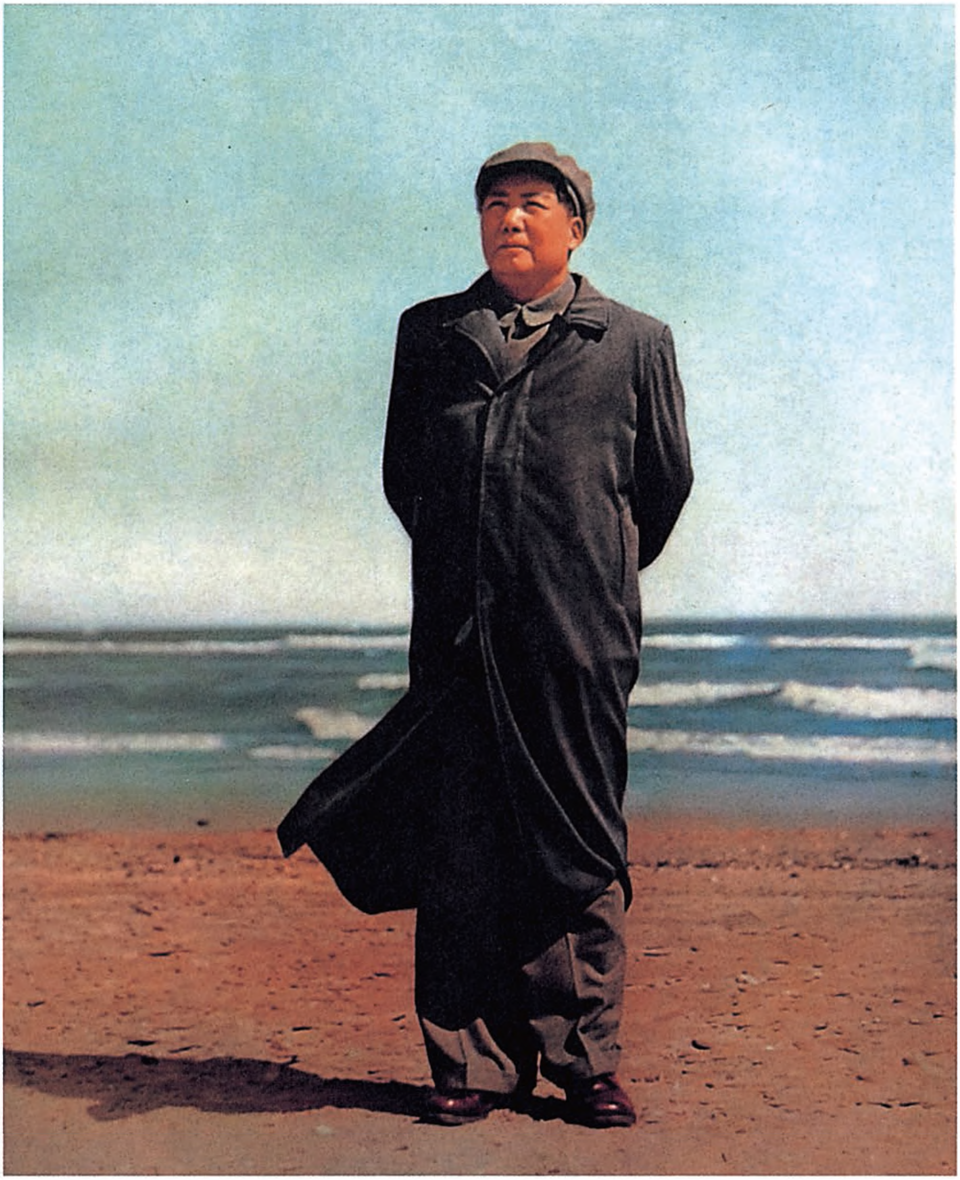
---

[1] 毛泽东命名并亲笔题写校名的“韶山学校”，其前身是1921年毛泽东倡导创办的毛氏族校。1952年冬，毛泽东得知家乡兴建了学校，甚为高兴，欣然题写了“韶山学校”四个大字。1953年正式更名为韶山学校。



毛泽东为韶山学校题写的校名。

1954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在转发邓子恢[1]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报告时加写的话[2]

（1954年1月4日）

一

此外，不但老根据地应这样做，一切晚解放区也应大体上这样做，也应用极大的注意力去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

二

所谓干部地方化，当然不是说地方高级和中级领导机关都要用本地人，不能用外地人，相反是必须要用必要的外地人的，现在如此，将来还会如此。在农业机械化实施的时候，农村技术人员也是要用一些外地人的。我在这里说的主要是指目前县区干部的情况。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1954年1月4日转发邓子恢关于老根据地干部情况报告的批语稿时，加写在末尾的一段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写的一个批注，加括号写在邓子恢报告中关于干部地方化的一段文字之后。

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修改[1]

（1954年1月）

一

阶级是由党领导着的，党又是由它的中央委员会领导着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还紧紧地依靠着一批忠实的有能力的高级干部。因此，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的负责干部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干部的团结，尤其是决定革命胜利的最主要的关键。

二

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

---

[1]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是在北京起草后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的。在毛泽东主持下，有跟他一起去杭州的同志参加，对决议草案作了大量的修改，但最初的改稿未能保存下来。现在看到的是1954年1月9日杨尚昆从杭州带到北京的决议草案稿。收入本篇的毛泽东的两处修改，就是改在这份决议草案稿上的。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

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问题的建议

（1954年1月7日、8日）

一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1]收到。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2]的几位同志，林彪[3]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4]。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

[2] 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3] 林彪，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杭州养病。

[4]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

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廿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余请尚昆[1]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二

少奇同志：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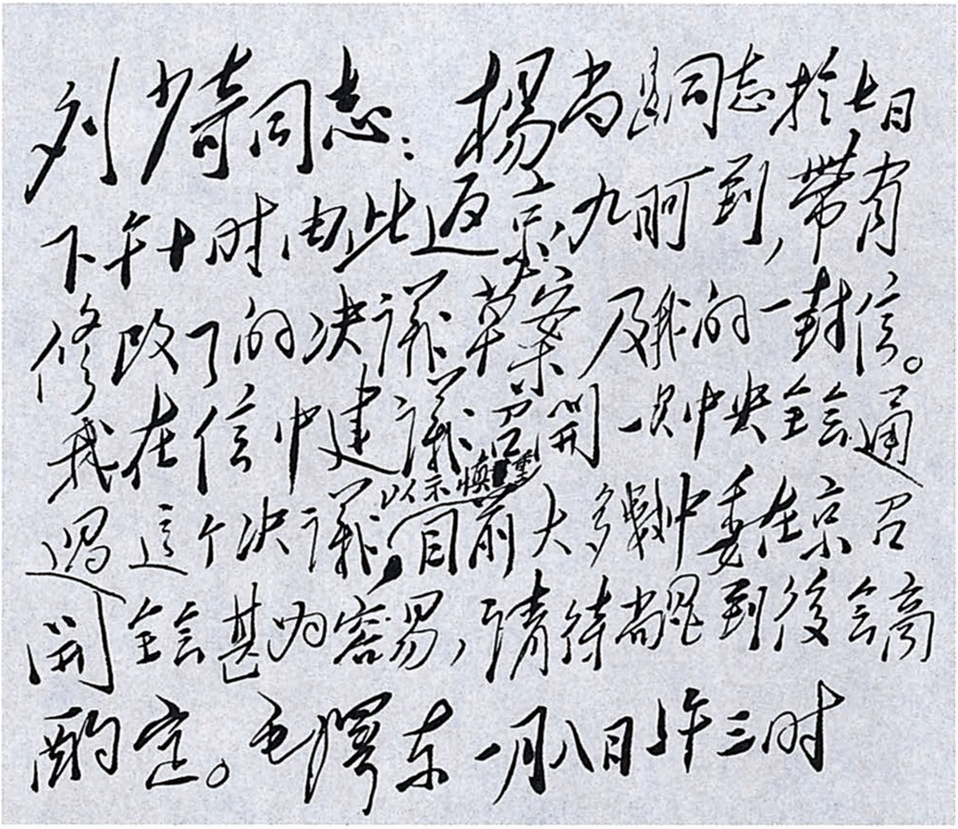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七日

三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于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日可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数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后会商酌定。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三时



刘少奇同志：杨尚昆同志於七日下午十时由此返京，九晨到，带有修改了的决议草案及我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建议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過這个决议，以示慎重，目前大多數中委在京，召开全会甚为容易，请待尚昆到後会商酌定。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三时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的手稿。

宪法起草工作计划

（1954年1月15日）

少奇同志，并中央各同志：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计划如下：

（一）争取在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

（二）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1]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

（三）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

（四）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

（五）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为了在二月间政治局便于讨论计，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

---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

（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

（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

（四）一九一三年天坛宪法草案，一九二三年曹锟宪法，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

（五）法国一九四六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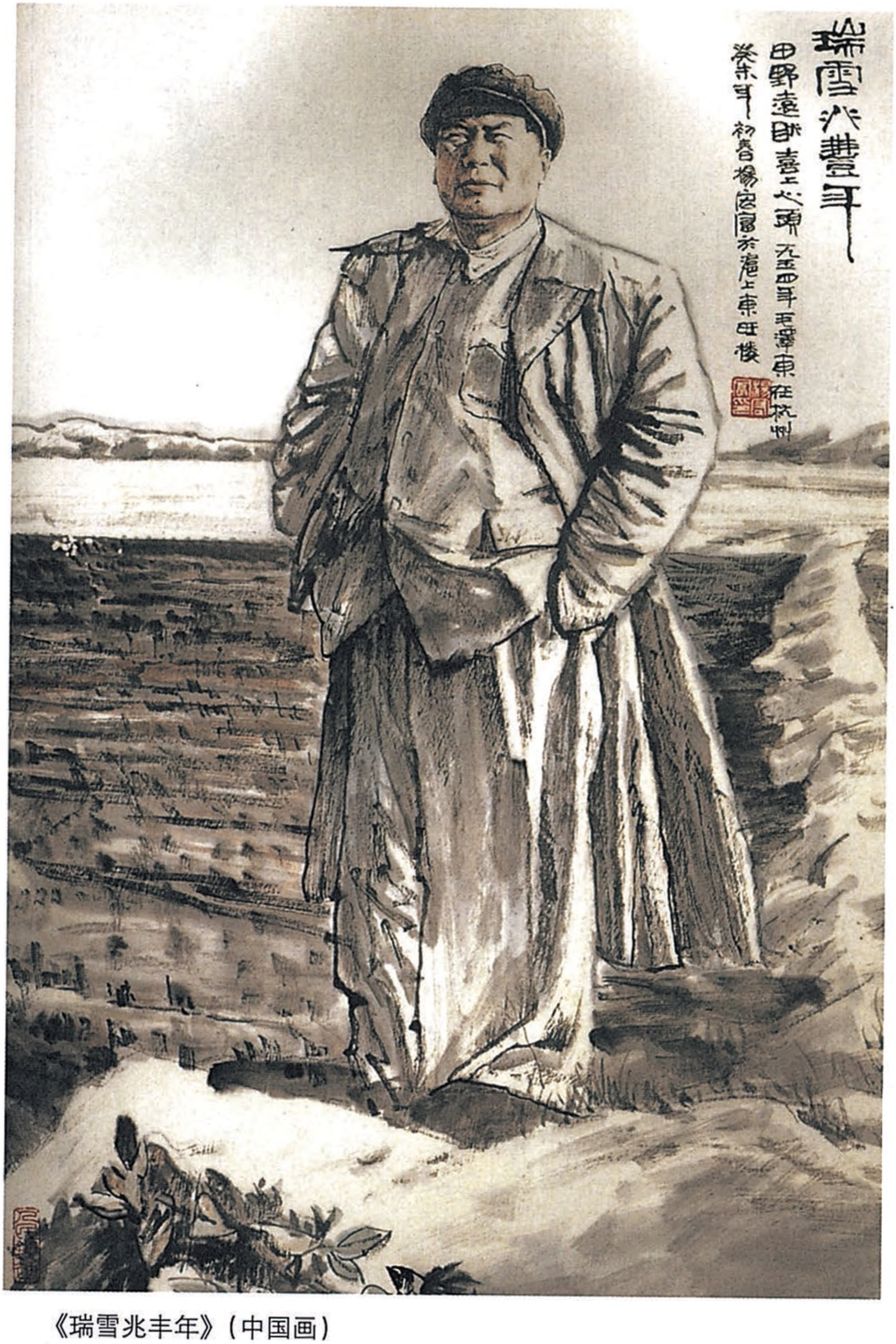
有何意见望告。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浙江农村视察。


瑞雪兆豐年
田野遠眺喜上心頭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杭州
癸未年初春楊宏富於滬上東丘樓

《瑞雪兆丰年》（中国画）

关于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征求对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意见的电报

（1954年1月18日）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又张闻天[1]同志宜通知他到会。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一月十八日

---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

关于高岗[1]来信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问题致刘少奇电

（1954年1月22日）

刘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批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图为七届四中全会的会场。

同意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1]的电报

（1954年1月23日）

德怀同志：

原则上同意你在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即可照此先讲，会后经书记处讨论修改后再印发。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

---

[1]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在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稿。主要讲了五点内容：一、关于会议的收获；二、关于正规化、现代化问题；三、关于学习苏联经验与发扬我军光荣传统问题；四、关于组织编制问题；五、关于加强团结改进领导问题。

关于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词的修改意见[1]致朱德电

（1954年1月25日）

即送朱德同志：

一月廿四日电及闭幕词收到。罗瑞卿、陈伯达二同志建议，在说党军关系及学习苏联的地方增加几句话，我看了认为可以，请你

---

[1] 罗瑞卿、陈伯达建议在朱德的闭幕词中增加的几句话是：关于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原闭幕词稿说："全党团结的最重要的关键，是党和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间的团结。因此，党的和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团结应有很高的自觉，应充分认识自己责任的重大。"陈伯达建议在这以后增加一段话："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关于学习苏联问题，原闭幕词稿说："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苏联军队先进的作战经验，学习苏联军队现代化的指挥艺术，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统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罗瑞卿建议在这之后增加一段话："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

和德怀[1]同志等酌定之。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现将有修改处的几段照发如下。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由杨尚昆[1]转达四中全会文件修改情况和有关意见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1月27日）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关于文件修改情形及我的一些意见，请杨尚昆同志向你们作报告。我和其他同志在这里都好。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

[1]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1月下旬携带四中全会文件从北京到杭州。

1954年1月29日，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同游杭州五云山。

1954年1月31日，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陪同毛泽东视察钱塘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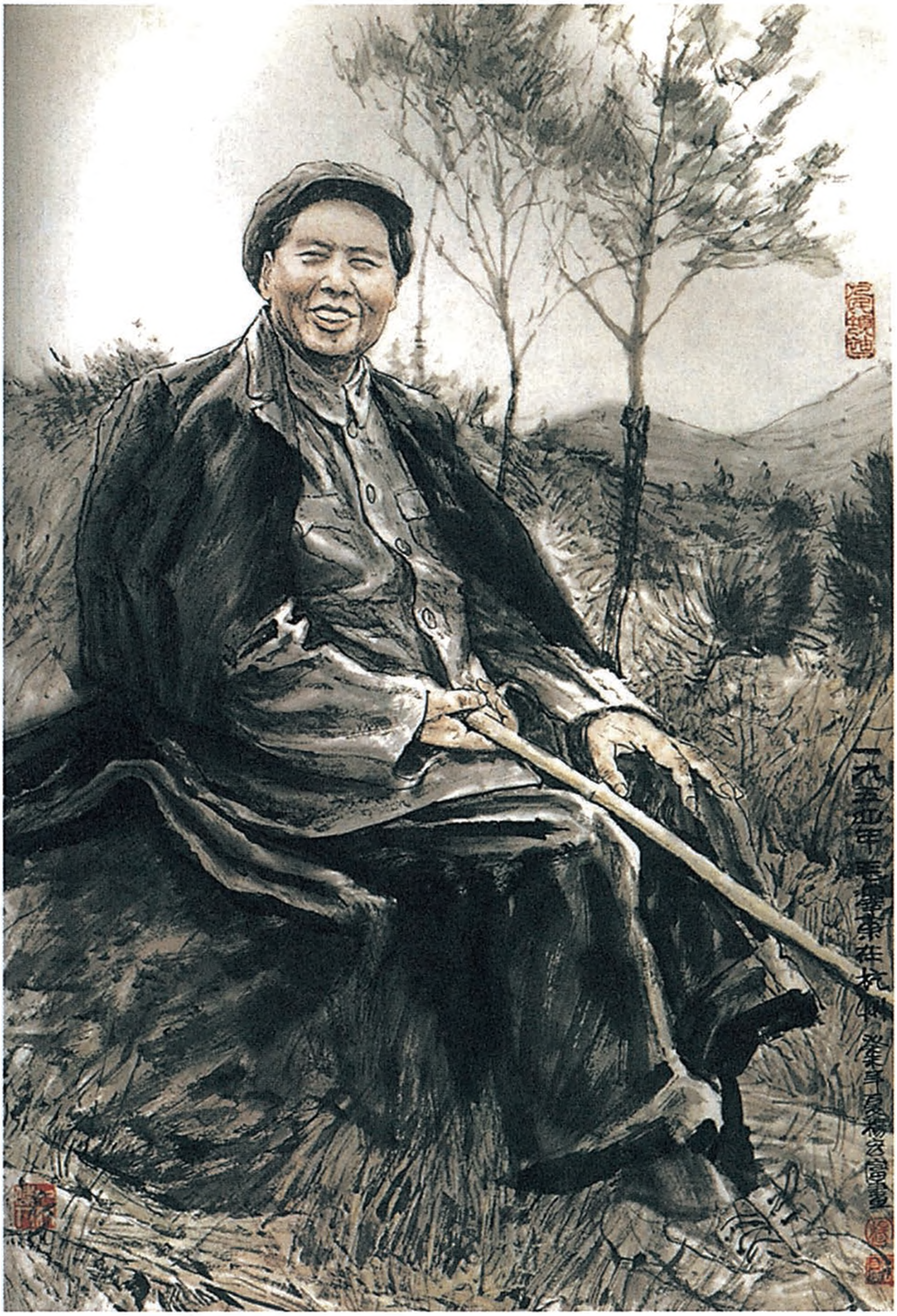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西子湖畔。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杭州
癸未年冬杨之光画

《毛泽东在杭州》（中国画）

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致马林科夫电

（1954年2月1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四周年之际，主席同志，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与热烈的祝贺。

四年来所经历过的事实愈益清楚地证明了：中苏之间的伟大同盟是保障远东及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可靠基础。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对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谨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永远发展和巩固。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

关于宪法初稿的讨论和修改给刘少奇等的电报和信

（1954年2月17日）

一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现将宪法初稿（五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二月二十日以后的一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将修改意见交小平、维汉[1]二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二十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2]明（十八）日动身，二十日可到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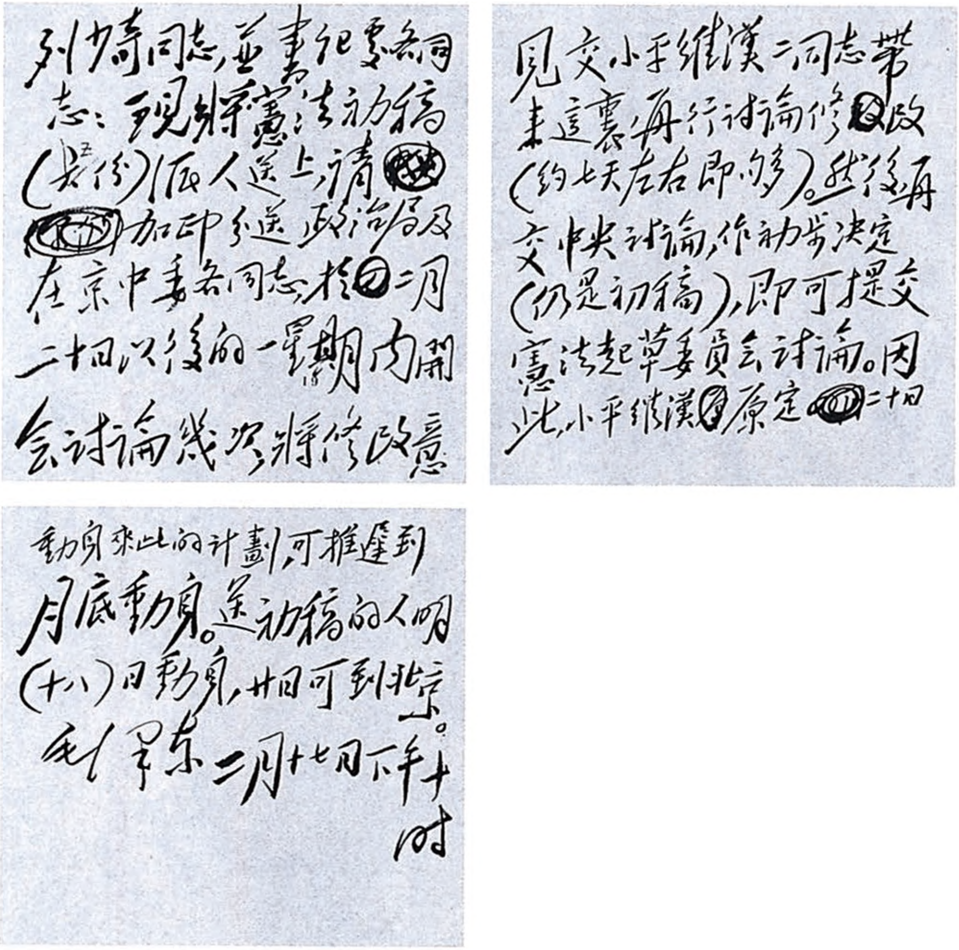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下午十时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张一平，当时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



刘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現將宪法初稿（共三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於一月二十日以後的一星期内開会讨论幾次，將修改意見交小平、維漢二同志帶来這裏再行讨论修改（约七天左右即够）。然後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維漢原定二十日動身来此的计劃，可推遲到月底動身。送初稿的人明（十八）日動身，廿日可到北京。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下午十时

毛泽东致刘少奇等电的手稿。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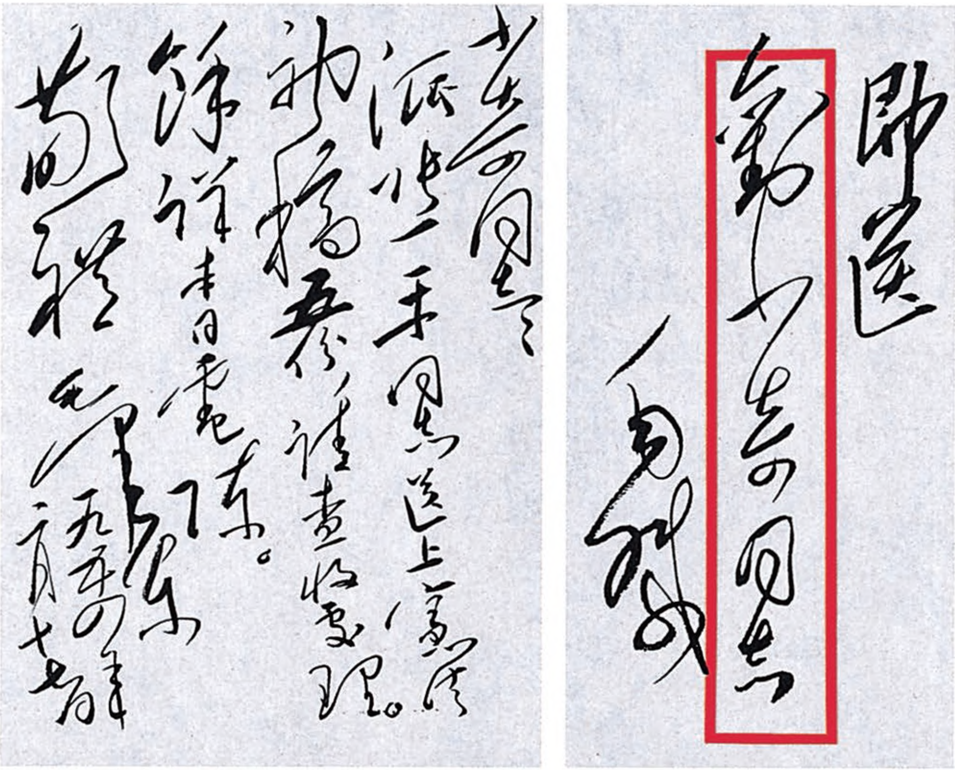
少奇同志：

派张一平同志送上宪法初稿五份，请查收处理。馀详本日电陈。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



少奇同志：

派张一平同志送上宪法初稿五份，请查收处理。馀详本日电陈。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

即送

刘少奇同志

[illegible]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手稿。

关于宪法草案初稿修改情况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2月24日、26日）

一

少奇同志：

兹将宪草初稿第二章以下二读稿及宪草小组报告送上，请印发各同志阅看。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四日上午二时

二

乔木同志：

今天所谈可作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夜廿四点以前打好清样送我，准备后天（廿六）送给中央。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三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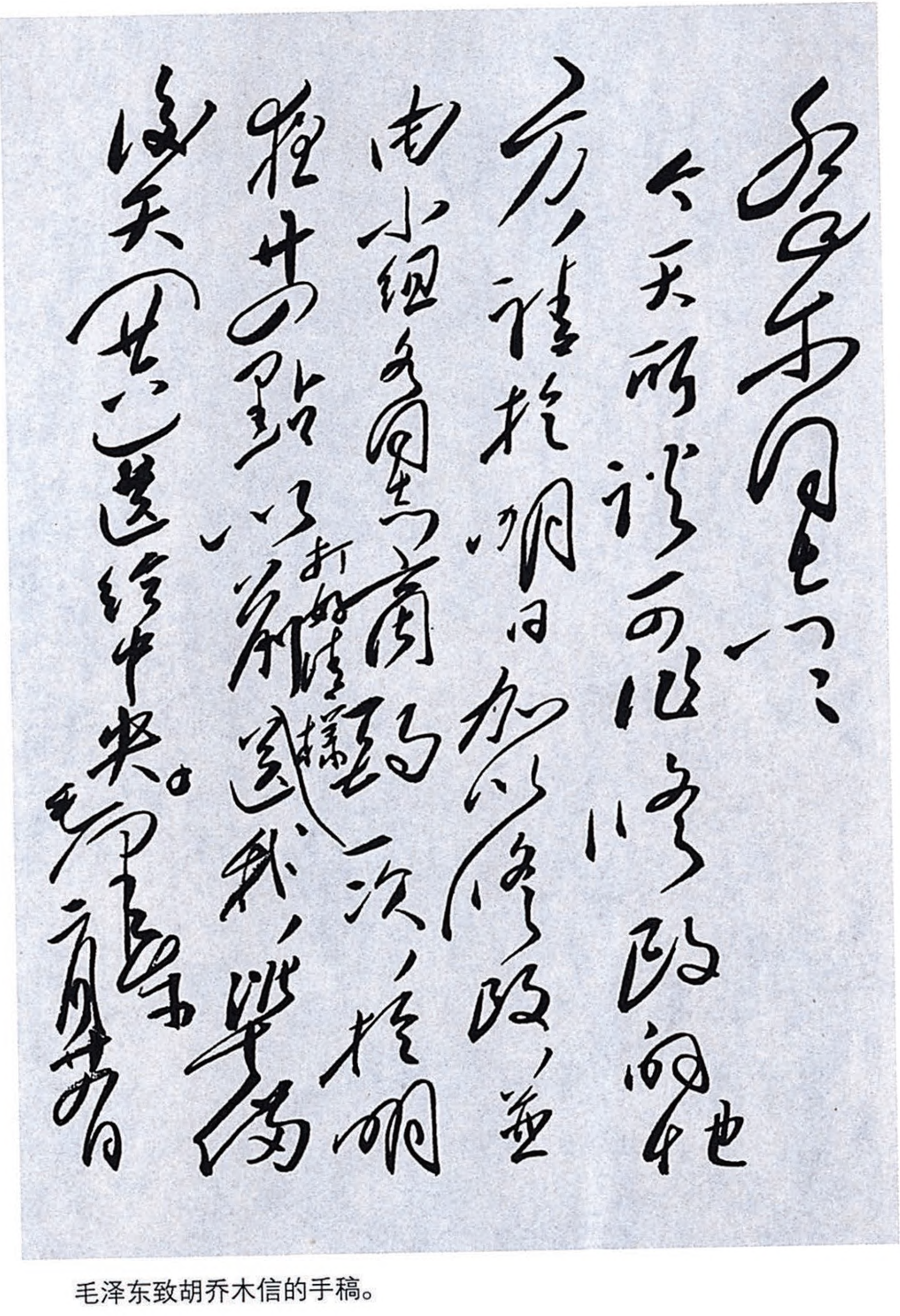
为便于中央在这几天讨论宪法草案，这里的小组赶于两天内又作了一次修改，称为三读稿，现送上，请照此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六日上午二时

1954年，毛泽东修改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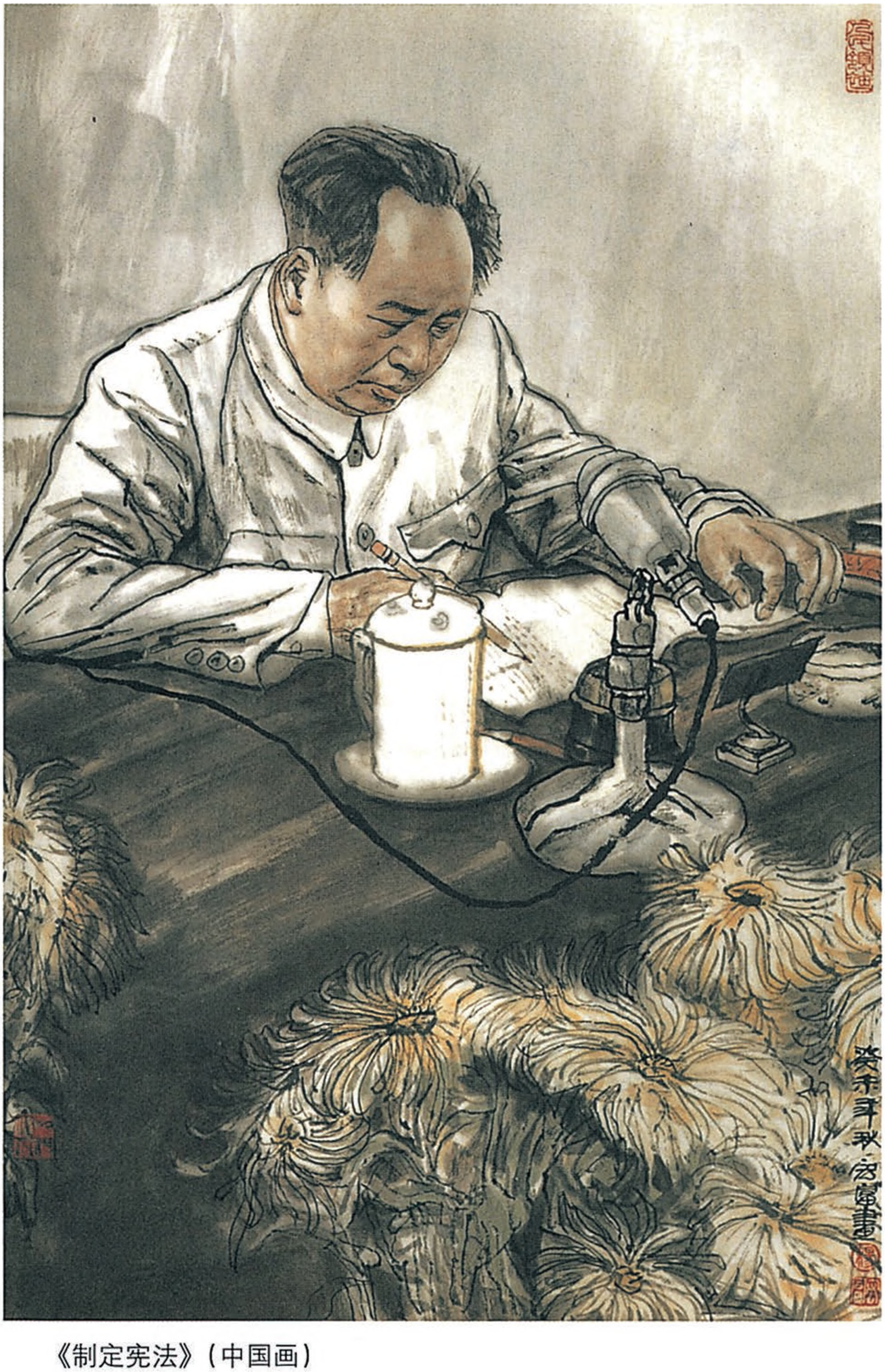


乔木同志：

今天所谈可能修改的地方，请于明日加以修改，并由小组各同志商酌一次，于明晚十二點以前打好清樣送我，以便後天再送给中央。

毛泽东
二月廿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制定宪法》（中国画）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毛泽东全集》第33卷
主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出版：润东出版社
承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852）23500066
电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址：www.enricheast.com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长：言臣
装帧：平装
开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面：544面
版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SBN：978-988-12907-0-0
定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划：树旺
主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建议增加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1
（1954年2月26日）
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2
（1954年2月28日）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批语……………………………………4
（1954年）
关于乔冠华、黄华等回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电报 ………12
（1954年3月1日）
给田家英的信 ………………………………………………………14
（1954年3月2日）
对一篇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电讯稿的批语 ……………………………15
（1954年3月4日）
在邓小平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上的批语 ………………19
（1954年3月12日）
关于审阅黄炎培在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的信 ………………………20
（1954年3月12日）
西藏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由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 …………23
（1954年3月23日）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 ……………………………25
（1954年3月23日）

关于发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的新闻稿的批语…35
（1954年3月28日）
给彭石麟的信 ……………………………………………………36
（1954年3月31日）
关于修改“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处提法的批语 ………………38
（1954年4月1日）
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的信 ………39
（1954年4月3日）
关于掘运朝鲜战争中军事人员尸体问题的电报 ………………41
（1954年4月3日）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批语 …………………43
（1954年4月15日）
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45
（1954年4月17日）
对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46
（1954年4月17日）
给文平山的信 ……………………………………………………50
（1954年4月21日）
关于游泳池建造费由稿费中支出给刘少奇等的信 ……………52
（1954年4月25日）
在《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上的批语…………53
（1954年4月28日）
关于修建闽南铁路线路问题的信和批语 ………………………55
（1954年4月28日）
奠边府作战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在后方交通线 ………………58
（1954年4月28日）

给毛少贤的信 ……59
（1954年4月28日）
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61
（1954年4月29日）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 ……65
（1954年4月）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66
（1954年4月）
给黄炎培的信 ……73
（1954年5月3日）
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活动应予以揭发 ……78
（1954年5月12日）
为官厅水库建成题词 ……80
（1954年5月）
对海军配属特种兵报告的批语 ……83
（1954年5月19日）
致南非印度人大会电 ……84
（1954年5月28日）
为育英学校教师王瑞珍题词 ……86
（1954年5月）
对粟裕关于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报告的批语 ……88
（1954年6月2日）
关于达赖、班禅尽早起程赴京的批语 ……89
（1954年6月3日）
检查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瑞典瑞士委员的关系 ……90
（1954年6月6日）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批语和修改…92
（1954年6月7日）
关于印发宪法草案修正稿给刘少奇等的信 ……………………94
（1954年6月9日）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宪法草案记录 ………………95
（1954年6月11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06
（1954年6月14日）
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115
（1954年6月14日）
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118
（1954年6月20日）
给毛泽荣的信………………………………………………………119
（1954年6月24日）
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120
（1954年6月）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121
（1954年6月）
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题名……………………………………123
（1954年6月）
对《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的批语………………………126
（1954年7月1日）
对华东局统战部关于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报告的批语………127
（1954年7月6日）
对西藏工委关于噶厦提出裁减藏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28
（1954年7月6日）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29
（1954年7月7日）
采取积极方针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134
（1954年7月10日）
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136
（1954年7月20日）
对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的修改………137
（1954年7月23日）
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致胡志明电………………139
（1954年7月23日）
给黎锦熙的信……………………………………………………………………141
（1954年7月23日）
给李敏、李讷的信……………………………………………………………145
（1954年7月23日）
对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的批语………………………………………………146
（1954年7月24日）
关于复英照会给刘少奇的信和对照会稿的修改……………………147
（1954年7月25日）
给许志行的信……………………………………………………………………149
（1954年7月25日）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150
（1954年7月30日）
对《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某些偏向》一文的批语…………152
（1954年7月31日）
浪淘沙·北戴河 ………………………………………………………………154
（1954年夏）

给三二〇厂全体职工的信……………………………………………………165
（1954年8月1日）
关于部队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批语………………………………………167
（1954年8月3日）
关于不要通过给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提案的批语……………………168
（1954年8月6日）
关于揭露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169
（1954年8月6日）
关于加强对蒋军作战政治工作指示稿的批语……………………………170
（1954年8月10日）
海空军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171
（1954年8月11日）
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74
（1954年8月13日）
关于攻击上下大陈岛时机问题的批语……………………………………177
（1954年8月21日）
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178
（1954年8月21日）
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181
（1954年8月24日）
给伍如春的信………………………………………………………………186
（1954年8月25日）
给熊子容的信………………………………………………………………189
（1954年8月26日）
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电报…………………………………191
（1954年8月31日）

对海军党委报告的批语……………………………………………………192
（1954年8月）
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193
（1954年9月1日）
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九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195
（1954年9月2日）
接受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迪莫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97
（1954年9月2日）
关于允许日本记者随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的批语…………………198
（1954年9月5日）
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199
（1954年9月7日）
关于通知周恩来等准备讨论宪法报告的便信…………………………200
（1954年9月9日）
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
批语和修改…………………………………………………………………202
（1954年9月）
接受瑞士驻华公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206
（1954年9月13日）
接受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斯蒂·纳赛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207
（1954年9月13日）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209
（1954年9月14日）
对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的批语………………………………………………214
（1954年9月14日）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15
（1954年9月15日）
关于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给胡乔木的信……………………234
（1954年9月19日）
接受匈牙利驻华大使希克拉丹呈递国书时的答词……………………235
（1954年9月22日）
在国庆五周年酒会上的祝词…………………………………………236
（1954年9月29日）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电报…………………………244
（1954年10月5日）
关于总参等部的称谓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批语……………246
（1954年10月8日）
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有问题给周恩来的信………248
（1954年10月11日）
答谢苏联赠送机器设备和提供技术帮助的两封信……………………250
（1954年10月12日）
关于安排叶恭绰、朱蕴山参加政协工作的批语………………………254
（1954年10月13日）
关于严格保护尼赫鲁专机安全的批语…………………………………255
（1954年10月15日）
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的批注……………………………………………………………256
（1954年10月）
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批注…………258
（1954年10月）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261
（1954年10月16日）
对公安部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国庆节保卫工作报告的批语…263
（1954年10月16日）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准备工作的批语…………………………………264
（1954年10月17日）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65
（1954年10月18日）
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273
（1954年10月）
关于邀集在京中央委员阅看同南斯拉夫建交文件的信………286
（1954年10月20日）
在印度驻华大使为尼赫鲁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287
（1954年10月21日）
给三三一厂全体职工的信……………………………………………………289
（1954年10月25日）
给二四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290
（1954年10月25日）
给一二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291
（1954年10月25日）
答谢金日成祝贺我志愿军入朝参战四周年的电报…………………292
（1954年10月25日）
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题词…………………………………293
（1954年10月25日）
对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的批语……296
（1954年10月27日）

对《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98
（1954年10月27日）
给程潜的信……………………………………………………………299
（1954年10月27日）
对蒋竹如来信的批语和复信…………………………………………303
（1954年10月29日）
给郭梓材、刘天民的信………………………………………………306
（1954年10月29日）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的电报………………………………307
（1954年11月6日）
关于请各省市制定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电报…………………309
（1954年11月10日）
对《〈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311
（1954年11月）
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314
（1954年11月）
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316
（1954年11月18日）
对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情况简报的批语………………………317
（1954年11月18日）
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318
（1954年11月19日）
对国防部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的批语……………………………………………………………319
（1954年11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的电报………321
（1954年11月22日）

给黄炎培的信……323
（1954年11月23日）
关于征求对兵役法和勋章奖章条例的意见的批语……325
（1954年11月23日）
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326
（1954年11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327
（1954年11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330
（1954年11月28日）
关于军委扩大会议的批语……331
（1954年11月30日、12月28日）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333
（1954年11月）
对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的批语……337
（1954年12月3日）
在缅甸驻华大使为吴努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339
（1954年12月4日）
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加写的一段话…340
（1954年12月5日）
对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决议等的批语……341
（1954年12月8日）
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343
（1954年12月11日）
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344
（1954年12月11日）

为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题词……………………………384
（1954年12月）
为苏联展览馆题名…………………………………………387
（1954年）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391
（1955年1月2日）
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392
（1955年1月10日）
关于同意国家不为个人祝寿的建议的批语……………………394
（1955年1月12日）
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和修改…………………………………………………395
（1955年1月12日）
关于不能由政府向党委下达内部命令的两个批语……………397
（1955年1月13日、17日）
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399
（1955年1月15日）
对中央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的批语…………………………………401
（1955年1月24日）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403
（1955年1月24日）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稿给陈云的信……………………404
（1955年1月25日）
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报告的批语…………………406
（1955年1月26日）

对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的批语……407
（1955年1月27日）
接受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08
（1955年1月28日）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410
（1955年1月28日）
给杨树达的信……412
（1955年1月29日）
给章士钊的信……414
（1955年1月30日）
在金韫颖《自述》上的批语……416
（1955年1月）
关于改善法院审判作风的批语……417
（1955年2月1日）
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我军不要向港口一带射击的批语……419
（1955年2月2日）
对陆定一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20
（1955年2月3日）
给陈嘉庚的信……421
（1955年2月3日）
对周敦祥来信的批语和复信……423
（1955年2月3日）
对错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的批语……425
（1955年2月6日）

关于请邓小平督促进行全党干部审查问题的批语……………………426
（1955年2月8日）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命令…………………………427
（1955年2月8日）
给毛森品的信…………………………………………………………428
（1955年2月10日）
给张之江的信…………………………………………………………429
（1955年2月11日）
关于公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的命令…………………………………………………431
（1955年2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432
（1955年2月12日）
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435
（1955年2月14日）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给刘少奇等的信……………………………437
（1955年2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的电报………………………438
（1955年2月21日）
对邓小平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440
（1955年2月、3月）
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443
（1955年2月23日）
在达赖、班禅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446
（1955年2月24日）

关于注意处理群众自愿入社问题给林铁的信……………………448
（1955年3月5日）
不能承认“两个中国”……………………………………………449
（1955年3月5日）
给周敦祜的信……………………………………………………453
（1955年3月6日）
和达赖喇嘛的谈话………………………………………………455
（1955年3月8日）
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459
（1955年3月9日）
对卫立煌《告台湾袍泽朋友书》的批语…………………………465
（1955年3月13日）
关于不要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的批语……………………………466
（1955年3月14日）
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467
（1955年3月14日）
给黄炎培的信……………………………………………………468
（1955年3月14日）
对卫立煌来电的批语和复电……………………………………469
（1955年3月17日）
对杨树达来信的批语和复信……………………………………472
（1955年3月17日）
关于修改和印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的批语…473
（1955年3月20日、21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474
（1955年3月）

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495
（1955年3月）
对陈毅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497
（1955年3月23日）
关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印发两篇文章的批语…………………………498
（1955年3月28日）
对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499
（1955年3月）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500
（1955年3月31日）
关于同意王明继续请假治病的批语…………………………………………505
（1955年3月、4月）

建议增加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1]

（1954年2月26日）

为加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特建议增加下列七人为军委副主席，计：军委委员、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军委委员、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军委委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军委委员、总参谋长徐向前，军委委员、华北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军委委员、中南军区代司令员叶剑英。并建议增加徐海东为军委委员。可否，请审查任命。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交的报告。

对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和修改

（1954 年 2 月 28 日）

一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1]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

[1] 指周恩来 1954 年 2 月 25 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提纲。提纲指出：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四十三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之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提纲从十个方面揭露高岗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分析了高岗所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并总结了从高岗事件中应当记取的教训。

二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1]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的发言提纲时改得较多的一段。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批语[1]

（1954年）

一

序言应有说明。[2]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他对历次宪法草稿作了多次修改，写了不少批语，并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宪法草案的会议上作了多次讲话和插话。但是起草过程中的这些文献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本篇收入的16条批语只是它的一部分。其中，前5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的一个油印打字稿上，这个稿子中有些条文附有说明文字。第六至第九条批语写在附有修正说明的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上。第十、十一两条批语写在封面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油印打字稿上。这些稿子均未标明时间，初步分析，约在1954年一二月间。第十二至十六条批语则写在铅印初稿的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上。

[2]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一章总纲的说明文字上方，是针对序言部分没有说明文字而写的。

二

此句好，宜采纳。[1]

三

不甚妥？[2]

四

宜单列一条。[3]

---

[1]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二条“说明”，在引用《共同纲领》第五十条原文后说，现除删去其中“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一语外，并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溢民族主义”两句的意思移到序言的第五段。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是针对删去的一句而写的。

[2]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五条的“说明”中说：“本条中所说的‘资本家所有制’，包括富农在内”。毛泽东在“包括富农在内”旁画了竖线，并写了这条批语。

[3] 这条批语是针对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十一条第二款而写的。第二款的原文是：“任何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得用以反对和损害公共利益。”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已单列为宪法总纲第十四条，文字改为：“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私有财产破坏公共利益。”

五

什么是公民？

举行内乱，推翻政府。

包括严厉与非严厉。[1]

六

国家主席的罢免。[2]

---

[1] 这三条批语分别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稿第十六条及其“说明”的上方。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人民民主制度，保护全体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权益，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惩办一切勾结外国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危害人民、破坏人民民主制度和破坏国家建设事业的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毛泽东在其中“全体公民”旁画两条竖线，并在上方写有“什么是公民”5个字。又在其中“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之后画一插入号，并在上方写有“举行内乱，推翻政府”8个字。这一条附有以下说明：“《共同纲领》该条中，原用有‘严厉惩罚’数字，那是对‘首要分子’说的，而本条现在的规定是指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故不用‘严厉’二字，以使规定较为灵活。”毛泽东在这一“说明”上方写有“包括严厉与非严厉”8个字。

[2]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罢免权的第三十二条的上方，修正稿没有罢免国家主席的内容。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对此增加了相应的内容，在第二十八条中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七

主席有交议权，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1]

八

需要。[2]

---

[1]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中国务院一节上方，修正稿没有提及国家主席的交议权和最高会议决议的性质。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稿，在说明中对有关这一内容的条款提出两个修改方案，一个方案是：“在必要时召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另一方案是：“在必要时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在前一个方案旁写了“较妥”二字。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四十三条中，将有关这一内容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2]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第五十八条所附的修正说明提出：“民委提议，规定各民族自治区得组织本自治区的公安部队和民兵，需否可考虑。”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上方批了“需要”二字。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七十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

九

较妥。[1]

十

此条似应移至总纲。[2]

---

[1] 宪法草案油印打字的第一次修正稿第七十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居住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所附修正说明提出，此款另一方案为将“通讯秘密”改为“通讯自由”，毛泽东在“通讯自由”旁画一竖线，并批了“较妥”二字。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2] 这条批语写在宪法草案初稿油印打字稿第五十八条上方，这一条的原文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执行其任务时，应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和监督国家管理工作，不断地注意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条已写入宪法总纲的第十七条，文字改为：“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

十一

不写为好。[1]

十二

田家英[2]同志：

一些意见，请提交党组会上讨论。

毛泽东

副主席受委托得代行主席部分职权，此点必须加入。除“同时”外，所有的“时”均改为“的时候”。

十三

“土地改革”不成文，应加“制度的”。“镇压反革命”，下加

---

[1] 宪法草案初稿油印打字稿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毛泽东在其中“游行、示威”旁画两条竖线，打一问号，并在上方写了这个批语。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仍然规定了公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

[2]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加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

“分子”。[1]

十四

此处不写“发布”为宜，免与主席职权分歧。[2]

十五

此条应采纳周鲠生意见。[3]

---

[1]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序言第二段有一句话：“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很有成效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完成经济恢复等项大规模的斗争”，毛泽东将这句话中的“土地改革”改为“土地制度的改革”，在“镇压反革命”后加了“分子”两字，并写了这条批语。

[2]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第三十六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的第四款为：“通过和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条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一款中的“和发布”3个字，并写了这条批语。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改为“制定法令”。

[3]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第三十六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中加了第十一款“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毛泽东在这一款旁写了这个批语。周鲠生是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聘请的法律顾问。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这一款改为“决定同各国缔结的条约的批准和废除”。

十六

此项恢复，可由副主席去办。[1]

1954年3月，毛泽东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委员合影。

---

[1] 宪法草案（初稿）1954年3月18、19日讨论修改稿第四十一条关于国家主席的职权中删去了原有的第三款“授予国家的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毛泽东在删去的这一款旁边批了这句话。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中保留了这一款的内容。

关于乔冠华、黄华[1]等回京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的电报

（1954年3月1日）

杜平[2]、乔冠华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3]：

二月廿八日电悉。

一、为了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同意李克农[4]同志意见，乔冠华、黄华等同志迅速回京，参加筹备工作。乔、黄过平壤时应向金首相报告工作并请示意见。

二、同意代表团党委改组，由丁国钰[5]同志任党委副书记；以

---

[1] 乔冠华、黄华，当时均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

[2] 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

[3]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4] 李克农，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书记，负责主持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的工作。

[5] 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

后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改由李相朝[1]、杜平、丁国钰三同志署名。

三、因杜平同志尚不能完全离开部队工作，故在杜不在开城时，党委工作即由丁国钰同志负责（柴成文[2]同志协助），向北京、平壤的报告请示即由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署名。在工作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丁国钰、柴成文二同志可以轮流回国休假。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

[1] 李相朝，朝鲜人民军中将，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

[2] 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委员、秘书长。

给田家英的信

（1954年3月2日）

家英同志：

（一）杨秀生[1]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形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

（二）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2]，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

（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3]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日

---

[1] 杨秀生，杨开慧的族兄。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1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3] 柳直荀，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对一篇有关中国领导人的电讯稿的批语[1]

（1954年3月4日）

一

此件送林彪、陈伯达、胡乔木、谭政、陶铸[2]五同志一阅。退毛。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合众社1954年2月26日发自东京的一篇电讯稿上写的三条批语。电讯稿对毛泽东退出政治舞台的可能性及继承人问题作了推测，其中还谈到对高岗的评价，说高岗“精明”，“曾由于治理满洲有成绩而得到当地领袖们的尊敬”。

[2] 林彪，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华南分局第四书记。

二

合众社传日本人论高岗[1]，值得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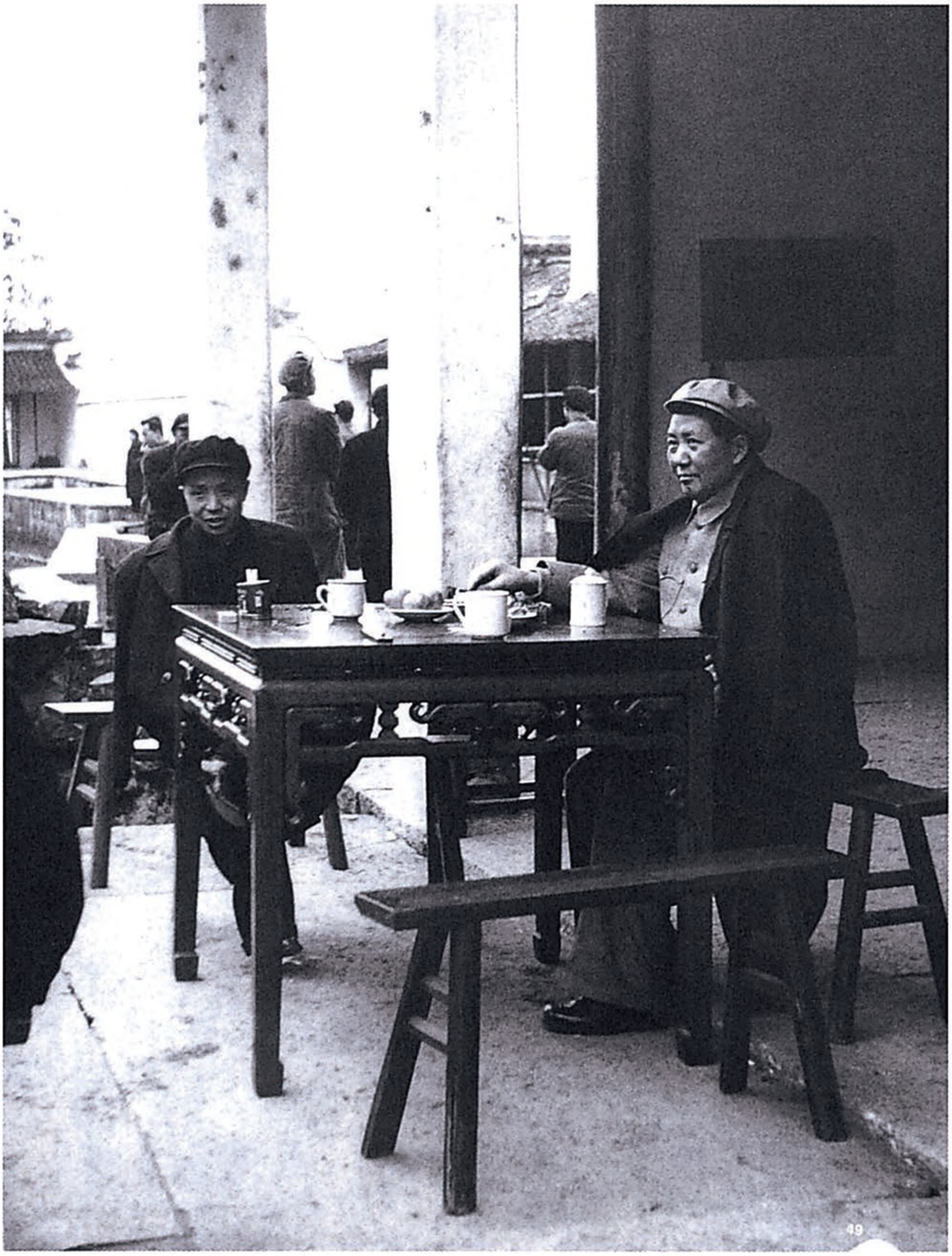
三

日本情报机关对高岗很熟悉，美日两情报机关是合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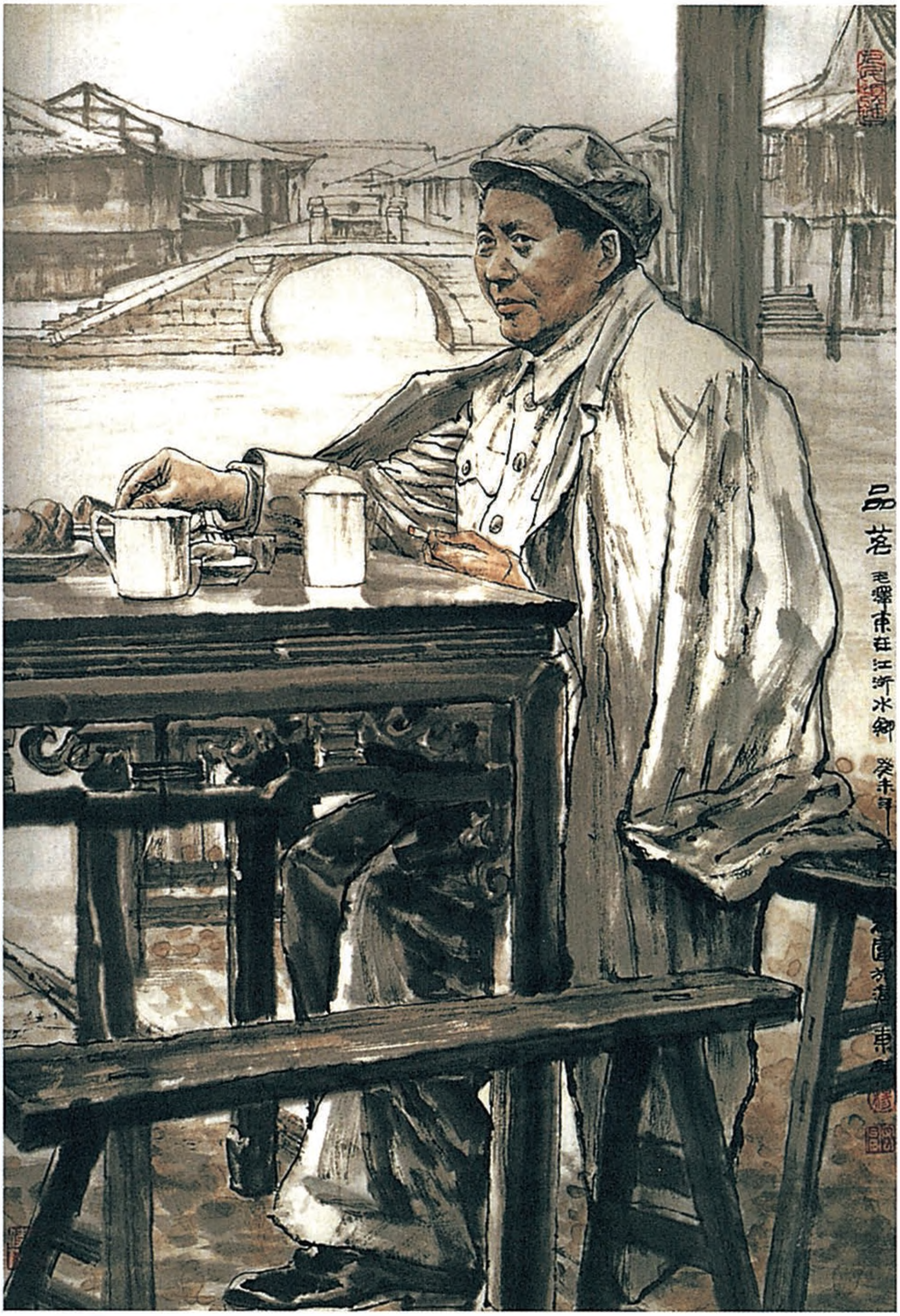
---

[1] 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他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

资料图片



1954年，毛泽东和谭启龙在绍兴。


品茗
毛泽东在江浙水乡

《品茗》（中国画）

在邓小平[1]等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4年3月12日）

此件[2]送小平同志。

在第四页上“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邓小平、陈毅（华东局第二书记）、谭震林（华东局代理书记）1954年3月1日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饶漱石在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破坏党的团结、阴谋分裂党的错误活动的各项事实。

关于审阅黄炎培[1]在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的信

（1954年3月12日）

一

黄副总理：

三月八日惠书阅悉。附件[2]已付周总理李维汉[3]部长斟酌奉告。“人们”是指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不包括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即不是“包括一切的”。“无痛分娩法”一词最好不写在印刷品上，因实际上那些不甚觉悟的人们总会觉得有些痛苦的。支票开得多了，可能引起幻想，而不去加重教育和学习，不去提高政治觉悟，结果感觉痛苦的人就会对我们不满。尚请斟酌。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于杭州

---

[1] 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指黄炎培1954年3月1日对上海工商界的讲话稿。

[3]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二

恩来、维汉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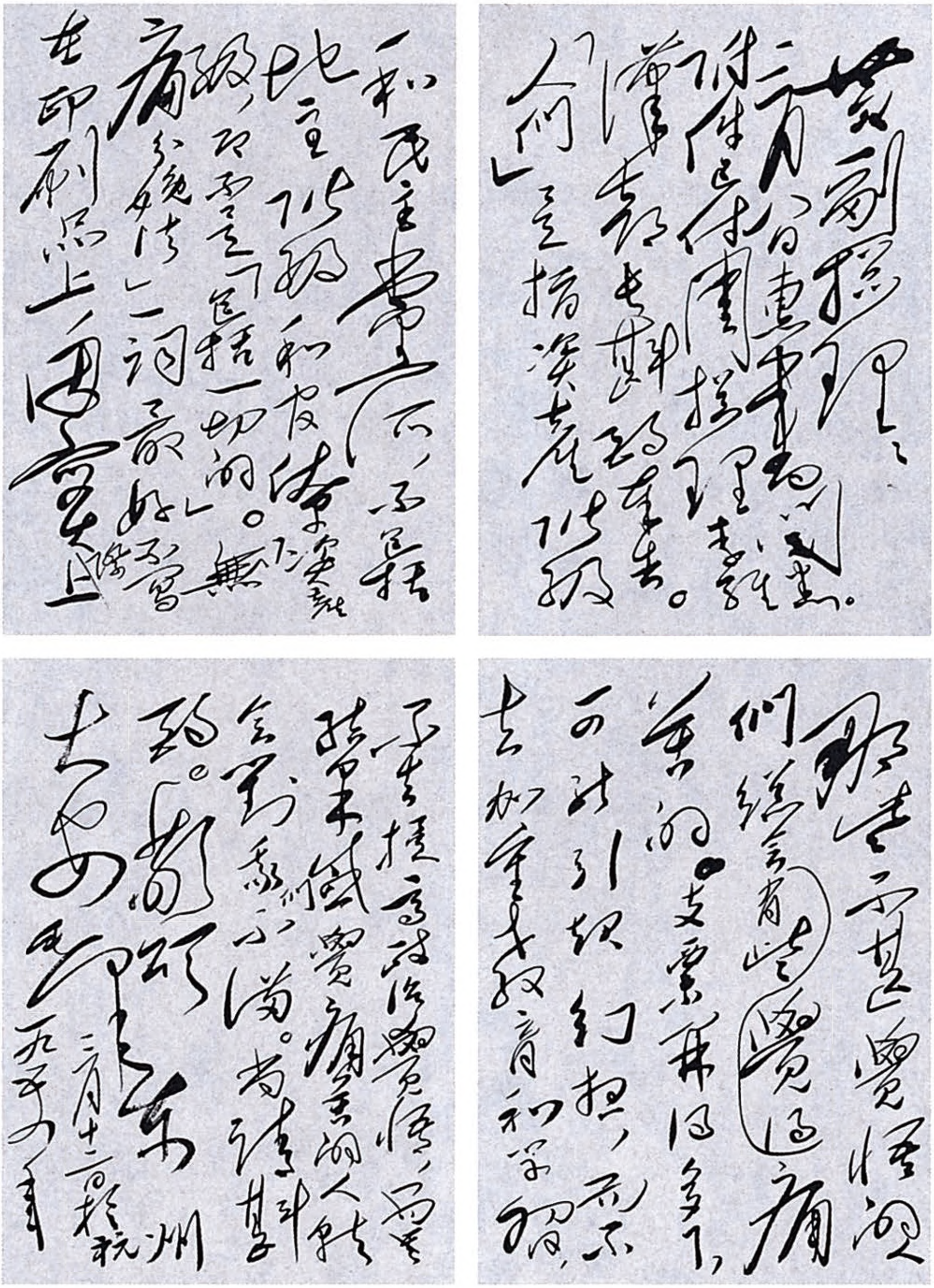
此件请审阅斟酌，并告黄副总理。“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似以改为“阶级消灭，个人存在”为适宜，亦可告以非正式发表的谈话不要他在印刷品中引用，请酌。如他的讲演不登报，又碍难修改，听其引用亦无不可。他所谓“无痛分娩法”亦不甚妥当，只作印刷品不登报，亦可不改。末了引我的话之后他说“人们”“是包括一切的”，我已复告他不是包括一切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包括在内。我复黄信只说这一点和批评无痛分娩法一点，此外说他的信已付你们二位斟酌告他。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

复黄信请阅后送交。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西藏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由西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1]

（1954年3月23日）

为了照顾少数民族特别是西藏的情况，在草案[2]第六十一条中写了第三款，即：“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具体形式，按照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意愿规定。”现在西藏是达赖[3]管事情，如按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办，就要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人民政府。这样办，恐怕达赖不干。他可以搬出我们和他订的十七条协议[4]，质问我们。怎么办？可以按照第三款办事。搞人民政府不行，可以搞别的具体形式。达赖是活佛，是活神仙，不是人民选出来的。现在想马上选又不行，究竟搞个什么形式，由那里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决定。他们信达赖、土司[5]比信我们信得厉害得多，你要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3]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4] 十七条协议，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

[5] 土司，是旧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官职，分多种等级。

动他是动不得的。好吧！就按照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吧！不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对西藏代表团说过，我们不强迫你们，你们搞不搞土地改革，搞不搞选举，由你们决定。十七条协议不实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实行。但其中哪一条你们现在不愿实行，可以暂时不实行，可以拖。因为协议上并没有说哪年哪月哪天一定要实行。已经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过去后，还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对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觉悟。我们相信人民一定会觉悟。我们曾发表过社论说：汉族干部不能干西藏人民所不愿干的事，要按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办事。第六十一条第三款，是否可和人民的意愿并列加个少数民族领袖人物的意愿？不加也可以，反正他们是绝对拥护他们的领袖的，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中如加上，看起来就不那么冠冕堂皇，所以没有加。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1]

（1954年3月23日）

（当谈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宪法起草小组自一月七日开始工作，三月九日工作结束。起草小组进行了一度工作后，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同志组成了研究小组，还请了周鲠生先生和钱端升先生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先生和吕叔湘先生为语文顾问，又搞了个把月，同时中共中央也讨论了三次，每次都有很多修改。

（当谈到宪法必须根据国家性质和经济关系，充分表达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根本要求时）

毛：这个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加上总路线，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

（当谈到共同纲领中的一些根本原则在宪法草案中被肯定下来，共同纲领中有些已经过了时的东西没有再写进宪法时）

毛：如土地改革；又如镇压反革命，虽然现在还有反革命分子，但是很大一部分已经镇压过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陈伯达作关于宪法草案（初稿）起草工作的说明时的插话的一部分。

（当谈到宪法草案不仅采用了共同纲领规定的各项根本原则，而且还吸取了建国以来各项重要法令中的一些原则时）

毛：例如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共同纲领上就没有。

（当谈到保护各种所有制时）

毛：宪法草案上有个其他个体劳动者，这是指：摊贩、夫妻商店、船夫、戏班子等等，他们既是劳动者，也是私有者。比如梅兰芳，他也是劳动者，他的戏班子又是他个人的。

（当谈到毛泽东说过个体经济像个汪洋大海，把他们变为集体所有制很复杂很困难时）

毛：最困难。改造资本主义困难，比较说来，改造个体农业、手工业更困难。人多，分散，一万万一千万户农民，就有一万万一千万个单位，我们要指挥这么多单位好困难啊！征粮、购粮，是一万万一千万个单位，怎么得了？你干，他不干；你要买粮食，他不卖，怎么办？为什么我们没有肉吃？就是因为他们吃多了。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解放前一天杀三头猪，现在杀十八头猪，还不够吃。

（当谈到采用过渡形式，逐步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使之向社会主义过渡时）

毛：我们的宪法，是过渡时期的宪法。我国的各种办法，大部分是过渡性质的。人民的权利，如劳动权、受教育权等等，是逐步保证，不能一下子保证。现在有人进不了学校，就打学校；说，什么人民政府！不让我进学校，我就打你。没有那么多的学校，怎能都进呢？我们的选举，也是过渡性质的选举。普遍，算是普遍了，但也有限制，地主没有选举权，也不完全普遍；平等，城市选的代表多，乡村选的代表少，如完全按人数平等选举，那人民代表大会就几乎成了农民代表大会，工人就变成了尾数；直接，我们只有基

层选举是直接的，其余都是间接的；无记名，我们一般是举手，还是有记名。总之，我们的办法不那么彻底，因为是过渡时期。怎样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不是乡村八十万人口选一个，城市十万人口选一个，这些问题，在选举法上去做文章好了，这里就不写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有过渡时期的特点。支票开得好看，但不能兑现，人民要求兑现，怎么办？还是老实点吧！

（当谈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关系时）

毛：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资本主义国家名义上是议会选出政府，通过法律，实际上议会是政府的附属品。我们中央有个国务院，就是中央人民政府；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的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就是国家的地方各级管理机关，也是国家权力的地方机关。因此，地方上就没有常务委员会了。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我们就是多个主席。有个议长，还有个主席，叠床架屋，这个办法可以不可以？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捷克、民主德国是这样的制度，他们叫总统，我们叫主席。议会议好的东西，归主席发布；但他不能发布议会没有议过的东西；他也不能行，行是国务院的事。这个大家是不是赞成？可以讨论。

（当谈到下级人民代表大会服从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下级人民政府服从上级人民政府时）

毛：这里是母亲服从儿子。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出来的东西全国四十四个

省、市都要服从。假若某一个省人民代表大会议出的东西不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把它撤销。

（当谈到中央的统一领导和各地方、各民族的积极性可以相结合，这一点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一样时）

毛：中央议事，地方办事。和专制时代不同。

（当谈到我们的国家主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是与国会对立的时）

毛：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可以解散国会。我们的主席不能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相反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倒可罢免主席。

（当谈到我们的国家实行集体领导，而以个人形式来表现时）

毛：主席也不是政府，国务院不向他报告工作。打屁股打国务院总理，不打主席。关于主席的职权，草案第四十条第五款规定，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而国务院又有国防部，我们还是叠床架屋，这是从国务院分了一点工作。第六款规定，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议什么事没有讲，总之不能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说很少开，有紧急的大事情才开会商量一下。大家看这样规定妥当不妥当？第一、二、三、四款，都是例行公事。第二款是说可以提出建议，建议不起决定作用，人家愿理就理，不理拉倒，毫无办法。这两条是说，主席也有些事做，不是专门吃饭。这是为保证国家安全起见，设了个主席。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叠床架屋地设个主席，目的是为着使国家更加安全。有议长，有总理，又有个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个地方同时都出毛病。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出了毛病，那毫无办法，只好等四年再说。设主席，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间有个缓冲作用。

（当谈到根据我国经验，设个主席有好处时）

毛：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职权，大部移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去。现在没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故政府委员有六十三人，以后这六十三人的委员会的工作就变成常务委员会的工作。

（当谈到国务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这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规定属同一类型，但有一些差别时）

毛：中央各部、各委员会列不列？我们没有列，苏联一九一八年的宪法也没有列。不列，伸缩性大。部、委员会可能经常变动，或增或减，如果列了，变动一次，就要修改一次宪法，这样，宪法就要年年修改了。

（当谈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之间过去有矛盾时）

毛：所谓矛盾，主要是大民族压迫小民族。古代也有小民族压迫大民族的，如元朝蒙古人压迫汉人，如五胡十六国等等。但到后来就不同了，清朝是利用汉族压迫少数民族。到国民党时期，就更不同了。

（当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族关系一天天好起来时）

毛：还有不少毛病，主要是汉族干部中有大汉族主义，个别的还有地方民族主义；也出过不少乱子，但基本上是好的。有的地方，少数民族的人当主席，汉族的人当秘书，结果是秘书专政，少数民族的人当主席是做做样子，少数民族做官，汉族掌权。内蒙古大概要好点。这种情形是有的，要继续改良，继续教育。

（当谈到宪法草案的结构时）

毛：有人主张把第二章的六节变成六章。宪法起草小组考虑把这六部分列在一章，加个总题目叫国家组织系统，很清楚。如分列为六章，好像有些头绪纷繁。宪法可以随时修改，苏联增加一个

部，减少一个部，都要修改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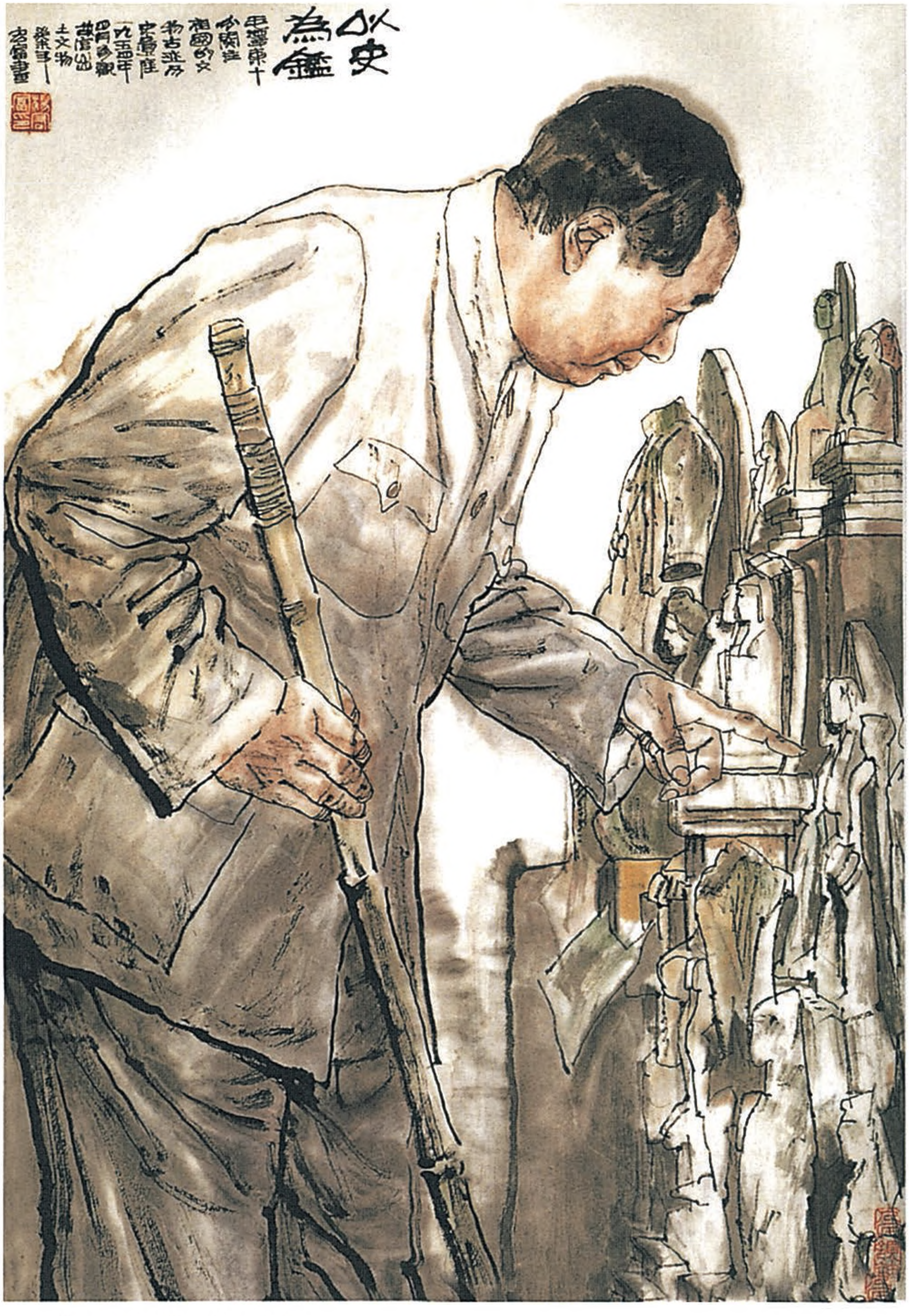
（当谈到宪法草案文字尽量通俗，以便群众了解和掌握时）

毛：把什么什么“时”都改为“的时候”。讲话一般不说“我们在讨论宪法时”，而说“我们在讨论宪法的时候”。“为”字老百姓不懂，都改成了“是”字。什么什么“规定之”，“之”字在一句话的末尾，只是重复了上面的，毫无用处，也都去掉了。也许还有改得不彻底的地方，还可以改。

毛泽东十分关注祖国的文物古迹、历史遗产。图为1954年毛泽东在故宫参观出土文物。

资料图片

1954年，毛泽东在故宫观赏汉代陶马。


以史
為鑑
毛澤東十
分關注
祖國的文
物古迹歷
史遺産
一九五四年
四月參觀
故宫出
土文物

《以史为鉴》（中国画）

1954年3月24日，毛泽东和蔡畅（左二）等在北京西郊。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郊区农村视察。

关于发表德国统一社会党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的新闻稿的批语

（1954年3月28日）

退刘少奇同志：

此件[1]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并写一社论[2]，称赞德国党的正确措施，我们大家应提高警惕性。

毛泽东

三月廿八日

---

[1] 指《人民日报》送审的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会决定将反党反人民分子开除出党的新闻稿。新闻稿说：《新德意志报》1954年1月25日发表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七次全体会议的公报，宣布把进行分裂活动的反党分子海恩斯塔特（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候补委员、《新德意志报》总编辑）和蔡塞尔（前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安部长）二人开除出党，并对在反对海恩斯塔特——蔡塞尔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犯了原则错误的其他三名政治局候补委员阿克曼、颜德累茨基和史密特给予严重警告和警告的处分。这篇新闻稿载于1954年4月9日《人民日报》。

[2] 1954年4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捍卫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成就》。

给彭石麟[1]的信

（1954年3月31日）

石麟先生：

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2]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3]先生、文运昌[4]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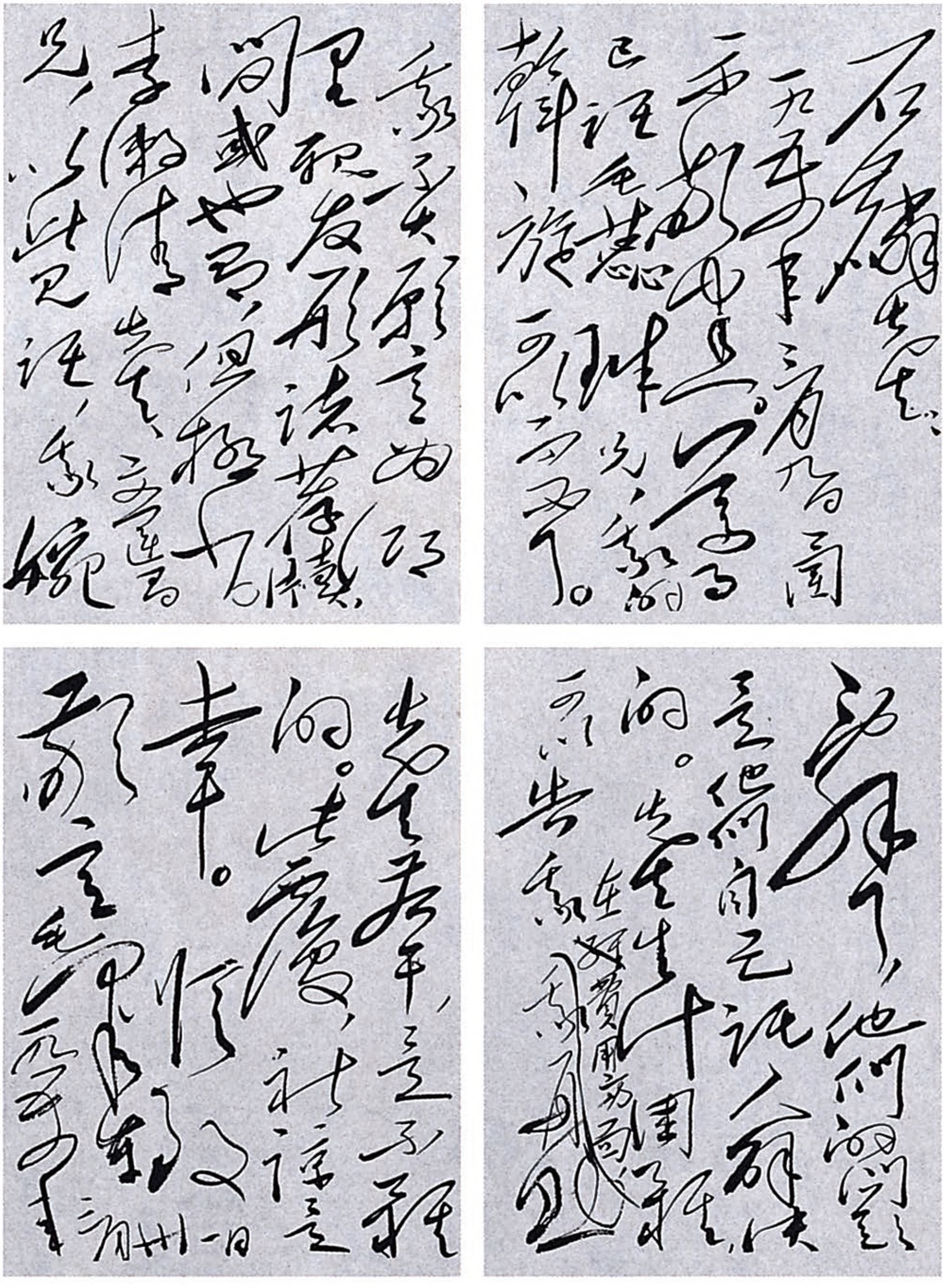
---

[1] 彭石麟，大革命时期曾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乡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帮助。

[2] 毛蕊珠，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3] 李漱清，毛泽东少年时的老师，大革命时期曾协助毛泽东在广州办过《政治周报》，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4] 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



毛泽东致彭石麟信的手稿。

关于修改“毛泽东军事思想”一处提法的批语[1]

（1954年4月1日）

“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基础上努力学习……”，应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毛泽东
四月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1954年3月27日关于呈请批准毕业证件的报告上。文内说的“附件”，指附在刘伯承报告后的对毕业证章制法的说明。毛泽东对其中关于“内容说明”的第三项作了修改。“附件”原来的文字是“毛主席题字：‘努力学习，保卫国防’是表示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科学，建设现代化的国防。”

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1]的信

（1954年4月3日）

彭德怀同志：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请计算是否可能。炮如不足，应从中国现有炮兵中抽调，让我们的一部分炮兵暂时变为徒手，以待将来补充。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的教员和顾问，应全部从去朝鲜打过仗的炮兵部队中抽调，应有师级和军级干部。训练地点最好在越南，否则广西亦可。六个月时间甚紧，如你同意，请饬参谋部会同炮司[2]迅速作出计划，一方面电商越方取得同意，务须全力以赴。两个炮兵师，不是招新兵，要以正规步兵师团或独立团营改充。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此外为三个炮兵师所需的充足的炮弹和工兵器材的供应，亦须立即筹备。高射炮应相应增加。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为补充奠边府的兵员消耗，应立即至少动员五千至八千新兵，训练三个月，迅即补充缺

---

[1]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 炮司，即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

额。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以上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关于掘运朝鲜战争中军事人员尸体问题的电报

（1954年4月3日）

李相朝、杜平、丁国钰[1]三同志，并告金首相、彭司令员[2]：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日简报、三月二十二日十二时及三月二十八日十三时请示电[3]均悉。一般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

（一）对方提出自五月一日起掘运尸体。鉴于我们的实际准备情况，掘运开始日期应予推迟。但在会议斗争中必须保持主动，以配合日内瓦会议。

（二）对方在掘尸问题上存有弱点。首先，对方前后交来墓地材料自相矛盾，予我以质问对方要求交代的很好材料。其次，对方所提正在集中墓地的政策，严格地说，是与停战协定不符的。停战协

---

[1] 李相朝，朝鲜人民军中将，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杜平，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代表。

[2] 金首相，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彭司令员，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

[3] 3月20日简报、3月22日12时及3月28日13时请示电，均为李相朝、杜平、丁国钰关于朝鲜停战各方前往对方地区掘运本方军事人员尸体问题的谈判情况，以及美方所提方案和我方意见、措施向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请示报告。

定规定一方军事人员的尸体应由其本方人员在坟墓所在地掘出并运走。对方将我方人员尸体掘出、搬运、集中，已与停战协定不合，而且将我方人员尸体掘出、集中、重行埋葬，然后再由我方人员前往重行掘出运走，于理亦不合。尸体既已掘出应即送交我方，没有理由重行予以埋葬。根据这一理由，我们可以提出各自掘运本方地区内对方人员的尸体进行交换的办法，而对方将比较难以反对。

（三）因此，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一方面迅速提出对方地区内广泛分布的我方人员墓地的材料，要求对方交代其历次提出材料中自相矛盾之处，另一方面争取交换尸体而不必派人掘运，如争取不成，则将我方地区内的对方尸体亦加以集中。

在具体做法上，可首先提出墓地材料，要求对方证实与交代，然后提出交换尸体的办法，准备就此与对方讨论一个时期，而一时不必进入具体掘尸办法与成立机构的讨论，亦无须在会议上提出推迟掘尸时间。

（四）来电所述关于召集有关方面的会议来汇报并搜集我方人员墓地材料、调查对方所提我区墓地材料、确定集中地点以及掘尸的具体安排等筹备工作，应立即抓紧进行。同时志司应即按你们所拟提纲，通知在朝鲜的和在东北的志愿军部队将材料搜集于四月下半月内送开城，人民军方面请金首相令有关方面搜齐送开城。在国内其他地区的前志愿军部队材料可于五月上半月内送开城。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批语[1]

（1954年4月15日）

略有修改[2]，可即印发。修改处请刘少奇、彭德怀[3]、罗荣桓同志一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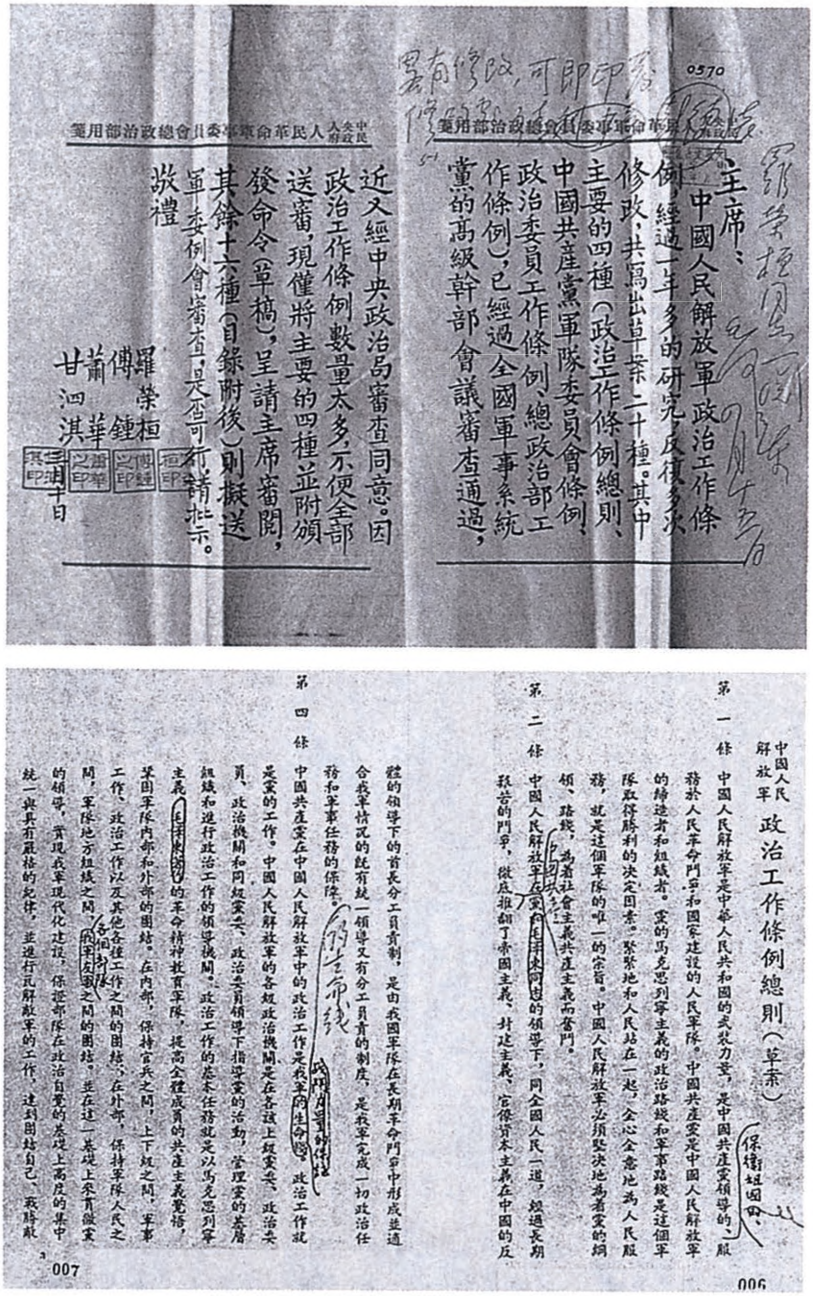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肖华、甘泗淇1954年3月1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过一年多的研究、修改，共写出各条例草案二十种，其中主要的四种，即：政治工作条例总则、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条例、政治委员工作条例、总政治部工作条例。

[2] 毛泽东所作的修改，主要是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总则草案第二条的首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改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时把这一条的“积极地有步骤地建设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一句中的“世界上第二支最”7个字删去。

[3]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略有修改，可即印發
[illegible]

羅榮桓同志

毛澤東 四月十五日

0570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用箋

主席：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反復多次修改，共寫出草案二十種。其中主要的四種（政治工作條例總則、中國共產黨軍隊委員會條例、政治委員工作條例、總政治部工作條例），已經過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審查通過，近又經中央政治局審查同意。因政治工作條例數量太多，不便全部送審，現僅將主要的四種並附頒發命令（草稿），呈請主席審閱，其餘十六種（目錄附後）則擬送軍委例會審查，是否可行，請批示。

敬禮

羅榮桓
傅鍾
蕭華
甘泗淇
三月十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總則（草案）

第一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保衛祖國、服務於人民革命鬥爭和國家建設的人民軍隊。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組織者。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是這個軍隊取得勝利的決定因素。緊緊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中國人民解放軍必須堅決地為着黨的綱領、路線，為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奮鬥。

第二條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黨的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同全國人民一道，經過長期艱苦的鬥爭，徹底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反

006

體的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是由我國軍隊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並適合我軍情況的既有統一領導又有分工負責的制度，是我軍完成一切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的保障。

第四條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政治工作就是黨的工作。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各級政治機關是在各該上級黨委、政治委員、政治機關和同級黨委、政治委員領導下指導黨的活動，管理黨的基層組織和進行政治工作的領導機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精神教育軍隊，提高全體成員的共產主義覺悟，鞏固軍隊內部和外部的團結。在內部，保持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軍事工作、政治工作以及其他各種工作之間的團結；在外部，保持軍隊人民之間，軍隊地方組織之間，我軍友軍之間的團結。並在這一基礎上來貫徹黨的領導，實現我軍現代化建設，保證部隊在政治自覺的基礎上高度的集中統一與具有嚴格的紀律，並進行瓦解敵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

的生命线

各個部隊

007

1954年4月，毛泽东批准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并在审阅时恢复了被陈伯达删去的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表述。

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1954年4月17日）

黄、粟[1]：

（一）可照韦国清[2]粟裕所提意见办理，彭电[3]可不发；（二）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请商韦国清另作计划。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刘[4]阅后，退黄克诚、粟裕办。

---

[1] 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粟，指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韦国清，当时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3] 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为军委起草的给韦国清的电报。

[4] 刘，指刘少奇。

对罗瑞卿[1]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54年4月17日）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2]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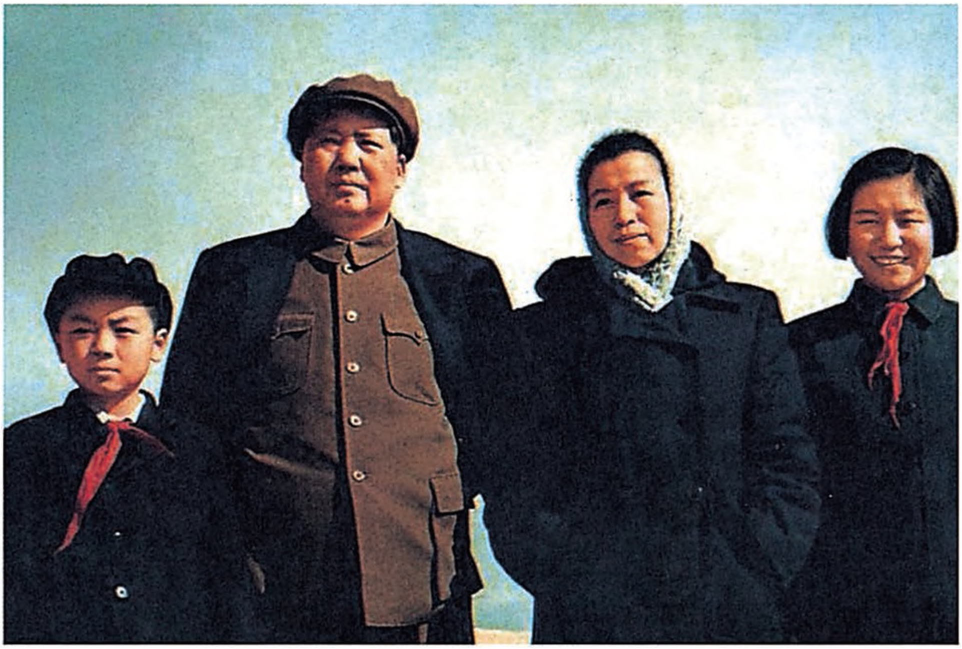
---

[1] 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

[2] 此件，指罗瑞卿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对发言稿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一）将“依靠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一句改为“依靠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二）删去了“我们党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及“这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与特别关心分得开吗？”两句中“和毛泽东同志”“和毛主席”的字样。

1954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西山小憩。



1954年，毛泽东和江青、李讷、毛远新在北戴河合影。

给文平山[1]的信

（1954年4月21日）

平山同志：

来信收到，甚为高兴。

和你祖母合照的像片，没有多的，故未寄你。

毛雪华[2]同志在苏联学习，现时你不必和他通信。此复。祝你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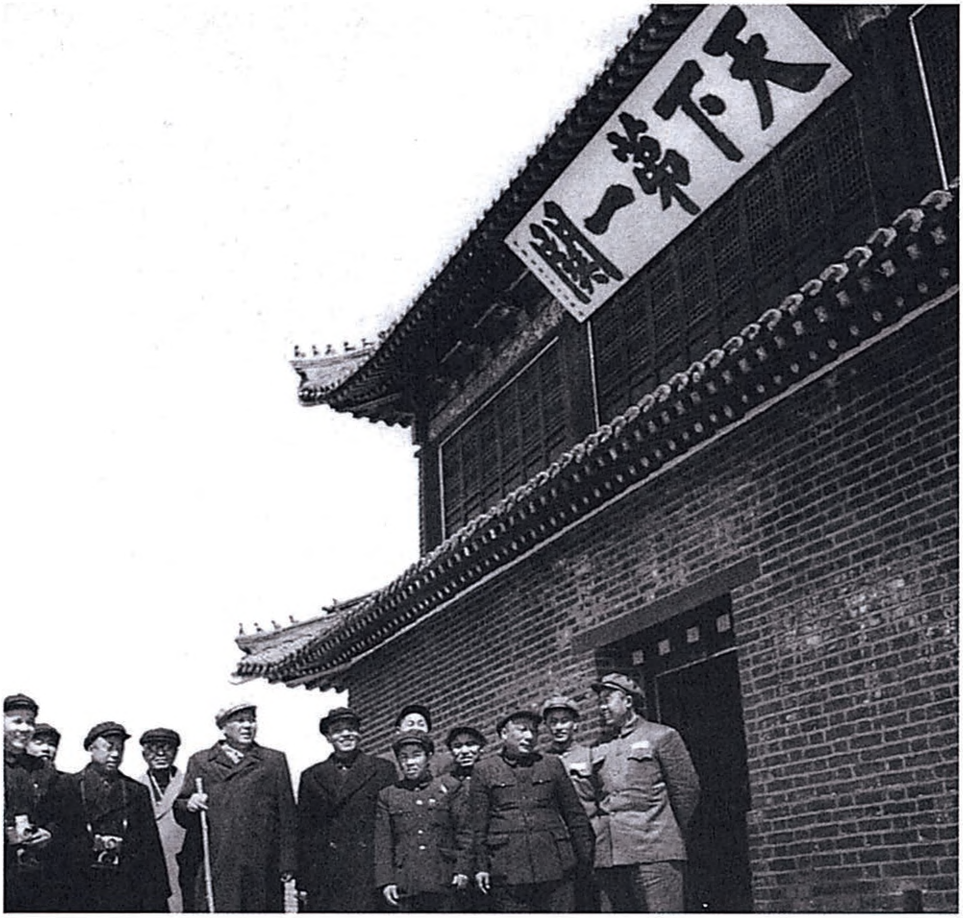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一日

---

[1] 文平山，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的孙子。

[2] 毛雪华，毛泽东的堂侄。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登上“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关于游泳池建造费由稿费中支出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4月25日）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1]诸同志：

江青此信[2]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3]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五日

---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指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罗瑞卿，当时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公安部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2] 指江青1954年4月2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

[3]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5万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在《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材料上的批语

（1954年4月28日）

刘少奇同志：

此件[1]，及去年冬季中宣部所辑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文件[2]，都是重要文件，宜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在京及

---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1954年3月27日报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题为《苏联宣传中对斯大林提法的改变》的材料。这份材料指出：一年来，苏联宣传中对于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变。这种改变从1953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7月后便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过去对于斯大林的功绩提得过高，有些个人崇拜的偏向，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目前对于苏联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文化革命、伟大卫国战争等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多强调群众的功绩，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包括有列宁其他学生在内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斯大林个人的功绩则很少提到，更不单独叙述。二是对列宁和斯大林两人的评价，过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宁相提并论，甚至比列宁提得还多些，现在有所纠正，特别强调斯大林是列宁的继承者。今年苏联各报纪念斯大林逝世周年的文章，多以“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为标题。材料还介绍了苏联报刊对斯大林在革命运动与理论贡献方面一些具体问题的提法的改变。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三、四期刊载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1953年12月25日报送中央宣传部的两个参考材料，一个是《苏联宣传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另一个是《苏联共产党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在各地的中委，候补中委，在京每〈某〉些应当『年』阅读的同志（如李维汉，安子文[1]），请考虑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关于修建闽南铁路线路问题的信和批语

（1954年4月28日）

一

陈委员[1]：

一月二十二日惠书[2]收到。所提建议，已交铁道部研究。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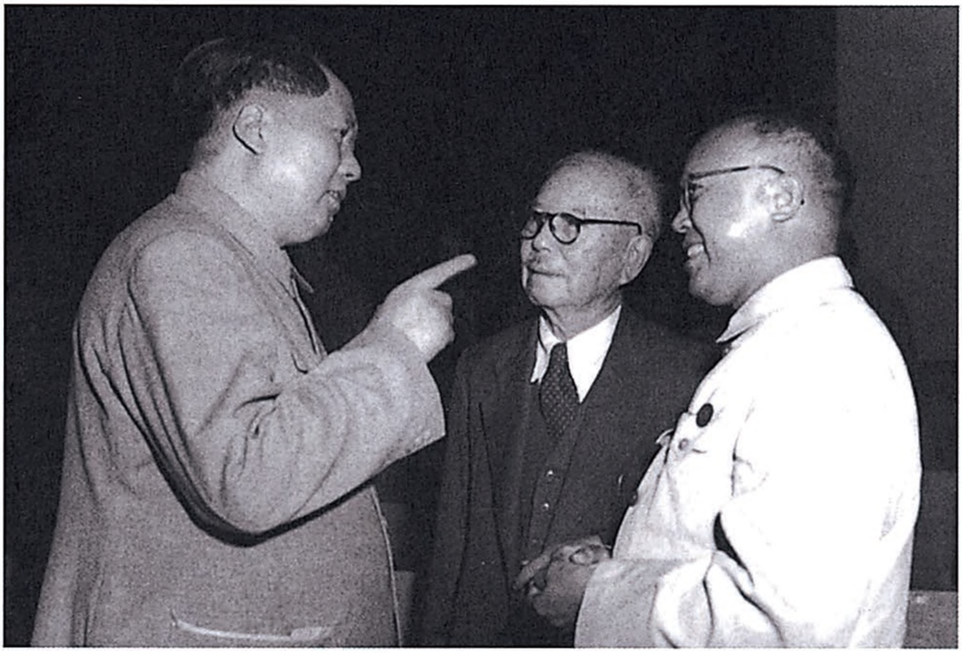
---

[1] 指陈嘉庚，爱国华侨领袖，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2] 指陈嘉庚1954年1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报告了他向周恩来提出的关于修建闽南铁路的线路的建议。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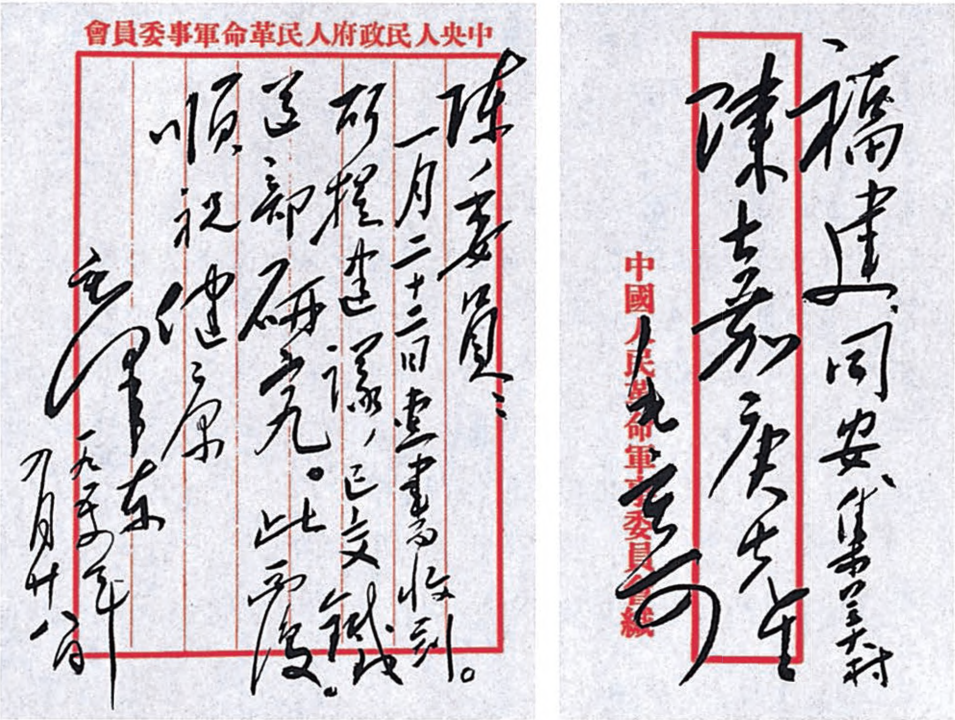
抄送铁道部研究，原信退我待复。[1]



1954年，毛泽东和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亲切交谈。

---

[1] 这是毛泽东写在陈嘉庚1954年1月22日来信上的批语。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陳先生：

一月二十二日惠书收到。所提建议，已交铁道部研究。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二月廿八日

福建同安集美学村

陈嘉庚先生

毛泽东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陈嘉庚信的手稿。

奠边府作战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在后方交通线[1]

（1954年4月28日）

彭德怀、黄克诚同志：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郎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黄克诚的信。

给毛少贤[1]的信

（1954年4月28日）

少贤同志：

去年十二月的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眼病以就近医治为宜，出外不容易。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八日

---

[1] 毛少贤，毛泽东的远房亲属。

1954年，毛泽东在江苏视察。

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1954年4月29日）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1]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2]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

[1] 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过接待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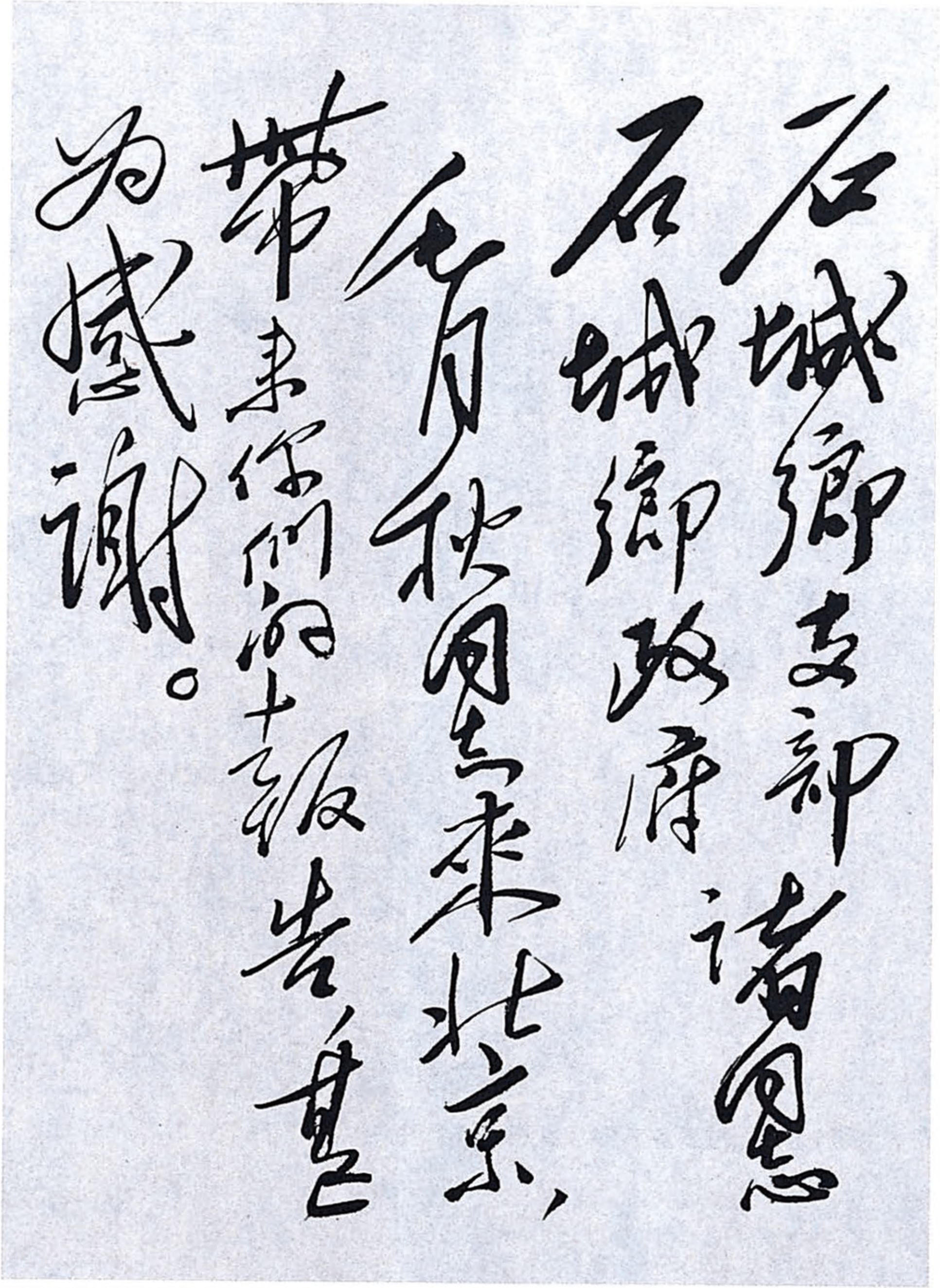
[2] 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作。

此致

同志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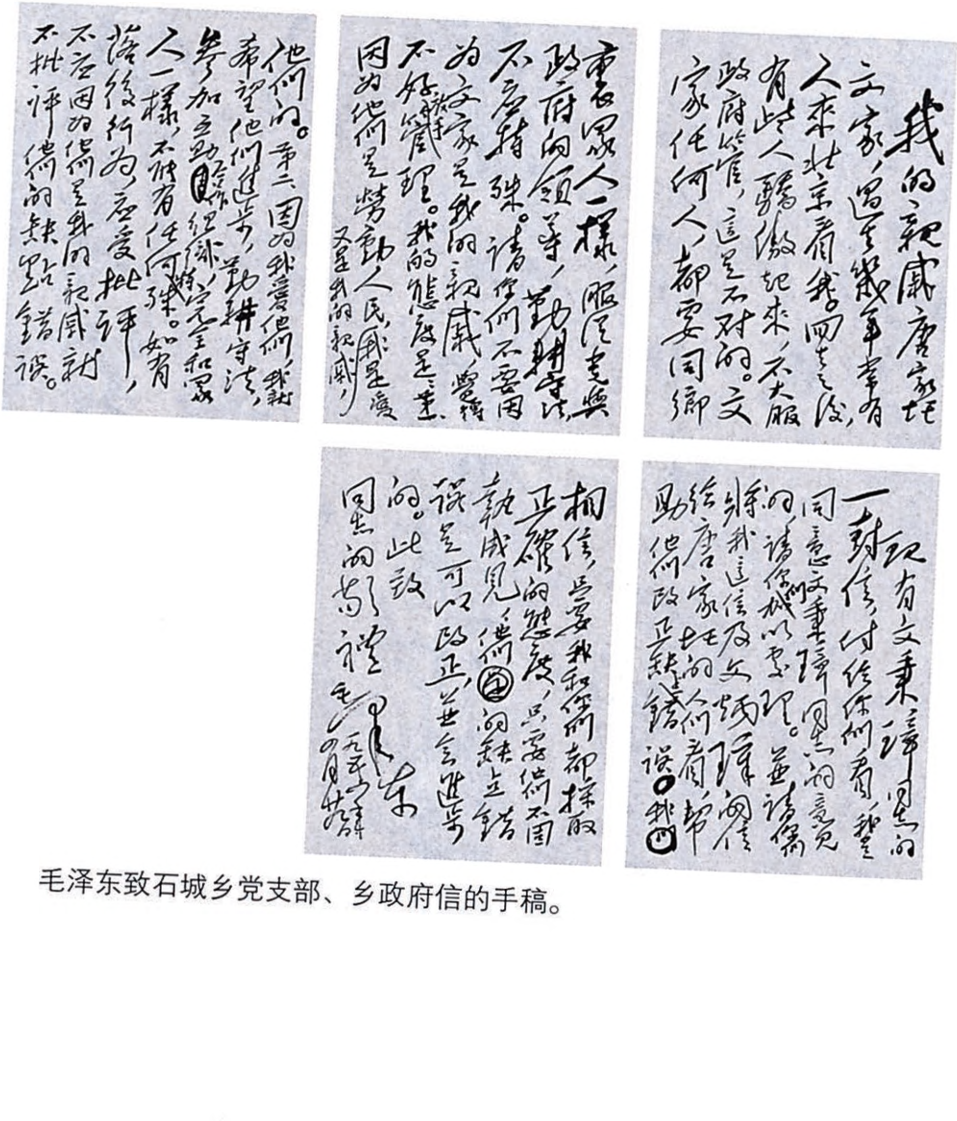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石城鄉支部
石城鄉政府
諸同志
毛月秋同志來北京、帶來你們的報告甚為感謝。

毛泽东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信的手稿。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要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要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要因为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秉璋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秉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各人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们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採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且会进步的。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信的手稿。

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 “开、好、管”的方针[1]

（1954年4月）

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

开，就是要开展批评。不开展批评，害怕批评，压制批评，是不对的。

好，就是开展得好。批评要正确，要对人民有利，不能乱批一阵。什么事应指名批评，什么事不应指名，要经过研究。

管，就是要把这件事管起来。这是根本的关键。党委不管，批评就开展不起来，开也开不好。

---

[1] 这是毛泽东和胡乔木等的一次谈话。

给班禅额尔德尼[1]的信

（1954 年 4 月）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

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出席首都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和献花儿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队伍。

1954年5月1日，北京少先队员给毛泽东等献花。

1954年5月1日，毛泽东和董必武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给黄炎培[1]的信

（1954年5月3日）

任之先生：

五月一日惠书并大作[2]一册收到，甚为感谢！爱国热忱，溢于言表，足征孟进〈晋〉。大作尚待暇时从容研究。敬复。

顺问日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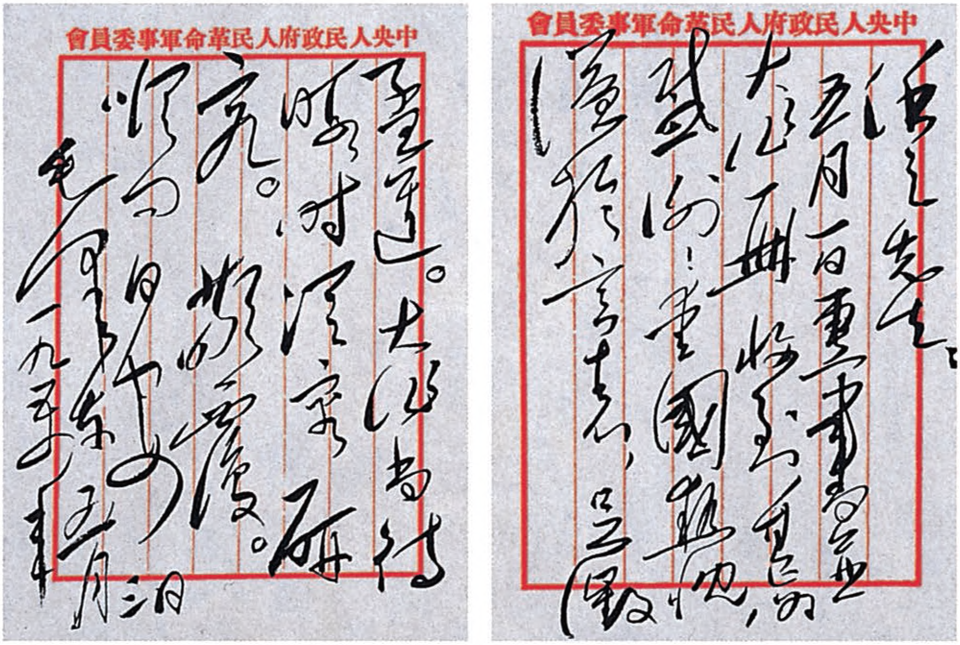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五月三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2] 惠书，指黄炎培1954年5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参加检阅“五一”群众大游行的感想，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情况。大作，指黄炎培写的《读〈资本论〉第一卷》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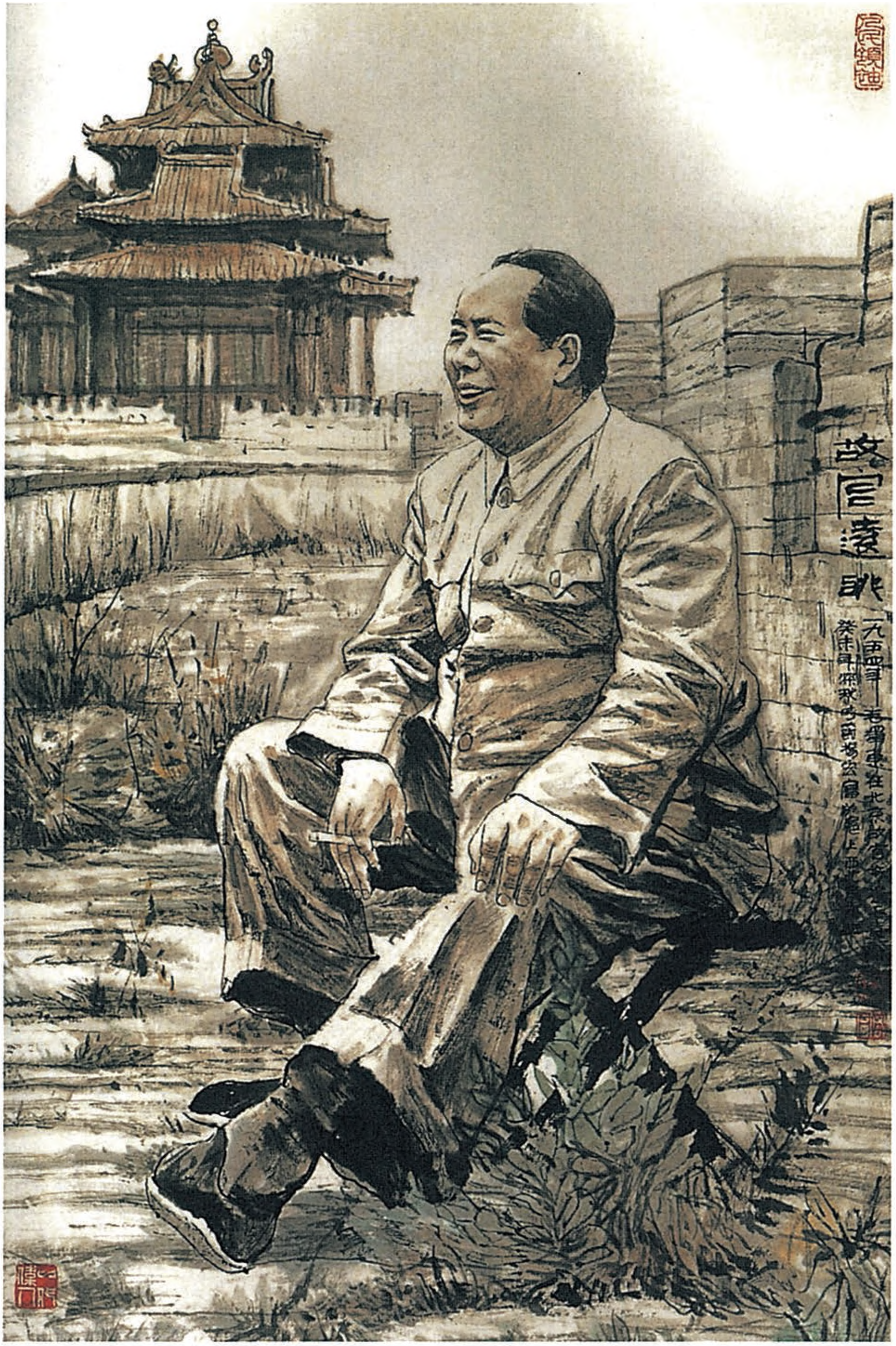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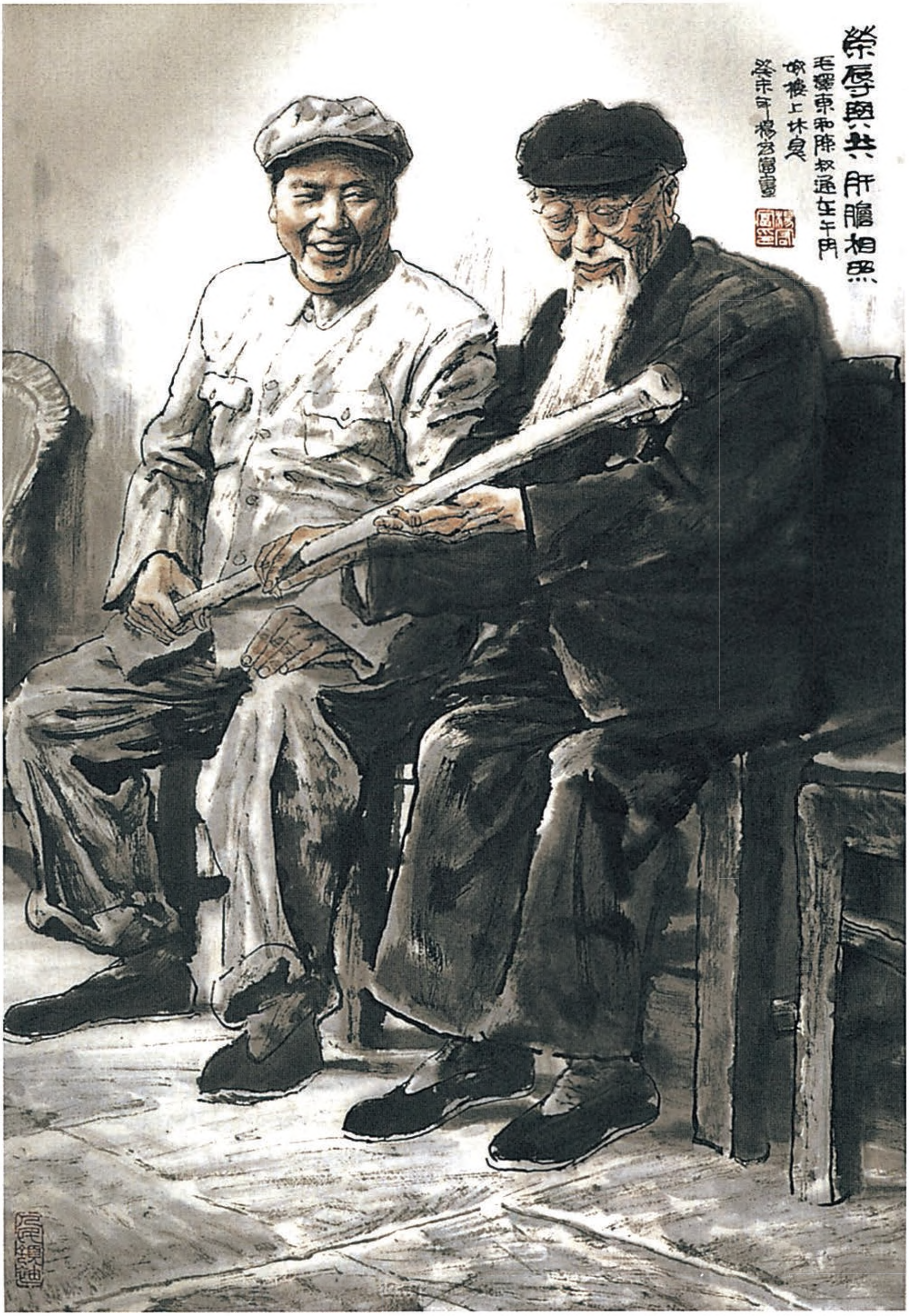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的手稿。

1954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故宫城墙上。


故宫遠眺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北京故宫

《故宫远眺》（中国画）

1954年5月，毛泽东和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在一起。


榮辱與共 肝膽相照
毛澤東和陳叔通在午門城樓上休息
癸未年 楊宏富畫

《荣辱与共　肝胆相照》（中国画）

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活动应予以揭发[1]

（1954年5月12日）

李相朝、丁国钰二同志，并告金首相[2]、志司[3]并周总理：

五月九日十一时来电悉。对方指使两瑞[4]建议修改停战协定，改换我方三个指定口岸，估计其用意除一般诬蔑我方并为美方辩护外，还在于为进一步破坏中监会[5]制造根据，并将责任归于我方。这是美方近一时期的活动中心。因此，我们应挑出维护停战协定、维护中监会的旗帜，对美方企图破坏停战协定和中监会的活动在会内会外予以揭发，并由波捷[6]配合行动。在两瑞委员尚未公开攻击我们之前，暂不对之作公开抨击，而由波捷出面与之斗争。

根据这个方针，我们应主动召开军停会[7]，就波捷关于美方运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李相朝、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丁国钰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3]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4] 两瑞，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典、瑞士委员。

[5] 中监会，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6] 波捷，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委员。

[7] 军停会，即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

入增援物资向军停会提出的报告进行反击，并提严重抗议。如果美方就两瑞的建议提出要求修改停战协定，我们应作总结性发言予以痛斥，并指出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提出这一要求，是有意制造紧张气氛，影响日内瓦会议。如果他们不提此事，我们也不要主动提出，而由波捷向军停会提一声明，对两瑞来信加以批评，并视情况争取将波捷这个声明发表，同时由我记者对两瑞的来信作一评论报道（但口气必须平和说理，不要谩骂）发表。

我对中监会关于两瑞来信的复信可暂缓发出。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

为官厅水库建成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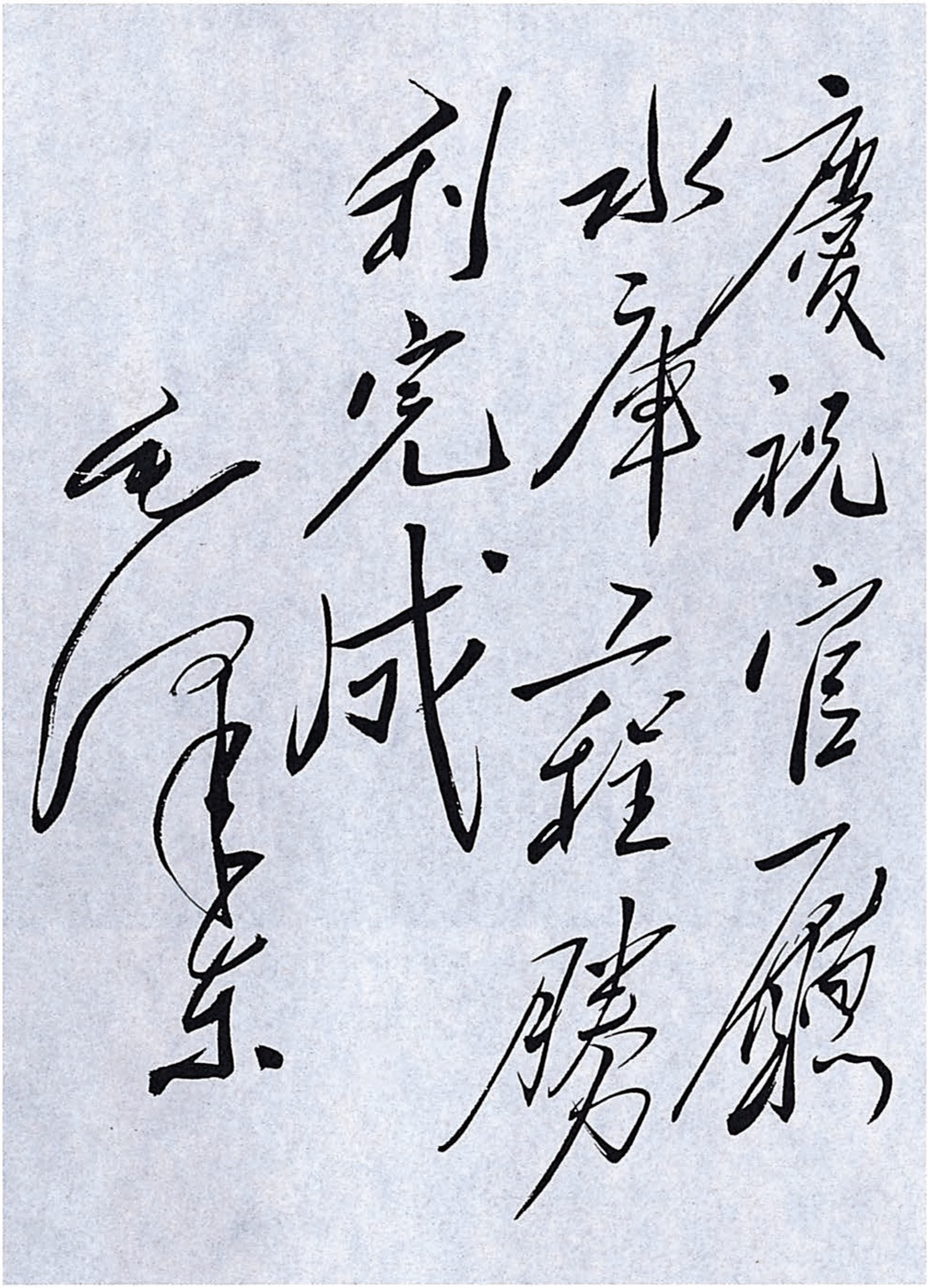
（1954年5月）

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毛泽东

---

[1] 1954年5月13日，官厅水库建成。毛泽东亲临官厅水库视察，并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毛泽东

毛泽东为官厅水库建成的题词。

1954年，毛泽东和李敏、李讷及身边工作人员在官厅水库工地。

对海军配属特种兵报告的批语[1]

（1954年5月19日）

退黄克诚[2]、粟裕照办。[3]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1954年5月18日报告的批语。

[2] 黄克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

[3] 粟裕的报告说：由于蒋军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致使该海区渔航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为使我海军训练与实战相结合，将华东海军主力推进到定海、石浦海区，并为加强今后海军的发展基础和海上对敌斗争，以转变闽浙沿海敌我斗争形势，应给予海军配属有关之特种兵部队以加强海军之战力。为此拟调部分装甲兵、野战炮兵、高射炮兵及部分空军部队归海军建制。

致南非印度人大会电[1]

（1954年5月28日）

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名誉书记卡查利亚、米斯特里先生：

我代表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南非的非白色人民（包括印度人及其他亚、非人民）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正义主张。祝大会在团结印度人和所有的南非人民——白色和非白色人民——争取和平、自由、民主与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

[1] 这是毛泽东给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名誉书记优素福·卡查利亚和米斯特里的复电，表示支持南非印度人争取民主权利、反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运动。

1954年5月28日，毛泽东等接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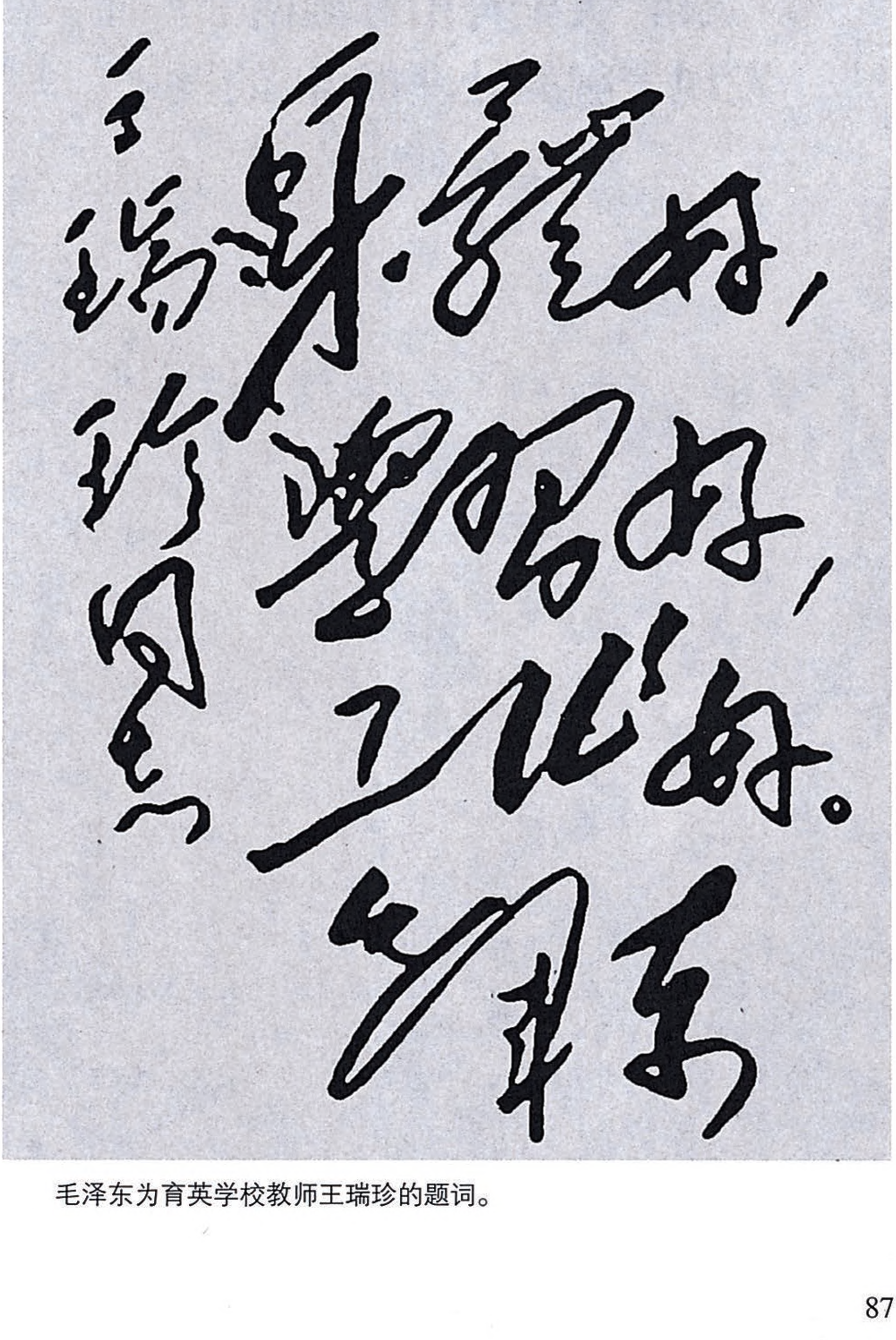
为育英学校教师王瑞珍题词

（1954年5月）

王瑞珍同志：

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

毛泽东



王瑞珍同志

身體好，

學習好，

工作好。

毛澤東

毛泽东为育英学校教师王瑞珍的题词。

对粟裕[1]关于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报告[2]的批语

（1954年6月2日）

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

毛泽东

六月二日

---

[1]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指粟裕1954年6月1日关于舟山群岛南部海面发现美舰的处理情况给刘少奇、朱德并转呈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今晨接华东军区电话称，舟山群岛南部朱家尖岛东南至上下大陈以北之海面，发现敌巡洋舰及驱逐舰共八艘，并有飞机在该海区上空盘旋飞行。似此显系美帝向我军进行挑衅。当即要华东军区转告该区我军陆海空部队，对当面之敌应严密注意监视，随时报告。如敌不向我炮击或轰炸，我军不得向其射击，以免引起冲突。如大陈岛的蒋军乘机向我守岛部队进攻，则应予以坚决回击。

关于达赖、班禅[1]尽早起程赴京的批语[2]

（1954年6月3日）

刘、邓、李维汉[3]同志：

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应尽早起程，九月五日前（最好九月一日前）务必到达北京，请即作部署。

毛泽东

六月三日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西藏工委1954年6月1日关于达赖为庆祝中印谈判成功宴请我驻藏干部的情况报告上。报告请中央尽早将达赖、班禅等藏族代表去北京开会的时间和人选下达布置。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检查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瑞典瑞士委员的关系[1]

（1954年6月6日）

李相朝、丁国钰两同志，并告金首相[2]、志司[3]：

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已成为目前日内瓦会议的焦点，我们对于中监会[4]的方针已电告你们，关于我们（朝、中、波、捷）对两瑞[5]的关系请你们作一总的检查，在检查中望注意以下各点：

（一）在新义州和满浦应坚持事前报告和抽查的总方针，但对抽查方面不妨放松一些，无论波捷[6]或朝中方面皆应注意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务使两瑞无可借口。

（二）在清津、兴南和新安州三地因无轮换与替换，在原则上自可不必容许抽查，但因对抽查限制过严反而启两瑞的疑心，不如适当增加一些抽查的机会使其无所得而退。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李相朝、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丁国钰的电报。

[2] 金首相，指金日成，当时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3]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4] 中监会，即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5] 两瑞，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瑞典、瑞士委员。

[6] 波捷，这里指参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委员。

（三）在我方各口岸对两瑞人员日常生活上予以适当照顾是对的，但对其一般活动上亦可在无大妨碍的情况下予以适当放宽。

（四）应说服波捷同志在中监会中努力与两瑞共同确定一些事实，不必事事做结论，在日常生活中亦应尽可能地有些来往。

（五）对于对方可能提出的特别调查应根据对方所有要求的具体性质予以考虑，如确实符合停战协定即不应以其麻烦而拒绝之。

（六）对对方在南方口岸提出的新办法应根据前电精神予以处理。以上各点务必根据每一地每一事的实际情况逐步改进，切忌突然放松反而予对方（美、韩、两瑞）以示弱的印象。

（七）以上各点请加注意。

（八）你们关于我后方口岸的请示电已悉。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六月六日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6月7日）

一

刘少奇、邓子恢[1]同志：

在第三页上作了一点修改[2]，请酌定。

毛泽东
六月七日

二

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2] 见本篇二、三两部分。

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

三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目前农业增产的主要出路。但要发挥这种增产潜在力，靠小农经济是有限的，靠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是工业发展以后的远景，在最近几年之内必须依靠大力发展农业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各种可能的技术改革。

关于印发宪法草案修正稿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4年6月9日）

少奇同志阅后，交李维汉[1]同志：

此件[2]可即印发有关各人（宪法起草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要他们于六月十一日带到会场。

毛泽东
六月九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修正稿。这个修正稿在1954年6月11日举行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列席参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讨论通过，并批准公布，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通过了准备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

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宪法草案记录

（1954年6月11日）

毛泽东：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六次会议，今天是第七次会议，也可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后，还要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要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这是它职权范围内的事。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将要在最近开会。宪法草案大概在十五日以前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还要进行两个半月到三个月时间的讨论。宪法草案公布后，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泛的解释，组织讨论。今天的会议是对宪法草案的全部条文作最后的审查。虽然大家对条文都很熟悉了，但是今天要表决通过，为了慎重起见，还是把它读一遍吧。

（齐燕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

李维汉：第二章第四节的第五十三条第三款，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节的第六十七条、六十八条、六十九条、七十条、七十一条、七十二条和第三章的第一百条都有一些修改，并删去了一条，现在的全部条文共一百零六条。

毛泽东：说明一下，为什么这样改？

李维汉：第五节的改动，是因为没有照顾到前面，条文有点乱，所以在第五十三条增加了一款。

毛泽东：什么叫“民族自治地方”，需要解释清楚，在第五十三条加一款，就有交代了。民族自治地方不包括民族乡。

李维汉：第五十四条是讲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机关。另外，还把“按照宪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改为“由宪法第二章第五节规定”。

毛泽东：改成这样比较清楚。第二章第五节有许多条，不只是第六十七条，它全部是讲民族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的，你们讨论过没有？

李维汉：民族事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已经讨论过了。

毛泽东：第五节第六十七条的意见已经移到前面去了，这里可以把它删去，好不好？

第五节的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改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机关”。因为在第四节第五十三条已经把民族自治地方交代清楚了，所以，在第五节不应再笼统地提“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六十七条加了“的组织”三个字。因为这一条是讲组织的，没有这三个字就不那么好。

第六十八条只是文字的修改。

第六十九条，把“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删掉，改为“第二章第四节”。因为这一条是讲职权的，而一切自治机关也都行使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这一条的改动是不是这个意思？

李维汉：是。第六十七条是讲组织，第六十九条是讲职权，照现在的改法，就同第六十七条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

毛泽东：为了节省文字起见，第四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可以不必列举。如果列举了，好处是人家一看就很清楚，但缺点是这样写了，第六十七条也要列举。照现在的写法，要让人家自己去翻找，不知能不能翻得出来？

陈叔通：不难翻出来。

李维汉：将来可以在单行法中规定。第六十七条写的是根据第二章第四节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好具体列举。

邓小平：第六十七条不好列举具体条文。

李维汉：各民族情况也不同，不好列举。

毛泽东：既然第六十七条不列举，那么第六十九条也不列举。

第七十条、七十一条、七十二条都是文字性的修改。

大家对第四节和第五节的修改还有什么意见？草案公布以后总还会有修改的。

刘伯承：第二十一条和第四十九条十四项都写的是“武装力量”，第四十二条也应改成“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毛泽东：譬如军事仓库、国防工事、兵船、飞机、汽车、大炮、炮弹等等都算不算武装部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能不能统率？照原文的写法，主席只能统率部队，炮队就不能统率了。

邓小平：武装力量包括人民武装在内，如果人民武装也归主席

统率，可以改为“武装力量”。

毛泽东： 民兵是不是归主席统率？那应该是政府的事。部队医院、军人休养所叫不叫部队？说“统率武装力量”是可以的，譬如“使用武力”不就是“使用武装力量”的简称吗！

陈叔通： 还是照原文好。

毛泽东： 初稿上原来写的是“武装力量”，后来怎么改成“武装部队”了？

钱端升： “武装力量”和“武装部队”两个名词翻译成俄文是一个词。当初所以把“武装力量”改为“武装部队”是认为部队可以统率，力量不好统率。我们法律小组的意见，可以考虑改成“武装力量”。

聂荣臻： 第二十一条讲的就是武装力量。

毛泽东： 武装力量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部队，一部分是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如果照原文的写法，好像部队以外的武装力量不归主席统率了。恐怕还是将军们的意见对。语文顾问同志，你们看哪个意见好？

叶圣陶： 还是改成“武装力量”好。武装力量能不能统率呢？我们看看第四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第四条写“……依靠……社会力量”一句话，既然社会力量可以依靠，为什么武装力量就不可以统率呢？

毛泽东： 改成“武装力量”好不好？

黄炎培： 武装力量包括人和物。语文专家的意见是可以采纳的。但是第二十三条的“武装部队”恐怕不能改成“武装力量”。

邓小平： 可以改成“军队”。

刘少奇： 改成“军队”好。

李立三：军队包括不包括警察？

毛泽东：警察是怎样进行选举的？

刘伯承：警察的选举是同政府在一起进行的。

张奚若：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由”字是否改为“按照”？因为“由”字有点未确定的意思，既然在宪法的第二章第五节已经把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规定得清清楚楚，还是用“按照”好一些。

周鲠生：“由”字含有将来的意思，用“按照”也不太好。索性用“在”字倒好一些。

毛泽东：“在”字不那么妥当吧。

黄炎培：用“按照”好。

李立三：还是用“由”字好，“按照”好像下面的话没有说完。

李维汉：当初是为了避免“按照”的字样过多，第四节“按照”第五节的规定，第五节又“按照”第四节的规定，不大好，才用了“由”字。意思是说，关于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这里不规定了，由那里去规定。

毛泽东：“由”字比“在”字好，也比“按照”好。“由”字不一定解释为现在没有将来才有的东西，比如：“这件事我办不了，由他去办。”张先生的意见怎么样？三个字比较，恐怕还是“由”字好。

张奚若：我没有什么意见。

张治中：第五节的标题“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民族”是指少数民族。原第六十七条和现在的第七十二条都标出了“少数”二字，第二十三条也有“少数”二字。第五节的标题是否也标明“少数”二字，或者在第五十三条新增加的最后一款中加“少数”二字。当然，不加也不会发生误会，但加上去更明确些。总纲

第三条也有“少数”二字。

毛泽东：总纲第三条第四款也用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字样，实际上是讲“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把“少数”二字省略了。

李维汉：“民族自治地方”是一个专门名词，不要把它拆开来讲。如果这里写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则将来所有的文件都要写作“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了。

毛泽东：这是“省文”。第三条的“民族自治地方”本来可以加“少数”二字，但省略掉了，这样写人家可以看清楚。

张治中：第五节是讲少数民族自治的单独一节，是否加上“少数”二字，明确些。

毛泽东：如果要加，则“民族乡”要改为“少数民族乡”才算完全正确；“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也都要改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自治县”了。

张治中：条文里可以省，标题不要省。

李维汉：最近几年来都是用“民族自治地方”，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就没有“少数”二字，大家都明白是指少数民族。

赛福鼎：我的意见，“民族自治地方”即代表了“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因为前面在第三条已经规定了：“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这里可以不写“少数”二字。

乌兰夫：第三条已经讲清楚了，第五节可以不写“少数”二字。

刘少奇：这是省文。比如“直辖市”，由什么地方直辖？是讲“中央直辖市”，把“中央”二字省掉了。因为除了中央直辖市就没有别的直辖市，不会误会。“民族自治地方”也是这样，因为只有少数民族自治，不会误会为别的。

毛泽东：其实哪一个民族都是自治，比如汉族，难道不是“自

治”，而是被别人治？只不过把“自治”二字省掉了。我看，再过上几百年几千年以后，大概就可以不要讲什么“民族自治”了。说“民族乡”，哪一个乡都是民族乡，难道你（指邓子恢同志）那个龙岩县白头乡不是民族乡，而是种族？部落？难道你那个乡不是自治而是被治？现在所以要特别标出少数民族自治，是因为少数民族过去是被汉族统治者治的，现在是实行自治，所以要标出来。汉人的地区就不要标出“自治”了，因为汉人从来就是自治的，只有好人治与坏人治的不同罢了。张治中先生，经过这样解释，可以清楚了吧？

张治中：我撤销这个意见。

毛泽东：第一百条，把“遵守公共生活规则”改为“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因为有人研究了，说苏联的所谓“公共生活规则”的主要内容是讲社会公德。

黄炎培：改得很好。

毛泽东：还有什么地方要改的？能想得起来吗？如果想不出来，恐怕就差不多了。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七个月。最初第一个稿子是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二稿，是在西湖，花了两个月时间，那是一个小组写的。第三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八千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我们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

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将来全国讨论以后，会有好的意见提出来，会有所修改，但总的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动了。

黄炎培：关于国歌问题。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有一个人还作了一首国歌，寄给我（昨天刚收到），要我送到中央来。我个人的意见，倒是觉得现在的国歌好。在这次讨论宪草中，也没有人提出要改国歌。

毛泽东：国歌不必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是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苏联采用“国际歌”作为国歌，也有那么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苏联人民从十月革命起一直唱到一九四一年，唱了二十四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的国歌有一句“最危险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不舒服，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国歌没有写。还有什么没有写的？各部没有定。还有领土没有具体写。

黄炎培：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什么，没有写。

毛泽东：对了，主席不是国家元首。我看还是不用元首好。

何香凝：要加强中央的力量，“中央人民政府”的名称还是保留好。因为国务院的职权里没有讲到军事方面。

毛泽东：有的。国务院的职权里有一项是“领导武装力量的建设”（第四十九条第十四项）。

何香凝：中央要集权，才能迅速及时处理国家大事。要加强中央的权力，“中央人民政府”还是要，对外宣传有作用。

毛泽东：你这个意见是很好的。中央的权力宪法中规定得很够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机关都是国家机关，规定得很充分了。我们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同，我们是把权力的主要首脑放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是它的执行机关。政府的权力也是很大的，并不是权力小。我们是中央集权，不是地方分权。一切法律都要中央来制定，地方不能制定法律。中央可以改变地方的决定；下级要服从上级，地方要服从中央。

何香凝：如果遇到紧急关头，比如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央要能及时采取办法才行。

毛泽东：你的意见很对，我赞成你的意见。就是要集中权力，要能灵活使用。遇到紧急关头，别人打进来了，常务委员会就可以决定问题（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无须等着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是靠第三十一条第十五项吃饭。这是讲“宣布”战争状态。如果敌人打来了，我们的军队当然立即就打。敌人打上海，我们上海的军队当然立即就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是等到宣布了战争状态再开枪，而是先打后宣布。常务委员会也可以立即开会，白天接到消息，当晚就可以开会；晚上得到消息，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开会。国务院总理也可以立即下命令行动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可以立即指挥军队，立即下命令：打。根据宪法草案第二十条，我们的军队的任务是“保卫国家的安全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哪个打来我们就打他，讨论也不要讨论。至于宣布战争状态，那是常务委员会的事了。

何香凝：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打。

毛泽东：那很对，外国打来我们立即打。

何香凝：“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还是要好。

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不要了，太长了。这是上次会议议的。也是反复了几次：初稿是“国务院”，后来改作“中央人民政府”，最后又改回来叫“国务院”。按照外国的习惯，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现在的政府多得很，省、县、乡都叫政府，现在宪法草案上规定地方都改叫“人民委员会”。

何香凝：我们的“长”字也很多，省长、县长、乡长，也多得很。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我们大家研究了一下，觉得这样可以。全国只有一个政府，即国务院。大家对“中央人民政府”的名字有了感情，很喜欢它，不愿意改，但改了我看也可以。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也就是部长会议。地方叫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委员会。中国古代也没有地方政府，叫作“布政司”，地方称政府也是最近若干年的事。别的国家的地方不叫政府，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古怪，政府多得很。其实我们在古代也是只有一个政府。你看这样改可不可以？

何香凝：可以，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只是想到这一点，随便说说。

毛泽东：我们和你一样，也喜欢“中央人民政府”这个名字，喜欢“人民政府”的字名，所以在宪法草案初稿里，地方还是叫地方人民政府，国务院也解释作“即中央人民政府”，也是舍不得这个名字，和你一样。后来经过大家讨论，反复研究，才舍得了，才改了。

何香凝：我不坚持这个意见。

毛泽东：那好。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付表决。赞成这个宪法

草案全文和今天的修改的，请举手。（全体一致通过）

毛泽东：还有一个报告。请齐燕铭同志把报告读一下。

陈叔通：报告中“一百零七条”要改为“一百零六条”。

（齐燕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关于宪法起草工作经过的报告）

毛泽东：“一百零七条”改为“一百零六条”。报告准备发表。赞成者请举手。（全体一致通过）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

（1954年6月14日）

1954年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和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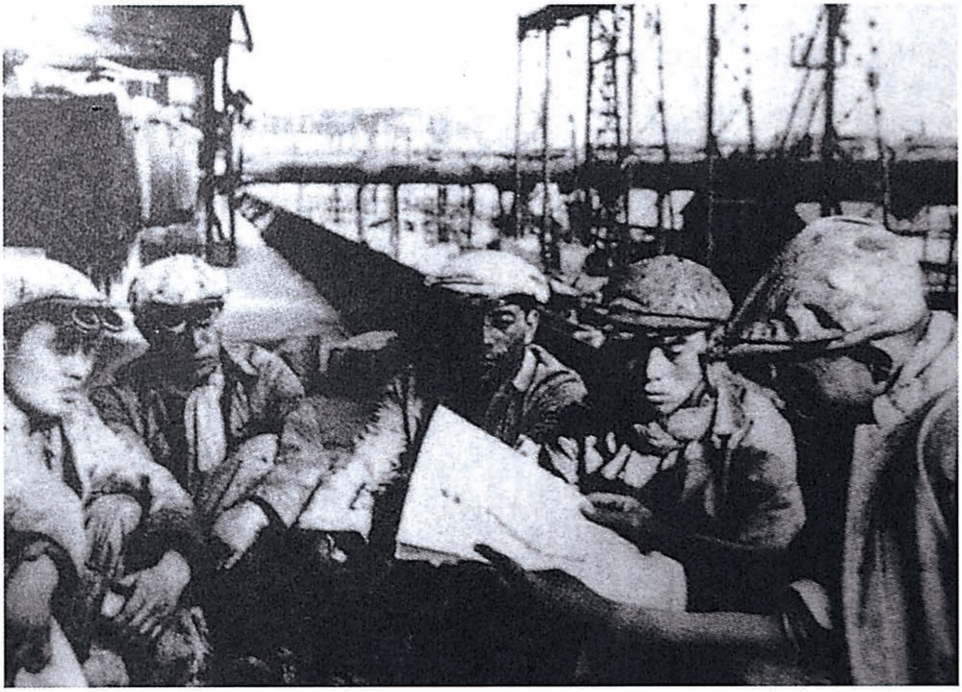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五百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八千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五千九百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这些意见，可以分作三部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正确的。还有一部分虽然不见得很不正确，但是不适当，以不采用为好。既然不采用为什么又搜集呢？搜集这些意见有什么好处呢？有好处，可以了解在这八千多人的思想中对宪法有这样一些看法，可以有个比较。第三部分就是采用的。这当然是很好的，很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些意见，宪法草案初稿虽然基本上正确，但还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不周密的。现在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个草案是比较完全的，这是采纳了合理的意见的结果。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

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的决议。图为工人在阅读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

条”[1]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3]，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

---

[1] 指清政府1911年11月发布的《重大信条十九条》。

[2]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颁布的。

[3] 指袁世凯政府1913年的天坛宪法草案、1914年的约法，曹锟政府1923年的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1925年的宪法草案。

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比如国家资本主义，是讲逐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是只有公私合营一种形式，而是有各种形式。一个是“逐步”，一个是“各种”。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原则，要达到这个原则就要结合灵活性。灵活性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灵活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比如公民权利的物质保证，将来生产发展了，比现在一定扩大，但我们现在写的还是“逐步扩大”。这也是灵活性。又如统一战线，共同纲领中写了，现在宪法草案的序言中也写了。要有这么一个“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可以安定各阶层，安定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安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它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共同的就适用共同的条文，特殊的就适用特殊的条文。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少数民族经济特点是什么？比如第五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有四种，实际上我们少数民族地区现在还有别种的所有制。现在是不是还有原始公社所有制呢？在有些少数民族中恐怕是有的。我国也还有奴隶主所有制，也还有封建主所有制。现在看来，

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都不好，其实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比原始公社制度要进步。这些制度开始时是进步的，但到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就有别的制度来代替了。宪法草案第七十条规定，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按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所有这些，都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的决议。图为农民在阅读宪法草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到大家拥护，大家所以说它好，就是因为有这两条：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总结了经验，一条是正确地恰当地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如果不是这样，我看大家就不会赞成，不会说它好。

这个宪法草案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是必须实行的。当然，今天

它还只是草案，过几个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就是正式的宪法了。今天我们就要准备实行，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这个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国际上会不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都会发生影响。在民主阵营中，看到我们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他们会高兴的。中国人高兴，他们也高兴。资本主义国家中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们也会高兴的。当然也有人不高兴，帝国主义、蒋介石都不会高兴的。你说蒋介石会不会高兴？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见就知道他是不高兴的。我们对蒋介石很熟悉，他决不会赞成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不高兴，也要说它不好。他们会说我们这个宪法是一条清楚的明确的但是很坏的道路，是一条错路，什么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是犯了错误。他们也不赞成灵活性。他们最喜欢我们在一天早晨搞出个社会主义，搞得天下大乱，他们就高兴了。中国搞统一战线，他们也不赞成，他们希望我们搞“清一色”。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

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十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

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关于宪法草案的修改问题[1]

（1954年6月14日）

宪法草案有两个地方要修改，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提出的意见，改了比较好。一个地方是序言第三段：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面加“第一次会议”五个字。下面的年月日也填起来，写成“一九五四年九月　日”。年月日前面没有“于”字，因为当初我们的两位语文顾问（语文专家）一致反对加“于”字，提出几次都通不过，我们多数只好服从他们少数。下面“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过去中国的宪法有八个（草案不在内）：清朝的“宪法大纲”，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中华民国宪法》，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说这个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符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但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当。

另一个地方是第三条第三款：“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的讲话。

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问题出在“和宗教信仰”五个字上。代表中有人提出，说改革“宗教”可以，改革“信仰”则不妥，并且第八十八条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谓“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就是说：你信仰宗教也可以，不信仰宗教也可以；你可以信这种宗教，也可以信那种宗教；信了，又可以不信；本来不信，后来也可以信。既然有了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第三条再讲“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重复了。这是西藏代表提出的意见，说这样写法不好，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说“改革宗教”还可以。历史上的宗教改革很多，比如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喇嘛教的改革等等。我看这一条意见是有理由的，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掉，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因为有第八十八条，删掉这一句没关系，免得误会，免得重复，也免得文字不通。语文学家反对这样写，说“改革信仰”不通。这一条完全是抄共同纲领的。可见，共同纲领还不是也有缺点。这一点，刘少奇同志的宪草报告中应当提到。

今天开会就是为着改这两处地方。这样改法行不行？有意见吗？

此外还有人提出：第七十四条，法院院长任期是第一款，法院的组织放在了第二款，说要改。我们觉得不改也可以。还有人说第五条“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的“主要”二字不要，我们考虑恐怕还是保留好，不要改了。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是这样说过。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出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能过得去的，

那就不要改了。

如果没有意见，就付表决。（全体通过）

宪法草案的本子，今天不再重印了。当然在大会通过之前还要重印一次。请各代表组组长负责召集各代表组开个会，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这两点修改，给大家讲一下。这次临时会议和这两点修改，报纸上都不发表。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位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千多名代表又讨论。宪法的起草应该说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推敲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

（1954年6月20日）

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

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1]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前些日子韦国清[2]同志电告越军作了一个新部署，准备在七月内把战争规模略为扩大。我们认为可以照韦电增加一部分军队于红河三角洲区域，以威胁法国人，但七月不要大打。何时可以大打，应完全依日内瓦会议情况作决定。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与胡、武、韦[3]三同志酌定。

中央

六月二十日

---

[1] 日内瓦国际会议于1954年7月21日就印度支那停战和恢复和平问题达成了协议。

[2] 韦国清，当时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3] 胡，指胡志明，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武，指武元甲，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韦，指韦国清。

给毛泽荣[1]的信

（1954年6月24日）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况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六月廿四日

---

[1] 毛泽荣，又名胜五，毛泽东的堂弟。

关于国家预算的指示

（1954年6月）

增产、节约、多留后备力量，是巩固国家预算的可靠的三道防线。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在宪法公布后的指示

（1954年6月）

我们要纠正领导上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错误，革命人民一定要有请愿、罢工、罢课的自由，我们是社会主义阶段，还要前进嘛！领导上有错误允许人民公开批评嘛，小字报、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都是很好的形式。

1954年，毛泽东在浙江。

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1]题名

（1954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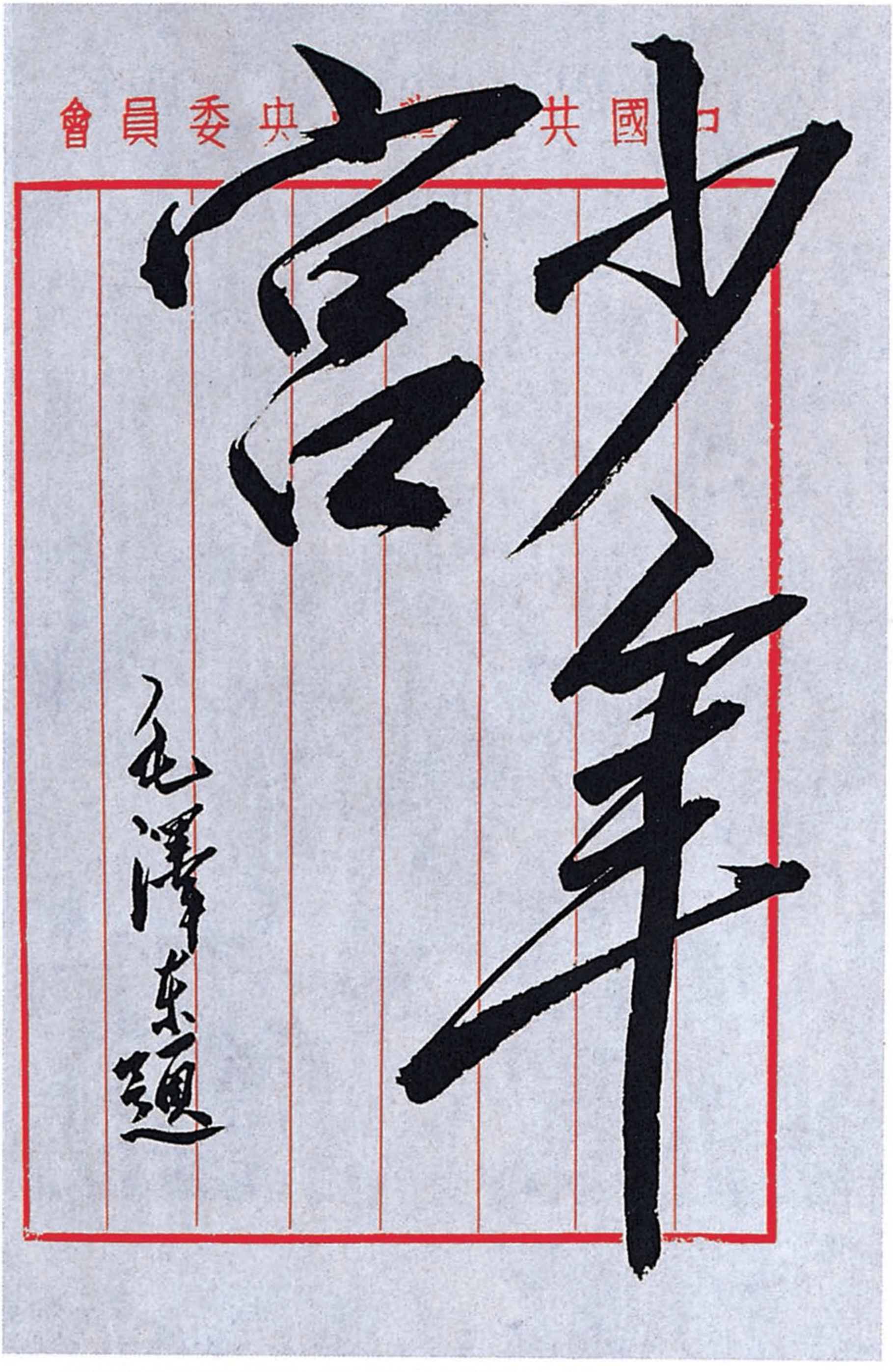
少年宫

毛泽东题

1954年6月，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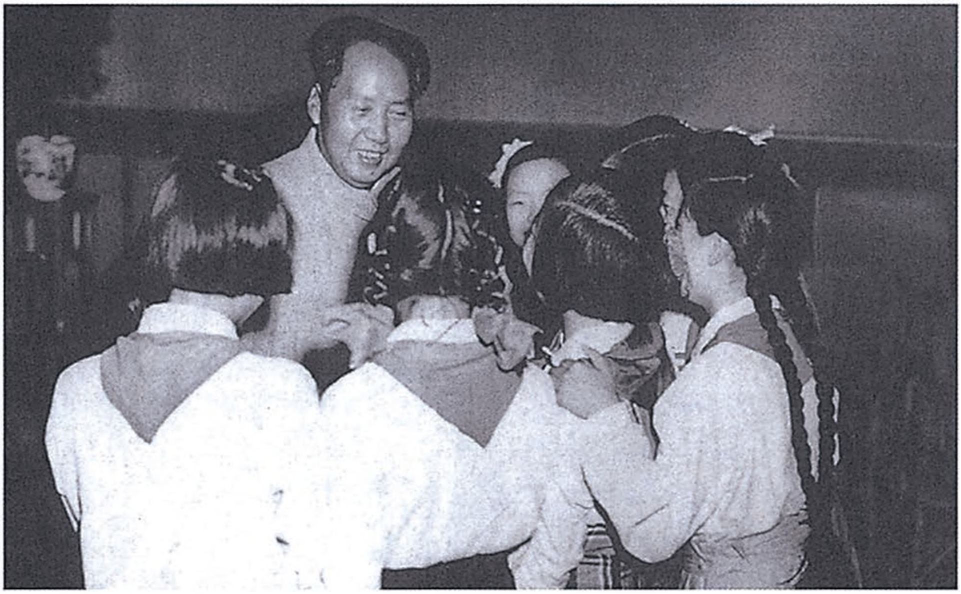
---

[1] 1954年6月，毛泽东应宋庆龄之请，欣然提笔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题写宫名。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少年宮
毛澤東題

毛泽东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题写的宫名。

1954年，毛泽东和“八一”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1954年，毛泽东和少先队员在一起。

对《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的批语

（1954年7月1日）

刘、朱、小平、李维汉、彭真[1]同志：

此件[2]值得看一下。

毛泽东

七月一日

送田家英[3]同志阅，退毛。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2] 指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政法研究》编辑部翻译的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九期刊载的《苏联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一文。

[3]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华东局统战部关于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4年7月6日）

李维汉[1]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委〕统战部（除华东）仿照办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1954年6月30日关于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情况给中央统战部、华东局并告各省市委统战部的报告。报告汇报了座谈会讨论公布宪法草案、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大行政区等问题的情况。

对西藏工委关于噶厦[1]提出裁减藏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

（1954年7月6日）

尚昆[2]同志：

这类问题[3]应由统战部拟处，是属于政治性质的，军委不好处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

[1] 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中共西藏工委1954年7月5日给中央并军委的电报中说，噶厦今天提出，拟将现有藏军除保留警卫代本1500人外，其余全部解散还乡，态度十分急迫，想在达赖离藏前解决。我们估计他们所以提出此项意见，主要是由于财政困难所致。我们意见当达赖离开西藏的时候，突然裁减藏军，殊非时宜，拟向噶厦进行说服，争取在达赖离藏期间，不裁减藏军，一切维持现状。如他们提出财政困难，则以中央名义给以一部分补助，其他问题仍由噶厦负责。

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

（1954年7月7日）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2]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至于说具体步骤，就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指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在日内瓦会议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联合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支那三国，即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际力量孤立美国，限制和打破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

是恩来同志所讲的，过去跟胡志明同志他们达成一致去做的和这一次谈好的那些东西。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所以我们应当批准过去这些活动。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比如丘吉尔在华盛顿同美国谈判，他们发表联合宣言[1]，写了六条，就不能不写那个第一、第二条，这两条就是说要跟我们拉手。这是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要拉手。对什么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拉手，他们说什么要有确实的保障，有很好的行动。我们有五项原则[2]，那不

---

[1] 指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954年6月2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宣言。宣言共六条，第一条说："我们将本着亲密友爱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在我们重新肯定下来的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世界和平。"第二条说："我们共同地并各个地继续向任何和一切以庄严的保证和切实的行动表明它们希望参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2] 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是很好的保障吗？我们参加日内瓦会议[1]不是很好的行动吗？所以，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恩来同志所讲的，艾森豪威尔同史密斯以及他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对现在要打是不赞成的；杜勒斯、诺兰、尼克松、雷德福[2]这些人，就比较更冒险一点。所以，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3]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

---

[1]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2] 杜勒斯（1888—1959），当时任美国国务卿。诺兰（1908—1974），当时任美国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尼克松（1913—1994），当时任美国副总统。雷德福（1896—1973），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3] 1954年12月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嘛。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1]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2]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这一点，我国许多民主人士是不了解的，他们就是相信那些宣传，总是讲，你看它们就是团结得很好。所以，明天要讲一讲这个问题，说明实际上不是这样。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你看我们这个东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鲜占去了，把台湾占去了，把菲律宾占去

---

[1] 艾登（1897—1977），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2] 尼赫鲁（1889—1964），当时任印度总理。

了，泰国变成它的了，巴基斯坦变成它的了，还有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把英国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么国家呢？过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是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所以情况是很好的。

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采取积极方针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1]

（1954年7月10日）

德怀同志：

此件经中央讨论，认为应采积极方针，分为四年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四个师（一百二十架），外汇方面，已交周总理便道与苏方商量可否借款问题，俟得结果再行决定。[2]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信。

[2] 1954年7月16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周恩来发了电报。电报指出：关于苏方帮助我们建设远程轰炸机部队问题，在你离京后，我们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虑。如果苏方准备给我们的是杜4式轰炸机（活塞式的），则以不建为宜，因此种飞机现在已经落后，速度慢（最高时速558公里），遇到敌人喷气式驱逐机即处于极不利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与此种飞机相适应的护航驱逐机（杜4式轰炸机活动半径为2500公里，米格15驱逐机活动半径为230至260公里），仍然困难执行远程轰炸的任务，并且此种飞机的机场设备及日常维护保养均耗费甚大，建设一个师除需外汇1亿5千万卢布外，国内尚需开支1万亿人民币（人民币旧币）。如果苏方给我们的不是杜4式，而是比依尔28式更新的喷气式远程轰炸机，或者是装有喷气与活塞两种发动机的飞机，则准备先建立一个师，以便培养干部，以后再考虑建立第二个师。请于返莫时向苏方询问清楚后，再与其商谈。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7月20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值此波兰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国庆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以我个人名义谨向波兰人民、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十年以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在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均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波兰已成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力量。

中国人民谨祝波兰人民在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对军委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的指示稿的修改[1]

（1954年7月23日）

一

当我海空军巡逻公海或直接护航的时候，对一切外国的飞机军舰均不得攻击。只有在经查明确认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向我护航目标（商轮或油船）有敌对行为（攻击或行劫掠）的时候，则坚决攻击之，以达到我护航之目的。除护航外，经确实查明是国民党匪帮的飞机军舰者，均坚决攻击之。

二

凡国民党匪帮飞机军舰为我击毁坠落海上时，应予停止攻击，我附近舰艇有将其救护、俘虏之责。

目前我护航任务仅限于防止国民党匪军抢劫行为，对其他任何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保卫领海主权及护航注意事项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外国海空军因在和平时期不会发生抢劫行为，故不发生自卫问题，一律不得采取攻击行动。又因双方速度较快，而蒋匪海空军均为美帝转让，稍一不慎则有击错可能，因此我护航作战原则：应以护航目标安全第一，如发现可疑国民党海空军未对我攻击而国徽又辨别不清我无十分把握时，不得攻击；如系一般运输机，而非军事运输机，即使是国民党所有亦不应攻击。

因我护航使我海空军已进入国际活动公海中，我各级干部、驾驶员、艇长均应学习公海规则，详尽地研究本指示，俾能圆满地达成护航任务，并成为遵守公海规则模范。

三

望你们严格布置执行，并加反复多次教育检查，将其情况上告。如有违犯此规定者，当受到应得的处分。

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致胡志明电[1]

（1954年7月23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同志：

当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般的越南人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您致以最衷心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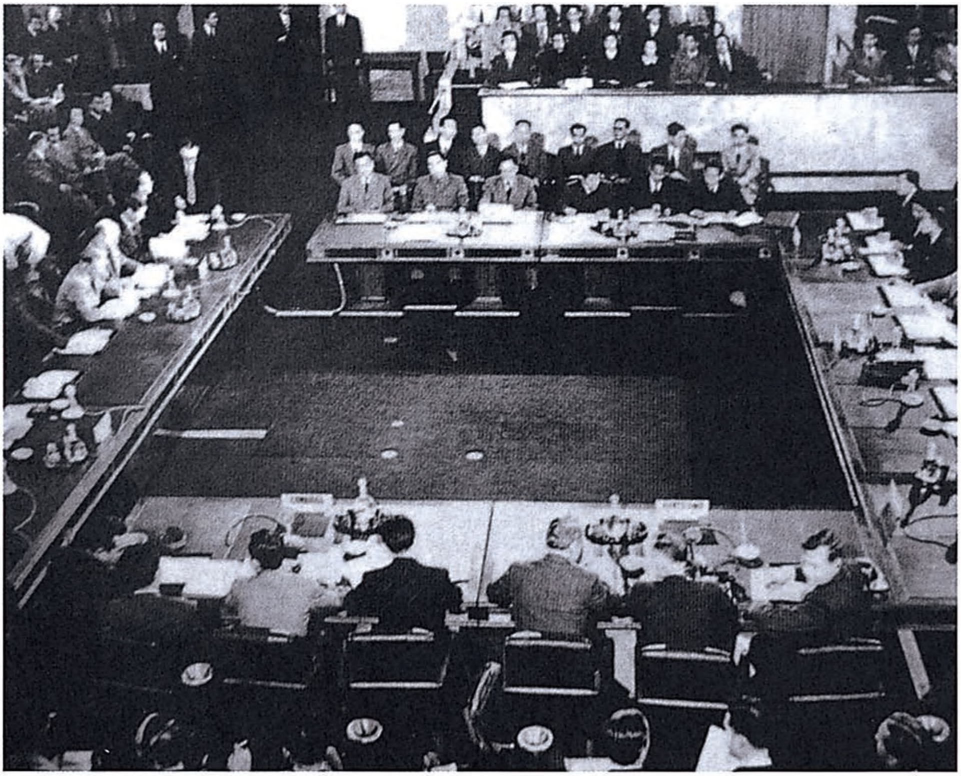
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

[1] 这是毛泽东为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主席胡志明的电报。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会议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从而结束了长达8年的印度支那战争。图为日内瓦会议的会场。

给黎锦熙[1]的信

（1954 年 7 月 23 日）

邵西先生：

先生元旦给我的信，我的秘书处转给文字研究会去了，书也转去了，我未见，不久前才又转回来，我已看了。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尊恙已好些否？宜多静养。如有困难，请告知为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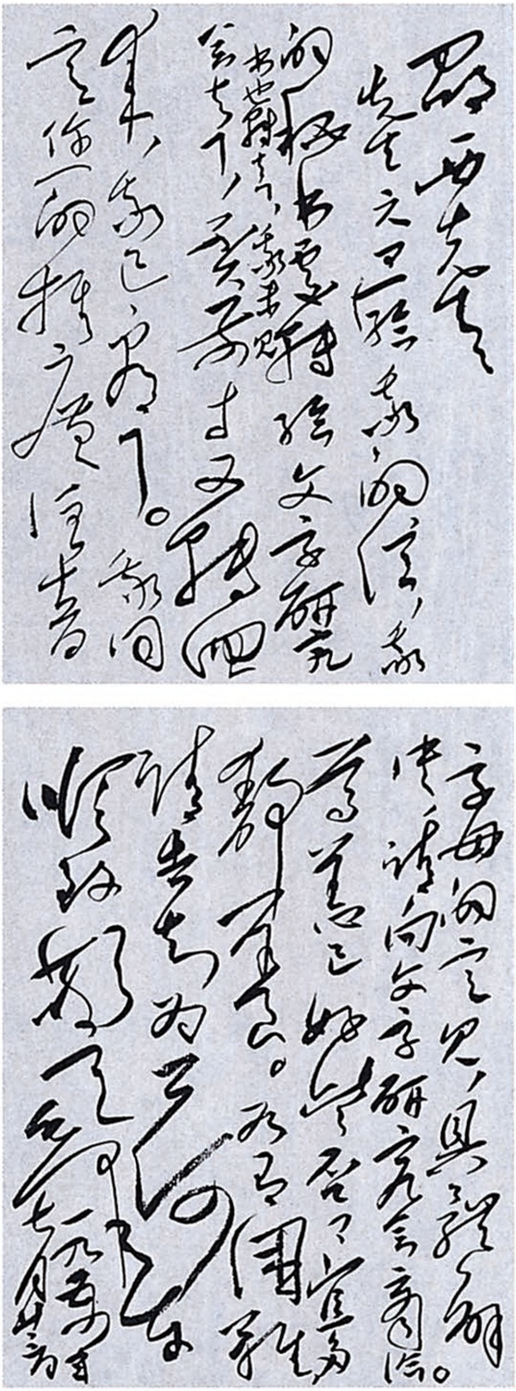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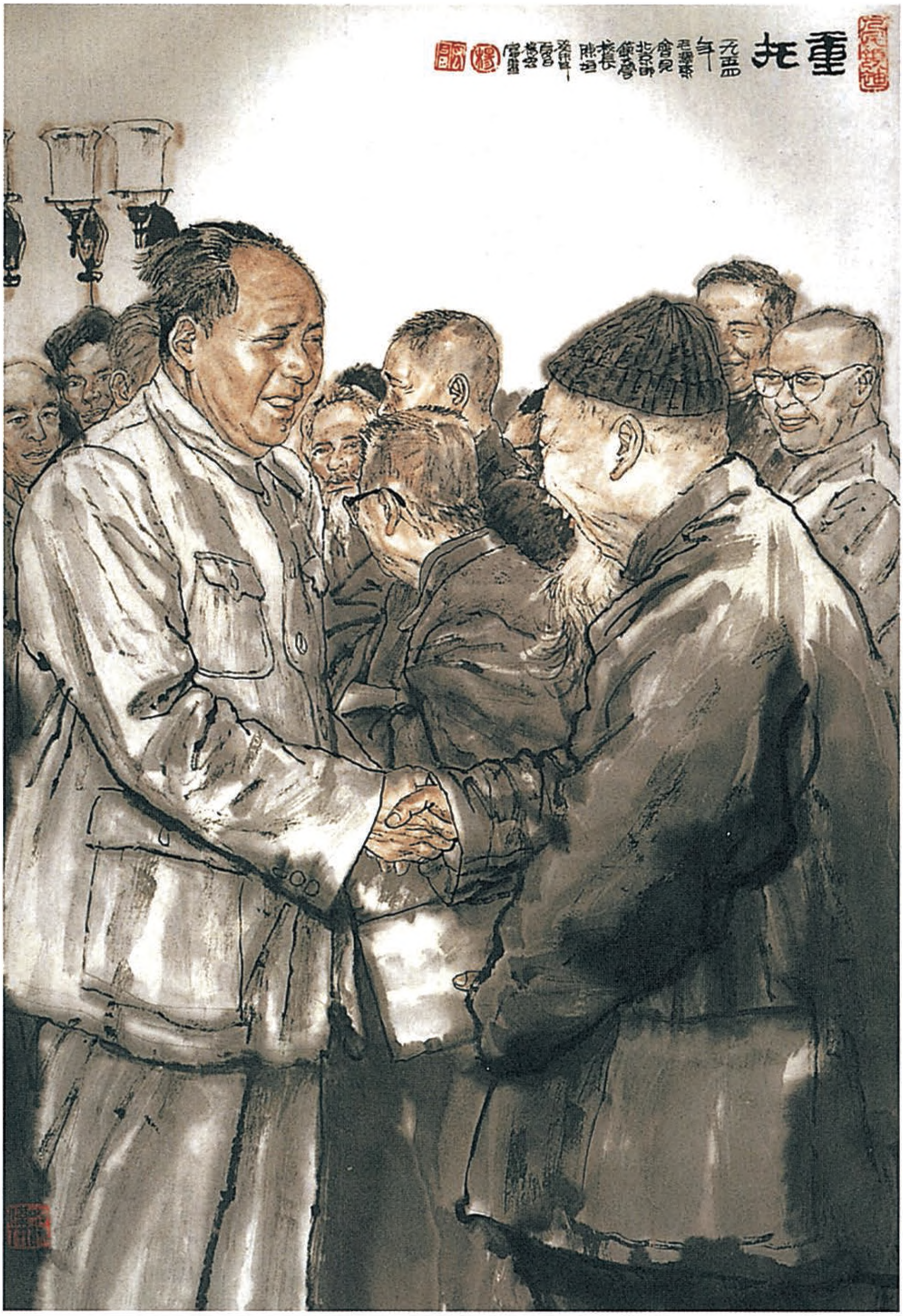
---

[1] 黎锦熙，又名邵西，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毛泽东致黎锦熙信的手稿。

1954年，毛泽东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亲切握手。



《重托》（中国画）

给李敏、李讷[1]的信

（1954年7月23日）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三日

---

[1] 李敏，毛泽东的长女，贺子珍所生，1936年生，原籍湖南湘潭，生于陕西延安。1940年从延安赴莫斯科随贺子珍一起生活。1943年开始读苏联五年制小学，1948年秋毕业。同年冬，随贺子珍从莫斯科回哈尔滨，1949年春随姨母贺怡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1959年和孔令华结婚。后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办公厅、总政所属机关工作。李讷，毛泽东的次女，江青所生。

对攻击大陈港敌舰方案的批语

（1954年7月24日）

德怀、克诚[1]同志：

请考虑是否须调华东军区，福建、浙江、上海三军区的负责人各一人来京讨论此问题。此电[2]内所提卅天准备时间是必要的，必要时还可延长至四十天。

毛泽东

七月廿四日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

[2] 指华东海军司令部1954年7月21日关于攻击大陈港敌舰的方案给海军司令部的电报。方案提出空军和水面舰艇联合打击，单兵种寻机打击和布雷相结合，并说为了做好联合打击的协同，需3周至1个月的准备时间。

关于复英照会[1]给刘少奇的信和对照会稿的修改

（1954年7月25日）

一

少奇同志：

请你召集陈、彭、邓[2]及章汉夫在你处一谈这两文件，考虑其措词是否适当。两件我均作一些修改，请你们再加斟酌。复英照会原稿第二段，措词极不适当，故作了修改[3]。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复英照会，以廿六日交出并广播廿七日登报为适宜。

二

据我军事机关收到来自海南岛方面的报告：七月廿三日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巡逻飞机在海南岛榆林港上空执行巡逻任务之际，

曾经与一架蒋匪帮的飞机在该地上空遭遇，发生战斗等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此消息后，即行多方面调查，始知该项飞机，实系英国所有的运输机，被我巡逻飞机误认为国民党匪帮飞机侵袭我榆林港军事基地者。发生此项不幸事件，实完全出于意外。

---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1954年7月26日复英国代办杜维廉的照会。英国代办杜维廉曾就一架英国运输机7月23日遭受袭击事提出照会。章汉夫在复照中指出，这架英国运输机被我巡逻飞机误认为国民党军飞机侵袭我榆林港军事基地而遭到袭击，发生此项不幸事件，实完全出于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此表示遗憾，并正在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处理。对于在此次事件中伤亡者及其亲属表示同情、关怀与慰问。对于有关生命及财产损失愿意考虑给予适当的抚恤与赔偿。这份照会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并在1954年7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

[2] 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

[3] 毛泽东对复英照会原稿第二段的修改，见本篇第二部分。

给许志行[1]的信

（1954年7月25日）

志行兄：

三月的信，早已收到，迟复为歉。知你仍在做教育工作，甚为高兴。此复。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七月廿五日

---

[1] 许志行，1919年冬和毛泽东在汉口相识，当时在上海市格致中学任语文教师。

对中医工作的指示[1]

（1954年7月30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进行考验，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思想改变。

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一、要抽调一百名到二百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毕业生交给有名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医工作的指示。1954年7月，刘少奇向中央文委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的中医，去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而且学习应当抱着很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二、各医院要有计划地请中医来院看病和会诊，允许住院病人用中药，并提出尊重中医的各种制度，从制度上加以保证，使中医到医院里坐诊工作不感到困难和顾虑。

三、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和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就是我们的罪过。所以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譬如，有些药材因培植时间较长，由种植到培植收获需二、三年以上，如白芍为四年生植物，黄连为六年生植物，个体农民往往没有力量种植，又如有利产药地区，如甘肃、青海交通不便，生产的药材不能及时运出，农民往往把药材当作燃料了。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制作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至于对中药研究，光做化学分析是不够的，应进而做药理实验和临床实验，特别是对中药的配合作用更应注意。

四、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过去由于难懂，再加不重视，无人整理。中医医书如不整理，就将绝版，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那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并组织他们（总结）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书来。

为了实现以上种种工作，首先在于纠正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只要思想上有改变，上述各种工作才能贯彻。

今后哪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如做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对《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某些偏向》一文的批语

（1954年7月31日）

一

此件[1]值得一看，请少奇同志考虑是否转发地委以上各级党委。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整理的《苏联纠正反世界主义斗争中的某些偏向》一文（载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1954年第十七期）。该文主要介绍苏联报刊最近批评思想文化战线个别部门对于历史遗产和现代外国科学技术成就持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的情况。这种错误首先表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持一概否定的态度，同时还表现在拒绝接受外国科学技术成就，否认各民族间精神上的交往和相互影响。195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这个材料。

二

陈云、彭真、李富春、陈伯达、田家英[1]诸同志阅，并留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彭、董[2]诸同志阅后，退江青。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浪淘沙·北戴河[1]

（1954年夏）

大雨落幽燕[2]，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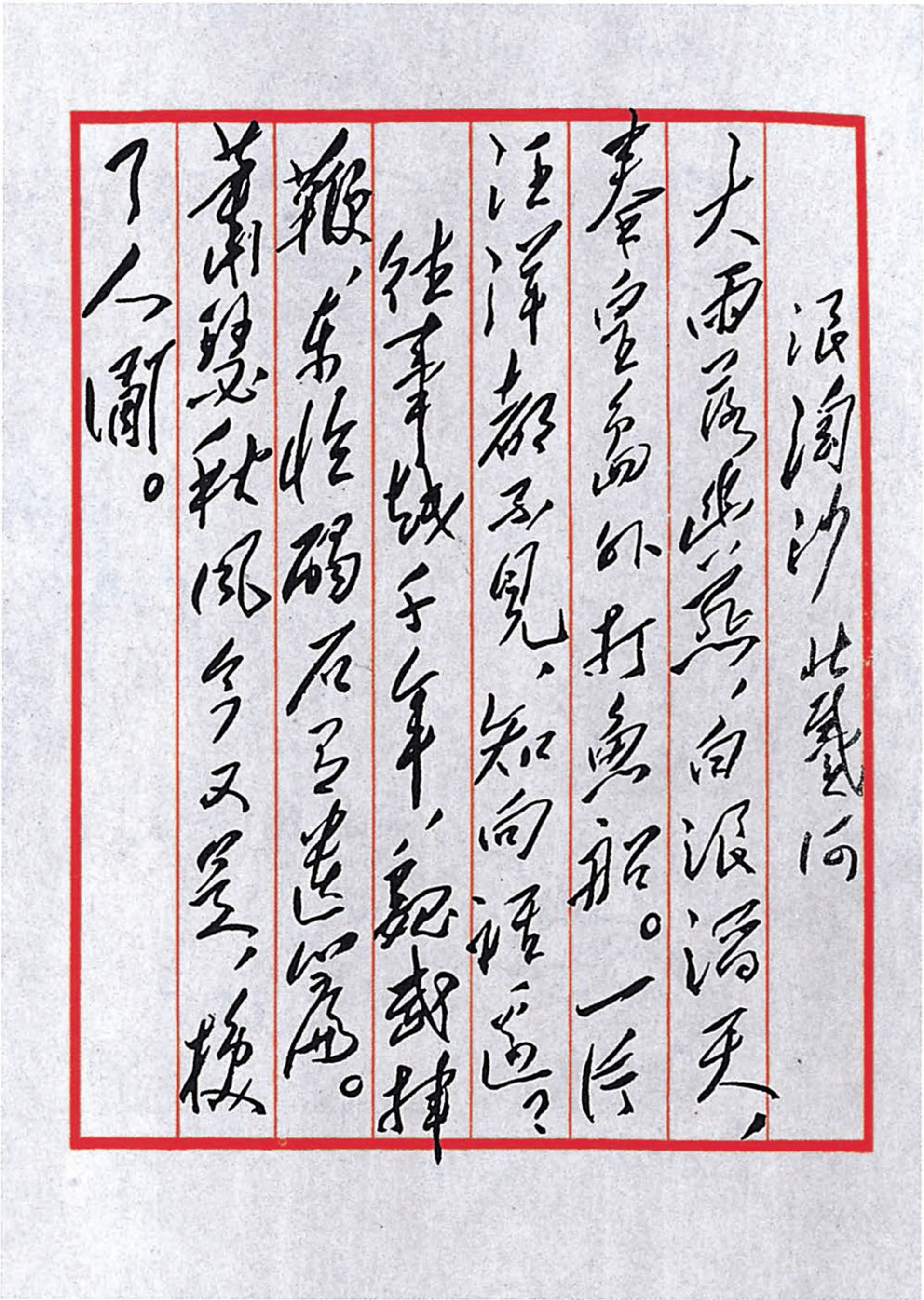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3]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

[1] 北戴河，在河北省东北部渤海边港口秦皇岛西，是著名夏季休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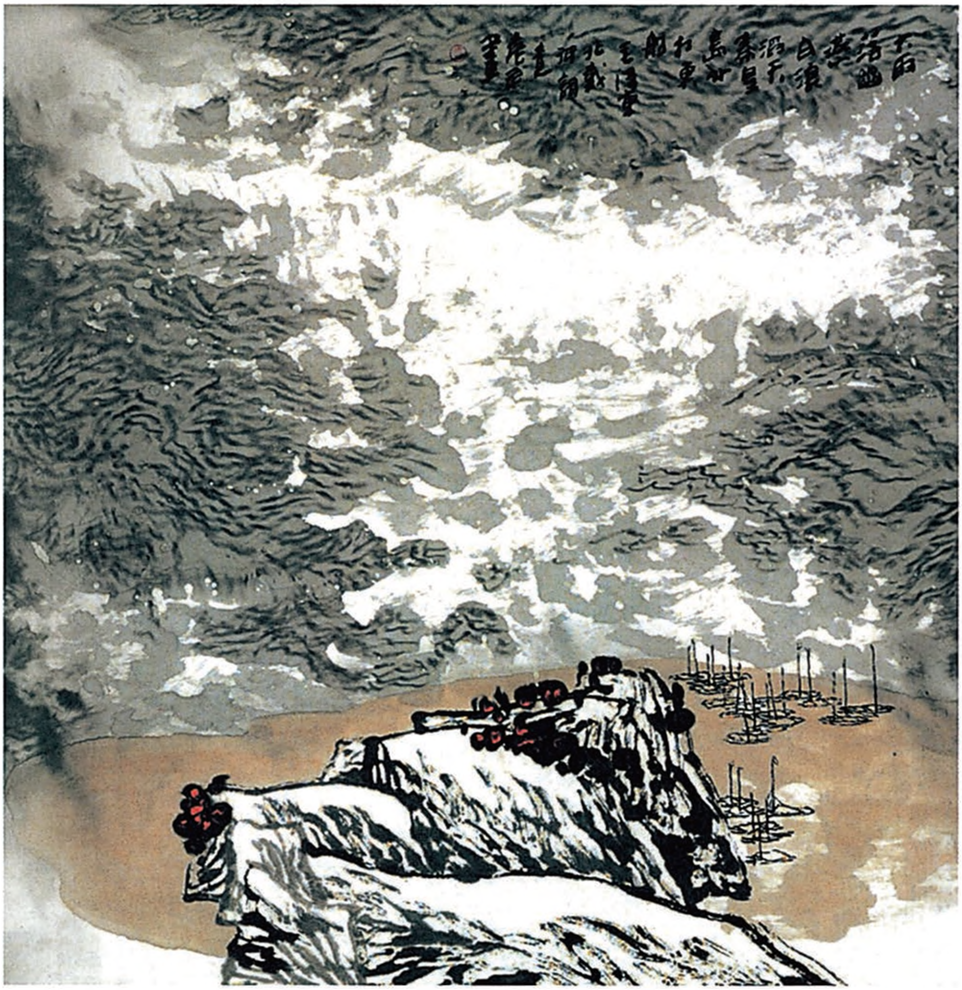
[2] 幽燕，泛指河北省。我国古代的幽州和燕国，都在今河北省北部一带。

[3]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公元207年（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曹操（后被尊称魏武帝）和乌桓族作战凯旋，曾经路过这一带。曹操的《步出夏门行》诗中有《观沧海》一章：“东临碣石（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碣石在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西距山海关约30里），以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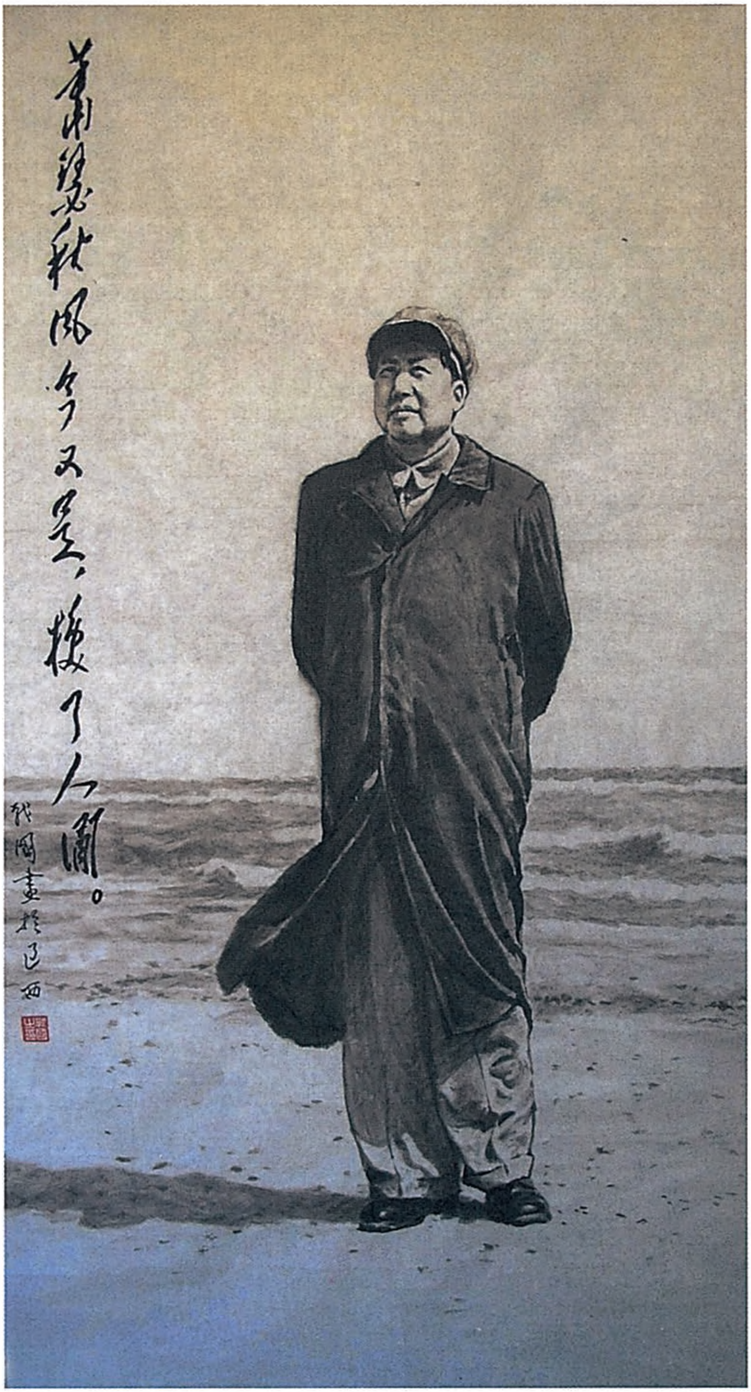


浪淘沙　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
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
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
了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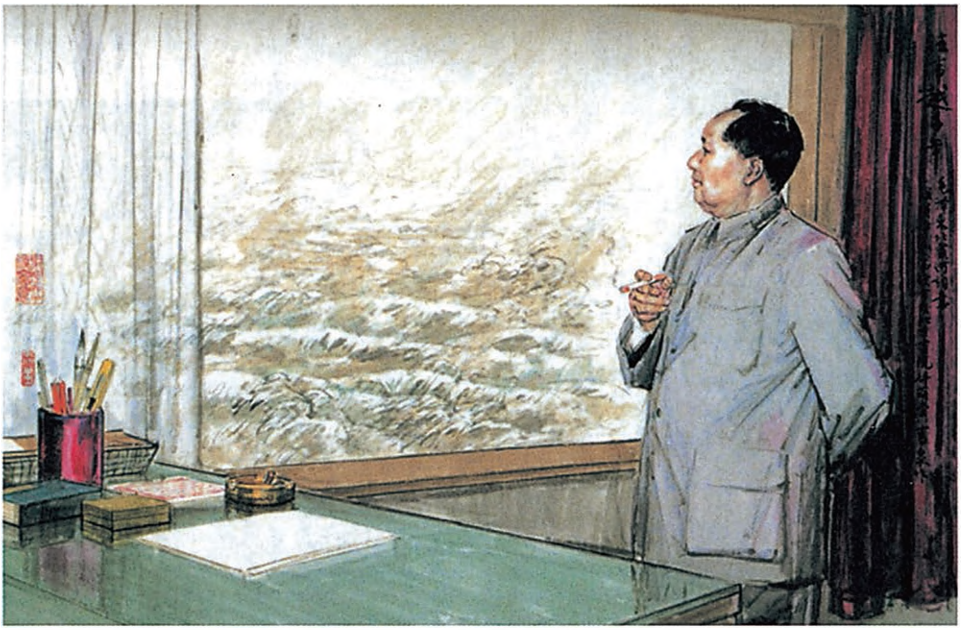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浪淘沙·北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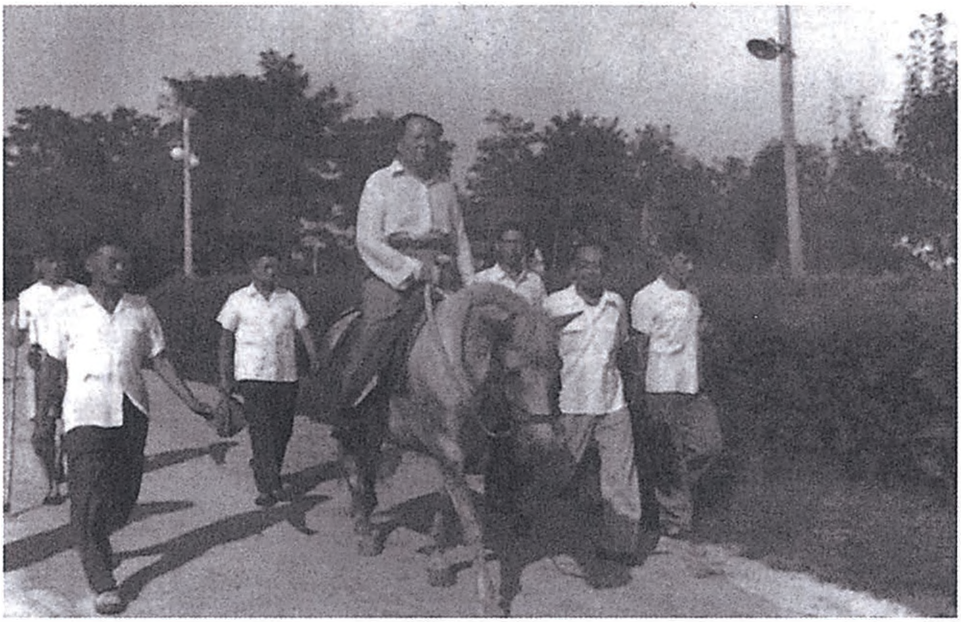
《北戴河》（诗意画）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钱刚画于己酉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中国画）



《北戴河》（诗意画）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散步时和刘少奇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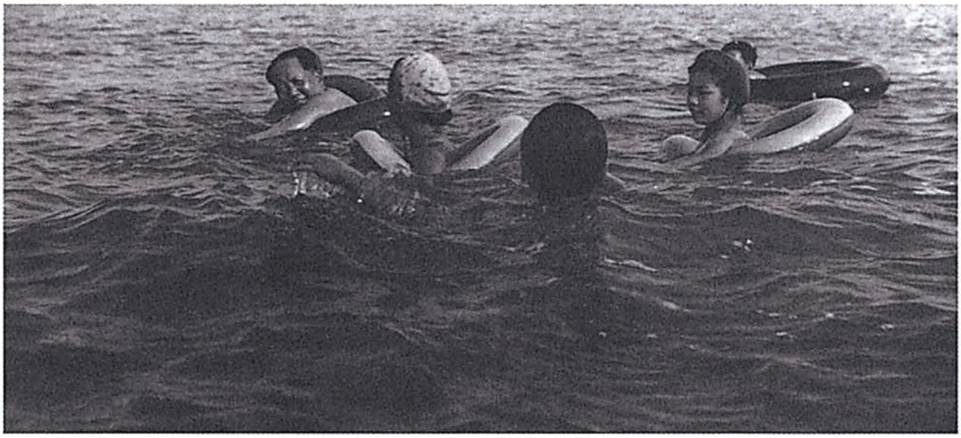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

1954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北戴河海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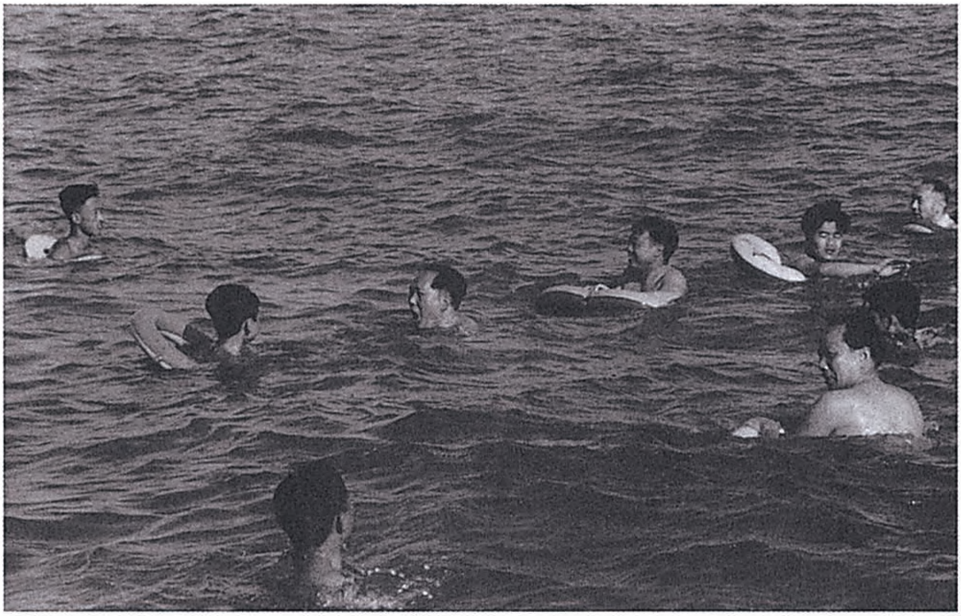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和李敏、刘松林等在在北戴河海滨。

1954年，毛泽东和李讷、毛远新等在北戴河。

1954年，毛泽东和李敏、李纳等在北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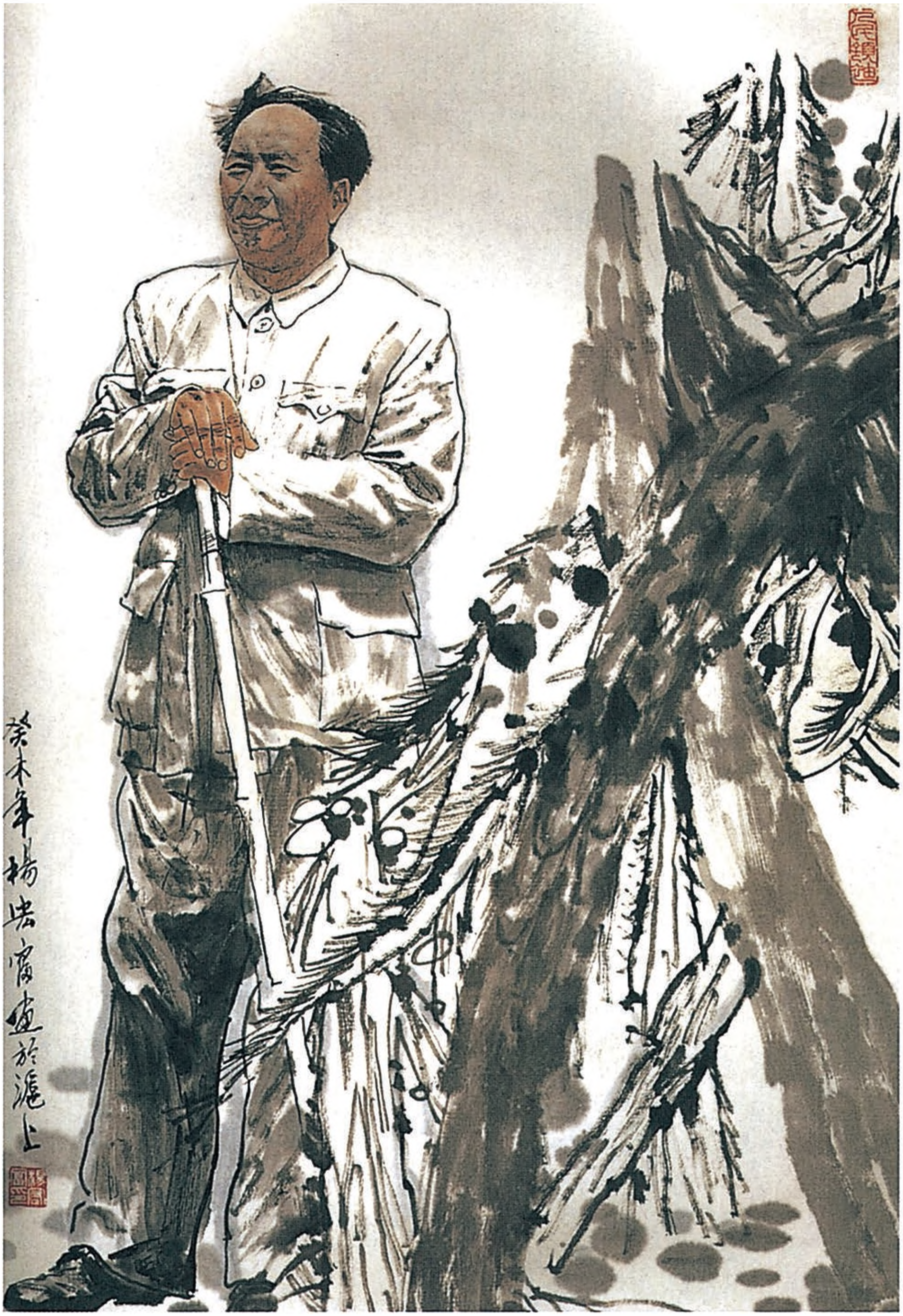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和孩子们在风浪很大的北戴河游泳。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游泳。

1954年，毛泽东和陈云在北戴河。



《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国画）

给三二〇厂全体职工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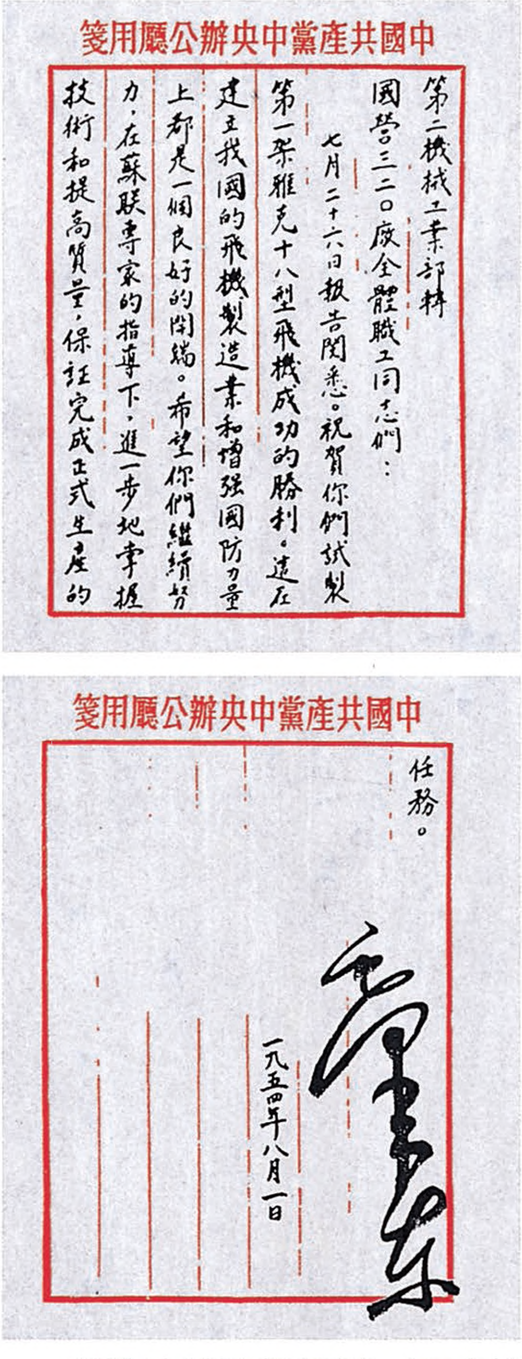
（1954年8月1日）

国营三二〇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七月二十六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用箋

第二機械工業部轉

國營三二〇廠全體職工同志們：

七月二十六日報告閱悉。祝賀你們試製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飛機成功的勝利。這在建立我國的飛機製造業和增強國防力量上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希望你們繼續努力，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進一步地掌握技術和提高質量，保証完成正式生產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用箋

任務。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

毛泽东致电祝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试制成功。

关于部队中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批语[1]

（1954年8月3日）

少奇同志：

此件[2]似应在中央会议讨论作出决定[3]。

毛泽东

八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1954年7月28日报告上写给刘少奇的批语。

[2] 指彭德怀的报告。报告说：最近部队中存在几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自三反运动以后，在一部分高级干部中，仍滋长着若干个人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二）1954年上半年，发生两件最严重的失密事件。（三）兵员太老，全军现80%的兵，都是参军3年以上的老兵。（四）下层干部的结婚限制，再不宜继续下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1954年8月27日会议决定：（一）关于在一部分干部中滋长着若干个享乐、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和严重的失密事件，必须开展适当的斗争和严格执行纪律，由军委在1954年冬或1955年春召开一次解放军全军党代表会议，提出讨论并做出决定。（二）关于兵员问题和下级干部的婚姻问题，待中央讨论兵役法时再行讨论。

关于不要通过给毛泽东以最高荣誉勋章提案的批语[1]

（1954年8月6日）

邓小平[2]同志：

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提案。

毛泽东

八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4年8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上。电报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给予毛主席以最高荣誉勋章的提案，该大会是否可以通过此提案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请速指示。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

关于揭露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

（1954年8月6日）

周总理阅。你的报告[1]和各党派联合声明[2]，均应就此问题[3]加以批评。

毛泽东

八月六日

---

[1] 指周恩来准备在1954年8月11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的外交工作报告。报告介绍了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举行的日内瓦国际会议的情况，阐述了我国的外交政策。这个报告后来在1954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这个宣言在1954年8月22日召开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扩大会议上通过，并于1954年8月2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3] 指美国拉拢英国、法国及西太平洋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某些国家组织所谓“东南亚防御集团”。

关于加强对蒋军作战政治工作指示稿的批语[1]

（1954年8月10日）

少奇同志：

此件[2]请连同军委作战计划一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

毛泽东
八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4年8月5日关于加强对蒋军作战政治工作指示稿上写给刘少奇的批语。

[2] 指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指示稿。指示稿说：近来美国公然叫嚣要与蒋介石残余匪帮订立“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全军必须警惕地严重地注视这一问题，必须认识到收复台湾是全国人民，特别是我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任务。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我军政治工作必须：（一）在全军广泛深入地进行准备收复台湾的政治动员。（二）加强沿海部队的政治工作，保证沿海部队对敌作战的胜利。（三）加强沿海城市、基地防空的政治工作。（四）开展对蒋军的强大政治攻势，结合军事斗争、瓦解和歼灭敌人。（五）加强部队外交政策和国际法规的教育。（六）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应加强对海防、边防部队的领导。

海空军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1]

（1954年8月11日）

我谈一点解放台湾的问题。我们和苏联不同，苏联建国以后，几十年没有国内战争。我们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有过朝鲜战争，现在还有个台湾战争。解放台湾，这件事好不好？要说好，天天要打仗；要说不好，但总比不打好。战争可以锻炼军队，可以提高人民的觉悟，可以加强团结。当然，这个方针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它是早已就提出过了。现在把它提出来，是为了强调它。从前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讲过边打边建。现在是不是就只建不打了呢？应当说，还是边打边建，在现在更应该是建。这个方针是不是要在报纸上提出？我看可以不必了。

解放台湾的时间也不会很短。今年是台湾脱离祖国的六十年，如果今年能够收复了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够，就再加上一年，加上一年还不行，就再加上一年。边打边建的方针对于我们并不是不利，它对我们的军队、国内的人民和各阶级的团结都有好处。我们能不能解放台湾？是不是就那么不得了？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蒋介石。蒋介石有两种，一种是过去在南京大陆上的蒋介石，一种是在水里的蒋介石。过去在没有水的地方打仗，我们有经验，但是在水里打仗的经验就缺乏了。蒋介石是钻在水里的敌人。因此，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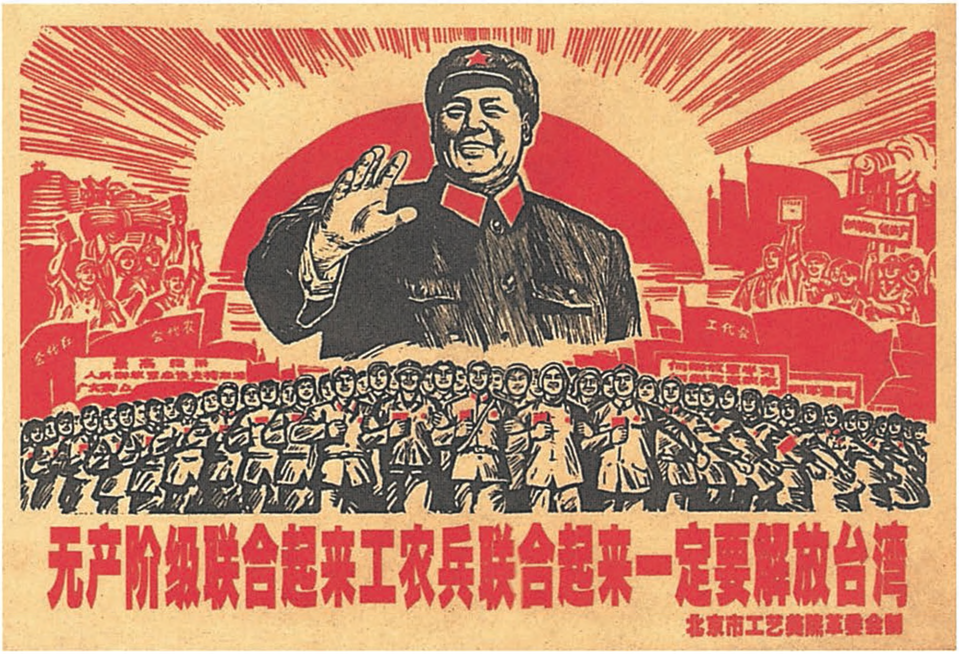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不应该轻视现在的蒋介石，说蒋介石算什么！可是蒋介石钻在水里就是不上来，假使他上来了，事情也就好办一点。因此，我们要搞海军、空军。台湾能不能收复？我想是能够收复的。海、空两军搞强大起来了，就能够收复台湾。这里面有军事工作、外交工作、宣传工作、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主要是讲团结，特别是沿海各省的团结。宣传也是件很大的工作，各民主党派都要做。同时，收复台湾也是个经济工作，如修建铁路。现在福建的经济和对国外的通商，因为有蒋介石，是个很大的障碍。这次政府委员会开会以后，还要召开一个政协全委常委扩大会议，有各大城市的人参加。在那个会上要通过一个联合宣言[1]。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很复杂的，它包括有军事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等，是个艰巨的工作。最后我们估计是可以收复台湾的，因为台湾是我们的，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最孤立的。

---

[1] 1954年8月20日至22日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工代会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工农兵联合起来一定要解放台湾
北京市工艺美院革委会制

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工农兵联合起来一定要解放台湾（宣传画）

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

（1954年8月13日）

---

[1] 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并附来了负责《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英国劳伦斯出版社负责人摩里斯·柯恩佛斯给他的信，信中说明了需要删节的理由。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替中央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本篇一、二、三就是毛泽东对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的批语，其中一写在中宣部1954年5月11日给中央的报告上，二写在随中宣部报告附送的波立特1954年3月29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上，三写在中宣部替中央起草的给波立特的复信稿上。8月，由中联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头两节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泽东选集》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困难问题，可以采取下列的办法解决：出版能在美国发行的选集，某些文章或演说如被美国反动法律禁止出版时，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但是《毛泽东选集》的美国版的目录事先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这封复信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本篇四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1954年8月13日关于复波立特信稿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一

陆定一同志：

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二

这样提问题[1]似不妥当。

三

这样答复[2]，似不妥。

---

[1] 指波立特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所说的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英译本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头两节的理由：“我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节，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节也不符合1951年2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先替中央拟的复波立特的信。信中同意波立特来信提出的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的提议。

四

刘、朱、陈、小平[1]、陆定一同志阅，退王稼祥同志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关于攻击上下大陈岛时机问题的批语[1]

（1954年8月21日）

刘、周、陈、邓[2]阅后，送彭德怀、黄克诚[3]同志：

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舰美机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

毛泽东
八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军委防空司令部1954年8月20日关于大陈岛地区美国空军活动情况及我机起飞情况给总参谋部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当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黄克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8月21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罗查同志：

值此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罗马尼亚人民和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十年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已获得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使罗马尼亚人民获得日益繁荣幸福的生活，并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

中国人民谨祝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

1954年8月2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在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8月，毛泽东和电影艺术家舒秀文、著名桂剧演员尹羲等在一起交谈。

1954年8月，毛泽东和许广平等在一起。

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

（1954年8月24日）

中国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欢迎你们来访问，把你们当自己的朋友看待。请你们在这里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吧。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

我们彼此一定还有很多的不了解。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过去日本统治过中国，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对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国又代替了日本，帮助蒋介石欺负我们。在这两个阶段，英国都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过去是日本人的问题，现在是美国人的问题。我们同美国之间也有一个洋，叫太平洋，可是太平洋不太平。有些问题我们不了解。例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一个条约[1]，声明说是为了反对

---

[1] 指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1951年9月1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的《美澳新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1952年4月29日生效，并无限期有效。主要内容是：缔约国将单独地和共同地采取自助和互助方式保持和发展单独和集体的军事能力；缔约国任何一国受到“威胁”时应进行协商，受到“武装进攻”时应采取共同行动。

共产党，说我们要侵略澳大利亚，因此有必要同美国和新西兰一起签订这个条约，一齐反共。反共的声浪在世界相当高哩，特别在前一个时期。据说，中国人犯了大罪，主要的是把一个很好的人叫蒋介石给赶走了，这个人好极了，他有完全的道德和全部的真理。我们就做了这一件“坏事”。我读过比万[1]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逻辑，说中国人自己侵略了自己。

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并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美国说我们犯了大罪，现在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结。关于蒋介石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两种议论。在美国看来，蒋介石比我们好。你们的看法不同些，因为你们早已不承认蒋介石了，所以我说

---

[1] 比万，英国工党领袖，当时是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成员，毛泽东会见时在场。

和你们没有根本分歧。我们彼此在日本问题上也没有根本分歧，因为对日本问题，英国今天管不了了。因此我们看见你们觉得很高兴。

我有点意见想谈一下。所谓反共，这事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

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能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我们之间首先就不会打仗。何必打仗呢？我们不仅不会和工党开仗，也不会和保守党开仗。

你们问，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

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你们赞成吗？如果赞成，就让我们订一个条约，当然不是今天下午订，订个几十年不打仗的条约。谁要打仗，就反对他。我们没有别的本钱，只有一桩，就是老百姓。人多，地大，是我们的两桩本钱。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我认为，英国工党朋友们对苏联的了解是不恰当的。英国是个大国，苏联也是大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不搞好，世界和平就成问题。问题不在于中国应和苏联离开，而是英国应该和苏联靠拢。我劝你们和苏联靠拢，这是我们的建议。为什么你们这样不喜欢苏联呢？

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观点不要一成不变，情况就可以改善。怎么样？再说一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国人彼此对骂得很厉害。我想，反对中国的不是美国多数人，而只是少数人。东南亚条约[1]，美国为什么不要中国参加？我们要

---

[1] 东南亚条约，全称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是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于1954年9月8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

参加，他们却不要我们。中国、苏联、英国、美国、法国都参加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1]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

一、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

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

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让我们大家统统解除武装，我们自己的几个兵也都不要了。让我们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这些亚洲和欧洲的国家倡议一下，向美国提出这个建议。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给伍如春的信

（1954年8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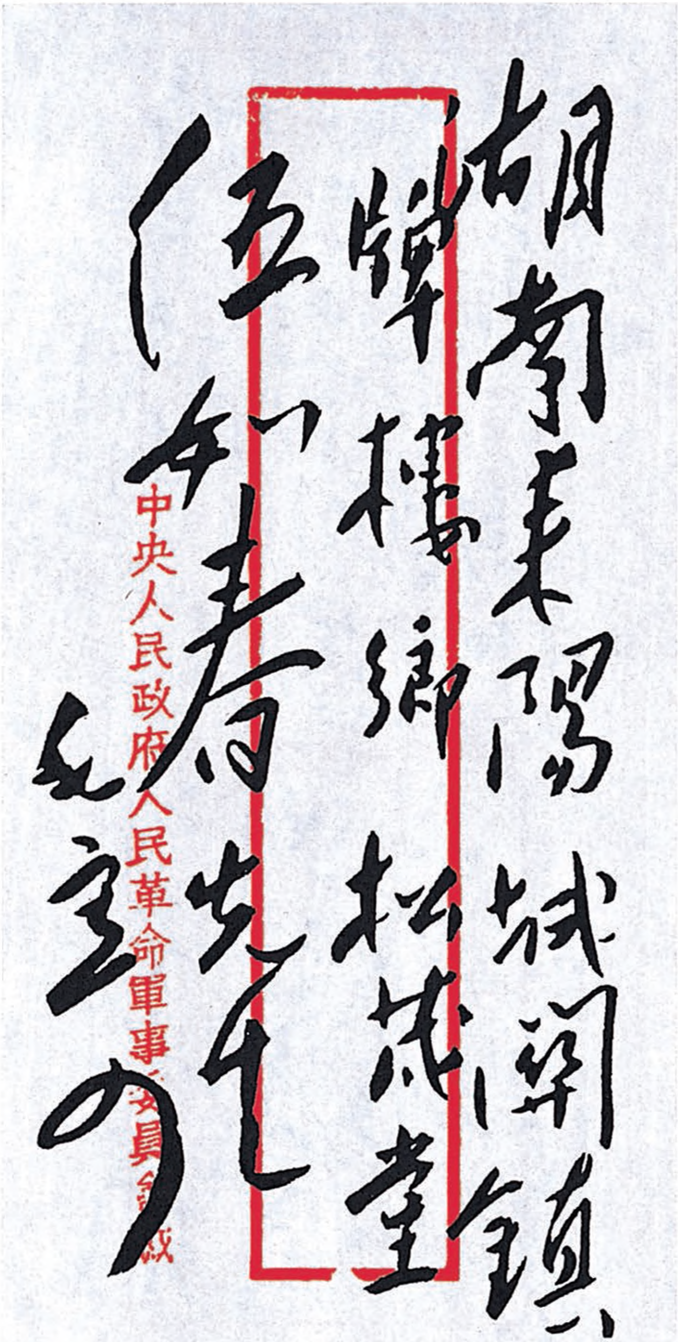
如春学兄：

惠书敬悉。困难甚念。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聊助杯水。如有急需，尚望续告。此复。

顺祝康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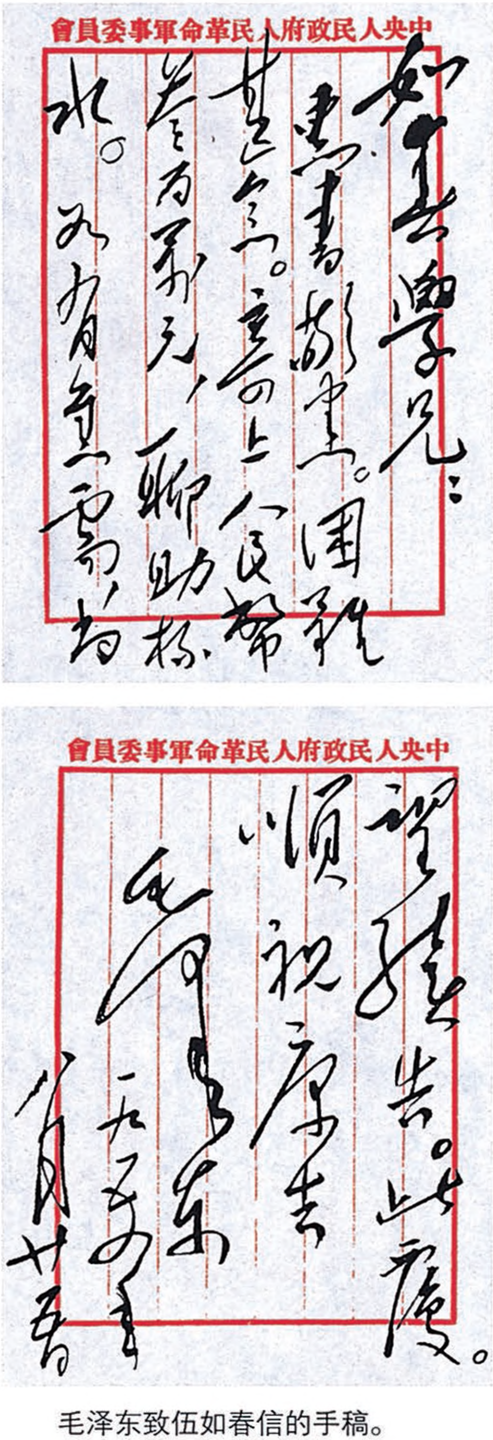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五日



湖南耒陽城關鎮
嶂樓鄉松茂堂
伍如春先生
毛澤東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緘

毛泽东致伍如春信的信封。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如春学兄：

来书敬悉。困难甚念。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聊助杯水。政府有无照顾，希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详以告。此复。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五日

毛泽东致伍如春信的手稿。

给熊子容[1]的信

（1954年8月26日）

子容兄：

七月三十日的信收到。进步甚慰。当选为人民代表，可为祝贺。工作问题，似以仍在原地为宜，易地则了解你的人可能不如原地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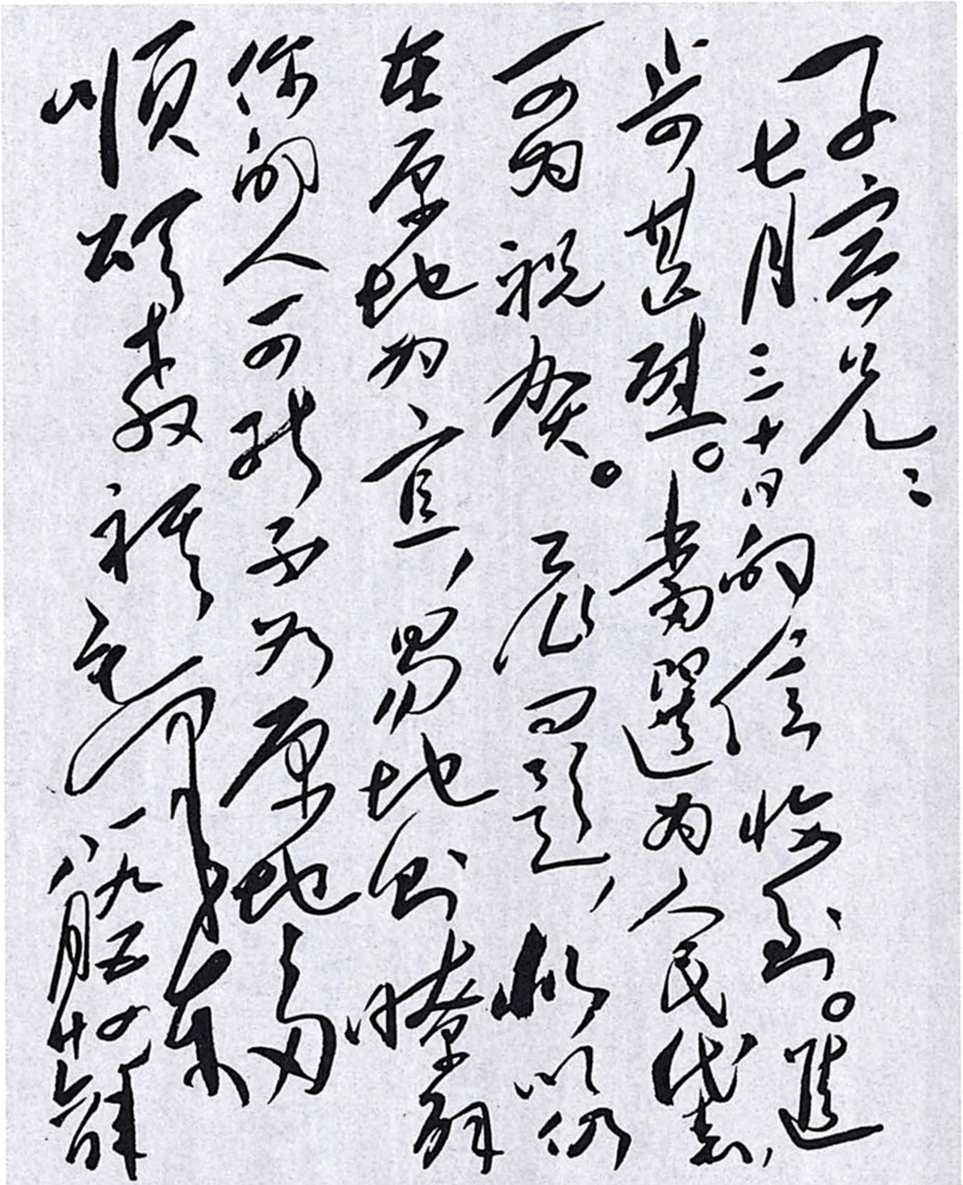
顺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廿六日

---

[1] 熊子容，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



子容兄：

七月三十日的信收到。進步甚慰。當選為人民代表，可為祝賀。我的意見，似以你在原地為宜，當地也需要你的人，可就多為原地[illegible]。順頌

教祺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八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熊子容信的手稿。

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1954年8月3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在印度支那和平已经开始恢复的时候，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极愉快的心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热烈地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庆九周年。

越南人民多年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英勇斗争已获得重大的成果。我深信：越南人民在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独立和民主的事业中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事业中越南人民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支持。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对海军党委报告的批语[1]

（1954年8月）

此件[2]很好。

刘、周、朱、陈、邓[3]同志阅。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总后方勤务部部长黄克诚1954年8月3日呈送的海军党委报告的批语。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1954年7月30日报告。报告说：我们在7月29日上午召开党委会，由苏振华同志传达毛主席关于加强对敌斗争和准备解放台湾的指示，并进行了讨论，一致认识到今后进一步加强海上斗争和解放台湾战争的长期性，进一步明确了边打边建的方针，特别是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建设海军。在展开对台湾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中正确地掌握政策，感到海军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因此，我们决定在8月9日召开一次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研究海军今后的作战任务和政治工作。毛主席指示要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建设海军，这对我们鼓励很大，同时也是艰巨的任务。拟作专门研究提出一个计划报中央、军委，以加强海上战斗力量，进一步展开海上对敌斗争。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关于高岗自杀问题给苏共中央的通报

（1954年9月1日）

苏共中央：

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通知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八月十七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作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的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是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他各方面所作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地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对于高岗自杀事，中共中央决定对外暂不公布。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将高岗及另一中共中央委员饶漱石的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行为，向中共全体党员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团员进行传达，对中国国内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

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党外干部，亦作适当的通知。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各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并以书面向苏共中央作如上的通知。

中共中央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

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九周年致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电

（1954年9月2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当此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第九周年之际，我们谨向苏联政府、苏联武装部队和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

最近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进一步地和缓了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和平力量的巨大胜利和战争力量的严重失败。

但是，美国侵略集团不甘心于它的失败，正在积极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动组织西太平洋和亚洲的战争集团，并加紧指使和帮助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以扩大对远东及世界的战争威胁。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战争政策，一定要解放台湾，以保障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维护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全。

恢复远东各国与日本之间的正常关系，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亚洲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迫切任务。中国人民愿为这一任务的实现而努力。

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是巩固远东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坚强保证。

中苏两国之间伟大的、牢不可破的、日益增进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

接受保加利亚驻华大使迪莫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2日）

大使同志：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呈递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之间兄弟般的友谊，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这不但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并加强了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

保加利亚人民在解放后的十年中，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光辉成就，鼓舞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人民的劳动热情。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和加强中保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关于允许日本记者随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的批语[1]

（1954年9月5日）

送周总理酌处。

要求派十名记者似可照办。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是否还要增加自由党代表？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秘书处1954年9月4日转报的日本社会党外交局长佐多忠隆1954年8月23日给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来信上。佐多忠隆在信中说：日本社会党的代表已经到达了可以访问贵国的阶段，这是非常值得欢喜的。近来我党得到了舆论的支持，其中特别是与新闻报道有关的人员，均积极主张打开中日两国外交为当前的急务，并表明愿借我党访问贵国的机会也派遣其本身具有代表性的新闻记者一同前往的强烈希望。我们虽然知道若将希望者全部派去诚有困难，但至少也希望能允许派去约十名记者，在我党代表访问贵国时同时前往。

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9月7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奥尔基·达米扬诺夫同志：

值此保加利亚解放十周年之际，我谨向您并通过您向保加利亚人民和政府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教导，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光辉的成就。这不仅鼓舞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而且增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九月七日北京

关于通知周恩来等准备讨论宪法报告的便信

（1954年9月9日）

高智[1]用电话通知：请周、朱、陈、小平[2]四位同志，今日下午五时以前及下午七时以后，看少奇同志宪法报告的头两章[3]，以便晚上十一时左右，和少奇、伯达[4]一起，到我处谈一下这两章中的有些问题。

毛泽东

九月九日上午二时

---

[1]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他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3] 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的第一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第二章是“关于宪法草案基本内容的若干说明”。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54年9月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经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图为委员们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9月）

一

此件送陈伯达[1]同志阅后，送交刘少奇同志：

又作了一些修改[2]，请阅酌。拟于晚上谈一下。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上午四时

二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2] 毛泽东从1954年9月7日至15日对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稿作过多次修改，其中比较完整的见本篇收入的6段文字。

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袁世凯领导的反动派篡夺了国家权力。

三

在过去相继统治中国的几个反动政府中，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是最后的一个反动政府，它是从来不要宪法的。但当它垂死的时候，也想用一个伪宪来救自己的命。这个伪宪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结果和过去的反动政府一样，在蒋介石公布他的伪宪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他的统治就彻底垮台了。同时，拥护这个伪宪的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反革命党派也受到了人民的唾弃。这件事，在座的各位代表都是清楚地记得的。

四

现在美国帝国主义还侵占着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还盘踞在台湾继续作恶，并且时刻企图回到大陆上来。反动派的复辟仍然是一个实际的危险。如果有人看轻这种危险，那就要犯错误。

五

在我国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作用。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较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

六

帝国主义者和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非常不喜欢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他们每天都在攻击我们。这有什么奇怪呢？原来我们是做对了。

有些外国资产阶级报纸失望地发现，在我们的宪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过的道路”。是的，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苏联的道路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而为人类社会必然要走的道路。要想避开这条路不走是不可能的。我们一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的真理。

为了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狡猾的敌人还特别雇用了一些人，如像托洛茨基陈独秀分子，他们装成“左”的面孔，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具体步骤和具体措施。他们说，我们做得“太不彻底”“太妥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想用这些胡说混淆人们的视听。他们要我们破裂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立即剥夺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又嫌我们的农业政策“太慢了”，他们要我们破裂同农民的联盟。这些难道不是完全的胡说吗？我们如果照这样作，当然只有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最为高兴。

七

我们的国家所以能够关心到每一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当然是由我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来决定的。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我国人民这样广泛的个人自由。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接受瑞士驻华公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13日）

公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所递交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国书，并对您所转达的瑞士联邦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及我个人的祝贺表示感谢。

五年来，中、瑞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已经有了增进。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受到了瑞士政府和人民的款待和协助，我借此机会表示谢意。今后中、瑞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将更加增进，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而且亦有助于世界和平的巩固。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瑞士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公使，在您为加强中、瑞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阁下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并祝贵国人民幸福及元首健康。

接受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斯蒂·纳赛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13日）

大使同志：

我非常愉快地接受您所呈递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它具有光荣的革命的历史传统。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后十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满怀信心地建设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并取得了光辉的成就。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祖国的独立和安全的斗争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无比的劳动热情，使中国人民感到钦佩。

中、阿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友好的外交关系。五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已结成了兄弟般的友谊。我深信：在互派大使之后，我们两国之间的真诚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不但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幸福的增进，并有助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中、阿两国友好合作

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1]

（1954年9月14日）

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1]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2]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3]。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4]，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5]，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7]，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2] 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3] 参见《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4] 参见《春秋·鲁宣公十五年》，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94年。

[5] 参见《论语·颜渊》。

[6] 参见《诗经·小雅·北山》。

[7]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200万年。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1]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2]。当时程潜[3]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

---

[1] 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指1898年（戊戌年）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3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6人，变法遭到失败。

[2] 指当时通用的银元。

[3] 程潜，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昌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协是不对的[1]。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2]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3]。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

---

[1]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合，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

[2] 董仲舒（公元前197—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思想家，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3] 参见《汉书·金日磾传》。

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以上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意见，是否妥当，请诸位考虑。

对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的批语[1]

（1954年9月14日）

照发[2]。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954年9月14日关于同意福建军区再次炮击金门计划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电报的批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1954年9月14日呈送的作战计划说：9月3日以来，我们在炮击金门和对空作战中已取得了重大战果，为报复敌海空轰炸，根据华东军区电示精神，我们同意三十一军在本月20日前后，选择有利目标对大小金门组织第二次集中炮击。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1]

（1954年9月15日）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一千二百二十六人，报到的代表一千二百十一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十五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七十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一千一百四十一人，合于法定人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

---

[1]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等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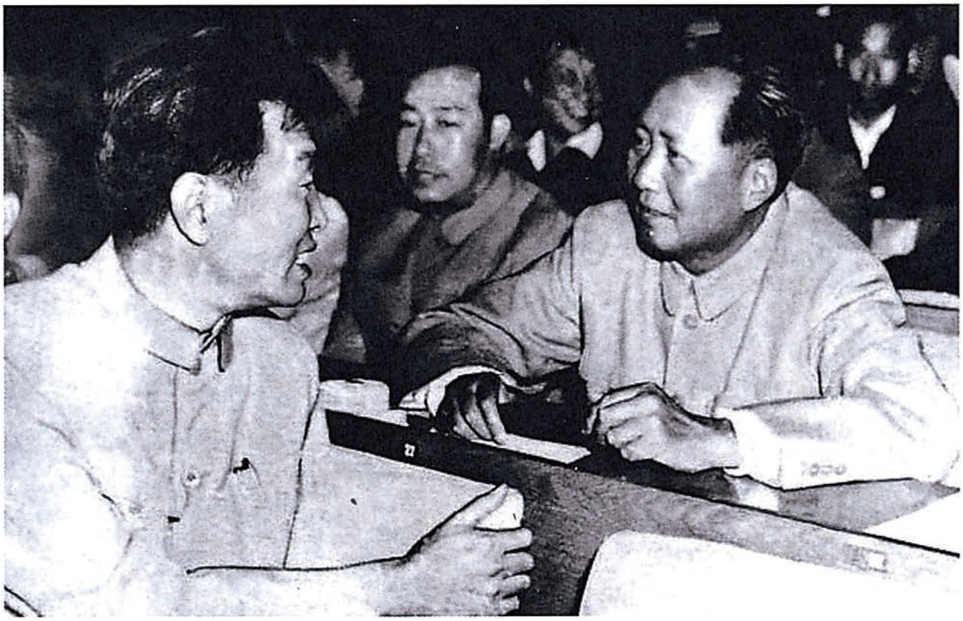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图为步入会场的代表。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

1954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填写选票。

1954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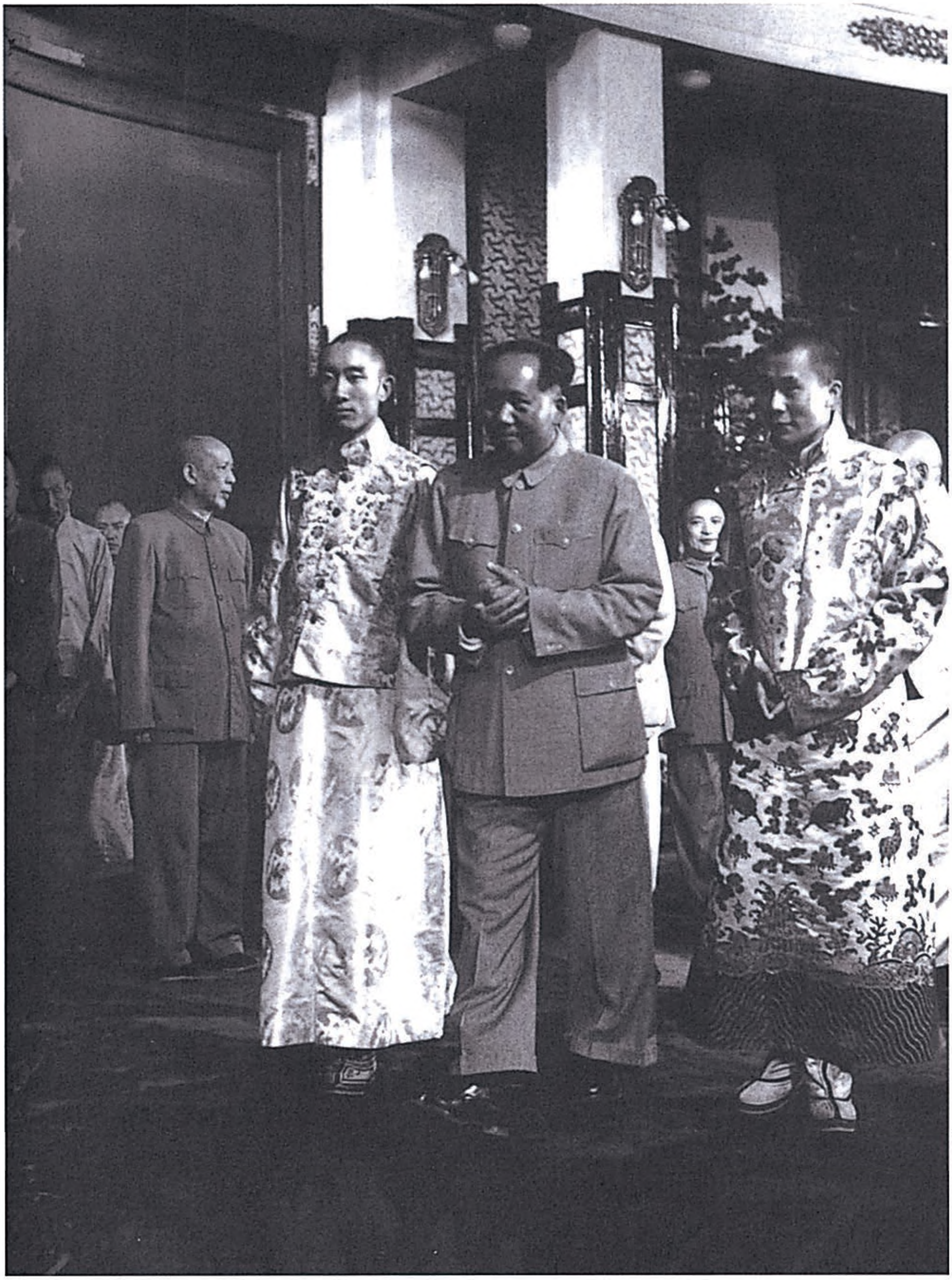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全场起立鼓掌。



1954年9月19日，毛泽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亲切交谈。

1954年9月20日，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和全体代表起立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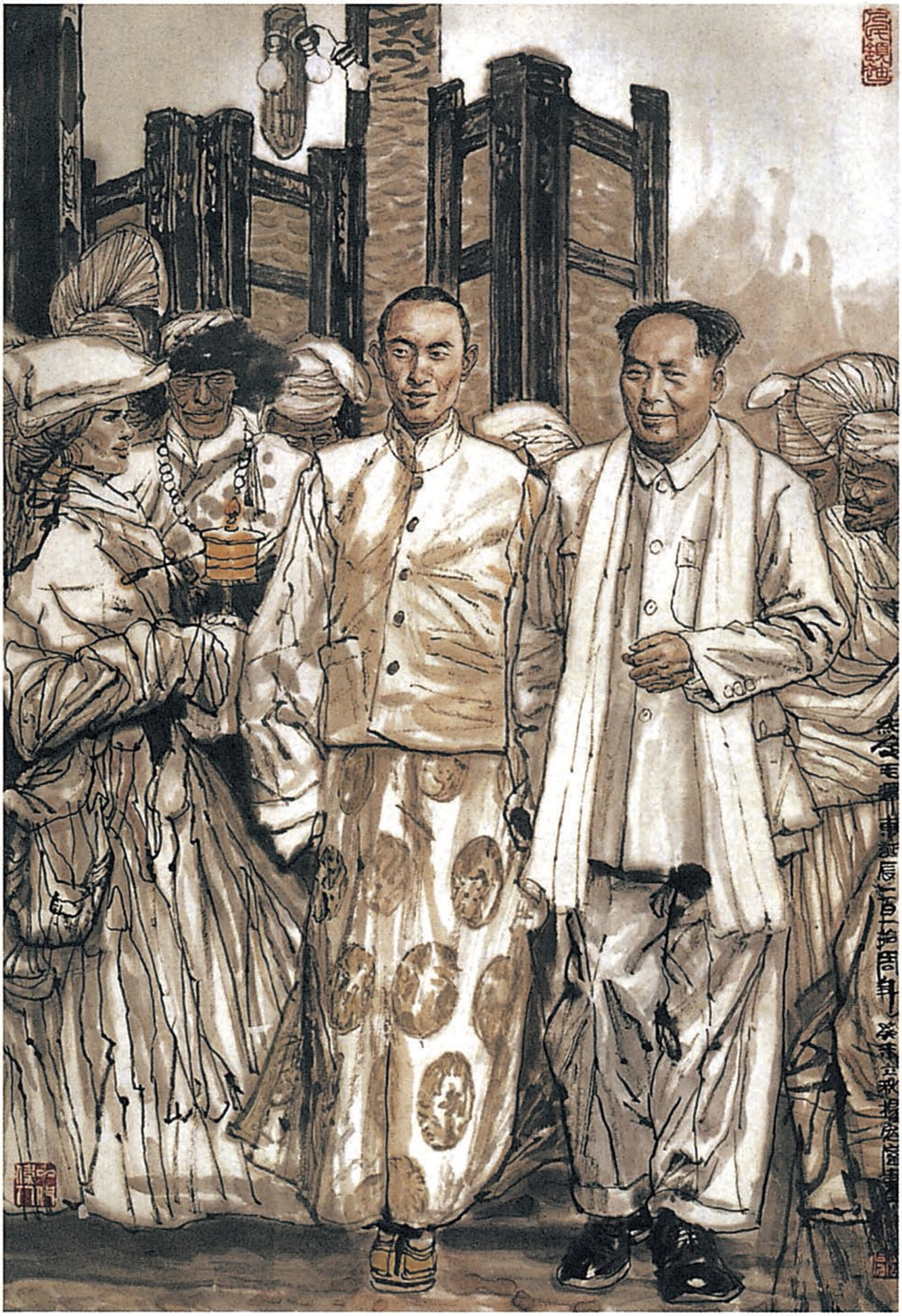
195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和代表谈话。



1954年9月21日，毛泽东接见出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西藏自治区代表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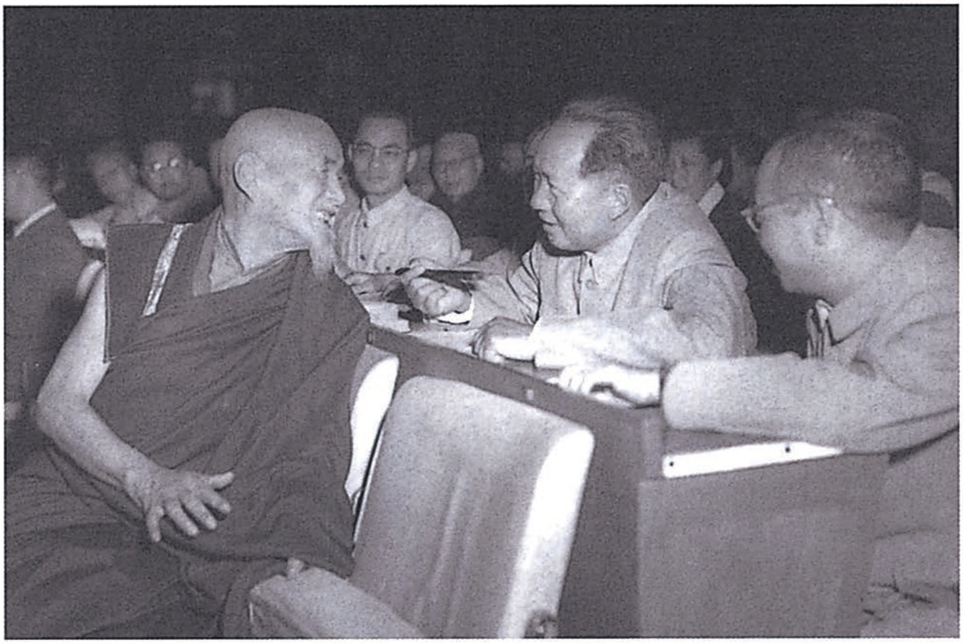
1954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西藏自治区出席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1954年9月，毛泽东和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宴会上。


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与班禅在一起》（中国画）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和少数民族代表交谈。



1954年9月，毛泽东和佛教协会代理会长喜饶嘉措交谈。

1954年9月，毛泽东接见喜饶嘉措等少数民族来京带表。

1954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在中南海紫光阁。

1954年9月，朱德、毛泽东、陈云、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中南海。

1954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人大会议上和工业劳动模范王崇伦、农业劳动模范李友秀交谈。

1954年9月，毛泽东接见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四书记赛福鼎·艾则孜。

1954年9月，毛泽东和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们在一起。

1954年9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宋庆龄等和与会代表合影。

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图为1954年的毛泽东。

关于修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给胡乔木[1]的信

（1954年9月19日）

胡乔木同志：

此件[2]看了一遍。有些觉得不妥处作了记号，有些处改了几个字，请你斟酌。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下午八时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指周恩来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接受匈牙利驻华大使希克拉丹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4年9月22日）

大使同志：

我很愉快地接受您所呈递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衷心地感谢您的祝贺。

九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下，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根本改变了自己国家的面貌。中国人民怀着欢欣与赞佩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匈牙利人民在国家建设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

五年以来，中匈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亲密合作已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这种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不但将进一步增进中匈两国的繁荣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且将加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进一步发展并巩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在国庆五周年酒会上的祝词[1]

（1954年9月29日）

周总理：

刚才我说的几句话如下，如发表，请照此文句。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中国！
对于各位朋友带来的友谊，我们表示感谢！
祝贺各位朋友身体健康！
祝贺我们相互间的友谊更加增进！
祝贺世界和平更加巩固！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1954年9月29日晚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应邀来我国参加国庆活动的各国外宾。毛泽东参加了这次酒会并在会上致词祝贺。

1954年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纪念活动。图为毛泽东在欢迎赫鲁晓夫的到来。

1954年9月30日，首都各界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图为毛泽东等和应邀参加庆典的各国政府代表团在主席台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的群众答礼。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布尔加宁、朱德、金日成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金日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祝大会上。

1954年，毛泽东在北京。

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电报

（1954年10月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敬爱的总统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爱好和平的全德人民和您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您的领导下，在伟大苏联的真诚援助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方面，都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五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团结着德意志人民中一切进步爱国力量，为了争取一个统一、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和保障世界和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赢得了欧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这些成就和努力，鼓舞了所有爱好和平的德意志人民，并增强了他们为和平统一德国的斗争信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在经济上、文化上的密切合作正在越来越发展。德意志人民为争取建立统一、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德国而进行的正义事业，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同情。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我国总

理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会谈公报，表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在伟大和平事业中的互相关怀和支持。

总统同志，祝您在领导德意志人民为实现自己祖国的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并祝您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

关于总参等部的称谓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批语

（1954年10月8日）

退彭德怀[1]同志。中央书记处已批准照此[2]办理。

毛泽东

十月八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2] 指彭德怀1954年10月6日关于军委直属的总参等部的称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军委直属之总参、总政、总干、总后等部原隶属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现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已经撤销，而国防委员会则为咨询机关性质，军委系党的组织，许多问题不能公开署名。如隶属于国防部，则成为政府系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均不得兼职。为此昨与伯承、贺龙、荣桓、荣臻、剑英诸同志共同考虑，拟均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等等，请予批准。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参观解放军通信装备展。

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有问题给周恩来的信

（1954年10月11日）

周总理：

（一）关于修筑新疆铁路及四个公司归中国独有等事[1]，请你于今日抽一时间（或要小平[2]）告诉赛福鼎[3]同志一声（他事也可告知一些）。

（二）各文件[4]及消息发表时，要写社论[5]一篇，在同日或第二日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指中苏两国政府将于1954年10月12日签订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的联合公报和将新疆省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等4个公司的苏联股份移交中国的联合公报等事。这天签订的《中苏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规定：在中国境内的铁路，将由中国政府负责修建，苏联给予技术援助。同日签订的《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规定：新疆省开采有

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省开采和提炼石油公司、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公司、组织和经营民用航空路线公司将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苏联股份的价值将用中国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数年内偿还。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4]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中苏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的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这些文件均发表于195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5] 1954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比深厚的伟大友谊》的社论。

答谢苏联赠送机器设备和提供技术帮助的两封信

（1954年10月12日）

一

亲爱的赫鲁晓夫[1]同志并苏联政府代表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候，苏联政府代表团代表苏联人民赠给中国人民以组织拥有两万公顷播种面积的国营谷物农场所必需的机器和设备。在组织国营谷物农场时期和熟悉农场生产的第一年，苏联政府为了在建设和管理国营谷物农场方面给中国以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帮助，准备派遣一批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充任顾问，使领导这个国营谷物农场的中国工作人员能够同苏联专家一起在最短期间内掌握技术和大型谷物农场的管理方法。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和人民这一重要的、巨大的、友谊的援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无疑地，这个国营谷物农场不仅在推动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会起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也会帮助中国训练农业生产方面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正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的技术人才和学习苏联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宝贵经验。中国人民从苏联人民这次慷慨的援助中再一次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深厚友谊和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的关怀和支援。

伟大的中苏兄弟友谊万岁!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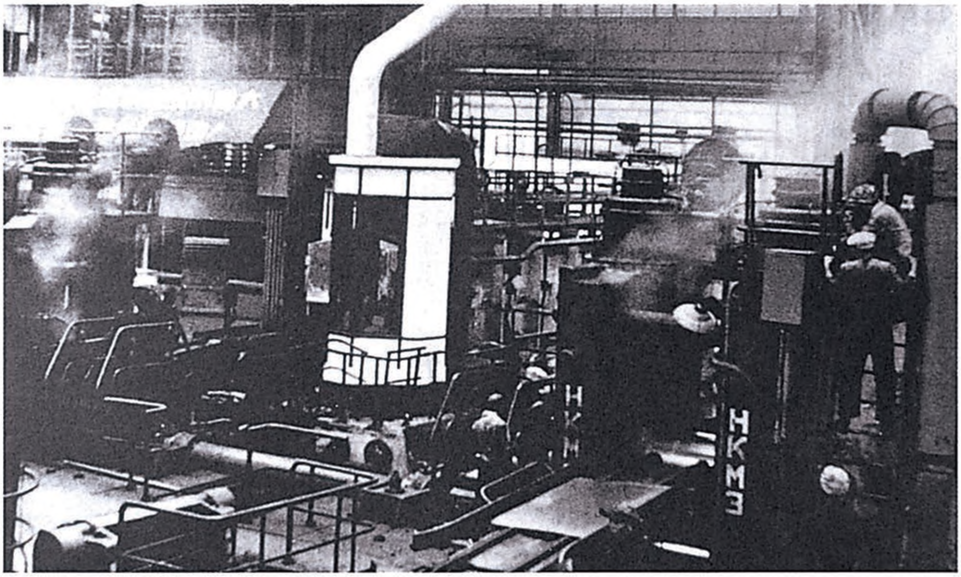
二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并苏联政府代表团:

苏联政府代表团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来信敬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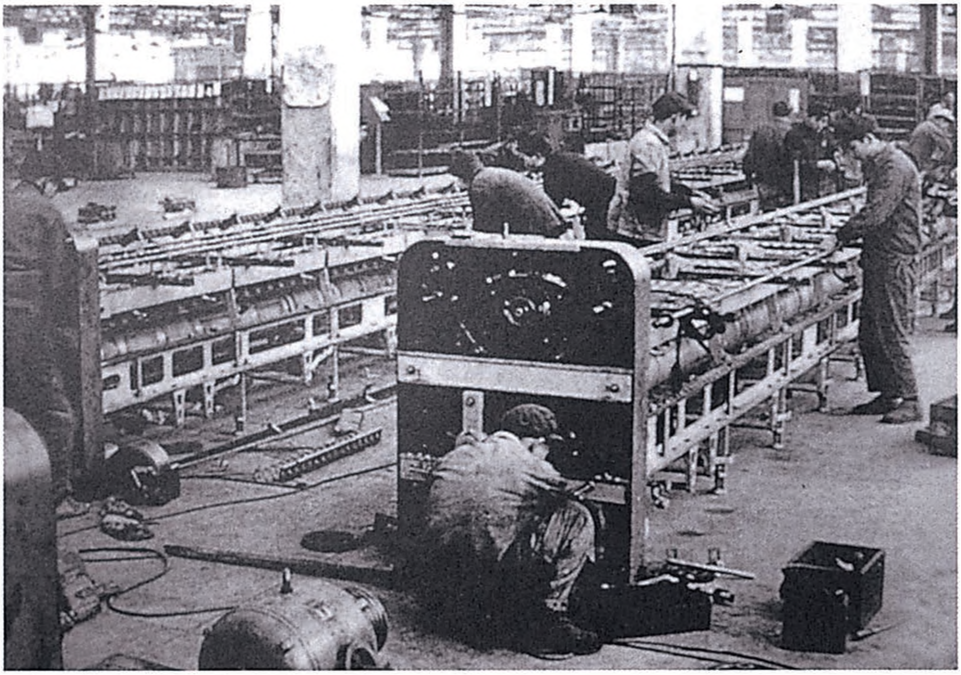
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将现在北京举行的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机床和农业机器等八十三件展品赠给我国，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向苏联政府致以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将把这次慷慨的赠礼看作是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亲密友谊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于北京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决定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帮助中国建设许多大的工厂。图为中国第一座机械化、自动化薄板厂于1954年在鞍钢建成投产。

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纺织机械制造厂——国营经纬纺织制造厂于1954年8月1日投产。



1954年，建设中的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关于安排叶恭绰、朱蕴山[1]参加政协工作的批语

（1954年10月13日）

李维汉[2]同志：

叶恭绰、朱蕴山似应在政协方面予以安排。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叶恭绰，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财政部部长、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部长。1950年由香港回北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决定撤销文教委员会后尚未安排其职务。朱蕴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2]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

关于严格保护尼赫鲁专机安全的批语[1]

（1954年10月15日）

周总理：

请迅即令知我空军及有关方面，注意严格保护，不得发生任何微小的误会和不便。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

[1] 经中、印两国政府商定，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954年10月19日至31日访问中国。10月14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致电外交部，通报了印度外交部关于尼赫鲁专机飞行路线的安排。这个批语写在申健的来电上。

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所加编者按的批注

（1954年10月）

一

青年团员，一个二十三岁，一个廿六岁。[1]

二

不过是小人物。[2]

---

[1] 这句话批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作者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旁边。

[2] 这句话是针对《文艺报》编者按中“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而写的。

三

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1]

四

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

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2]

五

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

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3]

---

[1] 《文艺报》的编者按中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其中"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写了这句话。

[2] 这两句话是针对《文艺报》编者按中"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而写的。

[3] 《文艺报》编者按中有一处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另一处又说"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与"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边，画了两道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分别批了这两句话。

对《光明日报》刊载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的批注[1]

（1954年10月）

一

不过是试作？

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

不过可供参考而已？[2]

---

[1] 这是毛泽东阅读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中发表的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时的批注。

[2] 《光明日报》为发表李希凡、蓝翎文章所加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十八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的批语是分别针对编者按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和“供参考”这3个提法而写的。

二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1]

三

这一点讲得有缺点。[2]

四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3]

---

[1] 这个批语是针对李希凡、蓝翎文章中下面一段话而写的："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

[2] 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走向崩溃。"毛泽东在这段话旁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了这个批语。

[3] 李希凡、蓝翎在文章中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两句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五

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1]

---

[1] 这个批语是针对李希凡、蓝翔文章中的最后一段而写的。这段话是："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红楼梦》也许和胡适的目的不同，但其效果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否认《红楼梦》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社会的人的悲剧，进而肯定《红楼梦》是个别家庭和个别的人的悲剧，把《红楼梦》歪曲成为一部自然主义的写生的作品。这就是新索隐派所企图达到的共同目标。《〈红楼梦〉研究》就是这种新索隐派的典型代表作品。"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1]

（1954年10月16日）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实现《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的一封信。

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1]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

[1] 《清宫秘史》是一部污蔑义和团爱国运动，鼓吹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影片。刘少奇把这部卖国主义影片吹捧为“爱国主义”影片。

对公安部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国庆节保卫工作报告的批语

（1954年10月16日）

刘、周、朱、陈、邓、彭[1]阅。

此件[2]值得注意。请彭对广州的防空加以布置。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公安部1954年10月12日向周恩来、中央转报的广州市公安局关于国庆节期间保卫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主要汇报了国庆节期间广州市的敌特活动情况和我公安部门采取侦察破案，组织机关、工厂、企业内部群众防范，充分发挥民警部门管理、控制作用等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保卫工作的情况。其中谈到国庆期间敌机共入侵3批4架次，有一次飞至增城东面离广州市60公里空域，被我机追击逃跑。

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准备工作的批语[1]

（1954年10月17日）

刘、周、陈、邓小平、彭真[2]阅。

此件最后一页[3]注意，应有所准备。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个内部材料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内部材料最后一页刊载的一则简讯。内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准备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提出的带有原则性的意见，应加以归纳，由常委会加以研究；对其中的具体意见，应分别情况，可行的由政府加以推行。第二，全国人大决定，过去几年颁布的法律和条例与宪法不相抵触的都有效。但根据宪法的规定看，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法令中，有问题的不少，对这些有问题的法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还是由政府处理，应加以确定。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954年10月18日）

开幕词

今天到会的有一部分人，我们过去是不认识的，只是闻其名而没有见过面。过去不认识的人，今天可以坐在一起开国防委员会会议，这种情形是很可以想一下的。今天是大敌当前，敌人很强大，他们包围我们、威胁我们，我们应当团结起来。今天在座的，有人民解放军的骨干，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以及过去做军事工作有经验的人，都是在各方面联系群众的，对于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能起作用的。

美国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很不满意我们，仇视我们。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现在还盘踞在台湾，全国解放战争在台湾这一部分还没有完成，还没有胜利。

我们国家的国防任务很大。除了工业问题以外，还有建军问题和作战问题。建军和作战，联系到各个方面。我们现在的作战任务是解放台湾。将来的作战任务是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建军中各方面的问题很多，比如兵役制度，现在有一个文件已经发下去了，请大家提意见，有些文件还没有发下去。我们军队要提高，编制、装备要改进，训练要改进，而军队的训练是同国民军训相联系的。

国防委员会今后的任务是：团结起来，训练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逐步建设一支近代化的革命军队。除苏联军队外，我们要建设世界上第二支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现在我们的经济建设有计划，文化建设有计划，军事建设也应当有计划，以便有步骤地达到我们建设强大的近代化的革命军队的目标。这是人民的目标，是宪法规定的目标。

讲话

中国军队的近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1]。新军有三十六镇，就是三十六个师。今天在座的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那个军队，里面有日本士官学校的；有云南讲武堂的，我们的朱德副主席就是云南讲武堂的；有湖南讲武堂的；有保定军官学校的，唐生智[2]委员就是保定军校的。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脱离了人民，四分五裂，各人筹各人的饷，各搞各的地盘，被人民所唾弃。

第二代是黄埔军[3]。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革了前面所说的那

---

[1] 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编练的新式陆军。

[2] 唐生智（1889—1970），湖南东安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和反袁护国战争，1923年任湘军第四师师长。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1954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

[3] 黄埔军，指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以黄埔军校校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到1926年6月发展为8个军。

个军队的命。今天在座的中间，有许多人，共产党的非共产党的，都是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的。我还曾经在上海为黄埔军校招过一期学生，地址是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为主干的国民革命军起初成立了八个军，黄琪翔、蔡廷锴[1]是四军的，程潜、李明灏[2]是六军的，唐生智是八军的。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共产党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共产党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3]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

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

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军队的三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三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我们的军队，首先是游击队，以后比较正规一些，现在更好一

---

[1] 黄琪翔（1898—1970），广东梅县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2]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1954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李明灏（1897—1980），湖南醴陵人，1926年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七师第五十四团团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3] 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北伐战争前期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

些，但严格地说来，距现代化还相差很远，因此必须努力学习。原子武器出现以后，军队的战略战术和装备都有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一方面我们一点都不懂。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建军目标是能够达到的，我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军队距离现代化很远，但是在朝鲜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末期，蒋介石和帝国主义搭上了线，不久国共两党分裂，北伐军队变更了方向，我们单独地搞。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支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我们能把游击队集合起来，成立了军团、方面军，以后又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

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重庆谈判前，蒋介石请我们一定要去商量国是，国是者全国之是也，不能不去。其实到了重庆，蒋介石毫无准备，只临时召集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他们一面谈一面发兵。我们几个人在重庆也商量了。古语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我们也发兵，只要把蒋介石打得越痛，就越好谈。高树勋[1]委员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义的。打到一九四八年冬天，局面就差不多了，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局面就定下来了。现在来算算这笔账，我们所以能获得胜利，基本的条件是我们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和方向。日本投降后，当时全国人民希望休息，哪怕是两三年也好。结果只休息了一年，但就是在这一年里也打了不少的仗。

人民的希望，人民所需要的方向，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各种努力，过去可以北伐，可以解放全中国，可以开始进行国家的建设。今后，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我们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解放台湾，也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现在工业、农业、文化、军事还都不行，帝国主义估量你只有那么一点东西，就来欺负我们。他们说“你有几颗原子弹?”但他们对我们的估计有一条是失算的，就是中国现在的潜在力量将来发挥出来是惊人的。

---

[1] 高树勋（1898—1972），河北盐山人。1945年10月率领一个军和一个纵队在邯郸起义。起义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和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委员合影。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我国有那样长的海岸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有空军，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支小小的空军，就像在天安门阅兵时看到的那样。一九五四年，我们国家自已出产了一架飞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还只是一架教练机。

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国，但工业不如荷兰、比利时，汽车制造不如丹麦。有一句俗话，叫做“夹起尾巴做人”，做人就是做人，为什么还不能翘尾巴呢？道理很简单，我们现在坦克、汽车、大口径的大炮、拖拉机都不能造，还是把尾巴夹起的好。希望大家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保养身体，一来是为了继续工作，二来是为了看一看将

来我们自己造的飞机、坦克、大炮、拖拉机。

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搞出些名堂来，使国家像个样子。能不能办到？能够的，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所有干部，都要努一把力。

今天，国防委员会有各方面的人，具有各个时代经验的人，大家为爱国主义所鼓舞，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一点是很可宝贵的。在座许多人是老前辈，你[1]当师长时，我还在当兵。我们有一条是好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事，使全体人民都知道。过去蒋介石有什么意见，人家要猜摸一番，过了一个时期就变了。现在对我们用不着猜摸，我们的方向就是人民的方向，这是载于宪法的。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要摸底，有什么底？宪法就是底。共产党的底就是发挥一切有用的因素，破坏阻碍的因素。有用的因素是建设性的力量，包括各种知识分子，旧军队出身的将军和士兵。共产党的将军们，很多也是从旧军队来的，像贺龙[2]副主席就是当过湘西镇守使的。没有天生下来就是共产党人的。一个人初生下来并没有什么任务，母亲生儿子也并不是要他当军人，当将军，这是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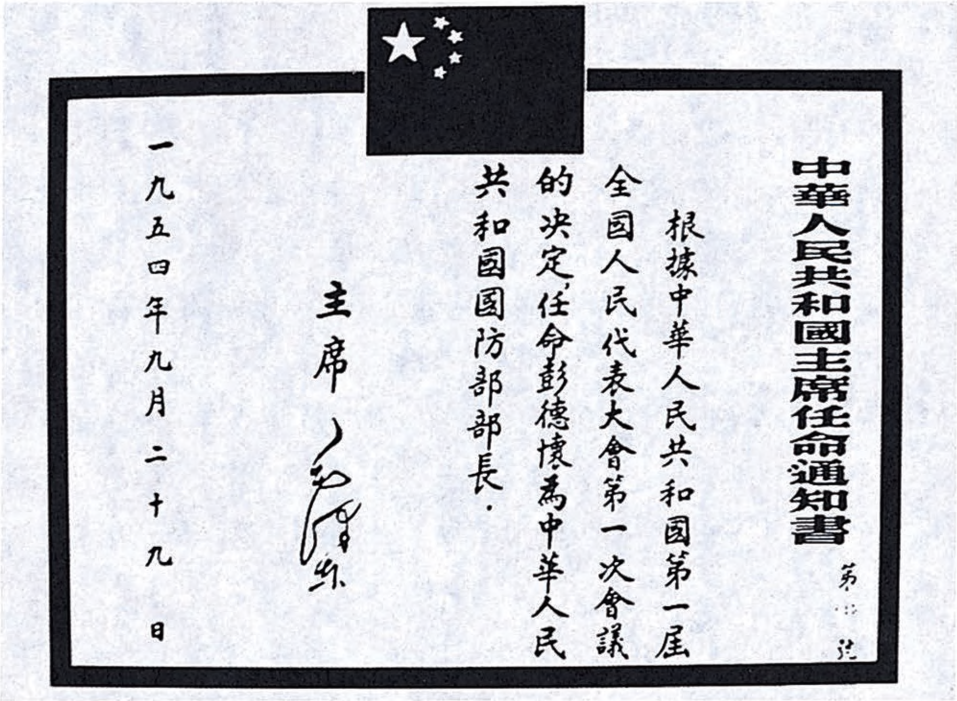
我们的海军，目前还只是一点萌芽。去年我还坐过一次军舰，从汉口到南京，在南京还看过鱼雷快艇演习，海军战士都是十九到

---

[1] 指程潜。

[2] 贺龙，1926年北伐时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二十三岁的青年，见了他们就忘了我们是老朽。当时也看到林遵[1]委员，你们变成先生了。建设工业要有工程师，办学校要有教授，要团结他们，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当然，没有新人也不行。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任命通知書

第 [illegible] 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決定，任命彭德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1954年，毛泽东任命彭德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通知书。

---

[1] 林遵（1905—1979），福建福州人，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1949年4月23日率领所部二十五艘舰艇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4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

（1954年10月）

一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日本虽然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过去它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也欺侮别的东方国家，可是现在连日本都受欺侮了。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三百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赖嘉文大使在中国已经几年了，一定懂得中国人民爱国的感情和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及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尼赫鲁总理不要以为中国已经完全独立，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有很大的问题，台湾就还在美国和蒋介石的手里。离开大陆几公里的地方，我们有三十多个岛屿，其中大的有三个。这些岛屿都被美蒋盘踞着，我们的船不能通过，外国船也不能通过。美国飞机飞到我们内地的上空，空投特务。这些特务以七人到十人为一组，带有电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几十组这样的特务空投到我们内地各省。在四川和靠近西藏的青海，美国飞机都曾空投过特务，并且空投武器给那里

的土匪。这就说明，美国当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机会就要整我们的。

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我读了尼赫鲁总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尼赫鲁总理所表示的情绪同我们的差不多。

我们两国人民对互访的两国领导人所表示的欢迎，说明他们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应当把五项原则[1]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想法？据我知道，美国和英国也说，它们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明，它们又不愿意干。

不能设想任何国家会开军队到美国去。至于说美国怕丧失它在世界各地占据的地方，可是我好像听说美国是反对英、法殖民主义

---

[1] 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的。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它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美国做事是不管别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东南亚条约，它就没有问问中国和印度。亚洲有许多国家，但是它只问了三个：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

尼赫鲁总理说东南亚条约是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一个反应，这很对。日内瓦会议[1]做了好事，美国就来破坏。

艾登曾经建议搞一个亚洲洛迦诺公约[2]，但是后来又放弃了，反而接受东南亚条约。这样的大国，竟这样胆小。我们两国就不

---

[1]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2] 洛迦诺公约，全称《洛迦诺保证条约》，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波、捷（捷克斯洛伐克）七国代表在瑞士洛迦诺会议上通过，同年12月1日在英国伦敦正式签字。公约包括一个议定书和七个条约，其中最重要的《德国、比利时、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相互保证条约》（又称《莱茵保安公约》）规定，签约国相互保证德法、德比边界不受侵犯；遵守《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莱茵区非军事化的协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一切争端。1936年3月德国法西斯政府毁约进军莱茵区，1939年4月宣布废止洛迦诺公约。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主张在东南亚地区搞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的集体安全体系，后因美国的反对未能实现。

怕。美国邀请印度参加马尼拉会议，印度就有胆量不去。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问题上，印度也有胆量投票赞成。但是像英、法这样的大国却如此胆小。我们向它们建议，把它们的大国地位给我们，好不好？

英国常说是我们不承认英国；我们对英国说，是它不承认我们。我们劝英国学印度，果真如此，英国就能同我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北欧的一些国家，例如挪威，也敢于投票赞成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同挪威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澳大利亚说怕我们，说共产党要去侵略它。可是我们连船都没有，怎样去法呢？澳大利亚参加马尼拉条约，说是为了防御。但是我们向它提出五项原则，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干。

我有两点怀疑：

第一，美国叫着反共的口号，它反对共产党倒是实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国共产党呢？中国只有几枝烂枪，我们有的只是人、农业和手工业。我看美国不是真怕中国共产党，而是以此为题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第二，像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跟着美国走，而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却不一定跟着美国走呢？我看这是因为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美国火车头下一个命令，它们不得不服从。印度、印尼、缅甸和北欧的一些国家没有把它们的利益套在美国车子上，或者套得不紧，因此没有必要跟着美国走。

（十月十九日）

二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1]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

国与国之间不应该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

（十月二十一日）

三

我们不赞成过去希特勒[2]德国的说法，希特勒德国和日本过去曾说，它们是“无”的国家，要向“有”的国家取得东西。日本在过去，在十年前，倒的确是“黄祸”。

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

---

[1] 参见《孟子·滕文公上》。

[2] 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它合作。毫无疑问，印度是赞成的，印尼和缅甸也是赞成的。

我想泰国也不会怀疑中国要大举进攻它。我们是想同它搞好关系的，但是泰国政府古怪得很，不理我们。

菲律宾说怕我们侵略，但是我们要同它搞好关系，它又不干。既然怕侵略，那末我们就交朋友吧，互不侵犯，并且像中印两国一样，发表一个声明。但是它又不干，它不愿意承认我们国家的存在。我们想不出这是为了什么，唯一的理由就是它听美国的话，同美国走在一条轨道上，美国说什么，它就做什么。

说到美国，我们上次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谈完，那就是战争问题。尼赫鲁总理说，美国想打仗，想用战争的办法得到更大的利益。关于战争是否有好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一看两次世界大战究竟对谁、对哪些国家有好处。可以说两次大战对三类国家有利，对其余的国家都是有害的。

第一类国家是美国帝国主义，它在两次大战中获得了利益，得到了发展。

第二类是在两次大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由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

第三类是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这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而是由爱国的团体和政党领导的，像印度、印尼、缅甸、叙利亚和埃及这样的国家属于这一类。

要搞战争的话，就要动员人民，就要使人民处于紧张状态，并且使他们学会打仗。但是，人民结合起来以后，势必会产生革命。例如，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印度的革命也是这样。我们两国的独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没有第二次大战，很难取得独立。

另外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国，由于日本和蒋介石削弱了，我们就起来了。由于英国削弱了，印度、缅甸和埃及起来了。由于法国削弱了，越南、叙利亚起来了。由于荷兰削弱了，印尼起来了。

如果再要打仗的话，不知道美国军事集团是怎样的想法。他们过去的经验是在两次大战中得到利益和发展，他们希望通过再一次战争得到更大的利益和发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这样想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两次大战以后还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和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如果再打大战，我看美国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国本身就会发生问题。如果再打大战，西亚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个拉丁美洲都会脱离帝国主义。

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机会才能起来的。布尔什维克[1]如果没有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那末十月革命就会有困难。我们在中国打了二十二年仗，但是胜利还是在最后几年取得的。第二次大战以后，我们得到了机会才起来的。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方面。

爱国党派领导的国家方面，我们在东南亚和西亚也可以看到一些例证。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我看，再打大战，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整个世界或世界的绝大部分将处于革命状态。我这样说，并不是故意危言耸听，而是根据两次大战的实际情况。如果再打大战，我看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只能使它的统治范围缩小。

在武器方面，美国以为它有原子弹和大炮，以为它的海、空军强大，因此它依靠这些东西。我想武器虽然有变化，但是除了杀伤

---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的人数增多以外，没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枪等。后来使用热兵器，例如步枪、机关枪、大炮等。现在又加上原子弹。但是基本的差别就是，冷兵器杀伤的人较少，热兵器杀伤的人多一些，原子弹杀伤的人更多。除了死伤的人数以外，没有什么差别。过去，冷兵器和热兵器双方都有，现在苏联和美国也都有原子弹。因此随着武器的变化，无非是死伤的人数更多而已。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死伤的人数恐怕就不是以千万计，而是要以亿万计。中国现在没有原子弹，不知道印度有没有。我们正在开始研究，原子弹是要花本钱的，我们一下子还搞不起来。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这一方有死伤，另一方也有死伤，因此就平衡了。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看谁拿着武器，看掌握着武器的战士们认为什么对他们最有利，看谁会打仗，而主要的还是前二者。至于说武器的多少，印度国大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没有武器的，现在我们都有了武器。

此外，还有一条经验。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防御者胜利，进攻者失败。第一次大战中，德国军队在西边打到巴黎，在东边几乎打到彼得格勒，但是结果进攻者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大战中的进攻者，德国、意大利、日本也都失败了。而防御的一方取得了胜利，虽然在防御这一方面的一些国家被战争削弱了，例如英国、法国。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不应该再打大战，应该长期和平。再打大战的结果，是对侵略者不利的。

我们双方的分析虽然有些地方相同，有些地方不同，但是结论是相同的。尼赫鲁总理在对美国进行分析时说，一方面美国从战争中得利，另一方面又遇到了困难。这种分析是很好的。至于战争工

具，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弓箭、大炮和原子弹。尼赫鲁总理说有性质上的不同，这是对的。我刚才谈武器时，只是就战争的结果而言。

不管用什么武器，不管是哪一个时代进行的战争，不管战争的规模是地方性的或是世界性的，结果多是一方摧毁另一方。固然，战争也有不分胜负而讲和的，例如三八线战争[1]和十七度线的战争[2]。在这种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根本打败另一方。但是在大多数的战争中，总是一胜一败，败者的力量被摧毁得更多些。所谓力量，不仅包括有生命的力量，而且包括物质力量。因此归根结底，还是看力量损毁的范围和大小来决定胜负。

当然，我是指战争的最后结果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德国的军队被全部毁灭，而苏联的军队不但没有毁灭，而且还打到柏林。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军队都被解除了武装。尼赫鲁总理推想，第三次大战会使全世界处于混乱时期，这种推想是可能的。原

---

[1] 三八线战争，指朝鲜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1950年6月，朝鲜半岛三八线北南两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发生战争。随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于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2] 指1946年至1954年越南人民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1945年9月，越南宣布独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统治，随即入侵越南。越南人民为保卫民族独立进行了长达8年多的抗法战争。1954年5月，越南人民经奠边府战役取得抗法斗争的决定性胜利。7月，根据日内瓦协议，越南人民军和法军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实行停火；法国承认越南独立并撤出印度支那。

子弹不仅会毁灭人，而且会毁灭物质，但是，是否许多国家就会没有政府呢？不会的。只要有人存在，总是会有政府的。一个政府被摧毁了，另一个政府又会起来。人类总是要找出路的，剩下来的人也是会求生的。还应该估计到，现在的人比过去的人有很大的变化，他们要求解放和独立的觉悟已经大大提高，这在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包括美国在内。

归根一句话，不打仗最好。如果我们能替艾森豪威尔[1]当个参谋长，那末他就可以听我们的话，而不受他的顾问的包围了。尼赫鲁总理做这件工作会比我们顺利些。如果我们去做这个工作，他就会说我们以革命来恐吓他，并且说他不怕革命。我想，不仅战争，就是紧张局势也使制造紧张局势的人一方面得利，另一方面又受到损害。我想问问，究竟是使人民感到安全有利呢，还是使人民每天处于紧张有利？紧张局势会促进人民觉悟，使他们做好准备，抵抗压力。这是有助于革命的。

很明显，中印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互相之间也不进行神经战，也不每天戒备着，像我们同美国之间以及苏联同美国之间那样。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印度也是这样。几千万年前有一种大动物叫恐龙，它在冰河时

---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期就消灭了。但是后来又出现了别的动物，最后出现了人类。现在在中国还可以看到冰河的遗迹。

总之，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十月二十三日）

四

大约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诗人屈原曾有两句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1]

我曾经在一次宴会上对尼赫鲁总理谈起我们对印度的感觉，我说我们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备着。我们没有感觉到印度要损害我们。

我曾经问，我们两国总理兼外长在谈话中如果说错了话，能不能改？我想是能改的。但这是在我们两国之间如此，在别的一些国家可能是会抓住我们说错的话的，我们也会抓住别的一些国家说错的话。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抓辫子”。但是我们同印度是不互相抓辫子的，我们并不互相防备，说错了话也不要紧。

印度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听袁仲贤[2]大使说，印度南部的人民在农业方面精耕细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这有点像我们成都附近的情况。印度的每一个好消息都使我们高兴。印度好了，对世界是有利的。

我很高兴能有这几次会谈，使我们相互交换了意见。同时尼赫鲁总理又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我们两国的外交是很容易办

---

[1] 参见屈原《九歌·少司命》。

[2] 袁仲贤，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的，不需要吵架。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1]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这是尼赫鲁总理可以感觉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这几次会谈，从过去几年我们的合作，从周总理访问印度时受到的欢迎和进行的恳谈看得出来。

尼赫鲁总理主张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并且表示希望赞成和平的国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2]，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如果华侨保持侨民身份，他们就不应该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如果取得了所在国的国籍，那末就应该按该国的法律办事。华侨也应该遵守所在国的法律。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是：双方互设商务代理处；双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和按惯例朝圣，并经一定山口、道路往来；关于两国外交、公务人员及国民过境事宜的规定等。协定1954年6月3日生效，有效期8年，1962年6月期满失效。

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不论是朋友之间、国与国之间或是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则谁还干呢？

（十月二十六日）

1954年10月，毛泽东接见印度总理尼赫鲁。

关于邀集在京中央委员阅看同南斯拉夫建交文件的信

（1954年10月20日）

周总理：

给张大使电报[1]发后，请将这整套文件交少奇、尚昆[2]同志，邀集（已阅过者不邀）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个别工作同志，到西楼轮阅一遍（不要印刷，或者还要加上第一次赫鲁晓夫的来信[3]）。

毛泽东

十月廿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4年10月18日关于同声斯拉夫进行建交谈判等问题给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进行建交谈判。1955年1月2日，中国同南斯拉夫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4年9月23日关于苏联及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同南斯拉夫关系问题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

在印度驻华大使为尼赫鲁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

（1954年10月21日）

中印两国人民都是坚决主张和平的。我们两国人民像全世界人民一样坚决为和平而努力。

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合作和两国人民的繁荣，
为世界和平，
为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沙德的健康，
为尼赫鲁总理到中国访问和他的健康，
为今天的宴会主人——赖嘉文大使的健康，干杯！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印度共和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驻华大使举行的招待会上。

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和尼赫鲁在招待会上。

给三三一厂全体职工的信

（1954年10月25日）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三三一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八月二十八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爱姆一十一型航空发动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

给二四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

（1954年10月25日）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二四七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八月十二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七六公厘野炮成功的胜利。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

给一二七厂全体职工的贺信

（1954年10月25日）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一二七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九月二十七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批一二二公厘榴弹炮成功的胜利。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五日

答谢金日成祝贺我志愿军入朝参战四周年的电报

（1954年10月2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我收到了您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来电。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全体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英雄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反抗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已经结成了血肉相关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维护远东和平的重要因素。在为争取朝鲜的和平统一和维护亚洲和平的奋斗中，我们两国人民的这种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谨祝朝鲜人民在迅速恢复自己祖国国民经济的庄严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为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题词[1]

（1954年10月25日）

参观了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以后，我们觉得很满意，很高兴。这个展览会用真凭实据表现了苏联工农业经济的突飞猛进，苏联技术科学的高度发展，苏联教育事业和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和苏联人民生活的幸福。通过这一切，展览会也生动地说明了苏联人民在劳动中所表现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说明了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各族人民的团结一致，说明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正确。我们以有这样强大的盟邦而自豪。苏联的强大是争取和平民主阵营各国经济文化普遍高涨的重要条件，是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条件。

苏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光荣成就大大地鼓舞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且使中国人民得到学习的最好榜样。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给了我们多方面的一贯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经过最近的中苏会谈是更加扩大了，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举行，也正是苏联对我国热情援助的一种表

---

[1] 1954年10月2日，苏联经济及文化成就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10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参观了展览会，并为其题词。

现。我们代表全中国人民对于这种情同手足的友谊表示感谢。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林伯渠
董必武　彭德怀　彭　真
邓小平[1]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1954年10月，周恩来和米高扬在有关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项目协定上签字。毛泽东等出席签字仪式。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1954年10月，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一起参观苏联经济建设展览。

1954年10月，毛泽东等参观苏联经济建设展览。

对陆定一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的报告[1]的批语

（1954年10月27日）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1954年10月27日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于本月24日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到会的有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批评工作者和各报刊编辑等60多人，俞平伯在上午也到了会。会上，一致认为李希凡、蓝翎二人关于《〈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简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并且认为消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影响，是一场严重斗争，经过这个斗争，将使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许多人准备写文章参加讨论，但也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发言中为俞平伯的考据劳绩辩护，主要是担心自己今后的考证工作会不被重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发言中适当地作了解释。这次讨论的目的，是要在关于《红楼梦》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划清界线，并进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出较全面的分析和评价，以引导青年正确地认识《红楼梦》。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的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刘、周、陈、朱、邓[1]阅，退陆定一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对《质问〈文艺报〉编者》[1]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10月27日）

一

即送人民日报邓拓[2]同志照此发表。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二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

[1] 《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载于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作者是袁水拍。毛泽东在审阅此文时，除加写了本篇二这一段文字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字修改。

[2]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给程潜[1]的信

（1954年10月27日）

程主席：

遵嘱写了几个字[2]，不知合用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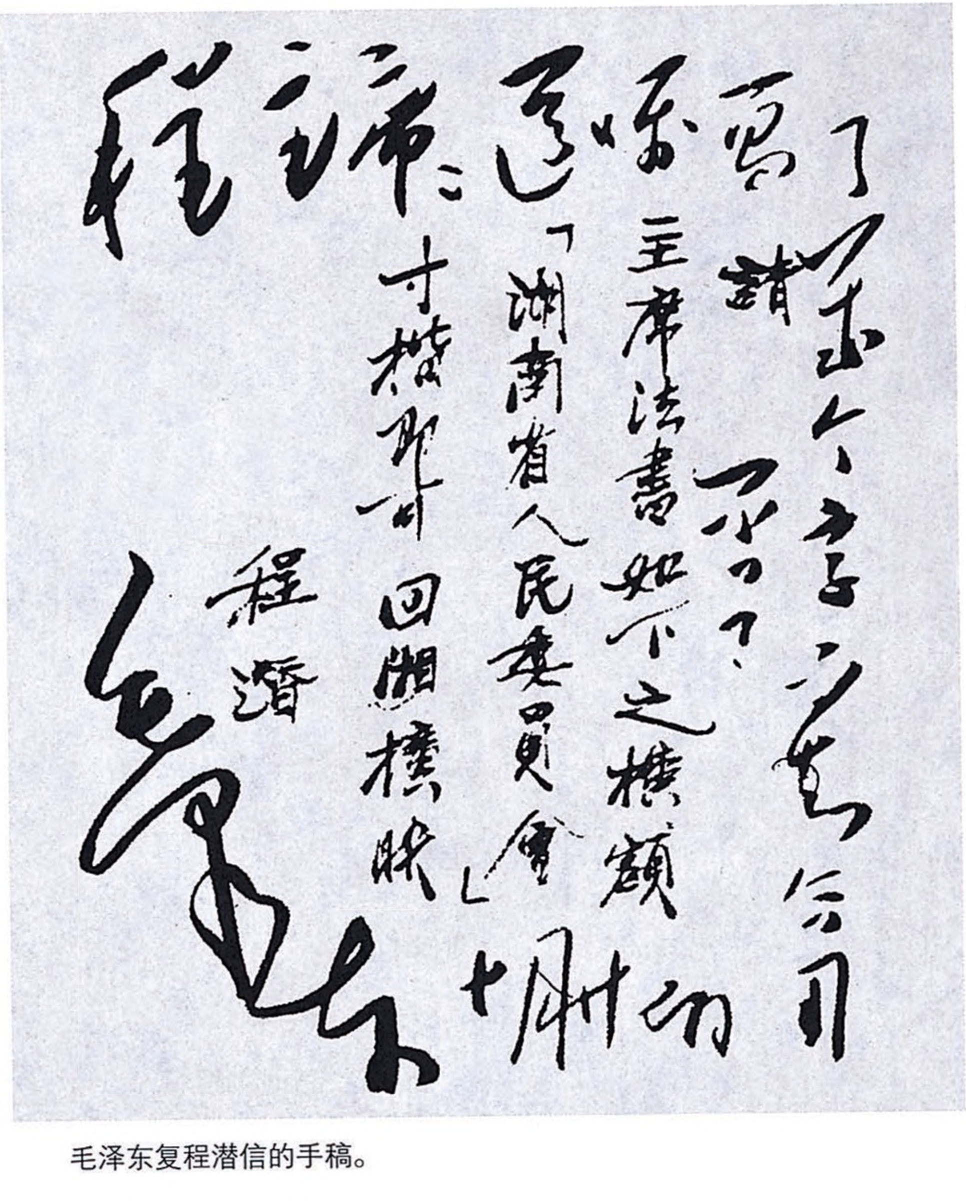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程潜，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委员会主席。

[2] 指毛泽东应程潜的请求而写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横额。



程頌雲 遵囑寫了[illegible]字[illegible]

請

主席法書如下之橫額

「湖南省人民委員會」

寸楷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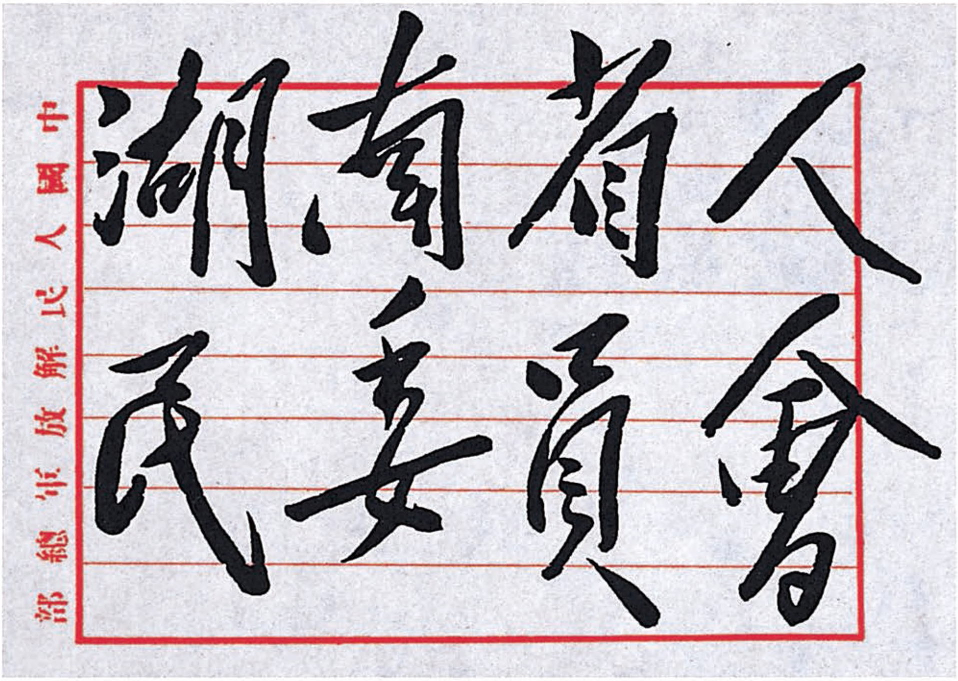
回湘橫聯

程潛

毛澤東

[illegible]

毛泽东复程潜信的手稿。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
湖南省人
民委員會

毛泽东应程潜的请求而写的“湖南省人民委员会”横额。

1954年，毛泽东和程潜等游明长陵。

1954年，毛泽东和程潜、程星龄、王季范等在北京十三陵。

对蒋竹如[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4年10月29日）

一

此信附件建议四点[2]，值得注意，请陈云、小平[3]二同志一阅。

---

[1]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长沙市女子师范学校当教员。

[2] 指蒋竹如1954年8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后所附的四点建议：（一）关于购粮工作，似应禁止超额竞赛办法。地方干部在执行政策时，互相挑战，争取超额，似乎不妥。因为农民收获有限，国家所取愈多，则农民所留愈少。去年购粮工作中，各乡互相挑战，争取超额完成，于是某些地方提升粮户地位，有的缺粮户升为保粮户，保粮户升为余粮户，这样一来，使若干农民的情绪不安，减低了生产兴趣，影响国家的增产计划。（二）洪水为灾，似应准备大建水库。今年湖南水患特大，不仅滨湖受害，山区、丘陵地区也有极大损失。今后防御的方法，惟有在扼要的山谷中大建水库，一则预防洪水，二则预抗旱灾，一举两利。（三）特殊的教育制度似应加以改进。湖南的育才幼儿园、省幼儿园、军区幼儿园在教育界中显得特殊，组织庞大，管理人员众多，耗费巨大，一则给群众不好的印象，二则那些幼儿，过惯了优裕生活，也没有好处。（四）对铁路工作人员的免票似应加以限制。现在各业工人的待遇，都是以各人的工薪去维持各家的衣食住行的费用，但铁路工人的家属，却能享受免票乘车权利，这种特殊优待，似不合理。一则妨碍了国家收入，二则形成了特殊制度，给人民群众以不好的心理影响，似应只能限于工作人员本身享有免票权利。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写信人是一个中学教员，过去我的同学。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

二

竹如兄：

八月九日的信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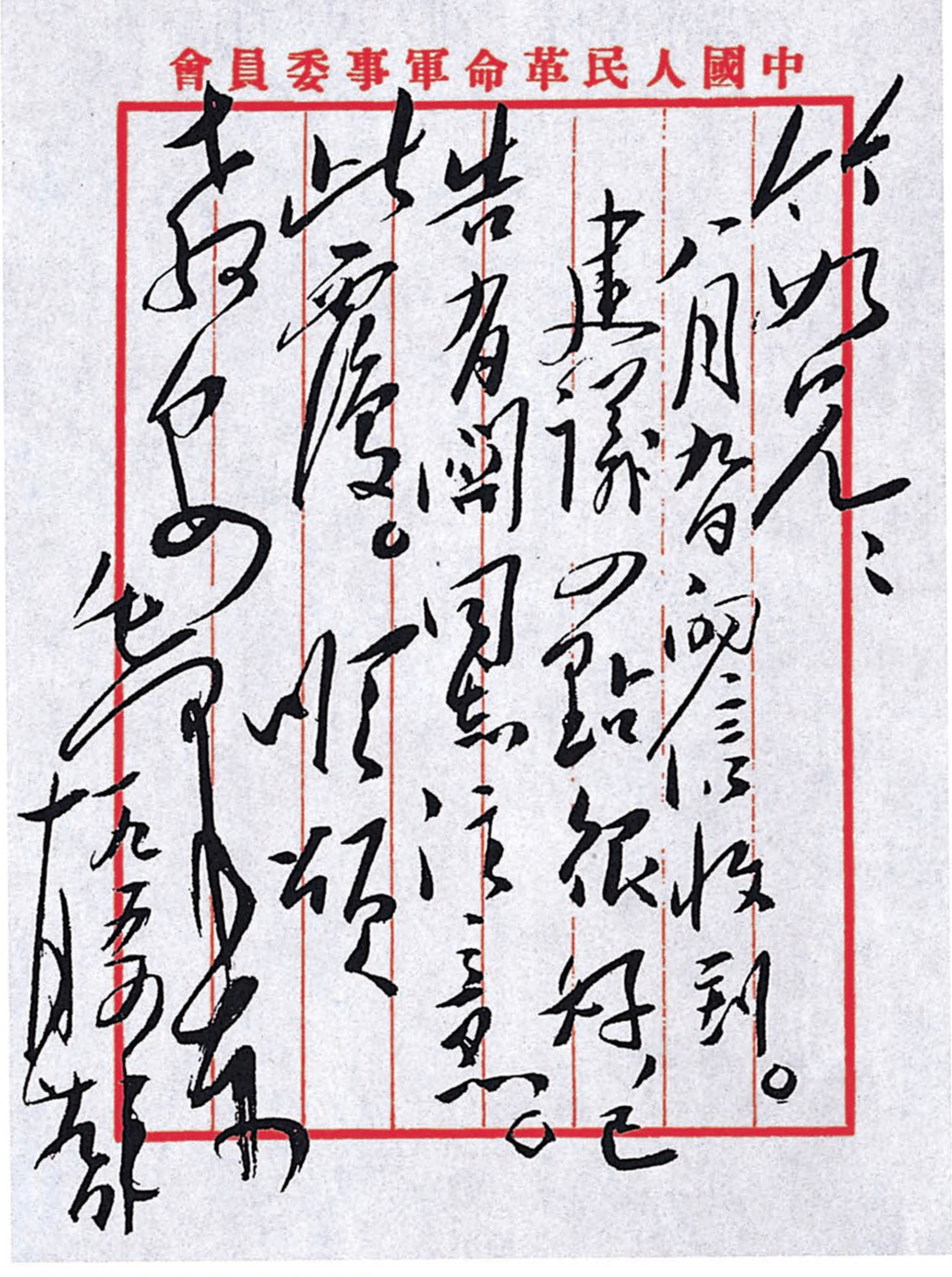
建议四点很好，已告有关同志注意。

此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九日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竹如兄：

八月九日兩信收到。建議各點很好，已告有關同志注意。此復。順頌

教安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十月廿九

毛泽东致蒋竹如信的手稿。

给郭梓材、刘天民[1]的信

（1954年10月29日）

梓材、天民二兄：

十月十五日来信收到。

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2]，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不要来京，以省往返之劳。此候

双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廿九日

---

[1] 郭梓材，幼年曾与毛泽东在井湾子私塾读书，又一起在长沙参加新军，解放后曾在湘潭建中猪鬃厂任会计。刘天民，郭梓材的妻子，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长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曾任湘潭市政协委员。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3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祝贺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1954年1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三十七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对于促进人类进步和维护世界和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而欢欣鼓舞，并把伟大苏联当作前进道路上的灯塔。

最近几年来，以苏联为首的全世界保卫和平的力量日益强大和发展。赞成和平共处的人越来越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不断遭受德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反对建立侵略性的军事集团，要求禁止原子武器、氢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普遍裁减军备的斗争正在普遍展开。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只要各国人民将维护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并且把这一事业坚持到底，世界和平就能够保持和巩固。

中苏两国的伟大同盟对促进两国的共同繁荣和维护远东与世界和平事业日益明显地发挥着极其巨大的作用。最近以赫鲁晓夫[1]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与中国政府的会谈，标志着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新发展，并再一次表现了中苏八亿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利益。这种友谊将加速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促进远东及世界和平的更加巩固。

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

中苏两国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关于请各省市制定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纲要的电报

（1954年11月10日）

一

中央：

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1]，如同意，请即发出为盼。

毛　刘　周[2]
十一月十日

二

各省、市委，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党组：

中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

---

[1] 即本篇第二部分。

[2] 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这时他们都在广州。

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在编制这一纲要时请注意以下各点：

（一）计划指标包括的范围：工业生产计划（包括地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和私营），手工业生产计划，农业生产计划，林业生产计划，地方交通运输计划，国内贸易计划（各种经济类型），基本建设计划，劳动计划，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计划，地方财政计划。在上述计划中，请各省委特别注意发展本省的农业生产的计划。

（二）在编制上述计划时，可参考十一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发的五年计划草案的分省指标。所用表格，一律按照一九五三年底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发表格填列，将一份报中央，五份报国家计划委员会，在编制过程中的具体问题，请直接与国家计划委员会联系。

（三）各省、市如已编过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亦请重新加以审查和订正报告中央。

中央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日

对《〈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的批注[1]

（1954 年 11 月）

一

首先不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2]

二

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3]

三

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4]

四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5]

五

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6]

六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7]

---

[1] 这是毛泽东在阅读1954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刊载的署名黎之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一文时写的6个批注。黎之是李曙光的笔名。

[2] 黎之的文章批评《文艺报》编者“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的最明显的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一句旁画了竖线，打了一个问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3] 《文艺报》1951年第五卷第三期曾发表《评〈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文章，文内说：“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蒋介石匪帮统治的中国，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而正相反，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人们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的品格只会一天比一天提高，不管他们发展变化的程度如何不一致，但他们在新社会影响与教育下，都具有与旧社会人物性格根本不同的特点，却是无疑的了。”黎之的文章引用了这段文字后反驳道：“原来蒋介石匪帮被赶出大陆不过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毛泽东这个批注，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写的。

[4] 195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发表了由编辑部自己整理的《读者对第三卷〈文艺报〉的意见》。这篇文章集中了读者来信中对《文艺报》的赞美的词句，却没有提到任何缺点和错误，黎之的文章就此事指出："显然地，《文艺报》编者是陶醉在这一片赞扬的歌声中了，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十全十美，好到'卓越'的程度了。当然，读者的意见是真诚的。"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是针对黎文中的这段话而写的。

[5] 黎之的文章批评《文艺报》"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打了问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6] 黎之在文章中批评《文艺报》"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他们钻在冷冰冰的公式主义的套子里，对新鲜的事物和新鲜的思想缺乏热情"。毛泽东针对这段文字写了这个批注。

[7] 黎之在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与"老大的作风"旁分别画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对冯雪峰《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的批注[1]

（1954年11月）

一

限于古典文学吗?

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2]

二

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3]

---

[1] 冯雪峰，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他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发表在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对这篇检讨所作的批注，写在11月14日《南方日报》转载的这篇检讨上。

[2]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的这个批注是针对这段话而写的。

[3] 毛泽东这个批注是针对冯雪峰检讨中所说的“这完全说明我对于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一句而写的。

三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

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

四

应说自觉的。

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2]

五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3]

---

[1]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毛泽东针对这段话写了这个批注。

[2]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毛泽东在这一段中的“可以不自觉地”和“在心底里存在着”几个字旁画了竖线，并分别写了批注。

[3] 冯雪峰在检讨中说：“在这次错误上，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是不可容忍的。”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1954年11月18日）

刘、周、李、陈、罗、陶铸[1]各同志：

《人民日报》十一月十三、十四两日载有苏联新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十二章的译文，请你们看一下，足见所谓“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说法是错误的。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请伯达同志将《新建设》及《学习》上论过渡时期经济法则的文章看一下，看有无错误。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李，指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指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他们这时都在广州参加会议。

对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筹备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4年11月18日）

周总理：

章程与名单[1]数日内即宜大体确定，否则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开会恐来不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

---

[1] 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章程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政协全国委员会工作会议1954年11月3日讨论筹备第二届政协问题的情况简报中说：关于修改政协组织章程的工作，一致同意不必另写共同纲领，在政协组织章程前面加总纲一章，并推定13人组成起草小组，于10日内提出初稿，交工作会议讨论。关于第二届全国政协的参加单位，一致同意定为29个，即11个党派，17个团体以及特别邀请人士。政协各参加单位的名额，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安排，不搞平均主义。各党派、团体的人选，于10日内提出名单草案，先交工作会议协商，并加以平衡。

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

（1954年11月19日）

刘、周[1]：

此件[2]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

毛泽东

十一月十九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 指越南劳动党中央1954年10月27日由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由于天灾连续发生和敌人长期破坏的影响，部分地区已面临饥荒，要求中国方面迅速救济1万吨大米，同时还要求救济500万米粗厚布匹，解决今冬100万人的穿着问题。

对国防部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的批语[1]

（1954年11月20日）

一

照办。删掉了几个字。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

二

应将“和毛泽东主席”六字删去。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1954年11月3日印送的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三个文件的批语。在毛泽东

审阅前，1954年11月16日，杨尚昆向周恩来报送这三个文件时附有一封信，提出决议草案和条例草案中有一个问题须考虑，原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在政治局讨论时，认为可能引起关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问题，故提议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11月19日，周恩来将经他审阅修改的这些文件转送毛泽东、刘少奇审定。这些文件中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提法，已分别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批语一中所说的“照办”，就是指这件事。其中所说删掉了几个字，是指在审阅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奖章的决议（草案）时，删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地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一句中“和毛泽东主席”6个字。本篇二就是毛泽东为此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述决议草案上的批语。

1954年11月，毛泽东在广州越秀山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的电报[1]

（1954年11月22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值此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之际，谨向朝鲜人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这一协定的签订和实施使中朝两国人民在并肩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战争中所结成的战斗友谊获得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以钦佩和欢欣的心情祝贺朝鲜人民在执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

朝鲜人民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争取朝鲜的和平统一所作的不懈斗争，一向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深切关怀和同情。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的电报。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一周年。

朝鲜问题必须在尊重朝鲜人民的民族权利和有利于保障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原则下获得解决。中国人民将继续全力支持朝鲜人民这一正义事业，直到最后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和日益巩固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给黄炎培[1]的信

（1954年11月23日）

任之先生：

十月三十日惠书收到。购粮事，我在京所闻，亦如先生所述。来广州时沿途调查，始知问题仍是有的，但一般尚好，据说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余案，已请陈云副总理注意。尊恙如何甚念，尚希注意护养。此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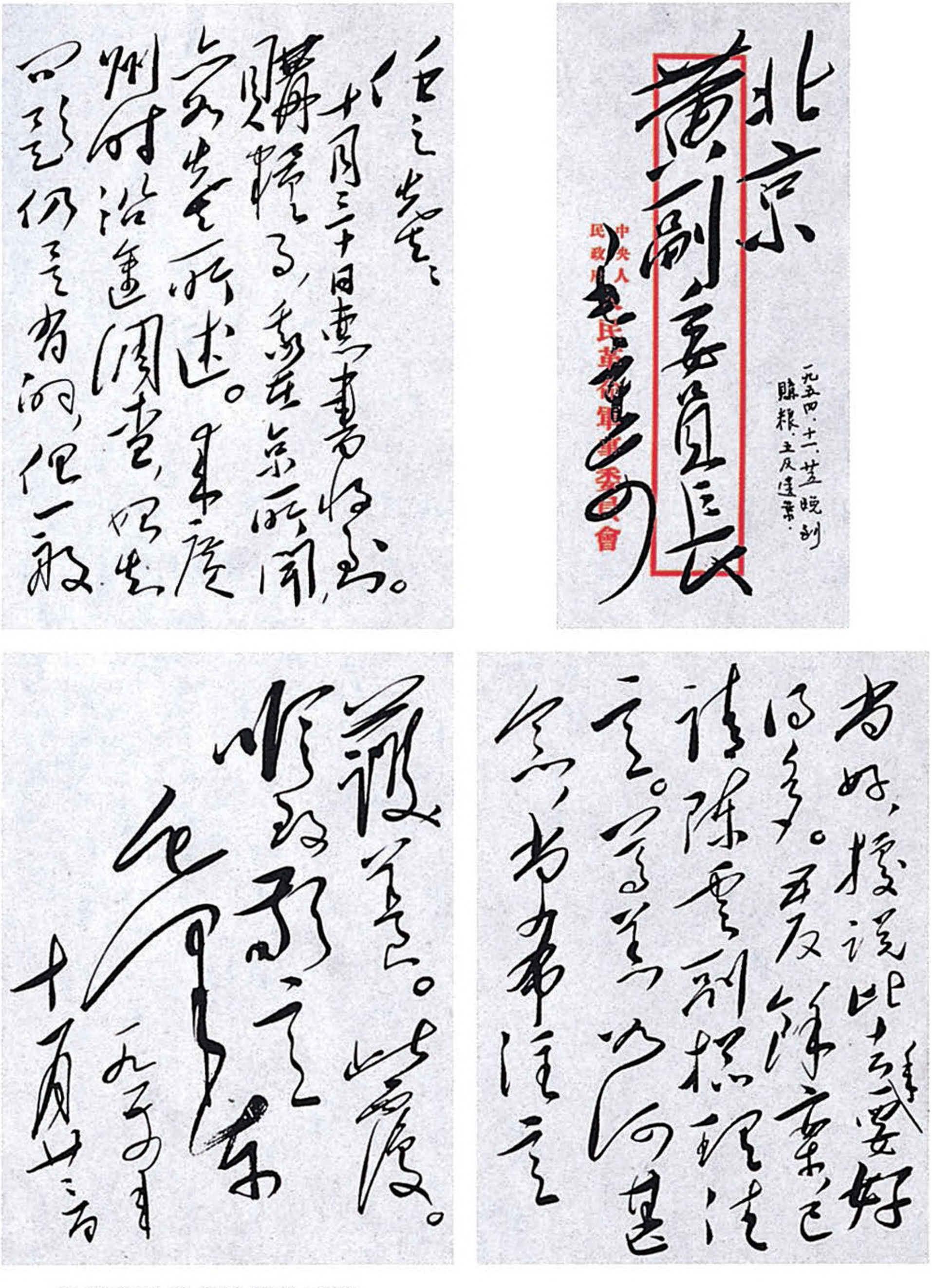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三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任之先生：

十月三十日惠書收悉。購糧事，前在京所聞，及先生所述，來廣州沿途調查，如此問題似已有的，但一般者好，據說比去年要好得多。五反餘案已請陳雲副總理注意。寄來[illegible]，[illegible]，書亦希還，謹致謝意。此復。

順致敬禮

毛澤東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北京

黃副委員長

毛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一九五四．十一．廿五晚到

購粮．土及達業．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关于征求对兵役法和勋章奖章条例的意见的批语[1]

（1954年11月23日）

退彭德怀同志照办。

同意周恩来同志的修改意见。应召集在京的国防委员会委员（主要是党外人士）开一次会，征集意见。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上。这封信是为报请审阅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功人员勋章奖章条例而写的。

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1]

（1954年11月24日）

金首相，并告志司[2]：

过去由于谈判的需要，开城的工作一直由中国同志负较大部分的责任。在共同对外的斗争中，朝中同志都取得了若干经验，同时开城工作显然有长期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开城工作今后交由朝鲜同志负责，由您直接领导较为适宜。我们也考虑过由朝鲜同志负责时的若干具体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采取相互协作的办法求得解决的。您如同意上述办法，当即派现在国内休假的柴成文[3]同志来平壤向您报告并请示，然后去开城和李相朝、丁国钰[4]二同志商量具体执行的办法。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的电报。

[2] 志司，即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

[3] 柴成文，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

[4] 李相朝，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丁国钰，当时任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党委副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1]

（1954年11月25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巴·贾尔卡赛汗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全体蒙古人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三十年前，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以英勇的斗争彻底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由于蒙古人民的不懈努力和苏联无私的援助，蒙古人民已永远摆脱了贫困和落后，走上了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光辉道路。中国人民深为蒙古人民的辉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巴·贾尔卡赛汗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

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54年，毛泽东会见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布桑。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4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值此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我们最好的祝望。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为自己祖国繁荣发展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事业中获得更辉煌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关于军委扩大会议的批语[1]

（1954年11月30日、12月28日）

一

刘、周、朱、陈、邓阅，退彭德怀同志照办。会议请彭德怀同志主持，我不准备参加。

毛泽东

十一月卅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4年11月30日关于军委第十四次会议决定12月15日召开的扩大会议的议程、到会人员和会议开法的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彭德怀12月27日送审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总结（草稿）的批语。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 为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制度。(2) 为了减少军委领导单位，便于战时防空指挥和工作领导，全国划分十二个军区，各省军区仍然保留。(3) 继继续执行各省公安部队由省军区统一领导的决定，为逐渐建立我国的警察制度，一部分公安部队逐步改为警察。(4) 关于部队军事训练与干部军事学习问题，决定以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的工作中心，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工作则为中心的中心，并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设立军事训练总监部。(5) 把从成分上政治上纯洁我军成员特别是干部作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6) 提高干部思想觉悟与防止腐化堕落。

二

退彭德怀同志。

在13页7行“动机”二字上，应加“反动或反革命”六字。其余均同意。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

（1954年11月）

一、关于中央卫生部向中央的报告要点和中医工作指示草案，毛主席指示，这个报告写得很好，特别指出这次检查卫生部工作的方法很好，开了二十多次会，从下面提出许多意见，翻了个底，这样方能解决问题。单是上面讲话还是不够的，必须靠自下而上的批评，这样才能解决得透，解决得好。单从上面解决问题，总有一定的片面性；和自上而下的批评结合起来，看法才能全面，解决才能完全正确。他说，这种办法在今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用过了，解决了大问题；文委也用这个办法来检查卫生部的工作，结果也很好。这种办法应该提倡。

二、毛主席指出，卫生工作的队伍很大，单是国家卫生工作人员就有二十几万，他要管的是五亿多人口的生、老、病、死，这真是一件大事业，极其重要。因而我们的责任很重。

三、毛主席说，几年来全国卫生工作的成绩很大，但是缺点也很多很大。他指出，卫生工作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政治工作少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太少了。

技术是不是多了？也不见得。医疗、医病都有许多问题没有很

---

[1] 这是对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卫生部党组报告时所作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的传达。

好解决。正因为政治太少了，技术也管不好。

毛主席最着重指出的是：党必须领导一切，必须领导卫生工作。他说，卫生部党委领导同志认为卫生工作是特殊的技术工作，中央不懂技术，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报告了中央也不一定有办法，因而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请示报告；认为文委是文化机关，尽是文化人，不懂医学，因此，对文委领导有一种不够尊重的情绪。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毛主席说，从这种逻辑出发，朱总司令就不能当海陆空的总司令了，因为他不能开坦克、驾飞机、打大炮呀！但朱总司令完全能当总司令，因为我们是用政治来领导军事。毛主席说，“你不懂这一门，你就不能管我”，这种思想是相当多的，也不仅卫生部门有。在我们的军队中，军事不服政治管的问题，是经过长期斗争才解决了的。卫生部门必须用最大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党要领导一切：要领导飞机大炮，领导生旦净丑，领导生老病死，就是说，要领导军事、经济、文教、卫生和其他一切工作。任何专门的东西，党都要去领导。譬如唱戏，党也要领导。毛主席说，□□□唱戏唱得好，但他唱的只是旦角，不唱生、净、丑角，旦角中他只唱青衣，别的也不唱。他是很专的，他不能领导别的。如果他来当主席，就当不好。但是我们的党领导他，领导戏剧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我们凭什么来领导？毛主席说，我们要用政治来领导。领导首先是政治领导，领导工作就是政治工作，离开政治就说不上领导。他们当卫生部长的，自己的职位就是做领导工作，也就是做政治工作。毛主席批评过去卫生部几位副部长的分工办法，谁管政治，谁管业务的办法是错误的。在旧中国，官僚们有所谓政务官、军事官之分。在我们这里，可不是这样，也不能是这样。凡是领导人都应

该政治领导。作为领导人只管技术，只记得技术，只管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势必政治挤不进去了，没有政治领导了。做领导工作的人都要懂得党的工作，懂得做群众工作，决不能只管医务，不管政治工作。

卫生工作一定要受党的领导，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搞独立王国。毛主席问周总理，卫生部的重要文件经过政务院通过批准的多不多，周总理说很少。毛主席说，人家是独立王国，就不受你管！

四、毛主席也着重地批评了卫生部缺乏集体领导，并且指示了应该怎样进行集体领导。他说，□□同志积极负责，就是说骨干是好的。但单干、盲干就不好了。盲干就是忽视党的领导，忽视政治对业务的领导。单干就是不要集体领导。大家知道，集体领导是我们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同志在自己的检讨中说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往往不经组织的认真讨论，即由个人决定，独断专行。毛主席指出，这种单干的作风就要把事情办坏，使自己孤立。这也不能说明个人的个性强，这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弱。毛主席指示，作为一个领导者，必须耐烦地和人家商量问题，遇事和群众商量，和上中下三方面商量。自己以为什么都正确，这是完全行不通的。领导者必须讲道理，有说服力，这样才算真强。党组开会要认真准备，要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要学习中央开会的办法。

五、毛主席着重指出，我们的医务部门领导人员中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其具体表现就是那种不愿受党的领导、缺乏政治、群众观点薄弱、不要集体领导等思想。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全国卫生队伍中相当普遍，我们一定要加以批判。

六、中央卫生部工作经过检查后，已开始有所转变。但同志们信心还不够，这首先领导上要有决心。毛主席指出，中央卫生部工

作的缺点和错误，□□同志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挂在□□同志一个人账上，其他同志也应负一定责任。他希望中央卫生部的领导工作要有个彻底转变。他问□□同志有这样的决心没有，□□同志回答说有这个决心。……毛主席说，这主要要提高思想转变作风，这次会议一定要开好，使大家有信心。

七、关于业务方针上的几个问题，中央对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基本上都同意。

关于中医问题，毛主席说，我认为中国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其中的一项。中医是在农业、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医是在近代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对其不合理部分要去掉。西医也有不正确的地方，也有机械唯物论。将来发展只有一个医，应该是唯物辩证法作指导的一个医。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过高了，也是不适当的。中医医院可以试办。中医进修问题，让他们学一些基础医学知识是可以的，但应该加入中医临床经验课程。医院可以请中医看病，治好了要向他学习。中西医的名称是不妥当的。

八、城市、工矿卫生，城市医疗要改革，要革命。

对周扬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组织计划的请示[1]的批语

（1954年12月3日）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2]、周扬同志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54年12月2日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根据你昨晚谈话的精神，对原来讨论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作了根本修改，并在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了经过修正的批判胡适问题的计划草案。这个计划改为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的题目也改定为：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二、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三、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四、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五、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六、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七、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八、《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九、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所谓新旧"红学"的评价）。关于讨论会的组织和活动方式，改为以个人研究为主，采取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和讨论方法。凡讨论会的主要文章，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为了领导这次讨论，已正式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茅盾、周扬、邓拓、潘梓年、胡绳、老舍、尹达等组成。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阅，照此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1954年，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在中南海。

在缅甸驻华大使为吴努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词

（1954年12月4日）

我请大家举杯：

为中缅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平共处，

为亚洲和平和国际的和平，

为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的健康，

为吴努总理的访问中国和他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吴拉茂大使和他的健康，

干杯！

在中宣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

（1954年12月5日）

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

[1] 毛泽东这段话加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4年12月5日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稿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中宣部这个通知下达之后，有的省委曾对通知中毛泽东加写的这句话电询中宣部“毛泽东同志”是否为“毛泽东思想”之误。中宣部于12月25日复电说：“原文系同志，并无错误。意思即是说，在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一般观点或意见的时候，可用‘毛泽东著作’的字样去代替‘毛泽东思想’的字样。”

对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决议[1]等的批语

（1954年12月8日）

周扬[2]同志：

均已看过。决议可用。

---

[1] 指准备提交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扩大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稿。决议稿有六点：（一）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实施集体领导原则。（二）责成《文艺报》新的编委提出办法，坚决克服错误，端正编辑方针，使《文艺报》成为具有明确战斗方向和切实作风的刊物。内容应以文艺批评为主，同时对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发表评论和介绍，力求扩大和密切文艺和广大人民生活的联系。（三）全国文联主席团责成中国作协主席团改进对《文艺报》的领导工作。《文艺报》在工作上应与文化部建立密切联系。（四）责成《人民文学》同中国作协领导的其他刊物及地方分会的刊物加强文艺批评工作，并提出开展文艺批评和自由讨论的具体计划。（五）责成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所属各地方协会的机关刊物以及各省市文联所属机关刊物的编辑机构，根据本决议的方针进行工作检查，并改进工作。（六）中国作协主席团应在1955年春节前召开作协第二次理事会，讨论改进作协的领导工作。这个决议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你的讲稿[1]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2]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早

---

[1] 指周扬准备在1954年12月8日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作的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稿。内容是：（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这个讲话稿在1954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准备在1954年12月8日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的联席会议上作的题为《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的讲话稿。内容是：（一）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二）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并提出十六字目标：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三）加紧扶植新生力量。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这个讲话稿的题目后来改为《三点建议》，在1954年12月9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关于攻击一江山岛时机的批语[1]

（1954年12月11日）

彭德怀、粟裕[2]同志：

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1954年12月9日关于进攻一江山岛作战计划方案给军委的报告上。

[2] 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

（1954年12月11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吴努总理大概可以看到，我们的方针是同你们友好。五项原则[1]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我知道吴努总理曾经同刘少奇委员长谈过缅甸国内的情况。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至于具体地如何取得国内和平，那要你们自己处理。如果我们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表示态度，那就不妥当了。

共产党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国家都有共产党。因此各国都要自己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你们国内也有对我们不友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在别国如印度、印尼也有。但是我们不好干涉，不好对这些党派、团体和个

---

[1] 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12月11日，缅甸联邦总理吴努来中国访问。图为毛泽东和吴努在谈话。

人说，他们不应该反对我们。每一国都有几种党。对于这几种党，我们不能表示反对哪些党，赞成哪些党。我们只能以每一国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希望你们谅解我们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吴努（以下简称努）：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态度，任何别的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

毛：缅甸人民和中国人民都看到我们所采取的步骤，例如五项原则和会谈公报[1]中所解决的问题。在我们两个民族、两个政府和

---

[1] 指1954年12月12日在北京发表的《中缅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主要内容是：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在两国适当城市互设总领事馆；开辟航空线，恢复公路交通并缔结邮电协定，促进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保护双方侨民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勉励侨民尊重侨居国法律和社会习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

两国人民之间，我们不去区分党派，而是把我们的共同问题初步解决了。

中国也有各种党派和团体。中国的各种党派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在一个水平上，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分别。中国各民主党派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也有各种团体，有工人的团体，甚至有资本家的团体。但是缅甸政府、吴努总理和吴拉茂大使对中国各党派只能一律平等看待，不能表示满意这一个党，不满意另外一个党。否则就会引起一些党的不满意。

我们对于缅甸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用政府的名义对缅甸的任何一个党表示态度，我们就会得罪这个党和一些群众。

既然已经谈起了这个问题，我们愿意说，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吴努总理说缅甸的内战已经成为很重的负担。我看你们自己是否能够谈谈，看看是否能取得妥协。如果能够这样，缅甸就能把全部精力放在建设上。我们将很高兴看到这一点。作为我个人的建议，你们自己先非正式地谈谈，试试看，不要把路堵死。最好是先非正式地、试探性地谈谈，如果谈得拢，最好，如果谈不拢，就暂时放一下，以后还有机会再谈。

我们对西藏的办法，可以供你们参考。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关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就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当然，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因为我们两国内部的情况不同。各国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处理自己的问题。

在这里也可以同时谈谈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别国的党的帮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东

欧各国，是因为苏联军队同纳粹德国作战时占领了这些国家，不然的话，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但是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革命不受外国的影响。像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和锡兰[1]这几个国家的独立，也不是完全不受外国影响的。但是缅甸的独立，并不是由于任何外国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帮助而取得的。

我们看到中美洲危地马拉就有不同的情况。美国在那里进行干涉，帮助反对党在别的国家组织军队打进危地马拉，而美国大使又在危地马拉内部策动。我们决不会干这种事。我们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并且由姚仲明[2]大使在缅甸内部策动。姚大使决不会干这种事，如果他干这种事，我们一定马上撤他的职。

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的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否则会使我们很尴尬，不好办事。

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泰国对我们不友好，原因不在于我们。我们实在是想搞好同泰国的关系。我们同泰国如此邻近，按道理应该搞好关系。外国报纸怀疑我们搞傣族自治区是要侵略泰国，是要建立什么“自由泰国”。傣族在云南省有

---

[1] 锡兰，今斯里兰卡。

[2] 姚仲明，1914年生，山东东阿人，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三十万人，他们组织一个自治区[1]。在广西省的壮族有七百多万人，他们也组织一个自治区。我们还有好几十个这样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例如，朝鲜族、蒙古族的。我们也准备在西藏建立一个自治区。我国少数民族的种类很多，但人数总计不到四千万。我们并不搞“自由泰国”，也不想打进泰国。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不是如此想的，不是如此准备的，也不是如此干的。

我们很想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它互相承认。如果泰国愿意的话，它也有资格在昆明设立领事馆。

泰国说怕我们侵略，但是缅甸也怕啊！而缅甸的做法却是搞好同我们的关系，并且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要侵略缅甸。可是泰国却连看都不愿意来看。如果泰国在昆明设领事馆，他们可以到我们的傣族自治区去看看。

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的意思向泰国当局说一下。

努：我已经答应了周总理。我将在曼谷过一夜，会见到泰国的总理。我不仅会告诉他，中国总理表示愿意同泰国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我还会进一步告诉他，中国的这种意愿是真诚的，这一点是我在这次访问中发现的。我希望尼赫鲁[2]总理会全力支持我这种说法。

毛：我们同尼赫鲁总理谈过，但是没有说得这样详细，没有说得这样多。希望吴努总理把我们今天说的转告尼赫鲁总理。如果你们两位一起同泰国当局谈这件事，使得中泰两国之间也能有像中缅之间这样的关系，我们将会很高兴。

努：我一定尽力来做。

---

[1] 1953年我国在云南省曾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后分别在1955年、1956年改为自治州。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毛：我现在说说大国小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艾德礼[1]先生批评美国对危地马拉的做法是，就像一个中世纪家庭的父亲替他的儿子找一个自己看得中的媳妇。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现在南北美洲的情况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家庭，美国是家长，其他国家是它的子弟。我们在亚洲不要这种关系。过去日本是想这样干的，它说的是共存共荣，但实际上是要剥削和侵略人家。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五年的相互关系。可以再看五年，再进行五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

你们的态度很好，你们有话，有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就讲出来。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友好合作更发展。

---

[1] 艾德礼，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

努：坦率地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就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被误会是英国、美国的走狗，怕的是反对我们的党正是这样向你们报告的。不过现在我们互相见面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昨天在周总理家里会谈以后，我已经把这一点告诉了我的朋友周总理。

昨天我甚至请求周总理释放美国飞行人员，这是我通常不会做的也是不应做的一件事，因为这有干涉内政之嫌。但是由于我同周总理互相有了很好的了解，因此我提出之后，并没有引起周总理的误会，这使我很高兴。

毛：释放总是要释放的，但是现在不能释放。我们对犯间谍罪的外国人是不杀的，犯同样罪的中国人就会被判处死刑。但是他们犯了罪，我们不能不执行法律。

我国是一个大国，原因就是人口多，地方大，但是并不强。吴努总理去看过我们的汽车厂，我们连一辆汽车都出不了，此外连一架飞机都不能造，那末强在哪里呢？但是，即使我们再弱，美国要把它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也是不行的。过去我们在延安，就没有屈服过。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也曾把侵入我们地区进行间谍活动的美国人逮捕起来。不论美国多强，能产多少钢，能出多少辆汽车和多少架飞机，我们也是不会屈服于它的压迫的。对于友好的国家，我们的态度像兄弟一样。对于压迫我们的国家，只要它们一天继续如此，我们就一天也不屈服。

这些美国间谍乘的飞机是在中国境内，在东北打下来的，但是美国说他们是战俘。真正的战俘是二万多名朝中被俘人员，他们被

扣住不放，并被交给了李承晚[1]和蒋介石。这是毫无道理的事，令人愤慨的事。

像我们这一类国家受过很多气，亚洲、非洲国家都是多年来受帝国主义大国的气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的就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我们现在还在受气。总有一天，我们真正独立起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了，就可以少受一点气。

你们的国家并不小。你们有近两千万的人口，相当澳大利亚的两倍多。你们国家的面积很大，相当于九个到十个锡兰。你们的国家有各种物产，人民勤劳聪明，各种事业都能逐步地办，例如制造汽车和生产钢铁。你们的国家大有可为，我们愿意看见你们的国家兴旺起来。

努：谢谢。

毛：假如亚非各国都能如此，到那时候就不会由几个大国称霸了。整个亚洲的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一半。亚洲的地方也是好地方，有两个洋：太平洋和印度洋。

努：缅甸的情况是很特殊的。最好是中国共产党派一些公正的人士到缅甸研究一下情况，我们不仅会很高兴地接待他们，还会给予他们各种便利。他们可以实地研究一下缅甸政府的立场以及缅甸人民对叛乱分子的感觉。

毛：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是不妥当的，会使外界得到不好的印象。我们的大使和领事可以根据报纸上的材料和公开的文件进行研究。他们不能同反对派直接联系，但是可以通过合法的党派来间接了解反对派。我们的大使馆进行这种研究，正像你们的大使馆

---

[1]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在这里进行研究一样。至于你们自己的纠纷，我们是不能介入的。

努：你们是应我们的邀请而来的，不是违背我们的意志而来的，因此不是干涉内政。如果我们请求的话，你们甚至可以派军队来，也不是干涉内政。

毛：不能说凡是政府愿意的，就不是干涉内政。有四种情况：

第一，同盟国家为了反对侵略，和共同的敌人作战时，一个同盟国家的军队可以到另一个同盟国家的土地上去，这不是干涉内政。

第二，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去建立军事基地，附带军事和政治条件的援助和贷款，在另外一个国家建立的宗教机关进行间谍活动等，都是干涉内政。

第三，纯粹属于内政范围的事，如民族之间或党派之间的斗争，如果外国介入，就是干涉内政。

第四，请外国的教授和专家，这不是干涉内政，这是互助。

第二、第三种情况是干涉内政，因为侵害了一国的民族利益。

如果我们派观察团到缅甸去观察民族之间和党派之间的纠纷，缅甸政府可以不认为是干涉内政，但是缅甸别的民族、别的党派就会有不同的看法，别的国家也会有不好的观感。

努：我没有预见到这一点，那末就不提我的建议了吧！

毛：我向吴努总理提出建议，不是以政府工作者的身分，而是以党的工作者的身分。我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还是中国共产党主席。我是以中国共产党主席的身分向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提出建议。

刘少奇委员长和我都同吴努总理讲了一些中国经验，这是朋友之间交换意见。至于缅甸政府是否照办，那完全要由缅甸政府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我们同缅甸做生意，决不以缅甸政府对哪一个党

关系较好作为条件。

努：我把主席和刘委员长对我提出的建议，看作是大哥哥们对一个小弟弟提出的建议。大哥哥是比小弟弟更有经验的。当我相信对我提建议的人是诚实、真诚而且是为他们的人民献身的，我就像小弟弟对大哥哥一样的谦恭，听取他们的建议。

毛：我们不是大哥哥同小弟弟的关系，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兄弟。况且，缅甸取得独立是在一九四八年，还比我们早一年。

努：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进行这些会谈。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毛：任何人都是从不了解到了解，这是很自然的。

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设宴招待缅甸联邦总理吴努和夫人，并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观看缅甸贵宾赠送的礼品。

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北京观看缅甸总理吴努赠送的礼物。

祝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萨波托斯基七十寿辰的电报

（1954年12月16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亲爱的萨波托斯基同志：

当您七十寿辰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衷心祝贺。

您为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进行了长期而英勇的斗争，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目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您的领导下，正在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日益繁荣幸福的国家，并为保障欧洲和平和安全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中国人民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这种正义事业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祝您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并祝您健康长寿。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北京

给黄炎培[1]的信

（1954 年 12 月 17 日）

黄先生：

惠书及大文[2]收到，已付几个同志传阅，须稍待方能璧还，乞谅为幸。顺颂

日安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

[1] 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惠书，指黄炎培 1954 年 12 月 15 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于 1954 年 11 月 15 日去北京医院做前列腺手术的情况和最近时期工商界的情况。关于工商界的情况，信中说：自强调爱国守法以来，工商界多少有些进步，但问题还有，有些还很严重，其中中小工商业较难导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以中小商业为尤甚。河北将棉布统销和私营布商的全行业改造相结合，分为维持、转业、改造三种处理方法，是很好的典型，如果各地按其不同情况参酌进行，当能完成改造私营工商业的任务。大文，指黄炎培写的《关于思想问题的四点答问》一文。

给章士钊[1]的信

（1954年12月17日）

行严先生：

惠书[2]敬悉。

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指章士钊1954年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建议将王冷斋安排进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毛泽东复信中所说的“某君事”即指这件事。王冷斋，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建国后任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给毛泽荣[1]的信

（1954年12月18日）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

你要求明年四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2]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北〈此〉住一个月回家。

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3]，以助日用。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1] 毛泽荣，又名胜五，毛泽东的堂弟。

[2] 毛仙梅，毛泽东的堂弟。

[3]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给郭耿光[1]的信

（1954年12月18日）

耿光先生：

十二月六日的信收到。寄上人民币贰百万元[2]，以助急需。此复。顺候

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

[1] 郭耿光，1927年前在湘潭做小生意时，曾掩护过毛泽东。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人民币折算，合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的谈话提纲[1]

（1954年12月19日）

性质、会期、任务。

（1）外交；（2）内政——选举；（3）向党委和国务院提意见（社会主义改造）并加以协商；（4）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团体及其他人员间的关系；（5）学习。

---

[1]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提纲，写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1954年10月16日分组讨论情况简报的首页上。这份简报，汇集了分组讨论政协章程草案的主要意见，涉及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10月19日毛泽东召集参加政协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座谈，对这些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关于政协的性质和任务[1]

（1954年12月19日）

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有些人认为政协的作用不大了，政协是否还需要成了问题。现在证明是需要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五百五十九人当中，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一百四十人，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见通过政协容纳许多人来商量事情很需要。虽然全国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和各省市人民委员会各方面都容纳了许多人，但是还需要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地方委员会。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

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这样说，那末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

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它的

---

[1] 这是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政协工作的谈话要点。

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

政协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协商国际问题。像过去的抗美援朝，现在的美国占领台湾问题，包括将来如发生外国侵略等，都需要商量。这类事大概每年都会有。这些事国务院要办，外交部和国防部要办，但有些问题，比如艾德礼、尼赫鲁、吴努[1]要来访问，我们需要先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方针，召集什么会好呢？人大常委会不太好，还是政协常委会好。国务院的人都可以去参加，不是以机关资格，而是以个人资格。过去经过政协，各民主党派发表了支持抗美援朝斗争的联合宣言[2]，还为解放台湾发表了联合宣言[3]。反对战争，保卫和平，这一条有很多文章可做，有些人大常委会不好做，国务院做不完，要由政协来做。

二、商量候选人名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候选人名单以及政协各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人选进行协商，它有这种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人民选举的，但各党派、团体要先进行协商。

三、提意见。当前主要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提意见。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都要改造，这就发生各方面的关系问

---

[1] 艾德礼，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吴努，当时任缅甸总理。他们分别于1954年8月、10月、12月来中国访问。

[2] 指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11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

[3] 指1954年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

题。选举也是有各方面的关系。还有文教、学习也有各方面的关系。比如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协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论问题。将来一万年以后，也还有唯心论，因为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陈旧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论。新旧之间的矛盾，一万年后也还有。社会主义改造是很纷繁的，各种工作就要协商。

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图为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我接到了很多来信。这次由广州回来，经过五个省都找各省的负责同志开了会，调查了农村情形。有人说农民每天只有六两[1]米，这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实际上，说农民苦的是富农，他们拿这

---

[1] 这里用的是旧的市制重量单位，旧制1斤为16两。1959年6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其中说："市制原定十六两为一斤，因为折算麻烦，应当一律改为十两为一斤。"

些话来反对统购统销。农村中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他们过去是贫苦的，是拥护统购统销的。我亲自问过一些农民，他们说每天有米十四两六，加上杂粮每天有一斤粮，不是六两。今年全国粮食产量三千四百亿斤，国家共征购七百七十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其中主要是购的占五百亿斤，征的只二百多亿斤。购的部分国家出公道价，相当于卖给私商的价钱。有的县长、科长、乡长，自己有余粮不肯卖，山西甚至有存几万斤粮的富县长。

今年湖南有三百万户灾民，湖北有五百万户，都安置好了。政府跟着灾民走，每人每天供应一斤粮食，灾民在哪里，供销合作社就设在哪里，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这证明了我们的组织能力，在前几年是没有可能的。

农村中，现在不是征粮问题，也不是灾民问题，而是商业问题。国营商业进得太猛，步子走快了，以致有许多人失业，没有安置好，中共中央已指示要放慢步子。工业原料问题，没有统筹兼顾，一定要统筹兼顾。需要多协商的还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像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可以协商座谈，还有手工业、渔业等问题也可以谈。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国民党的参议会才是投闲置散、虚应故事的，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

宪法的实施问题，巩固人民民主制度问题，政协可以向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意见。政协委员提意见，特别是发议论，说闲话，只要不是破坏性的意见，只要是建设性的意见，即使是错误的，提了也有好处。提意见是合乎章程的。

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过去汉族的统治者不好，压迫少数民族，现在要改变。要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具体的事是协商候选人名单。

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名单是否完全？完全的事情世界上是没有的。这次就把薛笃弼[1]给忘了，将来可以补上。缺点哪年都有的，可以改，可以补救。我们不姓蒋，不是“蒋家天下陈家党”[2]，他们惜墨如金，是党派不叫党派，叫社会贤达。

五、学习马列主义。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列宁主义也是列宁死后别人提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马列主义的东西。

学习是自愿的，不能强制。对马列主义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协常委他只爱国，不愿学习马列主义，也没有办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夹一懒。

我们的国家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民主是商量办事，不是独裁，但集中是必要的。现在还有对敌斗争，拘留条例主要是对付反动分子。对敌人是专政，要压迫他。对地主要剥夺财产，取消政治权利。几个民主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压迫帝国主义分子、地主分子，我们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暴易暴”“党同伐异”。

---

[1] 薛笃弼（1892—1973），山西运城人，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长、国民党政府甘肃省省长、民政部部长、内政部部长、水利部部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2] “蒋家天下陈家党”，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贬称。陈，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部长等职，是国民党CC系的首领。

1954年12月，毛泽东、周恩来、李维汉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1954年，毛泽东和青年代表合影。

给李济深[1]的信

（1954年12月24日）

任潮先生：

十二月二十二日惠书[2]收读。你的意见是对的，已告有关同志注意[3]。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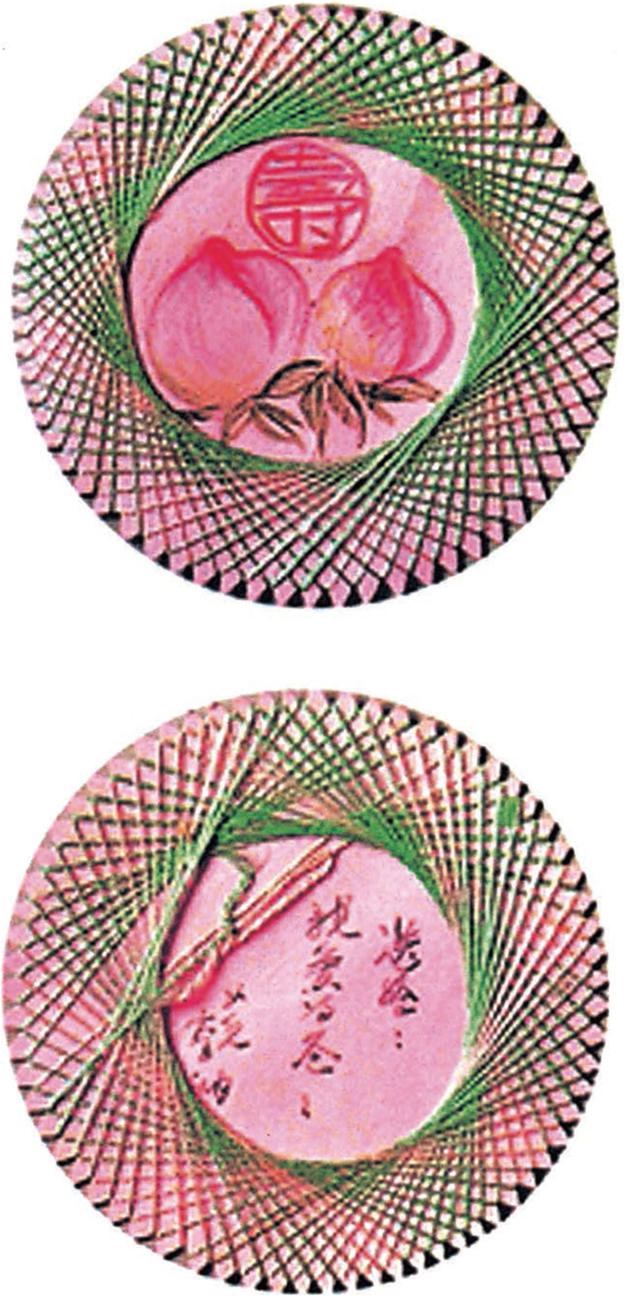
十二月廿四日

---

[1] 李济深，字任潮，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李济深1954年12月22日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信中说：2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1955年发行建设公债案，昨日并由主席公布了。这件事在法律手续上是正确的，但在步骤上我心里总有点不大自然。因为自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政府凡有一件比较大的事，都先经过协商机关座谈一番，然后提交政府委员会通过公布，而于推行上比较更顺利。这次是否因为时间关系，又值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开会，不便提出，故急于如此办理。现在兵役法又要提出了，是否照往例先交政协协商一番，于将来推行似亦有帮助。

[3] 毛泽东在李济深1954年12月22日来信的信封上批有：“刘、周、朱、陈、邓、彭、彭真、陈毅阅，请周酌处，退毛。”


寿
爸爸：
祝贺留念！
大娃
李讷

毛泽东61岁生日时，李讷赠送给毛泽东的生日礼物——寿桃图书签。

给李达[1]的信

（1954年12月28日）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2]，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都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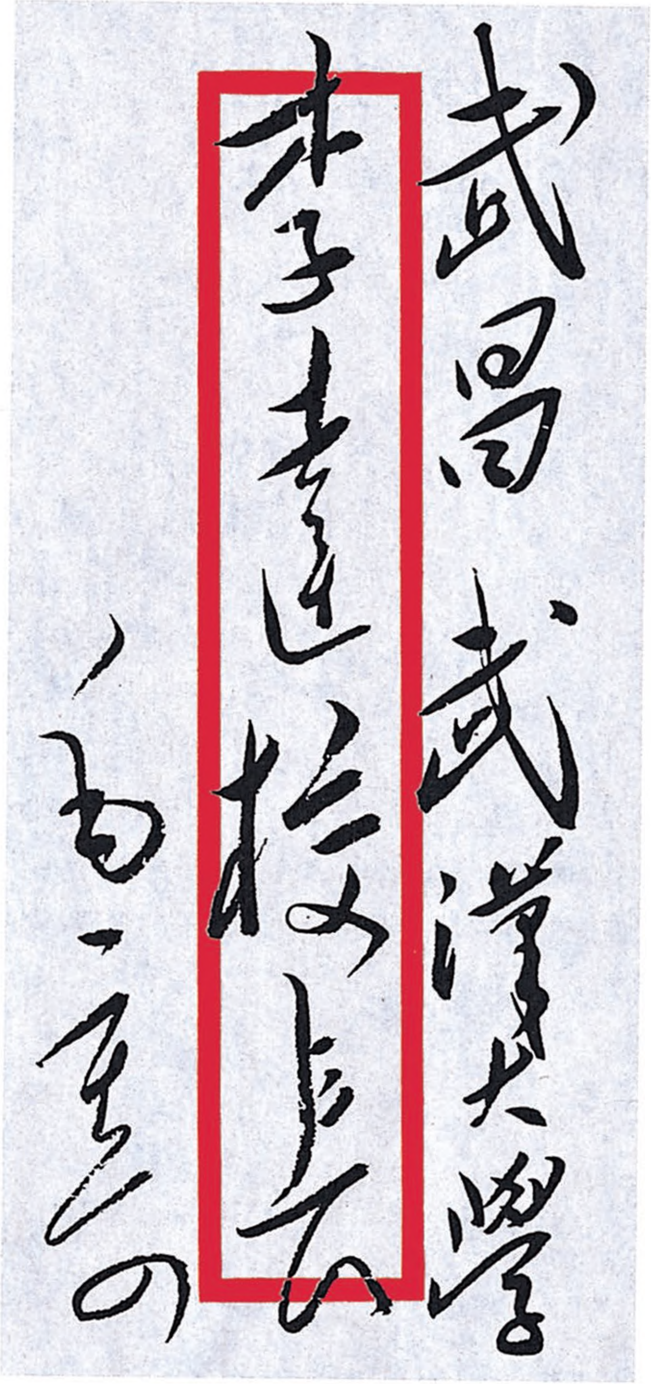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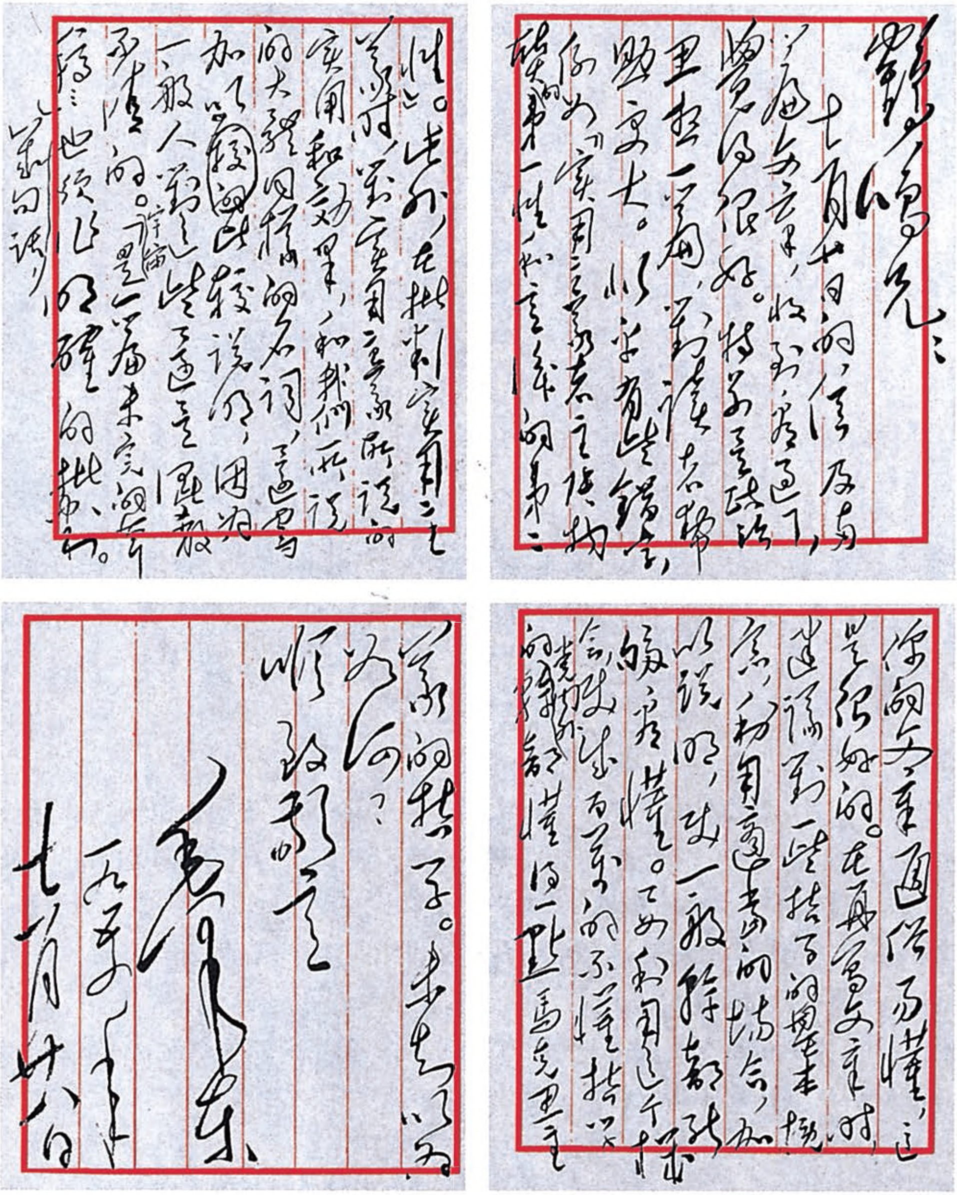
[1] 李达，号鹤鸣，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2] 指李达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和《胡适思想批判》。



武昌武汉大学
李达校长
[illegible]

毛泽东致李达信的信封。



鹤鸣兄：

七月廿日的信及另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谈话里举一两个读者来书，题实大。以下有些错字，你的"实用主义者否认了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实用和效果的大体同样的名词，应当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容易[illegible]混淆不清的。（详论）要一篇来完成的稿，也须作明确的批判。（第二篇的错误）

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基本概念，在用通俗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领会懂得。又如利用这个机会使更多的不懂哲学的党的干部能懂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
七月廿八日

毛泽东致李达信的手稿。

对韶山乡全体农民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4年12月）

一

刘、周、朱、陈、小平、子恢、伯达、尚昆[1]阅，退毛。

韶山乡的情况，值得一阅。

韶山乡五百八十六户，去年卖余粮十二万斤，今年卖二十万斤，增加了八万斤，生活还比去年好。除此信[2]外，现有四位农民来北京，受我招待，他们都说情形很好。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韶山乡全体农民1954年12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一年来，在党和您的正确领导下，您的故乡在实行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乡共有五百八十六户，至今参加互助合作的五百二十户，组织面已达百分之九十二点五。去年全乡卖出余粮十二万斤，今年又卖了二十万斤，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互助合作的道路，使全乡农民大家富裕，共同上升，增加了生产，改善了生活，并以更多的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二

毛月秋[1]，七十多岁，老党员，现受政府命看守我家乡的那个屋子。[2]

三

月秋同志：

你的信，全体农民的信，收到了，十分高兴。请你转告韶山乡的党政同志及全体农民同志，感谢他们的好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廿八日

---

[1] 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接待工作。

[2] 这段批语写在毛月秋1954年12月13日为转交韵山乡全体农民的信而写给毛泽东的信上。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1954年12月30日）

一

刘、周、邓[1]再阅，即发。

在第九、第十、第十一页及其他地方增加了几句话。[2]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4年11月19日关于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稿上加写的文字有4处，见本篇二、三、四、五，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文字。

二

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的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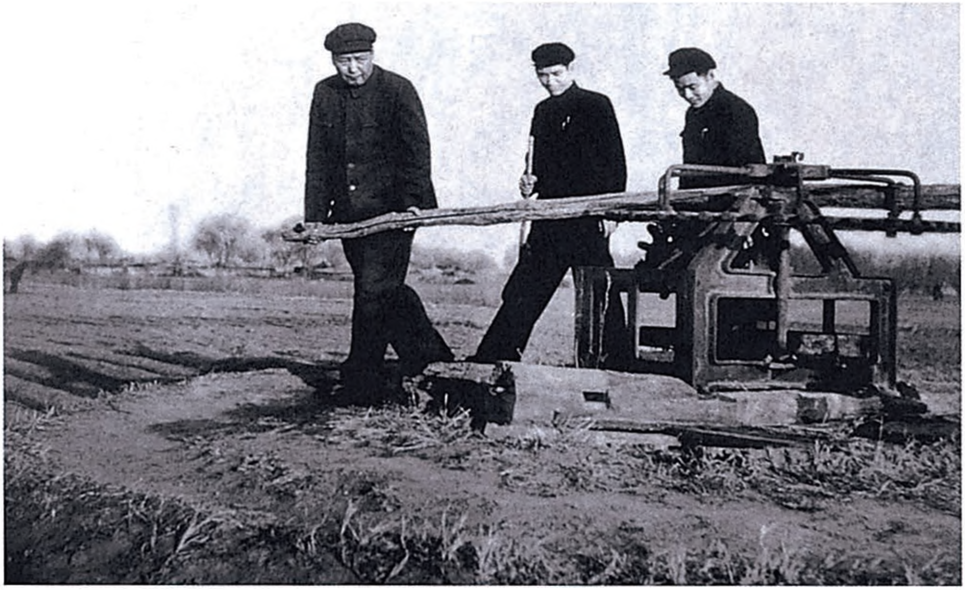
提出依靠包括原来是贫农现在已上升为新中农的人们在内的贫农这个口号，在互助合作的对象（已取得土地的雇农、贫农、中农）范围内，即占了绝对大多数，在农村人口总数内（包括地主富农）也是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在人数上也是占优势的。

四

这里所说的中农是指老中农。老中农在农村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多者百分之四十，少者百分之二十，这个数目仅次于贫农，他们又有较好的经济条件，如果不好好地团结他们，挫折了他们的积极性，那就是极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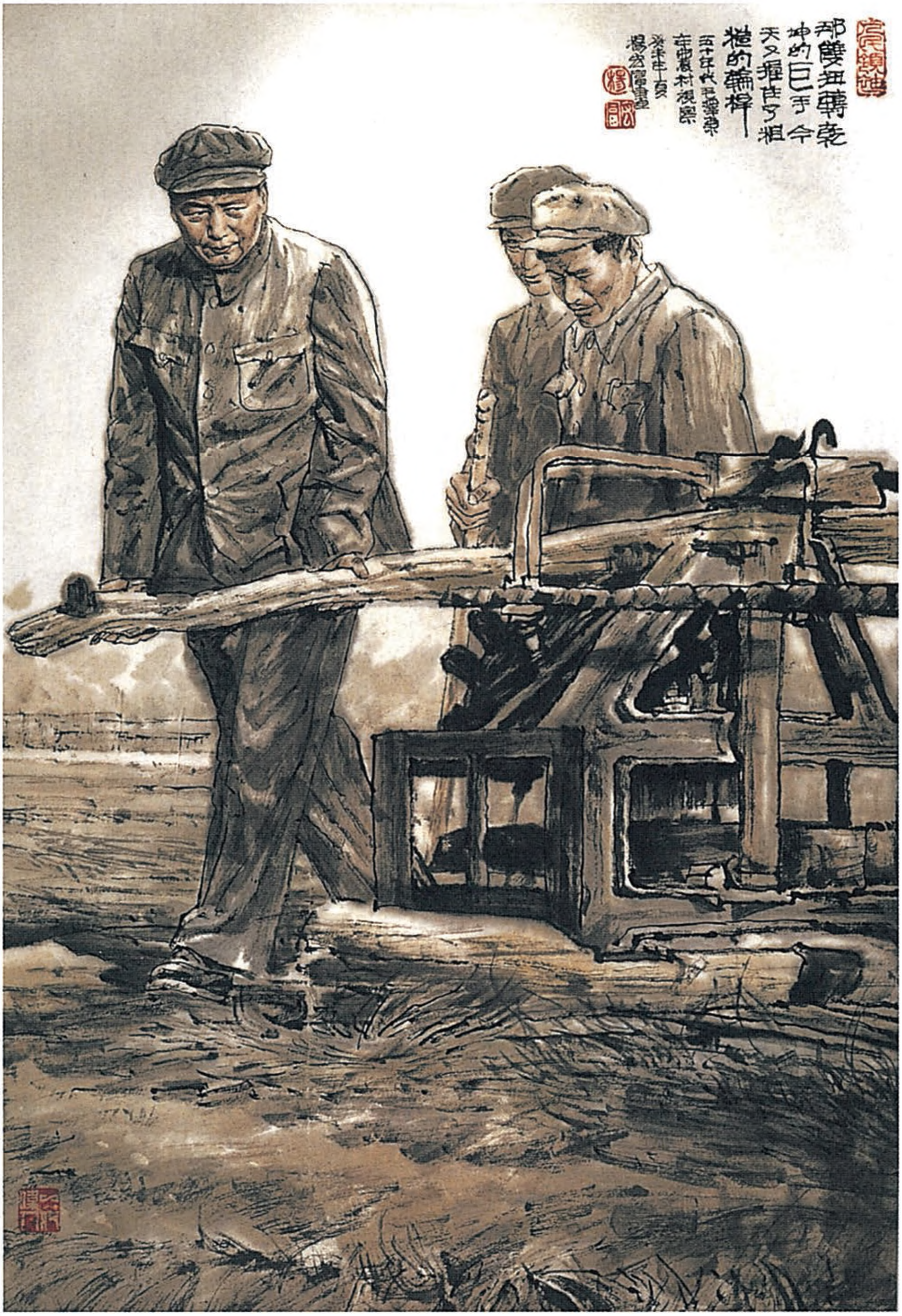
五

干部的提拔、撤换必须遵守社章所规定的民主手续。但应着重注意培养现在仍是贫农的以及贫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同时必须吸收老中农参加领导，并且不能太少，应有十分之三的数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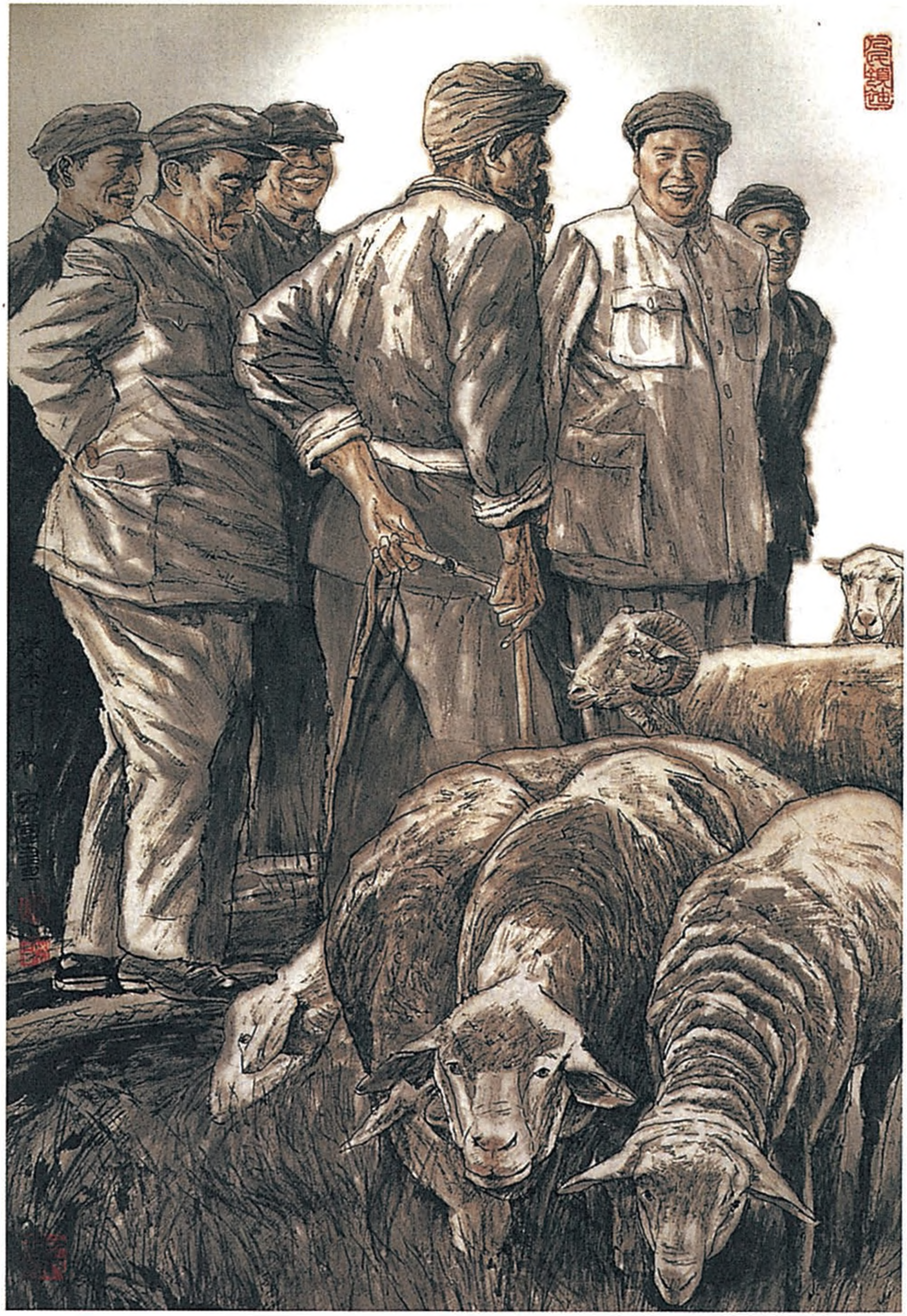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在河北顺义（今属北京）农村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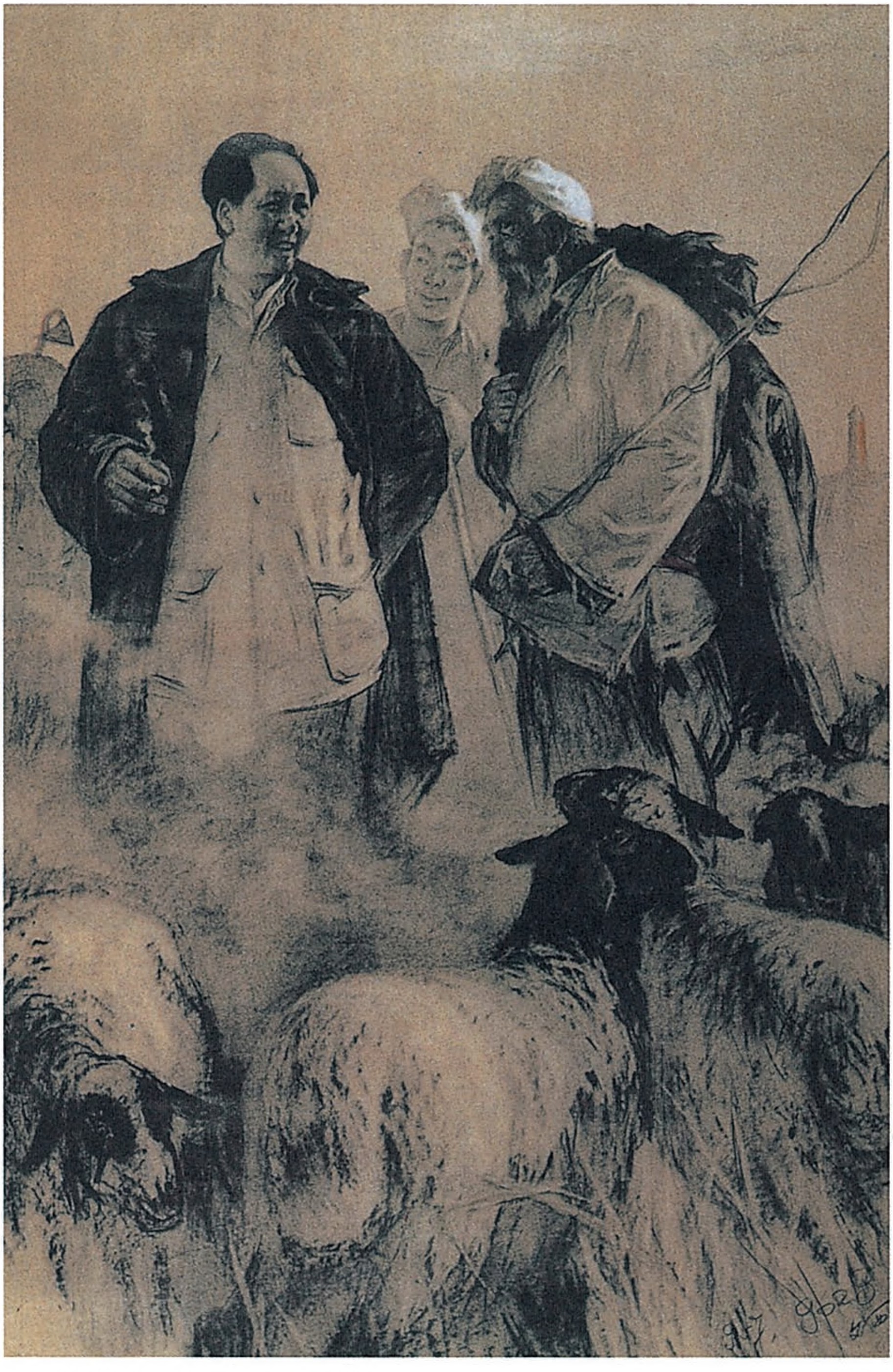
1954年，毛泽东在河北农村和牧羊人交谈。


那雙扭轉乾坤的巨手今天又握住了粗糙的輪桿
五十年代毛澤東在農村視察
癸未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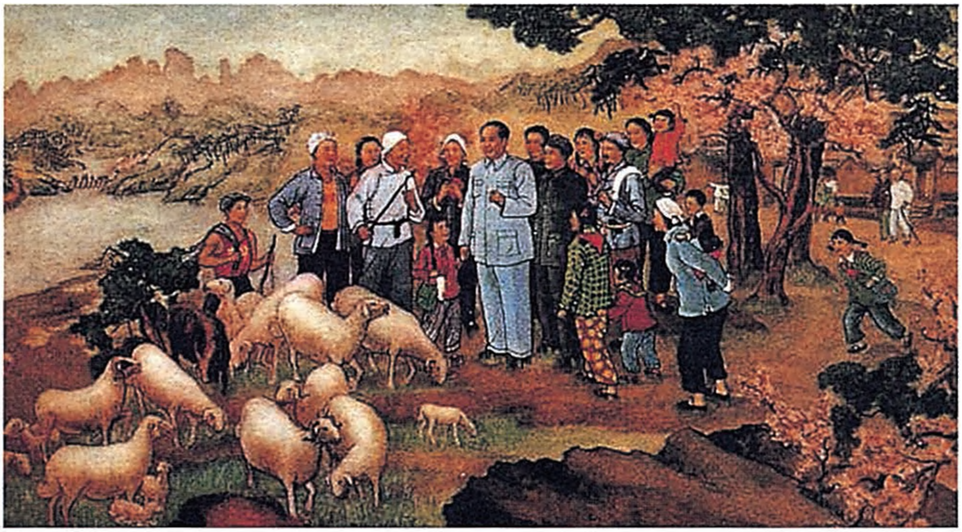
《那双扭转乾坤的双手，今天又握住了粗糙的轮杆》（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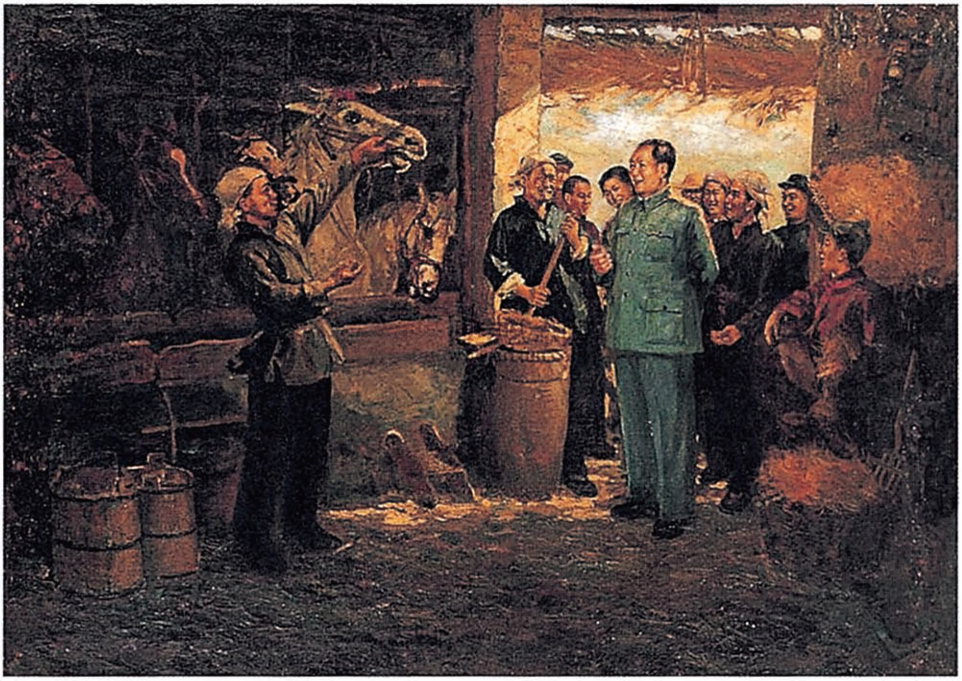
《与牧羊人交谈》（中国画）



《毛主席和牧羊人》（素描）



《毛主席在河北农村》（中国画）



《毛主席在农村》（油画）

关于阅看冯雪峰[1]的诗和寓言的批语

（1954年12月31日）

一

此件[2]送刘、周、朱、陈、邓、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3]各同志阅，退毛。

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

[1] 冯雪峰，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 指冯雪峰写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二

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1]各同志阅，退毛。

冯雪峰的诗及寓言。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越南政府还都河内的电报

（1954年12月3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举行还都典礼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人民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果。祝越南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在巩固和平，实现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毛泽东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为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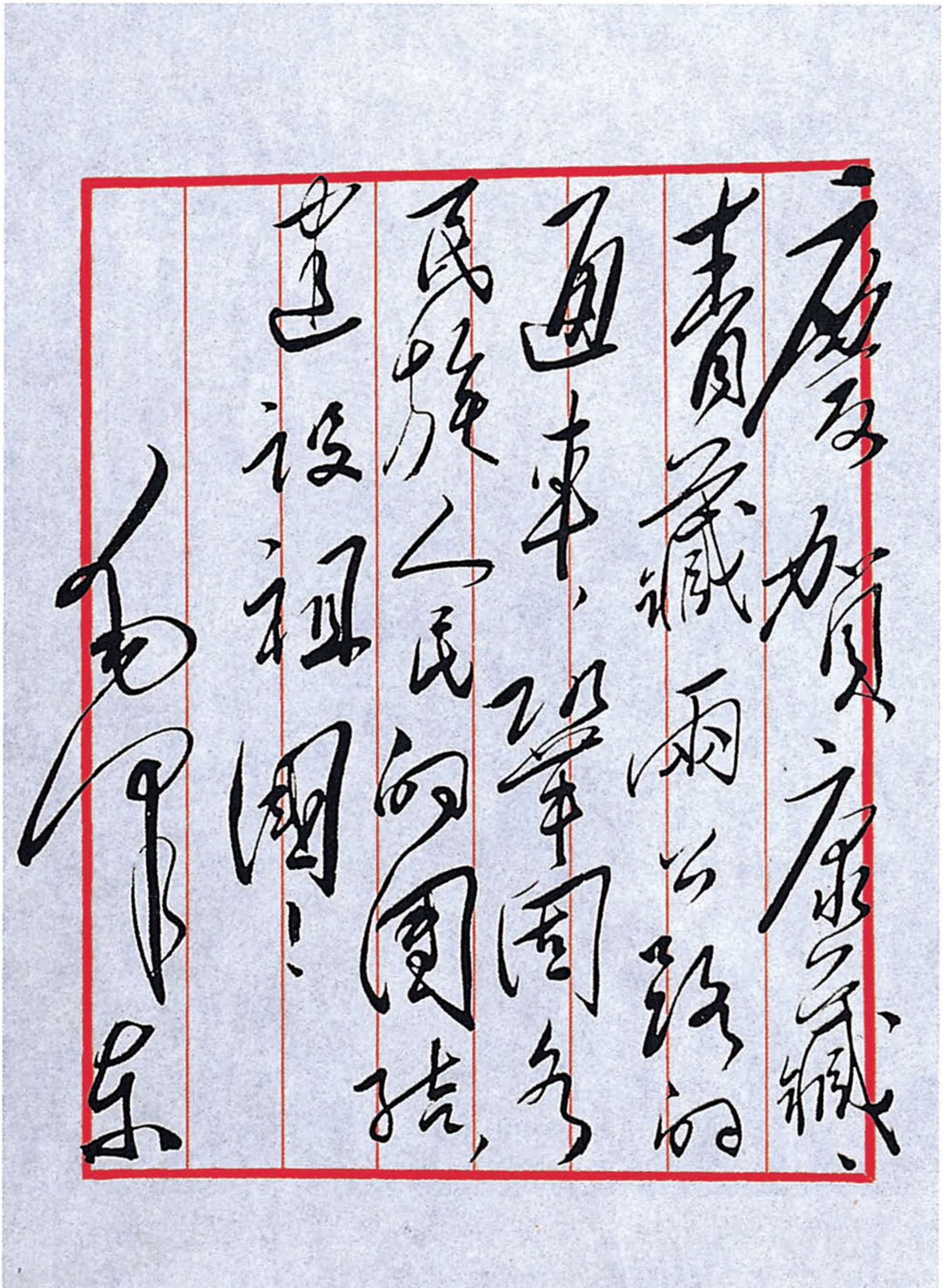
（1954年12月）

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在授予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筑路人员的锦旗上的题词。



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毛泽东

毛泽东为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的题词。

为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外界的联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中央决定修建青藏、康藏公路。图为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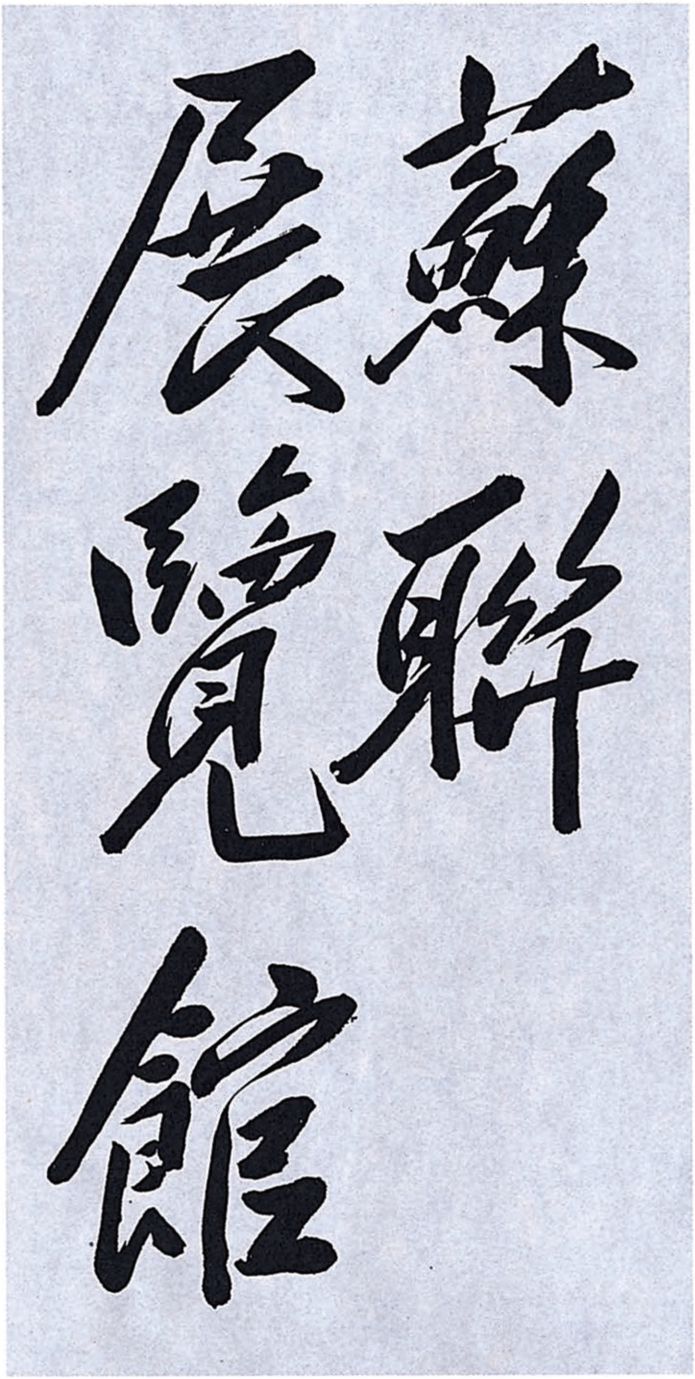
为苏联展览馆题名[1]

（1954年）

苏联展览馆

---

[1] 1953年10月15日，北京“苏联展览馆”工程动工，1954年9月竣工。毛泽东为其题写了馆名。



毛泽东为苏联展览馆题写的馆名。

1955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

（1955年1月2日）

缅甸联邦总统巴宇博士阁下：

值此缅甸联邦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缅甸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并祝中缅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日北京

对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月10日）

一

少奇同志：

在第六页上加了一条[1]，请审阅，此外还有一些修改[2]。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指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时加写的第七条，即本篇二。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稿除加写了第七条外，还将指示稿中的两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并在指示稿第三条谈到“政协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应开会一次，对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委员会的候选名单、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各种名单等，应提到适当的会议上进行协商”之后，加写了“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协商会议每年至少要有四次，即平均每季有一次；此外还应有一些对若干个别问题的协商会议”一段文字。

二

必须指出，在强调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任务的时候，不要忘记又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民主人士中存在着的政治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倾向，必须加以分析，并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的方式向他们指出，有些应当提出批评，或加以讨论，以达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改正错误的目的。认为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可以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关门主义的“左”的偏向，又要反对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居的右的偏向。

关于同意国家不为个人祝寿的建议的批语[1]

（1955年1月12日）

退彭真。

同意这样处理。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1955年1月3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的信上。信中说：黄炎培副委员长曾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写信，提议国家不为个人祝寿。我觉得，借黄的提议，把国家做寿的例停止了为好，免得成了惯例，国家要一个接一个地为多人祝寿。如果中央决定接受黄的提议，废除已开之先例，我即把黄炎培的信在常委适当范围内传阅，并在和几个民主人士碰头时，用征求意见的方式作适当酝酿，非正式地和党外人士商得一致意见。

对中国作协关于公开印发胡风[1]给中央报告的部分内容的说明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月12日）

一

刘、周、邓[2]即阅，退陆定一[3]同志，照办。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增改[4]。

---

[1] 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4] 见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胡风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报告[1]，经中共中央交本会主席团处理。本会主席团认为该报告中关于文艺思想部分和组织领导部分，涉及当前文艺运动的重要问题，主要地是针对着一九五三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2]而作的反批判，因此应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现在决定将胡风报告的上述两部分印成专册，随《文艺报》附发，供读者研究，以便展开讨论。为便于读者研究，将林默涵、何其芳的两篇文章也重印附发。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二日

---

[1] 指胡风1954年7月向中共中央提交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写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载《文艺报》1953年第二号）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写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载《文艺报》1953年第三号）。

关于不能由政府向党委下达内部命令的两个批语[1]

（1955年1月13日、17日）

一

刘、周、邓、先念、陈毅、仲勋、尚昆[2]：

这是财政部**党组**写给**国务院**，请它“**批转**各省市**党委**”的一个报告。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毛泽东这两个批语，其一写在财政部党组1955年1月11日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央的报告上，报告末尾请求国务院将这个报告批转各省市党委；其二写在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5年1月14日关于全国财经会议拟讨论的主要议题和初步意见给各省市委、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并报中央的电报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刘、周、邓、先念、陈毅、习[1]、尚昆：

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

[1] 习，指习仲勋。

在周扬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1]

（1955年1月15日）

刘、周、小平阅，退周扬同志：

（一）这样的声明[2]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55年1月15日关于同胡风谈话情况给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昨晚胡风来谈话，表示承认错误，说他是以小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思想方法片面，并有个人英雄主义，以致发展到与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相对抗，并说希望不要公开发表他1954年7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如要发表，也希望作些修改，并在卷首附上他的一篇声明。

[2] 指胡风1955年1月13日写的《我的声明》，主要内容是：一、1954年7月我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铀矿地质人员。

对中央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1]的批语

（1955年1月24日）

可用。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

[1] 中共中央1955年1月下发的这一通知中说，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错误思想的批判已告一段落，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初步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这些思想斗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通过对我国知识分子所熟悉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来具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向人民群众宣传唯物主义思想以提高他们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因此必须在大约500万有阅读能力的党内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中认真地进行教育，具体地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树立唯物主义思想，才能通过他们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为此，有必要采取演讲的方式，利用业余时间，向党内外500万知识分子讲解目前正在展

开着的思想批判的重要意义，结合当地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通俗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具体办法是：一、在各大城市，由当地省市委负责，利用公共场所，指定一批有演讲能力的报告员，进行演讲，并组织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前去听讲。二、报告员除指定适当的党员担任外，也可请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担任。三、演讲的内容可以参照北京各报刊已发表的批判胡适、俞平伯、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四、北京各报刊已发表的有关思想斗争的好文章，将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宣传通讯》上陆续介绍。五、好的演讲稿可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或寄交北京的报刊发表。六、此项演讲应在2月开始。七、应当把演讲的地点和时间逐渐固定下来，并增加新的内容，使之逐渐成为向知识分子和干部宣传唯物主义、时事问题和重要政策等的定期讲坛。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5年1月24日）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值此印度共和国国庆五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印度人民和阁下致热烈的祝贺。愿中印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日益巩固和发展，并祝印度共和国繁荣，印度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稿给陈云[1]的信

（1955年1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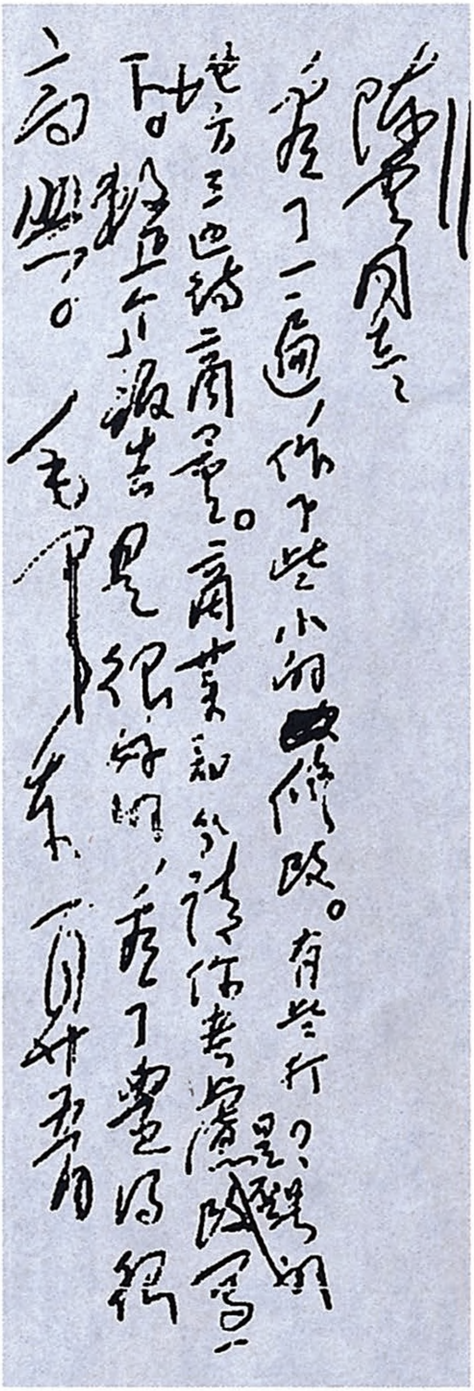
陈云同志：

看了一遍，作了些小的修改。有些打？号的地方还待商量。商业部分请你考虑是否改写一下。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代表中央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陈云同志：

看了一遍，作了些小的修改。有些行是累赘的地方已改，请商量。商业部分请你考虑改写一下。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

毛泽东致陈云信的手稿。

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55年1月26日）

请少奇同志处理。[2]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月26日呈送报告上写给刘少奇的批语。

[2] 彭德怀1954年12月2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讲了9个问题：（一）为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服役条例和军官薪金三大制度。（二）为了减少军委领导单位，便于战时防空指挥和工作领导，全国划分12个军区，各省军区仍然保留。（三）公安部队整编问题。继续执行各省公安部队由省军区统一领导的决定。为逐渐建立我国的警察制度，一部分公安部队改为警察的方针应肯定不变。（四）部队军事训练与干部军事学习问题。1954年1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已决定，以部队军事训练工作为全军的工作中心，培养教育干部的学校工作则为中心的中心。这是因为部队军事训练成绩的优劣，各级干部学习军事科学成绩的优劣，将是决定今后我军战斗力高低的基本标准。为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设立军事训练总监部。（五）纯洁内部问题。把从成分上政治上纯洁我军成员特别是干部作为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六）提高干部思想觉悟与防止腐化堕落问题。（七）培养20万个有战斗经验的初级干部。（八）建立武装力量监察部。（九）国防工事构筑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1月26日会议修改通过这一总结报告。刘少奇1月27日批示：“彭德怀同志阅后，交尚昆同志发出。”

对梁漱溟[1]《告台湾同胞》一文的批语[2]

（1955年1月27日）

刘、周[3]阅，退陆定一同志。

陆拟各点均可不改，只在文尾倒数第三行第二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毛泽东

一月廿七日

---

[1] 梁漱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55年1月19日关于修改和发表梁漱溟《告台湾同胞》一文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陆定一在报告后附送了他对该文的几点修改意见。《告台湾同胞》后来发表在1955年2月3日《人民日报》和1955年2月5日香港《文汇报》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接受芬兰驻华大使孙士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5年1月28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递交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您所转达的芬兰共和国总统的友好愿望。

四年来，中芬两国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大家知道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交往几年来是以多种形式进行的，特别令人满意的是两国贸易关系和文化联系顺利发展的情况，两国贸易年年都有发展而且贸易协定都是圆满完成的。一九五二年中国杂技团的访问芬兰，一九五三年以吉科宁[1]夫人为首的芬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和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国对外贸易部雷任民副部长应芬兰政府邀请访问芬兰都在两国人民中间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大大地增强了中芬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和平合作的信念；中芬两国的友好合作的关系充分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的。现在我们两国已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互相派遣了大使，这标志着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的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

[1] 吉科宁，1953年任芬兰共和国外交部长。

中芬两国有着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而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进，也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和巩固。我们相信，中芬两国间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将不断加强和发展。大使先生，我对您所表示的两国代表人物多作直接接触的愿望，表示欢迎。

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芬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中、芬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您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并祝芬兰共和国的繁荣、芬兰人民的幸福和芬兰共和国尤·库·巴锡基维总统的健康。

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1]

（1955年1月28日）

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同芬兰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有过战争，都是这些国家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的，比如英法联军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参加侵朝战争的有十六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这些侵略国家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朝、中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六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

---

[1] 这是毛泽东在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孙士教递交国书的时候谈话的要点。

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末，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俄国把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扫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中国把蒋介石和地主推翻了，东欧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也解放了。美国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八年或十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他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搞“颠覆活动”。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洲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给杨树达[1]的信

（1955年1月29日）

遇夫先生：

惠书及大著数种收到，甚谢！尊恙向愈，极慰。待完全康复之后，欢迎先生来北京一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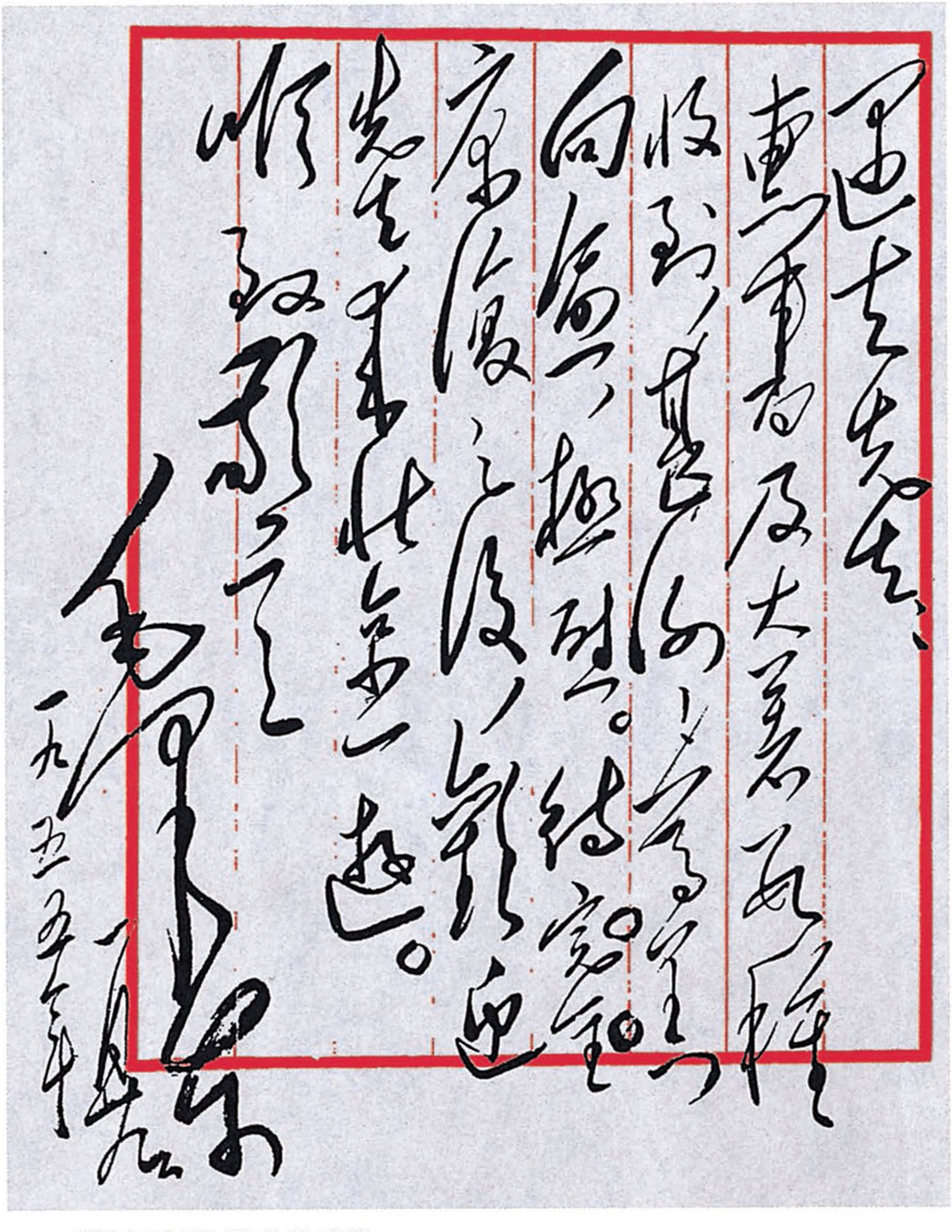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九日

---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和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遇夫先生：

惠書及大著兩種收到，甚謝！尊恙向愈，極慰。待完全康復之後，歡迎先生來北京一遊。

順致

敬意！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一月九日

毛泽东致杨树达信的手稿。

给章士钊[1]的信

（1955年1月30日）

行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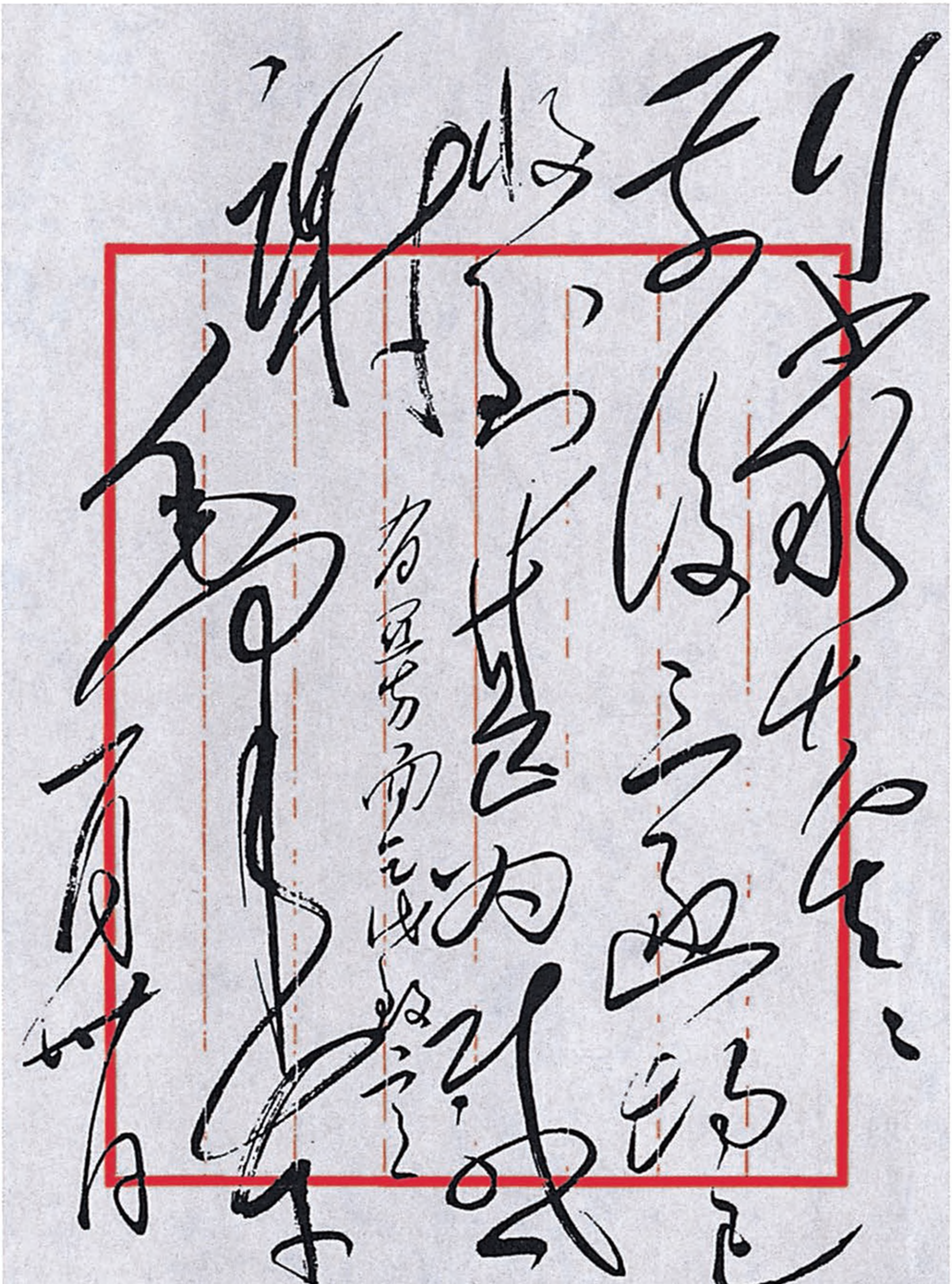
前后三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有关方面乞代致意。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在金韫颖《自述》上的批语[1]

（1955年1月）

一

周总理阅，并请考虑是否须酌予处理。

毛泽东

二

走进了人民群众，变成了一个有志气的人。

---

[1] 本篇是毛泽东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妹妹金韫颖的《自述》上的批语。其中：一写在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关于《自述》的内容简介上，二写在《自述》的最后一页上。金韫颖在东北解放后曾在通化摆烟摊维持生活，1949年来北京，后参加街道工作。她写的《自述》由章士钊转送毛泽东。1955年1月章士钊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特献一满洲女子之自述册子，备公作太平广记观，为几余涤虑之助”，并请求对金韫颖“优予提振”。

关于改善法院审判作风的批语[1]

（1955年2月1日）

少奇同志：

此件[2]可以批发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及政府党组，并登党刊，借此引起法院——工作人员注意——改善审判作风。至于错判“放蛊”事件，不过是不良作风表现在若干案件上面而已，应使重

---

[1] 这个批语写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1955年1月21日关于报送湖南省人民法院对绥宁县“放蛊”案件的检查给中央的报告上。

[2] 指湖南省人民法院1954年10月28日关于绥宁县“放蛊”案件的检查报告。报告中说，在湘西绥宁、靖县、会同等边远县份，自解放前就有“放蛊”的迷信传说，其中以绥宁最为严重。所谓“放蛊”，传说是把蜈蚣、乌烟虫、甲甲虫等有毒的昆虫烤焦碾成粉末，由“蛊婆”事先藏在指甲内，偷放在饮料和食物中，谁吃了就要中“蛊”。这个传说使绥宁一带群众深为恐惧，一些区乡干部也深信不疑。该县人民法院盲目受理了大量的所谓“放蛊”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又只重口供，不重证据，甚至采取逼供、诱供等错误的审讯方法，乱捕乱押，结果造成大量错判。不但对被告造成冤狱，而且由于对“放蛊”案件的判处，实际上在法律上承认了“放蛊”的存在，支持了迷信传说在群众中的传播。报告说，全省各级法院应对过去判处过的“放蛊”案件全部进行检查，凡属错判应即平反，并深刻检讨错误根源，认真订出改进审判工作的具体办法。报告还建议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请卫生部门配合宣传科学的医务知识，解除对“放蛊”迷信的疑惧，以遏止“放蛊”的继续流传。

点放在改善作风。

毛泽东
二月一日

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时我军不要向港口一带射击的批语[1]

（1955年2月2日）

彭德怀[2]同志：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1955年2月1日关于海岸炮兵使用的建议给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电报上。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对陆定一[1]关于处理保加利亚文版《毛泽东选集》稿费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2月3日）

照办[2]。

毛泽东

二月三日

退回为好。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陆定一1955年1月7日给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外交部转来保加利亚共产党出版社付给毛泽东的保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稿费7299400元支票一张，请示如何处理。过去匈牙利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也送过稿费，外交部征询我们意见，我们认为以转送匈牙利为宜。这次保方送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稿费，我们建议转送保共中央，并建议今后凡此类问题均将稿费转送各该国兄弟党。

给陈嘉庚[1]的信

（1955年2月3日）

嘉庚先生：

一月十八日惠书及附件业已收到阅悉，甚为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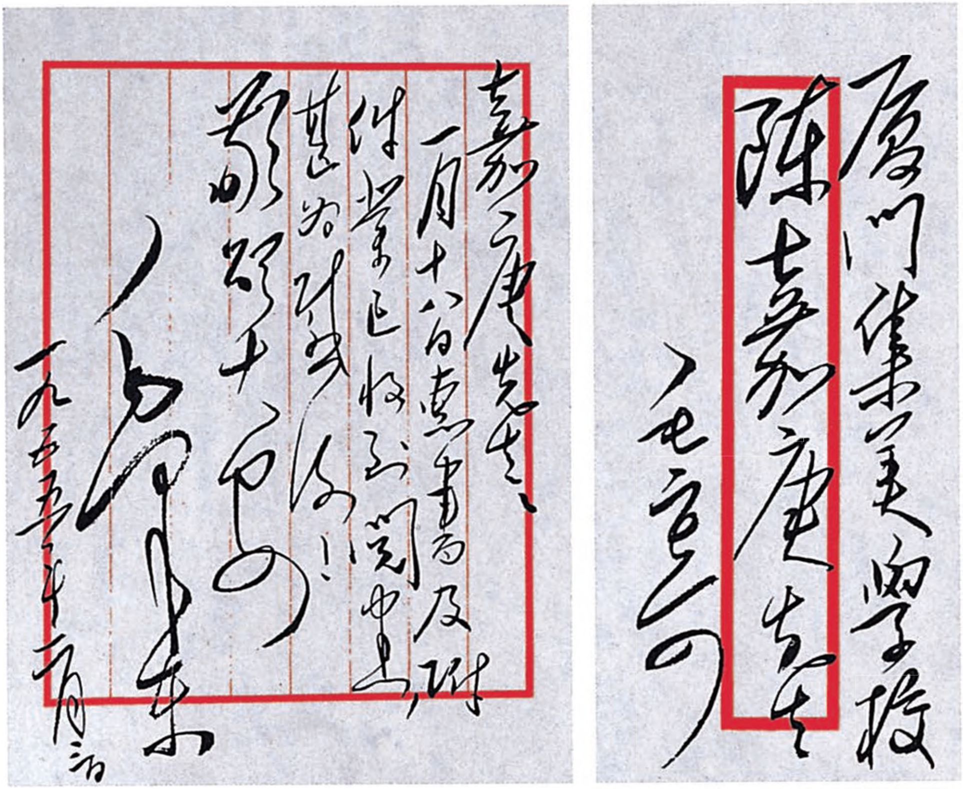
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嘉庚先生：

一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业已收到，阅悉，甚为感谢！

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三日

厦门集美学校

陈嘉庚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致陈嘉庚信的手稿。

对周敦祥[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5年2月3日）

一

将此信[2]转寄湖南省委统战部，看是否能在省参事室及文史〔馆〕给以位置。

毛泽东
二月三日

二

敦祥先生：

来信收到。尊况甚表同情。已请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酌量设法

---

[1] 周敦祥，五四时期曾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1955年4月后被安排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 指周敦祥1955年1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1921年她曾和张国基一起到南洋办教育，1935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因找不到正式工作，曾想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因华北革命大学从第四期停办，学习未成，工作不得，经济困难，个人生活也无法维持，希望毛泽东能给她介绍一个工作。

为助，未知能如愿否，你可就近接洽。如有急切困难，尚望见告。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二月三日

对错发《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的批语[1]

（1955年2月6日）

彭[2]，并粟裕同志：

应召集有关人员（包括新华社）开一次会，具体规定实行军委一月十二日指示[3]的办法，并对华东军区有所批评与指示。

毛泽东

二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1955年2月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并报军委、中央的检讨报告上。报告说，1955年1月20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华东军区首长电贺解放一江山部队》的新闻，是在主管首长不在的情况下，由秘书擅自答复同意发表的，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同时，发布这个贺电也违反了中央军委1955年1月12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此类贺电和嘉奖令对外发布宜用国防部名义、对内发布宜用军委名义的指示，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后当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克服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2] 彭，指彭德怀。

[3] 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5年1月12日关于战报与军事新闻发布问题的指示。

关于请邓小平[1]督促进行全党干部审查问题的批语[2]

（1955年2月8日）

刘、周、陈、邓、彭真[3]同志阅。

此件值得看一下。全党干部审查问题，请小平同志督促进行。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谭政、傅钟、肖华、甘泗淇1955年2月8日关于军队审查干部工作的初步情况给毛泽东、彭德怀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的命令[1]

（1955年2月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第六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

给毛森品[1]的信

（1955年2月10日）

森品兄：

惠书收到。

寄上人民币二百万元[2]，以为尊恙医疗之助。为了实行你的节约主张，希望你不要来京。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日

---

[1] 毛森品，毛泽东少年时期在湖南省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这里是以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按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的新的人民币折算，合200元（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

给张之江[1]的信

（1955年2月11日）

之江委员：

惠书早已收到。本想约谈，因循未果。近日查询，知先生已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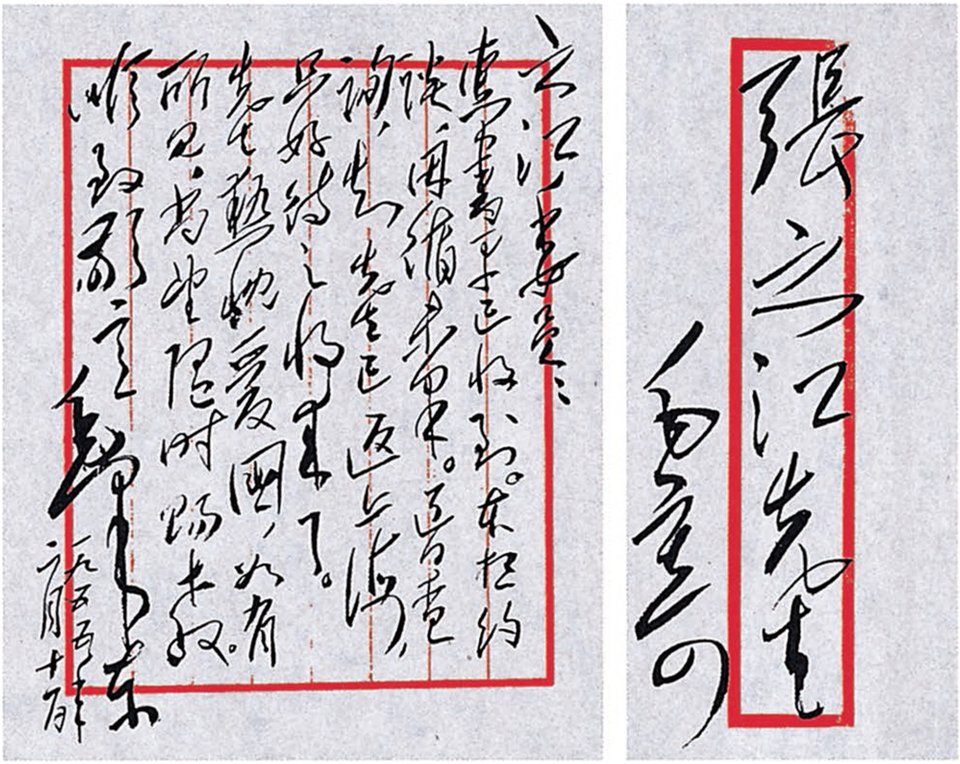
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

---

[1] 张之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之江先生：

惠书手迹收到。东征纪读，再续未完。本当面询，先生近返上海，只好待之将来了。先生热忱爱国，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赐教。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

張之江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致张之江信的手稿。

关于公布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的命令[1]

（1955年2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第七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55年2月1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五年来，中苏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有了广阔的发展，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了我们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以全面的、系统的和无微不至的援助。苏联政府先后帮助中国新建和扩建共达一百五十六项的巨大工业企业，派遣大批优秀专家帮助中国建设，几次给予中国优惠贷款，将中苏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和苏联机关于一九四五年在中国东北境内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获得的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将中苏合营企业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并决定把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和该地区的设备交由中国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议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

面给予中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这种友好的合作和真诚的援助，极大地推进了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并向全世界显示了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伟大生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到这种兄弟友谊的无上珍贵，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伟大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苏两国友好同盟的巩固和发展，对保证我们两国的安全和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苏两国的和平政策，推动并促成了朝鲜的停战和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使国际紧张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鼓舞了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中国人民热烈地支持苏联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反对武装西德而进行的斗争。中苏两国愿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并积极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独立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道路。中苏两国的真诚合作不仅符合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亚洲、欧洲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它是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

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正在到处推行战争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目前美国在台湾地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挑衅，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它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谴责。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台湾的斗争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中苏两国的友好同盟，在新的国际紧张局势下，在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必将日益发挥它的重大作用。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伟大的和平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条约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方面的伟大作用，今后的生活和实践将更加显示出这个条约的巨大力量和无限光辉。

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繁荣，为了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巩固，愿中苏两国间的伟大友谊日益发展。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于北京

在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955年2月14日）

我庆祝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

这种合作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我相信，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

在我们中苏两个伟大的国家的合作之下，我相信，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是要被粉碎的。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中苏两国的伟大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它们一定要被彻底粉碎。只要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和全世界人民就一定要将它们从地球上消灭干净！

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身体健康干杯！

1955年，毛泽东观看莫斯科“小白桦树”舞蹈团演出后会见演员。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5年2月20日）

刘、周、陈、邓、彭真[1]同志：

五年计划纲要第二稿，我已看过一遍，有些意见，已告陈伯达[2]同志。请你们**即于日内**分别找伯达谈一次，将你们看过后的意见告诉他，或将你们修改的本子交给他，连同其他同志的意见，由他汇集起来，加以修改，加上地方计划一章，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印出第三稿。那时我们可以看第三遍，可于三月十日左右印第四稿，即可作为基本定论。

明后天我开始看高饶问题文件[3]，看完再集谈一下。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3] 指准备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等文件。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的电报

（1955年2月21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值此苏联军队建军三十七周年之际，请接受我们的热烈祝贺。

光荣的苏联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以无敌的威力摧毁了法西斯势力，保卫了欧洲和世界文明，对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无可估量的贡献。现在，正当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加紧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准备原子战争、进行战争挑衅、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的时候，强大的和久经考验的苏联军队乃是保卫世界和平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根据中苏协定驻守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苏联军队，五年来，在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给了有力的支援。现在，当他们根据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苏联合公报即将撤离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苏联政府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及其军队，致衷心的感谢。

祝苏联军队在加强自己祖国的国防力量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事业中获得更光辉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对邓小平[1]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55年2月、3月）

一

刘、陈、彭真[3]、小平阅后，交恩来同志：

高、饶联盟文件已看了一遍，全文可用，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从第九页起括掉了两段[4]，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宜这样地在这里辩论，括掉后似乎要好一些，请你们斟酌。刘、陈、彭、邓各同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本篇收入毛泽东对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稿的三个批语，其中：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5年1月22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上；三写在3月10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次修正稿上；四写在3月19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之一《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上；二是毛泽东在1月22日印发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三次稿）上加写的一段话。

[3]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4] 毛泽东删掉的报告稿中的两段话，主要是批驳高岗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等问题的。

志的修改意见，请于日内即交恩来，以便明日或后日谈一下。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

二

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我们曾经进行严肃的斗争驱逐了这些叛徒。有些同志觉得高饶反党联盟是难以理解的现象，这是不了解党的历史、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的原故。

三

即送胡乔木[1]同志：

此件你阅后请送恩来同志阅，最好能于今天或明天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今晚或明晚即印发党代表会议参加者。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四

退邓小平同志：

在第二页，第十一页，第二十二页，第二十九页，第三十页上有点修改[1]。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

[1] 毛泽东对1955年3月19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文件之一《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所作的主要是文字上的修改，其中：在第2页上，毛泽东将原报告中“我们的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一句，改为“我们的党已经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在第11页、第30页上，将原报告两处说的“高岗、饶漱石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删去了其中的“个人主义”四个字。在第22页上，将原报告中“饶漱石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想，对山东省的工作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一句，删去了其中的“特别”二字，并在旁边批道：“这里不要‘特别’二字，因为饶对上海的危害也许比山东还大些。”在第29页上，将原报告的第五项中“中央政治局认为”一句，改为“中央委员会认为”。

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的谈话

（1955年2月2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庆祝你们这个民族的节日。你们在北京过藏历年[2]，我们很高兴，全国人民都高兴。我们汉人也有两个年，一个是阴历年，这是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保留下来的习惯，到现在绝大多数人还都过阴历年。另外一个是阳历年。

达赖喇嘛（以下简称达赖）：我们今年在内地过了三个年。

班禅额尔德尼（以下简称班禅）：我们已经去东北参观了，我不久将要去华东参观。在东北参观中，看到了许多重工业的建设，感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会很快地建设成，感到无限的高兴。

毛：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工业很不发达，有许多机器我们自己还不能制造，我们没有大量的钢。但这不要紧，我们可以建设，再过五十年，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我们的国家过去是常受人欺侮的国家，欺侮我们最可恶的是美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本来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然条件及气候也好，只是过去由一些坏人在这里领导，政治上不好，因而各方面比一般的先进的国家落后一百多年。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1955年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的新年。

在我们的国家里，许多地方还很落后，西藏也是落后的，这是应该承认的。我们承认落后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向苏联学习。这样，我们向先进的民族和国家学习，在我们内部各民族互相学习，亲密团结，共同建设，那末我们各民族都有希望，全国都有希望。

达赖：我们到每个地方参观的时间虽然很短，但由于是亲兄弟般的关系，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处都很融洽。

正如主席指示的，我们西藏各方面的条件都很落后。但我们可以向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

毛：落后不要紧，在汉人地区也有许多落后的地方，和西藏一样，将来都要搞好。

班禅：过去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西藏是很落后的，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有信心团结西藏人民，发展西藏的各项建设事业，使它进步。

毛：我有信心。在你们两人的领导下，西藏的事情一定会做好，但不要急，慢慢地来，做事情要取得大多数的同意。固然在三五年之后，做好事还会有人反对，但反对者不是老百姓，而是贵族、官员、头人和寺院的堪布[1]等。你们应该像老师一样地去教育他们，要耐心地团结他们。

你们根本不前进，我们是不赞成的。我们欢迎你们进步，但是你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大家团结一致地搞工作，不能因在内地看到了一些建设发展情况而着急。过去有些共产党员去苏联参观，

---

[1] 堪布，藏传佛教寺庙中教职名称。

看了苏联的先进情况，回来后也有些急，想一下办很多好事，但条件不成熟，好事办成了坏事。

做事情应广泛地和大家商量。比如藏钞问题[1]，起初噶厦[2]不同意，你们向他们解释，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样做很好，你们很会办事。我们在中央办事也经常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和你们商量，请你们放心，我们不会强迫你们办任何事情。

---

[1] 西藏和平解放后，藏钞与人民币币制不统一带来的一些问题，妨碍了西藏经济的发展。中央有关部门和西藏工委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停止印发和逐渐收回藏钞。1955年1月，达赖喇嘛和阿沛·阿旺晋美提出，请中央财政提供400万银元交西藏政府兑换收回藏钞，同时请中央财政每年提供70万银元补助西藏地方财政赤字，在西藏地区逐渐过渡到单一使用人民币，得到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同意。1959年西藏叛乱平息后，藏钞由中国人民银行西藏分行进行收兑，完全停止了流通。

[2] 噶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在达赖、班禅[1]为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1955年2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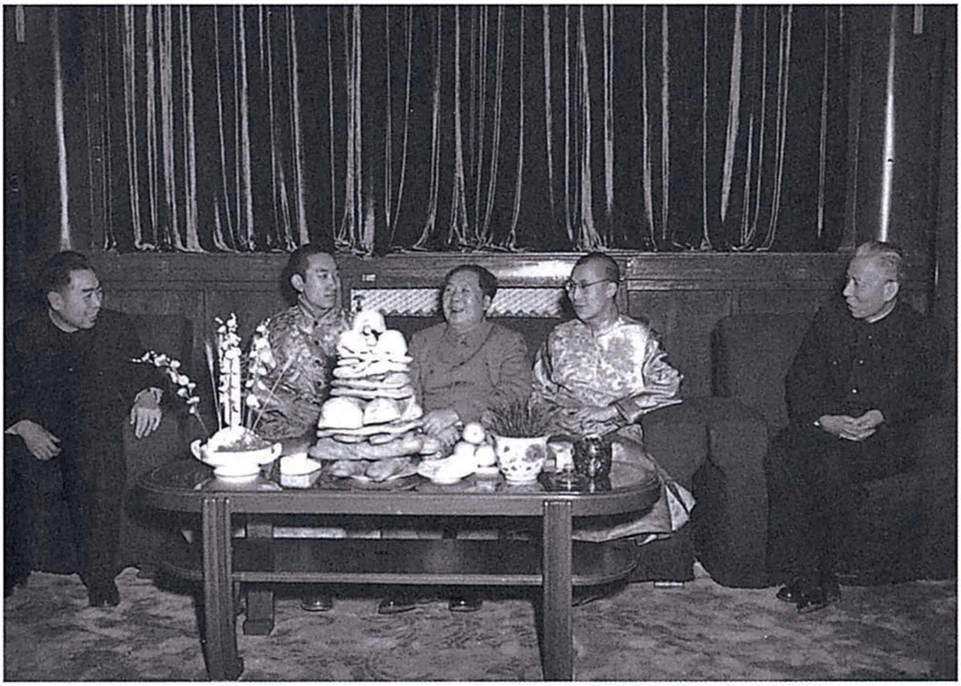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当着藏族新年的时候，让我们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祝贺，向西藏全体在京人员祝贺，向西藏和其他地区的全体藏族人民祝贺！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各民族间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间以及藏族内部的团结，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让我们为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健康，为西藏全体在京僧俗人员的健康，为我国民族的大团结而干杯！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庆祝藏历木羊年新年宴会。图为宴会前毛泽东和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一起交谈。

关于注意处理群众自愿入社问题给林铁[1]的信

（1955年3月5日）

林铁同志：

此事[2]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五日

---

[1]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

[2] 指毛泽东的卫士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中反映的河北省安平县一个村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简单化地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

不能承认“两个中国”[1]

（1955年3月5日）

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您经由尤金[2]同志转来的电报，已于二月二十八日收到了。

我们同意苏共中央的意见，即现在就台湾和其他中国岛屿地区的局势问题更详尽地交换意见，并共同确定一个大致的行动计划，是适时的。我们也同意您来电中提出的关于实施解放台湾任务的基本方针。

目前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情况是：蒋介石军队已经从中国浙江省沿海各岛屿全部撤退，留下的尚有福建省的马祖和金门诸岛共十三个岛屿。在马祖诸岛上，现有蒋介石军队四千人，在金门诸岛上，有五万一千人，连其他小岛在内，总共约有六万余人。

为了有把握地进行解放马祖和金门诸岛的军事行动，我们正在积极修建福建省的军用公路和机场。这些准备工作，大致需要半年至一年才能完成。从江西省鹰潭连接到福建省厦门的铁路约需要三年到四年工夫才能修通。

我们认为，即使夺取马祖和金门的准备工作做好，是否就发起军事行动，也还要看当时美国军队在沿海岛屿地区的具体情况再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复信。

[2]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定。马祖方面敌人兵力小，防御力量弱，金门方面敌人兵力稍多，但逼近大陆。目前在台湾海峡靠近沿海岛屿地区，美国想长期维持一个包括数艘航空母舰的庞大舰队是很困难的。美国又很难以自己的地面部队代替蒋介石军队防守马祖和金门。

从这种军事形势看来，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保持紧张的局面，对敌人不利，而对我们有利，因为敌人不知道我们将在何时何地打击他们，较大的主动操在我们手里。如果沿海岛屿被我们以军事行动夺回，或者敌人主动撤走，或者经过国际谈判撤走，这当然对我们是有利的。但在我们面前将是台湾海峡，我们自己知道，在美国军事力量留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发动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军事行动的。这样，在沿海岛屿问题解决以后，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将自然地和缓下来，关于台湾问题，也就很难谈判出什么结果了。正是因为我们目前尚未发起解放马祖和金门的军事行动，而台湾和沿海岛屿地区的局势一直在紧张，这才使得美国特别急于要英国替它试探，看看有无如艾登[1]所说的“和平解决”的可能。

艾登二月二十八日来信的重点，是问我们是否愿意“私下地或公开地声明”，“不准备用武力来达到”我们的要求。艾登想以我们的保证交换蒋介石军队自沿海岛屿撤退。

当我们在三月一日回信中阐明立场后，艾登觉得双方之间还没有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于是，艾登决定不来北京会晤。但是，紧张局势将会继续下去。我们估计，英国仍然会对此事继续进行活动的。

美国想要我们答应不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沿海岛屿，来交换沿海

---

[1] 艾登，当时任英国首相。

岛屿的撤退，从而在事实上承认美国对台湾的霸占，并在事实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形势。

印度不承认“两个中国”，认为台湾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军队应从沿海岛屿撤退，台湾和澎湖列岛问题经过谈判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

英国摇摆于美国同印度之间，但基本上靠近美国。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觉得，利用印度压英国使美国让步，较之英国和美国企图把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控制在它们自己手里要对我们有利些。

我们设想，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将有可能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做更多的接触，利用同这三国主要是印度的接触和会谈去创造解决台湾地区局势问题的机会，也许对我们有利。这样做法，当然并不排斥同英国接触，特别是苏联同英国的接触，而主要是使解决沿海岛屿的问题同苏联政府建议举行的十国会议联系起来。我们认为，为了促成十国会议，需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多方面地进行外交活动。

解放台湾应该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解放沿海岛屿，第二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是解放台湾本岛。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因为美国武装干涉中国解放台湾，造成台湾地区的危险局势，所以才需要同美国进行谈判，要求它放弃干涉和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

我们认为迫使美蒋势力从马祖金门等沿海岛屿撤退，对我们将是一项很大的胜利。利用美蒋感到威胁而经过国际会议首先取得这些岛屿，也许是可能的。

这种国际会议除了坚决不能让蒋介石参加外，最好不要同联合国有任何联系，如果在外交谈判发展到某个阶段，苏联很难避免同

印度、英国一起接受联合国的委托，进行斡旋，也要使联合国仅仅委托调解，此外不再过问，尤其是不要给联合国以过问台湾问题的任何机会。

此外，因为我们在国际会议以前和在国际会议上坚决不能同意美、英国人用沿海岛屿交换台湾澎湖造成“两个中国”的要求，这种情况可能使国际会议要经过许多曲折才能开成，而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让步的。即是说，我们宁可让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事实上占领台湾而不去进攻台湾，但不能承认美国的占领合法化，不能放弃解放台湾的口号，不能承认“两个中国”。如果美国人满足这种状态，也许它愿意让出沿海岛屿，以换得一个不合法的暂时的安定状态。

谨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

给周敦祜[1]的信

（1955年3月6日）

敦祜同志：

二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我对学生入学的事都不直接干与，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是否可待今年暑期在北京报考，请你自己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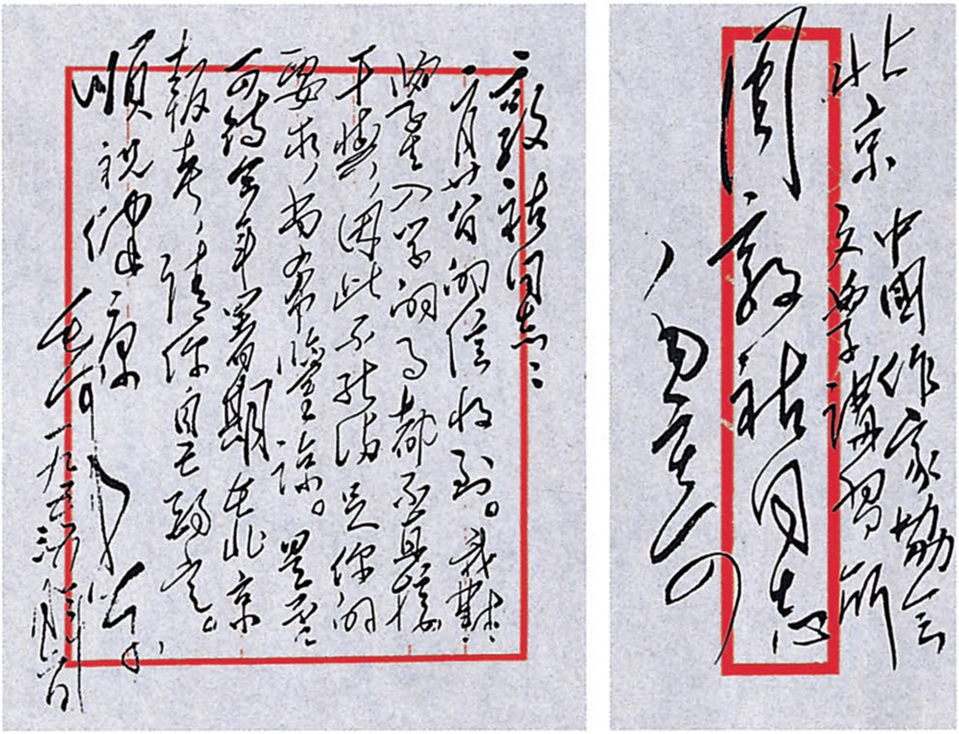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

---

[1] 周敦祜，早年在长沙读书时和毛泽东相识，当时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工作。



敦祜同志：

寄给的信收到。我对于诗词写作都不甚[illegible]，因此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尚希鉴谅。是否可待今年暑期在北京报考，请你自己酌定。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二日

北京 中国作家协会 文学讲习所

周敦祜同志

[illegible]

毛泽东致周敦祜信的手稿。

和达赖喇嘛[1]的谈话

（1955年3月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就要走了，今天我来看看你。你们走的事情都办好了吗？还有些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问题吗？

达赖喇嘛（以下简称达赖）：我们准备在十二日由这里出发，去西北各地参观后就回去。现在走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再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如果临时还有什么需要，我一定提出来。

毛：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比如，我们中国的文工团到外国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戏剧、歌舞，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等在外国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

我们的国家是很落后的，落后于先进的国家约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常欺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大量的钢，没有大量的机器，自己还只能造很少的汽车，飞机也只能造一两架教练机。但是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就能在工业方面打下一个底子。

听说你去东北参观后，对苏联帮助我们的工业建设很满意，是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这样吗？

达赖：过去我只听说苏联给我们的国家许多无私的援助，但实际上怎样，没有见到，只能凭想像。这次亲眼看到了苏联对我们的真正无私的帮助，想去苏联大使馆致谢。

毛：我听到这一点之后，感到你的眼光大，不光是看到西藏，而且看到全国的事。全国有好事你就喜欢，这就是说在你的思想上不光是想着西藏。你很有希望，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1]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受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有共同之处的。当然有许多不同之点。

在内地有一个观音菩萨，人们将她的像塑得很美丽、庄严、慈祥，人们对她十分信仰，认为她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神。西藏也有观音菩萨吗？

达赖：西藏有观音度母，塑像也很美丽、慈祥，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

毛：关于那天你所提的把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当成自己的干部的观点是对的。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是去帮忙的，不是代替的。实行区域自治是真正的自治，主要是依靠西藏自己的干部。但为了取得汉民族的帮助，我们可以向自治区内派少数的汉族干部去全心全意地帮忙。我们曾对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强调说，要全

---

[1] 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前486），佛教创始人。原为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的王子。

心全意地去帮忙，为了帮忙，性命也可以放弃，要把忙帮好，不准帮坏。但在这一点有些人的思想上还不通，不愿在那里工作，天天喊叫要回来，这还是为汉族打算，而没有为藏族打算，给东西时也设法少给一些等等，都是为汉族打算。有些人主观主义严重，很急躁，觉得别人落后，看不惯人家，实际上他们忘了自己也落后过。现在汉族较进步一些，也是从落后过来的。但是两千年之后的人看我们，那我们又很落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孔夫子[1]十分落后是一样的。孔夫子没有见过汽车、飞机，当然更不会开汽车和飞机，也不会开人民代表大会。可是我们就进步了，我们现在能坐汽车和飞机，也会开人民代表大会。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

你们这次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很好。你感到怎么样?

达赖：我们在这里的人都很满意。但是噶厦[2]由于对情况了解得不清楚，还有些怀疑。

毛：很好，你们回去后应该将情况向他们讲清楚。将来的自治区成立时，他们还会有一些怀疑，主要是怕对他们的利益有损害。

两个司曹[3]现在怎样？在筹委会[4]中能不能将他们放进去，或者将来在全国政协委员会安排一个位置。开会时他们愿来，我们欢

---

[1] 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2] 噶厦，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3] 两个司曹，指因支持、策划非法“人民会议”的活动于1952年4月被撤销代理司伦职务的鲁康娃·泽旺饶登和本珠仓·洛桑扎西。

[4] 筹委会，指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确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张国华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

迎，不愿来就算了。总之，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今天因为你快要走了，我来看看你，最后还有一句话告诉你：凡是派去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有和你们搞不来的、团结不好的，你告诉我，我们就调回来。

达赖：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回去后有张国华[1]等人在那里工作，我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

毛：我们对西藏民族寄予的希望很大，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点要说清楚，民族之间的帮助是互相帮助。西藏民族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帮助很大，民族团结搞好了事情就好办。这次你们来到北京和去各地参观，汉族人民对你们很重视，在招待、欢迎各方面都表现了我们是团结得很好的。比如拿国防来说，西藏对我们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将来在经济上西藏也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你们那里过去是一片大海，这是几千万年以前的事。现在我们用的石油是由几千万年以前海洋或湖泊里动物死后在地下慢慢变化来的，因此，在你们那里可能有大量的石油，同时还有各种矿产，将来开采后对国家建设很有用。

---

[1]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和班禅额尔德尼[1]的谈话

（1955年3月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身体好吧？听说你以前身体不大好，现在怎么样？

班禅额尔德尼（以下简班禅）：现在完全好了。

毛：你这次准备到上海参观吗？

班禅：这次本来计划到上海、杭州去，奉主席指示现在还要到广州去参观。

毛：很好。你们到广州去，一定要到虎门[2]去参观，这个地方很有历史意义。你们问他们，他们会给你们介绍的。

班禅：今天主席特别到这里来，对我们很关心，我们特别感谢。

毛：你们要走了，我来看看你。

班禅：我们过去几十年没有回到西藏去，这一次能够回到西藏主要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

毛：这不是我个人，这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军的帮助，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虎门，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主要出海口之一。清道光年间，林则徐曾在虎门销毁英商向中国贩运的鸦片，并率领中国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这里留有销烟池、炮台等遗迹。

同时也是由于你们自己的努力，西藏人民的欢迎而来的。

事情要慢慢地来，拉萨政府和你们中间有些问题，不是这次都解决了吗?

班禅：我回到西藏后，达赖喇嘛[1]也很关心我，虽然我们相互之间有些问题，但是这次在首都，都获得解决了。

毛：你们的任务很大，你们要拥护他们，他们也就拥护你们，这样团结就会搞好的。

班禅：是的，我们一定要根据主席的指示，这样去做。

毛：你们过去有点不放心，怕我们光要前藏不要你们。

你们的政策搞对了，你们能主动地拥护他们，主动地让步，能让达赖喇嘛当主任，你当副主任[2]，计晋美[3]能主动提议让阿沛当秘书长[4]，这是很好的，比我们共产党来提出要好得多。这样今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拉萨有好多官员，也有好多寺庙，其中有许多人，对一些问题不一定都同意达赖喇嘛的意见，因此你们办事，要照顾到他们的困难，慢慢地来，不要急，一切事情，慢慢地搞通再办是有好处的。你们怕拉萨，西藏人怕汉人，总是小的怕大的，这个不奇怪。由于过去汉人的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你们压迫你们，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对汉人害怕，印象不好。因此，我们今后必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确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张国华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

[3] 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4]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

须很好地多办些好事，才能使西藏人民慢慢相信汉人是帮助他们的，不是搞他们的。过去我同张经武、范明[1]都谈过，要他们对我们的干部讲，我们进藏是诚心诚意帮助的，不是代替的，而且帮助还要帮助得好，不能让人家不舒服。同时我也对他们讲，要以这两条来考验我们的干部。虽然这样，但是你们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帮助，随时提出意见，不对的要改正，如果不改正，你们可以提出意见，把他们调回来。

不能只说汉人帮少数民族的忙，少数民族同样是帮助汉人的。西藏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又有很多资源，西藏民族和汉族很好地团结和互相帮助，所以你们受到祖国各方面的欢迎。我们人民解放军进了西藏，给西藏人民做的事情还不多，修通了两条公路[2]，办了两个小学[3]，给藏民打了一些防疫针，但也给你们带来了三个问题，物价上涨，牦牛在运输中有死亡，一个时期采购不等价。

班禅：过去虽然有点问题，物价上受点影响，但是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例如开办人民医院，发放各种贷款。就是从运输上来说，既给脚价，牦牛死了又给赔偿。尤其在经济上，我们西藏主要产羊毛，过去从牧区运到农区，农区运到印度，不但得不到合理价格，反而遭受哄骗或卖不出去，但自解放后，中央以高价进行收购。以上这些，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毛：这些帮助只能说是才开始，不过今后会逐年扩大起来的。西藏地方蕴藏有很多物资，就从经济上来说，也不单是汉人帮助西

---

[1] 张经武，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范明，1914年生，陕西临潼人，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2] 指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

[3] 指拉萨小学和日喀则小学。

藏的，是互相帮助的。

班禅：西藏解放几年来，国家对我们帮助确实是很大的。

毛：应该帮助。你们发展了对国家有好处。比如新疆有稀有金属，内蒙古有森林、铁矿等，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有些矿产在我们汉人地区没有的，但是在你们少数民族地区有。

班禅：我们西藏听说也有铁矿和其他矿产，有些地方没有人居住，还是很大的荒地，现在唐古拉山附近已经发现了煤矿，将来还会发现许多矿产。

毛：你们很有希望，应该有信心。

班禅：对西藏的建设，我们是有信心的。今天在国务院开会，对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以及我们内部悬案问题的解决，对西藏建设事项的帮助等，都通过了决定或批复，问题解决了。这对我们西藏今后的团结统一和发展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毛：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和平协议[1]起了很大的作用。达赖过去害怕我们。你们过去也是害怕的，不然你们也不会跑到香日德。

班禅：我们过去受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是有些害怕。

毛：是的。昨天我和达赖喇嘛谈话时，达赖说他的哥哥在外国不回来怎么办？我说：你不害怕，你回来了，这是对的。他害怕，不回来也可以，他不害怕了，回来也好。有些人对我们不了解，他们还要十年八年地看我们。这需要我们做好工作，而且长期地做好工作。你们十二号离开北京，要回到西藏还得很长时间吧？你们回

---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去路上收礼收不收钱？

计晋美：过去我们来时，沿路老百姓送的礼，有的退还，有的给了寺庙，让他们做点好事。

毛：是不是收一点，表示一下？还是采取收两块赏三块的办法好？你们今后有些开支，国家可以帮助。你们如果不收礼，老百姓既能见佛爷，又能不花钱，这样老百姓会对你们更好。

（汪锋[1]向毛泽东汇报达赖、班禅曾给拉卜楞寺写信劝止送礼和准备铺张欢迎达赖、班禅的情况。）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做很好，这样的问题和他们商量一下就能很好解决了。

你们两位和代表团的很多人来，出席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又在各地进行了参观，以后恐怕你们四年要来一次。现在路通了，三个月能打一个来回，既能开会又不耽误工作。如果像这次你们来回要一年的时间，那会就很难开。

班禅：我这次和达赖喇嘛来北京开会，这是从前没有过的，对我们内部团结和整个工作来说，都有好处的。今后路通了我们要多多来的。

毛：将来香日德那边有了飞机场就好了。

班禅：是的。

毛：你这次来是第二次吧？

班禅：是的，五一年来过一次。

毛：五一年你是多少岁？

班禅：十四岁。

毛：你今年是十八岁了，你家是哪里？

---

[1] 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班禅：是循化县。

毛：是不是拉卜楞寺那里?

班禅：不是，离拉卜楞寺很近。

毛：你这次要到拉卜楞寺去吗?还回循化县吗?

班禅：是的。

毛：回家看看很好。西藏小学课本是用什么文字?

张经武：完全是藏文，汉文和英文是选修科。

毛：这样很好。(向张经武)过去我说过你们进藏以后，要学习藏文、藏话，你们现在学得怎样?

张：我们大家都学，但是抓得不紧，只是参加了训练班的学得可以。

毛：不仅要学藏文而且要学藏话。拉敏·益喜楚臣[1]这次没有来，以后有机会要来，这次你们回去代我问他好。

---

[1] 拉敏·益喜楚臣(1913—1977)，西藏拉孜人，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对卫立煌
《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的批语

（1955年3月13日）

刘、朱、邓[2]（请小平办）：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须要修改。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

[1] 卫立煌，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卫去香港，1955年3月回国，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全文载《人民日报》和香港《文汇报》。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不要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的批语[1]

（1955年3月14日）

尚昆[2]同志：

此项工作费，我不需要使用，应交给中央。此次送来的以及以后的，均请你交给中央会计机关。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1955年3月7日关于津贴全国人大代表工作费给毛泽东的通知上。通知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工作费，从1954年9月份起算，至1955年3月份共7个月，计人民币350元（每月50元），特随函一并送上，请查收。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马祖等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军不要攻击的批语

（1955年3月14日）

彭德怀[1]同志：

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确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给黄炎培[1]的信

（1955年3月14日）

任之先生：

三月十一日惠书[2]收读。民建开代表大会，很好，谨致祝贺。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1955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向毛泽东报告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将于4月1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情况，信后附有他对失业问题和农村粮食问题的意见。关于农村粮食问题，信中说：最近有人从家乡来，反映一般居民生活苦，尤其是农民特别苦，农民说：我们吃不饱，哪有力气去种田呢？而一些村干部工作作风不好，总疑心农民家有藏粮，致使民间有怨声。

对卫立煌来电[1]的批语和复电

（1955年3月17日）

一

尚昆[2]：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早

---

[1] 卫立煌，字俊如，原国民党军将领。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总司令，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卫去香港，1955年3月回国。1955年3月16日，卫立煌从广州致电毛泽东：“立煌昨日返回祖国，平安抵穗，谨电致敬，并问候刘委员长、周总理、朱副主席及中央各位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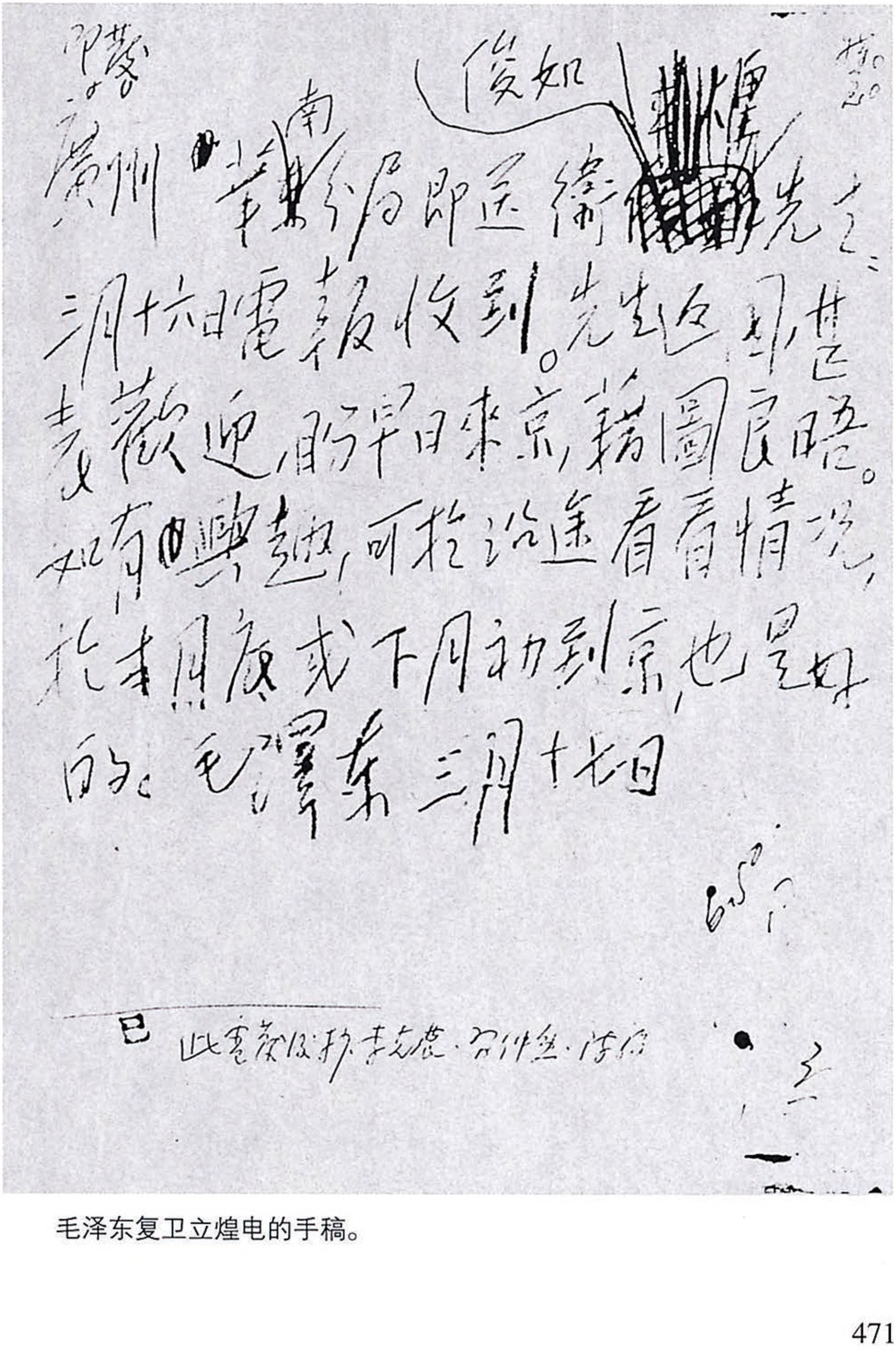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印發

廣州中~~華~~南~~分~~局即送衛~~立煌~~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電報收到。先生返國，甚表歡迎，盼早日來京，藉圖良晤。如有興趣，可於沿途看看情况，於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澤東 三月十七日

已 此電發後抄李克農、習仲勛、陳賡

毛泽东复卫立煌电的手稿。

对杨树达[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5年3月17日）

一

转科学院，请令有关单位予以注意。

二

遇夫先生：

二月十四日惠书[2]收读。序言已看过。并将大函转付科学院方面，请他们予以注意。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和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2] 指杨树达1955年2月1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要求毛泽东看一下他写的《耐林庼甲文说》自序，其中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在审查该书稿中有官僚主义作风。

关于修改和印发《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的批语

（1955年3月20日、21日）

一

尚昆[1]印若干份，在明天下午开会时，在会场上*临时分发*各代表，每人一份。校对清楚，勿使有错。

二

尚昆同志：

此件又有些修改，请*重印*，时间还来得及吧？

修改的地方是：第二页末行加了两个字；第六页第六行后加了一段；第七页第七行去掉两个字，第八行去掉六个字，加上一个字；第八页第五行加了四个字。请注意*校对勿讹*。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上午九时半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

（1955年3月）

开幕词

（1955年3月21日）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各位代表同志们：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三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我们的许多办法不

---

[1] 这是毛泽东1955年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致开幕词。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鉴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事件，骄傲自满情绪在我们党内确实是存在着，在有些同志的身上这种情绪还是严重的，不克服这种情绪，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

同志们都知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

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为着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个目的，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按照党章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饶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

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

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结论

（1955年3月31日）

同志们：

大家发言已经完了。我就下面的几个问题讲几句话：关于这次会议的评价，五年计划，高饶问题，目前形势，八次大会。

一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评价

绝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是从延安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我们互相了解更多了，思想更加统一了，使得我们有了共同的认识。本来我们是有共同认识的，但是在若干问题上，我们中间还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这一次会议，统一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思想的、政治的以及许多政策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就可以使

我们党更好地团结起来了。正如恩来同志所说，如果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同它以前一个时期全党的思想、政治上的整风，奠定了我们党的统一思想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民主革命的胜利，那末，这一次会议就会使我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党的水平是大为提高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这个情况是好的，这次会议表明我们是进步了的。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全党同志钻得有深有浅，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像医生一样，有的能够开刀，有的不行。有的打针能够打静脉，有的就不能，只能打皮下。有一些医生连皮下都不敢动手，就在那个皮上面。虽然有些同志没有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有许多人是钻进去了，就是有一点内行的味道了。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是极大的好事。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新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国防、其他各方面的新的工作。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

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图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

我们要作出计划，组成这么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有几百万人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二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志们认为，在讨论五年计划的时候，大多数同志的发言很好，大家是满意的。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他们讲透了问题，有点专家的味道了。但是，中央各部门的发言中间，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不够；地方同志发言中间，也有一部分是较差的，分析和批判是不够的。另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有些同志发言中间，对严重的浪费问题以及别的错误，只是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于这些发言，有些同志不满意。我以为这些不满意是有理由的。

我希望，所有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地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要奋发努力，在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基础上，使自己成为精通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专家。一方面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搞好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

这次会上，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凡是中央已经有了规定的，应当积极解决。其他的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解决办法，报告中央处理。

中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作的事也不少。中央部门在各地方办的事业，要请地方党委给以监督和帮助，特别是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地方党委有责任帮助中央在地方所办的事业去完成任务。所

以，不仅地方对中央有要求，中央对地方也有要求。只有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委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才能够完满地实现。

三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第一点，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这个联盟？或者不是联盟，而是两个独立国，两个单干户？有的同志说，没有看到文件，他们是联盟总得有一个协定，协定要有文字。文字协定那的确是没有，找不到。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三、是从饶漱石的话里看出来的。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四、是从高岗、饶漱石到处散布安子文私拟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件事看出来的。在这件事上，安子文是受了警告处分的。高岗、饶漱石等人把这个名单散布给所有参加组织会议的人，而且散布到南方各省，到处这么散布，居心何在？五、是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这件事看出来的。高岗说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要我来解围。我说，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第二次是在揭露高岗的前一天，高岗还表示要保护饶漱石。饶漱石直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他要给高岗申冤。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

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

至于说，因为没有明文协定，有的同志就发生疑问，说恐怕不是联盟吧。这是把阴谋分子组成的反党联盟同一般公开的正式的政治联盟和经济联盟等同起来了，看作一样的事情了。他们是搞阴谋嘛！搞阴谋，还要订个文字协定吗？如果说，没有文字协定就不是联盟，那末高岗、饶漱石两个反党集团内部怎么办呢？高岗跟张秀山、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之间，也没有订条约嘛！我们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文字协定嘛！那末连他们这个反党集团也否定了！还有饶漱石跟向明、扬帆之间，也没有看见他们的条约嘛！所以，说没有明文协定就不能认为是联盟，这种意见是不对的。

第二点，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没有受他们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受影响的，有浅有深。有些是一般性的，被他们扫了一翅膀；少数几位同志是比较深的，同他们谈了许多问题，在下面有所活动，替他们传播。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所有这些人，不管有浅有深，大多数同志在这个会议上都已经表示了态度。有的表示得很好，受到全场的欢迎。有的表示得还好，受到大部分同志的欢迎，但是有缺点。有的表示得不够充分，今天作了补充。有的全文讲得还好，但是有某些部分不妥当。不管怎么样，这几种人总之已经有所表示了，我们应当一律表示欢迎，总算有所表示嘛！还有个别同志要求发言，没有来得及，他们可以用书面向中央写一个报告。还没有讲的人，问题不严重，就是被扫了一翅膀的，知道一些事情，他没有讲。至于已经发了言的人，是不是也还

有一些是留了尾巴的？那末现在我们决定，不论是关于五年计划还是关于高饶反党联盟问题，所有的发言、报告，都可以拿回去修改，字斟句酌，在五天之内，把那些没有讲完全的，或讲得不妥的，再加以修改。不要因为在这一次会议上没有讲妥，我们就抓住他的小辫子，将来使他下不去。你还可以修改，以你最后修改的稿子为准。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

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没有受影响的同志，不要骄傲，谨防害病。这一点极为重要。前面讲的那些同志，可能有些是上当，有些是陷进去比较深，因为犯了错误，他们可能有所警觉，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害了一次病，取得了免疫力。种了一次牛痘，起预防作用。但是也不能保险，还可能害天花。所以，最好是三年五年再种一次牛痘，就是开我们这种会。其他的同志就不要骄傲，谨防犯错误。高岗、饶漱石为什么对这些人没有惹呢？有几种情形：第一种是他们认为是他们的敌人的人，当然不去传播；第二种是他们看不起的人，认为无足轻重，现在不必去传播，将来“天下大定”了，那些人自然跟着过来的；第三种是他们不敢惹的人，那些人大概是免疫力比较强，他们一看就不对头，虽然这些同志并不被认为是他们的敌人，也不是无足轻重，但是他们不敢去惹；第四种，就是时间来不及。这个瘟疫散播也要时间，再有一年的工夫不揭露，有些人那就难保。所以不要逞英雄：你看，你们不是惹了一点骚吗，而我可干净啦！再有一年不揭露，保管有不少的人是要受他们影响的。

我认为，以上就是受高、饶影响的和没有受影响的两部分同志应当注意的地方。

第三点，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之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他们那些话，他们那些行动，不符合党的原则，我们又看不惯，在这一部分问题、这一部分情况上，就不要打成一片。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五年计划，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报告，以及各种正确的

政策，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对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就是说，要划清界限，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是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在这次高饶反党事件中，以及在过去党内的路线斗争中，都有过许多这样的经验：只要你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保持一个距离，不挡回去，不划清界限，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所以，应当表示态度，应当坚持原则。

第四点，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情，但是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我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听到高岗、饶漱石讲了许多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话，甚至高岗、饶漱石还同他们商量过一些反党活动问题，那就应当看出来。一种是普通知道他们一些坏事情，而没有看出阴谋，这是难怪的，那是很难看出的。中央也是到了一九五三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活动，每一次都给他们顶了回去。所以，以后他们就完全转入秘密了。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这种事情过去也有过。井冈山时期有几个叛变分子，我们就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叛变。恐怕你们各位都有这种经验。

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

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

第五点，骄傲情绪的危险。不要逞英雄。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没有你就不得了吗？历史证明，各种事实证明，没有你也行。比如没有高岗、饶漱石是不是不得了呢？那还不是也行吗！没有托洛茨基，没有张国焘，没有陈独秀，还不是也行吗！这些都是坏人。至于好人呢，没有你也可以。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吗？地球还是照样地转，事业还是照样地进行，也许还要进行得好些。孔夫子早已

没有了，我们中国有了共产党，总比孔夫子高明一点吧，可见没有孔夫子事情还做得好一些嘛！

有两种人：一种是老资格，在座的不少，资格很老；一种是新生力量，这是年轻的人。这两种人中间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恩来同志今天也讲了这个问题，当然是新生力量更有希望。有些同志，因为自己是老革命，就骄傲起来，这是很不应当的。比较起来，如果说允许骄傲的话，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年纪越大，经验越多，就应当更谦虚。让青年人看到我们确实是有经验的：“这些前辈，确是有点经验，不要看轻他们，你看他们那么谦虚。”四五十岁的人了，因为得了许多经验，反倒骄傲起来，那岂不是不像样子？青年人就要发议论：“你们那些经验就等于没有，还不是跟小孩子一样。”小孩子有点骄傲情绪，那是比较合理的。上了年纪的人，有了这么多经验，还骄傲，把尾巴翘得那样高，可以不必。俗语说：“夹紧尾巴做人。”人本来是没有尾巴的，为什么要夹紧尾巴呢？好比那个狗，有翘尾巴的时候，有夹尾巴的时候。大概是打了几棍子的时候它就夹紧尾巴，大概是有了几批成绩的时候它的尾巴就翘起来了。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首先是老同志，不要翘尾巴，而要夹紧尾巴，戒骄戒躁，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

第六点，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

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我就讲这么几点意见。

四 关于目前形势

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党内形势，这三种形势怎样呢？是光明面占优势，还是黑暗面占优势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在我们这个会场上也是如此。不要因为有很多人作了自我批评，以为就黑暗了。这些同志是着重讲了他们的缺点错误，没有讲他们的长处，哪一年参加革命，哪里又打了胜仗，哪里有工作成绩，这些话都没有讲。专看他们这一篇检讨，那末就黑暗了。其实，这是一面，在很多同志身上，这是次要的一面。这跟高岗、饶漱石和张、张、赵、马、郭五虎将不同，他们不能适用这个估计：光明面占优势。高岗有什么光明面占优势呀？他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至于我们的同志那就不同，略有黑暗，这个东西可以洗干净，用肥皂多洗几回。

为什么要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呢？这是说，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十个，一百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你有十个，也只有五双，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都估计到了。

帝国主义拿来吓唬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也没有什么可怕。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一物降一物，有一个东西进攻，也有一个东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个“法宝”是不能破的呀？那样多的“法宝”都破了。我们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没有攻不破的“法宝”。

五　为胜利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个议事日程：（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明年七月以前要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各方面的工作，经济、文教、军事、党务、政治思想、群众团体、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工作，都要大进一步。

我顺便讲一讲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有些同志总是在那里吹，我们可帮助了你们，就没有看到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国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什么人住的？是汉族住的，还是什么人住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的地方是少数民族居住的。那里物产丰富，有很多宝贝。现在，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很少，有些地方还没有帮助，而少数民族倒是帮助了汉族。有些少数民族，需要我们先去帮助他们，然后他们才能帮助我们。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很大地帮助了汉族，他们加入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和汉族团结在一起了，全国人民都高兴。所以，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

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那种以为只有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没有帮助汉族，以及那种帮助了一点少数民族，就自以为了不起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们讲在这一年中各方面的工作要大进一步，就是要把已经揭露出来的缺点、错误加以改正。不要在这次会上许了愿，到明年召开“八大”时还照样有那么多缺点、错误，原封未动。所以要为召开“八大”而斗争者，就是要把缺点、错误改正，比如铺张浪费、大屋顶这样一些东西，认真地负责地改一下。不要在这里许了愿，一回去大家就把两脚一伸睡起觉来了。

有人建议一年或者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使同志之间互相监督，我认为可以考虑。谁监督我们这些人呢？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和国家的事业迅速进步。是迅速进步，不是慢慢地进步。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了。当然头五年不应当开，因为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过渡时期总路线也提出来了，又经过这次代表会议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统一了，为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条件。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不要每个人去检讨一篇，但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

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你没有搞好，我是不满意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你。怕得罪人，无非是怕丧失选举票，还怕工作上不好相处。你不投我的票，我就吃不了饭？没有那回事。

其实，你讲出来了，把问题尖锐地摆在桌面上，倒是好相处了。不要把棱角磨掉。牛为什么要长两只角呢？牛之所以长两只角，是因为要斗争，一为防御，二为进攻。我常跟同志讲，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一条，叫做批评和自我批评。

所以，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建议各省、市委同志们考虑，你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你们不是学中央吗？我看这一点是可以学的。

最后，我请同志们注意，也请全党同志注意：

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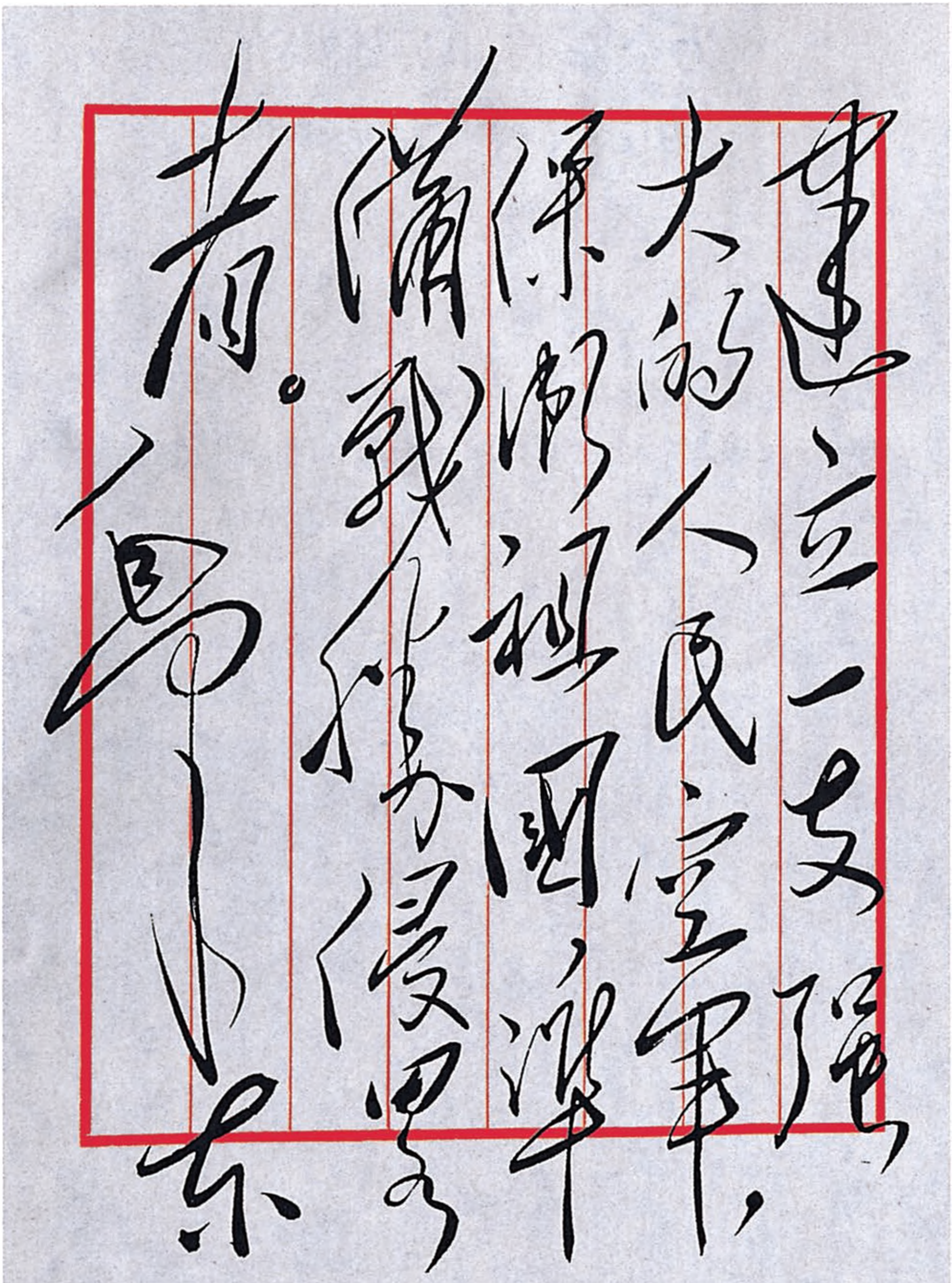
（1955年3月）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毛泽东

---

[1] 这是毛泽东为1955年3月21日在北京开幕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的题词。



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歼灭侵略者。

毛泽东

毛泽东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的题词。

对陈毅[1]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55年3月23日）

退陈毅同志：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廿一页上，我加了几个字[2]，我感觉，饶漱石[3]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4]小一些。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 陈毅发言稿第21页上讲到："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毛泽东把这句话改为："反党分子高岗，是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首脑人物，他的反党罪行从某一点上看，或者可以说比饶漱石更严重一些。"

[3] 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被揭露。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

[4] 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被揭露。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

关于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印发两篇文章的批语

（1955年3月28日）

邓小平[1]同志：

两篇文章[2]送上，请即印发各代表。两篇印在一起，加上一个总题目叫《两篇可看的文章》。

毛泽东

三月廿八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1955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胡琦、力峰写的《从红星工厂事件中看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的责任》一文和1955年3月25日《光明日报》择要刊载的苏联伊萨耶夫少将写的《实力政策的虚妄》一文。胡琦、力峰的文章介绍说，中共天津市地方国营工业局委员会，由于犯了只管业务不问政治的错误，致使所属的红星工厂厂长处处限制党支部的活动，把一批坏分子提拔为厂里的各级干部，打击了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计划的完成。伊萨耶夫的文章节译自1955年2月5日苏联《新时代》杂志，介绍了近年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鼓吹所谓实力政策，即用假想中的美国军事优势来对全世界发号施令，事实证明这一所谓的实力政策是虚妄的。

对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的批语

（1955年3月）

即退刘少奇同志：

题目可不要“提纲”二字。

毛泽东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

（1955年3月31日）

就下面的问题讲几句话：

这次会议的评价；

五年计划；

高饶问题；

目前形势；

八次大会。

（一）关于这次大会的评价：

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好，是从延安时期整风以来的又一次整风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们互相了解更多，有了共同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更好地团结起来了。

这次会议证明：我们的水平是大进一步了，不但比十年前的七次大会时期大进了一步，而且比一九四九年的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的三中全会时期大进了一步。

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

钻社会主义工业化，

钻社会主义改造，

钻近代化的国防，

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

虽然钻的有深，有浅，也有些人并未钻进去，但大多数同志是在钻，看样子是有许多钻进去了，快要成为内行了，这是极大的好事。

反高、饶联盟的斗争，将促使我们党大进一步。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辨〈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二）关于五年计划：

（1）同志们认为大多数的发言很好，其中有一部分发言特别好，认为满意；但中央各部门发言中，有一部分内容较差，分析和批判均不够；另一部分发言对严重的浪费问题只揭露了现状，没有说明如何处理；对这后面两部分人的发言认为不能满意。

（2）地方要求中央解决的许多问题，由秘书处会同提议的同志研究处理办法，报中央处理。

（3）中各〈央〉各部门要求地方协助的事项，请地方同志注意解决。

（三）关于高饶反党联盟：

（1）有人问：究竟有没有联盟，或者是两个独立国?

从财经会议高饶同时发动反对所谓刘少奇宗派的活动看来，

从组织会议饶漱石与张秀山配合反动〈党〉看来，

从饶漱石的话“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看来，

从高饶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个名单看来，

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一事看来，

他们是有一个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

至于说，没有明文协定，说〈那〉是把阴谋分子的反党联盟，和公开的政治联盟，如像巴黎协定，东南亚协定等同起来。

须知高岗集团的张、张、赵、马、郭[1]等人之间，饶漱石和向明、杨帆之间，也没有明文协定。

（2）受高、饶影响的同志和未受影响的同志各自应取的态度。

受影响的——有浅有深，少数尚未表示态度，但大多数已表示了态度，有表示得很好的，有表示得还好的，有表示得不充分的或有某些部分不妥当的，总之已有所表示，我们应一律表示欢迎，希望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少数问题不大，没有来得及发言的，可书面写出交中央。

未受影响的——**不要骄傲**，谨防害病。

（3）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在同志间，对于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论、行动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即划清界线，立即挡回去，不能因为老朋友，老上司，老部下，老同事，同学、同乡等而废去这个距离，不表示态度，不坚持原则。

（4）有些同志说，知道高饶一些坏事，但没有看出他们的阴谋，这是难怪的。中央到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阴谋，在此以前也是被骗的，瞎了眼睛；这种瞎眼睛的事还很不少。

从此得出一条经验：**不要被假象所迷惑**。

（5）骄傲情绪很危险：

以为游水可以不害感冒了，称了几个月英雄，害了一次大感冒，可见英雄是称不得的。

---

[1] 张，指张秀山。张，指张明远。赵，指赵德尊。马，指马洪。郭，指郭峰。

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有作用，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有你，地球还是照按〈样〉转，事业照样在进行，也许还要做得好些。

没有孔夫子，中国更进步了。

一种是老资格（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新生力量，哪一种人更有希望呢？当然是新生力量。

比较起来，如果说骄傲，倒是青年人值得骄傲一下。

据说，年纪越大，越有经骄〈验〉，因此中年以上的人应该谦虚些，让青年看到我们确有些经验的，否则就不像样子了。

（6）戒“左”，戒右：

有人说，“‘左’比右好”；

其实又有人说，“右比‘左’好”；

超过时代，冒进，乱斗，这是“左”，不好；

落在时代的后面，缺乏斗争性，也不好。

我们党内不但有喜“左”的，也有不少喜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

两条战线斗争。

（四）目前形势：

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形势，都是光明面占优势，黑暗面占劣势。

为什么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重复发生？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

（五）为胜利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斗争：

中央决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八〔次〕大会，有三个议事

日程：

（１）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２）修改党章；

（３）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明年七月以前完成代表的选举及文件的准备工作。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要求各方面的工作大进一步，已经揭露出来的各种缺点、错误，例如大屋顶，大浪费等等。

谢意

有人建议：一年或两年开一次这样的代表会议。可以交中央考虑，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迅速进步的好办法。

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可以相间着开。

请全党注意：为在一九五六年胜利地召开八次大会而斗争，为胜利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5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一九五四年洪水题词……………………………………1

（1955年）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周年的电报………………………………………4

（1955年4月2日）

关于通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情况和征求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给赫鲁晓夫的信……………………………………………………6

（1955年4月5日、6日）

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 …………11

（1955年4月7日）

中国和巴基斯坦应该成为好朋友 …………………………………………13

（1955年4月27日）

接受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5

（1955年4月27日）

关于越南奠边府作战应注意事项致彭德怀、黄克诚电 ………………16

（1955年4月28日）

对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7

（1955年4月28日）

毛泽东等为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题词 ……19

（1955年4月28日）

美国可怕，又不可怕 ……………………………………22
（1955年4月29日）
给黄炎培的信 ……………………………………………25
（1955年4月29日）
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 ……………………………………26
（1955年春）
给陈嘉庚的信 ……………………………………………27
（1955年5月1日）
给周世钊的信 ……………………………………………31
（1955年5月1日）
给蒋竹如的信 ……………………………………………32
（1955年5月1日）
给文炳璋的信 ……………………………………………35
（1955年5月1日）
给张沛民的信 ……………………………………………38
（1955年5月1日）
给谭世瑛的信 ……………………………………………39
（1955年5月1日）
给张四维的信 ……………………………………………40
（1955年5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42
（1955年5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44
（1955年5月7日）
对打击入侵美军飞机对策报告的批语 ……………………46
（1955年5月10日）

关于肃反工作要提高警惕、防止偏差的方针 ……47
（1955年5月12日）
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材料的批语 ……49
（1955年5月、6月）
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53
（1955年5月）
对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 ……56
（1955年5月16日）
关于印发彭一湖反映农村工作的信的批语 ……57
（1955年5月16日）
给杨树达的信 ……59
（1955年5月17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 ……60
（1955年5月17日）
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 ……62
（1955年5月17日）
关于调查谭世瑛的历史情况给湘乡县委的信和给谭世瑛的复信 …64
（1955年5月17日、6月8日）
对《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的批语和修改 ……70
（1955年5月）
对黑龙江省人委关于森林火灾和扑火情况报告的批语……72
（1955年5月）
对粟裕关于部署部队进驻福建新建机场的请示的批语 ……74
（1955年5月19日）
祝贺胡志明六十五岁寿辰的电报 ……75
（1955年5月19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语稿中加写的两段话 ……………………………………76

（1955年5月）

关于发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决议的批语 ……77

（1955年5月26日）

转发山西省委关于不许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的通知的批语 …78

（1955年5月26日）

对中央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79

（1955年5月26日）

转发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的经验的批语 ……………………81

（1955年5月26日）

对黄炎培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82

（1955年5月26日）

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 ……………………………85

（1955年5月26日）

中央关于调查粮食征购和供销情况的通知 …………………………92

（1955年5月28日）

在印尼驻华大使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酒词…94

（1955年5月29日）

对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的批语 …95

（1955年5月29日）

在姜黄族英来信上的批语 ……………………………………97

（1955年5月）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98
（1955年6月1日）
转发曾山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报告的批语 ………99
（1955年6月2日）
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00
（1955年6月3日）
给陈云的信……………………………………………………………102
（1955年6月5日）
对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的批语……………………103
（1955年6月7日）
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105
（1955年6月9日）
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按语…107
（1955年6月）
在《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稿中加写的文字…119
（1955年6月10日）
关于收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给胡乔木的信……………………120
（1955年6月10日）
为编辑《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按语和注文…121
（1955年6月）
对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的批语…………130
（1955年6月18日）
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给刘少奇的信………………………131
（1955年6月23日）
在黄文欢为胡志明访华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132
（1955年6月28日）

在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47
（1955年6月30日）
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团结合作……………………………………………148
（1955年6月30日）
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150
（1955年上半年）
转发山东省委关于抗旱夏种的紧急通知的批语 ……………………159
（1955年7月2日）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
的报告的批语 ……………………………………………………………160
（1955年7月4日）
关于提高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的批语………………………162
（1955年7月7日）
关于调查山西省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的批语…………………163
（1955年7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的电报……………………164
（1955年7月9日）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
告的批语……………………………………………………………………165
（1955年7月10日）
中央转发五人小组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
子的斗争情况简报的批语…………………………………………………167
（1955年7月13日）
给陈叔通、黄炎培的信……………………………………………………169
（1955年7月13日）

关于军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批语……………………………………170
（1955年7月13日、8月23日）
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的批语……………………………………………172
（1955年7月14日）
对肖华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的批语………173
（1955年7月15日）
给杜润生的信……………………………………………………………174
（1955年7月18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76
（1955年7月19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肃反斗争的两个文件的批语………………178
（1955年7月19日）
在中央警卫团战士的几份农村情况调查上写的文字………………180
（1955年7月）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情况通报的批语…187
（1955年7月20日）
对陆定一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189
（1955年7月20日）
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192
（1955年7月20日）
中央转发北京军区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195
（1955年7月20日、21日）
对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的批语………………197
（1955年7月20日、21日）

对廖鲁言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9
（1955年7月22日）
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01
（1955年7月23日）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关于粮食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03
（1955年7月28日）
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204
（1955年7月29日）
给黄守湜的信……………………………………………………208
（1955年7月29日）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209
（1955年7月31日）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报告的批语……232
（1955年8月3日）
对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234
（1955年8月3日）
关于少将以上军衔评定问题的批语………………………………236
（1955年8月3日）
给孙燕的信………………………………………………………237
（1955年8月3日）
中央转发北京军区空军关于勤杂人员中发现严重问题通报的批语238
（1955年8月4日）
关于解决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批语………………………………240
（1955年8月4日、11月1日）
中央转发建工部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
的报告的批语……………………………………………………242
（1955年8月5日）

给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的信……………………………………244

（1955年8月5日）

给湖南省湘潭县云源乡政府的信 …………………………………246

（1955年8月5日）

关于每年有计划地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批语…………………………248

（1955年8月6日）

给刘松林的信…………………………………………………………250

（1955年8月6日）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广州市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251

（1955年8月7日）

中央转发洛阳拖拉机厂肃反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253

（1955年8月8日）

关于及时转发军队开展肃反运动情况的批语………………………255

（1955年8月8日）

在安徽军区肃反情况简报上的批语…………………………………256

（1955年8月8日）

中央转发广东省建筑局发动后进群众开展肃反的经验的批语……257

（1955年8月9日）

中央转发中国作协关于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258

（1955年8月10日）

中央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260

（1955年8月11日）

关于派中国代表团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典礼复金日成电…………262

（1955年8月11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电报……………………………263
（1955年8月12日）
关于补充现役各军种部队和有计划训练预备兵的批语……………265
（1955年8月12日）
对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揭发出冒牌工程师的情况简报的批语和
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266
（1955年8月12日、13日）
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68
（1955年8月13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周年的电报………………………270
（1955年8月15日）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71
（1955年8月16日）
同意袁希洛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批语……………………………273
（1955年8月17日）
关于加强中央机关防卫工作的批语………………………………274
（1955年8月18日）
中央关于妥善保存和严格清查处理敌人遗留的各项档案材料的指示…275
（1955年8月19日）
对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277
（1955年8月20日）
关于举行群众集会支持印度收复果阿地区的斗争的批语…………278
（1955年8月20日、21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280
（1955年8月21日）

对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82
（1955年8月22日、26日）
关于修改、印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通知……284
（1955年8月、10月）
关于各地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直接由中央拟电答复的批语…288
（1955年8月26日）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的批语…289
（1955年8月26日）
中央关于召开有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291
（1955年8月27日）
中央转发热河、青海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92
（1955年8月27日）
对征求新式军服样式意见报告的批语……………………………294
（1955年8月27日）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的批语………………295
（1955年8月31日）
在朱德同金日成谈话摘要上的批语………………………………298
（1955年8月）
同意拨付农业合作社干部训练费和农业贷款的批语……………299
（1955年9月1日）
关于通报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的批语……………………300
（1955年9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301
（1955年9月1日）
慰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病情的电报 …303
（1955年9月1日）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04
（1955年9月3日）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06
（1955年9月3日）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08
（1955年9月4日）
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11
（1955年9月4日、7日）
中央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316
（1955年9月5日、7日）
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
草案的批语…………………………………………………………319
（1955年9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321
（1955年9月7日）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复电………323
（1955年9月8日）
对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
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信的批语……………………………………326
（1955年9月8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28
（1955年9月9日）
中央同意温州地委对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的电报…………331
（1955年9月9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333
（1955年9月9日、10日）

在国务院关于召开粮食工作汇报会议的通知上的批语……………335
（1955年9月10日）
对张云逸来信的复信和批语…………………………………………336
（1955年9月10日）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的批语………338
（1955年9月12日）
关于了解河北省博野县农业合作社整顿情况的两个批语…………340
（1955年9月13日、10月23日）
关于对日本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批语………………342
（1955年9月14日）
关于同意不再使用“中中农”一词的批语…………………………343
（1955年9月16日）
对邓小平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稿的批语…344
（1955年9月18日）
关于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和书信……………348
（1955年9月至12月）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353
（1955年9月、12月）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361
（1955年9月、12月）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批语…………………………………430
（1955年9月26日）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的批语…………433
（1955年9月26日）
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决定………………………………441
（1955年9月30日）

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意见的信和批语…442
（1955年9月30日、10月2日）
为德田球一题词……………………………………………………………444
（1955年9月）
答谢苏联军事顾问团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449
（1955年10月2日）
为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题词……………………………………451
（1955年10月2日）
中意重建邦交对双方都有利………………………………………………453
（1955年10月3日）
给周世钊的信………………………………………………………………455
（1955年10月4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电报……………………456
（1955年10月6日）
对邓小平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458
（1955年10月7日）
对彭真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460
（1955年10月9日）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462
（1955年10月11日）
对袁希洛要求去见蒋介石的信的批语……………………………………485
（1955年10月12日）
再次征求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稿的意见的信………………………486
（1955年10月15日）
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487
（1955年10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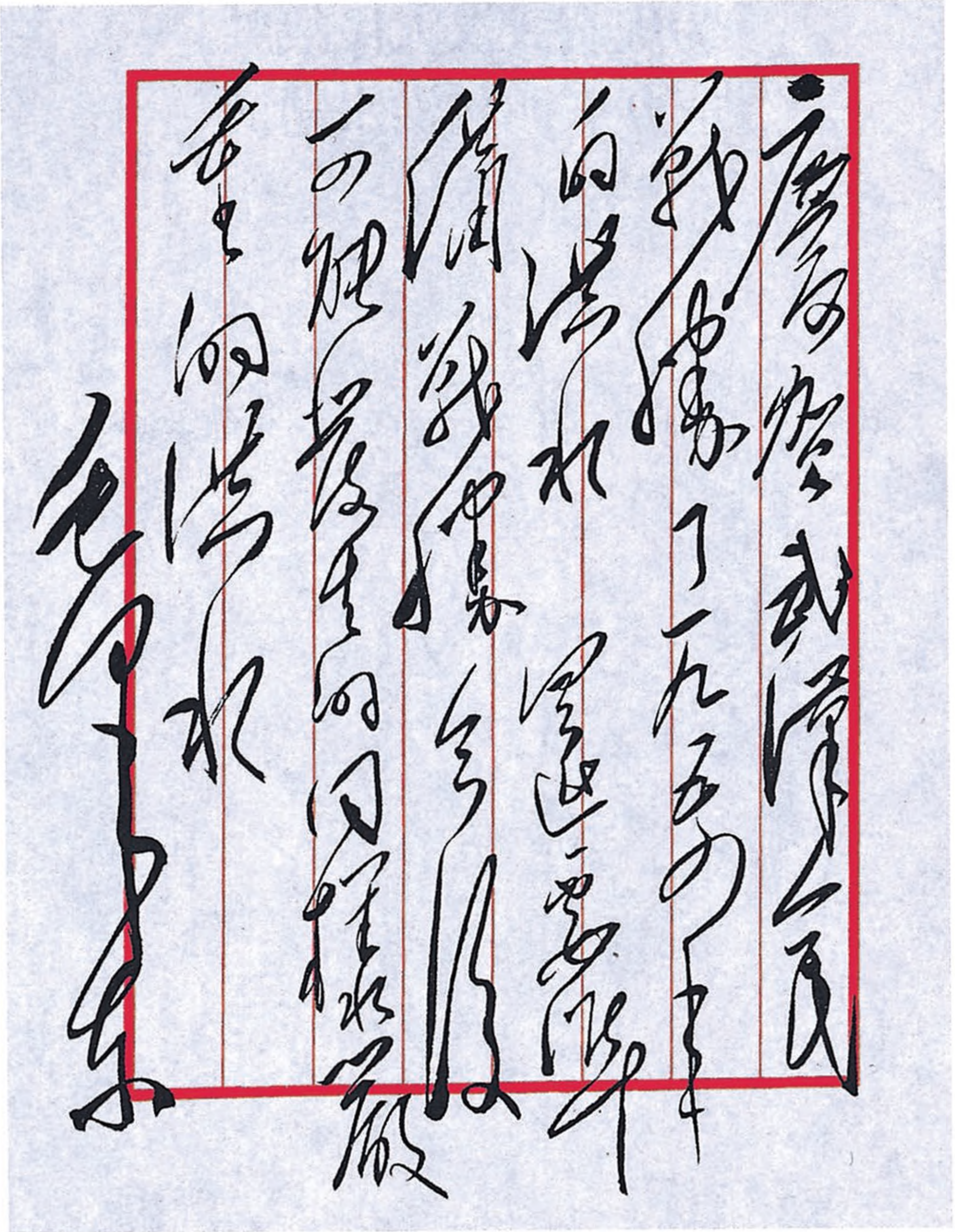
关于与越南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批语…………………………495
（1955年10月16日）
在刘澜涛关于华北各省市传达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上的批语…496
（1955年10月19日）
对北约空军演习情况报告的批语…………………………………………498
（1955年10月19日）
对章乃器来信的批语和复信……………………………………………499
（1955年10月、11月）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502
（1955年10月23日）

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
一九五四年洪水题词

（1955年）

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毛泽东



庆贺武汉人民
战胜了一九五四年
的洪水还要准
备战胜今后
可能发生的同样严
重的洪水
毛泽东

毛泽东为庆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特大洪水的题词。

1955年春，毛泽东在惠济饭店和湖北武汉党政负责人谈话。

1955年春，毛泽东在汉口惠济饭店和李尔重、王海山合影。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周年的电报[1]

（1955年4月2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斯特万·道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代理主席安德拉希·赫格居斯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雅诺希·波尔多奇基同志：

值此匈牙利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匈牙利人民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匈牙利人民在自己的劳动人民党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地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鼓舞了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以极其欢欣的心情祝贺兄弟般的匈牙利人民的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斯特万·道比、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代理主席安德拉希·赫格居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雅诺希·波尔多奇基的电报。1914年匈牙利加入德—意—日轴心国集团，1944年德军占领匈牙利。1945年4月，匈牙利人民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全境解放。

谨祝匈牙利人民在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击破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新的战争计划和确保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日于北京

关于通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情况和征求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意见给赫鲁晓夫的信

（1955年4月5日、6日）

一

尚昆同志：

五年计划，陈、邓两个报告，我的开幕词，少奇发言等五件[1]正译成俄文，准备十号送交尤金[2]转苏共中央，请其提意见。请你即于今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致苏共中央的信，于下午交我看。

毛泽东

四月五日一时

---

[1] 五年计划，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陈、邓两个报告，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开幕词，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少奇发言，指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

[2]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二

尚昆同志：

此件[1]请于本〔日〕下午三时以前打好送我签字。

毛泽东
四月五日早

三

尚昆同志：

打一份，于明日上午十二时送我。

毛泽东
四月五日

四

尚昆同志：

两件[2]都有文字的修改，请重打于本日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四月六日一时

---

[1] 指经毛泽东修改后于1955年4月6日对赫鲁晓夫邀请他访苏的复信，即本篇六。

[2] 即本篇五、六。

五

苏共中央赫鲁晓夫[1]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召集了全国代表会议（不是代表大会），议程为下列三项：（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三）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

关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和关于上述三个问题的决议，已在报上发表，想来你们或许已经看到了。现特送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和陈云同志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请求你们替我们加以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你们的意见希望于六月一日以前通知我们，因为六月间我国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并要公开发表。自然，提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公布的计划，不应当和我们送给你们看的这个计划一模一样，有些机密的部分，我们是不准备公开的。亲爱的同志，要求你们看这样麻烦的文件，实在是过分的请求，但是你们的经验比我们多，为了少犯错误起见，还是请你们替我们看一下吧。

此外，在我们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还有邓小平同志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关于目前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和我的开幕词，一并送给你们，作为参考，你们如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如有意见，也请向我们提出。这些都是不公开发表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的，刘少奇同志的发言并且是机密的。

致以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

六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三月二十五日来信收到。对于您的热情的邀请，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很愿意能到苏联和同志们聚谈和往各地参观。但因我近日身体有些不舒服，周恩来同志本月内又要出席亚非会议，因此不能成行，待以后再约时间吧。此复。

致以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看碑文。

关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命令

（1955年4月7日）

由于希特勒德国发动破坏世界和平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和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宣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希特勒侵略者被消灭以后，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会议[1]决定了德国应当发展成为和平、民主、统一的国家和缔结对德和约的途径。

但是由于美、英、法三国一贯奉行分裂德国、使西德复活军国主义和加入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的政策，德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对德和约仍然未能缔结。现在美、英、法三国积极图谋通过实施巴黎协定[2]进一步阻挠德国和平统一和缔结对德和约，使欧洲的和平和

---

[1] 指苏、美、英三国首脑和外长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也叫柏林会议。会议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讨论了设立外长会议，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德国赔偿，波兰西部疆界，控制黑海海峡，对意大利的政策，哥斯尼堡地区最后让予苏联，对罗、保、匈、芬的政策，战争罪犯，奥地利领土托管和参加联合国组织等问题，并签订了《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发表了《柏林会议公报》，这两个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件，通称《波茨坦协定》。

[2] 指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同联邦德国于1954年10月在法国巴黎签订的协定。

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全德人民以及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促进对德和约的缔结、保障欧洲集体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同时为了中国人民和全德人民的利益；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第九次会议的决议，宣布：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从此结束。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应当建立起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不改变德国的国际义务。同时并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有关德国的国际协定而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四月七日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29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

中国和巴基斯坦应该成为好朋友[1]

（1955年4月27日）

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东方国家，东方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他们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亚非国家中只有日本是工业化的国家，但是现在日本正处于困难的地位。这次亚非会议开得很好，与会国家基本上是团结的，会议的公报不是多数通过而是一致通过的。中巴之间从来没有战争，现在也没有任何争执，两国有贸易来往，因此中巴应该成为好朋友。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五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你们接受了美国军事援助，印度害怕，我们也害怕。阿哈默德大使说，巴基斯坦决不会利用这些军事援助来对付印度或其他国家，有了这条保证就好了。此外，你们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我们怕的不是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甚至也不是英国和澳大利亚，而是美国。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地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解，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的谈话。

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五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希望大使在北京能安居下来，有困难可以找外交部，在任期中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努力。我们将嘱咐我国驻巴基斯坦的代表及全体使馆人员同巴基斯坦政府搞好关系。

接受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5年4月27日）

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巴两国间的经济和文化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进展。我相信今后在贵大使努力下贵我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将在现有的基础上日益密切。这种友好关系的增进不仅将使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且将对于各国人民所努力争取的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有所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我本人欢迎阁下出任巴基斯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愿在您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和维护国际和平的工作中，予以充分协助。

关于越南奠边府作战应注意事项致彭德怀、黄克诚[1]电

（1955年4月28日）

彭德怀、黄克诚同志：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毛泽东

四月廿八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克诚，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对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4月28日）

一

刘[2]阅后发。加了一个尾巴[3]。

毛泽东

四月廿八日

---

[1] 国务院、中共中央1955年4月28日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近一时期粮食的销量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合理指标，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这是极端反常和危险的，必须立即加以扭转。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深入地发动群众，进行充分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使群众明了国家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真正出路。指示稿还规定了解决粮食供应问题的具体方法。

[2] 刘，指刘少奇。

[3] 指毛泽东审阅国务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稿时，在末尾加写的一段话，即本篇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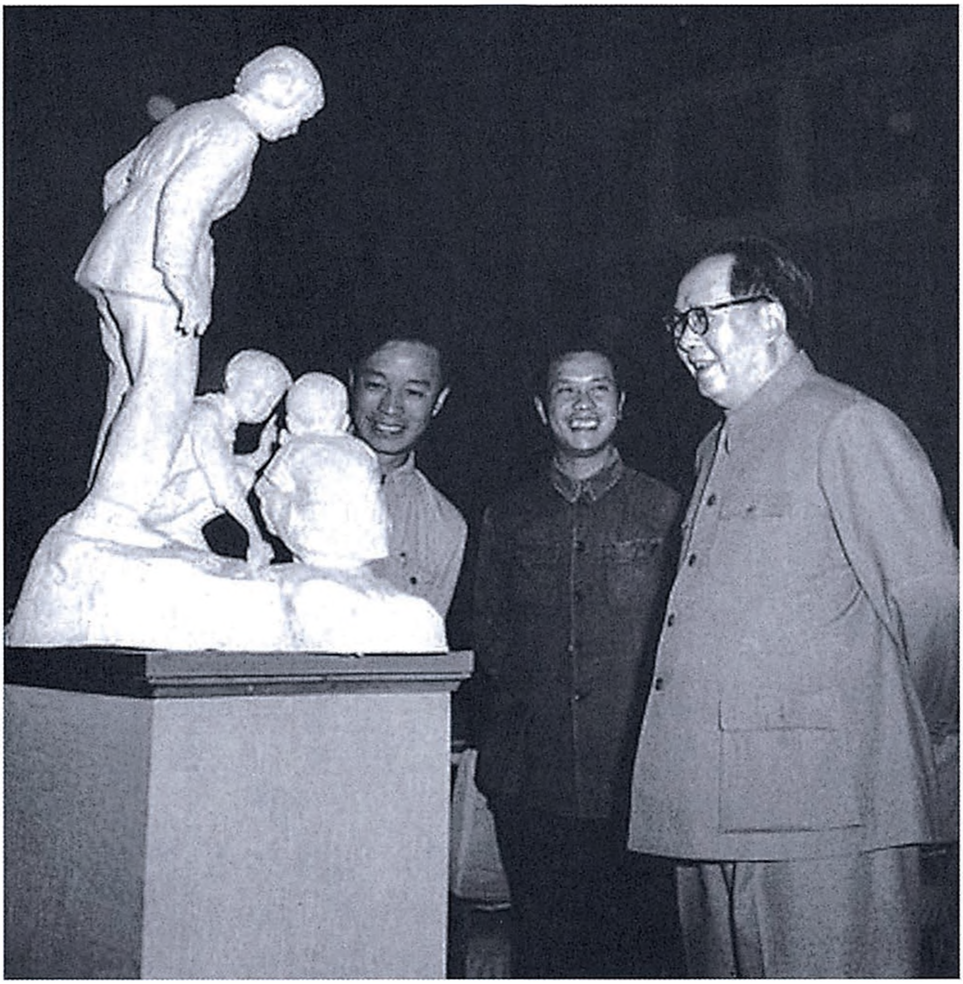
国务院和中共中央要求各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在接到本指示后的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将本指示的要点，结合当地情况，作出自己的指示和安排，一直传达到乡，并开始见之实行。

毛泽东等为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题词

（1955年4月28日）

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和文化在过去十年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的结果，这是捷克斯洛伐克全体劳动人民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结果。捷克斯洛伐克在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发展的事实大大地加强了我国人民对正在开始的工业化事业的信心，并且预示中捷两国贸易发展和科学技术合作的日见广阔的前景。祝捷克斯洛伐克日益繁荣强大，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间的友谊不断增进和巩固。

毛泽东　刘少奇　朱　德
陈　云　彭　真　林伯渠
董必武　康　生　张闻天
邓小平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1955年，毛泽东参观全国美术展览。

1955年，毛泽东参观全国美术展览。

美国可怕，又不可怕[1]

（1955年4月29日）

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目前美国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从东京到伦敦建立军事基地，把三百万军队中的一百多万人都钉在这些基地上，动都动弹不得。这不像是个打仗的架势。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所以我们在国内和国际方面都有很多工作可做，美国最后必定要被孤立起来。在其他国家中支持美国战争政策的人也会愈来愈孤立，这些人可能每个国家内都有，像蒋介石这样的人我想英国也有。

目前的问题是和平还是战争？战争打起来，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如果不打，还可以多活几年。

我们称美帝国主义为纸老虎，它还叫嚣，不相信。可以这样说，战争如果打起来，在战争初期和表现形式上，它可能是铁老虎，可是到后来便会成为纸老虎。因为美帝国主义不得人心，人民反对它，它只能是在铁老虎的形式中包含纸老虎的实质。希特勒也是如此，但纸老虎的成分美帝国主义还多一点。美国的军队到处不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时谈话的一部分。

受人欢迎。美国有三百万军队，驻在世界各地却有一百五十万。这样把自己的力量钉死了，无法打仗。看样子美国现在是想霸占些地方，不一定就会打起仗来。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们便可进行十个五年计划。同时在五十年间，在美国控制下的各国人民无法容忍，便要起来摆脱美国的控制。但是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我们不要打，它打来，那么便要扫它几下。在亚、非、欧，扫它是有把握的。如果打起来，三个洲都会变成一个腔调。因为我们有力量，对帝国主义我们并不怕。

我们要努力阻止战争的爆发。万一战争无法阻止，准备打他几年，把战争从三个洲的土地上扫出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打了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五六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准备打上十年吧。自人类有史以来，只打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打出个苏联来，第二次打出八亿人口的人民民主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出现了两类新的国家：第一类是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第二类是独立及半独立的印度、缅甸、印尼等。所以不待事实出现，就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1955年4月29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主席哈里·波立特。

给黄炎培[1]的信

（1955年4月29日）

任之先生：

四月二十五、六日惠书[2]收读，甚谢！

粮食问题，下一个月还会是紧的，六月以后将会好些了。

顺祝健康！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1955年4月25日和4月26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4月25日的信汇报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4月26日的信再次向毛泽东反映农村粮食问题，信中说：根据最近收到的各地人民来信，最严重的还是农村粮食问题，我曾选取可靠性较高的5封信送给陈云同志，并与其长谈达4小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此时正临“农忙”，人为的丰和歉将取决于这一关头，似须经过正确了解后及时处理。

关于中医问题的指示[1]

（1955年春）

去年责成□□□同志把中医工作总结检查一下，今年发现下层对中医中药有抵触情绪。责成□□同志限期把中医中药做出成绩。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有得到解放，中国六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数量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很少向领导反映，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历史证明中医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设立机构研究中医药。中医进修西医化了，说中医不科学，是有其不科学之处，但不能过早地批评，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几年来未做出成绩是不对的……

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两年中医。

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接待和待遇，因为中医功劳大嘛。反对中医的宗派，加强中国医药的研究。（对贺诚说）河北不是有个祈州吗？（贺诚说：有。）那是中药的集散地，商业部门必须加以研究。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给陈嘉庚[1]的信

（1955年5月1日）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2]，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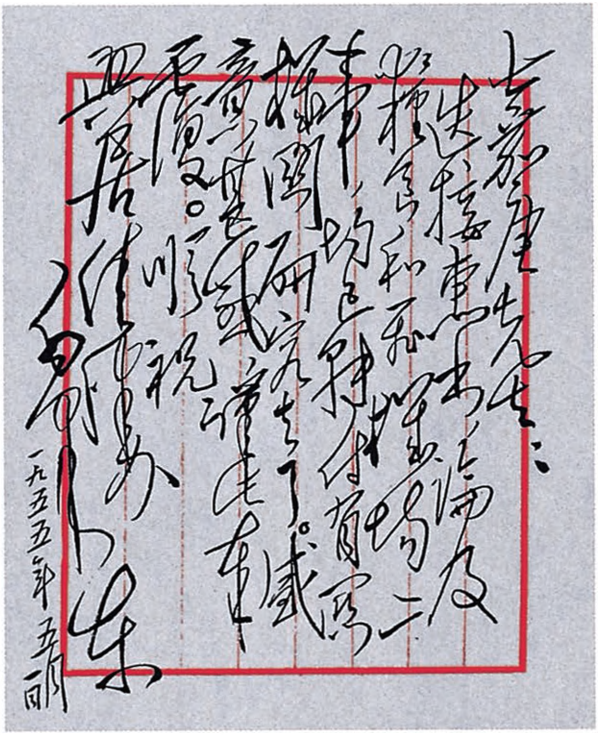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嘉庚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全国食用较粗糙的“九二”“九五”米（即每100斤脱壳的糙米，再加工后得92斤或95斤米）以节约粮食，和建议福建省晋江青阳机场改建在青阳公路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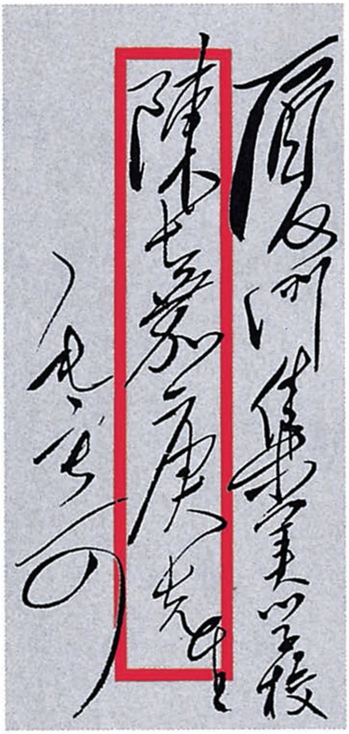
嘉庚先生：

先後接讀兩示及福建和廈門調查報告二件，均已轉交有關部門研究去了。感謝先生盛情厚意。順祝

起居佳勝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廈門集美學校

陳嘉庚先生

毛澤東寄

毛泽东致陈嘉庚信的手稿。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首都庆祝五一节大会主席台上。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首都庆祝五一节大会主席台上。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向游行的群众队伍答礼。

给周世钊[1]的信

（1955 年 5 月 1 日）

惇元兄：

三月惠书收读，甚谢！学校部署很好。规程和经费均不要同他处立异，但在教学内容方面多做工作，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我情形如去年那样，游水颇有好处。顺颂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给蒋竹如[1]的信

（1955年5月1日）

竹如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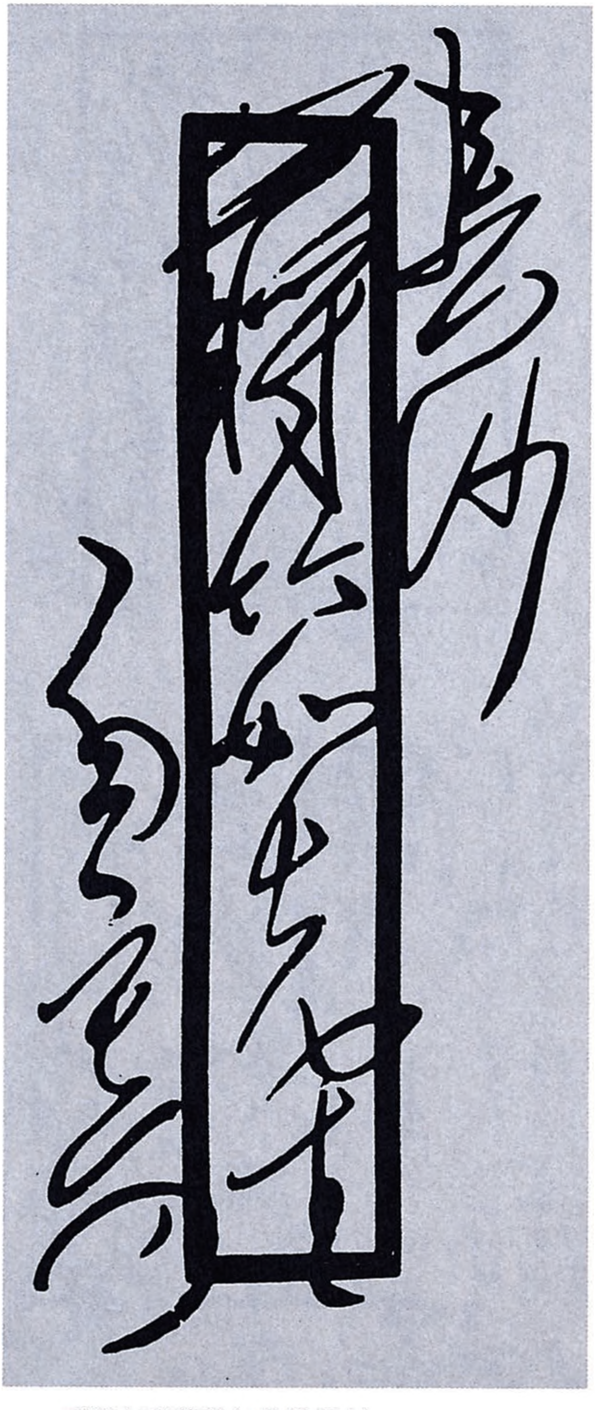
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此复。顺问教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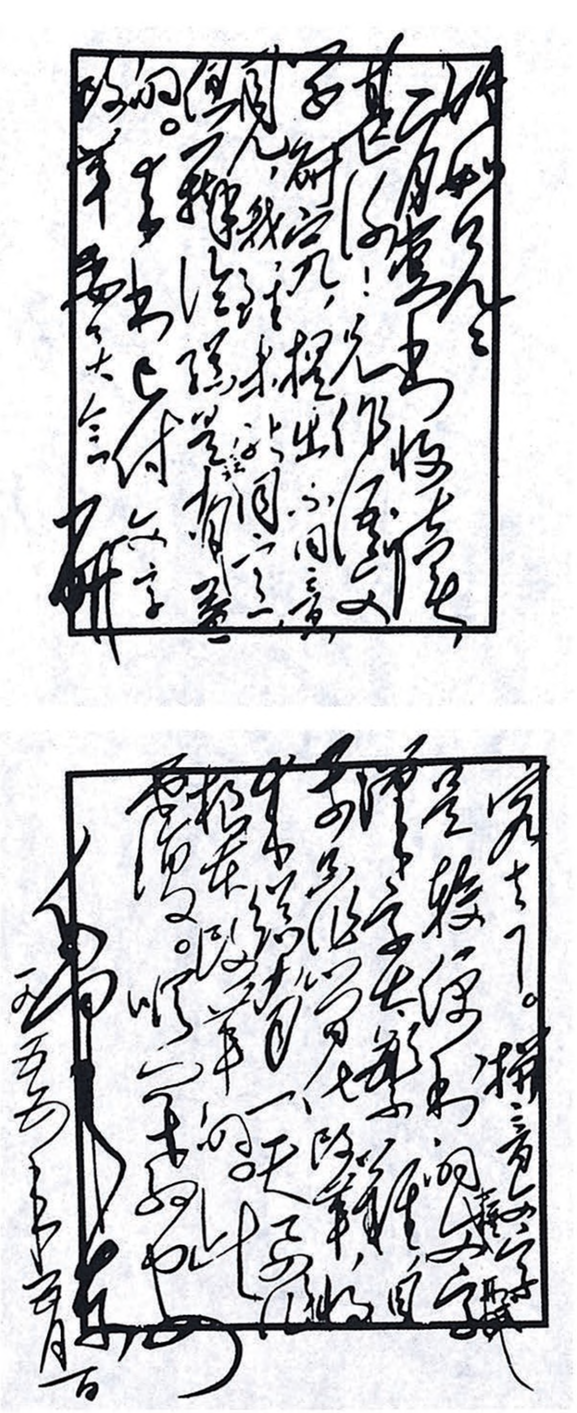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

[1]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毛泽东致蒋竹如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蒋竹如信的手稿。

给文炳璋[1]的信

（1955年5月1日）

炳璋同志：

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二人，和他们一道来京一行，即持此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3]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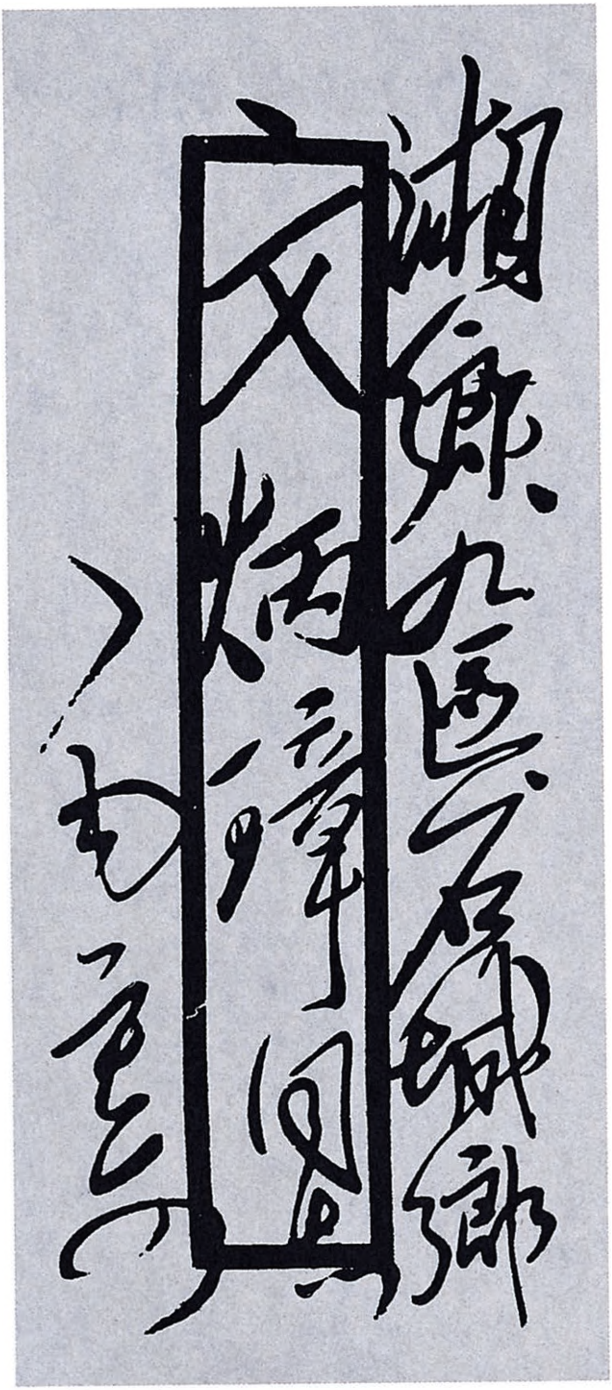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

[1] 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

[2] 毛泽荣，又名逊五，毛泽东的堂弟。毛仙梅，毛泽东的堂弟。

[3] 文梅清、文东仙，毛泽东的表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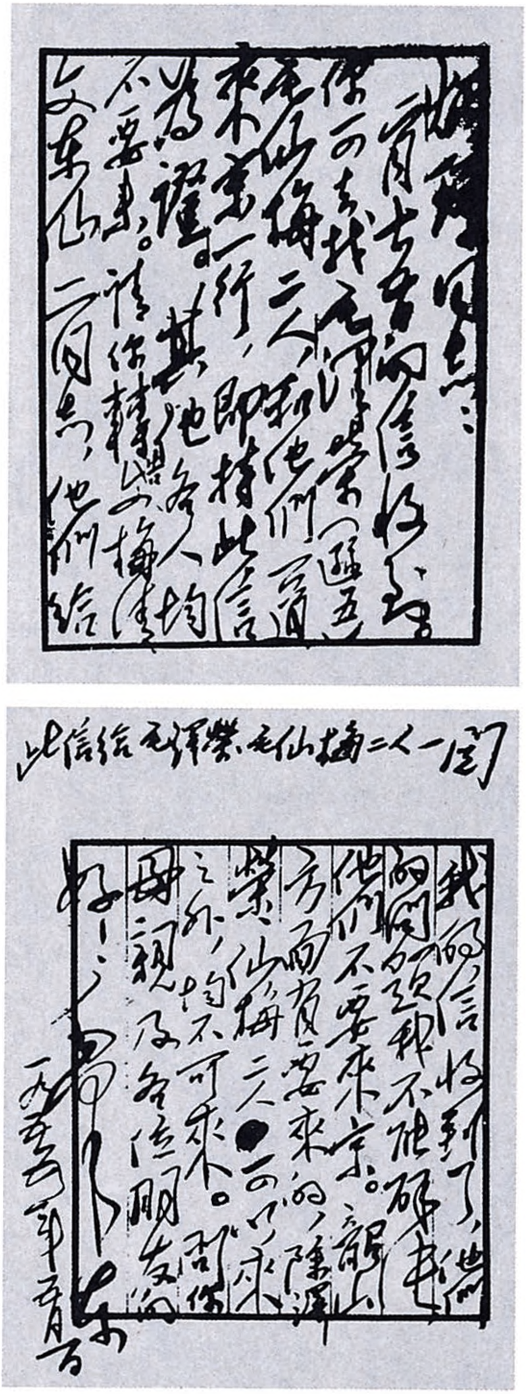


湘鄉九區石城鄉

文炳璋同志

毛澤東

毛泽东致文炳璋信的信封。



炳璋兄：

前月廿六日的信收到，你可来我处，泽荣（逊五）、毛仙梅二人，和他们同来京一行，即持此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毛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向你母亲及各位朋友问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致文炳璋信的手稿。

给张沛民[1]的信

（1955年5月1日）

沛民先生：

二月十五日的信收到。寄上二百元，聊助涓滴，不要还的。如有困难，尚可续告。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

[1] 张沛民，当时在长沙市当保姆。其丈夫刘政谋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已病故。

给谭世瑛[1]的信

（1955年5月1日）

世瑛兄：

去年夏历十二月廿八日来书收读。情况困难，甚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三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如有所需，尚望续告。年老出门，颇多不便，似以无动为宜。如体健兴高，亦可出门看看。此复。

顺候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

[1] 谭世瑛，毛泽东在湖南省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给张四维[1]的信

（1955 年 5 月 1 日）

四维兄：

三月二日的信收到。你说的事，我不能答复。生活困难，付上二百元，以为小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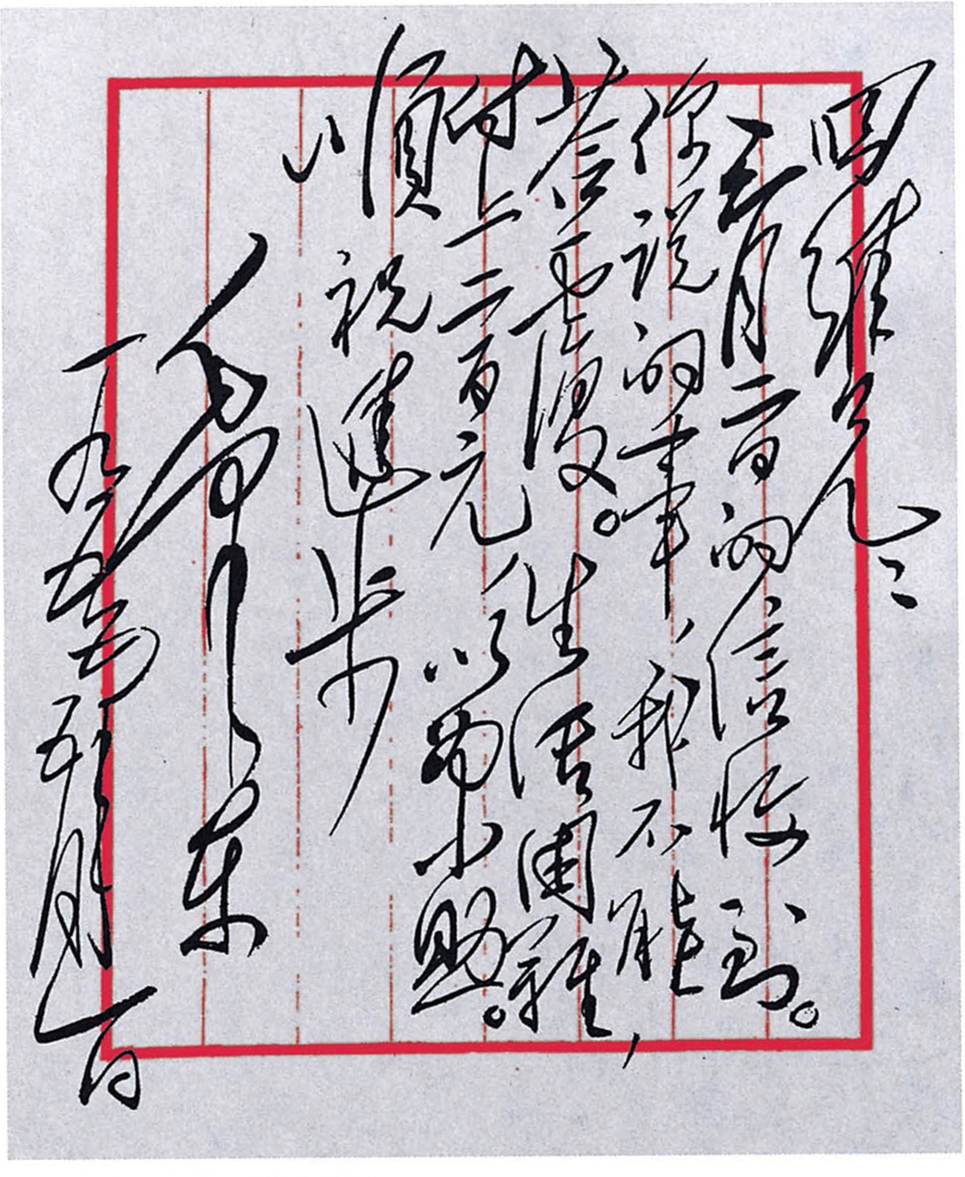
顺祝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

[1] 张四维，毛泽东少年时的邻居。当时在中国盐业公司湖南省公司工作。



四维兄：

五月十日的信收到。你说的事，我不能答覆。生活困难，附上二百元，以为小助。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八月七日

毛泽东致张四维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5年5月6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值此德国人民获得解放十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般的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德国人民在苏联军队粉碎希特勒法西斯统治后，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进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建立了自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五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胜利地建设着新的生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德国人民争取统一、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坚强堡垒。

美英统治集团不顾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加深德国的分裂，企图把西德变成新的战争策源地。最近巴黎协定[1]的批准，使新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欧洲和世界的和平遭受

---

[1] 指1954年10月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同联邦德国在法国巴黎签订的协定。

着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欧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为保障自身安全和维护欧洲及世界和平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并深信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强大团结一定能够彻底粉碎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德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得到胜利。

谨祝德国人民在阻止巴黎协定实施的斗争中，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设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五月六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5年5月7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萨波托斯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值此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获得解放十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特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和苏联的无私援助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方面已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正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人民是很大的鼓舞。

目前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正在力图实施巴黎协定，积极复活德国军国主义，使欧洲以至全世界人民面临新战争的威胁。中国人民完全支持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欧洲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保障自身安全和欧洲和平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并深信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在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下，一定能够粉碎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于北京

对打击入侵美军飞机对策报告的批语[1]

（1955年5月10日）

照办。[2]

毛泽东

五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1955年5月10日报告的批语。

[2] 粟裕的报告汇报了美军飞机侵入我安东（丹东）以南地区领空与我机空战的情况，并判断美机仍有来犯进行挑衅之可能。提出我方对策为：当查明美机北上时，我机即进入待机空域巡逻监视其行动。如美机入侵至我领空及保卫目标上空时，则组织所有防空兵力火器坚决打击之。要求安东、旅大地区的空军密切协同动作，以确保我军机场及保卫目标的安全。周恩来5月10日批示：“今日美机入侵，我即还击，刻已发消息警告美方。总参部署方针，请主席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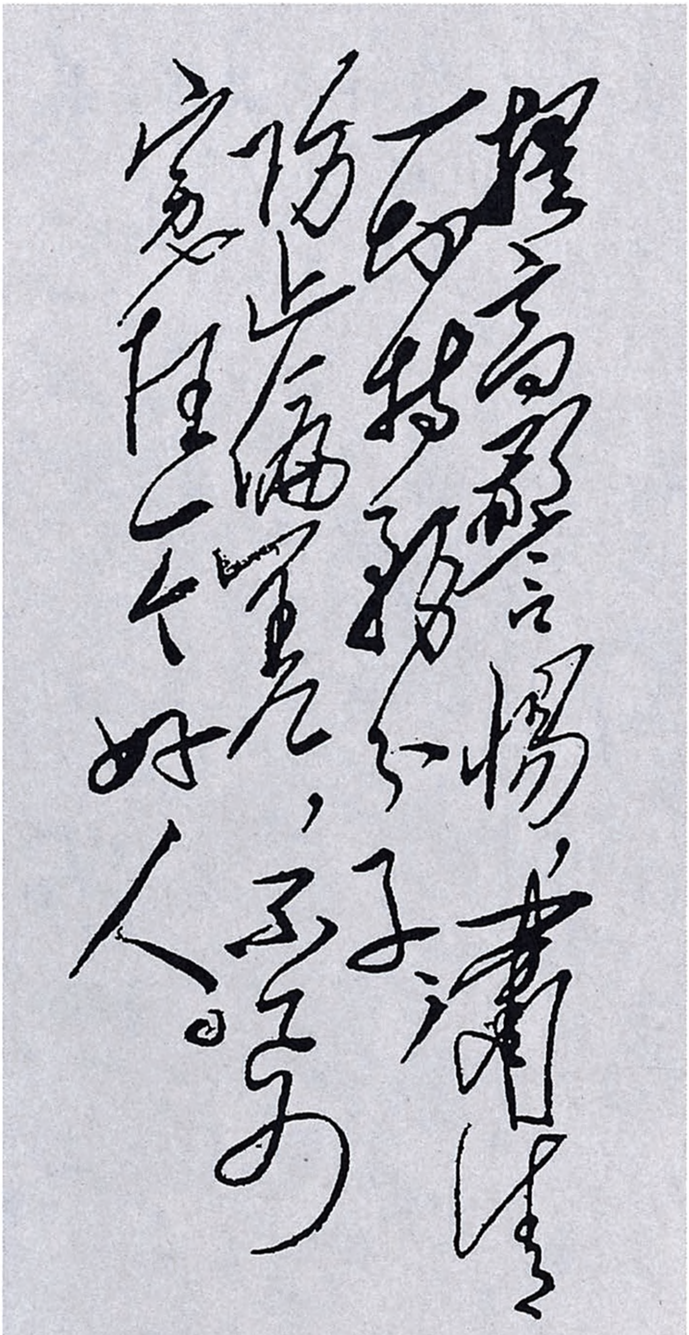
关于肃反工作要提高警惕、防止偏差的方针[1]

（1955年5月12日）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
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

[1] 在这份手稿旁，毛泽东还批有：“1955年5月12日最高国务会议通过。存。”毛泽东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讲了这两句话。



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毛泽东

毛泽东题写的肃反工作方针。

关于编辑、发表胡风问题材料的批语

（1955年5月、6月）

一

周扬[1]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2]，请你和陆定一[3]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2] 指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发表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写的编者按。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二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1]尚未看。对“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请别的几位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2]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毛泽东
六月六日

请再打清样送我看一次。

清样打出来后（最好今天下午打出），除送你们认为要送的人以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老、张闻天、康生[3]各一份，（朱、林、陈云[4]同志不在家）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

[1] 指《人民日报》社论稿《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后来发表在195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2] 陈伯达、胡乔木，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老，即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4] 朱，指朱德。林，可能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同志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也是逻辑问题）。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请定一务于今天下午四时前将胡风分子简历送交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八日上午八时

此信和两件清样请给乔木同志一阅。

四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1]，两条按语[2]，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二时

---

[1] 指毛泽东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

[2] 指毛泽东为收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补写的两个按语。

五

尚昆[1]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2]，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

毛泽东
六月十六日上午二时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2] 这篇序言后来发表在1955年6月20日《人民日报》上。

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1]的一些材料》等写的编者按

（1955年5月）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

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

[1]　胡风，当时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人民文学》编委。1954年7月，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系统地陈述他对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5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中宣部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同年4月前后，胡风给舒芜的一批书信受到注意，被整理成一份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起，

于5月13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为此写了这篇编者按，将胡风及有关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定性为“胡风反党集团”。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同年5月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1955年6月将陆续发表的三批材料编印成书，题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为该书写了序言。1965年，胡风被判处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1978年年底撤销对胡风的无期徒刑的判决，宣布释放。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从平反之日起恢复原工资待遇，本人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作结论，并由原单位妥善做好对他们的安置工作。凡经过法律程序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1981年，胡风被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85年5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了通报。1988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报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意见。关于“五把刀子”问题，补充通知说，“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关于“宗派活动”问题，补充通知说，“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补充通知说，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

对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1]

（1955年5月16日）

尚昆[2]用电话〔问〕周、陈、彭真[3]有无意见，如无，立即发出。

退尚昆于**十七日发出**，并立即印发给来京的各省市代表。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1955年5月16日为送审中央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中央通知中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于1955年7月初召开。在开会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将分赴各地或就近在城市和乡村视察。这次视察的重点，在城市主要是粮食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浪费问题；在乡村主要是粮食统购统销、社会治安、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问题。各地对于代表的视察，应该采取积极和欢迎的态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关于印发彭一湖[1]反映农村工作的信的批语

（1955年5月16日）

一

即送杨尚昆同志：

请将彭一湖的信[2]立即印发给明天（十七）到颐年堂的会的各同志。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彭一湖，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2] 指彭一湖1955年4月24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转给国务院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的家乡所在的湖南省东部地区农村中的一些情况：一、留粮点过低。1954年办统购的时候，由于给农民留下的粮食数量过少，使农民吃不饱，体力不足，生产情绪低，影响了生产，农民无力养猪，副业也受到打击。二、定产量的问题。1952年查田定产的时候，由于对平地水田的产量定得过高，加之1954年雨水过多，实际产量降低，使规定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出现空额。统购时由于对这一点估计不足，使农民留粮进一步减少。三、区乡干部作风问题。一些区乡干部遇事不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为了完成任务，往往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去执行，引起群众的反感。

各省市同志可能于十七日夜车或十八日早车回去。

小平[1]修改的中央的那个通知[2]（全国代表下去考察问题），亦请于明日印发给各同志。

二

彭真[3]发『表』给常务委员及常委一些工作人员及政协在京常委委员。[4]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中共中央1955年5月16日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

[3]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4]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的黄炎培为报送彭一湖的来信给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的信上。黄炎培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当时粮食问题的一些看法，说：“以我综合各方面报告，推想起来，到底有粮者叫是少数，无粮者叫是多数，而且前者是跟随着后者而发生的。要分别处理，但断不可不处理。”

给杨树达[1]的信

（1955年5月17日）

遇夫先生：

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此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五月十七日

---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与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当时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1]

（1955年5月17日）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地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百分之三十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贫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上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发展合作社，河南七万、湖北四万五、湖南四万五、广东四万五、广西三万五、江西三万五、江苏六万五，也是自愿互利。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利的，对你们各个地区也有利，如果你们自愿，那就拍板，把这个数字定下来。东北、西北、西南、华北，由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去召开一个会，把精神传达一下，讨论解决。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百分之九十是可靠的。

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

（1955年5月17日）

（广西省汇报时）

一万七千个社缩一二百，小事。发展五千个社，少吧！

（湖南省汇报时）

怪不得湖南不叫。（指粮食工作）

发展四千个，这么少，不到一番呀！

（江西省汇报时）

发展八千个，百分之三十四的乡。再发展一万四千个。

（湖北省汇报时）

周转粮不能没有，不放入计划，好呀！不买过头粮，不计周转粮。

（浙江省汇报时）

现在五万五千个，已退七千个，再退三千个，尚余四万五千，空白乡还要发展，其余各省可否翻一番？

（江苏省汇报时）

落后乡百分之五有反革命，百分之十坏人、蜕化分子，这是反革命同盟军，县区乡三级干部要调查。不能让中农做主，中农可以教育，他要按党的政策办事也可以。

三万二千个不发展?！要比一比浙江。

（安徽省汇报时）

不发达的省，要利用发达省的经验。江苏赶上去，湘鄂两广要放手发展。合作社多数要大发展，百分之九十较好，百分之十退。

（山东省汇报时）

死人真省粮？湖南说死几十人，只死一人。现象、本质分开，一股台风天黑了，不得了。一查，是假的，合作社百分之九十是好的，是经多次风的。再讲几点：

一、证明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机动幅度再研究，不决定。八百八十亿，十一亿重点减。湖南、安徽、山东要加一点。交粮食会议，为粮食需要者设。

二、层层负责有好处，但会形成无数独立王国。二十多万个要统一、分级。统一计划下各省负责。

三、周转粮、细粮、粗粮照旧。不要在粮食上舞弊，供应太广。□□缺是假缺。

四、合作社自愿互利，如果自愿，要拍板。承认了的，照着办，保证百分之九十可靠。

五、习、法、公核有争执，党委统一，合法又敏觉，做好。饶、潘、杨案子，包庇三个反革命。用大叛徒胡京和。可以传达到十四级以上。

胡风案子另发通知，那个字号不清楚。

关于调查谭世瑛的历史情况给湘乡县委的信和给谭世瑛的复信

（1955年5月17日、6月8日）

一

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

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1]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正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他的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

---

[1] 谭政，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这时已调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祝你们工作顺利。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

二

世瑛兄：

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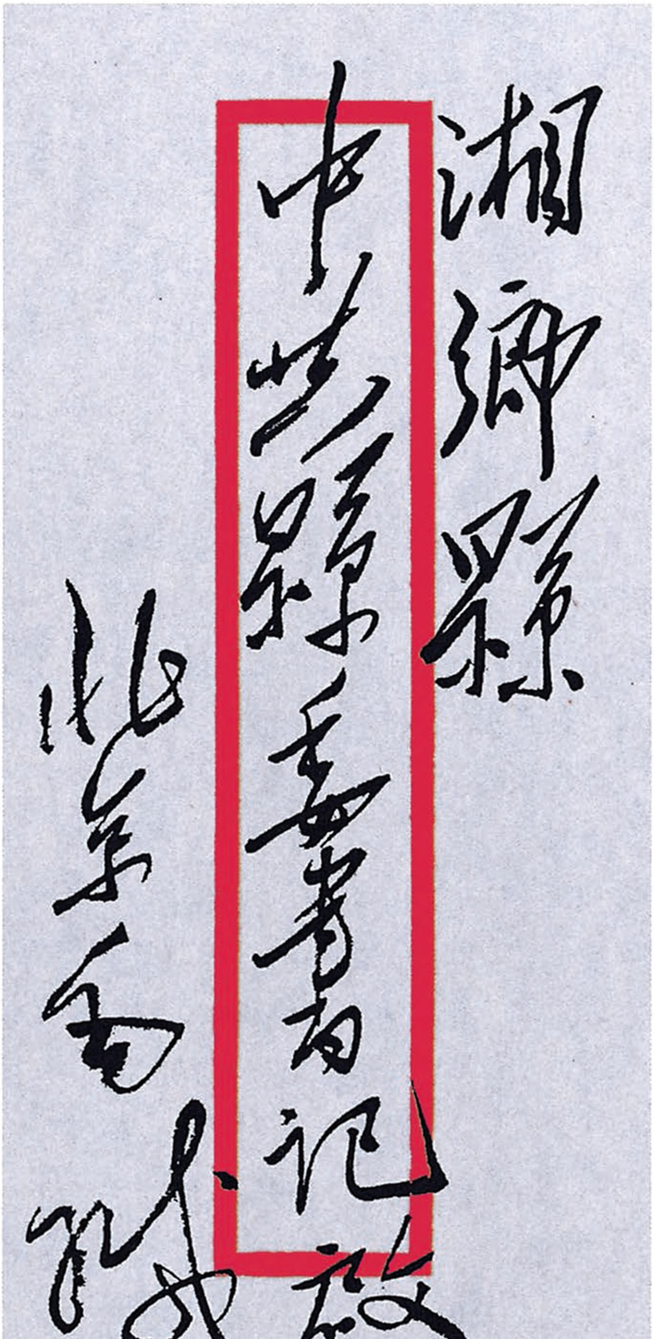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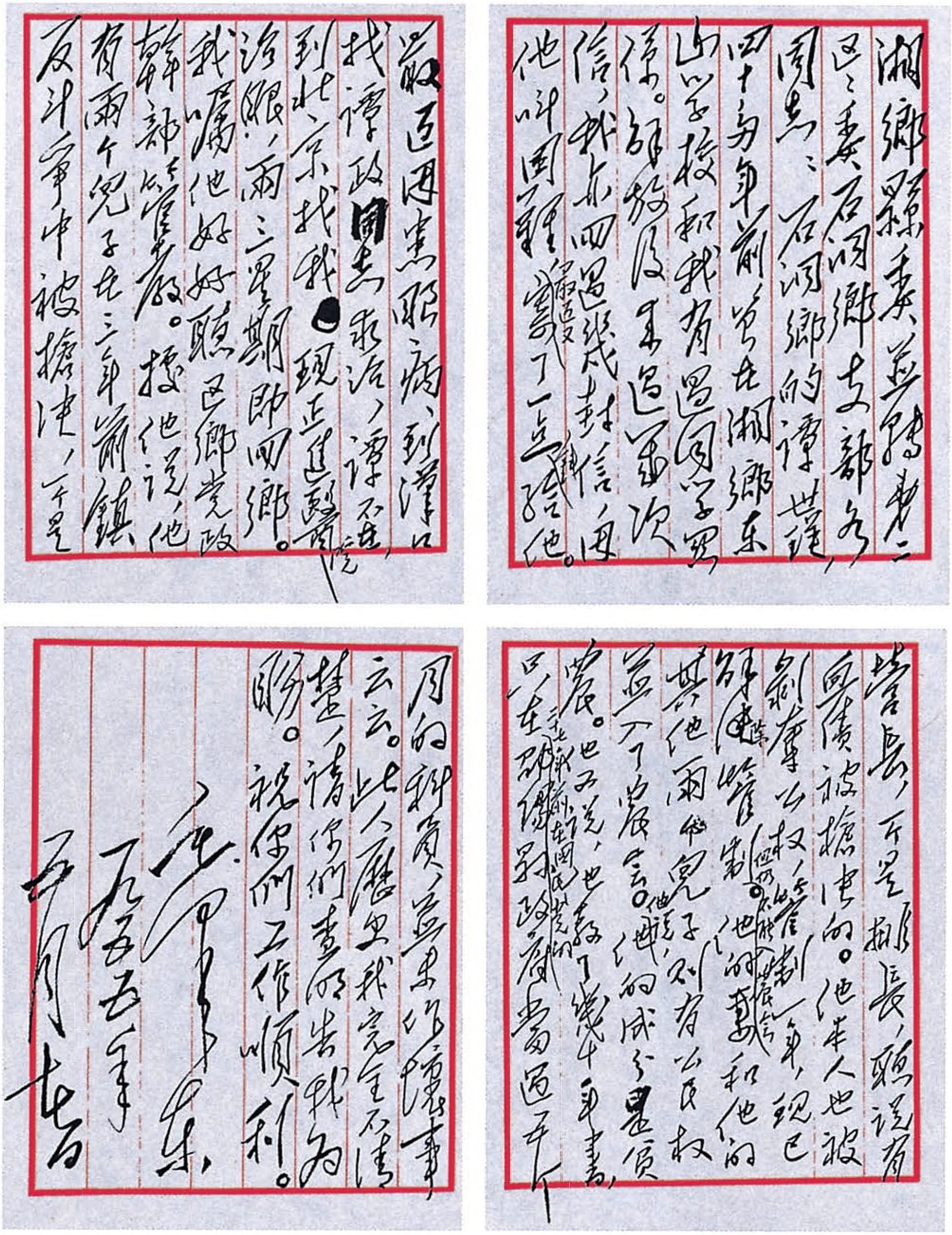


湘鄉縣

中共縣委書記啟

北京毛緘

毛泽东致中共湘乡县委信的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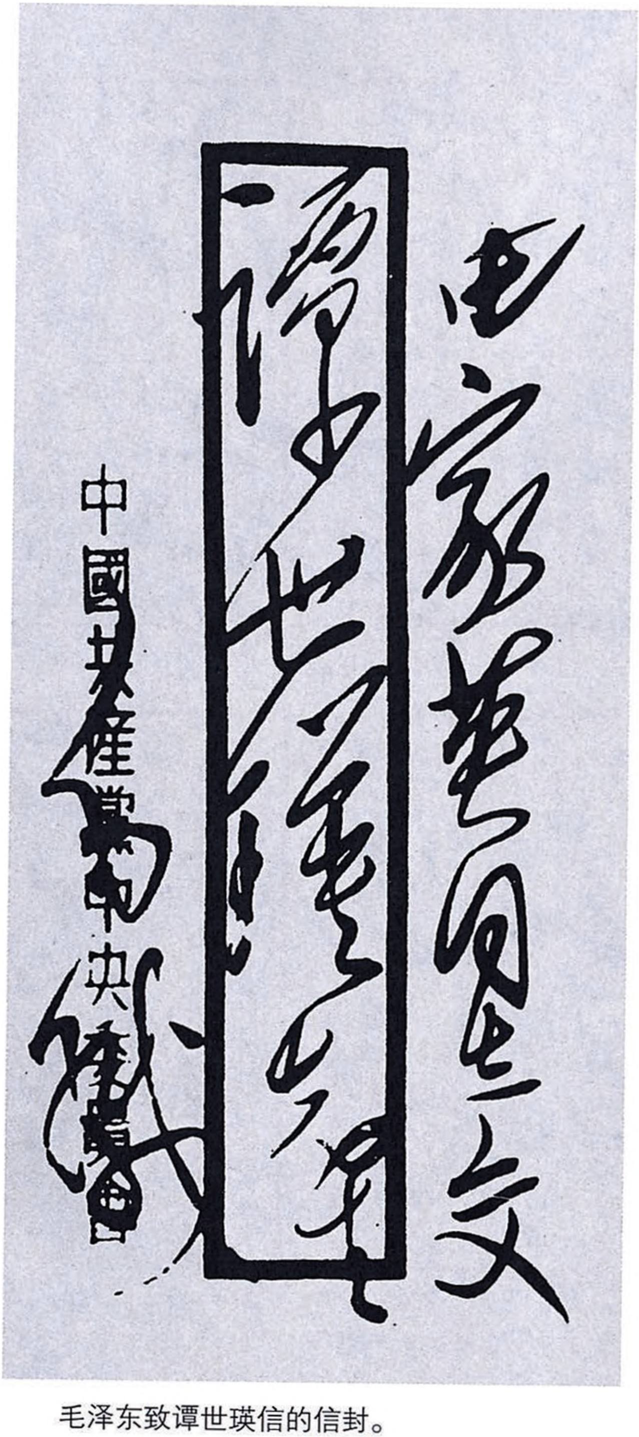
湘乡县委并转黄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湘潭找谭政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正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已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的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捕杀，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据说有血债被捕杀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他的妻和他的其他两个儿子，均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写了几千字书，已在湖南省政府当过半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祝你们工作顺利。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

五月七日

毛泽东致中共湘乡县委信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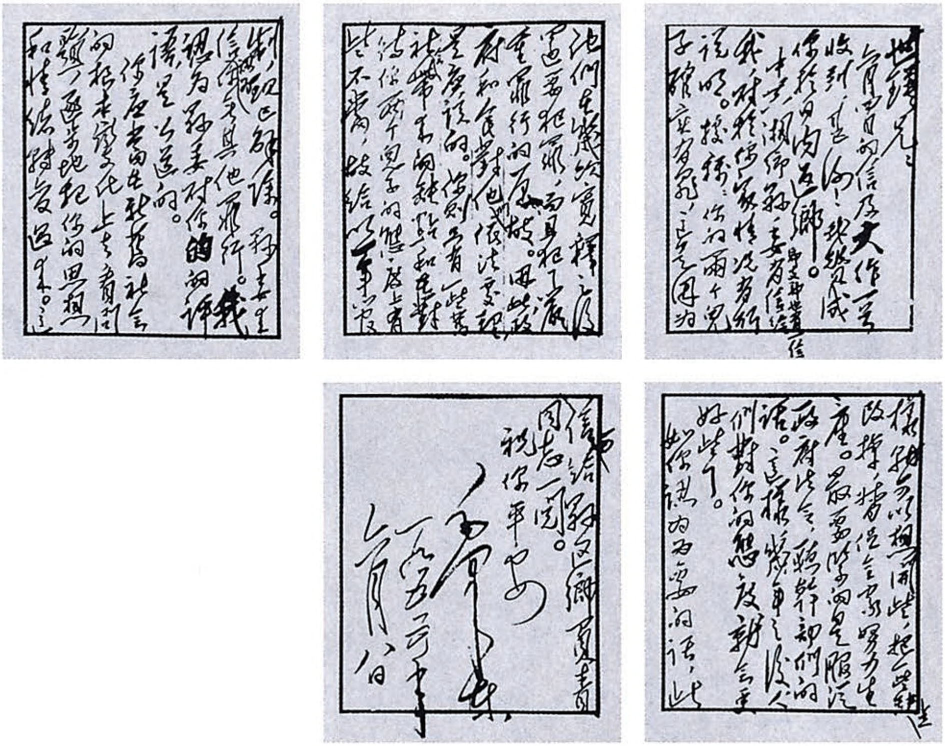


毛岸英同志交

譚世瑛先生

中國共產黨中央緘

毛泽东致谭世瑛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谭世瑛信的手稿。

对《人民日报》拟发的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1]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5月）

一

提高警惕，揭露胡风。[2]

二

按语不用，另换一个。[3]

---

[1] 指《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1955年5月15日晚10时报送毛泽东审阅的一组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的清样。这组文章的总标题原为《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

[2] 这是毛泽东为这组文章重拟的总标题。这组文章后来发表在195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此后，《人民日报》又以这个标题开辟专栏，陆续发了几组批判胡风的文章。

[3] 这个批语写在邓拓送审的为发表这组文章而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上。后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另拟了一个。本篇三就是毛泽东对另拟的编者按中一句话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个按语载于195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

三

如果我们不提高警惕，不把他们的问题弄清楚，不把他们的破坏活动加以制止，而让他们继续不断地“联络人”“争取人”“从事开辟工作”“大大地加强实力”，即是说让他们一天一天发展和扩大下去，他们就要用他们的“集束手榴弹”给我们的革命事业以严重的损害。

对黑龙江省人委关于森林火灾和扑火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5年5月）

一

参谋部绘图送我看。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指黑龙江省人民委员会1955年5月17日关于森林火灾和扑火情况给国务院并抄致林业部、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报告。报告说：一、鹤岗地区小兴安岭的山火，数日来经组织两万群众奋勇扑救，现已基本扑灭，开始撤人并进行彻底检查，以防复燃。二、呼玛县境大兴安岭的火灾，共有三处：一是盘古河西、岭木尔站西南，该处有11个火头，火势较大。二是在额木尔河东南，亦有11个火头。三是在马纶东南，有大小两个火头。整个火场是在依陵古鲁河与盘古河之间，火场约长60公里，宽15公里。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扑救，除呼玛已有450人在火场，330人在途中，现正动员750人赶赴现场外，准备再从嫩江动员1200人，黑河动员1000人赶赴火场。

二

送朱、周、邓、贺、子恢、彭真[1]阅，退叶子龙[2]。

黑龙江林火图。

---

[1] 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贺，指贺龙，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粟裕关于部署部队进驻福建新建机场的请示的批语[1]

（1955年5月19日）

退贺[2]、粟照办。

请注意研究周总理所提意见[3]。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1955年5月12日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报告说，福建地区新建机场将于6月底竣工，为配合外交斗争，保护浙闽沿海航线的安全，防止和打击敌机对福建沿海主要城市的空袭，并为解放金门、马祖创造条件，当上述基地竣工后，我即应进驻部队。

[2] 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3] 周恩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有以下意见："各项均妥，只第四项执行时应注意时机和有利条件。""摧毁敌人雷达后，敌人仍可再设，因之必须在我较有把握条件下方可进行空炮联合作战，否则易遭过多损失。"粟裕报告的第四项，是关于马祖敌设雷达的处置方法。

祝贺胡志明[1]六十五岁寿辰的电报

（1955年5月19日）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当您六十五岁寿辰时，请接受中国人民和我个人的热烈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您的卓越领导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您数十年来所作出的光辉贡献，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也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

谨祝您在争取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于北京

---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语稿中加写的两段话

（1955年5月）

一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二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关于发表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决议的批语

（1955年5月26日）

此件[1]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廿六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早一时

---

[1] 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1955年5月25日联席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开除胡风中国作家协会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的决议，载于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转发山西省委关于不许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的通知的批语

（1955年5月26日）

刘、邓[1]：

山西此项决定[2]很好，可转发全党。请为中央写一指示，放在前面。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5年5月22日关于不许在干部调动时请吃饭、照相、送礼给所属并报中央的通知。通知说，至今有不少单位在干部调动时，沿袭腐朽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请吃饭、照相、送礼，不仅浪费了国家财产，而且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省委决定：今后无论任何机关团体、厂矿企业，在干部调动时，均不许请吃饭、照相、送礼。

对中央关于征求党内外对继续镇压反革命和举行大赦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5月26日）

一

即送刘、周、朱、彭真、小平[1]阅发。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改了一点[2]。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见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鉴于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是一个关连到广大群众的政治行动，必须在党内党外更多地交换意见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因此，请各省市委对这个问题作一次专门的讨论，同时以政协为主体举行一次座谈会，然后将党内党外对这个问题（即应否大赦及如何大赦的问题）的意见，于六月廿日以前报告中央，以便确定是否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大赦的议案。或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举行大赦，以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反革命气焰高涨，人民不高兴），过几年再谈这件事，这种意见，民主人士中也有不少人提出。[1]究以何者为宜，请你们征询电告。

---

[1] 经过向党内外征求意见，中央决定不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关于举行大赦的议案。过了4年，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对上述罪犯实行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日发布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4日特赦释放了首批战犯33名。

转发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的经验的批语

（1955年5月26日）

少奇、小平[1]同志：

可用中央名义写一简短指示，转发安徽这个经验[2]，叫各地普遍仿办；并催督各地务必全党动员，在一切乡中普遍做好定销工作，压低总供应量，充分供应少数真缺粮户。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安徽省委1955年4月29日向所属通报的潜山县模范乡整顿粮食统销的经验。主要是：一、依靠积极分子排队摸底，使干部心中有数。二、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先开中心社的社员大会进行动员，讲清统购统销的好处，揭露坏分子的活动，表扬节约粮食的群众。然后分别召开小型漫谈会，算细账，找增产节约的办法，具体解决思想问题。三、中心社的问题解决后，召开全乡干部大会，介绍经验，推广到全乡。结果农民自动卖出节余粮食，使群众安了心，生产有了劲。

对黄炎培[1]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1955年5月26日）

一

任之先生：

五月二十五日惠书[2]收读。凡重要问题不厌求详地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最近我又找了十五个省市的负责同志征询了关于粮食、镇反、合作社等项问题的意见[3]，得了更多的材料，证实了我在最高国务会议所说的那些。但还要进一步研究，看到底是否如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1955年5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国民主建国会昨天召集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会，传达了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和实行大赦问题的讲话精神。大家对毛主席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二十四字结语一致表示拥护。对于大赦，大都主张可在适当时期进行有教育性的有原则的赦免。对毛主席博采众议、高度民主的精神，一致表示感佩。

[3] 1955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五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了粮食、合作社等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

此。先生此次下去考查，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民建会议材料[1]我已看过，很有兴趣，拟发各党派参考。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二

此件，各同志阅后请彭真[2]同志印发给人代常委、政协常委各人作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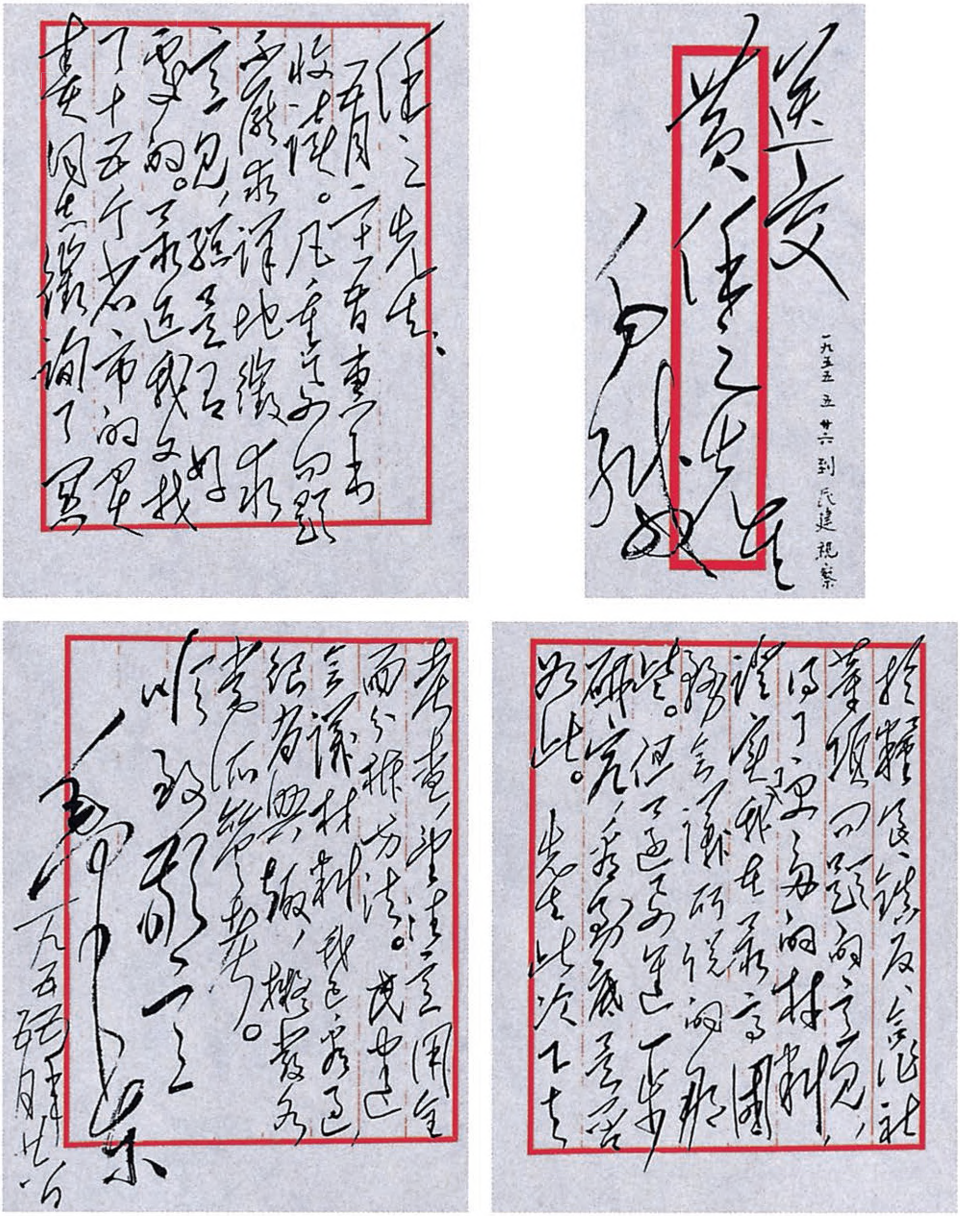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

[1] 指黄炎培信后附的中国民主建国会1955年5月24日召集的京津两地常委、中委座谈会记录。

[2]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送交

黄任之先生

毛泽东

一九五五　五　廿六　到　民建　视察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

（1955年5月26日）

我们之间没有隔阂。我们为你们好，因为对你们好的，也对我们好。希望你们强盛起来，发展起来，这对我们和对世界和平都有好处。亚非国家刚在万隆开过一次会[1]，这些国家都应该强盛起来，包括日本在内。过去日本不好，但是现在也受欺侮。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国家都强盛起来就好了。

由于科伦坡五国[2]的发起和召集，并在印尼总统和总理的主持下，万隆会议才开得好。中国是作为一个亚非国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以这种身份中国也尽了一份力量。中国愿意同所有的国家友好合作，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不是去做坏事的。由于中国所采取的态

---

[1] 指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29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2] 指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这5个国家的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主张。同年12月28日至29日，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联合发起在1955年召开亚非会议。

度，有些对我们不友好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泰国，在会议中同我们还可以相处，还过得去，没有什么大的过不去。当然，别扭还不少，但还是有些共同的地方。我们同这些国家有一种情况是相同的，它们也有同样的困难，那就是受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泰国的经济也是不发达的。日本虽然比我们先进，但是它也有经济困难。这是一般地说，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一般地说，我们是有某种共同点的。这次亚非会议恐怕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举行的第一次会议。

西方国家几百年以来，由于进行长期的侵略，它们对亚非两洲产生一种心理，轻视落后国家。它们说我们是有色人种。这是拿肤色来区分，就好像说有色金属那样。我们这些“有色金属”是会膨胀起来的，当然，我们不会去侵略别人。但“有色金属”是更有价值的，因为有色金属包括金、银、铜、锡等。

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西方国家说我们的民族不好，那末我们的民族怎么能保存并发展了呢？

我们很谈得来。我们同尼赫鲁[1]总理和吴努[2]总理谈过，现在又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谈了话。我们作为朋友是能够处得好的。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我们的关系不是互相损害，而是互利，不仅在商业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进行合作，万隆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要使这些国家每年都能看到进步。我们要互相帮助，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我们各有各的困难问题，经过互相帮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2] 吴努，当时任缅甸总理。

助，争取解决这些难题。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中国同印度之间过去有一个西藏问题，中国同缅甸之间有华侨问题和国界问题，中国同印尼之间也有华侨问题。对于那些同我们关系不大好的国家，我们也要采取具体步骤来解决一些问题。就是像泰国、菲律宾那样的国家，我们的想法也是一样，只要有可能，就争取搞好同它们的关系。我们曾经同尼赫鲁总理和吴努总理谈过泰国的问题，并请他们帮助我们劝说一下泰国。泰国说怕我们派军队去打它，但是怎么可以乱打呢？泰国又怕我们的傣族自治区[1]。我们说它可以派领事到昆明，看看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它。周总理在万隆曾经同泰国的外长谈过，也是为了搞好关系。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总理先生见到泰国和菲律宾的领导人时替我们说说，告诉他们中国是想跟他们的国家友好的。

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是没有好结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战争中固然双方都损失物资和生命，但是，历史证明战争有一个政治后果对西方国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俄解脱了旧有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

---

[1] 1953年我国在云南省曾建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后分别在1955年、1956年改为自治州。

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几年前，在座的人都是不合法的，我们都是“非法之徒”“叛徒”“坏人”。但是现在改变了。我们把那些所谓的好人赶跑了，你们赶走了日本人和荷兰人，我们赶走了日本人、美国人和蒋介石。这些人都说我们坏得很。尼赫鲁总理、吴努总理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都是坐过很久班房的。我们可以用这段历史去说服西方国家。它们说，它们的势力大得很，那末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都独立起来了呢？这个历史根据是很有力量的，不是造谣，也不是吓人。过去西方国家吓了我们几百年，现在到底是它们吓倒了我们，还是我们吓倒了它们呢？因此，结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不打，如果打，结果不是对我们不利，不是对亚非国家不利，而是对西方国家不利。如果说这是吓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们是有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作为根据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可能不听，它们的想法是偏在一边的，认为它们钢铁多、钱多、原子弹多。对于这些，我们怕不怕呢？有一点怕，不十分怕。我们说有一点怕，因为武器是杀人的。我们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损失，因此我们不要战争。西方国家手里这些东西的作用，是不会超过人民的力量的，因为人民是有生命的。西方国家有许多大王，什么煤油大王、钢铁大王、汽车大王，历史证明大王的结局

都是不妙的。希特勒、墨索里尼[1]、东条、蒋介石都曾经是大王。这间屋子就是皇帝曾经住过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大王都是手里掌握许多东西的，人民手里没有东西。我相信，印尼朋友开始斗争的时候手里也是没有东西的。我们在开始斗争的时候手无寸铁，我们的对手都是全副武装的。但是手无寸铁的人民却把全副武装的人赶跑了。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腐朽的人手里东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

就原子弹而言，亚非国家是无产者，我们这些国家连一个原子弹都没有。希望在这方面富有的国家善用其“宝”，如果乱用的话，不见得对它们有利。我们连一个原子弹也没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双手去侵略有原子弹的人，岂不危险？但是人家却把我们叫“侵略者”，说中国人是好侵略的。第一，我们“侵略”了中国大陆，现在又要“侵略”金门、马祖；第二，金日成[2]在朝鲜“侵略”到三八线，中国后来又帮助了金日成；第三，胡志明[3]也“侵略”到十七度线。而说我们的那种人倒似乎是十分爱好和平的。我

---

[1] 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首领。早年曾参加意大利社会党，后被开除。1921年组织法西斯党，1922年用暴力夺取政权，建立了法西斯专政。1939年同德国缔结政治、军事同盟，次年追随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7月，由于军事失败和国内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他的独裁政权垮台。1945年4月28日，被意大利游击队处死。

[2] 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们听说，荷兰人也说印尼要“侵略”西伊里安[1]。

总理先生说，印尼要和平利用自己的丰富的资源，我完全同意。印尼的前途是了不得的，有那么多的宝藏。日本虽然现在比较发达，但是资源贫乏，印尼是一定能超过日本的。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气候好，蕴藏的物资尤其丰富，若干年以后也会出现一个比日本更强的新印尼。当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资源，这对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印尼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相信，印尼人民也同样支持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国家。我找不到我们两国间有任何利害冲突，而只能找到两国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

[1] 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1963年5月1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图为毛泽东在设宴招待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中央关于调查粮食征购和供销情况的通知[1]

（1955年5月28日）

一

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

关于粮食问题的情况，请于接电后一个月内将下列各点调查清楚报告我们（计算的范围，除第六项问题外，其余五项都是除去盐民、林民、渔民、牧民、船民、灾民和经济作物的农民，即专算产粮农民，并以省为单位计算平均数）：（一）去年定产偏高的占百分之几，偏低的占百分之几，恰当的占百分之几；（二）缺粮户（以缺一个月粮为起点计算）占百分之几，自足户占百分之几，余粮户占百分之几；（三）缺粮户供应方面，该供应的真缺粮户占百分之几，不该供应而供应了的假缺粮户占百分之几（除去周转粮不计在内），本粮食年度内因对假缺粮户盲目供应而耗费的粮食共有若干；（四）以叫唤缺粮的人为一百，真缺粮而又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因而引起叫唤的占百分之几，假叫唤的占百分之几；（五）销售补课工作，

---

[1] 指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调查粮食征购和供销情况给上海局、各分局、各省市委的通知。

已经做好的占乡或户的百分之几，尚未做好的乡或户占百分之几，何时可以做好?（六）各省市销粮肯定应当减少，下一粮食年度究竟可减销若干。以上六项问题，如因时间来不及，请根据若干可靠的典型材料加以估算，于七月五日以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以前）先行报来。精确调查，留待下半年做。

中央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二

刘、周、邓[1]阅发。发后抄邓子恢，廖鲁言，李先念，陈国栋，毛、刘、周、朱、陈、邓[2]。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陈国栋，当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

在印尼驻华大使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1955年5月29日）

我提议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间友好合作的日益发展，

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的健康，

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的访问中国和他及他的夫人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莫诺努图大使的健康，

干杯！

对中宣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5年5月29日）

刘[2]阅后照发。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5年5月11日在给中央的这一报告中说，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自去年11月开始到现在，已展开为全国规模的运动。这是我党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思想斗争。经过这次批判运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毒害作用已初步揭露出来，开始引起人们对世界观问题的注意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在我国学术界发生了深刻影响，对于形成党的理论队伍，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部分旧学者也参加进来，受到了一定的教育。这次批判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从开始到现在，运动的发展一般是健康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第一，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影响还不够深广。第二，在各学术部门中发展还不平衡。第三，由于理论工作基础薄弱，虽然发表的文章很多，水平也逐渐提高，但好的文章太少，有的文章论证不多，说理不够，结论武断。针对上述情况，应进行下列几项工作：一、扩大这次批判运动在广大知识分子中

的影响，除继续发表文章外，应同时做好演讲工作。二、要注意针对旧学者在批判中暴露出来的错误观点，把胡适思想中欺骗性最大、迷惑人最深、影响最广的所谓治学方法等，进一步组织文章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批判。三、对批判已经充分展开的学术领域，应提出进一步深入的方向；对批判尚未充分展开的学术领域，则应提出重点，制订计划，坚决展开批判。四、要逐步扩大范围，对近几十年来其他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人物至今还有影响的，亦应进行批判。五、在报刊上发表论文，提倡在一篇文章内集中分析一个问题，而不是泛泛地概论一切问题；提倡进行正面的充分阐发，而不只是揭发和批判；提倡通俗、精练、明白易懂；提倡科学性和准确性；提倡充分的说理和严格论证；提倡深入研究，力求理论上有所建树。六、经常性的讨论会要坚持下去，但不必太多，要有计划，有准备，题目集中，以求在讨论中真正提高水平，不应为讨论而讨论。七、从现在起即着手准备几篇较有分量的总结性的论文，作为这一阶段集中批判的结果。

[2] 刘，指刘少奇。

在姜黄族英来信[1]上的批语

（1955年5月）

似可酌予帮助，请统战部徐冰[2]同志处理。罗迈[3]知姜济寰为人。

---

[1] 姜黄族英，早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是姜济寰的妻子。姜济寰在20世纪20年代和毛泽东相识，曾参加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去日本，于1935年病故。1955年4月27日，姜黄族英给毛泽东写信说，她年已六十，生活困难，请求帮她安排一个工作。后被安排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6月1日）

陆定一[1]同志：

请考虑用中央名义将此件[2]通报各地党委及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要他们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前谈指示[3]，可后发，先发此件。请于日内拟好，交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一日

此件用后退毛。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五人小组组长。

[2]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5年5月30日关于查处胡风分子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市委根据中央对处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召开了党员干部会，布置了这一工作，并成立了办公室专门处理“胡风集团”问题。

[3] 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

转发曾山[1]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5年6月2日）

少奇、小平[2]同志：

此件[3]很有用，请你们看看，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各省市〔委〕及中商部、合作总社党组，叫他们通知各地试办。

毛泽东

六月二日

---

[1] 曾山，当时任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曾山1955年5月30日关于南昌市鸿泰百货专业代销店情况给商业部党组并报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周恩来、各副总理、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南昌市了解市场情况时，看到南昌市鸿泰私营百货专业代销店的一些做法，对我们如何使私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为社会主义商业很有启发。该店解放时有资金3.9亿元（旧币），职工40人。解放后因经营不善，人员过多，营业额下降，亏累日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向市百货公司申请代销，在严格的合同督促下，改善了经营管理，扩大了营业额，职工的主人翁觉悟进一步提高，商店的内部关系已起了变化，为将来向国营店过渡创造了条件，值得研究重视。1955年6月3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委并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商业部、合作总社党组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5年6月3日）

一

刘、周、邓小平、彭真[2]阅后即发。

毛泽东

六月三日

---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指示稿中加写的第六条。此外，在指示稿第一条中，讲到“我们现在的党政军民各种机关中，和厂矿学校中，其所有人员，包括起义人员、留用人员在内，绝大多数是好人”中的“绝大多数”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百分之九十几”；在讲到“但同时，这些机关厂矿学校中，也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全体人员中是绝对少数”时，毛泽东在“绝对少数”后面加括号写了“占百分之几，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在指示稿第五条讲到各省市委应一律成立五人小组来领导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工作一段的后面，毛泽东加写了“党委书记和常委对此事应积极注意抓紧领导”。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二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给陈云[1]的信

（1955年6月5日）

陈云同志：

来信并附你父陈昌[2]烈士略传，均收到了。去年一信也收到了。略传已转付党史资料机关作参考。此复。

祝你学习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五日

问你母亲好。

---

[1] 陈云，当时在湖南长沙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当教员。

[2] 陈昌，新民学会会员，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曾任水口山工会主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1930年在去湘鄂西贺龙部工作途中被捕，遂被解往长沙杀害。

对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的批语[1]

（1955年6月7日）

少奇同志：

此事似应由政治局通过，然后方好发出[2]，请酌定。

毛泽东

六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1955年6月4日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审阅的中央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稿上。

[2]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中央于1955年6月10日正式发出关于建立省、市委书记处的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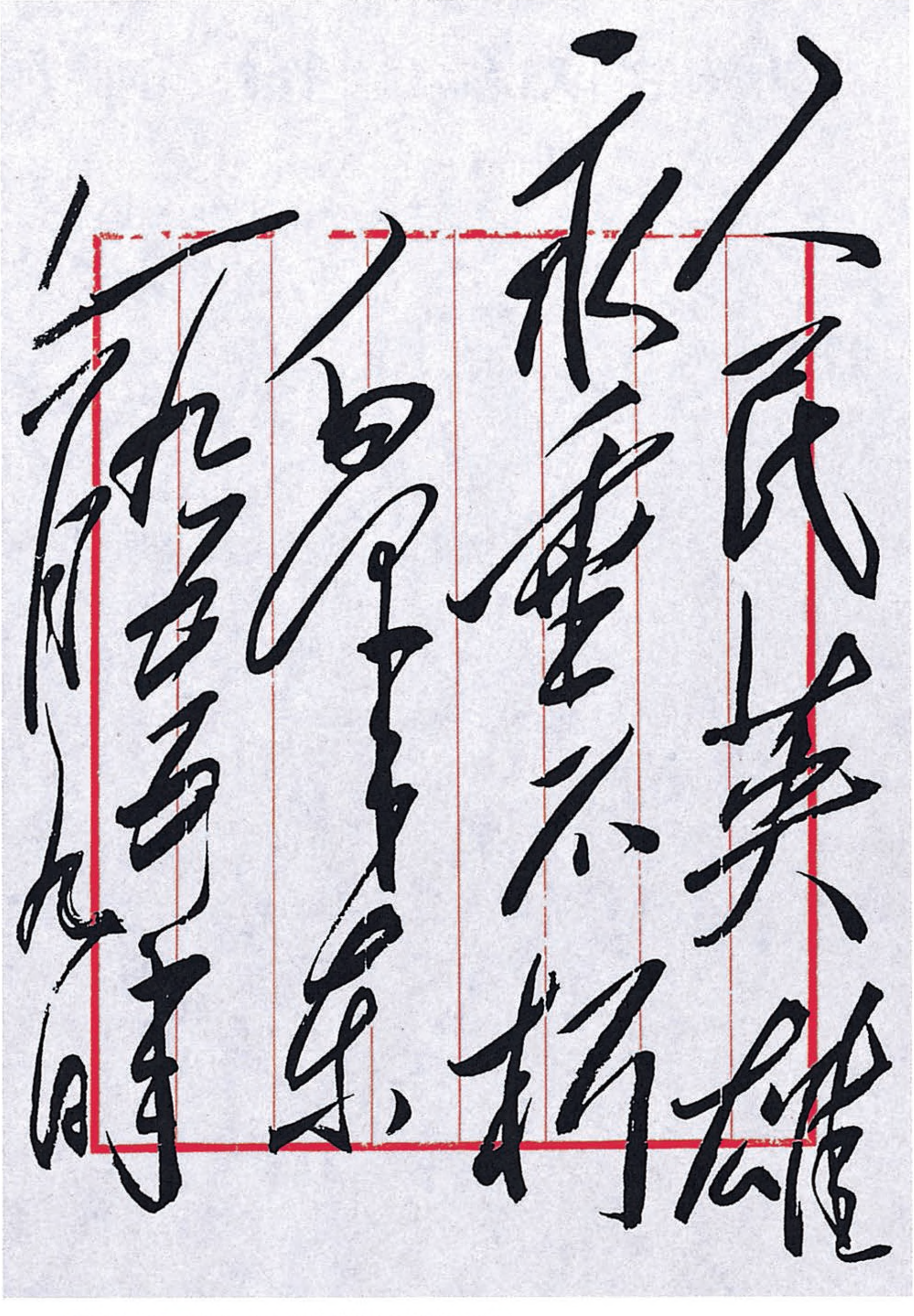
1955年6月7日，毛泽东的外甥女陈国生第二次到北京时和毛泽东合影。

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

（1955年6月9日）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九日



人民英雄
永垂不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
六月九日

毛泽东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词。

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写的按语

（1955年6月）

一

从这一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艺”集团，而是一个以“文艺”为幌子的反革命政治集团。他们仇恨一切人民革命力量。胡风分子张中晓说，他“几乎恨一切人”。许多人认为“胡风不过是一个文化人，胡风事件不过是文化界的事件，和其他各界没有关系”，看了这类材料，应当觉悟过来了吧！[1]

二

从以上两封信里可以看到胡风骨干分子绿原的真面目，胡风集团的骨干就是由这样一批人组成的。绿原在一九四四年五月“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去“工作”。“中美合作所”就是“中美特种技术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胡风1947年9月26日、9月28日、10月1日给阿垅的信和1946年7月15日阿垅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合作所”的简称，这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合办的由美国人替美国自己也替蒋介石训练和派遣特务并直接进行恐怖活动的阴森黑暗的特务机关，以残酷拷打和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而著名。谁能够把绿原“调至”这个特务机关去呢？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在后一封信里，在一九四七年九月，绿原还在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力量是“万恶的共匪”，可是，一九四八年初他就由另一胡风骨干分子曾卓介绍为共产党党员，打入了地下党的组织。后来绿原突然潜逃。武汉解放时又突然回到武汉，与曾卓一起自称是“共产党”，接收《大刚报》。一九五〇年再度钻进党来（参看本材料第二十八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就是这样来“追随革命”和钻进共产党里面来的。

三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拙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四

芦甸这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后来胡风果然实行了，这就是胡风到北京来请求派工作，请求讨论他的问题，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最后是抓住《文艺报》问题放大炮。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打开一个缺口”，使我们处于困难地位。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将他们战而胜之。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1]

五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这决不只是胡风分子，还有更多的其他特务分子或坏分子钻进来了。[2]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芦甸1952年5月7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绿原1952年5月18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六

胡风集团分子和其他许多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大都采取方然在这封信里所讲的两面派策略，特别是他的二、三两条策略，很可以欺骗许多人。但他们总有漏洞可以给人们找到，胡风集团的被揭露，就是一个证据。特别是在大多数人的觉悟程度和警惕性提高了以后，他们的两面派策略就更易被揭露了。[1]

七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一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和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这里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批判唯心论果然给了胡风集团以“矛盾和困难”，这就可见批判的对了。革命队伍里的人，难道也有“矛盾和困难”吗？[2]

八

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党内取得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方然1954年5月5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阿垅1954年11月15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切党组织注意。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后因潜逃失去党籍。在一九五〇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们的党组织“用最大诚恳写过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员”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吗？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骗了我们之后爬进党内来的，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斗争”看待，他们斗胜了我们，他们进来了！[1]

九

共产党员的自由主义倾向受到了批判，胡风分子就叫做“受了打击”。如果这人“斗志较差”，即并不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而愿意接受党的批判转到正确立场上来的话，对于胡风集团来说，那就无望了，他们就拉不走这个人。如果这人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斗志”不是“较差”而是“较好”的话，那末，这人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胡风分子是要来“试”一下的，他们已经称这人为“同志”了。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为教训吗？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2]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绿原1950年7月23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欧阳庄1951年6月24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十

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1]

十一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可见整风是有益的。怕整风的人不都是反革命分子，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对他们的方针是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但反革命分子很怕整风，对他们的方针则是进一步挖出他们的反革命根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是在解放前和解放后的几次整风，即过去的几次思想斗争中逐步地暴露出来的。由于那几次整风，才产生了胡风集团内部的分化，才迫使胡风集团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才有最后的大揭露。[2]

十二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在强大的人民革命力量即人民民主专政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路翎1952年1月30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芦甸1952年4月18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面前，只要这个专政提高了群众的觉悟，采取了正确的政策，那就不管有多少暗藏的反革命集团，也不管每个反革命集团的内部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总有一些人可以分化出来的，而这种分化是于人民有利的。舒芜从胡风集团分化出来一事使得胡风集团大伤脑筋，就是一证。近日各地许多胡风分子们纷纷坦白，自动地或被迫地交出密件，揭露内情，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发展。[1]

十三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该引起全体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的严重注意吗？[2]

十四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坚决反对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极端仇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党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文艺工作者要歌颂工农兵，要暴露工农兵的敌人，而胡风集团恰是工农兵的敌人，他们觉得暴露工农兵的敌人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芦甸1952年6月9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欧阳庄1955年1月28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会使他们混不下去，就会“屠杀”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生灵”，就会“压杀了”他们这伙反革命的所谓“新的东西”。但是他们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讲话，而且胡风还教唆他的党羽在表面上要“顺着它”，有时并引用其中的一些字句。这些都是胡风分子伪装自己的假面具。而在这封密信里，就完全暴露了胡风分子仇恨这个讲话和反党的真面目。张中晓说：“这书（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许在延安时有用，但，现在，我觉得是不行了。”“现在不行了”，在文艺界里面不是还有一些人也这样说过吗？说过这种话的人，请注意读读张中晓这封信吧！当然，有些说这样话的人，他们还只是抱着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所以不能认识这个讲话的重要性。但是，张中晓这个胡风分子，凭着他的反革命的敏感，却深深地了解这个讲话在全国解放以后会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掌握群众，并对各种反动的文艺思想起摧毁性的作用，所以他们就急于想阻止和破坏这个讲话的影响的扩大，他们所谓“现在不行了”，道理就在这里。

十五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的本意是“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就规定了战斗的坚苦性和长期性”。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他们在三十万字上书中只攻击林默涵、何其芳、周扬同志等几个人，说这几个人弄坏了一切事。有些在阶级本能上同情胡

风的人，也照着这样替胡风瞎吹，说什么“这不过是周扬和胡风争领导权的个人之间的斗争”。我们在肃清胡风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这一点也是应当注意的。[1]

十六

从这类信里可以看出，胡风集团在他们的三十万字上书和其他一切的公开言论中，好像他们主要只是反对共产党的作家而不反对其他的人。他们当然从来不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人物（只在有时小骂几句以作幌子，即所谓“小骂大帮忙”），但不反对其他人则是假的。原来他们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茅盾、巴金、黄药眠、曹禺、老舍这许多革命者和民主人士都是一概加以轻蔑、谩骂和反对的。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不正是蒋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吗？[2]

十七

如同我们经常在估计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力量对比的形势一样，敌人也在经常估计这种形势。但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芦甸1951年12月27日给绿原的信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路翎1950年6月15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我们亲眼看到了许多的反革命：清朝政府，北洋军阀，日本军国主义，墨索里尼，希特勒，蒋介石，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他们犯了并且不可能不犯思想和行动的错误。现在的一切帝国主义也是一定要犯这种错误的。难道这不好笑吗？照胡风分子说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呜呼完蛋”的，这种力量不过是“枯黄的叶子”和“腐朽的尸体”。而胡风分子所代表的反革命力量呢？虽然“有些脆弱的芽子会被压死的”，但是大批的芽子却“正冲开”什么东西而要“茁壮地生长起来”。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我们看，胡风分子为什么狂妄得那么可笑呢？原来他们是按着他们阶级本能的曲调走路的。[1]

十八

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阿垅195□年5月23日、7月31日给罗洛的信和芦甸195□年6月20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了，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密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弄得很清楚。[1]

十九

这封信里所谓“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乃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我国人民革命力量镇压反革命力量的伟大斗争感觉恐怖的表现，这种感觉代表了一切反革命的阶级、集团和个人。他们感觉恐怖的事，正是革命的人民大众感觉高兴的事。“史无前例”也是对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们，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被消灭的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而人民大众则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只有这时，才有这种必要，也才有这种可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牛汉1952年2月3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能。“斗争必然地深化了”，这也说得一点不错。只是“封建潜力”几个字说错了，这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一语的反话，如同他们所说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一样。[1]

二十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2]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张中晓1951年5月25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的张中晓1950年7月27日给胡风的信写的按语。

在《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稿中加写的文字

（1955年6月10日）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地有分别地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关于收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情况给胡乔木[1]的信

（1955年6月10日）

乔木同志：

请你将你所收集的关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包括下面大发展，省委核减等数字），写一简要材料给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为编辑《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写的序言、按语和注文

（1955年6月）

序　言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至六月十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一九五五年六月十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三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二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1]，又增加了两个按语[2]。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

估计到本书的出版，如同《人民日报》发表这些材料一样，将

---

[1] 即本篇注文部分。

[2] 即本篇按语部分。

为两方面的人们所注意。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

反革命分子和有某些反革命情绪的人们，将从胡风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鸣。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活动策略，将为一切能得到这本书的反革命分子所欣赏，并从这里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但是不论怎么样，总是无救于他们的灭亡的。胡风分子的这些文件，如同他们的靠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一切反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他们没有挽救他们自己集团的灭亡。

广大人民群众很需要这样一部材料。反革命分子怎样要两面派手法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成千成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就是因为这个原故，许多反革命分子钻进我们的队伍中来了。我们的人眼睛不亮，不善于辨别好人和坏人。我们善于辨别在正常情况之下从事活动的好人和坏人，但是我们不善于辨别在特殊情况下从事活动的某些人们。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真相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

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是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这个“材料”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十分引人注意。反革命分子固然注意它，革命人民尤其注意它。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来的。

按　语

一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

进。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这就使胡风等类反革命分子感到“舆论一律”对于他们的不方便。他们感到不方便，正是我们的目的，正是我们的方便。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一种矛盾克服了，又会产生新矛盾，又是这样去竞赛。这样，社会就会不断地前进。有矛盾存在就是不一律。克服了矛盾，暂时归于一律了；但不久又会产生新矛盾，又不一律，又须要克服。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在这个问题上，胡风等类的反革命分子好像振振有词；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像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吗？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正相反，那里是资产阶级专政，不许革命人民乱说乱动，只叫他们规规矩矩。剥削者和反革命者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少

数，被剥削者和革命者总是多数，因此，后者的专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则总是理亏的。胡风又说：“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空气是强迫人的。”我们在人民内部，反对强迫命令方法，坚持民主说服方法，那里的空气应当是自由的，“强迫人”是错误的。“绝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这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之后，人民方才取得了将自己由利于反动派剥削压迫的散沙状态改变为团结状态的这种可能性，并且于革命胜利后几年之内实现了这种人民的大团结。胡风所说的“强迫人”，是指强迫反革命方面的人。他们确是胆战心惊，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的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我们认为这也是极大的好事。这种好事，也是几千年没有过，仅在共产党领导人民作了长期艰苦斗争之后，才使得这些坏蛋感觉这么难受。一句话，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我们每年的国庆节，首先就是庆祝这件事。胡风又说：“文艺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这里的“机械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话，“最省力”是他的瞎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胡风在这封信里提出了三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加以详细驳斥的必要。胡风在这封信里还说到：“目前到处有反抗的情绪，到处有进一步的要求”，他是在一九五〇年说的。那时，在大陆上刚刚消灭了蒋介石的主要军事力量，还有许多化为土匪的反革命武装正待肃清，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还没有开始，文化教育界也还没有进行整顿工作，胡风的话确实反映了那时

的情况，不过他没有说完全。说完全应当是这样：目前到处有反革命反抗革命的情绪，到处有反革命对于革命的各种捣乱性的进一步的要求。[1]

二

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文艺报》问题，“不过是抓到的一个缺口”，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很需要由此“拖到全面”“透出这是一个宗派主义统治的问题”，而且是“宗派和军阀统治”。问题这样严重，为了扫荡起见，他们就“抛出”了不少的东西。这样一来，胡风这批人就引人注意了。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摘录的胡风1950年8月13日给张中晓的信增写的按语。

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1]

注　文

一

健康的愿望，指反革命的愿望。普遍存在，指反革命分子各处都有。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已解放的地方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但反革命分子已感到很不自由，故说像“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的存在着”。[2]

二

这时中国大陆已接近全部解放，故胡风认为反革命虽然“会胜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中摘录的胡风1954年11月14日给方然的信增写的按语。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1949年5月30日给路翎的信中“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一句增写的注文。

利”，但须要五年时间。[1]

只有像胡风这样做贼心虚的人，才会有这种神经衰弱的感觉。[2]

三

这年一月胡风给路翎信中说，胜利要有五年时间，这里又说，一两年内要大爆发，这表示胡风对时局估计没有定准；同时他很怕贾植芳因受他哥哥影响发生动摇，故意在这里对时局说得有希望些。[3]

四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尤其重要的是，他会不会弄节外生枝的手段”这一句。所谓“节外生枝”，就是揭露胡风集团的内幕，这是胡风们很怕的，后来果然由舒芜开始揭露了这个内幕。[4]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1950年1月12日给路翎的信中“五年为期”一句增写的注文。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1950年1月12日给路翎的信中“咳一声都有人来录音检查的”一句增写的注文。

[3]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1950年5月20日给贾植芳的信中“大概一两年之内要大爆发”一句增写的注文。

[4]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1952年8月12日给绿原信后的注文中增写的一段文字。

五

这是一九五二年的信。这时，不但国内革命局势日益巩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局面也已确定，反革命已经失败，所以胡风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想要“学得战术一些”“保存力量”，以待时机。[1]

六

这是胡风错误地估计中国共产党的文艺领导方面的心理状态的话。[2]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1952年5月9日给路翎的信中“血流得不少了”一句增写的注文。

[2]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摘录的胡风1950年8月13日给张中晓的信中“但近来他们心里渐渐着慌了”一句增写的注文。

对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的批语

（1955年6月18日）

定一[1]同志：

此件[2]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3]征求意见，看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

毛泽东

六月十八日

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4]。

---

[1]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五人小组组长。

[2] 指陆定一1955年6月16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

[3] 指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4] 陆定一送审的中共中央指示稿中原有一段话，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特点就是表面上顺着我们，甚至称赞我们，阿谀我们，并说胡风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骗取了鲁迅的信任。

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1955年6月23日）

少奇同志：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请考虑邀安子文，钱瑛，刘景范[1]三同志到会，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因这个问题曾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宜使他们与闻中央的决定。请予酌定。

毛泽东

六月廿三日三时

如少奇同志已睡　则于上午送交尚昆[2]同志。

又：舒同[3]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

毛泽东

---

[1]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钱瑛，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刘景范，当时任监察部副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在黄文欢[1]为胡志明[2]访华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1955年6月28日）

我提议：

为了中越人民亲密的友谊，

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胡志明主席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

为了胡志明主席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黄文欢大使的健康干杯！

---

[1] 黄文欢，当时任越南驻中国大使。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955年6月25日，胡志明抵达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访问。图为毛泽东到机场迎接胡志明。

1955年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热情迎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胡志明。图为少年儿童向胡志明献花。

1955年6月25日，毛泽东、胡志明和少先队员代表合影。

1959年6月25日，少先队员代表向胡志明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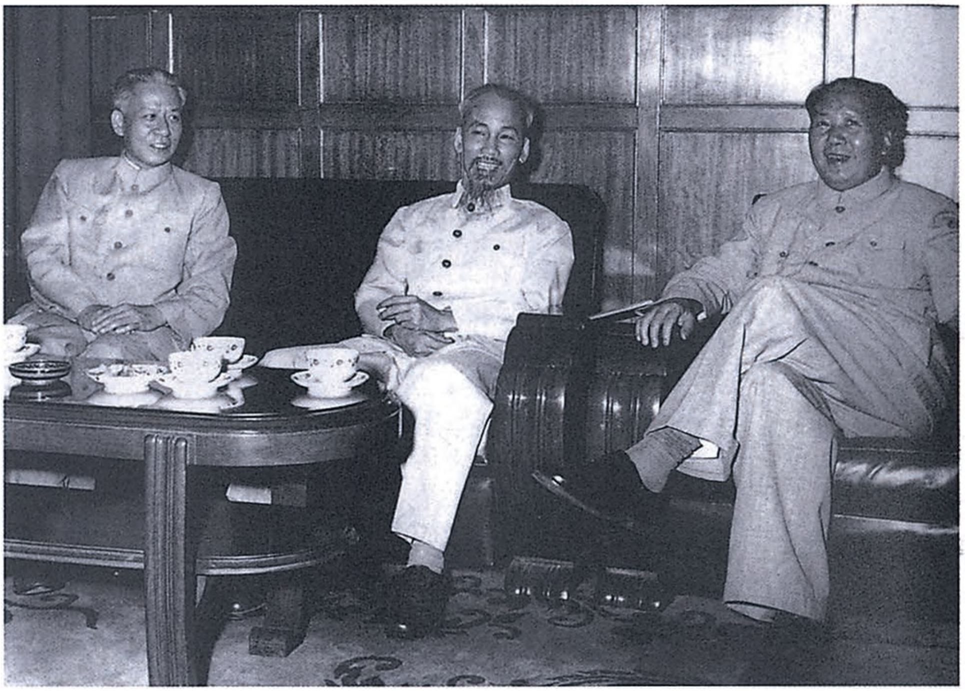
1955年6月25日，胡志明在机场接受女青年献花。

1955年6月25日，胡志明在机场接受北京市群众献花。

1955年6月25日，胡志明在毛泽东的陪同下步出机场，并向欢迎群众致意。

1955年6月25日，毛泽东欢迎胡志明访华。

1955年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陪同胡志明检阅仪仗队。



1955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和胡志明在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亲切交谈。

1955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一行在招待会上。

1955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祝酒。

1955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招待会上亲切交谈。

1955年6月，毛泽东会见胡志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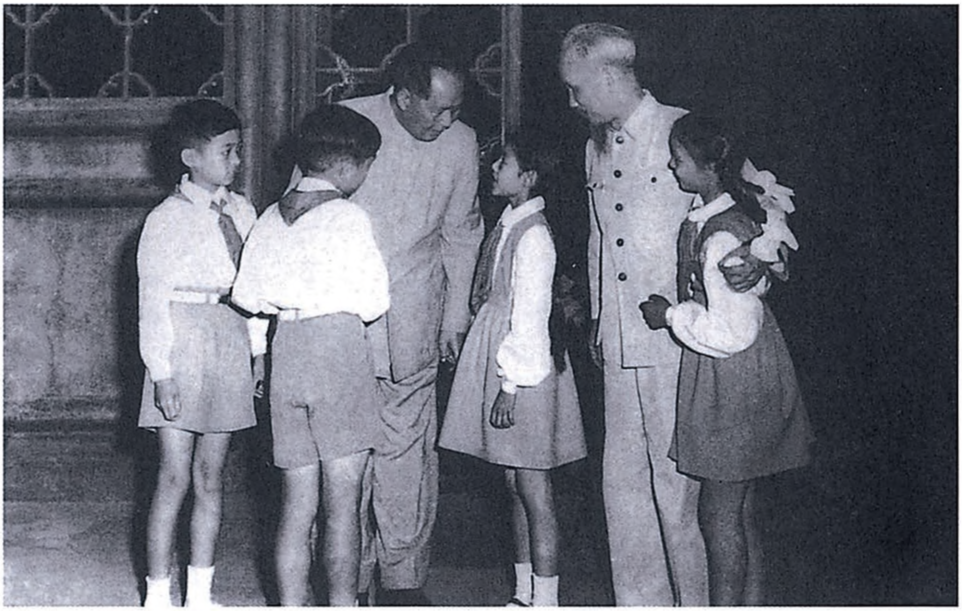
1955年6月，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和胡志明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会谈。

1955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会谈中互相致意。

1955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一起观看印度艺术团访华演出。

1955年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胡志明等在游园晚会上观看演出。

1955年7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出席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七一”游园晚会。



1955年7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北京中山公园“七一”晚会上和少先队员在一起。

1955年7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北京中山公园”七一“晚会上向演员们致意。

1955年7月，在中越两国政府《联合公报》签署仪式上，毛泽东和胡志明举杯祝酒。

在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5年6月30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递交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的国书，并感谢您的祝贺。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人民对于南斯拉夫人民在争取祖国独立和建设幸福生活中所作的努力，表示衷心的祝贺。最近，南斯拉夫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举行的会谈和它的结果，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贡献。

现在，中南两国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在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有着一致的愿望。我深信，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友好关系的加强，不仅符合于中南两国的利益，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发展中南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和支持。

我谨祝您在工作中获得成功。

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团结合作[1]

（1955年6月30日）

南斯拉夫人民是英勇的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你们的党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你们的国家获得了解放，东欧各国和我们中国获得了解放，北朝鲜获得了解放，现在胡志明主席领导的半个越南也获得了解放，这一切对世界人类都是有贡献的。这是使帝国主义分子不高兴的事情。当我们有争吵时，帝国主义分子就高兴了。最近苏联的领导同志同南斯拉夫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会谈，苏联采取了主动，南斯拉夫也采取了主动。苏联代表团去南斯拉夫受到了南斯拉夫人民热烈的欢迎，两国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公报。对于这个联合公报，我们是很高兴的，全世界的进步人类也是很高兴的。

现在我们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件好事情。你们很早就承认了我们。自从我们建国以来，你们就一贯支持我们，这种立场一直没有改变过。我们同你们延迟建交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样比较好，所以我们建交就延迟了几年。从国际环境方面看，现在建交更加合适一些。

中国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大使同志在中国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波波维奇的谈话。

现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僵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际局势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促进了彼此关系的改善。这是为了国际和平事业，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这并不是说，现在彼此的一切意见都已经一致，但只要主要的意见一致了，那问题就好处理了。

最近接到铁托同志的信，信中介绍您任驻我国的大使。我接到这封信，感到非常高兴。这不仅是国家同国家之间的通信，而且是同志之间的通信。铁托同志在二十七日又接见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并表示了友好的感情。我对此表示很感谢并请您将此谢意转达铁托同志。南斯拉夫同苏联和各个国家的关系尚可进一步改进。我们听说，铁托同志准备访问莫斯科，不知道这消息是否确实?（波波维奇：这消息是确实的。）这是很好的事情。历史和现实要求我们团结，合作。我们还有时间，不用着急，可能还会有些不融洽的地方，但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地就好了。我们要强调共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可以慢慢地谈，可以展开讨论。如果不能得到一致的意见，那可以放在一旁，以后再谈，不使它妨碍彼此的关系。这是有好处的。

我们的国家成立得晚，而且落后，现在开始的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各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帮助。你们需要帮助，我们也需要帮助。你们如果发现了我们的缺点，请不客气地提出来，我们可以交换意见。

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1955 年上半年）

讲话

（一）理论

开会要先有精确的文件，不要凭口讲，很危险，文件为凭，通过中央。“五一”“五二”均有文件，每一条均经中央看过，关系几亿人口，不可一哄而起、而念、而散，就了事。

（二）调查几个典型，找人派人来，太多了就害了事情。抗战时晋绥二十个乡典型材料不能做结论，（被批评过）形成一片黑暗。任弼时一个乡解决问题。

河北，解散百分之六，退出百分之七，贫农哭脸不退，还有一部分不愿意退。

不算大账，只算问题件数，怎么行？你们钻到工作里不出来。

粮食也是，春天很苦，秋天又好了。五三年春天都说苦得不得了，党内党外均叫，不谋而合，夫唱妇随。

今年又报告元帅，大势不好，我说再探，大事好，小事不好。麦子好，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四好，何以不好？这不是生产积极性，是消极性，我前后调查了十六个省，百分之九十八大体还好。你们心中无数，百分之八十五农民改善地位，大体好。这样讲，半分钟

讲清楚了。你不说大数，只说小数。

（三）中央五一年、五二年均提出合作方针。五三年来北京的人，闭口不谈改造，毫无影响，“言不及义，难矣哉”。我抗这个潮流，四大自由，个体经济。共产党群居终日，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个体经济的小惠，要达到护国利民的目的，难矣哉。五一年，总路线传到省，五三年无人讲社会主义。我放屁，很臭，无人听。

（四）你们搞社会主义，是逼上梁山的卢俊义，不情愿坐第一把交椅。取消这个比喻，因为你们不是俘虏。不过你们那么高明，尾巴翘那么高！对社会主义不热心。五三年，西楼讲好行小惠。财经会，中山解决总路线。以后不叫贯彻总路线，说是打倒大老虎，高饶横切一刀，许多人说话不恰当。中央孤立无援，搬来□□。你们自己有资本主义思想，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整整一个时期嘛！

社会主义不是中心。我说了几句有名的话：“过渡时期”你们无兴趣。高级干部中资本主义空气，不准备搞社会主义，不信请重新看看五三年财经会议发言。

我们批评薄和高饶两个目的。我们为了把工作做好，而他们借此攻击中央。

我放屁，社会主义之屁，总是香的吧！

冬季邓子恢通了，天下太平了。

今天谈农村工作：

1. 陈伯达发牢骚，他这个人不直爽，说没问题——有问题，说没有——有事。副部长为什么不能过问？拉屎、撒尿、睡觉以外，无第四件工作，杂牌副部长，有理由重视他。你们马克思主义好像比我们高一些，虽高也要请教，不耻下问，他起草了两个草案呀！

2. 你们既已知道中央总路线指示，五三年为什么不讲社会主

义？一点不露，证明脑子里一点社会主义没有，满脑子资本主义。我专门害人，讲了言不及义，挖苦一番。

财经会议，恩来宣布那几句话（总路线的几句话）。会议上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发言中不见社会主义。

你们的话不合中央要求。我们是修理好□□□，高岗是横切一刀，你□□□和我同山同乡同志，当时不能和我一致。四月党代会才解决问题，从此才变成同山同乡同志了。你们要再看看演说，很不成话，尾巴那么多，天下第三第四，很不健全，不是马克思主义风格。

蒸酒磨豆腐，不敢称师傅，总之未准备进入社会主义。

农村会议（五三年）邓子恢发言，只在自己发言中，夹着点我的意见，不成体系。

改造已四年了，五一年到五五年，我党已建立了广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社。对资本主义改造，一部分合营，大部分加工订货。广大的互助组，大批合作社（五一年已有了），各省市的人对这些大事物不认识。如此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商业、合作社，新鲜事物好像没有看见。当时我在每个文件中都添上合作社。反五多，对的，但言不及义。四大自由，稳定农村经济秩序，则是不对的。

这说明革命转变，经过中央宣传，首先是高干间的宣传，那时大家听不进去。除高饶等外，均是好人嘛！

前年七月八日财经会议，十月农村会议，有些同志对高饶斗争不积极，有些同志不愿自我揭发。李先念老实，比如他对农民问题改了意见，我直接派人去调查，都说大为改善。五三年大区来人都说苦，要减税反查田定产，我很摇摆，但不知为什么要反，是怕侵

犯农民利益？犯了什么罪？现在又摇到原来主张了，因为站在农民苦，站在保护私有，才反对查田。建设费中，工人担百分之九十，农民担百分之十，谁苦？

个体经济不能产生这么一点，一个工人顶几十人，你们都不生产，工农是生产者，工农是负担者。间接税当然农民是不少的，七算八算还是工人多，对中国农民，我们的政策是稳的。

搞一万件材料（死人、牲口、抢粮、万件黑暗）集合起来不过百分之六。（河北）人百分之七，百分之九十四是巩固的，百分之八十是真的。安平细雨乡材料，两条路线，请求不入社一年，认为蒋介石路线，全年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五退出，双方舒服。

河北一个小社六户，三户贫农要办，三户中农不办，还办下去了。中农是动摇的，互利政策也不那么灵，不揩油，他还是不来，抵抗社会主义优势。非大势强迫不可，心甘情愿不可能，不会像吊膀子逛街那样舒服。

强迫就是对中农的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大体还是贫农，中农要第二个五年，要和中农妥协，除非完全自由（半妥协，抽象的话，传出去出问题，统购中某些人不能和他妥协，但不是用刀子，而是要吃饭，一定要搞社会主义，不能不干，我没有说过不要互利自愿）。就是说要做宣传教育工作，社会主义对他们无损害。就是让他们不自由，不自由问题很大，全妥协妥协不成。

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没有中共中央加上省、市委坚持不行。六七个人决定大事，七百几十万人听他们的话就是吃一餐饭，靠七百万人来表示意见，不成功，因合作不自由。简单宣传“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说我不需要，宣传这个叫不识时务。

要承认自己马克思主义不够，去年决定发六十万，成功的，五

三年“农民苦”，不对。底子薄也是农民苦，反查田定产也不对，讲错了话的人要声明。

高说，估计大局有利于他，只西南未定，错了！

你们听见风不和我说，梅兰芳到上海演剧，还要拜杜月笙，为啥不拜我？

我好说挖苦话，为使人不忘记，致成为明日黄花，我好不客气，客气不习惯。

人们说粮食，损失农民积极性，须知，粮食购七百亿到八百亿，我搞了八百八十亿，不到三分之一，三百五十亿回到农村，供应比日本、国民党多不了很多。共产党来了，增加了人口，多数是农民自己生的呀！从前农民照这样供城市，军队比国民党少，浪费少。

多购了点，不良结果是影响牲口和猪，实际略多了点，如影响猪、牲口二百万，因素多种，自然杀也是一条。回民就是宰牛的，河南项城打起来了，打也是好事，得到教训。延安很多了，还是杀，皮价太贵。二百万，河南杀六十万条。但河南总数量是增加的。事物要有分析。

瘦弱有之，不是多数。

不积肥等十几个例子，一讲形成观念，不分析。损害积极性不符合事实。只猪牛有点损失，三年内可以恢复。

不用干部去调查，我用的是义士。干部你要什么，他来什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

对合作社估计不妥的（陈云报告，吸收你们的材料吧），没有说好话，你们没有看出来。

人人说统购，户户说粮食，一股风需要专政，堵风想办法，坚

持方针。

五亿多人，多数，能顺倒我们社会主义，要专政。

浙江可否恢复一下，“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不好。

黄炎培，得意得不得了，整了他一下。

专政，实际无产阶级专政。只听农民的，他就要自由。中农不揩油还是不来，到了时候，考虑进不进。进不进哪好？宁要不自由。贫农不一定能完全照我们，不见得。基本做到使中农不吃亏。有全是中农的，有贫农虽多的，坚持十分之三的中农当委员，贫农中农利害舆论就不一致。

大体过得去，使中农过得去。牲畜，私有公有，历来经验如此，公喂不利养育。

先搞好文件，不要长，长了反不好。

全国性的，不是个别的问题，要有文件，使中央有所凭据。先让中央看看。□□也可以参加，事先中央知道全部内容，免得口径不对，损失威信。

一年两次会，此次会议，文件未发，已迟了，落在后面了，要发一个章程，根据章程发议论。

是否要等到秋后估计？用不着，现在完全可以估计，否则是不信积极性。合作社百分之九十巩固，粮食叫喊不到百分之五，现在完全可以估计的。那一年也要如此估计，尽管有许多缺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五三年财经会议，说各部路线错误，几十个财经部门看成基本上不对的。应是基本上是对的，但有缺点，这就清楚了。）此次有反革命，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好的，人心稳定。

我号召上顶下压检查，解决百分之几。心中无数，吃了饭，开留声机，随便讲，锢住自己，最近又说合作根本不好。你们经过几

次革命，为什么出这毛病。农村会议开后，中央又开，内部吵起来了。预先有个文件就行了。

插话

1. （谈到山东曹县错误时）把少量错误扩大为全体。

2. 你们不是不听话，而是听另一种话。

3. 过渡时期每天都动荡，每天削弱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要动荡，不要稳定，一动就要地震，有四大自由，反而不稳定了。

4. 农民怕冒尖是很好的事。贫农的力量，社会主义的空气，你们倒要解除，成为资本主义万岁。正要你们怕。

5. 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是概括四大自由等口号的总方针。

6. 湖南洞庭湖社开了一次会，如同俄国工党第一次会议了，但也是个历史不能抹杀。

7. 反对者坚决，我们更坚决，自己不坚定，无法坚定别人。

8. 十二种人，缺粮户灾民、经济区、乡村手工业者、小商贩、渔民、盐、牧、林、船民、城市、自足户（百分之二十）、余粮户（百分之六十五）。据社会经济法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统购是生产关系与所有制有关，带有强制性质，没有专政手段绝对办不到的，不能靠资产阶级。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挑皮，抢粮暴动都是生产力要挑皮，各种办法（饿肚办法——示威性质）。有的是假不进会进，要求资本，有的是真的，要注意，不注意要报应。大体是适合的，开花、种麦、搞肥料等等，也有小破坏。现在措施是稳定的，购粮减、征不加。一万两千干部下乡说服。

专政，资本家、地主、富农、余粮户某种程度要反对，靠无产阶级，靠坚决的同盟者——贫农。

你们看看历史，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过渡时期开始，内部是五二年，但延安时即有国营工业、互助合作社，苏区即有社会主义因素，哪要到四九年？

9. 农村会议，解决了揩中农油，很好，还要互利，等价交换，现在贫农基础太少了，不能完全建立在他们身上，家族之间不是风平浪静，舆论争执不少。

10. 贫农贷款不去，贫农必揩中农的油，揩定了。中农的油一定不揩，也不可能。再过两年，大风刮进来，两条路，非来不可。

11. 增加支援。

12. 干部（有人说）“上层好，中层少，下层糟”不一定，上层也有不好的，高饶坏人，中间也不少，“下层糟”，很不好，工农基础，坏上层倒。百分之几糟，百分之九十几好，资产阶级也是百分之几能改造呀，不能全部糟，这是片面观点，那几句好听，不对劲。工农总不是剥削者。

13. 打电话，抓住组织问题。

14. 防左，要有季节，研究一下。秋收以前大发展，让他吹起来再说，收割以后，再估计五五年数字定了，又要数量又要质量，我们已订了条约，河南百分之三十，空白手，无事做，为什么闲起来？要填满！他怕他烂，他一个不烂更不好，烂了再办好。房子死了人，还不住人？让他垮一批，春季开会节制一下，开天把会，一个人十五分钟。

1955年，毛泽东和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谈话。

转发山东省委关于抗旱夏种的紧急通知的批语

（1955年7月2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转发河南、陕西两省委作参考。

毛泽东

七月二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山东省委1955年6月29日关于当前抗旱夏种给所属地、市委并报中央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目前全省灾情严重，已播的春苗缺水枯萎，如再有半月持续不雨，将造成大旱。因此要求在一切旱灾地区，全力突击抗旱播种。地、县委负责同志要深入灾区，大力发动群众，坚定干部群众的抗旱信心。同时要积极准备播种晚秋作物，力争减少损失。省委决定增拨各地抗旱贷款一百万元，专款专用。责成各地供销社大力收购晚秋作物种子，以保证晚秋作物及时播种。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7月4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你们那里如有相同的偏向，望注意纠正。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

二

刘、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泽东

七月四日

---

[1] 这个报告指出，国家机关党委所属的53个单位，已有36个单位由领导同志向机关全体干部作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动员报告，其余单位也正在积极准备。经过公开动员的单位，群众斗志高昂，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受到很大打击。但运动中还存在缺点，主要是各单位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运动的领导还赶不上斗争形势的发展。因此目前急需解决以下问题：一、坚决克服部分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的右倾麻痹思想和对运动采取的淡漠态度，这是目前开展运动的主要障碍。二、坚决克服某些单位不积极发动群众、不敢大胆让群众在小组会中开展思想斗争的倾向。三、层层负责，自上而下建立指挥斗争的机构，各部及各局必须建立五人小组的组织，以他们为核心，使广大积极分子围绕在领导核心的周围。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提高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的批语[1]

（1955年7月7日）

刘、周、陈、朱、彭真、小平阅，退彭办。

似应提高一些。如二万，一万五千，一万，八千等。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7月7日关于对台湾驾机起义人员的奖励标准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根据总政治部的建议，军委对台湾投诚起义人员奖励的具体标准作了研究，认为对起义人员给予物质上的奖励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政治上对他们是一种鼓励，另一方面能解决他们的某些实际困难，减少他们对起义的顾虑。鉴于过去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奖励标准，现拟按起义者政治上的自觉程度和驾驶的不同机种，分别给予不同的奖金：一、驾驶喷气式战斗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15000元。二、驾驶螺旋桨战斗机和轰炸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6000元。三、驾驶运输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5000元。四、驾驶教练机起义者，每人奖人民币3000元。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军委将上述四类标准提高后，于1955年7月24日以总政治部名义下发了关于对台湾空军起义人员奖励标准的规定。

关于调查山西省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的批语

（1955年7月8日）

小平[1]同志：

此件第五页所载山西两个县缺粮情况[2]是否属实，请转山西省委派人前往调查，以其结果报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七月八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人民日报》总编室1955年7月6日编印的《人民日报情况》登载的《读者反映山西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说：据6月中旬收到的读者来信反映，山西省和顺、昔阳两县农民缺粮情况十分严重，不少农民放弃了生产，成群结队到外地投亲或行乞，有的地方已出现卖子女、离婚等现象。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怨言很多，反动地主、富农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也趁机活动，各种谣言不断出现。读者在来信中要求党和政府迅速派人下去查明情况，解决农民的缺粮问题。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5年7月9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总理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理外交部长斯·拉布丹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四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以兴奋的心情注视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三十四年来在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光辉成就。祝蒙古人民在久经考验的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在胜利地实现第二个发展国民经济及文化的五年计划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于北京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7月10日）

一

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现将北京国家机关党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请你们参酌办理。各省市情况，望仿此方式择要上报。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日

---

[1] 中央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说，1955年6月27日，国家机关党委召开了所属53个单位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7月2日又召开了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大会。经过这两次会议，国家机关所属单位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有了较大的开展。目前已经展开思想斗争的小组，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有计划地对某些重点人展开思想斗争。二、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右倾思想、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主要是检查和批判右倾麻痹思想，然后逐步使斗争深入扩大。至于少数尚未开展思想斗争的单位，则督促他们迅速发动群众，把运动开展起来。

二

刘、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在京各中委和军委各部门。

毛泽东
七月十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五人小组[1]办公室关于中央一级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5年7月13日）

一

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

关于北京方面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经验，前已将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两件[2]发给你们。现又有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

---

[1] 指1955年5月成立的中央处理胡风反革命案五人小组，组长陆定一，副组长罗瑞卿。同年7月，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中央十人小组。

[2] 指中央国家机关党委1955年6月30日关于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专题报告和7月6日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专题报告。

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简报[1]一件，特再发给你们。此件内容虽然和前两件有一些重复，但仍有参考的价值。盼望你们的报告。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

二

刘、邓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在京各中委，军委委员，军委系统各部门首长，中央各部委，中央政府各党组及若干重要干部各一份。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中央五人小组办公室1955年7月9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中直机关党委、国家机关党委分别对所属单位传达了中央关于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后，运动较以前有了较大的进展，但仍有少数单位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或发动得很差，在开展得较好的单位，运动发展也不平衡。二、目前中央一级机关团体在开展这一运动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有些单位领导上还存在着右倾麻痹思想，顾虑太多，不敢广泛深入群众。第二，不少单位对在小组中有领导有重点地开展揭露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经验。有的对中央指示体会不够，把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完全对立起来，不敢在小组会上开展揭露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斗争，只是进行一般的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批判，因而这些机关的运动缺乏生气，达不到教育群众、搞出一批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中直机关党委和国家机关党委现正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

给陈叔通、黄炎培[1]的信

（1955年7月13日）

叔通、任之先生：

送上浙江农村材料[2]一件，暇时可一阅，阅后掷还为荷！顺致敬礼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5年6月30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端正互利政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上海局的指示。指示说，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后，今后巩固的关键在于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执行合作社内互利原则的各项具体政策，克服目前合作社内各项违反互利原则和政策的偏向。为此，省委要求各地委、县委应认真严肃地对贯彻党的农村阶级政策和本地区农业合作社执行互利政策的情况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讨论，并将检查讨论的结果和贯彻互利政策的计划，写成书面报告上报省委。

关于军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批语[1]

（1955年7月13日、8月23日）

一

少奇同志：

请提中央会议通过。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毛泽东关于军队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两个批语，其一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7月12日关于建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其二写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955年8月22日为送审总政治部关于在军队中成立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的通知稿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报告上。

二

陈云、小平[1]阅，退军委照办。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关于福建沿海作战问题的批语[1]

（1955年7月14日）

退彭德怀同志：

同意。[2]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7月12日报告的批语。

[2] 彭德怀的报告说：“关于福建沿海地区作战问题，7月8日召集一次会议，其经过内容附记录，请审核批示。”7月8日会议纪要说，这次会议确定，要坚持“充分准备，逐岛攻击，先选敌最小最弱的一个岛子攻占之，求得战必胜，攻占后即巩固之，然后再看情况决定下一步的作战行动”的既定作战方针。

对肖华[1]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7月15日）

周、朱、陈、邓[2]阅。退肖华：

此件[3]似可发给各级党委，至师党委为止。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

[1]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肖华1955年7月14日在总直机关和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报告。报告分析了近一年半以来军队内部发现的反革命问题和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情况，指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军队的破坏是严重的。全军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利用胡风事件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大张旗鼓地进行一次广大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以保证国防和人民政权的巩固，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成功，保证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给杜润生[1]的信

（1955年7月18日）

杜润生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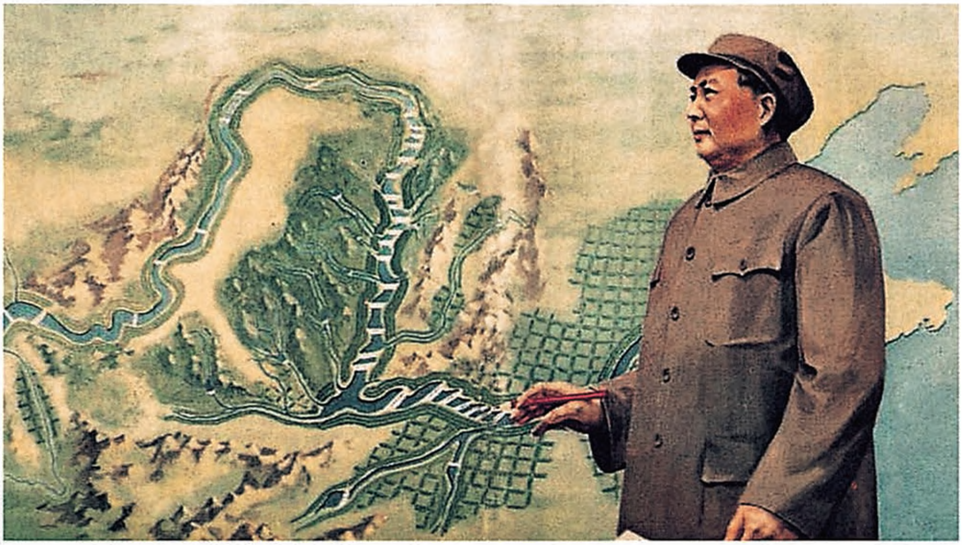
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四、五月间）[2]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人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

[1] 杜润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

[2]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4月21日至5月6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1955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7月18日的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同志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图为油画《一个战胜自然的伟大计划》。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5年7月19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同志：

值此波兰人民共和国十一周年国庆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十一年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无私的援助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奠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六年计划的顺利实现，波兰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和富强，大大地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的电报。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

中国人民祝兄弟的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为继续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于北京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肃反斗争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1955年7月19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

河北省委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四日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计划[1]和张承先同志在省直与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所作的结论[2]，都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九日

二

刘、邓、陆定一[3]阅，尚昆[4]办。

此件值得过细看一下。我们谈过的一些问题，这里都解决得很好。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中共河北省委1955年7月14日报送的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一、全省开展这一斗争的重点放在省直机关与省辖市，到9月底基本告一段落。二、要求各地委把重点放在地直机关，在八九月份开展这一斗争，地委要建立五人小组，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各县委应在9月开始，在地委帮助下分批集中县、区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提高警惕教育，为审查干部、清理反革命分子工作做好准备。三、各高等学校的全体师生与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职员与毕业生，应在暑假考试完毕后，留校进行7天至10天学习；党校及各部门干部学校，可选择一定时间在学生中组织报告、学习、讨论，作检举坦白的一般号召；中小学教职员、各医院的医护人员要普遍进行提高警惕的教育，做好政治摸底，为清理工作做好准备。四、开展这一斗争的方针政策与具体做法，要严格按中央指示执行。省委批准张承先在省直、地市委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的总结，随同这一计划发各地、市委、省直各部委、各党组执行。五、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目前中心工作之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

[2]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在1955年6月28日至7月1日召开的全省五人小组负责人会议上作的关于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麻痹思想、提高革命警惕、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结论，主要讲了六点：(一) 对过去开展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的检查。(二) 进一步认识开展这一斗争的重大意义，批判右倾麻痹思想。(三) 要放手发动群众并实行领导上的严格控制，以便顺利地健康地开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四) 关于审查和处理。要认真掌握只有5%左右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界限，注意调查研究，根据情节区别对待。(五) 具体的部署和要求。(六) 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中央警卫团战士的几份农村情况调查上写的文字

（1955年7月）

一

河南省兰考县六区小胡庄乡的情况[1]（一九五五年五月）

胡全德（党员）调查。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交吴芝圃[2]同志一阅。退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指中央警卫团战士胡全德1955年5月关于河南省兰考县第六区小胡庄乡北孙庄村的调查报告。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大多数群众，尤其是贫农没有余粮，缺粮户达到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困难户太多，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群众普遍反映村干部传达政策不及时，因此不满意。有的农户甚至拔麦子吃，影响了明年的粮食生产。

[2]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河南省省长。

二

河南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
王文礼（党员）调查的情况[1]。
送吴芝圃同志一阅。阅后退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三

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
李好学（团员）回家调查的情况[2]。

---

[1] 指中央警卫团战士王文礼关于河南省延津县第五区阎屯乡王连屯村的调查报告。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统购时，有些农民想不通，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统销时，有2/3的农户要购粮证，实际上现在没有吃的是少数。该村去年冬天组织了一个生产合作社，贫农占2/3，中农占1/3。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过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想不通，准备退社。由于不注意喂养，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社领导力量薄弱，缺乏经验，影响了生产。

[2] 指中央警卫团战士李好学1955年5月关于河南省新蔡县第八区新化乡的调查报告。报告说，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有些人为买粮食把农具、日用品都卖光了，农民的思想波动很大。在统购时，由于去年收成不好和部分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使许多农户把口粮都卖了，而有些区乡村干部的余粮则未卖，农民有意见。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老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卖出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送交吴芝圃同志一阅[1]，阅后，退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四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余粮的。合作社很好。[2]

五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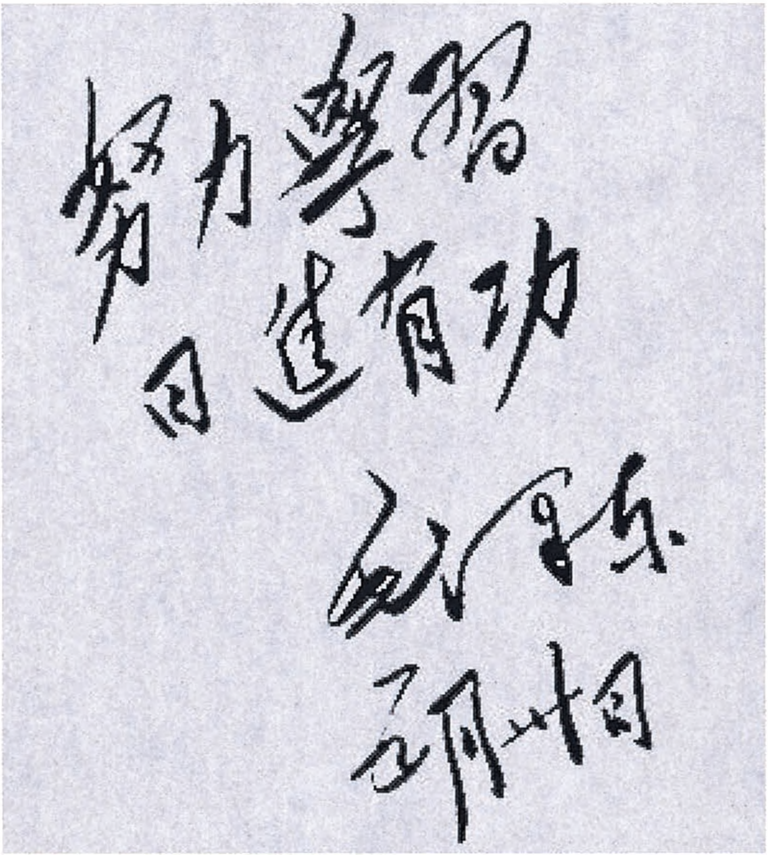
[1] 吴芝圃1955年7月22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负责人写信说："主席批交我阅的河南三个乡的调查材料，我已经阅过，感到这些情况很值得注意。""为了便于回去进一步作调查研究和改正工作中的错误，已把这三个材料抄写了。兹把原件送回，请查收。"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警卫团战士叶遥1955年6月关于广东省南雄县第三区新田乡溯水村的调查报告上。报告说，该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去年成立的。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了30%，被评为全县二等模范社。许多去年有顾虑的社员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在粮食统购方面，该村采取自报卖余粮的办法，农民都踊跃卖粮，特别是合作社有组织地把全部余粮都卖出去了。但也有极少数农民不愿意卖余粮，该村在自报余粮时，有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3]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警卫团战士高碧岑1955年6月关于湖南省宁乡县第六区南竹乡的调查报告上。

六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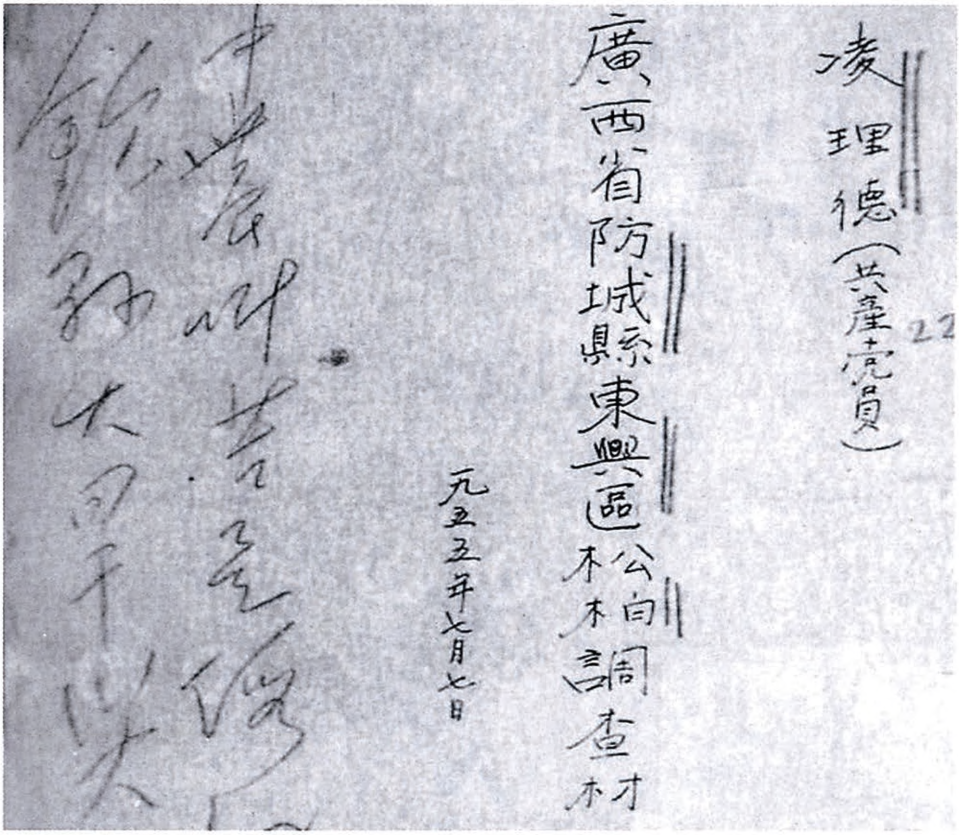


努力学习
日进有功
毛泽东
三月廿日

毛泽东为警卫战士写的题词。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央警卫团战士凌理德1955年7月7日关于广西省防城县东兴区松柏乡松柏村的调查报告上。报告说，该村对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经了解，10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个有真正的苦。报告还谈到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凌理德（共產黨員）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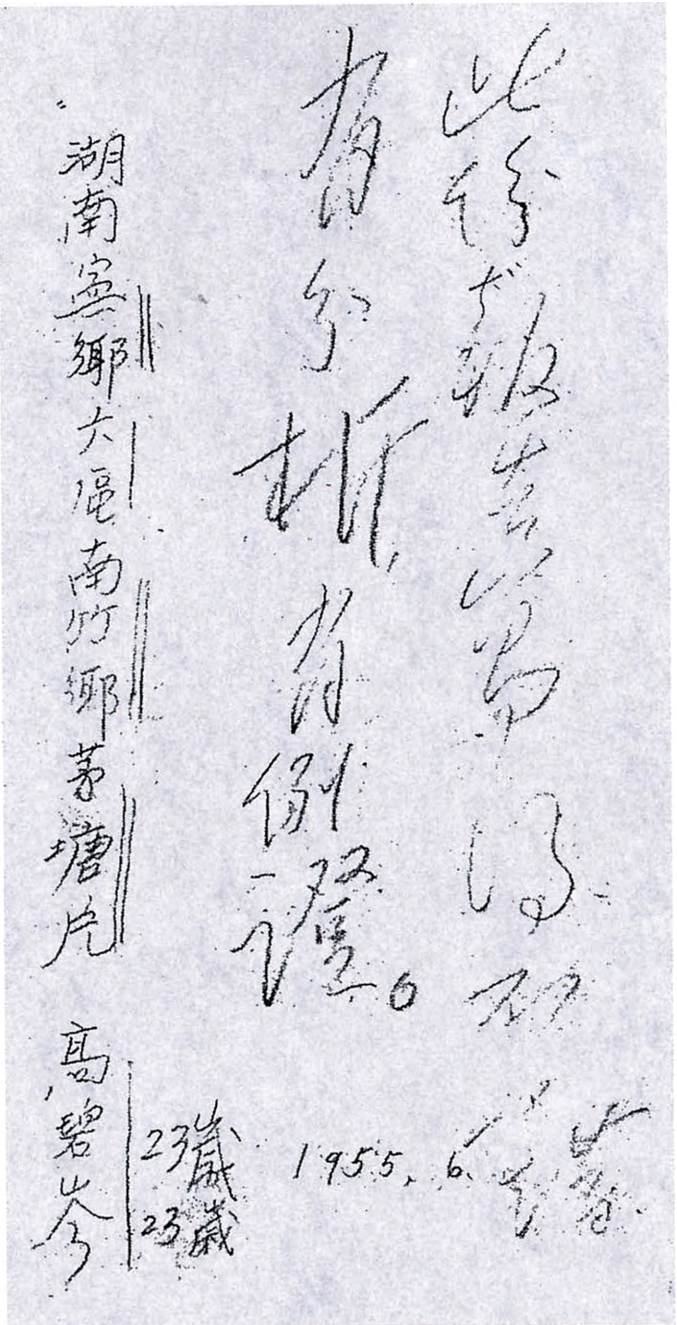
廣西省防城縣東興區松柏調查材

九五五年七月七日

中农叫苦是假

余粮太[illegible]

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战士凌理德的调查报告上写的批语。



此件报告写得好，有分析，有例证。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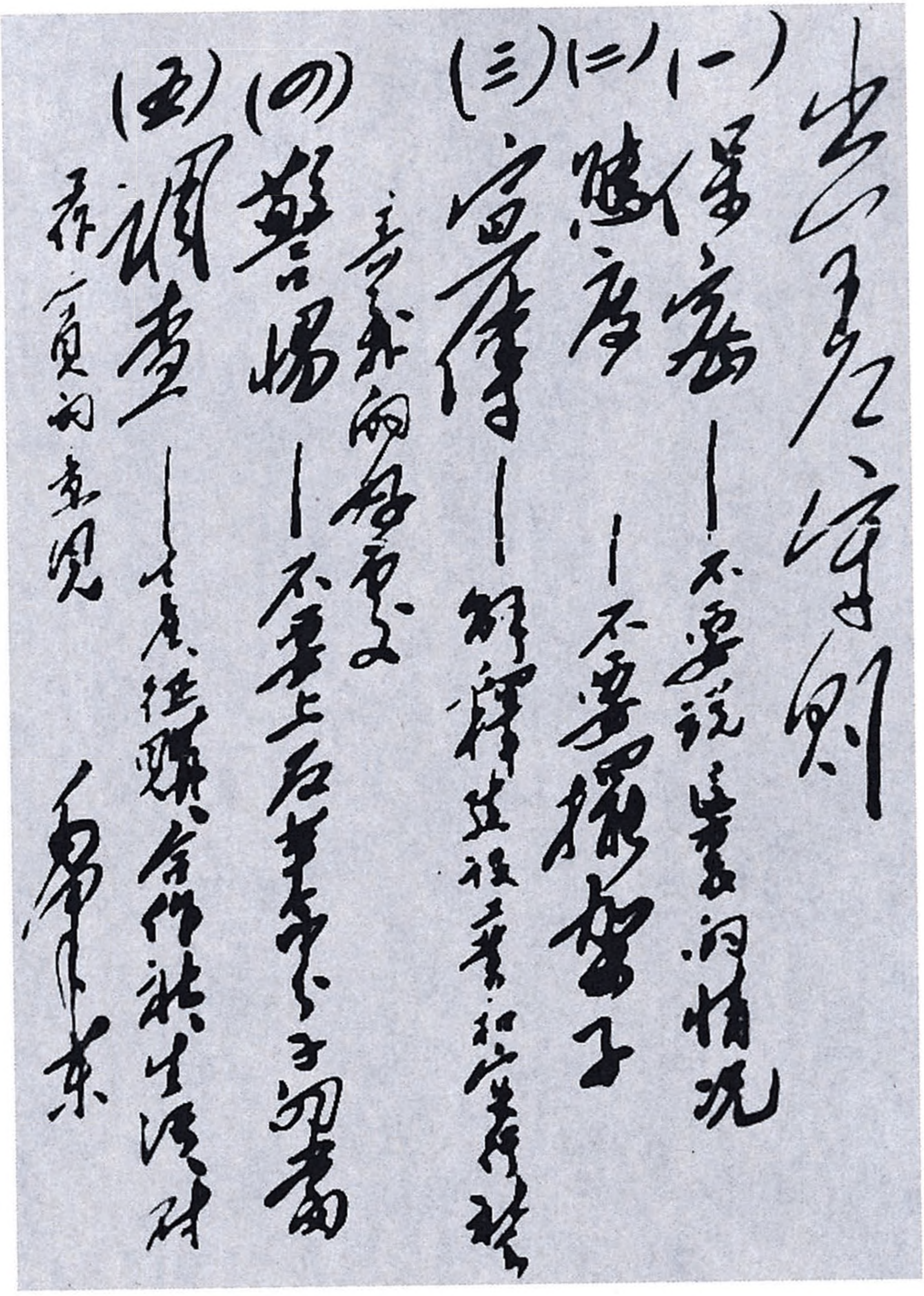
1955.6.

湖南寧鄉大屋南竹鄉茅塘冲

高碧岑 23歲

23歲

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战士高碧岑的调查报告上写的批语。



出差守则

（一）保密——不要说党内情况

（二）谦虚——不要摆架子

（三）宣传——解释建设事业·和宣传[illegible]

[illegible]我的东西

（四）警惕——不要上[illegible]

（五）调查——土产、征粮、合作社、生活、对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

毛泽东为警卫战士手书的《出差守则》。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情况通报的批语

（1955年7月20日）

一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上海市委七月十八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通报[1]一件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你们的好经验，望择要报来。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日

---

[1] 中共上海市委1955年7月18日的通报说，市委专门委员会7月15日召集第一（财贸）、第二（工业）专门小组、卢湾区委，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五个单位的负责人作了汇报。在开展反对右倾思想斗争以前，这几个单位的领导认识不足，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思想斗争。现在各单位针对具体情况，由领导带头作报告，带头检查，批判当前存在的右倾思想，使运动出现了新的气象。他们的经验是：一、坚决地反复地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斗争，领导带头，层层贯彻，对落后的单位和干部给予严厉的批评。二、放手发动群众展开斗争，加强对骨干分子的培养和教育，使骨干分子懂得党的政策，明确斗争的目的和方向。同时要注意动摇敌人，分化敌人，进一步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二

刘、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各单位。

毛泽东
七月廿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陆定一[1]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55年7月20日）

一

送交陆定一同志：

除小平[2]修改的以外，我又修改了一些（打红画的），请你加以酌定。

毛泽东

七月廿日

二

要求资阶〈产〉阶级和宗教信徒积极赞助和不反对马克思主

---

[1] 陆定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对陆定一的发言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义，是很难的。[1]

三

这一点[2]可在另外的地方讲，暂时不要在这个会上讲。

---

[1] 陆定一发言稿上原有以下一段话："凡是希望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得到成功的人，不管自己是唯心主义者或是唯物主义者，都应该积极赞助和不要反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毛泽东审阅时将这段话删去，并写了这个批语。

[2] 指陆定一发言稿中的以下一段话："我们也应该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中、妇女群众中、学生中、工人中，积极宣传无神论，这就是通俗化的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1955年，毛泽东和王稼祥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

对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同志的指示[1]

（1955年7月20日）

一

根据你们的任务特点，可以少学点制式教练，多学一些文化科学知识，多学一些地理、历史、数学、物理、化学。五年中学毕业。

二

你们不要单武，而且还要成为有文化的政治人员。你们在这个学校学习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

---

[1]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接见一中队的全体同志时，向他们提出学习文化的任务。中学课程一结束，根据毛泽东1957年的指示又办了业余大学。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于1955年7月20日作出的具体指示。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亲切接见中央警卫部队某大队一中队全体队员，面带慈祥的微笑给警卫战士讲话。

毛主席接見一中隊合影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接见一中队全体指战员并合影。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给警卫战士讲话。

中央转发北京军区等单位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5年7月20日、21日）

一

刘、周、邓、彭德怀、谭政[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泽东

七月廿日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北京军区、公安军、各特种兵等单位开展斗争肃清暗藏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情况》[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希望你们和当地军事机关联系和配合进行，并给他们以帮助。你们的五人小组开会时应邀军事机关的适当代表参加。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审干办公室1955年7月14日的情况简报说，5月下旬至6月初，北京军区等单位先后开展了反胡风斗争的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了检查，初步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线索。但前一段的工作还不深入，一般是停留在学习文件阶段。原因是：一、领导右倾麻痹，对这一斗争的严重性和内部不纯的情况认识不够。二、没有广泛地发动群众，怕发生“左”的偏差。三、有些单位首长没有亲自动手。根据这些情况，总政于7月8日召开总直和驻京机关部队负责干部紧急会议，已开始扭转过去不起劲、停留在一般学习阶段的情况，并把反胡风斗争扩展为向一切反革命分子展开斗争。各单位对运动的安排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阶段，学习文件，做好思想准备及组织与材料准备；第二阶段，展开坦白检举运动；第三阶段，转入审干，做出结论与处理。

对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1]的批语

（1955年7月20日、21日）

一

刘、周、邓、彭真、陈云、陆定一[2]阅，尚昆[3]用电报发，另印发北京各单位。

---

[1]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5年7月17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东省省直机关及广州市各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进入坦白检举阶段，暴露了许多问题。广东自解放以来，干部队伍是特别复杂的，而纯洁内部的工作又做得差，三反与土改整队虽然都是大的群众运动，但当时只解决了内部贪污腐化分子与土改立场不坚定分子的问题，后来清理中、内层也未形成一个大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领导上花的力量太少。最近的审干也未解决问题。因此在广东没有一个大的运动和斗争，内部不纯、暗藏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根本不能获得解决的。省委决心彻底搞好坦白检举，扩大战果，务求在这次运动结束时能基本上解决一些主要工作部门的问题。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此件很好。内有关于历史的估计。

毛泽东
七月廿日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广东省委七月十七日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正确的。各地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发生，可以参考广东的经验。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一日

对廖鲁言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1]的批语

（1955年7月22日）

即送陈云[2]同志：

请你即看一下，有无与你所讲相矛盾的地方。阅后即退廖鲁言同志。我觉得此件很好。

毛泽东

七月廿二日

---

[1] 指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的廖鲁言1955年7月21日送审的准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的粮食、棉花、油料以及牲畜、水产等各项增产指标是比较可靠的，是可以完成并可以超过的，应该保证完成，力争超过。今年是完成这个计划的关键一年。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工农业投资比例是适当的，是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的，也是符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的具体条件的。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还不能广泛实行农业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也还不能全面展开，发展农业生产的途径，主要还是依靠互助合作，合理使用劳力，充分利用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改变我国农业落后的根本道路，是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实行对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采取

削减工业投资的办法来增加农业投资。三、对几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应有恰当的估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是很大的。到今年春耕前，全国已发展到67万个合作社，互助合作，走社会主义道路，已成为农村中的主要潮流。对发展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也不隐讳，通过纠正错误，改正缺点，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更健康地更有信心地胜利前进。今后两三年内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关键时期，必须在此期间内，为合作化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础。四、关于农民生活问题。由于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紧接着就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发展了农业生产，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今后的任务是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资本主义的剥削。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引导农民到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为了更好的幸福的未来，农民必须和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7月23日）

罗瑞卿[1]同志：

此件[2]所说问题带一般性，请加注意。此件请你们商量一下，

---

[1] 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

[2] 指中共陕西省委1955年7月20日关于批准逮捕人犯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从最近反映的批捕人犯工作情况看，各地在原计划第一批逮捕的人数中，不少拟捕对象的罪证是失实的。其中有些是根本不该捕的；有些虽有一些过失，但也不属于捕办对象；有些是可疑分子，但在关键问题上缺乏材料和证据，尚需查对。存在这些问题是由于过去工作中存在轻敌麻痹思想和工作不深入，对可否逮捕的政策界限不清，因而在将要进入大批逮捕时，唯恐难以按原计划完成，产生了急于凑数的思想。根据这种情况，各级党委必须注意：一、严格掌握中央公安会议规定的应捕和不应捕的政策界限，切实纠正为了完成任务马虎凑数和对该捕的犹豫动摇的错误偏向。二、各地已组织起来的联合办公机构，应切实加强工作，特别是加强审查批捕人犯名单的工作。三、逮捕以前除了加强审查工作外，还需做好一系列组织工作。四、鉴于各地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部分地区逮捕工作的时间应有所推迟。1955年8月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转发了这个报告。

可否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党委注意仿办。

毛泽东
七月廿三日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省人委关于粮食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5年7月28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粮食问题极为重要，各地必须抓紧处理。现将黑龙江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

中央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八日

---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民委员会1955年7月15日关于全省粮食会议情况给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报告说，黑龙江省于7月6日至10日召开了粮食会议，传达了全国粮食会议精神，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提出的“坚决压缩销量，适当减低购量”的方针，表示一定要从全局出发，积极想法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坚决把粮食销量压缩下来。具体办法是：动员城市浮闲人口、剩余牲畜下乡生产；查清供应人口，消灭重复供粮；划清农业户与半农业户；调低口粮和城镇饲料标准，并供应一部分土豆代替粮食，适当控制熟食业用粮；深入贯彻节约，严格控制机关、企业等集体伙食单位用粮等。会议对全面实行“以人定量”的供应制度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一致认为这是压缩销量的重要措施，也是粮食工作的基本建设。为了加强对粮食工作的领导，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组成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并抽调有关部门人员设立办公室，联系各地，综合情况，督促检查，交流经验，解答问题。会议强调了任务要服从政策的原则，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在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思想觉悟的基础上，正确贯彻政策，防止急躁简单、强迫命令等偏向。

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上写的文字

（1955 年 7 月 29 日）

一

小平同志：

此件[1]请即印发各省市委书〔记〕及应到会的人（政治局委员加若干在京干部），原件用后退我为盼。

毛泽东

七月廿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1955年7月26日向毛泽东等报送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情况简报。主要内容是：一、今年春耕时全国有67万多个农业合作社，经过近几个月的整顿，有增有减，现有约65万个。二、各地对巩固与发展合作社的工作均作了部署，采取的主要措施是：集中力量巩固现有社，主要抓端正政策，做好社的生产工作，合理组织劳力，推行包工制；做好互助组工作，为建社建立基础；训练办社干部及准备建社的互助组骨干；抽调干部下乡帮助社的工作。各省的发展计划大体确立后，逐级向下分配任务，并由县区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修正意见，然后定案。三、1955到1956年度的发展计划是，由现有的约65万个社发展到103万余个，入社户数由1690余万户发展到约2920万户。这个材料还附有一份《全国各省现有社及一九五六年建社计划表》。

我在此件表上的侧面及背面所写的字[1]不要印。

二

改善耕作法：（1）深耕；（2）密植；（3）复种；（4）高产作物；（5）早熟作物；（6）选种；（7）除虫等。

改善劳动组织：推行包工制。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要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观点：（1）在发展问题上，“不进”与“冒进”。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2）在改变所有制的问题

---

[1] 指毛泽东在《全国各省现有社及一九五六年建社计划表》的各栏侧旁填写的各省市1956年入社农户数占总农户数的比率较1955年增长的数字，和在此表背面写的一篇文字，文字部分即本篇二。

上，即端正政策的问题。“揩油”问题已经发生，应当教育农民不要“揩油”，应当端正各『各』项政策，并以发放贷款的办法去支持贫农，这是一方面。但同时应当教育中农顾大局，只要能增产，只要产量收入比过去多，小小的入社时的不公道，也就算了。要教育两方面的人顾大局，而不是所谓“全妥协”，全妥协就没有社会主义了。又团结、又斗争是我们的方针。（3）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粮食问题：是否能实行三定，是否定到户，秋收以前是否能完成三定？

浙江有一个材料[1]是否适当？我觉是好的。

今年一定要比过去两年大进一步。

两次检查，今年十月和明年五月，全国人民代表，各省市人民代表都下去检查。主要检查：（1）粮三定；（2）合作社是否增产；（3）各城市的浪费问题。

增加生产资料，改善经营管理（端正政策、改善耕作法、推行包工制）和增加生产。

是否有把握（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即是否冒进？

去年是否冒进了10万个社？

今后一年又由65万个社，增至103万个社，即增加了近40万个

---

[1] 可能指中共浙江省委1955年6月30日关于农业合作社端正互利政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上海局的指示。

社；户数由1690万户，增至2920万户，即增1230万户，是否可以？

关键是在今后三年，重点在今明两年。

必须认真整社、建社；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几次。

训练干部和派遣干部，当地为主，外来为辅。

整社建社，必须从整党建党入手。

增加生产资料：（1）土地（深耕、开小荒、去阡陌等）；（2）牲口；（3）农具；（4）肥料；（5）水利。

改善经营管理，端正政策：（1）牲口入社问题；（2）大农具入社问题；（3）土劳分配比例问题；（4）投资问题；（5）附〈副〉业和社员自由使用一部分劳动力问题；（6）地富入社问题；（7）社员中贫农比例问题（应为贫农、新中农的下中农和中中农、老中农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的积极分子；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收这几部分人中的消极分子；更不要收富裕中农——不管是老中农中间的富裕中农，还是新中农中间的富裕中农；坚决不收地富）。

给黄守湜[1]的信

（1955年7月29日）

守湜兄：

七月四日惠书收到。深表同情。寄上人民币二百元，聊为杯水之助。再有困难，望续告。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七月廿九日

---

[1] 黄守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

（1955年7月31日）

一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

---

[1] 这是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1955年8月，毛泽东对报告稿修改后，作为修正本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1955年10月，毛泽东对报告修正本再次修改后，正式发表在1955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的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须由上面派出大批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到农村中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运动中才能学会怎样做工作。光是进了训练班，听到教员讲了几十条，还不一定就会做工作。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二

现在，全国合作化运动已经在大规模进展中，我们却还需要辩论这样的问题：合作社能不能发展呢？能不能巩固呢？就某些同志来说，看来问题的中心是在他们忧虑现有的几十万个半社会主义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几户）合作社能不能巩固。如果不能巩固，当然谈不到发展。某些同志看了过去几年合作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不相信，他们还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这一年的发展情况怎么样。他们也许还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巩固了，他们才会真正相信农业合作化是可能的，他们也才会相信我党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这两年的工作很要紧。

为了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的正确性，我们现在就来谈一谈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也许不是无益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那时，在江西是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在陕北是变工队，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是互助组。那时，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也已经个别地产生。例如，在抗日时期，在陕北的安塞县，就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过，这种合作社在当时还没有推广。

我党领导农民更广泛地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成批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现在，又已经有了差不多六年的历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党中央做出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的时候（这个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报纸上以正式决议的形式发表），已经有了三百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过了两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党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决议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两年时间增加了四十六倍。

这个决议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一万四千多个，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多个，即只准备增加一倍半，而其结果，这一年却发展到了十万个合作社，成为一万四千多个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党中央决定，由十万个合作社增加五倍，发展到六十万个合作社，结果完成了六十七万个合作社。到一九五五

年六月为止，经过初步整理之后，缩减了两万个社，留下了六十五万个社，较计划数字超过了五万个社。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很多。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到几百户。

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同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有了少数社会主义的国营农场。到一九五七年，国营农场将达到三千零三十八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一千六百八十七万亩。其中，机械化农场将达到一百四十一个（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增加的），耕地面积将达到七百五十八万亩；非机耕的地方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七个，耕地面积将达到九百二十九万亩。国营农业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将有大规模的发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我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这些合作社，过一两年就有经验了，就成了老社了，别人就会向它们学习了。由现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还有十四个月，完成这

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区的负责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实际情况定出一个适当的计划，于两个月内报告中央。那时我们再来讨论一次，最后定案。

问题是能不能巩固。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究竟能不能巩固呢？

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

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

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有力量的证据。请看第一批三百个合作社，第二批一万三千七百个合作社，第三批八万六千个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万个合作社，都是一九五

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来的，都巩固了，为什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万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暂定控制数字为三十五万个，尚待最后确定）就不能巩固呢？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为了使全国农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须认真地整顿已有的合作社。

必须强调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合作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偏向。因此，必须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两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经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还没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议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现有六十五万个合作社中，有五十五万个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较巩固的所谓“一类社”[1]。加上以前的十万个已经巩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经巩固的社是不少的。可以不可以由这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带领其余尚待巩固的合作社逐步地获得巩固呢？应当肯定地说是可以的。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

[1] 当时一般把办得比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称作一类社、二类社和三类社。

而不应当去挫折它。我们应当同合作社社员、合作社干部和县、区、乡干部共命运，同呼吸，不要挫折他们的积极性。

要下决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体社员或几乎全体社员都坚决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个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那就让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继续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坚决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让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将小部分人留下继续干。即使这样，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个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户，三户老中农坚决不想再干下去，结果让他们走了；三户贫农[1]则表示无论如何要继续干下去，结果让他们留下，社的组织也保存了。其实，这三户贫农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国五亿农民的方向。一切个体经营的农民，终归是要走这三户贫农所坚决地选择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

---

[1] 这里指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的三户贫农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

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四

必须认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这是我党在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著名口号。这个口号也可以用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中来。要有把握，就要有准备，而且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在一个省、一个专区和一个县里面建设一批新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事前做好许多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大体是：（1）批判错误思想，总结工作经验。（2）在农民群众中，有系统地和反复地宣传我党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在向农民作宣传的时候，不但要解释合作化的好处，也要指出合作化过程中会要遇到的困难，使农民有充分的精神准备。（3）按照实际情况，拟定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和全乡的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全面规划，从其中拟定年度规划。（4）用短期方式训练办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许多互助组互相联合起来，组成互助组的联合组，打好进一步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的基础。

有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发展的数量和质量统一的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还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着就去进行整顿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来以后能不能巩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准备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顿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不论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应当以乡村中当地的干部为主要力量，鼓励和责成他们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为辅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导和帮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办代替一切。

五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生产上，必须比较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决不能老是等于单干户或互助组的产量，如果这样就失败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减低产量。已经建立起来了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这是极好的情况，证明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合作社胜过互助组，更胜过单干户。

为了要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1）坚持自愿、互利原则；（2）改善经营管理（生产计划、生产管理、劳动组织等）；（3）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作斗争等）；（4）增加生产资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农具等）。这是巩固合作社和保证增产的几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坚持自愿、互利原则，现在必须注意解决以下各项问题：（1）耕畜和大农具是否以迟一两年再入社为适宜，入社作价是否公道和还款时间是否过长；（2）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比例是否适当；（3）合作社所需要的资金如何筹集；（4）某些社员是否可以使用自

己的一部分劳动力去从事某些副业生产（因为现在我们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地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上述四个问题必须注意解决得恰当，才不至于违反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原则，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自愿）；（5）社员的自留地应有多少；（6）社员成分问题，等等。

这里谈一个社员成分问题。我以为在目前一两年内，在一切合作社还在开始推广或者推广不久的地区，即目前的大多数地区，应当是：（1）贫农；（2）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3）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分子，让他们首先组织起来。这几部分人中间暂时还不积极的分子则不要勉强地拉进来。等到他们的觉悟程度提高了，他们对于合作社感到兴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们吸收进合作社。这几部分人的经济地位是比较接近的。他们的生活或者还是困难的（贫农，他们分得了土地，比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还因为人力畜力和农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难），或者还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有一种组织合作社的积极性。虽然如此，他们中间的积极性的程度，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积极，有些人暂时还不大积极，有些人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对于一切暂时还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们是贫农和下中农也罢，要有一段向他们进行教育的时间，要耐心地等待他们的觉悟，不要违反自愿原则，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

至于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一切经济地位较为富裕的中农，除开若干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们入社以外，其余暂时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强地把他们拉进来。这是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觉悟，只有等到农村中大多数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

者合作社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同这些富裕中农的单位面积产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们感到再单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对他们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较为有利的时候，他们才会下决心加入合作社。

这样，先将经济地位贫苦或者还不富裕的人们（约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几年内，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农。这样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

在最近几年内，在一切还没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区，坚决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农加入合作社。在已经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区，在那些已经巩固的合作社内，则可以有条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弃剥削、从事劳动、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来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参加集体的劳动，并且在劳动中继续改造他们。

六

在发展的问题上，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说现在合作社的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不对的。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

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这种状况的农民，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这就是说，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感觉，已经在广大的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迅速地发展起来。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们是动摇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面说过，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中间也有许多人，因为觉悟不高，暂时还是观望的，他们也有摇摆；但是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这是实际存在的情况。而我们的有些同志却忽略了这种情况，认为现在刚刚发展起来的几十万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已“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这是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这是第一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还对于共产党在农村中的领导力量和广大农民对于共产党的热忱拥护这样一种情况，估计不足。他们认为我们的党对于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他们悲观地描写党在领导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现时状况，认为“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不错，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新的革命。过去我们只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但是怎样去取得这种经验呢？是用坐着不动的方法去取得呢，还是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实行五年计划，不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工作，我们怎么能够取得工业化的经验呢？五年计划中就有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我们不去领导农民在每乡每村都办起一个至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试问“干部的经验水平”从何处得来，又从何处提高呢？显然，所谓现时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发展状况“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这样一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这是第二种错误思想。

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们必须相信：（1）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2）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缺乏这种信心，我们就不可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

七

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经验，鼓舞着我国人民，它使得我国人民对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了信心。可是，就在这个国际经验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赞成我党中央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步骤应当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的方针，而这种方针，曾经在苏联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在工业化的问题上可以采取现在规定的速度，而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则不必同工业化的步骤相适应，而应当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这就忽视了苏联的经验。这些同志不知道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

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问题，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是曾经遇到了的，苏联是用有计划地领导和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方法解决了，我们也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它。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苏联的经验，在这个问题上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孤立地互不联系地去看这些问题。其次，我们的一些同志也没有把这样两件事联系起来想一想，即：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

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这种经验，苏联也已经提供给我们了，我们的有些同志却没有注意。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找到了根据，拿来批评我国目前的农业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谓急躁冒进。《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不是告诉了我们，他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曾经在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在一个时期内，犯过急躁冒进的错误吗？我们难道不应当注意这一项国际经验吗？

我认为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的这一项经验，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但是我们不应当容许我们的一些同志利用苏联的这项经验来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

我党中央是怎样决定在中国进行农业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计划的。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到一九五二年，这三年多一点的时间，是为完成恢复我国经济的任务度过了的。在这个时间内，在农业方面，我们除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恢复农业生产这些任务之外，我们还在一切老解放区大大地推广了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织，并且着手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经验。接着是从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现在已经实行了差不多三年，我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向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经验也增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共有时间十八年。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内，同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的改造。这是可能的吗？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完全可能的。苏联是在一九二〇年结束国内战争的，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时间完成了农业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六年时间内完成的。在这个时间内，虽然苏联的一些地方党组织，如像《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上所说的，犯过一次所谓“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但是很快就被纠正。苏联终于用很大的努力胜利地完成了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农业方面完成了强大的技术改造。苏联所走过的这一条道路，正是我们的榜样。

第二，我们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进的办法。第一步，在农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仅仅带有某些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为一起或者十几户为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然后，第二步，在这些互助组的基础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

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这些小型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基础上，按照同样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进一步地联合起来，组织大型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步骤，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程度，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们较少地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好像是突然地到来的。这些步骤，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相反，它必须保证每年增产，而这是可以做到的。现在已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产的，百分之十几的社是不增不减的，百分之几的社是减产的。这后面的两类情况是不好的，特别是减产的一类最不好，必须用大力去整顿。因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产的（增产的数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为那百分之十几的合作社虽然第一年不增不减，但是经过整顿，第二年可能增产；最后，那百分之几减产的合作社，经过整顿，第二年也有可能增产，或者进到不增不减的地位。所以，就整个说来，我们的合作化的发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证增产而避免减产的。这些步骤，又是训练干部的很好的学校。经过这些步骤，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就可以逐步地训练出来。

第三，每年按照实际情况规定一次发展农业合作化的控制数字，并且要对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几次检查。这样，就可以根据情况的变化，成绩的好坏，决定各省各县各乡的每年具体发展的步骤。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也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有些地方应当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

可以只在老社中扩大农户的数目。各省各县，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至于对于合作化运动的检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和地委必须十分抓紧，每年不是进行一次，而是应当进行几次。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去作一次总解决。批评要是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例如今年七个月内，单是中央召集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会议，连同这次会议在内，就有了三次。实行这种因地制宜、及时指导的方法，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工作少犯一些错误，犯了错误也可以迅速纠正。

从上述种种情况看来，难道不可以说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因而足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吗？我想可以这样说，并且应当这样说的，将这种方针估价为“冒进”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九

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目前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我们认为恰好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工农联盟，这是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从

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给农民、使农民从封建所有制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这个革命已经过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经消灭了。现在农村中存在的是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个体农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十

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末

尾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开头，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国将有二亿五千万左右的人口——五千五百万左右的农户（以平均四口半人为一户计算）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就是全体农村人口的一半。那时，将有很多县份和若干省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并且将在全国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变为全社会主义。我们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〇年，对于包括其余一半农村人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那时，由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改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的数目，将会加多。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中的改革将还是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大型的农业机器必定有所增加，但还是不很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大型农业机器的使用将逐年增多，而社会改革则将在一九六〇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十一

要有全面的规划，还要加强领导。

要有全国的、全省的、全专区的、全县的、全区的、全乡的关于合作化分期实行的规划。并且要根据实际工作的发展情况，不断

地修正自己的规划。省、专、县、区、乡各级的党和青年团的组织，都要严重地注意农村问题，切实地改善自己对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各级地方党委和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抓紧研究农业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变成内行。总而言之，要主动，不要被动；要加强领导，不要放弃领导。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这已经不是新闻了），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委的报告[1]说：“随着农村合作化高涨形势的形成和发展，农村各类互助合作组织和各阶层群众，已经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动起来了。现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大社员，作为建社对象的农业生产互助组正在筹划和酝酿扩充自己的户数，不够条件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也要求进一步地发展和提高它们自己。群众有的张罗入新社，有的张罗入老社。今年不准备入社的人们，也在积极地酝酿插入互助组。动的面很广。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运动。这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一个新的突出的特点。但由于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龙江省的村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乡。黑龙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单位，等于关内各省的村。）在群众自找对象中，已经开始产生‘强找强，排挤贫困农民’‘争骨干，争社员，相互闹不团结’‘骨干盲目集中’‘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较严重的富裕农民趁机

---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4年8月关于双城县农村合作化运动中进行“全国规划”的经验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报告。

组织低级组或富农社’等等不健康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情况下，光是从建立新社这个范围和角度出发，考虑贯彻执行党的政策，领导这个运动，已经不够了，必须从全村范围（按：即全乡范围）和全面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角度出发，既考虑到老社的扩大，也考虑到新社的建立，既考虑到合作社的发展，也考虑到互助组的提高，既考虑到今年，也考虑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实现党的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里所说的“某些县、区有的领导同志，未能适应这个新的特点，及时地加强领导”，只是黑龙江一个省是这样的吗？只是某些县、区吗？我看，这种领导落在运动后面的严重情况，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来。

黑龙江省委的报告又说：“双城县的希勤村，以村为单位，采取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全面规划。这是领导合作化大发展的一种创举。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过规划，全面地实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加强了贫农和中农的团结，有力地开展了对于富农倾向的斗争。从农业全面合作化的利益着眼，适当地配备了骨干力量。调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组的关系，从而有计划地全面地推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其次，通过这样的规划，就把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工作，具体地布置到基层领导和广大群众中去，使党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进行领导，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发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组懂得了提高的具体方向，更加发挥了党的村支部和广大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地体现了依靠党支部、依靠群众的经验和智慧的正确原则。最后，正由于通过这种规划，可以进一步地摸清农村的底，具体地全面地去贯彻执行党的

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进，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从而正确地实现了中央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黑龙江省委报告中所说的某些“不健康的现象”，究竟怎样解决的呢？省委的报告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在省委报告的后面附载了双城县委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报告说：“通过党支部领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进行全面规划的结果，排挤贫困户入社的偏向纠正了，骨干过分集中的问题解决了，互相争骨干、争社员的现象没有了，社组关系更加密切，富农和富裕中农组织富农社或低级组的企图失败了，基本上实现了党支部的计划。两个老社扩大了社员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个新社的架子，整顿起两个互助组。估计搞得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群众，正在积极地实现今年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和搞好增产保收。村干部普遍认为：‘得亏这样一搞，要不就乱了，不但今年搞不好，还要影响明年。’”

我看就照这样办吧。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中央转发国家机关党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3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此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给各单位仿照办理。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

[1] 指中央国家机关党委1955年7月29日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专题简报。简报说，国家机关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进行了8周，大多数单位的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克服干部中存在的自满情绪和麻痹思想，加强对运动的具体领导。同时各单位的领导要注意将运动与业务工作很好地分工，不能耽误“五年计划”的实现，又要把运动搞好。二、要打开目前小组斗争中的僵持局面，着重解决下列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克服一般化的领导方法，有计划地研究敌情，总结斗争经验，具体地研究斗争策略；第二，要注意克服某些小组的骨干分子轻敌速胜思想和粗糙简单的斗争方式，绝不能简单从事；第三，根据不同的斗争对象，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和策略，提倡斗争方法和策略的多样性、灵活性；第四，注意调查研究工作，有计划地及早派人去调查材料；第五，积极开展专案审查小组的斗争，同时注意和一般小组的斗争相结合，灵活运用两种斗争形式。

二

刘、朱、周、陈、邓[1]即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

（1955年8月3日）

即送刘、朱、周、陈、邓、先念[1]同志阅，尚昆[2]办。

照此办理。在第一、二、三、四页上改了或加了几句话[3]。

毛泽东

八月三日

各项办法和表格已阅，均照办。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制度、控制购销、改进粮食工作的指示稿的修改有：在第1页，加写了抬头："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在第2页，将"中央检查了一九五三年以来的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大体还好，问题不少"一句中的"大体还好，

问题不少”，改为“虽然问题不少，但是大体上是好的”；在第3页“估计一九五五年的生产计划如果完成，粮食产量将比一九五四年增加二〇〇亿斤，而国家征购的数量又比上年度实收数减少六十四亿多斤，这样农民就能够留有较多的粮食，用以改善生活”一句后，加了“增加牲畜饲料”6个字；在第4页，将“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销得过多”一句，改为“必须抓紧每年七至十二月的销量，在这一期间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或国家销得过多”。

关于少将以上军衔评定问题的批语[1]

（1955年8月3日）

刘、邓[2]：

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批准。[3]

毛泽东

八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8月2日报告上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

[2]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的报告说：在现役军官中，准备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名单，从1954年冬至今，军委已根据军官服役条例规定的四个条件（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作了反复研究和征求意见。研究结果，大将名单（10名）已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作了定案；上将名单（53名），除3名起义军官须请中央确定外，其余人选已取得一致意见；唯有中将（177名）、少将（808名）名单，又作了大的缩减，这个名单已经8月2日军委会议同意，现呈上请审核。关于元帅军衔名单，经军委委员研究，认为毛泽东同志因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需要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故应评为大元帅；其余11个军委委员则评为元帅。地方党委的同志兼军队职务者，原则上是评而不授，但对个别同志，为了照顾起见，亦授予现役军衔。上述准备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者，共计1063名，请予批示。校级、尉级军衔名单于9月底审查完毕，待中央将少将以上名单批准后，即可在10月1日统一正式授予。

给孙燕[1]的信

（1955 年 8 月 3 日）

配君同志：

你的信收到，很高兴。你们想到北京一看，是可以的；但是今年不要来，明年再说吧。你母亲在何处工作，情况如何？如有困难，可告知。

祝你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

---

[1] 孙燕，学名孙配君。她的母亲陈玉英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中央转发北京军区空军关于勤杂人员中发现严重问题通报的批语

（1955 年 8 月 4 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局〈区〉党委：

现将空军党委《勤杂人员中发现的严重问题通报》[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勤杂人员成分不纯问题，很值得注意，应在此次肃反斗争中予以解决。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审干办公室1955年7月31日转发的北京军区空军《勤杂人员中发现严重问题的通报》。通报说，北京军区空军驻京单位自开展肃反运动以来，在勤杂人员中发现了不少问题，证明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审查不严，必须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注意。在勤杂人员中的肃反运动不能放松，以便将混在勤杂人员中的反革命分子坚决清除出去。

二

刘、周、陈、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解决儿童读物奇缺问题的批语

（1955年8月4日、11月1日）

一

林枫[1]同志：

此事[2]请你注意，邀些有关的同志谈一下，设法解决。

毛泽东

八月四日

---

[1] 林枫，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

[2] 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34号上刊载的《儿童读物奇缺，有关部门重视不够》的材料中说：中国少年报社最近召集有关部门座谈关于儿童读物问题，会上普遍反映儿童迫切需要的作品和中国儿童文学奇缺，许多应该有的读物都没有，在仅有的读物中，又多半只适合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阅读。（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注："书少"。）造成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一、各地文化、教育部门和团委不重视儿童读物的创作和供应，各地出版社都没有编儿童读物的干部和出版计划。二、一般作家不愿给儿童写东西，也有些作家觉得搞儿童文学"糊不了口，出不了名"。（毛泽东在这两项旁批注："无人编"。）三、全国多数书店不卖儿童读物，有的虽推销，也不积极，只停留在少数门市部，没有面向学校和孩子们。四、书价过高，一般的儿童读物价钱都在一二角以上，有的翻译作品需七八角甚至一元，孩子们没钱买。（毛泽东在这一项旁批注："太贵"。）

二

林枫同志：

此信[1]已阅，附件还来不及看。你们可以照你们的布置去做，不要等候我提意见。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

[1] 指林枫1955年10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关于改善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发行等问题，我们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曾和文化部、教育部、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团中央以及有关出版社的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现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创作问题的报告、文化部党组关于改进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发行工作的报告及教育部党组关于少年儿童读物问题的报告送请审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已经按此报告初步地布置了工作。

中央转发建工部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5日）

一

中央和军委各部门、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这个报告[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

---

[1] 指建筑工程部五人小组1955年7月25日关于在设计部门中发动技术人员开展肃反斗争的报告。报告说：建筑工程部设计部门党员骨干少，技术干部多。技术干部多从海外归来，与海外联系广，历史不大清楚。我们从6月10日起用了40多天的时间进行准备，整顿队伍，排队摸底，学习文件，反复动员，并进行了一般号召，最近又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斗争。取得的经验是：第一，领导思想上必须认识技术人员中同样绝大多数是好人，要善于把不良的思想作风和由于技术水平不高所造成的过错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区别开来，只有如此，才能有热情与耐心去发动群众。第二，领导必须亲自动手，主要是反复动员，交代政策，提高觉悟，解除顾虑，指出工程师在运动中应起的作用与应负的责任，并善于根据不同对象进行工作。第三，重视发动技术人员参加运动。第四，开展“攻心战”，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劝说运动。

发一切有工程技术人员的单位仿照办理。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二

刘、周、陈、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毛泽东
八月五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政府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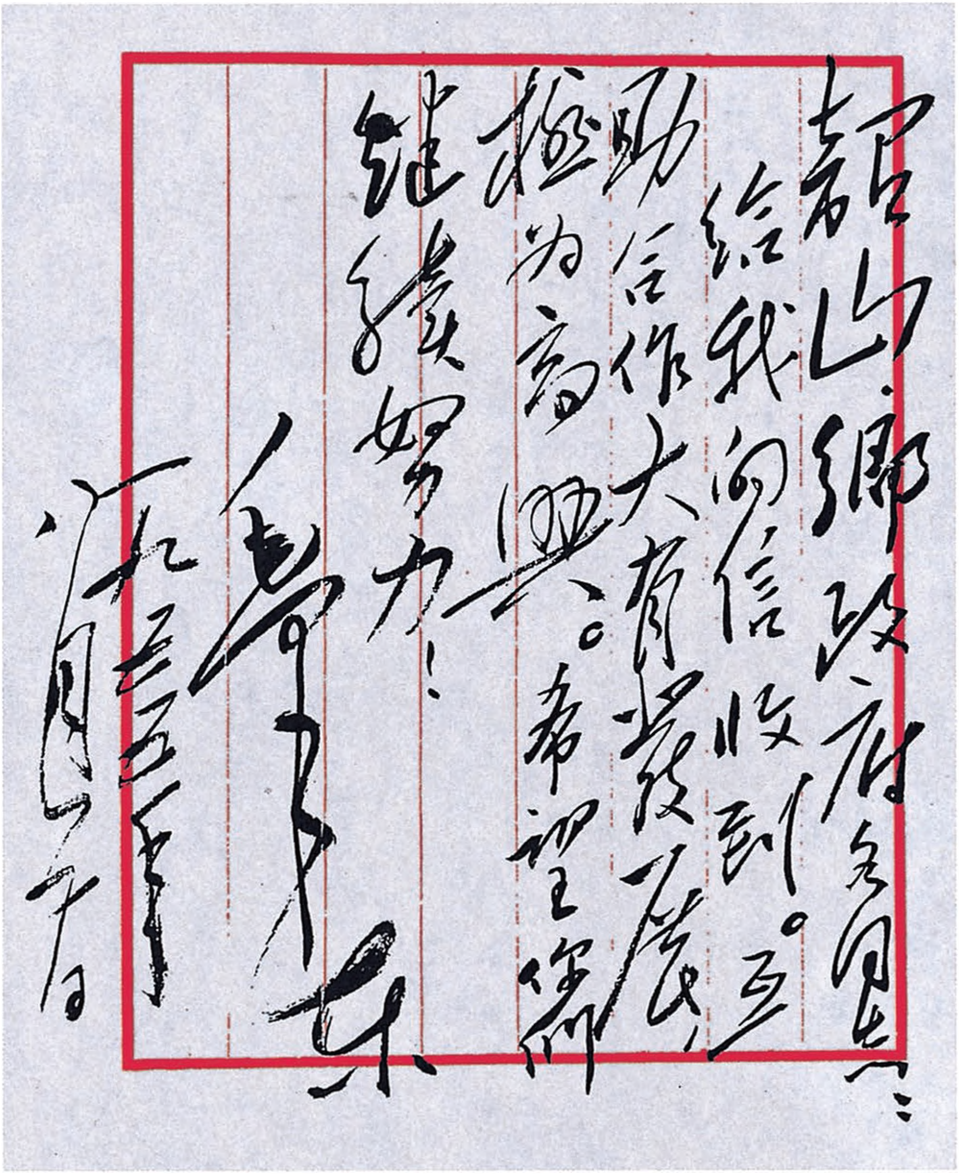
（1955年8月5日）

韶山乡政府各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韶山鄉政府各同志：给我的信收到。互助合作大有发展，极为高兴。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

毛泽东致湖南省湘潭县韶山乡政府信的手稿。

给湖南省湘潭县云源乡政府的信

（1955年8月5日）

云源乡政府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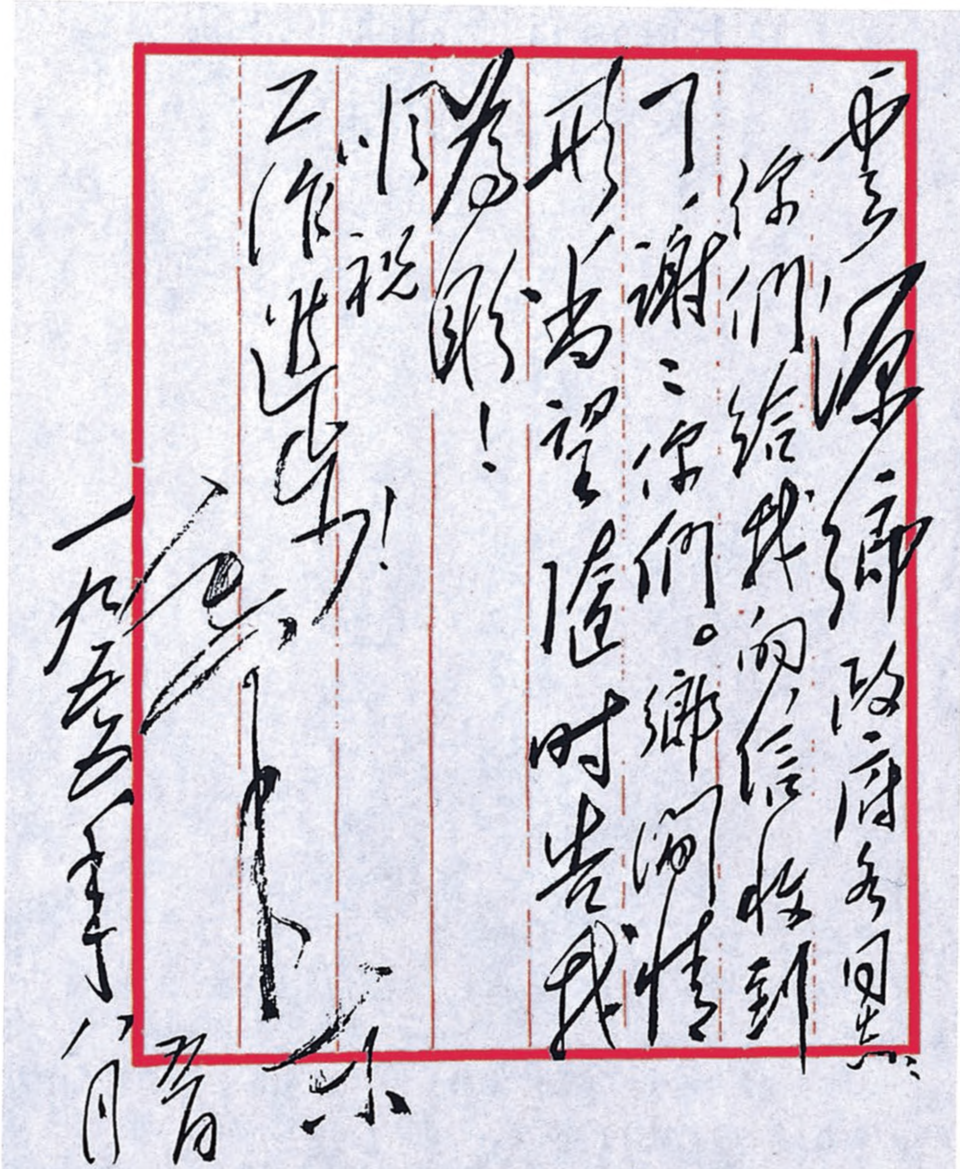
你们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乡间情形，尚望随时告我为盼！

顺祝

工作进步！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



雲源鄉政府各同志：

你們給我的信收到了，謝謝你們。鄉間情形，尚望隨時告我為荷！

順祝

工作進步！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日

毛泽东致湖南省湘潭县云源乡政府信的手稿。

关于每年有计划地下部队检查工作的批语[1]

（1955年8月6日）

一

彭[2]阅，**退粟裕**同志。

有计划地每年下部队检查几次，很有必要。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1955年7月11日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部队进驻福建问题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上。报告说，总参谋部关于修建福建地区一线机场及布置空军进驻福建，虽是本着中央军委的历次指示安排的，但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对空军进驻福建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不周到，对由此影响到的复杂的外交斗争理解不深刻，没有及时请示，应该引以为今后工作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要经常到下面去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借机学习，以克服事务主义的工作方法。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二

我已于五月十九日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因此你们已无不事先请示的责任，只有在后来决定具体部署时没有请示的责任。

毛泽东
八月六日

给刘松林[1]的信

（1955年8月6日）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

祝好！

父字

一九五五、八月六日

你要的列宁选集两卷，给你送上。

---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刘松林这时准备去苏联留学。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广州市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5年8月7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

[1]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5年7月24日关于广州市属机关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州市属机关一周来的运动发展很快，已揭露出一大批反革命活动的材料。运动中得到的体会是：第一，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特别是中间和落后的群众。反革命分子进行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拉拢和利用某些历史上有污点、有错误的人或落后群众，因此把这些人充分发动起来，卸掉他们的历史包袱，解除顾虑，提高其政治觉悟，对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二，必须反复地不厌其烦地交代政策。反革命分子最怕杀头，有一般性政治问题的最怕清洗，除此之外又怕不被信任而没有前途。应向他们讲清政策：彻底坦白，该杀者不杀，罪重者减轻，罪轻者免罪，允许立功赎罪；有一般性政治问题者只要交代，一律不清洗；彻底坦白而又能检举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者，可以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组织的信任，自己会有前途的。这样就可以大大动摇反革命分子的抗拒心理。第三，坚决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使运动深入发展，不走过场。第四，加强对基层小组的领导，深入检查工作，及时发现问题，予以解决。

现将广东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特别注意充分发动群众和反复交代政策这两点。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七日

二

刘、周、邓、陆定一[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洛阳拖拉机厂肃反斗争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5年8月8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

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反斗争，既要肃清一切真正的反

---

[1] 指中共洛阳拖拉机厂临时委员会1955年7月29日关于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给洛阳市委的报告。报告说，该厂参加这次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共48人，其中重点斗争对象13人。在这13人中，有4人交代比较好，8人思想动摇，1人仍然狡猾对抗。如何在运动中团结争取多数，分化孤立首要分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也是开展坦白检举运动能否胜利的关键。主要体会是：（一）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批判“不问政治、凭技术吃饭”的思想，树立对革命事业、对坦白检举的正确态度，是发动旧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参加运动的主要一环。（二）进行政策教育，一是团结教育改造技术人员政策，一是肃反政策。前一项政策主要是团结大多数好人，培养国家建设的技术人才，为人民服务；后一项政策是肃清破坏革命事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两项政策是不矛盾的，都必须贯彻执行。（三）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入贯彻政策，解除顾虑。（四）开展技术人员内部思想斗争，团结好人，分化敌人。

革命分子，并作适当的处理，又要团结、教育和提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好人（包括犯有某些错误的人在内），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的经验中，现有洛阳拖拉机厂党委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有关各单位。但应指出：该厂参加坦白检举运动的工程师和四级以上技术员四十八人中，有重点斗争对象十三人，这个比例很大。现在假定这十三人都是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的人，我们必须注意分别情节轻重，做出不同的结论，争取其中的多数人留在厂内，在领导控制和群众监督之下，继续工作，在工作中加以改造。只对极少数几个人，因为情节十分严重，留在厂内极为不利，可考虑另外的处理办法。此点望各级党委严重注意。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八日

二

刘、朱、陈、周、陆定一、罗瑞卿[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前批各件是否都已办了？**　**我处没有收到印件**）。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及时转发军队开展肃反运动情况的批语[1]

（1955年8月8日）

谭政[2]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你是否都看这类报告？应当都看，择要转发，及时指导各地。每隔一个半月，应召集全军性的会议讨论一次。

毛泽东

八月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1955年8月1日上报总政治部并给所属各单位的关于肃反运动情况的简报上。简报说，军区直属各大单位的肃反运动已转入联系实际、展开斗争、具体揭露的阶段。在揭发出的问题中，较为严重的有：（一）已发现一些反革命分子。（二）各单位都揭发出一些小集团活动。（三）不少单位揭发出一些严重的泄密事件。（四）各单位都揭发出不少反动言论。（五）有些知识分子开始暴露受胡风思想影响和崇拜胡风分子的问题。在此期间，军区五人小组与各级五人小组注意对开好小组会的指导和掌握，取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1. 凡能具体地联系实际，特别是依据本单位的业务特点与突出问题联系实际，小组会就有声有色。2. 小组是战斗单位，要重视提高小组长的领导水平。3. 小组会的形式可灵活多样，求得交锋。4. 对某些情况复杂的单位，在判定对象确有问题，群众斗争将要出现僵局时，领导应掌握火候，改变战术。

[2] 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在安徽军区肃反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55年8月8日）

谭政同志：

兵役干部复杂，不独安徽为然，此件[1]似可转发各省军区仿办，请酌处。

毛泽东

八月八日

肖华[2]病况如何，盼告。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部1955年7月30日转发所属并报总政治部的安徽军区党委、政治部1955年7月25日关于肃反情况的简报（第四号）。简报说，根据最近几天的肃反运动来看，有如下问题应加注意：第一，在兵役干部中，存在问题较多，必须注意清理。据初步了解，在军区干部学校学习的兵役干部中，已发现有反革命分子和重大政治嫌疑分子。对这类问题的清理，必须部队亲自动手，不能单独依靠地方党委。第二，转入坦白检举阶段前，必须有周密的布置和充分的准备。第三，在思想检查和坦白检举阶段的具体做法：1. 思想检查和坦白检举要密切相连，不能截然分开。2. 思想检查中，必须展开尖锐的斗争。3. 思想检查之前应确定重点对象，以便有对象有重点地开展斗争。4. 在群众已经发动，斗争已经展开，重点对象已经明确，骨干已经经过实际斗争锻炼之后，即由领导上号召坦白检举，转入坦白检举阶段。

[2]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中央转发广东省建筑局发动后进群众开展肃反的经验的批语

（1955年8月9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政府各党组：

这一份材料[1]，有推荐的价值，对技术部门特别有用，现发给你们参考。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九日

---

[1] 指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小组办公室1955年7月30日印发的关于广东省建筑局第二小组发动后进群众开展肃反斗争的经验材料。材料介绍了在肃反运动转入联系实际时，有意识地发动后进群众的经验：第一，必须摸透后进人物的思想特点、表现和各种顾虑，派适当的同志去个别谈话，针对其思想问题，解除怕组织不信任及撕不破面皮的思想顾虑。第二，必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办法，找和谈话对象同行的有感情基础的老工程师去交谈，从鼓励进步、巩固思想情绪入手，启发诱导，不追不逼。第三，要攻破敌人，必须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后进群众起来揭发检举。事实证明，敌人的活动对象是后进群众，而后进群众也最了解敌人的底细，发动了后进群众才能搞出敌人的真实材料。发动后进群众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不是一次半次谈话就可以解决的，必须有决心，有耐心，进行细致的启发教育工作。

中央转发中国作协关于对暗藏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10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军委各部门、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此件[1]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各单位仿行。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日

---

[1] 指中国作家协会1955年7月14日关于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的公布，作协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其他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大体分为三阶段：从5月13日第一批材料公布到5月29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反复阅读、座谈两批材料，批判右倾思想。从5月30日召开第一次动员大会开始为第二阶段，主要是展开尖锐的揭发批判和思想交锋，并作了初步排队。6月10日第三批材料公布后，立即召开第二次动员大会，把运动引到普遍暴露问题的第三阶段。

二

刘、陈、邓、陆定一[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

---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对外贸易部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斗争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11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军委各部门：

对外贸易部的肃反经验[1]很有用处，发给你们参考，并可转发

---

[1] 指对外贸易部党组1955年8月1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情况给国家机关党委并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介绍的经验。报告说，外贸部的肃反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从6月6日至6月21日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做好运动前的准备工作。（二）从6月22日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开始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经验是：第一，放手发动群众，强调联系实际，揭发坏人坏事，层层“剥皮”，最后达到孤立暴露反革命分子的目的。第二，小组进行思想斗争要有准备，必须重视整理材料和研究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三，小组斗争进行到足够程度时，应即转入专案审查小组进行审查斗争。（三）从7月下旬进入第三阶段，主要是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破案歼敌。这一阶段的经验是：第一，要继续反对右倾思想，加强具体指导。第二，大力加强专案审查小组的领导，求得破案歼敌。第三，在小组进行思想斗争剥去反革命分子的伪装后，进一步审查其历史和社会关系，对暴露反革命分子的真面目和教育干部的作用很大。

各单位仿行。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

二

刘、陈、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并抄军委各部门，另印发在京各中委。

---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派中国代表团参加朝鲜解放十周年典礼复金日成电

（1955年8月11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首相金日成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愉快地接受并感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以朱德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前往贵国参加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在平壤举行的纪念朝鲜解放十周年典礼[1]。谨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一日　北京

---

[1] 1955年8月13日至23日，朱德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了朝鲜解放十周年庆祝活动。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周年的电报

（1955年8月12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值此朝鲜人民获得解放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在伟大的苏联军队击败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后，十年来，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争取自己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以后，朝鲜人民又进行了艰巨的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朝鲜人民的这些成就给了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朝鲜停战以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严格遵守朝鲜停战协定，朝中两国政府始终本着协商精神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和平的敌人却多方图谋破坏停战协定，致使朝鲜停战至今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朝鲜停战协定决不容许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实现。

祝朝鲜人民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朝鲜人民在这一斗争中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深厚的同情和全力的支持。

祝你们在加强民主基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于北京

关于补充现役各军种部队和有计划训练预备兵的批语[1]

（1955年8月12日）

少奇、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于数日内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8月6日报告上写给刘少奇等的批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彭德怀1955年8月6日关于补充现役各军种部队的缺额和有计划地训练预备兵的报告。报告说：经军委第四十三次会议确定，1955年度征集义务兵105万人，其中补充现役部队88万人，组建10个预备役训练师，共12万人，合计为100万人，征集时加5%预备数5万人，总共实征105万人。关于预备师训练问题：为了应付突然事变，迅速有效地积蓄现代化兵种的预备力量，仅靠最近几年内复员的预备役是很不够的，军委拟定在现役常规军外，采取组建预备役训练师的办法以加速训练预备兵员，计划自1955年开始到1960年度分五期组建和训练，累计到1961年3月共可训练出130个师的兵员。这些预备师，主要在我国西南、西北及中原地区训练。

对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揭发出冒牌工程师的情况简报的批语和对中央批语稿的修改

（1955年8月12日、13日）

一

定一同志：

此件[1]可转。请查告城市建设总局属何机关管辖，是否直属国务院?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指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1955年8月10日关于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设计院揭发出冒牌工程师多人的情况简报。简报说，在肃反运动中，城市设计院经过群众检举和查历史，发现有不少是混进来的冒牌工程师，其中隐藏了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些人技术低劣，政治历史情况复杂。他们通过伪造历史、学历，夸张吹嘘个人本领等手段，混入技术部门。而我们有些单位由于基本建设任务繁重，急需技术人员，到处搜罗，更不管真假，一概收录，听说是大学、专科毕业，便给个工程师职位，这就给这些冒牌工程师的混入开了方便之门。1955年8月12日，陆定一向毛泽东建议转发上述简报。

二

对高级知识分子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正确的方针是：坚决保护一切好人；而对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则必须发动群众认真清查出来，并作适当的处理。[1]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1955年8月13日转发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城市建设总局城市设计院揭发出冒牌工程师的情况简报的批语稿中修改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5年8月13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湖北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

---

[1] 中共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于1955年8月3日和4日先后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检查了今年以来省委的工作。省委认为，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对于中央5月17日会议关于积极发展合作社的精神认识不足。在6月省党代会上，虽然检查了“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并分析了它的原因，但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省委认为，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是过渡时期各项工作的指针，一切工作都应充分发挥潜力，克服困难，尽一切可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度，必须反对在困难面前消极动摇的右倾思想。会议确定了全省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划方案，到明年秋季以前发展到12万个社，占全省农业人口的25%左右。关于全面规划和加强领导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准备在8月底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和确定全省规划方案。

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湖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为什么“有些干部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中，不是比土地改革时期的劲头更大，热情更高，而是滋长着一种极其危险的消极和怕困难的情绪”的问题，应当加以分析，给予明确的回答。关于各省区在一九五六年秋季以前按照实际情况究竟能够发展到多少个社的问题，望和较多的同志加以研究，确定一个计划，报告中央。湖北各地委目前正在召集区委委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地、县、区的规划布局。湖北省委准备召开地书联席会议进一步研究和确定全省规划方案。中央希望各省区也能这样做，时间或在八月底，或在九月上中旬，以在九月二十日以前研究和确定全省区的规划方案为适宜。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于九月二十日以前，务必作出切实的部署，连同全省发展规划，一起报来为盼。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

二

刘、陈、周、小平[1]阅，尚昆办。另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及各有关同志。

---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5年8月15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先生阁下：

值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周年纪念之际，谨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致热烈的祝贺。祝印度尼西亚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16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辽宁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辽宁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相互关系问题，必须强调二者的紧密联系，而不可只强调前者，减弱后者。因为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关于整社建社扩社的各项准备工作，辽宁省委指出，应包括“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积极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逐级做好发展社的全面规划，特别是着重解决村一级（按即乡一级，东北各省还未改称乡）合作化的阶级规划；继续做好现有社整顿巩固工作，进一步贯彻合作化的具体政策，审查、清理和纯洁合作社的组织；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打好建社的基础；把整社建社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

结合起来”，这些都是适当的。辽宁省委决定于九月上旬召开全省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的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化问题，各省可以酌量仿行。辽宁没有地委一级，为了加强对合作化的领导，立即建立这一级机构，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

二

刘、陈、彭真、小平、陈毅、恩来[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恩来，即周恩来。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意袁希洛[1]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批语[2]

（1955年8月17日）

刘、周、陈、邓、彭真、陈毅[3]阅，退毛。

似可允其来京一行，并参加国庆观礼。此人是江苏教育会派要人之一，似可考虑给以某种名义。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

[1] 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20世纪20年代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为转交袁希洛给毛泽东的信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邢西萍（即徐冰）的信上。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毅，曾任上海市市长，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加强中央机关防卫工作的批语[1]

（1955年8月18日）

罗瑞卿、邓小平、杨尚昆、汪东兴[2]各同志阅。敌人放毒事值得注意。请你们对中央机关的防卫问题，加强注意。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部1955年8月13日关于驻广州市部队发生严重中毒事件给总政治部并广东省委边防部、广州市公安局的报告上。报告说，驻广州市部队在八一建军节期间先后有24个伙食单位1500多人发生中毒，各单位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可疑线索和可疑人员，初步分析，这些事件的发生，有的是因反革命分子投毒所致，有的是因食物腐烂所致。各单位正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分别查清问题的性质，予以处理。

[2] 罗瑞卿，当时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中央关于妥善保存和严格清查处理敌人遗留的各项档案材料的指示

（1955 年 8 月 19 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关于妥善地保存和严格地清查处理敌人遗留下来的各项档案材料，对于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审查干部的工作，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档案，不但省市一级大量存在，而且在专县两级也是存在的，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通令所属妥善保存，并严格地加以清查和处理。广东省委对于此事已作了适当的部署[1]，现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仿照广东的办法，作出同样的部署。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九日

二

刘、陈、彭真、小平、瑞卿、定一[2]阅，尚昆[3]办。

---

[1]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5年8月14日关于清查处理敌人各系统有关档案给所属并报中央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广东解放后，各地区均接收了不少敌人遗留下来的档案材料，其中不少对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但由于对其作用认识不足，发现有不少单位将这些材料予以烧毁或当作废纸出卖，大部分地区对接收的档案至今仍分散搁置，未清查处理，在对敌斗争中亦未很好地加以利用。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凡是过去接收的档案材料，一律不许出卖或销毁。（二）对已接收或遗散各地的档案进行清查，限期弄清所有档案材料的情况和数字，以县、市为单位派专人予以登记处理。（三）各地党委应抽调政治可靠并有一定水平的干部组成清理小组，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结合镇反调查摸底工作和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迅速进行清理。（四）在清查工作中，各地如发现有省级机关的成批档案材料，应即送交省委。（五）上述工作进行情况，于8月底作出第一次书面报告。

[2]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广东省委关于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20日）

陆定一、罗瑞卿[1]同志：

此件[2]值得一看。此件中的意见，请考虑是否有一些可以吸收到你们现正起草的中央文件[3]中去。

毛泽东
八月廿日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组长。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中央十人小组副组长。

[2]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5年8月13日关于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广东省委为了贯彻中央肃反指示，除已布置各级领导深入研究中央指示并对前一段运动进行检查总结外，并计划：1. 省直单位9月底基本结束，广州市级单位年底结束，省属市9月开始，年底搞完，县以下明年开始，10月前搞完。2. 根据各单位的具体情况，适当分出一些人管业务。3. 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反复交代政策。4. 有计划地掀起高潮，分批分期打击敌人。现已组织专人清理敌人档案，以配合运动。

[3] 指当时正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于1955年8月26日发出。

关于举行群众集会支持印度收复果阿地区的斗争的批语[1]

（1955年8月20日、21日）

一

周总理：

---

[1] 果阿，位于印度西海岸，原为印度领土，16世纪初连同附近的达曼和第乌一起沦为葡萄牙的属地。果阿地区的人民为民族独立一直坚持斗争。1950年印度政府正式递交照会给葡萄牙政府，要求把它在印度的属地移交印度联邦，但葡萄牙政府断然拒绝了印度收回果阿的合法要求，拒绝同印度政府就果阿问题进行谈判。1955年8月15日印度独立纪念日，几千名印度志愿人员分别进入果阿、达曼和第乌。葡萄牙当局用自动武器和警棍对这些赤手空拳的志愿人员进行了血腥镇压，打死打伤200多人。同一天，果阿境内的人民不顾葡萄牙当局的严厉镇压，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要求把果阿并入印度联邦。葡萄牙当局的暴行，激起了全印度人民更大的愤怒，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了罢市和示威，印度政府也采取了关闭驻果阿总领事馆和要求葡萄牙关闭驻印度各地领事馆等措施。8月19日，印度同葡萄牙断绝了外交关系。此后印度人民一直坚持收复果阿等地区的斗争，直到1961年12月，印度出兵收复了果阿、达曼和第乌。毛泽东关于支持印度收复果阿斗争的两个批语，其一写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1955年8月17日关于印度解放果阿运动有新发展给外交部的电报上；其二写在中共中央1955年8月21日关于举行群众集会表示同情和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斗争的通知稿上。

我国人民团体和舆论界对此应有所表示[1]。

毛泽东
八月廿日

二

少奇、小平[2]同志：

拟议增加三个城市[3]，报导亦可发来北京，因为此事有颇大的国际意义。请小平处理。

毛泽东
八月廿一日

---

[1] 1955年8月23日，北京各界人民举行了支援印度人民收复果阿大会，大会向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印中友好协会发了声援的电报。195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的斗争》的社论。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中共中央1955年8月21日关于举行群众集会表示同情和支持印度人民收复果阿斗争的通知稿中，规定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5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毛泽东审阅通知稿时增加了沈阳、重庆、西安3个城市。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1]

（1955年8月21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西·布吉奇同志：

值此罗马尼亚解放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怀着万分兴奋的心情注视着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十一年来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个成就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巩固和繁荣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格·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西·布吉奇的电报。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一周年。1944年苏联红军进入罗马尼亚，同年8月2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发动反法西斯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政权，罗马尼亚转而加入反德国法西斯战争。此后，8月23日成为罗马尼亚的解放日。

自己的祖国以及保卫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祝中罗两国牢不可破的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对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8月22日、26日）

一

即退小平[1]同志处理。此件很好。略为作了一点修改[2]。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毛泽东1955年8月22日在审阅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时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在指示稿谈到“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畏罪自杀和假自杀，要在本单位宣布并指出其罪状，对假自杀的要追究原因和动机”一句后，毛泽东加写了“但是为了保存有用材料的目的，也要尽可能地防止反革命分子的自杀”。（二）在指示稿谈到“对好人不坚决保护是不对的；对高级技术人员一味照顾，即令有严重问题也不去触动他们的想法，也是不对的”一句后，毛泽东加写了“对少数因有某种必要经中央或各省市委区党委批准暂时不去触动的人，不在此例”。

二

少奇、小平同志：

在第12页上加了一段[1]。不加这一段则没有完全解决误工误课问题。如以为可，即可照发。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

三

除了分批进行这一个部署以外，在一个工作单位中，凡是同完成五年计划中的年度季度月度计划有关的单位，必须将领导人员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持日常工作，在大问题上兼顾肃反，另一部分人专门主持肃反工作。群众则须在工余课余进行肃反，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占用一部分工课时间，但以不误工课为原则。

---

[1] 指毛泽东1955年8月26日在中央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中增写的一段话，即本篇三。此外，在指示稿中“反革命分子起义的不要逮捕，坦白的看情节轻重和是否彻底坦白来决定是否逮捕，我们有材料但坚不坦白的必须坚决逮捕”一句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我们无材料则不要轻易逮捕”。

关于修改、印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的批语和通知[1]

（1955年8月、10月）

一

各同志：

此件已根据七月卅一日——八月一日省市委书记会议的讨论，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谈建社准备工作一段和谈苏联经验的两段，其余都是文字方面的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一两天内看一下，提出修改意见，于八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退还给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廿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修改他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写的批语和通知。其一是他在1955年8月对报告稿作了修改后于23日写的批语；其二是他在8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正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其三、其四是他在1955年10月再次对报告修改后于13日写的两个批语，这次修改后的正式本发表在1955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上。

即发刘、周、陈云、小平、彭真、董老、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1]等十三人。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省委市委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修正本），发给你们。你们收到后，可即印发给各级党委、党组、党内干部直至农村支部，但暂时不要在公开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带去的未修正本，请缴还中央办公厅。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董老，即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三

各同志：

这是第三次修正稿。请你们于收到后，即予审阅，提出修改意见，于十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以前退还给我。修改之处，主要是将原来的第二第三两节，合并为第二节；增加了解释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一句改为一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将河北省的例子删去一部分；在第五节中，在谈社员成分问题的第一第二行和谈地主富农是否可以入社的那几行都作了一些修改，将第十节中谈地富入社的那几句删去；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各有一些修改。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和第十三行，都说了注重质量的问题；在第八节的“第三”中，加了要有停顿、间歇的意思，还加了要有及时的批评一点。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三日下午六时

四

尚昆[1]同志：

此件请你于收到后，立即付排，并嘱**校正勿讹**，打出二十三份清样，于今夜十时以前，分送在京的十位政治局委员，八位副秘书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长[1]和子恢，伯达，鲁言[2]各一份，另外送我两份。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下午六时

给“各同志”的信，请附送。

---

[1] 指谭震林、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林枫、李雪峰、杨尚昆、胡乔木八位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2] 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关于各地有关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直接由中央拟电答复的批语[1]

（1955年8月26日）

小平、尚昆[2]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但对其他来报，例如青海省委关于畜牧问题的请示电报，仍应批交“农村工作部办”。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青海省委1955年8月20日关于提倡牧业区在畜牧业生产中的原有团结互助组织形式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上。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26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广东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九日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所述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是正确的。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六日

---

[1]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省委于1955年8月11日召开了有各区党委和钦州地委书记等参加的扩大会议，研究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二、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过去对合作社在新区也需要大发展的方针摇摆不定，主要是看到一些困难因素，对大发展的有利条件缺乏具体分析。这次会议一方面摆出困难情况，更重要的是研究了有利的条件，并一致认为有利条件是主要的。三、进一步巩固老社与整理提高互助组，全面搞好下造生产，为大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四、确定了大发展的做法和几项政策。广东现有农户约700万户，到明年春发展到7万个合作社，达到总农户数的40%，到1957年基本上达到合作化。为了搞好这个大

发展，既完成任务，又保证质量，必须长年准备，特别是要大力搞好对互助组的领导，推广以组转社来进行建社。建社时间以集中在冬春为好。老社的巩固主要依靠驻社干部负责，这样就能始终不间断领导，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对新建社明确了几项政策：（一）对社的形式与内容，在一两年内不要要求太高级太复杂，一般每社以25户为宜，停止一开始便建大社的做法。（二）要求做好土地入股，其他牲畜、农具等入股问题应待条件成熟后逐步解决。（三）不要急于搞投资过大、过分集中的副业生产。（四）贯彻互利政策。（五）为了解决社员的家畜饲料与吃菜以及某些习惯性生活和生产资料的需要，必须适当留给每户社员一份耕地。

1955年8月26日，毛泽东和警卫人员、服务人员在北戴河海滨浴场合影。

中央关于召开有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参加的中央会议的通知

（1955年8月27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委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他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作准备。准备事项，主要是深入了解当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情况和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关于合作化的全面规划。此项准备工作，须于九月二十五日以前完成。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中央转发热河、青海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5年8月27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热河、青海两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两个报告是正确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各』该省基本上完成合作化的全面规划，热河省委还对全部农村工作做了安排，这些都是好的。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七日

二

刘、朱、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抄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党组。

---

[1] 指中共热河省委1955年8月20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计划和下半年农村工作安排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和中共青海省委1955年8月15日关于1956年至1960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给中央的报告。热河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计划。今年全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已达到13085个，入社农户279475户，占总农户的28.22%，在此基础上，今冬明春，准备再扩大老社，新建社4100个，使入社农户增加16万，加上原有入社户数，可达农户总数的45%以上。到1957年达到70%以上，再到1958年达到80%以上，基本上完成合作化的任务。（二）下半年农村工作安排，10月中旬以前，主要抓紧粮食增产、秋收工作和秋翻地的准备工作。10月下旬至11月底，做好粮食“三定”到户，并抓紧征购入库，结合做好秋翻地和建社骨干训练工作，并完成第二批逮捕反革命分子的计划。12月至明年2月底，集中力量以建社为中心，结合进行老社整顿和整党建党工作。青海省委在报告中说，我省农业区现有农业生产合作社876个，入社农户24944户，占农业区总农户数的13%。在此基础上，计划1956年发展到1928个社，占总农户的28%；1957年发展到3214个社，占总农户的50%；1958年发展到3796个社，占总农户的63%；1959年发展到4132个社，占总农户的75%；1960年发展到4313个社，占总农户的85%，基本上完成农业半社会主义的改造。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征求新式军服样式意见报告的批语[1]

（1955年8月27日）

刘、朱、陈、邓[2]阅，退彭照办。[3]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8月26日报告上的批语。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的报告转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和总后勤部副部长洪学智、张令彬1955年8月24日关于征求新式军服样式意见情况的报告，并告：周恩来已在24日夜间批准此报告，同时口头同意1955年10月1日阅兵时，部队换穿新式军服。张爱萍等的报告，汇报了8月20日在政协礼堂邀请有关人员参观、座谈新式军服的情况。参观者一致认为各种服装品和肩章、领章、兵种勤务符号的式样，均带有我国民族特点的象征，其装饰大方美观，用料完全使用国货，并注意了节约和朴素，是适合我国现实情况的，表示满意。大家还对军服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张爱萍等在报告中对此一一作了说明。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8月31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安徽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安徽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安徽省委尖锐地批判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安徽省委还在十个具体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中央认为安徽可以按照这些意见去做，在做的中间再考验这些意见的正确性，如有某些需要修改的地方，那时可以进行修改。中央认为这十条意见应当提到全国各省市各自治区，在适当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并于今年国庆节以前报告中央。

中央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

周、陈[2]阅后，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3]阅，尚昆[4]用电报即速发去。另抄在京各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农业部党组。

---

[1] 指中共安徽省委1955年8月21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十个具体问题的意见：1. 耕畜和农具的处理问题，提出折价归社、私有租用、分批折价三种办法，供群众选择。一年多的经验表明，群众最乐于接受第一种办法。2. 土地和劳力的分配问题，也提出了三种办法供各社选择，即：定产以内比例分配超产归劳、定租制和按实产量比例分成制。试行的结果，采取定产以内比例分配超产归劳办法的比较多，准备继续推广这一办法。3. 社员投资问题，采取的办法是：第一年按土地股凑合，第二年民主商定在总收入中扣留。4. 社员自留地问题，只限于社员自己食用的菜园地。至于一般人所没有的小果园以及长成的树木等，在初期办社时不入社。5. 副业问题，我们的做法是：有一定规模的副业，应完全由社内统一规划办理，至于业余性质的小型副业，在不影响整体条件下应允许社员自搞。6. 为防止单干农民和互助组不愿兴修水利问题，我们规定：凡个体农民和互助组在自己的土地上兴修小型水利改变了水利条件的，以后土地入社时应提高其土地等级，增加其土地报酬。7. 鼓励社员积肥问题，我们规定：应根据社内全年所需肥料，以户为单位，按亩所定产量分摊，并根据肥料多少、好坏，给以工分。8. 对鳏寡孤独等缺乏劳力的农民，我们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吸收一定户数参加（大体十户带一户），试行结果一般均愿这样做。9. 农村中小手工业者入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们规定：属于专业性质的，加入手工业社；属兼业性质的，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仍允许其从事手工业工作。其收入全部交社者，则按技术工计算劳动工分，工具由社内统一修理。

其收入不愿交社者，则社内不给计工分，工具亦由其自备。10. 关于常年互助组问题，我们的意见是，在群众觉悟高、合作社大发展的形势下，不必再强调办常年互助组。但在合作社没有普遍发展以前，号召群众大量组织临时互助组，以解决生产上的困难，增加生产，还是非常必要的。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3]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朱德同金日成谈话摘要上的批语[1]

（1955年8月）

陈云、李富春[2]同志阅，退毛。

关于地下工厂一段，值得一看。

我国似亦应注意**建立地下工厂**。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1955年8月27日关于金日成首相和朱德副主席谈话的摘要上。金日成在和朱德谈话时介绍了朝鲜在战争时期及战后建立的地下工厂的情况。金日成介绍说，在地下建设工厂可以保障战争时期的安全生产，在缺乏大型钢材的条件下，挖石头洞子建设工厂在速度上原料上都有好处，地下建厂不像地面建筑那样复杂，建设起来也很坚固。地下工厂只要求好的通气设备和排水设备。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同意拨付农业合作社干部训练费和农业贷款的批语[1]

（1955年9月1日）

小平[2]同志：

这类电报须速复，请告子恢[3]办理。广东所提要求我看是合理的。照此计算，全国每年须付干部训练费约五千万元左右，在几年内每年须付贷款五亿元左右，付出这两笔钱是值得的。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广东省委1955年8月23日关于1956年农业社干部的训练经费与贷款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广东省于1956年春耕前计划发展到7万个社，建社骨干的训练费需127.6万元；1956年新社与老社的巩固工作，又需训练费118.3万元。以上两项共需约246万元，需请中央拨付。另外，为解决新建社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以及必要的基建、副业生产和开耕的生产费用，共需贷款3783万元，也需中央予以解决。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通报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经验的批语

（1955年9月1日）

先念[1]同志：

此类经验[2]，宜用电话向各省市通知，此类简报也可以用最快办法送去各省市。总之，迅速交换经验，及时指导运动，随时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最为紧要。以上请酌处。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

[2] 指国务院第五办公室1955年8月30日编印的《粮食简报》第十六期上登载的江苏省粮食“三定”工作的经验。简报说，江苏省在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工作中，各乡共同的特点是从生产入手，而后又归结到生产上。具体做法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训练骨干，打通思想，掌握材料。第二步是开好乡人民代表会和村民会，向群众宣传政策、讲解做法和弄通计算的根据，公布留粮标准和征购方案。第三步是由村到户（即归户计算）进行“三定”，这是整个工作的关键，而定产又是重要环节。定产有四种办法：（一）按农业税定产加成。（二）按1954年实产定产。（三）在去年特别丰产或歉收的地区，按1953年的产量定产。（四）按今年的实际产量定产。定产后购销可有70%到80%左右的农户定下来，有20%到30%的农户要进行评增评减的工作。江苏的“三定”工作在有些地方也存在着比较粗糙、没有将定产同统购统销结合进行的缺点。但从试点的结果看，只要“三定”同时安排，购销结合进行，一般情况是好的。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5年9月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争取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进行了英勇和艰苦的斗争，并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不但鼓舞了一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并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敬佩。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祝越南人民在为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祝你们在巩固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慰问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萨波托斯基病情的电报

（1955年9月1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

亲爱的安托宁·萨波托斯基同志：

获悉您患病的消息，中国人民和我本人怀着十分关切的心情，向您谨致诚挚的慰问并衷心地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5年9月3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黑龙江省委八月十七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

---

[1] 中共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中说，1955年7月20日至8月9日，省委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分析了全省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形势，确定了今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规划和做法。1955年冬到1956年春耕前，在认真巩固提高现有社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建立新社（预计4000到6000个）和扩大原有社，使入社农户由现在的37.23%发展到50%左右。1957年春耕以前入社农户达到70%左右。新建社的规模一般为20至25户，老社扩大一般以1/5到1/3为宜。根据上述规划，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要求：基本合作化地区，一般不再建立新社，集中力量巩固现有社，在适当扩大老社中妥善安置老弱残疾农民；在合作社比重不大的地区，应一面巩固现有社，一面根据条件积极发展；少数发展过猛问题甚多的地区，要全力巩固，一般不宜发展；空白村要加强领导，积极试办，争取村村有社。扩社、建社都必须坚持自愿、互助组基础和领导骨干等条件，做到充分的思想教育，深入的个别串联，正确地贯彻互利政策，在思想成熟的基础上，启发农民自愿报名入社，而后建立组织，统一组织生产活动。会议还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与组织建设，计划在今年挂锄、秋冬和明春，结合整社建社分批整党建党。

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黑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二

周、伯达[1]阅后，即送刘、朱、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泽东
九月三日

---

[1]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9月3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山西省委八月二十二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一件，另附计划[2]一件，均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山西省委的方针

---

[1] 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说，我们于8月12日至14日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与会同志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致感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会议确定了1955年至1957年全省合作化的发展速度，指出今后农业合作社的建设上应注意以下几点：1. 发展指标应根据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控制数字。2. 不要急于办大社，以按自然村单独建社为宜。3. 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4. 牲口作价入社或合槽租用，均以迟一两年为好。5. 新建社暂不吸收富裕中农（个别自愿入社者可吸收），坚决不收地主、富农。为巩固与扩大合作社的阵地，必须改进领导方式与作风，以适应大规模群众运动的要求，会议确定，要将整社建社与整党建党相结合，今年内必须完成落后村的改造和落后支部的整顿工作，同时完成1955年农村建党计划。

[2]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5年8月20日关于发展、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

是正确的。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二

周、伯达[1]阅后，即送刘、朱、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泽东
九月三日

---

[1]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9月4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南省委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

---

[1] 中共河南省委在报告中说，省委于1955年8月16日至22日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联系省委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明确了对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对合作社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通过了全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指标：即在今冬明春发展到10万个社，使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30%，1957年年底以前发展到18万个，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60%以上。会议还强调当前整顿现有农业合作社的重要性，并部署在今年9月、10月间第二次整顿，明年春夏第三次整顿。

二

周、伯达[1]阅后，**即送**刘朱陈邓[2]阅，尚昆[3]用电报即发，另印如前示。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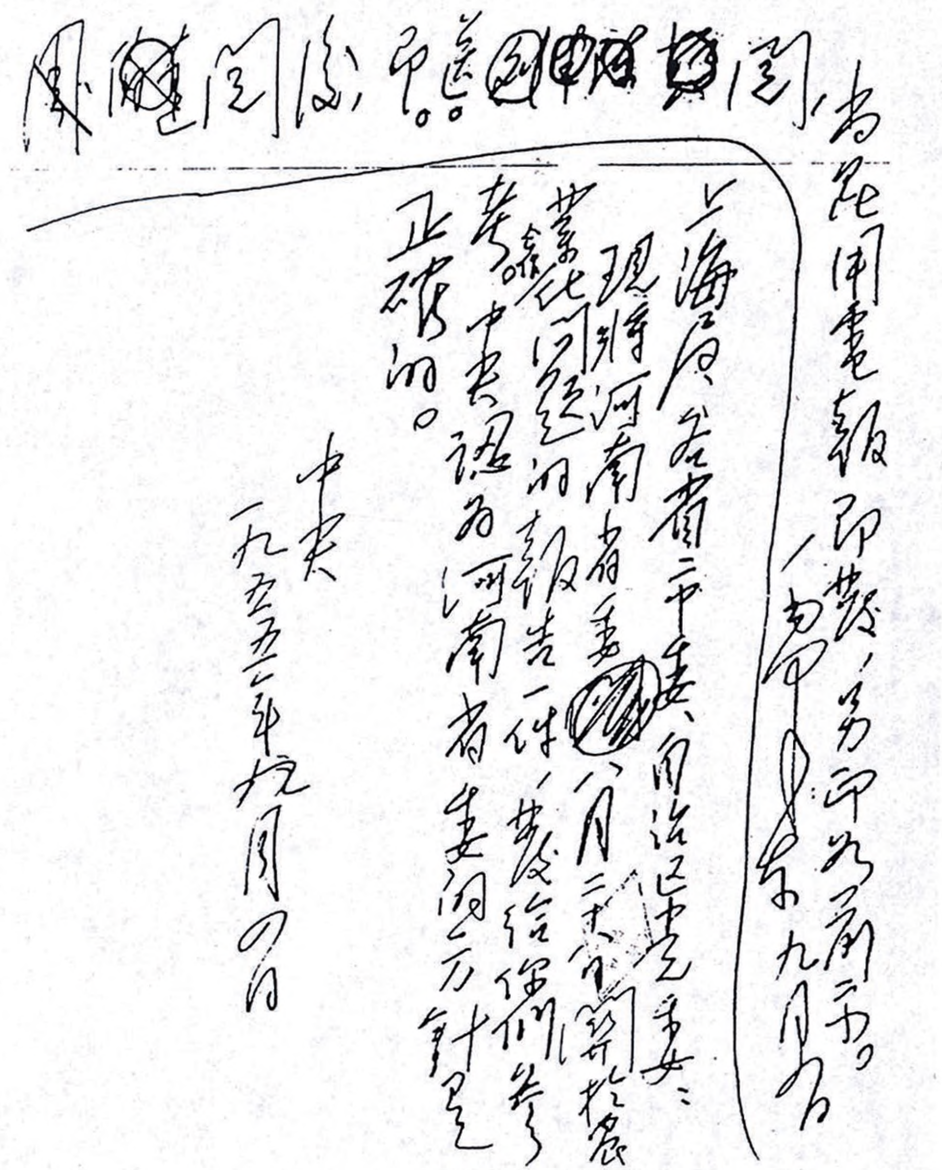
九月四日

---

[1]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周陈阅退、印。送。刘朱陈邓阅、尚昆：用电报印发，另印若干份。

毛泽东　九月四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河南省委八月二十六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9月4日、7日）

一

周、伯达、刘、朱、陈、邓、彭真、子恢[1]同志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毛泽东

九月四日

二

照发

毛泽东

九月七日

三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福建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3]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福建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一）新中农中间出现了富裕中农（即上中农），这些人中间除了若干政治觉悟较高的人以外，其余的人暂时还不愿意加入合作社；（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原来就不富裕，有些则因为在土地改革的时候不正当地受了一些侵犯，这些人在经济地位上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大体相似，他们对于加入合作社一般地感到兴趣。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故在一切合作化还没有达到高潮，富裕中农还缺乏觉悟的地方，以首先吸收（一）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在毛泽东同志报告[4]的修正本中，对于中农只分为上中农下中农两部分，未提中中农，以免分得过细，不易区别。现在所说的下中农实际上包括原来所说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中中农两个部分）；（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分人加入合作社为适宜（并应依其觉悟程度，分作多批吸收进来，首先吸收觉悟较高的分子）。对于凡在目前不愿入社的富裕中农，即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则不要勉强拉入。目前许多地方发生强迫富裕中农入社，目的在打他们的耕畜农具的主意（作价过低，还期过长），实际上侵犯他们的利益，违反了“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原则。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决不可以违反的。至于富裕中农中间资本主义思想浓厚的一些人，在目前一切合作社初办或者还不

占优势的地方，不论是把他们拉进来，或者他们自己企图钻入合作社谋取领导地位（并非由于真正的政治觉悟），或者企图组织低级社如黑龙江双城县所发现的那样，对于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都很不利（个别公道能干政治觉悟高的富裕中农，当然不在此例），而一切合作社是必须树立贫农和下中农的领导地位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而目前团结他们的办法之一，就是不要强迫他们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此外，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个二千五百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一百二十五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

[1]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意见：（一）关于农业社会主义高潮就要到来的问题。两年来我省通过贯彻总路线和粮食统购统销，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和巩固，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提高。根据最近调查，在先进地区，积极要求办社入社的农户占尚未入社的农户的24%左右，我们计划今年秋天至明年春耕前发展1.9万个社，将入社农户发展到总农户数的35%以上。因此，省委决定在全省区委书记以上的扩大干部会议结束后，各县再召开三级干部会，然后向群众作广泛的宣传动员，使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而积极地行动起来，成批成组地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时，我省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会到来。（二）关于阶级政策问题。自总路线宣传以后，由于我们依靠和支持贫农思想不明确，贯彻农村阶级政策有缺点，致使一部分合作社的骨干中富裕和比较富裕的农民占了优势，更严重的是一部分农村党支部的骨干中贫农没有占优势。由于我们两年来笼统地讲“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团结中农”，而没有把新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还不富裕的农民，和富裕的或者较富裕的中农区别开来，因而往往把极少数富裕或较富裕农民中的消极情绪，误认为是广大农民的情绪，对广大的贫苦或者很不富裕的农民的积极情绪，反而看得少或者看不到。这个问题如不具体地明确起来，今后也还会继续发生错误。我们的体会是：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还是按照中央规定的“依靠贫农（包括新中农），团结中农……”。但在具体执行中，应明确依靠对象为：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团结对象为：新中农中间的上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中中农，富裕中农。根据这一认识及农村党员现状，我们在农村支部建设中，明确指出：

1. 目前党员的主要发展对象是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及农村劳动人民（手工业工人等）；富裕农民暂不吸收。2. 支部领导核心必须保证贫农占优势，并积极培养吸收其他贫苦农民的成分到领导骨干中来。3. 对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党员，应加强“不要忘本”的阶级教育。合作社两三年内发展的对象，也主要是现有的贫农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中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先把这几部分人中间的积极部分组织起来，并把他们培养提升到社的主要领导地位上来。

[4] 指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

中央关于召开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

（1955年9月5日、7日）

一

周、伯达[1]同志阅后，即送邓小平[2]同志：

此件请小平商少奇同志，加以斟酌修改，印发各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用电报发去，须使各省市和地委于九月十一日以前收到为宜。

毛泽东

九月五日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各地委：

（一）中央政治局决定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议程有两项：

---

[1] 周，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甲）讨论和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乙）讨论和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代表选举工作的决议。

（二）六中全会是一次扩大的会议，决定由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各省委、各自治区党委、各大市委（沈阳、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和各区党委、各地委的书记（如果第一书记因病、因事不可能参加，则由第二书记参加或副书记参加），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农村工作部长，以及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应当参加的负责同志，参加此次中央会议。参加的同志是列席会议，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出席和列席的同志共三百多人。

（三）会议由陈伯达同志报告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由邓小平同志报告第八次党〔代〕大会问题决议的意义和内容。

（四）开会时间：十月三日到七日，共五天。

（五）一切出席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列席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各区党委各地委的书记或副书记，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农村工作部长，均须于九月二十七日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以便有几天时间事先交换意见和阅读文件，并且参加国庆节观礼。

（六）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包括在内）在此次全会上的发言，另行商定。

（七）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请立即开始准备，均须写成发言稿。此项发言稿，上海局书记，各省委书记，各中央直辖市委书记和各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可以有四千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省份及大省可以有五千字左右，小省可

以只要三千字左右。各大市委区党委地委书记的发言稿可以有三千字左右，合作化经验丰富的地委可以有四千字左右，经验不足的可以只有一千至二千字左右。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至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至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因为会期只有五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读发言稿，准备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区宣读自己的发言稿，而将另一部分地区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志虽然不可能都发言，但是每人都必须写好发言稿。此项发言稿，看其内容如何，准备略加修改（包括去掉合作化问题以外的某些部分），成为文章形式，在报纸上发表，借以交流经验，推动合作化运动。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

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的批语

（1955年9月6日）

一

尚昆[1]同志：

此两件[2]，请于今日上午印好，下午即送在京各中委、候补中委、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各一份。并请告胡乔木[3]请他研究和主持修改示范章程。

毛泽东

九月六日〇时半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准备提交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3]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二

各同志：

送上农业合作化决议草案（陈伯达[1]同志起草）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廖鲁言[2]同志根据原草案作了修改）各一件，请于收到三日内审阅一遍，批注修改意见，送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中央办公厅
一九五五年九月六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1]

（1955年9月7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达米扬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伏·契尔文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明·涅伊切夫同志：

值此保加利亚从法西斯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注视着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十一年来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使保加利亚人民获得了日益繁荣的幸福生活，并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祝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胜利。我们深信中保两国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达米扬诺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伏·契尔文科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明·涅伊切夫的电报。祝贺保加利亚解放十一周年。

的兄弟友谊必将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推进而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于北京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和复电

（1955 年 9 月 8 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错误方针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浙江省委建议的，因此应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主要责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现在也已经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批评。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二

浙江省委：

你们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收到，中央

认为是正确的，并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参考。这里再说两点：（一）报告第六页第一行“唯心主义”，应改为“主观主义”；报告第九页第十一行“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一句，应改为“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代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二）同意你们将这个报告发到支部。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

---

[1]　中共浙江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对浙江省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检查。浙江省4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1955年4月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错误的。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一）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这样快的发展，是超越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造成农村紧张形势的根源；如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夸大了当时合作社内部存在的问题。（二）认为“发展这样快，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是无法巩固的，勉强维持下去要造成农业减产”，从而忽视了各级党委在试办中已取得的经验。（三）把新、老中农的各阶层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笼统地强调中农（包括新中农）的动摇性。这种错误的分析，大大缩小了农业合作化的阶级基础。这些错误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富裕农民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在党内的具体反映。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首先在于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调查、研究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动态，因而心中无数，只看到现象，看不到本质。其次，是把中央主管部门的指示误认为就是中央的指示。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在组织上是不够严肃的。二、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巩固的计划：从1955年秋到1956年秋以前，发展到6.5万个社，入社农户数达到全省总农户数的40%左右；到1957年秋以前，发展到10万个社，入社农户达到70%左右；到1958年秋以前，采取以扩社为主、新建社为辅的原则，新建社3000至5000个，使入社户数达到85%；到1960年秋以前，使

入社农户达到90%以上，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说，实现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必须全党动员起来，从上而下，从内到外，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

对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1]教授关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学经验给杨献珍[2]信的批语

（1955年9月8日）

很感兴趣地看了这封信[3]。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格列则尔曼，当时任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2] 杨献珍，原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副院长，1955年4月起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

[3] 指格列则尔曼1955年8月1日给杨献珍的信。信中说：我们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会议上讨论了你们寄来的材料《马克思列宁学院关于第二部第二、三、四、五班的哲学教学总结》和《马克思列宁学院第二部哲学教学的经验》。我们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你们的经验。首先，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是你们反对学习当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的尖锐性。教条主义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局限于死记和背诵概念与术

语，而轻视与实践活动的联系；经验主义倾向则轻视学习理论的意义。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以学员最容易了解的形式阐明理论原理。参加讨论的教研室的同志还着重指出你们对学员进行深刻的具体研究的重大价值。在指明世界观同实际工作、党的工作作风之间的有机联系，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方面，也很有价值。我们认为，把学习理论和实现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有机联系起来，也是一项重要的宝贵的经验。在讨论你们寄来的材料的时候，同志们也谈到苏联讲授哲学的经验。苏联研究和讲授哲学的历史向我们表明，第一，必须反对理论与实践脱离，这是当时苏联一部分孟什维克派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特点。第二，必须反对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解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们党刊上曾展开过批评，批判了用一种给实际工作部门——例如渔业、钢铁工业——贴上辩证法范畴的标签的办法把辩证法直接附着到任何一个技术部门的企图。我们所讲的这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简单化认识的危险性，在现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讲授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同志们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并不从来都是人们的世界观的缺陷造成的结果。当然，政治斗争中的错误策略，是具有它的理论根源的。但是，如果我们想从一切实际性质的错误当中引申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个人主义等的结论来，那么，我们就有走上某种程度的简单化道路的危险。有一些同志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可能，在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从中国哲学史中引用一些材料，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你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跟对于你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估价和分析结合起来，跟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认为，正是这条道路才能给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共产党的政策的有机联系开辟最宽广的可能性。这封信后来发表在1955年9月17日《人民日报》上。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9月9日）

一

即送刘、朱、陈、彭真、小平、子恢、伯达[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因甘肃催得很急，请各同志务于本日[3]白天看完，下午或晚上发出。

毛泽东

九月八日夜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甘肃省委八月二十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4]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甘肃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甘肃省委在自己的报告中还规定了多项具体的政策和办法，中央认为可以照此在

甘肃实行。实行中如发现有需要修改的部分，可以在那时加以修改。全国各省，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酌量采用。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9月9日。

[4] 指中共甘肃省委1955年8月20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给所属并报中央的报告。报告着重谈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情况和意见，检讨了今春以来在领导思想上出现的落后、迟钝和摇摆不定的问题，修正了合作社的发展计划。确定1956年春播前，全省新建社11101个，使入社农户达到全省总农户数的23%；到1957年冬季前，发展到35000个社，入社户数达到45%以上。另外计划在一些老区试办几个畜牧业合作社和林业合作社，把几个基础较好的社试办成高级社，并从中摸索经验。为保证上述计划的完成，决定采取以下具体措施：第一，两三年内，先把老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三部分人中的积极分子，分批组织起来。第二，社务委员会要以老贫农中的觉悟分子为主，并吸收其他两部分人中的觉悟分子组成。第三，合作社必须继续保持比互助组与单干农民增产。第四，坚决贯彻自愿互利原则，社内各种经济问题，必须按照这一原则合理解决。第五，要注意经常整顿，每年应整顿三次。第六，要大力

解决会计问题，除积极培训外，可抓紧建立会计辅导员。第七，中央确定的每十个社应有一个办社专职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必须注意质量，最好都是党员。第八，要积极发展常年互助组与互助组联组，为新建社奠定基础。第九，继续办好民族联社。第十，要注意办好常年民校和发展农村文化娱乐。第十一，调整组织机构，以便抽出更多的干部办社。第十二，抓紧整党建党，使之与整社建社相结合。第十三，落后乡也要建社，要结合镇反，整顿组织，发动群众，彻底把现有的落后乡加以改造。除了上述各条外，报告还对几个具体问题作了规定：（一）对老区、早期土改地区的地主富农，已经改变了成分，放弃了剥削，劳动守法，社员同意的，可经县委批准，个别吸收入社。但新富农绝不能吸收。（二）属于中农以下成分的阿訇，自己能够参加劳动的，可允许入社。（三）在老区的山区，和共同开垦的公荒或耕种的公地，群众不愿以土地作股者，土地均可不计股份，不分收益。（四）偏僻山区，居民稀散地区，可以办10户左右的小社，并可在若干小社之间建立联社，统一领导。（五）在不妨碍合作社总的生产计划原则下，应允许社员从事若干副业生产，增加一些零用收入，但不能提倡经营商业。（六）牲畜第一年还是不要入社。（七）对劳动组织，可根据条件，推行“死分活评”，临时包工，以至长年包工等逐步升级的办法。（八）对自留地，在一般地区应维持不超过5%的规定，自种饲草的地区，应适当宽留。

中央同意温州地委对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的电报[1]

（1955年9月9日）

---

[1] 指中共温州地委1955年8月24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给浙江省委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在传达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时，一些干部把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分割开来，普遍解释说，“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是合作社试办时期的方针，认为在目前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即将到来的形势下，在合作社大发展时期，已经不适用了，现在的方针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地委讨论后认为，这种把“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机械地分割开来，说成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两个不同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为了在目前新的形势下，更好地更具体地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其实质精神就是既积极而又稳步。8月31日，浙江省委关于同意温州地委的解释致电中央、上海局并所属。电报说，温州地委对于农业合作化领导方针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既然已在温州地区的某些干部中发生，在全省其他地区的干部中亦可能发生。而这种错误的解释如不迅速澄清，就会引起思想混乱，以致严重影响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的正确传达和贯彻执行。各级党委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如同温州地委一样，立即在党委会议上认真研究，树立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领导方针的正确认识，并坚决反对在传达党中央指示时，夹带私货乱加解释的现象。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所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和最近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是一致的，温州地委和浙江省委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现将浙江两个文件发给你们。当地如有同样问题发生，望照此作统一的解释。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二

刘、朱、陈、邓、伯达[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的批语

（1955年9月9日、10日）

一

刘、朱、陈、邓、彭真、子恢、伯达[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毛泽东

九月九日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现将河北省委九月一日关于农业合作化规划和农业增产规划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河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个报告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地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安徽省委早几年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只是在最近的合作化报告中没有写上这一部分）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中央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

[1] 中共河北省委的报告说，从今年8月17日至30日省委召开了第四次党代表会议，着重讨论了我省今后3年农业合作化的规划和实现粮棉增产问题。确定全省今后3年农业合作化发展的计划是：今冬明春发展新社2.5万个至3万个，使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的50%左右，1956年年底达到60%左右，1957年年底达到70%至75%，1958年达到80%以上，实现全省农业合作化。今冬明春合作社的发展重点放在产棉区、市郊区和入社户数不足50%的地区以及一些还没有建社的村。为了做好发展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强调要统一干部认识，批判与纠正右倾情绪，向基层党员、群众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分析农村的阶级、阶层情况，大量发展互助组，抓紧训练骨干，同时对现有社认真地进行整顿与巩固工作，要求90%以上的社能够增产。会议还确定了全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后3年的粮棉增产要求，并对过去两年来执行粮棉增产计划的情况进行了检查，研究了今后增产措施，一致认为，只要我们树立起坚强的战胜自然灾害的信心，对农业生产长期打算，进行全面规划，从各方面挖掘潜力，实现增产是完全可能的。

在国务院关于召开粮食工作汇报会议的通知上的批语

（1955年9月10日）

陈云[1]同志：

这种分批短期检查工作的办法[2]很好，请告一切财经部门仿行。

毛泽东

九月十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国务院1955年9月8日关于召开粮食工作汇报会议给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等九省人民委员会的通知说，为了迅速交流今年农村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工作的经验，及时指导运动的开展，发扬成绩，纠正缺点，国务院责成第五办公室于本月12日召开第一批汇报会议，由上述九省各派一名掌管粮食“三定”工作和熟悉情况的财粮贸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一人参加。汇报内容主要是各地“三定”工作的主要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偏差，比如定产粗糙，购销脱节，重购轻销，以及是否有因任务繁忙而将粮食工作滑过去的危险等。会期暂定两天，每省在会上汇报的时间为半小时。

对张云逸[1]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1955年9月10日）

一

云逸同志：

八月十四日的信[2]收到。身体有起色，甚慰。我同意你的办法，即以休养为主，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为准备六中全会，这些天没有时间，候稍闲时再酌谈。

---

[1] 张云逸，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这时因病休养。

[2] 指张云逸1955年8月14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因病休养将有5年了，在这长期过程中，深赖主席及诸同志的关怀和照顾，现在我的身体基本上已恢复。3月间来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给我的教育极大；近又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愈加兴奋。久病之后，加上年龄的关系，体力脑力虽不如昔，但应将现有的力量为党为人民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以遂初志，而尽己责。现据医生的意见及我的身体情况，可以一面休养，一面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较为适宜。我每天除做体力运动外，还能学习党的文件，有时亦参加党的会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等。这样，我觉得对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益处，对工作亦可尽到一点责任。如主席有空时间，令我亲赴聆示亦得将我的情况面陈，尤为至盼。

祝康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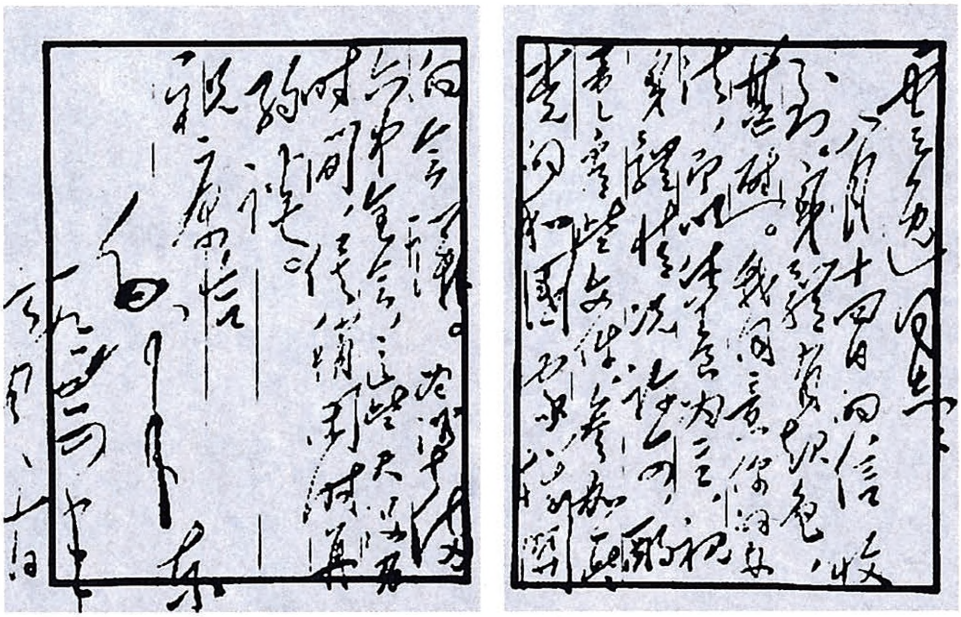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

二

尚昆：

复张信请转致。

毛泽东
九月十日



毛泽东致张云逸信的手稿。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的批语

（1955年9月12日）

刘、陈、邓、伯达[1]阅，请于本日阅完，尚昆[2]即印若干份（在北京发各中委和乔木、鲁言[3]、农村工作部若干同志），用飞机送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修改的意见，于月底来京参加中央全会时带来。

此件[4]我看可用，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5]。如伯达有不同意

---

[1] 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4]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5年9月12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修正稿）》。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通过了这个决议。

[5] 毛泽东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决议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在决议草案第九条的“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封建地主恶霸还在那里或明或暗地剥削和压迫农民群众”一句中的“现在各省还存在着一些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落后乡村”后，加写了“大约占乡村数的百分之五左右”13个字。

见，可于下午和我一谈。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早四时

关于了解河北省博野县农业合作社整顿情况的两个批语

（1955年9月13日、10月23日）

一

此件[1]送河北省委林铁[2]同志阅。

钟顺通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警卫工作人员。据他说，博野县有些合作社并没有认真去整顿。请省委注意此事，如果属实，应设法加以解决。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

[1] 指钟顺通1955年8月5日写的他的家乡河北省博野县徐家营、杜各庄、北延三个乡的农业合作社的情况汇报。汇报中谈到整社情况时说，这次整社只把财产、社名、社长、社的主要干部进行了登记，而社里存在的问题没有进行解决。农民要求，秋后一定要整顿农业合作社，整顿干部和党员，加强对农村干部特别是乡、村、社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

[2]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

二

叶子龙[1]电话告林铁同志：

此信[2]收到了，谢谢他。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

[1]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林铁1955年10月20日关于检查博野县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在接到毛泽东批转的钟顺通写的情况汇报后，河北省委即派出工作组协同当地干部在博野县三个乡进行了检查，实际情况是：在今年4月间，省农林厅训练班学员100多人曾到该县实习，并进行过一次十种表格登记，确实未解决多少问题。通过这次检查，存在的问题已引起博野县委注意，除检查时已解决一部分外，县委正结合今年建社，在继续进行整顿中加以解决。

关于对日本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批语[1]

（1955年9月14日）

周总理阅，退毛。

对日本似应明确提出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第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日本方面已有广大舆论基础。虽然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尚不愿谈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此去压它。请加考虑。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一份关于日本有关人士对我外交部发言人1955年8月16日就日本政府提出所谓撤退留在我国大陆的日本人问题发表的声明的反应的材料上。

关于同意不再使用“中中农”一词的批语[1]

（1955年9月16日）

小平、子恢、伯达、鲁言[2]同志阅，交杜润生同志处理。我认为小平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1955年9月13日为转报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关于河北省对使用“中中农”一词的反映给毛泽东的信上。杜润生反映说，河北来电话询问：老中农中的中中农该划到下中农还是上中农？有的认为应划到下中农，因为实际情况是接近不富裕的人；有的认为宜划到上中农，理由是划入下中农把依靠范围扩大，会使该依靠的反而依靠不好；有的认为老中农整个阶层基本上属团结范围才是合适的。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一）中中农这个名词不要再用。（二）从老中农的政治经济情况看来，只宜把其中生活贫困的一部分划入下中农。（三）不宜把老中农的大部分划入下中农。（四）最重要的是：不要一家一家地去确定谁是上中农或下中农，事实上第一、二批加入合作社的一般只能是那些比较贫苦的人（当然也有少数觉悟较高的上中农），从对于愿否加入合作社的态度，就可以大体判明他是属于哪一类的。

[2]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对邓小平[1]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草案的说明稿的批语

（1955年9月18日）

恩来同志阅，退小平办。

我认为可以照这样去讲[2]，只改了几个字。

毛泽东

九月十八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邓小平在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稿中着重对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未能早开的原因、八大的主要议程、代表的选举及召开的时间等作了解释。他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45年召开的，到1956年召开八大，相距11年。应当说，相距时间是很长的。但是，必须指出，八大迟未召开是有原因的。1945年到1949年这4年，我们正处在急风暴雨的革命战争中；1950年到1952年这3年，我们全神贯注地进行了完成民主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极为繁重的巨大的工作，并且紧张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斗争。在这7年中间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953年我们国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1952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考虑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时，就

曾考虑到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当时决定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接着在1953年下半年，经过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察觉了高饶反党联盟，于是先后通过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今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的处理。显然地，在解决了高饶反党联盟这样重大事件之后，再来考虑召开八大问题，无疑是更为适当的。在这几年中，党规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公布了宪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有了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经过整党建党，审干，总路线宣传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造一系列实际斗争教育，党的组织更加团结和巩固，党员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所有这些，实际上对党的八大作了更为充分的政治准备和组织准备。今天看来，八大开迟了几年固然是个缺陷，但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组织上说，1956年召开八大将会开得更为完满一些。

1955年9月20日至28日，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为毛泽东等接见大会代表。

1955年9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参加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会议代表合影。

关于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和书信[1]

（1955年9月至12月）

一

（1）依地区排列，制一个目录（照每篇文章上的题目，不照原件每一省市的总目）。

（2）有几篇，要鲁言[2]查明材料来源，注明在每一篇的题目之下。

（3）校对一遍，文字上加以修改，使更加通俗化。

（4）几天内先印几份清样，至少毛、田、乔木、伯达[3]各一份，

---

[1]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先后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1955年9月，当时书名定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次是1955年12月，扩大范围重新编选，书名改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本篇一至七是毛泽东在1955年9月、10月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写的批语和书信；八、九是毛泽东在1955年12月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写的两封信。

[2] 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3] 田，指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可能时再送刘、周、小平[1]各一份。

（5）争取月底或下月初印出四百本（样本）。

（6）用人民出版社印，告知尚昆[2]。

二

田家英同志：

最后部分付上，请付排。八月下旬的人民日报上载有邢台地委书记写的一篇关于邢台地区合作化的文章[3]，请清出加印到河北省部分中去。此外，请商廖鲁言同志翻阅一下今年一月至九月的人民日报看有无好的（要是很好的）材料可用的。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

三

田家英同志：

请付工厂照改。每省的题目和每篇的题目，均照我在目录上改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1955年9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邢台地委书记李吉平写的《把农业合作社办得更好更多是完全可能的》一文。后来这篇文章未收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的去改正。其余的，今天可以不必送我看了。

迅速打出八份（加陈云[1]同志一份），最好于今日下午或晚上送交各同志。

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请告乔木。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四时

四

退田家英。

都看过。修改处，请令印厂照改。是从二一四页起，不是从二〇四页起。二一四页以前的，请再送来看一次。二一四页以后的题目又作了一些修改，和昨天在目录上改的有些不一样，请注意。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五

退田家英。

在题目和小题目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令照改。有几篇缺少刊物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名称或未注明时间，应查补。按语因已改过，此份上面就未再改了。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

六

田家英同志：

请照修改的文字付印。

毛泽东
十月一日晚

五〇五页以下各页均已看完，付上。有两事请你注意：（一）目录要照每篇题目修改的文字加以改正；（二）按语修改处，要照着改在这一个本子上。十月四日要出书（样本），务请赶快改好付印。

七

不要加引号，因为这是就人身的毒瘤说，对于合作社是比喻，不是直说合作社。

已删去。

八

田家英同志：

送上到江西为止的大部分校样，请即付改排。每省市都将有按语的篇『幅』放在前面。改换了的题目，在目录上注意改正。只有个别的按语需要誊正付排，大多数都可以不要誊正。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五时

九

田家英同志：

已看过。请即付排，照此校正勿讹。别的同志，可以不必送阅了，我也不再看了。

毛泽东
十二月廿日上午六时

书名叫作《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如果用这个名称，那就要把补选的那篇《五亿农民的方向》放在第一篇的位置，请酌定。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1955年9月、12月）

序言一

（1955年9月25日）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十八年，即恢复时期的三年，加上三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地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有些人说，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几年以来，似乎可以看出这样一条规律，即在冬季是提倡发展的，一到春季就有人反冒进。这个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看见已经反过几次所谓冒进了。例如，一九五二年冬季有一个发展，一九五三年春季就来了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四年冬季有了一个发展，一九五五年春季又来了一个反冒进。所谓反冒进，不但是停止发展，而且是成批地强迫解散（一名“砍掉”）已经建成的合作社，引起了干部和农民群众的不满意。有些农民气得不吃饭，或者躺在床上不起来，或者十几天不出

工。他们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叫散，富裕中农高兴，贫农发愁。湖北的贫农听了停或散的消息，感到"冷了半截"，有些中农则说，"等于朝了一次木兰山"（湖北黄陂县有一个木兰山，山上有一个农民高兴去朝拜的木兰庙）。

怎样办農業生産合作社
（样本）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选本
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195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为什么有些同志会发生这种在常人看来完全不应该有的动摇呢？因为他们受了一些中农的影响。有一些中农，特别是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在合作化的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改造这件事是有抵触情绪的。这里关系到党在合作化运动中对于中农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许多经济地位较低政治觉悟较高的中农，主要地是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只要我们实行对于贫农和中农这两个阶层互相有利，而不是只利于贫农不利于中农的政策，加上我们的工作方法是好的，他们就愿意加入合作社。但是有一些中农，即使实行这种政策，他们也还是想暂时站在社外，"自由一两年也好"。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合作化是要变更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和整个的经营方法，这对于他们是一个根

本的变化，他们当然要审慎考虑，在一个时期内不容易下决心。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去从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上解决问题，听了富裕中农一叫，工作中又有一些偏差，就惊慌失措起来，大反其“冒进”，动不动就要“砍掉”合作社，好像如果不赶快割去这个毒瘤，人就会要死了似的。实际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是有的，但是整个的运动是健康的。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欢迎合作社。一部分中农需要看一看，我们就应当让他们看一看。富裕中农，除了那些自愿的以外，更应当让他们看的时间长一些。目前，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的缺点，是在很多的地方，党的领导没有赶上去，他们没有把整个运动的领导拿到自己的手里来，没有一省一县一区一乡的完整的规划，只是零敲碎打地在那里做，他们缺乏一种主动的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这样，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下面运动很广，上面注意不足，当然要闹出一些乱子来。我们看了这些乱子，不是去加强领导和加强计划性，而是消极地企图停止运动的前进，或者赶快“砍掉”一些合作社。这样做，当然是不对的，必然要闹出更多的乱子来。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1]。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一百二十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一九五五年一月至八月的，一小部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

[1] 这本书公开出版时，改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上，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材料的作者所表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是基本上正确的。读者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的前景。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一待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跑上去做了适当的指导，那里的问题就立即解决了。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序言二

（1955年12月27日）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

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1]。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九月，一次在十二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一百二十一篇材料。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大多数是一九五五年上半年的，少数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的。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他们认为需要补充一些材料。会后，大多数省、市和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删去了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从新收材料中选出了八十五篇，共计一百七十六篇，约有九十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收在这本书里的所有的材料，都经负责编辑的几个同志在文字方面作了一些修改；对于一些不易看懂的名词，作了一些注解；又按问题的性质作了一个分类索引。除此以外，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我们还在一部分材料上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按语因为是在九月和十二月两次写的，故在语调上也就有了一些差别。

问题还不是简单地在材料方面。问题是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

---

[1] 即序言一。

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〇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一切地方的党组织都全面地领导了这个运动。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最广大的群众第一次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将来。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一九六七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例如七年至八年）加以扫除。许多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等等，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总之，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本书是给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看的。城市里的人是不是也可以看看呢？不但可以看，而且应当看。这是新事情。如同城市里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社会主义事业的新事情一样，乡村里也在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农民在做些什么呢？农民所做的，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所做的有什么关系呢？为了要了解这些，看一看农村方面的材料是有好处的。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们准备从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中抽出四十四篇，约有二十七万字，印一个节本，使那些不可能阅读全书的人也能够接触这个问题。

1955年，毛泽东和汪东兴在一起研究工作。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1]

（1955年9月、12月）

---

[1]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这里全部收入。一百零四篇按语中，有十九篇（即第七、二十四、三十一、四十、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三、七十、七十二、七十六、八十二、八十五、九十、九十三、九十四、九十六、九十八、九十九、一〇二）是9月份写的，其他都是12月份写的或9月份拟就、12月份又对内容作了修改的。毛泽东还改拟或加拟了收入本书中的大多数文章的标题。为便于读者比较研究，我们分别在有关注释中作了具体交代。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重印此书中的一部分按语，毛泽东于3月19日写了一个说明。全文是：“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一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1]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如像这篇文章在开头所描写的，自己不懂，怕人问，就“绕开社走”的人，现在各地还是不少的。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一砍，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办合作社有怎样怎样的困难，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全国有不可胜数的事例驳倒了这一种说法。河北省遵化县的经验，不过是这些事例的一个。在一九五二年，这里的人都不懂得怎样办合作社。他们的办法就是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其结果就是“从不懂到懂”“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河北省遵化县的第十区，十一个乡，四千三百四十三户，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共计三年时间内，已经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阶段内基本上完成了合作化，入社农户占全区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这个区的农林牧等项生产的产量，一九五四年同一九五二年比较，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

我们现在有理由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这样做，别的地方就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说不可以，你们的理

---

[1] 这篇文章原载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文中介绍的王国藩合作社，是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党支部委员王国藩1952年秋发动本村23户贫农成立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由在什么地方呢？我看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怕麻烦，或者爽直一点，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就是“绕开社走”，就是书记不动手，全党不办社，就是从不懂到不懂，从少数人到少数人，从区干部到区干部。要不然，就是手里拿着刀，见了找麻烦的合作社就给它一砍。只要有了这样一条理由，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们提出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样一些口号，并且赞成遵化县同志们所提出来的“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个完全正确的口号。在遵化县，难道不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吗？难道不是“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吗？当然是的。这是不是有危险呢？是不是“冒进”了呢？危险在于“绕开社走”，这一点遵化县的同志们已经克服了。危险还在于借口“冒进”，大批地“砍掉”合作社，这一点遵化县那里并没有。所谓“合作社发展速度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这对于遵化县的情况怎样解释呢？那里的群众就是要求合作化，那里的干部就是由不懂到懂。人人都有眼睛，谁能在遵化县那里看得出什么危险来呢？难道在三年内，由于一步一步地实现了合作化，粮食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林木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点四，果树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二点八七，羊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三点一，这就算是一种危险吗？这就算是“冒进”吗？这就算是“超过了群众觉悟的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的水平”吗？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

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最后，我们要感谢这篇文章的那位没有署名的作者。他用满腔的热情，生动的笔调，详尽地叙述了一个区的合作化过程，这对于全国的合作化事业会有不小的贡献。我们希望每个省、每个专区、每个县都有一篇到几篇这样的文章。

二　《勤俭办社》[1]一文按语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现在有许多合作社存在着一种不注意节约的不良作风，应当迅速地加以改正。每一个省每一个县都可以找到一些勤俭办社的例子，应当把这些例子传开去，让大家照着做。应当奖励那些勤俭

---

[1] 这篇文章原载1955年5月4日《河北日报》，是《河北日报》记者王林写的。

的、产量最高的、各方面都办得好的合作社，应当批评那些浪费的、产量很低的、各方面都做得差的合作社。

三　《五亿农民的方向》[1]一文按语

这个三户贫农的合作社，几个月以来，在全国农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知道河北省有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英雄的合作社，给贫农壮了胆。

四　《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的道路》[2]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故事。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富裕中农的大多数，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对于合作化还是反对的，下半年就有一部分人改变了态度，表示要入合作社，虽然其中有一些人的目的是为了想要取得合作社的领导权而入社的。另一部分人表现了极大的

---

[1] 这篇文章原载1955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作者是李凯、庆琛。文中介绍的合作社，是河北省安平县南王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庞三户贫农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他们的带领下，到1955年秋，这个村入社农户已有280户，占全村总农户的85%，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生产也获得了丰收。

[2] 这篇文章原载1955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作者是史树芳。文章介绍了河北省新乐县东王庄三户贫农、一户下中农坚持办社的事迹。

动摇，口里讲要加入，心里还是不大愿意。第三部分人则是顽固地还要等着看。在这个问题上，农村的党组织对于这个阶层要有等待的耐心。为了建立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方面的优势，某些富裕中农迟一点加入合作社反而是有利的。

五　《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1]一文按语

这个材料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一个地方健全地达到合作化的问题是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问题。只要我们党对于处理合作化问题上的各项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党当着发动群众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所采用的工作方法，不是命令主义的或者简单从事的方法，而是向群众讲道理，作分析，完全依靠群众自觉自愿的方法，那末，完成合作化，并且达到增产，决不是很困难的。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村是老解放区，全村七十户，在一九五二年以前都加入了互助组，有一个强的党支部，又有王志琪那样为群众所信任的领袖人物，各方面的条件都成熟了。所以那个村，在一九五二年，只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建成了合作社，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条件没有这个村这样完备的地方怎么办呢？那就是准备条件的问题，有几个月，或者一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可以了。条件可以边做边准备。办一些小社，就是替全村全乡全区的合作化准备条件。

---

[1] 这篇文章是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王志琪1955年8月15日谈话的记录整理稿，原题为《河北省邢台县东川口如何达到合作化》，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只花一个多月时间就使全村合作化》。

东川口这个材料还着重地说明了党支部如何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如何依靠群众的自觉自愿去建立合作社的问题。其中有所谓“倒宣传”，是很值得注意的一点。关于劳动组织和劳动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个材料描绘了整个曲折变化的过程，结果出现了逐年增产的巨大的成绩。事实证明，这个合作社是健全的。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

六　《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1]一文按语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一九五五年的上半年，许多人对于一些事还是那么样坚持自己的信念。一到下半年，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只好相信新事物。例如：他们认为群众中提出的“三年合作化”不过是幻想；合作化北方可以快一些，南方无法快；落后乡不能办合作社；山区不能办合作社；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杂居地区不能办合作社；灾区不能办合作社；建社容易巩固难；农民太穷，资金无法筹集；农民没有文化，找不到会计；合作社办得越多，出乱子就会越多；合作社发展的速度，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干部的经验水平；因为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在合作化问题上，共产党如果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合作化将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如此等等，还可以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应当怎样认识工作薄弱的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原中共热河省委工作组写的，载于1955年10月15日承德《群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

举出许多。总之都是迷信。这些迷信，经过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六次中央全体会议（扩大）的批判以后，统统都打破了。现在全国农村中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群众欢欣鼓舞。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

七　《不应当挫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胡乱地解散合作社》[1]一文按语

这样地去解散合作社是完全错误的，本文作者的观点是正确的。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积极领导的精神》，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写的，载于1955年3月14日《河北建设》第二百九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不应当挫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胡乱地解散合作社》。文章介绍了河北省沙河县曹庄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的情况。这个社是一个有323户的大社，由于对入社时土地的产量，耕畜、农具的价格和劳动力底分的评估不合理，特别是耕畜作价偏低，管理不善，致使一批耕畜先后死掉。1955年1月，沙河县委农村工作部派人前往该社帮助整顿，鼓吹“出社自愿”，主张由大社分成小社，几乎使整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垮散。文章认为，沙河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违背了“积极领导”的精神。整顿合作社必须从积极方面着眼，爱护群众的热情，克服消极因素，反对在困难面前消极畏缩。要依靠和发动群众来解决障碍合作社巩固的问题，放弃领导就要犯“一哄而散”的错误。

八　《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1]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希望各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仿照办理，县委应当在这方面加强领导。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

九　《推行“财务包干”的经验》[2]一文按语

---

[1] 这个规划是河北省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1955年11月制订的。主要内容是：一、根据县委对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具体规划，针对各阶层妇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思想情况，采取各种方式，经常地反复地向她们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以逐步提高她们的觉悟，跟上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二、从发展生产和多方面增加收入出发，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和使用妇女劳动力，以便发挥妇女的潜在力量。三、提高妇女在农业和副业生产方面的科学技术知识，发动妇女参加农业技术改革运动，以便适应分工分业的需要。四、为了更好地推动妇女参加生产，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应注意发展托儿互助组织。五、有计划地培养大批妇女领导骨干。六、整顿和健全乡的妇女代表会议，使它在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在推动妇女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2] 这篇文章原题为《通县土桥乡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推行“财务包干”的经验》，作者是蔡垳佃。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推行“财务包干”的经验》。文章介绍说，河北省通县土桥乡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针对合作社刚成立时公共财产浪费严重、财务制度混乱的情况，决定各生产队对财务预算的各项开支进行承包，超支的由本队负责赔偿，节余的抽出一部分进行奖励。推行“财务包干”以后，加强了各队和社员的责任心，充分发挥了财务人员搞好财务管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了物资的利用率，显著地节省了开支。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这是执行勤俭办社这个原则的具体办法之一，一切合作社都可以仿行。

十　《勤俭办社，建设山区》[1]一文按语

这里说的是李顺达领导的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办了三年，变成了一个包括二百八十三户的大社。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工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劳动力的利用率，比抗日以前的个体劳动时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一十点六，比建社以前的互助组时期也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四。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已经由第一年的一百二十元，增加到了一万一千多元。一九五五年，社员每人平均收入粮食八百八十四斤，比抗日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比建社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这个社已经做了一个五年计划，实行三年的结果，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点六。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自然条件较差的地方能够大量增产，为什么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不能够更加大量地增产呢？

---

[1] 这是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李琳和马明1955年9月15日写的一篇调查报告。报告介绍了山西省平顺县西沟乡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在社长李顺达带领下，由互助组发展到合作社，艰苦奋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事迹。

十一　《平顺县的全面规划》[1]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可以作每个县委领导合作化运动、生产运动以及其他工作的参考。这样的全县规划和全面地叙述各方面情况的文章，我们希望每省都有几篇。

十二　《严重的教训》[2]一文按语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每一个合作社，不经过这样的一场斗争，就不能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合作社建立以后，还必须经过许多的斗争，才能使自己巩固起来。巩固了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山西省解虞县三娄寺合作社，就是在巩固以后，因为松劲，几乎垮了台的。仅在那里的党组织批判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向社员群众进行了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恢复了政治工作，方才克服了那里的危机，走上了继续发展的道路。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平顺县胜利地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也是中共平顺县委书记李琳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平顺县的全面规划》。

[2] 这篇文章原题为《三娄寺农业社的教训》，是《山西日报》特约通讯员阎广洪写的，载于1955年2月1日《山西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严重的教训》。

反对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这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我们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书所载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表现了这一个特点。

十三　《长治专区建立合作网的经验》[1]一文按语

合作网的办法很好，各地应当仿行。

---

[1] 这是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3月22日关于长治地区互助合作网的建立和整顿情况的综合报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长治专区建立合作网的经验》。报告说，建立以中心社为核心的互助合作网，是我区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一条经验，自1954年冬以来，共建立了1149个合作网，每个网一般有6至8个社，每个社又联系一到两个互助组，并固定地帮助个体农民。这样，就把全专区8000多个农业合作社、1.5万多个互助组和5万多户个体农民联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前进。

十四　《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1]一文按语

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十五　《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2]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有用，可作各县参考。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荒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解虞县西张耿乡的农业技术夜校》，是青年团晋南地方工作委员会1955年5月10日写的，载于《学习资料》1955年第一号。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文章介绍了山西省解虞县西张耿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帮助社员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在党、团支部支持下，成立乡的农业技术夜校的情况。这个夜校采取“少讲，讲清，地里做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的教学方法，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学员们从课堂回到田地后，又把自己学到的技术和知识教给那些没有参加学习的社员，使农业生产技术在全社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

[2] 这是中共山西省汾阳县委1955年10月11日关于挖掘水利潜力，大力兴办小型水利，扩大灌溉面积，争取在1957年实现每个农业人口一亩水地，保证农业增产的规划。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应当使每人有一亩水地》。

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在合作化的基础之上，群众有很大的力量。几千年不能解决的普通的水灾、旱灾问题，可能在几年之内获得解决。

十六　《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1]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希望大家看一看。全国各县，都应当在一九五六年，由县委领导，做出一个全面规划，包括合作化，农、林、牧、副、渔业，工业或者手工业，水利，肥料，农具，改良耕作技术，改良种子，商业，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各项内容。如果不能这样全面，首先抓住几个主要的项目也好。计划包括的时间，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计算到十二年（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当然更好。省应当督促所有专、县、区、乡都这样做，着重点放在县、乡。做得粗糙一点，也不要紧，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体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年再加以修正，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和完善化。离山县委的这个水土保持规划，可以作黄河流域各县以及一切山区做同类规划的参考。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中共离山县委书记刘耀1955年11月1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

十七　《看，大泉山变了样子！》[1]一文按语

很高兴地看完了这一篇好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典型例子，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并且不要很多的时间，三年，五年，七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问题是要全面规划，要加强领导。我们要求每个县委书记都学阳高县委书记那样，用心寻找当地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

十八　《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2]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应当引起一切合作社的严重注意。合作社应当设立监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是中共阳高县委书记王进1955年11月1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文章介绍了山西省阳高县张凤林、高进才两位农民治理大泉山的事迹。他们通过挖坑、开渠、培埂、堵沟、植树等方法，治水、用水，不仅使大泉山面貌改观，而且土地质量有了提高，自己的生活也逐步富裕起来。

[2] 这篇文章原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向贪污、盗窃的行为进行斗争》，是中共山西省雁北地委1955年6月24日写的，载于中共山西省委主办的《前进》第一百九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必须向贪污、盗窃的犯法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文章介绍说，雁北地区在1955年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发现不少合作社的干部有贪污盗窃等违法行为。为此，地委决定：各县在整顿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必须把所有农业生产合作社按照财务管理工作的状况，进行分类排队，限期结清账目，做到社社有收支预算，账目日清月结，财务公开，由社员监督；对于犯有贪污、盗窃等失职行为的干部，要查清事实，根据情节轻重和性质，分别进行处理。

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肃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十九　《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使牲畜大为发展起来》[1]一文按语

这一篇写得很好，可供一切畜牧业合作社参考。

二十　《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2]一文按语

对于条件已经成熟了的合作社，就应当考虑使它们从初级形式转到高级形式上去，以便使生产力和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初级形式的合作社保存了半私有制，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半私有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翁牛特旗畜牧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建立和发展的》，是原中共热河省委办公厅1955年9月20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翁牛特旗建立了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使牲畜大为发展起来》。文章介绍说，翁牛特旗在试点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12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广大贫困和不富裕的牧民，从实际中体验到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纷纷要求入社。合作化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2] 这篇文章原题为《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组写的，载于1955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文章介绍了北京市郊区东冉村乡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巩固到发展，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及其经验。

制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就要求改变这种制度，使合作社成为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化的集体经营的经济团体。生产力一经进一步解放，生产就会有更大的发展。转变的时间，有些地方可能快些，有些地方可能要慢一点。大约办了三年左右的初级合作社，就基本上具有这种条件了。各省各市和各自治区的党组织对此应有研究和布置，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两年内，应当在群众同意的条件下办一些试点性质的高级社。现在办的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社，向高级社转变的时候，应当取得群众同意，把许多小型社合并起来成为大型社。如果能够在这两年使得每个区都有一个至几个这样的合作社，并且在群众中显出它们比较初级社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那就可以使以后几年的并社升级工作，获得有利的条件。这个工作，要同发展生产的全面规划配合起来。当着人们看见了大型社和高级社比较小型社和初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当着人们看见长期规划将给他们带来比较现在高得多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意并社和升级的。城市郊区的升级会要快一些。北京这个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其他具有同类情况的合作社的参考。

二十一　《白盆窑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办成高级社的》[1]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10月写的。文中介绍了北京市郊区白盆窑乡党支部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直接创办高级社的经验。他们根据全乡各户农民耕地数量差不多，土地分红或不分红对收入影响不大，而劳动力却十分短缺的情况，经过酝酿和发动，在三个互助组的基础上，直接建立了两个完全按劳分配、土地不分红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从而提高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使社里的生产和社员的收入都有了显著提高。

这是两个由互助组直接进入高级形式、没有经过初级形式的合作社。有些条件适合的地方可以这样做。白盆窑的情况，使人看了高兴。其中有些经验，初级社也可以吸取。

二十二　《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的远景规划》[1]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十三年的长远计划，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这种计划的用处，是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使人们的眼光不被限制在眼前走出的一步。这种计划只是一个大的方向，还要用每一个五年计划和每一年的年度计划去加以具体化。由于几个年度计划的实行，远景计划会要一再加以修改的。

二十三　《红星集体农庄的远景规划》[2]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全乡一千多户建成一个大合作社（他们叫做集体农庄，即是合作社）的七年远景计划，可作各地参考。为什么要有这

---

[1] 这篇文章是北京市农林局规划工作组1955年10月写的。文中介绍了北京市京西矿区黄塔乡黄安坨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制订的1955年至1967年的长远发展规划，包括发展畜牧业、林业、农业、副业等的计划和措施以及改善社员生活的具体措施。

[2] 这篇文章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北京市农林水利局联合规划工作组写的，载于1955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文中介绍了北京市南苑区红星集体农庄的七年规划方案（1956年—1962年），规划包括土地利用、发展养畜业、培养技术干部和文化福利设施等四个方面。

样的长远计划，人们看一看它的内容就知道了。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

二十四　《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1]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确的。合作社必须强调做好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

二十五　《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2]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情况，就是在筹集农业资金方面，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巩固社的关键——记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作者是沙军，载于1955年7月6日《北京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张郭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文章介绍了北京市丰台区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紧紧抓住政治思想领导这一重要环节，使该社逐步由小到大、由低到高迅速发展起来的经验，包括上级党委的领导、教育社员关心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倾向、民主办社、坚持党的政策和深入群众等方面。

[2] 这篇文章原题为《丰台区三路居蔬菜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金是怎样解决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写的，载于1955年3月10日编印的北京《郊区农村工作》第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社自己可以解决生产资金》。

农民群众中间有很大的潜在能力。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在资金方面，国家应当给予农民以必要的援助，例如现在已经设立的贫农基金和其他贷款。但是资金的主要的大量的部分，还是应当依靠农民自已筹集。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对于农民的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二十六　《养猪模范的来广营合作社》[1]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二十七　《一个作风很好的合作社》[2]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来广营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把猪养好的》，是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互助合作组1955年10月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养猪模范的来广营合作社》。文章介绍了北京市东郊区来广营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好养猪场的经验，主要是：(一) 挑选好的饲养员。(二) 有一套科学的养猪方法，即：1. 喂猪要定时定量；2. 勤扫圈，勤洗猪食槽；3. 消毒隔离，定时防疫；4. 实行先进的繁殖方法；5. 细心喂养小猪。(三) 要不断地和一切不相信科学的思想和做法进行斗争。

[2] 这是天津市南郊区工作组1955年3月12日写的调查报告，载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一个作风很好的合作社》。文章介绍了天津市南郊区会馆乡前营村迎新农业生产合作社干部办社的事迹。这个社的干部公道能干，作风民主，关心群众的困难，不仅使合作社生产有较大发展，而且带动了互助组，团结了单干户，为合作社的扩建打下了基础，加快了合作化的进度。

这个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具有社会主义的工作作风，值得各地仿效。

二十八　《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1]一文按语

这种情况值得注意。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

二十九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2]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西郊王顶堤乡王顶堤村几年来的变化情况和应该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5年6月19日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二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必须对资本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文章说，王顶堤村在基本实现合作化以后，由于生产发展，个人收入增多，如何支配手中的钱，成了大问题。该村虽然在扩大再生产方面做了些工作，但生活提高的速度比生产提高的速度要快，铺张浪费现象日益严重，而政治思想工作赶不上形势的需要，使得不少农民变懒了，泡病号的也多了。党支部在向农民进行教育的时候，感到办法不多。

[2] 这篇文章原题为《津东郊区詹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是天津市东郊区詹庄子乡工作组1955年6月8日写的，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5年6月13日编印的《生产合作参考资料》第二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

三十　《新情况和新问题》[1]一文按语

这个材料有用，值得普遍注意。这个材料描绘了农村中各个阶层的动态。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许多中农要“再看一看”，他们爱“在外边松快”，他们主要地是要看合作社对于他们的生产资料入社是否使他们不吃亏，他们是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的。许多富裕中农对于合作化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其中态度最坏的，在那里变卖生产资料，抽逃资金，组织假合作社，个别的甚至勾结地主富农做坏事。我们希望各地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们都注意观察和分析自己那里的各个阶层的动态，以便采取适合情况的政策。这个材料提到了注意合作社忽视互助组的错误倾向，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意见，这是正确的。“互助合作网”的办法是好的，就是要社、组兼顾，合作社要真正帮助互助组和单干户解决他们的当前生产的困难问题。贫农基金必须迅速发下去。现在还没有加入合作社的贫农，要告诉他们，他们什么时候入社，什么时候就可以取得这笔基金。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今年互助组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黑龙江省讷河县平房、双泉、五福三个村互助组情况调查》，作者是张殿举、傅雁龙、郝景民、孙荣胜，载于1955年5月22日《人民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新情况和新问题》。

三十一 《双城县十一区的生产规划》[1]一文按语

黑龙江双城县的经验，值得各地注意。那里是以合作化和生产的全面规划著名的。

三十二 《关于财务管理》[2]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有用，各县可以仿照办理。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双城县十一区生产规划的经验》，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组1955年2月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双城县十一区的生产规划》。双城县十一区规划的内容包括：一、提高现有耕地面积的产量；二、增加生产内容，扩大生产范围；三、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准备在办好现有78个合作社的基础上，到1956年，全区的合作社发展到117个，使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75%左右。

[2]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拉林县委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是中共拉林县委1955年8月1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财务管理》。文章介绍了黑龙江省拉林县几年来在合作社的财务管理方面取得的几点经验：（1）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加强对三员（会计员、保管员、饲养员）的政治教育工作。（2）发动全党，加强财务管理工作。（3）按照不同季节，抓住不同环节，进行对财务工作的指导。（4）建立民主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三员之间的监督制度。

三十三　《安广县四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固定生产队和实行包工包产的经验》[1]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提出的办法并不是很完善的，但是它把包工包产中的问题叙述得很有条理，可以作为各地的参考。

三十四　《秋收分配方案》[2]一文按语

这一篇写得很好，可作各地参考。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安广县四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固定生产队、固定土地、固定耕畜农具、常年包产、短期包工、超产奖励”的经验》，是中共安广县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3月25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安广县四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固定生产队和实行包工包产的经验》。文章介绍的包工包产的经验是：一、由合作社理事会和各生产队订立“包工合同”，并在队内实行“小包工”“死分活评”的记工方法，鼓励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二、及时发现和解决实行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三、各生产队实行劳动自报、满勤奖励、零活计件和短期包工的办法。四、加强队内的计划管理。五、加强思想教育。六、.开展生产竞赛。

[2] 这篇文章原题为《永吉县达屯村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制订秋收分配方案的经验》，是中共吉林省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于1955年10月8日《吉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秋收分配方案》。文章介绍了吉林省永吉县口前区达屯村在秋收预分方案制订过程中，认真地估算秋后产量，结清劳动账目和财务收支账目，使社员心中有底，然后让社员反复讨论分配方法，对原来社章规定的分配方法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修改，最后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确定分配比例。分配方案公布后，激发了社员们的劳动热情，也增强了社干部的信心。

三十五　《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1]一文按语

刘玉如领导的这个合作社，同河北省的王国藩合作社相似，都是因为穷，被人看不起，经过刻苦奋斗，终于战胜了困难的。各省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应当广为传播，鼓励大家。

三十六　《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2]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各地均可仿照办理。“没有会计”，是反对合作化迅速发展的人们的借口之一。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问题是要迅速地加以训练，并且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的水平。以区为单位，由生产合作社、供销合

---

[1] 这是中共辽宁省锦县县委农村工作部1954年12月25日的通报，原题为《锦县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克服困难搞好生产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被人讥笑的穷合作社》。文章介绍了辽宁省锦县晓光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主任刘玉如的带领下，勤俭起家，战胜困难，搞好生产的事迹。

[2] 这篇文章原题为《彰武县第三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会计互助网》，是辽宁省彰武县第三农业技术推广站1955年8月写的，载于辽宁《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参考资料》第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由农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的经验》。

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会计员组成会计互助网，就是这种提高会计员的文化、技术水平的好办法。彰武县第三区的会计网，不但帮助会计员提高了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而且做了许多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县和区的党组织，都要注意去领导这项工作。

三十七　《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1]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可以从这里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三十八　《一个做了三年生产规划的合作社》[2]一文按语

---

[1] 这是中共山东省曲阜县委1955年11月15日的报告。文中讲的合作社，是山东省曲阜县第三区陈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

[2] 这篇文章原题为《荣成县楼下村黎明农业生产合作社制订的三年生产规划》，载于1955年11月20日山东《大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做了三年生产规划的合作社》。

这个规划有用，可作各地参考。一切合作社，均应做一个几年的生产规划，经过社员多次讨论，加以修改，然后付之实施。

三十九 《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1]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青年团高家柳沟村支部组织青年学习记工的经验》，载于1955年1月29日山东《互助合作通讯》第六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

二种课本也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四十　《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1]一文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也证明，适当地，不是过多地，并且是在启发社员有了充分的觉悟以后，对于贫苦社员又加以照顾等项条件之下，发动社员投资，解决合作社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是完全可能的。

---

[1] 这是中共山东省莒南县委关于新建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投资的情况报告，载于1955年4月24日山东《互助合作通讯》第十二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困难》。

四十一　《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1]一文按语

河北有王国藩合作社，辽宁有刘玉如合作社，这里又有开明义的翻身合作社，它们都是十分穷困，被人讥笑，经过坚决奋斗，翻过身来的。这种英雄事迹，各地一定很多，希望每省写出几篇，广为传播。

四十二　《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2]一文按语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四十三　《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3]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桐城县石河乡小汪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翻身记》，作者是张世荣，载于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5年10月20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翻身合作社一年翻身记》。

[2] 这篇文章原题为《陈学孟是怎样帮助群众办社的》，作者是肖克非，载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5年10月20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化的带头人陈学孟》。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武店镇农民、中共党员陈学孟带头办起本区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积极帮助其他群众办社的事迹。

[3] 这篇文章原题为《葛世玉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通过生产自救获得巩固与扩大的》，载于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4年12月8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四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只有合作化才能抵抗天灾》。

这是一个组织起来抵抗灾荒的生动的例子。一切劳动农民，不论是哪个阶层，除了组织起来集体生产，是无法抵抗灾荒的。安徽繁昌县的中农柯先富和贫农柯百法的话，讲出了这个真理。

四十四　《一个值得推荐的模范支部》[1]一文按语

这个支部的工作路线，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正确的，值得向一切在农村工作的同志推荐。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方法。

四十五　《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教训》[2]一文按语

这是胡乱解散合作社造成恶果的又一处教训。在这里是“勒令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凤阳城西乡支部在互助合作运动中培养干部的方法》，是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于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5年6月11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值得推荐的模范支部》。文章介绍了安徽省凤阳县城西乡党支部培养合作社骨干的经验。他们采取“突破薄弱区，就地培养干部”和“老社带新社，强的带弱的”的方法，培养了大批农业合作社骨干，推动了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2] 这是中共安徽省滁县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滁县白庙乡、全椒县三圣乡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通报，载于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5年6月11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错误地解散十八个“自发社”的教训》。

改组”，在浙江是“坚决收缩”，都是一些干部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之下做出来的。我们希望这种错误不要重复了。

四十六　《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1]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根据这两个合作社的情况，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据一些机耕农场的经验仍然是有出路的，因为生产的范围大了，部门多了，工作细了，这就不怕有力无处使。

四十七　《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2]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是中共肥东县石塘区委写的，载于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1955年6月11日编印的《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

[2] 这篇文章原题为《昆山县西宿乡的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全乡走向合作化的》，是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1955年10月14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吧！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这里不是老解放区，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晚解放区。这个晚解放区，走到许多老解放区的前面去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可以把它拉回来吗？当然不能，机会主义者只有认输一法。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得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哪一个年头能使这种人自己有办法走路，并且走得像个样子呢？有一个治好这种毛病的法子，就是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的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

四十八　《沂涛乡的全面规划》[1]一文按语

这个乡做了一个合作化、增产措施、水利、整党整团、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两年计划，全国各乡也应当这样做。有些人说计划难做，为什么这个乡能做呢？一九五六年，全国各县、区、乡都要做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包括的项目，比这个计划还应当多一些，例如副业、商业、金融、绿化、卫生等。哪怕粗糙一点，不尽符合实际，总比没有好些。一个省只要有一两个县、一两个区、一两个乡做出了相当像样的计划，就可以迅速传播开去，叫其他县其他区其他乡仿照办理。说起来怎样困难，其实是并不那么困难的。

四十九　《大社的优越性》[2]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一阅。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使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的小社为多。但是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

---

[1] 这是中共江苏省淮阴地委生产合作部1955年10月22日关于沭阳县马厂区沂涛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规划的调查报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沂涛乡的全面规划》。

[2] 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海连市朝阳乡朝阳大社的发展和巩固》，是中共江苏省新海连市委1955年9月21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大社的优越性》。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新海连市（由新安镇、海州、连云港三个城市合并而成）朝阳乡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小社发展到大社的经验。

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

五十　《清除坏人，巩固合作社》[1]一文按语

这一篇所说的问题有普遍意义，值得大家注意。

五十一　《定额包工和评工计分》[2]一文按语

这一篇描写了一个合作社的劳动组织的曲折变化过程，可作各地参考。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江宁县中前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反革命破坏活动进行斗争》，是中共江宁县委生产合作部写的，载于1955年9月10日《新华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清除坏人，巩固合作社》。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江宁县中前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坏分子破坏，使社员的生产情绪消沉，后来经过整顿才得以巩固的情况。

[2] 这篇文章原题为《前进第一农业社怎样实行集体包耕个人计件制》，载于1955年5月26日江苏《农村工作》增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定额包工和评工计分》。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涟水县前进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头在劳动组织上存在干活一窝蜂现象，后来采取临时划片分组，实行包工制，改善评工计分办法，使生产管理逐步地走上正轨的经验。

五十二　《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1]一文按语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合作社所在的这个乡——慈溪县的岐山乡，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农户加入了八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

五十三　《合作化模范邓家乡》[2]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广。一切完成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党的支部，又有了几批互助组的乡，只要按照浙江邓家乡的路线去做，一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是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10月23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文章介绍了浙江省慈溪县岐山乡五洞闸村创办全省第一个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带动全乡实现合作化的经验。

[2] 这篇文章原题为《邓家乡怎样运用中心社带动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开展生产运动的》，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3月17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化模范邓家乡》。文章介绍的经验主要是：一、运用中心社，带动互助组和单干农民进行生产，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组织农民实地参观，介绍中心社的生产合作经验。三、以中心社为核心，发动生产竞赛，进一步开展农林业生产运动。

两年内就可以比较健康地比较少出毛病地在一个乡内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使生产提高一步。有些同志认为合作化很困难，一定要出很多毛病，因此畏缩不前，不敢推广合作化，只是因为他们脱离了浙江邓家乡的这样一种领导路线。而浙江邓家乡的路线（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般），同河北遵化县第十区、安徽凤阳县城西乡的路线一样，不是别的，就是我党在全国一切群众工作中早已行之有效的一条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五十四　《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全国推广》[1]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值得推荐。合作网应当普遍地建立起来，使之成为制度。现在小社多，乡有建立合作网的必要，区也应有合作网。将来中等社和大社多了，应当着重区的合作网。我们希望一九五六年，每区每乡都有合作网。那些全乡只建成为一两个大社的地方，乡当然不要建立这种网了。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余姚县龙南乡根据群众路线办社的经验》，是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10月23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网的制度应当在全国推广》。文章介绍了浙江省余姚县龙南乡在农业合作化工作中建立互助合作网的经验。他们按照农业合作社的分布情况，将全乡划分为三片，组成三个互助合作网，每网挑选一个基础好、骨干强、地点适中的社作为“中心社”，由党支部的三个委员分工负责，推动了全乡农业生产的发展。

五十五　《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1]一文按语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是出于许多人意料之外的一件大事。过去，人们总以为合作化以后，劳动力一定会过剩。原来已经过剩了，再来一个过剩，怎么办呢！在许多地方，合作化的实践，打破了人们的这种顾虑，劳动力不是过剩，而是不足。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这种情形，现在还只是在开始，将来会一年一年地发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以后也将是这样。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千鹤农业社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复收复种中劳力不足的困难》，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5月24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六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文章介绍了浙江省建德县蓭口乡千鹤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经验，主要做法是：（一）帮助妇女合理地安排时间和分工。（二）执行男女同工同酬，合理评工记分。（三）解决妇女参加生产中的特殊困难，有重点地试办托儿组。

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必须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浙江建德县的经验，一切合作社都可以采用。

五十六　《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订立结合合同》[1]一文按语

本书谈这个问题的只有这一篇，值得普遍推荐，文章也写得不坏。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订立结合合同一事，应当普遍推行。

五十七　《有成片林木地区的合作社必须迅速处理山林入社的问题》[2]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切有成片林木的山区，或者非山区，都应该迅速地按照党的政策，处理林木是否马上入社和如何入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平湖县新仓乡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常年互助组签订结合合同的初步经验》，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3月4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四十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订立结合合同》。

[2] 这篇文章原题为《凤鸣乡处理山林入社政策推动春耕生产的总结》，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5月20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有成片林木地区的合作社必须迅速处理山林入社的问题》。

社的问题。浙江省龙泉县凤鸣乡的做法，可供各地参考。

五十八　《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1]一文按语

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一切合作社都要将养猪一事放在自己的计划内，当然省、专、县、区都应有自己的计划。猪的饲料是容易解决的，某些青草，某些树叶，番薯藤叶和番薯都是饲料，不一定要精料，尤其不一定要用很多的精料。除了合作社公养以外，每个农家都要劝他们养一口至几口猪，分作几年达到这个目的。某些少数民族禁止养猪的和某些个别家庭因为宗教习惯不愿养猪的，当然不在此内。发展养猪事业要有一套奖励办法，浙江省上华合作社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五十九　《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2]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上华社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发动社员增养毛猪》，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4月26日编印的《浙江农村工作通讯》第五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这里养了一大批毛猪》。文中介绍的浙江省上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养毛猪的经验是：（一）对社员加强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性的教育，鼓励社员私养毛猪。（二）用公有分养的办法，帮助有困难的社员增养毛猪。（三）发挥集体优势，社里养猪40只。（四）引导社员开辟新的饲料来源。

[2]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是福建省福安县楼下乡工作组写的，载于1955年8月16日《福建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题目改为《福安县发生“中农社”和“贫农社”的教训》。

这里所说的问题，有普遍的意义。中农是必须团结的，不团结中农是错误的。但是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去团结中农，实现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呢？当然只有贫农。在过去向地主作斗争、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是这样，在现在向富农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作斗争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也是这样。在两个革命时期，中农在开始阶段都是动摇的。等到看清了大势，革命将要胜利的时候，中农才会参加到革命方面来。贫农必须向中农做工作，把中农团结到自己方面来，使革命一天一天地扩大，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务管理委员会，如同过去的农民协会一样，必须吸引老下中农和一部分觉悟较高的和有代表性的新老上中农参加，但是人数不可太多，以占三分之一左右为适宜。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新下中农）委员的人数应当占到三分之二左右。社的主要领导干部，除了老下中农和若干觉悟很高、确实公道能干的新老上中农仍然可充当以外，一般应当由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来充当。我们对于福建省福安县贫农领导的合作社和中农领导的合作社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表示不同的态度这样一种情况，不应当看作是个别的现象，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六十　《一个整社的好经验》[1]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先锋农业社整顿巩固的初步经验》，是中共福建省龙溪地委生产合作部写的，载于1955年7月9日福建《农村工作通讯》第十三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整社的好经验》。

这是一篇很好的整社经验，值得推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它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们理解的宣传教育工作。目前全国各地都在做这种工作，出现了很多善于做宣传的农村工作同志。这篇文章里所描写的“四对比、五算账”，就是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这种方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它不是像有些不善于做宣传的同志那样，仅仅简单地提到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的货色，而是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这就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六十一　《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1]一文按语

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新泾区虹南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是李贻钧1955年10月7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一九五五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五月、七月和十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当然还有许多战斗在后头，还要努力作战。

六十二　《白遗桥蔬菜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1]一文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经验，不但城市近郊地区可以作参考，其他地区也可以作参考。

---

[1] 这篇文章是季音、陶贵章、杨国森1955年10月24日写的。文中介绍了上海市郊大场区塘南乡白遗桥蔬菜生产合作社由初级社转到高级社、由小社合并为大社的经验，主要是：1. 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从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深入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2. 妥善处理转社、并社的具体问题。3. 组织统一生产。

六十三　《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1]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社会就是这样地每天在前进，人们的思想在被改造着，特别在革命高涨的时候是这样。

六十四　《诸翟乡把大批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吸引到农业合作中来了》[2]一文按语

这个乡的情况也证明，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工人家属多的郊区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吴强、翟贵肇1955年10月7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文章介绍了靠近上海钢铁厂、国棉八厂的上海市吴淞区泰兴乡发动工人家属，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

[2] 这篇文章是戴星明、王树人、董俊明1955年10月24日写的，文中介绍了上海市西郊诸翟乡解决剩余劳动力的经验。这个乡根据耕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情况，除组织社员把大量劳动力用到土地加工、积肥等农业劳动上，还注意发展多种经营，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六十五　《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1]一文按语

这一篇也很好。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实行劳动竞赛和经济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个人收入和增加积累。农业合作社也必须是这样。在这方面，必须进行许多工作。

六十六　《谁说鸡毛不能上天》[2]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地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三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降低生产成本的经验》，作者是董铨、邵健、桂世杭。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真如区李子园农业生产合作社节约生产费用的经验》。

[2] 这篇文章原题为《安阳县南崔庄的党支部依靠贫农带头办社，实现了全村合作化》，是中共河南省安阳地委合作运动办公室写的，载于1955年11月2日《河南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两三年内，看谁增产：是单干的富裕中农增产呢，还是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增产呢？在开头，只是一部分贫农和下中农组成的合作社，同单干的富裕中农在竞赛，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还在那里看，这就是双方在争夺群众。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地有时秘密地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他们应当如同安阳县南崔庄的共产党人那样，坚决地支持合作社。但是，可惜，并不是每一个乡村的党支部都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混乱。首先是鸡毛能不能上天的舆论问题。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如果党不给以批评，它就会使许多贫农和下中农感到迷惑。其次，在干部方面，又其次，在物质力量例如贷款方面，如果都得不到党和国家的支持，合作社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富裕中农之所以敢于宣传鸡毛不能上天一类的从古以来的真理，就是因为合作社还没有增产，穷社还没有变成富社，个别的孤立的合作社还没有变成成千成万的合作社。就是因为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合作化的好处。还没有明确地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我们的许多地方党组织没有能够给贫苦农民以坚决的支持，也不能完全怪它们，上面还没有给机会主义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还没有给合作化做

出全面的规划，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加强对于这个运动的领导。一九五五年，我们做了这些工作，几个月工夫，形势就完全不同了。站在那里看的广大群众，一批一批地站到合作化这边来了。富裕中农也改变了腔调。有些要求入社，有些准备入社。最顽固的，也不敢议论鸡毛能不能上天的问题了。地主和富农，一点神气也没有了。这同人民政府惩治了一批破坏治安和破坏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也是有关系的。总之，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我国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社会主义大为上升，资本主义大为下降。一九五六年再有一年的努力，过渡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就可以从基本上奠定了。

六十七　《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1]一文按语

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是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于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9月4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

六十八　《荥阳县胡乱地清洗社员犯了错误》[1]一文按语

这里说的，还不是解散整个合作社，而只是在一些合作社内清洗一部分不应当清洗的人，就已经造成很坏的结果。河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

六十九　《许昌地区的办社辅导团》[2]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很好，各地可以仿行。

---

[1] 这是中共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荥阳县在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处理社员问题上发生偏差的通报，载于1955年2月11日《河南通讯》第二百九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荥阳县胡乱地清洗社员犯了错误》。通报中说，河南省荥阳县在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有不少合作社在处理社员问题上发生了偏差，清洗了一些不应当清洗的社员。这种做法不仅使敌人有机可乘，而且影响了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在处理社员问题上，必须慎重。对于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要求入社的，应当允许，已经入社的，不应当命令他们出社，他们的土地可采用租佃形式，由社内耕种；对于某些有污点的农民，应当加强教育改造，也不应当命令他们出社；对于有历史问题的农民，凡是已经交代的，只要劳动、守法，积极生产，取得农民同意，都不应当清洗出社，但是不能让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和要害部门的工作，而且在生产中应当对他们加以注意和考验，凡没有交代的，应当由政府命令他们交代。

[2] 这篇文章，是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写的，载于1955年10月30日《河南日报》。文章介绍了河南省许昌地区在1954年冬季和1955年春季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把有经验的社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办社辅导团，帮助合作化基础薄弱的地区进行巩固社和建社工作的经验。

七十　《襄阳县伙牌乡襄鄀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1]一文按语

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作者是到了这个乡同群众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的书记，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

七十一　《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2]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的问题。各级党委和派到农村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们，对于这个问题都应当引起充分的注意。合作社的领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鄀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喂养使用的制度和经验》，是中共湖北省襄阳地委书记赵修写的，载于1955年4月18日《湖北农村》第一百零六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鄀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

[2] 这篇文章原题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社的严重问题及整顿巩固的做法与经验》，作者是周敬文，载于中共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7月26日编印的《互助合作》第九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文章介绍说，武塘农业合作社在建社之初，由于在社务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没有树立起贫农的领导优势，致使生产搞得不好，产生了中农占便宜、贫农吃亏的严重问题。乡党委发觉后，对这个社进行了整顿，通过“两查”（查生产计划、查禾苗好坏）、“三算”（算季节、算劳动力、算肥料），搞好生产补救，并深入进行阶级政策教育，大力培养贫农骨干，形成了以贫农为优势的领导核心，加强了社员间的团结，巩固了合作社的组织。

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而以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作为辅助力量，才能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和中农的团结，巩固合作社，发展生产，正确地完成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这个条件，中农和贫农就不能团结，合作社就不能巩固，生产就不能发展，整个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实现。许多同志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建立贫农优势的问题，在土地改革时期是必要的，因为那时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十、六十到七十的贫农，还没有上升为中农，而中农对于土地改革是动摇的，因此那时确有建立贫农优势的必要。现在是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过去的贫农大部分已经上升为新中农，而老中农的生产资料又多，没有老中农参加就不能解决合作社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因此，这些同志认为，现在不应当提出依靠贫农或者建立贫农优势的口号，认为这种口号会不利于合作化。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很困难的。因为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比较地不固执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比较地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他们中间的大部分现在已经变为新中农，但是他们同老中农比较起来，除了一部分新富裕中农以外，大多数在政治上有较高的觉悟，他们过去的困苦生活还是容易回忆起来。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比较接近，而和新老中农中间的上中农，即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不相同。因此，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一）现在还处于困难地位的贫农，（二）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样三部

分比较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们，首先分批分期引导他们加入合作社，并且选择他们中间觉悟程度较高、组织能力较强的若干人，加以训练，组成合作社的领导骨干，特别要注意从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里面选择这种骨干分子。这不是在农村中重新来一次划分阶级成分的工作，而是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党的支部和派到农村做指导工作的同志们应当注意掌握的一种方针，这个方针应当公开告诉农民群众。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不能入社，而是说等到富裕中农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他们表示愿意入社，并且愿意服从贫农（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领导的时候，再去吸收他们入社，不要为了打他们的耕牛农具的主意，当着他们不愿意入社的时候强迫他们入社。已经入社而愿意留下来的，继续不变。要求退社，加以说服，愿意留的，也可以留社。生产资料少一点也可以组织合作社，很多贫农和下中农组织的合作社已经证明了。我们也不是说富裕中农一个也不能充当合作社的干部。那些社会主义觉悟程度高，公道能干，为全社大多数人所佩服的个别的富裕中农，也可以充当干部。但是，合作社必须树立贫农（再说一遍，包括现在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在内，他们占农村人口的多数，或者大多数）的优势。在组织成分方面，他们应占三分之二左右，中农（包括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只占也应占三分之一左右。在合作社的指导方针方面，必须实行贫农和中农的互利政策，不应当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建立贫农优势。在中农占优势的合作社里，总是会要排挤贫农和损害贫农的利益的。湖南省长沙县高山乡的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建立贫农优势和由此去巩固地团结中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如果不这样做，它的危险又会怎么样。本文作者完全懂得党的路线，

做法也很对，先去完成紧急的增产任务，后去建立贫农的优势领导。结果，贫农扬眉吐气，中农也心悦诚服。本文作者还告诉我们一件大事，就是一个情况混乱的合作社，究竟是将它解散好呢？还是加以整顿，使它由混乱走到健康好呢？这样的合作社，整顿巩固是不是可能的呢？本文作者很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不应当去解散那些“三等社”，而应当去做整顿工作。经过工作，三等社是完全可以变为一等社的。这种经验，全国各地已经不少，不止是长沙县高山乡一处。

七十二　《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1]一文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各省应当在自己的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或者指示里面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目前，有许多合作社，缺乏帮助困难户的社会主义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贫农，这是完全错误的。目前，政府已经设立了贫农基金，可以帮助贫农解决耕牛农具的困难，但是还不能解决贫农中有些户缺乏劳动力的困难，也不能完全解决有些户在青黄不接时期缺乏生活资料的困难，这只有依靠合作社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解决。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湘潭县清风乡支部领导农业社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的情况与做法》，作者是顾建鹏，载于1955年5月17日《湖南农村》第一百一十三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湘潭县清风乡党支部帮助贫苦社员解决困难》。

七十三　《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1]一文按语

这个县的情况也告诉我们，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这个数目，现在别处的有些合作社，已经做到了。副业必须要有确实的销路，不能盲目发展，这是对的。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问题是国家要有统一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掉盲目性。

七十四　《一个模范合作社》[2]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如何解决农业社剩余劳力出路问题》，作者是任培吾，载1955年4月3日《湖南农村》第一百一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湘阴县解决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2] 这篇文章原题为《萍乡县年丰乡易瑞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扩大》，是中共江西省委第二书记刘俊秀写的，载于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2月10日编印的《农村建设》第九十六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模范合作社》。

七十五　《合作社议订社章》[1]一文按语

此件有用，可作各地订立社章的参考。

七十六　《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2]一文按语

不要以为只有老解放区才能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的运动，晚解放区则不能够，这样想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晚解放区同样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合作化。就若干的县、区、乡来说，晚解放区可能和老解放区同时完成、甚至先期完成合作化，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事例证明了这一点。这是完全要看党的领导工作是否适当，是否少犯错误来决定的。这一篇是广东中山县的一个合作社主任的谈话记录，他谈的并不比一个老解放区的合作社主任差些，可能某些老解放区的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南溪乡罗巷农业社议订社章前后》，是中共江西省南昌县第七区委工作组写的，载于中共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2月2日编印的《农村建设》特刊第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社议订社章》。文章介绍了江西省南昌县南溪乡罗巷农业生产合作社议订社章的情况。这个社在没有订社章时，做事没把握，无章可循，感到办社处处碰钉子，于是社务委员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决定从检查合作社生产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发动社员把社章订好，他们通过思想教育，使社员树立了当家做主的观念、团结生产的观念和敌情观念，经过十天的酝酿和讨论，这个社订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章。

[2] 这是广东省中山县群众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梁祥胜的谈话记录整理稿，原题为《我当大社主任四个月的几点体会》，载于1955年5月编印的《中山县巩固农业社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我当大社主任的经验》。

合作社主任还比不上他。

七十七　《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1]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可作各地参考。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青年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当然青年人必须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学习，要尽量争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老年人和成年人的保守思想是比较多的，他们往往压抑青年人的进步活动，要在青年人做出了成绩以后他们才心服，本文就是很好地描写了这种情况。对于保守思想当然是不应当妥协的，那末好吧，就来试试看，成绩出来了，他们也就同意了。

七十八　《琼山县第一区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同自然灾害和同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巩固起来了》[2]一文按语

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最为有利这一点，海南岛红旗合作社的经验

---

[1] 这篇文章原载于1955年《华南青年》第十六期，是青年团广东省粤中区工委工作组1955年8月25日写的。

[2] 这是中共广东省琼山县委1955年10月10日给广东省委的报告。

也是证明。这个大型合作社还只有一年的历史，它就准备转变为高级社。当然，这不是说，一切合作社都要照这样做，它们仍然要看自己的条件是否成熟，作出自己究竟在何时实行并社升级为宜的决定。但是，一般地说来，有三年时间也就差不多了。重要的是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当着农民看见办大型社和高级社比办小型社和低级社更为有利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并社和升级了。

七十九　《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边海乡农业生产合作社》[1]一文按语

这一篇写得有声有色，可以一阅。这个乡的党支部是一个模范的支部，它领导群众作了许多英勇的斗争，获得了群众的拥护。

八十　《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2]一文按语

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决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

[1] 这篇文章原载于1955年5月8日《华南日报》，作者是王修平。文中介绍了广东省阳江县边海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合作社的带头作用，在和自然灾害作斗争中有计划地发展农业和副业生产的情况。

[2] 这篇文章是中共台山县委合作部写的，原载于中共广东省粤西区委1955年9月19日编印的《粤西通讯》第九十期。

八十一　《广宁县江埔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1]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值得各地研究推广。

八十二　《岑溪县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合理化建议的经验》[2]一文按语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经验，希望读者注意。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广宁县江埔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是中共广东省广宁县委江埔乡工作组写的，载于中共广东省粤中区委1955年5月18日编印的《粤中通讯》第二百五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广宁县江埔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了多种经济，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文中介绍了广东省广宁县江埔乡红星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多种经济的经验。主要是：（一）向社员分析本社的情况和特点，引起他们对发展多种经济的重视，明确方针政策，消除思想障碍。（二）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发挥群众的智慧，并制订多种经营的方案。（三）加强具体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地行动起来。（四）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合理定出各种工种的底分，保证农业和副业合理发展。

[2] 这篇文章原题为《莫寿全农业社开展“合理化建议”运动的经验》，作者是杨志庆，载于1955年2月7日《广西农村》第一百三十四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岑溪县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合理化建议的经验》。文章介绍了广西省岑溪县马路乡莫寿全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4年夏收夏种后发动社员提合理化建议的经验，具体做法是：由社员民主选举代表，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在集中代表收集的各方面的建议后，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作出决议，再召开社员大会审查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付诸实施。

八十三　《四川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互助联组》[1]一文按语

在那些合作化进度较缓的地区，这个经验还是有用的。

八十四　《简阳县解放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五年的生产计划》[2]一文按语

在看过的许多生产计划中，这一个写得比较具体，又有清楚的说明，使人容易看懂。

八十五　《郫县犀浦和古城两个乡是怎样处理各项具体问题的》[3]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是新华社记者李朝写的，载于1955年11月1日《四川日报》。文章介绍了四川省在互助联组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合作社的经验。

[2] 这篇文章是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简阳工作组1955年2月帮助整理的，文中介绍的四川省简阳县解放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的生产计划包括增产计划、增产措施、总收入、总投资和分配概算等几个方面。在分配概算一项中，文章说，该社全年农业和副业总收入为129400元，留公积金9%，为11646元，毛泽东在这里加括号写了一条按语："此项似乎留多了一点，暂时以不超过百分之四为宜。"

[3] 这是中共四川省委派往郫县犀浦乡和古城乡的工作组1955年4月10日关于在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贯彻自愿互利政策问题给郫县县委、温江地委和四川省委的报告。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郫县犀浦和古城两个乡是怎样处理各项具体问题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各地可以参照办理。

八十六　《简阳县射洪乡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经验》[1]一文按语

这一篇叙述了九个合作社在财务管理上违反了勤俭办社的原则和犯了其他一些错误的情形，希望每个合作社引以为戒。

八十七　《宜宾县天池乡集体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计划繁殖耕牛的》[2]一文按语

这一篇很好，各地应当仿照办理。有些合作社，不但不注意繁殖小牲口，已有的小牲口也不重视，这是完全不对的。应当把一切

---

[1] 这篇文章是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射洪乡工作组1955年10月14日写的。文中介绍了四川省简阳县射洪乡在省委、县委工作组帮助下整顿财务管理工作的情况。这个乡在农业合作社工作中由于只重视生产，忽视了对财务管理工作的领导，致使财务管理没有计划，农业和副业投资超过总收入，贷款还不清，财会人员职责不明，账目混乱等。根据这些情况，他们决定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帮助合作社干部从思想上明确财务工作“为生产服务、自力更生、量入为出、勤俭办社”的方针，深入地检查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第二，制订为生产服务的财务计划，实行经济核算制。第三，建立严格的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工作的民主管理。第四，成立会计辅导站，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具体指导。第五，正确处理会计科目。

[2] 这篇文章原载于1955年7月25日宜宾《农民报》，作者是陈静。

大小强弱的牲口作出统一的安排，并且应当如同宜宾县那样有计划地繁殖小牲口。

八十八　《凤冈县崇新乡是怎样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1]一文按语

这个地方的路线是正确的。这个乡已经有了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七个互助联组，三个常年互助组，十四个临时互助组，占应当组织的农户百分之九十八点四。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以前，这个乡的党支部还没有把自己领导工作的重心放到互助合作方面来，党员对于领导互助组的工作怕困难。支部所依靠的不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而是工作组（似乎是上面派在那里的工作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党的农村支部处在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状态的，现在在全国还是不少的。不但支部，可能还有一些上级党委也是这样。问题就在于这一点。我国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能不能和国家工业化的进度相适应，合作化运动能不能健康地发展，少出毛病，保证增产，就看各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重心是不是能够迅速地和正确地转移到这一方面来。工作组是必须派的，但是必须讲清楚，他们去是为了帮助那里的党组织，而不是代替他们，使他们自己不动手脑，专门依赖工作组。贵州的这个乡，自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转变工作态度以来，只有五个多月，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不是依赖工作组，而是自己动手了，党员也不怕困难了。这种转变，首先要靠

---

[1] 这篇文章原载于1955年7月15日《贵州工作》第八十二期，作者是柳耀华。

各级党委的书记——省委和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地委和自治州委的书记，县委和自治县委的书记，区委书记和支部书记，他们应当把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起来。怕麻烦，怕困难，面临着这样伟大的任务自己不动手，仅仅委托给农村工作部，或者工作组，这种态度，不但任务不可能完成，而且会要闹出很多的乱子来的。

八十九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1]一文按语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向每个党和团的县委、区委和乡支部推荐，一切合作社都应当这样做。本文作者懂得党的路线，他说得完全中肯。文字也好，使人一看就懂，没有党八股气。在这里要请读者注意，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也不讲究文法和修辞，爱好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体裁，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古，好像他们是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本书中所收的一百七十多篇文章，有不少篇是带有浓厚的党八股气的。经过几次修改，才使它们较为好读。虽然如此，还有少数作品仍然有些晦涩难懂。仅仅因为它们的内容重要，所以选录了。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晨光等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进行政治工作的》，是中共贵州省绥阳县委宣传部1954年11月10日写的，载于1955年1月8日《贵州工作》第六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合作社的政治工作》。文章介绍的贵州省绥阳县广大乡晨光、农园、杨家寨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是：一、教育干部认清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二、依靠党支部进行政治工作。三、及时地了解社员的思想情况，通过具体事例，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进行教育。四、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必须生动而新鲜。

股呢？这就要求我们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同志注意这件事，向作者提出写生动和通顺的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动手帮作者修改文章。

九十　《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1]一文按语

反革命破坏合作化运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是贵州省都匀县第五区一个地方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别省的同类刊物上却很少看到这个问题的反映。在合作化过程中，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充分地注意这个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斗争的问题。要学都匀县这个区一样，在合作社内，以党团员为骨干，建立保卫组织。在县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党的区委，在研究了情况，向党内外作好了宣传和解释，提高了群众对于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警惕以后，对于混入合作社领导机关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加以审查、清洗和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不过清洗的必须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真正的坏分子，不能将好人或者只有某些缺点的人说成坏人。处理尤其要恰当，必须经过县的批准。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对都匀县五区敌人破坏农业社情况的认识和加强农业社保卫工作的做法》，是根据贵州省都匀县公安局1955年6月6日来稿整理的，载于1955年7月30日《贵州工作》第八十五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必须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作坚决的斗争》。

九十一　《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1]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值得大家一读，可供各地合作社做长期计划的参考。本文作者说得很对：“制订生产规划的整个过程，就是先进思想和保守思想斗争的过程。”保守思想现在几乎在到处作怪。为了克服这种保守思想，使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一切地方，一切合作社，都要做出自己的长期计划来。

九十二　《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2]一文按语

这一篇文章不长，容易看。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

九十三　《季节包工》[3]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贵定县盘江乡平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建设的三年规划》，是中共贵州省贵定县委盘江工作组1955年10月7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合作社的三年生产规划》。

[2] 这篇文章原载于贵州省民主妇女联合会1955年10月编印的《通报》第九十九期。

[3] 这篇文章原题为《镇宁县马鞍山乡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推行季节包工的》，是中共贵州省镇宁县委工作组1955年3月10日写的，载于1955年4月4日《贵州工作》第七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季节包工》。

本文作者说，自从县里开了合作社主任的联席会议以后，这个合作社，就在临时包工的基础上，实行了季节包工制。可见县的领导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全国二千几百个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密切地注意全县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情况，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时地召开全县的合作社主任的会议，或者全县的重点合作社主任的会议，作出决定，迅速推行。不要等到问题成了堆，闹出了许多乱子，然后才去解决。领导一定要走在运动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后面。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党的县委应当起主要的领导作用。

九十四　《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1]一文按语

这个材料指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任何情况混乱的合作社，都是可以整理的。因为加入合作社的都是劳动农民，不管他们各个阶层之间意见怎样不合，总是可以说清楚的。有些合作社，在一个时期内，确是混乱的，唯一的原因是得不到党的领导，党没有向群众讲明自己的政策和办法。“我们知道办社是好事情。但是办起社来，县委、区委、支部都不管我们了。恐怕是嫌我们寨子穷，吃不好，住不好，才不到我们社里来。”所谓混乱，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得不到党的领导，当然就要混乱。领导一加上去，混乱就会立刻停止。这个材料又提出了一个在落后乡村是否可以建立合作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西畴县戈木乡东升农业社是如何由混乱走向巩固提高的》，是中共云南省西畴县委写的，载于1955年6月30日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一十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混乱的合作社整顿好了》。

社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本文作者所说的这个合作社，就是处在一个落后村。全国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落后乡村，我们应当都去建立合作社，就在建社的斗争中去消灭这些地方的落后状态。

九十五　《副业问题》[1]一文按语

此件说副业比较全面，并且是就一个县几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说的，作者就这个县的副业作了总结性的叙述。建议各县也做出这一方面的总结。

九十六　《富民县的耕牛问题》[2]一文按语

这一篇较长，文字上也有缺点。但是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一个整县的耕牛的情况，政策观点也是对的。因此，收录了这一篇。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马龙县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副业生产的情况》，作者是张兴华，载于1955年3月11日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零一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副业问题》。

[2] 这篇文章原题为《富民县在互助合作中贯彻耕牛政策的情况与问题》，是中共云南省富民县委生产合作部1955年4月20日写的，载于1955年云南《农村工作通报》第一百一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富民县的耕牛问题》。

九十七　《长安县王莽村四个合作社组织联社的经验》[1]一文按语

这个经验有用，各地可以仿办。由党的区委和乡支部作出计划，将那些准备合并为一个大社的若干小社，先组成合作社的联社管理委员会，如同长安县王莽村那样，经过一个时期，再行合并。

九十八　《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2]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地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地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许多地方党的领导还没有主动地赶上去。目前的任务，就是要使各级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将整个农业合作化的任务拿到自己手里来，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王莽村七一农业生产合作联社的领导经验》，是中共陕西省委农村工作部第二处1955年8月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长安县王莽村四个合作社组织联社的经验》。

[2] 这篇文章原题为《一个群众自办的农业社》，作者是陈泰志，载于1955年8月31日《陕西日报》。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

运动。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九十九　《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1]一文按语

此件有用，一切农村的党支部都应当这样做。

根据几处地方的反映，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委员会内设立政治副职，是必要的。各地都可以设立起来，在党支部的领导之下，专责进行政治工作。

在一个乡的范围内组织“互助合作网”或者如同陕西杨河坝乡那样组织“联社委员会”，看来是有益处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样一点，即劳动人民中的缺点或者错误，是能够经过适当的政治工作使他们加以克服或者改正的。读者可以看到，这个乡经过政治工作，使那些做贩猪生意的社员不去贩猪了，使那些把公牛养瘦了的社员把牛养肥了。

一〇〇　《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2]一文按语

---

[1] 这篇文章原题为《中共西乡县杨河坝乡支部领导互助合作的经验》，载于1955年7月6日《陕西工作》第十八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西乡县杨河坝乡党支部正确地领导了那里的互助合作》。

[2] 这是中共甘肃省皋兰县委关于大力全面开展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计划，载于1954年12月18日甘肃《工作资料》第一百四十期。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拟题为《皋兰县的三年发展计划》。

这是一个很有兴趣的文件。不管这个计划里面的某些部分在最近几年内是否有实行的条件（例如拖拉机站和教育经费等），也不管这个计划在计算方面是否精确，总算有了一个全县的全面计划，这个计划的总的精神是好的。其中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部分，按照皋兰县的条件，可能是恰当的。这个农业合作化的计划是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具有很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那时候，“收缩”和“砍掉”合作社的歪风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些地方同志的头脑能够积极地想事情。我们建议每个县都在国家和省（区）的计划所许可的范围以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可行的全面的计划，送省（区）批准实行。甘肃省委农村工作部对于各县做计划这件事，认为可以先由县级将计划的轮廓发给区乡，由各区乡依据县的计划和当地的情况，制定本区本乡的计划，报告到县，然后由县综合起来，再行决定县的计划。我们认为这个意见是好的。

一〇一　《酒泉县银达乡是怎样进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1]一文按语

本书谈文化工作的篇幅不多，这一篇算是好的。为了要在七年

---

[1] 这篇文章是车宏彰、黄显德1955年8月写的，文中介绍了甘肃省酒泉县银达乡试办民校的经验，主要有：一、要注意吸收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因为他们是农村的骨干，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直接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二、必须依据农事季节安排学习时间，农闲的时候多学，农忙的时候少学或者不学，注意解决工作和学习的矛盾。三、教学内容必须结合实用，最好是教农民常用常见的，使他们既容易懂，又容易记忆和应用。四、政治教员一般应当由党支部书记担任。

内，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消灭文盲，适应农业合作化的迫切需要，一九五六年各地就要做出全面的安排，并且完成第一年的计划。

一〇二　《民和县第五区官亭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的》[1]一文按语

这一篇文字差一些，对于不纯分子的活动也缺乏详细的描写，但是内容重要，值得一阅。这个合作社看来是一个很大的社，可是“县区党委放松领导，支部也没有加以过问”，致使不纯分子混入社内，贫农和中农的关系也不正常。只是在县区党委注意了领导，并且依靠支部去发动群众，才把问题解决了。

一〇三　《改变贫农和中农的不正常关系，有步骤地做到使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上占优势》[2]一文按语

凡是存在着青海循化县这样一种情况的地方（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都要经过对于干部和群众的教育，有步骤地改变这种情况。

---

[1] 这篇文章是中共青海省民和县第五区区委书记胡俊德写的，载于1955年7月20日青海《农村工作参考资料》第十期。

[2] 这篇文章原题为《循化县下滩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贯彻执行阶级政策》，是中共青海省委农村工作部1955年6月1日写的。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毛泽东把题目改为《改变贫农和中农的不正常关系，有步骤地做到使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上占优势》。

一〇四　《乡、村干部有能力领导建社》一文按语

这是一篇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使人懂得维吾尔族的农民，对于走合作化道路，积极性是很高的。他们为了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所需要的干部，也已经培养出来了。有人说，在少数民族中不能实行合作化。这是不对的。我们已经看到蒙族，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壮族和其他一些民族都已经办了不少的合作社，或者是几个族的人民联合办的合作社，并且成绩很好，这就驳斥了那些对于少数民族采取轻视态度的人们的错误观点。

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按语。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检讨报告的批语

（1955年9月26日）

一

刘、周、陈、朱、彭真、小平、伯达、鲁言[1]即阅，退邓子恢[2]同志。

毛泽东
九月廿六日

请各同志即阅，子恢催要此件[3]。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5年9月20日关于农业合作社发展问题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检讨报告。这个报告中检讨的“错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81年3月9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中，已予以平反。

二

有一些意见[1]，批在第三条、第五条和第六条上面。

毛泽东
九月廿六日

三

这就说对了。

四

为什么老是喜欢去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地去挫折它。

五

这样讲不真实。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

---

[1] 即本篇三、四、五。

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八月一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地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所以不是什么“对中央意见不够尊重”，而是根本不尊重。不是“不善于抓住任何一种微小的分歧意见”的问题，而是中央同志对你们的严重的批评，书记处和政治局对你们的提议的否决，都不愿意接受，何况你们部内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对你们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会理睬这些小人物吗？这是同全国农村中大量的普遍的积极因素不能影响你们，你们只愿意接受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影响这一点直接地联系着的。这一点，在第三条内你们已承认了。这是应当好好地想一想的：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的批语

（1955年9月26日）

退胡乔木[1]同志：

此件[2]看了一遍，觉了〈得〉改得很好，较原件大有进步。我只作了一些个别的主要是文字的修改，请你斟酌采用。

毛泽东
九月廿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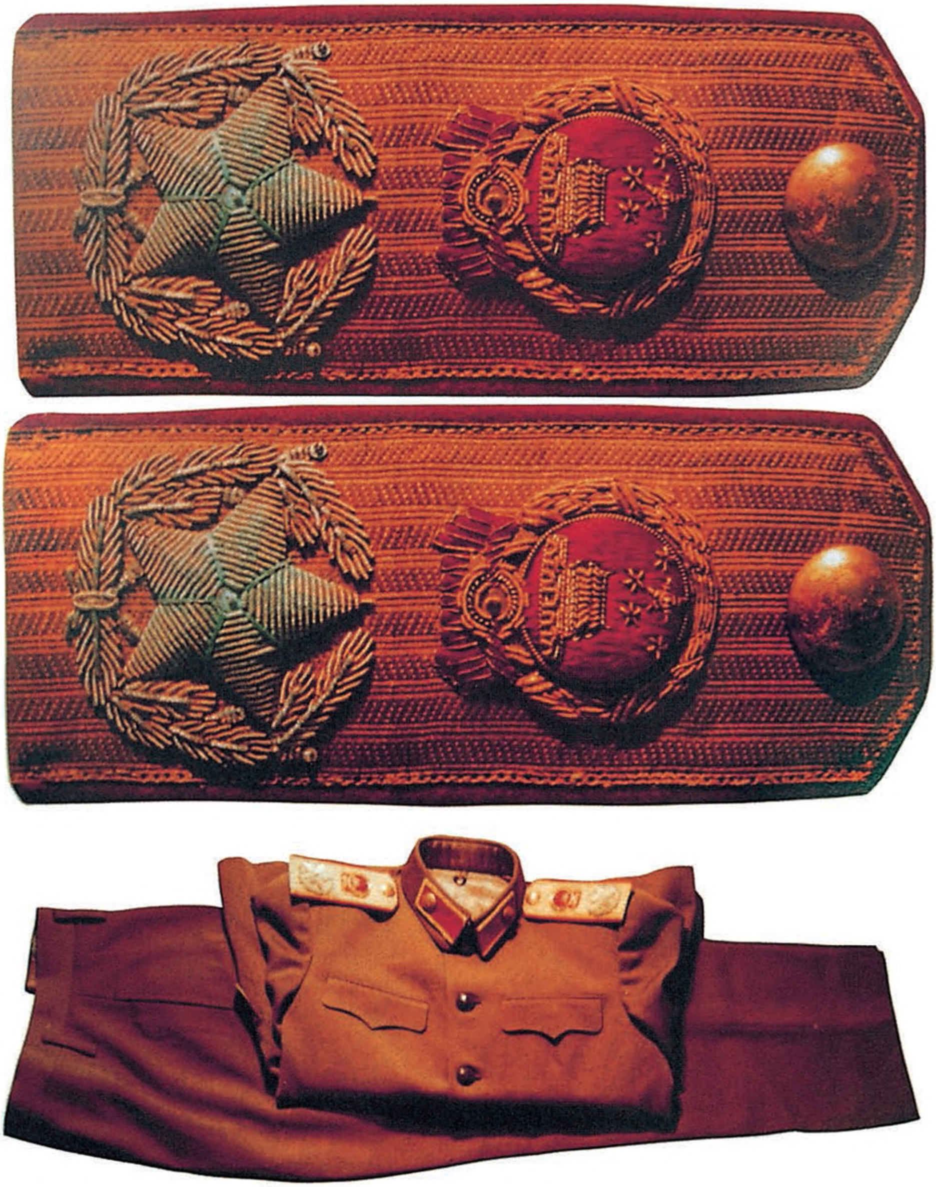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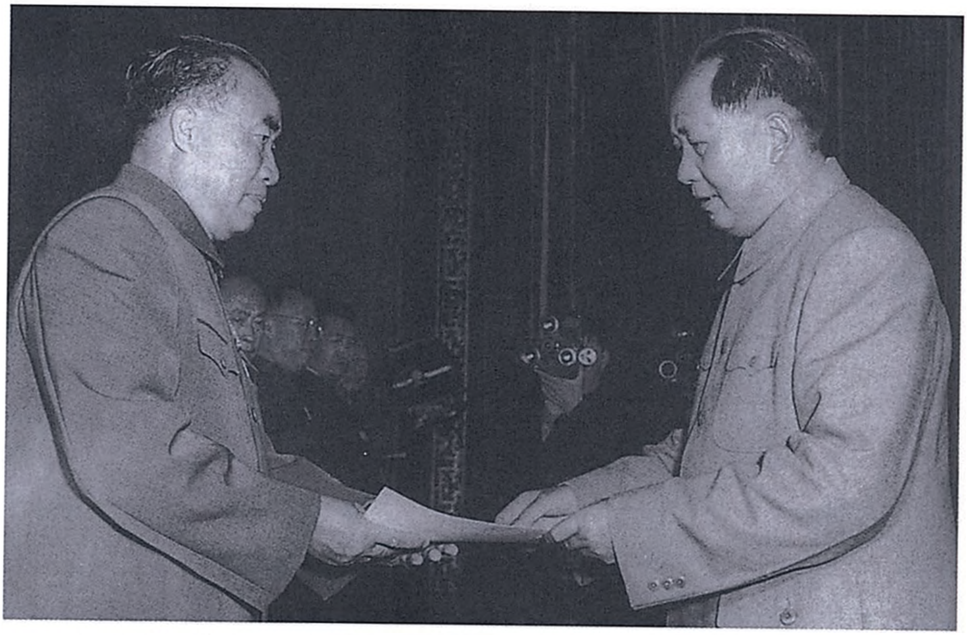
[2] 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修正稿）。这个文件提交于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讨论并原则通过，1955年11月10日由国务院正式公布。

1955年9月27日，授衔、授勋仪式在北京怀仁堂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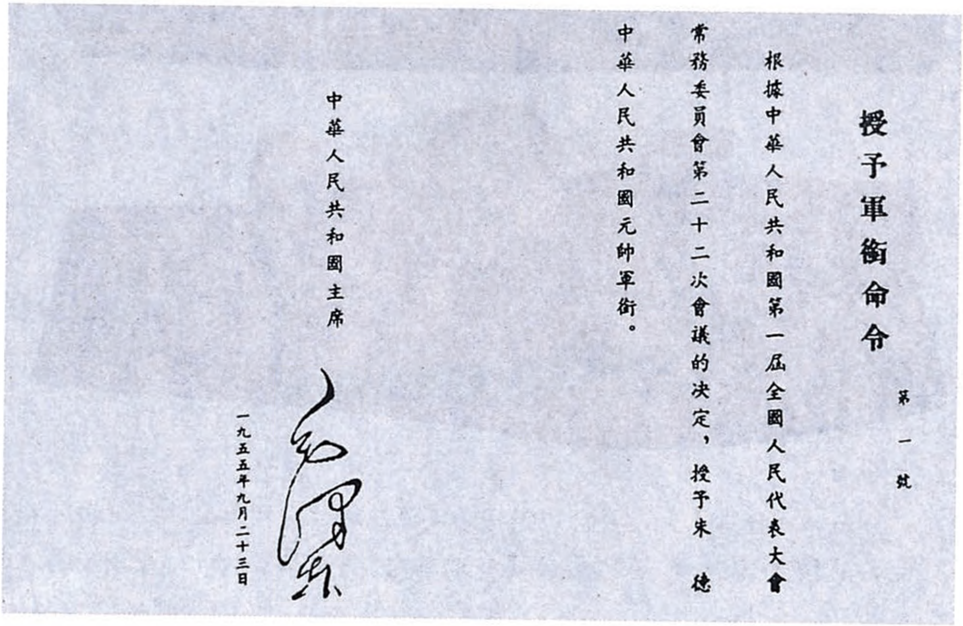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



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军衔，但毛泽东没有同意接受。图为给毛泽东准备的大元帅服、大元帅服肩章。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颁发授予朱德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



授予軍銜命令

第一號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的決定，授予朱德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授予朱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命令。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为朱德授勋。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为朱德授勋。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为陈毅授勋。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为罗荣桓授勋。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授予人民解放军女将军李贞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授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一级解放勋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55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肩章。

中共中央关于贺诚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1955年9月30日）

几年来贺诚同志在主持中央卫生部工作中，在方针路线上和中央有分歧，特别是在团结中西医、医学教育、面向工农兵和干部政策等方面，贺诚同志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贺诚的错误，已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希望他切实改正。

征求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的意见的信和批语

（1955年9月30日、10月2日）

一

政治局各同志：

送上陈伯达[1]同志准备在六中全会上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件，请即予审阅。如有修改的意见，请在文件上注明，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交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二

尚昆[2]同志：

此件请于今夜印十几份，明日上午即送交各政治局委员，外加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1]等人各一份。并请你用电话催他们于十月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看完，批注意见直交陈伯达同志，二日下午或晚上必须印发到六中全会各同志。

我的短信，请附印在封面上，或另印一纸条。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廿二时

三

尚昆同志：

此件请即付印，发给参加六中全会的各同志，每人一份，于明（三）日发到各人手里。

毛泽东

十月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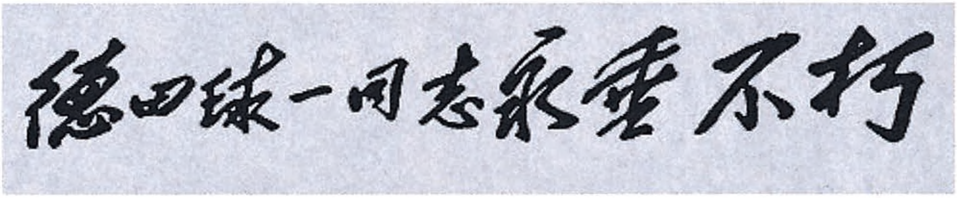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为德田球一题词[1]

（1955年9月）

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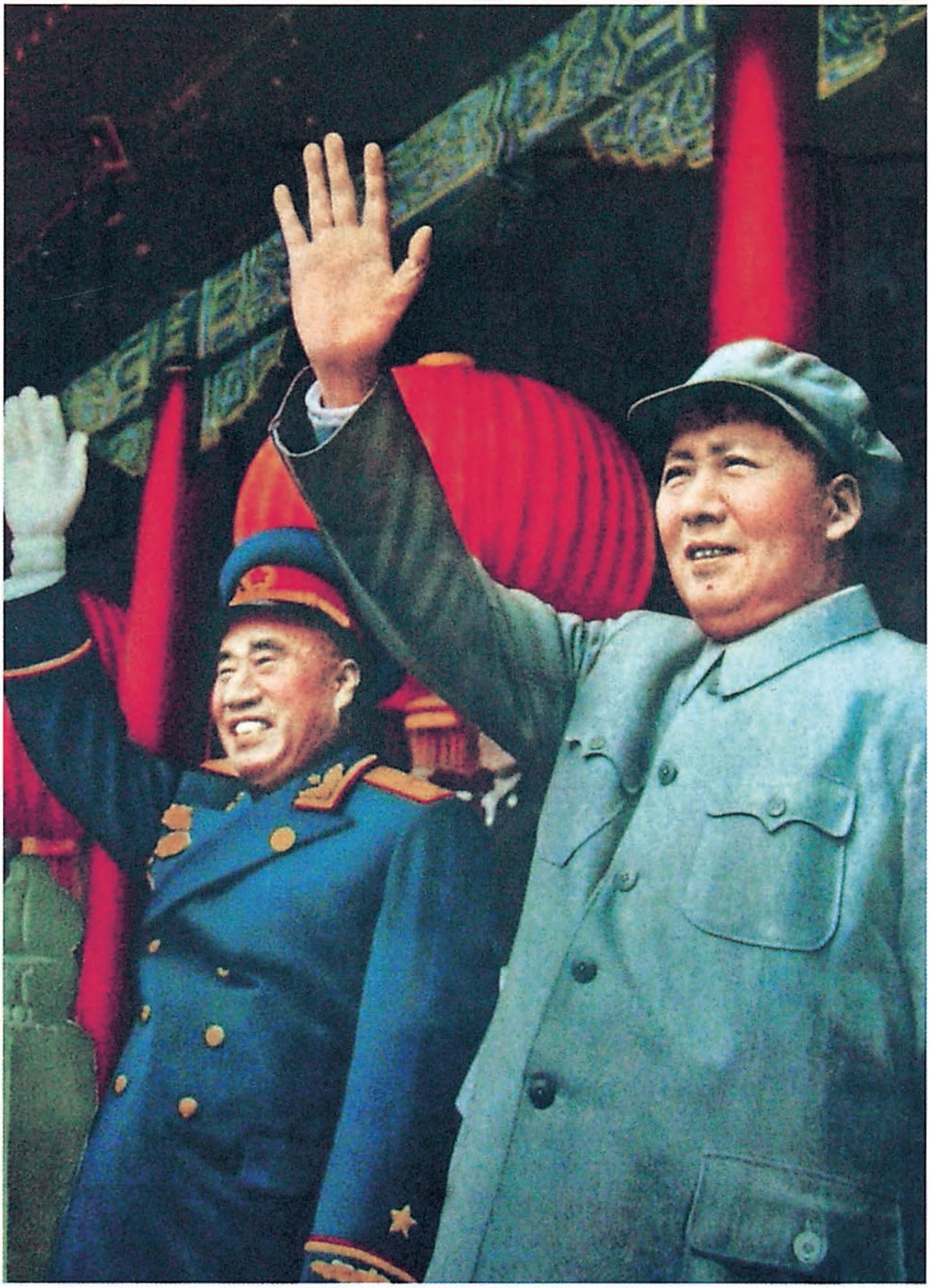


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毛泽东为德田球一的题词。

---

[1] 德田球一（1894—1955），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55年去世，同年9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3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其题词：德田球一同志永垂不朽。



195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一起检阅陆海空三军部队。

1955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答礼。

195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

答谢苏联军事顾问团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

（1955年10月2日）

一

退肖向荣[1]：

照办。[2]

毛泽东

十月二日

二

彼特鲁塞夫斯基上将、彼得洛夫上校、马里雅申上校[3]并转顾问团

---

[1] 肖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国防部办公厅主任。

[2] 这个批语写在肖向荣1955年9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肖向荣转交了苏联军事顾问团为祝贺我国国庆给毛泽东的信，并为毛泽东代拟了复信。

[3] 彼特鲁塞夫斯基，当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彼得洛夫，当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团政治处副主任。马里雅申，当时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党组织书记。

全体同志及其家属各同志：

当我国六周年国庆之际，承赐祝贺，并表达良好的愿望，谨致深切的谢忱。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和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及所有在我国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热情、无私的帮助分不开的。对此，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祝彼特鲁塞夫斯基顾问团在京专家及其家属的身体健康、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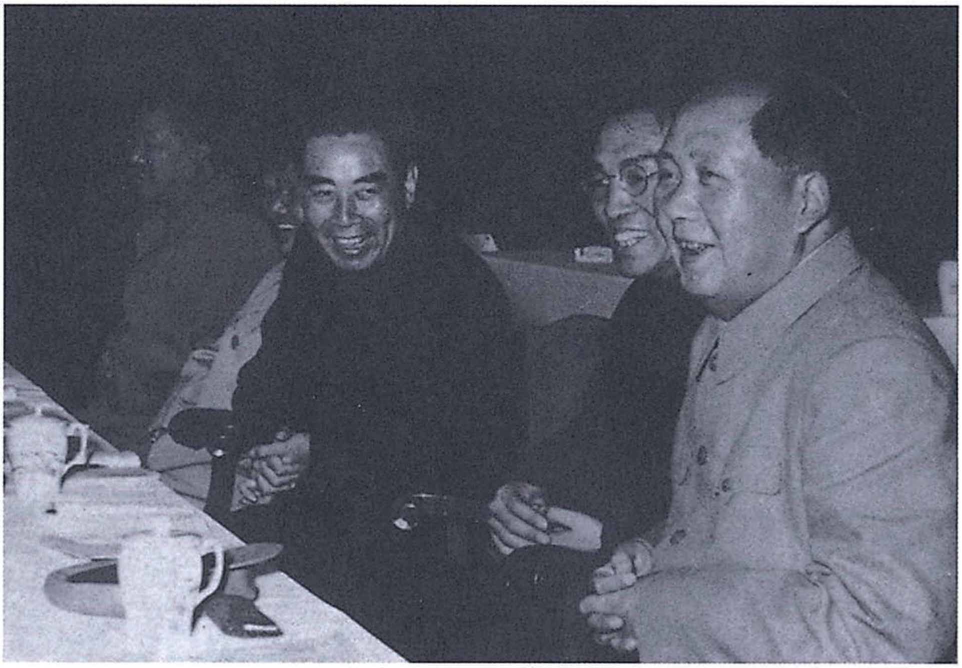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二日

为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题词[1]

（1955年10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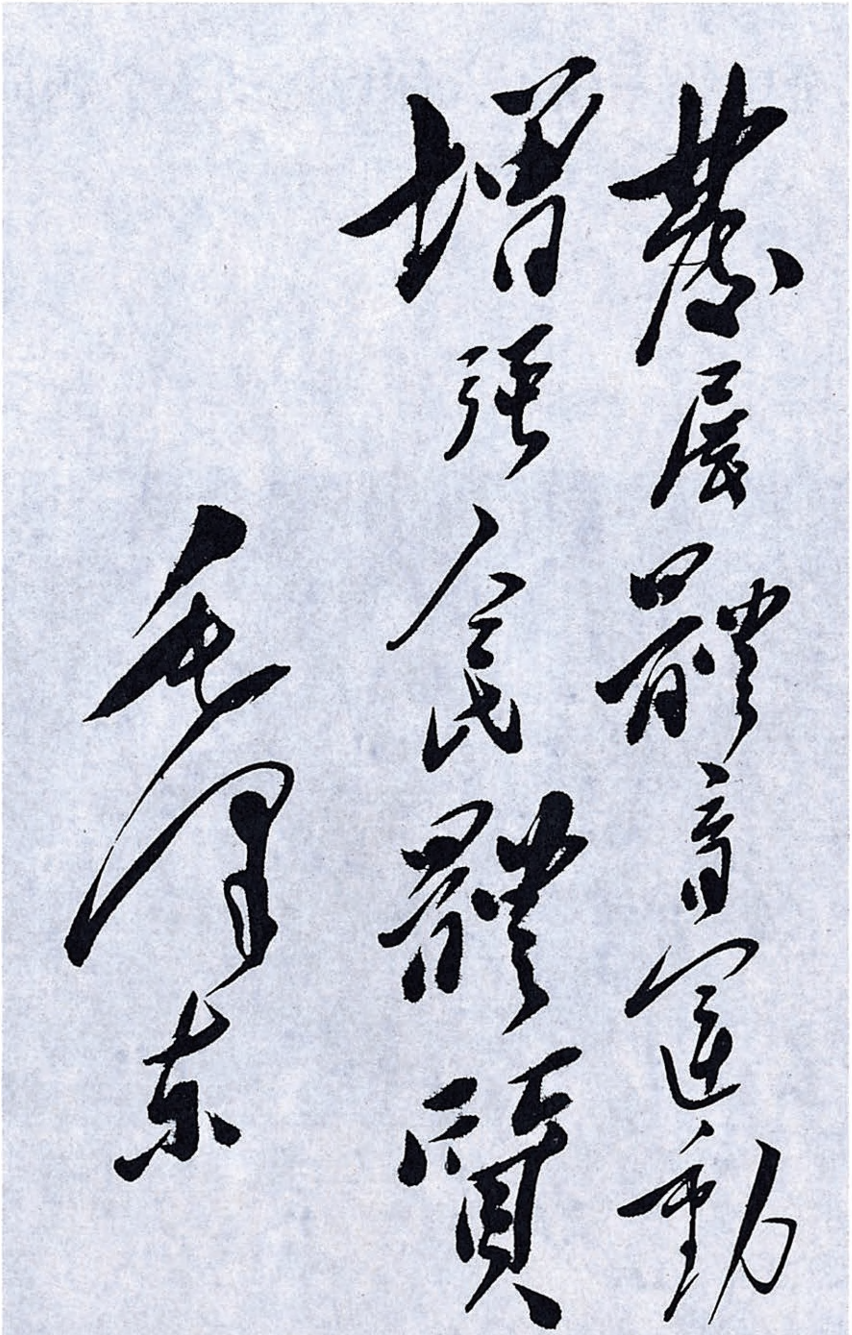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1955年10月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开幕式。

---

[1] 1955年10月2日，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对工人阶级自己的运动会非常关注，给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發展體育運動
增強人民體質

毛泽东

毛泽东为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的题词。

中意重建邦交对双方都有利[1]

（1955 年 10 月 3 日）

对你们促进重建中意两国邦交的努力，我们很赞成，重建邦交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说到困难，只有一点，我们要求意大利同蒋介石断绝关系，我们反对美国搞的“两个中国”。就以我们同英国的关系来说，是在英国同蒋介石断绝了大部分的关系之后才互相承认的；但英国又在联合国承认了蒋介石，因为如此，我们同英国只有半外交关系，仅只互派代办。意大利现在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不发生在联合国承认国民党的问题。问题在于美国给意大利施加压力，要它不承认人民中国。只要意大利政府能抵抗这种压力，我们马上可以建交。估计这还要有一段时间。

有些国家对中国人民并不友好，只要是建立了正常关系，我们也做生意。我们很愿意同意大利建立正常的关系，这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可以举出印度、缅甸、印尼、巴基斯坦、瑞典、丹麦、挪威以及瑞士，都是同蒋介石断绝了关系才同我们建立正常关系的。但是英国却在联合国拖了一条尾巴，我们向英国人提出这个问题，英国人也很难回答。

---

[1] 这是毛泽东和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意大利全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彼特罗·南尼谈话的一部分。

我们的艺术团目前正在意大利演出。意大利是否也可以组织个艺术团来中国呢？可以试行各种来往的办法。意大利派来的代表团当中也可以包括资本家，让他们来看看。中国也可以派代表团去意大利，只要意大利政府同意。现在我们同日本的来往就比较多，在中国的日本代表共有二百多人。

我们正在做过去所没有做过的工作，为了做得好些，一方面自己努力，另一方面需要朋友的帮忙。你们来中国我们很欢迎。

1955年10月，毛泽东会见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彼得罗·南尼及夫人时为其签名留念。

给周世钊[1]的信

（1955年10月4日）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2]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3]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4]。

顺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程颂万，湖南宁乡人，晚清诗人。

[3] 曹子谷，湖南长沙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4] 赫曦台，是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附属建筑之一。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的电报[1]

（1955年10月6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全德意志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六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获得了重大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争取德国和平统一的坚强堡垒和维护欧洲和平和安全的重要因素。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德国人民为和平、统一、民主所进行的斗争和苏联为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所作的努力。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电报。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六周年。

发展和巩固！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中、在争取德国和平统一和欧洲集体安全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月六日

对邓小平[1]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0月7日）

一

退邓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2]，请你斟酌。

毛泽东

十月七日

二

在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抱着右倾观点的共产党员中，确有一些同资产阶级共呼吸的人，他们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者。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稿所作的修改，即本篇二、三，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他们中的多数则是反映富裕中农的思想。

三

一切在这个问题上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因为他们同党外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某些共同点，他们在资产阶级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就会丧失警觉，解除武装，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资产阶级分子的谬论。例如在一九五三年，党内党外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苦”，而在一九五五年，党内党外又都有人叫喊所谓“农民生产情绪低落”，我们怎样能够希望这样的同志去理直气壮地驳斥党外的那些谬论呢？

对彭真[1]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0月9日）

一

即退彭真同志：

此件很好。作了一点修改[2]，请酌定。

毛泽东

十月九日

二

农民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应该知道他们的优点——这是他们基本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知道他们的缺点，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缺点；只有清醒地了解他们是劳动者又是小私有者这样两方面的情况，了解他们有保守性，但是他们的这种保守性又是可以被说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即本篇二、三、四，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服而加以改变的这样两方面的情况，才好帮助、教育他们，领导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进行自我改造。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巩固工农联盟，并且最后把工农融合成一体，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

三

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这是同我们党的限制资产阶级和限制富农的路线完全不相同的。他们不是限制资产阶级和富农剥削自由，而是用法令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可以进行无限制的剥削，并且加以提倡。

四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最后彻底消灭农村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是五万万农民群众的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革运动，是使城市资产阶级彻底地孤立起来，造成一种使他们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不可的形势，因而可以彻底地消灭一切城市资本主义痕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1]

（1955年10月11日）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的主席台。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结论。

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及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讲一些意见。

一　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农业合作化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关系问题，即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在同一时期内基本上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农业合作化和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农业合作化，工人阶级还没有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巩固的联盟，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还是动荡不定的。过去我们同农民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那个联盟，现在农民不满足了。对那一次得到的利益，他们有些忘了。现在要有新的利益给他们，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在，农民还没有共同富裕起来，粮食和工业原料还很不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就可能

在这个问题上找我们的岔子，向我们进攻。几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完全新的形势：工人阶级和农民在新的基础上结成比过去更加巩固的联盟。

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联盟，它巩固一下又不巩固了。在土地改革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共产党走没有意思，分了土地还是穷，他们为什么要跟你走呀？那些富裕的，变成富农的或很富裕的，他们也不相信我们，觉得共产党的政策总是不合自己的胃口。结果两下都不相信，穷的不相信，富的也不相信，那末工农联盟就很不巩固了。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那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嘴巴就被堵住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自己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恩来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工业品来换得农产品。十月革命后有一个时期，列宁就打这个主意。因为国家没有工业品去交换，农民就不拿粮食出来，单用票子去买他不干，所以列宁打算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主义结成联盟，为的是增加工业品来对付农村中的自发势力[1]。我们现在搞一

---

[1]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

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这是讲这两个联盟的相互作用。这两个联盟，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这两个联盟，在我们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都是必要的。

土地改革，使我们在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同农民结成了联盟，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农民得土地这件事，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它只破坏封建所有制，不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一次联盟使资产阶级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一九五〇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有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在这方面，良

心少一点好。我们有些同志太仁慈，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总是要消灭的。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是历史上发生的，既有生就有死。资本主义这个东西是历史上发生的，也是要死亡的，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就是“睡”到那个土里头去。

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十五年已经过了三年，再有十二年就行了。看样子是可能争取的，要努力争取。我们应当在外事工作方面、国防建设方面加强努力。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的胜利，并且将要继续取得胜利。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反唯心论的斗争，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已经搞了一年。我们要把唯心论切实地反一下，准备搞三个五年计划。在反唯心论的斗争中间，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镇压反革命，准备今年和明年一年，在包括国营工厂、国营商业、合作社、县、

区、乡各种组织，还包括军队的干部、工厂的工人在内，大概共一千二百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讲起反革命来，好像没有好多，看也看不见，一查，确实有，现在就已经查出来一批。粮食问题上也打了一大仗。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我们党内也有一股谣风，因此我们就展开了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们进行过许多斗争，这次会议也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展开了巨大的斗争，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和进攻，取得了主动。

资产阶级怕我们在这几个问题上对他们展开斗争，特别是怕镇压反革命。我们的镇反工作搞得好。这个工作要注意讲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才叫反革命，就是要搞真反革命，不要搞出假反革命来。也要估计到，可能会出假反革命，说不出，那很难。但是，我们要求出少一点，尽可能不出假反革命。要完全合乎规格，货真价实，硬是真反革命，不要冤枉好人。同时，也可能漏掉一些真反革命。你说这次搞得那么干净，也不见得，漏掉是难免的，但是要尽可能少漏掉一些。

二　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群众的许多发明，破除了许多迷信，打破了许多错误观点。这次讨论，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这是一个主要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群众要求大发展，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要求农业适应工业，所以那种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

其次，是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现在解决了，都能发展。

第三，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凡是条件成熟了的地方，都可以办合作社。有一部分地方，比如西藏、大小凉山那些地方，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就不能去搞。

第四，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现在证明也是可以办的。

第五，“办社容易巩固难”，这一条迷信也破除了。办社也不是那么十分容易，巩固也不是那么一定困难。一定要讲办社就容易巩固就难，这实际上是主张不要办社，或者少办为好。

第六，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一定要有机器才可以办社的空气现在不大了，可是也还有这个观点。这一条迷信也是能够完全破除的。

第七，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当然有某些少数确实不能办下去的社，可以退到互助组，但一般的所谓坏社，是不应当解散的，经过整顿是可以变好的。

第八，所谓“如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这大概是中央农村工作部传下去的一个“道理”。中央农村工作部不仅出谣风，还出了许多“道理”咧。我看这一句话大体“正确”，只改一个字，把“下”字改为“上”字就行了。你们农村工作部也不要悲观，你们给我这么多字都采用了，只改了你一个字。一字之差，我们的争论就是一个字，你要下马，我要上马。“如不赶快上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确是要破坏的。

第九，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这种说法是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的。耕牛死亡主要原因不在合作社，而是由于水灾，牛皮

价格过高，饲料不够，还有一些是老了，应当杀了。

第十，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这么讲是错误的。我们今年春季农村的紧张情况，主要是由于粮食问题引起的。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广大农民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充分的教育，同时我们的粮食工作也有缺点。去年究竟购多少适当，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摸底，多购了七十亿斤。现在我们就来一个调整，准备减购七十亿斤，加上今年又丰收，这样，农村情况也就可以缓和下来。

第十一，还有一种什么“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说法，这是悲观主义。我看合作社的优越性决不止三年，社会主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到了将来社会主义不能代表优越性的时候，又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来代替它。

第十二，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这个问题在过去是不清楚的，这次大家提出来了。应当办一批高级社。至于办多少，你们去研究。

第十三，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这也不对。今天看起来，从事木帆船、兽力车这类运输业的几百万劳动者，也应当组织合作社。

根据大家的讨论，我们解决了这许多问题，这是这次中央全会的重大收获。

三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全面规划应当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规划；第二，农业生产的

规划；第三，全部的经济规划。农村全部的经济规划包括副业，手工业，多种经营，综合经营，短距离的开荒和移民，供销合作，信用合作，银行，技术推广站等等，还有绿化荒山和村庄。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这件事情对农业，对工业，对各方面都有利。

还有什么规划呢？还有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中学里面增加一点农业课程，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网、电影放映队，组织文化娱乐等等。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还有镇压反革命。在整个规划里面都要有这些部分。

规划应当有这么几种：（一）乡村合作社的规划。每个合作社应当有个规划，虽然小也应当有规划，让他们学会搞这一套。（二）全乡的规划。我们全国有二十二万多个乡，搞二十二万多个乡的规划。（三）全县的规划。我们希望每一个县搞一个。现在，有的县已经搞出了很好的规划，看了很有味道。他们思想解放，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脚镣手铐的束缚，规划搞得很生动。（四）全省（或自治区、各市郊区）的规划。这里面着重全乡的规划，全县的规划。要抓住这两个环节，迅速作出一批，比如一个省里面搞三、四个县的规划，发出来要各地仿照办理。

合作化的规划，要分别不同地区规定发展的速度。分三种地区。第一种多数地区，第二种一部分少数地区，第三种又一部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要有三个浪潮，三个冬春。三个浪潮是：今冬明春，明冬后春，再加一个冬春。三个冬春就是三个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间要歇一歇。两山之间有一谷，西波之间有一伏。这

种地区到一九五八年春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第二种地区有两个冬春、两个浪潮就够了。比如在华北，东北，还有一些郊区。这一部分地区中有个别地区到明年春季就可以基本合作化了，只有一个浪潮就到了。第三种地区，就是另外一些比较少数的地区，需要有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冬春。这里还要除开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即大小凉山、西藏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的不能搞。什么叫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呢？这就是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的农村人口加入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这里面有一个回旋的余地，百分之七十也可以，百分之七十五也可以，百分之八十或者超过一点也可以，这样就叫作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剩下一点那是以后的事了。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这样讲老百姓比较容易懂。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三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切记不要使问题成了堆，才来一个总结，放马后炮。过去我们许多工作是这样搞的，中间有问题不去解决，让它去成堆，然后到完了的时候来一个总结，来一个批评。有些同志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是犯过这个错误的。不要专门喜欢事后批评。事后也必须批评，最好是刚露头就批评。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煞车，或者叫停车。像我们坐车子一样，下陡坡遇到危险，马上把车煞住。省、地、县都有煞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这就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有这几条，我看就可以使合作社的质量比较好，就可以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关键在今后两年，主要在今后五个月，就是今冬明春。从今年十一月到明年三月，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在今后五个月之内，省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区一级，乡

一级，这五级的主要干部，首先是书记、副书记，务必要钻到合作社问题里面去，熟悉合作社的各种问题。时间是不是太短？我看有五个月切实钻一下也可以。省级同志认真地钻一下，当然很要紧，特别是县区乡的同志，如果他们不钻，搞起许多合作社，自己又不懂，那很危险。如果老钻不进去，那怎么办呢？就应当改换工作。五个月以后，即明年三月以后，中央也许再召集一次现在这样的会。到那个时候我们要比质量，大家发言的重点，就不要重复这次的讲演稿，要有新东西，就是要讲全面规划的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意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有几项关于领导方法的建议，看是不是可行。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一年开几次会，或者大会或者小会，解决当前发生的问题。如果有问题，就要从个别中看出普遍性。不要把所有的麻雀统统提来解剖，然后才证明“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从来的科学家都不是这么干的。只要有几个合作社搞清楚了，就可以作出适当的结论。除了开会的方法以外，还有打电报、打电话、出去巡视这些方法，也是很重要的领导方法。另外，各省要选择恰当的人，办好刊物，改善刊物，迅速交流经验。再一点建议，是不是请你们试试看。我用十一天工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1]。你们每个省、每个自治区是不是可以一年或者半年编一本书，每个县搞一篇，使得各县的经验能够交流，这对迅速推广合作

---

[1] 这里是指毛泽东同志看了各地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件事。参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化运动有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发简报。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区党委，省委、区党委对中央，都要有简报，报告合作社进度如何，发生了什么问题。各级领导接到这样的简报，掌握了情况，有问题就有办法处置了。这是关于几个领导方法的建议，请各位同志考虑。

四　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现在有一句话，就是要思想交锋。好比打仗，你一刀杀来，我一刀杀去，两把刀子要打中，这叫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就在思想上交锋了，有明确性了，有彻底性了。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我想只有两条：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本人也有不愿意继续革命的，比如陈独秀不愿意继续了，张国焘不愿意继续了，高岗、饶漱石不愿意继续了，那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是愿意继续革命的。但是还有一条，要准许别人革命。我们不要当《阿Q正传》上的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也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高岗不准人家革命，结果还不是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方面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

有宽大的态度。没有后一条是不好的，关系就不正常。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我们应当这样做，应当有这种信心。犯错误的本人也应当有这种信心。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但不要以成绩当包袱。这一点他自己说了，说是有点摆老资格。人要虚心一点。只要虚心，愿意接受同志们的帮助，我们相信他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我们现在对于城市的资产阶级、农村的资产阶级（富农）是用限制的政策。那种对于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就有问题了。我说是“四小自由”。这有大小之分。在限制之下，资产阶级这些自由是有那么一点，小得很。我们要准备条件，把资产阶级这个小自由搞掉。对于城市资产阶级，我们叫做利用、限制、改造。要利用，但是它那个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我们就要限制。这样的政策是又不“左”，

又不右。根本不限制，那就太右了。限制死了，根本不准他们搞什么东西，那就太“左”了。列宁说过，一个政党如果在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1]。但是邓子恢同志的提法是不对的，因为他不提限制，跟中央的提法不同，跟二中全会的提法不同。

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和党在长时期中提倡的政策，差不多根本不理，似乎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过，不晓得什么道理。比如互助合作运动这件事，多少年以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延安，在哪一个根据地都搞过，却等于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一九五一年冬季中央就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也是没有看见。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者，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小惠者，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就是讲，有些同志对于党的决议或者长期提倡的一些政策，一些纲领，根本不理，自己单另搞一套。他们也不去查一查，同类性质的问题到底过去有人讲过没有，怎么讲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乌龟壳、金石文和地下挖出来的其他古东西还要去考，而这些同志对我们的时间不长的东西，却根本不理，也懒得去查。总而言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那样写，就是那样讲，例如讲些什么“四大自由”呀这类东西，结果好，碰了壁。

还有些同志老是很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原先是图舒服，立起一个王国来，自己称王。结果怎样呢？结果搞得很不舒服，要受批评。不是有个《大登殿》的戏吗？看那个薛平贵做起王来很舒服，他那个时候没有自我

---

[1]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

批评。这一点不好。有许多人总是不爱跟人家商量一下。许多同志口里赞成集体领导，实际上十分爱好个人独裁，好像不独裁就不像一个领导者的样子。当一个领导者不一定要独裁，你晓得！资产阶级有个资产阶级民主，它讲究阶级独裁。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有事情总是应当跟人家商量一下，在一个集体中间通过，集中多数人的智慧，这比较好。

还有一种情况也需要讲一讲。有许多同志老是钻到公事堆里头，不研究问题。公事要不要办呢？那是必须要办的。不办公事不行，但是，单是办公事，不研究问题，那是危险的。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你看究竟我想的对不对，请你谈一谈你的意见。”这样，就嗅不到政治气候，鼻子很迟钝，害政治感冒。鼻子塞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气候，闻不到。今天陈毅同志说了，事物冒了一些头就要能够抓到。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这种专门办公事，而不注意研究问题，不注意接触群众和干部，对他们不采取商量的态度，是很不好的。

五　若干其他问题

下面讲的一些问题，大多数是同志们提出来的。

第一，改换富裕中农在合作社中间的领导地位这样一件事，要讲究步骤，讲究方法，不要一阵风把他们同时拉下来。虽然富裕中农做领导者不适宜，可是他们是劳动者。应当分别情况，看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究竟怎样。有些人是必须要撤下来的，因为他在那里

继续搞，实在是很不行了。但也要使得群众（比如合作社的社员）和富裕中农本人都了解，他确实不适于继续当领导者。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准备了较好的接替的人，培养了比较好的人去代替他，才去改换他的工作。有的可以经过他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继续任原职，有些可以改为副职或者委员。至于本来干得好的，虽然是富裕中农，那当然不在撤换之列。不要把富裕中农当成富农看待，富裕中农不是富农。不要一下子统统撤换。对待这个问题要小心，必须好好地解决。上面说的几种办法，是不是可以，各省各地去研究一下。

第二，要在支部和群众中间说明，这一回我们讲下中农和上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层，不是重新划一次阶级，而是因为事实上各阶层对于合作化的态度有积极消极的区别，在一个阶层的内部的个人也有这种区别。比如贫农中间就有暂时不入合作社的。这一点是可以去说服这些富裕中农的：你看，贫农、下中农也有比较消极的，他不愿意来，也就不要他入，那末你富裕中农现在不愿意来，也就可以不来。我们先把热心的人搞进来，然后向第二部分人宣传，热心了又进来，再向第三部分人宣传。要分期分批。一切的人将来都要入社的。所以，不是什么重划阶级。

第三，关于地主、富农入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以县和乡为单位（县为单位还不够，因为一个县基本上合作化了，但是也可能有些乡还没有合作社），一个县，一个乡都基本上合作化了，就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农户入社了，那个地方已经巩固了的合作社就可以开始分批分期地按照地主富农的表现怎么样来处理。有一些表现历来都好，老实，归附国法，可以给以社员的称号。有一些可以在社里头一起劳动，也分取报酬，但是不叫作社员，实际上是候补社员；如果他们搞得好，也可以变成社员，让他们有个奔头。第三部分人，暂时不许入社，等到将来再讲，分别解决。所有这些地

主富农入社后不要担任合作社的职务。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

第四，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1955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

第五，合作社建社的时间是不是可以考虑不要一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和春季，夏季、秋季也可以建一些社，现在有些地方实际上

是这么搞的。但是，必须指出一点：在两个浪潮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休整的时间，发展一批之后必须要整顿，然后再发展，同打仗一样，两仗之间要有休整。不要休整，不要间歇，不要喘一口气，这是完全错误的。在军队里曾经有过这样一些意见，说是不要休整，不要喘气，就是要一往无前，要尽打，那事实上不可能。人是要睡觉的。今天我们这个会，如果不散会，尽这么开下去，所有的人都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人每天要大休整一次，要睡七八个钟头，至少要睡五六个钟头，中间小休整那还不算。搞合作社这样的大事不要休整，那种说法是很幼稚的。

第六，“勤俭办社”这个口号很好。这是下面提出来的。要严格地节约，反浪费。现在城市里头大反浪费，乡村里头也反浪费。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要勤俭办社，就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严格节约，降低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是任何一个合作社都必须做的工作。至于经济核算，那就要逐步来。合作社办大了，没有经济核算那是不行的，要逐步学会经济核算。

第七，这一次没有人讲国营农场的问题，是个缺点。希望中央农村工作部和农业部研究国营农场的问题。将来国营农场的比重会一年一年大起来。

第八，要继续反对大汉族主义。大汉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汉族这么多人，容易看不起少数民族，不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所以必须严格地反对大汉族主义。当然，少数民族中间会要发生狭隘民族主义的，那也要反对。但是，这两个东西，主要的、首先要反对的是大汉族主义。只要汉族同志态度正确，对待少数民族

确实公道，在民族政策上、民族关系的立场上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就是说，没有大汉族主义，那末，少数民族中间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现在大汉族主义还是很不少的，例如包办代替，不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等等。在今年三月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我曾经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第九，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

第十，有人问：什么叫“左”右倾？过去我们讲过，事物在空间、时间中运动。这里主要讲时间，人们对事物的运动观察得不合实际状况，时间还没有到，他看过头了，就叫“左”倾，不及，就叫右倾。比如讲合作化运动，本来有群众的积极性、互助组的普遍存在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成熟的条件，可是有些同志说还没有；合作化运动这个事物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是早几年，而是现在）已经可以大发展了，他们说还不能，这都叫右倾。如果农民的觉悟程度和党的领导力量这些条件还不成熟，就说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全国来个百分之八十合作化，这叫“左”倾。中国有句老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条件办事，是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比如生小孩子，要有九个月，七个月的时候医生就一压，把他压出来了，那不好，那个叫“左”倾。如果他已经有了九个月，小孩子自己实在想出来，你不准他出来，那就叫

右倾。总而言之，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第十一，有人问：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我们回答：完全可能。只要某个地方的领导方面，不管是乡支部、区委、县委、地委、省委，不去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去注意互助组的发展情况，又没有规划，又没有控制，不是分期分批，而是专喜欢数量，不爱好质量，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群众热潮起来，大家要求入合作社的时候，必须设想各种困难和一切可能的不利情况，向群众公开说明，让群众去充分考虑，不怕就可以干，如果怕就不要干。当然，也不要把人们吓倒了。今天我是估计不会把你们吓倒的，因为我们已经开了这么多天会。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过于膨胀，是必要的。

我们反对无穷的忧虑，反对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那末是不是可以根本不要忧虑了？清规一条也不要，戒律一条也不要？那当然不是的。必要的忧虑，应当有的忧虑，谁人不忧虑呀？也要有必要的清规戒律。没有点清规，没有点戒律，那怎么行呢？必要的忧虑，必要的清规戒律，必要的停顿、间歇、煞车、关闸，是完全应当有的。

有这样一个办法：当着人们刚刚想要骄傲的时候，那个尾巴刚刚翘起来的时候，就给他提出新的任务（比如现在我们提出比质量，明年来就要比质量，那时数量问题是第二位的了），使他来不及骄傲，他没有时间。这个办法，过去我们是试过的。在军队打了一个胜仗之后，有的同志刚刚同那些左右前后的人谈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尾巴翘得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给他提出打第二仗的新任务。把

新的任务一提出去，他马上就要想问题，就要做准备工作，那个翘起来的尾巴就下去了，他来不及骄傲。

第十二，有的同志提出，可以不可以允许县一级有百分之十的机动权？比如讲办合作社，可以少百分之十，也可以多百分之十。我看这个建议是可以采纳的，这一条好，不要搞得那么死。请你们再去考虑。

第十三，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第十四，有人问，将来的趋势如何？趋势就是：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据我看，就是这么个趋势。不过还可以加一点，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

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第十五，你们对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有许多修改的意见，很好，搜集起来我们考虑一下。今天通过以后，决议在几天内就可以由政治局加以修改公布。章程还要慢一点，要跟民主人士商量，要采取立法的手续，也许和兵役法一样，先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一下，交给国务院公布征求意见，各地方就可以照那样试办一个时期，到了明年，再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最后，我顺便讲一点请你们注意写文章的问题。我希望在座的都变成“国文教员”。你们的文章写得很不错，也许略有缺点。你们要注意帮助人家，把文章的作风改一改。现在许多同志的文章，空话连篇的也有，但比较少；主要的缺点就是古文多，半文半白的味道很大。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了不应当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于省掉动词，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注意。

对袁希洛[1]要求去见蒋介石的信的批语

（1955年10月12日）

刘、周、陈毅、彭真[2]阅，退毛。

此人要求之〈去〉见蒋，我说须得台湾许可才能去，因此他写了一封信[3]，似可听其发去。此人书生气很重，人是好人。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退徐冰[4]处理。

---

[1] 袁希洛，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会员和临时议会代表，20世纪20年代曾任江苏省启东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指袁希洛1955年10月给蒋介石的信。

[4]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再次征求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稿的意见的信

（1955年10月15日）

刘、周、朱、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康生、张闻天[1]各同志：

此件我已全文再看了一遍，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觉得整个文件是好的。请你于收到即看，于十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以前**看完，注明修改意见，交陈伯达[2]同志再作修改，于十六日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零时十分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

（1955年10月15日）

热烈地欢迎你们。我们都属于有色人种。有色人种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有色。有些人喜欢有色金属而不喜欢有色人种。据我看，有色人种相当像有色金属，有色金属是贵重的金属，有色人种至少与白色人种同等贵重。有色人种同白色人种一样都是人，都是第一类，不是第二类。第二类是动物，不是人。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肤色，都是平等的。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你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比我们高明，你们是工业化的国家，而我们现在还是农业国，我们正在努力。

客人来看主人，是客人看得起主人，做主人的应该感谢客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以后我们要多来往。世界上没有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如果只有一方面感谢另一方面的事情，那就不好了。相互有好处，相互有帮助，相互应该感谢。

我们两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国家压在我们的头上。你们以为中国是独立的国家，是不是？中国现在没有完全独立，和

你们的情况一样，你们也不是完全独立的，这是共同点。现在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它欺侮我们，不承认我们，说我们不算一个国家。我们承认它，它倒不承认我们。因此连累了你们，使得你们现在也很难承认我们。其实日本人民大多数是承认我们的，由于美国的手，使你们感到时间还没有到。这件事情，总会有一天要得到解决的。日本、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都会承认我们的。我们也不着急，你们不承认我们，我们就不能吃饭睡觉了吗？我们还是可以吃饭睡觉的。你一百年不承认我们，一百零一年总要承认我们的。

我们头上的手一定要顶走的。中国人民头上的手，日本人民头上的手，菲律宾、南朝鲜以及一切被压迫国家人民头上的手，总有一天要顶走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谅解你们的，根本不责备你们没有与我们建立国交。过去你们承认蒋介石，我们外交部曾责备过你们。但我们对整个日本民族是谅解的，中国人民愿意你们的力量更加强大起来，把美国的手顶走。我们曾经顶过美国的肚子。抗美援朝把美国顶了一下，它想跨过鸭绿江，我们把它顶回到三八线。这对日本有好处。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总有一天也要把美国从台湾顶走的。这对我们有好处，对你们也有好处。祝你们每一个斗争能使你们的民族独立增加一分，每一个斗争能使你们的民族权利增加一分。这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你们。能够独立自主，是自己应做的事情。中日关系要赶快改进。过去我们一般中国人是不喜欢日本人的，现在我们很喜欢你们，看见日本

人很高兴。是不是你们过去占了便宜而现在吃亏了？你们过去没有占便宜，现在也没有吃亏。你们民族为恢复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一年一年、一天一天地发展的，这是可以看到的。你们独立了，还有很多国家要受到影响。

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紧张的，你们感觉怎么样？也许你们没有来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是共产党国家，而共产这个事情，有人说好，有人说坏，也许脑子里面会有一些紧张。中国对你们是不是有礼貌？是不是欢迎你们？是不是对你们提出许多责难？我想，也许你们没有来的时候是这样猜的。现在你们可以看出来了，因为你们已经来了十多天了。还可以再看一个时期，中国人民是不是对你们友好，是不是对你们提出责难。我们对你们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没有什么可紧张的。不要那么紧张，紧张了不好过日子，还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好。再说，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但这个不一致并不妨害我们相互的尊重和友谊。过去的老账并不妨害我们，今天制度的不同也不妨害我们。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主要是将来的问题。

世界各个民族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有它的长处，如果没有长处，它就要消灭了。在这一点上，我们都是有色民族，本来就是要互相尊重的。我们中国的缺点很多，一直到现在，还是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点，你们比我们强，几十年内你们能够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所以你们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我们现在还是个农业国，正在努力把这落后状态加以改变，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有现代文化的国家。这个方面，作为朋友来说，你们是可以提出批评的，讲一讲你们的意见，指出我们有哪些缺点。这不是什么干涉内政，干涉内政是你们外交

部长与我们外交部长的事。在这上面提提意见，我们外交部长是不会有意见的，你们有什么意见尽可以讲。很抱歉的是，我比你们落后，你们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你们的情况，我是落后分子。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地球转得很快，太阳刚出来一会儿就落啦。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

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美国的事情由美国自己管，我们不管它，但美国现在管得太多了。你们这个民族过去犯了个错误，但却因祸得福，卸掉了包袱，你们主动了。你们现在有资格来说美国人，也可以说法国人，也可以说荷兰人，也可以说比利时人，也可以说葡萄牙人，也可以说英国人，你们现在是处于很好的地位。你们参加了万隆会议，这不是偶然的。你们在万隆会议上的态度是好的，你们现在没有包袱了。我们中国过去也犯了个错误，过去的政府都是腐化的，清朝政府、北洋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是这样腐化的政府，因此影响中国到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是比较注重的，因为我们感到过去这一点做错了。现在我们抬起头来了，也有资格说人了。我们工业的落后现在正在克服，过去农业生产很低，比你们低得多，现在也在开始转变。我们在目前还是有许多缺点的，牛皮是不好吹的，苍蝇还有不少。希望你们保持现在的主动地位，搞好你们的事情，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你们每一个胜利都对我们有帮助，都值得我们感谢。美国现在尽犯错误，它排斥日本民族，奴役日本人民，杀害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问题。我们两个国家，需要相互帮助，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帮助你们，互相之间也不捣乱，我们不捣乱你们的事

情，你们也不要捣乱我们的事情。各办各的事情，在友好的关系底下办事，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

所谓天下大事，就是解放、独立、民主、和平友好、人类进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有本小说叫《三国演义》，一开头就是这两句话。这也是我们过去犯错误的一条，因为老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搞不成什么事情了。我可以说一句，将来世界上的事情，和平友好是基本的，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如果人家一定要打，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们要打，原子弹已经放在你头上，那么一炸，炸一个大窟窿，从中国炸进去，从美国炸出来。这个地球不大，据我知道地球直径只有二万五千一百多华里，就是一万二千五百多公里，打个窟窿有什么了不起呢？到那个时候，我看他们的事情就不好办了。你们没有殖民地，我们也没有殖民地，我们都不怕丧失什么东西，所以打世界大战只对他们不利。他们非常怕共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个苏联共产，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许多国家共产。从历史上看，共产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打仗，人民的精神就紧张，紧张的结果，就另外想出路。人并不是一生下来，他母亲就嘱咐他搞共产，我的母亲也没有要我搞共产。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另外，还有一些非共产的民族独立国家，如印度、印尼及亚非的一些国家，也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这个道理，我同尼赫鲁[1]总理讲过，我说，你们印度、印尼也是世界大战打出来的。我讲的这些话不是造谣，两次世界大战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就得到这么些结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调查，世界上确实有个苏联，确实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独立的印度等等国家。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讲我是扯谎的。虽然我不是个历史学家，但历史却明明摆在那里。当然，世界大战还是不打好。

他们也会讲：你们拿共产吓唬我们，威胁我们，进行颠覆活动。我们并不威胁他们，我们只是不要打世界大战。如果不打世界大战，他们的事情还可以继续，共产还可以来得慢一点。如果他们一定要打，并且已经打起来，那是把世界人民的精神再一次紧张起来，世界人民大都要共产了。你们不相信的话，我们可以打个赌，如果再打一次世界大战，世界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不共产的话，我就不吃饭啦，把饭都让给你们吃。这不是跟你们打赌，是跟美国打赌的，因为有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作证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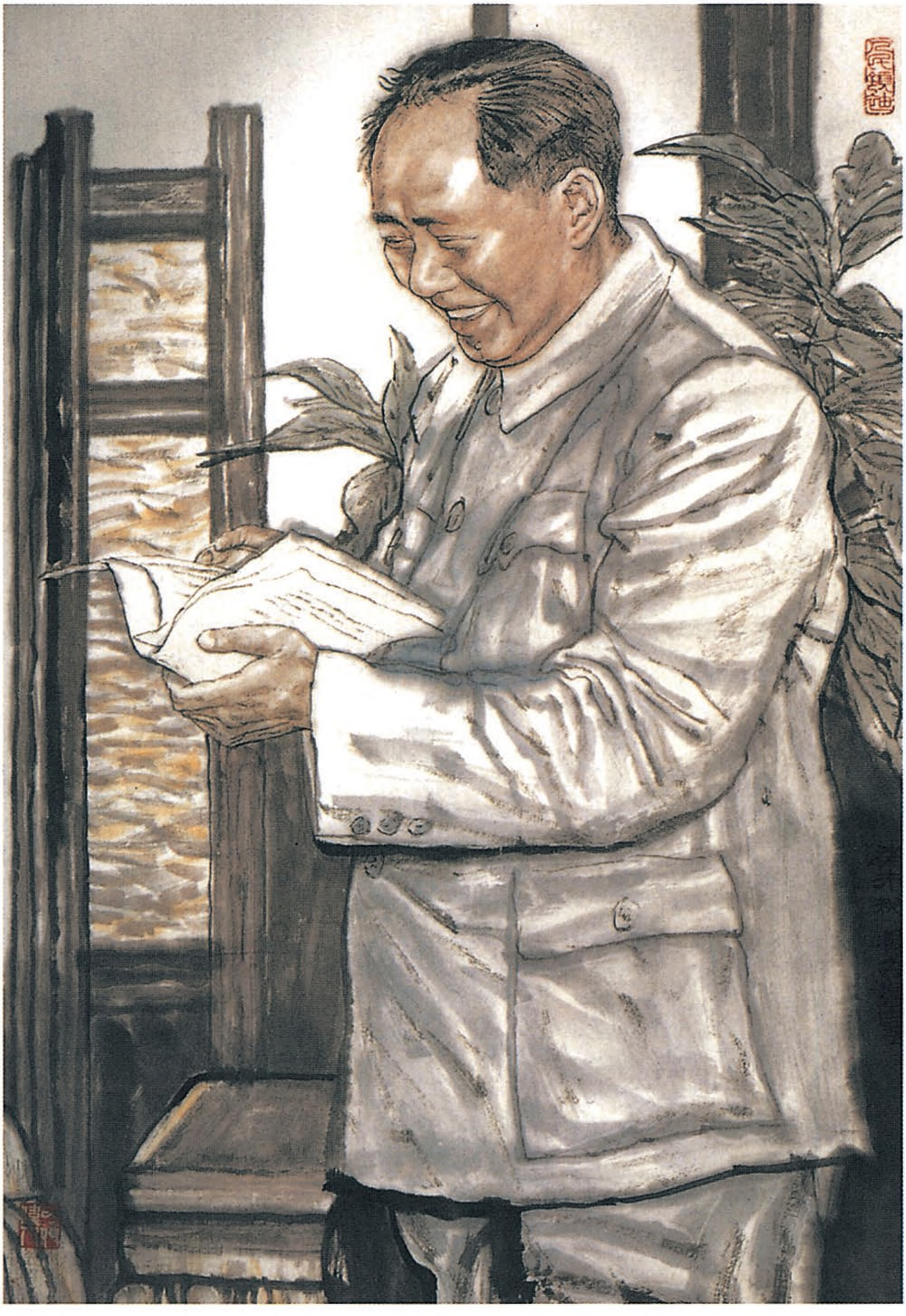
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账，现在你们不再欠账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账。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账。它欠了我们的账，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账再要来讨账，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怄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我很直爽地谈，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让美国的手缩回去，它的手太长了，美国很不应该。你们

日本人经过了多少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啦！

我们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这并不是能强制建立的）。战犯问题提得早了一点，把正常的外交关系恢复了，就尽可能争取迅速地解决这个问题。这道理很简单，我们并不需要扣留这批战犯。扣留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日本有人把政治问题说成是技术问题，说中日并没打仗，为什么是战争状态呢？但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文化交流，现在就可以做啦！日本歌舞伎剧团来了，它的演出很好，我去看了很高兴，对促进两国人民的谅解有帮助，在艺术上对我们也有所帮助。我们可以相互地取长补短，相互帮助。

1955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日本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长久原房之助。



《在中南海书房》（中国画）

关于与越南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批语[1]

（1955年10月16日）

刘、周、朱、小平[2]阅，退彭德怀同志。

已与彭商定，由彭德怀、陈赓、韦国清[3]三同志组织『组织』我方代表团为适宜，不要太多的人参加。粟裕[4]同志有病也可不参加。彭为团长，陈为副团长。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0月12日关于和越南代表团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陈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韦国清，当时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4] 粟裕，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在刘澜涛关于华北各省市传达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报告[1]上的批语

（1955年10月19日）

刘、周、邓[2]阅，退刘澜涛同志。

（一）结论[3]已请陈伯达、田家英[4]二同志加以整理，经我看过，并送各同志审阅后，或者可以发出。（二）全会各人发言稿，拟编印一书，发至地级或县级（待商定），其中有子恢[5]同志的自我检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可以不要特别的传达了。（三）马明方[6]

---

[1] 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1955年10月17日给毛泽东的报告说：自主席本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了结论之后，华北各省市和内蒙五个小组都开了小组会，14日又召集了地委书记以上的同志开了汇报会。各省市对于传达问题很重视，希望印发主席结论的标准记录，早日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并提出了关于中央农村工作部所犯错误的内容传达到哪一级为适宜等问题。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毛泽东1955年10月11日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后来这个结论整理稿没有正式发出。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5] 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6]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同志的发言宜作『宜』适当的修改，即请澜涛商明方一办，将修正稿交胡乔木[1]同志，因他在担任编这本书。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对北约空军演习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5年10月19日）

此件[2]可以一阅。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0月13日报告的批语。

[2] 指彭德怀转呈的由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研究室编写的专题资料。资料介绍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6月底在西德、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东部举行的代号为“空白纸”的空军演习情况。此次演习，美、英等国空军出动飞机3000多架，历时8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空军演习，其目的在于试验“闪击式原子战”的可能性和效果。对演习结果有不同反映，美英方面偏重于夸大原子弹威力和强调主动进攻的优越性，某些高级军官公开表示未来的世界大战可在几天内决定胜负，西德国防部部长则强调建立陆军的必要性。

对章乃器[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5年10月、11月）

一

刘、周、陈、邓、彭真[2]阅，退毛。

章乃器的信[3]。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陆定一、陈伯达[4]阅，退毛。

---

[1] 章乃器，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指章乃器1955年10月1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学习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的体会。

[4]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二

此信的主要目的在这一段，意思是说，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清规戒律太多了。[1]

三

周、陈、彭真、李维汉、徐冰阅，退毛。

章乃器的信[2]，值得一看。

四

乃器部长：

前后两信均已收到阅悉。感谢通知我这些情状和你的意见。干部中的片面观点总是会有的，问题是好好帮助他们学会实事求是全

---

[1] 这个批语是针对章乃器1955年10月18日给毛泽东信的最后一段写的。信中说："最后，提出一点建议：应该号召搞宣教工作的人们学习一些巴甫洛夫的基础知识，让他们从那里找到'与人为善'和'循循善诱'的科学根据，从而减少清规和戒律；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正确地划清唯物和唯心的界限，以至更好地掌握辩证法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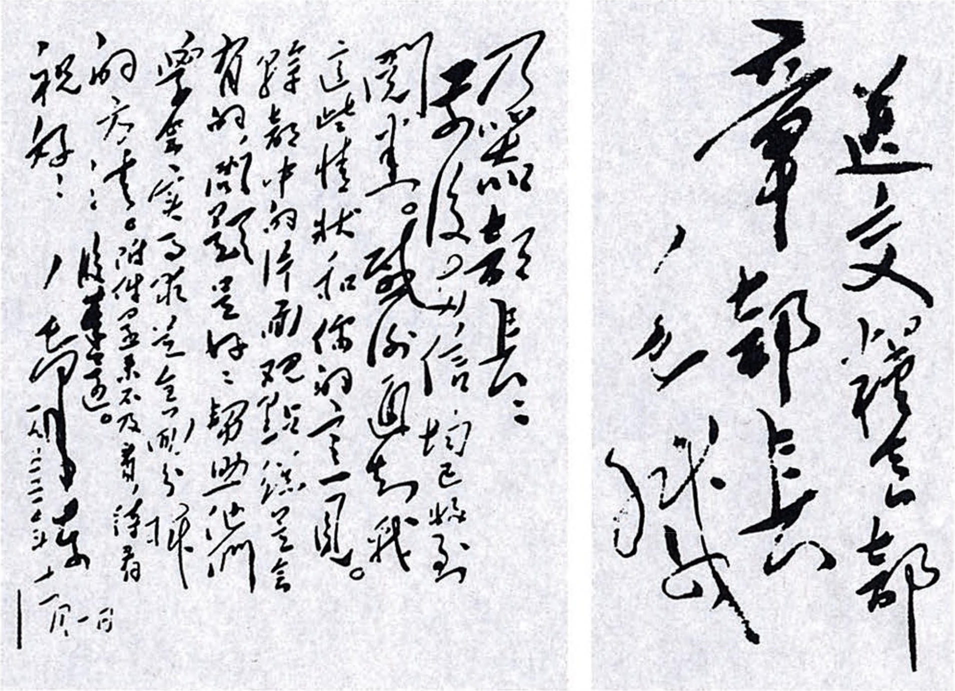
[2] 指章乃器1955年10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前些时向您反映的民建郑州市分会说当地私营工厂百分之百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不准确，这是由于写稿人和签发人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热爱有欠缺，和对违法和不违法界限不清造成的。信中还说，下面有很多人在那里随便立法，他们提出的对工商界的要求，比对国家机关和国家企业的要求都高，如按这些要求衡量，我们粮食部也是违法的。

面分析的方法。附件[1]还来不及看，待看后奉还。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毛泽东致章乃器信的手稿。

---

[1] 指章乃器在1955年10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后附的关于教条主义在民主党派中的表现的专题反映等材料。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

（1955年10月23日）

拉鲁·次旺多吉[1]（以下简称拉鲁）：几年来，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名符其实地得到了解放，我们非常感激。

去年，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2]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制定了宪法[3]。回去后，他们作了传达，增加了西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西藏内部的团结也加强了。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很好。不了解的人总还是有的，要彼此了解，还要一些时间。

你们有什么问题？

拉鲁：以前，听到解放军要来有点害怕。真正来了以后，看到解放军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帮助人民解决困难，顾虑打消了。

---

[1] 拉鲁·次旺多吉，西藏地区参观团团长，曾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

[2]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指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毛：是不是这样？不是还有点怕吗？

噶雪·却吉尼玛[1]**（以下简称噶雪）：**我过去没有来过内地，这次从西藏出发，经过许多地方，看到欣欣向荣的景象，认识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就是幸福。西藏人民也知道，毛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像天上太阳一样。我们六亿人民团结在一起，正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因此，我们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真有说不出的感激。

毛：谈一谈，大家互相了解，过去藏人怕汉人，慢慢也就不怕了。现在的汉人是不会欺侮你们的。宪法上也写着，不能歧视和压迫，要尊重各民族自己的风俗习惯。宪法规定你们有自治权。因此，各民族的事情自己管，就像新疆维吾尔族的事情由他们自己管一样，汉人只能帮助，不能代替他们管理。你们有人去过内蒙古，那个地方的事情是蒙古族自己管的。达赖、班禅也到过延边，那里的事情是朝鲜族自己管的。总之，实行区域自治的各民族的事情都归本民族自己管。

有人怕改革，其实内地经过改革以后，也并没有怎样不好。

噶雪：新疆在国民党统治时人民的生活很苦，解放以后的变化，使过去新疆的人几乎有点不相信。现在建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后的远景更是无限美丽的。

毛：建立自治区好。

噶雪：关于改革，内地先进也是经过改革得来的，因此，我个人是没有顾虑的。

---

[1] 噶雪·却吉尼玛，曾任西藏地方政府噶伦。1955年10月1日，以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大会。会后来北京，参加了毛泽东和西藏地区参观团和西藏青年参观团的负责人的谈话。

西藏解放前连一个小学也没有，人民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文化水平低，对有些问题认识不到，因此有些顾虑，但在毛主席领导下，是会消除的。

毛：改革要人民同意。人民怕，就等一等。改革以后，你们贵族是不是怕没饭吃?

拉鲁：贵族庄园的土地大小不同。我的庄园每年收租子三四千克[1]（约合十万斤左右），我认为改革以后好，但改成社会主义以后究竟怎么办，自己现在还想不出来。

毛：现在不要去搞社会主义。大家都不了解，怕嘛，不要勉强去做。西藏的事归你们管，你们藏人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不赞成的就不办。

噶雪：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对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回去后作了传达，僧俗人民都表示拥护和感谢。

西藏人民是普遍有宗教信仰的。由于解放军执行了民族平等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使西藏人民过去的怀疑消除了很多，西藏人民和解放军的团结更好了。

毛：你们不要怕。汉人里边也有信佛教的，土改以后有人信，社会主义建立以后还会有人信。对于宗教信仰，政府是不干涉的，也不能随便取消的。

你们将来的改革，也不能一下子搞社会主义，要分好几步走。改革以后，贵族、喇嘛还要过和以前相等的生活。要不要改革，是你们自己的事，你们商量。改了以后，贵族、喇嘛的生活还是照旧，不能改坏。这些都由你们来定，你们不想改，还是改不成。你

---

[1] 克，这里指量器，1克一般为12.5公斤至14公斤。

们可以到上海去看一看，上海有个大资本家叫荣毅仁，是我们汉人中的贵族，他现在准备搞社会主义，你们去和他谈一谈。

桑颇·登增顿珠[1]：西藏农民生活最不好。

毛：你们信佛教，释迦牟尼原来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你们可以学释迦牟尼的办法，生活还会比释迦牟尼过得好一点，因为释迦牟尼那时候没有共产党，没有人民政府。

噶雪：我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根据听到的和看到的，对西藏的将来考虑了一下，我想，只要跟着毛主席走，生活是会比过去好的，后代比我们更要好。

毛：你的思想不错。慢慢来，以前很多人都不安，想通一点了就好。

噶雪：这种信心，不只我一个人有。西藏人民的信心都一天一天加强了。这是从解放军身上得来的。西藏人民称解放军为新汉人。

毛：好。你们当贵族的不要那么恐慌。在座的，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乌兰夫[2]就是少数民族，也是共产党员，他从前也是贵族。宋[3]副委员长、李济深[4]副委

---

[1] 桑颇·登增顿珠，西藏青年参观团团长，1951年时是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全权代表之一。

[2] 乌兰夫（1906—1988），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3] 宋，指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 李济深（1885—1959），广西苍梧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员长、陈叔通[1]副委员长也是贵族出身。汉族中也有贵族，我们不叫贵族叫资本家。我们在座的这些贵族，现在住的房子，过的生活，比西藏贵族不算坏，比他们自己以前的生活也不算坏吧！

拉鲁：不是恐慌，有些人是不了解，慢慢就会了解的。

毛：改革要你们下决心，你们不干，我们是不干的。贵族、喇嘛赞成了才干，我们不能替你们下决心。

安庆·定结[2]：拉萨办了小学校，寺庙的喇嘛害怕将来没人当喇嘛了。我们现在要求，和办拉萨小学一样在拉萨、日喀则开办宗教学校。

毛：可以考虑。由民族事务委员会研究一下，将来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去办理。

噶雪：在拉萨成立小学，过去有些人有顾虑，上学的人不多，只有三百名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大家看了实际情况以后，学生增至七百多人。有了小学，不仅拉萨的学生可以上学，广大牧区的学生也可以上学。这充分证明了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

我亲眼看到新疆的宗教不是削弱了，回去要向达赖喇嘛报告，并向西藏人民传达这种情况。

毛：很好。各民族要互相往来。你们明年四五月成立自治区筹委会[3]的时候，也可以邀请各民族的代表，维吾尔族、蒙古族、回

---

[1] 陈叔通（1876—1966），浙江杭州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

[2] 安庆·定结，西藏地区参观团副团长，西藏扎什伦布寺活佛。

[3] 自治区筹委会，1955年3月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确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张国华分别任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任秘书长。

族、壮族、苗族、彝族，青海的藏人，四川的藏人等，请几十个人到拉萨看一看。

噶雪：在新疆，看到人民解放军使用拖拉机开垦荒地，打的粮食很多。

毛：到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生产的东西就更多了，生活就好了，全国人民都当“贵族”。你们将来也可以搞拖拉机。

拉鲁：以往不了解，有些害怕。听主席指示后，不怕了。今后一定要改革，不改革不能发展。要改革，就要汉族人帮助。

噶雪：西藏人看不远，是个大缺点。再一个缺点是为个人打算。今后要为人民打算。这次在新疆参观建设以后，完全相信西藏今后是会发展的。

毛：西藏几年来有进步，每年都有进步。西藏今后是会发展的，人口要发展，财产要发展，文化教育也要发展。宗教学校也可以办。几十年后，西藏情况就会有很大改变。你们要学释迦牟尼的样子，为广大群众着想，为全西藏人民谋利益。释迦牟尼领导人民搞改革并没有饿死啊！

才旺多登[1]：我虽然不是贵族，但也有庄园，我有改革的愿望。

悦希凭卓[2]：我一九五一年在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青年团。今天能有机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感到是我一生最光荣的一天。今后我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带动广大青年参加祖国建设，并希望社会主义早日实现。

毛：也不能那么急。

悦希凭卓：按照党的指示，逐步去搞。

---

[1] 才旺多登，西藏青年参观团副团长。

[2] 悦希凭卓，西藏青年参观团副团长。

毛：他（指悦希凭卓）讲的不错。他是青年，你们在座的还有青年，我们都是从青年过来的，没有青年不行。

仁青顿珠[1]**：**昌都过去受过赵尔丰[2]的剥削压迫，人民很苦。几年来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昌都人民团结得很好，进步很大。

毛：昌都应该和西藏其他地方团结起来。卫（前藏）、藏（后藏）、昌都三个地方应该联合起来。

拉鲁：今天和毛主席、各位首长合照的相片，我们希望留作纪念。其他具体事情准备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去谈。

毛：那好。你们可以到各地去看一看。到广东去，看一看海，看一看虎门，坐一坐船。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山上好，海里也很好。你们以为海里怎么样？汉人传说海里也有王，叫龙王，住的也是宫殿。

宋副委员长是广东人，她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孙中山先生按你们的话说，也是大贵族，但他是很了不起的人，是总统。你们可以到南京去看一看他的陵墓。

噶雪：达赖喇嘛回到西藏后传达时，特别指出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就有前途，我们是深深相信的。

毛：是，这一点是可以保证的。保证你们人口发展，财富发展，文化发展。过去赵尔丰是去压迫你们的。我们跟你们是平等的，不管贵族、妇女，完全是平等的。

---

[1] 仁青顿珠，西藏地区参观团副团长。

[2] 赵尔丰（1845—1911），清末汉军正蓝旗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任建昌道，不久任川滇边务大臣。1908年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5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在马明方关于西北各省讨论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

（1955年10月23日）

必须认真克服“左”的偏向，使肃反运动健康发展……………………2

（1955年10月23日）

关于成立上海警备区的批语………………………………………………3

（1955年10月23日）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4

（1955年10月27日）

关于召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的批语 ………10

（1955年10月28日）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11

（1955年10月29日）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22

（1955年10月）

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 ……………………………25

（1955年11月1日）

关于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进行军事训练问题的批语 ………………28

（1955年11月1日）

关于组建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批语 ………………………………29

（1955年11月1日）

在陈嘉庚来信上的批语 ……………………………………………30
（1955年11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31
（1955年11月6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批语和修改 ………………………33
（1955年11月14日、17日）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信件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 …………………………………………36
（1955年11月）
给黄炎培的信 ……………………………………………………43
（1955年11月17日）
对李维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45
（1955年11月22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 …………………………………………………48
（1955年11月24日）
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信 ……………………………………………50
（1955年11月24日）
给周世钊的信 ……………………………………………………53
（1955年11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55
（1955年11月26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 …………………56
（1955年11月26日）

在中央关于传达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58

（1955年11月27日）

关于西藏贸易等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59

（1955年11月28日）

关于朱德、聂荣臻访问民主德国、苏联时应注意事项的批语 ……61

（1955年11月28日）

中央答复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的电报 ………62

（1955年11月30日）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提纲 ……………………64

（1955年11月）

对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的修改 ……………………………………………………………………65

（1955年11月）

为工程兵积极分子会议题词 …………………………………………66

（1955年11月）

在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纪普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68

（1955年12月3日）

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电报的复电 ……70

（1955年12月4日）

在一份反映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情况严重的材料上的批语 ………72

（1955年12月4日）

在中央十人小组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写的话…73

（1955年12月6日）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 ……………………………………………74

（1955年12月6日）

为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题词 ……………………………………77
（1955年12月6日）
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批语 ………………………………………79
（1955年12月7日）
给翟作军的信 …………………………………………………………80
（1955年12月12日）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82
（1955年12月16日）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85
（1955年12月21日）
我们的愿望是使中泰两国友好 ………………………………………90
（1955年12月21日、1956年2月10日）
为江汉桥题名 …………………………………………………………94
（1955年12月）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95
（1955年12月26日）
关于元旦社论和准备召开部分省委书记会议等问题的信 …………97
（1955年12月30日）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99
（1955年12月）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记录稿）……………………………………100
（1955年）
五律·看山 ……………………………………………………………103
（1955年）
七绝·莫干山 …………………………………………………………106
（1955年）

七绝·五云山 ……………………………………………………108
（1955年）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
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113
（1956年1月7日至9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120
（1956年1月10日）
给齐吉树的信……………………………………………………134
（1956年1月14日）
关于控制高级社发展数目的批语…………………………………140
（1956年1月19日）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出的号召…………………………144
（1956年1月20日）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45
（1956年1月20日）
对达赖喇嘛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154
（1956年1月21日）
对班禅额尔德尼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155
（1956年1月21日）
关于注意研究解决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的批语………………156
（1956年1月21日、4月11日）
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158
（1956年1月22日）
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后面的一些文字………………161
（1956年1月）

对廖鲁言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164
（1956年1月25日）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66
（1956年1月25日）
关于发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问题的批语……………169
（1956年1月26日）
给宋庆龄的信……………………………………………………170
（1956年1月26日）
给黄宗缙的信……………………………………………………173
（1956年1月26日）
给许志行的信……………………………………………………175
（1956年1月26日）
对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76
（1956年1月28日）
关于建立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批语…………………………………181
（1956年1月28日）
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修改……………182
（1956年1月）
关于检查同苏联专家、顾问关系的批语…………………………187
（1956年1月30日）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189
（1956年）
关于建立空军学院的批语…………………………………………190
（1956年2月5日）
和藏族人士的谈话…………………………………………………191
（1956年2月12日）

在汪东兴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95
（1956年2月13日）
给刘松林的信……………………………………………………197
（1956年2月14日）
吊唁杨树达逝世的电报…………………………………………199
（1956年2月16日）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200
（1956年2月19日）
转发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11
（1956年2月19日、20日）
关于派团赴苏联远东军区参观演习的批语………………………213
（1956年2月24日）
关于发表郭沫若访日诗篇的批语…………………………………214
（1956年2月24日）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215
（1956年2月）
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 ………………………217
（1956年3月3日、5日、7日）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21
（1956年3月4日）
在听取汇报工作时的指示…………………………………………224
（1956年3月6日）
在听取交通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227
（1956年3月8日）
关于撤回驻越南军事总顾问改派武官的批语………………………230
（1956年3月12日）

毛泽东等吊唁贝鲁特逝世的电报……………………………231
（1956年3月13日）
和长征、艾地的谈话…………………………………………233
（1956年3月14日）
关于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237
（1956年3月17日）
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拉科西的信…………………238
（1956年3月28日）
对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批语和修改…………239
（1956年3月30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的批语……241
（1956年3月30日）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245
（1956年4月2日、4日）
对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的批语…253
（1956年4月2日）
同意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福州两军区的批语…………254
（1956年4月4日）
接受丹麦大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255
（1956年4月10日）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257
（1956年4月10日）
对中央就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59
（1956年4月11日）
关于请中宣部讨论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的批语……261
（1956年4月18日）

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的谈话纪要……262
（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电报……271
（1956年4月20日）
为印发徐运北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72
（1956年4月20日）
给毛宇居的信……273
（1956年4月20日）
给毛笔珠的信……274
（1956年4月20日）
给毛泽荣的信……275
（1956年4月20日）
论十大关系……277
（1956年4月25日）
颁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命令……299
（1956年4月25日）
倡议实行火葬……300
（1956年4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302
（1956年4月28日）
给贺果的信……311
（1956年4月29日）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312
（1956年4月29日）
减少国防费用多搞些经济建设……319
（1956年4月）

关于斯大林问题……326
（1956年4月、10月）
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327
（1956年4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329
（1956年5月2日）
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332
（1956年5月8日）
公布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的命令……336
（1956年5月12日）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337
（1956年5月14日）
写在湖北省财贸工作汇报提纲后面的文字……340
（1956年5月）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344
（1956年5月20日）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353
（1956年6月8日）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56
（1956年6月13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357
（1956年6月14日）
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一处带原则性修改的批语……359
（1956年6月22日）

接受罗马尼亚大使尼古拉·乔洛尤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362
（1956年6月28日）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363
（1956年6月28日）
关于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365
（1956年6月30日）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366
（1956年6月）
水调歌头·游泳 ……………………………………………………368
（1956年6月）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电报…………374
（1956年7月9日）
关于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命令……………………………………………………376
（1956年7月9日）
关于国庆阅兵问题的批语……………………………………………377
（1956年7月13日）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378
（1956年7月14日）
对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浙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388
（1956年7月22日）
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390
（1956年7月22日）
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的批语…………………396
（1956年7月23日）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398
（1956年8月、9月）
给曹云芳的信………………………………………………………426
（1956年8月11日）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批语………………………428
（1956年8月）
给达赖喇嘛的信……………………………………………………429
（1956年8月18日）
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与独立…………………………431
（1956年8月21日）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433
（1956年8月22日）
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442
（1956年8月24日）
在欢迎老挝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453
（1956年8月25日）
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的批语……………………………………454
（1956年8月27日）
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456
（1956年8月29日）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458
（1956年8月）
对彭德怀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460
（1956年8月30日）
对李立三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462
（1956年8月30日）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463
（1956年8月30日）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批语…………………475
（1956年8月、9月）
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批语……………477
（1956年8月、9月）
毛泽东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479
（1956年9月）
关于修改和播发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的批语……………480
（1956年9月5日、12日）
对陈绍禹不能参加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482
（1956年9月10日）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483
（1956年9月10日）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493
（1956年9月13日）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497
（1956年9月13日）

在马明方[1]关于西北各省讨论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5年10月23日）

刘、周、陈、邓[2]阅，退毛。

第二页末数行所提问题[3]，请小平、陈云同志注意。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

[1] 马明方，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马明方1955年10月20日关于西北各省座谈讨论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第二页末提出的两个问题：一、陕西省提出，训练办社干部的经费不够用，要求中央财政部批准在地方财政节余中开支。二、各省反映，现在下面的工作很忙，希望中央各部的会议能够有所控制。

必须认真克服“左”的偏向，使肃反运动健康发展[1]

（1955年10月23日）

一切确实发生“左”的偏向的单位就要采取措施加以克服，不要讳言“左”的偏向。同必须克服右的偏向一样，我们必须认真地克服“左”的偏向，才能使肃反运动自始至终地得到健康的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5年10月23日转发卫生部五人小组关于检查中直第四医院肃反运动中所犯“左”倾错误与无组织无纪律错误给国家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并中央十人小组的报告的批语稿中加写的一段话。

关于成立上海警备区的批语[1]

（1955年10月23日）

周、朱、邓[2]阅，退彭照办。[3]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0月21日报告的批语。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的报告说：鉴于上海地区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便于平时警备和战时指挥，拟成立上海警备区。其任务是：平时负责上海地区警备治安、部队训练和国防工程构筑；战时统率上海地区部队保卫上海。

工商业者要掌握自己的命运[1]

（1955 年 10 月 27 日）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呢？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害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

[1] 这是毛泽东和工商界代表的谈话。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的说来，基本上是做了好事，有益于国计民生。有些人偷税漏税当然不好，但是因为现在还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这个制度，就有这些问题。要是说私营工商业者百分之百的偷税漏税，我不相信，有些只有百把万元（相当于现在百把元）的就算了，不要尽搞。共产党员中也有贪污百把块钱的，也算了，还算好人。共产党也不是那样干净，政府中管钱的也有少数人还有贪污。

从社会上说，总是做好事的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多，错误只是部分的。要有这个估计，不要总是抬不起头。但不要出去吹没有问题，你们可多说些缺点。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也有唯物论，不是历来都是唯心论。

因此，我想劝一些人，每个大中城市有那么几十个、百把两百个觉悟比较高的核心人物，经过他们去说服大多数人，这样比我们去说更好。要有一些人早些下决心拥护共产[1]，因为迟早是要共产的。

农民搞合作化，对于私有制总有些恋恋不舍。《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离家时还爱惜家具是有理由的。旧的东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东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种新的思想，要慢慢地才能在人们的头脑里占领阵地，才能使旧的东西的影响逐步缩小。一个城市有少数核心人物思想先搞通，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好处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委员有三百人左右，各省各市还有一批会员，合起来就有好几万人。在这些人中间争取

---

[1] 本篇所说的“共产”，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国有化。

一批人，早点建立决心，不是立即共产，而是作思想准备，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现在先搞半共产。农民在一九六〇年以前也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总之是要逐步地做，不使人们感到突然。生产关系、生活方式都要逐步改变，不要突然改变，最后是要改变的，但是要安排好，要使这些人过得去。一个工作岗位，一个政治地位，都要安排好。民族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不同。对地主，在一定时期要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改变成分后才可恢复公民权，加入合作社，那时就不叫地主而叫农民。对地主来说，这事实上是解放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总共三千万人，以后要同大家一起共同富裕起来。将来农民的生活要超过现在的富农。资本家如果将来饿肚子，这个制度就不好。如果大家生活不提高，革命就没有必要，因此生活福利都要逐步提高。总之，要逐行逐业安排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大家都领薪水，资产阶级不见了，都成了工人阶级，我看这是好事。我总劝人赞成共产，也许一时感觉不好，但将来会说好的。社会主义会有缺点的，将来还要发展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也要分阶段。旧的制度不行了，新的制度就要起来代替。生产力总要向前发展，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这就推动着社会不断前进。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1]。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做主，说文明

---

[1] 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1]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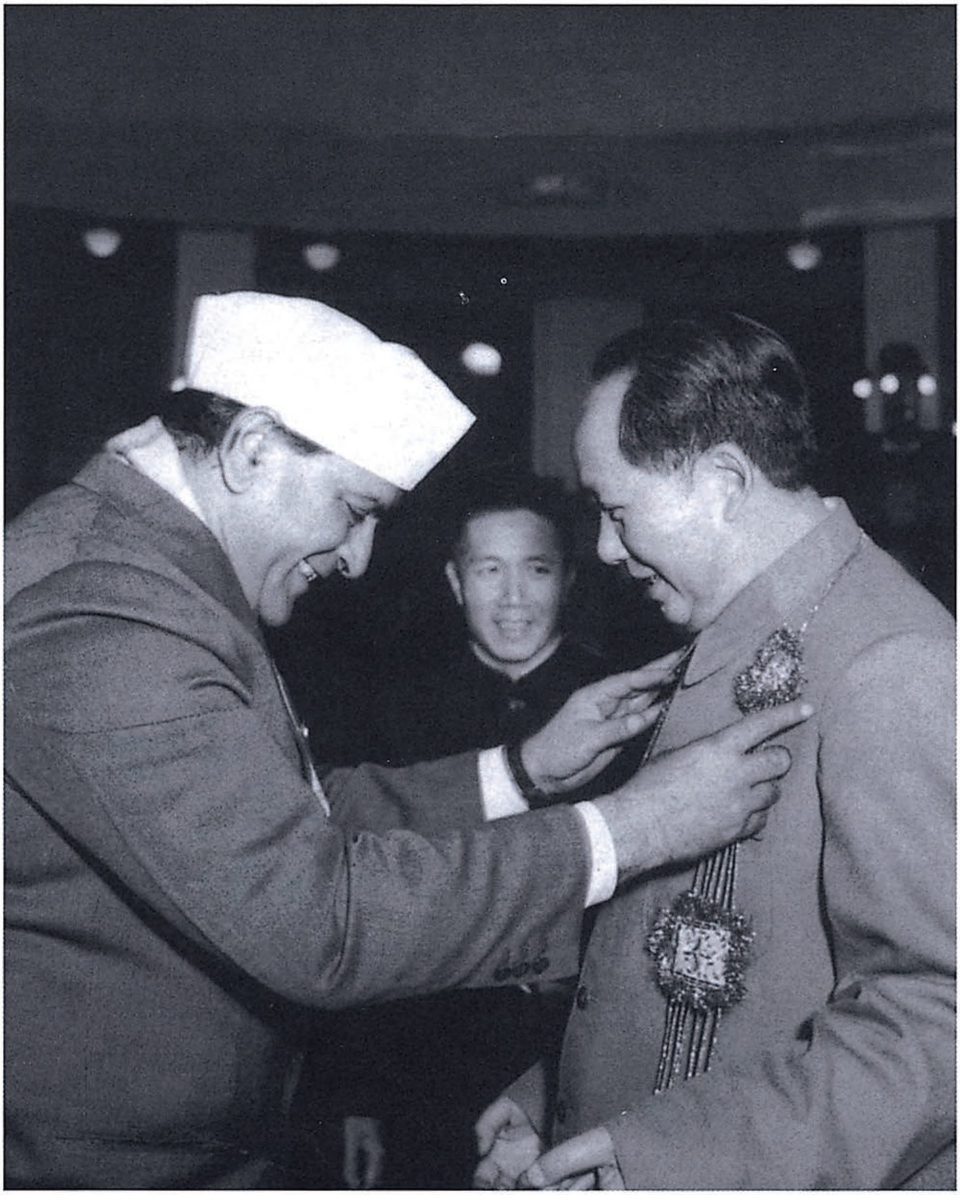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作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用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刚才胡子昂[2]副主任说，公私合营企业中有把女老板当家属不安排工作的事。我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现在还只是开始，真正平等要到社会主义，几十年以后。妇女中有极大的潜在劳动力还没有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才有发挥的机会。歧视妇女、不重视妇女的事，要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改掉。在中国，妇女有三亿人口，妇女问题一定要安排好，要同男子同工同酬，在合作社、工厂都要一样。妇女要争取到正当地位好困难，因此要一有机会就说，要统筹安排，同工同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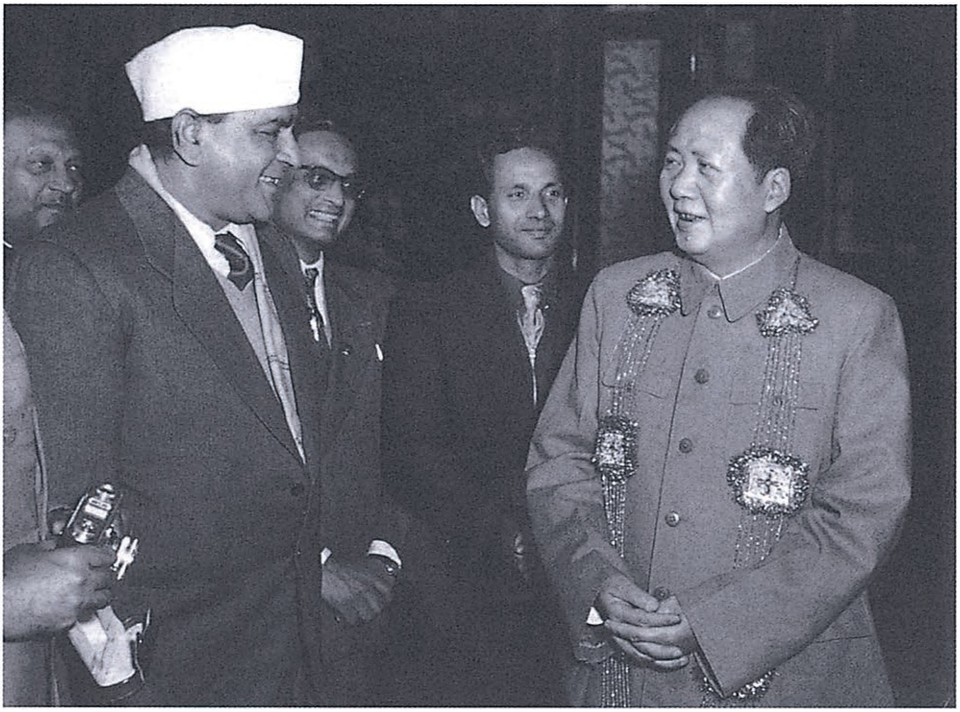
[1] 参见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恩格斯说：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2] 胡子昂（1897—1991），重庆市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1955年10月，由著名电影人、国会议员普拉卡普尔率领的印度电影代表团访华。27日，毛泽东会见了印度电影代表团。图为卡普尔向毛泽东献花环。

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接见印度电影代表团。



1955年10月27日，毛泽东接见印度电影代表团。

关于召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的批语

（1955年10月28日）

彭真、邓小平[1]同志：

明日下午四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2]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三百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上午八时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5年10月29日）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邀请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了许多，我来补充讲几点意见。这些意见，早两天跟有些朋友说过的。

总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人们问：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前途如何？或者说趋势如何？我们早几个星期开了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也有许多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前途如何？趋势如何？这个问题，在全国广大的人群中都是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改变社会制度。现在我国存在两种私有制：一种是个

体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在改变这两种私有制的过程中，凡是处在这两种私有制地位的人，都发生前途如何或叫趋势如何的问题，都处在一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之中，不晓得将来会如何。本来，对前途问题，我们的宪法已经规定得很清楚，在去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过，关于五年计划等各种文件也都讲过。为什么还是经常发生这个问题呢？原因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地位的人，对改变这样一种制度，自然地会发生不晓得明天怎么样的问题。说完全不晓得？也不是。晓得一点，但是问题还是发生，还是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贡献一点意见，就是说，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是不好的，每天难过日子。旧社会就是那样子，无论哪个阶级，自己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是在被统治之下的，他们得不到什么权利，命运操纵在人家手里。统治阶级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国民党政府，它也是不安的。我们有一个一定的发展方向，有一个社会发展的规律可以把握，应该是心安的。但是对这一点要讲清楚，并且要经常讲。如果不经常讲，今天安了，明天又可能不安。比如讲统一战线到底还要不要？现在经常发生这个问题。这不是一个政党（共产党或者它的中央委员会），一个集团，少数人或者个别的人，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这么一个问题。这是要看统一战线存在下去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劳动人民事业，对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益还是没有利益来决定的。刚才陈云副总理说，我们的道路很宽广，将来不怕没有事情做。我们跟国民党那个时候完全不同，我们的事业很宽广，每年都发展，我们不怕人多。我们已经在长期革命中证明，有统一战线比没有要好。

革命战争时候，就是找不到许多人，哪能有今天这样的机会，找了许多人坐到这里来开会。那时候，国民党不许可嘛，他们不赞成我们，讲共产党许多坏话，说什么共产党不像样子，头，就不只一个，有三个头，样子也很难看，一句话，是坏透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国民党拿这种话到处讲，讲得许多人也似乎相信了。那个时候，要找人谈，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困难。现在证明，建立了统一战线对我们有帮助，不但对过去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利的，对现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也是有好处的。因此，统一战线要坚持下去，宪法上已经作了规定。

总之，我们的事业一天天地发展，与国民党的事业一天天地缩小相反。现在我们的事业，包括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欺负，包括国内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建设工作还刚刚开始，所以大家应该安下心来。我总劝朋友们，经过你们再劝更多的人，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最好全部用抽水机，因为抽水机它不是七上八下。这样，睡觉就比较好些。刚才陈云副总理讲的话，也是抽水机性质。不要发愁，开始会有困难的。比如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否妥当等等，会有些问题发生。但是经过商量，经过考虑，经过调查研究，总可以实事求是地求得解决的。这样，大家就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

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农民这个阶级还是有的，但他们也变了，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那时，全国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工人、农民的知识分子。

刚才陈云副总理说，工商业改造的全面规划里面有宣传这一项，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现在，听到各大城市工商界都有学习的组织，我们很高兴。参加学习的人应该逐步地扩大，每个城市要有几千人，要逐步地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要有比较少数的核心人物。这次召集会议，我们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在工商界里面，这些人比其他的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的人。这一点是不是可能呢？应该是可能的。我们看，过去这几年，工商界已经有一些人觉悟程度是比较高的，他们懂得国家的方针、政策，因此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设想：经过工商联、民建会、各民主党派的工作，壮大这么一个队伍，达到全国有几千人。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我曾经同一些朋友说过，并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共产[1]了，不是这个意

---

[1] 本篇所说的“共产”，是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国有化。

思，而是说准备共产。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广泛宣传。这个东西是历来被人家说成不好的，曾被蒋介石说得很不好。最近几年情况虽然变了，但是还有一些人对实行社会主义动荡不安。由一种制度变为另一种制度，他们势必不安，因为还在变嘛；变了以后，在一个时期他们还会感到不舒服，因为旧制度的残余还在脑筋里面存在着。新制度的宣传，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要逐步宣传，使新制度的思想逐步增强，使旧制度的残余逐步减少。工商界的人中间也会是参差不齐的，有些人更觉悟些，有些人不觉悟些，甚至最后还有一些顽固分子。资产阶级连他们的家属，大概有七百万人左右。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小商小贩、独立手工业者（不包括店员、手工工厂的工人），有两千几百万人。两者合计有三千万人左右。面对这么大一个队伍，应该有一个整个的宣传教育计划。有许多工商界的朋友提意见说，五年计划报告中间关于宣传教育方面提得不够。我说这个意见提得好，过去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全面规划。今天到会的有政府许多部门的同志，有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你们就没有管这个事嘛。而且，宣传的时候要作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说好的，坏的就说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据我们看，经过这几年，整个工商界是有进步的，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是有进步的，基本情况是好的，是向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的。作这样一个总的估计，我看是合乎事实的，是需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基本的估计，我们就不能建立信心，工商界本身会没有信心，向他们进行工作的人也会没有信心，感到横直是不能改造嘛，横直是没有希望嘛，那个私有制无论如何拔不掉嘛，根挖不掉嘛！那有什么办法呢？白费力气，搞了五六年了，成绩没有，或者有也很少，

总而言之，搞社会主义改造，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路线错了。是不是能这么说呢？我看，不能这么说。能不能说工商界在抗美援朝、经济建设、加工订货、公私合营、买公债等方面一点好事没有做，一点成绩都没有呢？我看，不能这么说，也没有听到有人这么说过。对整个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应该肯定他们的成绩，不然就没有信心，下文就不好办，而且那种说法根本不合事实，因为这几年确实是有成绩的。当然肯定成绩并不是抹煞缺点，是会有缺点的。是缺点就说是缺点，缺点有多少就说多少。这就叫做实事求是，全面分析。我们不要那个不实事求是的方法，不要片面的分析方法。不实事求是就是主观主义，片面分析就站不住脚。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地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地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地做工作，慢慢地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如果新制度不能证明比旧制度大为有利，那新制度

就不可取了。新制度所以应该采取，就是因为比旧制度有利得多，不是只对少数人有益处，而是对全国人民都有益处。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这部分利润，是工人生产的利润中间分给私人的部分，有说一年四五个亿的，有说没有这么多的，大概是一年几个亿吧，十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价，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合计是三十三亿元。我想，如果十五年再加恢复时期三年共十八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对资本家的安排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要通通地安排好。政治地位方面，给选举权的问题，无所谓安排了，因为我们早已宣布，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不剥夺它的政治权利的，跟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要剥夺一个时期，比如地主一般是要五年，有些还要延长，看他表现好，才能改变成分，才给他

选票。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合作的政策，他们的政治权利是已经有的，将来阶级成分变了，不是资本家了，变成工人就更好了，因为工人阶级比资产阶级更吃香嘛。过去有钱的人很吃香，现在似乎是要当一当工人阶级才舒服的样子。你们想当工人阶级有没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开一张支票给你们。这是一个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个体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了，社会上就剩下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整个民族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更有前途，更有发展希望。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1]同志作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一百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来牛皮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再谈谈领导方法问题。领导的方法可以好一些，也可以差一些。领导要能够适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如果领导得好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好一些，缺点错误就少一些，工作也就好一些。如果领导得

---

[1] 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差一些，适合客观规律差一些，工作也就差一些。所以，我们要注意领导方法，各个党派、工商联，中央同地方，都要注意用什么方法使大家更觉悟一些。为什么企业偷税、漏税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领导者对他们宣传教育得不够。学习多一些，偷税、漏税就少一些，没有学习的就偷税、漏税。所以，偷税、漏税也有我们领导者的问题，不能只怪人家。当然，领导者不止我们这几个人了，在座的都是领导者，许多人都是人民代表、副市长、工商联委员、政协委员、民主党派负责人，你们都有责任。你看，归根到底又把问题搞到你们身上来了。当然，我也是要担负一点责任，不担负也不行啰！我们大家都要担负责任，共同负责，这是整个民族的问题嘛。

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共产了，不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少越好。所以，核心分子非常重要，有核心才能有领导，才能达到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包括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有全国的意义，还有国

际的意义。整个世界都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我们在世界上是走在前面的，中国的资本家将来是先进者，我这个支票也是可以开的。中国人是要走在前面的。（周恩来：是对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当然，我不是讲一切国家都会走我们的方向，而是讲比较落后的国家会跟我们学的。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要做好事，这是一个原则。我跟许多朋友谈过，做好事越多越好。做好事越多，前途就越好，得到的好处就会多一点，在社会上就更有名誉。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间，在参加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间，替人民做好事越多，工作成绩越好，得到人民的嘉奖就应该越多，不会成反比例的。总不能说，立了功了，还得倒霉。不是那么一个趋势，那是不合道理的，是说不通的，人家是不服的。定下这么一个标准，就可以鼓励人们上进，鼓励做更多的好事，做得更好一些。当然会有参差不齐。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农民也是这样，他加入合作社也要经过多少次考虑，经过家庭商量，想加入又不想加入，搞过几次以后，才下决心。你说，工商界就没有三番五次的考虑，不开家庭会议、同业会议商量？我们最后要引导他们走到社会主义这条路上，不再动摇。要逐步引到那一步，首先就要先有先进分子不动摇，然后逐渐使更多的人把怀疑、犹豫、动摇减少。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

然”的那个“自然”，而是讲，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会有困难的，也一定会有破坏的。有的地方搞合作化，曾死了一些牛，猪也减少了，出现了“三叫”：人叫、猪叫、牛叫。合作化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才能够做到“三不叫”。要“三不叫”，就要人有饭吃，猪和牛也要有东西吃。对你们工商界就不好提这个“三不叫”了，人不叫是要的，但机器不好不叫。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七律·和周世钊[1]同志

（1955年10月）

春江浩荡暂徘徊，
又踏层峰望眼开。
风起绿洲吹浪去，
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2]谈笑人依旧，
域外鸡虫事可哀。[3]
莫叹韶华[4]容易逝，
卅年仍到赫曦台[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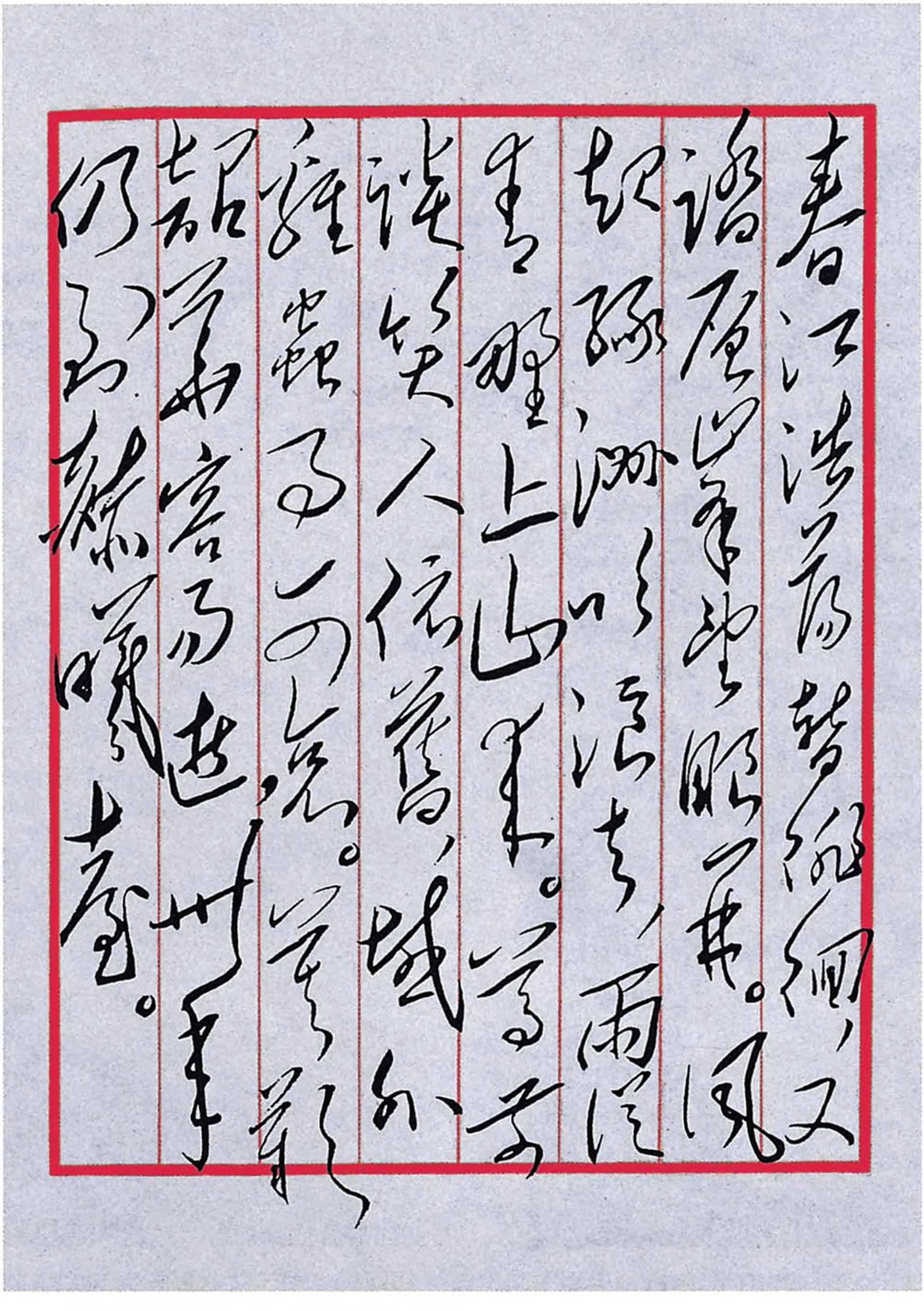
[1]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尊前，尊同樽，酒杯。尊前，酒席前。

[3] 域外鸡虫事可哀，国际间的某些事件像鸡虫得失一样渺小，人们为这些小事而勾心斗角是可悲的。这里所指的具体内容待考。唐杜甫《缚鸡行》：“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中厌鸡食虫蚁，不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4] 韶华，美好的年华，指人的青年时代。

[5] 赫曦台，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岳麓书院。朱熹曾称岳麓山顶为赫曦，后因称山上的台为赫曦台。清代因山上的台已毁，将原“赫曦台”匾额悬于岳麓书院“前台”，由此前台更名赫曦台。赫曦，光明盛大的样子。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周世钊同志》。

1955年10月30日，毛泽东和贺龙一起观看中国足球队同苏联列宁格勒“泽尼特”足球队的比赛。图为毛泽东等在赛后接见全体运动员。

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1]

（1955年11月1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两个报告中，特别是山东的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意见，值得各地注意。这两省（还有云南贵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五月十七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即在夏季（六、七、八月）做了准备工作（山东的准备时间较短，是一个缺点），所以它们在秋季的头两个月（九月和十月）即完成了一年的发展计划，它们准备在今后五个月内（今年十一月至明年三月），结合粮食三定、统购统销等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顿合作社的工作，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建立和健全劳动组织，做好生产规划，做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金等项问题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种（在南方）和积肥等项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

作，以利明春的生产。在这个季节安排问题上，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妥帖，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冬春两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

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二

即送刘、邓先阅，再送周、朱、陈、谭震林、子恢、鲁言即阅后，发。发后另印如前示。

关于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进行军事训练问题的批语[1]

（1955年11月1日）

退军委照办。[2]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8月8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根据兵役法规定，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应当进行军事训练，以便使学生养成必要的军事生活习惯和纪律观念，同时经过学校的军事训练，为军队培养一批预备役军官，特别是预备役技术军官，这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防建设都有很大好处，是国防建设不可缺少的工作。报告对在高等学校和高级中学进行军事训练的原则及具体实施方案作了说明。

关于组建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的批语[1]

（1955年11月1日）

退军委照办。[2]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8月8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为在军队系统开展违法案件的审判工作和开展检察监督工作，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组建军事法院和军事检察院。报告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权限和军队各级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的组织与干部任命提出建议。

在陈嘉庚[1]来信上的批语

（1955年11月1日）

周总理：

此件[2]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

[1] 陈嘉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陈嘉庚1955年10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此次访问西北，于9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坟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未派人看管。保护山陵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庙竟任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1955年1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八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致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万分欢欣的心情祝贺兄弟般的苏联人民过去一年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中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进一步增强了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鼓舞着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为争取和平和进步而斗争的信心。

伟大的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一年来，苏联政府为着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促进国际间的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最近苏联政府就欧洲安全和德国问题、裁减军备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的接触等问题所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符合于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

苏联政府所作的这些努力。

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坚强团结，对促进两国的共同繁荣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起着日益巨大的作用。中苏两国经济文化的全面合作和苏联对中国的巨大援助，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愿中苏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日益发展和巩固！

我们伟大的盟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六日　北京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1月14日、17日）

一

可以照此发表。为了说清楚问题，在“第二”中加了几句[1]。

毛泽东

十一月十四日

二

社会的前途对于所有的人都好比早晨的太阳一样明白，而所有的人只要沿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前进，就都可以找到平坦而且广阔的道路。这种道路，对于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来，就是放弃小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的合作制。对于资本家说

---

[1] 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来，就是放弃资本主义所有制，放弃对工人的剥削，接受社会主义的国有制。资本家真正放弃了剥削，以劳动为生，他们的社会成分就不再是资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他们同工人、农民就没有矛盾了，他们就一身轻快不受社会责备了。这里说放弃剥削，不是说马上就要这样做，而是说现在要做思想准备，要在各城市的资本家的学习组织中逐步地适当地展开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有疑问，要由适当的人加以解答，要准备经过公私合营、逐行逐业的改造，在条件成熟以后，最后达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那个时候，他们的工作是不是有问题呢？须知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也不会有经济危机的，只要不是懒汉，只要是愿意诚恳地工作的人，就永远不愁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做。因此，一切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爱国的工商业者应该认清这个前途，不但不要徘徊瞻顾，而且要主动地奔赴这个前途，这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就不至于皇皇无主，不至于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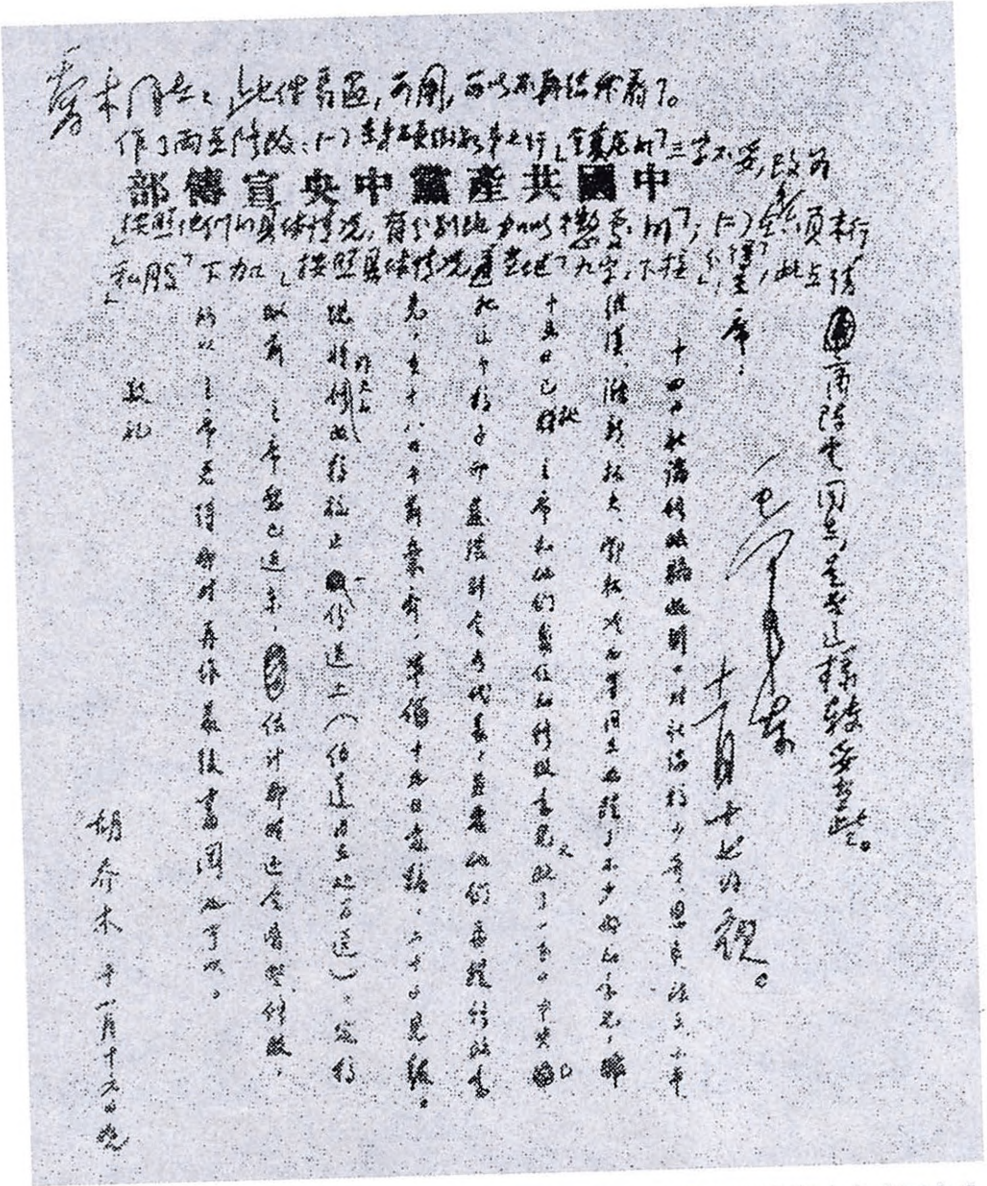
三

乔木同志：

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一）在第五页倒数第七行“镇压的”三字不妥，改为“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分别地加以惩处的”；（二）在第六页末行，“私股”下加“按照具体情况适当地”九字，下接“分得”，此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夜



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

主席：

敬礼

胡乔木　十一月十六日晚

胡乔木关于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的修改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批语的手稿。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信件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1]

（1955年11月）

一

少奇、小平[2]同志：

送上《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十三份，请予审阅处理。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3]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十八日或十九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

---

[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改，主要有七段，即本篇三至九，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少奇，即刘少奇，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这时他们和毛泽东一起在杭州。

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1]。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估计明年一年，即可达到全国基本上初级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户入社，大大有利于农业生产。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我召集了九个省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

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四时

二

小平、尚昆[2]同志：

此件请*将题目下括弧内的几句话*[3]*加上*，即付排，先打清样七份，于本日下午分送刘、周、朱、陈云、彭真[4]、小平及我（送前

---

[1]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修改后，追认为正式决议。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写的说明，即本篇三。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标出修改的地方），再看一次，即可印发。

毛泽东

十一月廿九日上午二时

三

这个文件曾经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

四

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

五

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

六

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我们的赎买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10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20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

七

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八

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两种教育方法。三反五反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教育方法，但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当着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给予他们这样一次重大的从外部强加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教育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已经基本上被打垮，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个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的条件，这就是采用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引导资本家内部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加强对于资本家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了解时事和国家的政策，了解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根据许多地方已有的经验，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

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九

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后，有些同志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取得教训，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例如上海民用药厂和铅笔一厂所发生的一类事件，各地都可能找到一些例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教育他们，加以纠正。并且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要“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只是企图用“挤垮”的简单方法去回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在实质上却

是右的。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消极的偏向。不是放弃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而是应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不是放任自流，若即若离，“敬鬼神而远之”，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提出一整套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广大地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改造。这样做，反而可以较快地减少资本家的疑虑，把他们的心大体上安定下来，从而能够有秩序地加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会不遇到许多资本家的动摇、犹豫、埋怨、以及少数人的抵抗。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上述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摇和抵抗，抽逃资金等项违法事件也将会减少。同时，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又对一切同资本家接触的党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党内右倾的危险性也将较易于防止，被腐蚀的党员可能反而要少些。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定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起动员的作用，会使一切最顽固的资本家陷于孤立，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

给黄炎培的信

（1955年11月17日）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1]收到。尊恙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2]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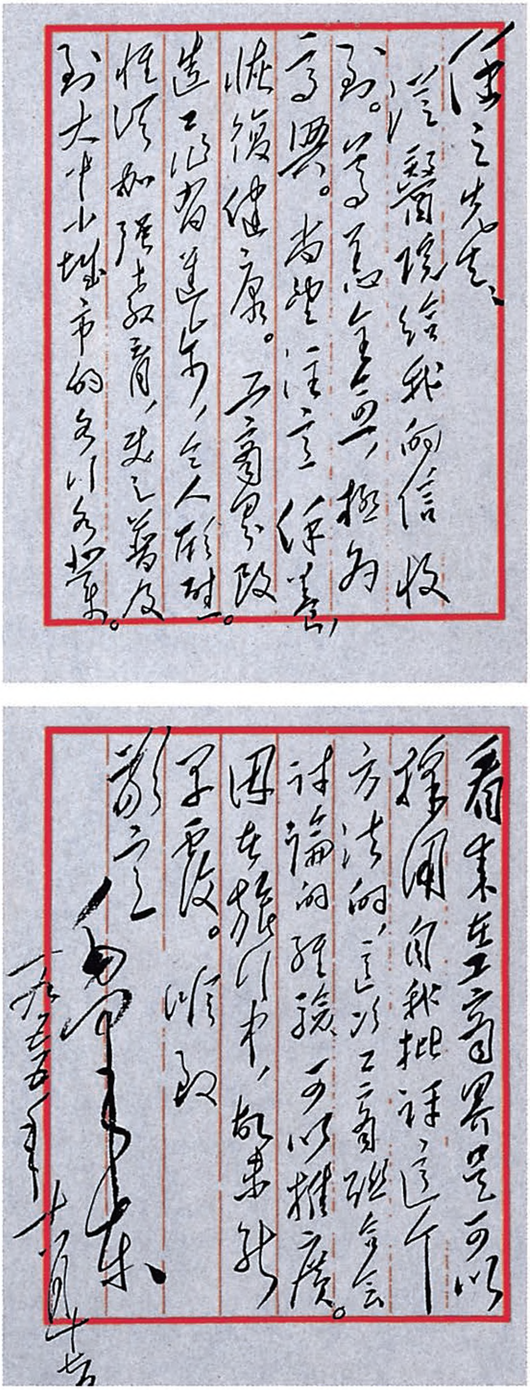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

[1] 指黄炎培1955年11月5日从北京医院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报告了他做前列腺手术后基本痊愈的情况，并说：由于住院，很遗憾地没有能经受怀仁堂主席的指示，然已从传达中知悉大概。我以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丰收，不能看作1955年“天”的恩赐，而必须承认是农民和农民领导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合作组织、改进技术等，特别是一致的极度兴奋的工作情绪，这些都是“人”，不是“天”。农业增产，轻工业会相伴而增产，只有在生产激增，人们心情高度兴奋的时候，才有可能进一步促使资本主义工商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2] 指1955年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毛泽东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国务院副总理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



任之先生：

送经医院给我的信收到。得悉全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着着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其教育，并且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工商界是可以接受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七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对李维汉[1]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1月22日）

一

即送李维汉同志：

此件[2]可用。有一些修改[3]，请你考虑是否可用。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下午十时半

二

经济部门不问政治工作，政治部门不问经济工作，或者彼此各不相谋地去作。这样，是不利于改造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改造资产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指李维汉1955年11月21日向毛泽东报送的准备在中央召集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发言稿。

[3] 即本篇二至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阶级分子的。

三

在公私合营形式上的企业改造，首先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很大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企业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企业了。既已合营了之后，即转入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造，即是经营管理方法上社会主义路线同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在开头一定期间内，这是合营企业中主要的阶级斗争形式。

四

我们又必须耐心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方实职人员，帮助他们逐步地认识两种制度和两种方法的好坏优劣，批判和抛弃旧的（即资本主义的），站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这方面来。这样，他们在企业合营的时候过了一关，又在这时过了一关。过了这两关之后，改造他们的问题就会更加顺利了。

五

落后分子固然受反动分子（即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影响，但他们主要地要看中间分子的态度，如果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左转了，落后分子觉得自己快要孤立无援，也得勉强跟上去，我们应当使他们逐步地离开反动分子。

六

反动分子不仅是可以孤立的，而且也是可以分化的。反动分子中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我们也应当分别处理。

七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经过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接受改造是由于大势所趋的形势和我们的政策所决定的，有一小部分人还一定要抵抗。

八

总结六年来改造工作的成绩，可以说，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经接受了公私合营或者准备接受公私合营这样一种改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九

除了大约占百分之几的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以外，其余的应当肯定是可以用又鼓励又批评的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批评就是对于他们的主要的斗争方式。当然还要加对违法者给予罚款等等一项斗争方式。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5年11月24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高兴。我时常想念你，想念你在北京的时候我们相处的那种愉快的情形。何时再能和你见面呢？大概要再等三年，等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那时你也许会来这里吧。你回去以后的许多活动，我觉得都很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不久可以成立，各族人民都会很高兴。西藏是在前进。当然不要性急，每年有一些进步就好了。希望你好好保养身体。我们这里的情形还好。也做了一些错事，正在批评改正。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是不富不强，希望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后，变为一个又富又强的国家。西藏是很有前途的地方，希望你们好好做去。很高兴地看到你在信里附寄的西藏鲜花，我在这里也附寄一朵给你。希望经常看到你的信，随便写几句，不拘形式，就是好的。馀事请问张国华[2]同志。我已嘱咐张国华，叫他好好向你请教。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祝你健康、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给班禅额尔德尼[1]的信

（1955年11月24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三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

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此复。

顺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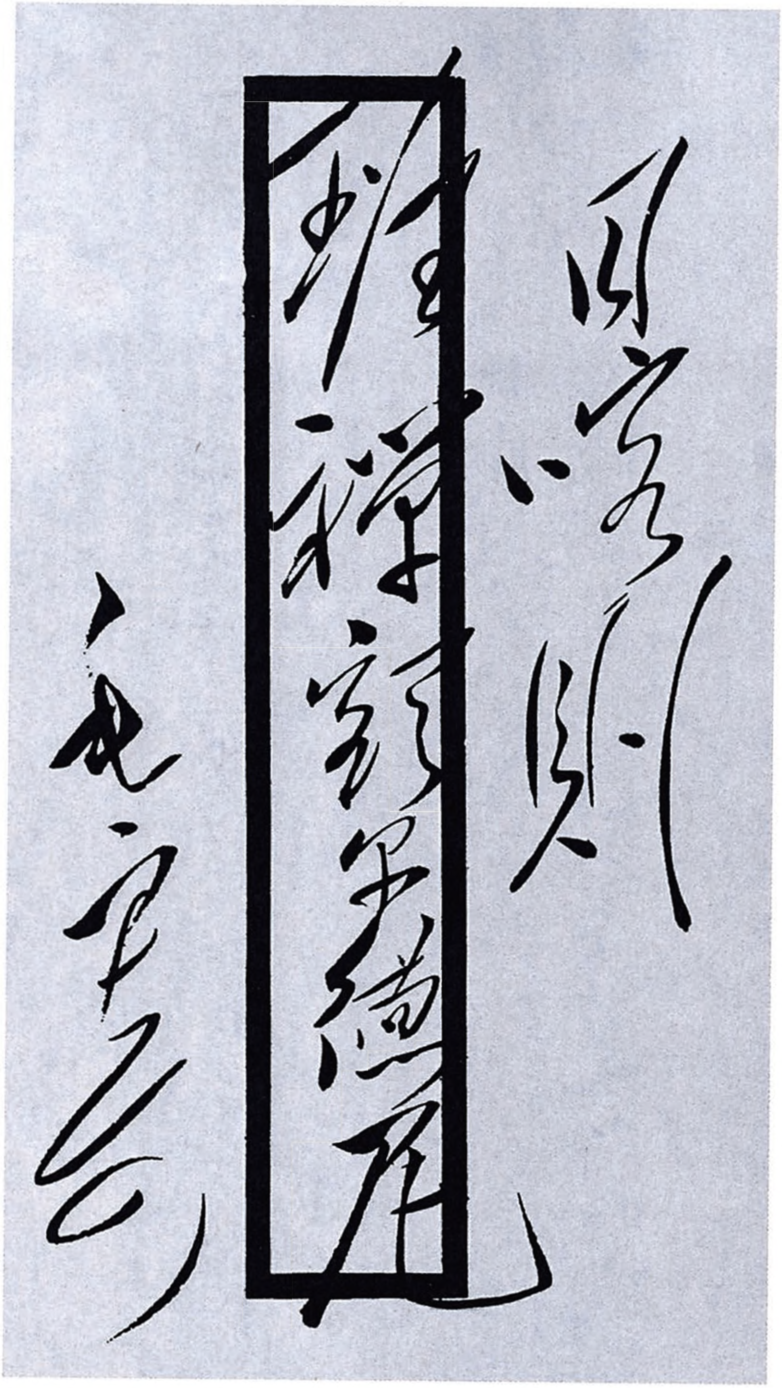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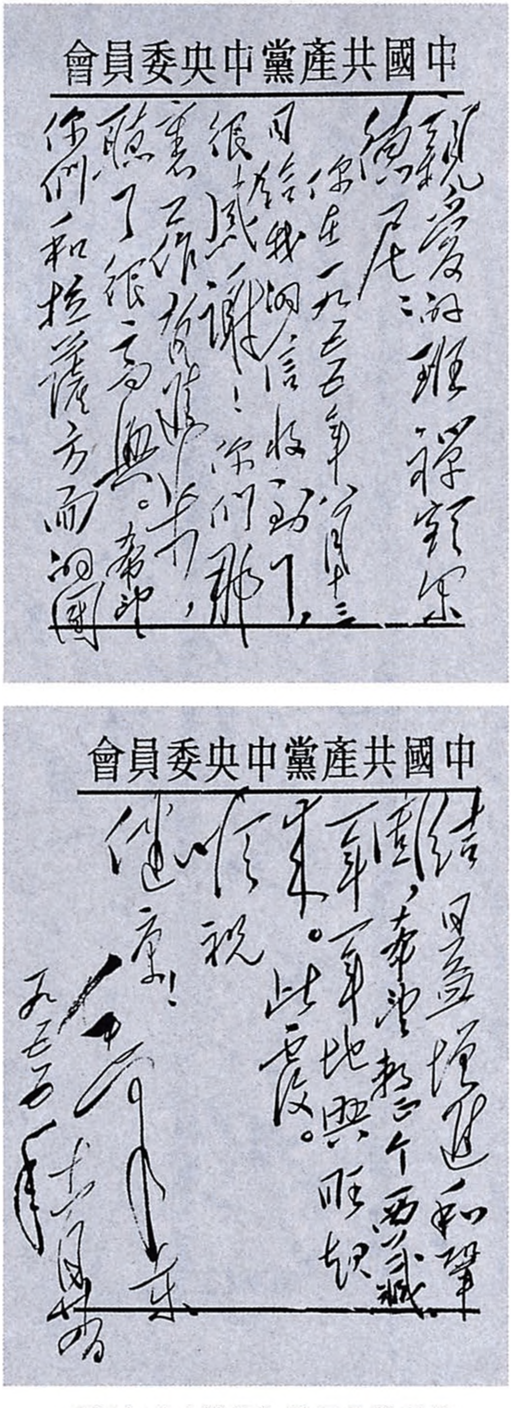


日喀则

班禅额尔德尼

毛泽东

毛泽东致班禅额尔德尼信的信封。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親愛的班禪額爾德尼：

你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給我們的信收到了，很感謝！你們那裏的情況，我們聽了很高興。希望你們和拉薩方面團結，日益增進和睦團結，帶領整个西藏更快地興旺起來。此復。

祝

健康！

毛澤東

五五年[illegible]

毛泽东致班禅额尔德尼信的手稿。

给周世钊[1]的信

（1955年11月24日）

惇元兄：

你的信好久就收到了，你的大作及附件各种都已读悉，极为感谢！嘱写的字至今未能应命。你那里还不那样急需吧，我想等一等再讲，如何？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看些别的东西。再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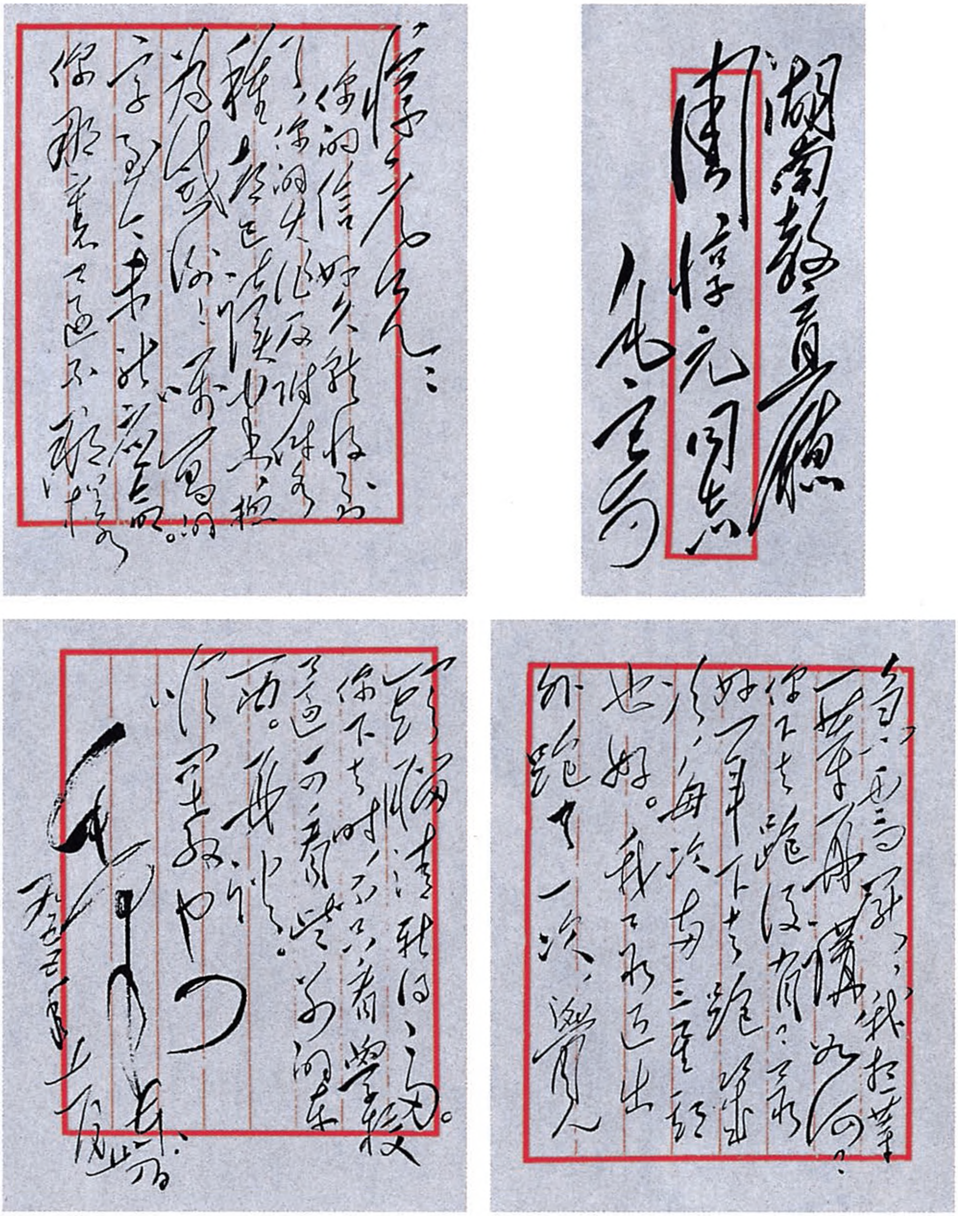
顺问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惇元兄：

[illegible]

湖南教育厅

周惇元同志

毛寄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5年11月26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布·铁托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莫萨·皮雅杰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同志：

值此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英雄的南斯拉夫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南两国人民过去在争取自己祖国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就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南两国的友好合作自从两国外交关系建立以来，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还会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祝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一周年的电报

（1955年11月26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当阿尔巴尼亚人民获得解放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政府致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十一年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捍卫祖国独立和创造繁荣幸福的新生活方面已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成就感到欢欣，并且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在我们两国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1955年，毛泽东接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团长贝哈尔·什图拉。

在中央关于传达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文件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

（1955年11月27日）

（四）在十二月下半月内，你们要召开一次关于研究改善我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的会议，准备派人出席在明年一月十日左右由中央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的意见和材料。此事将另有通知。

（五）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日内即可送给你们。

关于西藏贸易等问题给刘少奇、周恩来等的信

（1955年11月28日）

刘、周、陈、小平、李先念、李维汉[1]同志：

和张国华[2]谈了一次，他提出对西藏贸易每年赔钱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元以求降低物价的计划，我认为很值得注意，似应实行他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去后，粮价涨了几倍，茶价涨了两倍，百货也涨了百分之六十，这对西藏人民是很不利的，长此下去，什么改革都谈不到，最后可能引起失败。因为西藏不能和新疆、内蒙相比，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要用特殊的办法解决。而目前行得通的办法，就是经济上长期补贴办法。西藏面积很大，地质形成较全国许多地方为晚，很可能有极大的地下蕴藏，有待将来开发，目前赔一点钱，将来会补偿的。此事请陈云、先念、小平研究一下，在张国华走前，在书记处一谈。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附件[1]请一阅。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八日

阅后退毛。

---

[1] 指中共中央拟发的关于西藏目前工作中若干问题的指示稿。

关于朱德、聂荣臻[1]访问民主德国、苏联时应注意事项的批语[2]

（1955年11月28日）

刘、周、朱、陈、邓[3]、聂荣臻阅，退毛。

朱德同志和聂荣臻同志去德、苏，在谈话时请加注意，不要涉及具体事项的承诺，如对方涉及，应推出两国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去商谈。此件所说情况，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5年11月26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施托夫来信，提出向中国供应光学、医疗等仪器问题，看来信意思，可能是为这些产品在中国找市场。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答复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两个报告的电报

（1955年11月30日）

甘肃省委，并告青海、陕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福建、热河省委，及其他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看了甘肃省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关于批判“甘肃落后论”等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报告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我们认为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合作化的发展计划小了一点。你们说“目前全省积极要求入社的农民，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左右，加上已经入社的农户，则达百分之五十左右”，但是你们在第五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计划，则要到一九五六年才让“入社农户达到总农户百分之三十”，这是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的。你们应当改变这个计划，将已经积极要求入社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的农户，就在今冬明春分两批吸收入社，连同已入社的农户，共达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你们就主动了，明年秋冬再来一个浪潮，就可以基本上合作化了。这样做对于用全面规划的方法去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是很有利的。根据中南、华东、华北、东北各省计算，除福建、热河尚未查明，湖南据说只能于今冬明春完成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以外，其余十六个省，合作化农户占总农户的比例，大多数的省已经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少数的省也可以

于『于』今冬明春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他们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即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根据青海省委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报告，那里已经入社和酝酿入社的农户已达百分之五十，还有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可能。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这对今后的工作极为有利。你们的意见如何，请你们和各地委联系加以研究，电告为盼。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提纲[1]

（1955年11月）

（一）思想落后于实际。

（二）全面规划（各个矛盾侧面）。

（三）向资本家学习（又教他，又向他学习）。

（四）两面性是否有变化。

（五）上海一封信。

（六）对工人和工作人员的教育，然后去教资本家（资本家现在有了主动）。

（七）领导小组和政协的学习委员会。

（八）市镇以上的会议。

（九）对知识分子的会议。

（十）自我批评。

---

[1] 这十条提纲，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李维汉送毛泽东参阅的国务院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1955年11月24日关于全国500人以上私营工厂合营情况的统计表上。

对中央关于进一步展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的指示草案的修改[1]

（1955年11月）

为了进一步展开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在私营工商业者中间培养出一批核心分子。每个大城市应当有几百个这样的核心分子，每个中小城市也要有几十个或者几个这样的核心分子。这些核心分子由于接受党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逐步地解决了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因此他们逐步地不怕共产了，能够团结在党的周围，向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宣传和组织的工作。党委应当经过党委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统一战线部门的工作人员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人员，经常教育这些核心分子，关心和指导他们的工作，切实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和困难，经过他们去团结私营工商业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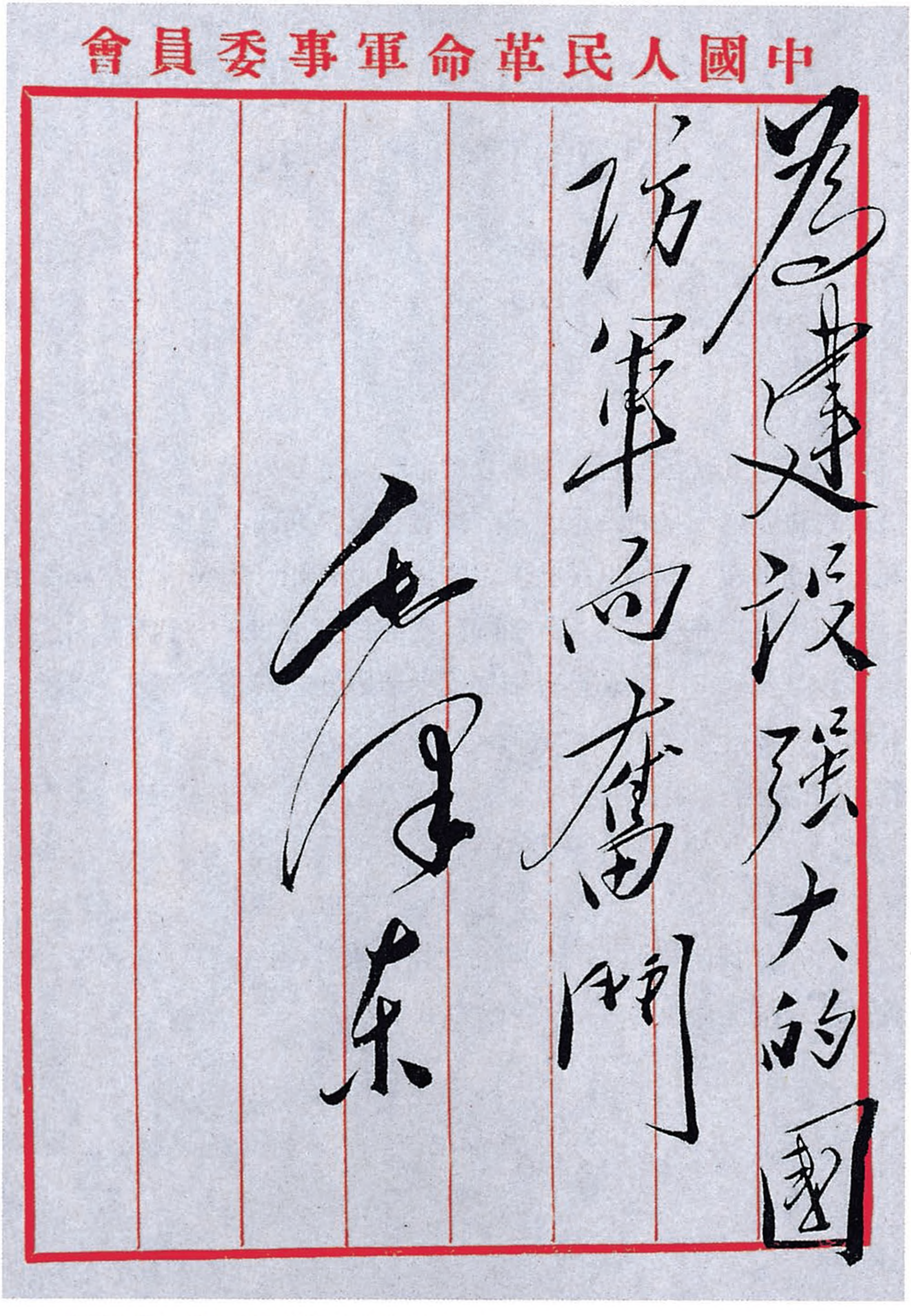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为工程兵积极分子会议题词

（1955年11月）

为建设强大的国访〈防〉军而奋斗。

毛泽东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為建設強大的國防軍而奮鬥

毛泽东

毛泽东为工程兵积极分子会议的题词。

在接受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纪普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5年12月3日）

毛泽东主席在致答词中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德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德国和平统一以及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成为全德和平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和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我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德国人民争取德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一斗争中，德国人民将继续得到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亲密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全面合作和兄弟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和愿望，也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1955年12月11日，毛泽东向来访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格罗提渥举杯敬酒。

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问题的电报的复电

（1955年12月4日）

一

甘肃省委，并告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日的电报[1]收到。像甘肃那样的情况，我们的意见，今冬明春分作两批，共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四十多一点，如果不勉强，则占总农户百分之五十多一点也可以，再多就可能不适合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再一个浪潮达到占农户百分之八十左右，那就很好。你们说“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发展到占总农户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数字太大，以控制在百

---

[1] 指中共甘肃省委1955年12月2日关于全省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中央11月30日对我省农业合作化规划速度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我省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规划确实是小了，这说明我们的领导仍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现决定于12月5日召开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准备来一次重新规划。根据目前各地合作化进展的实际情况看，在今冬明春的一个浪潮中，入社农户数发展到占总农户的75%左右是完全可能的。同时还必须注意，不但数量要多，而且质量要好。

分之四十左右、或五十左右为宜。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四日

二

刘、周、朱、陈、彭真、小平、子恢[1]即阅，尚昆[2]办。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一份反映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情况严重的材料上的批语

（1955年12月4日）

陈云[1]同志：

此件中江苏一条消息[2]请看一下。这个问题，请在研究曾希圣[3]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全面地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回答曾希圣并告各地的电报，能在一星期内外，写好发出就好。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新华社1955年12月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三九期上刊载的《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的消息。其中说，江苏省各地宰杀耕牛数字惊人，省畜产公司今年以来收购的牛皮比去年增加50%。据了解，这些耕牛中，有许多还能耕种。各地滥杀耕牛的原因是：一、农业合作社在处理耕牛入社问题上对老牛、小牛的报酬压得过低。二、对宰杀耕牛的审批制度执行不严格，很多地区经兽医检查后由区文书盖章就可以宰杀。三、价格政策有毛病，死牛比活牛的价钱还高。

[3]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在中央十人小组关于目前肃反运动应注意事项的通知稿中加写的话

（1955年12月6日）

在肃反运动中，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对象，必须也同其他方面一样，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超过这个控制数字的，必须得到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批准，有些要得到中央十人小组批准。

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

（1955年12月6日）

“左”比右好，不对；右比“左”好，也不对。有些人思想落后在实际后边，头上没有角，没有斗争性。两条道路斗争，不进行批评，批评不尖锐，怕批评，怕丢选票，均右倾之表现，党内有反之必要。农村部经验主义右倾，六中全会作了批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是严重问题。资本主义改造、镇反、合作化均如此。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过去农业落后于工业，十七条出来后赶上来了，压迫工业进步，如初级社，三四年不提高，不利的。五九年可能会实现社会主义。十七条思想反保守主义，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基本措施、先进经验，半年前不考虑，现在变了，出现了极大变化，极大的生产力，像发现新大陆，大陆本存在，看不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五七年百分之九十，手工业也要快，计划太少了。五七年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工商业国有化原说六二年，也许提前。合营了，变国营又不难了，合作化十八年改为十年，证明落后实际。群众潜力极大，可多办事，应该反右倾反保守，提前完成改造。建议，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改掉“大约”“基本上”“十五年左右”等不定语气。可争取的争取，如订货要求提早，利用在休战期间，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八大”思想。如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战场好办。赶快搞极有利，要打台口好打，但完

成建设任务则困难，要加快，各项工作均又快又多又好，较短时期得到较好成绩。办得到有条件，群众要求，办得多而好，即稳步前进。过去反盲目冒进出毛病，反掉群众干部的积极性，不对的。扫盲，反冒进反掉了，正气不升，邪气高涨，干部群众均没劲。这样问题：中央未能及早提出，是中央失职。群众说：“跟共产党走，没错。”大方向说没错，但具体说，我们错了，群众也跟错了。前进有几条路，上中下三策。

比较正确的合理的路线即站在前头，鼓舞群众前进，而非站在后边泼冷水。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成绩，按这，即稳步前进。按常规办事，时间长、工作少，即保守路线。要克服，有两种方法：全面规划，接近群众，非坐在办公室想办法，要接近群众找出新事物、新经验、先进经验推广。不一定捉麻雀好多才知肝胆。知浙、皖可快合作化，即知全国可搞。保守主义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抓先进的，批评落后的，发现新的生产力、群众潜力，这是一个领导法则，是领导方法，才能说服人。坐办公室，不接近群众，不抓先进，不行。公事要办，但只办公事是不行的，出去跑也要抓先进的，不能只搞落后的回来。一个负责人七至十周，接近群众。办公室式，只能是常规法。先进经验是要突出常规的。客观事物，天天突破，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这是前进规律。平衡了不可改变的观点是不对的，不平衡中抓先进的，带动其他，才能前进。不怕突破、出矛盾。永远太太平平必出错误。冲破而又求平，才是辩证法。这才能鼓舞群众积极性，提早社会主义建设，快、多、好，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稳步前进。

我国和苏联比较：（1）我国是二十多年根据地经验，三次革命战争的演习，经验极其丰富。胜利前，各个方面均有经验，左右好

几次，很快组成国家，完成革命任务。（苏是新起家，十月革命，无军，无政，党员少）。（2）我国有苏联及其他民主国家之助。（3）人口众多，地位很好，勤苦耐劳。不合作化，农民无出路。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好、更快地进到社会主义，不要老比苏联。我三个五年即可搞二千四百万吨钢，就比苏快。现在是两翼高涨，主体可能落后。两翼易骄，但最易骄者为工业，首先是重工业。鞍钢即有骄。很可能国家社会主义化了，但非工业化（比例不过六十，体系未建立），可否让农民等一下？那是不行的。农民社会主义化，并不妨害工业化，不能让他们等。两翼工作作了严格的检查。此外，对工业问题，也应作一次严格的检查，也按期过过大运动。财经、贸易、文教均要检查。八大作一次总结性的检查，这就是中心问题。反保守、右倾、消极、骄傲，发现先进经验，改变领导方法，做到又快又好。动员群众批评，自我批评，克服保守主义，做出来更多成绩，全党准备，全国人民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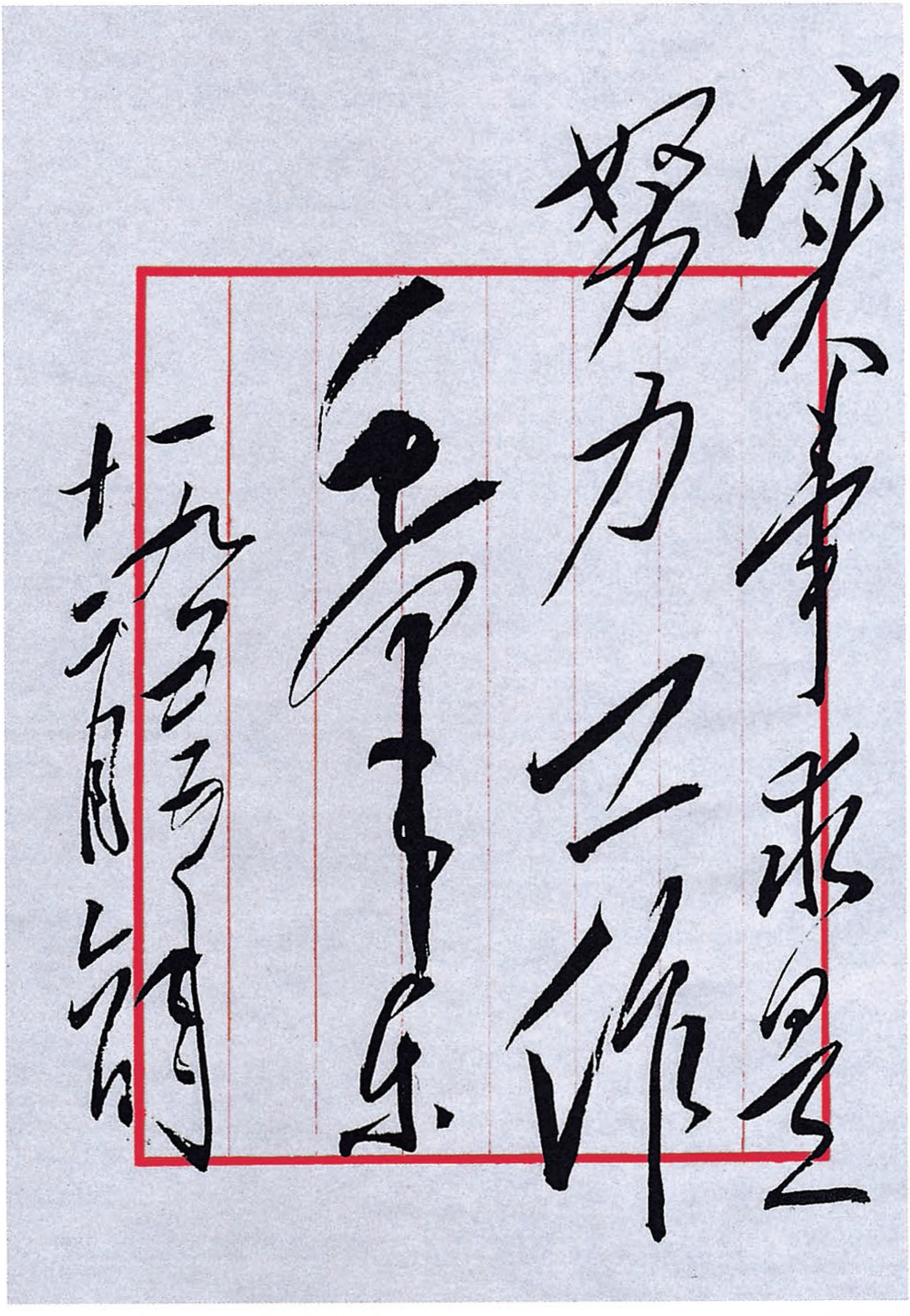
为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题词

（1955年12月6日）

实事求是，努力工作。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六日



实事求是
努力工作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为第二次政治情报工作会议的题词。

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批语[1]

（1955年12月7日）

同意。[2]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12月1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遵照主席在1953年关于军事系统每年应召开一次全军性的高级干部会议，以讨论工作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根据目前军队建设情况，军委准备在1956年1月底或2月初召开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拟集中讨论作战方针和具体规划，并总结1955年的军事训练和肃反工作，布置1956年的军事训练和肃反工作，研究授予预备役军官的勋章、奖章和军衔，紧缩机关编制、节减人员和统一军语等工作。报告还说：几年来，全国的军事建设工作，基本上是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和布置的。但是由于这一方针还没有在全军高级干部中进行深入讨论，所以大家对这一方针的认识和理解尚不一致，对作战有关的工作亦未作全面规划。因此，深入讨论一次，求得在全军最主要的干部中统一认识，使大家能够在统一的作战方针指导下全面规划各项工作，是很需要的。同时，经过两年多的摸索，大家对于国防工业的建设，对于新军种、兵种的建设已逐步能够掌握。因此，现在来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条件也比较成熟了。

给翟作军[1]的信

（1955年12月12日）

作军同志：

十二月二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你大概已回太原去了。过去的信收到一点，似乎没有收全。我们都好。希望你好好学习。下次到北京的时候，早日通知（用电话和我的卫士长李银桥联系），可来一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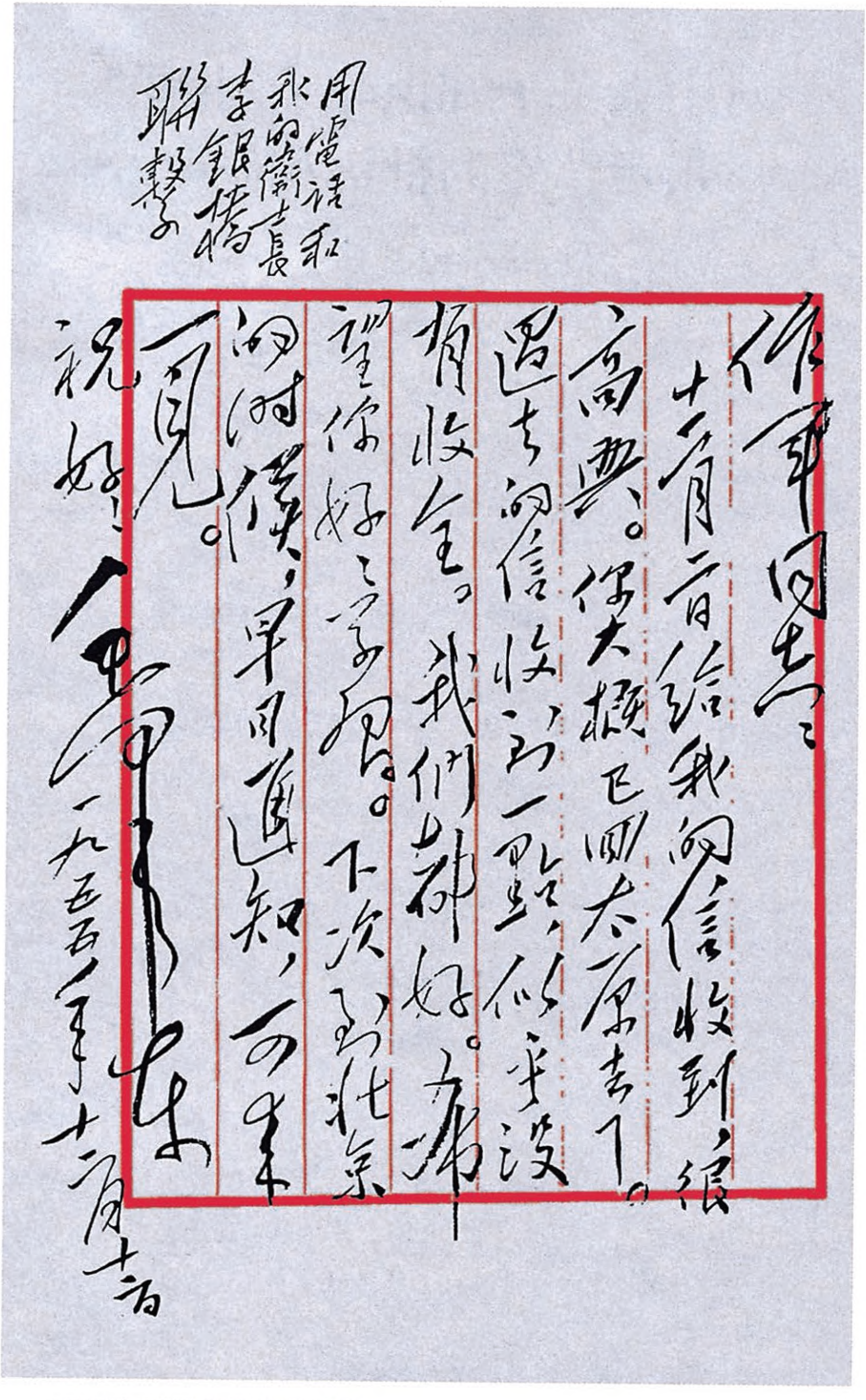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

[1] 翟作军，1937年至1939年曾在毛泽东处当警卫员、警卫班长。



作軍同志：

十二月二日給我的信收到，很高興。你大概飞回太原去了。過去的信收到一點，似乎沒有收全。我們都好。希望你好好學習。下次到北京的時候，早日通知，可來一見。

祝好！

毛澤東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用電話和我的衛士長李銀橋聯繫

毛泽东致翟作军信的手稿。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1955年12月16日）

一

刘、周、陈、彭真、胡乔木[1]即阅，于本日阅完，交尚昆[2]于本日晚上发出。另印如前示。

这个文件可用。作了一些修改[3]。最大的缺点是不通俗，只好将来再修改。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四时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即本篇三至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各党组，总政治部：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发给你们。请你们在准备召开的会议上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以前将应修改之点电告中央为盼。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三

这个草案发给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然后在中央准备召集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召〕开『会』的会议上再征求意见，加以修改，最后确定。

四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五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六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

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

（1955年12月21日）

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

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

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一九六〇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

缩短一年，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一九五六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一九五七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三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三十万个，或者四十万个，或者五十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十万个社，我国是否以三十几万个社或者四十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一九五六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一九五七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分，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一九五六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三年，最好七年，可以到十二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

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区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1]（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

---

[1] 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将麻雀换为臭虫。

蝇，蚊子。

（十四）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十五）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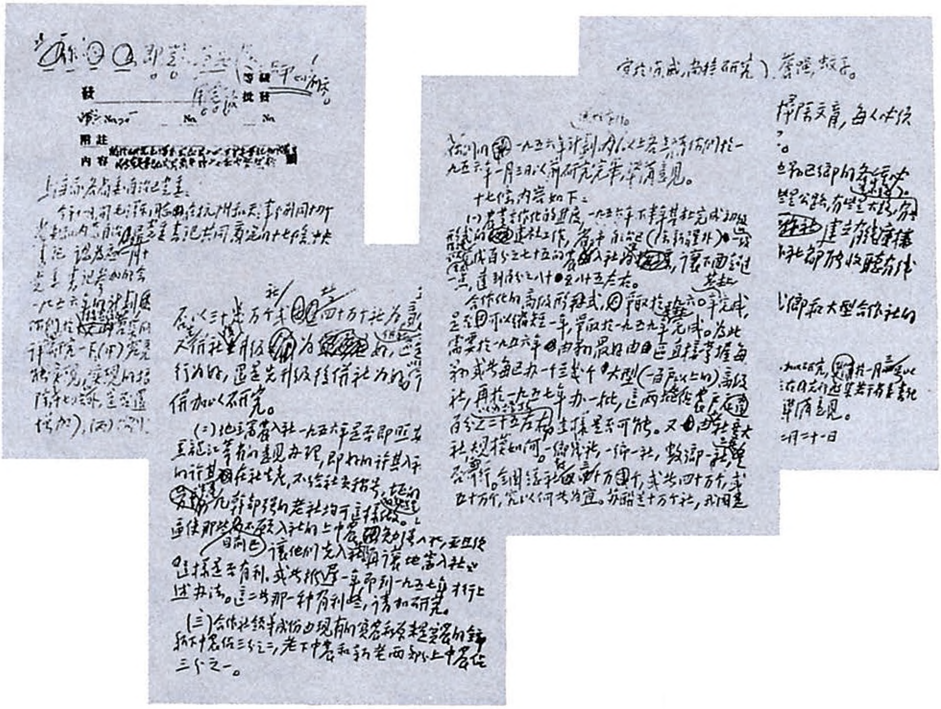
（十六）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同15个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通知，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我们的愿望是使中泰两国友好[1]

（1955年12月21日、1956年2月10日）

一

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目前可以帮助你们设棉纺厂、造纸厂和糖厂。你们可以用大米、橡胶来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对銮披汶总理、乃炮警察总监和乃练的致意，我表示感谢。我们希望大家合作团结起来，希望銮披汶同乃炮团结起来。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

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5年12月21日和泰国代表庵蓬等人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1956年2月10日和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

你们的做法要慎重，美国是会下毒手的，要小心。你们当初提出要秘密地来，当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后，就同意了。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銮披汶同乃炮应该团结，团结对泰国有利。美国希望你们不和，内部争吵。它制造这派反对那派，那派反对这派，是为了乘机捣鬼。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如果我们去了，美国会同你们找麻烦，造成你们的困难，那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

二

我们希望能够逐步地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两国就会建立起邦交。要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我们可以等待。我们的愿望是要使两国友好。有误会可以慢慢解释，比如说怕中国要侵略泰国，其实我们是怕人家侵略，怕美国侵略。我们不怕印度或泰国侵略我们。现在美国正侵占着我们的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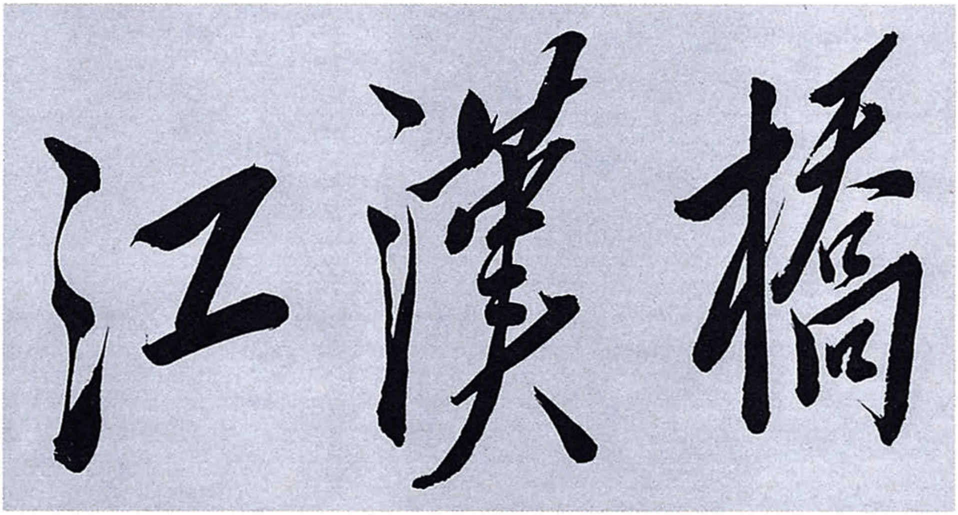
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要慢慢来，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巴基斯坦、柬埔寨和锡兰的总理最近都要到中国来，其实巴基斯坦的前总理阿里先生在万隆会议上曾经骂过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吵过架，西哈努克亲王也曾经同周总理吵过架。（问周总理同旺亲王有没有吵过架，周答：旺亲王一开始就好。）你们吵得少一点。我们跟他们有吵架的一面，也有团结的一面。这些国家反对中国跟美国反对中国是不一样的。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这一条的。日本政府也反对我们，但这同美国反对我们是两回事。菲律宾也是一样，它不愿意同我们建立邦交，罗慕洛在万隆会议上也同周总理吵过架。我们很关心这些国家的处境，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共同的遭遇，都受到美国的欺负。亚非国家都反对殖民主义，印尼不满荷兰，北非和印度支那不满法国，马来亚不满英国，中近东也不满英国。那些殖民主义者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但是，不是中国在抢去各国市场，而是美国在抢去各国市场；不是中国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不是中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

事顾问团到各国去。总的来说，中国一没有抢夺各国市场，二没有在国外建立军事基地，三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四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事实上，中国在中国境内抢夺了他们的市场，中国在中国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结果把他们的朋友蒋介石赶走了。我们争夺了中国市场，在中国建立了军事基地，我们对蒋介石不客气。美国说我们这样是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又犯了错误，犯的什么错误？犯了接待外国朋友来访问的错误。三年来日本来了一千多人，其中也有国会议员，我们犯了接待他们的错误。现在又犯了接待你们的错误。有一天我们还会犯接待美国人来访问的错误。外交学会会长是一个犯错误的会长，因为他经常接待外国朋友。而你们到中国来也犯错误，以后还会有人再犯这样的错误。你们走向中立的时候还要犯一些错误，因为讲和平、讲中立，美国都说是犯错误。世界的是非竟是如此。

为江汉桥[1]题名

（1955年12月）

江汉桥



毛泽东为江汉桥题写的桥名。

---

[1] 江汉桥位于武汉市汉口和汉阳之间，北连汉口武胜路，南接汉阳鹦鹉大道，是汉江上修建成的第一座公路大桥。1953年，武汉市政府决定修建汉江公路桥，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1954年设计并施工，1955年12月25日竣工通车。毛泽东亲自题写桥名。

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5年12月26日）

一

胡乔木[2]同志：

此件[3]可用。即送刘、周、陈、彭真[4]阅后，由你处理。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

---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文件集序言稿时改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3] 指胡乔木1955年12月6日代中共中央办公厅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文件集》序言稿。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二

一九五五年十月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潮流是这样地勇往直前，以至一再地超过了任何最乐观的估计。成万万的农民涌进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完成。

关于元旦社论和准备召开部分省委书记会议等问题的信

（1955年12月30日）

周、刘、陈、彭[1]各同志：

社论[2]写得很好，陈伯达[3]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

我已约陈毅、柯庆施[4]二同志来此，先行商量一下，准备一月五日开会的事情。陈云同志病情如何？不知一月四日能来此否？如未愈，则不要来。谭震林、廖鲁言[5]请通知他们于三日或者四日来此。

请周要尚昆[6]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一月四日到达杭州，准备于五日开

---

[1] 周，指周恩来。刘，指刘少奇。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人民日报》准备在1956年元旦发表的《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5]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6]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

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1]，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2]同志。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

[1] 指毛泽东1955年12月27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

[2]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

（1955年12月）

新华社这几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有管？

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

[1] 这是毛泽东针对当时新华社在发展国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动迟缓的情况所作的指示。

关于增产节约的讲话（记录稿）

（1955年）

我们是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大国，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均很低，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内是过渡时期，中心是工业化，打物质基础。在现有条件下，继续贯彻党的艰苦奋斗传统。资金唯一来源靠自己积累。第一个五年十个指头，只做了一个。第二、三个五年资金需要更大，不厉行节约无法完成任务。如果非生产建设投资突出了，会破坏工农联盟和全国团结，农民为什么不进城？十五年内，不可能样样现代化，样样社会主义，是打基础阶段。非重点建设，非近代技术装备的工厂，第一个五年感到困难，第二、第三个更要大。削国防不可能，削行政人员，也非安置生产，非加强生产不可。不可设想削减建设国防人员解决问题。只有全面节约解决问题。

过去认识不深，贯彻不透。如工厂，福利设施均社会主义设施。已无福利可增加。先抓生产、开工。

农场也太近代化了。牛场120万平方米，先进社会。

工房、宿舍、高楼、大厦，百把万，住不起。长春汽车厂、乌拉尔厂，宿舍太漂亮了。厨房，西太后出来也要说话了。这是不了解建设困难，忘记传统，违背工业化方针及与农民共艰苦患难的精神。

生产和生活不平衡。节约为了增加积累。

一、除近代化技术设备以及和设备必要配合的厂房（国外的按国外设计，国内的按可能削减），其他一律降低造价。和延安窑洞看齐，办公室、教室、农场、宿舍、车站等按过渡时期标准，用十五年、二十年。一律砖木结构，甚至土坯子、竹泥墙。

一类是现有大城市，可以砖木。

二类新的单独城市、厂矿，要用土坯。

办公室、学校50元至70元

宿舍20元至50元

不同宿舍不同房租。

仓库40元至50元

车站50元至70元

首都盖大楼装样子，须国务院批准。

工程部六至八月拟出标准。

二、新建工厂、铁道、农场、福利、设施，根据生产、利润、业务的情况，逐年实施。先抓重点，如宿舍、卫生所无利润以前不建设。不可一下子社会主义，是远景，不是一下子社会主义。首先礼堂不可搞。

三、新建企业其他方面厉行节约。轻工业至多一年的筹备机关，以前筹备由部局直接筹备。

设计，照标准。重工业部门到苏联的人太多。

实习生的待遇要降低。

每个环节，严加控制。厂内办公室，沙发一律不准，也不买收音机。不要厂长和职工生活脱离太远。

四、现有新城，计划均要修改，不要搞社会主义化，要利用旧

城。工业要相当疏散。

1. 不搞高大建筑。一层两层。

2. 非工业集中的城市，根本不建城市。如职工用水，可用地下水，用自来水者使用公共水龙头。

马路要，绿化面积慢慢来。

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化”。二十年后，再用新规划。

五、今年准备建筑的高楼大厂，未动工的一律停止。

六、地质勘探：

1. 勘探量不必增加。

2. 希望增加的，增加50%工作量。

七、建筑部六、七、八个月交出标准。

1. 生产方面：

（1）降低成本：工业6%加到7.5%；铁路2.5%至3.5%；商业2.9%至13.9%。

（2）节约原料，轻工业、棉花、卷烟量。

（3）重工业完成新产品试制计划，上半年49%，不及一半。

（4）一律停止收新工人，先内部清理调整，现在都核不清。现在人多了。

（5）每一环节，直至清理垃圾。鞍钢月搞五万吨钢铁，指标到车间。

2. 生活消费：

（1）除招待外宾外，一律只供清茶一杯，一律不请客、会餐。

（2）办公室不买沙发，首长办公室，两个小沙发，用会议桌。

（3）公文表报节约，非国家统计局批不可发。

（4）减少汽车使用。

五律·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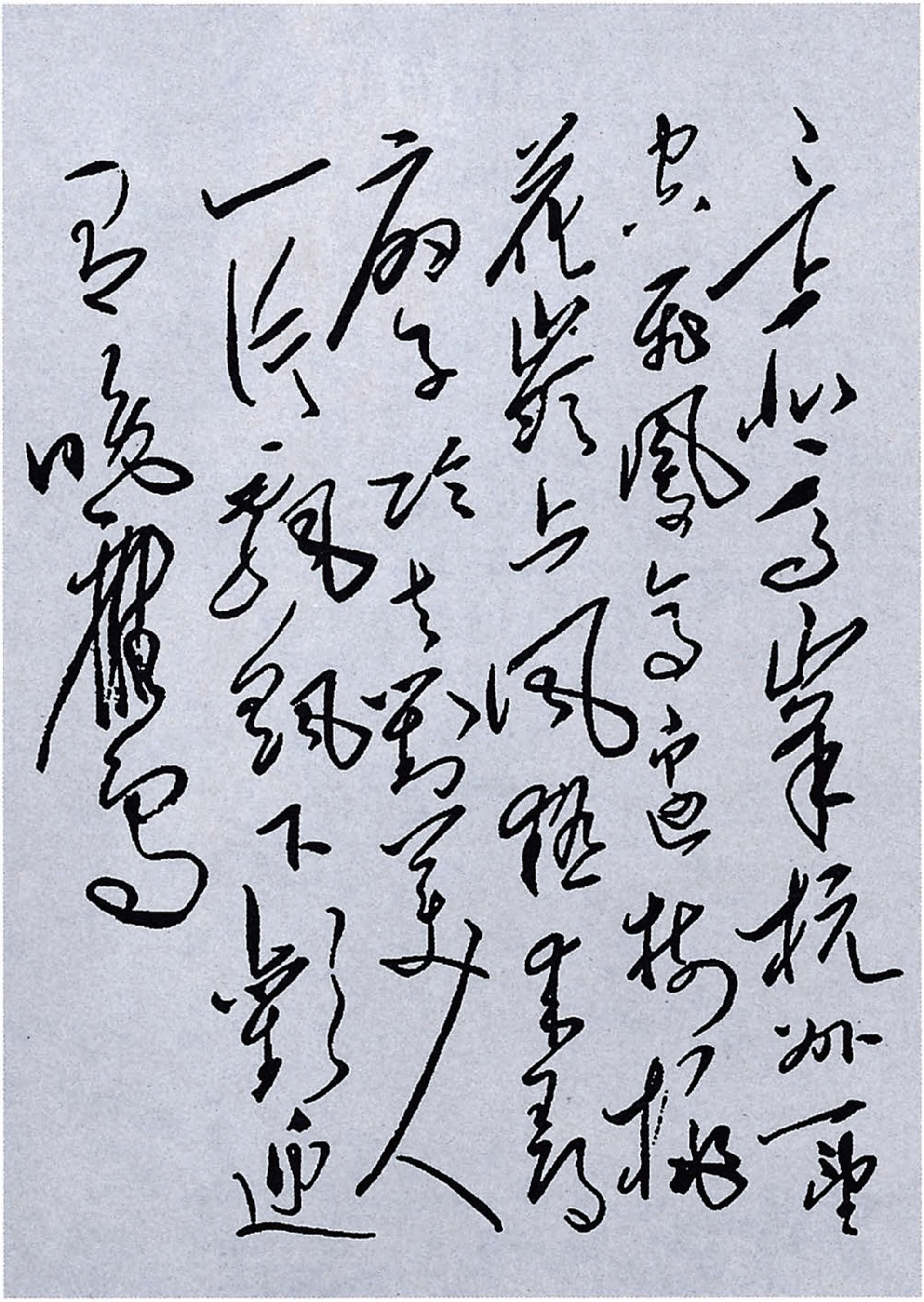
（1955年）

三上北高峰[1]，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飖[2]下，
欢迎有晚鹰。

---

[1] 北高峰，在浙江省杭州市灵隐寺后，与南高峰相对峙，为西湖群山之一。在北高峰附近有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等名胜。根据毛泽东自注，诗中的“扇子”指扇子岭，“美人”指美人峰。

[2] 飘飖，同“飘摇”，飘荡、飞扬貌。这里指鹰翔。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
空飞凤亭边树桃
花岭上风热来寻
扇子冷去对佳人
一片飘飖下欢迎
有晚鹰

毛泽东手书《五律·看山》。

毛泽东登上杭州北高峰。

七绝·莫干山[1]

（1955年）

翻身复进七人房[2]，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3]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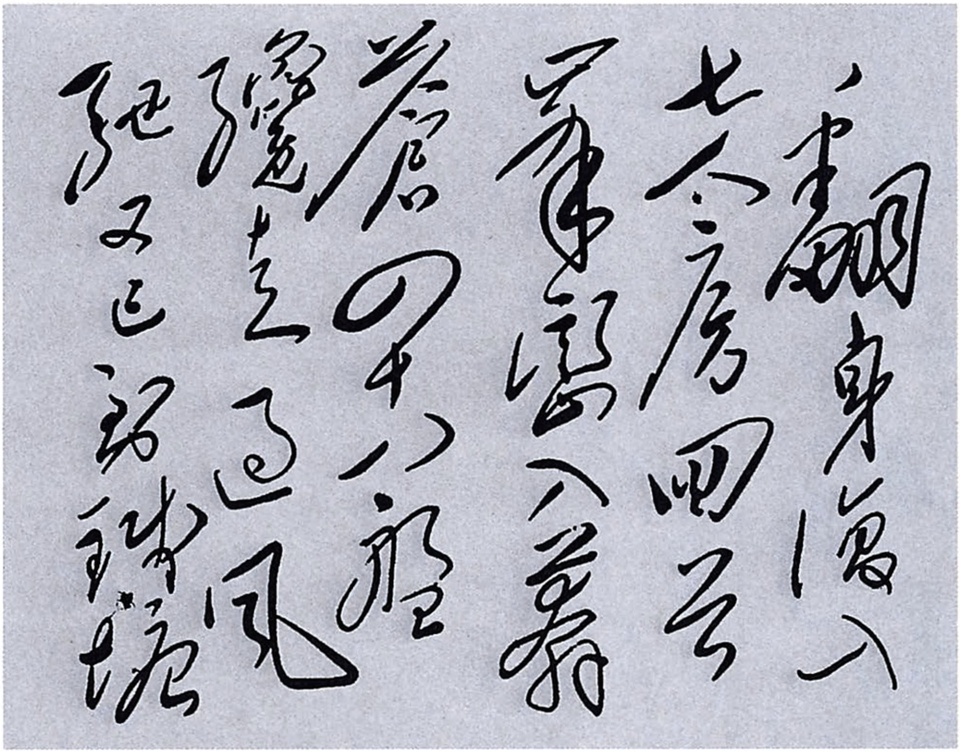
---

[1] 莫干山，在浙江省德清县西北。相传春秋时吴国在此铸“莫邪”“干将”二剑，故名。为浙北避暑、休养胜地。

[2] 七人房，指毛泽东使用的卧车，可坐七人。

[3] 四十八盘，泛写曲折盘旋的山间公路。

[4] 钱塘，旧县名。这里指杭州市。



翻身复入
七人房回首
峰峦入莽
苍四十八盘
才走过风
驰又已到钱塘

毛泽东手书《七绝·莫干山》。

七绝·五云山[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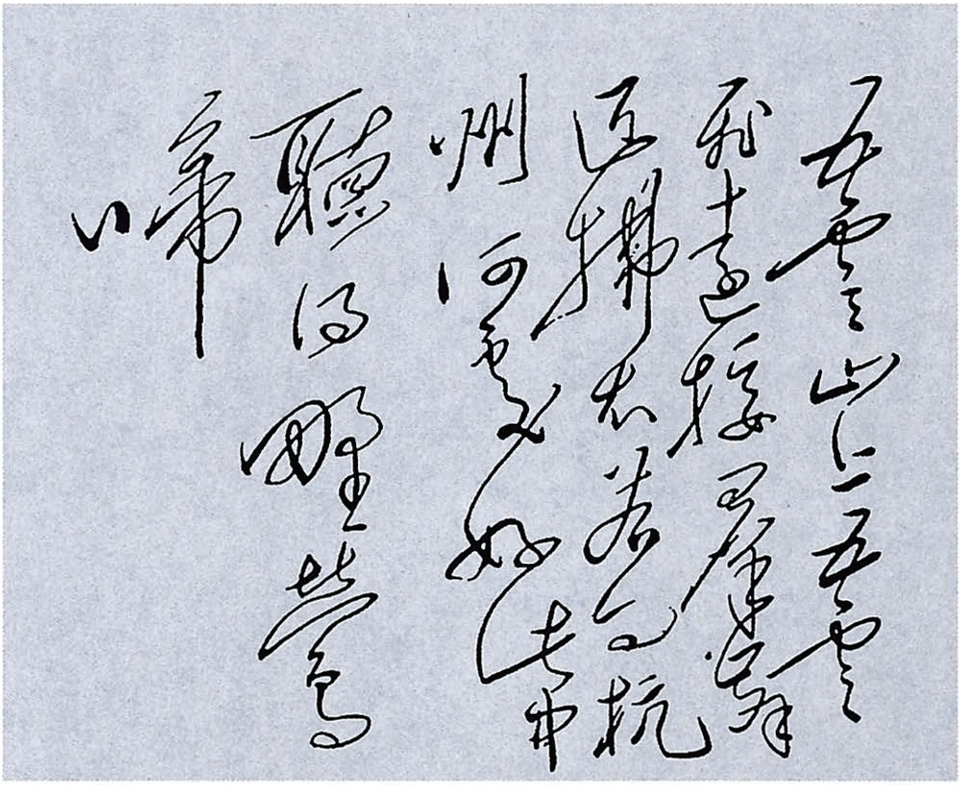
（1955年）

五云山上五云飞，
远接群峰近拂堤[2]。
若问杭州何处好，
此中听得野莺啼。

---

[1] 五云山，是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群山之一，邻近钱塘江。据传因有五色彩云萦绕山顶经时不散而得名。

[2] 堤，指钱塘江的江堤。



五云山上五云
飞远接群峰
近拂堤若问杭
州何处好此中
听得野莺
啼

毛泽东手书《七绝·五云山》。

1956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

（1956年1月7日至9日）

一

恩来同志：

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

---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扩充发展起来的。1955年11月间，毛泽东先后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就全国农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共同商定了“十七条”。12月21日，中共中央将“十七条”发至各地征询意见。1956年1月上旬，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商量的意见，在毛泽东主持下，对“十七条”进行多次补充和修改，逐步形成为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40条。这个草案，1月23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1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布。本篇三至九，是毛泽东对纲要草案稿（当时为36条）的修改，其中三至八改在“第三天会议改正稿”上，具体修改时间不详，九改在毛泽东这次修改抄清稿上，在标题上方注有：“一九五六年一月七日稿”。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1]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来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2]，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二时

有些指标数字尚待填入的，待廖鲁言[3]同志回京后，查明填入。

---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国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

[2] 指为讨论修改《农业十七条》于1956年1月5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部分省委书记会议。

[3]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二

恩来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1]，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2]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53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将未改的52本加以改正。

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我拟于今晚十时动身返京。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上午四时

---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条款是在讨论修改过程中逐步增加的。1956年1月4日的改稿为22条，1月7日前增加到36条。在1月7日的铅印件上，根据毛泽东前一次批注的意见，增加了有关青年的1条，并加写了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1条，共38条。1月8日的铅印件上，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2条，成为40条。

[2]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三

（5）对于由合作社管制生产的反革命分子，合作社应当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则，给他们以应有的劳动所得。（6）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只要他们没有参与犯罪行为，应当允许他们入社，并且应当同一般社员同等待遇，不要歧视他们。

四

蔬菜是一项重要的副食品。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一律种植蔬菜，改善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城市郊区和工矿区附近的农民应当有计划地种植蔬菜，充分地保证城市和工矿区的蔬菜供应。

五

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积储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区、乡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定出实现这个要求的具体规划。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

六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

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大量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上述这些工作，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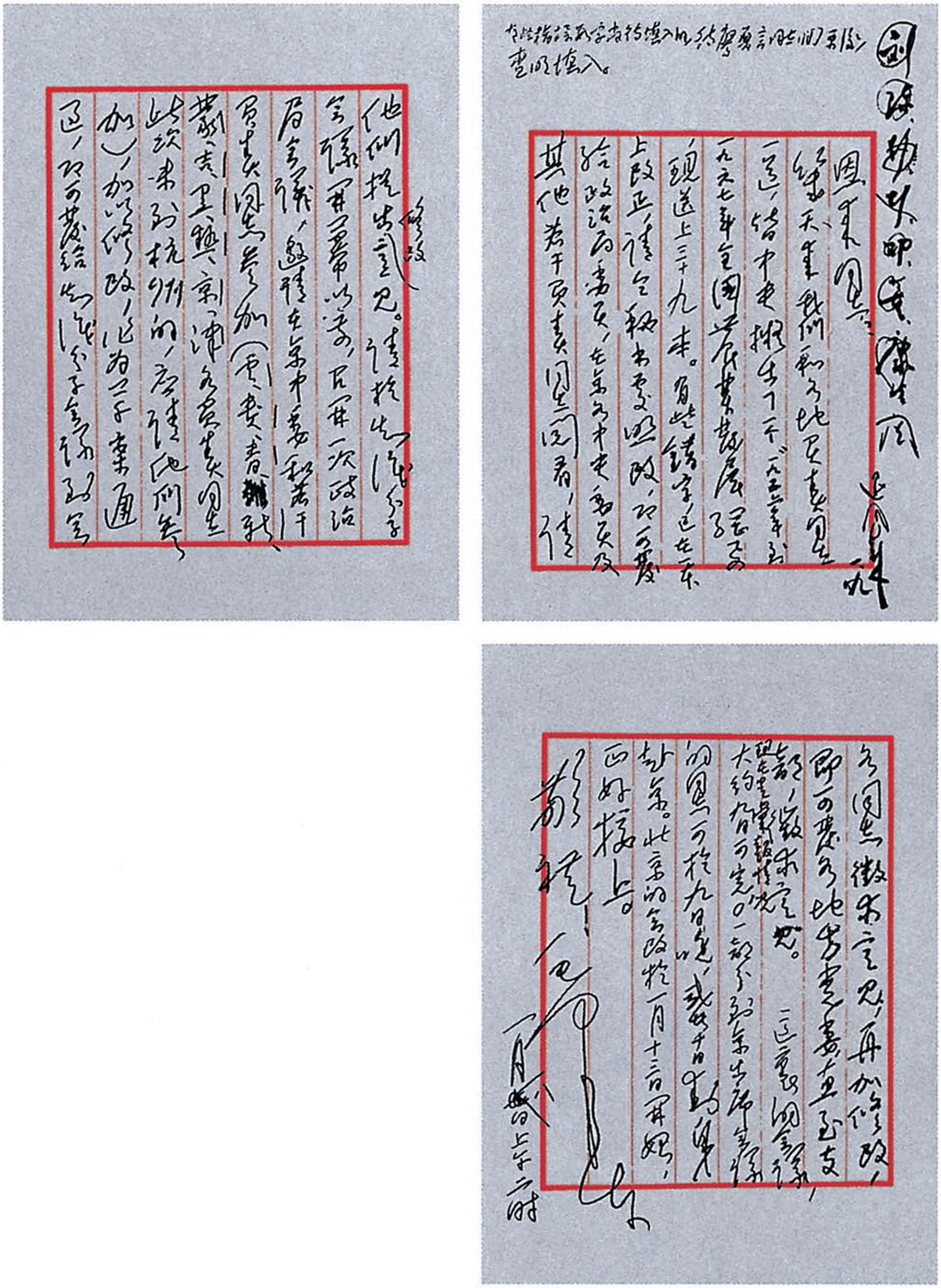
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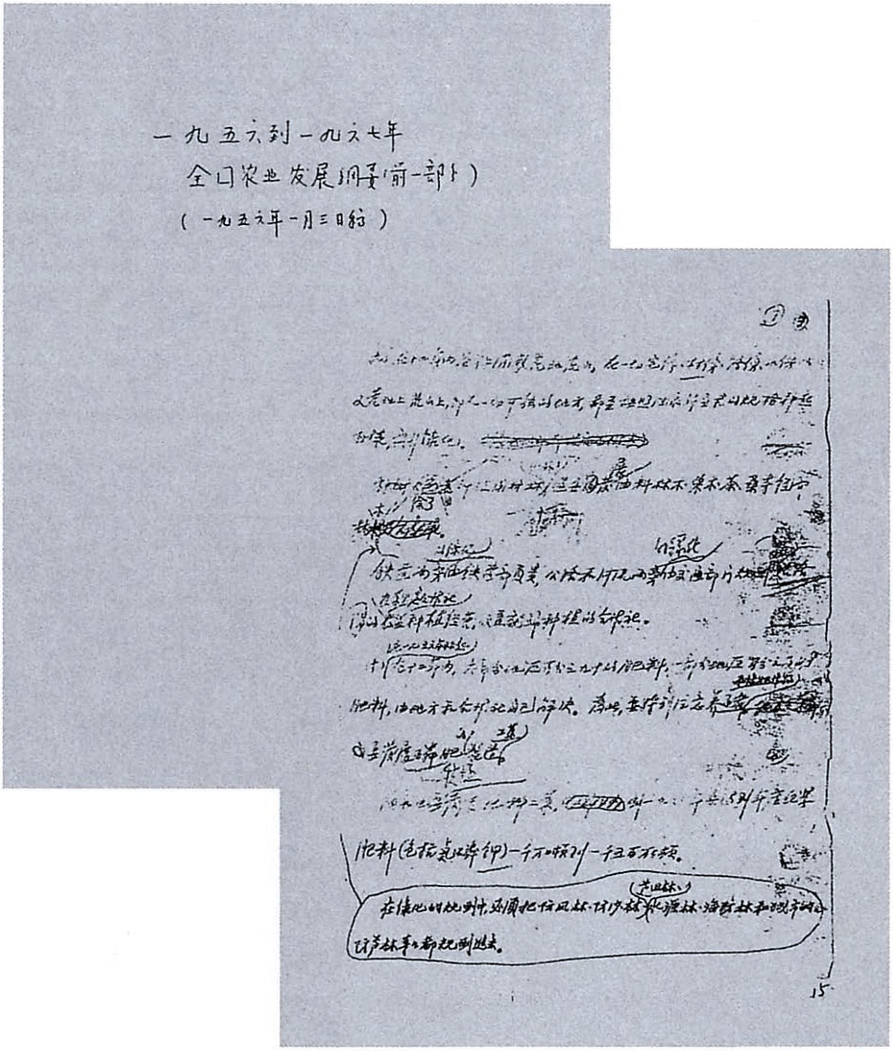
随着合作社生产的发展和社员收入的增加，为了便利社员从事生产活动和政治文化活动，为了改善社员的卫生条件，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鼓励和协助社员，在自愿和节约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批分期地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

九

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系统地建立、充实和提高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的机构。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手稿。



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前一部分)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稿)

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部分)。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6年1月10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贝哈尔·什图拉同志：

值此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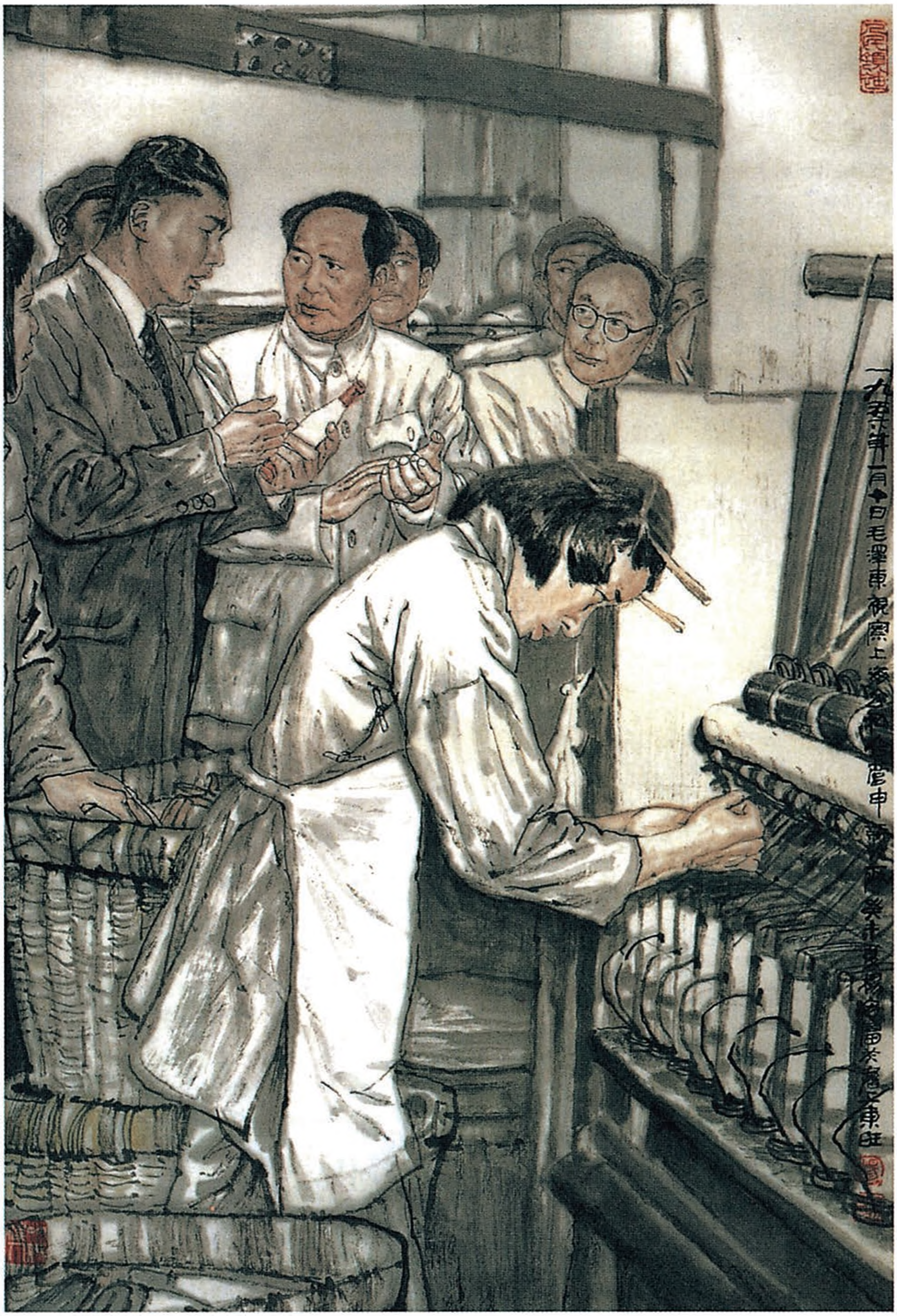
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并且正充满信心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最近阿尔巴尼亚参加联合国的事实定将使阿尔巴尼亚今后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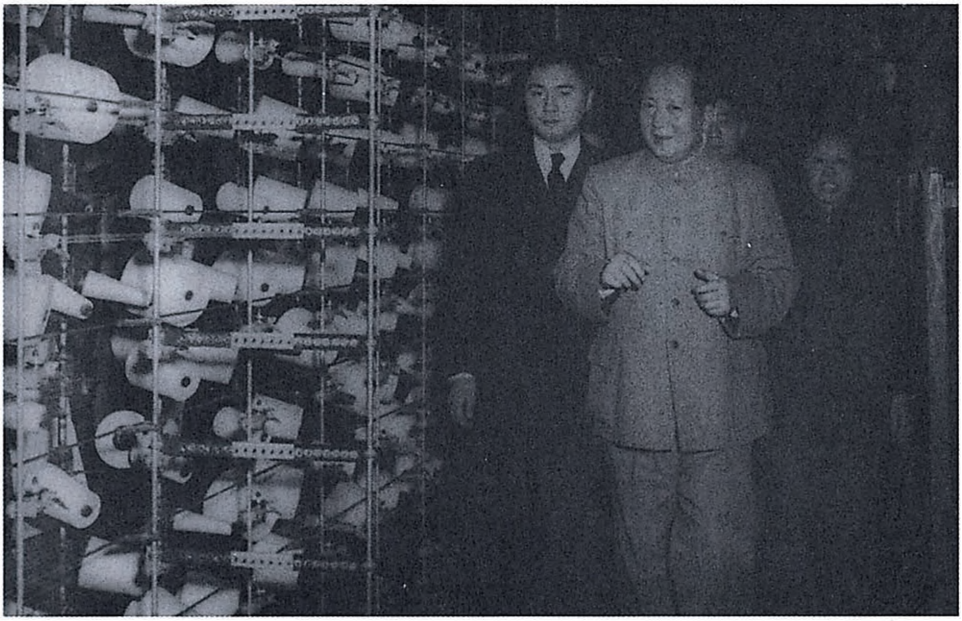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5年1月10日于北京

1956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市长陈毅的陪同下，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棉纺九厂。图为毛泽东和荣毅仁在交谈。

1956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在荣毅仁的陪同下，视察公私合营后的申新棉纺九厂。



《视察棉纺厂》（中国画）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在上海参观公私合营后的申新棉纺九厂。

1956年1月，毛泽东在上海和各界人士交谈。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到上海江南造船厂视察。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视察江南造船厂，参观正在建造中的我国第一艘潜艇。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参观上海江南造船厂。

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南京市郊十月农业成产合作社，和干部、社员亲切交谈。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郊区饶辰乡十月农业合作社视察。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视察时和群众在一起。

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并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及苏联顾问合影。

1956年1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视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

1956年1月，毛泽东和南京各界人士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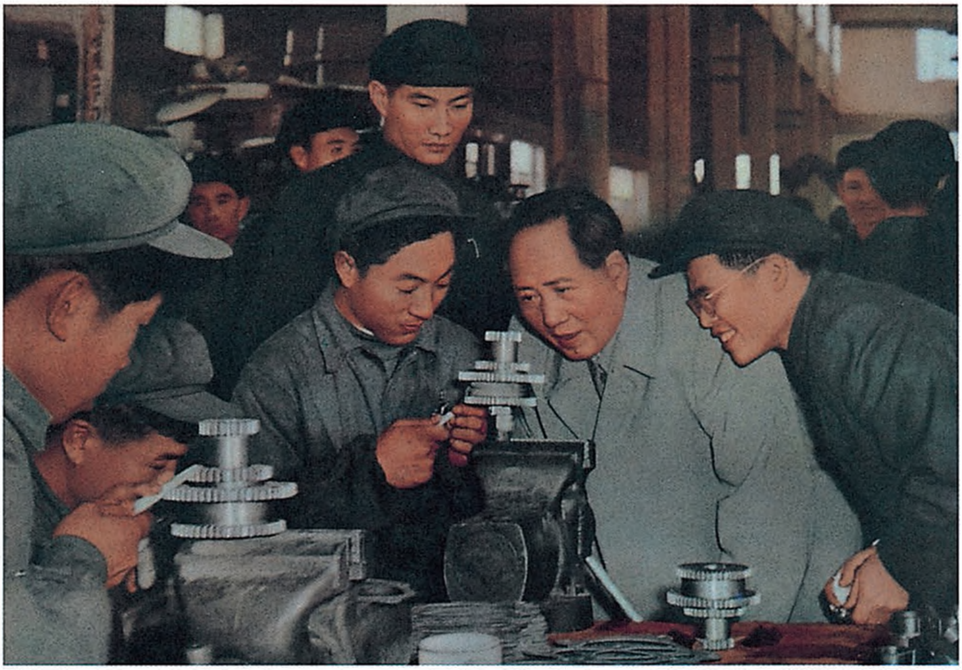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南京和各界人士在一起。

1956年1月，毛泽东和南京各界人士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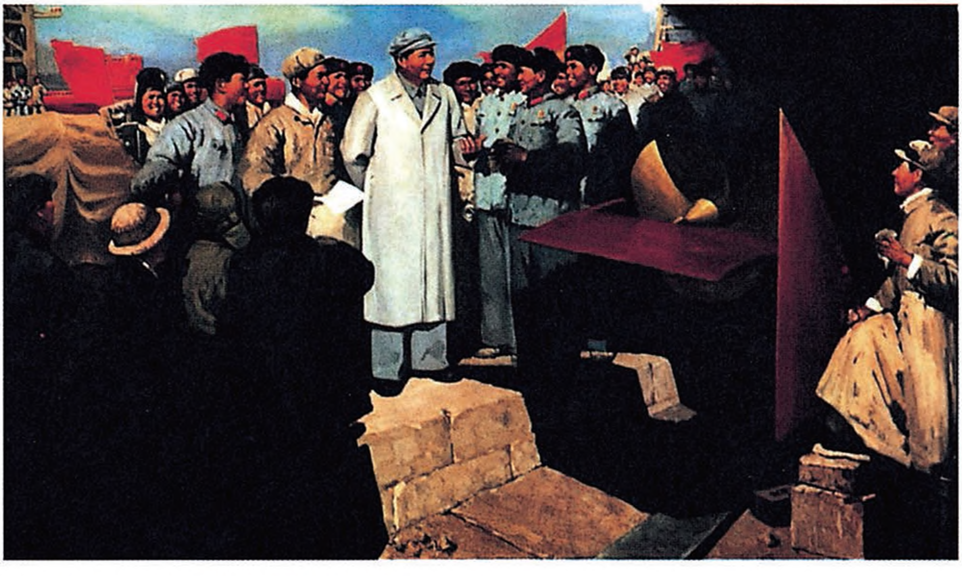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参观南京无线电厂。

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视察国营南京无线电厂。

1956年1月，毛泽东参观南京机械厂。



1956年1月，毛泽东视察天津拖拉机配件厂。



《毛主席来到造船厂》（油画）

给齐吉树[1]的信

（1956年1月14日）

齐吉树同志：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药已托人去找，如能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照片送上。顺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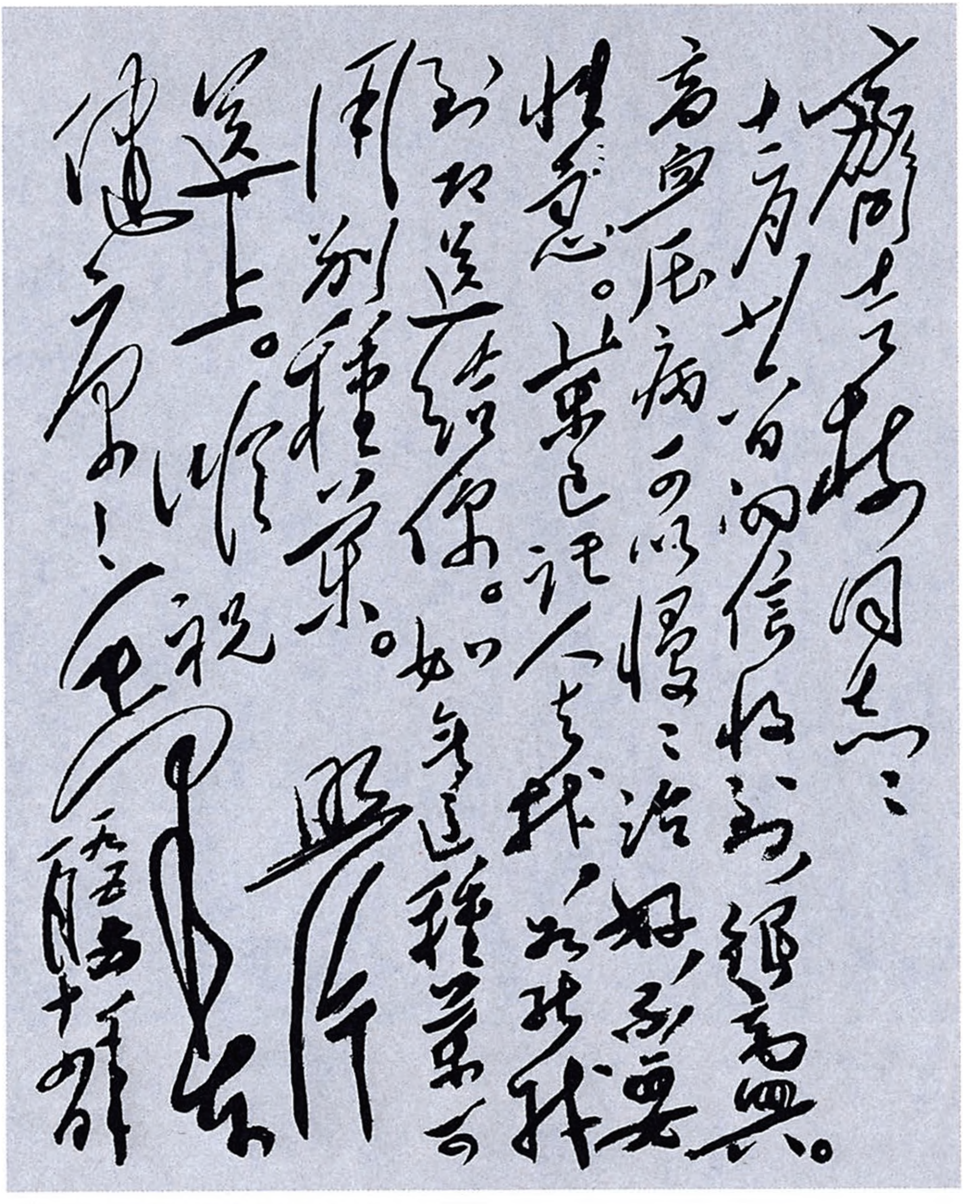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

[1] 齐吉树，1943年至1946年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



齐吉树同志：

十二月廿日的信收到，很高兴。高血压病可以慢慢治好，不要性急。业已托人去找，如找到即送给你。如无这种药，可用别种药。送上。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四日

毛泽东致齐吉树信的手稿。

公私合营信大祥绸布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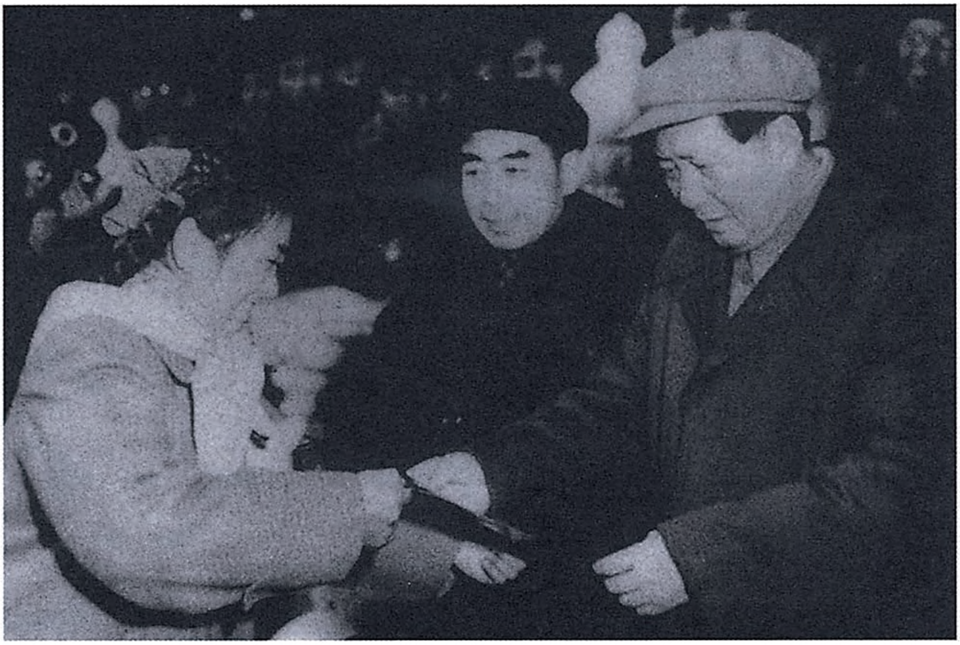
1956年，上海信大祥绸布商店职工在庆祝公私合营。

1956年，全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上海市永安分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后，商品品种增加，营业额上升。

1956年1月，上海市私营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民建上海市分会主任委员、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盛丕华率领工商界赴京报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的亲切接见。

1956年1月15日，20多万北京各界人士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在全国第一个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图为毛泽东在周恩来和彭真的陪同下，接受工商界代表乐松生呈献报喜信。

1956年1月15日，20万北京市各界人士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图为农民代表向毛泽东敬献喜报。



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听取北京工商业职工的汇报。

关于控制高级社发展数目的批语[1]

（1956年1月19日）

先送廖鲁言[2]同志办，同意王任重[3]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4]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5]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廖鲁言1956年1月19日转报王任重关于湖北省发展高级社的控制数目问题的电话请示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目前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关于高级合作化问题，一部分同志赞成省委的计划，即春耕前发展1万个高级社（达到农户总数的25%到30%），秋收前后再发展；另一部分同志主张放手发展高级社，达到全部农户的70%或80%，基本上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仍按省委计划发展比较稳当。廖鲁言在报告中表示同意王任重的意见。王任重在电话中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同志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2]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3]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5]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

1956年，毛泽东亲切会见台湾省政协代表。

1956年，毛泽东和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高卓雄亲切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亲切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何贤亲切交谈。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1]上发出的号召

（1956年1月20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1月14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1月20日）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

会议开得很好。听了各位同志的讲话，很高兴，可以看出同志们的水平很不低，很高，许多讲话是很好的。

现在我要讲的是领导方法问题。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拿最近一年来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知识分子的问题等几件事来看，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迟一些、坏一些，也可以早一些、好一些。我们在延安时，曾组织过宪政促进会，现在没有了；现在有人说中央是全国社会主义促进会，这次会议也是一个促进会，省、市委，各部门，也是促进会。领导机关可以促进，也可以促退，也可以有进有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是国民促退政治，它促使社会倒退。我们的领导机关应该促进事业的发展，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农村工作部有一个时期就是农村工作促退部，因为它要砍掉些合作社；卫生部有一个时期也是促退部，把事业搞垮了。各地方、各部门是否也有这种现象呢？上层建筑不适合经济基础，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这就丧失了上层建筑应有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基础，上面还有政府、党、各部门，这都是上层建筑，必须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如果不促进，就丧失了它的职能。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为了使上层建筑能够适应基础，促进社会的发展。你们对客观情况的发展注意不够，估计不足。凡事都有两面性，一万年后还是有两面性，但是，今年和明年不是一样的两面性，如果一点不变化，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但是现在是马克思主义的，用马克思主义来看，农民几年来对他们的落后性抛弃很多，最近几个月，农民跑得很快，几个月就改变了个体经济。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我们总是说他们“唯利是图”，现在他们已经把工厂交出来了（变成公私合营了），“唯利”又怎样“是图”法？对知识分子也是尽说他们不好，可是这次会上同志们说知识分子中进步分子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占40%左右，落后的当然还有，但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应该促进这种改变。可是有的同志看不到这种变化，想到没有对象的地方去决斗，对象没有了，还要斗，这就变成唐·吉诃德了。

当然，还有对象，但也在起变化，因此我们应当欢迎这种变化。我们应该看到在生产关系改变后的新形势，去年上半年那样困难，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最近两三年，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这些情况反映在同志中间、人民中间和知识分子中间，我们应该认识这些情况，并且适应这些情况。

讲到促进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同时也应该注意不要搞那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敲锣、打鼓、报喜，这是好的，这正是促进嘛，这正说明中央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嘛！但是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情况要引起我们注意，值得谈谈这一点。农村发展纲要中已把好些农业增产的指标去掉了，右倾保守思想存在于各方面，两种领导方法采取哪一种？我因为其中有些还没有研究，没有充分根据，例如垦荒五亿五十万亩，据说用的钱要等于一年的预算，要多少人民币？垦荒仍是要垦的，但是否能垦那么多，要仔细研究。计划一定要行得通，一定要建筑在有根据的基础上，不然又要搞成盲目性。现在有些同志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了。合作化快是好的，但不要无根据地快。各省同志要注意。高级化务必做到在绝大多数人满意条件下高级化，现在听说，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对放弃土地分红还放不下，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如等几个月。北方可以到今年秋冬或明年春天再转，明春最好。建议你们多考虑。陈云同志说公私合营，人家送上门来，不要不好，但问题是内心是否通，如不通，那就等几个月，等几个月并不算长。我建议这样，不要以为又是来阻挡你们，又是右倾机会主义！总要叫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高兴，不高兴的过了百分之几就有问题。各部门计划指标也要放在可靠的基

础上，本来可以做的不做，是不好的，但无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就叫盲目性，就是“左”倾冒险，虽然目前这还不是主要的倾向，但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的头脑不那么清醒，不敢于实事求是，怕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难听。凡是经过调查研究，办不到的，要敢于说办不到，敢于停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北京已进入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

经完成。要完成，还要做几年工作（比如说还要三四年），资本家定息的尾巴哪年割掉，还要看情况发展。北京资本家清产核资用自评的办法，可以介绍，以后农村中地主富农入社，哪些人好，哪些人坏，哪些人算社员，哪些人算候补社员，哪些人应当管制生产，可不可以也让他们自己去评，我们加以领导，建议各地试试看，让他们自己里头发生斗争。

再一点，有的同志引用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说到的“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句话，我说“不能完全按照”，这就是说大体上还要按照，否则五年计划，岂不也没有了。但是有的同志一改改成“已经不能按照”或“已经完全不能按照”，可见头脑已经有些发热了。

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得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都赞成，你们赞成不赞成？老百姓问题不大，识字很容易，但有些人觉得采用罗马字拼音，好是很好，可惜罗马字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用夏变夷”，没有问题；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用夷变夏”，就有问题了。洋字比较好，吴玉章同志说的有理，字母少，写起来一边倒，汉字比不上。有些教授说：“汉字是世界上万国最好的文字。”我看不见得。因此我们采用罗马字。例如阿拉伯字也是外国发明的，现在不是大家都用了吗？罗马字出现在罗马，英、美、俄等国不也都在采用吗？我没有学过文字史，他们过去也都有自己的文字的。据说我们中国字是仓颉造出来的，我看不见得。社会主义不是出在俄国，俄国也学了。外国的好东西，我们要统统拿过来，变成我们的东西，要一二十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汉朝、唐朝就是这样的，唐朝奏乐、舞蹈有七种，有六种是外国的，唐朝很有名，搞久了就变成中国人的。

在吴玉章同志的讲话中，其中有一条我是不赞成的。就是他说：“这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去年七月三十一日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严肃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并用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结果。”“这种新的观点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的物质生活的发展，已经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产生出来，当新的观点和理论产生以后，它们就成为最严重的力量，就能促进解决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过程所提出来的新任务，就能促进社会向前发展。”这样说来，好像农业合作化是新的事情，新的社会观点和理论。但是，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联共党史上就写到的，他们是地球上第一次做这件事，还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已经讲过了，三十多年前，俄国已经做了。我们现在讲的，并没有什么新的观点和理论。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过去在欧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已经提出了新任务，产生了新的观点和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后列宁又加以发展。我们有没有新的东西呢？有的，那就是在形式和细节方面，如互助组的普遍发展、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这是新的。关于过渡时期和资产阶级联盟，在理论方面，列宁已讲过了，只是我们实行得比较完全和有步骤，这很好，有必要加以发展。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现在云南没有火腿了吗？）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要注意情况的复杂性，善于分析，以适合各种复杂情况。许多工作，也还有发展余地，譬如肃反也要发展，现在肃反有一个准备阶段，大有文章可

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是好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就能做到比延安甚至比去年又快又好。准备工作做不好，底没有摸清，就会把时间拖长，树敌太多。这都属于领导艺术，也都大有发展余地。去年夏天以来，几方面的工作，如反胡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领导艺术都是有发展的，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更发展一步，我们在理论上也应有所贡献，把前人讲过的进一步地发展。但十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显着新的东西。

和平问题。和平问题是大家很关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十二年时间，来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呢？看来是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经过二十一年，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过去十年，还可能多些。现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已有不同，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与过去不同，挑战不大可能。美国讲究赚钱，蚀本他不干，没有人抬轿子，自己不想用脚走路。现在美国军队的摆法，就不像打仗的样子，它到处搞基地，就像牛尾巴捆绑在桩上，怎样好动呢？但是还要估计到也有可能突然袭击，世界上可能出疯子的，必须估计到。所以我们的工作，越能提早完成越好，越有利。

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多了，如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等。知识分子问题现在还没有主动，还要过一些时候才能主动。在工业方面也没有主动，大批机器还要靠外国，大的、小的（精密的），我们都不能制造，只能造中等的，“两头不行，中间可以”。我们吹牛皮吹不起来，工业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重要的工业装备和精密机器都不能制造。地大、人多，但是自制的汽车、坦克、飞机有多少，一辆汽车、一架飞机，未免太少吧？有什么值得翘尾巴的！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老

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这些话是聪明的话，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现在打仗，飞机要飞到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过去骑着马了，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现在我们看出这件事，就可以开始主动，要有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要有更多的普通知识分子，以后要使每人都有华罗庚那样的数学，都要能看《资本论》这是可能的，二十年不行三十年，最多一百年就差不多，否则叫什么共产主义？同志们回去要向各方面说清楚这件事情。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先接近世界水平，然后赶上世界水平。我国地方大，人口多，位置也不错，海岸线很长（就是没有轮船），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再加努力，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六亿人口，又是勤劳、勇敢干什么呢？几十年以后，如还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国，是不应该的。现在美国只有十几颗氢弹，一万万吨钢，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应该搞它几万万吨钢。

中国有个好处，一个是穷，一个是白（无知识），这也有两面性，穷就要革命，知识少是不好的，但好比这张白纸，这一面写过了，就没有什么好文章可做，这一面没有写过，是空白的，就大有文章可做，几十年后，就可以赶上外国。

1956年，毛泽东接见从美国归国的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

对达赖喇嘛[1]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1956年1月21日）

达赖喇嘛：

你在一月一日给我的新年贺电收到了。谢谢。我衷心祝你身体健康，并盼你在新的一年内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对班禅额尔德尼[1]祝贺新年电报的复电

（1956年1月21日）

班禅额尔德尼：

谢谢你的新年祝贺。过去一年内，日喀则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有进步，我们听到了都很高兴。现在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我们的国家一年比一年繁荣兴旺，西藏地方和别的地方一样，都是要一年比一年兴旺起来的。在新的一年内，你们那里也将会有更大的进步。我祝你身体健康，学业精进，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一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关于注意研究解决小学教师待遇低等问题的批语

（1956年1月21日、4月11日）

一

陈云[1]同志：

此件[2]请你注意研究一下。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二

刘、周、陈、邓、彭真[3]同志：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1956年1月21日第二十二号《情况简报》摘报的“小学教师的一些意见”。此件反映了许多小学教师来信中提出的薪金低、入团入党困难、工作忙累、找爱人难等问题。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此件[1]值得一阅，并应予以解决。

毛泽东

四月十一日

---

[1] 指1956年4月6日第七十八号《情况简报》摘报的“小学教师中的一些问题”。此件反映了当时小学教师中存在的待遇低、地位低、质量低三个主要问题。

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1]

（1956年1月22日）

一

你们这个国家是打出来的，奋斗出来的。帝国主义这套东西就害怕打，这点我们和你们相同。我们过去没有很多东西，只是小米和步枪，我们的敌人是飞机加大炮，但还是小米、步枪战胜了飞机、大炮。这是从古至今的一条基本原则，弱小但是进步的战胜强大但是落后的。

二

你们国家与我们一样，处在最前线，经常很紧张。你们是吃新闻饭的，一定很紧张。不晓得哪一天美国会整我们，可能明天就整我们。不知道美国哪一天来放原子弹，究竟放不放？原子弹并不比刀、枪厉害，你们相信不相信？古人用刀、枪一打三百年，汉代中国人口有五千万，一打只剩一千万。唐代又发展到五千万，安禄山

---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新闻工作者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造反[1]一打又剩一千多万。用冷武器打仗拖延很久，死人很多，大片土地无人。欧洲历史上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后来拿破仑时代开始发展到步枪，可打八百米远。以后又发展大炮，用热武器打仗，缩短了时间，减少了破坏。现在打仗一般三四年可解决。

我们要准备着。我们无原子弹，不想打。苏联有，也不想打。但如果帝国主义丢下原子弹，我们准备打。打的结果，欧、亚、非跑到我们这边来，欧、亚、非三洲都实行社会主义。五分天下有其三，剩下美洲、澳洲给他们，何况中南美是不是给他们还不见得。因此我们打了再建设也可以。我们还没有建设好，索性打五年，最多丢掉一个五年计划，可能还建设得好一些。因为那时候地盘更大了，那时整个欧、亚、非三洲都过来了。要往这方面设想，它即使打来，可能也是件好事。你要搞就搞，你不要来吓我。这些话我们也公开向资本主义国家讲过，我们是有根据的，不是乱吹。二次世界大战他们也吃了亏，社会主义沾了面子。因此，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一定要扩大，他们要大吃亏。这是第一条，是它要打的一条。

第二条，它不打。他们也研究历史，不打的可能性很大，大家都不赞成打。我们这边愈来愈多，尼赫鲁[2]也在内，墙筑得愈来愈厚，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筑墙的工作，把墙筑高筑厚。

第三条，要对中间国家做工作，在敌人营垒内也做工作，这没有秘密，使他们孤立。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维持和平，南斯拉夫与我国要做和平工作，一面加强自己，一面争取人家。我们认

---

[1] 公元755年，唐朝军事将领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起兵叛乱，占领唐都城长安，史称“安史之乱”。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为保持十年的和平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不是艾森豪威尔[1]的参谋长，我们必须把第一条考虑进去，这样不吃亏。要准备突然事变，但我们决不先打第一枪。我们尽一切力量争取和平。我们双方多写点文章，广播些好东西。

1956年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并观看铁托总统赠送的礼品。

---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写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后面的一些文字[1]

（1956年1月）

四百斤问题[2]（水的问题）。

储粮两年问题。[3]

---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在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为会议文件之三印发。毛泽东在这个印件上对纲要草案又作了修改，并在另外一页纸上写了本篇这一些文字。这一些文字，主要是对纲要草案中他所作的一些修改的说明，其他是表明他对纲要草案中某些问题的思考。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即将第二条中老解放区和合作基础较好、并且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1958年改为1957年，其余地区基本完成高级农业合作化的时间，由1959年改为1958年，即分别提前了1年。

[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六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以北地区，由现在的一百五十多斤增加到四百斤。"

[3]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七条规定："要求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除了自己食用的和保证国家需要的粮食以外，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积储起足够两年食用的余粮，以备紧急时候的需要。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区、乡和各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应当定出实现这个要求的具体规划。在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备粮，以应急需。"

十二年基本消灭十种病虫害问题（加了“可能的”的限制）。[1]

省内外移民1000万户、垦荒五亿五千万亩问题（与国营数是否有重复?）。[2]

治病问题（加了“在一切可能地方”一句）。[3]

除四害问题（作了限制，应无问题）。[4]

---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十八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虫害和病害，例如蝗虫、粘虫、棉蚜虫、稻螟虫、玉米螟虫、红蜘蛛、红铃虫、黑穗病、小麦线虫病、甘薯黑斑病。”毛泽东在其中的“基本上”三字前面，加写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八个字。

[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十九条规定：“垦荒移民。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垦荒五亿五千万亩，省内和省外的移民共一千万个劳动力，大体上也就是一千万户。”第二十条规定：“发展国营农场。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一九五五年的四百万亩增加到二亿四千万亩。”毛泽东对这两条作了批注：“两项是否有重复?”还将第二十条中的“二亿四千万亩”改为“一亿四千万亩”，并在“四百万亩”旁划一问号。《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在1956年1月26日公布时，第十九条删去了垦荒和移民的数字。第二十条的这段话改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要求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36万亩增加到14000万亩。”

[3]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二十六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的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脑炎，鼠疫，白喉，疟疾，天花，性病。”毛泽东在其中的“基本上”三字前面，加写了“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八个字。

[4]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第二十七条规定：“除四害。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1956年，毛泽东看贫下中农的丰收喜信。

对廖鲁言[1]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说明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56年1月25日）

一

尚昆[3]同志：

此件[4]请即付印，校对勿讹，印350份，于一月廿五日下午三时带到勤政殿，发给到会的人，每人一份（共有320人左右）。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零时

---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廖鲁言的说明稿比较集中修改的两段。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经毛泽东改定的廖鲁言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1956年1月2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二

这个四十条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今后几个月内将还是一个草案，要请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加以讨论，提出意见。

三

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一百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专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十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向上海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失业人员移五十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的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待说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个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

（1956年1月25日）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过去的六年中，前三年的工作主要是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前一革命阶段中没有完成的各项社会改革，主要是土地改革[2]。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

[1] 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

[2] 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秋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52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约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2]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

---

[1]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的编制，从1951年开始进行，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于1955年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执行的结果是：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到1957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2] 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1月公布。1957年10月公布修正草案。后又经修改，于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40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1956年1月，毛泽东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商量，将“十七条”扩充为“四十条”，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这个草案初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在1月25日提请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图为毛泽东在主持最高国务会议。

关于发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问题的批语

（1956年1月26日）

即送人民日报

邓拓[1]同志：

这篇社论[2]不能用，因为完〔全〕和廖鲁言的报告[3]重复，并且还不及报告的详尽。我看，有了那篇报告，不写社论也可以了。如果要写，要由你们自己写，并注意不要和廖的报告重复。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

[1] 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农业部部长廖鲁言为《人民日报》写的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社论稿。

[3] 指廖鲁言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发表于1956年1月26日的《人民日报》。

给宋庆龄[1]的信

（1956年1月26日）

亲爱的大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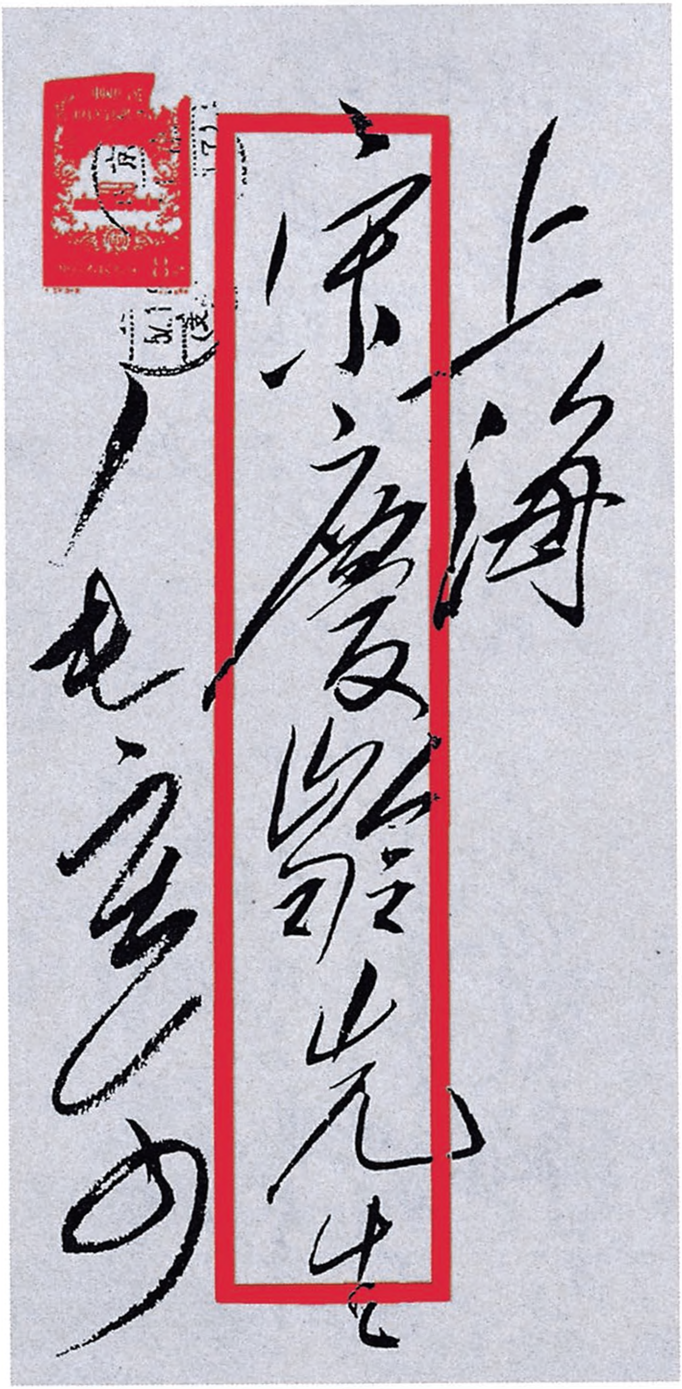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

[1] 宋庆龄，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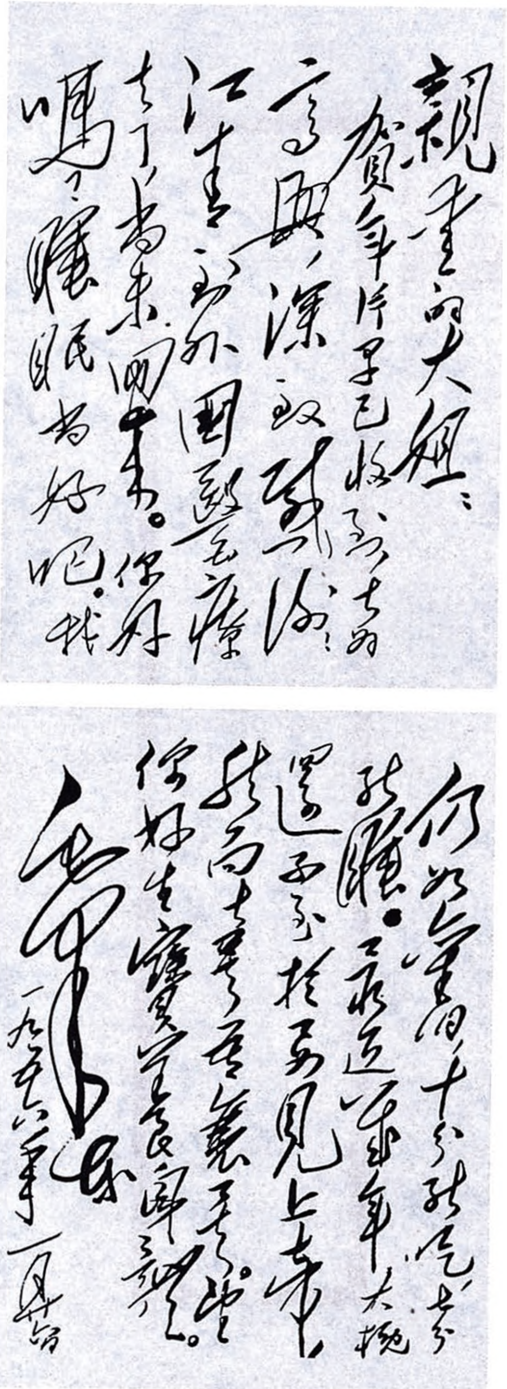


上海

宋庆龄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致宋庆龄信的信封。



親愛的大姐：

賀年片早已收到，十分高興，深致謝忱！江青到外國醫療去了，尚未回來。你好嗎？睡眠尚好吧。我仍如舊，十分能吃，十分能睡。最近幾年大概還不至於去見上帝，我尚壯健，足慰遠念。望你好生保養，宜長命[illegible]。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日

毛泽东致宋庆龄信的手稿。

给黄宗溍[1]的信

（1956年1月26日）

黄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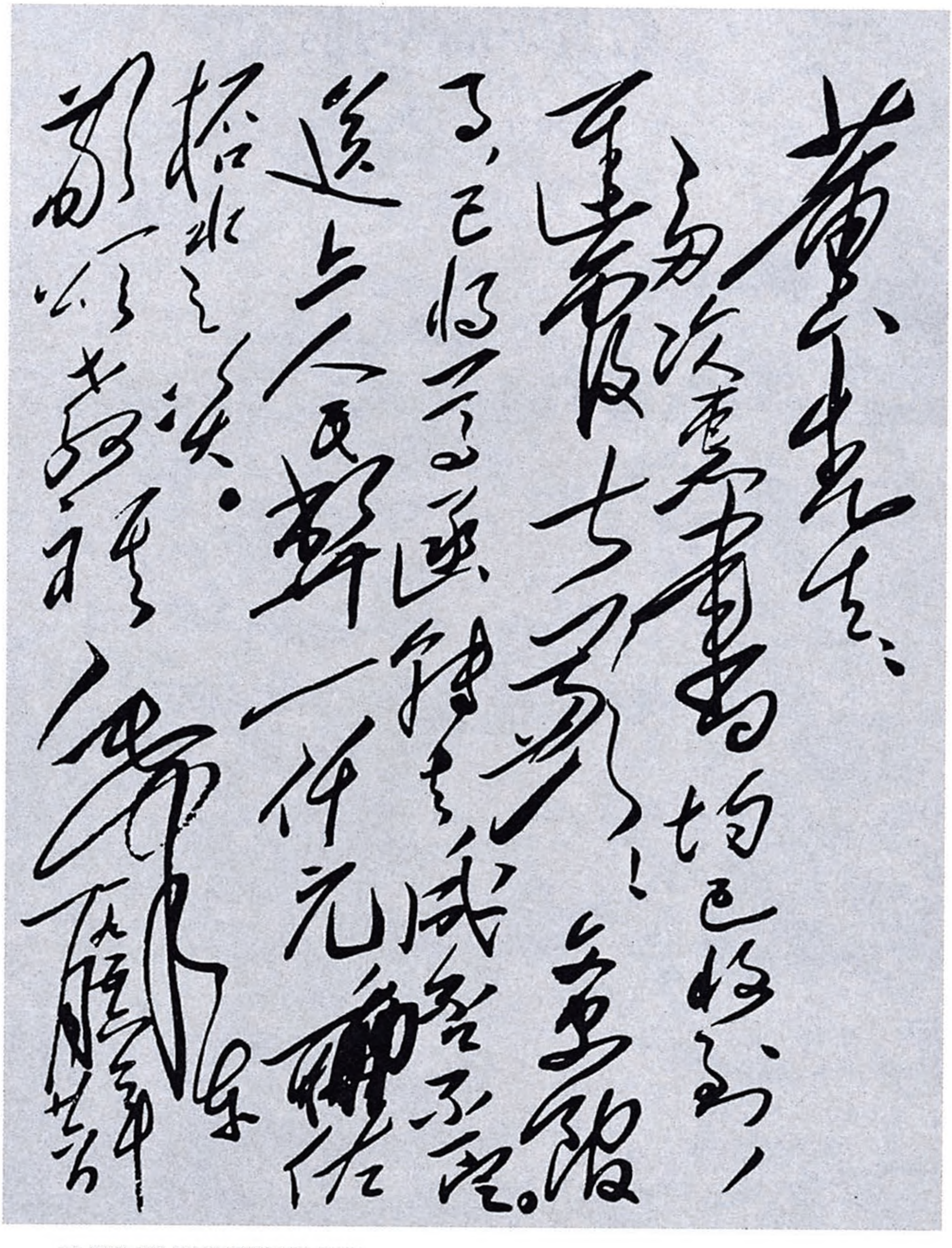
多次惠书均已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一千元，聊佐杯水之资。

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

[1] 黄宗溍，1918年上半年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地理教员。



黄先生：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illegible]七万元！[illegible]了，已收下了，[illegible]人民解[illegible]

毛泽东

毛泽东致黄宗澝信的手稿。

给许志行[1]的信

（1956年1月26日）

志行兄：

十月八日惠书早已收到，甚为感激，迟复为歉。现在是寒假，如果你愿意，可以来北京一叙（到中南海找叶子龙[2]）。暑假可去韶山。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廿六日

---

[1] 许志行，1919年冬在武汉和毛泽东相识，1926年曾应毛泽东之邀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在上海格致中学教书。

[2]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统战部关于民主党派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56年1月28日）

小平同志：

此件看过，觉得可用，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1956年1月25日关于民革、民盟、九三学社召开代表大会和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召开中央会议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就民主党派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等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以下意见：（一）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和作用问题。报告说，由于各项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展，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这些民主党派不仅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而且已经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现正在我党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应当肯定他们已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党派。他们今后总的任务应当是：为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动他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并在实践和学习中获得进一步的改造。（二）关于学

习马列主义和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报告说，民盟、九三学社、民进和农工民主党等以文教科学界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党派，可以要求他们的成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改造，首先从正面推动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使他们增强信心，帮助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掌握思想武器，在此前提下，引导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改造。（三）关于组织发展问题。报告说，这些民主党派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应当根据需要和可能发展他们的组织，拟推动他们各自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发展组织的规划。此外，报告还对民主党派开好代表大会和中央会议、改选领导成员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握手。

1956年，毛泽东会见全国人大代表时和李济深握手。

1956年，毛泽东和民主党派人士在一起。

1956年，毛泽东和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在一起。

关于建立青年生产队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月28日）

不要普遍建立单独的青年生产队。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第四办公室1956年1月25日关于团中央准备在全国农村推广青年生产队问题给邓小平的报告上。报告说，经过征询有关同志的意见和初步研究，觉得青年生产队的形式在试办过程中确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在发展当中，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有些地方提出青年生产队的队员都要身强力壮、思想进步的，这样办就会使得强劳力和积极分子过分集中，影响到合作社内整个劳动组织的合理调配和其他队的生产。目前普遍建立青年生产队，条件和经验都不成熟。

对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稿的修改[1]

（1956 年 1 月）

一

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

二

我国政府一年来曾经再三指出：除了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还存在着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可能性。这样，我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就有一种共同的爱国的责任，这就是除了积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方式解放台湾以外，努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政治报告稿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凡是愿意走和平解放台湾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多大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究〈咎〉既往。

1956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接受全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工商界的代表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报喜信。

1956年1月30日，工商界代表李烛尘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向毛泽东报喜。到1956年1月底，全国各大城市和50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中等城市相继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1956年1月30日，毛泽东和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工商界代表谈话。

1956年1月，毛泽东和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招待宴会上。

1956年1月底，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对此，毛泽东感到由衷地高兴。图为1956年的毛泽东。

关于检查同苏联专家、顾问关系的批语

（1956年1月30日）

一

此件[1]值得看一下。似须整个检查一次同各方面顾问专家的关系。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1] 指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1956年1月12日同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谈话的纪要。总顾问说，一些苏联军事顾问反映，中国同志目前已经不需要他们，不交给他们工作做。他自己有很多话也无处谈。彭德怀对这种情况进行了解释。双方还就缩减顾问编制和中国军队装备现代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二

刘、周、陈、小平、彭真[1]阅，尚昆[2]存。

20世纪50年代，大量的苏联专家和技术人员来到中国，为中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图为苏联专家在大连造船公司。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扫除文盲，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

（1956年）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普及小学教育。要求做到一般的社有小学和业余文化学校，一般的乡有农业中学，以便进一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文化水平。农村办学应当采取多种形式，除了国家办学以外，必须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提倡勤工俭学。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合作社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按照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的原则，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和体育活动。

关于建立空军学院的批语[1]

（1956年2月5日）

照办。[2]

毛泽东
二月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56年1月31日报告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为适应我国空军发展的需要，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空军学院。经军委研究后，拟于1957年起，以南京军事学院的空军系为基础，建立一所空军学院，培养空军大队级以上的飞行指挥干部、领航干部、参谋干部和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院址设在北京西郊。

和藏族人士的谈话

（1956年2月12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好了就要成立，你们还怕吗？对土地改革赞成不赞成？对西藏地区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办法，要采用云南的办法。云南有土司，他们也是贵族，那里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进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满意，土司也满意。总之，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国，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稣教的有八十万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万人；信伊斯兰教的有一千多万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几千万人；还有信道教的，数目也很大，约有一千多万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现在不是搞合作社的问题，而是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什么时候进行，由你们自己去决定。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要由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下决心，要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任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由西藏的僧俗官员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们决定。要有一个酝酿的时期，一年、二年、三年，通过讨论，打通思想。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两方面的意见都可以讲。多酝酿、多讨论有好处，大家都讲，慢慢地就讲通了。贵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们回去后要对贵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论如何改革，对他们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维持。

我们同资本家、同各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帮助，有了错误加以批评，共同进步。同时，也采用自我批评的办法，各民主党派也进行自我批评。少数民族自己内部也可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办法。你们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办法，采取新办法，用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办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汉族过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们前藏、后藏、昌都过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来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内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现象，这同汉族过去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的内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够是一样的。过去资本家很怕我们，各民主党派也有一些怕我们。经过了六年的时间，现在他们和我们的相互信任大为增强。过去他们不信任共产党，共产党也不那么信任他们。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见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议你们回去好好研究和协商，增强你们内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也增强你们和我们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

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参观团的参观很有益处，大家应当相互交流经验。西藏是个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国面积的八分之一。我同达赖说过，不要以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了，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条就是落后问题。在经济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汉族也落后，比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波兰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为只是你们落后。我们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发展起来，我们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来克服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支援你们，你们自己也要发展。你们应该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文化。经济不发展，人口也不能发展，文化发展了，可以帮助经济发展。你们在座的都是知识分子，有文化。你们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汉族农民一样。将来农民都要大学毕业，所有的人都要大学毕业，你们相信不相信？全国人民都从小学毕业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国人民都从初中毕业要三十年到四十年，你们可能看得到，我们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国人民都从大学毕业要一百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学毕业吗？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学现在还赶不上内地的小学，将来是可以赶上的。西藏也要设立大学。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进步，就可以达到目的。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西藏的物价上涨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损失，以后老是这样可不行。解放军到西藏，要给人民办好事，不然要解放军干什么？修了两条公路是好事，但这还只是为做好事准备

了有利的条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们可以帮助。你们也可以搞五年计划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个计划，标准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区域自治区要搞建设，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学家。青年要学科学，有很多科学要学，像电呀、机器呀这些东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东西。要有使用机器的人才，要有农业科学家，要有地质科学家。汉人也是一样。在反动派统治下，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我们一搞起来就相当快。例如全国解放时，我们的地质科学家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搞了六年，已经发展到几千人了。现在柴达木盆地正在开采石油，离青藏公路不远，你们可以去看看。培养人才要慢慢来，不是几个月、几年的事，你们要有计划地培养科学干部。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的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在汪东兴[1]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6年2月13日）

一

汪东兴的考察报告。

此件[2]提出了一些问题，可以一阅。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

---

[1]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

[2] 指汪东兴1956年2月11日关于江西部分农村合作化发展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统计，全省初级社入社农户已达总农户的78%。春耕前，群众结合搞生产规划，已在酝酿办高级社。有的地区已经铺开，计划今冬明春基本实现高级社。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是：抗水灾、旱灾能力差，农用机器短缺，劳动力不足，牲畜、种子少，购买困难等。关于今后高级社的发展规划，省委打算分两步走（先试点，再扩大），但怕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如并作一步走，又担心工作缺乏经验，难以保证90%的社员增产。目前省委正在研究，还未作出定论。

二

尚昆[1]同志：

此件请你印100份，发各政治局同志、农村工作部及中央警卫队约八十人，每人一份。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刘松林[1]的信

（1956年2月14日）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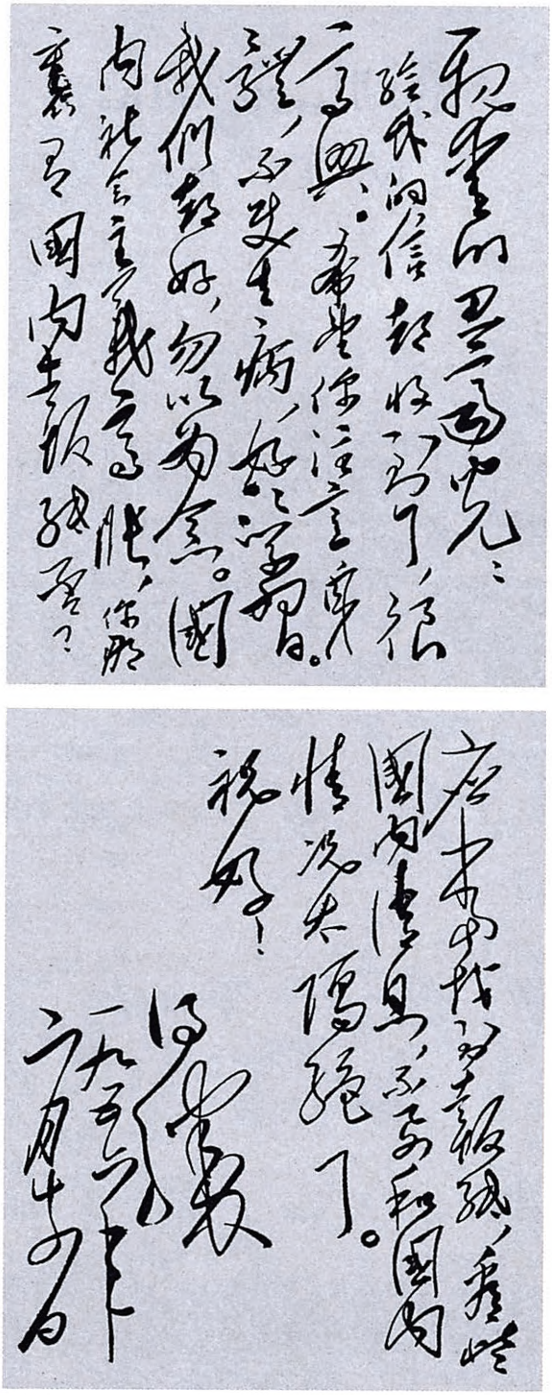
得胜[2]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

---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5年9月至1957年9月，刘松林在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力学系读书。

[2] 得胜，即李得胜，是毛泽东在陕北时使用过的名字。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寒暑，不要生病，好好将息。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高涨，你那裏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得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了解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爸爸

一九五九年

六月十四日

毛泽东致刘松林信的手稿。

吊唁杨树达[1]逝世的电报

（1956年2月16日）

湖南省政治协商会议转杨树达先生家属：

惊闻树达先生病故，深为悼念，特电致唁。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六日

---

[1] 杨树达，字遇夫，早年在长沙任教时和毛泽东相识，后一直从事文字学教学和研究工作。逝世前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

对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不应禁止谈论[1]

（1956年2月19日）

刘、周、陈、彭真、小平、陈伯达阅，退定一办。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2]，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3]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2月1日关于是否要向苏联共产党有关方面反映苏联学者在中国参观时讲的一些话给中央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2] 指当时在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在去访问广东省中山县孙中山故居途中，向中国陪同人员谈到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先生的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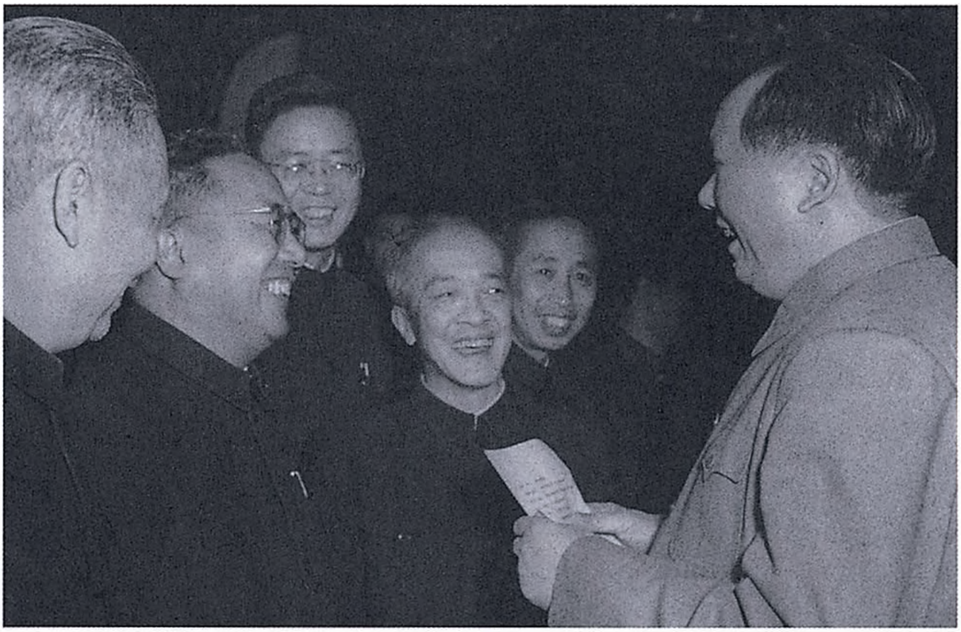
[3] 尤金（1899—1968），苏联哲学家、科学院院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1956年2月，毛泽东和政协委员在一起。

1956年2月，毛泽东会见著名报人、通俗小说家张恨水，雕塑艺人张景祜，作家杜鹏程。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亲切地握手。

1956年2月，毛泽东接见青年红学家兰翎。



1956年2月，毛泽东和生物遗传学家童第周、语言学家胡愈之、数学家华罗庚、社会学家费孝通等在一起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桥梁专家茅以升、化学家侯德榜等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宗教界政协委员在一起。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全国政协常委（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握手。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艺术家们在一起。

1956年，毛泽东和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等合影。

1956年2月，毛泽东接见新疆维吾尔族舞蹈专家康巴尔汉。

1956年2月，毛泽东和著名中医施今墨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钱学森在宴会上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全国政协特邀人士卫立煌、谢无量在宴会上。

1956年2月，毛泽东和上海医学院副院长颜福庆、伊斯兰教协会副主席达浦生在宴会上交谈。

1956年2月，毛泽东和天文学家邹仪新在宴会上。

1956年，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东花在招待会上。

1956年，毛泽东和河北省安平县坚持办农业合作社的农民王玉坤在宴会上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桂剧演员尹羲在宴会上交谈。

转发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6年2月19日、20日）

一

廖鲁言同志：

此件[2]可以转发各地。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江苏省委1956年2月10日关于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中央1956年2月20日转发江苏省委报告的批语稿上写的批语。

[2] 指中共江苏省委1956年2月10日关于江苏省农业高额丰产会议情况给中央和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这次会议传达和讨论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打开了大家的眼界和思路，不断克服了各种保守思想，注意纠正了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在此基础上，分稻麦区、杂谷区、棉区、山区大组交流和总结了丰产经验：一、合理改变耕作制度，增加复种面积，争取全面增产；二、积极进行农业基本建设，兴修农田水利，增积自然肥料，改良土壤，增添耕牛、农具；三、积极改进栽培技术，从选种到收获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四、因地制宜地抓主要增产措施。会议还进行了全省高额丰产的布局，规定了有关竞赛运动的办法，并分片、分级、分等规定了不同的粮棉丰产指标。

二

刘、周[1]阅，尚昆[2]办。

1956年2月22日，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开幕。图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和大会代表合影。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派团赴苏联远东军区参观演习的批语[1]

（1956年2月24日）

照办。[2]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2月22日报告的批语。

[2] 彭德怀的报告说：苏军总部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10名军官到苏联远东军区参观3月5日至10日举行的军事演习。经与总参谋部研究后，提出了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为团长、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郭化若中将为副团长的参观团人选。

关于发表郭沫若[1]访日诗篇的批语

（1956年2月24日）

送彭真[2]同志：

内件[3]请交北京日报发表。其中有些草体字须先改为楷书，以免弄错。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3] 指信封内装的郭沫若访日诗篇七首。郭沫若于1955年12月1日至25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率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访问日本。这些诗是他访日期间写的。信封内的七首是：《箱根即景》《访须和田故居》《别须和田》《宫岛即景》《访博多湾》《留别华侨》《游别府》。1956年2月29日在《北京日报》发表时，将《访博多湾》和《留别华侨》分别改题为《吊千代松原》和《归途在东海道车中》，又增加了《宿春帆楼》和《船入长江口》两首，这九首诗总题为《访日杂咏》。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2月）

一

刘、周、瑞卿[2]再阅，在尾上加了几句。

毛泽东

发后，抄公安部。

二

可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

---

[1] 本篇一是写在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1956年2月12日关于当前社会镇反工作意见的报告的批语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中央批语稿末尾加写的文字。中央于1956年2月29日将广东省委的报告批转上海局、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审定。

1956年2月28日，来访的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为毛泽东佩戴柬埔寨王国的最高勋章。

关于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批语[1]

（1956年3月3日、5日、7日）

一

送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

原定今年三月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是否按期召开？准备情形如何？望告。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

毛泽东
三月三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水生动物研究专家秉志1956年2月28日为转送他给毛泽东的信而写给刘少奇的信上。秉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消灭钉螺用土埋不行，必须用火焚烧，以期永绝后患。本篇二写在中共四川省委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办公室1956年3月2日给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的电报上。本篇三写在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1956年3月5日关于召开防治血吸虫病会议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二

尚昆[1]同志：

请你电话告知上海柯庆施[2]同志和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同志，今年三月召开第二次防治血吸虫病会议的时候，应当邀请福建、广东、广西、四川等有血吸虫和钩虫病的省区派出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并问他们此次会议何日召开，有无准备？

毛泽东

三月五日

三

中央卫生部

徐运北同志：

除长江中下游六省外，其他已发现血吸虫病的省份如四川、广东、福建等也应当请他们派代表参加，请与柯庆施同志商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除讨论血吸虫病为主要任务以外，钩虫病及其他最严重的疾病也宜加以讨论。会议应当订定下一次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会议（即每年开会两次）也就可以了。

1956年3月，毛泽东和中医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鲁之俊握手。

1956年3月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参加全国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医郭可明。

1956年3月，毛泽东发出了把中医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号召。图为毛泽东和医药卫生界人士在一起。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

（1956年3月4日）

（一）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一九五五年年底以前只组织了二百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了三百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点九，似乎低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业合作社的规模，一般的一百人左右为宜，有的也可以几百人，有的也可以几十人。

（三）组织铁、木业合作社为农业生产服务，下乡修理农具，这个办法很好，农民一定欢迎。中国手工业几千年来就有这样做的。组织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术，就能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四）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五）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

---

[1] 这是毛泽东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指示的一部分。

业是二万元到三万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一千五百元，个体手工业是八百元至九百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六）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1]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六千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些。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八）国家调拨物资给合作社，要合理作价，不能按国家调拨价格作价。合作社和国家企业不一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区别。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

[1] 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的五名妇女。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九）手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产销为什么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手工业这样大，应当纳入国家计划。

（十）有些地方党委忙，手工业排不上队，这不好。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业的工作？我倒很想搞这样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们要在六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中，选择突出的例子，编写典型材料。各地区、各行各业都要有；好的、坏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机械化的、机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书，像《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样。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图为手工业者在踊跃报名入社。

在听取汇报工作时的指示

（1956年3月6日）

改进或扩充生产设备，应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解决，不应使用企业奖励联金。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当时张国焘在长辛店工厂办了一个工人夜校，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名叫李实的当校长，我还到那里参观过一次。

（当汇报到不少干部满足于现有成绩，缺乏从发展上看问题，满足于数字上完成任务，缺乏对国民经济发展及周围情况的认真研究，因而思想工作、组织工作、技术政策、干部培养都落后于发展希望时）

你会不会打麻将？打麻将要看三家的牌，还要看桌上已经打出来了什么牌之后，才决定自己打什么牌。

□□人多，家底大，成绩也不小，容易骄傲，应该注意这一方面。

一九五三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找到的。苏区只剩下一

个根据地，白区几乎全搞光了。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一律团结，也不是一律斗争，既不是只“团”无“斗”，也不是只“斗”无“团”。对于党内的关系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反从前的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是否主观主义会缩短一些。自从一九五三年反主观主义之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进了一步，但是带来了一个右倾。当然你们是采取原谅的态度，你们说中央的领导是英明的，你们自己犯了错误。所以必须要在去年提出反对右倾的口号，先从农业开始，以后又在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也反对右倾。共产党要反过来反过去，多反复几次就要好些。

（当汇报确定部长、副部长每年至少下现场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时）

对，我们这样的人就是要常到现场去。

你们自己要办学校！

为了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抽出大量时间，向各部委了解情况，他们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图为用于听取汇报的中南海西楼甲楼。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听取汇报的会议室。

在听取交通部汇报工作时的指示[1]

（1956年3月8日）

一

□□部汇报，列了目录，一目了然，各部都要这样做才好。

你们可以搞点展览会，把各种交通工具展览一下。

学院学生太少了，可怜得很。

将来可能有一两千万吨船，中国可能突出。世界海船吨位，我国不到百分之□，这表明我国太穷。

公路少，应多修。地方工业和修公路都要发挥地方积极性。

二

运价高，束缚生产力，工农业产品交换不起来。

“一长制”刺眼得很，怎么不改个别的名词？需要强调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降低运价问题，财政方面打小算盘不妥当，运价

---

[1] 本篇一是在汇报基本情况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汇报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与今后措施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在汇报远景规划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在汇报其他几个问题时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高，束缚生产，税收减少，结果害自己。工农业都在发展，两方面交流，靠运输纽带，中间路太狭，通不过去，发生矛盾，就影响两方面发展。过去地方公路标准太高，修不起来。

有许多事，开始听好像有道理。学习苏联经验要结合实际才行，脱离实际就错了。

地方交通会议后，情况有转变，可见领导还是重要的，不然六亿人有六亿个方向，不得了。开片会办法很好，一年一次，也可一年开两次，先规定会期，下边就动起来（如消灭血吸虫病）。各种铁、木轮车改为胶轮车，要赶快改。

人力车已合作化百分之二十五。合作化当然要得，怎样化法要注意，有些先挂个号也可以，不挂心不安，能组织就组织，不能则不勉强。

对资本家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现在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现在小资本家愿意，工人愿意，大资本家随潮流走。现在问题是怎样安插。中国资本家特点之一是许多资本家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思想不一定比高岗、饶漱石、潘汉年坏，比陈光、戴季英坏。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私有财产是否三年收归国有，还要考虑，将来可能给他们福利基金。

福建省委提的对个体车船改进意见，你们可以拿几个社试一下。每个省试一下，再下决心。

肃反，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真反革命是有技术的，已经知道了，在次要岗位上亦可控制使用。

灯光装猪法是怎么回事？可见强迫命令不行，猪尚不能，何况人乎？

三

一九六七年达到□□万吨船，这还像个样子。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

四

机关汽车统一管理方针很对。汽车，主要看需要，要与工农业相适应。

交通和轻工业如不能适应，有一天我们会挨骂的。

地方运价降低问题，开个会先商议透，看准后再决定。

简易公路，要个标准，各地乱修，则不得了。

你们对的意见我都支持，我已经说过把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关于撤回驻越南军事总顾问改派武官的批语[1]

（1956年3月12日）

刘、周、陈、邓[2]阅，退彭，照办[3]。武官人选，要是很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3月7日报告的批语。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的报告说：为了逐渐减少我国在越南的军事顾问人员，增派越南军队所需要的技术人员，拟将在越南担任军事总顾问的韦国清撤回，另派一名驻越南武官担任两国的军事联络工作。

毛泽东等吊唁贝鲁特逝世的电报[1]

（1956年3月13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同志：

惊悉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非常悲痛的心情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是波兰人民敬爱的领袖，也是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卓越战士。他的逝世，对于波兰人民和对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都是极大的损失。

我们深信：波莱斯瓦夫·贝鲁特同志生前的光辉事迹将永远鼓舞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斯克热歇夫斯基的电报，吊唁贝鲁特逝世。贝鲁特，即波莱斯瓦夫·贝鲁特（1892—1956），波兰工人党创建者之一，曾任波兰共和国总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人民共和国全国阵线全波委员会主席。1956年2月他率领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会后因突发心肌梗塞，于3月12日午夜在莫斯科逝世。

我们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波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而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同波兰人民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而奋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3月13日于北京

和长征、艾地的谈话[1]

（1956年3月14日）

长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泽东：因为我怠工，所以拖迟了。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周恩来：《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还大。

艾地：《毛泽东选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卷、第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泽东：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

艾：《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文章[2]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

---

[1] 这是谈话的一部分。长征（1907—1988），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1923—1965），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 指《战争和战略问题》。

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

毛泽东：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

艾地：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

毛泽东：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同志也曾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1]

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应当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应当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经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国和美国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2]但到二十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整个力量

---

[1] 波立特（1890—1960），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4年3月29日，他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2] 参见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页）

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之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

艾地：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

毛泽东：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无论什么时候谁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

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四十

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是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八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关于公布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1956年3月17日）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3月17日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

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书记拉科西的信

（1956年3月28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敬爱的马加士·拉科西同志：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四日来信收到了。

我们了解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困难，并且愿意尽可能帮助你们克服困难。根据你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可能，我们准备在一九五六年内增加供应你们价值三千万卢布的货物。我们已经指示我们对外贸易部立即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商谈供应货物的品种和数量。

谨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对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3月30日）

一

刘、周、彭真、小平[2]阅，尚昆[3]办。

毛泽东
三月卅日

二

中央最近分别听取了工业、交通、农林水和财金贸各部党组的汇报，在今后几个月内中央拟分别听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关于工业、运输、农林水、财金贸等方面工作的汇报。

---

[1]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三

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同时，应当写成书面文件报送中央，字数以一万五千字左右为宜。但要看内容如何，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上开十项[1]如果一次写不完，分别写成几个报告也可以。如果一时写不好许多问题，先写两三个或者三四个问题也可以。

---

[1] 中共中央所拟各地经济工作汇报提纲的内容，共有十项：（一）目前各省、市、区的主要经济状况。（二）本省、市、区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三）对全国和本省、市、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本省、市、区的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四）当前工人群众社会主义竞赛高涨的情况，工业、农业、交通、商业、财政各方面的潜力表现在哪里，如何具体地在生产、基建、运输、流通各方面发掘潜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中央和地方在事业、财政、计划的体制划分的意见。（六）地方党委对地方各种企业和中央国营企业如何更好地加强领导，如何进行统筹安排。（七）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情况和发生的问题。（八）私人工商业、私人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中的问题和意见。（九）对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分工的意见，对工农产品的价格政策的意见。（十）对资金积累、负担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见。提纲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向中央的汇报，应当根据各自的经济特点，对其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作历史的比较。中央的这个汇报提纲于1956年3月30日发往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的批语

（1956年3月30日）

刘、周、彭真[1]阅后，退小平[2]照办。

毛泽东

三月卅日

国务院春耕指示[3]（此件已退习[4]办）于四月一日见报，此件[5]应待一二天，可于四月三日或四日见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国务院1956年3月27日关于春耕生产的指示，发表于1956年4月1日《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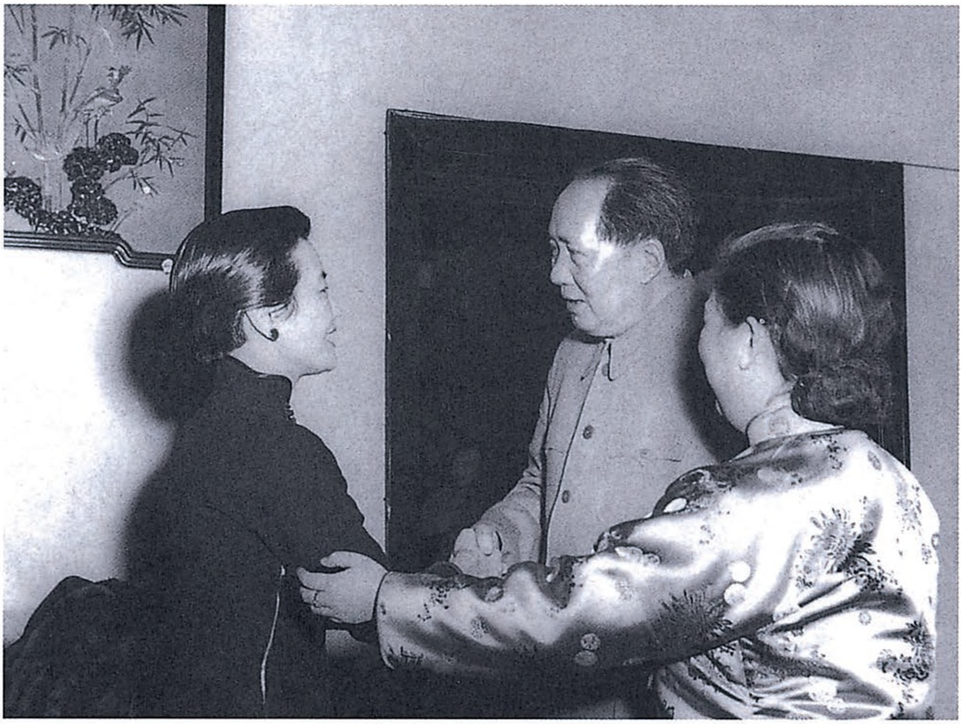
[4] 习，指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

[5]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这个指示1956年4月4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1956年3月29日至4月6日，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接见与会代表。

1956年4月，毛泽东和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交谈。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接见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及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成员。



1956年4月2日，毛泽东和港澳工商界妇女观光团团长李慧英握手交谈。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4月2日、4日）

一

少奇、小平[2]同志：

社论[3]已由陈伯达[4]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5]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加写的题下说明。本篇四至十一是毛泽东1956年4月2日至4日多次审阅这篇文章时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文章发表于1956年4月5日的《人民日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修改时改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5]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邓拓，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二

照此[1]改正，再打清样十五份，于今日上午十点，连同这份原稿，送交我的秘书高智，勿误为盼。

毛泽东
四月四日上午八时

三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

[1] 指毛泽东1956年4月4日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所作的修改。

四

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这一点，我们共产党人是必须充分地估计到的。

五

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领导人物的责任是要尽量减少错误，尽量避免某些严重的错误，注意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取得教训，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时期的错误。而要达到这种目的，就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十分谨慎和谦逊，密切地联系群众，遇事和群众商量，反复地调查研究实际的情况，经常进行适合情况的、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他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中所以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做。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六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导人，当他不是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中，而是相反地把个人放在党和群众之上的时候，当他脱离了群众的时候，他对于国家的事务就会失去全面的洞察力。只要是这样，即使像斯大林这样杰出的人物，对于某些重大的事务，也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合实际的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没有能够从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中引出教训，而使这些错误不致变为全国范围的和长时期的严重错误。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七

有些人认为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矛盾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中消除掉，这个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只要还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还存在着先进和落后的矛盾，还存在着社会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那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也就还将存在，还将经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是在社会中生活着的，也就会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各个社会中的矛盾。所以，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是每个人都是完满无缺的。那个时候，人们本身也还将有自己的矛盾，还将有好人和坏人，还将有思想比较正确的人和思想比较不正确的人。因此，人们之间也还将有斗争，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罢了。

八

当革命胜利之后，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独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而不应当稍为疏忽。为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九

鉴于这种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抗日战争

时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这里所指的进步势力，就是共产党所领导和可能影响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这里所指的中间势力，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这里所指的顽固势力，就是那些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以蒋介石为首的买办封建势力。实践的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方针是适合于中国革命的情况的，是正确的。

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几次犯严重错误的经验。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在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革命时期，我们党内出现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其中特别严重的是李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前者是在一九三〇年发生的，后者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发生的，而以王明路线对于革命的损害最为严重。在这个时期内，在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里还发生了同党的中央相对抗的反党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严重地损害了一部分重要的革命力量。上述两个时期内所犯的错误，除了张国焘路线是属于一个重要革命根据地的错误以外，都是全国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内又出现了以王明同志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我们党吸取了以前两个革命时期的教训，没有让这条错误路线发展下去，这条错误路线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我们党的中央所纠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

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在自己同各种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使自己获得了锻炼，因此取得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和建设胜利的。至于局部的和个别的错误，则在工作中时常发生，仅仅是依赖党的集体智慧和人民群众的智慧，及时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们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没有成为全国性的和长期性的错误，没有成为危害人民的大错误。

十一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

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世界上一切反动势力正在讥笑这件事，他们在讥笑我们阵营中克服自己的错误。这种讥笑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疑义，结果将是在他们面前站着一个比较过去更加强大和永远不可战胜的以苏联为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阵营，而讥笑者们的吃人事业却是很不美妙的。

对彭德怀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56年4月2日）

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中央各同志意见，在他们看过文件后，即会告知你。

毛泽东

四月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3月23日为报送关于军委扩大会议结果的报告和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简要报告上。彭德怀1956年3月6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关于战略方针问题，主要讲了以下问题：第一，争取持久和平，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第二，战略方针问题的提出；第三，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第四，关于阵地战结合运动战问题；第五，关于作战指导上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部分关于国防建设问题，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第二，动员准备工作；第三，建立军事科学研究工作。

同意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福州两军区的批语

（1956年4月4日）

刘、周、朱、小平[1]阅后，退彭德怀[2]同志。

此件[3]看过。同意划分为两个军区。叶飞[4]的省委书记是否可以不再兼了，何人充任省委书记的问题，请小平和谭震林[5]商定告彭。

毛泽东

四月四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3] 指彭德怀1956年3月28日关于建议将南京军区划分为南京军区（辖江苏、浙江、安徽三个省军区）和福州军区（辖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给毛泽东的报告。

[4]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建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省长。

[5]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

接受丹麦大使格瑞杰生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4月10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贵大使递交的丹麦国王所签署的国书，并且感谢贵大使的祝贺。

自从1950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丹麦王国建立邦交以来，贵我两国的关系沿着友好的道路向前发展着。今年二月，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两国关系，贵我两国协议将双方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几年以来，中国人民杂技团，中国古典歌舞剧团曾经赴丹麦演出，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丹麦，中国工农业和艺术展览会也曾经分别在哥本哈根举行。丹麦的工会和文化代表团访问过中国；1955年丹麦工商界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进行了贸易谈判，扩大了两国之间的贸易。这些友好往来促进了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而贵我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加强，是有助于促进国际间的和平的。

我深信在贵大使的努力之下，贵我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贵我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必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增长。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丹麦王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发展中丹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增进中丹两国经济、文化联系的工作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予以充分的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且祝贵国元首健康。

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1]

（1956年4月10日）

毛泽东主席（以下简称毛）：你在北京呆多久了？

金·阿·格瑞杰生大使（以下简称格）：已经有三年了。我很喜欢北京。

我真诚地希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获得发展。

毛：我们两国之间过去没有打过仗，将来会打仗吗？

格：不会的。

毛：你们不是参加大西洋联盟的国家吗？要是美国打起仗来，你们怎么样呢？

格：那不会的。我们两国之间将来也不会打仗。中国作为世界的大国而出现，使和平得救了。

毛：中国不过是个马马虎虎的国家，地方大，力量并不强。

格：中国地方大，有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而丹麦只有四万多平方公里。

毛：中国地方没有那么大。如果每一平方公里都像你们国家那样发达就好了。

格：中国还有六亿人口哩！

毛：中国是不会向别人翘尾巴的。如果中国翘尾巴，你们可以

---

[1] 这是毛泽东和丹麦驻华大使金·阿·格瑞杰生谈话的一部分。

批评。

格：那自然不会的。至于丹麦，地方虽小，但论单位面积，还经营得不坏。我愿提请主席注意，中国将派两个代表团去丹麦考察农业和合作社。

毛：我们很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愿意向世界上所有国家学习。如果美国人愿意的话，我们也愿意向他们学习。每个国家都有值得学习的长处。我们也愿意向冰岛学习。

格：冰岛只有渔业，农业很少。

毛：渔业就值得学习。

格：希望中国代表团去丹麦考察回来后介绍一下丹麦的情况。

毛：需要在报上介绍介绍。你们老呆在北京，知识也受到限制。我想，驻北京的使节们每年五一和十一以后（就是春耕、秋收以后），可以组织两次旅行，到中国各地去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格：这个主意很好。

毛：我们也要学一学你们是怎么办合作社的。

对中央就战犯处理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1]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6年4月11日）

一

彭真[2]同志：

略有修改[3]，主要是发到县级，于五月份收集意见上报。

毛泽东

四月十一日

二

除此以外，请你们将此件印发给所属地委、省辖市委和县委，也请他们召集党内外的适当会议加以讨论，征求意见，于五月中旬以前由你们汇集报告中央。

---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4月11日关于征询对蒋、日、伪战犯的处理意见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各

党组的通知。通知说，目前对于在押的蒋、日、伪战犯，需要作适当的处理。中央经过总的利害权衡，觉得似以从宽处理为好。从宽处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再判刑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的较大的战犯。这种处理，有助于我们孤立、动摇、瓦解国内外敌人，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国家对人民都比较有利。但是，这样处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认为太便宜了这些罪犯，也可能使一部分反动分子感到无所畏惧，因而助长他们的反动气焰。为此，提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4、5两月内召开当地政协常委扩大会，或其他适当范围的座谈会，征求意见，会后将结果向中央作报告，以便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在各地讨论之后，中央当年没有作实行特赦的决定。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对上述罪犯实行特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日发布特赦令。最高人民法院于同年12月4日特赦释放了首批战犯23名。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3] 即本篇二。这是毛泽东在中央通知稿末尾加写的一句话。

关于请中宣部讨论对待苏联科学的教条主义态度问题的批语

（1956年4月18日）

张际春[1]同志：

此件[2]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3]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

毛泽东
四月十八日

---

[1] 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1956年3月14日摘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哈格尔3月3日的谈话纪要。哈格尔说，过去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苏联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成就。例如，我们宣传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学说一切都好，将德国科学界很有权威的魏尔啸一切都否定了，认为奥地利遗传学家孟德尔的一切都是反动的，而在德国的生物学家，绝大多数是孟德尔派。科学可以有各种学派，我们相信久而久之可以使一些真正研究科学的人走上唯物主义。苏联科学有好的我们应该学习，但不能将苏联科学界的每句话都认为是神圣的。哈格尔还说，在哲学上也要重新研究，我们与某些苏联哲学家一样对黑格尔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听取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的谈话纪要[1]

（1956年4月18日至24日）

听取第一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18日）

一、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工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如果说沿海不敢利用，那么东德[2]、捷克斯洛伐克[3]就不要建设了。

二、从邓子恢[4]同志的谈话中可以得出两条教训：一条是农民的收入每年必须有所增加，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合作社中百分之九十

---

[1] 1956年4月18日至24日，毛泽东连续6天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的谈话纪要。

[2] 东德，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1949年10月在苏联占领区内成立。当时属社会主义阵营。1990年8月31日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签定“统一条约”，统一为一个国家——德国。

[3] 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属社会主义阵营。1993年解体，分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

[4] 邓子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的人收入应有所增加。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不是不搞公共积累，而是搞得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是负担不起的，这势必妨碍农民个人利益，秋后不能增加收入或增加很少。

再一条是抓先进经验，即增产经验。抓住推广先进经验，即可抓住一切。

因此，要抓住先进经验、农民个人得利（与工人增加工资意义一样）这两条。

三、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还要看看这两年农业实际的增产情况。总之，要向苏联学，也不能完全照搬。

四、计委应指定三四个人，不做别的，专门分析限额以下的建设项目。这里面一定有味道，看看都是些什么。

听取第二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19日）

一、对沿海工业的利用问题。

不仅原有的轻工业绝大部分在沿海，就是造船、机械、钢铁、水泥、化工等重工业也多在沿海，也必须充分利用。

三个关系都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二、农业增产问题。

我国农业机械化的步骤要慎重，不能破坏了深耕细作。

我对邓子恢同志的总结，提了两点意见：（一）增加农民个人收入；（二）抓先进经验。先进经验包括技术政策、副业等等。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如建球场、俱乐部等）太多。我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里，曾说到农民有钱，但有钱是有限度的，应该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年年个人收入有所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副业也是错误。

应该把积累、个人收入、发展副业、纠正命令主义这些问题都纳入规划之中。为此，四月底要召开一次省委书记会议。

三、“两个万岁”问题。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监督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四、石油钻探进尺，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千万公尺太少了，应搞得更多些，来一个革命加拼命。

五、统计生产效率时，可以搞两个数，一个是按生产工人计算，一个是按全员计算。

听取第三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0日）

一、过去有人说，“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这种思想是不对的。

为什么英国、美国、日本建设了呢？为什么苏联建设了呢？当

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戏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列宁反抗了第二国际[1]，才取得了俄国的革命胜利。我们抵制了第三国际[2]的错误，才取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当然，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国际不革命，第三国际有一时期革命太过火了。

不管谁放的屁，都要分析一下是香是臭，决不能随风倒。

二、重工业是重点是无争论的，但如果把轻工业和重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轻工业定少了，那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建设工业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不要上杜勒斯[3]的当，他不希望我们改善人民生活，而希望我们多搞军火。

三、拖拉机到一九六二年拥有二十一万台，是否多了些？对拖拉机的使用要慎重。

---

[1] 第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组成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14日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初期基本执行了马克思主义路线，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分化，以列宁等为代表的左派同第二国际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于破产。

[2]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1943年6月解散。

[3] 杜勒斯(1888—1954)，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任内推行实力地位政策、战争边缘政策、反共政策和艾森豪威尔主义，敌视新中国。

三个五年计划开荒四亿亩就算是最多了。

四、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就无办法处理。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听取第四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1日）

一、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还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人总是比机械会做工作，广东潮州每亩产量二千二百斤，有的国营农场每亩产量一百多斤，一拖一拉一百多斤，不拖不拉二千二百斤。好像瓦尔加对中国科学院的考察团提出过中国是否用拖拉机的问题。

二、战时和平时的互相转化问题。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

三、专业与协作问题。老铁路修理厂（如长辛店），可以考虑改为制造厂，只担任一小部分修理任务。通用的机器（如钻探机），非机械部门可否制造一小部分，还可研究。

四、地方工业问题。应立两条法律：一让地方搞，二不拿走。地方工业，中央部门在技术上、规划上、供产销平衡上还要管。

五、群众的事业由群众自办，也要加以限制，要分期分批来办，不要七年到十二年的事在一二年内解决。

六、汇报得好，下功夫摸了一下，总结了经验。过去没有这些经验，现在总结了这些经验。可以发到各部各省市去。今后每年都要你们汇报一次。

听取第五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3日）

一、几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机器自给率，第一个五年是百分之五十，第二个五年百分之七十，第三个五年百分之九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二、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任务的几个提法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应改为“除个别边疆地区外，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巩固”二字还值得考虑。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就要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加上“基本上”三字。

苏联于一九三六年钢产量一千八百万吨时才宣布工业化，我们一九六七年应争取达到三千六百万吨。

三、猪一九六二年可达三亿头，一九六七年可达五亿头，那时仍是粪肥的主要来源，争取农村中每人一口猪。

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五、人家看我们是缺点的“白”和“穷”，恰恰是我们的优点。

我们没有什么包袱，受帝国主义压迫达百年之久，翘不起尾巴来，这也可能就是谦虚的来源。我们既无帝国主义的包袱，又无十月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包袱。

六、茂名页岩油厂，两期一百万吨，投资十三亿元。可计算一下收回成本的时间，再下决心是搞两期或搞一期。

七、内昆线应争取一九五八年修到昆明。

八、张白线，京太线，中咸线，经济意义不大，可以暂不修建。

听取第六次汇报时的主要插话

（4月24日）

一、工厂已有很多在沿海城市，可以不再建大厂、新厂，而建小厂和适当扩建旧厂则是可以的。

二、山东沂源的钢铁厂可以考虑放在临沂以北地区。

三、小学下放不必一定两年，也不必规定一律，有的二年，有的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等。

小学下放是国家与合作社的矛盾（有两个矛盾：即国家与合作社、合作社与社员）。

四、一九六二年粮食消费水平只增加百分之一点二，一九六七年不动，是值得重新研究的。因为增了产，不论城乡都会增吃，故增百分之一点二可能太少了。

配给制不要轻易取消，对备荒备战都有很大好处，这是全民性质的计划供应，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五、六大矛盾问题：

（一）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些资。

（二）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

（三）国防、行政与经济、文教的矛盾：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

（四）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福利。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的关系。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

（五）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

（六）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五分之四。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他们占了两条。金银财宝很多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四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一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国防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里应大减，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考虑再减少一些。国防工业是否生产那样多的产品，也值得研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国防费和行政费占的比重很小，而我们的比重就大得多。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些？我总想从国防费和行政费上打点主意，多搞些经济建设。可以再看两年，看国防费、行政费可否再减。

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最复杂，农村中往往是占人口百分之五的干部社会主义积极性太高，而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则更多注意个人利益，这就是矛盾。

财政一节，说还想从农民多要一些，很值得研究，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农业税一百七十亿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税加小学下放共达三百七十七亿元，已经加了很多。对农民总要经常照顾，不要一下使农民收入大为减少。去年就是一个大教训，多收入六十亿至七十亿斤，全体农民都骂我们。我们减少了征购，实行了“三定”，又加上丰收，因而改骂娘为鼓掌。总之，要小心谨慎，多要些，还可以多想些办法，如薄利广销等。

六、最后结论：

就照你们的办，因为你们说的有道理。凡是在汇报中我们谈到的问题，你们要注意调整一下。

计委要和各部、各省市见面是好的，他们比我们的知识多些。

部（包括委员会）、局、委（省市）、厂每年都搞一次报告（今年算第一次）。厂里的报告不能都看，可以抽看。去参观之前，可先找厂长来谈两次，这样就会熟悉起来。

人民代表大会去年七月开，今年六月开，明年可否提到五月开。

八大时，第二个五年计划报告，由总理[1]报告好（富春[2]同志提议由总理报告）。

---

[1] 总理，指周恩来。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电报

（1956年4月20日）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1]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各位委员：

我愉快地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热忱地希望西藏各阶层人民在你们指导之下更加团结和进步，在发展西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上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为印发徐运北[1]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6年4月20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五百份或更多些，分发**党内外**高级干部及廿五日到京的各省委书记。

毛泽东

四月廿日

---

[1]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徐运北1956年4月18日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会议，有14个省、市的党政代表参加。会议一致认为，血吸虫病在我国流传面广，危害极深，不仅损害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严重地影响着国家建设的发展和整个民族的前途。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血吸虫病，必须做到：一、加强党的领导，这是问题的关键；二、充分发动群众；三、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组织和领导；四、追加防治血吸虫病的经费。报告还附有中医、中药治疗血吸虫病的验方一份。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报告时，还加了题目“关于消灭血吸虫病问题的报告”和题下注“（这是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1956年4月1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值得大家一阅。中共中央办公厅注）”。

给毛宇居[1]的信

（1956年4月20日）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借纯珠[2]兄之便敬致问候之意。

即祝兴居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

[1] 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

[2]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兄弟。

给毛笔珠[1]的信

（1956年4月20日）

笔珠兄：

纯珠[2]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

[1] 毛笔珠（1895—1973），名泽田，毛泽东的堂兄弟。

[2] 纯珠，即毛纯珠，毛泽东的堂兄弟。

给毛泽荣[1]的信

（1956年4月20日）

泽荣贤弟：

多次来信，均收到了。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吧。

顺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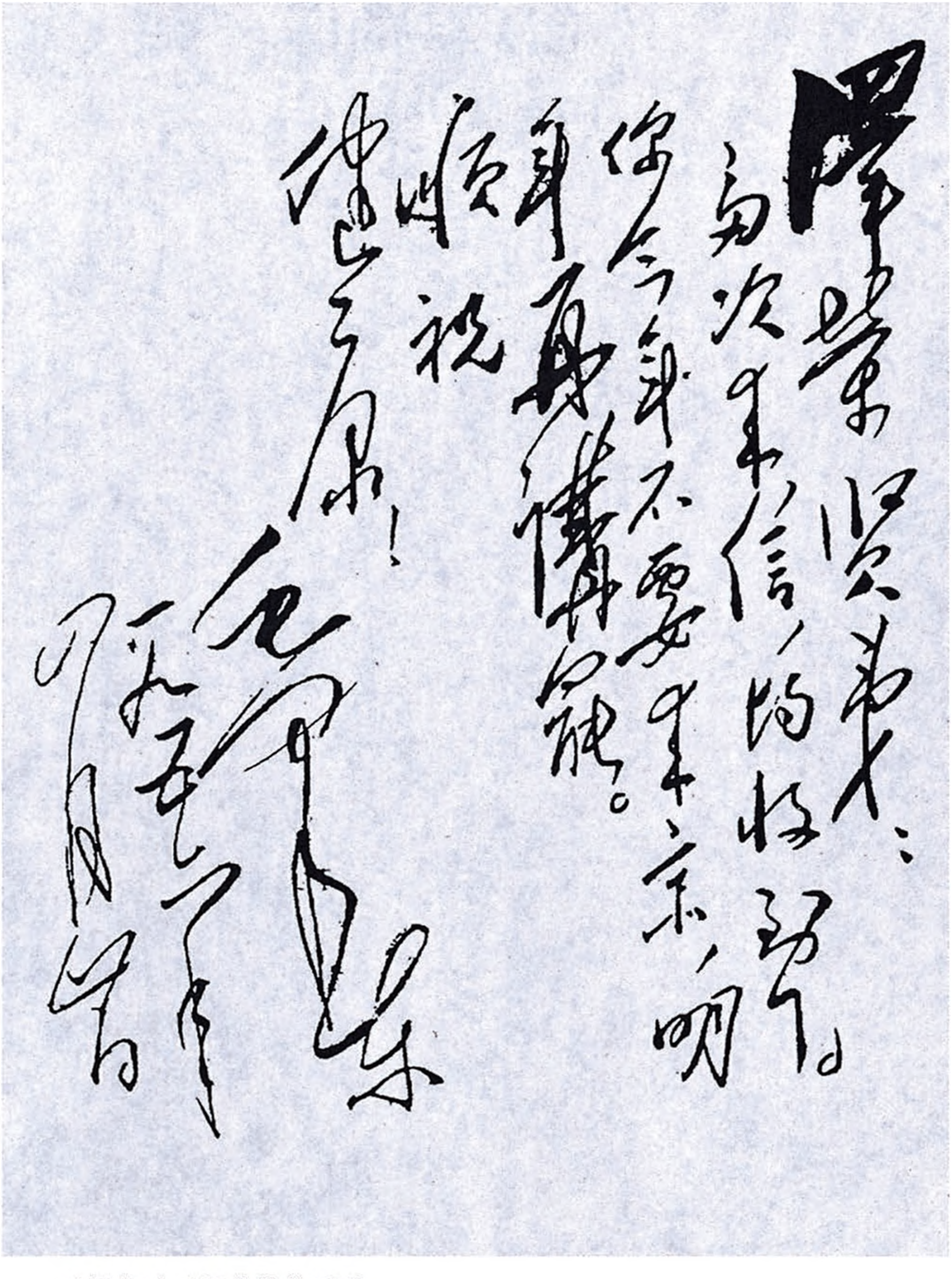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日

---

[1] 毛泽荣，毛泽东的堂弟。



泽荣贤弟：

两次来信，均收到。你今年不要来京，明年再讲罢。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四日

毛泽东致毛泽荣信的手稿。

论十大关系[1]

（1956年4月25日）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地基本思想。

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下面我讲十个问题。

一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

比例要加重一点。

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

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二　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

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

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三　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国防不可不有。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

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在开始能造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现在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

加强经济建设。

四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

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1]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

---

[1] 义务交售制，是苏联1933年至1957年实行的国家收购农产品的一项主要办法。集体农庄和个体农户每年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义务交售的数量和价格向国家提供农产品。

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

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五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

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

由地方去处理。

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

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

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

六　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

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

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现在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

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

合，要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七　党和非党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

“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

八　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

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

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有几点应当肯定：

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

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

现在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现在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目前有实际意义。

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现在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

放松警惕。但是，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

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

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

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

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九　是非关系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

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

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十　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

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

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

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

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1]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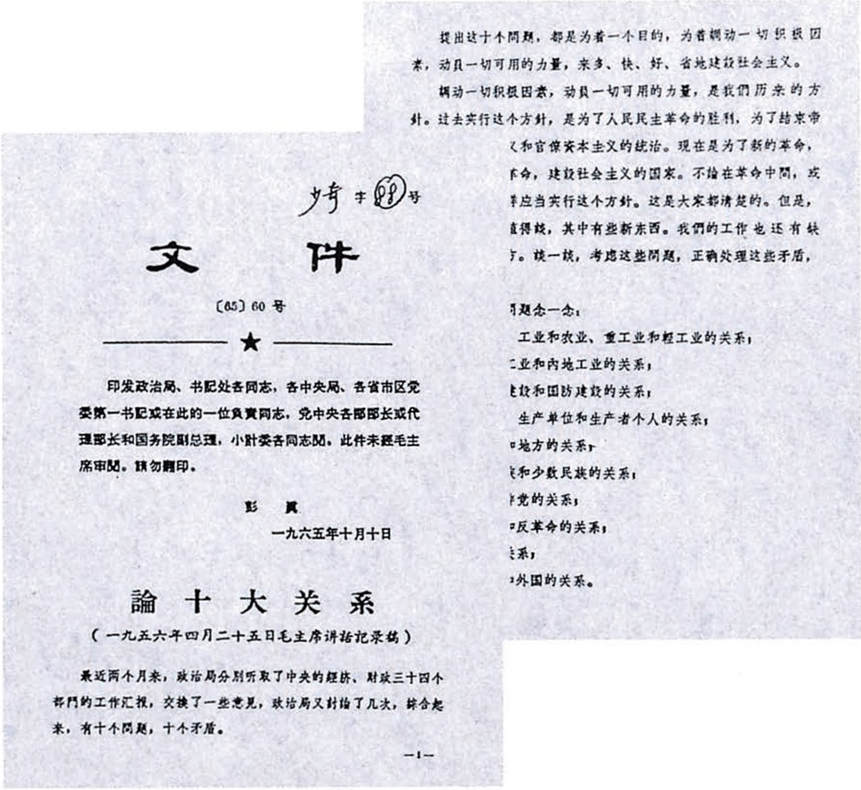
[1] 贾桂是京剧《法门寺》里明朝宦官刘瑾的亲信奴才。

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

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

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少奇 字88号

文　　件

〔65〕60号

★

印发政治局、书記处各同志，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記或在此的一位負責同志，党中央各部部长或代理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小計委各同志閱。此件未經毛主席审閱。請勿翻印。

彭　真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

論　十　大　关　系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主席讲話記录稿）

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經济、財政三十四个部門的工作汇报，交換了一些意見，政治局又討論了几次，綜合起来，有十个問題，十个矛盾。

—1—

提出这十个問題，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員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員一切可用的力量，是我們历来的方针。过去实行这个方针，是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为了結束帝

和官僚資本主义的統治。现在是为了新的革命，

命，建設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論在革命中間，或

应当实行这个方针。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

得談，其中有些新东西。我們的工作也还有缺

。談一談，考虑这些問題，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題念一念：

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的关系；

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設和国防建設的关系；

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地方的关系；

和少数民族的关系；

党的关系；

反革命的关系；

系；

外国的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图为毛泽东的讲话记录稿（部分）。

颁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的命令[1]

（1956年4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2]，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

[2] 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956年4月25日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指出：现在在我国关押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了各种罪行，使我国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害。按照他们所犯的罪行本应该予以严惩，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在关押期间绝大多数已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因此，决定对于这些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决定还对处理在押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原则和有关事项作了规定。

倡议实行火葬[1]

（1956年4月27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

---

[1] 在这篇倡议书上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本篇题下的年月日是毛泽东签名的日期。按照签名顺序，签名的还有朱德、彭德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内外136人。1959年2月10日，陈云给杨尚昆写信说：“前几年有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自愿签名死后火葬，那一次我未出席会议所以没有签字。我是赞成火葬的，特补此信，作为我的补签字。”“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因此，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

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办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物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1956年4月28日）

很多问题周恩来同志都讲了，我就不要讲很多了。

第一，党内生活问题。七届四中全会[1]以来，我们的党内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泼。四中全会是应该召开的，反对了高岗[2]那一种破坏性的煽动，增强了党的团结。这以前，我们党内有相当一些同志不够警觉，不够自觉，上了高岗的当。所以，把高岗这个“围

---

[1] 七届四中全会，指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2]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3年，他与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子”塞起来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来，还让他再搞一年，那我们的党就会被搞得很乱。可是在高岗问题被揭露出来以后，我们党内又产生了另外一种现象：谨小慎微，莫谈国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都生怕犯那个错误。现在我们就讲清楚，国事有两种：一种是破坏性的，一种是建设性的。像高岗那种破坏性的国事就不要去谈，但建设性的国事就要大谈特谈，因为它是建设性的。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

---

[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存在缺点和错误。大会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左”倾路线[1]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2]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3]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还有张国焘的右倾路线。鉴于这些教训，我们开展了一个整风运动[4]，接受好的东

---

[1] 第一次“左”倾路线，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1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1928年4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2] 第二次“左”倾路线，指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3] 六届四中全会，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4] 指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三年多。

西，批评和纠正错的东西，主要口号是又团结又斗争，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统一和分散的问题也有历史的经验教训。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非常强调集中统一，不许讲不同的话。比如“失败”这两个字就是讲不得的，事实上是失败了，可是不能讲失败，如果讲了，你就是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给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很大的独立性。但是，后来又发展到了有些根据地闹独立性，不应当由根据地自己发表的意见也发表了，应当听中央指挥的也不听。当然，这同第二次王明路线[1]是有关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2]等来进行纠正。在纠正的时候，我们仍然给各根据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权力。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3]，逐步把这种过于分散的状态纠正过来。这种过于分散，在抗日战争时期是适用的，后来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就不适用了，不能再像过去

---

[1] 第二次王明路线，指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37年12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右倾错误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在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2] 指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3] 指1948年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

那样各自独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这几年又有一种偏向产生了，这就是集中过多了。有些问题，比如工业的集中问题，工厂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权，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权，都还没有研究好。如果说苏联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对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研究好，似乎我们也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们革命胜利才只有这么几年，而且有些东西既不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是地方的决定，就是那么照搬过来了。

总而言之，我们党有这么一段历史，要想一想这段历史。曾经有很集中的时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也曾经有很分散的时期，不应当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那个时期地方的权力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事实上等于没有中央了，后头才逐步纠正过来，这是完全必要的。记得有一次会议上，我一共念了八个文件，这些文件的内容是讲需要集体领导，不要分散主义。现在我们讲，过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调动一切力量来达到建设强大国家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鉴于苏联的教训，请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以便适当地来解决这个分权、集权的问题。恩来同志说了，现在由国务院组织一个机构，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拟一个方案出来。

第二，个人和集体的利益分配问题。我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应该归社员，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归合作社和国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积金、生产费、管理费和各种杂费，包括国家的公粮和公粮附加。合作社和国家顶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让农民多分一点。这中间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调剂的。

第三，社会主义整个经济体制问题。关于企业的独立自主，列宁所说的独立自主，应搞到什么程度，请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业无非是这样两类：一类是生产过程的企业，工业是厂矿，农业是生产合作社；一类是流通过程的企业，就是运输业和商业。这些企业应当有怎样一种独立性呢？我这里是随便这么讲，表述不是很准确，叫做要有点“独立王国”。高岗的那种独立王国当然是应该反对的。这里的所谓“独立王国”，是说要有半独立性，或者是几分之几的独立性，公开的、合法的“半独立王国”。我这个话不能上宪法，不能上党章，也不能上决议案。总之，如果因为反对独立王国就把一切独立自主都反掉了，没有一点自主权了，那事情也很难办。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关于中央同地方分权的问题，中央要设多少部门，它们有多大的权力，地方有哪些部门，管哪些事，有多大权力，恐怕在几个月之内就可以搞出一个草案来。

我请同志们注意，请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员。听说，现在到中央部门办事见不到人，中央部门处理问题拖延不决，这两点相当普遍。地方要解决问题，到中央部门就是见不到人，连处长都不容易见到，有些问题拖了几年不得解决。应当检查这个问题，看用一种什么方式，又能见到人，又能比较快地解决问题。中央曾经发过一个通知[1]，说地方有权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这里是说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岗的独立王国了。也许你们会制止得多了一点，但并非出于坏意，也是可以原谅的。我们信任现在的省委、市委和区党委，给了你们这个权。这个权不能给地委，也

---

[1] 指1953年4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推迟群众戒烟时间和给地方党政以权力推迟或停止上级所发那些不合实际情况的命令指示问题的指示》。

不能给县委，只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因为省委、市委和区党委这一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比较成熟。总之，你们有权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训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的东西。

第四，修改党章问题。陆定一[2]同志说，党章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

---

[1] “五多”，指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

[2] 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问题。是哪一个同志在这里讲了，这个问题很重要。现在是发展了命令主义，合作社什么都得听命令。过去是个体经济，就是搞自由主义。现在集体化了，能听命令，一起上工，这就有极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听命令，这就宽了。命令要正确，范围不要太宽了，要给农民一些自己活动的时间，就是要有一点自由，如同我们每天都要有一点自由一样。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自由能活下去吗？我就不相信。比如你们回到家里就可以随便谈谈，跟你们的夫人、小孩讲一点笑话。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个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严肃是同不严肃相对立而存在的，没有不严肃哪有严肃呢？纪律是对没有纪律而来的，是对自由主义而来的，不搞一点“自由主义”怎么行？总是要有一点“自由主义”的。现在我们反对自由主义，是反对在不应当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对一切自由。如果反对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个家庭设一个检查长去检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严肃，都不搞一点自由。

第七，全国平衡问题。全国的平衡还是需要的。有一个同志讲，地方要有独立性，同时还要有全国的平衡，我看这句话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

---

[1] 这是毛泽东1951年给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

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全国的平衡，就会搞得天下大乱。如果上海的货不运到四川去，你李井泉[1]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货统统到北京来销，就要把北京的货都打倒。所以还是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当然，在现在地方缺少独立性的时候，强调一下地方的独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经济工作问题。我们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这两年要切实摸一下经济工作，中央同你们每年来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区党委都来汇报一次。但是总还要找一些委、部、局、厂，搞一些典型来研究一下，因为我们也不大懂。请各位同志切实研究一下，着重研究一下，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

[1]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给贺果[1]的信

（1956年4月29日）

培真兄：

给我的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好意。我情况还好。盼你保养身体。便时望将你的情况告我为盼！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九日

---

[1] 贺果，字培真，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省贵阳市教育局局长。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

（1956年4月29日）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与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中国从前是半殖民地，现在也还是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帝国主义是最吝啬的，根本不愿意帮助别的国家建立工业，他们撤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

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在中国，在南北美洲，民族资产阶级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在某些时候甚至比工人阶级的影响还大。所以对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现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不但要作斗争，同时要团结他们，要给他们利益，这样他们才能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给什么利益呢？一是给他们工作，二是给他们选举权。

对民族资本家的改造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我们给他们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六年了，我们还打算再给他们三年的时间，一共九年。这样做对工人农民是有利的，生产不中断，市场

---

[1] 这是毛泽东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上群众需要的商品不短缺，物价稳定，货币购买力稳定。现在我们革民族资产阶级的命，取消他们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我们的办法是教育资本家，给他们上课、开会，让他们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并鼓励他们积极的一面，打通他们的思想。资本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没有痛苦的，不是没有斗争的。我们动员了广泛的社会力量来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工作。不但工人对资本家作斗争，资本家家庭里的进步子女也同父母作斗争。这样，六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就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了。

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对资本家很好地进行了安排，使他们逐步变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目前有的工厂的厂长是资本家，副厂长是我们的同志。要他们当厂长是因为他们懂技术，但他们的企业在逐步变为国营企业。资本家要比封建地主有用得多。对地主我们只给一些土地，让他们自己种地，变为农民，现在不给他们选举权。但对资本家就不同，他们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在这些方面无产阶级必须向他们学习。

中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可供中南美洲兄弟党作参考。你们可以考虑在革命前对民族资产阶级多做一些工作，争取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他们对帝国主义是不满意的，你们可以联合他们，争取他们，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如果你们能让全部农民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再加上争取了资产阶级，你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在目前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将来的社会解放运动中，你们的希望会很大。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团结不剥削别人的小资产阶级，即独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这是被剥削者同不剥削别人的独立生产者的联盟。这种联盟是很重要的。此外，无产阶级还要有另外的一种联盟，这就是同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的宗教人士以及开明地主

的联盟。半殖民地国家要争取获得独立和解放，没有这种联盟也是不行的。

总而言之，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对于党内犯过错误的同志要有正确的政策，帮助他们，而不是把他们整死。批评并不等于一推了事。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同的是，有的犯得多一些，有的犯得少一些；有的改正得早一些，有的改正得晚一些。我们党内曾经有过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无情打击”的偏向。人总是有情的，何况是对同志呢？“无情打击”只会在党内造成对立，闹不团结，今天我打你，明天你打我，打来打去弄得大家不和气，党的事业不兴旺、不发达，同志们大家都不高兴。后来我们党纠正了这种偏向，帮助在改正错误的同志，能团结的力量越多越好。

犯过错误的同志有了经验教训，在这一点上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要强。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下一次有可能会犯错误。

大敌当前，我们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包括社会的、党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国际上也一样，没有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我们的革命就不能取得胜利。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包括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进步力量。我们可以同你们相配合，牵制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力量。帝国主义到处都插一手，我们就每一处都抓住它一点，这样它就难

以行动了。我们的胜利也是靠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例如朝鲜战争[1]期间，美国只能把它的兵力的三分之一放在朝鲜和东方，另有三分之一放在欧洲，还有三分之一在美洲。它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就帮助了我们，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胜利呢？怎么能在三八线[2]上停战呢？在反对蒋介石统治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都是这样得到各国的帮助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有一些从中国大陆被赶走的中国人在巴西吧。对于在外面的中国人，我们的方针也是争取，争取一切愿意回头而不帮助美帝国主义的人，不管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的罪，我们都可以赦免他们。我们希望他们回来，回来看看再走也好，回来找工作也好。蒋介石如果愿意也可以回来，但他很顽固，不肯回来。

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我们也尽量争取，不管对它过去侵略中国的仇恨有多么大，我们对日本的资本家、日本的前高级军官也争

---

[1] 1950年6月，朝鲜半岛三八线北南两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发生战争。随后，美国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出兵干涉，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大举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略，迫使它于1953年7月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以朝鲜国土上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暂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

取。一批过去侵略过中国的日本军人要求来中国看看，我们说可以。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十几个人的代表团，在五一节以后来。这是因为今天日本的地位和过去大大不相同了，现在它实际上是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了。过去日本欺负别人，而今天美国欺负它。美国虽然同日本、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签订了军事协定，可是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地位是极不巩固的。

中国现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国同志和人民的支持。

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

听说同志们在这里都很认真，肯钻研。认真学习是很好的，这是战胜敌人取得成功的一种保证。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弄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因为事情都有好的光明的一面和不好的黑暗的一面。我们应当把中国的这两个方面都给外国人看。你们已经看到了好的一面，还应该再看看不好的一面。

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曾给我国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的错误对我们有帮助，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从这一点上讲，我本人就是他的

学生。我们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教员，蒋介石是我们的教员，犯错误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教员。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是八分功劳、两分错误，同志们不会通过；说他是六分功劳、四分错误，也不会被通过。但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

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1]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

犯错误是难免的。谁不犯错误呢？难道帝国主义犯错误犯得少吗？算账总有正负，对错误即负的必须批评，成功的经验即正的必须保护。错误往往是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马克思主义总共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错误是一定会犯的，各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会发生错误。中国将来也一定会犯错误。认真一些，就会少犯错误，少犯全国性的错误，即使犯了全国性的错误也会及早纠正。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相信唯物论的话。人的思维不可能完全确切地反映客观实际。人类只能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认识的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事物是十分错综复杂的，又是在发展变化

---

[1] 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的，人的思维的反映跟不上客观实际，就一定会犯错误，如果我们相信辩证法的话。

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

减少国防费用多搞些经济建设[1]

（1956年4月）

一

重工业是重点，这是没有争论的，但如果把轻、重工业建设投资比重定得不恰当，如果轻工业定少了，就是立志不想搞重工业。要搞重工业，就要适当增加轻工业的投资。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建设工业就是为了搞国防，减少些国防，多搞些工业，正是为了国防。赫鲁晓夫[2]同志说得对，不要上杜勒斯[3]的当，他不希望我们改善人民生活，而希望我们多搞军火。

国防工业原定一九六四年满足战时需要量，也可考虑再推迟一年，即到一九六五年。因为和平区域是逐渐扩大的趋势，东自菲律宾，西至法国。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1956年4月20日、21日、24日先后听取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插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3]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二

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这个办法是好的，必须如此做。

三

国防、行政与经济、文教的矛盾，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

国防费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应大减，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考虑再减少一些，国防工业是否生产那样多的产品，也值得研究。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国防和行政费占的比重很小，而我们的比重就大得多，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些？我总想从军事、行政费上打点主意，多搞些经济建设，可以再看两年，看国防、行政费可否再减。

195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大会上。

1956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

1956年4月，毛泽东等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上。

1956年4月，毛泽东等接见出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6年4月3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彭德怀等接见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港澳工人代表团及外国工会代表团。

1956年4月，毛泽东在邮电部部长朱学范的陪同下接见参加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会议的代表。

1956年4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出席新华社国内分社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1956年4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出席新华社国内分社会议的全体同志合影。

关于斯大林问题[1]

（1956年4月、10月）

一

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集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

二

斯大林是希望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三

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6年4月在苏共二十大后不到两个月，先后对米高扬和苏联驻华大使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1956年10月23日接见苏驻华大使时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1956年10月30日接见苏驻华大使时谈话的一部分。

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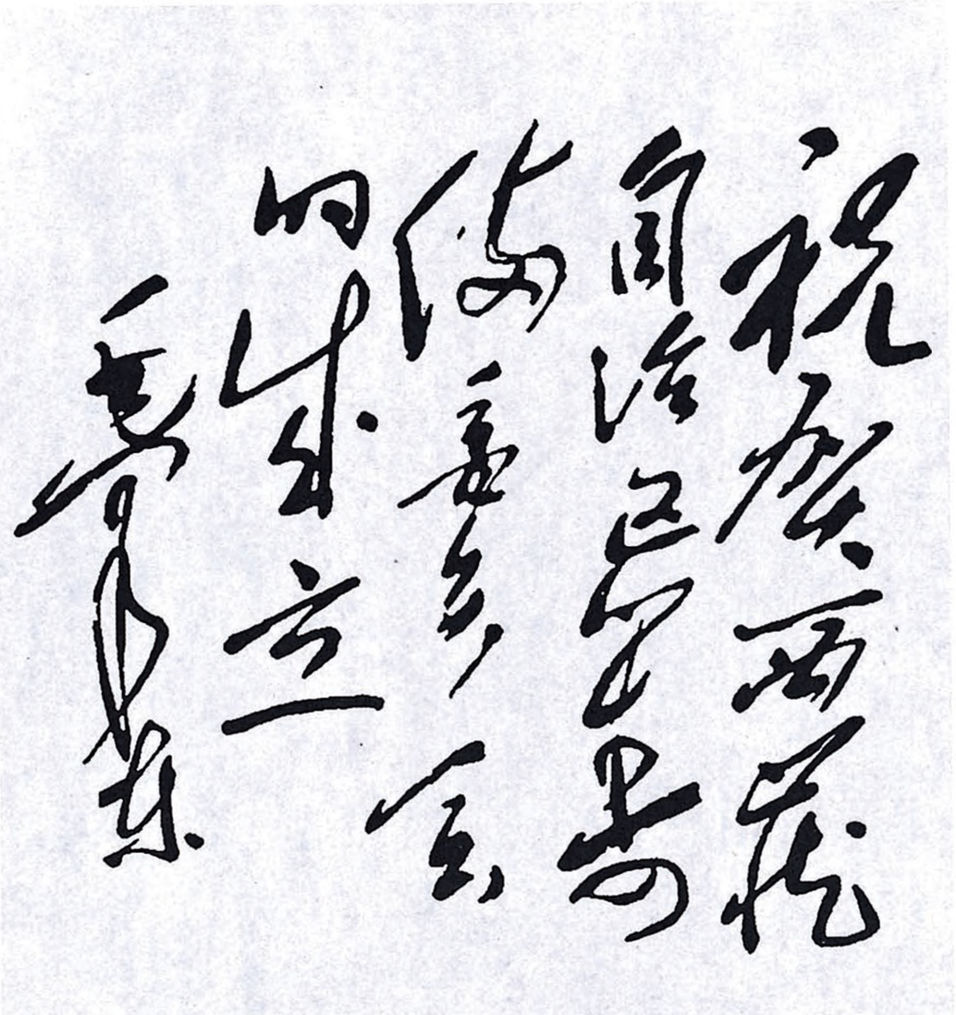
（1956年4月）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毛泽东

---

[1] 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题词：“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并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发出贺电。



祝贺西藏
自治区筹
备委员会
的成立
毛泽东

毛泽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题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56年5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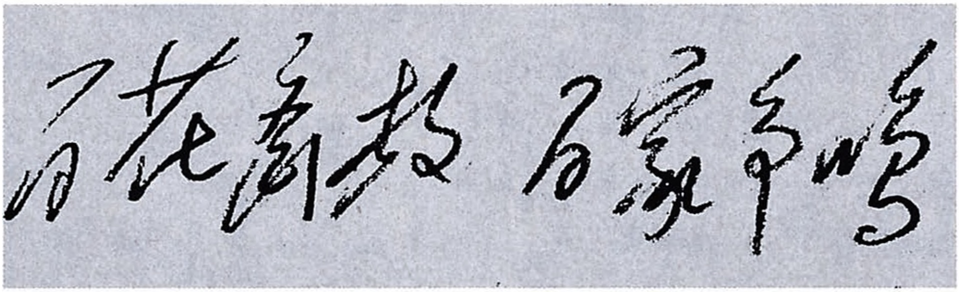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委书记会议[1]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战国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2]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康芙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

---

[1] 指1956年4月25日至28日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芝加哥学派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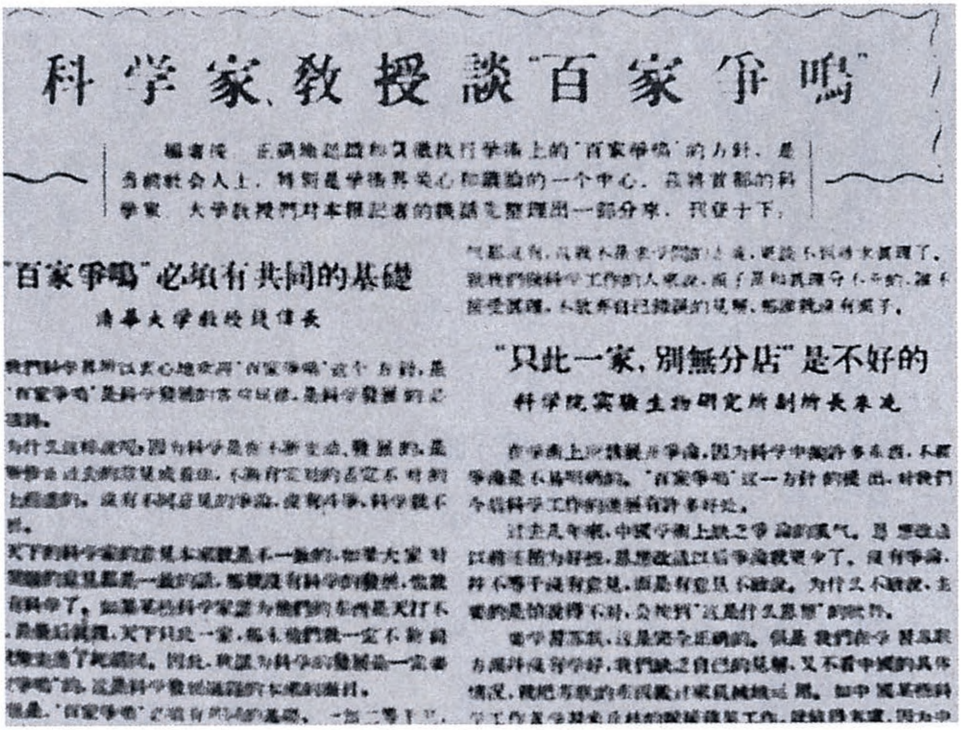
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1]、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手书“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

[1] 李森科（1898—1976），农学家，苏联生物学中李森科学派的创始人。曾任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他反对作为遗传学基础的基因理论，排斥、压制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曾对中国农业及相关领域产生不良影响。



科学家、教授談"百家爭鳴"

"百家爭鳴"必須有共同的基礎

清華大學教授錢偉長

"只此一家，別無分店"是不好的

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副所長朱冼

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在全国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图为《光明日报》刊载的《科学家、教授谈“百家争鸣”》。

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6年5月8日）

一

四川省委，并转西康地委：

此件[1]发给你们参考。西藏方面前往康区的考虑〈察〉团，不久就会到来，你们应予以热情的接待，将叛乱原因、平乱情况，党的政策和工作办法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可以告诉他们，并请他们帮助你们做些安抚劝说工作。如果他

---

[1] 指中央代表团党组1956年4月29日关于当前西藏政治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央代表团自北京出发的同时，四川藏区发生叛乱的消息传到拉萨，在喇嘛、贵族上层中间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恐惧，怀疑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和代表团的来藏是来搞改革的，对这两件事的态度由热情转为冷淡。经过召开上层分子座谈会，广泛地进行拜会、访问和向寺院发放布施等各种活动，宣传中央的政策，解释误会，揭露谣言，局势已逐渐稳定下来。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已胜利闭幕。估计再继续进行一些工作之后，拉萨的局势可进一步安定下来。报告还谈到，达赖提出派人组成代表团去四川藏区，协助当地党政进行宣传和安抚工作，我们已表示同意。

们愿意到成都和北京走一趟则更好。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八日

二

请四川省委和西康党委注意：拉萨方面所说引起叛乱的四条原因，请按实情加以分析，对于即将到来的拉萨考察团予以符合情况的说明——中央注。[1]

---

[1] 中央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拉萨对四川藏区叛乱发生的原因有多种传说，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叛乱是由于斗争上层、收枪、收税和破坏宗教等四条原因引起的。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的这四条原因后加的一个批注。

1956年5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五一庆祝会上。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了十大关系。图为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公布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的命令

（1956年5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5月12日第四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等问题的决定，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二日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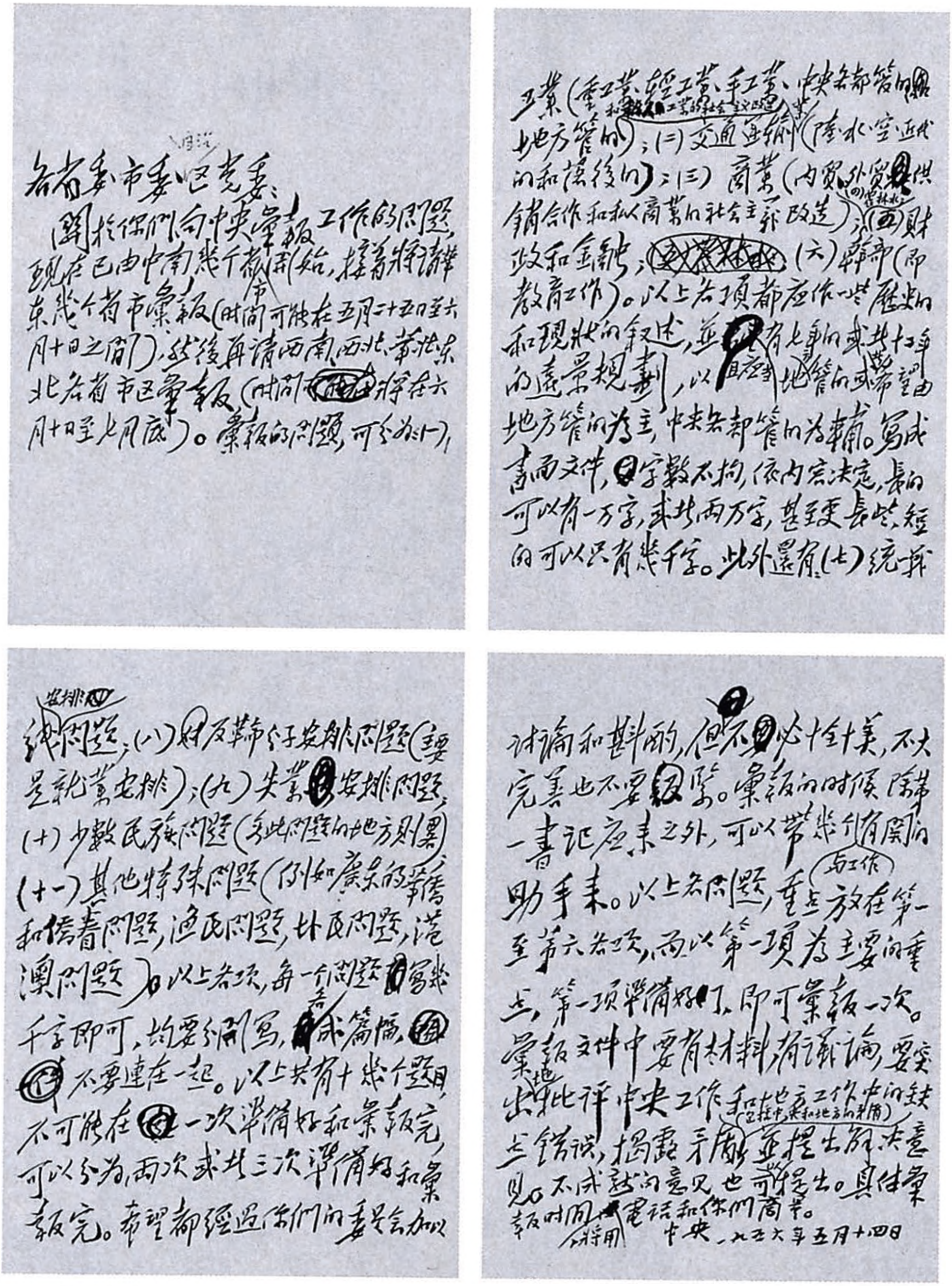
（1956年5月14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地方管的和私人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业（陆、水、空，近代的和落后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干部（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且应当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七）统一战线安排问题；（八）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无此问题的地方则略）；（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盐民问题，港澳问题）。以上各项，每一个问题写几千字

即可，均要分开写，各成篇幅，不要连在一起。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汇报的问题，可分为：（一）工业（重工业、轻工业、手工业，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和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二）交通运输（陆水空运输的和邮电的）；（三）商业（内贸、外贸、供销合作和私人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四）农林水；（五）财政和金融；（六）文教（即教育工作）。以上各项都应作一些历史的和现状的叙述，并有七年的或者十二年的远景规划，以地方管的或者应当由地方管的为主，中央各部管的为辅。写成书面文件，字数不拘，依内容决定，长的可以有一万字，或者两万字，甚至更长些，短的可以只有几千字。此外还有（七）统战安排问题；（八）对反革命分子安排问题（主要是就业安排）；（九）失业人员安排问题；（十）少数民族问题（有此问题的地方就写）；（十一）其他特殊问题（例如广东的华侨和侨眷问题，渔民问题，疍民问题，港澳问题）。以上各项，每一个问题写几千字即可，均要分开写，各成篇幅，不要连在一起。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批准，但不必十分完善，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有关工作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十四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的手稿。

写在湖北省财贸工作汇报提纲后面的文字[1]

（1956年5月）

资本家〔企业〕国『家』有化慢一点：

（1）抓住他们的尾巴；

（2）可得息钱；

（3）有时间，我们主动一点。

经验：

人事与业务的安排要迅速；

经济改造要逐步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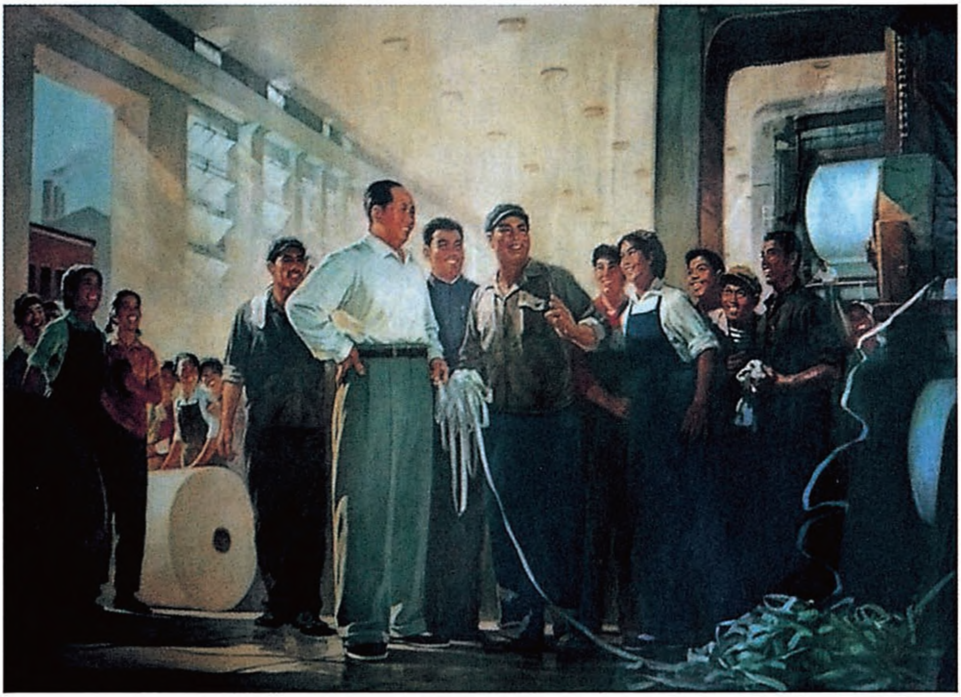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的这些文字，写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关于湖北省财贸工作的汇报提纲（草稿）最后。在提纲封面上毛泽东写有“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九日——廿日”的字样。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乘机抵达广州，在广州白云机场和机组通讯长柳昆尚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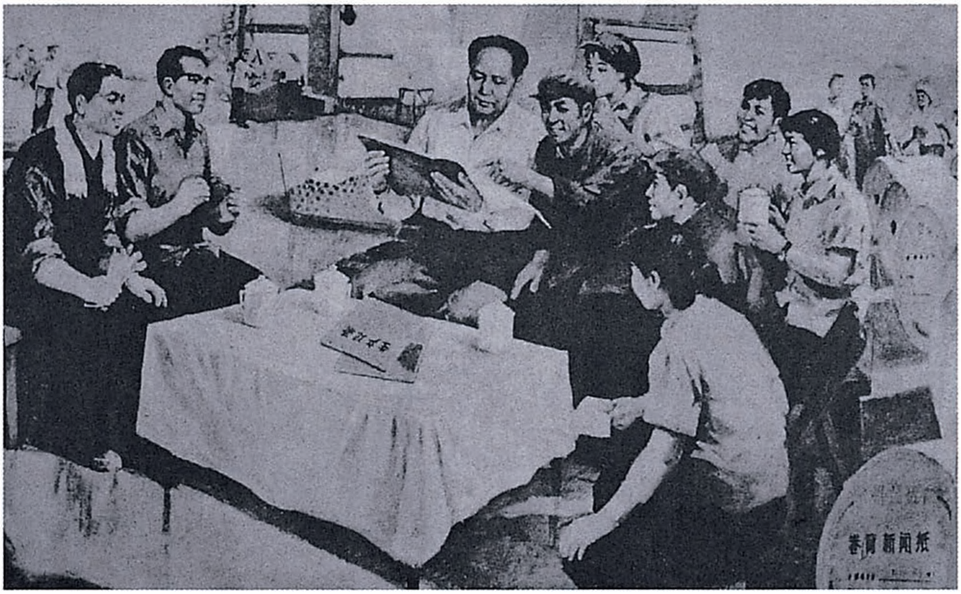
1956年5月3日，毛泽东乘专机到达广州后在机场和工作人员合影。

1956年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等人陪同下视察广州造纸厂。

1956年5月，毛泽东在参观新中国工业建设。



《毛主席视察广州造纸厂》（中国画）



《毛主席和造纸厂工人在一起》（油画）

中央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1956年5月20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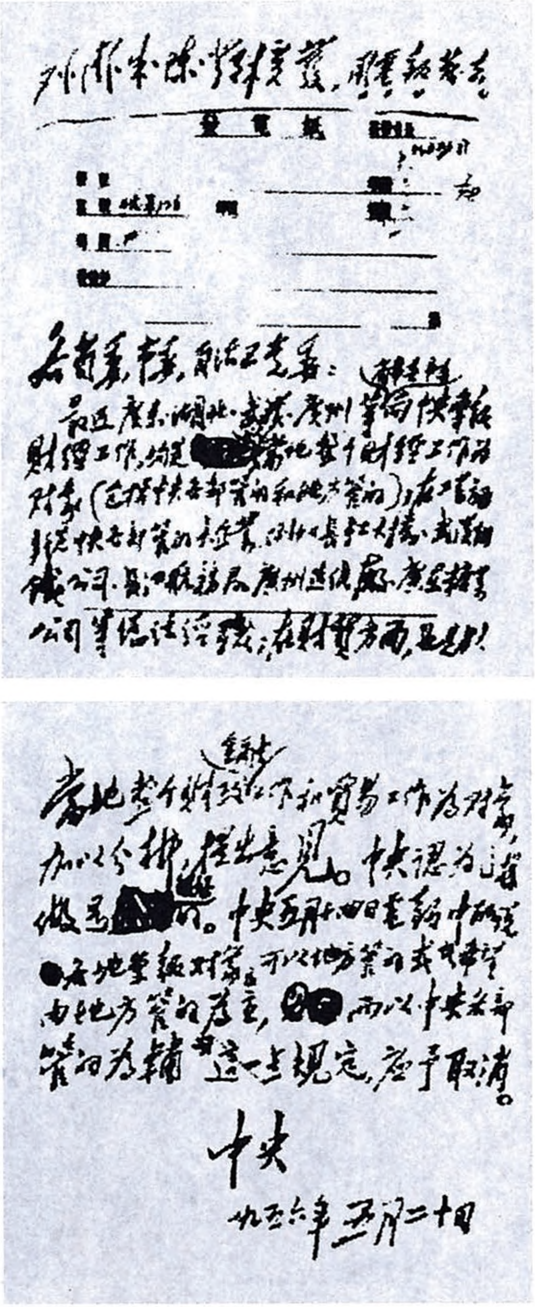
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1]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

[1] 即中共中央1956年5月14日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illegible]

发电纸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市委向中央报告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有些省市报告中央各部管的企业，如湖北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航运公司等经济情况；在材料方面是好的，全面性当地整个财政经济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中央管的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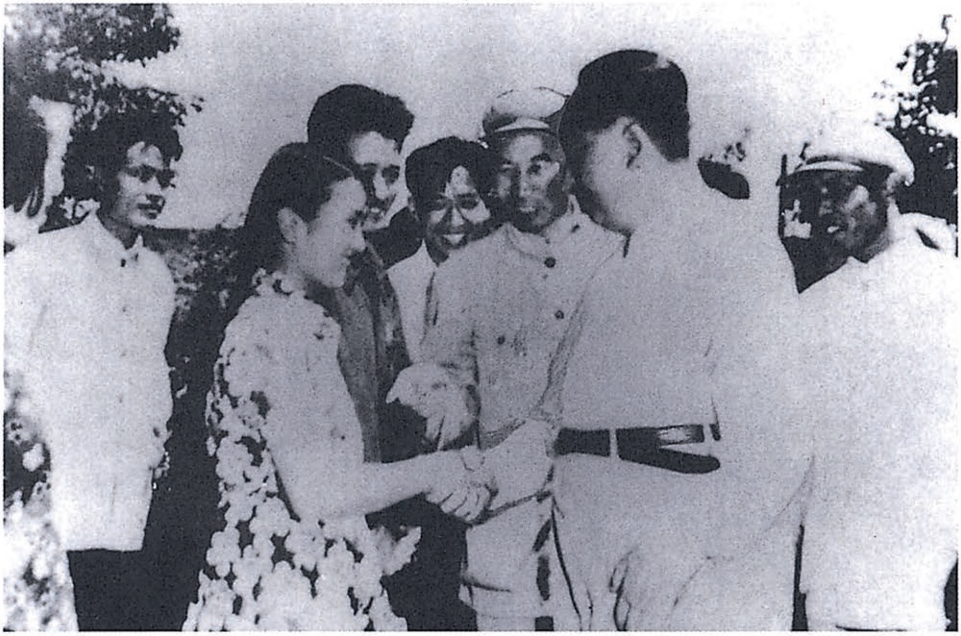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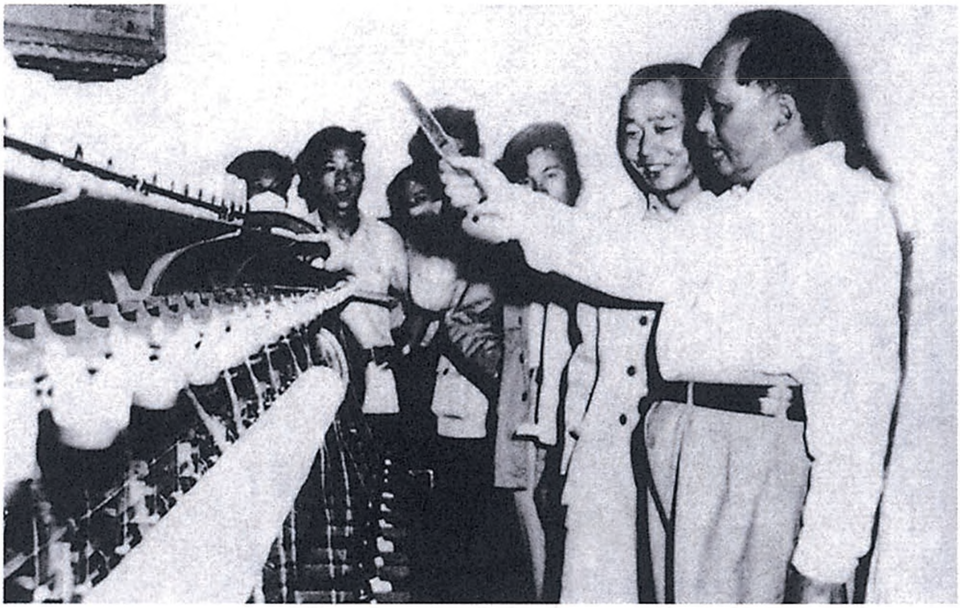
1956年5月30日，毛泽东在武汉汉口机场。

1956年，毛泽东在武汉和水利专家研究长江大桥的设计等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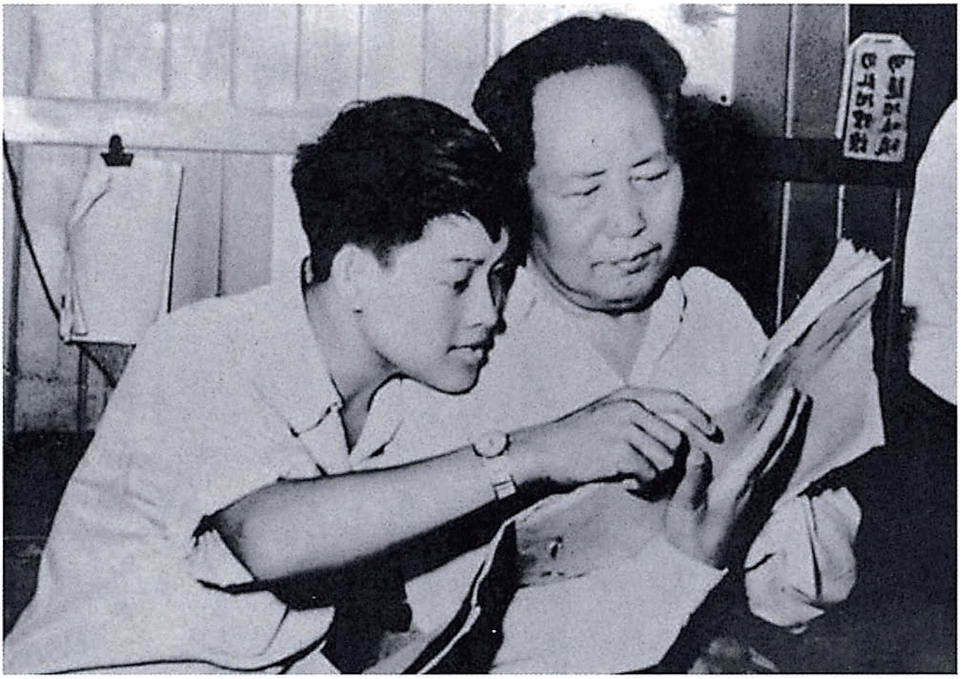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一厂，了解生产和工人生活情况。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武汉国棉一厂向前来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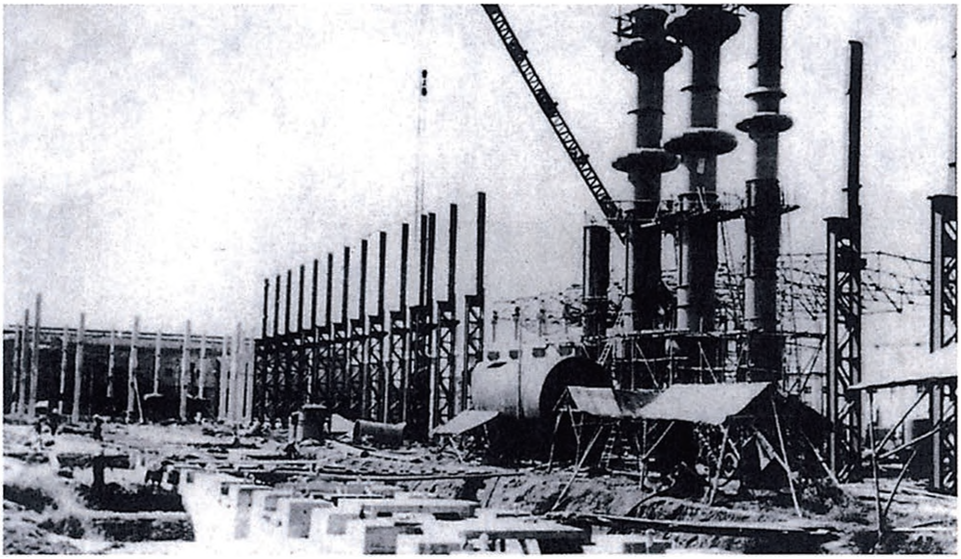


1956年6月1日，毛泽东在武汉国棉一厂棉纺车间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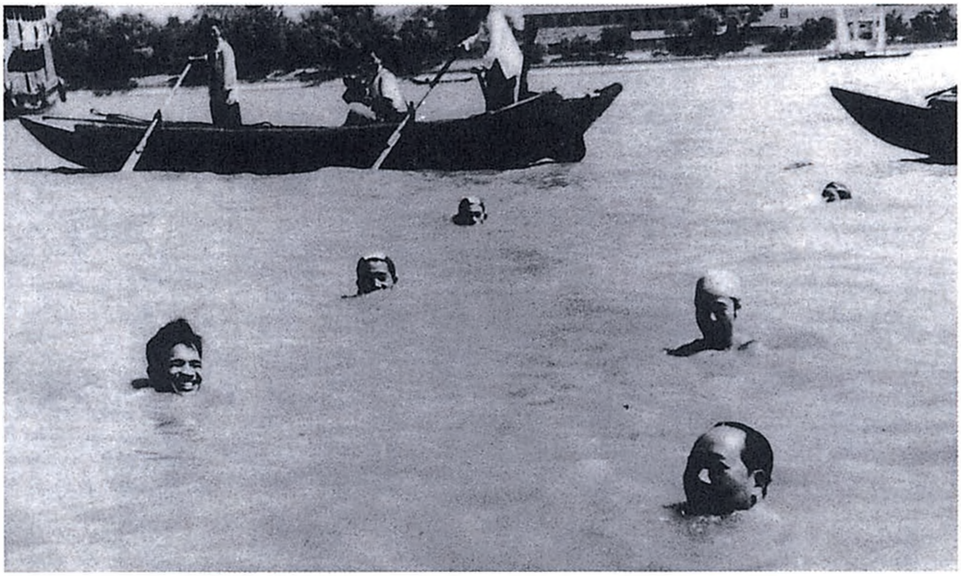
1956年6月，毛泽东在磨木车间视察。



1956年6月，毛泽东在磨木车间向工人陈维新询问工作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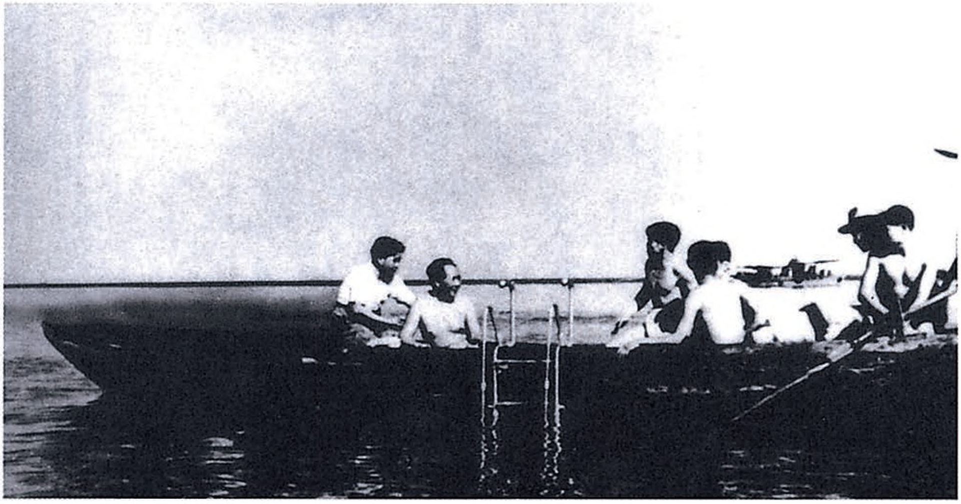


1956年6月3日上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正在筹建中的武汉重型机床厂。图为当年正在筹建中的铸造厂吊装冲天炉。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是在木船上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

1956年6月，毛泽东和武康轮工作人员的合影。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1]

（1956年6月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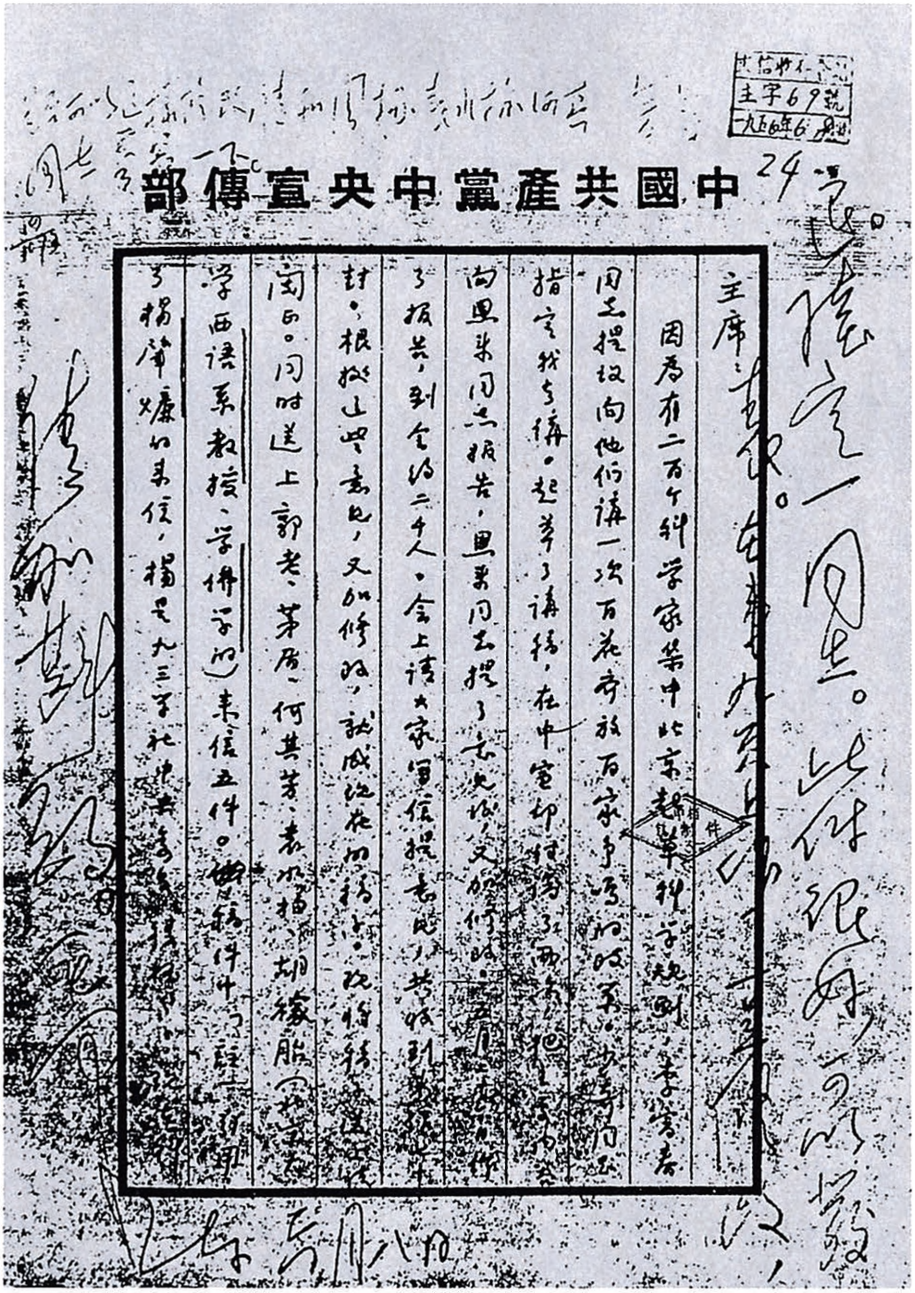
退陆定一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发表。在第九页上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

毛泽东
六月八日

是否可以这样修改，请和周扬、袁水拍、何其芳等同志商量一下。

---

[1] 这个批语写在陆定一1956年6月7日为送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因为有二百个科学家集中北京起草科学规划，李富春提议向他们讲一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少奇同志指定我去讲。讲稿起草后，中宣部讨论了两次，后又根据恩来同志的意见作了修改。5月26日在两千人的会上作了报告，会后收到来信70封。根据这些意见又加修改，成为现在的稿子。同时送上郭沫若、茅盾、何其芳、袁水拍、胡稼胎来信五件。关于俞平伯的一段，袁水拍、何其芳提了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将这段删去。但因为这一段的影响是好的，所以仍旧保留。1956年6月13日，这篇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发表。



主字69號
一九五六年6月

中國共產黨中央宣傳部

主席：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在怀仁堂举行报告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双百”方针。图为6月8日，毛泽东在陆定一报送讲话稿时所附信件上的批示。

1956年6月，毛泽东接见海军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时和张学思亲切交谈。

接受巴基斯坦大使阿哈默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6月13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和贵国总统对我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我本人的好意和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寻求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所有邻国执行睦邻政策。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兴地看到，中国同巴基斯坦自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两国的贸易文化交流和相互友好访问正不断地得到发展。

我国政府和我本人欢迎阁下的新任。我们珍视阁下在过去一年多来为加强中巴两国友谊所作的努力，并且愿意在这方面继续给阁下以充分的协助。

祝阁下在工作中获得新的成就。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幸福、贵国元首健康！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

（1956年6月14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项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作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1956年6月14日，毛泽东等会见参加制定规划的科学界人士。左起：周恩来、毛泽东、林伯渠、朱德、陈云、聂荣臻、邓小平。

对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一处带原则性修改的批语[1]

（1956年6月22日）

可以这样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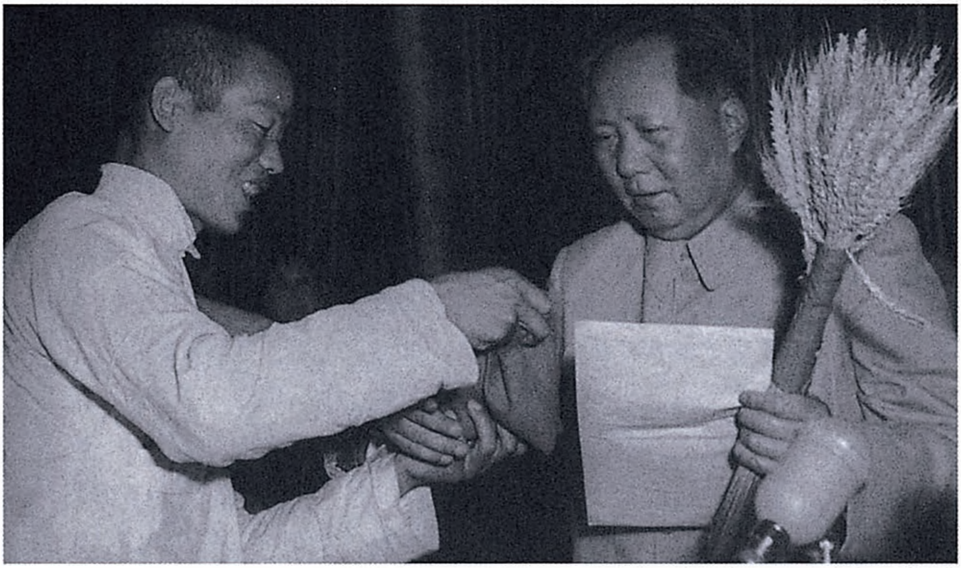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六月廿二日

---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1956年6月21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的信中说：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修改稿中，第十四条加了一句“必要的时候，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这是比较带原则性的修改，请酌是否合适。彭真转报刘少奇时写的信中说，“我觉得改得可以。但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的社员，与鲁言、总理电话商后，觉得还是用公益金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不给土地报酬为好”。刘少奇表示“拟同意照这样修改”。毛泽东看后，在“可以暂时保留适当的土地报酬”一句旁边批写：“可以这样修改”。1956年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这个章程时，将这句话改为“对于完全丧失劳动力，历来靠土地收入维持生活的社员，应该用公益金维持他们的生活，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章程于1956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56年6月15日至6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接见出席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



1956年6月，陕西省兴平县农民代表许敬章把丰收的小麦献给毛泽东。

1956年，毛泽东和王国藩亲切握手。

接受罗马尼亚大使尼古拉·乔洛尤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6月28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由人民群众掌握政权的国家。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罗马尼亚人民得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解放以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罗马尼亚人民今后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几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使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合作和兄弟友谊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利益。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

（1956年6月28日）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末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

[1] 这是毛泽东和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谈话的一部分。

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我跟苏联同志说，过去他们犯过错误，今后还会有错误，他们不大相信。我们也犯过很多错误、很大的错误。我们党内有过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高岗的右倾反党的机会主义，今后还一定会有错误，还会有如高岗等等的人。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关于公布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命令

（1956年6月30日）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1956年6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6月30日

对《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的批评[1]

（1956年6月）

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既要反对保守倾向，又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社论讲反右不到半年，就认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不能说社论一点马列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君子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卖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

---

[1]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刘少奇命令陆定一由旧中宣部的人写成，刘少奇、陆定一审阅发表的。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篇社论。

1956年6月，世界著名的和平人士黎巴嫩东正教大教主尼冯·萨巴来中国访问。7月1日，毛泽东接见了他。

水调歌头·游泳[1]

（1956年6月）

才饮长沙水[2]，
又食武昌鱼[3]。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4]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5]。

---

[1] 游泳，1956年6月，毛泽东曾由武昌游泳横渡长江，到达汉口。

[2] 长沙水，毛泽东自注：“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

[3] 武昌鱼，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鳊鱼，称团头鳊或团头鲂。

[4] 极目楚天舒，极目，放眼远望。武昌一带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楚国的范围，所以作者把这一带的天空叫“楚天”。舒，舒展，开阔。柳永词《雨霖铃》：“暮霭沉沉楚天阔。”毛泽东在1957年2月11日给黄炎培的信中说：“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5] 宽余，指神态舒缓，心情畅快。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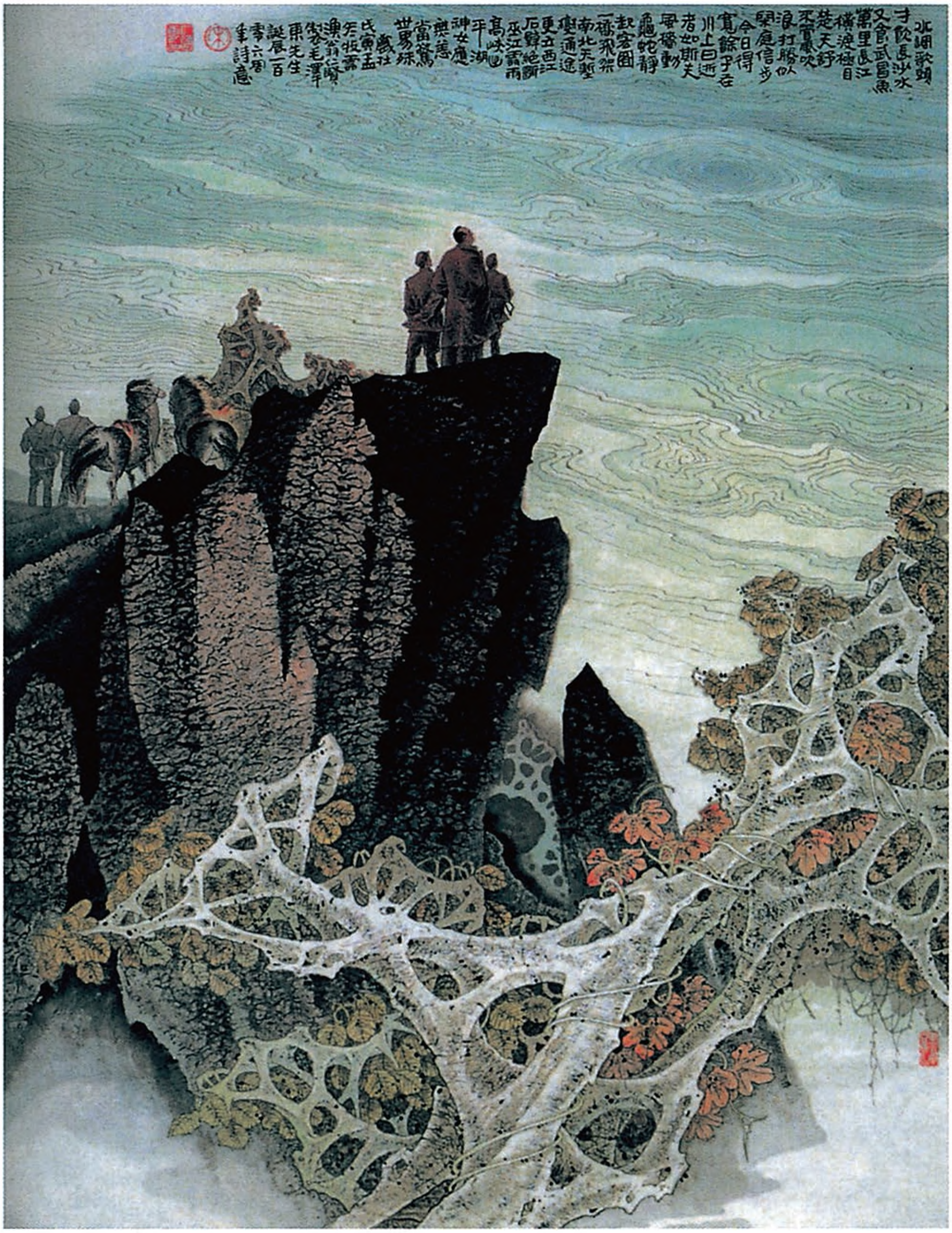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1]
天堑[2]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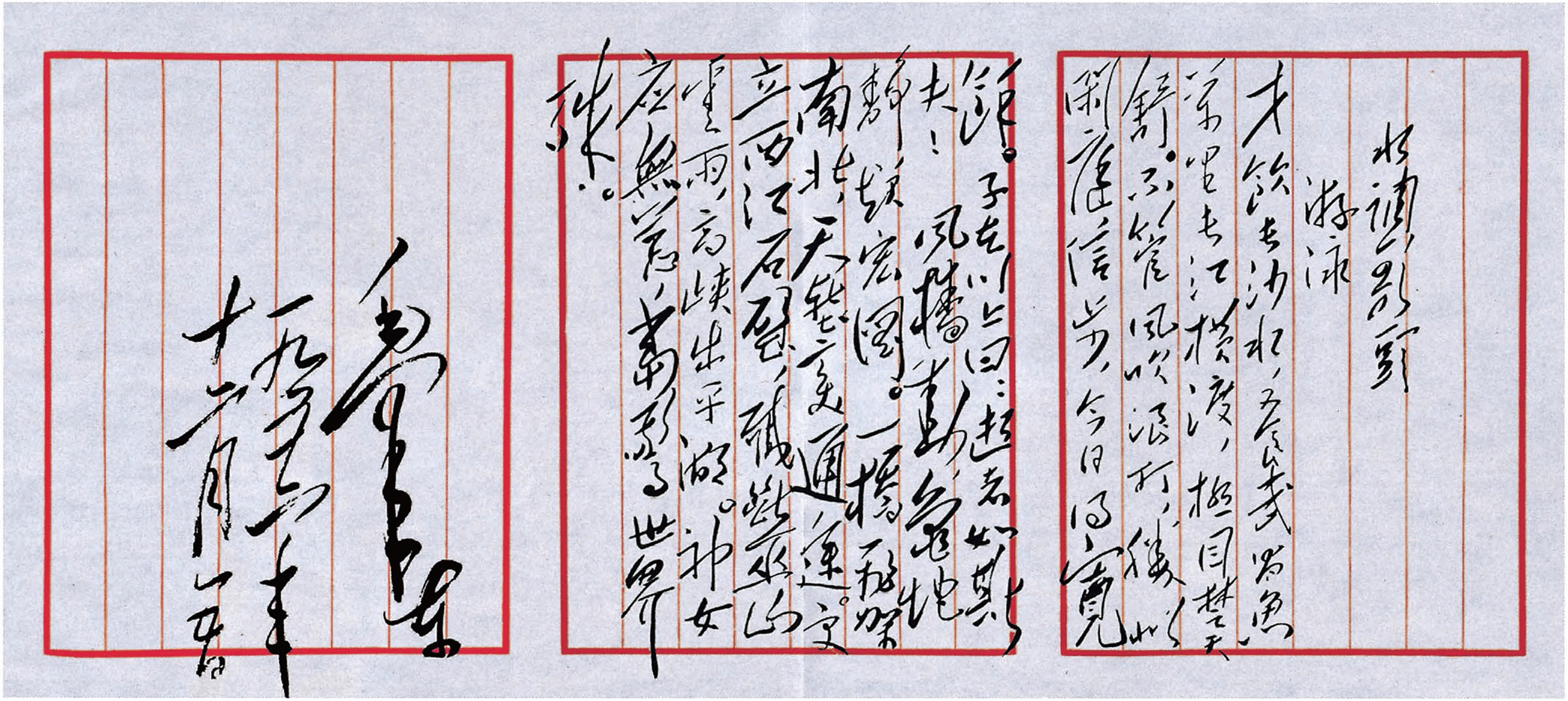
[1] 一桥飞架南北，指当时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1958年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毛泽东曾将此句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经毛泽东同意恢复原句。

[2] 天堑，堑，沟壕。古人把长江视为“天堑”。据《南史·孔范传》记载，隋伐陈，孔范向陈后主说：“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3] 更立西江石壁……当惊世界殊，将来还打算在鄂西川东长江三峡一带建立巨型水坝（“西江石壁”）蓄水发电，水坝上游原来高峡间狭窄汹涌的江面将变为平静的大湖。到那时，巫山的雨水也都得流入这个“平湖”里来。巫山上的神女当然会健在如故，她看到这种意外的景象，该惊叹世界真是大变样了。巫山，在四川省巫山县东南。巫山形成的峡谷巫峡和上游的瞿塘峡、下游的西陵峡合称三峡。巫山云雨，传楚宋玉《高唐赋·序》说，楚怀王在游云梦泽的高唐时曾梦与巫山神女遇，神女自称“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这里只是借用这个故事中的字面和人物。


水調歌頭
才飲長沙水
又食武昌魚
萬里長江
橫渡極目
楚天舒
不管風吹
浪打勝似
閑庭信步
今日得
寬餘子在
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
風檣動
龜蛇靜
起宏圖
一橋飛架
南北天塹
變通途
更立西江
石壁截斷
巫山雲雨
高峽出
平湖
神女應
無恙
當驚
世界殊
歲在戊寅孟冬

《极目楚天舒》（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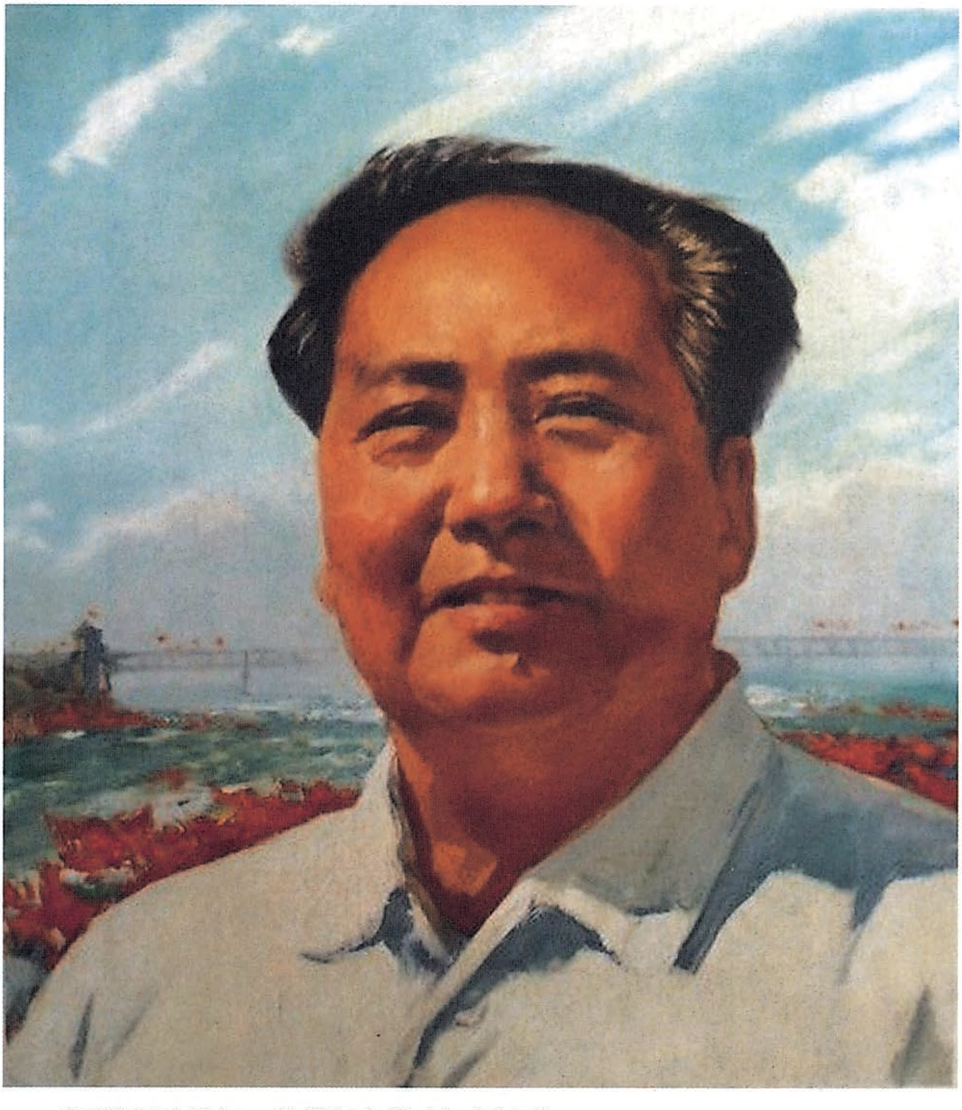


水調歌頭
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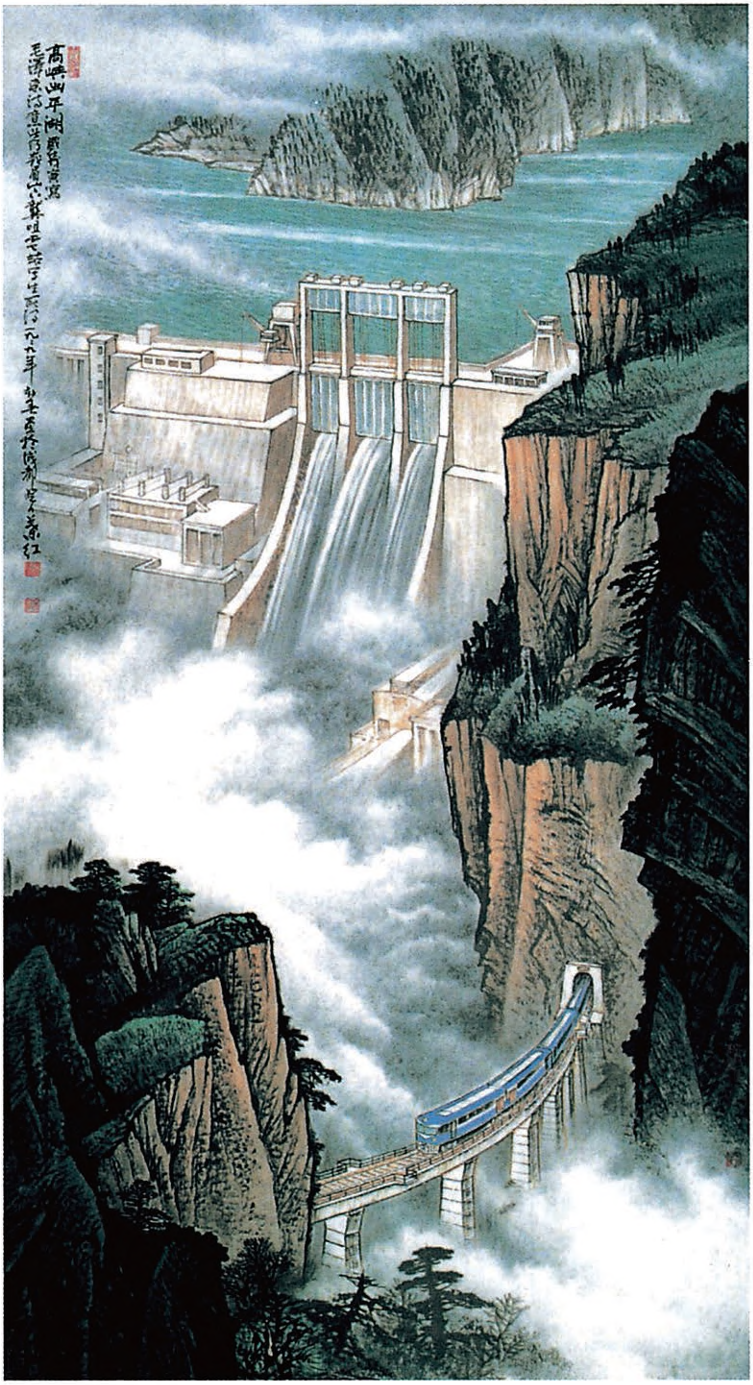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毛澤東
一九五六年
十二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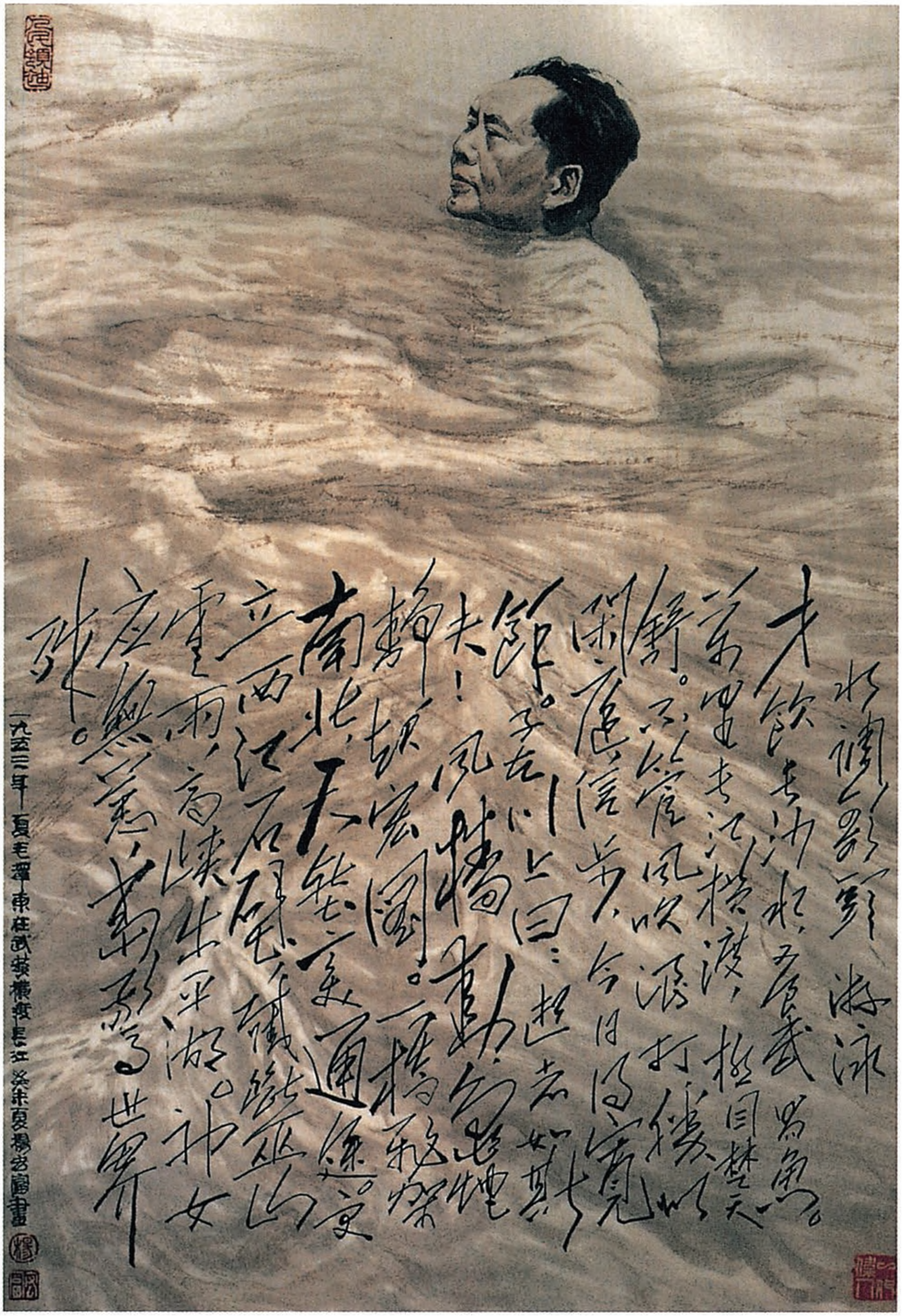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水调歌头·游泳》。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油画）



《高峡出平湖》（诗意画）


水调歌头 游泳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
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
闲庭信步，今日得宽
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风樯动，龟蛇
静，起宏图。一桥飞架
南北，天堑变通途。更
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
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
应无恙，当惊世界
殊。
一九五六年夏毛澤東在武漢橫渡長江 癸未夏楊之光畫

《畅游长江》（中国画）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电报[1]

（1956年7月9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达·阿吉尔毕希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1921年7月11日，蒙古人民推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取得了人民革命的胜利，三十五年来，蒙古人民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并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对加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对于兄弟般的蒙古人民的成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达·阿吉尔毕希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就感到万分高兴。

祝蒙古人民在和平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中蒙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7月9日于北京

关于批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的命令

（1956年7月9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7月9日第四十三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7月9日

关于国庆阅兵问题的批语[1]

（1956年7月13日）

刘、周、朱、陈、彭真、小平[2]阅，退彭[3]办。

仍由国防部长阅兵，并照旧发布命令，不要改变。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1956年6月13日关于今年首都国庆节阅兵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提出，国庆由谁阅兵问题，军委会议讨论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从今年起由各元帅轮流担任，一是仍由国防部长担任，究应如何，请中央确定。报告还提出，近年来，国庆节阅兵所发布的命令内容大体相同，今年阅兵时拟不发布命令，是否可以，请中央决定。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接见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夫妇的谈话

（1956年7月1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你们，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斗争，很同情你们。恐怕只有帝国主义不高兴，也只有美帝国主义，英国可能还好一些。怎么样？在美国干涉你们的时候，英国采取什么态度？

阿本斯（以下简称阿）：英国看起来没有表示态度。在安理会上，对危地马拉要求制止帝国主义干涉的提案，英国投了弃权票，既不表示支持，也不表示反对。

在事件发生时，有一艘英国商船正在危地马拉港口运货，被美国大使馆操纵的空军飞机打沉了。

毛：英国在危地马拉有什么利益没有？

阿：英国在危地马拉没有任何利益。在上世纪（19世纪）时，英国取得了危地马拉的一块领土的让与权，这一块领土成了英国的殖民地。（毛泽东看地图）

阿本斯夫人：就是地图上的英属洪都拉斯。

阿：我们一直在要求收回它。

毛：收回这块土地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吧？主要的还是美国对危地马拉全国的侵略。在事情发生时，你们的邻国表示什么态度？墨西哥采取什么态度？

阿：墨西哥同危地马拉之间的关系一直都很友好，墨西哥政府尽力表示中立。

毛：墨西哥属北美洲吗？

阿：是的。

毛：中美洲有哪些国家？

阿：中美洲包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毛：不包括巴拿马吗？

阿：不。巴拿马原来是哥伦比亚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巴拿马运河区的关系，它才成了一国。另外，中美洲五国在独立后成立过统一的中美联邦。

毛：你们南边的国家态度怎么样？

阿：南美各国人民对危地马拉都很同情。

毛：干涉是来自海上的吗？

阿：不。侵略是直接从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来的，显然是美国国务院直接挑起来的。事情发生前，在加拉斯加召开了美洲国家的外长会议。会上，杜勒斯提出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干涉”的提案。这一提案是要一切美洲国家迫害共产党人和所有保卫本国利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人士。危地马拉反对这一提案，因为这是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并使垄断组织增加对其他国家的渗入的提案。

毛：这个会是几时开的？

阿：一九五四年三月开的。

毛：美国到处以反共的招牌为名，而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美洲国家共产党人数很少，苏联离得很远，为什么美国那样急于反

共呢？

阿：美国所以急于反共，是因为共产党坚决为本民族的主权、独立以及从垄断控制下争取解放而斗争，并且揭露本国政府的卖国企图。

危地马拉代表团在加拉斯加会议上指出，美国是利用反共的旗帜掩盖着进一步渗入其他国家和加深殖民控制的企图。

美国提案的投票情况是这样的：墨西哥和阿根廷弃权，危地马拉代表团投票反对，其他国家投票赞成。

危地马拉的态度受到各国进步的革命力量的尊敬，因为它不仅表达了危地马拉人民的意愿，也表达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意愿。

毛：我们知道的。

你们的朋友多些，美国的朋友少些，你们的朋友比美国的多。

美国的胜利是暂时的，危地马拉终究是你们的，是危地马拉人民的。一切民族都要独立。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还有欧洲国家的账。全世界都不喜欢美国，包括英国在内。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它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日本、南朝鲜、中国的台湾、菲律宾、南越、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都受到美国的侵略。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阿：国际形势最近两年的发展，有利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亚洲国家就是这种例子。亚洲形势对其他大陆的斗争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现在听到了亚洲的声音，以后一定会听到拉丁美洲的声音。

毛：一切会有变化。力量大的要让位给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思想上要求变，小的要求变大。美国力量

大要变小，因为美国本国人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主席问在座的人的年龄）我们这里有三个清朝的人、四个民国的人——四个国民党的人。（笑声）

满清，要推翻。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打仗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满清。大，也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几年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人民对土地的要求。不知道他晓得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就失败于一个军阀首领袁世凯。

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老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而后，孙中山（后来是蒋介石）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军阀都消灭了。

蒋介石统一中国，得到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承认，统治了二十年，力量最大。我们力量小，当时五万党员，经过镇压只剩下几千党员。敌人到处捣乱，还是按照老规律，强大的失败，因为他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他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结果，也就是这样。

抗日战争，日本很强大，把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都赶到了偏僻的地区，占领了中国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广州。日本军国主义和希特勒也是按照这个规律，没几年就倒了台。

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赶到了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长征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五千人。

经过抗战时期，打日本，我们发展到了九十万游击队，枪炮不

如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四百万。（阿本斯向夫人惊奇地说：四百万。）打了三年，国民党打不赢我们。强大的打不赢，弱小的总是胜利。

现在美国很强，不是真的强。美国政治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本国人民也不喜欢。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做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笑声）

整个历史都证明这一点。人类有阶级社会的历史已有几千年，可以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在美洲，美国要让位给你们。

阿：感谢主席先生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帮助。

毛：我们的经验，供参考，不能照抄。

阿：我们一定会使它适合我们的情况。我们感到很有信心。再过五六年，我们愿意再到中国来看中国人民的成就。这种成就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各国的人民，包括危地马拉人民。

毛：中国人民是你们的朋友。中国人民的成就中，有你们的一份；你们的成就中，也有中国人民的一份。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终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阿：亲爱的主席先生，能亲自向你致意，使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极大的友谊，对危地马拉人民的极大的友谊。在我们的人民的心目中，主席先生受到极大的尊敬。（主席：谢谢。）我们祝贺主席先生在国家工作中的成就，祝主席先生的个人幸福。

毛：我们是处在同一种地位，做同样的工作，为人民办点事，

减少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国主义的压迫。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我不懂。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志。

我们性质上相同，只是所住地区、民族、语言不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我们同帝国主义却有性质上的分别。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乔冠华在三十八度线上的板门店同美国谈判了两年多，也是看到帝国主义就不舒服。

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来说，重视它，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怕，可以轻视它。但是它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斗争，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因此需要时间。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多才搞出名堂，搞出个朝鲜停战。现在又在日内瓦谈了快一年了，还没有谈出名堂来，也可能谈到二十一世纪去。只要美国拖到二十一世纪，你就得准备拖。

不要悲观，不会拖那么久的。

同美国打交道，像我们中国所说的吃牛皮糖一样。看样子美洲

国家、亚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阿：现在各国人民的风雨正在打美国。

毛：对。

刚才你说五六年后再来中国，是说五六年后有把握取得胜利吗？

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取得胜利。但我们相信最后总是要胜利的。

毛：你（指阿本斯）是从欧洲移去的？

阿：我父亲是从瑞士来的。母亲是……

毛：你呢？（指阿本斯夫人）

阿本斯夫人：我相信我有点西班牙血统。

毛：西班牙血统的占人口的多少？印第安人占多少？

阿：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占百分之七十。

毛：其他中南美国家的印第安人多吗？

阿：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印第安人多。阿根廷、智利差不多全是欧洲移民的后裔。

毛：有人说，美洲人是从中国去的？

阿：危地马拉人很像中国人。

毛：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也可能是从中国去的，也可能不是。南美、北美一共有多少印第安人？

阿：（犹疑）几千万吧？

毛：这是不是就出现了欧洲移民同本地印第安人的合作问题？

阿：工人和农民都受到剥削，尤其印第安人受到歧视，身上标着号码，像牲畜一样。

毛：你们从欧洲移入的人，是不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

统治另外一部分人，那么你们这一部分被压迫的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所处地位相同。

你们的政府实行了土改的政策，把帝国主义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外地来的人当总统，把土地分给本地人，一定会得到他们的拥护。

阿：我们确实把反动党派搞出来的压迫取消了一些。我们那里没有种族歧视，黑人不受歧视。

毛：危地马拉有黑人吗?

阿：很少。

毛：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政策太进步了，也是一个缺点。是不是一切地主的土地都没收？有民族资产阶级吗？地主中间有没有不跟美国走的？人民不喜欢美国，对美国关系小些的地主，可以团结。这样就能组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包括一些虽对本地人歧视，但又对美国不高兴的人。

阿：地主阶级一般是亲美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同帝国主义的利益对立的。我们听了危地马拉共产党的建议，改正了前任政府的一个错误。前任政府为吸引人民的支持，采取了一般有利于穷人不利于富人的政策，造成贫富对立。我们改变了它，支持民族资产阶级的合理要求。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民族资产阶级、工业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支持政府，我们却远离了他们。

毛：我们这里也有地主中间的左派，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反对蒋介石，和我们在一起。

除开逃往台湾的那些以外，我们接收了整个资产阶级，接收了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中、小学的教授、教师。教育他们，要

他们为人民服务。

我们的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错误，使他们感觉到不舒服，引起他们的反感。

大体上可以说，经过五六年的合作，团结得更好了。

国民党的文、武官员，只要没有跑到台湾，我们也接收了下来。但我们处理得不好，有些有职无权，挂个名。这些非切实改正不可。水利部有个参事郑洞国，挂个名，没有事做。长期下去如何得了。文史馆不做事情。有些地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做事情，这是缺点。

你在中国对我们的错误缺点要注意，要进行比较。

毛：还要为阿本斯组织些什么座谈？

吴茂洁：已组织了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还要组织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统一战线问题的座谈。

毛：尽讲好的，你就不要相信他。他不讲坏的，你就问他，有什么坏的？还能在中国留多久？

阿：到八月十四日。我们因签证问题，必须在下月底前回到法国。

毛：那么还可以到各地看看。多找些人谈谈，找共产党人，也找其他党派的人，找起义将领、资本家、宗教界人士。你们如有少数民族问题，也可谈谈，这方面我们有点经验，也有错误。

张奚若：他们已参观了民族学院。

阿：很感谢主席先生所讲的话。我们将利用在中国逗留的时间来学习。我们已经学到了你们的政策的灵活性，你们给每一个不同美国在一起的人以机会，使他们为人民服务，并在服务中承认自己的错误。

美洲的一些政治领袖，往往不是这样。他们对他们自己，也从来不承认有错误。

毛：你很老实，想到的就说了出来。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在根据地的头几年，采取可以叫做“一切打倒”的口号。除工人、农民外，什么人都不要，通通赶掉。这样，蒋介石倒感到舒服了。蒋介石力量大了，把我们从南方的很多根据地赶到北方的一个根据地。这样，我们就“想”，批评、改正了这个错误。

我们的历史上犯过三次“左”倾、两次右倾——陈独秀、王明。此外，局部的、个别的也犯过右的错误，如张国焘、高岗。

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日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有很多老师：日本、美国、蒋介石、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这些学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历史上，英国同我们打过很多仗。英帝国主义、法国、德国、意大利，都很喜欢我们这块地方，都是我们的教授，我们是他们的学生。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错误。如果你们有错误，你们也可以取得教训。美国就是你们的教授。现任总统阿马斯可以说是你们的第二个教授。

阿：在告别之前，我首先要表示感谢。我们占了你很多时间。我们知道，这些时间并没有白费掉。我们要把主席先生的话带到我们的政治力量中去，来改进我们的工作。非常感谢。

毛：谢谢你们来看我。

对中央转发王观澜关于江浙农村情况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1]

（1956年7月22日）

报告中的第二项[2]“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个算法与实际税收和农民负担有某些出入，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摸底，也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和真正了解农民的经济情况，各级党委都应当进行这样的调查，地委、县委在一两个乡或者在一两个合作社内进行调查，省、市、自治区党委选择一两个县直接去进行典型调查。这项工作应在夏季

---

[1] 王观澜，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本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王观澜1956年6月12日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第二项。这一项主要是谈为农民算账问题。报告说，在浙江临海县曾为农民农副业的收支算了一次账。在农业方面，按每人约有一亩三分田地、平均每亩年产量四百八十五斤计算，扣除农业税、生产成本（种子、肥料等）后，大概每人可得原粮四百五十四斤，折人民币三十一元八角，每月可得二元六角五分。副业方面，找不到必要的材料算一次细账，据1955年统计，浙江副业和土特产产值占农副业总产值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但目前均有下降趋势。临海县养猪只完成今年计划的三分之一。因此，农家每人每月收入包括副业在内一般也只有四元多，多数农民的生活仍然是贫困的。对于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他们是很敏感的。

布置，以备秋季之用。王观澜同志报告中所述临海县情况，是农民不能增加收入的情况，如果这种县多了，则事情未可乐观，值得严重注意。请你们调查所属如临海情形的有多少县，好于临海的有多少县，摸一下底，电告我们为盼！

在听取甘孜、凉山两个自治州改革和平乱问题汇报时的谈话

（1956年7月22日）

李维汉[1]**（以下简称李）**：关于平息叛乱，继续贯彻执行“以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打击”的方针，宣布停下来谈判。允许叛首自己来谈判，也可以派代表来谈判。谈判要有上层参加。在谈判期间，叛众不下山，我们不去打。对叛乱分子，反复争取，不惜时间。同时，利用时间让部队、干部、群众休整（体力、思想、组织等等）。要戒备，要防御，再打我们更主动。做得好，估计一部分和大部分叛乱分子可以瓦解。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个办法很好，应当坐下来谈判，我们有缺点就讲缺点，有错误就讲错误，这样也才能说服拉萨方面。

李：稳定邻区，缩小叛乱影响。对所有叛乱分子，宽大处理，不咎既往。在平叛中和平叛后，都不杀人。有的同志主张，平叛后罪大恶极的还可以杀。这就有一个对中央四月九日指示[2]理解的问题，指示中说：“即使对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分子，无论是首恶分子还是胁从分子，只要表示悔改，停止叛乱，也对他们一律从宽处

---

[1] 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1956年4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四川省彝族和藏族地区反革命叛乱情况的通报。

理，不咎既往，过去在政府和协商机关有职务的，保留职务，允许继续参加工作。在平息叛乱中有立功表现的，还将给予奖励。”

毛：可以一个不杀，民愤很大的，拖他一二年，群众气平了，就可以不办了。苏永和、马良[1]都没有杀嘛！杀这些人对西藏上层会有影响。

廖志高[2]（以下简称廖）：寺庙枪支不动，群众不放心，上层的枪向寺庙转移。

毛：暂时不动，不是永远不动。暂时不动，约法三章，我们有理。

李：关于划分农区阶级成分，划分三种阶级成分即农民、富农、地主，农民内部不再划分，以便加强农民内部的团结。但在发展党团、配备骨干、提拔干部时，要掌握其阶级成分和斗争中的表现。

毛：发展党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好好地发展。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

现在，民族之间还有些不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是共产党，就要做到民族之间的完全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听取少数民族的意见。意见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正确

---

[1] 苏永和，又名罗基邦让·多吉巴参（1909—1981），西康芦花（今四川黑水）人。1955年任阿坝藏族自治州（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副秘书长、政协副主席。1956年春参加叛乱，被捕。释放后出走印度。1980年从加拿大回国定居，任四川省政协常委。马良（1905—1960），甘肃临夏人，曾任国民党军马步芳部团长。1951年在甘肃、青海、四川边界的藏族地区组织武装叛乱。1953年被捕。

[2] 廖志高（1913—2000），四川冕宁人，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三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的就采纳，不正确的要说服，说不服就等待。我有个亲身体验，当年在陕北的时候，遇事就和高岗[1]商量，听取他的意见。此人以后变坏了，那是另外一回事，换成另外一个人道理也是一样的。对于陕北是我的学问高呢，还是高岗的学问高？当然是高岗的学问高。所以，遇事我就和高岗商量。他到东北去以前，我告诉他我的这个经验，他到东北后把这个话忘记了。

在汉族地区都是这样，更何况在少数民族地区。本地人总是了解本地的事，即使有些话说得不对，也只能用同志的态度去说服。说服不了就等待，等待他三、四、五年，待他们同意了再办。汉族干部这样做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那时你要走，他们也会出来挽留的。留一些为本地人信任的汉族干部在那里长期工作。要取得他们的信任，首先就要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没有这一条就是格格不入。

民族间的隔阂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要缩短这个时期，就要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一条。还要增加一条，叫做“唱对台戏”，使他们有讲话的机会，把苦处和怨气都吐出来。你们这次会开得很好，汉族干部唱一台，少数民族干部也唱一台。像这样的会，可以考虑每年开一两次，各省也可以开。

李：几年来少数民族干部有一些反映，在这里汇报一下。这些反映是：

一、自己的意见常常不被重视，而汉族干部的意见每每必须接受，甚至发表演说、汇报工作，都不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和想要做

---

[1] 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33年到陕甘苏区工作，是陕甘工农红军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西北中央局书记等职。

的事。

毛：这就是强加于人。绝不能强加于人，做好事也不能强迫。

李：二、有一股压力，不敢随便说话，特别是不敢说不同的意见，害怕随便扣帽子。

三、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有名无实或者名多实少，不能做主。

毛：那就不好，应该倒过来。

李：四、自治地方的许多困难和要求，提出来很不容易解决，他们对中央各有关的部门有很多意见。

毛：你们不是要开民族工作会议吗，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

李：在划阶级上自觉缩小打击面，地、富比率划得小一些，剥削轻微的富农可以划到农民中去，地主划到富农中去。具体办法由地委研究。孤立地主，中立富农。

毛：现在划的地、富占多少？

廖：省委意见，地主和富农占人口的比例准备到百分之七，个别不超过百分之八。

毛：我看多了，汉族地区一些地方也不过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划百分之三、四、五就可以了。有些人可以有意识地不划成地主。在汉族地区小土地出租者一条定下来，几百万人感到舒服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很苦，上层的生活也不很好。

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和汉族地区的不同，汉族地区的地主在土地改革以后剥夺了选举权，不能做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剥夺选举权，还可以做官。对少数民族中的地主应该宽一些。我们对资本家都是赎买政策，对他们应该比对资本家更宽大一些。

现在，逐句议一下李维汉同志讲的第一节。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战争的性质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战争的那一方面即叛乱的头子认为是民族斗争性质的。他们用“保卫民族和宗教”欺骗了一部分群众，这个战争带有群众性。打是不得已的，现在又要停下来，就是要争取群众，解决这个群众性的问题，把民族和宗教的旗帜从他们手中拿过来。从我们方面说来，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民，使他们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我们说阶级斗争，是有充分根据的。打仗要有彝民参加，土地分给当地农民，我们并不搬走。过去的民族斗争，总是掠夺他们。我们是大量地援助，这能说是民族斗争吗？我们还有一条，就是少数民族自己管自己的事。这方面还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今天谈的就是解决这一条。所以桑吉悦希[1]说，我们就听他的，把我们都压倒了。

战争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上层，这个估计是对的，同时也教育了拉萨方面。将来金沙江以西藏区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附带一小条，准备不可避免地小部分地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一天打，也要有准备。但要争取不打。

李：怎样讲就怎样做，要讲政治信用。少数民族对我们不信任。讲了不办，哪怕是对上层人士讲的，都会被拿去欺骗群众。

毛：汉人有时对我们共产党也不信任，民主党派在我们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开始也不相信，后来我们登了报，才相信了。要做到叫人家相信，就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就是

---

[1] 桑吉悦希，又名天宝（1917—2008），四川马尔康人。当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甘孜藏族自治州州长。

“唱对台戏”，先党内后党外，叫他们说心里话。不说心里话的团结是假团结，那种团结是不巩固的。汉族干部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背着老包袱，自以为“老子不贪污，是来解放你们的”，这就不好取得他们的信任。

应该说明白民主改革是必要的，改革的决心是正确的。但是，我们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协商不够，听意见不够，准备不够，让步不够，灵活性不够。中央对这些事，也有责任。过去没有专门讨论过，今天讨论了四个多钟头，我们就主动了。

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在一起。

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的批语[1]

（1956年7月23日）

送李维汉同志酌处。

下面有些人不赞成这种变更。究竟是否应当变更，请审议酌复广东〈西〉[2]。

毛泽东

七月廿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广西省委统战部1956年7月12日关于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问题给中央统战部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毛泽东在5月下旬曾口头指示：暂时停止进行变更区一级自治区和建立民族乡的工作。为了便于执行，请给以明文指示。

[2]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6年8月草拟了中央关于更改区级和乡级民族自治区问题给广西省委的复电，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电报指出，对这一问题，各地少数民族中都反映了一些意见，应该分别不同情况，适当地加以处理。凡是可以改建、扩建或合并建立自治县的区级自治区，即可着手建立自治县；但对那些确实不能更改为自治县，而当地民族人民又不愿意更改为区公所或民族乡的少数民族区级自治区，决不可以强迫他们更改，应一律暂时停止更改，留待以后再说。至于改建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为民族乡的问题，如果当地少数民族不同意，也可以暂缓处理。

1956年7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接见出席全国供销合作社会议的代表。

1956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

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8月、9月）

八月上旬的批语[2]

一

经济数字太少（成就）。

苏共二十次。

国防。

华侨、工、青、妇。

---

[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在讨论、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写了不少批语，并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本篇收入的是他在多次过程稿上的批语和加写、改写的文字，这些文字用宋体排印。1956年9月15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这篇报告，报告的全文发表于同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

[2] 8月上旬的批语中，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6年8月8日印发的《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初稿）》的封面上，二至五写在政治报告初稿有关文字的旁边。

二

不能完全归咎下面，中央也要负一部责任。[1]

三

革命也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一些文化。[2]

四

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3]

---

[1]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55页上，这页上的内容主要是说在我们的一些同志中间，存在着只追求数量和曲解节约而不管质量的错误思想和极其有害的自满情绪，结果造成1955年有些工程的质量事故。

[2]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78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有些同志不愿意承认文化革命的重要性，他们根据中国革命胜利的老经验来否认提高文化的迫切需要。是的，当劳动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文化水平很低的时候，只要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逐步提高，并且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就能够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并且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在那个时候，认为必须首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进行这些斗争，那是荒谬的。但是在已经完成了这些斗争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而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

[3]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111页上讲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而特别需要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一段文字的旁边。

五

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1]

八月中旬的修改[2]

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在各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阶级还未消灭。在阶级消灭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还会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这就是我们今后还可能犯错误的社会原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思想消灭以后，社会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人们的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这又是人们永远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性的原因。我们必须正视这种种情况，而不是否认这种种情况，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和尽一切努力争取不犯极端严重的错误，而决不能认为已经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

---

[1] 这句话写在政治报告初稿第140页以下一段文字的旁边："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

[2] 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1956年8月14日送给他的政治报告稿中"党的领导"部分所作的修改。

八月二十一日的修改[1]

一

在不久以前，苏联共产党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总结了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许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政策方针，而且对于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斗争，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现在世界上民族的醒觉运动的高潮还在继续发展，它的规模来得非常广阔，它将继续取得重大的胜利。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势必受到亚非两洲的影响，而向前发展起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西方少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广大的后方，失掉了这个后方，帝国主义就将崩溃。现在这个后方的广大部分已经解放了，还有几个部分正在争取解放。

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双重打击之下，殖民主义即帝国主义这个十分丑恶的东西，已经日益显得陷于孤立，并且正在走进彻底瓦解的过程之中。不论是英法等欧洲旧的殖民帝国的

---

[1] 这里收入的是毛泽东审阅政治报告（修改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部分所作的13处比较集中的修改。在这两部分修改稿前面，有刘少奇1956年8月21日写的“此件即刻排印”“今日十二时前印好”等批语。

挣扎，还是美国建立新的殖民帝国的努力，都将受到彻底的失败。美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最凶恶的殖民帝国主义，这个殖民帝国的崩溃，将是人类的最后解放。总之，原来由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宰割世界广大地区的局面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局面已经永远地一去而不复还了。

三

在今后，只要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在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下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避免战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就确实出现了。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这一新形势，在抗美援朝时期已经出现，在最近苏伊士运河事件中更加鲜明地摆在人们的眼前，使得帝国主义国家不敢将局部战争扩大为世界战争，使得尖锐的国际争端不敢轻易动用武力。

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组成了一个侵略性的军事集团，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组织侵略性的军事集团，长期占领西德和日本，并且占领南朝鲜和我国的领土台湾，大规模地进行扩军备战，从而造成了世界的紧张局势，据说这是为了要“防御共产主义的侵略”。他们在口头上虽然大嚷反对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实际目的却不仅仅在这里，他们首先和主要的目的也不在这里。

这个集团是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但是因为以苏联为首的团结得很紧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碰倒的，要碰这个阵营的壁垒，势将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社会主义阵营按其本质和实际情况完全不需要向外侵略，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共产主义侵略”可以“防御”的。而他们需要防御的，却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以及他们本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

五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殖民主义阵地的缩小，符合于西方国家要求社会解放的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政党的利益，他们从这里找到了有力的同盟军。而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持久和平可能性的出现，则符合一切不愿意战争的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所以，就西方国家来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可以作为我们和平事业的同盟军。我们必须重视西方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发展。

六

帝国主义者还会要在许多地方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会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地方，决不会轻易放手。爆发战争的原素，即垄断资本，仍然存在，并且要起作用的。因此，斗争还会要经过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

七

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亚非两洲和拉丁美洲广泛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帝国主义国内和其他国家人民力量的支持，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从外部保卫了我们革命的胜利。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苏联的存在和声援。[1]

八

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同国民党成立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在以后，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党曾经屡次试探是否可以经过和平的道路实现中国的变革，并且在一九四六年，我们和几个民主党派一道，曾经和国民党达成了一个和平建国的协议。我们认为这种和平试探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作这种试探的活动中，我们党没有放弃警惕性，没有放弃自己的武装。我们的政策是：如果国民党愿意和平，并且愿意在和平的条件下进行社会政治改革，这对于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我们当然应当争取这样做。但是如果国民党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那末，我们也有充分的准备，能够动员人民的力量击败他们，使战争发动者自食其果。

历史所作的实际结论正是这样。战争的结果把被美帝国主义者

---

[1] 这一段话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修正稿）“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部分时，对中国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迅速胜利的第三条主要原因的修改。前两条主要原因是：一、战后的中国人民不愿意退回到原来受蹂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二、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够把中国人民引向胜利。

所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从中国的统治地位推落下去，旧中国的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被彻底打碎，革命根据地的人民民主专政于是变成了全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种革命的方法是战争，是革命方面用强力打倒反革命方面的强力。但在战争过程中间，也有几个地方经过和平谈判而获得解放，例如北京、绥远、长沙、昆明、四川西部、新疆以及西藏的大部分地方，就是这样。

在准备用战争夺取政权和在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两个问题上，都是有过争论的。一些人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条件，他们在紧要关头反对我们准备战争和实行用战争夺取政权。这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如果我们遵循这条路线，就没有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是一个关系到在一个六亿人口的国家内，当着时机成熟了的时候，是否应当夺取政权的大问题。

九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标志着革命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进行由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的和平改革的可能性，就真正出现了。这种革命的方法是和平的，即用教育说服的方法，而不用强力压制的方法。

十

如同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中国革命不可免地将在世界上引起种种的结果，这是历史的规律。一百多年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世

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没有不互相影响的。

十一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不要忘记祖国的一部分神圣领土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希望一切有爱国心的台湾军政人员，同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不管采用什么方法，我们相信，解放台湾的正义事业是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美帝国主义者企图长期占领台湾并从而继续威胁我国的活动，终归是要失败的。

十二

所谓特殊的规律，就是各国的差别点，就是说，各国无产阶级取得执政地位的具体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一党制或者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改造旧生产关系的方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过渡时期所需要的时间，等等，因为各国不同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会有所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任何一个不同民族中都是存在的，而在有一些民族中就可能有更多的存在。如果以为有了差别性，就可以否认共同性，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有了共同性，就可以否认差别性，也是错误的。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

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

十三

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必须争取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必须努力促进我国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必须继续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民主生活；必须继续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性；必须继续巩固同农民的兄弟联盟；必须继续巩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友爱；必须继续巩固和扩大一切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必须继续巩固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力量，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研究；最后，必须巩固和各国兄弟党的团结，争取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援助。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党在今后应当积极完成的任务。

八月二十四日的批语和修改[1]

一

退少奇同志：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这里已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二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前，虽然革命根据地包括了上亿的人口，因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要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并且在根据地内执行了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最后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部分时写的批语和作的比较集中的修改。这一部分的题目是毛泽东审阅时加拟的。

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们并不去破坏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不去破坏农民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所以这时候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三

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着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旧时代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专政。这样的专政，可以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以执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到了它执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就鲜明地显露出来了。

四

至于我国的社会性质，目前还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一方面，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因素存在着，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几年才能完全建成。它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

五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领导，在过去为了执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斗争中，在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机关中，早已建立

起来。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没有参加这种政权，但是已经有了一些党外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工作。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国家机关工作的不只是有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而且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团体都宣告他们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

六

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我们还应当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不管他们的批评有许多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但是能够引起注意问题的所在，使我们能够及时地解决这方面发生的问题。这也是监督的一个方面。这对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益无害的。

八月二十九日的批语和修改[1]

一

退少奇同志：

---

[1] 这里的一和二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和“国际支援”三部分时所写的批语。三和四是他审阅政治报告稿“国际支援”部分时加写的两段文字。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1]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二

退陆定一[2]同志：

此件[3]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增加了两个小段，请加斟酌。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三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

---

[1] 指政治报告稿“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部分。刘少奇1956年8月29日为送审“关于民族问题”部分的改写稿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3] 指政治报告稿“共产党”和“国际支援”两部分改稿。

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四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八月三十日的批语[1]

退少奇同志：

---

[1]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1956年8月30日关于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的各部分编排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上。

可以这样编排[1]，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2]。

毛泽东
卅日

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八月三十一日的批语和修改[3]

一

伯达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

---

[1] 刘少奇送给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各部分编排的顺序是："序言　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改造；四、社会主义建设，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关于华侨问题、关于我国的国防问题、关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问题、关于官僚主义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问题、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六、共产党；七、国际支援。"

[2] 政治报告稿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在修改过程中有多次变动。1956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其各部分的顺序为：开头部分；（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建设（下面有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五个小标题）；（四）国家的政治生活；（五）国际关系；（六）党的领导。

[3] 这里的一是毛泽东在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改造"部分时所写的批语；二、三是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时所写的批语和修改；四是关于压缩政治报告稿头几部分文字的批语。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

毛泽东

卅一日三时

二

即退胡乔木[1]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

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2]，请乔木注意。

毛泽东

卅一日五时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2] 这一页上讲到，“在第一个五年内，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因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只约占百分之五十八”。毛泽东在这一句话旁边写了批语：“还有百分之十的开支要作交代。”这句话后来修改为：“在第一个五年内，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在第一个五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除用于信贷基金、归还国内外债务、援外、总预备费等项共约占百分之十以外，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共约占百分之五十八。”

三

国家工业化的任务，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情况，要求我们建设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对内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对外也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发展充分有效的国际协作，并且只要有可能，就发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们往来的国家的通商贸易关系。

四

乔木同志：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六时

九月六日的批语和修改[1]

一

即送乔木同志：

---

[1] 这里的一、二是毛泽东审阅政治报告稿“社会主义建设”部分时所写的批语和修改；三是关于同周恩来联系修改政治报告的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毛泽东

九月六日二时

二

为了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巩固初办的合作社，党中央要求全国的合作社，在初办的几年内，在正常年景的情况下，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而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一般社员都可以逐年增加收入。为此，合作社不应当任意增加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公积金、公益金的数量；国家的税收也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比例上。

三

伯达同志：

周总理及洛甫[1]同志今日开始修改政治报告，请你与总理联系，或即与总理处合并举行。

毛泽东

九月六日七时

---

[1] 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九月七日的批语

一

周总理：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修改时请与陈伯达联系。

毛泽东

九月七日六时

二

乔木同志：

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

不知15页上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没有？

毛泽东

九月七日六时

三

伯达同志：

“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交我看过**，再送少奇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我们请总理同时修改，请你与他联系，于晚上九时以前索取他的改样，由你酌量采取。头三部分[1]，今日也要争取改好，我已〔告〕总理注意，改好后交你。

毛泽东

九月七日七时

四

周总理：

政治报告的头三部分，请你主持，于今日改好。形势部分，可以大修或重写。**但请于今晚十时前**，交伯达看一下，然后交我。“改造”“建设”两部分请你与富春[2]一道修改，请**需于今日修好**，**于晚上九时交伯达汇总**。以上各部分我和少奇看一下以后，**必需于八日上午交付翻译**。

---

[1] 指政治报告稿的“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三部分。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1]，亦须于九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八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
九月七日十时

五

乔木同志：

“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2]谈一下。

毛泽东
九月七日十时

九月八日的批语

一

伯达同志：

---

[1] 指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今日你和其他同志可以休息一天。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1]，加以修改，并请饬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八日八时

二

少奇同志：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饬人将改处准确地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毛泽东
九月八日九时

九月九日至十三日的批语

一

尚昆[2]同志：

---

[1] 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少奇同志修改处请交翻译注意照改。改印，暂可等一下，待各同〔志〕修改意见交来，汇总修改，并经少奇和我看过后，再行付印。

毛泽东
九月九日八时

二

伯达同志：

国家政治生活部分，读改时，请邀彭真、罗瑞卿、董老[1]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照前抄三份，分送刘、周[2]及我。

毛泽东
九月十日五时

三

少奇同志：

你和周总理的修改，都看了，都同意。我也改了一些，请看是否可以。如你同意这些修改，请令人将三个本子上的修改处抄在一个本子上，并**立即打清样**，**付翻译**。

---

[1] 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总理改本，用后请送伯达，因为里面有批语处，需请伯达再修改的。

此外，请将已定稿的各部分（冒〈帽〉子及一至四[1]）立即印成一本，于今日发给所有代表，每人一份，并附通知，请他们收到即看即加修改，于九月十二日下午送回中央。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四时半

四

少奇同志：

同意你的修改。我又修改了一些，另有两处是和乔木、伯达商量修改的，请酌定。周总理今晚没有时间看此件，他在改他自己的报告[2]。因此，请即将这一部分的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于九月十三日下午交中央。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二时半

---

[1] 指政治报告稿的开头部分和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二、社会主义改造，三、社会主义建设，四、国家的政治生活。

[2]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五

即送少奇同志：

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只是“国际关系”第六页，“以不同的方式（有的是在经济上，有的是在政治上）”这一些新增的字，可以不要，以求与周总理报告一致。这原〔是〕我提议的，现觉应该取消。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七时半

九月十四日的批语

一

即送少奇同志：

（一）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他字句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

（二）党的部分，本日十二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再改。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二时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二

伯达、乔木、家英同志：

（一）“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但是一定还会有一些修改。我们都要睡觉。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我们起床后再看改样好了。

（二）开幕词又作了一些修改，已去打清样送你们，请再加斟酌，于下午交我为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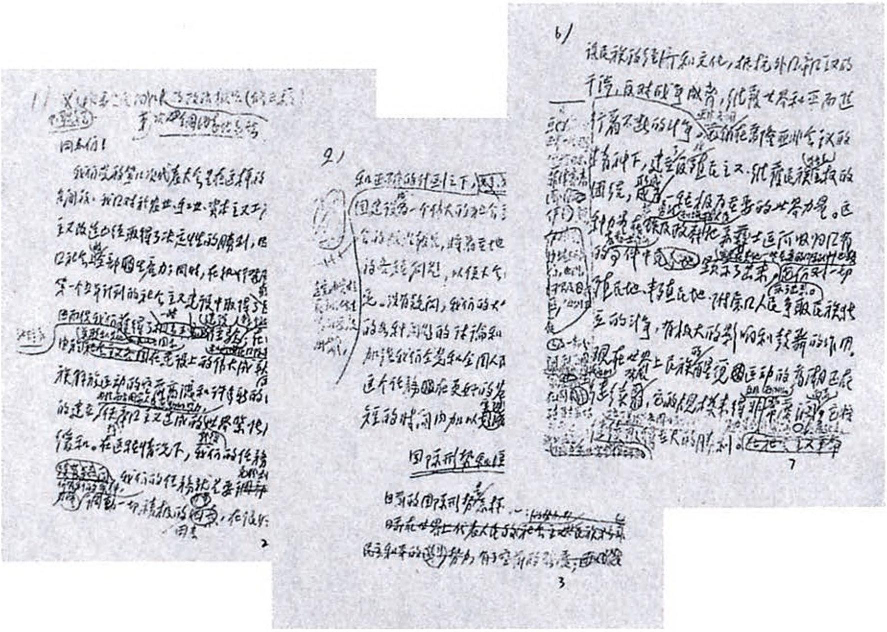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三

杨尚昆同志：

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陈伯达同志等的修改稿，要今天下午才能交出。据我看，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总理报告的翻译工作，亦请抓紧。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六时



1956年，在筹备中共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反复审阅并修改了八大政治报告。图为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部分）。

给曹云芳[1]的信

（1956年8月11日）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2]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

顺祝康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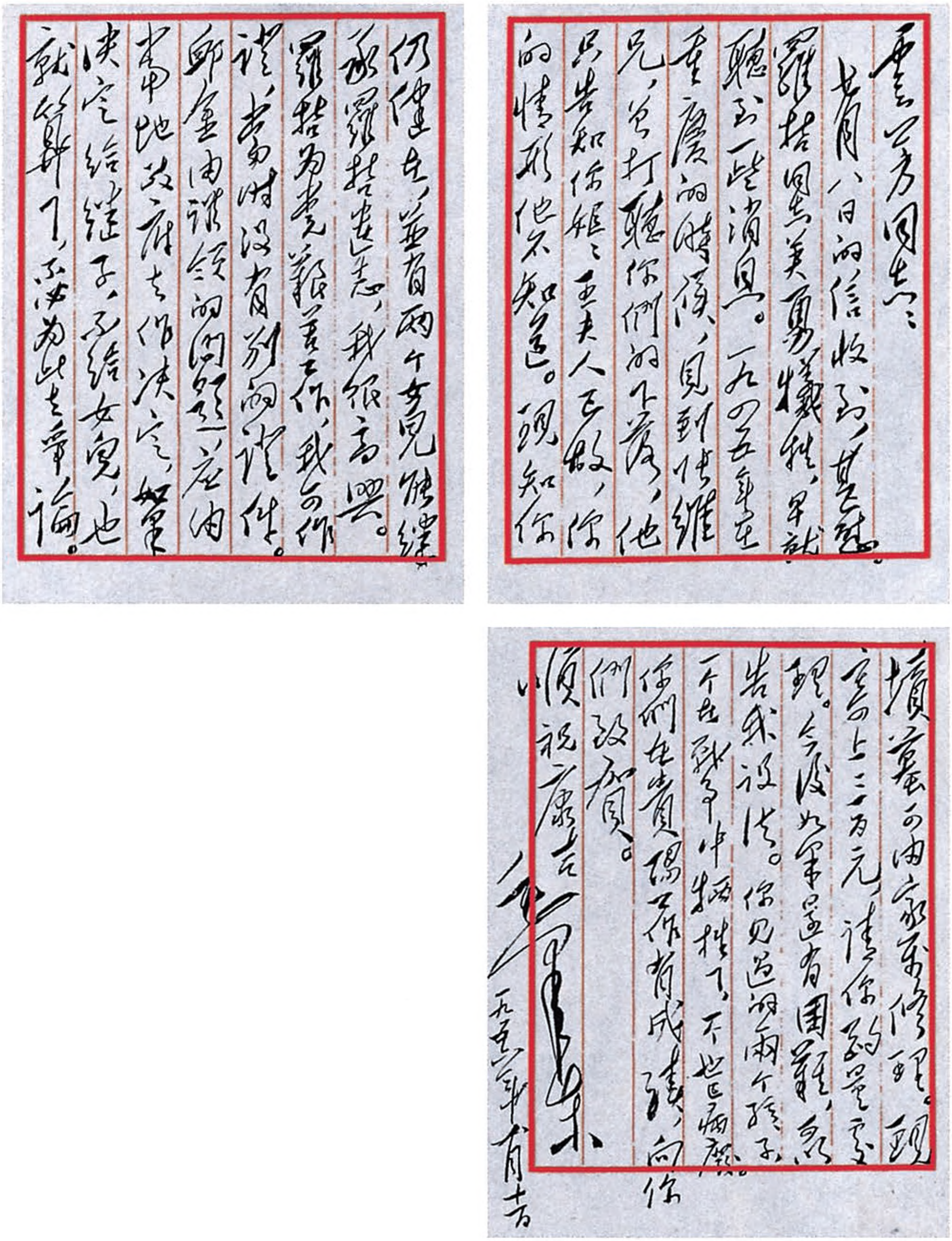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

[1] 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2] 罗哲，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你继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们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们健在，并有两个女儿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乡里由谁继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党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乡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总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问候。

顺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三

毛泽东致曹云芳信的手稿。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批语[1]

（1956年8月）

似应有几句话劝告英法政府和英法人民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应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

[1]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支持埃及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联合声明（初稿）上。后来，这个联合声明改为中国政府声明，发表于195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发表了有关声明。根据毛泽东的批语，中国政府的声明增加了有关劝告英法政府的一段话：“中国政府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主权行为是不容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的；有关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问题，是能够通过和平协商求得解决的。英国和法国在这次事件前，曾经采取过一些有利于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比较明智的行动。中国政府希望，英国和法国将本着这种精神来对待苏伊士运河的问题。任何武力威胁和武力干涉的行为将必然引起亚非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且对英国和法国来说，也决不会是有利的。”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6年8月18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听说已经谈开了，很好。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大家谈一谈，先作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等到大家想通了，各方面都安排好了，然后再做，可以少出乱子，最好是不出乱子。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转达了你的意见。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草字尚多，一时改不过来，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务宜忍耐。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

亚非国家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与独立[1]

（1956年8月21日）

我们非常欢迎你们来访问。我们两国是邻居，是朋友。我们很高兴，最近两国的关系接近了，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你们已经看到中国人民是多么高兴看见你们。

我们中国也很困难，过去一百多年受到外国的压迫，现在建国不久，在工业、文化等方面都还需要发展。我们需要朋友们的帮助。以后我们可以互相合作。

我们欢迎你们来中国访问，以便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小国的地位也应尊重。柬埔寨觉得它是小国，但我们把他们的代表团当作大国的使者来欢迎。我们对大国、小国都一律平等看待。

亚非国家现在都在争取独立。亚非会议召开后只不过一年多，万隆精神已发展得很快，影响很大。亚非会议团结了大小国家，人口有十五亿。自从埃及事件以来，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界线更加分明了，甚至日本在伦敦会议上也不站在殖民主义方面。日本在万隆会议时，还不很积极呢。殖民主义国家的人数很少，事实上根本不可怕。他们没有翅膀，飞不起来了。现在亚非国家都在争取独

---

[1] 这是毛泽东和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的一部分。

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连拉丁美洲也受到了影响。

我们许多亚非国家过去都受到外国的统治，现在获得独立后，要团结起来，保证和平和独立。看看我们的国家就知道，我们是不会侵略别人的，侵略别人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地方原来就有本地民族居住着，别的民族跑去做什么呢？过去的侵略者是日本，现在是美国。你们现在还有外国的基地。我们的台湾还被人侵占。

你们的政策、方针很好，对内采取和平、民主的方针，对外采取独立、友好的方针，这样就有可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你们的经济。你们现在国内不打仗了，讲和了。我们也是采取同样的政策，准备和蒋介石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你们做得很好，国内问题没有了，事情也就好办了。

现在我方在座的没有过去互相打过仗的人，但却有互相吵过架的人，因为他们是属于各个不同党派的。过去和我们打过仗的人，现在在北京也有工作做，各得其所。

我们很多方针都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我们一定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支持你们，这对双方都有利。

我们关心的是东方，而不是西方，因为东方有李承晚、蒋介石和吴庭艳。过去日本侵略我们，现在日本有很多人和我们来往。我们要搞好关系，我们也愿和美国搞好关系。和美国在板门店谈了两年，在日内瓦谈了一年，相信终有一天会谈好的，我们不着急。对台湾问题也是如此，我们不着急。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56年8月22日）

一

今天是七届七中全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次全会的任务就是为八大做准备，有三大工程：文件、选举、发言。

第一，文件问题。有五个文件要审查：一个是政治报告，一个是党章草案，一个是修改党章的报告，一个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一个是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现在就靠大家了，还有二十天的工夫，还来得及，请同志们发表议论、提出修改意见。

第二，关于八大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如果全体代表能够在八月三十号以前到齐，最好三十号开一次会，争取在一号、二号、三号、四号这四天内提出一个名单。想用这样的办法：先由各代表团提出一个名单（中央不提名单，由个人自己提，想提什么人就提什么人），然后中央集中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开始时的讲话；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对提交七届七中全会的几个文件作解释说明后的讲话。个别地方有删节。

长提出一个预选名单；再发下去，在各代表团进行讨论预选；再由政治局集中起来，制订一个向大会提出的正式的候选人名单。[1]

第三，发言问题。中央委员中有许多同志是要发言的，还有其他代表要发言，一千零二十六位代表，准备有八十人左右发言，（邓小平：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到一百个）看时间长短。总之，原则是

---

[1] 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对提交七届七中全会的几个文件作解释说明时，毛泽东插话说："这一次中央委员会人数，政治局也想过，是不是可以要二百、三百？后来考虑，扩大到那么大的范围，不好安排。所谓'三八式'的干部，牵连很多。选你没有选我，选我没有选他，问题很大。所以，原则还是'三八式'以前的。但是，代表们可能要突破'三八式'这个界限。所谓'三八式'，就是抗日时期涌现出来的干部。的确有大批优秀干部是'三八式'的，但是因为牵连太广，所以，'三八式'的一般不选。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说服他们，让他们等几年，这样也有好处，等几年并不坏，更成熟，更孚众望。现在还是让这些'三八式'以前的同志在中央委员会掌一下权。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准备定在一百五到一百七，包括这正式的和候补的。"在邓小平谈到上届中央委员中有几人被解除职务时，毛泽东说："政治局商量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应该向代表们建议，原有的中央委员都当选更为有利。一般同志，当选当然没有问题了，主要是过去犯了错误的几位领导同志。比如两条路线，今天在座的就有李立三路线的代表，还有王明路线的代表，要代表们选举他们，有些代表会有些抵触。我们觉得包括他们两位都当选比较有利。世界上的事情就那么怪，七次大会时，开头也是通不过，后来选上了。选上了，对于我们的事业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没有害，有利。因为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党内许多人，有同他们思想相同的人；还有党外的观感，觉得我们不轻易抛弃人，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我们还包容他们。是不是能说服代表们？当然，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如果代表们一定不选，你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希望能够说服大家，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在座的中央委员都要做这个工作，使上届的委员都当选。这回法国党的情况也是这样，上届的委员都当选了，我们也采取他们这个办法，看可以不可以。这是一点建议。"

不要太长，内容要精彩一点。会议时间，现在的安排是十三天，包括中间的休息，实际开会十二天，如果能够节省时间，最好实际开会十一天。时间不要太长，不要照延安时的七大那个办法。七大开得太长。（邓小平：也有一个好处，把日本开倒了。）当然也有好处。延安整风，把大家的思想搞一致，团结起来对付敌人，所以得到了胜利。

七次大会后，我们得到革命的胜利，并且开始了建设。这一次大会我们要得到建设的胜利，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胜利。[1]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可以团结和应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切同这个方向不相同的，我们就要批驳，就要反对。凡是不利于团结一切力量，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方针，我们就要批评。这是我们这次大会、也是我们党历来的旗帜。

我们的七大是团结党内、国内、国际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战争，打倒敌人，并且开始了建设的大会。那末，现在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初步的经验，还是这个方针，就是团结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得很紧。再就是全世界一切革命因素——民族运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

---

[1] 在邓小平说明几个文件时，毛泽东还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还是在建设，占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在讲建设。”

动，凡是能够孤立帝国主义的力量，我们都要团结起来。即便是帝国主义国家，只要它愿意和平，能够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都跟它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在内。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

我们这个国家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后，将来可以看得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过去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大的，在历史上起了它的作用。但是最近这一百多年衰落下来了，起的作用不大了，跟我们中华民族众多的人口、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应该建设一个完全新的大国，在世界上起更大的作用。

二

此外有几点，我还想趁此机会谈一下：

第一，关于常任代表制。我们这个党章草案上有个常任代表制。这是鉴于：过去十一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开会，其中有各种原因，我看原因之一就是惰性，没有别的理由。把代表大会看得非常神圣，非常严重，愈这样看就愈是难开。我们现在要改变那种惰性，要每年开，开成习惯，成为条件反射。那末，从前没有开是不是就完全不合法呢？那也不能说完全不合法，因为党章上说在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集一次，如果情况不许可，也可以推迟。我们少开了两次，实际上是少开了一次，因为三年战争那个时候很难开。我们与苏联不同，苏联是先占大城市，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城市。打三大战役的时候，人家都在打仗，不会来开会。一九四九年还在打仗。后头又有一个朝鲜战争，忙得要死。要讲理由，还可

以讲好几条。总而言之，战争那么忙是很难开会的。现在的情况改变了，完全可以经常开，有了常任代表，不要选举就好办了。如果我们用常任代表制（这上面写的是五年选一次），就可以每年开一次。草案上写的还灵活，如果有特别情况，这一年也可以不开。我看最好每年开一次，这要成为习惯。这样，就可以经常展开批评，民主生活可以发展。最近各省市开的代表大会一般讲开得很好，特点就是展开广泛的批评。不开这样的代表大会，许多意见就听不到。中央改为常任代表制，地方也要改为常任代表制，也是每年开。这是个制度问题，也是党章修改的一个重点。此外党章的修改还有很多内容。

第二，关于中央的组成。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工作的有利，中央准备设几层屏障，并设有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推举邓小平同志当总书记。因为他已经是总书记了。秘书长是什么呢？按照英文的写法，就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国人的脑筋里头则不同，秘书长就是秘书长，总书记那是另外一件事。那好吧，我们就设一个总书记吧。

中央书记处过去是五位同志，就是朱德同志、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少奇同志和我，还有一个候补书记彭真同志。再过去是两个候补书记，陈云同志和彭真同志，陈云同志补了弼时同志。这样几个同志开会时，有许多时候秘书长是参加的，还有别的同志间或参加。有许多时候参加会的同志很多，譬如讨论肃反问题，五人小组的负责人和公安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讨论别的一些问题，譬如《红楼梦》的问题周扬同志参加了，工业问题、商业问题、合作化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有关的同志都参加了。但是缺少一个工作机关，就是秘书处，现在的秘书处还不十分便利工作。因此，想在政

治局和它的常委会之下组织一个书记处。至于组成人员，正式、候补，现在还没有议。那末以后，这个书记处，就是管中央日常工作，如准备文件，审查工作的执行等。

中央政治局还设一个常委会，常委会相当于过去的书记处。因为估计到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可能不止十三个人，政治局委员、候补政治局委员合起来可能会到二十人多一点。我们认为组织一个小的常委会，一个小的“内阁”，是有必要的。

还有中央副主席、主席。过去只有中央主席，没有副主席，没有总书记，现在设总书记，又设副主席。副主席是设一个，还是设几个？这个问题也考虑过，也跟一些同志谈过，觉得还是几位比较好。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六亿人口，一千一百万党员，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总觉得孤单。准备向新的中央委员会建议，过去的几位书记都当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或者是从飞机上掉下来，或者是一个炸弹下来，把主席打死了，还有副主席；把一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三个副主席；把两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两个；把三个副主席打死了，还有一个；统统打死了，还有一个总书记。（笑声）总而言之是有备无患。

此外还有，在必要时要设名誉主席。这也是为了有备无患。有些人不赞成现在设，也可以考虑，设不设要看对党与国家是否有利。

第三，关于过去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中央委员会同它的政治局实行的这条路线是不是对的？可以有两种答复：一种是对的，一种是错的。为什么可以有两种答复？譬如，南斯拉夫的大使找了保加利亚的一位中央委员，还有保加利亚大使馆的几位，集合在他那里开会，说中国共产党是机会主义的党，斯大林不打倒，中国的社会主义建不成，因为在中国天安门上，还挂有斯大林的像，对斯大林

反得不彻底，此外还有许多。因此他断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不成功。那末，如果以后建设不成功，就是我们现在以及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还有印度党的一位老同志，他说我们的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总之，国际上怀疑我们这条路线的人并不很少。曾经有一个时期，有相当一些人认为我们党是个机会主义的党，说世界上的铁托不只一个，有两个，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中国的铁托就是我。我是铁托，你们也有点嫌疑呀!(笑声)还有，有相当的人说我们是民族主义的党，就是资产阶级的党，不是无产阶级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空气什么时候才变的呢？先是签订中苏条约的时候，特别是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一来，世界局势变化了，中国的党也好，政府也好，都不是亲美的了。抗美还亲美？亲美就不抗美了。不要因为国内批评我们的人比较少，就以为我们这条路线是对的。国际社会各方面承认我们党有个历史过程，有个认识过程。我们党内一千一百万同志是不是完全赞成我们这条路线呢？不见得。一千一百万党员，你查得那么清楚，一个也不反对？不是那样的。从遵义会议开始，到延安整风，到现在，虽然我们还要在党内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国内应该采取发展巩固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际上应该跟苏联很好地合作，跟人民民主国家很好地合作，跟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跟各国共产党很好地合作，跟民族解放运动建立同盟，但是并不等于说对我们这条路线就没有怀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要在预备会议中间谈一谈呢？我看谈一谈比较好。因为开代表大会总是要讲过去或者错或者对，这并不妨碍批评错误。中央这十一年的工作是有错误的，不能说没有错误，可以举出相当的一些错误。但是说到路线，我这么建议，也许能够得到在座的同志们的同意，应该肯定我们的路线是对

的，不是机会主义路线，我们是在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条路线。我们的路线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批评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路线之后建立的一条路线。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整风，通过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后产生的路线，就是七次大会所规定的路线。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我们有两条总路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你要说民主革命的总路线是错误的，也可以讲，比如托派就这样批评我们，总说我们是农民党。这个“农民党”的说法也传得很远，美国国务院从前特别欣赏这个说法，现在他们又说我们不是了。我说我们这些人有一个知己，他也是中国人，就是“蒋委员长”，蒋介石。此人比较懂得我们，他在国际上从来就是替我们辩护的，他说：对共产党你切记不要相信，它是一个非常王八蛋的党，就是要搞共产，绝不会跟你们妥协。你们不要幻想把中国从苏联方面分化出来，搞个南斯拉夫的铁托，这不行的。我们没有出薪水，他控制的报纸刊物，在香港、台湾纷纷给我们作这个宣传，作这个解释工作。（笑声）同时美国人也给我们作解释工作，美国人是从我们把蒋介石推翻之后替我们作解释工作的，也不要我们出薪水。英国人有时候解释，有时候就不解释，他说：还是有把中国同苏联分化的可能，中国有出铁托的可能，你看吧，他们的土改也不一样，对资本家的办法也不一样。美国一骂，蒋介石一骂，还不足以说明我们中国不是南斯拉夫吗？美国一骂，大家就懂得中国共产党大概是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了，不然为什么美国这么骂呢？虽然如此，这个问题现在是不是就完全终结了呢？还没有终结。在国际上还要看，你们究竟怎么搞的呀？比如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许多外国人就是不了解，中国同志也有不了解的。中国同志中“左”

派多得很。原来十月革命的那个方式深入人心，我们党内跟资本家接触的很多人又鉴于“三反”“五反”，以为资产阶级那么坏，这个看法也深入人心。现在这几个月有所改变，因为进行教育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三反”“五反”是最激烈的斗争，以后也还有说服、批评等各种文明的斗争，是可以不需要经过另外的强力的办法来改造、来没收的。这不是机会主义，这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运用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肯定，这两次大会之间的中央是执行了七次大会的路线的，而七次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可不可以这样说，请同志们讨论一下。

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

（1956年8月24日）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2]，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的谈话。

[2] 抗美援朝，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入侵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9月15日它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

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1]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2]，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

---

[1]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1889年7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2] 江亢虎（1883—1954），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1913年，该党被解散。1924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1927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他的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1]。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

---

[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1]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

---

[1] 桐城派，是古文中的一个流派，主张“义理”“考据”“辞章”合而为一，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由于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把他们和他们这一派的人称为桐城派。这一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

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1]。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2]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

---

[1]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考虑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由于资本家阶级一般地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设想没有能行得通。

[2]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1]，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2]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

---

[1]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

[2] 唐明皇，即唐玄宗李隆基（685—762），公元712年至756年在位。

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1]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2]，也要《阿Q正传》[3]。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4]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

[1]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他设立的六门课程（即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

[2] 《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创作的长篇小说。

[3] 《阿Q正传》，鲁迅小说的代表作。

[4] 《毁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创作的长篇小说。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1]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2]。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

[1] 西太后，即叶赫那拉氏（1835—1908），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1861年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因住在西宫，所以又称西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同时又盲目地排外。1898年，她镇压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运动。

[2] 隋朝的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据《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唐朝的十部乐是：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其中，龟兹、康国、安国、疏勒、高昌都属于西域，高丽即朝鲜，天竺即印度。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

[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个中国近代有关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命题，是由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提出的。他在《劝学篇·设学》中说：“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作为维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和京剧演员在一起。

在欢迎老挝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8月25日）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举杯，向老挝国王致意，祝他身体健康，向梭发那·富马首相致意，祝他身体健康，并且向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全体团员表示祝贺，向老挝王国全体人民表示祝贺。

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和老挝是近邻，两国在历史上是友好的，近代两国间的关系虽然曾经有过中断，但是，现在在新的基础上、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开始恢复历史上的友好关系。毛泽东主席对两国友好关系的恢复和五项原则的胜利表示祝贺。

毛泽东主席在致词以后，同梭发那·富马首相和卡代·敦·萨索里特[1]等一起干杯。

---

[1] 卡代·敦·萨索里特，当时任老挝王国副首相。

对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稿的批语

（1956年8月27日）

退邓小平[1]同志。

此件[2]看了一遍，觉得大体可用。作了一些小的修改[3]，请你们酌定。第23页上批了一点建议修改的意见[4]，请考虑。许多句子太长，不好读。我在第23〈32〉页的一段中试增了一些标点，请考虑全文都增加一些标点。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2] 指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

[3]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的修改稿所作的修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在报告的第一部分第一段，“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之后，加写了“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十四个字。另一处是在报告最后第四段分析我们党的胜利的原因时，在“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前面，加写了“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这两处修改意见，在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都采纳了。

[4]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修改稿）第23页论述了党内民主并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七大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讨论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接着，报告稿列举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边写了两条意见：一条是“1955年3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应在此处提出”，另一条是“没有说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粮食统购统销会议，也没有说1949年的扩大的二中会议”。邓小平1956年9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采纳了毛泽东的这两条建议，加写了这四次会议。

同兄弟国家团结一致，同一切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

（1956年8月29日）

一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点之后，又必须肯定另一点，即应当继续努力同苏联和一切兄弟国家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同世界上一切兄弟党、人民革命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取得他们的同情和援助。如果我们不肯定这一点，那也是完全错误的。

二

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对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稿时加写的两段文字。

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1956年8月）

陈、陆、胡、王稼祥、李维汉、胡绳、田家英[2]。

a. 大会宗旨：总结经验，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有用〔因〕素，外宾四十九国[3]，为建设社会主义为〈而〉斗争。

b. 除了选举以外，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团结那与自己有过斗

---

[1] 这个讲话提纲，写在印发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安排、会议规则等六个文件的目录上。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1956年8月30日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已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2] 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都参加了中共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

[3] 指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实际上，后来参加八大的共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代表和观察员。

争的人[1]。

七大选票〈举〉经验是成成〈功〉的。

时间安排是充裕的。

资产阶级。

c. 150—170[2]。

上届中委。

三八线[3]。

d. **36小时发言时间**[4]是充裕的。

前门饭店。

---

[1] 这里指要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说："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又说："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说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

[2]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额。1956年9月27日，八大正式选举出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共170人。

[3] "三八线"，这里指考虑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以"三八式"干部划线问题，即1938年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干部一般不进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

[4]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草案）安排的9个下午约36小时的大会发言时间。

对彭德怀[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56年8月30日）

一

退彭德怀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作了一点小的增减修改，请斟酌。

毛泽东

八月卅日晨

文字通畅，可以不再缩减。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2] 本篇一写在彭德怀1956年8月29日为送审关于军事工作的发言的修正稿给毛泽东的信上。彭德怀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这个发言，原题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而斗争》，195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时改题为《胜利完成军事工作的光荣任务》。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彭德怀发言稿所作的两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虽然由于我军现代化建设为时不久，各军种、兵种还未能达到完全现代化的程度，但是已经达到我国空前未有的规模。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军现代化水平必将进一步获得提高。在这里，我要表示对于我们伟大盟邦苏联的感谢，因为苏联在供应军事装备和帮助我们建设军事工业方面，作了完全兄弟般的努力。

三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问题我们也应当研究，以便达到知己又知彼的目的。他们的技术科学，只要是对于我们有用的，我们也应当学习。

对李立三[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1956年8月30日）

退李立三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2]。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方面的修改，请加酌定。

毛泽东
八月卅日

---

[1] 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

[2] 指李立三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1956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

（1956年8月30日）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大会的目的和宗旨。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3]以来的经验，团结全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关于总结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不能够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些。

我们党是一个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过去有些外国同志怀疑：究竟你们搞些什么事情？有许多人不了解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们的整风运动。现在，我看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说一般是了解了。当然，还会有些人不了解。在国内，甚至在党内，也还会有些人不了解，认为七大以来的路线不见得那么正确。但是，事实摆在面前，我们进行了两个革命：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夺取全国政权；一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七大以来的十一年，我们的成绩是很大的，全国承认，全世界承认，甚至连外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两个革命证明，从七大到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这在世界上是个新鲜事情。对这个革命，国际资产阶级不管三七二十一，骂的多，总是说不好。俄国资产阶级是个反革命阶级，那个时候，国家资本主义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坏，拿起枪来打。俄国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干掉他。这就惹火了各国资产阶级，他们就骂人。我们这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舒服一点，觉得还有些好处。现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1]不让美国的新闻记者到中国来，实际上就

---

[1]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是承认我们的政策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这里是一塌糊涂，他们就会放那些人来，横直是写骂人文章。他们就是怕写出来的文章不专门骂人，还讲一点好话，那个事情就不好办。

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领导我们革命事业的核心是我们的党。这次大会总结经验，首先要使全党更加团结。我们党，到六月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对这一千多万党员，要进行广大的教育工作、说服工作、团结工作，使他们在人民中间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单有党还不行，党是一个核心，它必须要有群众。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过去，在团结全党和团结党外人士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毛病。我们要在这次大会上和大会以后进行宣传教育，把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进。

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这次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来参加我们的大会，这是很好的事。过去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没有两个革命的胜利，没有建设的成绩，现在不同了。外国同志对我们是比较尊重的。

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

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而且应该用“伟大的”这几个字。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建设事业。六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虽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个国家，但是超过两千万吨钢的国家只有几个。所以，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

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第二点，关于继承党的传统。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我们看到的批评斯大林错误的许多文章，就是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或者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我们这次大会的文件所规定的东西，所讲的东西，要尽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国的实际。同时，要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批评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观点，批评这个主观主义，打击这个主观主义。这个任务，早几年我们就开始提出来了。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过去，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受主观主义的害时间很长，受了很大的惩罚，根据地差不多丧失干净，革命力量丧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觉悟。经过延安整风，着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

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宗派主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我们历来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谁要你去学习落后经验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连苏联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观主义。苏联人自己都说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我们也有部分的东

西是不好的，我们自己就要丢掉，更不要别国来学这些坏事。但是，坏事也算一种经验，也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我们说不服的人，蒋介石一教，就说得服了。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教呢？他是用机关枪、大炮、飞机来教。还有帝国主义这个教员，它教育了我们六亿人民。一百多年来，几个帝国主义强国压迫我们，教育了我们。所以，坏事有个教育作用，有个借鉴作用。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作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我这里是讲打得不对的，斗争得不对的。如果那些人后头改变了态度，承认打你打错了，封你为机会主义王国的国王是不妥的，只要有这一条就行了。如果个别的人还不承认，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比如，现在我们党里头，有许多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人，他虽然没有跟你打过架，交过手，但是因为他思想上还没有入党，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势必不很妥当，有些缺点，或者做出一些坏事。对这一部分人，要团结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

一为看，二为帮。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动，看你怎么样，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该你遭殃。这种态度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不是积极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不但要看，还应该帮。

第三点，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刚才小平[1]同志讲，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额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届中委是七十七人，这次加一倍多一点，这样恐怕比较妥当。等几年，比如等五年，那个时候再来扩大，恐怕是比较有利。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这个人数究竟妥当不妥当，究竟多少为好，请同志们考虑。

应该肯定，上届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没有辜负七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在十一年间，他们正确地领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正确地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的东西作斗争，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克服了各种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设的因素。他们是有成绩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错误的同志。这是讲中央委员会的整体。至于个别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计。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一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

---

[1] 小平，即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

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1]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这样的事情不干，让我们走王明路线、立三路线，不干。他们搞的党内关系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对犯过错误的，或者跟他们作过斗

---

[1] 二中全会，指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讨论了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规定了全国胜利以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争的，骂过他们是机会主义的，他们都不要。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代表小资产阶级里头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群众广大的国家。小资产阶级中间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动摇的。比如富裕中农，大家看到，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高兴起来可以发狂，悲观起来可以垂头丧气。他们的眼睛经常看到的是他们那一点小财产，无非是一两匹牲口呀，一辆大车呀，十几亩地呀。他们患得患失，生怕失掉这些东西。这种人跟贫农不同。中国的贫农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们党，拿成分来说，基本上是工人和贫农组成的，即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组成的。半无产阶级也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它的坚定性要比中农好得多。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们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适合。他们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范畴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农村中生产资料比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农。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党员，前怕龙后怕虎，经常动摇，主观主义最多，宗派主义不少。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他们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明火执仗，敲锣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纲领来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纲领，李立三也有政治纲领。当然，陈独秀也有

政治纲领，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党外搞反党活动。张国焘搞阴谋，搞分裂，跑到国民党那里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问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有它的社会原因。这种社会原因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遇到重要关头就要动摇。这种动摇就是机会主义。所谓机会主义，就是这里有利就干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章程，没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比如王明就是如此，从前“左”得不得了，后头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是不是选举了他们，犯错误的人得到奖励了呢？犯错误的人当了中央委员，那我们大家一齐犯错误好了，横直有当中央委员的机会，会不会这样呢？也不会这样。你看，我们七十几个中央委员，他们并不故意犯几个错误以便再当中央委员。没有当中央委员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会不会就学王明、李立三，也搞两条路线，变成四条路线，以便争取当中央委员呢？不会，没有人这样，而是鉴于他们的错误，自己更谨慎一些。

还有，从前有所谓“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种话，那末，选举他们，党内会不会发生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这样的问题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线错误，要选他们当中央委员，结果就要正确的人或者犯小错误的人空出两个位置来，让他们登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从这一

点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确的或者犯小错误的人要把位置让给那个犯大错误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不公道，这里头没有什么公道。如果这样来比，应该承认，是所谓正确不如错误，小错误不如大错误。但是，从另外一点看，就不是这样。他们犯路线错误是全国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选举他们的道理就是他们出了名。你有什么办法呀，他们是出了名的，你那个不犯错误的和犯小错误的名声没有他们大。在我们这个有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是旗帜。选举他们，许多人就会这么说：共产党还是等待他们的，宁可让出两个位置来给他们，以便他们好改正错误。他们改不改是另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很小，只是他们两个人。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党内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动摇分子，知识分子中间有许多这样动摇的人，他们要看这个榜样。他们看到这两面旗帜还在，他们就舒服了，他们就睡得着觉了，他们就高兴了。你把这两面旗帜一倒，他们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问题，他们改或者不改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党内成百万容易动摇的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分，特别是知识分子，看我们对王明、李立三是怎样一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土地改革中间对待富农一样，我们不动富农，中农就安心。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在外国对犯错误的人采取我们这个态度的很少，可以说没有。

我们这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从今天算起，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好的。我们相信，这次大会是可以开好的，代表们的水平是能够保证这次大会开好的。但是要兢兢业业，大家努力。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和批语[1]

（1956年8月、9月）

一

第三十七条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二

即退小平[2]同志：

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我只在党章第三条觉得应当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审阅邓小平1956年8月5日报送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三十七条条文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修改稿的批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起草工作。

添三个字[1]，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日廿二时

在第三条加了三个字。

---

[1] 《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第三条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第一款是：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毛泽东在其中的“实际问题”前面加上“理论和”三个字。

对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草案的批语[1]

（1956年8月、9月）

---

[1] 本篇一写在1956年8月印的中共八大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第三次草稿上。本篇二是对第三次草稿中以下两段话的批语，这两段话是："在增强国防力量和提高行政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地缩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开支，而增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支出，以加速国家的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应当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58%左右，提高到60%—70%左右。"后来，建议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加写了以下的话："而用于国防和行政费用的支出，应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32%左右，下降为20%左右；其他部分用于国家的物资储备、信贷资金、归还内外债款和总预备费等。"本篇三写在1956年8月23日印的这一建议草案中所列的关于1962年主要重工业产品的计划产量及其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957年计划产量的百分比的数字表旁边，后来的草案修改稿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语，分别列出了1957年计划产量、1952年实际产量和历史上最高年产量的绝对数，删去了原有的百分比数字。本篇四写在1956年9月7日印的建议的草案修改稿上。毛泽东在此稿上所作的一些修改，主要是在文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根据各民族人民的意愿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有步骤地进行，以适应当地经济、文化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一句中的"各民族人民"后面，加写了"和领袖人物"五个字。

一

要一个说明理由的文件，供内部用。

二

400—450亿（军），130—140亿（政）＝530—590＝2350亿的22%，比现32%，减10%；其他支出：（1）还外债，（2）援外，（3）物资贮备，（4）总预备费，（5）信贷资金，共计10%左右。

三

要把历史上最高年产量，1952年产量，1957年产量都列出绝对数字来。

四

周总理：

有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五时

毛泽东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1]

（1956年9月）

姓名	性别	出生年	民族	籍贯	入党时间	现任职务
毛泽东	男	1893	汉	湖南，湘潭县	1920	党中央主席 国家主席

---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使出席“八大”的每个代表的籍贯、出生年、入党时间、现任职务等情况做到准确无误，于1956年9月2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候补代表登记表”，请各人自己填写。本篇收入的这张登记表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是毛泽东填写的。

关于修改和播发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的批语[1]

（1956年9月5日、12日）

一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你看一下，并立即印发各中央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并附上一个通知，请他们于九月八日以前于原件上批上修改意见，退还中央。意见收到后均交邓老[4]负责修改，于九月十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代拟稿的批语；二是写在最后改定的这一指示稿上的批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1956年9月4日送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代拟稿。陈正人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明，这个指示在起草过程中作过多次修改，现在送审的代拟稿，是根据前两天陈云主持召开的农业生产协作委员会会议的意见修改的，邓子恢、廖鲁言、王观澜、刘建勋等同志还没看，他们可能还有某些修改意见，但不会有大的修改。同日，邓子恢向毛泽东报送了一份进一步修改的指示稿。

[4] 邓老，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前退还中央，准备于九月十二日发表。

毛泽东

九月五日六时

此件我看了一遍，大体可用。拟在征集修改后，再看一遍。同时请总理提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十二日以前）。

二

此件用。退周总理。

即刻送新华社，立即广播，**明十三日**必须见报。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对陈绍禹[1]不能参加党的八大的电报的批语

（1956年9月10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可以印发各代表。

毛泽东

九月十日

---

[1] 陈绍禹，即王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正在苏联养病。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3] 指陈绍禹1956年9月8日给刘少奇并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自八月七日接到中央盼我在健康条件许可下能出席八大电示后，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曾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病况仍不许可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乃不得不以深沉的愧歉心情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专电请假。"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1]

（1956年9月10日）

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2]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一共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间，我们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过大的损失，吃过很多苦头，死了多少人，牺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牺牲了多少党员和干部。犯错误，受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 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我们党内的人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但是作出一个结论来也还会犯错误。所以，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有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1]，有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还有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2]，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

---

[1] 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2]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我想，我们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么多弯曲道路，主观主义这个东西可以更多地肃清，宗派主义也可以更少一点。我们这个党，在最近若干年以来，就中央来说，就高级干部来说，是个宗派主义比较少的党，也是主观主义比较少的党。你说主观主义有那么多，你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革命搞胜利了，现在搞建设又有了成

绩。你说宗派主义有那么多，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陷于孤立？在革命时期没有陷于孤立，在建设时期也没有陷于孤立。可见我们的主观主义不是那么多，宗派主义也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有主观主义，还是有宗派主义，包括中央发布的文件中间也有。例如一长制[1]，中央曾经批转过某些地区的经验，认为可以试行。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经验，就不能下一个断语，说一长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断定一长制不好，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好。

现在讲党内的关系。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刚才陈云[2]同志说了，几位同志也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这个名单里头，工人少，上海工人差不多没有，天津工人也没有，武汉、重庆、广州、沈阳、鞍山、大连、青岛的工人也没有，北京工人也没有。那好，你这个中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中央？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现在开八大，全国搞工业化建设，无产阶级成分还这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在农村先发展先胜利。许多同志在根据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区奋斗，有的长期坐班房。这些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得

---

[1] 一长制，是当时苏联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生产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赋予各个企业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做出裁决的充分权力。

[2]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成熟了，有一部分便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所以现在，也许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头来。刚才陈云同志讲了，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了，那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要起变化。所以，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不能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中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你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帝国主义呀？为什么会搞社会主义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们的党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关于一百七十个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犯得也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这一点陈云同志讲了，别

的同志也讲了，问题是这个名单如果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一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我们取得革命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要搞个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

我还想起一个理由，应该再加以解释。别人的例子很多，我想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

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

一点。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些人去考试，

一个名叫孙山的人去看了榜回来，别人问他自己的儿子考上没有，他说“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意思是说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的儿子在我孙山后面，没有考取。这就是所谓“名落孙山”的典故。我说今天没有列上名单的同志，即名落孙山的同志，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当然这是说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也许是孙山以内的人将来起很大作用。这有两种可能。至于将来几十年以后怎么样，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我们可以不去管他。我们这个名单管不了。我们这个名单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纪。同志们，我并不是许愿，也不是说你们现在不选上更好一些，是说要斟酌，要各方面平衡。至于哪个起作用大一点，哪个起作用小一点，这里头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刚才讲的名单中上海工人、天津工人、大城市的工人很少，这就是一种偶然性。必然性是经过偶然性来表现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是在乡村里头先搞的，乡村里搞革命的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你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看山上确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家都上了山，有这么多根据地嘛！

刚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团的负责同志商量，觉得可以增加少数人，如果通不过，也可以减少几个人。七大就是这样，有两位同志，几次在候选名单上提了他们，最后就是没有选上。这次也可能有个别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因此，代表们在预选时，这张一百七十人的名单里头可以调换某些人，可以减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过这个总人数。为了开票的时候好计算，不混在一起，可以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上你认为可以增加的人选，增加几个也可以，增加十几个也可以，你爱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提供一些情况让中央考虑正式名

单里头是否要增加若干同志。这样，中央可以根据得票数的多少，根据各方面情况，斟酌出一个正式的候选人名单，并且分出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出最后确定的名额。比如不是一百七十人，而是一百七十几，或者还是一百七十，或者如果划掉的多，就再减少几个。这些都请同志们考虑。

对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稿的批语

（1956年9月13日）

一

即送周总理：

看了一遍，很好。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九时半

二

周总理：

你的报告[1]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醒，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

---

[1] 指周恩来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

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1]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十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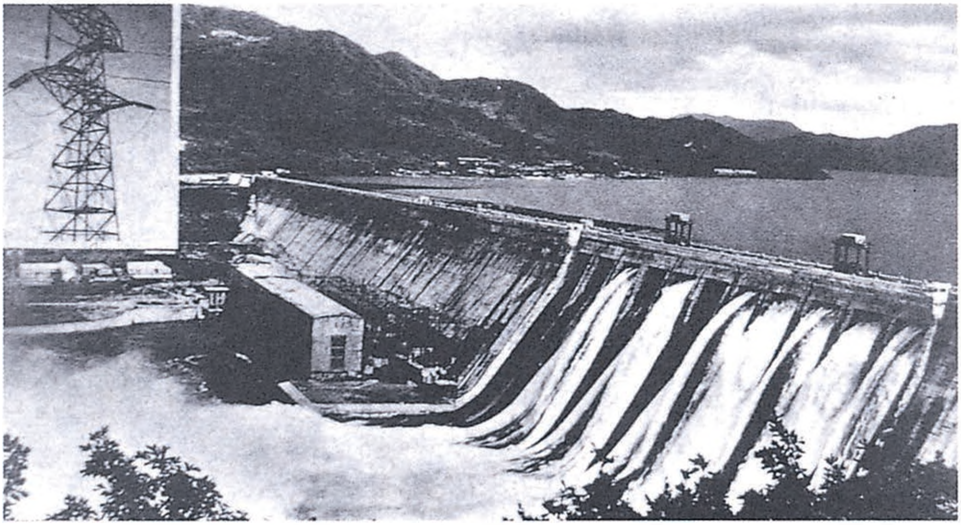
三

在这里，对苏联和各国专家对我国帮助的功绩提一二句为好。[2]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改稿）中说："不论是在我们恢复国民经济的时期，或者是在我们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我国都在各方面获得了伟大的苏联的巨大的和友好的援助，同时，也获得了各兄弟国家的援助。这种援助，帮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以比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写在这一段文字的旁边。



在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各方面建设都在飞速发展，新中国显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图为1956年建成的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站——丰满水电站。

1956年9月，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试制成功。图为飞机制造厂的装配车间。

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1]

（1956年9月13日）

我们为中央八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中央全会今天是最后一次了，大会的准备工作到今天可以说大体上搞好了。

关于政治报告，不晓得同志们看了最后一部分没有？那部分还要修改，今天晚上大体上可以修改好。我还没有看，你们看了没有？可以不可以？还过得去吗？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民主的。你的道理对，就写进文件，完全是讲道理，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报告恐怕有四万九千字的样子，由一百五十一页减到八十三页。

大会的第二个文件是关于党章和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这个报告已经根据代表们的提议加以修改了。

第三个文件是恩来同志作的经济报告和建议[2]。大家看了没有？我看过了。搞了两个稿子，前一个比较长，现在这个是十六条，简明扼要，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样长远的计划，许多事情要做到，支票不可开得太多，采取谨慎的态度比较好，年度计划再去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2] 指将由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按照情况发展。报告我看写得也不坏，就是头一部分文字上要重新修改一下，后面写得很好。

这是关于文件方面。

再一个就是选举。现在已经预选[1]过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个别同志还有意见，要减的只有个别同志，要增的也只有几个同志。这样，问题就好办了。七大那次的选举，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也是有增有减的。主席团也可以根据这个情况提出新的意见。明天、后天、大后天是没有工夫了，有两天报告，但是到选举还有一个多礼拜，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分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个别同志的增减还可以调整。选举问题交给主席团。将来由主席团的常委跟各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来商量这件事情。我们这一千多同志，有意见，有议论。这些意见、议论很值得注意。但是整个说，大家是顾大局的。这是好现象。

关于主席团，上次谈过，这里有一个名单，六十三个人。这个名单是经过斟酌的，原来就是中央委员的在这一个名单里占绝大多数，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的有十六个，各方面的人都有。文教方面有周扬、杨秀峰。民族方面有刘格平、乌兰夫。乌兰夫是老中央委员了，刘格平是做全国的民族工作的。再提别的人，牵扯就大了，所以还是提刘格平同志，他的资格也比较老。军队方面，就是黄克诚、谭政。各代表团的团长都在内，这样好商量事情。地区的是各大区领导，还有几位中央的部长。女同志有几位了，除了三位中央

---

[1] 预选，指八大正式召开前，对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推选。办法是：先由各代表团在与会代表个人提名基础上选举，产生各团候选人名单，然后集中起来，由政治局同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商定一个统一的预选名单，交各代表团预选，最后根据预选结果，由政治局向大会提出正式的候选人名单。

委员以外，还有钱瑛。（邓小平同志插话：现在加了一个帅孟奇。）此外，还有工、青。总之，主席团只调换一个人，以帅孟奇同志调换王鹤寿同志，其他都照样。这样一个名单你们看行不行？请你们在这两天有机会的时候向代表们传达一下。

大会增加几位副秘书长，有王稼祥同志、刘宁一同志、张际春同志。因为要发布文件，搞新闻、宣传。还有什么人？（邓小平同志插话：还有谭政。）谭政同志是军队的。秘书长我看还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插话：不要秘书长。）不要秘书长怎么行呀！要不要秘书长？（全场齐声说：要！）要秘书长毫无问题。

再一个问题是发言。发言稿，大家尽量短一些，杂文形式的。发言内容，有人专讲我们的生产质量不好，有人讲一讲主观主义，有人讲一讲宗派主义。大汉族主义是宗派主义，大国主义也是宗派主义，什么老子打天下，人家坐天下，这是宗派主义。对少数民族包办代替，有职无权，对资本家也是以“三反”“五反”时那样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些都不好。我们要多团结一些人在自己的周围。就是对反革命分子，我们要实行劳动改造，要搞人道主义。搞人道主义干什么呢？还不是要把他们改造为有用之人！要以教育为主，不要以赚钱为主，要使他们吃饱，赔一点钱也可以。我看不要去赚钱，在劳改犯人身上赚钱、捞一把，来进行积累，那就势必达不到改造犯人的目的。过去我们对俘虏是这种态度，对日本人也是这种态度，何况中国人呢！这样的政策是可以改造他们的，使他们变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这是讲改造反革命。那么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资产阶级，对少数民族的剥削者、上层分子、贵族、头人，对这些人要多做一些工作，对好人及其他一些劳动出身的人，要使他们有职有权，真正是去帮他们的忙，不是去代替他们。我们党，你

说是宗派主义比较少，也是真的；你说是宗派主义比较多，也是真的。

现在的中心问题还是发言问题，请同志们注意。今天到会的同志，有中央委员，有各个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有各省的省委书记，有直辖市委、自治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你们要与各方面的代表联系。现在要注意的方向变了，不是报告，不是文件，基本上也不是选举了，而是发言。当然，贯穿大会的骨干是文件，没有几个好的报告，开一次大会干什么呢？全党、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要看我们发表什么样的报告。还有决议，这些都等会议开幕以后再去解决。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颂扬，登到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剩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有第三种写法，也可以有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也能有比较高的水平，那么，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报告是有相当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农业四十条、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还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大家通了，以后步伐比较整齐，就

团结统一了。

同志们有什么意见?

政治报告稿中“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贯地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句，以前都是讲“镇压和宽大”，是我改成“惩办”的。“镇压”那个事情吓人，不如改成“惩办”，以后这个提法想改一下。以前都是“镇压和宽大相结合”，人家一想，镇压就是杀人；以后杀人杀得极少了，这方面的问题就不多了，问题就是一个惩办。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就是不要完全搞“惩办主义”。

“杀人”的问题，在政治局曾经谈过，开人代会的时候谈过两次，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党中央委员会认为，除极少数的罪犯由于罪大恶极，造成人民的公愤，不能不处死刑以外，对于其余一切罪犯都应当不处死刑，并且应当在他们服徒刑的期间给以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凡属需要处死刑的案件，应当一律归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之后的“以求慎重”可以不要。“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达到完全废除死刑的目的”这一句话，这一个支票是没有时限的，“逐步地达到”，也没有讲哪一年，总有一天会完全废除死刑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要废除死刑的。这就是现在的新政策。资本主义改造了，进一步公私合营了，农业社会化了，这样一来，反革命的阵地就大为缩小，阶级力量的对比大有变化，就是我们这一方面的势力更大了，剥削阶级那一方面的势力更小了，反革命的势力更小了，因此我们就更不怕，政权更巩固了。我们问了一些地方的同志，又问了一些群众，他们都感觉现在的政策的中心不是杀人，不需要杀那么多人。杀戒一开，势必造成恐怖。过去我们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为生产力被那些人束缚着。所谓旧社会，就是旧生产关

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那些反革命是旧生产关系的最集中的代表，如果不把他们杀掉一部分，群众就不能起来，不能得到解放。解放战争，解放运动，任务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有没有杀错的呢？也有，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也有，但是从根本上应该说，用死刑的方法破坏这一小部分人，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样，反革命就一年一年少了。极少数罪大恶极、造成人民公愤的，有一个乡的人民公愤，有一个区的人民公愤，有一县的人民公愤，有一国的人民公愤，在那种情形之下，就必须处死刑。我们保留了这一条就不怕。对于其余一些罪犯都不应该处死刑，并且给以人道主义的待遇。至于“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就是想改一改“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提法，可不可以？可以的。我们国家根本上不杀人了，再杀人由中央批准，这个事情在我们中央的范围内还没有谈过，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范围谈过。唐朝在全盛时候，一年只处十几个死刑，都是中央判决。宋朝在天下不乱的时候，处死刑的也极少，而且都是中央判决，皇帝批准。你们看怎么样，这样是不是有毛病?

中国历史上，要么就你灭掉我，要么就我灭掉你，没有第三种办法，没有一个妥协的方法。我们采取的道路是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把从前当权的、犯过错误的和被自己推翻的人都消灭掉。在延安时我们立了这么一条，一个不杀，免得造成一种恐怖，杀错了就不可挽救。对于反革命采取一种完全保存的办法，我们已经惩办了他，他也不会为乱。至于犯思想错误，犯政治错误，那又当别论。这就不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了，位置就要安稳得多。资产阶级的办法就是这样：我上台你就下台，但是我也不杀你。我们跟民主党派的关系叫做统一战线，长期共存，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所有的民主党派，既来之则安之，各得其所。党内也是这样，就是大家都

有一口饭吃，位置多安一点，来代替资产阶级的办法。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办法：民主党和共和党，工党和保守党，谁都不灭掉谁，但是通过竞选把你打下去；以后你再来竞选，人民赞成你，你又上台。我们现在不能用资产阶级这个方法，而是用我们现在的这么一种办法。不论反革命，敌我，是非，凡是能保存的都保存，都给工作，但是要把是非弄清楚。这就是第三种办法。这个办法在我们这里，从七大到现在已经实行十一年了，还比较好，没有造成什么恐怖。并且，问题都是事先商量好再去作决议，不是突然袭击，不搞强加于人。所以我们这次会开了半个月，所有代表都到了，什么预选，什么修改文件，提意见，国外认为是新闻。

关于文件[1]，今天就基本通过，同志们还可以看，还有时间。明天一天（十四号），十五号一天，十六号就不能再改了，十六号晚上八点钟以前新华社就要广播，十七号就登报（十五号作报告，十六号只登新闻不登报告）。因此还有两天半的时间可以提意见，请用书面交给文书处。今天基本通过好不好？这个修改委托书记处和起草委员会负责。

我在这里还要谈一下关于设副主席和总书记的问题。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

---

[1] 指将由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多几个人好。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末，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

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邓小平同志：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

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6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

（1956年9月15日）

接受埃及大使拉加卜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0

（1956年9月17日）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 …………………………………12

（1956年9月17日）

给黄炎培的信 …………………………………………………………15

（1956年9月17日）

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 ……………………………………………16

（1956年9月18日）

对周扬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17

（1956年9月21日）

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 ………………24

（1956年9月24日、27日）

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28

（1956年9月、12月）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37

（1956年9月24日）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 ………………………………………………48

（1956年9月25日）

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尼协定签订的电报的复电 …………54
（1956年9月25日）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的命令 …………55
（1956年9月26日）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宴会上的讲话 …………56
（1956年9月29日）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 …………58
（1956年9月30日）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宴会上的讲话 …………73
（1956年10月2日）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76
（1956年10月5日）

为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 …………78
（1956年10月）

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80
（1956年10月12日）

给戴毓本的信 …………85
（1956年10月13日）

对金日成关于志愿军赴朝参战六周年贺电的复电 …………93
（1956年10月27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94
（1956年11月6日）

关于合作社养猪问题的批语 …………96
（1956年11月）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名 …………98
（1956年11月11日）

纪念孙中山先生……103
（1956年11月12日）
关于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的批语……105
（1956年11月13日）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106
（1956年11月13日）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109
（1956年11月15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10
（1956年11月15日）
对关于目前沿海军事斗争的几项规定的批语和修改……129
（1956年11月21日）
关于土特产品收购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批语……131
（1956年11月24日）
对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缩编等问题的批语……133
（1956年11月25日）
在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134
（1956年11月30日）
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册》题词……135
（1956年11月）
为“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会”题名……136
（1956年11月）
对《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的批语……137
（1956年12月）
对邓子恢关于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39
（1956年12月3日）

给黄炎培的信……………………………………………………………140
（1956年12月4日）
给周世钊的信……………………………………………………………144
（1956年12月5日）
给贺果的信………………………………………………………………146
（1956年12月5日）
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148
（1956年12月7日）
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154
（1956年12月8日）
对浙江执行侨务政策情况报道的批语…………………………………164
（1956年12月8日）
给杨开智的信……………………………………………………………165
（1956年12月13日）
给毛春秀的信……………………………………………………………167
（1956年12月13日）
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批语……………………………168
（1956年12月14日）
对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稿的修改和批语……………………………169
（1956年12月16日）
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的批语…………171
（1956年12月16日）
给黄炎培的信……………………………………………………………172
（1956年12月16日）
给杨开英的信……………………………………………………………173
（1956年12月16日）

对邓子恢关于撤区并乡试验情况报告的批语……………………176
（1956年12月21日）
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的批语……………………………………177
（1956年12月21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问题的批语……………………………178
（1956年12月24日）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79
（1956年12月24日）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181
（1956年12月24日）
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的批语……………………………182
（1956年12月26日）
给周世钊的信……………………………………………………184
（1956年12月29日）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86
（1956年12月）
和周恩来应对联…………………………………………………189
（1956年）
为《农村工作通讯》杂志题名……………………………………190
（1956年）
为光荣亭题写亭名………………………………………………191
（1956年）
为清华大学题名…………………………………………………192
（1956年）
为鲁迅迁葬墓碑题词……………………………………………193
（1956年）

关于登载高士文章的批语……197
（1957年1月3日）
印发江苏省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200
（1957年1月4日）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意见……201
（1957年1月5日）
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203
（1957年1月5日）
邀请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信……204
（1957年1月6日）
印发《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的批语……205
（1957年1月7日）
给臧克家等的信……206
（1957年1月12日）
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208
（1957年）
对撤销公安军的批语……210
（1957年1月22日）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211
（1957年1月）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242
（1957年1月）
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题词……251
（1957年1月）
在公安部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报告上的批语……253
（1957年2月2日）

对邓子恢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254
（1957年2月6日）
给黄炎培的信 ……………………………………………………255
（1957年2月11日）
对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257
（1957年2月15日）
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259
（1957年2月15日）
在颐年堂的讲话……………………………………………………260
（1957年2月16日）
对日本战犯榊原秀夫亲属来信的批语……………………………270
（1957年2月21日）
关于调查河北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批语…………271
（1957年2月24日）
对彭德怀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的报告的批语…………………272
（1957年2月25日）
对军委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73
（1957年2月25日）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 …………………………274
（1957年2月）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281
（1957年2月27日）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320
（1957年3月1日）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322
（1957年3月1日）

关于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问题的批语……………………334
（1957年3月4日、4月6日）
复班禅额尔德尼电………………………………………………336
（1957年3月6日）
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348
（1957年3月6日）
关于同意甘孜藏族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语…………360
（1957年3月7日）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361
（1957年3月7日）
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365
（1957年3月8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376
（1957年3月8日）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379
（1957年3月10日）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385
（1957年3月12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88
（1957年3月12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的批语………403
（1957年3月16日）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405
（1957年3月17日）

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408
（1957年3月17日）
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423
（1957年3月18日）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442
（1957年3月19日）
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446
（1957年3月20日）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468
（1957年3月20日）
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478
（1957年3月、9月）
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480
（1957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490
（1957年4月3日）
欢迎和感谢波兰政府代表团访华的讲话……………………………492
（1957年4月8日、9日）
对整风运动决定草案的批语和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稿…494
（1957年4月）
关于请胡乔木阅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的批语………496
（1957年4月）
给张维暨夫人的信………………………………………………………497
（1957年4月15日）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498
（1957年4月、5月）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956年9月15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热烈鼓掌）

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热烈鼓掌）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热烈鼓掌）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热烈鼓掌）我们各方面

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我们的工作是做得正确的，但是也犯过一些错误。在这次大会上，需要把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加以总结，使那些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而从那些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就国内的条件来说，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并且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进行伟大的建设工作，在我们的面前，摆着极为繁重的任务。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做。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在我们继续加强全党的团结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继续加强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国际范围内，我们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热烈鼓掌）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热烈鼓掌）现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是更加有利了。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由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不断努力，国际的局势已经趋向和缓。（鼓掌）为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热烈鼓掌）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坚决支持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完全合法的行动，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埃及主权和对于埃及实行武装干涉的企图。（热烈鼓掌）我们必须使帝国主义的制造紧张局势和准备战争的阴谋彻底破产。（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许多年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在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比起整风运动以前，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鼓掌）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给苏联共产党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学习，再学习[1]。苏联的同志们，苏联的人民，按照列宁的指示做了。他

---

[1] 参见列宁《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再学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页）又见列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为了革新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6页）

们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极其灿烂的成就。（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以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鼓掌）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鼓掌）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鼓掌）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热烈鼓掌）

同志们，我和大家都相信：已经得到解放的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又有伟大的盟国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鼓掌）我们又有世界上一切兄弟党的支持，（鼓掌）又有世界上一切同情者的支持，（鼓掌）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热烈鼓掌）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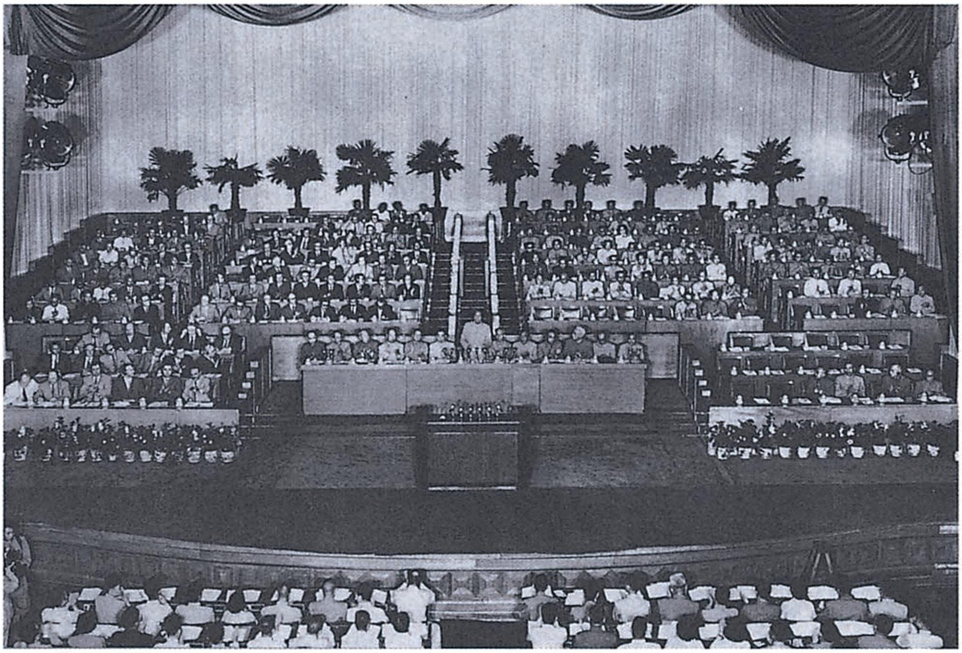
今天在座的有五十几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他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和我们有一种共同的语言。（鼓掌）他们走了很长的路程来到我国，以崇高的友谊参加我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这对于我们是一个

很大的鼓舞和支持。（热烈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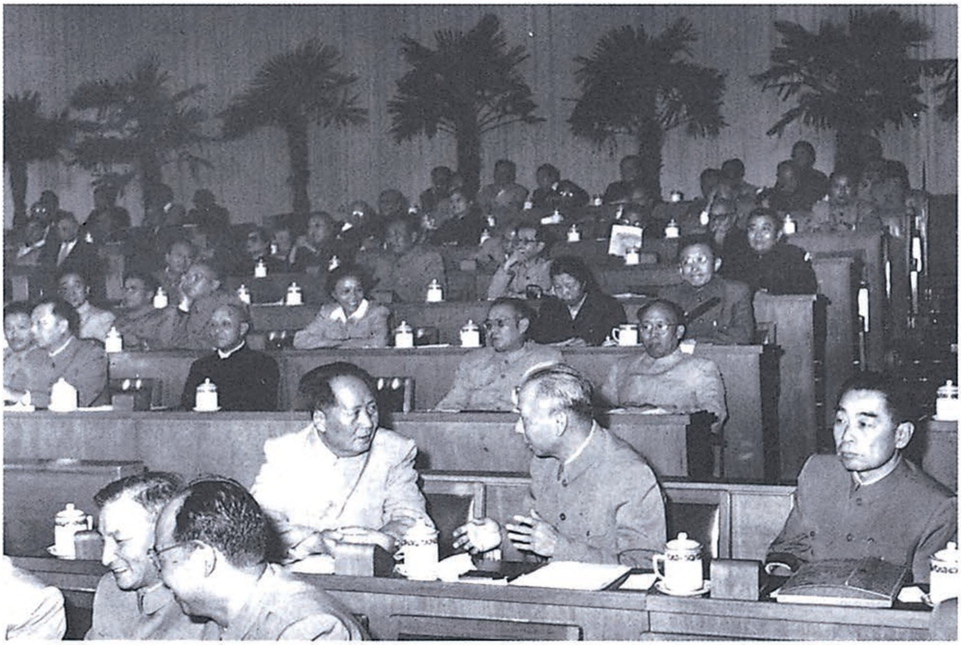
今天在座的还有我们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热烈鼓掌）他们是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亲密的朋友。（鼓掌）他们一向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鼓掌）我们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起立，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图为出席中共八大的代表步入会场。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



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1956年9月，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在中共八大会议上。

1956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共八大上投票。

1956年9月，毛泽东和人大代表在一起。

接受埃及大使拉加卜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6年9月17日）

大使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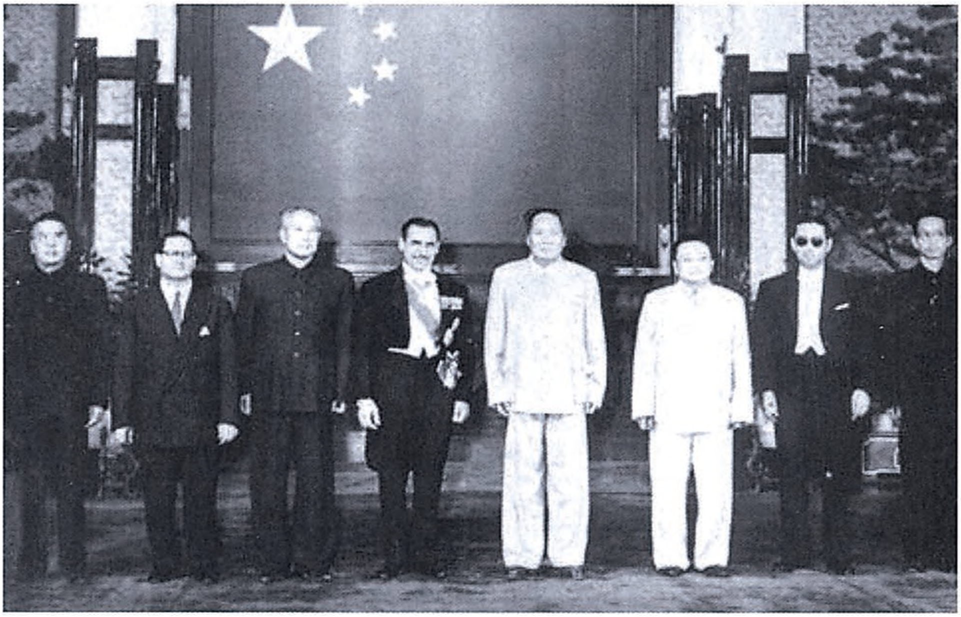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被任命为第一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感谢阁下对我本人的友好祝贺。我愿意趁此机会通过贵大使向纳赛尔总统表达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的敬意。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并且相信在这一斗争中埃及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埃两国都是世界上文化最古老的国家。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诚如阁下所指出的，有着悠久的历史。殖民主义者曾经阻碍过中埃传统关系的发展，但是赢得了各自的民族独立的中埃人民，又建立起了新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珍贵同埃及人民的这种友好合作关系，并且相信，这种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作为亚非两个爱好和平国家的中国和埃及间的友好合作，无疑地将对维护和巩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作出重大的贡献。

大使先生，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埃及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贵大使为发展中埃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将会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充分协助。

谨祝贵国国家繁荣，人民兴旺，并祝纳赛尔总统阁下健康！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接受埃及共和国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递交国书。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和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等合影。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1]

（1956年9月17日）

我们一看到埃及人就觉得高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支持埃及。全世界最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埃及，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反对埃及，另外有一部分国家采取中立。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这次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你们还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统一的。

你们的国王做了坏事，所以被人民推翻了，但他还是个埃及人。现在全埃及人民、全阿拉伯人民和全亚非人民都团结起来了，他也应该讲点爱国主义，不要发表不利于埃及的言论，不要做帝国

---

[1] 这是毛泽东和埃及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的谈话。

主义的走狗，你们应该对他做点工作。中国地主的土地土改时都被没收了，但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们也赞成打美国人。

埃及团结了八千万阿拉伯人民，组成了一条坚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线。在这条战线上，埃及是处在最前哨。中国是在另一条反帝战线的最前哨。有了你们，我们就好办了。如果你们垮台，我们这里也不好办。在埃及的外国企业很多，在中东还有很多的外国石油企业，要一下子把这些企业全部收回是不可能的，要一步步地去做。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这次和“五国委员会”的会谈，他就用很和平的声调把他们送回去了。

你在中国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可以去，完全没有限制。你如果要看陆军、空军、海军、工厂、学校、农村等，都可以看。你可以随便找人谈话，可以直接找工人、农民等谈话。你可以多拜会些民主党派的领袖，他们也很支持埃及，你去拜会，他们会很高兴的。你也可以拜会我们各部门的负责人，需要什么资料，可以向他们要。我们外交部会给你一切帮助和便利。你可以研究一下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在北京，现在埃及人是最受欢迎的。

苏联会全力帮助埃及的。中国也愿意尽力帮助埃及，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

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末现在可以记帐，以后再说，或者过了一百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1956年9月17日，毛泽东和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亲切交谈。

给黄炎培的信

（1956年9月17日）

任之先生：

画册[1]、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知。[2]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

[1] 画册，指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由黄炎培代呈毛泽东。黄炎培1956年9月9日在为送画册和诗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八大’快要召开，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流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八十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二十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最近工商界接受种种新的措施，特别是五厘定息，大、中、小皆大欢喜。——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

[2]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于同年9月19日复信毛泽东，告知张叔通生活穷困，江苏省文史馆每月给他生活费50元。黄炎培认为，如果政府给他照顾，他会接受的。同年12月16日，毛泽东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500元。

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1]

（1956年9月18日）

中国政府一向鼓励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令，不要从事政治活动，并且鼓励他们把他们的人力和财力为所在国的利益服务。当然，也可能有些华侨做了些不利于印尼利益的事，但是这和中国政府是毫无关系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应该很好地合作，对他们进行教育。对华侨包括华侨商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加以保护，但是对那些不法的、欺骗和敲诈人民的奸商则应该加以惩罚。我们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就曾经对奸商严厉地惩罚过。我们现在和新加坡还没有外交关系，如果将来建立了关系，我们也可以对当地的华侨进行些教育工作。

---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佐·维约普拉诺托谈话的一部分。

对周扬[1]在中共八大发言稿的批语

（1956年9月21日）

即退周扬同志：

此件[2]看过，可用。只是引证我的话觉得多了一点，减少一些为好。

毛泽东

九月廿一日五时

---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

[2] 指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在1956年9月2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时，题为《让文学艺术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1956年9月，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应邀列席中共八大。图为毛泽东在欢迎参加中共八大的各兄弟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

1956年9月，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友人。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

1956年9月，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政治局委员雅克·杜克罗向毛泽东赠送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

1956年9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团长、中央委员约凡·维塞林诺夫向毛泽东赠送礼物。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侯赛因·沙希德·苏拉瓦底，并观赏他赠送的礼品。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1956年9月，毛泽东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

1956年9月，毛泽东在宴会上。

关于讨论和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的批语

（1956年9月24日、27日）

一

尚昆[1]同志：

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案〈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2]同志，以便修改。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五时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的秘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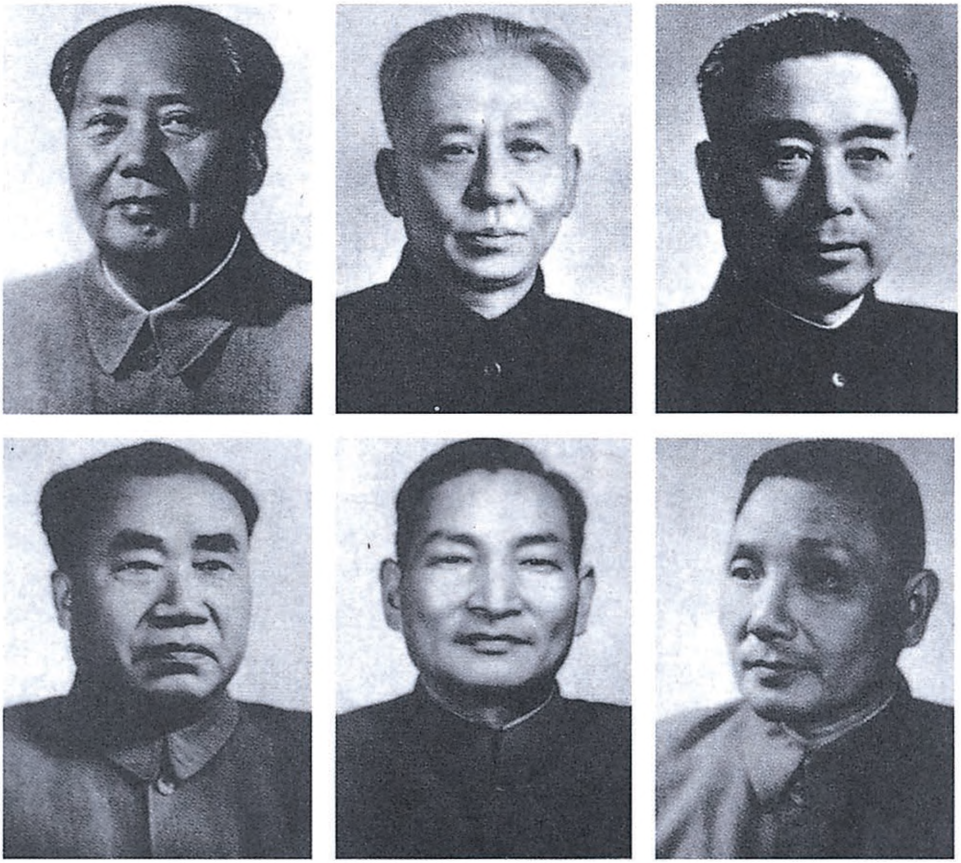
即送胡乔木同志：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二时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闭幕。图为大会主席台。左起：张闻天、董必武、彭真、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陈云、朱德、林伯渠、彭德怀、邓小平。

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胜利闭幕，毛泽东步出会场时，受到大会代表和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



1956年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

和蒙古人民革命党代表团的谈话和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1956年9月、12月）

一　谈话记录

时间：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参加人：蒙方：达姆巴[1]（团长）、曾德、奥其尔巴特（大使）、哈什冈白、策热布桑巴

中方：王稼祥[2]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几天你们很累了吧？

达姆巴（以下简称达）：不，不累，我们很舒服。

毛：蒙古同志是好同志，好朋友。你们是友好的国家，友好的党！

（接着主席就问候泽登巴尔[3]同志）

达：他很好，他跟桑布[4]同志向您问候呢！

---

[1] 达姆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3] 泽登巴尔，当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4] 桑布，当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

毛：谢谢！请你们替我向他们问候！

达：谢谢！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援助。

毛：不，不要这样！中国是个大国，这是我们的义务，是你们的权利。我经常听到你们这样讲，同时经常看到文件上也这样写，我觉得心里不舒服。我们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因为三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曾剥削过你们、压迫过你们，他们曾留下了不少的债务，因此，今天我们要还这些债务。过去我国国内少数民族也同样受过压迫，我们对他们也要还债，这是我们的义务。

我国藏族人口的一百二十万人直接属于拉萨，其他一百万人口分布于青海、云南、四川、甘肃等地。蒙古的宗教情况怎样？喇嘛多不多？总人口多少？

达：过去很多，现在非常少了。在革命初期，有些喇嘛干过坏事情，将他们处理了。有一些参加了劳动以及其他工作。现在还有极少数的喇嘛。我国总人口八十万。

毛：蒙古工农业的发展情况如何？

达：革命前我们是个很落后的国家，在革命的年代里，由于苏联的热情帮助，我国人民在工业方面、牧畜业方面以及文化教育方面都有了很好的进展。

毛：蒙古农业也很发展了吧？

达：今年刚开始发展农业。

毛：水够不够？

达：在我国，水是很缺乏的。

毛：雨量如何？

达：平均年雨量是一百二十至三百毫米（其中森林地带是三百毫米，而沙漠地区是一百二十毫米）。

毛：打井怎样?

达：沙漠地区打井困难。

毛：那么，建设一些蓄水库，储下水来，以供使用，这样不可以吗?

达：在沙漠地带很困难，水储不下，很快渗入地下。

毛：你们境内有哪些大河流?

达：色楞河、鄂嫩河、克鲁伦河等。

毛：向西北方向流去的是哪一条河?

达：鄂嫩河、克鲁伦河。

毛：蒙古历史、文化的发源地是哪里?

达：鄂嫩河、克鲁伦河一带。

毛：你们不可以在这些河流上建筑一些水闸、水库、蓄洪沟等工程吗?

达：人民和我们都迫切要求那样做，但力量达不到。

毛：现在我们也有些困难。但几年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帮助你们。

达：谢谢。

毛：今年河北闹水灾，三千万亩农田遭到了水祸。中国的水利工作，至今还没有能够很大发展，再有十年之久可能解决。不过，我们在这方面对你们的援助，用不了等十年之久。

达：去年你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援助，派了一万三千工人和技术员，这在工业和其他建设方面起了推动作用。并且今年还给了无偿的一亿六千万卢布。因此，蒙古老百姓非常欢欣鼓舞。

毛：不，不，上边已经说过，这是我们的义务。那些数目是太少了，你们一提，我就觉得惭愧。

达：集二线[1]对我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毛：蒙古的农业现在怎样？

达：现在较过去有了一些发展，但由于人力缺乏，很大一块土地至今还未开垦。

毛：这样不好，应该开荒。你们定居了吗？

达：定居对我国农牧业发展，有很大好处，但现在还未定居下来。

毛：这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要逐步地办到，因为一个地方的草，是有限制的。我国有的省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定居下来，还可以种菜，种庄稼，这样人口才能增加。

达：对！（指曾德说）他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任。您的这些建议，对我国将来的计划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毛：发展农业、牧畜业，首先要发展水利工作，这里包括水闸、蓄水库、水沟等工程。另一方面，牧草是很重要的，对你们来讲，“草就是油”。因此，你们应当培植牧草，应当采用深耕的方法，这样牧草就能长得又高又多，然后定居下来就有条件了。

达：是的！我们重视您的这些谈话。

毛：你们可以早一些开始水利工程的准备工作。这方面包括地质勘察工作、人力、物力等等，而财力还不算那么重要，最重要、最要紧的是人力。

你们应该先着手进行最迫切需要的工作。例如，由乌兰巴托到西部国境，这一段路的中间，你们修了一条近代化的大马路，但很少用它。这是不很需要的。

---

[1] 集二线，指内蒙古自治区的集宁至二连浩特的铁路。这条铁路北出国境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相接。

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只有七年之久。在这以前，我们两国人民不大来往。虽然我国革命成功已有三十五年，但由于我国过去很落后，所以在这三十五年内未能很好地发展起来（虽然有成绩）。因此我国工农业可以说是没有很好地发展。

毛：你们应该自给自足。

达：现在许多日用品都不能自己生产。

毛：这是不好的，应该扩大这方面的工业。

达：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影响了这一方面的发展。

毛：你们还有多少军队？

达：将近一师。

毛：这已够用了。现在，你们周围没有敌人。

达：现在我们正在将这支部队的复员人员培养成为司机、建筑工人等。

毛：这是很好的。这是生产军！那么文字怎样呢？

达：现在都用新（俄）文字，成年人都已识字了。

毛：很好，内蒙古也正在这样做。

达：据说是那样。在文字方面，我们也可以帮助内蒙古。

毛：对，很需要这样。你们跟内蒙古有直接联系吗？

达：现在没有直接联系呢！只是通过中央取得联系。

毛：不需要直接联系吗？

达：需要直接联系，但未办正式手续。

毛：你们可以办的。你们可以到内蒙古建立自己的领事馆。这样做，用不了什么费用！你们从自己的大使馆抽出几个人来，就可以了。苏联也这样办的。在天津、上海、沈阳、广州等地都有他们的领事馆。

不过，上述这些事，是我个人的说法，也许不正确，因为我未与政府、外交部负责人商量；同样，你们也是未与自己的政府商量过。但我认为，这些事情是能够实现的。

达：谢谢！历史上的“债务”，我们连想也没想过。我们只是感谢你们。

毛：不！要还债的，这是我们在追还祖先们的债务。

毛：你们蒙古族是第三个民族。第一个民族是匈奴。它占了新疆、黄河北部的土地，有的已渡过了黄河。第二个民族是突厥，它占领了阿美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埃及、希腊等十几个民族，建立了大帝国。但这一民族后来被蒙古族打败了。因此，蒙古是第三个民族。我们至今还没有搞清你们的祖先的来源。是不是在西伯利亚？

奥其尔巴特：噢！据说是那样！

毛：西伯利亚那里曾有一个高车族，据说他们都坐在高大的车子上。高车族是不是你们的祖先？

达：老人们都说，古代的祖先搬家时都用很高的车拉上所有的东西。

毛：你们有没有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

达：关于十二世纪以前的记载，现在还没有，十三世纪以后的有些记载。这一方面的工作苏联帮助着我们。十三世纪以前的蒙古历史，跟中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将来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还要跟你们一起进行研究。

毛：很好，今天我们谈了许多有关历史的事情。

达：我们的前途很宽广，因为有苏联和中国的兄弟般的援助。今后，我们更要好好努力工作。

毛：应该好好发展。

达：我再一次表达我们内心的感激，你们对我们的援助是兄弟般的伟大的援助。我们不能把它当做“债务”来看待。

毛：但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同任何国家都以平等共处，过去我们压迫了你们，因此现在要向你们认错。不仅对你们这样，而且对国内少数民族也是这样的。过去，我们压迫了他们，因此，如果我们现在不认错，就不能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实现民族平等。这是有根据的，这不是漂亮话。是不是？过去我们压迫过你们，但你们现在一句怨言都没有。我们给你们的援助是小小的，这是在还债，不是援助。这样才能互相信赖。你们说是援助，这也好，你们这样说也表示平等。

达：我们对你们所给予我们的过去的和将来的一切援助表示感谢！中蒙两国劳动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反动阶级所干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毛：有些中国工人去蒙古了。你们应该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以免他们犯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毛病，以免他们称王称霸。

那里的中国工人或工作人员如果犯错误，你们应该向我们反映。

达：大多数的人都很好，少数人虽有时犯毛病，但那也不是有意识的。同时，谁都会有一些缺点的。

毛：应该教育他们，如果有人犯严重错误，就应当依法处分。你们应以主人翁的态度站起来，教育他们。

达：我们那里中国工人中有二百名党员，他们带领着其他工人很好地工作着。

毛：好！工人一共有多少？

达：连家属一共一万三千人。过去的华侨一部分已回国，现在

只剩下四五千人，但这些人都已年老了。

毛：蒙古人指挥他们吗？

曾德：是的！蒙古人以主人翁的态度指挥着他们。

毛：中国工人中有做木工活的吗？

达：有。此外还有制砖的，以及其他各种行业。

毛：让他们带蒙古徒弟吗？

达：他们分别地带着徒弟呢！

毛：以后在农业方面，我们可以用人力援助你们，其数目可以是十万，也可以是二十万，甚至也可以达到三十万。其中某些人也可以帮助你们搞牧畜业。

达：对，不过事先我们应该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和计划工作。不然，接到那些人后，住宅等各方面要发生困难的。

毛：对！应该逐步地进行这些工作。你们有八十万人口，因此可以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了。

达：我们有五万二千多工人。

毛：八十万人口中有五万多工人，这数目不算小了。有使用机器的吗？

达：使用着半自动机器。

毛：有没有自动化的？

达：没有。

毛：那么将来可以装置一些。关于这一问题，将来我们互相可以谈一谈。

达：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现在有了火柴厂、瓷器厂，但火柴厂所需要的火柴盒等都是用手工制作。

毛：火柴生产的数目多少？

达：全国总共需要两千万盒火柴，明年生产可以达到这一数目。但在国内销路不太好。

毛：你们的市场怎样？

达：市场，有是有，但很小。

毛：今天我们谈得很好。

达：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怀，感谢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我们，感谢您对我们提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感谢您对我们讲了很有益的话。我们回去后，把您今晚所讲的话，当做今后工作上的指针。当我们分手之际，我再一次代表我党中央和全体人民向您致衷心的敬意。

二　印发谈话记录的批语

外交部：

这个谈话，应抄送我驻蒙使馆，内蒙自治区党委，及各省、市、区党委阅看，因为各省市区都有少数民族问题，另抄给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以上请会同尚昆同志办理[1]。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于1956年12月16日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驻蒙古大使馆。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

（1956年9月24日）

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中国。你们来，我们很高兴。我们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各国兄弟党的支持。当然，我们也支持你们，支持所有的兄弟党。现在世界上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阵线，不管是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胜利的地方，都是团结一致的。但是也有过不团结的时候。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2]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3]

---

[1] 这是毛泽东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

[2] 情报局，指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1947年9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成立的。1948年6月和1949年11月，情报局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1956年4月情报局宣布停止活动。

[3] 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1]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样急。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你们吃了亏，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说来，却取得了犯错误的教训。要充分认识这个错误。

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

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末中国是不是独立国呢？当然是独立国。既然独立，为何要听他们的话呢？同志！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2]，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我对苏联

---

[1] 指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

[2] 铁托（1892—1980），前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领导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1945年创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后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48年6月28日，由保、罗、匈、波、苏、法、捷、意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参加的情报局会议，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对南共进行公开的指责，并把南共开除出情报局。

同志讲过，你们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现在他们不承认。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1]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2]，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

---

[1] 季米特洛夫（1882—1949），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35年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2] 指王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战争必须实现的六项任务（也被称为六大纲领），这六大纲领取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项主张，并提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一指挥”。这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对“十大纲领”的严重倒退。

纲领[1]，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2]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3]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

---

[1] 指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 罗斯福（1882—1945），美国民主党人，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丘吉尔（1874—1965），英国保守党人，1940年至1945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3] 雅尔塔会议也称克里米亚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协调了最后击败德国的军事计划，讨论了欧洲的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克里米亚会议公报》，就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和管制德国的问题以及波兰问题等达成了协议。会上秘密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规定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二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美、英方面承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恢复1905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会上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第三国际我们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末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叫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们可能不很了解，为什么现在中国还挂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们，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时候只拿列宁及其他活着的领袖的像，当然没说也让中国照办。我们很为难。斯大林的四条错误，中国人民并不知道，就我们整个的党来说也是不知道的。这和你们的情况不同，你们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党内知道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但人民并不知道这是来自斯大林的错误。至于斯大林不让中国革命和怀疑我是半个铁托的错误，只有我们党中央知道。

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1]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就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因此，中国不挂斯大林像不行。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2]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

---

[1] 赫鲁晓夫（1894—1971），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

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维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时不是没有拿像吗？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1]的像，和一个活人——毛泽东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你们南斯拉夫人可能说，苏联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你们中国人还挂。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

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

---

[1] 孙，指孙中山。

以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不愿和别人友好，要和苏联分裂，要成为祸害。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这样的人少了，从抗美援朝起开始减少。而帝国主义则不同了，中国愈强大，他们就愈怕。但他们也知道中国工业不发达，只靠人多力量大，没什么可怕。他们第一怕苏联，第二才怕中国，怕我们的政治，怕我们在亚洲起影响。所以他们就经常说，中国不得了，将要侵略，等等。

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1]。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们可能也有同感吧？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

---

[1] 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同志们，我劝你们也要注意这一点。你们工业化程度比较高，发展比较快，斯大林整了你们，但是有理的是你们，真理在你们这一方面。这都可能成为你们的包袱。

上面讲的斯大林对我们犯的四条错误，也可能变成为我们的包袱。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过去我和波波维奇谈话时只是说：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和尤金[1]讲过，将来见到赫鲁晓夫时也要对他讲。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我们和你们不同，你们在铁托自传中提到斯大林的错误，因为你们和苏联断绝了关系。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

---

[1]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1]、《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2]：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莫斯科批评斯大林以后，我们就可以讲这些情况了。今天把他的四条错误讲给你们听了，但是为了和苏联保持关系，不便在报纸

---

[1] 指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一文（《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309页）。

[2] 指1939年12月20日在《新中华报》上发表的《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和1953年3月9日为悼念斯大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最伟大的友谊》。

上公开讲。在赫鲁晓夫的报告[1]中关于斯大林对我们犯的错误，只提到一个糖厂的问题，所以我们还不便公开讲。矛盾的事情还是有的。

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对南斯拉夫的错误已由赫鲁晓夫纠正了。对于王明的错误，他们已经了解了，而过去我们批评王明，他们就不愿意。他们也取消了“半个铁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个半铁托。取消了给铁托戴的帽子，我们很高兴。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

[1] 指赫鲁晓夫1956年2月25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1]等同志。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在1956年9月28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1]

（1956年9月25日）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中国过去也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的情况很接近。一个国家，农村人口多，存在封建势力，有不好的一面，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来说，又是好事，使我们有农民这个广泛的同盟军。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有严重的封建主义，布尔什维克党[2]因为有广大农民的支持，革命取得了胜利。我国更其如此。我国是农业国，有五亿多的人口住在农村。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现在我国城市资产阶级很快地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因

---

[1] 这是毛泽东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2] 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业合作化了。因此，党在农民中的工作非常重要。

照我看来，封建主义严重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要到农村中去找农民。知识分子下乡找农民，如果态度不好，就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城市的知识分子对农村事物、农民心理不大了解，解决农民问题总是不那么恰当。根据我们的经验，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真正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他们相信我们是为他们的好处而斗争，才能取得胜利。绝不能认为农民一下子就会相信我们。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

农民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党开始也是不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把城市工作放在第一位，农村工作放在第二位。我看，亚洲有些国家的党，农村工作也没有搞好。

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

第一个时期，我们没有看清农村。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在这个时期，我研究过农村，办过几期农民运动讲习所[1]，虽

---

[1]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先后担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和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

然有些马克思主义，但是看得不深入。

第二个时期，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好先生，就是蒋介石。他把我们赶到农村去。这个时期很长，十年内战，跟他打了十年，那就非得研究一下农村不可。这十年的头几年对农村了解还是不那么深刻，后来才比较了解，了解得也比较深刻。这个时期，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我们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我们党在农村中的大部分根据地搞垮了。

以后，是第三个时期，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

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

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总书记调查一两个农村，心中有数了，就可以帮助同志们去了解农村，弄清农村的具体情况。我看很多国家的党，总书记不重视解剖一两个“麻雀”，对农村懂是懂得一点，但是不深刻，因此，发出的指示不很符合农村情况。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也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这就叫做“解剖学”。

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在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里，有两种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你们的国家有没有这两种资产阶级？大概都有的。

买办资产阶级始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革命的对象。买办资产阶级又分属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对买办集团的斗争，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首先对付其中的一个，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例如，过去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有亲英、亲美的和亲日的。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还必须分别大地主和小

地主。在一个时候，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甚至对大地主也只打击少数最反动的。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为害很大。

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的冤家。中国有句俗话：“不是冤家不聚头。”中国革命有一条经验，对付民族资产阶级要谨慎。他们同工人阶级对立，同时又同帝国主义对立。鉴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敌人不打倒，人民就不能解放，因此，我们一定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兴趣，因为他们和地主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又是压迫和剥削工人的。因此，我们要同他们作斗争。但是，为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斗争要适可而止，要有理、有利、有节。就是斗争要有道理，要有胜利的把握，取得适当胜利的时候要有节制。为此，要调查双方面的情况，要调查工人的情况，也要调查资本家的情况。只了解工人，不了解资本家，我们就没有法子同资本家开谈判。在这方面也要作典型调查，解剖一两个“麻雀”，也要用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个方法。

在整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使他们站在人民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在一定时期还要和他们保持联盟。这样做，有利于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有利于发展生产、稳定市场，有利于争取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你们现在还没有取得政权，你们准备夺取政权。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团结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他们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行；对他们反工人阶级的、反共的反动言行，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面是错误的：只有斗

争，不要团结，是“左”倾错误；只有团结，不要斗争，是右倾错误。这两种错误我们党都犯过，经验很痛苦。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两种经验，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必须斗争的就作斗争，可以团结的就团结起来。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对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祝贺中尼协定[1]签订的电报的复电

（1956年9月25日）

加德满都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陛下：

值此中尼协定签订之际，承致祝贺，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尼泊尔王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中尼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在这一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签订的协定的基础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国王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6年9月25日

---

[1] 指1956年9月20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载于1956年9月24日《人民日报》。

关于公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的命令

（1956年9月26日）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组织简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七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9月29日）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开始时致词，对阿查里雅首相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主席说：尼泊尔同中国有长久的历史关系，两国人民间有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有一座山，这座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这座山不仅连结着中国和尼泊尔，而且也连结着中国和印度。所以，印度、尼泊尔和中国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是近邻。毛泽东主席接着举杯祝尼泊尔国王陛下的身体健康，祝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里雅阁下和他的夫人以及同他一道来中国访问的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在座的印度朋友们的身体健康，祝中国、尼泊尔和印度三国团结一致，祝尼中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和最近签订的协定。

1956年9月，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访问中国。图为毛泽东在观赏阿查里雅赠送的象牙。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1]

（1956年9月3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万隆会议[2]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有很大的变化。是不是？

苏加诺（以下简称诺）： 是的，的确如此。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 从前大家都同时提日内瓦会议[3]和万隆会议。现在，日内

---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谈话。

[2] 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共29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3]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瓦会议和日内瓦精神，大家都不大提了，剩下来的只有万隆会议。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苏：我自己也认为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毛：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美国招待得还好吧？

苏：一般地说，美国人的欢迎还是相当热烈的。但是，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员大多不很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

在美国不论到哪里，记者都问，印尼对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答复是很坚决的，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如果联合国没有代表六亿人民的中国参加，那末联合国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你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苏：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毛：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苏：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毛：早参加或者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要快才好。

毛：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苏：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在日内瓦的谈判中，我们也对美国提到这一点，指出他们

不对。但是，这不是日内瓦谈判的一个题目。日内瓦谈判的题目是：平民遣返问题，解除禁运问题，人民来往问题，更重要的是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苏：希望主席谈谈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

毛：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苏：但是，问题是这三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末，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

毛：我们可以在联合国以外反对。

苏：我还是不太了解。

毛：英国急于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叫做谈判，就如何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一谈就谈了五年。这期间，英国在中国的是谈判代表，而不是合法的外交官员。英国在联合国投蒋介石的票，而不投我们的票。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指责英国在两边搞。现在，我们和英国之间是半正式的外交关系。

苏：但是，主席还没有谈到联合国的问题。

毛：我正在讲这个道理。

法国、西德这些国家，我们也不急于同它们建交。它们既然不急，我们也不急。至于要拖多少年，那就看吧！它们要拖多少年，就拖多少年，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现在是不想同中国建交，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的。美国天天骂我们，我们的耳朵已经听惯了。这就说到联合国了。美国是不赞成我们进入联合国的，它是要阻挠的。

苏：这个问题可以分开来谈。

中国同英国、法国、西德、美国建交的问题和中国参加联合国的问题，是两回事。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这种企图。

毛：问题是台湾。

苏：台湾问题可以搁在一边，台湾和中国是一回事，控制大陆的应该代表中国。

毛：这是你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但是，美国和追随美国的国家不这样想。

苏：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一个国家提出要中国参加联合国，其他的国家支持。这是要经过斗争的，印尼愿意参加这个斗争。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了联合国，代表台湾的人当然就没有权了。

毛：这样的提案需要过半数，还是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苏：三分之二的多数。如果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不能否决。

毛：提案被大会通过以后，我们能不能进入安理会？安理会里是有否决权的，五大国[1]是需要一致的。在这五大国中，一大国曰美国，二大国曰蒋介石。

苏：不管安理会有没有否决权，提出来以后，就会引起斗争，这总是好的。

毛：这个我们赞成，但是最后还是难于解决。

苏：但是世界舆论就会不同。例如，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安理会里如果有一个大国否决，那就做了一件笨事，一定会引

---

[1] 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即苏联、中国、美国、英国、法国。1956年，中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非法窃据。

起反感。

毛：好的，作为斗争，这是应该做的。但是，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那末，我刚才已经说过要准备两条，我们就要准备进去，同你们一起，多一票。

苏：由一个中国代表整个中国，另外由台湾集团代表台湾，作为过渡的办法，主席认为这样一个策略如何？

毛：这个办法不妥。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

苏：但是，这只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正像西伊里安[1]和印尼的关系一样。

毛：西伊里安不代表印尼。相反地，在联合国里，印尼有代表，西伊里安没有。

苏：中国和台湾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弄成像印尼和西伊里安的问题一样，那就是说，把台湾作为中国将要收复的领土？

毛：在联合国里有没有西伊里安的代表？

苏：我建议的只是过渡的办法呀！

毛：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苏：那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蒋介石就要退

---

[1] 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进行谈判。1963年5月1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出，没有台湾代表的地位。

毛：对。

（面向黄镇[1]大使）中国京剧团到印尼去表演过没有？演出过《雁荡山》没有？

黄镇：演出过。

毛：在这个戏里，两派作战。保守派守城，革命派把城围住，后来飞进城去。英国报纸画了一幅漫画，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

苏：已经参加联合国的会员国可以联合起来，要求把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列入议程。

毛：赶走蒋介石的代表。

苏：这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毛：如果蒋介石的代表不走，我们就不去。我们还有很多文章好做。

苏：我这样提出问题，是为了要了解中国的态度。

毛：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如果联合国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提案，而我们却不能进入安理会，那我们就有了斗争目标，就还有时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六年之后，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十一年，那时候我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

---

[1] 黄镇（1909—1989），安徽桐城人。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因此，何必急呢？

苏：刚才主席说，美国不怕中国。其实不是这样，美国是怕中国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工业化，或者有原子弹。

毛：它是怕我们的政治。

苏：是的，怕中国的政治，怕中国的思想意识。

毛：怕我们去散布，对它不利。

苏：美国不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因为美国怕中国。

毛：美国是有一点怕中国。说老实话，我们也有点怕美国。

苏：澳大利亚也有点怕印尼。这不是因为印尼已经工业化了，而是因为印尼如果收回西伊里安，东伊里安也会成问题。

毛：你说的这个道理很对。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洲，半个美洲，一个澳洲。他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他们一百年。

苏：哪些国家不赞成中国？

毛：英国，它现在还投蒋介石的票。只要它一天如此，我们就一天不同它建交。它一百年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就一百年不同它建交，只是交换代办。法国、比利时也不承认我们，还有葡萄牙、西班牙。

苏：正如我昨天在乌兰巴托的演说中提到的，世界上大多数人，几乎是全部，都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有些国家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接纳中国，并且附上一个条件说，中国必须参加联合国，否则联合国就变成演滑稽戏的场所，这些国家就要退出。这样，美国如果反对，它就做了一件笨事。

毛：我们完全赞成这样做，但是不必退出联合国，可以在联合国里进行斗争。

苏：这个斗争是复杂的，我们需要互相商量。

毛：对的。最后，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走路。到那时候，我们就飞进联合国了，戏就唱完了。但是，我们必须准备第二条，那就是，多少年不让我们进去。

苏：这同我们收回西伊里安的问题几乎相同。在印尼，一部分人主张把西伊里安问题撇在一边，先考虑如何建设，等到我们强大以后，西伊里安自然会回来。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认为，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另一方面要为收回西伊里安而斗争。

毛：这同台湾问题一样。一方面，我们要把自己建设强大，另一方面要尽快收回台湾。台湾和西伊里安一样，有两个收回的时间。第一是早一点，这当然是最好的。第二是迟一点，这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睡觉，不致于失眠。

苏：但是，这样会不会影响人民的斗争情绪呢？

毛：问题不是全靠我们来解决的，对我们来说，当然最好是早一点。

苏：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人民的斗争情绪像火一样，不扇的话，就会熄灭？

毛：火是在烧的，但是，仍然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早一点，另一个是迟一点。

苏：从这一点来说，我是同意的。我们应该一方面进行建设，同时还要继续斗争。

毛：早一点当然最好，迟一点也可以。

苏：当然不是一两天可以办到的。

毛：不是一两天，也不是一两年，而是十年八年，甚至还要多。

苏：这一点我同意。收回西伊里安不是五六年之内的事，还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对人民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要继续斗争，要在明年收回西伊里安。

毛：我百分之九十九同意你。我们也是每天宣传收回台湾，只是我们不讲明天或者明年。我们天天要求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我们天天说要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交，包括美国在内，但是我们不讲时间。中国人办事，就是不讲时间的。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

苏：这是一种策略。

毛：不是，的确是如此。问题的解决，不决定于我们这一方面，要对方改了才成。

苏：对方是谁？

毛：英国、美国、法国、台湾、西伊里安、荷兰。问题是它们的参谋长是它们自己的人，而不是我们的人。如果阿卜杜加尼外长去作美国的外长，那就好了。

苏：现在西德的人也是这样说。他们说，阿登纳[1]下台的话，整个西德就会变。

毛：如果它变了，并且提议同我们建交，我们就没有理由拒绝了。

苏：主席的话很有味道，都是实实在在的。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中国方面认为，我们应该早一点还是迟一点在联合国提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

[1] 阿登纳（1876—1967），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毛：早提。

苏：这就好了。

毛：每年都要提一次，哪年成功就算完事。

苏：要成功的话，还要经过斗争。早提有很多好处，这样可以使各国表明立场，阵线分明。

毛：完全对。

禁运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我们可以等六年，等十一年。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

苏：难道他们对中国的发展不了解吗？

毛：了解是了解的，但是，他们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说现在这样做是上当了，但是他们还有另一方面的困难，使他们要同我们顶。因为这个口子是决不得的，一决以后，黄河的水就要流。对他们来说，面子就很不好看。我们的想法是，早一点承认也好，迟一点承认更好。到那时候，他们到中国来，就悔之已晚，就将无能为力。而且，我们还有第二条，那就是，要他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因为是他们不承认我们，而不是我们不承认他们。我们天天要同他们建交，而他们不同我们建交。不是我们不进入联合国，而是他们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天天要他们解除禁运，但是他们不解除。结果，就会使美国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一切理由都抓在我们手里，都抓在我们朋友手里。对付美国人是要有一点办法的，要有两

条，一条不行。第一是坚决斗争，每天都要叫，这是你的办法。二是不要着急，这一条是不登报的。

我们同蒋介石也是这样微妙的关系。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三回呢？但是蒋介石反对。他每天反对，我们就每天说要同他合作。这样就使我们的蒋委员长很难处，他的内部正在分化。

苏：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阶级也不一致。美国国会里也有人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

毛：不是多数赞成。

苏：但是已经有人赞成。

毛：我们看到有人赞成就高兴。这次中国共产党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在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说，愿意同一切国家建交。但是，在这些报告和决议里，都没有我刚才向你讲的第二条的内容。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代表。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北京机场迎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行。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和苏加诺通过北京街道，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和苏加诺乘坐敞篷汽车前往中南海，沿途受到几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

195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检阅庆祝国庆节的群众队伍。

在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10月2日）

总统阁下，印度尼西亚的贵宾们，
女士们，
先生们：

我们热烈地欢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苏加诺总统前来我国访问。我们感谢苏加诺总统给我们带来了八千二百万印度尼西亚人民兄弟般的友谊。

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和苏加诺总统怀有最大的敬意。曾经被殖民主义统治了三百五十年的印度尼西亚，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后，终于赢得了民族的独立。现在，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为维护民族团结、逐步肃清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着勇敢的斗争。苏加诺总统在这些斗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和最近在欧美各国访问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和正义的人民同声赞扬的。印度尼西亚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和要求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持你们。

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它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中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历来就是很好的朋友。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的友谊，更加加强了。我深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

我建议大家举杯，
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友谊，
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
为苏加诺总统的健康，
干杯！

1956年10月2日，毛泽东宴请印尼总统苏加诺。

1956年10月，毛泽东和陈毅、苏加诺在北京。

在苏加诺总统为印尼建军十一周年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

（1956年10月5日）

总统阁下，朋友们，同志们：

在印度尼西亚建军十一周年这个重要的节日，我首先要向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祝贺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在争取实现印度尼西亚人民理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什么是印度尼西亚人的理想呢？苏加诺总统在最近对我们所作的几次重要的演说中，已经说得很明白，那就是：独立的理想、和平的理想、新世界的理想。这些也正是中国人民的理想。为了争取实现这些理想，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而且永远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忠实的战友。

总统阁下，六天来，你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对你的欢迎和敬爱。你的访问已经使我们两国人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明天，你就要离开北京，不久以后，你就要离开中国。虽然我们又将要相隔几千公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两国人民的心，将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建议：

为我们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

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苏加诺阁下的健康，

干杯！

为日本商品展览会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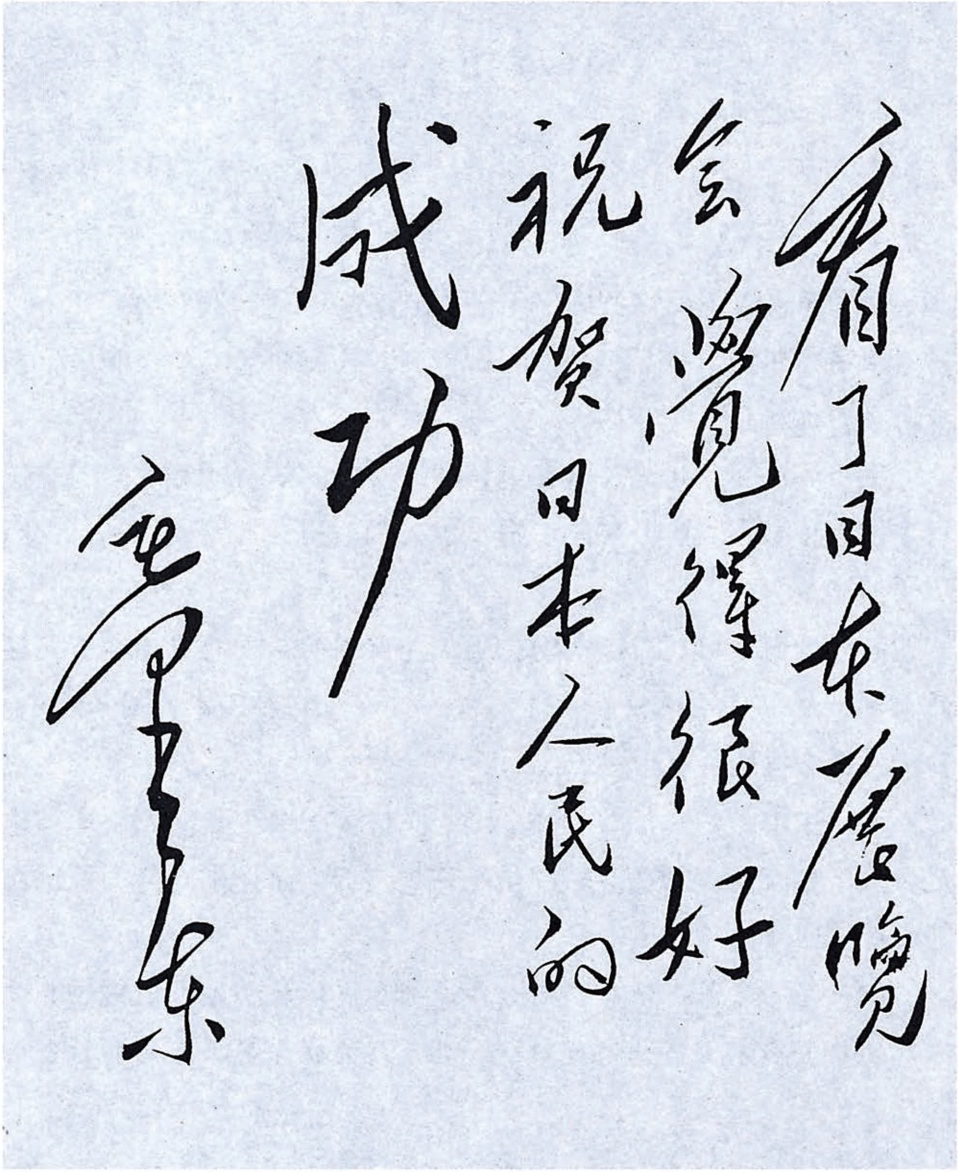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

看了日本展览会[1]，觉得很好。祝贺日本人民的成功。

毛泽东

---

[1] 毛泽东于1956年10月6日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村田省藏等的陪同下参观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这是毛泽东为展览会写的题词。



看了日本展览会觉得很好祝贺日本人民的成功

毛泽东

毛泽东为日本商品展览会的题词。

和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1956年10月1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在南斯拉夫，妇女的权利怎么样？

申特尤尔茨[1]（以下简称申）：南斯拉夫宪法规定妇女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

毛：宪法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的执行同宪法的条文还有差别。不知在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妇女的权利是否同男子一样？

波波维奇[2]（以下简称波）：美国和英国的妇女同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她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在有些国家，例如瑞士，妇女就没有被选举权。

毛：在中国，参加政府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妇女毕竟也是少数。妇女的权利在宪法中虽然有规定，但是还需要努力执行才能全部实现。

申：毛主席讲得很对。例如在南斯拉夫解放初期，国民议会候选人的联合名单上有一半是妇女，那是因为联合名单是南斯拉夫共

---

[1] 申特尤尔茨，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团长，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

[2] 波波维奇，当时任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

产党[1]提出来的，名单上的那些妇女一般都能当选。后来实行了个别提名，当选的妇女就减少了。那是因为在某些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也就是人民政治觉悟不高的地区，人们不愿意提名妇女为候选人。目前，南斯拉夫妇女在人民委员会、工人委员会、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工会和工人自治管理机关内，还是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毛：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三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

申：在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2]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六。在各个联邦共和国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例如在斯洛文尼亚的议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五。在一些基层的立法机构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三十。

毛：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地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以后，妇女

---

[1] 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在1952年11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

[2] 1963年4月7日通过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将联邦国民议会改称联邦议会。

们参加了生产，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但是合作化后，农业生产还是主要靠体力劳动，妇女又要兼顾家务，所以只有当农业机械化以后，才能根本改变这种情况。现在，在重工业部门中，主要还是男同志从事劳动，轻工业部门中女同志比较多。

申：在南斯拉夫也有同样的问题。在一些重工业集中的地区男工占多数，因此他们结婚就成了问题。目前，我们也开始在重工业地区设立一些轻工业，使女工人数有所增加。

毛：在中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在南斯拉夫是否实行计划生育？

波：南斯拉夫是一个小国家，人口不多，因此南斯拉夫政府一直很重视人口的增加。

申：我们已经开始设立一些儿童福利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在母亲们工作的时候，照顾她们的孩子。最初这种组织只是设立在工厂或大的地区，现在也开始努力在一般的居民区设立这种组织。此外，我们还有服务站，主要是帮助工作太多的母亲们兼管家务。服务站的工作，使主妇们减轻了很多家务负担，使她们能更积极地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有一些女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工作很繁忙，但是又要照料家务，因此过度疲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通过服务站的帮助，可以减轻她们家务的负担。

毛：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知服务站的工作项目是哪一些？

申：服务站的工作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而有不同的项目。主要的项目有洗衣服、熨衣服，打扫房间，照料小孩，缝纫，代做饭菜，送牛奶、面包、水果，等等。服务站主要是南斯拉夫妇联创办的。对妇女的政治教育工作，就主要由工会和社会主义联盟来进行。

毛：在南斯拉夫，有没有因为孩子太多而父母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的情况?

申：没有这种困难，因为每生一个孩子国家就发给补贴金。但是有些父母不把补贴金用于孩子的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组织、工会和党的组织就要指导孩子的父母如何来使用这笔补贴金。在南斯拉夫，我们也为节育提供便利，我们设立了一些节育指导站，人们在节育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同他们研究。

毛：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夫妇之间应该订出一个家庭计划，规定一辈子生多少孩子。这种计划应该同国家的五年计划配合起来。目前中国的人口每年净增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是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1]，他就提倡节育。

波：请问在中国究竟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比较赞成节育?

毛：不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只要是孩子多的、家庭负担重的都赞成节育。

申：在南斯拉夫我们也宣传避孕的知识，这种宣传主要是妇联来做的，我们也研究和制造避孕的药品。此外，还用一些办法来限制生育，那就是对孩子多的父母，多收孩子的托儿费，不知在中国是否也可采取这种办法?

毛：这种办法在我们这里恐怕行不通。孩子多的父母，本来就有经济上的困难，如果再增收他们的托儿费，那末经济上就会更困

---

[1] 邵力子（1882—1967），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

难了。我们的干部过去是享受供给制待遇，他们的一切费用都由公家包了。现在实行了薪金制，孩子的托儿费要干部自己负担，这在客观上也是对多生孩子的一个限制。

申：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我们同中国妇联的同志们进行了座谈，交流了经验。我们也会见了一些革命经历很长的女同志，在一起交流了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我们有着这些坚固的联系，这将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功。我们要感谢中国妇联的领导同志们，她们促成了这次访问，并且把访问日程安排得很好，使我们有机会看到每一样希望看到的东西。

波：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毛：我们今天谈得很好，特别是接触到了人类生活本身的一些问题。

给戴毓本[1]的信

（1956年10月13日）

毓本同志：

给我的信收到，甚为感谢。很久以前的一信，也早已收到，因忙未复，幸谅。希望你继续努力工作，争取光明的前途。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以习梅[2]现在所处地位，似可不必再有检举。

---

[1] 戴毓本，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同学，曾在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当时是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医生。

[2] 习梅，即彭习梅，戴毓本的丈夫。当时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少数民族参观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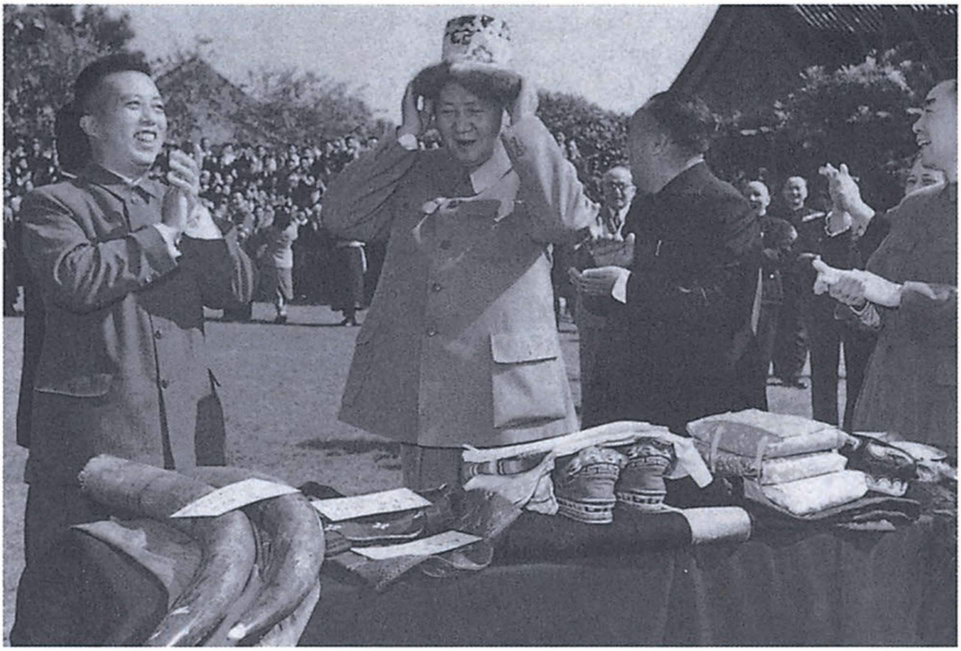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云南省少数民族参观团。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广西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参观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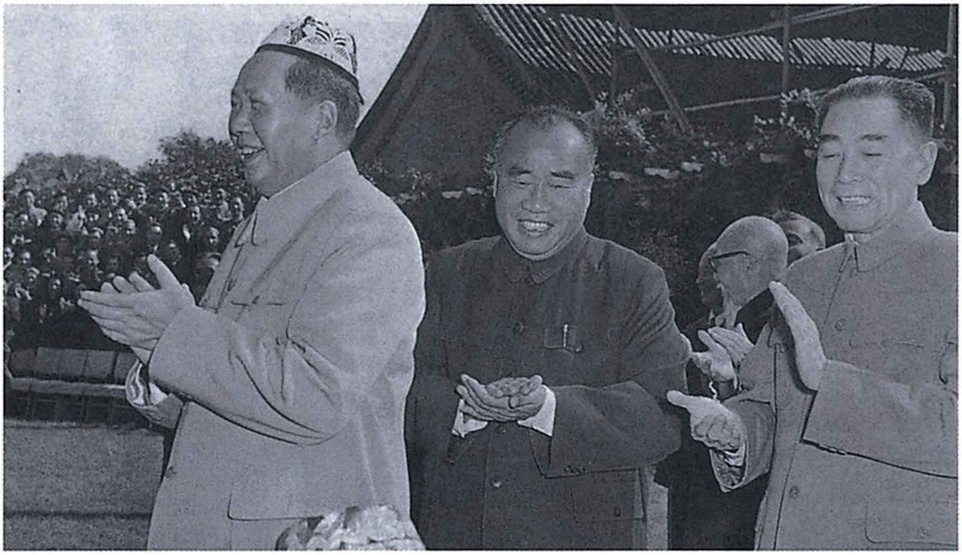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毛泽东接见贵州少数民族代表。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看各族人民敬献的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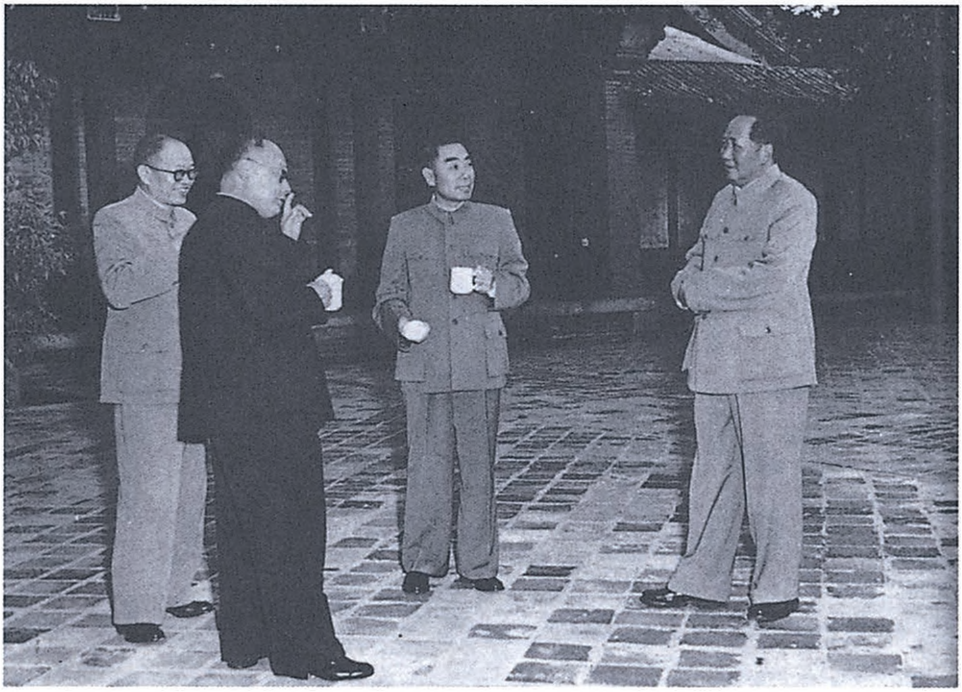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看各族人民敬献的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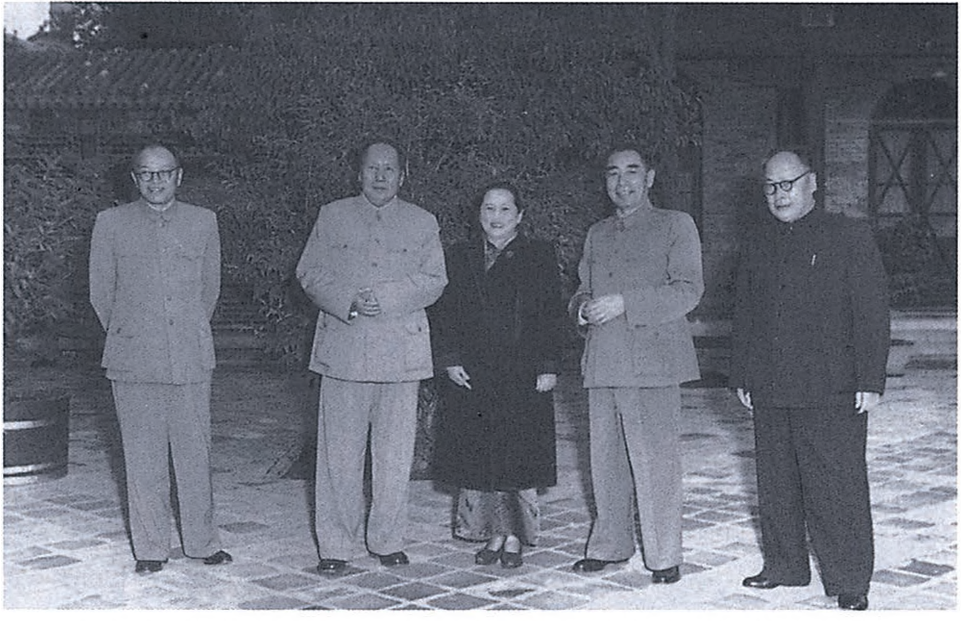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观看各族人民敬献的礼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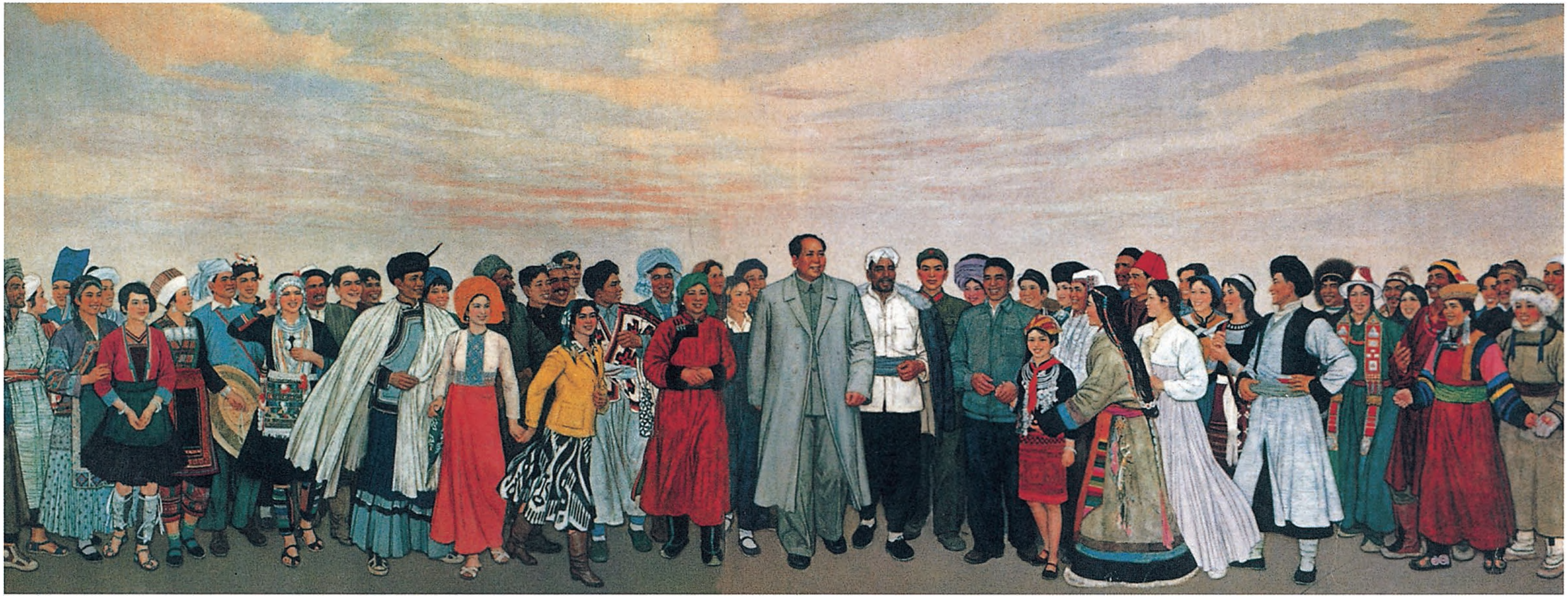
1956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并观看他们敬献的礼品。



1956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张闻天在中南海颐年堂前交谈。



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陈毅、张闻天在中南海。



《永远跟着共产党　永远跟着毛主席》(油画)

对金日成关于志愿军赴朝参战六周年贺电的复电

（1956年10月27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参战六周年之际，承来电祝贺，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向你，并且通过你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通过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和两国经济、文化关系的增进正日益巩固和发展。我们谨祝你们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毛泽东

1956年10月27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1956年1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德·特·谢皮洛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以及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鼓舞了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和为争取美好未来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合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我们高兴地看到，最近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1]。这个宣言充分地表现了

---

[1] 指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一宣言，载于195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苏联忠于社会主义各国伟大团结的共同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毫无疑问，苏联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步骤将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友好关系，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的经济高涨。

中苏两国的伟大友谊和合作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深知中苏两国的永恒友谊是符合于我们两国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的根本利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个友谊将会极大地增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的力量，并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祝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永恒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1956年11月6日于北京

关于合作社养猪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1月）

一

请尚昆办。

此文印发八届二中全会各同志阅看。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猪二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山东省阳谷县石门宋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宋保恩的《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后写的批语，这篇文章和批语（去掉抬头和第一句话）后来发表于1956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本篇二写在陈云1956年11月15日关于拟将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下发征求意见给邓小平的信上；本篇三写在国家计委1956年11月14日报送的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省昆山县同心社养猪办法的报告上。

二

即退陈云同志：

在第五页和六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1]，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三时

三

少奇、陈云、小平阅，此件[2]似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请小平酌处。

毛泽东
十一月卅日

---

[1]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第五页“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斤到十五斤”一句后，加写了“（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将第六页上“除大城市外，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一句，改为“除大城市城区以外，大城市郊区和中小城镇各机关、部队、学校的伙食单位，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养猪”。

[2] 指国家计委商业局一位副处长关于江苏省昆山县同心社养猪办法的报告。报告说，这个社养猪的特点是：（一）由社里划出一定耕地来种菜做饲料。（二）每头猪只喂到毛重120斤，每亩可养7头。（三）一年养两次，每头只养半年。这种办法在有条件的地方是值得提倡的。195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这一报告。

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1]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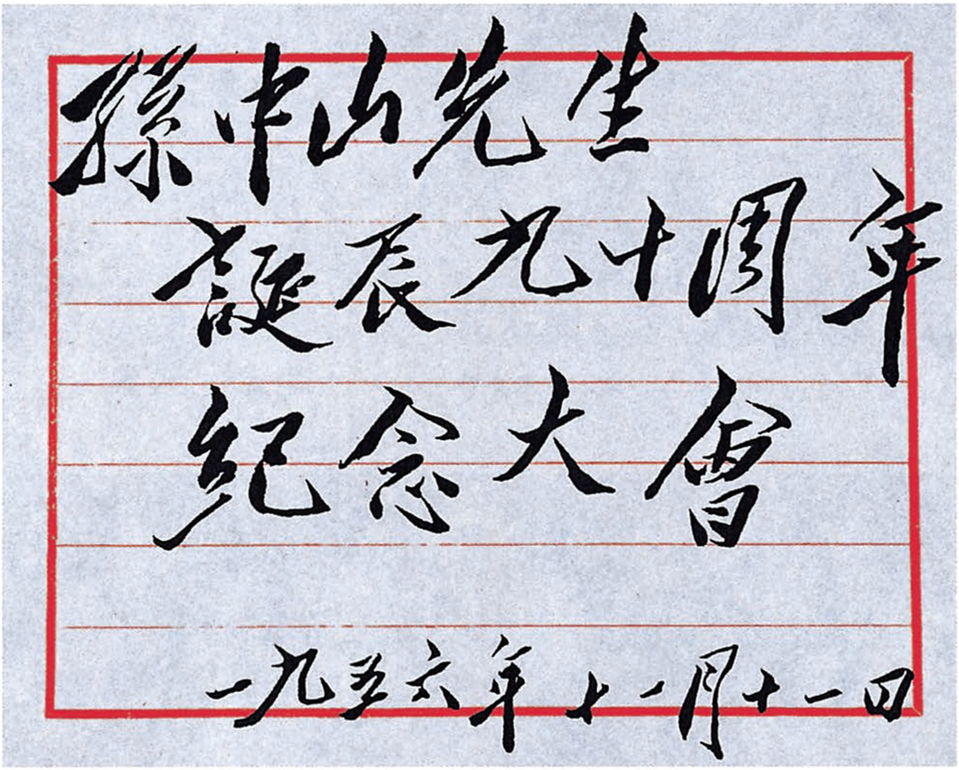
（1956年11月11日）

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1] 1956年11月11日北京举行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隆重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这是毛泽东为大会题写的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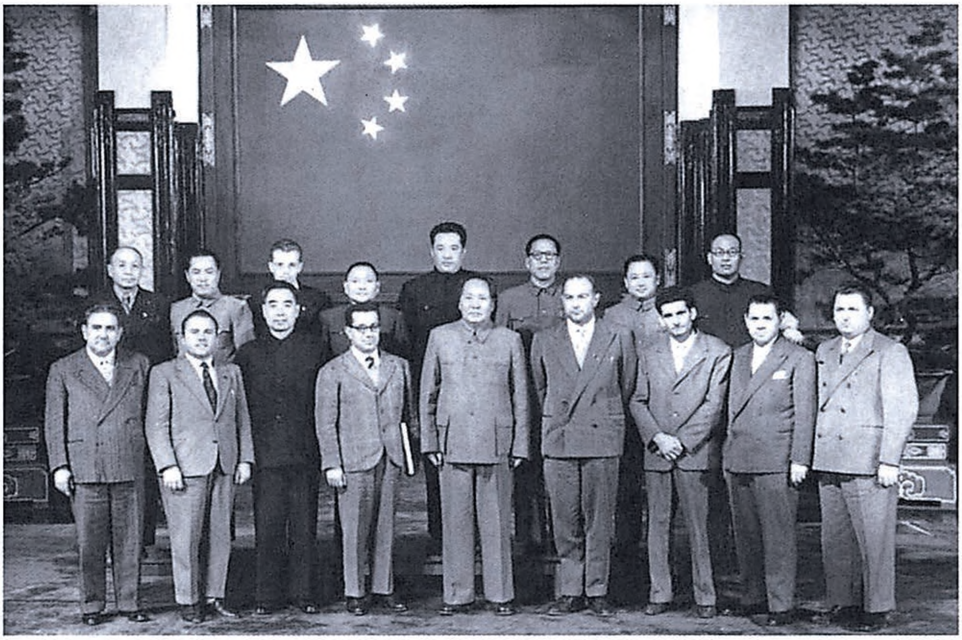
孫中山先生
誕辰九十周年
紀念大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毛泽东为“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题写的会名。

1956年11月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缅甸领导人吴努。

1956年11月5日晚，毛泽东在北京体育馆观看苏联国家马戏团的表演。演出人员休息时，毛泽东亲切会见马戏团的艺术家们。



1956年11月6日，毛泽东等和来访的意大利社会党农业考察团合影。

1956年11月11日，毛泽东观看叙利亚议员代表团赠送的礼物。

1956年，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印度记者夏尔玛的采访。

纪念孙中山先生[1]

（1956年11月12日）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

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

---

[1] 这是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写的文章。

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关于团结党外军人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1月13日）

各同志阅。退彭德怀[2]同志。

转发各军区、各军事学校以及有同样统战问题的军或师的党委阅读，加以讨论，仿照办理，认真解决团结党外军人问题。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政治委员王振乾1956年10月29日关于团结该军军长陈明仁一起工作问题给广州军区党委的报告的批语。报告谈了军党委常委在同陈明仁相处中存在的缺点，以及为团结他一起工作采取的具体改进措施。通过相见以诚，多次找他个别恳谈和集体交换意见，并改进领导制度，从而增强了团结。陈明仁表示对他帮助很大，希望今后大家常谈心。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国家预算要保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1]

（1956年11月13日）

（一）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都有所增长。

（二）一九五六年的国家建设事业是有成绩的。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其他事业开支，大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不正确。在308亿元（旧价[2]）的预算开支中，有20亿元到30亿元用得不恰当或者用多了，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占15亿元左右。

（三）一九五六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四）一九五七年的预算，收支各为308.65亿元（其中包括自筹资金2.15亿元。308.65亿元折合旧价为317.65亿元）。在预算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为157.26亿元，社会文教支出为39.3亿元，国防支出为57亿元，行政支出为25亿元，债务支出为8.42亿元，援外和其他支出为6.41亿元，国家物资储备支出为5亿元，信贷资金为5亿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的发言要点。

[2] 指1955年的价格。

元，总预备费为5.26亿元。在经济、文教、国防、行政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合计为126.73亿元（折合旧价约为135.73亿元），其中自筹资金2.15亿元。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是平衡的，但是打得较紧，并且应该使它与现金平衡相结合。

（五）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一九五七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一九五六年作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地压缩。虽然如此，总的说来，我们的建设事业还是前进的，因为一九五七年的收支均比今年有所增加，收入增加22.5亿元，即增长8.2%；支出增加9.53亿元，即增长3.2%。关于压缩问题，必须做到合理安排，不出乱子。物资不足，应该首先支持必要的生产，同时注意平衡。

（六）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发动一个增产节约运动。[1]增产必须在原料有保证和社会需要的条件下进行，同时必须保证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节约是有希望的，必须在不降低质量和减少工伤事故的条件下讲求节约。在企业、事业和行政开支方面，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在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必须节约原材料，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

---

[1] 195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对1957年建设的规模作适当的调整，对原定在1957年开工的建设项目，应当进行具体分析，重新排队；把那些在今年和明年都有可能和有必要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对去年已经施工的项目，也应当进行排队，把那些在今年还有可能和有必要继续施工的项目，列入年度计划。在工业、农业的生产中，在运输、邮电和商业的经营中，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广泛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克服各种浪费现象。大量节减行政管理费用，严格限制人员的增加，合理调整现有的机构和人员，逐步改变某些不合理的工资福利制度，并且彻底地消灭铺张浪费现象。

（七）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改造，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党内问题的解决的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大的民主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

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发言[1]

（1956年11月15日）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毛泽东同志号召全体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工作人员首先是各方面的负责工作人员，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与群众同甘共苦，反对铺张浪费现象，并且采取整风方法，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倾向作斗争。他要求全党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国际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主义。他着重指出：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密切依靠人民群众的原则，反对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力量，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而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

[1] 这是新华社报道的毛泽东的讲话。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1956年11月15日）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一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

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

---

[1] 这里是指孔子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参见《论语·为政第二》。

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

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二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1]，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

---

[1] 指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骚乱事件和同年10月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事件。

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

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1]。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这里讲一个“里通外国”的问题。我们中国有没有这种人，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岗就是一个。这是有

---

[1] 参见《周易·系辞上》。

许多事实证明了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揭露高岗的中央会议上，我曾经宣布说，北京城里头有两个司令部：一个司令部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司令部刮阳风，烧阳火；第二个司令部呢，就叫地下司令部，也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刮阴风，烧阴火。我们的古人林黛玉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现在呢，不是阳风阳火压倒阴风阴火，就是阴风阴火压倒阳风阳火。他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大批人。

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这是不好的。我希望同志们在党组、党委里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一级，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说清楚，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我们不赞成苏联的一些事情，党中央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几次，有些问题没有讲，将来还要讲。要讲就经过中央去讲。至于情报，不要去通。那个情报毫无用处，只有害处。这是破坏两党两国关系的。干这种事的人，自己也搞得很尴尬。因为你背着党，心里总是有愧的。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

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我们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都是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在斗争中教育人民群众。我们搞阶级斗争是从十月革命学来的。十月革命，无论城里、乡里，都是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现在苏联派到各国去当专家的那些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不过几岁、十几岁，他们很多人就忘记了。有的国家的同志说，中国的群众路线不对，很高兴学那个恩赐观点。他要学也没有办法，横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我们不企图去领导任何别的国家，我们只领导一个地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你有多少资本呢？无非是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你把斯大林

丢了，把列宁也丢得差不多了，列宁的脚没有了，或者还有一个头，或者把列宁的两只手砍掉了一只。我们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四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

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资产阶级腐蚀的工作人员，“五反”是斗资产阶级，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早几天群众到英国驻华代办处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这也是大民主，是反对帝国主义。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我们的确是爱好的。这种大民主是对付谁的呢？对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付资本主义。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付资本主义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要废除小生产私有制，就它的性质来

说，也是对付资本主义的。我们用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动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主要是贫农下中农首先组织起来，上中农也只好赞成。至于资本家赞成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那是因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来，工人群众又在底下顶他们，逼得他们不得不这样。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

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现在，民主党派、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再来一个“五反”，他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很害怕：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民主？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警惕，也怕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这里再讲个达赖的问题。佛菩萨死了二千五百年，现在达赖他们想去印度朝佛。让他去，还是不让他去？中央认为，还是让他去好，不让他去不好。过几天他就要动身了。劝他坐飞机，他不坐，要坐汽车，通过噶伦堡[1]，而噶伦堡有各国的侦探，有国民党的特务。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事，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是从坏的方面着想。出现这种坏的情况，我也高兴。我们的西藏工委和军队要准备着，把堡垒修起来，把粮食、水多搞一点。我们就是那几个兵，横直各有各的自由，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们总是不要先攻，先让他们攻，然后来它一个反攻，把那些进攻者狠狠打垮。跑掉一个达赖，我就伤心？再加九个，跑掉十个，我也不伤心。我们有经验一条，就是张国焘跑了并不坏。捆绑不成夫妻。他不爱你这个地方了，他想跑，就让他跑。跑出去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没有什么坏处，无非是骂人。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有人怕泄露机密，张国焘还不是有那么多机密，但是没有听见因为张国焘泄露机密，我们的事情办坏了。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

---

[1] 噶伦堡，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城镇，靠近我国西藏的亚东。

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首先要保护

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赞成在和平时期逐步缩小军队干部跟军队以外干部的薪水差额，但不是完全平均主义。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

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

1956年11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公安军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合影。

1956 年 11 月 16 日，毛泽东接见全国烈属、军属、残废军人、复员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和彭湃烈士的母亲周凤（中）、黄继光烈士的母亲邓芳芝（右）握手。

1956年11月，毛泽东等接见参加国防工程整治工作会议的全体干部。

1956年11月，毛泽东和华东军区炮兵副司令陈锐霆亲切交谈。

对关于目前沿海军事斗争的几项规定的批语和修改[1]

（1956年11月21日）

一

退彭。有几处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

我们对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和蒋介石、李承晚[2]集团最近的军事示威、挑衅和寻找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借口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戒备。必须遵照中央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既定方针，严守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11月21日报告的批语。本篇二和三是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目前沿海军事斗争的几项规定中的两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李承晚，当时任大韩民国总统。

自卫的立场，采取特别慎重的步骤，决不主动惹事，以免政治上陷于被动，即使在某种情况下失去某些战机，也决不上敌圈套。

三

对越入我国大陆边缘上空的外国运输机，我海（边）防部队不要向其攻击，但应严密监视并即上报。如深入我大陆纵深，在确认为军用机而非民航机时，或发现进行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等活动时，则应迫其降落或歼击之。

关于土特产品收购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批语

（1956年11月24日）

一

送陈云、李维汉[1]同志阅，退毛。

请陈云同志看建屏一条消息[2]，我看这种情况，在全国是相当多的，应当统一加以处理。请维汉看武汉的一条消息[3]。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2]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1日第二〇五七期上刊载的河北省建屏县贸易系统有些单位，在收购农民土特产品时压秤压价，非法营利，引起农民不满的消息。

[3] 指同期《内部参考》刊载的武汉民主人士就匈牙利事件对我统战工作提出意见的消息。消息说，武汉民主人士希望中共从匈牙利事件中接受经验教训，进一步改进统战工作，采取措施改变“五统五不统”的现象。

二

请李维汉同志电话询问武汉什么叫五统五不统[1]。并要你改善工作。

---

[1] 这是当时武汉民主人士中对中共统战工作的意见的一种说法。五统五不统，是指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统工商不统党派、统进步不统落后、统政治不统思想。

对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缩编等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1月25日）

刘、朱、陈、邓[2]即阅。退彭照办。[3]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6年11月23日报告的批语。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呈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说：决定于1957年1月初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缩编问题和1957年的军队训练工作。随《通知》附送的《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草稿）》说："军委决定：在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原则下，把我军的现有的员额裁减三分之一，即从三百八十三万人中裁减一百三十万人左右，保持二百五十万人或者更少一些的常备军队。"

在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稿上加写的话[1]

（1956年11月30日）

苏方邀请书似以在十二月中旬或下旬发出较为适宜。此外请你看形势，对于西方在匈牙利组织颠覆活动一点，在适当时机加以揭露，你以为如何?

---

[1] 中共中央1956年11月30日给周恩来的电报，是由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交的，当时周恩来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电报说：二十九日，尤金大使约见刘少奇时，口头转达赫鲁晓夫的意见，希望周恩来在访问阿富汗后能到莫斯科一谈，并问是否需要由苏方发出正式的邀请书。中央政治局常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由苏联正式邀请访问是必要的。你的意见如何，请考虑电复，以便中央再行考虑决定后，答复苏共中央。毛泽东审阅电报稿时，在末尾加写了这段话。

为《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册》题词[1]

（1956年11月）

纪念孙中山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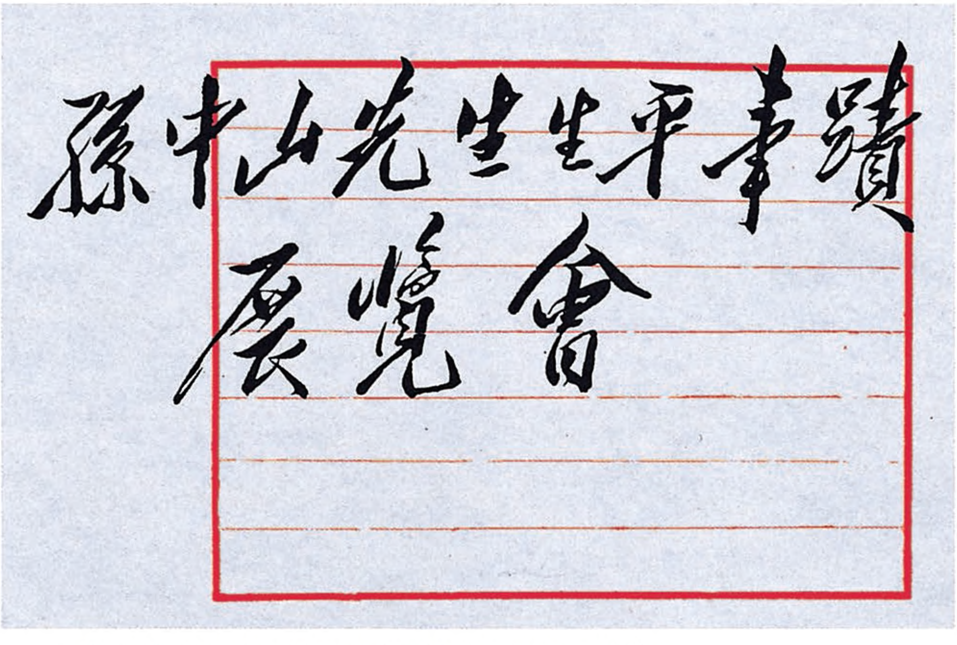
---

[1] 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发行了《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册》。毛泽东在其封面上题词：纪念孙中山先生。

为“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会”题名

（1956年11月）

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


孫中山先生生平事蹟展覽會

毛泽东为“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会”的题写的会名。

对《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1]的批语

（1956年12月）

---

[1]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12月3日第二〇六八期刊登的《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章乃器的一些情况》。文内说，不久前闭幕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对章乃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通过的《关于讨论当前几个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就是针对章乃器的错误论点的。这个决议已由新华社摘要报道（见1956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但章乃器的意见未公开发表。文内还简要介绍了章乃器的主要论点和有关情况。章乃器说，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全行业合营后，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两面性，那是长时期的思想改造问题。不单是工商界要这样，许多人都要这样。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不存在了。“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来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他还说：“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学习‘八大’文件是‘歌功颂德’，是‘礼多人不怪’。”“工商界进入社会主义，能交出企业而无所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了章乃器的上述错误论点，指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否定或者不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消极的一面的想法和说法，在实际上必然会模糊当前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区别，从而使人忽略当前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将足以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进一步接受教育和改造，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不利的。”

少奇、陈云[1]同志阅，退毛。

此件第一篇关于章乃器[2]的，值得一阅。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章乃器，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

对邓子恢关于龙岩县农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6年12月3日）

少奇、陈云、尚昆[2]阅，请尚昆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56年11月27日关于福建省龙岩县农业生产合作社若干问题的报告说，中共龙岩县委最近召开了农业合作社社长会议，反映了合作社存在的以下问题。一、社员收入，各社多少不一。收入多的主要是搞好了副业，收入少的主要是靠种粮食。这种余粮社收入少的结果已引起农民重副业轻粮食生产。二、关于副业问题。社员分散搞副业影响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除饲养家畜家禽、种菜及某些家庭手工业外，其他一般副业由社统一经营。三、公益金少留，无法解决困难户的困难，公益金不能少于全年收入的2%。四、关于办社规模问题。龙岩是山区，县委拟将现有的700多个社合并到300个左右，平均每社120户左右。五、关于生产计划，区乡政府只按照上级交代任务往下分摊，并未征求各社意见，这样机械地分配任务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六、贫农基金贷款太少，今春发下的双铧犁差不多99%不能用。七、干部配备上老农的比重过低。八、交通条件差，阻碍了山区生产的发展。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黄炎培[1]的信

（1956年12月4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2]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

---

[1] 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苏川沙（1993年并入上海浦东新区）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中国民主建国会195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同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1]，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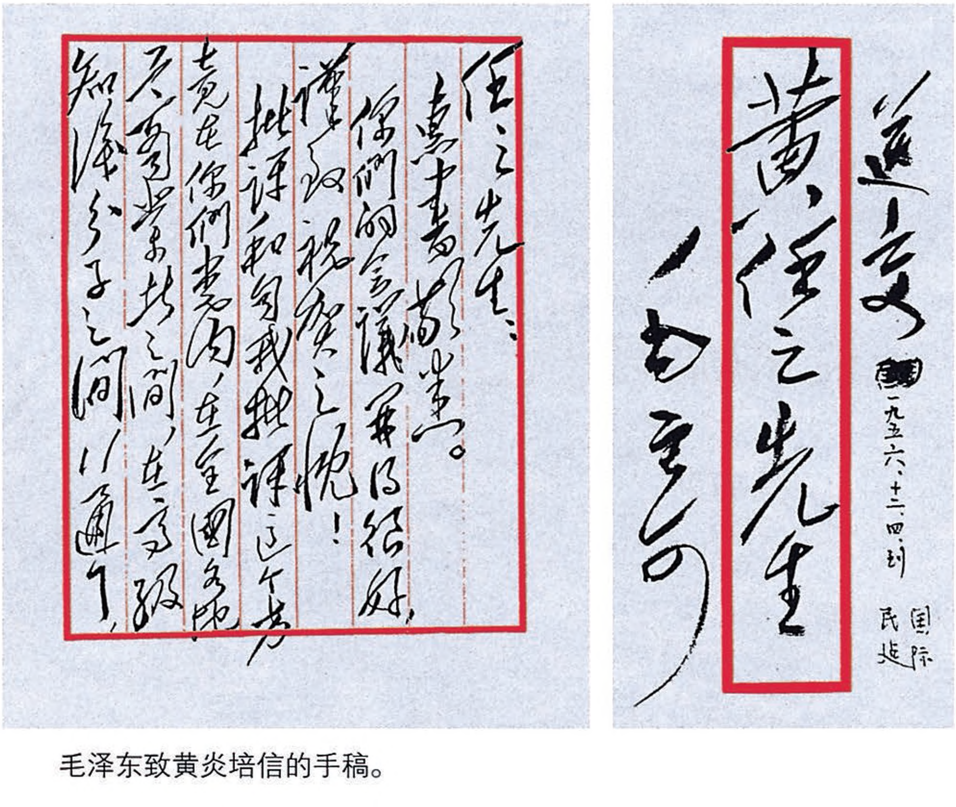
---

[1] 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泽东这一年夏天填的。《水调歌头·长江》是1956年6月填的，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时，改题为《水调歌头·游泳》。词中的“逝者如斯乎”，在1956年12月16日给黄炎培的信中，更正为“逝者如斯夫”；“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在同年12月5日将这首词抄录给周世钊时，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界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

送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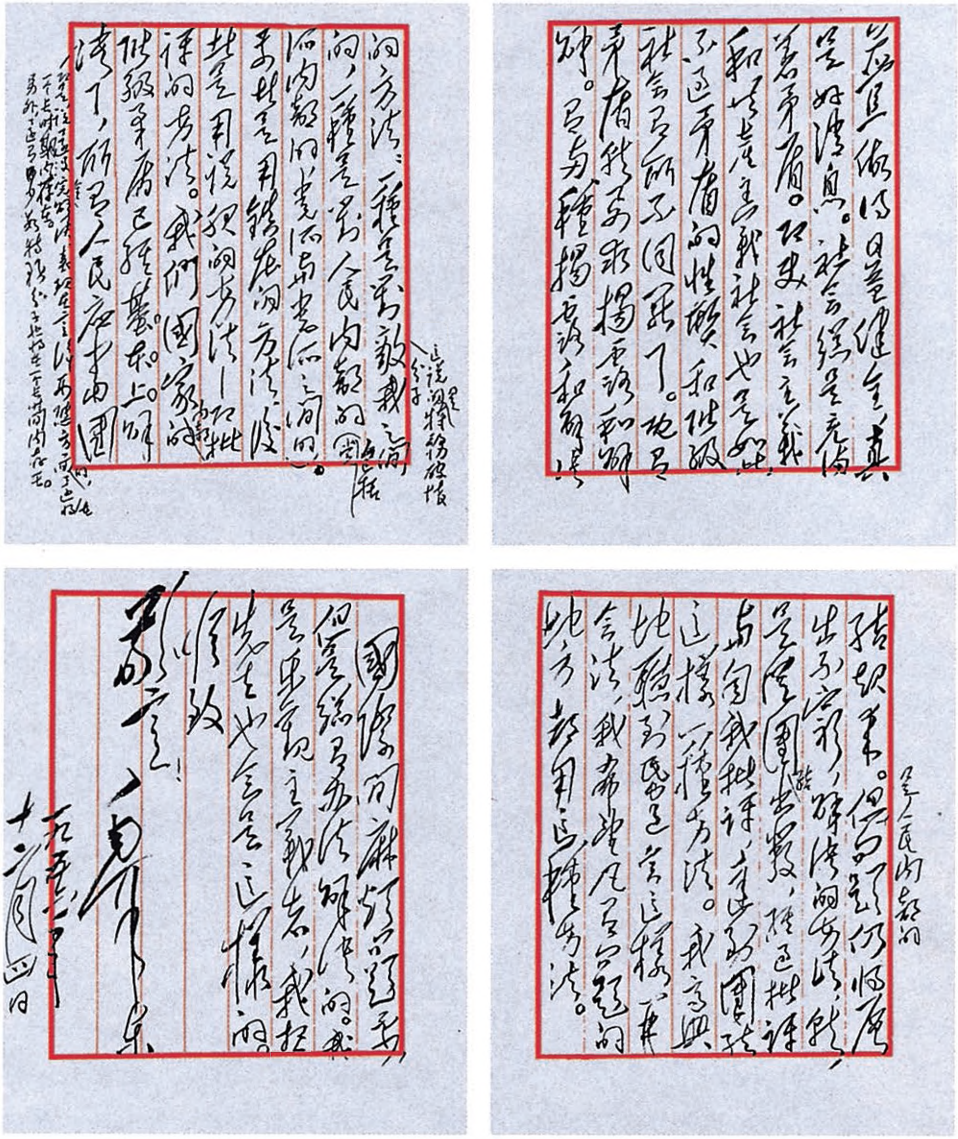
黄任之先生

毛泽东

一九五六、十二、四，到

国际
民建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只要你们自己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只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这是说对特务份子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以人民大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仍然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是这样，工商联会也，我希望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但是总是要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相信也会这样解决的。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给周世钊[1]的信

（1956年12月5日）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形情，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帐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2]，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长江[3]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

---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指周世钊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所作的《过许昌》一诗。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邺中王！"

[3] 《水调歌头·长江》一首词，毛泽东写于1956年6月。词中的"逝者如斯乎"，在同年12月16日给黄炎培的信中，更正为"逝者如斯夫"。这首词的题目，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时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会出国，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给贺果[1]的信

（1956年12月5日）

贺果兄：

惠书敬悉。告我以中小学形情，极为有益。我暂时不会出国，请放心。情意勤恳，极为感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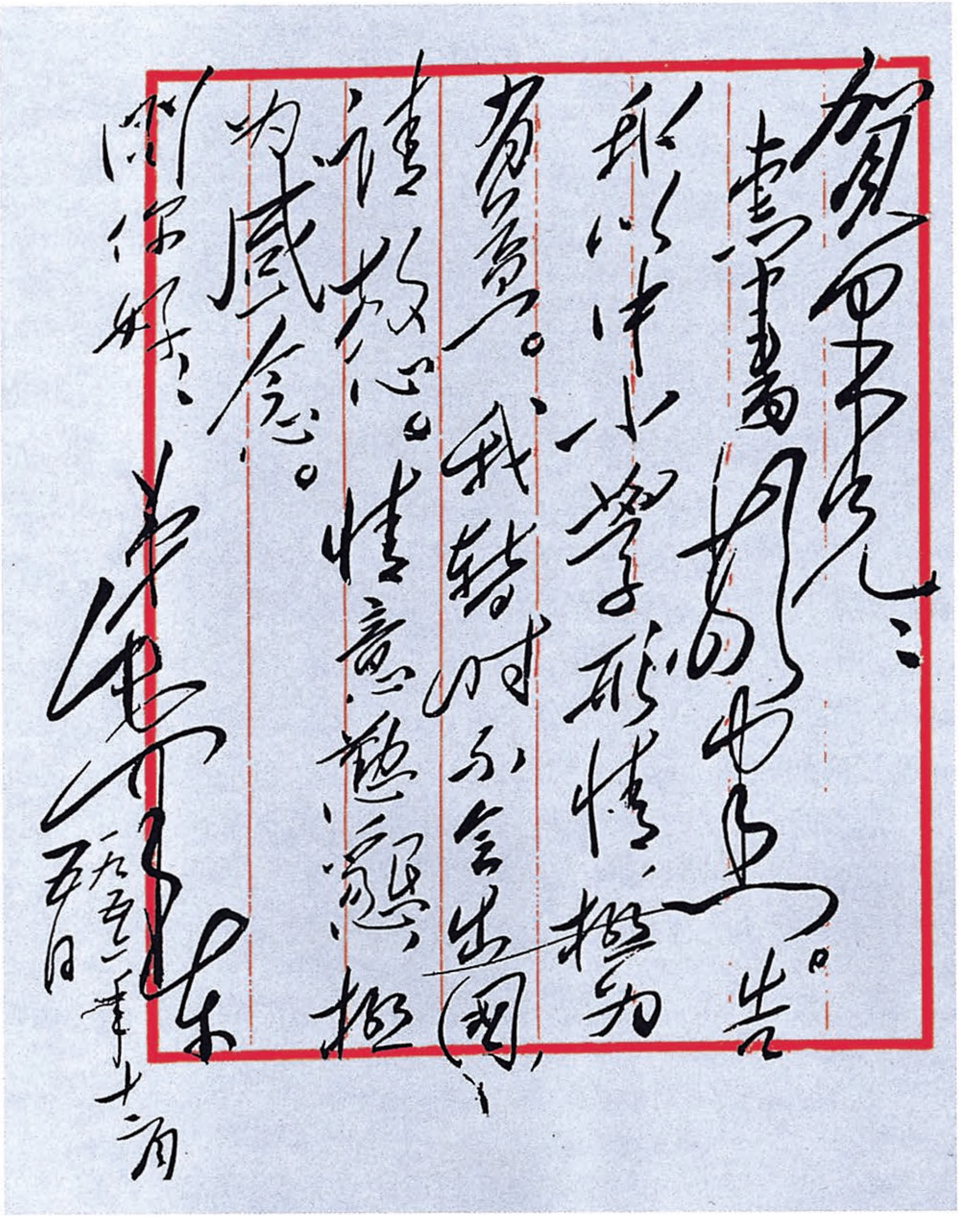
问你好！

弟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

[1] 贺果，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贵州省贵阳市副市长。



賀果兄：

惠書敬悉。告我以中小學校情，極為有益。我暫時不會出國，請放心。情意懇懇，極為感念。

附問好！

毛澤東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毛泽东致贺果信的手稿。

和民建、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

（1956年12月7日）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一九五五年十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一九六二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1]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四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二千六百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今年一月杭州会议[2]上，发现了“三反”“五反”[3]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

---

[1] 马天水（1911—1988），河北唐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2] 杭州会议，指1956年1月4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3] “三反”，指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怕。有个公股代表开会回来晚了，老板娘煮了一碗面条给他吃，公股代表不敢吃，怕挨批评。我们一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只批评不鼓励，不认识资产阶级这几年有很大进步，对资产阶级应该采取又批评又鼓励的方针。我一月南下到杭州开会，搞出四十条[1]。回来后开最高国务会议，我讲三年左右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八大[2]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我讲的不同，说是今年上半年基本完成的。谁讲得对？八大报告讲得对。基本完成说的是公私合营，不是国有化，国有化是全部完成。三年左右，可左可右。对我的这句话有人发生误会，想到是不是要取消定息[3]了。取消定息，那是全部完成，不是基本完成。

北京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英雄聚集一处，坏处是不出知识。要出知识就要地方上来人。你们工商联也是一样，空空的几条。地方上来人一吹就出知识。住在北京的人一年要下去半年。北京有理论，有原则，但缺乏实际；地方上有实际，但缺乏全面情况的了解。两者配合起来就好了。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

---

[1] 四十条，指《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2] 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3]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1956年开始支付定息，1966年9月停止支付。

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取消定息不好搞什么高潮，一搞高潮就是整拿定息较多的人，而他们大都是先进核心分子。想快点摘帽子的是中小资本家，他们有些人拿的定息是很少的。小的资本家如果七年的时间等不了，是否可以先“开饭”，先取消定息，先摘掉帽子？我看过两三年要求摘的可以先摘，我们一不提倡，二不搞高潮，三不登报。可以开“流水席”，有先有后。这个“开席”问题，是等齐了再开，还是开“流水席”，由民建和工商联讨论和掌握。中心问题不是在工商业资本家中的百分之九十，而是在百分之十。十三万工商户中，经济上起重大作用的，只有几千户、万把户。解决问题不能从人数来看，代表资产阶级的是大的资本家。

民建主要代表大的资本家。我们团结的主要对象、定息的主要对象是大的资本家，这些人是主客不是陪客。小的资本家是附属性质，替大的资本家加工订货，不起主导作用。我们不要使对国家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提出中小路线是没有把问题搞清楚。当然，中小资本家也有作用，也要照顾。

现在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还是反革命的阶级？不能说是反革命的阶级。他们有选举权，历来反对帝国主义，同政府合作，遵守宪法。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还是非对抗性的？妥协了，还有什么对抗。民族资产阶级遵守《共同纲领》[1]，

---

[1] 《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拥护宪法，接受公私合营，没有对抗了。资产阶级在“三反”“五反”中只是部分的对抗，只有完全违法户才是对抗的。最近几年，更融洽了。现在是我们的工作跟不上，不能怪下级，只能怪上面，比如公私关系，不敢吃面条，不敢讲话，“左”的空气。座谈会[1]证明资产阶级的进步是主要的，但还有缺点错误，还要继续改造。资产阶级中，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是个别的，整个阶级不能说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现在有些文章太“左”了。合营了，没有对抗了，合营前已经没有对抗。民建、工商联、民主党派同我们是合作的，看不到对抗。要组织人写这方面的文章。

但是，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一面进步，一面落后。如果认为只有一面性，那就不需要改造了，说只有一面性，是不利于改造和进步的。我们的任务是又鼓励又批评，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对立统一的。又鼓励又批评，一万年也是这样。我过去说过两句话：人是可以分析的，不犯错误是没有的。资产阶级可以分析，共产党也可以分析。

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

---

[1] 指1956年7月6日至9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和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工商界代表就公私关系、人事安排、工资待遇、定股定息以及小商小贩的安排等有关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问题，反映了很多情况，并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

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1]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重庆的低质产品，旺季不合规格，淡季合规格了，是因为旺季社会需要太大，供应不足。供应不足是长期的，是好现象，是因为购买力增长。要想办法。定息时间要相当长，急于国有化，不利于生产。公私合营有优越性，比不合营好，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资方的态度也改变了。

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

---

[1] 新经济政策，是苏俄1921年开始实行的用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极大的作用。八大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了这方面的理由。

工商联将来怎么办？也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定息取消了，资本家也还要改造。工商联这个名称可以保存下来。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1]一万年要保存。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把《申报》[2]取消了，我不高兴。《解放日报》可以恢复为《申报》。党报也可以用原来的名字。我年青时到乡下走亲戚，那里都叫卖《申报》，可见深入人心。内容改变，名称保存。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3]要永远保存下去。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名称是封建时代的也可以。“长城”和“省”，就是从元朝开始这样叫的。

韩愈[4]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

---

[1] 瑞蚨祥，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1870年前后开业。同仁堂，指北京同仁堂药店，1669年开业。

[2] 《申报》，1872年在上海创刊，1949年上海解放时停刊。

[3] 王麻子，指北京王麻子刀剪铺，1651年开业。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1903年开业。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1864年开业。

[4] 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孟州）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1956年12月8日）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九千人，十期就有九万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

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我们有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去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但还没有最后完成，在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公私合营等方面，都还有很多问题。将来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了以后，也还会有许多问题。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比如生活问题、工作问题、经济性质的问题、政治性质的问题、文化性质的问题。所谓问题，就是矛盾，世界是充满了矛盾的。今天你们提的问题，就是矛盾，就是不协调，摆得不平衡。

我现在谈谈时局。你们看，社会主义搞得成搞不成？你们是不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社会主义恐怕搞不成吧？社会主义阵营要崩溃吧？我看就是崩溃了，也没有什么大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社会主义阵营最重要的国家，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不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香港是我们中国的，为什么他们要夺走？万隆会议为什么能够团结这么许多亚非国家？就是因为帝国主义是侵略压迫人家的。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幻想处在苏联和美国之

间做桥梁而有所得益，这种想法是不适当的。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工、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替我们设计过。在我国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宗教界、工商界中，甚至在一部分无产阶级中，也还有人幻想美国会帮助我们，英国会帮助我们。这是不会的。

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我们信仰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们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不是硬搬苏联的经验。硬搬苏联经验是错误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农业的合作化是跟苏联不同的。苏联农业集体化后几年是减产的，而我们农业合作化后是增产的。今年灾荒比去年大，但粮食比去年可以增产二百三十亿斤，其他好几种经济作物也是增产的。这是因为我们的农业合作化是采取逐步渐进的办法，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分三步走。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的，应该说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这一点工人是不大了解的，因为他们在厂里从前是跟资本家作斗争的，我们应该对工人说清楚。工商界的学习高潮以来，你们愿意学习，工人是会对你们改变观感的。在资本家中要宣传把个

人的事情和国家的事情联系起来，提倡爱国主义，总要想到国家的事情。在农村里过去曾提过“要发家，种棉花”的口号，结果大家只管家了，后来觉得这个口号提得不对，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这就把家和国联系起来了。你们也要把家和国联系起来，这个国家你们也是有份的。

你们这个会[1]的中心是要讨论你们自己的事情，同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回去宣传教育时也要联系到国家的事情。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在我们的国家里，没有发生像有的国家那样一种反苏潮流，工商界当中也没有，青年大学生当中也没有。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国家建设人才，我们是完全信任他们的。他们是你们的子弟，解决你们的问题对他们也会产生影响。至于入学、助学金、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要一视同仁，只看条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如果成绩不够的，就是工农子弟也不能录取，资本家子女成绩够的就应该录取。助学金应该看学习成绩和家境情况来决定，大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就不要补助了，中小资本家出身而家境寒微的就应该补助。入团、入党都应该以是否具备条件作为标准。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爱国的阶级，但是不要说是红色资产阶

---

[1] 指1956年12月1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

级。民族资产阶级中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颜色不一，思想状态不一，并且有两面性，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这是合乎事实的。因此，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学习。如果说都是好的，那就不符合事实了，也就不要学习了，变成圣人了。一个人不要满足，世界上的事情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要加紧学习。我们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有好处的，这样我们就有一个任务，要学习。

匈牙利事件[1]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呢？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为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硬套苏联的办法，没有照顾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我们提过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但我们从来没有提过学习他们落后经验的口号。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上是好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是好的，匈牙利事件也基本上解决了。当然，世界上还会出乱子的，中国也会出乱子的。但不要以为出了一个高岗，出了一个贝利亚[2]，斯大林犯了错误，就不得了，就睡不着觉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我们不是板起面孔专门教训人的，不是意见提得不对就给他一棒子，打得他头向下、脚朝天。我们叫人民政府，你们有话尽可

---

[1] 匈牙利事件，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2] 贝利亚（1899—1953），曾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部长等职。1953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认定他犯有“反党叛国”罪，决定将他开除出党。12月，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秘密审理了贝利亚案件，并发布了《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关于审理贝利亚等人叛国案件的通告》。贝利亚被判处死刑。

以讲，不会借故整人的。

我再来谈谈经济问题。你们关心的是大中小资本家的问题如何解决，定息问题如何解决。大、中、小应该分阶层。我现在提一点意见，是否对，请你们考虑。我主张把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不划入资产阶级范围，拿到的定息只够买几包香烟的，就叫他们小资产阶级。资方代理人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围，叫上层小资产阶级。过去我们也这样搞过，在土改当中，有种小地主，就叫他小土地出租者，不叫他地主。资方代理人或拿定息很少的资本家，如果一定不愿意干，要劳保，可以把他们划出来，但不是今年，是明年、后年，以免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要定息，使那百分之十拿定息的人过不去。是否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政府也要考虑。中小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就放弃，不愿意放弃的就让他拿下去。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是大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还是中小资本家对国计民生的作用大？中小资本家人数多，占资本家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生活的作用不大，对国家经济生活作用大的，还是大资本家。你们会说我照顾大资本家，不照顾中小资本家，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不照顾中小资本家，中小资本家人数很多，不注意安排是错误的，要替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党内有过中小路线，应当承认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对中小资本家必须照顾，现在我们把他们放在小资产阶级范围内来解决。农民是小资产阶级，是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城市也有小资产阶级，其中就包括中小资本家。从公私合营和国有化来说，大资本家对国家的意义更大。所谓大也是比较而言的，并不是说中小资本家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中小资本家，没有手工业，我们就不能生活。没有农民我们就没有饭吃。不对大资本家很好地照顾，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都摘掉了帽子，剩下的占百分之十的大资本家就会感到面子上不光彩，说别人都是红色的，我们还是白色的，不好看。我们不能这样做。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七年为期，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七年。八大文件里已经有这个意思，现在和你们商量。工人可能会反对，中小资本家也可能会反对。工人会说太便宜了资本家，照工人的想法最好马上就取消定息。中小资本家认为搞一二年就行了，为什么要那样长。所以有两个抵触，第一个是工人，第二个是占百分之九十的中小资本家。这就需要说服。要赎买就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本钱也不大，工业私股资金只有十七亿元，折合美金七亿元不到，只有那么一点。我们国家怎么会不受欺侮呢？帝国主义欺侮我们是有理由的，民族资本只有这么一点嘛。要赎买就全部赎买，不要省这几个钱，不要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要说服工人，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这对整个国家是有利的。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七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中小资本家人数多，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大资本家人数少，但他们的资本多，比中小资本家对国家的作用来得大，所以中小路线是不对的，应该是大中小路线。工商联大会的代表中，中小资本家占多数，要向他们说明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损害他们的利益，对工人、

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不见得有利。中小资本家的利益是尽早摘掉帽子，大资本家的利益则是定息时间拖长一些。可以各搞各的，要早摘掉帽子的就早摘，虎头虎身七年，愿意拿定息的还可以继续拿。这样做可以不可以？现在没有法律规定，大家可以商量，到了七年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再拖一个尾巴也可以。

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这个利他们一时还可能不了解。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是不要继承权的，但是对政府这样对待资本家他们是会满意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上层领袖、宗教界也都会满意的。很快地取消定息，他们会不满意的。还有外国人，他们到中国来都要到上海看看荣毅仁[1]先生，看看他有几部汽车，一部还是两部，房子里有没有钢琴。有一个法国资本家看过以后说，只要法国共产党这样做，他就放心了。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急于取消定息是没有好处的。实际上定息没有几个钱，一年只有一亿二千五百万元，有人还说只有一亿一千万，七年总计不到八个亿。这个钱没有送给日本人、美国人，是送给中国人的。总之肥水没有落入外人田，是“楚弓楚得”[2]，是国家的购买力，也是公债推销的对象，还可以用来开工厂，可以从各方面来考虑。我们做事要“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

---

[1] 荣毅仁，1916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2] 典出《说苑·至公》：“楚共王出猎而遗其弓，左右请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1]这是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说的。我们的革命就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是为建设扫清道路。革命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加以改变，把经济制度加以改变，把政府、意识形态、法律、政治、文化、艺术这些上层建筑加以改变，但目的不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一个新的生产关系，而在于发展生产。七年来我们发展了一些，还很少。现在我们只有四百多万吨钢，明年有五百万吨，再搞五年也只有一千多万吨钢。我们国家有六亿人口，这点钢不算事，同日本、法国比可以超过它们，要赶上美国一亿吨钢，还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请大家把目标转向这个方面。过去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工商联开会，民建开会，大家学习，为的什么？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钢，我们还要别的东西，还要办学校，全国人民至少要初中毕业，再过多少年，扫马路的人、大厨师以及所有的人都要能够大学毕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我们一切的工作就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导参加会议的这一千多人，把目标向着生产方面。我们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在生产上、科学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

[1] 参见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8页）。

1956年12月1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图为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会议代表。

对浙江执行侨务政策情况报道的批语

（1956年12月8日）

罗瑞卿[1]同志：

111页上关于浙江省的一条消息[2]值得一看。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2] 指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12月6日第二〇七一期刊登的《浙江省许多地区在执行侨务政策中存在不少严重缺点》。文内说，出席浙江省最近召开的侨眷、归侨代表会议的代表反映，浙江各地（特别是农村）在对待侨眷和归侨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不少青年由于亲属在国外不能入团，甚至入工会也受阻碍；国外来信被拆阅以至传阅；干涉侨汇使用，强迫借贷、捐款和购买公债；一些公安部门对归国观光、探亲的华侨出国多方限制、留难。代表们认为，政府的政策是很好的，但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下面执行得不好，要求大力开展对侨务政策的宣传，重视贯彻侨务政策的问题。

给杨开智[1]的信

（1956年12月13日）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2]及阖家安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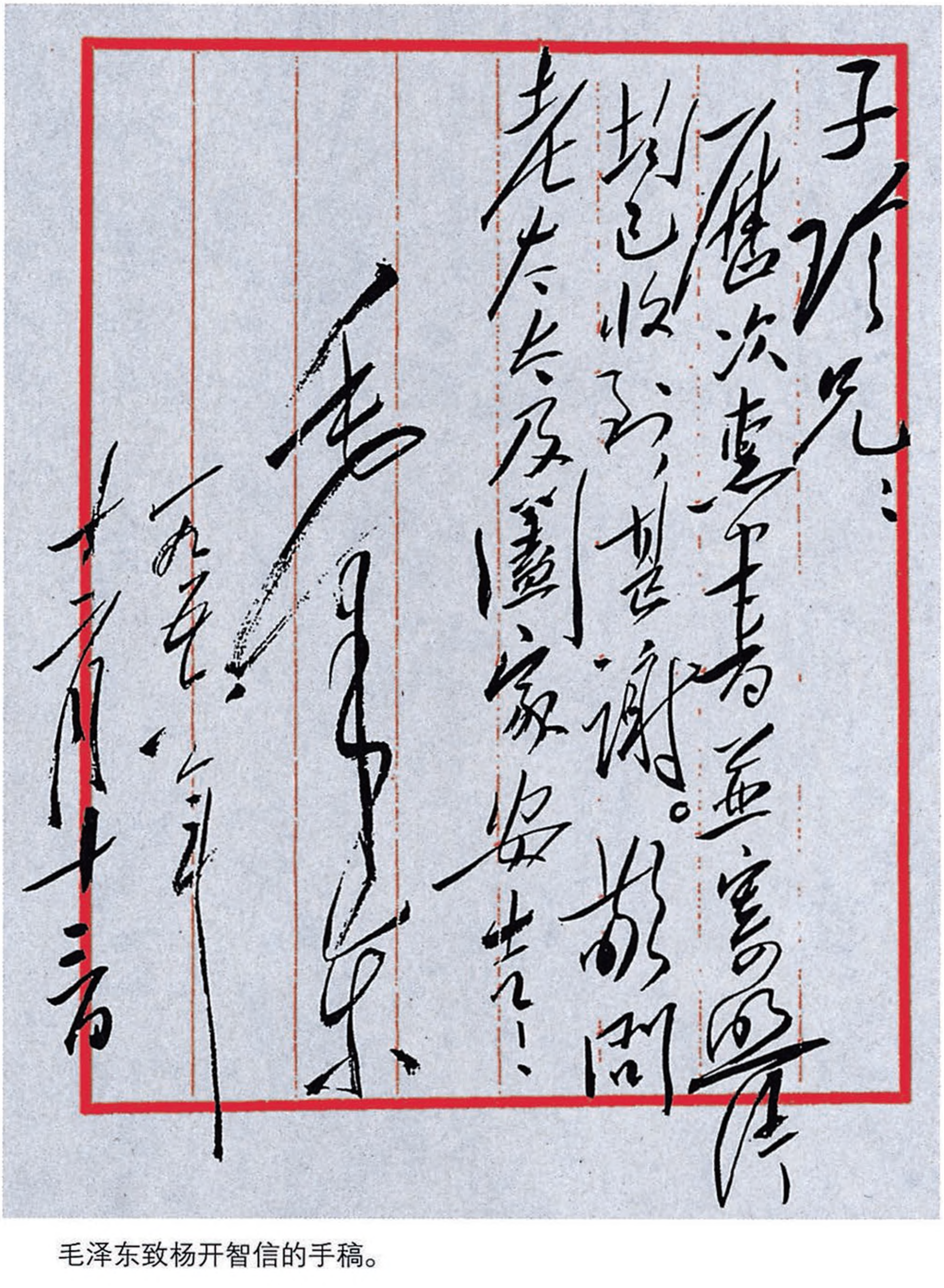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1]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子珍兄：

屡次惠书并寄两[illegible]，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杨开智信的手稿。

给毛春秀[1]的信

（1956年12月13日）

春秀同志：

给我的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

调你儿子做财经工作一事，我不能办，要在当地所属机关自己申请，乞谅为荷！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1] 毛春秀，毛泽东的姑母。

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2月14日）

退彭德怀[2]同志：

可以准备在春季或春夏之间了解几个军事部门的工作情况。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1956年12月13日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你在今年夏季说过两次，军事系统各部，也要照政府各部一样，系统地向中央汇报一次工作。我认为这不仅对于中央政治局或常委会的同志了解国防建设是必要的，同时对于军事系统各部、各军种、兵种的同志也是一次很大的鼓励。因八大前后事情很忙，这项工作未能进行，可否在明年1月初旬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进行汇报。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对中央关于西藏问题复电稿的修改和批语[1]

（1956年12月16日）

一

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2]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但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

---

[1] 中共西藏工委1956年12月12日电告中央，西藏拉萨等地可能发生暴乱。中央统战部于15日为中央代拟了关于西藏可能发生暴乱对策问题的复电。这份电报原只发给西藏工委，毛泽东审阅时在电头加写了“并发驻缅甸大使馆转周总理，另发驻印度大使馆知悉”等文字。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央复电稿集中修改的一段，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1]，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

二

少奇阅，即刻发，再送朱、陈、彭、谭、徐冰、洛甫、汉夫[2]阅。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十七条。

[2] 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汉夫，即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的报告的批语

（1956年12月16日）

请总政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将此件[1]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区党委及志愿军党委，一律仿照办理，并以结果上报。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

[1] 指南京军区党委1956年11月16日关于进一步密切军队和地方关系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军委、总政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在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上还存在着某些不够协调的情况。例如，有些部队对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地方全面工作照顾、配合不够，向地方提出的有些要求偏高偏急，而有些地方工作同志因对部队情况缺乏了解，对其特点和需要也照顾不够，等等。为了进一步密切军队与地方党政的关系，解决现存的一些问题，报告建议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月期间，请地方各级党委主持召开有驻军党委同志参加的会议，检查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商讨今后密切联系、加强团结的措施，研究如何共同努力加强治安工作，搞好新兵征集、复员转业等项工作。

给黄炎培[1]的信

（1956年12月16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前信[2]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赠吴湖帆先生、张叔通先生[3]各五百元，敬请转致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毛泽东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的信。

[3] 吴湖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张叔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江苏省和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给杨开英[1]的信

（1956年12月16日）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2]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3]及杨子珍夫妇[4]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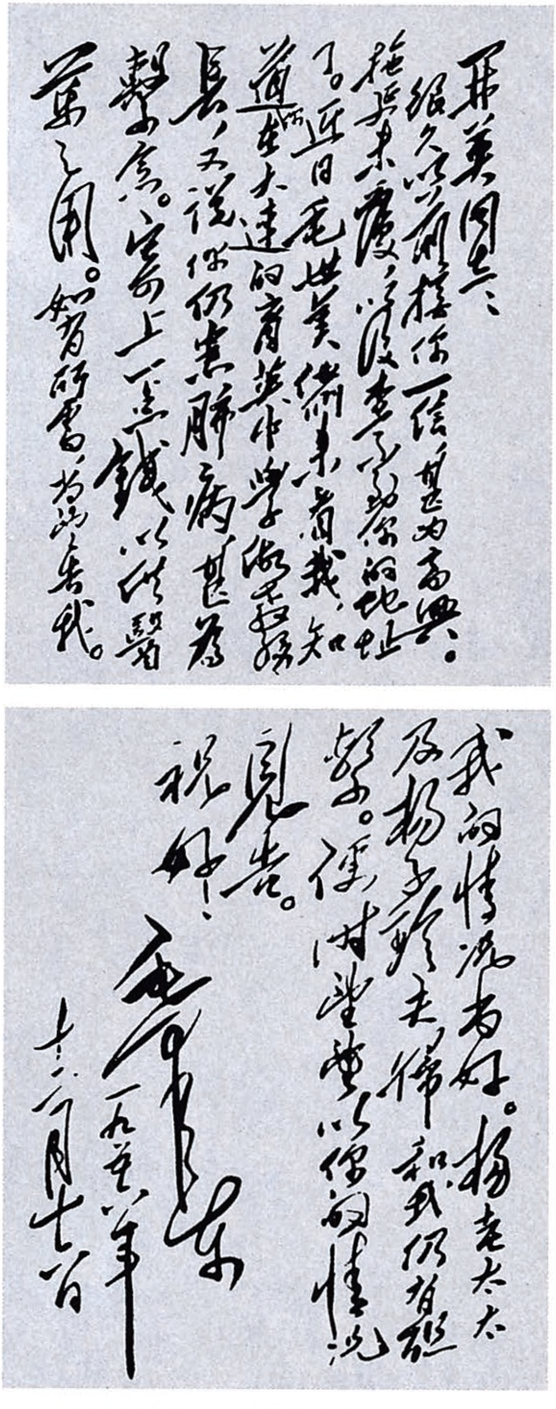
---

[1] 杨开英，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堂妹。当时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

[2] 毛世美，现名毛臻，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3] 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4] 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字子珍）和他的夫人李崇德。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据兵来覆，谈及李家的地址了。近日毛世英偕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们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作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可以告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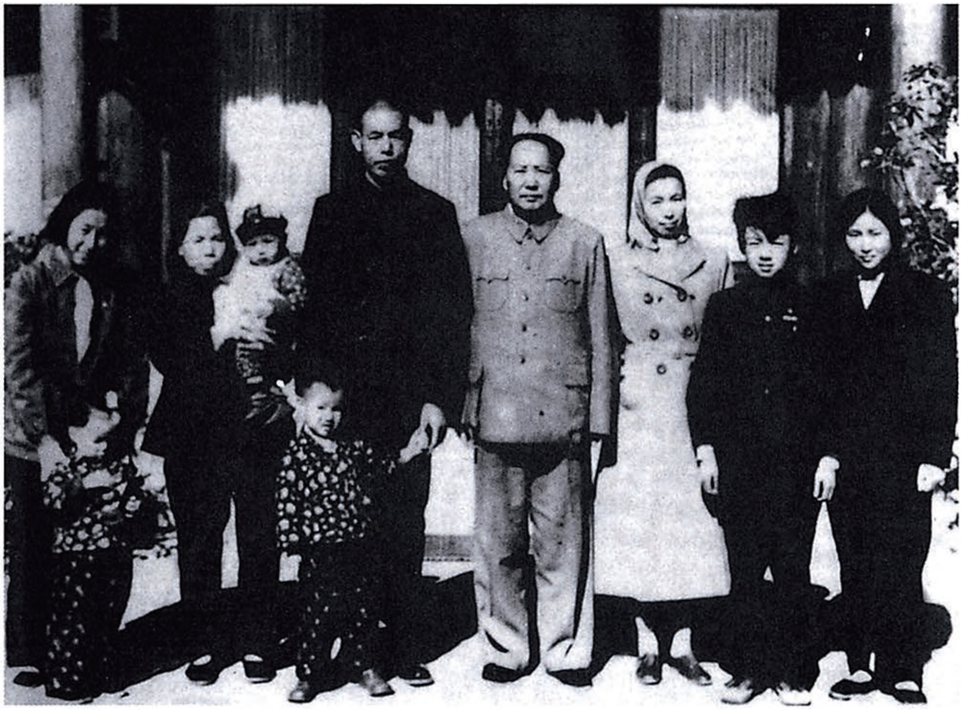
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们都很好。便时望以你们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毛泽东致杨开英信的手稿。



1956年，毛泽东和毛泽青等在中南海合影。

对邓子恢关于撤区并乡试验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6年12月21日）

震林、尚昆同志：

此件[1]请书记处加以讨论，如大家赞成的话，则转发各地仿办[2]。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一日

---

[1] 指邓子恢1956年12月18日关于福建省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试验情况给邓小平转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今年5月龙岩县委并区并乡时将白土区撤销，合并于附城区（5个小区合成的大区），将原属7个乡并为3个乡，将原来乡干部中较强的调到县区工作。结果，乡的范围扩大了，任务加重了，干部的力量却削弱了，乡干部成天忙于日常事务，不能深入下层。针对这个情况，今年11月在白土进行撤区并乡试验，将3个乡并为1个乡，将原来区里的主要干部调回去，并将原3个乡的干部12人合并，名称叫乡，实际上是区，干部相当强，可以独立工作。改编之后一般反映较好，有利于减少层次，发挥乡的积极性，加强乡的领导。

[2] 1956年12月28日，中央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指出，中央认为龙岩县白土区撤区并乡的经验是好的，可供各地参考。但目前对全国撤区并乡问题还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各地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和自己的经验，自行决定撤区（或撤销全部、或撤销大部分、或撤销一部分）或不撤区，并乡或不并乡，以及何时撤区并乡。凡撤区并乡的地方，应根据乡的范围大小，配备较强的干部，并注意总结经验。

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的批语[1]

（1956年12月21日）

一

陆定一[2]同志：

天主教事现在是否仍归你管理？上海的天主教工作值得加以研究，将那里的有关管理和接触天主教的干部和天主教中的进步分子加以教育，使他们善于做工作。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一日

二

此条[3]可以一阅。

阅后退毛。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个内部刊物的封面上。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 指这期刊物刊载的《上海市卢湾区宗教界人士的思想情况》这条消息。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2月24日）

此件送陈叔通先生一阅[2]，退还陈云副总理。

我在这里[3]讲的是“大约三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讲三年全部完成。所谓基本完成，在工商业就是公私合营，但不是三年而是半年即完成了，我多估计了两年半。所谓全部完成，就是国有化，即取消定息，那是至少需要七年的。

毛泽东

十二月廿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1956年12月23日关于遵陈云之嘱将同年1月26日《人民日报》送给毛泽东审阅的报告上。

[2]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看了毛泽东这一批语后，于1956年12月25日写了以下一段话：各报均如此登载，我们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亦是照此传达，只是未曾再加一句：即是走上高级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国有化。因此，有些人不懂基本两字，懂的亦不免怀疑，说三年结果去冬今春已走上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再两年即转变为国有化。这次毛主席说明定息七年还可能拖一个尾巴，大家就安心了。陈云将陈叔通写的这一段话报送毛泽东。

[3] “这里”，指高智送阅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毛泽东1956年1月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说：“从去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对中央转发统战部关于加强地方政协工作意见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6年12月24日）

一

在中央指示[1]的末尾加了一段，请少奇、徐冰[2]同志再阅，交尚昆[3]办。

二

大约在一九五七年夏季，中央将召开一次专门讨论全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会议，请你们早作准备，将所属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包

---

[1] 指中共中央1956年12月24日为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转各地委、市委、县委的指示。毛泽东在审阅这一指示稿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

[2] 徐冰，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括少数民族工作）加以认真的检查和安排。对于有些在党外人士面前爱摆老爷架子，宗派主义作风极为严重的同志，应当认真地给以批评和教育，端正他们的态度和作风。

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西郊机场和女青年们在一起。

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的修改[1]

（1956年12月24日）

各地合作社对于富裕中农急急忙忙叫他们入社，或者让他们入社，本来是不策略的。按照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报告[2]所规定的策略，是首先让一部分觉悟了的贫农下中农入社，然后让后觉悟的大部分贫农下中农入社（分批分期），不要忙于动员富裕中农入社。后来在合作化潮流高潮中富裕中农勉强入社，就有些人来说，当时也很难劝阻。今年分配所得，他们的收入一般都有些减少，因此怨言甚多，有些人要求退社。中央认为让一部分（不是大部分，更不是全部）坚决要求退社的富裕中农退社，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请你们考虑这个政策是否可行。如果认为可行，就下决心让一部分人退社。

---

[1] 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1956年12月4日关于退社问题报告的批语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同年12月24日，中央转发了广东省委的这一报告。

[2] 指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的批语[1]

（1956年12月26日）

一

刘、朱、陈、闻天[2]阅，退彭[3]。

---

[1] 这个批语写在彭德怀1956年12月12日关于援助埃及军事装备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彭德怀在报告中说，7日埃及大使来访，声称埃军在西奈半岛作战中，虽然部队损失不大，但军事装备损失很多。现在英法军队虽然被迫撤退，但战争危险并未消失。为了坚持长期的斗争，埃军总部希望知道中国除了在政治上、道义上的支援以外，在军事装备方面能够给予何种援助及其条件。我当即说明我国军事装备生产的情况，并告毛泽东主席曾说过，只要埃及需要的，我国有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并愿意援助，至于条件则可商量，通过协议的方式、贷款的方式或无偿援助的方式均可，这主要看埃及方面觉得哪种方式合适即采取哪种方式。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闻天，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二

筹划的两项[1]，可以进行筹划。具体援助事项，须经国务院统筹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

---

[1] 指彭德怀在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已告总参谋部筹划的两件事情：一、具体研究一下我国生产的轻武器有哪些可以出口，以便为政府以后商谈援助埃及问题做好准备。二、我国生产并可出口的步兵轻武器样品，准备给埃及大使参观一下。

给周世钊[1]的信

（1956年12月29日）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2]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3]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顺祝平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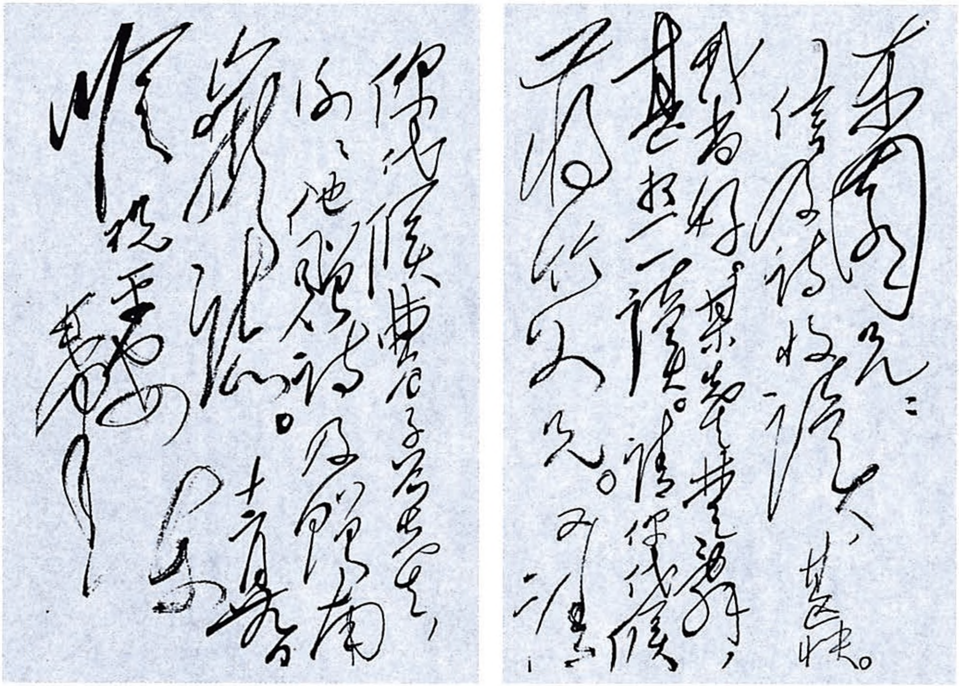
十二月廿九日

---

[1] 周世钊，又名东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 曹子谷，即曹籽谷，解放前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1]

（1956年12月）

一

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

二

保卫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这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在目前

---

[1]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发表于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在起草过程中作过多次修改。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审阅第三、四、五、六稿时作了较多修改的四段文字，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和加写的。此外，在第六稿第1页上论述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同全世界人民力量对立问题的一段文字旁边，毛泽东写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应〔在〕全文末尾写一小段”的批语。后来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在第四节末尾增加了这样的内容。在第六稿第9页上，他还删去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在旁边写了“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的批语。

的国际形势下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一切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团结无产阶级，团结人民群众，坚决地击退帝国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世界的猖狂进攻，坚决地沿着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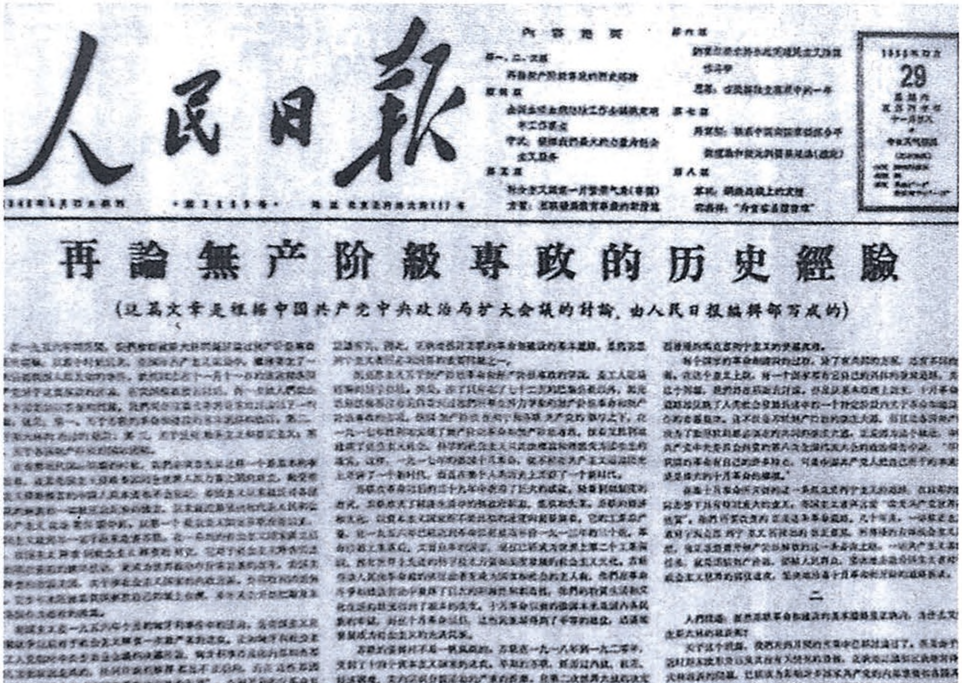
三

我们在总结斯大林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时候，必须同时看到他的正面和反面，他的功绩和错误。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某些时候为了纠正这些错误而对这些错误加以强调是必要的，但是为了作出正确的估价，不使人们发生误解起见，将这些错误放在适当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

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路线，我们的党现在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一些错误。



人民日報

29

再論無产阶級專政的历史經驗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的討論，由人民日报編輯部写成的）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

和周恩来应对联[1]

（1956年）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毛泽东）
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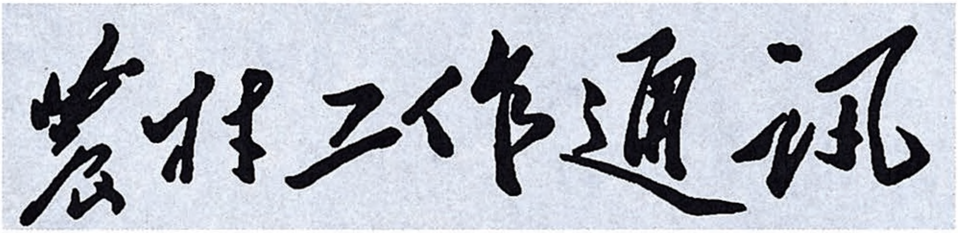
---

[1] 1956年，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湖南视察。一天他们同乘一辆轿车，行至湘江橘子洲头岸边，毛泽东追忆青年时代在这里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的情景，不由豪兴勃发，提出和周恩来对对子助兴。毛泽东即景咏出上联。周恩来正在思索时，小车驶到当年毛泽东常和同学们谈论天下大事的天心阁。这时，一群鸽子从阁内飞出。周恩来灵机一动，忙说："主席，对子的下联我对出来了。"接着念出了下联，毛泽东会心地微笑着。

为《农村工作通讯》杂志题名[1]

（1956年）

农村工作通讯



毛泽东为《农村工作通讯》杂志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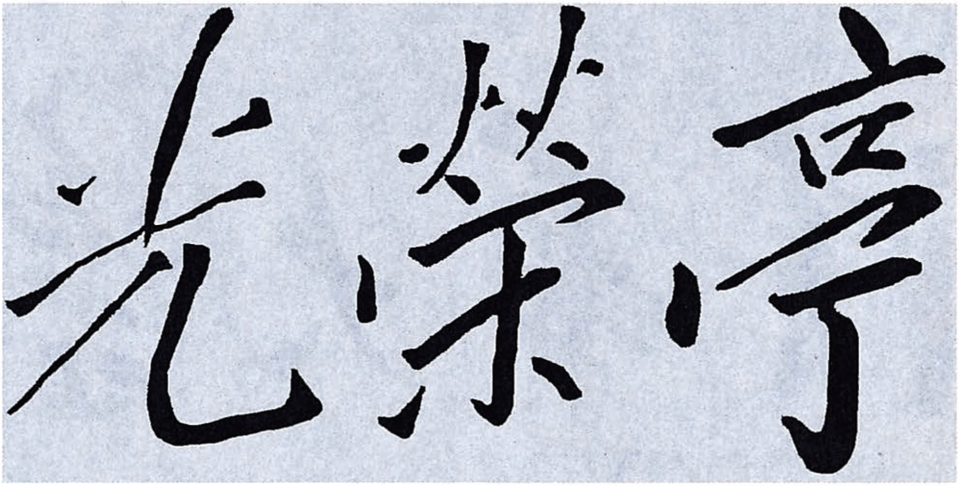
---

[1] 《农村工作通讯》创刊于1956年5月，由毛泽东提议创办并题写刊名，先后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国家农委、农业部的机关刊，是唯一一本专注于“三农”问题的国家级新闻期刊。

为光荣亭题写亭名[1]

（1956年）

光荣亭



毛泽东为光荣亭题写的亭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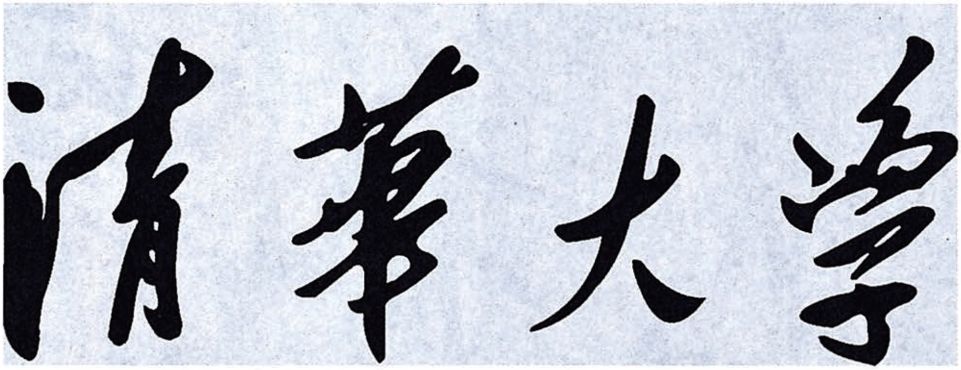
---

[1] 1956年，光荣亭重建，毛泽东亲笔为这座新建的光荣亭题写亭名。

为清华大学题名

（1956 年）

清华大学



毛泽东为清华大学题写的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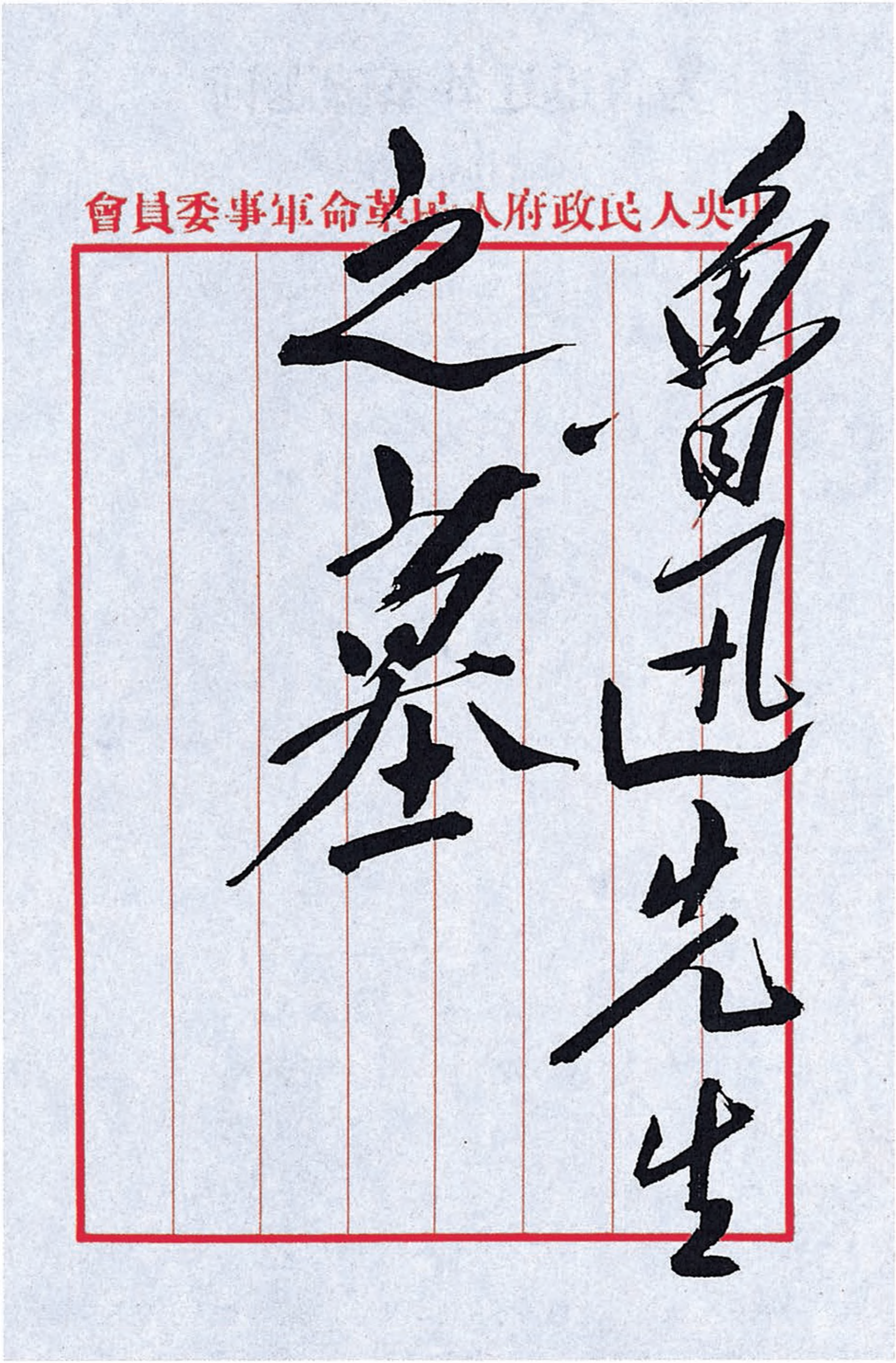
为鲁迅迁葬墓碑题词[1]

（1956年）

鲁迅先生之墓。

---

[1] 鲁迅墓，原在上海西郊万国公墓内，1956年鲁迅逝世20周年前夕迁葬于四川北路146号鲁迅公园（原虹口公园）内西北隅。毛泽东为其墓碑题词：鲁迅先生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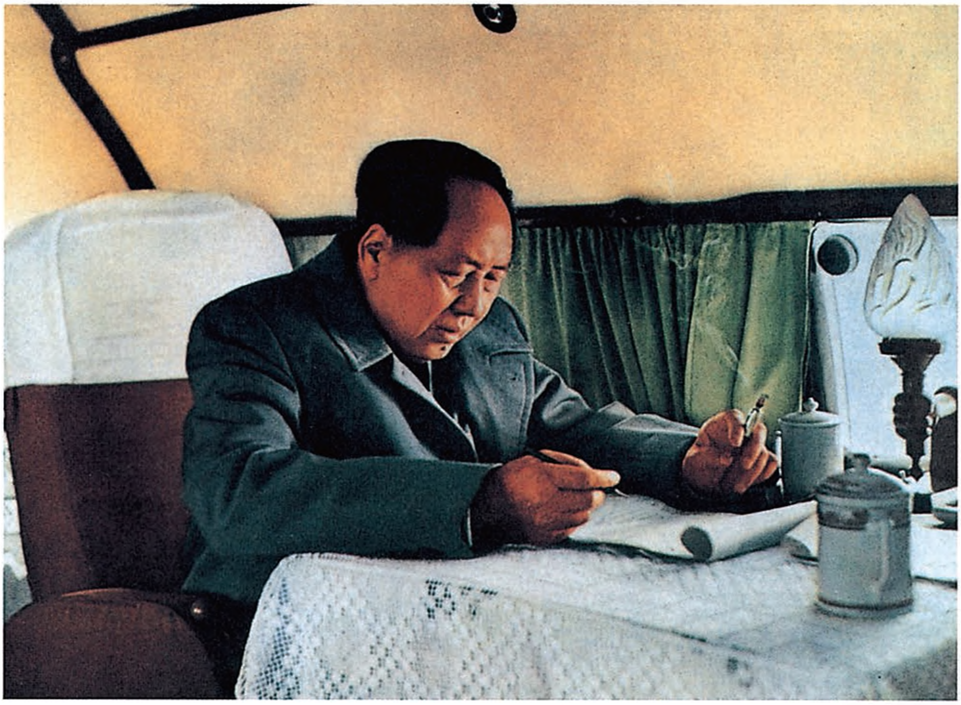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魯迅先生之墓

毛泽东为鲁迅迁葬墓碑的题词。

1957



1957年3月19日，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

关于登载高士文章[1]的批语

（1957年1月3日）

退陆定一同志：

此件[2]看过。高士文章也看过，可以登世界知识。我已〔转〕胡乔木、田家英二同〔志〕一阅，大概不久就可以退还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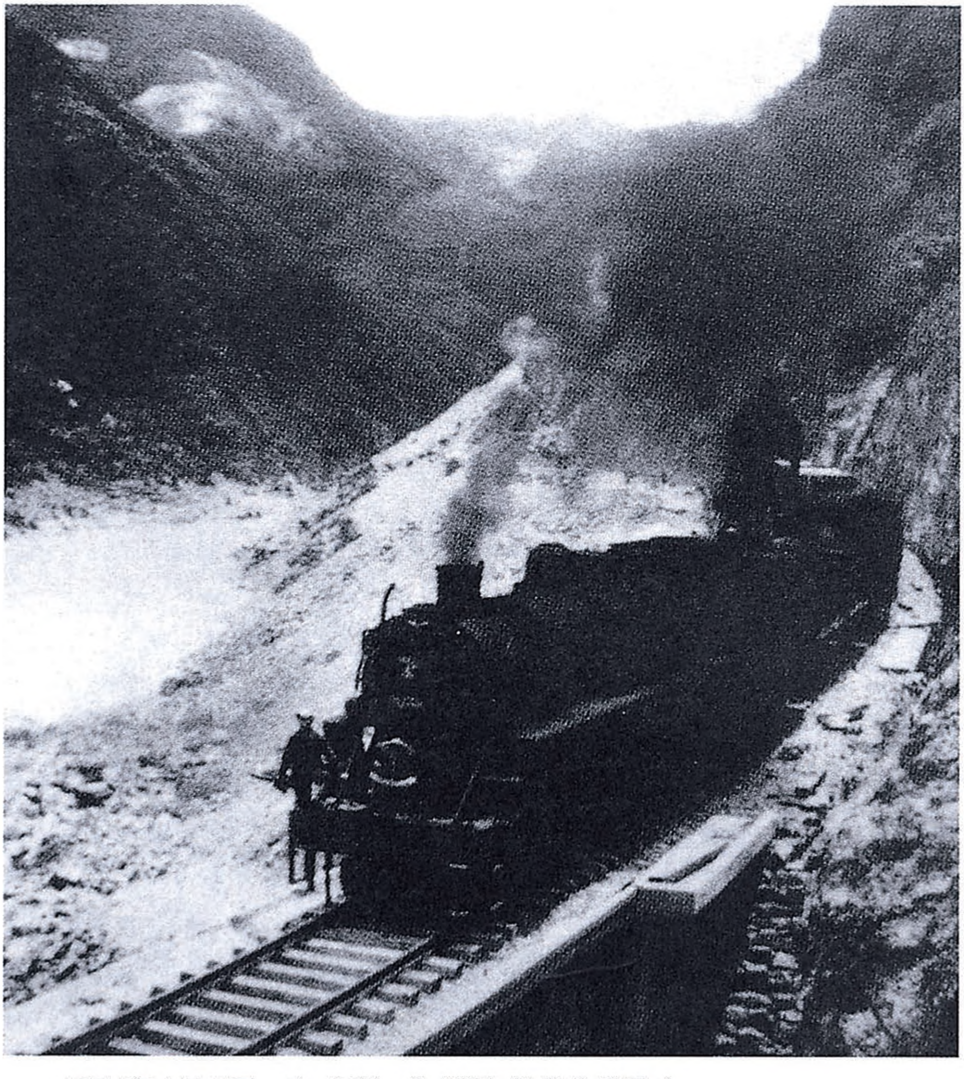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三日

---

[1] 指印度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阿约艾·高士写的《论印度的发展道路》一文。1956年，苏联《新时代》杂志第二十八期和第三十二期先后发表了经济学博士摩德斯特·鲁宾斯坦的《论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和《再论不发达国家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两篇论文，在印度等许多国家中引起了各种反响。这两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关于在印度制止垄断资本继续生长，通过和平方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高士认为，这不符合印度的实际情况。他在印度《新世纪》月刊1956年第十期上发表这篇文章批评鲁宾斯坦的观点。《世界知识》1957年第二期转载了鲁宾斯坦的第一篇文章和高士的文章。

[2] 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成员加拉赫和阿诺德1956年10月26日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问题的意见。他们说，目前的英译本不能令人满意，译本和原著的重要性不相称，毛泽东出色的文体也未能得到体现。建议本着信、达、雅的原则，组织精通中、英文和具有将作者的特性翻译过来的特殊才能的人对这一译本进行修订。



1957年1月1日，宝（鸡）成（都）铁路全线通车。

1957年，中国交通事业迅速发展。图为行驶在川藏公路上的车队。

印发江苏省委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报告的批语

（1957年1月4日）

请尚昆[1]注意，待省市委书记到京时将此件[2]印发给他们。

毛

此件请乔木看一下，退尚昆办。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1月4日转发的江苏省委1956年12月22日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况和部署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省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相当严重，铺张浪费现象也较过去有了发展。突出的表现是，机构极为庞大，结果造成会议多、文件多、刊物多、长途电话多、管理和服务人员多，相互之间扯皮也多，致使领导人员高高在上，不能深入基层，处理问题，层层批转，迟迟不能解决，对下面的工作，则管得多，管得死，影响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因此，必须精简机构，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报告对江苏省的增产节约运动作了全面部署：一、广泛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的宣传教育。二、基本建设和各种经费开支不再增加新的项目，冻结现有机构和人员编制。三、调查研究，制订整编方案，省级机关先行一步。中央在批转江苏省委的这一报告时指出：现有编制应冻结起来，任何机关目前不得增设机构，吸收新人员；在没有找到妥善安置办法以前，不要把精简人员从现在工作岗位上减出去。这两点请各地特别注意。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意见[1]

（1957年1月5日）

一

增加一条，这是在中央会议上谈过的，并已向陈叔通、荣毅仁[2]及各省市资本家代表宣布过。

毛泽东

一月五日

二

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进行肃反工作的问题，不但应吸收那些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转发天津市委关于1957年肃反规划的批语稿时，对增写一条所作的说明；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批语稿中增写的第三条。

[2] 陈叔通，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荣毅仁，当时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自愿参加的资方人员参加，而且应和工商联及民建会协商，取得他们同意，方可进行。对于资方人员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在结案时也要有工商联民建会参加审查，得其同意，方可结案。各省市目前是否在私方人员中进行肃反，由各省市自己决定。

对《评艾森豪威尔主义》一文的批语

（1957年1月5日）

定一[1]同志：

国际问题文章[2]内容和文字均无弊病，可以不要修改了。

毛泽东

一月五日夜

---

[1]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人民日报》社论稿《评艾森豪威尔主义》，发表于1957年1月8日《人民日报》。

邀请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信

（1957年1月6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敬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热烈地邀请你，敬爱的主席同志来我国进行访问。我深信，你的访问必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伟大友谊。如你同意，请将你认为合适的访问日期[1]，通知我们。我和全中国的人民以十分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你的光临。谨向你致最崇高的敬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7年1月6日于北京

---

[1] 1957年1月18日，伏罗希洛夫复信毛泽东。信中说："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您的邀请。如果对您方便的话，我准备在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期间访问兄弟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发《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1]一文的批语

（1957年1月7日）

尚昆同志：

请将此文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月中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七日

---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过去一年中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反对“公式化、概念化”，但在反对中有些界线不清的地方，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作为反对艺术应为政治服务、艺术应有高度思想性、艺术应作为教育广大人民的武器的借口。文章还说，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百花中最主要的应该是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在人民新的生活土壤上开出的花朵，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不注意培植和保护新花的百花齐放是不完全正常的。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多次提出了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57年8月21日，陈其通、陈亚丁在《人民日报》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对此作了自我批评。

给臧克家[1]等的信

（1957 年 1 月 12 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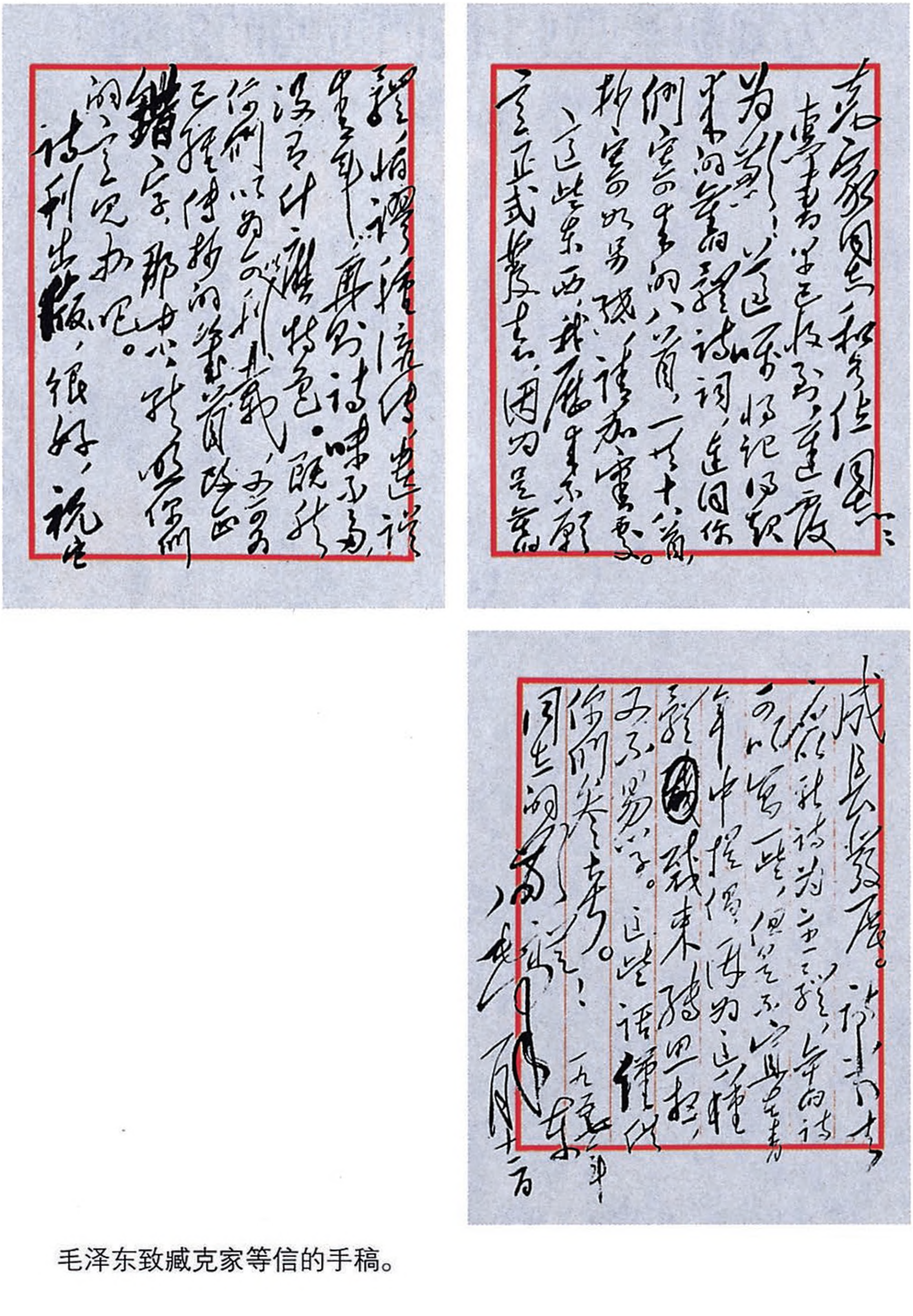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信的手稿。

为刘胡兰[1]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2]

（19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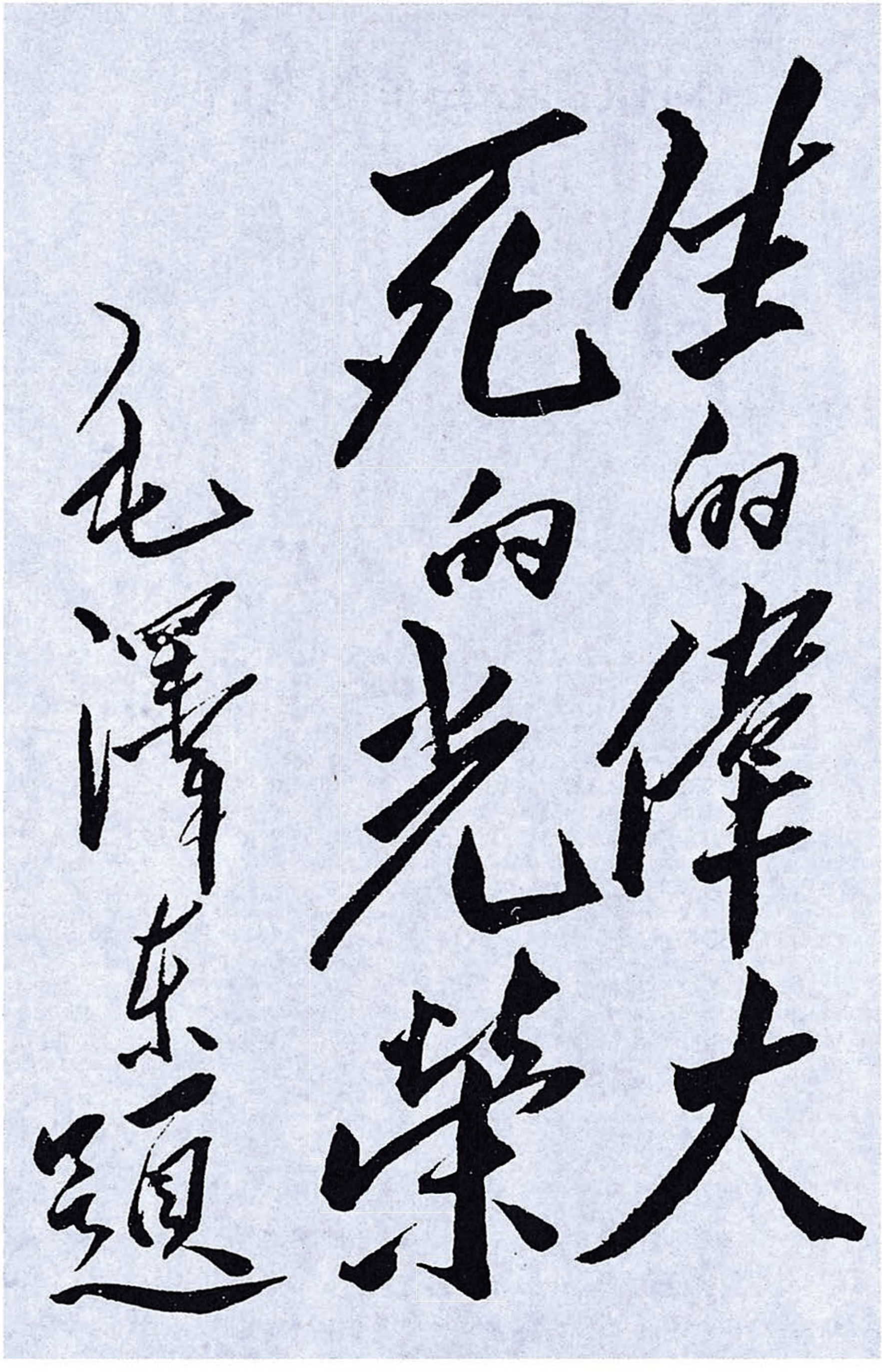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毛泽东题

---

[1] 刘胡兰，山西省文水县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12日被捕，英勇就义。生前曾任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区妇救会干事。

[2] 1947年3月，毛泽东得知刘胡兰的事迹后，曾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字。这一题词后来在战争中丢失。1957年为纪念刘胡兰牺牲十周年，修建刘胡兰烈士陵园，毛泽东为陵园重写了这一题词。



生的偉大
死的光榮
毛澤東題

毛泽东为刘胡兰烈士陵园重写的题词。

对撤销公安军的批语[1]

（1957年1月22日）

照办。[2]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黄克诚1956年12月28日呈送的《关于公安军问题小组会议记录》的批语。

[2] 黄克诚呈送的《关于公安军问题小组会议记录》说：关于公安军问题，经过专门小组三次会商，大家一致同意撤销公安军的番号，并撤销管理公安军的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57年1月17日批示："请主席批示，刘、陈阅后退黄克诚。"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1月）

一　一月十八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三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思想动向问题，我们应当抓住。这里当作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现在，党内的思想动向，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出现了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

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两年内不可能完全化好。要向党、

政、军、民各界的同志们讲清楚。合作社只有这么一点历史，大多数合作社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经验很少。搞了一辈子革命的人还会犯错误，人家只搞了一年到一年半，你怎么能要求他一点错误都不犯呢？一有点风，有点雨，就说合作化不行了，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个大错误。事实上，多数合作社是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拿出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化的一切怪论打下去。为什么这个社能办好，别的社就不能办好？为什么这个社有优越性，别的社就没有优越性？你就到处大讲这个社的经验。一个省总可以找出这样一个典型嘛！要找那个条件最差，地势不好，过去产量很低，很穷的社，不要找那个本来条件就好的社。当然，你搞几十个也可以，但是，你只要搞好一个，就算胜利。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

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

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我劝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有些人摇那么几次，取得了经验，就不摇了。有那么一种人，是永远要摇下去的，就像稻子那一类作物，因为秆子细，风一吹就要摇。高粱、玉米比较好些，秆子比较粗。只有大树挺立不拔。台风年年都有，国内国际的思想台风、政治台风也是年年都有。这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现象。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我们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主要是由工人和半无产阶级的贫农出身的人组成的。但是，也有许多党员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

身，或者是富裕中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所谓农村政策“左”了，就是说农民收入不多，比工人少。这要有分析，不能光看收入。工人收入一般是比农民多，但是他们生产的价值比农民大，生活必需的支出也比农民多。农民生活的改善，主要依靠农民自己努力发展生产。政府也大力帮助农民，比如兴修水利，发放农贷，等等。我们的农业税，包括副业的税收，约占农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很多副业没有抽税。我们统购粮食，

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国家在工业品和农业品交换中间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利润也很少。我们没有苏联那种义务交售制度。我们对于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是缩小剪刀差，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扩大剪刀差。我们的政策跟苏联大不相同。所以，不能说我们的农村政策“左”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像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至于说城市政策右了，看起来也有点像，因为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1]。七年以后怎么办？到时候还要看。最好留个尾巴，还给点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政策，中央是仔细考虑过的。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

---

[1] 定息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的一种形式。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国家按照资本家的资产，在一定时期内，每年付给他们固定息率的股息，叫做定息。定息仍然属于剥削的性质。

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所以，也不能说我们的城市政策右了。

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城市政策也是正确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全国性大乱子闹不起来。无非是少数人这里闹一下，那里闹一下，要搞所谓大民主。大民主也没有什么可怕。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有些同志好像很怕。我说来一个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讲什么，做什么。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杀几千几万人”，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吗？能得到大多数人同情吗？“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公然违反宪法吗？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有优越性，这都是宪法里头讲了的，是全国人民公认的。“要战争不要和平”，那好呀！你来号召战争，统共那么几个人，你的兵就不够，军官也没有训练好。这些娃娃们发疯了！石家庄那个学校，把那三个口号一讨论，七十个代表，只有十几个人赞成，有五十几个人反对。然后，又把这几个口号拿到四千学生里头去讨论，结果都不赞成，这十几个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坚持这几个口号的极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

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二　一月二十七日的讲话

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第二点，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

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柯庆施[1]同志讲，要想尽一切办法。这个话很好，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这个口号应当宣传。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第三点，国际问题。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

---

[1]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

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讲一讲中美关系。我们在会上印发了艾森豪威尔给蒋介石的信。我看这封信主要是给蒋介石泼冷水，然后又打点气。信上说需要冷静，不要冲动，就是说不要打仗，要靠联合国。这是泼冷水。蒋介石就是有那么一点冲动。打气，就是说要对共产党继续采取强硬的政策，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出乱子上。在他看来，乱子已经出了，共产党是没有办法阻止它的。各有各的观察吧！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十七年。一九二九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一九三三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十八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

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

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对落后的东西是另一种学法，就是不学。他错误的东西，我们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犯那个错误。他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一定要学。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第四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1]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

---

[1] 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

---

[1] 参见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

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1]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

---

[1] 克劳塞维茨（1780—1831），著名的德国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斯大林对克劳塞维茨的评论，参见斯大林《给拉辛同志的复信》。

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1]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

---

[1] 参见列宁《战争与革命》。

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现在，我们决定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从两千份扩大到四十万份，使党内党外都能看到。这是共产党替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连那些骂我们的反动言论也登。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为什么要种牛痘？就是人为地把一种病毒放到人体里面去，实行“细菌战”，跟你作斗争，使你的身体里头产生一种免疫力。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

疫力。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无论党内也好，民主人士中间也好，青年学生中间也好，凡是歪风，就是说，不是个别人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股风的，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

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第五点，闹事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少数人闹事，是个新问题，很值得研究。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

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我们党内，也有各种对立的意见。比如，对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就有反对和拥护两种对立的意见。党内的不同意见是经常发生的，意见刚刚一致，过一两个月，新的不同意见又出来了。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哪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对于闹事，究竟是怕，还是不怕？我们共产党历来对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都不怕，现在倒怕学生闹事，怕农民闹社，这才有点怪哩！对群众闹事，只有段祺瑞怕，蒋介石怕。此外，匈牙利和苏联也有些人怕。我们对于少数人闹事，应当采取积极态度，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就是说不怕，要准备着。怕是没有出路的。越怕，鬼就越来。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

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在国际，无非是打世界大战，甩原子弹。在国内，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我们就是

从那个地方来的。我们已经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请我们回延安怎么办？大家就呜呼哀哉，痛哭流涕？当然，我们现在并没有打算回延安，来个“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上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对，而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了。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少数人闹事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这又是个难免论。但是，只要不犯大的路线错误，全国性的大乱子是不会出的。即使犯了大的路线错误，出了全国性的乱子，我看也会很快平息，不至于亡国。当然，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一点回头路，有点回归，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经过那样一次大乱子，脓包破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总是要前进的。

对于少数人闹事，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你急于收场，总有一天他还是要闹。凡有学生闹事的学校，不要放假，硬是来它一场赤壁鏖兵。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

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要学会这么一种领导艺术，不要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人家一发怪议论，一罢工，一请愿，你就把他一棍子打回去，总觉得这是世界上不应有之事。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你不许罢工，不许请愿，不许讲坏话，横直是压，压到一个时候就要变拉科西。党内、党外都是这样。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

对于闹事，要分几种情况处理。一种是闹得对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并且改正。一种是闹得不对的，要驳回去。闹得有道理，是应当闹的；闹得无道理，是闹不出什么名堂的。再有一种是闹得有对有不对的，对的部分我们接受，不对的部分加以批评，不能步步后退，毫无原则，什么要求都答应。除了大规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乱必须武装镇压以外，不要轻易使用武力，不要开枪。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惨案，就是用开枪的办法，结果把自己打倒了。我们不能学段祺瑞的办法。

对闹事的人，要做好工作，加以分化，把多数人、少数人区别开来。对多数人，要好好引导、教育，使他们逐步转变，不要挫伤他们。我看什么地方都是两头小中间大。要把中间派一步一步地争取过来，这样，我们就占优势了。对带头闹事的人，要有分析。有些人敢于带头闹，经过教育，可能成为有用之材。对少数坏人，除了最严重犯罪的以外，也不要捉，不要关，不要开除。要留在原单位，剥夺他的一切政治资本，使他孤立起来，利用他当反面教员。清华大学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我们邓小平同志去讲话，就请他当教员。这样的人，又没有武装，又没有手枪，你怕他干什么？你一下把他开除，你那里很干净了，但是不得人心。你这个地

方开除了，他就要在别的地方就业。所以，急于开除这些人不是好办法。这种人代表反动的阶级，不是个别人的问题，简单处理，爽快是爽快，但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没有尽量利用。苏联大学生闹事，他们就开除几个领袖人物，他们不懂得坏事可以当作教材，为我们所用。当然，对于搞匈牙利事件那样反革命暴乱的极少数人，就必须实行专政。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国民党很怕批评，每次开参政会就诚惶诚恐。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将在斗争中取得经验，受到锻炼，这是很有益处的。

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这一点，现在很多同志还不清楚。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是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像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

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突然来了个少数人闹事，就感到出乎意料之外。

对闹事又怕，又简单处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的少数人闹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如果一万年以后地球毁灭了，至少在这一万年以内，还有闹事的问题。不过我们管不着一万年那么远的事情，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认真取得处理这个问题的经验。

要加强我们的工作，改正我们的错误和缺点。加强什么工作呢？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大家搞业务，搞事务，什么经济事务，文教事务，国防事务，党的事务，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现在我们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出马到清华大学作报告，也请你们大家都出马。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都要亲自出马做政治思想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每个省市自治区都要把理论工作搞起来，有计划地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评论家。

要精简机构。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不等于国家，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机关工作是需要一点人，但是越少越好。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这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条，必须减人；第二条，对准备减的人，必须作出适当安排，使他们都有切实的归宿。党、政、军都要这样做。

要到下面去研究问题。我希望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这样做。听说现在许多负责同志不下去了，这不好。中央机关苦得很，在这个地方一点知识也捞不到。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工厂怎么办，合作社怎么办，商店怎么办，在机关里是搞不清楚的。越是上层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第一不下去，第二不请下面的人上

来，就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兼一个工厂或学校的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要兼一个下级单位的书记。这样可以取得经验，指导全局。

要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势必要挨打。匈牙利的领导人，没有调查研究，不了解群众情况，等到大乱子出来了，还不晓得原因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有些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不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有人酝酿闹事，酝酿暴动，根本不知道，出了事就措手不及。我们一定要引为鉴戒。中央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各部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年总要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等基层单位去跑一跑，进行调查研究，搞清楚群众的情况怎样，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有多少，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如何，做到心中有数。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农下中农，依靠先进分子，总要有个依靠。这样，才有可能避免出匈牙利那样的事件。

第六点，法制问题。讲三条：一定要守法，一定要肃反，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

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制，并不是只要你民主人士守法。

一定要肃反。没有完成肃反计划的，今年要完成，如果留下一点尾巴，明年一定要完成。有些单位进行过肃反，但是肃而不清，必须在斗争中逐步肃清。反革命不多了，这一点要肯定。在闹事的地方，广大群众是不会跟反革命跑的，跟反革命跑的只是部分的、暂时的。同时也要肯定，还有反革命，肃反工作没有完。

一定要肯定肃反的成绩。肃反的成绩是伟大的。错误也有，当然要严肃对待。要给做肃反工作的干部撑腰，不能因为一些民主人士一骂就软下来。你天天骂，吃了饭没有别的事做，专做骂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骂越好，我讲的这三条总是骂不倒的。

共产党不晓得挨了多少骂。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别人跟我们通，就叫“通匪”。结果，还是“匪”比他们非“匪”好。自古以来，没有先进的东西一开始就受欢迎，它总是要挨骂。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从开始就是挨骂的。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开始也还是要挨骂的。

肃反要坚持，有反必肃。法制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有反不肃，束手束脚，是不对的。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第七点，农业问题。要争取今年丰收。今年来一个丰收，人心就可以稳定，合作社就可以相当巩固。在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搞合作化，粮食总要减产多少年。我们搞了几年合作化，去年大搞一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还增产了。如果今年再来一个丰收，那在合作化的历史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就是没有先例的。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就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

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

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全党都要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观察和处理国际斗争中的新问题。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

（1957年1月）

一　思想斗争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对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要有说服力，而不是简单骂几句。如果简单粗暴，则歪风越刮越大。

今年五月人代会，七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一个是法制，一个是农民苦，一个是没肉吃，总的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要准备打这两仗，在座的代表要出马参战。每人准备一篇，要有分析。

同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富裕中农思想作斗争，要反复斗争很多年。富裕中农的影响很大，特别厉害，应当注意。

光搞业务工作，不搞思想工作，就会闹乱子。

每个省要有一两个马克思，一两个鲁迅。你们应该写文章，六十岁以下的都应该写。

每个省要培养理论家。现在有培养唱戏的、画画的，没有培养

搞理论的，这也是个体制问题，你们靠中央，中央并没有不让你们搞。

二　闹事问题

对闹事怕不怕，我看还是不怕，闹更多的事也不怕。年年会闹事，以后会更多，怕有何用？矛盾要揭露，问题才能解决。社会是对立的统一。教授、学生与我们总会有矛盾，总会有吵架。再过二十年，老的死了，新的还会有问题。苏联革命四十年还有闹事的。工厂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大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他们闹事不要怕，闹到北京来都不怕。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采取消极态度。格罗从南斯拉夫回到布达佩斯骂群众，一下丧失威信，被轰下台。卡达尔则不同，既不骂群众，也不跟纳吉跑。要准备出大事，可能就不会出大事，出了事要采取积极态度，正确办法，争取分化。有本领的人，就是要在波兹南、匈牙利那样的情况下，搞出一个局面来。

但愿天下太平，但要放在最坏的方面，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没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在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只要思想上从坏的方面作准备，一切不怕，不准备就会哭鼻子。七大提出十七条，“赤地千里”。现在得了六亿人口的国家，出点事算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可奈何。

罢工、罢课、请愿，宪法上有的规定了，有的也未禁止。因此，第一，不要提倡；第二，不管合理不合理，要罢工请愿，就让他罢工请愿，提得合理的要纠正，提得不合理的要解释。教授要发

议论让他发，以揭露矛盾解决矛盾为好，不要一棍子打死。如果只是压，结果一定会总爆发，就会变成拉科西。也不能一味迁就，如果一味迁就，又会变成纳吉。

小资产阶级想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但事前要作准备，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他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看清是非。不管怎样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都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就算工作做好了。

对闹事要开县、区委书记会议作准备，区委书记、区长以上要有精神准备。先太平无事，消极怕闹，结果闹起来了，被动，先思想麻痹，后事事答应。

不打问题不能解决，矛盾要经过斗争解决。河南农民宰牛受限制，起来打干部，一打就解决了。打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就是不合理的也是好的，有脓总得放。

对于坏人的处理，一律开除好不好？我看不要急于开除，也不杀掉（反革命刑事犯除外），要利用他做工作，把他当作政治教材，剥夺他的政治资本。简单处理就是思想上不承认对立统一。

对于肖罗、丁雪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对于学校闹事的党员，讨论清楚再开除党籍，不要急于开除党籍，也不能开除出校。

陕西关于工人成分的调查很好。匈牙利没有调查，乱子出来了还不知道什么原因。鉴于这个教训，必须把工人成分摸清楚，了解可靠的、中间的、有问题的各有多少。现在调查可靠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再增加工人的比重，过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逐渐改变这种情况。大学生成分再过二十年才能改变。现在招许多工人、农民，在大学还办不到。

苏共二十次大会，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痛快得很，现在斯大林又活过来了。摇过去是本心，摇过来不是本心。帝国主义一棍子，社会主义几棍子，又摇过来。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不说不是本心。

三　哲学问题

懂得分析，就是懂得辩证法。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又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地在破坏，有的几天几个月就破坏了，刚平衡，马上又不平衡。统一者即是一致、同一、合一。党内有意见，开个会统一了，过两个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又开会。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也是对立统一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主观主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对立

统一的。哲学永远有斗争，讲哲学就要作斗争。有人讲哲学只讲一面，百花齐放只讲放香花，不讲放毒草。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有对立的东西，斯大林就有形而上学，主观主义。苏联不承认有对立，法律上不允许，实际许多错误的东西，都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面掩盖着。

列宁认为单讲唯物主义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就要同唯心主义斗争，要斗争就要研究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就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东西斗争出来的。

哲学领域里两个对立的东西在斗争：世界观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方法论是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我们与蒋介石是对立统一，与民主人士也是对立统一。各种事物有矛盾的两个侧面的联系。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有错误，“否定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了资本主义，但他不承认社会主义被否定。我们认为天下是稳定的，又是不稳定的。社会主义有一天也会消亡。如果说有一个社会上层建筑不会灭亡，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同宗教一样了。

四　农村问题

丰收很重要。苏联去年丰收，许多事情好办了。我们有了一年的经验，今年要来个丰收年。如果今年大家努力丰收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意义很大。这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创举，历史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都减产，我们一九五六年增产不大，一九五七年要大增一下。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个目标，看三四年能否达到。湖北是丰收，还有百分之十五的社员没有增加收入。应该向党

政军民讲清楚，合作化只有一年到一年半的历史，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还犯错误，人家只有一年多历史，为什么不能犯错误呢？要有三年的历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是可能办到的。

农民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生活苦，笼统地说农民苦是不对的，要有分析。所谓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收入减少了，有一部分老干部家里富了，反映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思想。

四十条在今年党代表大会上讨论过，宣传一下。亩产四、五、八百斤，争取提前一年完成。十二年计划十一年完成。

头三脚难踢，办事有三折，今年完了才一折，要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办好。

自古以来，凡是先进的东西，一开始没有不挨骂的。进化论、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都挨过骂。一万年以后先进的东西还会挨骂。

只要有一个合作社有优越性，就可以驳倒一切胡说，以此作宣传。

五　经济问题

要注意搞粮食，不搞粮食很危险。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罢工罢课，也有饭吃，天下不会大乱。油粮和猪肉由合作社包干。国家只要不给。收粮食也是这样（经济作物区除外）国家只管统购，不管农村统销，社包社，队包队。

两年后不是与民争粮食，而是怕国家不买，只要统购，不要统销。湖北省孝感县，现在情况就是如此。

新工矿区要开国营农场，解决粮、油、肉、菜等问题。

大的工厂是必要的，但不要太多，小的更是必要的，不怕多，大都是由小长大的。小的要以有原料和销路为原则，大的要以国力有多少则搞多少为原则。

六　学校问题

初中要加农业课。

各省市委要派干部加强学校，把学校抓起来。整个文教工作都应如此。

省委、地委、县委同志要分区分片向学生进行教育。

各省开一次学生代表大会、教师代表大会，一年一次，先准备好。一天报告，三天讨论解决问题，对学生工作没有安排应当安排。一年开一两次会，讲一两次话，要注意发现问题，不要等问题大暴露了再解决。现在好管了，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就是这么些单位。

七　文学艺术问题

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鬼蛇神、乌龟王八都出来。各省要注意，对重大的成熟的问题，以一个人为主，组织些人写文章，准备一个月写一篇，把邪气压下去。

种牛痘可以产生免疫力（给你身体内部埋点对立物），为什么文学艺术不可以种牛痘？

宣传部一两个月召集记者谈一两次，两个月谈一次也可以，现在是一年谈不上一次。

八　干部问题

干部尽往上提，提上来又没有事做，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现在只准下放，不准上提。领导机关人越少越好，无非是写文章，打电话。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能出少数人组成国家。六亿人统统变成国家哪能行？大学教授有什么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教授？工人农民如何提拔？还不是白发苍苍的当一世工人农民？不是不提拔，死了就得补。

极端民主，绝对平均，总是不行的。颜渊没有评级，是第二级圣人。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要调整一下。县委委员中，可以外来与本地各一半。

九　领导问题

中央委员、部长、省委书记每年都要到工厂、农村去跑一跑，了解情况，才不会变成拉科西。

省委书记、县委书记对各部看到等于没有看到一样，往工厂、合作社里钻。

真正的知识出在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越到上面越没有东西。要解决问题，一是下去，二是调人上来汇报。北京这个地方不好，搞不到很多知识，省里好一点。一定要下去，工业部长下工厂，农村部长跑农村。

中央委员、部长、省委书记，每人一年一定要有一些时间下乡

研究问题。搞一个县、一个乡，两个月可以搞清楚，两个月不看电报还能看懂。现在听说大家都不下去了，机关里事情多了。

省委书记可以兼一个县（市）委书记，把原来的县（市）委书记压成第二书记。省委书记下去了，地县委书记也会下去。市委书记可以兼厂长、校长、党委书记。这样，就可以深入实际，吸收知识。

区委书记会议，一年开两次好，逼得你研究问题。

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边有对立，有香也有臭（包括北京在内），一定要嗅一嗅。

各省要注意，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农村依靠贫农，学校依靠左翼，总要有个依靠。

胡志明在依靠贫农的问题上有错误。不是纠“偏”，而是纠“正”，对土改不肯定成绩，光讲错误，发了一个罪己诏——告农民书。地主一变而为农民，民主党派反对一党专政，知识分子反党。有人提出要学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不让学，说过去学中国学错了，结果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现在改变了。

十　其他

精简各省自己搞，有出路的先搞下去，尽可能转回生产。无出路的设教养院，听候出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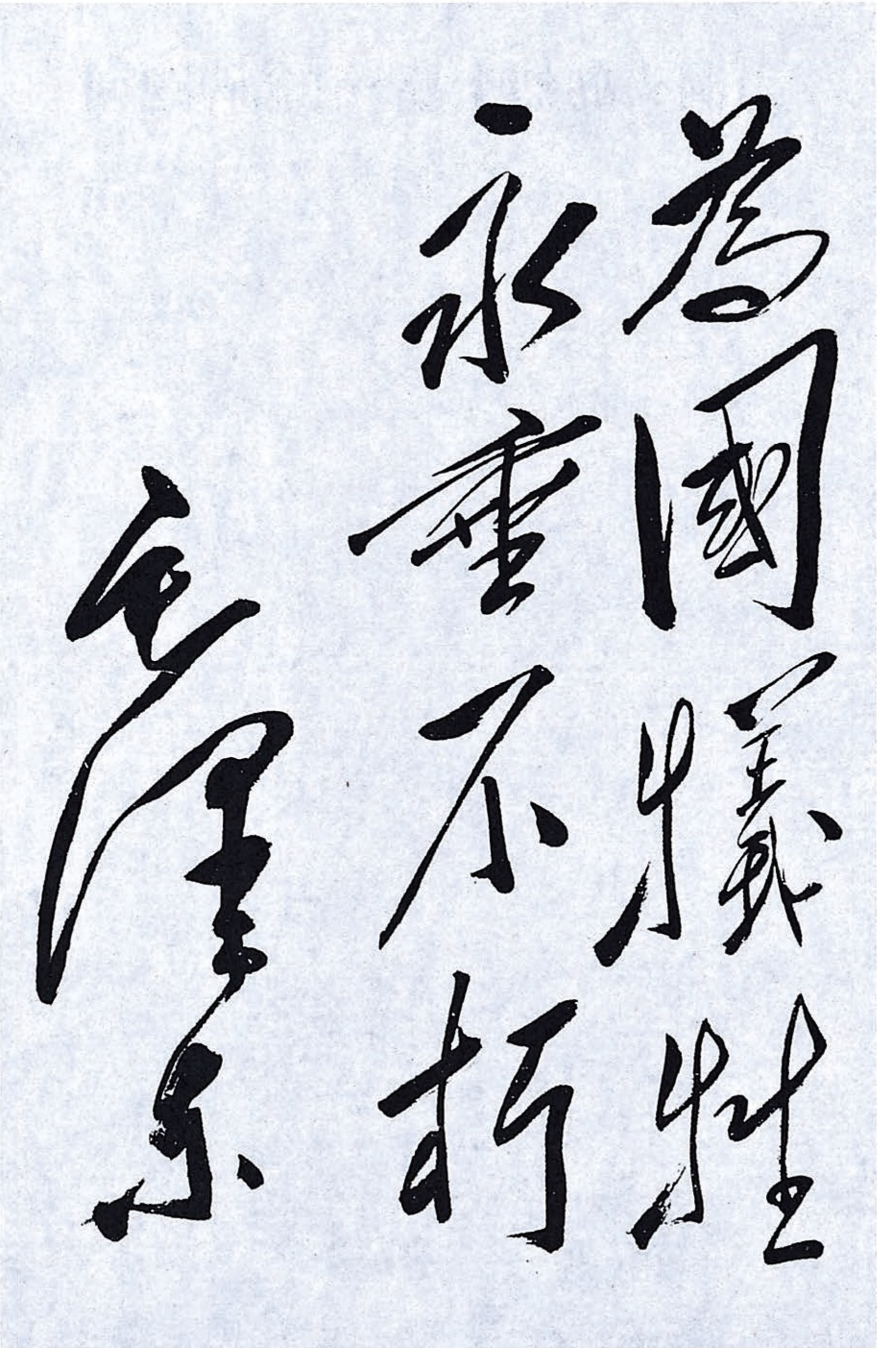
为洞头岛烈士墓[1]纪念碑题词

（1957年1月）

为国牺牲，永垂不朽。

---

[1] 洞头岛烈士墓建于浙江省东南瓯江口外洞头岛北岱山麓。这座公墓安葬了132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烈士，他们是在1949年8月至1952年1月多次保卫洞头岛一带人民的战斗中牺牲的。



為國犧牲

永垂不朽

毛澤東

毛泽东为洞头岛烈士墓纪念碑的题词。

在公安部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报告上的批语

（1957年2月2日）

不但这些人[1]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处理方案送中央审阅。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指公安部党组1957年1月29日关于处理在押病残战犯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考虑到他们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对邓子恢[1]关于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的报告的批语

（1957年2月6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研究，请陈云同志的五人小组[4]处理。

毛泽东

二月六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邓子恢1957年2月5日关于建议按原定计划动工修建三门峡水库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门峡水库是黄河综合利用的水力枢纽，它的建成将从根本上解决千年洪水灾害，保证黄河不改道，使冀、鲁、豫、苏、皖五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目前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建议不要停止兴建，按原定计划在今年2月开工，以争取在1959年汛期内部分蓄洪。

[4] 指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

给黄炎培[1]的信

（1957年2月11日）

任之先生：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2]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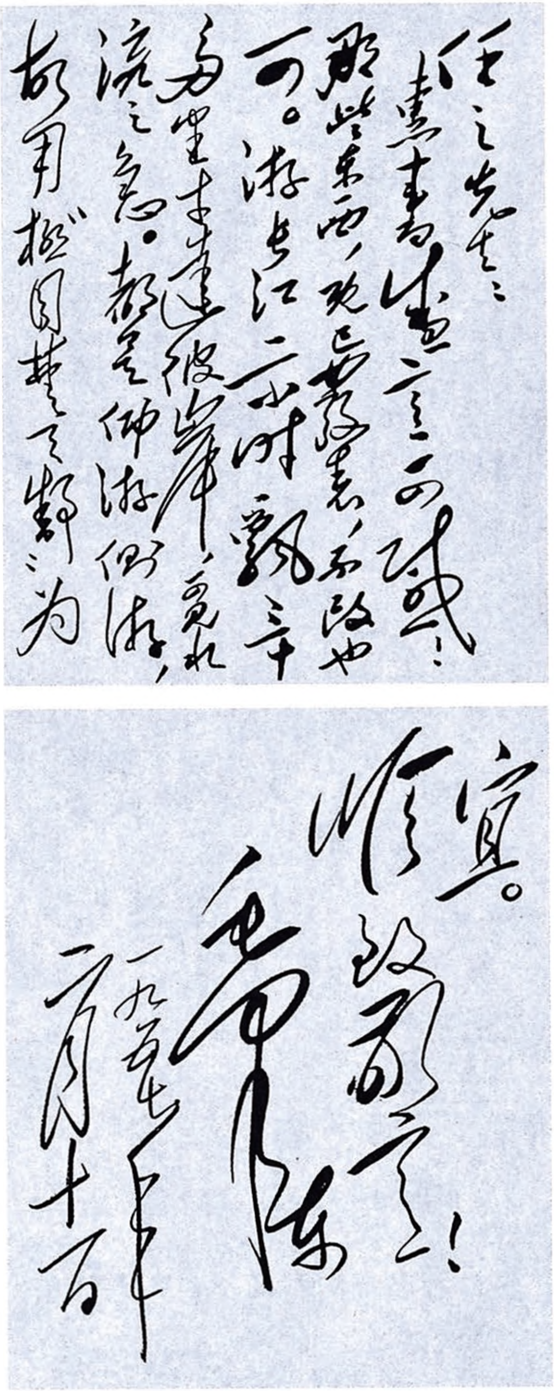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这是毛泽东1956年6月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中的一句。毛泽东曾在1956年12月4日将这首词录赠黄炎培。



任之先生：

惠书收读，言之可感！那些东西，现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一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对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稿[1]的批语[2]

（1957年2月15日）

---

[1] 指示说，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迅速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但是这一年经济建设的年度计划也有进展过快的缺点，并且在计划执行的某些方面放松了应有的控制。第一，基本建设发展的速度过高，摆的摊子过多，使1956年物资的供需之间和现金的收支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平衡的现象。第二，职工人数增加过多，其结果不但使企业的工资开支和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过多，而且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城市人口增加过快，城市建筑的需要也增加过快。第三，由于过多地增加了职工，过多地扩大了职工工资的升级面，不适当地支付了一部分福利费用和奖金，一部分人员的工资也增加过多，社会购买力的增长大大超过了消费物资的增长，造成了市场上特别是城市中消费品供应的紧张局面。此外，1956年农业生产的年度计划由于遭受自然灾害没有能够完成，对于1957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发展，特别是对于消费物资的生产和供应，以及财政的收入，也有不利的影响。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调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7年1月30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七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一月三十日修正稿）上。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稿时，将括号内“一月三十日修正稿”几个字改为“一九五七年二月八日政治局通过”，移至题下。这个指示于1957年2月15日印发。

退胡乔木[1]同志。

此件可用。请用中央名义写一电报，请中央各部委及党组，地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于收到此件后，迅即转发县委、城市的区委和军队的团委，并在党刊上登载。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1]

（1957年2月15日）

编辑部同志们：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

---

[1] 1957年2月6日，《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寄来读者抄录的说是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为庆贺彭德怀率兵攻取腊子口写的一份电报："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他们请毛泽东校阅并准予在《东海》月刊上发表。毛泽东看后于2月15日写了这封回信。由于时隔20多年，加之来信把写诗的地点、背景弄错了，毛泽东回忆不起这首诗来，未同意发表。据彭德怀回忆，这首诗是毛泽东在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击败追敌骑兵后写给他的，他把诗的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参见《彭德怀自述》第206—207页）这首诗最早发表在1957年《解放军文艺》4月号上，1986年9月收入《毛泽东诗词选》副编。

在颐年堂的讲话[1]

（1957年2月16日）

今天谈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百家争鸣的方针问题，文艺有了缺点，应当如何对待。

王蒙写了一篇小说，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但是反驳的态度不怎么适当。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正在讨论，问题在于批评态度。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刘宾雁的小说并没有批评整个官僚主义。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正面的积极力量写得不够，要批评。应该有批评，也应该有保护。正面人物林震写得无力，而反面人物很生动。）

我们的官僚主义就是没有整垮，应该批评。过去有一个片子（指《荣誉属于谁》）没有演，那不是因为批评了老干部，要保护老干部，而是因为在那个片子里，那官僚主义没有整垮。

《星星》（四川的诗刊）里面有几首诗还是好的，有几首是不好的，要酝酿一下，不要骂。

（《星星》在叫喊，不要忙，沉住气，酝酿一下，不要仓皇应

---

[1] 这是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之前主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对文、哲、教育界谈文化思想问题，着重谈文学批评问题。这一材料根据三份传达记录稿整理而成，以一份记录稿为主，括号内是根据另两份记录稿插入的。

战，不打无准备之仗，过去的“批评”文章，群众投我们的票少。）

对那些写了坏作品的作者要帮助，要调查。

对起义将领傅作义，对荣毅仁，我们都是帮助、改造。这样做了，他们就同我们合作。

坏小说，无非里面有资产阶级思想，唯心论，只要作者在政治上同我们合作，就和胡风有区别，不能一棍子打死。

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

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在中央，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中央里面就出过坏人，像张国焘、高、饶、李立三、王明。坏人多了怎么办？照他们的办法就要用油锅煮。

〔李希凡的文章不能说服人，认为中央所在地的区委不会有官僚主义，是不对的。中央都出过高、饶，区委（有官僚主义）更不稀奇了，“难免论”嘛。（对林震也有些“难免论”。）〕

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错误的方针，很多同志实际没懂。对这个方针，十个部长大概有九个反对。

〔问题是作者（王蒙）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小说有消极影响。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因为写北京，（地方）太具体，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样（批评）不能说服人。〕

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

是有官僚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王国，小资产阶级一共有五亿五千

万之多……这也是客观实际。

（中国是小资产阶级大王国，党内也不可能没有小资产阶级。）

说共产党的缺点不能揭发，这种观点不对。

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赞成的人很少，真正懂得的人很少，“整”，不能服人。

（干部中真正搞通统一战线思想的人不多——要帮助人家改造，达到真正的团结。怎样帮助改造人家思想，很不够，办法常是整一通。“整”，很容易，但不是好办法，应不用。“整”，不能团结。）

现在王明还是有选票，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是一脚把他踢倒。

“一脚踢倒”是老办法，那很容易。喜欢用这办法的人，最好开枪，开机关枪，那是国民党的办法。

…………

（小资产阶级大王国是客观现实。工人阶级只有两千四百万，其中产业工人占一半，干部也占一半，这是一头；另一头是地富和资产阶级，大约有三千万；中间五亿五千万都是小资产阶级。一千两百万干部也并不都是无产阶级化的，真正化了的大约有二百万。所以，看文艺问题要从这现实出发。）

现在是大变的时期，有的人不满。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就不满。

（大学生中地富和资产阶级子弟占80%，都是非工人阶级，青年问题多，并不奇怪。其中要搞匈牙利事变的极少，多数是拥护共产主义的。）

但是，不满的人过去还是拥护抗美援朝，他们不搞“匈牙利”。当然，个别想搞匈牙利事变的人也是有的。

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

（……矛盾总要表面化，闹一闹还是好的。闹是片面性，我们用片面性去反对片面性，不能解决问题。）

我们的同志有教条主义，用片面性反对片面性，用形而上学反形而上学。

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

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

（许多批评文章，立场对，但简单化。）

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光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

马寒冰是什么人？也是一个什么官长，总是一个什么军长级的干部吧，他在《文汇报》的文章就写得不好，教条主义。

〔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立场很好，《人民日报》也可以发表，但是说服不了人，似乎百花齐放以后都错了，这是教条主义，朵朵香花是不可能的。教条主义是没有力量的，它所以滋长，原因之一是共产党当了政。马克思、恩格斯批评杜林，列宁批评卢那卡尔斯基，所以要下功夫，驳倒他们。斯大林不同，（他当了政），所以他们批评不平等，很容易，像老子骂儿子。“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批评不要利用当政的权力，需要真理，用马克思主义，下功夫，是能战胜的。〕

（用教条主义不能批评人家，因无力量，请看一下列宁是如何写

《经验批判论》的。斯大林后来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讨论问题了，不是搜集大量材料发表意见。有些东西写得好，有些东西只坐在山岗上，捡起石头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

陈其通、马寒冰等四人联名写的文章，后讲清楚原因，没有办法。陈沂，你写了几篇文章？有没有教条主义？出一个选集吧！全面检查一下。

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

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

马、恩驳杜林，很用了一番心思。但是当了政的斯大林就不一样了，他骂人不平等，没有说服力。

应该研究分析人家的文章。

当了政，骂人像骂儿子一样，不好。

当政党同人民的关系，不应当是老爷同人民的关系，不应该骂。

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当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二十一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

（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二十一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的。）

（对地富、资产阶级要安排、改造，何况对小资产阶级？我们写文章常常笔下不留情。教条主义的本领是戴帽子、骂人、片面性，不是从团结出发，目的也不是团结。不是帮助改造缺点，达到真正的团结。）

（对人民内部的错误，要同对付敌人的错误严格地区别，错误的杂文也是不区别。对敌人无情斗争，对人民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否则就容易杀人。）

应当“刀下留人”。

…………

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我们靠他们吃饭，要把他们改造为工人阶级。）我们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同志不了解中央这个方针：批评团结，治病救人。

他们就是怕闹事。

清华有个学生，说要杀几千万人，这太多了。这个学生也不要开除他的学籍。

学生闹事有理由，但也不提倡大罢课。他们反国民党反成了习惯。

不允许工人罢工是不正确的。宪法上没禁止罢工。贴标语是言论自由，开会是集会自由。

对闹事的人不应当通通叫他们写悔过书，也不要写检讨。

因为有问题，还是闹一下好。

学生闹事，不等于造反。

六亿人，一年有一百万人闹事是正常的，六百分之一。

闹事的人根本不能说是反革命，可能其中有个别反革命。

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哟！

当然，我也不登广告，提倡全国罢工。

这些矛盾是暂时性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的矛盾。

出了事情，要看两面。（闹事的人也有两面性，警惕我们。有脓疮，出脓就好了。）

说老子是“老革命”不能反对。国民党也是“老革命”，比我们更老。我们不能采取国民党对人民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同敌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资产阶级思想内，取合理的部分，发展起来，这样才形成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只是打，是锻炼不出文学艺术来的。

是不是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存在？（百花齐放应允许毒草存在，允许风格不同。）

毒草是毒人的，但是香花是同毒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

粮食地里有许多野草，庄稼是同野草作斗争才发展起来的。苏联建设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地里一样有野草。有野草不要紧，一翻过来，就是肥料。

是毒草，可以说明，有的人主张写：“此是毒草，不许尝试。”苏联的办法是只要香花，不要毒草。其实许多毒草是借香花之名以生。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

斯大林有唯心论，有唯物论，他有片面性。（形而上学，有唯心也有唯物，斯大林两者都有，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正因为这样，所以有功有过，功大于过。）

苏联同志转不过来，喜欢采用高压的办法。

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片面性。

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

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有两个不同的侧面。

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

《文汇报》上姚文元的文章好。（《教条与原则》很有说服力。）

不能说以前都是教条主义。国民党曾经一家独鸣，所以打倒他们后，共产党也有一阵一家独鸣，这个一家独鸣是必需的，现在就不同了。

（东欧出乱子，就是这原因。现在情况变了，必须百家争鸣。要争鸣就要有准备。通过鸣来教育改造，而不是自由主义。一切不要一脚踢开，对错误要批评，也要承认二重性。）

可以对大家讲清楚，不要仓促应战，不要仓促写文章。打仗，不是说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没有把握的仗吗？没有把握的也就是无准备的。现在打的仗也就是无准备的。

有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有从那里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思想斗争，有对他的教育责任。

我们现在是以少数教育多数。

不要用简单的办法开除。

他们可以当教员，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员。

马寒冰、李希凡的文章也有二重性，是教条主义，但可以促起注意。他们实际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实际，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

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现在五百年当过去多少万年。

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

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

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总会有新的学说出来。

当然，有些东西是不能推翻的，如同说地球旋转而太阳不旋转，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但是地球有一天还是要烂的。

人类也会被否定。有一天这样的人类不适合了，就一切毁灭，但这样对宇宙进化有好处。

三千年前，人类还用石头，以后进化到用铜铁，一直到用机器。人类历史五十万年，章太炎在“书”里就讲过。铜器时代否定了石器时代，人类在地球上就是挖地皮过日子。谁也没有选举人类当地球的主人，许多动物，野兽没有选，细菌也没有选，大概只有植物才不反对我们。我们死了，可以供给植物养料，我们排泄的东西也可以供它们补用。

人类本身要进化，马克思主义者也要进步。

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大国家，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少走弯路？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六亿人口，马克思没有想到，列宁也没有想到，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几年。

我们六亿人口，将来有一天上街，在大街上走都得排队。将来在街上会挤杀人，怎样分配报纸，怎样看电影，怎样逛公园，都会成问题。

不能说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有很多问题要发现，要解决。

不要怕歪风。风总有两种，一歪一正。

吉林今年大水灾，就是下多了雨。两股流，一股寒流，一股暖流，不在黑龙江上空相遇，也不在辽宁上空相遇，偏偏在吉林上空相遇，作战，就下大雨。雨下多了，不好。但是如果不下雨，就是

旱灾。两股还缺不得一股。

越斗争，越丰富，就会出现新道理。

（□□：现在有一种倾向，写爱情多。）

没有爱情，人类就会绝种。

（□□：杂文有“难免论”。）

“难免论”要多登几篇，这样就引起注意了。

掌握政权也有两重性。许多人就是怕“放”，怕“鸣”。

（我们应特别注意到，掌握政权之后，想用简单的办法把人打倒。百花齐放为什么有人怕放？怕饭票子过河。青年人反对官僚主义不那么怕，因为他们还没有当事，官僚主义还未轮到他们头上。）

最近这种压法，缺乏说理，不大妙，应给人家出路、帮助。

（□□：王蒙要求谈。）

谈两点：1. 好，反官僚主义；2. 文章还有缺点。

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难得。

现在就是碰不得官僚主义，好像骂官僚主义就是骂自己，好，你自己既然承认官僚主义，就得骂。

不能讲北京不能批评，不能讲不能写党的缺点。

（□□：说不搞工农兵了。）

不搞了，全国就剩下工农兵加知识分子了。

（□□：工农兵搞得好，大家还是欢迎。）

是啊，我们反杜林反了许多年，还不知道杜林是怎样的，可不可以找到杜林的书？

（□□：谈到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黑格尔、马赫。《新建设》周谷城论大逻辑，有点道理。）

（学校只听校长意见，不听学生意见不对。）

对日本战犯榊原秀夫亲属来信[1]的批语

（1957年2月21日）

请周[2]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

---

[1] 指日本战犯榊原秀夫的女儿榊原公子、榊原贵子和妻子榊原房子1956年年底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1956年11月20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报道，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视察团时曾说："战犯榊原如果有病的话，可以考虑释放。"榊原过去在国家战争政策的压力下，进行了细菌研究，的确是一个犯了罪的人。但作为他的亲人，是没有一天不在祈望着他的健康和自由的。今得知榊原旧病暂时痊愈，又患了咳血症，恳请毛主席先生宽宥他，让他回国治疗。来信并表示：为了向中国的许多牺牲者表示哀悼之意，一定要尽全力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活动。

[2] 周，指周恩来。

关于调查河北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批语

（1957年2月24日）

此件[1]寄河北省委马国瑞[2]同志：

此件所说是否属实，原因何在，请派人去涿县尚庄乡切实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

[1] 指莫余平关于河北省涿县尚庄乡联盟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生产情况的调查与整社意见的报告。莫余平，任冶金工业部金属回收管理局副局长，当时正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这个报告是他利用寒假回乡探亲时写的。报告说：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低落，社员不愿上工，积肥不积极；1956年灾情同上年差不多，但减产严重，农民收入普遍下降；有的地方出现宰杀耕畜和强行把大车、牲口拉回家的现象。报告认为1956年大量减产是人为的灾害，是主观主义、强迫命令和组织管理不善造成的。主要是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强行盲目推广新技术；耕作粗糙，荒地不少；收割时随便把粮食丢在地里糟蹋了；副业生产搞得不好。报告还反映了社员对社领导和党支部的意见，说社领导强迫农民入社、投资，作风不民主，经济不公开，办事不公平，关心社员少，干部之间闹宗派，党支部包办社的工作等，因而社员思想极为混乱，任其发展下去，合作社有垮台的危险。

[2] 马国瑞，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对彭德怀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7年2月25日）

同意。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

毛泽东
二月廿五日

大量裁兵，一定要有出路，不能推出了事。要作至少一个月还乡态度、策略教育，设想各种困难，作好精神准备。又及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7年2月21日关于外出检查军事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拟于2月25日或26日与陈赓、谭政、陈士榘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以及了解军事院校工作、军队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问题。

对军委关于军事系统向中央汇报工作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7年2月25日）

军委：

上半年忙，下半年为妥。不要都准备，有四总、空、海即够，看情形酌定。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1957年2月22日关于军事系统各部门，各军种、兵种向党中央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汇报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军委经过讨论，初步预定：按总参、总政、总干、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的次序，依次汇报，最好都能分别汇报一次，以使政治局同志多了解一些军队工作情况，多给些指示。但是否每个部门都一一汇报，或只抽其中几个重要部门和军种、兵种汇报，请指示。汇报时间可在3月20日至4月中旬以前。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讲话提纲）[1]

（1957年2月）

（一）两类矛盾：敌对阶级之间，人民内部之间

性质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首先，**分清敌我**，**分清是非**。

人民日报的文章[2]，说的是国际方面。

专政制与民主集中制。

大民主与小民主。

早一点取消专政吗？

制〈专〉政所适用的范围。

民主是目的吗？**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阶级的具体的**『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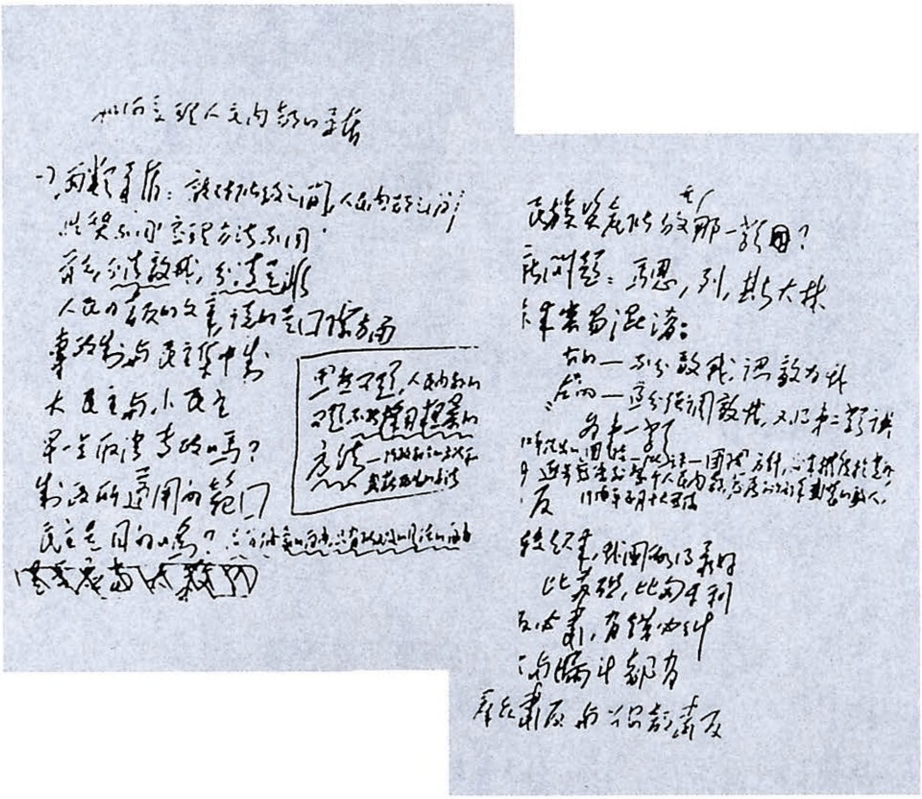
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

民族资产阶〔级〕放在哪一类？

---

[1] 这是毛泽东写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提纲，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来在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上，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 指《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登载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1956年12月29日登载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写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的手稿（部分）。

新问题：马恩，列，斯大林。

本来容易混淆：右的——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左”的——过分强调敌我，又将第二类误为第一类。

1942年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方针，后来推广于党外，逐步发展到整个人民内部，发展到解除武装的敌人，1956年五月十大关系。

（二）肃反

比较起来，我国做得最好，比苏联，比匈牙利。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过火与漏斗都有。

群众肃反与公安部肃反。

今年和明年应来一次大检查，全面总结一次。中央由人大常委与政协常委主持，地方由省市人委与政协主持。

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

是否应当大赦？

（三）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

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吗？

应支持农民，反对歪风。

争取五年内巩固合作社，接近或达到富裕中农水平，**习惯于**集体生活。

生活已有改善——七年增产**1400**亿斤，**平均60元**。

还有百分之几到十几的缺粮户，有的地方已无缺粮户。

几年内不增加征购量，逐步取消农村统销，粮、肉、油自给（一般）。

（四）资本主义改造

也有一股风，说是资本家不改造了，工人也有两重性。

工人、资本家已经一样了吗？

（五）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有很大进步，也有歪风——波动，怪议论，想杀人，想学匈牙利，要大自由，讨厌马克思主义，只钻业务赚薪水。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改造自己。

（六）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四年来，歪风又发展了。

（七）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是战略方针——例如：救灾、统销、安排工商就业、统战安排等。

从六亿人口出发，节育。

去年就业近三百万。

广州、上海等处还有一些人失业。

百分之四十、四百万、八十万、九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

（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两方面的斗争。

毒草不是香花，教条主义也不是香花。

老干部不能批评『鸣』吗？

新老干部的关系：一视同仁，又不能一视同仁，领导核心。

种牛痘。

北京不能批吗？

钟惦棐、陈沂、陈其通、马寒冰[1]。

马克思主义是和它的敌〔对〕思想作斗争发展起来。历史上的香花在开始几乎均被认〔为〕毒草，而毒草却长期〔被〕认为香花。香毒难分，马、列、达尔文、哥白尼、伽利略、耶稣、路德、

---

[1] 钟惦棐，当时任《文艺报》编委兼艺术部主任。1956年12月15日，他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文艺报》第二十三号发表了《电影的锣鼓》一文。陈沂，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其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马寒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部。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马寒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干部陈亚丁、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孔子、孙中山、共产党、孙行者、薛仁贵。

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

从存在出发：六亿人口；小资产大王国，**顽强地表现**自己，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长期耐心的教育。

许多人实际上不赞成这个方针。

文章要有说服力，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

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1]？**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

这是一个人民内部教育自己和发展自己事业的方针。“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需解放全人类”，“在阶级斗争中，改造剥削者，同时也改造了自己”。治病救人。

统一战线，长期共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治病救人，反对形而上学、教条主义——联系起来。

（九）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十）闹事，出乱子，都不好吗？

罢工、罢课、游行、请愿、闹事的二重性。

匈牙利事件[2]的二重性。

批判斯大林事件的二重性。

反苏反共事件的二重性。

生人死人的二重性。

美国不承认我们的二重性。

出现几篇错误文章的二重性。

没有大作品、好影片的二重性。

物极必反，不及则不及〈反〉。

---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

[2] 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政治事件。

中国人穷与愚（不识字）的二重性。

外国人富与智（文化高）的二重性。

如果打三次世界大战，也有二重性。

国际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向坏处着想，打大战，怎么办？打败仗怎么办？**打败仗就是打胜仗**。

目前一个长时间内还不会，可能有十几年，可能更长。

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互争殖民地，互争亚非。

（十一）少数民族与大汉族民族问题，西藏问题

（十二）中国可能在三、四个五年计划内，初步地改变面貌

工业化的道路，可以和苏联有些不同。

重、轻、农的比例是否可以是六比一？重工业还是优先，但走新的道路是否比苏联那样（二十一年内增加1400万吨钢）工业化速度反而快些？如果给我们二十一年（从1950—1970），是否可以基本上工业化，而不止1800万吨钢（由90万吨开始）？

这个问题我们还缺少经验，总之要有广大市场，要看六亿至八亿人口。

还是要学习苏联。苏联不好吗？别国也要学，但谁给装备和技术呢？

十大关系：

（一）重与轻、农关系

（二）沿海与内地关系

（三）经济与国防关系

（四）国家与生产单位（工厂、合作社）与个人关系

（五）中央与地方关系

（六）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

（七）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其他人关系（长期共存）

（八）敌我关系

（九）人民内部关系（是非关系），一家与百家关系（百家争鸣）

（十）中国与外国关系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

（1957年2月27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为了叙述的方便，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在这里，也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是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

一　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的国家现在是空前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我们的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国的六亿人民正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后来毛泽东根据原始记录加以整理，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和补充，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

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

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

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

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按照我们的经验，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一九四二年，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解决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就是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间的矛盾，教条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左”倾教条主义者从前采用的党内斗争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我们在批评“左”倾教条主义的时候，就没有采取这

个老方法，而采取了一个新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方法是在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采用的。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把这个方法推广到了党外。在各抗日根据地里，我们处理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处理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几部分军队之间的关系、几部分干部之间的关系，都采用了这个方法，并且得到了伟大的成功。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一九二七年我们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始，关于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关系，就是采用这个方法的。不过到了抗日时期，我们就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之上了。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

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许多人觉得，提出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事实并不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中国共产党忠实地遵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原则。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个意思，在我们党的过去的许多文件里和党的许多负责人的言论里，曾经说得很多。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讲话里，又说过：“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过去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并且在工作中

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很多干部和人民都在实际上懂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过去国内外的敌我斗争很尖锐，人民内部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注意的缘故。

许多人对于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分辨不清，容易混淆在一起。应该承认，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我们的错误没有扩大化，是由于我们在政策中规定了必须分清敌我，错了就要平反。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多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

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例如，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

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二　肃反问题

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是敌我矛盾的斗争问题。在人民内部，有些人对于肃反问题的看法，也有一些不同。有两种人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不相同。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广大群

众认为是敌人的人，他们却认为是朋友。有“左”倾思想的人则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的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把某些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也看作反革命。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能正确地处理肃反问题，也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肃反工作。

为了正确地估计我国的肃反工作，我们不妨看一看匈牙利事件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有些动荡，但是没有引起什么风浪。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说，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

当然，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不是由于肃反。我们国家的巩固，首先是由于我们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和解放军，有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锻炼的劳动人民。我们的党和军队是在群众中生了根的，是在长期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是经过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的，不是突然建立起来的。有些民主人士也受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同我们共过患难。有些知识分子经历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的锻炼，许多人经历过解放以后的以分清敌我界限为目标的思想改造。此外，我们国家的巩固，还由于我们的经济措施根本上是正确的；人民生活是稳定的，并且逐步有所改善；我们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的政策，也是正确的；等等。但是，我们在肃清反革命方面的成功，无疑是我们国家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一切，我们的大学生，虽然还有许多人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但是除了少数例外，都是爱国的，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在匈牙利事件时期没有发生波动。民族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更不要说工农基本群众了。

解放以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一些有严重罪行的反

革命分子被处了死刑。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会抬不起头来。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有些人不了解我们今天的政策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想否定过去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人民群众所不允许的。

我们的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有错误。过火的，漏掉的，都有。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采取了群众路线，工作中当然也会发生毛病，但是毛病会比较少一些，错误会比较容易纠正些。群众在斗争中得到了经验。做得正确，得了做得正确的经验。犯了错误，也得了犯错误的经验。

在肃反工作中，凡是已经发现了的错误，我们都已经采取了或者正在采取纠正的步骤。没有发现的，一经发现，我们就准备纠正。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我提议今年或者明年对于肃反工作全面检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正气，打击歪风。中央由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常委会主持，地方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委员会主持。在检查工作的时候，我们对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不要泼冷水，而要帮助他们。向广大干部和积极分子泼冷水是不对的。但是发现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无论公安部门、检察部门、司法部门、监狱、劳动改造的管理机关，都应该采取这个态度。我们希望人大常务委员、政协委员、人民代表，凡是有可

能的，都参加这样的检查。这对于健全我们的法制，对于正确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会有帮助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三　农业合作化问题

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我认为，情况根本上是好的。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合作化迅速完成，有些人担心会不会出毛病。幸好，毛病有一些，不大，基本上是健全的。农民生产很起劲，虽然去年的水旱风灾比过去几年中哪一年都大，但是全国的粮食仍然增产。现在有一些人却在说合作化不行，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吹来了一股小台风。合作化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呢？今天会场上发的文件里面，有一

个关于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1]的材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合作社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山地，历来很穷，年年靠人民政府运粮去救济。一九五三年开始办社的时候，人们把它叫做“穷棒子社”。经过了四年艰苦奋斗，一年一年好起来，绝大多数的社员成了余粮户。王国藩合作社能做到的，别的合作社，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能做到，或者时间长一点也应该能做到。由此可见，那些说合作化不好了的议论是没有根据的。

由此也可看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

积极拥护合作社的是些什么人呢？是绝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余的人，大多数也对合作社寄予希望。真正不满意的只占极少数。许多人没有分析这种情况，没有对合作社的成绩和缺点以及缺点产生的根源作全面的考察，把局部和片面当成了全体，这就在一些人中间刮起了一阵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

要多少时间合作社才能巩固，认为合作社没有优越性的议论才会收场呢？根据许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来看，大概需要五年，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现在，全国大多数的合作社还只有一年多的历史，我们就要求它们那么好，这是不合理的。依我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建成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合作社能得到巩固，那就很好了。

---

[1] 指河北省遵化县西四十里铺村以王国藩为社长的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

合作社正在经历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上述矛盾。在生产问题上，一方面，合作社经济要服从国家统一经济计划的领导，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参加合作社的各个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个体经营的经济可以由自己作出适当的计划以外，都要服从合作社或者生产队的总计划。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

许多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说来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这就是说，解放七年以来，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以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解放以来，农民免除了地主的剥削，生产逐年发展。以粮食为例，一九四九年全国产粮只有二千一百几十亿斤，到一九五六年产粮达到三千六百几十亿斤，增加了将近一千五百亿斤。国家征收的农业税并不算重，每年只有三百多亿

斤。每年以正常价格从农民那里购粮也只有五百多亿斤。两项共八百几十亿斤。这些粮食销售在农村和农村附近的集镇的，占了一半以上。由此看来，不能说农民生活没有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至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特别得到国家的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以及有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是高了一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四　工商业者问题

我国社会制度的改革，除了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以外，私营工商业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也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了。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但是现在有些人说：资本家已经改造得和工人差不多了，用不着再改造了。甚至有人说，资本家比工人还要高明一点。也有人说，如果要改造，为什么工人阶级不改造？这些议论对不对呢？当然不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

造，劳动者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当然，剥削者的改造和劳动者的改造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造，不能混为一谈。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还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一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吗？

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两面性，那末资本家的改造和学习的任务也就没有了。

应该说，这种意见不仅不符合工商业者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工商业者大多数人的愿望。在过去几年中，大多数工商业者都是愿意学习的，并且有了显著的进步。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是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但是经过学习改变自己的某些旧观点，也是重要的。工商业者的学习，应当以自愿为基础。许多工商业者在讲习班里学习了

几十天，回到工厂，同工人群众和公方代表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语言，改善了共同工作的条件。他们从亲身的经验懂得，继续学习，继续改造自己，对于他们是有益的。刚才所说的那种认为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改造的意见，并不能代表工商业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只是少数人的意见。

五　知识分子问题

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在知识分子中间也表现出来了。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新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

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

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

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对于这一部分人不要苛求；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当给他们以适当工作的机会。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

管。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提倡勤俭建国。要使全体青年们懂得，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六　少数民族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有三千多万人，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但是居住地区广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所以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无论是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关系比较从前大有改进，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在一部分地区，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还严重地存在，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经过各族人民几年来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绝大部分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

议[1]，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

七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我们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地发展着，成绩很大，但是，在目前社会大变动的过渡时期，困难问题还是很多的。又发展又困难，这就是矛盾。任何矛盾不但应当解决，也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

---

[1]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

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八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

于太阳系的学说[1]，达尔文的进化论[2]，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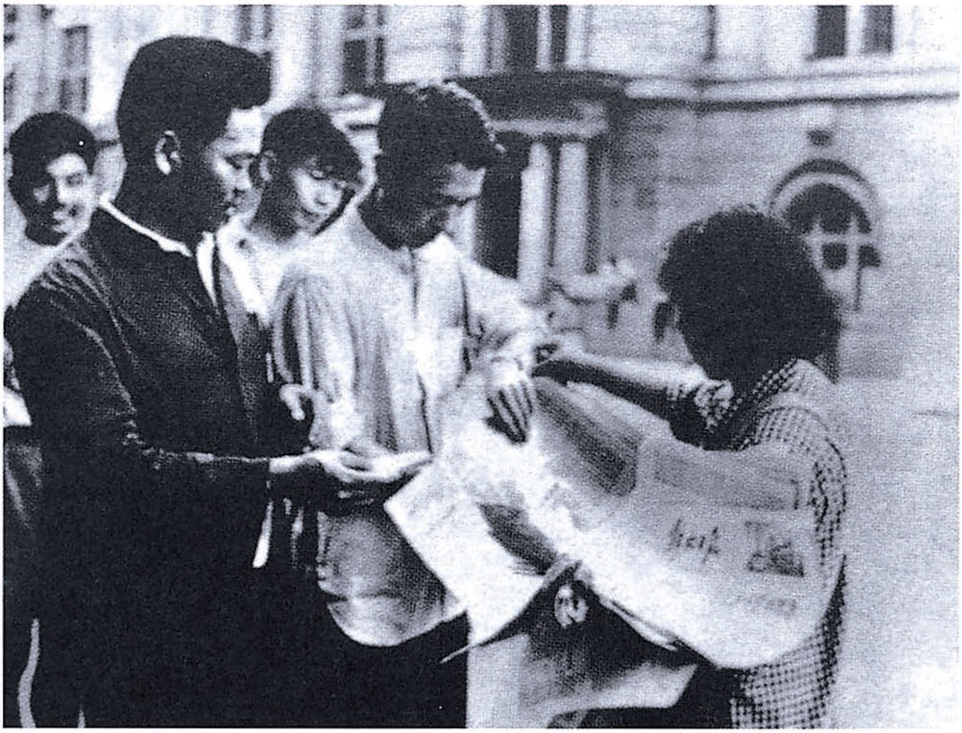
---

[1]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运行，推翻了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

[2] 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

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经过修改补充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图为上海市民在购买刊有讲话全文的报纸。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

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

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

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

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九　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

一九五六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一九五六年，还有少数合作社社员闹社的事件，主要原因也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

应该承认：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

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决不无故闹事。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

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十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如像我在上面讲过的，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

---

[1] 参见《老子·五十八章》。

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将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十一　关于节约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节约的问题。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

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

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我们反对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而着重在反对贪污。一九五五年提倡过节约，重点是在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中反对了过高的标准，在工业生产中节约原料，成绩很大。那时，节约的方针还没有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认真地推行，也没有在一般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中认真地推行。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我们对建设工作还缺乏经验。在过去几年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也有浪费。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在去年十一月中共二中全会更着重地提出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以后，几个月来已经开始发生效果。这一次节约运动必须彻底地持久地进行。反对浪费，同批判其他缺点错误一样，好比洗脸。人不是每天都要洗脸吗？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总之，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

勤俭建国的方针。

十二　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经济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因为才进行七年，还需要积累经验。对于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

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然后才有全国的胜利。我们要求在取得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较取得革命经验的时间要缩短一些，同时不要花费那么高的代价。代价总是需要的，就是希望不要有革命时期所付的代价那么高。必须懂得，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矛盾的，即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这需要在实践中去解决。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因此也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

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除了苏联以外，东欧一些兄弟国家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完全不错，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不管我国情况，适用的和不适用的，一起搬来。这种态度不好。另一种态度，学习的时候用脑筋想一下，学那些和我国情况相适合的东西，即吸取对我们有益的经验，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种态度。

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

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1957年2月，毛泽东等接见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

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作结束语的提纲

（1957年3月1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要普及，要提高，京戏原来是地方戏，将来也可能转化。

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

共产党也总有一天变得无用了。

马克思主义应当宣传，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为领导，是否不妥？

匈牙利要两年至三年才能恢复。错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批评问题。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老干部不怕批评。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没有安排，安排不够。

大民主，小民主——一般适用小民主，局部（不实行小民主地方）允许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

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

纪律，为了增进纪律——我们人民是很守纪律的。

以军队民主为例。

遵师爱生。

局部的，个别的，不是一般提倡。

作为『了』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因为官僚主义存在。

发至县级[1]，还要研究。

官僚主义——橡胶。

以工人阶级、共产党、马列主义（指导思想）为领导，是否不妥?

曲折、波浪式、螺旋形的前进。

科学。橡胶50—60年。

对唯心主义是否可以批评？问题是要有说服力。

发行参加〈考〉消息40万份（2000，30万）[2]，蒋介石选集[3]。

不要泼科学家的冷水。参观科学院。

控制在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少增长，以待条件具备，再作适当增长）。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

美国经济危机，美国同各国的矛盾。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耻!

---

[1] 指将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发至县级。

[2]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中说，《参考消息》的发行，准备由2000份扩充到30万份，发到县一级。

[3] 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中说他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但不公开发行。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

（1957 年 3 月 1 日）

同志们：

我没有多少话讲了，有几点说一下。

批评的问题。这个问题刚才有人谈到老干部批评的问题，还有人提到（在小组会的时候）马列主义能不能批评。马列主义，这个马列主义是不是可以不规定为领导的思想，或者叫指导思想？因为规定它为指导思想，使得有些人有点害怕。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有个很大的改变。我是讲由过去的那种领导，旧社会国民党，蒋介石嘛，那么一种领导，改变为让位于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我们的国家制度。这个工人阶级为领导么，它就是有个党。现在还是有党派的时代。这个党、这个阶级，这个党有一种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那么，问题是它如何领导，如何指导。并不是说让一切人都进共产党，都相信共产党的道理，去讲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这些东西，如讲世界观这个问题，只能够是逐步地使人了解，开头是很少的人，以后多一点人，以后又多了一点人，不能一下子要求很多人相信，就是不能强迫人相信这一点嘛！不能强迫人信什么东西，前天我提到了。精神上的东西不能强迫人家相信，也不能强迫人家不相信。比如强迫人不信教就不行咯，强迫人要信这种教不信那种

教是不行的。强迫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行不行呢？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一天天发展，相信的人一天天更多一些的。但是无论怎样，几十年之后，我相信总还有许多人不相信的，不相信那个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的，有神论者不信。甚至几十年后，多少年后，还有相当一些人不信怎么办？原来就是在马列主义领导里头应该安排的，就是应该认识到有些人不相信，事实上或许要如此，也只能如此。

能不能批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它就没有用，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还怕批评，那就不行了。所以不发生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事实上唯心论它就批评马克思主义，宗教界也批评马克思主义，有些人不说就是了。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说成为与他那个宗教结合。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是该批评的。你一批就倒嘛，你是纸糊的、棉扎的，纸糊棉扎风一吹就倒。应该是不怕批评的。所以这时候，提出怕批评，就是有弱点了。这个弱点有没有？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当批评，无论哪种干部、政府，缺点、错误应该接受批评的，并且成为习惯，人民政府成了习惯。批评就没有事，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嘛！人民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我们不要把这个权利交给反革命，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我讲得不够。讲的这种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大讲这个问题，今天有朋友讲到咯。什么叫长期？我想这个问题答复比较容易，长期么就是你共产党有多长，它就有多长，照办就是了。共产党有多少寿命么，就是民主党派有多少寿

命。今天郭老说我们这些人统统要向他看齐，无党派寿命最长咯。共产党有天要灭亡的，我们希望这一天不迟不早地到来。大概太早不行，太迟了没有必要。凡发生的事物，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生的，因此都有它一定的寿命，共产党就是一个事物。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用这些方法监督嘛。我们有各种机会嘛，比如今天就是机会，还有各种机会进行批评，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批评缺点，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说，你又讲大民主不适当，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是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这是我们过去所做的，包括肃反中间的某些做法。现在有人建议不要大民主了，现在的做法已经改了，现在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是老的。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咯，都是小民主咯，有些一个“小”字还不够，再加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就是和风细雨比较好。现在所讲的就是那个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工厂，那样的合作社，那样的学校，那样的商店，那样的机关，那样的单位怎么办？它任何的民主都没有，大民主没有，小民主没有，小小民主也没有。简直是官僚主义，一万年也不能解决问题，就是问题不得解决，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对这种官僚主义如果不允许它我看是不好的，应当允许它，虽然宪法上没有罢工的条文。这并不是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这个，我们提倡反对官僚主义，提倡人民范围之内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罢工算不算一种斗争？也算一种斗争，用批评斗争，没有办法的时候，对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是应该允许的。那么，先生管不了学生怎么办？应该是

有纪律的，无论工厂、学校、商店都应该有政治思想教育。我们中国人民是有纪律的，是很守纪律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进行工作，政治思想教育很缺乏，很多方面缺乏。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有些地方，相当多的学校不能解决，没有教育。纪律也应该进行教育，应该先生学生打成一片，工厂厂长与工人打成一片，关心他们。那么这样一来的时候，还有什么罢工呢？凡是这样做了，就不会有罢工的。所以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以后下面三条，就是第二条咯，如果个别地方、局部地方、个别工厂、个别合作社、个别学校，官僚主义十分严重，这个时候，不问事实上有罢工，事实上有罢课，就是因为连小民主也没有，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有些地方的同志，回到各个地方，不要说北京开了会的，从此全国可以大罢工，（笑声）全国可以大罢课，说是我说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以军队为例，军队我们曾经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战士批评军官，使军官很难受，战士批评连长，干部会批评军长、师长。大批评以后，这个师长、这个军长、这个连长他的工作更好做了。战士们是拿着枪的，可以用这样的批评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然后你就要检讨，你当连长的要检讨，你犯了错误！不能打人，官长不打士兵。军队这样做了，我们解放军里头有很大的民主，为什么我们学校不能做？我们工厂不能做？我们合作社不能做？我们合作社现在的时候，许多地方命令主义很严重。为什么我们机关不能做？是不是这样一做，天下就会造反，天下就会大乱？为什么军队没有乱，还这么打胜仗？那么打胜仗靠什么？一没有原子弹，二没有氢弹，洲际导弹，一个也没有，飞机也没有，那个时候武器不如敌人，如何团结起来？就靠肃清官僚主义，减少官僚主义，跟群众打成一片，走群众路线。

至于要服从领导，工人要服从厂长的领导、指挥，学生要服从先生的指挥，要有学习的纪律，但是先生与学生要打成一片，关心学生，解决学生的问题。现在学校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课太多，学生负担太重。我看我们中国人民就是这样，要么一个字不认识叫文盲，要认识字一天给你堆一大堆。所以讲到这个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这个事情，我们要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之一，一种补充方法，经常的方法应该是克服批评官僚主义，但是如果办不到，用这种方法调整我们的社会秩序作为一种补充方法也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允许的，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敌人的情况。我们准备发行一个刊物《参考消息》，在座的大概都看到了，《参考消息》过去发多少？发两千份，现在准备扩大到三十万份一个大报纸，比如《大公报》它是发二十万份，这个报纸发行比它多，有三十万份。由两千份准备跃进到三十万份，发到县一级，就是要花钱买咯。凡是愿意购买这个刊物的，党内党外都可以看这个刊物，那么人们就要说替帝国主义出钱办报纸，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无条件地办报纸。我说这个话也可以这么讲，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要把你们骂我们的话，如何骂我们，你那里发生了的乱子，登在报上，作为内部刊物，有三十万人可以看到，一份不止看一人，还不止，什么“不得遗失”，那个东西人家遗失了怎么办？那有什么要紧？（笑）（周总理：现在没有了。）没有了，不要那么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至于是不是受他的宣传，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变成他们的人，我看也有可能一两个变，变一两个，我们中国人多，刚才马老也讲了六亿人口嘛，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蒋委员长这个问题，蒋介石他讲了许多东西，有许多著作、演说，

听说有这么多长，我就赞成出全集，有人反对出全集，这个当然不公开发行，公开发行行不行？现在还不好公开发行吧，图书馆里头愿意买，愿意看看，你要研究研究历史。他是历史人物，是社会存在的一个反映，他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我们要批判那些东西，他的文章都没有读过，那怎么批判法？那是不是读了他的文章统统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进也可以咯，这一条就是要见世面，要见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那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更加懂得咯，为什么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里面总要放出一些祸来就是咯！要鸣出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应该怎样看？我前天说了，不好的东西它另外有一个作用，一方面是不好，一方面是好，毒草有它的好处。它不单是一个毒，我举了种牛痘的那例子，这个细菌、病毒是坏东西，有些也有好的作用，能使人产生免疫。

其他的东西还有什么？

比如匈牙利，有人批评我，说我讲得不够，没有讲清道理。匈牙利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误那天也讲了一点，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我们也真不太清楚。过去那个拉科西，那个同志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大清楚，苏联许多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苏联比较好，拉科西那个时候搞得岂有此理。大概有这么几条，无非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那天我不是讲了吗？工业方针没有原料，没有销场，办大工厂，工人的薪水降低百分之二十，资本家简单地打倒。如讲我们的荣毅仁先生，把他打倒，到申新九厂当工人，一个匈牙利事件一起，他就出来组织工人委员会，组织什么会？组织工人委员会。他就那么简单，简单明了。（笑）知识分

子没有改造，根本不谈知识分子改造，于是乎裴多菲俱乐部，记者协会，学生联合会就出来了。还有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没有群众跟反革命作斗争，而是少数人在那里斗，大批的真正的反革命没有受损伤。匈牙利来了大民主啦！这一次，大民主时间不长，可是恢复要多少时候呢？有人说要三年，他们自己讲，他们的人跟我们讲要三年才能恢复到过去十月二十三日，一两个月的大民主，大民主好是好，可是要三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的大民主就减产一半，十月十一月，十月减产一半，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多少恢复一点吧！所以还是搞小民主好。搞大民主，我们在座的相当多的人也受不了，是不是？

人口控制在六亿，一个也不多啦？（笑）这是一种假设，就是讲有一个时期，比如讲条件没有具备，无非是粮食、衣服、房子、教育等等，现在每一年生一千多万，你要它不增，很难讲，因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嘛，必然王国还没有变自由王国咯！在这方面人类完全不自觉，没有想出办法来，我们可以研究这个问题，应该研究。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那天我讲了，政府应该设一个部门或一个委员会，人民团体可以广泛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想出办法来，人类总而言之要自己控制自己就是了，有的时候使它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停顿一下子，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笑）这是一种设想。这一条马老讲得很好，今天讲得好哇！我跟他是同志，以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时人家反对，说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但这个问题还很值得研究，政府应该设机关，还有一些办法。人民会不会有这个要求，还是我们主观的，人民是要求这个东西的，不是每个人要求，而是很多人要求，比如农民要求这个，人口太多的家庭，要求节育。城市里头农村里头都有

这个要求，说没有要求是不适当的。邵先生咯，嘿，你们两个坐在一起了。（笑）

不要向科学家泼冷水，这一条好不好？我看好，不要泼冷水，科学家怎么能泼冷水？向科学家泼冷水这当然不好。一切家，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也不要泼冷水。科学家不要泼冷水，积极分子只要他积极，有时候工作做得不好，我们也不要泼冷水，帮助他改正错误，只有那个别的、极顽固的、无可救药的分子另外处理，无可救药的，科学家不要泼冷水。参观科学院，今天郭老将了我一军，这个恐怕没有办法，你既然将起我的军来了，不然你已经封了我的封号“官僚主义者”。（笑）

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同志们说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得好，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科学家、技术人员、技术干部，学生们不要单纯技术观点，技术观点是好的，应该有技术观点，没有技术观点怎么搞技术？观点还没有哪有技术？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热心。但是单纯就不好咯！可以搞到替社会主义可以服务，替资本主义也可以服务，因为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对于新的政治关心，对于新的大局关心，但是我们要做好我们的工作。这不能完全怪他们，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些东西他们不能接受，就是我们所谓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他就没有兴趣来接受你这个东西，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在学校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工厂，一切有科学技术人员存在的地方，学生们中间，加强并且改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

关于邦有道怎么样？贫且贱焉耻也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确不是个别的问题，这是所谓安排问题。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有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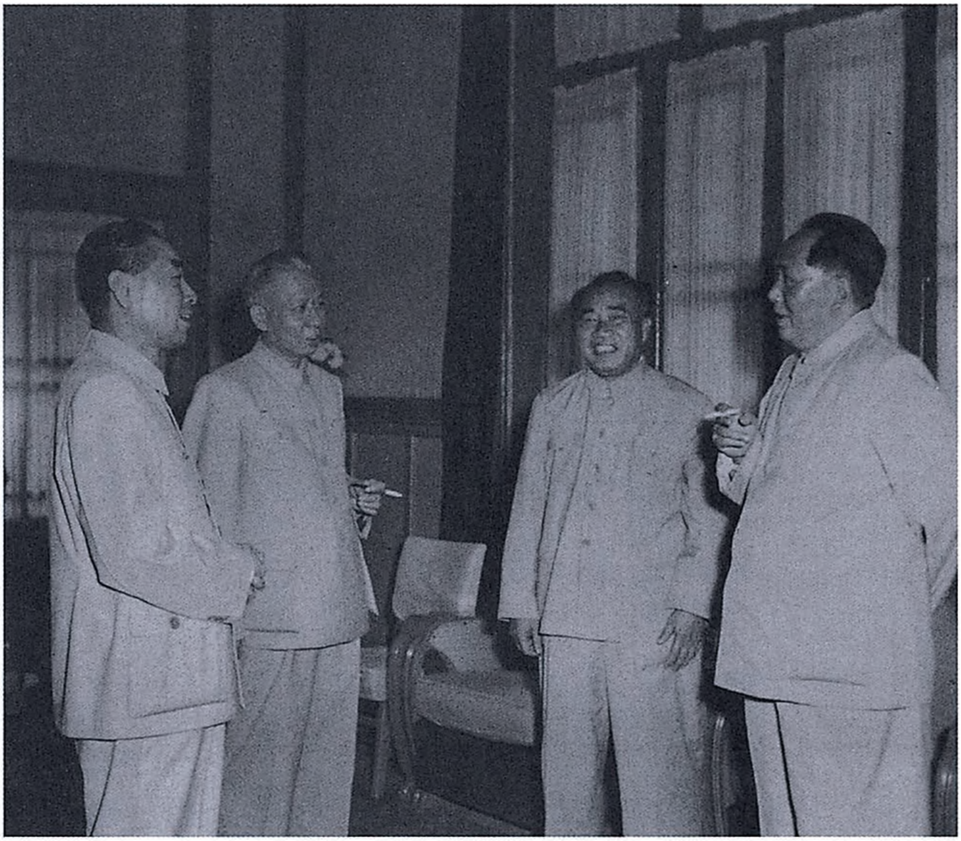
人没有安排，一个是安排不适当。所谓不适当者就是有职无权没事做，或者就是安排的位置跟他那个学问才干不适合。人们承认邦有道，这个好，邦有道，邦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是什么东西呢？无非是社会主义嘛！辩证法嘛！（笑）贫且贱焉，贫就是薪水不够，贱就是没有工作，大概是不要讲他不注意劳动呐，没有工作或者安排得不恰当。他是用孔夫子来批评我们。所以孔夫子有时还有用处，（笑）这个是关于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缺点的问题，这个缺点很多，中共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统一战线方面的问题，希望各党派无党派的同志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有所准备，提意见给我们，什么话都说。那一些人搜罗起来贫且贱焉的有多少，其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还有我们有许多缺点，我们在前进中间有很多困难，但是不要忘记外国也有困难，比如讲美国它有它的困难。红楼梦里头著名人物王熙凤有言“大有大的难处”。因为人家向她借钱，她就说（诉苦）“大有大的难处”，刘姥姥借钱，因为她这么一说，刘姥姥就冷了半截。的确大有大的难处，美国的事情并不那么好办，据我看，经济危机要来了，美国、法国、西欧、自由世界、西方世界，西方国家它们都矛盾很大，经济危机要来，这个东西恐怕不可避免的。美国的月亮恐怕也不一定那么好，还是要证明。它现在强点，这一点要不要承认？要承认。我们骂它纸老虎，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人家有那么多东西，我们说它是纸老虎呢？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建立在不很稳定的基础上，谁人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我们的基础比较巩固，还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阵营不那么巩固，我们也有毛病，也有缺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有许多不满意，我们的经济还落后，文化还落后，整个社会主义跟它比较起来我们还落后，可是

它是建立在一个矛盾更多更大的基础上的，不要忘记这一点。

最后我这个讲话，前天这个讲话，有些地方补充一点，修改一点，今天讲的同志们提了许多意见，这个东西不准备全部公开发表，因为有些问题比如讲罢工罢课这个问题，一公开发表，那好吧，全国就罢起来了吧！（笑）而我们的干部没有准备，我们的同志没有准备，地方来的同志开过会回去的时候，请你们要使他们有准备，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好讲，我们坐在这里好讲，首当其冲的是他们，要使他们有准备。局部的、若干个别的，是那些极端的官僚主义长期不能解决问题，是指那些范围。最后如果修改一下子，调整一下子，我讲的这一篇，准备发到县一级，党内党外都可以看到。几天之后我们准备开一次宣传教育会议，宣传会议，宣传工作、报纸的会议，准备跟他们再谈一次，完了！（鼓掌）

1957 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1957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一起。

关于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问题的批语[1]

（1957年3月4日、4月6日）

一

尚昆同志：

内有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严重浪费一文，请据此检查，分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2月27日第二一三九期刊载的《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工作浪费情况甚为严重》的消息后写的批语。消息说，据《大公报》通讯员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规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费很大的力气，经过严格的挑选，才能符合标准，因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新华社派记者对此事作了调查，并在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4月4日第二一七〇期刊载了《关于对中央负责同志肉食供应有严重浪费现象的调查》。这篇调查说，《大公报》通讯员所反映的情况，经记者复查，有些情况是事实，但不够全面，并有夸大之处。实际情况是：北京市对中央负责同志的肉食供应，几年来和特种供应（对象是各国使馆、大饭店、外宾、专家、高级医院等）的标准相同，并没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规定。全市每天特种供应的猪60头，占全市每天供应量的5%，其中只有3头左右是供应部分中央负责同志的（目前约160户），不足全市特种供应量的5%。至于要求严格，是因为此类供应如质量不好或不卫生，极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毛泽东看了这篇调查后写了第二个批语，即本篇二。

清责任，予以处罚。并将情形告我为盼！

毛泽东
三月四日

二

尚昆[1]同志：

160户每天三头猪，如以每头150斤计算，共有450斤，每户每天得肉约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够了，可减少一半，请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为是可行的，似应减半执行，以示同甘共苦。现在供应油肉到用户，实际上有很大浪费，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费掉了。请酌办。

毛泽东
四月六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复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57年3月6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从印度回到日喀则时给我拍来的电报和火鸡年[2]元旦给我的贺电，我都收到了，谢谢你的祝贺。

这次你和达赖喇嘛[3]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4]涅槃二千五百年纪念会，在加强中印友谊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祝你在新的一年内在西藏地区各项工作上取得新的成就，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六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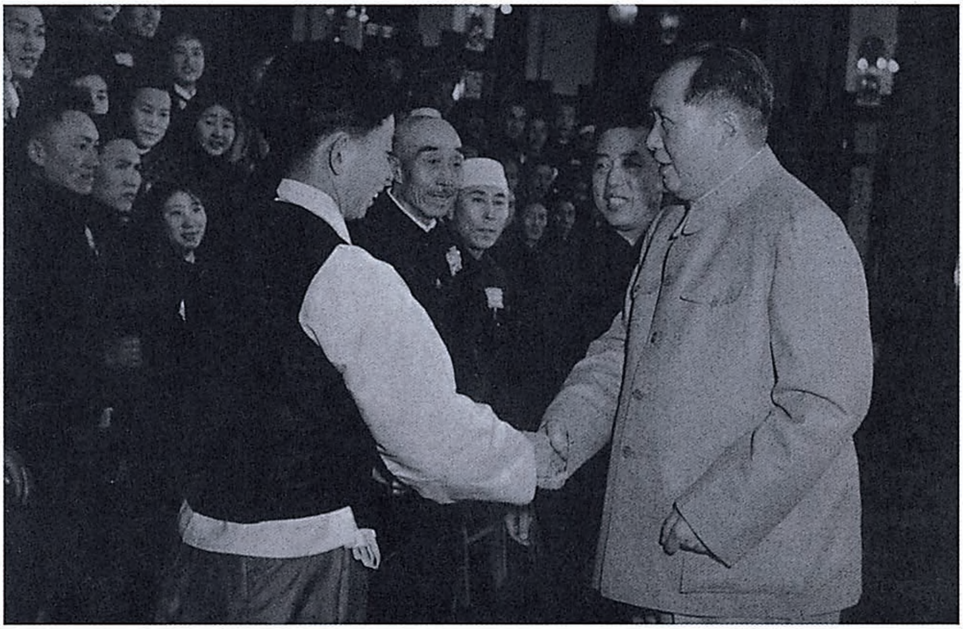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2] 火鸡年，藏历纪年。藏历采用干支纪年，以“阴、阳”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代替十干，以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代替十二支，再以十干和十二支相配，如阳木鼠年、阴木牛年等。以此计算，1957年是藏历阴火鸡年，也称火鸡年。

[3]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4] 释迦牟尼，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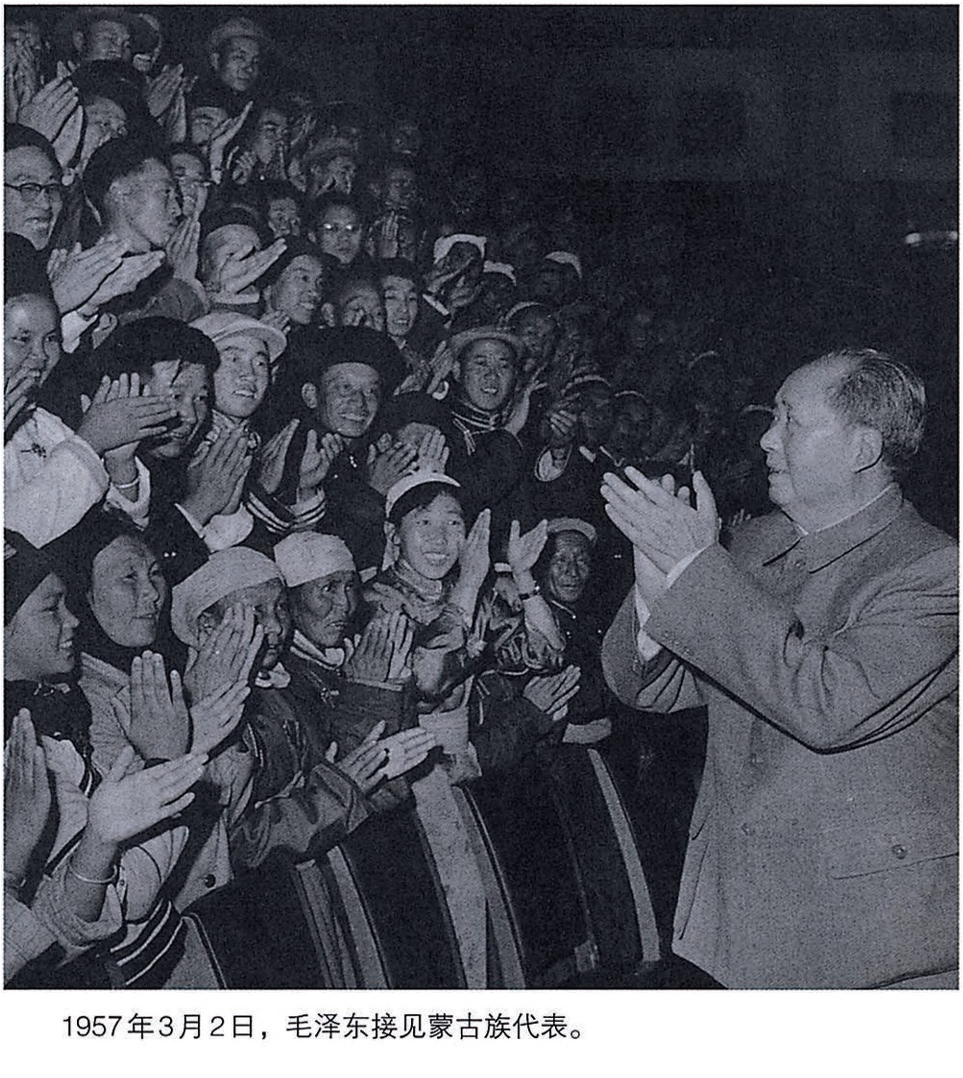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参观团和贵州各民族参观团全体成员。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辽宁省少数民族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四川、广东等省少数民族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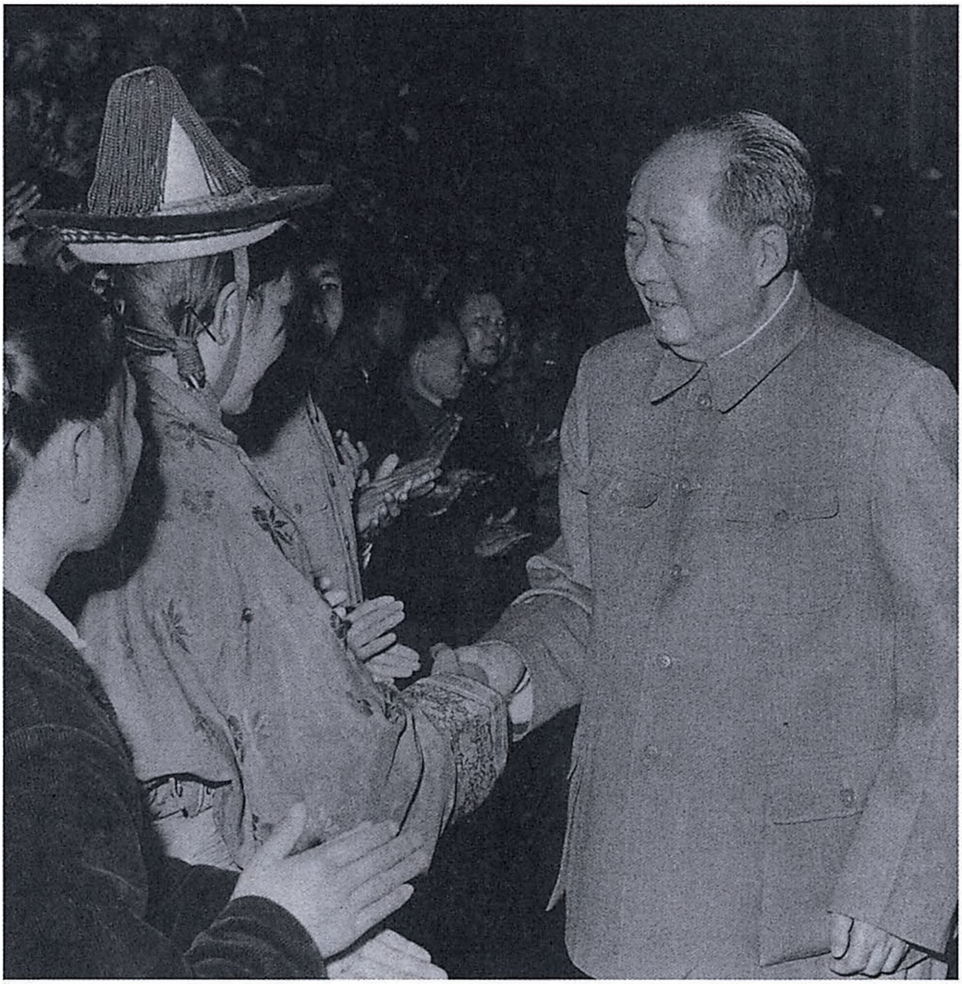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贵州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蒙古族代表。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少数民族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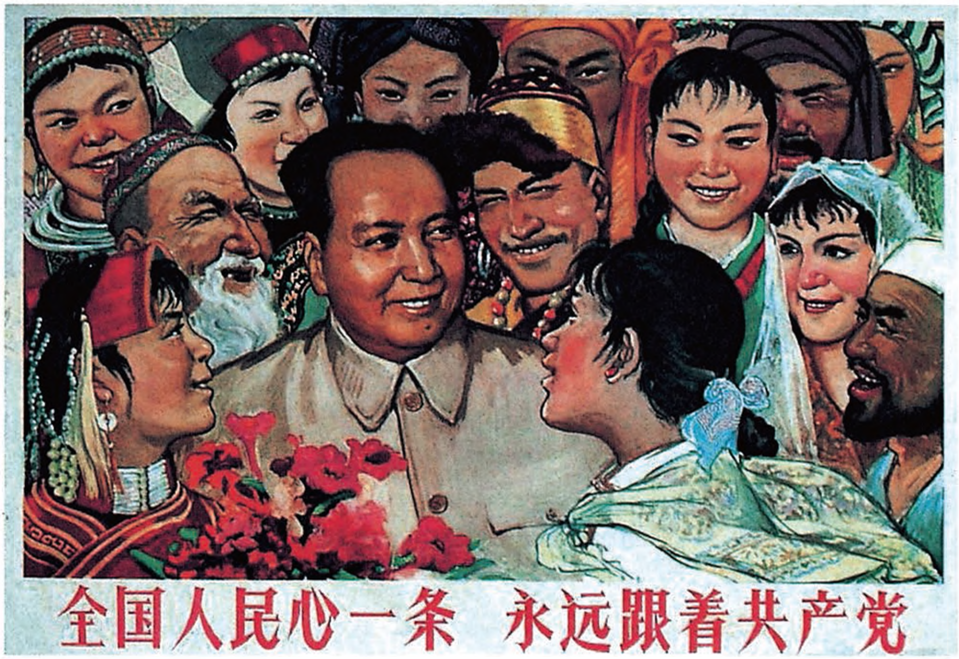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西藏自治区各族青年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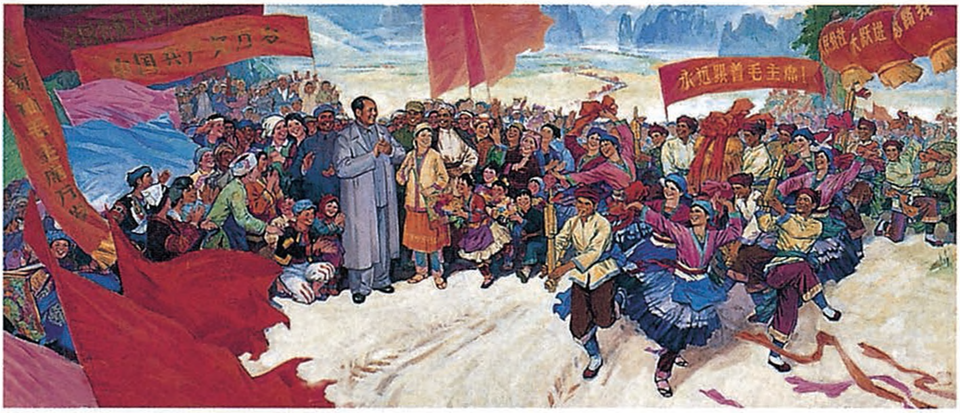
1957年3月2日，毛泽东接见裕固族代表。

1957年3月，西藏农业劳动模范白马登珍向毛泽东献哈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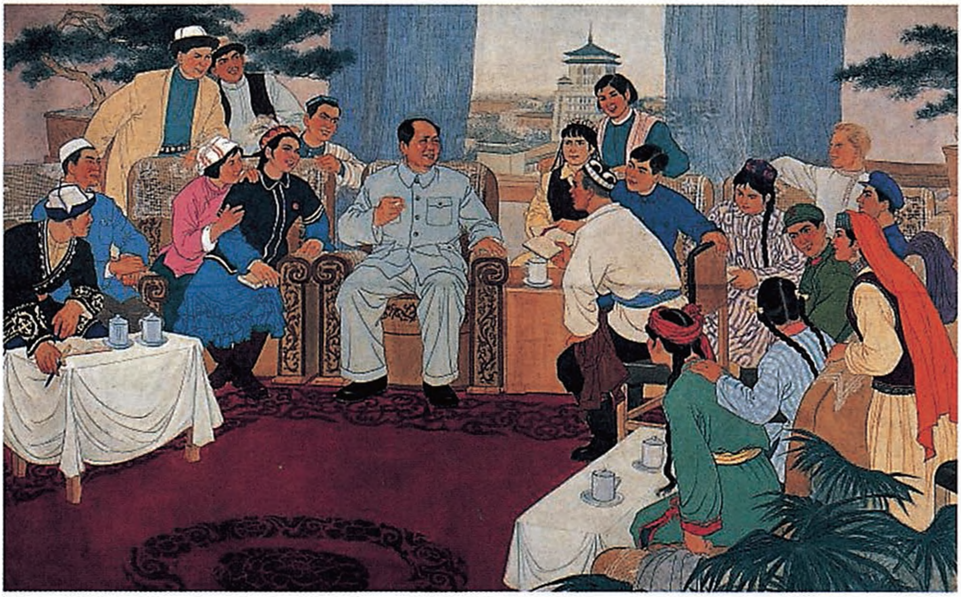
1957年3月，毛泽东和少数民族妇女代表玛依努尔等人一起祝酒。


全国人民心一条　永远跟着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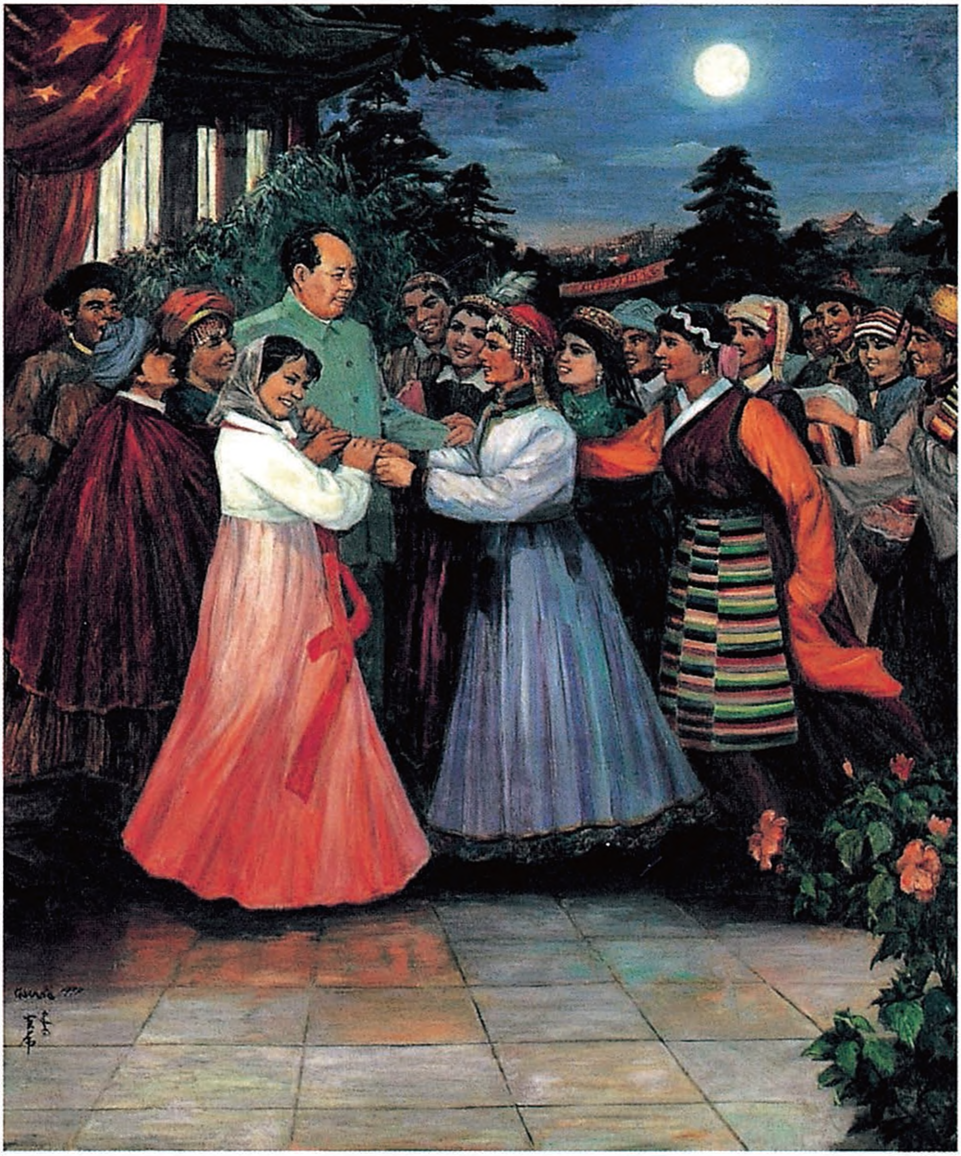
全国人民心一条　永远跟着共产党（宣传画）


永远跟着毛主席！
大跃进

《群山起舞》（油画）



《向毛主席汇报》（油画）



《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代表》(油画)

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谈话

（1957年3月6日）

（关于会议开法，听了主席录音报告，内容很丰富，要好好消化，最好多开小会，少开大会。）

好，开一星期，不够，再多开两三天，开到解决问题为止，多开些小会。

（各地到会有党外人士，我们来的是清一色。）

党内也不会是清一色。

（对陈其通等四人文章，听报告录音与前次省市委书记会议所传达精神，不同。）

他们是以卫道君子的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是达不到卫道的。过去讲的是插话，可能听漏了什么了。

（关于党委各部门应分管政治思想工作及政府各业务部门不抓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第一书记要抓思想，回去告诉他们，希望第一书记把思想工作抓起来。第一书记才行，第二也不行。光是宣传部，孤单单的不好办。管业务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结果来了大民主，就会把你搞掉。各部门、各党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别是第一书记，各司局都要管思想工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问题很多。）

问题是多的，要放手，有好处。

（批评工作没做好。）

打大仗往往不可避免先要打几次败仗，有了经验就会胜利。

（康生：团结，批评，团结，但往往一批之后，没达到新的团结，是批回去了，急得很，主要是仓促应战。）

领导要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才能解决问题。

（上海反映，党员与党员在报上斗。）

党内思想也很混乱，不要害怕，要放手，怕什么，难道地球会炸了?!

（康生：党外也怕，怕宗派主义，不让人争鸣。）

（有人反映老教授对“争鸣”还有顾虑，写文章不容易，第一天文章一登，第二天给人一批，学生对自己也不尊敬了。）

那第三天再写一篇批回去就是了。

（有人提出，陈其通文章问题是否省市委书记会议强调一面，国务会议又强调一面，因国务会议有党外人士?）

党内党外要一起谈，关起门来，对外又一套，或单独对党外谈也不行，要党内外一起谈。

（闹事问题。）

特殊的、个别的犯法分子当然要按法律处理。一般闹事的不要开除，总开除不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去，他总要有个立脚点，还不是到学校、机关、工厂、合作社去。西安抓了一百多个流氓，社会很高兴，但学生中“流氓”跟社会流氓不同，知识分子不是社会那样“流氓”法，如不犯法，仍不要开除……

（希望讲讲上层建筑与基础关系问题。有图画家说，花草没有阶

级性，还有自然科学问题。）

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但它要靠人去搞，就可能渗进一些人的阶级意识进去。

（当前思想斗争，是否可概括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马寒冰文章是教条的，钟惦棐则是右的，两派我们都要批评……《电影的锣鼓》文章基本方向是不对的。

（周□：所提的一些缺点，的确是有的，但“中申”一些同志情绪不对头。部里是不同意该文的。）

无产阶级思想要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是不错的，但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齐放中，资产阶级思想出现会多起来，但并非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并非无一可取，扣帽子会把人家吓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现就马上驳倒。

（陆□□：大将不要先出马，不要打冲锋，先让党外人士发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中国知识分子少，要他们信马克思主义不容易的，如三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知识分子信了马列主义，就是很大的胜利。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因他没办法，不能不接受，但思想上不是很服。

（□□：北大哲学系系主任公开说相信唯心论。）

他们政治上可以跟我们走，但要信马列主义不容易，有的搞康德、黑格尔几十年，可以逐步改变；有些一辈子也不会变的。

（□□说：百家争鸣还有顾虑，怕把是非问题弄成敌我问题。）

怕升级。

（有的人看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暴露出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好像过去工作白费了。）

不暴露好像没有，暴露就很多，是否过去工作白费了？解放才六七年，资产阶级思想就没有了？他们说出来是好的，我们得到机会去教育。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文章还没有说服力，企图压服。压是压不服的。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要几十年，批评人家一定要有研究，想打几棍子不是办法，不能解决问题。过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绩的，那是大风暴，是粗枝大叶，基本解决分清敌我，分清拿刀子杀人的，这是有数的。现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体地讲，仔细一件一件地讲，如数学、物理等等……还有一派派，必须具体讲是非。

（有人问：这个是非怎么分？如新闻工作等就有争论，请主席讲一下。）

我不是新闻家，你们是内行，□□就是专家，我们要讲的是大是大非，要分清敌我。不是特务，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用的。

（湖北反映初级党校科级干部酝酿上街游行有五条理由，反对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改了，人家就不游行了，因此要加强党员教育。

（现在思想混乱，究竟原因何在？有的说是官僚主义，有的说是要民主、自由、个性，不要集中、专政、共性，领导要纪律、共性、集中，被领导的要另一面，有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等等。）

如果动不动就说“反对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是不妥当的，因为学校存在问题没解决，所以闹事，如湖北党校是什么问题呀？要分析。

（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是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斗争？官僚主义？）

不能用一个简单口号去套一切。现在与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不同了。合作化要搞好几年，个人与集体是矛盾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还要改造，这就叫过渡时期。

（……）

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兰州原要开除几十个学生，现在不开除了，又有点草率收兵。）

开除几十个学生是国民党办法，事情结束如不解决问题，将来还是要闹事的，如讲到兰州林业学校、护士学校招生骗人家，学生闹事，我是站在学生这方面的，你欺骗人家嘛。

（康生等：欺骗就是犯法，可以告到法院，有罪的。）

像这样的学校，你说是什么问题？这两校都是官僚主义，欺骗，又有官僚主义……共产党员工作这样，要整！不罢课怎能整掉官僚主义？学生中很多成分不好，但他要说："对，我是地主成分，但你为什么骗了我？"我们要向党内外宣布，在人民内部无所谓专政，在人民内部讲专政是错误的！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人民自己专自己的政？个别犯法是例外，不犯刑法就不能法律制裁！

（党校讲课都用大纲，党内关于马列主义教育能否争鸣？）

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家，如果有不同解释，就是曾经有第二国际，列宁的第三国际，斯大林有马列主义，也有教条主义。

（教学大纲以前叫"法律"，后改为"参考"了。）

以前叫"法律"，现在叫"参考"，可见这"法律"就不太严肃了吧。

（四川曾想封《星星》杂志社。）

《星星》还是不要封。这次会议一开，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又会冒出来，不要急，我们不忙于理它，它大有劲头了。你们不是反映有些教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敌深入”吗？我们对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有两条：（一）必须批评，（二）必须批评得好，因此必须要有准备，要有说服力，毒草在中国长了几千年，再长七八年也不要紧，而且我们还是要做事情的。他们一肚子气，可以让他们讲，毒草不可怕，如用压下来的办法，还是要翻的。

（有人说，《星星》所谓七君子中两个有杀父之仇的。）

这样，《星星》出现那些东西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如何对付不正确思想？要有办法，不要急躁，不要简单，应该研究方法。中国有几千万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高等学校80%学生是他们的子弟，那些有杀父之仇的，能不恨、不骂我们？但应估计到，剥削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可以争取的，现在高等学校工农子弟还不多，在中小学。匈牙利高等学校60%学生是工农子弟，照样闹事，反苏反共，我们80%是那样子弟还没闹事。专业学校官僚主义为主，还有欺骗。在工厂里也有官僚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毒草是有的，但不是多数，占百分之几？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是小资产阶级……现在是转变时期，大变化时期，在观念形态上一定有所表现的，但99%或还要多一点是能够教育过来的，问题在方法，在于有说服力的文章，学校的教员、工厂的干部能讲得清道理，能说服学生、工人。光压，压得服人？

（百家争鸣中党内外有人动不动就说庸俗社会学。）

简单口号压不了人的，我们应当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要有

说服力的文章。如果大家看来都对，只有一人说是教条主义，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多数人都说你是教条主义，那就不成了。地、富、资产阶级及其子女、知识分子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在于方法。极少数的人会教育不过来的，大约只有千分之几，但如果他们不拿起刀子来也不要紧。《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钟惦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机会主义之花；马寒冰的文章是教条主义之花，马寒冰文章中有这么一种气味——你是什么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你就乱放?！我们要取得经验，要学会如何掌握。我们对付蒋介石、帝国主义是有经验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问题我们也掌握了。因此对问题必须研究，要用脑子，要学习，重要的是在斗争中取得经验。有两点：（一）对毒草估计过分了，几千年来，人民就这样容易毒倒啦？人民是有分辨能力的，不怕！让他放一下吧！党员（领导干部）不要先讲话，先让民主人士写文章，让党外充分讨论。（二）过去搞阶级斗争，我们是有办法的，现在是思想斗争，不能再用老办法了，打倒蒋介石，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的办法，现在是思想斗争，是不同了。思想斗争是动口不动手，而且动口要恰当，不是采取专政的办法。不要将敌人夸大而低估自己，没有什么可怕的。去年一些专业学校采取欺骗办法，有17个学校7000人罢课，全国有500万中学生，中学校长和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500万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

领导思想斗争的方法要研究，过去是对敌斗争，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现在问题是复杂的，有科学、文艺、高等学校，还有《草木篇》，他能写，我就不能写，《诗经》《楚辞》是什么呀！大部分是草木篇。他们和我们作对，不怕，四川是大省，有几

千万人口。陈其通四人文章，老干部十之八九是同情的，但党外不赞成，党就孤立了。

要发动知识分子讨论“再放”。

（航空学院副支书张云凤写反动标语问题。）

他写“苏军滚出匈牙利”，我们要他“滚进”，他要“滚出”，学校里同意这意见的究竟有多少？千分之一大概是会有的。

（有人提糊涂思想还很多。）

这是显明的敌对问题，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糊涂思想不算，世界上多得很。

（□□：支部表决开除张党籍问题，五人赞成，四人主张留党察看，是在负责同志讲了要开除以后表决的。）

九个党员，五个赞成四个不赞成，说明时机未成熟，何必急？张有意见可在支部中公开讲，为什么要秘密写标语？这是恶劣！我们还可以研究经验，是否要开除？如要开除，什么时机开除？

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的儿子也有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来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少了些，像张云凤这样的少。

（□□：像张东荪那样的人，几年了，现在还放在那里教书，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害。许多教授公开说：“共产党会胜利是无天理！”我们也还是采取严肃批评与耐心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最近他自己公开检讨了，这说明还是有效的，对党无损害。去年他还参加了知识分子会议，还加了薪呢。）

思想斗争是“文”的，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统一战线，团结批评团结，我们是当医生，开刀是为了把人救活。

（有些教师认为不需要继续改造了。）

不要改造？我60岁了，还要改造，一万年还要改造。人要前

进，就要改造，这是合乎规律的。如果还是老一套，像过去骑在马上打蒋介石那样，就不行，就要改。共产党还是有点人情，是做事的。说到学术，人家说我们“不学无术”，我们这方面的确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学习研究。

（有高级知识分子说你们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

对，政治是为业务服务的。

（□□：在一定范围内是应当这样说的。）

政治是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的。我们提出“向科学进军”“十二年规划”，至于半导体、原子能等就应该由你们去搞，我就不懂，过去我们是阶级斗争，是种攻势，他们没办法，但不舒服。现在要建设，知识分子就以改造之身出来讲话，批评我们的官僚主义。他们批评是好的，为什么不可以把尾巴夹起来呢？要学习，要研究。

（知识分子中的新老问题，老的怕新的批评。）

规律就是如此，后一代的人学过前人就批评前人。马克思就是如此，如果后代跟我们一样，有什么好处？

（他们不公开宣称唯心，而是把唯心唯物搞在一起，搞乱了，借反教条主义之名，以抬高唯心，是他们百家争鸣之目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有各的目的，但结果是我们的目的能够达到。

（□□：有人提出，“百家争鸣”没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那么明确，是否加上“去伪存真”或“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的方法，唯心主义者是虚中求是。

（有的科学家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

党能不能够领导科学？能够，办办看，如领导不起，还是不行，我们是从政治上来领导科学，搞十二年规划，向科学进军，这

个我还领导不得?

(□□：去年我们搞照顾等等，做了总务长的工作。)

我们，总务长加李富春，第一给饭吃，第二计划。现在科学研究，我们就没那么多党员去充当所长，难怪人家说，这点不要去争，自然科学我就不懂，要请他们当先生，李富春加总务长，我一点都不领导？自然科学，先生还是你。

(苏联是否过渡到共产主义?)

还没有。

(陈伯达同志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所提知识分子通过两条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问题。)

自然科学家是通过自己业务实践道路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这是指他个人通过的道路，并不是说不要领导。有些知识分子口头说党不能领导，但实际上我们领导了。列宁懂得半导体？但还是领导了。自然科学部门那么多，科学家自己也是懂得这个不懂得那个的。梅兰芳能领导京戏，还能领导话剧？他是旦角，难道能领导丑角，他领导得了程砚秋？结果还是外行领导内行，政治就是领导。他们事实上是说这么一个问题——“共产党还没有科学家”。苏联情况和我们不同，它已有大批党员科学家。

(教授说：政治为教学服务。)

政治为教学服务，整个人民政府就是为工农服务，也为科学技术服务的。也是的，搞得好一点就发展得快一点，就是为其服务，并且全心全意地服务。

(对闹事学生、工人中共党员该怎么办？有困难。)

有困难，应当看有理无理。如果有理，党员应该站在群众方面，对十分坏的官僚主义，要反对。当然首先要极力争取和平解

决，不罢工罢课。对于无理的，就不卷入。有理的，党员、工会、学生会应该站到群众方面。

（报纸要不要干预生活？）

报上的宣传要看对人民有利无利。没有抽象的言论自由，只有什么阶级的自由，阶级中集团的自由，有阶级的时候，是阶级办报，如果把报纸当作没有阶级性，将来是对的，现在可不。

（有人提出省里传达说，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是对的。）

我是先后插话谈过“这几个同志对党是忠心耿耿的，为了党的事业的，但文章则不堪领教”，下面这句话没了。

（康生：可能反映到会同志的一些思想，上一截容易接受，后一句就容易忽略。）

他们的文章反映出对敌对思想的仇恨情绪，没有这也不得了，也要保护。问题是他们是教条主义，方法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当然在放之中任何错误的东西都应该批评。现在放够了吗？鸣够了吗？不够的。人家还在猜我们的意图，认为我们是“诱敌深入”，因此必须再放。现在开宣传会议，大家同意这方针，要很好研究这方法。（一）党员不忙于写文章，让党外先写，当然要领导。（二）党员也应该写，但必须是要有说服力的，有研究的，有分析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方法，有分析就有说服力，我们应采取帮助人家改正错误的态度，而不是一棍打死的态度。

（关于八大决议，制度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所引起的争论。）

矛盾有，但不大。但保护生产力发展的，不能拿将来与今天比，也不能拿美国与中国比，这是不妥的，50年后的中国会有不同，生产关系在50年内变动不多，苏联已经过了40年，现在还是适

应的。矛盾嘛，现在有，将来更大，现在小一些。这一句话在决议中本来已经删去，但还照原样印发了，临开会才知道。

关于同意甘孜藏族自治州继续进行民主改革的批语

（1957年3月7日）

刘、周、朱、彭真阅，退小平（或尚昆）办。

我认为应当同意这个方针[1]。

毛泽东

三月七日

---

[1]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7年3月5日关于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继续进行和完成改革的方针。报告说，甘孜藏族自治州除牧区、农牧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和早已完成合作化的泸定县（汉族）外，农业区（约32万人）的民主改革，14万人的地区已经完成，其他地区正在进行和准备继续进行。省委认为，这样做符合整个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理由是：1. 有利于巩固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果，保护和发挥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生产，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大量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2. 坚持改下去，将会教育藏族上层，认清前途，消除顾虑；3. 完成改革的地区，对寺庙迅速实行包起来的政策，给以长期维持，有利于社会治安和生产发展；4. 可以巩固公路交通，利于进藏物资的运输；5. 坚决完成这一地区的改革，必将促进整个藏族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增进民族团结，也可减少云南后顾之忧；6. 如果不坚持改下去，势必伤害干部，加深群众痛苦，助长上层右倾，甚至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脱离群众，前功尽弃。

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7年3月7日）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

办戴帽中学[1]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2]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就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

---

[1] 戴帽中学，指小学增设的初中班。

[2] 草台班子，指演员较少、设备简陋、经常在乡村或小城市流动演出的戏班子。

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1]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的。

助学金现在是多少？助学金应该加以调整。农村合作社要搞好，还得三年到五年，现在大多数地区合作化只有一年的历史，去年副业搞得很少，农民收入增加不多，生活还是苦的，子女入学不容易解决吃饭问题。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经过三年，农业合作社的困难减少了或者没有了，助学金就可以逐渐减少。当前，助学金应按照学生困难情况发给，不能作为奖学金的性质。

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学生。社办和民办的问题，有条件的都可以办，但不好下命令。现在的困难情况，主要是由于去年有大灾荒，今年收入不能有很大的增加。去年挖了节余，挖了老本，物资储备用空了，钢材、木材、竹材用空了。轻工业生产，主要是棉纱和布，今年不能同去年相比，税收也没有去年那么多。应当对学生讲清楚，让他们了解国家的经济全局。国家只有这些钱、这些东西，就只能办这么些学校。

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学生要能耐艰苦，要能白手起家。我们不都是经历过困难的人吗？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学校中要提倡一种空气，教师与学生同

---

[1] 萧楚女（1893—1927），湖北汉阳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蜀报》主笔、《中国青年》主编。

甘共苦，一起办好学校。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今后无论谁去招生都不要乱吹，不要把一切都讲得春光明媚，而要讲困难，给学生泼点冷水，使他们有思想准备。学生谈恋爱的风气应当加以扭转。婚姻法有关结婚年龄的规定不必修改，但要劝青年晚点结婚。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

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教育，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发展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董纯才[1]可少做点行政工作，多抽出点时间编教科书，还可请张际春、胡乔木[2]协助，共同编好教科书。

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为什么县委书记一年内不能找中、小学校长谈一两次话，开一两次会呢？最近中央要发指示把这件事情讲一讲。这件事情，省、地、县三级第一书记要管一管，书记不管，宣传部长就很难管。上半年管三四天，下半年管三四天，一年管七八天就够了。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

---

[1] 董纯才（1905—1990），湖北大冶人，教育家。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2] 张际春（1900—1968），湖南宜章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农业课本要由省里编，地理可以编地方地理，文学也要有乡土文学，历史可以有各省自己的史料。课程要减少，分量要减轻，减少门类，为的是全面发展。“关关雎鸠”这几句诗[1]一点诗味也没有，《楚辞》《离骚》没有人懂。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2]的作品。现在作文太少，至少每星期作一次，如果有困难少一点也可以。

---

[1] 参见《诗经·周南·关雎》。全诗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2] 唐宋八大家，指唐代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

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1]

（1957年3月8日）

你们的会议开了几天？开得怎样？汇集的那三十三个问题[2]，我都看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人提出作家对官僚主义者恨得不得了，能不能把他们的结局写成失败，写成死？官僚主义当然应该批评。有个电影叫《荣誉属于谁》，里面有一个铁路局长，是个官僚主义者，可是他的局长还照样当，这样的干部应该撤职。为了治病救人，可以送他去学习。这部电影里那样写这个局长，叫做不彻底，缺乏彻底性，反官僚主义应该彻底。

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现在还没有展开。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3]，今年准备，明年开始，这也要有一个酝酿时期。决议要在今年上半年做出来。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什么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认识还不一致。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和文艺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33个问题。

[3]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整风开展起来，那时候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下，陈其通等就发表文章[1]，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整风，整主观主义，重心放在教条主义；整宗派主义，他们总是想一家独霸，他们总是觉得六亿人口太多了，少一点才好；整官僚主义，多得很。好几年没有整风了。

在座的，有些是党内的，也有党外的，共产党的道理你们也懂得一点，就是要推动，要统一思想，要有共同语言。不然你说官僚主义，他说不是。你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不放；放了一点，有些不好的东西出来，就慌了手脚。总而言之，很怕放就是了。我们主张百花齐放，有的人很怕百花，现在百花齐放的环境还没有造成。

从汇集印发的那三十三个问题，可以看出来问题很多。要求答复，一个人怎么答复得了？我看还是大家自报公议，一个人念，大家讨论，大家答复。

有一种看法，实际上是认为思想不能指导创作，这种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正确看法有关系。要求所有的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作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大概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在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间内，只要不搞秘密小团体，可以你写你的，各有各的真实。这里边，当然还要有帮助。对马克思主义有真正赞成的，有勉强赞成的。对改变社会制度也是这样，比如民族资产阶级，你把他的生产资料拿来共产了，他心甘情愿吗？总有些勉强，当然也有不大勉强的。改变社会制度，从私有到公有，从个体到集体，几亿人口，总有勉强的。

---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总而言之，制度的变化，是一个大变化。迫于全中国的大势所趋，有些人不得不勉强赞成。现在思想这样混乱，汇集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就是社会基础变动而来的反映。我国过去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打倒以后，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和几亿人口的小资产阶级，要改变所有制。知识分子，按出身说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当然还有大、中、小的区别。按全国六亿人口计算，如果说其中百分之一是知识分子，那就有六百万人。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都是进过大学的，萧楚女就什么正规学校也没有进过，他是靠自学的，也是知识分子。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五百万里面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有十分之一没有？十分之一就是五十万。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相当懂得，用来指导行动。搞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不算是懂得马克思主义。若有十分之一，那就是好事。文艺界有多少这样的人？有十分之一就很好了。还有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抵触的，其中有些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敌对情绪的，不只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他不是特务，又不拿刀子杀人，他就是发牢骚，有时也写点文章。这样的人是否也有十分之一？这些人多数不说话，沉默地抵抗。恐怕这两头都没有十分之一，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挂名的不算，教条主义的不算，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对马克思主义，党内有不信的，党外倒有相信的。现在两头去掉，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还是大多数。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那末，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怎么办呢？只好让它发行，只要不是对社会主义

制度抱敌对情绪的。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作品，如果是教条主义的，人家不要看。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要好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哪怕少一点，有那么几部，写得较好，用几十年工夫，去影响那百分之八十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作品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有人说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不要了，我看为工农兵服务是不错的。你不为工农兵还为谁？资产阶级也要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是工人阶级，你说不要为他们服务，中国就没有其他人了。

有人说文艺不要目的，一有目的就概念化。我看，不要目的的文艺作品，也可以出一些吧。出两种，一种要目的的，一种不要目的的，行不行？总之，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文学艺术家恐怕也要经过一个锻炼的过程，有些人还是不自觉的，没有经过锻炼。有些主张文艺不要目的的，其实是要目的，只是不要你这个目的，在无目的掩护下，有他的目的，就是要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目的。

有人问资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我就分不出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属于一个范畴。若论出身，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反动起来，也很厉害。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蛮革命，我也是算在这个范畴之内的。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们接受的是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而资产阶级是按照它的利益来教育人的，有的人后来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如何区分法，我看很难。

报纸、广播、文工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戏，总要影响人。所以教育者首先应当受教育，这是马克思讲的。[1]我们这些人应当受教育，说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教育人的人，他们从事的工作，整个说来，是教育人的过程，要几十年，把六亿人口教育好。

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2]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我们可不可以让人家办个唱反调的刊物？不妨公开唱反调。苏联那时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路人”，可见这一点同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开头几年还可以唱反调，有些言论自由，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我们的文化教育政策不采取他们的办法，我们采取有领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还没有造成放的环境，还是放得不够，是百花想放而不敢放，是百家想鸣而不敢鸣。陈其通他们四人的文章，我就读了两遍，他们无非是“忧心如焚”，唯恐天下大乱。应该估计到中国的情况，两头小中间大，小资产阶级那么多，无非是思想混乱，要求解答问题。

---

[1] 参见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原文是：“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2] “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简称的音译，成立于1925年。1932年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定》，解散“拉普”，成立苏联作家协会。

我说这些话，是想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看看客观情况是否如此。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在知识分子中占十分之一——五十万，有没有这么多？不信的，那么多，这不能强迫。假如经过三个或者四个五年计划，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又不是教条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那就好了。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上次我曾讲了薛仁贵[1]、孙行者的事。薛仁贵害了病，打胜仗，功劳挂在别人身上。对孙行者也不公平，他自然个人英雄主义蛮厉害，自称齐天大圣，玉皇大帝只封他“弼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我看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有，张士贵[2]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都有。

---

[1] 薛仁贵（614—683），即薛礼，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代将军。

[2] 张士贵（？—约656），本名忽峍，虢州卢氏（今属河南）人，唐代将军。

文艺批评怎么样了？这也要看到知识分子是两头小、中间大这个基本状况，这就是为什么要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缘故。为什么有人怕放呢？就是没有看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好、文化提高，要经过他们去教育中国几亿人民。如果查成分，大学生百分之八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子弟，中学生也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你不要他们要谁呢？这些人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文艺批评问题，我想提出来谈谈。这方面的文章我读得不多，读了一点，感觉恰当的批评不多，经过研究的，有分析的，事前跟作家谈过的，真正是对作家有所帮助的，不是骂一顿的，不很多吧？有些批评粗暴得很。对待这类批评，鲁迅有个办法，就是不理。现在文艺批评可以说有三类：一类是抓到痒处，不是教条的，有帮助的；一类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从中得不到帮助的，写了等于不写；一类是教条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碍文艺批评开展的。是不是这样？

我看到文艺批评方面围剿王蒙[1]，所以我要开这个宣传工作会议。从批评王蒙这件事情看来，写文章的人也不去调查研究王蒙这个人有多高多大，他就住在北京，要写批评文章，也不跟他商量一下，你批评他，还是为着帮助他嘛！要批评一个人的文章，最好跟被批评人谈一谈，把文章给他看一看，批评的目的，是要帮助被批评的人。可以提倡这种风气。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

[1] 王蒙，1934年生，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北平（今北京），作家。当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三区（东四区）委员会工作。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受到错误批评。

就在一月份第二期上，可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1]。我对他描写喝茶的人有些兴趣，他的文章说在那里喝茶的群众不会喝茶，可是他们还喝得很有一股劲。他还批评这个茶馆合作社经营得不好，有缺点，这个批评是对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经过公私合营与合作化以后，把原来的许多优点都丢掉了，这以后应当整顿。但是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2]，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看得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无论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小资产阶级思想也好，在知识分子中还是占大多数的，他们还没有跟群众打成一片。我看还是跟工农兵打成一片才有出路，不能打成一片，你写什么呢？光写那五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身边琐事？不能永远只写这些人，这些人也会要变的。文艺作品，总是要写点这一部分人跟那一部分人的关系。上海的作家，也可以写写申新九厂，写写那个资本家荣毅仁[3]，你要写荣毅仁，就得写他跟工人的关系。也可以允许一部分人就写他自己的身边琐事，他又不去跟工农兵打成一片，他又能写，你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大个国家总会有这些人的，这也是客观存在。但我们还是要帮助他，影响他，他不接受也没有办法，可以出他的书。

体验生活也有各种各样的，搞不好，老百姓就是不把心交给知识分子。现在有些知识分子下去体验生活，老百姓感到是灾难，特

---

[1] 姚雪垠（1910—1999），河南邓州人，作家。当时在武汉市作家协会工作。

[2] 姚文元，1931年生，浙江诸暨人。当时在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委工作。

[3] 荣毅仁，当时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

别是有名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就怕你来调查我什么，我就是不告诉你。老百姓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对付你。有些地方“记者成灾”。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1]的《典论·论文》和曹植[2]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3]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归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大家反映作家职业化后，有些书因纸张缺乏印得很慢或印不出来，影响作家的生活。作家协会能不能自己搞个印刷厂？拨一些机器给你们，再搞些原料。教授、科学家的著作，一时不能印出来，他们还有大学和科学院发的薪金可以维持生活。作家则不同，他们是靠版税稿费生活，若是书籍杂志没有纸张印不出来，他们没有稿费收入，就无法生活。我说作协自己办一个印刷厂，当然不是要老舍、巴金先生去办，而是周扬、沈雁冰[4]他们筹划去办。

---

[1] 曹丕（187—226），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魏文帝，三国时期文论家、诗人。

[2] 曹植（192—232），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之子，三国时期文学家、诗人。

[3] 萧统（501—531），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公元502年被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编有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文选》，后人习称《昭明文选》。

[4] 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1896—1981），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当时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去年，我们一年摄制三十多部故事片，太少了。日本八千多万人口，去年出三百多部故事片。中国六亿人口，才出三十多部，你们最好也出他三百多部。

赵丹[1]、孙瑜[2]没有安排好吧？你是和他合作过的。有了安排那就很好。你们两个合作搞的电影《武训传》，曾受到批评，那没有什么，一个作品写得不好，就再写嘛，总该写好它。

这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精神，你们回去就传达，就要贯彻，不要等三中全会[3]作决定。地委书记、地区专员以上的干部约一万多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是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都很难说，其余十分之九还是不赞成的，这些都是高级干部呢！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

关于继承文化遗产问题，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可以让它演出来，批评一下。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有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的《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本里有也不稀奇。中国人不一定很相信鬼，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许多青年都不懂什么是牛鬼蛇神，让他们看看也不要紧。拿个更好的东西来代替

---

[1] 赵丹（1914—1980），山东肥城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曾主演电影《武训传》。

[2] 孙瑜（1900—1990），四川自贡人。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曾编导电影《武训传》。

[3] 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于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在北京举行。

它当然很好，但还拿不出来，就让它演吧！对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1]，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2]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

[1] 《草木篇》，流沙河写的一组散文诗，发表在《星星》1957年1月创刊号。

[2] 《吻》，曰白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星星》1957年1月创刊号。

对《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7年3月8日）

一

退小平办。略有修改[2]。

毛泽东
三月八日

二

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对于闹事群众中的领导分子，如果行动合理合法，当然不应该加以歧视；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一般也不应该采取开除办法，而应该将他们留下，在工作和学习中教育他们。对于抱着恶意煽动群众反对人民政府的坏分子，应该加以揭露，使群众彻底认识他们的面目。对

这些分子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应该给以适当的处罚，但是不应该开除他们，而应该不怕麻烦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至于确实查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严重违犯刑法的凶犯，则应该分别情况，依法处理。

三

各级党委，特别是省、市和自治区一级的第一书记，对于了解工厂、学校以及报纸、刊物的思想政治动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解决这些方面的具体问题等项任务，应该立即抓起来，并且教会地、县两级和城市区级第一书记抓起这些工作。不应该只委托宣传部长、文教部长、教育和文化厅、局长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们。

---

[1]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修正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值得我们严重地注意。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是有矛盾的。但一般说来，这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和应该在民主集中制的范围内，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不需要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一类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一般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提倡，而且应该力求防止这类事件发生。（二）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

发生，根本的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在工厂方面，应该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和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在学校方面，切实保证学生会、教职员工会、青年团和党的支部会议能够充分地自由地对学校工作提意见，在有民主党派的学校，应尽量吸收他们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随时征求他们的意见。（三）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还必须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由于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而工人队伍又增长很快，一部分工人忽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倾向有了发展；在学校和知识分子中，埋头业务不问政治，斤斤计较个人生活、地位和其他不正确的倾向也逐渐抬头。要针对这种情况进行教育，使群众懂得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领导人员必须认真注意同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指示对闹事问题的处置作了一些要求和规定。

[2]　即本篇二、三。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这一指示的修正稿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三是他为指示修正稿加写的第五点。这一指示正式印发前，中央还作过一些文字修改。

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1]

（1957年3月10日）

你们说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现在心中无数，慢慢就会有数。一切事情开头的时候总是心中无数的。打游击战，打以前，我们就连想也没有想过，后来逼上梁山，非打不可，只好硬着头皮打下去。当然，打仗这件事情不是好玩的，但是打下去慢慢就熟悉了。对于新出现的问题，谁人心中有数呢？我也心中无数。就拿朝鲜战争来说吧，打美帝国主义就和打日本帝国主义不相同，最初也是心中无数的，打了一两仗，心中有数了。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当然也夹杂一些阶级斗争），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我们可以把问题好好研究一下。谈社会主义的书出了那么多，教人们怎样去具体地搞社会主义的书，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还没有；也有些书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东西什么都写出来，但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有些事情还没有出现，虽然可以预料到，却不等于能够具体地提出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当然，学是要自愿的。听说有些文学家十分不喜欢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说有了它，小说就不好写了。我看这也是“条件反射”。什么东西都是旧的习惯了新的就钻不进去，因为旧的把新的压住了。说学了马克思主义，小说不好写，大概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跟他们的旧思想有抵触，所以写不出东西来。

在知识分子当中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学他十年八年，马克思主义学得多了，就会把旧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形成风气，没有风气是不会学得好的。

目前思想偏向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是否定一切，教条主义则把凡有怀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观察问题和了解问题。当然，要完全避免片面性也很难。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没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我们要用十年八年的时间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逐步抛弃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那样，我们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这次对电影的批评[1]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我看大多数批评文章提出的问题，对于改革我们的电影是很有益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改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个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

---

[1] 指上海《文汇报》上开展的电影问题讨论中提出的一些批评。这次讨论开始于1956年11月，持续近3个月，涉及电影艺术的指导思想、电影工作的领导方法和作风、电影审查制度、演员的使用和积压、电影艺术传统的继承及电影与观众等方面的问题。

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

你们的报纸搞得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青年不爱看可以不看，各有各的“条件反射”。一种东西，不一定所有的人都爱看。

群众来信可以登一些出来，试试看。政府和有关的业务部门有不同意见，报馆可以和他们研究商量一下，在报上加以解释，再看结果如何。一点不登恐怕不大好，那样业务部门会犯官僚主义，不去改进工作。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马克思主义是按客观情况办事的，客观情况就包括客观效果。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有正确的领导，有不正确的领导。正确的领导按客观情况办事，符合实际，群众欢迎；不正确的领导，不按客观情况办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使编报的人感到不自由，编出来的报纸群众不爱看，这个领导一定是教条主义的领导。我们要反对教条主义。我们过去用整风方式搞了好几年，批判了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办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报纸有一些专业化也好，好像《大公报》[1]那样，开放自由市场的时候，我就爱看它，因为它登这一类的东西多，又登得快。但是，太过于专业化，有时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兴趣就少。搞专业的人也要看专业之外的东西。

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总比资本主义的报纸好。香港的一些报纸

---

[1] 指上海《大公报》。

虽然没有我们说的思想性，但也没有什么意思，说的话不真实，好夸大，传播毒素。我们的报纸毒少，对人民有益。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文章写得通俗、亲切，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现在经济方面的杂文也可以写。文章的好坏，要看效果，自古以来都是看效果作结论的。

新华社的新闻受不受欢迎？听说你们那里有人提出通讯社的消息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

观的报道是没有的。美国的通讯社和报纸，现在也报道一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形，它是想做生意，所以做些姿态出来给人看看，因为经济危机压迫着它。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该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延安办报，历史也很短，全国性办报就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学研究都是这样。全国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其中的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这话有一半真理。现在我们是外行领导内行，搞的是行政领导、政治领导。至于具体的科学技术，比如地质学，共产党是不懂的。但是国民党也不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只造就二百多个地质人才，我们解放七年造就了一万多。这种行政领导的状况，在现在的过渡时期，只好这样，将来是要改变的。现在要争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个初步了解，而不是要求他们一下子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马克思本人，也不是一下子就全部贯通的。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要求知识分子一下子都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说懂得马克思主义，其实懂得的程度也

不相同。我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也不多。作为专家是要读多一点的，我们没有那么多工夫，读少一点也可以，重要的是要注意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

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新闻的快慢问题也是这样。有的消息，我们就不是快登慢登的问题，而是干脆不登。比如土改新闻就是这样，我们在报上不宣传，免得传播一些不成熟的、错误的经验。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

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至于政策性的，恐怕就要分别一下情况。但是划范围也有困难，因为政策那么多。比如，你们说的节育和晚婚的宣传，报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为要修改婚姻法，赶快去结婚。这样，报纸也难办。在旧社会，报纸上的东西老百姓看了等于不看，现在报上一登可不同了。如果发现宣传上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可以写文章来解释说明，但是我们报上的文章往往不及时。至于范围怎样划法，各报可以自己回去研究。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1]

（1957年3月12日）

在这次会上不能将一切问题都解决，只能提起一个纲领和解决某些问题。

（一）新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存在决定意识，各种不同意见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大变动是基本上健康的，须要几年才能巩固，从此将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个伟大的工业国。

（二）我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除了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敌对情绪，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会失败、希望回复到资本主义时代去的以外，都是爱国主义者，都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但有许多人对于在新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解答，不大清楚，对于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许多人还有怀疑，他们抱有各种错误观点。在500万左右知识分子中，大约有10%左右是比较熟悉了马克思主义的，另有大约百分之几的人是反对或者不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80%以上的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还不多，但

---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写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提纲，题为《在宣传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出席的有党内外思想文化工作者800人左右。

是愿意研究它。我们的任务，就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争取在今后两个五年计划内，使我们的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通过实践懂得较多的马克思主义。

（三）教育者先要受教育，大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一面教，一面学。

（四）整风

先在党内整，党外自愿参加，批判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克服错误，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整风方法，像延安那样，研究文件，批评错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

（五）为人民服务，工农兵方向

下厂下乡，调查研究，交朋友。

任何知识分子，不同工农打成一片，不知工厂、农村情形，要指导工农事业，是不可能的。

不调查没有发言权。

我们希望有70%的人下去，另有30%的人不能或者不愿下去，也就可以了。

要造成风气。延安曾做过，很有效果。不然，单在书本上看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没有共同语言，很多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作品还是写不好。科学家有实验室，工厂农村是一切知识分子的大实验室。

（六）两种片面性

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都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判。

工作中，文章中，不可能不带片面性，但是我们应当要求：辩证法逐步地多一些，形而上学逐步地少一些。

“是否能领〔导〕科学”，只要能领导阶级斗争，就能〔领导〕向自然的斗争，会有大批的科学家加进党里来。

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

“杂文一定有片面性”吗？这是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学通的人讲的话，列宁和鲁迅就没有片面性。

“不敢写文章”。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并且我国的环境也不算太坏。是文章的好坏问题，真正的好文章，会受读者欢迎。

诚心为人民服务，立志改革的人，应当能写敢写。

（七）“放”，还是“收”

“放”，有百利而无一害；“收”是错误的。

真、美、善、香与伪、丑、恶的对立统一，前者才能分辨，才能发展，马克思，孙中山，共产党为例。

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

各省传错了对四人文章[1]的批评问题。

电影事业应当进行彻底改革问题。

（八）希望地方召开有党员与非党员都参加的会议，将会议中提出的问题继续讨论。

---

[1]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1957年3月12日）

各位同志！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会议中间提出了很多问题，使我们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现在就同志们所讨论的问题讲几点意见。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就性质来说，现在的变动比过去的变动深刻得多。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全国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都在起变化。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都发生了变化。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样的

---

[1] 这是毛泽东继1957年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于同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一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记录整理成文后，于1957年3月30日报送毛泽东。同年6月，毛泽东对这篇讲话整理稿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并曾批示将稿子印送中央领导同志及其他有关的同志征求意见，批语是："即刻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胡绳、陈正人。另发翻译十二份。""各同志：此件请即看一下，于你认为需要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在六月二十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退还陈伯达同志，为盼！毛泽东六月十八日。"这篇讲话整理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

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地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中国究竟有多少知识分子，没有精确的统计。有人估计，各类知识分子，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知识分子在内，大约有五百万左右。这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

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这后一条路线，在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里都有，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在这些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中间，有许多人对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工作，许多新问题如何了解，如何对待，如何答复，还不大清楚。

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

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是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对别人要求过高，又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如果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生活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第三点：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在为旧中国服务的时候，知识分子中的左翼是反抗的，中间派是摇摆的，只有右翼是坚定的。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就反过来了。左翼是坚定的，中间派是摇摆的（这种摇摆和过去不同，是在新社会里的摇摆），右翼是反抗的。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我们的教授、教员，都在教人民，教学生。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

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过去几年，他们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有些人并且很用功，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有些人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自以为有学问了，但是并没有读进去，并没有在头脑里生根，不会应用，阶级感情还是旧的。还有一些人很骄傲，读了几句书，自以为了不起，尾巴翘到天上去了，可是一遇风浪，他们的立场，比起工人和大多数劳动农民来，就显得大不相同。前者动摇，后者坚定，前者暧昧，后者明朗。因此，如果认为教人者不需要再受教育了，不需要再学习了，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只是要改造别人，改造地主、资本家，改造个体生产者，不要改造知识分子，那就错误了。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我说所有的人，我们这些人也在内。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了解得比较多的人，无产阶级立场比较坚定的人，也还是要再学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农下中农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据我看，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多数人是愿意学习的。我们的任务是，在他们自愿学习的基础上，好心地帮助他们学习，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学习，而不要用强制的方法勉强他们学习。

第四点：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知识分子既然要为

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如果一辈子都不同工人农民见面，这就很不好。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有一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生活在工人农民里面的，例如工业技术人员本来就在工厂，农业技术人员和乡村学校教员本来就在农村。他们应该把工作做好，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我们要把接近工农群众这件事，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说要有很多知识分子这样做。当然不能是百分之百，有些人有各种原因不能去，但是我们希望尽可能有比较多的人去。也不能大家一下子都去，可以逐步地分批地去。让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工人农民，过去在延安时期曾经这样做过。那时候，延安的许多知识分子思想很乱，有各种怪议论。我们开了一次会，劝大家到群众里面去。后来许多人去了，得到很好的效果。知识分子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

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如果我们的知识分子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又在同工农群众的接近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有所了解，那末，我们大家就有了共同的语言，不仅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而且还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如果这样，大家的工作就一定会做得好得多。

第五点：关于整风。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共产党内的整风，在抗日时期进行过一次，以后在解放战争时期进行过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又进行过一次。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

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在整风中间，一方面要严肃认真，对于错误和缺点，一定要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且一定要纠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采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抗日时期的整风就是证明。它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我们过去说过，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就是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在整风中间，我们一定可以更多地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如果我们把作风整顿好了，我们在工作中间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本事就会更大，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在从前，

在旧中国，讲改革是要犯罪的，要杀头，要坐班房。但是在那些时候，有一些立志改革的人，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在各种困难的条件下面，出版书报，教育人民，组织人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给我国的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开辟了道路。我们的政权的建立还不过短短几年，人们可以看到，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斗争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在共产党人方面，我们要给这些合作者创造有利的条件，要同他们建立同志式的良好的共同工作关系，要团结他们一起奋斗。

第六点：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

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像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

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第七点：“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

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时

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

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点，第八点：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这一点是在座有些同志希望我讲的。现在许多地方的党委还没有抓思想问题，或者抓得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忙。但是一定要抓。所谓“抓”，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要研究。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各地方要召开像这次宣传会议一样的会议，讨论当地的思想工作和有关思想工作的各方面的问题。这种会不但要有党内的同志参加，而且要有党外的人参加，要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我们这次会议的经验证明，这对于会议的进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对《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1]的批语

（1957年3月16日）

---

[1] 《中央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指出：我国大约有五百万知识分子，他们是人民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是教育人民的人，离开了他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少数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受剥削阶级的影响甚深；有少数人，包括党内党外，是不但很积极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掌握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的；最大部分的人，是愿意接受社会主义的制度，但世界观还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将会长期存在。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目的，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向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促进我国的科学、文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迅速地繁荣起来。现在，党与知识分子关系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状态，原因是党内存在着两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必须在党内党外反对这两种错误思想。指示还肯定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经验，要求各省市召开同样的宣传工作会议，吸收教育、文艺、科学、技术、新闻、出版界的党外人士参加，充分发扬民主，让他们讲出内心的话。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必须亲自领导思想工作，并指导会议的进行。毛泽东审阅这一指示稿时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如将指示稿中“现在，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一句，改为“现在，大规模的群众行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即送周、陈、彭真、定一[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如前示。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四时

我今天乘车去天津，明天去济南。

---

[1]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

（1957年3月17日）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1]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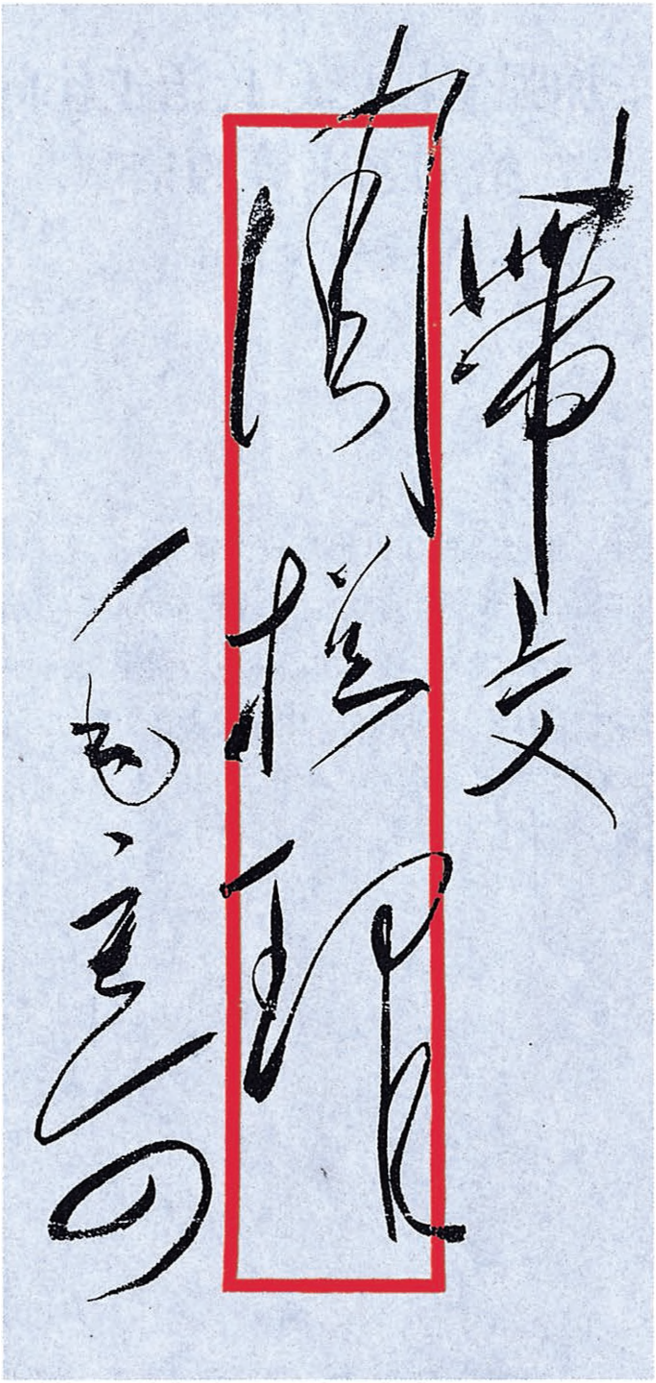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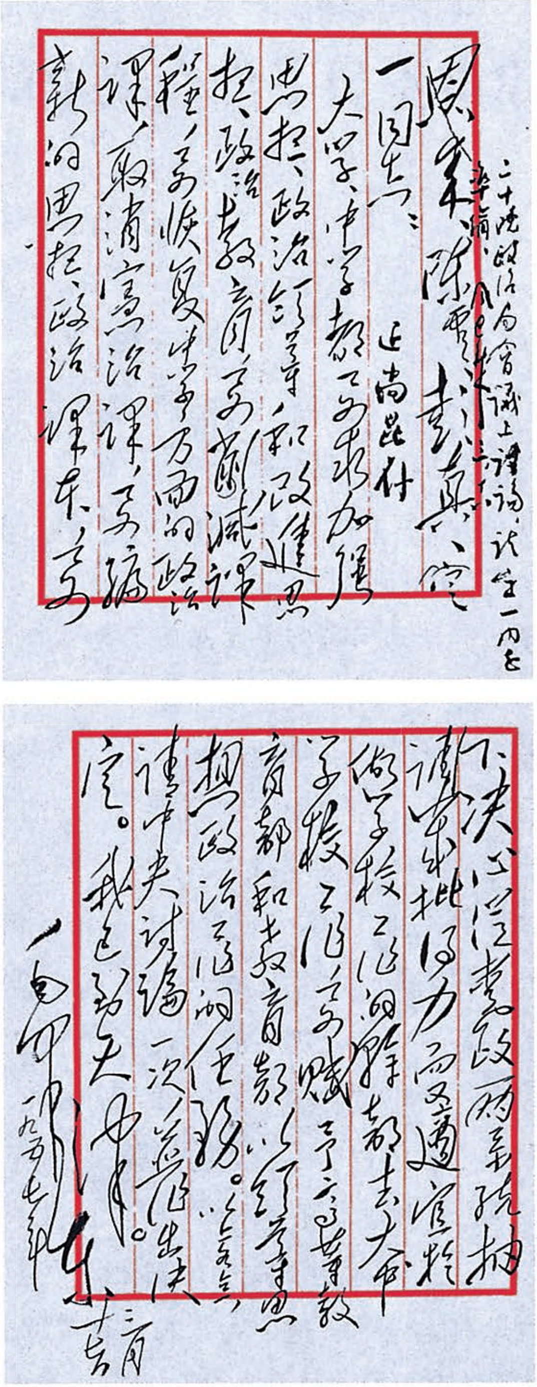


带交

周总理

毛泽东

毛泽东致周恩来等信的信封。



周、朱、李、[illegible]、陈、[illegible]、彭真、定一同志：

送尚昆付

大学、中学都要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政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另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学术批判力量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去实行领导教育部和教育部门，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意见，请中央讨论一次，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二十晚政治局会议上讨论，[illegible]

毛泽东致周恩来等信的手稿。

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17日）

（黄火青、吴砚农、□□□、李耕涛四同志陪同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全体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

黄火青：同志们，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鼓掌）

毛泽东：你们有什么问题？

黄火青：你们有什么问题需要主席解答的，可以写出来，现在主席先给大家讲。

毛泽东：讲什么东西？同志们，你们有什么问题？

很多同志没见过面，今天和同志们谈一点事情。希望同志们提一点问题给我，你们的问题还没有来，那么，还有时间，我就先讲几句咯，就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好不好啊？（鼓掌）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们全党关心的问题，是社会上大家关心的，社会上民主人士、各界人士是关心的。对这个问题在我们同志中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可以，赞成，有一些同志看样子还可以，但是心里总有那么一点不舒服：“百花齐放”，那么多花，恐怕有不好的东西出来了怎么得了啊！“百家争鸣”，咱们共产党员只算一“家”，九十九家包围我们，怎么得了啊！有没有这个问题，同志们？就是有比较了解这个问题的，有了解一些但是又不很多的，还有怀疑的，有不赞成的，有各种意见在我们党内。

过去我们党做的工作主要是什么工作呢？现在不是有建设工作吗？在过去我们几十年，主要的工作就是阶级斗争工作。阶级斗争，还不是建设工作。阶级斗争就是要推翻几种制度，就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那些制度。那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就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打蒋介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城市里还有一个民主改革，还有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都是属于阶级斗争范围。那个声势很大，是不是？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前年下半年跟去年上半年这个高潮，那个时候锣鼓喧天，热闹得很。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这一方面。这个斗争时间很长，它从我们祖宗鸦片战争那个时候算起，一八四〇年，从那个时候反帝国主义算起，算到一九五〇年，就一百一十年了，到去年一九五六年，就有一百一十六年之久，才把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改变为新的生产关系，旧的上层建筑改变为新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主要是讲所有制，现在我们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就是政府、国家权力机关、军队，都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斗争。在过去作这个斗争的时候，人们对于我们，在开头也是不相信的。谁人相信共产党能够成功呢？开始有共产党的时候是不相信的，中间也是不相信的，因为中间我们经过失败。经过北伐战争时候的失败，后头，土地革命的失败，经过两次很大的失败，人们都不相信的。现在呢？现在人们就相信了，说共产党行了，行在什么地方呢？说政治你们行、军事你们行，你们有这两门。人们说共产党有这两门，还可以考赢了。还是帝国主义考赢了？跟我们考，跟我们比，蒋介石，国民党跟我们

比，谁比赢了？谁胜谁败？我们赢了。你赢了嘛，那就算嘛，赢是好的嘛，你赢了嘛，还有什么话讲，那好嘛，建设呢？历来人们就是说共产党恐怕是不行的，现在怎么样呢？我们一面革命，一面建设。我刚才是讲为“主”，阶级斗争为主，不是讲没建设，还是有建设，这一方面，我们是不会。要讲不会，也会一点，因为过去作阶级斗争的时候，在根据地也多多少少学了一点。但是盖大工厂，什么设计、施工、安装，那一套东西，我们就不会了。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要教大学生，大学教授我们就很少了。在座有没有多少大学教授？（起立向台下问），有没有？大学教授请举手！一个都没有？有没有大学教授？总得有几个吧？（台下有同志举手）一个，那里有一个，少得可怜啊！同志们，（黄火青：有的没举手。毛主席又回原座继续说）有几个没举手？是啊，你们势力不大，你就不敢举手。

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共产党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搞工程，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有几个不行就是喽！这个话怎么样呢？你们听得到没呢？同志们！我听到了一些这样的话喽，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中学里头当教员的也少。文学艺术方面有点儿也是三七开；就是像斯大林犯错误一样，斯大林不是有三分错误有七分正确吗？我们有三分会七分不会。文学艺术方面。优势还是共产党以外，大学教授几乎全是共产党以外的，医生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以外的。是不是？教育界有二百万人，大、中、小学，所谓公教人员的“教”有二百万人之多，共产党干什么事情呢？共产党就是在学校里名为领导，实际上就是不能领导，因为你不懂嘛！所以应该承认，这是我们不

行的一方面。他们讲得对，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我说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不对。共产党不能领导，这是对的，共产党也能领导，他们没给讲。为什么也能领导呢？我说就是我不懂请你们干嘛！国民党也是不懂，“蒋委员长”蒋介石他也不懂，国民党那个党对刚才讲过的这几门也是跟我们差不多，他也是作阶级斗争的这个党，他是专搞阶级斗争的，他就不搞建设。我们一面搞阶级斗争，这七年搞了点建设。他搞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我们搞了七年，今年八年，有多少吨钢呢？可能达到五百万吨钢，按照计划四百一十二万吨，可能超过。也许不到五百万，就四百多万吨。那么他二十年只有几万吨，我们八年有四百万吨，这就是说我们搞计划，此外，财政部给饭给这些人吃。国民党一无计划，二不给饭。同志们！不吃饭我也不能讲话，你们也不能听，科学家也好，大学教授也好，医生也好，是要吃饭的，国民党有饭不给那些人吃，他专搞阶级斗争，给军队吃了，给那些政客吃了。我说李富春，一个李先念，世界上还有这两个人嘛，一个管计划，一个管财政，把这些科学家、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统统放到计划里头，做出什么长远计划，年度计划，在这上面领导他们，以计划去领导他们，此外，还有一条什么可以领导他们呢？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他们，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领导他们。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是不会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我们现在要学，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八大”上面说了，我们全党要求搞这个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大学里头当教授，要学会在科学机关里头做试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跟自然界作斗争，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

把中国这个面貌加以改变。政治面貌加以改变之后，必须要使经济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要改变经济面貌，大体上改变一下，跟过去有所不同，也要花几十年时间。像我们过去不会作阶级斗争一样，阶级斗争谁会呢？没有哪个人会的，比如说我就不会，我是当小学教员的，进共产党也没有想到，相信资本家对我们宣传的那一套，进的是资产阶级学校，相信那一套，后头，大概是逼上梁山了。你们各位呢？老早就打定主意了，母亲生下来，就当共产党？是不是？交代任务就是共产党，我妈妈没有交代这个任务给我，那么是学的，是不是？什么土改，也是不会，各种都是不会的，打仗也是不会的，打了多少败仗，经过多少变化，跟着经验的增多，我们学会了，善于作阶级斗争。是不是？经过许多失败，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的代价少一些？因为我们付的代价很大，有几次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万里长征以前的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白区也没多少工作了，那是因为“左”。一九二七年的失败是因为右。阶级斗争右了，后头是因为“左”。有了这两条我们就学会了。所以陈独秀，王明（陈独秀就到敌人那方面去了，后头这个人也死了。王明还没有到敌人那方面去）不管怎样，这样的人，都给我们很大的益处。不是他们个别的人，而是他们领导的这个运动，在一个时候失败了。这给全党以很大教育，给全国人民以很大的教育，那么代价是很大。现在我们的建设，是不是也付那么大的代价？如匈牙利从前的领导者，它的阶级斗争也是失败的。它的建设工作也是失败的，因为一闹嘛——去年十月一闹嘛，我说是闹得很好，有些人很不高兴这个匈牙利，我是很高兴。坏事就是好事。匈牙利还是闹好还是不闹好？无所谓闹不闹，总而言之是要闹的就

是了，一个脓疮总是要穿的喽，我看可以争取，因为我们曾经学阶级斗争要付很大的代价才能学到，那么现在我们如果是不搞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曾经付很大的代价呢？不是搞左倾机会主义吃的亏嘛，搞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吃了亏嘛，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以前的错误，在建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少的少付代价，可以避免像匈牙利那样的事情。[1]

现在我们好好的想想，很需要想一想，有这么一种情况，作阶级斗争结束，这么一件事。过去阶级斗争高潮的时候，比如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高潮的时候，我们的缺点，人们不大看得见，我们的缺点，我们还懂，我们在建设方面，科学，办学校，这些事情人们要原谅，人们比较原谅我们。社会上现在那个戏不唱了，□□□，有没有？那就是镇压反革命，他的戏不多了，有还是有，在座的有军官，有军事干部，如果没有戏唱，还要他们干什么呢？当然还是有戏唱的，但是现在不唱，故养兵千日，现在还没有听见炮响，于是就把现在社会上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个问题是有了，因为这个锣鼓，阶级斗争的锣鼓，热闹得很，自从去年上半年锣鼓喧天，以后“八大”作了结论，那么这个东西就浮到上面来了，就摆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摆到我们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人们就更加要求我们了，你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我们说：“同志，我也有一套本领叫阶级斗争喽！哈哈！你们不要老是看我们不起吧！老子也是干了几十年的哟！”但是我们老是讲这个话，就不那么好了。因为人们，承认你这条。他说你政治行，军事行，你是干了几十年，你是辛辛苦苦，那是没问题，功劳簿上有我们的名字，但是，同志

---

[1] 本段有些语句不通，均按原文排印。

啊，现在大学教书是怎么教啊，医院里头是怎么开刀啊，我是没学呀，中学怎么办呀？什么科学问题怎么解决呀，原子物理，什么东西，工程师、设计、施工、安装、运转，这一套我们就不会，我们才开始学习，这种情况的改变，得要有一个时间，大概要远需三个五年计划，至少还要有十五年的时间，才会有一个改变，更大的改变，时间还要多一点，因为这个东西需要学，需要时间，那么能不能学到，我看是一定能学到，没什么巧，自然科学，开刀之类，你没学就不会开，我去开刀，就是像一个相声讲开刀一样的，一定会当那样的医生就是了。但是只要学就可以学到。现在有没有人学呢？现在有人学，我们还要派人去学。比如现在的大学生，现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就在学，过十五年，他们就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也许不要十五年，有十五年他毕业的时候，还有现有的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有一部分人，他们愿意加入共产党，条件适合的也可以接受他们加入共产党。所以再有三个五年计划是可以学到的。阶级斗争，哪个容易学习呢？我看还是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学习。总比那个打仗，比那个肃反，像那个肃反，看都看不见，你说没有，又有，你说有，他又没写名字反革命。抗美援朝打美国人那样的仗，事实没有多少把握，美国这样大堆，我们拿这么一个指头去打他。我看还是就要是中学毕业以后进五年大学以后出来做五年到十年工作，就可以当大学教授，就可以当工程师或工程技术人员，开刀也可以。所以有些人看不到这些变化，大概共产党永远学不到。我看是可以学到的而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学到。那么先生是谁？先生就是现在的党外民主人士。他们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跟他们学点东西，只要我们态度好，不摆官架子，不摆那个老子多少年，革命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啊？不把这一

套摆出来，我们把这套装起来，因为那套摆得没有意思，什么几十年嘛，那个是历史家去写的。我们每天见面就把两句话讲完了，老子革命几十年，此外，就没有了，就等于没有干一样，因为那个事情完了嘛，那个事情基本完了嘛，阶级斗争的问题。咱们现在来讲科学，你有什么长处，我跟你学习。我懂不懂呢？我是一窍不通。首先承认自己一窍不通。那你过去干什么去啦？那么就是因为过去搞阶级斗争喽，就是忙一点喽。这样子答复一句那可以的了，就是少年失修嘛！少年失修，所以不懂。现在你可不可以教呢？有些教员还不那么爽快的哩。但是只要我们好好请教，他会教的。我说从前拜师傅的时候要烧香，又磕三个头，现在天津还有没有啊？恐怕也还有吧！还有磕头的？（黄火青：不磕头了。）不磕头了，（黄火青：订师徒合同。）订师徒合同。现在磕头这一灾难免了，我说假如要的话，怎么办？一定要那个规矩呢？还有要磕三个头才教我们，磕不磕？这个时候发生问题了，我说咱们应该磕三个头。你要学本领嘛，那他的规矩是要你磕头嘛，头现在是可以不磕，但是诚心诚意向他学，要尊重师傅啊，要尊重他啊，要努力学啊，这也相当于磕头了。这个精神还是要的。现在我们党里头是有种风气是不大好的，就是脑筋里头还是装满了过去那个几十年，新的风气没有养成，没有事情就是，你们这里是打麻将还是打纸牌啊？或者是看戏，或者是跳舞，横直是没有事情做，没有养成阅读看书的习惯。没有把我们剩余精力放在学习里面去。这是一般喽。至于在学校里头，在工厂里头，在科学研究机关，在医院里头，我们的工作人员凡能学的，你能学那么一部分也好，了解一下内容也好。你完全不懂，你又要在那里做领导工作，就是无怪乎人家说我们不行了。你完全不懂，你学，你又要摆那么一套架子，这就不好了，应该学

习。百花齐放，关于艺术方面，这样的方针也是这样一个时期则特别显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竞赛。放出坏事来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坏事，有许多怪议论。我说不要紧，这些怪议论批评它就是了。人们很怕开出来的花不好看，这个花有毒。百家争鸣，说是共产党只是一家，其他九十几家把我包围了。当然不是这样的意思。在社会科学，在世界观这一方面的问题上，不是什么百家争鸣。是两家争鸣。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百家里头按其性质分类，可分为两家争鸣。在现在这个世界上，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这两家的思想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小资产阶级算不算一家？当然也可以算一家。但是小资产阶级在基本点上，它是同资产阶级是一家的，它属于资产阶级那个范畴里头的。在共产党这一家里头，有没有争鸣的？事实上有，历史上第二国际这是一家，头上顶着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修正主义，现在还有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我们国家有没有呢？我们国家也有这样，可以找到这样的人，这种人可以叫做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国讲有修正主义，不必去讲，好像我们是有个修正主义派别一样，现在没有。但是过去有，陈独秀就是。陈独秀就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后头王明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错误，同志们知道不知道？第二次，就是打日本初期，抗日初期那就是修正主义。现在钟惦棐不是写了篇文章吗？关于电影问题，否定一切，对于过去的成绩。另外有些同志就肯定一切，看不到缺点错误，人家批评不得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什么人呢？就是陈其通、马寒冰，一月七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陈其通、马寒冰，我说这些同志好心好意，忠心耿耿，追求正义，他们是保护党的，看到外面锣鼓喧天反对我们，就是不得命令自动出去作战，这

个自动出去作战的这些人们，他们是有一股精神，他仇恨那些看不惯的那些东西，应该承认他们这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方针同方法是错误的。天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找一找。“左”的右的，肯定一切的否定一切的，这是两种片面性，把我们的工作一切都肯定不加分析，这个东西不对，以前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拉科西就是这样，斯大林就是这样，斯大林，说他完全是教条主义者？也不能讲。这个人，他做了许多事，但是他有教条主义，他这个教条主义影响中国，使得我们一个时期革命就是失败，如果照他的办，后头的革命也办不成，现在我们就不在这里开会，这个房子什么人盖的，也还不是我们盖的，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因为这还是国民党帝国主义统治嘛。他是两方面都有，又有教条主义。一切搬苏联，我们必须学苏联，苏联的东西很值得我们学，错误和成绩这两方面，我们现在提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没有讲要学习他的落后经验，哪一天提过这样的口号呢？但是虽然没有提，有那么一些东西跟着搬过来了，在最后七年里头，但是大体上说，我们不算是完全不加选择，这就是硬搬，因为我们曾经对教条主义有所批评，而教条主义的来源就来自斯大林。

对于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不满意共产党，说我们不行，这个是我刚才讲了的，本来不行的就应该承认不行。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就具体的业务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的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政治去领导吧！国家计划去领导他们，所以我们有学习的任务，对这些错误的议论，社会上有许多错误议论，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究竟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我们

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别的方法都是不要，而现在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呢，就是记着继续过去那种方法，或者叫做军法从事，你不听话呀，那么就正军法了，拉出去简单地砍了。（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简单的方法）□□□的办法（指镇压反革命）这个办法不行了，这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对付阶级敌人呀，对付那些有血债什么东西的那些人们，就拉出去砍了吧，正军法嘛。因为我们习惯这种方法，我们习惯了。搞了几十年了，在阶级斗争里头，其实也不那么简单，还有许多细致的方法喽，但是因为是对付敌人，我们很有一股劲，在现在呢，不是对付敌人，而是对付人民内部的问题，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这么许多人，大学教授、医生，这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行了。这是另外一套。我们要经过学习，他们是对的，辟如科学、技术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而学习是完全可以学到的。有十年到十五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技术上领导他们。至于各种不同意见，分两类，一类是科学方面的，不论我们懂不懂，我们现在不懂，将来懂了，也是这个方针，不能“军法从事”的，□□□的那个办法是不行的。只能采取“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大家讨论，一门科学可以有几个学派，去争，以后会得出真理，社会科学的问题，也是这样，凡属于科学的，都是用辩论的方法，而不是用我们看不顺眼就去整一下的办法，而要改造这样一个情况，需要经过说服的过程。这些议论完全没什么可怕，有什么可怕呀，胡风怎么样呀，胡风不是抓起来了吗？那是国内他搞秘密的小组织，胡风这个人还活着的了，总有一天要把他放了的了，坐班房坐了一个时期，他的错误，他的罪就满了嘛。但是呢，胡风的思想并没有死，在社会上，胡风的思想活在许多人里头，这就是资产

阶级思想。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譬如宗教，马列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艺术方面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这两个方法里头取一个，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去想要压一下，这个压么就不服了，压不服的人，只会把问题压得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再来个，他挂笔账共产党犯了错误。你对美国人打过三八线，你用压服的方法，那是对的，反革命你用压服的方法，是对的。对国民党蒋介石、地主阶级使用压服的方法，你为什么用压服的方法对付科学呢？如果我们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所以应该采取说服的方法。那么说服我们又不会说怎么办呢？问题是那么就学嘛。我们南方有一句话叫化子打狗，叫化子你们叫要饭的，他打狗是专门技术，“叫化子打狗，操习一门”，我们乡下有这么一句话。现在我们是不了解的，不会应付，不会说理，我们要学会说理，要学会写说理文章，学会做说理的报告。老子就是一冲。曾经有过一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是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他说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你三冲两冲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文章来有说服力。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不是特务，他们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多数，也就是极少数人是仇视我们的，也不是特务，但是他是仇视我们的。许多人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学了一点，但实际上不相信，再有一些人，相信了一些，不完全，这里头包括共产党员，我们党里头的同志有一些，但是没有

完全学通马克思主义的，还不懂，你看两种片面性的人都有嘛，教条主义的，肯定一切的，别的人说不得坏话，本来我们有缺点，不许人说一说；也有另外一种人，什么都是坏的，否定一切。这两种片面性，这两种形而上学，可见得是存在的。

现在我们发行《参考消息》，在座的同志都看过这个东西吧，没有这么多吧，有呀。这个东西人们就会说了，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尽义务，一个铜板都不要，给他出份报纸来骂自己，共产党无代价替帝国主义出份报纸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看样子是这样的。我每天都看，许多东西就是骂我们呀，现在要扩大发行三十万份，可能有一百万人看，发到县一级范围看的，城市到什么一级呀？来锻炼我们，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应该见世面，锻炼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么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么样。说会乱，不会乱的。这就是把我们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就很危险，所以有人这么说，这个《参考消息》一扩大发行，那就会使反动气焰嚣张，因此那位同志（这是你们市委黄火青同志告诉我的），希望每一条国际消息都加一按语，那就麻烦了！同志！都要加按语？我们就是叫人们自己去思考，去开座谈会，可能有许多怪言论出来的，怪言论我看是越多越好，就是不要把自己封锁起来，马克思主义，是同他的敌对力量作斗争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譬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那么我们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具体问题的情况来解决。对百家争鸣没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

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说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我们是马列主义，他们是国民党，我们是共产党。蒋介石那样的“老干部”，他们也是“老干部”，那些“老干部”可是批评不得呀，因为他们的脚是站不稳的，我们本钱大。这个地方没有摆一摆，摆一摆几十年，我们做工作的时候，不要天天挂在面上，说老子干了几十年，但是人民还是知道的。老干部就是那样容易批评，一批评就批评倒了，吹一口气就倒了？你们都是老干部啊，有没有新干部啊？大概也有吧！现在专讲老干部，我看是吹不倒的，普通的风；除非是十二级台风，十二级台风可以吹倒树，吹倒房子，但是要吹倒老干部我看也还是不行。十二级台风要吹倒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不行，新干部也不行，只要他是正确的。至于你有错误，正是要有点风吹一吹，要刮点风。这房子没有风扇哪？这是因为冬天喽！到夏天得搞点风扇，大概夏天人就要有点毛病吧。我们用洗脸打比喻，你们是三天洗一次脸还是一天洗一次呀？这样一件事情谁也不去研究它，不去研究为什么人们要一天洗一次脸，有的甚至一天洗两次，这个就是因为有灰尘嘛！既然这个皮肤不仅与外面是一条界限——“三八线”，它是与空气接触，它是“黄河为界”，它搞了一副面孔，它而且是个排泄机关，皮肤是个很大的排泄机关，它排泄那么多东西，人的面部我看周身就是它最脏，因为它有七个洞，除了这些东西，另外还有许多小的排泄机关，因此每天要洗。那么党就不要洗吗，党也要洗脸。毒草不可怕，反马列主义思想暴露出来不可怕，而且正有作用，我们需要那些东西跟我们来见面，以便和它作斗

争，使我们发展起来，这就等于我们种牛痘一样。刚才讲的《参考消息》，要扩大发行。现在不是提倡种牛痘吗？牛痘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是一种病毒，还是一种微生物，种那么点东西放在人里头，使你两个人打架，就产生一种免疫力量，以后就不出痘子啦，出了麻子就不出麻子了，因为他产生了“免疫”了；一辈子不害病的是很危险的。有个人写文章说我讲什么东西，说是小毛病什么东西，我是讲这一辈子不害病的人，就是有一天他要害病了，就是危险，就是了。因为细菌病毒钻他钻得太少了。经常害病的人呢，那些人比较牢固，因为他作斗争嘛！无产阶级思想它跟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各种艺术的发展，需要百花齐放互相竞争，来比较。百家争鸣，互相竞争，批评讨论，正确的东西才能发展起来。因此我们不要怕这个东西，不要怕，我们要到空气里头去，不要老在有暖气设备的房子里头。

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报告

（1957年3月18日）

刚才舒同同志给我出了题目，要我讲些什么事情。出了题目就要做。但是他出的题目很多，那怎么办？那么多题目，我只讲一个题目：思想问题。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讲：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比过去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同志们最好不要记录，记录就妨碍听，我倒不是要守什么秘密，我给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记人就忙了，不记舒服些）。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有一些人讲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也的确有些合作社办得不好，共产党也的确不大懂科学。还有苏联过去是比较好，去年以来就比较坏了，不晓得是个什么道理，总而言之今年比较好，去年比较坏。今年又好起来一点，苏联还是那么一个苏联。有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美国比苏联好，美国的钢比苏联出得多。此外，人民闹事也发生得不少。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不晓得山东情况如何，听说也有一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纪律有些松弛。工厂里头、学校里头的纪律，合作社出勤的纪律，不是一般不好，一般还算好，只有一些不好。报纸上，不晓得你们山东报纸怎么样，北京、天津、上海的刊物上、报纸上，小品

文，讥笑、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嘲热讽。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看得出像舒同同志所讲，对合作社有些人就看得是不好，没有优越性，一片黑暗；有些人员觉得很好，很好就不注意它的缺点了。这一些情况下，就是有一些共产党人也跟着别人走，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些跟着资产阶级走，就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些。另外一些共产党人就不服气，说这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事？搞不搞这个“百花齐放”？别的地方是搞了一下子，“百花齐放”，刚刚只放了十几朵花，还没有放齐，“百家争鸣”，大概有一二十家出来争一争，放的中间，争的中间就说一些事情不那么好了。有一些同志就看不顺眼。他们就想收起来，说放得多了，要收一下，就是不要放了，或者少放一些，“百家争鸣”也收一下，主张收的这么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外面讲什么我们也讲什么，跟着人家走；一种人就想收，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是个内因。当然外国的事情也影响我们。二十次代表大会把斯大林批评了一下，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铁托的演说，卡达尔的演说，（山东的报纸登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还有，我们工作中有许多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工作中间，我们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引起思想上有一些混乱。什么大混乱没有，我们中国，我说没有外国那么乱，当然就没有波兰、匈牙利那么乱了。比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他们那么乱，譬如越南就很乱了一阵子。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原因，就是有外国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自己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

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八次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些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全国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也是阶级斗争。这是向什么阶级作斗争？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向跟资产阶级有联结的那个个体经济。我们要消灭资产阶级同那个资本主义发生基础的那个个体经济，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这个大斗争的结束，那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还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了，就暴露出许多思想问题了，思想上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我说过去有的，特别是我们新进城来，解放大城市那个时期，同志们都经过，一九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五三年那几年，那几年还不乱？还是那几年乱些？还是现在乱些呢？实际上，是那几年乱些，你像资产阶级那个时候他们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心里不安。但是过去那些不同的意见分歧就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吓住了，被解放战争、剿匪、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那些东西所吓住了，许多人不敢开腔了。并非没有问题，那个时候问题还很多，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民主人士这六七年有很大进步，就是因为在这些斗争里头我们跟他们合作，应该承认他们是有进步的。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

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是基本结束，不是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一个尾巴也掉得很长的，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一家是无产阶级，我说不是“百家争鸣”，而是两家争鸣，这百家里头有两家，一家是

资产阶级，这个争鸣是要争几十年的。

所以现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面来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那个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讲的，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里面的，我们是把它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他当做内部矛盾来处理，不把他当做一个国民党特务那样的一个问题来处理。资本家呀，你们这里苗海南呀，我们把苗海南跟蒋介石区别，跟特务区别，我们说他不是特务，也不是蒋介石，他就是苗海南。我们跟他合作，这一来，他说可以，他说愿意跟我们合作，咱们两个人就好办事，我们也愿意了，你们也愿意。前面刚才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样的方针，在我们党里头还有相当多的同志不甚了解。有一些同志就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方针，究竟在座的同志赞成不赞成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刚刚来，平时我们又不在一道工作。我在别的地方看的时候，比如北京，许多高级的同志，部长，我说十个人里头可能有一个人赞成，一个人想通了，真正其他九个有些相当赞成，但是不那么十分赞成，各种程度不同。至于什么厅、局长，什么科长，这样几级的同志，开头是表示怀疑的多，什么“百花齐放”，放那么多花，百家争鸣，那个是危险得很，咱们共产党就是一家，其他九十九家把我们包围，出来怎么得了，要请解放军帮忙，杀开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才跑得出去哩。长期共存也是不赞成，那个民主党派大概有个什么七八年也就差不多了嘛，让他挖一个坑埋下去嘛，究竟谁监督谁，还要请他监督共产党呀！你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呀？这些同志，你说他没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权利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还是工人阶级、农民打来的，共产党领导他们，还是你们民

主党派打来的？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但是还是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比较好。哪有什么道理有什么理由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种方法，也是一条方针。它是一种使得文学艺术，使得科学能够繁荣起来的一种方法。不管你多少花，你就得开嘛，那么其中有好看的花，有不好看的花，有很丑的花有毒草都可以开。那么毒草开出来怎么得了呢？世界上是有毒草的，人怎么样呢？是不是碰了毒草就死了？这样就有比较，有比较就好办，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很复杂的。各种的花都可以开（各种的艺术）。人们就说，是否这样一来鬼就出来了，牛鬼蛇神就跑到戏台上来了。你们这些地方戏演得怎样？有没有牛鬼蛇神？别的地方就有，特别是上海，曾经演许多的落后的东西，在戏台上打屁股，演包公的时候一定要在戏台上打屁股，现在我们不是讲废止肉刑吗？但是我们的包公仍然在台上要打屁股的。这些东西慢慢地会要淘汰的了。现在让他演一演可以不可以呢？让他演一下我看也可以。这些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人就少了，他那个东西就不演了。过去我们生硬地禁止一下，以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就是说：我们党就是因为功劳太大的原因，工人、农民的政党，我们党主要成分是工人同贫农的党，按他们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为在中国威望很大，这个威望太大，就发生一个危险，容易包办代替，以简单的行政命令，反正是人多嘛，社会上的威望也大嘛。所以我们特意请那么几位来监督我们，并且长期共存，我们有一天，他们也有一天。我们就不必说，我们假使共产党有一百年，只准他们五十年，共产党还有五十年，只准他有二十四年。总而言之是要他们先死，先死几十年就是了，

有没有那样的必要？它早死了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是不是呢？粮食就多了？钢铁就多了？木材就多了？水泥就多了？礼堂就砌得更好了？并不见得。民主党派灭亡了，我们礼堂砌得更好了，不能证明这个道理。就是有一些民主党派跟我们唱对台戏比较好，就是说怪话，一年有那么几次找一些怪话来说，专门指出我们的缺点，这么一个道理。所以现在不是收起来，而是还要放，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把它压下去，而是不要压。思想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不是用粗暴的方法和压服的方法能够解决的。我们应该大家展开民主的讨论，平等地讨论，互相争辩，这样的方法就是用说服的方法，不是用压服的方法。两个方法采取哪一种？一个是压服，一个是说服。这个压服的方法是对付敌人的方法。我们打过仗的都知道，从井岗山那时候就打起嘛，什么大别山、什么各地方，对付敌人只能用这个方法。对付美国人在北朝鲜，就是抗美援朝，用压服的方法。对付反革命、特务用什么方法？我们就是压服它嘛，以后再来说服，先把它搞出来。压服这个办法是对付敌人的，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就是动手，人民内部就不是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人民内部就是讲道理，就不讲打，武力解决就不是个办法。或者是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强迫禁止，实际上是把一个解放军摆在这边，名为不用武力，实际上是它在这边我们用强迫命令，如果没有解放军，这个行政命令也就不行的。谁听你这个行政命令？还是借他们的声势来搞行政命令，我们后面有个解放军，几百万，还有那个老百姓，我们有了基本群众，就是工人、农民。第一我们有基本群众，第二我们有武装力量，所以那些民主人士吃不开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没有这两个东西，一没有基本群众，二没有武装力量。如果我们是采取了开放的方法，而不是把它收拢来，采取说服的方

法，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兴盛起来。因为现在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采取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内部，不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对付人民，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专政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讲无产阶级专政吗？专政是对付敌人的，而民主就是对付人民的。人民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种民主的关系。当然民主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不是讲不要领导。现在有些地方纪律松弛，缺乏纪律，这就有些过分。要克服这个问题，要用说服的方法，同他们好好地讲，开会，一次开不清楚开两次、三次会。跟学生们、工人们、农民们能不能说服呢？我们是能说服的。只要我们有理，就是用说理的方法，讲理的方法。如果我们搞错了，把专政的范围扩大到人民内部，用压服的方法，凡是有矛盾，有问题的时候就用压服这么个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就要受到损失，就要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总有一天要回过头来，压服不了的时候。君子动口不动手，你要动手，总有一天这个手要收回来的。因为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那是解决敌我斗争的办法。是不是可怕？人民内部的矛盾发展起来了，又不要压服，不要行政命令，这样一来，是不是很危险？由我看，没有什么危险。不同的意见只会因为辩论、民主的讨论而正确地解决，得出真理，艺术方面会更活泼，会发扬创造性，文学艺术、科学方面会发展起来。这种功效不是一年、两年看得出来的，或者几十年内，十几年到几十年内看得出他的效力来的。这里就要准备着真正的坏人坏意见，就是讲：艺术方面有毒草，有毒的草，很不好看的花开出来了，开出来怎么办？我们说那东西也有用处，因为让世人看一看有这样的草，有这样的花。一个人硬是每天只都是看见好的不看见坏的，真理是跟错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不让错误的意见说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他的意见。这个美是跟丑作斗争发展起

来的。好人是跟坏人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一万年以后都有真理跟错误，都有美跟丑，都有好人跟坏人。有一些坏人，他是坏人，是不好，但是，又是好人的先生。有了坏人，人们就有了榜样了，就不学他们的坏了。有好人就学好人，单有好人没有坏人比较，人们分不清楚好坏。几岁的小孩子看戏的时候，他首先要问好人坏人。所以不怕那个坏人，什么错误的道理那些东西，用不着怕。这样我们党跟政府的错误也比较容易克服。相反呢，倒是不好的，倒是很可怕的，就是用压的办法。

我们党习惯了对敌斗争，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我们会搞这一套，结果证明我们是会搞的，是我们胜利了，几十年嘛！所以人们也佩服我们这一条。觉得共产党有什么行呢？你们政治不错，军事也可以。我们有这两条人家佩服的。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佩服呢？那就不见得。我们刚成立党的那个时候谁也不佩服我们，我们那个时候提出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军阀，人们只是听了一下，根本不理。后头又犯了错误，搞万里长征，稀稀拉拉剩下几个大人，我们那时候提出打倒帝国主义那一套，人们也是不大理。以后就搞出名堂来了，到一九四八年那个时候，社会上许多人就变了。共产党似乎兴起来了，共产党就了不起了。特别是到了一九四九年胜负分明了，那佩服的更多了。但是，同志们，建设人家不佩服，共产党能够搞建设呀？人家还要看一看，看来是行的，这些人就会搞那么几手，有那么一股蛮劲。谁佩服我们会搞建设啊！现在在建设问题上面慢慢立起了一些信任，看你这个样子搞了六七年也还有一点本领。但是讲到科学那是另外一回事情，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说你们不行，还是我们来。这个东西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你们在座的都是科学家，是不是？

我们党科学家不多，其原因就是科学家不多，大学教授不多，工程师不多，各种艺术家有一点也少，就是这些方面不行。大学校长是党外人士当得多，山东大学什么人当校长？（问下面，回答：晁哲甫），晁哲甫是党内党外的？（问下面，回答：是党内的）党内大学校长还是要听党外人士的话。你没有教授，有些当了副校长，人家党外人士不佩服。我们的党员就是学生、助教多，讲师里面有一点也少，教授里头很少。那么究竟是学生领导先生，还是先生领导学生呢？是助教领导教授，还是教授领导助教呢？所以这个问题发生得很自然。我说这个道理是有，他们讲得对，共产党就是不行，就是在教授、科学家、工程师这方面我们人很少，甚至没有。还有许多文学艺术这一方面。什么原因？就是我们过去忙坏了，我们干了几十年的阶级斗争，忙于搞阶级斗争，没有机会搞这个。过去你这个东西要有个地盘嘛，过去济南这些地方人家不许我们来嘛，什么山东大学、齐鲁大学他不许我们来嘛，来都不许来嘛。北京我是住过的，三十一年我是不能来的，就是不能进城，进了城他就要请我到班房里面去。所以我们承认这些，但是可以不可以学会呢？阶级斗争我们学了二十四年，到了七大，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二十四年才作总结，我们才基本上学会了这个东西。犯过许多错误，又加上七大以来的这么多年。那么，我们搞建设、搞科学，学当教授，医院里面当医生、开方，是不是可以学会呢？比阶级斗争哪样困难些呢？阶级斗争那个东西我看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一打它就跑了。这个开刀好开，那个病人他不能跑的。自然科学，五年大学毕业，再干五年就是十年，再干五年就是十五年，他不变成工程师呀，这些人他不能当大学教授呀？可以当的，有个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学会的。现在设计、施工、安装我们已经学

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了，管工厂也相当学会一些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呢？就要转入到学这些，搞建设。所以整个社会与自然作斗争，所以六亿人口与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可以学会的，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批评是好的，没有批评，压制批评就不好。斯大林就是犯这个错误。斯大林做了许多好事，但是他做了一些坏事，他混合这两者，拿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付人民，人民内部的矛盾，说不得政府的坏话，说不得共产党的坏话，一说坏话，风吹草动，就说你是特务，把你抓起来。所以现在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请愿。但是我们要反对官僚主义，要克服官僚主义，那什么罢工、罢课这些东西就会少的，但是怎样也要有。那怎么办？有就用对付人民内部的方法来对付。那么还要不要解放军？那么就把他解散，是不是？那行不行？“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解放军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不是为了对付人民的。解放军就是人民的儿子，那么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父亲啊？你总不能讲吧，人民的儿子对付人民啦！人民打人民啦！那不行。解放军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是专政的武器。我们要跟国民党有区别，什么人比较怕批评，还是共产党怕批评还是国民党怕批评？我看就是国民党，他那个党最怕批评了，什么“百花齐放”这类东西，他们怕得很，只有我们敢提出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我们说要跟他们共存几年他都不干。那个时候他们开一个什么国民党参政会，我也是个参政员，共产党有几个参政员，我们是以什么资格呢？不是以共产党的代表，而叫做社会贤达，好听就是了，又贤又达了。他不承认我们是共产党的代表。你还说长期共存，短期共存他都不干。所以这样的口号“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只有我们讲。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比较大公无私的，因为它的目的是要使全人类解放，要使整个人类解放，它自己才能解放。共产党是应当最不怕批评的，我们是批不倒的，风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我们都不怕，十二级台风可以把一个大礼堂吹走，可以把这么大的（手势约二尺直径）树吹走，但是要吹走共产党，人民政府，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我看是吹不走的，吹不倒的，十二级台风都吹不倒，何况是什么五六级、六七级。你们到过青岛没有？我没有去过，我想去一下，我到过北戴河，七级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平时没有风浪很吃力，要一步一步地爬，起台风一个浪头就有一两个人高。十二级台风我没见过。批评不倒我们的，批评不倒共产党，工人阶级、农民是批评不倒的。因为真理在我们手里，我们手里掌握着真理，比较任何阶级我们的道理是更正确的。我们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有工人、农民基本群众作基础，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怎么能批倒呢？马克思主义又怎么能一批评就倒了呢？吹了一口小气就倒了，那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大概是不要台风，这么招一下手就要倒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那一套东西吹倒一点我看也好嘛，那套东西是要吹倒嘛，把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这些东西吹掉一些。

刚才舒同同志提到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怀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讲优越性尽是优越性，缺点一点都没有。一讲没有优越性就一点好处也没有。这是两种片面性。我们党内存在着，党外也存在着。两种制度作斗争，哪一个胜哪一个败，就是讲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谁胜谁败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呢？你们看，分了胜负没有呢？按照我们八次大会所说的，应该说基本上是分了胜负的。谁胜谁负，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

了。基本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就没有。作为社会制度，这两个制度的竞争，社会主义基本上胜利了，但是还没有最后胜利，还没有巩固，还要看，人们还要看，资本家要看，农民还要看，资产阶级要看，小资产阶级要看，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还要看，我们共产党里头有一部分人也还要看。两种制度作斗争谁胜谁负，哪个胜哪个败，基本上可以说胜利了，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有两三个五年计划。合作社至少要有五年才可以巩固，现在一般的合作社才只有一年多一点的历史。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谁负谁胜那么就更要差一点的。所以现在相当乱呀，思想方面，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作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思想还是相当顽固地保守着。特别是关于世界观这一方面，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那么这个时期还要更长些。

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里头：大学、中学、小学就有二百万人。此外，党的系统，政府的系统，军队的系统里头的知识分子，经济系统，商业系统，工业系统里面的知识分子，文学方面的，艺术方面的知识分子，合起来有人说有五百万这样多。其中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只占少数。我们国家是文化落后的国家，但是五百万人也就不少了。因此，我们要好好利用知识分子的队伍。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

至于本人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后来的事。我想在座许多同志们中间的知识分子，也是这么一种情形。你母亲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也有这样的经验，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她并没有讲这一句话的，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有共产党。这是因为后头社会斗争逼上梁山，我那个梁山叫井岗山。你们各有各的梁山。这个梁山就在你们山东。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也许多一点，这是讲真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的，但他们不是特务。这一些人是民主人士，但是他心怀不满，根本反对我们，有没有呢？我看是有的，这也是少数。中间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间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过寥寥，叫他下乡没有兴趣，到工厂里面看看，溜一溜就回来了。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们打成两片。我们说打成一片。他们说打成两片好，搞不成一片，就因为感情不融洽，知识分子跟劳动人民感情不融洽，隔那么一层。这些人世界观没有改，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思想的乱，就是这样。他们为什么思想乱呢？他们动摇着，墙上的草，风吹两边倒，不风吹就站在那里，一风吹就倒，匈牙利一股风，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一股风，还有什么地方一股风。世界上总是要刮风的嘛。他们可以倒过去，也可以倒过来。又很骄傲，那个尾巴翘得相当高，他认为他是知识分子，相当了不起。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值钱的。所以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真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他们，这些还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的范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叫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可以，你叫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愿意，但是基本范畴还是资产阶

级范畴。这个时期大概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过了几年了，大概还要经过十几年，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要争取他们。要知道现在教书的是谁？就是他们。他们都是教员，他们办报纸，他们在学校里头教书，他是我们经济机关设计、办各种事情的人，他们是工程师，我们是一天也离不开他们。在座的同志们，你们里面也有知识分子，但是你们里面的知识分子比较少，你们如果说，知识分子我们可以离开他们，那就不行，我们离不开他们，没有人教书，大学、中学、小学里头有二百万人工作、教书，有各种报纸，有文学，有艺术。山东唱武生的，山东大鼓，那不算知识分子吧，但梅兰芳要算，梅兰芳是知识分子。你们有个山东梅兰芳（叫什么名字，你们山东人，不知道山东梅兰芳吗?）

我再来讲一讲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工人阶级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地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为自己服务，马克思就是这样争取过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替工人阶级服务。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现在有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刚才不是讲过了，五百万中百分之十左右，就是五十万左右，这是知识分子里面的核心力量。

各种阶级，哪一个阶级有前途呢？只有工人阶级有前途。我们现在有多少工人阶级呢？革命以前，解放以前只有几百万人，这几年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现在在工厂里头工作的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六亿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万人，就是五十分之一多一点，五十人里头只有一个工人，人数这样少，但只有他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阶级，就是走路，走路走到那里，走到他那个地方去。比如农民，农民将来要机械化变成农业工人，集体化，集体化将来进到社会主义，就要变成国有化，全民所有制。现在的农业合

作社所有制，将来几十年之后，要改成跟工厂一样，就是农业工厂，这个工厂里头种包谷、种小米、种大米、种番薯、种花生、种大豆，资产阶级这大家都知道的，资产阶级现在正在过渡，他们也要变成工人。几亿人口的农民，手工业工人现在已经变成集体农民，将来变成国有制的农民，农业工人，使用机器，现在除了少数人以外，这五百万人知识分子里头，其他的知识分子，虽然是动摇的，在世界观问题上，在思想问题上。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上面也赞成，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地说，除了少数人他们拥护，他们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好嘛。工人阶级已经把他们争取，经过中国共产党把知识分子争取到自己一边，跟我们合作了，但是这个合作，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一件事，世界观、灵魂世界又是一件事。要他们换掉世界观，改成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要有一个时间。

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变，或者还没有大变，小变了一些，我刚才所讲的，他们和劳动人民有些格格不入，没有打成一片。文学艺术家不愿下厂下乡，下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的注意力不在那里，他们对农民的兴趣不大，对工人的兴趣不大。他们愿意回到家里面和知识分子搞到一块，我叫这些人是半条心。有半条心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半条心是好的。因为有半条心啦，剩下那半条心可以慢慢来嘛，那半条心还是资产阶级的王国，资产阶级思想。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一讲，他们就会跳起来，“你说老子半条心啦！”我说我就这样讲，你跳到屋顶上去，我还是这样讲，因为你还是这样动动摇摇的，你们是愿意为工人阶级服务，但你不是全心全意，是半心半意。有什么证明？就是你们跟工人、农民打成两片，不是打成一片。你们在工

人、农民里面没有朋友，你们的朋友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跟知识分子交朋友，就不如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但是他们不干，你把他赶也赶不下去。赶下去没有几天就回来了。但是工人阶级要求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要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面来一个改变，丢掉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在报纸上讲：要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一个破一个立嘛，它那个东西不破，这个东西不能立的。于是乎就发生了一个任务要破，破嘛有点痛，那你资本家现在都提出来嘛。资本家里头有大批知识分子，我们要使用他们，工人阶级要求大量知识分子，全心全意为他自己服务。不是百分之百，应该是大多数，相信马克思主义，跟我们有共同利益，我们现在有共同利益。他们听到合作社办得不好就高兴，合作社倒霉他们就舒服，共产党出了乱子他们就开心，有这样一小部分人。但是，多数人还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吊在半天上，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

我们党现在提出准备整风，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我们先要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中央准备今年开一次会，现在还没有决定，今天我也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多少年没有做整风这个工作了，“三反”“五反”很激烈，那个东西没有在思想上面解决问题，准备进行一次整风，这样我们就估计可以争取共产党的作风整好了，可以争取广大的党外人士。谈到这个民主人士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合作还是不合作。这个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他们跟我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而是我们跟他们合作不合作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合作是好讲，我们跟你们合作，民主人士，苗海南，但是就是使用不使用的问题。有些人讲，他们没有多少用处，甚至讲是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嘛，废物为什么不可以利用

呢？我今天不能具体讲苗海南是废物，苗海南大概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就是有些用处不多的人，也可以利用，有些人起了一个名字叫废物，废物也可以利用。一开会不是应付了一下，无非是每年开那么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应付一下，过了关就没有事了，大概一年有那么一两个礼拜吧。这种态度是消极态度，我说要采取积极的态度。这些民主人士大体上都是党外知识分子，这一些人是老知识分子，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现在大学生有多少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呢？全国的统计有百分之二十，一百个大学生里面只有二十个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百分之八十都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子女。中学生就不大清楚了，大概是四六开，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有百分之六十，工人农民出身的有百分之四十，或者是一半一半。你们有这个统计没有？我在这方面没有统计，中学生升了高中恐怕还是他们的人多，还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多，什么年间大学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高中生百分之百是工人农民出身，至少要过三个五年计划以后，至少还要过十一二年，这个情况才能起根本变化，也许时间还要长一些，再有两个五年计划还不够，也许还要三个五年计划。他那个种是要绝的，那是没有问题的，他是个绝种问题。这个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种呢？地主阶级还有什么种呢？他就没有种。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绝种嘛，就是以后没有资本主义制度了，没有地主封建制度了，以后一万年都是工人、农民的制度，就是都是工农子弟。

最有前途的是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时候青黄不接，同志们要知道，我们一步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没有人教书，没有人当工程师，没有人研究科学，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大都是他们，文学家，艺术家，大都也是他们，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我们一步

也不能动。所以应该好好跟他们团结。几个五年计划才能起变化。那个时候他们也变了，资本家变成工人了，地主变成农民了，他们的子弟也变了，现在正在变。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三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

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今年准备，今年是准备阶段，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整。有些贪污分子，他今年就要赶快收手。本来要抓到一些东西的，现在我赶紧放到这里，那么我们就不算贪污犯了。明年正式整的时候，你今年把他吐出去了，今年不贪污了，或者贪污了的怎么吐出去。那么已经吃下去了、消化了，变成屎了怎么办呢？变成屎了看其情况分期吐出。那个农民，合作社里面不吐可是不行，有什么三十块，就是大问题，那么你就分三期吐，今年吐十块，明年吐十块，后年吐十块，今年吐好了的整好了的，明年就不算贪污犯了。所以今年出告示呀，官僚主义整好了，跟人民的关系，跟下级的关系。当个厅长也好不容易啊！厅长底下有好多人，平时不是不大管的，等到你一整风的时候，那些人就会说话的，你们在座总有厅长，局长，科长嘛。是不是扔一千炸弹就要整风了呀，我看不，我看不应这样做了，改一下就是嘛，我们的缺点，人民内部的缺点，不用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我们是搞小民主，如果一个小还要少，再加一个小字就是小小民主。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我们来吹他二年。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什么东西吹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

（1957年3月19日）

（一）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许多人还不认识，还企图用过去的方法对待新问题。

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

公开承认矛盾，列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

林〈斯〉大林不承认，混淆两类问题，直到死前才在理论上承认，但实际做又是一件事。

（二）如何解决矛盾，人民闹事如何处理？

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妨〈防〉止，但不要夸大。

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观察也有“左”有右。

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

（三）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

---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3月19日写的一篇讲话提纲，他自拟的题目是“讲话”，按照这个提纲，毛泽东于1957年3月19日和20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

六亿和500万[1]——左、中、右。

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150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

使中间派进一步。

我们必须使用他们，否则一步也不能动。

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

我们必须学文化（科学、技术），学建设。我们是否可以学会科学技术？如过去一样，可以学会的。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放还是收？

说还是压？要善于说服，要学会以理服人（四人文章[2]）。

会不会乱？

会不会被批倒？

毒素怎么办？

（五）为工农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两片。

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党内党外）。

争取70%下厂下乡。

我们干部要经常下厂下乡。

（六）要展开讨论，整风，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它的发展史。谁怕批评？阿Q[3]。

党内党外，并和党外一起。

---

[1] 指当时中国全国6亿人口和500万知识分子。

[2] 指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报》。

[3] 阿Q，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主人公。

要使用党外。

要讲真心话，很多事不要两套。

要艰苦奋斗（调整工资）（革命意志衰退）（争名夺利）（白手成家）。

要养成学习习惯。

原则性与灵活性（**闹事**，**毒素有好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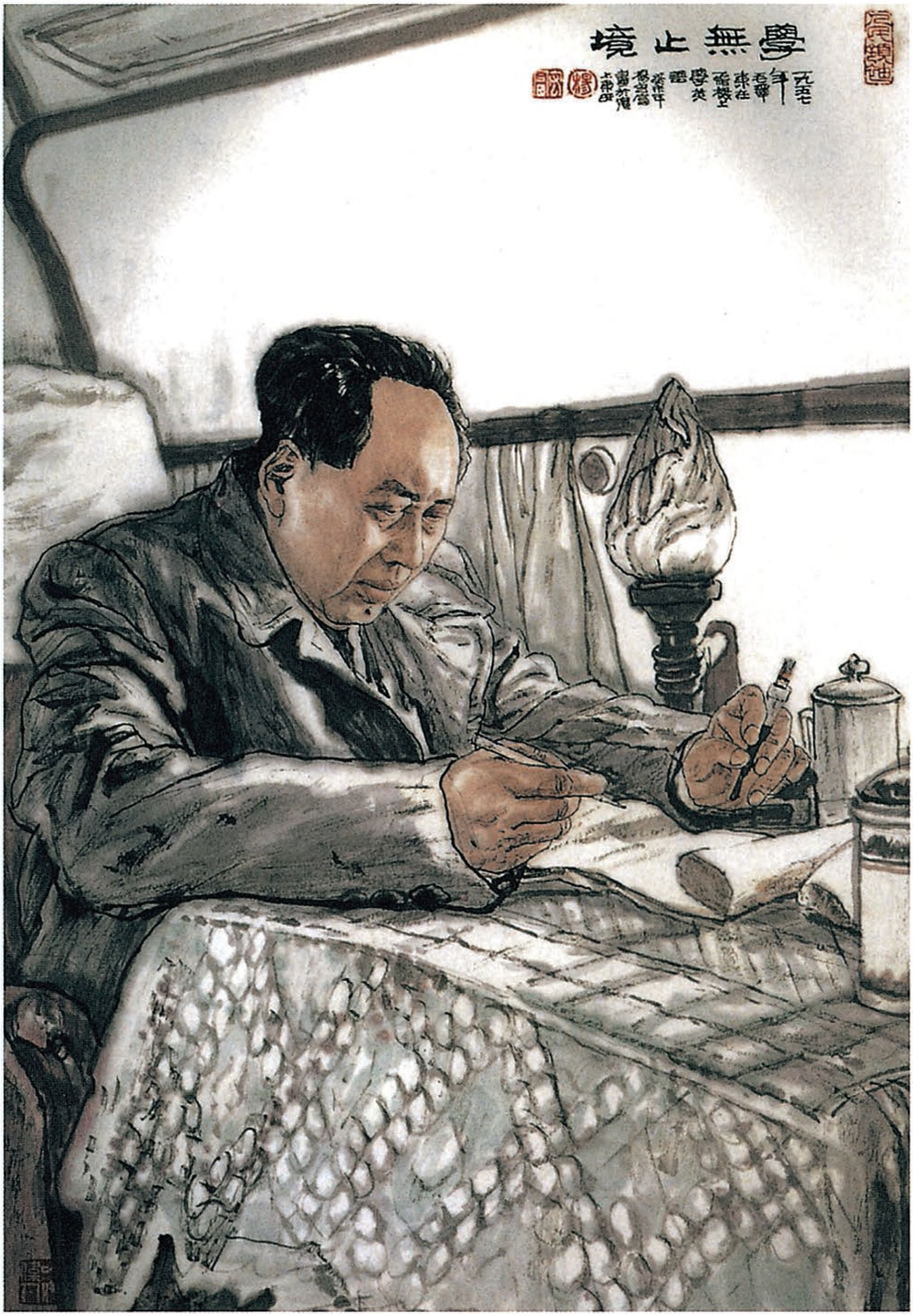
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

如果不注意，很可能在几年以后，政治兴趣低落，**政治觉悟不高**，**因此要加强**。

谁怕批评？共、**国**、**民主党派**。

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

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学无止境》（中国画）

在南京部队和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20日）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嘛，南京，从前也来过。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龙蟠虎踞”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二十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各地方的问题都差不多，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就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

那么，合作化是不是阶级斗争呢？合作化当然不是一个阶级向一个阶级作斗争。但是合作化是由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由个体的制度过渡到集体的制度。个体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的范畴，它是资本主义的地盘。资本主义发生在那个地方，而且经常发生着。合作化就把资本主义发生的地盘，发生的根据地去掉了。所以

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你看，我们这个会场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这样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了好几年了，这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在最近几年了，现在也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这是过去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结果。拿共产党的历史来说，有三十几年；从鸦片战争反帝国主义算起，有一百多年，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干了个阶级斗争。同志们，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跟社会经济制度，这仅仅是为建设，为发展生产，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提高开辟道路。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过去那个斗争，就我们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完结了，就国际上来说，还没有完结。为什么我们还要解放军呢？主要是为了对付外国帝国主义，恐怕帝国主义要来侵略，它是不怀好心的，国内也还有少数没有查出来的反革命残余分子，有一些过去被镇压过的，比如像地主阶级、国民党残余，如果我们没有解放军，它又会起来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现在守规矩了，资本家还不同些，我们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跟农民接受合作化不同，他们可以说是一种半强迫，就是说有些勉强，而且是在对他们相当有利的条件下接受改造的，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善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关于思想工

作，我们这个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有机器，就要有科学，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这种情况的变化，我想大家也就懂得了，也就意识到了。但是，似乎还有一些人不大清楚，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现在发生一些新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文化的问题，人民中间向我们提出一些要求，发生一些人民闹事。这些问题在什么地方？临时工、农村的困难户，学生方面，合作化方面，都发生新的问题。有一小部分工人发生罢工，有一小部分学生发生罢课，或者游行示威，请愿，复员军人也有想闹事的，也有一部分合作社社员，富裕中农，人数不多，但是他们不满意，要脱离合作社，还有些别的事情，他们不满意，向我们闹。怎么办？人民闹事怎么处理？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这个问题。矛盾应该分为两类：第一类，就叫做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类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过去几十年就解决了第一个矛盾，现在要解决第二个矛盾。这里面表现在各方面。比如现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这也是矛盾。

我们技术不够，没有机器，没有文化，生活不好。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不是讲社会主义已经成功了吗？去年共产党开了大会，说社会主义基本上完成了大概就要过好日子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它作为社会制度，就是生产关系。我们建立了一种关系，跟过去的关系不同，人

民进行生产，过去是资本家和工人的那么一种关系，地主和农民的那么一种关系；现在，我们建立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用这样的一种相互关系去进行生产，也就是用一种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进行生产。因为过去旧的方法不适宜，不利于生产，不利于发展，比较差些，弄得中国人民长期地又穷又是文盲，在世界上是人们看不起的。现在这种关系刚改变，还没有生产，没有生产就是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是没有好的生活。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一百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就不能享福了。那当然不要那么长，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一百年，是很短的时间，就是搞一万年，人总要生活下去的。

刚刚革命，刚刚搞社会主义，这个生活怎么会好起来？粮食怎么会多起来？粮食多了没有呢？是多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府成立的那一年，我们只有二千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我们就有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斤。但是多少人吃呢？我们这个国家好处就是人多，缺点也是人多。人多就嘴巴多，嘴巴多就要粮食多。增加这一千四百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一九四九年没有粮食，现在还是没有粮食，还是不够。要过好生活，现在我们搞出十二年的生产计划，科学计划，农业计划，工业计划，一步一步来工作、生产。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这个问题容易懂，青年人可不容易懂。好像他来到了世界上，样样要像个样子，因此要向他们进行教育，要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特别是对青年进行教育，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

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我们祖宗给我们很少。我们的祖宗是谁

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它是我们上一辈子，我们上一个政府。他们给我们的就是把人民身上的肉刮去了，但是，他们走了，也就好了。他们走了，空出一块地方来。我们这块地方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东边从海边起，西边到昆仑山、帕米尔高原，北边到黑龙江，南边到海南岛，就是这么一块地方，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五十年。

要分清两类矛盾，第一类敌我矛盾不能和第二类人民内部的矛盾混淆在一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有矛盾的，是存在着矛盾的。这一点列宁曾经指示过，他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的，斯大林在开头，在列宁死了以后的一个时期，苏联的内部生活，还是比较生动活泼的，跟我们现在差不多。也有各党各派，也有一些比如托洛茨基那么样出名的人物，他有很多人，不过他大概是共产党内部的民主人士，而且是调皮角色，跟我们闹。此外，还有一些人，社会上也可以说各种话，可以批评政府，那个时候曾有那么一个时期。后来不行了，后来就搞得很专制了，就是批评不得，谁要批评，百花齐放，那是很可怕的，只能放一朵花，百家争鸣也怕的，风吹草动，就都说是反革命，就抓人，就杀人。这就是把两种矛盾混淆了，把人民内部的矛盾误认为敌我矛盾。你们南京许家屯同志说，很多学生向他来请愿，队伍很整齐，省长彭冲也说，纪律很好，在路上都是很好，一到他那个衙门里头，就喊“打倒官僚主义”，要解决什么问题。这样的问题，如果拿到斯大林，我看就要抓他几个，难免有几个，头要落下地。你打倒官僚主义，不是反革命？其实一个反革命都没有，是很好的青年学生。而是那个问题应该解决，确实有点官僚主义，因为，那些华侨学生闹事，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好。学生这么一请愿，就帮助了我们，学生也得到了教育，很多干部也得到了教育，华侨学生也得到了教育。闹事的、打人的，也不打了，何必一定要天天打呢？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他们很好地进行教育，没有发动群众批判他们。像这类问题，还有什么复员军人闹事。曾希圣同志，他在你们附近的安徽省，他那个地方复员军人闹事，找到他，他讲了四十分钟的话，问题解决了。开头还有一股气，后来这一股气不晓得哪里去了。总之问题是没有好多了，问题就解决了。其中已经查出一个冒充革命军人的人，也很坏，他是个领袖。

对于人民闹事，就是不能采取对地主阶级、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的那种做法，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除了那个犯了法的人以外，比如讲，他拿刀杀人，打伤人，跑到办公室把桌椅打得稀烂，这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哪怕他犯了错误，他是领袖，率领人闹事，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出工厂，不要开除出学校，不要开除出机关。你开除他，他跑到哪里去呢？你开除出这个学校，他就进那个学校，那不是一样吗？你开除出这个工厂，他就跑到那个商店，他总要落一个地方。他不能跑到中山陵上去活，那个地方没有粮食，没有房子，他不能在那个地方活的，不能在野外活的，总要落一个地方。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可以舒服一点，我说你这样太舒服了不好，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工厂，有这么一点闹事的人，是不坏的。

我们再谈到第一类矛盾——敌我矛盾，敌人同人民，人民同敌人反革命的矛盾。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就是右倾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依法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个不好，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这方

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各省应该注意。民主人士中间，民主党派中间，有一些朋友，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也是有右倾的观点，他们比我们右倾观点有时还右得厉害一点。因为有些反革命，就是他们的老朋友，现在有些关在班房里，有些杀掉了，他们有点伤心了，因为杀了他们的亲戚，杀了他们的朋友。有的观点，我们要讲清楚，在党内这种观点是不好的。第二，也有夸大的观点，也有“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可不对。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要肯定。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不肃反，那可不得了。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而匈牙利没有肃清。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这个观点就是不符合情况了，夸大了。

对于第二类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现在比较显露出来了，比较暴露出来了。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同志中间的意见也不一致，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还要经过说明，经过讨论，经过研究，使得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统一起来。对于人民还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我们过去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那么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过去是向敌人闹事，那就叫革命，现在这个就不叫革命了。你把我革掉，怎么办呢？又请蒋介石来呵？但是事还是要闹的。因为事情你没有解决得好，凡是解决得好的，十个地方九个地方解决得好，十个问题九个解决得好，有一个地方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得好，那个地方就要闹。这个闹事是正常的。你没有解决得好他为什么不闹呢？请问：他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向“蒋委员长”去闹吗？他到台湾去了。他们就要向工厂的厂长闹，向合作社的社长闹，向乡政府闹，向市政府闹，向人民政府

闹，向学校的校长闹了，因为你没解决得好。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们人很多，意见也不齐，因此存在官僚主义。这里也是有“左”有右的观点，对于人民闹事，也有主张用老的办法来对付，横竖我们办法是有一套，我们是搞了几十年，你晓得老子干革命干了多久呵！是不是？总是有一套办法，就是拿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有时候也用一下，压一下，叫警察。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国民党就用这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那完全是没有办法。过去对付帝国主义很神气、很威武，就是不怕。小米加步枪，你帝国主义、蒋介石、飞机大炮，不怕。不怕帝国主义，可有点怕人民闹事。我说，帝国主义你不怕，你还怕老百姓？可就是有那么怪，就是怕老百姓，帝国主义他是可以不怕，老百姓一向他闹事，他可没有办法了。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一条，他还没有学好。过去学的是对付帝国主义的，对付蒋介石的那一套，要讲打土豪、分田地，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所以，很值得研究。要跟党内党外公开地提这个问题，开展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同志们！究竟是对付帝国主义容易些，还是对付老百姓容易些？对付敌人难办些，还是对付人民难办些？敌人，你撵了多久，他就是不走，赖皮得很，特务钻到机关里头、学校里头、工厂里头、农村里头，他就不走。老百姓无论如何不是特务，他不是帝国主义，他不是地主、资本家，他是老百姓，他是劳动人民，很容易讲清道理，所以我们许家屯同志、彭冲同志对于华侨学生打人，很大一批学生不满意，向他们请愿，他们就来了一个说服，结果是很好地解决了问题。

我说，对于全国，我们的方针是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

强思想教育。这个方针可以说是战略方针，因为这是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里包括地主、富农、民族资本家。没有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你总要去安排他；失业的各种人，都要做适当的安排，总要使他们能够生活，有事情做。其中，有大约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但是也有一批，大概有五百万左右。其中不到一百万进了共产党，还有四百万在党外。他们干什么事情呢？他们在我们政府系统做工作，军队里面也有一小部分，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大学、中学、小学都算，财政经济系统有一百万人，还有科学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文学家、诗人、艺术家、画画的、唱戏的，还有新闻工作者，办报纸的，等等，上海很多。

这么一大堆知识分子，有些是工农化了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了共产党，有些没有进，但是很接近我们。积极拥护马克思主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占一小部分，大概占百分之十或者多一点，据江苏说有百分之十七。另外一点，他们是有敌对情绪的，但是，不是特务。他同我们敌对，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勉强地接受，没有办法，大势所趋。这样的人，也是有的，可能占百分之几。中间的有百分之八十，或者没有这么多，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他们是中间派，动摇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有些赞成，也读了几本书，但是，没有读进去，就是读在这个上面（指额头上面），没有进到里头去。考知识分子有个办法。人们说要分别一下，究竟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意思就是说，戴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比较资产阶级的要舒服一点。可是我说不然。我就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的资产阶级学校。那个社会的空气是资产阶级的空气，搞的那一套，就是唯心论的什么东西，康

德的唯心论我就信过，你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读的是资产阶级，信的是资产阶级，你还能说是个小资产阶级？有的时候，是可以分的，也应该分的，但是讲到世界观，可就难分了。你说，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什么东西呵？是半唯物主义吗？我这个人马克思主义是后来钻进去的，后头学的，而且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跟敌人作斗争逐步改造的。有一件事情，可以考知识分子，就是跟工人、农民一道，看谁跟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有一部分人可以打成一片，大多数知识分子，他还离开得这么远，想要打成一片，打不拢来。他跟工人、农民没有感情，不是朋友，工人、农民有话也不跟他们讲，他也看不起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一条尾巴，要泼它一瓢冷水。狗，泼它一瓢冷水，尾巴就夹起来了，你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它就翘得很高，它就有些神气。因为他读了几句书，确实有些神气。劳动人民看见你那个神气，看见你那个样子，他就不舒服。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动摇着的中间派。他们一般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他们还没完全接受。我说，他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他们有半条心想为人民服务，这是好的。但是，还有半条心，不晓得放在哪个地方。你要说他拥护台湾，他也不拥护台湾，但他一讲外国，恐怕还是美国好。“你看，美国有那么多钢，美国科学很发达”。我说，外国好，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国家好，是不是好呢？是好。他们有那么多机器，那么多钢铁，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他好是他好，不是你好，美国有那么多钢，是美国人的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钢。我们天天吹他那个好，有什么用处？他每年生产一万吨钢，我们没有。我们每年能多几万吨钢，我们就高兴。我们现在只有四百万吨钢，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可

以完成四百一十二万吨钢，可能超过，可能多一点，可能有四百几十万吨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几万吨钢，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四年，主要是日本人的，那才有九十万吨。蒋介石搞了二十年，我说蒋介石该倒，是有道理的，并不是糊里糊涂我们把他赶走了。他搞了二十年，只有几万吨钢，其中还有一部分是清朝末年张之洞他们搞的。我们搞了七年，今年来讲八年，可以搞四百多万吨钢。所以我们增加一吨钢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就高兴。你美国增加几百万吨钢，我也不高兴，你越多我越不高兴。你增加那么多钢，干什么呢？你增加那么多钢就很危险，要打我们的。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吹美国钢！钢！钢！那么多！这是我们要说服他们的，我们要说服知识分子。

有些知识分子在做教员。科学家都是教员，大学教授都是教员，中学、小学教员都是教员，教育人民；新闻记者，办报的教育人民；广播员、文学家、艺术家都是人民的教员；技术员，工程师，是我们工厂所必不可少的。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活动。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我们学校就不能办，我们有许多报纸就不能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共产党就没有出梅兰芳，就没有出周信芳；现在有个袁雪芬进了共产党，总还没有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大学教授就没有，工程师现在开始有一点，很少；技术人员开始有一些进了共产党，大批的还是党外人士。

所以，我们几百万知识分子，不管他多么动摇，但是，是有用之人，是我们人民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现在只有他们当教员，没有别的教员，因为他是上代遗留下来的，是社会遗留下来的。他

们的出身都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但是可以教育过来，我们不要搞唯成分论，鲁迅也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马克思就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列宁也是，那怎么得了呀？这就不能讲唯成分论。因为现在，他们——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没有社会根子了，他们的社会基础，他们的社会根子，我们已经挖了，现在他们落在空中，就像降落伞一样，吊在空中了，所以就便于改造，并不要怕他们。

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工农干部，看到知识分子，有点恼火，恐怕吃不消，咬不烂。知识分子有点麻烦是真的。因为，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麻烦也就是读几句书，我们就是少几句书，你少几句，他的尾巴就翘起来，事情也就不好办，有的就难办。所以讲难办也就是难办。但是讲好办也还是好办。这七年，这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有进步，应该肯定这一点。你们江苏省可以证明，你们这里知识分子最多，是不是？总算是还有进步。

民主党派是什么呢？民主党派他们还都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里面工农干部很少，有什么工农干部？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江渭清同志说，要我讲讲这个问题。

提出这样的方针是有理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放”，还是要“收”？现在党外人士就说我们“放”得不够，他们就深怕我们“收”。而我们同志呢？看那个样子似乎不对，就有一点想“收”。有一点想收兵。那么我们呢？中央的意见，也和各省的同志谈了，去年十一月开了二中全会，今年一月开了省委书记会议，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

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不对的应该批评，错误的意见，错误的作品，或者一篇文章里头，一个作品里头有一部分错误，那就要批评那一部分，但是要用说服的办法。所以还是用“说”，还是用“压”？还是用“说服”，还是用“压服”？这两个办法里头，采用一个办法。还是“放”，还是“收”？这两个里头取一个。我们认为还是要“放”，不要“收”。那么“放”，就放出许多东西来了。有许多东西就不对头，怎么办？那么就“压”？还是采取另外一个方法，说服它？有些同志，手就有些痒，想去“压”，把对付阶级斗争的那一套搞出来，军法从事，用简单的办法，或者是不调兵，用行政命令，看不顺眼的，就把它“压”一下。中央认为，这样不好，压是不会服人的。从古以来，就没有压服过人的。我们对敌人那是要压，压了之后，还是要“说”。比如俘虏一解除武装，我们就说服他。反革命，只要不杀头的，我们还是争取、教育、改造他。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么一“放”，又是用“说服”，不要用行政命令来高压，会不会天下大乱？我们说不会乱。会不会从各方面进行批评，在报纸上、刊物上、会议上批评我们的缺点，会不会把我们批评得不得下地，把人民政府批倒，像那个匈牙利一样，会不会那样？我说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大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大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老干部也批评不倒，所以，老干部不要怕批评。老干部批评一下很有好处，如果我们身上有官僚主义，有缺点，首先让党内批评，然后党外批评，批评我们的缺点，把我们的官僚主义改一改，把缺点改一改，不就好了吗？会不会倒呢？不会倒的，人民政府怎么吹得倒呢？上海去年刮了龙卷风，把个什么大东西吹起了，房子还有什么装石油的，吹上天去

了。起那么一股风，但是上海人民政府没有吹走，不管刮多大台风，我看人民政府，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老干部、新干部，只要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的，吹不倒，半心半意替人民服务的，那要吹倒一半；那一点心思都没有，跟人民政府敌对的，那么该吹倒。

毒素怎么办？百花齐放这一来，放出许多毒素，蛇口里吐出一朵花来。我说对于有毒素的东西，有篇文章叫《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同志们大概都看过了，这个里头有这样几句话，说民主集中制，如果有缺点，就应该批评。毫无疑问，民主集中制的集中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党的领导必须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领导。在这些方面如果发生了缺点，就必须坚决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绝不能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的“涣散和混乱”。这个对不对？这个对了很好。你们拿这个东西，跟民主人士讨论，要大学生去讨论。这篇文章上讲了的：批判是可以，但是批评的结果，批评的目的，就是要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像敌人所希望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

这些原则性，原则必须如此。但是有一种灵活要注意，让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一些很不好听的话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中间可能出一些乱子，它的目的不一定跟这个相符。群众闹起事来，那些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都是没有学会马克思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他怎么会了解这一条？开起会来，批评的时候，会出一些乱子。这时候，如果到处都拿这一条去压，“你看，我有一本书，你看过没有？”也不行。你是要学我们彭冲同志、许家屯同志他们解决这

个问题的样。他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就搬出这一条来念，就是念这两句，别的话都不讲，保证他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因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有时候搞得过火一点，这是难免的。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那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也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就没有看过，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搞那么一点，见见世面，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这跟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是大家赞成的，没有哪个反对，还有什么“劈山救母”“水漫金山”“断桥”之类，那些都是神话。也没有哪个反对。就是有另外一些东西，也不必那么急，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出了几篇小说，写了几首诗，演了一些什么“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我们可以慢一些，让社会评论，逐步地使他们那些作品，那些戏剧，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而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要让它出现，让社会上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要丧失，要逐步改造的。我们过去就是用一个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又慢慢出来了。可见得，我们的那个禁止是不灵的。

最后我讲一下要在党内党外把我们党提出的这些问题开展讨论。讲一样的话，在党内讲，也跟党外讲。比如半条心这样的话，也要跟他们讲“我就是讲你半条心，你怎么样？”“那就不行！你讲我半条心，就不行！”不行，我要打架，打架也不怕。你是半条心，我说你半条心，你还不舒服？你有半条好嘛！你还有半条心，这是讲世界观，我不是讲你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你是拥护的，但是有一些也不见得，譬如合作社这个制度，有些是怀疑的。

但一般讲社会主义，五年计划，你要问他赞不赞成，他说赞成。宪法赞成不赞成，他赞成。共产党一般他拥护，但是讲到世界观，辩证唯物论，这一套就不赞成了，或者只有一部分赞成。我们讲半条心，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你还有一个任务，还要改造。你有二重性，一重是赞成社会主义，二重是不彻底，所以是半条心。想跟人民接近，但是又不能完全接近，不能打成一片，从乡里遛一圈回来，还是差不多。

听说，你们南京曾经出了一件事，在“三反”的时候闹出来的。有一位作家，是作家协会里头的秘书长什么人，下去体验生活，带了城里的饭到乡里去吃，回来的时候，预先就有报信的到南京，南京作家协会接了信之后，就排起队伍来欢迎，站立两厢，我们这位体验生活的作家，走中街而过。总而言之，很神气就是了。还有一位在“三反”中间，他这个人结婚，一定要在结婚的那一晚，睡总统府蒋介石睡的床，他要去睡一晚。总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怪事就是了。来了“三反”“五反”，把这些事都暴露出来了。南京方面这些材料送到北京，我们也看到了，那种人心情状态，总是有他的兴趣，这是总统睡过的床呀，这个总统姓蒋，蒋介石呀，我今天结婚，一定要在那个地方睡一晚。我们要使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刚才讲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就是些知识分子。我们要用他们。人们说用是好，可是他们没有用处，是老废物。废物也要利用，废物也有好处。应该用他们，应该开会，这回北京开政协会议，我也跟他们讲过一回，每年不要开会就是应付一下，应付一下过了就算了，而要是利用开会，每个省一年开一回、两回，利用这些机会，给他们做工作，说服他们，使他们替我们去做工作，因为他们联系一些人，经过他们去说服那些人。这样的态度，就是一种

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使用他们的态度。就是“利用”“限制”“改造”嘛。我们同志喜欢后面两条，一条叫“限制”，一条叫“改造”，就不喜欢头一条那个“利用”。我就“改造”你，我就“限制”你。当然那是对资本家讲的，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好这么样，对民主人士不好讲“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我们的同志事实上就是一个限制，就是不去“改造”，不去“利用”他们，他们可以做一些我们不能做的工作，要同他们讲真心话，有很多事情不要用两套，不要党内一套，党外一套。像我跟同志们讲的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当然任何一个党，他有一部分事情是不跟党外讲的。民主党派他们也有一部分事不跟我们讲，我们也有一部分事情不跟他们讲，但是，关系政策的事情，都可以讲，党内是这样讲，跟党外也是这样讲。材料都可以看。有一材料，比如讲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暴露我们官僚主义的这样一些材料，可以印发给他们看，他们平时看不到，这样一来，反而比较好。有时可以开两个党的共同的会议，党内党外同时参加。最近，北京开宣传会议，开得比较好，有一百五六十个党外人士参加，占五分之一。你们如果开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可以让他们占五分之二。我们在政策这些问题上，艰苦奋斗这一点上，做很多工作。

艰苦奋斗，江渭清同志也讲了这一点，我先前也讲了，要有多少年我们人民的生活才能改善？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但是不等于女同志不穿花衣服的，花衣服还是可以穿，据他们研究，花衣服便宜，现在做两套，里面穿花衣服，外面穿兰布褂子，那花钱太多，我们要节省，穿花衣服是个节省的办法。各种事情，我们都要从节约这点上，艰苦奋斗这点上，做很多工作。

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有些同志精神不振作，就是做那么一点事

情，没有事情就是打扑克、打麻将，听说打扑克成风，有时一打打到天亮。要养成读书的习惯。我不反对打扑克，也不反对跳舞，也不反对看戏，就是不要太多。我们的长处使用不上了。我们的长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政治军事。我们现在的缺点，就是缺乏文化，缺乏科学，缺乏技术。我们要在这方面学习。这些话我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那一篇文章里就讲到过，说我们过去的长处，我们所会的东西，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快要不用了，而我们所不懂的东西，现在摆在面前，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过了七年，更加觉得要提倡学习，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剩余的时间，把剩余的精力用在那上头，这样想打扑克的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多了，味道钻到书里去了，钻到学习里去了。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九十岁，看你有多长的命。只要你还能工作就多多少少应当工作。而工作的时候就要有一股革命热情，就要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当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一闹一评级，有些人闹得不成样子，像什么三天不吃饭，我说四天还可以。你三四天不吃饭，人送饭去，我说送早了，你让他饿四天、五天，一个星期不吃饭，就相当有问题了。三天不吃饭有什么要紧？急于送牛奶、鸡蛋，何必那么急呢？有些人痛哭流涕，比级别高低，比薪水多少，比衣服漂亮程度。

工资恐怕是要加以调整，中央还没有作出决定，去年不是提出

工资改革，增加了工资？工资是应该增加的，但是有些是增加多了一点，如行政系统，也许还有教育系统。这不是讲工人、讲工厂，而是讲行政系统。我们有一百七十万行政工作人员（包括乡干部，不包括合作社），教育系统有二百万人，另外有商业系统以及工厂以外的事业系统，还有三百八十万解放军，合共有一千万出头一点。这就是我们组成为国家的这么一个人数。产业工人过去几百万。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我们国家大，工作人员也是要多一点。所以准备在有条件的时候，就是讲有出路的时候，把一部分人回到工厂里头去，回到合作社里头去。主要的生产是两个部门，一个工业，一个农业。就靠这两个部门来生产。现在看起来工资有一些不很适当，引起人们不满。我说这个问题，如果社会上讲话的多了，倒是好办，因为讲话的多了，我们就有根据来一个调整，要保持过去我们革命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时候，那样一种精神，那么一股劲儿，那么一股热忱。革命热情，就是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底。每一个人，有一条生命，看你能活多久，或者六十岁，或者七十岁，或者八十岁，或者九十岁。有一个画家齐白石，他有九十八岁。看你有多长的生命，到那个时候，你真是不能工作，你就不工作，当你还能工作的时候，你多多少少应该工作。而工作的时候，要有一种热情。缺乏热情停滞下来，这些现象不好，应该做教育。有些人就是因为机关庞大，许多人围在一起，没有工作，打扑克，毫无出路。你堆上一大堆，只有那么几件小事办，他不打扑克？

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今天军队的同志到会的很多。军队里头怎么样？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战时，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

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比如开个党代表大会，给他们一个批评的机会。陈毅[1]同志在“三反”的时候讲得好，他说，我们发号施令多少年都可以，现在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下，批评一个星期，可不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应当是可以的。我赞成这个话，就是让下级批评我们一个星期。在大家批评之前，先准备一下，作一点报告，讲一讲自己有什么缺点，无非是一二三四，有那么几条。然后同志们发言，补充一些，批评一下。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连排长也要给战士们一个批评的机会，最好一年有这么一回，开这么几天的批评会。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全党应该强调思想工作，我们今天讲的总题目就是思想工作，思想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近来比较突出，特别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人们就说，是不是要“放?”恐怕危险。长期共存，为什么要怕长期共存?“你那个民主党派，我们革命的时候，你在哪里?”只要搬出这一条来，那他就没话说，他就遭殃，我们说这个时候还不要搬这一条。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一般来说，新干部没有这种包袱，比较自由。老干部对新干部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要向他们学习。他讲“老并不是你们好呀，你们就是革命几十年，我就是那个时候，你们革命的时候，我还在地上爬呀！”这一条他讲我们不赢，因此他就没有这个包袱。

那些新干部，我们对他们要处在平等的地位。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如他们。比如讲知识，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现在这一代，只有他们能够在知识上教育工人阶级、教育农民。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什么知识分子呢？没有嘛！现在的大学，约有百分之八十是地主、资本家、富农的儿女；中学据江苏省统计高中百分之六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初中也有百分之四十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只有小学倒过来，大概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儿女占百分之二十、三十，工人、农民子弟可能有百分之七十、八十。这种情况，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要一二十年，才能改变。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要耐心争取他们，一面要说服他们，使他们进步，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就是说教育他们，他们要做教员，必须学习，另一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现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习，因为，除他们就没有知识分子了。

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只有他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向他过渡的。比如说农民，将来要变成农业工人，合作社几十年之后，就要变成国营农场，社员要变成农业工人，资本家现在正在变，再过若干年，他们也变成了工人。整个社会都是工人，所以只有工人才有前途，其他都是过渡的阶级。无产阶级要有他的知识分子，要有全心全意为他服务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半心半意。大概估计，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我们可能从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由现在的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十五，或者百分之十七（这里包括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而不算在里头的），因为进了共产党，他并不一定等于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共产党。有一部分人倒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比如过去鲁迅就是这样的人。鲁迅好？还是陈独秀好？还是张国焘好？还是高岗好？我说还是鲁迅好，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非党人士，就个别人而论，进了共产党，并不等于比党外人士好（有一部分党外人士比共产党员好），争取扩大到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他们或者是进党，或者在党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跟工人农民接近。还有三分之二，在这十几年当中，也会有些改变，由半心半意改变成再多一点，三七开，尾巴掉一点，有些进步。我们要争取这个前途。因为讲思想问题，就联系到知识分子问题。

至于合作化许多问题，我就不讲了，合作化是个好事，是确定它有优越性的。因为我们许多合作社证明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但是有一部分同志，还有疑问，党外人士还有异议。这一点要向他们作解释。

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3月20日）

刚才柯庆施谈到，现在是一个转变时期，过去我们是长期从事革命战争，从事阶级斗争。而这个斗争，在国内来说，现在基本上结束了。阶级敌人的统治已经被推翻，社会制度的改革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过去的旧制度。在我们面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这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报告和大会决议都说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老的方法对待新的问题，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的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去年四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讲到一条敌我问题，一条是非问题。在那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到了去年上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

确定地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详细地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方法对待新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他认为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内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在斯大林的后期，人们说不得坏话，批评不得党，批评不得政府。斯大林实际上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把说坏话的，说闲话的当做敌人，所以就冤枉了许多人。斯大林在一九五二年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也说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还有矛盾的。并且解决得不好，矛盾也会转化成为对抗。虽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还是说得很少。我以为我们今天应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做出适当的结论，比较好。

比如说人民闹事这样的问题。这当然不会是普遍的，只是一些个别的，但是会经常有，因为官僚主义这个东西总会存在，我们要整风，要解决官僚主义问题。凡是出了官僚主义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民就可能闹事。闹出了事，我们怎么看？应该看成是普通的事情，不应大惊小怪。应该看到这是在特殊情况下调整社会秩序的方法，如果按照正确的方法，问题长期不得解决直到群众一闹才解决了，那么，群众为什么不闹呢？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提倡闹。不闹而解决问题，经过民主集中制、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的主张，实行这个主张，就需要反对官僚主义。如果有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者，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十分顽固，群众不可去提意见，而上级又没有及时发现、纠正，不把那个

领导撤掉，那么，那里的群众就会闹。在这样特殊情况下，闹一点事有什么要紧呢？无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们党内都有不同的观点，有右有“左”，在敌我矛盾的问题上，右的观点就是看不见敌人。现在不是说国内的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吗？有些人，就把基本解决看成完全解决，因此他们对那些人民痛恨的很坏的人，真正的特务，真正的坏人，也不去处理，这一种思想当然不对。夸大了也不对，夸大了是“左”的观点。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有些人却说还没有，说阶级矛盾很大。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人忽视了这个事实，以为太平无事。我们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跟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斗争的，后来又跟资产阶级作斗争，人民怎么会回过头来反对我们呢？过去没有设想过人民会有不满意，没有设想过群众会对我们游行、请愿、罢工、罢课，现在也还是不大相信。这是一种情绪。另外一种情绪，就是怕。出了一点乱子就是不得了，天下就要大乱，人民政府就要倒了，就算起了龙卷风，我们共产党会不会吹走呢？人民政府会不会吹走呢？马克思列宁主义会不会吹走呢？我们可以有信心地说，不会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怕。如果在客观上真有非闹不可的形势，让闹反而比压着不让闹好些。这样一种看法，同志们考虑考虑。是否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一个问题。

其次，我想谈一下知识分子问题。全国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教育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多一点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大约有百分之几。这两部分人合起来，据有的同志估计，大概有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七。在另一方面，也有少数跟我们有敌对情绪的人。他们并不是反革命分子，而且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跟我们还能合作，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怀疑的。这样一种人大概有百分之几。其余百分之七八十是中间状态的。他们了解一点马列主义，但是了解不多；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也容易动摇，至于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就还有困难。他们常说，“你们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党当作他们的党，像多数工人贫下中农那样。从他们跟工人农民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列主义的，他们到工厂里头、农村里头去看的时候，跟工人、农民不能打成一片。看是看了，但是有距离，互相不能成为朋友，不能谈知心话，也还是“你们他们”的关系。他们也在为人民服务，但是还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跟工人农民不是一条心，但也不是两条心，而只有半条心在人民方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他们。要在比如三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十一年）使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跟工人、农民结合方面，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进了党，或者成为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地来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似乎还是一个问题，这也是知识分子新的人生观还没有建立起来的一种表现。我们要向他们说明在我们国家里，除了工人、农民就没有别的人了。资本家要变工人，地主已变农民。除了这两种人，第三种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替工人农民服务的，他们的本身性质在变，要逐步地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们还能提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那些力量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丧失了社会基础。至于几亿小资产阶级分子也已经进入了集体化，现在还叫小资产阶级就不行，

他们已经变成集体农民，集体手工业者了。

当然他们的思想还拖了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特别是那些富裕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很严重。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思想。但是无论如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现在都只剩了一条尾巴，尾巴无论有多长，终究是要消灭的。因此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现在还流行着一种舆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这个话有没有理由？我们说有一半理由。在现在，党员工程师、教授、医生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确实很少，一般地说来，我们现在还确实不懂科学。我们的人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钱进大学，到外国去留学。还有，帝国主义、国民党也不让我们留在城市里研究科学。许多知识分子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搞政治可以，军事也行。其实，这也只是现在的话。在以前我们没有胜利的时间，在我们打游击战争的时候，他们可不这么说，他们那时认为我们什么都不行。总之是成不了气候。人民是要看事实的，因此在我们在科学上还没有占领领导地位的时候，要他们承认我们可以领导科学，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的道理也只有一半对，另一半他们就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显然不懂科学。但是我们还是在用国家计划领导着科学事业，用政治领导着科学事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中国的工业发展了，科学也发展了，这是不是事实呢？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如果不是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又

是在谁的领导下工作呢？而且科学也是跟政治、经济一样，是可以学习的。我们既然可以学会政治和军事，也可以学习科学。如果说我们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经过了二十八年才取得了胜利，那么学习科学达到一般专家的水平，就不必用这么长时间。进五年大学，再加十年工作，有十五年的工夫就差不多了。

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要在党内做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你监督我，我还用你监督吗？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放”，主张“收”。这些想法对不对呢？

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于发展科学事业，是一个基本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在目前的过渡时期对于团结教育知识分子，这个方针更有特殊的意义。这就是说，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的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对于说错了的怎么办？用压服的方法，还是用说服的方法？中央认为压服的方法不好。压服就是压而不服，不可能压服。人民内部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用说服的方法不应该采取压的方法，无产阶级实行的专政只适用敌对分子。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界限。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动不动就想“武力解决”，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坚决纠正的。

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说道理，是可以学会的。用了说服的方法人家还要闹怎么办？会不会搞的天下大乱？我说不会，只要我们坚持说理、充分说理，不会乱的。而且也不要尽是怕乱，出一些小乱子有好处，我们可以取得经验。对于那些有毒素的文章，或者别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要批判、要斗争，但是用不着怕。我们同那些有毒素的东西作斗争，会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同敌对思想作斗争而发展起来的。

我们要同敌对思想作斗争，我们自己的缺点首先要整顿。我们有很大的成绩，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也有许多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的。不应该肯定我们所做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最主要的，正确的东西。同时也绝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一部分错误和缺点。否定一切就是机会主义，肯定一切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也是形而上学，它肯定一切而不加分析。如果把我们的工作加以分析，就会知道，我们的工作中间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有缺点，所以，我们要进行整风。

关于整风，中央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准备这样做：今年准备，明年、后年实行。采用延安那时候的方法，从容不迫地用自我批评的精神来学习一次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作风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缺点，用适当的方法加以批评。批评是在小组内，不开大会，有多少毛病就是多少毛病。不要缩小也不要扩大，自己反省反省，同志们加以帮助。总之，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就是说，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这样的态度来进行整风，提高马克思主义

的思想水平。从延安整风以后，实际上有十几年没有进行全党范围的有系统的思想整风了。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我们自己来批评我们自己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丧失威信？我看不会丧失威信，会增加威信。延安那次整风就是证明。增加了党的威信，增加了同志们的威信，增加了老干部的威信，新干部也得到了教育。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害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挽救了自己。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在我们方面。我们把风整好了，我们在工作中就会更加主动，我们的东西就更多，我们的本事就更多。同时也就会更谦虚一些，原来不会说服人的就会慢慢地增加说服人的能力。党外人士，可以让他们自愿参加。我们先整，他们后整。如果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知识分子参加整风就很好了。

整风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的革命的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的热情有些不足。注意待遇，注意享受的人多起来了，要经过整风使这些同志重新振奋起来。经过这么长久革命斗争，有一点疲劳，需要一些休息，这是可以理解的。看一点戏，跳一点舞，穿一点花衣服，这并不需要反对。我们所反对的是追求地位，追求特权，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凡是可以节省，应该节省的都要节省。阶级斗争，几十年革命，都是为建设开辟道路。而要建设，就必须珍惜人力、物力。建设的时间长得多，这是另外一场战争，我们希望在不很久的时间之内，中国比现在要好，比现在要富，比现在要强。革命就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一仗就是为了这一仗，那个战

争就是为了这个战争。这个战争更艰苦，时间更长，比方说至少一万年。为了建设得更好更快，就必须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铺张浪费、追求特权、摆架子等一切坏习气。

跟党外的关系，应该比过去更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讲，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

我们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会不会妨碍党的领导？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里头有这样几句话：“但是对于这些缺点的批判，只能是为着巩固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领导。而决不能像敌人所企求的那样，造成无产阶级队伍的涣散和混乱。”我刚才讲的一些话，说是闹一点也可以，登一点错误的文章也可以。我们慢慢来批评教育，讲道理。这两种提法是不是互相冲突？文章上讲的原则性，我们现在说的是属于灵活性。要灵活地运用原则。不然，一个地方罢了工，我们就去嚷：“嗨，你破坏党的领导！”知识分子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责问他：“你要涣散无产阶级的队伍吗？你要破坏党的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吗？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吗？”到处拿这文章做挡箭牌。这行不行呢？这就不行。我们在原则上不提倡罢工罢课，不提倡错误的文章，不提倡有毒素的戏等等，但是事实上发生了一些个别的罢工罢课，报纸上登了一些个别错误的文章，戏台上演了一些个别不好的戏，对于这些现象采取放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没有大害，反倒有利；采取压的方针，反倒不利。这样的方针比较容易调整社会秩序，调整领导者跟被领导者，政府跟人民，党跟人民的关系。这种调整的结果，正是巩固了党，

巩固了民主集中制。

我们希望把我们国家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提，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这些人有错误缺点必须改，不改就不行，因为没有道理，无论党政府[1]都不实行官僚主义，不能强制人们做那些没有道理的事。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政治、经济，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地繁荣发展起来。

---

[1] 原文如此，疑有缺漏。

中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1]

（1957年3月、9月）

一

我还想同你们谈谈我国外交方面的某些政策问题。

台湾的情况现在有变化。美国现在想搞垮蒋介石。它正在扶植一派人，想用这派人来代替蒋介石。现在我们需要帮助蒋介石来反对美国。因为问题是：蒋介石好些呢，还是美国所扶植的更亲美的势力好些？台湾像目前这样作为美国的半占领地好些呢，还是台湾成为美国完全的占领地好些？

美国、英国这些国家要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它们想一方面承认我们，一方面又承认台湾。我们的方针是：承认我们就不能承认台湾。我们不怕它们不承认。美国愈晚承认愈好，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清理内部。它要是在我们这里有使馆，它就要在我们内部搞各种破坏活动。这是我们实际的政策。在对外方面，我们同美国也进行谈判，这是为了在外交上采取攻势。这个谈判已经搞了一年多，到目前之所以一直没有破裂，是因为双方都想把谈判破裂的责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二是毛泽东和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代表团及布拉格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任加在对方身上。只要它愿意谈下去，我们就陪它谈下去，谈几十年也可以，看样子有可能长期拖下去。

同英国，我们不同它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只同它建立半正式的外交关系，同它采取若即若离的方针。

关于参加国际组织问题，如奥林匹克委员会、联合国的附属机构等，有些兄弟国家不大了解我们，一片好心，总希望我们参加这些组织——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你们在内，认为我们太左。我们的看法是：如果这些组织内有国民党代表在，我们就不参加；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承认“两个中国”。我们说，我们可以依靠同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合作。我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同亚非国家也进行着合作，没有这些西方国家，我们一样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美国现在搞禁运，我们愿意它搞。它不禁运，我们就要同它搞贸易，就要同英国、法国、西德等等国家都搞贸易，但是由于经济落后，我们还拿不出东西同它们搞。当然我们的口号是反对禁运，它搞禁运我们就骂它，这也是外交攻势。到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后它解除禁运时，那我们就会有些东西同它搞贸易，到那时我们可以同它建立关系。

（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二

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所以这和杜勒斯的方针相同，他们怕我们去闹事，不同我们建交。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在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上的批注[1]

（1957年3月）

有一半对

一、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中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工作的人不少。他们还认为党的领导对科学的发展没有好处。“在美国没有人管科学，科学家很自由，所以有李政道、杨振宁那样的成就，在我们这里就做不到”，要求党“无为而治”。有的科学家想挑比较容易取得个人成就的工作做，不愿意切实地为国家需要服务。党应当怎样来领导科学工作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还存在着阻碍。一方面有些党员负责干部把最近一个时期科学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表现，都算在“百家争鸣”、“向科学进军”的帐上。（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许多思想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也是原因，例如“副博士”问题，闹了已将近一年，但有关部门还没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57年3月6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是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同志参考的，共编入了33个问题。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20个问题作了22条批注。

有认真研究过。在我们的国家条件下，学位制度到底应该怎样来设立，特别是社会科学方面，副博士必读书目和学位论文写法之类的流行，更助长了教条主义的风气）。另一方面，党外科学家中间的宗派主义也还没有彻底解决。

他们是有些理由的

三、不少科学家认为，如果工作条件没有很好解决，就拿不出什么科学成果，因此“百家争鸣”对他们的实惠不大。这个看法在社会科学〔家〕中有（特别是经济学家认为得不到调查统计资料，不能切实地做研究工作），而在自然科学家〔中〕更为显著一些。他们对“工作条件”的兴趣，比对“百家争鸣”的兴趣高。纸张供应紧张后，关心科学成果能不能发表的人就更多。现在我们没有一套发表和评定科学成果的健全的制度，对贯彻百家争鸣也是一个不小的阻碍。

应当弄清这种关系

四、人们常问：“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的指导思想”两者间的关系怎样。同时关于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不允许哪一些文章出来争鸣，有各不相同的议论。有人认为科学界已有定论的事情就不再允许争鸣。有人认为不是实事求是研究问题而是狂妄自大夸夸其谈的文章不应允许出来争鸣。有人认为讨论问题态度不好的文章不应允许争鸣。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百家争鸣”与“学风”问题。

戒律太多

五、哲学家提出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

遗产的继承性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文学界、法学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要不要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学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问题也已经提出。目前在社会科学中几个理论性最强的方面（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中怎样进行研究的问题也未解决。

目前不要去找主要危险，而应按具体问题处理

六、目前文艺界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仍然很严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又确实有些抬头。哪一方面是主要危险，在一些同志中间看法不一致。对这种状况，应该怎样估计？

七、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揭露和批评生活中的缺点，应当注意什么原则，如何掌握分寸？

不对。但可以允许少数人这样做

八、目前有些作家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写真实，因此，“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感受即真实”，至于作品对人民有什么教育作用，作家用不着考虑。对于文学的真实性与思想性的关系，应该怎样看？

九、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在文艺界看法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文学既然是反映现实，只要现实主义就够了，现实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当然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些人认为作家反映现实离不开他的立场观点，具有社会主义

思想的作家，他的现实主义就不同于过去的现实主义，因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的现实主义是有性质上的区别的，它不应该被否定。对这个问题，应该怎样看？

同上

十、应该如何正确地进行文艺批评工作？

十一、报刊上是否允许发表和党不同的主张？就是说党的政策和党、政府的工作方针能否在报刊上“争鸣”？

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去年八月，在中央批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方案中，有这样的指示：“除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特别自从“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在这个问题上的了解不同，并且有些误解，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有些地方的党委对和党的政策不相同的意见主张少发表或不发表，要有掌握。而报刊方面受到读者、作者的冲击力很大，主张多发表一些。

有些报刊发表了关于讨论某些国家工作的文章，还发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有的报纸发表了关于“劳卫制”问题的文章，讨论“劳卫制”在中国适合不适合，很多学生受了讨论的影响，就不愿参加“劳卫制”了，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就不赞成在报刊上进行这种讨论。诸如此类问题

很多。

同前

十二、同上述问题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中央政府各部有些措施不当，在没有经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商妥以前，地方报纸能否批评？

同前

十三、有人说：“报纸是宣传工具，但它也是商品”，“不把它当作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这种言论引起了报界的注意。在讨论中，有些人否认报纸是党教育人民的工具，否认党的领导。例如，有的编辑说：“报纸应有权力，不应跟在党委屁股后面走”；“心目中一有领导，版面就编不好，心目中有了读者，报纸就编得好。”还有人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说：“在野报”、“民间报”可以“大胆敢言，切中时弊，讲人民要讲的话。”不少党内办报的人也提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应该如何统一？如何理解？

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

十四、有人指出党校是有特殊性的，即学员都是党员，因此，这里的“争鸣”，只能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有人说，“党校中不能给唯心主义设‘讲坛’”。有人说，党校已经有一个方针了（即“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增强党性”），怎么又来一个“百家争鸣”，究竟是一条方针，还是两条方针？有人说，“百家争鸣”的精神就是“理论与实际

联系”，所以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包括在党校的原有方针中了，在党校中何必另外强调百家争鸣？

十五、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学习经典著作有无矛盾呢？有人说提倡百家争鸣和独立思考，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妨碍的，因为这样一来，大家不先去接受经典著作的内容，而是首先去怀疑经典著作了。有人说，“经典著作是不许怀疑的”。

不许怀疑吗？

为什么不允争论呢？

十六、党的政策是否允许怀疑？对党的政策的怀疑的意见是否允许争论？有人说，根据党章规定，党员对党的政策是可以在党的会议和刊物上讨论的，怀疑的意见也可以提出争论，有人说，党员争论党的政策只限于对政策的不同的理解和执行方法问题，如果有反对或者怀疑党的政策的意见，是不允许争论的。

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十七、党员在理论上怀疑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是否允许？如果根本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可否留在党内？（例如有人入党后仍然相信凯因斯学说，如何办？）

就是允许批评、争论

十八、如何克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中的教条主义？

应当改变

目前许多理论课程教员，埋头准备讲稿，照念讲稿，不关心国内外大事，不学习党的重要文

献，不研究现状。

十九、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独立思考”“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等口号提出后，高等学校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干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放弃领导，对群众的错误思想行为不进行教育批评，以致产生若干混乱现象；一种是在党的这一重大的方针政策面前，迟疑观望，甚至有抵触情绪，对各方面的工作不敢放手，群众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的积极性未能很好地发挥。因此，在教育方面如何正确执行这一方面的方针政策，仍旧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两者都不对

二十、针对少数中等专业学校和个别高等学校中发生过的罢课、请愿事件的情况，今后应该如何对广大青年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廿一、党章规定，学校党组织具有领导和监督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职能以后，党内党外都有一些人认为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对科学和教学都没有什么研究，领导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困难较多，部分党委书记和党员校（院）长对此也缺乏信心。这个问题应该如何从思想认识上和具体作法上求得解决?

此点值得重新研究

廿二、自从提出“向科学进军”以后，高等学校教师偏重于搞科学研究工作，不愿多作教学工作，从而发生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如何适当安排的问题；同时，党的干部和政治工作干

都是不对的

部多希望作科学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不安心政治工作，忽视政治思想工作的倾向相当严重。

都是不对的

廿三、过去学校对于学生管理得死死的。自提出百家争鸣方针和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以来（还有外国的影响），已开始表现出另外一个偏向，学生强调自由、民主、个人专长的发展，不遵守学校纪律，对教师不礼貌，缺乏艰苦耐劳的思想；而在学校和教师方面，则变得束手束脚，不敢管理和教育学生。

前者是错误的，后者应当改革

廿四、有些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学校当局不重视学校的政治思想领导，有单纯搞业务的现象。还有学校课程多，教材分量一般较重，因此，形成学生的负担重（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有人说主要原因不在这里，而在别的方面。

廿五、提出讨论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学方针以来，许多人积极参加讨论，截止目前，仍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全面发展是完整的方针，不需要加因材施教；一种认为需要加因材施教。目前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前一种意见，多属教育领导部门和某些教育机关人员的意见，后一种主要是下级教育领导部门和学校干部的意见。在这个方针的讨论中，也表现出，一种人对过去教育上的成绩肯定的太多了一些，只承认有很小的缺点；另一种则似乎对教育成绩又否定得多了一些，而对缺点则看得多了一些。

廿六、前一时期卫生部把中医政策概括为“先系统学习，全面接受，然后加以整理提高”十七个字下达，在医学界中引起了一些误解，有人觉得贯彻中医政策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矛盾，也有些西医在学习中医问题上不服气。另一方面，在中医工作的领导思想上，也存在着拒绝一切不同意见的毛病。

廿七、卫生系统应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卫生行政部门怎样抓政治思想问题，各级党委怎样加强对卫生工作的领导？医院党组织的任务是否应该与学校、企业、工厂相同（即实现党的领导与监督）？

廿八、目前，对农村矛盾的分析有些混乱。有的说：“当前主要矛盾是新、旧思想矛盾”；有的认为是“经营管理的矛盾”；有的说：“主要是富裕中农斗争”；有的则认为“资本主义思想已是残余的了”或“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残余的了”。应该怎样才全面？

是一个东西

廿九、目前，在党内思想斗争中，对资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含义，区别得不清楚，有时叫这样，有时又叫那样，怎样划分这个界限？

卅、目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几类，什么是当前主要矛盾？

卅一、目前主要应反对哪几种官僚主义？目

前有些地方群众反对官僚主义划不清界限，如认为领导上不能满足他的要求，即是官僚主义。

卅二、过去各业务部门下达任务时，只规定生产任务、指标、上缴利润等，今后是否可以规定政治任务？如何解决业务挤掉政治的矛盾？各业务部门如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业务部门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如何协调？

卅三、目前在文教单位做党委工作的干部能力弱，水平低。另据有的省委负责同志反映，前有人强调校长制，对党委制有抵触。在文教系统中如何健全党委制？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

（1957年4月3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伊斯特万·道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亚诺什·卡达尔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伊姆雷·霍瓦特同志：

当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十二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方面作了重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成就。不久以前，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伟大的苏联真诚无私的援助之下，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和匈牙利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匈牙利人民的这一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团结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民主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我们相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挠英勇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的决心。最近中匈和苏匈之间的会谈和取得的协议，进一步加强了中、

苏、匈三国的团结和合作。我们谨祝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祝中匈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日

欢迎和感谢波兰政府代表团访华的讲话[1]

（1957年4月8日、9日）

一

毛泽东主席在宴会上致词，对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毛主席说，波兰是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的国家，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中波两国之间的友谊一天天在增进。祝波兰一切都好，祝社会主义国家日益团结，祝中波两国的友谊日益发展。

毛主席举杯祝代表团的全体同志身体健康，祝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身体健康，祝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身体健康。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7年4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欢迎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的新闻稿的一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1957年4月9日在西伦凯维兹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二

同志们、朋友们：

我们感谢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所率领的波兰政府代表团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波兰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我们请波兰政府代表团把中国人民同样的友谊和最良好的祝愿带回给波兰人民。

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祝苏联、波兰、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加巩固地团结在一起。

祝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同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更好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努力。

我请大家同我一起，

为波兰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同志和他的夫人，为波兰政府代表团其他同志们的健康，

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同志的健康，

为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同志的健康，

干杯！

对整风运动决定草案的批语和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稿

（1957年4月）

一

彭真[1]同志：

此件[2]请商周[3]在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发出。

毛泽东

四月九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4月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一次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1957年进行准备工作，并在适当范围内试行，1958年全面开展，大约在二至三年时间内完成。这个决定（草案）原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准备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后下发。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在文内作了一些修改，并起草了中央关于试行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后来，决定（草案）和通知都没有下发。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始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

[3] 周，指周恩来。

此件以早发出为有利。

二

各级党委和党组：

现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发给你『你』们，请即试行，取得经验，报告我们，以便修改，在中央全会通过，然行〈后〉正式施行。你们试行的时候，必须作出部署，并且根据地方特点发出省市一级的指示。然后在试行中密切注意随时纠正运动中发生的缺点。文件以能阅读者为限，不能阅读者以讲演代之。农村整风，由省市级另定办法。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1]日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通知时写的一个待定的日期的符号，原准备按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通知的时间填写，后来这个通知没有下发。

关于请胡乔木[1]阅读《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一文的批语

（1957年4月）

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2]。

毛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文章说，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大变动的时期。第一，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发展，我国的社会制度起了根本的变化。第二，经济制度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反映到广大人民的思想意识中。第三，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其他工作不能停留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它们应当而且也必然会有高度的发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里，时代带给我们巨大的历史任务。在经济建设战线上，我们要把人民的经济事业组织好、管理好，这就要求我们学会经营管理社会主义的企业，也要求我们学会逐步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在思想建设战线上，人民的思想状况应当符合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能推动经济事业的发展。

给张维[1]暨夫人的信

（1957年4月15日）

张维同志暨张夫人：

来信收到，深为系念。病情虽重，可能痊愈。尚望安心休养，争取好转。家属诸同志努力上进各节，自当遵嘱帮助，以尽故人应尽之责。请张夫人随时以情况见告。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于北京

---

[1] 张维，早年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1]

（1957年4月、5月）

一

敬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同志：

你这次来我国访问，是中国人民的光荣，是我们两国日益发展的友好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你和随同你前来访问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兄弟的敬意。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道路，为整个人类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榜样。中国人民正在苏联人民的鼓舞和支持下，沿着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努力前进。

中苏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兄弟友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7年4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的欢迎词；本篇二是毛泽东1957年4月17日在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国宴上的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1957年5月3日在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为伏罗希洛夫访华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本篇四是毛泽东1957年5月26日在伏罗希洛夫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的欢送词。此外，据新华社1957年4月16日报道，伏罗希洛夫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欢迎酒会上见到卫立煌，周恩来作了介绍，并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中，苏联人民给予了我们最大的同情和支持，请允许我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主席同志，你是伟大苏联人民的代表，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我们深信，你的访问一定会进一步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并且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

中苏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岁！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二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同志，
亲爱的苏联同志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

欢迎。

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四十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了辉煌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进步事业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的身上看见自己解放和建设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作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的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战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地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八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

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

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日益发展，

为世界的和平，

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

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三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亲爱的大使同志，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当伏罗希洛夫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友好访问以后，我们又同他们欢聚在一起，感到特别亲切和愉快。

伏罗希洛夫主席以巨大的热情和不倦的精力，在将近二十天的时间内，访问了我国许多地方，同我国广大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各界人士作了亲切的会见，把苏联人民的兄弟感情转达给千百万的中国人民。这一切，对中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且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这些日子里，全世界再一次看到中苏两国人民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和亲密无间的深厚友谊。这种团结和友谊，不仅是我们两国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有利因素，而且也是社会主义各国团结的重要部分，也是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可靠保证。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一样，将继续尽一切力量，为不断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的团结友好和合作关系而努力。

伏罗希洛夫主席不久就要结束他在中国的友好访问了。我愿意借此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并且衷心地请他把中国人民最诚挚的友情带给全体苏联人民。

让我们举杯：

为我们伟大的盟邦苏联的日益繁荣和富强，

为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为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

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

为世界和平，

为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四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同志：

同志们、朋友们：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我国各地进行了二十多天亲切友好的访问以后，继续前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的访问。现在他们就要离开我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我们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来欢

送他们。

伏罗希洛夫同志在中国的访问给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历史写下了新的、灿烂的一页。他带来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友情，他同中国广大人民的热情会见，再一次生动地体现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间久已存在的深厚友谊。我们希望伏罗希洛夫同志把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最诚挚的友好愿望带给全体苏联人民。

伏罗希洛夫同志！当你即将离开我们的时候，请允许我再一次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你，并且通过你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最大的感谢。我们虽然暂时分别了，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心将永远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亲爱的主席同志！我祝你身体健康，一路平安，并且在增进苏联人民的繁荣幸福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伟大团结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首都机场迎接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

1957年4月15日，毛泽东等在机场迎接伏罗希洛夫。

1957年4月15日，伏罗希洛夫在毛泽东陪同下，乘敞篷车从机场到宾馆，沿途受到北京市民热烈欢迎。

1957年4月17日，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在欢迎酒会上。

1957年4月17日，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在欢迎酒会上。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7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1

（1957年4月19日）

给袁水拍的信……3

（1957年4月20日）

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5

（1957年4月21日）

给达赖喇嘛的复电和对复电稿的批语……9

（1957年4月22日）

接受瑞士大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1

（1957年4月22日）

对中央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的修改和说明……12

（1957年4月23日）

接受保加利亚大使涅加尔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4

（1957年4月25日）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16

（1957年4月26日）

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7

（1957年4月26日）

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18

（1957年4月27日）

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的批语 ……………………21
（1957年4月27日）
对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22
（1957年4月28日）
关于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和按语 …………24
（1957年4月30日）
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 …………………………………………26
（1957年4月）
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36
（1957年5月4日）
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 …………………………………39
（1957年5月5日）
对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稿的批语 ………44
（1957年5月7日、11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46
（1957年5月8日）
给李淑一的信 ………………………………………………………47
（1957年5月11日）
蝶恋花·答李淑一……………………………………………………49
（1957年5月11日）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 ……………………………………51
（1957年5月14日）
事情正在起变化 ……………………………………………………52
（1957年5月15日）
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60
（1957年5月16日）

接受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呈递国书时的答词……………62

（1957年5月17日）

接受蒙古大使苏诺姆·鲁布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64

（1957年5月17日）

给达姆巴的信 ……………………………………………………………65

（1957年5月20日）

关于制止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行为的批语 …………………………67

（1957年5月24日）

在接见共青团三大全体代表时的讲话 ………………………………68

（1957年5月25日）

对转载《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文的批语 ……………………79

（1957年5月30日）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81

（1957年6月6日）

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 ………83

（1957年6月6日）

关于转载《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一文的批语 ………………84

（1957年6月7日）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86

（1957年6月8日）

在陈正人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信上的批语 ……………………………………………………………………90

（1957年6月8日）

给孙燕的信 ……………………………………………………………91

（1957年6月8日）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93
（1957年6月10日）
关于了解清华大学动态给蒋南翔、陈舜瑶的信 ……………………96
（1957年6月11日）
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批语 ……………………………………97
（1957年6月13日）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99
（1957年6月14日）
复达赖喇嘛电……………………………………………………………102
（1957年6月14日）
复班禅额尔德尼电………………………………………………………103
（1957年6月14日）
关于发表赵一明发言的批语……………………………………………104
（1957年6月16日）
关于了解北师大情况给何锡麟的信……………………………………105
（1957年6月18日）
对改进兵役工作指示稿的批语…………………………………………106
（1957年6月20日）
接受朝鲜大使李永镐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07
（1957年6月21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108
（1957年6月）
关于接待许志行给韶山乡的信…………………………………………110
（1957年6月22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问题的批语…………………………………111
（1957年6月25日）

对美国《新共和》杂志一篇文章的批语……112
（1957年6月26日）
关于印发《整风专辑》的批语……113
（1957年6月27日）
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14
（1957年6月27日）
关于转载和播发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的批语……115
（1957年6月28日）
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116
（1957年6月29日）
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117
（1957年6月）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24
（1957年7月1日）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129
（1957年7月7日）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30
（1957年7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电报……132
（1957年7月9日）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34
（1957年7月9日）
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150
（1957年7月18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56
（1957年7月20日）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58
（1957年7月）
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168
（1957年7月31日、8月1日）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170
（1957年8月1日）
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172
（1957年8月1日）
给林克的信……………………………………………………………174
（1957年8月4日）
给刘松林的信…………………………………………………………175
（1957年8月4日）
给刘松林的信…………………………………………………………176
（1957年8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177
（1957年8月13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二周年的电报………………………………179
（1957年8月15日）
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　…………180
（1957年8月18日）
给达赖喇嘛的信………………………………………………………182
（1957年8月18日）
关于同意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的批语…184
（1957年8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85
（1957年8月21日）

祝贺马来亚独立的电报……187

（1957年8月30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188

（1957年8月31日）

对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的批语……190

（1957年9月）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96

（1957年9月8日）

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98

（1957年9月12日）

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00

（1957年9月15日）

为查找《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写的批语……202

（1957年9月15日）

给陈云的信……203

（1957年9月16日）

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204

（1957年9月17日）

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205

（1957年9月19日）

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07

（1957年9月20日）

关于转载上海工商界批评高方的报道的批语……208

（1957年9月25日）

关于印发《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的批语……………………………………209
（1957年9月30日）
七绝·观潮　……………………………………………………………………210
（1957年9月）
国庆之夜会见各国贵宾时的谈话………………………………………………211
（1957年10月1日）
给林克的信……………………………………………………………………214
（1957年10月2日）
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216
（1957年10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的电报……………………………218
（1957年10月6日）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220
（1957年10月9日）
做革命的促进派………………………………………………………………225
（1957年10月9日）
对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的批语…………………………239
（1957年10月9日）
祝贺威廉·皮克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242
（1957年10月9日）
对探讨辩证逻辑对象问题的一篇文章的批语　…………………………………243
（1957年10月11日）
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245
（1957年10月12日）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249
（1957年10月13日）

致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电……………………………………………………264
（1957年10月17日）
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命令…………………265
（1957年10月22日）
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266
（1957年10月26日）
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269
（1957年11月2日）
关于公布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的命令…279
（1957年11月6日）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280
（1957年11月6日）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289
（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
公布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的命令……………………………………………………………………………311
（1957年11月14日）
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312
（1957年11月16日）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318
（1957年11月17日）
为感谢苏联人民的情谊给《真理报》的信………………………………328
（1957年11月20日）
给苏联领导人的感谢电………………………………………………………329
（1957年11月21日）

祝贺诺沃提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电报……………330
（1957年11月21日）
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331
（1957年11月24日）
给张明霞的信……………332
（1957年11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和解放纪念日的电报……………333
（1957年11月26日）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335
（1957年11月27日）
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慰问电……………337
（1957年12月4日）
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338
（1957年12月）
祝贺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召开的电报……………344
（1957年12月12日）
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345
（1957年12月14日）
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给叶子龙的信……………349
（1957年12月17日）
给周世钊的信……………352
（1957年12月17日）
给李淑一的信……………353
（1957年12月17日）
给孙燕的信……………354
（1957年12月17日）

空军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356
（1957年12月18日）
为空军题词……357
（1957年12月18日）
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的电报……359
（1957年12月26日）
对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的批语……361
（1957年12月31日）
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362
（1957年）
对《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新闻稿的批语……365
（1958年1月2日）
祝贺缅甸独立十周年的电报……366
（1958年1月2日）
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367
（1958年1月3日）
对《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的批语……370
（1958年1月3日）
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的批语……372
（1958年1月3日）
在杭州会议上谈两类矛盾问题的讲话提纲……373
（1958年1月）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374
（1958年1月3日）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378
（1958年1月4日）

对《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的批语……………………………397
（1958年1月9日）
关于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398
（1958年1月）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400
（1958年1月）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403
（1958年1月11日）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406
（1958年1月12日）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412
（1958年1月12日）
祝贺毛雷尔当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414
（1958年1月12日）
《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415
（1958年1月15日）
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418
（1958年1月19日）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422
（1958年1月21日）
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434
（1958年1月）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438
（1958年1月24日）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441
（1958年1月24日）

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442
（1958年1月28日）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445
（1958年1月28日）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458
（1958年1月28日、30日）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464
（1958年1月31日）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465
（1958年1月）
在黄炎培关于提倡平地深葬的来信上的批语……484
（1958年1月）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批语……485
（1958年2月3日）
对化工部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发展报告的批语……488
（1958年2月3日）
对杨勇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报告的批语……489
（1958年2月3日）
给李讷的信……490
（1958年2月3日）
对河北省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492
（1958年2月4日）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传达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报告的批语…493
（1958年2月7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95
（1958年2月7日）

对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497
（1958年2月8日）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499
（1958年2月8日）
关于古代官吏是否禁带眷属问题给刘少奇的信…………………………503
（1958年2月10日）
给陈玉英的信…………………………………………………………505
（1958年2月11日）
给杨开智的信…………………………………………………………507
（1958年2月11日）

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

（1957年4月19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作

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十五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九日

给袁水拍[1]的信

（1957年4月20日）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2]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3]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4]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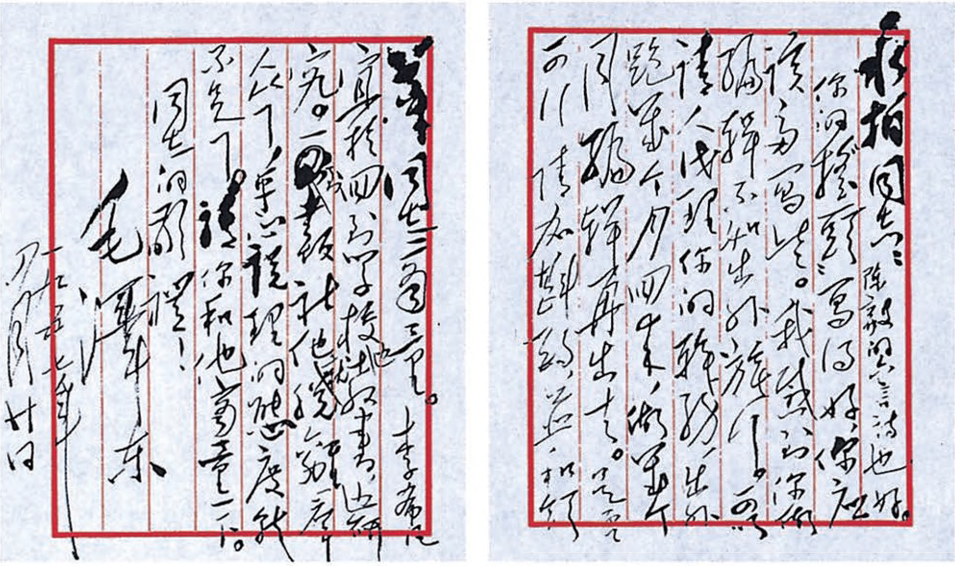
---

[1] 袁水拍，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

[2] 《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载于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3] 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载于1957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4] 李希凡，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1955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任编辑。



毛泽东致袁水拍信的手稿。

1957 年 4 月，毛泽东接见解放军通讯兵首届技术竞赛大会代表。

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1]

（1957年4月21日）

一

赞成你的意见。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但迟一点解决也没有什么。要尽量努力，但也要准备迟一点。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日本的问题也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的台湾也是美国的问题。美国这个问题是要在世界范围内解决的。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要取消军事基地，需要各个方面的朋友，需要和各个方面的合作，但是日本有很大的力量，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有可能首先争取到完全独立。世界有十个工业化的大国，日本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还算不上，印度也算不上，因为我们还没有工业化。你们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中国的力量是会增长的，现在还不行，但是有希望。中国的力量增长，对你们有利。现在的情况是，做生意也没有多少好做，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七年、八年、十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二

苏联建议在缔结原子弹的停止使用、减少生产和互相进行监督的协定之前，首先停止试验。英国要试验，可以在英国本国试验，不要拿到东方来试验，所以中国的和平团体可以支持你们的国民运动。太平洋是东方人的，英国的行动妨碍了我们，所以可以向英国有所表示。亚洲国家都怕原子弹，和你们是一样的。

还存在着美国的问题。所以即使日美安全条约废除了，日本完全独立自主了，日本、苏联、中国以及亚洲各国都有了和平条约，问题也还不能解决。我们可以劝美国，但美国不一定听。世界上还有美国，这是客观存在的力量。我看你们的路线完全正确，是亚非国家友好的路线，不是和西方国家建立同盟。历史上你们和西方建立过同盟，如和英国。日英同盟还是平等的同盟，现在却和美国建立了不平等的同盟。现在唯一的道路就是不和美国合作，而和亚洲国家和平友好。但是美国有原子弹，它要打仗你怎么办？所以防御还是需要的，你们也需要。其他国家都听话，就是美国不听话，你怎么办？美国有两条路，一是听话，这很好；一是不听。全世界能团结起来，使美国听话最好。苏联已提出停止核试验，问题是美国不停怎么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美国力量强大了，就是美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对立。现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仅在你们一个国家有，在我们的台湾也有，欧洲、非洲、亚洲都有。美国到哪个地方都建立军事基地，这是很显著的。当然美国也搞原子弹、氢弹，将来中国也搞，日本也搞，印度也搞，但美国不怕我们，它比我们快，数量比我们多。当然，谁也没有原子弹是上策，他们有、

我们也有是中策，只有它一个国家有是下策。美国既然有了，苏联也有，就使得仗打不起来。假如只有它一个国家有，它就可以拿来吓唬人家，它向哪个国一显示，哪个国就得跟它走。我们看看美国的做法：在南美、中美有泛美公约；为了反对日本，美国和澳洲、新西兰搞三角同盟；为对付中苏，和日本搞了一个日美安全条约；它又在东南亚搞东南亚条约，在中东搞巴格达条约；在非洲它想搞垮纳赛尔[1]，在欧洲搞北大西洋公约。美国有几十只手，几百只手，控制了很多地方，南朝鲜有它的军事基地，台湾它也控制。

三

还有一点我想谈谈，就是关于人民力量的问题。人民力量一定要胜过反人民力量。比如社会党有什么力量呢？就是靠人民嘛。你们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执政，从钱上说你们也没有大银行。我们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呢？为什么能和有外国援助的军队打仗呢？就是因为有人民。我们在延安时，只有几根破枪，国民党有四百多万军队，又有美国援助，但是我们打胜了。再以印度为例，英国很强，又有资本，但也撤走了。这就是人民运动的力量，尼赫鲁[2]就是靠人民力量把英国赶走了，英国没办法，只好走。这就可以得出个结论：美国钢铁多，有原子弹、氢弹，但只要世界人民团结，就可以战胜美国。美国，在政治上不得人心，人民不赞成美国。

---

[1] 纳赛尔，当时任埃及共和国总统。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1957年4月21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时和团长浅沼稻次郎交谈。

给达赖喇嘛[1]的复电和对复电稿的批语

（1957年4月22日）

一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四月一日从拉萨拍给我们的电报收到了，谢谢你的问候。

你同班禅额尔德尼[2]出国参加释迦牟尼[3]涅槃两千五百周年纪念和访问印度，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作了重要贡献，并且给各方面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这次长途旅行，请你对身体多多保重。祝你在加强祖国各民族团结和西藏内部团结的工作中作出新的成就。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 释迦牟尼，古印度释迦族人，佛教创始人。

二

分复为好。退徐冰办理。[1]

毛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的请示信上写的批语。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曾分别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发来电报。徐冰在报送统战部代拟的给达赖喇嘛的复电时，曾建议用毛、刘、周、朱4个人的名义合发一份复电。

接受瑞士大使贝努义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4月22日）

大使先生：

我很高兴地接受阁下所递交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的国书，并对您所转达的瑞士联邦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和我个人的祝贺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一直对瑞士人民怀着友好的感情。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瑞士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永久中立国家在维护和平方面所作的贡献。

值得欣慰的是，从1950年中、瑞建交以来，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已有了发展。我国驻贵国公使馆已于去年年初升格为大使馆。在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方面，诚如大使先生所说，也有了加强。大使先生，这些成就无疑同您在担任联邦驻我国公使期间所做努力是分不开的。现在贵国政府已将驻我国的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我相信这将使中、瑞间已存在的友好关系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瑞士联邦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加强中、瑞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定将获得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协助。

我预祝阁下在工作中继续获得成功，并祝贵国人民幸福和元首健康。

对中央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的修改和说明[1]

（1957年4月23日）

一

关于全面检查肃反工作问题，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毛泽东同志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的意图，就已经提出全面检查的要求。

二

彭真、小平[2]再阅，尚昆[3]办。

必须把**目的**提出，因此加了几句话。

毛泽东

四月廿三日

---

[1]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1957年4月22日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中央转发的文件有：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准备迎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通知》；3.《公安部党组关于通知各地公安机关准备迎接全面检查肃反工作的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在检查工作中，应注意：（一）这次全面检查，主要是对有疑问的案件和是否依法办事的问题进行典型和重点检查，而不是对过去所有的案件一一复查。（二）全面检查的对象是犯人尚在关押、劳改、被管制中的案件，检查的重点是冤案和错案。由于形势的变化，党和国家采取了比过去更为宽大的政策，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绝不能用现在的量刑尺度衡量过去已经判决的案件，甚至改判过去的案件。（三）检查肃反工作一般应该由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司法机关进行，同时必须吸收被检查单位参加肃反斗争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但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单独地同被斗争的对象和别人谈话，或任何人要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单独谈话，均不得阻挠。（四）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既要检查好的典型，又要检查坏的和中等的典型，要介绍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也要介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对以往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要批评，对违法乱纪行为应作适当的处理，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五）领导肃反运动的十人小组，是领导群众进行肃清反革命运动的组织，任务是领导群众清查、检举反革命分子。它不是司法机关，不担负对犯人的逮捕、起诉、审判工作。批语还要求各级党委应当重视这次检查工作，切实领导和督促十人小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有关部门共同做好这一工作。各地对检查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应该随时报告中央，并于检查结束后，向中央做总结报告。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修改中央批语稿所作的说明。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接受保加利亚大使涅加尔科夫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4月25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您所递交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任命您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您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保加利亚人民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和自由并且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人民，保加利亚人民是经过长期的反对外国压迫的英勇斗争而获得解放的。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十二年中，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将保加利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和合作化农业的工业——农业国。保加利亚在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般的保加利亚人民的这些成就和贡献深为钦佩，并且感到欢欣鼓舞。

近年来，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我深信，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道路上，这种友谊和合作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加强。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您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您为巩固和加强中保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您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关于《人民日报》等报纸的理论水平的批语[1]

（1957年4月26日）

乔木[2]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泽东

四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7年4月24日《大公报》的报头上。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4月26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平恢复两年多以来，越南人民又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越南人民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定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诚如大使同志所说，很久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就在兄弟般的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中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和发展。我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亚洲和世界和平。

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1957年4月27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中，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1]，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2]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那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

---

[1] 指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0日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这个指示在同年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

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1]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四月十九日电报[2]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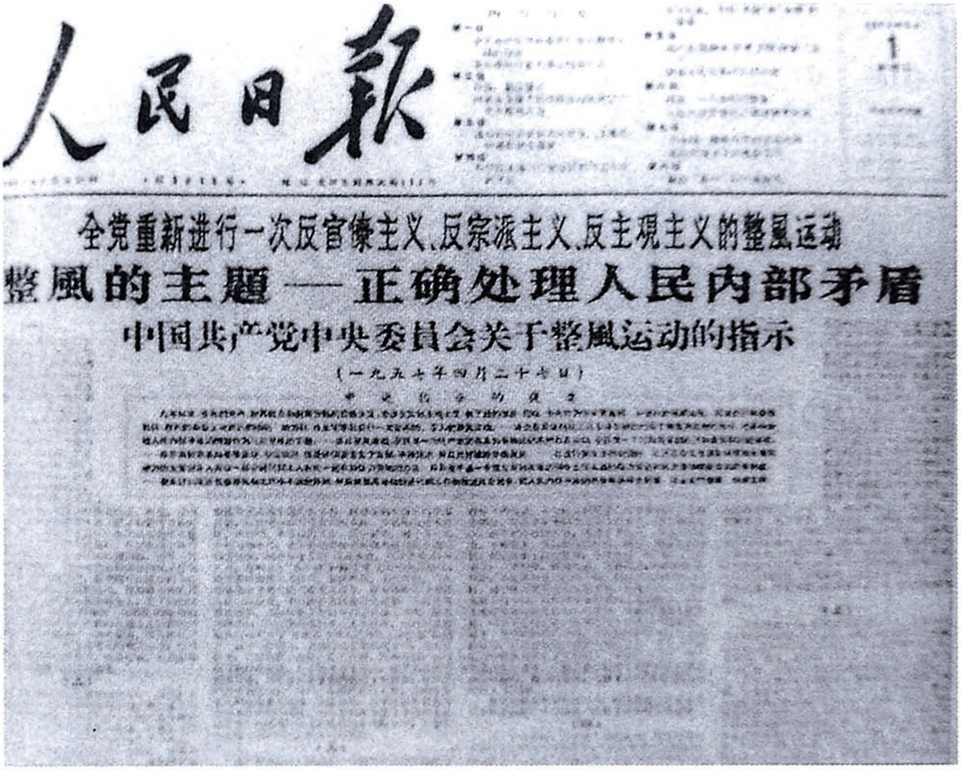
中央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

[1] 指新华社1957年4月23日发的关于湖北省农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道。报道说，目前农村中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主要是：一、农业合作社内领导不民主、财务不公开、分配不合理，引起群众不满。二、一些干部对民间的迷信活动和宗教问题处理不当，引起农民闹事。三、在占用渔场、畜牧场、林场、茶场、小矿山及耕田等问题上，国家与当地群众发生利益纠纷。四、地方干部与转业军人相处不好，发生纠纷。五、城镇中学政治空气薄弱、校风校纪不正，引起广大师生和学生家长对政府和学校领导严重不满。有些学校领导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严重，引起学生闹事。六、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加深了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

[2] 指中共中央1957年4月19日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及《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一文。



人民日報

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觀主义的整風运动

整風的主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关于整風运动的指示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重新开展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图为《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

关于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实习生问题的批语[1]

（1957年4月27日）

陈云[2]同志：

这个问题，请你与有关人员研究一下，严格控制，统一解决，并指〔定〕一个机关统一管理。以后应当少派，派去的要精。已去而品格恶劣或程度太低的，可否考虑调回。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1957年4月18日关于我国驻苏人员的一些思想问题和留学生、实习生派遣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上。报告说，目前，我驻苏人员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健康的，工作、学习也是积极的。但自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后，在相当一部分人员（主要是留学生）中，产生了一些偏激情绪。有不少学生失去了在苏联学习的信心，要求回国学习和实习的学生增多。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4月28日）

一

即送刘、朱、陈、乔木[2]阅，尚昆[3]于**今日下午**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

毛

四月廿八日一时

---

[1] 本篇二、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发表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

二

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须同时改造自己。

三

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

关于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批语和按语[1]

（1957年4月30日）

一

送乔木[2]同志：

此篇[3]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四月卅日

二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

---

[1] 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载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的文章代《人民日报》写的编者按。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指李汝祺发表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1]，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

[1] 毛泽东替李汝祺的文章重拟的题目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将原题《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作为副题。经毛泽东推荐，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上海局杭州会上的讲话

（1957 年 4 月）

一、最高国务会议、宣传会议以后，知识分子情况：紧张空气比较缓和，党外知识分子初步和我们接近起来，犹豫情绪比较开朗，报告不是万灵药，还要用各人的药，要的东西不给他们，就处于被动，给了以后，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我们的办法是先整自己，把党整好，整得谦虚一些，讲道理。现在的问题就不是我们的问题。知识分子左派向我们要民主，学生向教授要民主，那时就要求救于我们。我们一放，他们自己就鸣起来，我们一紧，就向我们要。

民主党派，上海去年发展一万一千多，他们内部的问题就多起来。只有无产阶级不怕政变，错了，就改。他们中间问题就多起来了。

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谁让我们有教条主义，攻掉就好，攻得过火，“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我们想一想。陈毅同志三反时说：我们专政专了这么多年，让人骂一个星期也可以。问题是你倾盆大雨那样向我们倒来，我们也会大吃一惊。有些知识分子还怕放长线钓大鱼。有人说，对。共产党威信高，报上只要一二句话，风吹草动，就有人怕。党外怕，党内也怕。事情对，也要谦虚三分。压力

大，自己要懂。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我们现在让人批评，以后再去分析。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一定要看，可能看二十年。党内也看，例如治病救人，有人不相信，直到后来看了事实，才相信。要经过许多考验，共产党的政治要受考验，领导者要受被领导者的考验。过去知识分子为旧统治者服务，现在生产关系改变，没有社会基础了。知识分子过去是寄托在封建、资本主义、个体生产制。知识分子出身哪个阶级，为哪个阶级服务。出身的阶级现在已破坏，吊在半空中，脚不踏实地。他们现在爬在我们的身上。工农通过共产党让他们做事，帮他们吃饭。我们还要用十几年洗脑筋，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他们想不要批评，说不出口来。现在有一千多万人悬在半空中，他们的脑筋是旧的，没有什么可怕。吊在半空中，很需要我们伸出手去接一把，如果我们热情地伸出手去，可以快一些。大部分过来，就不那么简单了。最欢迎变化的是无产阶级。农民最希望蒋介石、美帝、地主起变化，但不希望小私有制起变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看到文化革命来得太突然太急，也可能变。毛脱了皮，但魂还在旧的皮上，毛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他们常常魂魄不安。不变不会不安，不安是变的表现。有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长期不可能改变……考验作家的世界观，就是要考验他们能否与工农打成一片，还是两片，下乡能不能和农民说真话。党内的官僚主义者世界观也成问题，脱离群众。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又与群众格格不入，那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上有一批人，唯恐天下不乱，有反共思想，主张打出去。改造要几十年，有些人到死不改，大部分可改。有那么一部分老顽固，到死不改。

二、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没有讲通，或没有说服。这是有领

导的反官僚主义。凡是不让放，毫无准备，结果大放。我们主张放，最大乱处无非是乱一阵。为人民办事，人民还是不满意，有人想不通，苦恼得很。总有人不满意，有满意有不满意。比过去他满意，比将来或比现在好的那些人他又不满意。这种情况一年以后也还有。如果都满意了，我们只要去睡觉好了。现在还没有放，怎么知道就要乱呢？过去阶级斗争，警惕性太高了，现在右一下子。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明显的错误，长期不批评是不好的。草多可以用拖拉机，蒋介石不是草，三年就打倒。中国知识分子，百分之十懂马克思主义，百分之八十是爱国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可见毒草只是少数，似毒非毒、野草香花中间的是多数。这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这个问题是新问题，干部还没有试过，试一试，试出味道来，顾虑就没有了。要是讲清楚，人民还会反对共产党吗？似毒非毒的是大多数，毒草是少数。

我不是鼓励人民闹事，搞闹事促进会。闹事打办公室要处分。乱糟，偏有一点。现在是党外情绪高，过些时，党内情绪也会高起来，先低后高。

解决一些问题，取得了一些经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政策都是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的，应该让干部去工作中试一试。

又怕又不怕，又高兴又不高兴，问题解决又不解决，这就是辩证法。比如打仗，开始提心吊胆，越打下去越大胆，没有几次路线错误，就不会现在这么好。好事多了，会骄傲，就会出坏事。苏联就是如此。王明错误大，没有自我检讨，没有威信。错了，紧张一礼拜，检讨了，就好了，还有免疫作用。邓老对合作化问题，我想彻底攻他的。对干部帮助的办法，就是攻。最多失掉一票，不想提

名我。

巴金说杂文难写。一、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风气。二、彻底唯物论者是不怕的。王熙凤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大家应帮他，不帮忙是站不住的。

鲁迅墓搞个运动场有什么不好？陈其通、钟惦棐代表两个片面。我也是片面无忧论……可以变成循环论，但辩证法不是循环论。

片面性多了，就要出辩证法。这些人无非要我们倒霉，我们就想得更坏一点。现在好像右了一些，但说服群众，不能简单化办法，对闹事不是彻底解决。事情处理过分了，不行。谁说要看牛鬼蛇神？是群众要看。不能压，只有多演好戏。应该让社会复杂一些，把重心放在科学上面。有人说开除闹事学生比国民党还毒辣，我们应该比国民党高明一些，有一个国民党和我们比较，很好。他们是在掘坟墓，我们不要学国民党。阻止广东学生来京请愿，我至今也难受。国民党对人民专政，共产党讲民主，这点应清楚。有人拿专政的原子弹向人民的头上晃一晃，这是不好的。

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改变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人认为不是时候，与政治思想工作有矛盾。大规模政治斗争已基本结束，八大做了结论。这个方针提出正是时候。

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很深。我想是说没有一条沟，没有界限是不好的，但不能成为一条沟，有沟，就脱离群众。

上海工厂有千分之一，没有万分之一闹事，有百分之一就好了。可以清除官僚主义。

从党内到党外。党内党外一起讲，戏就唱起来了，这样，可以把许多人推上政治舞台。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要整一整。

有人感到左不行右不行，难办。知道难办就好，就会动脑筋，否则就只说专政，说集中。

党内要不要斗争，当然要斗争。农民年年锄草，批评错误要有说服力，不能靠压。靠几篇文章不行，要以理服人，不要靠资格。

对敌讲力量，对人民讲理。没有理，不会历史主义，地位多高，不行。要多学习，多研究。干部摆资格，讲势力，是很危险的。

没有民主党派行不行？也行，苏联就没有。听不到反面意见，但打仗还是打胜了，也没有杀知识分子。苏联不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主党派都是大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并没有农工。要给他们事做。

两头团结，中间批评。没有批评就是右倾。钟惦棐文章出来很久没有批评。

《文汇报》上批评要全面分析，这批评是有益的。

对民主党派人士要讲真话，有缺点就说。当民主党派也有苦处，听不到，看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也可以讲一些党的缺点。我们要打倒民主人士，他们就反起来。虚心学习，很有必要。

开了许多会议，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这是《国民日报》。

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我就没有群众基础。

党内外应当有一条线，不应当有一道墙。第一书记要经常接见党外人士，把底亮出来，诱敌深入，也可以讲，不讲是不民主。让讲又是诱敌深入，怎么办？要从六亿人口出发，我们野心要大一点，知识分子有五百万，要争取他们。莫朴是宗派主义者，要交审，要审查党籍，为什么不要国画？他是搞丑术，不是搞美术。国民党还有国画。他是什么党，大概是第三个党吧？社会存在不能否认。社会存在有反革命，我们就要肃反。民主范围内的问题早已存

在。火烧红莲寺也要采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怎么行？江丰、莫朴搞辩证法，为什么不要国画？只搞单干户？夫妻也要配对嘛！老干部要考虑，过去是一套办法，现在要解决人民内部问题。《新民报》看了几张，不是黄色报纸，软一点。不能领导科学，不要一下子顶回去，要请教，刘备还要请个诸葛亮。党外人士讲话是考虑过的。有时有错误，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不要说死了。

四、关于几个问题的认识问题。

范瑞娟文章有二百多封信反对，我看没有黄色，天天上甘岭，没有我的丈夫[1]怎么办？写文章要有逼，毛骡子没有人骑不行。领导、选报、准备、说服力、有利五个条件。这么多条件，只有说服力比较具体，其他的都很难改，但不要教条主义。

对党的政策能否辩论，《人民日报》的文章组织都对？陈其通等的文章就不对？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总有些难办的事情，不成堆也不行。上海六百万人口，只有二百多□□反对，可见是少数。报纸上也不能天天打气。一年开四次会，春夏秋冬。文教事业是教育人民的东西，要经常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电影厂有人说力争香花，不出毒草。这精神不对，我们不怕出三分之一毒草，避免毒草是一句空话。

片面性。要求党外都避免片面性，都成为辩证法专家，一万年

---

[1] 1957年3月，艺人范瑞娟的文章由中国新闻社发往海外，香港《大公报》首先发表，但题目由《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变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3月24日，上海的《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风波。

也是不可能的。上次我从自己谈起过。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永远存在。

知识分子入党问题。应该争取三分之一到党内来。民主党派可以跨党，领导人员不要入党，六年之内搞四分之一，三个五年计划三分之一入党。今年争取百分之十五入党，要稳步。今年如果不争取一批知识分子入党，对社会主义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方针，如果组织上关门，那是不相称的。我们党没有大作家、大诗人、大教授，要招兵。过去办不到，现在要努力。高尔基只读二年书，孙中山也没有受很高的教育，人是可以培养的。

教育上摇摆不定，有道理。没有经验，摇几次，就不摇了。初中教材中，应当有历史、地理、文物等等。过去中小学就学外国文，应该学。初中课太多，应该砍掉三分之一。学校教课怎么百家争鸣？应以一个为主或几个为主。

肃反检查是查五五、五六年的，过去的不查了。

先进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矛盾，这句话不对。

节育问题。马尔萨斯结论不对，可是人多是否一定要打仗？中国节育要看省份。江苏人多，东北人少。婚姻法不要改，多劝说不要早婚。

一千年还有革命，我说过，但不一定。

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将来不叫国有化，是球有化的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好，就会被推翻。现在已有个别的乡政府、支部。

五、领导问题。要改善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共产党的责任。不怪宣传部，要第一书记负责。第一书

记不仅要抓思想领导，还要看文章，要看历史、哲学、文学……历史分期。人家锣鼓喧天，第一书记什么都没有看，怎么解决？有人说，旁的事少干一些，抓思想工作，要看刊物，看文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养成习惯，慢慢就有兴趣。党内也要讨论，讨论没有时间，不讨论也会没有时间。有人把“百家争鸣”念成“争鸣”。不懂要接接班，周瑜二十多岁，程普五十多岁，大敌当前，谁挂帅？搞文教工作，要有文化。诸葛亮初时不被重用，后来用了。那时能破格任用，现在为什么不行？去年评级，有人意见很多，破格提升有很多阻碍。当兵的没有文化，可难，可也要业余学习。现在是打另外一个仗。各级的将、校、尉、官兵要重新配备。各级干部要学会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不然，大将出马，耍了两下子，枪杆子就掉到地下去了。大学党委会要改组，接受干部任务完了，现在可调出来，有个把留在学校里搞搞事务，“百家争鸣”，不要去当校长。

要做宣传工作，逼上梁山讲，要到大学里去讲，先与教师、学生谈谈。今天不讲，明天不讲，今年不讲，明年不讲，一万年不讲，怎么行？

高教部长、宣传部长、党委书记都请去讲，总比政治教员好一些。

定息问题。企业性质改变了，两重性质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但灵魂还在。定息搞短搞少，长期留一个口实，不合算。现在一年还一亿，还十年，将来还一千万。他们不要求取消，我们就还下去。小的资产阶级要摘帽子，不要小的一摘，大的不安，最后总归自动取消。

六亿人口中有缺点的，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不对可以不

听，对的要接受。反对肃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孙大雨说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报上登出来。胡风、铁托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就脱离群众，这也是帮助的一种办法。做政治工作要有一点办法，不怕发表，要驳他。

各省要交流经验，不要不相往来。

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伏罗希洛夫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机场和访华归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话别。

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1957年5月4日）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

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山公园和各界青年欢度青年节。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市庆祝青年节晚会上跳舞。

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的批语[1]

（1957年5月5日）

一

刘、周、朱、陈、邓、彭真[2]阅，小平办。

此件[3]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毛泽东

五月五日上午十时

---

[1] 1957年5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黄炎培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和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在二届人大不提名他当国家主席的建议。5月5日，毛泽东在看这封信时，在信中写了四条批注并在信后写了一段批语，即本篇三，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此外还有两件批语，即本篇一、二，这两件批语分别写在单页纸上和陈叔通、黄炎培的信的第一页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经毛泽东批注的陈叔通、黄炎培的来信。

此事[1]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二

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

毛泽东
五日

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

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考虑。（此数句不要印）

三

少奇委员长：
恩来主席：

昨毛主席于会议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

---

[1] 指毛泽东关于下届全国人大召开时不再提名选举他为国家主席的建议。

嘱我们透露消息，我们两个人意见：不说拥戴的空话，而要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我们的国家由民主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就七年来说，发展要算顺利的。但不可以不看出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以上两个理由，因时期太长，连任四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经验，可能要十五至二十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毛泽东注）在此期间，最高领导人还是不更动为好。诚然要强调集体领导，但在短期过程中全国人民还认识不清楚，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毛泽东注）似应再连一任，而于宪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任期四年”下加一句“连选不得过两任”，则以后依法办事，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毛泽东注）不然，可能因国内人心的震动，而给以国际间推波助澜的造谣机会。（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毛泽东注）我们期期以为未可。至于代行职权，亦可在宪法上规定副主席二人或三人，前年委员长已代行过职权，接见外国使节，本来应该在宪法上加以修改，此事关系重大，应请先由党、政府慎重考虑，暂不透露。特以密陈。并请考虑应否及时邀集昨在场人大、政协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如大家都有上面所陈感想，即请转陈毛主席，同时我们相约勿遽外传。

至于领导上工作太长期高度紧张，这点确值得大大注意，今后必须在安排对内对外工作时，尽可能使倾向宽舒，似乎各位领导者

都有这样必要。如荷同意，亦乞通知进行。

披沥直陈，统希亮察。

顺致

崇敬！

陈叔通
黄炎培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邓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八年，可不连选；（二）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四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1957年，毛泽东和黄炎培、陈叔通在一起。

对中央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57年5月7日、11日）

一

伯达[2]阅，小平[3]同志办。政治局通过后，填上日子[4]，在报上发表。

毛泽东

五月七日

在第四页上有一些修改[5]。

---

[1] 本篇一写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初稿）上。这一初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毛泽东于5月11日又作了批示，即本篇二。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再次审阅这一指示稿时，将文件的日期定为“1957年5月10日”。

[5] 毛泽东在指示初稿第四页上只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二

可用。公开发表[1]。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

[1] 这一指示发表于1957年5月15日《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7年5月8日）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今天致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萨波托斯基、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和总理威·西罗基，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

贺电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纪念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为这些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不久以前，以西罗基总理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我们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文化合作协定和保健合作协定。这不但对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捷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有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

贺电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给李淑一[1]的信

（1957年5月11日）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2]所述那一首[3]不好，不要写了吧。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4]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

---

[1] 李淑一（1901—1997），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夫人，当时是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

[2] 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牺牲。

[3] 指《虞美人·枕上》（《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

[4] 直荀，即柳直荀（1898—1932），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9月在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被害。

亭[1]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

[1] 柳午亭（1877—1957），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父亲。

蝶恋花·答李淑一[1]

（1957年5月11日）

我失骄杨[2]君失柳，
杨柳轻飏[3]直上重霄九[4]。
问讯吴刚[5]何所有，

---

[1] 答李淑一，这首词是毛泽东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词中的“柳”指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烈士（1898—1932），湖南长沙人，毛泽东早年的战友。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0年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曾任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2年9月在湖北洪湖革命根据地被害。1957年2月，李淑一把她写的纪念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词寄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了这首词答她。

[2] 骄杨，指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负责机要兼交通联络工作，后随毛泽东去上海、武汉等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隐蔽在长沙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11月牺牲。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将该词手书送给毛岸青、邵华时，将“骄杨”和“泪飞”分别写作“杨花”和“泪挥”。

[3] 飏，飘扬。

[4] 重霄九，九重霄，天的最高处。我国古代神话认为天有九重。

[5] 吴刚，神话中月亮里的一个仙人。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月亮里有一棵高五百丈的桂树，吴刚被罚到那里砍树。桂树随砍随合，所以吴刚永远砍不断。

吴刚捧出桂花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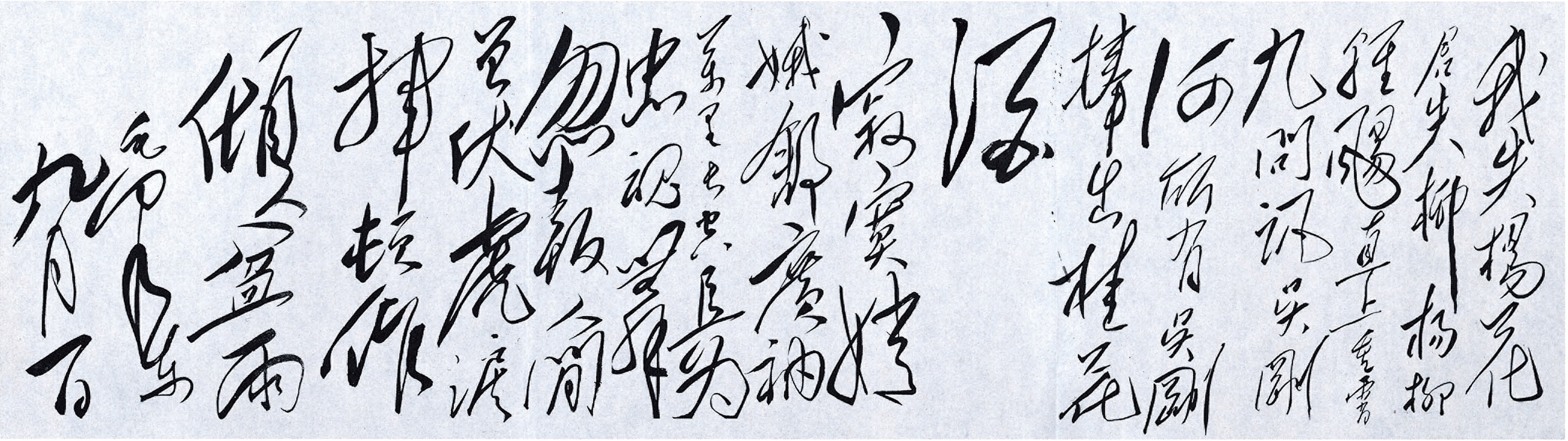
寂寞嫦娥[1]舒广袖[2]，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3]

---

[1] 嫦娥，神话中月亮里的女仙。据《淮南子·览冥训》，嫦娥（一作姮娥、恒娥）是羿的妻子，因为偷吃了羿从西王母那里求到的长生不死药而飞入月中。

[2] 舒广袖，伸展宽大的袖子。

[3]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忽然听到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捷报，两位烈士的忠魂顿然高兴得泪流如雨。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毛泽东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我失杨花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

九月日

毛泽东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

3P

50-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

（1957年5月14日）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2]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7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解放日报》于1957年5月8日邀请22位中、小学教师举行座谈会，请他们谈谈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5月10日，该报第二版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整版刊登了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事情正在起变化[1]

（1957年5月15日）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就我党的经验说来，前者为多，后者只是个别的，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思想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

---

[1] 这是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曾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真正的教条主义分子觉得“左”比右好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要革命。但是对于革命事业的损失说来，“左”比右并没有什么好，因此应当坚决改正。有些错误，是因为执行中央方针而犯的，不应当过多地责备下级。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混同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原则区别，他们混同反映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经济的新闻事业与反映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和集团竞争的经济的新闻事业。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为了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包括新闻事业在内的）必要的但不是过分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切记不要相信。不论是民主党派内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都是如此。有两派最坚决：左派和右派。他们互争中间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是“国宝”，是惹不得的。过去的“三反”，肃反，思想改造，岂有此理！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人们反对扣帽子，这只是反对共产党扣他们的帽子。他们扣共产党的帽子，扣民主党派左派中派和社会各界左派中派的帽子则是可以的。几个月以来，报纸上从右派手上飞出了多少帽子呢！中间派反对扣帽子是真实的。我们对中间派过去所扣一切不适当的帽子都要取掉，以后也不要乱扣。在“三反”中，在肃反中，在思想改造中，某些真正做错了的事，都要公开改正，不论对什么人的。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

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资产阶级和曾经为旧社会服务过的知识分子的许多人总是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总是留恋他们的旧世界，对于新世界总有些格格不入。要改造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用粗暴方法。但是必须估计到他们的大多数，较之解放初期是大为进步了，他们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大多数是对的，必须接受。只有一部分不对，应当解释。他们要求信任，要求有职有权，是对的，必须信用他们，必须给以权责。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凡对的就应采纳。右派的特征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他们企图摆脱这种领导。而只要没有这种领导，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我们民族就要受到绝大的灾难。

全国有几百万资产阶级和曾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这些人为我们工作，我们必须进一步改善和他们的关系，以便使他们更有效率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便进一步改造他们，使他们逐步地工人阶级化，走向现状的反面。大多数人一定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改造就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斗争是互相斗争，现在是许多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时候了。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

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地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

“你们这一篇话为什么不早讲？”为什么没有早讲？我们不是早已讲了一切毒草必须锄掉吗？

“你们把人们划分为左、中、右，未免不合情况吧？”除了沙

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为什么不合情况？划分了，使群众有一个观察人们的方向，便于争取中间，孤立右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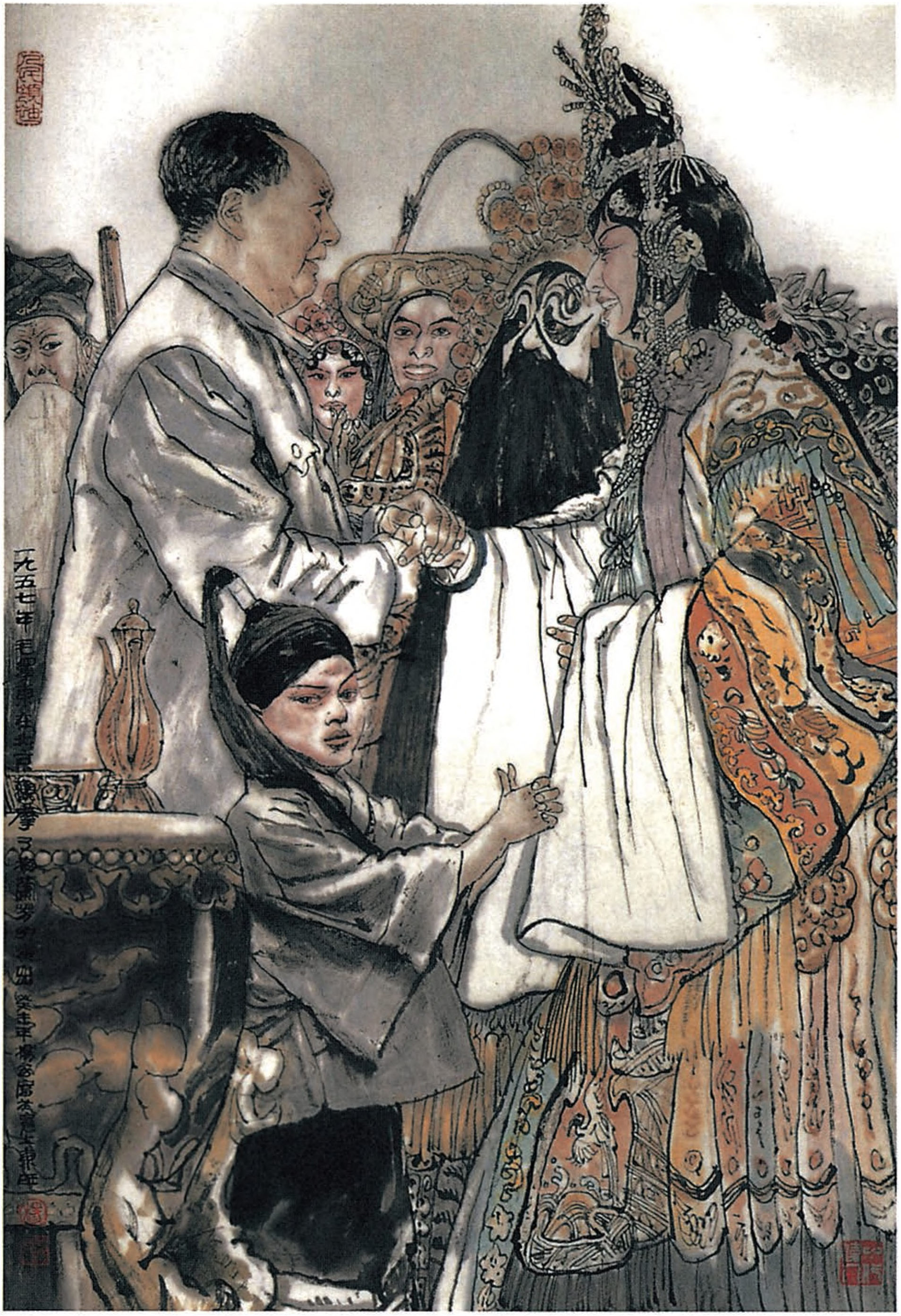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哪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什么叫“严重违法乱纪”？就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而这种损害，是在屡戒不听一意孤行的情况下引起的。其他普通犯错误的人，更是治病救人。这是一个恰当的限度，党内党外一律如此。“整”也是治病救人。

要多少时间才可以把党的整风任务完成？现在情况进展甚快，党群关系将迅速改善。看样子，有的几星期，有的几个月，有的一年左右（例如农村），就可完成。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思想水平，那就时间要长些。

我们同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又团结又斗争，将是长期的。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这样将加速他们的进步，更易孤立少数右翼分子。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是互相帮助，使歪风整掉，走向反面，变为正风。人民正是这样希望于我们的，我们应当满足人民的希望。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赴京演出的琼剧演员。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

《观看演出以后》（中国画）

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1957年5月16日）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各中央直属部委首长，各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搬〈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

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1]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种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形势，设法团结多数中间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中央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7年5月14日发出的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说，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的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露暴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妥当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你们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接受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山道尔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5月17日）

我很愉快地接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任命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对你的祝贺表示衷心的感谢。

勤劳、勇敢并且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在解放后的十二年中，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不久以前，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匈牙利反动分子利用广大人民对过去领导所犯的错误的不满，策动了一个企图推翻匈牙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但是，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依靠苏联的国际主义的援助，彻底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匈牙利人民的这个伟大胜利，不仅捍卫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团结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民主力量、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等方面作了许多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深信，匈牙利人民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沿着光明、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中国人民一向密切关怀匈牙利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事业所进行的斗争。并且把匈牙利人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匈牙利人民在维护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永远可以指望六亿中国人民的衷心的支持。匈牙利人民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直给予多方面的援助，中国人民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种兄弟般的友好关系的不断增长，不但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将加强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你出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进一步发展和加强中匈两国友好合作的工作中，你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谨祝你在工作中获得完全的成功。

接受蒙古大使苏诺姆·鲁布桑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5月17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委任你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的国书，并且向你表示热烈的欢迎。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获得了不少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几年来，中蒙两国人民的真诚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不仅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并且对增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也具有重大意义。大使同志，在你为巩固和发展中蒙两国友谊和合作的工作中，一定能够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我预祝你的工作获得成功。

给达姆巴[1]的信

（1957年5月20日）

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给我的来信。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八百七十万人，其中七百多万人是汉族，而蒙族同胞仅有一百多万人。其次，我们考虑，如果从中国动员劳动力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生产建设，我们也只能够动员从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力前往，而动员从事牧畜业的劳动力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因为人数过多，在语言方面，在生活习惯方面，在行政管理方面，都会有困难的。我们设

---

[1] 达姆巴，即德·达姆巴（1908—1989），今译达希·丹巴。当时任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想，在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业建设的劳动力中，主要应该是些技术工人，以便帮助蒙古居民学会某些生产操作的技能。我们意见，当这些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中国技术工人，在双方规定的期限之内教会蒙古居民生产操作的技能以后，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根据我们的计算，在最近几年内，每年供给数千人是可能的。为了使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汉族人便于工作，便于同蒙古人民团结合作，我们准备每年在派去的劳动力中调配几十名懂蒙、汉两种语言的蒙族人，以便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管理机构联系，从而减少管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建议关于供给劳动力问题，可以由我们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办理。如果你们认为汉族人不熟悉蒙古语言和生活习惯因而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少派一些，或者不派。总之，一切都应该根据你们的需要，并且对于你们方便，作出决定。

目前，我们已经派有八千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我们今后也将本着这个原则，凡是违犯蒙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中国员工都应该按照蒙古的法律法办。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

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1957年5月20日

关于制止税收工作中违法乱纪行为的批语[1]

（1957年5月24日）

陈云[2]同志阅后，转李先念[3]同志阅，退毛。

我看此种现象不但福建有，各省都可能有，似宜采取措施，加以处理。可否举行一些典型调查，然后制定一个法令。不然，如福建那样，是危险的。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情况简报》1957年5月21日第一一八号上。这份简报摘报了福建省监察厅党组关于晋江专区税收工作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简报说：福建省监察厅等单位最近重点检查晋江、大田等7个县的税收工作，发现违犯政策、违法乱纪的现象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护税组织胡作乱为，随便拘人、扣货、变卖商品、动用税款。二、滥施处罚。三、不经批准，滥行搜查。李先念看了毛泽东批阅的这份简报后，于5月29日向陈云、毛泽东建议将福建省的这个报告转发各省市。1957年6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3]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在接见共青团三大全体代表时的讲话[1]

（1957 年 5 月 25 日）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就是能掌握马列主义，站得高，看得远；立地就是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群众打成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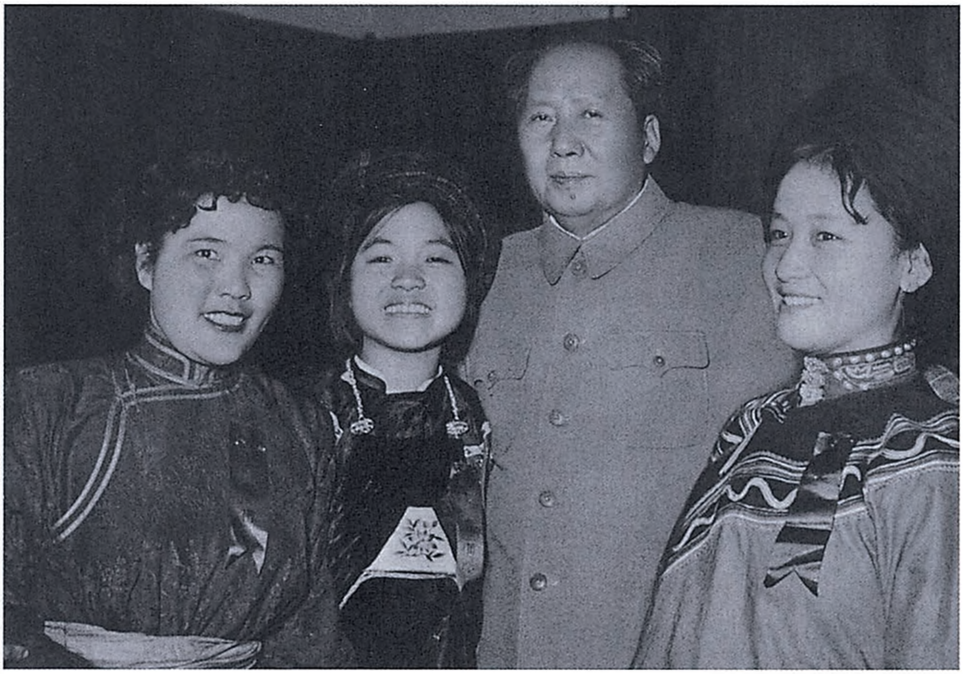
---

[1] 1957 年 5 月 15 日至 25 日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会还决定把改名以后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历次代表大会衔接起来，依照次序加以排列，并确定下一次团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名称为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毛泽东在接见代表时讲话的一部分。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周恩来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1957 年 5 月，毛泽东接见各民族学生代表。

1957年5月，毛泽东和各民族青年代表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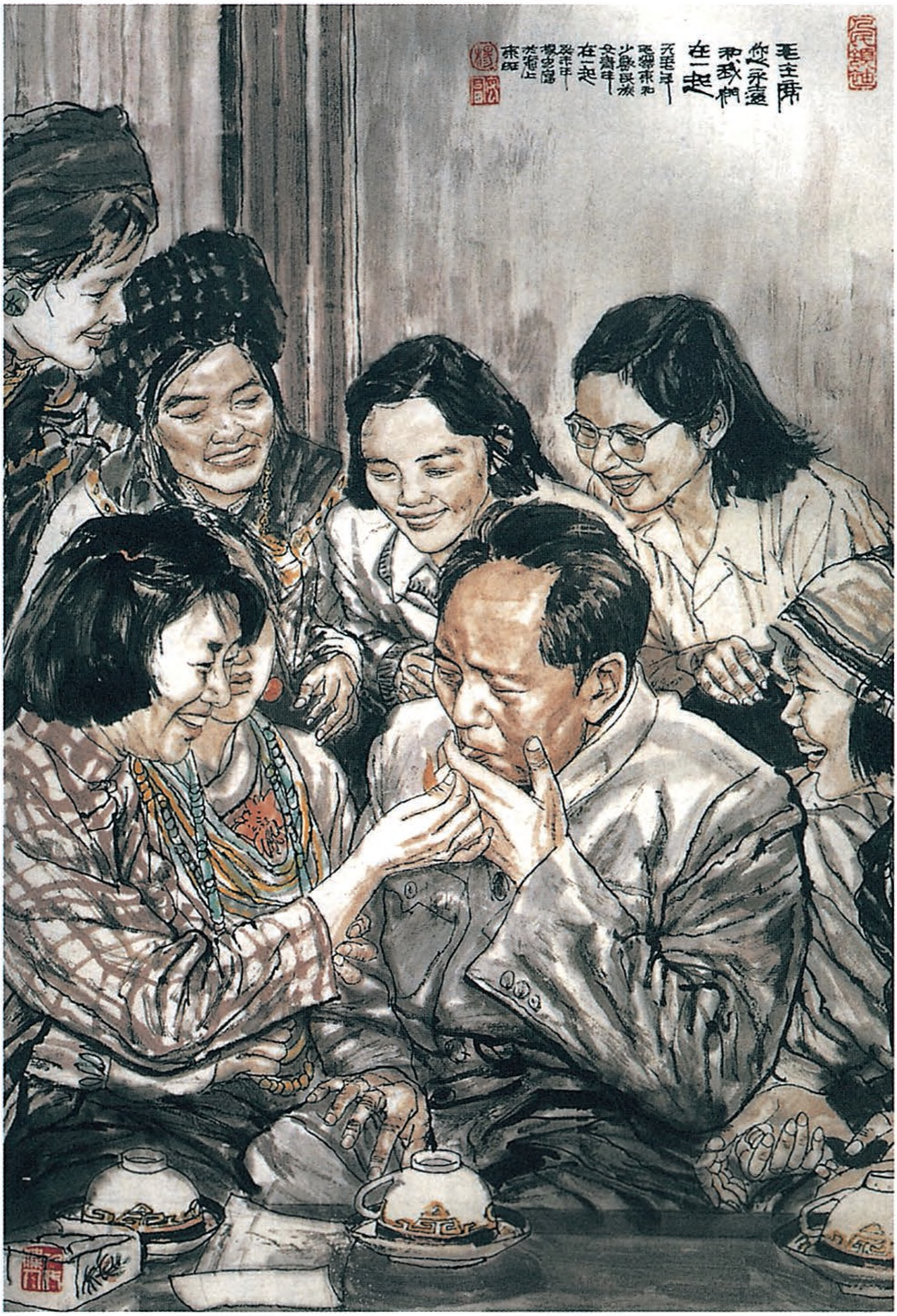


1957年5月，毛泽东和蒙古族、布依族、彝族女青年在一起。

1957年5月，毛泽东和青年团代表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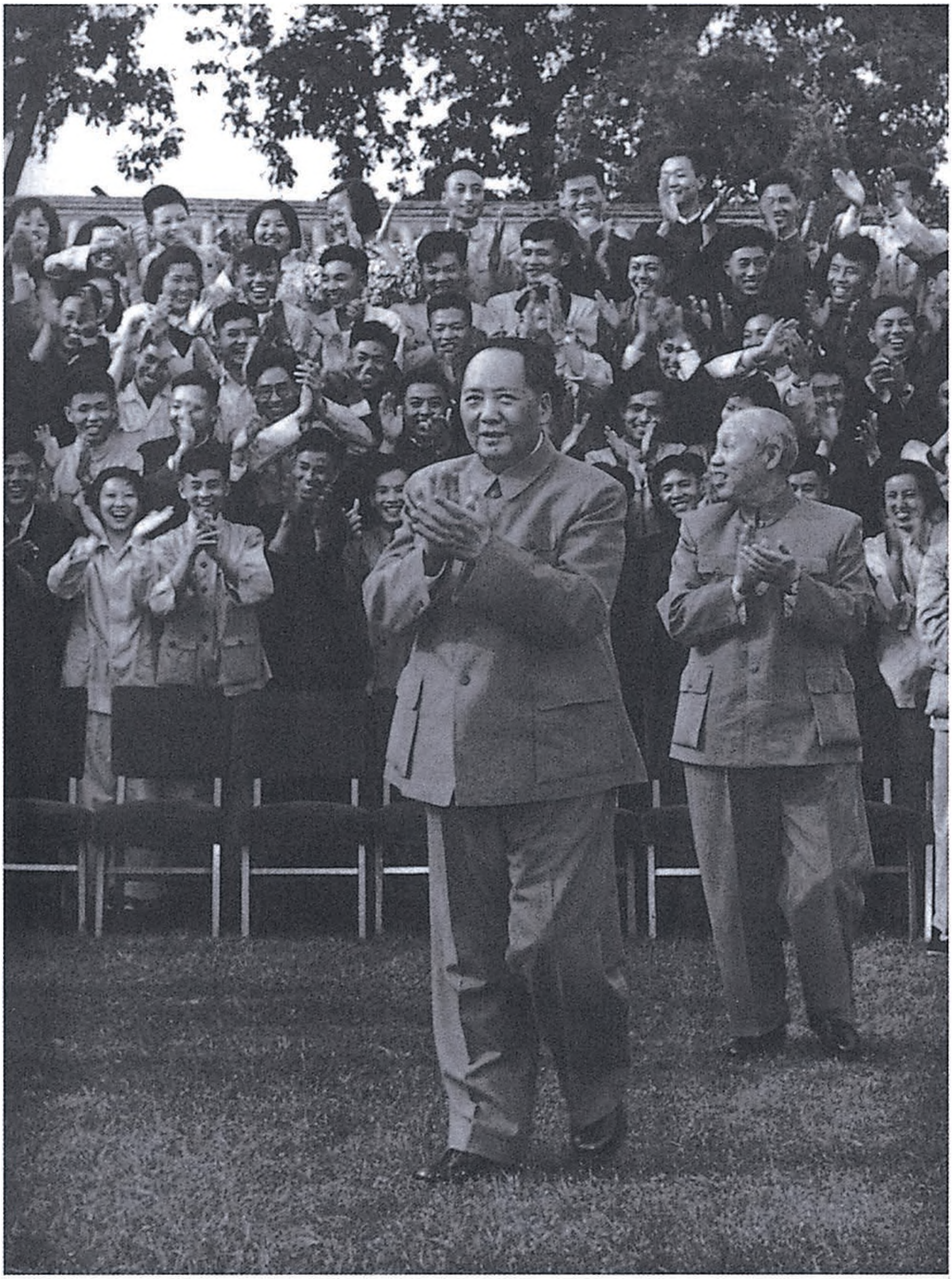
1957年5月，毛泽东和青年团代表在一起。

1957年5月，毛泽东和青年团代表在一起。


毛主席您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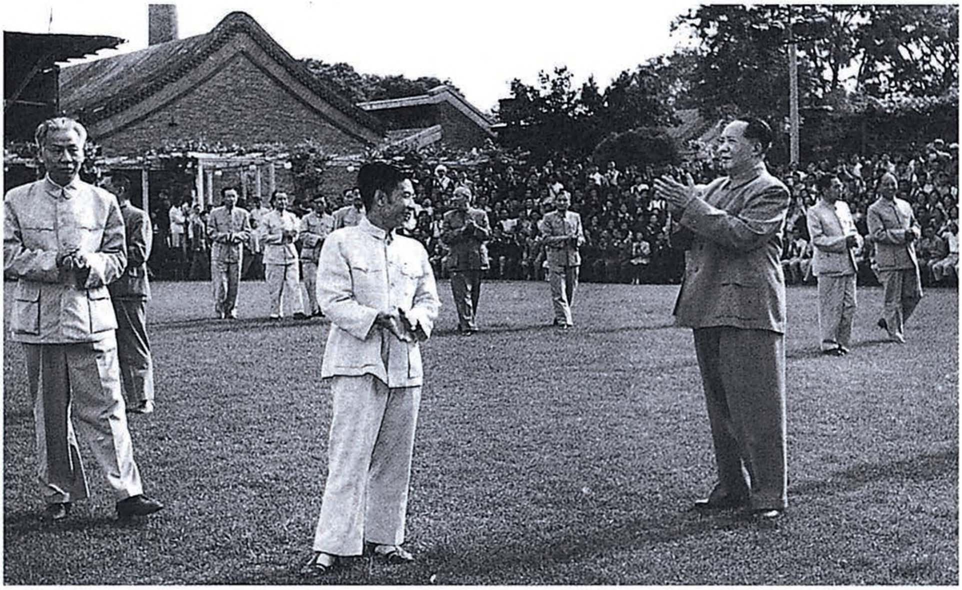
《毛主席，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中国画）

1957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青年团代表。



1957年5月，毛泽东和董必武接见出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7年5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代会代表时讲话。



1957年5月，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后田暴动队员张龙地。中为邓子恢。

1957 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吕厚民在一起。

对转载《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一文的批语

（1957年5月30日）

乔木同志：

此篇[1]似可转载，何时转载适宜，请你和报馆商量一下。

毛

五月卅日

---

[1] 指《新闻日报》1957年5月29日刊载的小雅写的《关于“特殊材料制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在整风运动中，章乃器于1957年5月1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文章说：“已经有不少人说过，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一条沟’。”“‘联共党史’记载了斯大林在哀悼列宁时候的誓词，一开头就说：‘我们共产党员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由于这一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一种思想基础了。”小雅不同意章乃器的这些说法，他在文章中说，所谓“特种性格”“特殊材料”，不同于旧时法国贵族所自诩的在他们身上流着“高贵的血液”，而是说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担负着伟大

的历史任务，献身于一个崇高的理想，他们必须具有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必须具有前所未有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至于“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看了斯大林的话，竟飘飘然以“特殊”自居了，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但这是他们自身的问题，不能据此就把斯大林的话贬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根据毛泽东的批语，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1957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和夫人。

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1957年6月6日）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毛泽东同志二月廿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1]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放大鸣方法的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派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

---

[1] 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6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一次公开发表。

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

关于印发六月四日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57年6月6日）

尚昆[2]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

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毛泽东

六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1957年6月5日为报送《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简报》说，北京大学有一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造谣说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90%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这篇文章油印后在校内外散发，震动很大。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转载《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1]一文的批语

（1957年6月7日）

---

[1] 《知识分子应怎样对待整风》，作者笪移今，登载于1957年6月6日的《文汇报》上。文章提出，知识分子对待整风应做到：第一，要认识党有伟大的气魄。党是以全国人民意见为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是大公无私、敢于公开承认错误、纠正错误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不是党的本性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些党性不纯的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从团结人民出发所产生的后果。整风，就是党以实际行动来表明克服缺点的决心。第二，要学习整风文件。学好文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是置身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时代中，使我们善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善于识别社会演变的方向，善于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懂得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第三，要掌握和风细雨的精神。现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搞好团结。要接受过去运动有些过火批评的教训。第四，要明辨是非。非党人士帮助整风，要在接受党的领导下，要在不与党对立的认识下，监督党贯彻整风政策。既要大胆批评，又要避免冤枉人，发现批评离事实太远，要出来说话。第五，要提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协助领导共同解决矛盾，缩小矛盾。对于人民提出的过高要求，对于暂时办不到的事情，知识分子更应该用笔向群众进行宣传和解释。第六，要从帮助整风来改造自己。第七，要领会整风运动的实质。整风的目的就是巩固党的威信，加强党的战斗力量，使党能更有效地团结六亿人民，充分贡献力量，为加速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不能把扩大社会主义的民主生活，与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这篇文章，后来未见转载。

乔木[1]同志：

此文很好，可以转载在显著地位。

毛

六月七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1]

（1957年6月8日）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十五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百分之一，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工人要看清大局，不要闹事情。在此期间，不要提出福利工资等问题，一致对付反动派。

请你们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左中右的人都参加，正反两面意见都让其暴露，派记者予以报道。我们巧妙地推动左、中分子发言，反击右派。此事很有效。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时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起，即陆续发表。注意组织中、左派写文章。但在高潮未落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可以登些中间派文章）。大字报必须要让群众反驳。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他们是最好的教员。到了适当时机，则立即要组织党团员分组开会，分别哪些是建设性的批评，加以接受，并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哪些是破坏性批评，予以反驳。同时组织一些党外人士讲演，讲正面话。然后，由较有威信的党的负责人作一个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总结性演说，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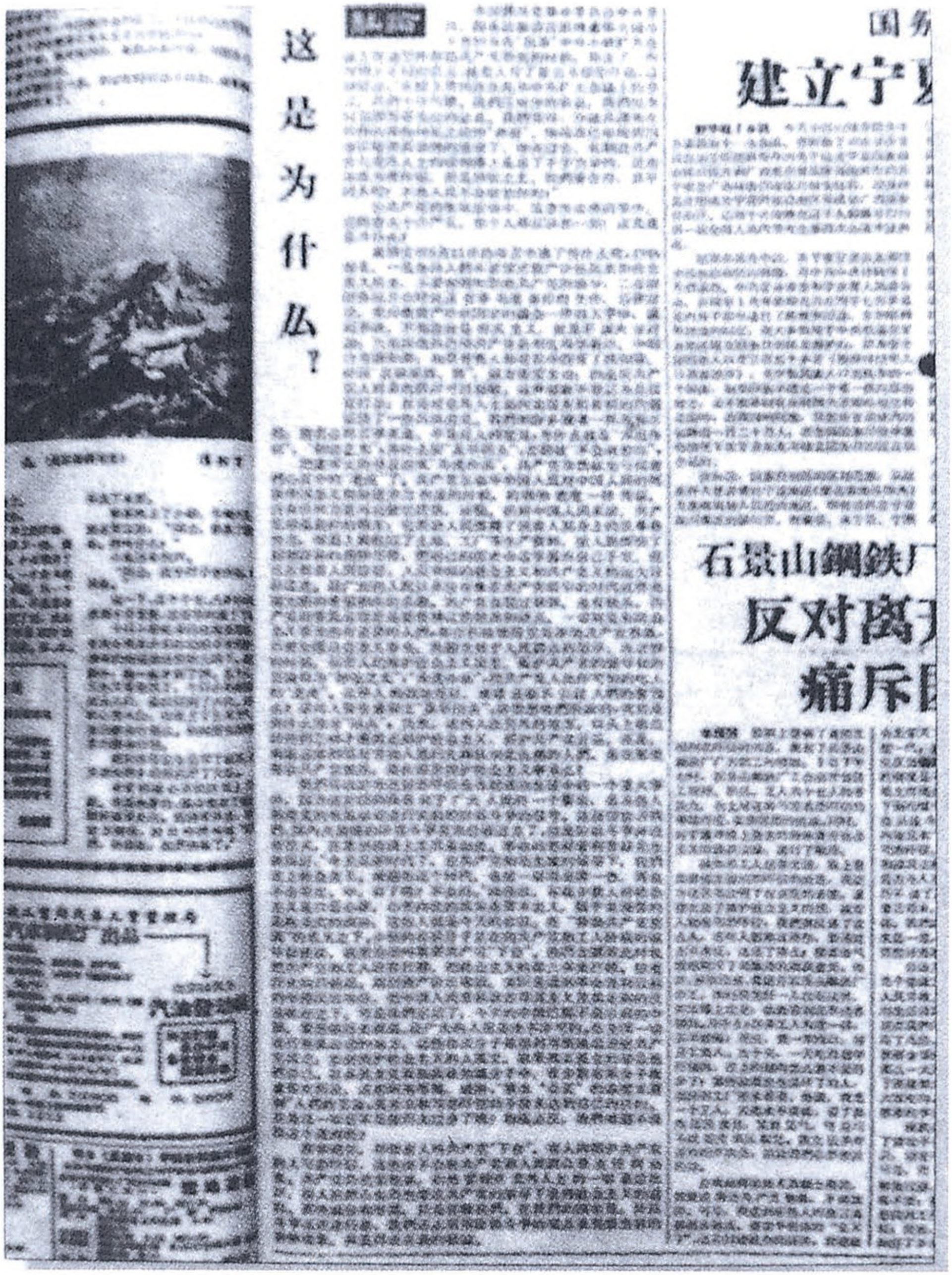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各地情况不同，你们可以灵活运用策略，灵活做出部署。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

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

现在国内形势很好，我们能够巩固地掌握工农党政军及大多数学生。国际形势很好，美国处在困难地位。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这是为什么？

国务

建立宁

石景山鋼鉄厂

反对离

痛斥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以此为契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拉开序幕。

在陈正人[1]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信上的批语

（1957年6月8日）

陈伯达[2]同志：

此件[3]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

毛泽东

六月八日

---

[1]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指陈正人1957年6月7日写给毛泽东的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的意见信。信中建议在稿中“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这一句前面加上“革命时期”4个字。并说，“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两个革命——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胜利，革命（社会改革）已基本结束，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斗争，不但表现为长期的思想上的斗争，也表现为政治的及其他形式的斗争（如经济的）”。后来公开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采纳了这一建议。

给孙燕[1]的信

（1957年6月8日）

佩君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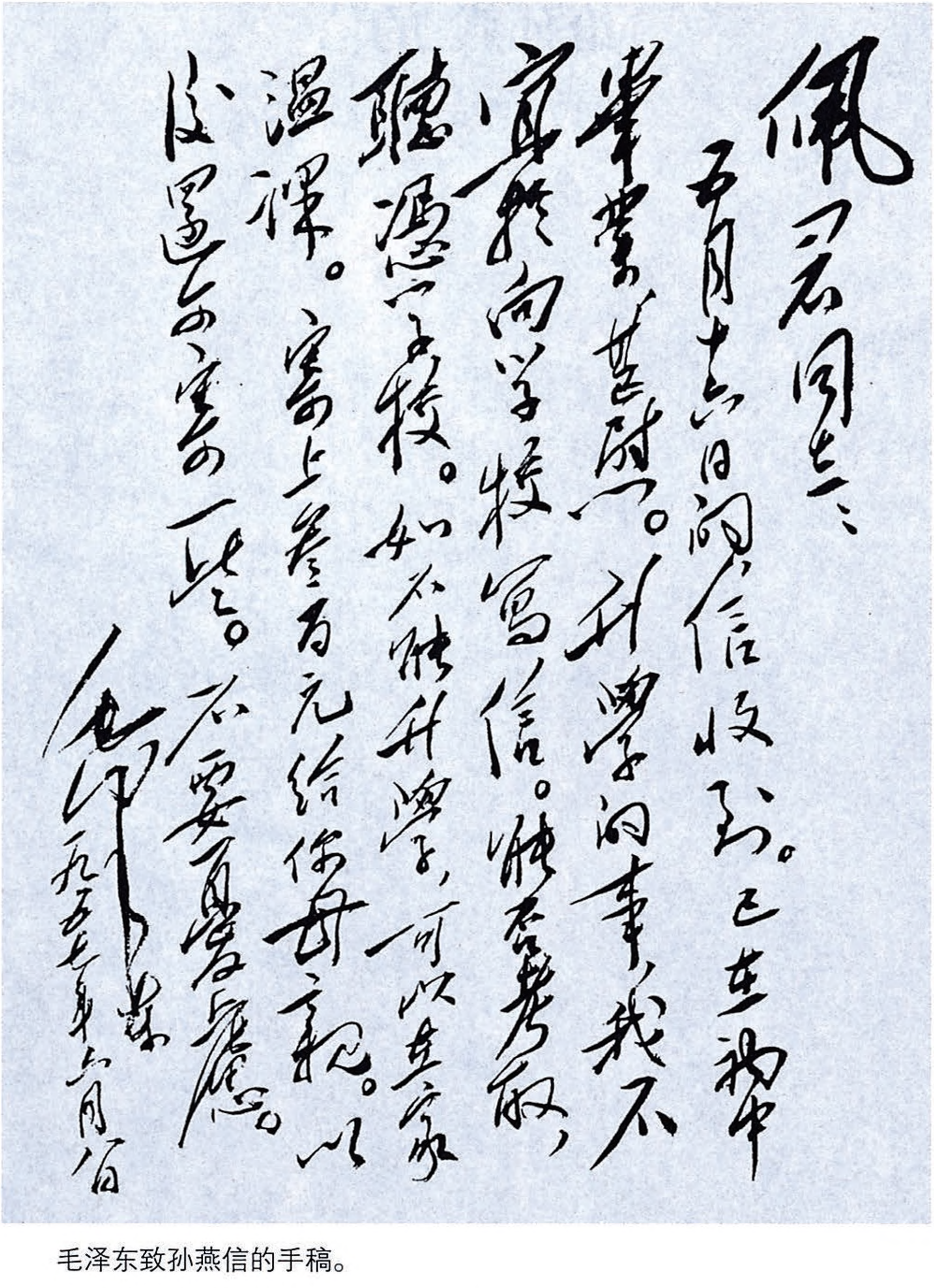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

[1] 孙燕，学名孙佩君。她的母亲陈玉英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業，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於向学校写信。惟在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叁百元给你母亲。以後還要安一些。不要有憂慮。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毛泽东致孙燕信的手稿。

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1957年6月10日）

一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将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骂人打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

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注意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1]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2]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越放得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有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

---

[1] 章乃器，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李康年，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上海公私合营鸿兴织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萃众织造厂经理。

[2] 章伯钧，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罗隆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

二

即送刘、周、陈、朱[1]阅，尚昆[2]用电报发出。

另印如前示。新、藏不发。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指朱德。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了解清华大学动态给蒋南翔、陈舜瑶[1]的信

（1957年6月11日）

南翔、舜瑶同志：

兹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来看你们，请由你们中任何一位和他谈一下你们学校目前的动态。如果你们忙，则请你们指定一位别的同志和他一谈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

[1] 蒋南翔，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陈舜瑶，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助理兼副教务长。

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批语[1]

（1957年6月13日）

一

乔木[2]同志：

北京日报比人民日内〈报〉编得好，有工人、农民、学生、左翼党外人士的批判反动言论的大量报道，极为丰富，文字也较人民日报生动，编排也好。请看第二版全部报道。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

二

请在人〔民〕日报召集一个会议，有较多人参加。事先要他们读这第二版，全部读一遍，然后开会。你的编排水平应当提高。文

---

[1] 这两条批语写在1957年6月12日《北京日报》第一版上。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觉“怎样对待『对待』批评”[1]这个概念化的标题是不好的，不感觉这篇文章通体是一个八股调。希望思索改进。

毛泽东
六月十三日

---

[1] 这是《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清样稿）的题目。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这篇社论发表在195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

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1]

（1957年6月14日）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2]见于6月10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乎已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

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的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考虑。

---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载于1957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同时，毛泽东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全文如下：“（新华社十四日北京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意见和姚文元的文章如下。”

[2] 指1957年6月10日《文汇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文章说，同是一条消息，经过不同的编辑同志的编排，其价值可以相差十万八千里之遥。例如，毛泽东1957年5月25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消息，解放日报用特别巨大的铅字和醒目的标题放在第一条新闻，人民日报排在当中，标题比解放日报要小些，也突出了毛泽东的话：“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

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但文汇报的标题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再如，李维汉1957年6月3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用“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和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文章批评了文汇报上述这些做法和“新闻的编排是没有政治性”的观点，认为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复达赖喇嘛[1]电

（1957年6月14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五月二十三日拍给我的电报收到了。谢谢。

西藏和平解放六年以来，在你和班禅额尔德尼[2]的领导下，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伟大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望你继续努力，把西藏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进一步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3]，使西藏更加团结、进步和发展。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3]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17条。

复班禅额尔德尼[1]电

（1957年6月14日）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周年的时候，拍给我的电报收到了。对你的祝贺，致以谢意。

西藏在和平解放以来的六年期间，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绩。但是建设西藏还是有不少困难的，希望你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协助达赖喇嘛[2]领导、团结各方面的爱国进步的力量，一道前进，在执行协议十七条[3]、建设西藏的工作中作出更好的贡献。

祝你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2]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3]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有17条。

关于发表赵一明[1]发言的批语

（1957年6月16日）

彭真、维汉[2]同志：

请彭查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3]，是否已经在成都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请告新华社用新闻形式转发；如未发表，请商李井泉[4]争取发表，然后新华社再发表。

毛泽东

六月十六日

---

[1] 赵一明，当时任民盟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 指赵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1957年6月15日召集的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揭露了章伯钧、罗隆基在同年4月民盟中央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一些言论及其对民盟地方组织的影响。6月16日，《四川日报》刊登了这一发言。6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节。

[4]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关于了解北师大情况给何锡麟[1]的信

（1957年6月18日）

何锡麟同志：

现派我的秘书林克同志到你们那里，请你将你们学校的情况告诉他。如果你无时间，请你介绍一位别的同志同他一谈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八日

---

[1] 何锡麟，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第一副校长。

对改进兵役工作指示稿的批语[1]

（1957年6月20日）

同意。[2]

刘、周、朱、陈、小平、彭真[3]即阅。退彭德怀同志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7年6月19日送呈报告的批语。

[2] 彭德怀呈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改进兵役工作的指示》规定：把民兵与预备役合而为一，民兵即预备役。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接受朝鲜大使李永镐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7年6月21日）

我很高兴地接受你递交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国书，并且感谢你热诚的祝贺。

中国人民经常关心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各方面的成就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为实现朝鲜的国家统一、为建立朝鲜南部和北部之间的联系所提出的许多合理建议，不仅为全体朝鲜人民所拥护，而且也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近年来，朝鲜国家领导人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之间的相互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对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都有重大意义。

几年来，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密切合作已经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实际利益。中国人民将继续加强同朝鲜人民的友好关系并且对朝鲜人民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的事业继续给予支持。

大使同志，我热烈地欢迎你出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在你的工作中，你将得到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全力支持。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不平常的春天》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6月）

一

即送乔木[2]同志照办。

二

右派“鸣放”，意在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如此，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就不能不坚决地进行反攻。有人说，党不是在请别人帮助自己整风吗，怎么整到别人头上来了呢？不错，党还将继续请广大群众帮助自己整风，这是毫无疑义，必须坚持到底，也必然会坚持到底的。但是难道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也可以受到保护，

---

[1] 《不平常的春天》是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在审阅此文一、二两次清样稿时，都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第二次清样稿作了修改后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在清样稿上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不受批判吗？如果各界革命领导人物对于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不管它们借什么神圣的名义）不知道警惕和识别，不知道迎头痛击，这样的革命者对于人民的事业还有什么责任心？

三

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事实证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图的，他们不但是不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也早就不赞成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因此，无论如何，一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本来有争论，而且是根本性质的、不容含混的争论，掩掩藏藏暗地进行好呢，摊开在桌面上好呢？显然，前者不好，后者好。表面上躲开这场争论，决不会帮助我们平稳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相反，经过这场争论，弄清了人们的真面目，就将教育广大群众。这样，就将使政治界、知识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得到提高，人民内部的团结将比以前更为加强，而社会主义制度也将比以前更为巩固。

关于接待许志行给韶山乡的信

（1957年6月22日）

韶山乡人民委员会
生产合作社委员会　各同志：

许志行先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是上海学校的教师。他在几十年前曾在湖南读书，并且到韶山住过一个暑期。他现在再到你们那里来看看，请你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问候你们！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法问题的批语[1]

（1957年6月25日）

即送周总理：

在讲社会主义改造的地方都加上“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等字为宜，以区别人的改造尚未完成。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早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准备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初稿）上。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稿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主要是在几处提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前面，加写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9个字。

对美国《新共和》杂志一篇文章的批语[1]

（1957年6月26日）

陈云[2]同志：

17页有一句话，值得研究一下。这一句是唱反调的，但也应当促使我们注意。有人提议农业投资应占20%，少了不利，请你研究一下。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早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参考资料》1957年6月24日第一四三五期封面上。该期第17页至19页刊载了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的题为《在我们的对华政策上的辩论》的文章。文章在“垮台论”的小标题下，一开头便说：“‘一百万人委员会’说：‘北京政权现在并不能牢靠地控制住大陆。’工业产品、猪肉、棉花和煤的缺乏，反映出一种‘严重的经济危机’。”毛泽东在旁边批示，“这一句请你研究一下——毛”，并给陈云写了这一批语。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印发《整风专辑》的批语

（1957年6月27日）

小平[1]同志：

情况简报的《整风专辑》很有用。现请：（一）将六月十五日至六月廿五日共十一天的“专辑”立即印成一集（印成一本），印若干份，用飞机火车迅即分送各省市委及地市委，每单位『有』多的有十几本，少的有三四本即够，供其参考。（二）以后每三天印一集，分送。如你同意的话，请照办为盼！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八时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7年6月27日）

小平同志：

此件[1]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

[1] 指谭震林1957年6月24日关于在湖南省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他在老家湖南省攸县住了40多天，根据民主办社的方针，亲自领导整顿了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整社中发现，目前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部之间造成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不民主，账目不公开，从而引起社员对社干部的很大怀疑。通过财务清算，公布账目，并且对少数贪污、占小便宜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处理后，社员的怀疑解除了，生产情绪提高了，同干部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关于县级机关整风问题，报告说，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一是干部的特权思想较严重，二是在工作中存在狭隘的阶级观点，三是官僚主义发展到不愿动手动脚的地步，写东西都推给秘书干事，县级干部下农村的时间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中央规定县级干部一年应有6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县级机关整风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关于转载和播发郭沫若对《光明日报》记者谈话的批语

（1957 年 6 月 28 日）

乔木[1]同志：

郭沫若此篇[2]，请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3]，新华社全文播发。

毛泽东

六月廿八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的关于反击右派的谈话，题为《拨开云雾见青天》。载于1957年6月28日《光明日报》。

[3] 郭沫若的这篇谈话，1957年6月29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题目改为《乌云消散，太阳更加万丈光芒——郭沫若谈反右派斗争》。

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稿的修改[1]

（1957年6月29日）

一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

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

[1] 本篇一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谈话

（1957年6月）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过去好像一讲矛盾，就不得了，其实有什么不得了，蒋介石四百万军队，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也没有什么不得了。每天都在矛盾中生活，到处都是矛盾，都在唱对台戏，但是就不肯承认或者混淆两种矛盾。要承认它，然后分析它，找出解决办法。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两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要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人们并没有提议要打破你的饭碗，也不是要一棍子把你打死，而是要求改善关系。把矛盾从各方面分一下类，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等。卫生也很值得攻一下子，多攻一下，切

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找出办法，要党内外一起来，以往开小会不灵，要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和宣传会议一样的大会，党内外一道开会，两种元素合在一起，起了化学作用，成了另一种东西，就灵了。各省、市都要开。报上登一下，就可打破沉闷的空气。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劳动。这并不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示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农民说，过去你们和我们一道土改，现在你们做了官了，不理我们了。过去合作社主任不参加劳动，很不得人心，群众很不高兴，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现在区乡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群众马上同他们讲真话。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比方在南方打秧锄草并不困难。当然，年老的有病的可以不去。我国有一特点，人口有六亿如此之多，耕地只有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

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同共产党一道混，民主人士确是不好当，很有点恼火，不好办事。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一地方，谁当长的就归他管（马寅初：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主席：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搞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唯物辩证法，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马列主义世界观。希望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有三分之一，即一百五十万左右的知识分子能接受唯物辩证法就很好了。今后学习都要自愿学习，自己研究，可以自愿结成小组。关于辩证法的课本要一年编一本，有些过时了，旧话要新讲。世界观是长期的问题。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五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要转过来为新社会服务，他们有的是旧的世界观，有新的世界观的只是一小部分人。很快的时间内就有很多人相信新世界观是不自然的，不可能的。估计十年之内，还会有三分之一多一些三分之二少一些的知识分子还会有旧的世界观，但这些人一是爱国，二是相信社会主义，这样就可以了。有些教授讲课讲马列主义，这是为了吃饭；但对自己讲，就说自己并不相信辩证法了。上海有一左翼教授说，解放以来“魂魄不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教社会科学的天天处于被动，历史要重写重教，在旧社会教书拿出来就行，一个课本可以教多少年，又没有这么多的会议。自

然科学家好一些。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五百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早已推翻，连民族资本主义也根本没有了，个体所有制也破坏了，有人说，私有制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产业工人有一千二百万人，党、政、军、教育和经济工作人员（厂长、合作社社长不在内）等共一千四百万人，合计二千六百万人。这一千四百万人不是直接生产的，真正直接参加生产的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其余所有的人都要向工人过渡的。解放时产业工人只有五百多万，苏联初期也只有三百五十万人。社会前进不决定于人数，农民有几亿，并不能解决社会的前进不前进，农民最后都要变为农业工人，合作社变为国营农场，这可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五百万知识分子的毛要附在一千二百万的工人阶级的皮上，毛脱离了皮是不行的，总要在一家吃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脚（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过去的经济基础，一经地震，他们就悬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一个，说小资产阶级出二元论，资产阶级出一元论，有人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舒服些，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不舒服，其实这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社会风气。如我原来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的社会风气影响，受资

产阶级的教育，我信过佛教，信过康德，信过无政府主义，这些都是唯心主义，因此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工商业者政治常识课本可学，但课本就是课本，思想还是思想，总有一部分人永远不会变的。条件反射，生孩子本来不痛的，就是社会舆论说会痛就痛起来了，要变痛为不痛，要医生做许多工作，要另外一种条件反射。不要相信所有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都相信共产主义。共产党内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相信共产主义而且不相信社会主义，他们相信的是民主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准备。原河北省副主席薛迅就反对统购统销，主张自由贸易。统购统销不搞不行，多搞也不行，明年准备除经济作物区以外，大多数合作社的粮、油、肉由合作社自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不信社会主义，他们搞社会主义是随大流卷进来的。我就不相信民主党派都信社会主义，有一大部分人不相信社会主义，但也不愿公开讲，共产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农民中一部分，工人中一部分（工人也成分复杂，由五百万发展到一千二百万，人心不齐），对社会主义成不成功，共产党行不行，还要看一看。社会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上了贼船（共产主义之船）没有办法，会不会翻船要靠天。这是很自然的。

过去作的是阶级斗争，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是如此，是人与人开战，人打人，人内部造反，花了几十年的精力，如从鸦片战争起算，已经百余年了。鸦片战争，就群众来说，是阶级斗争，对林则徐来说，是中国剥削者与外国剥削者的斗争。单就最近几十年说，从共产党成立起，已有三十多年，精力都耗在这上

面。有人说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就只会搞阶级斗争，共产党有术无学，这说对了一半。说我们有术无学，要看是什么学，譬如阶级斗争是一门大学问，不能说我们没有。这是经过多少年犯错误作检讨学来的。阶级斗争，以后还会有的，如同帝国主义战争，同资本主义国家办外交，都是阶级斗争性质的。现在进入另一种战争，就是向自然界开战，要懂得自然界科学，不懂怎么办？我在一九四九年的文章中就说过了，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要老老实实地学，可能要同过去学习阶级斗争一样，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党的成立到七大（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五）共花了二十四年时间，流了那么多的血，受了许多挫折才学会阶级斗争，现在学建设的新战争，要从头学起。能不能学会？肯定可以学会。有些党派专家多，如民盟、九三，民建也不少。总的说来，是新时代和新的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现在还在过渡时期，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巩固，打这个仗，要几十年，大概要二三十年。因为我们无经验，无干部。有苏联经验在前，可能我们比苏联略好或略差或一样。搞得怎么样，大家要看，我也要看，不能吹百分之百正确的牛皮。有人说共产党朝令夕改，特别是高教部。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会多就要变，今年基本建设就变了二十几亿。预算头年十一月就需要确定，提到人大常委，十二月就要发下去讨论，一月就要生产。提到人大是实际上的事后批准。缺少经验，需要学习，学自然科学，学计划经验，要积累经验，需要积累几十年经验，有些朝令夕改，是因为没有经验。我的脑子开始也有点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间才开始变化，找了三十几个部的同志谈话，以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十大关系，其中有五条属于经济方面的。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四个月在外，八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1]

（1957 年 7 月 1 日）

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略嫌不足的是编排技巧方面。编排的技巧性和编排的政治性是两回事，就光明日报说来，前者不足，后者有余。技巧性问题是完全可以改的。在编排技巧方面改一改，面目一新，读者是会高兴的。这件事也难，本报有志于此久矣，略有进展，尚未尽如人意。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编辑和记者中有许多人原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一下子改变，大不容易。大势所趋，不改也得

---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改，是勉强的，不愉快的。说是轻松愉快，这句话具有人们常有的礼貌性质。这是人之常情，应予原谅。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说来，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文汇报在六月十四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作自

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农民不是每年要锄几次草吗？草锄过来还可作肥料。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

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他们的报纸不少，其中一个叫文汇报。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它在六月十四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它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这里是一种什么逻辑呢？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就是文汇报的逻辑。文汇报至今不准备批判自己大量报道过的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刊发的反动言论，大量采用过的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新民报不同，它已经作了许多比较认真的自我批判。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文汇报的责任心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几时开始，照新民报那样做呢？欠债是要还的，文汇报何时开始还这笔债呢？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文汇报现在处在一个完全被动的地位。在新民报没有作自我批判以前，文汇报似乎还可以混过一些日子，有了新民报的自我批判，文汇报的日子就难过了。被动是可以转化为主动的，那就是以新民报为师，认真地照它那样办。

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这个名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累戒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共产党继续整风，各民主党派也已开始整风。在猖狂进攻的右派被人民打退以后，整风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

（1957年7月7日）

中央，并请转罗瑞卿、王任重[1]二同志：

我拟七月廿四日到重庆，廿五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游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如不可能，则于船出峡口时下水到宜昌，或径到沙市。然后乘船到武汉。此事，已与瑞卿谈过。请中央考虑批准[2]。如果中央同意的话，则（一）请瑞卿即带孙勇、韩队长[3]等能游者十人左右，到武汉与已试航试泳一次之船队再去试行，反复几次。（二）王任重同志不要去，我拟于七月中旬到武汉和省委谈一些问题。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57年7月7日给毛泽东复电说，关于在三峡游泳一事，常委提出先派人调查和试水，然后再作决定。后来，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

[3] 孙勇，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警卫科副科长。韩队长，指韩庆余，当时任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队长。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

（1957年7月9日）

一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

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2]，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例如北京约有800人，上海有700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50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700多人，报上点名的只有20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增加报纸上点名批判右派骨干分子的人数等问题的通知；本篇二是毛泽东关于这个通知给中央的便信。

[2] 在这个通知之前，中共中央在1957年6月29日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估计："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34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400人左右，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

百分之十左右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分子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16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中央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

二

中央：

起草了一个通知，请向彭真、维汉[1]一商，如认为可行，请即决定发出。

毛泽东
七月九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维汉，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电报[1]

（1957年7月9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阿尔维齐德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祝蒙古人民胜利地完成和超额完成1957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建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斯·阿尔维齐德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六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的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设计划。

祝中蒙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于北京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

（1957年7月9日）

三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百天了。这一百天，时局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百分之五十一的人，而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在我国六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应当承认这一点。这是每一次运动都证明了的。比如这一次，拿学生来说，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

放火烧身可不容易。现在听说你们这个地方有些同志后悔了，感到没有放得厉害。我看上海放得差不多了，就是有点不够，有点不过瘾，早知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让那些毒草长嘛，让那些牛鬼蛇神出台嘛，你怕他干什么呢？三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讲不要怕。我们党里头有些同志，就是怕天下大乱。我说，这些同志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就是没有看见大局面，就是没有估计到大多数人，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好人。不要怕群众，他们是跟我们一块的。他们可以骂我们，但是他们不用拳头打我们。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有什么可怕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有那么一些怕，又怕房子塌下来，又怕天塌下来。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1]，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的。至于房子，我看这个房子不会塌下来，刚刚砌了不久嘛，怎么那么容易塌下来呢？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地方，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同志，不要怕。怎么怕群众呢？怕群众是没有道理的。什么叫领导人物呢？小组长、班长、支部书记，学校里头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领导人物，还有柯庆施同志，我也算一个。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现在把火放起来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希望把我们的同志烧好。我们每一个

---

[1] 参见《列子·天瑞》。

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没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和科教文化艺术工商界人士座谈。

要定期“放火”。以后怎么搞呀？你们觉得以后是一年烧一次，还是三年烧一次？我看至少是像闰年、闰月一样，三年一闰，五年再闰，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搞两次。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锻者就是锤打，炼就是在高炉里头炼铁，平炉里头炼钢。钢炼出来要锻。现在锻要拿汽锤锻。那个锻可厉害哩！我们人也要锻炼。有些同志，你问他赞成不赞成锻炼，那他是很赞成的，“啊，我有缺点，很想去锻炼一下”。人人都说要锻炼一番。平常讲锻炼，那舒服得很，真正要锻炼了，真正要拿汽锤给他一锻，他就不干了，吓倒了。这一回

就是一次锻炼。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就是两股风来吹：一是大多数好人，他们贴大字报，讲共产党有缺点，要改；另外是极少数右派，他们是攻击我们的。两方面进攻的是一个方向。但是多数人的进攻是应当的，攻得对。这对我们是一种锻炼。右派的进攻，对我们也是一种锻炼。真正讲锻炼，这一回还是要感谢右派。对我们党，对广大群众，对工人阶级、农民、青年学生以及民主党派，右派给的教育最大。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些右派，这些右派是要打倒我们的。对这些右派，现在我们正在围剿。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么，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哪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

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战争、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要不要抗日？一派人是唯武器论，说中国的枪不够，不能抗；另外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还是可以打。后头接着来的解放战争，也是经过辩论的。重庆的谈判，重庆的旧政协，南京的谈判，都是辩论。蒋介石对我们的意见，对人民的意见，一概都不听，他要打

仗。打的结果，他打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经过长时期精神准备的。

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单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比如报纸，这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的。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是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搞自然科学的许多人，世界观是唯心论的。你要说水是什么东西构成的，那他们是唯物论，水是两种元素构成的，他们是照那个实际情形办事的。你要讲社会怎么改造，那他们是唯心论。我们说整风是要整好共产党，他们中间一些人说要消灭共产党。这一回暴露了这么一些情形。

右派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政策是这样，就是只听不说。有那么几个星期，硬着头皮，把耳朵扯长一点，就听，话是一句不说。而且不通知团员，不通知党员，也不通知支部书记，不通知支部委员会，让他们混战一场，各人自己打主意。学校的党委、总支里头混进来一些敌人，清华大学党委的委员里就有敌人。你这里一开会，他就告诉敌人了，这叫做“起义分子”。不是有起义将军吗？这是

“起义文人”。这一件事，敌人和我们两方面都高兴。在敌人方面，看见共产党员“起义”了，共产党要“崩溃”了，他们很高兴。这一回崩溃了多少呀？上海不晓得，北京学校的党员大概是崩溃了百分之五，团员崩溃得多一点，也许百分之十，或者还多一点。这种崩溃，我说是天公地道。百分之十也好，百分之二十也好，百分之三十也好，百分之四十也好，总而言之，崩溃了我就高兴得很。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所以，在我们方面，看见“起义”的，我们也高兴。哪一年清党、清团清得这么干净呀？他自己跑出去了，不要我们清理。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反过来了。我们把右派一包围，许多跟右派有联系但并非右派的人起来一揭露，他不“起义”了。现在右派不好混了，有一些右派起义了。我三月在这里讲话以后，一百天工夫，时局起了这样大的变化。

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思想斗争的成分有没有呢？有，但是我看政治斗争占主要成分。思想斗争主要还在下一阶段，那要和风细雨。共产党整风，青年团整风，是思想斗争。要提高一步，真正学点马克思主义，要真正互相帮助。有什么缺点，主观主义有一点没有呀？官僚主义有一点没有呀？我们要真正用脑筋想一想，写一点笔记，搞那么几个月，把马克思主义水平、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提高一步。

反击右派也许还要几十天，还要个把月。右派言论尽这样在报纸上登，今年登一年，明年登一年，后年登一年，那也不好办事。右派就那么多，右派言论登的差不多了，也没有那么多东西登嘛。

以后就阴登一点，阳登一点，有就登一点，没有就不登。我看七月还是反击右派紧张的一个月。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我们不是提倡和风细雨吗？他们说，和风细雨，黄梅雨天天下，秧烂掉，就要闹饥荒，不如急风暴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那个“乌鸦”他提此一议。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从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其实，我们从前搞思想改造，包括批评胡适、梁漱溟，我们党内下的指示都是要和风细雨的。世界上的事情总是曲折的。比如走路，总是这么弯弯曲曲走的。莫干山你们去过没有呀？上下都是一十八盘。社会的运动总是采取螺旋形前进的。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因为他

1957年7月，毛泽东在上海和科教文化艺术工商界人士座谈。

们来了个急风暴雨，这好像是我们报复他们。这个时候，右派才晓得和风细雨的好处。他看见那里有一根草就想抓，因为他要沉下去了。好比黄浦江里将要淹死的人一样，哪怕是一根稻草，他都想抓。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现在是暴雨天，过了七月，到了八月那个时候就可以和风细雨了，因为没有多少东西挖了嘛。

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我们中国历来如此，有正面的教员，有反面的教员。人需要正反两方面的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第一个大好的反面教员。从前还有清政府，有袁世凯，有北洋军阀，后头有蒋介石，都是我们很好的反面教员。没有他们，中国人民教育不过来，单是共产党来当正面教员还不够。现在也是一样。我们有许多话他们不听。所谓不听，是什么人不听呢？是许多中间人士不听，特别是右派不听。中间人士将信将疑。右派根本不听，许多话我们都跟他们讲了的，但是他们不听，另外搞一套。比如我们主张“团结——批评——团结”，他们就不听。我们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民主集中制，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他们又不听。我们讲要联合社会主义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他们也不听。总而言之，这些东西都讲过的，他们都不听。还有一条他们特别不听的，就是说毒草要锄掉。牛鬼蛇神让它出来，然后展览，展览之后，大家说牛鬼蛇神不好，要打倒。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这些话讲过没有呢？还不是讲过吗？毒草还是要出来。农民每年都跟那些草讲，就是每年都要锄它几次，那个草根本不听，它还要长。锄了一万年，草还要长，一万万年，还是要长。右派不怕锄，因为我讲话那个时候，不过是讲要锄草，并没有动手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并非毒草，是香

花，我们这些人是毒草，他们并不是应当锄掉的，而要把我们锄掉。他们就没有想到，他们正是那些应当锄掉的东西。

现在就是辩论我上边讲过的那三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没有经过充分辩论，党内没有充分辩论，社会上也没有充分辩论。像牛吃草一样，先是呼噜呼噜吞下去，有个袋子装起来，然后又回过头来慢慢嚼。我们在制度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政治制度也好，意识形态也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没有展开充分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就是展开辩论。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无产阶级讲白话，资产阶级也讲白话。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一个时候，两三个星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好像是利于资产阶级。我们讲硬着头皮顶住，也就是那两三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你们不是讲锻炼吗？有几个星期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就是锻炼，并非要把你塞到高炉里头去烧。

有许多中间人士动摇一下，这也很好。动摇一下，他们得到了经验。中间派的特点就是动摇，不然为什么叫中间派？这一头是无

产阶级，那一头是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中间派归根结底是好人，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资产阶级也想争取他们作同盟军，一个时候他们也有点像。因为中间派也批评我们，但他们是好心的批评。右派看见中间派批评我们，就来捣乱了。在你们上海，就是什么王造时、陆诒、陈仁炳、彭文应，还有一个吴茵，这么一些右派人物出来捣乱。右派一捣乱，中间派就搞糊涂了。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发源地都是在北京。北京那个地方越乱越好，乱得越透越好。这是一条经验。

刚才讲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像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至于飞机、大炮，那大概是《文汇报》之类吧，还有《光明日报》，也还有一些别的报纸。有一个时期，共产党的报纸也登右派言论。我们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论，要照原样登出来。我们运用这种方式，以及其他各种方式，使广大群众从正反两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报》《文汇报》的工作人员，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们过去分不清什么叫无产阶级报纸，什么叫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一个时候，他们的右派领导人把报纸办成资产阶级报纸。这些右派领导人仇恨无产阶级，仇恨社会主义。他们不是把学校引到无产阶级方向，而是要引到资产阶级方向。

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不要改造？他们非常之怕改造，说改造就出那么一种感，叫做“自卑感”，越改就越自卑。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应当是越改造越自尊，应当是自尊感，因为是自己觉悟到需要改造。那些人的“阶级觉悟”很高，他们认为他们本身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他们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

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经过踌躇、考虑、不大愿意、摇摆这么一些过程，总归是要走到愿意改造。越改造就越觉得需要改造。共产党还在改造，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你说整了这次风就不整了？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有那么一条，他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共产党还要整风，资产阶级和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不要整风？不要改造？那就更需要整风，更需要改造。

现在各民主党派不是在整风吗？整个社会要整一整风。把风整一整，有什么不好？又不是整那些鸡毛蒜皮，而是整大事，整路线问题。现在民主党派整风的重点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我看整得对。现在共产党整风的重点不是整路线问题，是整作风问题。而民主党派现在作风问题在其次，主要是走哪条路线的问题。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诒、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做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哪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共产党也有个路线问题，对于那些“起义分子”，共产党、青年团里头的右派，是个路线问题。教条主义现在不是个路线问题，因为它没有形成。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教条主义路线问题，因为它形成制度，形成政策，形成纲领。现在的教条主义没有形成制度、

政策、纲领，它是有那么一些硬性的东西，现在这么一锤子，火这样烧一下，也软了一点。各个机关、学校、工厂的领导人，不是在“下楼”吗？他们不要那个国民党作风和老爷习气了，不做官当老爷了。合作社主任跟群众一起耕田，工厂厂长、党委书记到车间里头去，同工人一起劳动，官僚主义大为减少。这个风将来还要整。要出大字报，开座谈会，把应当改正的，应当批评的问题都分类解决。再就是要提高一步，学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好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道理的，很热情的，很聪明的，很勇敢的。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两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纪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准人家讲话，本来不对的也不准批评。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罪，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现在要给什么人小鞋子穿呢？现在我们给右派穿。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有些同志怕群众跟怕水一样。你们游水不游水呀？我就到处提倡游水。水是个好东西。你只要每天学一小时，不间断，今天也去，明天也去，有一百天，我保管你学会游水。第一不要请先生，第二不要拿橡皮圈，你搞那个橡皮圈就学不会。“但是我这条命要紧呀，我不会呀！”你先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游嘛。如果说学一百天，你在那个浅水的地方搞三十天，你就学会了。只要学会了，那么你到长江也好，到太平洋也好，一样的，就是一种水，就是那么一个东西。有人说在游泳池淹下去还可

以马上把你提起来，死不了，在长江里头游水可不得了，水流得那么急，沉下去了到哪里去找呀？拿这一条理由来吓人。我说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我们的游泳英雄，游泳池里头的教员、教授，原先不敢下长江，现在都敢了。你们黄浦江现在不是也有人游吗？黄浦江、长江是一个不花钱的游泳池。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骂群众，群众是不能骂的呀！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学生群众，民主党派的多数成员，知识分子的多数，你不能骂他们，不能跟群众对立，总要跟群众一道。群众也可能犯错误。他犯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好好讲道理，好好讲他不听，就等一下，有机会又讲。但是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1]，

---

[1] 参见《左传·信公十四年》。

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帝国主义跑了，他们的产业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所有制消灭了，土地都归农民，现在又合作化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了，基本上（还没有完全）变成社会主义的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了，尽管这个制度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

一百天以前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基础了，他丧失了原来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他除非落在新皮上。有些知识分子现在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

上八下。他在空中飞，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我说，这些人叫“梁上君子”。他在那个梁上飞，他要回去，那边空了，那几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老家没有了，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你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研究一下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他不，他也晓得那边空了，但是还是想那个东西。我们现在就是劝他们觉悟过来。经过这一场大批判，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

那些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应当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我说，这种人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就犯错误。现在不去讲那些右派知识分子，那是反动派。中间派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棵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什么孙大雨那一套，他们一看就知道不对。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什么叫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不要脱离群众，我们跟群众的

关系，就像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你对阎王说，我是五张皮的维护者，我很有“骨气”，共产党、人民群众斗争我，我都不屈服，我都抵抗过来了。但是你晓得，现在的阎王也换了。这个阎王，第一是马克思，第二是恩格斯，第三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的阎王大概还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顽固不化的右派，一百年以后也是要受整的。

在青岛会议上的讲话

（1957年7月18日）

一

现在是过第三关，过第三关顶少还要十年。历史上包下来一批王八蛋，一路来敲锣打鼓，拥护了七年是假的，只是到了现在，他们就翘尾巴了。每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政协会议，总是要对付他们一场。通过法案，他们都举手，下去视察，他们就找岔子，并且搞组织活动。估计到他们有一部分人随时会叛变，但历来都没有暴露他们的办法。现在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整风，右派分子的头子就翘尾巴，反共反社会主义了。把孙行者的尾巴打下去，花果山的猴子就不神气了。抓住改造，逐步把领导权转到左派和中间派手里。各省市基层把民主党派、教育界的领导权拿过来。学校实行党委制可以考虑，但我们必须领导学校，领导权过去是不巩固的，有一部分领导权是在人家手里，缺乏战斗力，一时搞得天昏地暗，例如清华大学党团员占百分之八十，但党的领导并不巩固。科学技术界、新闻、艺术、出版、教育、卫生界，都有左中右，我们不占领阵地，就搞不成社会主义。总之，要搞意识形态，要搞知识分子。过去搞五大运动、三大改造，没有好好搞教育界。过去省委书记怕见大学教授，现在见了一下，见出名堂来了。再摸一个时

期，就更清楚了。

敌我双方对政治形势的估计都不大对头。敌人方面对形势估计错了，我们对自己的估计也不是那么正确，在鸣放期间，觉得我们的力量比较小，对工农兵——我们的基础估计不足。现在看来，在工农党团员中只有少数，大部分是好的，我们也为假象所迷惑。

多次人民代表大会，政协都要斗一场。名义上在台上参加政权，大体上顺着我们，实际上是反对派，拥护是假的。到去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提出的“两百”方针，加上匈牙利事件，他们开始翘尾巴了。首先看出这个问题的是陈□□等几个同志。说百花齐放可以，但放得不妙，放出牛鬼蛇神了。周恩来二月回来以后，罗隆基公开批评总理的外交报告，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有几个学校闹事，工厂闹事，农村闹事，以为形势不妙了，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就是大学也是九个指头是好的，只有一个指头不好。反右只有一个多月，就看出来了。民主党派打他百分之二十，也还有百分之八十，经过六月，七月半个月，我们就完全清楚了。凡事皆要加以分析。分析了就有底了。这一下我们的心就放下来了。

敌人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工农估计不足，对左派也估计不足，这一点右派同我们一样。在中国搞匈牙利是搞不起来的。放，还应当有决心，不然就放不起来。

还有，广播、电话、电报、邮电要抓住，不让民主党派去发展。民主党派要抓住其中的右派，狠狠地打，在打的当中，建立领导权。抓住这个时期搞他一年。如果搞到明年六月，全国人大改选，我们假如再提他们的名，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的。经过反右派，一定要换掉一大批。地方，明年年初就要开始政治改组，三月各省把改选搞完。我们这样估计：打算打一年。现在报纸上这样积

极地吹，总吹也不行，还要搞点别的。右派分子虽然多，但头儿已经打了，打右派主要是打头子，把头子打了，就不好作怪了。以后采取剥笋政策。其他的人，哪怕也有些错误□他是领头□□，□□□，□□□怎么打法？□□□反人民，不公开反共不闹事，但死也不改。右派分子人数虽少，但不可小看，对右派分子要剥笋。

知识分子多数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工农事业不那么有感情。但他们有这样种种倾向，只要他们今天倾一点，明天倾一点，再过十天工夫就改造了。山东提议：要反右派的事情向工人农民作宣传。地主、资产阶级好像都在替工人、农民说话。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祥）。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

合作化没有希望？有这样一些富裕中农，本想叫他们慢慢进社，也挡不住，进来了又想退出去。是否让他们退出去？从阶级路线来看，少数不愿在社的，可以让其退出。山东临沂地区一百多万户，退了一万户，过去闹事最多，现在是全省比较太平的地方了。退出去的不要苦他，也不扣右派帽子，将来愿意来的就来，要退的大体上有百分之一，愿意退的就允许退。今年秋天下这个决心看如何。

农村、工厂整风如何整法，要把解决的问题收集一下，准备意见。中央拟于八月十五日到二十五日开一次中央全会，地委书记也参加，研究整风与体制问题。党代表大会可在一、二月底到春节前召开。

整风问题，头一步以政治为主，结合思想（敌对阶级的、内部的）；下一步以思想为主，结合政治。这里讲的政治，主要指反右派斗争。其实，同敌对阶级的斗争，多数人向我们提的意见，如傅

鹰，和我们不是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是政治关系。如权限下放，也是政治关系。但像张轸那样的家伙，写信批评周、□，就要狠狠批评，要登报。这些人要告诉他好好重新做人，留一碗饭吃。民主人士的职务要重新安排，代表、委员、部长、厅长、局长，在这次运动中有功劳的要上台，右派要下台。他们由长期共存，变为短期共存，由互相监督，变为无权监督，自己否定自己。

有职无权，人事制度，评级评薪都是政治性的问题，调整关系的问题。

每天都有高潮低潮，上报的人数要增加，并且要各行各业都反映到报上去，这样就不单调。下一步整风，思想要搞得深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也要费点时间，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

今后反右派斗争就是两个字：一叫深，一叫改。对内和，对敌狠。徐州地委有百分之五十的基层干部是好的。另外百分之五十分三类：轻微错误的有百分之二十，比较严重错误、手头不干净的有百分之二十九，严重违法乱纪的只有百分之一。前两类可以主动下楼。办法是开开干部会，肯定成绩，检查错误。

什么叫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群众路线四个字。总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倾听群众意见，加以分析。好像游水一样，要顺水性，或者说是鱼水关系。干部脱离群众，就不能活。过去军队在战争中都是搞三大民主，为什么现在工厂、农村里搞三大民主呢？军队是拿着枪的，都不损害干部威信，为什么县、区、乡干部不能这样做呢？对干部一个是撑腰，一个是帮助。毛病要改，又不要伤害干部。大家批评一下，一篇检讨就可以过关，要教会基层干部过关。农村、工厂不能采取机关、学校的办法。而采取三级干部会、

社员代表会、支部大会、职工代表会等，就是陈伯达同志的办法。陈伯达在福建的办法，开始区、乡干部都不赞成，后来大部分的干部选上了，选举不要党团员保证，而是充分酝酿，群众提名。各省可搞点经验。

工厂干部要下车间，还要到宿舍。

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该是讲道理的关系，不是我打你通，我压你服。共产党不怕群众。实行民主的结果是增加威信，而不是降低威信。过去军队实行民主，就打胜仗。

反革命搞得厉害的地方，要镇压。肃反不彻底的，要杀一些人。少杀不是不杀，杀少数人是完全必要的。浙江仙居、临海两县，合作社解散百分之八十。每年准备一百万人闹事，或者还要准备多一点。

河南长葛县修飞机场赶走农民，打伤四个人，这是国民党作风残余。有些国民党作风残余的是合乎实际的，一定要整好，虽然是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彻底整好。这次整风，要想一次整好，一劳永逸，我才不信。现在要把闹事的数目扩大一点，六亿人民每年准备有三百万闹事，百分之零点五的人闹事，经过几年右派一闹，我们摸了底，就不怕了。过渡时期有个不稳定的时间，再有五年半能把社会秩序大体稳定下来，就是好的。总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陈伯达讲的不是狭隘经验。

二

北京打击了一千五，全国要打出十个北京来。大树是有根的。

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要好好交代地委书记、县委书

记的斗争策略。

大字报是好东西。为什么我们不怕大字报？因为我们总是多数。

工厂一定不要妨碍生产，哪个地方烂，崩溃越多，哪个地方就越好办事。省要派有经验的干部下去，硬着头皮，大放大鸣两个星期，只听不说。

每个五年计划搞两次整风，一大一小。

不要搬石头，现在我们还靠这些石头。粮食年年增产，但是越来越少。去年动用库存七十亿斤，今年一定要搞八百五十亿斤。穿也是大事，现在折半了，越搞越少。怎么得了？

有反必肃，抓起来再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下。

手工业社脱产人员太多，浙江兴登县七万人有三千五百多官，真是太多了，应该减三千，留五百。工厂非生产人员也太多，占百分之三十。苏联百分之二十五，美国只百分之三至五，现在要考虑。多的人要养起来，几年内转到生产中去。用节约下来的钱扩大经济事业。

整风范围扩大，党、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工商联，学校，艺术界，经济事业机关，合作社都要整。

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

共产主义者协会要大于共产党，中央领导同志去当会长。

地、富、反革命摘了帽子的，要调皮再给戴上。搞个劳动教养条例。死刑不要轻易废除。地、富、反革命的选举权，不要给得太早了。不搞大，只搞小，这些关口要卡住。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反右倾思想，右派，极右派，合乎人情，顺乎天理。各省市对民主党派，不管其中央，予以腰斩。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7年7月20日）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着兄弟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维护和发展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在保卫世界和平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中、波两国总理的互相访问，进一步巩固和加深了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促进了中、波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

祝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保障欧洲和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阿达姆·拉帕茨基的电报。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世界和平事业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般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于北京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

（1957年7月）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

---

[1] 这是毛泽东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在这个会议上印发过，同年8月和9月，又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

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右派，包括混入共产党内和青年团内的一些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党猖狂进攻，因此必须充分揭露，并把他们开除出去，借以纯洁党团组织。

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即就商、学两界而论，在右派猖狂进攻时期，多数人可以一时被蒙蔽，发生动摇。几个星期以后，反击右派展开，多数人也都清醒了，都过来了。所以，这两界的多数人，最后也是可以信任的，他们是可以接受改造的。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

过低，对资产阶级右派力量估计过高，不少同志曾经犯过这种错误。现在地县区乡及工厂干部中还有许多人是这样，应当好好说服他们，不要低估了自己方面的力量，不要夸大敌人方面的力量。农村中，地主、富农正在被改造；其中，一部分人还在捣乱，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富裕中农，多数愿意留在合作社，少数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应分别对待。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去做工作。最近几年，三百五十亿斤征粮和五百亿斤购粮，必须坚决收到，不能短少。按照年成丰歉，可以有所调节。农村中，因为逐年增产，缺粮户逐年减少，因此销粮应当逐年减少。城市销粮过多之处，也应酌量减少。这样，国家的粮食库存才有可能逐年增加，以备可能发生的紧急之需。如果八百五十亿斤左右的粮食收不到

手，则将牵动市场物价，牵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并且无法应付紧急情况，这是很危险的。今年秋收以前，必须在农村中进行一次反对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斗争。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提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都由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在不违背中央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地方政法文教部门受命于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不得违反。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大谈特谈，习以为常，也就见怪不怪了。把人民内部矛盾想通，说开，正确处理一批问题，收了效果，得了经验，再也不怕了。

再说一遍，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军队多次整风，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时班上建立互助组，实行官兵、军民打成一片，禁

止打人骂人，禁止枪毙逃兵。因此士气高涨，战无不胜。手执武器的军队能够这样做，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

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除了叛徒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这两种人，在整风中保护一切党团员，用大力用诚心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缺点，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水平。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一定要有不怕困难和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去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一定要克服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则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有一些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和坚持错误的人，在累戒不改的情况下，党委应当予以正当处理，重者绳之以纪律。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在半年到一年内，要亲身研究一个合作社，一个工厂，一个商店，一个学校，取得知识，取得发言权，以利指导全般工作。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也应这样做。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

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作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

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

[1] 参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九章第五节。

中央、省市两级，在整风、批判右派和争取中间群众这三个任务方面，取得了经验，是一件大事。有了这个经验，事情就好办了。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这样一来，豁然开朗，群众路线对于许多人说来就不是一句假话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和整个党委，必须把这个伟大斗争完全掌握起来。必须把民主党派（政治界）、教育界、新闻界（包括一切报纸和刊物）、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的政治改造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

批判右派这件事，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震动极大。应当看到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种倾向，各类人程度深浅不同。应当看到，现在他们对于真正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真正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基本点虽然还只是一种倾向，但是，只要有了这种倾向，他们就从资产阶级立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开动了第一步。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这些人在过去，并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个革命，对于他们，是突然发生的。共产党员中，也有一些人是这样。批判右派

和整风，对于这些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将是一个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不要怕惊涛骇浪，硬着头皮顶住。就一个单位来讲，大约两三个星期，洪峰就过去了，就可以转到反击右派的新阶段。在两三个星期内，各单位的领导者对于右派的猖狂进攻，硬着头皮，只听不驳，聚精会神，分析研究，聚集力量，准备反攻，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八月，请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一级和地委一级的第一书记，抽出一段时间，摸一下农村中整社、生产、粮食等项问题，以备九月中央全会之用。四十条农业纲要，请你们逐条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

1957年7月21日，毛泽东等在青岛第二浴场。

1957年8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青岛第一体育场与青岛市级机关部分干部和驻青部队团以上干部合影。

中央关于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1]

（1957年7月31日、8月1日）

一

刘、邓[2]：

此件请提政治局通过，发出。省属市委提名是否恰当，请酌。

毛

七月卅一日

二

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各地委；哈尔滨、长春、沈阳、抚顺、鞍山、旅大、济南、青岛、南京、杭州、广州、长沙、重庆、成都、兰州、西安、太原各省属市委：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通知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决定于今年九月下半月召开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届第三次中央全体会议。请各省委、中央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上开省属市委选派代表一人参加，最好是第一书记。省级第一书记为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者，不再选派代表。议程主要为：（一）整风问题；（二）农村问题。特此通知，请各有资格到会的同志们在会前对此两项问题加以研究为盼。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1]

（1957年8月1日）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一）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实事求是地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二）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三）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给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指示。

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四）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实事，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以强词夺理。（五）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人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六）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七）深入挖掘时期，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中央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对范仲淹[1]两首词的评注

（1957年8月1日）

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

---

[1]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吴县市）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

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1]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

[1] 李讷，1940年生，毛泽东之女。

给林克[1]的信

（1957 年 8 月 4 日）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一九一七年）[2]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八月四日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做什么?》，今译为《怎么办?》。《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一文，1917 年 4 月 7 日发表于苏联《真理报》。

给刘松林[1]的信

（1957年8月4日）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

转学事是好的，自己作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作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八月四日

---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11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5年刘松林去苏联，在莫斯科大学数力系读书。1957年暑假回国办理转学手续。同年10月转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给刘松林的信

（1957年8月9日）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八月九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电报[1]

（1957年8月13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同志：

当朝鲜解放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战后三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在国家的恢复和建设事业中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而感到欢欣。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维护朝鲜停战协定和为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不仅为全体朝鲜人民所拥护，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科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的电报。祝贺朝鲜解放十二周年。

而且获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祝朝鲜人民在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和独立，在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于北京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957年8月15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欣逢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二周年，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热诚的祝贺。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深厚友谊，通过阁下去年对中国的友好访问，已经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增强，祝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加强民族团结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国家昌盛和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的修改[1]

（1957年8月18日）

一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社会主义已经基本上代替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就丧失了前一个时期的积极性的一面，变成了根本反动的东西，因此，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人，即资产阶级右派，也就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当大力争〔取〕过来。另一小部分人在政治上已经抛弃了资本主义立场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成为左派。左派在增多，有的达到百分之十，这是可喜现象。但中间派仍占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而在从资本主义立

---

[1] 本篇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场到工人阶级立场的长距离路程中前进了第一步；但是另一方面，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对于交出企业，对社会主义，对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并不甘心和心服，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不过多数人口里不说罢了。但他们是动摇的，可以进步的，大概再有五年，他们将大进一步。

二

鉴定工商界的右派分子，除了根据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划分左、中、右标准的建议”以外，在时间界限上，应当以今年鸣放以来的反动言行为主，结合去年高潮以后的言行，除了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许多极右分子以外，不要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因为工商界在实行企业合营以前，是立足于合法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的资本主义立场是自然的和合法的，而在高潮到来以后，由于实行了全行业合营，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确已跨进了一大步，再以高潮以前的言行为依据，便不得人心和不利于争取多数。这一段时间只有一年多，许多人从旧立场到新立场，转不过弯子来。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可以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并大进一步。

给达赖喇嘛[1]的信

（1957年8月18日）

亲爱的达赖喇嘛：

你托阿沛·阿旺晋美[2]带给我的信收到了。我很高兴。阿沛我也见到了，并且由周总理和他谈了话。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你领导下工作是做得好的，有成绩的。去年对实行民主改革提得早了，工作机构也太大了，这是缺点。现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改革，并且把过大的机构作了精简，这就改正了缺点。

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对缺点，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正确分析，积极改正，记取经验，继续前进。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你在访问印度期间，拒绝了那些逃亡国外的反动分子出的坏主意，是做得很对的。他们大概还要找机会进行反动活动，要教育僧俗官员对他们保持警惕。

西藏地方政府和堪厅间的关系问题，希望都能从团结愿望出发，双方好好协商加以解决。

---

[1]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西藏宗教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2] 阿沛·阿旺晋美，当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很惦念你，希望你多注意健康，并多来信。

祝你愉快！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关于同意发表《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1]一文的批语

（1957年8月19日）

退人民日报吴冷西[2]同志。看过，可用。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指《人民日报》送审的陈其通、陈亚丁写的《克服教条主义，投入反右派斗争》一文的清样稿。1957年8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同年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作了自我批评。当时马寒冰已经去世，鲁勒正在国外。

[2]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7年8月21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格·毛雷尔同志：

当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欢欣的心情注视着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罗两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彼·格罗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斯托伊卡、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扬·格·毛雷尔的电报。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更加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祝贺马来亚独立的电报

（1957年8月30日）

马来亚联合邦最高元首端古·阿卜杜勒·拉赫曼陛下：

欣闻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谨向陛下和马来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马来亚联合邦繁荣和马来亚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957年8月3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范文同同志：

当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1]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

---

[1] 指1954年7月20日到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以及《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这些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恢复和平，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尊重这三个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祝越南人民在为祖国的独立、和平和统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越两国间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57年9月）

此件可用。略有修改。

毛泽东

---

[1] 指中共中央1957年8月26日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第四次修改的草稿）。指示说：正确执行贫农和中农之间的互利政策，曾是我国顺利完成农业合作化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今后巩固合作社的一个重要保证。实现合作化以后，互利政策的重点，主要是经过合理的生产分工和合理的分配，恰当地调节各社员之间，尤其是贫农和中农之间的收入问题。指示就认真贯彻执行互利政策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对于可能减少收入的社员，首先是对于贫农、下中农的困难户，应该在劳动生产分工和经营社内及家庭副业方面，给以适当的照顾。二、适当地调整入社后减少收入的非农业户的工作，使能得到合理报酬，增加收入。三、对某些特殊生产资料的原主，可以部分或全部暂不入社，仍归原主经营，也可以入社后仍包给原主经营，实行比例分益，在包工包产上给予适当照顾，使他们能增加一部分收入。四、成片的果树、林木一般应该由社统一经营，实行比例分红，已折价入社的，如社员意见很多，也可改为比例分红。五、对于入社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多余的折价款和社员的投资，应按期归还，并付给应得的利益，折价过低者，则按入社时的一般市价作适当的调整。六、多民族地区的民族联合社，要注意特别照顾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社员的经济利益。七、应允许社员家庭饲养家畜，并完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如要使用社员的耕畜，应付适当租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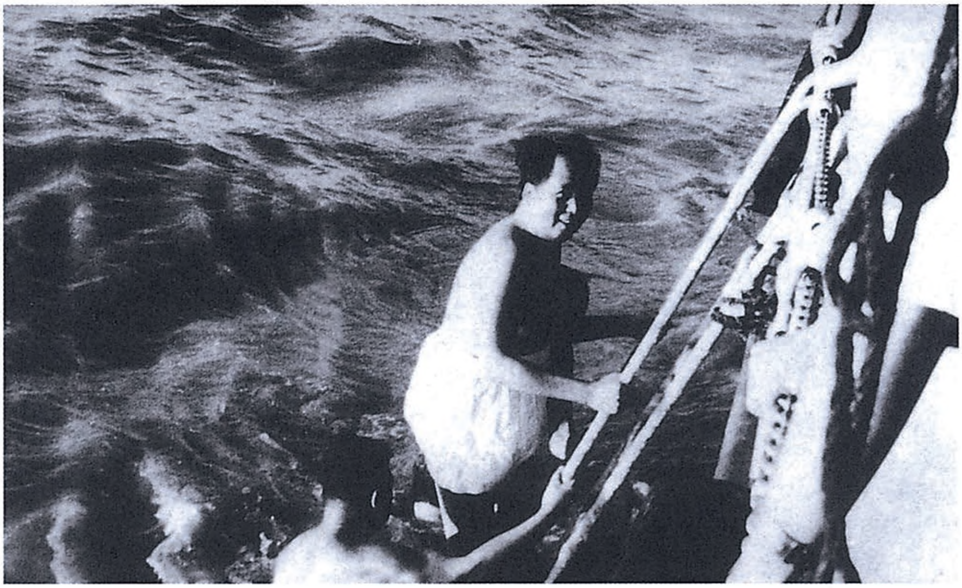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国棉四厂。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在国棉四厂看大字报。

1957年9月6日，毛泽东离开武汉国棉四厂步入码头，准备再一次畅游长江。

1957年9月，毛泽东步行视察武汉长江大桥前看大桥画册。

1957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和群众交谈。



1957年9月，毛泽东在武昌造船厂码头乘船，于长江大桥5号桥墩下水游泳。

毛泽东游泳后准备上船。

1957年9月10日，毛泽东看密云水库工地小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7年9月8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卢卡诺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保加利亚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十分欢欣的心情关注着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同伟大的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亲密的合作下，在建设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

一年以来，中保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我们相信，这种友好合作的发展将一定加强以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达米扬诺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于哥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卢卡诺夫的电报。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并且对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祝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9月12日）

一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二

拥护社会主义的，不但有无产阶级，而且有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其人数达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反对的，或者暂时不赞成的，或者勉强赞成而实际不赞成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社会主

---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195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义是当前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意志和最高利益，所以反社会主义就是反人民。“反共”“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这三件事本来是一种必然的联系，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联在一起，或者可以任意不联在一起的。

1957年，毛泽东在聂荣臻、贺龙、罗荣桓等陪同下观看空军飞机表演。

对《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9月15日）

一

退胡乔木[2]同志。此件可用。请送刘、邓、伯达、定一[3]再加斟酌。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二

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1956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为查找《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写的批语[1]

（1957年9月15日）

林克[2]：

请在杭州找一本《哲学研究》本年第四期。

毛

十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7年9月15日《杭州日报》刊登的反右派论文摘要《哲学思想中有哪些修正主义观点》旁边。这篇摘要摘自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反对哲学思想中的修正主义》一文，原载《哲学研究》1957年第四期。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给陈云[1]的信

（1957年9月16日）

陈云同志：

八月廿八日的信收到。你父亲[2]入党时间及其工作情况，我都不清楚，因为那个时期我不在湖南。你们努力工作，帮助你母亲[3]治病，甚慰。请代问你母亲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

---

[1] 陈云，当时在湖南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员。

[2] 指陈昌，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1929年年底，受中央军委派遣去湘鄂西协助贺龙工作，途中被捕，1930年2月被杀害。

[3] 指陈昌的夫人毛秉琴，早年同毛泽东熟识。

在上海听取整风情况汇报时的指示

（1957年9月17日）

要青年学生打杂扫地，也不是一件坏事啊！我看对青年一定得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青年不再轻视劳动，要愿意参加体力劳动，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

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会上的讲话

（1957年9月19日）

副总统阁下，

同志们、朋友们：

印度共和国副总统、印度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拉达克里希南博士来到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我们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感谢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伟大的印度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印两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好朋友，好邻居。我们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使我们的传统友谊有了新的基础，新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都在建设自己的国家，都在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为了这些共同的目标，我们两国进行着亲密的和友好的合作，中印两国十万万人民团结在一起，是一个伟大的力量，是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殖民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企图扭转这个形势。但是，正像去年埃及人民和现在叙利亚人民向全世界所表明的那样，殖民主义者的一切阴谋和挑衅一定会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

中国人民历来对勤劳、智慧的印度人民怀着极大的敬意。我们

庆贺印度人民在和平建设中的每一个成就。我们敬佩印度人民对于国际和平事业的出色贡献。我们特别感谢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的正义支持。我们毫不怀疑，印度将在世界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提议，

为印度共和国的繁荣和印度人民的幸福，

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世界和平，

为印度共和国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阁下的健康，

为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沙德阁下的健康，

干杯！

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9月20日）

一

即送小平同志：

此件很好。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

毛泽东

九月廿日上午一时

二

我们应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使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

[1] 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准备向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时加写的一句话。这篇报告1957年10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关于转载上海工商界批评高方的报道[1]的批语

（1957年9月25日）

乔木、冷西[2]同志：

批评高方，写得很好，请转载在人民日报上。以后请鼓励这样有充分说服力的批评。现在的批评中，有很大一部分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提倡浮夸，很不切实。右派浮夸，左派不应当浮夸。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

[1] 指1957年9月22日《新民报》晚刊刊登的《摆事实，讲道理，比过去，看现在——工商界舌战右派高方》的报道。1957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作了转载，题为《这次辩论进行得好——介绍上海工商界对右派分子高方的说理斗争》。高方，当时任上海统益纱厂总管理处副总经理。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关于印发《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1]的批语

（1957年9月30日）

小平[2]同志：

办公厅印发的《全会各小组活动情况》，只发给“各组长”，使多数人不知道别组的意见。似宜发给到会的一切同志。**第一星期的**，**应重印补发**。如你认为可行，请即办。

毛泽东

九月卅日

---

[1] 这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印发的一种简报。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七绝·观潮[1]

（1957年9月）

千里波涛滚滚来，
雪花飞向钓鱼台[2]。
人山纷赞阵容阔，
铁马[3]从容杀敌回。

---

[1] 观潮，指观赏浙江省钱塘江口的涌潮。钱塘潮以每年阴历八月十八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毛泽东在1957年9月11日（即阴历八月十八），曾乘车去海宁七星庙观潮。

[2] 钓鱼台，即钓台，在钱塘江中段的富春江边，相传为东汉严光（子陵）隐居垂钓处。

[3] 铁马，配有铁甲的战马，借喻雄师劲旅。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钱塘江涌潮袭来时，波涛汹涌，如闻“十万军声”。

国庆之夜会见各国贵宾时的谈话[1]

（1957年10月1日）

毛主席同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托菲克·雅兹谈话时，祝叙利亚独立、繁荣和强大，祝叙利亚人民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人们高兴地看到叙利亚、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团结，所有阿拉伯人民都要团结起来。”毛主席还请托菲克·雅兹转达他对叙利亚总统、总理和一切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们的问候。

叙利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对中国人民对叙利亚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还转达了叙利亚总统对毛主席的问候。他说，希望叙利亚总统能有一天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说，很可能。

在同埃及客人们会见的时候，毛主席请客人们转达他对纳赛尔总统的问候，并祝埃及人民好。

毛主席同美国青年谈了话。他说，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能够在和平中友好往来。

---

[1] 这是新华社发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会见各国贵宾》的新闻报道中的一段。

195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庆祝国庆节的群众游行队伍。

1957 年 10 月 1 日晚，毛泽东、朱德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卡达尔在天安门城楼上观赏国庆焰火。

给林克[1]的信

（1957年10月2日）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漠〈寞〉吧？

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2]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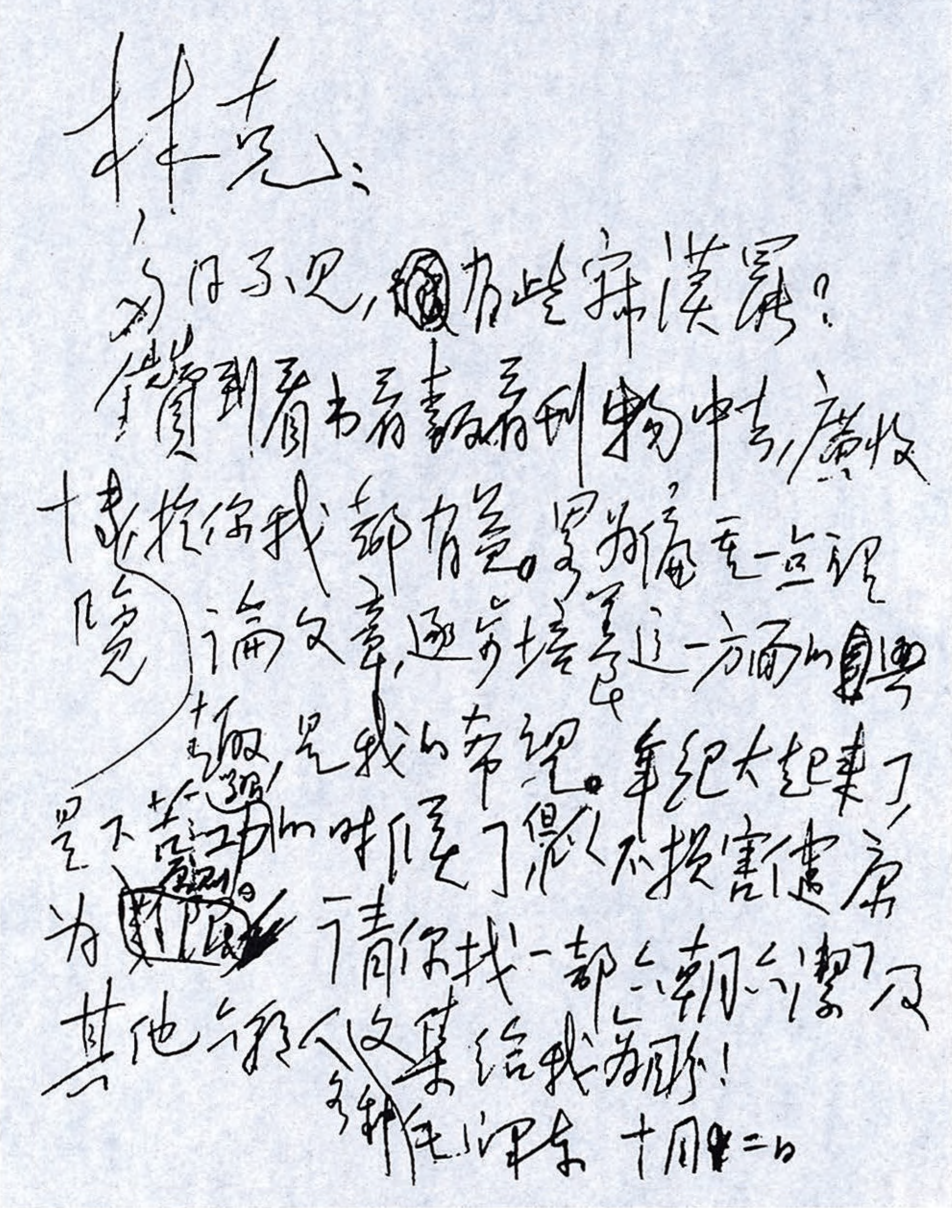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月二日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六朝文絜》，是清代许梿选编的一本骈体文集。该书选录晋至隋的骈文72篇，大多是篇幅短小、语言精美的抒情写景名作。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罢？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逻辑学这一方面的要搞通，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不要加以限制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度。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絜》及其他六朝人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十月二日

毛泽东致林克信的手稿。

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1]

（1957年10月3日）

一

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基础，工业不发达，国防因而不巩固。我们是依靠政治的。过去是靠政治战胜敌人的，那时敌人很强大。现在敌人更强大，因为我们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

二

斯大林在后期犯了一些错误，那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应把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与整体的、长远的现象区别开。错误和缺点，当然会引起不愉快，不愉快的事我们也遇到过。但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垮法西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等是主要的。从这方面看，就可以想得通了。尽管苏联有缺点，但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主要力量。我赞成你[2]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阵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人多，但在帝国主义面前是弱国。他们有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波兰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指波兰国防部部长、波兰访华军事代表团团长斯彼哈尔斯基上将。

氢弹，他们侵略我们，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战。他们想消灭我们，也想消灭波兰和苏联。

三

事情是不容易的，在我们这些国家里，革命尚未最后胜利，还要相当长时期才能解决。今后的事，就由我们自己负责了。究竟如何？方针政策是否对？十年十五年以后才能证明。以后的人来算我们的账，也许我们还活着，自己来算这笔账。所以要谨慎小心，随时总结经验。我们欢迎你们来中国看看，对情况可以分析。对中国的缺点、错误要足够地估计到，同时也足够地估计其正确的方面、有利方面。我们也研究你们的经验。但我们的经验较之苏联不完全得多，它有四十年，我们要好好研究。丢开个别的不愉快，心平气和就好办事，同苏联同志也好相处。在我们这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尚未解决，在国际范围内更是如此。我们相信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这是不可动摇的，但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是两个问题。我们需要争取和平时间，如果二十年内无战争，事情就好办了，中国不仅能打游击，而且可以进行正规战了，也许那时候帝国主义就很难打了。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的电报[1]

（1957年10月6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奈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之际，我们谨向你们和全体德国人民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深切地关怀着德国人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为建立统一、和平和民主的德国，为完成国内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所进行的艰巨的斗争，并且为德国人民所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一年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奈斯·狄克曼、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电报。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八周年。

来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相信：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有利于中、德两国人民，而且必将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有力的贡献。

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月六日

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7年10月9日）

这次会议的评价：

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

我们的革命如此丰富，工作进展异常迅速。不论革命工作、建设工作都是如此。

最好每年开一次这样的会议。

整风：

大胆的放，彻底的放，坚决的放。

大胆的改，彻底的改，坚决的改。

一九五七年中国革命创造了一个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革命的内部〈容〉找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形式。从此无论大是大非、小是小非的问题，无论是革命的问题、建设的问题，都可以用辩论的形式去迅速地解决。发挥群众的主动性、责任心，克服领导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领导与群众就容易打成一片了。从此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

农业：

四十条[1]大约几天之后，即可改好发出，请你们在农村中组织一次很好的鸣放辩论，发扬正气，驳倒歪风。

省、地、县、区、乡、社都要搞农业规划。“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整风生产两不误。又要领导整风，又要领〔导〕生产，生产就要有规划。

何时可以做好一个长远规划？已有几年经验了，今冬明春是否可以做好？明年五一以前做好？或者明年做好？只有十年了，要完成“四、五、八”[2]。

六级规划都要在农村中鸣放辩论，是否要分期分批，不然恐农民吃不消。

粮食有了底了，以后将好办得多，准备对付大荒年。

国家积累外，合作社〔积〕累和家庭积累，均很重要。湖南办法：总产值（30亿元）扣20%为生产费（6亿元），其中以20%为基建费（1.2亿元），按照社章抽5%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在外。

---

[1]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这个纲要（草案）先后在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以及10月16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0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纲要（修正草案）。

[2]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规定：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四、五、八”是上述粮食平均亩产指标的简称。

管理费必须缩小到1%。

积累丰歉不同，以丰补歉。

全国每个人都要有大志，远大理想目标。

要将大吃大喝、不善持家的风气转变过来，经过大鸣大辩的方法。

红白喜事中的陋习和浪费，也要经过鸣辩逐步解决，10年改革完毕，是否可能？

振起精神，一定要灭掉四害，乐昌县岐乐社的经验[1]立即推广到全国。两年试点，五年突击，三年扫尾，全国基本上变成四无国。

人口问题：三年试点，三年推广，四年普做，达到计划生育，是否可能？

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必要，浙江文件[2]，值得一阅。

---

[1] 指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在《一个搞好卫生工作人财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中介绍的广东省乐昌县岐乐农林生产合作社广泛发动群众，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开展爱国增产卫生运动的经验。

[2]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7年5月4日关于从发展农业生产看社会主义建设的协作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上海局的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1957年10月9日将这个报告印发给参加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同志，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两个批语。第一个批语印在报告的封面上：“农、工、商、学四业必须协作，值得一阅。毛泽东　1957年10月9日。”第二个批语印在报告第一页的标题下：“此件是我在华东五省一市1957年4月杭州会议上在听了浙江省委的口头报告之后，觉得很有意思，因此请他们写成书面〔报告〕给我。他们就在1957年5月4日写成寄来了。毛泽东　1957年10月9日”。

红安县的经验[1]值得注意，各级领导办试验田。我们不但政治要摸底，技术必须摸底，业务必须摸底。

也是十年计划，十年内必须精通工业、农业各种技术业务，将自己和许多人都变得“又红又专”，基本上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伟大任务。对此，各级均要有计划。“十年树人”极为必要，非此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加上过去八年，十八年树人，估计可以基本造成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专家队伍。往后是扩大加深，再有十年，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形势就更不同了。争取以28年基本上达到苏联40年的水平，是否可能?

在以重工业为中心任务的条件下，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与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都可达到目的，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

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好省。

党委还是促进委员会，不是促退委员会。有些暂时的局部的促

---

[1] 指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1957年9月写的《合作化改变了老苏区的面貌，红安县1957年获得了社社增产，样样丰收》的报告所介绍的经验。报告说，为了切实领导好农业生产，红安县县区干部深入农业社和生产队，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同时亲手试办高额丰产的试验田，进行典型示范，使领导干部开始懂得农业生产知识，逐渐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克服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改变了过去空谈政治的领导作风；农业技术干部通过试验，也开始学会了走群众路线和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更好地推广了农业技术；农民从高额丰产的实验中，也提高了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克服了保守思想，积极改进了对农业社的经营管理。总之，通过办试验田，使党的领导、技术改革和农业社的管理三个工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推动了农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

退正是为了促进。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

厉家寨，每一社。

省、县、地的规划。

每年开一次三级干部会。

黄敬、彭真（只改一个字）、韶关三发言。[1]

军队军〈要〉整风。

将来农业粮食生产要亩产800斤，1000斤，2000斤。21世纪初。

苏联、东欧、中国，主要矛盾。

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十年学会马列、技术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新闻学、教育学。打纸牌、下棋、看电影、『看电影、』跳舞也要一点，但不可着迷，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二件上，玩是需要的，但是第三位。人的脑力能够有很大的发展。肖楚女、齐白石、高尔尔〈基〉、玄奘、惠能、梁鸿、富兰克林[2]为例。

---

[1] 指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1957年10月8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发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同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精简、整风、政法等问题的发言和中共韶关地委第一书记林铭勋作的《一个搞好卫生工作人财两旺的农业社》的发言。

[2] 肖楚女，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齐白石，中国现代画家、篆刻家，建国后曾任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高尔基，苏联著名作家。玄奘，唐朝高僧，与南北朝时的鸠摩罗什、真谛合称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唯识宗创始人之一。惠能，唐朝高僧，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梁鸿，东汉文学家、诗人。富兰克林，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做革命的促进派[1]

（1957年10月9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这样扩大的中央全会，有省委和地委的同志参加，实际是三级干部会，对于明确方针，交流经验，统一意志，有好处。

这样的会，恐怕是有必要一年开一次。因为我们这么一个大国，工作复杂得很。去年这一年没有开，就吃亏，来了一个右倾。前年来了一个高涨，去年就来了一个松劲。当然，去年开“八大”了，也没有时间。再开这样的会议，可以掺少数县委书记和一些大城市的若干区委书记，比如再加百把人是可以的。我建议各省也开一次全省性的三级或者四级干部会议，掺一部分合作社的干部，把问题扯清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讲一讲整风。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因为过去是打仗，五大运动[1]，三大改造，这样从容辩论的形式不能产生。那个时候，从容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搞它一年，不许可。现在许可了。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公开登报，不怕出“丑”，什么“党天下”呀，什么“共产党要让位”呀，“下轿”呀。刚刚“上轿”，右派要我们“下轿”。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延安整风的时候，写笔记，自己反省，互相帮助，七八个人一个小组，搞了几个月。我接触的人都感谢那一次整风，说改变主观主义就是那一次开始。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事同群众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们军队里头，连长给战士们盖被子，同战士很平等地友谊地谈话。延安整风，土地改革，军队里头的民主生活，还有“三查三整”，后头的“三反”“五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等，这中间都有丰富的民主形式。但是，这样

---

[1] 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五大运动。

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然后还要搞和风细雨，商量，启发，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第三点，农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已经作了修改，不久就可以发出去。请同志们在农村中很好地组织一次辩论、讨论。我问了一些同志，地区一级要不要作农业计划？他们说也要作。区一级要不要作？说也要作。乡要不要作？说也要作。社也要作。那末，就有这么几级：一个省，一个地，一个县，一个区，一个乡，一个社，六级。请你们注重抓紧搞一搞这个农业规划。规划、计划是一回事，讲成了习惯，就叫规划也好。要坚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好像去年下半年就不是全党办社了，书记不大动手了。今年，我们要坚持这样搞。

规划究竟什么时候可以作好？我问了一些同志，有些地方已经作好了，有些地方还没有完全作好。现在着重的是省、地、县这三

级，是不是在今冬或者明春可以作好？如果作不好，明年这一年总要作好，而且六级都要作好。因为我们有几年经验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差不多作好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省的规划和其他各级的规划，都要拿到农村去讨论。但是，七个规划一起讨论太多了，还是要分期分批拿到群众中去鸣放、辩论。这是讲长远规划。作了，将来不适合怎么办？再有几年经验，还要修改的。比如“四十条”，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三年一小改，五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一共十二年，过去了两年，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十条”中规定的三种地区分别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计划指标，就有落空的危险。抓紧是可能完成的。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两千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八百斤，淮河以北亩产一千斤，淮河以南亩产两千斤？到二十一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我看一个人平均三亩地太多了，将来只要几分地就尽够吃。当然，还是要节制生育，我不是来奖励生育。

请同志们摸一下农民用粮的底。要提倡勤俭持家，节约粮食，以便有积累。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

今年，凡是丰收的地方，没有受灾的地方，应当提高一点积累。以丰补歉，很有必要。有的省的合作社，除公积金（百分之五）、公益金（百分之五）、管理费以外，生产费占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其中基本建设费用又占生产费的百分之二十。我跟别的省的

同志商量，他们说基本建设费用恐怕多了一点。我今天跟你们谈的，都是建议性质，可行则行，不可行则不行，而且各省各县不要一律，你们去研究一下。合作社的管理费，过去有些地方占的比例太大，应当缩小到百分之一。所谓管理费，就是合作社干部的补贴和办公费。要缩小管理费，增加农田基本建设费用。

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论，才能改过来。我看，改革旧习惯也要列入规划。

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只有十年了，可不可以就在今年准备一下，动员一下，明年春季就来搞？因为苍蝇就是那个时候出世。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那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

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还有综合计划问题。刚才我讲的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商业计划，文教计划。工、农、商、学的综合计划，完全有必要，兜起来互相配合。

种试验田的经验，值得普遍推广。县、区、乡和合作社的领导干部，都搞那么一小块田，试验能不能达到高产，用什么方法达到高产。

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是错误的。因为那种人实在想白下去，后红不过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些干部红也不红了，是富农思想了。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政治上是白的，技术上又不专。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科学规划也是十二年，还有十

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这个问题小平同志也讲了。

第四点，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不要只考虑一种方法，经常要考虑两种方法。比如修铁路，选线路要有几种方案，在几条线路里头选一条。可以有几种方法来比较，至少有两种方法来比较。比如，大鸣大放，还是小鸣小放？要大字报，还是不要大字报？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好？这种问题可多啦，就是放不开。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一个都放不开，没有一个爽爽快快放开的。因为这是放火烧身的问题呀！要放开，需要有充分的说服，而且要有一种相当的压力，就是公开号召，开许多会，将起军来，“逼上梁山”。过去革命，这种方法，那种方法，这种政策，那种政策，党内有过很多不同意见，结果我们采取了一种比较适合情况的政策，所

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比较从前那几个时期都进步。建设的方针也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我们也要采取比较适合情况的方针。

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学习苏联，并不是所有事情都硬搬，教条主义就是硬搬。我们是在批评了教条主义之后来提倡学习苏联的，所以没有危险。延安整风以后，“七大”以后，我们强调学习苏联，这对我们是不吃亏的，是有利的。在革命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在建设这方面，我们刚开始，只有八年。我们建设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不是没有错误。错误将来还要犯，希望少犯一点。我们学习苏联，要包括研究它的错误。研究了它错误的那一方面，就可以少走弯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比如钢的产量，我们可不可以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达到两千万吨？经过努力，是可能的。那就要多开小钢厂。我看那个年产三五万吨的钢厂，七八万吨的钢厂要多开，很有用处。再有中等的，三四十万吨的钢厂，也要开。

第五点，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高兴的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有个把同志讲到这个问题。还有，在报纸上我

也看见那么一篇文章，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说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促退，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从这次会议看，大家都是想要促进，没有一篇演说是讲要促退的。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第六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

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1]。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

---

[1] 参见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九》。

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只要你空几个月不搞，就松松散散了。一年要鼓几次气。新兵来了，要进行教育。就是老兵，老干部，只要你不整风，他的思想也要起变化。

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平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都可以。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

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哪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我们这些人叫什么家呀？叫政治家。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每个省都有报纸，过去是不抓的，都有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过去也是不抓的，还有统一战线、民主党派，是不抓的，教育也是不抓的。这些东西都不抓，结果，好，就是这些方面造反。而只要一抓，几个月情况就变了。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国棉一厂看大字报。

对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的批语

（1957年10月9日）

一

此件[1]值得一阅。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请同志们在今冬明春每县选一个好例寄给我，准备编一本书。请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底以前直接寄我。要是经过考查无虚假内容的一个合作社的生动叙述。如蒙做到，十分感谢。此外，省、地、县三级的农业计划纲要，也请你们同时寄给我。尚未做好的，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寄给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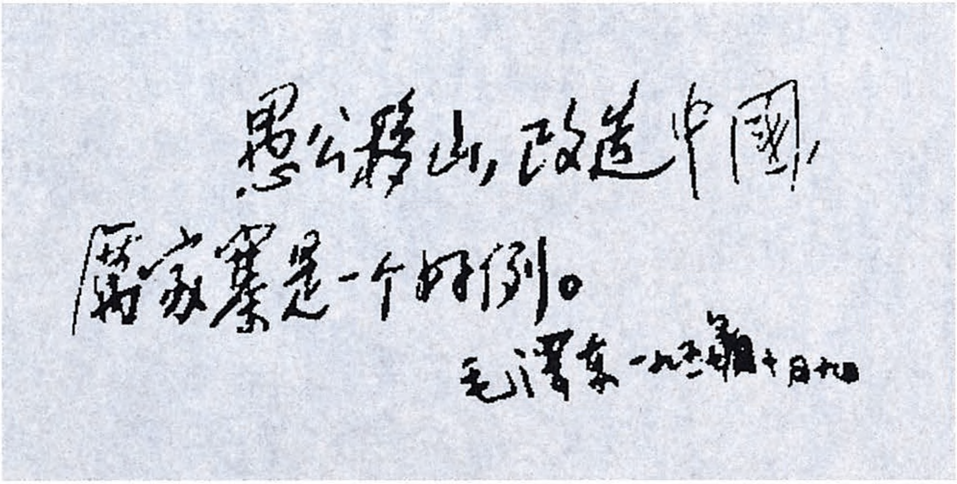
[1] 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1957年4月29日关于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乡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的报告。发表于1957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题为《英雄社战胜穷山恶水——记大山农业社建设山区的丰功伟绩》。

二

此两件[1]立即付印。本日下〔午〕三时三中全会开会时发给每人一份。请尚昆[2]办。

毛泽东

九日上午八时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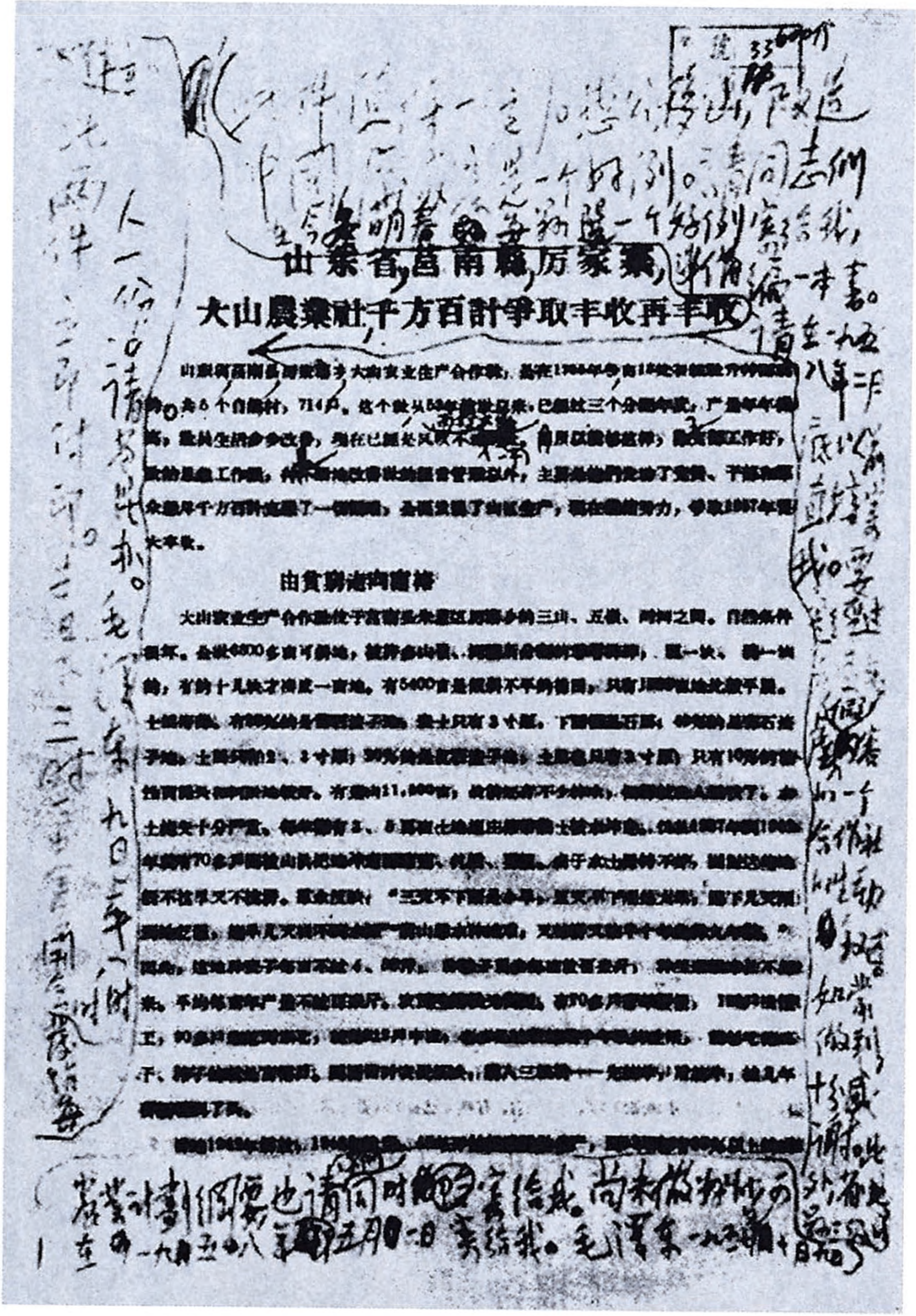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毛泽东为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的题词。

---

[1] 指中共莒南县委工作组的报告和毛泽东对这一报告的批语。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山東省莒南縣厉家寨

大山農業社千方百計爭取丰收再丰收

毛泽东关于厉家寨事迹的批示的手稿。

祝贺威廉·皮克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1957年10月9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在你连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的时候，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总统同志，你的任期的延长，再一次证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对你的无限的信任和真挚的爱戴。

祝你为在和平民主原则上统一德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对探讨辩证逻辑对象问题的一篇文章[1]的批语

（1957年10月11日）

送陈伯达[2]同志。这里辩证逻辑一文可以一阅。此人有些新颖见解。阅后还我。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指1957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且大有《对于探讨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的几点意见》一文。文章认为，近几年来苏联和我国学术界对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的讨论，迄至目前为止，仍然束缚于恩格斯的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相互关系的比喻，没有多大的进展。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本身的问题没有弄明白，就来谈二者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受着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文章就讨论中涉及的辩证逻辑的对象问题，谈了个人的意见：一、辩证逻辑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把辩证唯物主义或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看作辩证逻辑，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把关于思维的一般学说和辩证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与形式（概念、判断、推理等）的学说等同起来，实质上否认辩证逻辑这门科学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否认它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二、辩证逻辑不是与辩证唯

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并列的哲学科学。二者的区别在于：（一）科学对象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一般的客观辩证法，研究对象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三个领域，是研究其中一般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辩证逻辑研究的是主观辩证法，是研究思维领域中特殊的运动、变化与发展规律的科学。（二）认识范围的区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适用于人类认识的全部领域，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历程；而辩证逻辑仅适用于理性认识的范围。（三）阶级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阶级性的；辩证逻辑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它是探讨思维领域的具体科学之一，因而是没有阶级性的。三、辩证逻辑是而且也只能是关于正确思维的规律和形式的具体科学。它是研究思维的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和形式的辩证思维。四、辩证逻辑不仅研究概念和范畴之间的关系，还应研究思维规律，还要探讨一些逻辑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等方法；至于证明、假设和类推的问题，也有以辩证逻辑的角度来加以探讨的必要。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改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7年10月12日）

一

即送刘、周、朱、陈、邓、彭真、陈伯达[2]同志看一遍，印若干份发给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人，并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一次，争取于十月廿日在报上公布。政治局是否还要讨论一次，请刘邓决定。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7年9月6日印发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此稿序言部分的修改，后来公开发表时，这一段话改为中共中央对纲要（修正草案）的一个注；本篇三至八是毛泽东分别对此稿的第一、第七、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八、第三十八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有所修改，是否妥当。

阅后退田家英[1]办。

二

这个纲领草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已经起了积极的作用。现在根据两年来一些事实的变化和工作的经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提交农民和全体人民展开讨论，再作修改，准备提交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然后提交国务院讨论通过，最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作为正式文件公布。估计到今后十年中，一定会有许多新的情况出现，还会要作某些修正的。

三

加强对现在还存在的少数个体农民的教育和领导，争取他们自愿地陆续加入合作社。不愿入社者，听其自便。

四

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步骤地积极地实行农业机械化。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机械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应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当经过广泛的试验研究工作，拟出一个适合我国条件的农业机械化方案，为推广农业机械化做好准备，随即制造适合各地的机械，供应农民；随时改良，积极推广。

五

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

六

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

七

除疾病的根本精神，跟除四害是一样的。

八

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

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

（1957年10月13日）

现在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跟我们党历史上采取过的形式是有区别的。延安那一次整风，也出了一点大字报，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提倡。后来“三查三整”，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在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的党和军队就是依靠战士，依靠当地人民，依靠群众。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民主作风。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个时候金鼓齐鸣，在打仗，阶级斗争那么尖锐，如果内部这么大闹，那就不好了。现在不同了，战争结束了，全国除台湾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现了这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

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当工厂厂长的，当合作社主任的，当学校校长的，当党委书记的，怕一放出来，火一烧，怎么下台呀？现在容易说通了，在五月间那

---

[1] 这是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个时候，就很不容易说服人。北京三十四个大专院校，开了很多会才放开。为什么可以不怕？为什么放有利？大鸣大放有利，还是小鸣小放有利？或者不鸣不放有利？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台。还有冯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他们不是想要把我们国家搞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本家、民主党派成员的多数，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们不要怕乱，不会乱，乱不了。应当相信多数，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会主义革命对我们都是新的。我们过去只搞过民主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不破坏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只破坏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有许多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可以过来。这里头，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热心，是勉强过来的；有些人对彻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这一关过来了。现在是过社会主义的关，有些人就难过。比如，湖北有那么一个雇农出身的党员，他家是三代要饭，解放后翻身了，发家了，当了区一级干部。这回他非常不满意社会主义，非常不赞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对统购统销。现在开了他的展览会，进行阶级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错误。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

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今年是斗争的一个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来一个洪峰？像每年黄河的洪峰要来一样，我看恐怕不是那样。但是，这样的洪峰，以后也还会有的。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拿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青年团支部，那个青年团支部；这个民主党派的支部，那个民主党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哪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不说他是

资产阶级，一定要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是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我看，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大字不认得几个的工人、农民，也比他罗隆基高明得多。

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讲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那也是拥护的，手也是举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气的。这里头就要分别了，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讲共产党这样也不能领导，那样也不能领导吗？不仅右派有这个思想，中间派有些人也有。总而言之，照他们的说法，差不多就完了，共产党非搬到外国不可，无产阶级非上别的星球不可。因为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嘛！无论讲哪一行，右派都说你不行。这一次辩论的主要目的，就是争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间派，使他们懂得这个社会发展规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还是要听文化不高的无产阶级的话，在农村里头要听贫农、下中农的话。讲文化，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不如他们，但是讲革命，就是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行。这可不可以说服多数人？可以说服多数人。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艺术家、文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中的多数，是可以说服的。不大服气的，过若干年，慢慢就会服气了。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

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我们不要怕乱，也不要怕下不得台。右派是下不了台的，但也还是可以下台。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右派这么闹一下，使我们摸了一个底：一方面，赞成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这样的底，就心中有数了。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

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我们不需要像波兰那样封一个刊物，我们只要党报发一两篇社论就行了。对文汇报，我们写了两篇社论批评它，头一篇不彻底，没有讲透问题，再发第二篇社论，它就自己改。新民报也是它自己改。在波兰就不行，他们那里反革命的问题没有解决，右派的问题没有解决，走哪条道路的问题没有解决，又不抓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所以封一个刊物就惹起事来了。我看中国的事情好办，我是从来不悲观的。我不是说过，乱不了，不怕乱吗？乱子可以变成好事。凡是放得彻底的地方，鬼叫一个时候，大乱一阵，事情就更好办了。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做“梁上君子”的危险。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大学教授、文学家、作家，他们没有工人朋友，没有农民朋友，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比如费孝通，他找了二百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汉、无锡等地都有。他在那个圈子里头出不来，还有意识地组织这些人，代表这些人大鸣大放。他吃亏就在这个地方。我说，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

二百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另找二百个。我看知识分子都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农民中，不要轻易去找富裕中农做朋友，要找贫农、下中农做朋友。老工人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贫农、下中农辨别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开点小组会，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的整风文件中讲和风细雨，当时许多人不赞成，主要是右派不赞成，他们要来一个急风暴雨，结果很有益处。这一点我们当时也估计到了。因为延安那一次整风就是那样，你讲和风细雨，结果来了个急风暴雨，但是，最后还是归结到和风细雨。一个工厂，大字报一贴，几千张，那个工厂领导人也是很难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时间，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辞职，说是受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北京那些大学的党委书记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那时候右派他们说，你们不能驳，只能他们鸣放。我们也讲，要让他们放，不要驳。所以，五月我们不驳，六月八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这样就充分鸣放出来了。鸣放出来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确的，有百分之几是右派言论。在那个时候，就是要硬着头皮听，听了再反击。每个单位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这个整风，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都要搞。现在军队也是这样搞。这样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场”又要发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风，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工程师、科学家里头，又要出许多怪议论，资本主义思想又要抬头。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扫，脸每天要洗一样，

整风我看以后大体上一年搞一次，一次个把月就行了。也许那时候还要来一点洪峰。现在这个洪峰不是我们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们不是讲过吗？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认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响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说自己已经改造好了。章乃器说，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剥皮。我们说要脱胎换骨，他说脱胎换骨就会抽筋剥皮。这位先生，谁人去抽他的筋，剥他的皮？许多人忘记了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这么搞，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讲学问，你说他现在不行，他将来是会行的。这批新的人出来了，就对老科学家、老工程师、老教授、老教员将了一军，逼得他们非前进不可。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

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国没有那样一些知识分子，它资产阶级专政怎么能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已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

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

我在四月三十日讲的那些话，许多人就听不进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说中国有五张皮。旧有的三张：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过去知识分子就靠这三张皮吃饭。此外，还靠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一个小生产者所有制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我们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张皮的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会主义革命是革后两张皮：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所有制。这五张皮现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张久已不存，另外两张也不存了。现在有什么皮呢？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这张皮。当然，这又分两部分，一个全民所有制，一个集体所有制。现在靠谁吃饭？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也好，科学家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是吃工人阶级的饭，吃集体农民的饭，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总起来说，是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饭。那五张旧皮没有了，这个毛呢，现在就在天上飞，落下来也不扎实。知识分子还看不起这张新皮，什么无产阶级、贫农、下中农，实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反对的人多，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天天反，说是“共产主义不适

合中国国情”，害得大家生怕这个东西。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他说，这个风潮总要过去就是了。很正确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

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他说，我是不投降的，阎王老爷你看我多么有“骨气”呀！他是资产阶级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残余、反革命是有联系的，通气的，彼此呼应的。那个文汇报，地主看了非常高兴，他就买来对农民读，吓唬农民说，你看报纸上载了的呀！他想倒算。还有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美帝国主义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假如美国人打到北京，你们怎么样？采取什么态度？准备怎么做？是跟美国一起组织维持会，还是跟我们上山？我说，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张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说这个话是极而言之，把问题讲透，不怕乱。你美国占领半个中国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吗？后来我们不是打出一个新中国来了吗？我跟日本人谈过，要感谢日本帝国主义，他们这个侵略对于我们很有好处，激发了我们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高了我国人民的觉悟。

右派不讲老实话，他不老实，瞒着我们干坏事。谁晓得章伯钧搞了那么多坏事？我看这种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罗同盟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最喜欢了。他们利用这两个口号反对我们。我们说要长期共存，他们搞短期共存；我们说要互相监督，他们不接受监督。一个时期他们疯狂得很，结果走到反面，长期共存变成短期共存。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

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这些问题都要考虑，是一个麻烦的问题。革命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

各民主党派什么情况，基层什么情况，恐怕你们这些负责人也不摸底。坚决的右派分子，在一个时候，在一些单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浑，使我们看不见底。一查，其实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矾放下去，就看见了底。这次整风，就是放一把明矾。大鸣、大放、大辩论之后，就看得见底了。工厂、农村看得见底，学校看得见底，对共产党、青年团、民主党派，也都有底了。

现在，我讲一讲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经过两年的实践，基本要求还是那个四、五、八，就是粮食亩产黄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这是基本之点。整个纲要基本上没有改，只是少数条文改了。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如合作化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相应的条文就作了修改。有些过去没有强调的，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现在要大搞，条文上就加以强调了。还有条文的次序有些调动。这个修改过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过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联席会议讨论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国农村中去讨论。工厂也可以讨论，各界、各民主党派也可以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

发动全体农民讨论这个农业发展纲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劲

来。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这个劲鼓起来了。我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不是主观主义的。原来有些主观主义的东西，现在我们把它改掉了。总的说来，实现这个纲要是有希望的。我们中国可以改造，无知识可以改造得有知识，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纲要里头有一个除四害，就是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我对这件事很有兴趣，不晓得诸位如何？恐怕你们也是有兴趣的吧！除四害是一个大的清洁卫生运动，是一个破除迷信的运动。把这几样东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们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

计划生育也有希望做好。这件事也要经过大辩论，要几年试点，几年推广，几年普及。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里头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仅是农业计划，还有工业计划和文教计划。三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我们国家的面貌是会有个改变的。

我们预计，经过三个五年计划，钢的年产量可以搞到两千万吨。今年是五百二十万吨，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钢产量是一百六十万吨，现在是一百七十几万吨，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几万吨。我们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万吨，三年恢复时期搞到一百多万吨，又搞了五年，达到五百二十万吨，五年就增加三百多万吨。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一千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达到一千一百五十万吨。然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是

不是可以达到两千万吨呢？是可能的。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1957年10月，毛泽东会见阿富汗首相达乌德。

致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电

（1957年10月17日）

叙利亚共和国总统舒克利·库阿特利先生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周年时，承蒙来电祝贺，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衷心的谢意。

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祝中叙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祝叙利亚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祝叙利亚共和国繁荣和阁下身体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于北京

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命令

（1957年10月2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第八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央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1]

（1957年10月26日）

各级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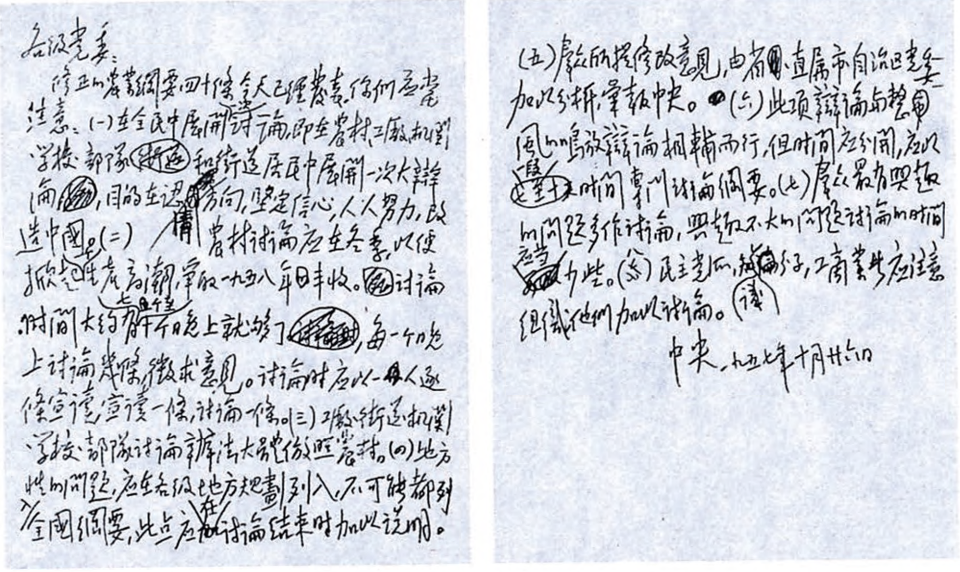
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一）在全民中展开一次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二）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个至十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三）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四）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五）群众所提修改意见，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六）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七）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织他们加以讨论。

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廿六日



各级党委：

修正的农业纲要四十条今天已经发表，你们应当注意：（一）在全民中展开讨论，即在农村、工厂、机关、学校、部队和街道居民中展开一次大辩论，目的在认清方向，坚定信心，人人努力，改造中国。（二）农村讨论应在冬季，以便掀起生产高潮，争取一九五八年的丰收。讨论时间大约有七八个晚上就够了，每一个晚上讨论几条，征求意见。讨论时应以一人逐条宣读，宣读一条，讨论一条。（三）工厂、街道、机关、学校、部队讨论办法大体仿照农村。（四）地方性的问题，应在各级地方规划列入，不可能都列入全国纲要，此点应在讨论结束时加以说明。

（五）群众所提修改意见，由省、直属市、自治区党委加以分析，汇报中央。（六）此项辩论与整风的鸣放辩论相辅而行，但时间应分开，应以一段时间专门讨论纲要。（七）群众最有兴趣的问题多作讨论，兴趣不大的问题讨论的时间应当少些。（八）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应注意组织他们加以讨论。

中央 一九五七年十月廿六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示》的手稿。

1957年10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图为通车典礼上，数百辆汽车驶过长江大桥。

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1]

（1957年11月2日）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布尔加宁[2]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受中国人民的委托，来到莫斯科向我们的苏联兄弟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祝贺。

我在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先后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都邀请我再一次访问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最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对于

---

[1] 这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于1957年11月2日抵达莫斯科机场时的讲话。在讲话稿上，毛泽东写了以下批语：“（一）印发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二）即刻翻成俄文和英文；（三）送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各一份，请提意见，阅后收回。”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即沈雁冰）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所有这些友好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都表示非常的感谢。

十月革命节是苏联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伟大胜利节日。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四十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地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把侵略和战争的矛头指向阿拉伯民族，指向独立的叙利亚。这种侵略企图有导向世界战争的危险。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和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正义斗争。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对侵略者的严重警告。全世界人民都应当警觉起来，为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

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巨大的同情和慷慨的援助。我们两国人民已经在共同的斗争中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我们分开。

同志们，我们将永远站在一起，为着世界和平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光荣归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光荣归于伟大的苏联人民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世界和平万岁！

1957年10月29日，毛泽东观看苏联新西伯利亚歌舞剧院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后，接受演员赠送纪念章。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图为毛泽东在伏罗希洛夫陪同下检阅苏军仪仗队。

1957年11月，毛泽东、宋庆龄到克里姆林宫拜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

1957年11月，毛泽东等在苏联访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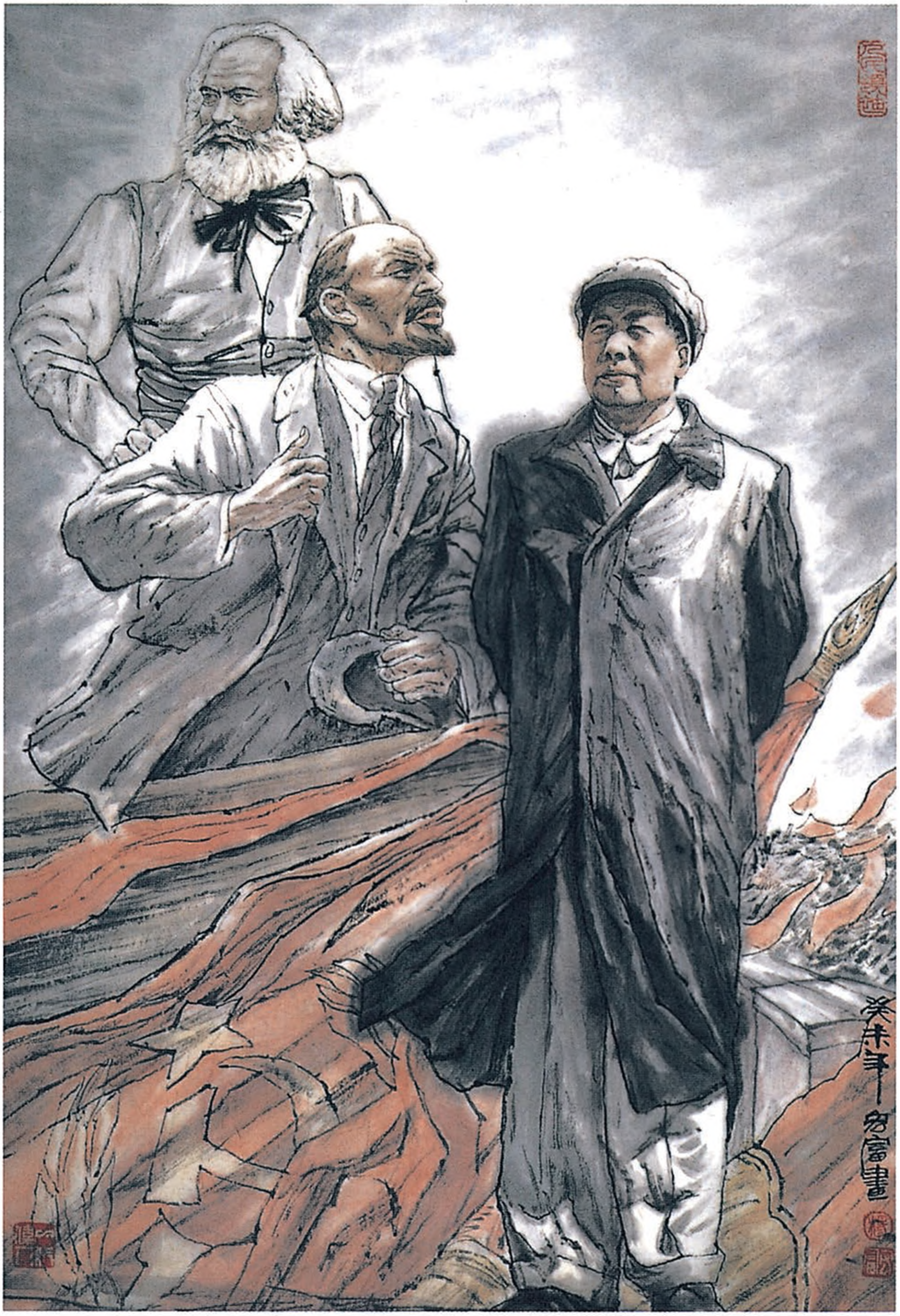
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的毛泽东。

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的毛泽东。

1957年11月5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前往拜谒列宁陵墓。

В. И. ЛЕНИНУ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57 年 11 月 5 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红场拜谒列宁陵墓，并敬献花圈。



《继往开来》（中国画）

关于公布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的命令

（1957年11月6日）

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条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第八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1957年11月6日）

亲爱的同志们：

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节日，我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全体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谨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和朋友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中经历了艰苦的路程。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敌人曾经显得好

像比苏联更强大，他们两次武装进攻苏联。但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把这些侵略者的进攻彻底地粉碎了。

苏联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一个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国家，是一个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真正反对民族压迫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本国全体人民的热烈支持，同时有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两种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是各国的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

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所有这些，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对此感到不高兴的，只是一些反动派。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的工

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1]。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

---

[1] 参见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的译文是：“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同样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现在全世界踏上十月革命道路而赢得胜利的，已经有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了九亿多人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早已丧失了优势，社会主义早已变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争。但是他们能够从战争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

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苏联在裁军问题上，在禁止制造、使用和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上，所一再提出的建议，代表着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主张，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美帝国主义顽固地要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在中国干涉解放台湾，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1]。它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现在还在策划通过土耳其或以色列侵入独立的叙利亚，还在阴谋颠覆反殖民主义的埃及政府。美国的这种疯狂的侵略政策，不但造成了中东的危机，而且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都站在叙利亚方面，反对美国和土耳其的侵略者，正如他们在去年十月都站在埃及方面，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者一样。苏联政府已经向美国和土耳其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迅速打消侵略计划。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的卫国斗争，坚决支持苏联的正义立场。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帝国主义曾经而且还在继续竭力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它终究无法阻止中国的六亿人口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

---

[1] 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路。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八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可能有的成就。中国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中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亲密的联盟。他们的这种狂妄企图，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反击之下彻底失败了。[1]

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须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我们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教育运动，大概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今后，我们准备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期各项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

---

[1]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须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们方面的，是讲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经验所证明。

我们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说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苏联的多方面的兄弟般的援助。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请让我们对于给予中国这种友好援助的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条约[1]。这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采用一切挑拨离间的手段，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和团结。但是，事实只能使帝国主义者失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得愈来愈紧密了。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

---

[1] 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同盟国家的侵略行为；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互助合作关系。条约于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1979年4月3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

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这样说过：“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个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1]九十几年前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永远不会过时。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

[1] 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新的译文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图为会场全景，讲话者为毛泽东。

195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讲话。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

（1957年11月14日、16日、18日）

一

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4日和16日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两次讲话；本篇三是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四十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去年这一年，帝国主义搞了一个风潮，在我们脸上擦了一点黑。今年好了，天上没有乌云了。而西方世界的天上有相当多的乌云。我们的事情更好办了，杜勒斯却比较难于睡觉。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

个五百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五百公斤。搞一个五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五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赫鲁晓夫同志插话：大家共同努力之下可能。）大家共同努力那也对，主要由你努力。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了。罗斯福不是讲过“免于恐怖”吗？资产阶级政治家有时候也讲几句好话。不过他们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要免于恐怖，要有五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在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的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

究竟哪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譬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所以我认为：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我提出这个意见，同志们要批评尽可以批评。各国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你们不赞成请你们批评我。

二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没有强加于人。在人民内部，尤其是在同志内部，采取强加于人的方法是不好的。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譬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将来我们见马克思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

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马克思他们会怎样讲？无非也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研究一下，这里头有什么冒险主义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看不见冒险主义。由此观之，冒险主义的性质也没有，机会主义的性质也没有。那么是一个什么宣言呢？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是不是呢？

三

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

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1]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2]，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3]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

---

[1] 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1942年夏，德军在对苏联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7月17日德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企图攻占该城，切断伏尔加河，南夺高加索油田，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5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大量敌人。11月19日苏军转入反攻，23日包围了33万德军。次年2月2日全歼该敌。这一战役，德军损失兵力达150万人，苏军夺得战略主动权，标志着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新的转折点。

[2] 匈牙利事件，指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3] 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69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1]，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2]，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它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3]和丘吉尔[4]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

---

[1] 法斯特，1914年生，美国作家。1942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写过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映美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作品，担任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2] 指1957年10月4日和11月3日苏联成功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3] 罗斯福，1933年至1945年任美国总统。

[4] 丘吉尔，1940年至1945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1]，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2]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在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3]，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4]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

---

[1] 雅尔塔，在前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4] 杜鲁门（1884—1972），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至1953年任美国总统。

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1]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2]。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3]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

---

[1] 金日成（1912—1994），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战争期间，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2]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组织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连同美国共16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3] 胡志明（1890—1969），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1]，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2]。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

---

[1]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规定法国军队集结在北纬17度线以南。这样，就把大半个越南划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2] 先锋计划，是当时美国制订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计划。美国试图通过这一计划在航天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

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1]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

---

[1] 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1911—1977），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1]曾经一支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2]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

---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2] 二月革命，指1917年3月（俄历2月）在俄国发生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过是纸老虎（PAPER TIGER），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

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1]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比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2]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3]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

[1] 哥穆尔卡（1905—1982），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 指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64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

[3]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越南、蒙古、朝鲜和中国等12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1]。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

[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原文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1]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

---

[1]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1926年10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也许你们讨厌我在这样一个会议上讲这样一类问题。我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时间又讲得很长了，那就不讲了吧。但是，我还要讲几句。我赞成苏共中央解决莫洛托夫问题，这是个对立面的斗争，事实证明它是不能统一，它是一方排斥一方。莫洛托夫集团举行进攻，乘赫鲁晓夫同志到外国去了，措手不及，来一个突然袭击。但是我们赫鲁晓夫同志也不是一个蠢人，他是个聪明人，立即调动了队伍，举行反攻，取得胜利。这个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错误的路线，一条是比较正确的路线。斯大林死后这四五年，苏联的内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这就证明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莫洛托夫同志是一位老同志，有很长的斗争历史，但是这一件事他是做错了。苏共党内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带着对抗的性质，因为是互不相容，互相排斥，一个排斥一个。处理得好，可以不出乱子。处理得不好，有出乱子的危险。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1957年11月，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自右至左：乌兰夫、宋庆龄、毛泽东、邓小平、郭沫若。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莫斯科宣言》及《和平宣言》上签字。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上签字。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15年内中国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公布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的命令

（1957年11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八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可以每年举行一次的决定，现予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1]

（1957年11月16日）

一

人们往往估计不足。我就犯过这样的毛病，有时估计过高，有时估计不足。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说欧洲的革命要来了，结果革命没有到来，一直等到恩格斯逝世后二十二年才爆发了十月革命。列宁也是估计不足，他认为就要发生世界革命，但匈牙利的革命、德国的革命都垮了台，波兰的革命也没有取得胜利。后来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托洛茨基[2]派对此没有信心，他们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而斯大林及和他在一起的同志们则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于是全党就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结果，全党承认在一国内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样才有了信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说，要革命就要好多国家同时进行，并且还要在资本主义最先进的文明国家首先

---

[1] 本文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托洛茨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

取得胜利。事实的结果并不是如此。西方的文明国家到现在革命还没有取得胜利，首先胜利的却是经济落后的俄国，更落后的中国也取得了胜利。

中印两国有两个特点：一是穷得很，二是不识字的人多。对这两点也要加以分析，一分为二。一方面是不好的，落后、贫困当然不好。西方国家对我们很傲慢，看不起我们，说我们生活水平低，贫困、愚笨。我们承认这些，他们说得对。我们工人、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能比得上西方国家工人、农民的生活及文化水平吗？他们也说亚非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好，因为亚非国家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和财富赶不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从这一方面来说是不好的，即所谓落后国家，不发达的国家。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这一方面西方国家是看不到的，就是穷的人、不识字的人要革命。谁把英帝国主义从印度赶走呢？是印度人民。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呢？是中国人民。

蒋介石等四大家族[1]集中了中国最大的财富，文化水平也高（当然只有唯心论的一套）。蒋介石手中掌握了武装力量，有四百万军队，还有一点空军和坦克。在一九四六年他们向我们发动进攻时，我们只有九十万军队，连一点空军、一点坦克都没有。他们后面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帮助，而我们毫无帮助。那时我们只有被分割、被包围的十几个根据地，人口只有九千万，而他们却有四亿多的人口。我们没有大城市，只有像延安那样的小城市。延安只有七千人。我们同他们打了三年。开头一年，他们占领了我们的延安，还占领了我们大部分县城。我们有计划地撤退，使他们的军

---

[1] 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统治集团。

队分得很散，分散在四面八方。一年后，我们开始反攻。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几个指头去吃掉他们的一个指头。我们撤退的时候，军队没有损失。当我们反攻时，集中几个指头吃他们一个指头，一个指头被我们吃掉了，蒋介石发现他只剩下九个指头了。我们按照同样的战略方针又吃掉他们一个指头，他们只剩下八个指头了。于是照样再吃一个，又吃一个。最后，他们只剩下四个指头了。但是，那时他们还很厉害，战斗力很强。一九四八年冬和一九四九年春，在三大战役中，他们大多数指头被吃掉了，只剩一个指头了。他们说要讲和，好像共产党是好战的。共产党也爱和平，让他们派代表来北平进行谈判。谈了一两个月，达成了协议，他们代表团里十几个人都赞成协议。至于签字，他们便要向南京请示。协议的条款规定战犯要捉起来，第一名战犯便是蒋介石，他们的军队要改编，政权要交出来。蒋介石一想不能签字，那时他又不爱和平了。在他拒绝签字的那天晚上，我们的军队便渡过长江。那时中国人民讲，不是共产党不要和平，而是蒋介石不爱好和平。

至于现在的台湾问题，和平解放台湾好不好？有两个办法，一为和平解放，一为武力解放。我们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但是我们天天在广播：和吧，我们都是中国人，过去又是朋友，你们被美国欺侮也不好。结果他们不来。他们总是要打，我们总是要和。打也打不成，和也和不成。他总是要打，但是连一个兵也不敢派上岸。他喊要打便于向美国要钱。我也打不成，因为那里有水，我们的军队是在陆地上作战的，不是在水上作战的。除此以外，台湾有美国另加蒋介石。我们还是要说和，美国怕我们“冒险”打过去，便提出了一个办法，他们说我们来谈吧。那好，谈便谈吧！谈判在日内瓦举行，他们的谈判代表是美国驻捷大使，我们的谈判代表是

我驻波大使。他们两人已谈了两年多了。两国大使乘同一架飞机去日内瓦，又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他们各自的工作地点。大约要谈一百年吧！

二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完全不能得到人民的同情。蒋介石要打我们，但全国人民却不要战争。我曾去过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会谈，周恩来也跟他们进行谈判，后来在南京又谈。先后谈了一年，并且达成了和平建国的协定。这些都是从达到战略目的的策略观点出发的。策略是：由于人民要求和平，不喜欢蒋介石，但对他还有幻想，而对共产党还不了解，我们必须提出和平口号，让人民清楚地看到谁要和平，谁撕毁和平协定，谁对把全国人民投入战争负责。于是人民便觉悟起来，一致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的军队也不想打仗，不然我们的武器从哪里来呢？

在我们的宣言中，提到和平过渡还是战争过渡的问题。宣言里有一长段讲争取和平过渡，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广大人民不想打仗，要和平。假如我们共产党人天天讲要打，要用暴力推翻政府，那么我们便会脱离群众，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和平。这样做的目的是逐步地使群众觉悟起来，这是一只手。一个人总是有两只手的，还有一只手，那就是后面写的一段，假如资产阶级要使用暴力，那么无产阶级便被迫使用暴力。这个口号是作为防御口号提出，你先打我，我才打你。如果资产阶级不使用暴力而让出政权，那是谢天谢地。但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当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我们还有一只手。我们事先有准备，你先打我，我便打你。那么谁

还能说共产党人是好战分子，不人道呢？同时，由于我们有准备，在精神上使自己决不解除武装。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不相信资产阶级会自愿地退出政治舞台的，当我们要它命的时候，它便不干了！什么叫要它的命呢？那就是取消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便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

三

我们很多同志仇视蒋介石，相信还是做国民党普通党员的工作好。这个问题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夜，我们才懂得，你不把蒋介石搞好，怎样能把国民党普通党员搞好呢？因为普通党员还是听蒋介石的话的。于是我们和蒋介石达成抗日协定，并且还声明在蒋介石领导下抗日。我们说，我们赞成三民主义，声明三民主义是现阶段革命所必需，共产党人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我们声明共产党人并不放弃我们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但是现阶段不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将来的事情，于是他们也就不怕了。我们的军队由工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换军服，换帽子，主要是换帽徽，由五角红星的帽徽改成青天白日的帽徽。同志们死也不戴，甚至痛哭流涕。我们向他们说：没有对反革命的仇视，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你们不想换帽徽便是保卫革命，这是很好的，我们要向你们致敬，但是帽子还一定得换。我们说服战士们放弃工农红军的军帽，以便于与国民党一道打日本。拥护蒋委员长[1]抗日，实现三民主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换军帽这一套，是策略，是为达到战略

---

[1] 蒋委员长，指蒋介石。

目的的策略。这样我们便壮大起来了。王明路线的错误使我们的军队由三十万人减到两万人，我们运用以上所讲的策略再由两万人发展到九十万人，这就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便取消青天白日帽徽，把八路军、新四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到现在还是叫人民解放军。这一套是中国革命的经验。你们那里既没有工农红军，也没有换军帽的问题，但是中国革命的策略思想是可以作为参考的。

革命的发展总是经过迂回道路，逐步上升，而不是直线的发展。把革命看成直线是形而上学，把革命看成曲线与直线的统一是辩证法。比如，画一个圆圈，它并不是直线而是弧形的，但是把圆圈切开来，每一份都是直的。两点之间只有一条最直的线，这是几何学上的原理。这一原理是对平面说的，而不是对球面说的。球面则不同，在球面上可以有许多线都是直的。地球上的经线不是都相等吗？我们必须懂得平面，同时也必须懂得球面，要懂得平面与球面的统一。

向莫斯科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实习生的讲话

（1957年11月17日）

同志们：

我向你们问好。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们都老得这样了。但各有各的长处，我们老的有经验，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气候不好，今年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你们读过《红楼梦》没有？这句话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说的。二个阵营，其中有中间地带，西方世界有四亿人，其中有很多我们的人，我们可以挖它的墙脚，那里会发生地震的。我们有十亿人，我们中间也有他们的人，譬如中国的右派。这种人比较少，在中国约占百分之二左右。二方面都有对方的人。就好比宋末元初赵孟頫妻子的一首诗里说的：“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这个比喻虽然不完全恰当，但有点是对的，即帝国主义阵营中有我们的人，我们这里也有他们的人。但他们的阵营中我们的人多，在我们的阵营中他们的

人少。

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二十七亿人，我们约有十亿人，帝国主义约有四亿人，还有几亿呢？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子就算出来了。这十三亿基本上分布在三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十三亿中七亿多已取得了民族独立，如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黄金海岸等。还有六亿人在那边，如日本、伊朗、台湾、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那一套。在帝国主义阵营中德、意、日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美英不合作，这中间地带的十三亿人由二个阵营争夺，他们大多是倾向我们的。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也没有在那里搞军事基地。

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小国。在政治、人口上是大国，但在经济上是小国，还比不上比利时呢！你们大概不高兴吧！但又有什么可以不高兴的呢！比得上就是比得上，比不上就是比不上！

马克思、恩格斯以后一百年来这次大会是最盛大的一次，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几天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这个会开得很好，决定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这两天在开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能结束。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转折点，如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二个卫星上天，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在一起开会，这也是大转折点。这是二个世界的战争，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不对，

应在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所有制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就这么一提，好比人民政府在这头，工农群众在那头，资本家在中间，二边一夹就夹过来了。

有些外国人说：“我们思想改造是洗脑筋。我看也说得对，就是洗脑筋嘛！我这个脑子也是洗出来的。参加革命后，慢慢洗，洗了几十年。我从前受的都是资产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封建教育。孔夫子的书读了不少。我们那时根本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只知道华盛顿、拿破仑。你们就好了，你们很幸福，像你们这么大的娃娃就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赫鲁晓夫、多列士、杜克洛、陶里亚蒂等。我们那时对于中国革命是怎么搞法，有谁知道?!

我们大家都要割尾巴，我也劝你们割尾巴。中国有句古话“夹起尾巴做人”，这句话很有道理。现在人都进化了，摸起来就没有尾巴了，但无形的还有。右派就是尾巴翘得太高了。青年人应该具备二点，一是朝气勃勃，二是谦虚谨慎。

今年国内五月到六月是满天乌云，我们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住，让右派骂。他们骂共产党是王八蛋，共产党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少错误多。我们把它都登在《人民日报》上了。我们还给机关学校下了指示：硬着头皮，别开口。国内贴了许多大字报，你们这里没有贴吧？北京大学贴了几万张，《人民日报》是小字报。好，鸣放就是鸣放、就到人民面前去报账，让人民去讨论。右派是打垮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你们没有做过工作，不知道。你们去当当厂长、党委书记、校长、副校长、教授、工程师试试看。一做工作，就会有错误。八年来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是件很大的事，我们要认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干部放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农民都

说："老八路又来了。"基层干部中只有百分之一有严重缺点，脱离群众，绝大部分都是好的，其中一部分有错误，但可以改正。

我国人口现在六亿四千万，已经不是六亿了。要六亿四千万人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世界。要做到这一点，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老的四十条基本上是正确的，但部分有主观主义成分，在新的纲要中化学肥料增加到一千五百万吨。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召集不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话，问他们能否做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又如除四害的问题，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有人建议麻雀不要打，就网开一面，城里的不打。这里有没有四川人？四川的老鼠是多得很。北京的苍蝇打完了，过了两年又有了。这个问题也要有决心，大家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这类事情上也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五百二十万吨。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将有一千二百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后，钢的产量就有二千二百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四千多万吨，我们问过波利特同志，他说十五年后英国约能生产三千万吨，那么，再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超过英国，苏联就会超过美国。那时世界面貌就会大大改变。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要十五年或者多一些，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活五年，如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满意足了，能超额完成，当然更好。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要是孔子现在还不死，二千多年前的人现在还不死，那还成什么世界。所以，我开始就和你们说了，世界是

属于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句，祝贺你们，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

第一，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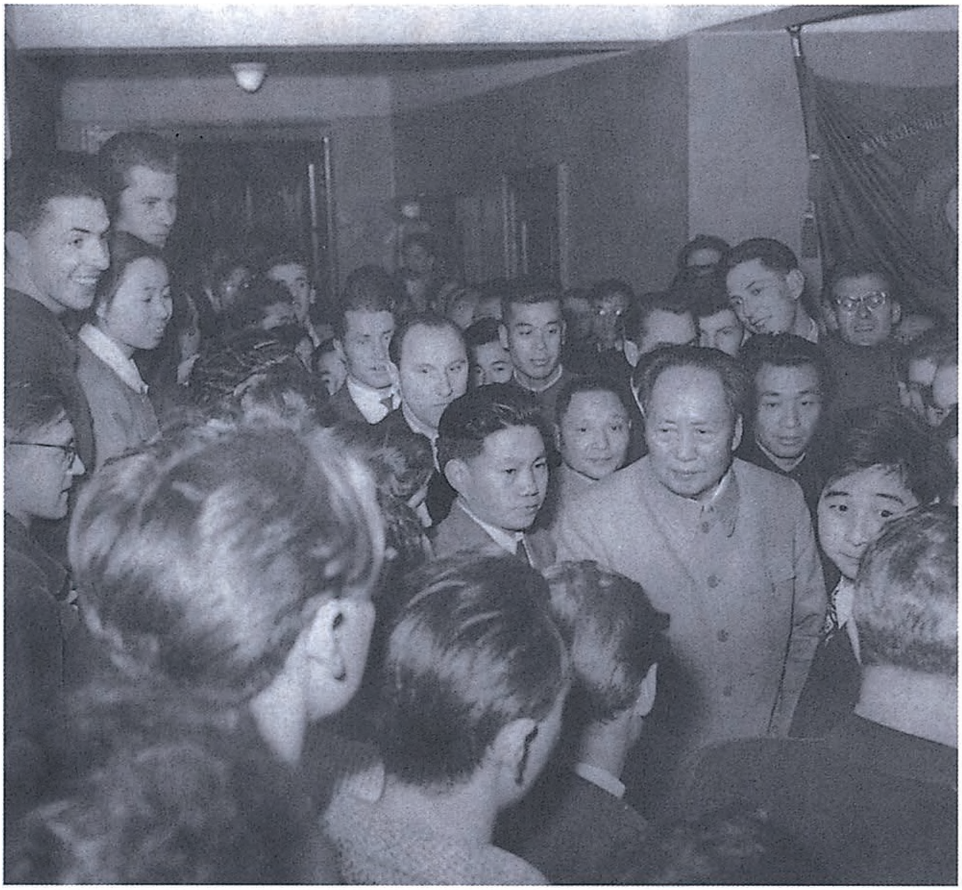
第二，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

第三，祝同学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

1957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并发表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的著名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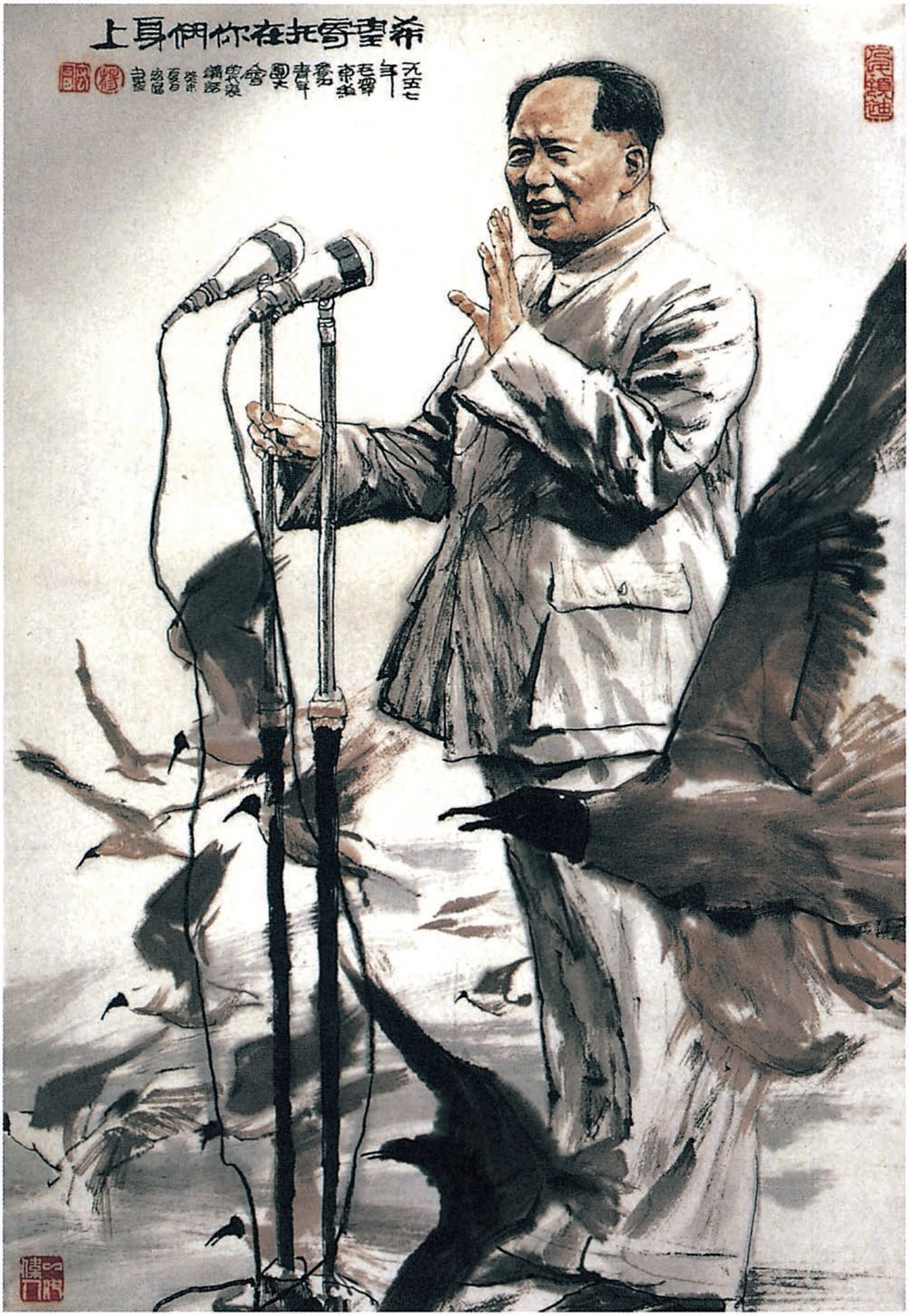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礼堂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讲话。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



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

1957年11月，毛泽东和李银桥（右）、张仙朋在莫斯科。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画）

为感谢苏联人民的情谊给《真理报》的信

（1957年11月20日）

《真理报》编辑部：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你们伟大国家的逗留期间，收到了苏联公民们的大批信件和电报，其中有的还附来了珍贵的礼品。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都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它的成员以及对我个人的最诚挚的兄弟情谊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们把苏联人民的这种感情看作是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象征。因为我和我的同志们难以对这么多的信件和电报一一作复，请让我们通过贵报转达六亿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们和我个人对苏联人民、对所有给我们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的苏联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于莫斯科

给苏联领导人的感谢电

（1957年11月21日）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1]：

当我们将要离开伟大苏联的国土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再一次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你们邀请我们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典礼和访问你们的伟大的国家，感谢你们对我们非常亲切的接待，感谢你们对我们和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深厚的兄弟情谊。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同志们身体健康，祝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永远巩固和不断发展。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伊尔库次克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祝贺诺沃提尼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的电报

（1957年11月21日）

亲爱的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欣悉你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谨以中国人民和我个人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以你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授予你最高国家职位，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对你无限的信任和爱戴。

祝你在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对周扬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讲话[1]的批语

（1957年11月24日）

周扬同志阅后，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

此事前日和你[2]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

我现在不看。待小平会议讨论再加修改后，我再看。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周扬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讲话。这个讲话稿，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作了修改，于11月20日再送毛泽东审阅。这篇讲话后来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题目改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

[2] 指胡乔木。

给张明霞[1]的信

（1957年11月25日）

张明霞同志：

来信早收到，迟复为歉！

《蝶恋花》[2]一词可以在你们的刊物[3]上发表。《游仙》改《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五日

---

[1] 张明霞，当时在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读书。

[2] 即《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这首词是毛泽东1957年5月11日写给当时的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原题为《蝶恋花·游仙》。在给张明霞的这封信中，毛泽东改《游仙》为《赠李淑一》。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中，这首词的题目改为《蝶恋花·答李淑一》。

[3] 指《鹰之歌》。这是湖南师范学院语文系张明霞等9位同学组织的“十月诗社”办的一个油印诗刊。他们从长沙市第十中学李淑一处抄录毛泽东写的《蝶恋花》词以后，于1957年6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允许在《鹰之歌》上发表。毛泽东回信时《鹰之歌》已停刊，这首词于1958年1月1日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首次发表，题为《蝶恋花·赠李淑一》。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和解放纪念日的电报

（1957年11月26日）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同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霍查同志：

当阿尔巴尼亚民族独立四十五周年和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四十五年前，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反对土耳其的黑暗统治、争取民族解放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胜利信心。后来，在反法西斯的解放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出的英勇、刚毅、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的精神，受到了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十三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于这些成就感到极大的欢欣鼓舞。

近年来，中阿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以彭真[1]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以里塔·马尔科[2]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的相互访问，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友好合作关系。

祝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幸福生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阿两国人民间的兄弟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

---

[1]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1957年1月曾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

[2] 里塔·马尔科，当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1957年5月曾率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

毛泽东等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7年11月27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同志，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国务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同志：

当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南斯拉夫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国和南斯拉夫两国人民的友谊几年来获得了不断的发展。今年，以彭真[2]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在南斯拉夫的访问，以及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伏克曼诺维奇同志和以斯坦鲍利奇同志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联名给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兼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布罗兹·铁托、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彼得·斯坦鲍利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国务秘书长科查·波波维奇的电报。祝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国庆。

[2] 彭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国民议会代表团的先后在我国进行的友好访问，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中南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友好合作。

祝南斯拉夫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慰问电

（1957年12月4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获悉阁下于十一月三十日突遭歹徒袭击。谨向阁下致亲切的慰问，并且对这次事件中不幸牺牲的人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为收复西伊里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一切危害印度尼西亚民族利益的阴谋活动一定要失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关于讲卫生、除四害问题的批语和信

（1957年12月）

一

送胡乔木[1]同志：

（一）此文[2]好，转载并广播；（二）中央和国务院应联合发一个指示[3]，号召全民动员，讲卫生，除四害，立即动手，分步进行；此点请你和邓、周[4]一商，指人起草，两星期内务必发出；（三）接着《人民日报》写一篇好社论[5]。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7年12月4日《安徽日报》社论《四害不除，决不罢休》。1957年12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于1958年2月12日发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刊载。

[4]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

[5] 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在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的同时，发表了《一定要在全中国除尽“四害”》的社论。

二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1]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改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2]，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五日八时

---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

[2] 指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这些讲话于1958年5月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印发给到会代表。

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三

乔木同志：

这里有一篇报道，一篇特写，一篇社论和几张照片，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似可转载[1]。请告新华社注意报道除四害和卫生运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七日

---

[1] 指1957年12月27日《浙江日报》刊登的报道《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吴兴南浔已成“无蝇镇”》、特写《王阿金老太太积极除四害》、社论《除尽四害》和9张有关的照片。同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些报道、特写、社论和其中的一张照片，报道的题目改为《人人动手家家扑打，一年四季坚持不懈，无蝇镇——吴兴南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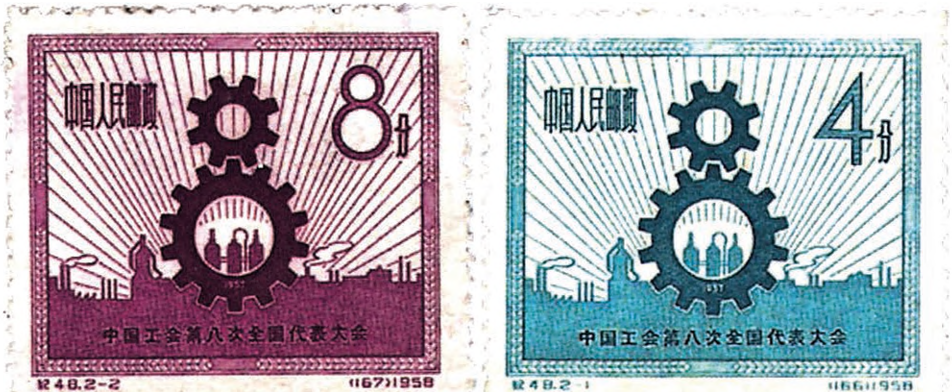
1957年12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12月2日，毛泽东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

1957年12月，毛泽东在第八次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期间接见武汉“二七”老人林茂祖。

1957年12月，毛泽东等接见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右四为赖若愚。

1957年12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接见马恒昌等新当选的执行委员。


中国人民邮政
8分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纪48.2-2
(167)1958
中国人民邮政
4分
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纪48.2-1
(166)1958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邮票。

祝贺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召开的电报

（1957年12月12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阿·尔·达姆波先生转非洲人国民大会第四十五次年会：

值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召开第四十五次年会之际，我代表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表示同情和支持，并且祝你们在团结南非各族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的事业中不断获得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1]

（1957年12月1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很年轻，这对你们的国家很有利。

吴巴瑞（以下简称巴）：因为我们的国家很年轻，所以领导人也很年轻。

毛：我国也很年轻，不过我们由于长期参加游击战争，所以年龄比较大一些。缅甸的面积不小，每人平均有多少土地？

吴觉迎（以下简称觉）：每人平均一英亩耕地。可开垦的荒地还很多,目前的耕地面积是二千万英亩,大概还可增加四千万英亩。

毛：中国每人平均只有三亩，缅甸每人的平均数比中国多一倍。我们的可耕地很少，但你们不用害怕中国是否想要缅甸的土地。缅甸的土地是缅甸人民的，中国任何人都不能要缅甸的土地。

前次吴努总理来华时，我问他缅甸是否有人害怕中国，他说有些人害怕。当时我也向他解释过，缅甸不必害怕中国，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

觉：我们也相信中国是这样的。不过在吴努总理来中国之前，和同毛主席见面之前，缅甸对中国确实有些害怕，因为缅甸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自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并在我们共同倡导五项原则后，我们彼此都了解了，所以现在缅甸没有害怕的情绪。

---

[1] 这是毛泽东和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吴觉迎等谈话的一部分。

毛：过去缅甸认为云南省是黑暗的，不知中国在那里放了多少军队，对缅甸在搞些什么鬼。那时缅甸对我们很不放心，因此我们就建议缅甸在云南设立领事馆看守着。

巴：我们产生这种害怕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从历史上看，大国总是欺侮小国。缅甸是处在大国之间。不过现在我们这种害怕已消失。

毛：尼赫鲁总理也对我们讲过，说有些国家害怕中国，有些国家害怕美国，甚至还有些国家害怕印度。我们同印度、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是友好的邻国，所以我们对我国的西南部很放心。对北部也很放心，因为有苏联、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当然我们不害怕日本、菲律宾、台湾和香港，而是害怕美国，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搞我们的鬼。我们的海岸线很长，达一万二千公里，所以我们要更注意海防。在我们西南部，我们不必放很多军队。

巴：缅甸决不会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决不会成为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基地。

毛：中国国家大，事情多，连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怎么还会想到去侵略别人呢？我们人口虽多，但是可以依靠自己满足人民的吃、穿。有些西方观察家，如艾德礼认为中国人多，将来出路成为问题。他们不知道中国平均养活一个人只要十五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一亩），有些地方只要三十分之一公顷（半亩）就够了。我们人口在增加着，估计到二十世纪末中国人口将达到十亿。可是到那时我们的工农业都发展了。

周恩来总理：那时十个人可有一公顷土地，即每人一点五亩。

毛：因此中国不会发生对外扩张的事。假使人类能发明人造粮

食就好了，目前穿衣可用人造纤维解决。

觉： 如果人造纤维能大量生产，现在种棉花、种麻的土地就可用来种粮食了。

毛： 国民党残余部队在缅甸还有多少？

巴： 还有一些。但是他们都流窜在缅甸、老挝边境和缅甸、泰国边境，行踪很难捉摸。我们派军队去追击时，他们就逃到老挝或泰国去。等我们军队一走，他们又回来进行骚扰。

毛： 数目少了一些了吧？

巴： 估计还有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不过已不成为政治性的组织，而成为股匪，到处抢劫。过去最多时有一万二千至一万六千人。

毛： 这些中国人很对不起缅甸人，他们破坏缅甸的村庄。不知缅甸是否向中国要求赔偿？

觉： 这些坏人同中国政府是没有关系的。

毛： 不过我们还是这样感觉的。你们帮助我们去消灭他们，这是互相合作，因为他们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巴： 在这个问题上，泰国给了我们一些帮助，中国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例如，我们过去派空军去轰炸这些国民党部队，有时飞机越入泰国国境，这样我们只能经常向泰国道歉。现在达成谅解了，因此也就好了。

毛： 假使泰国能变成像你们的国家那样就好了。泰国是参加东南亚条约的国家，不过泰国的大多数人对我们是没有敌意的。泰国有些人怕我们去侵略他们，因此有人就造谣说，中国要给在中国避难的前泰国总理乃比里十万大军打回泰国去；又造谣说，中国在搞自由泰国活动。当然后来泰国对我们有了了解。

觉： 泰国在一开始时对中国是有这种害怕的。

毛：他们派了一些代表团来中国看过，现在好一些。缅甸同泰国有外交关系吗？

巴：很早就有，不过改进两国的邦交关系还只是近几年来的事。

毛：上次我曾对吴努总理讲过，希望缅甸帮助中国做一些泰国的工作。

吴拉茂：吴努总理已作了努力。巴基斯坦是东南亚条约国家，但它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泰国也可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毛：你这种观察很对。

巴：吴努总理不久将去泰国。

毛：请转告吴努总理，希望他再帮我们一点忙。他已帮助过我们，我们很感谢。相信在一段时间后，我们同泰国的关系一定会搞得好一些，目前泰国还不敢这样做。

1957年8月2日，毛泽东等在青岛市政协礼堂接见缅甸联邦国会访华团。

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1]给叶子龙[2]的信

（1957年12月17日）

叶子龙同志：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3]、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上午二时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1957年12月9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报告共9个部分：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二、农村工作；三、工业生产和工人阶级；四、财贸工作；五、知识分子工作和文教工作；六、资

产阶级和民主党派；七、肃反问题；八、军事工作；九、党的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前一种情况是比较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是有起伏的。在这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阶级敌人被迫退却，斗争形势可能在一定时期缓和下来。”“这种斗争的起伏形势，将在若干年内反复地发生。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国内阶级斗争，将通过这种起伏，逐步地减弱以至消灭。”报告批评了当时党内看不到敌我矛盾仍然存在的右的倾向和夸大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左”的倾向。这篇报告发表于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题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人民日报》加了编者按，指出：“江华同志这个报告，用整风运动作为‘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系统地讨论了一个省在一年来的各方面的工作，鼓舞了干劲，批判了谬论。”“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究竟什么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怎样认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为什么党在一个时期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另一时期强调阶级斗争？这些重大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江华同志在他的报告里，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正确的解答。报告针对党内的思想分歧，批判了忽视敌我矛盾和夸大敌我矛盾的两种错误倾向，坚持了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这里所批判的错误观点，目前在其他地方的党组织内也是存在着的，也是必须加以澄清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对这些理论性原则性的问题展开大辩论，对于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贯彻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有很大的意义。”在江华作上述报告半个月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毛泽东审阅了这一报告，并作了一些修改。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

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一段话后面加写了“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一句。

[2] 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刘顺元，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给周世钊[1]的信

（1957年12月17日）

惇元同志：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因忙迟复，幸谅。你好吗？我还可以，勿以为念。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给李淑一[1]的信

（1957年12月17日）

淑一同志：

给我的信及祭文，均已收到。迟复为歉。寄上五百元，聊佐菽水，勿却。不久可能去你那里，可谋一晤。

顺祝教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

[1] 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杨开慧的好友，当时在长沙市第十中学任教。

给孙燕[1]的信

（1957 年 12 月 17 日）

配君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已六十，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问你母亲和你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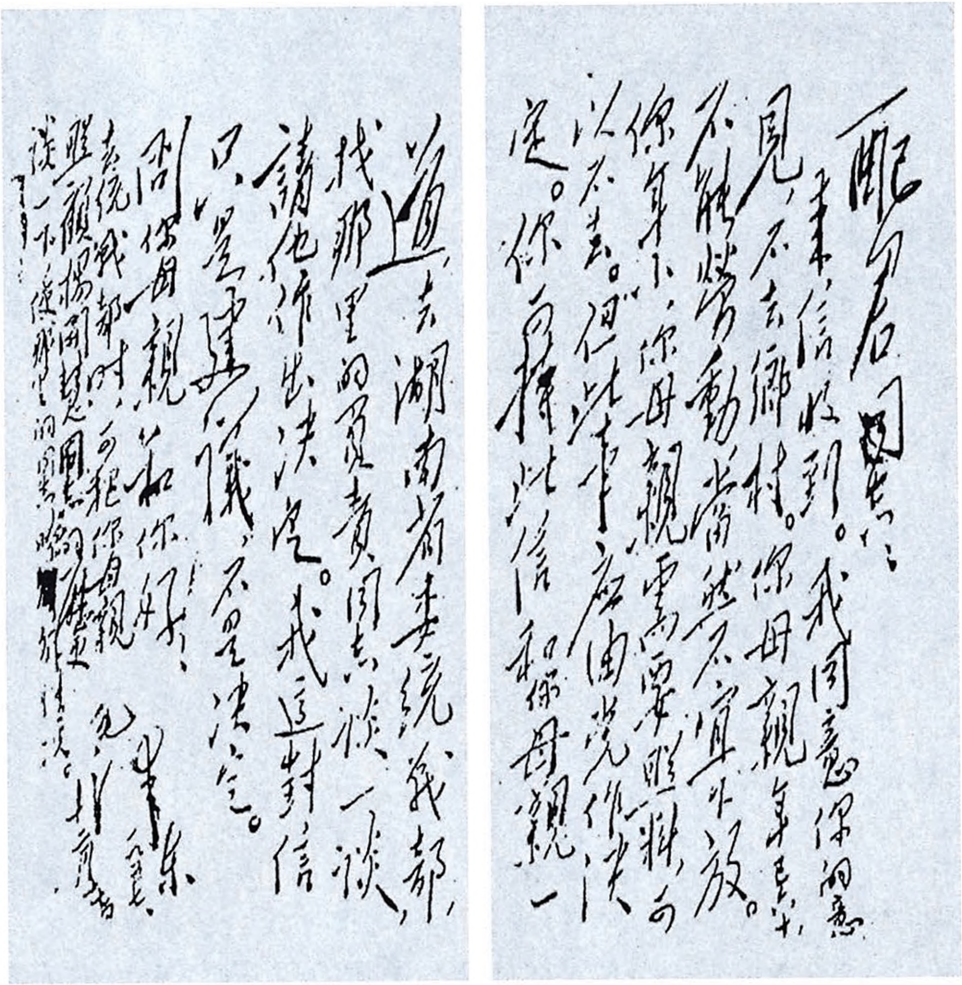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杨开慧同志的历史谈一下，使那里的同志了解情况。

---

[1] 孙燕，学名孙佩君。她的母亲陈玉英1926年冬到毛泽东和杨开慧家里当保姆。1930年10月随杨开慧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同敌人作了不屈的斗争。



耶石同志：

来信收到。我同意你的意见，不去乡村。你母亲年岁大，不能劳动，当然不宜下放。你年小，你母亲需要照料，可以不去。但此事应由党作决定。你可持此信和你母亲一道，去湖南省委统战部，找那里的负责同志谈一谈，请他作出决定。我这封信只是建议，不是决定。

问你母亲和你好！

毛泽东

八月七日

去统战部时，可把你母亲照顾烈属问题同他们谈谈一下，促那里的负责同志[illegible]解决。

毛泽东致孙燕信的手稿。

空军要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1]

（1957年12月18日）

退彭德怀[2]同志：

非常必要。请你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赓1957年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侵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给彭德怀并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说，台湾飞机今年多次偷入大陆沿海重要城市和内地，空投了大批反动传单和“慰问品”，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由于部队有些领导同志对防空作战思想上不重视和领导上检查督促不严，对窜入内地蒋机均未能将其击落。为了迅速扭转这种状况，我们已布置空军和各军区今后必须采取一切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可能入侵内地的蒋机给以应有打击，并力求将其击落。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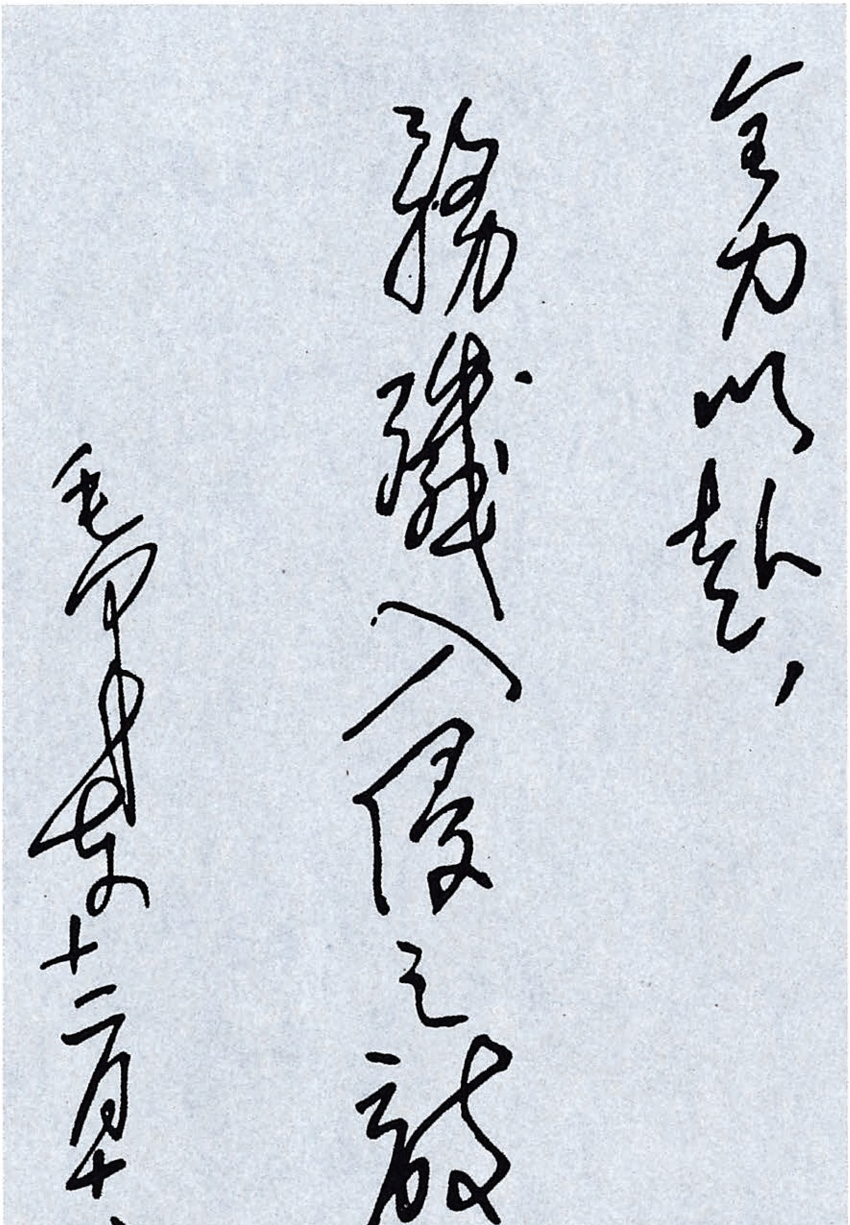
为空军题词

（1957年12月18日）

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全力以赴，

务歼入侵之敌。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空军的题词。

祝贺亚非团结大会召开的电报

（1957年12月26日）

亚非团结大会：

亚非团结大会的召开，对于发扬“万隆精神”，促进亚非人民团结，争取和维护亚非民族独立以及对保卫亚洲、非洲和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将有巨大的贡献。谨致衷心的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957年12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杭州。

对从朝鲜撤回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1]的批语

（1957年12月31日）

同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

[1] 从朝鲜撤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方案，是周恩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商议后拟出的。关于撤回志愿军的办法，方案提出：全部志愿军在1958年底以前撤完，分为3批，每批各撤1/3。第一批在1958年3月至4月撤回；第二批在7月至9月撤回；第三批在年底撤回。

关于中国前途的谈话

（1957年）

记者问：生活在比以前舒服得多的条件下的青年一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您的看法怎样？

毛：我自己也无从知道，这恐怕谁也无从知道。可是能够想到两点：一点是继续革命，也许会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外一点，也许现在的青年们会否定革命，表现不好，也就是说，或许会和帝国主义和好，把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领回大陆，投靠现在国内存在的少数的反革命分子。

当然，我不希望他们反革命，可是未来的事情要由未来的一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决定。是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还不能预想到，正像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人们所具有的广泛知识超过了封建时代的人们一样。从长远看来，将来的一代应该比我们更聪明，问题是他们怎样判断，而不是我们来判断。今天的青年以及他们的未来的青年，将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结果。

1958

1958年，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对《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新闻稿的批语

（1958年1月2日）

乔木[1]：

红领巾新闻[2]可阅，并可参看江苏报纸由新华社写一条新闻播发[3]。

毛泽东

一月二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7年12月30日《新民报》晚刊登载的新闻《江苏红领巾支援四十条》。报道了南京市雨花台区第一中心小学少先队向江苏省少先队员提出开展“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活动的倡议。主要内容是：（一）开展各种义务劳动，像积肥、修水沟、除四害、扫盲、种向日葵等，以实际行动为家乡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贡献力量；（二）用我们集体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钱集中上缴，在最有意义或最需要的地方修建红领巾水闸和水库，作为少先队员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献礼。报道说，他们的倡议已受到江苏省教育厅和共青团江苏省委的支持，红领巾水闸和水库的修建地点也已确定，“红领巾水闸”将修建在涟水县，“红领巾水库”将修建在赣榆县。

[3] 这条新闻经过改写，以新华社南京10日电播发，载于1958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上，题为《我们也来支援四十条》。

祝贺缅甸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8年1月2日）

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阁下：

在贵国独立十周年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缅甸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缅甸联邦繁荣和缅甸人民幸福。祝中缅两国人民间亲密的友谊永世长存。祝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

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

（1958年1月3日）

一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肃清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1]一份转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办理。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

---

[1] 《上海市关于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中说，1957年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人委召开了行政会议和各区电话会议，布置了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参加突击。12月19日，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市工联、团市委、市妇委、卫生局等机关团体负责人和干部千余人组成了100个突击队，深入到17个区38个单位进行了半天的除四害突击活动，在全市人民中作出了榜样。现在全市比较显著的蚊蝇孳生地初步进行了清除垃圾、堵竹节、挖蛹工作。各个区的卫生运动都开展得有特点、有目标。如东昌区的突击点是发动户籍警深入到每家每户宣传除四害，各办事处均有一个重点户带头示范，树立旗帜，并已决定将每星期四作为除四害日。

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中共中央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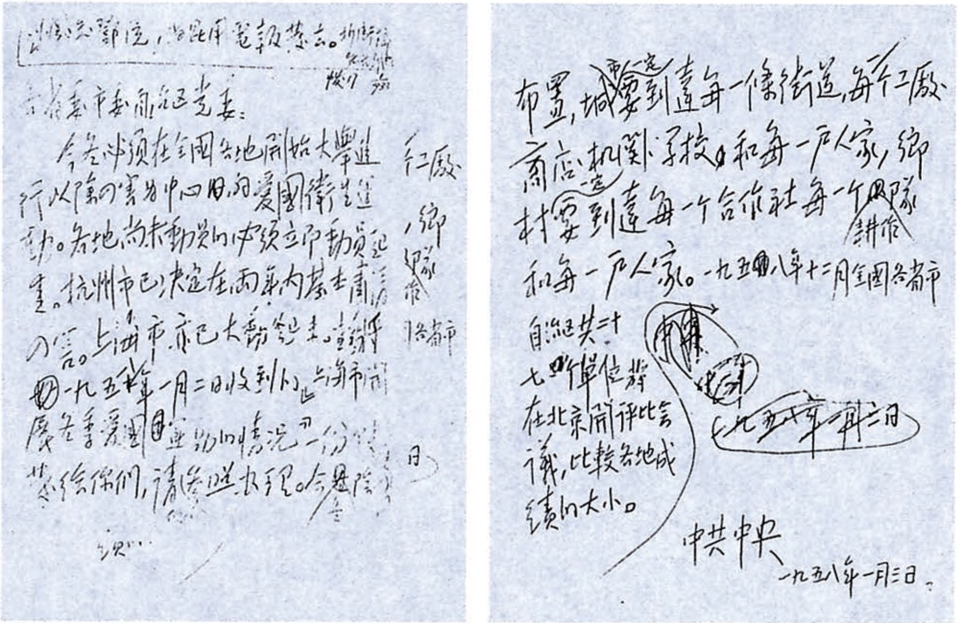
二

刘、周、朱、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抄卫生部和各部门。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illegible]部门，[illegible]党刊发去。[illegible]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今冬必须在全国各地开始大举进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各地尚未动员的，必须立即动员起来。杭州市已决定在两年内基本消灭四害。上海市亦已大动员起来。兹将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收到的上海市开展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一份发给你们，请参照办理。今冬明春[illegible]

每个工厂

乡村

耕作队

各省市

日

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共二十七个单位将在北京开评比会议，比较各地成绩的大小。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

中共中央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的手稿。

对《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1]的批语

（1958年1月3日）

乔木[2]：

---

[1] 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报》发表了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社论说，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热烈讨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认为纲要所规定的粮食生产指标和其他各种主要指标，在浙江不仅可以实现，而且可以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或稍多一点的时间内提早实现。社论指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它能不能提早实现，是否有勇气促进农业生产在现在的基础上来一个大跃进，在人们思想上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两种对立思想的斗争。有勇气、敢作敢为的人是我们事业的“促进派”；没有勇气、怀着无穷忧虑的人是“促退派”。社论列举了这两种人在对待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经验教训、自然条件、依靠谁来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推广先进的增产经验等方面所取的不同看法、不同结论和不同态度，指出：促进派比较能够全面地看问题，既看到困难的一面，也看到有利的一面，因而能够充分发挥积极因素，克服困难；促退派则往往只看到困难，夸大困难，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消极畏难。社论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都应当是促进派，而不应当是促退派。毛泽东阅读这篇社论时，除写了这个批语外，还把社论中“在我们的队伍中，毕竟有少数人是促退派”一句中的“少数”二字改为“许多”；把“好像农业生产注定了不会大跃进，只能以爬行的发展”一句中的“爬行的”改为“爬行方式”。1958年1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此篇很好，可转载，并可广播。

毛泽东
一月三日

对《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的批语

（1958年1月3日）

江青阅，此件[1]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

[1] 指1958年1月1日《光明日报》刊载的王佩琨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文章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并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水泥、煤炭、机床、化肥生产等方面的差距，认为我国在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在杭州会议[1]上谈两类矛盾问题的讲话提纲

（1958年1月）

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间〈期〉）

大量：先进、落后

原因：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主观主义的原因；领导的原因——领导好，形势先进占多数，落后迅速克服。

经常把几个问题放在心里想一想，同少数人吹一吹，这是一个重要方法。

---

[1] 指1958年1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的有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另据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转载《浙江日报》报道，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视察了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向该所所长楼光宇询问了所里的研究工作情况，并问："你们有没有进行农具方面的研究工作？"楼光宇答："我们只结合做了一些。"毛泽东接着说："要做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部门来进行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楼光宇回答说："好的。"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1月3日）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匹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匹，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治淮十二亿人民币搞了七年，治淮的数量，如果打七折（有些有质量上的问题），也是合算的。原来计划低了，后来超过了，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评愈高兴。甘肃一千多万人口，劲头很厉害，值得去学习。

要抓十二条，今后要评比：1. 水；2. 肥；3. 土；4. 种（优

良品种）；5. 改制——如复种、晚改早、旱改水；6. 除病虫害（浙江因虫损失一亿斤，一年夏把虫灭得差不多了，日本无马克思主义，已搞得无虫了，我们有马克思主义）；7. 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等）；8. 畜牧；9. 副业；10. 绿化；11. 除四害；12. 治疾病讲卫生。

还要抓另一个十二条，也要评比：1. 工业；2. 手工业；3. 农业；4. 副业；5. 林业；6. 渔业；7. 牧业；8. 交通运输业；9. 商业；10. 科学；11. 文教；12. 卫生。

四十条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倾。一九五六年工业产值增百分之三十一，没有一九五六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开党代会再比一次。省与省比，县与县比，社与社比。如果大家同意再商量着办。大家都要到别的省参观参观，自己不出门，比输了就活该。很值得到甘肃去一次。

要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开几次会，开小型的会，抓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会，两个月开一次，每次不超过五天，县委到地委去开会（几个地委一起开，比较有兴趣）。大型的“非常会议”，一年只能开一两次，要两个月抓一抓，否则一年很快过去了。各省评比，在中央开会。

我自己每月同大家谈四次，到处跑一跑，每次两天到三天，看五六个单位。

工业也要四十条，科学文教也要有。先有个别人准备意见，大家再七凑八凑才成。

全国搞几个经济协作的区域，有些省可以交叉。要认庙不认神。要有这么一个传统，有庙不论谁在那里挂帅，就由他做头，能

凑合过去就行了。沙文汉、杨思一等是另外一回事。

湖北省委有个关于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报告，中央批转了，看到没有，很重要，要普遍搞试验。

关于积累与消费问题，究竟积累问题多大，有的提百分之四十五，有的百分之五十，有的百分之五十五。最好一半一半，要看年成，看地方，作几种规定。百分之六十分掉不是一般标准，是减产的情况。要勤俭持家，个人的消费要节约，红白喜事，大吃大喝要反对。各省要出个布告禁赌。婚丧喜庆，红白喜事，都要从简，家庭造酒，完全禁止也不好，爆竹不要禁了，有振奋精神的作用。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做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什么时候交计划，省地县社都要搞，先搞粗线条的省，要半年交卷。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1月4日）

《哲学研究》第五期上李□的一篇文章，第六期上冯□□的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一看。形式逻辑是量变阶段的科学，是辩证法的组成部分。量变与质变是对立的统一。事物有它的相对的固定性。定出计划，做出决议，是相对的平衡。定了以后，还是要变。平衡、巩固、一致……都是暂时的，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开会的都有散会的思想，越开得长，越想散会。

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级数学。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圆周割裂千万片它就方了。圆与方是对立的统一。

思维形式表现为：概念、判断、推理。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形式逻辑有不少错误的大前提，因而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可是按形式逻辑来说并不错。它只管数量，不管内容。内容是各种学部门[1]的事。

昨天讲了两个十二条。下面再谈几个问题：

一、水、肥、土等十二条，要抓住，相互平衡。有水无肥，有肥无水都不行，是相互联系的。农业十年以后（也许要更多的时间）要实行电气化。电气化犁田。畜牧与肥料有关。又是动力，是肉食，是工业原料。除四害与劳动力有关，增加体力，振作精神。

---

[1] 原文如此，疑似漏字。

二、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二条要抓住。

三、反浪费。上海材料，梅林罐头食品厂四年中浪费了四十五万，占资产之一半，八年可以建同样大的一个工厂。这是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每个工厂、学校、机关、合作社都搞一下，要节约多少物资。什么事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人家都不信。只要一个材料就够了。剖一个麻雀就够了。不一定剖太多。

整风中以十天时间专搞反浪费（从放到改十天到十五天时间就可以）。可以搞几十亿。

四、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要当作大问题来研究。这个比例有百分之四十五、百分之五十、百分之五十五、百分之六十等，各种分法要研究。春季即抓，不抓来不及了。这是大问题，搞得不好，工人农民不满意。一九五四年搞了九百六十亿斤，得罪了几亿农民。今年八百五十亿斤，暂时规定三年。我倾向于百分之五十。歉收、丰收有所不同。跟勤俭持家结合起来，可过日子。婚丧喜庆，一律从简。

五、要搞试验田。湖北省委关于试验田（的报告）是个好报告。（□□插话：浙江省委的报告，因为有了《人民日报》的按语，大家就注意去看了。）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六、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要作两方面的批判。专管政治，不熟悉业务不好。政治与业务就是红与专。搞政治的都专有困难，但主要的部分要专一下。湖北省委试验田很见效，搞的时间并不长。

七、打掉官风。上海提出的。不要做官，统统把官风打掉，与

老百姓平等。

八、按时交计划。

九、除四害。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每月大检查一次。“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这句话很好。

十、绿化。今年彻底抓一抓，做计划，大搞。听说三丈多高的树每天要吸收和散发一吨多水，会不会影响地下水？

十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各省地方工业产值比例要超过农业生产（产值）（包括下放给地方管的工业在内）。要有全国平衡，不能无政府主义。

十二、开会办法。要大中小型。（各省）“非常会议”（如党代会）一年一二次；中型几十人到二三百人（如开县委书记会议），小型的如地委书记会议。要下去开会，了解他们，“非常会议”谈政治，业务会议也要谈政治。

十三、省委书记、委员轮流离开办公室，一年四个月，到处跑，可以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办法。到一处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下去一周半月也好。不一定到一个地方就是三四个月。

十四、内部不要请客，不要要人家请吃馆子，不要迎送。不专搞舞会，不请看戏。谁去机场接客人，要处分被接的人，这是打掉官气的一个方面。

十五、关于两类矛盾问题。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一类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一类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内部的，先进落后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分两类，一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还有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些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打老婆，甚至因此杀老

婆，又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问题看不到底，譬如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北京开会时还看不大清楚，会后南下到山东，到其他地方一看，形势大变，才有把握写序言。这是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形势看不清。有些人硬不肯增产，总认为没有条件。开展整风，右派一下子起来，几篇社论，六月到七月大局一定，许多事是无法完全预料到的。

主要的占大量的矛盾，阶级斗争是主要的，是要革一个东西嘛。宪法上规定三大改造，实际上是两大改造，改造资产阶级，改造小资产阶级。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搞得好再有□□年就行。□□年加八年，共□□年，不用□□年。我们每年这样搞一次整风，就把资产阶级思想搞掉了。大量的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同大量中间派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富裕中农中百分之四十赞成合作化，百分之四十不那么热心，百分之二十想退社，未真心退社。坚决退的是少数，有百分之五可能是右派，他们还是劳动人民，不划右派，要七擒七纵。

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

1.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劳动人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官僚主义（现在要挂在资产阶级账上）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2. 主观主义的原因。看不准，估计不足，右了。要经常提醒跟着形势前进。

3. 有领导的原因。领导好一些，先进占多数，落后占少数。可以这样领导，可以那样领导（如浙江平阳和黄岩两县就不同），只要

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了解整个气候。如何领导，很值得研究。山东寿张县有个刘传友是深入领导的。鲁西无喂猪习惯，现在每户养两头，还能改造土壤。浙江桐庐油厂、酒厂在同样条件下比出品率高低，使落后赶上先进的材料很好。《人民日报》王朴写的短评也写得好，里面有辩证法（均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要宣传理论，讲辩证法，讲唯物论，如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内容。

经常把问题放在心上想一想，和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吹一吹，和自己的秘书平等地吹吹，看看他们的看法如何，找几个党委书记谈一谈，不作为决定，作为酝酿。在一个时期内把几个问题想一想，吹一吹，作为一个重要方法。不要事先不动脑筋，不想一想就开会。有些东西是慢慢成熟的。

十六、谈谈不断革命论。我说的不断革命论和托洛茨基讲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革命的步骤是：

1. 夺取政权，把敌人打倒，这在一九四九年就完成了。

2. 土地革命，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基本完成了。

3. 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现在讲主要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一九五五年也基本完成了，一九五六年有些尾巴。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中农以上的就不想搞合作化了。保加利亚好些，百分之三十合作化。

4. 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这一次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完成。明年上半年还要搞。

5. 还有技术革命。

1至4项都是属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性质的。土改是封建所有制的破坏，是属于生产关系的。技术革命是属于生产力、管理方法、操作方法的问题，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搞。1、2、3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旧有的，一个人过一两年又会生霉了。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要大量发展技术专家，发动向技术好的人学习。在工厂、农村中有初级的技术家。红安县领导干部原来是空头政治专家，后来又红又专，工业照桐庐县的方向，搞试验与技术革命联系起来，政治家与技术家结合起来。

从一九五八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在技术革命方面，着重搞好技术革命。斯大林在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时，也提出了技术革命。

着重搞好技术革命，不是说不要搞政治了，政治与技术不能脱离。思想政治是统帅，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

消灭阶级再有□□年就好了。以后，人与人之间思想政治斗争（或者叫革命）还会有，但性质不同，不是阶级关系，都是劳动人民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这时的斗争也是分两部分，一是劳动人民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一是属于主观主义——认识上的原因，或者还有领导的原因。懂得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好一些，否则差一些。“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为什么莫斯科宣言中加上辩论法一段呢？因为它适应过去、现在和将来。将来全世界都统一了，两派人争权还会有的，因为意见不一致，出各种报，演各种戏，各人争取群众，有思想交锋。那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总是有的，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会有左中右三种人。上层建筑在那些顽固落后的人手中，又不许大鸣大放了。不会

改正错误，也会有冲突。没有军队了，也可能用拳头，用木棒。那时没有阶级，处理得好，对抗，处理得不好，也会对抗。一个进步路线，一个落后路线，是互相排斥的，是对抗的。□□年后，国家权力对内职能逐步地不存在，都是劳动人民了。现在对劳动人民来说，权力也基本不存在了。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对劳动人民不能使用国家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打倒官气，十分必要。对敌人威风凛凛是对的，对人民就不行了。

十七、政治家一定要懂些业务，农业搞试验田，工业搞试验品。要比较，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与车间、小组与小组、个人与个人之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要讲评比，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是可比的，不是不可比的。

政治家总要懂得一些业务。技术上要比，政治上也要比。技术与政治相结合，看哪一个搞得好。

大家把几篇文章看一看，《解放日报》登的上海梅林厂开展反浪费专题鸣放，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关于桐庐厂比出品率的报道和王朴写的短评。一件事反映了全国性的事，大家一定要把人家的好事当作自己的好事。搞社会主义，不论问题出在哪里，都要当作自己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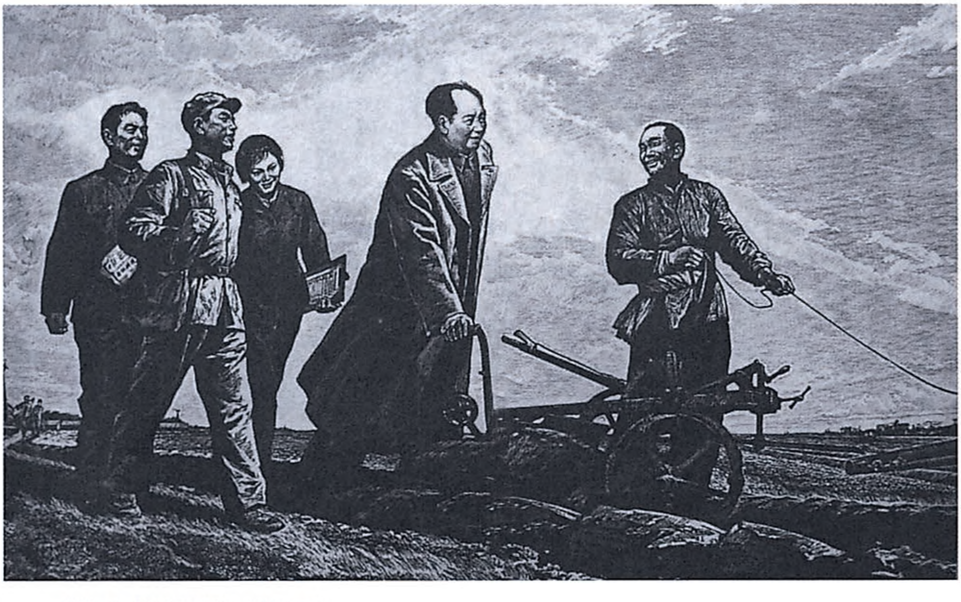
学生中的右派，百分之八十可以留校继续读书，要加强对他们的工作，学生要和他们往来，逐步把他们化过来，他们做了好事也要表扬，当然也有假积极的。

不要以为经过这次整风，一切都是黄河为界，界限划得那么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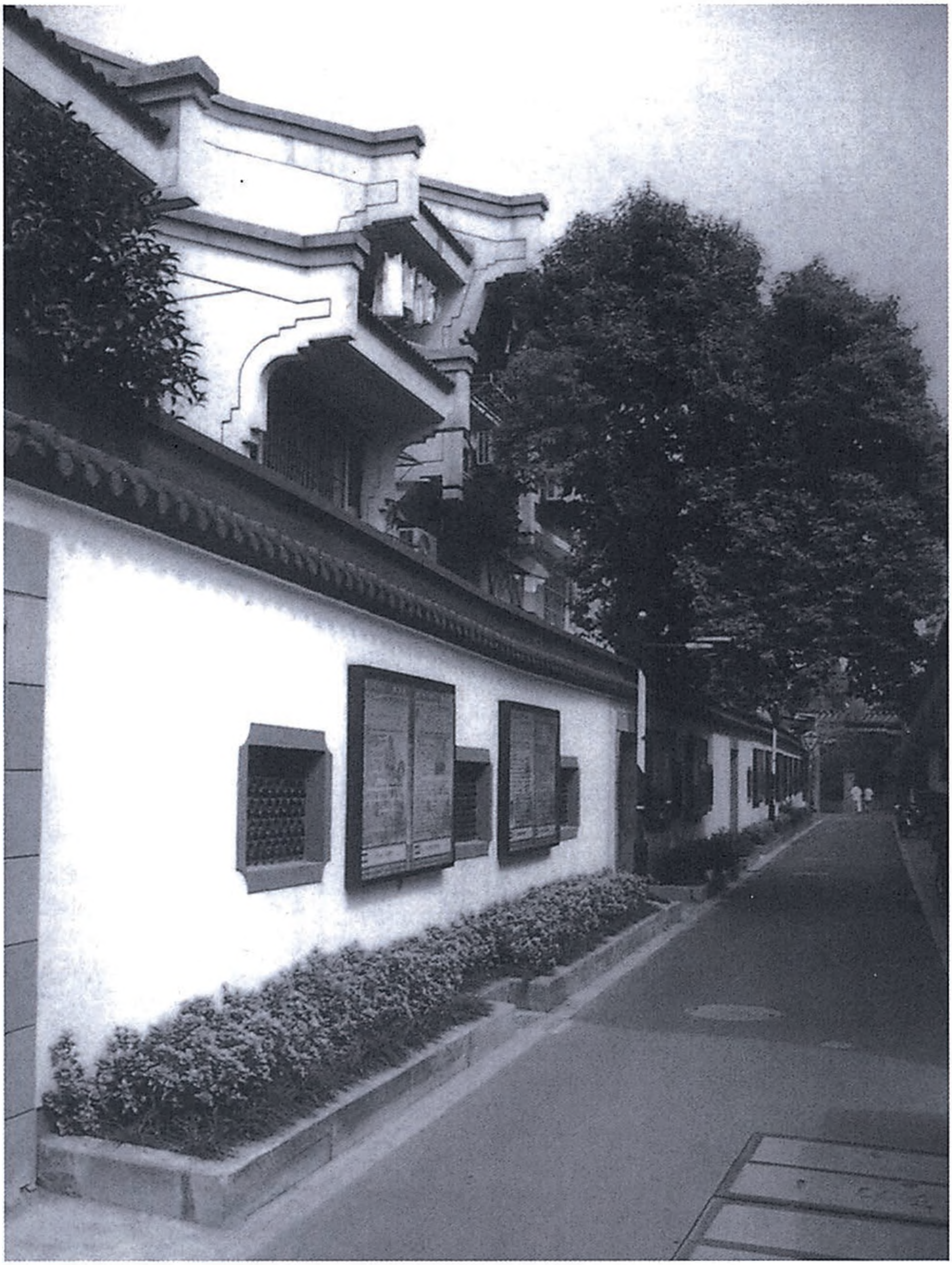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耕田。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耕田。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农科所观看双轮双铧犁耕田。



《伟大的实践》（版画）



1958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视察浙江时在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的陪同下视察了小营巷。图为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的陪同下视察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小营巷居民亲切握手。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小营巷和居民亲切交谈。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参观小营巷61号墙门。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亲切询问小营巷居民的生活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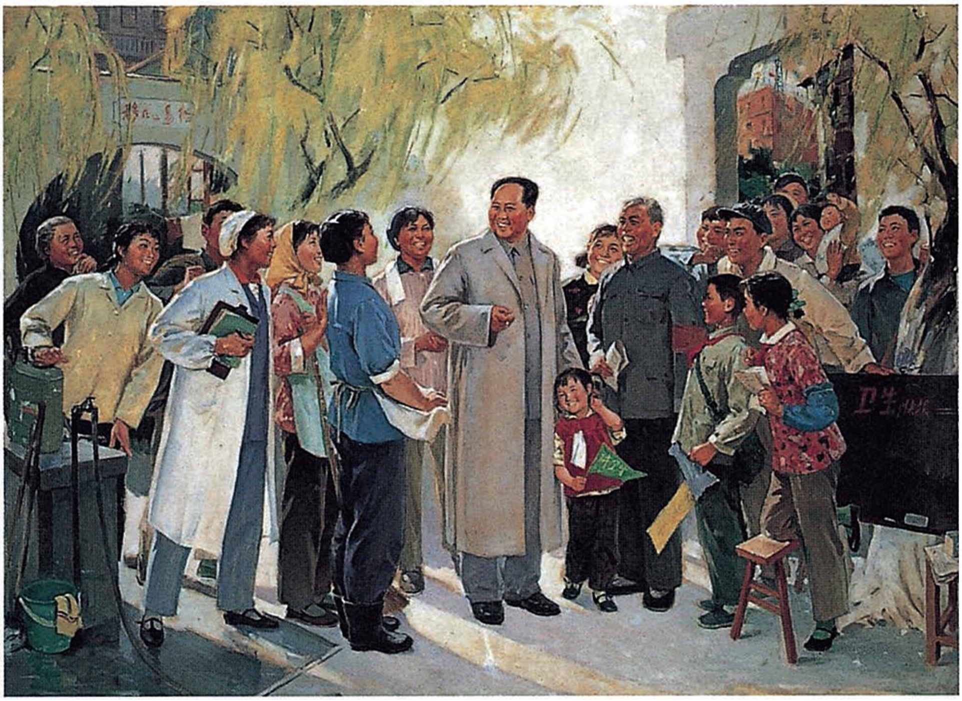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小营巷查看墙上庆祝元旦的黑板报。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视察杭州小营巷。图为毛泽东在居民家询问居民工作、学习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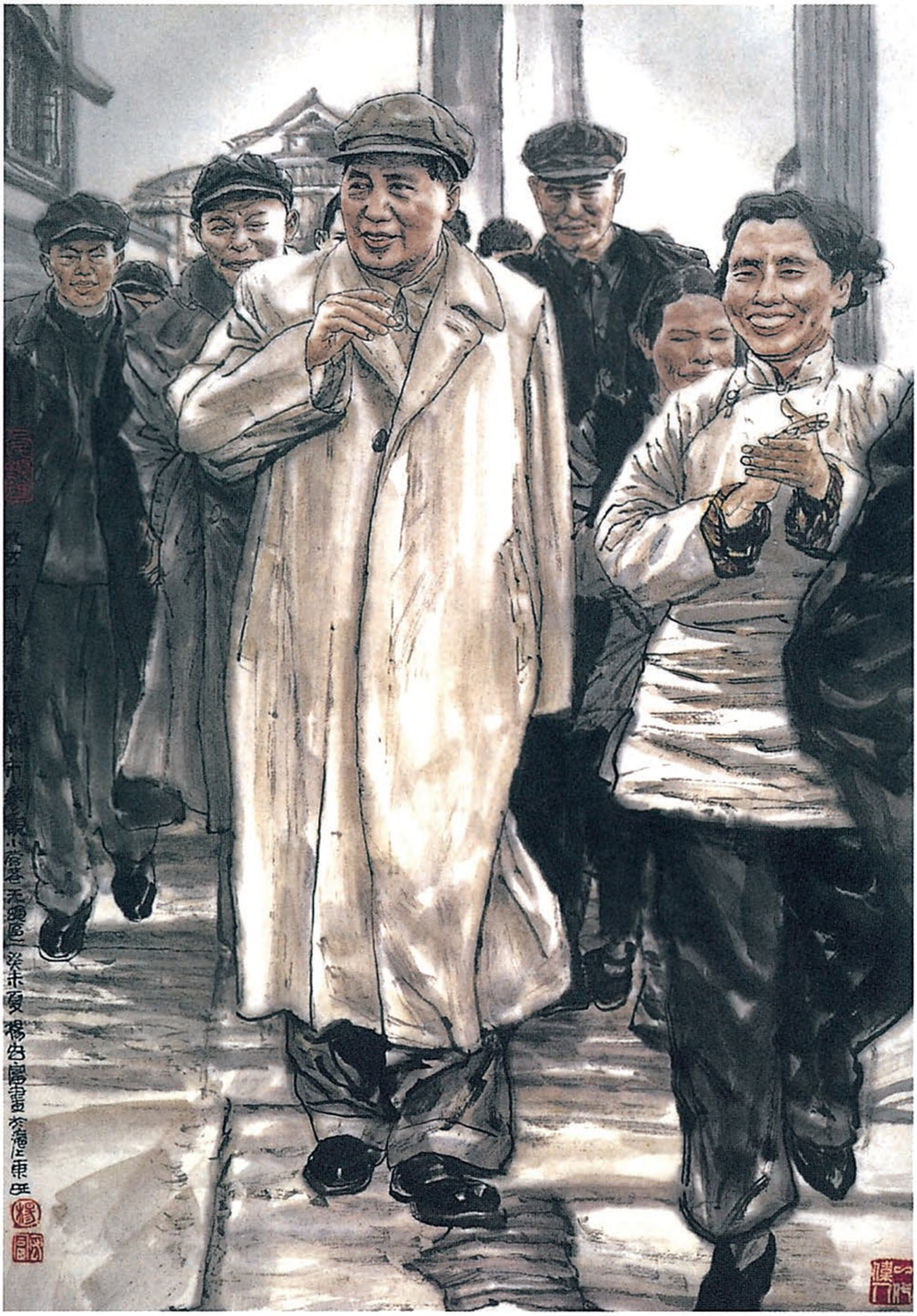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小营巷居民家阅读当日的《杭州日报》。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小营巷居民依依惜别。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和小营巷的群众告别。



《毛泽东主席视察小营巷》（油画）



《参观小营巷》（中国画）

对《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的批语

（1958年1月9日）

送乔木：

烧砖粉代水泥这件新闻[1]，可以转载，并广播。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2]

---

[1] 指1958年1月8日《广西日报》刊载的《烧砖土可代替水泥》一文，文章介绍了广西省横县南康乡用烧制的砖块轧成粉来代替水泥同石灰、河沙配用，以解决修水利时水泥不足问题的经验。1958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以《烧砖粉可以代替水泥》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

[2] 这里月份有误，应为1月。

关于召开南宁会议[1]的通知

（1958年1月）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2]，毛泽东，共26〈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十天会，廿号完毕（中间休息二天到三天，实际开会七天到八天）。

谭震林[3]管中央，总司令[4]挂帅。陈毅[5]管国务院。

---

[1] 指中共中央准备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至23日举行。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总理，指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黄敬，当时任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冶金工业部部长。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欧阳钦，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史向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总司令，指朱德。

[5]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月）

一

上海报告[1]

文件，秀才，理论，文风，文法，学哲学，学逻辑，文件的重要性，苏联不重视理论及文件。[2]

学外国文，十年计划，革命意志，朝气，可以不很〈紧〉张，安排得好[3]

---

[1] 指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2] 领导干部要学理论是毛泽东这一天讲话的主要部分，他说：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个人每年搞篇把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

[3] 毛泽东在讲话中谈到要学外国文的问题时说：外国文也要学，除非发烧三十九度，病得要死。我六十多岁了，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外国文可以休息脑筋。搞个十年计划。工作紧张是对的，但不要十分紧张，要很好安排。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都可。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1]

学楚词，先学离骚，再学老子

会议上谈理论

官僚主义

二

外交——兄弟（又团结又斗争）、亚非（又团结又斗争）、西方——使处于被动（另一类型的又团结又斗争）

发展真理，破除迷信

王明

中国的共产主义

天津南京两封信

兄弟国家的怀疑

资本主义初高兴，几天后即清醒，杜勒斯正『正』确，不愧为领导者

办刊物

秀才训练班（山西）[2]

崔昌益、莫洛托夫、高岗

下一次会议的重点题目是什么?

设置对立面，欢迎对立面。

---

[1] 毛泽东在谈暮气问题时说：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面。要讲革命朝气。

[2] 中共山西省委1958年1月曾经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指示。

随时都有两种方法可以比较

落后的劳动者阶级表现积极起来；它的意义是什么?

马克思用这点作标识，证明革命到来了。

1956年我们有些人不认识这一点。

1958年，人民对革命和建设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高

如何保持这种积极性?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1月11日）

关于向人代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只给成品，不给材料，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么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谈，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慢慢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是一个极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愿，三不愿”，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点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就会变色。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

了，钻到那里边去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如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河北省一九五六年兴修水利工程一千七百万亩，一九五七年兴修水利工程二千万亩，一九五八年二千七百万亩。治淮河，解放以后七八年花了十二亿人民币，只做了十二亿土方，今年安徽省做了十六亿土方，只花了几千万元。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是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二十年经验，只给我们留下四万吨钢，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

右派老是喜欢。轻视古典，这是比先进还是落后问题，古典总落后一点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麻雀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般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墙打洞，张奚若也哭鼻子，这是政治。

元旦社论，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陈伯达插话，说应该多积累）。

减少人员问题，商业部分，合作社不受政治影响，说了几年了，他们不砍，交给地方砍去它一半。我一进北京，三轮车一辆也不能减，我们的“圣旨”太多了。无考虑余地，你说可以考虑，我也高兴一点。我们的现状维持派太多。要重新做判断之学，如“蒋介石是反革命”，有些概念要重新判断。

章伯钧要搞资产阶级设计院，我们设计院是政治局，办法是通一通情报，不带本子，讲讲方针。搞个协定如何？如果你不同意，我有个抵制办法，就是不看。已经两年不看了。地方财政部门也采取这个办法。

这几年反分散主义，创造了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权，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政治机关有些人提出，说是党政不分，是不是要一家一半？这不行，先不分，然后才能分，不然就是小权独揽，如四十条纲要怎么分，中央二十条，农业二十条，这是不行的。中央搞了四十条，然后分工去办，这就是分。宪法，不能中央搞一个，由什么机关搞一个。小权小分，大权就不能独揽。大家不是赞成集体领导吗？一长制不是搞倒了吗？（苏联军队实行一长制，朱可夫犯了错误。）

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1月12日）

八年来我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我说了一千次，一万次，这是极而言之，说得多了，等于白说。人的思想总是逐步受影响的。要“毛毛雨下个不停”，“倾盆大雨”就会发生径流。政治局是团粒结构不足的，倾盆大雨吸收不了，顺着身上流走了（这是土壤学，农业学都要有一本，不然省委书记当不成，有一天总要撤职的，这不是我威胁你们）。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你给十全十美的文件，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了，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是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不准备看。

在杭州会议我讲的，恩来同志讲了没有？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我不懂，也不知道。

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

（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六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反“冒进”就影响了人代会的报告。人心总是不齐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法则。孟夫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惜也。”人心不齐，又可以齐，有曲折，螺旋式地前进。当然大家都是为党为国，不是为私。

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就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财经部门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也不讲。要和风细雨，要事先通一点情报，总是倾盆大雨，发生径流，总不开恩。总没有准备好，不完全，这就是封锁，这是斯大林的办法。开会前十分钟拿出文件来让人家通过，不考虑人家的心理状态。你们是专家，又是红色，政治局多数人是红而不专。我攻击方向，主要是中央部长以上的干部，也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封锁的人。小会不解决问题，就开中央全会（文章做好这件事。没有认真解决，写给广西省委一封信，谈报纸问题）。我在苏联写回一封信，说你们不得中央的支持，对你们工作不利，不然会孤立，像“梁上君子”。

政治局不是设计院。倾盆大雨在我们身上流走了，老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分散主义有一点，但不严重。各有各的心理状态，我替你们设想，你们大概有一个想法，大概中央是十全十美的，不是全能，也是九分。另外，大概像《茶花女》小说中的女主角马哥瑞特，快死了，见爱人还要打扮一番。《飞燕外传》，赵飞燕病了，不见汉武帝。总之是不愿以不好的面目见人。蓬头散发见人有何不可？想起一条写一条，把不成熟的意见提出来，自己将信将疑的东西拿出来，跟人家商量，不要一出去就是“圣旨”，不讲则已，一讲就搬不动。四十条就是这样，开始在杭州拟了十一条，天津增到十七条，到北京才增加到四十条。“寡妇养仔，众人之力”，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看还得闹对立的统一，没有针锋相对不行。要么你说服我，要么我说服你，要么就是中间派。有人就是这样，大问题不表示态度。马克思主义不是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吗？这样我不理解，应当旗帜鲜明，大概想做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

再一个是顽固（乔木到，一说曹操，曹操就到）。人民日报革命党不革命。我在二月二十九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民主党派拿我的讲话做文章，各取所需，人民日报闻风不动，写一篇社论，从恩格斯谈起。二月开始谈到，我给他们讲，你们又不执行，为什么又不辞职？十一月二中全会，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哪个放得开？□□□同志五月二十二日在中直会议上作报告，有一句名言：“千金难哭好时机”“寸金难买寸光阴”，这样才放开了。大鸣大放，清华大学叛变了几个支部，右派高兴，不然审也审不出这些叛变分子。人们都有一种惰性，不容易搞开，乔木要不是那一次会议，北冰洋的冰是开不了的。□□是好人，就是无能，我说他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又说过他是死人办报。

再谈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财经工作者有很大成绩，十个指头，只有一个指头不好，我讲过一万次就是不灵，工作方法希改良一下。我最无学问，什么委员也不是，我和民主人士谈过，我是唱老夫人的，你们是唱红娘的。我是老资格吗？总该给我讲一讲。我灰心了，这次千里迢迢让你们到南方来，是总理建议的。

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这篇东西格子未画好，十个指头是个格子，只一个指头有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

我要争取讲话，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得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你看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

赋》，这篇文章使登徒子二千年不得翻身，他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登徒子向楚襄王反映，宋玉长得漂亮，会说话，好色，宋玉一一反驳了。宋玉反击登徒子好色，说登徒子讨了一个麻脸驼背的老婆，生了七个孩子，你看好不好色，只攻其好色一点，不及其余。我们看干部，要看德才资，不能德才都不讲，只讲德的一部分。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看几年要下毛毛雨，不要倾盆大雨，要文风浸润，不要突然袭击，使人猝不及防。

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粮食年度征购九百二十亿斤。多购一百亿斤，讲“冒进”，这一点有冒，闹得“人人谈统购，家家谈粮食”。章乃器是粮食部长，他同意这个计划，是不是故意把农民闹翻，可能有阴谋。去年粮食销量多，反映了农民没有劲。江苏反映社长低头，干不下去了。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泄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中央大权独揽，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际在国务院。

人都有迷信，有惰性。比如我游水，中间隔了三十年。

除四害，人人讲卫生，家家讲清洁，一年十二个月，一月检查一次。这样医院办学校，医生去种田，病人大大减少，人人精神振作，出勤率大为提高，要集中搞，最好两年完成。

我和华东五省约好，今年开四次会，小型的会，是两种元素配合，中央和地方两个元素一配合就不同了。各省也开小型的会。廖

□□告诉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我一年给你们开四次会，检查十二次。两本账，争取超额完成。这是苏联发明的。红安县那篇文章，请你们再看一遍。一人首倡就推开了。县委副书记一人买锄头，百分之八十的人买了锄头。还要山东营县那个公社的例子。有一个例子就够了。

给刘建勋、韦国清[1]的信

（1958年1月12日）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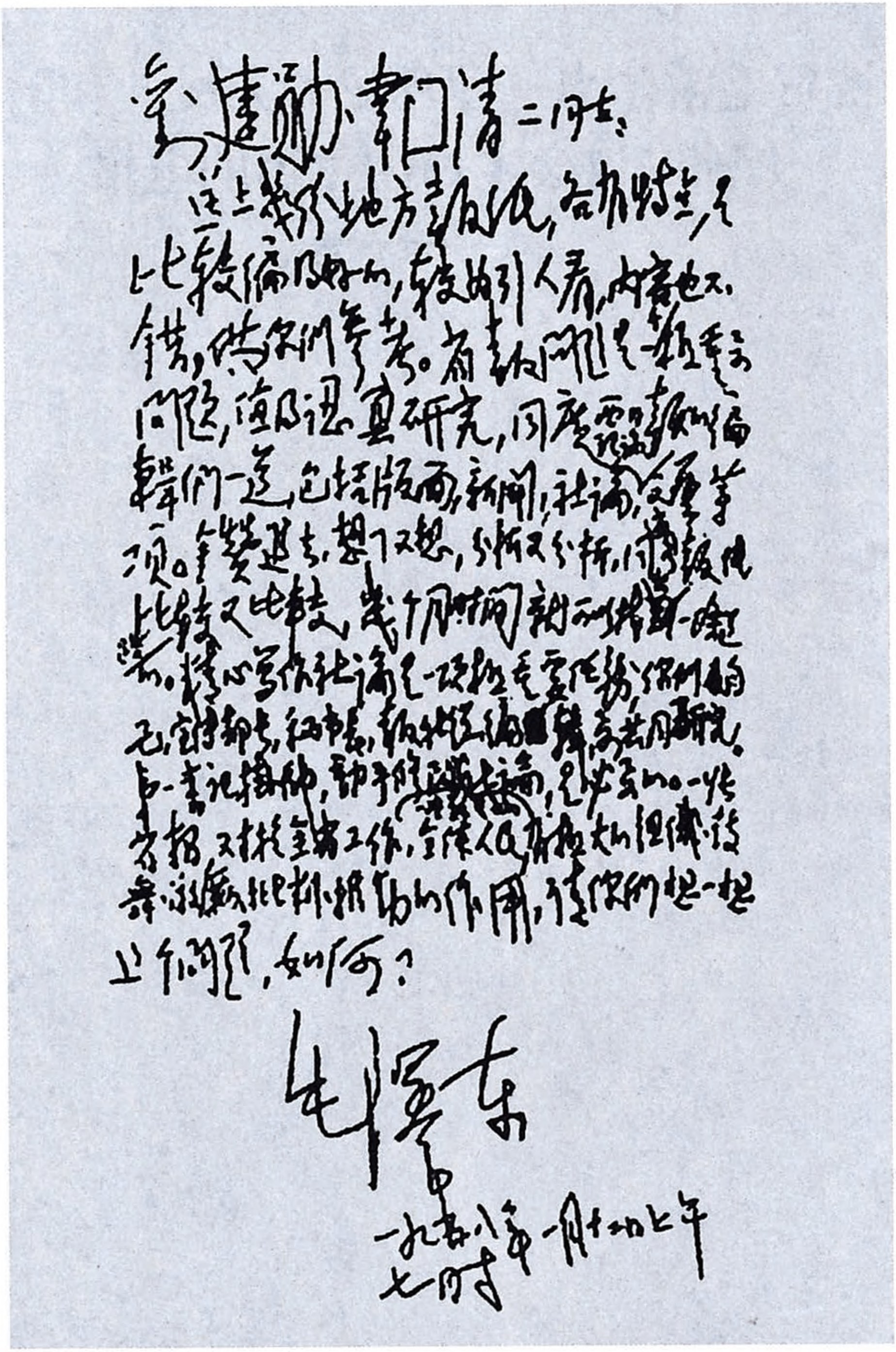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

[1] 刘建勋（1913—1983），河北沧县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韦国清（1913—1989），广西东兰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广西省省长。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送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报纸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文风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别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毛泽东致刘建勋、韦国清信的手稿。

祝贺毛雷尔当选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

（1958年1月12日）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欣悉你光荣地获得罗马尼亚人民的重大信任，当选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罗两国人民在共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已经结成了亲密的、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对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并且将继续作出重大的贡献。祝你在为罗马尼亚人民的幸福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卓越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

《人民日报》不应“反冒进”[1]

（1958年1月15日）

现在大家对报纸的反映比较好，报纸有进步，新闻、评论都有进步，但还要改进，不要满足。

评论大家写，各版包干是好办法。总编辑是统帅，要组织大家写，少数人写不行。

组织形式，这种“生产关系”有没有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要研究。各部门，各版可以竞赛。

写评论要结合情况和政治形势。转变要快。写得不要刻板，形式要多样化。政论应该像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

报社的人应该经常到下边去，呼吸新鲜空气，同省委关系要搞好。下去又做工作，又当记者。不要长住北京，要活动一些。要经常到外边跑一跑。

人民日报社是中央一个部门，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一样，都应该向地方学习。

《人民日报》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转载地方报纸的好东西，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做。这样，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使他们非看《人民日报》不可。

---

[1] 本篇是毛泽东对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一部分。

思想评论可以搞。

标题要吸引人看，这很重要。

除四害还要搞一个专刊。

一九五六年六月以后宣传反冒进的情况如何，要检查一下。检查那时的评论与消息。

六月二十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说什么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情绪。当时反右不到半年，这篇社论就以为反右成绩很大，估高了，是不对的。不能说这社论一点马克思主义没有，但“但是”以后是反马列主义的。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党里有君子也有小人，朝廷里有小人也有君子。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东林者小人。引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两句，不引全段话，这不对。像秦琼卖马，减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际上是反“左”反“冒进”。

批评双轮双铧犁“冒进”了，说南方不能用，不好。实际是用了，很好，应翻案。为它恢复名誉。

“打破常规”的问题，社论说是“不适当地打破常规”，这话就不对。革命，就要打破常规。作为方针来讲，不能讲“反冒进”，只能讲“调整”。作为倾向来反，就把多快好省反掉了。

社论说，特别在中央提出“多快好省”“四十条”后，产生了“冒进”。这说法是片面的，这样说就认为缺点来自中央。

你们反了右没有？这种说法，形式上是辩证的，实际是把辩证法庸俗化了。反“左”、反右同时并举，四平八稳。

“多快好省”方针本身是全面的，是一个整体，不能说这个适当，那个不适当。

根据经验，工作中有缺点是正常的，不是反常的。革命就是要跳跃。个别缺点不可免，要分清是九个指头，还是一个指头。工作中“左”一点，右一点，是正常现象。问题在于方针、方法如何。以后不要提反“冒进”，决不要提。

对《文艺报》“再批判”特辑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1月19日）

一

即刻送北京文艺报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2]三同志：

看了一点，没有看完，你们就发表吧。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我在南方，你们来件刚才收到，明天就是付印日期，匆匆送上。祝你们胜利！

毛泽东
一月十九日下午

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二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3]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肖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三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

四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五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

“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

[1] 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会1958年1月16日的报告。报告中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报》准备在第二期出一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并写了一个编者按，请毛泽东审阅。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文艺报》编委会报告上的批语；二至五是毛泽东修改《文艺报》特辑编者按时改写或加写的段落。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刊出了“再批判”特辑，1958年1月27日《人民日报》介绍了这一期特辑和所加编者按的主要内容。在这之前，丁玲、陈企霞于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1957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中又遭到批判；在这之后，丁玲、陈企霞、艾青、罗烽分别于1958年4月、5月被划为“右派分子”；肖军虽没有划为右派分子，但点名说他在延安“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1979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罗烽的右派问题分别作了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作出改正的结论，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1979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反党集团”问题和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了“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的结论，并于1979

年9月和1980年1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共中央同意，恢复他们的党籍、政治名誉与原工资级别。1984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除重申“定丁玲同志为‘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错定，不能成立”外，还对她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维持1940年中央组织部的结论”，即“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决定，要求在适当范围消除影响。关于肖军的平反问题，1980年4月，中共北京市委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批复，给肖军作了正式的政治结论，确认他是“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并说“1958年1月《文艺报》‘再批判’的编者按语中，说肖军在延安与某些人‘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这种提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从而为他恢复了名誉。

[2] 张光年，当时任《文艺报》主编。侯金镜、陈笑雨，当时任《文艺报》副主编。

[3] 王实味，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在整风中受到批判。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同年底被关押。1946年结论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于这件事（指处决王实味），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毛泽东著作选读》（1986年新编本）收入这篇讲话，在注释中指出：“关于他（指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

（1958年1月21日）

一

1. 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

2. 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财政（金融）、劳动（人口）（14）

我跟你们今年至少谈四次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至四日华东四省一市

3. 水、肥、土、种、改、虫（病）、机、畜、副、绿、害、病（12）

4. 省与省比　县与县比　社与社与〈比〉

十二月开全国党大会评比，同时开除四害的评比会

5. 分配：积累与消费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上作结论的三组提纲手稿。第一组有13页，写在白纸上，标明为1到20。第二组有4页，也写在白纸上，没有分条，其中的头两个问题：“开会的方法：材料与观点的统一”“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正好是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记录稿中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第三组有四页，写在横格纸上，标明为23到42条。南宁会议以后，毛泽东以这个结论为基础，增加了一些内容，调整了部分次序结构，写成《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

6. 普遍推行试验田

7. 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8. 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9. 在整风中每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0. 何时交计划?（六月?）省的，地的，县的，社的。

11. 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伟大爱国卫生运动。

12. 夏季为什么不能种树?

13. 省一年开中小型会议四次，几十人的，百多人的，二三百人的，检查工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4. 书记、委员大多数人，轮番离开办公室，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到处跑，走马看花，下马看花。

15. 地方工业超过农业要多少时间，五年？十年？要做一个计划。

16. 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

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

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气，十分必要。

政治家，一定要懂一些业务，在农业是试验田，在工业试制产品，两者都用比较法，在同一条件下，先进与落后比较。企业与企业比，车间与车间比，个人与〔个〕人比。

技术方面比，政治方面也要比，看谁领导得更好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

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17. 文件的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古代考据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概念和判断的问题，公式是什么是什么。

例如：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喾、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外一种?

以上是概念问题。

例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固〈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猖〉披兮，夫唯截〈捷〉径以准〈窘〉步？

以上，是判断问题。

古代的义理学，要解决〔的〕问题，是推理的问题

以上二学，都属理性认识。

18. 抓两头，带中间。一个好的方法。

19. 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是一个真理，也是方法。

20. 一年检查四次，每季一次。非常会议一次至两次。一种好的方法。中央、省、地三级，都这样做。今年试一试这个方法。

中央、省、地三级的委员每年要有四个月时间离开办公室，到处跑，走马，下马。

二

这肯定是一个好方法。

今年实行。

少一天也不可以。

开会的方法：材料与观点的统一。

用材料去说明自己的观点（思想，意见）。将两者割断，互不联系，是一个很坏方法，并且不生动，使人头痛。

有材料，无观点，则更坏。

只需要典型性的材料，解剖一个或二三个麻雀就行。一大堆材料，只会使人短命。自己应〔有〕丰丰〈富〉的材料，但在会议上只需要拿典型。会议所需要使用的材料，和写大著作（例如资本论）所需要使用的材料，有所不同。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裁〈栽〉筋斗。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1]，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饶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同少数同志交换意见的方法：

同个别人，同十几人，同二十几人反复交换，多次交换，从而得出比较正确观点、政策。

集体创造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方法。

以一个人为核心

看报纸和研究报纸，看文件和研究文件的方法：

要有区别，研究典型。

学本地话，学普通话，学英文

大学生中右派如何处理，开除20%，留80%；根本不开除，30%劳动考察

城市支援乡村

党大会应有县书参加

参观法，好方法之一

展览法

大字报　快报

---

[1] 毛泽东讲话中批评1956年“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

三

23. 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4. 从今年起着重抓工业，抓财贸，一年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工作的负责人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他们有此要求。

25. 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自己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当需要的原始材料，或半成品，不要一个早晨突如其来拿出成品。要下一些毛毛雨。而不要在几小时内，或几天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量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尽可能减少。要有共同语言，先要有共同的情报知识。

26. 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拿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27. 学本地话，学普通话。

28. 中央和省市两级的主要干部建议在自愿原则上会一国外国文，五年至十年，达到中学程度。

29. 学一点文学。

30. 学一点文法和逻辑。

31. 学一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32. 学一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33. 学一点历史和法学。

考虑当教授和当教员的问题。

考虑出刊物的问题。

34. 干部和秘书的统一，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和二排议员。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

35. 中央一级、省一级的若干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36. 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同意。

37. 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少奇同志的一条[1]

38. 是否要事事问过第一书记？

39. 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成过程，思想的形成过程，人脑反映客观世界是不容易的。有了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

40. 如何传达？只是建议，需要发展，在四月党大会以前形成正式条文，准备在以后随时修改。

---

[1] 指刘少奇在讨论工作方法问题时写的关于规章制度的一条，后来毛泽东将它收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41.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 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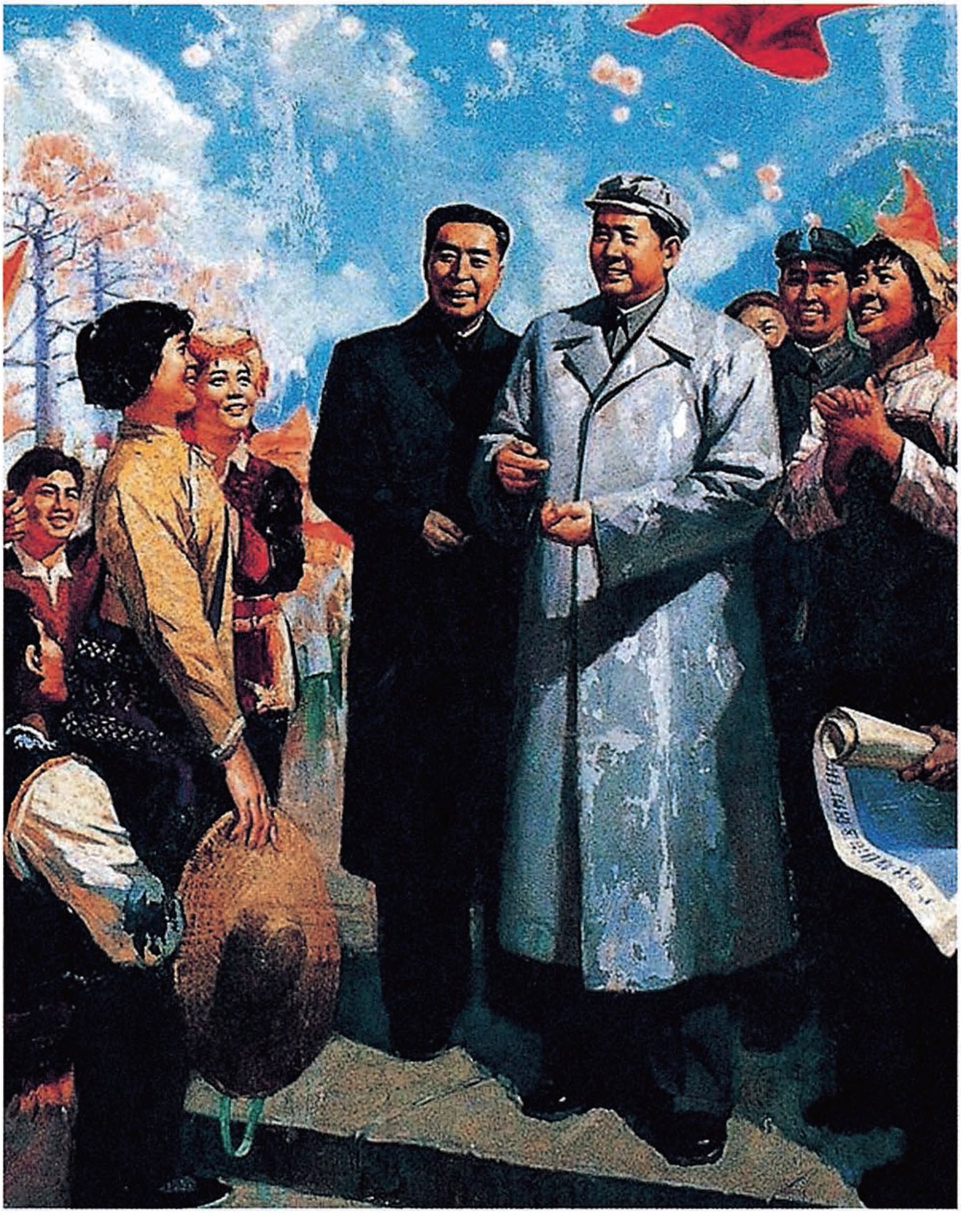
1958年1月22日，韦国清陪同毛泽东视察广西。

1958年1月22日，韦国清陪同毛泽东视察广西。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冒雨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广西各族人民及广西军区驻邕部队代表。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南宁人民公园接见各族群众。

1958年1月22日，毛泽东接受广西少数民族女青年献花。



《红日照南疆——毛主席视察广西》（油画）

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1]

（1958年1月）

针对反右、多快好省提出批评

一、摘自1956年预算报告

（1956年6月15日在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二、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

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进行了反对保守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在一份关于反冒进的摘录材料上的批注。这里把批注和原文对照排印，原文中的横线、波线、竖线和三角等符号是毛泽东批注时画的。毛泽东的批注用宋体字排印。

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已经收到重大的效果。经过了这场斗争，右倾保守思想已受到深刻的批判，大家都已认识到右倾保守思想的危害。△

…………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庸俗辩证法

?

为什么在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去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

？尖锐地针对我

于缺少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当然就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

既然使干部走到了极端，不是方针错了吗？

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地向前发展。△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批了右没有？

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

是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正确的工作方法，就是要使我们的计划、步骤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在你们这个地区、这个部门中，有没有右倾保守，有没有急躁冒进，哪些是右倾保守，哪些是急躁冒进，右倾保守是主要的，还是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右倾保守严重到什么程度，急躁冒进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要具体加以分析，不能凭空想象。也可能在同一个部门、同一个地区的工作中，在这件事上是右倾保守，在另外一件事上又是急躁冒进。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得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方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

…………

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给金日成的电报

（1958年1月24日）

金日成首相同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二十五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

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十二月十六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1. 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2.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3. 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4. 今年二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1]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末，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

---

[1] 李承晚（1875—1965），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5. 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二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6. 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1]的两瑞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

[1] 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于1954年8月1日成立的，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瑞士四国成员组成，执行《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所规定的监督、观察、视察与调查的职能。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1月24日）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值此印度共和国国庆八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伟大的印度人民表示热诚的祝贺。祝中印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不断巩固和发展，并祝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在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月28日）

民族发扬蹈励〈厉〉，大有希望，伟大的觉醒。十五年，五年，三年，头年，头月[1]。原子核释放热能。

十五年赶上英国，可能不可能?

四千万吨钢，现在是五百廿万吨

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多一点

四千万启罗瓦特发电容量，现在是四百多万……

五年到八年完成四十条[2]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好大喜功，近〈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董”

又穷又白，又富又文

人多好，少吃一点，东方风味，身体健康

西方人肉食者鄙

工作方法：

---

[1] 毛泽东讲话中说：15年赶上英国，我看完全可能。15年就看今年开始的这五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就看前三年，三年就看头年，头年就看头月。

[2]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40条。

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打掉官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

民主党派也可以这样做

士希贤[1]

四个月外出，与工农打成一片

北京没有任何东西（原料），但有加工，这是理论[2]

劲可鼓而不可泄，鼓励士气，还是士气败坏？缺点用鸣放改正。

认真学习：试验田，当工人（每周一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文学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每年检查四年〈次〉，有些十二次

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

右派，开右派大会，一感谢，二帮助，三七开，都有利

共产党准备大改革

民主党派、无党派，怎么样？不可以吗？可以的。

把心交给别人，不可隔一层纸，罗隆基[3]等人不听

不断革命

---

[1] 这是毛泽东在说到要打掉官风时引的一句话，他说：过去有句话“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你们难道不愿意当圣人吗？不愿意当圣人当个贤人也好。还有一些好的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历史上有一些统治者是比较好的。

[2]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北京不出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间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加工，我们是个加工工厂。一切思想、计划、命令、法律的来源都是从劳动人民那里来的。我讲的都是一些现成的东西，只有这一条算作理论。

[3] 罗隆基，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林业部部长。1958年2月1日被撤销职务。

帮助同志，去掉疑心

莫斯科宣言[1]，会议，转折点

1956年反共高潮（批判斯大林），有些人心动，有反响

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与16日至19日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1月28日）

今天的国务会议是临时召集的。

大家不要因为上午八点开会就认为有大事。过去多在下午，这是我心血来潮，商量一个普通问题。

八年以来，讨论国家预算这一次是最早的一次。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

这次人代大会，要开得从容些，要开好一点。多开小组会，多做些准备工作少开大会，真正把问题搞清楚，修正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作报告的人来没有？（未来）作了报告不要第二天就发表，报告了，让大家提修改意见，讨论修改后再发表。

我看了七八年了，我看我们这个民族大有希望。特别是去年这一年，我们六亿人口的民族精神，大大发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左右可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重新发布等，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事情过去做不到的，现在能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现在也有办法了，比如除四害，群众劲头很大。我这个人老鼠捉不到，苍蝇、蚊子可以捉它一下。平常总是苍蝇、蚊子向我们进攻嘛！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提倡消灭老鼠的文章。现在我们要除四害，几千年来，包括孔夫子在内

都没有除四害的志向，现在杭州市准备四年除去四害，有的提二年、三年、五年的。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要批判悲观论者。当然不要打架，要讲道理，是具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文章在“大”字上，日本人讲：“大大的有。”（笑声）

我们的民族在觉醒，像我们大家在早晨醒来一样。因为觉醒了，才打倒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以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现在整风、反右派又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穷是好的，好革命，白做什么都可以，做文章，画图样，一张白纸好做文章。

要有股干劲，要使西方世界落在我们的后头，我们不是要整掉资本主义思想嘛！西方要整掉资产阶级思想不知要多长时间。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要是杜勒斯愿意整资产阶级的风，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笑声）

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产量是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比这些都不行。但是我们有股干劲。要赶上去，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

十五年要看头五年，头五年要看前三年，前三年要看头一年，头一年要看头一个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作了布置。

现在劲头鼓起来了，我们的民族是个热情的民族，现在有了热潮，正好有一比，我们民族像原子，把我们民族的原子核打破，释放热能，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也能做到。我们这民族有这么一股劲，十五年要赶上英国，要搞四千万吨钢（现在五百多万吨），要搞五亿吨煤（现在是一亿吨），要搞四千万千瓦电力（现在是四百万千瓦），要发展十倍，所以要发展水电，不光发展火电。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十年，看来不要十年，有的说五年，有的说三年，看来八年可以完成。

要达到这个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有一股干劲。我在上海，一个教授和我谈《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他说，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就是从上海上四川，上游得费点劲，不是下游。说得很对，我很欣赏这个人，这是好人，这人有正义感。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的古人都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是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有什么不好呀，急功近利，也不是不好呀！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是圣人之长。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像我们这样的人要惜分阴，不能老开会，几个月不散会。急功近利，要看是搞个人突出、主观主义，还是搞合乎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要搞平均先进定额，如亩产量，有先进、中间、落后，都搞先进的为定额，以大力士为定额，那不行，是在先进定额中加以平均。

至于轻视过去，不是说过去没有好东西，过去是有好的东西，

但是否对过去那么重视，老是天天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我不赞成那样看历史。如过去用木船，现在就可以不用了，可以用轮船，郑州的建筑物太古老了，总是新的东西好，北京的房子，就不如青岛好。外国的好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搬来，铁路就是外国的嘛！这个东西（敲扩音器）也是外国的嘛！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一定要保存，要挖，把它保存起来。推出午门以外斩首，那是老落后。有的认为城墙不要拆，有的主张可以拆，我看可以拆。用石头做工具才四千年不到五千年，那时发明细石器，像现在发明原子弹一样，是了不起了，那时的英雄可以骄傲得很，可是现在不能用石器。为什么要把古老的东西保持下来？石器起过进步作用，而且最大，是否现在要回到石器时代？我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一代不如一代，前人不如后人。右派分子说“今不如昔”，应当倒过来！今天比过去好。有的人为了拆城墙伤心，哭出眼泪，我不赞成。但北京的城墙不拆也可以，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我很高兴，有些老人就伤心啊！伤心哉，秦砍，汉砍，近代砍？北京的城墙保存一千年，一千年以后还是要拆。你们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什么都轻视。在某种意义上不要对过去太重视。“迷信将来”，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如开会，现在讲，将来就是散会，老开会不行，人民代表大会，开上十几天就想散会了。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将来是对的，但不能迷信。

所以上边上海那个教授的话是对的。

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好大喜功我已经讲过了，至于偏听偏信，陈铭枢是叫我听梁漱溟、陈铭枢的，我不能偏听右派的，是偏听共产党，还是偏听国民党、杜勒斯？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是

因为少正卯同他争学生，孔夫子就给少正卯定了五条罪状。（问在座的人：哪五条？有人答……）

我们对右派都不杀，所以不偏听偏信是不可能的。陈铭枢你过去好，我就喜欢，现在你成了右派，我就愤怒，这还让我喜什么？说我不像个主席的样子，我这个人就是不像个主席的样子。还说我轻视古典，古代的东西都好吗？我劝青年不要搞旧诗，不要那么重视古典。

人多好，人少好？人多一些好嘛，现在劳动需要人。但是要节育，现在是：第一条控制不够，第二条宣传不够，目前农民还不注意节育，恐怕将来搞到七亿人口时就要紧张起来。现在不要怕人多，有人怕没饭吃，那我们大家就少吃一点，人多一点，士气旺盛，这是我有点乐观，不是地大物博嘛！但我不是说不要宣传节育，我是赞成节育的。要像日本、美国那样节育，不要像法国那样节育，越节越少。邵先生六道讲得对，现在不对，达到极点就趋向反面。人多没饭吃，就少吃点。据说东方人吃素对身体健康有益处，这是黄道之学（黄炎培）。中国人平均每月吃肉三斤，二人六斤，匈牙利每人吃二十多公斤，这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除匈牙利外，帝国主义国家吃肉多，都肉食者鄙。我们吃四钱油，五钱盐，也行。至于提倡吃素，我看不行，因为理论与实际脱节，可见黄道之学不学也可。过去孔夫子很讲究排场，食不厌精，每餐要吃点姜，闹脑溢血。我看还是少吃点好。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画外国资本家那样。

我这都是说的一些问题，请大家考虑。

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比较好一点，一种比较差一点。这两种方法，不是说杜勒斯一种，我们一种，而是都搞社会主义，有两种

领导方法，两种作风。合作化问题，有人主张快点，有人主张慢慢来，拖到七八年才搞。我认为前一种好，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点，不要拖拖拉拉。整风好，不整好？还是整风好，还是大鸣大放好。我们说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说的。他们要用于政治，所以“大鸣大放”这个提法是从右派那里借来的，可见小鸣小放不行，中鸣中放也不行，就是要大鸣大放。

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氅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写《水经注》这个人了不起，写得那么好。孔夫子也是官气十足，他有两匹马一辆车，每天坐在车子里摇摇摆摆，得了胃病，叫胃下垂，而且还要吃细的。类似狮子之类吧。他吃多了，有沙子，不干净，所以得了胃病。孔子到了齐国，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看骂红安县以前有些干部也是这样，所以中央机关干部每年要有四个月离开北京。北京不是好地方，历来出官僚的地方。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不建都在北京呢？大

概是因为这个地方出官僚。北京不出产任何东西，我不是指北京这个地方，是指中央机关，中央机关不生产钢，不出水泥，不出粮食，也不出纸烟，什么也不产生。产生思想吗？也不产生，思想也是从群众中来的，不是北京出的。我说不产生任何东西，是指不产生任何原料，原材料是产生自工人、农民。章伯钧要搞政治设计院那不行，一切要从群众中来。原材料来自工农，我们是加工，我脑子里不产生任何东西，一跑出北京就取得了东西，产生出力量。

要鼓干劲！鼓舞士气，劲可鼓，而不可泄，应当鼓舞士气。合作化一搞，有人叫得不得了，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不太好，在湖北等四省还好。大家看过登徒子写的《好色赋》[1]没有，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说登徒子的老婆很丑，别人谁都不要的，脸上有麻子，耳朵很大，还有痔疮，结果生了五个儿子，宋玉以此证明登徒子好色。因为登徒子告了宋玉一状，说宋玉很漂亮，好色，请楚王注意。我这里不是替登徒子翻案，是讲这个方法不好。右派就是这样攻击我们的。但好人也有的这样看。我们大家都要注意，有那么一天，攻你们一点。比如王云五在国民党时期当财政部长时，他说：“我没有研究过财政，还想学习。”结果人家就说：你没学，你就不能当财政部长。

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要革地球的命，从我们这里到杜勒斯那里，直径12500公里，乘3.1415……要大家努力，现在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我们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空间还不行，现在我们抛卫星还不行，要改造地球表面，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差一

---

[1] 应为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

点，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要认真学习，要搞试验田，农业要搞，工业也要搞。工厂的干部每礼拜一天、半天，真正当个学徒工，这有什么困难呀，文学也要学一点。你是科学家文学家也要学，由郭沫若当老师，过去我不看《人民日报》，像蒋介石不看国民党《中央日报》一样，现在《人民日报》七整八整好了一点。

政治思想革命还要革，不能松劲，技术革命现在不登报，一登有的就会说，整风不要整了。要坚持整风，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放松整风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主党派，不利于改进工作。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六个月可告一段落，并不是说可改造好了，以后还要整。

关于右派分子，我想开个右派分子大会，你们赞成不赞成？今天我们约了个右派分子参加会议，费孝通来了吗？（应声：来了。）请费孝通参加会，我是寄希望于他，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这像什么样子啊，最高国务会议请右派分子参加不违犯宪法，因为宪法有规定，开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要请什么人就请什么人。右派分子做了好事，就是他们说了假话。对右派分子，第一要感谢，感谢他们向党进攻，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感谢右派是因为他们当了教员。第二，是帮助（监督）。所谓帮助，是三七开，十个人有七个人可以改造，逐步转变过来，经过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其中大部分能够转变过来的，规定时间，给以帮助，多数是有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对的。但总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变的人，只有带到棺材里去。像章、罗，要像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变也好，有它的用处，它的用处就是不变。我们不怕它，因为它人数少。我们对右派的批判必须是全面的、深刻的，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是严肃的，

但处理要宽大点，不要宽大无边，要给他们留条路，这是为了教育中间分子，也是为了教育他本人。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再就是共产党大改革，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整风，就整风。整风就大鸣大放。整得不够就再整，民主党派也要改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整个社会都变了嘛。

我主张不断革命论，你们不要以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湖南人常说："草鞋无样，边打边像。"托洛茨基主张民主革命未完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是这样。如一九四九年解放，接着搞土改，土改刚结束，就搞互助组，接着又搞初级社，然后又搞高级社。七年来就合作化了，生产关系改变了。随着就搞整风，趁热，整风以后，就搞技术革命。像波兰、南斯拉夫建立民主主义秩序，搞七八年，出了富农。可以不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还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还要有。民革有人说，民革的右派占百分之十二，十个指头有八个半是好的，当然不会有半个。十个人有一个是右派，那么还有九个不是右派，并且就是右派，也是批评从严，处理从宽。

去年七月我与费孝通谈，他说他那时才感到孤立。你（指费说）现在还孤立吗？（费答：孤立。）知识分子在某一方面来讲是没有知识的，对知识分子的骄傲自满应该批判，知识分子像孙行者一样，不要把尾巴翘得像旗杆那么高。罗隆基说："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我看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条

真理，工农出知识。除马克思、列宁是大知识分子外，我不算。费孝通到过英国，我就没有条件到英国。我去年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张皮都剥掉了，知识分子的毛就要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上，有时粘上来了，有时粘上一点，有时在天宫中，梁上君子。我看知识分子要恭恭敬敬夹起尾巴向无产阶级学习，所谓（罗隆基说）“三顾茅庐”“礼贤下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温良恭俭让”都是封建的东西。我们一直讲知识分子要改造，七八年都这样讲。知识分子一面说共产党英明领导，一面向我们进攻。英明领导，猖狂进攻，口喊万岁进攻，喊万岁时，总有人在那里骂娘，同仇敌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规定，各党派也承认，但是还要搞两套。过去很多人不相信，现在很多人相信了。傅作义先生相信了吗？现在要帮助他们，要互相帮助，要公开讲，不要背地讲。什么要结束共产党的领导，搞阴谋，这不行。我们采取和平改变（转变），国际上没有先例。三反五反是场严重的斗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他们谨慎了，比较老实一点。但是知识分子还骄傲得很，一跳跳到一万公尺那么高，这须扑通跌一下，很必要，使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右派分子向人民投降，写降表，但他们写假降书是不行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真话。要当面讲，不要背后讲，要去掉疑心，每个人要把心交给别人，不要隔张纸，你心里想什么东西，交给别人。鲁迅的作品很好，他把他的心与读者交流。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做法，总是叫人不摸底。“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不适合今天的社会的。我有点东西就先卖出去。

我开了支票，在人代会上再讲讲，我这支票也不一定兑现，如

果代表们有兴趣，就讲讲，还讲这套。

知识分子失败一次没有坏处。

我们当年红军有三十万人，走了二万五千里，剩下二万多人，蒋介石把我赶到山上。他没有料到，他办了好事。我当时一看蒋介石手里有枪，我也要有，我要从你手里拿枪，蒋委员长就当了运输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清党，赶我们“上山为寇”。后来，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求当一家人，大公报王芸生写了个《不要另起炉灶》。我们请蒋委员长封官，就可以不另起炉灶，你得给饭吃嘛！我说得加个但是，要是不给饭吃，就另起炉灶，你不封，我就自己封自己，上山为寇，落草为王。

第二次王明路线，害得我们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陈独秀是右的，王明是“左”的。你们听说过吧，唐朝有个什么诗人写的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这一次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严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们。

知识分子不受严重的挫折是教育不过来的。你们民主党派，民主，很高明，我过去就说过，共产党还出高岗、饶漱石，你们就没有，你们总以为我说这话是怕你们出奸臣，以为看你们不起（一人插话：没有），啊，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把心交给你们了，你们没有交给我。现在我抓住你们的小辫子了，摆在人民面前的右派就不少。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在座的恐怕都是清朝人吧，我看这里我们清朝人占优势哟！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可能的，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我就是偏听偏信，看听信谁的。要节省，要反浪费。我们一面要提高生活，一面要节省，反对浪费。一万年也要节省。反浪费大有文章可做。做官可以，不要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主要干部要四个月离开北京，去求神拜佛，到工农群众中去。工农群众出钢铁，出粮食，弄点东西回来就加工，成为政策法令，不要以老爷姿态出现。你们看过《四进士》的戏没有？《四进士》的戏，有我们老毛家的一个毛朋，就是神气十足，巡按出朝，地动天摇。

劲，可鼓而不可泄。有了缺点错误，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来纠正，不要泼冷水。有人批评好大喜功，那么能好小喜过吗？能重视过去，轻视将来吗？要好大喜功。要鼓励士气。

检查工作，一年四次，有些可以一年检查十二次，一年十二个月嘛！老鼠、麻雀、蚊子，一年检查十二次，看你干不干。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讲的是政治，专讲的是业务，要红色的业务家，不能要白色的业务家。你说你不是白色的，那么是灰色的，也不行；不是灰色的，是桃红色的，也不行。搞政治的人，如只红而不那么专，红也不那么真红，是空头政治家。当然有些人情况不同，比如年龄大……凡情况许可的人都可以专，同时要更加红起来。在我们这个国家要有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就那么多。美国就搞他不赢，据说美国博士也有那么好弄的，当然也有是用功的，如杨振宁。

我们搞上层建筑的，不出原材料，要到外边去取，我们加工。

要改造右派，要帮助。要改革，这是激烈的改革，各民主党派要注意。

要把心交给人。

要采取不断革命的方法。

公私合营，敲锣打鼓，黄老你没料到，我也没料到。抗战后，民主革命才三年半的时间就把蒋委员长赶到台湾，我也没料到。世界是变化的，两个卫星上了天，谁也没料到，我就根本不懂。现在那边很被动，我们这边很主动。过去苏联面上有灰，两个卫星上了天，脸上也光彩了。双轮双铧犁能用，我要为它恢复名誉而奋斗。什么合作化不行，四十条不行，双轮双铧犁也抹黑了，这跟斯大林一样倒霉。

不讲了，大家讨论讨论，提出意见。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要点[1]

（1958年1月28日、30日）

一、八年来第一次在一月讨论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以后也要每年在这时候开会，这次人大要开得从容一些，多开小组会，大会可以少开，工作缺点看到的要加以批评，准备工作不太好，一方面开，一方面准备，文件可以在讨论后再修改，再发表。

二、我们这个民族，七八年来看来是有希望，特别是去年一年，几亿人口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许多问题搞清楚了，到处发扬了积极性，任务提得更恰当，如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方面赶上英国，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重新发布等。过去做不到的事现在可以做到了，过去没有办法的事，现在也有办法了，如除四害，全民族大有希望，悲观者不对。是大有希望，不是中有希望，小有希望，更不是没有希望，文章就在大字。

我们民族还在逐渐觉悟，因为觉了，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才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才进行整风，反右派，中国又穷又白，穷就要革命，一张白纸好做文章，西方世界又富又文，他们就是太阔了，包袱甚重，资产阶级思想成堆。

现在生产与我们地位完全不相称，历史甚久，但钢铁生产比不

---

[1] 为便利阅读，把前后两次谈话按问题整理在一起，问题排列次序也略有变动。

上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我们只有五百二十万吨，群众热情甚好，完全有把握十五年赶上英国，十五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头月，更看前冬，去年中共三中全会就在水利、积肥上作了布置。现在群众热潮好像原子能，发出了热力，十五年后，要搞出四千万吨钢，五亿吨煤，四千万千瓦电力，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看起来，八年可以完成，为达到这个目的要有干劲，要鼓足勇气，力争上游。

三、有一个朋友说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几句话恰说到好处，"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又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符合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功近利"看是否搞个人突出，是否搞主观主义，还是符合实际，可以达到的平均先进定额。过去不轻视不行，大家每天都想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是不行的，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但不是根本不要，外国的好东西要学，应该保存的古董也要保存，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迷信将来"，人人都是如此，希望寄托在将来，这四句话提得很好。

还有一个右派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好大喜功"前面已说过。偏听偏信，不可不偏，我们不能偏听右派的话，要偏听社会主义之言。君子群而不党，没有此事，孔夫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喜怒无常"，是的，我们只能喜好人，当你当了右派时，我们就喜不起来了，就要怒了。"轻视古典"，有些古董如小脚、太监、臭虫等，不要轻视吗？

四、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目前农民还不注意

节育，恐怕要到七亿人口时，人们才会紧张，要看到严重性，但不要怕，要节省，一方面节育，一方面节省，要成为风气。

五、工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比较做得好些，一种做得比较差些，也就是两种作风，譬如合作化，一种搞得快些，一种拖到七八年才搞。我看趁热打铁，一气呵成为好。整风中大鸣大放很好，这是右派发明后我们搞的，现在全民中用大鸣大放来整风了。

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除。像除四害一样，官风、官气也是一种迷信。要破除迷信，部长也好，总理也好，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感到在我们面前是平等的，自己感觉平等是靠不住的，要使对方感觉平等。湖北红安县的干部，1956年上半年官气十足，农民很不高兴，下半年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山东干部下放农村，农民说：“八路军又来了。”这几年官气大长，共产党要改，各党派也要改，共产党的负责人，除了病老以外，每年要有四个月的时间离开北京，向劳动人民取经，回来加工制造，这样可以打掉官气。各党派和民主人士酌情办理，身体不行的可不去。北京不在地方好坏，而在中央机关不产生任何东西，即不生产任何东西，中央只是加工厂，一切原料出自工人、农民那里，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觉得脑子空了，一出北京就有了东西。

六、劲可鼓而不可泄，有时没有注意，给群众以挫折。一个时期一些问题上发生了错误，如合作社曾有人说搞多了要砍掉十万个，双轮双铧犁在南方名誉好，举登徒子好色为例，宋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个办法不好。右派就用这个办法攻击我们的，但好人有时也这样看，共产党也有这样的人。共产党也好，民主党派、工商界、知识分子也好，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就是右派，多

数也是可能变好的，如不相信多数，就没有信心了，对人民的事业丧失信心是不好的。现在的大学生，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但右派只占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对他们除个别的以外都不开除学籍，用这种政策，可以把他们改造过来。

七、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向技术革命，要认真学习，搞试验田，到工厂当学徒，要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文学等。但社会革命还要天天革，整风还要整，不能松劲，六月可告一段落，但并不是说改造好了，将来还要整。

要讲不断革命论，解放后搞土改，土改后搞互助组、合作社。一九五六年是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接着五七年搞整风，再接着就要搞技术革命，一个接一个，趁热打铁，中间不使冷场，在这里，要团结每一个可能团结的人。

八、共产党准备大改。整风和反省，各党派也可以搞，现在已在搞，有很大的成绩。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作风也可以改变的。全国人民已振奋起来，我们这些人要适应这种情况，适应六亿人民的要求。相信能适应这种情况，各党派在进步，整风在继续，但不要勉强。要把事情搞好，把人整好，不是整坏，整风对共产党要求严格，对民主党派不要太严格了。不太严格不是不整，整整也好，试试看。目的是整得适合人民要求，把人整好不是整坏，相信会整得更好，因为全中国人民都在进步，有一股热气，在这样环境中生活，是有利于进步的。

很值得高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成右派的不多，参加最高国务会议的人成右派还不到十人，但也给了我们以教训，去年四月三

十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我们说过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改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要附到工人阶级的皮上来，否则变成梁上君子，但章伯钧、罗隆基等听不进去。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很高兴“长期共存”，但他们变成“短期共存”了。

口头喊万岁，切记不要都信，有些人大喊万岁，接受领导，但实际上却猖狂进攻。

在统一战线内部，不管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互相帮助，要讲真话，要去掉疑心。要将心交给人家，要当面讲，不要在后面讲。“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旧社会的话，现在不适用，逐步做到说真话。

九、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总是要说改造，从未说不要改造，知识分子要向劳动人民投降，知识分子在某一点说是最无知识，知识分子不失败一次，不会翻身。我们党失败过多次，从右的和“左”的两大错误中取得了教训，就全面了，民主党派不见得更高明，中共出了高、饶，你们就没有?我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人要经过严格考验，才能取得教训。

政治和业务要配合，要又红又专，红是政治，专是业务，不红只专是白色专家，搞政治的，如只红不专，不熟悉业务，不懂得实际，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十五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十、要开一个右派分子大会，在大会中，第一向他们致感谢，第二想帮助他们。所谓感谢，是指他们向工人和党进攻，当了教员。帮助他们，是想在其中使五成到七成的人，经过五年到十年时

间，逐步变过来，为人民服务。总有不变的人，即使如此，也有用处，用处就是在他不变，容许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不变不强迫，对右派批判必须严肃、深刻、全面，处理要比较宽大，当然宽大无边是不好的，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第一是为了许多思想上还未解决问题的中间分子，第二是为了这些右派本身，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当然首先要他们自己下决心，但是还要我们帮助。

右派大会要开，哪一天开，要研究，不只是北京开，各地也要开，先开小的，然后开大的。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教育工作时的指示

（1958年1月31日）

学生健康不好的原因是伙食不好，卫生不好，功课重，课外负担过重，太忙。要增进学生健康，要增加营养，要搞好卫生，减少负担，少紧张些，要吃得饱。学得太多，可以少学一点，要克服忙的现象。要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消耗。因此，要增加助学金，改善伙食，另方面要克服忙乱现象。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1958 年 1 月）

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一九五七年发动整风运动，又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方面取得了基本的胜利，就在这一年，又超额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这样，我国六亿多人民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认清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责任，打击了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方面刮起来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妖风[1]，同时也纠正了和正在继续纠正党和人民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和由于主观主义造成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党是更加团结了，人民的精神状态是更加奋发了。党群关系大为改善。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为了适应这种情况，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作方法，有作某些改变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杭州会议[2]

---

[1] 参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2] 杭州会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2日至4日在浙江杭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和南宁会议[1]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条文（关于规章制度）[2]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这里讲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有一些是工作任务，有一些是理论原则，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我们现在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工作方法方面求得一个进步，以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政治情况的需要。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一）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这里有十四项：1. 工业，2. 手工业，3. 农业，4. 农村副业，5. 林业，6. 渔业，7. 畜牧业，8. 交通运输业，9. 商业，10. 财政和金融，11. 劳动、工资和人口，12. 科学，13. 文教，14. 卫生。

（二）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 产量指标，2. 产品质量，3. 新产品试制，4. 新技术，5. 先进定额，6. 节约原材料，找寻和使用代用品，7. 劳动组织、劳

---

[1] 南宁会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

[2] 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第二十三条。

动保护和工资福利，8. 成本，9. 生产准备和流动资金，10. 企业的分工和协作，11. 供产销平衡，12. 地质勘探，13. 资源综合利用，14. 设计和施工。这是初步拟定的项目，以后应该逐步形成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1]。

（三）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这里也有十四项：1. 产量指标，2. 水利，3. 肥料，4. 土壤，5. 种子，6. 改制（改变耕作制度，如扩大复种面积，晚改早、旱改水等），7. 病虫害，8. 机械化（新式农具，双轮双铧犁、抽水机，适合中国各个不同区域的拖拉机及用摩托开动的运输工具等），9. 精耕细作，10. 畜牧，11. 副业，12. 绿化，13. 除四害，14. 治疾病讲卫生。这是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2]中抽出来的十四个要点。四十条必须全部施行。抽出一些要点，目的在于有所侧重。纲举目张，全网自然提起来了。

（四）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五）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每年看前冬。这是一个掌握时机的方法。时机上有所侧重，把握就更大了。

（六）一年至少检查四次。中央和省一级，每季要检查一次；下面各级按情形办理。重要的任务在没有走上轨道之前，要每月检查一次。这也是掌握时机的方法，是就一年内说的。

（七）如何评比？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可以订评比公约，也可以不

---

[1] 工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后来没有形成。

[2]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订。农业比较易于评比。工业可以根据可比的条件评比，按产业系统评比。

（八）什么时候交计划？省、自治区、直属市、专区、县都要按照三个十四项订出计划。订计划时要有重点，不可在同一时间内百废俱兴。区、乡、社的计划内容主要就是农业十四项。项目可以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增减。先订五年的计划，可以是粗线条的。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以前交卷。计划要逐级审查。为了便于比较，省委要在县、区、乡、社的计划中选一些最好的和少数最坏的送给中央审查。省和专区的计划都要按期交中央，一个也不能少。

（九）生产计划三本账。中央两本账，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账。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账为标准。

（十）从今年起，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着重抓工业，抓财金贸。一年要抓四次，主要是七月（或八月）、十一月、一月（上旬）三次。再不抓，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可能落空。要把工业部门和财贸部门的若干主要负责干部带到讨论地方工作的会场上去，中央的带到地方去，省、直属市和自治区的带到专区、市属区和县里去，许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和在地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种要求。

（十一）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

（十二）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就全国范围来看，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普遍做到，六年或者七年可能普遍做到，八年就更加有可能普遍做到。

（十三）十年决于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其他地区的时间可以略为延长。口号是：苦战三年。方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十四）反对浪费。在整风中，每个单位要以若干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每个工厂、每个合作社、每个商店、每个机关、每个学校、每个部队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反浪费斗争。今后每年都要反一次浪费。

（十五）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怎样才算恰当，这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希望大家研究。

（十六）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也需要研究。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十七）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矛盾需要解决，需要定出一个适当的比例。现在的情况是，有的地方，有些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是倒四六、倒三七（即是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的

收入，占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农民对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应当改变。各省可以经过鸣放辩论，研究出控制的办法，对经济关系作适当调整，在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全面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农家的收入中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比例，在几年内逐步达到三比七或者二比八（即是农民从合作社得到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或者八十）。

（十八）普遍推广试验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方法。这样一来，我党在领导经济方面的工作作风将迅速改观。在乡村是试验田，在城市可以抓先进的厂矿、车间、工区和工段。突破一点就可以推动全面。

（十九）抓两头带中间。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方法。任何一种情况都有两头，即是有先进和落后，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这是一个辩证的方法，抓两头，抓先进和落后，就是抓住了两个对立面。

（二十）组织干部和群众对先进经验的参观和集中地展览先进的产品和作法，是两项很好的领导方法。用这些方法可以提高技术水平，推广先进经验，鼓励互相竞赛。许多问题到实地一看就解决了。社和社、乡和乡、县和县、省和省之间，都可以组织互相参观。中央、省、市、专区和县都可以举办生产建设展览会。

（二十一）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

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

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二十二）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阶级还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这种

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1]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的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的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以及革命一定还是会有的，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普遍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跟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定

---

[1] 鸣放辩论，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简称“四大”。1957年春天，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广大群众积极对党的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极少数右派分子却利用中共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要求实行“大鸣、大放”，他们的不少言论实质上是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地位进攻。复杂的形势，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规模贴大字报的做法，形成了全国性的政治上不稳定状态。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同样运用“四大”的方法进行了反右派斗争，但是这个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大”演变为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夺权的主要手段。1975年“四大”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8年修改后的宪法仍将“四大”列为人民的民主权利。1980年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过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妨碍了人民正常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同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当时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要懂得一些。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导得比较好些。

（二十三）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湘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总结群众中的这一类先进经验，发展下层单位和群众的这一类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建议主管机关给以批准，停止原有的规章制度中某些规定在这个单位实行，并且把这个单位的先进经验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的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二十四）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二十五）中央和省、直属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

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去开，省委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二十六）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

（二十七）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二十八）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句话，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句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

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议。

（二十九）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三十）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三十一）大型会议、中型会议和小型会议，都是必需的，各地和各部门要好好安排一下。小型会议，参加的几个人，一二十人，便于发现问题和讨论问题。上千人参加的大型会议，只能采取先作报告后加讨论的方法，这种会不能太多，每年两次左右。小型和中型会议每年至少要开四次。这种会最好到下面去开。省委可以到地委召开一个地区或者相近几个地区的县书会议。中央同志和国务院各部门可以轮番到地方开些小型会议。各个经济协作区有事就开会，每年至少开四次。

（三十二）开会的方法应当是材料和观点的统一。把材料和观点割断，讲材料的时候没有观点，讲观点的时候没有材料，材料和观点互不联系，这是很坏的方法。只提出一大堆材料，不提出自己的

观点，不说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种方法更坏。要学会用材料说明自己的观点。必须要有材料，但是一定要有明确的观点去统率这些材料。材料不要多，能够说明问题就行，解剖一个或者几个麻雀就够了，不需要很多。自己应当掌握丰富的材料，但是在会上只需要拿出典型性的。必须懂得，开会同写大著作是有区别的。

（三十三）一般说来，不要在几小时内使人接受一大堆材料、一大堆观点，而这些材料和观点又是人们平素不大接触的。一年要找几次机会，让那些平素不大接触本行事务的人们，接触本行事务，给以适合需要的原始材料或者半成品。不要在一个早上突如其来地把完成品摆在别人面前。要下些毛毛雨，不要在几小时内下几百公厘的倾盆大雨。“强迫受训”的制度必须尽可能废除，“强迫签字”的办法必须尽可能减少。要彼此有共同的语言，必须先有必要的共同的情报知识。

（三十四）十个指头的问题。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筋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三十五）“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

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1]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2]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五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醒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三十六）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的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

---

[1] 立三路线，即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2] 陈独秀路线，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件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做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作起来做。

（三十八）不可以一切依赖秘书，或者“二排议员”。要以自己动手为主，别人帮助为辅。不要让秘书制度成为一般制度，不应当设秘书的人不许设秘书。一切依赖秘书，这是革命意志衰退的一种表现。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三）学点文法和逻辑。

（四十四）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

（四十五）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

（四十六）外来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要学普通话。先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学好，或者大体学好，至少学会一部分。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必须学当地民族的语言。少数民族的干部，也应当学习汉语。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四十八）一切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凡是可能的，一律试办工厂或者农场，进行生产，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这些学校可以多招些学生，但是不要国家增加经费。

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此外，还可以由学生和教师同当地的工厂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四十九）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行生产，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并且派教师住到合作社去，使理论和实际结合。农业学校应当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人入学。

农村里的中小学，都要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立合同，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农村学生还应当利用假期、假日或者课余时间回到本村参加生产。

（五十）大学和城市里的中等学校，在可能条件下，可以由几个学校联合设立附属工厂或者作坊，也可以同工厂、工地或者服务行业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

一切有土地的大中小学，应当设立附属农场；没有土地而邻近郊区的学校，可以到农业合作社参加劳动。

（五十一）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要每月检查一次，以便打下基础。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情况，增加四害以外

的其他内容。

（五十二）化肥工厂，中央、省、专区三级都可以设立。中央化工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计，中央机械部门要帮助地方搞中小型化肥工厂的设备。

（五十三）省、自治区、直属市，应当设立农具研究所，专门负责研究各种改良农具和中小型机械农具，同农具制造厂密切联系，研究好了就交付制造。

（五十四）湖北孝感县的联盟农业社，一部分土地每年种一造，亩产二千一百三十斤；四川仁寿县的前进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八十斤；陕西宜君县的清河农业社，这个社在山区，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广西百色县的拿坡农业社，一部分土地一造亩产一千六百斤。这些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

（五十五）种子搭配的问题（即是在一个地域内，一种作物要有几种品种，同时种植），各地可以进行研究。

（五十六）薯类大有用处。人吃，猪吃，牛吃，造酒，造糖，造粉。各地可以试制薯类粉，有控制地适当地推广薯类种植。

（五十七）绿化。凡能四季种树的地方，四季都种。能种三季的种三季。能种两季的种两季。

（五十八）陕西商洛专区每户种一升核桃。这个经验值得各地研究。可以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将这个经验推广到种植果木、桑、柞、茶、漆、油料等经济林木方面去。

（五十九）林业要计算覆盖面积，算出各省、各专区、各县的覆盖面积比例，做出森林覆盖面积规划。

（六十）今年九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因为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1]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 * *

这次会议的传达方法。把这些观点逐渐和干部讲明，不要采取倾盆大雨的方式。

这次所谈的意见，都是建议性的。请同志们带回去讨论，可以推翻，可以发展，征求干部的意见。大约要有几个月才可能形成正式条文。

---

[1]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

在黄炎培[1]关于提倡平地深葬的来信上的批语

（1958年1月）

电话告黄：信[2]收到了，谢谢他。我赞成他的意见。因忙不写回信了。

---

[1] 黄炎培，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1958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最近写了一篇《试倡平地深葬》文，认为一般采用土葬法，把很好的可耕地为埋葬死人而浪费，这种不合理的风俗习惯，应按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予以改变。此文曾发表在1月11日《人民日报》和1月12日《新闻日报》，是一种公开建议性质。各报先后转载，人民来信有直接给我的，有送报纸发表的，纷纷表示赞成。我以为此时应广泛地宣传，请新华社宣传一下。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批语[1]

（1958年2月3日）

退吴冷西[2]同志。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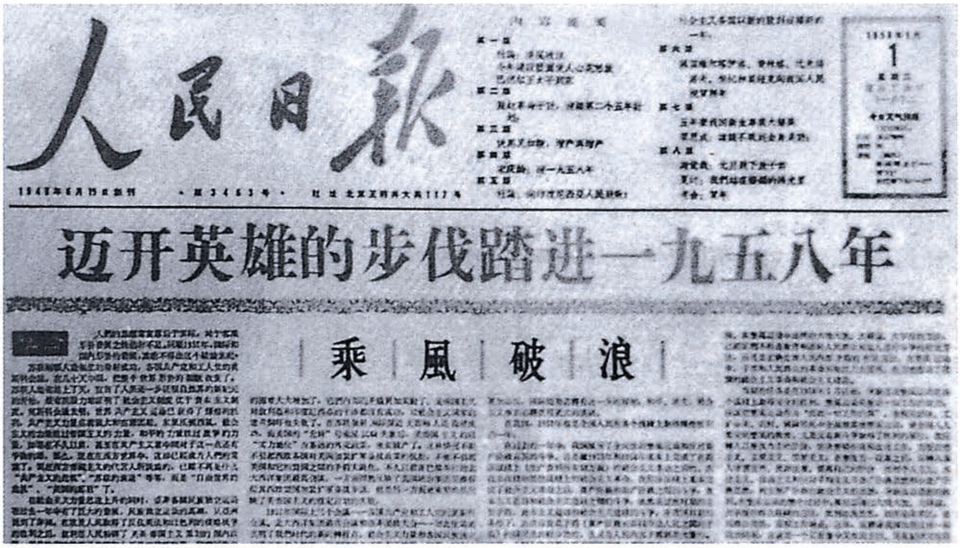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一时

---

[1]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稿主要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社论稿说："1956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的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肯定跃进，肯定好的东西，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来调整和克服其中个别的缺点。但是有些人却分辨不出九个好指头和一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惩前毖后，我们不应当再用这种错误的态度来对待当前新的跃进。"社论稿还说，我们的国家现在面临着一个全面跃进的新形势，"全国大部分地区应争取在三年内使当地的面貌基本改观"。这篇社论在195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

[2]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通讯社社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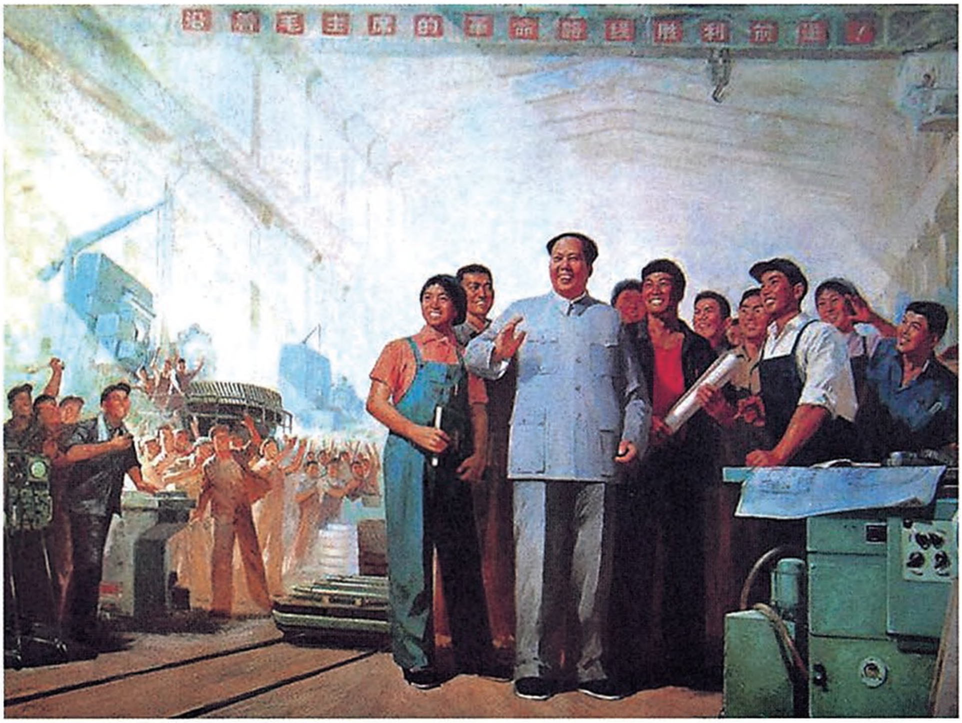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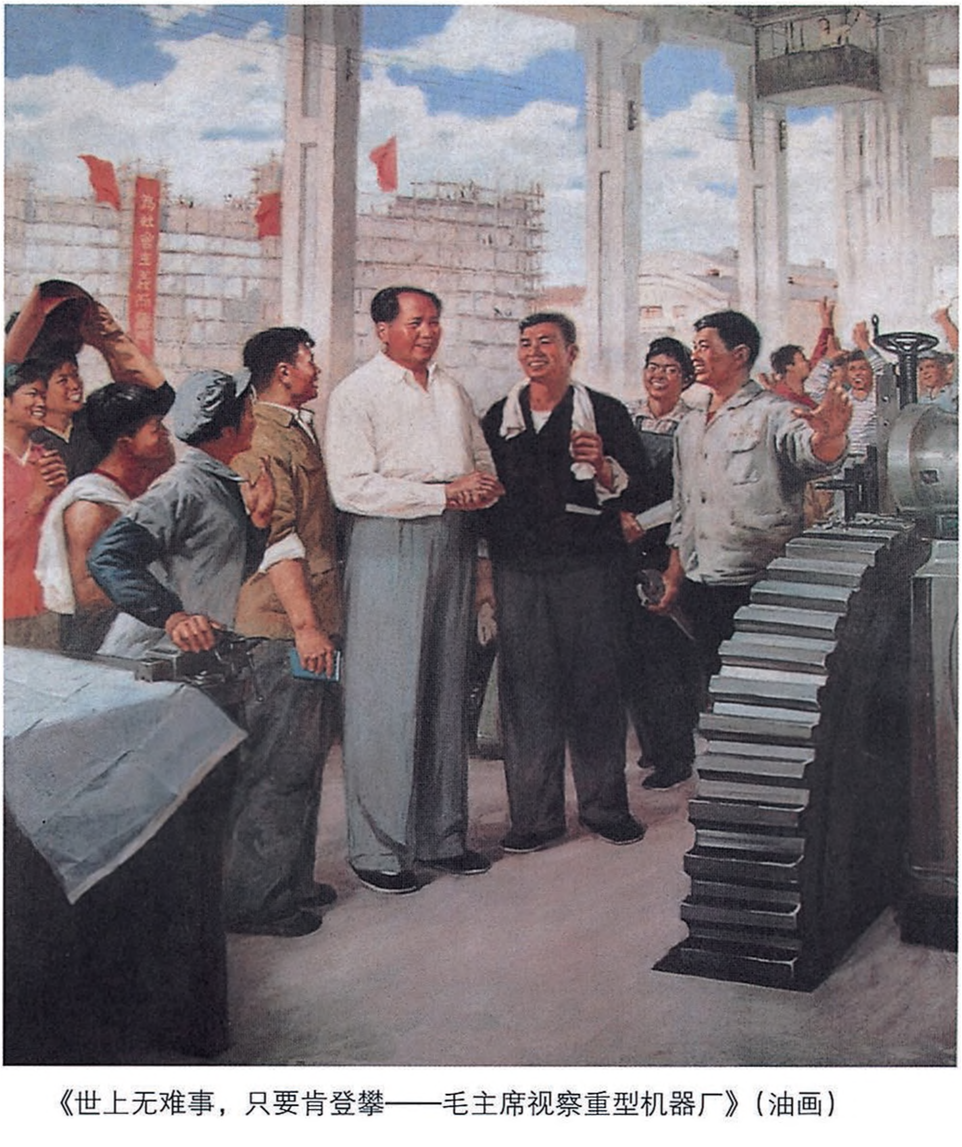
迈开英雄的步伐踏进一九五八年

乘　風　破　浪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号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光辉的道路，灿烂的前程》（油画）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视察重型机器厂》（油画）

对化工部关于第二个五年化肥预计发展报告[1]的批语

（1958年2月3日）

退总理：

可以印发。要署部长姓名。另注明“密件，注意保存”字样。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三时

重工业各部，每部都做出一个至几个这样的文件，在几天内交来。

---

[1] 指化工部1958年2月1日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化学肥料预计发展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到1962年化肥的预计产量；第一个五年计划化肥厂建设项目建成后生产预计；第二个五年计划新建、扩建和原有的化肥厂生产预计。报告的说明中说：按照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我们曾将1962年化肥的生产水平定为700万吨，最近又重新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到1962年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到1000万吨的水平。报告还预测了达到1000万吨化肥产量后将取得的经济效果和为完成这一计划所需要的投资、技术力量及原料资源等情况。

对杨勇[1]关于志愿军撤出朝鲜报告的批语

（1958年2月3日）

退彭德怀[2]同志。此件[3]看过。

毛泽东

二月三日

---

[1] 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3] 指杨勇1958年1月28日给彭德怀的报告。报告说，鉴于从朝鲜撤走志愿军的形势已定，行动时间迫近，在不放松战备而又节约经费开支的精神下，我们已初步采取了停建营房、仓库，压缩一线永备工事的构筑和动员家属还乡、军官家属一律不准入朝等措施。报告还对各军回国后的驻防位置和志愿军直属机关的处理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给李讷[1]的信

（1958年2月3日）

李讷：

念你。害病[2]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3]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

---

[1]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2] 李讷当时住院连续做了两个外科手术，手术后伤口感染，引起发烧。

[3] 这是唐朝诗人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的一首。其中第四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

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对河北省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8年2月4日）

吴冷西[1]同志：

此件[2]可发表，广播，用后退叶子龙[3]。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1958年1月31日关于开展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的简报。简报中说，从目前情况看，我省的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很多地区全党全民动员向四害展开猛打猛攻，仅10天时间，已取得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组织除四害突击队48963个，消灭老鼠466万多只，麻雀690余万只，清除垃圾1473万余车，挖蝇蛹6414斤，又涌现了大批“四无村”“四无乡”。取得这些成绩的主要经验是：（一）各级党委都结合当前生产、整风进行了统一安排，并亲自动手抓起了这一工作；（二）领导带头行动；（三）采用生动、活泼、振奋人心的形式，对群众进行了有力的政治鼓动工作；（四）充分发挥了党、团员和青少年的骨干带头作用；（五）经过社会主义教育，群众觉悟提高以及群众有着消灭四害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六）加强了技术指导工作。简报说，为把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省委要求在春节前后再发动几次突击，在突击的基础上做好经常工作，争取在三五年内使河北省基本上成为“四无省”。

[3]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传达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2月7日）

一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上海局，联省会议各召集人，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

发给你们河南省委二月二日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问题的报告[1]

---

[1] 中共河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史向生同志参加南宁会议回来后，即于1月29日至2月1日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指示，同时向省直各部门负责干部作了传达，2月3日分七个地区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由常委分头去传达。省委常委会完全拥护毛主席的指示，一致认为这是保证把技术革命搞成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获得自己充分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进一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必要的条件。报告说，省委常委会根据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和我省实际情况，对当前工作作了新的部署，要点是：1. 整风要坚持到底，保证全胜；2. 作好规划，组织全面大跃进，包括提高农业规划指标和调整工业规划，开展文教事业的改革运动，培养技术力量，抓好灾区的基本建设等；3. 开展春节大宣传运动，肯定成绩，推广先进经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苦战三年改变全省面貌。

一份，供你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作参考。

中央

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

二

刘、朱、周、彭真[1]即阅发。用电报发各地，印发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2月7日）

一

即退胡乔木[2]同志。在第六页作了一点修改[3]，现在许多基层单位就是这样做的。在第七页上加了灭臭虫跳蚤一句[4]。

毛泽东

二月七日

二

各基层单位（例如一个生产队，一个工段，一条街道）的除四害讲卫生工作应该每星期检查一次，各较大单位（例如一个合作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1958年2月12日《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在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4] 即本篇三。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社，一个乡，城市一个工厂，一个区）应该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应该大检查总评比一次，以便为实现长期计划打下基础。

三

向群众提出的具体口号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例如除四害在有血吸虫病的地区要加上消灭钉螺，有黑热病地区要加上消灭白蛉子，有臭虫、跳蚤的地区要加上消灭臭虫、跳蚤，讲卫生在城市中可以包括劝止随地吐痰，在工厂中可以着重防治职业病等等。

对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

（1958年2月8日）

退总理。在第三页和第十二页上有一点文字修改[2]。

毛泽东
二月八日

---

[1] 指周恩来准备在1958年2月1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稿，题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发表在1958年2月11日《人民日报》上。

[2] 在周恩来讲话稿的第3页上，毛泽东将“中国人民也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稍多一点的时间”改为“更多一点的时间”；在第12页上，周恩来讲话稿说：“亚非各国访华的外宾中，仍然以日本朋友为最多，中国也派出了许多重要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和学习。中国人民深深感谢日本人民和团体对中国各种代表团的招待和协助”，毛泽东删去了这句中的“和学习”“深深”五个字。

1958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接见周谷城。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1958年2月8日）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的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得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超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

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

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地讨论一些原则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

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关于古代官吏是否禁带眷属问题给刘少奇的信

（1958年2月10日）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1]，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2]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3]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

---

[1] 这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一句。原诗全文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信中提到的“少小离家”一诗即指这首诗。

[2] 李白，唐代诗人。

[3] 齐白石，画家，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这时已去世。

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给陈玉英[1]的信

（1958 年 2 月 11 日）

玉英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此次看见配君[2]，她说暂时不做工作，继续补习，将来再讲工作问题。我看这个主意不错，故让她回长沙。她还年轻，目前学习一时期有益。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

祝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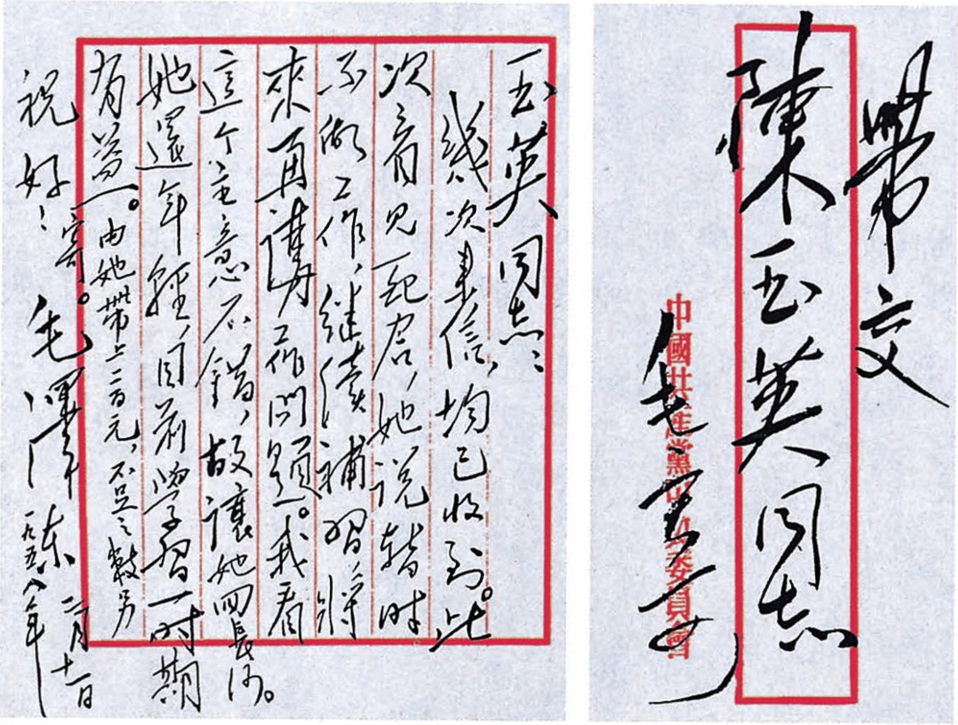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

[1] 陈玉英，1926 年至 1931 年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2] 配君，即孙配君，陈玉英的女儿。



玉英同志：

幾次来信，均已收到。此次看见纪君，她说暂时不能工作，继续补習，将来再讲工作问题。我看這个主意不錯，故讓她回長沙。她還年輕，可再學習一時期，有益。由她带上二百元，不足之数另寄。

祝好！

毛澤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帶交

陳玉英同志

毛澤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毛泽东致陈玉英信的手稿。

给杨开智[1]的信

（1958年2月11日）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2]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并问尊夫人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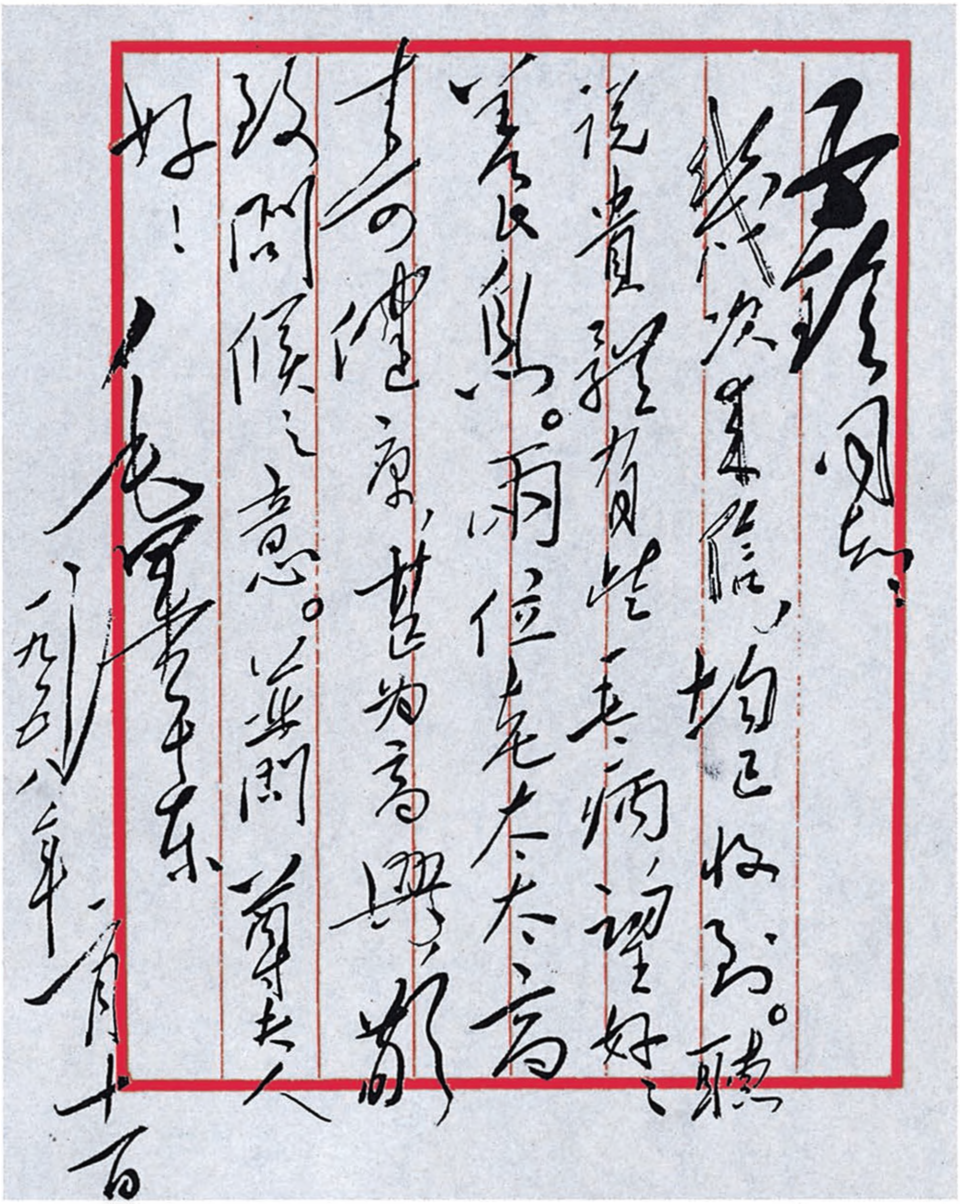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

[1] 杨开智，字子珍，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指杨开智的母亲向振熙和向振熙的姐姐。



开智同志：

给我的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并致问候之意。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毛泽东致杨开智信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8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3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1
（1958年2月13日）
对北京实验中学学生王桂芹《暑假归乡散记》的批语 …………14
（1958年2月16日）
关于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给刘少奇的信 ……………16
（1958年2月17日）
对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稿的批语 ……………………………17
（1958年2月17日）
我们的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二百万 ……………………………18
（1958年2月18日）
军队要打掉老爷气 ………………………………………………19
（1958年2月18日）
给杨开英的信 ……………………………………………………20
（1958年2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的电报 …………………22
（1958年2月21日）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24
（1958年2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胜利十周年的电报 …………25
（1958年2月24日）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27
（1958年2月）
关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致苏共中央电 …………32
（1958年2月27日）
给黄炎培的信 ……………………………………………………34
（1958年2月29日）
中央转发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 ………37
（1958年3月2日）
在陈正人来信上的批语 ……………………………………………39
（1958年3月2日）
关于同意陈毅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批语 …………………………40
（1958年3月4日）
对福建省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41
（1958年3月4日）
关于了解山东灾情给邓小平的批语 …………………………………42
（1958年3月5日）
祝贺柬埔寨王国国庆的电报 …………………………………………43
（1958年3月5日）
对彭德怀关于空军进入福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44
（1958年3月8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45
（1958年3月）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 …………………………………………62
（1958年3月9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67
（1958年3月10日）

祝贺丹麦王国国庆的电报 ……………………………………………………73
（1958年3月10日）
对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的批语和修改 …74
（1958年3月11日）
对浙江省委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76
（1958年3月13日）
对陕西省委关于组织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
的通知的批语 ……………………………………………………………77
（1958年3月15日）
对《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78
（1958年3月15日）
对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的批语 ……………………………………79
（1958年3月16日）
对《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批语 ………………………80
（1958年3月16日）
一批按语 ……………………………………………………………………81
（1958年3月19日）
祝贺突尼斯独立二周年的电报 ……………………………………………83
（1958年3月19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84
（1958年3月20日）
关于推广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经验的批语 ……………………………92
（1958年3月21日）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101
（1958年3月21日）
给滕代远的信………………………………………………………………102
（1958年3月22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105
（1958年3月22日）
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113
（1958年3月22日）
对彭涛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报告的批语……115
（1958年3月22日）
对《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16
（1958年3月22日）
给田家英的信……118
（1958年3月22日）
对《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19
（1958年3月25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121
（1958年3月25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129
（1958年3月26日）
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的批语和修改……132
（1958年3月26日）
在介绍一种有灭蝇蚊作用植物的材料上写的说明……134
（1958年3月）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任职的电报……143
（1958年3月28日）
对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的修改……144
（1958年3月）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145
（1958年3月）

在廖鲁言《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上加写的话……………165
（1958年3月）
为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写的标题和批语……………166
（1958年3月）
为编印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写的标题和批语………………168
（1958年3月）
为成都会议印发马克思和毛泽东文章拟的标题………………169
（1958年3月）
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170
（1958年3月）
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话………………………………………172
（1958年3月）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　……………………………181
（1958年4月2日）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三周年的电报…………………183
（1958年4月3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一）　……………………………185
（1958年4月6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189
（1958年4月6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193
（1958年4月1日至6日）
关于不派代表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给赫鲁晓夫的信……204
（1958年4月8日）
对江苏省委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06
（1958年4月8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08
（1958年4月10日）
介绍一个合作社……………………………………………………212
（1958年4月15日）
临时通信……………………………………………………………227
（1958年4月23日）
给周恩来等的信……………………………………………………229
（1958年4月25日）
对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语……………………………231
（1958年4月25日）
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232
（1958年4月27日）
对一封反映广东潮汕地区整风情况的来信的批语…………………233
（1958年4月27日）
给田家英的信………………………………………………………241
（1958年4月27日）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242
（1958年4月）
给纳赛尔的信………………………………………………………248
（1958年5月4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批语………250
（1958年5月4日）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251
（1958年5月）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267
（1958年5月8日）

给张闻天的信……………………………………………………………277

（1958年5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279

（1958年5月8日）

关于中共准备派代表团参加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给赫鲁晓夫的电报…281

（1958年5月9日、13日）

对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的批语……284

（1958年5月12日）

对罗瑞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286

（1958年5月12日）

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87

（1958年5月13日、24日）

对陈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 …………………293

（1958年5月15日）

在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上的批语…………………………………295

（1958年5月15日）

四海之内皆兄弟……………………………………………………………296

（1958年5月16日）

对滕代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298

（1958年5月16日）

祝贺挪威王国国庆的电报…………………………………………………299

（1958年5月16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300

（1958年5月17日）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315

（1958年5月18日、20日）

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拖拉机成功题词……………………318
（1958年5月18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319
（1958年5月18日）
对《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的批语…………324
（1958年5月19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326
（1958年5月20日）
关于印发四百个科技创造发明家小传资料（初稿）的批语………336
（1958年5月21日）
给张治中的信…………………………………………………………338
（1958年5月22日）
关于印发沈鸿给毛泽东信的批语……………………………………340
（1958年5月22日）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341
（1958年5月23日）
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写的题下说明…………………………………………………………345
（1958年5月）
对《红旗》杂志发刊词的批语………………………………………346
（1958年5月24日）
为《红旗》杂志题名的批语…………………………………………347
（1958年5月24日）
关于注意粮食供应问题的批语………………………………………350
（1958年5月24日、27日）

对赵尔陆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建议的批语…………352
（1958年5月25日）
为十三陵水库题名………………………………………………………………354
（1958年5月25日）
对刘少奇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62
（1958年5月）
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的信……………………………………………………363
（1958年5月26日）
关于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座谈会给邓小平的信………………………364
（1958年5月29日）
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365
（1958年5月）
纠正《红旗》杂志第一期中错别字的批语…………………………366
（1958年6月4日）
为购买《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给林克的批语……………………367
（1958年6月4日）
在方强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语………………………368
（1958年6月5日）
关于做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布局和开好军委会议问题给邓小平的信…371
（1958年6月7日）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372
（1958年6月7日）
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上的批语…………………………374
（1958年6月7日）

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375
（1958年6月8日）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批语……377
（1958年6月12日）
关于中央各部委干部参加劳动的批语……378
（1958年6月15日）
人民不要战争但要有战争准备……379
（1958年6月16日）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383
（1958年6月17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先念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批语……385
（1958年6月18日）
给高智的信……387
（1958年6月19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388
（1958年6月21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399
（1958年6月22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400
（1958年6月22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401
（1958年6月22日）
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批语……402
（1958年6月22日）

对《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的批语……………404
（1958年6月23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406
（1958年6月23日）
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11
（1958年6月24日）
在中国驻苏使馆关于苏联积极筹备庆祝我国国庆的报告上的批语…413
（1958年6月24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邓子恢夏收增产统计报告的批语……………414
（1958年6月25日）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机械工业问题的几个报告的批语……………416
（1958年6月26日）
关于应对国民党军火力袭击的批语………………………………417
（1958年6月26日）
对《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的批语和批注………418
（1958年6月27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422
（1958年6月29日）
在一九二〇年《中国共产党宣言》上的批语……………………427
（1958年6月）
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428
（1958年6月）
七律二首·送瘟神 …………………………………………………429
（1958年7月1日）
《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434
（1958年7月1日）

给胡乔木的信……………………………………………………………………435
（1958年7月1日）
为索要一批图书杂志开列的清单…………………………………………………437
（1958年7月1日）
介绍一封信…………………………………………………………………………438
（1958年7月3日、30日）
为罗哲烈士墓题字…………………………………………………………………441
（1958年7月）
为曹云芳题词………………………………………………………………………443
（1958年7月4日）
对谭震林关于华东五省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总结的批语………445
（1958年7月7日）
接受锡兰新任驻华大使高伯拉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46
（1958年7月7日）
关于注意暴雨冲毁水库问题的批语………………………………………………447
（1958年7月8日）
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 …………449
（1958年7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的电报……………………450
（1958年7月10日）
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452
（1958年7月12日）
对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的批语…………………………455
（1958年7月14日）
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457
（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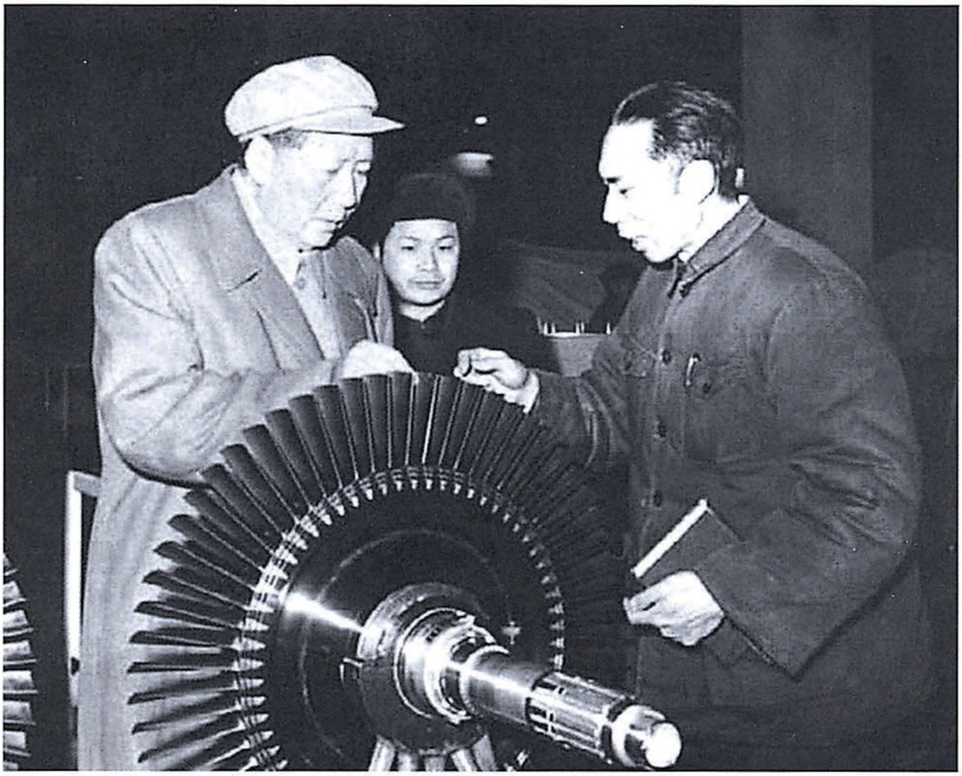
对肖向荣关于几件外事安排的请示报告的批语……………………460
（1958年7月17日）
在董必武关于乌布利希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上的批语…………461
（1958年7月20日）
为《跃进》杂志题名……………………………………………………462
（1958年7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464
（1958年7月21日）
关于延期报送各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发展工农业规划的批语……466
（1958年7月22日）
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467
（1958年7月22日）
祝贺突尼斯共和国成立日的电报………………………………………479
（1958年7月25日）
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480
（1958年7月27日）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82
（1958年7月28日）
给周谷城的信……………………………………………………………483
（1958年7月28日）
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的批语…486
（1958年7月28日）
关于相机透露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给宦乡的电报………487
（1958年7月31日）
在黄镇关于印尼寻求贷款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489
（1958年7月31日）

要采取追击的战略……490
（1958年7月）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492
（1958年8月4日）
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496
（1958年8月9日）
和陈昌奉的谈话……505
（1958年8月9日）

视察抚顺煤矿时的指示

（1958年2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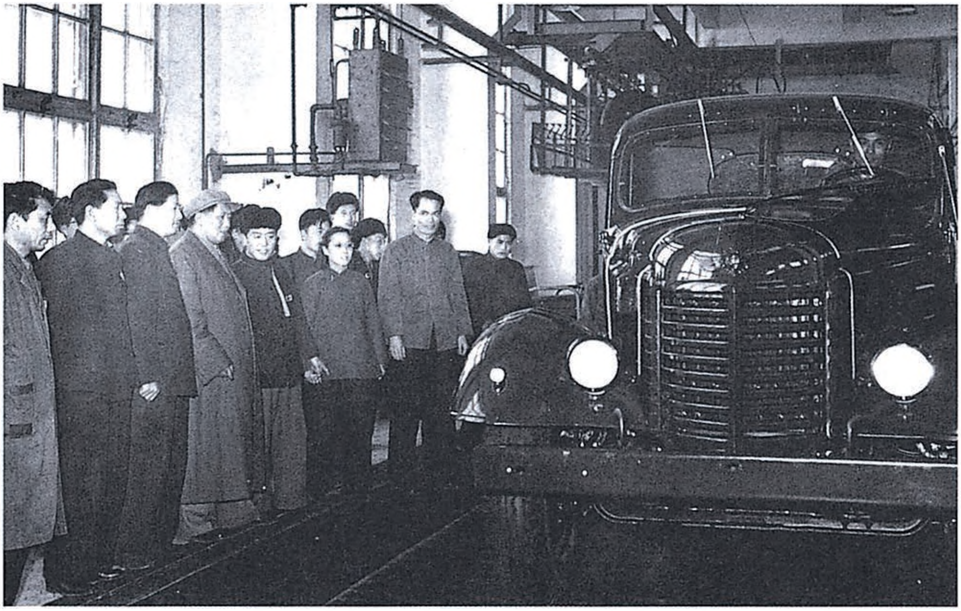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地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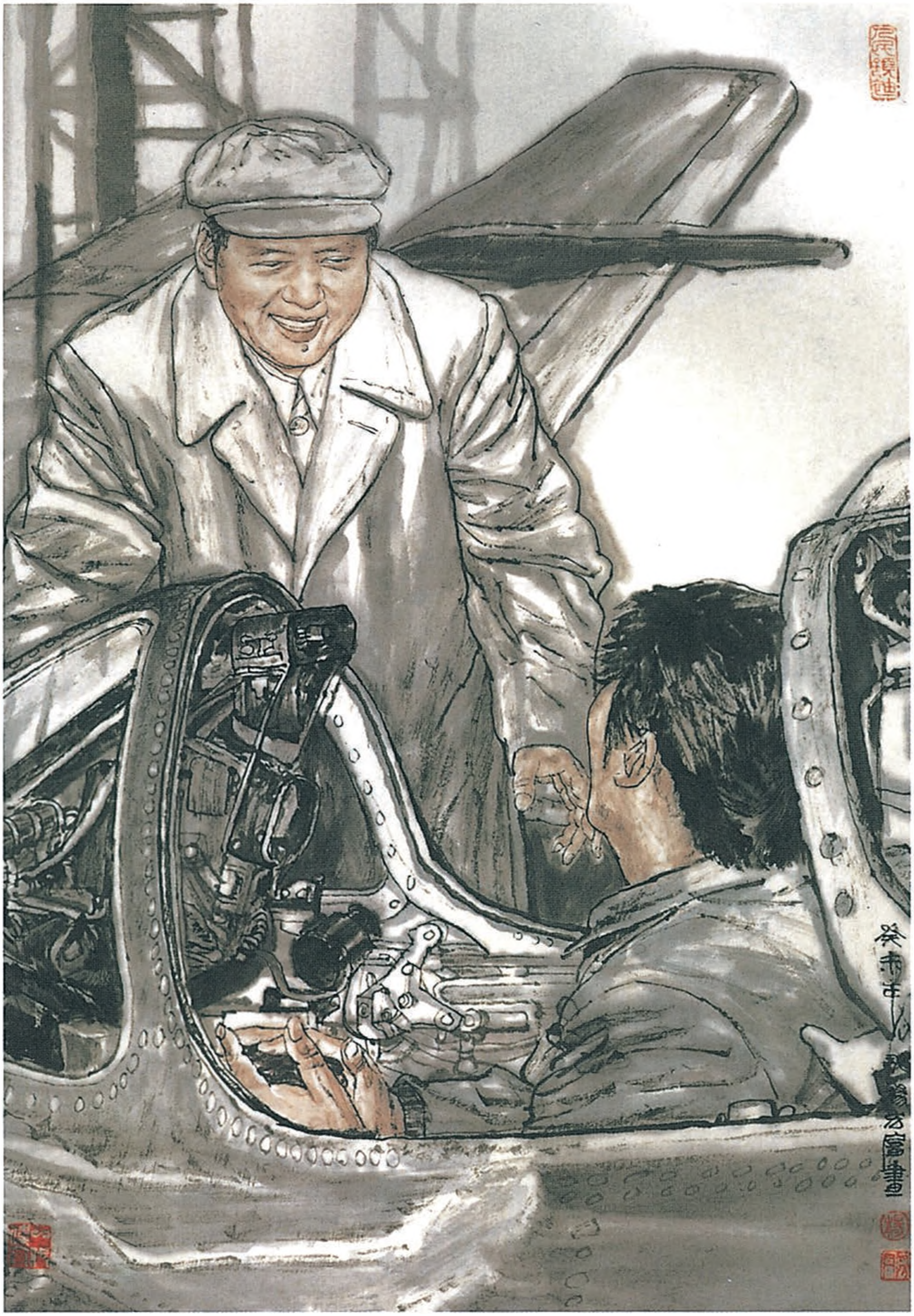
1958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沈阳黎明机械厂装配车间观看涡轮转子。

1958年2月12日，毛泽东在沈阳黎明机械厂和工人交谈。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沈阳参观国产喷气式歼击机。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时，观看国产解放牌汽车。



《观看喷气式歼击教练机》（中国画）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鼓起革命劲头
实现生产建设大
跃进！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参观松陵机械厂总装配车间。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高坎镇。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西露天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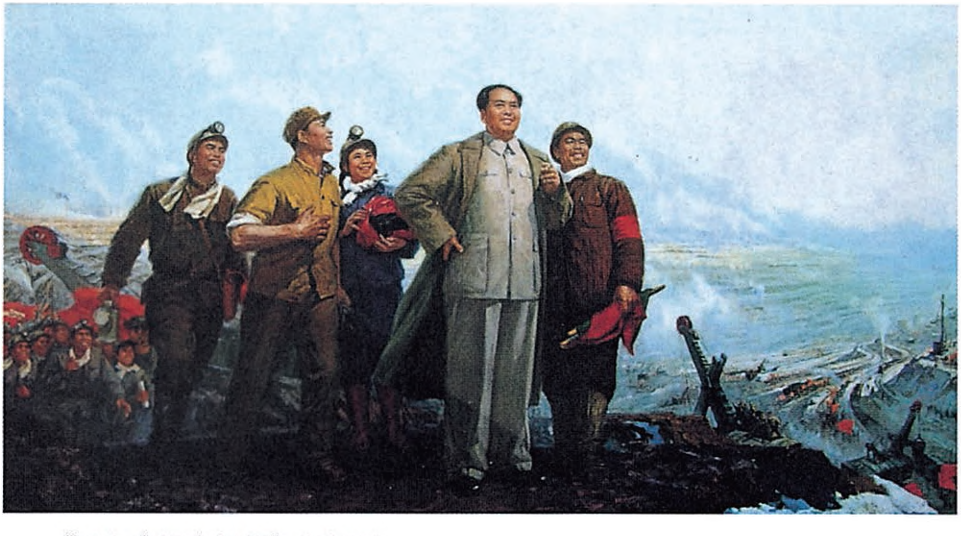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西露天矿。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西露天矿。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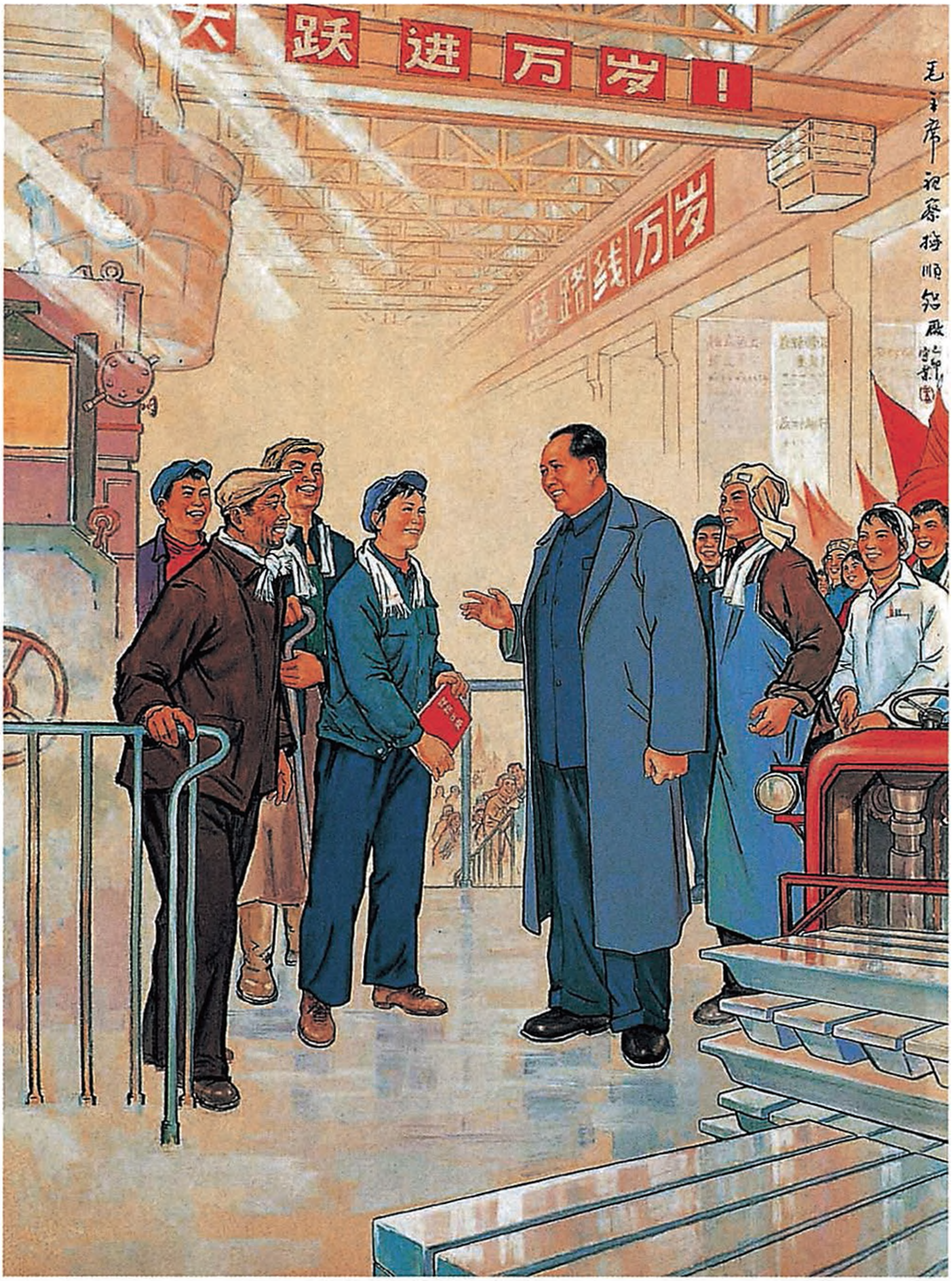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



《毛主席视察抚顺》（油画）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视察沈阳市二一三机床电器厂。

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小演员亲切交谈。


大跃进万岁！
总路线万岁
毛主席视察抚顺铝厂

《毛泽东视察抚顺铝厂》（水粉）

对北京实验中学学生王桂芹《暑假归乡散记》的批语[1]

（1958年2月16日）

一

此文可在报刊上发表。

二

每年暑假回乡一次，极为有益。

此文写得很好。住半个月不够，最好住一个月。

---

[1] 毛泽东这三个批语写在北京实验中学高三学生王桂芹的《暑假归乡散记》上。其一写在《暑假归乡散记》的篇头；其二写在《暑假归乡散记》的篇尾；其三是写给毛泽东的女儿李讷、李敏的批语。《暑假归乡散记》是王桂芹的十四篇日记，记叙了她1957年8月4日至8月17日暑假期间回到家乡河北省阜平县的所见所闻所感。1958年2月1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四期发表了王桂芹的这十四篇日记，题为《假期回乡日记》，同时发表了毛泽东写在《暑假归乡散记》篇尾的批语手迹。1958年2月20日《中国青年报》予以转载。毛泽东批语的时间待考，本篇所署时间是《中国青年》发表的时间。

三

李讷细看两遍，退李敏。李敏也要看两遍。

1958年，毛泽东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师生在一起。

关于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给刘少奇的信

（1958年2月17日）

少奇同志：

想了一下，我想在今日或明日召集一『一』次政治局会议，谈一下“工作方法六十条”如何分组研究征求意见的问题（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你以参加这一次会议再出去为宜。如何，请酌定。陈云[1]同志可能在会议上讲他的意见。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上午七时半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稿的批语

（1958年2月17日）

即送章汉夫[1]同志：

在《声明》[2]第四页上改了一个字[3]，请你即转告总理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半

---

[1] 章汉夫，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准备于1958年2月19日签署的联合声明。

[3] 毛泽东在审阅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时，将“不久前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对于加强和发展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团结起了莫大作用”一句中的“莫”字改为“很”字。

我们的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二百万[1]

（1958年2月18日）

有一天，我找了几个军委方面的同志（彭德怀、谭政、粟裕、黄克诚[2]）谈了一下。我出了一个题目，请他们研究一下，我们的军队可不可以减少到二百万？现在有三百万，再减少一百万。其办法是这样的，我们只要三十个师是满员的，学美国的办法，每个师有二万人，非常之满员，而不是现在的一万三四千人，搞大师。其他那些架子，都可以保存，但是官多兵少，骨瘦如柴，一个师有两个小团。人数缩小到只有二百万，腾出钱来，搞一套常规装备。一百个师的常规装备要十亿元左右，分五年，每年拿两亿元，五年搞起来，五年不行再加两年，七年，一年一亿多元。另外再拿出一笔钱，搞中程导弹，打一千五百公里、二千多公里。将来打仗，就是要禁止原子弹、导弹，还是枪对枪、炮对炮。就是要打那个东西。假如我们能够造一种炮，隔一千五百公里、二千多公里能打到敌人那多好。步枪名为打二千米远，实际上是八百米远有效。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讲话的一部分。

[2]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粟裕，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军队要打掉老爷气[1]

（1958年2月18日）

军队方面现在有进步，整风了。我问了一下，是不是也跟党、政、民有相同的情形，就是老爷气多了一点？无非是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军队大概没有那个娇滴滴的气吧？那三个气总是有的。也有娇娇嫩嫩的情况，南方暑季他要歇暑，不能演习；冬季北方不能演习，怕冷。在川西跟少数民族的叛乱分子作战的时候，一时手忙脚乱，不得下地。所以，我们的军队，真正打起仗来，开头两三个月可能要打一些败仗的。有小姐气，有骄傲之气，有暮气，有官气。据一些同志讲，确实有，军以上比较多，师以下比较活泼。由此观之，党、政、军、民，现在是下面比较活泼，而我们这个党、政、军、民（党是党中央，政是国务院，军是军委会，民就是工青妇）这几种气就多。你们回去以后，如果嗅不出来，就请个鼻子灵的看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同时，我们党内关系要更正常化，庸俗的空气要打掉。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二次讲话的一部分。

给杨开英[1]的信

（1958年2月20日）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一九五六年，听了胡觉民[2]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3]，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4]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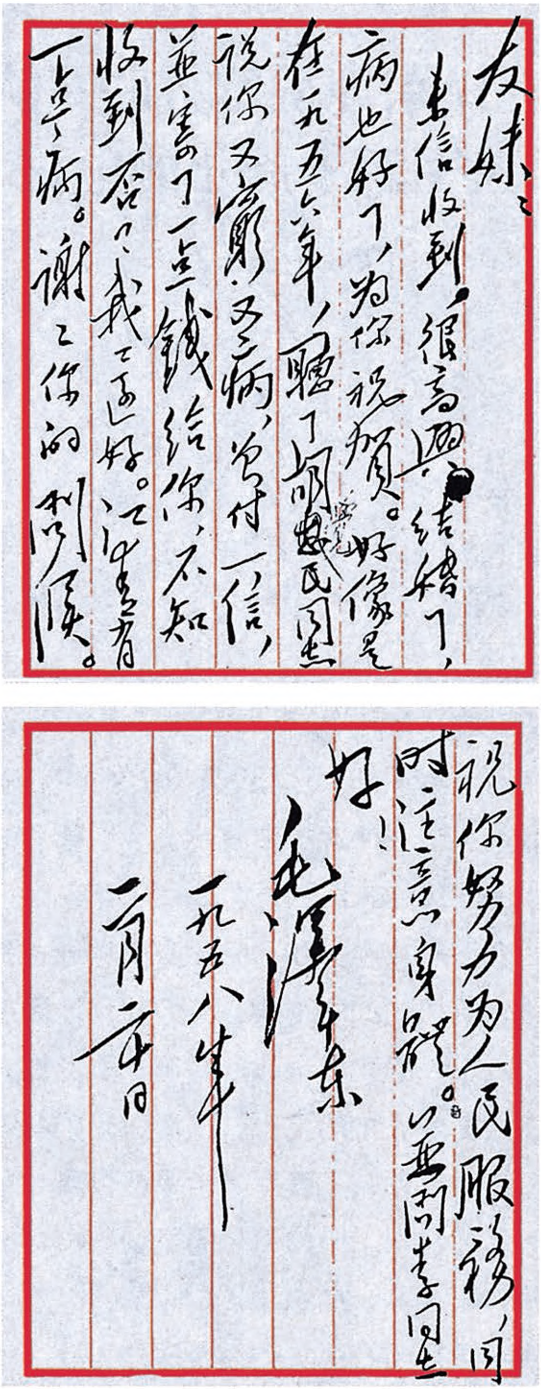
---

[1] 杨开英，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堂妹。

[2] 胡觉民，毛泽东的侄媳。

[3] 指毛泽东1956年12月16日给杨开英的信。

[4] 指李辉，杨开英的丈夫。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一九五六年，聽了胡[illegible]民同志说你又离婚，又害病，曾付一信，並寄了一点錢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还有一点病。谢谢你的关怀。

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並問李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

一月五日

毛泽东致杨开英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的电报

（1958年2月21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欣逢英雄的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谨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光荣的苏联军队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世界上第一支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军队。四十年来，这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军队，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之下，经历了光辉灿烂的战斗道路。英勇的苏联军队，曾经胜利地保卫了十月革命的成果，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消灭了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侵略军的主力，从而保卫了各国的独立，拯救了人类的文明。战后时期，苏联军队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不懈，并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事实证明苏联军队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爱好和平人民的忠实朋友。

由于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军队中不断地加强政治工作，由于苏联军队拥有最丰富的战斗经验和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苏联军队已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最具有战斗威力的革命军队。我们相信，在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安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苏联军队定将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斗中，学习了苏联建军的基本经验；今后，苏联军队仍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的榜样。我们高兴地看到，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团结正在日益发展，中苏两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正在不断加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永远坚定不移地同苏联人民和英勇的苏联军队在一起，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成立的电报

（1958年2月23日）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值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正式成立和阁下当选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繁荣昌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于北京

---

[1]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是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的。1958年2月1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在开罗签署宣言，宣布成立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接着，两国议会分别通过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临时宪法。2月21日，两国公民投票，选举纳赛尔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1961年9月28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地区大马士革军区的陆军部队发动政变，随后宣布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年12月14日，纳齐姆·库德西当选为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埃及也在1971年9月1日改国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胜利十周年的电报

（1958年2月24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当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胜利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事件的日子里，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紧密地团结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周围，彻底地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企图颠覆人民民主制度、恢复资本主义统治的阴谋活动，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十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为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由衷地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将继续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

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地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对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2月）

一

默涵同志：

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2]。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是根据他1957年9月16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讲话整理、补充并和文艺界的一些同志交换了意见之后写成的。文章分三部分：大风浪中的考验；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文艺上的修正主义路线。文章写成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先后两次作了修改。本篇一是毛泽东第一次修改时写的批语；二、三是毛泽东第二次修改时写的批语。四至九是毛泽东对周扬文章修改的六段文字，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后来发表在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1958年3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五期。

二

退林默涵同志：

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

三

“文学”下加“艺术”二字。[1]

四

一时间，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文艺界的风正在向右刮。看到这种现象，一些“左”的教条主义者着慌了，想用简单粗暴的压服方法镇压这股歪风。当然教条主义和压服方法是克服不了修正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害怕鸣放，是由于他们不相信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所以他们表面上的“左”正是反映了他们骨子里的“右”。

党坚决地采取了放手让他们鸣放的方针，因为他们力争鸣放，

---

[1] 周扬文章的原稿说：“我们的文学应当以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人民，而不应当再向人们灌输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在“我们的文学”之后加了“艺术”二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发了狂了，恨不得一口气吃掉共产党。他们完全不讲道理了。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宪法，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党早就公开说明，我们不怕毒草，要把毒草锄翻，变成肥料；我们不怕牛鬼蛇神，要请牛鬼蛇神做人民的反面教师。我们看到毒草已经长出来了，那么，就让它长吧。因为毒草是一种客观存在，毒草盛长，就标志着工人阶级锄草队伍要出动了。想把客观存在的毒草泥封土掩，不许露头，或者一露头就用简单办法一下子压死，是一种不懂阶级斗争策略的蠢笨作法，而且一定会留下后祸，将来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把它锄掉。党相信群众有识别毒草，克服毒草的力量。党是懂得如何对付阶级敌人的。就是这样，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同社会各界的右派分子一样，就原形毕露，张牙舞爪地乘机活动起来，形成了两军对垒。两方面都高兴。右派即反动派高兴的是共产党眼看垮台，资本主义可以复辟了。革命派高兴的是牛鬼蛇神大队出笼，有机会灭掉它们了。

五

在我国，1957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也要建

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六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两种矛盾就体现为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阶级消灭以后则体现为新旧斗争。

七

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给予社会以影响。

八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这只能向作家提倡，鼓励作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修养，密切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使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成为作家的血肉和灵魂，而不是向作家下一道强制执行的命令。

九

我国人民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从事改造世界、改变历史面貌的伟大工作，他们的高度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在一切方面不可遏止地表现出来，也必然要在文学艺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上得到它应有的反映。

关于同意出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致苏共中央电

（1958年2月27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并且讨论了苏共中央1958年1月31日的来信[1]。

中共中央同意在布拉格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月刊，作为参加这一刊物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也同意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关于刊物的基本原则和出版经费的分担办法。

---

[1]. 指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8年1月31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会议上，许多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出版一个国际性理论刊物的建议。当时约定，愿意参加出版杂志的各国党，在进行必要的协商和准备工作以后，即着手实现这个建议。苏共中央认为，为了不使事情拖得太久，目前需要了解哪些党打算参加出版这个理论刊物，并且就出版这个刊物有关的具体问题开始交换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这个杂志可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合刊物。它不应当成为发号施令的刊物；它将从事宣传、研究马列主义问题，并且是各兄弟党交流经验的国际讲坛。1957年11月于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宣言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原则将是这个杂志的基础。1958年8月，《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正式出版。

中共中央准备派出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1]同志出席将于三月七日至八日在布拉格召开的创办杂志的各党的代表会议。

此致

同志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宁一、赵毅敏，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给黄炎培[1]的信

（1958年2月29日）

黄任老：

惠书[2]敬悉。目前形势，确实是好的，如能予以适当的指导，定将产生很大的力量。一个月前赐书[3]中论及深葬事，适获我心，将来适当时机，可能推广实行。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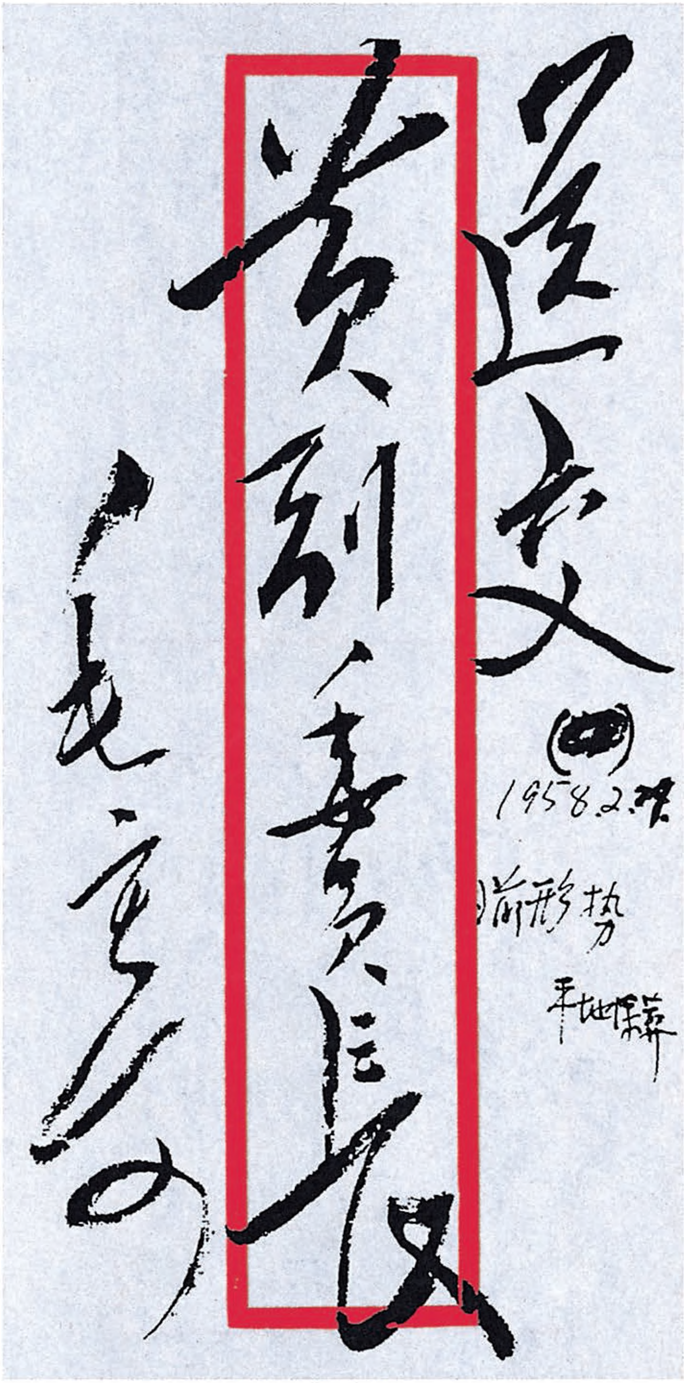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二月廿九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指黄炎培1958年2月2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在农历除夕同民建中央小组到北京市参观商业时看到的情况：商场中没有过去出现的拥挤现象，许多商店的售货员春节加班应市；一些公私合营企业互送挑战书、保证书，提出开展比思想、比学习、比卫生、比朴素、比干劲、比钻劲活动，说明私方人员包括民建会员决心抛弃资产阶级立场，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了。

[3] 指黄炎培1958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



送交

黄副委员长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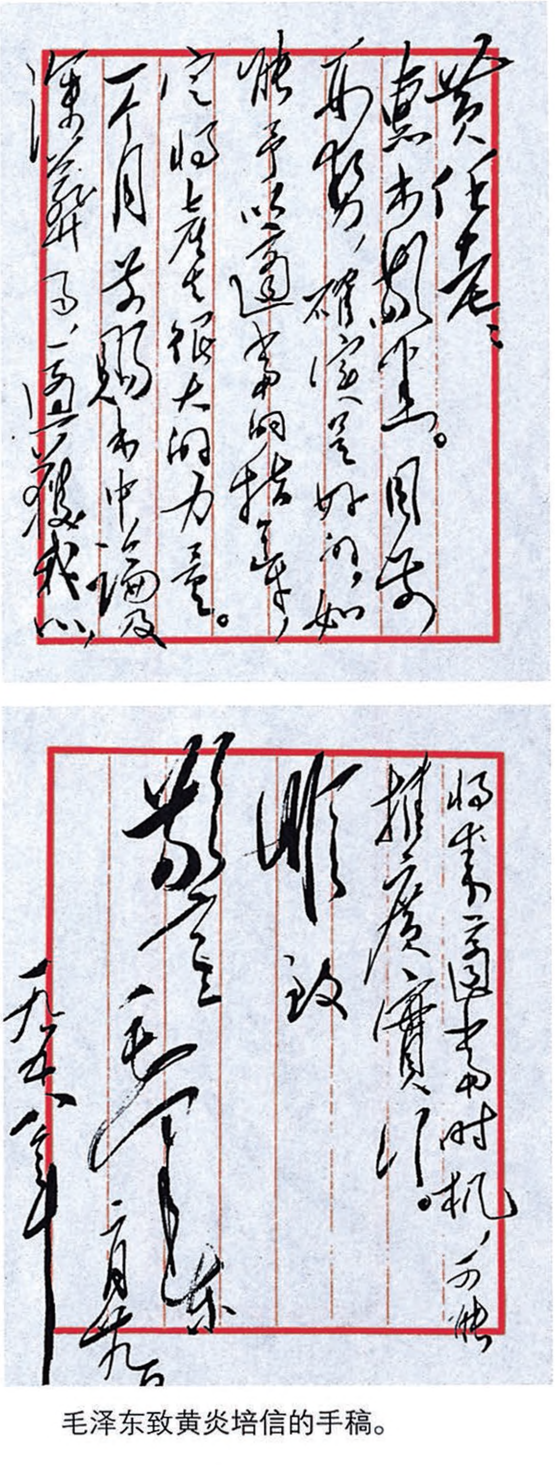
(四)

1958.2.[illegible]

前形势

平地惊[illegible]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信封。



黄任老：

惠书收悉。同意所提办法，确定好的，如能予以适当的指导，定将产生很大的力量。下月若于赐书中论及[illegible]、[illegible]将来适当时机，可以推广实行。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illegible]年[illegible]月九日

毛泽东致黄炎培信的手稿。

中央转发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8年3月2日）

一

上海局，各省、各直属市、各自治区党委：

附在后面的这个文件[1]，可以一阅。

各地应当召集右派分子开会，由主要领导同志去做报告，争取他们和分化他们。会可以是几十人的，几百人的，几千人的，都应

---

[1]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召开右派分子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简报说，团中央机关于1958年2月14日、15日分别召开了两次右派分子会议（一次是原处长级以上的，一次是一般干部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地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愿意悔改，党对他们是采取宽大政策的，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不杀不关，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指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很年轻，来日方长，只要愿意继续为人民服务，还可以取得人民的信任，不少人还可能变成好干部。这两次会的效果都很好。

由该单位（例如一个大学，一个部门），该系统（例如文教系统）或该地区（例如一个区，一个市，市的右派人数很多时，则选择若干人，例如二千至三千人）最有威信的主要负责人去作讲演。这样，一定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中央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日

二

朱、陈、邓、彭真[1]阅后发。

---

[1] 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陈正人[1]来信上的批语

（1958年3月2日）

电话告知陈正人同志：

文件[2]收到。因我即日出巡，不能谈话了。

毛泽东

三月二日

---

[1] 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2] 指陈正人1958年2月26日向毛泽东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稿。

关于同意陈毅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批语[1]

（1958年3月4日）

退陈毅同志：

同意辞去上海市长，因为现在兼任外交工作了。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陈毅1958年3月2日关于请求批准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给毛泽东的信上。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上海市市长。

对福建省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8年3月4日）

吴冷西[1]同志：

此件[2]可发表，广播。退叶子龙[3]。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委1958年1月29日关于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给中央、国务院并各地、市委的报告。报告说，我省自1957年10月以来，结合冬季生产运动，先后开展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今年1月2日又举行了有百万人参加收听的除四害广播动员大会，会后运动进展迅速，已从城镇向农村深入开展。开展运动的体会是：（一）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展开宣传活动，真正做到家喻户晓，“户户动员，人人动手”。（二）领导亲自动手，书记挂帅。大部分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亲自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运动，提高了群众除四害的信心。（三）要有具体规划，并使突击运动与运动经常化结合起来。（四）培养先进典型，组织观摩，推动运动前进。

[3] 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了解山东灾情给邓小平[1]的批语[2]

（1958年3月5日）

小平同志：

此件所载山东灾情问题，请用电话向舒同[3]询问一下，问他们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济办法如何？

毛泽东

三月五日上午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8年2月26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四二九期的封面上。该期《内部参考》刊载了《山东轻灾区与非灾区灾情日趋发展，灾民断粮、要饭、外逃现象相当严重》的报道。

[3] 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祝贺柬埔寨王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3月5日）

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陛下：

值此陛下寿辰和柬埔寨王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诚的祝贺。祝柬埔寨王国繁荣，人民幸福。祝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于北京

对彭德怀[1]关于空军进入福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3月8日）

已阅。退彭德怀同志：

进福建事，同意你的意见[2]，照那样作准备；但最后实行进入，到那时再作决定。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彭德怀1958年3月5日给邓小平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我空军歼击机师进入福建第一线机场的准备工作的意见。

在成都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3月）

一　在三月九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

协作问题[2]

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结合去做？（县以下）[3]

税制与价格

地方工业的劳动法

规章制度问题：

大问题还是小问题

从来不反映，例如*农业是反映的*？

---

[1] 成都会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 协作问题是毛泽东3月9日讲话的第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3] 县以下，指县级以下。毛泽东讲话中说：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是辩证法，还是片面性

“理论与实际结合”，实际不承认

上层建筑（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解放与束缚生产力?

八年的教条主义，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

“**只能搬**”，**也不尽然**，我党历史上只**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

我的目的，不是整人

一种压力，不能独立思想，本质仍是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新的继续。

二

第二本账[1]

究竟多少年完成十年农业计划

大量招工问题

平衡问题

平衡理论问题

不平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普遍的永久的

平平〈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普遍的暂时的

很多事物，以不平衡为平衡，例如人有老少、知多知少、高低肥瘦，知识的多少深浅，永远不能平衡。时代精神是有的，一致是有的，只是一个侧面。

粮食包干是大问题

---

[1] 指成都会议准备讨论通过的国家经委提出的《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

地方工业发展速度问题

打架问题

与欧洲相反，倒转过来发展地方个性[1]

发展生产力——一个理论问题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现在形势，矛盾基本上克服的趋势（暂时的，在过渡时期是决定性的）

两种方法的比较——一个理论性问题，

矛盾的对立斗争，以河北为例

文教的十四项[2]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再谈一下不断革命论

虚报、空唤不做（不切实际）问题

整风的新形势，基层整风

资本家、知识分子的新气象

开右派大会问题

农村工具改革运动（技术革命的萌芽）

六十条的修改[3]

---

[1] 毛泽东在这里讲地方分权问题，他说：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2] 指成都会议准备讨论的关于文教工作的十四项规定。

[3] 六十条，指毛泽东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这时已作为草案下发各级党委。毛泽东讲话中说：六十条现在还非正式，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人民日报》的革命与地方报纸[1]
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
朝鲜的经验
波兰的经验
印尼形势
阿拉伯世界形势
西方形势
是否参加经济协作
同日本做大生意，同东欧做小生意，是否妥当
国防计划问题

三

然后，逐一谈一下，可以在一『个』段时间内（例如两个星期）解决一大批问题。

大体成熟，不甚成熟的问题，作出草案发去征求意见，隔一段时间（例如两三个月）再行定案。

走马与下马
空军进驻福建问题
国防方向问题
略带一点理论色彩

---

[1] 毛泽东在这里讲如何办好报纸。他在讲话中说：中央、省、专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赔〈培〉养理论干部计划，例如山西[1]

技术革命的萌芽

下一次会议的重点是什么？

工业、文教、报纸、商业、**政治**——**一切事业的统帅**

我不做国家主席的问题

协作区会议两个月开一次

出研究题目问题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对立统一问题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对立统一问题

生产关系三个部分的研究问题

再举河北水利工作为例，说两种方法比较问题。

“看得到，抓得起。”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不然就难于领〔导〕下去，如果老是这样的话。可以学会做到这一点，问题是研究工作方法。

广与深的方法

先广后深。

逐步广，逐步深。

为一下摸深，钻到一二个较小的问题里去，势必把大量的问题忽略了，把大问题丢了。

先全面看一下，问一下，想一下，一共有些什么问题。求广。不这样是危险的。

---

[1] 中共山西省委1958年1月曾发出关于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指示。

二　在三月十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学习与独创

——例如硬搬规章制度[1]

建党时期　北伐时期

1921—1927

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尚在，俄国阶级斗争激烈，斯大林领导尚未稳固

我国发生陈独秀主义，其来源是国内的资产阶级

内战时期

1927—1934（遵义会议）

我国发生三次左倾路线

其第三次（1931—1934），发生在苏联反托洛茨基胜利，反德波林孟什维克唯心主义胜利，斯大林统治开始稳固，米夫当远东部长，因此教条主义传来，并有自己的特色。

过去8年

1950—1957

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

硬搬部分与适用部分

主要是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其次，教育工作，卫生工作；商业与轻工业似较少些；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是

---

[1] 硬搬规章制度，指硬搬苏联的一些规章制度。毛泽东讲话中说：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有独创精神的。

这些比较，分析，甚为必要。

其原因：（1）设计、施工、装备都从外来，自己不行；（2）对苏联对中国都不了解；（3）大压力，如斯大林，盲目地屈服于这样一种大压力。我党对赫鲁晓夫打死斯大林这种压力，也有这少数人附〈随〉声附和；对反个人崇拜感兴趣。有两种个人崇拜，正确的，不正确的，应分清楚；（4）忘记了历史经验，不懂比较法（对立统一），不知道设置对立『立』面，不加分析，不动脑筋。

现在的变化：

1956年，十大关系；斯大林被批判；对苏联了解较多；中国对“冒进”。

1957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整风，反右

1958年，杭州、南宁及现在的会议，反浪费反保守

国务院各部门规章制度的改革，已经提出

地方已经分权

马克思论上层建筑

三　在三月二十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改良农具运动应推广到一切地方

它的意义极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迅速有效。现代化机械与改良农具的对立统一。请各省市区普遍推行。

像河南，至少提“一年到两年”的口号，今年也不要登报，实干就是

各省不要一阵风，让河南今年试一年，各省可以在明年大跃进。

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先后一年，二年乃至三年，五年完成四十条，不算不荣誉。

各省市区两个月开一次会，省市区内部的。协作区也如此。

调整生产节奏（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基础上，波浪式的前进，急缓的对立统一，劳逸的对立统一，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两个战役之间必须要有一次休整、补充和练兵，这是规律，每种都互相转化（急转为缓，缓转为急，劳转为逸，逸转为劳，战斗转为休整，休整转为战斗，睡眠转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转化为散会，散会转化为开会，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转为团结，生产转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春夏转化为秋冬，生转为死，死转为生，女转化为男，男转化为女，压迫者转化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转压迫者（对前时的老压迫者），战争转为『平』和平，和平转为战争，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有限转为无限，无限转为〔有〕限。如此等等），请同志们想一想，推而广之，教育干部。

现在的路线在创造中。

基本点已经有了，现在已经使少数人感觉是正确的，尚有很多人（可能是多数）将信将疑，或者不自觉，一部分人根本不相信。对于我们，理论上和若干实践上（相当的增产，其他工作也有当〈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但四、五、八[1]尚未大部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尚是口号，165项全部

---

[1] 四、五、八，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要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要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要达到八百斤。

实现后是大好，是中好，或者出乱子，尚未证实。所以说路线由于群众斗争和我们的思想反映已开始形成，但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前后完〔成〕了。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正是形成正确路线的必『须』要条件，二者的对立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无此事实，否定对立统一规律，是一种形而上学。

四　在三月二十二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

张生与惠明[1]（刊物问题）[2]

看不到，抓不起（捡了芝麻，抱〈丢〉了西瓜）

是何原因？不思而已。

“势如破竹”“高屋建瓴”。

精神不振，奴隶精神存在，迷信古典作家，又没有学习到古典作家的势如破竹的风格，他们风格较高，我们风格较低。怕教授，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具有无穷恐惧，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教

---

[1] 张生、惠明，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毛泽东在3月22日的讲话中，一开始讲了张生和惠明的故事，他说：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但无人送信，于是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胆大勇敢，是坚定之人。希望中国多出惠明。

[2] 指创办《红旗》杂志。《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正式出版。

授。近来好些，陈伯达似乎振作起来了——一篇演说[1]，一个通知[2]。从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懂〈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

大字报表现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批评的尖锐性，庸俗空气一扫而空。

而我们呢？老是四平八稳，逢人且说三分，未可全抛一片。恩来在1956年二中全会的报告敢说心里话，这一点可取，虽然是错的。王鹤寿在这次长出了一点菱〈棱〉角，可取。天津南京二位同志批判我，可取，虽然是错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3]虽然是错误的，但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点可取。陈沂[4]又当别论。

当面不说，背后咕哝，最不好。

尖锐的态度，委婉的态度，都好，依问题和情况不同而定。

从团结、帮助出发而采取的尖锐性，只会使党团结，不会使党

---

[1] 指陈伯达195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陈在讲话中主要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的问题，他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学边干。

[2] 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通知于1958年4月2日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1957年1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文章对贯彻“双百”方针提出了异议，同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部分新闻工作者时，批评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4] 陈沂，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

分裂。

有话不说，则相当危险。

应当选择说话的时机，是对的。像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大礼案、红丸案[1]，那些人，并不高明。比干、汲黯、朱云、屈原、贾谊[2]，则是好的。

怕带〈戴〉机会主义帽子，怕撤职，怕开除党籍，怕老婆老公离婚，怕坐班房，怕杀头，六怕不好，都要准备。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

“舍得一身剐〈剐〉，敢把黄〈皇〉帝拉下马。”

对苏联同志的某些原则问题，当面说，不公开，是适当的。

我们要适应群众斗水〈争〉的水平，群众现在比『我』我们先

---

[1] 大礼案，史称“大礼议”。1521年明武宗死，武宗无子，由兴献王子厚熜继帝位，为明世宗。在对其本生父母如何称谓及崇祀问题上，挑起了臣僚之间的激烈争议。礼部观政进士张璁等迎合世宗意，认为世宗是依祖训继统于武宗，议尊其本父兴献王为皇考。大学士杨廷和等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议三年，世宗裁定追尊本父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致死十余人。红丸案，晚明三大案之一。1620年，明光宗即位后生病，服太监崔文升药，更重，又服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光宗即死。时人疑郑贵妃（明万历妃）指使下毒，引起争议，是为“红丸案”。结果将崔李二人谪戍。

[2] 比干，商纣王的叔父，相传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汲黯，汉武帝时任东海太守、淮阴太守，常直言劝谏，反对汉武帝反击匈奴贵族的战争。朱云，西汉元帝时任槐里令，为人狂直，多次上书抨击朝臣腐败。屈原，战国时楚国大夫，在同反动贵族斗争中，遭谗去职被放逐。后见楚国将亡，投汨罗江而死。贾谊，西汉文帝时为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

进。我们的某些作风，应赶快步有所改变。

1956年吹掉三样东西：有痛心的，有漠不关心的，有高兴的——三种态度，是一个教训。有许多问题，都有三种态度。

这次会议，解决了大批问题，比南宁[1]进了一步。但思想谈得较少，似是缺点，是否不去重庆、武汉，以两天或三天时间谈一点思想问题，心里话。

三峡问题，就在这里解决。

又说是整风，又不谈思想，是不是矛盾呢?

收集民歌问题[2]

二

创立学派问题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被敌人统治着。

有些同志甘愿当资产阶级反动派学者的奴隶，是殖『民』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隶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

没有学问的问题，向书呆子投降。

---

[1] 南宁，这里指中共中央1958年1月11日至23日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2] 指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各省搜集民歌问题。他说：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学问问题。

青年列宁的学问问题

青年黑格尔

青年达尔文

青年牛顿

青年孔夫子

颜渊，曾参，贾谊，诸葛亮，王弼，玄奘，惠能，李世民[1]

我们自己这些人[2]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邹容[3]

---

[1] 颜渊，孔子的学生，孔子称赞他的德行，说他“不迁怒，不贰过”，早卒。曾参，即曾子，孔子的学生，以孝著称，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18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文章，为世人所称誉。诸葛亮，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26岁时，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王弼，三国魏玄学家，曾任尚书郎，少年时即享高名，卒时年仅24岁。玄奘，唐代高僧，27岁时，他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赴天竺（今印度）寻经，游学天竺各地，经历17年后回到长安。惠能，即慧能，唐代高僧，传说早年丧父，以卖柴养母，因听人诵《金刚般若经》乃发奋学佛，后成为佛教禅宗的南宗开创者。李世民，18岁率兵参加反隋战争，26岁继皇帝位，即唐太宗。毛泽东在讲话中，举这些人为例，说他们都是少年有为的。

[2]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20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3]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是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1898年发动维新变法，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镇压，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被杀。章太炎、邹容，近代民主革命家。

中国的古文经学家

欧洲中世纪经院学派

耶稣、释迦的少年时代与经院派佛学家的比较

我们与右派的比较，究竟谁有问题

只要方向对，学问是可以逐步积累的

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我们不是空疏的教条主义者，我们会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应当在理论上苦战多年

十九世界〈纪〉俄国文学界的自卑感

伯林斯基的一篇文章

五　在三月二十六日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文件如何处理?

睡三天，如何走

（1）事前没有设想，实业虚业并举（实多，虚少）

（2）一年抓四次，平均每次半月，共两月

省、地、县可否这样?（大区六次）

稳稳掌握群众情绪，掌握建设进度

（3）下次：抓工业（有煤、电、油、水、地、机、建、财、贸、银行、木〈林〉业、交通）

再下一次：抓文教；1959财政、计划；可否?

再下一次：抓商业。

（4）各省、各部，如何虚实并举，红专都来？

（5）工、农、商、学、兵、思，六者都要抓

（6）对日五年一亿英镑贸易问题

1亿镑＝2.8亿美元　　　　每年0.56亿美元

1美元＝4元人民币

3.8亿[1]美元×4

15.2亿元人民币

3.04 ——每年对日贸易额

5)15.2

15

20

20

0

（7）三个阶级，或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①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即尚未转变的地、富、反、坏和右派；

②民族资产阶级，即中间派；

③工、农（过去是被剥〔削〕者、或不剥〔削〕别人的独立劳动者）

（8）解放第一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的一部分繁重工作，非常必要；如此就有可能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较大的问题。

（9）三区合开武汉会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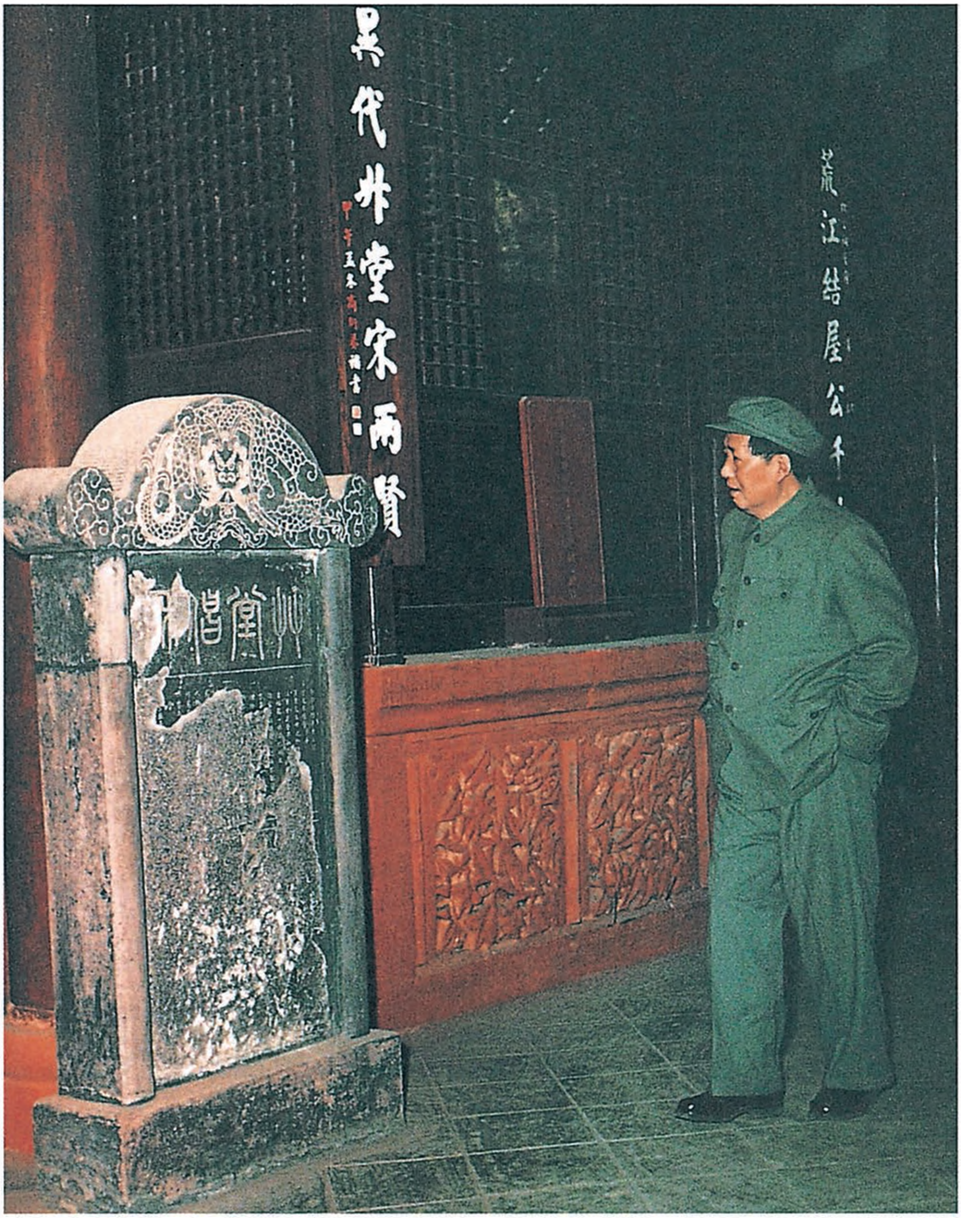
[1] 这里数字有误，应为2.8亿美元。以下乘除的计算均有误，对日五年贸易总额和每年贸易额，应分别为11.2亿元人民币和2.24亿元人民币。

叶飞、刘建勋[1]是否到会？

北京是否还有人到会？

---

[1] 叶飞，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


異代不同時
问谁堂宋两贤
荒江结屋公千

1958年3月，毛泽东参观杜甫草堂。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3月9日）

现在提出以下一些问题来讨论。你们的问题也提出来。

一、协作问题。现在普遍存在协作问题。这是□□同志提出的。全国，省与省，市与市，社与社，农、工、商、交通、贸易、文教，都要协作。

二、中心工作与非中心工作如何去做。县委书记搞了中心工作，其他同志就不高兴。在县级以下，不要因为中心而丢掉其他。

三、税制和价格问题。

四、地方工业中的劳动法。县、乡工业是否实行八小时制，劳动保护，工资福利如何？

五、第二本账问题，要在这里谈谈，提出原则，党代表大会通过后六、七月交人代会通过。

六、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3年完成，12个省5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湖北5至7年完成（包括2年灾荒），争取5年完成，这就比较主动。现在账已公布出来了，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挨骂不要紧，无杀头之罪，无非是主观主义。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

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七、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1956年工资冒了10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八、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九、粮食包干问题，浙江有一个报告，已印发。

十、又统一又分散——地方分权问题。欧洲现在没有统一的国家，可是地方发展了。中国自秦至今，一统天下，统了，地方就不发展。各有利弊。

十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究竟有什么问题？这两类矛盾的情况如何？克服的趋势如何？

十二、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是除掉四害，一种是让四害存在，除四害也有两种方法，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两三年搞完。又如肥料，1956年比1957年多一倍，1958年又超过1956年一倍。肥料多好还是少好？去年生产不起劲，今年不仅恢复，而且超过1956年。哪种办法好？1957年的“马克思主义”反冒进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这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

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十三、文教，有人提议搞14项。商业是否也搞14项？

十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不断革命论。在南宁会议只提出了技术革命，现在有人加上文化革命可以研究。

十五、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但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样重。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现在不是去泼冷水，而是提倡实报实喊，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十六、整风问题。双反抓到了题目。知识分子“专深红透”这个口号很好。刘备招亲，弄假成真，他们也是有真的，有假的，他们有小部分是假的，多数是半真半假的，可以发生突变的。不要多少时候就会变的，因为去年整风反右为基础，今年又有生产高潮，思想有很大改变，这是整风的形势。

基层整风如何做法？要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群众中一些错误思想也要解决。这些工作都要做，不然，热情就不够高。

十七、右派大会开不开？一个城市、一个区、一个学校召开右派大会，有左派参加，主要目的是争取分化右派，给他一条出路，一打一拉，又打又拉，就是给右派一条出路。

十八、农具改革运动，要一直改到拖拉机。湖北省当阳县的车子化，是技术革新的萌芽。

十九、六十条现在还不是正式的文件，要修改或重新写，基本观点对，要有所增减。

二十、报纸如何办？中央、省、市、专（市）、县、区报纸如何改变面貌，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二十三条，有跃进的可能。

组织、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

二十一、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宦乡说英国的备忘录，刺得我们很不舒服，其实他们是用针刺我们，而我们则用锥子锥他们，我看很舒服。他们不希望我们公开辩驳，是因为国际形势，国内大选和做买卖对他们不利。印尼、阿拉伯世界的情况是好的。朝鲜、波兰（农业问题）有希望，不是一团黑暗。十二国经济协作要研究。政治要和业务相结合，是否外贸在政治上有不足之处？可叫兄弟国家制造我们需要的东西。是否参加十二国协作会议，是否成为正式委员，我看问题不在形式，而在于实质。

二十二、国防计划问题。

二十三、出理论杂志问题。

二十四、过去八年的经验，应加总结，反冒进是个方针问题，南宁会议谈了这个问题。谈清楚的目的是为了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好做工作。

规章制度。□□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上饭馆，不许上街买鞋，这是谈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现在双反、整改，大有希望。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上层建筑，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搬的也有，但是中央

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节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有物也有人，工业只有物没有人，商业好像少一点，计划、统计、基建程序、管理制度、财政，搬得不少，基本规章是用规章制度管人。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未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要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丧魂失魄，丧失独立思考。什么事情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不是建筑上的）。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为生产关系的三大部分，规章制度，有一部分属于生产关系，工资福利属于分配，都是生产关系。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3月10日）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独创精神，学习应和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内战时期到遵义会议（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最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在理论上只战胜了德波林学派，中国“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在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

条主义，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加上斯大林的统治开始巩固（大巩固是在肃反后）；共产国际当时是布哈林、皮可夫、季诺维也夫，东方部长是库西宁，远东部长是米夫。□□□是个好同志，善良，有独创精神，就是太老实了些，米夫的作用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有些中国同志也受到影响，“左”倾在知识青年中也有。当时王明等搞了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缩小了党的圈子。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问题上，因为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动，向农民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结果地主没有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绿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铁板一块，不可分割，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工作几乎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是，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因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总

之，是苏联第一。商业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教条主义的情况也有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中国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而且还要借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破中国的旧专家的资产阶级思想，苏联的设计用到中国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整个经济情况不了解，对苏联和中国的经济情况的不同更不了解，只好盲目服从。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设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对中国的情况，都有些了解了。

三、在精神上没有压力了，因为破除了迷信。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

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斯大林很欣赏高岗，专送一辆汽车，高岗每年“八一五”都给斯大林打贺电，现在各省也有这样的例子。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广东、内蒙、新疆、青海、甘肃、安徽、山东等地都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时局是不稳定的，“脚踏实地”是踏不稳的，有一天大陆会下沉，太平洋会变成陆地，我们就得搬家。轻微的地震是经常会有的，高饶事件是“八级地震”……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适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过去我们反对教条主义，他们的“布尔什维克”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实话报”攻击中央苏区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

一九五六年四月提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有我们的一套内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任何时期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

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是因为顾全社会主义利益。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出了工、农业同时并举，工业化的道路，合作化、节育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工作的批评，对人民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则集，能分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分权当然不能是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期是反动的。苏联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而中国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故不能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

许革命”。“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新中国。与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十纲领。按照王明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是不真了。这个报告公布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并发表了文章说是“中国自由化”。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那是很自然的事。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也不是没有见解的人，如杜勒斯听到我们的文章，说要看看，不到半月他便做出结论：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但当时苏联看不清，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有一致，也有矛盾，苏联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

祝贺丹麦王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3月10日）

丹麦王国国王斐德烈九世陛下：

值此陛下寿辰和丹麦王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诚的祝贺。祝中丹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和巩固。祝丹麦王国繁荣，丹麦人民幸福和陛下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于北京

对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3月11日）

一

此件[2]付讨论。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二

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五年不变问题及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要求答复。

三

以上建议请中央考虑，如认为可行，即速确定，通知有关部门和我们立即执行，以利建设。

以上二、三两项建议，请中央指示。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的批语；二是毛泽东为广东省委建议拟的标题；三是毛泽东修改的广东省委建议末尾的两段文字，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8年3月6日关于财政下放和工业下放问题的建议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财政下放对组织社会主义大跃进起了良好的作用。1958年广东省的基建投资，已由原来中央安排的1.19亿元增加到2.26亿元，即由地方追加1.07亿元。估计在开展反铺张浪费，厉行节约和挖掘生产潜力后，企业利润还可增加，也就有可能再增加投资，用于生产建设。（二）财政“五年不变”的规定，将会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之能更主动地去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因此，请中央考虑，是否正式宣布财政下放、五年不变的方针，和批准广东省五年基建投资计划。（三）要使工业的发展真正做到多快好省，除有些工厂必须由中央直接管理外，应把发展地方生产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些工厂尽量下放。现在有的工厂由中央各部门分管，地方插不上手，这些厂往往各搞一套，浪费很大，生产潜力远没有发挥。我们认为，在一个地区的工业，原则上必须确定由地方统一管理。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浙江省委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8年3月13日）

此件[1]可以一阅。水利、积肥不算突出；但有些经验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8年3月5日关于冬季生产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并上海局的报告。报告汇报了浙江省冬季生产运动中关于兴修水利、积肥、绿化造林、冬播作物及除四害、讲卫生等方面的情况，提出了冬季生产运动中必须加以解决的几个问题：一、关于各项生产的全面规划和安排问题。该省绝大部分地区采取了“排任务、排劳力、排时间”的办法，把各项生产纳入计划，既抓住重点又照顾全面，因此使各项工作互相促进，互相推动，做得又快又好。二、对占百分之十左右的三类合作社，各地正在抽调骨干加强领导，结合生产、整风彻底整顿三类社，要求在春耕前根本上改变这些社的落后面貌。三、生产与分配的关系问题。有些地方对粮食分配工作重视不够，放松领导，致使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没有核实，统销未作妥善安排，群众叫喊缺粮的现象又有出现，对当前的生产高潮有不利影响。报告最后说，为了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省委决心继续抓紧整风，彻底转变领导思想和作风，用整风的精神和方法领导生产运动。此外，还希望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检查评比，定期组织各社代表到中心社参观检查，学习先进经验，研究改进办法，制定工作规划，使参加检查和被检查的单位都能明确努力方向，以推动春耕生产运动的发展。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陕西省委关于组织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的通知的批语

（1958年3月15日）

此件[1]可阅。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同志们研究一下，出一批题目发给若干干部；同时寄中央书记处一份。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陕西省委1958年2月16日关于组织县级以上负责干部和理论教育工作者进行专题研究的通知。通知说，为了使全党负责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对于整风运动和工农业生产高潮中提出的新问题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以便有效地改进实际工作，促进工农业大跃进，并使负责干部注意采取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方法，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省委决定凡县级以上具有进行理论研究工作条件的负责干部和具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理论教育工作者，都要尽可能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单独或组成小组，每年至少研究一个有关当前实际工作的重大问题，写出专题论文或报告。通知还列出了五十个供地委书记以上负责干部参考的研究题目。毛泽东的批语和陕西省委的通知，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的批语

（1958年3月15日）

此件[1]可一看，然后谈一下。为什么知识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二十八期刊载的《上海新闻出版和文学艺术部门党内负责干部的一些意见》。意见综合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1958年1月8日、9日、13日、14日分别召集上海市新闻、出版、文学、电影等单位党内负责干部座谈会的情况。在新闻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有些同志谨小慎微，不敢说话。左派不愿替报纸写稿，有点踌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报纸的边。版面上也没有生气。在出版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出书没有长期规划，今天不知明天做什么，和现在国家建设面貌不相称。对出版工作如何贯彻百家争鸣只是兢兢业业小心为妙。对旧的通俗文艺书籍采取什么态度，方针还不明确。而儿童文学书籍无人写稿，愈是低年级学生读的书愈是无人写，发生稿荒。在文艺界座谈会上，有人反映，大学的古典文学师资有脱节现象，建议在上海成立文学研究所。在电影界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如何“放”的问题，比如，有毒的片子是否经过消毒、修改后就拿出去？还是发现问题就停下来重新搞？还有人反映，反右以后，大家缩手缩脚，特别是在创作上很少发言。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情况反映，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洛阳第一拖拉机厂跃进规划[1]的批语

（1958年3月16日）

付讨论。拖拉机型号名称不可用洋字。各种拖拉机样式和性能一定要适合我国的气候和地形；并且一定要是综合利用的；其成本一定要尽可能降低。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

[1] 指中共洛阳第一拖拉机厂委员会1958年2月27日向洛阳市委并河南省委上报的关于第一拖拉机厂1958年至1968年跃进规划。主要内容是：一、增加品种，拟由原设计的一种产品增至七种基本产品，和十一种变型产品。二、增加产量，由原设计五万四千标准台，第一期至1961年达到九万九千四百六十六标准台（1959年第二季度正式投产，年底可生产八千二百三十三标准台，1960年7月达到设计水平），再经过二期与三期扩建，增至十九万二千八百六十六标准台，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我厂可累计生产一百一十一万六千八百九十一标准台。三、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累计产品可耕作面积六亿三千一百九十六万亩。四、我厂十二年的累计产量可赶上英国一九七二年拖拉机保有量，即至1969年我厂可累计生产七十一万三千四百五十混合台，超过英国1972年本国保有量（七十万台）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台。跃进规划后附有“十年内增加品种与逐年产量表”，表内的“品种名称”列有拖拉机型号“**ДТ**-54型”“**ДТ**-75型”等。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规划，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的批语[1]

（1958年3月16日）

付讨论。山西的办法很好，各省、市、区可以仿行。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3月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二十七期上。该期刊载了《山西河南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措施》一文，文中说：中共山西省委、河南省委都在1958年1月间发出了关于加强理论工作队伍的指示。山西省委要求从1958年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培养出一批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政治品质优良、思想意识健康、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工作干部。具体要求是：每个县至少培养出二至四人，每个地委和市委培养出五至十人，省级机关培养出三十至四十人。要求在二月底前认真地配备和调整理论教员，并确定了在职理论教员的编制总额和挑选理论教员的条件以及对理论教员的培养和使用办法。河南省委也要求理论教员的调整配备工作要在二月底以前完成，要求“必须如同支援文教战线一样以最大决心抽出一批优秀干部来充实这条战线”，并要求经过这次调整之后，一般不再调动他们做其他工作。毛泽东在批发这篇文章时，将括号中“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几个字删去。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文章，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一批按语[1]

（1958年3月19日）

这些按语[2]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高潮》[3]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

---

[1] 这是毛泽东为在成都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的一批按语写的说明。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毛泽东1955年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写的一部分按语。

[3] 书名应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

祝贺突尼斯独立二周年的电报

（1958年3月19日）

突尼斯总统哈比布·布尔吉巴阁下

阁下：

欣逢突尼斯独立二周年纪念日，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突尼斯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新的胜利。祝中、突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祝突尼斯共和国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8年3月19日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8年3月20日）

我讲四个问题：

一、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因为几亿农民在动手动脚，否定肩挑的反面，一搞就节省劳动力几倍，以机械化代替肩挑，就会大大增加劳动效力，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完成机械化，总有些角落办不到，一千年，五百年，一百年，五十年，总有些还是半机械化，如木船；有一部分手工业，过几万万年还会有的，如吃饭，永世是手工业，它同机械化是对立的统一，只是性质不同，应当结合起来。

二、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像土改一样，开始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

如果在一年内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当然可能缺点很

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只要总路线正确，是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那么，先后一年、二年，乃至三年、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在高级合作化问题上，李井泉同志可是从容不迫，他就不忙搞高级化。他搞高级化不是在五五年，也不是在五六年，而是在五七年。别的省大概是五五年下半年和五六年上半年就搞得差不多了，他那里迟一年。这有什么要紧？也许还更好些。这当然不是泼冷水。如果你们现在去传达，本来是三年搞得完的，一定要搞四年，说横直是讲了的，这不算荣誉，搞五年也不算不荣誉，那也不好。要看条件如何，群众情绪提高没有，觉悟提高没有，这是精神条件。还有物质条件。只要条件搞好了，需要多少年，这是个客观的事情。如果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用十年、八年或者十几年完成四十条，也是搞社会主义，但那是另外一条路线。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就是不那么舒服，慢一点，人民比较愁闷。苏联人民的气不舒畅，干部上下级之间也不很通气，四十年搞那么一点东西，搞那么一点粮食，搞那么一点钢。有的同志讲，我们只要十八年（已经过了八年，再加两个五年）就行。我说三个五年计划赶上它年产五千一百万吨钢就好了。假如十八年抵它四十年，那当然好。我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我们的政治条件跟它有些不同。应当说，我们列宁主义比它多一点，生动活泼，它那里列宁主义丧失了一部分。我们这一套是学习列宁的。同志们，你们看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革命前夜同革命之后几年在《火星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是跟群众通气的，把心交给群众的。骂起来的时候骂得很凶，只有敌人恨他，群众说骂得

好。时间、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用脚走路，一点钟只能走五公里，用自行车就多了，用汽车、火车、飞机更多，这是客观存在。凡是主观、客观条件办得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办不到的，就不要勉强。现在可有一股风，这股风不是七、八级，而是十一、二级。这风很有好处，现在不要刹这个风。但是我们内部安排，要压缩空气。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事情还是那么多，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虚报、浮夸、争名，不去务实，讲是讲得好，一查没有措施，这就危险。这一点请同志们注意。总而言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是现在有些事情没有措施，就不务实了。

三、各省、市、自治区两个月开一次会，检查总结一次。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协作区也要二三个月开一次会。运动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为了调整生产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与慢的对立的统一。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与急的对立的统一，劳与逸的对立的统一。如果只有急和劳，则是片面性，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做事总要有缓有急，（如武昌县书记，不看农民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要修水库，民工跑了一半）也是苦战与休整的统一。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不可能一个接一个打，打仗也有节奏。中央苏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反休整，主张“勇猛果断，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苦战与休整的对立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休整与苦战，也是如此。劳和逸，缓和急，也有同一性；休战与苦战也

有同一性。睡眠与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觉。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在成都不能开一万年会。王熙凤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席。”这是真理。不可以人废言，应以是否为真理而定。散会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搞一搞意见就有分歧，就转化为斗争，发生分歧，重新破裂，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有不团结，不团结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老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团结经过斗争，才能团结，党内、阶级、人民都一样，团结转化为斗争，再团结。不能光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矛盾。苏联就不讲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党是这样，人民、阶级都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一分为二，这是普普遍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革命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新生力量是无敌的，它一定会在斗争中获得壮大和发展，最后战胜腐朽力量。因此，我们就要赞美新事物，为新事物的发展，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事物。

折中主义是假公正、假科学、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诡辩术，是展开唯心论的范畴的。

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为了其他劳动者，而且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

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他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说：生产就包含着消费。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生产是为了消费，几十年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又走向反面，不叫种子，而是秧苗，收获，收获以后，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收的例子，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春夏秋冬也是互相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互相转化的，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开庆祝会，因人是非死不可的，这是自然规律。粮食是一年生植物，年年生一次，死一次，而且死得越多生得越多。例如猪不杀掉，就越来越少了，谁喂呢？

简明哲学词典，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死转化是形而上学，战争与和平转化是不对的，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的，是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的。

儿子转化为父亲，父亲转化为儿子，女子转化为男子，男子转化为女子，直接转化是不行的，但是结婚后生男生女，还不是转化吗？

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相互转化，就是资产阶级、地主与工人、农民的关系。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阶级讲的，这是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是和平，三八线一打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军事是特殊形势下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有些缺点，总要转化的，而我们如果搞不好，又会硬化的。那时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就会翘尾巴，思想就会僵化。

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级，或者要另起个名字，不会固定的。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是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热现在就比古代冷得多了。冰河时期，二百万年变一次，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南极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代是很热的，延长县发现有竹子的化石（宋朝人说，延长古代是生长竹子的，现在不行了）。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

讲这些就是为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系统，有几十万人。总而言之，要多想，不要老想看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例如农民搞水利，不能说他对水利将信将疑，但他对于路

线则是不自觉的。又如除四害，真正相信者，现在逐渐多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将信将疑，碰到人就问："消灭四害能否办到?"合作化也是如此，没有证明此事就要问。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有相当的增产，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四十条，十五年赶上英国，这是理论，四、五、八大部尚未实现，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十五年赶上英国还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搞二千万吨，在我脑筋中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要开会，一年四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建成后的形势无非是：大好、中好、不甚好、不好或者是大乱子。看来出乱子也不会很大，无非乱一阵，还会走向"治"，出乱子包含着好的因素，乱子不怕。匈牙利建设工业出了些乱子，现在又好了。

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许多事情是没有料到的，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比如，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涨轰轰烈烈，没有料到有斯大林问题、匈牙利事情、"反冒进"，明年怎样？又会出什么事，反什么主义？谁人能料到？具体的事是算不出来的。

现在人们的相互关系，决定于三大阶级的关系：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不革他们的命，就束缚生产力。右派占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其中大多数人将来可能改变，转化过来，那

是另外的问题。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是指右派以外的那些人，他们对我们的新中国是半心半意的，半心被迫向我们，半心要搞资本主义，经过整风，已经有了改变，可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北京民主党派开自我改造誓师大会，全国都要开）。

第三个是左派，即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其实是四个阶级，农民是另一个阶级）。

路线已经开始形成，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工人向农民摆阔气，有些干部争名誉、地位，都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就搞不好生产，不解决这些相互关系，劳动怎能搞好？过去我们在建设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只有男人没有女人，否定女人怎么办？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多少，是高个儿和矮个儿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关于推广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经验的批语

（1958年3月21日）

此件[1]连同谭震林的报告[2]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1958年3月14日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给邓小平、彭真并报毛泽东、中央各负责同志的报告。报告中说，徐水县从1957年11月起，苦战3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至三套灌溉设施。徐水县兴修水利的特点，是在群众自办农田水利的方针下，建立一个以小型为基础、大中小型互相结合的、防洪除涝灌溉相互为用的水利工程系统。报告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一）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二）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三）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四）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五）坚持个人负责与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六）努力使中心任务与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2]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1958年3月13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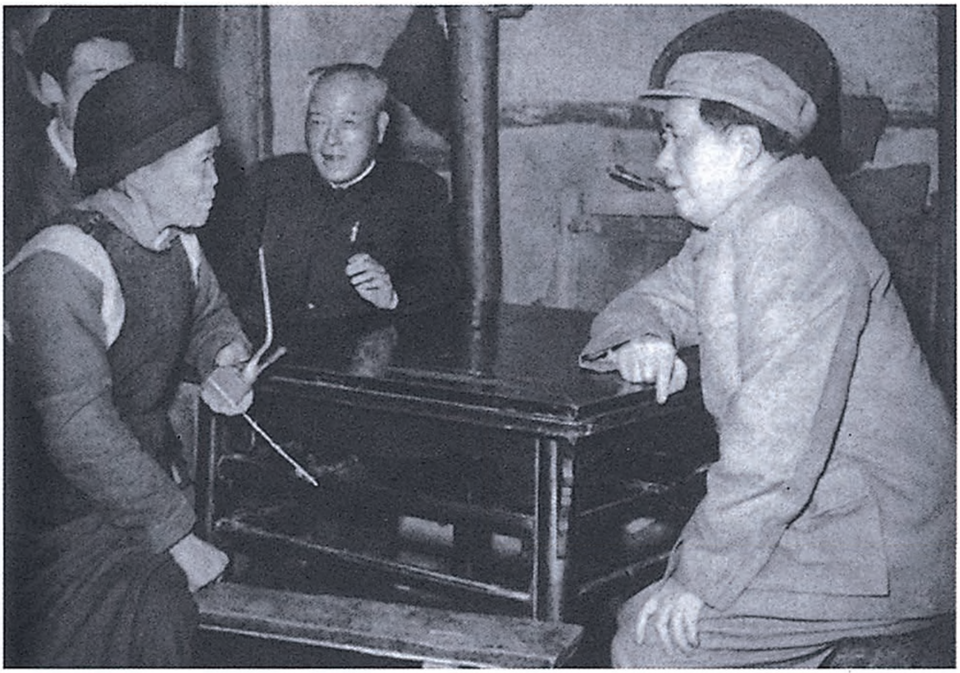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视察。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四川郫县红光农业合作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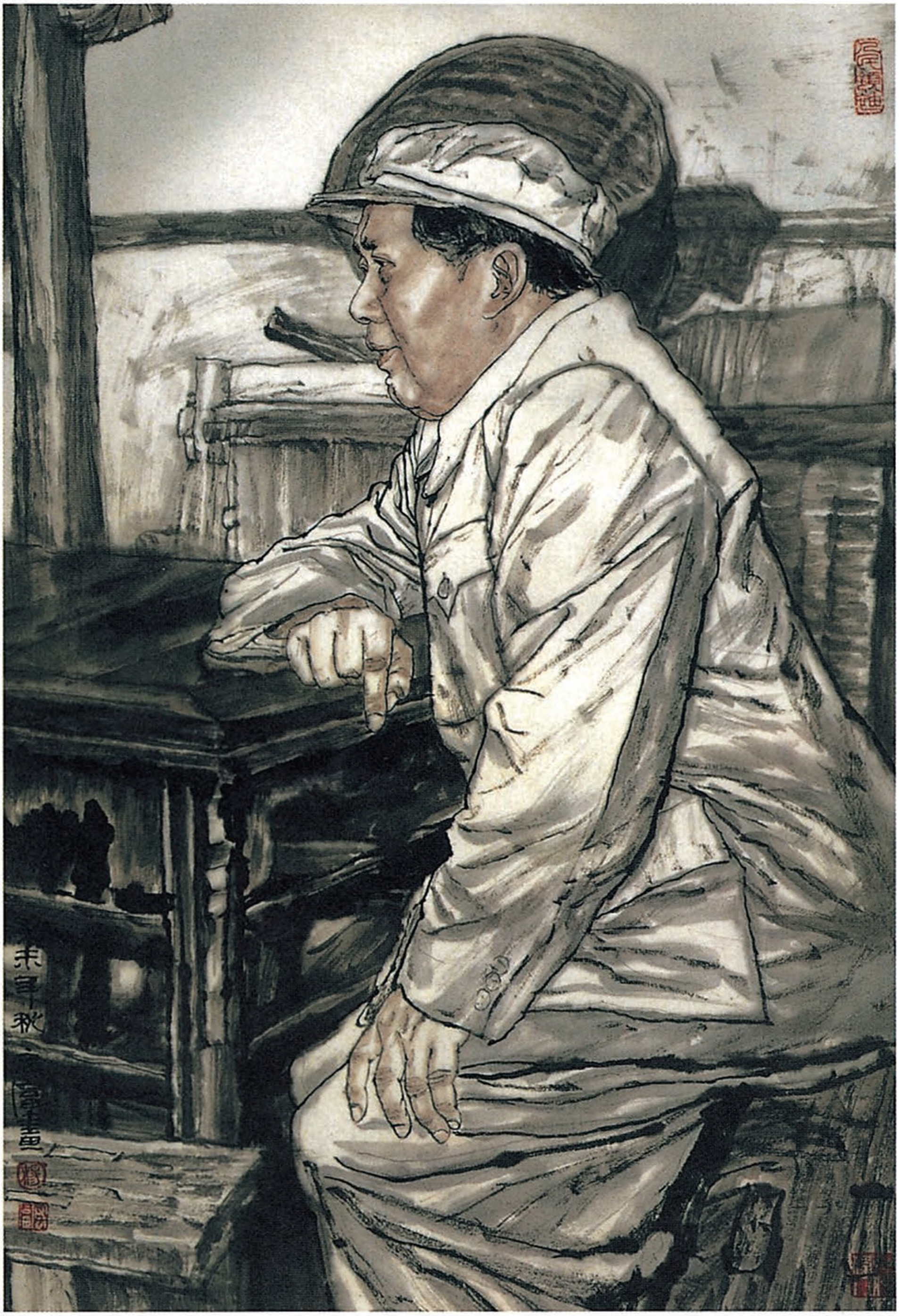
1958年3月，毛泽东在红光农业合作社视察时和小朋友在一起。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幸福公社和农民高勃然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红光农业合作社和社员温大娘亲切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四川灌县新城乡莲花一社的苕菜地摘苕菜。



《在合作社社员家中》（中国画）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到四川灌县视察都江堰，观看水利规划模型。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观看都江堰水利枢纽规划模型。

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视察都江堰。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

（1958年3月21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伊斯坎德尔·米尔扎阁下
总统先生：

值此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贵国人民致以热忱的祝贺。祝贵国繁荣、人民幸福、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给滕代远[1]的信

（1958年3月22日）

滕代远同志：

铁道文件[2]，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钱，有无可能，每一个五年各需用多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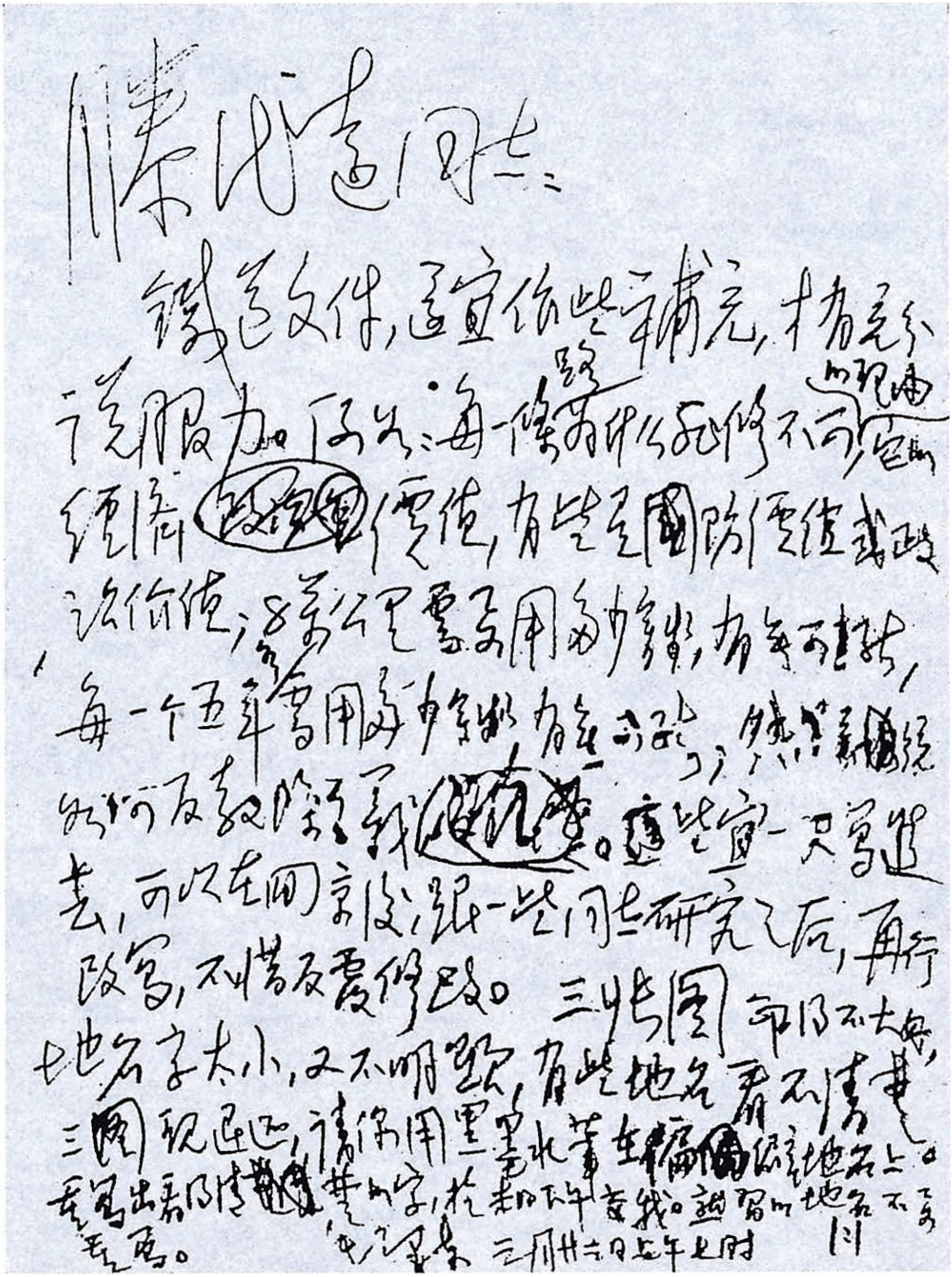
[1] 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2] 指铁道部党组向成都会议提交的文件，包括铁道部党组1958年3月14日《关于全国铁路十五年（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二年）新线发展规划的说明》和滕代远1958年3月2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建成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报告说，旧中国在73年内仅修筑过2.5万公里铁路，不仅数量少，分布也极不平衡。建国以后，为迅速改变铁路的落后面貌，在恢复原有铁路的同时，于1950年就开始新建铁路，到1957年年底，全国已经通车的铁路总长度增加到近3万公里。但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只有3万公里铁路是太少了。根据中央关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工业与农业并举、沿海与内地兼顾的建设方针，为适应目前全国工农业生产和建设大跃进的形势，铁道部党组反复研究了新建铁路的规划，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新线2万公里，第三、第四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各修3万公里，十五年共修建8万公里新线，到1972年，全国铁路总长度将达到1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和苏联，在世界上从第十一位跃至第三位。这些文件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印得不大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退还，请你用黑墨水笔在偏僻地名上重写出看得清楚的字，于本日下午交我。熟习的地名不要重写。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上午七时



滕代远同志：

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增强说服力。例如：每一条路为什么非修不可，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8万公里需要用多少钢轨，每年需要多少，每一个五年需用多少钢轨，有几个五年；然后[illegible]可及超[illegible]。这些宜一一写进去，可以在同主任等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三张图部分不太好，地名字太小，又不明显，有些地名看不清楚。三图现送还，请你用墨笔在稿图的地名上重写出来，用清楚大字，於本日下午交我。凡留的地名不要丢掉。

毛泽东　三月廿六日上午七时

毛泽东致滕代远信的手稿。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8年3月22日）

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到一点问题交换意见。

《西厢记》中，有一段张生和惠明的故事。孙飞虎围着普救寺，张生要送信请他的朋友白马将军来解围。无人送信。开群众会议，惠明挺身将信送去，这是描写惠明勇敢胆大的坚定之人。希望中国要多点惠明，要在县委委员以上几十万人中发动一下大鸣、大放、大字报批评领导。这是一种无产阶级的气氛，共产主义的气氛。群众骂你一顿出口气，并没砍你的头，撤你的职，这是蓬勃的战斗的情绪，是很高的共产主义的风格。现在群众斗争的风格很好，我们同志之间也要提倡这种风格。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

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秦国称王在后，但是称帝在先。

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现在并不企图势如破竹，有精神不振的现象，这很不好，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较好一点。联共党史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可以改变。如一国不能胜利[1]。"中国的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框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斯大林也称势如破竹，但有些破烂了。他写的语言学、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是比较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但有些问题值得研究。例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价值法则的作用如何？是否拿劳动准备时间消耗多少来定工资的高低？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即看到此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后备并抚育成人的单位。教育部

---

[1] 这里应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内首先取得胜利。

门的主要部门，也在学校。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现在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付酬，家庭还有用。到共产主义分配关系是变为各取所需，各种观念形态都要变，也许几千年，至少几百年家庭将要消灭。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设想，思想狭窄得很。这些问题经典著作上已经讲过，如阶级、党的消灭等，这说明马列风格高，我们很低。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耐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他们自然科学可能多学一点，但社会科学就不见得。他们读马列主义比我们多，但读不进去，懂不了。如吴景超读了很多书，一有机会就反马克思主义。

不要“自惭形秽”，伯恩斯坦、考茨基、后期的普列汉诺夫，马列主义比我们读得多，但他们并不行，把第二国际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仆从。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厚今薄古）、一封信（给主席的）、一个通知（准备下达）有破竹之势，但有许多同志对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无动于衷，如批判胡风、梁漱溟、《武训传》《红楼梦》、丁玲等。本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点，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有了。在过去民主革命中，就经常讲革命分两个阶段，前者为后者的准备。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许多同志对于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革命，土地改革后搞什么都不去想，对社会主义萌芽熟视无睹。而社会主义萌芽早已诞生。比如

在瑞金、在抗日根据地，就产生了社会主义萌芽互助组。

王明、陈独秀是一样的。陈独秀是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让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然后壮大无产阶级再搞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陈独秀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激进派。但是，经过三十多年，还有这样的人。坏人如丁玲、冯雪峰，好人如□□□完全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一套。搞“四大自由”，讲农民怕冒尖，他就跟我尖锐对立。河南的富裕中农有好东西不让干部看，装穷，无人时，才向货郎买布。我看很好，这表示贫下中农威力很大，使得富裕中农不敢冒尖，这说明社会主义大有希望。但有些人认为不得了，要解除怕冒尖的恐惧，即大出布告，搞“四大自由”。既不请示，也不商量，这明明是和二中全会方针作对。他们没有搞社会主义的精神准备，现在被说服了，积极了。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二十三岁开始。耶稣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青年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来的。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在开始著书时，只有二十几岁。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都是一些当时的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康有为也是如此，刘师培成名时还不过二十岁，死时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因用脑过度早死，死时才二十几岁。颜渊（二等圣人）死时才三十二岁。李世民起义时，只有十几岁，当了总司令，二十四岁登基当了皇帝，年纪不甚大，学问不甚多，问题是

看你方向对不对。秦叔宝也是年轻的。年轻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有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罗成、王伯当都不过是二十几岁。梁启超年轻时也是所向披靡，而我们在教授前就那么无力，怕比学问。刊物出后，方向不错，就对了。雷海宗读了本马列主义不如我们，因为我们是相信马列主义，他越读得多还当右派。现在我们要办刊物，要压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只要读十几本书就可以把他们打倒。刊物搞起来，就逼着我们去看经典著作，想问题，而且要动手写。这就可以提高思想。现在一大堆刊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不办刊物大家也不会去看书，尽讲抽象不算红。

各省可办一个刊物，成立一种对立面，并且担任向中央刊物发稿的任务，每省一年六篇就够了。总之，十篇以下，由你们去组织，这样会出英雄豪杰的。

从古以来，创新学派、新教派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而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的。马丁·路德创新教，达尔文主义出来后，多少人反对！发明安眠药的，既不是医生，更不是有名的医生，而是一个司药的。开始，德国人不相信，但法国人欢迎，从此才有安眠药。据说盘尼西林是一个在染坊洗衣服的发明的。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住学校。看你方向对不对，去不去抓。学问是抓来的。从来创立学派的青年，一抓到真理，就藐视古董，有所发明。博学家就来压迫。历史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开头搞革命，还不是一些娃娃，二十多岁。而那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段祺瑞都是老气横秋的，讲学问，他们多，讲真理，我们多。

我很高兴，最近时期大字报很有气魄，批评得尖锐、生动。把暮气一扫而光，但我们老是四平八稳走方步，“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讲真心话。

王鹤寿第二篇文章敢于批评教条主义，彭涛的也好，有说服力，尖锐性差一点，无非是“打击别人提高自己”，但不是个人主义的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了打击错误思想，提高正确思想，是完全必要的（当然错误中也包含自己的错误）。滕代远那一篇也好，但说服力不够。修那么多铁路要说出理由来，不然就把别人吓倒了。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禹王惜寸阴，我们爱每一分钟。孔子“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孔子“席不暇暖”，墨子“突不得黔”，这都是急功近利。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六亿人口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

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是正确的。天津、南京两封信虽然是反对我的，但精神可取，我看是好的，天津的更好。南京的萎靡不振，骨气不硬。陈其通等四人，除陈沂是右派分子，这些人敢于说话的精神是可取的。当面不说，背后唧唧咕咕，这是不好。应该大体一致，至少要基本一致，可以尖锐一点，也可以委婉一点，但不能不说。有时要尖锐鲜明，横竖是从团结帮助的态度出发，尖锐的批评不会使党分裂，只会使党团结，有话不说，就很危险。当然，说话要选择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的三大案，反魏忠贤

的那样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一个四川人杨慎安被充军到云南。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被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说：“要造成一种环境。”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我们应当领导群众，现在群众比我们先进，他们敢于贴大字报批评我们。当然和储安平不同，那是敌人骂我们，现在是同志之间的批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的作风不好，有些话不敢讲，只讲三分。这是一怕不好混，二怕失选票。这是庸俗作风，要改变，现在已有可能改变。

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有三种人，三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痛心的，一种是漠不关心的，再一种是吹掉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这三种态度的人，两头小中间大。一九五六年有许多问题，都有这三种态度，反日、反蒋、土改是比较一致的，但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要有三种态度。这种估计是不是对，这次会议解决了一批问题，取得协议，为政治局准备了文件，但缺点是思想谈得较少，是否用两三天的时间谈谈思想问题，谈谈心里话？

同志们说这次会议是整风会议，又不谈思想，实践诺言，是否有矛盾？一不搞斗争，二不划右派，和风细雨，把心里话讲出来，

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敢说，把顾虑解除，要在地委书记约在两三人的范围内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邹容十八九岁写了一篇《革命军》，直接骂皇帝。章太炎写文章驳康有为也是精神百倍，年纪越大用处越不多，但也不要妄自菲薄，要鼓点劲。当然，年纪大的也还要，也要掌舵。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要冲破党内的沉闷气氛。

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任，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本出来。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现在的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搜集民歌的工作，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民歌。这不费很多的劳力，比看杜甫、李白的诗舒服一些。

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1]的批语

（1958年3月22日）

一

可以一阅。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3月13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刊载的《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一文。文中说，目前上海化工学院学生正大张旗鼓揭发各班级中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现象，形成“兴无灭资”巨流。许多“自由王国”“自由天地”“自由集体”已被揭发出来。该校两个右派学生也写了一篇大字报，其中揭发的情况，经学校了解是真实的。大字报说：化工学院三舍203室，夜夜电灯通明，烟雾弥漫，房门倒锁，经常聚拢一些头发高耸、衣着奇异、口含烟卷的学生，桌上陈列菠萝美酒，口中哼着黄色歌曲，手里玩着从文娱部偷来的扑克打桥牌，窗旁悬着一副对联“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就是他们每天夜自修的生活。在学习上，他们从不认真，上课坐在最后，偷看小说，对政治课及政治运动则更歧视，不仅诽谤政治课教师，而且千方百计逃避政治活动。出入这个房间的所谓“知己”，都是一些这次反右斗争中被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还有一些分散在各个班级的落后分子和认识不清的人。领导过去注意不够，说明领导存在官气。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作为会议文件在成都会议上印发。

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二

见1958年3月13日《宣教动态》。[1]

---

[1]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化工学院两个右派分子的大字报》一文后写的说明。

对彭涛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报告[1]的批语

（1958年3月22日）

可用。付讨论。请作者回京后，将文内一切化学名词注上分子式。三月间写的四级办肥料厂文件[2]，不如此件生动和有说服力，如有时间，请重写一次。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二日

---

[1] 指化学工业部部长彭涛1958年3月21日关于发展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我国有机合成化学工业的构成和建设构想，认为我国可以在有机化学产品上也来一个大跃进，并提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走以电石为主的发展合成化学工业的道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我国有机合成化学工业能不能大跃进？能不能在十年内赶上英国?”，并把报告中“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至少在十年内我们应该走以电石为主的道路”一句，改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应该走以电石为主的道路”。这个报告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2] 指彭涛1958年3月4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为了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和到1962年实现化学肥料生产七百万吨的规划，除在中央和省两级办化肥厂外，还准备在专署和县两级开办化肥厂，这样，四级同时举办化肥厂，到1962年氮肥产量可达到1800万吨至2000万吨，再加上500万吨至700万吨磷肥和部分钾肥，就可以在数量上把英国远远地抛在后面，在每亩施肥量上，十年内赶上英国，也就大有希望了。

对《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1]的批语

（1958年3月22日）

退乔木[2]办。在第二件上，增加了县的一条，请与少奇、小平[3]商量酌定。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

[1] 《中央关于适当扩大某些专署权限问题的意见》是在1958年2月21日成都会议上通过的，主要内容是：一、为了适应农业、地方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大跃进，根据中央改进行政管理体制的精神，在某些省、自治区可以适当地扩大专署的权限。1. 建立专区的财政。2. 专署对所辖县、市的财政预算执行，可以作必要的调剂。3. 原由省委托专署管理的企业、事业和中等学校，划归专署直接管理。4. 根据地方工业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兴办适合于专区管理的企业，建立中等技术学校和工业、农业的科学研究机构。5. 专区范围内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物资分配计划，由专署编制汇总。6. 专区范围内的人员编制，在省控制的总指标内，专署可以在地区间和部门间作必要的调剂。二、为了使工农业便于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每个专区应有一个工业城市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三、专署无论是否扩大权限，仍然是省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关，不是一级政府。四、专区的建立或撤

销，专署行政区划的改变，都由省委、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然后由省人民委员会报国务院备案。五、专署权限是否扩大和如何扩大，专署编制是否相应地扩大和如何扩大，以及专署的组织形式，完全由省委、自治区党委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行决定。这个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1958年4月2日会议同意下发。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给田家英[1]的信

（1958年3月22日）

田家英同志：

请着人再找一部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金批本与此本有些不同。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对《上海最近情况（三月二十四日电话消息）》的批语[1]

（1958年3月25日）

可以一阅。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五日

---

[1] 《上海最近情况（3月24日电话消息）》的主要内容是：（一）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运动正在进一步发展。同工种比，同业务比，同行业比，厂际比，车间比，科室比，个人比，越比越深入。（二）运动与前一时期比较，开始转到想办法，找关键，比智慧，比措施。很多厂开了诸葛亮会，或者摆擂台。如江南造船厂抓住了缩短造船修船周期的关键，订出先进的指标和措施，原来造五千吨的船花18个月，现在9个月就完工；修船周期也缩短一半。（三）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许多规章制度实际上被冲破了。比如，工厂的成品以前是装箱后送商业部门验收，这样费时费钱，现在商业部门派人到工厂验收了。又如工厂上下工序之间、车间和验收人员之间的手续是很多的，现在已大为减少了。（四）有些工厂建立新的规章制度跟不上去，工作已发生困难。如江南造船厂过去靠施工命令、派工单领导生产，现在车间工

长、主任直接到车间派工，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新的规章制度跟不上，计划科统计不出完成生产的情况，劳动工资科发不出工资。这个问题必须迅速解决，已要工业部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五）各方面的情况有很大变化：1. 许多厂增产一倍、两倍以上，最多的永泰电机厂产值比去年增加二十六倍；新产品不断出现。2. 群众思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过去调动工人积极性总是讨价还价，现在这种现象没有了。3. 厂内及厂与厂之间的协作关系有很大改进。上海绢纺厂过去三班工人闹不团结，干部没有办法。这次检查说：不团结就赶不上英国。现在三班工人互相照顾，生产也上去了。（六）修改定额问题。国营大厂有定期修改定额的习惯，大都在四五月修改，现在提前了。电机、橡胶、针纺等行业的工厂自动提出修改定额，办法是工人自己提出来，自下而上经过讨论，再用送捷报的办法到没有修订的工厂去报喜。（七）最近发现有简单化强迫命令的现象，如推销公债、储蓄、税收、绿化等。这些情况已引起市委注意。（八）商业方面的情况：1. 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效率提高以后，公司、基层商店感到人员过多，很多职工贴大字报提出上山下乡。对这些人的安排，除到郊区、江西和长兴岛以外，还要研究其他的出路。2. 机构与体制问题，经过酝酿，上海市属六个局合并为三个局，即第一、第二商业局合并为第一商业局，零售业务下放给区，市级批发业务交中央站兼管；服务局、粮食局、供销合作局合并为第二商业局；外贸局不动。3. 商业网的调整正在个别区、个别行业试点。毛泽东的批语和这个材料，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五）

（1958年3月25日）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但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只有大量的事实，才能认识问题。写报告是反映下面干部和群众的意见的，要经过调查研究。省要反映地、县的情况，不详细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就冒出一篇报告来，那是危险的。要先听训，才能训人。要老老实实听群众的话，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县、社、工厂）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以后遇到大的问题一定要与若干省委书记谈一谈。反冒进的问题就是没有征求省委书记的意见，也没有征求各部门的意见，这个方法是不对的。在中央方面，工业部门想多搞。财贸部门想少搞一点，不仅脱离了省，也脱离了多数的部。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一般、特殊、全局、个别，这是辩证法的问题。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

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没有反映。把特殊当成一般来反冒进。

除四害的指示，是卫生部起草的。根本不能用，这是去年的例子，这几个月的情况，根本没有接触，所以说卫生部最不卫生。后来由□□找了一些同志座谈，经过反复研究写成一篇很好的指示。不然根本写不出来。如果一个指示不起作用，顶好不发表，一篇文章也是如此，如果写得不好，人家连看也不看，怎么指导工作呢？因此以后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尊重唯物论、辩证法。

尊重唯物论、辩证法的人，是提倡争论，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把问题提出来，暴露了对立面。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黄敬同志对经济问题有意见，我当时的注意力在思想问题方面。没有很好注意他提出的问题，故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有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展开。

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的。矛盾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的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把支流当作主流，没有抓到本质现象。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没有抓住本质问题，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

冶金工业部党组开会，吸收了部分大厂的同志共十几人参加，空气就不同了。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部如此，各省也如此，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必要时，除省委书记外，再加上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的，也要找地、县委书记，合作社，学校谈谈，只同省委书记谈不够，要一竿子到底，不要仅仅限于间接的东西。我很想了解一个城

市、一个县的工作，把一个县各方面的问题都谈一谈。不要多长时间，有两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各省也应该这样做。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别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红安县在一九五六年的作风，不就是老爷作风吗？那怎么能指导农业生产呢？一般说来，越上越离群众远一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越上官气越小。例如列宁就没有那么老爷气。相反有不少人越下官气越大，许多乡长、厂长、党委书记，官气也不小。

尽可能地征求意见，搞出的东西才比较有把握一点。但这样搞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的，还没有经过实践的证明。许多东西，我自己就是将信将疑的。比如，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究竟对不对，十大关系究竟对不对，我看还要看几年。我不提倡我们在报纸上来宣传这些东西，可怀疑的东西不要去宣传。我说至少还要看五年。我们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只有一个，就是革命。至于建设，还没有证明，或者可以说还只有初步的证明，因为只搞了八年嘛。为什么说革命的正确性已经证明了呢？因为我们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蒋介石政府总是推倒了，你不能说这不是事实。社会主义革命，经过去年这一年，也可以说经过证明了。我不谨慎，在一九五五年九月到十二月期间，写了些按语，其中有一篇，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的问题好像基本解决了。[1]那个时候矛盾的两外一个侧面还没有暴露出来，还是经验不足。

---

[1] 指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机会主义的邪气垮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写的按语中所说的“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年过去，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有了很大的把握了”。

所有制的解决，已经是一种新的关系。而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只解决了一部分。我们的党、政、工厂、学校，不管有多少官僚主义，总是与国民党有原则区别的，所以相互关系不能完全没有变化。如果不经整风，则国民党的作风、老爷气还要大量存在，这是与国民党相同的一面。“八路军不见了”，经过整风下放干部，“八路军又回来了”。

我们讲鸣放，右派（也有中派）加了个“大”字。大鸣大放，从艺术科学转到政治方面来。我们很快就转过来了。《解放日报》有一篇“只放不收”的社论，讲一万年都不收，放手发展民主，很主动。只要抓本质、主流的问题。例如一个口号——十五年赶上英国，就会起很大作用。本质问题解决了，次要问题人们会去解决的。如果只抓枝节现象，问题就解决不了。从部分现象看问题，那是很危险的。

我们很多同志不注意研究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哪里来呢？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都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的事物，那还有什么规律？“老子”是唯物论，还是客观唯心论？我是怀疑的。规律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社……反复出现。普遍存在的规律，才是普遍性的规律。比如打仗诱敌深入，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战略上他包围我们，战术上我包围他们，等等。这是经过多少年战争，胜仗、败仗，才概括起来的，完整的体系，只能在后来完成，而不能在事先或者初期完成。对井冈山时期的十六个字战术，当时人们就怀疑，哪有这样的战术法则呢？这十六个字战术法则，在苏联军事史上找不着，但这是从群众斗争中得来的。赫鲁晓夫片

面地单纯依靠原子弹是危险的事情。

一九五六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材料，就国际上的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的反冒进问题。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得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上海很多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大大提高。太原的协作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落后的起来了，是革命的标志，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现在不仅先进的起来了，而且广大中间、落后的群众也起来了。农村富裕中农不想退社了，城市的职员和落后的工人也积极起来了。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去年是搞革命的一年，经验非常丰富，大大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懂得社会主义是些什么事情。今年再看一年建设问题，很有好处。所有制的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但未完全解决。对本质问题、主要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加以分析，研究方法，求得解决。几年来许多同志就是看不到、抓不起本质的问题，自信心建筑在不巩固的基础上。也有能看得到而抓不起的人，缺乏一种魄力。

以后究竟有什么事是预料不到的？国内国际上有些什么事可能出乎意料？如世界大战，疯子要打，苏联还会发生什么问题？……原子弹把我们一套通通打烂，那也没有办法，打了再建设，可能建设得更好些。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有多少条？各省、各部党组可以谈谈，列出一个单子来，思想上无准备不好。当然，在我国发生波匈一类的事件，可以不必料，但是，部分地区还可以发生。最近甘肃不是发生问题了吗？西藏完全可能出乱子，上层人物心在印度、英、美，对我们是敷衍的。汉族内部一点事也没有也不可能（如张清荣叛变），领导人被暗杀是可能的（如列宁、基洛夫、高尔基）。但不能因此脱离群众。

冶金部党组前次会议专搞虚业，不搞实业。这种办法要提倡，抽出一段时间，专谈思想性、理论性的问题，不伤心，讲心里话。先虚后实也可以。下次开会可以多找几个部，并且事前准备一篇报告。文章写得要有说服力，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对本质问题要看得到、抓得起。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六）

（1958年3月26日）

会议文件怎样处理，有些文件可以发给省、地、县，各省、各部选择一下，不一定都印。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有必要可以印，反分散主义草案可以印发参考，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的国内外反应可以印一本。至于这些讨论的指示、记录等，还要等候北京中央政治局发正式文件，不必全部印，也不禁止印，选印为好。总而言之，自己选择。

这次会议开得还可以，但是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多了一点，虚少了一点，如果虚也有五天就好。这次实业长了一点，但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并且是跟地方同志一道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虚实并举，先实后虚或先虚后实（南宁是先虚后实），各省各部可以去斟酌情况办理。也不是讲任何会议都要一虚一实，过去我们太实了，现在希望虚多一点好，以便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的问题。红与专结合。希望各省、各部去安排一下，没有到会的省、部由协作区区长，由中央同志去传达。

一年抓四次，三年看头年，是否对？如果不抓四次，改为半年一次。由于形势发展快，很多矛盾要很快反映和解决，不抓四次，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还是一年抓四次。省、地、县可否这样？请地方同志去斟酌。协作区会议一年六次，每两月一次（曾有规

定）是否引起大家埋怨开会太多了，开一下再看看，两个月一次，一次的时间不能太长，觉得太多了，将来再减少。目的是今年抓紧一点，以便更及时地掌握群众的情绪，稳一点掌握建设的速度。

下次会议七月开，重点是工业。

现在的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工业方面除到会的几个部接触了一下外，其余没有摸，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政治局开座谈会是个好办法。过去有一句口号：“工农兵[1]学[2]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今后这五年，还是要抓五方面。这次接触了国防，但是没有怎么谈论，过去总是搞军事。现在几年都不开会，文件都没有看。人有五官——眼、耳、口、鼻、舌，五性——色、声、香、味、触。我们工农兵学商样样有，还要加上一个“思”。南宁会议讲工农和思想，再次要讨论国防问题。地方也要讲点军事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抗美援朝后）没有管国防。军事工作，地方也只是抽兵走，转业来而已，地方也要管军事工作，今后要回过头来搞点军事工作。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看成敌人。国民党所做的事，就

---

[1] 兵，指国防。

[2] 学，指文教。

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人）。

右派这么多，所以采取除少数外，不提他，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有些同志说，希望第一书记工作解放一点出来，从中央、省到地三级的第一书记和其他某些同志解放一部分繁重工作，这才有可能比较注意一点较大的问题。党报的总主笔也须解放一部分，不能天天工作，少搞一点事，就有可能多管些事。解放出来，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如何解放，大家研究。

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3月26日）

一

退陈伯达[2]同志。此件可用。略有修改[3]。或者还须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4]同志斟酌处理。

毛泽东

三月廿六日

二

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

---

[1] 指1958年3月第一次起草的刘少奇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的草稿。3月9日，邓小平在向政治局各同志征求意见的信中说：“这个报告草稿是为四月间党代表大会准备的。草稿由陈伯达同志写出，中央其他同志都没有看过。现发给你，请你看后准备意见。”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改在5月举行，报告稿重新起草，5月5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 即本篇二、三，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4]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

三

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

在介绍一种有灭蝇蚊作用植物的材料上写的说明[1]

（1958年3月）

一

四川农民报提供的关于具有消灭蝇蚊作用的一种植〔物〕的材料。这种植物名曰“打破碗花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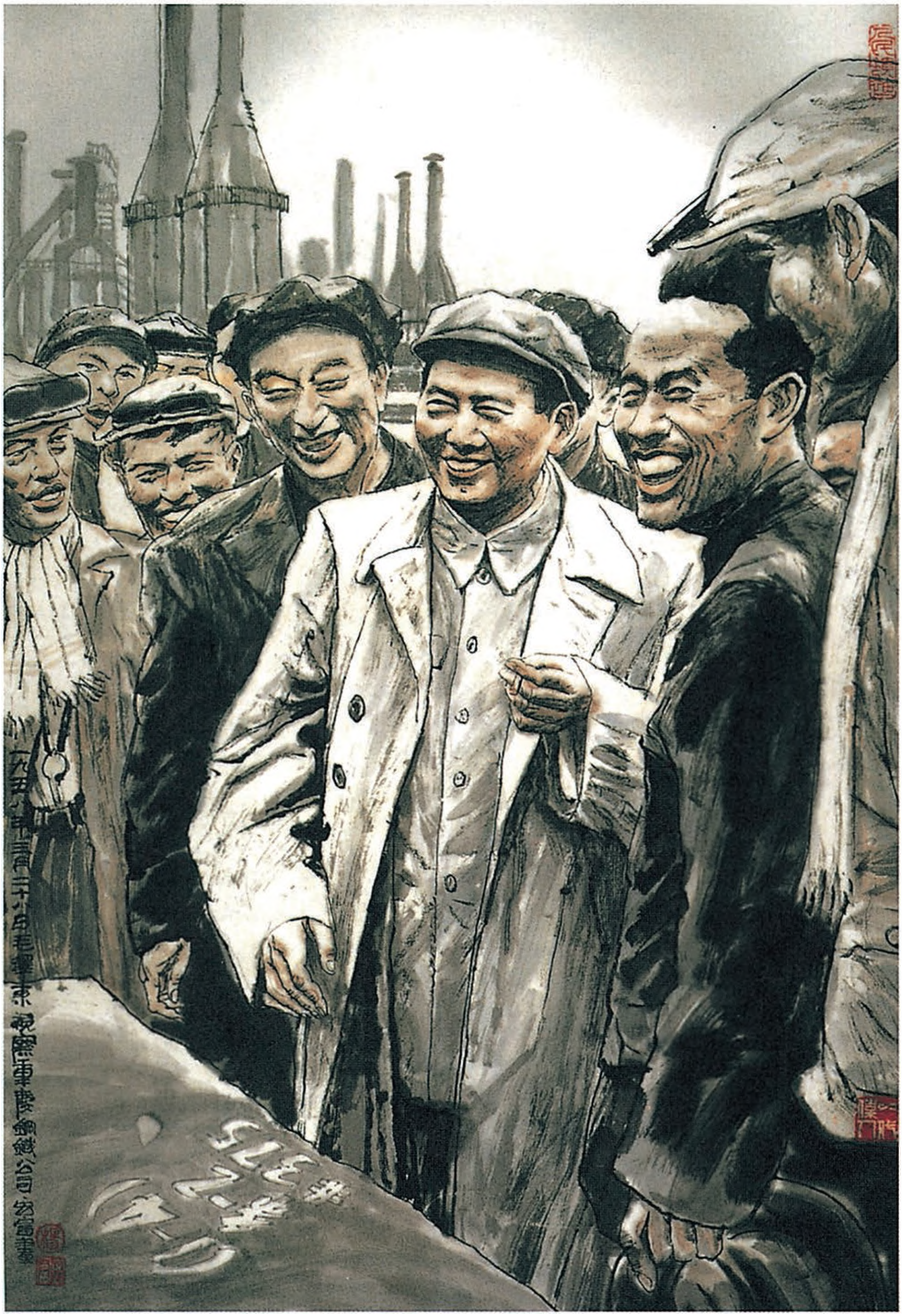
二

红光社的同志们说：其所以叫做“打破碗花花”，是农村中大人们教导小孩子，不要去触动这种植物的身体，使它破裂流出一种汁来，粘在身上，腐烂皮肤。讲时并不是这么说的，而说成：如果谁去触动这种“花花”（植物），回到家里，就会有失手将碗打破的危险。

---

[1] 毛泽东的说明写在《四川农民日报》1958年3月19日提供的介绍四川农村中一种具有杀虫作用的名叫“打破碗花花”的植物的一份材料上。材料中说：四川各地农村里，在田坎边、水井旁生长着一种野生植物，郫县的农民叫它作“打破碗花花”，把它采来撒在粪坑、水凼能杀蛆灭孑孓，它还能毒杀土蚕、螟虫，同时它又是一种很好的绿肥。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以《让毒草为人类服务》为题介绍了这种植物。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在重庆钢铁公司》（中国画）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钢铁公司。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建设机床厂视察。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时，受到职工的欢迎。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建设机床厂。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在重庆建设机床厂车间参观。

1958年3月28日，毛泽东视察重庆建设机床厂。

1958年3月，毛泽东视察隆昌气矿。

毛泽东、周恩来祝贺伏罗希洛夫和赫鲁晓夫任职的电报

（1958年3月28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欣悉你们光荣地被选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致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加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祝你们在争取实现苏联人民这些崇高目的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有力保证。祝我们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对成都会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的修改[1]

（1958年3月）

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2]

---

[1] 意见稿在第五项中还谈到要正确地解决长江流域规划工作中的六种关系，即：“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型，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毛泽东审阅时又增加了“发电与用电（即有销路）”一种关系。

[2]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批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

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

（1958年3月）

（□□□发言时的插话）

国家、自治区、合作社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搞好。

说清楚，蒙汉两族要密切，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看真理在谁的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族，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权，不管哪里人，南方、北方，这族、那族，只问哪个为共产主义，马克思做书记，你赞成不赞成？他也不是本地人。汉人的头子，要向少数民族干部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起来。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去，应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民族问题。究竟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吃地方主义的饭还是共产主义的饭？首先要吃共产主义的饭，民族要，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发言时的插话）

要破除迷信，“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多年来认为耕地太少，其实每人二点五亩就够了。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也不对，应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到七亿五到八亿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要农民节育。少数民族、黑龙江、吉林、江西、

陕西、甘肃不节育，其他地方可以试办节育。一要乐观，不要悲观，二要控制。到赶上英国时人只要有文化了，就会控制了。

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唱戏如此，改良戏要靠观众，靠外行。

大烟，国内每年用□□万两，云南现有三十万两，烟土不要烧，收起来。技术革命开禁，不一定到七月一日。对整风无害。文化大革命也可开禁。

改良土壤有二法：一为深翻，一为调换。可四至五年轮流深翻一遍。山东若县大山农业社就是如此。

现在中心问题就是地方工业，即解决机器的问题。地方工业有四大任务：一为农业服务（基本的），一为大工业服务，一为城市人民生活服务，一为出口服务。

一切正义的、有生命的事，开始都是违法的。

化肥厂，南宁会议谈到统一由专区办，现在看每县都可办。

我们有些人有错觉，认为农业品出口容易，换回工业机器不容易。其实相反，死东西容易搞，活东西不容易，农业不容易。应把这种看法改变过来，农产品很贵重。

（□□发言时的插话）

要把薯类、洋芋的名誉提高，列入正粮，不要叫什么杂粮。

三年内不要减少自留地和个人养猪。可以说一下。增加合作社的积累，分得少了，应该让农民发展一些副业，增加一些收入。自留地减少，大家要多养猪，两头猪死不了。千斤社庆丰收，这不同于婚丧，吃一顿，每人□□□，不必泼冷水。

大字报在农村可以推广。有四条好处：一、可及时议论国家大事，二、干部能听话，三、群众便于说话，四、不怕报复。这次会议做出一条决议，发一个指示。农村普遍贴大字报。中国自有了大

字报……

（□□□发言时的插话）

北京城墙可以挖，先不全挖，而是挖得稀烂。

打开通天河、白龙河与洮河，借长江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

定息不能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我们就不取消。资本家要求取消定息想去掉帽子。资本家自动不领定息是可以的，但不摘帽子，也不宣传。资本家劳动可以。

（毛泽东插话）

为什么不做政治工作？各部可否设立政治委员？设政治委员是设立对立面，逼部长进步。管业和管人是两面。

规章制度，各方面都布置些问题，工厂报表要大减少。由几人小组负责整理一下，下次会议提出汇报，并且提出一个革命的办法，实现规章制度革命。各地来个专题鸣放。

（□□□发言时的插话）

无产阶级之风压倒资产阶级之风，正风压倒邪风。

现在有些虚，不是计划，要措施。不要措施，工人没有信心。许多事要有具体措施，才有保证。计划要和措施结合，否则计划会落空。地方工会、产业工会应下放由省、市管。

没有办法时，睡一觉起来开会就有办法。

对六十条你们要提出意见，取消什么？增加什么？

“酒、色、财、气”，酒是粮食，色是生育，财是财金，气是干劲。一样不能少。

（毛泽东插话）

工业方面，全国平衡，超产部分，地方与中央分成，由地方调

动，地方协作也可以平衡，六十条，加一条协作关系。

（□□□发言时的插话）

八年中只有两个半年，大家很值得注意，肇源县去年百分之六十的土地亩产达到四百斤，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为什么不能？

乌克兰称为苏联的谷仓，为什么东三省不能称为中国的谷仓？

成都灭鼠经验，不搞就不搞，要搞就两礼拜消灭。

各省的第一书记和参加会议的部长同志，大家要读一读威廉斯著的土壤学，从那里面可以清楚为什么会增长。土壤学是农业的基础科学，好像医生的解剖学。日本农业并不高明，我们苦战三年就可以赶上去。不要请他们来插手，要请社会主义国家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决不开门。日本现在跃跃欲试。

协作会议应多开，一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不超过三个月。每次两天就够了。

农业机械化（包括拖拉机）靠地方制造为主，还是靠中央为主？恐怕要靠地方，地方自办为主，国家支援为辅。头两年所需的油料、钢材和高级技术人员，也可以地方为主，中央帮助。以后自己解决。

拖拉机社有或大部分社有。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各省可不可以这样提？特别是农业机械化问题，各省可以议一下。

对工业化不要看得太神秘了。看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神秘了，但忘记了一条，有□□，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有葫芦，照样子一画就行了。机械化了，合作化就可以最后巩固起来。我国农业机械化，可以很快实现。

小社势必会合并一些，合并后仍然不能搞的（指机械化）可以联社搞。

（毛泽东插话）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要一百年，可以五十年。个别行业可以试办一些办法和经验。可不可以先由一个省先进入共产主义？

整个中国农业机械化，要打破陈旧观念，可以试办，可以缩短时间。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得内行跟着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今年修水利，要不是谭□□等同志，靠些内行一百年也修不出来。

学习苏联和一切国家先进经验，是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做的一件事，更要坚持，同时又要独创，独立思考，但要防止不学外国，防止两极化。

农业机械化的所有制如何？现在苏联已改变。过去苏联是耕者无其机。是否以社有或大社所有？合作社买不起的，恐怕也要贷点款。

（□□□发言时的插话）

省的工作应该从三分之二的人口出发，做到粮食自给。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是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以前我们也没有认识这个问题。辽宁工业为主，八年吃了这个亏。一开始就提出并举，可不可以？这个问题也可研究。提出并举的时间也许迟了一点，但是宣传上有很大偏差，一直是讲工业化，没有把农业放在恰当的位置上。总路线宣传提纲中强调了工业化，未强调农业。对农业机械化，过去也讲得很远，现在看有两个到三个五年计划就可以实现。过去有忽视农业的思想，认为农业落后似乎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中国革命路线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未完全形成，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才完成。建党、北伐、内战时期未形成中国自己的政治路线。那时有“左”倾又有右倾。即陈独秀右倾路线，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时期王明路线，这就没有可能形成。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共二十一年。到“七大”时才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政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八年不算长，还不能算形成，再有五年就差不多了，苦战三年也可能形成。过去革命中损失很大，八年建设中也受了一些损失，但损失不大。同时这时期什么也顾不上，抽不出手来抓建设。如去年春季到夏季右派进攻，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抗美大部分力量在朝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也难得抓建设。对事物的认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中才能认识清楚。现在切实抓一下，苦战三年，建设路线就可以形成。没有陈独秀主义、王明路线，就没有比较。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斯大林问题发生，我们每天开会，一篇文章写了一个月。又发生了波匈事件，注意力又集中到国际方面。现在才有可能抽出时间来研究建设。开始摸工业，现在要苦战三年，形成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

电气化这个名词不好，叫电力化好。

（谈到三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时）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快法有点发愁。可以活动一点，再看一看。

解决相互关系要分析一下。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

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五气”是资产阶级给我们的，我们从旧社会来，当然有。单是所有制改变，工人、农民不感到与我们是平等的，不批评我们。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觉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一日所有制，一日相互关系，一日分配，这是经济学。所有制和分配改变了，相互关系未改，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说“（不清楚）”“八路又回来了”，要抓住这件事，凡是做得不彻底的要继续搞。

（吴德发言时的插话）

（讲到要克服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和制度，执行计划是春天必大，秋天必小时）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有暮气，值得注意。

（□□□发言时的插话）

山上到处搞梯田，搞鱼鳞坑。

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些情况，十年前陕北即此情况。过去曾发生老土改区社会主义的劲差一些。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来的。去年以来有变化，是好现象。

全国有三个一千七百万（指人口），即陕西、江西、广西。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应普遍提高人工翻地。一年翻一部分，三五年翻完，可保持三年到五年丰收，这是改良土壤的基本建设。《人民日报》应该把土壤学宣传一下。

农具展览（包括人力的，不只是耕作的，而且要有加工的、运输的）在今年四月间搞起来。

苏联技术出口，我们依样画葫芦，并不那么神秘，工业化、机械化不要那么迷信，也不要迷信科学家。科学家的脑筋中总有一部分不科学的。

大家同去找一个大学当教授，发聘书，每月讲一次，一年讲几次，学柯庆施，都要有著作。在座的同志，中央委员，一年做两篇文章，一业务，一政治，专深红透。

中国历来男人是农民，女人是工人。女人是食品制造、纺织……男人造原料，所以男人心粗。

（谈到农村搞工业问题时）比较大的最好是乡政府搞。国、社、私三者合营。国家也不一定投资，赚的钱多少可以分一点红。

中等技术学校都归地方管，学生分三分之一给地方，或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农学院完全归地方，医学院三分之一归中央。

（毛泽东插话）

（谈到三车辆精简机构问题时）这是劳动组织问题。两种形式哪种好？这不忙作结论，铁道部也不要说全世界都查了，没有这样的。

（谈到勤工俭学时）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半工半读，专读书就是最坏的，见书不见物，脱离实际，四体不勤。不一定会自给，有半自给，四分之一自给。方针是不要全读书，一定要又读又劳动。我们民族又穷又白，省下来的钱多办学校，中小学可大办，农业学校也要发展。只有教育发展了，才能赶上英国。靠文盲建设不起社会

主义。

苏联有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要上千万的知识分子，美国就怕这一点。

（毛泽东插话）

（谈到水利局反对修东渠的问题时）科学家不科学。水利局应登报检讨。种草很重要，要加进去，覆盖面上要有草。

只要提出问题，各地就想办法解决，南宁会议只提出若干地方工业赶上农业总产值，并没有提出办法。可是现在各地解决了。

西北四省，山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不要提倡节育。本省也要有地区的分别。

麦子的穗太短，如何研究培养一种新的品种，穗很长的，那就很好。

（谈到群众集资问题时）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搞这么多，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这样。

（谈到除四害、扫盲时）大鸣大放，提出问题，几个星期，面貌大变。农民不见得那样保守。

（□□发言时的插话）

公私合营全国取消定息，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少数民族地区也不取。

（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

牧区的改造经验很好。因为在社会主义包围中，他是不安心的，这和西藏不安心是一样的。

中国创造了一条经验，合作化增多。农业、牧业都如此……

下次会议，要把工业当成中心，大家要摸一下。六七月开这样一次会，再下一次讨论一下文教，请大家准备。商业也要讨论一

下，中央和地方合署办公。

新疆地区分散，加工工厂必须分散办，流动加工厂、轧花、面粉、榨油、化肥。这个办法可以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应用。二万五千元可以搞一个流动汽车加工厂。水多的地方可以搞船上流动加工厂。

不要以为天下太平。不太平是正常现象，也不过是个把指头。但不能任其泛滥，不及早注意就会传染，一变二，二变三，发展下去就会天下大乱。

（当谈到民族主义者希望出匈牙利事件时）实质就在这里。三中全会议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过去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现在就主动了。小平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引起异议。

许多人过去看不清楚，如李世农过去就未看出来。山东八个地委，两个反对省委，两个拥护，四个中间动摇，后来摇过来了。但未彻底搞，问题未解决。现在省委指挥不灵，也是一条经验。

首先是阶级消灭，而后是国家消灭，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

（□□□发言时的插话）

分两种情况。一种有反党集团，广东、广西、安徽、浙江、山东、新疆、青海，八省区[1]都有，要推翻领导自己挂帅。也有另一种情况，像四川那样做，是右派活动。是不是各省都大同小异？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阶级斗争发展到这个阶段，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一定会暴露出来，不出来反而是怪事。党内思想动向值得注意。阶级斗争情况如何？可谈一谈。

摸工业、摸农业、摸阶级斗争，就是要找马克思主义。当然按

---

[1] 原文如此，疑有误。

业务来讲，还有文教和商业，文教和商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要逐步研究马列主义，要研究理论，结合解决当前实际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双铧犁不能用，是因为思想不能用，脑子不能用，不是客观不能用，可见思想是统帅。思想动态要当成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应首先抓。在委员中应经常座谈，平常不谈不好，平常没有意识到就不好了。有的省对思想讲得少，不在意识，山东一开会就发现。

这里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问题：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是否有？明显地有：一为排、大、国，一为蓄、小、群，这不是两条路线吗？把水排走是大禹的路线，从大出发。依靠国家（过去依靠国家修了好多水库），现在是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农业比工业更难些。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所以盲目性就是对客观的必然性不认识，因而也没有自由。什么叫自由？就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自由是对必然的了解。自由和必然是对立的。所谓盲目性即对必然没有认识。农民上肥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农业不了解，就不自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例如治淮排涝是曾希圣发明的。他是曾颜。在他以前山西太行山的和尚张凤林，在高阳县发明了治水的方法，他和一个雇农发明了鱼鳞坑。现在全国推广。他是蓄、小、群，不是排、大、国。当然他并不那么系统。经过我们许多同志一帮忙，就系统化了。把漭河等经验一总结，总结出了葡萄串、满天星。蓄、小、群为主，当然也要排、大、国。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也是逐步形成，现在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两年，如工农业不大出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

成了。五年加八年，共十三年，付出一部分代价，无疑是浪费一点，群众痛苦，时间延长，苦闷一点，但成绩总是主要的。

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那就自由了。学苏联首先在路线上学。斯大林基本上正确，但有错误。他们不工农并举，反对大、中、小。我们是大、中、小结合，基础放在小的上，靠地方，靠小的。中央是标准设计，干部、技术。盲目性是慢慢克服的，对客观必然性是逐步认识的。没有克服以前，那就是盲目性，就是自然界的奴隶。对于社会斗争，去年反右以前，我们也是奴隶，因为你对右派这个客观现象不太认识嘛！不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不了解客观世界，就是客观世界的奴隶。

（谈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时）辽宁三年，广东五年，是左派，三年恐怕有困难，可以三年到五年。上面打长一点，让下面超过。

（谈到劳动中工伤事故时）工业也有，花这一点代价赶上英国，也是要付的。各省准备死五百人，一年一万多人，十年十万人，要有准备。

化肥太多破坏土质，还是以自然肥料为主。

河南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

这次会议应对时间取得一致看法，除四害可三年到五年，一年突击，三年推广，第五年扫尾。粮食是五年至十年。绿化三年到五年。这样两本账，有伸缩，好些。

工业发展必然同购买力相符合，否则，像匈牙利工业产品没有出路怎么办？工业产品必须和购买力平衡，这是一条原则。

党、政、军、商业机构缩小，技术机构扩大。

（谢富治发言时的插话）

云南明朝以前是少数民族，以后才开始的。

（谈到水利化时）现在算成三年，大修水利。现在搞政治运动，为了多打些粮食。社现在可考虑除了地广人稀的地区外，搞大型社，可议一下。当然不是回去就并，而是五年之内，要逐渐并。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房，不要茅房，这不发生爱国不爱国的问题。青岛、长春最好，成都就不如重庆，开封不如青岛。应有一个计划，十年内改变。房子样子搞好一点，不要封建主义，应搞些标准设计，采取因地制宜。几年丰收的合作社，可以逐步建筑农民的房子。苦战七年到十年，改变农村房子的基本面貌。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上海看齐。

报纸是一个材料部，它反映很快，也很经常给我们提出问题。

过去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办事，反右派后，工厂并未搞坏，反而更好了，这是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央的人没有上课，总有一天要比输的。比输也好，我们下去你们上来，一直下到当老百姓。

（周林发言时的插话）

说人民内部矛盾经典作家没有讲，这个话不对，列宁说："一个郑重的党，对于自己的错误，向群众公开承认，找出错误的原因，加以克服。"这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未这样来说。工人阶级、共产党内部经常不统一的，参差不齐的。我们这些人那么统一了，三个月不开会就不统一了。因为各人所得的情报，材料和观点不同，就不统一。开会就是为了达到一致，不统一才开会，统一了还开什么会？

整风没有整好的要补课。不然，总有一天要暴露出来的。

军队中废除肉刑——打骂枪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调整矛盾的政策吗？当时推行这些政策不

是长期工作之后才行通的吗?

各省市要准备出一点乱子，群众中出了乱子，领导中出了乱子，要有精神准备。不要采取赫鲁晓夫式的答复：没有矛盾。杜勒斯看到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有幻想，他读了几遍，他看见抱有幻想很危险，他就以全世界资产阶级总司令的资格说话，指出这个危险。英国报纸有些观念是对的，但他也摸到点气候。去年春季波兰拥护，中国右派拥护那篇文章，而左派摇头。苏联现在敢于说人民内部矛盾，但不说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杜勒斯很赏识我那篇文章，他们注意七月一日的社论。他们很注意我们这些东西。资产阶级很注意研究我们这些东西，我们干部为什么不注意研究呢?美帝为什么注意我们的动向，因为它将要灭亡，总想看到我们的弱点，把芦苇当渡船。

请各省市抓一下工业，抓一个月，没有一个月抓两个礼拜，然后到北京去开会。还要抓思想，抓理论，这是纲。以后口里要触到马列主义，现在是不讲政治经济学，不讲辩证法，也不讲自然科学，只要部门经济学。以后要略带一些理论色彩，报纸的社论，也应略带一些理论色彩，以此为荣。

大社可以办一些加工厂，最后由乡办，或几个乡联合办，县办社助，手工业社办工矿。

（谈到工商户要把股票给商联时）接受了被动，对内好，对外不好。每年只拿一百元，要把资产阶级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帽子戴起来，对我们有利。要强迫他们要。他们交了股票，手里无股票，头上无帽子，政治资本就在他们手里。

群策群力。群策，即大鸣大放，大家出主意；群力，即大家动手。这个路线古来就有。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谈到民主党派誓师问题时）可以搞，交心可以，另外要帮助他们动员知识分子参加。

（谈到工厂劳动强度问题，白天工作晚上出大字报出工伤事故时）应通报。着重要技术革命，大字报数量，不要追求。

（谈到少数民族闹事时）应当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解决，而不用战争去解决。贵州的事与川西不同，川西有五万支枪，他先攻我。

到少数民族地区，要批评过去欺负少数民族不对，解放后我们也有一个指头不对，不经常与群众说这一条，群众就会改变态度。

对四川西部藏族叛乱，八擒八纵，百擒百纵，比孔明的七擒七纵多九十三擒九十三纵，对杜聿明、王跃武，也准备纵。

（柯庆施发言时的插话）

（谈到工业的生产竞赛时）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要推翻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搞个世界政府、地球政府，五年计划分工合作。

（谈到整改工作时）这与去春不同，去春夹杂着敌我矛盾，看不清楚。现在反保守，比反浪费目标鲜明，批评领导，领导觉得越批评越舒服。

知识分子，科学家的态度也在改，这些人要就不改，要就突变。

现在有些过去常写东西的人，现在不写东西，因为他们还在过渡状态中，旧的破了，新的未建立起来。资也破得差不多，无还没有建立起来，有一点也不多，所以难写，过些时候就会写出来。

（谈到整风中工人当中阿飞和“废品大王”态度有很大转变时）过去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还统治着我们党，工人、农民，还没有兴起来。现在变了。无兴起来了，无的自由就扩大了，横竖自由□□□

口，一定要把资产阶级思想灭掉。有些人感到不自由，是资产阶级思想还没破尽。资灭多少，无的自由就有多少，有你的自由，就无我的自由。“废品大王”本来是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的，第五天资灭掉，无就兴起来了。

中间派现在是不敢动笔的。只要把无产阶级兴起来，他就有大的自由，才能写出东西。

现在是过渡时期，需要的小说不是大作品，而是写一些及时反映现实的中篇、短篇，像鲁迅的那些作品。鲁迅并没有写什么大作品嘛！现在是兵荒马乱时期，大家忙得很，知识分子还未改造好。大作品是写不出来的，我们也一样，没有创造一件，都是把群众和下级创造出来的东西加以提倡，不接近群众如何能提倡好的东西。创作也是一样，也必须和人民接近，听人民和下级干部的话。

没有民主哪来的集中？过去国际范围内的民主集中是一句假话。

因为集中是建立在民主之上，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很好的集中。民主集中制首先是民主，然后是集中，没有真的民主，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怎么能发挥出来呢？

右派帽子也可以摘掉，全靠自己改造。右派这个对立面转过来将我们的军，也是一种推进工作的力量。

学制、课程要由各省市去研究改变，有了典型，教育部门才能改出来。历来统一的东西，都是由典型到普遍的。

孔子是一个学派，是许多学派中的一个，到汉朝的时候，政府才加以提倡和推广，其学派得到发展。

在取消定息问题上，我们准备处于被动，总是不松口，这样于我们有利。

对资本家的薪金部分工资高一些，是为了“赎买”，目的是把他

的政治资本完全剥夺净尽。必须向工人做解释工作。工人阶级不要和资产阶级比，不可比，比不得，这是两个不可比的阶级。资本家工资太高的也可以不动为好，一动就不好了，就给他们增加了政治资本。他们吃“五个菜”政治上就被动，他们的薪金高，说话声音小。

要和中间派做朋友，也要找几个右派分子交朋友、做工作，现在连我们这些中央委员都怕沾右派的边，那怎么行？怎么了解他们呢？

有些左派，例如邓初民在理论问题上是真左派，在政治问题并非真左派。

（谈到培养理论干部时）现在已经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陶铸发言时的插话）

总路线就全党来说，是逐步完备的。开始提出工业化是不太完备的。没有这次社会主义革命，要把小学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搞出来是不可能的。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这次山东的一个教训是没有划右派，没有搞臭、搞透，是非没有分清楚。鸣放不够，以致现在指挥不灵。广东问题较彻底。

全国青工、青农、青年学生、社会青年，确实需要很好的教育，要在鸣放中让他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雪花膏按马克思主义原则可以搞，但是苦战三年，不搞也可。

反对地方主义教育，全国各省市都需要进行。

对地方主义者，实际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

王明究竟怎么处理？开除不行，拿出讨论也不必要，还是让他住在苏联有利，再拖二十年，赶上英国再说。

右派开除党籍，地方民族主义者不开除党籍咋行？

教育主义是资产阶级性质，比较容易改，右派是资产阶级中的反动派，不容易改，两者不同。

没有南方的布尔什维克到东北、华北、西北建立根据地，先取北方后取南方，革命咋能胜利？现在把南方干部北调，各地干部互相渗透，对工作有好处。

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天下人写八宝饭，不能单打一万和九万。掺的政策是有利的政策，区乡不在内，可以清一色，县上掺外来干部。现在省、专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外地去的，对反地方主义感到理不直气不壮。应采取列宁的办法：“与其你专政，不如我专政。”

这次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五六十万，不算多。这比苏联几次清党人数多、方式好，经过群众，民主。

销售点多设，排队购买的现象是可以消灭的。

总路线、规律，总是经过反复才得出来的，规律就是经常出现的东西。美国的经济状况，二月份增加失业者七十万人，达到五百二十万人。衰退——萧条——危机。苏联二十次大会，对资本主义的估价是有毛病的。

七届二中全会对社会主义问题是讲清楚的，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一九五三年才讲，原因是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土地改革，但是做的百分之八十是社会主义的，百分之二十是半社会主义的，当时不讲有个策略问题，例如孙行者，糖衣炮弹，这些不好公开讲，邓老根本不管“七届二中全会”，他搞“四大自由”，他说是河南取来的经验，但为什么不从西柏坡取经，而从河南取经？

二中全会绝不是突如其来的，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有了思想准备，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们就看出社会主义因素，如在江西打土豪分田地，就看出其中有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当时红军拿着武器，但是跟老百姓讲平等，那是社会主义；群众耕田队，那也是社会主义萌芽，当时在陕北就讲那是另一种革命。当时在安寨发现一个安全集中的合作社，我们很感兴趣，并发展了互助组，这些为二中全会作了准备。但是没有唤起更多的人注意。例如邓老仍靠“四大自由”，也不跟中央商量，我说他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死不承认，直到七月三十日（一九五五年）他才缴出武器。因此说，邓老有资产阶级思想，但这个人是好的，可以改造的，作为思想问题，经过严肃对待，坚持原则，改得彻底。但是有些同志对此却避开锋芒，表示宽宏大量，无非是怕不好混，不好共事，或者怕失掉选举票。马克思主义者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对邓老讲过，要改造你的思想，不是撤你的副总理的职，不开除你的中央委员，但对许多错误思想党内要作严肃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共产党员要有明确的态度，但有的人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有相当庸俗的空气。思想阵地你不插旗子，他就插旗子。

革命路线吃过苦，经济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

（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

一九五八年的劲头，开始于三中全会，许多事没有料到，如一九五六年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和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为只是所有制问题，而没有弄清那只是小部分，还有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

右派、反冒进都是对我们有压力，人民内部干群关系中也存在

问题，心情并不舒服。经过整风反右派，关系改变了，大家的思想也得到解放，如铁道工人的节约，就可修六千公里的铁路。

技术决定一切，政治思想不要了？干部决定一切，群众不要了？全面的提法就是又红又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技术又要政治思想，要干部又要群众，要民主又要集中。

在廖鲁言《关于农业方面的几点意见》[1]上加写的话

（1958年3月）

农业、畜牧业的经营，还一定和各地大、中、小片各种类型的（用材林、薪炭林、其他各种经济林、防风防沙防潮林和风景林）林业经营相结合。总之农、林、牧三业要结合。

---

[1] 这是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准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稿，题目是毛泽东审阅时拟的。这个发言作为成都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为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写的标题和批语

（1958年3月）

一

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1]

---

[1] 这是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为编印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而拟写的标题。编入的诗词主要有：李白的《蜀道难》《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上三峡》《早发白帝城》《送友人入蜀》，杜甫的《剑门》《蜀相》《水槛遣心二首》（选一首）、《赠花卿》《野望》《狂夫》《客至》《登楼》《绝句四首》（选一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白帝城最高楼》《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高适的《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岑参的《奉和杜相公发益州》，唐玄宗的《幸蜀西至剑门》，王勃的《杜少府之任蜀州》，张藉的《成都曲》，刘禹锡的《松滋渡望峡中》《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白居易的《竹枝》二首，李商隐的《马嵬》《杜工部蜀中离席》《武侯庙古柏》《筹笔驿》，罗隐的《筹笔驿》《魏城逢故人》，李贺的《巫山高》，温庭筠的《锦城曲》，韦庄的《菩萨蛮》五首、《荷叶杯》二首，苏轼的《洞仙歌》一首，陆游的《剑门道中遇微雨》《成都书事》《归次汉中境上》《楼上醉书》《秋晚登城北门》《渔家傲·寄仲高》《诉衷情》《谢池春》。另据1954年4月30日《成都日报》报道，毛泽东于1958年3月7日游览了杜甫草堂。报道说：在杜诗版本展览室，他看完明、清和近世刻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是政治诗！”他还仔细地看了各种杜诗外文版本。

二

送田家英[1]同志。用后退毛

第11页第二行、第13页第13行各有一个错字[2]，请即改正。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初稿中的两处错字是：在第11页上，李商隐《马嵬》一诗中“空闻奉旅传宵柝”应为“空闻虎旅传宵柝”；在第13页上，韦庄《荷叶杯》一词中“花不见无期”应为“花下见无期”。

为编印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写的标题和批语

（1958年3月）

一

诗若干首（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其中有咏曹操一首，不关四川，放在咏刘备一首之后，因连类而及。）[1]

二

放在明诗前，作为总题，单印。不与唐宋诗混。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为编印明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而拟写的标题和题下说明。编入的诗主要有：杨基的《长江万里图》，李延兴的《读贾谊王粲传》，杨慎的《宿金沙江》《三岔驿》《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送余学官归罗江》《春兴二首》《武侯庙》，黄夫人的《寄外》，皇甫汸的《从军行寄赠杨用修》，李攀龙的《送皇甫别驾往开州》，谢榛的《送谢武选少安犒师固原因还蜀会兄葬》，谢遴的《巴女词》，费密的《朝天峡》，吴骐的《汉昭烈》，陈恭尹的《邺中》《蜀中》，黄幼藻的《题明妃出塞图》。

为成都会议印发马克思和毛泽东文章拟的标题

（1958年3月）

一

从生产出发，还是从交换和分配出发？[1]

二

从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出发，还是从片面的财政观点出发？[2]

---

[1]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商品交换的一段话拟的标题，马克思的那段话是："近代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的考察——重商主义——必然会从流通过程及其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的表面现象出发，所以仅仅把握了一个外观。一部分因为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它（商业资本）曾经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时开始的。"

[2]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另拟的标题。《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毛泽东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

视察四川省一个养猪场时的谈话

（1958年3月）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对饲养员）辛苦了，好同志！（握手）祝你们获得更大成功！

饲养员（以下简称饲）：全靠你老人家的教导！

毛：主要是你们自己的努力。

（对社长）能使你们全社妇女都当上模范吗？

社长：保证全能当上，毛主席！

毛：全当上模范未必行吧！只能在二三年内做到有一半妇女当上模范就不错了。你说我这个看法保守吗？（众笑）

毛：参观一下你们的养猪场好吗？

饲：欢迎，欢迎！毛主席多指教！

毛：别什么都要我指教吧，我和□□都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许多事情上，你们比我们内行多了，是吧？

毛：这是什么？

饲：是糖化牛粪，拿来喂猪的，猪很爱吃。

毛：真是新鲜事儿，牛粪也能喂猪！怎么个制法？介绍一下吧。（摸出日记本来作记录，向□□说）来，我们都记上吧，这是群众的创造！从前我们就没听见说过。看来我们中国那句老话“做到老，学到老”实在不错！

毛：（对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回家喂猪有意见吗？

饲：有啥意见呀！我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这养猪场哩！

毛：很好！可要把你学的科学，传授给群众才更好。

毛：……多看看先进的东西，眼光就会更开阔些。

（亲自给一头猪打了蛋清针，然后对□□□说）

这里的经验真不少，特别是代饲料，如果全国都推广，一年要节约好几十亿斤粮食哩！请记者同志在报纸上介绍一下好吗？

□□□：办得到。

毛：最好后天见报。

（对饲养员）谢谢你们！对我们教育太大了！

饲：可有人看不起我们哩！

毛：谁？谁是顽固派？

（饲养员介绍一些人如何从轻视妇女到称赞妇女的成绩）

毛：看不起妇女的人虽不多，但哪里总有几个，这不完全怪他们，过去封建制度对他们影响太深了，脑筋一下不容易转过弯来，又不能用飞机大炮来对付他们。那怎么办呢？我看除了加强教育外，最好的办法，就是妇女同志们做出成绩来，多拿事实给他们看，看得多了，他们脑子里的那个“封建王国”就会不攻自破的。

和江峡轮船员的谈话[1]

（1958年3月）

毛泽东：（对江峡轮三副、女青年石若仪）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问石若仪）你在船上工作多久？

（石若仪说到有四年多了。）

毛泽东：（问杨大副）你呢？

杨大副：三十多年了。

毛泽东:（对石若仪）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很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毛泽东：有些地方的航道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

毛泽东：（对江峡轮船长）你的经验是丰富的，要多带徒弟，把技术传给青年人。

---

[1] 这是1958年3月，毛泽东乘江峡轮去武汉途中，和船员谈话的一部分。

1958年3月，毛泽东和王任重等在江峡轮上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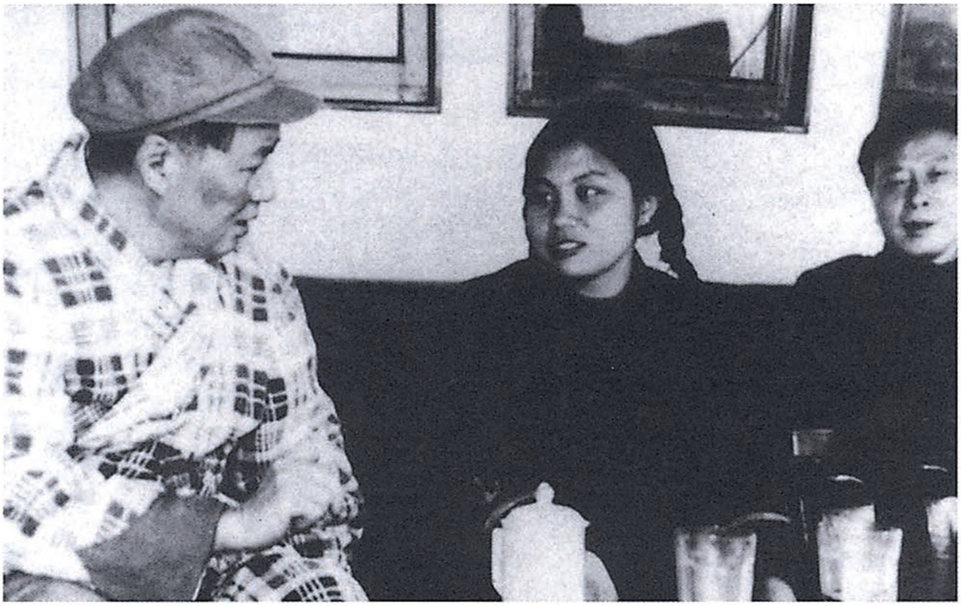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乘坐江峡轮去武汉途中，和女三副石若仪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江峡轮驾驶台和船员亲切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驾驶台向莫家瑞船长了解长江航道的相关情况。

1958年3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后在船上和大家畅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江峡轮上和船员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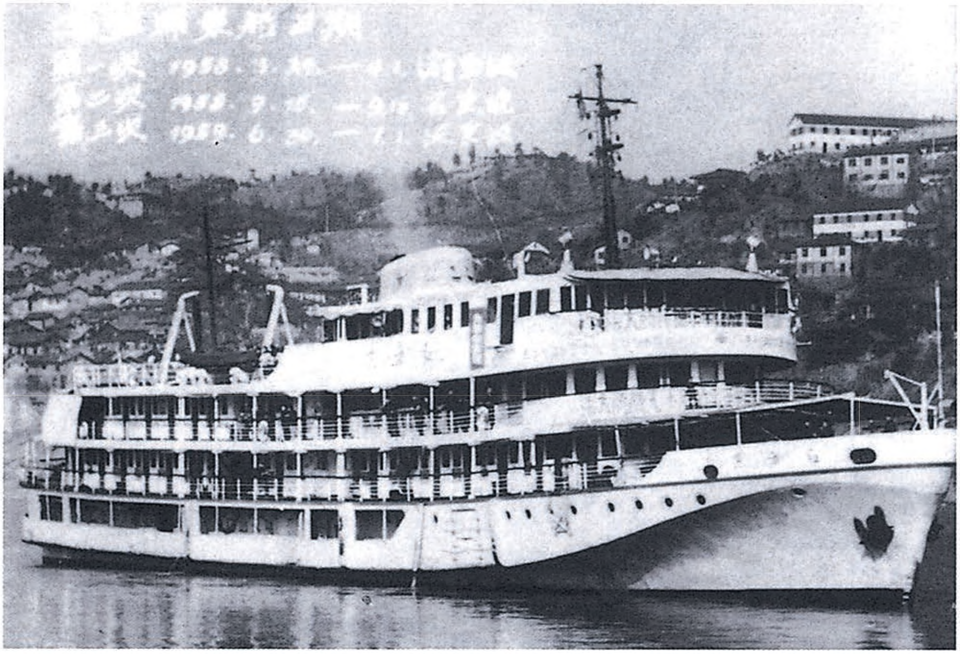
1958年3月，毛泽东和女三副石若仪交谈。

1958年3月，毛泽东向大副杨大福了解长江的有关情况。左三谢滋群，左四杨大福。

1958年3月，毛泽东乘江峡轮视察三峡。

1958年3月，毛泽东乘乘船视察三峡航道。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江峡轮上考察三峡航道。



毛泽东曾三次坐过的江峡轮，后称东方红轮。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1]

（1958年4月2日）

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比我们实现工业化的时间早。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可以说什么都没有。世界各国，什么地方有好东西，统统学来。这是件好事。外国有好东西为什么不学？学了究竟有好处，还是有坏处？这是讲学好东西，包括苏联的经验在内，是学他们的好经验，学我们用得着的东西。可是，有时也学了一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这个责任不能由苏联专家担负，而应由我们自己担负。这是指对苏联经验随便硬搬，十个指头中间有一个指头学得不对。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学习先进经验，但也把一部分不适合中国的经验学来了。这也有一个好处，不适合的经验我们再改进，这样就能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经验。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就行不通。

要学先进经验，这是对每个国家都适用的。同时有一小部分经验不适用，这一部分搬到各国是有害的。列宁告诉人们不要硬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话，就是它的基本原理，也要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各国党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去创造性地运用，结合各国情况去实行。

现在很好，在莫斯科开了一次会，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决定

---

[1] 这是毛泽东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了一个根本的纲领。刚才讲的，纲领上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各国情况相结合；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没有这样的纲领，现在有了这个纲领，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所接受的纲领。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客舍接见以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雅罗谢维奇为团长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前排右四为雅罗谢维奇，后排右一为武汉市长刘惠农。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三周年的电报[1]

（1958年4月3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当匈牙利解放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和匈牙利人民表示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的匈牙利人民的这些成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的电报。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三周年。

就感到欢欣鼓舞。祝中匈两国人民间的永恒友谊和兄弟合作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 年 4 月 6 日）

生产高潮形成的原因。现在生产高潮是怎么来的?

（1）以前有过高潮，有了领导高潮的经验，一九五五年冬一九五六年春曾有过高潮……

（2）反冒进的错误使许多人不舒服，使干部抬不起头来。但挫折对我们很有益处。一种搞快些，一种搞慢些，这样就有了两种工作方法的比较。反冒进就慢。这几年来两高潮形成了马鞍形，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春和一九五七年冬目前就高，中间反冒进就低。这种形势对我们很有利。

（3）中央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在三中全会和青岛会议上及时恢复了四十条、多快好省和做促进派的口号。

（4）经过整风反右派斗争，群众干劲起来了，干劲足了。

两个战役之间休整问题。目前的生产高潮，动员群众很广。动员这么多群众是从古以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在战争时期，在参军上搞过大规模动员的。群众是个劳动大军，各级干部是指挥者，指挥者应当懂得在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

同时，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

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去年我们注意粮食、肉，从明年起要大搞油料，各省要规划，雷厉风行。四十条要增加油料增产指标和措施，为了帮助兄弟国家也要提高，还可提口号（陕西种核桃，各地还可以搞什么），如为了支援东欧国家等，这样号召力更好些，对农民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教育。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

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年年有工作做，不是没事情。五年能搞掉四害，就算好。

总之，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今年是历史上大跃进的一年，把经验总结一下。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得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有右倾思想的人，就会出来刮台风；观潮派“楼看沧海月，门对浙江潮”就会说话，群众有怨言，就会从上而下地反映意见，影响上层建筑。要在党内讲清楚，党内要有精神准备，给地县委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气，要搞措施，到十二月

比实际，要看结果，吹牛不算数。实际上九月便会看出，比输了，活该。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今年像平津战役、淮海战役那样子，增产有希望，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通过试验。湖北省有这样的话："鼓起眼睛看丰收，干部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会实现。"向农民讲清楚，可能某些地区有天灾，要鼓起眼睛看丰收，也要准备无丰收。要特别注意深翻地换土，大有味道，宁可一亩地花几百个工也划得来。

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游哉，很必要。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4月6日）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怎样?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不冷不放，他不会出来的。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地主现在分化了，有改造过来的，有没有改造过来的。没有改造过来的地、富、反、坏和右派分子，这一些人反共，就是现在的蒋介石、国民党，是敌对阶级，如章伯钧等。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样的。包括一些现在划为中间偏右还没有触动过的右派。人数大约是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万，比较恰当。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一要斗，二要拉，要把十分之七分化出来，就是大胜利。要调动他们，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几年之后，他们把心交出来，真正改变，可以摘掉帽子。右可能转左，或转成中间；左也可能转为右，如考茨基。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如刘绍棠、陈伯华，农村富裕中农也包括在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与前一个剥削阶级不同。又反共又不反共，是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反共，但不坚决，与蒋介石不同；看谁力量大，就跟谁

走。汉口有个资本家从汉口到北京就靠“拥护共产党，拥护代表”这句话吃饭，多一句也不讲。实际上思想没有多大改变。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两条心的，是半心半意的。右派是无心无意的。经过去年一年到现在的斗争，这些人政治上正在发生着变化。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农村、城市整风一胜利，一年生产的大跃进，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形势是人造成的。人成堆，多数人逼少数人。长江大桥、工业化等可放在形势里面。这个剥削阶级比较文明一点，我们也用文明的办法对待，采取批评方式，与反右斗争的方法不同。对右派采取带点武的性质，无非是把他们搞臭。这是两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也不同。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他们虽有三千万之多，但分散全国，在包围之中，处于孤立地位。开右派大会，他们料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就等于皇恩大赦。各大城市（三十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要开，要主要负责同志讲话，讲透一些。首先一训，然后一拉。训则凄凄惨惨，冷冷清清，拉则全身热，通身舒畅，指明前途，使他们有希望，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借钱一样，开始凤姐表示冷淡，后来很热情，搞得刘姥姥很高兴。凤姐这个人很厉害，有人说她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过去心不齐，意识形态、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工人农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做工、种田，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如老爷对小民，奴隶主对奴隶一样，只压服不说服。上海某大学一个女职员霸占一个厕

所，不许别人进去。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所以，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乱，谁敢贴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理发、洗澡工人说自己不应该增加工资。武汉有个商店工人一当干部，对店员就板起面孔，这就是国民党作风。红安县干部，老爷气一经改变，与群众就打成一片，关系就大改变了。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三个问题，我们抓中间，也就是抓住相互关系，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共产党员中某些人是在社会上、学校里学了一些奴隶主的神气。刘介梅是向社会上学来的。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这是列宁主义，不是机会主义。列宁死早了，他的作品，特别是在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人民，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作斗争也是如此。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在教会学校读书，辩证法不甚通，唯物论也不甚通。脱离实际，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现在好一些了。我们的民主传统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地搞民主，无钱、无粮、无枪，孤立无援，必须依靠群众，党必须与人民一致，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官必须与兵一致。要搞好这些关系，非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可。以平等待人民，军队内

废除肉刑，不枪毙逃兵，经常教育，经常作斗争，打一仗，新兵来，又要作教育。所以，老爷态度虽有点，但民主作风还是学了一些。这是因为斗争艰苦，时间长，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可是至今还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说服方法。如济南有人说，（五七年）春季右倾了，只赞成夏季形势，不赞成春季形势。其实夏季形势也是不赞成的。夏季形势一文就说过，军队可用民主，对人民为什么不可用民主？可见这问题还没有解决。经过去年一年，特别是今年丰收，苦战三年（基本或是初步）改变落后面貌，那时候人们就通了，真相信了，但还要写文章，用理论说服这些人。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他们肚子里是有意见的，不过嘴巴暂时不说，将来还要说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几亿人民蓬蓬勃勃起来了。右派孤立了，三十万右派搞臭了，没有资本，资产阶级也臭了，三反五反就臭了。对知识分子戴上两个帽子，封了他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封了他们迷失方向。出英雄是左派，是我们这些人。将来犯错误的人，也出在左派，因左派有资本，一不小心就会犯错误。如□□□□是四十年政治局委员，脱离群众，一个工厂不去，一个农村不去。□□□□的好处，就是下去到处跑，人家说他是旅行家。当旅行家也有好处，过去我们打游击，是旅行家，旅行了几十年，现在还是南方旅行到北方，还要当旅行家。中央和省两级规定，四个月当旅行家，地县更多。这是赶出大门。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在汉口会议上的插话

（1958年4月1日至6日）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也要破除迷信，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学得好，洋人都是了不起的。中国人算不算洋人？我们叫不叫神仙呢？我问过好多人，都说不算。神仙是住在别的星球上的，我们叫凡人。别的星球上的人看我们，是不是也是神仙？这是一种迷信。中国人当奴隶习惯了，看不起自己，什么东西都是别人行，自己不行。

△为什么农村不能办大学？十五年普及，十五年提高，三十年后大家都是大学生，每乡一个大学。第一书记要当大学教授。

△每省都要采取检查的办法，组织检查团下去，检查措施是否可靠。（安徽检查结果，有百分之二十是虚的）省委第一书记做团长，省长做副团长。民主党派也要派人下去。

△“搞水利，吃大米”，一下子讲到本质问题。人民看到前途，这么多人搞，总有希望。

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否则明年不好办，要留点余地。苦干三年，基本上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战了，我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

△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都有真有假，都是真那不可设想。

（谈到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问题时）中央、省做样子好，还是不做样子好？省委先做个样子。

对科学家要破除迷信，对其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从古以来，都是儿子比父亲厉害，学生比先生好，青年比老年强。当然也有儿子不如父亲、学生不如先生的，一般是好。看戏的比唱戏的厉害。一般说来，戏剧的改进，主要靠观众。

△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后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注意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粮食一样的位置。回去要做出计划，雷厉风行搞，搞点油水给大师傅做菜。

各省搞民歌。下次会上每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

《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猪八戒一辈子都自由主义，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好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伯恩斯坦。

△高潮为什么会来，这是有历史的：（一）从前有过高潮（一九

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有了经验。（二）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来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人们。有比较，有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一个“反冒进”。（三）为什么又高起来呢？鉴于“反冒进”不好。

△现在担心又会不会“反冒进”，这么大的劲头，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势必影响上层建筑，那时议论又会出来（“还是我的对”）。民主人士、富裕中农、党内民主人士，就有不少在那里等着看我们垮台。又要刮风。党内中间偏右、观潮派，“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此时要和地、县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几化完不成怎么办？

△一曰好大喜功。打蒋、反右、灭资、五年计划，都是好大喜功，难道还是好小喜败？二曰急功近利。大禹惜寸阴，我辈惜分阳。刘琨、祖逖闻鸡起舞，诸葛亮“不靖中原，誓不回师”。这不是急功近利吗？古人多得很。现在三包、定额、计件工资，这不是急功近利吗？三曰鄙视既往。就是要轻视过去。难道过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西藏的奴隶制度不应轻视吗？伯达说：厚今薄古。四曰迷信将来。苦战多少年，没有将来有什么意义。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做一段，休息一天，劳逸结合，有节奏，波浪式前进，很必要。指挥劳动大军，两个战役之间要休息一下，连续作战是由战役组成的。

干一个时期，专门休息一下，悠哉游哉。成都会议解决了这个问题。

技术革命是被逼出来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整风，打倒帝国主义，不是逼出来的？孔明的木牛流马也是逼出来的。一个对立物，把你一逼就逼出来了。

△大鸣大放，干部我压服你，我打通你，世界观基本改变了。过去人是两只脚的猪，是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说是人民，讲得好听，事实上多多少少是这样。做了官都有那么点官架子。

从古以来，不听个人的话，只听空气的话。斯大林在世好像什么都好，死了什么都坏。

凡是乱得厉害（的地方），问题就接近解决。让闹，闹够，你们总是不通，一不让闹，二不让闹够。

△特大灾害要向群众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没有办法。

对群众是说服还是压服？我们从红军开始，几十年来总是要说服。不要压服。为什么解放以来，忽然来了一股风，只要压服，不要说服。只说压服地主，没有说压服群众。国民党是压服，我们也压服，与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呢？蒋介石反共还讲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什么我们不讲政治？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斤，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要有观点指挥材料，不要材料把观点淹没了。要学会用政治带业务，先讲政治面貌（观点、思想），然后谈工作面貌，不能倾盆大雨，而是要毛毛雨（有些人一讲两三天，少则三个钟头）。不要企图把所有的观点都拿出来，这样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时候给人家几个观点叫宣传，一个时候给人家一个观点叫鼓动。又说政治水平很高，谈起来就是数目字。不谈政治，政治都没有，哪里有水平，政治与数字是官兵关系，政治是元帅。

干群关系，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承认的问题，只有我国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的态度。列宁专门下乡、下厂，接近群众，发动群众，特别是对官僚主义者骂得很凶。整风没有内外夹攻是整不好的。

经过大鸣大放后，看起来政治上是扎稳了根。如这次“双反”、大鸣大放，干部和群众不仅敢放，而且放得健康。干部、人民都有了经验，知道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应该拥护，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对什么人应采取什么态度。

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又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这样稳，会出大祸。对稳妥派，有个办法，到了一定时候就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这一派人数可能比较多，想看一看，如果来一个灾荒，他们还是要喊的：“看你跃吧！”“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

△整风是纲，整风挂帅，生产是中心，带动其他工作。

△（在湖南□□□汇报《群众的变化》问题，谈到社会风气大变，农民安心在农村了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如果许多人长期不安心农村要亡国的。这是非常好的新气象，应该非常注意。

△（在湖南汇报到干部普遍种试验田时）这是全国普遍现象，在大跃进的面前，不仅要有干劲，而且要增加措施，空气要压得很紧。组织大检查的工作措施。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各省、地、县都要组织检查团去基层检查。今年是个非常年，今年好好看一年，以后胆子就大了。因此要很好组织大检查。各地要检查几次，检查很好。没有检查的要补上这一课。

△（在各地汇报抓水、肥、土的措施时）这个问题还要研究。水利各省搞得也很多，特别是安徽搞了水利规划，搞了水网。

究竟什么肥（人畜、土肥、堆肥、绿肥），什么肥各占多少，如果是土，那就有问题。虽然如此，比过去多得多了，这也是好的。

翻地是很重要的，值得各省注意，把土地大翻一遍就能增产很多，这个经验值得很好推广。

△（在汇报到生产高潮中，相当多的干部强调稳，不前不后走中间时）这是党内的稳妥派，实际上是落后，要把这种人抓起来，办法是不断提出新任务、新口号，使他们永远赶不上，这就推动了他们，他们就不落后了。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大学接见武汉社会科学界人士。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召开的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上向代表招手致意。

1958年4月，毛泽东和著名水利专家何之泰亲切握手。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体育馆接见科技工作者。

1958年4月，毛泽东在武汉和科技工作者在一起。

1958年4月，毛泽东和武汉测绘学院院长、著名测绘专家夏坚白亲切交谈。

1958年4月，毛泽东和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亲切谈话。

关于不派代表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给赫鲁晓夫[1]的信

（1958年4月8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您四月三日给我们的信[2]，并听取了尤金[3]同志的口头说明。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在各国共产党尽了一切努力改善同南共的关系之后，提出并准备通过这样一种有体系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许多基本原理的纲领草案，表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企图向全世界散布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同莫斯科会议十二国共产党宣言相对抗。我们决定同你们采取一致的步骤，改变过去的决定，不派代表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2] 指赫鲁晓夫1958年4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南共纲领草案问题提出看法，认为南共纲领草案是别有用心地企图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实质上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相违背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对当前国际局势、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有不少错误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和评语。因此，苏共中央准备改变原定派代表团参加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只委托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

[3]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大会，而委托我驻南大使伍修权同志以观察员身分列席。我们并决定不向南共代表大会发贺电。请将你们通知南共不派代表出席南共大会的信（副本）及发信日期告诉我们，以便在你们发信给南共之后，我们随即把我们新的决定通知南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

对江苏省委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8年4月8日）

付讨论。研究推广办法[2]。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

---

[1] 指中共江苏省委1958年3月29日关于农业中学问题给中央、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江苏省的农业中学，是从邗江县施桥乡和海安县双楼乡开始的。施桥乡用七天的时间办了两所，双楼乡用四天时间办了一所。现在，全省各县都在筹办这类学校，截至本月24日，共兴办851所。举办农业中学必须贯彻群众自办、半耕半读、勤俭办校、为生产服务和谁读书谁出钱的原则。从已办和正办的农业中学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办学的目的比较明确，是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办学的方法，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许多重大问题都经过群众讨论解决。学制一般暂定三年，也有打算学两年的。课程一般有语文、数学、农业知识（或者有关技术知识课等）、政治四门课。教材暂由各县、市自编，省和专区也在编写。教师就地取材，一是没有升学的高中生，二是下放干部兼课，三是在中小学教师中挖潜力，兼课。上课时间，有半日制，有隔日制，个别也

有早晚班制，形式不拘，以有利于生产、有利于教学为原则。学生一律走读，实行半耕半读，又劳动，又学习。收费标准，各地不一，一般是每学期收学费四至五元。校舍一般利用原有祠堂、庙宇或公房，也有租用民房或搭些草房。都能做到因陋就简，贯彻群众自办，乡社领导，勤俭办学、勤工俭学的方针。

[2] 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民办农业中学问题的报告。中央批语中说：（一）普遍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对于满足广大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的强烈要求和小学毕业生的升学要求，有重大的作用。这是实现农业技术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凡是有条件的省、市和自治区，应当仿效江苏的办法，大力发展民办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二）随着各地大量举办农业中学，师资必然感到不足。这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现有师资的潜力，组织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下放干部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干部去做教员；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和改进师范大学、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和农学院的工作，采取各种有效方法，迅速培养农业中学的师资，并且帮助农业中学教师的提高。同时，各级党委还要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根据因地制宜、学以致用的原则，编辑当地农业中学的教科书。（三）农业中学是一种职业学校，它和普通中学担负着不同的任务。在城市和农村发展民办职业中学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普通中学的领导，改进普通中学的教学工作，积极提高教学质量，以保证高等学校有较高质量的学生来源。普通中学的学生，要利用假期和休息日的一部分进行劳动，实行勤工俭学，但不应实行“半工半读”，也不要勉强实行学校“自给”和“半自给”，以致妨碍学生的学习。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4月10日）

此件[1]很好。转发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

中央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

---

[1] 指中共甘肃省委1958年3月29日关于解决甘南叛乱问题给中央、兰州军区加发甘南州委的报告。报告就乘这个机会解决甘南问题；区别对待部落头人；收缴叛乱地区的枪支；坚决彻底肃清外来反革命分子；继续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寺院；执行党的俘虏政策；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在群众中追悼被杀害的藏族干部和群众；组织武装工作队等11项措施向中央作了汇报。

1958年4月，毛泽东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亲切交谈。

1958年4月，毛泽东参观武汉市第六工业展览会展出的第三文娱手工业社会成产的竹制点头喷粉器。

1958年4月，毛泽东观看沼气灯和沼气炉。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观看湖南木偶剧团的表演。

1958年4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观看皮影戏后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

介绍一个合作社

（1958年4月15日）

一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1]，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

美的画图。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于广州

二

刘、邓、周、陈、乔木、吴冷西[3]各同志：

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

[1] 指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1958年3月2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个报告同毛泽东的文章一起发表在1958年6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1958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社长崔希彦、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封丘县县长张剑南。这次接见的情况，新华社记者写成通讯《幸福的会见，巨大的鼓舞》，刊载在1958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其中有这样的报道：

毛主席首先问封丘县县长张剑南：

“应举社的那篇报告是谁写的？”

张剑南一听就知道毛主席指的是“红旗”杂志上发表的那篇“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报告。他马上告诉毛主席：“是中共封丘县委第一书记韩洪绪同志写的。”

“那篇报告写得很好。”毛主席还问，“韩洪绪同志读了多少书？”

“战前在高小毕业。”

毛主席就称赞说：“不容易，不容易，高小程度就能写出这样好的报告，真不容易！”

毛主席又问了韩洪绪工作的情况，张剑南都一一向毛主席作了介绍。

“你们的合作社，为什么叫应举社？”毛主席同崔希彦开始了有趣的谈话。

“我们村里过去出了一名文举，这个举人，同一般的举人不一样，他不剥削人，靠自力更生维持生活。我们的合作社也是依靠自力更生进行生产渡荒的，所以就叫应举社。”

毛主席听得笑了起来。“很有意思！”他说，“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些成绩都是由于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才取得的。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崔希彦说。

毛主席摇摇手说：“不，不，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

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依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毛主席又问：“应举社的小麦每亩收了多少斤？”

“估产是每亩一百五十斤。”

毛主席算了一下以后说：“你们计划每亩产八百斤，小麦每亩只能收一百五十斤，还有六百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八百斤？”

“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崔希彦满怀信心地回答。

…………

燃着一支香烟，毛主席亲切地对崔希彦说：“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崔希彦听着毛主席的教导，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只是说：“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你们合作社的交通方便不方便？”毛主席又问崔希彦。

“交通很方便，在新乡下火车以后，有汽车直通我们的合作社，周围的公路也四通八达。”

这时，毛主席和内务部农村救济司司长熊天荆、河南省民政厅厅长施德生谈起了民政工作，熊天荆和施德生把民政工作的内容一一讲给毛主席听，共有20多种。

“这么多，能做完吗？”

“在省里，除这些工作外，党交给我们的其他工作，我们同样是完成的。”施德生说。

“过去有人提意见，说民政工作头绪多不好做。谢觉哉部长批判了这种意见，他说，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别的部门不管的事情，我们都要管起来。”熊天荆说。

“你的意见呢？”毛主席问熊天荆。

“我同意谢部长的意见，只要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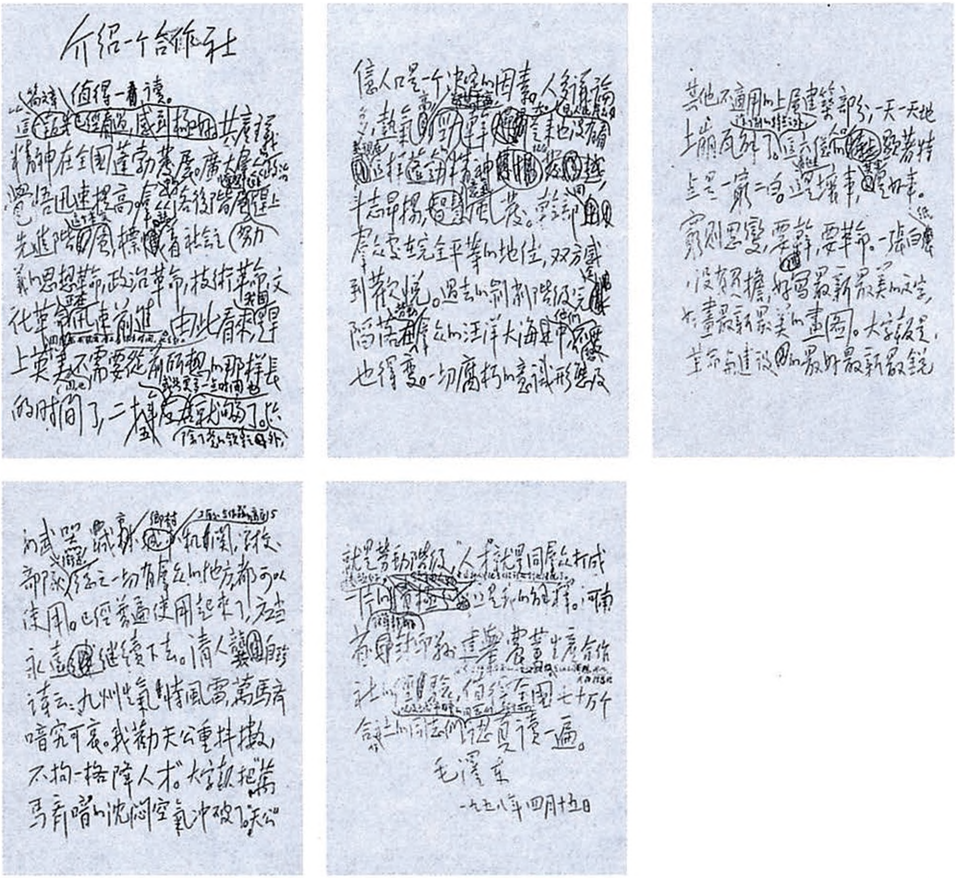
“对了，民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不要怕麻烦。”毛主席乐得笑开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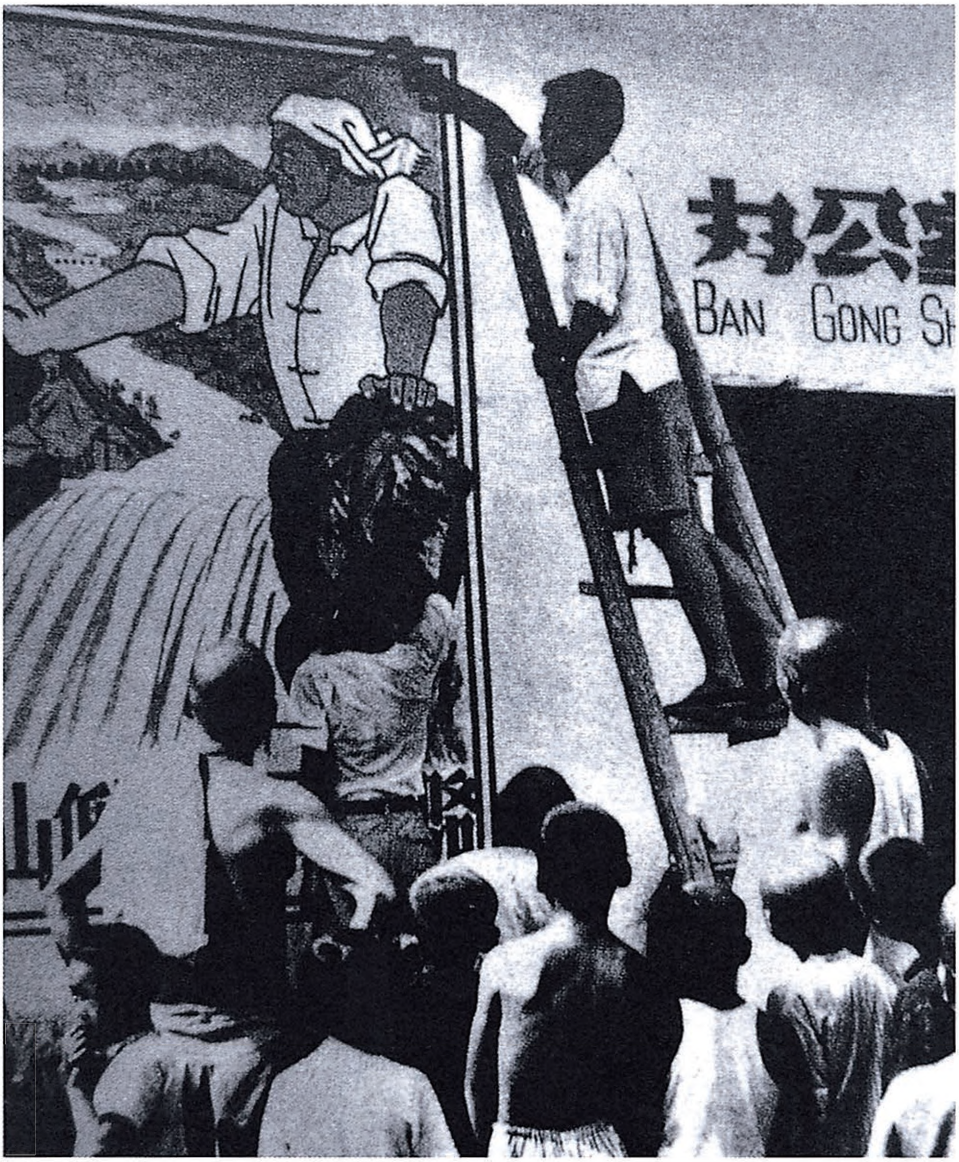
[2] 这段话原手稿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同志意

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在本篇（二）中的一段批语，就是针对这段话的修改而写的。《红旗》杂志发表时，改为现在这个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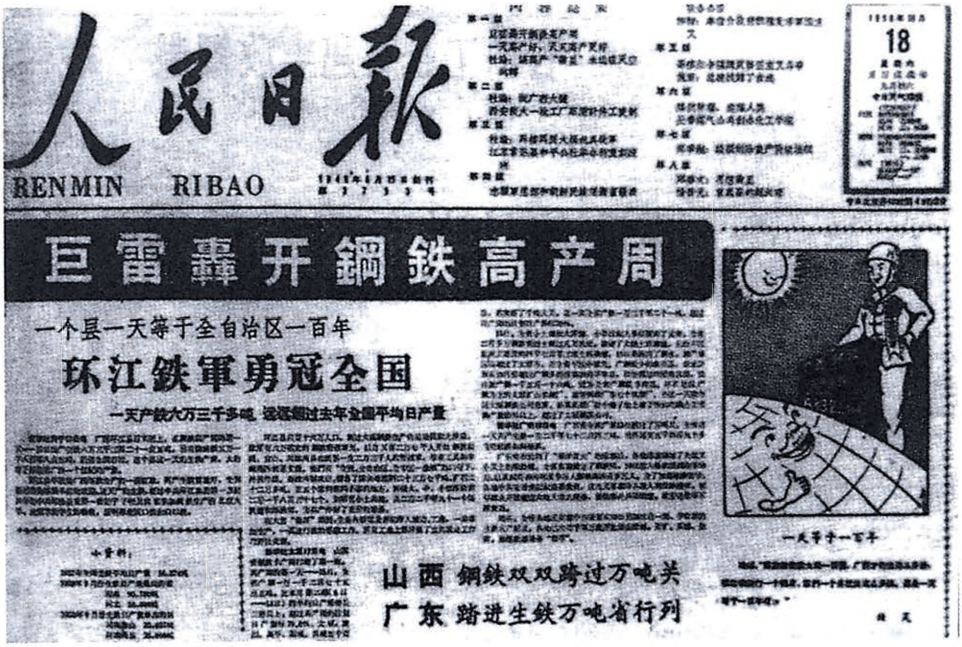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撰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手稿（部分）。


办公
BAN GONG SH
山低
路

西安雁塔区春花农业社社员在创作壁画《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8

巨雷轟开鋼鉄高产周

一个县一天等于全自治区一百年

环江鉄軍勇冠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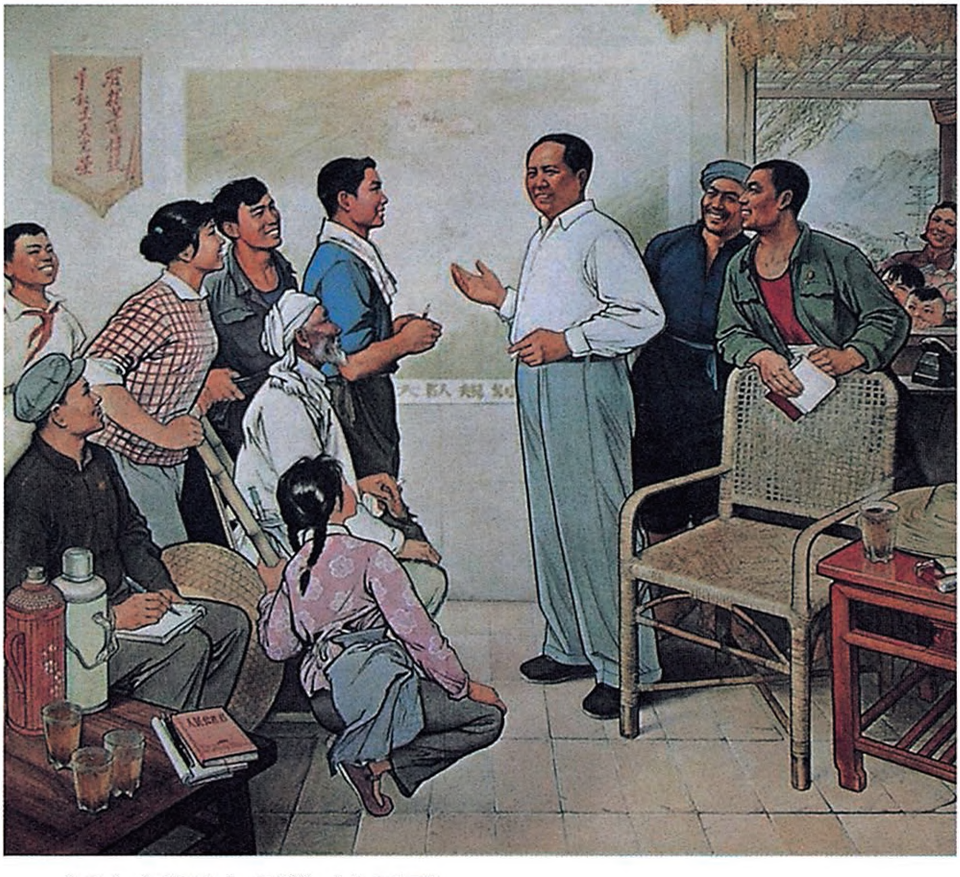
一天产鉄六万三千多吨 远远超过去年全国平均日产量

山西 鋼鉄双双跨过万吨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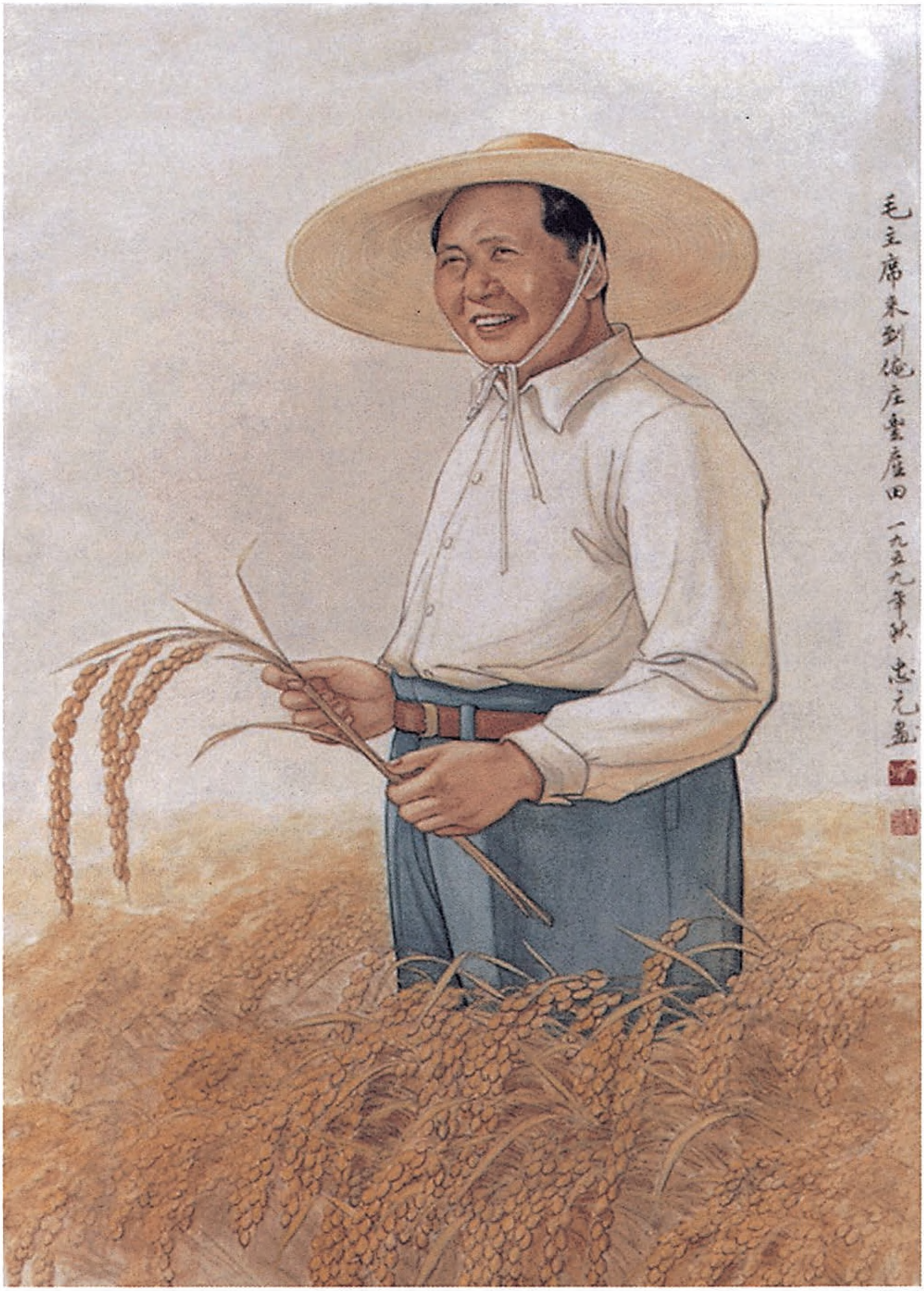
广东 踏进生鉄万吨省行列

一天等于一百年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农业一马当先，各地纷纷提出“大跃进”目标，报刊上不断出现“高产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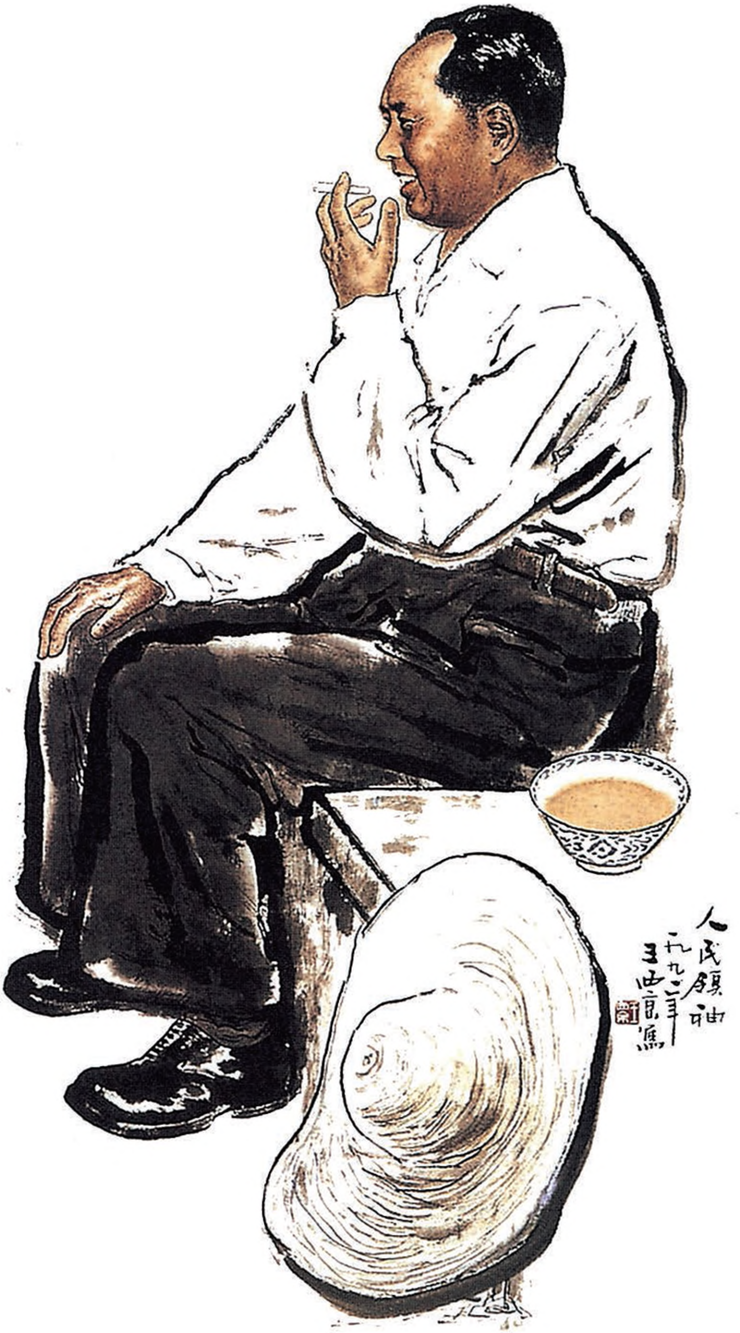


《毛主席指引金光道》（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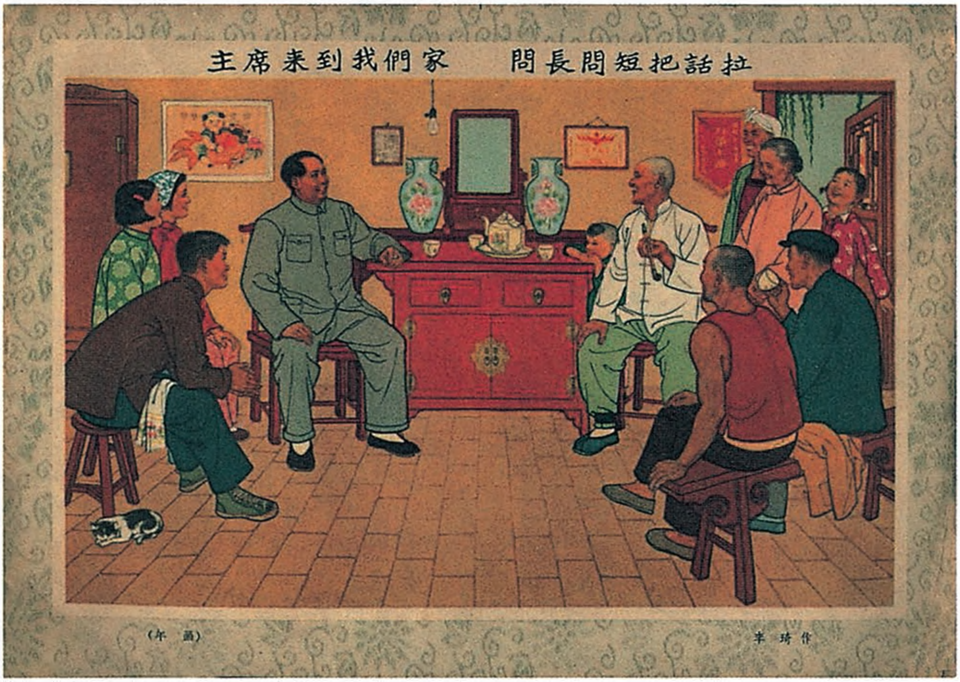

毛主席来到俺庄丰产田
一九五九年秋
忠元画

《毛主席来到俺庄丰产田》（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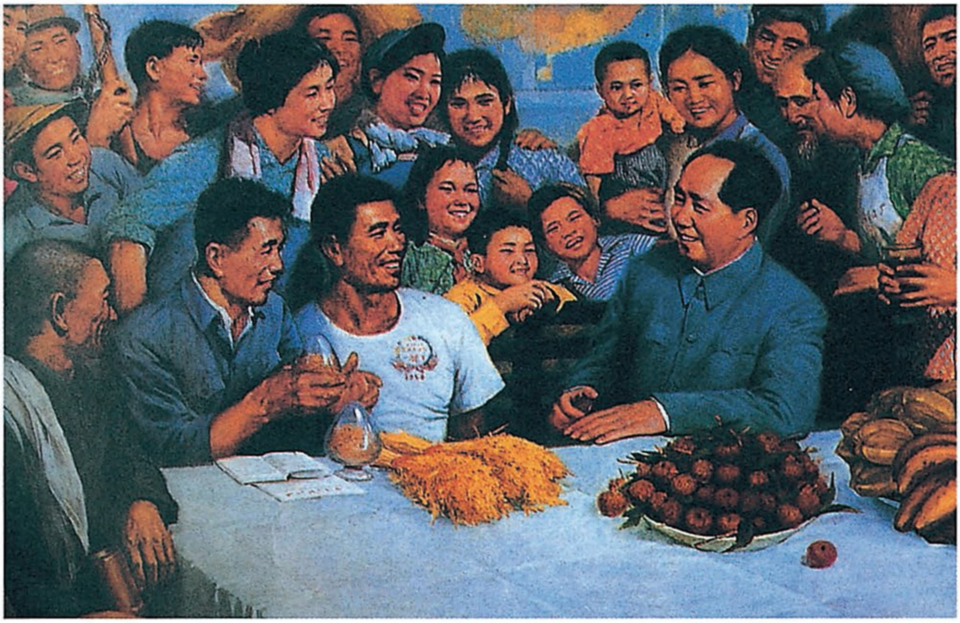
资料图片


人民領袖
一九九二年
王西京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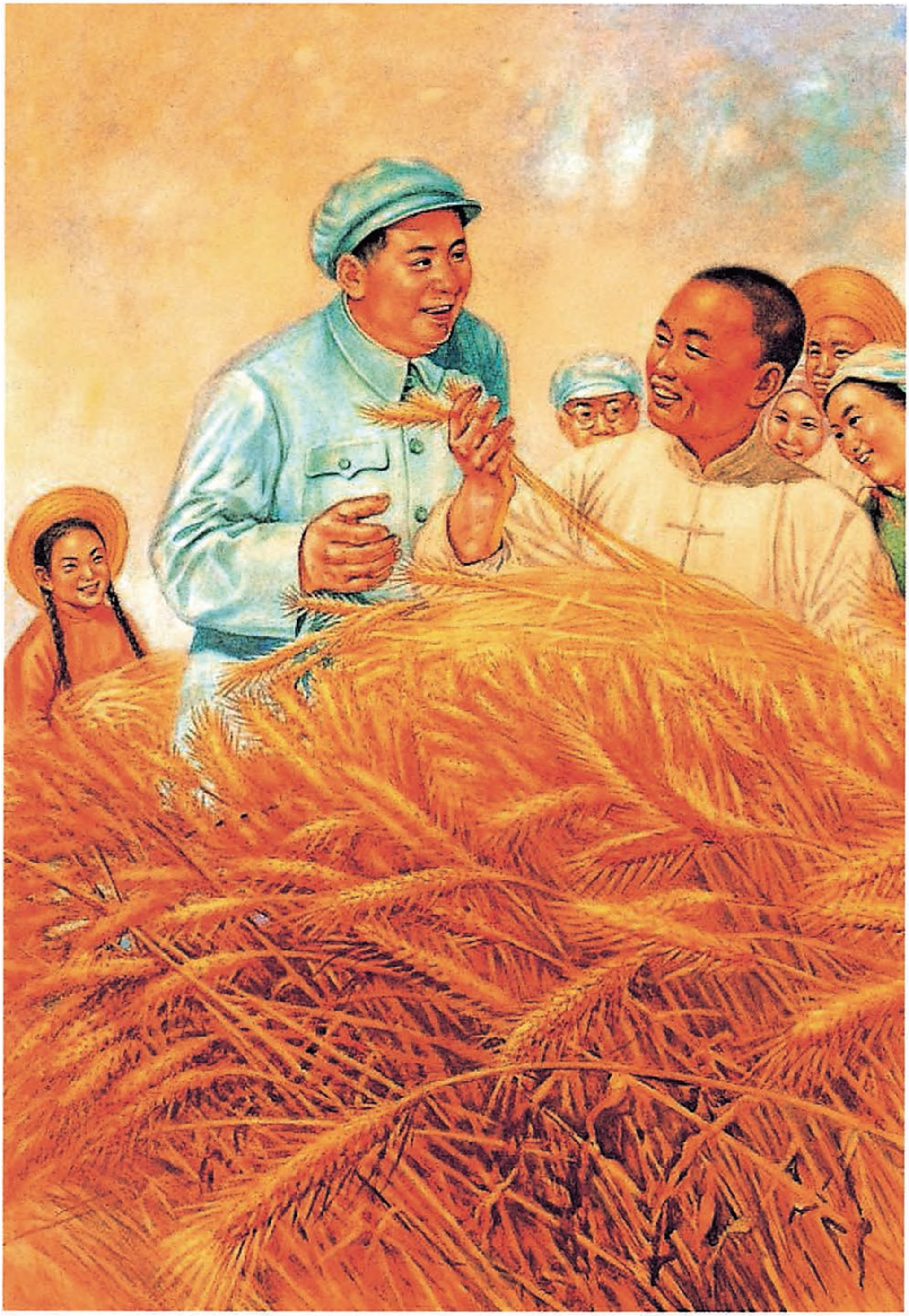
《人民领袖》（中国画）


主席来到我們家　問長問短把話拉
（年　画）
李琦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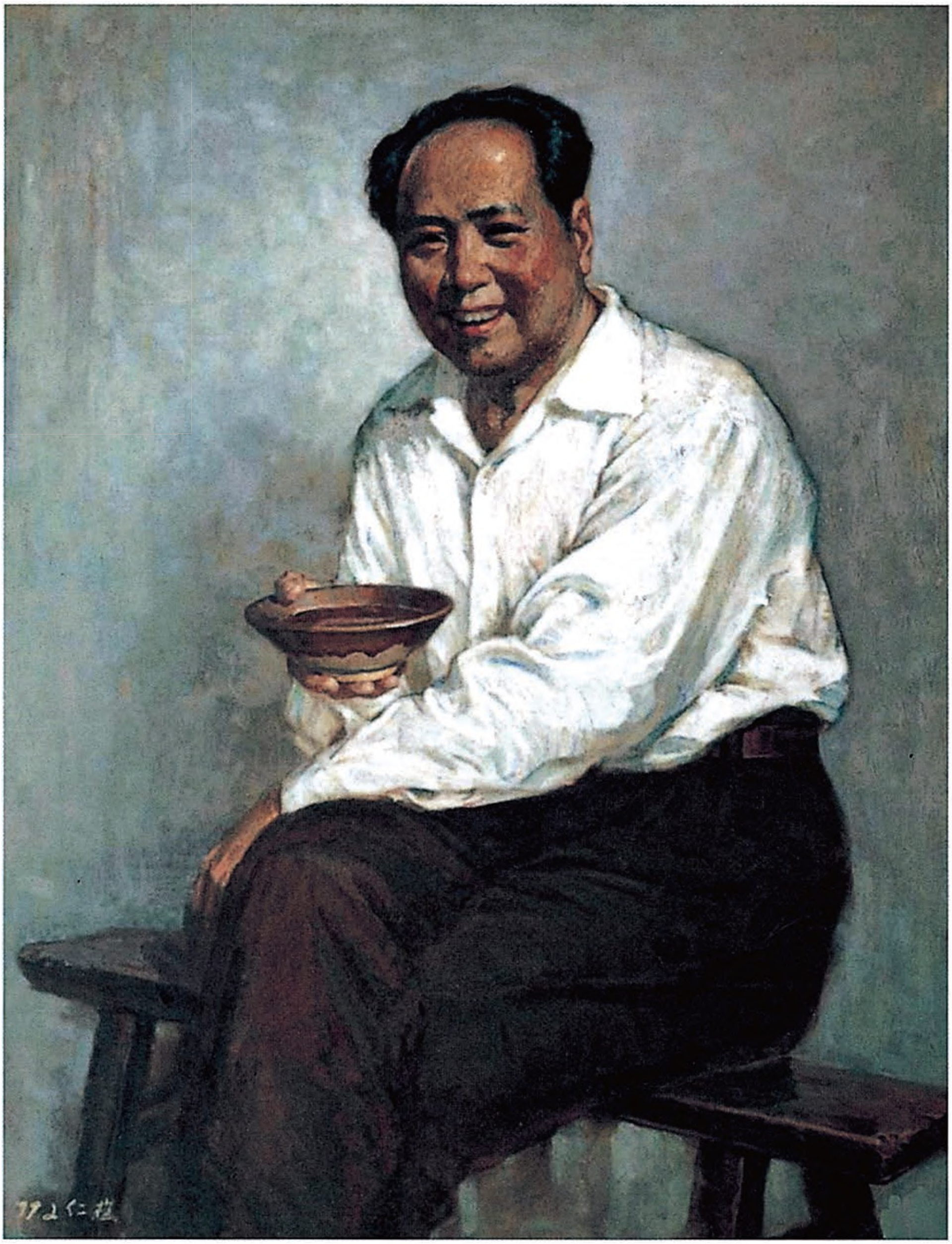
《主席来到我们家　问长问短把话拉》（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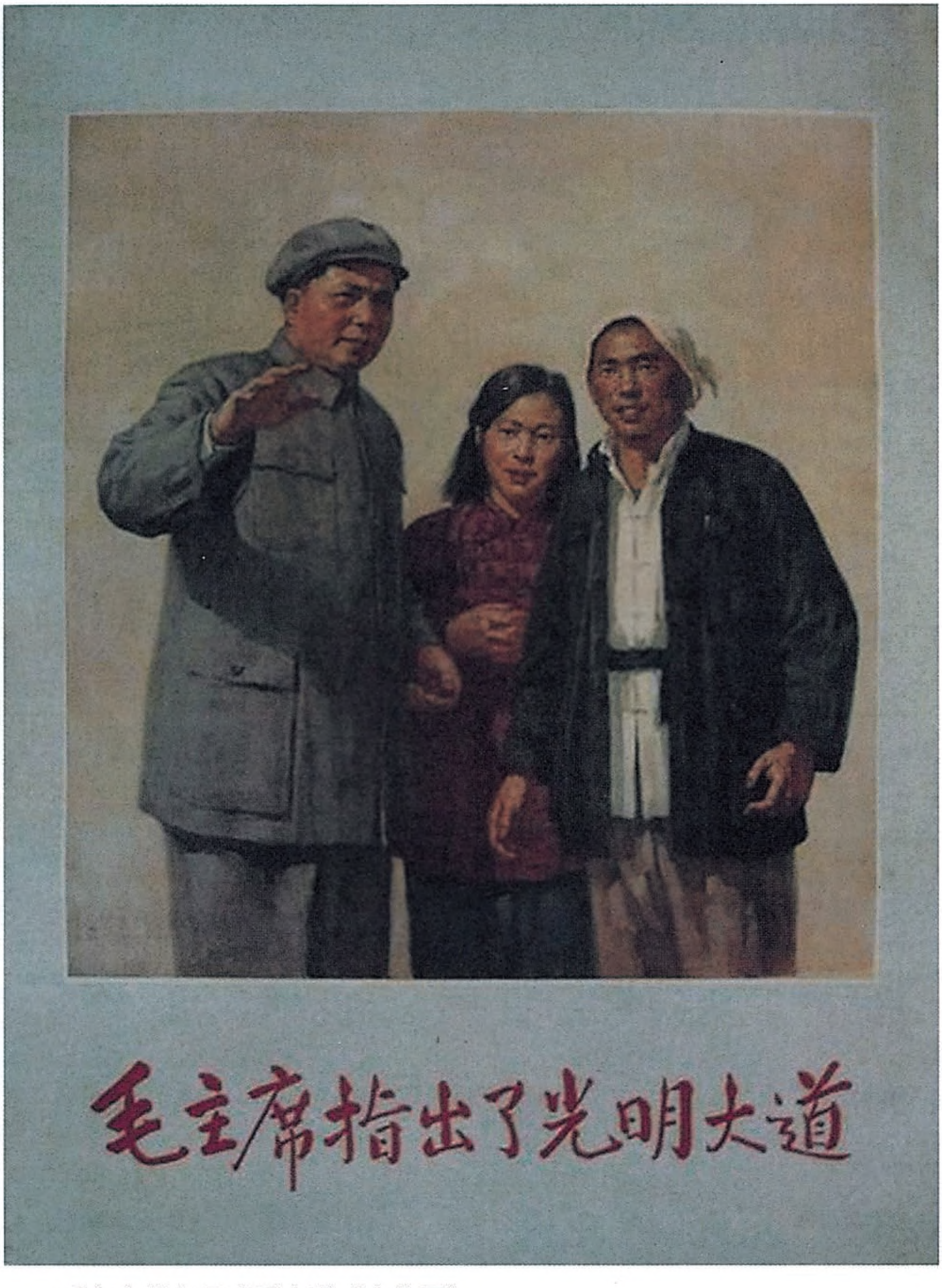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社员在一起》（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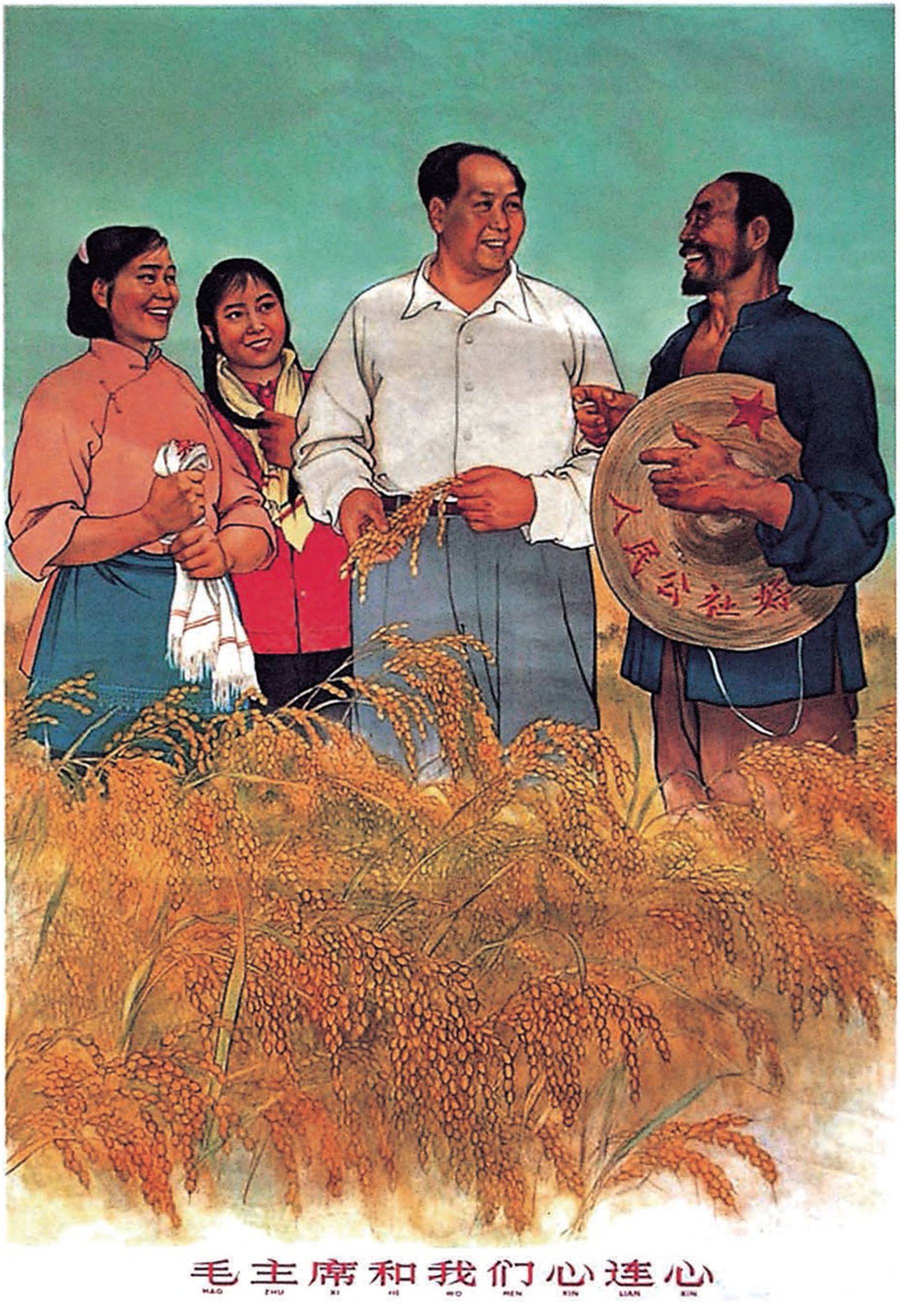
《毛主席来看我们的庄稼》（油画）



《毛主席来到我们家》（油画）


毛主席指出了光明大道

毛主席指出了光明大道（宣传画）


人民公社好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
MAO ZHU XI HE WO MEN XIN LIAN XIN

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宣传画）

临时通信[1]

（1958年4月23日）

一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

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有十几项主要指标就够了，更多不必要。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连夜赶工，有七天至十天时间也就够了。你们已经有了一些底子，赶一下不甚难吧。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属〈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初步接触一下，每项一个星期或者两三天时间也就够了，秋冬再做较深入的研究，明春再做更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写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的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深入的研究。方法是以政治带动业务，以虚带实。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以上各点如同意，请酌办。此件用电话通知。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二

刘邓[1]阅，罗光禄[2]用电话通知杨尚昆[3]，请尚昆即刻用电话通知各省市区。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罗光禄，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3] 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周恩来等的信

（1958年4月25日）

一

恩来、陈云、德怀、富春、一波[1]同志：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2]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廿五日或廿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3]，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4]，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5]，水利部李葆华[6]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7]同志一道来。最好本（廿五日）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2] 毛泽东这时在广州。

[3]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彭涛，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滕代远，当时任铁道部部长。

[4] 刘澜波，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5] 刘景范，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

[6] 李葆华，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7] 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动身，以便开四天会，卅日回去，五月一日站天安门。如何，请酌复。或者今日到长沙，明日上午到此。

毛泽东

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二

刘邓[1]即阅，用电话即发。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批语

（1958年4月25日）

此件[1]写得很好。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从政治上想通了，政治统帅了业务，迷信破除，胸怀坦荡，势如破竹了。除了已经写了较好报告的几个部以外，希望各部仿照几个好的报告写一个或长或短的报告给我和政治局各同志。如有好文章，可写上万把字。要条理清楚，政治统帅，思想明确，文字生动。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廿五日

---

[1] 指水利电力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加快电力工业发展速度，十年赶上英国。（二）发挥地方积极性，促进全国电气化。（三）放手发动群众，全民办电。（四）水电和火电的比重。（五）电力网建设。（六）设备供应问题。（七）投资问题。

在广州召集的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4月27日）

15年能否超过美国？

15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

仿电力部报告[1]（还有冶金部）十天内写一个长报告是否可能？供党大会用，我也要用。

各部的措施和资金，总投资，怎么样？着重1958年。

各部思想整风怎么样？（以红带专）

大权统一于中央是否可行？

有多少人关于1953年的决定草案？有无可能，什么时候做出一个正式决定？

第三次党大会（1959），是否可行？

可否宣传集体决定了方针？似乎有两派，态度各一。

党、政、军、民、学五方面都如此。

---

[1] 指水利电力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电力工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对一封反映广东潮汕地区整风情况的来信的批语

（1958年4月27日）

陶铸[1]同志：

此件所提问题[2]，请派一个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彻查一次。宗派主义可能有的，但死者有无因而致死的特殊情况，也值妥善详查。去的人不要带任何预定估计，完全从寻找真理出发。情况弄清，群疑可释。闻你病了，要静心养病，好了再工作，不急忙。潮汕这件事件，可用几句话交付一位书记去办就行了。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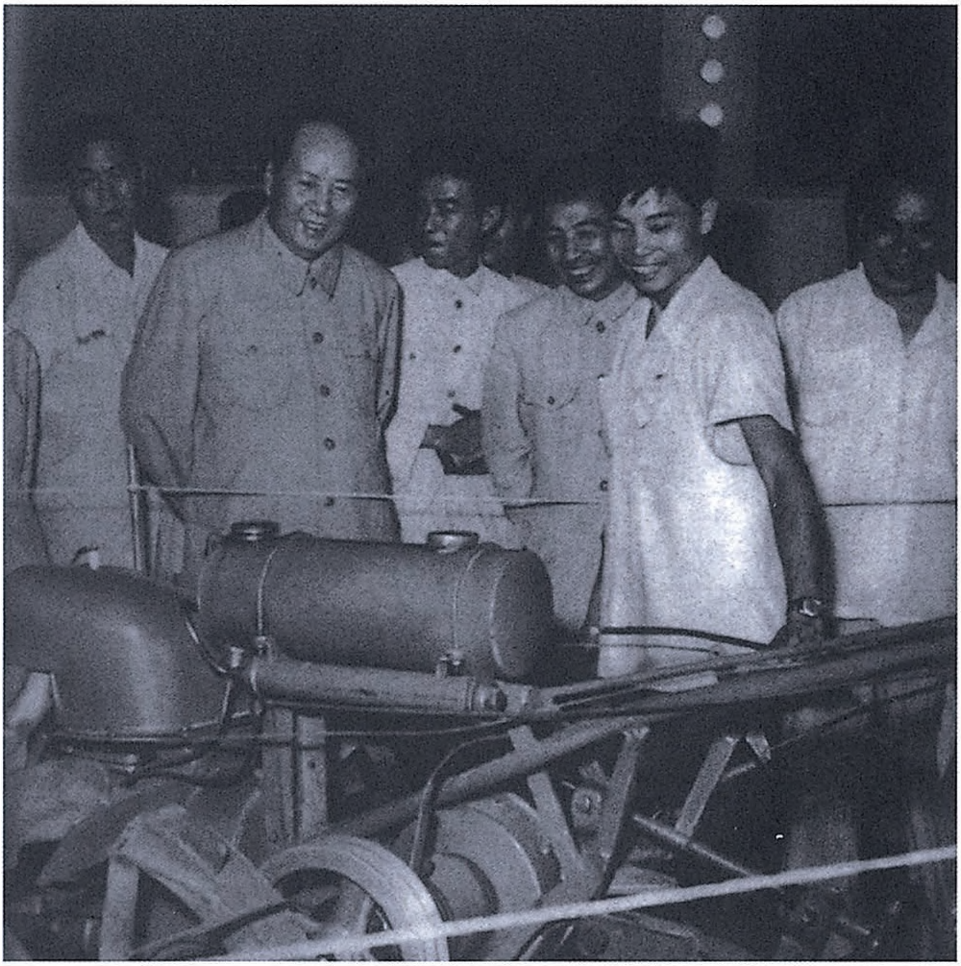
四月廿七日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2] 广东省潮安县有人于1958年4月1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信，反映潮安县委书记在整风反右斗争中自杀的情况。来信希望从速派人到潮汕检查该地区整风中的反地方主义运动，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整风运动健康发展。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视察了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的耕耘、水利、水产和土壤肥料4个馆。图为毛泽东在观看新式渔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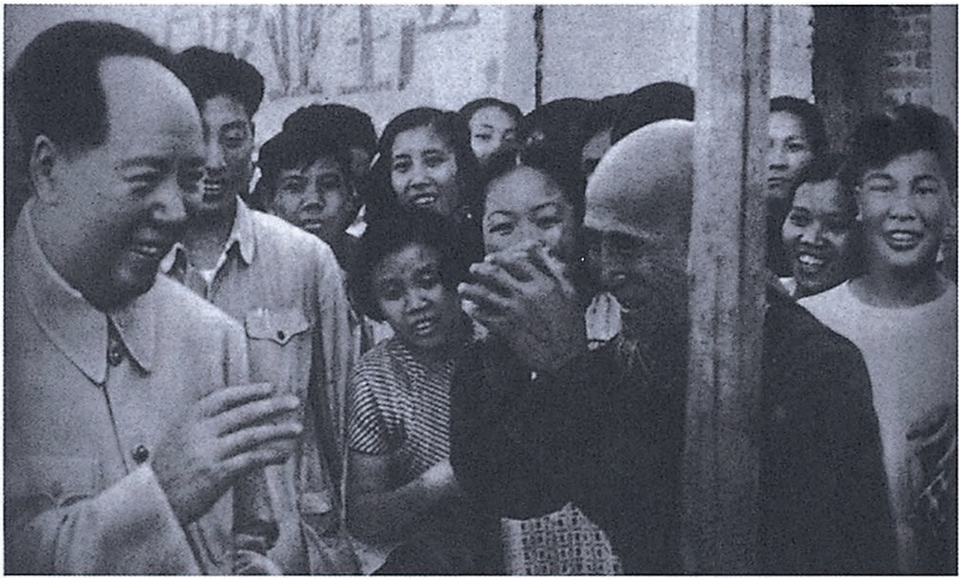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上参观万能拖拉机。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东农具改革展览会上观看淡水河涌养鱼系统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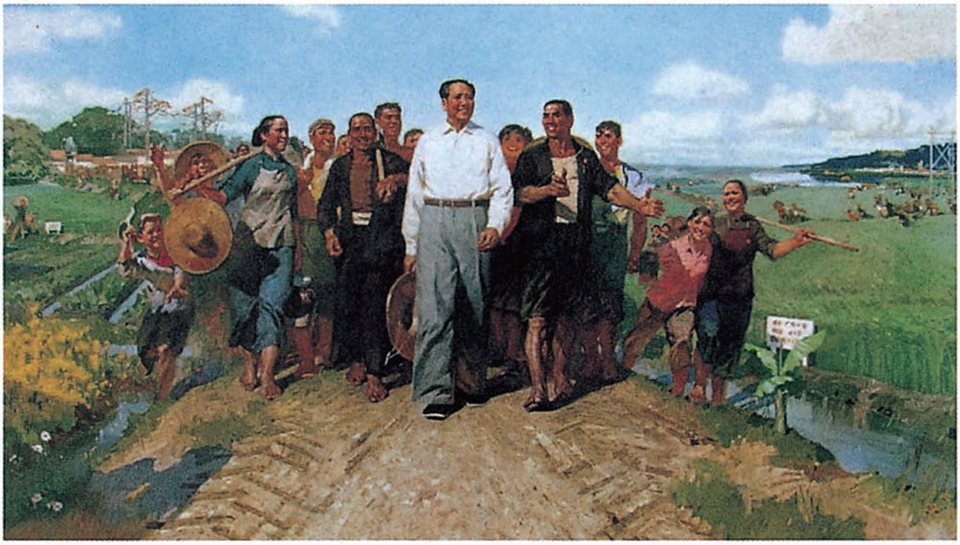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州市市长朱光陪同下，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视察广州郊区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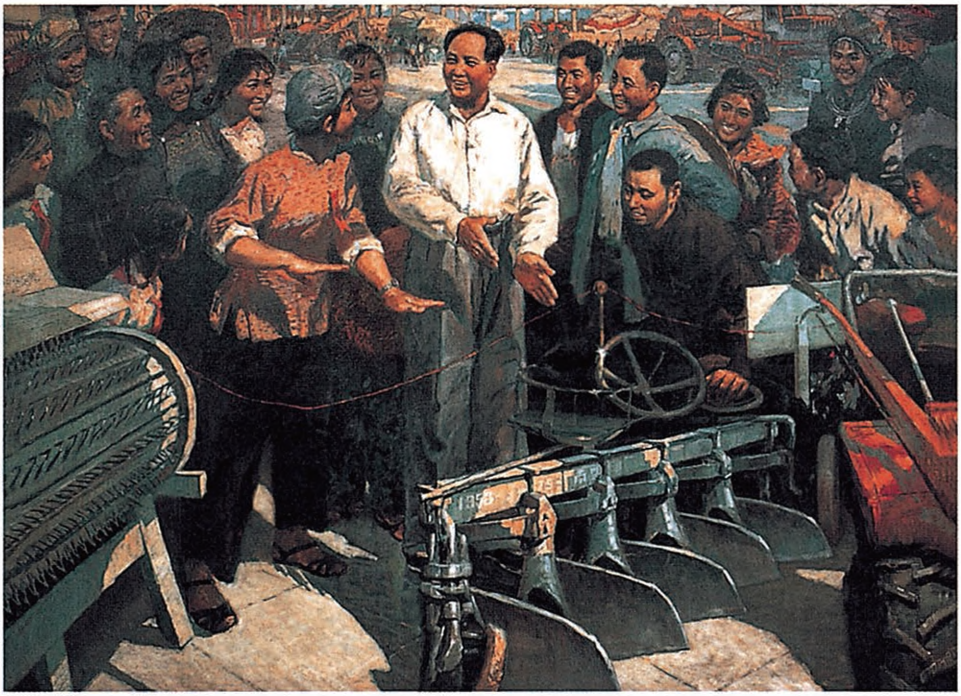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和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老社员在一起。

1958年4月30日，毛泽东视察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和青年在一起。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油画）



《毛主席视察农机馆》（油画）

给田家英[1]的信

（1958年4月27日）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2]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3]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4]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撰有《汉书》。

[3] 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当前工作的十七项指示

（1958年4月）

当前有十七个工作：

（一）十年农业规划：1. 水利规划：全国大兴修水利，甘肃省五八年一千一百多万亩，我省原定三十二万亩，有保守，现为九十二万亩（解放前全省为九十四万亩）认为差不多，现在看还落后，五八年要修九十四万到一百万亩，解决水利。2. 肥料：要做到上万斤肥，打千斤粮。3. 土壤改良：盐碱地的改良（如柴达木等地）。4. 选择优良种子。5. 改制、改良（农业技术改良，深耕细作）。6. 病虫害的消灭。7. 推广新式农具（包括农业机械在内）。8. 副业发展：副业与农业的关系，发展副业为了支援农业。9. 发展耕畜。10. 绿化。11. 除四害。12. 消灭严重疾病（传染病）。

这十二条中央、省、地、县、区、乡、农业生产合作社都要做出规划。

（二）另有十二个规划：1. 工业规划（主要地方工业）；2. 手工业；3. 农业；4. 副业；5. 森林；6. 渔业；7. 牧业；8. 交通；9. 商业；10. 文教；11. 科学；12. 卫生。中央、省、地、县都要做出规划。共为二十四条。

（三）反浪费问题。要开展反浪费运动，国务院将发指示，贪污也要反，贪污不是大量，浪费是大量的，特别在建设方面浪费最

大。□□□同志讲："浪费很大，各个厂（场）矿都有浪费，反掉浪费就能积累建设资金，他说柴达木建设（工薪）不降，不管有多少油，我主张不降。"增产是两个方面，即增产、节约。增产不节约就浪费了增产。

（四）正确解决农村积累和消费问题。在合作化开始一二年，为了显示合作化的优越性提出多扣少分。现在是要多积累合作社的资金，一个合作社的积累也是巩固社的，没有社的积累，社就无法巩固。可考虑50%作为社的积累，50%分配。合作化后，农村的情况是26%的农户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现在不强调生活水准，主要发展生产，现在不是要吃好、穿好，而是要真正苦干五年，艰苦奋斗，如果一人少用十元就六十亿，这对国家有好处，有了积累才能建设，有了建设才有希望。积累资金的办法：一种是国家的积累（包括企业事业公益金），二种是合作社积累（合作社的公积金、公益金），三种是国家税收积累。

全国取得一条经验，一些建设国家投资就搞不好，凡是自己动手就能搞好建设，要大量地依靠农业人口的劳动力来建设水利。自己搞水利建设就搞好了，靠国家投资搞水利就没搞好。

农业合作社里，可以搞社员个人向合作社投资，做成合作社的积累，来建设农业，集中生产，但不能强迫社员投资。青海一九五八年搞一千万至三千万积累，有些人是有钱的。

（五）搞试验田问题。各个党委要搞试验田。黄安县搞得好（土地不好）亩产八百斤，原因是人的作用，经营得好，黄安县提出千斤县，主席指出：中央到县都要搞试验田。牧业区搞牧业试验场，要抓紧搞先进，不搞落后。人的作用是主要的。要具体领导，什么工作都要具体领导，搞农业就要搞试验田。县、区、乡都搞，就能

搞几十个，几百个场子。工业也要搞试验，这方面的干部不要住在楼上办公，应到工厂（场）去办公。搞出经验来，办学校也搞试验，文教厅的干部可搬到学校办公。真正深入实际，这是领导的根本问题。

（六）红与专的问题。红与专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红专两个方面都搞（红是政治，专是专业技术），要批判空头政治家。批判不重视政治的技术家，只讲空话是不行的，有些人不红，就是白的。

（七）打掉“官”风（全国反官僚主义一般化）。要提倡干部有革命的干劲，干部要有朝气。现在的干部不论新老，应是越老，干劲就越大。

（八）二十四条规划，省、地委在六月报中央，县委的规划除报地委外，直报省委，乡区的规划好的典型与不好的典型选择报省委。

（九）除四害：毛主席指示，要求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它的意义不仅是除四害，它关系着人的健康问题。

（十）绿化问题。主席讲天天绿化，大规模地搞运动，如木林、经济林。有些省提倡上山，河北省飞地，农业社抽人上山搞生产，搞牧、农场。

（十一）认真地搞地方工业，第二个五年计划，争取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要超过农业总产值。王震参观日本的农业发现许多工业分散在农村，我们要学习日本这种方法。省、地、县都应搞工业。

（十二）开会方法，地区联系问题。开会的方法我们党内有许多好形式。主席讲大鸣大放大字报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几级干部会除讲工作外，还要讲理论、思想问题。这样就能提高干部的思想性、原则性。这次反右派是理论问题，又红又专。地方民族主义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不从理论讲，永远不能解决问题，浙江省

委书记□□同志的报告是标准，我们要看七八次，报告中第八、第九部分是敌我矛盾，政治、思想、革命问题。上海市委的报告提到了思想问题。

地区联系，更好地互相配合起来。中央提倡互相联系，过去大区撤销是必要的，大区撤销后密切了上下联系（省与中央），地区的联系是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各省可以互相订合同。

中央初步考虑了七个点。1. 以上海为中心，华东五省。2. 武汉，两湖、河南、安徽。3. 广东，包括两广、湖南、福建、江西。4. 成都，包括西南三省、陕西。5. 西安，西北五省陕、甘、青（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河南。6. 天津，与河北合并，河北、内蒙、山西、河南。7. 沈阳为中心，东北三省。

各省开党代会，互派代表参加。

我们也要搞中心联系，农业社也要互相联系。

（十三）中央领导同志下乡问题，一年至少四个月下去。

（十四）中央同志下去，不迎接，不请客，不唱戏，以免耽误工作。

（十五）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报告谈得很明白，反右派以来有人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存在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是敌我矛盾问题（二中全会决议指出）。两个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两条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有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右派是代表敌人的），但是敌人一天天减少。右派十五万要超过，这些右派搞了，敌人的量减少了，但是矛盾仍然存在，敌我斗争还有。但是敌我矛盾不是主要的。人民内部矛盾占了主要的，敌我矛盾占2%，同时是分散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也可以采取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反右派中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部分

是人民内部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上下之间，这是长期的大量的，因此，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看成敌我矛盾，或者看不到敌我矛盾。

（十六）不断革命，（这是对工作而言）工作以不断革命的精神进行，今后是一个接一个运动，经过这次整风，在政治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谁战胜谁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战胜了资产阶级），今后是解决技术问题，十五年后铁的产量要赶上英国。十五年，党的任务放在技术问题上，政治是统帅、灵魂，只有红不专，当空头政治家是不行的。工作要比赛，比先进与落后，全党要钻研技术，不钻研技术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但要红就要学习政治，要有共产主义思想，提拔干部有的人说不要德，有才就行，德是坚强的革命意志，没有是不行的。另外，要有技术。十五年后要消灭阶级，那时有没有革命，有没有斗争？还是有的。解决好了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不好就是敌我矛盾。苏联两个人造卫星的上天，证明科学技术超过了美国，因此，我们革命的干劲应赶上先进派。

（十七）对立面的统一。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有好与坏，才能比较出先进与落后。报纸也要宣传好的、坏的，大量的和主要的。比较的方法实际是积极性的比较。不但经济工作上要比较，而且政治思想工作也要比较，主席讲一年比三次（党代表大会比，其他会议比），办法是：推广好的，批评差的。

1958年5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界人士。

给纳赛尔的信

（1958年5月4日）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先生阁下：

我收到了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给我的信。我非常感谢你向我和中国人民所表示的那种深厚的友谊。

今天，我接见了穆罕默德·易卜拉欣[1]中将和他所率领的访华军事代表团，我们谈得很融洽。[2]

我高兴地看到贵我两国之间为了和平目的而日益发展和巩固的崇高友谊。我衷心地祝愿阁下所领导的伟大事业得到更大的成功，祝愿阁下健康和愉快。

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中国人民的事业现在有较大的发展。大约再有若干年我国的情况可能更好些。这些，穆罕默德中将会告诉你的。不管帝国主义者

---

[1]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当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陆军总参谋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

[2] 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5月4日电《毛主席朱副主席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电讯说："毛泽东主席在今晚接见了以易卜拉欣中将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友好访华代表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毛主席对贵宾们说，中国人民得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友谊，感到非常高兴。毛主席说，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我们是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相互关怀。"

怎样敌视我国，他们决不能阻止我国前进。正如同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他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是一样的。

向阁下致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于北京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批语

（1958年5月4日）

即送陈伯达[1]同志：

此件[2]写得很好，即刻照发。

毛泽东

五月四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 指1958年5月4日报送毛泽东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清样。社论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而写的。主题是批判不久前结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篇社论于1958年5月5日发表。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

（1958年5月）

一　在五月八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

题：破除迷信

怕教授

破除迷信，无法无天

破马克思[2]

妄信〈自〉菲薄

天体、神仙、洋人、细菌[3]

从古以来，发明家都是年轻人、卑贱者、被压迫者、文化缺少者，学问不行

名家是最无学问的，落后的，很少创造的

敢想、敢讲、敢做

劳动人民中蕴藏了丰富的积累〈极〉性

工业没有什〔么〕了不得，迷信不对的

十五〔年〕赶上美国，可能的

龚定盦的诗[4]

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不是狂妄的，实事求是的

革命精神与实际精神的统〔一〕

世界第一大国，不是大国沙文主义——丑、低级趣味

甘罗、贾谊、刘项、韩信、释迦、颜子、红娘、荀灌娘、白袍小将、岳飞、王勃、李贺、李世民、罗士信、杜伏威、马克思、列宁、周瑜、孔明、孙策、王弼、安眠药〔发〕明者、青霉素〔发〕明者、达尔文、杨振宁、李政道、郝建秀、聂耳、哪吒、兰陵王[5]。

原因：方向对，而名人学问多保守落后了

世界是青年的，长江后浪催前浪，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反对贾桂[6]

庸信〈俗〉的谦虚，谦虚＝实际

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上层建筑问题

不揭盖子，没有希望

盖子一揭，大有希望

插红旗、标新立异

学列宁[7]

先进的东方，落后的欧洲

十五年后走向反面，尾巴一定挠〈翘〉起来，如果不注意的话。不要紧，再来一个否定，又生动活泼了。

你看：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

你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封〕建『筑』〔时〕代的『上』形而上学——现代的辩证法

客观存在的，不是吗？

设置对立面，十分必要

如何设置？客对〈观〉存在的

下回再讲，再见！Thank you very much. 十分『感』感谢！

二

破除迷信

现在迷信还多得很

怕教授，怕马克思

科学是高不可攀的

工业是很难的

军事也有神秘色彩

原子弹，尤其可以吓人

拿苏联吓人

我军有很多有头脑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应将一切东西拿过来，并且有所独创。

插红旗，辨风向，要用嗅觉嗅一嗅风向气味，不用被野心家吓住了，一万人〈年〉还会有野心家

风向能辨，才能插红旗

不止□□一处，可能还有些小□□

要有分析：□□同志与□□不一类的

要研究我们自己的历史——军事史及其他

我所总结的只有很少一点，要把范围扩大，不要把自己束缚在我所讲的那一个小天地内

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方法，才有共同语言

要学苏联，不是硬搬，而是有选择地学，一定要将一切有用的

东西都学来，无用的东西则反面学，以我为主，不是盲从。

还一定要学日本和美国，这是我们的敌人。

马克思、列宁都反对将他们的主义当教条

这次会议的意义

二　在五月十七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除四害的伟大意义

印度的响应

我们不提“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之类的口号，也不提列宁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共产主义”的〔口〕号，而提我们现在的一些口号，反而快些好些，为什么?

我们的口号高明些，干部、技术、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

20年来，1800万吨钢，我们13年就可做到，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又紧张又松弛**，**又团结又斗争**，一句话，我们发展了辩证法。

是不是，请大家想一想。

昨天有一位同志讲得不对：“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错的”，又跟不〈又〉不跟，要有独立思考，“跟”字不对。

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之前。高级干部，中央委员

十个指头

位置要摆得对

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一个的问题。资产阶级中

间派，其中中部分是一半对一半

往往到具体问题就忘记了，有搬石头打自己脚的危险，如高岗

一九五六年错误的性质

秘书室

训练部

准备对付大灾难

（1）战争

（2）分裂　谁不照顾大局谁将跌斤斗

资产阶级思想、习惯的长期性

可能还有30万右派（党内外）

可能有成百万有左倾观点的人

十几〔年〕内反复整风

反右是纠正过去倡右错误

百花、长期之必要

修正主义

社会主义阵营的密切合作

学习，辞去主席

四海之内皆兄弟

人人是外行，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东风、西风、南斯拉夫，亚非拉

原子大战，乐观主义

准备挨骂，党内分裂

请同志们准备下次大会

准备冬耕

三　在五月二十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一

再讲破除迷信

一机部的材料[8]

应加农、林、水、卫

再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

“老子第一”，看不起人，就会在大部〔分〕人中一扫而空，剩下的人也就难于作怪了。

再有再扫荡

这是**一种低级趣味**。

大国沙文主义，也就受到致命打击

讲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

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

内行少，外行多，例如一万行

略熟几门别行，是必要的，业余转化为专业，专业专〈转〉化为业余

右派提起这个问题，答复得不系统。

插红旗，辨风向

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或者其他人插灰旗

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9]，识的极端重要性

斯大林论预见：站在看台上，什么也不见

易曰：知几其神乎？可见不容易

不要太老实

庸俗的、**低级趣味的谦虚**，不插红旗，闭口道士，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

再讲灾难：

坏事是好事

红白喜事

大、中、小灾难

原子战，党分裂，大讲特讲，破除迷信。

讲死讲鬼，就能不怕死了，就不怕鬼了。

突变（生死都是突变）**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

突变优于量变

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险主义

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质变、分裂是永远的、绝对的

应防止、**也可能防止不利于人民的大分裂**。

南斯拉夫、法斯特、陈独秀、张国焘、丁玲、李峰、李世农、沙文汉、古大存、陈再励、赛甫拉也夫、孙殿才、孙作宾、潘复生[10] 分裂是好事

以后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如同细胞的不断死灭

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如同细胞的不断产生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情绪〈报〉局的发生、发展与消灭

有灭亡，才有生长，还归自然，再造生物

如孔子至今存在，岂非一大灾难？

鼓盆而歌[11]是正确的

人死应开庆祝会

开庆祝会之所以不可避免，是为了团结起来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

遗传性与变异性，习惯性与创造性，旧条件反射与新条件反射，**设置对立面**（**自然的**，**人为的**）

怕死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

我也有这种反射

愁忧与快乐的对立统一

——后者的主导方面，乐观主义

一个人的思想也经常有建立与破坏

党的分裂的艺术领导，预见，搞得好一点。

治病救人

允许革命

在这次讲的意义：

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乐观主义**

民歌

民歌与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参考

立即布置冬耕，1959年计划、预算

八月『五』上旬开省委书记会议[12]

思、工、农、商、学、兵，**两个月内**，都要抓一下，重点在工（交通在内）

明年五月开三届大会，请作准备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

二

你们中有好些能想、能分析、能综合，聪明，有才分；我很高兴；前途是你们的；但不知道你们的品德如何？品德就是忠实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粹，死而后民〈已〉；顾大局，不个人伸手；辨风向，敢于插红旗，拔黑旗、灰旗；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同群众打成一片。

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

从思想上政治上随时解部〈剖〉自己，学鲁迅；看鲁迅全集；看报看书。

学习：看书看报。

制试〈式〉教练要学，其余都可自学。华罗庚、齐奥尔科夫斯基[13]。

破除迷信

人有各种迷信：狗肉，游水，学英文。

妄自菲薄，奴隶尾巴

自力更生，有些人不如合作社

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

待马克思……

没有苏联就不能活（工业、军事），此论不通

苏联之前无苏联

马克思之前无马思想

必须认真学马、学苏。不学、少学、不认真学，都是错误的。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都要学。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认真学，非学不可。

自己长了一个脑筋，为什么不独立思考

马、列是指导，不是教条，教条论是最无出息的，最可丑的

要产生自己的理论

我虽不行，总算分析的一点我们的经验

你们应当超过我

教条诸公对我没有发言资格

有一个同志讲得对，我的东西，他说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这就作了分析

教条说：“批叛〈判〉的学习”，不对，因他们是教条，无资格；又不平等待遇。

与教条平等，与外国平等。

真理：批判学习一切东西，党中央的，马列的，外国的，我的，你们的。

四海之内皆兄弟

几个经济文件，看了没有？

军事工作的缺点

四　在五月二十三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真正的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这个制度必须认真执行。

例如：

（1）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是中央常委会通过的

（2）“促进委员会”，是在政治局扩大会（知识分子会议，1000多人），在一篇演说中提出，而为全体所默认的，以鼓掌欢迎出之

（3）四十条，是政治局扩大会（有全体省委书记参加）〔通

过的〕

（4）十大关系，是在上述同一会议上通过的

（5）多快好省，是在中央常委会上通过的

有些同志，当时同意（无一人反对），五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即表示反对，或者不同意，或者怀疑，而不经合法手续，即经同样性的会议加以改变，即进行反对活动，提反冒进。

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事实上推翻四十条，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序言（反右倾保守），而改为反左倾冒进，十人小组无疾而终，但八届二中全会并未做出明确决议（这个会议一切无决议），相反，有一个公认的七条意见，我又在结论中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部分的，总的方向是向前促进的，“飞鸟之影未尝动的”，鸟在前进。可是“反冒进”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

为什么?

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一股狂热的运动。

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

他们的错误与潘复生、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孙殿才、孙作宾、赛甫拉也夫等人有原则性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

这次大会开得很好。

党依靠这样的大会**制定路线**，**监督中央**。

---

[1]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

23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四次讲话，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这四次讲话的提纲。

[2] 毛泽东讲话中，在谈了“我们大多数同志有些怕资产阶级的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地不大怕了”以后接着说：是不是还有另外的一种“怕”，即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不要怕嘛。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在楼下的人，不一定要怕楼上的人。我们读一部分基本的东西就够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

[3] 毛泽东讲话中，在说到我们的同志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时，谈了如何看待天体、神仙和洋人的问题，他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这是什么道理？我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下。我说，不，我们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也住在天上。中国人喜欢神仙。我也问过我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来人，他们不把我们当成神仙吗？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把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4] 龚定盦，即龚自珍，清代文学家、思想家。他的诗文提倡“更法”“改图”，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洋溢着爱国热情。《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

风雷》是其代表作。诗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5] 甘罗，十二岁做秦相吕不韦的家臣，吕企图攻赵，以扩大燕国献给他的河间封地，甘罗自请出使赵国，说服赵王割五城给秦，因功封为上卿。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文章，为郡人所称誉，他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著有《鹏鸟赋》《过秦论》等。刘项，指刘邦、项羽，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秦亡后，发生楚汉相争，刘邦打败项羽，建立汉朝。韩信，刘邦建立汉朝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他年轻时"胯下之辱"的故事，流传很广。释迦，即释迦牟尼，相传他二十九岁时创立佛教。颜子，即颜渊，孔子的学生，孔子称赞他"不迁怒，不贰过"，早卒。红娘，元杂剧《西厢记》中的人物，崔莺莺的婢女，聪明勇敢，热情地促成莺莺和张生的结合。荀灌娘，晋代人，自幼习武，其父任荆州都督时，被叛兵围于宛县（今河南南阳），荀灌娘年仅十三岁，请求突围求救兵，率勇士数十人于夜间突围而出，救兵到，敌军逃走。白袍小将，指罗成，传说他十四岁起兵参加隋末的农民起义，后降唐。在后来的戏剧中，扮演他的人都穿白色盔甲。岳飞，南宋抗金名将，后被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罪名杀害，死时三十八岁。王勃，唐代文学家，少时即显露才华，著有《滕王阁序》。李贺，唐代诗人，早岁即工诗，死时二十七岁。李世民，十八岁率兵参加反隋战争，二十六岁继皇帝位，是为唐太宗。罗士信，唐初将领，十四岁时参加农民起义，勇猛善战，后降唐。杜伏威，唐初将领，隋末参加农民起义，后降唐。周瑜，三国时吴国名将，三十三岁时率吴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孔明，即诸葛亮，三国时蜀汉政治家、军事家，二十六岁时，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孙策，孙权之兄，东汉末江东豪强，在江东地区创建孙氏政权，死时二十五岁。王弼，三国时魏国玄学家，少年即享高名，著有《周易注》《老子注》，卒年二十四岁。达尔文，英国博物学家，二十二岁时开始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后提出生物进化论。杨振宁、李政道，美籍华裔科学家，1957年杨振宁三十五岁、李政道三十一岁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郝建秀，全国劳动模范，1951年十六岁时创造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聂耳，中国著名作曲家，他二十三岁时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一九四九年

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被定为代国歌。哪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形似少年，神通广大。兰陵王，指北齐兰陵王高长恭，传说他勇武而貌美，自以为不能使敌人畏惧，常戴面具出战。毛泽东在讲话中列举了这些人的事例，他说：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是要战胜老年人，学问少的人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为大学问家所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

[6] 贾桂，戏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7] 毛泽东说：我们要学习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不应该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该的。旗帜横直是要插的，你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资产阶级插的旗帜，我们要拔掉它。

[8] 一机部的材料，指第一机械工业部编印的四十一个科学发明家小传。毛泽东讲话中说：这个材料可以证明，许多科学发明家是出身比较穷苦的人，像瓦特是工人，还有许多是农民，是小知识分子。搞出这些科学发明家的小传，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可以帮助工人、农民、小知识分子、新老干部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农林水部门、卫生部门、政法部门、文教部门都可以搞这样的材料。

[9] 刘知几，唐代史学家，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的专书，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应尤重史识。毛泽东讲话中说：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10] 李峰，曾任中共山东惠民地委第一书记，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因被认定犯有“反党性质的错误”，受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二年处分，1980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平反。李世农，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1962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并报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意，决定撤销关于开除李世农党籍的决议，恢复其党籍、名誉、职务和级别。沙文汉，曾任中共

浙江省委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81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改正。古大存，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1957年整风运动中因被认定犯有“进行地方主义活动错误”，受撤销职务处分，1982年1月中共广东省纪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平反。陈再励，曾任中共广西省委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决定予以改正。赛甫拉也夫，曾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因地方民族主义问题，受撤销职务处分，1979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其党的组织生活，后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殿才，曾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和地方主义分子，开除党籍，1963年9月中共甘肃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改为给予党内警告处分，1982年8月中共甘肃省委进行复查，并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决定予以平反。孙作宾，曾任中共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1958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8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予以改正。潘复生，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在整风运动中被定为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受撤销职务处分，1962年5月中共河南省委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并报中共中央同意，决定予以平反。

[11] 《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

[12]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

[13] 华罗庚，中国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齐奥尔科夫斯基，苏联科学家，最早提出火箭飞行理论和航天理论。这两人都是没有上过大学，自学成才的。

1958年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认为这标志着我国正在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图为大会会场。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5月8日）

我讲一讲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同志讲破除迷信吗？

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

怕教授，怕资产阶级教授。整风以后，最近几个月，慢慢地不太怕了。有些同志，如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当教授，这是不怕教授的一种表现。

另外一种怕，是怕无产阶级教授，怕马克思。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房子里，要搭很长的梯子才上得去。于是乎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这种怕，是否需要？是否妥当？在成都会议上我谈过对马克思也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只是那里头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很多东西给我们看，我们不一定都要看完。□□□同志在不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主义那么多东西，时间不够，不一定都要读完，读几份基本的东西也就可以了。我们实际做的，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这就是理论。二月、十月，

中国革命成功了，理论上就不能没有反映。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现在不高，但不要怕，可以努力。我们要努力。我们可以造楼梯，而且可以造升降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宣传他们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非圣则违法”，反对圣人，就是违犯“宪法”。对外国人说我不行，对孔夫子说我不行，这是什么道理？

我问我身边的同志：“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他们摇摇头说：“是住在地上。”我说：“不，我们是住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看我们，不也是住在天上吗？”所以我说，我们是住在地上，同时，又住在天上。

中国人喜欢神仙，我问他们（指主席身边的同志），我们算不算神仙？他们说：“不算！”我说不对，我们是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是“神仙”呢？如果别的星球有人，他们不把我们看成是神仙吗？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大家说，外国人才算洋人，我们不算洋人。我说不对，我们叫外国人叫洋人，在外国人看来，我们不也是洋人吗？

有一种微生物叫做细菌。我看细菌虽小，但是，在某一点上，它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它干劲十足，多快好省，力争上游，目中无人，天不怕，地不怕。它要吃人，不管你有多大，即使你有八十多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

自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在开始时，都是年轻的，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这些发明家在后来变成了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普遍规律？不能肯定，还

是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

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的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人怕出名猪怕壮。”名家是最落后的，最怕事的，最无创造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成了名。当然不能全盘否定一切名家，有的也有例外。

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战国的时候，秦国有个甘罗。甘罗十二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他的祖父甘茂没有主意，他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调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学家。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廿四岁，三年到咸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该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

孔夫子当初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吹鼓手，后来教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和我们现在一个县差不多，他那个“司法部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当过“会计”，做过管钱的小官，可是他却学会

了许多本领。

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个“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也只有三十二岁。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时候，他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是印度当时一个被压迫民族的人。

红娘是个有名的人物，她是青年人，她是奴隶，她帮助张生做那样的事情，是违犯婚姻法的，她被拷打，可是她不屈服，反抗一过，还把老夫人责备一顿。你们说，究竟是红娘学问好，还是老夫人学问好？是红娘是“发明家”，还是老夫人是“发明家”？

晋朝的荀灌娘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子，顶多不过是“初中程度”，敢到襄阳去搬救兵，你看她多大的本领。

唐朝的诗人李贺，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七岁。

唐太宗李世民起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做皇帝的时候只有二十岁。

李贺、李世民都是贵族。

罗士信是山东人，也是二十四岁起兵，打仗很勇敢。

做《滕王阁序》的王勃，唐初四杰之一，他是一个年轻人。

宋朝的名将岳飞，死的时候才三十八岁。

范文澜同志你说对不对？你是历史学家，说的不对，你可以订正。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壮年、老年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是在年轻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写《共产党宣言》时才二十几岁。

列宁也是三十一岁（一九〇三年）创造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吴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

瑜打了胜仗。有个黄盖，是我的老乡，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晋朝的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解，他十八岁就是哲学家，他的祖父是王肃。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据说是一个司药。我在一个小册子上看到的。他为了发明安眠药，在做实验的时候，几乎丧失生命。试验成功了，德国不赞成他，法国人把他接过去了，给他开庆祝会，给他出书。

盘尼西林——青霉素的发明者是一个染匠，因为他女儿害病，无钱进医院，就在染缸边抓了一把土，用什么东西和了和，吃了就好了。后来经过化验，这里头有一种东西，就是盘尼西林。

达尔文，大发明家，他也是个青年人，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就是没有到过上海。

最近的那个李政道、杨振宁也是年轻人。

郝建秀，全国人民代表，她在十八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纱办法。

作国歌的大音乐家聂耳，也是年轻人。

哪吒——托塔李天王李靖的儿子，也是年轻人，他的本领可不小嘛！

南北朝的兰陵王也是年轻人，他很会打仗。

现在许多的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都是年轻人……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学问少的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不要被权威、名人吓倒，不要被大学问家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种束手束脚的现象不好，要从这种现象里解放出来。

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从来是很丰富的。过去是在旧制度的压抑下，没有解放出来。现在解放了，开始爆发了。

我们现在的方法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都爆发出来。

过去不少的人认为工业高不可攀，神秘得很，认为搞工业“不容易”呀，总之，认为搞工业有很大的迷信。

我也不懂工业，对工业也是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管工业的谈过，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大概只要十几年的工夫，我们的国家就可以变为工业国。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严重。首先蔑视它，然后重视它……

“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这句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

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实际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者。

…………

不要大国沙文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是丑恶的行为，是低级趣味！

法门寺这个戏里有个角色叫贾桂，他是刘瑾的手下人，刘瑾是明朝太监，实际上是“内阁总理”，掌大权的人。有一次刘瑾叫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不敢坐。这就是奴隶性。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不免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要打倒贾桂的作风。

有两种谦虚，一种谦虚是庸俗的谦虚，一种是合乎实际的谦虚。

教条主义者照抄外国，是过分谦虚。你自己干什么？你就不动脑筋。中国古诗中有一种拟古诗，就是过分谦虚。自己没有独创风

格，要去模拟别人。

修正主义者也是过分的谦虚。如铁托无非是照抄伯恩施坦，从资产阶级老爷那里搬点东西来。

教条主义是一国的无产阶级照抄另一国的无产阶级。有好的就抄好的，有不好的也抄了。这就不好。抄是要抄的，要抄的是精神，是本质，而不是皮毛。比方说，莫科斯宣言的九条共同纲领（“再论”说是五条，莫斯科宣言分为九条）是各国的共同的东西，少一条也不行。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只是照抄，那就是过分的谦虚。非普遍真理，就不能照抄。就是国内的东西，也不能照抄。土地改革的时候，中央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地方的经验，这就是怕照抄。现在工作当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抄了资产阶级，铁托抄伯恩施坦就是一例。

我们要学列宁，要敢于插红旗，越红越好，要敢于标新立异。标新立异有两种：一种是应当的，一种是不应当的。列宁向第二国际标新立异，另插红旗，这是应当的。红旗，横竖是要插的。你要不插红旗，资产阶级就要插白旗。与其资产阶级插，不如我们无产阶级插。要敢于插旗子，不让它有空白点。资产阶级插的旗子，我们就要拔掉，要敢插敢拔。

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是真理，到现在还是如此，我们先进，西欧落后……

我们蔑视资产阶级，蔑视神仙，蔑视上帝。但是不能蔑视小国，蔑视自己的同志。

十五年之后，我们变成现代化、工业化、文化高的大强国。可

能要翘尾巴，我们不要怕，现在就讲清楚。狗翘尾巴，不一定要打棍子，泼一瓢冷水就行了。我们有时候要浇一浇冷水的。

不正当的自信心，庸俗的自信心，虚伪的自信心，那是不允许的。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谦虚不叫谦虚，真正的谦虚是要合乎实际。比如说，我们见了外国人说，中国现在还是农业国，工业建设刚开始……这就是实际，但外国人说我们谦虚。一般是合乎实际的。

也有谦虚低于实际，过分谦虚。一般的是合乎实际。

这种说法，类似鲁迅对于讽刺的说法。鲁迅说：用精练的或者有些夸张的笔墨写出真实的事物，就叫讽刺……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事物总是要走向自己的反面。

希腊的辩证法，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文艺复兴。这是否定的否定。

中国也是如此。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辩证法。封建时代的经学，这是形而上学。现在又叫辩证法。

是不是？范文澜同志，你对这些很熟悉。

我看，十五年后尾巴肯定要翘起来，要出大国沙文主义。出了

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怕，难道就怕变成大国沙文主义而就不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吗？即使将来出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的。有一种正确的东西代替大国沙文主义的，有什么可怕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全部的人都变成大国沙文主义。

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部分形而上学，现在的辩证法，也是否定的否定。

斯大林不完全是形而上学，他懂得辩证法，但不甚懂得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这是客观存在的。设置对立面很重要。对立面是客观存在的。如我们对右派，让他放，让他讲，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要设对立面。整右派以后，有的同志忽视整改，又强调大字报搞双反，这样设置了对立面，出了一亿张大字报，逼得非改不可。

设对立面不是说客观不存在而设置。所谓对立面，是要客观存在的东西才能设置起来。客观不存在的东西，是设置不了的。

我讲完了，这个题目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1958年5月，毛泽东和彭德怀、陈毅等交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给张闻天[1]的信

（1958年5月8日）

洛甫同志：

三个报告[2]都看了，第三个[3]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

---

[1] 张闻天，又名洛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

[2] 指张闻天1958年4月中下旬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的三个报告，分别是：1958年4月13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等问题的报告，1958年4月25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外商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1958年4月26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

[3] 指张闻天1958年4月26日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果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报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热情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的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号上午三时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8年5月8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特别是在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对于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最近一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友好互助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已经更加巩固和加深。

祝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的电报。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庆十三周年。

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

关于中共准备派代表团参加经互会高级代表会议给赫鲁晓夫[1]的电报

（1958年5月9日、13日）

一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安东诺夫[2]同志转来您的关于召开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问题的来信。

中共中央高兴地接受你们的邀请，并且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5月20日开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的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一俟确定后，当另行通知。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九日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安东诺夫，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二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为了参加5月2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参加国兄弟党高级代表会议，我们决定派出由以下三位同志组成的代表团：

团长：陈云同志（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团员：李富春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

叶季壮同志（中共中央委员、对外贸易部部长）

此外，随同代表团前去的，还有助理人员及翻译八人，谨此通知。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三日

1958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天津参观进出口商品陈列馆。

对邓小平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1]的批语

（1958年5月12日）

即送邓小平同志：

看了一遍，可用。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2]，请酌定。有些地方尚待谈一谈。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稿。报告汇报了1957年11月中国共产党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并就（一）关于国际形势，（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各国民族特点的相互关系，（三）关于思想工作和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等问题作了阐述。

[2] 毛泽东对邓小平报告稿的修改主要有：在报告稿讲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是我们的坚定的方针。但是，学习必须采取正确的方法，学习

必须同独创相结合”一句中的“但是”之后，毛泽东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一句；在报告稿讲到“十二国共产党宣言事实上就是各国共产党在目前时期的思想工作的一个总纲领”一句中的“思想工作”之后，毛泽东加了“和政治工作”几个字；报告稿讲到“右翼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中间还有相当的影响”，毛泽东把这句中的“还有相当的影响”改为“还有很大的影响”；报告稿讲到“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最近所通过的纲领，不管这个纲领的支持者的主观愿望怎样，也不管这个纲领在表面上点缀了多少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它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恰好适合帝国主义的这种需要”，毛泽东把这句中的“这个纲领的支持者”，改为“这个纲领的创造者”；在报告稿讲到“南共所以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正是他们在国内对资产阶级思想屈服，而在国外又对帝国主义压力屈服的结果”一句中的“南共”之后，毛泽东加了“领导集团”几个字；在报告稿讲到“不但一切愿意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人们无法同情南共领导集团的分裂活动，而且一切愿意和平事业和民族独立运动胜利的人们也无法同情他们”一句中的“而且一切”之后，毛泽东加了“真正”二字。

对罗瑞卿[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58年5月12日）

退罗瑞卿同志。此件[2]已阅，可用。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部长。

[2] 指罗瑞卿1958年5月10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题目是《进一步贯彻群众路线，更好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

对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5月13日、24日）

一

即送胡乔木[2]同志：

有些修改，你看何如〈如何〉?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第五章有些话显得陈复多余，宜加删节。二、三、四章也有一些多余的话，可试删节。

第一章则无一句多余的话，觉得很好。

---

[1] 毛泽东对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稿先后修改了两次：一次是1958年5月13日，一次是5月24日。这两次修改比较完整的有六段，见本篇六至十一，其中八、十是5月13日修改的，六、七、九、十一是5月24日修改的。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二

退胡乔木同志：

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我又作了一些修改，你看如何？并请送少奇同志酌定。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上午六时

三

成语是削足适屦，不是适履。屦是草鞋，履是一般的鞋子。[1]

四

是否确是一月，请再一查？[2]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5月13日修改刘少奇报告稿时，对文中一个错字的批语。刘少奇原报告稿中说："对于不平衡的出现惊慌失措，因而要求先进向落后看齐，要求削足适履、因噎废食的平衡，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将这句中的"削足适履"的"履"改为"屦"，并写了这个批语。

[2] 这是毛泽东1958年5月24日修改刘少奇报告稿时在文内写的一个批语。刘少奇报告稿中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在一九五六年一月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毛泽东在这句中的"一月"处画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胡乔木查后，在毛泽东批语旁边写道："已查，不错。"

五

“从来”不对，错误路线统治时期能够如此吗？[1]

六

帝国主义各国之间，首先是美、英、法三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化了，虽然它们现在仍然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反共、反人民、反民族独立运动为目标而互相联系着。

七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5月24日修改刘少奇报告稿时在文内写的一个批语。刘少奇报告稿中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多次指出，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应当是‘不断革命’。及时地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使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不致在中途发生停顿，使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不致因为革命的间断而冷却，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不致因为满足于既得的成就而生长起骄气和暮气——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把这段话的最后一句中的“从来”二字改为“长期以来”，并写了这个批语。

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所有这些号召，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八

曾经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表示怀疑的同志，许多人已经从这样一次反复中得到了教训；有些人却还没有得到教训，他们说：“到秋后再同你们算账。”让他们等着算账吧，他们总是要输的。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一九五六年——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九

在我国的六亿多人口中有五亿多农民，他们无论在革命斗争中和建设工作中都是一支最伟大的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这个伟大的同盟军，把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胜利。农民同盟军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革命时期是这样，建设时期仍然是这样。无论在什么时候，政治上犯错误，总是同这个问题相关联的。

十

至于以破坏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人们的言论行动，我们从来没有给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允许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出来，在人民面前建立对立面，以便让人民从比较中看得清清楚楚，激起众愤，群起而锄之，借以锻炼群众的斗争本领，开辟社会主义的百花齐放的广阔天地。这个政策是公开宣布了的，过去采用过，今后还要采用。毒草是客观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不过遥远将来的毒草，不带现在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罢了。毒草既然是客观存在，不让他们以本来面目生长，它们也会以各种变形面目生长，暗里地毒害人群。不如公开对它们说：毒草是不合法的，长出来是要锄掉的，但是我们并不禁止你们长出来，有谁愿意出来斗争就出来吧。这个政策很见效，大批毒草猖狂进攻，被人民锄掉了。未被锄的仍然起来斗争，并不因为前车之覆，后车就警戒了。凡未被锄的，今后一有机会，必然又会起来，那时又得再锄。锄毒草，这是敌我问题；放百花，这是人民内部问题。两类矛盾，两种方法。资产阶级的反动右派自命为社会主义的百花之一，那是冒称的，不能算数的。

十一

我们应当向毛泽东同志和其他联系群众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中央、省、地、县、乡各级党的和群众的大批领袖人物）学习，学习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

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严肃的原则精神同生动的独创精神相结合的榜样，学习他们同亿万群众在一起、看到了正确方向、抓住了真理、就为真理而奋斗、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榜样。

对陈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5月15日）

一

陈云同志：

此件可以用了，并且可以在明天讲。我加了几句[2]，你看如何？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晚十时

二

我们必须依靠各级党委和依靠群众，必须向中央和各级党委经常反映财经情况，必须纠正那种平时不反映或很少反映财经情况，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8年5月16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主要讲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速度问题。

[2] 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一次下倾盆大雨的错误办法。无论是工业方面、农业方面、财贸方面、或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又应经常注意检查，并且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大鸣大放的办法，敲起警钟，批判脱离群众和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

在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的信上的批语

（1958年5月15日）

小平[1]同志：

苏共五月九日给南共的信[2]，是一个好文件，和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他们想通了，站起来了。请你做两件事：（一）找苏使馆负责人谈一下，表示热忱祝贺。或者在大会[3]后由我找他谈一次。这是一件大事，苏共政治理论有转机，作风在改，大有希望。（二）将苏件立即印发大会代表阅读。如有时间在小组会上谈论一次，并可带回去。奇文互相赏，迅即印发。此信附印在苏件上，放在前面。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58年5月9日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的信，主要就苏南两党关系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提出看法，认为南共七大的纲领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相对抗的，大多数南共领导人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对苏联、苏共和各兄弟共产党进行了不友好的和敌意的批评。

[3] 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四海之内皆兄弟[1]

（1958年5月16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1958年5月14日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报告说，我部担负的是一项新的建设任务，很多技术问题我们不懂或者不完全懂，因而苏联专家就成了我们当前的重要技术力量。苏联专家受苏联党和政府的委托，积极热情地来帮助我们建设，他们把能够帮助我国建设最新技术、最高标准、规模大的、内容齐全的厂矿，看作是自己最大的荣誉，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前一时期，由于我们对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大中小相结合的方针强调不明确，在共同设计的时候，有时我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彼此之间有些争论，因此在一些技术问题上扭来扭去，各执一词，形成了两股劲。直到成都会议后，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示，进一步明确了总路线，才有所转变。这个转变经过一个过程。开始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教条主义态度，不敢想，不敢问，认为自己不懂，只能照抄照搬。成都会议之后，进一步总结了对苏联专家工作的经验，发现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也必须政治挂帅，强调务虚，以虚带实，虚实结合。近一个多月来，我们运用各种方式反复向苏联专家介绍我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总路线，介绍整风运动和其他有关的中国实际情况，使苏联专家自觉地掌握中国的方针路线，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工作，效果很好。现在苏联专家能够和中国同志一起主动地讨论怎样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怎样贯彻多快好省路线，许多设计修改了，想了很多窍门，制出新的更合理的设计。这就使过去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正如一位苏联专家所说“这是中苏友谊的结晶”。

一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1]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2]！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

二

小平同志：

此件请即办。批语印在文前。

毛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贾桂，京剧《法门寺》中的人物，明代宦官刘瑾手下的太监，在刘瑾面前，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对滕代远[1]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58 年 5 月 16 日）

即送滕代远同志：

此件[2]写得很好，看了很高兴。立即就向大会去讲。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

---

[1] 滕代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

[2] 指滕代远1958年5月15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怎样把铁路修得快些、办得好些?》。发言稿内容包括：（一）必须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二）全国工农业大发展，迫切需要铁路建设大发展；（三）全党全民办铁路，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是完全可能的。

祝贺挪威王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5月16日）

挪威王国国王奥拉夫五世陛下：

当挪威王国国庆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和挪威人民致热烈的祝贺。祝中、挪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祝陛下身体健康，挪威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六日北京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 年 5 月 17 日）

一　国际形势

讲讲卫星上天吧。上天是好的。这个卫星比第二个大一倍以上，几个月以后，一年、二年、几年以后，也许再搞大一点的，两千公斤的。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搞五万公斤的，搞到五千公斤只是十分之一。突破这一关就可以搞两万到三万公斤，这是很大的好事。

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乱子很多，我们这个世界现在乱子比较少，我们团结巩固，南斯拉夫不在我们阵营，它不算，不是我们不要，是它自己不干。我们阵营十二个国家形势很好，形势从来就是好，没有哪一天不好过，不过有时天上有些乌云。有人认为我们不行，人家行，我说我们行。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十条证据，证明我们从来就行。蒋介石在南京，我们在延安，究竟哪个行？那时延安只有七千人，还包括郊区在内，南京那么大，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在蒋介石手里，他们有几百万军队，我们只有几十万游击队，从来就是小的战胜大的，弱的战胜强的，小的弱的有生命力，大的强的没有生命力，总的形势很好，希特勒、蒋介石、美帝国主义不在话下，我们从来把美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美帝国主义可惜只有一个，再有十个也不在话下，迟早它是要灭亡的。

日本人在北京和我说："很惭愧，过去打过你们。"我说，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到了北京。我们在延安时说，哪一年才看到梅兰芳、程砚秋的戏，有的人怕这一辈子看不到，可是我们看到了，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七年来全国团结，就推翻了蒋介石，现在又要团结起来建设。七大有个纲领，这次会议也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也有个共同纲领，全党一致制定了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全国人民的总路线，全党团结，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这是国内形势。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法国、阿尔及利亚、拉丁美洲、印尼、黎巴嫩乱子都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但我们都有关系，凡是反帝国主义的东西，都对我们有利。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他们压迫印尼、黎巴嫩、拉丁美洲，还争夺阿尔及利亚（不详讲，看材料）。总而言之，有时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这种时候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以为我们就不好了，就觉得世界不好了，要倒霉了，没那个事！我们过去最不好的那一段是万里长征，前堵后追，军队少了，只剩下一点点，地方小了，党也小了，十个指头剩下了一个，那样的困难都克服了，得到了锻炼。以后机会来了，又发展了，又由一个指头发展到十个指头，一直发展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全国的胜利。苏共党史第一章第一页就讲到由小到大的辩证法，苏共由几个人开始的小组，发展成为苏维埃联邦的大党。他们当时一支枪也没有，而他们的敌人先是沙皇，后来是克伦斯基政府，都是全副武装的，是全副武装强，还是手无寸铁强？你说哪个强，我说手无寸铁的人强。最后是谁战胜谁？我们党的情况也是一

样。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到的十二个代表，董老就有你呀！你参加了吧！参加这次大会的周佛海是个“好同志”。（笑声）有个陈公博又是个“好同志”。（笑声）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想一想我们党的历史，我们经过了多少困难！有一段万里长征，还有一段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在上海开，没有几个人了，危机存亡，党在分裂。

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也是党在分裂，党经过分裂，以后又团结。张国焘跑了，党恢复了团结，后来在延安，蒋介石和日本包围我们，将我们分割成十几块根据地，那样困难的局面，到底延安强些还是南京强些？我们强些还是蒋介石强些？现在证明是我们强，不然为什么现在我们能在怀仁堂开会呢？他为什么跑到台湾呢？是谁胜利？

中国是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讲到国际形势就要讲中国，举中国例子，就证明劳动人民被压迫者有生命力。现在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同盟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的同盟军。这些地区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在它们后方有我们的同盟军，我们绕到帝国主义后方来了。列宁说：“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欧洲，英、法、意、西德、比利时、葡萄牙都落后了，美国也落后了。你看他们先进我们先进？斯大林懂得这一点，一九四九年六月□□□率领我党代表团到苏联，斯大林在宴会上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要超过苏联，□□□同志说：“这杯酒我们不能喝，你是先生嘛，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了一二十分

钟，最后□□□同志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赶不上先生就不争气。这说明不仅列宁，连斯大林也看出了先进的东方。师高弟子强。我们不要狂妄，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也不要有自卑感，妄自菲薄。要破除迷信，把自己放到恰当的地位。应当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铁托也敢想、敢说、敢做，但他的基础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列主义。我们的基础是马列主义，因此我们是正确的，所以敢想、敢说、敢做是不会出乱子的。

二　国内形势

讲讲国内问题。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农民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工人阶级假如没有农民同盟军，就不能得到解放，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家。解放前，我国工人阶级数目只有四百万人（手工业除外），现在有一千二百万人，增加了两倍。连家属在内不过四千万左右。而农民则有五亿多，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不很清楚，在农村混几十年也不清楚。一九五六年为什么犯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对农民思想情绪不太懂，因此就没有根，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一九五六年我们出了一本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书，搜集了各省、自治区一百九十几个合作社的资料，哪一省都有几篇文章，只有西藏没有。其实不需要那么多。有一个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资料就差不多了。另外冀中有个穷棒子社，中农跑了，只剩下三户贫农不散，他们还是坚持下去。这三户指出了五亿农民的方向，每个省都有许多合作社增了产，一增产就是一倍、几倍，你还不相信吗？农业四十条一定能实现你还不相信吗？我看是能够实现

的。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不相信的人相当多，所谓观潮派很多，从中央到各级都有那种人。现在还有□□□说的秋后算账派，不去找积极因素，只找消极因素。听几个干部说农村不大妙，三四个人往耳朵内一吹，说合作社不好，眼前一片黑，农民吃不饱，说什么不增产、无余粮等。家里人写信为了要钱就说得很厉害，写得苦一点，说什么粮油布都没有了。不然你就不寄钱。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作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些什么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中央一级没有人喊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立场上看问题呢，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看问题？

现在比较好些，农村有了大跃进。经过整风、反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一部分管理工作，城乡政治空气变了，农业“悲观论”“没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可以说一扫而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部分人还没有扫光，所以还要注意工作。谭□□报告中提到要防止华而不实，浮而不深，粗而不细。这些话是江苏提出的。就是说要看出自己的缺点，十个指头，九个指头是光明的，一个指头是阴暗面。华者花也，不要只开花不结果。粗而不细，张飞粗中有细，我们就当张飞，要粗中有细，不要华而不实。粗而不细，以免秋后达不到指标的要求。各行业各部

门同志们都要注意，不论什么工作，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写小说等工作都要注意。

国内形势很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包括多快好省在内，没有信心。多快好省是讲工业、农业、交通各项工作，基本问题是农业，是对四十条的问题。现在信心高了，是由于农业生产大跃进。农业跃进压迫工业，使工业赶上去，一齐跃进，推动了整个工作。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五年、七年，究竟几年地方工业的产值赶上或超过农业产值？各省就进行规划。这个纲一提起来，一月不算，二、三、四，只有三个月，省、县、乡的地方工业就蓬蓬勃勃搞起来了。现在许多同志都了解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央有些同志不大了解。经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四、五、六几个月，现在解决了。去年六月，恩来同志在人代会上的报告很好，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那篇文章很可再看一下。那时问题真正解决了，深刻了解还在以后。

现在中央规定中央负责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解剖几个麻雀、几个工厂、几个合作社。把根扎在人民群众身上，把人民群众的根扎在脑子里面，不然总不深。感谢河南长葛县第一书记的发言。这个发言很好，我又看了一遍。一年把一百二十万亩地全部深翻一遍，深翻一尺五，争取亩产几百斤。这就提出一个新问题，各县是否都能做到。河南长葛县能做到，别的县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就可以了吧？五年总可以再翻一次吧？我看五年总可以，他们第二个五年计划把全县所有的地都翻一遍。没有好工具就用长葛县那样的工具，用他们那种办法。他们的办法是：先把熟土翻在一边，然后把肥料施在生土上，再用铁锹把二层生土翻开，与肥料搅拌，打碎坷垃后仍放在下层不动，挨着

翻第二行，把第二行熟土翻在第一行生土上，依次翻下去，表层土不变。这是个大发明，深翻一遍增产一倍，至少增产百分之几十。增产的措施，土壤应当放在前边，土、肥、水、种子，还有密植，要单列一项，要合理密植。广东一亩要搞三万垛，每垛插三根秧，每根秧发三根苗，结二十七万个穗，每穗平均六十粒，共一千六百二十万粒。两万粒一斤，一亩八百斤。亩产八百斤不就算出来了吗？北方的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大豆等都可以这样算一算。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们都不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被植物吸收变成碳水化合物，经过光合作用，制造植物需要的东西，碳水化合物等于二氧化碳加阳光。粮食是热能储藏库，每个结构都是个小水库。这扯远了，主要是讲扎根串连，研究几个合作社、几个工厂，串连搞几个连队，教育搞几个学校，商业搞几个商店不要多了，总之各行各业都是要搞几个，抓几只麻雀，然后才有深刻的印象。要尊重唯物辩证法，首先要尊重唯物论。为什么要尊重唯物论？世界现、方法论、认识论，这三个东西是一个东西。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生下来就有，还是实践之后才有？人的思想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看见狗，看见人、小孩、树木、马、石头等概念，概念初步形成之后，才可以推理和判断。问三岁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就是小孩的判断。妈妈是个别的，人是一般的，这里面有同一性。这种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的统一，这就是辩证法。所以说三岁小孩就懂得矛盾统一，懂得辩证法。我们的思想只能由客观世界刺激感官而形成，是客观实践所形成。概念是从哪里来的？是客观世界来的。现在的多快好省的概念是积累了许多经验

才形成的，中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根据地的经验、几年建设的经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也是非要不可的，没有这个不行。一个人，一群人，一个党，没有干劲，干劲不足就不好办事。上游当然要争，力争到四川，不争下游，下游是江西。这是借自然地理来谈问题。要向先进看齐……

我们的同志要和群众联系，要真正懂得群众的感情，要使群众的感情深入到我们脑筋中来，群众的感情不深入我们的脑子，就容易动摇。深入了，工作上有问题，就有办法对付了。过去我们打仗也常遇到困难，到半夜十二点还无办法，睡一觉第二天办法就出来了。经常有困难的事，不容易的事。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我们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深知凡遇到困难的事就和群众商量一下，睡一觉，开个会，就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问题，没有困难吗？不要为一时的黑暗所吓倒。我们经常有两个因素，一是光明，一是黑暗。现在河北北部就干旱不下雨，你说河北同志不发愁？他们去年搞四十亿斤，今年搞八十亿斤，就是旱也要增产五十亿到六十亿斤。国内形势很好，有黑暗不要怕，有两个侧面，光明和黑暗。犯过错误的同志，去年六月就了解了，现在更深刻地了解了。还有很多“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也不怕，多讲些道理，要好好说服他们，摆一摆国际国内形势进行教育。

三　除四害

讲个除四害。除四害好不好？我很感兴趣。《参考消息》说印度人也感兴趣，也想除四害。他们有猴子一害，吃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化得更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不懂。这点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过。

我们的口号，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我看我们的口号高明一些，应当高明些，因为先生教出学生，学生应当比先生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居上。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他“干部决定一切”，我们要干部嘛！他“技术决定一切”，我们要技术嘛！他“苏维埃加电气化”，我们要共产主义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以提前到来。苏联的老底子在一九一三年时是四百万吨钢。那是在辛亥革命后两年。十月革命时工人四百万，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〇年三年内战不算，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六月，共计二十年加半年，他们搞到一千八百万吨钢。德苏战争一九四一年六月开始，就拿这点钢打败了希特勒。苏联二十年加半年比老底子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不要这么多时间，我们有苏联的帮助。有六亿人口，有苏联四十年经验。从他那里学，但是对的我们就学，不对的不学。几千万吨钢我兴趣不大。一九六二年我们三千万吨，一说三千五百万吨，还有一说四千万吨。八年加五年十三年。我们老底子不是四百万吨，只有九十万吨。这些钢主要是日本人搞的。其次是蒋委员长。蒋介石实在不高明，他搞了二十年加满清张之洞的老底子才搞了四万吨，蒋介石不灭亡实在无理。苏联从四百万吨钢，二十年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十三年不是增加一千四百万吨，而是三千万吨。所以说事在人为。六亿人口加

苏联经验。几个并举，群众路线，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列宁讲党群关系讲得很好，斯大林这方面不会讲。列宁讲不管多大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十三年三千万吨可能超过，数字不着急。总而言之，大大超过。为什么？六亿人口，群众路线，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落后阶层也都发动起来了。富裕中农、贫农、工人中一部分落后的人也起来了。

做事要有紧张有休整。常常紧张不好。又紧张又松弛，太紧了也不行。河北、河南大办又红又专的学校，这很好。可是大家太累了。上课时有人打瞌睡，先生也累了。但不敢打瞌睡，硬挺着。太累了不行，总要有几天休息。我们要有张有弛。“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文王武王人家是圣人啊！尚且不能，我们能行吗？

有紧张，有松弛；有团结，有斗争。只有团结没有斗争不行。斗争是为了团结，大中小结合，有张有弛，有民主有集中，哪个地方都是一样的。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斗争。但目的是为了团结，不是不叫革命。阿Q最伤心的事是不准他革命。不帮助人家改过，一味批评不好。一斗二帮，要有好心，没有好心，居心不良可不好，无非是打倒你我来。多一个人好，少一个人好？人多一点好，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辩证法应该在中国得到发展，别的地方我们不管，中国由我们管。我们这一套比较合乎辩证法，比较合乎列宁，不太合乎斯大林。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合乎生产力的发展，否认矛盾，他死前写了一篇文章否定了自己，说完全适合不是没有矛盾，处理不好也可能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斯大林没有辩

证法，有，有几成，有迷信，有片面。但也依他的方法建成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敌人，有五千万吨钢，今年可能到五千五百万吨。三个卫星上了天，那是一种方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别的一种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都是马列主义。比如经济斗争，我们采用列宁的，而不采用斯大林的。斯大林在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革命后的政策是从上而下的和平政策，斯大林不搞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对东欧、北朝鲜和平土改，没有斗地主，没有反右。只是自上而下的对资本家，不斗争，我们有从上而下，但又加了一个从下而上的扎根串连阶级斗争。我们在“五反”中斗争了资产阶级。现在搞建设，我们搞群众运动，从上而下的要一点，如政府的命令指示、规章制度等等。但大量的要群众自己来搞，反对恩赐观点、和平土改，东欧和朝鲜的办法，我们不要恩赐观点、和平土改。没有阶级斗争，没斗地主，没斗资本家。路线不对，遗害无穷。

为什么我们比苏联的建设速度要快？四十年他们搞五千万吨钢。我们可能只要十五年就行，从今年起可能再要七年。王□□提出一九六二年四千万吨，很有可能六三年达到五千万吨以上。是否如此，请大家想一想。讲十大关系时讲过。可否比苏联快一些？因为我们条件不同，六亿人口。苏联走过的道路，苏联的技术援助，应当比苏联发展得快一些。我们将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群众路线加以发挥，依靠群众。农村依靠贫农，不过他没有这句话。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地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淘大粪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

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哪个好，真理在哪，就跟，不要跟某某人。糊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我们同志对十个指头，往往搞不清。一出事忘了十个指头。劳动人民内部矛盾。劳动人民犯错误总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错误也是如此。我这不是讲，古大存、李世农、□□□、陈再励、李峰、吴芝圃同志发言很好。安徽发言为什么不讲李世农？浙江讲沙文汉也讲少了。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为啥不讲？他们这些人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沙文汉是十个黑指头，陈再励也是十个指头都黑了……李世农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现在讲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有动摇的人，这些同志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问题。现在又看清楚了，他们与这些人不同。要团结所有这些人，要保护这些干部，要坚决保护各级积极分子，虽然有错误，但他们积极。他们怕大鸣大放，怕下不来台。坚决保护就下台了。他们的错误只是十分之一，在整风中要坚决保护这些干部。青岛会议文件上就讲了保护干部的问题。以前也讲过，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个别例外。资产阶级中间派，中中是五个指头（五个指头是资本主义，五个指头是社会主义），中左是六个到七个好指头，中右是六个到七个黑指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脑筋一下子洗不干净。需要几次反复。资产阶级还会反复，大的没有，小的可能……无产阶级也会起风浪，在十二级台风面前，我们有些同志还会动摇的。但有了去年一年的经验，全党经历了一次锻炼。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去年那么大的风，我们的船没有翻。有人说《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写早了一点，也不早。再下去有些左派也要烂掉。实际上去年

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你说章罗划了右派就不能进攻吗？他照样进攻。只要温度适宜，达到三十七度到三十八度，那些东西照样会放出来的。

不要忘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就是忘了这个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要从中吸取教训。

四　准备最后灾难

现在讲点黑暗，要准备火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战争疯子甩原子弹怎么办？甩就甩吧，战争贩子存在一天，就有这个可能。还要准备党搞得不好，要分裂。我们搞得好，不会分裂，搞得不好也会分为二。现在这样搞不会吧？但在某种情况下不能说不会分裂。苏联还不是分裂了吗？我和□□说过我们有分歧，对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都谈过，我们有些事，为大鸣大放你们也不一定赞成，有意见，但这都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在莫斯科和□□□□、□□□、□□□□□谈话，我们有□□□参加，单独谈，把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和平过渡问题，公开场合不谈，法宝留一点，个别谈都谈了。谈斯大林欠我们的债，我们有一肚子气，气拿出来帝国主义就感兴趣。什么气？两笔账，一王明路线，二不许革命。王明路线实际是斯大林路线。抗战时，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以后不许我们革命，不准打内战。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劝蒋介石，斯大林劝我，说打内战我们民族有毁灭的危险。说得过分。怎么毁灭呢？有那么容易？打原子仗，我们死一半还有三亿人口。在十二日会议上讲，气不多了，什

么事我不讲。

战争与和平，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争取和平的可能性比过去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比过去大，和平的可能性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苏联强大，民族独立运动是我们强大的同盟军，西方国家不稳定，工人阶级不愿打仗，资产阶级一部分人也不愿打仗，美国人也不愿打仗，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帝国主义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现在打原子战，时间会缩短，不要四年，只三年就可以了。要准备，真正打怎么办？要讲讲这个问题，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既有可能打世界大战，就要准备，不能睡觉。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打仗死人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汉武帝时五千万人口，到三国两晋南北朝，只剩下一千多万，一打几十年，连连续续几百年，三国两晋南北朝、宋、齐、梁、陈。唐朝人口开始是两千万。以后到唐明皇时又达到五千万，安禄山反了，分为五代十国，一两百年，一直到宋朝才统一，又剩下千把万。这个道理我和□□□讲过，我说现代武器不如中国关云长的大刀厉害，他不信。两次世界大战死人并不多，第一次死一千万，第二次死两千万，我们一死就是四千万。你看那些大刀破坏性多大呀！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假如党分裂，就会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有人和饶漱石、高岗一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

你们要注意一下。中央委员更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要跌跟头。□□□□不让□□□□革命，他不看中国小说，未看过阿Q正传。你们看过阿Q正传没有？这是本好书，没看的要看。高岗不准中央个别同志有个别缺点，不准革命。□□□□□□他们把一个指头的缺点说成十个指头，闹分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凡不顾全大局闹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罗章龙、张国焘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闹分裂，搞分裂是不对的，只有一种分裂是可以的。像第二国际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投帝国主义战争的票，列宁才和他们决裂。在以前，列宁和他们有斗争，但不决裂。我们要作合法斗争，来争取多数；不要搞分裂，不顾大局。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冯白驹（比古好些，有进步）……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是闹分裂的问题，广西陈再励也是，冯白驹稍好一点。他们是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新疆也有一批干部闹分裂，不是各民族团结起来，而是要分裂出去。西兰也有人在闹，想分裂，不想合作。闹分裂的人都是会失败的。

我们是要调动六亿人民的力量，连右派我们都要做工作，分化他们。你们开了右派分子会议没有？使右派中十个人有七个人改好，经过十年八年改好了，会站到我们方面来，摘掉右派帽子。再三五年再坏，再给他戴上。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

（1958年5月18日、20日）

一

此件[2]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1958年5月3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1954至1955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1956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1957年2月试制成功一台30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5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150台，一九五九年生产1500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25马力拖拉机。

受刑剹〈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三〈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二

小平[1]同志：

此件请即照发大会。

毛
五月十八日上午六时

三

送小平印发。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此件有用，印发各同志阅。

昨件“戮”误为“剹”；“三刖其足”，“三”应为“两”。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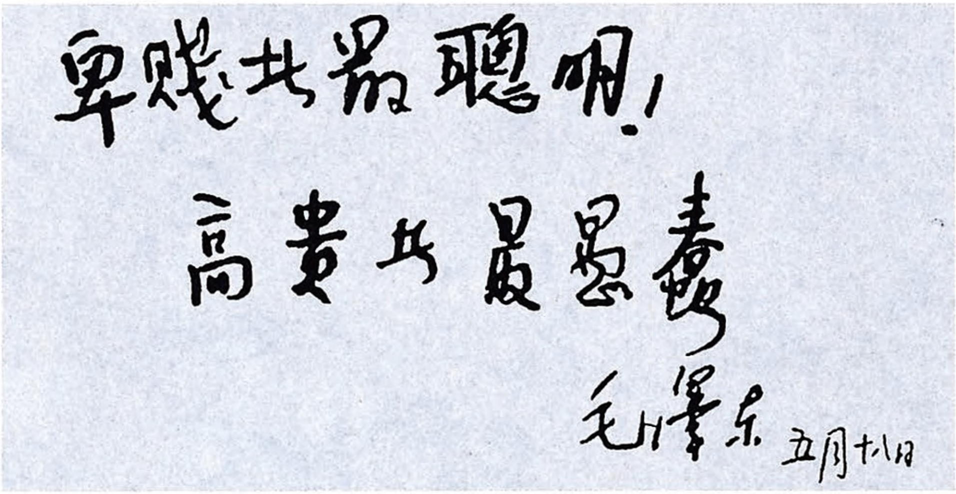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日

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拖拉机成功题词[1]

（1958 年 5 月 18 日）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



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丹东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试制拖拉机成功的题词。

---

[1] 1958 年 5 月 18 日，毛泽东来到丹东五一八拖拉机厂参观，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十二个大字，送给全厂职工。

在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

（1958年5月18日）

写一个近三百年来的各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写明其年龄、出身、简历等，看看是不是都是没有多少学问的人，各行业搞各行业的。

科学家华罗庚是个中学生。

苏联搞出人造卫星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是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员，主要是教数学，搞卫星是他的副业，慢慢搞成了专业事。

当然，美国也有发明，但发明者不是杜勒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一个人能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龄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二三十岁敢于幻想，人学问多了，不行了。

白蚂蚁全世界没有办法。广东一个只读过中学的青年学生，想出了办法。

中国楚人卞和（即“和氏之璧”的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把璞玉于荆山之下。经过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瓦特是个工人。

富兰克林是小报童。

种试验田要三结合——领导、技术人员、老农（老工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

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要用这些材料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己起来创造。

我曾问过一些人，我们是不是在天上？算不算神仙？是不是洋人？大家答复都是否定的，他们就有迷信。

两次讲话，一是破除迷信，二是讲国际国内形势，三是讲灾难。

国际形势总的说来是一片光明。但也可能有战争。

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不抓农民没有政治，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就会犯错误；有了这个同盟军，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八十年发展资本主义，等待工人多了，农民觉悟了，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解放后的农民，精神振奋，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是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能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不提和苏联比，实际上是和先生比。我们有两个生身父母，一

是国民党的社会，二是十月革命。群众路线、阶级斗争是学列宁的。对资产阶级彻底消灭（包括思想在内），但不没收。人不灭掉，斯大林不搞群众路线，搞恩赐观点，阶级斗争又过分了。

国内形势主要是农民问题：水、肥、土、种、密、深翻土，长葛县的办法是一个典型。

我主张重工业，冶金、机械、化学、煤炭、外贸都要讲一下，宁可迟一点闭会。

二十六个省、市、区，十三个发生问题。政法系统、文艺系统很乱，是全国性的。

两种：一种是右派分子，一种是右倾机会主义。犯路线错误的，允许革命。对于潘□□、古大存、冯白驹，这次会议都不处理为好，提出处分是正义的，不处理也对。

有几个文件印一下，王明和库西宁的谈话、天津一个支书和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给主席的信。

天津支部书记很好，没有软下去，因为过去没有告诉那么多人，放不放，在那时是跟不上的。清华大学烂掉一个支部。

还有《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印一下，其中讲所有制基本解决就对了。但在相互关系即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估计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是有点过分乐观，料不到还要搞这样的大革命。至于中国资产阶级，估计会有斗争，要用长期的斗争来肃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深厚的影响。单独一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免不了的，在所有制基本解决以后必须另搞一次。这次这场革命，没有料到几个月就解决，整风提前也没有料到。当时的整风是由于形势逼着而来的。同资产阶级斗争是必然的，但“反冒进”也促出了右派的进攻。借右派之

力来整风，我有自觉的。放出来再想办法，斗几下再说。青岛会议印成了一个材料。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很坚决，提出：共产党倒了怎么得了？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无论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经过大跃进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选举有什么意见？头上不长角不好，多了也不好。牛角两只角，正好，四个就多了。候补选一批就平衡了，候补多几个也没有问题。

工农兵、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也是“农民主义”吗？我和欧洲同志谈：你们怎样？欧洲情况，除了农业工人以外，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大跃进不要太紧，红专学校学生上课都打瞌睡，这怎么行？中央苏区二次反围剿，两个星期打了五次仗，很少睡觉，但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突击。要注意不要太紧，

协作区如何搞？是否定之否定。

大会后休息一天，再开两天会，每省一个，中央若干人参加就

行了。

八月五日再开会，我们有两个整月的时间抓工业、商业、文教、军队。现在就要准备和布置秋后的农业生产。

除四害，全民大动员，五岁的小孩都调动起来了。

各省党内出了问题的，要写一篇发言，有时间就讲，无时间就书面印发。这次会议的发言印一本丛书，事实上是自己评比，许多好经验非常丰富。

广东新会县商业工作搞得好，可以到那里开一次现场会议。

深翻学长葛县。一年不行，三、四、五年翻一次，总是可以的，增产一倍。

八亿人口，十亿也不怕。美国记者说，一百年后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一半。那时文化高，都是大学生，很自然会节育。中国地势条件好，东边大海西边大山。

中国有自己的语言，如“共产主义”“帝国主义”这两个词。苏联、美英等国的读音都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就和外国的读音完全不同。自从秦始皇以来，从来不把外国人放在眼里。过去谓枣秋之邦；到了满清末期，外国人打进来了，打怕了，都变了奴隶，感觉不行了。从前骄傲，现在又太谦虚，来个否定之否定。

明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如果五年能达到四千万吨，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上八年就能赶上美国。

中央一年抓四次，一次党代会。省抓六次，两次大检查，小抓四次。

看到农民瞒产我高兴。你多我也多，农民有，就等于我们有。

森林下放，地方包干。

竹子要大发展。北方不长竹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对《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1]的批语

（1958年5月19日）

一

小平[2]同志：

此件请印发大会各同志。

毛

五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二

见今年第63期《宣教动态》。[3]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宣教动态》第63期刊载的《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文中说，4月25日下午宋任穷约集第二机械工业部在京的苏联专家座谈，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当前整风和大跃进情况，以及多快好省的建设路线、工农业并举、大中小结合的建设方针等，并列举了苏联专家协助我国贯彻多快好省路线的大量事例。苏联专家沃尔比约夫除在会上讲话外，会后向翻译说了一些意见。沃尔比约夫说：现在中国党提出的

“多快好省”的建国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主要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又多又省”这两点，必须结合当地情况。比如在苏联钢材很便宜，而木材很贵，但在中国却相反，木材很便宜，而钢材很贵。假如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况，而提建设时都要用钢材，不用其他代用品，势必造成多花钱，就不合乎“多”“省”的精神。又如在苏联提倡搞机械化、自动化的大型工厂，这是因为苏联人少，劳动力不够。但在中国就不一样，中国人多，现时如果也提倡像苏联一样搞机械化、自动化，就不合乎中国国情。中国党现在提出多搞中型、小型厂矿企业的方针，是合乎中国情况的。这样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在这以前，沃尔比约夫也说过，在他与中国同志的接触中，常发现有些同志在工作中不动脑筋，主动考虑问题不够，不管大事小事都要依靠专家来解决，甚至在讨论问题时，有些同志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而是只抄专家的答案，事后原封不动地去照办。这不是创造性地学习先进经验，而是机械地搬用。因此，也就容易发生偏差，不合乎中国国情。专家只能起顾问和指导作用，许多问题还得中国同志自己来解决，因为他们了解情况最清楚，同时也便于发挥本身的独立思考精神。这份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印发。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这是毛泽东在《苏联专家对“多快好省”路线的看法》一文后写的说明。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8年5月20日）

主席团决定我讲一次话，采取成都会议的方法，总共讲三次。已经讲了两次，今天是第三次。

（一）再讲破除迷信。第一机械部发了一个材料，不知印发了没有？搞了四十一名科学家、发明家的小传，都是比较穷苦的。其中只有七个是工程师，比较有社会地位的，其他都是贫苦的，或工人出身，农民出身的。如瓦特就是工人。这批材料很有用处，已经印发给同志们，希望各部门都搞一下这种材料。这个材料是从十八世纪搞起的，是一百多年的事。一百多年也好，二百多年也好。无论从何时搞起，对破坏迷信很有好处，对我们很有帮助，可以帮助我们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工农、小知识分子有自卑感，可以破除。上回来讲农林水（工业交通）、卫生应该加上。农林水、政法文教、卫生各部门，都可搞这方面的材料。

（二）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

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你是我管的。”就靠这个吃饭，妨害创造性的发展。要破除这种东西，在大部分人中扫除官气。只看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他是挑大粪的、挖煤的、扫大街的、贫穷的农民，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官做得再大，真理不在他手里，就没有理由服从他。多数人扫掉了官气，剩下少数人就孤立了，就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不是高级趣味，不是共产主义精神。相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才是高级趣味。这样一来，我们所要防止的大国沙文主义就可能防止。如果全党大多数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谦虚（科学谦虚），就可以防止，出了也不可怕。

（三）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差不多可以说，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过去右派提出了这个问题，闹得天翻地覆，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是否可以这样讲呢？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处于被动地位。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对右派的批判不系统，讲得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行科学技术。每人只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只会青衣，而旦角就是青衣、花旦，老旦就不如李多奎，此外还有其他角色，老生、小生……一万行里头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内行，人人可能成为内行，但是人人又是外行，对九千九百九十九行是外行。一个人精通两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隔行如隔山，内行少，外行多，岂不是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外，对其他行业也应当知道些，摸一摸，略熟一门，有点常识是必要的。如做党的工作的，熟悉工业、农业等是必要的。但要熟悉多是不可能的。我就只会坐飞机，不会开飞机。中学有十几门科学，大学就更多。许多事情是由业余转化的。如孙中山，开始是被人看不起的，当个小医生。二十岁搞革命是不合法的，开始当医生他是内行，搞政治是副业，后来搞革命。政治转化为正业，不行医了，医又是副业，甚至不干了，变成外行了。但是，这时可以管医生了。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不起自己，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四）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除了南北极，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要插旗子的，从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现在南北极也在插旗子，美国插了，苏联也插了。可惜我们还未去。北极南极都没

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开一只船到南极、北极去一趟。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不是红旗子，就是白旗子，或者还有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某些合作社，究竟插什么旗，右派和我们双方都在争夺，资产阶级要插白的，我们要插红的。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学校、连队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插的什么旗子？不是白旗就是灰旗。我们要到那里走一走，到落后的地方走一走，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红旗插起来。一个生产队也要有个旗子插起来。

庸俗的谦虚，就是不插红旗。不插红旗就是低级趣味，虚伪的谦虚。“闭口道士”，不吹吹打打，这种谦虚应当批判。有这社会舆论，奖励这种作风，不挺身而出，不敢想敢说敢做，这是从《儒林外史》那里学来的。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学会辨别风向，看刮什么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苏州姑娘林黛玉讲的。世界上总是分党派的。社会上的人总是分左、中、右三种，有的处在先进状态，有的处在中间状态或者落后状态。现在的任务，就是依靠先进分子争取中间状态的人，带动落后分子。要争取中间分子站到左边来，即插起红旗。右派插的白旗，是资产阶级的旗子，中间分子插的旗子是灰的白的。唐朝有个刘知几，说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才是才干，学是学问，识不是指知识，是指善于辨别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是“识”的问题，不讲前面两者，要善于识别风向，要有识别力。识别力有其极端的重要性，尽管有些人很有才，很有学问，但对识别风向很迟钝。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识别风向，未刮风，刮小风时就知道刮大风，站到看台上，什么东西看不到，是不好

的。没有预见性，已经相当普遍存在了，还看不到，这种状态给右派可乘之机。你看不到，位置由他们占领，他就来了。

要驳右派、插红旗。随时随地，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平原、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现在许多地方并非都是红旗，参差不齐。有的刚刚插起红旗，过几年又不红了。又落后了，不红了。经常变化，这也是自然状态，旗子变了，就要换。

（五）讲一个红白喜事，上次讲对付可能的灾害，主要是讲的战争和党内分裂，灾难有大、中、小。我讲的是大的战争分裂。

中国人把结婚叫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合起来叫红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是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孩子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母亲分裂出三个、两个、一个小人出来。多子女的分裂出六七个，七八个，甚至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我不是不赞成节育，我是讲辩证法，是说新事物的发生，人的生产，这是喜事，是变化，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至于死亡，老百姓也叫喜事。一方面开追悼会，哭鼻子，要送葬，人之常情；另一方面是喜事，也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讲辩证法而又不赞成灭亡，是形而上学。有灾难，是社会现象。突变，是宇宙根本的规律。生是突变，死也是突变，由生到死几十年的渐变。假如蒋介石死了，我们都会鼓掌。杜勒斯死了，我们没有掉眼泪。这是因为旧社会事物的灭亡是好事，大家都希望。新事物的产生是好事，新事物的灭亡当然不好。如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失败。南方我们根据地的丢失，等于现在的苗子被雹子和暴

雨打掉，这当然不好，这就发生补苗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希望事物变化的，所以跃进，就是和过去不同……突变优于量变。没有质变，不可能突变。没有量变不行，否定量变就会冒险主义。平衡的破坏是跃进。平衡的破坏优于平衡。不平衡，大伤脑筋是好事。如一机部、冶金部、地质部等，日子不好过，大家压他，压得很紧，都要大大发展，这是好事。平衡、量变、团结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突变、不团结则是绝对的、永远的。许多不团结被克服成为团结。团结任务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一个人团结了，两个人就有不团结。我们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各种出身的人。要常开会就团结。我们有南宁、成都会议作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运动等。大跃进，城乡结合，工农业并举。中央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结合。都出来了。所以年年讲团结，就是因为年年有不团结。每人想法不同，党员水平不同，就必须开会。常任代表制搞对了。过去没有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的制度。开别的会，现在每年开一次极好。不开会，想法不同。开会就把比较合理的意见采纳了，会上做出决议，做个报告发表出来，全国一致。这种会议，有些地委、县委书记参加，使我们的会更好了，他们讲了很多好的意见。

不仅年年要讲团结，每天都要讲团结。因为每天都有分裂，细胞分裂，新陈代谢。旧的不死，对小孩发育不利。新陈代谢是姓陈的走了，姓新的来了，姓新的把他赶出去了。不是赶陈伯达。老的作揖打躬。新的把旧的赶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事物都是变化的，没有不变的事物。现在有一百零二种元素，原来开头还没有这么多，是后来变化的，再过几万万年，就可能不是一百零二种了，可能是百多种元素。事物是要变化的，要转化到他的反面。我们一千二百万党员，每天总有出党的，每天总有斗

争，有受批评的。湖北省有哥妹俩贴大字报，哥哥老资格有官气，不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对待妹妹，妹妹请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只好贴，真理在妹妹手里，结果哥哥输了，妹妹赢了。可见学问少年纪小的比较有真理。浙江父亲儿子争论密植。儿子赞成，父亲反对，结果父亲输了，儿子赢了。这是一般规律。做父亲哥哥总是有相当危险就是了。比输了，也没大关系，出路一条，就是检讨投降。这就好了，团结起来了。无非是兄妹开荒，哥哥比输了。团结了，父亲和儿子比要不要密植，结果父亲说：我服了你。向妹妹、儿子认输就是了。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免得危险。

我讲的是要防止不利于人民、不利于党的大灾难。如世界大战，党内分裂，像□□□、高岗那样的分裂。我们党有四次分裂，一是陈独秀，二是罗章龙，三是张国焘，四是高岗。由中央，整下去了。王明三次“左”倾路线，是以合法形式出现的，我们对他采取治病救人、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态度，容许他们继续工作。只要有党，新的分裂是可能有的。只要有党，就有可能分裂，一百年后还会有。我们的办法是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党顶多百把年，也许几十年就要改变。大概到二十一世纪，现在到二十一世纪只有四十二年，世界会有很大的变化。四十二年要出多少煤、钢、电，十五年赶上美国，还有苏联赶过美国。我看苏联不要十五年。

这样讲大家可能不舒服。我就讲了才舒服。讲了大家有思想准备。南斯拉夫不是搞分裂吗？还有美国的福斯特。我们过去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搞分裂，最近有了丁玲，山东的李峰、广东的古大存、广西陈再励、安徽李世农、河南□□□、青海孙作宾、新疆拉甫古也夫、浙江沙文汉……也搞分裂。北京政法系统垮

了，文艺界人类灵魂工程师垮得更厉害。这些垮了有什么不好？世界上总是有分裂的。新陈代谢嘛，年年有分裂，月月有分裂，日日有分裂，像细胞死亡一样，年年有团结，月月有团结，日日有团结，像细胞生长一样。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情报局也没有了。现在可以用莫斯科会议的方式来代替，十二国相约，苏联为会议召集人，有事开会。新的方式出现了，订了一个内部协定，波兰不赞成公开发表，未公布。所以一、二、三国际都有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六）设立对立面。设置对立面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上本来存在的。如右派本来就存在，放不放是政策问题。我们决心放，大鸣大放，放出来作为对立面，发动人民起来与他辩论，与他对抗，把他搞下去。小学教员有很多右派，在三十万右派中有十万。三十万右派的对立面是存在的，放出来教育了六亿人民，对我们有利。

另外一种是自然界不存在的，带有物质条件。如修水坝，可以用人为的办法设对立面。抬高位置再让水流。使它有个落差，可以发电，可以行船，如开工厂，也是设置对立面。鞍钢是日本人修的，长春汽车厂是新的，是人工设置的对立面。自然界没有的，可以人为地造，但有物质基础。卫星上天是人为的，找到规律就上去了。

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分裂，分裂是自然现象，□□□□对苏联有帮助，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分裂对我们也有帮助。两次王明路线。内战时期三次“左”倾路线，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路线。教育了我们党。这许多对立面都有好处。当然，要是人为地造一个□□□、陈独秀、高岗也难造，也不必要，只要有一定气候，他就由来，没有什么可怕，出来了是不是要替他们开庆祝

会？我们不开。克服这种修正主义者，我们开庆祝会。这种事发生我们也有忧愁。至少，一个月总有件把事忧愁。

乐观主义是我们的主导方面，忧愁的也有。右派出来时，大家能不发愁？柯庆施是乐观主义者，右派进攻不着急，我就有点发急，着急就要想办法。如天天高兴，没有什么事，就会被右派打倒。这就要讲领导艺术，领导得好，分裂由坏事变成好事。早早预见到，也可以使之不发生，防患于未然。像锄草一样，农民有预见，农民积累多年的经验，深知禾苗生长得好，必须除杂草。在一千二百万党员中，二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不怕。在座的只有一千多人，经过我们团结更多的人，如一万、二万、三万人，有更高的觉悟，就是能有预见性。搞好一点就不怕分裂。怕什么？怕也不行。世界大战我们要作准备，我们争取不打，但打也不怕，打了再建设。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要允许他改正。除非到丁玲那种地步。潘□□犯了路线错误，但要允许他改过。现在我们很团结，没有什么大事，中央地方都很好。经过整风，反冒进的问题现在搞清楚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扩大一点讲一讲为的是使大家自觉起来，有精神准备，引起大家注意，我们是乐观主义者。

昨天□□讲民歌讲得很好。在座的一直到支部，每个乡可出一集。九万个乡出九万集。如果太多了，少出一点，一两万集也好，出万把集是必要的，不但新民歌还有老民歌，革命的、一般社会上流行的都要，办法是发纸，一个人发三张纸。不够，发五张，不会写就请哥哥、妹妹，不行，请柯庆施写，他是提倡教育文化，乡乡办大学的。我说工、农、兵、学、商、思，黑龙江把思想提到第一

位也好，思想是实际的反映。以虚带实，以政治带业务，以红带专。这就是“思、工、农、兵、学、商”。斯大林的两个口号缺乏辩证法，讲“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讲“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说得好，“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是对的。苏维埃是政权，有了人民政府才有可能。如果北京是蒋介石政权，我们就不会在这里开会。苏维埃是政治，电气化是技术，是动力，苏维埃和电气化结婚，政治和业务结婚，生的儿子就是共产主义。政治与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它俩结了婚，就会产生儿子。我们首先用一个七年超过英国，再用八年超过美国。第一个儿子叫超英，第二个儿子叫超美。

这两个月要抓一下，有的省委书记建议七月不开会，搞一九五八年计划，八月五日开会好，那时可决定农业的丰欠，开半个月二十天。再开三天散会。

关于印发四百个科技创造发明家小传资料（初稿）的批语

（1958年5月21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是否已印发，如未，请立即付印，于明日务必发明〈给〉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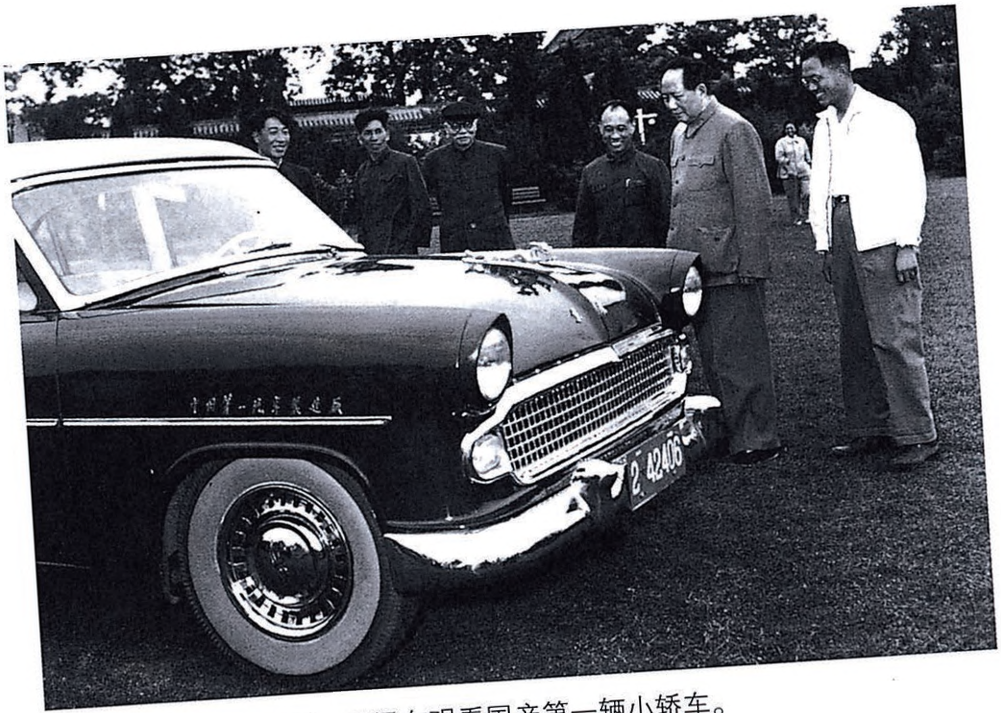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五月廿一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1958年5月编印的《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资料“编者的话”中说：为了初步地具体了解中外古今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情况，我们编出了这本资料（初稿）。在这400人中，中国的有70人，外国的有330人，其中我们把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年纪较轻、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人算作一类，占总数的58%。这个材料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图书馆的几位工作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期间搜集和编印的，由于时间仓促，在人物的选择、材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上，都会有很多缺陷，但我们相信它对于破除科学界的迷信，将会有所帮助。《400个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家的小传资料（初稿）》作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1958年5月21日，毛泽东观看国产第一辆小轿车。

1958年5月，毛泽东在试坐国产第一辆小轿车。

给张治中[1]的信

（1958年5月22日）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2]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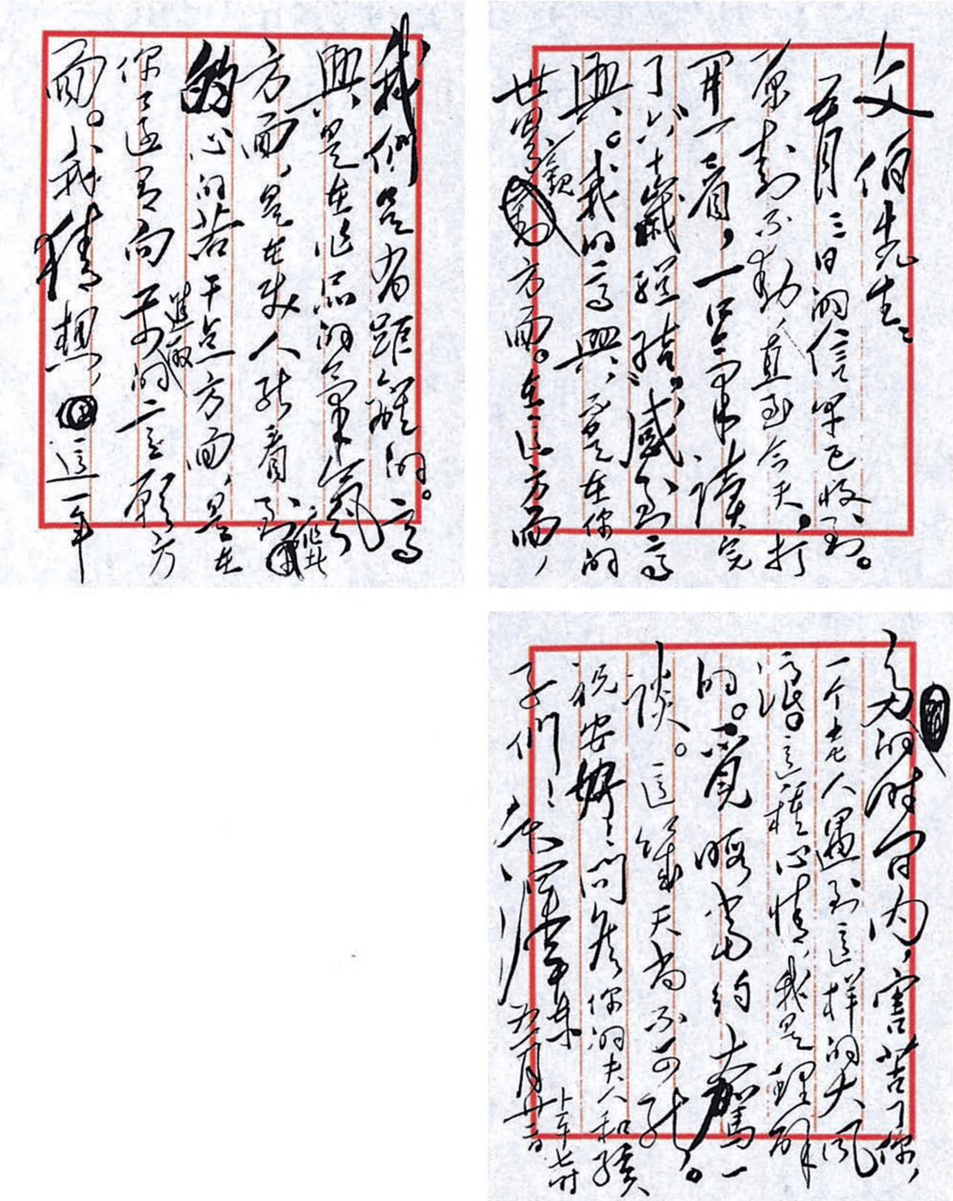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

[1] 张治中，字文白，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2] 指张治中1958年5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在民革整风期间写的《自我检查》的情况，并将《自我检查》和他1949年冬写的《六十岁总结》送请毛泽东审阅。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书不动，直到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以[illegible][illegible]经[illegible]，感到高兴。我们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illegible]兴，是在[illegible][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方面，是在为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的心的若干进步方面，是在你还是向[illegible]的二至[illegible]方面。我[illegible]想，这一年为[illegible]日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谈。这几天[illegible]不[illegible]了。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廿三

[illegible]七时

毛泽东致张治中信的手稿。

关于印发沈鸿[1]给毛泽东信的批语

（1958年5月22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即刻付印，发给各同志阅。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

[1] 沈鸿，当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沈鸿1958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他对毛泽东创议编印科学技术创造发明者小传的感想，并建议我国自己制造万吨水压机。这封信作为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8年5月23日）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大，人民群众得到了解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建设有很大的发展，这样已经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前途。以前还不清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摆脱被动状态、落后状态。以前我们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使人看不起，杜勒斯把我们看不在眼里。这和我们的情况不相称，其中也有道理，就是因为你虽然人口多，力量还没有表现出来，有一天赶上英国、美国，杜勒斯就得看上眼。确实有这个国家。我们的方针，这个客人暂不请。那时你找上门来，我们只好招待。过去几年，前年还看不清楚，还有人反总路线，多快好省的方针怀疑的人不少。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是客观存在。这许多人能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时怀疑的人、反对的人不少。有些人看到了，有些人看不到。看到，要经过曲折才能看到，经过一个时期，看到的人就多了。道路总是曲折的，以后还会有曲折。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前年高去年低，今年又高。有了这个变化，这个会就开好

了。这次大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要求、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一九五五年冬季，有两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反斯大林，发生了波匈事件。世界上出现了反苏反共高潮，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我们党。国内没想到来了个反冒进。没料到这件事。成都会议上就说过。请到会的同志注意，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请各省委研究。要预料到，前次在大会上讲了，有战争的可能、有分裂的可能，预料到就不要紧了。大家要研究一下，各省对可能有战争有分裂……还要研究。因为料到了就不怕。并非现在有战争，但是有可能，世界上有疯子。在莫斯科会议上就讲过，要防备疯子，宣言说打起来它就得完蛋。世界是我们的。会出乱子，但是不正确的力量总要被批判的，正确的力量总要胜利。但是要预料到，党内也要想一想，那么多省市委、自治区一半以上出了问题，但都没有推翻省市委，都克服下去了，如□□□、□□、□□□、□□□、□□等等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多多少少）都有过一些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有些是属于好人犯错误，如对多快好省不了解，有些是坏人混进党来。□□□是好人犯错误……丁玲是暗藏在党内的坏人，早已叛党。

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首先跟什么人。首先是跟人民学习，跟人民走，人民里面这么多干劲，多快好省。许多发明创造，一类社，千斤亩，两千斤亩。工业方面突破定额，发明创造。总之，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军事各方面，思想理论各方面，有各种人才，代表人民的。大会讲了这么多经验，要我讲讲不出来，你们讲得比我好，是正确地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思想、感情。根据这些正确的

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如这次大会决议和报告，过去没有这样。经过这八年，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三中全会的鼓励就给了全党全国人民比较明确的方向，经过全党的努力。最近半年，去冬今春的大跃进，又经过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给这次大会作了准备。写了总结、决议，又搞了六十条，还没完成，还要改写。大体意思搞出来了，过几个月再改写一下。这就是先跟人民，然后人民跟我们。首先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理论来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就是理论来自实践，然后又指导实践。开头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因为有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反映到人民脑子里，首先是反映到先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脑子里。客观规律反映到主观世界，有了理论性的总结，而他们发展为理论，给我们做模范。如果要政治上不犯错误，就要理论指导实践。但理论又必须从实践中得来，离开革命实践不可能制造出理论系统来，关着房门不可能制造出理论来。大会的总路线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人突然想出来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下去联系人民，或者向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半年你不与人民联系，什么也不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四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向与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然后总结上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六亿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的干劲，除了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等这些人可能干劲不大。

插红旗，辨别风向，你不插人家插。任何一个大山小山，任何一亩田，看到那些地方没有旗帜就去插，看到白旗就拔。灰的也要拔，灰旗不行，要撤下来。黄旗也不行，黄色工会，等于白旗。任何大山上小山上，要经过辩论，插上红旗。

上次讲的是风向，不是方向，风向即东风还是西风。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开始的。那时已有十大关系，多快好省，还有促进会。四月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省市委书记参加，那时没有明确的决议就是君子协定，大家赞成，不像这次大会有明确的决议、报告。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也没有明确决议，但有报道，重点是千方百计增产节约。那股风没有能够挡住，这是件坏事，转为好事，使我们有了比较，成都、南宁都谈过。这次大会，同志们有很多好的发言……铁托是专门泄气，是那一方面的干劲，莫斯科宣言是我们这方面的干劲。南斯拉夫纲领是灭无产阶级志气，长敌人威风。

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看。他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民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风起于青蘋之末。侵谣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那时最不容易辨别。

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写的题下说明[1]

（1958年5月）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修正草案，作了第二次修正，并加以原则的批准，准备提请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

[1]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于1958年5月又提请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5月23日，八大二次会议对纲要作了第二次修正，并决定基本通过这个纲要，“号召全党同志和五亿农民一起，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

对《红旗》杂志发刊词的批语

（1958年5月24日）

此件[1]写得很好，可用。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1] 指《红旗》杂志发刊词，载于1958年6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

为《红旗》杂志题名[1]的批语

（1958年5月24日）

一

伯达[2]同志：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

二

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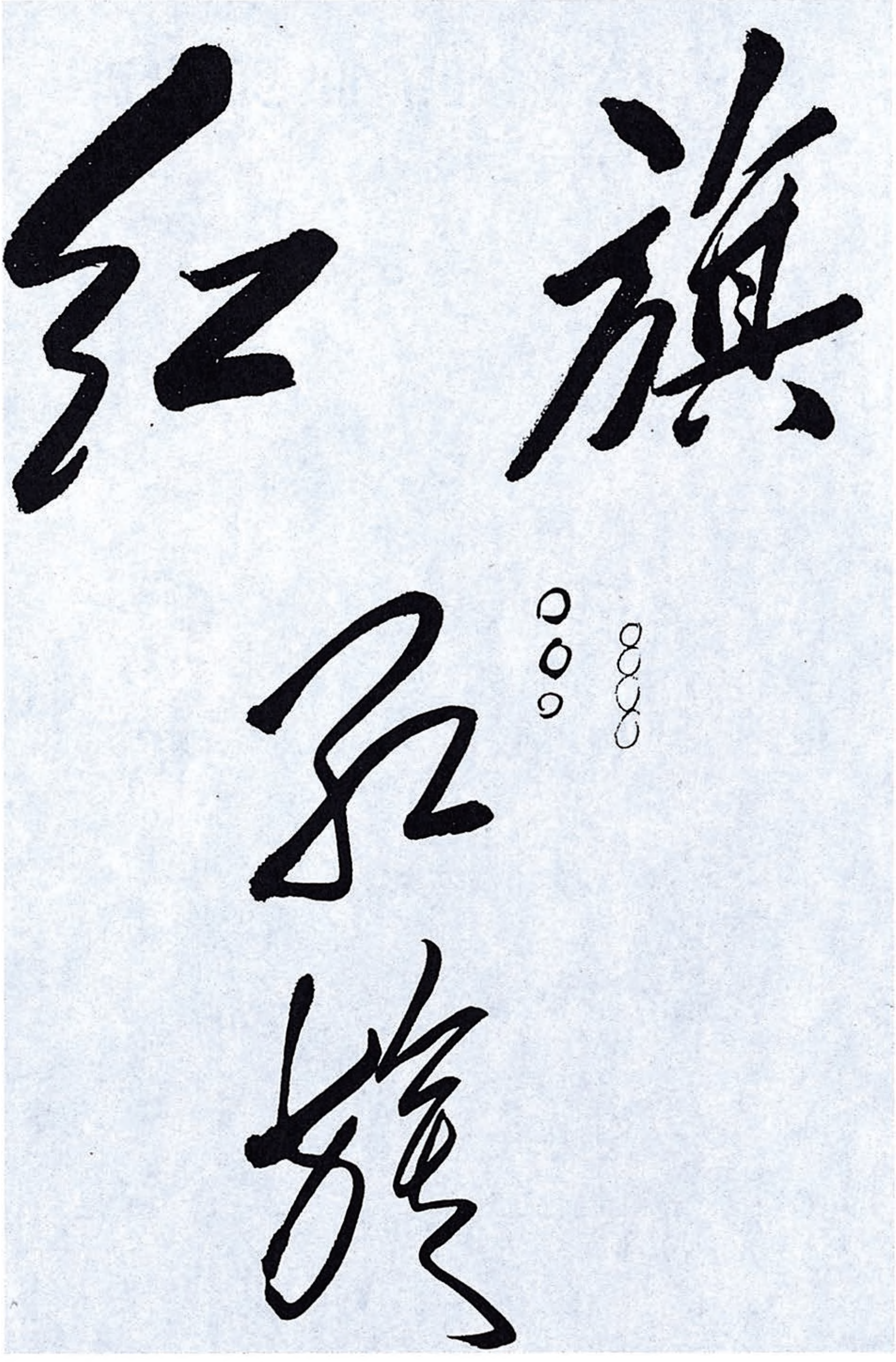
---

[1] 本篇收入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名时写的三个批语，其中一写在单另的一张白纸上，二、三分别写在他题写的其中两幅“红旗”字的旁边。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和即将出版的《红旗》杂志总编辑。

三

比较从容。



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的刊名。

关于注意粮食供应问题的批语

（1958年5月24日、27日）

一

震林[1]同志：

此件[2]请你一阅。

山东有那么多的缺粮户，值得研究一下。

如你有时间，请找李宝森等三人（都是干部队队员，给我们守卫的，排长级干部）问一下情况[3]。因我忙，无暇找他们谈。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二

即送小平[4]同志，即刻印发到会[5]各同志。

粮食问题，请各同志注意。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二时

---

[1]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央警卫团干部队李宝森、王立勤、段明玉写的反映山东省一些地区缺粮情况严重的材料。

[3]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谭震林找李宝森等开了一个座谈会，并于1958年5月26日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本篇二就是毛泽东在谭震林的报告上写的批语。谭震林的报告中说：已遵示，找了警卫队李宝森等三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他们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对的。山东省每人平均口粮360斤，少数山区是200多斤，一般说是够吃的。去冬以来劳动强度增加，有一部分人不够吃，这是全国的现象。武汉粮食会议已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北京又综合各地情况发了一次通报。粮食问题主要是增产赶不上口粮增加的需要，这个困难，估计三五年内即可能解决，即全国每人平均有一千斤粮食：口粮600斤，种子100斤，饲料200斤，余粮100斤。这个要求如果无特大灾害出现，连续三个跃进年就可能达到。如果打算有二年发生大灾害，则需五年达到这个要求。

[4]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5] 指正在举行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

对赵尔陆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建议的批语

（1958年5月25日）

小平同志：

此件[1]请印发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

毛泽东

五月廿五日

---

[1] 指赵尔陆1958年5月17日关于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问题给毛泽东的建议信。信中说：如何从组织上加强各经济协作区的作用，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自执行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和实行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新体制之后，地方办工业、群众办工业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但如何使各省市工业的发展更能符合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性，避免和减少盲目性，更好地适应多快好省的总要求，单靠省或中央各部是不容易处理好的，而目前以各经济协作区的协作会议的形式来担负这一任务也比较困难。因此，我有一个想法，是否可以考虑在各区成立党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或别的组织形式，以统一和加强对各区的经济领导，综合规划各区的建设远景，及重大方针政策的掌握和生产的组织、地区的全面协作平衡等。在政权方面可不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但要设置一个强的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是中央局的办事机关。不论从目前的工作需要，还是将来的发展趋势看，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似乎有必要。因为主席号召大家要敢想敢说，我就把最近以来经常想、而又没有想好的意见大胆地向主席讲出来，供参考。

赵尔陆[1]同志对区域协作问题，建议设立六个中央局及六个区域经济计划委员会。

---

[1] 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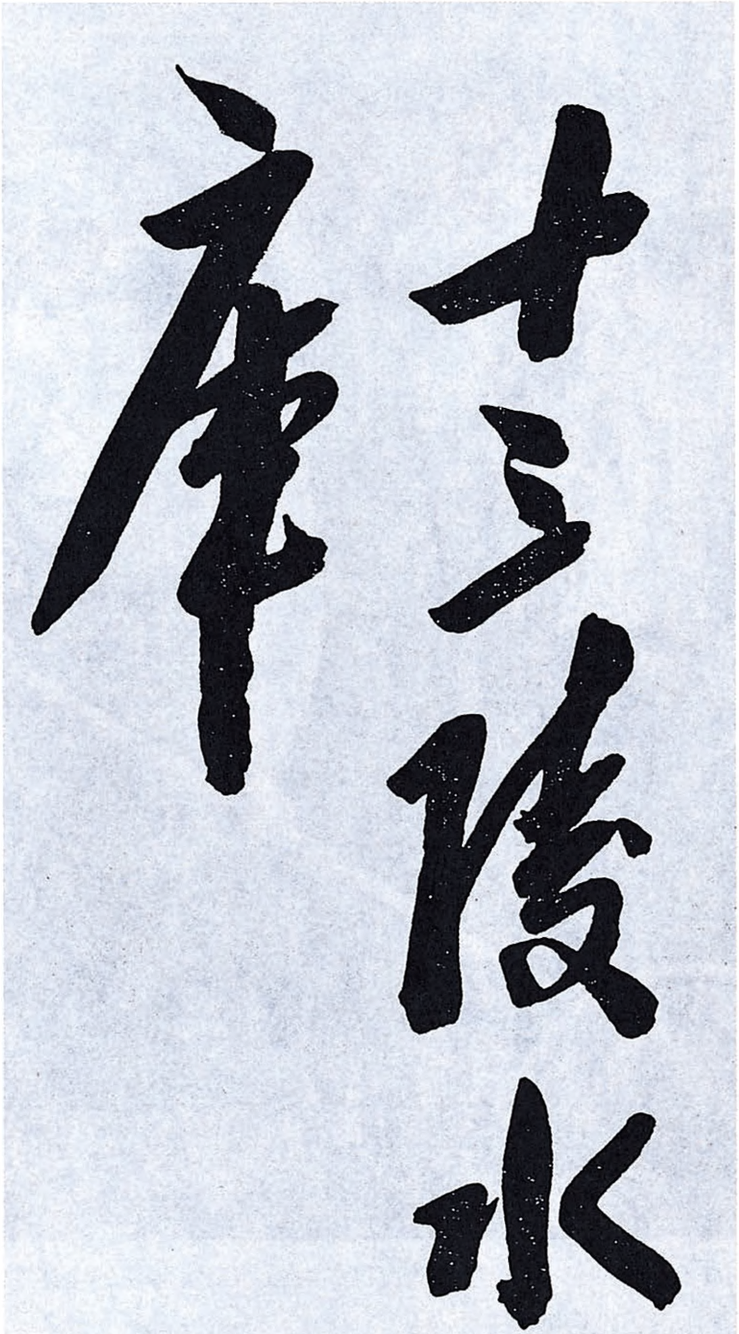
为十三陵水库题名[1]

（1958年5月25日）

十三陵水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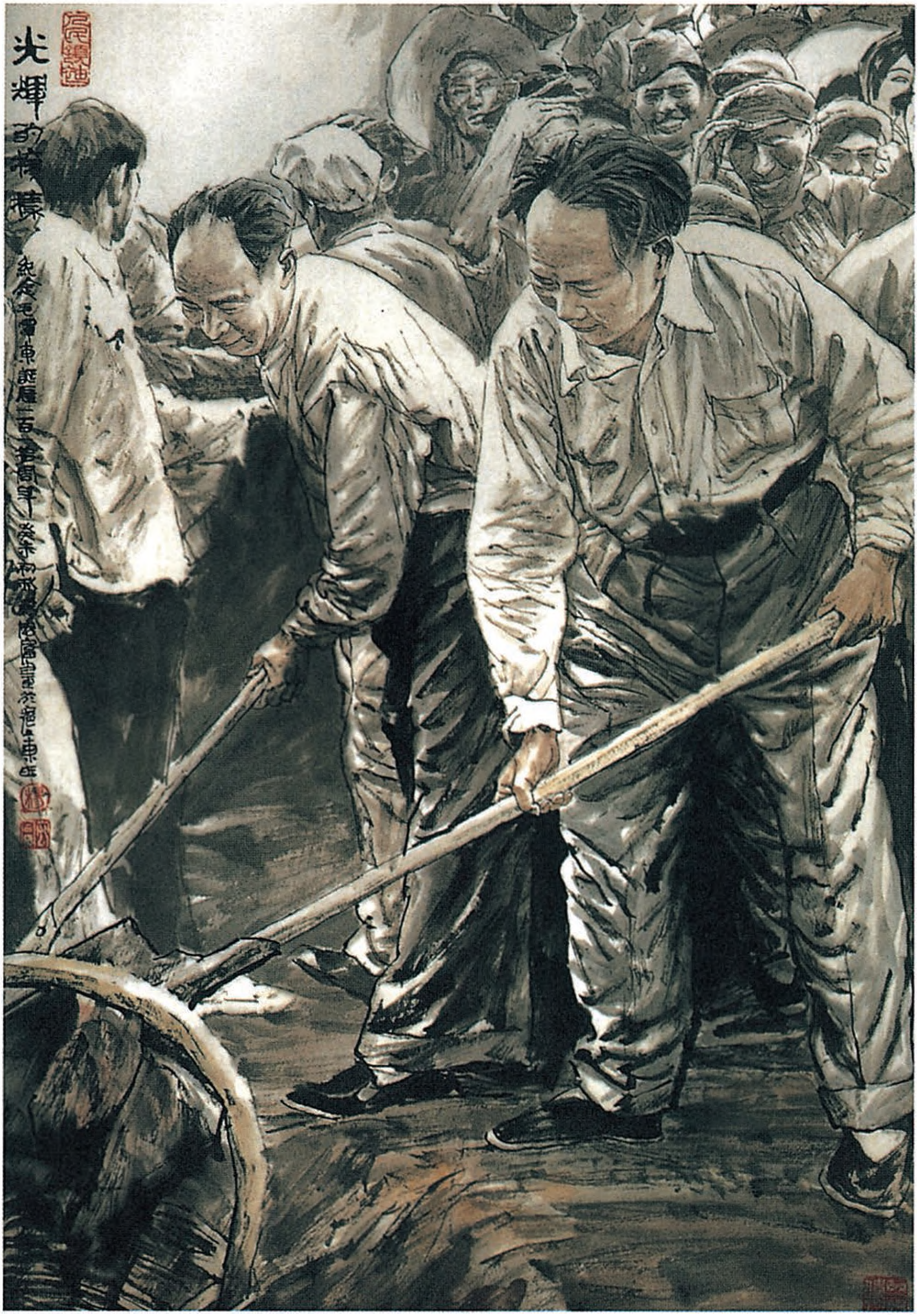
---

[1] 十三陵水库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境内，在十三陵盆地的东南，距北京城区40公里。十三陵水库是1958年初开始修建的，当年6月30日胜利建成。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来到正在建设中的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代表十万劳动者，敬请毛泽东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题词，毛泽东欣然写下了“十三陵水库”五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毛泽东为十三陵水库题写的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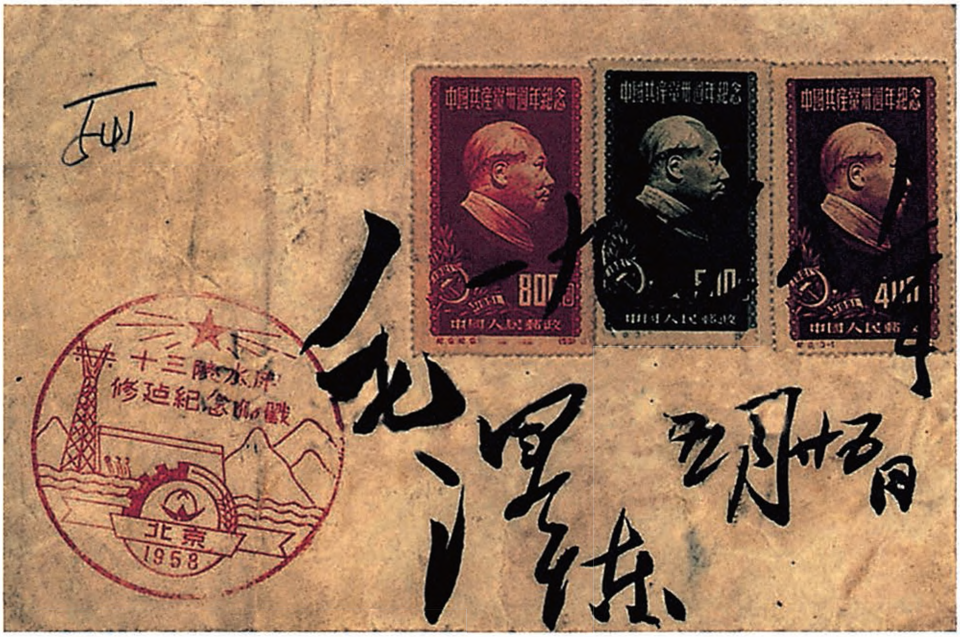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带领出席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全体中央委员到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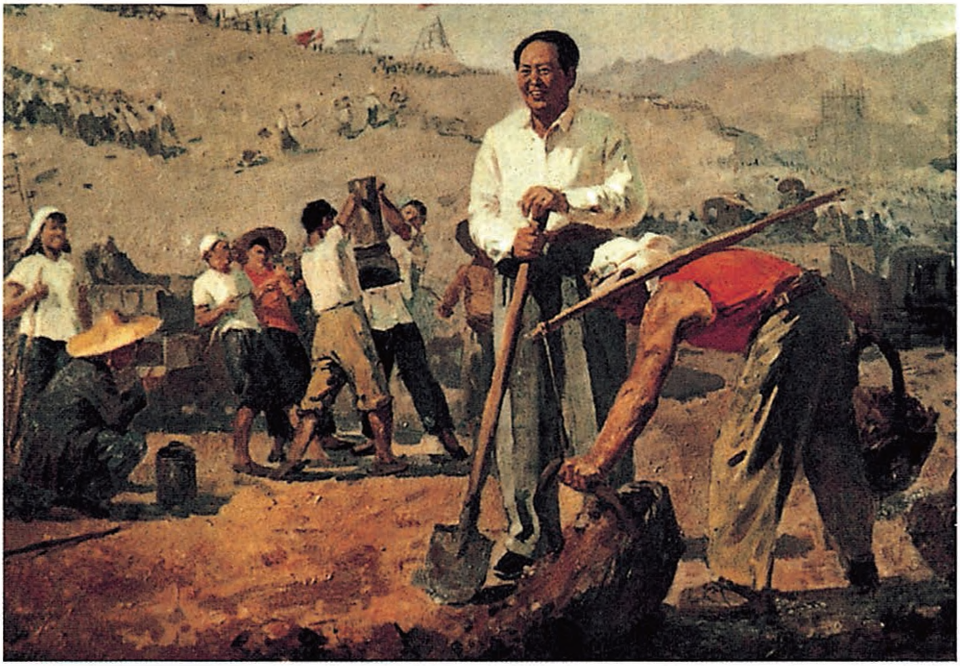
《光辉的榜样》（中国画）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视察十三陵水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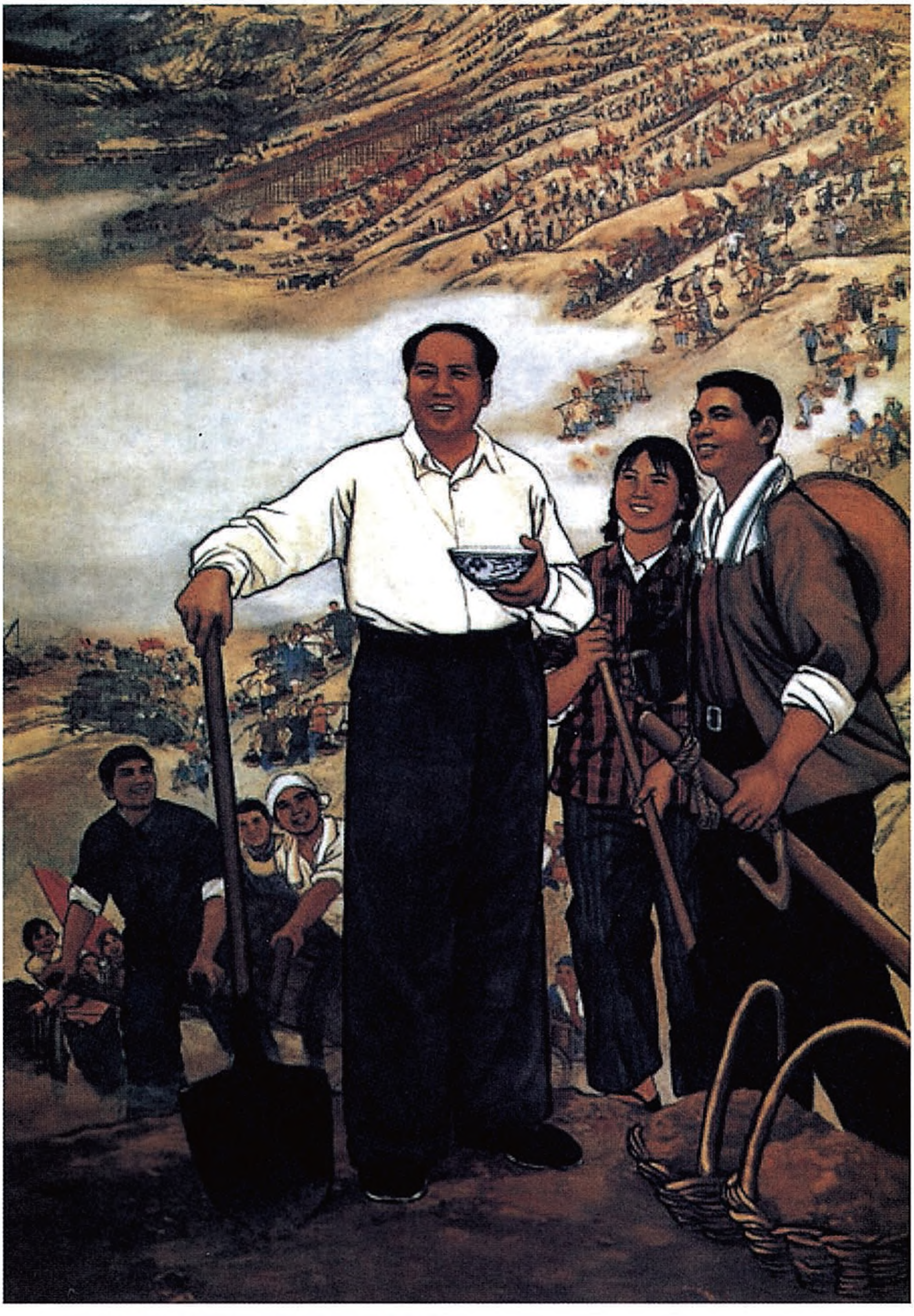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向工地上的劳动者致意。


中国共产党卅周年纪念
中国人民邮政
十三陵水库修建纪念邮戳
北京
1958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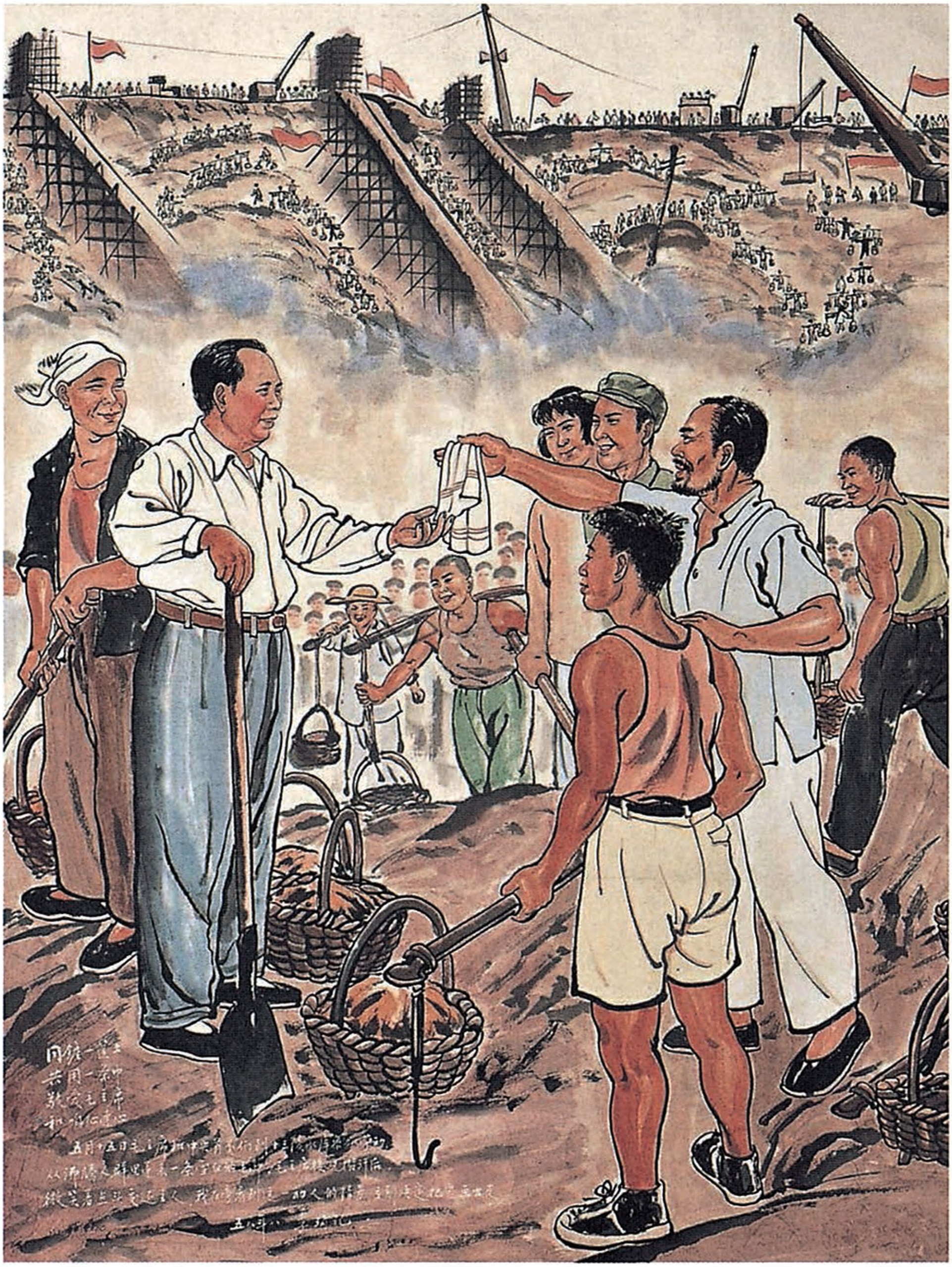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修建纪念明信片上的签名。



《毛主席和我们一起劳动》（油画）



《毛主席与我们一起劳动》（油画）



《毛主席在十三陵工地》（中国画）

对刘少奇关于改进劳动工资、劳保福利制度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5月）

退少奇同志处理。

此件[1]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

---

[1] 指刘少奇1958年5月25日给毛泽东、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报告说，关于改进我国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制度问题，中央已决定在县以下的工业企业中不再实行老办法，由各省和自治区另拟新办法。至于县以上的工业企业，我认为应在现有的企业和现有的工人中暂时实行原来的办法，基本上不加变动；但在新建的企业和新招收的工人中可另拟新办法实行。此外，我曾同恩来、定一及个别省市委的同志谈过关于教育、劳动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和半工半读的工矿、机关劳动制度。另一个是除注意组织城市职工和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运动外，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力也组织起来。这两个问题，已在个别单位进行试验。

重看《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的信

（1958年5月26日）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上午七时

关于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座谈会给邓小平[1]的信

（1958年5月29日）

小平同志：

本日有事商量，请通知柯、陶、王、张、林、欧、李[2]七位协作区主任委员留一天，我想有些事和他们谈一谈，或者由常委召开会议，或者由我、你、彭真[3]主持。明天酌定。昨天会议上气氛不大好，值得座谈一会儿。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也以留一天为宜，待座谈会本日开后，明日再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以为如何？如以为可，请即执行。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上午五时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柯，指柯庆施，当时任华东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陶，指陶铸，当时任华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王，指王任重，当时任华中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张，指张德生，当时任西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林，指林铁，当时任华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欧，指欧阳钦，当时任东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李，指李井泉，当时任西南经济协作区主任委员。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

（1958年5月）

中国人民得到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友谊，感到非常高兴。

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我们是站在反殖民主义斗争的一条战线上，相互支持，相互关怀。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阿联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纠正《红旗》杂志第一期中错别字的批语

（1958年6月4日）

陈伯达[1]同志：

第四页第三行多了一个“的”字[2]。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误表，在下期刊出[3]。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2] 《红旗》杂志第一期刊载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中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的，应当永远使用下去。”后面这一句中，多排了一个“的”字。

[3] 1958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刊登了一则“更正”，对《红旗》第一期和第二期上的一些错讹之处分别进行了订正。其中包括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多排的一个“的”字。

为购买《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给林克的批语[1]

（1958年6月4日）

林克：

请将《第六辑》买一部给我为盼。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8年6月1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第211期刊载的《文学遗产增刊》第六辑目录的旁边。增刊第六辑载有：徐嘉瑞的《九歌的组织》、陈朝壁的《关于“招魂”的作者和内容的商榷》、金德厚的《关于“‘离骚’中窜入的文字”》、任二北的《古歌辞中的和声与叠句》、郑孟彤的《汉赋的思想与艺术》、邓潭洲的《论韩愈的诗》、陈友琴的《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刘开扬的《论孟郊》、陈贻焮的《王维生平事迹初探》、马克垚的《关于李白思想的一些问题》、麦朝枢的《关于“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樊兴的《“蜀道难”的寓意及写作年代辨》、胡国瑞的《论温庭筠词的艺术风格》、吴则虞的《辛弃疾词论略》、浦江清遗著《论小说》、戚法仁的《“汉宫秋”杂剧主题思想的探索》、陈中凡的《高明“琵琶记”评价的商榷》、聂石樵的《略谈“桃花扇”》、章沛的《“聊斋志异”个别作品中的民族思想》、张鸿勋的《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在方强[1]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上的批语

（1958年6月5日）

一

此件[2]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彭、黄、邓[3]看后还我。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让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

---

[1] 方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院长。

[2] 指方强1958年5月29日关于对军委扩大会议开法的意见给会议主席团的信。信中说："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整风和整编两个内容，要解决军队建设中的思想问题，以求得认识上的统一，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都是对的。但这次会议整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要解决哪些主要的思想问题，解决什么主要矛盾，还须有明确的必要，否则会议就开不好。我认为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应当解决我军当前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即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优良的革命军队；另一方面在各项工作中还或多或少存在着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阻碍我军的发展。建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指导思想应当是认真贯彻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导下，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

毛泽东
六月五日

二

不存在问题么？[1]

三

要学外国的技术。[2]

---

[1] 方强在意见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几年来，在这些方针和路线的指引下，我军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在"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几句下面划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2] 方强在意见信中列举军队建设中的教条主义的表现时说："我们的部队和学校，不主要去学习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主席的军事著作，不以今天活生生的马列主义理论——《毛泽东选集》为指南，而着重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以外国的东西为指南。"毛泽东在"而着重去学习外国的经验，以外国的东西为指南"一句下面划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四

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方』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1]

五

彭、黄阅后退小平：

有些同志对会议的开法感到不满。此事容易，调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气，大有可为。请小平商彭黄召集七八个同志经常谈一下，似可不必开小型会，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六月五日

---

[1] 这个批语是针对方强信中批评军队中的教条主义表现一段话而写的，这段话是："我们军队曾有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种趋向，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发扬我军的光荣优良传统；只强调业务技术，不强调政治；只讲集中，不重视民主；只讲学习苏联（这是必要的），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只强调首长教育部属，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我军官兵互教的优良传统方法；只讲纪律服从，不讲政治自觉；只讲遵守规章制度，不注意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积极性；只讲军衔等级，不讲或少讲官兵政治平等……这种种，使我军的一些优良传统，在某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使我军某些根本制度发生过摇摆。"

关于做好第二个五年计划布局和开好军委会议问题给邓小平[1]的信

（1958年6月7日）

小平同志：

六、七两月份，你应做两件事：（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布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帮助德怀[2]同志将军事会议[3]开好，关键是本月一个月，宜与彭等少数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来干，多快好省。

毛泽东

六月七日上午四时

军事会上，你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3] 指正在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

对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的批语

（1958年6月7日）

一

刘、林彪、小平、周、朱、陈、彭真、陈毅[1]阅，退彭德怀同志：

可以照所拟办理[2]。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毛泽东

六月七日

---

[1] 刘，指刘少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2] 彭德怀1958年6月5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关于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问题，苏方仍坚持原来双方共同投资建台的意见，并提议在6月上旬即派专家来华进行选址、勘查设计、拟制协定等工作。看来苏方是不会很快接受我们的意见的。为了不影响勘查设计工作的进行，可先同意苏方专家来华着手进行一些技术性工作，有关投资和使用等问题可放在下一步解决。

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在谈话部分，毛批有意见[1]，请彭注意。

二

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应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

---

[1] 指毛泽东在彭德怀1958年6月4日和苏联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的谈话记录中修改的一段文字，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在王鹤寿关于发展冶金工业报告[1]上的批语

（1958年6月7日）

小平[2]阅。1962年，可产6,000万吨钢。

毛
六月七日

---

[1] 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1958年6月6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年底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这两天我们在研究有色金属工业的规划，9日以后冶金部党组的同志分头到各区去，协同各省市采取措施。我们有极大信心完成和超过现在预定的指标。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6月8日）

一

即送刘、林彪、小平、彭真、周、陈、朱、彭阅，交小平办。

此件加了职权划分[1]，小组成员也有些增加[2]，请你们阅后，退小平提付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发出。有不同意见，请即告我。

毛泽东
六月八日上午三时

---

[1] 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中增写的关于职权划分的一段文字，即本篇二，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2] 毛泽东在中央财经小组名单中，增加了副组长谭震林，组员王鹤寿、赵尔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二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批语[1]

（1958年6月12日）

陈伯达[2]同志阅。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要用这两位青年的方法，就是为解决迫切问题而去跑图书馆。列宁为了批判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评〈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8年6月11日《光明日报》上，该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在“东风强来西风弱，真正英雄看今天”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两篇文章：《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和《孙守纲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消灭“沙门氏菌”的马国荣》一文，介绍了只上过两年大学的天津仁立食品厂青年技术员马国荣，针对蛋制品中的“沙门氏菌”问题，从学习入手，利用空闲时间跑书店、图书馆，找有关细菌、微生物和医学方面的书籍阅读，并结合实际开展研究，经过一年多的刻苦钻研和322次试验，创造出了“真空充氮处理法”，消灭蛋品中的“沙门氏菌”，解决了国际市场上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孙守纲制成质量超过英国的“矽胶”》一文，介绍了天津市供电局修理试验所21岁的化验工孙守纲不畏困难，在4年多的时间里跑图书馆、查技术资料，经过多次试验，制成质量超过英国和日本的优质“矽胶”的事迹。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关于中央各部委干部参加劳动的批语[1]

（1958年6月15日）

小平[2]同志：

这好像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部做法，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农垦部部长王震1958年6月13日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农垦部三分之二的干部已于五月底分赴密山、佳木斯等垦区参加劳动，一律下场四个月，进行现场整风，学习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和帮助农场工作。我个人拟待十七日处理完下放任务后，也去密山、佳木斯垦区。"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人民不要战争但要有战争准备[1]

（1958年6月16日）

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有信心怎么行。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如亲美、崇美、恐美之类。

我们六亿人的心理状态怎么样？是否已免于恐怖？我们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和平好，战争总要死人的。人总希望死得慢一点，但人老了终归要死，死是正常的，不死是反常的。

要打原子战争，那就打嘛，不是我们要打。打起来，即使人都死光了，五十万年以后又恢复原状，人还是会生长出来的。总之，要谈一谈形势，要谈彻底一些。世界是无始无终的，无机物会变有机物，五十万年算不了什么。我有一次说，原子战争可能打掉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但还有三分之一，这还不乐观吗？即使一个人也没有了，海里总还有单细胞的生物。本来地球上没有什么生命的，后来才有的。话又说回来，就是要你们辩论一下，不要悲观，天不怕，地不怕，无非是杀头而已。

中心问题，是否双方都怕？应该是哪个怕哪个多一些，程度上应有多少之别。一九四六年，我讲过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他们的强大不算数，统统会灭亡的。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有时天上有

---

[1] 这是毛泽东和部分驻外使节谈话的一部分。

乌云，如蒋介石打张家口时将来的形势怎么样啊？即使城市统统丢掉了，我相信还是要胜利的。抗美援朝战争时，我是以美国占领鸭绿江这个最坏的估计来考虑问题的。你占领了鸭绿江，我就退回到辽宁，但是我取得了出兵的资格，我打算分为六支兵力插进朝鲜去，反攻敌人。

双方都怕，敌人怕我们多一些，他们比我们弱一点。这是我们的估计，根据这一估计来决定我们的政策。但是有时会有变化的。总的来看，说我们怕他们多一些，这不合乎事实。

戴高乐[1]登台是好事，也是坏事。坏事是他要整共产党，好事是比过去的总理要硬一些。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成了一个“软体动物”。戴高乐是一条“墨鱼”，比“软体动物”多一条骨头。

请你们把谁怕谁多一点当作一个问题来辩论一下。每当发生了问题，好像上面的估计就不灵了。

莫斯科宣言曾谈到战争问题，因为有战争疯子。就全世界的人民来说，要有两条腿走路。人民不要战争，可是要有战争的准备。我们准备五年搞出原子弹，十年搞出氢弹，苏联帮助我们技术，我们还要想些别的办法，主要靠我们自己动脑筋来搞。

讲和平为什么又讲战争的危险呢？这不是不统一吗？是统一的。但不能用诡辩的方法来说统一，要用论据来说统一。过去少奇同志在延安时谈到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我是赞成的。高[2]借此来

---

[1] 戴高乐，1958年6月出任法国总理，同年12月当选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

[2] 高，指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攻击少奇同志，实际上是冤枉刘少奇。

一条腿——和平过渡，我们又加上了一条腿——战争过渡，两条腿才好走路。

世界大战是从垄断资本来的。他们要战争，就可能出战争狂人。希特勒、蒋介石、日本法西斯都是战争狂人，但他们都被打败了。原子战争打起来，天地会无光的，但五十万年以后，人类还是有希望的。尼赫鲁[1]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人都死完了，也找不到人来主和了。我说能找到人，他不相信我这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打出了一些民主主义国家，如印度等。要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完蛋了。讲到这里，我想到《新民主主义论》中没有说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可以和美国闹独立性，如印度、印尼、叙利亚、埃及等国，这些国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现在看起来，没有讲到这一点是不正确的。

道理就是一点点，一讲就讲长了。你们留下几天议一议。打原子战争，美帝国主义还是一个纸老虎。过去我们延安只有七千多人，蒋介石占有上海等大城市，他们有坦克、飞机、大炮，我们没有，究竟是谁胜利呢？抗美援朝时，我们每一个军才有五十门炮，美国一个师就有八百门炮，我们把他们打得一塌糊涂。打原子战争，七打八打，他们灭亡，我们胜利。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不会打的，因为美帝国主义满身是疮，漏子很多，人民反对它。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很不巩固。大鱼吃小鱼，是一个基本规律。他们都是“鱼类”，都是帝国主义，现在还是大鱼吃小鱼。北大西洋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公约组织就是大鱼吃小鱼。

思想要搞通，想通。对兄弟国家要适当地影响他们。有些国家对骂帝国主义就有些怕，还不如蒋介石，他竟敢打美国大使馆，当然目的是为了搜文件，结果他竟搜去了。美帝国主义搞中间地带好些，还是我们搞中间地带好些？中间地带又那么大。

我们的政策，分为两部分，一是和平，二是战争。所谓和平，因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目前，中间地带它吃不下去，内部又有经济危机。过去人民的力量还不能制止战争，现在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

1958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北京西郊。

独立自主地搞建设[1]

（1958年6月17日）

一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2]，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

[2] 参见《孟子·离娄上》。

二

彭、黄：

此件请即印发。

毛

第一页，请克诚抄正看过，再付印。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李先念[1]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批语

（1958年6月18日）

一

此件[2]很好，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

二

克诚[3]：

此件请即印发。

毛

---

[1] 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58年6月16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财政计划要点的报告。报告对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趋势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作了汇报，对如何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提出了意见。

[3] 克诚，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照原样印，我作的记号不要印上去。我改了一个字，增了一个字[1]，要印上去。

---

[1] 毛泽东在批发李先念的报告时，将报告谈到“今年麦季增产已经达到三百五十多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全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一百五十亿斤还要多二百亿斤”一句中的“一九五七年”改为“一九五六年”；在报告谈到“第二个五年财政支出的分配，应当首先保证生产建设的需要”一句中的“生产”“建设”之间加了一个“和”字。

给高智[1]的信

（1958年6月19日）

高智同志：

请你在上午找一本1956年一月号的《新建设》；再将《哲学研究》1957年全年六期（第4期已到）找来为盼！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新建设》1956年全年各期，1957年全年各期都找来更好。马特和周谷城两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2]，在江青那里，请给我于上午找来。

---

[1]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马特在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和周谷城在1958年6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一文。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58年6月21日）

这次讲话不是指示。先讲几点意见供参考，是否对，供讨论。只当做问题提出，几年来习惯于这种形式，你们什么时候起来的？今天？我是昨天起来的。大家比我高明，经常接触实际，对军事没有抓。这几年，有同志批评了军队。但他也有责任，我有点单打一，这方式曾提倡过，但有时也有缺点。军事工作基本上做得好，有成绩，也有缺点。也怪我去抓别的了，有本书叫《香山记》讲观音菩萨。头一页上讲不唱天来不唱地，开头先唱香山记。事情总是这样的。我这几天，不唱天，不唱地，开始先唱别的戏。这事也难免，唱《打渔杀家》不能同时唱《西厢记》，如红线女每年有多少工作日？据说有二百个，其他的时间不搞工作。虽有理由，但也不大好，有个空军政委说，他这次参加会议很荣幸，沾一点边，是否中央间接有点责任，军委有责任，中央也有，这是提出了问题。这次检查首先检查军委和各部。不要针对各军区，他们可以同去检查。你们越压迫我，我越舒服，中国人不受帝国主义压迫不起来革命。人不逼不革命。帝国主义压迫劳动人民，实际做了自己掘墓人。当然你们的压迫不是帝国主义的，是督促的意思，否则我们不会动了。事情关系到六亿人民，关系到世界持久和平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6月21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军委几年来工作基本对的，但有很大缺点，责任首先在领导。

国内形势起了很多变化，几亿人民起来奋斗，这次会议批发了富春、先念、薄一波、冶金部、一机部几个文件，希望大家很好地阅读（主要讲了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值得仔细看看。现在我们国家的问题是：一曰粮，二曰钢，三曰机械。第一是粮，最重要，如若不相信，让厨房停伙三天行不行？现在的口号是：“苦战三年，争取每人千斤”（六千五百亿斤），今年可能增产一千亿斤，达到四千七百亿斤到四千八百亿斤。“苦战五年，争取达到每人一千五百斤。”到那时，我们的腰杆硬起来了。二曰钢，今年计划：五年之内争取六千万吨，要接近苏联（七千万吨），明年可能超过英国。从工业方面想办法，干部一年下去四次，抓四次。军队也如此，你们要我管少了，是要我多抓，驴驹子喜欢人骑，中央这些驴驹子也要有人骑。如果没有钢，不能造机械，炼钢本身也要机械（平炉、轧钢等）的发展，电力、石油、炼油、采矿都需要机械，还有交通运输机械（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农业也要机械（拖拉机、排灌机械等）。

当前是粮、钢、机械三个重要问题。

军委会开得很长，但还要准备很长地开，多则一年，少则三个月，最少一个半月。反正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税多。六十条中有一条抓军事，同样每年要搞几次军事，过去中央抓得不够，现在愿意抓了。现在各方面进步很快，首先是地方，特别是农业方面。这是说中央各部门是有缺点的，多了一点东西，少了一点东西，多了一点官气，少了一点政治。南宁、成都会议，八届二次会议后，政治扩大会议后，有很大进步，不能说他们“一多二少”了。官气少了，政治多了。军队有的同志讲，工、农、兵、学、商，兵在老

三，现在落后了，如果有些落后，是领导上有缺点，像今天这样的会议开得很少。这几年主要抓农业，搞出一套办法。解决了以后搞工商也都弄出来了一套，还有一兵和学都往那里开会。（康生：前几天主席讲：工农兵学商，农搞出一套思想解放了，工业也基本上搞出一套，商也如此，只是兵与学未搞出一套来，意即兵学落后、思想落后。）开始动了。（康生：前几天主席的话有道理，教育的确还未搞出一套中国形式的来。）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民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特点相结合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大众的——走群众路线的。教育与广大群众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留同志们三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有何迷信？思想没解放？这次会议务实太多，务虚不够，讨论中的时间不够，也可以看出这问题。大跃进中，群众思想跃进，教育工作跃进，我们领导思想仍落后。（□□：主席把军事与教育会议并列，军事会议比我们务实多，时间多，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实的问题。）我们这会有点事务主义，（□□：他们的会还要开一个半月至两个月。）这两方面都在开会。军队的落后，不是全部落后，中间脱节，可能上层热情少点，但也不是上层都如此，军事干部对我说：“各方面是大跃进，军事进步不够，心不安。”这是好的，经过这次会议后，会起变化的，军事会议要开得好，要讲清道理，达到一个目的。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六亿五千万，地方比苏联小一半，但是比较好是温带，海岸线长，达一万二千公里，全国面积九百五十万平方公里，这国家有山有平原，山是西边，平原在东边，这有好处，使水位落差比较多，可建水坝利用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苏联早一些，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算起，已有四十七年；俄国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时

间很短，中国从辛亥革命到一九四九年有三十八年，我们落后，但革命是自己搞成的，自己找马克思主义，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原理，也是一种辩证主义的原理，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作用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是什么？在莫斯科会议前，我们有五条，后变成九条，这种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结合不行，因中国有其历史的特点，照搬不行。有过照搬，党的历史上曾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结果受到很大损失，但也有很多好处，给了我们教育，得了很多经验，同样的，凡是我们的敌人也给我们很多教育，也有好处。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等，再如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有些是党内性质的，王明现仍在党内，但他走到何处？将来再看，这人一开会就有病就是了。政治上犯错误，军事上也一定会犯错误。写过游击战争小册子，古田会议决议案是总结那时经验，划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军事的界限，那时这种界限不清楚，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军队中有两种路线，有些同志对资产阶级军事学，一套资产阶级管理制度很有兴趣，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谓外行指当时军代表政委不能领导军队，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当然不存在。有些同志认为要领导军队非学过军事不可，你们大家是否进过学校，没有的。这不是说过去在军队呆过的同志没用，他们起了很大作用，没有他们革命要迟好几年，俘虏兵也有作用（过去内战中俘虏兵也是内行）。

如果是缺点，大家都有，四军九次代表大会有那么一股空气，对资产阶级军事学特别有兴趣。林彪虽进过旧学校，但他反对那一套，另搞了新花样。实际上资产阶级军事管理制度无非是打骂制度。这一时期，喜欢旧的资产阶级军事学，管理制度那一套是一种

什么思想？可叫作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后来又来了个无产阶级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时代，有个外国人（李德）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争思想，说是上山主义，他们要正规化，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此时旧的资产阶级教条主义归降洋教条主义、无产阶级教条主义，实际也不是归降，而是两种教条主义合作，结果把我们的工作送掉了，来了个大游击，二万五千里长征，二万五千里穿过地球的中心。其他根据地也犯过错误，中央苏区还来了一个大扭秧歌，一直到陕北。

我们党有三次“左”倾路线，两次右倾路线，结果军队搞少了，受损失。但也有好处，取得经验，经过遵义会议、延安会议、延安整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把绝大多数同志说服过来，纠正过来。因此，不能说军事没犯过错误，正因为犯过错误，蒋介石请我们走，我们就走了。长征中还有一些，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反中央。以后转入抗日战争时期，有些人犯过二次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若按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今天没办法在此怀仁堂开会和看梅兰芳的戏。

抗战后，解放战争中全党全军没有基本分歧。一九三八年六中扩大全会上讲述游击战争的好处，可建党建军建政，由九十万游击队变成四个野战军，主要说抗战，解放战争不是按洋教条，也不是按资产阶级教条办事，而是按照自己的一套，当然也参照外国经验，不是按着两种教条主义取得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胜利后，我们又打败了美国帝国主义，抗美援朝战争不是小战争。苏联同志讲过，在朝鲜战场上，敌空军的威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未遇到过，当时我空军不能到第一线（敌后）。第二线（三八线）只能在后方顶一下，在当时情况下，打败美帝国

主义很不容易。有人说我没参加世界大战，不对，我们参加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厉害的战争。美国陆军怎么样？不清楚，总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在战略上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纸老虎，但是在战役和战术上要看成是铁老虎。

胜利后办了许多学校，产生了教条主义，请那么多苏联专家来，教条主义自然有了。到底有教条主义没有？对此有四种看法：（1）没有；（2）有，不多；（3）有，不少；（4）有，很多。哪种对，请大家讨论。

党的历史有两种教条主义，一种是资产阶级军事学和管理制度；一种是无产阶级接受外国的军事学和管理制度。对这两种都作过斗争，克服过。

解放后又出现了教条主义，是否有？我看有点，分量问题可研究，说完全没有，是不妥当的。不加分析地搬外国是妄自菲薄，不相信自己。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没有。只写过几篇文章，那时有一肚子气，没有气也写不出来。王明由苏联回来，王明速胜论（写文章说四年抗战胜利）。当时有速胜论和亡国论两种。党内主要批评速胜论，对国民党则主要批评亡国论。那是应时文章。现在的一套我不懂了，小米加步枪，我是看过的，辛亥革命时也背过。后来南、北议和，成了外行。

我军有两种传统，一是优良传统，一是错误传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一是非马克思主义传统。

这次会议要作点决定，大的一个，小的可几十个，成都会议就是这样（三十多个）。实事求是讲道理，大家说，大家要讲心里话，我们也提倡直道心事（坦白、交心），直道工作。有人怕讲了穿小鞋，穿有什么要紧？共产党怕穿小鞋？中国过去女人都穿小鞋。三

寸金莲不妨碍她们生四万万五千万人，共产党人怕什么？穿上几十双有何要紧？我在成都会议讲过五条，杀头当然不会，我们提倡交心，我向你们交心，得罪人有的，总之要插旗子，不插红的就插白的或灰的，不要讲出话来过多斟酌，讲话可以，今天讲话也是乱吹，写出稿子就困难了。目的是为了团结，全党全军团结，要团结起来，必须把问题搞清楚，否则不会真正团结，军人要爽快，交心才能达到团结。

为何要团结？要争取时间，最好十年不打仗，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九年，共有二十一年的和平。假如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按这个二十一年计算，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八年。现在蒋介石就那么一点大，可是他很神气，天天骂我们，搞几架飞机经常进来，到处撒传单，闹一下。你去捉，他又跑，也被我们搞了一些。我们现在还不忙。就台湾来说，如果我们有了一亿五千万吨钢，美国可能让步，它就得走。那时候吹一口气，嘘，它就得走，而现在我们就是打雷它也不听，它说这不过是蚊子叫。

我们要搞海军。肖劲光同志，你不是要搞点海军嘛，那时就有希望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军委像这样的会一年要开一次，全军党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大家把道理讲通，心情愉快，有共同的方向。方向很明确，不是糊里糊涂。肖劲光同志我给你打保票，现在不行，搞海军没有钢铁，所以你还等一下子，不用那么忙，但有希

望。我们总是有希望的就是了。干十五年，有很大的希望。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有钢什么东西都可以搞，轮船可以搞，军舰也可以搞，铁路也可以搞，空军也可以搞，陆军装备也大为不同。要为此而奋斗。全党团结起来，全军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图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主席台上。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肖劲光、许光达和刘亚楼在一起交谈。

1958年6月，毛泽东和将军们在一起交谈。

1958年，毛泽东和许世友等亲切交谈。

1958年，毛泽东和许世友在一起。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

[1]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58年6月17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就1958年国民经济形势和1959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报，其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向政治局的报告）”。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的产量上在1959年达到2,500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一些简单的表，很容易看。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

[1] 指冶金工业部1958年6月7日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包括：全国主要冶金产品的1962年生产水平（钢、铝、铜、金），全国主要冶金产品分区的1962年生产水平，第二个五年需要的投资额、第二个五年需要的设备数量和第二个五年需要的建筑材料等。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在原标题“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的规划”下注有：“冶金工业部向政治局提出，1958年，6月。”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会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

[1] 指农业部1958年6月11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点）的报告。报告的内容包括：1962年时耕地面积和各种作物的种植比例，粮、棉、油产量指标，增产措施和畜牧业的发展指标。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农业部向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农业方面所要到达的目的）”。

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批语

（1958年6月22日）

一

此件[1]发给各大协作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中央委员，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军委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六月廿二日

---

[1] 指冶金部党组1958年6月21日关于产钢计划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建议指标。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又将进入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和华东区的同志研究了争取明年达到生产能力800万吨的措施，同时其他各大协作区也在最近分别召开冶金工业的规划会议，研究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从各大协作区会议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目前冶金部正用全力协同各区，共同组织设计、设备制造以及技术力量的培养等项工作。

二

刘邓[1]阅发。各省市用电报发去。军委会议，请克诚[2]印发。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对《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的批语[1]

（1958年6月23日）

陈伯达[2]同志：

请约定一、康生、乔木、胡绳、邓力群、田家英[3]几位同志，将此期第一篇所列问题，主要是八、九、十节的问题，当场看一遍，当场逐个问题进行分析，有四、五小时也就可以了。然后和我谈一次为盼！这些问题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六月廿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1958年6月20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10期的封面上。该期《内部参考》刊载《各地对少奇同志报告学习和讨论的情况》一文，文章分10个方面综合了各地学习和讨论刘少奇八大二次会议报告时提出的问题，其中第一至七节提出的问题是：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

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区别和联系；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精神的问题；关于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总路线基本点的问题；关于破除迷信问题；关于“马鞍形”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第八节是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文章说：八大一次会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两次会议提法不一致，究竟哪一个对？有人认为八大一次会议的提法错了，中央对当时形势的估计过分乐观，但也有人认为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敲锣打鼓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策略上不能也不应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有人问，既然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思想战线上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就是说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如果承认这种理解是对的话，为什么还说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既然今后的主要矛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什么又说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什么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不一致？今后阶级斗争的规律如何？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敌情观念？第九节是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文章说，有人对东风压倒西风表示怀疑；有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会发生，对战争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缺乏信心。第十节是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关于插红旗、拔白旗的问题；关于领导干部如何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对不断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仍要搞群众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不少干部对解放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有厌倦情绪；目前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毛主席提出“不断革命”，这与陈独秀提出的“两次革命”论有什么区别等。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3]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点[1]

（1958 年 6 月 23 日）

一、人民解放军有没有教条主义呢？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搬是搬了一些，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下来了。现在有四种说法：一种是说没有，一种是说有，一种是说很多，一种是说相当多。说没有教条主义是对的，究竟有多少，这次军委扩大会议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因此就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

二、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了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讲话的要点。

三、现在形势很好，特别是国内形势很好。现在我们要抓三样东西，粮食、钢、机械。□□□同志打电话给我，说华东五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今年可以增产粮食□□亿斤，如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做一个单位，两广、云、贵、川做一个单位，也各增产□□亿斤，这样即使不算东北、华北、西北，今年就可以增产□□亿斤。钢一九六二年可以达到□□万吨到□□万吨。赶上美国不要□年，□年□年就可以了。□年可以赶上苏联，□年，最多□年就可以赶上美国。有了粮食、钢、机械，十年内又不打仗的话，人民解放军大有希望，威力会大大地加强。到那时候，肖劲光同志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现在“小米加步枪”的经验还是主要的，新的还没有，就把“小米加步枪”否定了是错误的。当然停留在旧阶段也是不对的。

四、肯定讲我们要学习苏联，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过去学了，现在要学，将来也还要学。苏联的经验有三种：一种是好的，我们用得上的，就要取“经”；第二种是不好不坏的，要取其好的一部分；第三种是坏的，也可以研究，引以为戒。所以对苏联的经验要有选择地学。苏联顾问、专家，大多数是忠心耿耿的，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应当肯定。我们对他们应当做兄弟一样看待，不要把他们当做客人。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坏的只是少数、个别的，也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他们就是有一个缺点：政治水平不高。有问题时要好好同他们研究，商量问题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团结诚恳对待他们，也要有批评，有斗争。这一方面第二机械工业部做得很好，向专家宣传我们的总路线，专家也说要向我们学习，批评我们有些人有依赖思想。要注意不要因为反教条主义而否定一切。

五、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是三个“并举”。斯大林只强调一面，强调工业，忽视了搞农业；强调集中，忽视分权；强调大型的，忽视中小型的。我们比斯大林要完整。苏联现在有两个地方有改进，注意了农业，注意了分权，但他们还是不大注意走群众路线，不提倡搞中小型。我们还有一条，就是洋办法和土办法结合，人民解放军搞现代化，搞洋办法，也应该搞点土办法，例如民兵是土办法。土办法发展以后，也可以变成洋办法。“小米加步枪”同现代化可以结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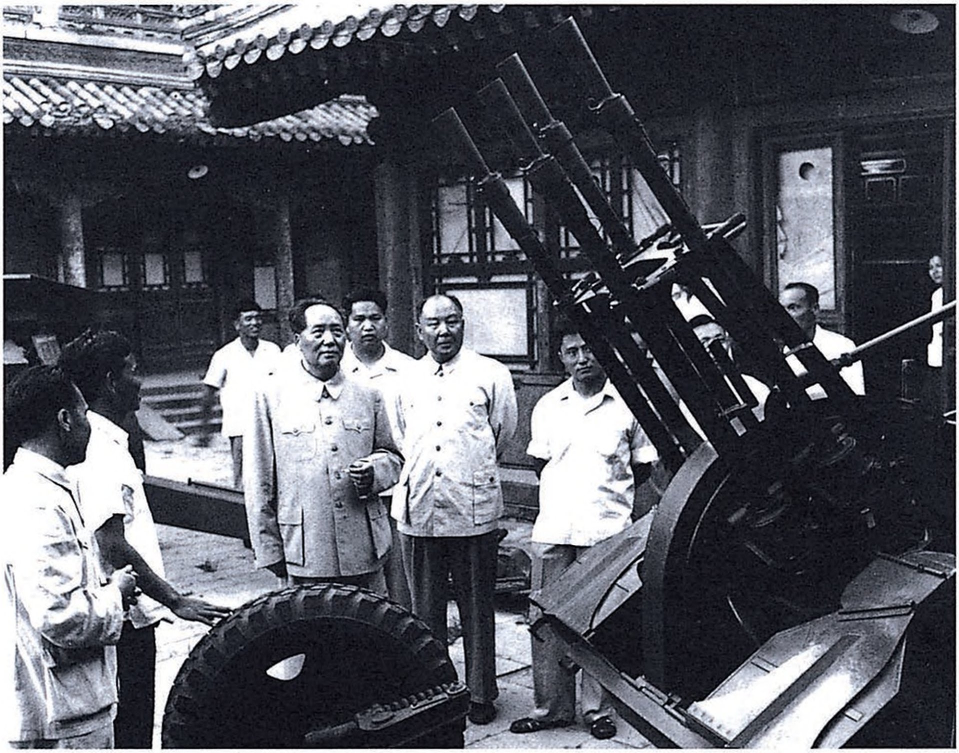
六、军委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一定要改进，办法就是一年下去摸四次，像地方一样有系统地去摸。住北京的人，官气多一些，政治少一些（现在有改进），因此要注意这个问题。军委领导要改进。下面有批评，我看这些批评是好的，要求高一些，都是为了改进军委领导。今后军委这样的会要每年开一次。今后中央开代表会议应多吸收军队同志参加，如地方上应相当地委书记以上参加者，军委师以上党委书记可以参加。你们不是说文件看不到吗？这次给你们多看一些。你们参加省委没有？（刘培基答：我们有八个人参加福建省委。）福建这个问题解决了，我知道的。

七、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指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反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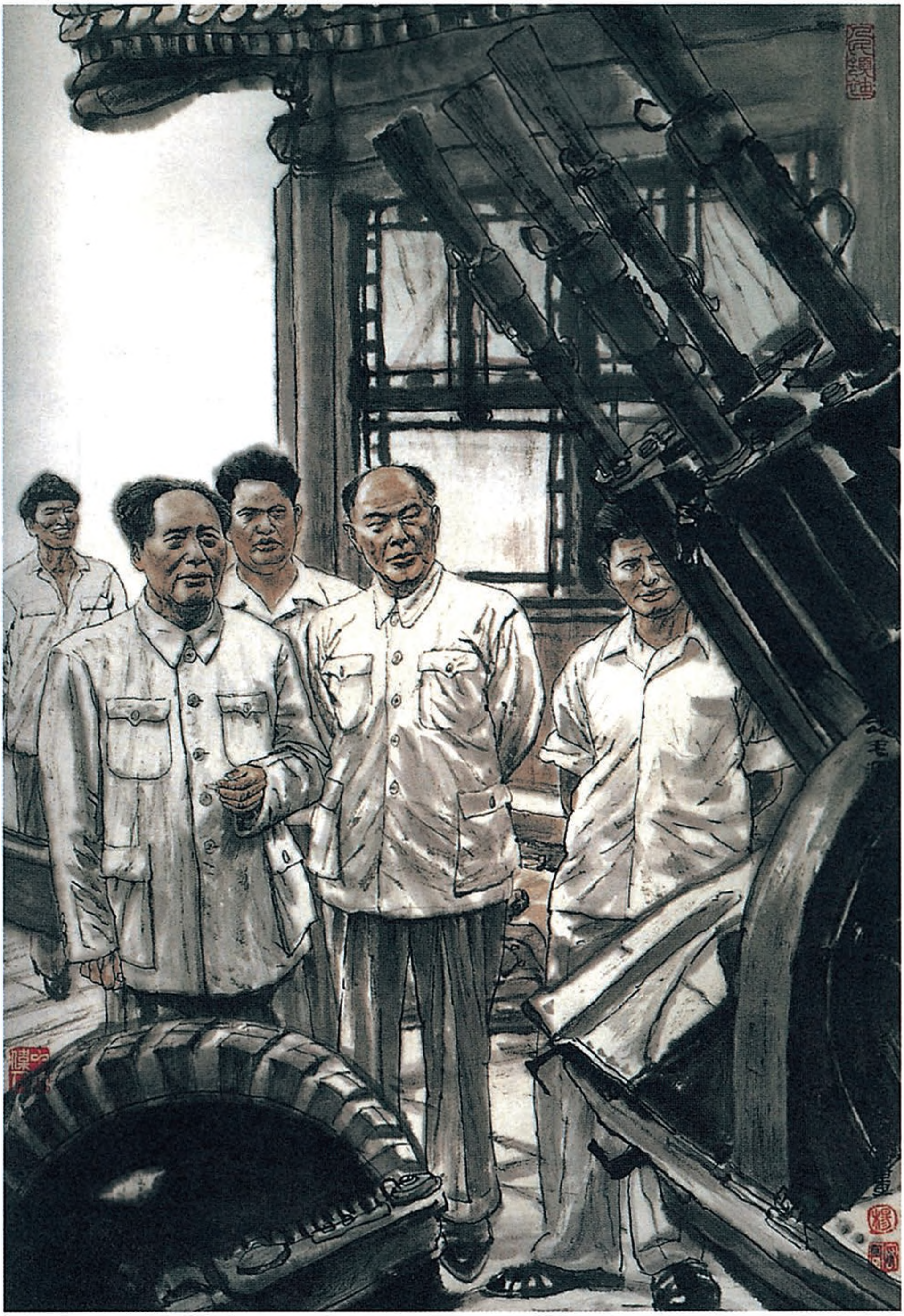
八、王明至今还向苏联告状，告我三个东西：一是反对共产国际，二是搞个人崇拜，三是强迫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都作检讨。□□□说：共产国际有错误为什么不能反？□□□就是参加过共产国际的，他说得很对，□□同志的这个报告也要印给大家看看。

九、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是□□亿，由于没有经验，加上

教条主义地照搬，浪费了一半，本来可以搞□□亿的事业，可以做更多的事而没有做到。好处是取得了经验教训。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我国自己研制的武器。



《观看新型武器》（中国画）

转发青海省委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8年6月24日）

---

[1] 指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6月18日关于镇压叛乱问题给中央、军委并兰州军区、各州、县委、柴达木工委、西宁市委的报告。报告说，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已经蔓延成为全局性的问题，全省牧业区的6个自治州都或多或少地先后发生了叛乱。从平息叛乱、捕捉反革命分子等方面获得的材料，证明青海地区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与西藏拉萨方面的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的阴谋分裂祖国的活动密切相联，是帝国主义和拉萨反动集团策动的。其实质是帝国主义与拉萨反动派阴谋分裂活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反改造的反映，是一场尖锐剧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必须争取群众，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真正使劳动人民从政治上翻身，彻底铲除叛乱的根源。同时对于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必须以革命的武装予以严厉打击。198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复了青海省委关于解决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央批语指出：“应当肯定，当时平息局部地区的武装叛乱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使一批干部、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遭到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责任主要在领导。处理这个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要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消除群众之间、干部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隔阂，引导各族人民顾全大局，团结起来向前看；在经济上，也要给予适当的抚恤、救济和补助，但目前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不可能完全解决，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把经济搞上去。”

一

此件请克诚[1]同志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同时请小平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先发川滇黔藏。使大家知道这件事。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毛泽东

二

刘、邓、彭、黄[2]阅，请邓、黄办。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

在中国驻苏使馆关于苏联积极筹备庆祝我国国庆的报告[1]上的批语

（1958年6月24日）

刘、邓[2]：

看来不举行庆祝是不行的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然后常委谈一下，考虑方针，答复苏共。

毛泽东

六月廿四日

---

[1]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8年6月20日给外交部、中联部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6月20日，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维诺格拉多夫接见了陈楚并告称，苏共中央很重视我国国庆十周年纪念，认为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节日，苏联将进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庆祝活动。苏共中央希望了解我国的意图，庆祝活动的计划、措施、规模和总的精神等，以便更密切地配合进行活动。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邓子恢[1]夏收增产统计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5日）

一

此件[2]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是一个好消息。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五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指邓子恢1958年6月24日关于夏收增产统计给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从河南、湖南等17个省区已报来的增产统计数，共339亿斤；二、甘肃、新疆、北京3个省区市增产估计数共15亿斤；三、据20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951亿斤，去年是596亿斤，今年比去年增产355亿斤；四、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5200亿斤，增产可达2100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毛泽东在这一项旁批道：“八大第一次会议决定1962年为5000亿斤。”）

二

克诚[1]办。办后，将此稿送小平[2]，印发在京各中委、各部长。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机械工业问题的几个报告的批语

（1958年6月26日）

机械工业问题

此件[1]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此件分为几个部分，全文虽长，每一部分甚短，很吸引人，可以一阅。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请克诚[2]办。

---

[1] 指第一机械工业部关于机械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几个报告，主要是：关于重型机械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自由锻造水压机的生产分布和分配的报告、关于冶金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电站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石油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关于氮肥设备制造问题的报告。

[2]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关于应对国民党军火力袭击的批语[1]

（1958年6月26日）

退彭照办[2]。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8年6月26日呈送的电话记录上写的批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1958年6月26日上午电话报告：福州军区判断，国民党军最近可能对我组织一次大的火力袭击。据此，福州军区提出两项应对措施。一是消极方面的，采取撤离等防范措施，高炮加强对空作战。二为积极方面的，即组织还击。总参谋长粟裕指示：除火炮防敌袭击外，另调一些高射炮部队，集中火力打击敌飞机。如有机会再打地面目标，并同意作战部关于积极进行还击准备，待敌暴露目标后狠狠给敌以打击的建议。彭德怀6月26日12时批示："即送主席阅后审批。我同意第二项措施，采取积极还击并加强对空火力。"

对《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的批语和批注[1]

（1958年6月27日）

一

即送刘、邓、彭真、定一、康生、伯达、乔木、胡绳、田家英[2]各同志阅，退江青。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

[1] 《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载于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6月2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七十三期。毛泽东为此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并在这个材料的空白处写了7条批注，我们把毛泽东的批注和这个材料对照排印，其中的横线、双横线、波线、三角、叉等符号，是毛泽东批写的。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

二

一篇为“中间立场”辩护的哲学理论

下面是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的交心材料：

我认为：

（一）世界上万事万物在客观上都有两面性，都有矛盾性。有两极就有中间。譬如：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后、薄中厚。中间就是矛盾的平衡，两面性的统一。×××

（二）万事万物依存于极端的总是少数，多数都是处在中间状态，因此普遍、共同、真实、真理正表现在多数这方面，△也就是中间方面，△而两极总是少数的、是特殊的、片面的、表面的、不是代表性的。△

（三）两极中间也有中间，我所走的中间路线就是中间中的中间，这是最客观的，最稳妥的，最全面的，最辩证的。

根据以上的观点，我把中间路线分成三部：

第一，立身处世，接物待人的中间路线：

我肯定自己是个平凡的人，把自己放在众人中间，不突出就不孤立；

我认为喜乐爱恶，大家相同，平等待人，平心

论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善与人同。我对人家好，人家也对我好，与人方便就是方便自己，与人无争无竞，最能息事宁人，四平八稳，无往不利。极端个人主义

反阶级斗争，反辩证法

小资产阶级的庸俗社会学

第二，工作作风上的中间路线：

不争上游，不甘下游，安于中游。不求有功，但愿无过，有功就可能突出，自己的功劳中很难避免不剥削人家的劳动。△有功，△也难免有个人主义，△难免不包括名利思想。△有过也不好，自己要检讨。

第三，政治方面：

一、学习不积极不落后，在小组会上不发言也不沉默。人家发言热烈，我也热烈发言，人家钻研学习，我才钻研学习，跟着一块儿学习。

二、各次运动中，不带头不落后，把自己放在群众之中，不偏前，不偏后。运动在前进，我也在前进。

世界观是极端唯心论，中庸是伪装

三、对厚古薄今与厚西薄中问题，该厚的某点即厚，该薄的某点即薄。古有好的，今也有好的。中有好的，西也有好的。古有坏的，今也有坏的。中有坏的，西也有坏的。好的为好的，坏的为坏的，不能主观片面，不能以特殊代表普遍。

相对主义，折中主义

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批评和自我批评没有展开时，我也不批评人家，也不自我批评。批评展开了，大家彼此批评了，我也批评，大家自我批

评，我也自我批评。反动极了

总之，跟随大家就是走中间路线，也可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大家既然进入社会主义，我在大家中间，当然我也进入社会主义。

中间路线的好处是：

一、不为人羡而忌；

二、不为人畏而恨；

三、不为人敬而远；

四、不为人重而疑。

因此就可以安于现实，进一步可以争取荣誉，退一步远离耻辱，善始善终。

这种人是右派的后备军，这种人多了，右派的天下就巩固了。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8年6月29日）

这次会议开得不错，有些同志的发言很好。张宗逊同志的发言很好，我赞成。这是经训总四级干部会议逼他写出来的，可见一逼就写出好东西了。只有一点我不同意，那就是张宗逊说他犯错误是因为没有很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不对，应该说，主要是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这次亚楼同志的发言也可以。这说明军队同志是有水平的，可以写出东西来。最好组织一些军师级同志发言，写写东西，因为他们是做实际工作的，接触下面，写的东西能够理论与实际结合。会议内容应该丰富多彩，也要介绍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在文章中讲话时，不要批评苏联，教条主义是我们学习的问题，不是苏联先进不先进。

我军队开始就存在着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古田会议斗了一下，但没有说服有错误意见的同志，有的同志到今天还坚持着错误路线。肖克同志不仅有教条主义，而且是个军阀主义，有资产阶级思想，教条主义、封建主义思想。

战争中按照苏军条令执行是不行的，还是搞自己的条令。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做教条来背，如果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要批评他

们是教条主义。现在教条主义者主张抄苏联，请问苏联当时是抄谁的。“八大”决议中有一节关于技术改革的问题，按照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提得不妥当，就是过分强调依靠苏联的帮助。争取苏联的援助是很需要的，但主要的还是自力更生，如果过分强调依靠苏联援助，请问当时苏联又依靠谁来援助。

工农业大跃进，打破了迷信。我们在□年可以赶上英国，□年至□年赶上美国。明年我们钢产量，将达到□□至□□万吨。据说东北一九六二年即可产□□万吨，这是整风的结果。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形成工业大跃进。军队训练已经八年多了，连一本战斗条令也没有搞出来。这次要集中一些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有些人提出，苏联顾问看我们不抄他们的，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就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

□□为什么革命胜利后没有搞好呢？除了对前一段未深刻检讨，接受历史教训不够外，一是迷信旧的东西、旧教条，二是迷信洋教条，迷信苏联，三是迷信自己。这个人工作很积极，很努力负责，就是方向不对头，政治上不够强。这次会议主要是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以整风方式大鸣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经验教训，主要是教育全党全军，团结全党全军。因此会议上可以指名批评，但我建议在写决议时只要达到分清是非，搞清问题，就不要写出犯错误同志的名字。古田会议的决议就没有写出名字嘛！

主要是迷信洋人，有自卑感，没有打破迷信，不以自己为主。现在一个合作社也要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不然就会落后。湖北省

新洲五个合作社搞得较好，麻城差点，可是新洲没有注意把自己的经验总结起来，而麻城派人到新洲学习，结合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推广，结果麻城工作跑到前面去了。军队过去打仗，还不是把下边打的经验总结起来，再去训练部队，又再去打仗吗？我们各种工作都要注意总结好的经验，加以推广。

苏俄打败过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那已经很久了。苏联有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打败过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有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经验看得那么不值钱，是不对的。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的情况的。要翻译美国、日本的东西。将来美国在东方战争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来的，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况。对苏军的经验是要学的，因为我们的装备是苏式的，但装备技术天天在发展变化，学苏军的技术经验也要用发展的观点去学。过去俄国人很怕拿破仑，因为他领兵曾打到莫斯科，最后俄国人又把他打败了，所以俄国人经常宣传他们比拿破仑还厉害。目前，苏军顾问搞的东西（作战计划、想口）都是进攻的，都是胜仗，没有防御，没有打败仗的。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争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一定要总结。至于他们说我们是经验主义，那么，我们就说，你们搬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也是经验主义。

肖克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过去没有这样的时机来开这样大的会议，今天有了这个时机，我们可以挖挖教条主义的根子。

关于学习苏联，对内讲批判地学，为了不引起误会，对外还是讲有分析地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是，最重要的是学习

苏联先进经验一定要和自己的独创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这一点要同苏联同志讲清楚。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习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苏联专家现在也有了转变，苏联二十次代表大会和朱可夫事件后有转变。（陈□插话：据归国苏联同志他们也讲：来的时候是带着我们的经验来的，回去的时候是带着你们的经验回去的。）这就说明了大跃进的形势，不但鼓舞了我们中国人民，同时也鼓舞了苏联同志。这样好。

李世民、曹操等，他们都是会打仗的。中国过去还是有些东西的。凯丰[1]同志曾说《孙子兵法》中没有马克思主义，我问他看了没有，他答不上。可见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武断地下结论，是不妥当的。

破除迷信是成都会议提出的，四个月来发展很快，八大二次会议后，更在全国全面开展，如鞍山，原计划产钢□□万吨，但现在变了，到明年就可能达到□□至□□万吨钢。他们也搞大中小型结合，土办法洋办法结合。据□□□同志从东北来信说：东北第二个五年计划可搞到□□万吨钢。有了钢，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工业就好办了。我赞成多生产一些轻武器，武装广大民兵。过去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因为我们粮、钢、机械少，现在搞出了东西给大家看看。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刘道生[2]发言稿中提出十年搞五十万吨位，这太少，最少搞一百万吨位。一九六二年我们可搞□□至□□

---

[1] 凯丰，即何克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 刘道生，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万吨钢，要这么多钢干吗？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还手，要打它。把它打垮，就要考虑追击，要修水上铁路（造军舰）。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造船还要几年才行？一九六二年我们有□□至□□万吨钢，有□□万台工作母机，生产能力就大了。

原来认为军队有很大的捞头，现在只有□多万了，考虑还减不减？去年减□□万，留□□万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情况不同了。

我准备下次座谈会上，专门讲部队整编和干部等问题。

在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宣言》上的批语[1]

（1958年6月）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秘书局1958年6月3日编印的《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刊载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上。《党史资料汇报》的编者按说：这个文件是从去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们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选出的，不是原件，是根据英文译稿又译成的中文稿。英文稿译者于1921年12月10日写有一个说明，全文是：“亲爱的同志们！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十一月间决定的。这宣言的内容不过是关于共产主义原则的一部分，因此没有向外发表，不过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这宣言之中文原稿不能在此地找到，所以兄弟把他从英文稿翻译出来。决定这宣言之时期既然有一年多了，当然到现在须要有修改和添补的地方。我很希望诸位同志把这个宣言仔细研究一番，因为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得要注意这种重要的文件——共产党宣言。并且会提出远东人民会议中国代表团中之共产主义者组讨论。讨论的结果，将要供中国共产党的参考和采纳。”

接见应举社社长时的谈话[1]

（1958年6月）

你们过去是一个穷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就改变了面貌，再过几年你们还会更好！

这是由于你们合作社全体社员的努力，才取得了这样大的成绩。全国的事情要办好，就要靠全国六亿人民的努力。

要戒骄戒躁，干部和群众要紧密地团结，要把红旗永远插在你们社里。让红旗越插越高。

民政工作就是作人民工作，不要怕麻烦。

---

[1] 这是毛泽东接见河南登封应举社社长崔希彦等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七律二首·送瘟神[1]

（1958年7月1日）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2]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3]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
华佗无奈小虫何！[4]
千村薜荔人遗矢，[5]

---

[1] 送瘟神，把迷信传说中的司瘟疫之神送走。意谓动员起来的群众力量同科学知识相结合，将有可能彻底消灭危害中国长江流域以南很多省份广大人民的血吸虫病。

[2] 余江县，在江西省东北部。

[3] 浮想联翩，种种想象接连而来。

[4] 华佗无奈小虫何，华佗，汉末著名的医生。小虫，指血吸虫。本句意谓不发动群众消灭它，就是名医也无能为力。

[5] 千村薜荔人遗矢，薜荔，野生常绿藤本植物。千村薜荔，形容很多村落荒凉。矢，同屎。“人遗矢”，借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记战国时赵国名将廉颇的故事。廉颇被废，虽老仍健，赵王想再起用他，但派去的使臣却捏造说他一会儿就拉了三次屎（顷之，三遗矢矣）。这里指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病人下泻不止，濒于死亡。

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
巡天遥看一千河。[1]
牛郎[2]欲问瘟神事，
一样悲欢逐逝波。[3]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4]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

---

[1]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人们住在地球上，因地球自转，于不知不觉中，一日已行了八万里路。地球赤道全长4万公里，合八万里。地球在太空中转动，所以住在地球上的人们也在“巡天”。一千河，泛指宇宙中很多的星河。

[2] 牛郎，神话人物。神话传说牵牛星是由人间的牛郎变成的。

[3] 一样悲欢逐逝波，逝波，一去不回的流水，借喻已过去的时间。这里是说人间的血吸虫病，在解放以前，在中国共产党没有发动群众加以扑灭以前，还是同牛郎在时一样，悲者自悲，欢者自欢，多少年头就这样流水似地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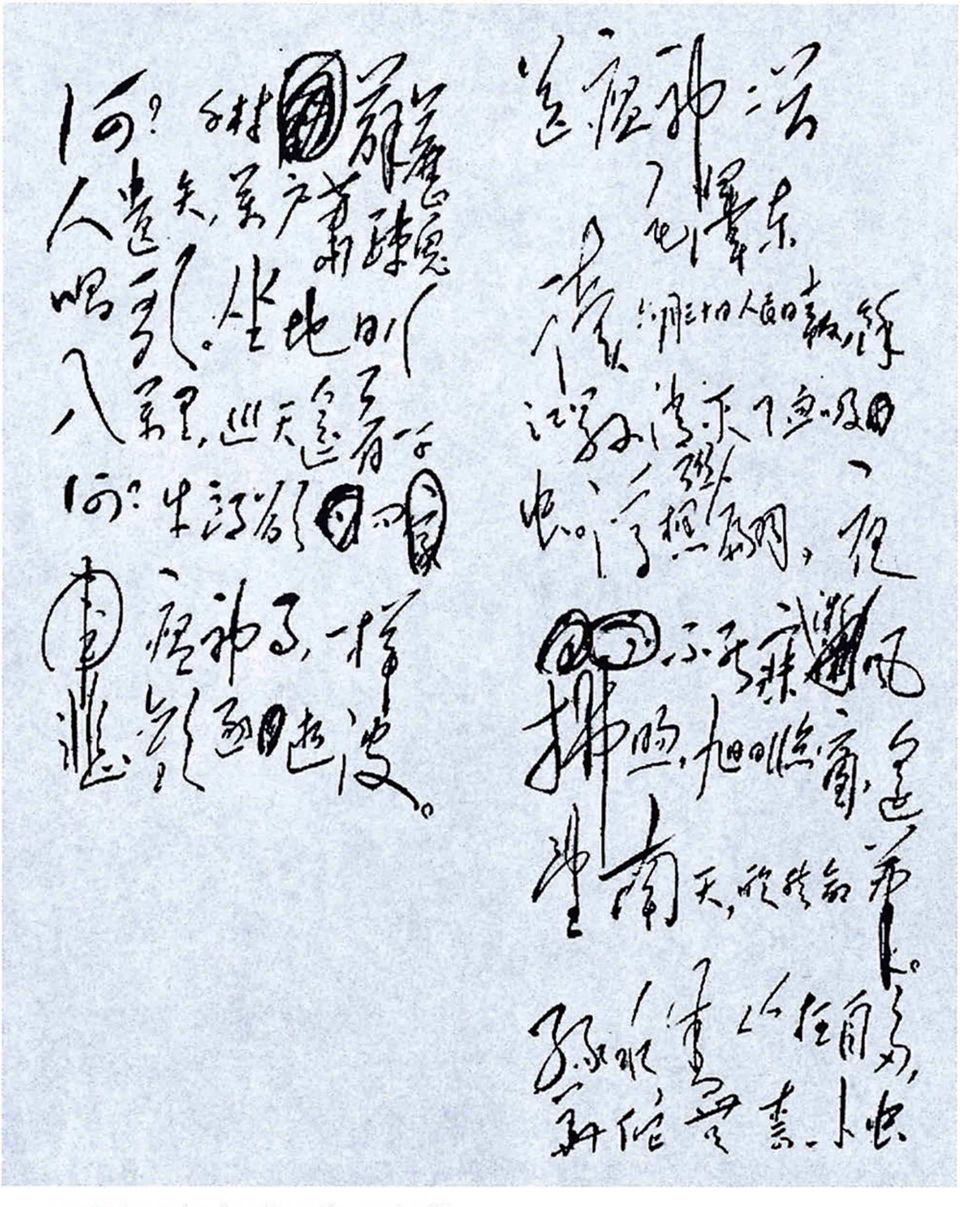
[4] 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国的六亿人（当时人口约数）都是尧舜一样的圣人。尧和舜是古代历史传说中唐、虞两代的“圣君”。

地动三河[1]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
纸船明烛[2]照天烧。

---

[1] 三河，汉代把河东、河内、河南三郡称为三河之地（见《史记·货殖列传》），原指今晋西南和豫西黄河两侧的一部分地方，这里泛指北方。上句五岭，泛指南方。

[2] 纸船明烛，旧时祭送鬼神有烧纸船、点蜡烛等习俗。这里借来形容瘟神（瘟君）在六亿人民的奋进中无处存身，只有逃离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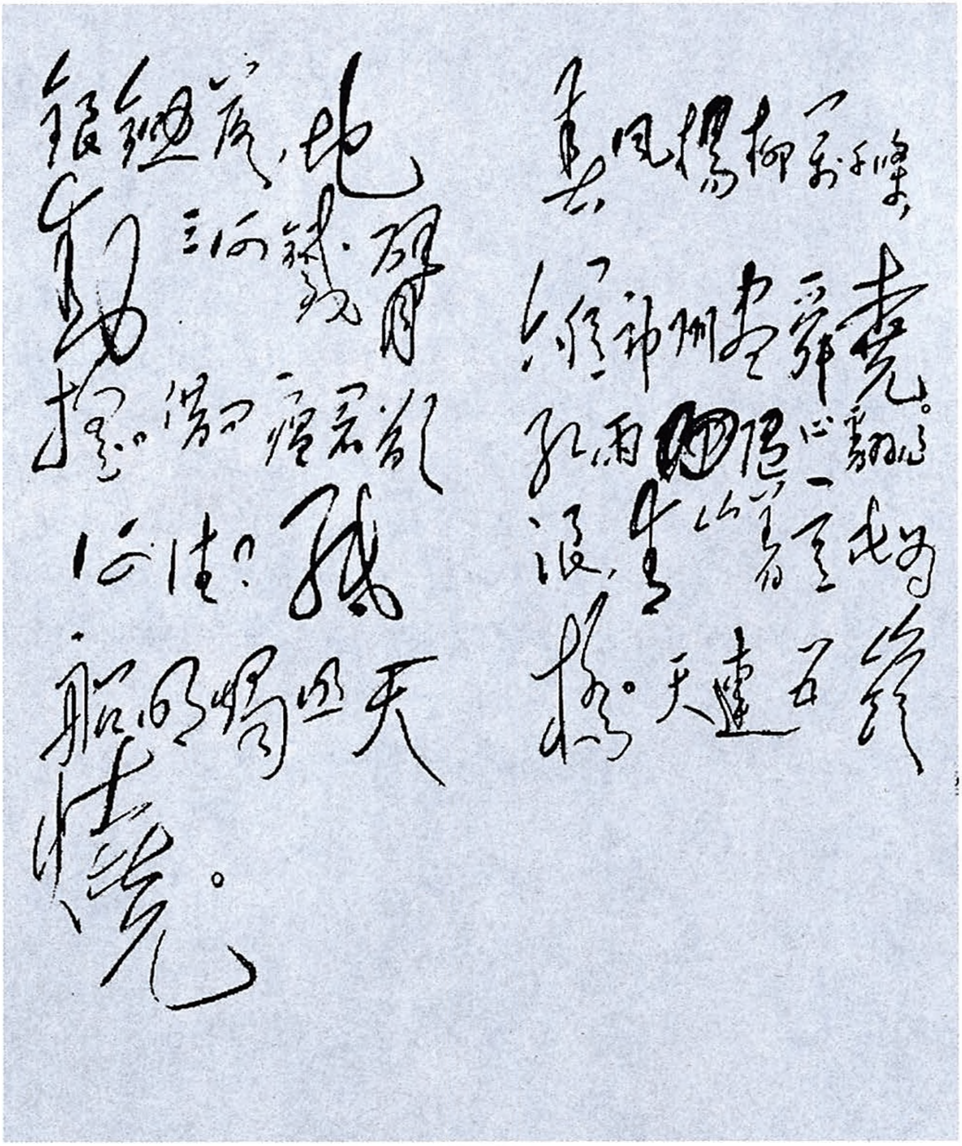
送瘟神二首

毛泽东

读六月卅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毛泽东手书《七律二首·送瘟神》。



春风杨柳万千条，
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
浪，青山着意化为
桥。天连五岭

银锄落，地
动三河铁臂
摇。借问瘟君欲
何往？纸
船明烛照天
烧。

毛泽东手书《七律二首·送瘟神》。

《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

（1958年7月1日）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如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给胡乔木的信

（1958年7月1日）

乔木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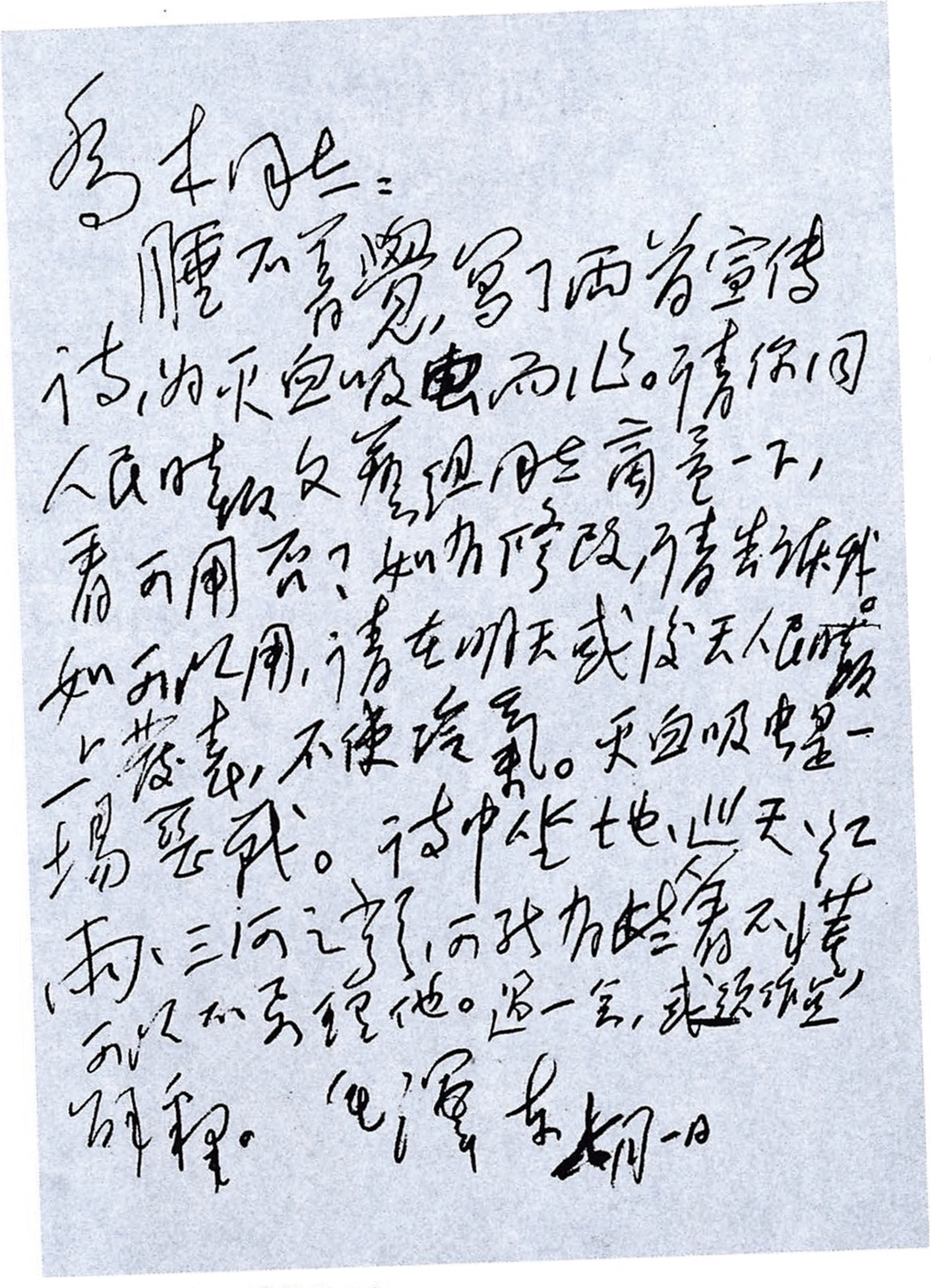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1]，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七月一日

---

[1] 指《七律二首·送瘟神》。



乔木同志：

睡不着覺，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氣。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会，我须作些解釋。

毛泽东

七月一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为索要一批图书杂志开列的清单[1]

（1958年7月1日）

古诗源
唐诗别裁
明诗别裁
诗韵
楹联丛话，续话
六朝文絜
初唐四杰集
西厢记（剧本）
金瓶梅词话
红楼梦

一至六月：
哲学研究
历史研究
文艺报
诗刊

---

[1] 毛泽东开列的这个图书杂志清单分写在两页白纸上。原手稿没有时间，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的日记记载，这是毛泽东1958年7月1日写给逄先知，并由他去办的。

介绍一封信[1]

（1958年7月3日、30日）

一

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同志最近率领北路检查团到从化县，经四天工作，给省委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三个问题：一、对早造[2]生产的看法问题；二、群众路线问题；三、大字报问题。这些都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重要问题，值得一切从中央到基层的领导同志们认真一阅。红旗半月刊应当多登这样的通信。这封信的风格脱去了知识分子腔，使人高兴看下去。近来的文章和新闻报导，知识分子腔还是不少，需要改造。这封信在广东党内刊物上发表，由新华通讯社当作一份党内文件发到北京的。其实，这类通讯或文章，完全可以公开发表，无论对当地同志和全党同志都有极大好处。我同意赵紫阳同志的意见，早造每亩『么』能收300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200斤增长50%，何况还有350—400斤的希望。原先的800斤指标是高

---

[1] 本篇是毛泽东对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1958年6月8日给广东省委的信写的3个批语。标题是毛泽东在第一个批语上拟的。赵紫阳的信后来发表在1958年8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上，题为《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

[2] 早造，即早稻，又叫上造。

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这是由于缺乏经验，下半年他们就有经验了。对于这件事，从化的同志们感到难受，这种难受将促使他们取得经验，他们一定会大进一步。群众路线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全党注意的问题。其办法是从全省各县、全县各乡中，经过鉴定，划分为对于群众路线执行得很好的，执行得不很好也不很坏处于中间状态的和执行得很坏的这样三大类，加以比较，引导第二、第三两类都向第一类看齐，到第一类县乡去开现场会议，可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农村有，城市也有，故是全党性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

二

小平、彭真、震林、伯达同志：

你们看这封信是否可以发表？我看发表毫无害处。请伯达打电话给广东省委，问一下这封信是否已在党内刊物上发表，或者是用单个文件发表〈到〉各县，或者并没有发去？再则告诉他们，我们拟在红旗上发表，他们意见如何？以其结果告我为盼！

毛泽东

六〈七〉月三日上午七时

请在**七日下午**退给陈伯达。

三

陈伯达同志：

此事请你处理，我来不及了。

毛泽东

七月卅日

为罗哲[1]烈士墓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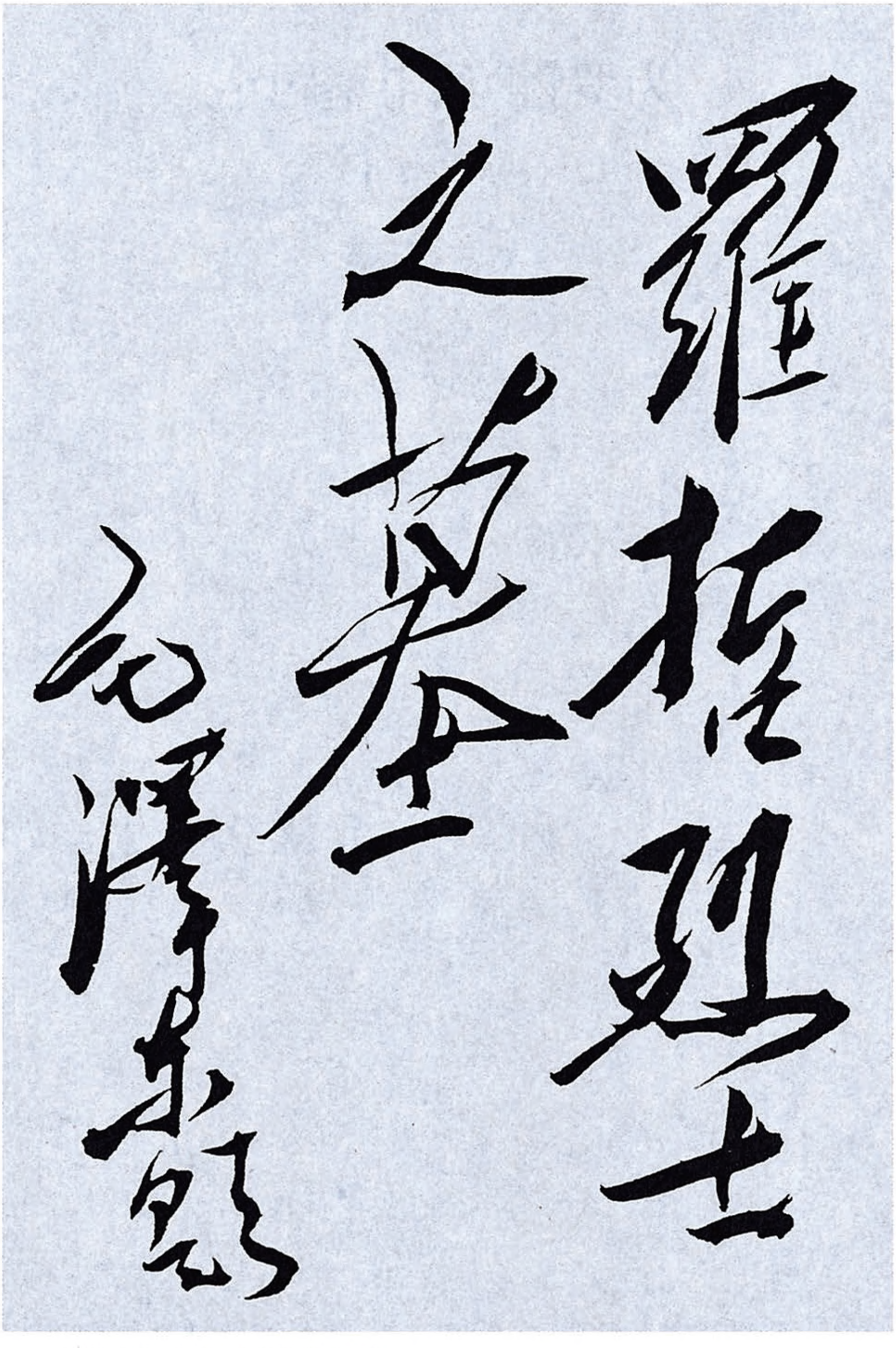
（1958年7月）

罗哲烈士之墓

毛泽东题

---

[1] 罗哲，湖南株洲人，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羅哲烈士之墓

毛澤東題

毛泽东为罗哲烈士墓的题字。

为曹云芳[1]题词

（1958年7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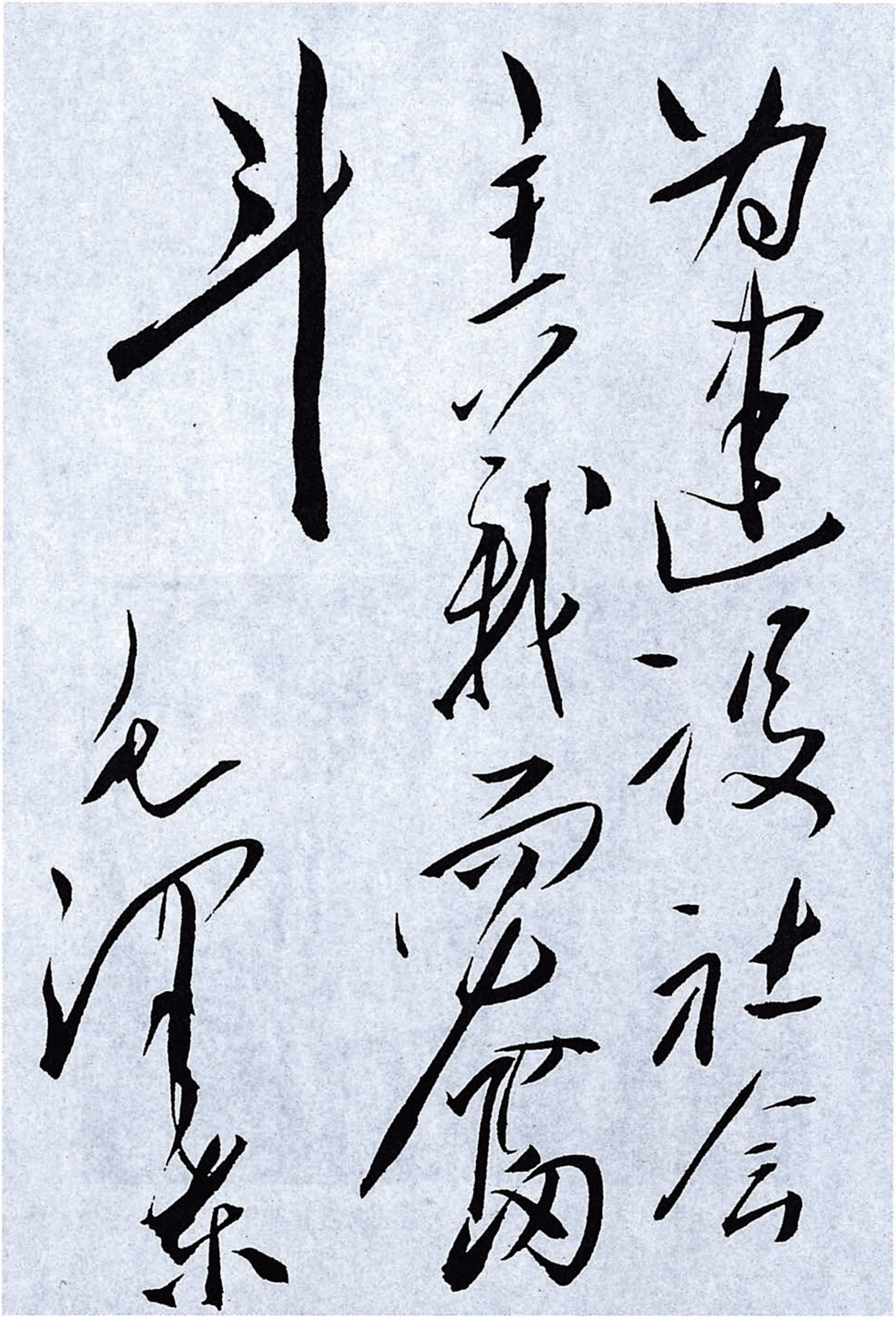
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

1958年，毛泽东和罗哲夫人曹云芳及其两个外孙女合影。

---

[1] 曹云芳，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她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曹云芳的题词。

对谭震林关于华东五省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总结的批语

（1958年7月7日）

陈伯达同志：

此件[1]似可登红旗，你看如何？谭震林去郑州，大约一星期左右回京。他回来后，可和他商量一下。题目另换一个。文字略作修改（不要多改）即可。

毛泽东

七月七日

---

[1] 指谭震林1958年6月25日在合肥召开的华东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总结在谈到农业发展的形势时指出：“从华东四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和上海市）的情况看来，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几十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并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的粮食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摆在我们面前的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任务，就是积极争取今年的秋季丰收和明年的更大丰收，以便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总结还就争取农业全面丰收，保证夏种计划的完成，加强田间管理，认真推广改良农具和新式畜力农具几个方面提出了要求。谭震林的这个总结后来发表在1958年8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六期上，题为《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接受锡兰[1]新任驻华大使高伯拉瓦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8年7月7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锡兰作为亚非会议发起国家之一，在国际事务中正在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锡兰政府和人民为争取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事业、特别是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有益的贡献，受到了亚非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尊敬和欢迎。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继续同锡兰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在一起，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幸福而共同努力。

"如阁下所说，中国人民和锡兰人民从很早的时候起就进行了友好往来，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去年2月，中锡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确认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这就为我们历史上的友谊联系建立了新的巩固的基础。我深信，在这样的基础上，中锡人民的传统友谊将得到越来越广阔的发展。

"我热烈地欢迎阁下出任锡兰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并愿为阁下在加强中锡两国友好联系的工作中给以充分支持和协助。谨祝贵国繁荣，人民兴旺。"

---

[1] 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关于注意暴雨冲毁水库问题的批语[1]

（1958年7月8日）

一

彭真[2]同志阅。

河南暴雨冲毁水库一条，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七月八日

---

[1] 这两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8年7月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1期上。其中：一写在《内部参考》第2521期的封面上；二写在该期《内部参考》刊载的新华社郑州2日讯《河南部分地区暴雨成灾》的旁边。新华社报道说：6月27日至30日，河南部分地区发生暴雨。暴雨中心在沙河上游的宝丰、郏县、叶县及白河流域的镇平一带。由于暴雨集中，势猛水大，造成了严重灾情。平顶山市冲垮水库16座、水塘35个、堰埂81处。郏县李口乡沙山水库土坝被冲毁，大水冲进张店村。宝丰县代集乡42个小水库被冲毁35个。叶县冲毁中型水库2座，小水库3座。偃师冲毁水库五座。镇平冲毁渠道7条，进水闸1座，拦河坝15座，小水库6座。灾情发生后，当地党政领导立即率领干部抢救，现洪水已基本退下，各地正转入善后工作。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二

冲毁不少中小水库。

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指示谈肃反斗争宣传等问题

（1958年7月8日）

文章发表的面比较宽了，目前可以采取少而精的原则了。

群众的检举很有作用。这要大大提倡。反革命最怕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报社有几百封信。有材料，应写成新闻，读者知道自己的信有了下落。对反革命分子也要进行神经战。使他们知道我们发动了群众。并且进一步号召群众检举，写成社论。

不要把自由主义当作政治上闹独立王国、反党等等。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的电报[1]

（1958年7月10日）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此中国人民感到无限的欢欣。不久以前，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总结了蒙古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制定了新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我们深信，勤劳勇敢的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定会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中蒙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不断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七周年。

祝蒙古人民共和国日益繁荣富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和黑非洲青年代表团的谈话[1]

（1958年7月12日）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九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一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一百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

[1] 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我们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占领别的国家，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你们也是如此。你们解放后也不会去占领法国、美国、英国、德国。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帝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散布他们是文明的、高尚的、卫生的。这一点在世界上还有影响，比如存在一种奴隶思想。我们也当过帝国主义的奴隶，当长久了，精神就受影响。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我们在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破除迷信。过去中国人中有恐美病，要去掉它的影响。你们有没有人有恐法病？想必会有的，法国一直在宣传那些东西，总会有人跟着它走。我们要在人民中慢慢改掉这种思想。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刚才外交部长陈毅同志跟我说，摩洛哥向法国、英国买机器买不到，法国、英国不肯把工作母机卖给他们，摩洛哥要向中国买机器，他们很欢迎我们的机器。法国、英国、比利时离摩洛哥很近，但是不卖机器给他们。我们卖机器给他们。

一个国家获得解放后应该有自己的工业，轻工业、重工业都要

发展，同时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还要发展林业。森林是很宝贵的资源。中国解放后自己发展工业，自己制造机器。你们那些国家怎么样？有没有民族资本？自己能不能制造机器？

我的著作，中国的情况，仅仅只能作你们的参考，你们办事要按照你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当然中国的情况你们也可以看看，比如上海、北京就可以看看。但是，你们做事一定要根据你们国家自己的情况，一个民族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过去是吃过亏的，照搬外国，就是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把南方的根据地几乎都丢掉了，只好长征，使革命受了很大损失。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1]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了。长征中我们走了很多路，用两条腿走的，全部路程等于地球的轴心，从中国钻进去，从美国出来，有一万二千五百公里。那时我们犯了错误，蒋介石就逼着我们走这么多路，走到北方来了。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来一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

---

[1] 参见列宁《论策略书》。原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对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1]的批语

（1958年7月14日）

---

[1] 新华社1958年7月12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528期刊载湖北省粮食厅工作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介绍湖北省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常年办食堂的经验，其中说，在京山县合作乡八一社，提起办食堂这件事，无论社干部和社员都会喜笑颜开地把它赞扬一番。这个社的农民喜欢食堂，是由于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的收入；第二个好处是节约了粮食；第三个好处是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第四个好处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但这个食堂开始并没有办好，他们经历了三次兴办两次垮台的过程，主要原因是食堂的管理工作未做好，加之吃饭的分配方法有问题。社里领导针对社员群众存在的怕办得不合理、怕管理人员贪污以及富裕农民怕露富的思想顾虑，进行了以下几件工作：首先，深入一点，作出榜样，用实事解除社员的误解。其次，成立组织，加强管理。全社以管财经的主任为主，吸收有关人员参加，组成了食堂管理委员会，各队也成立了食堂管理小组。主要任务是检查账目、随时听取群众对食堂工作的反映，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改进食堂工作。再次是坚持自愿入食堂的原则。对于不愿入食堂的农户的粮食、烧柴，仍然按分配原则如数分给。由于坚持了自愿原则，加之食堂越办越好，使原来不愿入食堂的农户也自动要求参加了。1958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以《八一农业社的食堂是怎样办好的?》为题发表了这篇文章。

陈伯达[1]同志阅。退毛。

第十一页湖北京山县合作乡一个合作社办食堂一事，可以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毛泽东

七月十四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1]

（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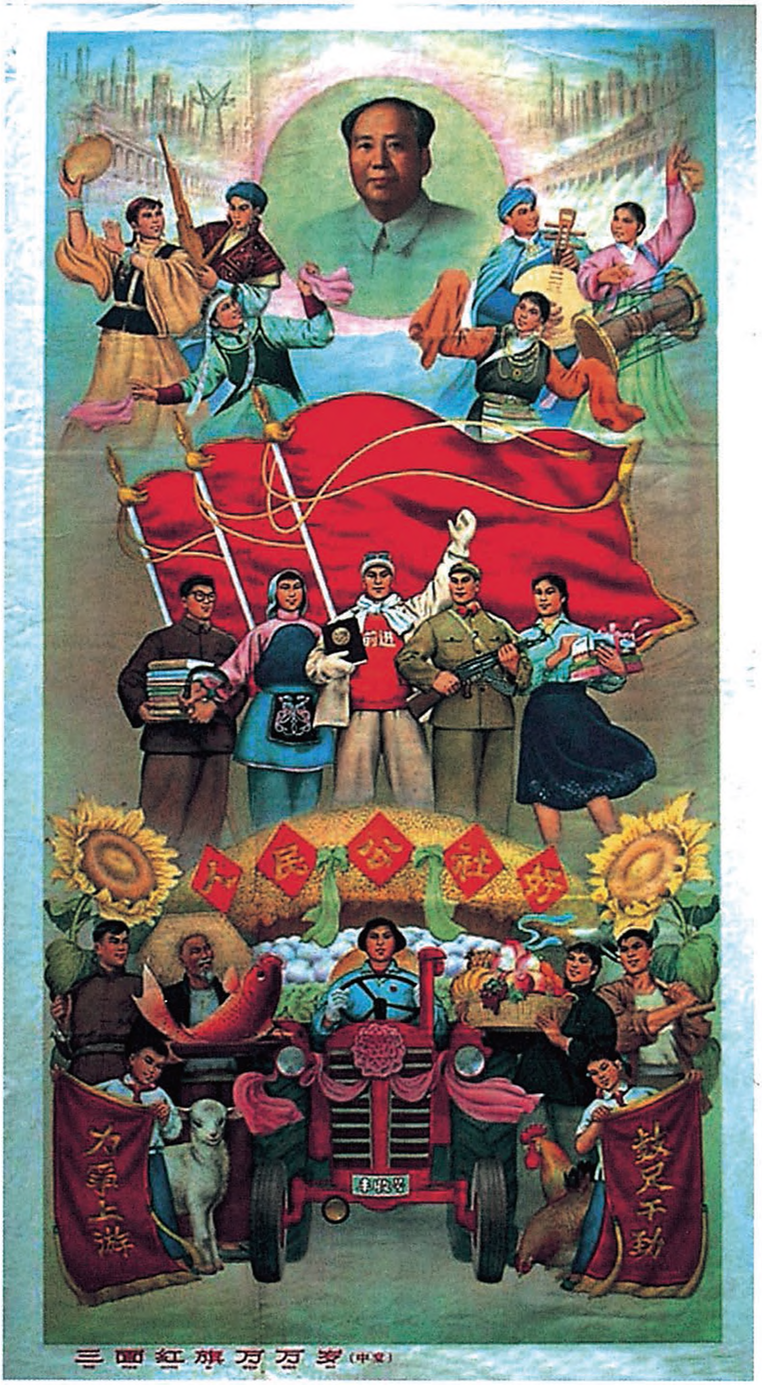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

[1] 这是《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红旗》杂志1958年第四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引述的毛泽东的话。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说明：“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是为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上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彻底消灭以前，这种全民武装是完全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1958年8月上半月，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地视察，又就人民公社和其他一些问题发表了意见，对此，新华社作了报道。主要有：（一）据新华社8月10日电，毛泽东于八月初视察河北省徐水县，当中共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说徐水县秋季要收11亿斤粮食时，毛泽东问：“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张国忠表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说：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要求徐水县委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二）据新华社8月11

日电，毛泽东于8月6日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在参观这个公社的棉田时，毛泽东问社干部："你这样的棉花有多少?"社长王文生说："七里营生产队1.5万亩，有5000多亩是这样的。每亩保证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毛泽东笑着向吴芝圃（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吴芝圃说："有这么一个社就不愁有更多这样的社。"毛泽东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三）据新华社8月12日电，毛泽东于8月9日在山东视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裴孟飞汇报了山东省各项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强调部署各项工作必须通过群众鸣放辩论。他说，计划、指标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毛泽东还要求领导干部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指导。当谭启龙汇报历城县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四）据新华社8月15日电，毛泽东在天津市视察，在天津市长李耕涛汇报天津工业当前主要情况时，毛泽东指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随同毛泽东视察的中共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汇报了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去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毛泽东很称赞，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人民公社好
前进
为争上游
鼓足干劲
三面红旗万万岁（中堂）

三面红旗万万岁（宣传画）

对肖向荣关于几件外事安排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58年7月17日）

如时局许可，可以去。谈时可将时局许可与否商量一下。

毛泽东
七月十七日

---

[1] 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1958年7月12日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报告，主要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国防部长邀请彭德怀回访作出安排。彭德怀将这个报告送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定。邓小平在报告上批道："请主席批示，主要是彭总访东欧各国问题。"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邓小平批语的后面。

在董必武[1]关于乌布利希[2]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上的批语

（1958年7月20日）

定一[3]同志：

此件[4]值得一阅，注意第二页[5]。

毛泽东

七月廿日

钱学森的文章收到了。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正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2] 乌布利希，当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4] 指董必武1958年7月13日关于乌布利希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5] 指董必武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关于乌布利希与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三）中的一段话：“大约在半年前，党中央向各基层组织发出了一封信，要求组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信发出以后效果很好。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在党的会议上出色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他们的工作，介绍了应如何在实践中应用辩证法的经验。”毛泽东在这段话下面划了波线，并批有“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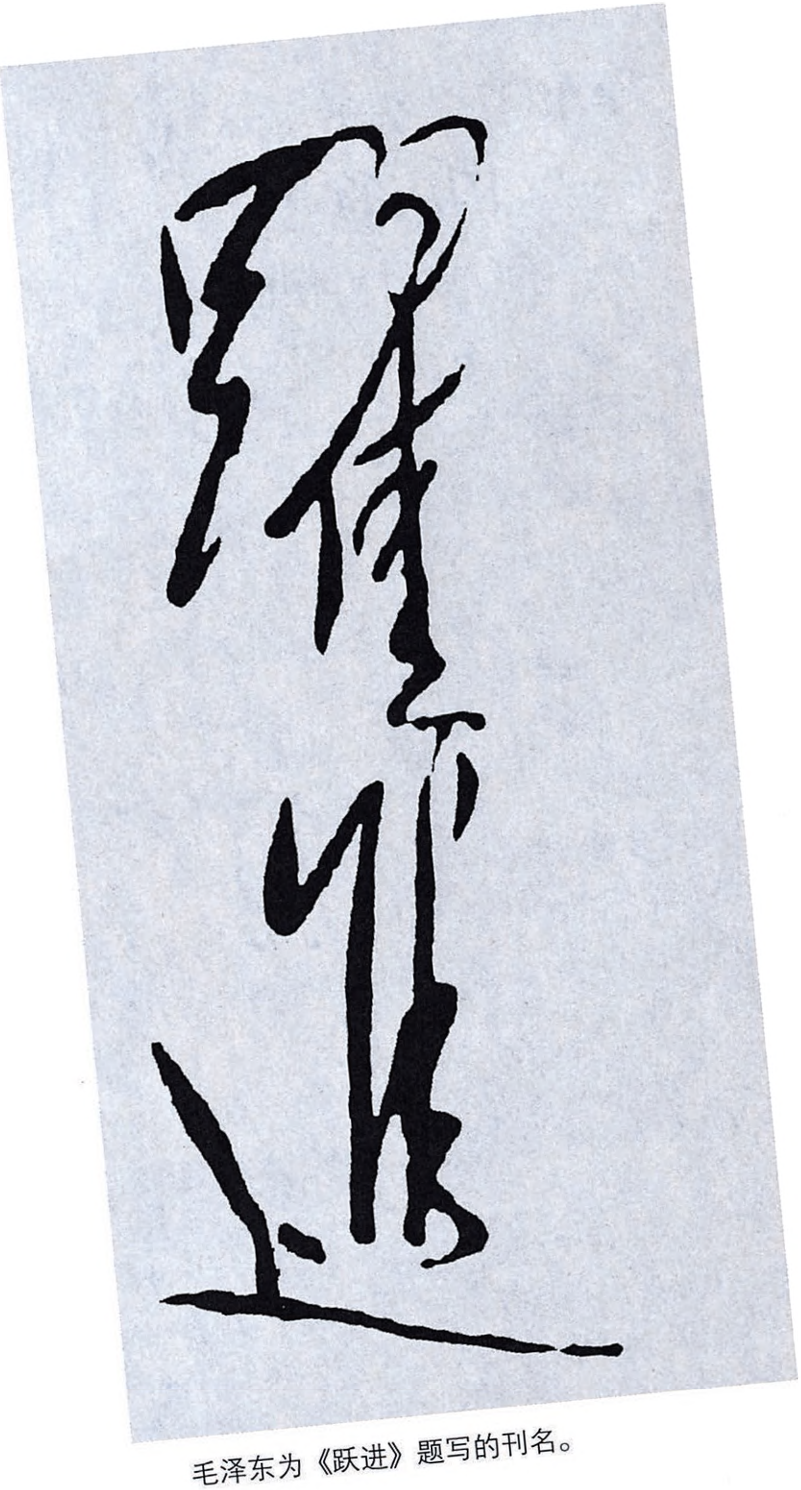
为《跃进》杂志题名[1]

（1958年7月20日）

跃进

---

[1] 《跃进》杂志是中共江西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创刊于1958年7月1日。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提出让毛泽东为《跃进》题写刊名。毛泽东为《跃进》题写了刊名，随题字还附有一封信，内容是：“水静同志：遵嘱写了两个字，不知可用否？”



毛泽东为《跃进》题写的刊名。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

（1958年7月21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欢欣的心情注视着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发展国民经济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年来，中波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在各方面又获得了新的发展，这种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有助于加速我们两国的社会主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的电报。祝贺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四周年。

义建设，而且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关于延期报送各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发展工农业规划的批语[1]

（1958年7月22日）

小平[2]同志：

通知各地七月一日限期取消，改为明年春季交来，较为有利。

毛泽东

七月廿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湖北省委1958年7月21日请示推迟报送湖北省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规划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曾经规定，各省要在7月1日以前把本省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全面规划和发展工农业的规划报送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情况变化很大，原订计划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需要修改与补充。因此，此项规划拟于10月份报送中央。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

（1958年7月22日）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

---

[1] 这是毛泽东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的一部分。1958年7月21日，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2] 1958年6月28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1]，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

---

[1] 租让制，是苏俄政府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讲到租让制时说：“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页）

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1]。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2]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

---

[1] 1950年3月和1951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分别签订有关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4个协定，在中国境内开办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这4个合营企业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企业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苏方承诺于1955年1月1日前将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接收，其余3个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厂。

[2] 季诺维也夫（1883—1936），十月革命前夕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6年在“肃反”中被处决。

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1]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2]。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3]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4]。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

---

[1] 布尔加宁（1895—1975），1957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库西宁（1881—1964），1957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1902—1982），1957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1957年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3] 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4] 《莫斯科宣言》，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9条共同的规律。

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2]。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

---

[1] 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11月10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5条。

[2] 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156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1950年至1954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154项。1960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150项。

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2]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3]招待我，费德林[4]当翻

---

[1]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2] 莫洛托夫（1890—1986），1949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1949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3] 科瓦廖夫，1949年12月曾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是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4] 费德林，1912年生，苏联汉学家，长期在苏联外交部门担任中文翻译，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1]，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

---

[1] 彼得罗舍夫斯基，曾受苏联政府派遣在中国任军事总顾问。

[2] 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1956年8月至1957年10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1]，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合办的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1]，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

[1] 指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祝贺突尼斯共和国成立日的电报

（1958年7月25日）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布·布尔吉巴阁下：

值此突尼斯共和国成立日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突尼斯人民表示热诚的庆贺。祝突尼斯人民在维护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祝贵国繁荣、人民幸福。祝中、突两国友好关系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

（1958年7月27日）

德怀、克诚[1]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2]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3]、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

---

[1]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副部长。

[2] 指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驻金门岛国民党军进行的炮击。炮击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自10月6日以后，福建前线部队采取了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半停半打的方针，并在10月25日宣布，每逢双日不打炮，逢单日为炮击日。1961年12月中旬，停止对金门的实弹炮击，只在单日向金门打宣传弹。1979年1月1日，福建前线部队奉国防部部长徐向前的命令，自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3] 漳、汕，指福建漳州和广东汕头。

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1]，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

---

[1] 叶飞，当时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

接受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8年7月28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中印两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令人传颂的友谊。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自从中印两国分别赢得解放和独立，并且建立了外交关系以来，这种传统的深厚友谊在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已经获得了新的重大的发展。中印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不断加强不仅符合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维护和巩固亚洲和世界和平的重大力量。

"中印两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印度对于和平事业的努力和贡献一向受到中国人民很高的评价。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目前由于殖民主义者对西亚的侵略致使国际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我深信，中印两国必将更加高举五项原则的旗帜，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努力。

"大使先生，我热诚地欢迎你出任印度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在你为发展中印两国的友好合作和保卫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工作中，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将给予充分的协助和支持。"

给周谷城[1]的信

（1958年7月28日）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2]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3]，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

顺颂教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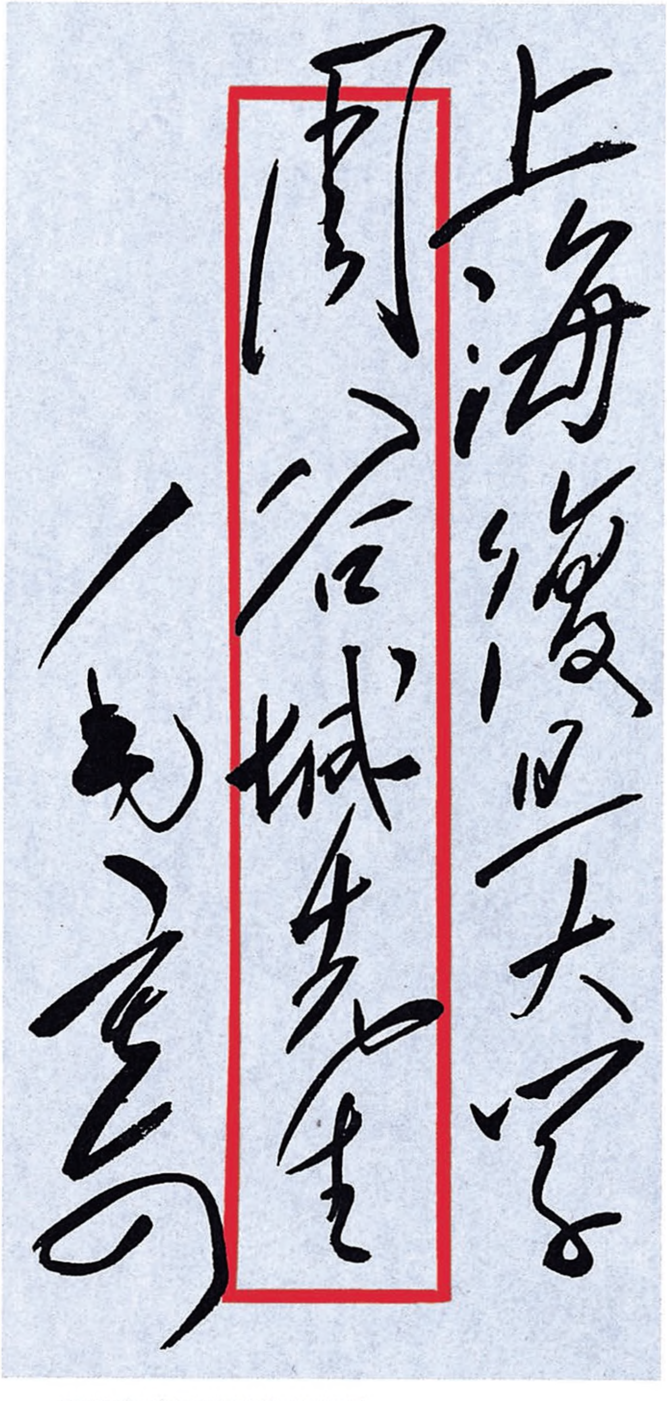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

[1] 周谷城，当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2] 指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

[3] 指当时主要在马特和周谷城之间展开的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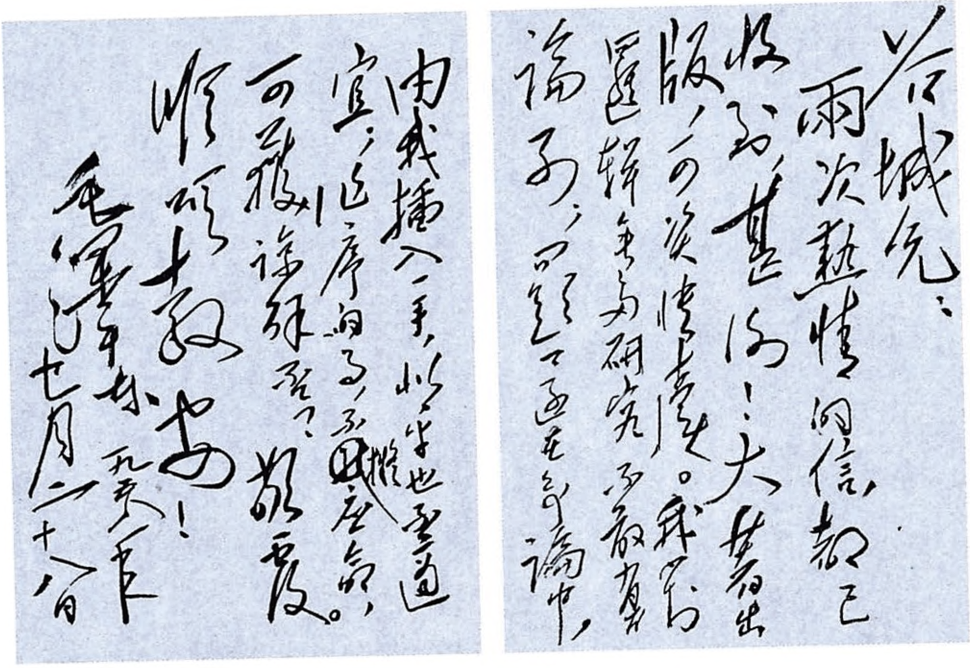


上海复旦大学

周谷城先生

毛泽东

毛泽东致周谷城信的信封。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读者。我的选辑集为研究不敢当论了，可能还不适在余论中，由我插入一手，此举也不适宜，近序自高，不~~既~~拟居名，可就稍以论辩矣。敬复。

顺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致周谷城信的手稿。

对《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的批语

（1958年7月28日）

江青：

此件[1]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

毛
七月廿八日

---

[1] 指外交部新闻司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一四一号刊载的《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

关于相机透露毛泽东准备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给宦乡[1]的电报

（1958年7月31日）

一

发驻英使馆宦乡同志：

六月二十日你给外交部的电报我看了。所传辞职事是真正的。我决心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中央及省市同志都认为有利，正向地县区乡干部通知，并展开辩论，以免临时显得突然。国内民主党派已通知并酝酿一年多了。在华外人，如苏新使节及前印度大使尼赫鲁等亦已谈过。请你经过新华社记者在伦敦新闻记者中相机陆续放出一点空气。要是非正式的，以闲谈方式出之。经过英共记者，或更好些。逐步使人们不当作谣言，而当作事实。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

[1] 宦乡，当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

二

刘、周、朱、林、陈、邓[1]阅发。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黄镇[1]关于印尼寻求贷款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8年7月31日）

陈毅[2]同志：

此件[3]第二页第二段所说向我贷款事，黄镇是否曾有报告？如有，请送一阅。此件阅后退毛。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

[1] 黄镇，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指黄镇1958年7月27日给外交部的报告。其中第二页上说，根据印尼向苏联要求贷款的情况，以及印尼当前继续执行镇压颠覆活动的政策，要取得美国的贷款尚有许多困难，印尼既已向我政府迫切地提出了贷款的要求，我馆意见，我政府可酌量贷予一部分。这将和过去的米、布贷款一样，会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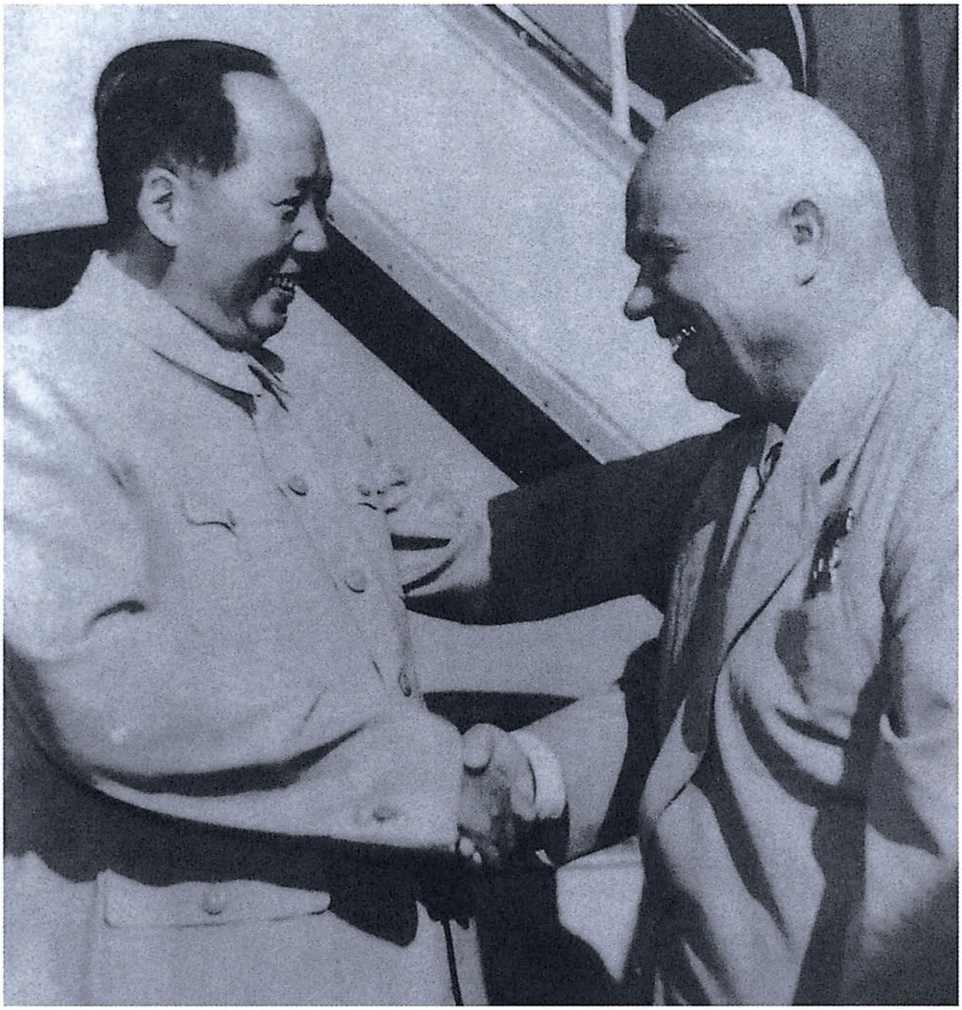
要采取追击的战略[1]

（1958年7月）

依靠我国有利的地形，特别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就可能把进攻的敌人主力歼灭在海岸和海上，不许敌人主力深入我国国土，并且还要在敌人发动进攻的基地上给以打击。我们将不但胜利地保卫祖国，而且要在歼灭了侵略的敌人主力之后，采取追击的战略，进而将敌人的出发根据地的侵略武装力量加以解除，借以根绝侵略后患，同时也就解放敌国被压迫人民。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8年7月19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讲话第三部分《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工作》一段文字所作的修改。文中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图为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视察徐水时的谈话（摘录）

（1958年8月4日）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这妇女解放得很彻底哩！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个县是十一万多劳力，抽出了四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七万多人搞农业嘛！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搞了九十多个团，两百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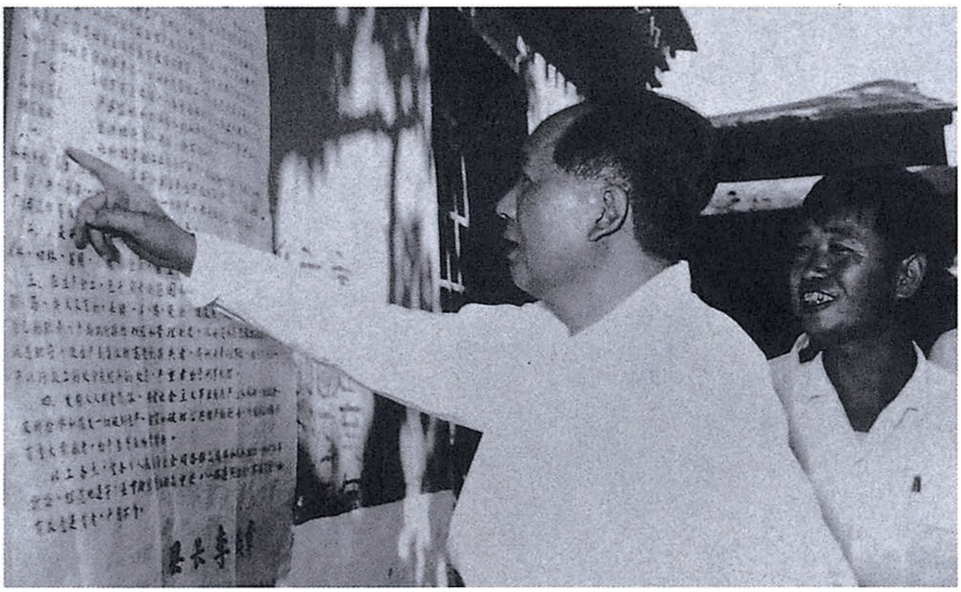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祝你们丰收！秋收我要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们。这里的干劲不小哩！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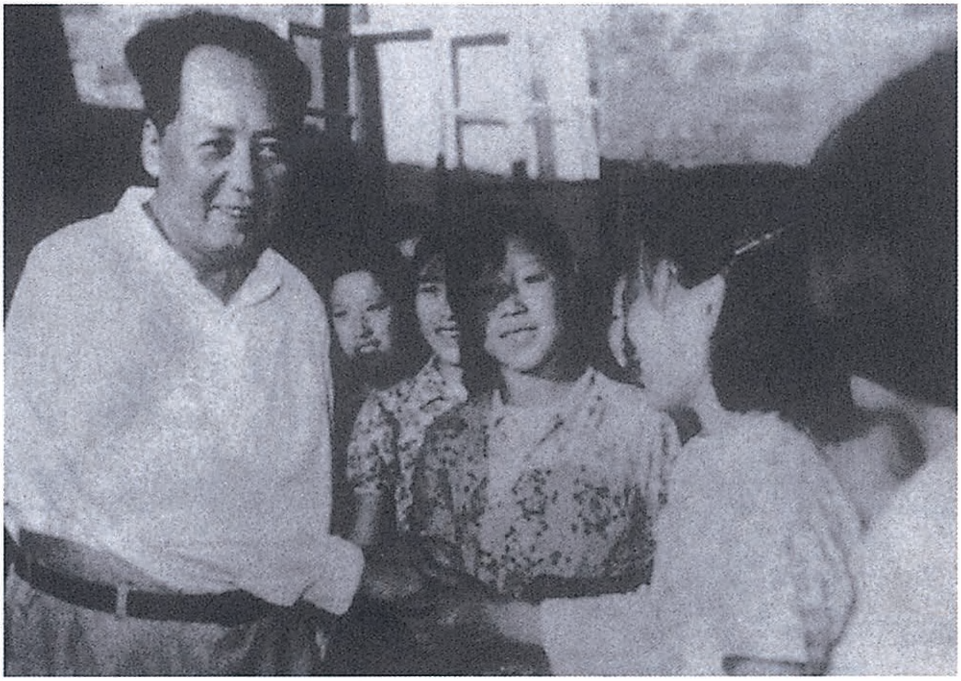
要早抓明年的粮食规划，要多种小麦，多种油料作物，种菜也要多品种，这样来满足人民的需要。

小麦地一定要深翻，翻到一尺以上。以后人民就主要吃小麦，玉米和山药喂牲口，喂猪；猪喂多了，人民就多吃肉。

下边真好啊！出的东西真多啊！北京就不出什么东西。你们说，北京出什么啊？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徐水视查。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和农民亲切握手。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徐水县视察时和县委领导及工作人员合影。

1958年8月5日，毛泽东视察安国县时，在玉米地和农民张同顺握手。

视察山东时的谈话（摘录）

（1958年8月9日）

计划、指示不经过群众辩论，主意是你们的；辩论后，群众自己是主人了，干劲自然更足。

领导必须多到下面去看，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就地进行领导。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你们的小米长得不好嘛，我看群众的干劲太少！

好，你这个人（历城县北园乡北园农业社主任李书成）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的。

你好，你（山东省农科所副所长秦杰）学的学问能用上了。

是应该压迫你们一下，不压迫，你们就不会上梁山。

你们研究一下棉花为什么落桃，棉花落桃的问题，是否可以研究个办法，叫它少落或不落。

你们行还是农民行？

那很好，你们要继续努力，力争上游。

你们干得很好，都鼓足了干劲。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济南历城北园乡视察。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历城北园农业社稻田。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历城北园农业社田头和社负责人亲切交谈。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棉花试验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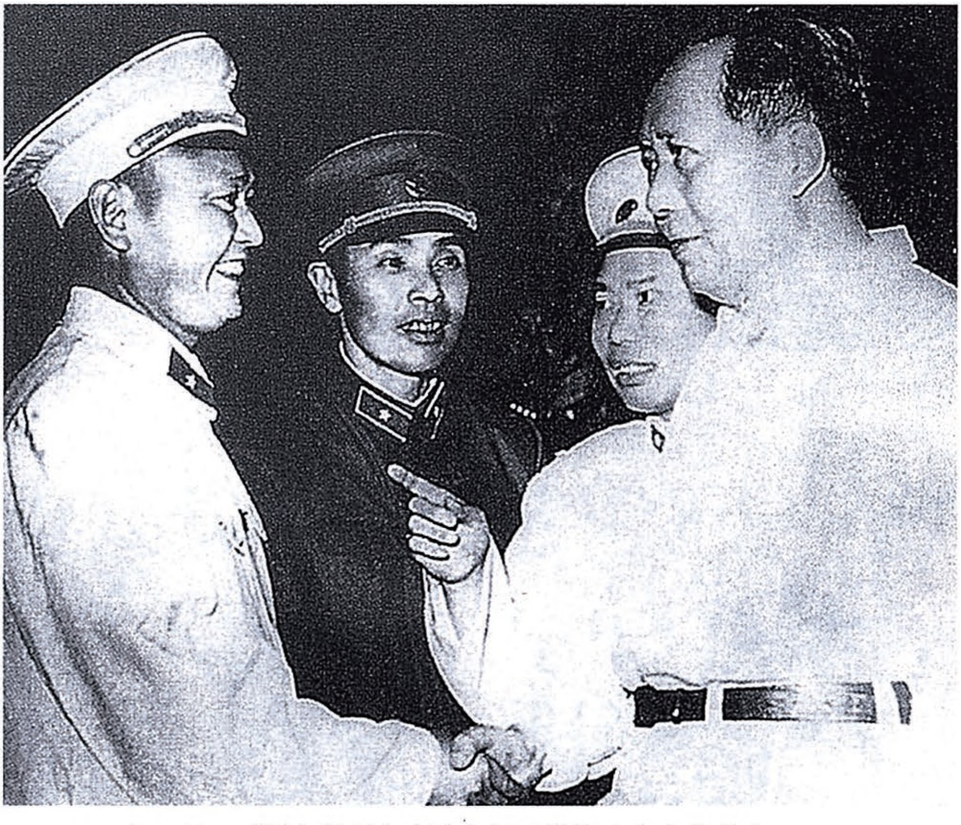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聊城农校。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山东时接见济南军区指战员。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济南西郊专线车站接见山东省部分劳动模范。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济南西郊专线车站接见山东省和济南军区负责人。

1958年8月，毛泽东和参加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一起。



1958年8月，毛泽东接见出席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8年8月，毛泽东接见藤县县委书记王吉德。

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观看黄河流域概况图。

和陈昌奉的谈话

（1958 年 8 月 9 日）

山东地方很好，根据地很大，新解放了许多县城，很需要干部。到那里要尊重地方，尊重地方干部，尊重新单位的负责人，要和当地干部搞好团结。

学习也好，倒不是为当官，而是为人民多做些事。当然，学习中间也有很多困难，只要你有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指导员也是革命工作嘛！非当上什么官才行吗?

想当官的人到共产党这里来就是走错门啦！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官不官啊！都是一样。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到我们这里发财当然不用说了，想升官也达不到目的。

1958年8月9日，毛泽东在济南和长征时的警卫员陈昌奉交谈。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3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0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视察天津时的谈话（汇集）……………………………………………1

（1958年8月13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三周年的电报 ……………………………12

（1958年8月14日）

控制学生数量、多搞技术学校 ………………………………………14

（1958年8月15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三周年的电报 ………………………………16

（1958年8月15日）

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批语、按语和修改…17

（1958年8月）

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 ………………………………………………22

（1958年8月16日）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 …………………………23

（1958年8月17日）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29

（1958年8月17日）

关于停止在深圳方面的演习准备打金门的批语 ……………………48

（1958年8月18日）

关于索要《科学简讯》的批语 ………………………………………49

（1958年8月18日）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50
（1958年8月19日）
关于印发刘晓给中央电报的批语……55
（1958年8月19日）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56
（1958年8月21日）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62
（1958年8月21日）
对开展农村工具改良运动的指示……69
（1958年8月）
对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报告的批语…70
（1958年8月22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71
（1958年8月22日）
对中央关于教育工作指示草案的批语……73
（1958年8月23日）
对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农业方面的文件的批语…74
（1958年8月24日）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五）……75
（1958年8月30日）
在北戴河会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稿上加写的话……83
（1958年8月）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84
（1958年8月）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86
（1958年8月）

关于编印《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的批语 …90
（1958年9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电报 ……………93
（1958年9月1日）
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 ……………………………95
（1958年9月2日）
和巴西记者马罗金、杜特列夫人的谈话 ………………………98
（1958年9月2日）
在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上的批语…104
（1958年9月3日）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06
（1958年9月5日、8日）
对全国办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的批语…………………………127
（1958年9月6日）
整台湾是整家法……………………………………………129
（1958年9月6日）
关于研究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稿的批语………………132
（1958年9月7日）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稿……………………134
（1958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136
（1958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38
（1958年9月8日）
关于台湾局势等问题复胡志明电……………………………140
（1958年9月10日）

给湘乡县东山学校的信……142
（1958年9月10日）
给毛禹居的信……144
（1958年9月10日）
视察武汉大学的指示……147
（1958年9月12日）
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的信……157
（1958年9月13日）
视察武钢时的指示……159
（1958年9月13日）
对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动态》的批语……173
（1958年9月13日）
给王任重的信……178
（1958年9月16日）
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名……180
（1958年9月16日）
给曾希圣的信……182
（1958年9月16日）
在《钢铁生产紧急会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上的批语……204
（1958年9月18日）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217
（1958年9月19日）
给曾希圣的信……218
（1958年9月19日）
给江渭清的信……238
（1958年9月21日）

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问题致周恩来电……………………240
（1958年9月22日）
祝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的电报……………………………242
（1958年9月22日）
关于阅看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给江青的批语…243
（1958年9月24日）
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244
（1958年9月）
关于游泳的几次指示……………………………………………………………249
（1958年9月至1966年7月）
关于报道钢铁生产情况的批语…………………………………………………253
（1958年9月30日）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254
（1958年9月）
为《锡林郭勒日报》题写报头…………………………………………………255
（1958年9月）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263
（1958年10月2日）
对一封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灾情的来信的批语…………………………………267
（1958年10月2日）
给袁水拍的信……………………………………………………………………268
（1958年10月2日）
灵机应变主动在我………………………………………………………………269
（1958年10月5日）
关于暂停炮击和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 …272
（1958年10月5日、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274
（1958年10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的电报…………………277
（1958年10月6日）
祝贺几内亚共和国成立的电报……………………………………279
（1958年10月7日）
给仇亦山的信………………………………………………………280
（1958年10月7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且看他们怎样动作》的批语和修改……282
（1958年10月9日）
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284
（1958年10月11日）
关于苏共中央来信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286
（1958年10月11日）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语……287
（1958年10月1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290
（1958年10月13日）
再告台湾同胞书稿…………………………………………………292
（1958年10月13日）
关于找草书字帖给田家英的信……………………………………296
（1958年10月16日）
关于到河南遂平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给陈伯达的信………………297
（1958年10月）
关于国防部恢复炮击命令的批语…………………………………301
（1958年10月20日）

给周恩来的信……303
（1958年10月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304
（1958年10月25日）
给周世钊的信……307
（1958年10月25日）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钱学森的谈话……309
（1958年10月27日）
对王鹤寿关于钢铁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13
（1958年10月30日）
对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意见的批语……316
（1958年10月30日）
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318
（1958年10月31日）
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319
（1958年10月31日）
关于转载《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批语和对《人民日报》编者按的修改……322
（1958年10月）
对《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的批注……324
（1958年10月）
对驻苏大使馆关于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报告的批语……326
（1958年10月）
听取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328
（1958年10月）

在邯郸地区的谈话……………………………………………………330
（1958年11月1日）
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336
（1958年11月1日）
建议金门炮击大打一天给周恩来等的信……………………………341
（1958年11月2日）
为厦门前线写的广播稿…………………………………………………342
（1958年11月2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343
（1958年11月2日）
对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报告的批语…………347
（1958年11月5日）
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348
（1958年11月6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351
（1958年11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的电报………………………355
（1958年11月6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357
（1958年11月7日）
对山西省太谷县红旗人民公社的情况与计划的批语…………………360
（1958年11月8日）
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362
（1958年11月）

关于读书的建议……………………………………………………368
（1958年11月9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371
（1958年11月9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378
（1958年11月10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382
（1958年11月10日）
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393
（1958年11月10日、12日）
对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的批语……401
（1958年11月10日）
关于建议在北京开会为武昌会议作准备等问题给刘少奇、邓小平的电报……………………………………………………410
（1958年11月13日）
在轻工业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猪皮制革的报告上的批语…………412
（1958年11月13日）
祝贺也门王国国庆的电报…………………………………………414
（1958年11月13日）
关于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方针的批语……………………………415
（1958年11月14日）
对湖南省岳阳县筹办人民公学的批语……………………………417
（1958年11月14日）
关于印发《人民日报》社论《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巨大步骤》的批语…418
（1958年11月18日）

对《关于“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辩论》一文的批语……420
（1958年11月18日）
对《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经验》一文的批语……422
（1958年11月18日）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424
（1958年11月18日）
对谭震林、廖鲁言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425
（1958年11月19日）
对化工部党组关于扭转化学工业发展的被动局面的报告的批语…431
（1958年11月19日）
对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34
（1958年11月19日）
关于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的批语…436
（1958年11月20日）
对《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一文的批语……437
（1958年11月20日）
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438
（1958年11月21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440
（1958年11月21日）
记者头脑要冷静……453
（1958年11月21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的批语……455
（1958年11月21日、27日）

给李富春的信……………………………………………………………458
（1958年11月22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稿的批语…462
（1958年11月22日、12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的电报………465
（1958年11月22日）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二）……………………………………………467
（1958年11月23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
政贸易管理体制决定》草案的批语和修改……………………………477
（1958年11月24日）
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480
（1958年11月、12月）
对《财经各部委党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的批语…489
（1958年11月24日）
对《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的批语…………………………………492
（1958年11月25日）
一个教训…………………………………………………………………494
（1958年11月25日）
第十次接见朝鲜代表团时的讲话………………………………………496
（1958年11月25日）
对《苏联学者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几个新提法》一文的批语…498
（1958年11月25日）
民兵现在主要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500
（1958年11月26日）

对《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批语……………………502
（1958年11月27日）
关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议程给邓小平的信…………………………504
（1958年11月28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505
（1958年11月28日）

视察天津时的谈话（汇集）

（1958年8月13日）

对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的指示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怎么样?

视察天津大学时的指示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天津大学张国藩校长向毛泽东汇报学校情况说，这个学校已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还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

毛泽东：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有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工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的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没有学进去，把脑筋学坏了。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

离实际。

毛泽东：（问王元之）天津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元之：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搞起勤工俭学来了，六十多所中学还建立了工厂或生产车间。

毛泽东：好啊！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

毛泽东：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毛泽东对天津大学在短时期内办起许多工厂很感兴趣。）

毛泽东：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五十岁以上的教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的、中年的都要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说服他们也说服不了。

毛泽东：连夜搞是否把人搞瘦了呢？还是注意有节奏地生产，有节奏地休息和劳动。

毛泽东还指示：

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

一是党委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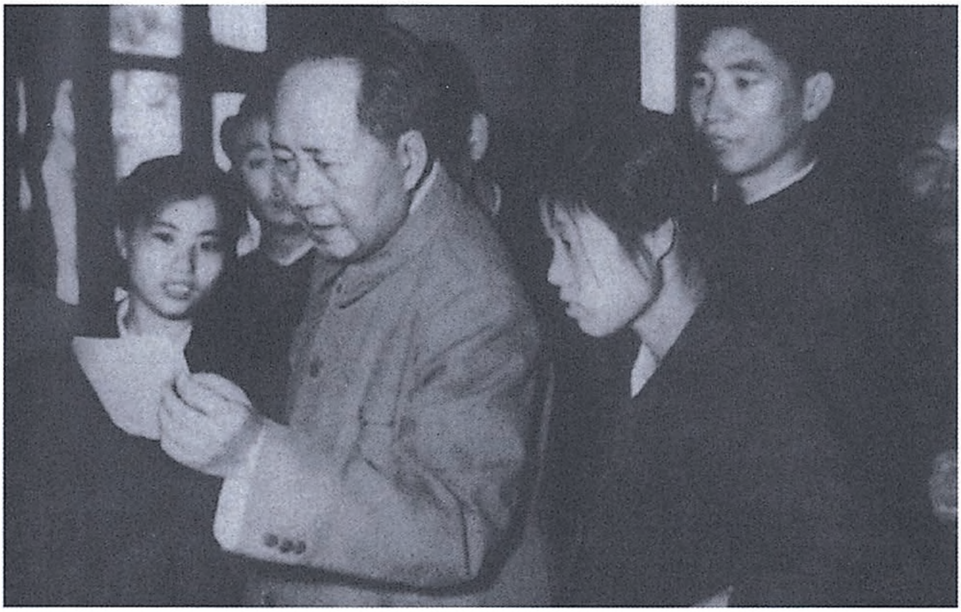
二是群众路线；

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天津郊区农村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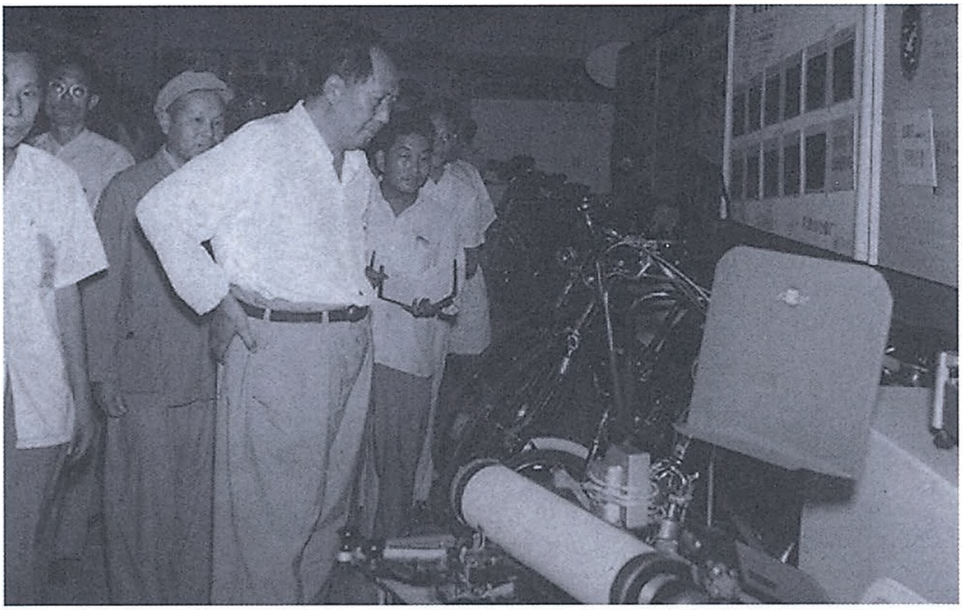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天津郊区视察。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市东郊区四合乡。



1958年8月，毛泽东参观天津工业技术革命展览。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天津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上试用聋哑人教话器。



1958年8月，毛泽东参观天津工业技术革命展览会。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接见天津大学师生。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南开大学。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农业合作社。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正阳春饭店视察。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三周年的电报

（1958年8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同志：

在朝鲜解放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自己的祖国进行着忘我的劳动，跨上了千里马，沿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飞跃前进。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朝鲜人民所取得的各项巨大成就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

朝鲜政府和人民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而进行的坚决斗争，赢得了各国人民普遍的赞扬和同情。美国一贯阻挠和平统一朝鲜和继续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行为，已经遭到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近，侵朝国家的主要成员美国和英国又向阿拉伯人民发动了武装侵略。可以断言，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坚决斗争下，帝国主义侵略者必将像他们在朝鲜的命

运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近年来，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凝结成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有了更大的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对于巩固以苏联为首的坚强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着巨大的作用。

祝朝鲜人民在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四日于北京

控制学生数量、多搞技术学校[1]

（1958年8月15日）

学生数目也要控制一下。小学没有关系。中学要控制一下，因为没有那么多事等着给他们做。

不要搞普通的学校，要搞些技术学校，农业学校。

---

[1] 这是毛泽东和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谈话的一部分。

1958年8月，毛泽东接见西哈努克。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三周年的电报

（1958年8月15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三周年的时候，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致热烈的祝贺。祝印度尼西亚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捍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间的深厚友谊不断发展。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繁荣富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的批语、按语和修改[1]

（1958年8月）

一

很好，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宜用较大字型，例如四号或五号，不用新五。是否如此，请伯达[2]酌定。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二

定一同志：

---

[1] 本篇一、二、三是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写的三个批语；四是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发表陆定一文章写的编者按；五至九是毛泽东对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作的修改。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58年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七期。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改得好。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史洛夫[1]、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2]你看如何？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

三

定一文章关于教育史部分，请再打印一份给我一阅，有人提议不要批评凯洛夫、斯大林，似较适宜，可以括掉。

毛泽东
廿八日

---

[1] 史洛夫，应为凯洛夫，苏联教育家，曾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著有《教育学》等书。

[2] 毛泽东1958年8月16日在审阅《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初稿时，加写了关于中国教育史的一段话，即本篇六；除这段话外，毛泽东还写了批评凯洛夫和斯大林的一段话，全文是："兄弟国家，例如苏联的某些教育理论家，如同唯心论语言学的那些理论家一样，他们的教育学，就是错误的。我指的主要是凯洛夫的教育学。中国人却迷信他，捧为神仙，流毒非浅。斯大林的理论，也有一部分是错误的。他少谈教育，多谈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其中就有好些是错误的。他不自觉，他的方法论带形而上学的某些成分，这就不能不影响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这段话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删去了，参见本篇三。

四

编辑部按：陆定一同志这篇文章，是根据党中央召集的教育工作会议的结论写出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即将有指示发给各级党委[1]。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在讨论党的指示的时候，结合陆定一同志的文章予以讨论。在学校党委讨论此事的时候，可以吸收非党的教授教员参加。

五

研究教育史，如果是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的话，那当然有好处，可以知道几千年阶级社会时代教育的规律。但须知，这种阶级社会历史上教育的规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更不等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的规律。

六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但是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来，几千年来的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从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到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是教育的质的飞跃，是教育本身的大革命。

七

我国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第三，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第五，这是最重要的，我国是一个严肃地进行整风、反右的国家，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国家。我们应当根据我国自己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来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等。

八

我们也认真研究兄弟国家的经验和认真研究历史，但目的不是去抄袭，去搬运，而是为了了解历史情况，了解教育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便有所借鉴，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好自己的工作。

九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

的德育。这二者同智育是连结一道的。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1]

（1958年8月16日）

大国、小国应该平等相待。有这样一种论调：大国是不好惹的，小国是可以随便欺侮的。这种论调是绝对没有道理的。什么大国小国，大国往往是由许多小国联合组成。中国在古代就是由一万个左右的小国组织成的，后来变成八百个小国，以后又变成七个小国，最后才统一成一个大国。现在中国还是由许多省份组成的。鹿和老虎谁比谁强？我看老虎不一定比鹿强。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来，八国联军中也有小国，可是它们欺侮大国。日本也是小国，也侵略过我们。这是因为它们是工业国；我们是农业国，政府也很腐败。

国家大小只是形式。我们两国是完全平等的朋友性质的国家。我们希望你们发达起来，我看这是完全可能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柬埔寨王国首相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谈话的一部分。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1]

（1958年8月17日）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省和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都参加。题目就是印发的这些，同志们还可看题目。

重点是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主要是工业，农业也有一点。发一个参考数字，不太公道，要搞公道一点，正确一点，搞三天，由富春同志负责。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钢由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万吨翻一番，达到一千一百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由□□□同志负责。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由陈、李负责。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印了一份河南试办人民公社的简章。

---

[1] 这是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17个议题。会议于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举行，讨论了17个问题，并通过了《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等文件。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包括今年粮食处理），由先念负责。粮食产量今年可能达到□□□□亿斤，每人□□斤，明年每人争取达到□□斤，后年□□斤，是否搞到两千五百斤至三千斤，以后再议。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发展粮食，我看超过三千斤就不好办了。

第七个问题：教育问题。陆定一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决议即可印发。

第八个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包括我们在座的，不论做什么官，不论官大官小，凡能参加劳动的都要参加，太老的和太弱的除外。我们做官的有几百万，加上军队有一千几百万，究竟有多少官也搞不清楚。干部子弟有几千万，近水楼台容易做官，官做久了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十三陵水库修成了，许多人都去修水库劳动了几天。是否每年劳动一个月？一年四季分配一下，工、农、商都可以，把劳动和工作结合起来，一切人都如此。人家劳动，做官的不劳动怎么行？还有那么多干部子弟。苏联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不愿下乡。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乡下去。一切学校都要办工厂，天津音乐学院还办几个工厂，很好。参加劳动，县乡级好办，中央、省、专级难办，开机器怕不行！能用筷子吃饭用毛笔写字的人，难道不能开机器？开机器容易，还是爬山容易?

第九个问题：劳动制度问题，由劳动部准备。

第十个问题：五百七十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国际形势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出的，因为到处有人问会不会打世界大战？打起来怎么办？西方国家军事集团究竟

是什么性质？紧张局势对谁有利？联合国承认有利还是不承认有利？到底谁怕谁？谁怕谁多一点？这个问题在党内也不是完全解决了。有人说：东风压倒西风，可见未压倒，否则美英在中东怎敢登陆？这个问题看法不一致，党内党外都有怕西方情绪，有恐美病。谁怕谁多一点，恐怕是西方怕我们多一点。世界上有三个主义：共产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后两者都是资本主义。一派是民族资本主义，一派是压迫别人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原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可是它一反帝，就变成我们的后方。印埃两国都搞，但是比较对我们有利。我们两个主义站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原子弹双方都有，人民力量我们大，因此不会打。但是也可能打，我们要准备打。垄断资本也难说，假如它要打，是怕打好还是不怕打好。横起一条心，对敌人用黑心，拼命地打，打烂再建设。讲清楚不怕打是好的。

对帝国主义的三个集团，我们在宣传中说它是侵略者，因为它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侵略。但是不要看得了不起，它只在一种情况下向我们进攻，即我们出了大乱子，反革命把我们推翻。匈牙利的反革命已被镇压下去了，他们不敢来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巩固中，我们中国有七八千万吨钢就巩固了。帝国主义那些条约，与其说是进攻的，不如说是防御的，是患了肺病的钙化组织，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巴格达条约搞了一个洞，中心突破，伊拉克一天早晨就变了。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渗透，我很欣赏□□□说的他们怕我们穿过去，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是薄板墙，立在不巩固的基础上，是整中间地带的，他们没有机会整我们就整中间地带，并且互相整，英美整法国，又限制西德。我们宣传反对紧张局势，争取缓和，好像缓和对我们有利，紧张对他们有利，可否这样看，紧张对

我们比较有利，对西方比较不利。紧张对西方有利的是能够扩大军火生产，对我们有利的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七月十四日早晨，伊拉克的盖子揭开了。紧张可以使各国共产党增加几个党员，可以使我们多增加一些钢铁、粮食。美英在黎巴嫩、约旦晚走一些日子好，不要使美国变成好人，多呆一天就多有一天好处，抓住了美国的辫子，有文章好做，美帝成了众矢之的，但宣传上不能这样讲，还是讲立即撤退。

禁运越禁越好，联合国越不承认越好。我们有经验，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何应钦不发供给、不给钱，我们提出团结自给，发展大生产，搞出的价值不止四十万元，棉衣也穿上了，比何应钦给的多得多。那时如此，因此现在各国禁运也有利。最好再过七年再承认。七年计划分三阶段，苦战三年、二年、二年。那时我们可以搞□□到□□万吨钢，面前有一个敌人，紧张对我们有利。

第十三个问题：今冬、明年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协作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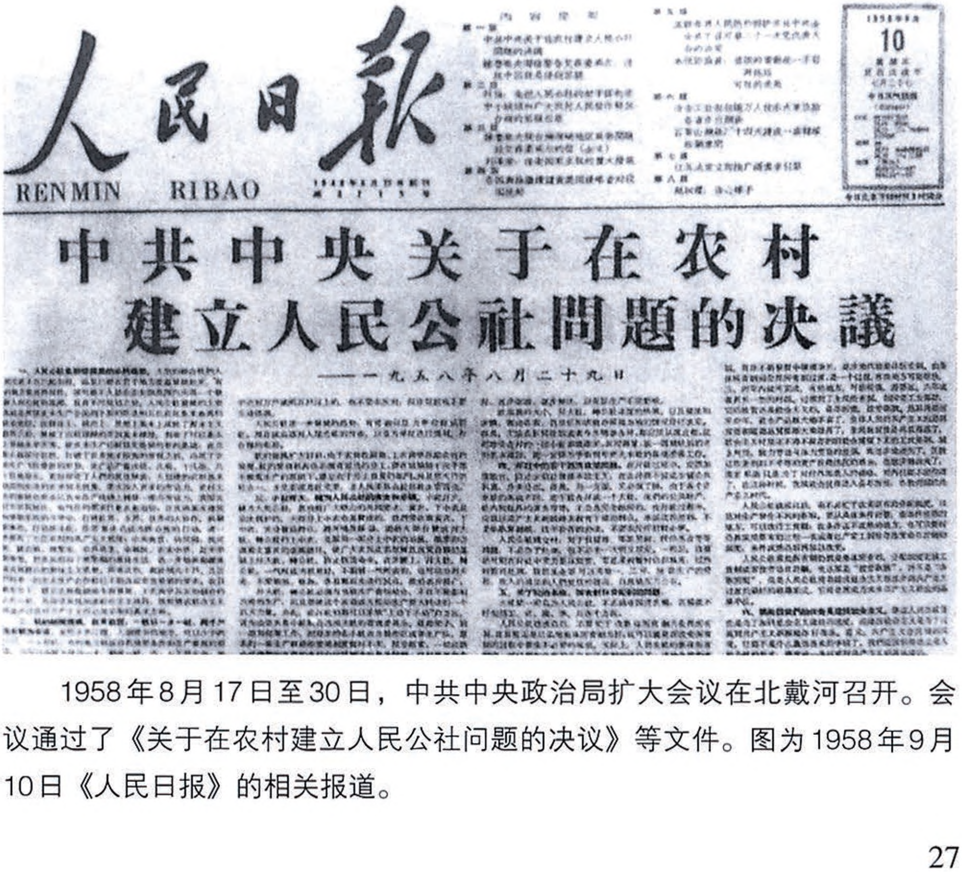
第十五个问题：深耕问题。目前农业的主要方向是深耕问题。深耕是个大水库、大肥料库，否则水、肥再多也不行。北方要深耕一尺多，南方要深耕七八寸，分层施肥使土壤团粒机构增多，每个团粒又是一个小水库、小肥料库。深翻使地上水与地下水接起来。密植的基础是深耕，否则密植也无用。深耕有利于除草，把根挖掉又有利于除虫，这样一来可以一亩当三亩，现在全国每人平均三亩地。我们向下边跑，就可高产。种那么多地干什么？将来可以拿三分之一的土地种树，然后过几年再缩一亩。过去平原绿化不起来，到那时就能绿化了。如不深耕就无这种可能。

人口的观念要改变，过去我说搞八亿，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

也不要紧。对多子女的人不要提倡，文化水平提高以后就真正节育了。

第十六个问题：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民兵问题，协作区或较大的省可以生产轻武器，如步枪、机枪、轻炮等，武装民兵，搞大合作社，工、农、商、学、兵一套都有。造那样多枪可能是浪费，因为我们不打仗，浪费点也要搞。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多唱穆桂英、花木兰、泗洲城，少唱祝英台。再用六年时间四人发一支枪，全国供需一亿支枪，每人发几十发子弹，必须打光。



人民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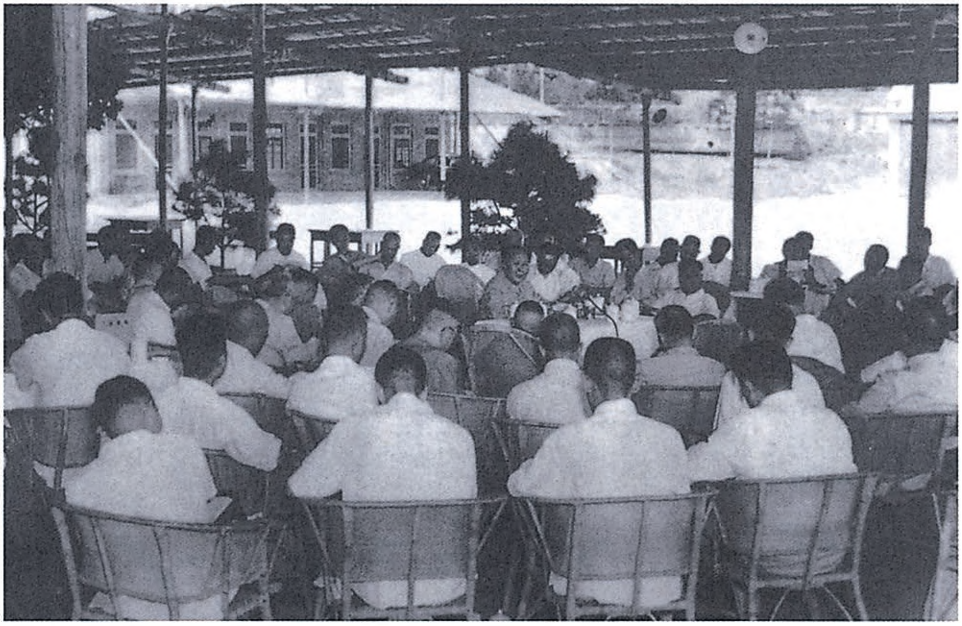
RENMIN RIBAO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等文件。图为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

1958年8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扩大会议场。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8月17日）

一

此件[1]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

[1] 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简章草案共24条，分别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社员成分和入社手续，公社对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财产和个人财产的处理，公社对农具改良、农村电力化、发展工业的规划，公社设立供销部及其经营方式，公社建立信用部及其经营方式，公社的义务教育和学校设置，公社的科学研究工作，公社实行全民武装及民兵的组织、训练和任务，公社的辖区范围，公社的最高权力机关社员代表大会的权力，公社实行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组织形式，公社的工资分配和管理，公社的粮食分配和管理，公社的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幸福院和公墓的建设和管理，改善社员居住条件、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以及公社的年收入分配项目、公社的计划管理和民主管理等。这个简章草案在1958年8月17日召开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1958年9月1日《红旗》第七期全文刊载。

二

公社要逐步把社员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劳动者。[1]

三

在条件具备的时候，建立适合公社需要的专科大学。在将来生产高度发展的时候，可以适当地减少社员劳动的时间，增加他们读书的时间。要使全体青年一代都有大学的政治、文化、技术程度。[2]

四

公社实行全民武装。适龄的青壮年和复员退伍军人应该编成民兵，经常进行军事训练，并且担负国家所分配的军事任务。其目的是维持社会治安和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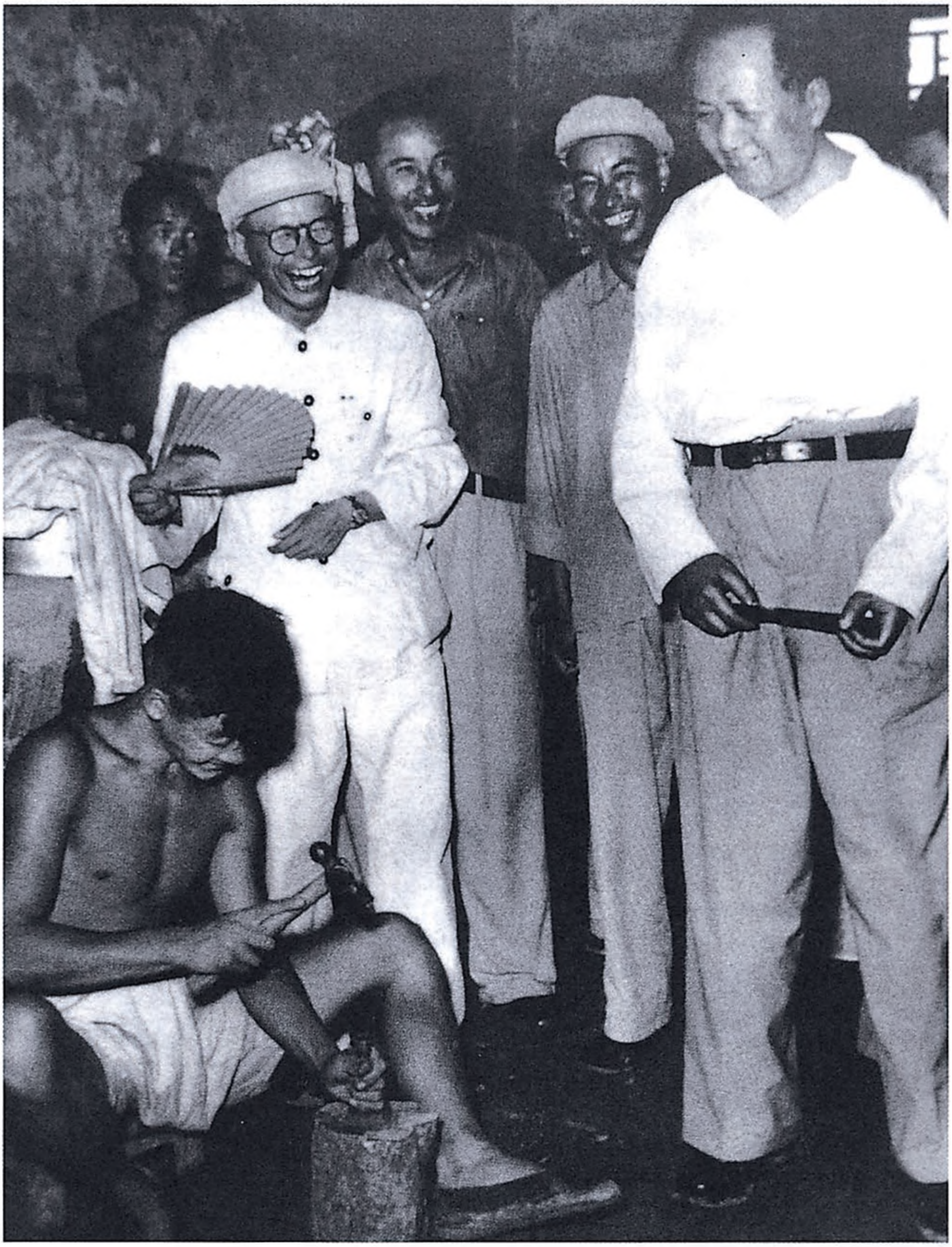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九条中的一段话。

[2]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九条中的一段话。

[3]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条中的一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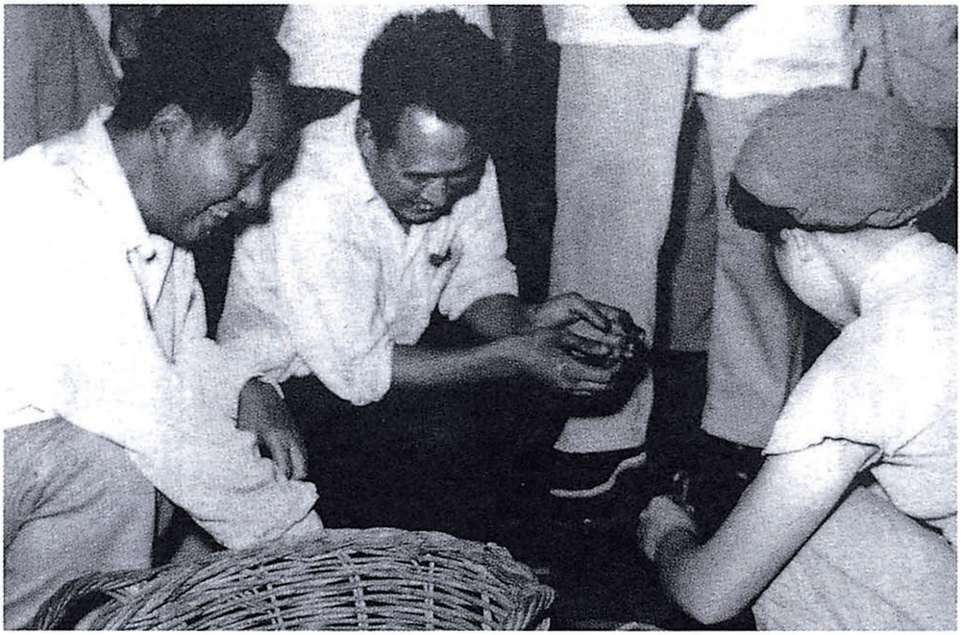
1958年7月，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

1958年8月，毛泽东和乡亲们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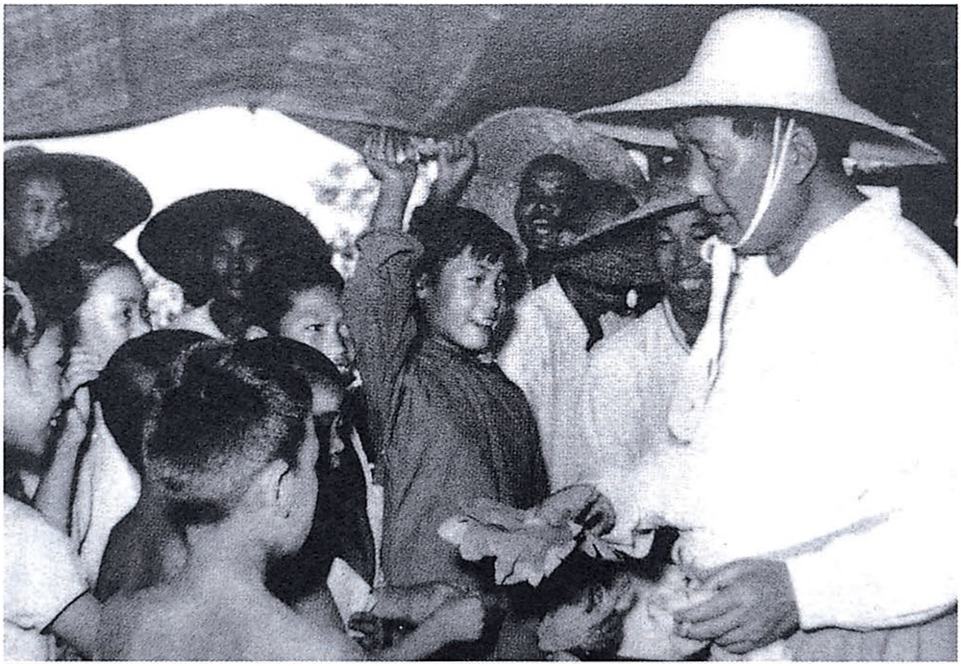


1958年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观看工人劳动。

1958年8月，毛泽东和青少年在一起亲切交谈。



1958年8月，毛泽东和群众在一起。



1958年8月，毛泽东和小朋友们在一起。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棉田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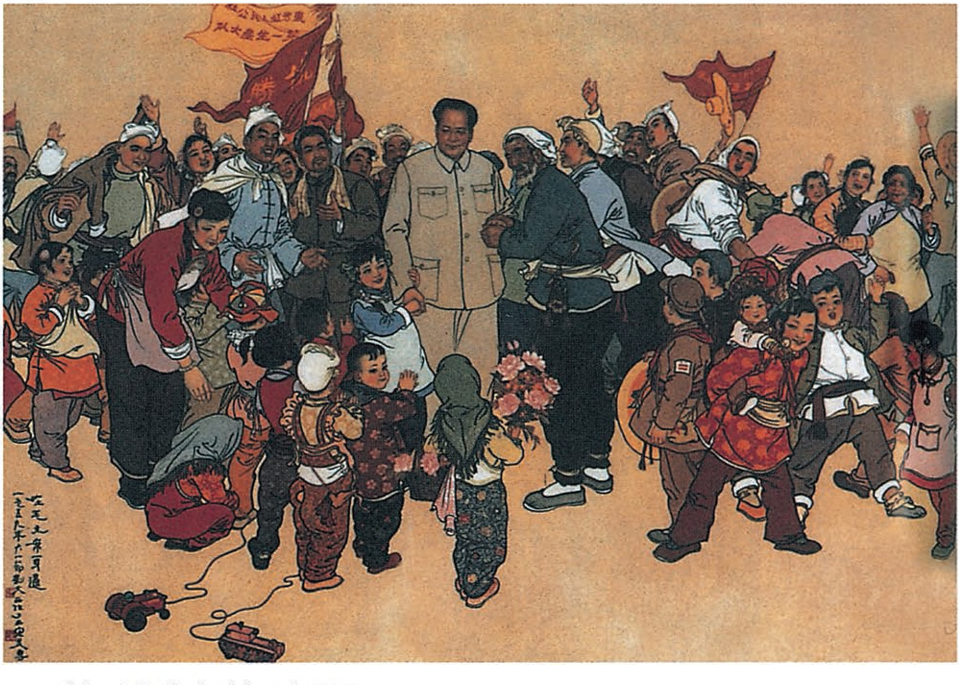
1958年8月，毛泽东离开七里营人民公社大门。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农村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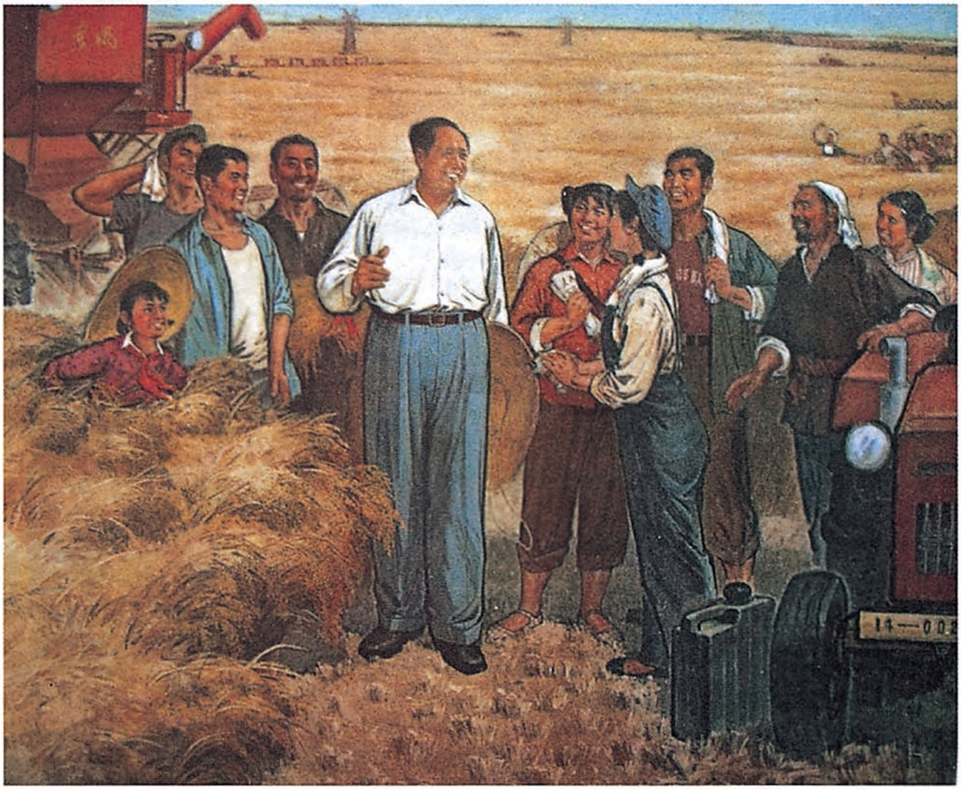
1958年8月，毛泽东在襄城县三里沟视察。

1958年8月，毛泽东在长葛县农村玉米地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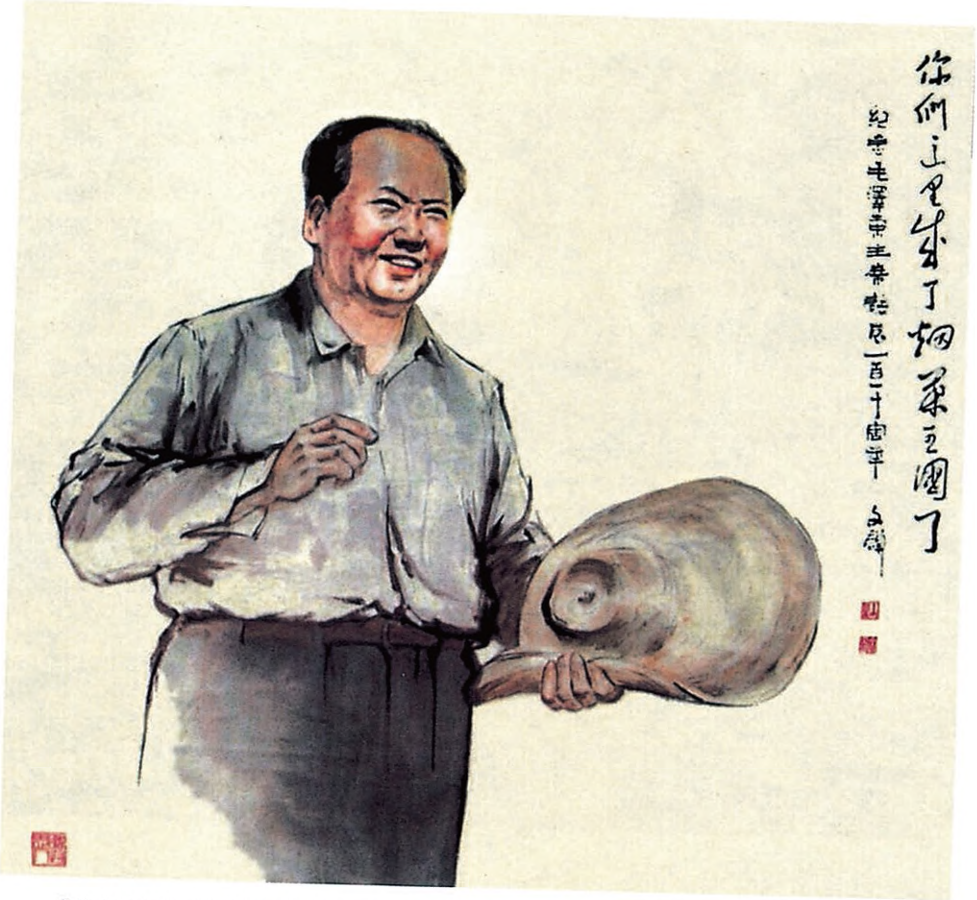
1958年8月，毛泽东在长葛县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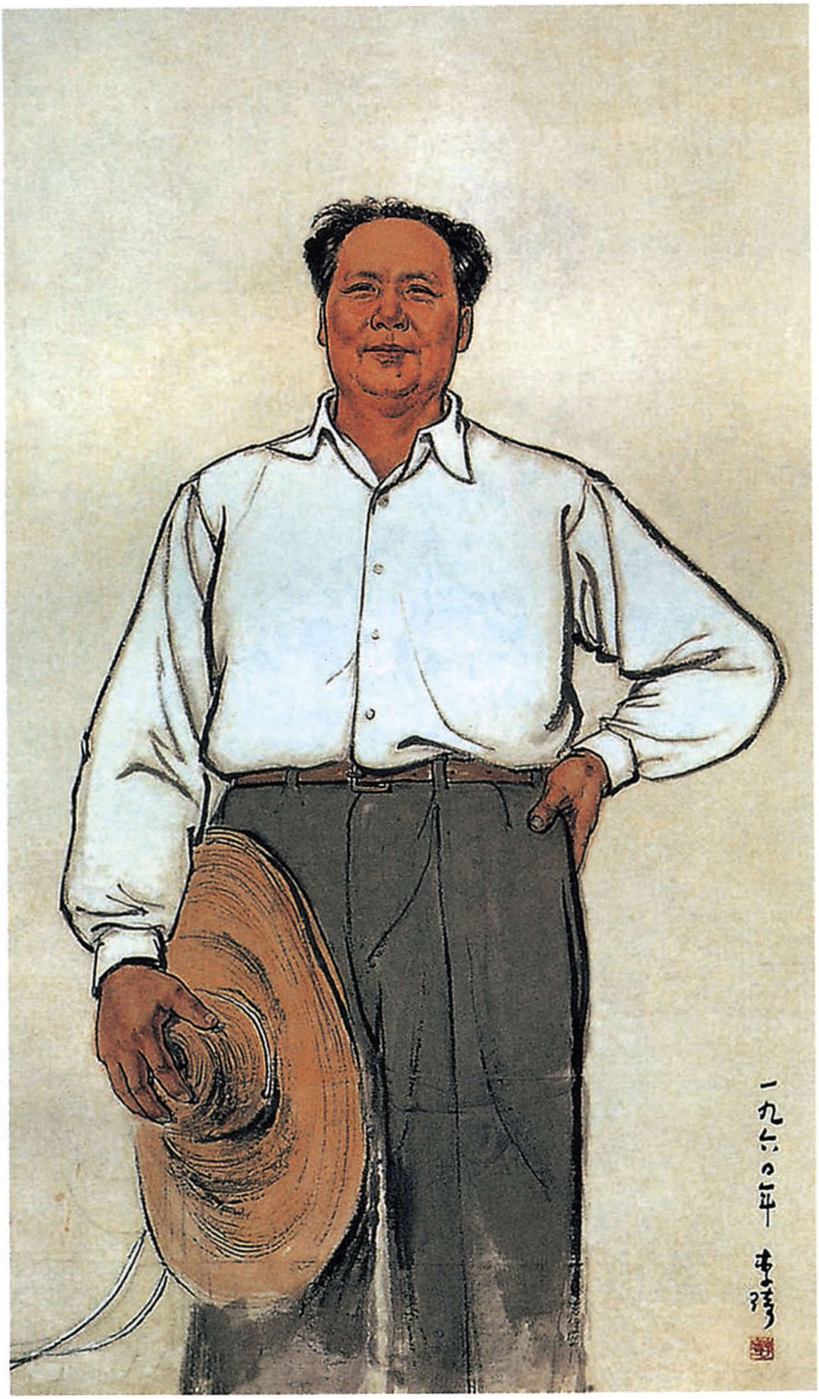
《在毛主席身边》(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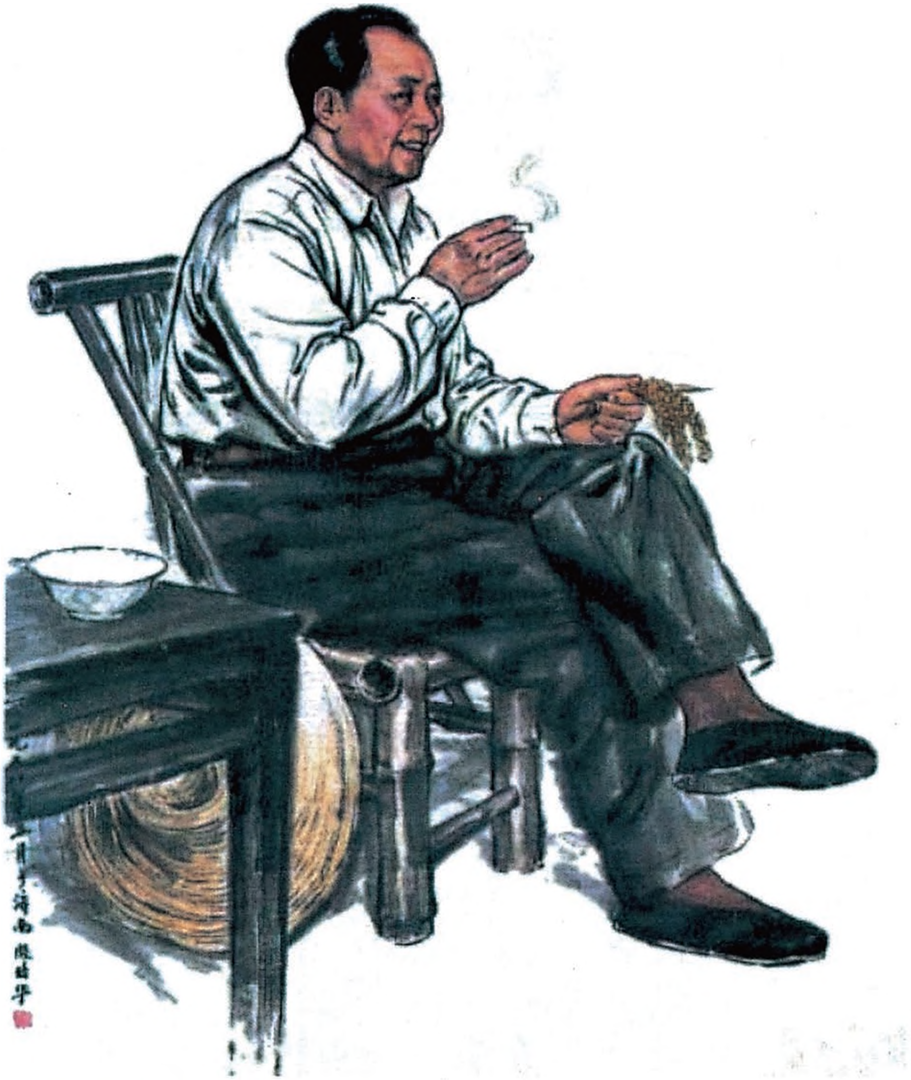
《黄河两岸尽朝晖》（中国画）


你們這里成了烟葉王國了
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一百一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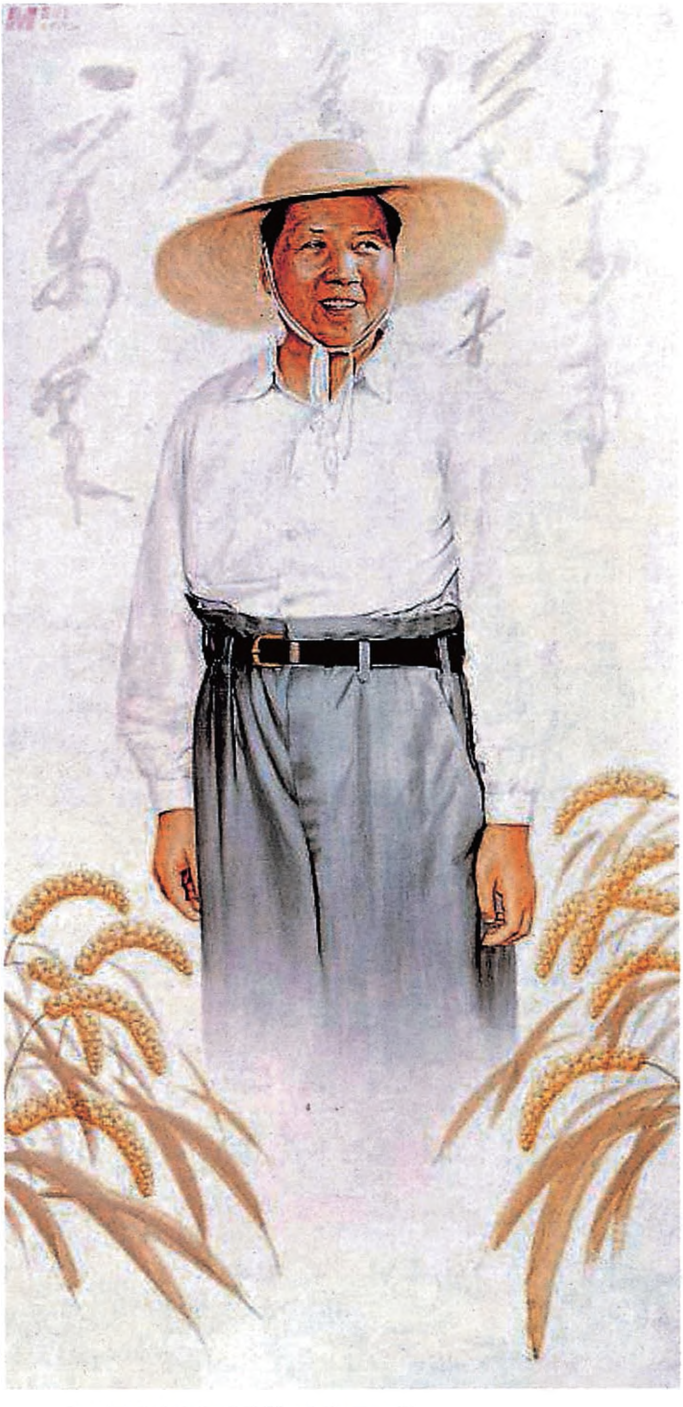
《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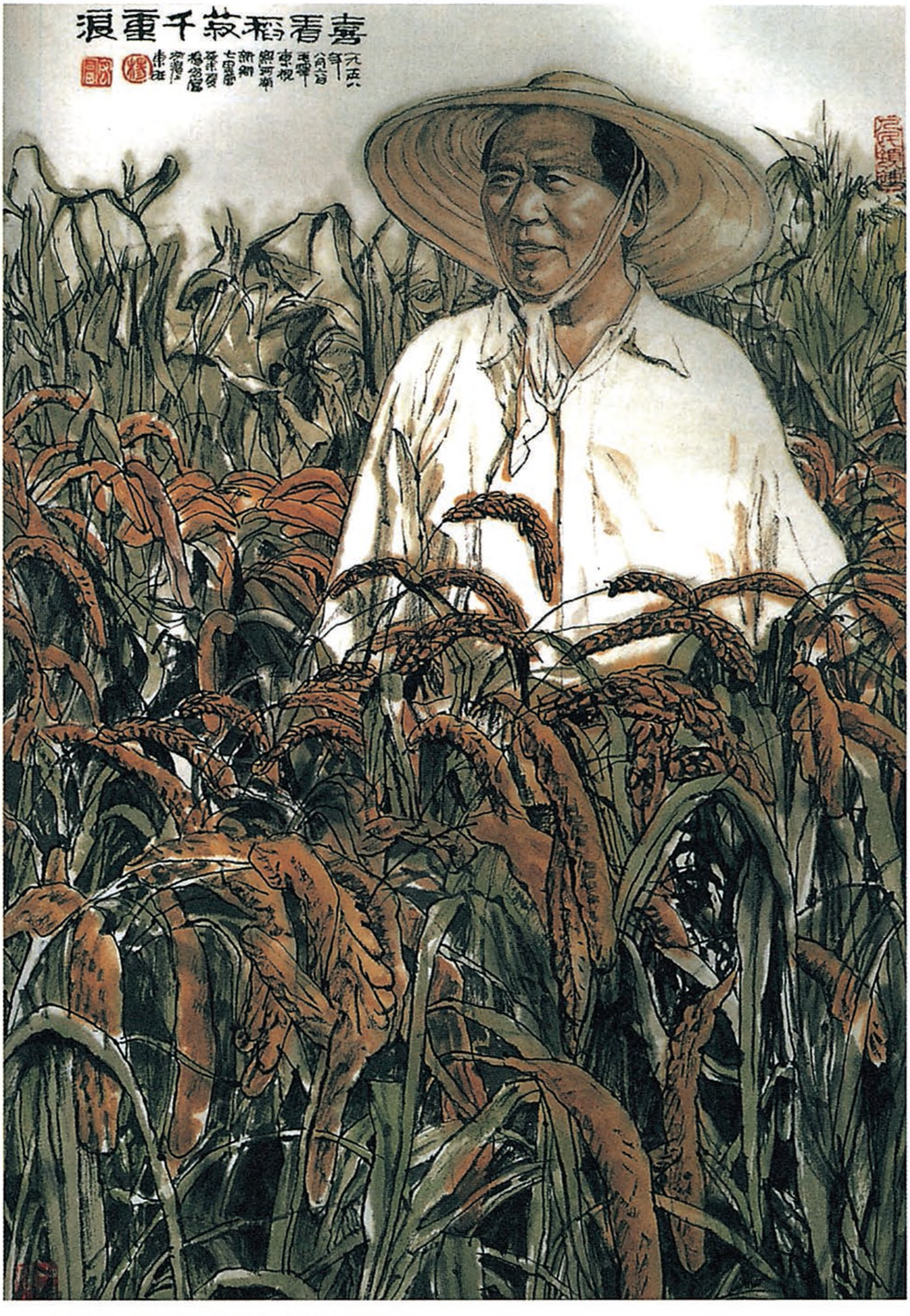
《走遍全国》（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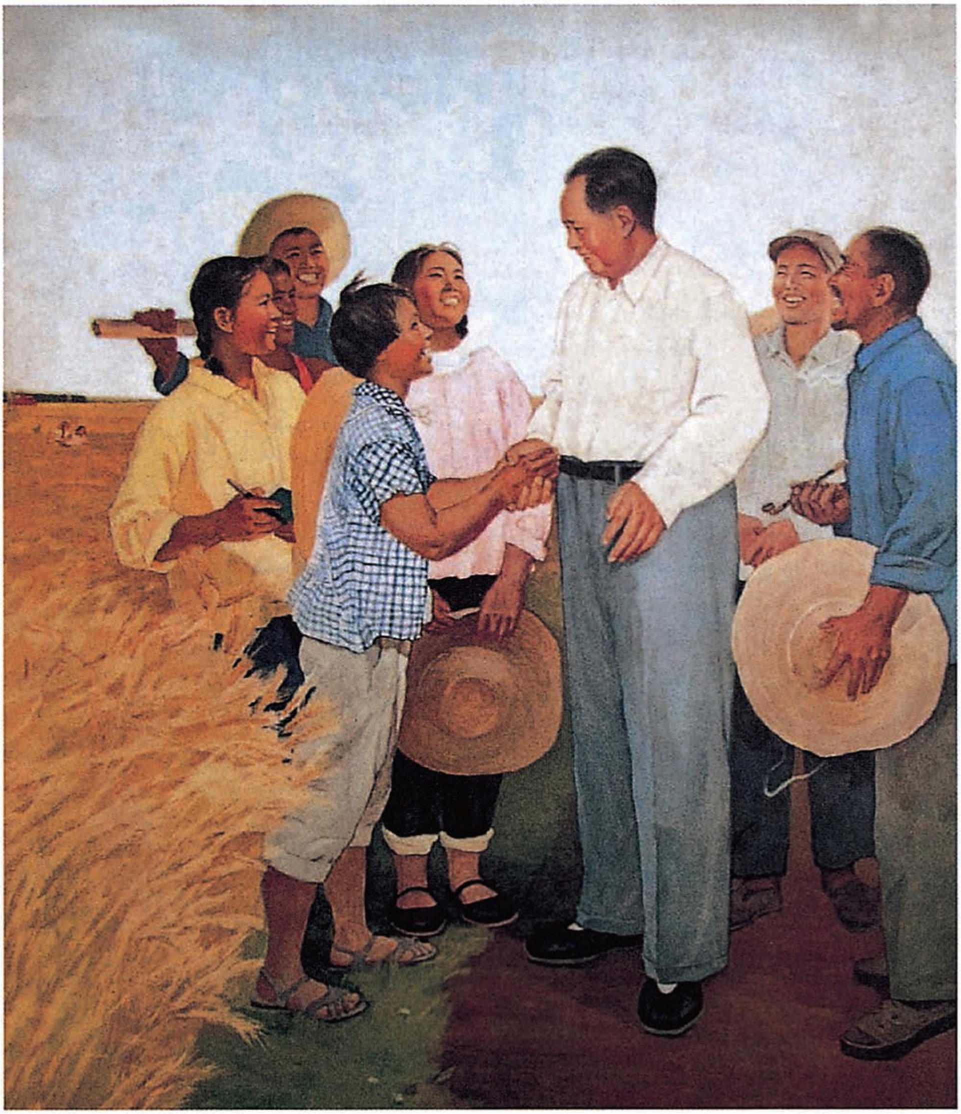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调查期间》（中国画）



《毛泽东视察农村》（中国画）



《喜看稻菽千重浪》（中国画）



《亲切的关怀》（油画）

关于停止在深圳方面的演习准备打金门的批语[1]

（1958年8月18日）

德怀[2]同志：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东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上午一时

再：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1958年8月13日关于在深圳方向上进行演习的部署给军委的报告上。

[2]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关于索要《科学简讯》的批语[1]

（1958年8月18日）

高智[2]同志：

找一至五期给我。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科学院科学简讯编辑室1958年8月15日编印的《科学简讯》新第六期上。

[2]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8月19日）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样管，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全党办工业，各级办工业，一定要在统一计划下，必须要有重点，有枝叶。不妨碍重点的大家搞，凡是妨碍重点的必须集中。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一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粗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为。各协作区要有一套，但各省要适当分工，不要样样都搞。各省到底生产多少粮食、多少钢铁？以后各省都要自己生产，自己用掉。各省不要想跑到别处去调，还要准备中央调进一些，福建搞□□吨钢，用到哪里去呢？钢铁大的归中央，小型的各省都可搞一些。

地方分权，各级（省、专、县、乡、社）都要有权，内容有所不同，范围有所不同。分级管理，但不要把原材料都分掉了。

各级计划要逐步加强。合作社的生产与分配，也要逐步统一管起来。没有严密的计划性与组织性是不行的。粮食生产也要有计划，明年是否种这样多薯类？棉花要不要种那么多？明年再鼓一年劲，粮食搞每人□□斤再看。

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严密的组织网，一万年后，人多，汽车多，上街也要排队，飞机多了，空中交通不管也不行。在猴子变人的时候，是很自由的，往后愈来愈不自由了。另一方面，人类大为解放，自觉地统治宇宙，发掘出无限的力量。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

明年粮食生产还要不要鼓劲？还要鼓。苦战三年，储粮一年（每人□□斤），红薯可以减少一点。

所有计划统统要公开，不要瞒产，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以后评比要比完成任务，比技术创造，比工作方法，比组织性纪律性，比更有秩序，比合理的独裁。要大鸣大放，才能独裁。现在铁也调不出，钢也调不出，几十万个政府，那还得了。

还要讲形势。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从中央到合作社，要上下一致，要有许多机动。但机动是属于枝叶方面的，不能妨碍骨干。钢明年□□吨要

完成，今年□□吨要保证。

省委书记回去以后，要立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条子要灵，一个地区一个主，一个省只能有一个头，“冤有头，债有主”。邯郸有一个合作社，赶了一辆大车到鞍钢要铁，不给就不走。各地那么多人乱跑，要根本禁止。要逐级搞平衡，逐级上报，社向县，县向专，专向省，这叫社会主义秩序。中央也只有一个头，中央钢铁的头是□□□，机械的头是赵尔陆。

中央计划由各省、市参加共同制定，省计划由地、县参加制定，一次也许讲不清楚，要多讲几次。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天津有一百万人能参加劳动而没有参加，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才能基本实现机械化，劳动力才能彻底解放。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

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钢铁专门小组每十天检查一次才行。你们回去后，什么事情也不搞，专门搞几个月工业，不能丢就不能专，没有专就没有重点。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高产卫星不要过分重视。帝国主义压迫我们，我们一定要在三年、五年、七年之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大工业国，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把大工业搞起来，抓主要的东西，对次要的东西，力量不足就整掉一些，如种棉花整枝打杈保桃一样。这样会不会损伤下面的积极性？合作社不搞钢铁可以搞别的。钢铁谁搞谁不搞，要服从决定。要下紧急命令，把铁交出来，不许分散。大、中钢厂的计划必须完成，争取超过。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唱《逍遥津》就不能同时唱别的戏，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

钢、铁、铝及其他有色金属，今明两年要拼命干，不拼命不行。钢要保证完成，铁少一点可以，也要争取完成。

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它。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才有可能。现在两个阶级各有各的计划，将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不分彼此，帮助困难的地方一个钱也不要。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谁能赔偿损失，现在搞建设，也是一场恶战，拼几年命，以后还要拼，这总比打仗死人少。不能按钟头计算时间，那还算什么道德高尚？河北省计划十五岁的青年十五年后可以大学毕业，半工半读，人民的觉悟就提高了。靠物质奖励，重赏重罚过多是不行的。我们今后不要发什么勋章了，军官要下放当兵，没有当过兵的要当

一下，当过兵的再当一下也很有好处，师长、军长下放让班长管，搞三个月后再回来当师长、军长。云南有一个师长，当了几个月兵，了解士兵的生活、心理，这很好。干部参加劳动，有人说搞两个月，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我们与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曹操骂汉献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有道理的。只要大家拼命地干，再过三年、五年就搞起来了。

协作区不搞政治不行，要搞点政治。过去有人说协作区只搞经济不搞政治，我看还是要搞政治挂帅，思想一致了，才能搞好经济，在政治挂帅之下抓计划，搞大公社统一计划，重点建设，枝叶去掉一些，就是政治。

关于印发刘晓[1]给中央电报的批语

（1958年8月19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印发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刘晓，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刘晓1958年8月16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不久前我曾往访库西宁同志，向他转告了毛主席对苏共中央关于王明情况通知的答复。他表示对毛主席能充分地理解苏共中央非常高兴，至于王明是否应该在苏继续治疗的问题，应完全由中共中央决定。既然毛主席认为他可以留下，这对苏方来说也不会成为负担。然后我向库西宁表示，毛主席很高兴地欢迎他在任何他认为方便的时间到中国做客，他表示非常感动。这个电报作为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8年8月21日）

保证重点，明年搞□□到□□万吨钢，□□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因此，要拼命干，要一星期抓一次，还有十九个星期要抓十九次。二十四日开工业书记和厂党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对搞分散主义的，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然反而不利。我看一千一百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钢是否能翻一番了？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如果不完成一千一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利益的大事。

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或者搬到重要地点去，首先保证重点设备——高炉、平炉、轧钢机、电机和重要铁路重点工程、车床、吊车。要向干部和人民讲清楚，首先保证几件大事，才是万年幸福。冤各有头，债各有主，一省只能有一个头，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一个人也不能乱跑。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协作区之间，省与省之间，还可以互相调剂一点。还有一百三十三天，十九个星期，每星期抓一次，一定要抓好。

我们的人民是很有纪律的，给我印象很深。我在天津参观时，几万人围着我，我把手一摆，人们都散开了。河南修武县，全县二万九千多户，十三万人，成立了一个大公社，分四级：社、联队、中队、战斗小组。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秋收翻一番，群众就看出好来了。甘肃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搞起来的。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样大呢？原因就是我们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销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党，一个主义，群众拥护。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大整风以后，一条心。红安经验，就是一个典型。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地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

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我在延安身体不大好，胡宗南一进攻，我和总理、胡□□、江青等六人住两间窑洞，身体好。到西柏坡也是一间小房子。一进北京后，房子一步好一步，我的身体不好，感冒多了。大跃进一来，身体又好了。三天到四天中，有一天不睡觉，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耶稣教清教徒的生活艰苦，佛教创教，释迦牟尼也是从被压迫民族中产生的。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西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嵖岈山公社章程，《红旗》杂志要登出来，各地方不一定都照此办，可以创造各种形式。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来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河北省□□□

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里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如□□、□□。□□的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

号”（粳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一个工人家庭做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倒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产品十分丰富，粮食、棉花、油料实行共产。那时道德大为进步，劳动不要监督，要他休息不休息，建华机械厂搞“八无”。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都是些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过去革命打死很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将来一律叫公社，不叫工厂，如鞍钢叫鞍山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大学、街道都办

成公社。乡社合一，政社合一，暂时挂两个牌子。公社中设一个“内务部”（行政科），管生死登记、婚姻、人口、民事。

有人问，统一以后，要不要有机动了？机动还是需要的，在保证一千一百万吨钢以外，允许有机动，如果树、棉花要整枝，其他就不整枝，统一主要是钢铁、机械。准备一百亿元冲击，使合作社的冲击力有东西可冲。国家保证□□万吨钢，剩下□□万吨由省、地、县去安排，能超过一点更好，计划不可能搞得那样准确，不可能样样事先有计划，有些事情难以预料，盲目性是不可避免的，乱是有一点，成绩是很大的，空前的。过去我们没有管，现在全党要管这件事，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各级党委都要设几个书记。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8 年 8 月 21 日）

五九年粮食方针问题。劲鼓得比今年大还是和今年差不多？劲还是愈鼓愈好，明年还是要大于今年，现在不要愁丰收有灾，不要怕多就不鼓劲。但要有节奏地生产，现在劳动强度很大，要使农民有适当的休息，一个月休息两天，半个月休息一天，忙的时候休息少些，闲的时候休息多些，离工地较远的可以在工地里集体吃饭、睡觉，这样可以节省来往时间，多得到休息。这个意思要写到文件里去，但不要讲得太多。

粮食多，油还不够。粮、棉、油都要增产，中心是深耕，今年是多数未深耕，密植也不够，太密了不通风也不好。深耕才能密植，蓄水、施肥、除虫。（□□插话：密植一千万株以上可能有失败的，五百万株没有什么问题，大面积密植要创造经验。）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需要重新解释。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

题，都未展开，苏联的集体农庄、手工业合作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为什么不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不仅是中央的，而且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我们现在管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也管不了，无非是开开会，一年抓四次，从前管得更少，无非是发发指示，通报一些情况。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石景山钢铁厂投资包干，可以从六十万吨钢搞到一百三十万吨钢，第二期就可搞到三百万吨。这是什么原因？这里边有鬼，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是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管的时候，实际上是设计员在专政。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印度独立之后比英国统治时积极性高，一独立就有积极性。当然它是表现在阶级斗争上，街道、工厂、民办学校，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也发展了。

“死”活斗争问题。“死”活斗争一万年也有。控制“死”还是不控制“死”呢？没有死不行，统得太死也不行，一点不死也不行，五九年的钢如果是□□吨，□□必须卡死，□□吨是活的，如果□□吨，就有□□吨是活的，如果超过□□吨，还可以分成食油，多的多吃，少的少吃，这就活了。死者保证重点，活者重点之外不妨碍重点。大包干就是有死有活，大家都要管。死与活两方面就是统一与分散，兼而有之。包干制就是有死有活的矛盾统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就是这个道理。中央究竟谁当家？大权独揽揽到何处？只有经济建设委员会是否够了？可否分设工业生产委员会和工业基建委员会？总要冤各有头，包工包干，使大家有奔头。我们说六项纪律，是搞神经战，主要是吓人，不坐班房，大家不犯法就是嘛！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几十万劳改犯不算多。军队过去说自己落后，会一开，相互关系一改变，就出现了新气象。各地军队都在开会，军队大跃进已经起来了，可以搞各种名堂，军队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搞政治、文化、劳动，影不影响军事训练？不但没有影响，反而搞得更好。公安、法院也正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还是马青天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大跃进以来，都搞生产，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时间犯法了。对付盗窃犯不靠群众不行。（刘□□插话：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法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的决定，大家去办就是法。上海梅林公司搞双法，报上一登，全国开展。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多数人要靠养成习惯。军队靠军法治人，治不了，实际上是一千四百人的大会治了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韩非子是讲法治的，后来儒家是讲人治的，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靠成了习惯才能遵守，成为社会舆论，都自觉了，就可以到共产主义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

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民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张道陵的每人五斗米的教，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

食是有规律的，大口小口一年三石六斗，放开量叫他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搞公共食堂，也可以打回去吃。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职工宿舍要搞搭配，大片宿舍比公馆好。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掉，大学教授比学生吃好一点。河南搞八十亿土方，粮食翻一番，河南能办到的，全国都应该办到。

明年建国十周年，宣传是大搞还是小搞？我们是为中国人民作宣传，对全人民是鼓劲，不考虑影响外国的问题，实际上外国会受影响。大搞请不请外国人，请多少？

回去告诉军队同志，军官要当一个月的兵，先从少数人搞起，一个人搞起来了，别人都要搞。一个十月革命，全世界都要革命；一个合作社搞千斤亩，全国都要搞千斤亩。到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多数服从少数？历来都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少数人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你们来开会，还不是邓□□发了一个通知，把你们都找来了，这不是多数服从少数吗？达尔文进化论、哥白尼太阳系的理论，都是一个人搞的，别人都服从。马克思、恩格斯是两个人，反映了客观规律，或者反映了多数人的意见。蛋白质的公式还未找到，活性染料一百六十七种，已经找到了公式了，世界第一。沼气是四碳一氢，屁是二氢一硫，石膏是硫化钙。就这样一点来说，那是少数人的意见反映多数人的意见。

河北省徐水县搞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这三个口号提也可以，不提也可以，组织形式不一定搞团、营、连、排、班，设大队、中队、小队也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劳动组织与民主化问题。帝国主义为这件事造谣，但我们不怕它。强迫命令当然不好，但工作中有点强制也需要，这是纪律。大家来北戴河开会，也是如此。苏

联的军事共产主义是余粮征集制，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传统，搞供给制，是军事共产主义。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刘绍棠成了右派，姚文元不错，比流沙河好。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

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各地不一定按徐水的办法去搞，三句话（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化）各地都有。卫星公社的简章要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大体可用，各地参照执行。

对开展农村工具改良运动的指示[1]

（1958年8月）

各级党委要摸清情况，全省全区有多少农具需要改良，多少农具需要装上滚珠轴承？订个规划，哪种先改、哪种后改，什么时候完成，都要有个具体安排。这样，领导就具体了，加强了，工具改良运动就会更好地开展起来了。

---

[1] 这是《人民日报》关于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电话会议布置和检查农村工具改良运动的报道中引述的毛泽东的话。报道说，195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在农村展开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后，全国各地的工具改良运动更加热烈地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推动运动的发展和检查运动中的问题，中央书记处两次召开省委书记电话会议，除继续贯彻中央和国务院联合指示的精神外，并进一步指出工具改良运动是我国当前农业生产中的中心问题，要求各地党委特别加强对于这一运动的领导。电话会议之后，毛泽东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详细了解了运动的进展情况，对各地党委都十分重视工具改良运动表示满意，并作了这个指示。

对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8月22日）

退少奇、小平同志：

第五页，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这样说是不对的，那里的生产力并没有解放。[1]第五页，阶级消灭了，这样看也是错误的，现在全国并未消灭阶级。[2]这两点作了『作』修改。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

---

[1] 中共青海省委1958年7月5日给中央的报告说："农业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已经改变，民族关系已经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着。只是这种矛盾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毛泽东审阅报告时，将这段话中的后一句改为："这种矛盾即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这种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2] 中共青海省委的报告中说："事实再一次表明，阶级虽然消灭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反革命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毛泽东审阅报告时，将这句话修改为："事实再一次表明，就全国说来，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虽然过去了，但是阶级尚未消灭，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反革命虽然不多了，但是还有。"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8年8月22日）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伕·斯托伊卡同志：

欣值罗马尼亚解放十四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我们高兴地看到，罗马尼亚人民在解放后的十四年内，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罗马尼亚人民一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事务中，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坚持不渝地执行着和平的外交政策，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坚决为反对战争威胁、制止侵略和捍卫欧洲和世界和平而斗争。

近年来，我们两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有着亲密的合作。不久以前，我们两国签定了长期贸易协定，这标志着两国人民兄弟友谊的进一步增长。

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

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教育工作指示草案的批语

（1958年8月23日）

恩来、少奇、小平、定一[1]同志：

此件[2]可用。似宜印发各主要民主人士，并同他们座谈一次，然后公布[3]。

毛泽东
八月廿三日

---

[1] 恩来，即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1958年8月15日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草案。草案共有6条，主要内容是：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各大协作区应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要逐步地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

[3]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并于1958年9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农业方面的文件的批语

（1958年8月24日）

退谭震林[1]同志：

各件[2]已阅，可用，照此付印。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上午二时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关于农业方面的9个文件，这些文件是：1. 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2. 中央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3. 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4. 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5. 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6. 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7. 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8. 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9. 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五）

（1958年8月30日）

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共产主义本来是有群众自发的因素，先有空想社会主义、古典唯物论、辩证法，然后再由马克思那些人总结出来的。我们的人民公社是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没有来由的。把这个问题条理化，需要我们去搞清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了不起，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解放。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青年、妇女非常欢迎，破除了家长制度，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有一个公的特点，是劳动效率比合作社可以提高。

全国现有七十万个合作社，搞成万人、万户的大合作最好。河南提出二千五百户左右一个，当然也可以。这是一个新问题，只要

一传播，把道理一讲，可能只要几个月，一秋一冬一春可能就差不多了。当然，离实行工资制，吃饭不要钱，还要一个过程，也许一年，也许有些人要三年。决议案上有句，一二年或者四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工厂差不多，即是吃饭、穿衣、住房都公有。苏联还鼓动私人盖房子，我们将废除私人房屋。

绿化问题。园林化，城市乡村都像中山公园、颐和园。中山公园不出粮食不好。中国刚建设，要想建设得怎样更合理，更好些。有人说，城市工厂占地更多，农村就不同，中国每人三亩地，我们两亩就够了。几年后亩产提高了，可以拿三分之一种树，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让地休息，地也轮班。假如亩产万斤，达到现在的“卫星”时，一亩等于四十亩、八十亩至九十亩，还种那么多干什么呢？种树要有规划、有计划地种。法国人把街道、房屋、林荫搞得很好。资本主义能搞，为什么我们不能搞？应当把它搞得有秩序一点。康有为咏西湖的一副对联：“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其实何必游四大洲，我们绿化起来，全国到处可以游，何必一定游西湖？西湖水浅，林也不好。房屋要好好安排一下，今年大搞还不行，有些今年开始，有些明年开始。如果搞□□斤粮食（今年可能是□□斤，明年加一番）的话，我们就可以搞规划，园林化、绿化、畜牧、住房等。河北、河南我看了一下，什么绿化？没有树怎样绿化？真正绿化，我看每人有了几千斤粮食，腾出三分之一地来种树，才能大搞绿化，农、林、牧是互相结合、互相影响的。

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已经有了一个章程：河南卫星公社十四条，它的“宪法”一公布，全国闻风兴起的就会不少。人民公社在两三年（明年、后年）内能不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工资制，办农业工厂？有个文件写第三个五年计划向共产主义过渡，我加了个第四、五个。有个文件讲，明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句话讲得好，粮食再翻一番，钢搞到□□到□□吨，争取□□吨，这是一场大仗，还是没有休息的，机器不能休息。今年还有四个月，我犯了错误，早抓一个月就好了，六月十九日出了题目，但没有具体措施，大家都抓计划去了。热情是好的，但对今年的生产有所放松，我没有搞好，责任是我的，不是大家的，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轰轰烈烈，有人说一九五七年的粮食生产，比一九五六年更扎实得很，实际上增产不多，只增产□□斤。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明年□□吨，后年再增□□吨，苦战三年，达到□□吨，基础就搞起来了，剩下两年，到六二年搞到□□到□□吨钢，就接近□□。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粮食产品要多样化，不光要地瓜。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

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〇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做。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得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人民公社，有的地方采用军事组织——师、团、营、连，有的地方没有，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纪律化”这三化的口号很好，这就是产业大军，可以增产，可以改善生活，可以休息，可以学文化，可以搞军事民主。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

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这次会议工、农、商、学、兵都有，重点是工业。全党全民办工业，从今以后，第一书记要偏到工业方面来，过去我们偏到农业方面，拿农业压迫工业，将它的军，农业搞起来了。农业上了轨道，工业还没有上轨道。工业要抓，有人说，睡到土地上，睡到机器旁边去，就可以搞起来，不到机器旁边睡觉不行。东北三省过去抓工业，但农业未搞好，东北要一面抓工业，一面抓农业。其他各省、自治区重点抓工业。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首先是钢铁、机械。有了钢铁、机械，可以挖煤、发电，什么都好办，封为“元帅”是有理由的。要抓，还要抓紧，不要抓而不紧，以后考就是考这个东西。六条纪律：一警告，二记过，三撤职留任，四撤职，五留党察看，六开除党籍，不坐班房，坐班房损失劳动力。这几条都是神经战，不可少，是属于惩罚一类的性质，九个指头是说服，靠政治，凭良心办事，一个指头是纪律。马克思主义不是靠惩罚，靠惩罚办事就犯错误。我们党历来靠说服教育和斗争，如□□、□□□、古大存、孙作宾、新疆的什么拉巴拉也夫，总之，大大小小有几十

个，只有那么少数人，只是十个指头的一个，你说服不了他，就得惩罚，劝告警告，紧急的时候，一下撤职也是有的。□□是军队中的右派（没有划右派），□□是地方上的右派，王明也是右派。为什么又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呢？因为他是老党员，搞了许多年，不能便宜了他，不当不行，你想不当，我想叫你当，不当中央委员就没事了，他的原则是一开会就害病，让他当，有益处。□□□也是当一下好，或者改好，或者不改，总有一天要开除，这是说服与纪律的关系。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有“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吨到□□吨，争取□□吨，其中□□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吨到□□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有些同志怕没有活命了，统统都“活”不行，要“有死有活”。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各级办工业，全民办工业，有重点，有骨干，有枝叶，树长有干，才有枝叶。人靠一根脊椎骨，是脊椎动物，是高级动物。狗是一种很懂人性的高级动物，就是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炼钢，和资本家差不多。

下次会议。两个半月以后再开，即十一月半在南方再开一次小型会议，时间不要这样长，因为，那时还不能总结。十月后，剩下个把月，还可以抓一下。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斯大林办得不太好）请各省都印，广为散发，让大家看一下，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因为那时受条件限制，没有经验，所论当然模糊不明确。不要以为老祖宗都放香屁，一个臭屁也不放，讲到将来，是一定有许多模糊地方的。苏联有四十一年的经验，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要破除

迷信。

除四害。国庆、阳历年、阴历年抓一下，我希望四样东西越搞越少。因为这些东西对劳动人民有害，直接影响人民的健康，要把各种疾病大大消灭。杭州有个地方，去年只有一人生病，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医生没有事做，可以去种地，作研究工作，哪一天中国消灭了四害，要开庆祝会的，历史要写进去。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办到，所谓文明，可是苍蝇、蚊子多得很。

在北戴河会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稿上加写的话[1]

（1958年8月）

我国人民不需要也不应当侵占外国任何领土主权，但是我国人民必须保卫自己的领土主权不受侵犯。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8年8月26日印发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稿上加写的一段话。决定对民兵的性质、组织形式、干部配备、武器装备以及训练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

在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上加写的话[1]

（1958年8月）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

---

[1]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于1958年8月29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1960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中曾提到这段话。批语说：毛泽东“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

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关于主要矛盾问题

（1958年8月）

关于主要矛盾这个问题，提不提？提了有好处没有好处？（康生：和□□、庆施同志谈过，人们认为过渡时期是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为主。但也提出一点疑问，是否影响整改，其次，是否引起对八大几句话的争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主要的，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我们进行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对于资产阶级和个体经济是不动的；第二次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革命中有两条道路，即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两条道路，与现在两条道路性质不同。现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理论上讲是没有问题了。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行了一段了，从一九五三年全国财经会议宣布总路线以后，到冬季又让中宣部写了个总路线宣传提纲。如果不算今年，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只有三年半时间，算今年只有四年半，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个体农民问题也解决了。这种情况反映在八大，八大说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胜利，大规模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能说不对吗？所有制解决了，人家服服帖帖打锣打鼓嘛，八大指出在经济制度上也还没有完全解决（资本家拿定息），在政治斗争上也没有完全解决（思想斗争），

还要继续改造，民主党派的一部分——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富裕中农，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满意，这在八大时并不是完全没有划清。八大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当时他们服服帖帖，现在他们要造反嘛，青岛这篇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即讲清楚了。今后为了策略，还是青岛的讲法好，即城乡都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没有熄灭等都讲了。这个问题到会的人知道就算了，不要因为“主要矛盾”那个字，闹得天翻地覆。

□□□讲的重庆那个工厂干部被工人斗得过不下去了，新工人有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干部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都挂到资产阶级账上，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剥削人民的人，一种是不剥削人民的人。最大量的是中间派，没有中间派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最近不在报上搞，过几个月以理论文章的形式写东西。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剥削人了，总不能再挂到资产阶级账上了，但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湖北有个刘介梅就不是资产阶级，他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明朝朱元璋、南北朝时代宋刘裕也是那样的人。政治势力和意识形态还没有完全解决，党内三个主义也属于意识形态。

大鸣大放是最好的革命形式。革命是要取得经验的，有人要大吵大闹就让他闹。革命这么多年就没有发明这个办法，今年和右派合作发明了这个办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鸣大放这个办法，是他们提出，我们接过来的。在延安时有兵的报和轻骑队，当时这个办法没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是在艺术、学术方面讲的。在政治方面右派提出来大鸣大放，我们接过来这很好嘛。□□同志过去看过新乡工厂，从那个工厂的情况和现在的报告来看，用后的方法是不行的。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是主要矛盾，这

一个是肯定对的了。第二个，在几个月内不在报纸上宣传主要矛盾，免得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影响整改，报纸上只宣传两条道路斗争。

所谓人民内部有几种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党内也有几种人。实际上人民内部矛盾，就有阶级矛盾。所谓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人民，但有对抗的一面。现在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与地主的矛盾，而是三部分人民的矛盾。这三部分人民之间，内部有一部分暗藏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如章伯钧等，今年把他们暴露了。我们用剥笋政策，今年是剥不完的。现在主要矛盾不是与地主的矛盾，湖南捉了七千人，没有人民反对，如捉章伯钧就不行。今天敌我矛盾是次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加上家属有几千万人，小资产阶级是几亿，对这些人主要是改造问题。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大量的中间派。对这些人不能说是对抗性的矛盾，如章伯钧之流是对抗性的。百分之九十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工农也有矛盾，工农矛盾也称两条道路的矛盾。右派有多少呢？最多有十五万左右，不是那么多，不能说主要矛盾，估计还要分化一部分出来，对我们有利，特别是有知识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了，但还没有完全解决。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讲是大体适合，斯大林讲完全适合有毛病。将来若干年之

后生产力发展了，集体所有制和发展生产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为什么适合？合作社是发展生产的嘛！我们这个制度比起印度来，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三百一十万吨钢，我们增加了四百多万吨，你说我们的制度不好吗？我们的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但也有缺点。到几十年以后，生产力发展了，价值法则没有用了，货币可以不要了。

八大那句话（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没有什么害处，不妨害整风、生产、反右派、改进工作。这句话是好话，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民间的矛盾，这是和外国比、和我国以前比。（康生：原来写这句话时，当时考虑写不写，反复考虑了列宁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有语病的，但没有坏处，实际上没有发生坏作用，这句话不必去改了，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子。当时本来想改，已印发出去了。

关于编印《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的批语

（1958年9月1日）

一

尚昆[1]同志：

几十个决议，除印成一本[2]发给各中央委员和几级党委（似应发到县级，军队发到团级，作为**内部文件**）外，哪些应在报纸上公布，请与小平、彭真[3]同志商定。

毛泽东

九月一日

二

退尚昆办。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决议，后由中央办公厅编印成《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文件汇集》。汇集包括五个方面37个文件：一、关于计划和体制方面的8个文件：1. 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2. 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3.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计划管理制度的规定；5. 中央关于经济协作的几项具体规定；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物资分配体制的几项规定；7.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进限额以上基本建设项目设计任务书审批办法的规定；8. 关于纺织机械企业领导问题的决定。二、关于农业方面的9个文件：1. 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2. 中央关于1959年农业生产安排的决议；3. 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4. 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5. 中央关于肥料问题的指示；6. 中央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的指示；7. 中央关于储备粮食问题的决定；8. 中央关于农业社积累与消费问题的指示；9. 中央关于改进农、林大专学校教育的指示。三、关于财贸方面的10个文件：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相应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2. 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关于1958—1959年度粮食购销问题的报告；3. 中央批转商业部党组关于1958年棉花、麻类、烤烟收购数量的初步意见；4. 中央批转粮食部党组对1958—1959年度油脂购销调拨计划安排的意见；5.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市场物价分级管理的规定；6. 中央批转李先念、程子华同志关于物价会议向中央的报告；7. 国务院关于农副产品、食品（不包括粮食油脂）分级管理的规定；8. 中央关于发展中药材生产问题的指示；9. 中央关于对外贸易必须统一对外的决定；10. 中央关于贸易外汇体制的决定。四、关于教育方面的1个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五、其他方面的9个文件：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各级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2. 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3. 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4. 中央关于继

续展开除四害运动的决定；5. 中央关于技术保密问题的规定；6. 中央批转劳动部党组关于劳动工作分工管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7. 中央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职工宿舍冬季取暖补贴问题的指示；8. 中央关于发展铜和铝生产的决定；9. 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电报[1]

（1958年9月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之际，我们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你们和全体越南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勤劳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民主改革，胜利地实现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严重任务。现在越南人民正在以新的步伐向着社会主义前进。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了不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团结和密切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所作的不懈的努力，对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越南人民所获得的光辉成就感到无限的欢欣。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名义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电报。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

一年来，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关系，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全力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为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坚决为实现日内瓦协议所作的不懈努力和所采取的一切步骤。我们深信，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建设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一定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祝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悠久的传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

（1958年9月2日）

刘、周、彭真、小平、陈云、富春、一波、先念、克诚、震林、伯达、定一、康生、乔木[1]各同志：

这个文件[2]看了两遍，觉得不大满意，不能动员群众。这次会议各类文件，以农村类文件为最好，每样事情交代清楚，前后次序有逻辑性，文字通顺，一般具有鲜明性和准确性，特别是人民公社一件为最好。其次，是陆定一同志论教育的文章[3]，虽较长，理论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部副部长。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指国家计委、国家经委1958年8月25日向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送的《对一九五九年计划调整情况的说明要点》。

[3] 指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

水平颇高，逻辑性、准确性、鲜明性三者都具。其次，是民兵决议[1]，写得很好，使人读得下去，读过后很舒服。其次，是商业类文件，也不错，可读。工业类文件要考下等了。有一个较好的，就是那个不长的意见书[2]，读得下去，提纲挈领。“说明要点”最差，我读了两遍，不大懂，读后脑中无映象。将一些观点揍〈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看不见，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其原因，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词学。我疑心作者对工业还不甚内行，还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于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所谓不大懂辩证逻辑，就工业来说，就是不大懂工业中的对立统一，内部联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分别，因此构思写文，不可能有长江大河、势如破竹之势。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我对作者是很喜欢的，从文件内容看来，他是一个促进派，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坚决拥护者，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甚为不足，是在理论与文词。我的意思，痛切一道，引起注意（过去我所做的一万次的唠叨历史，只当做一阵西北风）。如不同意，可用通信方法鸣放辩论。我写的是一张大字报，你们也写吧。如果同意，请你们会谈一下。我看你们的心意，把这类事当作芝麻，你们注意西瓜去了。却是写出文件叫人不愿意看，你们是下决心不叫人看的，是不是呢？建议：重写一遍，二遍，三遍，以至多遍，写得同人民公社

---

[1] 指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

[2] 指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向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决议〕那样好。你们研究一下，你们做工业官，有工业志，就是不用心思，毫无理论研究，以致文件写成这样。建议：你们有意写工业纲要四十条，那很好，就动手吧，写一篇好文章出来，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上午九时

“说明要点”，无年月日；无署名，不知谁人写的；表中有好几张除作者外，恐怕谁也看不懂。为什么如此呢？

如果少奇、恩来尚在北京，请给他们一阅。彭真请给一阅。

毛泽东　再白

和巴西记者马罗金、杜特列夫人的谈话

（1958年9月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等了很久吧？因为我们开会，没有能早见你们。

马罗金（以下简称马）：得到你的接见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等多久都可以。

杜特列夫人（以下简称杜）：等得再长，我们也感谢你的接见。而且，这样可以有时间多看一些材料，也可以在中国多呆一些时候。

毛：看了些什么材料？

马、杜：有你的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

毛：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1]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

---

[1] 基马尔，又译凯末尔（1881—1938），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23年，在土耳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

杜：《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对巴西这样的国家很重要。

毛：这本书里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说来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只有像上面所说的个别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充。

马：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立场可以长期维持吗？

毛：什么事情都不能永久维持。帝国主义不能够永久维持。社会主义也不能够永久维持，因为还要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立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

杜：对于民族主义国家说来，采取中立的立场是不是正义的？

毛：是的。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杜：可以同时同双方维持正常关系吗？

毛：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的。但是，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

---

[1]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它们。

拉丁美洲有多少人口？

马：大约一亿。

毛：一亿人口的朋友。巴西人口占拉丁美洲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你们是大国。以后巴西人口还会多；土地那么大，跟中国差不多。你们的国家很有前途。

马：我们希望中国帮助我们工业化。

毛：只要你们愿意，我们没有不愿意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

杜：拉丁美洲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阵地，美国正在世界各地败退，所以加紧对拉丁美洲施加压力。

毛：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

杜：拉丁美洲正在开始这样做，但是很不容易。

毛：可以先取得半独立的状态，然后完全独立。亚非有许多国家就是如此，有些已经独立了，有些已经半独立，正在争取完全独立，有些还在受帝国主义的统治。

马：我们希望知道主席对于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的意见。

毛：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即使台

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

马：美国的禁运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毛：对我们说来，没有影响，好处甚大。

马：主席对国际形势是乐观还是悲观？

毛：目前国际局势很好。西方国家要达到它们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它们的目的是要统治一切可能统治的地方，但是它们到处受到抵抗。它们这些殖民国家结成一体，自称为西方国家。从地理上看，巴西也算西方国家；但是，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说的西方国家，实际上只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德、荷兰等等。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样的话。[1]那时候，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

---

[1] 参见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9页）。

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这句话，杜勒斯[1]这些人听起来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说："这是吹牛，我们有钢铁和原子弹，怎么反而是落后呢?"我说：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同意他们政府的做法。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杜：我们相信，你的解释对拉丁美洲很有帮助。

毛：我们对拉丁美洲人民的情况很关心。像尼克松到南美八国的故事[2]，我们很感兴趣。

马：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杜勒斯在里约热内卢也受到很大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1958年4月28日至5月14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后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8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激烈的抗议行动。尼克松到委内瑞拉时被迫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的“欢迎”。

毛：拉丁美洲人民起来了，他们不把尼克松、杜勒斯看在眼里。在他们眼里，尼克松、杜勒斯不过是纸老虎。尼克松、杜勒斯都落后了，拉丁美洲人民比他们高明得多。

在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上的批语[1]

（1958年9月3日）

一

克诚同志：

指示及附件[2]，写得很好。请即交彭德怀同志看过，再经军委会议通过，然后发出。在军委会议上，请你详细解释理由。

毛泽东

九月三日

---

[1]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时，除写了本篇两个批语外，还在指示稿第四项“由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的斗争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斗争，对各方面的影响很大，因此，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一句中“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后面，加括号写了：“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

[2] 指示，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附件，指军委指示后附的关于海军、空军对付敌机敌舰沿海活动的几项规定。

二

发福建军区及各军区，各省、市、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特种兵司令部，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外交部，陆定一，吴冷西[1]。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

（1958年9月5日、8日）

一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

（1958年9月5日）

最高国务会议，二月开了一次，现在是九月，六个月没有开了。二月那一次会上，我们谈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讲了个大有希望，不晓得同志们记得不记得？我还比较一下，不是“中有希望”，更不是“小有希望”，而是“大有希望”。还讲了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群众中出现。我们在座诸位，以及共产党里头有许多人，要办到这一点，也是要努一番力的。我们跟国民党相反，他们是以一个贵族的姿态、老爷派头在人民中出现，我们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出现。

那一次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批评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你说是坏的，我说是好的，这不是唱对台戏吗？有些人看了那四句评语实在舒服。“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

---

[1] 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于1958年9月5日至8日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三篇讲话记录稿，由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9月29日印成中共中央文件（中发〔58〕846号）发出。在三篇讲话记录稿上，中共中央办公厅都注有：“未经主席审阅，只供参考”字样。

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岂有此理!”我说，恰好是有理，不是岂有此理，而是确有此理。有些人为什么支持那种批评呢？就是因为他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三门科学或者是了解得不深不透，或者简直就不大去理会，因此就缺乏分析。什么分析呢？有资产阶级的好大喜功，有无产阶级的好大喜功，两种好大喜功。有资产阶级的急功近利，有无产阶级的急功近利。“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这大概是今天的资产阶级的一类。孜孜为利者，资本家之徒也。我们呢？我们就是另外一种急功近利。至于鄙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是有阶级不同的。资产阶级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过去的古董，那就是宝贝，至于将来，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那就是狗屁。这不是迷信过去，鄙视将来吗?

这六个月，发生很大变化。我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变化的。我的脑筋也有变化。有许多事情料不到的。今年二月那个时候虽然讲大有希望，那个希望究竟怎么样?比今天的现实还是落后些。

国内形势，如大家所知道，就是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有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自行车、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

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这一干的结果，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即有可能从去年的三千七百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棉花，去年是三千三百万担，今年大概有七千万担，可以超过一倍。烟叶可以超过三、四倍。只有油料只超过半倍，还是不足的。麻类作物，过去没有注意，没有抓紧。钢铁可能翻一番。一九五六年中共八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总理在那里建议，五年计划搞钢铁一千零五十万吨到一千二百万吨，如果说一千零五十万吨，今年就有超过的可能，可能搞到一千一百万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不是十二年吗？五六年开始，五六、五七、五八，基本完成，如果明年加一年，是超额完成，十二年计划，四年超额完成。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今年如果搞到七千多亿斤粮食，明年如果又翻一番，就是一万五千亿斤。明年也许不能搞这么多，搞太多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但是明年总是可能超过一万亿斤。钢铁明年可能超过两千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起了变化，并且还在继续变化中。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在民主党派中间是个相当严

重的问题，要逐步来，不能很性急。但是，形势迫人。形势就是人，就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多数人造成一种形势，少数人就感觉到压力，就得打点主意。我是历来主张对立面的，没有对立面，谁也不干的。我有什么对立面呢？在我们民主队伍里头有很多对立面，此外还有在我们队伍以外的，“地富反坏右”，这都是对立面。工人农民压迫我们，他们说，你做官，你得好好做，你做不好我就整你。比如五五年上半年，有许多老百姓也实在不喜欢我们，人人谈统购，家家说粮食，那个时候你说粮食没有危机，我看也可以讲是一个危机。一个原因是因为粮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富裕中农兴风作浪。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他们是党员，但是他们当了县区乡干部。他们叫‘农民苦”，所谓“农民苦”，就是他们苦；所谓他们苦，就是余粮多。据江苏省的统计，在我们县区乡的干部里头，这种人有百分之三十。他们每天叫“农民苦”，说统购统销太多了，不赞成。这一来，煽起这些农民，本来够吃的，也说不够吃，用各种办法来吵。这一压迫，就打主意吧，就搞合作化。合作化的决心就是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批判各种迷信：什么后解放区合作化不行，什么没有会计，什么平地可以山上不可以，什么汉人可以少数民族不可以等等。破除了这些迷信，没有几个月，合作化就搞起来了。然后又影响工商界，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到一九五六年那个时候，有些人又觉得恐怕不行了，走得太快了，似乎一个时期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又不灵了，多快好省也不灵了。同时，斯大林问题也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出来了，帝国主义反共反苏，那么一个潮流，国内就是右派酝酿活动。经过整风反右，才把这些东西扭转过来。而现在呢？就转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方向。民主党派也好，大学教授、中学教员也好，文化界的人也好，新闻界的人也好，科

学界的人也好，工程技术界的人也好，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也好，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或者已经改变立场，或者正在向改变立场前进。也还有少数没有改变的，还有左中右。阶级还是存在的。说现在阶级不存在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了，这个观点恐怕是不对的。我说像吃鸦片烟一样，吃鸦片烟上了瘾，是不容易戒的，资产阶级思想，还有封建主义思想，那么容易戒我就不相信。要慢慢戒，还要形势迫人，还要看事实。一个长江大桥，可以说服许多人。你没有长江大桥他就不信，出了个长江大桥，许多人去看了，他就信了。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明年二千五百万吨钢，苦战三年，后年五千万吨钢，粮食由三千七百亿斤到一万五千亿斤。我还是讲个可能性，要努力。到底那个时候怎么样？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达到，一个可能少一点，不可能达到这么多。这样一来，天天劳累，是不是人就大批死亡，或者由胖子变成瘦子，或者生病？这也有的，也有伤亡的，变成瘦子也有的，生病也有的。但这是个别的，多数人我看是相反，一不死，二不瘦，还要胖一些，也不生病。特别是把四害一除，疾病大为减少。农民劳动起来是有纪律的，军事化，干劲甚大。公共食堂一来，节省时间，免得往返。节省粮食，节省柴火，节省经费，此外还节省大批时间。这是徐水县的经验。科学技术界也有很大的进步，“将军”将得厉害，就是学生将老师，讲师、助教将教授，研究员将所长。有那么一个科学研究所，叫作药物研究所，设在上海，所长赵承嘏有门本领，就是可以在中国的一种植物里头提炼出一种药来，可以治高血压。但是他老先生就是对什么人也不讲，他也不作。他那个所里头的青年人就没有办法，他们呕了气，就自己干，结果苦战多少昼夜，搞出来了，能够提炼出那个药来了。这样的事情不只一个所，有相当几个所。

大学教授相当有一些人落后于学生，编讲义，编教学大纲，编学生不赢，学生是苦战几昼夜，集体来搞。听说师范大学有个文学班，要编一个文学史，一个班有二十六个人，苦战四昼夜，读了二百九十部中外文学名著，编出一本文学史大纲。这是形势迫人，就是压迫。青年人不压迫老年人，老年人不会进步的。这一压，老年人就有出路了，他不进步不行了。当然，不是青年人个个都是好的，也有坏的，青年人里头，吊儿郎当的，阿飞，偷东西的，那种人也有，但是一般说来，总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要承认这一条。

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一根索子绞住了。

我现在提出若干观点，提出一些看法供给各位，并不要把它作为一个什么决定，作为一个法律。作为一个法律就死了，作为一个看法就是活的。拿这些观点去观察观察国际形势。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这也是个观点，也是个看法。请各位拿了这个观点去看一看，观察观察，以后一年、二年、三年、四年，就这样观察下去，究竟还是西方怕东方多一点，还是我

们东方的人怕西方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1]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为什么他们怕得多一点呢？就是一个力量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即使这些洲里头有许多统治者还是亲西方的，比如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日本、土耳其、伊朗，可是人民中间亲东方的不少，可能是相当多。就是垄断资本家以及中了他们的毒最深的人是主张战争的。除了垄断资本家，其他的人，大多数（不是全体）是不愿意战争的。比如北欧几个国家，当权的也是资产阶级，他们是不愿意战争的。力量对比是如此。因为真理是抓在大多数人手里，而不抓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我们依靠人民，他们是维持那些反动统治者。现在杜勒斯就干这一套，他就专扶什么“蒋委员长”、李承晚、吴庭艳[2]这类人。我看是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李承晚，当时是南朝鲜政府总统。吴庭艳，当时是南越政府总统。

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它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它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它们就啃那些比较可啃的地方，搞什么印尼、印度、缅甸、锡兰，想搞垮纳赛尔[1]，想搞垮伊拉克，想征服阿尔及利亚等等。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进步。尼克松是个副总统，在八个国家不受欢迎，被吐口水，打石头。美国的政治代表在那些人面前被用口水去对付，这就是藐视“尊严”，没有“礼貌”了，在他们心目中间不算数了。你是我们的对头，因此拿口水，石头去对付你。所以，不要把这三个军事团体看得那么严重，要有分析。它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它并不巩固。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我们每天都是要求缓和紧张局势，紧张局势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那么，凡是紧张局势就对我们有害，是不是？我看也不尽然。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呢？因为紧张局势除过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怕打原子战争，就要想一想。你看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这就是因为人们怕战争，怕美国到处闯祸。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除了一个李承晚之外，现在还没有第二个国家支持美国。可能还加一个菲律宾，叫作“有条件的支持”。比如伊拉克革命，还不是紧张局势造成的？紧张局势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帝国主义自己造成的，但是归根结底对于帝国主义更不利。这个观点列宁说过的，他是讲战争，他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它紧张起来。现在当然没有战争，但是这种

---

[1] 纳赛尔，当时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在武装对立的情况下的紧张局势也是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且使落后阶层想一想。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美英侵略军必须撤退。但是帝国主义现在想赖在那里不走，这对人民是不利的，可是同时它也有教育人民的作用。你要反对侵略者，如果没有个对象，没有个靶子，没有个对立面，这就不好反。他自己现在跑上来当作对立面，并且赖着不走，就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所以他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就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你为什么不走?

第五条，戴高乐[1]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这个毒必须得放，等于我们右派的毒，你得让他放。你不让他放，他总是有毒的，放出来毒就消了。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这个东西究竟对于我们的利

---

[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理，1958年12月当选法国总统。

害怎么样？资本主义国家跟我们多作生意好，还是少作生意好？现在生意是作，是少作。我看，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不感觉禁运有什么不利。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历来感谢何应钦[1]。一九三七年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每月有四十万法币，自从他发了法币，我们就依赖这个法币。到一九四〇年反共高潮就断了，不来了。从此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想什么办法呢？我们就下了个命令，说法币没有了，你们以团为单位自己打主意。从此，各根据地搞生产运动，产生的价值不是四十万元，不是四百万元，甚至于不是四千万元，各根据地合起来，可能一亿两亿。从此就靠我们自己动手。现在的何应钦是谁呢？就是杜勒斯，改了个名字。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等于禁运一样，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现在还有四十几个国家不承认我们，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比如法国，想承认，但是因为美国反对就不敢。其他还有一些中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以及加拿大，都是因为美国而不敢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承认我们的，合起来只有十九个，加上社会主义阵营十一个，有三十个，再加上南斯拉夫有三十一个。我看就是这么一点过日子吧。我们搞三亿吨钢，最好搞七亿吨钢，三万五千亿斤粮食。这要多少年，我看十五年就差不

---

[1] 何应钦，1937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1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50年后担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多。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这是讲总数，不是按人口，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就钢铁来说，要三亿吨。英国五千万人口，有两千二百万吨钢，我们有七亿人口，得要三亿吨钢。刚才讲七亿吨钢，要三亿吨钢翻一番还要多一点，那可能要十五年，也许还要多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你们不信这一条？比如我们打二十二年的仗，二十一年就是不胜利，而在二十二年这一年，就是一九四九年，就全国胜利了，叫突变。粮食也是一样，搞了八年，七搞八搞还只有那么一点。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到四千亿斤。搞八年没有摸到一条路，不会搞。也是因为制度没有改革，个体经济，初级合作化，没有整风反右。钢铁也是一样，几十年只有那么一点。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这还是张之洞[1]遗留下来的。两个东西最要紧：一个粮，一个钢。有了钢，就能作机器。什么机器也可以作：挖煤炭的机器，开矿山的机器，发电的机器，炼石油的机器，火车、轮船、飞机等交通机器，化学工业的机器，起房子的机器，农业机器，都要钢。所以一为粮，二为钢，加上机器，叫三大元帅。三大元帅升帐，就有胜利的希望。还有两个先行官，一个是铁路，一个是电力。扯远了，还是回到不承认的问题上来。不承认我们，我看是不坏，比较好，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那个时候也可以不承认，他不承认有什么

---

[1] 张之洞，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以主张办工厂、修铁路著名。曾任清政府湖广总督、军机大臣。

要紧？

最后一条，就是准备反侵略的战争。头一条讲了双方怕打，仗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搞一个保险系数。因为世界上有个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准备作战。这一条要在干部里头讲通。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苏联也是，要打就是他们先打，逼着我们不能不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我们现在只有手榴弹跟山药弹。氢弹、原子弹的战争当然是可怕的，是要死人的，因此我们反对打。但是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么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在整个宇宙史上来说，我就不相信要那么悲观。我跟尼赫鲁[1]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没有政府了，统统打光了，想要讲和也找不到政府了。我说，哪有那个事，你这个政府被原子弹消灭了，老百姓又起一个政府，又可以议和。世界上的事情你不想到那个极点，你就睡不着觉。无非是打死人，无非是一个怕打。但是他一定要打，是他先打，他打原子弹，这个时候，怕，他也打，不怕，他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因此，我们现在搞民兵。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由各省造轻武器，造步枪，机关枪，手榴弹，小迫击炮，轻迫击炮。人民公社有军事部，到处练习。在座的有文化人，你们也要号召一下，单拿笔杆不行，一手拿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有这么八个观点，当作一种看法，供各位观察国际形势的时候采用。

二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

（1958年9月8日）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们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1]，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法国、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现在不讲别的，单讲两条绞索：一个黎巴嫩，一个台湾。台湾是古老的绞索，他已经占领几年了。他被什么人绞住了呢？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绞住了。六亿人民手里拿着一根索子，这根索子是钢绳，把美国人的脖子套住了。中东是最近套住的。谁人让他套住的呢？是他自己造的索子，自己套住的，然后把绞索的一头丢到中国大陆上，让我们抓到。黎巴嫩也是他自己造的一条绞索，自己套上去，绞索的一端就丢到阿拉伯民族手里。不但如此，而且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手里，大家都骂他，不同情他，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府手里拿着这个绞索。比如中东，联合国开了会。但主要是在阿拉

---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伯人民手里套住了，不得脱身。他现在进退两难，早退好，还是迟退好？早退，那么所为何来呢？迟退，越套越紧，可能成为死结，那怎么得了呀？至于台湾，他是订了条约的，比黎巴嫩还不同。黎巴嫩还比较活，没有什么条约，说是一个请，一个就来了，于是乎套上了。至于台湾，就订了个条约，这是个死结。这里不分民主党、共和党，订条约是艾森豪威尔，派第七舰队是杜鲁门[1]。杜鲁门那个时候可去可来，没有订条约，艾森豪威尔订了个条约。这也是国民党一恐慌，一要求，美国人一愿意，就套上了。

金门、马祖套上了没有？金门、马祖据我看也套上了。为什么呢？他不是讲现在还没有定，要共产党打上去，看情形，那个时候再决定吗？问题是十一万国民党军队（金门九万五，马祖一万五），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对约旦的侯赛因[2]和黎巴嫩的夏蒙[3]那样好？他不能见死不救。昨天第七舰队的总司令比克利亲自指挥，还有那个斯摩特[4]，不是放大炮吗？引得国务院也不高兴国防部也不高兴的那位先生，他也在那里跟比克利一道指挥。

总而言之，你是被套住了。要解脱也可以，你得采取主动，慢慢脱身。不是有脱身政策吗？在朝鲜有脱身政策，现在我看形成了金马的脱身政策。他们那一班子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脱身者，是从绞索里面脱出去。怎么脱法呢？就是这十一万人走路。台湾是我们的，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步的，是内政问题。跟

---

[1] 杜鲁门，美国前总统。

[2] 侯赛因，当时任约旦国王。

[3] 夏蒙，黎巴嫩前总统。

[4] 斯摩特，当时任驻台湾美军司令。

你的交涉是国际问题，这是两件事。你美国跟蒋介石搞在一起，这个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电解铝、电解铜，用电一解，不就分离了吗？蒋介石这一边是内政问题，你那一边是外交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以，我总是觉得，它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是不敢来的。除了我们这个阵营以外，它都想霸占。一个拉丁美洲，一个欧洲，一个非洲，一个亚洲，还有个澳洲，澳洲也在军事条约上跟它连起来了，听它的命令。它用“反共”的旗帜取得这些地方好些，还是真正反共好些？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他们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到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

今年要争取产钢一千一百万吨，比去年翻一番。明年增加两千万，争取三千万吨。后年再搞两千万，不是五千万吗？苦战三年，五千万吨钢。那么，全世界除了苏联同美国，我们就是第三位。苏联去年就五千万，加三年，他可以搞六千万。我们苦战三年，有可

能超过五千万，接近苏联，再加两年，到六二年，可能出八千万到一亿，接近美国（美国因为它经济恐慌，那个时候也许只有一亿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接近或赶上美国。再加两年，七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老子天下第一不好，钢铁天下第一有什么不好？粮食，苦战三年，今年可能是七千到八千亿斤，明年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后年就要放低步调了。因为粮食还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经过酒精搞橡胶，搞纤维，搞塑料，等等。

至于紧张局势，也许还可以讲几句，你搞紧张局势，你以为对你有利呀？不一定，紧张局势调动世界人心，都骂美国人。中东紧张局势大家骂美国人，台湾紧张局势又是大家骂美国人，骂我们的比较少。美国人骂我们，蒋介石骂我们，李承晚骂我们，也许还有一点人骂我们，主要就是这三个。英国是动摇派，军事不参加，政治上听说他相当同情。因为他有个约旦问题，你不同情一下，美国人如果在黎巴嫩撤退，英国在约旦怎么办呀？尼赫鲁发表了声明，基本上跟我们一致的，赞成台湾这些东西归我们，不过希望和平解决。

这回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他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

我想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利在什么地方呢？中东紧张局势对于美国有什么利？对于英国有什么利？还是对于阿拉伯国家有利些，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其他各洲爱好和平的人民有利些。台湾的

紧张局势究竟对谁有利些呢？比如对于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现在全体动员，如果说中东事件有三四千万人游行示威，开会，这一次大概搞个三亿人口，使他们得到教育，得到锻炼。这个事情对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也好吧，各党派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样一来，过去心里有些疙瘩的，有些气的，受了批评的，也就消散一点吧。就慢慢这样搞下去，七搞八搞，我们大家还不就是工人阶级了。所以，帝国主义自己制造出来的紧张局势，结果反而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几亿人口有利，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各阶级，各阶层，政府，我看都有利。他们得想一想，美国总是不好，张牙舞爪。十三个航空母舰就来了六个，其中有大到那么大的，有什么六万五千吨的，说是要凑一百二十个船，第一个最强的舰队。你再强一点也好，你把你那四个舰队统统集中到这个地方我都欢迎。你那个东西横直没有用的，统统集中来，你也上来不得。船的特点，就在水里头，不能上岸。你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摆一摆，你越打，越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无理。

三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

（1958年9月8日）

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

合。现在苏联对这个问题也想改革，他们正在搞一个文件在那里酝酿。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讲了的，教育必须与劳动相结合。我在天津看了两个大学，有几个大工厂，那些学生们在那里作工。老读书，实在不是一种办法。书是什么东西呢？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1]

在财政方面，我找了一个材料：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全部财政收入是一千七百亿，今年起，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大概可以收四千亿。你看，八年一千七百亿，五年可以搞四千亿。这个事情很可以注意。那八年的头一年，一九五〇十五亿，可怜得很。

---

[1] 据新华社1958年8月15日报道，毛泽东1958年8月13日视察天津大学时，谈了他对教育工作的意见。报道说，毛泽东对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说：学校是工厂，工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毛泽东又说：要讲实际，科学是反映实际，是讲实际的道理。不知道实际，老讲书本上的道理怎么成？刘子厚（河北省省长）向毛泽东汇报说，有些人有顾虑，怕搞勤工俭学影响了教育质量，实际上搞了勤工俭学，学习才好。毛泽东笑着说，河南省的长葛县已经有了证明，那里的学校有的搞了勤工俭学，学生学习成绩好，升学的很多；有的没有搞勤工俭学，学生学的不好，升学的少。毛泽东还指示，不仅学生要搞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机关干部也要办点附属工厂，不然光讲空的，脱离实际。1958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在题为《天津大学决定苦战50天作出更大成绩》的报道中，也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报道说：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视察的时候，指示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毛泽东还指示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第二年，一九五一年，一百三十三亿，增加了。第三年，一九五二年，一百四十八亿。这两年都是一百亿以上。到五三年，就是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跃到二百二十二亿，五四年二百六十五亿，五五年二百七十二亿，五六年二百八十七亿。总而言之，这四年相当停滞，有所发展，都没有突破二百以上到三百。到三百是去年，去年是三百一十亿。你看，以前搞了四年，都是二百几，去年一年就是三百一。今年，可以搞到四百三十亿。你看，由三百一，一跃进就到了四百。明年应该是五百几或者六百几十亿吧？也不要五百几，也不要六百几，一下就搞到七百几十亿。我这说的是第三本账，七百二十三亿有可能。去年三百一只有一年，今年四百三也只有一年，五百没有，六百没有，明年一跳可以跳到七百二十三亿。是不是能够搞到，还要看，这是一种预计，或者还会更多一点。后年就会更多。五年四千亿，平均每年八百亿。这个数目值得注意。还有一个数目也是值得注意的：基本建设投资，五〇年可怜得很，只有十一亿，五一年二十三亿，五二年四十四亿，五三年八十亿，五四年九十一亿，五五年九十三亿，可怜。五六年不是搞“冒进”吗？由九十三亿一跃跃到一百四十八亿。说是搞“冒进”了，不是犯了错误吗？五七年就减少了一点，由五六年的一百四十八亿减少到一百三十八亿，减少了十亿，所以成为“马鞍形”。今年是二百六十八亿。明年总应该搞三百多亿或者四百多亿吧？都不是，一下就可以搞五百多亿。前面这八年，五〇，五一，五二那三年合起来是八十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只有四百九十二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二百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五百五十六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而那五年的五百亿办的那么多工厂就浪费差不多一半，本来可以办两个，只办一个，时间本来只要一

年的，要两年，那么，明年这五百亿就可以当作一千亿来用。因为现在有了经验了，双反，破除迷信，打破了一些规章制度。这是两笔大帐。此外，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这几个月出来的新事件。

还有一点是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去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忙那些事情忙得要死。但是地方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抓了农业。认真抓农业，搞试验田，是从去年冬季起。这一抓，就抓起来了。现在我们要转过方向。人有两只手，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我讲了个抓紧。什么叫抓，什么叫紧？抓而不紧，没有抓起来，等于不抓，你拿烟也拿不到，拿饼干也拿不到，拿洋火也拿不到。抓工业要抓紧。主要是抓一个钢铁同一个机械。有了这两门，万事大吉。钢铁是原材料，机械就是各种设备，包括挖煤炭和挖铁矿的矿山机械，开油矿的钻探机械，电力机械，建筑机械，化工机械，交通运输机械（无非是汽车、火车、轮船、飞机，我们坐飞机就是坐机器），还有农业机械，如拖拉机，耕种机械，收割机械，加工机械，农村用的运输机械，农村电气化用的电力机械。苦战三年，农村机械还不会那么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可能基本上用机械武装起来。所以，一是抓钢铁，二是抓机械。没有钢铁，机械就没有材料，就不能造机械。机械里头有个工作母机，什么矿山，什么炼油，什么电力，什么化学，什么建筑，

什么农业，什么交通运输，这些机器都要有个工作母机，无非是车、铣、磨、刨、钻之类，这些东西是根本的。今年不是二万多台，一发展就是五万多台，现在又搞到八万多台。这就是指工作母机。明年不是搞二十几万台吗？实际上明年争取三十万台，如果明年能搞三十万台，后年再搞五十万台，我们这个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搞一百多万台机器。我们解放的时候，四九年只有八万台工作母机，还是破破烂烂都在内。今年年底有二十六万台。从张之洞起，到今年搞二十六万台工作母机。而这个二十六万台里蒋介石交给我们的遗产是八万台。二十六万减八万台，我们这九年搞了十八万台。但是同志们，明年这一年就不是八万台了，也不是二十六万台了，而是三十万台，一年三十万台！我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搞就不搞，要搞就多搞一点。明年就可以搞三十万台，后年搞五十万台。苦战三年，明年三十万，后年五十万，八十八万台，连前头的二十六万台，是一百多万台。那个时候，我们跟美国人谈判就神气一点了。

对全国办人民公社情况汇报[1]的批语

（1958年9月6日）

小平[2]同志：

此件可以印在京各中央委员。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向毛泽东报送的关于各地办人民公社情况的全国电话汇报会议的材料。材料说："九月四日晚，中央书记处召开了全国各省、区、市委（缺西藏）电话会议，听取各地汇报办人民公社的情况。据汇报，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已经到来。河南已经全省实现公社化，河北、北京市郊区九月十日前可实现公社化，山西、山东、上海市郊区九月半可实现公社化，其他大部分省正在总结试点经验，逐步展开，估计九月底前均可实现公社化。只有内蒙、福建、新疆三个地方，九月搞试点，秋后铺开，计划到今冬全部搞完。至会前统计，全国农村已建立九千零三十四个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少数是数乡一社，除河南修武县外，山西、陕西、青海也有个别县实行一县一社。最大的社已达六万四千户（山西高平县），最小的不到一百户（黑龙江一个公社，但方圆有八九十里）。各地建立人民公社一般分作两步走：秋前先搭架子，换牌子，上动下不动，实行统一调配劳动力，统一安排生产；秋后再处理具体政策和解决经营管理等问题。这次运

动的发展非常迅速，而且很健康。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现在各地农村到处是锣鼓喧天，纷纷写决心书、申请书、大字报，要求办公社。已办公社的地方，又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只有少数地方由于思想发动不够好，群众有顾虑，发生了杀鸡、杀猪、卖牲口、砍树、藏粮等不正常现象。对此，各地均已引起注意，并在纠正中。材料还提出了几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一、城市是否也办公社？二、国营企业是否办公社？三、农村建立公社后，国营财贸机构怎么办？四、是否办县联社？五、牧区是否建立公社？六、喇嘛是否允许参加公社？七、是否实行供给制？八、如何保证运动正常发展？”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大办人民公社高潮在全国兴起。图为湖南宁乡县鹤岗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整台湾是整家法[1]

（1958年9月6日）

研究一下，看有什么缺点，可不可以照这样发表[2]？苏联还要表示的。它看到我们还没有表示，我们社论都没有写，政府负责人没有讲话。从今天下午起，这个东西广播了，群众运动就要起来的。各民主党派你们考虑一下。明天下午北京可能有一个群众大会，各地方也会有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明天下午你们登天安门，好不好？今天准备一下，明天上午还可以准备。有稿子的宣读一下稿子，没有稿子的讲一讲也可以。

至少美国是被动的。它仓促调兵，有一艘航空母舰是从菲律宾

---

[1] 这是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指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8年9月6日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略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调来的，还没有到，有些是从夏威夷调来的，有些是从日本调来的。它真诚地希望我们不去登金门。它那个东西是个索子，被套住了，使它难办。台湾是一根大索子把它套住，金门、马祖也是一根索子。我们这个蒋委员长[1]，他搞三分之一兵力，两个岛有十一万人，其中有九万五千人在金门岛，有一万五千人在马祖岛。而金门岛三面在我们炮火包围中。金门距大陆只有三公里。金门岛把厦门变成一个死港，马祖岛就把我们福州的闽江海口塞住了。这个东西得整它一下。我们整金门，是整家法，这是我们国内的事。当然，整台湾也是整家法，不过那个地方有你美国的兵，那我还是暂时不去。你美国过去谈判又那么冷淡，中断了好几个月，现在你想谈，那好，可以谈。我们不打，它就不想谈，要把这个绞索捏紧一下，它感觉到痛了，它说，好好好，我们来谈吧。你不捏紧，它就不谈。

美国说他们已经决定了，要从金门、马祖撤退，但是蒋介石又不撤。你不撤我就打，你一撤那我就可以不打，你全部撤走我可以一炮不打。这对蒋介石也是一个难事，他怕一撤，影响人心士气，又丧失了这两块土地，他的土地也就不大了。听说美国人也劝过他撤，不晓得是真的是假的。你现在不撤，我们反正老是打，可以隔几个星期或者隔几天打那么一次，或者隔个把两个月打一次，一打就是几万发炮弹，或者每天打点零炮，打个什么一百发、两百发炮弹。

美国要拿金门、马祖交换台湾，我们是原则上不能交换台湾。你把金门、马祖交我们，台湾就成为独立国，这个东西总不可以吧！在座诸公，可不可以？原则上总不行吧。至于解放，哪一年解

---

[1] 蒋委员长，指蒋介石。

放，我们又没有定期，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都没有作决议，一定要在哪一年哪一月解放。但是，原则上台湾一定要解放。这个东西跟李富春[1]同志讲的那个钢铁有关系，你现在只有这么一点钢嘛！

这是经过斟酌了的[2]，有些观点是一路来的，几年以来我们就是这样的观点。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了，它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它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下地。它每天紧张，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上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杜勒斯前天那个东西[3]前面很硬，后面就软了，就是雷声大，雨点小。

---

[1] 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 指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3]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8年9月4日发表的声明。

关于研究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稿的批语

（1958年9月7日）

恩来同志：

本日上午约五六人，对赫致艾文件草件[1]认真研究一次。如可

---

[1] 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958年9月7日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稿。信中呼吁美国政府对在中国台湾及台湾海峡地区所采取的行动要慎重从事，不要轻易采取可能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的步骤。并说，远东经常保持极不正常的紧张状态，根源在于美国政府敌视人民中国，敌视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当前紧张、并且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局势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以武力侵占了中国自古就有的领土——台湾岛以及澎湖列岛，并继续占领这些领土，而掩饰这一占领的借口是支持中国人民的叛徒蒋介石。信中强调，中国不是孤立的，它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忠实的朋友在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准备随时援助它，因为中国的安全的利益是同苏联的安全的利益不可分割的。信中还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于美国政府所持有的立场没有参加联合国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极其不正常的，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只有设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信赖它对国家的领导的那个政府才有权、才真正能够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只有一直无视中国实际情况的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不现实的态度才是一块绊脚石，它阻挠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一项唯一正确的决定，即从这个组织中把蒋介石这具冒名顶替的政治僵尸抛出去，并给予伟大中国的代表们以他们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1958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

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1]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90%，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你看如何?

毛泽东

九月七日上午七时

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

[1] 指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

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新闻稿[1]

（1958年9月8日）

在今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讲了话。

毛泽东主席说，目前的形势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民有利。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毛主席指出：总的趋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毛泽东主席又说，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毛主席说，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如果坚持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

---

[1] 这篇新闻稿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

战争政策，势必有一天要被全世界人民处以绞刑。其他美国帮凶也将是这样。

毛泽东主席在谈到国内形势的时候指出：经过了伟大的全民整风运动，全国到处出现了蓬勃兴旺的气象。无论在农业、工业、文化教育以及其他建设事业方面，都形成了大跃进的形势。由于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毛主席说，鉴于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对工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还鉴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方面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基础和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的领导工作的重心需要适时地从农业和农村工作方面转移到工业建设方面来。中央和省一级的领导机关，必须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而从现在开始，要把重点放在工业方面。在工业方面，必须首先抓紧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因为这是实现我国工业化、农业机械化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基础。毛主席又说，农业和农村工作不能放松，明年农业生产还要继续大发展。关于目前正在全国蓬勃展开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毛主席说，必须采取热忱欢迎的态度，积极加强领导。

毛主席对于中美两国在华沙即将开始的大使级代表的谈判[1]寄予希望。他说：如果双方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的话，谈判可能会取得某些成果。现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注视着两国代表将要进行的谈判。

---

[1]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同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阻挠，会议经常遭到破坏和中断，金门炮击开始后，又继续进行。1958年9月，会谈改在华沙举行。迄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共举行了136次。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8年9月8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同志：

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和全体朝鲜人民致最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朝鲜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长期的艰苦斗争的伟大胜利。十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艰苦而光荣的道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美国侵略者就向它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妄图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恢复黑暗的殖民制度。但是，英雄的朝鲜人民是吓不倒的，他们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下，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加下，万众一心，英勇奋战，终于打败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队，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朝鲜人民这一伟大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各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对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事业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朝鲜停战后，朝鲜人民克服了重重困难，很快地医治好了战争创伤，并

且正在以极大干劲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中国人民为朝鲜兄弟的这些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中朝两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共同反对侵略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亲密合作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有着巨大的意义。

祝朝鲜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和平统一朝鲜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9月8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达米扬诺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保加利亚人民在光荣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短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自己的祖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发达的工业和大规模合作化和机械化的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人民一贯忠实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保卫巴尔干和世界和平进行坚持不渝的斗争。中国人民对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获得的这些光辉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全面的互助合作，一年来有了新的发展。毫无疑问，这必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实现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关于台湾局势等问题复胡志明[1]电

（1958年9月10日）

胡主席同志：

九月八日来信[2]收到，谢谢你。

我认为：

（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

（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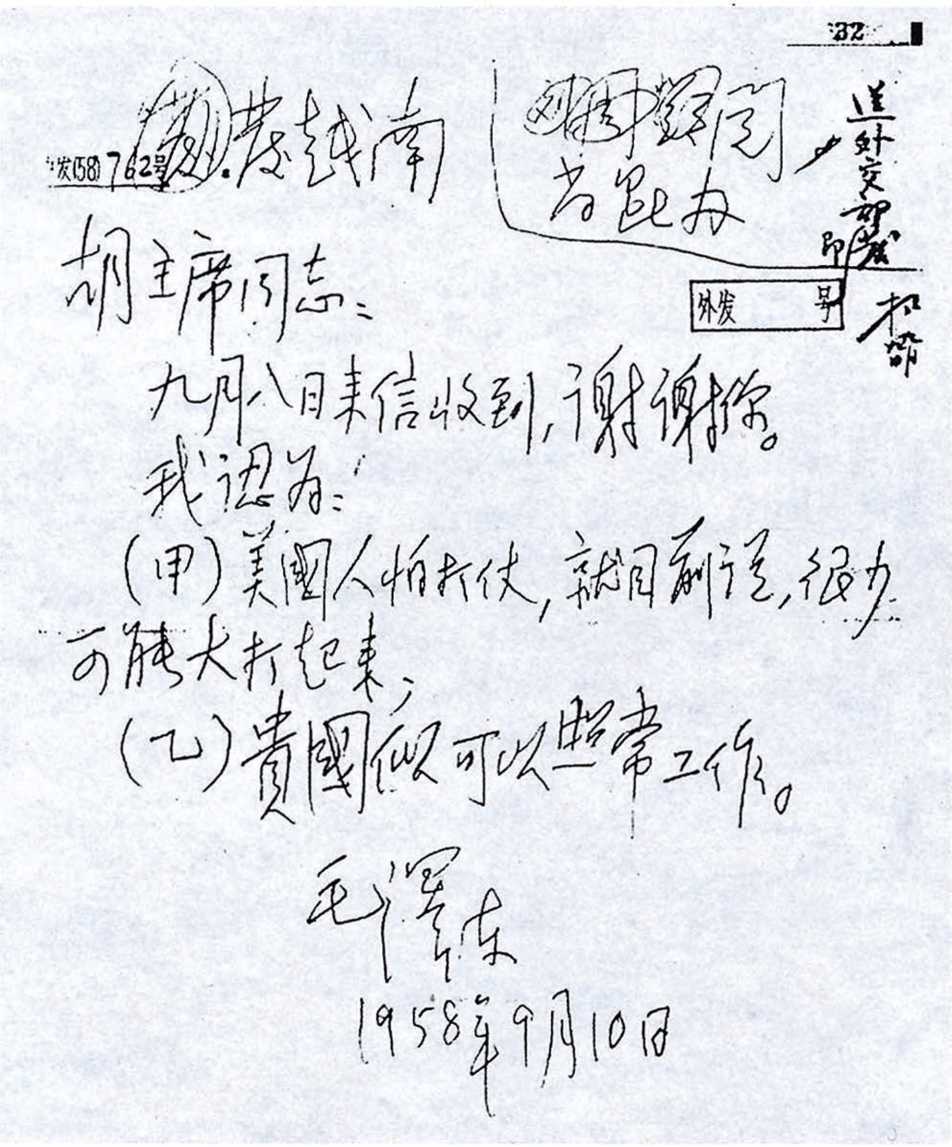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

---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 指胡志明1958年9月8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鉴于台湾情况之紧张，美帝态度之顽固，请您告诉我们：（甲）可能不可能发生美华战争？（乙）我们越南应该有什么准备？



32

外发(58) 762号

发越南

刘朱周邓彭阅
后退办

送外交部发
印
机部

外发　　号

胡主席同志：

九月八日来信收到，谢谢你。

我认为：

（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

（乙）贵国仍可以照常工作。

毛泽东

1958年9月10日

毛泽东复胡志明电的手稿。

给湘乡县东山学校[1]的信

（1958年9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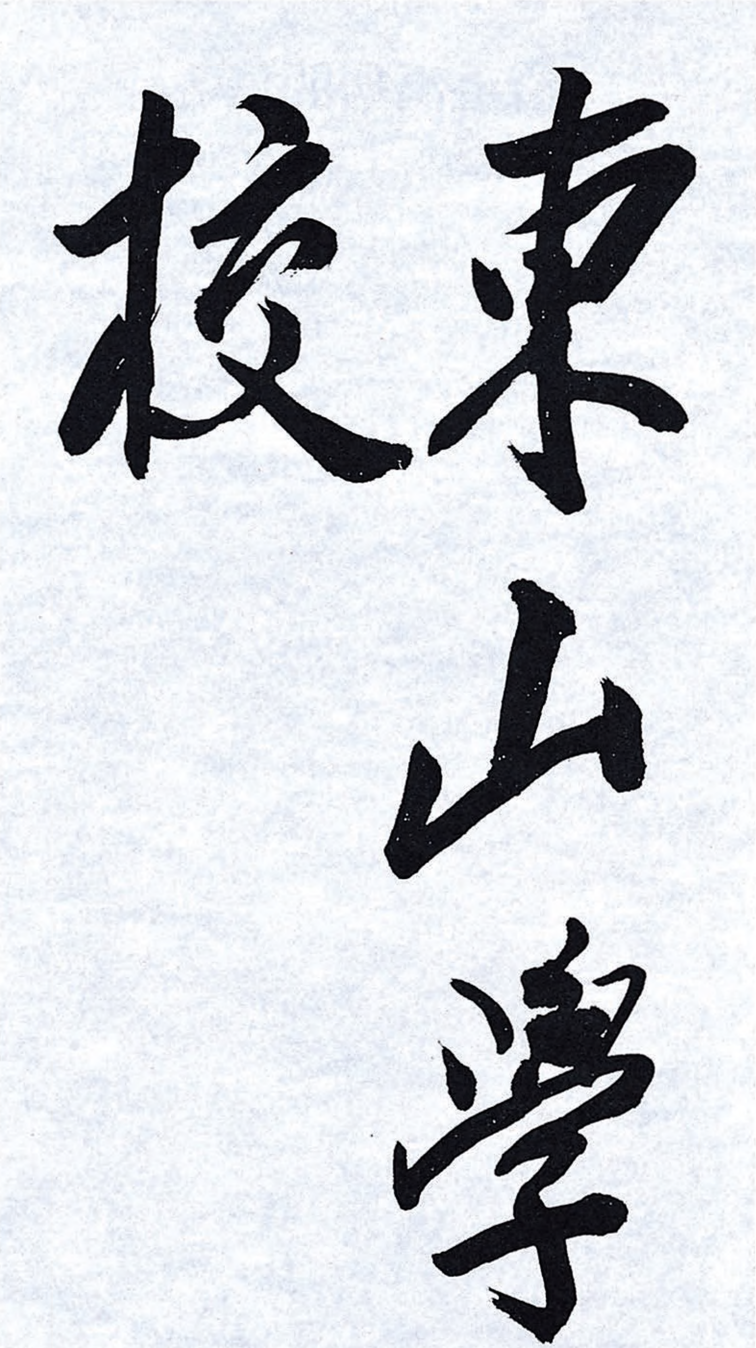
东山学校各同志：

你们的大字报早已收到，甚谢。现遵嘱写了校名二纸，请选用，未知适当否？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

---

[1] 湘乡东山学校始建于1895年，初建时称“东山精舍”，建成后曾多次易名。1958年9月10日，毛泽东为该校题写了“东山学校”的校名，沿用至今。这里历史悠久，英才辈出，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和革命传统。1910年秋至1911年春毛泽东曾在湘乡县东山学校读书。



毛泽东为东山学校题写的校名。

给毛禹居的信[1]

（1958年9月10日）

禹居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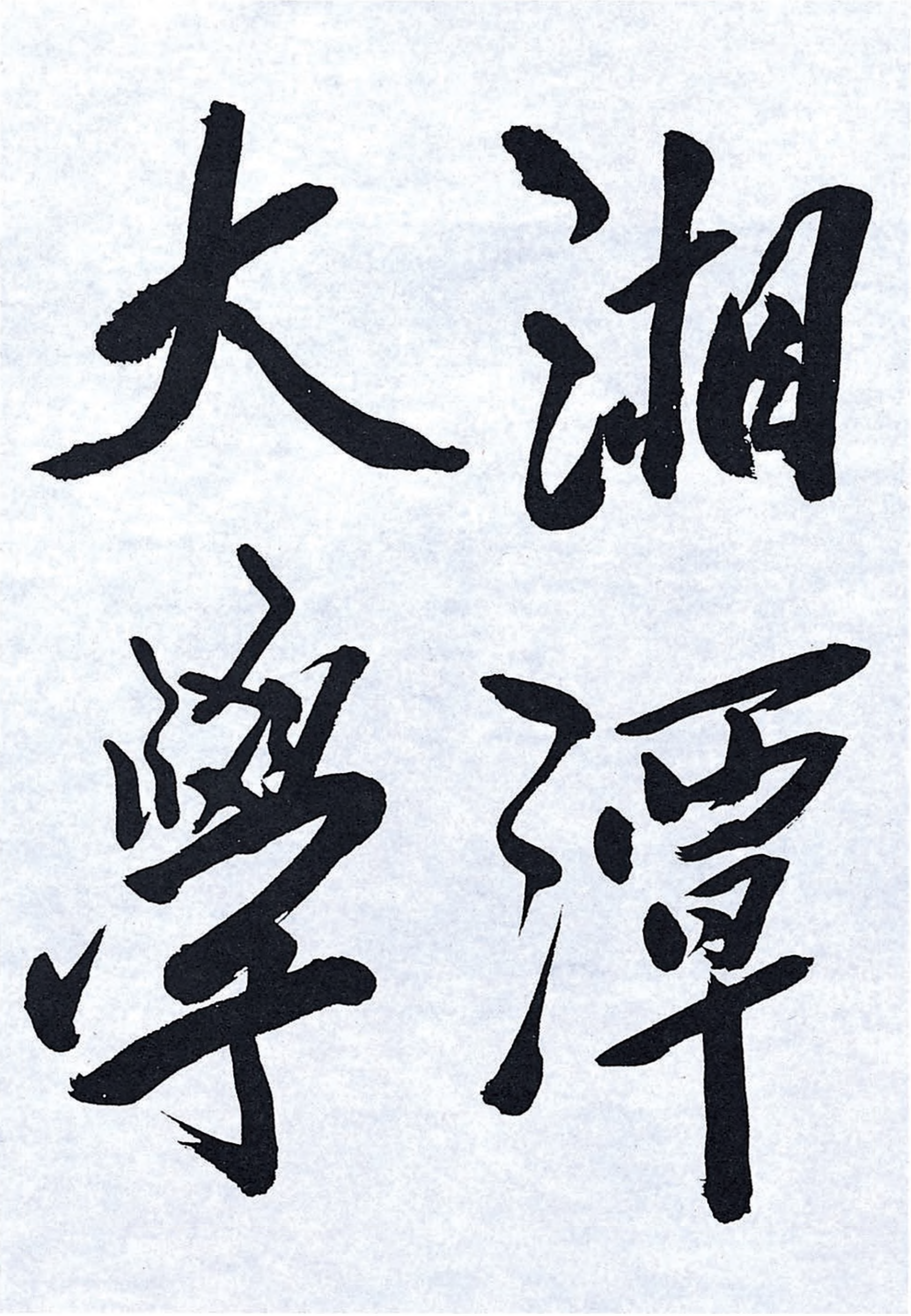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二纸，请转致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缄，亦烦转致。

毛泽东

九月十日

---

[1] 毛禹居，毛泽东的堂兄和读私塾时的老师，当时在毛泽东故居做接待工作。1958年6月，根据毛泽东“想在家乡办一所大学”的愿望，湘潭大学得以创办。同年9月10日，应毛宇居之请，毛泽东亲笔题写校名。



毛泽东为湘潭大学题写的校名。

1958年9月11日，毛泽东视察武汉第一纱厂小高炉。

视察武汉大学的指示[1]

（1958年9月12日）

青年人，就是要有志气。

…………

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教学改革中，应当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地集中群众的智慧。

---

[1] 这是毛泽东在视察武汉大学时讲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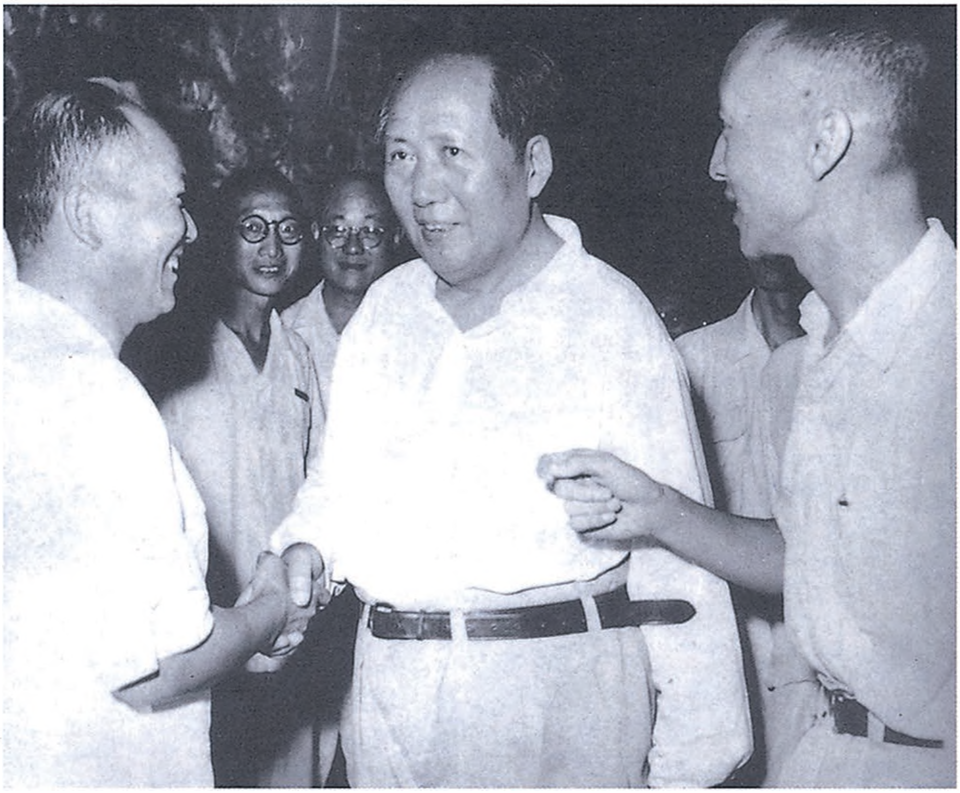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时前往校办工厂视察。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武汉大学电池厂听取教师汇报。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武汉大学炼焦厂听取学生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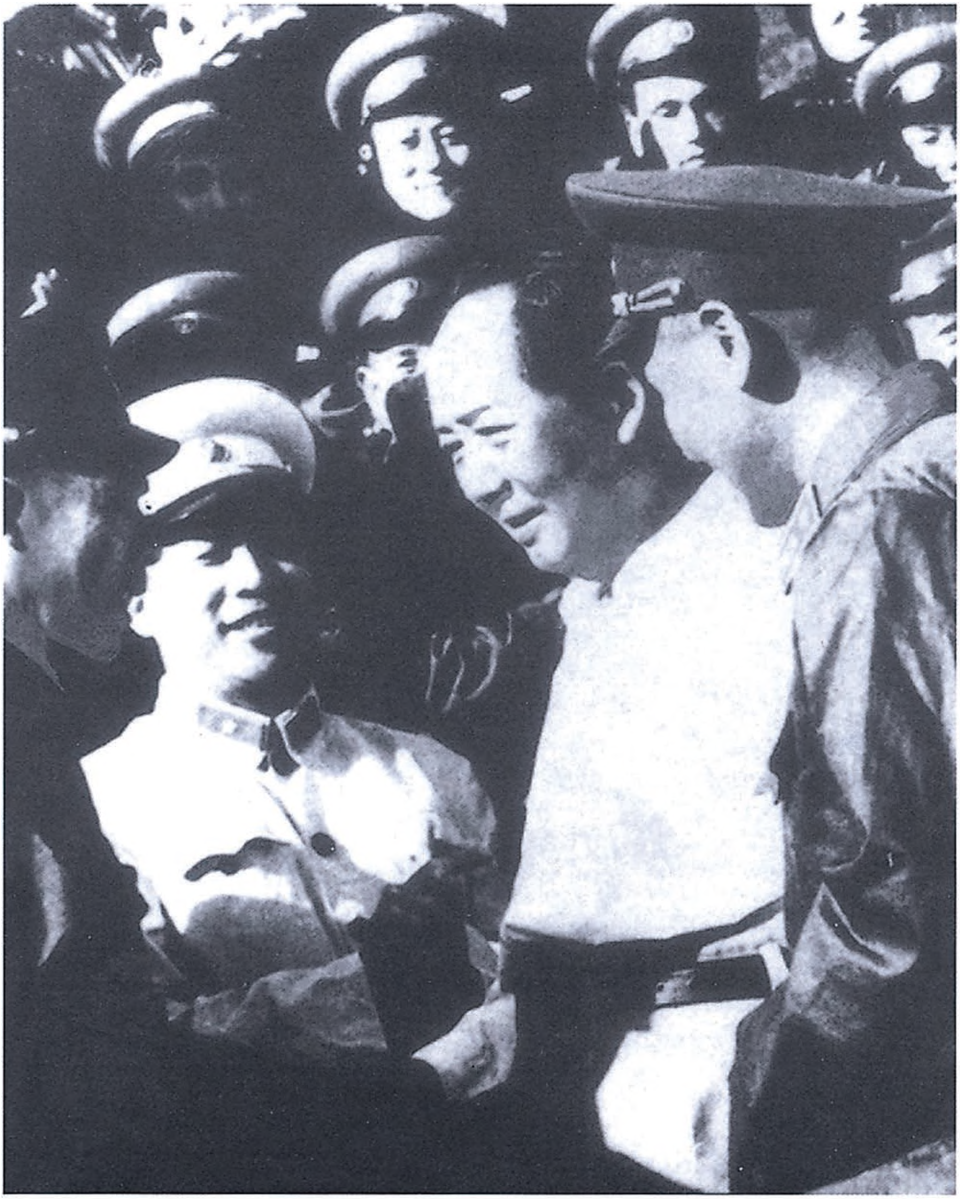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向武汉大学硅胶厂教师和学生了解生产情况。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化工厂。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院长张如屏握手。

1958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武大操场前台接见武汉大学、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学院13000多名师生员工。



1958年9月，毛泽东接见武汉部队高级干部。

1958年9月，毛泽东接见武汉军区党代表大会全体代表。

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的信

（1958年9月13日）

一

周总理、黄克诚[1]同志：

送来连日金门情况二件及我军命令[2]一件，收到。除照你们命令规定路线执行以外，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二十四小时，特别是黑夜，特别是对『对』料罗湾[3]三厘以内，打零炮（每天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似有大利，至少有中利小利。你们

---

[1] 周总理，即周恩来。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副部长。

[2] 指1958年9月11日十一时十五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炮击金门的命令。命令规定：一、若今日美舰继续掩护并停泊在距料罗湾3海里外时，我即炮击进入料罗湾码头卸载的蒋军运输舰和码头上的人员。不靠岸的军舰不论是美舰或蒋舰一律不打。炮击弹药消耗标准，以打沉、打跑蒋军运输舰并适当地打击敌人地面目标为原则。二、我空军高炮部队必须切实准备对付蒋机的轰炸。空军高炮应好好组织协同；若敌机向我轰炸，我歼击机为了便于掌握战机，可以进入金门上空作战，但轰炸机今日仍不出动。三、在上述原则下，炮击时机和具体问题，请你们自行掌握，若有新情况，则应即时报告，以便请示中央作新的决定。

[3] 料罗湾，位于大金门岛南部，是当时国民党军舰艇停泊的码头。

意见如何？大打之日，不打零炮。小打之日，即是打零炮。特别黑夜对料罗湾打，白天精确地较准炮位，黑夜如法炮制，似较有利。请征询前线研究，看可行否？

华沙谈判[1]，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周、彭、张、乔（冠华）[2]诸位意见如何？顺祝旗开得胜！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于武昌

二

如同意，内信请寄叶飞、刘亚楼[3]、厦门前指付讨论。不要勉强同意。是则是，非则非，以实际可行者见告。

---

[1]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同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此后由于美方进行阻挠，会谈经常遭到破坏和中断，金门炮击开始后，又继续进行。1958年9月，会谈改在华沙举行。

[2] 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3]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刘亚楼，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视察武钢时的指示[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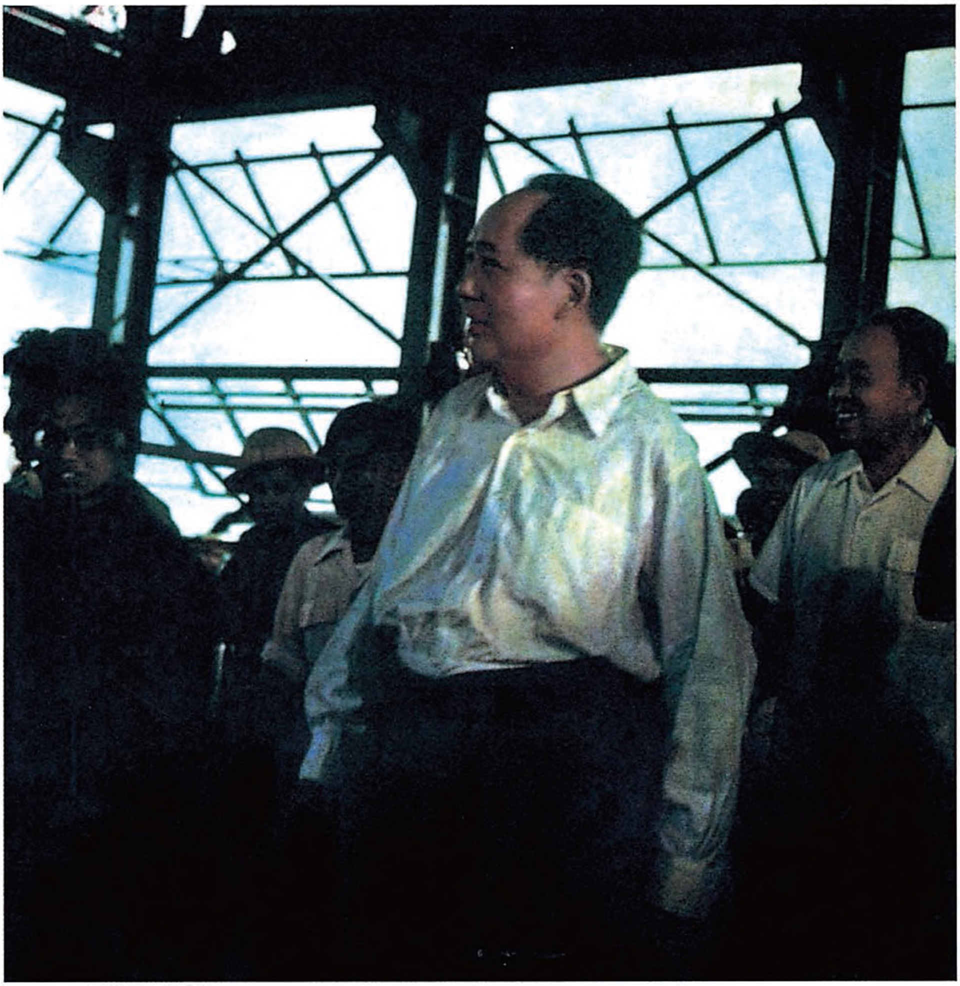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3日）

像武钢这样的大企业，可以逐步地办成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了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

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

---

[1] 这是毛泽东在视察武汉钢铁厂时讲话的一部分。



1958年9月13日，武汉钢铁公司一号高炉建成投产，毛泽东来到这里视察。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钢铁公司视察。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钢铁公司视察。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视察武汉钢铁公司。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钢铁公司视察。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在武汉钢铁公司视察。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视察武钢时询问钢铁厂原料情况。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视察武钢时和炼钢工人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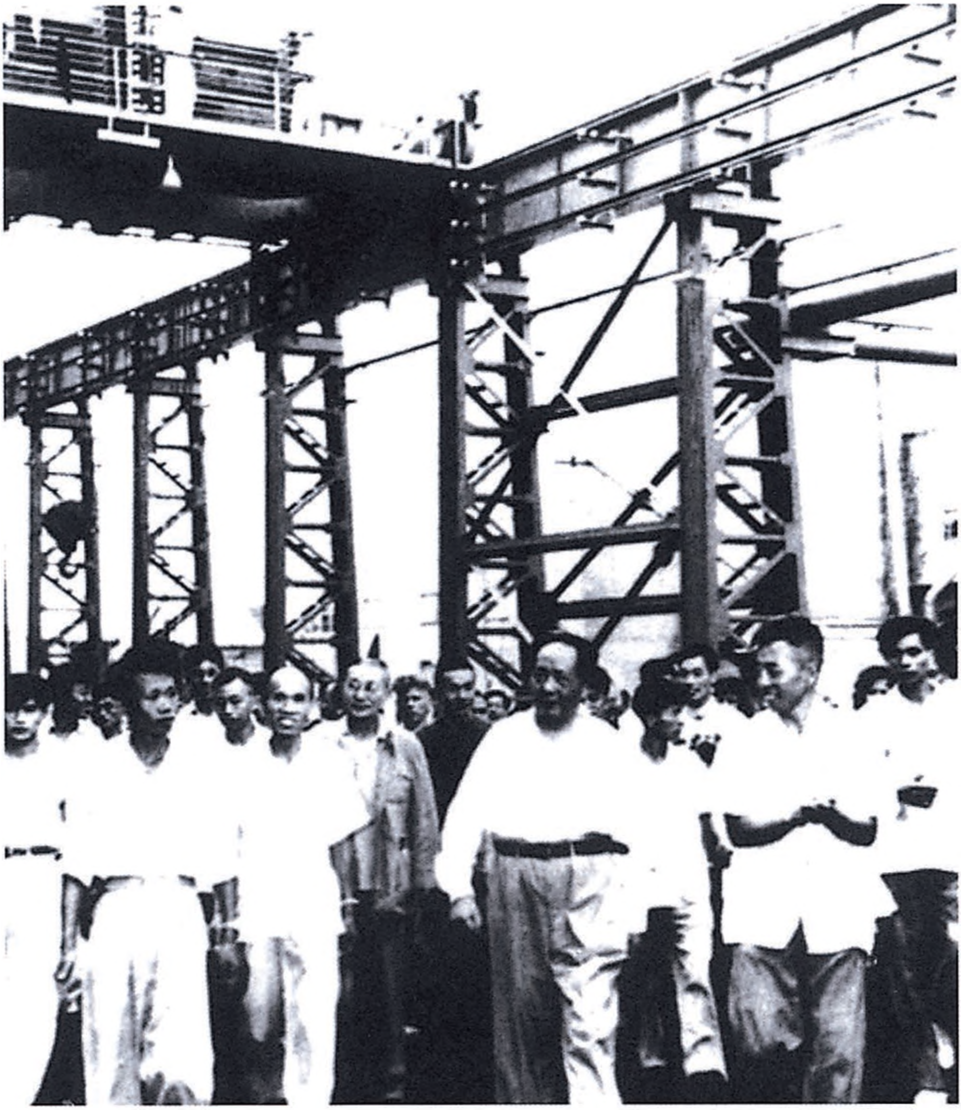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向武钢副总经理韩宁夫（右三）了解生产情况。

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和工程技术人员、苏联专家、劳动模范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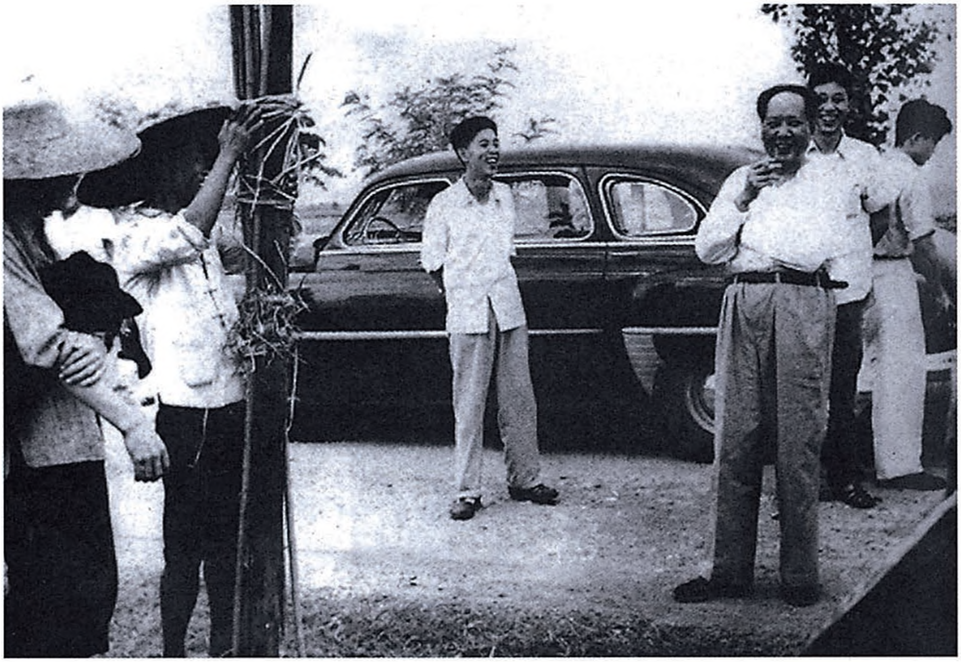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重型机床厂第一机械加工装饰车间参观。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武汉重型机床厂第一机械加工装饰车间外巡视。



1958年9月，毛泽东从武汉乘汽车到黄石，在途中休息时和农民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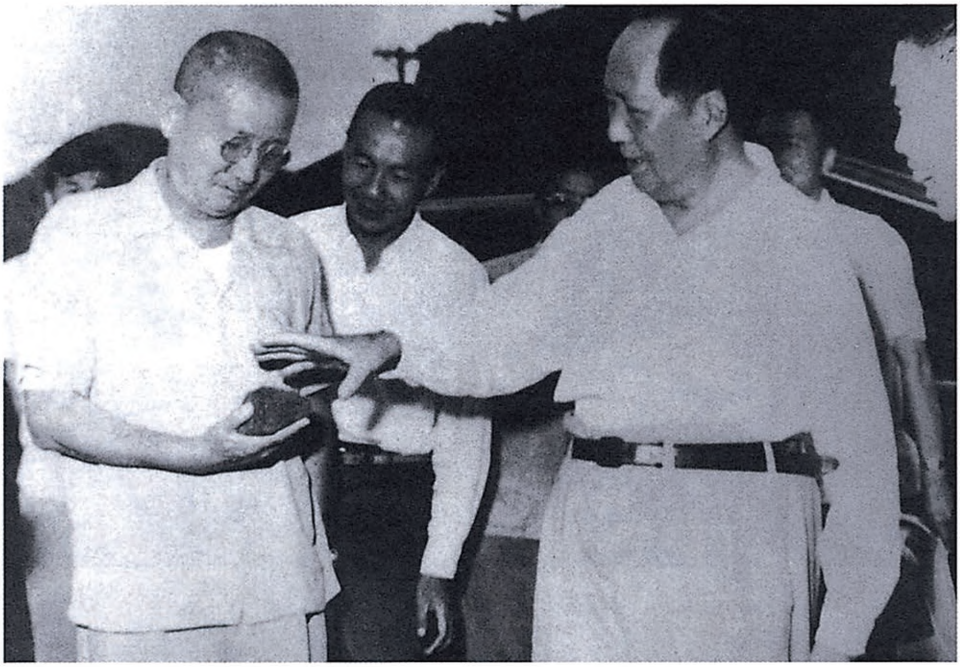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毛泽东在黄石大冶钢厂了解平炉炼钢情况。

1958年9月，毛泽东观看炼钢高炉炉火。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察看一号高炉冶炼情况。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观看一号高炉流出第一炉铁水时向大家祝贺。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炉台上向欢呼的职工挥手致意。



1958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张治中等一起看矿石。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湖北大冶铁矿。

对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动态》的批语[1]

（1958年9月13日）

电话告吴冷西同志：

《动态》第1号收到，看过，觉得很好。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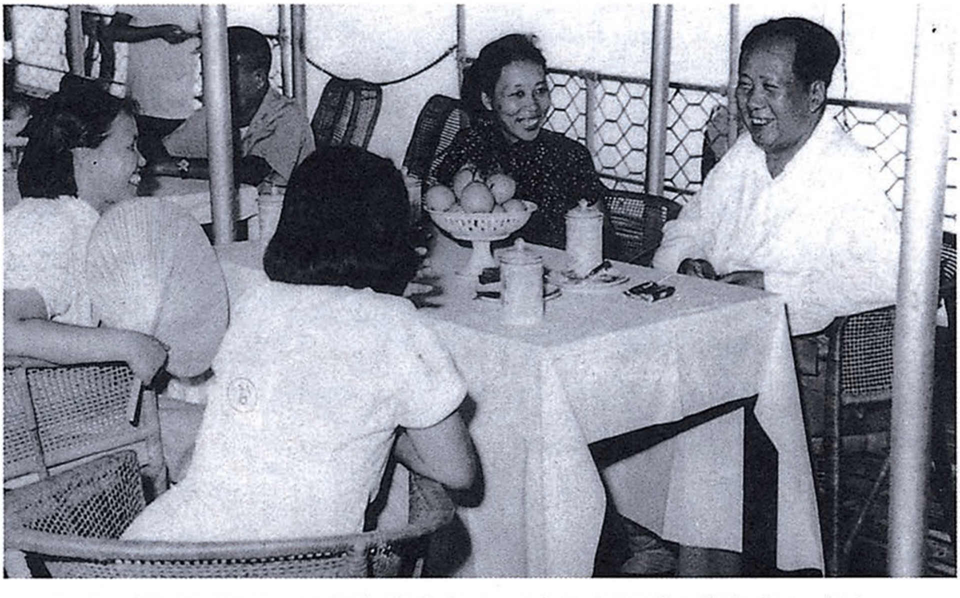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1958年9月1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了便于中央领导同志经常了解这两个单位的工作情况和问题，并及时予以指导，合编了一个刊物，现呈阅。我们希望经常得到主席的批示，以便据以改进我们的工作。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洪山礼堂小会议室接见武汉妇女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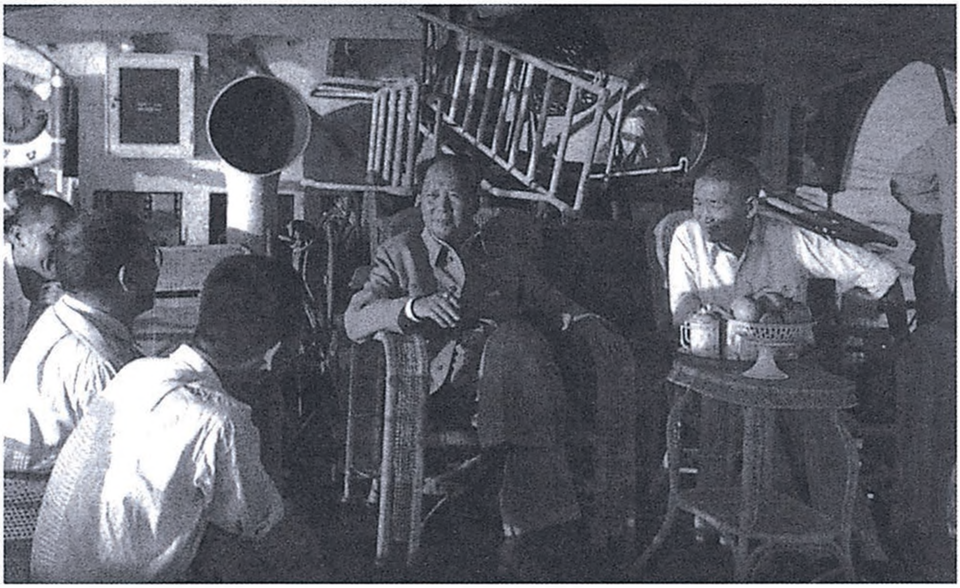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接见武汉妇女代表时和朱玖等谈话。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在洪山礼堂接见邱益英。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和武汉市优秀房管员邹秀珍握手。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在轮船上和武汉市妇联几位负责人谈话。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在长江航轮上和中共湖北、安徽两省的第一书记谈修建三峡大坝问题。

毛主席与江峡航川轮全体船员合影纪念1958.9.1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和江峡轮船员合影。

给王任重[1]的信

（1958 年 9 月 16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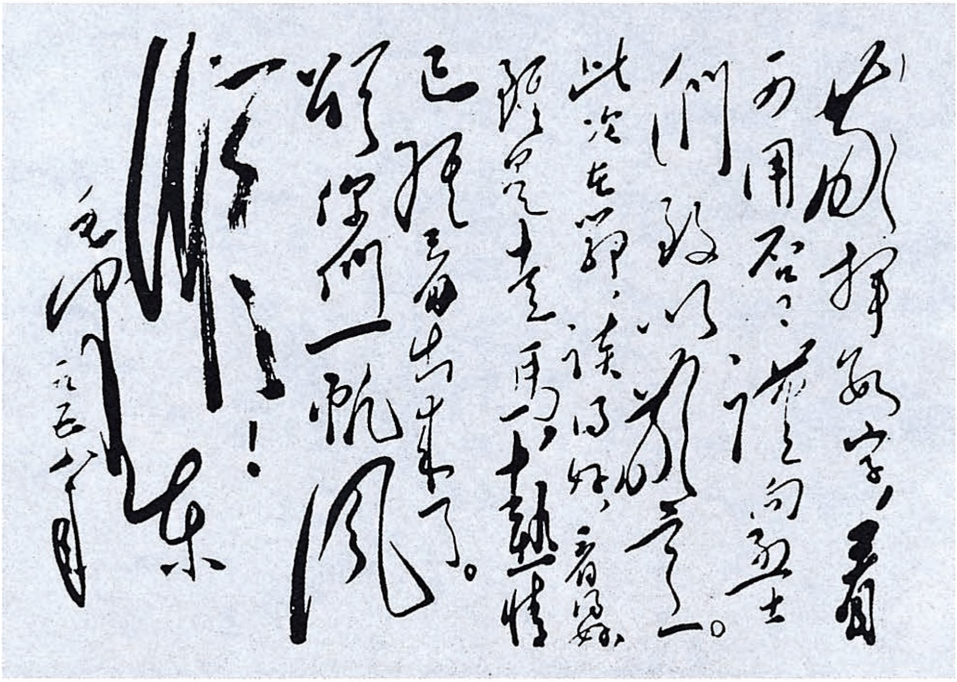
敬挥数字[2]，看可用否？谨向烈士们致以敬意。此次在鄂，谈得好，看得好，虽是走马，热情已经看出来了。颂你们一帆风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

---

[1]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毛泽东为武汉二七烈士纪念碑题名：“二七烈士纪念碑”。



毛泽东致王任重信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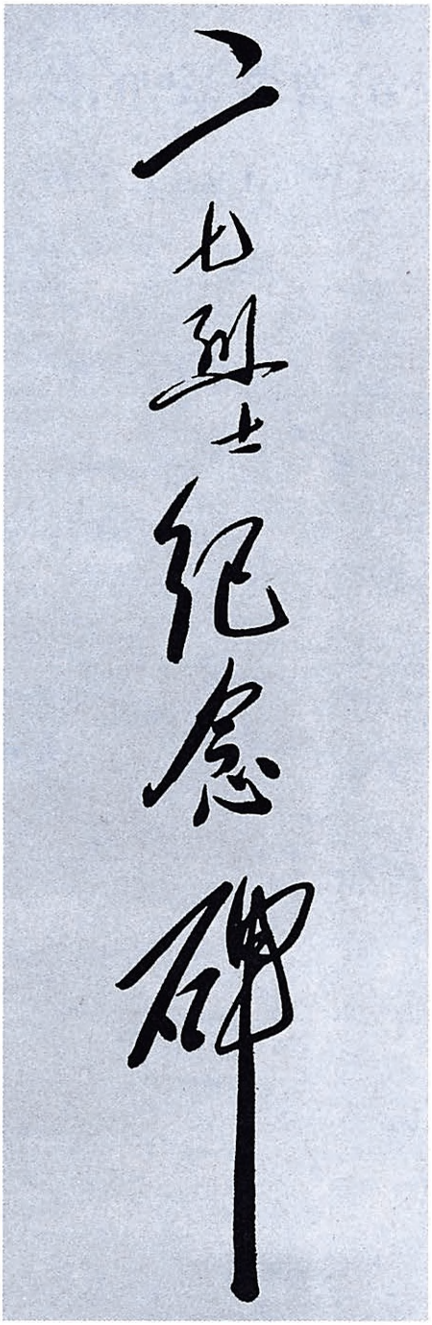
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名[1]

（1958年9月16日）

二七烈士纪念碑

---

[1] 二七纪念碑和纪念馆位于武汉市，创建于1958年，是为了纪念在1923年2月党领导的“二七”大罢工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的林祥谦、施洋等51名烈士修建的。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为湖北二七烈士纪念碑题名：二七烈士纪念碑。



毛泽东为二七烈士纪念碑题写的碑名。

给曾希圣[1]的信

（1958年9月16日）

曾希圣同志：

校名遵嘱写了四张[2]，请选用。沿途一望，生气蓬勃，肯定是有希望的，有大希望的。但不要骄傲，以为如何？合肥不错，为皖之中，是否要搬芜湖呢？从长考虑，似较适宜，以为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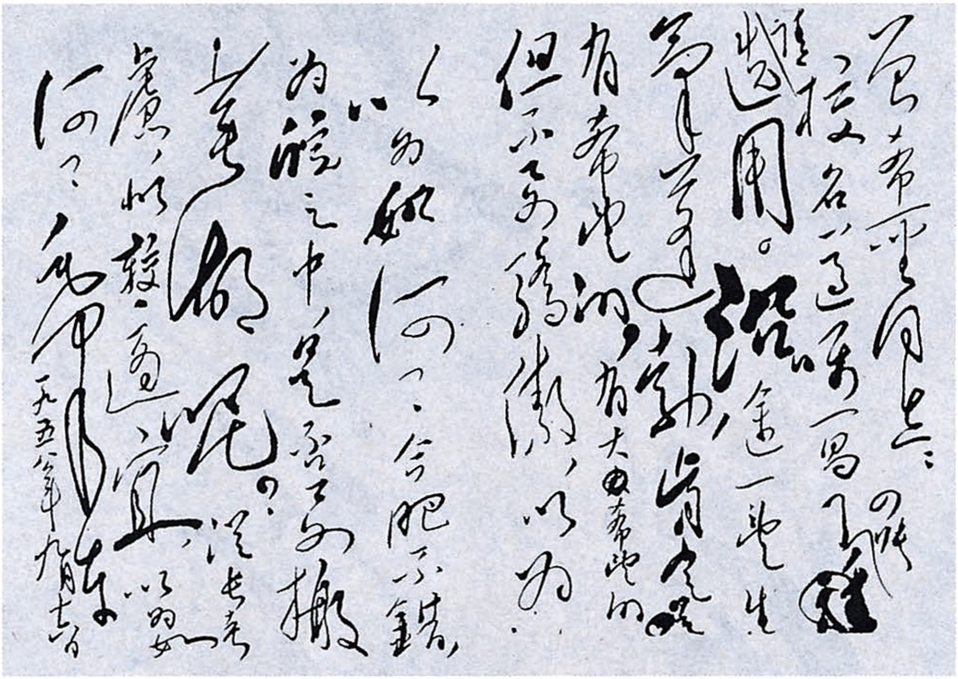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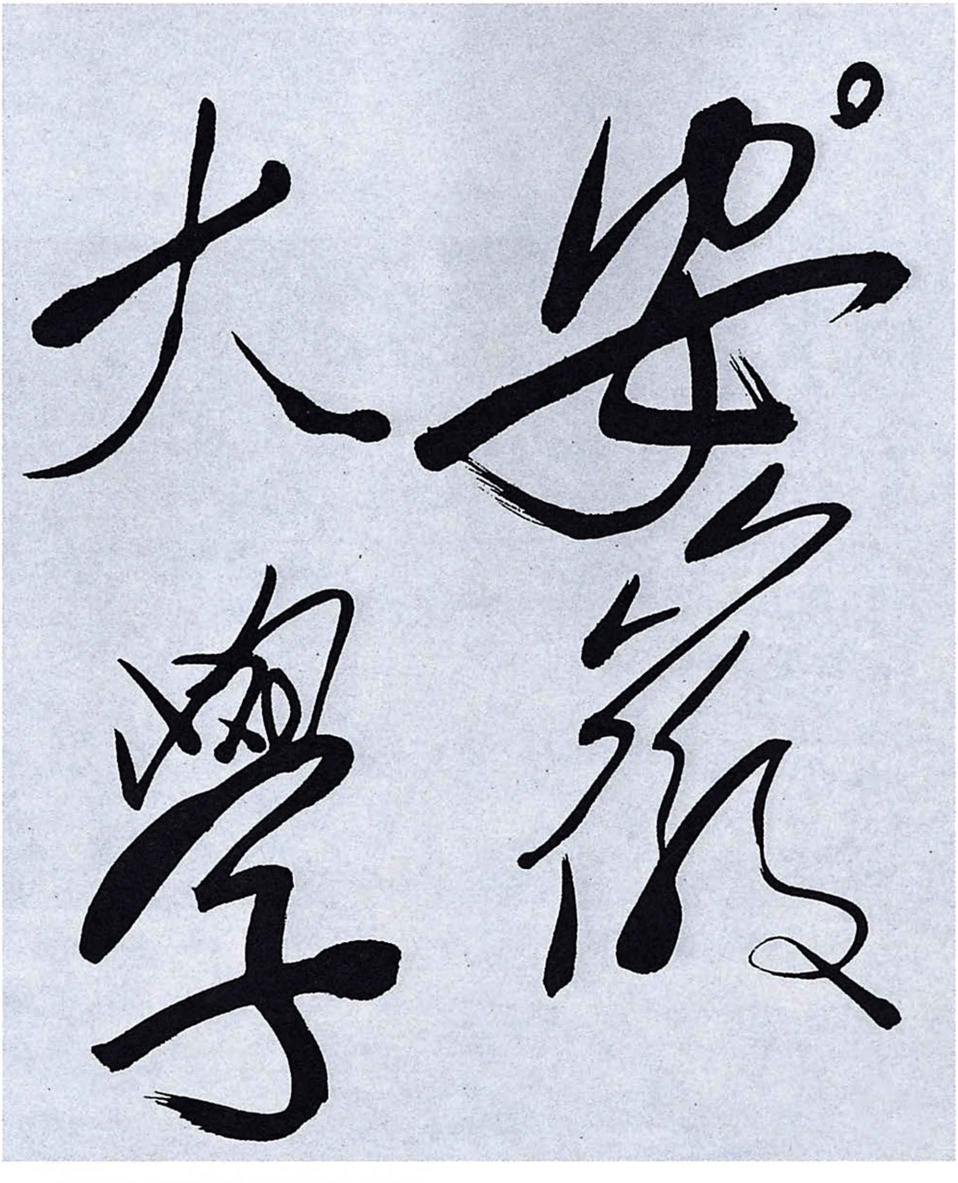
---

[1]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毛泽东应曾希圣的请求，为安徽大学题写校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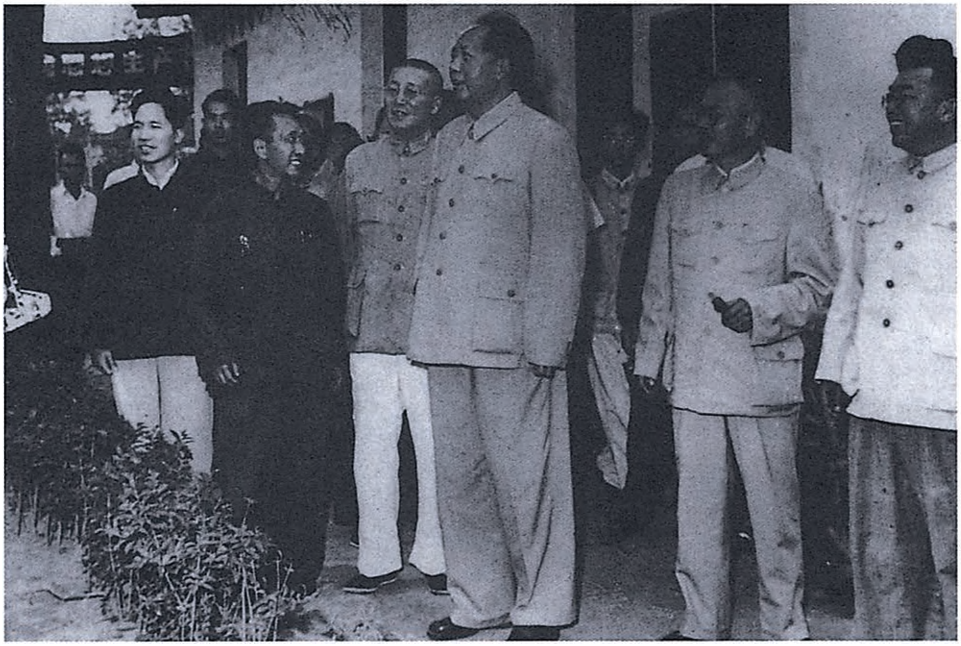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曾希圣信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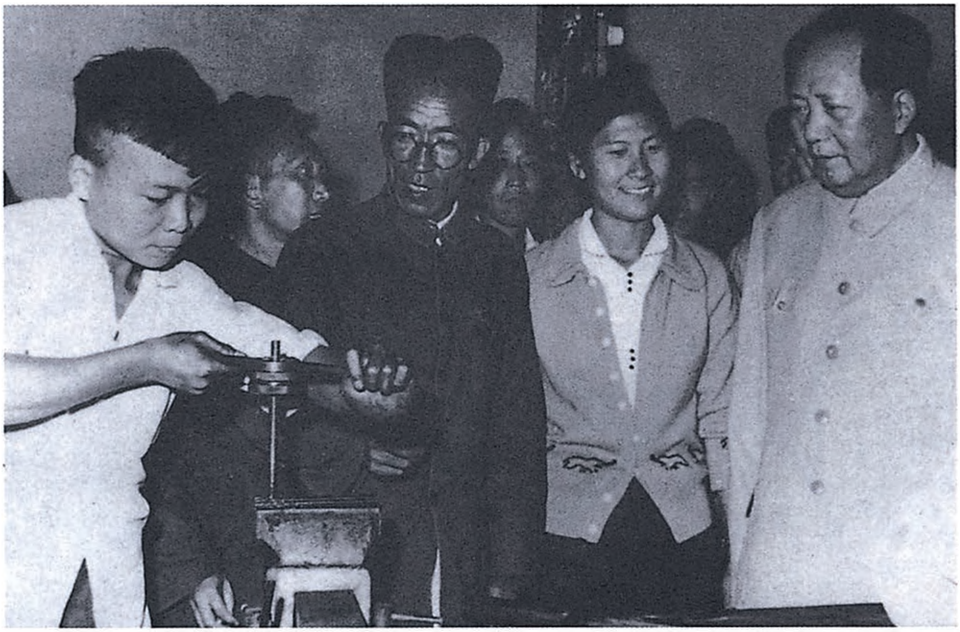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安徽大学题写的校名。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安庆市第一中学，受到了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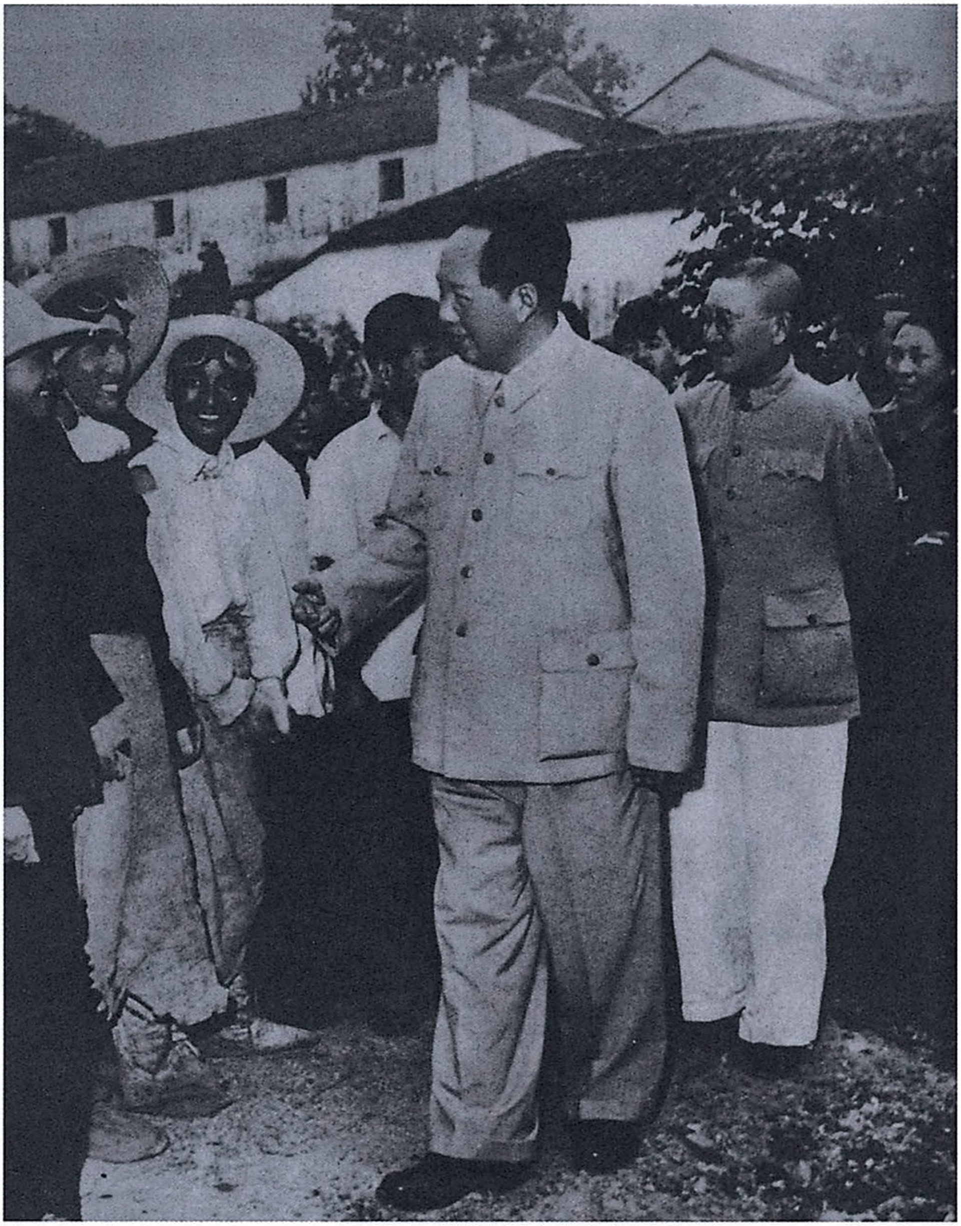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安庆市第一中学。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观看学校黑板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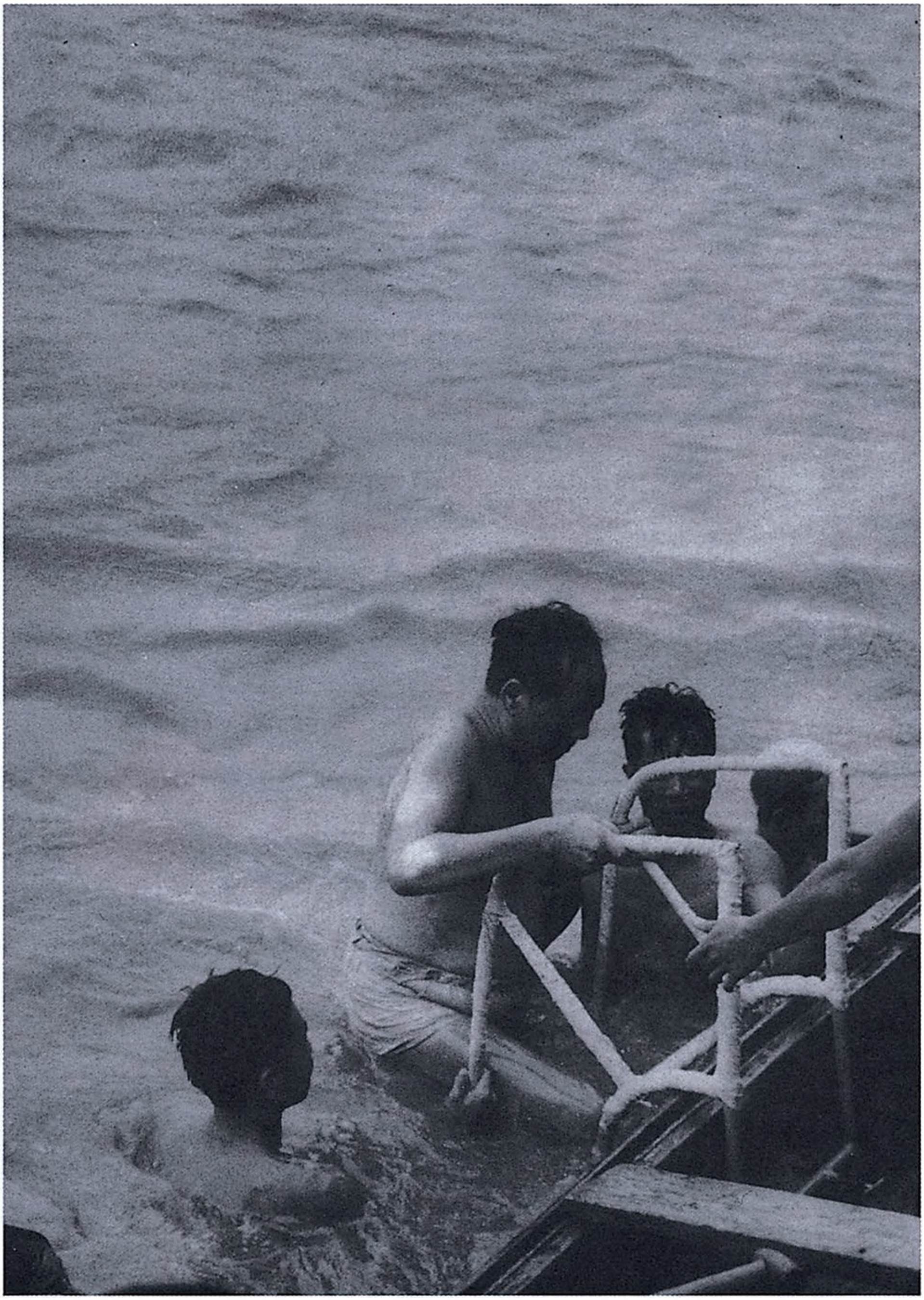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观看学生操作机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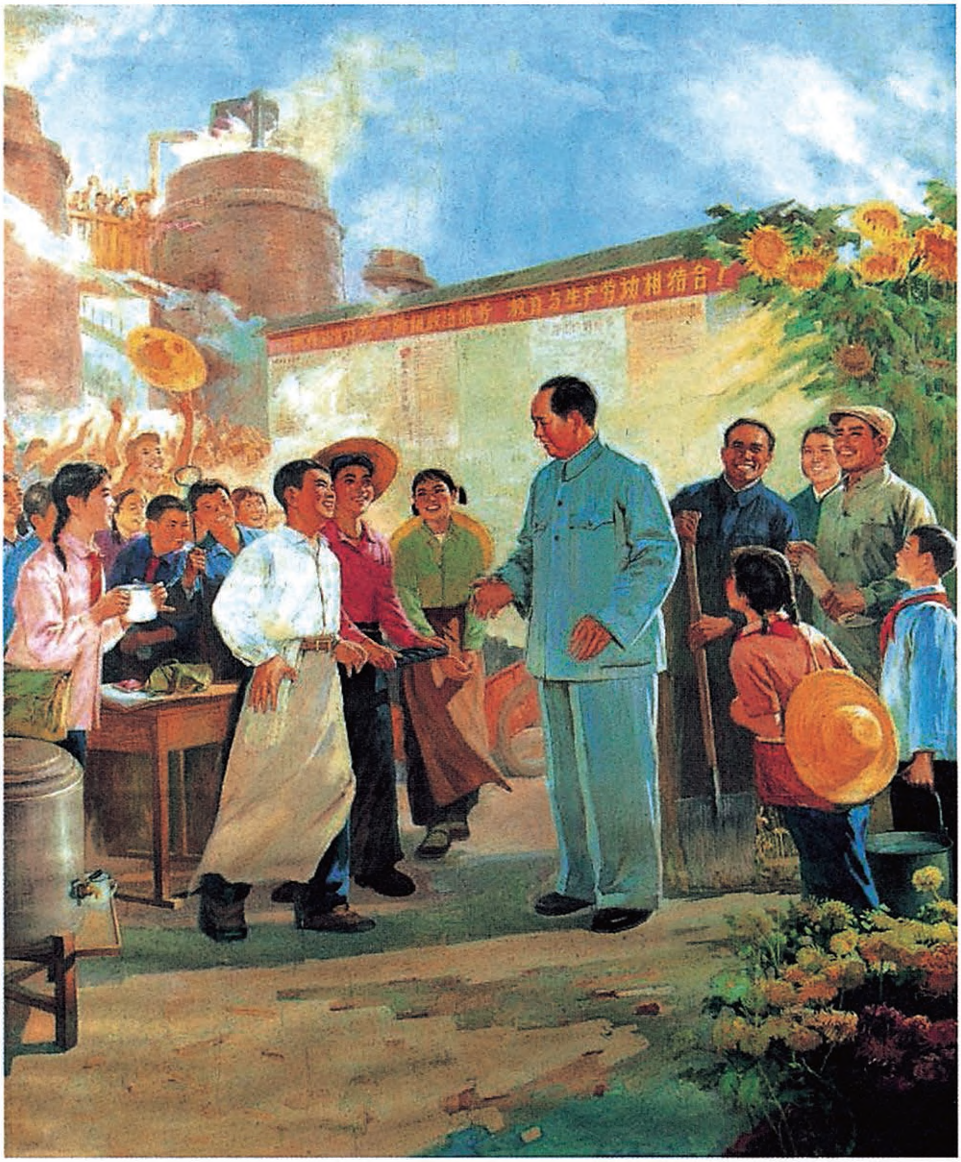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安庆第一中学时和参加劳动的学生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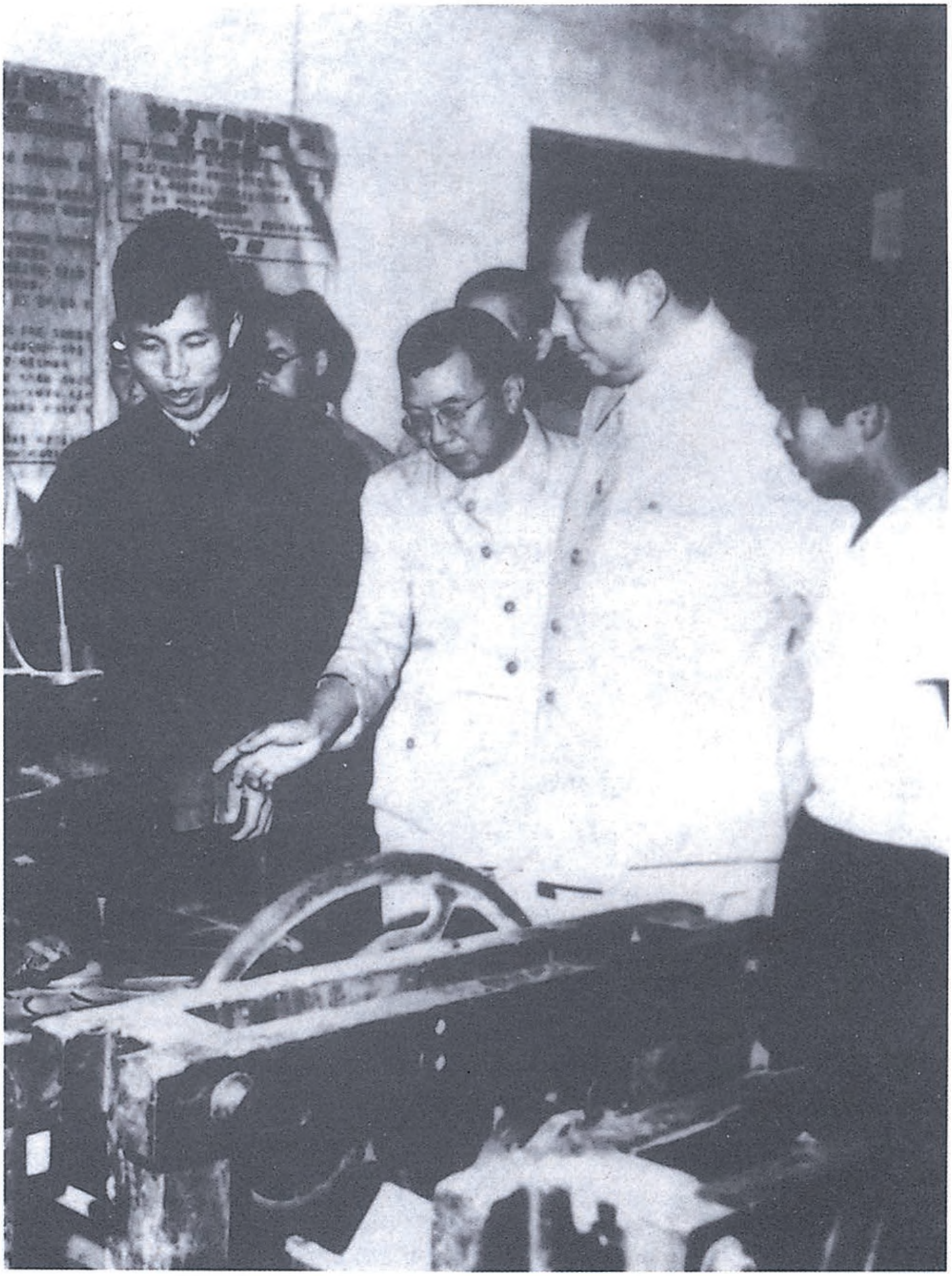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和安庆一中教师亲切交谈。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安庆市和游泳健儿们畅游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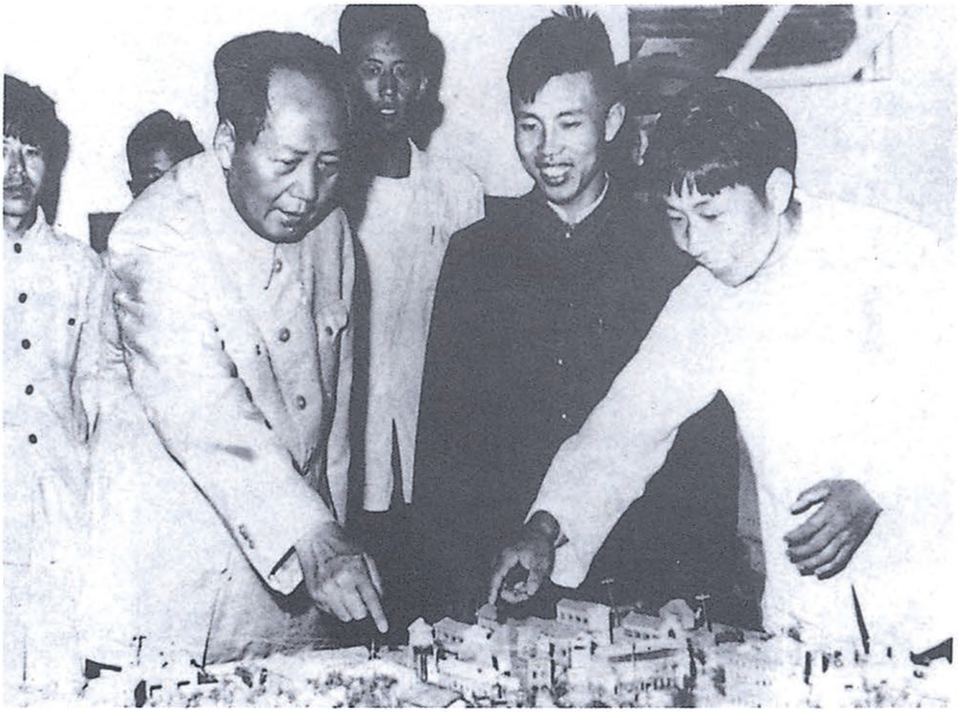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视察安庆一中》（水粉）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在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参观制茶机。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安徽舒茶人民公社。



1958年9月16日，毛泽东视察安徽舒茶人民公社。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太平天国时期的文物。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战国时期大侣铜鼎。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参观展出的沼气池。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参观治淮工程运土机模型。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淮北水利工程规划总图。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防治血吸虫病的规划图。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参观棉花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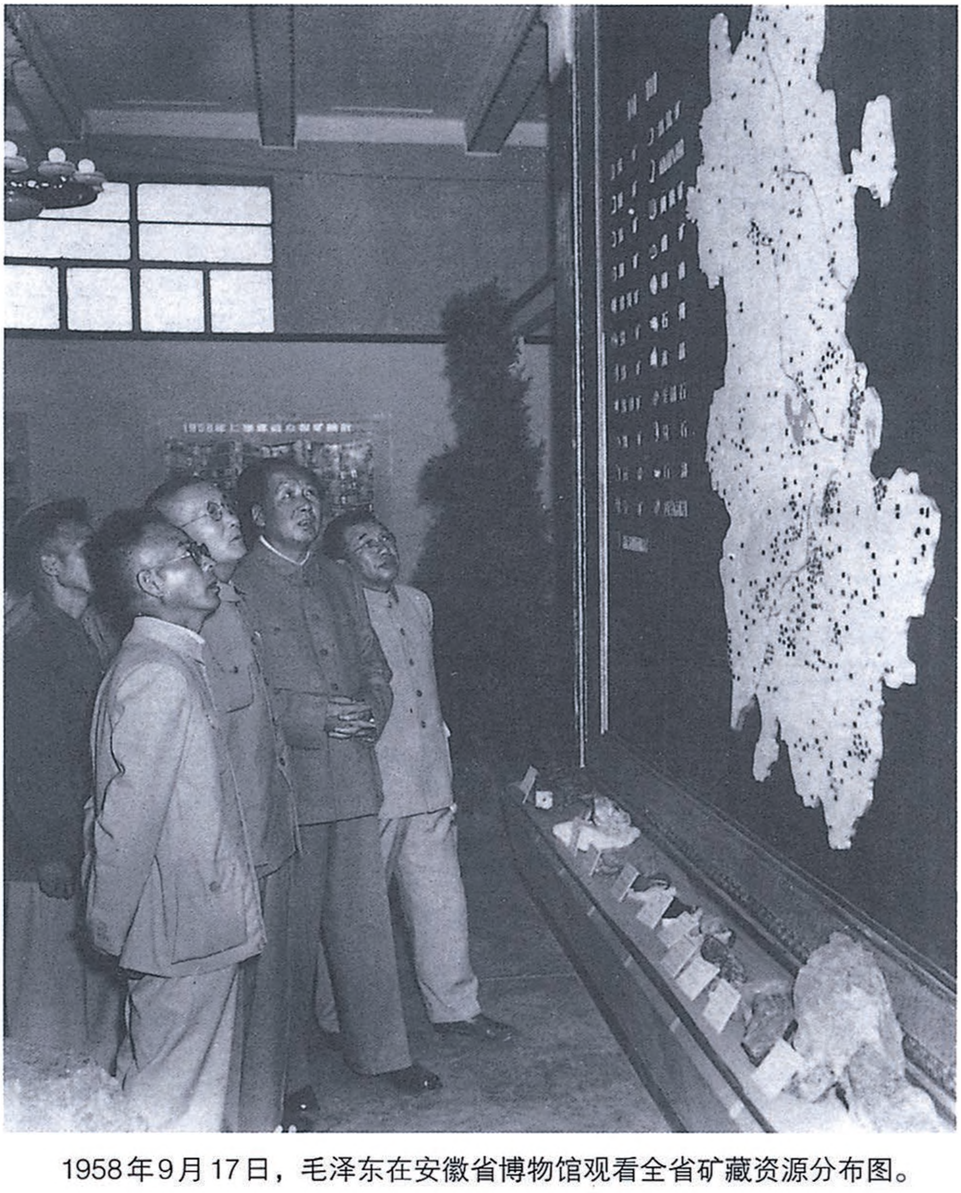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中华鲟鱼标本。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参观邮电馆。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观看安徽省博物馆教育馆陈列的校办工厂生产的工业样品。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参观冶金馆。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活板捕鼠夹。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观看全省矿藏资源分布图。

1958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博物馆休息室观看芜湖铁画。

在《钢铁生产紧急会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上的批语

（1958年9月18日）

曾希圣[1]同志：

此件[2]请一阅。你们收到否？

毛泽东

九月十八日早

---

[1]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8年9月15日印发的《钢铁生产紧急会报会商定事项的通知》。通知说：周恩来同志于9月14日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报会，讨论了目前钢铁生产的情况，一致认为9月上旬平均每日钢铁产量显然比8月份有所增长，但是，铁的平均日产量方达3.1万吨，钢的平均日产量方达2.4万吨，离9月份计划产铁200万吨和产钢120万吨的任务还有一定的距离，今后半个月的工作还是十分紧张的。为此中央各有关部门必须大力协助各省市、各钢铁厂及时解决当前钢铁生产中首先是生铁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并采取各种紧急措施，争取尽可能完成9月份产铁产钢任务，以利今年第四季度钢铁生产的更大跃进。通知还下达了就增强采矿技术力量、改善铁路运输等17个问题商定的处置意见。

1958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视察合肥钢铁厂，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1958 年 9 月 18 日，毛泽东视察合肥钢铁厂时会见干部和职工。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视察合肥钢铁厂时和工人亲切握手。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和正在劳动中的青年工人热情握手。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观看烧结矿。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深入车间观看工人的生产。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和正在劳动的青年工人热情握手。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视察合肥钢铁厂向工人了解生产情况。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农具展览会上参观群众制作的农具。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农具展览会上观看深耕犁的操作表演。

1958年9月18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农具展览会上观看深耕犁的操作表演。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安徽合肥稻香楼宾馆和警卫、服务人员合影。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结束对合肥视察。图为毛泽东在长江路上接见合肥市20万群众。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合肥火车站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合肥火车站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位坦克兵中士握手。

外交斗争必须高屋建瓴势如破竹[1]

（1958年9月19日）

恩来同志：

十八日夜来信[2]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3]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上午四时于合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对美斗争问题给周恩来的复信。

[2] 指1958年9月18日夜周恩来关于中美会谈和沿海军事斗争的策略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信。

[3] 王炳南（1908—1988），陕西奉天（今乾县）人，当时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首席代表。叶飞（1914—1999），福建南安人，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州军区政治委员。

给曾希圣[1]的信

（1958年9月19日）

曾希圣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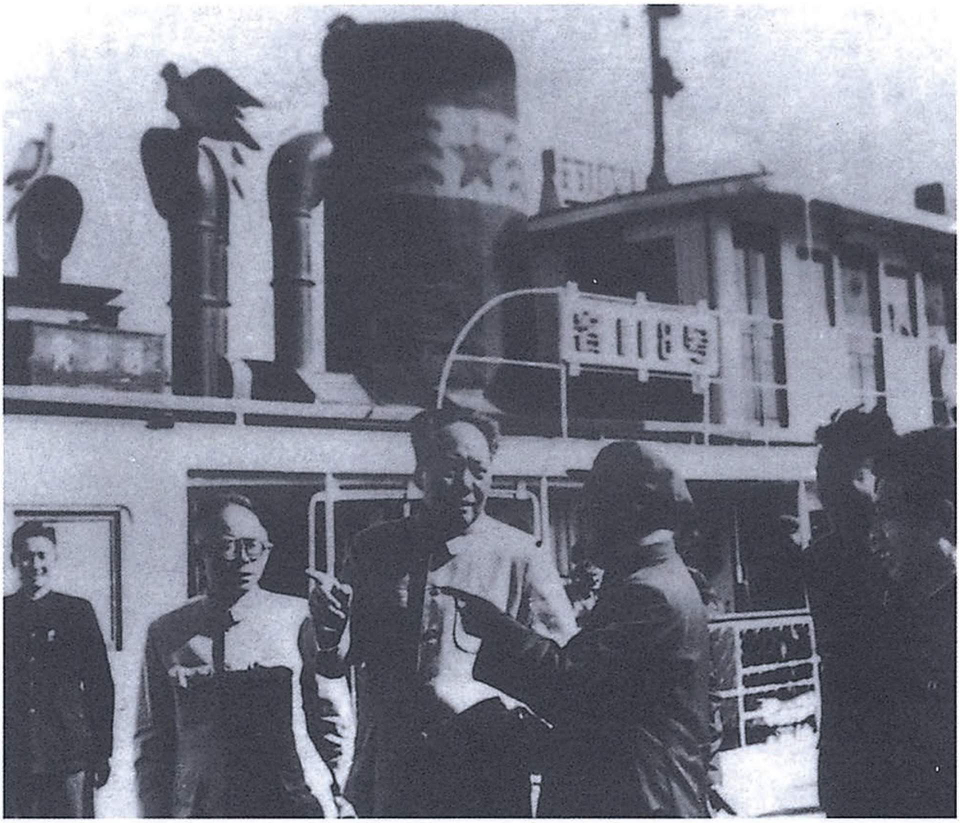
请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委员、省政府主要人员（主席、副主席、各厅局长、计委等委员会主任、法院及检查院院长），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开一张名单给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上午二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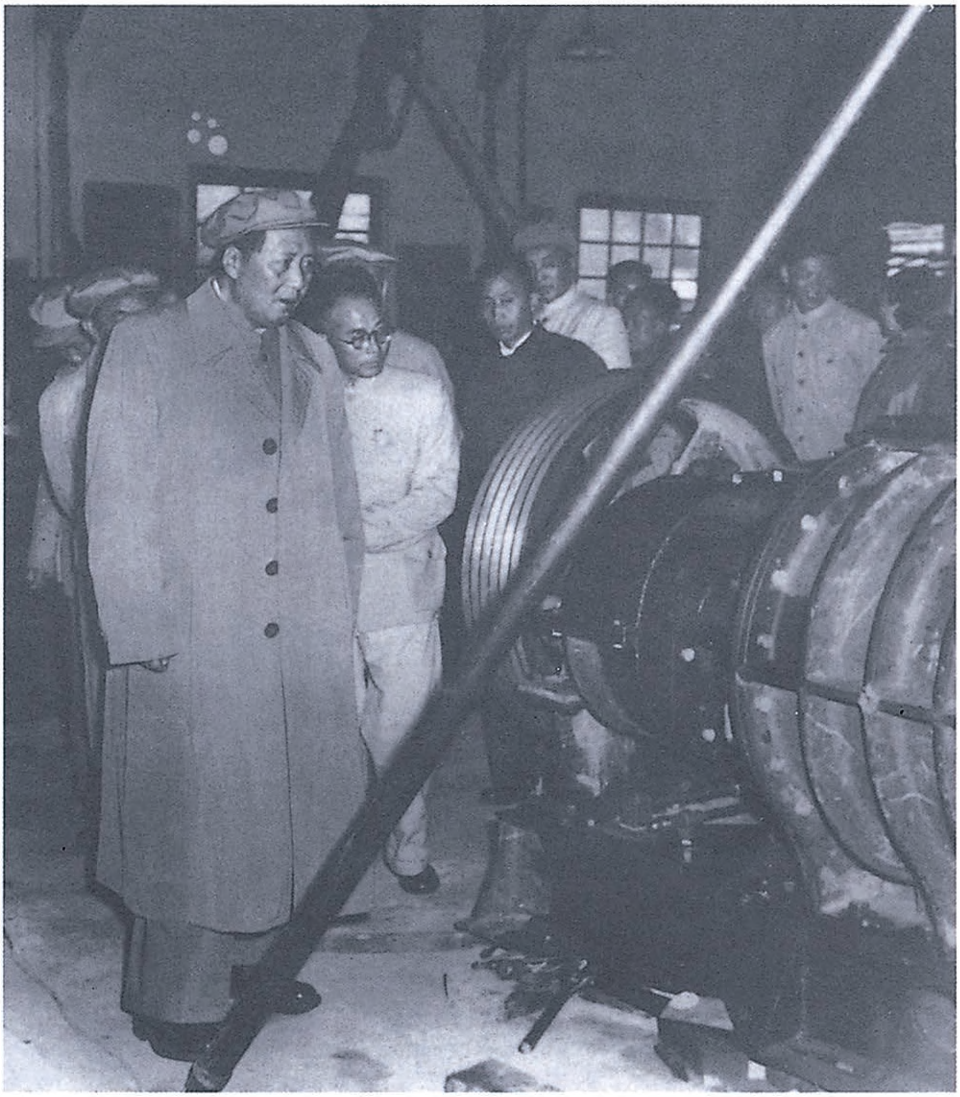
[1]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58年9月19日下午，毛泽东前往芜湖市视察。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亲切接见安徽省公安部队某部官兵。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冒雨视察芜湖造船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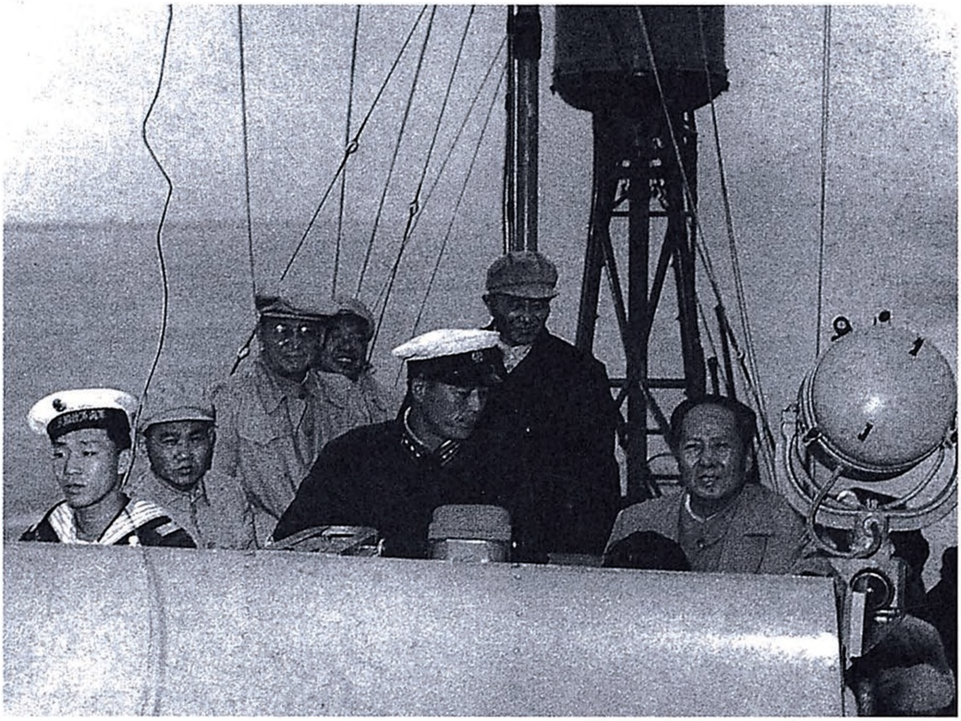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芜湖造船厂生产车间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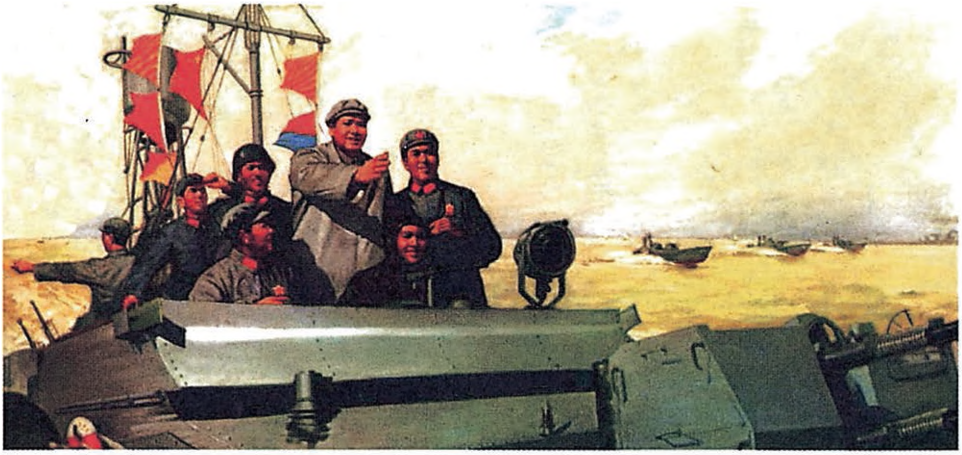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视察芜湖造船厂时和工人亲切握手。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亲切接见驻芜湖海军某部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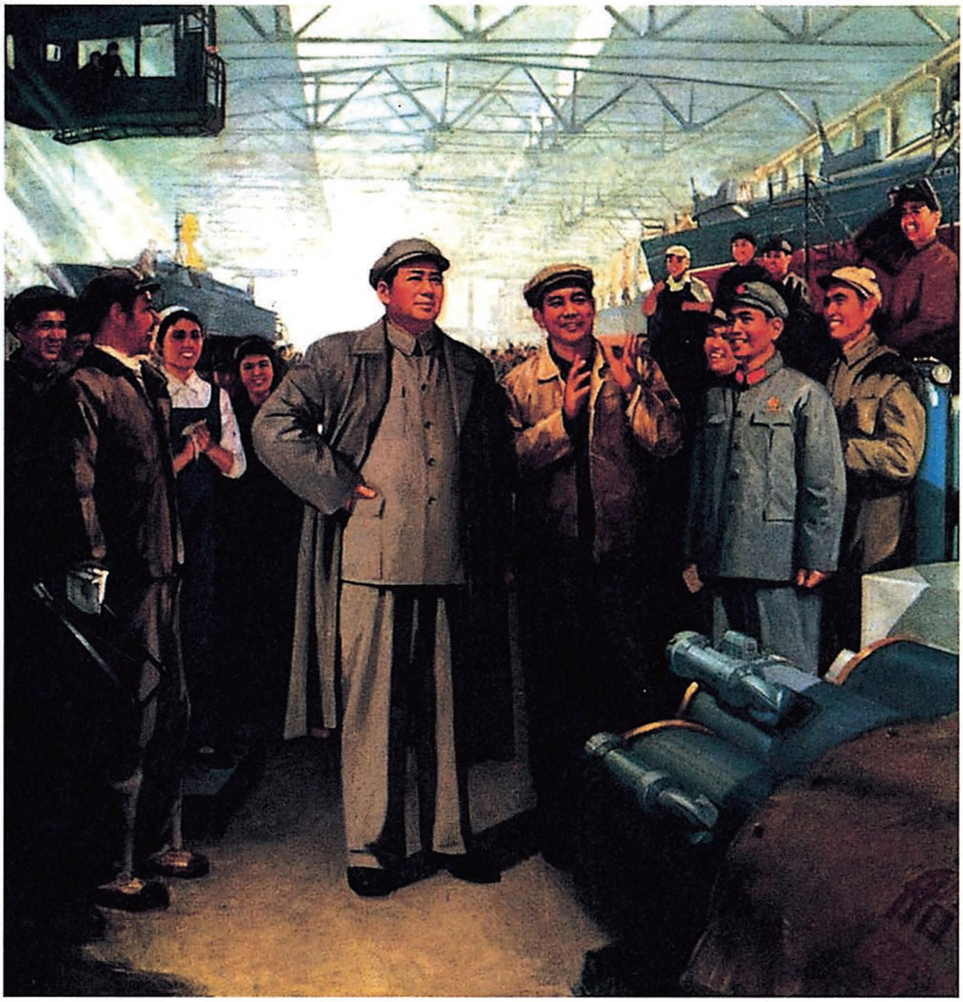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在芜湖乘快艇巡视长江。



1958年9月19日，毛泽东乘鱼雷快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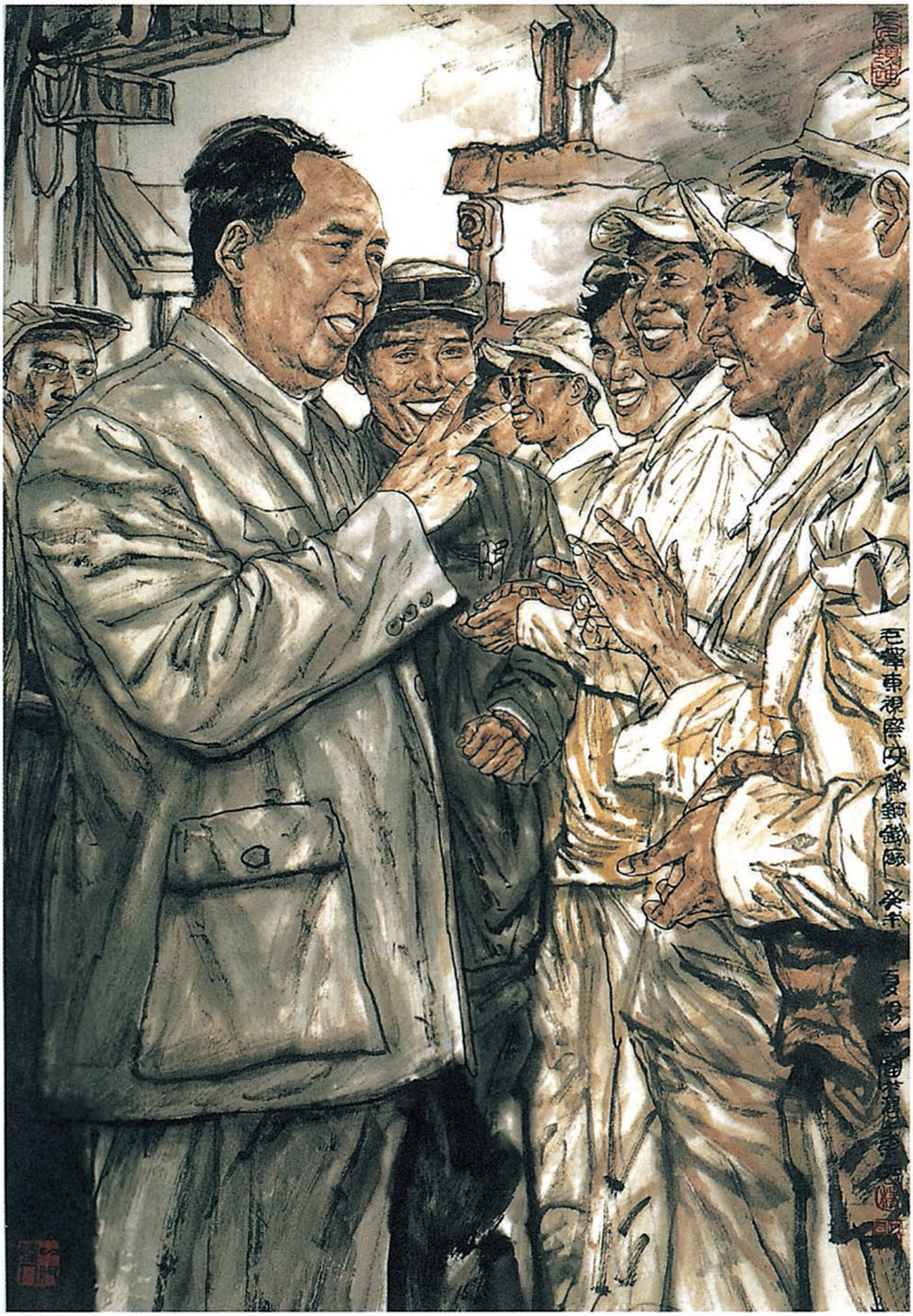
《毛泽东挥手我前进》（油画）



《毛泽东视察造船厂》（油画）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公司视察。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公司视察时和工人亲切交谈。


毛澤東視察安徽鋼鐵廠
癸未夏

《视察安徽钢铁厂》（中国画）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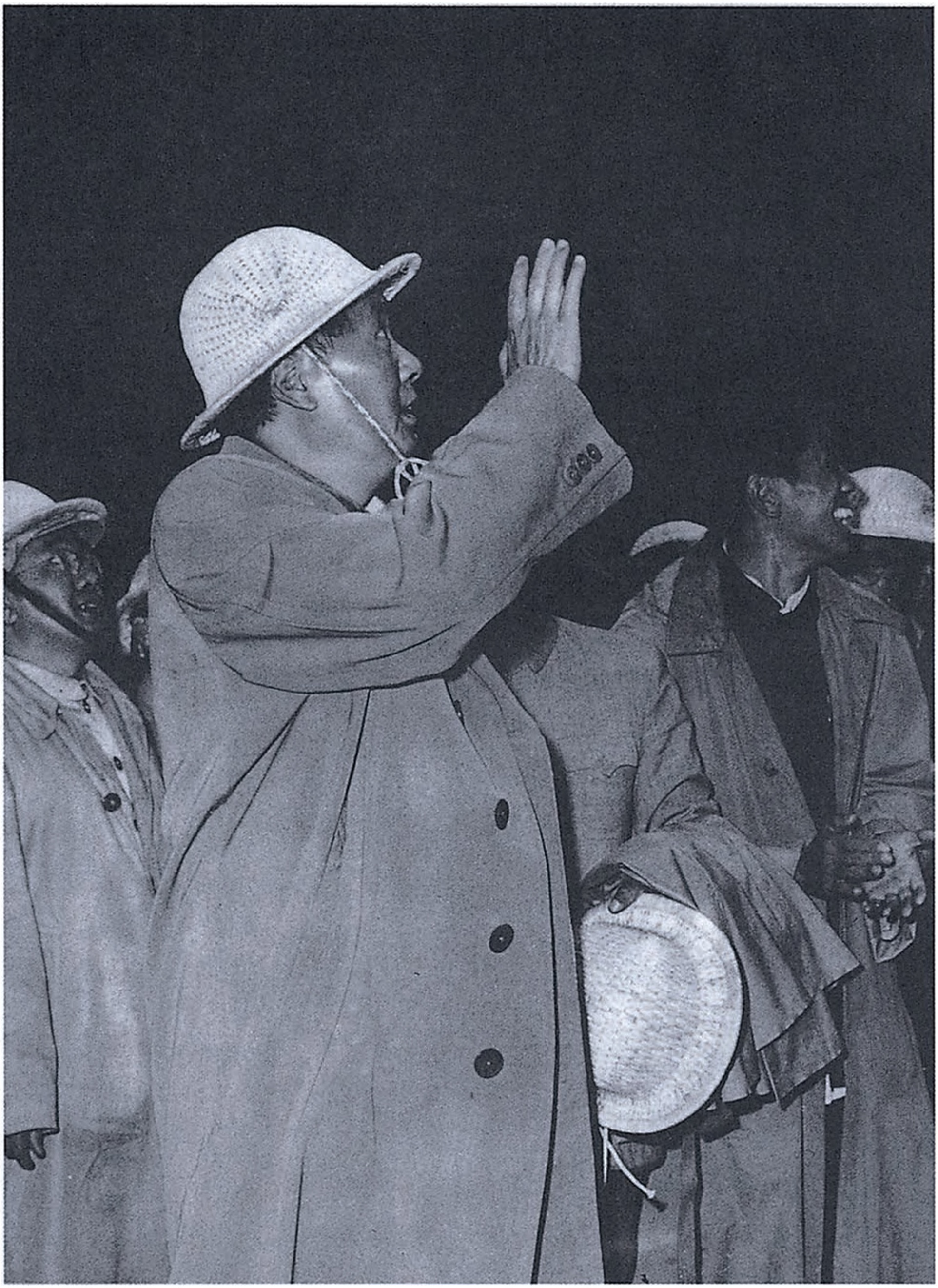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参观新建的高炉。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公司参观高炉施工现场。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和工人亲切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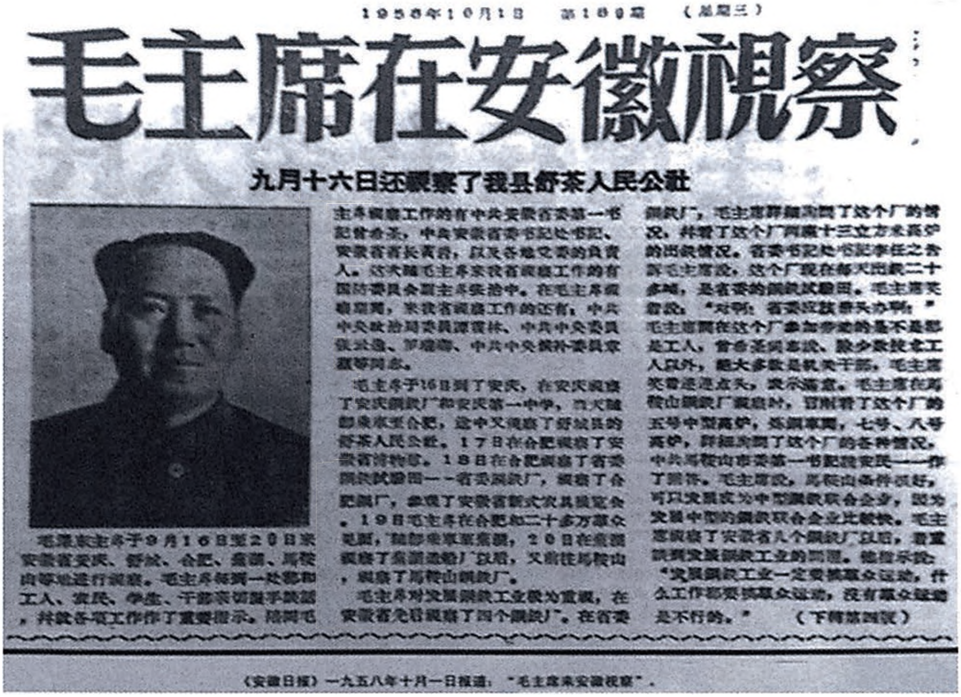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向工人们招手致意。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厂查看烧结矿。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观看马钢二号炉突击排制订的生产岗位责任制。

1958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马鞍山焦化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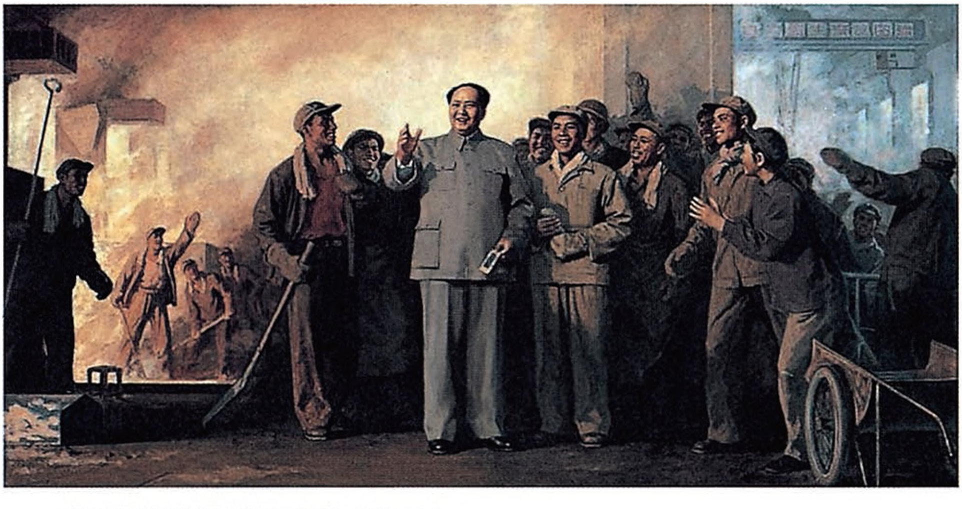
1958年10月1日　第189期　（星期三）

毛主席在安徽視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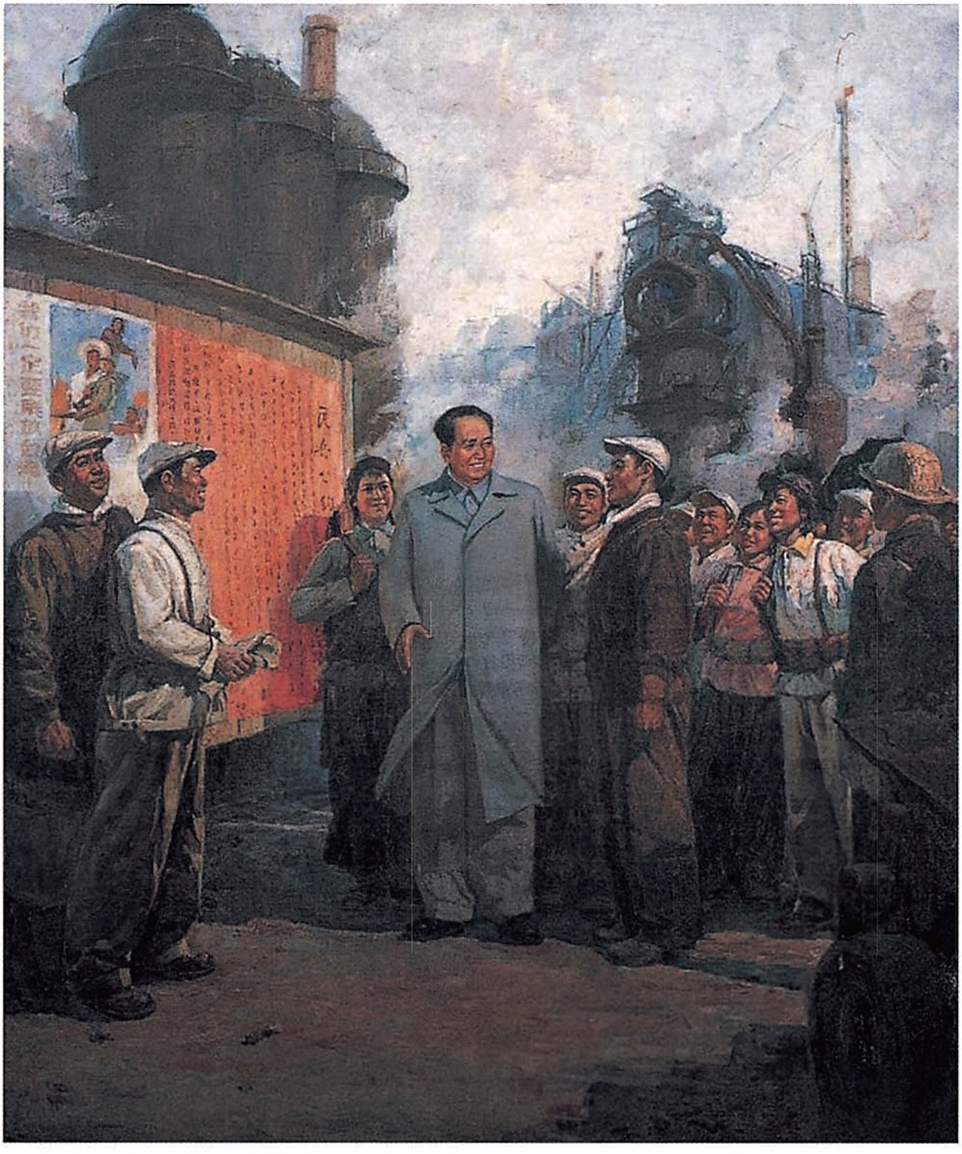
九月十六日还视察了我县舒茶人民公社

《安徽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报道："毛主席来安徽视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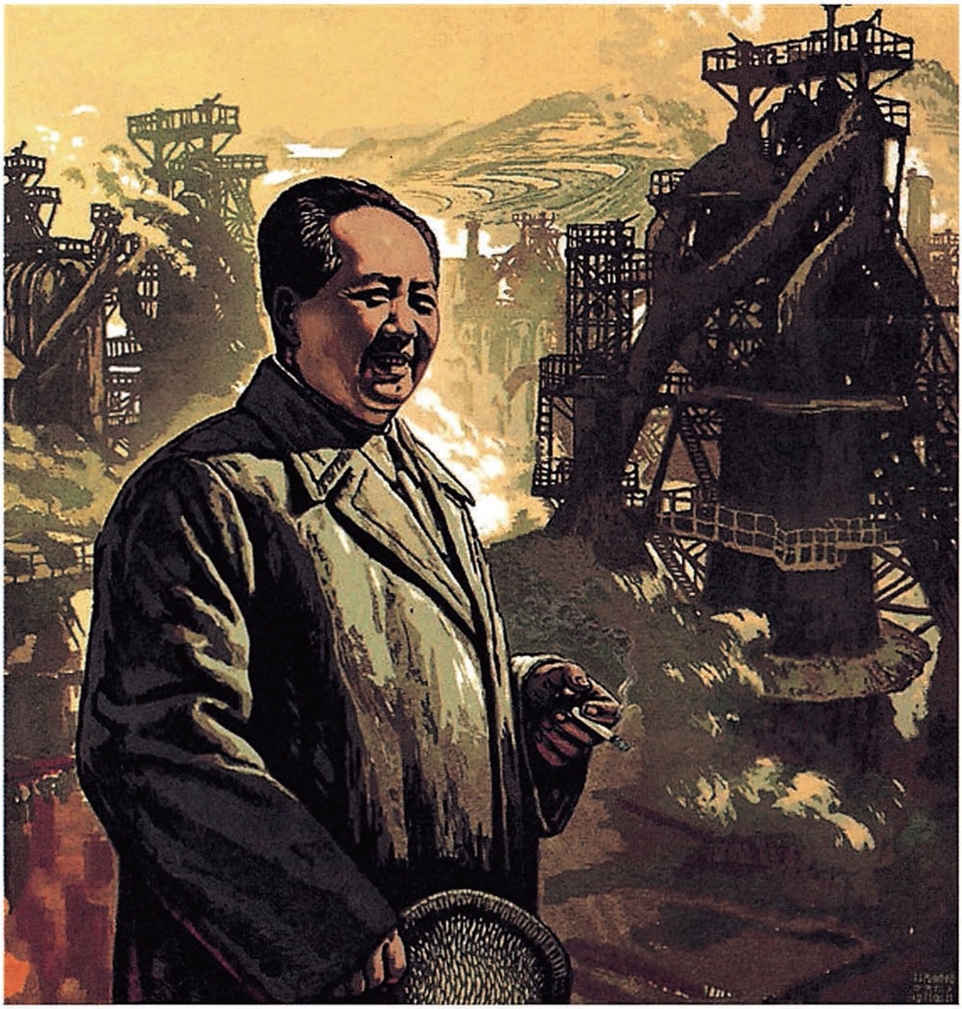
1958年10月1日的《安徽日报》登载了毛泽东在安徽省视察的消息。



《毛主席视察上钢三厂》（油画）



《毛主席视察钢厂学习班》（油画）



《沿途一望生气蓬勃——毛主席视察安徽》（版画）

给江渭清[1]的信

（1958年9月21日）

江渭清同志：

请照安徽办法，将江苏主要负责同志抄一份名单给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廿一日上午四时

如天气好，我也许今天去杭州。

安徽名单，请阅后退我。

---

[1] 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南京和江渭清、许世友亲切交谈。

1958年9月，毛泽东和许世友等在南京。

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等问题致周恩来电

（1958年9月22日）

恩来同志：

（一）同意对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处理[1]，我国必须早日宣布承认它，并着手商谈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二）你九月廿二日三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2]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

九月廿二日下午五时半

---

[1] 周恩来1958年9月22日1时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已在开罗宣告成立。阿拉伯世界已有七个国家宣布承认。戴高乐政府威胁北非承认的国家，说要准备绝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给中国总理来电要求承认，外交部拟同意承认。我当约彭真、陈毅、张闻天、廖承志、刘宁一（稼祥病了）、章汉夫商谈，拟先由陈毅同志约苏代办安东诺夫一谈，告以我国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但不去询问苏联政府的态度。"1958年9月22日，毛泽东和外交部部长陈毅分别致电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费尔哈特·阿巴斯和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拉明·德巴金，通知

对方，中国政府已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

[2] 指周恩来1958年9月22日3时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关于金门作战方针的意见：“目前形势下对金门作战方针，仍以打而不登，断而不死，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为妥。海空炮联合作战确不易配合很好，且有触及美舰美空军的可能。我实施对金门空炸更不适宜，因这样做，恰好给蒋介石空军以轰炸我大陆的机会。目前，美军还在控制蒋帮空军不许其轰炸我大陆，其原因是摸不透我空军回炸何地：金门还是台湾？既然美方还摸不清我方空炸动向，我就以不促成蒋空军向我大陆轰炸为有利。”

祝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的电报

（1958年9月22日）

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费尔哈特·阿巴斯阁下：

感谢你1958年9月19日的来信[1]。我代表我国和我国全体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地祝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祝贺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加辉煌、更加伟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

[1] 指费尔哈特·阿巴斯1958年9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叙述了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的情况后说：“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成立满足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是自然发展不可抗拒力量的必然结果，它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在4年的英勇斗争中牺牲了60多万人的生命所取得的成果。信中赞扬毛泽东是亚洲人民解放的巨匠，是人民自决权的不倦的保卫者。”并说：“鉴于光荣的中国人民对阿尔及利亚革命事业的巨大支持，以及我们政府的成立将作为受苦难的阿尔及利亚的解放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记载在历史上，我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是最先承认在1958年9月19日13时成立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国家之一。”1958年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致电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部长穆罕默德·拉明·德巴金，通知对方，中国政府已决定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

关于阅看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给江青的批语[1]

（1958年9月24日）

江青：

陆定一的文章极好，必须看，至少看两遍。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8年9月1日出版的《红旗》第七期的封面上。该期《红旗》发表了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

巡视大江南北后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1]

（1958年9月）

【新华社30日讯】毛泽东主席最近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毛主席9月10日至15日在武汉，看了武汉钢铁公司第一炉出铁；会见了工人群众；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2]看了武汉大学化学系师生们办的许多小型化学工厂，同武汉大学师生见了面；[3]看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同工人见了面。在武汉同各方面的干部见了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9月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市，于9月29日回到北京后，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新闻稿。新闻稿经毛泽东审定和修改。

[2] 据新华社1958年9月28日报道，毛泽东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铁矿区、大冶钢厂和武昌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在视察中毛泽东指示说，像武钢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以逐步地办为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除生产多种钢铁产品外，还要办点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工业等。他还指示说，这样的大型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一点。在大冶铁矿区视察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那里在进行基本建设过程中所实行的大包干的办法。他在听取了矿区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载1958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3] 新华社1958年9月28日还报道了毛泽东视察武汉大学的情况。报道说，毛泽东视察时指出，学生自觉地要求实行半工半读，这是好事情，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必然趋势，对这种要求可以批准，并应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他还指示在教学改革中应注意发挥广大师生的积极性，多方面的集中群众的智慧。

面。[1]15日，毛主席由武昌经鄂城、大冶到了黄石港，沿途看了丰盛的农业、大冶铁山、黄石港特殊钢厂，同工人群众见了面。16日上午，毛主席到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会见了安庆人民群众。当天毛主席到了安徽省会合肥城，沿途经过桐城、舒城、肥西三县，看了丰盛的农业，看了一个人民公社[2]。在汽车道上，毛主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广大的人流。毛主席第一次访问了合肥城。在这里，毛主席看了两个中型钢铁厂；看了农具展览场；又看了工业农业产品和发明的展览馆。毛主席在合肥会

---

[1] 毛泽东这次在武汉会见各方面干部的情况，报道不多，只有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七一》杂志1958年第五期发表的《札记二则》，其中说：有一天下午和毛主席同车到第一纺织厂参观小高炉出铁，谈起了今年农业的大丰收和农民的苦干精神。毛主席问我：“你看要不要农业合作社开个庆丰收的大会，让人们吃点肉，喝点酒……”我说：“好，就在国庆节那一天，庆祝国庆，庆祝丰收。”主席说：“那么要发个指示，不然会有人说是铺张浪费。”此外毛主席还告诉我：“在苦战三年当中，积累不可过多，必须使农民越干越有味道，越干越有劲。”另外记不清是哪一天了，主席说：“许多事情看来怪得很，要就没有，或者很少，要就很多很多。过去九年粮食增加得很慢，老愁粮食不足，可是今年一年就增加了几千亿斤。今年翻一番，明年还可能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九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

[2] 指毛泽东参观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据1958年9月29日《安徽日报》报道，当毛泽东了解到这个公社办了公共食堂，已经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后，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

见了干部[1]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芜湖，看了工厂，会见了干部。20日毛主席到了马鞍山钢铁厂[2]，会见了工人和市民群众。毛主席20日到南京，跟干部们见了面，然后到上海，会见了干部，看了一个钢铁厂。毛主席已经在9月29日回到北京。

毛主席对本社记者说：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毛主席对记者说：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

---

[1] 《安徽日报》1958年9月29日的报道中，还谈到毛泽东在合肥期间和妇女干部谈话的情况。毛泽东说：“如果每年每人没有一千斤、两千斤粮食，没有公共食堂，没有幸福院、托儿所，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毛泽东指出，只有办好人民公社，才是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2] 1958年9月29日《安徽日报》还报道了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厂视察的情况。报道说，毛泽东在马鞍山钢铁厂冒雨看了这个厂的五号高炉，炼钢车间，七号、八号高炉，详细询问了各种情况，毛泽东说，马鞍山条件很好，可以发展成为中型钢铁联合企业，因为发展中型钢铁联合企业比较快。报道说，毛泽东视察了安徽省几个钢铁厂以后，着重谈了发展钢铁工业的问题。他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好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1959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1958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当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毛主席说：民兵师的组织很好，应当推广。这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专门扶植各国反人民的反动派，霸占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以原子战争威胁和平。这样，他们就迫使全世界90%以上的人正在或者将要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但是帝国主义者目前还是在活着，他们依然在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横行霸道。他们在西方世界也依然在压迫他们本国的人民群众。毛主席说：这种局面必需改变。结束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全世界人民的任务。

此次同毛主席一起旅行的，有张治中将军。他是人民代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安徽人。他对工业、农业大跃进感到兴趣。他很关心在台湾的那些过去和他有联系的人们，希望他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凶恶，走到爱国主义的道路上来。

1958年，毛泽东在外出途中走下专列漫步。

关于游泳的几次指示

（1958年9月至1966年7月）

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二日游泳后对运动员谈话）

毛泽东：全国要有三亿人学会游泳，行不行呀？

答：除了七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学，三亿人是可以的！

毛泽东：可以，完全可以。

（一一问过运动员的学历情况，毛泽东知道他们都是读过专科的，有相当的知识后）

毛泽东：你们是学出来的，可是要好好工作呵！你们是年轻人哪！是吗？时间是你们的！还要向群众去学习。

二

你们不要老在游泳池里面练，游泳池小。游来游去就那么一点，要多到江河里去练习。

三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你们不让我游，我

现在不是已经游过来了吗！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四

游泳是一项很好的运动，应该提倡。

五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

会休息，才能持久。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毛泽东轻快自如地领头游着，并风趣地问一位同志）

毛泽东：你说是人怕水，还是水怕人？

答：人怕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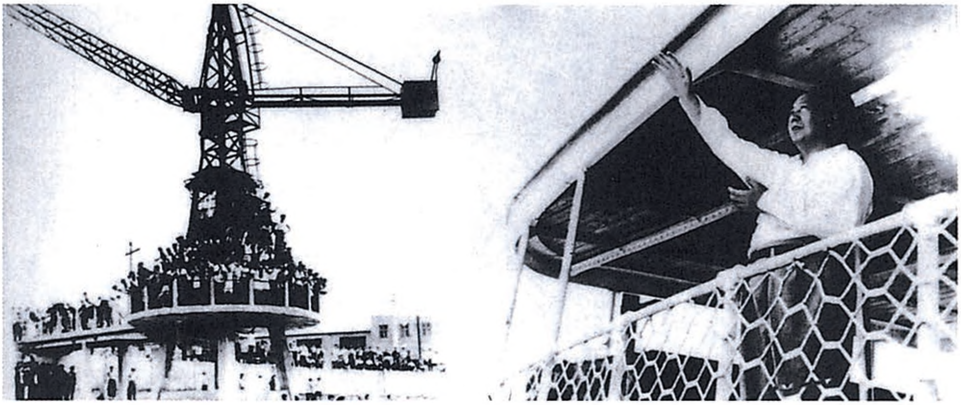
毛泽东：我看是水怕人。水怕人压迫他。

六

在江河游泳，有逆流，可以锻炼意志和勇敢。

全国的江河这样多，能不能都利用起来游泳呢？全国六亿人口，能不能有三亿人口都来游泳呢？

1958年，毛泽东和陪泳的教练员、运动员在船上。



1958年9月14日，毛泽东游泳前乘航川轮在武昌造船厂附近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

1958年9月，毛泽东游长江后，在船上休息。

关于报道钢铁生产情况的批语

（1958年9月30日）

即送彭真[1]同志：

此件[2]似可改写成一个新闻报导，在报上发表。即酌办。

毛泽东

九月卅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河南省委1958年9月25日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省钢铁生产已经形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跃进到一个新阶段。我省原来钢铁生产基础很差，去年只生产土铁3000吨，今年9月上旬平均日产生铁也只达568.9吨。经过全省人民日夜苦战，9月10日以后日产量达到千吨，9月15日冲破了各种难关，一天炼出生铁18944吨。15日至22日共产生铁67217吨，真正形成了大规模的全党全民千军万马大办钢铁的运动。现在全党全民正在乘胜前进，扩大战果，为国庆节放出日产3至5万吨的卫星而努力。报告还谈了四点体会：（一）解放思想，明确方向，采取正确的方针路线，是保证大办钢铁的首要关键；（二）钢铁大跃进是政治挂帅，全党动员，提高共产主义风格，充分发动群众，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三）连续突击，放几次钢铁大卫星，是很好的发动群众，组织钢铁生产高潮的方法；（四）钢铁生产真正跃上去，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集中力量，保证重点。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以《群众发动越透，钢铁跃进越快》为题，发表了经过改写的这个报告。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1]

（1958年9月）

对国际问题应该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临时抱佛脚，发表感想式的意见。对许多国际问题都要有基本的看法，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议论。现在对国际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感想式的。

搞新闻工作，光务实，不务虚，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见，就要找机会、找题目发挥。

报纸宣传，报纸编辑工作，最近一两个月比较杂，看不出方向，究竟搞什么？今年春天，发表《从梅林看全国》的社论[2]时是有方向的。最近一两个月，东西很多，方向不大明了。报纸应该有方向，在最近就要转变过来。省报也应当如此。

报纸一个时期要有一定的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过来。

---

[1] 本篇是毛泽东和吴冷西谈话的一部分。

[2] 刊于1958年1月8日《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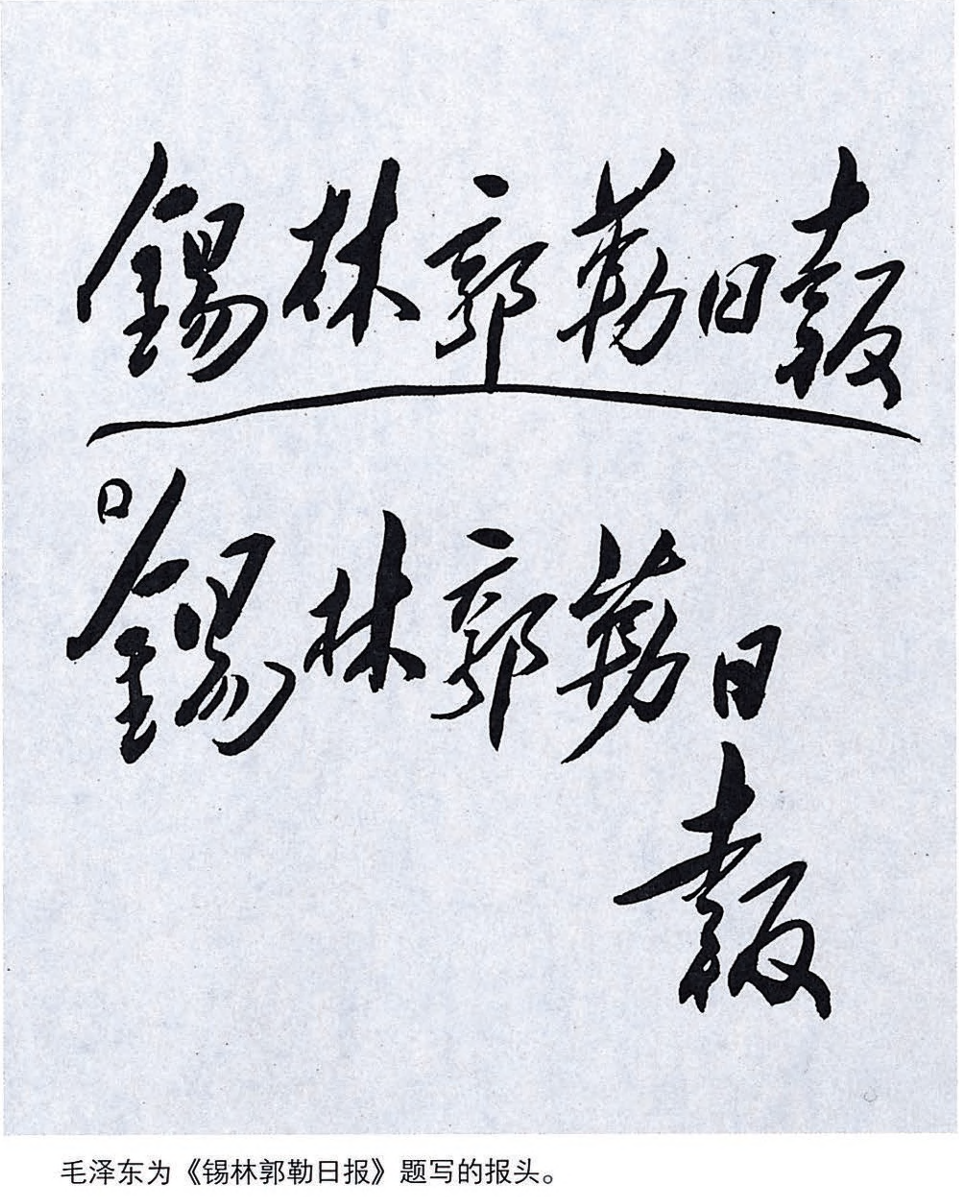
为《锡林郭勒日报》[1]题写报头

（1958年9月）

锡林郭勒日报

---

[1] 《锡林郭勒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草原最早创办的地市级党报。


锡林郭勒日报
锡林郭勒日报

毛泽东为《锡林郭勒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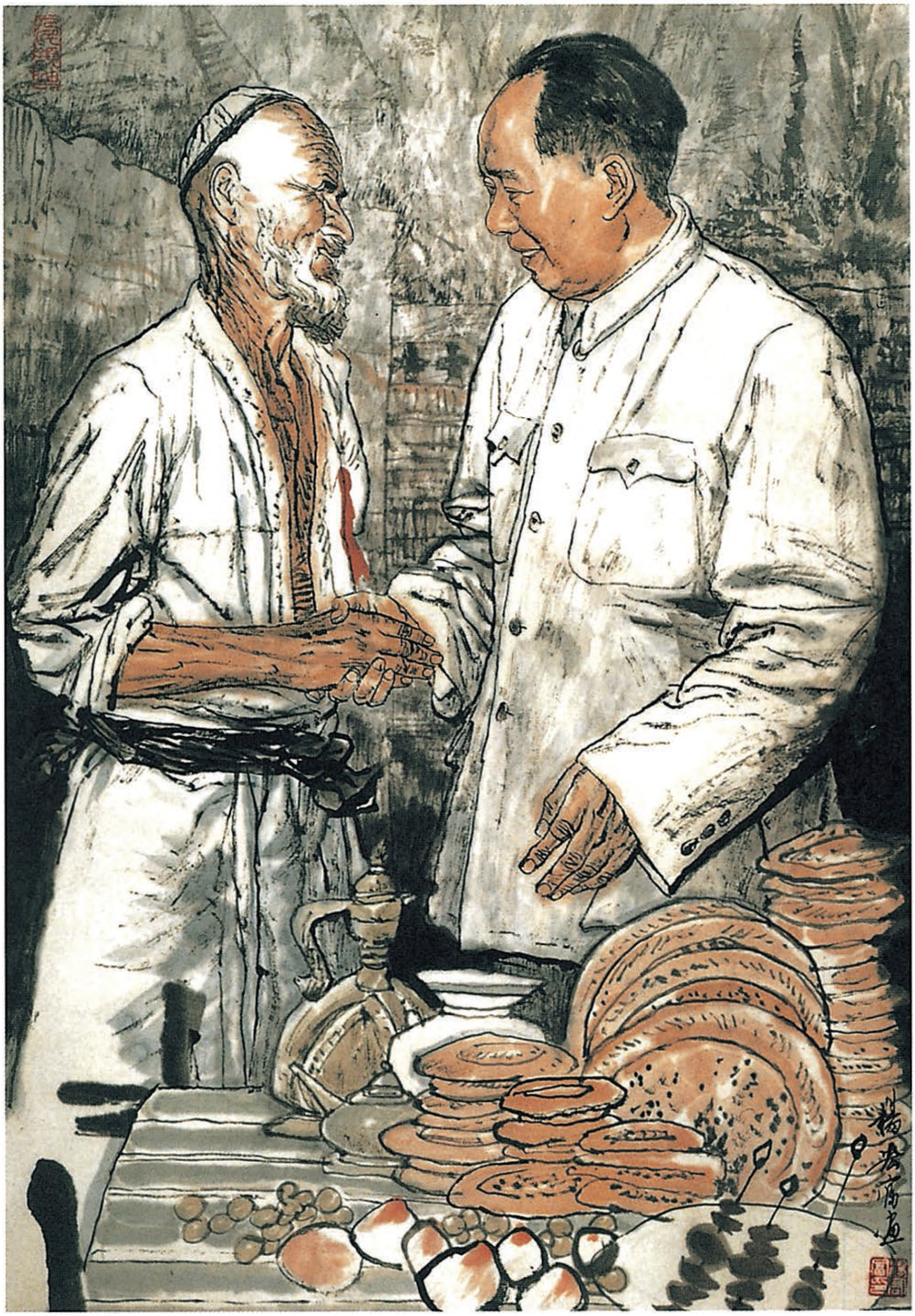
195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群众挥手致意。

1958年10月1日，毛泽东检阅通过天安门的方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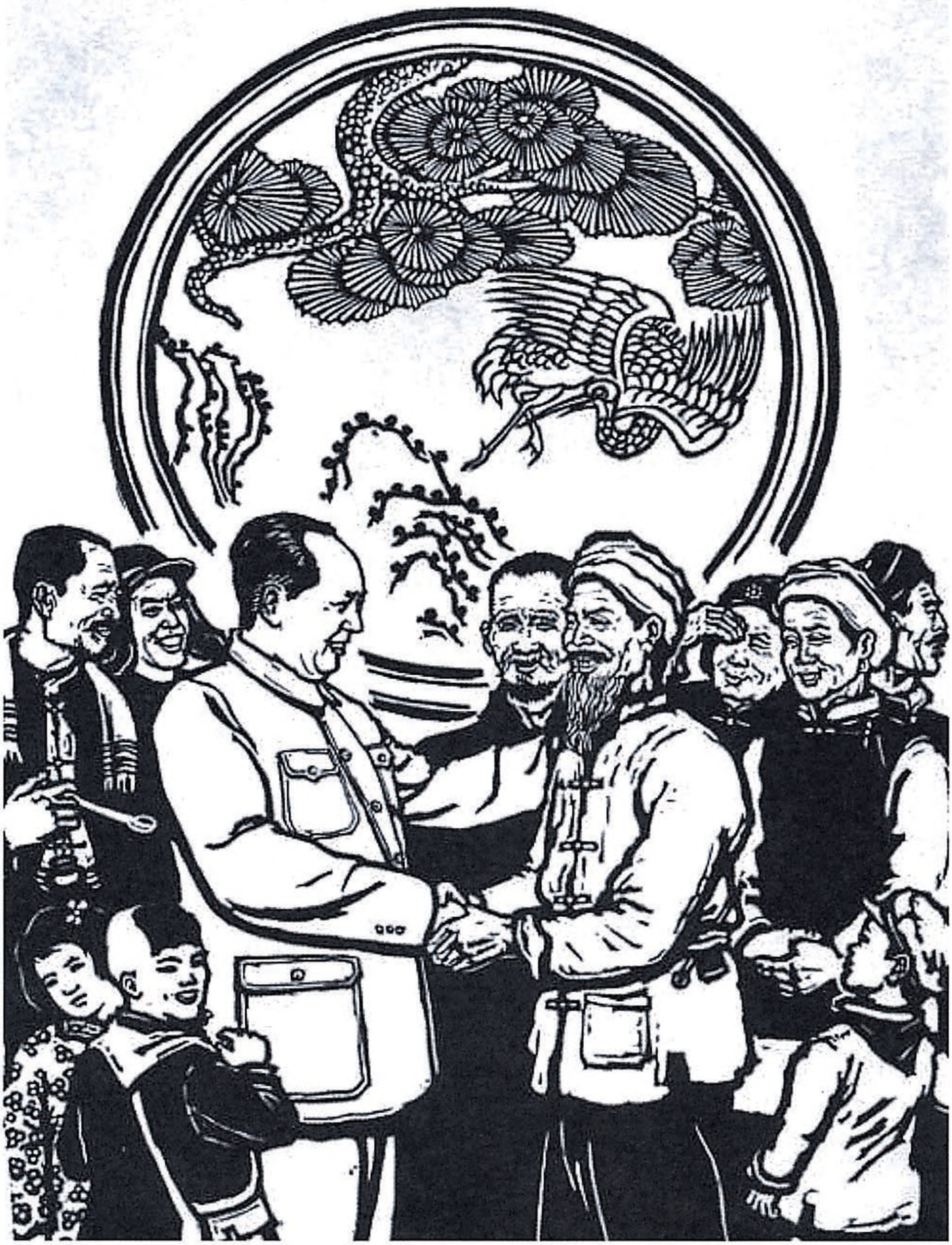
1958年，毛泽东和宋庆龄在一起。

1958年，毛泽东和陈毅在北京。

1958年，毛泽东和新疆维吾尔族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亲切握手。



《拉着维吾尔族老大爷的手》（中国画）



《托主席的福》（版画）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1]

（1958 年 10 月 2 日）

祝同志们健康，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更大发展，为最后战胜帝国主义而奋斗。要不要战胜帝国主义呀？总有一天要战胜它吧！当然不一定是明天早上，明天晚上也可以，后天早上也可以，总要战胜它吧？帝国主义总是要战胜的。打么，有两种打法：文打和武打。基本上是文打，用和平的方法打它，但是我们也准备武打。这次有好几个军事代表团来，你们是准备文打还是武打的？我们有这么些军队，难道有军队我们不准备开枪的吗？当然是准备开枪的喽！这是我代表你们回答的。但这是我们最后的手段，如果敌人用这个手段来对付我们，我们就拿出这个手段来。

你们会批评我，说我的思想自相矛盾，既然这是最后才拿出来的手段，为什么还在金门打炮？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抛入一个窘境，

---

[1] 这是毛泽东和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1950 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1953 年至 1959 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威胁要实行“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 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 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

很难回答。

金门打炮[1]，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总统”叫蒋介石，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跟他这个仗可打得久了，打了三十一年，一九二七年打起，还要打多少年，我也不知道，可能还要打七十年吧，合起来就是百年战争。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希特勒曾经尽过这样的历史责任，还有墨索里尼，在东方还有

---

[1]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我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1959年1月7日，共进行7次大规模炮击，13次空战，3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36架，击沉击伤军舰17艘，毙伤国民党军7000余人。金门炮战一直延续至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时停止。

日本帝国主义，把广大的欧洲人民和世界人民教育过来了。可惜现在没有希特勒了，墨索里尼也不见了，日本有些军国主义者也不存在了。但是教员还是有的，有杜勒斯，这不是一个好教员吗？世界上没有杜勒斯事情不好办，有他事情就好办。所以我们经常感觉杜勒斯跟我们是同志。我们要感谢他。这个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里，他是比较最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坚决执行阶级斗争的路线，相当不妥协，我这里没有讲他毫不妥协，因为他还有缺点。他相当坚决，只是坚决得还不够就是了。虽然有缺点，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教员，只是除了共产主义者以外。当然第一个教员是马克思主义者，第二个教员才是杜勒斯，还要加上蒋介石，他还活着。

看来世界人民在金门问题上真正受到了教育。情况还将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现在也有利于我们，将来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他总是拿朝鲜相比，说共产党又在搞朝鲜战争啦!人们说不像嘛，朝鲜是朝鲜嘛！金门是金门嘛！金门只有那么大，只有一个酒杯那么大。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在黎巴嫩，我也是不愿美国走得太快。美国走了，好！它又是爱好和平啦！这次在黎巴嫩逮住了美国[1]，这个偷东西的贼从来没

---

[1] 指1958年美国武装干涉黎巴嫩事件。1958年5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7月15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10月25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有被人逮住过。一九五六年在苏伊士运河，我们逮住了英国、法国[1]。那时美国装好人，它装成爱好和平的。这次在黎巴嫩，美国可被我们逮住了。我说它最好多呆一点时间啊！我跟赫鲁晓夫同志商量过，他也赞成我这个意见。至于美国呆多少时间，三年好不好？恐怕阿拉伯世界的朋友们不同意，要它走得快一点。美国也可能不要好久就开走了，因为它混不下去了。唉呀！我这个目的就达不到哇！想留它多住呀，它就要走了。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如何。也许在几个月内它在黎巴嫩就可能开跑，但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这就是台湾海峡，我们可以使它多留。台湾海峡这件事，是一个对全世界的教育工具，特别是对中国人民有相当大的教育啊！你们不相信哪？

好！那末打起仗来怎么办哪？谁要打仗啊？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呀。这个叫打文仗，不叫打武仗。我们是要惩罚蒋介石。这个教员哪，我们又要感谢他又要惩罚他，也给他以批评嘛。学生也可以给先生以批评，就是用大炮批评他。

---

[1] 指苏伊士运河事件。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69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对一封反映安徽省灵璧县灾情的来信[1]的批语

（1958年10月2日）

曾希圣[2]同志：

是否属实，请派人去那里查一下，酌量处理。

毛泽东

十月二日

---

[1] 这封写于1958年9月5日无署名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安徽省灵璧县冯庙乡、杨町乡、尹集乡由于遭受风灾，谎报亩产，强行旱改稻及多报栽种亩数等原因，灾情严重，到目前为止已饿死不下500余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请求中央派人调查处理。信中还反映冯庙乡的乡社干部吊打一户地主、一户中农逼要银洋的事情。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安徽省委派出检查组进行了调查，并于1958年12月26日报告毛泽东，说信中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对此省委作了自我检查，并采取了措施，进行了处理。

[2]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给袁水拍的信[1]

（1958年10月2日）

水拍同志：

诗二首定稿，请照此发表。可以照我写的字照像刊出，以为如何？字不好，与诗相称，似乎适宜。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发表两首诗给袁水拍的信。

灵机应变主动在我[1]

（1958年10月5日）

一

为了粉碎美国的“停火”“撤军”阴谋，使其不能解脱绞索，为了加深和扩大美蒋之间的矛盾，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办到这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紧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等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据似乎较为有利。

二

为了打破美国停火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过去那样的大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所作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和三是毛泽东在指示稿中加写的两段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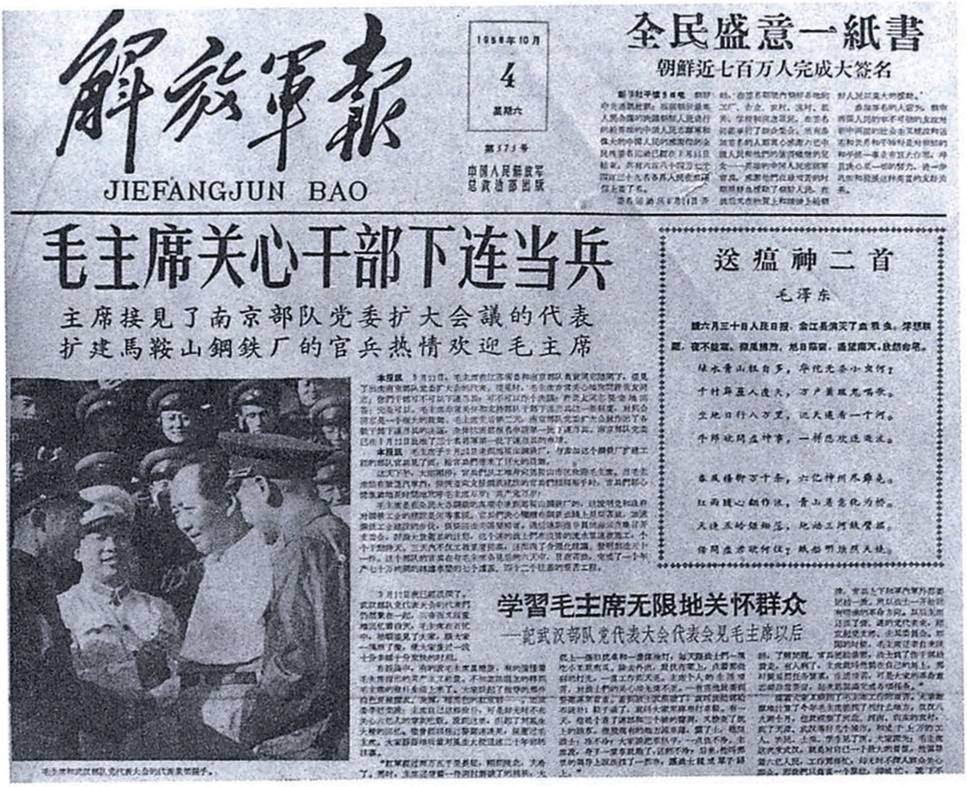
打。灵机应变，主动在我。

三

此件[1]同时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书记处同志和各军区的负责同志。请受件人注意保密。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1958年10月5日24时《关于当前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示说：自8月23日以来，我军炮击封锁金门的斗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炮击金门以来的情况变化是极其复杂的。蒋介石集团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惶惶不安，但是在美国海、空军的掩护下，仍在竭力向金门、马祖运输物资，企图坚守金门和马祖，并用各种办法拖美国下水。美国在我炮击后，虽然对我继续进行军事挑衅，积极援助蒋介石集团，但又怕被拖下水而越陷越深。美国正在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企图摆脱其目前所处的进退两难的窘境。美国可能的阴谋有：第一，玩弄所谓“停火”阴谋，争取蒋军不从金、马撤退，或只从金、马撤退一部分；第二，要蒋介石撤退金、马，驻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得已时，掩护和强迫蒋军撤退。为此，军委决定减轻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使金门、马祖的蒋军能够生存下去。炮兵对金门各岛，在一定时期内，停止大规模的炮击，只作袭扰性的打击。



解放軍報

JIEFANGJUN BAO

1958年10月
4
星期六

第57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出版

全民盛意一紙書

朝鲜近七百万人完成大签名

毛主席关心干部下连当兵

主席接見了南京部队党委扩大会議的代表
扩建馬鞍山鋼鉄厂的官兵热情欢迎毛主席

送瘟神二首

毛泽东

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学習毛主席无限地关怀群众

——記武汉部队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見毛主席以后

毛泽东十分重视加强基层连队建设。图为1958年10月的有关报道。

关于暂停炮击和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给彭德怀、黄克诚[1]的信

（1958年10月5日、6日）

一

德怀、克诚同志：

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以上请即令行。或者即以此信转发叶飞、韩先楚[2]。

毛泽东

十月五日上午八时

此件处理后，*送总理一阅*。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2] 叶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

二

彭、黄，请发韩、叶[1]：

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2]。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毛泽东

十月六日上午二时

即送克诚办。

---

[1]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韩，指韩先楚。叶，指叶飞。

[2] 指毛泽东起草的、准备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1]

（1958年10月6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2]、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3]，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

[2] 康，指西康省，1955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3]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订立的《共同防御条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1954年12月2日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1]，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2]。美国人总

---

[1]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8年9月30日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么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2]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8月1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1958年8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9月15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136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10月6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奈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国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九年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德国人民在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德意志人民正在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西德政府的战争政策，为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和争取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德国人民的正义的斗争。

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当前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军事

挑衅和战争威胁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中国人民对于这种兄弟支持，十分感谢。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必将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

祝兄弟的德国人民在实现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于北京

祝贺几内亚共和国成立的电报

（1958年10月7日）

几内亚　科纳克里

几内亚共和国总理塞古·杜尔先生阁下：

10月5日收到你的来信[1]。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热烈祝贺几内亚共和国的诞生，祝贺几内亚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所获得的伟大胜利。我希望，我国政府对贵国的承认将导致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祝贵国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七日于北京

---

[1] 指几内亚共和国总理塞古·杜尔1958年10月4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我荣幸地通知你，几内亚国民会议于1958年10月2日宣布了几内亚共和国成立。几内亚政府已于当天组成。作为独立和主权国家，几内亚愿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给仇亦山的信

（1958年10月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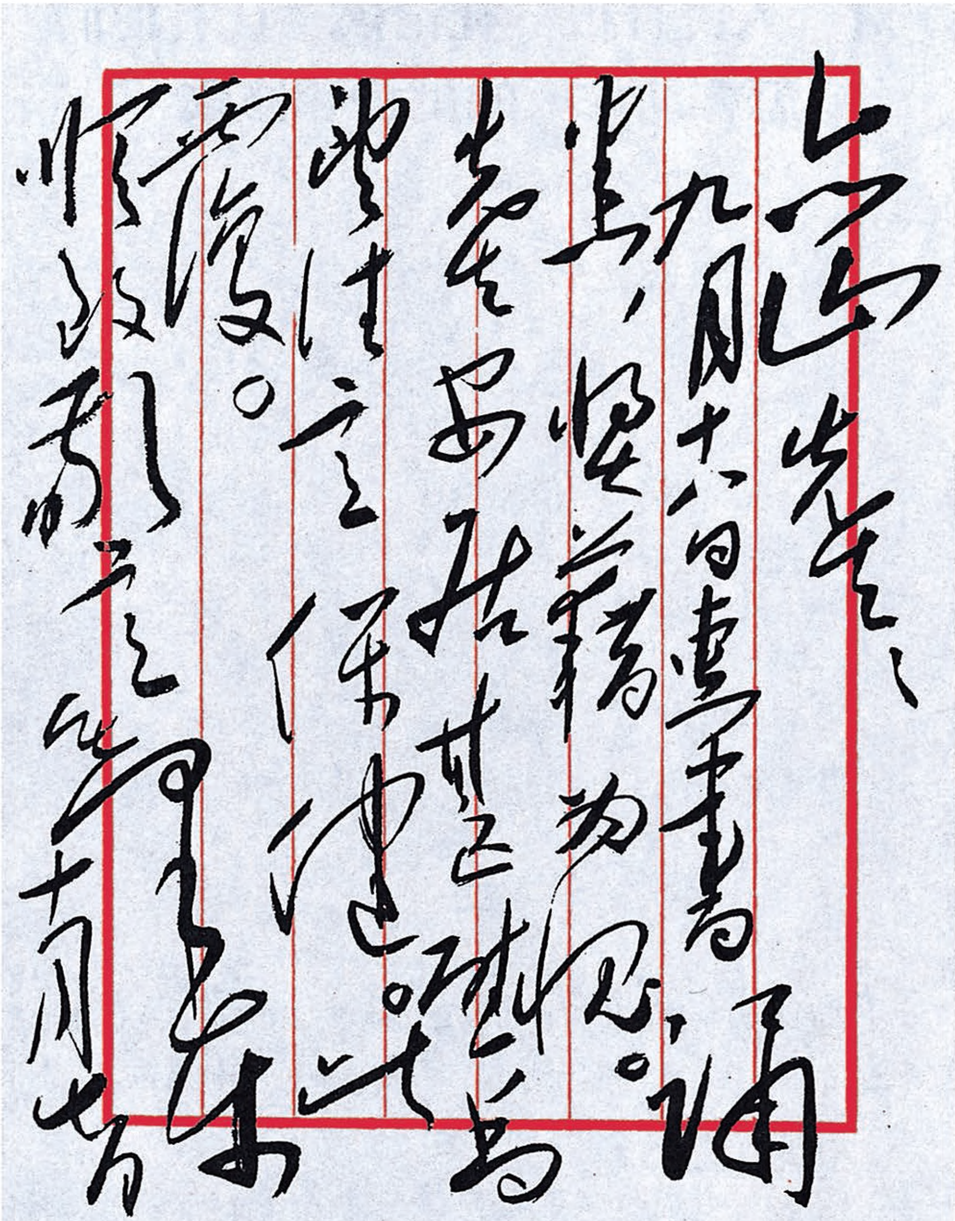
亦山先生：

九月十八日惠书诵悉，奖籍为愧。先生安居甚慰，尚望注意保健。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十月七日



亦山先生：

九月六日惠书诵悉，坚益精为慰。老安居甚适为望注意保健。此布复。

顺致

敬礼

毛泽东

十月七日

毛泽东致仇亦山信的手稿。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且看他们怎样动作》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10月9日）

一

退吴冷西[2]同志：

不算好，勉强可用。

毛泽东
十月九日六时

二

中国内部的事情应当由中国人自己处理。我们的内战，三十年了。这三十年中，有一两年没有打，其余的时间都消磨在大大小小

---

[1] 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且看他们怎样动作》时修改的两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于1958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的战争中。

三

看来，问题尚有待于观察和考验，离解决之期尚很远。帝国主义到底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到底是反动派。且看一看他们究竟怎样动作吧！

关于转载《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给吴冷西的信[1]

（1958年10月11日）

冷西同志：

信[2]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3]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

---

[1] 张春桥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最早发表在1958年9月16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用了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吴冷西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谈了对张春桥的文章有不同意见，请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关于苏共中央来信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1958年10月11日）

恩来同志：

苏来件[1]不忙复，谈一下再说。

曹聚仁[2]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

叫克诚将八月十九日汕头空战以来五十多天中，我歼敌机多少，敌歼我机多少，确查统计，准备告诉苏方。他们信敌人谎报，不明实情。地空导弹应卖给我，由我使用，他们派少数人来教。我倾向这种方针。是否适宜，今晚或明晚可以商定。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

[1] 指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958年9月27日和1958年10月4日给毛泽东的信。

[2] 曹聚仁，文史学家，记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任《前线日报》编辑兼香港《星岛日报》特约记者。1950年移居香港，先后任香港《星岛日报》编辑和新加坡《南洋商报》驻香港特约记者。1958年回大陆采访，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接见。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1]的批语

（1958年10月11日）

尚昆[2]同志：

此件很好。卫生部党组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即今后举办西医离

---

[1] 指卫生部党组1958年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们于1955年12月开始组织西医学中医，除一般在职学习外，还重点组织了6个离职学习班（303人），以便进一步广泛推行西医学中医，并培植出一批在医疗、教学和整理研究中医学方面的骨干。现在中医研究院创办的一个班已于本年6月毕业。这个班于1955年12月开办，共有学员76人，年龄都在40岁以下。学习进程是：开始学习中医政策和辩证唯物主义；接着学习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即用现代语言编写的内经节要、伤寒论、金匮要略、本草经等讲义），说明中医的治疗规律和理论原则，主要方式是听取中医老师讲课和学员自习复习，共计6个月，使全部学员都具有读中医任何医籍的能力；然后学习中医临症各科，以自学为主、结合课堂辅导和临症见习，共计7个月；最后临症实习1年零3个月，分散在北京、南京、苏州等地，跟有经验的中医实习，实习时有部分学员曾到农村为群众治病，效果和影响都很好。从收获来看，76人中除个别人较差外，一般都能掌握中医的理、法、方、药一套治病规律。他们已经不同于一般的西医和中医，基本上能运用中、西医两套技术进行临症、教学和研究工作。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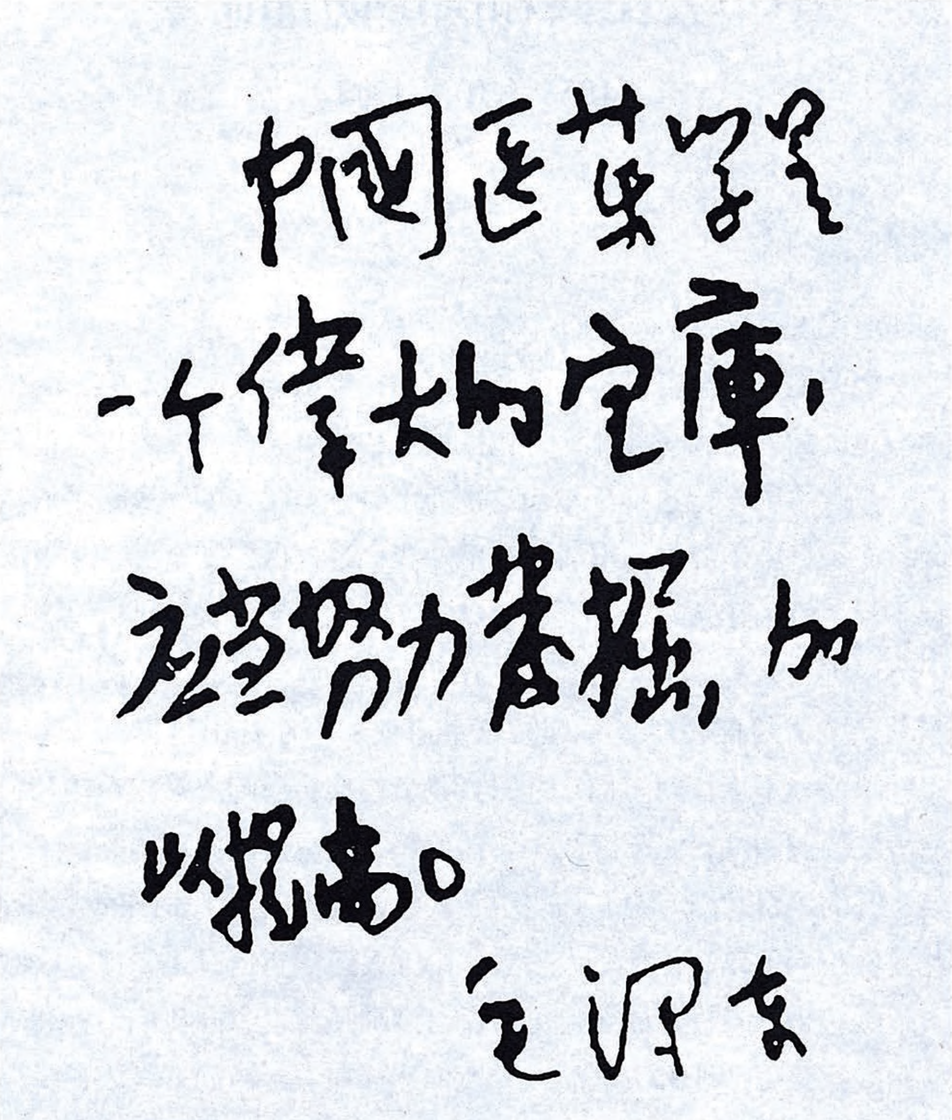
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负责办理。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此事请与徐运北[1]同志一商，替中央写一个简短的指示[2]；将卫生部的报告转发给地方党委，请他们加以研究，遵照办理。指示中要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指示和附件发出后，可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徐运北，当时任卫生部党组书记、卫生部副部长。

[2] 指中共中央1958年11月18日为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指示说，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经验很好，现转发给你们，请研究执行。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认真地学习、研究，加以整理。根据中央的方针，卫生部曾经举办了少数西医离职学习中国医药学的学习班，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很好。各省、市、自治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该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学生的条件，应该有大学毕业水平和二三年的临床经验，最好能有看中医书籍的中文水平。这样，在1960年冬和1961年春，全国大约就可以有2000名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请你们积极办理。这个指示连同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发表在1958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上。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

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的手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1]

（1958 年 10 月 13 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2]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

[2] 台、澎、金、马，指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

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1]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一时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再告台湾同胞书稿[1]

（1958年10月13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一星期过去了，炮没有打，一方清静。全世界欢迎，你们快乐。有几位先生有点不舒服，余悸犹存，胡思乱想。例如说：共产党向你们建议的是一条诡计。诡计吗？历史会来证明不是，而是一条较好的出路。例如说：七天之后又要大打。你们对我的第一封信有一个字没有看清楚，那就是“暂以七天『以』为期”的那个暂字，意谓可能延长，七天是暂时规定。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的领导人了，七天为期，六日开始。你们看见十月五日的南洋商报[2]吗？行人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一说

---

[1]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起草的、准备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后来改变主意没有发表，只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10月25日，毛泽东又重新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

[2] 1958年10月5日《南洋商报》刊载“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其中说：“据此间第三方面最高人士透露，最近已有迹象，显示国共双方将恢复过去边打边谈的局面。据云：在最近一周内已获致一项默契，中共方面已同意从十月六日起，为期约一星期，停止炮击、轰炸、拦截台湾运送补给物资在金门、马祖的一切船只，默契是这些船只不由美舰护航。”

共产党靠不住，你们有三十年和我们打交道经验。让我们算一下账吧。我们和你们历史上有过两次和谈。一次，1945年，各党派开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重庆，通过了一个全民团结共同建国的协定。是谁撕毁这个协定的呢？国民党。又一次，一九四九年，两党代表团聚于北京，议定了四十八条和平协定，双方全权代表签字同意。是谁不愿意批准这个协定宁愿继续打下去的呢？国民党。由此看来，你们经验虽多，不会总结。你们不自反省，反而归结为共产党不可信任。颠倒是非，一至于此！你们靠美国吃饭。靠得住吗？肯定靠不住，迟早他们要把你们抛到东洋大海里去的。下毒手要一下子置你们领导人于死地的，不是美国人吗？那个美国走狗孙立人[1]将军，不是被你们处置了吗？他是你们的一个武贼。洋奴胡适[2]，组成派别，以自由、民主为名，专门拆国民党的台。你们不是大张挞伐，拼命抵抗过一阵子吗？他算是一个文贼，仗美反华，余威尚在，我看你们还难安枕吧。你们看，美国人有一毫一厘一丝一忽所谓仁义道德吗？其他种种，千件万件气死人的事，你们一一亲历，不必我来多说。积怨如山，一旦爆发，于是有去年五月二十〔四〕日

---

[1] 孙立人，曾任台湾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1955年8月，被蒋介石以“阴谋叛乱罪”撤职，后遭软禁。

[2] 胡适，1938年至1942年间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1958年4月自美返台就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曾因刊载胡适等人为蒋介石“祝寿”（1956年10月30日为蒋介石七十寿辰）的文章，受到国民党报刊的猛烈抨击。台湾当局“国防部总政治部”的“特种指示”称：《自由中国》“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曲论调”。

之役[1]。这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要大书特书的。什么美国大使馆，三拳两脚，打个稀烂。做得对！做得好！因为那些人欺人太甚。你们有些人说：共产党离间你们与美国人的关系。什么叫离间？你们对待一个文贼，一个武贼，一个大使馆，较之我们说几句闲话，即便叫做离间，谁的分量重一些呢？我们就是企图唤醒你们，坚决跟美帝国主义离开，跟伟大祖国靠拢，这样难道不好吗？我们无求于你们，只是希望你们实行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三民主义，然后逐步进到社会主义，如此而已。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你们的一位军事发言人说：停火七天太短，没有码头，全靠手搬，供应不了许多东西。这是实情。为此，我们决定，再停七十天，从本日算起。期满如有必要，可以考虑延长。你们怕我们大举进攻。那么，你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多运粮，厚筑墙。你们中间又有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这是共产党的又一条诡计。告诉你们：确是如此，但非诡计。谈判未举行，和平未实现，贵我之间战争状态依然存在，当然只好谈谈打打，打打停停。但是这里所说的谈，不是华沙会议的谈判，专指我们两党之间的谈判。内政问题，不容外国干涉，华沙未

---

[1] 指台湾“五·二四”事件。1957年5月24日，美国军事法庭宣判无故枪杀国民党少校军官刘自然的美国士兵雷诺兹无罪，引起台北数万人举行反美示威，示威群众捣毁了美国驻台湾“大使馆”和美国新闻处，并要求美军撤出台湾。示威活动迅速扩展到其他城市。

便谈此。华沙谈的，是一个美国人走路的问题。美国人同我们讲生意，想以金、马换台、澎，造出两个中国来。他们的梦多么甜蜜啊！停火，停火，再一个停火！我们不知道美国官员们究有多少常识。看起来似乎不很多吧。说他们代表美国自己谈这个问题吧，中美之间并未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不能代表自己。说他们代表你们吧，也是冒充。你们的领导人反对华沙谈判，并且讥笑停火。你们没有委托美国人当代表。假如委托了，我们也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中国两个政党不去直接谈判，要委托一个外国做代表呢？这种谈判，我们感到羞耻，因此不可以谈。华沙谈的，只能是一个中美关系问题，一万年也是如此。台湾的朋友们，不可以尊美国为帝。请你们读一读鲁仲连[1]传好吧。美国就像那个齐湣王[2]。说到齐湣王，风烛残年，摇摇欲倒，他对鲁卫小国还要那样横行霸道。六朝人有言：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现在是向帝国主义造反的时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一时

---

[1] 鲁仲连，战国时齐国人，善谋划，常周游列国，排解纠纷。公元前258年，秦军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派人向魏国求救，魏王畏惧秦国，遣使劝说赵王，欲尊秦王为帝，以求罢兵。鲁仲连游说赵、魏两国，不尊秦王为帝，秦军无奈，随之“却军五十里”。

[2] 齐湣王，战国时齐国君，曾与秦昭王并称东、西帝，攻打周围小国。后各国联合攻齐，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攻破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出走至莒，不久被楚将淖齿杀死。

关于找草书字帖给田家英[1]的信

（1958年10月16日）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2]等），于右任千字文[3]及草诀歌[4]。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5]？）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王羲之，东晋书法家。

[3] 于右任千字文，指书法家于右任（曾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选用历代草书名家的草字双勾而成的《标准草书范本千字文》。

[4] 草诀歌，指明代韩道亨所书草楷对照的《草诀百韵歌》。

[5] 郑振铎，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关于到河南遂平调查人民公社问题给陈伯达的信

（1958年10月）

一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1]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廿一日刘子厚[2]同志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3]准备意见，很有必要。可带李友九[4]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

[1] 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2]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3] 杭州会议，似应为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4] 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到郑州时，最好能请史向生同志和你们一道去卫星社。史对人民公社有研究，他去过卫星社。他是省委书记。

二

伯达同志：

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建议将胡绳[2]、李友九都带去，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我**过了下星期**就去郑州，一到，即可听你们关于卫星社观察所得的报告，在四省第一书记会议上予以讨论。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半

---

[1] 指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

[2] 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三

陈伯达同志：

你们调查研究卫星社大约要一个星期，包括调查团（社）营（大队）连（队）的各项问题。然后，请找遂平县级同志们座谈几次，研究全县各项问题。以上请酌量处理。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下午五时

四

陈伯达同志：

回信收到。我还须几天才能出发。如果遂平调查已毕，你们可去附近某一个县再作几天调查，以资比较。于十一月二号或三号回到郑州即可。已令吴冷西、田家英[1]二同志昨日夜车出发，分赴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几天再去郑州。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四时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958年10月17日，毛泽东接见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杨才魁。

关于国防部恢复炮击命令的批语[1]

（1958 年 10 月 20 日）

一

照办。

毛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58年10月20日12时半关于警告美舰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稿和国防部恢复炮击金门的命令发布问题的报告上的两个批语。周恩来的报告说：“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十二时半起广播，连续二次，中外文相同。新闻稿附后。国防部命令稿已写好，现送上请批阅后即退我，再以打字稿分送邓、陈、黄三同志核阅。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三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

二

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毛泽东
十月二十日下午一时

给周恩来的信

（1958年10月25日）

恩来同志：

此件备用，是否用，何时用，待今晚或明天商谈一下。

增加一段，插入第4页。

请饬人打出几份，以一份并原稿交我。请乔冠华、浦寿昌[1]二同志加以校正，并付翻译。

毛泽东

十月廿五日上午八时

---

[1] 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浦寿昌，当时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再告台湾同胞书[1]

（1958年10月25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2]，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3]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

---

[1] 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再告台湾同胞书。

[2]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 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首领，曾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长期统治东北。1926年自任安国军总司令，联合直系军阀吴佩孚入据北京。1928年6月同蒋介石作战失败后退回东北，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

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1]，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

---

[1] 蒋、杜会谈，指蒋介石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8年10月21日至23日在台湾举行的会谈。会谈公报中说：“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是自由中国的以及广大中国人民所抱希望和愿望的真正代言人。”

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给周世钊[1]的信

（1958年10月25日）

惇元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2]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

---

[1] 周世钊（1897—1976），字惇元，湖南宁乡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蒋竹如（1898—1967），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1]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

[1] 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 α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时和钱学森的谈话[1]

（1958年10月27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们还是一九五六年在政协见的面。那一年，全国的干劲很大，第二年春天也还有劲，以后就泄气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来个反冒进，真是一股邪风。说“马鞍形”是不错的。

钱学森：我不懂农业，只是按照太阳能把它折中地计算了一下，至于如何达到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发现那个计算方法也还有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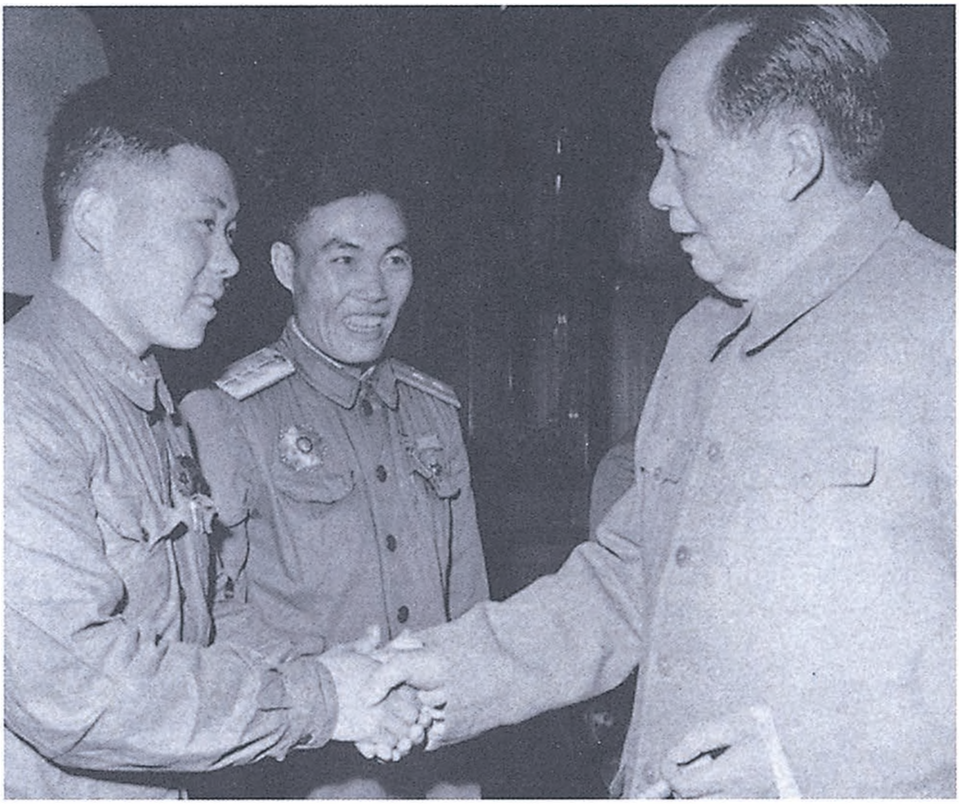
毛：原来你也是冒叫一声！

毛：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对的，现在的灌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丰产的主要经验，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阳，让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机物，才能长得多，长得快。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求深耕细作，少种多收。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来的土地可以绿化，可以休闲，可以搞工厂。

---

[1]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到中关村参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这是在参观过程中和钱学森谈话的一部分。

1958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志愿军代表团。



1958年10月29日，毛泽东接见志愿军“罗盛教式”爱民模范黄治富、二级战斗英雄王占山。

1958年10月29日，毛泽东和朱德、杨勇上将、王平上将在一起。

对王鹤寿[1]关于钢铁方面几个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10月30日）

此件[2]很好。请彭真[3]同志即印发有关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并带至武昌准备发给到会[4]各同志。这是我要鹤寿同志写的。我已另要赵尔陆[5]同志写一件。煤炭，电力，石油，化学，森林工业，建筑材料，铁道，交通等单位，请书记处通知各负责同志都写一件。文不要长，要是能看出问题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

---

[1]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2] 指王鹤寿1958年10月29日关于钢铁方面应当立即动手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全党全民抓钢铁的群众运动已经两个月。我们对当前运动有以下体会：（一）两个月解决了工业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两个月来，在我国钢铁工业战线上，以至整个工业战线上，进行着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就是在政治挂帅、思想解放指导下，用群众运动大搞钢铁工业

建设和整个工业建设。现在全民大搞钢铁，声势浩大胜过淮海战役的群众运动，由何而来呢？除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思想基础以外，今年有两个伟大的日子，一个是6月19日，毛主席提出了钢翻一番的任务，它的意义在于提出了高速度发展的可能性；一个是8月16日（北戴河会议的前一天），毛主席提出了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抓钢铁工业。两个月的实践证明，在钢铁的生产建设上，虽然困难很多，但是只要书记挂帅，群众一起来，什么问题都会很快解决。完全没有搞过钢铁的群众，很快能生产出几百万吨的钢铁；没有设备，机械制造部门很快制造出千万吨能力的设备；20多天建设起年产60多万吨的炼钢厂（上海）；四个多月建设起一座1500立方米的大高炉；没有铁矿，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发现几百亿吨的矿量等等。所以书记挂帅，全党全民搞钢铁，它的意义绝不只在于保证今年钢铁翻一番的作用，主要的还在于我们弄清楚了一个工业中的根本问题。（二）“小土群”和“大洋群”还要继续“过关”。目前全民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小土群”和“大洋群”。小土群应该向建立钢铁基地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现有炼铁炉群、炼钢炉群的基础上，迅速增加土轧钢机以及土炼焦厂、耐火材料厂等等，以便形成一个小的钢铁联合企业。至于“大洋群”还存在“不准革命”和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所谓“不准革命”，就是在部分大钢铁企业的干部思想中，把“马钢宪法”（指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公司的组织规程和技术规程）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不准群众超过这些条文。过去，我们学习了“马钢”的经验，帮助我们否定了日本的技术操作，从而使产量提高了一倍以上。所以苏联的经验是必须学习的，苏联专家帮助我们提高生产的功绩，是极其伟大的。但是群众不断地创造出了更先进的经验，我们应该根据群众的创造，不断地革命。因此，在大企业中，解放干部思想，敢于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是当前的一个主要问题。（三）两种不同样子的完成计划。就目前的形势看，完成全年钢产量翻一番的计划，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样子。一种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重点钢铁厂，都大致按预计完成产量指标；一种是就总的数量看完成了钢翻一番的指标，但是土法炼出的钢大大超过计划，而各重点钢铁厂没有完成原定的钢产量，使我们得不到应有的钢材。我们希望争取前一种，但现在重点钢铁厂确有完不成计划的危险。这是目前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形势，不改变这种形势，我们完成计划的样子将是不好看的。（四）目

前生铁生产和钢的生产的关键在哪里？目前生铁的关键问题，已经不是数量问题，而在于能否炼出更多质量更好的生铁。而钢的生产要过两个关，一个是洋炉（平炉、转炉）用土铁炼钢的技术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是土法炼钢如何提高。土法炼出的钢大部分只能锻打成不大的体积，而不能铸成较大的钢锭，以轧成各种钢材，因此限制了它的用途。这一问题不解决，土钢的发展将是困难的。解决的办法是推广能够把生铁炼成钢水的土炼钢炉。有些省、市的土平炉和土洋结合的小转炉，就是土炼钢炉中可以推广的。（五）为了明年，现在抓什么。明年钢铁的生产指标是：铁4500万吨，钢3000万吨。现在应该抓三件具体工作：一是把现有正在建设的炼铁、炼钢设备配齐。二是迅速增加轧钢设备。三是各省、市、自治区需要争取在今年各建设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中等规模的钢铁厂。有了一个中等的或几个小的能轧出钢材的钢铁厂，明年就能争取主动。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指准备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举行。

[5] 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对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意见的批语

（1958年10月30日）

一

乔木[1]同志：

此件[2]很好，可在红旗发表。

毛泽东

十月卅日下午十一时

二

插红旗，拔白旗。[3]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指中共湖南省委1958年10月20日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其中介绍了被称为“一面共产主义的鲜艳红旗”的南县华东农业生产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朱元生和被称为“一面资产阶级思想的白旗”的浏阳县星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队长刘耀琪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表现。意见认为这两面旗帜，

两个对立面，充分反映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农村的共产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思想斗争的缩影。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已经迅速成长，成为运动的主流。另一方面，有一部分人反对公社统一分配，认为违背按劳取酬原则，穷社剥削富社，不公平，不合理，不能发挥劳动积极性，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理解共产主义。同时，秋后算账派大肆反攻，干部中也有人对人民公社来得如此快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很有必要通过人民公社运动，来一个全民的共产主义思想大革命，大破大立，将一切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右倾保守等等白旗或灰旗，通通连根拔掉，让共产主义思想占领全部阵地。1958年1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意见。

[3] 这是毛泽东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开展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而拟的标题。

金门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

（1958年10月31日）

恩来、陈毅、克诚[1]同志：

应将逢双日不打[2]的地方加以推广，就是说，逢双日一律不打炮，使蒋军可以出来活动，晒晒太阳，以利持久。只在单日略为打一点炮。由内部通知福建实行，暂不再发声明。待有必要，再考虑发一声明。此事，请你们商量酌定。

我今日下午南下。

毛泽东

十月三十一日上午二时

---

[1] 恩来，即周恩来。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从1958年10月上旬开始，中共中央军委令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采取打打停停的方式炮击金门。10月25日，国防部又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

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1958年10月31日）

你们这里是河北省水利化先进的地区？今年的水库用上了没有？（□□□：有的用上了，有的没有用上。）

这里有什么铁矿没有？（□□□：井陉、平山、获路等十几个县都有铁矿，估计有□□□吨。）可以在这里搞个大钢铁厂了，你们不一定在邯郸搞一个大钢厂吧，在这里也可以搞一个吧？

今年的麦子种得怎么样？每亩下种多少斤？犁多深？（□□□：一亩下种三十多斤，耕一尺多深。）今年一尺多，去年才有三四寸，那就不错吧，是否准备大面积丰产，五千斤到一万斤有没有？（□□：有一个县搞一万斤。）你们今年小麦平均多少？（□□□：二百七十斤。）今年丰产，有上帝帮忙，究竟不算。白薯亩产千斤的有几个县？（□□□：有十四个县。）那还有十几个没达到。今年小孩摘棉花，将来农业是妇女和娃娃们的事情。

究竟是否需要化肥，要它干什么？我看就搞土化肥好了，不搞洋化肥怎么样？拖拉机是否需要？（□□：拖拉机搞深翻地还有用处，带三铧五铧改成带一个犁可以深耕。）这样子你们要拖拉机了。化学肥料不要可以吧？（□□□：有些还是好。）搞土化肥，洋化肥是否少搞一些？你们这里有拖拉机厂没有？（□□□：有一个，现在搞鼓风机。）暂时休息，只搞鼓风机，不搞拖拉机。

人民公社搞得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有几种，有的在一起吃，有的打回家去吃。）打回家去不冷了吧，食堂里做不做菜？你们食堂有办得好的吧。比较一下，分一、二、三类，都要向一类看齐，人民是否欢迎吃大锅饭？过去不欢迎，现在欢迎了。（□□□：正定县妇女罢了一天工，食堂就办起来了。）正定罢了一天工，真有其事，罢一天工有什么不好，进步的罢工，是对落后分子最好的批评。

一个食堂，一个托儿所，两个事注意搞好，搞不好影响很大，影响生产，饭吃不好就生产不好，小孩带不好就影响后一代。保育员要像母亲那样关心孩子，你们有没有人管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对孩子一叫一闹就打不好，要叫小孩子吃得好，穿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要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一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你们听说过李顺达那个社吧？他这个社就是在太行山上，七扶八扶起来了。不能发工资的社要把它扶起来。种些核桃，核桃是高级油料。将来普通油料是吃不开的，菜籽油是吃不开的，要种些芝麻，叫人吃香油嘛。此外要喂羊子，喂羊和林业有矛盾，吃光了山。好处是，一个拉肥料，一个是羊毛。我们这里有多少羊？（□□

□：四十八只。）你们（指□□□）那里羊多一些，（□□□：张家口地区多。）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一百一十元。）你们要摸一下底，看生活水平情况怎么样，有高有低吗？安国比徐水高多了，徐水是七十元，安国是一百一十元。安国很值得注意，你们这里有没有像安国这样的县？（□□□：正定县好，棠城比正定还好。）正定这个县比较好，棠城比正定还好，离这里有多远？深县是你们这里的吧，他们种的蜜桃很好，把深县这个县都种成蜜桃可以不可以？

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份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百分之十五，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吗？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啸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四百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关于转载《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批语和对《人民日报》编者按的修改

（1958年10月）

一

吴冷西[1]同志：

这篇文章[2]可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世界知识》编辑部将我各个时期阐述这个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放在一起，看起来好像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小册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册子。你看如何？请你和陆定一[3]同志商量一下，看他同意否？《世界知识》编者按语，或者照登，或者另写一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1958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转载《世界知识》杂志摘录的《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一组论述。1958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转载时，补充了一些材料，在编排上作了一些调整，并改题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段，由你酌定。

毛泽东

二

这些文章、讲演和谈话，虽然多数是发表过的，没有发表过的只占少数，时间前后相距二十年之久，又是采取集纳的形式；但是看起来却使人感觉好像是一篇新的完整的政治论文。其原因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一方，各国人民为另一方，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美帝国主义又特别张牙舞爪，以原子战争威胁世界和平，被压迫受威胁的人民的心思被这种紧张局势所吸引，迫切地要求解决这个矛盾，故尔使得读者对毛泽东同志关于论述解决这个矛盾诸多问题中的一个首先和主要的问题，纸老虎还是并非纸老虎的问题，自然感觉兴趣。[1]

三

编者按：当时的人口调查不确实，以为全国只有四亿五千万人，解放以后经过确实调查，中国人口有六万万。[2]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编辑部为转载《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编者按语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2] 毛泽东这个编者按，加写在《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摘录的毛泽东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已经打得很疲倦，而且在中国解放区还只有一万万多一点的人口。”

对《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的批注[1]

（1958年10月）

一

不对，又自己矛盾。[2]

---

[1] 这是毛泽东对1958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郑季翘《谈谈削除资产阶级法权》一文的批注。

[2] 郑季翘的文章说：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一开始就具有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性质。恩格斯举出事例证明这种性质，即：最先承认人权的美国宪法，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黑人奴隶制，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待到后来，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这就完全揭穿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自由、平等的虚伪性”。毛泽东在其中“阶级的特权受到了指斥，而人种的特权却为法律所神圣化”，“由于世界上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资产阶级国家便竭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即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的人权”等句下面划了横线，有的地方还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二

形式的而已。[1]

三

这是等价交换吗？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了？在这里，只是一个欺骗工人的等价形式。

这是对的。[2]

---

[1] 郑季翘的文章说："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就在于它把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愈益分成为两大敌对的营垒、两大彼此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经济状况的不同，在生活上以至在社会地位上会形成不同的等级；但作为资本主义法权来说，则不能说其核心是等级制度。相反，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在这句话中的"在资产阶级的宪法上写着的，是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处划了横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2] 郑季翘的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法权，本来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要求的反映。所以，这种法权，也特别强化了自由贸易和等价交换的合法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既然成为商品，所以劳动力也是'等价交换'的，因而，'做多少事，给多少钱'，就成为这个社会特别显著的特征。"毛泽东的前一句批注是针对这段话写的。紧接着，郑季翘的文章说："这种状况，蒙蔽了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性质。资产阶级遂据以大事宣传其社会的自由和平等，并说这种社会是'永恒的真理'的化身。"毛泽东的后一句批注，是针对这一段话写的。

对驻苏大使馆关于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8年10月）

刘晓[2]同志和他的助手是能想问题的。此件可以一阅。退毛

---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8年10月20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自中苏北京会谈以来，苏联各方面情况都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第一，在国际斗争方面，苏联对于和平和战争的问题，依据中苏会谈公报精神，较之以前作了比较完善的论述。赫鲁晓夫从北京回来后的几次公开演说和苏联报刊宣传，都强调了我们不怕战争和和平不能乞求的正确立场。苏联对东风压倒西风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但认识的深度还不足，对战争与和平、紧张与和缓的辩证关系理解不够深刻，掌握不够熟练，对于现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和毁灭性仍有顾虑，甚至在指导思想上还占着上风。第二，在同我国的关系方面，由于中苏两国政策思想更趋一致，苏联在国际斗争中同我国的配合比较密切。苏联对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我国对苏联的影响，已在若干政策上发生作用，他们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但苏联对于我们党的战略思想和策略的运用以及我国当前发展的许多新事物新思想还理解不深，对人民公社运动、向共产主义过渡、吃饭不要钱和目前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等问题不很了解。第三，在反对南共修正主义方面，目前苏联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局限于赫鲁晓夫在东德党的“五大”的演说中所提出的，苏联将继续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但不扩大现有冲

突和不恶化关系这一政策范围内。第四，苏联国内情况最突出的变化，是苏联特别强调要加速建设的速度。赫鲁晓夫从北京回来后的公开讲话和报刊宣传，都强调要赢得时间，加速建设。报告还说，苏联形势今后继续向着健康的方面变化的这个总趋势是肯定的。这将主要表现为曲折和渐进的变化过程，但变化的快慢将最终取决于苏联内部和外部因素对它相互影响的发展。

[2] 刘晓，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听取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

（1958年10月）

一、今后要改变广种薄收、务广而荒的办法。现在耕地面积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两亿多劳动力搞饭吃，不像话，要逐步缩小面积，精耕细作，种少种好，少种多收。深耕要逐步做到翻三尺，只有深翻，水、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以后单位面积产量搞到万斤，每人二分地就可以了。

二、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没有可以交换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药材等。

三、交换问题，交换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地卑视交换是不对的。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卑视交换，卑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四、两个出路。劳动力很紧张，这是个大问题。出路一个是改变广种薄收，少种多收，可以省工、省水、省肥等。一是机械化，目前是抓工具改革。将来达到一半劳动力搞工业，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像个样子了。

劳动组织分工要适当固定起来。工业、农业劳动不固定起来

不好。

五、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给制部分搞得不要太多了，供给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额，级差不能太小，否则，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减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六、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成本一万元，工资八百元，积累七千二百元。一个农民一年生产不过七百元，二十五个农民顶一个工人的产值。鞍钢产品可以全国调拨，农业上可以调拨的就不多，所以十二年能过渡了就不错。

七、不论搞什么工作，像搞人民公社，不能走马观花，要搞透一个公社，解剖一个麻雀，就可以有把握。学马列主义也是一样，书看得很多，不透，不好。我最近看参考资料，很仔细，每次看几遍，多看一遍，就多一些收获。

八、明年要大搞农业生产，省的第一书记要一手抓工业，一手抓农业。县的第一书记，除少数搞工业的重点县外，都要抓农业。

九、可不可以不走化肥的道路。（今年化肥生产一百八十万吨，明年只生产六十到七十万吨，进口化肥也要减少了。）今年没有化肥，粮食搞到八千亿斤，棉花搞到八千万担，证明可以基本不靠无机化肥，主要靠有机肥料和土化肥。

可不可以不走拖拉机的道路，走绳索牵引机实现机械化、电气化的道路。

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1958年11月1日）

今年大丰收，老百姓高兴吧？要求休息两天吧！看来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一个月休息两天，放了假啥也不做，一年才二十四天不算多，过了十一月份后放假一个礼拜，好好休息一下。这算不算个问题，你们想一想。（□□：钢铁这一关还没过去，还要再突击一个月。现在是准备几天，突击几天。）准备几天，突击几天，钢铁是这样，农业也这个样是否行？农业上的棉花啥时可以收完？（□□：现在棉桃还没有开，还要一个多月。）这时棉桃还没开，它就不准备开了吧，剩下这些活叫娃娃们去搞好了。现在紧张，要轮班休息，十一月份叫他们休息两三天行不行？群众有什么不满意的吗？（□□：一个是累，一个是吃不好，群众有些意见。）是啊！一个是吃冷饭，没有菜，一个是托儿所，一个是累，三件事。大人、小人要吃饭，吃了饭他们要干活。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八十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没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了吧？（□□□：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没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

经济作物吧！鸡鸭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你们是两个区合并的，九个县一个市，那和石家庄一样了。你们的粮食去年是二十二亿斤，今年七十亿斤，翻一番是四十四亿斤，这么你们翻两倍多了。你们每人吃四百斤不够吧？你们这里吃饭还要不要钱？明年粮食计划生产多少？（□□：计划一百七十亿斤。）你们今年是一千万亩麦子，去年是多少？（□□：七百万亩。）七百万亩，今年一千万亩都施底肥了吧？以后还要施追肥，每亩下种多少？（□□：二十五斤以上的占百分之九十五。）亩产多少？你们这里是两白两黑，两白是棉花、小麦，两黑是钢铁、煤炭。你们种五百万亩棉花，青麻还有什么经济作物？青菜由哪里来种？你们这里食堂吃饭有菜吧？一个月吃两次肉行不行？你们要一个人一口猪，一口猪一百斤，平均每天六两肉，那就每天可以吃肉了。（□□：公社化后猪减少了些。）是死了还是卖了？猪也要改善一下生活么。明年亩产千斤，亩产八百斤也就好了，今年小麦亩产多少？（□□：二百零二斤。）明年三百零二斤也就满意了。（□□介绍了临漳县搞的百里丰产川计划亩产五千斤。）临漳离这里有多远，路好走吧？出门坐火车不好看，这是老太爷的车，坐汽车也就好看了。

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死不跃进的县？（□□：不是他这里，是石家扈县，白旗也拔掉了。）有白旗，当然不会跃进了。

你们麦子一千万亩，大面积丰产二百五十斤。什么人搞这些丰产亩？是不是青年突击队？也有老人吧？（□□：有青年也有穆桂英队、佘太君队。）有佘太君队，搞这个有味道。把这些丰产方法推广，一推广就照他这个办法，那么，你们种植面积就可缩小到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亩，用这个方法缩小种植面积，好

比这个桌子，两头的桌子都不种了，就种中间这一个，又省水，又省肥，又省人力。这个方针是河北省提出来的，过去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现在要精耕细作，少种多收。

你们小麦四百万亩，一亩一万斤就是四百亿斤，六百五十万人，四百亿斤就吃不完么？桌子可以砍掉一半，耕它三尺深，其余的叫它休息一年。我在安徽省看每地都烧肥，把那些主根子、杂草，一堆一堆地堆起来，叫作熏亩，地一休息，阳光一晒，一分化，一熏，我看是要走这个方向。在北戴河我提出种地三分之一，其他种草、种树，没水的挖塘养鱼。将来不是地少，而是地多，少种多收。深耕也就是耕三四尺。细作无非是中耕、追肥、追水、治虫那套么，少种多收，也就是种一亩收一万斤。过去几千年都是浅耕粗作，广种薄收。

再加上一条机械化。你们这里有钢，有没有机械厂？（□□：有个小机械厂。）可不可以生产拖拉机？（□□：做不了拖拉机。）你这个人就是志气不大!不用拖拉机行吗？用绳索将来用钢丝牵引。肥料不要洋化肥，只要土化肥行吗？我觉得有机化肥对作物有利，人畜拉的屎尿你们压绿肥用什么？（答：用紫穗槐。）这可以代替洋化肥吗？明年可靠它。是否我们国家基本上不用拖拉机，少要一点，不是拖拉机化。洋化肥也是大部分不要，少搞一点，用在那些需要的作物上。这是我提出来交换意见。我看没有洋化肥，亩产一万斤，苏联有了它是一百八十五斤，我们是万斤可是没有洋化肥。拖拉机也是一样。土化肥就是洋化肥，第一，是人畜拉的屎和尿，第二是压绿肥，第三是土化肥，这些都是化肥。（□□：全专区有二十三万个化肥厂。）好吧！在当地群众搞，比洋化肥好。

北戴河提出三分之一种庄稼，三分之一种草、种树。树木经济

价值很大，木柴是化学原料，可以多种些。

拖拉机是否少搞一点，但是要机械化，用其他的形式，用中国的形式。少搞洋化肥也当作一个问题来考虑，机械化是否一定要经过拖拉机？肥料是否一定要经过洋化肥？人畜屎尿绿肥、土化肥、拆炕、拆墙、挖河泥，多得很嘛！

你们钢铁任务多大？（□□：一千一百零五万吨，七万吨钢。）你们钢的原料从哪里来？什么叫低碳钢？合碳多少？（□□：不清楚，说元朝都在这里炼过钢。）你们怎么知道是元朝的？你们这里有多少矿石？（□□：勘查清的有□□□吨。）含铁百分之六十，就□□□吨铁。这两个月矿藏资源查清楚些了吧？（□□到处说有矿，越来越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了。）由糊涂到清楚，用铁垒梯田、垒墙、垫路，你看我们国家有多富，土都是铁，不开矿挖土嘛！

你们这里有铜矿没有？（□□□：勘探清楚的有□□□□万吨）有铜矿就搞些铜吧！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把劳动组织，组织得更好些，又完成任务，又吃好，休息得好，这样可不可能？解放妇女，看拿些什么人去教育孩子，青年不愿意去，搞那些老年人去，是搞钢铁重要，还是小人重要？还是小麦、棉花重要？这是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就显示不了优越性。这是一个大事，每个省、专、县都要注意下一代的问题，我们再干它十年，总要他们来接替吧！要把这点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娃娃带好，在托儿所要比在家跟父母好些。

再就是吃饭，一是吃饭，二是吃好。不要吃冷饭，吃热饭要有菜，菜里要有油和盐，要比在家庭、在小灶吃得好，这样农民才欢迎吃大锅饭。食堂要划分一下，一、二、三类，找一个一类食堂，

叫他们都向它看齐。（□□：涉县有一个食堂，吃玉米饭半月不重样，搞得很好。）这好么！把这个当成个大事，吃饭就是劳动力，吃早饭就是中午的劳动力，吃午饭就是下午的劳动力，吃晚饭就是明天的劳动力，要吃好，吃不好就没有劳动力。

再就是休息问题。下个命令，要休息，要睡够，要人吃，要人睡。现在不是军事化吗？下个命令睡觉，睡个中午觉，你们研究研究怎么样？冬天睡觉在地里太冷了，春、夏、秋都可以。不叫休息人民会不满意的。现在平均下来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下个命令至少睡六个钟头，睡完了劲更大。劳动增加了，干活效率会提高。

吃好、睡好、孩子带好。

对小孩要吃好、教好、管好。你们六百五十万人，百分之二十五就是一百六十万吧，这是一支很大的娃娃军。有的就是见物不见人，钢铁也是物么，种棉花也是物么，不管娃娃军就是见物不见人。托儿所要比家里有优越性，如果和家里差不多，一定会垮台，不垮台那才怪哩。食堂也是一样，如果不比家里吃得好，那也会垮台。

劳动力如果睡不好觉，私有都没有了，睡觉也是私有哩！在中午让他们睡一个钟头，你不是军事化吗？营长、连长开一次会，好连长应当是关心战士，给战士盖被子，不是老是只睡五个钟头，要睡七个小时行吧？不睡不行，睡觉是个任务，强迫命令一下，群众会欢迎的。这当作问题研究，不是作了决定。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你们这里公社平均一万户左右，你们这里是赵国，平原君就在邯郸。（□□：这里还有回车巷。）廉颇蔺相如还要回车，我们的干部有的闹不团结，连车也不回，还不如他们呢！

你们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大搞土法炼钢、秋收种麦、水库用劳动力，群众不能休息。）三大任务，有四百五十万劳动力，怎么组织好些？小土办法要一点，睡觉，一天一定要七个钟头，这是个任务，你们先试一试。小孩问题，都不愿管人，师范学院的不愿教书，这是本末倒置，愿管物，不愿管人，实在也怪，我愿在小学当教员，去管娃娃。睡不好觉，你们要看到后果，几年后是会受到影响的。苦战，睡觉算苦战任务之一，吃饭要吃饱吃好，睡觉就睡七个钟头。试一试看完成任务怎么样？我看不一定比睡觉少完不成任务。省、市、地、县委第一书记要抓管人的事情，这都是人的事情。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不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没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在新乡地区和五个县委书记谈话纪要

（1958年11月1日）

你们这里有没有钢铁？（□□□：有很多铁矿。）路东有什么铁？（□□□：路东没有，都在路西。）有多少参加搞钢铁？（□□□：一百二十万人）包括炼钢铁炼炭、运输？（□□：包括。）区有多少人口？（八百二十万人。）八个里头一个还多。天气冷起来你们怎么办？你们搞起来多少铁？是铁渣？是铁水？（□□□：全年任务□□万吨，已炼铁□□万吨。）不算铁吧，同志。（□□□：有百分之十的好铁可以上调的，其余我们可以自己炼钢。）可以炼钢是不是？又炒又打的办法？只炒不打可以吧？（□□□：要打。）一个炉子要多少人？（□□□：六七人。）一半炒一半打？（□□□：大致是。）你们炼多少钢？（□□：全年任务□□，已炼钢□□。）那你们可以不要干事情，睡大觉。下雨下雪怎么办？你们打算没有？（□□□：我们正在开会研究，打算十一月份下山一批。□□□：采取精兵的方法。）什么时候再上山？明年开春。你们准备下山多少？（□□：六十万。）还有六十万住在什么地方？下雨下雪，要叫他们生活好，工作好。山上的人都是青壮年吧？（□□□：也有很少年纪大一些的。）有妇女没有？（□□□：有，妇女顶大事。）顶大事。（□□：有这样个道理，妇女搞农业生产，没有男人熟练，不如男人。）搞钢铁男女都不会，大家一块学习。（□□□：有的妇女比男的学得

还快。）啊！有这个道理。一百二十万里头有多少妇女？（□□□：百分之四十，四五十万人。）

七里营的棉花收多少？（□□□：全年平均每亩皮棉二百多斤。）我去看的那一块呢？（□□□：还要多些。）你们种多少麦子？去年下种多少？（□□□：已经完成麦播计划，去年每亩地下种十斤左右，今年都在三十斤以上。）多一半还多。（□□□：还有下种几百斤、一千斤的。）太多了，挤死出不来。（□□□：分层种，像楼梯一样。）啊，麦子在楼梯上站着。（主席笑，大家都笑。）你们的地耕得深吗？（□□□：一尺二寸左右。）没有七八寸深的？（□□□：有。）五六寸深的？（□□□：很少。）要注意浇水、追肥、锄草、管理，要注意一下。

群众生活怎么样？食堂办得怎么样？（□□□：以连为单位办食堂，一个食堂几百人。）要轮流吃饭。（□□□：原来有打回家吃的，现在都集中吃。）打回家吃饭就冷了。吃多少粮食？（□□□：可放开肚子吃，不限。）这是一件大事，吃饭还有菜，都有菜吃吗？（□□□：有。）什么菜？（□□□：红薯、萝卜。）（□□□：七里营群众普遍可以吃上豆腐。□□□：还有豆芽。）冬天吃什么菜？（□□□：萝卜。）每人每月吃多少盐？能不能吃一斤？（□□□：差不多。一个同志说：现在市秤改为十两一斤了。）油呢？一天一个人五钱？你们明年要有计划种油料，你们有棉花，可以吃棉籽油，每人每月十五两。（□□□：可以。）不仅是饭，还要是菜，菜里还要有盐有油。猪肉一个礼拜吃一次行不行？（□□□：行。）鸡蛋呢？（□□□：猪肉、鸡蛋国家都收购，不能吃得太多。）

公社的工资普遍发没有？发的什么？（□□□：人民币。）人民币从哪里得来的？（□□□：政府收购物资。有几个人民公社不能发

工资？（□□：都能发。）靠不住。不出经济作物的地方，它只产一点粮食，哪有钱发工资？（□□□：受灾地方困难些，人民公社成立后，有灾区，有丰收区，可以互相调剂。）奖励工资究竟好不好？每个月都要评，争吵，你多我少。（□□□：我们是津贴。）你们是津贴怎么分配？（□□□：大人小孩平均每人每年七十元。）津贴多少？（□□：供给部分百分之七十，津贴部分百分之三十。）

钢铁基地上有医生没有？（□□□：有。）这比打日本好，比打蒋介石好，打仗要死人，这也可能死一个两个的。

你们还有模范食堂？（□□□：有。）你们把食堂排排队，分一、二、三类，号召二、三类食堂向一类看齐。（安阳县委书记：安阳挖出一个赵匡胤炼铁的炉子。）你有什么根据？（看县志和听老年人说的。）安阳出曹操、袁世凯（坟在那里），没听说赵匡胤在那里炼铁。赵匡胤是洛阳生的人，他的父母是个小官吏，是五代梁、唐、晋、汉、周时的人，你说的可能是宋朝时候的炼铁炉。（大家都笑了。）

管理人员是件大事，一是管小人的，一是管吃饭的，过去都不愿干这种事，不愿当保姆，这个事情不管好怎么办？优越性就是比父母管得好，管得一样就没有优越性，管得比父母差一些，他还要拿回去，没优越性就不行，出个大字报，看你怎么办？大灶不比小灶好，怎么能行呢？现在大家一股劲，将来大家一算细账，说不好。（□□□：能办好。）你们都有信心吗？（大家说：有信心。有个县委书记说：现在食堂办得比单吃的好。）有垮台的没有？（□□□：没有，许多妇女决心大，把小锅都砸了。）这个革命可革得厉害。幸福院幸福不幸福？（□□□：幸福。）有这样的事，自己不愿去，儿子、媳妇硬叫他去，我看他不幸福。（□□□：我们的幸福

院，现在只收五保户。）他们做活不做？（□□□：做。）是单独搞还是跟群众一起搞？（□□□：有单独纺纱的。）他们吃饭怎样？（□□□：小孩……吃中灶，青壮年吃大灶。）这个好，客人吃饭要不要饭票？（□□□：不要，实行供给制。有一个老人来了客，队上给他做四个菜，还有酒，他高兴极了。）伙食是个大事，你们解决得很对。

睡觉问题解决得如何？睡觉要当任务，每人每天能不能睡八小时？七小时？六小时总可以。（□□□：睡不到六小时。）要强迫命令，一定要睡六小时。紧张时也一定要睡六小时，睡五小时就没有完成任务。在工地上疲劳的时候，叫他们睡半小时再起来干，睡觉是一大任务。（□□□：现在炼钢铁，秋收秋种，过去这一紧张阶段就可以了。）你们研究出几条睡觉的宪法，规定小人、青壮年、老人的睡觉时间，睡不好将来要受损失。（□□□：七里营妇女摘棉花，上午两个小时可以摘六十斤，下午四个小时只摘六十斤，疲劳了劳动效率就不高。）不管你如何紧张，一定要睡六小时，少半个小时也不行，要强迫命令。这个强迫命令老百姓欢迎，主要是干部，小人要睡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你们不是有营长、连长吗？（□□□：有。）叫营长、连长下个命令，躺下来睡，叫农民睡个午觉，你们研究一下，这是大事。一个吃饭，一个睡觉，一个管好小孩子。

种地用深耕细作的方法，达到少种多收的目的。亩产搞它一万斤，先搞两千斤，加一番再搞四五千斤，再翻一番就是一万斤。地耕一尺二寸深，分层施肥，省水、省肥、省人力。（□□□：我们在搞卫星田。）搞大面积卫星田。（□□□：全省八十万亩小麦，卫星田一千六百万亩。）占百分之二十。二三年后，公社把耕地面积缩小。深耕三四尺，亩产一万斤，一个深耕细作，一个机械化。过去浅耕粗作，广种薄收，改为深耕细作，可以少种多收。我出题目你

们研究一下，不要一下弄得没饭吃，可能这是一条出路，加上机械化不要搞得累得要死。好，咱们就谈到这里，谢谢大家。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乡火车站接见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

建议金门炮击大打一天给周恩来等的信

（1958年11月2日）

恩来、陈毅、克诚[1]同志：

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同时使蒋军得到拒绝撤兵的口实。是否适宜，请加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上午五时于郑州

---

[1]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为厦门前线写的广播稿

（1958年11月2日）

一

金门群岛军民同胞们注意：

明日，十一月三号，是个单日，你们千万不要出来。注意，注意！[1]

二

发周总理。

今日（十一月二日）下午，厦门前线口头广播，反复三次。

---

[1] 这个广播稿正式播出时，周恩来在“明日”前又增加了“今日11月2号，是个双日，我们一炮未打，你们得到补给”一句。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11月2日）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管理区是专员公署性质的，徐水县都是叫公社，上有管理区，再上是县公社。搞分级管理，级太多不好。有个体制问题，作风问题（两类矛盾）、生产问题（不可单调，要尽量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

一穷二白，愈穷愈赞成，现在不是夸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党是集中了这个意志，军队里头有饭吃，从古以来军队就吃大锅饭，就是集体化、战斗化、军事化。武王伐纣，也是如此。

（陈伯达插话：一个县一个公社优越性比较大：一、统一调配劳动力。二、统一财政收入。三、统一产品分配。四、统一发工资〈不同的管理区〉，在二三年内，工资水平不一定要强求拉平，生产发展可拉平，现在保持一定差别有好处。五、实行分级管理，发挥各级的积极性，管理还可以分四级。六、服从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

和上缴利润的计划。一县一社和一县数社相比较：1. 统一调配劳动力，联社也可以，但是联社不易统一供给……）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左”的错误。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陈伯达接着说：2. 联社各分社自负盈亏，但联社也可抽一部分公社积累；3. 统一调拨商品，一县一社好办，一县数社就难办；4. 统一财政收支，一县一社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可说是有全民所有

制的性质，但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还不能那样说。）

鞍钢一个工人拿八百元，一个工人劳动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了七千二百元原料、生产成本，还有一万零八百元，这就是国民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叫消费，即八百元工资；另一部分为国家作公共积累。以县为范围的公社可说是小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

农业是两条：一、深耕。可以少种，可以除虫，可以蓄水。深耕细作，少种多收；浅种粗作，多种少收。只要种现有耕地的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即可。这是第一步，下一步还可以减少。现在亩产二百斤，将来亩产万斤，种那么多干什么？二、机械化，但不都是拖拉机。要创造新机器，解放人力出来搞工业，主要是工农学兵。

保证劳动者忙时睡六小时，闲时睡八小时，要强迫命令，要保证吃好、睡好。睡觉六小时，吃饭一小时半，工作和休息还有十四个半小时。这一点要下命令，否则就没有完成任务，吃好睡足，效果更好。八小时工作制在英国国会内争论过，有个资本家说，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因为工作效率高，然后才通过。要睡好觉，要实行午休制。

饭要吃饱，要吃好，花样要多些，要吃热饭，一个月打一次牙祭。早饭是上午的劳动力，中饭是下午的劳动力，要把这件事当一件大事办。像现在这样苦战，不良后果可能在几年后才能看出来。

还有一个，带好小孩子。小孩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什么人也不愿去托儿所，食堂也不派有能力的人去办，这叫见物不见人（见钢不见娃娃）。把小孩子带好，要比家庭管得还好。吃饭、睡觉也是人的问题，搞不好就要垮台，要派有能力的人去干。

北戴河会议以来，两个月，人海战术，大搞钢铁，组织了队伍，初步学会了技术，从农业中化出几千万工人是一件大事，是新

社会分工（不完全合理）。明年要定点，搞综合企业（煤钢联营），提高技术，“小土洋”“中土洋”，结合“群”。挖矿，挖煤，冶炼，运输，要组织得比较合理。还有许多人要转到其他“小土群”方面，要以“小土群”来搞铝、煤、石油、机械，用机器再把农业劳动力解放出来。农业将来以妇女、小孩负担为主，男子为辅。钢铁以男子为主，妇女为辅。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肥料，应该主要用人粪尿、塘堤、沟泥、墙土、炕土、厩肥、绿肥、有机肥料。少搞洋化肥，多搞土化肥。亩产□千斤，根本不依靠硫酸铵。要搞一点，但不作为主要的。拖拉机要搞一点，但也不是主要的。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按人口计算，英国五千万人，二千五百万吨钢。我国七亿人口，要三亿吨钢，要那么多钢铁干什么？修桥补路是一个出路。

对轻工业部党组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8年11月5日）

此件[1]很好，轻工业找到了路子。立即印发到会[2]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五日

---

[1] 指轻工业部党组1958年10月30日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一）当前的轻工业形势紧张，一方面各地为集中力量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要求轻工业让路，停工和半停工现象已经发生，另一方面，市场供应十分紧张，许多日用品和食品已出现脱销现象。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积极大力发展轻工业生产。（二）将带有关键性的技术上的创造发明加以系统总结，认真推广，是提高现有生产能力的关键，也是当前增加生产最为迅速有效的措施。（三）贯彻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在人民公社中大办工业，是轻工业发展的基本方向。轻工业的原料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销售市场也主要在农村。过去轻工业工厂大都建在城市，从农村将原料运进城市，再从城市把成品运回农村，往返运输，浪费劳力。在人民公社办工业，既进一步贯彻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又利于加强工农业的结合，为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创造条件。目前重要的问题是应该放手发动群众，根据人民公社的经济特点和自然特点，因地制宜，自力更生；以小型为主，中小结合；以土法为主，土洋结合；并使骨干企业与群众企业相结合，既建新厂，也改造原有企业，特别是手工业。（四）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继续开展反保守思想的斗争。

[2] 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对《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的批语

（1958年11月6日）

一

此件[1]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2]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还，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九时

二

印发。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3]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4期刊载的《山东范县提出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一文，文章报道了范县

人民公社党委（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作的关于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报告的摘要。主要内容是：一、工业。报告提出，1年实现地方工业网，2年实现工业化、电气化。规划包括：钢铁工业，土洋结合，内外结合；集中力量大搞机械工业；电气化，1958年建立水电站八处，1960年建成黄河水利工程大型发电站一处，除供给工业用电外，农村、城镇全部达到电气化、电灯化，并开始研究和利用原子能；大搞化学工业；大力发展生活用品工业；大力发展建筑工业。完成这些规划后，我社将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拿到手里。二、农业生产万斤化。规划提出1960年粮食作物种植15万亩，保证亩产2万斤，争取3万斤，共产39亿斤；棉花种植15万亩，保证亩产籽棉1.5万斤，争取2.5万斤，总产22.5亿万斤；花生种植15万亩，保证亩产5万斤，争取8万斤，总产75亿斤；甜菜种植5万亩，保证亩产3万斤，争取5万斤，总产15亿斤。今年的水利要实现河网化。1959年全部土地田园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1960年达到灌溉电气化、自流化。到那时：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絮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得了不的。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根据三分之一的土地种庄稼，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树，三分之一的土地休闲的要求，1959年在林旁、宅旁、公路旁、渠道旁、水库池塘旁、河旁、堤旁、坟墓陵园实行绿化。（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报告摘要略去）四、共产主义的乐园建设规划。1. 根据全公社工农业生产布局和有利于生产、美化环境的原则，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在3年内合并为25个合乎共产主义的新乐园。每个新乐园内设有：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浴池、养鱼池、供应站、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厂、畜牧场等，达到八院、二所、四馆、三厅、两池、三站、四场。2. 根据共产主义新乐园的规划，范县筑成“经

三、纬五”8条宽达30公尺的大马路，贯串到全公社25个新乐园。田间也修成笔杆条直四通八达的12公尺宽的管理区道，除当中铺成马路外，两旁培植果树和花草。总之要实现：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五、文教、科学、卫生、福利。1. 文教，五九年普及小学教育，凡是适龄儿童全部入学。2年建成大学四至六处，师范学院1处，中学80至100处，普及中学教育。2. 科学，1959年建公社气象总站1处，分站10处，正规红专大学11处，科学院1处，分院10处，农业大学1处，党校、团校、医校各1处。各院、部、站和学校，均购买一套比较完整的工农业科学研究仪器，并应有自己的工农业试验田。3. 卫生，今年除实行公费医疗外，1959年扩建十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25处，100个床位的公社医院、妇产院各1处，门诊部100个；1960年除已建立的院、部进行扩建外，再兴建公社疗养院4处。4. 福利，在1958年已建戏院、图书馆、澡堂22处的基础上，1959年扩建戏院、澡堂、电影院、体育场、公园、图书馆、俱乐部各25处。5. 邮电，五九年把生产队、食堂、工厂等单位均安上电话，户户有喇叭；1960年生产大队建总机，托儿所、妇产院、医院、图书馆等单位均安上电话。真正达到：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学习娱乐“三八制”；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真喷鼻；室内室外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开开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六、丰衣足食。到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规划后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李友九，当时任《红旗》杂志常任编辑。

[3] 这个批语是针对《宣教动态》刊载的关于中共范县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报告要点的报道而写的。“照文老样”，指按照《宣教动态》报道后附的《山东范县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原样（参见本篇注[1]）排印。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8年11月6日）

只搞两个月，就搞出了一个名堂，明年再搞一年就有办法了。明年一年，极其重要，以钢为纲，三大元帅，两个先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担心短了，我担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不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地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俄国农民不会那么自私，不会不要不断革命，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但这秩序是不能巩固的。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

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地调，全省、全国地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武王伐纣是否三化？自古以来就是三化，先从军事上开始的。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标准是鞍钢。鞍钢除七千二百元成本折旧，下余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所得八百元，为国家积累一万元，要这样调拨。这种过渡，对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也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们吃饭不要钱是各取所需的萌芽。我们现在油太少，一般不到四两，有一两、二两、三两、四两、五两，一般是三五两，营养取自粮食，故吃饭多，可以转化，不要冒险，凡是可做的必须逐步去做。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教授参观徐水大学，一看一月发五元，每天吃不到两盒前门牌，你叫优越性？河北有三个县要救济，十几个县只能吃饭。第三种发工资，从两毛起到几块，北京、上海钱多。农村水、火不算钱，要议一个标准。

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有共产主义萌芽，斯大林看不到这个辩证法。

不能两三年内搞农业，现在就要搞工业，继续发展农业，我们

也怕搞掉农业。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中国是一个极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五亿人口只搞饭吃，搞那么一点——三千七百亿斤粮食，得出两条经验：提倡机械化和少种多收，节省出劳力，大办工业。明年、后年两年能达到就行了。河北明年准备搞一千万亩，亩产万斤，则一千亿斤，去年八千八百万亩，还只二百五十亿斤，今年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用机械电气之力，种少量之地，得多量之粮食。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标准各不一样，有和尚标准，恩格斯要吃油、吃肉。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人民公社性质，如何过渡，多少时间，四十条宪法，要议一下。城市人民公社如何搞？不同的人，是否原则上不降低标准？干部党内略微调整，不宣传，教授降薪，前门牌少抽，标准还降低，有什么优越性？是否搞点步骤，提高才算优越性。工人恐怕要增加

点工资，农民已经起来了，城市供给制也是要搞的。

明年一月一日开始变化，睡足八小时，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农民，八—四—二—十制，工人最好是八—四—二制，搞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星期天休息。

不休息，这是共产主义精神，劳动不是为人民币，已经不只是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必需。我这个人不是为五百三十九元，而是为了必需，要搞个调查，操儿女之心，个人之心，变为操社会事业之心。

今年一年好事多得很，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因此，才敢设想人休息，三分之一的休息。

林业，可了不起，不要看不起。威廉士说："农林牧要结合，不要以为种树只是绿化而已。"南方要十五到二十五年，北方要四十到五十年，种树也必须密植，有伴容易长，大家长就舒服，孤木不长。种树也要有一套，养鱼如养猪，种树如种粮，挖一丈深，分层施肥。

今年大搞小土群，有人说森林、煤炭有很大浪费，也大为节省，几千万人上山，又查出资源，又得了经验，这是收入。

不能完全以生活水平来讲，否则那些腐败的皇帝和贵族早已是共产主义了。要讲需要，要说热量等于五百卡路里就够了。做皇帝、诸侯，超过了就受不了，少了也不行。食物含有氮、氢、碳、氧、镁、钾、钠、锗、磷、氯，共产主义也只是以一定量的元素作营养，不能太多。

四十条连今年十五年，十年完成。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一周年的电报

（1958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伏罗希洛夫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四十一年来，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的巨大影响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十月革命所开辟的新世界一天比一天更加繁荣和强大。自从去年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议，并且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以来，世界的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年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更加团结和壮大。各国工人运动更加广泛的发展，全世界保卫和平、反对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运动空前高涨，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势力则日暮途穷。全世界人民清楚地看到，东风正在进一步压倒西风。帝国主义的寿命，决不会很长的了。

苏联人民，在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共产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苏联人民在宏伟的建设事业中所获得的辉

煌成就，使各国劳动人民看到了自己的幸福的明天。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兄弟的苏联人民的劳动成就，并且像看到自己的成就一样，感到欢欣鼓舞。

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有着情同兄弟的深厚友谊。今年八月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会谈是这种友谊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标志。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一贯给予慷慨的援助。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斗争中，获得了苏联人民有力的支持。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中国人民决心同苏联人民一起为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坚持斗争。我们力争和平，但是，我们也决不害怕战争。如果帝国主义者敢于把战争强加在我们的头上，那只会加速他们的彻底灭亡！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国际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8年11月7日）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全民所有制就是要产品调拨。

回去开会，征求意见，不要说郑州开了会，是不是全民所有制？是不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因素算不算？不要把决议一下子推广出去。家庭要废除，言不由衷，口里很左，斩头去尾，父离子散。

县联社与一县一社，各县有差别，一县一社容易出秦始皇，联社不容易出秦始皇，秦始皇不好当，徐水县是独立王国，许多事情没有和省委、地委商量，省委、地委对它没办法。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做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大的方针政策要有个商量，领导机关要清醒。

田间管理，无人负责不好，搞责任制，不要混乱，统筹安排，将来产品分配，采取“三三”制。

城市公社，要搞，有先有后，搞得好的，北京、上海搞慢一

点，搞快了，黄炎培怎么办？一个城市、一个公社恐怕也是联社性质，一定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罗果夫赞成我们的公社，说苏联过去的公社只是搞消费，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为中心的组织形式。城市分两种，一个大工厂的城市，市民想打主意，福利方面要开门。大工厂、大学属于国家，成员加入公社，但干部、产品不能调动，可以拨一点福利，帮助建立卫星厂，享受公社的权利，也尽义务，这是国营工厂与公社的关系，军队也是如此。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公社不能派工厂各种任务，为全国、全省服务的企业、学校一般放不下为公社所有。不这样，可能发生毛病，如石家庄的制药厂几乎停产，把人员拉去搞深翻地、炼钢。

工人创造的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关系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休息时间，公社社员一个月至少两天（女子要五天，月经期间要强调休息）。将来要做到六小时工作制、四小时学习，资本家、教授、民主人士、演员、运动员，要有所不同。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对山西省太谷县红旗人民公社的情况与计划的批语

（1958年11月8日）

一

此件[1]印发到会[2]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八日

---

[1] 指关于山西省太谷县原候城乡5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成立红旗人民公社的几个材料。这些材料是：《山西省太谷县红旗人民公社分配制度（草案）》《山西省太谷县红旗人民公社争取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轮廓规划（草案）》《山西省太谷县红旗人民公社生活福利工作试行办法（草案）》《山西省太谷县红旗人民公社社员的思想动态》。毛泽东为这些材料拟了一个总标题，即本篇二。

[2] 指当时正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二

山西太谷县红旗人民公社的情况与计划。

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11月）

一

尚昆[2]：

送小平[3]同志阅办。略有修改。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下午十时

---

[1] 《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是提交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讨论的一个文件。毛泽东对这个《纲要》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本篇一、二是毛泽东修改《纲要》初稿时写的批语；三至十四是毛泽东对《纲要》初稿的修改。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二

尚昆同志：

请你邀集刘、邓、伯达[1]三同志在一起，看一下，作最后斟酌，立即付印，在天明前分发到会[2]各同志。当改即改，我不再看了。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下午十时

三

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因素必将逐步增长，这就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 指当时正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四

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两个长期计划，一个是规定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和文教卫生等项事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个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前者经过一九五八年一年的实践，后者经过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三年的实践，都已经在主要项目和多数要求方面基本上完成，有些并且超过了。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的结果。现在，党和人民都希望我们制定一个新的计划性的长时间的纲领，以代替旧的过了时的纲领，作为全党全民的奋斗目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就是这样一个新纲领。这个纲领，作为草案的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中〈上〉旬郑州会议上通过的。随后在十一月下旬，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六〉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仍为草案第一稿。由于是一个包括三个五年的长期计划，根据现在（一九五八年）的经验，对于若干问题，主要是工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回答，是带有很大的估计性的。因此，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苦战三年时间内，这个草案，还只应当在党的县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范围内，予以研究。苦战三年，我们将取得很多的经验。大约到1960年，至迟在1961年春季，这个草案就可以公开发表，交给全党全民展开讨论，然后，提到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予以通过。

五

在上述条件下，到一九七二年，争取将全国现有耕地面积十八亿亩中每年播种的面积只要六亿亩左右，以另一个六亿亩左右的耕地休闲和种植绿肥，其余六亿亩左右的耕地植树种草，使整个农村园林化。

六

从一九五八年起，所有的耕地每三年轮流深翻一次，深度从一尺到三尺，一部分还要更深些，例如深达四、五、六、七尺。

七

经营林业，也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采取深耕、施肥、灌水的方法。

八

劳动和休息要有节奏地结合起来。应当保证每个劳动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和娱乐时间，每天睡眠、休息和娱乐的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时间不得少于两小时。

九

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家长制。在住宅建筑方面，注意使住房适宜于每个家庭的男女老幼的团聚。

十

要把为食堂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

十一

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

十二

人民公社应当按照满足社会需要的原则有计划地进行生产。既要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又必须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性的生产。这种商品生产，通过商品交换，既可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又可以换回等价物资，满足本社生产上和社员生活上日益增长的需要。在商品流通过程中，价值、价格和货币仍然将起它们的积极的作用。

十三

为了准备条件，在帝国主义如果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的时候彻底打败侵略者起见，我国应当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十四

一切工作都必须力求合乎实际，力求把革命的热情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关于读书的建议

（1958年11月9日）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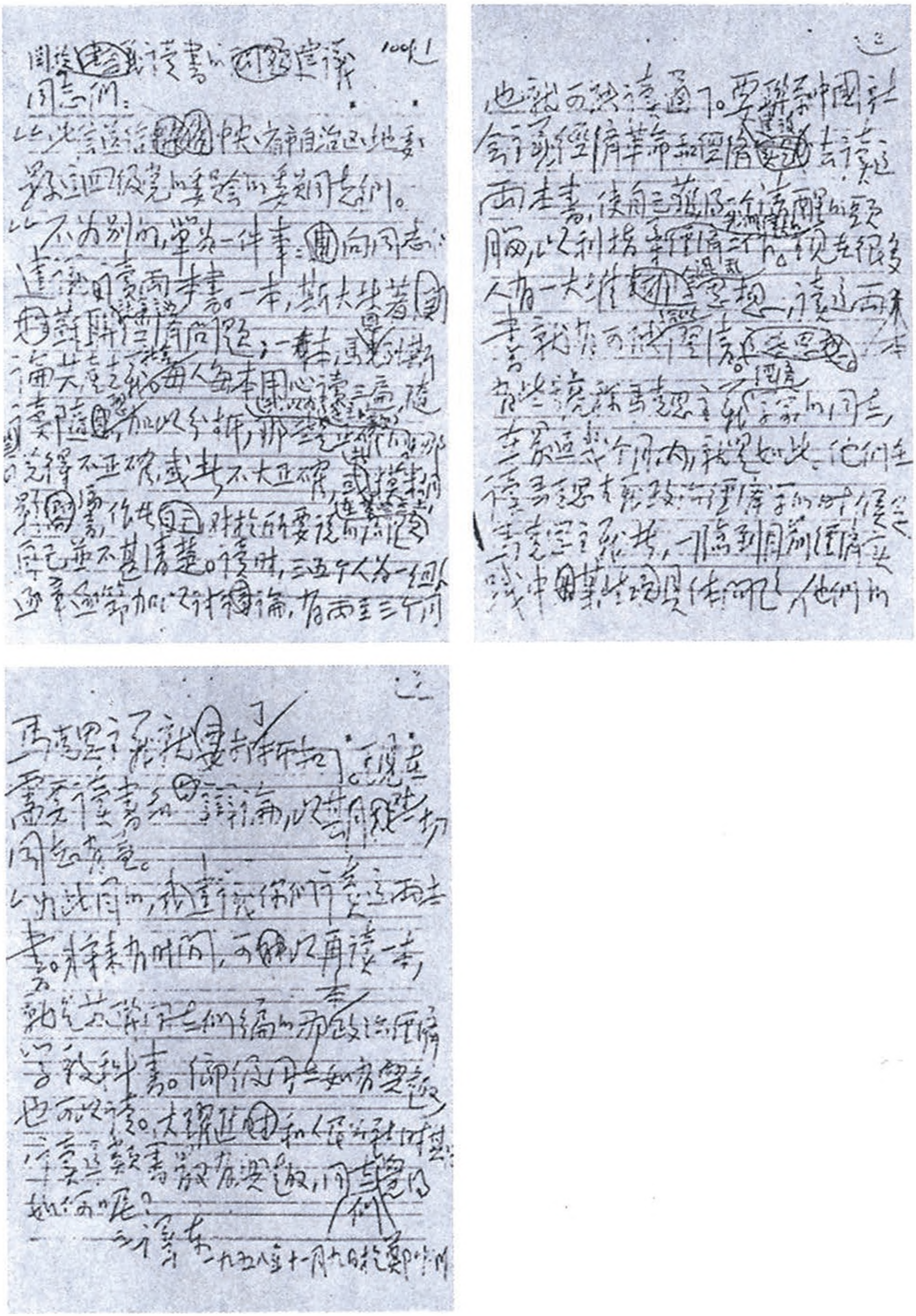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1]。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

[1]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即人民出版社1958年8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毛泽东致各级党委委员信的手稿。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8年11月9日）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〇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

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行工资制，一九五三年不改也不行，因为解放区工作人员占多数，因为工人阶级也是工资制，因为新增加的人多，他们是受到资产阶级影响的，要他们改供给制，不容易，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等级太多了，评成三十几级，闹级别，闹待遇。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经过整风，这股风降下来了。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这个关系完全不必要。去年到今年给资产阶级法权很大的打击。过去搞试验田，干部下放，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不用压服，因而空气大有改变。没有这种改变，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不然，群众为什么不睡觉，不休息，而工作二十小时？因为共产党跟他们在一起。红安县的干部过去是“老爷式”的，挨群众骂，五六年下半年一改，有大进步，群众欢迎。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资产阶级可让他当社员，但还戴资产阶级帽子（帽子不摘）。社员分两类，一是工农社员，一是资本家社员。

为了团结，中央、省、地三级，要有一个纲领。省委以上不把目标与相互关系搞清楚，如何行？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一传就传出去了。发到哪一级，要做政治考虑，粮食，人家不怕，主要是钢、机、煤、电四项吓人。时间可提“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指标指“□□”，只□讲。林业将变成根本的问题之一，林业以后提牧业、渔业，蚕桑、大豆要加上。林业是化学工业、建筑工业的基础。消灭水旱灾害，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大部归人管，一部归天

管，一万年也如此。肥，有机肥为主。除四害与其他主要害物，也要加上“最大限度地”。劳动，每天睡眠休息不得少于十二小时，学习二小时，最大限度的劳动时间，不得多于十小时。这是全国的大问题，要把公共食堂服务的工作，看做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要把为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崇高的工作，每个劳动人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

三十六条，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铜、铝过去未指挥到，今后要转移力量去搞。

过去讲一为国，二为社，三为己，但生产者倒过来，一为己，二为社，三为国，尽管我们如此说：“保家卫国。”“要发家，种棉花。”“爱国保家，多种棉花。”

三十八条，要加“为了准备在侵略者如果发动侵略时彻底打败侵略者，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三十九条，一则以喜（作社员），一则以惧（保姆，高薪）。要对工人讲清楚：优待资本家是为了孤立他们，让他们特殊，个人突出，小的早入，中的不一定。

四十条，一堆观点，不满意。七个观点谁也不看。中心是解决实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要捆人、打人、骂人、辩人、罚苦工，营长对连长都如此，“辩你一家伙”，不止徐水一个，捆连长、打连长、骂连长、辩连长，因此人人怕辩论，辩论变成了斗争会，辩论变成了一种刑罚。两种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辩论。一种是对右派，一种是人民之间的，是说服。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在他心目中，认为苏联的计划基本上反映了客观法则，但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一直到现在，他们的商品产品比我们少，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同我们的计划比较，究竟哪个更适合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法则？还有一点，斯大林强调技术，强调干部，只要技术，不要政治；只要干部，不要群众，这也是二条腿。在工业上注意了重工业，也是一条腿，没有注

意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讲钢是基础，机械是心脏，我们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工业方面以钢为纲。这个辩证法，我们也是最近摸到的。我们提出以钢为纲，就有了原料、机械、煤、电、石油、运输，海陆空都上来了。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好，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解作用，起调解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

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做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资产阶级法权，法权思想、法权制度等问题。列宁曾提出“全线进攻”的口号，当时新经济政策实行了一年，急了一些，在苏联像荣毅仁这些人统统丢到海里去了，而教育组织还是资产阶级式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地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少数人，如地主、富农、右派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人是想进到共产主义，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

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

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企图蒙混过关，以《四十条》草案为据。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1958 年 11 月 10 日）

题目应叫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纪要，搞个文件很有必要。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一）完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

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3）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为此需减少劳动时间，五小时至六小时劳动，再是要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多面手。“自由就业”，我不大懂。学纺织的又去学开飞机，采煤的又去学纺织，十八般武艺，十多样我赞成，学几百样，怕不容易，会没饭吃。三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四要提高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增加工资的办法是增加货币工资，特别需要的是降低物价。

这三个条件是好的，主要是第一条，但缺少一个政治条件。这几条的基本点是增加产品，极大地增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是发展生产，发展生产力，但是没有一套办法，问题是怎么办。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农、文，没有几个并举，没有整风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三个条件，是不容易达到。我们有人民公社，从一县多社到一县一社，加上人民公社就更容易办了。

文件第一条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在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大集体，小全民”变为“全民社会主义”。

大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文件第三条，生产的对象不明确。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为：

（1）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

（2）社会产品也为全民所有（所谓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而且是消费资料）。在过渡阶段，国营工业已是全民的，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农具、牲畜、机械、工业、厂矿）和产品也应该逐渐增加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部分和产品的调拨部分。不能只讲后一部分，首先应是前一部分。

要能实现调拨“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指什么“物质基础”不清楚，应该改为生产资料。不断发展生产——两个部类的生产。

人民公社的性质。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在“现阶段”，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民兵不一定是专政，主要是对外的，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准备力量。公社是一九五八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

在劳动调配中，要注意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劳动力的调配，各生产部门（农业、工业、运输）的比例，是当前的重大问题。劳动分配要合理，组织要适宜。不是价值法则，而是计划的要求。现在这种分配比例不合理，要注意不要突出这里，丢掉那里。

关于分配。要使农村人民公社每人每年平均有150元—200元的消费水平，并且增加调拨的比例。个人、公社、国家“三三制”的

规定是好的，能得人心，要生产者吃饱、穿好一点。

吃饭问题，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的热量和养分，足够起码的条件，要同营养学家商量，定出适当比例。第一，小米、小麦、粳米。吃小米可以什么也不加，缺点是不太好吃。粮食是热量，没有起码的必要数量不行，不可疏忽大意……

过冬问题，要加上“三北公矿”要立即布置烧炕。没有煤炭不能过冬，必须解决。

城市人民公社，八大城市应当放慢，这种社会主义，不怕，一要搞，二要慢一点。

所谓全面的全民所有制，含义如何？两条：（一）社会的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社会的产品为全民所有。

在为八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

（1958年11月10日）

记录改为政治局决议，下面回去就实行。政治局补行法律手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线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

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1]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做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第四页第二段说，自由是被认

---

[1] 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三十六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这个纲要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识了的必然。客观法则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客观法则和人们的主观认识是相对立的，认识客观法则才能去驾驭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要研究它的必然性。成都会议提出的意见，看来行之有效，八大二次会议作了报告，看来还灵，是不是合乎法则？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还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考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几年，我曾对□□□□说过，你还要看十年，我们过去，革命是被人怀疑的，中国革命应不应该，应不应夺取政权，国际上某些人是坚决反对的，但革命这些年证明了路线是正确的，实践证明是对的，但还只是一个阶段的证明，合作社、公私合营，增产都是证明。增是增了，但建设八年，才搞了三千七百亿斤粮食，今年搞多一点，晓得明年如何，□□□同志建议，今年十二月，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这四个月，第一书记还要抓一抓农业。这关系到夏收，请大家考虑。抓钢铁同时抓农业。第一书记召集一个会，把劳动力分一分，宣布一下，强迫命令一下，交给农业书记负责。省、地、县都要负责，搞不好不行，不然无人负责。各说各有理，大家都拖到钢铁方面去了。山西说：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这个口号是好的，搞掉一个就是铁拐李了，缺农业就成了斯大林了，搞农业的要死心塌地地搞农业。决议上再写一下，不要把农业丢掉了。第一书记要心挂两头、三头、四头，学会多面手，一个月搞一天，四个月搞四天，太少了，工业、农业、思想是成都会议提的，这是山西人的创造。如同苦战三年是河南人提的，现在变成全国的口号，搞试验田是湖北的口号，我们这些人头脑是不出任何东西的，无非是把各地的经验集中起来加以推广，做成如成都会议、北戴河会议那样一些产品。这次出了两个产品，一个立即实行，一个是初稿。

我们的措施是否完全符合于客观规律呢？大体符合就可以了。斯大林说：“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母胎里只有思想，经济形式是后创的。我们是有先例的，有苏联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斯大林这本书极为有用，编了教科书，我未好好看，现在逼着我看，越看越有兴趣了。□□、富春知道得多，去取过经。有了先例，我们应该比他们搞得更好一点。如果搞糟了，就证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用处就不多。

该书第六页第二段，第七页第二段，说消灭创造法则是不对的，客观法则和政策法令不能混为一谈。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产生的，那里无政府，这里有政府。我们也搞过计划，也有经验，一个风潮，煤太多了，又一个风潮，糖多了，一个风潮，钢铁多了，强迫卖给苏联，第二天又毁约，因为又不够了。上月说多，下月说少，心中烦闷不知如何是好，像苍蝇在玻璃房里盲目地向玻璃乱碰。经过这些曲折，马鞍形的教训，五六年小跃进，五七年跃退，经过比较，想出了一条路，叫作总路线。农业四十条也有曲折，一时说灵，一时说不灵，归根结底还是灵。已经基本完成了，总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新四十条是不是也灵？我也有怀疑，准备再谈一下。十五年按人口赶上英国是不是可以？苦战三年不发表，以免吓死人。那时吓帝国主义一下，也吓朋友。一千万，三千万，过几年吓惯了就不怕了。

客观法则，是不是总路线的一套，是反应得比较完全，还是没有搞好呢？搞钢就无煤，上海、武汉没有饭吃。对客观世界要逐步认识，不到时候没有展开矛盾，不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不能认识。八年不晓得以钢为纲，今年九月才抓住了以钢为纲，抓住了主

要矛盾的主要侧面。一元论不是多元论，抓住了主要矛盾就带动了一切。不是煤、铁、机平列，大中小以大为纲，中央、地方以中央为纲。和跳舞一样，男女跳舞女的闹独立性如何行？应该在服从中取得独立性，不服从男的就没有独立性。你不跳舞，文化贫弱，我和你没有共同语言。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一吨钢要百分之二的铜铝。不能说八年计划完全反映法则，不能说今年一年都完全反映这个经济的法则要求。

斯大林谈到这里为止。这个问题没有展开，他研究到什么程度，我是怀疑的，为什么不两条腿走路呢？为什么重工业要那么多规章制度呢？问题是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熟练地应用了？至少是不充分。我们的计划如同他们一样，也是没有完全反映法则，因此要研究。

第二章，商品生产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

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1]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2]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3]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我是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斯大林对英国革命成功后废除商品仍有保留，我看英国

---

[1] 指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

[2] 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3]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页）。

与加拿大合成一个国家才好办。（十页第二段）恐怕至少有一部分能废除，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并不武断，他没有作结论。

第十一页三段中说，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1]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剂），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中国工人穷惯了，工作起来很努力，又有干部下放，打成一片，干十二小时，叫他们回去都不走。农民炼铁炼钢以后说，工人老大哥可不简单。农民太穷，工资太少，现在拿得多了不好。每人（按全部人口）平均五元是少数。

第九页关于商品生产命运问题。列宁的回答“夺取政权”，没收

---

[1]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页）

工业我们办到了，公社比苏联进了一步。发展工业，加强农庄，我们也在做，不要剥夺农庄。公社办工业比斯大林胆大。会不会搞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有政权，依靠贫农、下中农，有党，有县委，有成千成万的党员，过去想过赚钱的工业要乡政府搞，不要合作社搞，这有点斯大林主义残余。政社合一，放在区委管理之下办工业，到处发展，遍地开花，这样，不是钱少了，而是多了，李先念也想通了。现在公社太穷，管饭之外，发工资很少，有的只发几角钱，吃也是很穷，在水平以下，还是一穷二白。我说这是好事，老根据地就不起劲。

“不想前，不想后，只想高级化前土改后”，那时是黄金时代。“革命到了头。革命革不到头，革命革到自己的头”，这是山西的话。不断革命没搞，停顿了。我说要动中农，“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列宁说：在一定时期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交换）。这是唯一可按受的，要全力展开贸易。这段话，我们曾大吹大擂，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贸易。斯大林说是唯一适当的道路，我看是对的。只能贸易，不能剥夺。五四年，我们还是购买，不是调拨搞多了，农民还反对。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一九五六年的错误的根源是没有看到农民问题，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第十页第十段“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

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1]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2]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3]，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4]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5]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

---

[1]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2] 纣王，又称帝辛，商朝最后的国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259—前210），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

[3] 参见《书经·周书·武成》。

[4] 参见《孟子·尽心下》。

[5]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1]，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2]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

---

[1] 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2]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待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对台湾也是如此，争取台湾一部分中下级和上级分裂不是没有可能的。杜蒋在一起好？还是争取一部分到我们这边好？我们谨慎小心，蒋也谨慎小心。对美国老是警告，说明我们是受气，许多人对我们警告不了解，我看警告三千六百次，现在美国不搞了，可见很灵。

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你们来驳斯大林？两种所有制如何过渡的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解决。他很聪明，说要单独讨论需要很多篇幅。

只要把“我国”改成“中国”，就有兴趣了。“只限于个人消费品”，行不通。还有农业工具、手工业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赫鲁晓夫不是把机器卖给农庄了吗？历来就有商品生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对《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修改和信件[1]

（1958年11月10日、12日）

一

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此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后，发至各级党委党组织认真实行。在实行前，要加以充分讨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

会议讨论了：（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二）公社问题；（三）城市公社问题；（四）要抓农业；（五）工作方法；（六）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一）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

经过讨论，归纳为下列五点：

---

[1] 这个文件原来的标题是《郑州会议纪要》，毛泽东把它改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重新起草的。

1. 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东西，我们叫作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内，全党全民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集中表现，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我们有了一个不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这就是国营工业，大森林地，河道，领海，国营水库、水湖、水塘，国营农场、林场、牧场以及其他各项国营事业。这还只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而非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2. 现在存在的以人民公社形式出现的社会主义大集体所有制，也就系小全民所有制，要逐步地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所有制。

这一部分包括几亿人口，主要是农民，还有手工业工人。他是〈们〉原先是个体的中小生产者，经过几个步骤，在1953年到1956〈1958〉年的六年时间，发展到了现在人民公社阶段。集体性逐步提高了。有可能开始向全民性发展，例如现在出现的县办工业，就带有向全民所有制发展的因素。但尚非全民所有制，可以称为县民所有制，即所谓小全民所有制。在全县范围内能够由县调配的劳动和产品，都属于这种制度。

3. 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含义，是（一）社会生产资料为全民所有；（二）因此社会产品（不但是生产资料的产品，而且是生活资料的产品）也为全民所有。在过渡时期的目前阶段，除国营企业和其他国营企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已成为全民所有以外，人民公社的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池、种子、肥料、牲畜、农具、农业机器、工业厂矿）和产品，应当逐步地增加全民所有的成分，即逐步增加生产资料的全民性部分和逐步增加产品能由国家调拨的部分，根据国家计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调拨。

4. 要能实现调拨和逐步增加调拨的比例，就必须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根据国家计划和公社需要，增加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因此，必须不断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不断提高这两个部类的生产水平。

5. 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产资料，就必须实现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即机械化和电气化）。

（二）

公社问题，其中有公社的性质问题，体制问题，分配问题，全民、集体、个人的关系问题，作息时间问题，食品问题，取暖问题。

1. 关于公社的性质问题：

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公社在现阶段同时又是基层政权的组织。

公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

公社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这两个过渡是：一个，由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到完成阶段的过渡——即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另一个，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过渡。

公社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2. 关于公社的体制问题：

现在有三种形式：一是一县一社，二是一县数社县有联社，三是一县数社县无联社。大家认为，县有联社的组织形式较好，一县一个社可以继续试行，一县数社无联社形式是不好的。

公社内部各级都应当有一定的权力和机动，以便发挥各级的积

极性。

各地公社要一律冠以地名。

在劳动调配中，第一，必须实行和巩固生产责任制。第二，必须使生产各部门（农业部门、工业部门、运输部门）的劳动分配要合理，劳动组织要适当。

县级工会组织取消。县妇联的组织目前暂不改变。

3. 关于分配问题：

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九六〇年，或者略长一点的时间内，农村人民公社实现每年每人能够分配到150元到200元。并且逐步提高国家对产品的调拨比例。争取在十年内（一九六七年以内）达到公社的纯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归个人，三分之一左右归公社积累，三分之一左右归国家调拨。

4. 关于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

应当实行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

5. 关于作息时间问题：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实现六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八小时睡觉，六小时吃饭和娱乐。

在苦战三年期间，在农村中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和学习（一般的时候十小时工作，两小时学习。农忙的时候，十二小时工作），四小时吃饭和休息，八小时睡觉。

在城市中，一般地应当根据实际条件，尽可能维持八小时工作制，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加班加点。

6. 一定要注意食品中含热量和养分两个部分对于每一个人的起码必需数量。为此，要同营养学家商量，作出适当规定，不可疏忽大意。

7. 立即作好过冬的准备。凡冬季在野外工作的必须有相当的宿舍。北方必须迅速解决冬季取暖问题。

(三)

城市公社问题

1. 采取积极态度，在城市中试行人民公社。

2. 要分步骤地搞，各地进度可以有快有慢。大城市应当放慢。

3. 城市公社必须要有生产基础。没有生产基础，是很难搞好的，即使组织起来，也办不了大事。

4. 城市中在一个时期内，应实行工资为主供给为辅的制度，个人机动多一些。目前不宜过多地牵动城市人民现有的生活习惯和方法。

5. 国营企业和大学校的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所有制，人员的调配）和管理权限不能改变，人员可以加入当地的公社，可以从厂长基金、超额提成、工会费用中拨出一定数目的经费，交纳公社。

6. 地方国营的中小企业，可以下放一些给公社经营，保证上缴利润，原来这些企业的上缴利润由公社包缴。

城市公社问题比较复杂，委托柯庆施[1]同志写一文件，提交武汉会议讨论。

---

[1]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四）

在注意抓工业的同时，必须注意抓农业。一九五九年农业的关键是夏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九五九年一、二、三月四个月内，必须负起责任，用一个必要的时间抓农业，保证一九五九年夏季和全年的农业继续获得伟大的胜利。争取工业、农业、思想三胜利，山西省同志的这个口号很好，应当在全国推广。

（五）

工作方法

1. 在人民公社中，由于群众生活的集体化程度更高了，干部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生活的影响更大了，必须特别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不允许用简单化的行政命令手段去处理有关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必须严格禁止和纠正假借组织军事化的口号而打骂捆绑群众和任意处罚群众的现象，严格禁止和纠正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用所谓“大辩论”“辩你一下”，即整你一下的方法来压服群众的现象。

2. 对于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一定要采取老实态度，反对谎报成绩，隐瞒缺点。无论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哪一方面的数字，也无论对内对外对上对下，都应该是多少就说多少。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现在有一种在成绩方面以少报多，怕说缺点的倾向，这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在全体干部中进行一次教育，彻底克服这种不良风气。

（六）

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1．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不宜改动。定息不宣布取消，要不要听其自便。愿意参加劳动的欢迎，不愿意劳动的不要勉强。

2．干部待遇问题，涉及面很大，要慎重处理。在改为供给制时，原则是上面高薪的要降低些，其余的基本维持，有升有降。

在农村工作的干部的薪给，既要照顾到农民的生活水平而略有减少，又不宜减得过多。必要时他们的薪给可由国家发给，不由公社开支。

3．工人的工资总额不能降低。由于取消计件工资等措施而减少了的部分，应当予以补足，并且略有提高。

二

小平[1]同志：

想了一下，那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还是稍等一下（大约两个星期左右），带到武昌会议[2]上再谈一下，得到更多同志的同意（可能有好的意见提出来，须作若干修改，也说不定），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出，较为妥当。这并不妨碍各省同志按照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举行。

他们带去的草案立即在干部中传达、讨论和实行。是否如此，请你同北京同志们商量酌定。既然如此，郑州会议就是一个为武昌会议准备文件的会议，因此不要发公报。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三

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和各协作区负责同志：

到郑州开会的同志们从郑州走后，我又想了一下。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宜于在武昌会议上征求更多同志的意见，然后发表，较为适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可能未到郑州的同志有些好的意见，也说不定。为此改变原定计划，中央政治局暂不批准，交给武昌会议再议一次。对这件事你们怎么处理呢？你们可以在这几天内，征求省地两级及个别县级负责同志们的意见，由你们将这些意见带到武昌，加以研究。这样做，时间耽搁也不甚多，不过十几天，并不妨碍大事。决议中有些要立即施行的，你们可以立即施行，仍如郑州会议时所约，并不变更。以上如以为可，即请照办。已另报告中央。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于郑州

对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8年11月10日）

一

即送林铁、张承先[1]同志：

此件[2]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

毛泽东

十一月十日下午十时

二

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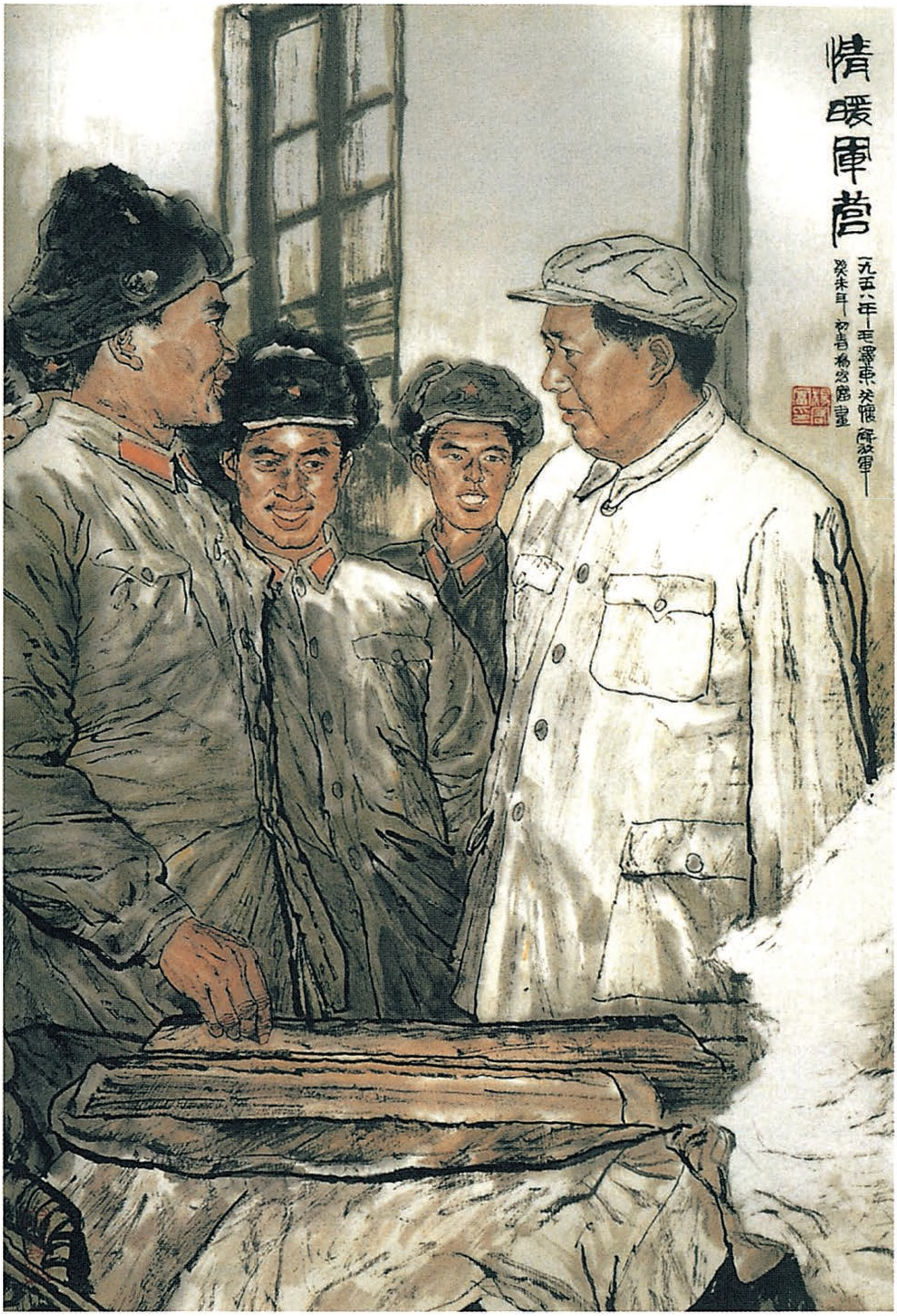
[1]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张承先，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58年10月17日关于在河北省徐水县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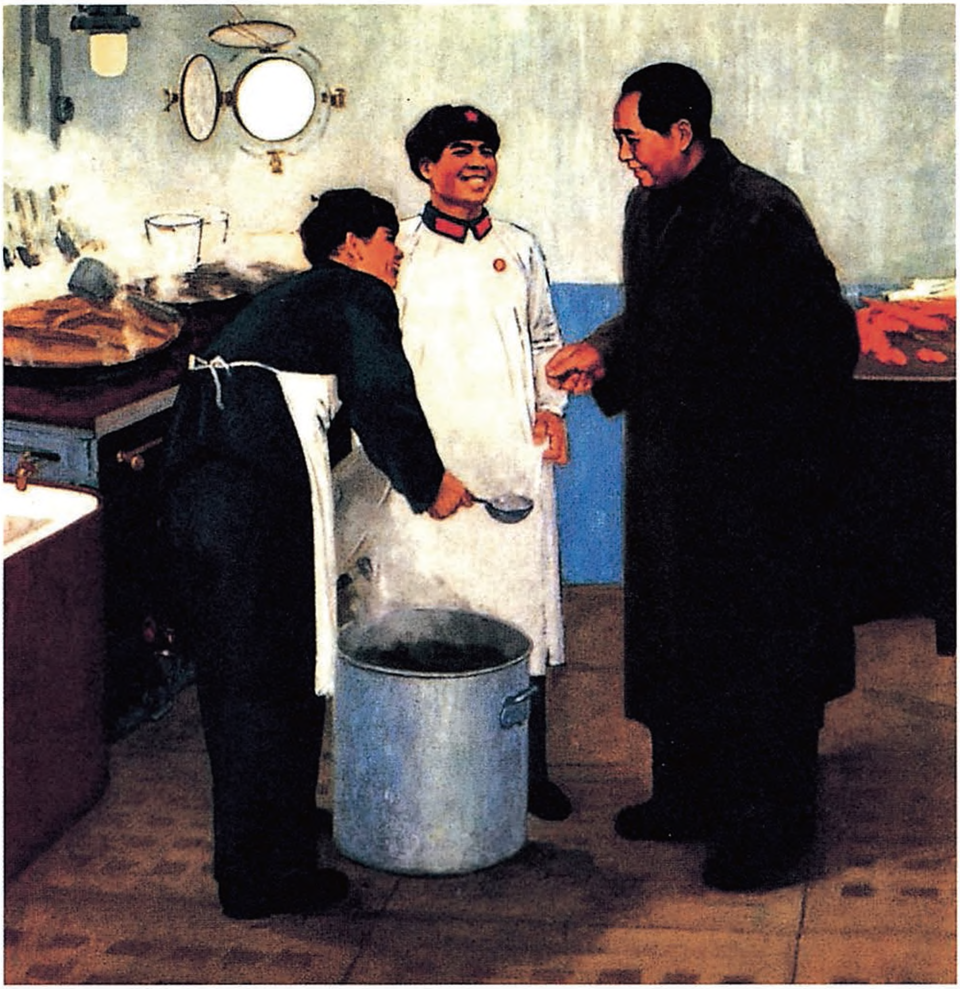
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9月中旬，中办机要室部分同志去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这次下去，完全是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反应很好。现将劳动中看到和听到的一些情况报告如下。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这个地区往年常遭水旱灾，人民生活很苦。去冬今春，全县人民在县委领导下，大搞水利建设，实现了“满天星、葡萄串”的水利化，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这里的劳动组织完全按军队那样编成连和营，劳动是军事化、战斗化，纪律很严，为突击收秋种麦，还组织了一个野战部队，在地里吃饭宿营，是劳动中的一支突击力量。这个村还建立了食堂、幼儿园、幸福院、缝纫组、洗衣组、俱乐部、土化肥厂、供销部、粮食加工厂等，实行供给制，受到社员们的拥护。这个村自公社化后，一切自留地、房屋、零星果树都归公社所有，彻底割掉了私有制的尾巴，加之劳动大协作的锻炼，使农民的思想觉悟有了飞跃提高。我们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主要是：（一）目前各营（即原来的村）的耕作区仍是公社化前的原有耕作区，很分散，社与社之间互相交叉的地很多，不便于耕作与组织劳动协作。建议各公社的耕地重新划分，打破原来各小社的地界，以适应新的劳动形式的需要。（二）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由于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三）存在一些虚假现象。据公社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报现象不少。县里和各公社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也多半大于实际产量。（四）鸡鸭的饲养问题。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而这里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肉和蛋。应组织幸福院的老人们集体饲养鸡鸭，以解决这个问题。（五）几个值得研究的口号。在商庄公社庆祝国庆的大会上，公社党委书记在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我们感到这些口号公开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是有些问题的，因为有些口号不够实际，有的则在提法上就不够确切。喊出去，到时候

实现不了，会给群众造成不好影响。过去这个县就曾宣布1958年9月争取成为文化县，而现在文盲还是不少，实际上没有实现。

1958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一大队一中队炊事班战士亲切交谈。


情暖軍營
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关懷解放軍—
癸未年初春杨之富画

《情暖军营》（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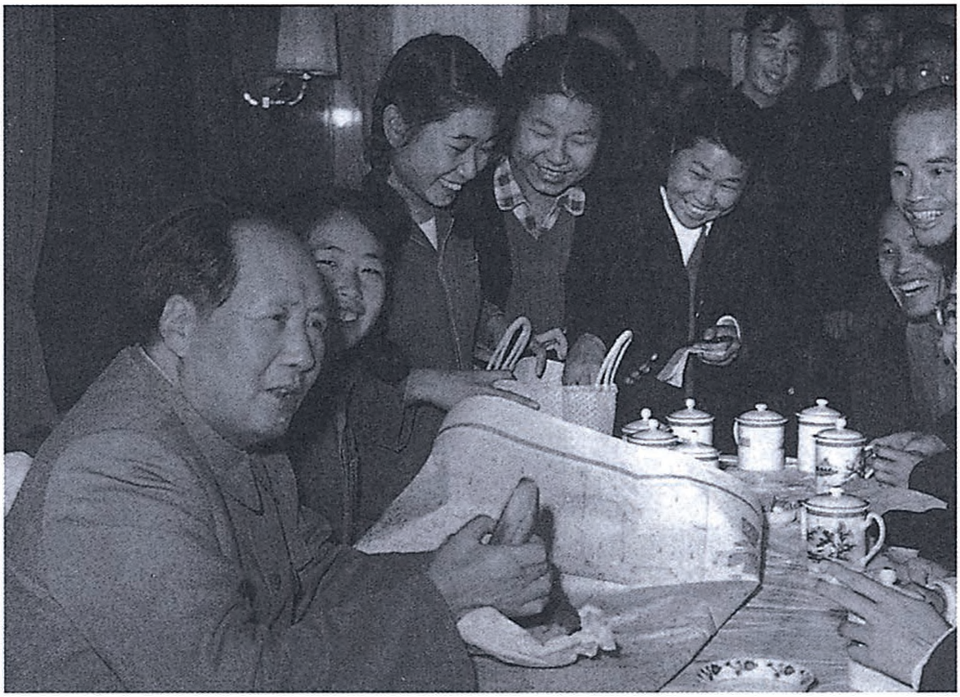
毛主席来到炊事班（宣传画）

1958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军区礼堂接见中共河南省军区第一届第二次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和省直机关干部。图为毛泽东向代表招手致意。

1958年11月12日，毛泽东接见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许昌轩、河南省副省长王国华。

1958年11月12日，毛泽东接见河南省省委常委、监委书记刘名榜（右二）、省军区副参谋长李定灼（左三）、政治部主任徐光华（左二）。

1958年11月12日，毛泽东接见河南省党政军领导人。



1958年11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河南下放锻炼的干部们亲切交谈。

关于建议在北京开会为武昌会议作准备等问题给刘少奇、邓小平[1]的电报

（1958年11月13日）

少奇、小平同志：

建议在北京在政治局、书记处同志并再参加若干同志的范围内，在这几天内，开三次至四次会：（一）讨论郑州起草的两个文件[2]，当作问题提出，征求意见；（二）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第二第三章[3]。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4]先作精神准备。是否可行，请酌办。我认为省级也应这样做，讨论上述同样的两个问题，也应当只是当问题提出，征求意见的性质。如以为可行，请以电话通知各省。所谓当作问题提出，即对每一个问题，都提出正反两面。例如对划一条线弄清界限问题，提出划线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郑州会议讨论起草的两个文件是：《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草案、《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3] 指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对于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的前三章：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准备在武昌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举行。

好，还是不划线好？对商品问题，提出现阶段要商品好，还是不要商品好。其他问题，以此推类。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七时于郑州

在轻工业部党组关于大力发展猪皮制革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8年11月13日）

尚昆[1]同志，并小平[2]同志：

（一）此件[3]很好，应予批准转发。（二）人民公社大办轻工业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轻工业部党组1958年11月7日关于大力发展猪皮制革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出口计划的增加，工业用革、农业用革、出口皮鞋用革的供应很紧张，但皮革工业的生产潜力却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沿海大城市的皮革厂生产任务不足。原因是在皮革的原料问题上，存在着迷信牛皮、跳不出牛皮圈子的思想。要求皮革工业有个大发展，必须打破迷信牛皮的思想，大量发展猪皮制革。利用猪皮，有些同志存在顾虑，认为群众不习惯吃剥了皮的猪肉，认为猪革不如牛革，生产猪革赔钱。这都是保守思想的反映，因为群众的习惯是可以逐步改变的。例如山东省，原来只有昌潍、莱阳专区有剥猪皮的习惯，但经过领导重视，努力推广，现在大多数专区都已开剥。至于使猪皮价格降低问题，经过努力，也是可以解决的。在技术上，目前猪革不仅可以做到光滑平整，而且可以做纺织工业用的皮卷革和服装革。发展猪皮制革，应该首先面向人民公社，皮鞋的销售市场今后主要将是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因此，社社县县都可以办原皮加工厂、制革厂和制鞋厂，这样皮革工业和皮鞋工业就可以力争上游，遍地开花地发展起来。

那一件[1]（即郑州会议印发的那一件）怎么样？是否批准转发了？（三）省办西医学中医训练班问题，拖得太久了，只需一百字左右的批文，要卫生部写，看来是不成的，应当自己动手，花卅分钟就写成了，以为如何？[2]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时于郑州

---

[1] 指轻工业部党组1958年10月30日关于人民公社大办工业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

[2] 1958年9月25日，卫生部党组向毛泽东并中央报送了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在报告上作了批示。195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报告。

祝贺也门王国国庆的电报

（1958年11月13日）

也门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国王伊马姆·艾哈迈德·伊本·叶海亚·哈米德丁·纳赛尔·里迪尼拉陛下：

值此也门王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和也门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也门国家繁荣，人民幸福，并祝陛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于北京

关于工作、生活同时并重方针的批语

（1958年11月14日）

一

此件[1]印发到会[2]各同志。很值得注意，是一个带全国性的问题，注意工作，忽视生活，必须立即引〔起〕全党各级负责同志，首先是省、地、县三级的负责同志的注意，方针是：工作生活同时并重。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四时于广水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8年11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〇期刊载的电讯稿《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电讯稿说，今年入秋以来，河北省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痢疾、肠胃炎等症也有发生。这次患病人数之多、蔓延之快是历年来所未有的，已在全区波及二十一个县市、七十多个村庄。疾病的流行严重地影响了钢铁生产和三秋工作。发生流行病的主要原因是，某些领导干部只注意生产，忽视了对群众集体生活的领导和关心。有些地方食堂卫生工作搞得不好，吃不到热饭，找不到暖和的地方，加上睡眠不足，使社员的身体抵抗力下降，疫病蔓延很快。另外，某些地区的领导和卫生部门，没有及时积极组织中西医生进行治疗，有的地方还发生药品不够的现象。这些情况，已经引起邯郸地委的注意，现正采取有效措施，扑灭现存病疫，控制蔓延，杜绝传染。

[2]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二

邯郸专区伤寒疫病普遍流行，原因是抓了工作，忘了生活。[1]

三

见1958年11月11日《内部参考》。[2]

---

[1]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新华社电讯稿修改的标题。

[2] 这是毛泽东在新华社电讯稿后写的说明。

对湖南省岳阳县筹办人民公学的批语[1]

（1958年11月14日）

待去查一下。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8年11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〇期刊载的《岳阳县城关镇正在筹办人民公学》一文的旁边。文中说，中共湖南省岳阳县委于10月底召开了城关镇三个学校和四个工厂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办一所人民公学，并组织了“岳州人民公学、钢铁机械联合企业委员会”。办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使教学和生产更加紧密结合，贯彻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的方针，使学生和工人既有学习的机会，又有劳动锻炼的时间，培养出大批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和红色专家，以促进文化技术革命的飞跃发展。办人民公学有三大好处：一、可以很快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从根本上清除鄙视体力劳动的资产阶级观点，把学生和工人培养成红透专深的新型劳动者；二、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向前发展，推动技术革命；三、可以贯彻以厂养校的原则，取消学费，实行读书不要钱，并可减轻国家在办学上的经费负担。文中还介绍了创办人民公学在组织机构、教学与劳动、生活福利等方面的安排。

关于印发《人民日报》社论《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巨大步骤》的批语

（1958年11月18日）

这是195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1]，印发到会[2]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

[1] 《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6日社论《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巨大步骤》中说：1959—1965年发展苏联国民经济的控制数字公布了。这个七年计划将经过两个月的全民讨论，然后提交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执行。这个宏伟计划以空前巨大的规模，以飞跃发展的速度，以在和平竞赛中压倒帝国主义的气概，以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雄姿，博得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引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震惊。我国人民对苏联走向共产主义的这个巨大步骤，感到无限的兴奋和鼓舞。7年中，苏联的钢产量将从1958年的5500万吨增加到1965年的8600万至9100万吨，石油产量从1958年的1.13亿吨增加到1965年的2.3亿至2.4亿吨，发电量从1958年的2330亿度增加到1965年的5000亿至5200亿度，谷物年产量达到100亿至110亿普特。从7年计划的图景中，可以看出苏联今后七年发展

的主要特点：第一，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发展所有经济部门，大力加强国家的经济潜力，以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以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同时进行必要的平衡。第三，改进生产力的布局，加速发展东部地区的经济。第四，进一步推广最新技术和发展尖端科学。第五，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同时，将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2]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关于“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辩论》[1]一文的批语

（1958年11月18日）

---

[1] 这篇文章刊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1月13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三八期上。文章说，山东省寿张县、范县先后在1958年10月26日、28日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县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寿张县委第一书记在《动员全党全民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报告中，提出了“为二年内实现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基本上建设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任务。范县县委第一书记在《为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到一九六〇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报告中，提出了“二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任务和具体规划。参加山东省宣传文教工作高唐现场会议的同志在参观寿张、范县两县后，对这种提法大都表示怀疑。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认为：目前实行的吃饭、穿衣不要钱等等，虽具有共产主义因素，但还不是“各取所需”，还不是共产主义。我们思想上对共产主义应该看得更远，目标才能更明确，干劲才会更大。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各地要以全国的速度为转移，要靠全国的大协作来解决。先进的县要关心全省、全国，通力支援落后县及邻县、邻省。共产主义是一个整体，一省一县单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想法是不妥当的。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还要有国际条件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但也有人认为一个县是能够建成共产主义的。某县县委宣传部长在和大家辩论后，仍然坚持他的看法，认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有快有慢，一个县就有可能先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各取所需”，一个县是可以先做到“各取所需”的；现在的县人民公社，已经可以说是全民所有制的共产主义经济了。

一

值得一阅，印发到会[1]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二

此件见1958年11月13日《宣教动态》。[2]

---

[1]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关于“一个县能否进入共产主义”的辩论》写的说明。

对《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经验》[1]一文的批语

（1958年11月18日）

一

此件印发到会[2]各同志。要实行技术革命，就应当这样做。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于武昌

二

见《经济消息》第34期。[3]

---

[1] 指1958年11月12日出版的《经济消息》第三十四期刊载的《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的好经验》一文，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经验》。文中说，长春汽车厂在充分发动群众大闹技

术革命的运动中，提出在明年“十一”实现年产15万辆汽车的跃进方案，并在运动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丰富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内容。过去推广“两参一改”，一般只限于工人参加行政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的改革，这次大闹技术革命运动，工人不仅参加行政管理，而且全面地参加设计和技术管理，并对生产工作和技术工作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使得工人、技术人员和职员密切结合起来，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运动的开展，还打破了迷信思想。过去不少干部认为工厂是苏联成套设计、成套供设备，有苏联专家帮助，是第一流的厂子，对修改设计的事不敢想。发动群众以后，工人们首先提出了修改设计的问题，底盘车间在修改产品结构、调整工艺线路和工厂平面布置上，达到了班产二百五十辆汽车的要求。于是，以工人为主力军、技术人员和职员共同参加的群众性的修改设计运动全面开展起来，并打破了许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妨碍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新的制度也正在逐步建立。

[2] 指即将在武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 这是毛泽东在《长春汽车厂发动群众大闹技术革命的经验》一文后写的说明。

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的批示

（1958年11月18日）

中国医药学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它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

对谭震林、廖鲁言[1]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11月19日）

一

此件[2]印发各同志，予以研究，需要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3]。然后由中央予以批准，发给省、自治区、直属市党委照此执行。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二

和去年比。[4]

三

这几项和去年比。[5]

四

和上年比。[6]

五

这几项都要有具体数字和去年比。[7]

六

究竟去年各有多少？[8]

七

1958年冬和1959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按各地的初步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有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去冬和今年是五百亿方）。假定用农村男女劳动力的半数，约一亿二千多万人来兴修水利，每人工作一百天，每人每天平均要做十五方以上，才能完成。不能搞这样多，要大大减少，否则，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的安排上发生矛盾；并且势必会加班加点，过分延长劳动时间，妨碍必要的休息和睡眠。

八

在公社化的过程中，自留地等残余的私有生产资料归社公有，比较顺利，个别地方出现过某些波动（例如卖猪、宰鸡等等），时间也只有几天，政策交代清楚，就稳定下来了。运动是健康的，比过去的初级合作化和高级合作化都顺利得多。但过去两个多月各地人民公社忙于秋收秋种和大搞钢铁，大多数还只搭起个架子，一大堆问题尚未处理。处理这些问题是今后几个月的任务。

九

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必须办好。副社长和社党委的副书记中都要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管生活。此外，县和县以上的农村工作部和妇联，都应该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这件事。要把为公共食堂和托儿所、幼儿园服务的工作当做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崇高的工作。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指谭震林、廖鲁言1958年11月16日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1958年农业收成的情况。粮食总产量预计8500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700亿斤翻一番；棉花总产量预计8500万担，比1957年的产量3280万担增长一倍半。报告还列出了油料及其他经济作物的产量。并说，这些统计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上报的数字少20%至30%。下面报产量有浮夸虚报，也有隐瞒产量的，经过省、地、县三级打些折扣后，这些数字可以认为是可靠的。总之，1958年的农业生产全面丰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二）1958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完成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自用部分增多、留用种子增多、劳力紧张和运输工具不足，此外，国家的收购计划没有真正成为农业社的计划等。建议从1959年起，在农产品的采购方面实行合同制，由采购部门同农村人民公社订立合同，双方保证按合同完成任务。（三）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提出的1959年种植计划，粮食播种面积将缩减到十五亿亩以内，比1958年减少四亿亩左右。这就是说亩产量要比1958年增加一倍半，由亩产400多斤提高到1000斤以上，才能使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再翻一番，达到1.5万亿斤。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必须开展大面积丰产运动，改变广种薄收为少种多收，实现土地利用的“三三制”，从根本上改变“五亿人搞饭吃”的局面。推行这个方针必须要有步骤，1959年的第一步不能跨得过大，特别是1958年的冬种和1959年的春种面积，只能少减，不能多减。建议各省根据不同地方的不同条件，提出实现土地利用“三三制”的步骤、方法和执行计划。（四）1958年的粮棉总产量虽然增加一倍以上，但农副业总产值没有翻一番，副业增加不多，个别地方还有减少。有许多公社账上积累不少，但现金短缺，有的甚至开不出工资；也没有钱购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这种情况，必须力求及早改变。要求各地抓住冬季大搞副业生产，成立专业队，规定完成的任务，解决1959年夏收以前的工资开支和其他现金支出。并发展社办工业，扩大多种经营，增加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这是从经济上巩固提高农村人民公社的一项关键措施。（五）1958年冬和1959年的水利工程计划，比上一年度增加近三倍。这样重的任务势必与钢铁、积肥、副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其他农村基本建设在劳动力安排上产生矛盾。因此，一方面必须保证重点工程

如期完成，另一方面要减少一些次要工程，推迟到1960年或1961年再去兴修。（六）关于分配问题和集体生活问题。生活问题，要有专人负责，县及县以上的农村工作部和妇联也都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这些事；分配问题，1958年的分配，由各省、市、自治区自行决定，可以以公社为单位统一分配，也可以由公社统一扣留之后，其余部分以原合作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另外，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可分一部分粮食给社员，使每户都有所储蓄。（七）今后的任务是，加强党的领导，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办好人民公社。1958年冬季要根据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的指示精神，系统地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对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准备在1959年1月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一次专门会议加以研究；同时从县以上的机关中抽调干部去充实公社的领导核心，并把在公社化和大跃进中的积极分子吸收一批到党内来，以保证党对人民公社的领导。这个报告后来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3] 谭震林、廖鲁言报告的修改情况，见本篇二至六，五个批语的注释及七、八、九三段文字。

[4] 这个批语写在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棉花预计总产量的一段话的旁边。报告原文说：“棉花总产量预计八千五百万担。由于入秋以来雨水过多和人手不够，对产量有些影响，但是出入不会很大，八千万担左右还是有把握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报告稿后来又增加了一句：“比1957年的产量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增加一倍半。”

[5] 这个批语是针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油料产量统计的一段话写的。报告的原文是：“秋收油料预计：大豆二百六十亿斤，花生一亿二千六百万担，芝麻一千一百八十八万担，加上棉籽和明年春收的油菜籽（各省提出的计划共一亿六千万担）共可产食油六百五十万吨左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这段话后来修改为：“秋收油料作物的预计：大豆二百六十亿斤，比1957年产量二百零一亿斤增长百分之三十，面积减少百分之二十六，亩产量提高百分之八十；花生一亿二千六百万担，比1957年产量五千一百万担增长近一倍半；芝麻一千一百八十八万担，比1957年产量六百二十五万担增长百分之九十；加上棉籽一亿二千万担（1957年是五千多万担）和明年春收的油菜籽（各省提出的计划共一亿六千万担，比1957年产量二千七百七十万担，

增长四至八倍，可能大了一点），共可产食油六百五十万吨左右（蓖麻、向日葵和木本油料都没有计算在内），每人平均有食油二十斤。”

[6] 这个批语写在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1958年食油产量统计的旁边。报告稿后来修改，没有增加这一项和1957年作比较的内容。

[7] 这个批语是针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1958年其他经济作物产量的统计写的。报告的原文是：“其他经济作物都有增产，烤烟、糖料作物都是成倍的增长，麻、丝、茶的增长比例则只有百分之几十，都不足一倍。”按照毛泽东的批示，这段话后来修改为：“其他经济作物都有增产，烤烟由1957年的五百一十二万担增加到一千九百八十七万担，甘蔗由二亿担增加到四亿五千万担，甜菜由三千万担增加到一亿六千万担左右，都是成倍地增长，而麻（由1957年的七百零七万担增加到九百九十二万担）、丝（由1957年的二百二十五万担增加到三百一十四万担）、茶（由1957年的二百二十三万担增加到三百零二万担）的增长比例，则只有百分之几十，都不足一倍。”

[8] 这个批语是针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中关于1958年大家畜、羊、猪等的统计而写的。报告的原文是：“1958年预计，大家畜增加六百六十三万头，羊增加三千万只，猪发展到二亿七千万头”，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段话后来修改为：“1958年预计，大家畜由1957年的八千三百八十二万头发展到九千零四十五万头，增加六百六十三万头；羊由1957年的九千八百万只发展到一亿二千九百万只，增加三千一百万只；猪由1957年的一亿四千万头发展到二亿七千万头，增加近一倍。”

对化工部党组关于扭转化学工业发展的被动局面的报告[1]的批语

（1958年11月19日）

---

[1] 指化工部党组1958年11月10日关于坚决扭转化学工业发展的被动局面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当前化学工业最迫切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基本化学工业（硝铵、硝酸、硫酸、纯碱、烧碱等）和重要的化学原料（电石、绝缘材料、合成橡胶等），以适应冶金、机械、电力、煤炭、石油、建筑、交通运输、国防和尖端科学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二）走自力更生的道路。目前化学工业一方面由于缺少电力、原料，生产计划完成不够好；另一方面，化学工业的建设项目排不上队。要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唯一的出路是鼓足干劲，靠自力更生，大搞“小土群”，大搞技术革命，自己动手炼钢炼铁，制造设备，以补不足。（三）学会用两条腿走路。在大搞化学工业“小土群”的同时，还必须在一切生产企业中认真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在旧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挖掘潜力，节省动力、材料、设备和投资，加速化学工业的发展。（四）发展综合性的联合企业。重点是办机械工业，下定决心，在今冬明春，靠自己动手炼钢炼铁，扩大设备制造能力。同时也希望其他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也办一点化学工业，以便解决本身所需要的化工原料。（五）急起直追，发展化学工业的尖端技术以配合整个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尖端科学技术需要化学工业供应的产品，质量要求十分严格，并且绝大部分国内没有生产过，要依靠自己摸索解决。化工部党组的报告后还附有《目前化工生产的严重落后情况和建议采取的若干措施》的材料。

一

彭涛[1]同志：

此件写得很好。在第九页上有一处不明[2]，有一处需改变重点并举些例子[3]。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

[1] 彭涛，当时任化学工业部部长。

[2] 这里是指化工部党组报告第九页上的一段话：“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把化工部门武装起来，或者给他们一些机床，或者给他们一些机械工厂作为基础，以便在今冬明春逐步发展壮大起来，使1959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化工设备制造能力达到1万吨—2万吨。”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道：“是总共这样多，还是每个省要这样多?”

[3] 这里是指化工部党组报告第九页上的一段话：“我们希望其他工业部门和交通运输部门，也办一点化学工业，这不仅是对化学工业的支持，同时对于解决本身所需的化工原料也大有好处。”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划了竖线，并写有一条批语：“可以举几个例子，重点是于他本有益，并且必不可少。若是为了支持化工部门，他们那样忙，谁肯支持呢?”

二

应将各项已有量列出数字来，省得读〔者〕一项一项去算。[1]

三

全文中许多不确定之词都应修改。[2]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是针对化工部党组报告后附的《目前化工生产的严重落后情况和建议采取的若干措施》材料中的一段话写的。这段话在说到现有化工生产能力只能供应1959年对化工产品需要量的四分之一，新建投产企业再供应四分之一，其余一半还没有着落时，列举了纯碱、烧碱、硫酸、硝酸、硝铵、电石和硼砂等现有产量占应供应量的百分比和缺额数。

[2]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化工部党组报告后附的《目前化工生产的严重落后情况和建议采取的若干措施》材料第四页上。在这个材料中，毛泽东对一些提法和用语作了修改（如将“明年”改为“1959年”，“今冬明春”改为“1958年冬季和1959年春季”，“可否请辽、吉两省和青、藏地区考虑建立硼的专业矿务机构”一句改为“建议请辽、吉两省和青、藏地区迅速建立硼的专业矿务机构”等），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国家建委党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11月19日）

此件[1]很好，印发到会[2]各同志。应予批准，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1958年11月17日向毛泽东报送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当前基本建设工作中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报告。报告说：（一）工业布局应该适当分散，企业类型应该以中小为主。这样做有四条好处：一是能够及早投入生产，二是为大厂建立了基地，便于今后的发展，三是取得了建设经验，四是培养了技术力量。因此，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省、市、区内的工业布局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和合理的调整，把需要适当分散的企业分散一下；把应该缩小的企业规模化大为小；已经开始建设而规模过大不便于缩小的，可以分期建设。（二）基本建设项目施工先后必须排队。1959年基本建设项目的排队，仍以钢为纲，即装备大中小钢铁企业和相应的基本工业、交通运输业，以保证完成三千万吨钢的生产任务。（三）设计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土洋结合的方针。就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群众的创造和其他具体条件，参考外国的经验而进行设计，这是设计

工作贯彻执行总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建议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所有的建设项目的设计，认真审查和修改一次。（四）推广快速施工，可以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缩短工期，以很快的速度建成成批的新企业和新建筑，并且降低建筑成本。（五）认真组织成套设备的供应。各工业部门应从速确定各种类型工厂成套设备的供应范围，并且开出清单通知各省、市、自治区，使各地方心中有数；在规定机械制造任务的时候，不仅要安排主要设备的生产，同时必须给配套设备的生产留出一定的生产能力；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全国成套设备供应工作的组织领导。（六）基本建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基本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展开讨论，大鸣大放，真正做到思想交锋，统一认识，以保证在基本建设的各个环节上随时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

[2]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关于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的批语

（1958年11月20日）

此件[1]值得一阅，印发到会[2]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1月15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139期刊载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主要修改和补充》一文。文章介绍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特征的表述、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表述、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论述，以及关于价值和使用价值的非对抗性矛盾、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性质、关于物质鼓励和按劳分配原则等问题上同前二版比较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2] 指即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一文的批语

（1958年11月20日）

此件[1]可看。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8年11月1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三二期刊载的报道《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介绍了河北省安国县伍仁桥东风人民公社在开展播种规格化、种植区域化、耕作园田化的小麦大面积丰产运动中，搞的一块“千亩天下第一田”的情况，说这块千亩麦田埂直如线，畦平如镜，土粒胜如筛过，畦埂犹如刀切，计划平均亩产二万斤。毛泽东在这篇报道后写有：“见1958年11月13日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报道后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在会上印发。

在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1月21日）

（一）过渡到共产主义问题。

中国和苏联哪个先过渡到共产主义？要从各方面慎重考虑。中国早过渡究竟有无可能，是否有利。即使有可能，也可以用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

（二）十五年规划问题。

四十条放两年再说，不可外传，勿务虚名而获实祸。长期计划可以不必作，只要少数人中间有一种考虑。

（三）全会任务问题。

就搞人民公社指示和明年指标。

（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是否提三四年、五六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五）消灭阶级问题。

苏联的提法和我们的提法。经济上消灭阶级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消灭阶级。苏联的教训和中国的教训。

（六）商品经济问题。

商品的范围。商品的寿命。斯大林的提法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提法。

（七）减少任务问题。

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收缩。是否泼冷水？是否机会主义？一定要有客观可能性。过了明年六月再看。

（八）人民公社整社问题。

用四个月整社。公社、食堂、托儿所，垮不垮的两种可能性。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

（1958年11月21日）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他们有他们的困难，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像猫和老鼠。我们干部下放，从中央以下干部都参加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脑力体力，没有去破除。但他们谨慎。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不管我们搞多少钢，这条大家看对不对？也许我们钢多一点，因为我们人多，还有群众路线，十年搞几亿钢。他七年翻一番，五

千五百万吨翻一番，一亿一千万吨，只讲九千一百万吨，留有余地。想一想对不对？因为革命，马克思那时没有成功，列宁成功了，完成了十月革命，苏联已经搞了四十一年，再搞十二年，才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们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怎么办？我看要逼他过，形势逼人，逼他快些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比他迟三年，但是一定要让他先过。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只看到几亿人口，没有看到二十七亿，我们只是一个局部（六亿人口），全世界是全局。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牵涉到我们的想法，作计划，对苏联的学习和尊重，去掉隔阂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底子比我们好，我们的政治底子又比他们好。他们两亿人口，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吨石油，技术那么高，成百万的技术人员，全国人民中学程度，它的本钱大，美国比不上他。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十一年，我们只有九年。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看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我们后过，这是不是机会主义，他是十二年只有一亿吨钢，我们也不能先过，也有理由，我们十年四亿吨钢，一

百六十万台机器，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国有天下第一田，到那个时候，地球上有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一个问题。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十一月十七日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像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杨，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得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钢铁上去各方面都上去，六十四种稀有金属都要有比例。什么叫比例？现在我们谁也不知道什么叫比例，我是不知道，你们可能高明一点。什么是有计划按比例，要慢慢摸索。恩格斯说，要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我看斯大林认识也不完全，运用也不灵活，至于熟练地运用就更差，对工、农，轻、重工业都不那么正确，重工业太重，是长腿，农业是短腿，是铁拐李。现在赫鲁晓夫有两条腿走路之势。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何长工没有来，他的腿就是没有按比例，我们按三个并举，就是两条腿走路，几个比例，大中小也是个比例，世界上的事总有大中小的。现在十二个报告，我看了，大多数写得好，有些特别好。口语与科学名词结合也是土洋结合，过去我常说经济科学文章写得不好，你自己看得懂，别人看不懂，希望大家都看一遍。我们有这么多天，一天看一个就容易看完了，似乎我们有点按比例。三个并举，有个重点，重工业为纲，但真正掌握客观规律，熟练地运用它还有问题。

总的讲，是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我们后进入，如果我们实际先进入了，怎么办？可以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有实无名，可不可以？比方一个人，学问很高，如孔夫子、耶稣、释迦牟尼，谁也没有给他们安博士的头衔，并不妨碍他们行博士之实。孔子是后来汉朝董仲舒捧起来的，但到南北朝又不太灵了，到唐朝韩愈这些人，又写了他，特别是宋朝的朱熹，朱夫子以后，圣人就定了，到了明、清两代才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位”，到“五四”运动又下降了，圣人不圣人吃不开了，我们共产党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承认他的历史地位，但不承认什么圣人不圣人，他们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不过是贤人。就是说，我们过渡到共产主义，不封为圣人，搞个贤人和普通人，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封个贤人这不妨碍本质，人有三种，普通人、贤人和圣人，就搞个贤人好了。我们共产主义者本质是圣人，不封。搞个贤人，并不妨碍本质，是否好一些。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他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米，我们飞机只几千米，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

翻了番，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究竟要不要这么多，买主是谁？无非是吕正操，修铁路，无非是造船，这是交通部的事。机械电气设备还有其他，究竟需要不需要，做到做不到？大概农业方面比较有把握，工业比农业难，你们办工业的，你们说能不能？真正全党全民办工业，只有两个月谁有把握？这就涉及四十条了，是否就这样还没有把握，四十条这次可以议一下，不作为重点。郑州会议搞了，很好，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继续下去，议不出什么事来，可不可能搞四亿吨钢，需要不需要？□□□同志给我的说明不解决问题，只说明可能，需要不需要，他没有回答。美国一亿吨钢，出口一千万吨稍多一点（包括机器），即十分之一。至少苦战三年，明年和后年，才能搞到一点边，心血来潮，一想就出个数字。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今年一千一百万吨，是搞迟了，明年是十二个月。（□□插话，三千万吨是元帅，其他怎么安排？）

四十条这个问题，如果传出去，很不好。你们搞那么多，而苏联搞多少？叫做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到，谁也不相信，说中国人吹牛。说受实祸，美国人可能打原子弹，把你打乱。当然也不一定。将来一不可能，二不需要，这样岂不如自己垮台？我看还是谨慎一点。有些人里通外国，到大使馆一报，苏联首先会吓一跳，如何办？粮食多一点没关系，但每人一万斤也不好，要成灾的，无非是三年不种田，吃完了再种。听说有几个姑娘说，不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我看她们是想独身主义的，把这个作挡箭牌。据

伯达调查，她们还是想结婚的，八万斤是不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究竟怎样好？摆他两三年再说，横竖不碍事，过去讲过不搞长远计划，没有把握，只搞年度计划，但在少数人头脑中有个数，还是必要的。四十条纲要有两种办法，一是认真议一下，作为全会草案讨论通过；另一种方法是根本不讨论，不通过，只交待一下，说明郑州会议的数字没有把握，但有积极意义。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我们到今年是九年，再过十年共十九年。苏联从一九二一年算起，到一九三八年共十八年，只有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到一九六八年也是十八年，时间差不多，肯定东西要多，我们明年就超过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建成社会主义。是所有制合为一个标准，都是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按此标准，苏联就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它还是两种所有制，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全世界人民要问，苏联到现在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曾希圣插话，这条不公布。）不公开也

会传出去。另外一个办法，是不这样讲。像北戴河会议一样，只讲几个条件，什么时候建成不说，可能主动一些，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消灭阶级问题。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

法，是一九三六年宣布的十六年消灭，我们十六年也许可能，今年九年，还有七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后来冒出来一个章罗联盟，农村地主喜欢看《文汇报》，《文汇报》一到，就造谣了。“地、富、反、坏”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地、富、反、坏经济上不剥削，但作为政治上、思想上的这个阶级，如章伯钧一起的地主、资产阶级还存在，搞人民公社，首先知识分子、教授最关心，惶惶不可终日。北京有个女教授，睡到半夜，做了一场梦，人民公社成立，孩子进了托儿所，大哭一场，醒来后才知道是一个梦，这不简单。

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消灭阶级，为什么一九三七年还杀了那么多人，特务如麻。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如宣布消灭了，地主都是农民，资本家都是工人，有利无利？资产阶级允许入人民公社，但资产阶级帽子还要戴，不取消定息。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苏联的知识分子里面，阶级消灭得那样干净？我看不一定。最近苏联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造成世界性运动，香港报纸大肆宣传，艾森豪威尔说：“这个作家来了我接见。”他们作家中还有资产阶级，大学毕业生中还有那么多人信宗教，当牧师。（□□：爱仑堡如果在中国，就是一

个右派。）恐怕他们以前没有经验，我们有经验，谨慎一些。

（六）经济理论问题。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在郑州只限于生活资料，加上一部分公社的生产资料，这是斯大林的说法，斯大林主张不把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我国还宣布土地国有，机械化的机器自己搞，农民做不了的，我们供应。现在有个消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但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斯大林有一点讲得不通，农产品是商品，工业品是非商品，一个商品，一个非商品（国营工业的产品），两者交换（布匹与农庄粮食交换）这怎么能讲得通呢？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的钢吃不得，穿不得。赵尔陆的机器也是这样，化工穿用得多，张霖之，你的东西也不能吃，李葆华的水可以吃，电也不能吃。归根结底，生产资料为了制造生活资料（包括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唱戏的二胡、笛子、文房四宝等等）。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当然，有个时期是阻碍生产发展的。因此，四十条中商品写得不妥当，还是照斯大林写的，而斯大林对于国营生产的生活资料和集体农庄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关系没弄清楚，请大家议一下，是政治经济学第三版，其他没有大改。所以斯大林的东西只能推倒一部分，不能全部推倒。因为他是科学，全部推倒不好。谁人第一个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斯大林。当然那一本书其中有部分缺点和错误，例如第三封信。为抓农民辫子起见，机器不卖给农庄。写规定有使用之权，无所有权，这就是不信任农民，我们是给合作社……我问过尤金同

志，农庄有卡车，有小工厂，有工作机具，为什么不给拖拉机？我们这些人，包括我，过去不管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看书。现在全国有几十万人议论纷纷，十人十说，百人百说，还要看书，没有看过的要看，看过的再看一遍，还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你们看了没有？教科书每人发一套，先看社会主义部分，不是要务虚吗？

（七）会不会泼冷水？要人家吃饱饭，睡好觉，特别人家正在鼓足干劲，苦战几昼夜，干出来了。除特殊外，还是要睡一点觉。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

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计。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也不能出口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多搞一万吨，明年要搞二千一百四十一万吨，我看还是稳一点。水利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搞他十年，不就是五千亿了吗?我说还是留一点儿给儿子去做，我们还能都搞完哪!

此外，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七月一日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农业指标搞多少?(□□□：对外面说搞一万亿斤差不多，每人有两千斤就差不多了。)北戴河会议的东西还要议一下，你说右倾机会主义，我翻一番哟!机床八万台，明年翻四番，搞三十二万台，有那么厉害?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现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

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要搞万人检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八小时，如只睡七小时是未完成任务，我是从未完成任务的，你们也可以检查贴大字报。食堂如何，要有个章程，人民公社要议一下，搞个指示，四个月能不能整顿好？是不是少了，要半年。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省（市）地委集中力量去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候要搞万人检查团，不然就有亡国的危险。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搞人民公社。都这样说，你们不搞公社不会亡，搞会亡，我看不能说他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性，一亡，一不亡。当然亡了会搞起来，是暂时的灭亡。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中央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不是垮台了？王明还没有垮台，现在他的态度好转，（给中央的信，给他印发）可能是……我们这条路

线硬是好像百分之百的正确。

我是提问题。把题目提出来，去讨论，哪样为好，各个同志都可以提问题，这些时候，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究竟哪个方法好？如钢铁究竟是三千万吨还是二千一百四十万吨好？

这次会议是今年这一年的总结性会议。已十二月了嘛，安排明年，主要是第一季度。

记者头脑要冷静[1]

（1958年11月21日）

做报纸工作的，做记者工作的，对遇到的问题要有分析，要有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

矛盾有正面，有侧面。看问题一定要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群众运动有主流，有支流。到下面去看，对运动的成绩和缺点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要把任何一件事情绝对化。好事情不要全信，坏事情也不要只看到它的消极一面。比方瞒产，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是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没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

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强迫命令，不好。一定的命令还是需要的。如果什么事情都命令，就不好了。有些事情也并非强迫命令，例如党委的决议，一定

---

[1] 这是毛泽东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谈话的要点。

要照办。总要有集中。集中的过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风，反对强迫命令。

记者要善于比较。唐朝有一个太守，他问官司，先去了解原告被告周围的人和周围的情况，然后再审原告被告。这叫作“勾推法”。这就是比较，同周围的环境比较。记者要善于运用这种方法。不要看到好的就认为全好，看到坏的就认为全坏。如果别人说全好，那你就问一问：是不是全好？如果别人说全坏，那你就问一问：一点好处没有吗？

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这种思想方法，首先是各新华分社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北京的编辑部要有。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

记者，特别是记者头子，头脑要清楚，要冷静。

对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的批语

（1958年11月21日、27日）

一

此件[1]很好。请小平[2]同志阅后，印发到会[3]各同志，加以研究。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二

退小平同志印发。

毛
廿七日下午七时

既在会〔后〕公布，时间应是十二月某日。[4]

三

关于人民生活问题。[5]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8年11月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规定说，省委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多次指示，向全省党组织提出一个重大任务：要努力做好有关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其目的，不是泄气，而是鼓气；不是促退，而是促进；不是要使明年的工农业生产只有一个小小的跃进，而是使明年的工农业生产来一个比今年更大的跃进。为此，作如下规定：（一）把劳动和休息有节奏地结合起来。第一，要使劳动者有足够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和一定的文化娱乐时间，每天睡眠八小时，吃饭、休息四小时，共十二小时，必须保证；第二，搞好工具改革，改善劳动组织，逐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劳动效率；第三，保证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每周休息半天；第四，保证妇女劳动者月经期内不做重活，不下冷水，不熬夜；第五，保证生产的安全，尽可能改善劳动条件，力求减少和避免工伤事故。（二）办好公共食堂。第一，要吃饱；第二，要吃好；第三，要吃得干净卫生；第四，公共食堂要有餐厅；第五，公共食堂要实现管理民主化；第六，本着“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对于在食堂吃饭的人，应当允许有必要的机动。如病人、老人、小孩、孕妇可以打饭菜回去吃等；第七，搞好工地食堂，保证工地上工作的人吃饱、吃好；第八，在食堂吃饭的人数和食堂工作人员人数，目前应当是20:1，或者25:1，尽可能改革炊事工具，减轻和改善炊事劳动，提高效率；第九，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社员，来了客人，可以带到食堂吃饭，食堂不另外添菜招待；第十，应当分批举办炊事员训练班，使所有食堂的炊事员都能够不断地提高烹饪技术，增加卫生知识，发扬热爱食堂工作的精神；第十一，不准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在公共食堂担任任何职务；第十二，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三）住宅问题。第一，各公社要有一个至若干个建筑队；第二，各公社

要逐户检查住宅，及时做好住宅的防寒过冬工作；第三，各县委、公社党委，要在进行城镇规划、土地规划的同时，做出集体新村规划；并且搞好试点，在新村规模、房屋样式、园林化、讲卫生以及禾场、道路、公墓、厕所、畜舍的建筑等方面，做出样子。新建住宅要便于一家男女老少的团聚。(四) 关心老年人和妇女儿童。第一，办好敬老院，使无依无靠的老人，老有所养；第二，办好托儿所和幼儿园；第三，对待妇女，除了必须同工同酬，照顾妇女经期卫生之外，还必须耐心帮助妇女学习文化和技术。(五) 做好卫生工作。第一，全省城镇乡村都应当发动群众修订除五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钉螺）、灭五病（血吸虫病、疟疾、现症梅毒、钩虫病、丝虫病）、讲卫生的工作规划，并迅速行动起来，力争一二年内做到基本上除掉五害，灭掉五病；第二，健全医疗机构，做好医疗工作，简化医疗手续，尽可能给病人以各种方便；第三，搞好公共澡堂，不愿在公共澡堂洗澡者，允许把洗澡水打回去洗澡；第四，搞好一切住宅和一切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六)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第一，各级党委要发动群众，搞好田间工地的文娱活动；第二，在一九五九年春节期间搞一个大规模的文娱体育运动，搞会演、开运动会，让全体劳动者玩一个痛快；第三，积极培养工厂、农村的自编、自导、自演的不脱离生产的小型剧团，并且要注意有计划地帮助他们逐步提高政治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第四，把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和民兵的军事训练结合起来，做好国防体育工作。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正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 这个批语写在邓小平1958年11月27日为报送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的批语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此件少奇、彭真同志已看过，请你阅审退我，如认为可用，拟即印发全会，在会后公布。”中共中央批语稿署的时间是1958年11月，毛泽东将其改为12月，并写了这个批语。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此件时，中共中央批语的时间署为1958年12月19日。

[5]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的批语稿拟的标题；1958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也采用了这个标题。

给李富春[1]的信

（1958年11月22日）

富春同志：

1959年指标[2]，请于每一个指标数字下面，注明1958年的预计完成的数字，例如：钢的第一个方案是2,200万吨，在其下注明1958年的预计完成数为1,100万吨。其他各项，照此注明，以便阅者比较。第二方案栏内，可以不注，以免重复。注好，请再抄一份给我，同时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上午六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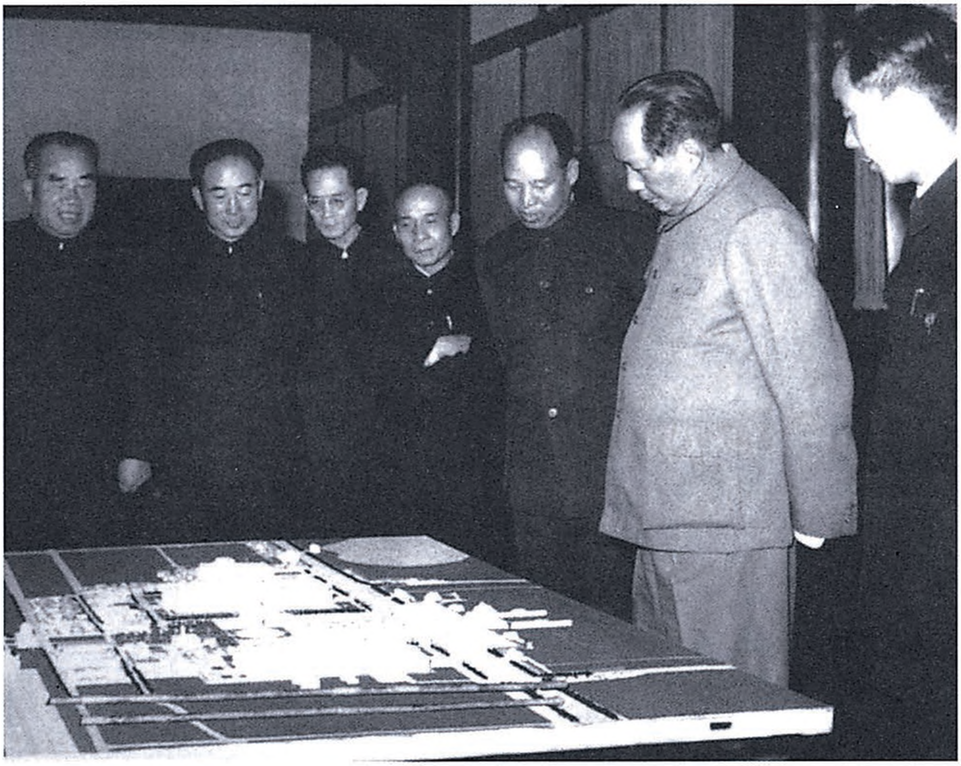
---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 指准备提交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中列举的1959年各项主要产品产量的指标。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1958年，毛泽东、朱德等观看天安门广场规划模型。

1958年，毛泽东等观看天安门广场规划模型。



1958年，毛泽东、朱德等观看天安门广场规划模型。

对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稿的批语

（1958年11月22日、12月6日）

一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印发到会[3]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二

即送小平同志：

请你问一下王任重[4]同志，十二月五日报上发表的这一件，和印发到会各同志看的那一件，在内容上、文字上有无差别，即有无修改。如有，请再印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时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8年11月21日关于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的指示（草稿）。指示稿有七条，主要内容是：(一)“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即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目前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采取这种分配方式，基本上仍然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付酬”的原则；它是人民公社在现阶段应当实行的一种比较适当的分配方式。(二）确定工资和供给标准，要以1958年的生产水平为依据；要使90%以上的社员比1957年的实际收入都有所增加，其余的社员比1957年也不致减少收入或减少不多。目前供给部分所占的比重不宜过大，以免一部分劳力强、人口少的社员减少收入。今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还要适当增加工资，逐步扩大供给范围和提高供给标准，并且要积极发展集体生活福利事业，使社员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三）目前各个人民公社以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较为适宜。收入比较少的公社也可以只实行粮食供给制。少数因灾减产的公社，如无力实行粮食供给制，可以暂时实行粮食半供给制。衣服、鞋袜以及其他日用品等，目前暂不实行供给制为好。(四）合理地评定工资等级。评定工资等级的主要条件，应当是劳动态度好坏、劳力强弱和技术高低。一般地说，这三个条件的集中表现是1958年实做工分的多少。在评级的时候，应当使妇女劳动力得到应得的等级；对于1958年因病缺勤较多的社员也应当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等级分做七级左右比较适当。评定工资等级和工资标准，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不准少数人包办代替。(五）在目前条件下，从社员工资总额中抽出10%—15％作为奖励工资，对于鼓励社员劳动积极性有好处。(六）在一个公社内部，工资标准应当统一。但各人民公社都应当注意照顾与解决原农业社之间的穷富矛盾。(七）要把推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当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深入思想发动，具体地交待政策，依靠贫农和下中农，充分发扬民主，力求做到绝大多数人真正满意，高高兴兴，以达到推动生产大跃进的目的。

[3] 指正在武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4]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958年，毛泽东和朱汉雄在武昌东湖客舍。

1958年，毛泽东和彭真在武汉东湖漫步交谈。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58年11月22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五周年，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英雄的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满意地看到，中朝两国经济文化合作关系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繁荣和高涨，这对进一步发展中朝两国人民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作出了重大贡献。

兄弟般的朝鲜人民现在正雄姿英发、朝气蓬勃地为争取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并且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就，这不仅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幸福的生活，而且增强了保卫和平的力量，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欢欣和鼓舞。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斗

争中赢得新的胜利！

祝中朝两国人民传统的、兄弟般的友谊万载常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二）[1]

（1958年11月23日）

（一）从写文章谈起。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要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中央委员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以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

---

[1]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于21日和23日在会上作了讲话。

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要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炉子可以吃土铁，有什么根据？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电力不足怎样办？现在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己搞电站，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办法？能解决多少？在座的如果没有电力，一切事情都搞不成。

如何解决呢？是不是议论两三天后，再动手修改文件，补充根据，主要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

现在我们兴了个规矩，一年抓四次，中央和地方在一起检查，共同商量。明年的事今年安排，一年的架子先搭起来。明年到了春夏秋冬各抓一次。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郑州会议和这次武昌会议，算是抓了六次。南宁会议是夸夸其谈，解决相互关系。成都会议就有具体东西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武昌会议是成都会议的继续。

（二）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同志写报告的问题。中央各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各省市委的同志，你们一个也不写是不行的，要压一压。每人写一个是否可以？大家不言语。这次逼，可能逼死人。是不是下次每人写一篇？五六千字或七八千字，片面性、全面性都可以，就是第一书记亲自动手，即使不动手，也要动脑、动口，修修补补。中央各部的报告是不是部长亲自动手写的啊？下次会，明年二月一日开，这些文章在一月二十五日前送到，以便审查，会上印发，在会场上可以讨论修改。各省要开党代会总结一下，问题太多了不行，搞一百个问题就没有人看了，去掉九十九个，写几个问题或一个问题，最多不超过十个问题，要有突出的

地方。人有各个系统（吸收系统、生殖系统……），地方工作也有许多系统，因此，有些可以不讲，有的要带几笔，有的要突出起来讲。

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三）谈一谈昨天晚上的问题。以钢为纲带动一切，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零七十万吨，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

不是机会主义，要他说了才算数，还说我是大冒进，不是大跃进我不服，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做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采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东北去年三百五十万吨左右，今年原定六百万吨，完成五百万吨，明年只准备搞七百一十五万吨，又说经过努力可以搞八百万吨。我看要讲机会主义，他才是机会主义。可是在苏联，他是要得势的，因为今年只有五百万吨，明年八百万吨，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嘛，增加了半倍多，是半机会主义。华北去年只有六十万吨，今年一百五十万吨，明年打算四百万吨，今年增加一点七倍，这是马列主义。明年打算四百万吨，这是几个马列主义了，你办得了吗？你把根据讲出来，为什么明年搞这么多？华东去年二十二万吨，今年一百二十万吨（加上坏钢是一百六十万吨），明年四百万吨，增加二倍多。上海真正是无产阶级，一无煤，二无铁，只有五万人。华中去年十七万吨，今年五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三倍。此人原先气魄很大，打算搞三百万吨，只要大家努力，过那些关，能成功，无人反对，并且开庆祝会。西南去年二十万吨，今年七十万吨，明年二百万吨，增加两倍。西北去年只有一万四千吨，比蒋介石少一点，今年五万吨，超过蒋介石，明年七十万吨，增加了十三

倍，这里头有机会主义吗？华南去年两千吨，今年六万吨，增加三十倍，马克思主义越到南方越高，明年六十万吨，增长十倍。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这些数字，无非证明并非机会主义，没有开除党籍的危险，各地合计，明年是二千一百三十万吨，问题是，是否能确实办到。要搞许多保险系数，一千八百万吨作为第一本账，在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确实为此奋斗，还要作思想准备。如果只能搞到一千五百万吨好钢，另外有三百万吨土钢，我也满意。

第一本账，一千八百万吨，第二本账，两千二百万吨，以此为例，各部门的指标，都要相应地减下来。例如发电，搞小土群，可以自发自用。强迫命令，已搞的，要采取不发饷的办法。又如铁路，原定五年只搞两万公里，现在几年就搞两万公里。需要是需要，但能不能搞这么多？（□□□：明年第一季度，只有二百九十万吨钢材，加上进口，不过三百万吨，不够分配。开口要三万吨，只能给一万吨。）吕正操，没有钢怎么办？（吕：可以搞球墨铸铁。）成都会议是五年二万公里，现在一九五八年就搞了二万公里，□□□的气魄很大。我很高兴，问题是能不能办到，有没有把握。要找出根据，你有什么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各地自己造。）（□□□：几个月我们都是见物不见人，看看部的报告，吓一跳，写不出来。）有矛盾。□□□，你真是思想解决了，中央可以夸海口，担子则压在地方身上。（□□：任务是第三本账，武钢要七万五千吨，共十五万五千吨，而中央只给七万吨，所以那些项目是建不成的。）不给米，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农民就有各种办法抵制我们。例如，区上为填表报，专设一个假报员，专门填写表报。因为上面一定要报，而且

报少了不像样子。一路报上去，上面信以为真，其实根本没有。我看现在不少这样的问题。今年究竟有没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四）作假问题。郑州会议[1]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2]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

---

[1] 指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2]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久就在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作诗不一样，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苞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苞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

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1]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糊弄糊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2]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

---

[1]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张良（前250—前186），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的重要谋士。

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秦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

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决定》草案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11月24日）

一

先念[1]同志：

此件[2]很好。我只作个别文句的修改和一些增补[3]，请加斟酌。

---

[1]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修正草稿）》。决定稿指出，财政贸易管理体制必须适应人民公社成立以后的新形势，作必要的改进，实行“两放、三统、一包”。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的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行这种办法，既可以保证国家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全面贯彻，又有利于人民公社在执行政策的条件下机动地处理业务；既可以保证国家统一计划的执行，又有利于人民公社对工农商学兵各方面活动作全面的管理和安排；既可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增加积累的积极性。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这个决定，并于1958年12月20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署名公布。195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决定的全文。

[3] 见本篇二至四。

此件印发各同志加以讨论（可能有某些修改），并待中央全会予以批准之后，即可公开发表。我的修改处，请送小平[1]同志一阅。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上午五时

二

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在现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障碍的部分，正在遭到破除，而那些有用的部分，则还保留着，使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三

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在现时，还只是在国营工业、运输业及其他国营企业和事业方面存在着全民所有制，所以还不是全面的），有利于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地准备条件。

四

目前，全国各地的公社虽然已经搭起架子，也可以说基本上建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立起来了，但是要在思想、组织、生产、分配、生活福利和各项业务上都弄清条理、建立就绪和走上轨道，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因此，国家财贸部门对于公社的财贸工作，应当继续在计划管理、业务指导、技术帮助等方面加强领导，特别在公社建立的初期，更应当配合公社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大力给予帮助。

对《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11月、12月）

一

乔木[2]同志：

提了一点意见，请与小平、任重[3]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十二时

二

这里逻辑不清，相当混乱，故作如此修改。所谓逻辑，有一个必须遵守的通用原则，就是“全量大于部分”，或者说，“大比小为大，小比大为小”。说话，作文，必须注意及之。[4]

三

为了照顾苏联，不用“正确”二字。[5]

四

即送小平、乔木同志：

此件一至六节，又看了一遍（七、八两节未看），略有修改，请你提出和各同志谈一下，看是否可用。这一件还是十一月二十九日看的，各小组所提意见那时还没有，故没有涉及。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上午十时

五

这一切都证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上根据群众的创造所作的关于在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正确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六

目前城市中的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中许多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相当浓厚，他们对于成立公社还有顾虑，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应

当有所等待。因此，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

七

广泛地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成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前进的速度较快，需要的时间还将很长，全部完成这个过程，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八

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觉悟的水平这些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

九

过去人们经常忧愁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但是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产的事实，把这种论断推翻了。只要认真推广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的经验，耕地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人口就不是多了，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

是一个极大的变化。

十

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需要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必须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原则，不要办那些本地没有原材料、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取原材料的工业，以免增加成本，浪费劳动力。

十一

供给范围目前不宜过宽。实行供给制并不是使人们的生活清一色。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需要总是大体相同而又各有不同的。因此，无论在目前和将来，在供给的范围内，必须注意尽可能使社员有适当选择的自由。

十二

各个地区的工资水平也允许有相当的差别。目前城市中工资的差额要比农村大一些，这是必要的。到了将来，由于生产有了极大的高涨，所有一切人都富裕起来，无论在城市或者农村，这种工资等级的差别就会显得没有必要，而逐步趋于消失，那就是接近共产主义的时代了。

十三

要办好敬老院，为那些无子女依靠的老年人（“五保户”）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场所。

十四

现在世界上有一大堆蠢人，下死劲攻击我们的人民公社，其中就有美国的杜勒斯[6]先生。这个杜勒斯，对于我国的事情，啥也不懂，却要装作一个中国通，疯狂地反对人民公社。特别使他伤心的是，据说，我们破坏了几千年传下来的好得不得了的家庭制度。不错，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须知这种家长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没有了，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进步。我们却更进一步，建立了民主团结的家庭，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只有在将来，在那里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后，这样的家庭才有可能普遍出现。至于托儿所，幼儿园，工厂里的工人食堂，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先有。不过，在那里，凡是由资产阶级举办的这类事业，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目的在于便利资本家剥削男女劳动者。而我们所举办的这类事业，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便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便利于人类个性的解放，真正彻底地解放了妇女群众，并使儿童教养得更好些，因而得到全体劳动人民，首先是妇女群众的热烈欢迎。

十五

近代的产业军，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一个工厂就等于一个军营。工人站在机器面前，其纪律之严，不下于军队。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业产业军，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产业军，去掉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在工人阶级内部实行了生动活泼的自觉自愿的民主集中制。我们现在把这个制度应用于农村，这样就建立了没有地主富农剥削、也脱离了小生产状态的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农业产业军。

十六

民兵组织应当根据需要配备武器，武器由地方自办兵工厂生产。基干民兵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军事训练，普通民兵也要在劳动间隙进行适当的训练，以便为实行全民皆兵准备条件。我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民兵制度是喜闻乐见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只有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战胜武装的反革命，才能成为中国这块天地的主人；而在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又看到，国外还有天天声言要灭掉这个人民国家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存在；因此，全体人民决心继续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且声言：一心想要抢劫我们的强盗们，你们小心一点儿吧，不要妄想来碰我们这些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我们是准备好了的。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

十七

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但在国外，在资本主义世界，严重地存在着；就是在国内，也还是存在着。要教育群众提高革命警惕性，严防敌人的破坏活动。

十八

整社工作，在每个县的范围内，要首先做好一个或者两个试点，即在一个或者两个人民公社内，帮助那里的同志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做好那里的工作，取得经验，作为榜样，然后全面推广。

---

[1]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的。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第一次郑州会议通过了《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会议决定先将草案带回去贯彻执行并征求意见，准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后正式发给各级党委。会后，毛泽东觉得文件不满意，建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将各地对文件讨论的意见带到武昌会议上再讨论。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会议及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根据新的情况和各地讨论的意见，又重新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对这个决议作了多次修改，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在修改时写的批语，五至十八是毛泽东对决议稿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修改的文字。除此之外，毛泽东在修改决议稿过程中还加写了两段比较长的话，后来在正式通过的决议中删去了。其中一段是：“农业方面的少

种多收将引起农业生产上的大革命。所谓基本农田制，所谓园林化，是什么呢？就是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将现有全部用于种植农业作物的十八亿亩耕地（等于一亿二千万海克托），用三分之一，即六亿亩左右，种农业作物，三分之一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种树造林。到处要有大小水塘或水库，其中有鱼、有虾蟹、有各种水生植物之类。人民公社实行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其中的农，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五业中农林牧三结合对于土地的合理利用最为必要。其所以能够只用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种粮棉等类作物，是由于深耕细作、分层施肥、合理密植而获得极其大量的高额丰产，例如亩产万斤粮、千斤棉之类。因此有可能以其余三分之一种草，三分之一种树，美化全中国。这是一个大概的设想，看来是可行的，不过须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彻底实现。这样做，大大省水，省肥，省人力，还会在土壤中大增其细菌，从而增加土壤的肥力。种树、种草，也要逐步地进向深耕、施肥，大体如种粮棉那样。在副业渔业方面，也要精益求精，千方百计地争取高额丰产。总之，要来一个农林牧副渔的全线大革命。这样一来，就使人们过去为之而忧愁的所谓人口多、耕地少的看法，完全变了。实现耕作三三制，耕地不是少而是多得很多了，人口不是多，而是感到劳动力不足了。这将是一个极大的变化。”另一段是：“人民公社已经搭起了架子。现在的问题，是在几个月内，就是说一定要在今冬明春四五个月内，把它们切实充实起来，使它像一个人一样，不但有骨骼系统和皮肤系统，而且有其他一切系统，有血有肉，心肝脾肺肾，五脏俱全。这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公社的思想政治工作、各项组织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使生产建设和生活福利事业尽快地走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这是毛泽东1958年11月28日修改决议草案时，在一段文字旁边写的批语。原决议草案说：“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过程，同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的过程是互相联系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前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以后一过程的完成为前提。”毛泽东把这段话中的后半句修改为：“但是这并不是说，前一过程的实现必须以后一过程的极端高度的发展和

绝对全面的完成为前提，把事情强调到这样刻板的程度。”并写了这个批语。

[5] 这是毛泽东1958年11月28日修改决议草案时写在一段文字旁边的批语。原决议草案说：“随着全国的工农业高度发展和公社的工农业同时并举而来的社会产品日益丰富，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商品经济范围逐步缩小，以及同一时期内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差别的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的逐步缩小这些都是共产主义因素和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条件逐步增长的过程。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增长过程，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将来，无疑是不正确的。”毛泽东将这段话最后一句中的“不正确”，改为“不适当”，并写了这个批语。

[6]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和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讨论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对《财经各部委党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的批语

（1958年11月24日）

尚昆[1]同志：

第一篇[2]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用后还我。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经济消息》第三十六期刊载的《财经各部委党组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讨论中提出了一些意见：(1)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有的同志提出：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基本经济规律和一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这两个规律，一个（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谋取最高利润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一个（有计划发展）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物而提出来的。两个规律之间缺乏完整性和内部联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又补充了一个“按劳分配的规律”和一个

“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规律”，不但没有补救斯大林的缺点，反而把问题弄得更糊涂了。有的同志认为，基本经济规律的要点是“发展生产、满足需要”。为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就必须用最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因此，从基本经济规律引申出来，首先应当是要求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其次才是要求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只讲比例关系而不讲速度，就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和根本要求。苏联把平衡当作计划工作的基本方法，他们过分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首先强调发展速度，因此他们的计划总是订得“平平稳稳”，发展的速度虽然不算慢，但决不是高速度发展。计划和比例关系必须保证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而决不能束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我们要求的决不是静止的比例关系，而是发展中的比例关系，高速度发展中的比例关系。有的同志提出，斯大林的基本经济规律在说明怎样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的时候，只提了“高度技术”，而没有提到人的作用。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说：“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不但提了“先进技术”，而且提了“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显然比斯大林提得完整。斯大林提技术决定一切，也同基本经济规律的提法有同样的缺点。在这种只讲技术，不讲政治，见物不见人的思想指导下，往往只计算机器设备所能发挥的力量，而不充分计算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所发挥的伟大力量，就把争取高速度发展的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抛弃了。苏联也提出要发挥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只有物质鼓励，而不是在物质鼓励以外加上政治思想教育。其结果，就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 关于比例关系。什么是比例关系？有的同志提出，所谓比例关系，实质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不应当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同经济活动或经济计划中的比例关系混淆起来；规律不会时时变化，而比例关系是时时变化的。计划工作者的任务，不是要保持原来的比例关系，而是要不断建立更恰当的新的比例关系。根据上述认识，大家认为比例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要“按比例”齐头并进；而是要在生产发展中不断打破旧的比例关系，建立新的比例关系，经过不平衡而达到新的平衡。机械的平衡论和比例论必须打破，因为这些东西都会约束生动活泼的群众运动。当然也要反对另外一种看法，就是

不讲比例，不要平衡，搞了再说，根本否定计划。(3) 关于计划方法问题。有的同志认为，我们的计划工作在苏联上述思想的影响下，也曾经发生过一些缺点，例如：过分强调平衡，往往迁就薄弱环节；满足于所谓“平均先进定额”，对生产的潜力估计不足，特别是对劳动人民在思想解放后所发挥的潜力估计不足等。在讨论中，归纳了几条我们计划工作的经验：第一，统一计划、分级管理、块块为主、条条为辅。第二，政治挂帅，走群众路线。第三，采用两本账的办法，只求大体上的平衡，不断克服而不是迁就薄弱环节，达到积极的平衡。第四，一年抓几次，在实践中不断进行调整。第五，执行计划的时候，应当是指导国民经济波浪式地发展。抓住一个中心任务，突出一个重点，带动其他部分跟着前进。这篇文章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对《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1]的批语

（1958年11月25日）

一

宦乡论点是对的。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破裂的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

---

[1] 这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1958年11月18日给外交部的一份报告，毛泽东批发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报告说，英法之间进行了近两年的关于西欧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终于宣告破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经济战争已经开始。英国在外交上力图分化西德和法国，拉开比、荷等小国，破坏共同市场的计划都告失败。这次失败在经济上说不算严重，但从外交上看，却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英国对西欧外交的首次严重挫折。现在英国面临着两项重大抉择：是断然采取报复措施，破坏欧洲政治经济合作呢？还是重新恢复谈判，继续寻找暂时妥协的基础？看来英国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即继续寻找和法国、西德妥协的办法，并获得美国的支持。英国的这一失败，反映出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国”地位又有了进一步削弱，战后以来英国所缔造的西欧霸权已经彻底动摇。西欧大陆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法国、西德，而不利于英国。至于英、法、西德间的三角关系，英国似仍在继续力求利用法国与西德间的矛盾，加以分化并使之互相牵制。这种均衡政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势必继续推行下去。西欧帝国主义间的力量对比正在酝酿着新的变化，帝国主义者之间在西欧问题上的矛盾空前尖锐。这个报告作为武昌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1]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面要求他的大小伙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

小平[2]同志：

此件请印发。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五日上午十时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一个教训

（1958年11月25日）

这是一个有益的报告[1]，是云南省委写的，见《宣教动态》一四五期。云南省委犯了一个错误，如他们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报告对问题作了恰当的分析，处理也是正确的。云南工作可能因为肿病这件事，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2]。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因为他们还没有犯过云南所犯的那样一种错误，没有取得深刻的教训，没

---

[1] 指中共云南省委1958年11月18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报告说，今年春夏之间，云南省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人情况。造成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领导作风不深入，对于今年紧张持续的苦战中需要特别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不够，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估计不足等。目前，省委正在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精神，集中检查省委和地、市委两级的领导作风，接受经验教训，并准备采取以下措施：地、市委书记会议后，立即在党内和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批判强迫命令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倾向；组织专门小组对肿病死人事件进行认真的检查，严肃处理死人事件中的违法乱纪和失职问题；立即执行郑州会议关于作息时间的规定，检查和改善矿山、水利工地等各个战线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劳动安全问题，从各方面调节群众的劳逸和生活等等。

[2] 参见《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们不善于教育干部（主要是县级，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不善于分析情况，不善于及时用鼻子嗅出干部中群众中关于人民生活方面的不良空气的话，那他们就一定要犯别人犯过的同类错误。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要为群众留点余地；（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十次接见朝鲜代表团时的讲话

（1958年11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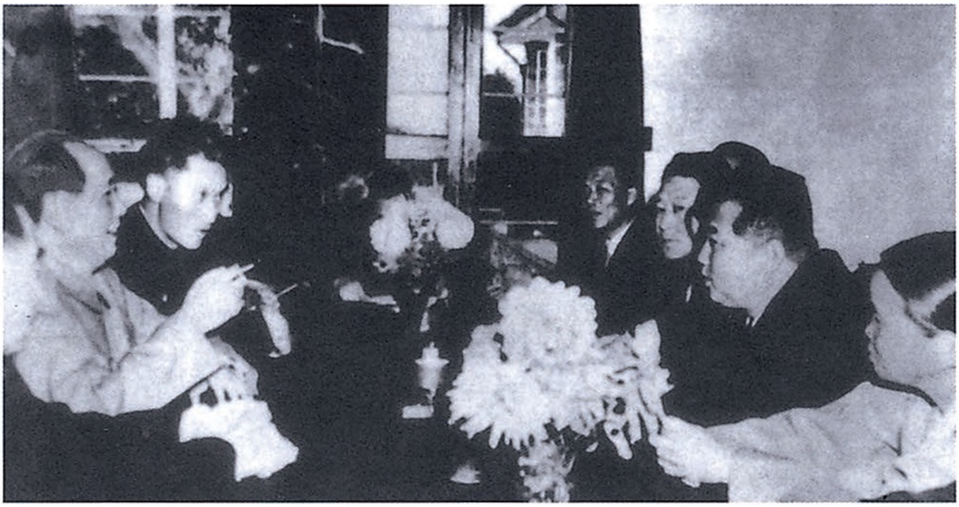
越搞越熟了。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相互之间的认识都要有一个过程。个人与个人之间也不是一下子就认识清楚的。

一个民族，一个党，两个民族，两个党，兄弟国家有十二个党，十二个民族，相互之间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十二国、六十四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对于我们之间的认识，对于十二国之间的认识进了一步。

我们对你们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也同你们认识我们有一个过程一样。

看问题要看本质，看主流。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要看本质，看路线。就是它在国内是不是搞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是不是讲国际主义。这三点就构成一条路线。

中国共产党也是反帝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些方面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本质，这些都是表现。例如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表现。是不是坚决，可以作个比较。像铁托是不是坚决？他的东西，我看三条都缺少。反帝国主义，他是不怎么反的，总是讲帝国主义好。



1958年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并设宴欢迎金日成首相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图为会见时的情形。

对《苏联学者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几个新提法》[1]一文的批语

（1958年11月25日）

小平[2]同志：

此件请印发。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五日

用后退毛。

---

[1] 指《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十期刊载的《苏联学者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理论问题的几个新提法》一文。文中说：最近《真理报》发表了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疆诺夫和哲学家米丁的两篇文章，在下面几个问题上有一些新的提法。1. 奥明确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作用，并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2. 集体农庄经过什么道路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苏联很多人曾经主张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化”。奥这次提出，“集体农庄的合作所有制有可能不经过国家所有制，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3. 奥认为今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会继续加强，而不是削弱，集

体农庄也要实行经济核算制，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今后会更多地采取货币形式，国家收购农产品和供应农业大量机器、日用品等都要通过贸易的形式。价值规律的作用也将随着加强。4. 米丁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指出，在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关于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教育对共产主义建设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他说，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特别是在一些青年中。作者还阐述了劳动对改造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后批有：“见《哲学社会科学动态》，1958年，第10期。”毛泽东的批语和这篇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文件在会上印发。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民兵现在主要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1]

（1958年11月26日）

组织民兵，我们已有很久的历史。打日本，打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那时就有民兵。解放后已有了基干民兵，征兵就从基干民兵中挑出一些人作为战士。现在把范围扩大一些，男的从十六岁到五十岁，女的从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统统组织到民兵里面。他们都很高兴搞民兵，北京就组织了民兵。

民兵训练了一两个礼拜就很像样了，改变了精神面貌，更有精神了。现在枪支还不够，武器不多，将来大多数人都要有武器，最好每人都有武器。搞民兵也跟资本主义有关系，他们不是也搞国民军训吗？为什么他们能搞，我们不能搞！

现在我们要造枪。中央兵工厂已经不造枪了，分给各省去造，造步枪、马枪、机枪、轻炮，把人民武装起来。也要造迫击炮、反坦克炮、高射机关枪、高射炮。我们现在的军队不多了，只有二百五十万人，有这些民兵作基础就好一些，胆子壮一些。

帝国主义灭亡了，我们的海军、陆军、空军都可以不要，民兵也可以不要，但是产业军——农业产业军、工业产业军，我看再过一万年也还是会有的。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时谈话的一部分。

民兵多，军队少，因为民兵不花钱。普通民兵，男的是从十六岁到五十岁，女的是从十六岁到四十五岁。基干民兵是从十八岁到三十岁。民兵现在对维持秩序还有作用，但主要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这样到处都可以打响，并且是常备军的基础。征兵就是在基干民兵中征。军队每年有几十万人退伍，他们到乡村、工厂就可以当民兵的骨干，退伍的军官可以当民兵的指挥员。至于帝国主义骂我们，证明它没有办法。我们已经被它骂了几十年，还准备让它再骂几十年，骂到帝国主义不存在了，就不骂了。

对《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批语

（1958年11月27日）

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1]，很有意思，同宦乡对欧洲的分析[2]相

---

[1] 指中共中央调查部关于美国国会选举后的国内政治局势的报告。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主要内容是：一、在美国国会选举中，执政的共和党遭受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最大的惨败，民主党将以压倒多数在今后四年中继续控制国会。新当选或重新当选的议员绝大部分属于民主党自由派，这就大为加强了该派在民主党内和国会中的力量。二、在共和党内，代表中西部财团的保守派力量遭受到严重削弱。臭名昭著的极右翼分子或落选或见势不妙退休了。三、这次选举和选举后的形势表明：（一）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二）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在往好的方面发展。美国各阶层人民普遍恐惧战争，厌弃战争狂人和法西斯倾向，在“麦卡锡主义”全盛时期上台的共和党极右分子几乎全面落选。（三）共和党政府今后的处境将更为困难。艾森豪威尔已表示政府的基本政策不变，但美国政府的开支仍紧缩不了，这势必会加速通货膨胀和财政金融危机的发展。美国还准备大力加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扩张来转嫁危机，还将继续以军事实力来支持它这方面的侵略活动。但国会内民主党自由派力量的增长，必然会给政府以更多牵制，而美国内部的争吵必将更趋剧烈。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报告，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2] 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1958年11月18日给外交部的分析英国外交形势与西欧形势的报告。

似，都是好文章。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关于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议程给邓小平[1]的信

（1958年11月28日）

小平同志：

请考虑组织以大区为单位的七个小组，将北京来的同志们分别插入各小组，中央常委六人不插入，或只以一二人或二三人插入，边看文件边座谈。头几天每天只开会一次，酝酿思想，交换意见。

此议，请提交今天下午会议上，征求各同志意见，看是否可行。没有几天座谈交换意见，人民公社决议（草案）[2]中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不易弄清楚的。待〔通过〕1959年经济安排问题决议（草案）[3]，接着就要分组座谈这一件事。如何，请酌。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上午十一时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准备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讨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3] 指准备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讨论通过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8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当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四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致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十四年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表现了坚定不移的立场，对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和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把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切成就看成自己的成就并且以此而感到自豪。

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正在进一步的发展和巩固。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对我国加紧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的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对这种兄弟的支持，中国人民

十分感谢。我们深信，建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阿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将万古长青。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毛泽东全集》第40卷
主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划：树　旺
出版：润东出版社
承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852）23500066
电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址：www.enricheast.com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长：言　臣
装帧：平　装
开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面：544面
版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SBN：978-988-12907-0-0
定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星
策　　划：树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骂人问题给吴芝圃等的信……………1
（1958年11月29日）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3
（1958年11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8
（1958年11月）

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的批语……………………………………………………10
（1958年11月）

为印发宦乡报告重拟的标题和批语………………………………12
（1958年11月）

写在《参考资料》上的刘禹锡的一首诗…………………………13
（1958年11月）

对李普曼《苏联的挑战》一文的批语和批注……………………15
（1958年11月）

为印发杜勒斯批评我国人民公社言论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17
（1958年11月）

为印发杜勒斯演说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18
（1958年11月）

为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20
（1958年11月）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22
（1958年11月）
接见金日成时的谈话 ……………………………………………………23
（1958年11月）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24
（1958年12月1日）
关于注意各地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批语 ……………29
（1958年12月1日）
为印发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和批语 …………31
（1958年12月1日）
为红线女题词 ……………………………………………………………33
（1958年12月1日）
关于我国决定同苏丹建交的复电 ……………………………………35
（1958年12月1日）
祝贺加涅夫当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36
（1958年12月1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37
（1958年12月5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批语 ……………………39
（1958年12月5日）
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40
（1958年12月6日）
印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三篇文章的批语 ……………46
（1958年12月7日）
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 …………………………………………47
（1958年12月7日、10日）

对农业部党组关于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50
（1958年12月8日）
对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52
（1958年12月8日、9日）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55
（1958年12月9日）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61
（1958年12月9日）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 ……76
（1958年12月12日）
对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79
（1958年12月）
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的批语 ……81
（1958年12月18日）
复霍查电 ……82
（1958年12月18日）
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 ……83
（1958年12月21日）
关于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的批语 ……89
（1958年12月22日）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91
（1958年12月23日）
祝贺苏丹独立纪念日的电报……105
（1958年12月29日）
在共同社、英新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两篇评论上的批注……106
（1958年12月）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 ……109
（1958年）

对大跃进报道的指示……129
（1958年）

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130
（1958年）

关于造船方针的指示……131
（1958年）

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题名……132
（1958年）

四言韵语·养生十六字诀 ……133
（1958年）

七绝·刘蕡 ……135
（1958年）

七绝·改梅白《夜登重庆枇杷山》 ……136
（1958年）

为《鲁山报》题写报头……137
（1958年）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141
（1959年1月3日）

对福斯特来信的批语和复信……142
（1959年1月11日、17日）

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44
（1959年1月15日）

给黄炎培的信……146
（1959年1月21日）

对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47
（1959年1月22日）
对中央关于动员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49
（1959年1月22日）
在西藏军区关于边坝等地叛匪活动的电报上的批语　……………151
（1959年1月22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批语　………152
（1959年1月22日）
致苏共二十一大贺词……………………………………………………153
（1959年1月23日）
印发陈伯达关于人民公社生产方面几个问题的来信的批语………156
（1959年1月25日）
对新华社关于广东新会县人民公社劳动效率下降的报道的批语……157
（1959年1月25日）
对新华社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的报道的批语………158
（1959年1月25日）
对新华社关于四川省委加强工业战线工作的报道的批语…………159
（1959年1月25日）
印发谭震林关于目前农村情况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60
（1959年1月25日）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61
（1959年1月25日）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报告的批语………163
（1959年1月26日）

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摘录）……………………164
（1959年1月27日）
对驻苏使馆关于约夫楚克若干哲学观点的报告的批语……………………165
（1959年1月）
在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67
（1959年1月）
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168
（1959年2月2日）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72
（1959年2月2日）
祝贺锡兰国庆的电报……………………180
（1959年2月3日）
对驻英代办处关于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的批语……………………181
（1959年2月12日）
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和中央转发这一文件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82
（1959年2月13日）
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86
（1959年2月13日）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88
（1959年2月14日）
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查哈勒斯库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93
（1959年2月17日）
祝贺尼泊尔国庆的电报……………………194
（1959年2月17日）

两次失败使我们学会了打仗……………………………………………195
（1959年2月17日）
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99
（1959年2月18日）
对总参作战部关于平叛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200
（1959年2月19日）
在关于英国各界对我撤销出口合同的反应报告上的批语……………202
（1959年2月19日）
对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的批语………………203
（1959年2月20日）
和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204
（1959年2月21日）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208
（1959年2月21日）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的电报……………………………………210
（1959年2月21日）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211
（1959年2月22日）
对《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14
（1959年2月22日）
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给刘子厚的信…………………………………217
（1959年2月24日、27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219
（1959年2月）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223
（1959年2月27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233
（1959年2月27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241
（1959年2月28日）
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和注文……250
（1959年2月28日）
关于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批语……253
（1959年2月28日）
在《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一文上的批语……255
（1959年2月）
在河南九县讨论郑州会议讲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256
（1959年2月）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257
（1959年3月1日）
郑州会议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三封信……263
（1959年3月1日、2日）
祝贺柬埔寨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268
（1959年3月3日）
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269
（1959年3月3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278
（1959年3月5日）
郑州会议纪要……288
（1959年3月5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289
（1959年3月）
关于传达湖北省委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的两个批语……291
（1959年3月8日）
对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讨论情况的综合材料的批语……293
（1959年3月8日）
党内通信……295
（1959年3月9日）
介绍安徽的经验……300
（1959年3月9日）
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301
（1959年3月9日）
介绍广东的经验……303
（1959年3月10日）
祝贺丹麦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305
（1959年3月10日）
接受缅甸联邦新任驻华大使貌貌觉温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06
（1959年3月12日）
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307
（1959年3月13日）
党内通信……315
（1959年3月15日）
在安徽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上的批语……318
（1959年3月15日）
关于注意给达赖复信问题的批语……320
（1959年3月15日）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材料的批语………321
（1959年3月15日）
关于召开县以下各级干部会议等问题给王任重的两封信…………323
（1959年3月16日）
党内通信………………………………………………………………325
（1959年3月17日）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328
（1959年3月17日）
转发《山东的经验》的批语…………………………………………329
（1959年3月17日）
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331
（1959年3月18日）
转发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经验的批语…………………………335
（1959年3月18日）
祝贺突尼斯独立纪念日的电报………………………………………339
（1959年3月18日）
毛泽东等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的电报 ……………340
（1959年3月19日）
对《四川的经验》的批语……………………………………………342
（1959年3月19日）
介绍河南的经验………………………………………………………344
（1959年3月19日、24日）
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提纲………………………346
（1959年3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提纲………………………………………348
（1959年3月）

关于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的批语……………………………………………350
（1959年3月20日）
对《山西省委的经验》的批语………………………………………………351
（1959年3月20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十二条措施的批语…………352
（1959年3月20日）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353
（1959年3月21日）
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354
（1959年3月23日）
转发《四川的经验》的批语…………………………………………………356
（1959年3月24日）
转发《福建的经验》的批语…………………………………………………357
（1959年3月24日）
对浙江省委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的批语……………………358
（1959年3月24日）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提纲……………………………………………………360
（1959年3月）
关于请上海会议各同志阅读薄一波发言稿的批语……………………361
（1959年3月26日）
介绍安徽的十项规定…………………………………………………………362
（1959年3月26日）
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364
（1959年3月27日）
党内通信……………………………………………………………………………368
（1959年3月29日）

对人民银行总行党组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批语……370
（1959年3月29日）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371
（1959年3月30日）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375
（1959年3月、4月）
关于同意董必武辞去现职改换工作的批语……379
（1959年3月30日）
对班禅额尔德尼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命令的电报的批语……381
（1959年3月30日）
关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体制的几条原则……382
（1959年3月31日）
第一批反映……383
（1959年3月）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385
（1959年3月）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386
（1959年3月、4月）
对上海会议纪要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389
（1959年4月）
介绍麻城的经验……392
（1959年4月2日、3日）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395
（1959年4月3日）

关于是否担任政协名誉主席问题的批语……………………………397
（1959年4月4日）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398
（1959年4月）
生产增长速度有高有低，是波浪式的前进…………………………400
（1959年4月5日）
给汪锋的信………………………………………………………………401
（1959年4月7日）
对印度新闻社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的批语……………………403
（1959年4月7日）
关于发表国外对西藏叛乱反应的材料的批语………………………405
（1959年4月8日）
关于西藏平叛……………………………………………………………406
（1959年4月15日）
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14
（1959年4月15日）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两个批语……………………………………416
（1959年4月15日、16日）
中央转发吴芝圃关于分期分批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18
（1959年4月16日）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420
（1959年4月17日）
转发周小舟关于处理少数违法乱纪干部的意见的批语……………425
（1959年4月17日）
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426
（1959年4月19日）

工业界的新事……………………………………………………429
（1959年4月）
对陶铸关于广东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33
（1959年4月20日）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报告的批语……434
（1959年4月21日）
在陈赓关于一九五九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安排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36
（1959年4月21日）
在李先念关于吕泗洋风暴事故后最近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37
（1959年4月24日）
关于调演豫剧《破洪州》给周恩来的信……………………………438
（1959年4月24日）
为阅看《关于〈三国演义〉》前两部分给林克的批语……………440
（1959年4月24日）
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的批语…………………………441
（1959年4月25日）
对外交部就印度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给驻印使馆的指示稿的
批语和修改…………………………………………………………444
（1959年4月25日）
关于妥善安排渡过春荒的批语………………………………………446
（1959年4月26日）
对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决议稿的批语……………447
（1959年4月28日）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449
（1959年4月28日）

转发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报告的批语……………452
（1959年4月28日）

对《光明日报》发表《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资料的批语……………453
（1959年4月29日）

党内通信……………454
（1959年4月29日、5月2日）

工作方法十六条……………460
（1959年4月）

党内通信……………469
（1959年5月2日）

关于反击挪威报纸侮辱我国领袖问题的批语……………471
（1959年5月4日）

关于注意逃缅蒋军配合西藏叛乱在我边境扩大骚扰的批语………473
（1959年5月4日）

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的谈话……………474
（1959年5月6日）

对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77
（1959年5月6日）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484
（1959年5月7日）

对中央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91
（1959年5月7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国庆的电报……………493
（1959年5月8日）

对中央转发湖北等省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495
（1959年5月8日）
对驻印使馆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语…496
（1959年5月9日）
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批语…497
（1959年5月9日、11日）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499
（1959年5月10日）
给周世钊的信…………………………………………………………504
（1959年5月10日）
中央转发孝感地委关于贯彻农业方面六个问题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505
（1959年5月11日）
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分配自留地的规定的批语…………………507
（1959年5月11日）

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骂人问题给吴芝圃[1]等的信

（1958年11月29日）

吴芝圃同志，并请转寄河南省委的同志们：

一封信[2]送上，长葛县的，值得注意。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但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的，你看是不是呢？现在农村中，有一部分村乡，权力还是掌在反动分子手里，长葛县那件事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也说不定。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

---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众来信。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一些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公社的领导对此不深入了解情况，也盲目提出批评。来信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从县到乡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进行调查。

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月廿九日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1]

（1958年11月30日）

做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则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钢铁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对国家的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纲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多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11月30日下午和武汉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题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题，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钱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一点，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不能过重悬殊，但也不能没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没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题，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题。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没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

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国际形势。赫鲁晓夫开记者招待会，在柏林问题上搞了一手，你不撤，我撤。赫鲁晓夫也懂得了搞紧张局势。我们也搞点紧张局势，使西方要求我们不要紧张了，让西方怕搞紧张局势，对我们有利。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台湾就开紧急会议，其实会上没有谈一句台湾局势问题。四国首脑会议不召开了，也说是受中国影响。其实会上也没有说四国首脑会议的问题。如果出远门，是不是安全？斯大林神经不健全，从前哪里也不去。各种材料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也没有了。杜勒斯十八日的谈话说，你们共产党人搞人民公社不要出那个范围，你们只管你们的事，不要管你们以外的事，我们就放心了。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杜勒斯说我们搞奴隶劳动，搞集权主义，说我们积累太多。他说总收入扣除工资，就是积累，他把这种积累叫做资本。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是列宁的公式。好好看看杜勒斯十八日的讲话。他承认我们的积累多，组织性强，哲学搞不赢我们。杜勒斯谈话的调子低，战争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不说了，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英国人老奸巨猾，美国人比较暴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

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世界秩序研究会议，三千七百万教徒发出一封信。主张承认我们。杜勒斯说教会只要规定道德原则，细节不要管。

北戴河会议谈的八个观点灵不灵？还是灵的。北大西洋公约，向民族主义和本国共产主义进攻（重心是进攻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除非出了匈牙利事件。但我们在宣传上是另一回事，还要说他是进攻的。不要自己被自己蒙蔽。李普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不是进攻，但说服不了苏联人民。谁怕谁多一点？李普曼主张把印度扶植起来抵制我们，看来惧怕我们，怕我们在亚洲、非洲争取领导权，很怕我们经济高涨。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我们有利。戴高乐出现，横竖要出现，出现了，比较对无产阶级有利。中东美军早撤好，还是晚撤好？只有一个多月就走得光光的，证明他们撤走。台湾打炮有好处，不然民兵不能组织这样快。禁运、进联合国、和、战、打原子弹问题，比较对谁有利？怕好还是不怕好？横起一条心，不怕反而好，在一起议一议就不怕鬼了。杜勒斯好战。挨骂是假象，不是真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赫鲁晓夫过于谨慎，过于不平衡，是“铁拐李”。不是两条腿走路。人民生活才二百卢布，比我们稍微高一点，重工业偏大，偏于中央不重地方，偏于行政，缺乏群众路线。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一点，松一点，比较集中，只搞两个文件。纸老虎问题，党内外尚有许多人不了解。有人说既然是纸老虎，为什么不打台湾？为什么还要提出赶上和超越英国？我写一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是真又是假，暂时现象是真的，长远看来纸

的。我们从来就是说，战术上要重视它，战略上要藐视它。不但对阶级斗争应当这样，对自然斗争也应这样，除四害、扫盲、绿化、血吸虫，不是一年可以实现的，要几年去搞才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三告台湾同胞书[1]

（1958年11月）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三告台湾同胞书稿。后未发表。

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的批语[1]

（1958年11月）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

（一）增加社会产品，首先是生产资料；

（二）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

（三）高度文化水平，全面发〔展〕体、智，为此，必须：

（1）减少劳动时间至每天六小时、五小时；

（2）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3）改善居住条件；

（4）增加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其办法是：

（甲）直接增加货币工资；

（乙）重要『重要』是降低物价。

意见：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一份抄录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斯大林的这段话是：“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言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切实加以保证的，不是神话般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而是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第二，必须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如果认为用不着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便可以达到社会成员的这种强大的文化高涨，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及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为印发宦乡报告重拟的标题和批语

（1958年11月）

一

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宦乡报告）[1]

二

请小平印发。

毛

---

[1] 这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宦乡1958年11月26日给外交部的报告重拟的标题。宦乡在报告中说：自苏联提出关于结束四国占领柏林法规的动议后，西方恐慌困惑。这个动议，虽然只涉及一个柏林地位问题，但在实际上却牵涉到谁赞成德国真正和平统一，谁反对德国真正和平统一的问题。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口头上一直叫喊德国统一，但骨子里却力图加深德国的分裂，并使之永久化。德国人民对此是非常不满的。统治阶级中许多人士对此是不安的。目前在欧洲问题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上与下的斗争方兴未艾，反对美英联盟操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风浪还在继续汹涌，现在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又因柏林问题而重新激化起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既然矛盾重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无论从远东看，或从欧洲看，又都证明了只操在社会主义阵营手里。帝国主义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写在《参考资料》上的刘禹锡的一首诗[1]

（1958年11月）

高髻危冠宫样装[2]，
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
断尽苏州刺史肠。[3]

杜鸿渐　扬州

---

[1]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〇四期上抄录的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赠李司空妓》。这期《参考资料》中，以《美官员竭力诬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说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为题，刊载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其中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经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毛泽东正在孤注一掷，看这个制度是否能养活这个国家。鉴于一再发生的旱灾和水灾——这些灾害已经使中国的饥荒，几乎成为司空见惯

的事——这是一种冒险的计划。”“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把社会组织成最有效的生产单位——在纸面上。但是他也是在把潜在的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在事情不顺利时推翻他。这个制度的成功或失败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中国的疆界。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正如渴望从莫斯科获得较多的自由的东欧卫星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关切地注意着这一发展。”毛泽东在这几段文字下面划了横线，或作有着重号。他抄录的刘禹锡的诗就写在这篇电讯的天头和旁边。

[2]　刘禹锡原诗为“高髻云鬟宫样妆”。

[3]　《全唐诗》注：“禹锡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开宴。命妓侍酒……刘于席上赋诗……杜韦娘，歌曲名。”

对李普曼[1]《苏联的挑战》一文的批语和批注

（1958年11月）

一

此件[2]印发。值得一看。

毛泽东

---

[1] 李普曼，美国专栏作家。当时任《纽约先驱论坛报》“今日与明日”专栏特约撰稿人。

[2] 指1958年11月14日出版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一二期刊载的新华社日内瓦12日电讯稿《李普曼说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苏中树立的实例，显示了把落后国家人民的力量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道路，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电讯稿摘要报道了李普曼在1958年11月1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苏联的挑战》一文的内容。

二

注意：进展顺利。[1]

三

注：不见得，我是基本上相信的。[2]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加括号写在李普曼文章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我们之间的基本争端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现在与它一起的还有共产党中国——在取得亚洲和非洲的领导权方面进展顺利。"

[2] 李普曼的文章说："苏联的疑心的内在动力是这样一种看法：美国和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决不容许——除非被迫——俄国和中国来完成它们在亚洲和非洲所领导的革命。在莫斯科——无疑在北京也是如此，当我们坚持说德国和土耳其的重新武装以及维持一个空军基地包围圈的做法是防止它们进行军事侵略的防御措施时，它们不相信我们的话。"毛泽东的批注，加括号写在这段文字之后。

为印发杜勒斯[1]批评我国人民公社言论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958年11月）

一

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他向亚洲人宣传共产主义的坏处和资本主义的好处，杜勒斯大谈其政治经济学，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2]

二

此件请小平[3]印发。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这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上的演说重拟的标题。杜勒斯的演说全文载于1958年11月14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一三期，题为《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发表演说，大肆攻击和诬蔑我集体劳动和公社化，竭力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幸福”，以抵制我国伟大成就对亚洲的影响》。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印发杜勒斯演说[1]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958年11月）

一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

---

[1]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8年11月18日晚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1958年11月19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二三期刊载了杜勒斯演说的全文，题为《杜勒斯叫嚷在台湾海峡地区继续搞“不依靠武力”阴谋，为此甘冒“战争或疏远朋友”的危险，惊呼对社会主义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不能“防御”，须加紧颠覆和干涉》。其中说：共产主义的统治正在产生一个在工业上和科学上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世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有效的抵抗，中苏统治者多关心自己人民的福利，少关心为了扩张主义的目的而剥削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快地到来。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幸运地为一向存在于俄国和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自然的诚挚而友好的精神所支配。这个材料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二

注意：作为11月18日杜勒斯演说的题目。

为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958 年 11 月）

一

美国一大批教会领袖主张承认中国

他们说，这样做有四大利益

他们想把我国拉过去，而他们自己则向中国钻进来

美国资产阶级已感到恐慌，感到被动，想要设法脱出这种情况。[1]

二

此件请小平[2]印发。

---

[1] 这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电讯稿原题为《美一批教会领袖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佯称

主张承认我国和恢复我联合国席位》，刊载在1958年11月24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三二期上。电讯稿转引中央社纽约11月22日英文电说：《纽约时报》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报道，“美国新教领袖们”昨天一致通过一项声明，赞成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且接纳它进入联合国，同时保障“台湾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权利”。这个声明是一封5000字的《致各教会书》的一部分，是由纽约市联合神学院院长约翰·贝奈特牧师领导的一个二十三人委员会起草的。声明说：“关于中国，基督教徒应该敦促我们的政府重新考虑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台湾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同时也应该采取走向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和我国政府承认它的步骤。”“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赞成它。这种外交关系应该构成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更加广泛的关系的一部分。把中国大陆上的有效政府，目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以外，在很多方面对这个大家庭都是不利的。这样做会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人民心中形成一种假象。这样做会使我国人民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这样做将妨碍裁军的谈判。这样做将限制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我们强烈希望，恢复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关系，也可以使得恢复他们的教会和我们的教会的关系成为可能。”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1958年11月）

从九月份以来，宣传的火力比较集中。九月份以前，中心还不突出。《人民日报》总要冷静些。《人民日报》在三年困难时期，登了那么多鬼戏，宣扬有鬼无害论，至今没有进行批判，欠了账不还是不行的。迟早都要还。

《人民日报》一方面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又宣传有鬼无害论，自己把自己置于什么位置。

接见金日成时的谈话[1]

（1958年11月）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今天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推翻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推翻我们这个党。我们好好地搞，是可以继续巩固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最后巩固，有可能我们来一个大失败，敌人全部地占领上海，占领武汉，占领北京，占领郑州这一条线，我们要退到西北西南山区，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保证能够经过几年的战斗，最后能够恢复我们中国，最后战败帝国主义。不能只看到现在发展顺利，我们随时要做好这个准备。

---

[1] 这是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时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1958 年 12 月 1 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

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1]。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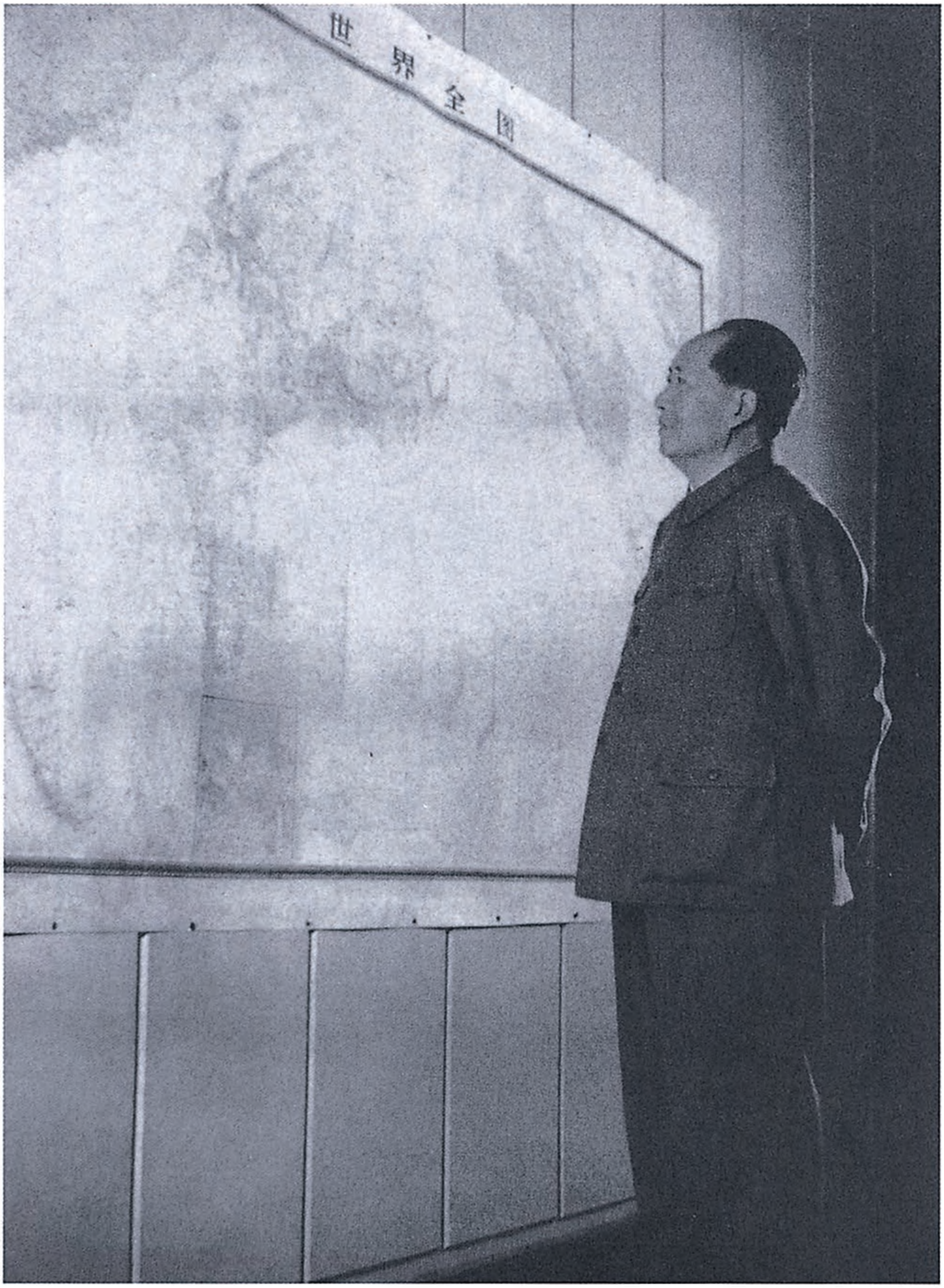
[1] 指《一九五六——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指示精神，从1956年4月开始，组织600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20多位苏联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制订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个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

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1]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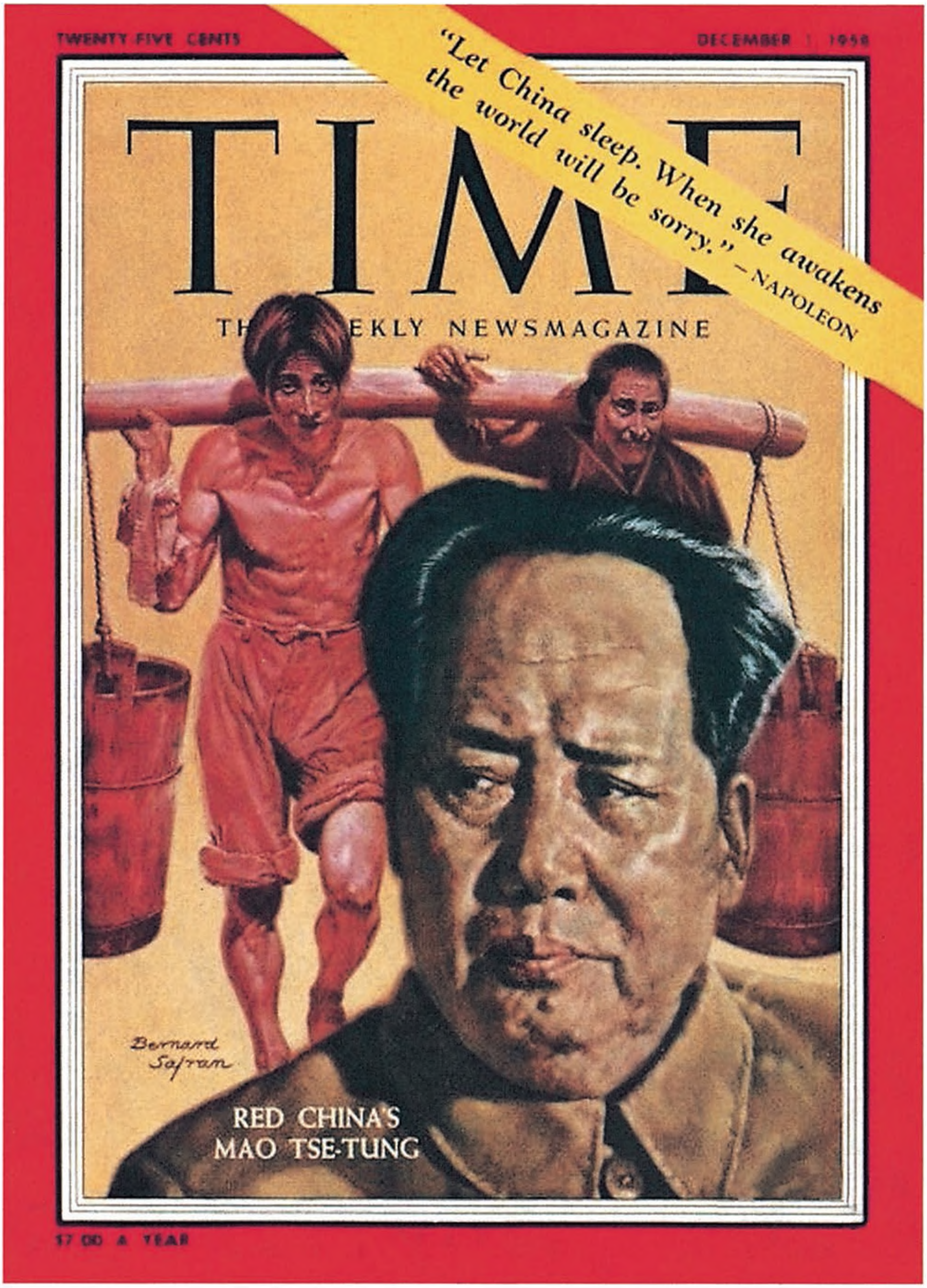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

[1] 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1961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一本干部学习材料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十一个字。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撰写《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图为毛泽东在看世界地图。


TWENTY FIVE CENTS
DECEMBER 1, 1958
TIME
TH EKLY NEWSMAGAZINE
"Let China sleep. When she awakens the world will be sorry." –NAPOLEON
Bernard Safran
RED CHINA'S MAO TSE-TUNG
$7.00 A YEAR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第三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关于注意各地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批语

（1958年12月1日）

一

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二

此件[1]请小平[2]同志印发。

毛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8年11月28日向毛泽东报送的

关于湖北省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搞“六万斤卫星”试验田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今年9月，随县县委在得知金屯乡光大九社的一亩中稻试验田放出六万斤的“卫星”后，到现场调查，结果发现，这块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9.75亩中稻拔掉移栽上去的。问题弄清后，县委对这个乡进行了整顿，并对有关干部作了处理。现在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转变。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报告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在会上印发。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印发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和批语[1]

（1958年12月1日）

一

共产党捉不完，反动派大恐慌，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体相同的情况，不只是吴庭艳[2]一块地方而已。

---

[1]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一份关于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这份情况动态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印的刊物上。情况动态中说，南越吴庭艳统治集团在伊拉克革命爆发和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的形势下，暴露了恐慌不安的情绪。南越报纸提出“美国应该坚决守住中东、金门和东南亚”，但表现出对美国缺乏信心，忧虑自己的命运。不仅如此，南越统治集团更害怕内部不稳爆发反吴事变和畏惧人民及北越的力量。最近，它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如加强“诉共”活动和武装扫荡，以破坏越南劳动党的组织和镇压人民群众运动；在行政部门中成立了“行政人员考核委员会”，又在各省成立有军事人员参加的“安全委员会”，并在最近的国会中大力酝酿通过“反共法”。总之，南越吴庭艳集团惧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一方面竭力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军事上的防御力量；同时也不放松对北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2] 吴庭艳，当时是南越政府总统。

二

请小平[1]同志印发。

毛

十二月一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红线女[1]题词

（1958年12月1日）

一九五七年，香港有一些人骂红线女，我看了高兴，其中有黄河。他骂的是他自己，他说他要灭亡了。果然，已经在地球上被扫掉，不见了所谓黄河。而红线女则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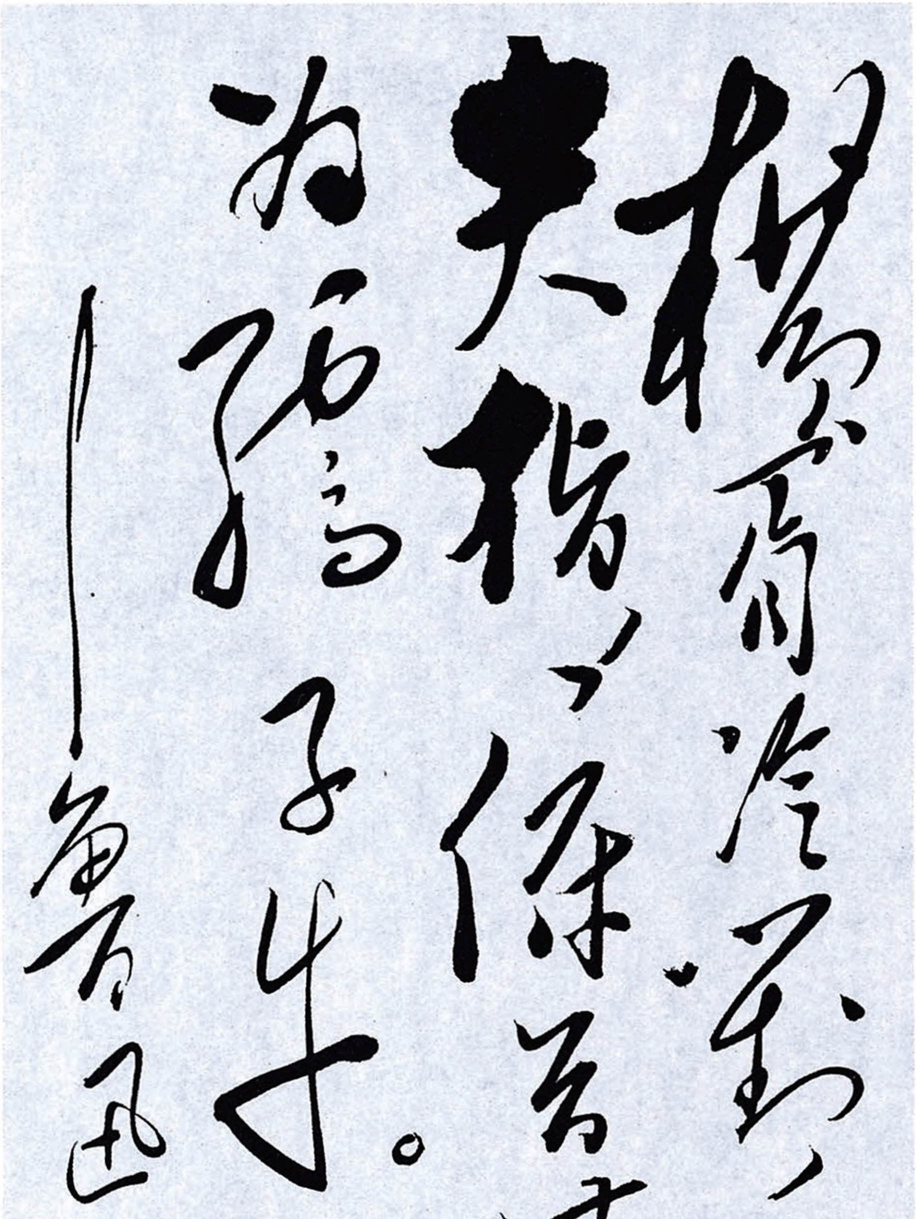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

---

[1] 红线女，原名邝健廉，粤剧艺术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去香港，1955年年底回广州，加入广东省粤剧团。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

毛泽东为红线女的题词。

关于我国决定同苏丹建交的复电

（1958年12月1日）

喀土穆

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了阁下1958年11月30日的来电[1]。我深信苏丹共和国对我国的承认将导致贵我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地发展。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苏丹共和国繁荣，人民幸福，并祝阁下和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维护苏丹人民利益的事业上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

[1] 指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将1958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在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露出曙光的时候，我高兴地通知阁下，苏丹共和国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期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代表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苏丹政府和人民，祝阁下和中国人民幸福、昌盛和永远安宁。"

祝贺加涅夫当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

（1958年12月1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吉·加涅夫同志：

欣悉你光荣地获得保加利亚人民的重大信任，当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全面合作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将起着重大的作用。祝你在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人类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卓越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12月5日）

一

即送小平、乔木同志：

此件[1]写得很好，比起《人民公社决议》[2]来，好得很多。可即印发付讨论。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上午八时

---

[1] 指胡乔木1958年12月4日向毛泽东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决议稿提出，动员全国人民为1959年的2200万吨钢、1400万吨钢材、10500亿斤粮食和其他一系列伟大的目标而奋斗，为1959年钢、铁、铜、铅、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而奋斗。决议稿还说，1959年计划的决定，是一个既反对太冷又反对太热的过程。它是一个跃进计划，是一个苦战计划。非跃进，非苦战，我们的国家不能较快地过关。它又是一个比较有根据的计划，它的指标比1958年拟议的一般要低得多，因为不作这种调整，就缺少实现的客观可能性。这个决议后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2] 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二

注意：“教导”“指示”这类字面，用于个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气氛，使人看了不顺眼，以后不可再用。[1]

三

钢铁战线上的“小土群”转向“小洋群”，这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的前进过程；但是土铁、土钢、土钢材、土机械、土铁路等等，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特别是在地方工业、公社工业中，仍将起重大的作用，千万不可以小看了它的作用，小看了就会犯错误。同时，工业战线上的小型、土法的群众运动，还必须在炼钢、炼铝、采煤、发电、化工、轻工等方面继续发展。同志们须知：一万年〔后〕还会有跟大企业并行的中小企业的，还会有那时的“小土群”和“小洋群”，还会有“土洋结合”这种事情。不过那时所谓“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现在大不相同了吧。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多样化的宇宙，这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一条法则。[2]

---

[1] 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的草稿中，有“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就教导我们”“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这样的话，毛泽东审阅决议草稿时，分别将其中的“教导”“指示”改为“告诉”，并写了这个批语。

[2]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稿中的一段文字。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8年12月5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可印发，供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8年11月28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农村在今年9月上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建成公社953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95%。从9月下半月开始，在农业丰收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我们从改革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组织群众的集体生活和加强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三个方面进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一）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确定在全省农村公社中普遍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这个新的分配制度比以前的按劳动日计工付酬的分配制度有更大的优越性，现在全省各公社正在推行，到今年12月可以全部完成。（二）关于群众的集体生活问题。到10月下旬统计，全省建成食堂23.5万多个，参加食堂的人数达3482万人；建立托儿所213217个，幼儿园101633个，入托儿童440多万；建立幸福院13599个，入院老人近10万。（三）关于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0月间即作了具体布置，现在正向普遍和深入发展。

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1958年12月6日）

一、反对浮夸作风。不是追求责任，而是接受教训。自大跃进以来，在通讯社、报纸、广播的宣传工作是取得一定成绩的，对推动大跃进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宣传也有些问题，使思想上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这是由于大跃进形势来得很猛，我们又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很难免的。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不追究责任，而是要取得教训。一定要作些检查，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的大跃进。过去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苦战三年。放“卫星”“三化”，起了很大作用。总的方面是对头的，就是在宣传的分寸上有些问题，界限掌握得不很准。

二、放“卫星”对不对？在开始是好的，但老是放下去就值得研究了，长期下去会造成人为的紧张，不见得好。特别是有些单位放的钢铁卫星。人民日报登“这个省、县能做得到，那个省、县为什么做不到”，对各地压力很大。运动搞起来了，不要这样干，人民日报在宣传广西鹿寨县炼钢时，连续写了两篇社论，大家都去参观，但事实上数量没有那么多，质量也很差，很多是烧结铁，影响不好。宣传工作中光讲成绩，不讲缺点。如河南今年成绩很大，缺

点也不少，只讲成绩，会助长下边的浮夸作风，急躁情绪，这是不对的。文艺界放“卫星”时，不要这样宣传，因为放出了“卫星”后，还要群众承认，还是先搞出来以后，群众说“卫星”才算是“卫星”。

三、宁可少说，不可多说。对于生产成绩的数字，各省都公布出来了，但很难对起总数，今后发表统一的数目就行了。今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但究竟多少，说法不一，有说一万亿斤，有说九千亿斤，也有说七千五百亿斤的，我说就七千五百亿斤的好。报道中究竟说多好呢，还是说少好呢？说少好，说少了，顶多落个干劲不足，说少了结果多，粮食还在。说多了，事情就不好办。粮食翻一番，在全世界是少有的，现在有些人就不相信，如果说多了，拿不出东西来，不单对你那个数字不相信，而且会把我们整个成绩都推翻了，对党的威望有损失。

四、郑州会议后，宣传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

（1）防止夸大消极面，不要认为过去我们都是搞“左”了，现在又要纠偏，不要只讲坏的不讲好的，不要说紧张得不得了，不要说过去糟得很，不要造成一种纠偏空气，要实事求是。实际上成绩是主要的。

（2）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在宣传中不是要泼冷水，而是在水缸里放些明矾，使水澄清一些。

（3）要考虑国际影响，现在国外许多人怀疑我们大跃进的成绩。我们不能说这是浮夸，那也是浮夸，你说了，人家就更不相信了，为了防止副作用，要从正面宣传。如说关心群众生活，不要说过去生活搞得糟，要说一面抓生产，一面抓生活，民主与集中要结合讲。不要说过去不民主，要说管理民主化。

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同志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越论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本来准备结束这一讨论，现在要继续讨论三个月，有教育意义。郑州会议有些东西不宜宣传，有些内容在党内宣传，有些内容在党外宣传。搞不清楚的不要急于宣传，应请示。

五、破除迷信。不是要否定科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要很好结合。现在宣传工作中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报纸的标题比较生动，能吸引人，这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但有些不很正确，不管什么都加以诗化。经济工作和写诗不一样，要切实，浪漫主义有一定限度，反对浮夸。运用群众语言有进步，但有些滥用，群众语言变成文字时，一定要求正确性、确切性、科学性。

六、对中央各领导同志到各地视察时的报导的问题。中央报纸很注意这些报道，对各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把领导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传播出去了，但也有些缺点，把负责同志的每句话、衣服的颜色、笑了一笑、什么时候点了一下头等小动作，写了又写，不必要。有的写群众等领导同志，等了很长时间，给人以官僚主义的印象，有些将领袖写神化了，这样报道不好。有些领导同志在视察中对一些问题，随便点点头，并没有肯定或者考虑要推广的，但报纸上就加以肯定了，有些事就造成被动。报道□□同志在河南视察，周总理在清华大学视察时，都有类似现象，今后对中央负责同志视察的报道，由中央规定。

（1）只限于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同志；

（2）写成后必须交本人审阅，不能随便发表；

（3）中央报纸不得随便转载地方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宣传问题。好的方面是主要的，但在宣传中也有片面性，违反中央精神的也有，有些问题只讲搞劳动，不讲搞学习。现在有的中学与大学把许多基础课程都放松了，这是一种危险。学校在基础课上打不好基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另外，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大中学校，以学习为主，另一种是红专学校，以劳动为主。但现在人们中有一种趋势，想将两种学校搞成一种红专学校，要纠正。两种学校都要，否则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行的。在学校中过分强调社会化，强调学生住学，这作为方向是可以的，有的做得过急，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八、对家庭问题的宣传有很多缺点，强调了斩头去尾，男女分居，各地对此反映非常反感，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对“家庭”两个字都不可以提，可成立父母兄弟姐妹“小组”。这些东西现在不要宣传，将来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式，还不清楚，不宣传它，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什么妨碍，宣传了实际意义不大，反而造成混乱。

九、对城市公社化的宣传问题。城市公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农村中地主富农都被消灭了，但城市中还有资产阶级，要集中起来搞生产还没有把握，究竟怎么搞还没有经验，现在可积极试办，但不宜在人民日报宣传。阳泉市大量调整房子的事，这在小城市当然可以，因为房子质量差不多，但在上海、北京就不行，在城市中还有一部分人生活悬殊很大，住宅不一样，还有一部分人不从事生产，要调整房子会天下大乱，所以暂不要宣传。

十、对农业问题的宣传。农村大跃进以来，农业跑到工业前面，这是一种实际情况，农业过了关，这是一种实际情况，但也有

一些人造成错觉，认为农村先进，城市落后，农民老大，工人老二。究竟农民先进还是工人先进呢？这要从三方面看：（一）从所有制看。工人是全民所有制，农民是集体所有制。（二）对国家的贡献来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所得工资八百元，贡献很大，而农民是无法和工人比较的，农民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丰收地区，对国家可拿出贡献来；一种是刚刚可以供给自己生活的；还有一种是国家要补贴的，如灾区。（三）农民组织纪律性不如工人阶级。所以今天农民还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共产党来领导。

十一、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不要公开对外宣传。该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些缺点，苏联把这本书批判得很差，如我们公开讨论，那样就不好。

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标准，不要宣传，最好要慎重。我们和苏联的标准不一样。苏联是一九三六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它有两个条件：一条是消灭阶级，一条是工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宣传了我们的标准，那么等于说苏联现在还未建成社会主义。

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和红安、麻城县委书记座谈。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住地。

印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三篇文章[1]的批语

（1958年12月7日）

印发。极好看。请小平[2]即刻处理。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上午十时，在武昌

此件用后退毛。

---

[1] 《参考资料》专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的三篇文章是：《捷红色权利报载文谈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说我国巨大的革命发展对于全人类有重大意义，认为毛主席的帝国主义寿命不长了的论断符合世界的发展》《捷红色权利报驻京记者热情赞扬北京全民炼钢运动盛况》《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谈我大跃进，说我全面大跃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硬化”的滥调响亮的回击》。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

（1958年12月7日、10日）

一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为印发《张鲁传》写的两个批语。

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是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二

张鲁传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注）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对农业部党组关于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8年12月8日）

---

[1] 指农业部党组1958年11月20日关于全国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情况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后附有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现场会议关于开展全国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技术要点。农业部党组的报告说，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深耕改土和肥料问题的指示，我部责成中国农业科学院会同农业部土地利用局，于10月21日至11月5日在广东省新兴县召开了一次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议，会议的基本情况和提出的建议是：（一）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已成为推动农业连续跃进、不断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全国已完成10个专区209个县的土壤普查，其中广东省已基本搞完，部分省区正在由点到面的展开，大部分省区已进行过试点或正在进行试点。（二）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带来的好处是：（甲）摸清了土地资源和土壤分布情况，为人民公社和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乙）摸清了土壤的底细，打破了以往不切实际的一般推测，为深耕改土、因土苗施肥找到了对症下药的科学依据。（丙）打开了群众和干部的眼界，增强了更大跃进的信心。（丁）在农民中培养了大批的土壤科学技术干部。（戊）在群众性的土壤普查鉴定的基础上，为克服我国土壤学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发展反映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实际情况的农业土壤学、土壤耕作学、土壤改良学、农业化学，以及绘制全国的大比例尺土壤图创造了条件。建议尚未进行土壤普查鉴定的地区，各级党委应在今冬明春将这项工作列入日程。

小平[1]同志：

请问一下，此件印发没有？如未，请发，让同志们带回去看。因为此件很有用。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12月8日、9日）

一

请小平同志即刻印发。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

二

退小平同志印发各同志。请各有关同志今晚即以电话将此件通

---

[1] 本篇收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稿时写的三个批语和对决定稿的修改。其中：本篇一写在全会决定的初稿上；本篇二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印发决定稿给毛泽东的信上；本篇三写在毛泽东最后修改的全会决定稿上；本篇四是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这个决定于1958年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明后两天至迟大后天（十二月十二日）开完电话会议，传达到人民公社。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下午五时半

三

小平同志：

有几个字的修改，不要再印，只在发表时照改稿登报就是。阅后，请交尚昆[1]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

四

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2月9日）

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

第一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出现。

第二个问题：保护劳动热情的问题。

对犯错误的干部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

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

对谎报也如此，90%以上，说服，1%～2%～3%，分别处罚。

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

对干部如此，对群众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的问题。

这个口号是否适当呢？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吗？“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不是好些吗？在南宁会议，原来就是这样提的，何时推广到“全国”去了的呢？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集体的决定。

三年可能搞3,000万～4,000〔万〕吨钢，这就可以算作“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吗？

到1962年，5,000万～6,000万吨钢，叫作全国基本改变面貌，不是好一些，不是较为切合适〈实〉际些吗？此事值得商量一下。这样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至十五年彻底改变，即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我们内盘〈部〉如此设想，不登报，不是较为好一些吗？

五年基本改变，这样提，而其结果是三年或四年基本改变了，有何坏处呢？

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

土石方8亿～16亿～32亿～64亿，有何不可？

我以为马克思是赏识这种“机会主义”的。[1]

第四个问题：党内争论问题。

几十万干部性急了一点，没有作历史的，全局的，国际主义的分析。

冲天干劲，革命热情，极可宝贵。

其缺点，可以在实践中，同志们的辩论中，在几个月内，大体得到解决。

可能有几万干部，忧心忡忡，为了向共产主义事业负责，建议

---

[1]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讲话中说：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希圣提议翻一番，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有几天又提高到32亿，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马克思会赏识这种“机会主义”的，不会处罚我们。

不要太急了吧，有些问题等一年二年去作结论，不是较为稳当些吗？这类同志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懂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问题已经成熟了，国内国际都十分迫切地要求答复许多问题。不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蔓延开去如何得了呢？

作这样两方面的分析，可不可以呢？

第五个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

研究斯大林（他是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虽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第一、二、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几本书。

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五〈六〉个问题：研究辩证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在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

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

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各级（直至公社的生产队）分级管理的思想，确立了。

大洋群，中洋群，小土群，洋土结合群，总之，大型与中小型企业的对立统一，洋与土的对立统一的思想，确立了。

农业中，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三三制的耕作制，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确立了。

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内：社会主义的时代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对立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

并且也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这些思想被提出了。

提出了大集体、小自由的思想

提出了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思想

在武昌，提出“实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经济计划，又热又有冷，雄心与科学分析相结合，避免了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而产生的不切实际的缺乏根据的3,000万〔吨〕钢的可能是孙悟空式的危险，把我们的脑筋压缩了一下，留有余地。如果1959年可能的话，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这个计划吧!

联系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世界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必要性，提出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而我们则一定要后进入。在可能性上，我们也可能只能后进入，不可能先进入。这样设计，就避免了一个违反国际主义、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共产主义的错误。是不是一个错误呢？可能是。

第七个问题：十五年纲要，目前是否可能作出来的问题。

我们可以每年议一次，在1959年、1960年两年内，或者还要加1961年，共三年，才可能制定。

因为在可能和需要两个问题上，我们都缺乏根据。10年，4亿吨钢，有什么根据呢？大概到1962年，就可能做出一个长期计划了，例如10年。

第八个问题：

1958年的军事有一个大发展，大整风，军长当兵，参加生产，大办民兵师，这是几件大事。

第九个问题：

1958年，改革了教育制度，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件大事。

第十个问题，谈一下两种可能性：

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

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

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

个人要准备随时有灭亡的可能，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第十〔一〕个问题，辞掉共和国主席：

要做一个正式决议[1]

要请大家在三天内用电话会议立即做一次宣传

是为了积极奋斗，而不是临阵脱逃。

群众中，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要预料到。宣传工作做得不好，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犯错误。

第十一〈二〉个问题：

1958年的国际形势有大发展。烂下去，好起来，经过长期曲折，估计战争可能性。（完）

中央委员会离开首都在武昌开会，有极大好处。

---

[1] 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即将作出的《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二

（1）成绩是主要的，不能估计过低

（2）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进入全民所有制的问题，即大约两个五年计划时间内进入，一部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进入，大部分在第二〈三〉个五年计划内进入

（3）**不忙于宣布消灭阶级**

消灭剥削与消灭阶级问题（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

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的结合。

（4）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有矛盾，按全国一盘棋原则去解决

（5）57亿～67亿的进出口，比去年增20%

对外贸易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主〈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

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

1959年70亿元～80亿元的进出口数量

（6）条件于〈与〉可能出右倾

没有第三阶段

看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7）美、南大骂：大跃进；人民公社；东风压倒。

从农业中抽15%的劳动力是可以的（四川3,000万劳动力中抽500万）

明年二月再开会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8 年 12 月 9 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

之三、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哪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万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得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

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跤，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

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作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哪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

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全是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

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产生疑问。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万吨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地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

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上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

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副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得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的诸位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

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在他们没有变

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 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图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

1958年，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江汉饭店观看文艺演出。

1958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会谈。

1958年12月11日，毛泽东和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客人一起接见正在洪山礼堂开会的干部群众。

1958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接见以雷维斯上将为团长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

（1958年12月12日）

（一）公报问题。西方可能四分五裂，看样子会四分五裂，但是也还不准。欧洲大陆一个集团，对付英美，但内部矛盾重重，德法有矛盾，英美也有矛盾，他们是又团结又斗争。斯大林分析资本主义内部要打仗。我们早已说过，一九四六年我们写的文章，发明美国和苏联的中间地带，争夺中间地带是主要的。为什么不打中间地带，先打苏联呢？以反共为名，去搞蚕食政策，对中间地带侵略，引起中间地带的反抗，有广大中间地带，他们走不过来。包括美、法、德、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他们的后方。欧、亚、非在闹乱子，美国如何脱出手来打苏联？

剥削是剥削人，剥削人才能剥削地球，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把人都打死，占了它干什么？我想不出为什么要打原子弹，还是常规武器。我们想，只要不打原子弹，德、法、意都赞成，许多国家都不怕美国，不能订个条约互相不使用？垄断资本存在，不打仗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原料，没有市场。

公报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帝国主义一定要四分五裂，而且自己要打仗。尼克松说：要搞经济竞赛，要把印度扶起来。印度如何能扶植起来呢？西方是一股悲观气氛，我们是一股高兴气氛。四分五裂这句话要斟酌一下，四分五裂是真理，但一讲，是否会引起

他们警惕，可是又没有办法。美国在台湾要把自由主义分子挤进去。伊拉克很紧张，这几天捕了一大批反革命，但是胜负还未决定。主要是美、英、土耳其、伊朗在搞阴谋（卡赛姆——为什么解散工会？怀疑伊拉克为什么消息灵通）。

（二）三个文件，已定稿。辞职问题：“偶像”总要有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有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个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死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少，可上可下。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五九年计划搞二个月再说，二月半再议一次。

人民公社如何？二月一日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或在北京，或在成都，或在上海。

香港报骂蒋介石“仓惶辞庙，逃往台湾”。

人代会三月十五日开。

二月一日开会，除检查两个决议外，另外，整顿国家机构是必要的，安排人代会报告，还有教育问题，人民公社再搞点内部指示。

人民公社对宪法有破坏没有？例如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学美国，搞不成文宪法。美国是不成文宪法，一篇一篇凑起来的。

进入共产主义，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搞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是指第二个五年计划了。多则五六年，是指第三个五年计划。

（三）人民公社文件还要修修补补，还要想一想，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时间修改，十八号发表公报和主席辞职问题，十九号发表人民公社决议。

主席辞职问题，如果还有疑问，还可再开一次电话会议，解释解释。

（四）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是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陈炯明在东江和一个县的税务局长凑股子，选举一个人当局长。抓两个股一摸。

还有两句话：“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横联是“政治挂帅”。

下午必须开一次会。出告示，要专政。省委书记要会做。无非是落后，已经落后了。再落后几年，有什么问题，做省委书记要全面，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还有矛盾，服从全国的利益。顾全大局有最高的品德，这种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凡不顾全大局的，就要吃亏。杨一辰就是不顾大局，想趁机而起，打倒周、陈等，想搞这一套。凡是想搞这一套的，都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有一帮人，不顾全大局。历史上一切不顾大局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杨一辰、高岗、罗章龙。

准备自己受了冤枉，还要顾全大局，杨一辰有多少马列主义？一毫也没有。

有些省穷得要命，再穷几十年也不要紧，实际上不会穷几十年。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红娘晚上站在外边，并且挨打，为了什么？

对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12月）

一

乔木[1]同志：

此件[2]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十七日下午广播，连同『志』主席问题决议[3]一起，十八日见报。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十时

二

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稿。公报于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

[3] 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这样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1]

---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稿中的一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12月18日）

林克[1]：

1普特等于多少公斤[2]，请即查明告我。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一时

此件[3]先给陈伯达[4]同志看一下，如果他今天不走，下午可以谈一下。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普特，苏联用的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千克）。

[3] 指1958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塔斯社报道的苏共中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其中说，提高谷物生产的任务仍然是主要的任务。要完全满足国家的消费，每年需要有100亿到110亿普特的粮食。粮食收获量的决定性来源就是提高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复霍查电

（1958 年 12 月 18 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你在 1958 年 10 月 9 日面交我国大使罗士高同志转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

十分感谢你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有关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人民一向关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你在来信中提到，为了顺利完成你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希望中国方面给予新的贷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五千五百万卢布的贷款，并且已经经过我国外交部通知了巴利里大使同志。有关贷款和供应各项主要物资的具体事宜，将由我们两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商谈。谨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18 日

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1]

（1958年12月21日）

一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2]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

[1] 这是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的批注。

[2] 引用的鲁迅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1927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唐宋传奇集》上册1927年1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次年2月续出下册。

试仿陆放翁[1]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二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2]

三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3]，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4]

---

[1] 陆放翁，即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击水”的批注。

[3] 指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4] 这是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心潮”的批注。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1]

五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2]

六

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3]

---

[1]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的批注。《菩萨蛮》，指《菩萨蛮·黄鹤楼》。

[2] 这个批注写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那一页的天头上。以下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3]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长征》一诗中“水拍”“三军”的批注。

七

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1]

八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2]

九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3]

---

[1]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苍龙”的批注。

[2] 这是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一词的批注。1957年《诗刊》一月号首次发表的这首词和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本词下阕的第八句作“一截留中国”，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

[3]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雪》一词的批注。末三句，指这首词的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十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国之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1]

十一

乐奏：这里误植为奏乐，应改。[2]

十二

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

---

[1]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三十一年还旧国”一句的批注。

[2] 这是毛泽东对《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奏乐”二字的修改意见。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原作“万方奏乐有于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

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1]

十三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2]

---

[1] 这是毛泽东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批注。其中所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一典有误。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对“武昌鱼”的注释是：“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鳊鱼，称团头鳊或团头鲂。”

[2] 这是毛泽东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的批注，指“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

关于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的批语

（1958年12月22日）

陆定一[1]同志：

建议将此件[2]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六五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材料指出，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的党员在讨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反映出一些不正确认识，表现在：（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这个党支部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清华大学党委及时发现并检查纠正了这些错误做法。195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语和清华大学的材料。

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1958年12月23日）

要培养新生力量，没有年轻的哪能写好文件？

过去不是有人说干军队没有奔头吗？军队还是有奔头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战时有奔头，就是平时也有奔头，可以成为多面手，一专多能，学会很多有用的技术。

金门打炮对部队士气有没有影响？还是不要打？（答：部队情绪高）闹个人主义的时候再打他一下。我们对台湾海峡地区的这个政策，大家赞成不赞成？是不是很得人心？要就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单是金门我们就不拿。杜勒斯说，中国人不好谈，对金马无兴趣。假如杜勒斯丢下金马走了，我们怎么办？请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是政治家，一个办法是去占，我们可以控制台湾海峡一半。便于南北的海运，一个是不去，搞个无人地带，以表示我们兴趣不在这里，而在台湾。这时一定会有很多舆论，舍不得。我们不去，很可能蒋介石又来占领，这更好。我们不要他走。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不走。他会说，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撤退。你美国人多没面子啊！

现在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称贵我双方？为什么不打敌人司令部，为什么还答应在对方请求的时候供给他们“以固

守”？同志们可以议一议。如果金门的敌人叫我们供给，那倒是好事，那一点兵我们养得起。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和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座谈。

在此次军工会上，可拿一天时间谈谈形势问题。过去，《人民日报》的同志对我们对台澎金马的政策问题想不通，新华社的同志也讲不通，周总理报告了，分头研究，才搞通了。在此次政工会议上可以大鸣大放一天。这是政治问题，国际形势，离开形势，政治工作不好做。过去的规矩，第一是讲国际形势，第二是讲国内形势，第三是本部队。过去那些有点形式主义，如一点不搞就不好了。形势问题至少讨论一天。

四国共管柏林，是德苏战争结束，苏联打得精疲力竭时，斯大林同意了的。尤金大使曾告诉我，苏德战争中苏联死了两千万人，可能包括战区的男女老幼。苏联近两亿人口，就算他有五千万壮

丁，作战死去一千万壮丁，问题不算小。苏联同志们，斯大林在那几年中能取得那样的胜利，已经了不起。斯大林为什么不要我们和国民党打仗呢？因为国民党就是美国人。一方面他把美国夸大了，另一方面把我们看小了。后来斯大林承认他错了（一九四九年夏）。他曾问过□□□，他说的话在中国有无影响？□□□说，没有影响，因为你们提出的，我们没有执行，也不能执行。一个共产党指挥一个共产党，奇事。因为当时没有第三国际了。其实蒋介石硬要打你，你不打怎么办……美国也怕我们——怕我们蛮干，不怕死。别的他也知道，无非是手榴弹那一套。还怕我们的将来，今年是钢翻一番，粮食那么多。真让我们搞七八年，可了不起。

杜勒斯怕人民公社，而且怕得很。他总研究人民公社，骂我们两条。一叫拆散家庭，二叫强迫劳动。这也是战士关心的问题。家庭要不要拆散？有没有这个问题？劳动是不是强迫？如蒋介石强迫老百姓那样，还是自愿？我看基本上还是自愿的劳动，老百姓看到了这样的劳动结果能迅速增产。只要我们让他们睡足觉，每天睡八小时。一定要强迫，你不睡不行。

过去出工，自由主义，阴一个，阳一个，我们学军队的办法，准备出发，十分钟可以完吗？出发很快，整整齐齐。是整整齐齐好，还是阴一个阳一个好？过去各家吃饭，这家煮得早，那家煮得晚，上工稀稀拉拉要三小时。现在一个食堂吃饭、议事，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方便。上工整整齐齐，只要一小时。

政工会上要谈谈人民公社问题，看看有些什么问题。（众答：房子问题，男女分居问题……）分居有几个星期，扎野营你不分居怎么办？这次人民公社运动比合作化要顺利些。由个体到集体比较难。合作化和现在的变化哪个大？

（谈到部队内民主作风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样整整齐齐的军队还这样，公社刚办起来，有点缺点就议论纷纷。公道不公道？过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三个月不搞就忘得干干净净，天下大乱。还不是每天搞，每个礼拜搞？

小锅子还是要恢复。可以炒菜、做饭，大集体，小自由嘛！自由主义搞光了不行。

对领导方法简单的农村工作干部要说服教育。过去，军队里的官长只要兵不听话就打，把打人当作最后的手段。后来我们实行官长不打士兵。许多班长就没办法了。经过说服教育慢慢地就改过来了。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兵还是可以带走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不是写一个文件吗？现在看那样的文件，哪有现在这样进步？问题那么多，没有发挥。

公社一个连长要领五百人，实际上是一个营。有男女老幼，不如军队好带。

去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巩固合作社。现在五六年至五八年。加上明年四年之内使人民公社上轨道。使干部学会带兵——男女老幼，又管生产，又管生活，又管思想，又管精神，又管物质。

把过去的区乡干部转为公社干部。政社合一，县政府就不要了，县级干部转为县联社的干部。县委全就是县联社党委，加上下放干部。

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吗？得有三化。姜太公当政委，武王是司令员。那时恐怕还是奴隶时代。三化是军队发明的。组织不军事化怎么打仗？从来军队都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组

成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好，乡村搞不得？广州市有没有公共食堂？死了人没有？（朱光答：有食堂，死的都是该死的。）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这点不会犯原则错误吧。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一九五五年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候，谁料到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一整波匈事件，一两周之内，天下大乱。这是坏事，没有料到。有好些事也没有料到，如今年的大跃进。去年九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冬今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这一搞，粮食增产□□□□斤以上，共□□□□亿斤，砍掉□□□□亿斤，算□□□□亿斤，有个保险系数。这件事我就没料到，人民公社也是没有料到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时都没有想起人民公社。七月份还是没有想过。

钢铁翻一番的问题。是在游泳池里和王□□同志吹的。我说试试看，他就发命令了。没有料到真正翻了一番。

还有军队起变化。今年一月份我找几位部队同志谈话时，罗荣桓同志讲有落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军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来我也没有管军队，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军委开了五十五天会，以后军区开，军、师开，一下子问题解决了。现在空气不是改变了吗？还不是有希望吗？你们这次政工会议搞八个文件，是去年就计划好了吗？我不相信。还不是在今年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才搞出来的。大跃进，干部当兵，民兵大发展是从北戴河会议之后搞起来的，一个多月，北京搞了几十个民兵师。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许多

好事、坏事，事先不可能完全料到。只能大体上料到。

（谈到看问题要看到两种可能性时）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你们广东就有省委书记想搞分裂嘛！我们的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不准备就被动。列宁总是不避讳。他常常说：要么胜利，要么灭亡。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解决。是帝国主义灭亡，还是我们灭亡，中苏社会主义十二个国家是共同命运，无论如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暂时灭亡，部分灭亡。敬老院、公共食堂，也会崩溃一部分。没有坏处，这部分的失败有好处，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你们准备垮台就不会垮台，至少是垮得少。你们可以进行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

社员有退社的自由。我们这次决议上没有写。工厂的工人可以跳厂。鞍钢那么大，工人自己一个人要成立一个鞍钢是困难的。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似乎与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论点不符合了。这还是符合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托儿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如此。彻底崩溃是不会的，我们总还可以打游击，还有民兵在手里。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云南去。我与民主人士讲过，他们都笑笑而已。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还是留在北京搞维持会呢，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呢？这样好像与美帝是纸老虎不符合了。所谓纸老虎，并不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武王不伐纣，纣不会倒。帝国主义还活着，经过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

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风浪。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不让敌人登陆。登陆了，可以打败它。或者就是登了陆也只占领少部分地方，这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苏德战争，德军打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不是苏联崩溃。但那是危险的。第二个可能也要估计到，要受损失，部分的，暂时的。

美、英、法、西德统治阶级闹别扭，对我们有利。资产阶级分两部分，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有矛盾。西方世界闹别扭，不带革命性；纳赛尔反帝是有革命性的，但是他们一面反帝，一面本国又有反动的部分，如印尼右派。

把各国因素合起来看，巩固因素第一。七年、十年、十五年不打仗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写保票，总还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性，所以莫斯科宣言就把这种危险性写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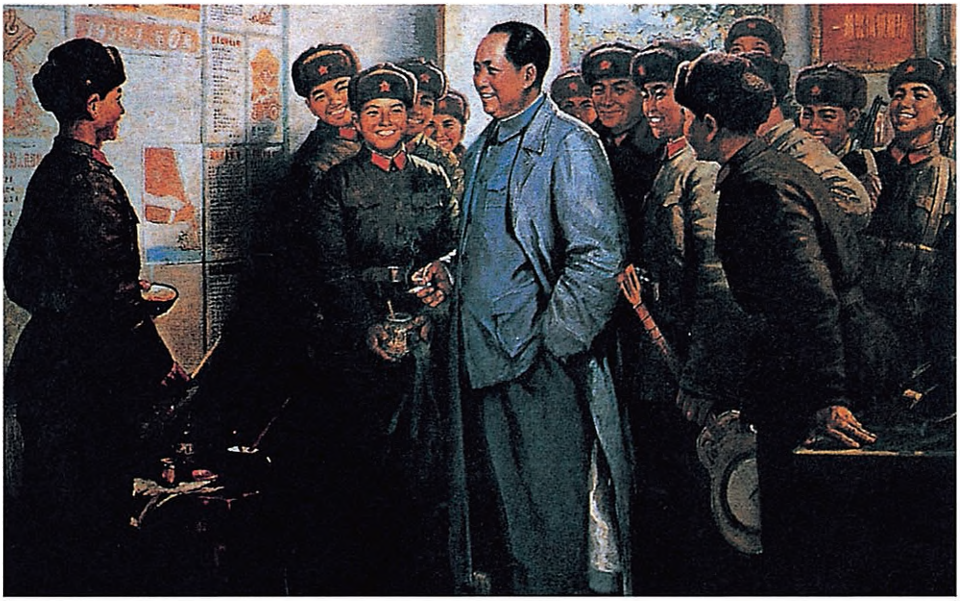
活老虎能转化为死老虎，铁老虎能转化为豆腐老虎。估计两种可能性，说东风压倒西风，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就说通了。在座诸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不是说你一年也不害一次感冒。害病和健康两方面都要估计到。

你们对我所讲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准备？河南有一个地委书记，听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他的面色发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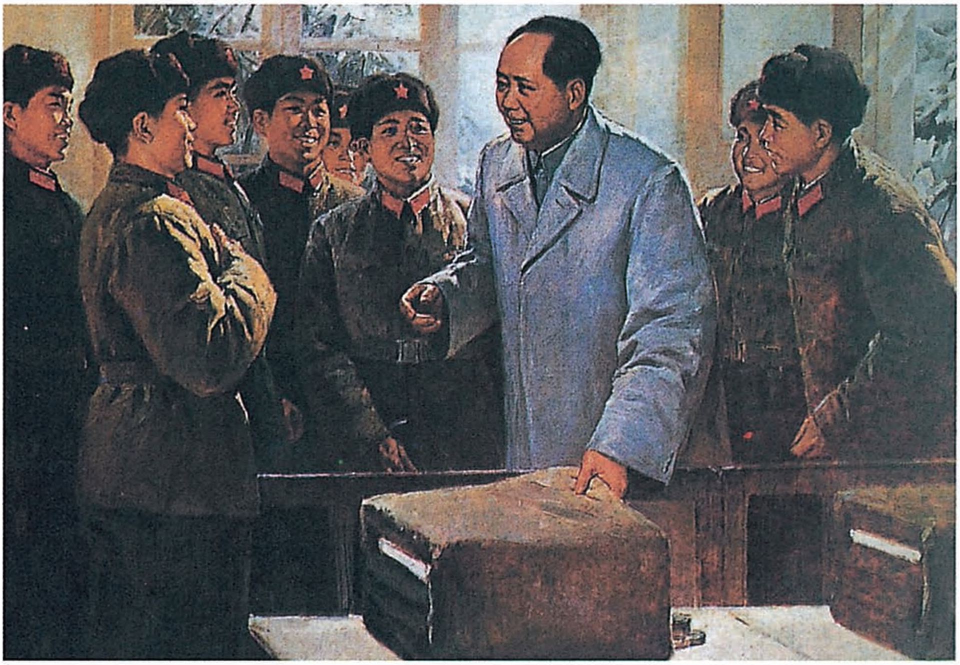
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我的讲话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以议一议。一个人也有两种可能性，活下去，或者死了。广州军区一千台汽车三个月之内运输了许多物资是好事，但是有□□人伤亡了，你事先想到了没有？有个县委书记被碰伤了，他事先也没有想到呢？部分的、暂时的损失随时都要准备。三个月之后总要进步一点，老是这样搞还行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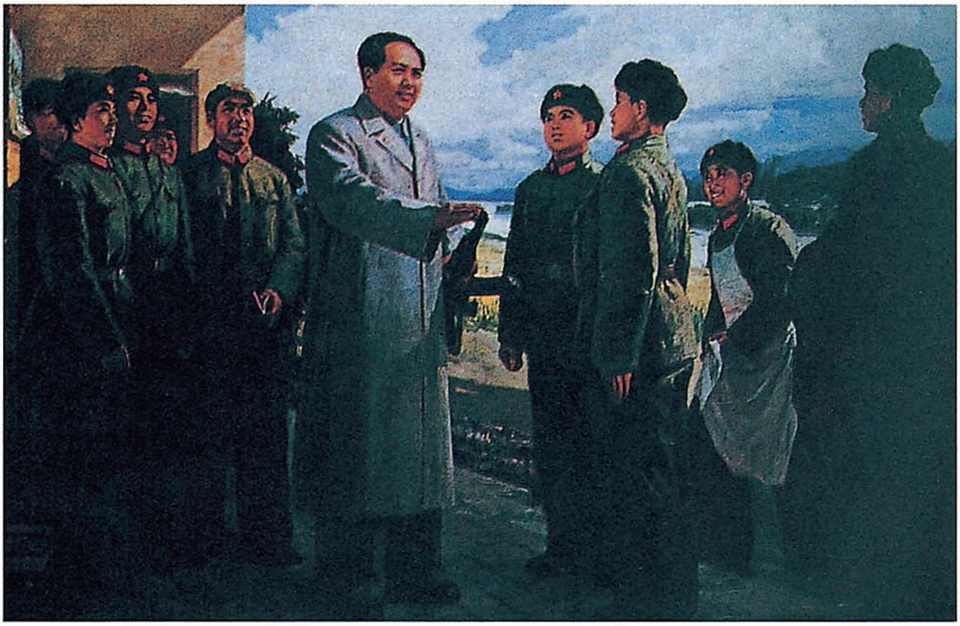
朝鲜打仗，研究时有时觉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线有一个师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会吃人的。战术上，具体工作上绝对不要轻视敌人，一点也不能放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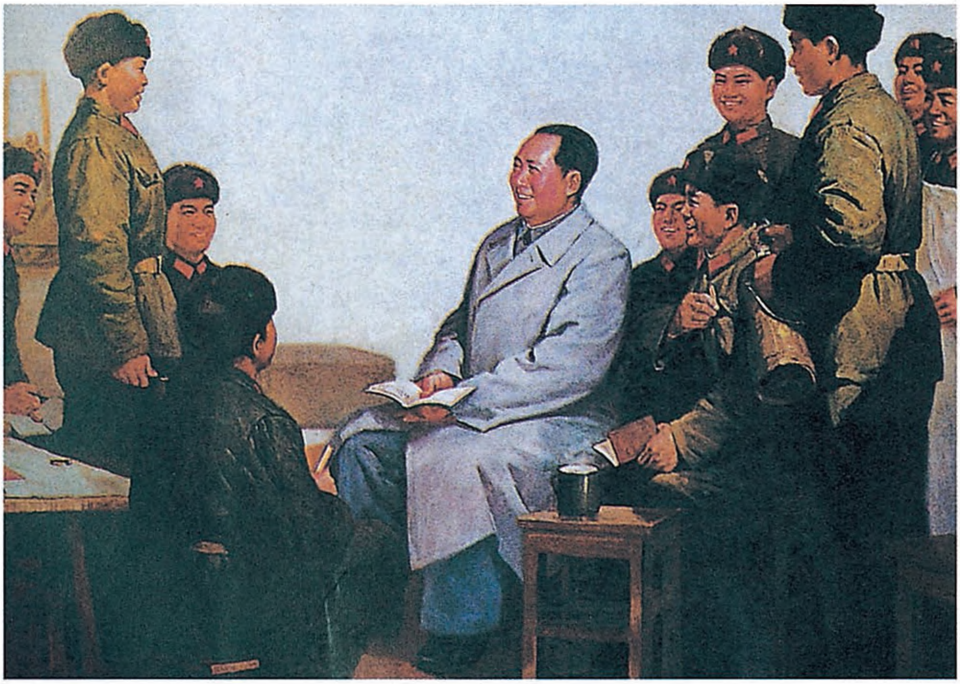
《毛主席夸咱能文能武》（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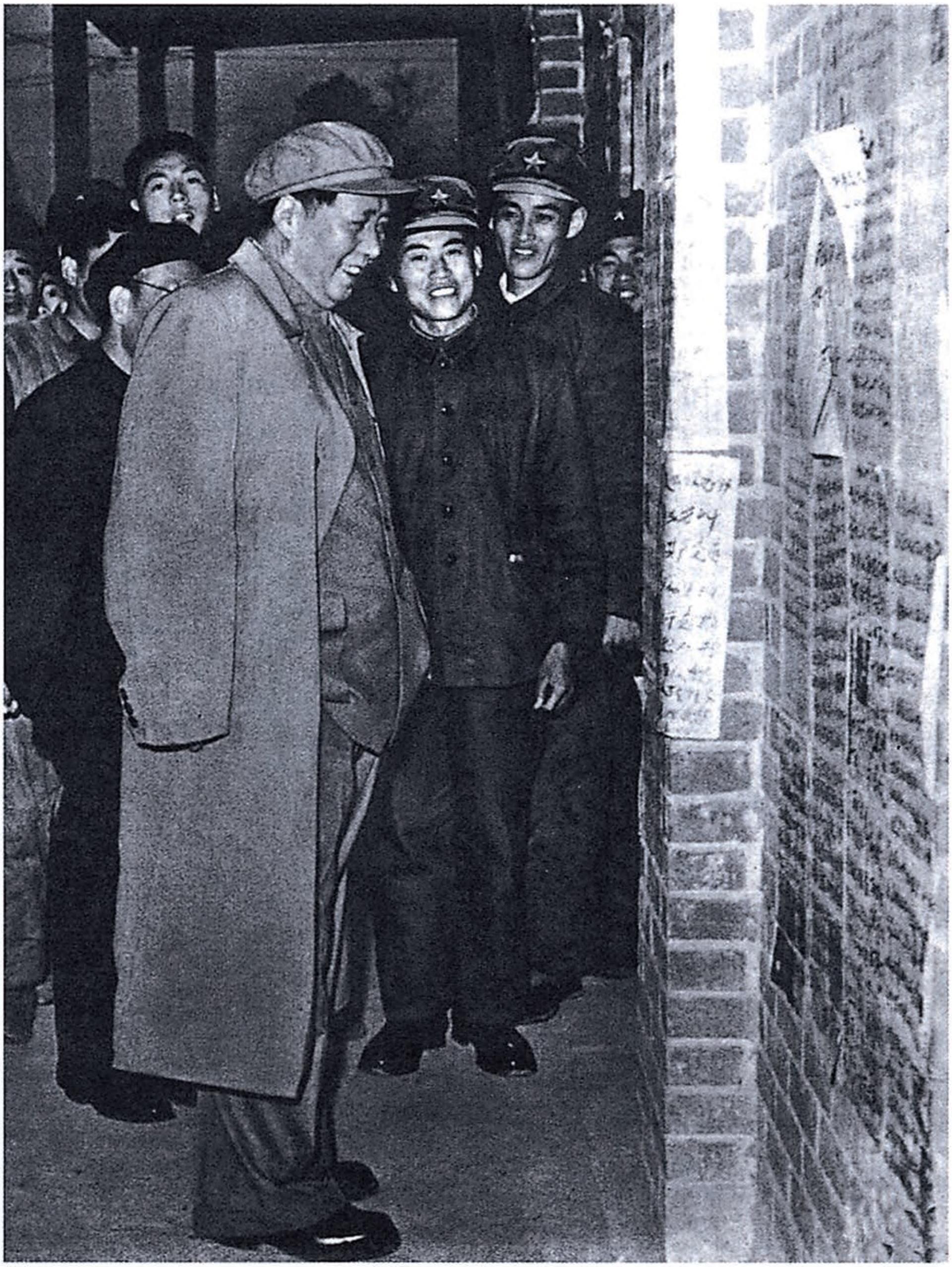
《温暖》（油画）



《伟大的教导》（油画）



《谆谆教导》（油画）



1958年，毛泽东在解放军某军部看大字报。

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65岁寿辰时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院内留影。

1958年12月，毛泽东接见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滋群等。

1958年12月，毛泽东和中共武汉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握手。

1958年12月28日，毛泽东和中共武汉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合影。

祝贺苏丹独立纪念日的电报

（1958年12月29日）

喀土穆

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阁下：

欣逢苏丹共和国国家独立纪念日，我谨代表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苏丹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苏丹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共同社、英新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两篇评论上的批注[1]

（1958年12月）

一

【共同社东京21日电】评论资料：“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作者：桥本正邦。

基本正确

新华社18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这篇东西发表以后，为全世界所注意的人民公社的方针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说明（?）“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形式”，另一个意义是，“纠正对于人民公社的错误想法和偏差”。

人民公社从今年夏季开始出现以来，在全世

---

[1] 本篇两部分开头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批注。共同社、英新处的两篇评论，刊载在新华社1958年12月22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特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第四十期上，文内的横线、三角、圆圈等符号是毛泽东加的。

界，善意的和恶意的批评纷飞，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了一步”，而加以注意；△又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违反人性的制度，是一定要失败的。”△人民公社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最初是在中国人民间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自发的产生的。○唯其如此，似乎中国人自己过去也没有把它的意思弄清楚。何况是从外面观察的人，他们不大了解，那恐怕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了一步”的人们着眼于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采取两种分配制度：工资制和供给制（不用钱配给）。听说由于粮食大增产，中国已经能够做到“人人都吃得饱”；无论谁都可以去人民公社的食堂不花钱吃饭。○这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劳动，谁都可以吃到一份饭。△这也就是有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且，人们也就进一步设想过，假如继粮食之后，布匹充足了，住宅建筑得多了，那么，这些东西也可以不要钱，分给大家了，○那样也就可能分期分批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

二

【英新处伦敦19日电】中国共产党决定暂时不实行在大城市建立公社的计划。“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兴办公社，这个事实说明党中央委员会在实行公社计划时遭到了困难。

只有一部分对

关于推迟在城市建立公社的决议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10日通过的并由北京电台在12月18日广播的。决议还承认，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并不是像过于性急的党员们所想的那样，不久就能实现的，它的实现……。但是同时，中央委员会同意公社制度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形式。

如果说在过去在中国大力推行新计划时控制得比较轻松的话（?），这一次运动的速度之快已经使某些地区失去了控制（揣译）。现在中国人用六个月的经验研究这个运动中出现的好的和令人不满的现象，并且已经作出他们认为是解决公社计划中出现的比较困难的问题之一的最好办法。

看来，公社肯定继续巩固和扩大，成为□□联盟，最后城市将同乡村地区一致。群众受到鼓动以后产生的最初的热情现在看来是消失了，△△△这大概是因为在过度地工作以后的身心方面的疲劳，并且人们□□这种计划□□□幻想破灭。△△△△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1]

（1958年）

对于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

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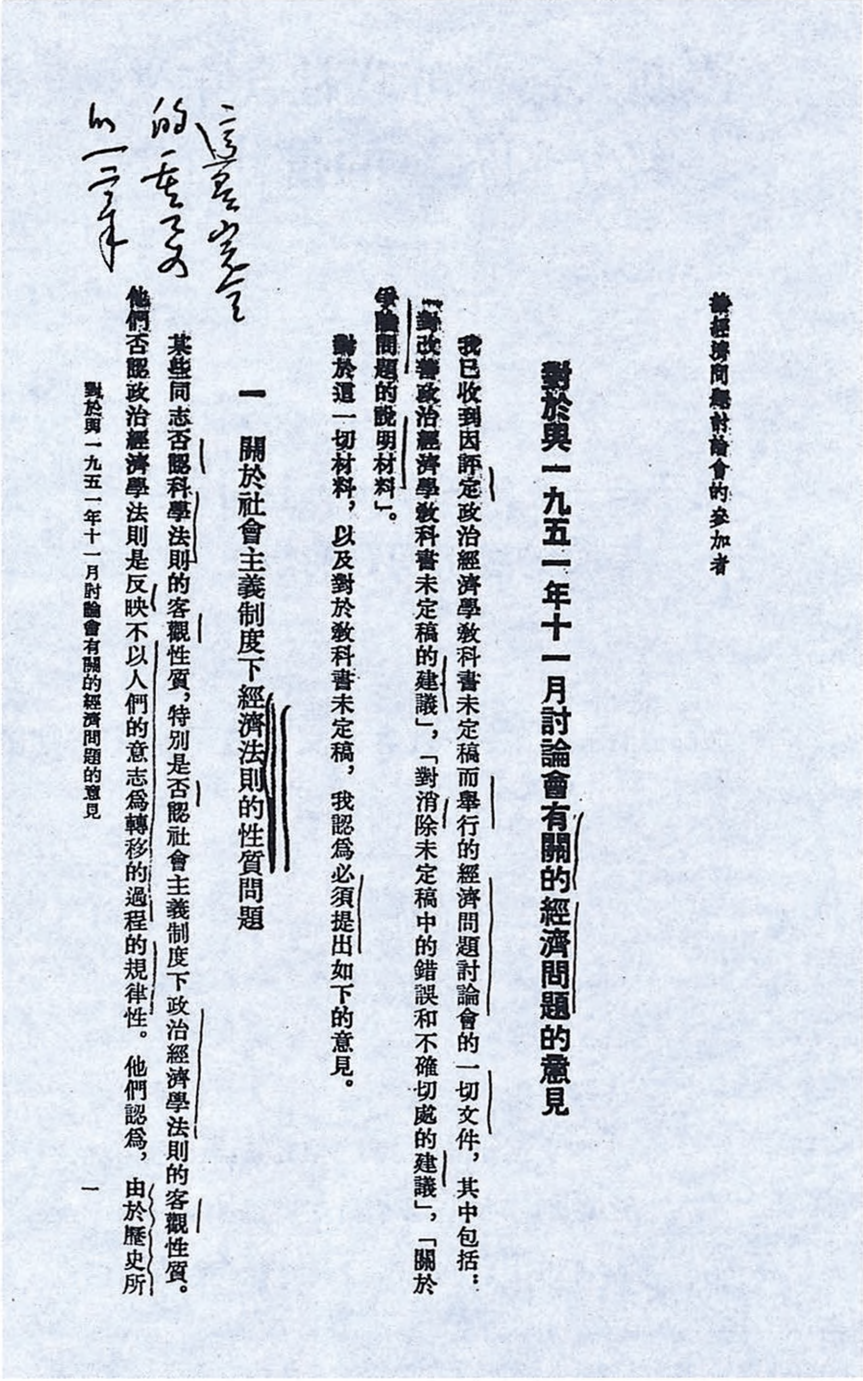
一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第1页]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法则。但是原来的这些法则，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

---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三次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的批注。



給經濟問題討論會的參加者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我已收到因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而舉行的經濟問題討論會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對改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的建議」，「對消除未定稿中的錯誤和不確切處的建議」，「關於爭論問題的說明材料」。

對於這一切材料，以及對於教科書未定稿，我認爲必須提出如下的意見。

一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這章完全
的看不[illegible]
的一字未

某些同志否認科學法則的客觀性質，特別是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法則的客觀性質。他們否認政治經濟學法則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過程的規律性。他們認爲，由於歷史所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一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舞台，让位给新的法则，这些新的法则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自由与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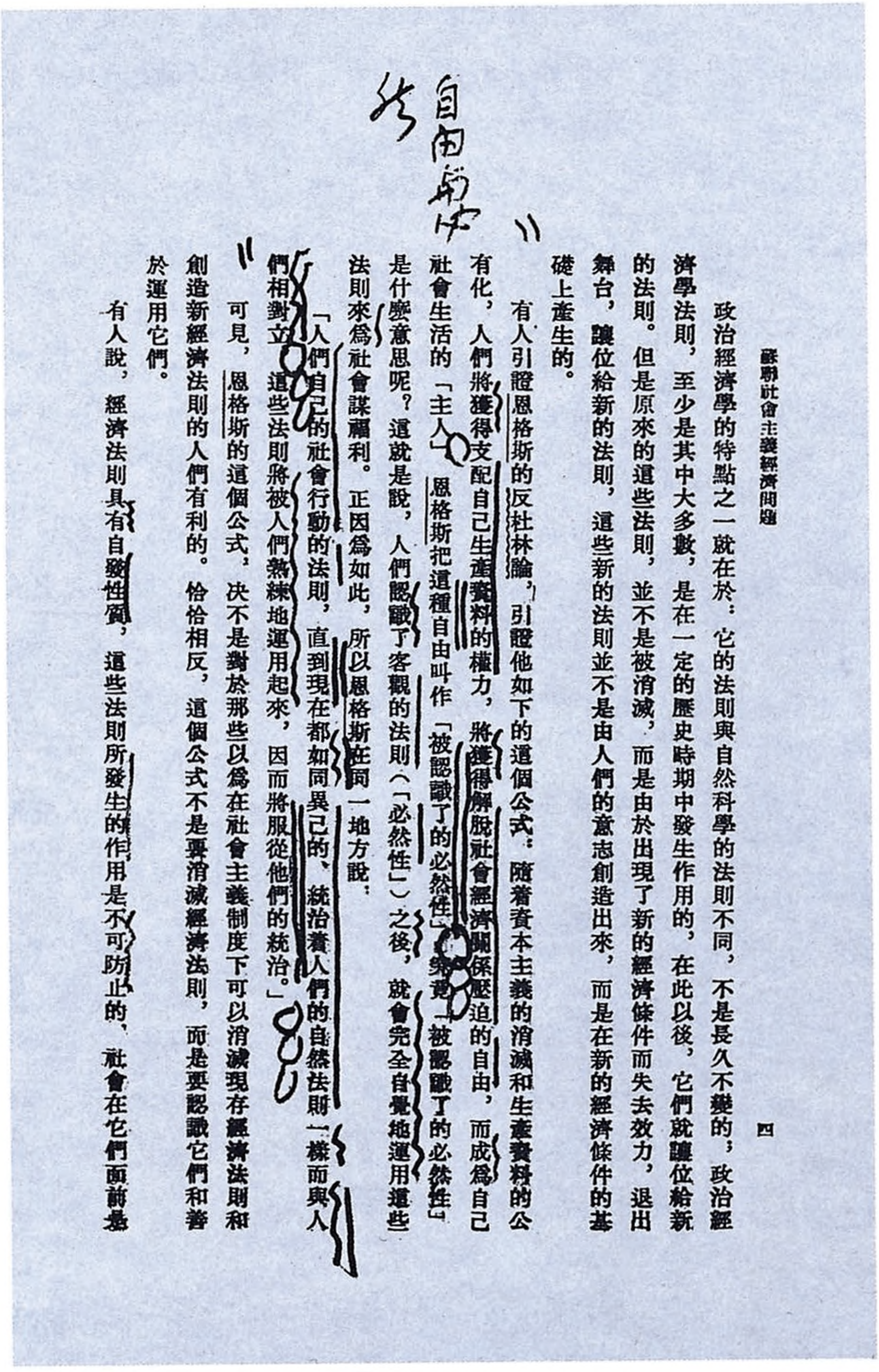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如下的这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将获得解脱社会经济关系压迫的自由，而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说：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法则，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法则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这些法则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决不是对于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经济法则的人们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不是要消灭经济法则，而是要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第4页]

……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决定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



自由与必然

政治經濟學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的法則與自然科學的法則不同，不是長久不變的；政治經濟學法則，至少是其中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在此以後，它們就讓位給新的法則。但是原來的這些法則，並不是被消滅，而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讓位給新的法則，這些新的法則並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而是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

有人引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引證他如下的這個公式：隨着資本主義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人們將獲得支配自己生產資料的權力，將獲得解脫社會經濟關係壓迫的自由，而成爲自己社會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這種自由叫作「被認識了的必然性」。究竟「被認識了的必然性」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人們認識了客觀的法則（「必然性」）之後，就會完全自覺地運用這些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正因爲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說：

「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法則，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着人們的自然法則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這些法則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

可見，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決不是對於那些以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消滅現存經濟法則和創造新經濟法則的人們有利的。恰恰相反，這個公式不是要消滅經濟法則，而是要認識它們和善於運用它們。

有人說，經濟法則具有自發性質，這些法則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會在它們面前是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形式去代替—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了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

我们有先例

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

?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似乎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法则，不依靠这个法则，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第5～6页]

……

这是一个客观法则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

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

注意

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第6～7页]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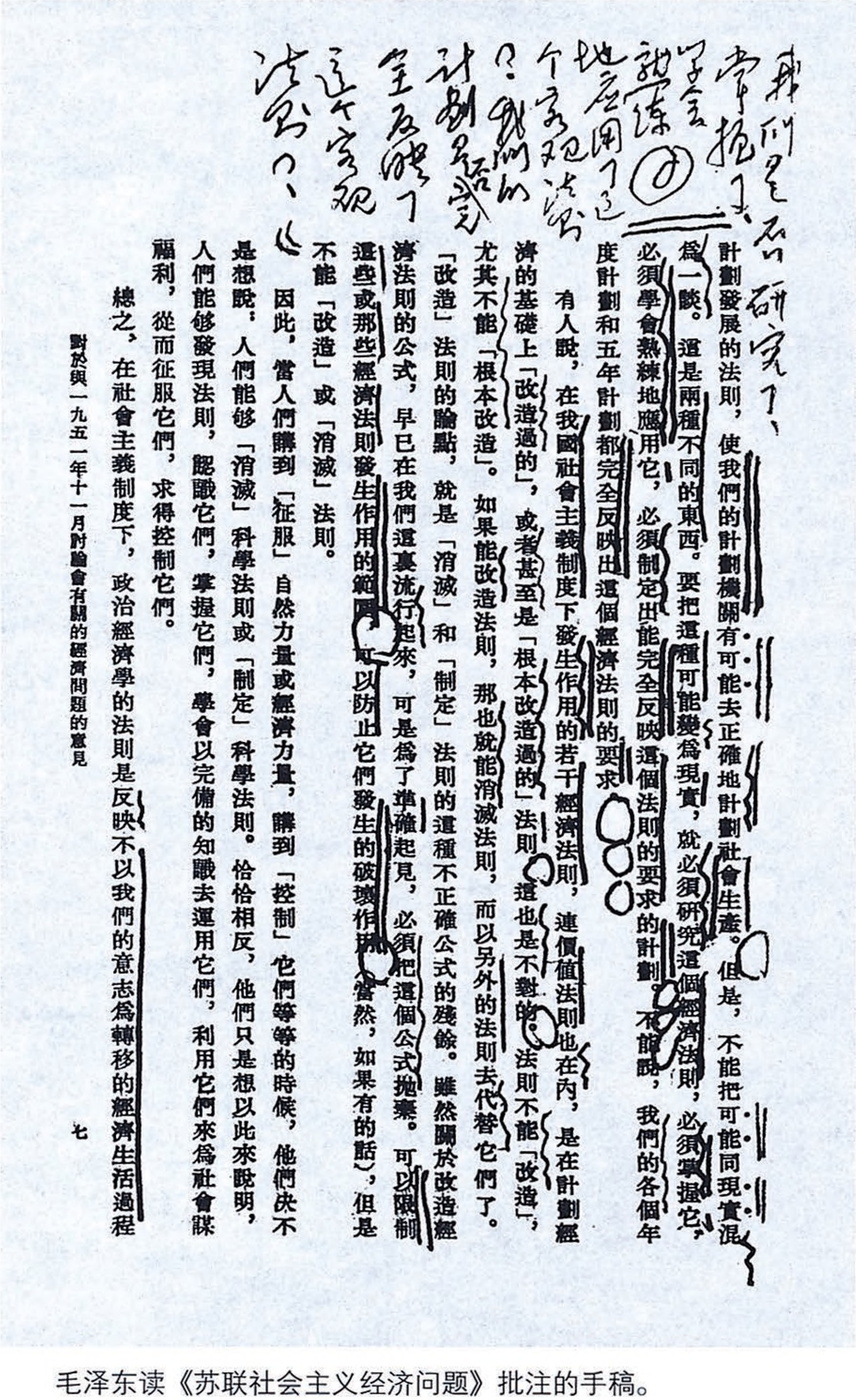
二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不明确

我们也有〔这〕样的人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便应当消除商品生产。关于这点，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末商品生产



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了、

計劃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爲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爲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練地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都完全反映出這個經濟法則的要求。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干經濟法則，連價值法則也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法則。這也是不對的。法則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則，那也就能消滅法則，而以另外的法則去代替它們了。「改造」法則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法則的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餘。雖然關於改造經濟法則的公式，早已在我們這裏流行起來，可是爲了準確起見，必須把這個公式拋棄。可以限制這些或那些經濟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可以防止它們發生的破壞作用（當然，如果有的話），但是不能「改造」或「消滅」法則。

因此，當人們講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經濟力量，講到「控制」它們等等的時候，他們決不是想說，人們能够「消滅」科學法則或「制定」科學法則。恰恰相反，他們只是想以此來說明，人們能够發現法則，認識它們，掌握它們，學會以完備的知識去運用它們，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從而征服它們，求得控制它們。

總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是反映不以我們的意志爲轉移的經濟生活過程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七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理解成这样，也可以理解成那样。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自己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一切归全民，才能废商业
因而产品充分发达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出是这样的一些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直到现在，

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

只有英国一国。

英国是否能废商业，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看来还得生产商品

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后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美、法、德、瑞、挪、丹、荷、比、卢都不如英吗?

甚至，不仅在十九世纪末叶，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是已经达到了像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程度。至于说到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农村中却还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应该予以确定的。[第8～10页]

……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将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运动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

列宁的回答可以简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丁）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开展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第 11～12 页]

……

不要怕资本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

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

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它并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它，因而**只有**在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时，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里，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商品生产是否有用的工具。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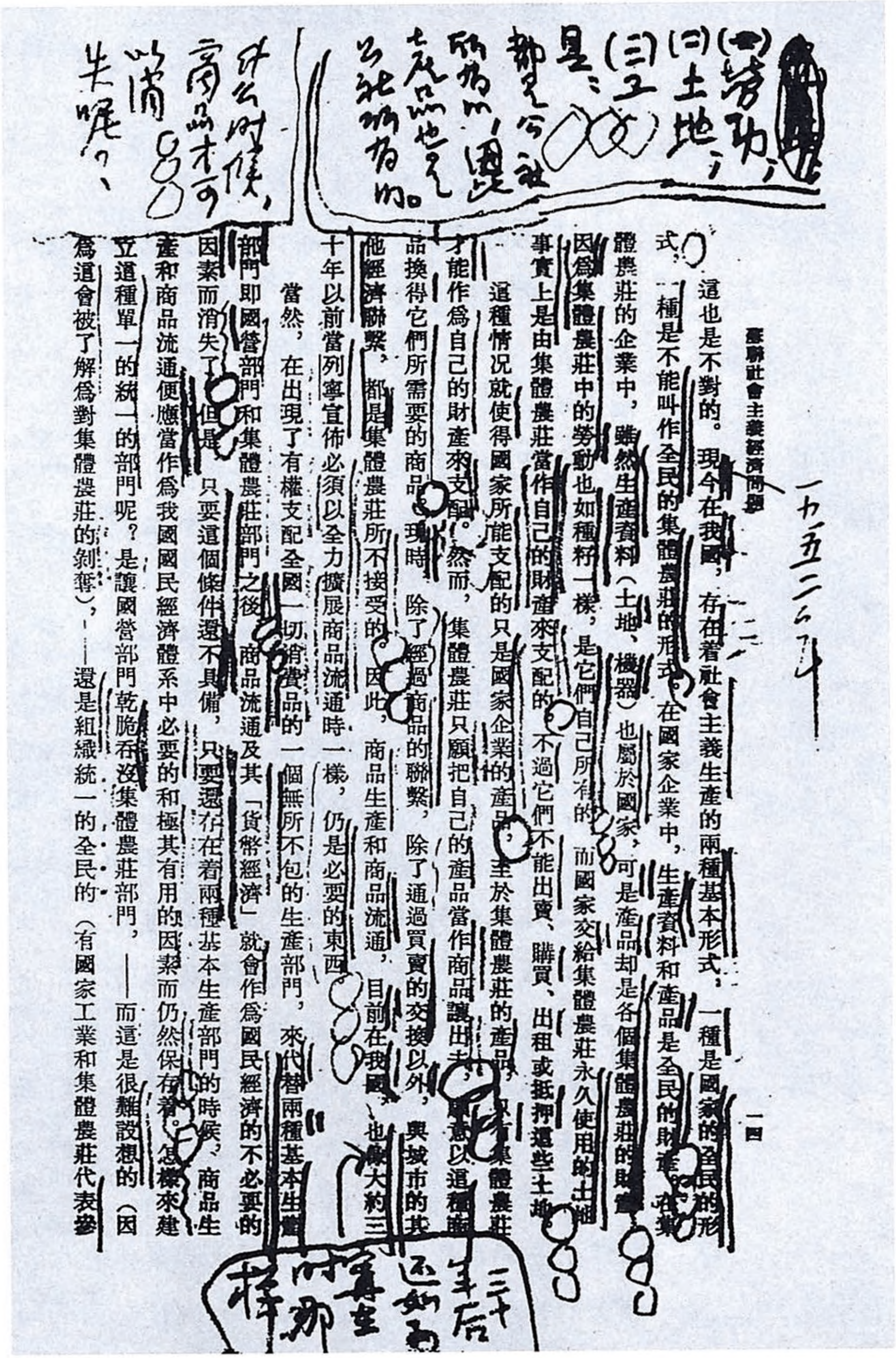
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等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极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一）劳动；（二）土地；（三）工具：都是公社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的。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一九五二年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做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籽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不过它们



一九五二二六十

這也是不對的。現今在我國，存在着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體農莊的形式。在國家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的企業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於國家，可是產品却是各個集體農莊的財產，因爲集體農莊中的勞動也如種籽一樣，是它們自己所有的，而國家交給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實上是由集體農莊當作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的，不過它們不能出賣、購買、出租或抵押這些土地。

這種情況就使得國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至於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作爲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然而，集體農莊只願把自己的產品當作商品讓出去，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繫，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繫，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佈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

當然，在出現了有權支配全國一切消費品的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部門，來代替兩種基本生產部門即國營部門和集體農莊部門之後，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會作爲國民經濟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但是，只要這個條件還不具備，只要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生產部門的時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便應當作爲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必要的和極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樣來建立這種單一的統一的部門呢？是讓國營部門乾脆吞沒集體農莊部門，——而這是很難設想的（因爲這會被了解爲對集體農莊的剝奪），——還是組織統一的全民的（有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代表參

(一)劳动，(二)土地，(三)工[illegible]是，都是公社所有的，产品也是公社所有的。

什么时候，商品才可以消失呢？

三十年后还如此，[illegible]那样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三十年后还如列宁在时那样。

什么时候，商品才可以消失呢？

当然，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部门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

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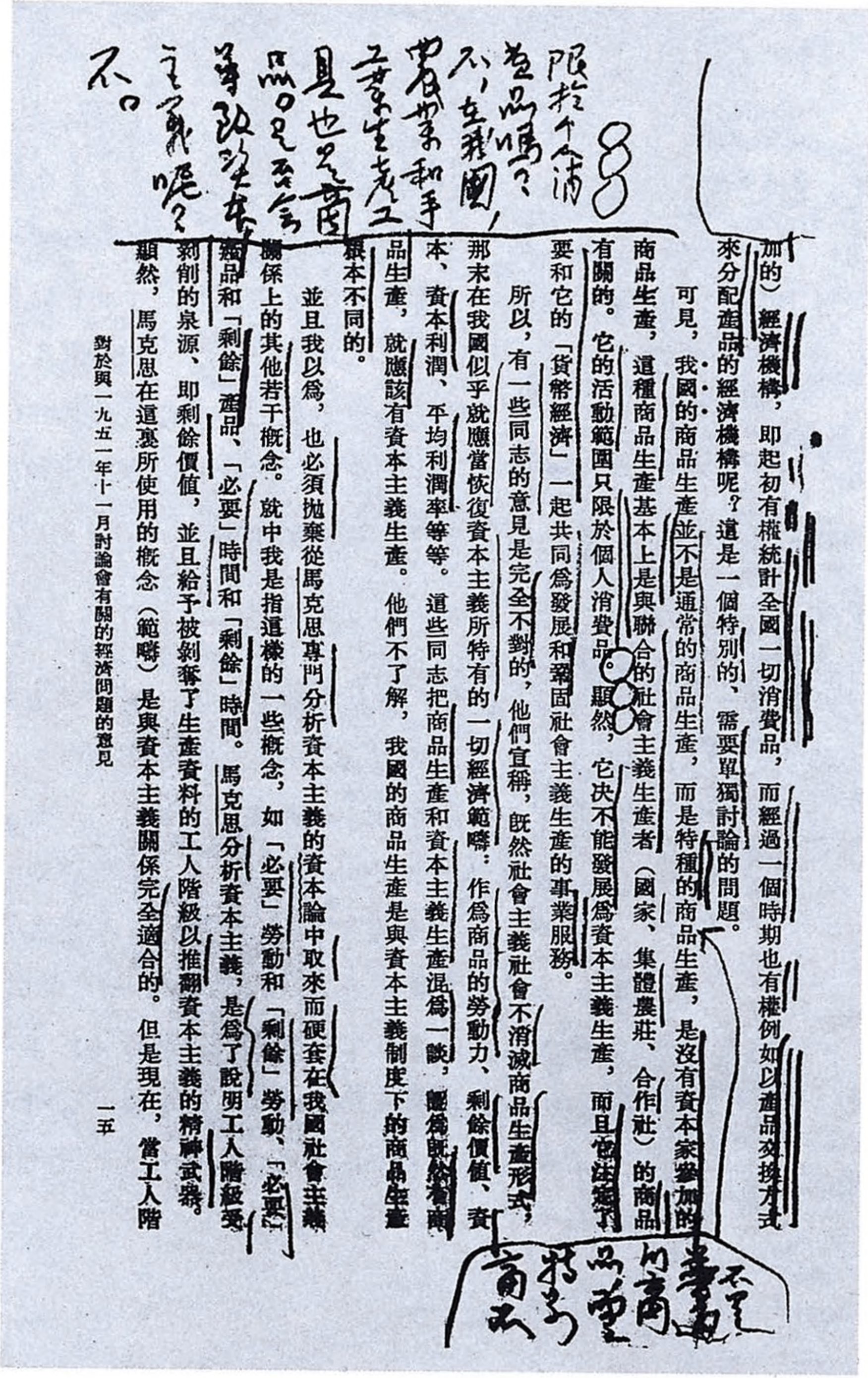
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第12～15页]

两种劳动都是必要的。

……现在，在我国的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现在讲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第16页]

……



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者之间也是商品，只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会。

加的）經濟機構，即起初有權統計全國一切消費品，而經過一個時期也有權例如以產品交換方式來分配產品的經濟機構呢？這是一個特別的、需要單獨討論的問題。

可見，我國的商品生產並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基本上是與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的商品有關的。它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顯然，它決不能發展爲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爲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見是完全不對的，他們宣稱，既然社會主義社會不消滅商品生產形式，那末在我國似乎就應當恢復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一切經濟範疇：作爲商品的勞動力、剩餘價值、資本、資本利潤、平均利潤率等等。這些同志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爲一談，認爲既然有商品生產，就應該有資本主義生產。他們不了解，我國的商品生產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根本不同的。

並且我以爲，也必須拋棄從馬克思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的資本論中取來而硬套在我國社會主義關係上的其他若干概念。就中我是指這樣的一些概念，如「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是爲了說明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泉源、即剩餘價值，並且給予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以推翻資本主義的精神武器。顯然，馬克思在這裏所使用的概念（範疇）是與資本主義關係完全適合的。但是現在，當工人階

不是[illegible]的商品生将[illegible]商式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一五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三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

……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

四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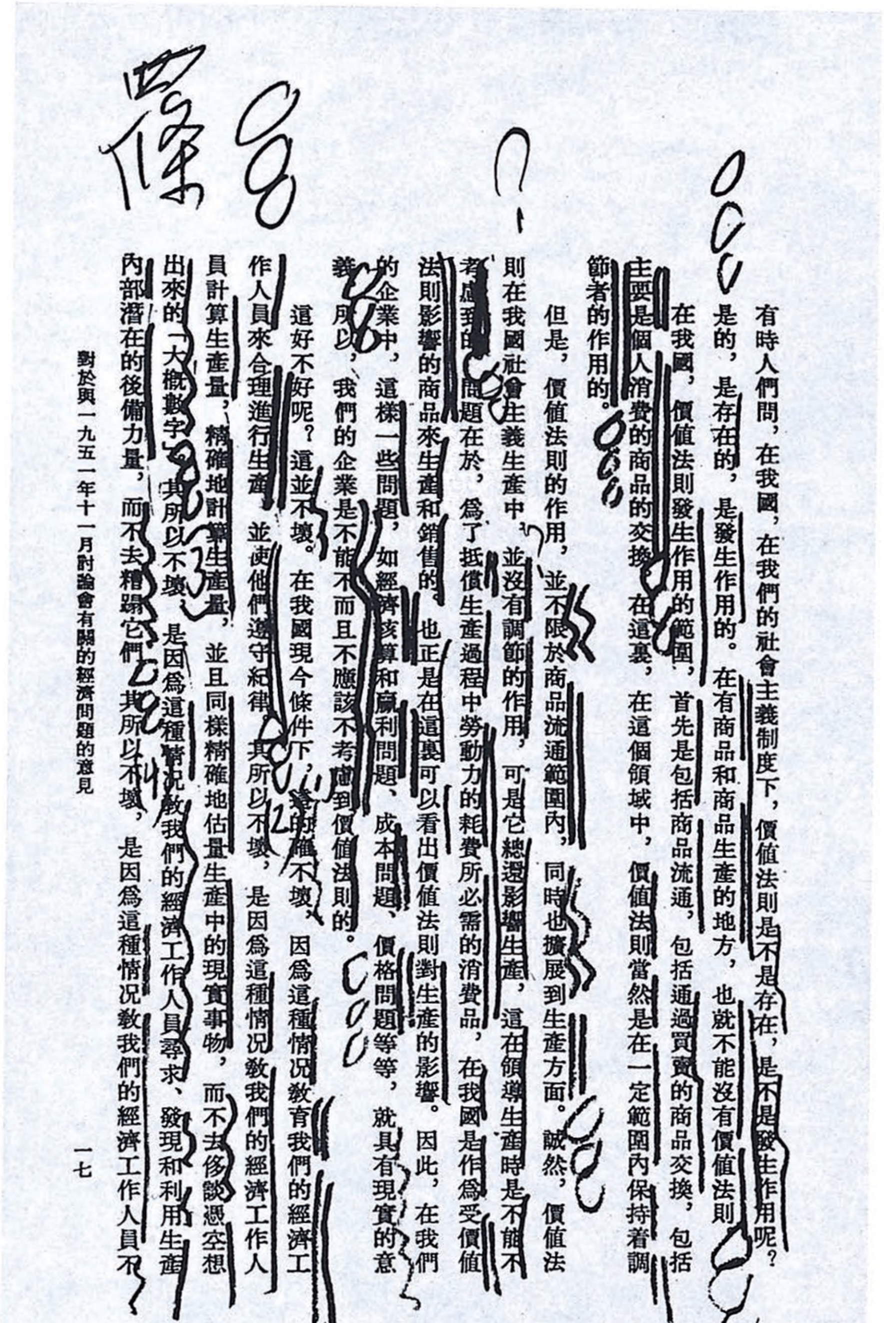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1）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2）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生产量，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现实事物，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3）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4）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第 17 页]

……

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说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法则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值得研究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



傑

？

有時人們問，在我國，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法則是不是存在，是不是發生作用呢？是的，是存在的，是發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也就不能沒有價值法則。

在我國，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過買賣的商品交換，包括主要是個人消費的商品的交換。在這裏，在這個領域中，價值法則當然是在一定範圍內保持着調節者的作用。

但是，價值法則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法則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的作用，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問題在於，為了抵償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必需的消費品，在我國是作為受價值法則影響的商品來生產和銷售的。也正是在這裏可以看出價值法則對生產的影響。因此，在我們的企業中，這樣一些問題，如經濟核算和贏利問題、成本問題、價格問題等等，就具有現實的意義。所以，我們的企業是不能不而且不應該不考慮到價值法則的。

這好不好呢？這並不壞。在我國現今條件下，這的確不壞，因為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來合理進行生產，並使他們遵守紀律。其所以不壞，是因為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計算生產量，精確地計算生產量，並且同樣精確地估量生產中的現實事物，而不去侈談憑空想出來的"大概數字"。其所以不壞，是因為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尋求、發現和利用生產內部潛在的後備力量，而不去糟蹋它們。其所以不壞，是因為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不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一七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比起往往赢利较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说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第20页]

……

答А·И·诺特京同志

……

可以出售给人民公社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在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时，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管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之后，不但不变成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任，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第46页]

……

价值法则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是有调节作用的。第一，我国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而不是“自由”

应研究

的。第二，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并不是由自发的力量，不是由什么偶然的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第三，为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而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法则的调节作用呢？[第49页]

对大跃进报道的指示

（1958 年）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1]

（1958年）

早就应该这样做，过去（分社）省也管不了，现在这个办法是适应国家的情况的。省委管比你们有办法，分社也就不孤单了，就有依靠了。

---

[1] 1958年，新华社国内分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站合并。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关于此事汇报时，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

关于造船方针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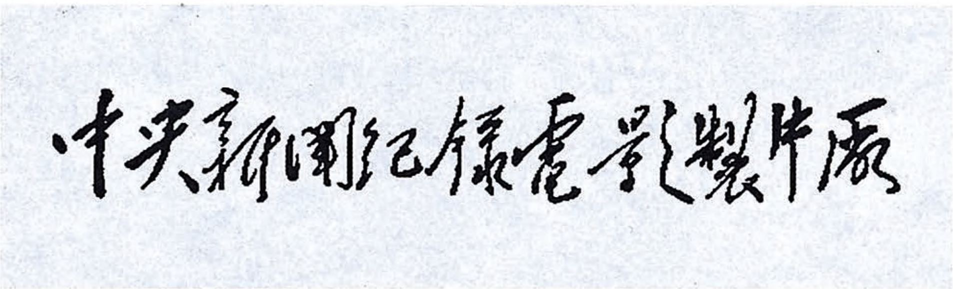
（1958 年）

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力量的建设不仅要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工作。同时还要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在打败敌人之后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把侵略者赶回他们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侵略战争永远不再发生。为此，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建设以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题名[1]

（1958 年）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製片厰

毛泽东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题写的厂名。

---

[1]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是我国唯一生产新闻纪录电影的专业厂。1953 年 7 月 7 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京正式成立。毛泽东于1958 年为新影厂亲笔题写厂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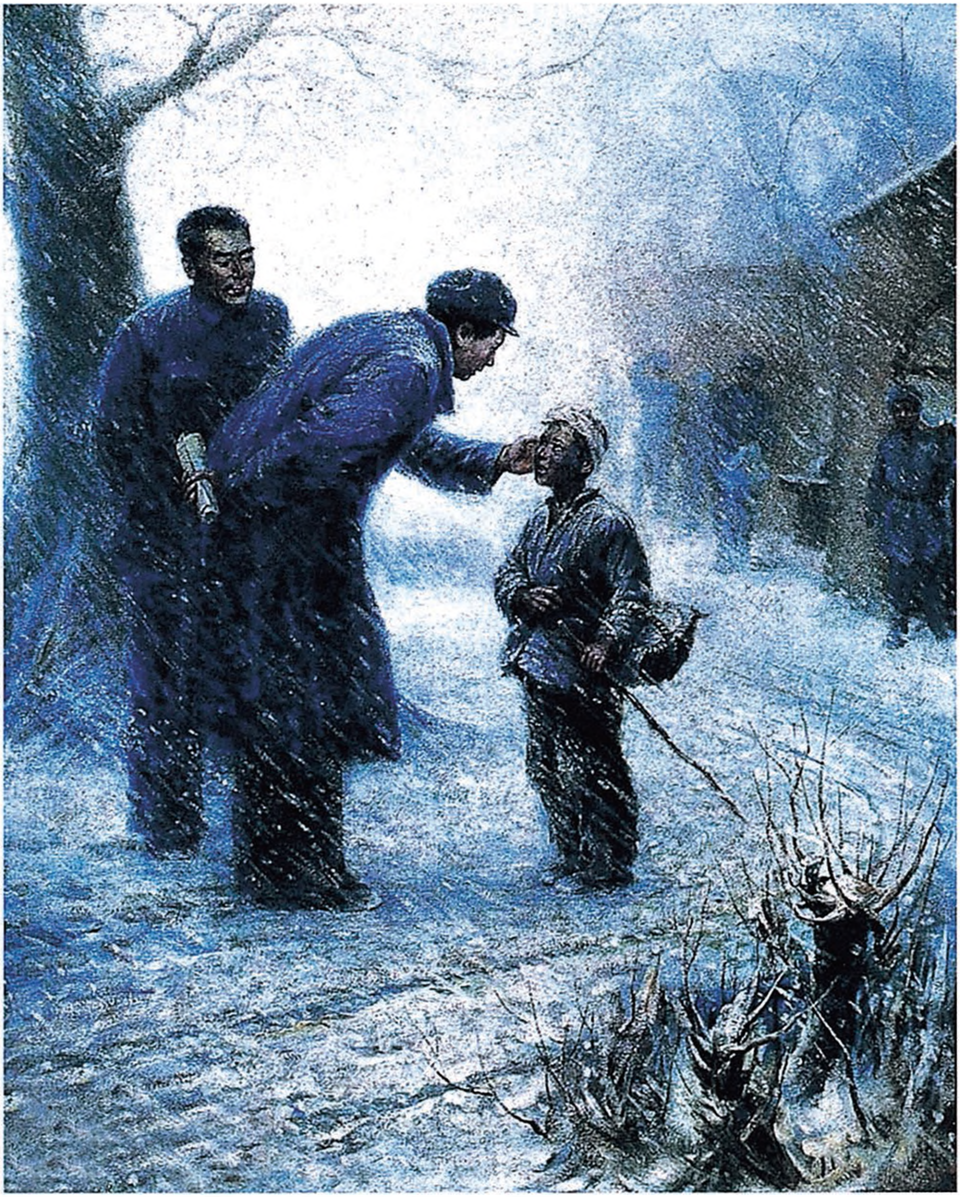
四言韵语·养生十六字诀[1]

（1958年）

遇事不怒，
基本吃素。
多多散步，
劳逸适度。

---

[1] 这是毛泽东谈及自己的养生之道时，总结出的健康十六字诀。



《孤儿找到了母亲》（油画）

七绝·刘蕡[1]

（1958年）

千载长天起大云，
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2]
万马齐喑叫一声。[3]

---

[1] 刘蕡（？——842）字去华，幽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人。中唐大和二年（828），举贤良方正，刘蕡对策称："宫闱将变，社稷将危""阍寺持废立之权""四凶在朝，虽强必诛"。痛论宦官专权，能废立君主，危害国家，劝皇帝诛灭他们。考官赞赏刘蕡的文章，但惧怕宦官的专横，不敢录取他。令狐楚、牛僧孺都征召他为幕府从事，后授秘书郎。终因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客死他乡。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刘蕡传》时，对刘蕡的策论很赞赏，旁批："起特奇。"

[2] 孤鸿铩羽悲鸣镝，孤鸿，孤单失群的大雁，喻指刘蕡。铩羽，羽毛摧落，这里比喻受挫、失意。鸣镝，也叫响箭，这里比喻宦官对刘蕡的中伤和打击。

[3] 万马齐喑叫一声，万马齐喑，亦作"万马皆喑"。喑，哑。苏轼《三马图赞引》："振鬣长鸣，万马皆喑。"谓骏马抖动颈上的鬃毛嘶叫时，其他的马都鸦雀无声。后用来比喻一种沉闷的局面。叫一声，喻指刘蕡冒死大胆攻击宦官，名动一时。

七绝·改梅白《夜登重庆枇杷山》[1]

（1958年）

我来高处欲乘风，
暮色苍茫一望中。
百万银灯摇倒影，
嘉陵江似水晶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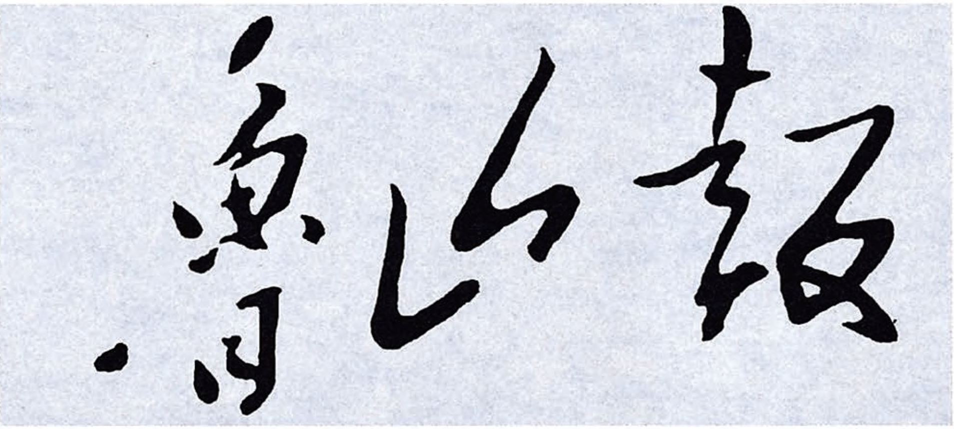
---

[1] 1958年，毛泽东视察三峡，梅白跟随在他身边。毛泽东见梅白写的一首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颇有兴致，就对梅白的诗做了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1）苍茫，原诗为辉煌。（2）百万，原诗为几万。（3）摇倒影，原诗为流倒影。（4）似，原诗为比。

为《鲁山报》[1]题写报头

（1958 年）

鲁山报



毛泽东为《鲁山报》题写的报头。

---

[1] 《鲁山报》是鲁山县创办的一份报纸，于1955年3月试刊，当年12月14日正式发行。1958年任鲁山县张良乡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文香兰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当年她去北京参加会议，受县领导委托，请毛泽东为《鲁山报》题写报头。会议期间，她将写有“请毛主席给俺写个《鲁山报》报头”的字条提交给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大会秘书处将毛泽东题写的《鲁山报》报头交给了文香兰。

1959

1959年，毛泽东接见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

（1959年1月3日）

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阁下：

在贵国国庆的时候，我谨代表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缅甸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缅甸联邦繁荣富强，祝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

对福斯特[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9年1月11日、17日）

一

少奇、小平、乔木[2]同志阅，退王稼祥[3]同志处理。

可照小平意见[4]办。复信作了一点文字方面的修改[5]。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

---

[1] 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当时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 邓小平1959年1月10日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公开发表福斯特来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说："我同意来信在《红旗》上发表，主席复信除用公开电发去外，亦可在《红旗》上同时发表。"福斯特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后来均发表在1959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并载于1959年2月2日《人民日报》。

[5]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拟的复信稿时，主要是对其中的第三段作了一些修改。

二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

十分感谢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来信。从您的充满热情的来信中，使我看到了伟大的美国共产党的灵魂，看到了伟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的灵魂。

中国人民懂得，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1]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于不大顺利的地位，但是你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现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们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您——美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战士和领袖，致以衷心的问候，并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果您有可能的话，我热诚地欢迎您到中国来医疗和休养。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1]的批语

（1959年1月15日）

---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1月13日关于中苏关系的意见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一年多以来，苏联报刊的宣传表明，苏联同志对我国的重大方针政策主要是赞扬和支持的，但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有着一定的保留或怀疑。我们认为，苏联同我国在基本方向和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的完全一致是肯定的，在个别问题的看法和作法上出现某些不同也是自然的。对此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引起苏联同志的误会，也会被国际上的敌人利用进行挑拨离间的宣传。因此，目前在宣传工作和处理中苏关系及事务中，就不能不特别谨慎。近来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不够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有办法，无所可学。不适当地强调我国的成就，甚至夸大我国的建设速度，不负责任地随便透露未经确定的远景指标。有的甚至态度傲慢，使苏方难堪。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上述消极影响，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我党代表团阵容，以能充分表现我党的重视和中苏两党的团结无间为宜。（二）今后派遣来苏的各种业务性质代表团，应注意成员情况，加强领导，强调友好与业务合作。（三）代表团同苏方商定协定以外的各类事项时，应多考虑对方情况，以免强人所难。（四）对苏联某些不同意见，应尽量避免在报刊或群众场合公开表露。（五）对国内的苏联专家应多做工作，态度谦虚。

刘、邓[1]：

此件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如何？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给黄炎培[1]的信

（1959年1月21日）

任之先生：

惠书及大作早已收读，甚为感谢！连日小病迟复，幸谅。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一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对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1月22日）

一

先发，再送少奇同志阅。

毛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代拟稿。通知稿说：在目前的报刊宣传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应继续进行充分的宣传。宣传中应注意科学分析，力戒浮夸，但不能冷冷清清，而应当热烈、有劲。（二）宣传上必须继续注意鼓足干劲，但对各地今年的计划指标不宜公布过多。（三）今年上半年内，报刊上只着重宣传工作中的成就和积极的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的方面。（四）在宣传中要继续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要随便宣传超过国际水平，在宣传科技成就时不得贬抑兄弟国家。

[2] 毛泽东在审阅这一通知稿时，在其中的第三条后面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并将通知稿的日期改为“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二日”。同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通知。

二

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有些人却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右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对中央关于动员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9年1月22日）

一

送刘、小平、德怀、克诚[2]阅后，尚昆[3]办。我在尾上增了一段[4]。

毛

一月廿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59年1月20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195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西藏工委正式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即本篇二。

二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武斗争中予以完成。

在西藏军区关于边坝等地叛匪活动的电报[1]上的批语

（1959年1月22日）

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最好经常打打，打五六年，或七八年，大举歼敌，实行改革的条件就成熟了。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1959年1月14日关于边坝、扎木、雪喀、山南等地区目前叛匪的主要活动及企图给总参谋部等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叛匪在这些地区集结，伏击我军，围攻守点分队，企图截断交通要道，气焰非常嚣张。我守点分队被迫进行了还击。鉴于当前叛匪活动较前猖獗，军区分别于去年12月25日和今年1月10日下达了《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及对行车备战组织的指示》和《各守点分队注意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守点分队及外出执勤人员的掌管部门，认真研究贯彻，严防遭敌伏击，确保安全。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批语

（1959年1月22日）

送胡乔木[1]同志：

此件[2]可用，照发。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59年1月21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后载于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致苏共二十一大贺词[1]

（1959年1月23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兄弟的祝贺，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诚挚的衷心的敬意。

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就，在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共同斗争中作出了许多的重大贡献。最近，苏联发射宇宙火箭的成功，又一次显示了苏联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光辉灿烂的高峰。

现在，苏联共产党根据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提出了1959年—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建立巩固的基础，并且将以建设共产主义的宝贵经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这个计划的实现，还将进一步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更加有利于争取世界

---

[1] 这是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致苏共二十一大的贺词，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1959年1月28日上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宣读。

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伟大的七年计划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无比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必然胜过资本主义。

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从来就是各国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的光辉榜样。我们相信，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鼓舞之下，各国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将更加信心百倍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自从1957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以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无论在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在一切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方面，在彼此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和斗争中都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尽管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还在玩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阴谋，但是这种阴谋必将同以往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现在，帝国主义正遭受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严重打击，他们的殖民体系正在进一步瓦解，他们的内部正在逐渐走向四分五裂。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所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汇合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垂死挣扎绝不能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一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通过这个胜利，中国人民对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更加坚强的信心。中国人民在建设和保卫自己的国家的斗争中，从苏联得到了一贯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

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成功！祝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印发陈伯达关于人民公社生产方面几个问题的来信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同志：

此件[1]请印发到会[2]各同志。同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指陈伯达1959年1月18日请中共福建省委转交毛泽东并中央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在考察广东、福建两省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情况时提出的一些看法：（一）现在除了应推广密植的方法到那些还是稀植的地区外，还应注意密植的适当程度，根据不同的土质、气候等条件，密植程度应有不同。（二）深耕程度应照顾地方的不同条件，在不同地区、气候和季节，应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三）应将粮食底子向群众公开，节约用粮。力争丰年吃好，歉年吃饱。（四）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不要勉强群众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五）去年大跃进中，有些地方提出要压这个、跨那个的口号，这样做并不一定会使自己成为先进，并且往往会使自己陷于落后。（六）今年这里的农业生产指标，可以考虑提翻一番，或稍低些，力争超过，不要提得过高。报纸公布去年完成的数字，也应该是严肃的。（七）公社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关于劳动组织、定额和报酬的生产管理制度。195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将陈伯达的这封信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对新华社关于广东新会县人民公社劳动效率下降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同志：

此件[1]极有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阅读，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新华通讯社1959年1月19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八八期上登载的这则报道说，广东省新会县一些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普遍下降，否定供给制的言论又有所抬头，有些人进而要求完全恢复高级社时按劳取酬的分配方法。一部分基层干部也因此而消极起来，对落后现象不敢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甚至随波逐流，对今年更大的跃进缺乏信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主要是分配比例不合理，供给部分过多，工资部分太少。一般社员认为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抱着“按酬付劳”的态度，积极性受到压抑。（二）劳动组织和责任制不健全，形成人无事做、事无人做的现象，这是造成窝工浪费和消极怠工的重要原因。（三）对人民公社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这也是群众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与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有很大关系。目前中共新会县委正按照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采取调整分配比例、健全责任制和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等措施改变这种情况。

对新华社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有用，请印发到会[3]同志们一读。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新华通讯社1959年1月22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一期上登载的该社香港分社记者组写的这一报道说，香港副食品绝大部分历来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对香港供应量锐减，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在广大的中间、落后居民中，流露着一种恐惧、彷徨和不满情绪，糊涂看法很多；在进步人士中，认识还算比较清楚，但也有各种疑虑；反动派目前也在利用这个机会大肆进行反动宣传。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对新华社关于四川省委加强工业战线工作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极好，应当仿行。请印发到会[3]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新华通讯社1959年1月2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二期上登载的这则报道说，中共四川省委今年1月12日、19日两次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市委确定“一开头就抓紧、自始至终抓紧”的领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工业战线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松劲情绪，以扭转当前钢和钢材产量下降的情况。为了保证完成今年以钢铁为中心的整个工业计划，省委要求各市委都要做好各项具体工作，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印发谭震林[1]关于目前农村情况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2]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3]阅，印发到会[4]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谭震林1959年1月24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各地传达、讨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已深入到县，整社试点工作也已经普遍进行。农村中虽然出现了各种困难和混乱现象，但估计经过四五个月的整顿后，一切都会转入正常。只要我们不让人民公社垮台，它就绝不会垮台。今年农业生产任务是很艰巨的，决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目前各地对少种的看法尚不一致，有的地方少种的步子大了一些。我认为没有高产的实现，不宜少种过多。今年农业生产高潮尚未形成，六中全会决议的宣传还不够有力，克服虚报浮夸把许多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都“克”掉了，这是最大的危险。至于劳动力紧张的状况，今年还会继续下去，经过合理安排可能会好一些。1958年的分配工作尚未做好，这对群众的生产情绪有很大影响，在压缩空气后，又发生了瞒产私分的现象，增加了分配工作的困难，尚须努力一段时间，才能做好。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9年1月25日）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欣逢贵国国庆，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阁下和伟大的印度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并祝印度人民幸福，国家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1959年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和来访的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交谈。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报告[1]的批语

（1959年1月26日）

请小平[2]同志印发到会[3]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9年1月24日请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转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这次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着重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具体内容如下：（一）关于劳动力分配规划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今年劳动力紧张的关键是在首先保证实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前提下，合理地分配使用劳动力。同时通过继续大搞工具改革、改善劳动管理等项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关于公社分配问题。会议提议：（1）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余的不减少收入；（2）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一半；（3）公社分配收入和家庭自产收入，大约保持9∶1的比例；（4）工资尽可能按月发放。（三）做好公社的初步整顿等项工作，加强对公社的领导。毛泽东在审阅时，对这个报告还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1959年1月27日）

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这些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用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没有他们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又用他们，又同他们作斗争。所以是很复杂的工作。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性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北京有三十四个高等学校，我们让他们造反。有一个时期他们占上风，闹得天昏地暗，好像共产党就要灭亡了。这时候，我们准备反攻。经过几个月的辩论，驳倒了他们的谬论，多数人争取了过来，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然你们那边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们离敌人太近了。在我们这里，在每一个大学、中学、工厂、政府机关，右派想怎么做就让他怎么做，让他们尽量讲，我们一个月没有说话，并且给他们登报。这就给他们照了相，再也收不回去了。然后，我们就组织队伍，进行反攻，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右派的政治资本没有了，可是中间派当中还可能有人反对我们，世界上有混乱的时候，他们又会再来，我们要有准备。

对驻苏使馆关于约夫楚克[1]若干哲学观点的报告[2]的批语

（1959年1月）

送交林铁、陶鲁笳、张仲良、张德生、吴芝圃、舒同、曾希圣、王任重、周小舟、陈伯达[3]同志阅，阅后退毛。

---

[1] 约夫楚克，当时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2]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8年12月25日给外交部的这一报告说，约夫楚克本月23日向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四、五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七年计划中的哲学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了有关中国的一些问题。约夫楚克说，社会发展有其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不应生硬搬用，不能把中国的经验机械地搬到苏联来。中国人认为人民内部存在矛盾，而苏联不同。如果说苏联人民内部有矛盾的话，那也只是在部分官僚主义分子和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他强调列宁关于没有物质利益原则就不能进到共产主义的话，指出一些外国人认为这一原则会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是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不对的。产品的分配不能按平均主义办法进行。他说，有些人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拼命地干，其实主观包括党、领导、政策、路线和正确的计划等，这

虽然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脱离物质生产的规律和原则。约夫楚克在报告中还讲道：外国有人认为国家应立即消亡，这是修正主义观点；马林科夫等人要强调集中，这也是错误的；在教育问题上，说服不是唯一的办法，强迫也不只是针对敌人的。

[3]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关于张国焘[1]最近情况简报[2]上的批语

（1959年1月）

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

---

[1] 张国焘，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曾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1959年时正寓居香港。1979年死于加拿大。

[2] 1959年1月5日印发的这份内部情况简报说，张国焘去年10月表示愿意为新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

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

（1959年2月2日）

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同志们：

你们今日走，我想留下你们一天，谈一点哲学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诸问『问』题，觉得有必要。你们意见如何？昨天我讲了一些观点[1]，含意未申，不深不畅，未能畅所欲言，觉得余事未尽，心里过不去，老是想，不能入睡。因此想把你们掇回来，今天不要走，如何呢？留一天，你们虽然归心似箭，也不会了不起吧！一定留下。我现在睡。下午三、四、五时开会。务一天虚，时间不长！离春节还有好大几天，呆住不过一天，大概也可以吧！有几个深切的辩证法问题要谈[2]，与总路线、大跃进有大关系。请你们上午吹一吹当前实际问题的辩证法，打点底子。这个问题不想通，不开朗，不搭起架子，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失败，或者半失败的。大跃进，干部大提高一步，群众也大提高一步，可能在我国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善心的劳动人民的团结与奋进，大有益处。如荷同意，就请照办。阅后，立即送少奇、小平[3]等参加会议的中央各同志，传一下，中午十二时传完，请小平办。

倚枕书，毛泽东

1959年2月2日上午6时Good morning！

---

[1] 毛泽东1959年2月1日下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在高潮中有些人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一部分是敌对的，要加以分别，不要以为都是坏事情。做这么大的事，总会有些缺点。讲些怪话，不足为奇。去年11、12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要紧，可以再鼓足干劲。（二）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包括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还有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必须经过努力，克服这几方面的失调和不足，使1959年的计划指标不受影响。（三）李富春说做个长期计划，我赞成。现在就可以做，但根据不足，明年可以再做一年，还可以加个后年，看究竟能搞多大规模。今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即由3000万吨钢减到2000万吨。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实际上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多，有些是把几十亩田并成一亩拼出来的。（四）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安排，现在想到的有劳动力、原材料、生活资料、干部教育等。这几方面不安排，单是我们这些人挂帅不行。今后搞大跃进，我们有几个条件：（1）群众的干劲、劳动热情，这是过去几年特别是整风、反右替我们准备下的。（2）有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3）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4）今年还有11个月，抓得早些。去年我们专务虚，今年从现在起就务实。（5）今年有了人民公社，而去年大部分时间没有。（6）一年可以抓几次。干部下放，干部参加劳动，这两条今年还要搞。

[2] 毛泽东1959年2月2日下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所说的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讲主观能动性，两者结合起来讲就好了。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的缺点，讲了几十条，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至于结

果坏是另一回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下面加了一段，说明有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和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的过渡，并列举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可是人们不注意这一段，只注意“不是遥远的将来”那一句，于是暴露出各种各样的想法，两个月内，鸡、鸭杀了那么多。至于桌椅板凳这些私人家具，还是暂借的好，将来作价分期归还。剥夺地主、富农理直气壮，剥夺富裕中农则理不直气不壮。我们国家贫农、下中农想揩中农的油，历来是跃跃欲试的，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不要把富裕中农当做地富反坏去剥夺。这次搞出的计划，比较全面，形而上学较少，看到了其中的联系。如工业与农业、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日用百货与副食品等的联系，都有所注意和安排，照顾得比较全面一些。我们应当称赞这个计划，宣传这个方法，既两条腿走路，又有重点。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就是矛盾。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仗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对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对5%以内的违法乱纪的干部，也要分别情节，区别对待，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了，是不好的。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斯大林曾提出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相统一。我们是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义；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也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这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严重不足，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过去的安

排缺乏这一方面。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现在我们似乎开始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1959年2月2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道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减少一点，增加□□亿投资，□□万美元。□吨钢材搞

轻、化工业是对的。要宣传、讨论、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斤粮食，□□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粮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担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

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人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嫌。

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周，重点在□，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

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

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

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的。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祝贺锡兰[1]国庆的电报

（1959年2月3日）

奥利弗·古涅狄莱克总督阁下：

值此锡兰独立十一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阁下和锡兰人民致诚挚的祝贺。祝中锡两国人民间深厚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锡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日于北京

---

[1] 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对驻英代办处关于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的批语

（1959年2月12日）

此件[1]甚好。林克[2]阅后，送江青阅。

毛

二月十二日

---

[1] 中国驻英国代办处1959年1月5日的这一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1958年是英美实行所谓“相互依靠”政策的一年，在这种“相互依靠”的形式下面，两国各谋保持并扩大自己的阵地，削弱乃至在必要时牺牲对方来挽救自己；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两国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了新的发展，未来一年中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两国的矛盾将更趋深刻化和复杂化。（二）1958年也是英法矛盾发展到白热化和英德矛盾逐步尖锐起来的一年，这种矛盾贯穿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三）1958年英国同美、法、西德矛盾尖锐的原因是：1. 社会主义阵营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和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的飞跃发展，使两大阵营间力量的对比愈加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2. 美国经济危机持续恶化波及西欧，使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间竞争空前激烈。3. 亚非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增长。4. 西德的再起，打破了战后西欧出现的“均势”。5. 西欧各国人民反对氢武器，反对侵略战争，要求和平共处，加强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离心倾向。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和中央转发这一文件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2月13日）

一

略有修改。退周总理、陈毅处理。

二

中央同意中央外事小组“关于1958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1959年外事工作的方针规划”。现发给你们，希据此安排和掌握有关外事方面的工作，并应组织适当范围的干部，对有关涉外事项，加以讨论，坚持正确方针，纠正错误缺点，贯彻实行。

中央

1959年二月十三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和中央外事小组代拟的中共中央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代拟的中央指示稿的修改；本篇三至六是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美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

四

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将更加孤立和被动，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继续显著地起作用。

五

必须虚心地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对其在历史上所犯某些错误，例如斯大林时期所犯某

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同时采取积极主动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和对外政策，消除某些可能发生的误解。

六

在岸信介[1]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例如出口少量生漆），对两国民间的往来应当继续进行。在适当时机也容许有某些官方人物的往来。

---

[1] 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1959年2月，毛泽东和出席苏共二十一大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胡志明亲切交谈。

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2月13日）

一

应连同附件，一起发出。[3]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发给哪一些单位，请彭真同志商周陈[4]酌定。

---

[1] 指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1959年2月5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代拟稿。代拟稿后还附送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

[2] 本篇一是对中央指示代拟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中央指示代拟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在附件中讲到部分同志“拿我们的框子去衡量别人，片面地夸大兄弟国家工作中的缺点”一段后加写的一句话；本篇四是在附件的最后加写的一段话。

[3] 中共中央1959年2月16日正式下发了这一指示及其附件。

[4]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

二

必须继续强调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一切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对其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有过的缺点，也要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

三

过去有些同志对朝鲜同志看缺点较多，看成绩较少，犯了片面看问题的错误。

四

以上材料是不完全的，可能有些同类材料还未收集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其办法，就是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力戒骄傲、浮夸、急躁，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争取1959年的更大胜利而奋斗。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

（1959年2月14日）

马特（以下简称马）：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

---

[1] 这是毛泽东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一部分。

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

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查哈勒斯库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9年2月17日）

毛泽东主席在答词中说：近年来，中罗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罗马尼亚人民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因而是牢不可破的。我深信，在我们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朝着共产主义奋勇前进的康庄大道上，这种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这将有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并且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祝贺尼泊尔国庆的电报

（1959年2月17日）

加德满都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

欣逢贵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尼泊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深信，中尼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巩固，祝陛下和尼泊尔人民在谋求国家繁荣昌盛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于北京

两次失败使我们学会了打仗[1]

（1959年2月17日）

中国民主政党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叫做同盟会，孙中山是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一年是十六年，是在同盟会成立十六年后才成立的。一九一一年举行辛亥革命，当时没有共产党，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他们失败了，第一个共和国灭亡了。以后就不断地斗争，同军阀买办进行斗争，那时还没有共产党。从一九一一年到共产党成立有十年之久，资产阶级老是失败，找不到出路。我们这些人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辛亥革命，我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当时参加的还有吴玉章、林伯渠[2]等。后来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还是没有共产党。资产阶级没有出路，就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3]签订了孙越协定，这是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的时候，苏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的第三次大会决定参加国民党，就是一部分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里·亚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阿卜杜塞·布尔基亚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吴玉章，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领导四川荣县起义。林伯渠，1905年参加同盟会，同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3] 越飞，1922年8月至1923年1月作为苏俄政府特命全权代表来华，并于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党员参加到国民党里面去。国民党接受了，我们就参加进去。它的目的是要“容纳”共产党，就是要把我们化掉。他们有个民生主义可以化共产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目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薄弱的，抵抗不了帝国主义。在组织上也是薄弱的，不会做组织工作。我们就去帮助他们组织群众，建立支部。这里指改组后的新的国民党。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内，每十个委员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委员是共产党，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孙中山死了，蒋介石来一个政变，同共产党打，发生在广东，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据地都是在广东。蒋介石的军队也是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搞起来的。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把我们在中央的权力剥夺了，但是在地方和军队中他们没有做到。因为那里复杂得很，他们搞不下去。因此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是国共合作的。

一九二七年是个大胜，也是个大败，蒋介石争得了领导权，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党内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革命高潮变成了革命低潮，共产党由合法变成非法。大批党员被杀戮。那时我们党缺少经验，只懂得同资产阶级合作，不懂得斗争。要准备同他们斗争，准备失败，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这个准备。

革命果实落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同农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相反地却受到镇压。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得到了经验，原来资产阶级是这样的，曾经和我们合作，现在打我们。这条经验我看对你们是有用的。

我们就想一想，他杀人，我们就隐蔽起来，搞秘密工作。从前我们不懂得搞秘密工作。第二条是上山，他有枪，我也有枪，跟他对打。

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做秘密工作。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第二个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创立了十几块根据地，有三十万部队（包括游击队），有三十万党员。这个时候我们又犯了错误，“左”的错误，以为这个时候我们也了不起了，轻视敌人。陈独秀[1]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时犯“左”的错误。一犯错误就很大，三十万军队就剩下两万军队，垮下来，中间经过一个长征，走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你们也许听说过。党员剩下几万人，十几个根据地剩下北方一个，我们从南方转到北方来。秘密工作因为“左”的错误，也破坏得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失败，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

我们有两次大起大落。第一次有五万党员，党在军队中有很大势力。敌人把我们打败了，剩下几百个、千把个党员，数目虽少，但都是很优秀的。有的被杀了，有的叛变了，有的动摇了，总之天昏地黑不好混。在座的有三个就是经过大起大落的党员[2]。第二次大起大落就是刚才讲的，由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剩下两万军队、几万党员。

这是一个认识中国革命的过程。我们是中国人，就是不知道中国革命要用什么方法。所以在抗战时期，鉴于两次失败，一“左”，一右，做了综合工作，长处和短处，正确和错误，两种经验综合起来。政治、军事、经济搞出一套来了。

从第二次大落到北方，从一九三四年冬季到现在，有二十三年

---

[1]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

半，就稳步上升，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了。这中间包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蒋介石，在朝鲜战胜美帝国主义，在国内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们革命有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这个时期包括抗日战争，同蒋介石合作，一共八年，后来又打了，把他打跑了，跑到台湾去了。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对我们不怕。

我们长期对资产阶级分两个部分搞不清楚。对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有不同的政策。

对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我们比较清楚，但反封建要会分析。

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

（1959年2月18日）

刘、周、陈毅、小平[2]阅后，退彭德怀[3]同志。

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2月1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十六号上。这期简报登载了新华通讯社2月2日关于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发展为全面性叛乱的电讯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对总参作战部关于平叛情况报告[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2月19日）

一

德怀[3]同志：

---

[1] 总参作战部的这一报告说，自1955年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少数民族中的反动上层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欺骗、诱惑、胁迫人民群众，组织武装叛乱。我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3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平叛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是：一、根据目前情况，滇、川、甘、青等地区1959年应基本平息本地区的叛乱。西藏地区因情况复杂，应严守中央关于自卫作战的原则。二、一些叛乱分子利用西藏目前的形势窜入西藏，企图与我长期周旋，为此各地应密切组织、协同作战，使敌无隙可乘。三、各军区应认真总结平叛经验。四、其他如装备、战时供应和救护等问题，由各军区提出，有关部门预作准备，逐步解决。

[2] 本篇一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1958年12月27日关于几年来成都、兰州、昆明、西藏军区平息叛乱情况和几个待解决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这一报告中加写的一句话；本篇三是在这一报告中修改的一句话。

[3]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此件很好。建议密发西藏工委、军区直至团级，使他们了解全局，明白方针政策。川、滇、甘、青平叛区域，也应发给。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九日

二

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三

我们军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准备和及时地平息叛乱。

在关于英国各界对我撤销出口合同的反应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2月19日）

恩来、陈毅[2]同志：

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是否有利，请查明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

[1] 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参赞1959年2月14日给外贸部并外交部的这一报告说，上海土产公司与英商成交霜黄棉约2000吨，最近该公司以政府不发许可证为由撤销合同，此事已引起英国各界广泛注意和评论。我代办处在对外接触时，对类似上述问题一般不明确说明原因，亦不强调运输问题，有时适当指出贸易发展必须以政治友好为前提，对有些客户，尽量说服其接受撤销部分合约。我们认为，今后如毁约面太广，将对我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故建议国内各公司应尽量缩小不履约的品种和客户范围，确实无法交货，亦应与对方协商解决，置之不理态度，将更会造成对方的对立情绪，采取不利于我的行动。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对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的批语[1]

（1959年2月20日）

退徐冰同志：

与总理和小平、彭真[2]同志商酌定案，我无意见。

毛泽东

二月廿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徐冰1959年2月6日为报送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给毛泽东的信上。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和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1959年2月21日）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不是拉平的。苏联5500万吨钢不能和我们1000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做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1956年高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

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没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地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地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传，下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25%，这就占1／4，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1953年为止的30年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

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得太多）。要改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们作这是好心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25%，你们考虑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得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25%，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和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

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评，按劳取酬”。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1]

（1959年2月21日）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这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

---

[1] 这是毛泽东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作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9年2月21日）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欣逢贵国国庆，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致热烈的祝贺。祝中阿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并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幸福，国家繁荣昌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1]

（1959年2月22日）

一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2]及广东省委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指示；本篇二是毛泽东1959年2月15日为印发这一指示初稿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印发这一指示修改稿写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这一修改稿上拟的。

[2] 赵紫阳1959年1月27日的这一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干部大会上，一定要根据群众思想发展规律来进行工作，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会议后期要在查错漏、查平衡的基础上迅速安排社员的生活，总结思想，整顿组织，纯洁队伍。

的批语[1]，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2]，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

[1] 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1月31日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说：粮食问题必须解决，这是关系到今年生产跃进和整顿公社的最重要问题。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2]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二

即送刘、彭真、周[1]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快〈越〉好。另印如前示。

三

即送李雪峰[2]同志办。最好用电报发去。另印政治局各同志。常委各同志已看过。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指周恩来。

[2]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1]诬蔑中国的谰言》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2月22日）

一

陈毅同志：

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不久即因病辞职。

[2] 本篇一写在陈毅1959年2月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两周前我们商定用外长出面，发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此文由新华社与外交部的同志共同起草，已改了三遍。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这篇文章后来没有公开发表。本篇二、三、四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证明，我国人民将在一个不是很短但也不是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繁荣昌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

我们在大跃进中自然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或困难。但是，这些是我们前进中的困难，甚至是我们的成绩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总括成为一点，就是设备的暂时不足。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在建设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予以解决的。

四

最近，在美国严密控制下的菲律宾，不满美国横暴干涉的情绪也在高涨。日本人民也是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的。南朝鲜人民，南越人民，泰国人民，老挝人民以及受美国控制或威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蕴藏着不满。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

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给刘子厚[1]的信

（1959年2月24日、27日）

一

刘子厚同志：

昨天谈得相当舒畅，相当好，感谢你们！一月改变整社的方针政策，与党大会的想法不同，是很好的。[2]我觉得你们路线好，但是还有参考别省经验和做法的必要。山西一月决议[3]极好，你们可以打电话叫他们送一份给你们，可能对你们有某些参考价值的。你们有一个整社六个问题的指示文件没有？应当有吧。我极想看，有的话，送一份送〈给〉我，两天内送到济南即可。我在这里有两三

---

[1]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2] 中共河北省委在1958年12月29日至1959年1月9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提出整社到1959年4月底结束。1月中下旬，河北省委召开财贸书记会议和整社工作座谈会，分别对整社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省委书记处又作了研究，认为整社和生产必须统一起来，整社工作大体上在3月份基本结束是比较适宜的。有些社，如三类社、问题多的社和农事季节较晚的地区，也可到4月上旬或4月半结束。为了避免把整社的力量搞得过于分散，发生草率现象，除整社试点外，各地要分作两批进行整顿，由点到面，分批进行，波浪式发展。

[3]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

天住，来得及的。至祷至盼！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二

印发各同志。此件[1]很好，可作参考。注意看“第三，分配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

[1] 刘子厚在1959年2月13日电话会议上传达的省委关于当前整社若干问题的意见，共谈了六个问题，即整社要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抓政策、抓干群关系。其中第三条“关于分配问题”讲到，分配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基本关键。要坚持实现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去年收入的分配原则是：在生产有差别的基础上，分配应当有所不同。在公社从各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额的必须提取的费用后，基本上以生产队（或原小社）为单位进行分配。社本身统一提取的不能太多，以发挥队的积极性。各队之间因生产不同，吃粮标准、工资标准应允许有所不同，社里不能无代价调拨。至于1959年生产收入的分配，原则上要采取包产包任务的办法，生产队上交社的任务完成后，所余完全归生产队自行分配。

在郑州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

（1959 年 2 月）

所有制问题：

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的生产队（即过去高级社）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

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由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经过了四年（1953—1956），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四年，或者还到〈要〉多些时间——要五、六、七年。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这个过程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阶段，才能完成〈全〉建成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在（从 1958 年算起）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到大部分的人民

---

[1] 指中共中央 195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5 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去。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却在最近四个月内（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大闹粮食油料大不足的风潮。一方面，省、地、县、社党委大批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瞒产私分；一方面，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利。一、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民总产值的7%左右（河南为例），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26%，连税收（国家积累）7%，共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其中有的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共计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这太少了。公社是1958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中，有些是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应当不动的，如全部鸡鸭和一部分猪，另一部分猪应当作价归〔社〕，而不能无偿归社。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括〈刮〉起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

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当然，公社积累不是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公社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建设基金。

劳动分配问题：

土地、人力、产品，三者，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然是也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矿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如此而已。希望也是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将现在实际所有制翻过来，变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部分为生产队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极小的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旁土地、小群果树、家禽家畜等。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设以前，当然是私人的。

现在，农民不怕公社拿走土地，那是拿不走的。怕的是人力、产品两样被拿走。

劳动分配，现在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人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多了20%，或更多。服务业应大减。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争人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分配应有差别问题：

队分穷、富、中三等。

吃粮和工资分配应有差等，队队不同。上死下活，死级活评。

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大反浪费。

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宣布：1959年的公社积累不超过18%，连同国税，共不超过25%，以定民心，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下放当社员问题：

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公社的生产队当社员，每年至少30天，多者45天。一部分下厂矿当工人。

在郑州会议[1]上的讲话（一）

（1959年2月27日）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会[1]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做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做，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

---

[1]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1]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

---

[1] 北戴河决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六中全会决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

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

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

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

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做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59年，毛泽东、邓小平、王稼祥在一起。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9年2月27日）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足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50%，生产费用占20%，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利，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反按劳付酬的原则

的。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30%，他就加15%，实际上是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拼命地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70%，消费只占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至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地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风。这与救济穷人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

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地提积累，要正当地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地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地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解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得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

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采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在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

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1953年到1956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至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

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张，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

（他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嘛，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地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得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

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设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抢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法抵抗。去年农民拼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得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须坚决地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

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大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年公社积累不超18%，连同国税7%，总共不超过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9年2月28日）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

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

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做，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

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至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7%，共33%，占总收入的1/3。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大坝）。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要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

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

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至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又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百、五百、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2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

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做。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型、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20%至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12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13人脱产，15个管理区每区5人，154个生产队每队3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1.1万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

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地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也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9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做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1]同志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

---

[1] 原文如此，疑缺字。

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和注文

（1959年2月28日）

一

即刻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1]，值得一读，借作参考。这里印的，斩头去尾，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略去了，中间二、

---

[1]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1月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经修改后于2月17日印发的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共分七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指出，整社必须从生产入手又落足于生产，动员广大社员为成倍地增长工农业产值而斗争；工业生产要和农业的发展密切配合，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要大大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增加公社的现金收入。第三部分指出，要解决好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各人民公社首先要合理地确定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关系，全省一般以各占百分之五十为宜；工资部分可以采取评工记分的劳动日基本报酬制和死级活评的等级工资制两种办法；在不同的管理区之间，应允许有不同的工资标准和差别；实行新的分配制度，要走群众路线，批判“左”、右倾错误思想。第四部分指出，在这次整社中，必须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使所有干部都懂得，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着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目前，在生活问题上，要根据大集体和小自由相结合的原则，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敬老院。第五部分指出，在这次整社中，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

三、四、五段，是精华。着重地读第三、第四、第五节，是讲得很好的。

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于郑州。

二

毛注：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需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1]

三

毛注：农业应放在第一位，要占有最大部分劳动力，在没机械化以前，应当如此。[2]

---

[1] 决议第三部分最后一段讲到，要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批判只顾公社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或者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公社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和顾全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公社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必须根据工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作统一的安排，规定适当的比例。”毛泽东在其中的“农业”之后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四

毛注：很对。[1]

五

毛注：这就对了，行政人员、服务人员就有了限制，不致浪费了。[2]

六

毛注：这是大事，有关积累，不可等闲视之。[3]

---

[1]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在1959年，我省用于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应当占到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每个公社的行政管理费，全年不得超过总收入的千分之四。"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3]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必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防止和反对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现象。"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关于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批语[1]

（1959年2月28日）

一

此件印发各同志。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是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59年2月19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九期《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旁边。该文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他们一怕粮食不实行“三包”办法，而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调剂余粮；四怕别队不报实产，自己吃亏。因此许多基层干部带头瞒产私分，形成群众性的闹粮风潮。查清问题的真相后，县委和工作组立即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向干部和群众反复说明分配和统购政策，明确宣布1958年的收益仍以大队（原来的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实行“三包”，超产归队，统购任务以农业社为单位结算，绝不无代价地调拨粮食，私人存粮一律归个人支配。结果使不少大队的闹粮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

二

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注[1]

---

[1] 《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讲到，“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好，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后一切都要归公’”。在文中的“一些”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在《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一文上的批语[1]

（1959 年 2 月）

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

---

[1] 新华通讯社 1959 年 2 月 2 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六七二期以《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为题，全文登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1 月 31 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篇报道的旁边。

在河南九县讨论郑州会议讲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59年2月）

还有集中过多思想，即集中起来的权力、物力、人力过多了一点。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办公室1959年2月27日夜整理的关于巩县、太康等九县干部讨论毛泽东当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情况报告上。报告说，绝大多数干部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后，都表示非常拥护，讨论特别热烈。但由于大家思想没有准备，还存在着不少顾虑和糊涂认识。有人认为，生产队成了一级核算单位，这下不背大包袱了，但统一种植计划不好办了，工业化机械化速度慢了，抽调劳力不好办了，因此对人民公社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越性发生怀疑。有人认为，这样搞公社还有什么权？生产队的权力大了，本位主义会更大。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这些情况而写的。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9 年 3 月 1 日）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元，十年搞一百亿元无息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1959年3月1日，在郑州会议上讨论进一步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图为毛泽东等在列车上召开会议。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铜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

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猪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哪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采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

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收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收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两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地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

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与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100万吨钢，后年200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10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两三个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

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郑州会议[1]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2]等的三封信

（1959年3月1日、2日）

一

少奇、小平同志，各位同志：

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级〈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大省可有3000～4000人，中省2000～3000人，小省1000人左右。最好另外从省、地、县、社四级共找算账派1000人左右参加会议。会厅小的，分开房间开。有十天时间，尽够将问题的道理讲清，政策和办法也规定得完整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各省市同志们：请你们即在这里用电话通知你们自己的省、市召集上述六级干部会议如何？会期，可定在三月五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日各省市同时开会，三月十四日同时结束。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参加）推到三月十八日开，开十四天，三月三十一日完毕。十四天中，末尾五天，可考虑召开七中全会。四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准备全国人民代表会的文件，时间尽够。难道二十五天之久还不够从容准备文件的起草和政治局讨论批准吗？文件还可在人大会期之内精审修改，不愁不会完善。人大开会日期，定于四月二十五日代表集中，二十六日开幕，跨月份开，四月末尾两天五月头两天共四天休息，实际开十四天，五月十二日结束，可以认真讲解、讨论、研究今年形势、任务、计划和总结的主要问题。如感不够，再加三天，共十五天，尽够尽够了。政协与人大同时开，开一次团结、热烈、舒畅的大会，以利动员全民为今年大跃进而奋斗，并向国外人民群众澄清一些问题，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志气。此信请少奇、小平二位同志提向今天上午的会议，议一下，看是否适宜。有不适宜的地方加以修改。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我准备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须呆四五天，看看他们想些和讲一

些什么。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几天商谈。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二月廿七、廿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同志们如能再呆两天可以多带两天的记录回去。我已叫省委办公厅在今天九时左右将头两天记录送给你们，请你们收到即读，两小时即可完毕。读完再举行会议，讨论我所提出的人民公社问题。吴芝圃[1]同志：今天晚上不要看戏，改在明晚看。因为我要在下午和晚上，跟同志们商量已经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请你安排三月三日在郑州我跟拉丁美洲各国同志们会见，请他们二日由武汉飞到这里，三月〈日〉上午请吴芝圃同志替这些外国同志安排一次参观，看看人民公社，我要在三日下午或者晚上才能见他们。此信请胡乔木[2]同志替我在会上宣读一遍。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时

二

少奇、小平，各位同志：

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

---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耽〈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同志们要求有时间，我想可以。增加一星期，到三月二十日为止，在省城开完**六级**（是六级，另加若干算账派）干部会，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二十日结束。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四月五日完，开十二天。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看几天文件，月底只作报告，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起草文件有20天时间尽够了。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上午四时半

三

少奇、小平同志，各位同志：

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肖华、定一、康生[1]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1]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2]，以昭慎重。

我的讲话稿，即刻付印，你们收到，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交与各同志带回去。因此，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

吴芝圃同志：今、明、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

小平同志：今天我不能见任何外宾，明天（三日）才能见他们。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上午八时

请你们阅读昨天（一日）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吴芝圃同志：今天（二日）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请于明天（三日）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使他们能够带回去。以后几天的记录，请用“航快”直送各省、市、区及中央。

---

[1] 指毛泽东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

[2] 指当时议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后经进一步讨论，扩充为十四句话，写入《郑州会议纪要》。

祝贺柬埔寨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

（1959年3月3日）

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陛下：

值此陛下寿辰和柬埔寨王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我的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祝中柬友好万古长青，祝柬埔寨王国繁荣，人民幸福。祝陛下万寿无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3日

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1959年3月3日）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

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1]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你们知道去年的金门事件[2]吗？那个岛只有八万人口，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美国的方针是把金门、马祖两个岛交给我们，以此作为交

---

[1] 社会民主党，也称“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党”“工党”等。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1889年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早期曾对工人运动起过积极的作用，以后由于内部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被机会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它们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2]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1959年1月7日，共进行7次大规模炮击，13次空战，3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36架，击沉击伤军舰17艘，毙伤国民党军7000余人。

换条件，让它继续占领台湾。这生意不好做。我们要留蒋介石在这两个岛上，要不我们就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全部拿回来。

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这是你们的邻居干的事。我们西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帮了你们一些忙。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力量还在西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牵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牵住了它的力量。中东、北非地区也牵住了美国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在地中海有一个舰队，就是第六舰队，比它在西太平洋的舰队更强大。

此外，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这是你们对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的忙。古巴革命[1]就发生在美国的旁边，那里有六百多万人口，美国投资有十亿美元。美国眼看着古巴革命，望洋兴叹，一个手指也不敢动它。有些人说，美国厉害得很，有原子弹呀、氢弹呀，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们，你们却对他不客气，赶走他，他也没有办法[2]。人家一个副总统来看你们，你们不

---

[1] 1959年1月1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2] 1958年4月28日至5月14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后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8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激烈的抗议行动。尼克松到委内瑞拉时被迫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好好招待他，还用石头、烂鸡蛋、唾沫招待客人，使他那样难堪，对客人那样不讲礼貌啊！

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好不好，我们也考虑过，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我们同美国现在这样的状态，对于我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我们国家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我们很舒服。大概是因为我们破破烂烂，客人不想来。他们要等我们建设好了才来。比如说，美国现在年产一亿多吨钢，大概要等到我们年产两亿吨钢的时候才来。那时，我就要跟各位商量商量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更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也可以建造大房子，因为有了更多的钢铁。这个方针，也许你们不赞成。

现在美国不怕中国，它主要怕苏联。它知道中国只有几块破铜烂铁，而苏联是强大的国家。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无法无天”，不受约束。

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1]，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国民党同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我们还在继续

---

[1] 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1956年1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打国民党。国民党没有饭吃，美国给他们吃。美国的军舰距离在我们炮弹射程之内的海岛只有三海里。他们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以“战争的边缘”来对付“战争的边缘”，结果他们不敢前进，只到战争的边缘为止。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敢动，他们看我们，我们看他们，看了两个多月。我们帮了美国民主党的忙，十一月，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利了。我们的帮忙是无代价的，是义务劳动。帮了民主党，整了杜勒斯。

我算了一笔账，从去年五月起有六件事情整了美国，使杜勒斯处于被动地位。把委内瑞拉推翻希门尼斯[1]算在内，就有七件。加上非洲一件事，就有八件。如把伊拉克革命[2]和黎巴嫩事件[3]分开算进去，就有十件。我说的是最显著的大事。十件事中有三件发生在拉丁美洲。一月份委内瑞拉人民赶走了美国的走狗希门尼斯。五月你们用烂鸡蛋欢迎尼克松，这件事有世界意义。七月发生了伊拉克的革命，使美国大吃一惊，这件事也有世界意义。几天以后发生了

---

[1] 希门尼斯（1914—2001），1948年任委内瑞拉总统。执政期间，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采取亲美政策。1958年1月23日，其政权被人民起义推翻。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1958年7月14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3] 1958年5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7月15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10月25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黎巴嫩事件，美军登陆，闹得全世界都反对美国。这是第四件。接着就是金门事件。我们不想叫美国休息，在联合国通过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决议的第二天，我们就向金门岛开炮，闹得全世界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也忙得很，从东太平洋调动兵力，兵力不够，又从地中海调。杜勒斯自己讲，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海、空军的集中，美国把它仅有的十二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开来了。这是第五件。第六件是十一月美国举行了选举，民主党胜利，共和党失败。第七件是北大西洋集团的四分五裂[1]。形式上他们有所谓的团结，实际上他们保持不了团结，你要吃我，我要吃你。第八件是赫鲁晓夫丢出了一颗柏林事件的炸弹。他也不想让美国休息。美国现在忙得很，柏林事件不好解决。第九件就是你们搞的一件好事，搞古巴革命。古巴革命是在美国身边放炸弹。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第十件是今年二月间以刚果为代表的非洲人民爆发了反帝斗争[2]。也不能

---

[1] 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1958年12月16日至18日，该组织在巴黎召开理事会会议，在军事集团的领导权、美国要求在各盟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以及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

[2] 1908年刚果正式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1958年12月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召开以后，刚果民族运动党领导人卢蒙巴明确提出实现独立是刚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口号。1959年1月4日，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人民集会上又提出刚果独立的口号，比利时军警对集会进行镇压，造成多人死伤。此后形成全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局面。1960年6月，刚果获得独立。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也兴起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把它只看作是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的主要锋芒是针对美国的。刚果的外国资本中美国占很大数字。苏伊士运河事件[1]不算，这是前年的事了。我只从去年一月算起。

现在美国的调子一天比一天低了，大规模的报复不太讲了。

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国际紧张到底对谁利益大，对美、英利益大或者对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因为紧张的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

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在你们那里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北美的月亮好呢，还是中

---

[1] 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69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我们要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派军队到美国去。

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当然西方国家的人民不野蛮，他们只是受了欺骗和蒙蔽，不觉悟，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人不算在内。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是野蛮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这也要除掉帝国主义的走狗，例如中国的蒋介石，美洲的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野蛮人的代理人。

他们说我们野蛮、不文明，这要翻过来。我的证据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非洲没有侵略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西班牙，而是这些国家侵略非洲。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同志们很高兴，很亲近。我们这些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同是所谓不发达的国家。我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兴。你们接触过非洲人没有？我最近会见了非洲一些国家的青年代表，有肯尼亚、喀麦隆、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的代表。马达加斯加人的肤色和我们比较接近，介于黑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见了面觉得很亲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处在同样的地位。

你们不要以为中国解放了，和你们不同。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除了解放一事外，我们大体和你们相

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等方面，都差不多。

我同你们相处感到一种平等的气氛，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身体脏，月亮没有他们的好。没有办法，谈不来。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们，轻视我们。拉丁美洲的人，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外，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

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农民不剥削别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剥削别人，他们是手工业者或小市民，或者只有轻微的剥削。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工人受人剥削。农民不剥削别人，其中贫雇农受人剥削，中农基本上不剥削别人。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但有反帝要求。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1959年3月5日）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

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鸿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称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两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

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时，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

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19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

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草谷”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三十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三十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

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做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沙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人热衷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

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里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缴给公社不缴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分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

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成。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茨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茨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变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

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在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做，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3500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观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

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止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收款”，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郑州会议纪要[1]

（1959年3月5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

[1] 这是毛泽东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的纪要。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

（1959年3月）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表现。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讲得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得就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没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究竟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做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庄）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

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关于传达湖北省委贯彻郑州会议[1]精神的情况报告的两个批语

（1959年3月8日）

一

湖北省委三月七日的这个报告[2]，现在请中央书记处用电话方式，立即传达给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以作参考。湖北的特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7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近几天来，省委紧紧地抓住一条，即迅速、广泛、深入地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召开了一系列各级干部会议，并定于3月11日在武昌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加上各地600名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人数将达3500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和传达后的反映，进行讨论，写出文件草稿，交六级干部大会进一步讨论。这次扩大会议提出：一、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在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之后，还要解决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整党整社。二、从湖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原农业合作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上交公社的部分不宜太多，1958年为50%，1959年为10%左右，最多不超过15%。生产队的积累仍为8%左右。三、对原定的地方工业规划和基建工程计划做必要的调整。四、有关人民公社的具体政策问题，正在搜集、整理、研究和讨论。

点，就是快，有准备，有步骤。他们从三月三日到十日，以八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是生动活泼的。四五天内，一下子弄通了省、地、县三级和少数几个典型公社的多数同志的思想，作了调查、研究，并且着手起草文件，以便提交三月十一日开始的有全省3000多人参加的六级干部大会。这个大会，有几百个观潮派、算账派参加，多么好啊！我认为，湖北省委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郑州会议的精神的。他们的各项细节，我现在不准备发表评论，湖北的同志们会弄得好的。我准备于三月十日到武昌，研究他们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

毛泽东
1959年3月8日于郑州

二

吴芝圃[1]同志：

湖北省的这个报告，请你印发六级干部会议各同志，每人一份，以为参考，以壮士气。不要吝惜3000多份纸张，各省交流经验，可以启发思想。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9年3月8日上午8时

---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对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讨论情况的综合材料的批语[1]

（1959年3月8日）

一

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很值得一看。

毛泽东

1959年3月8日，于郑州

二

河南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1959年3月6日。根据此项材料，起草了一个《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

---

[1] 本篇一是转发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项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这一材料写的标题和说明。

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1]和一个总结提纲[2])。

---

[1] 这一规定（草稿）的主要内容是：一、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公社必须实行权力下放，恰当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合理解决产品分配和劳力使用问题，克服平均主义和统得过多过死的现象，进一步调整国家与公社、公社与生产队、队与队、队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巩固公社制度。二、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一）应当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实行权力下放，以大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分级管理制度。（二）生产队的职权范围。（三）县联社的职权范围。三、关于若干政策问题。（一）公社要正确确定各大队的收益分配比例。（二）公社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必须坚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三）公社对劳动力的分配，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应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四）对穷队社员要进行自力更生教育，同时从经济上解决其生产困难，对富队社员也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五）宣布征购工作结束。（六）对建立公社时的经济遗留问题，根据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处理。（七）公社在体制变化之前所欠的外债，原则上仍由公社负责分期归还。（八）公社必须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2] 指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全省六级干部会议准备的《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草稿）。

党内通信[1]

（1959年3月9日）

一

小平[2]同志：

附信[3]，请你看后，立即送交少奇同志看一下，叫尚昆[4]务**于今夜**（三月**九日**），**用电话**发至各省、市、区，西藏除外。

听说，湖南定于三月十六日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太迟了，故写此信。

毛泽东

三月九日上午三时

乔木正在帮吴芝圃同志修改大会的两个文件[5]，迟一二天方回你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即本篇二。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5]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

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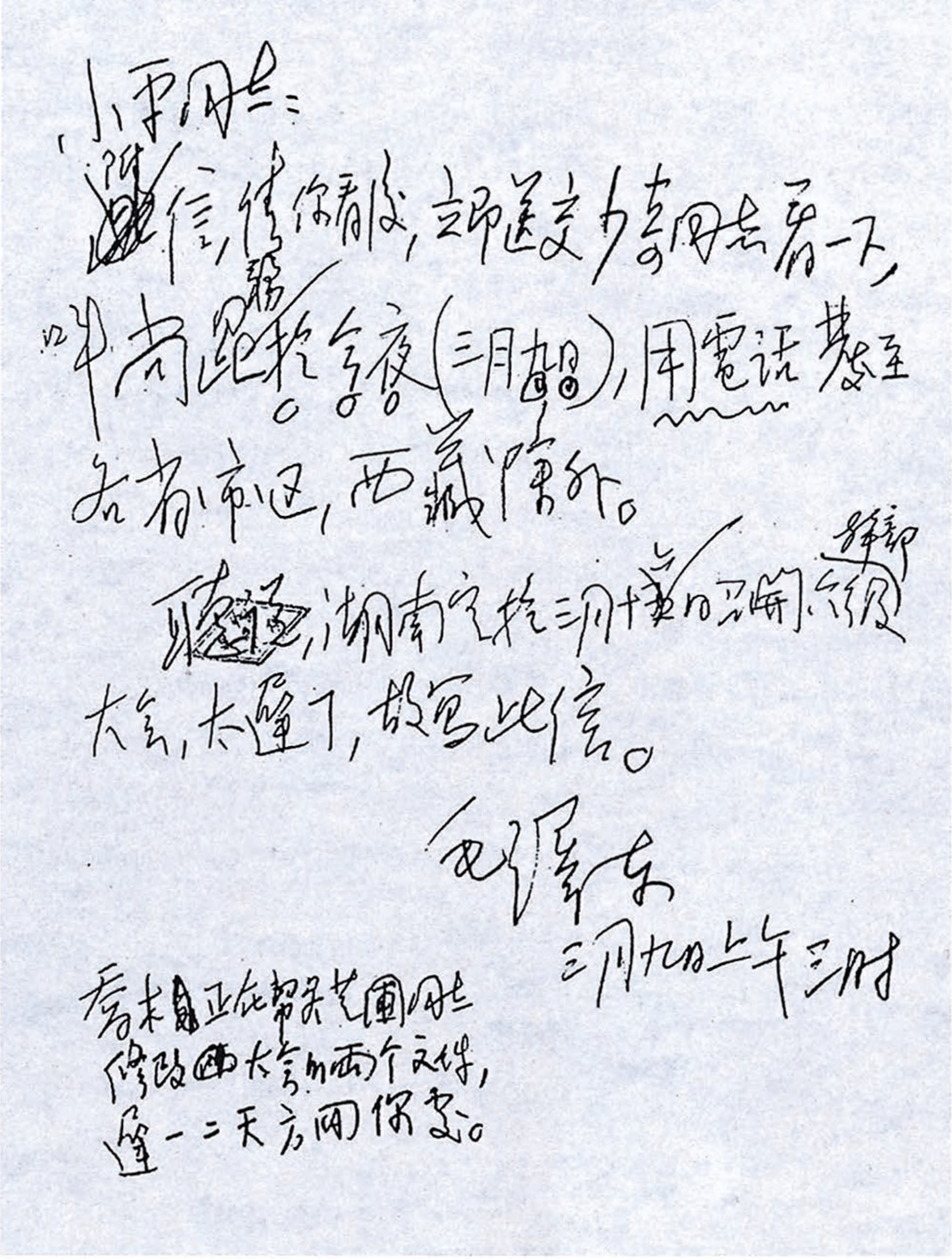
中央定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太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身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大会的方针，讨论各县、社、队的具体执行方法。县的四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级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级每队一人。外加若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余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个星期，

留给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么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作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几天时间也就可以了。从三月四日至十日，有六七天时间作准备，还不够吗？顶够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小平同志：

附信，请你看后，立即送交少奇同志看一下，以书记处名义于今夜（三月九日），用电话发至各省市区，西藏除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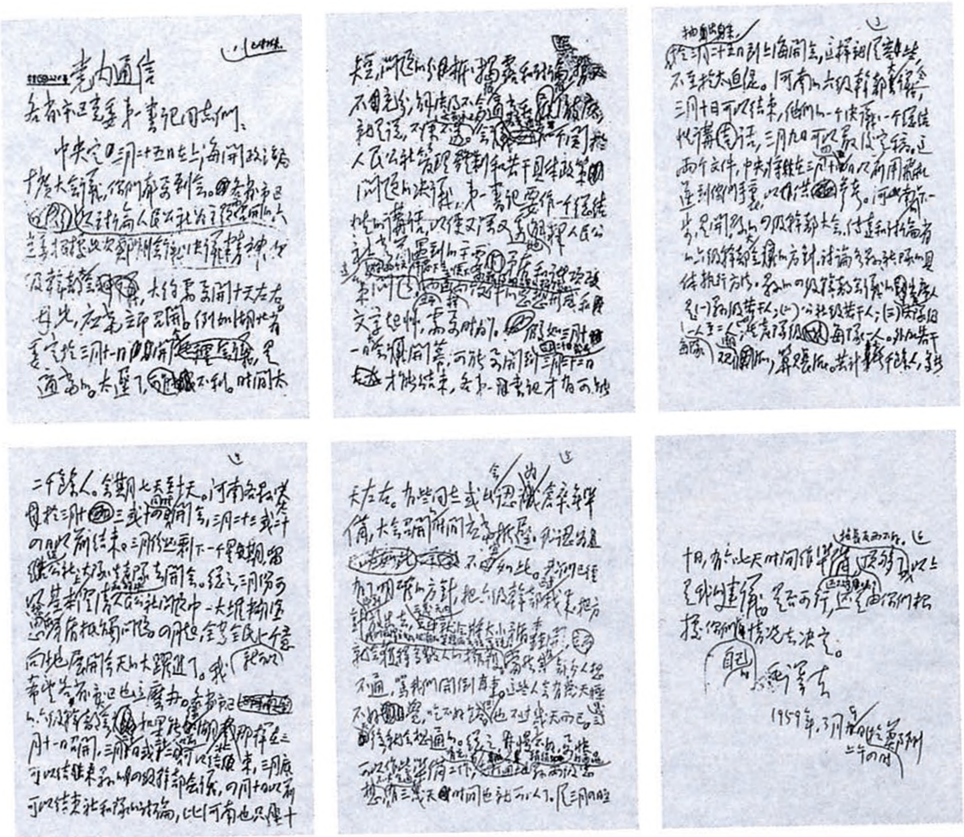
听说，湖南定于三月十六日召开县级干部大会，太早了，故写此信。

毛泽东

三月九日上午三时

乔木正在帮吴芝圃同志修改大会的两个文件，过一二天方同你交。

毛泽东致邓小平信的手稿。



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信》的手稿。

介绍安徽的经验[1]

（1959年3月9日）

曾希圣同志三月八日二十四时报告九日上午收到。安徽六级干部大会定三月九日开始，十八日完毕，比湖北还早两天，非常之好。安徽大会人数竟达一万多人，内观潮派有一千多人，手面很大，没有怕鬼思想。共产党人如果怕鬼，那就不像样子了。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以为参考，西藏除外。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十二时

---

[1] 这是为转发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1959年3月8日24时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写的批语。报告主要谈了安徽省委召开六级干部大会的计划和县以上三级干部讨论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的情况。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1]

（1959年3月9日）

一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用电话于今夜发各省、市、区党委。下附湖南八日报告[4]。

毛

九日十三时

---

[1] 这是对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给中央的简报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即本篇二。

[4] 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3月8日给中央的简报说，最近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讨论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指示。由于当前正是春耕备耕和培育春收作物的紧张阶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必须要求在思想方面尖锐和深入地解决问题，同时又必须继续鼓足正在展开的生产跃进运动的劲头。为此，省委决定：（1）根据中央分级分权精神，布置当前生产工作。（2）各县正在开会传达今年农业生产跃进计划，首先将生产锣鼓打响。（3）3月13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4）省委、各地市委立即各搞一两个试点，摸清干部、群众思想情况，提出如何贯彻执行郑州会议精神的具体方案。

二

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事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事也有利。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下午一时于郑州

介绍广东的经验[1]

（1959年3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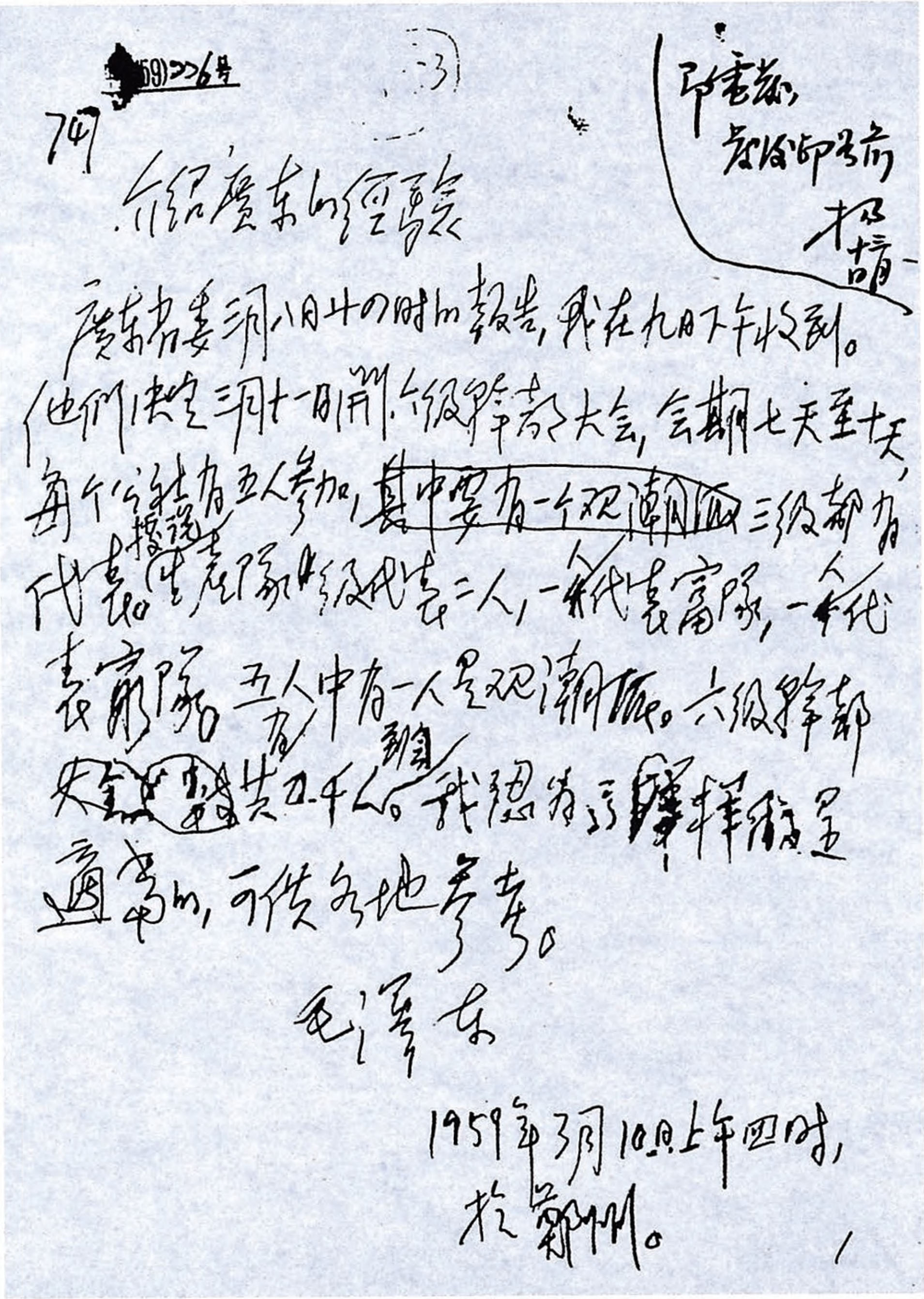
广东省委三月八日廿四时的报告，我在九日下午收到。他们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六级干部大会，会期七天至十天，每个公社有五人参加，三级都有代表。据说生产队级代表二人，一人代表富队，一人代表穷队。五人中有一人是观潮派。六级干部共有五千人到会。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可供各地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10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

[1] 这是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59)226号

747

即电各处，
发给印发各行

介绍广东的经验

广东省委三月八日廿四时的报告，我在九日下午收到。他们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六级干部大会，会期七天至十天，每个公社有五人参加，其中要有一个观潮派，三级都有代表，据说生产队级代表二人，一人代表富队，一人代表穷队。五人中有一人是观潮派。六级干部大会共五千人到会。我认为这样办法是适当的，可供各地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10日上午四时，
于郑州。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祝贺丹麦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

（1959年3月10日）

丹麦王国国王斐德烈九世陛下：

欣逢陛下寿辰和丹麦王国国庆，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致以热诚的祝贺。祝中、丹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祝丹麦王国繁荣，丹麦人民幸福和陛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10日

接受缅甸联邦新任驻华大使貌貌觉温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9年3月12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中缅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亲密的邻邦。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中，两国人民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两国各自先后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以来，两国人民在新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有了不断的发展。我深信，在中缅双方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下，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从而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3月13日）

小平同志：

---

[1]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11日23时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汇报。汇报说，为了抓紧生产季节，广东省委决定在农村普遍实行“三定”“五放”。所谓“三定”：一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有些即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几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或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二是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加强领导，组织生产。三是定1959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任务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层层加码，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所谓“五放”，是为了使新的基本核算单位能立即进行生产，把必须和可以迅即下放的立即宣布下放。主要包括：（一）下放劳动力，即将原来从生产队抽调出去的劳动力迅即进行一次清理，放回原生产队，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二）下放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由其进行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业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汇报最后说，我们准备在本月十二日晚八时半召开全省各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有线电话会议，将上述规定布置下去，安定人心，推动生产。

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很好，请你用电话方式，于今日立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广东行动迅速，一面开会，一面即将方针直达各生产队长，毫不拖泥带水。湖北的方针[1]三月八日即下达各生产队，广东于三月十二日下达，也是很快的。各地宜仿此，一面开会，一面迅即下达方针。广东的“三定五放”，符合郑州会议精神，请各地研究，酌情采纳。

毛泽东

1959年3月13日上午五时，于武昌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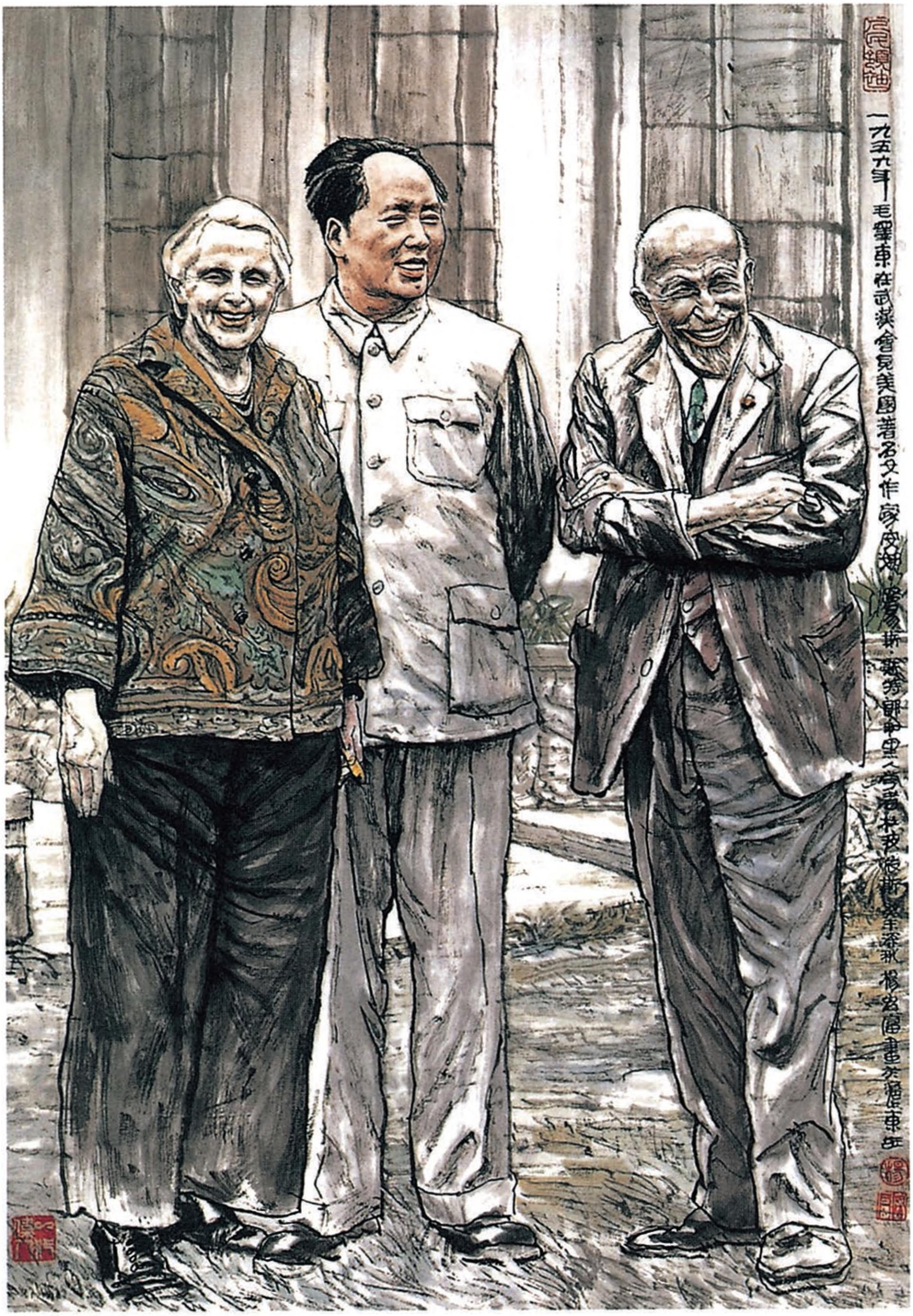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接见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和杜波依斯、斯特朗亲切交谈。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和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伊斯在武汉东湖畅谈。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同美国友人、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和美国女作家斯特朗合影。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在武漢會見美國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學者杜波依斯

《老友重逢》（中国画）

党内通信

（1959年3月15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2]，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志来此，和王任重[4]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

---

[1]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3] 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4]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1]。“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

---

[1] “三定五放”，是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11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的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三定”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加强领导，组织生产。（三）定1959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任务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层层加码，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一）下放劳动力，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将原来从生产队抽调出去的劳动力迅即进行清理，抽回一部分给原生产队，投入农业生产。（二）下放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等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并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给生产队经营管理。（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

（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1]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

[1] 这个记录是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在安徽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59年3月15日）

小平[1]同志：

安徽三月十一日简报[2]很好，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他们收到后，可以印发正在开会的同志们每人一份。此外，广东的第二次简报[3]，山东第一次、第二次简报[4]，都很好，请同时转发各省、市、区大会，予以印发，供他们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上午六时于武昌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安徽省委1959年3月13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3月11日讨论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简报。简报说，安徽六级干部会议，11日继续分组讨论。讨论中，社队干部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公社化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认识到其中一度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人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已认识清楚。在检查缺点时，社队干部分析去年“共产风”刮起来的原因有三：一是

自己认识糊涂，把“共产风”当“好风”；二是害了“传染病”，互相传染；三是省里有关部门传下去的。讨论中，公社一级的干部发言不多，省委已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再一次说明责任主要由省委负，解除他们的顾虑，但也要他们注意检查自己的经验教训，大胆发言。毛泽东在批转这一简报时，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安徽的经验》。

[3]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11日23时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汇报。

[4] 指中共山东省委1959年3月10日关于贯彻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精神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3月12日下午4时关于山东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续报。山东省委的报告说，本月5日至8日，我们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郑州会议精神，为六级干部会议作准备。会上大家一致反映，听了主席的指示，找到了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从所有制问题入手，重视生产队的所有制。过去公社统得过多，“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主要是有一种急于实行共产主义的思想。许多干部听了传达之后，思想上豁然开朗，纷纷打电话回去，要求停止反本位主义的做法。但讨论中也反映出许多错误认识和思想顾虑，对以生产队还是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争论也比较多，这些问题有待于六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解决。舒同的报告说，我省的六级干部会议从本月9日开始，已举行3天。听了郑州会议精神后，群情振奋，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正确，抓住了主要矛盾，照此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紧张局面。粮食问题、生产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矛盾也都将迎刃而解。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回去，要求家里好好生产，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为了把会议搞深搞透，我们提出分两阶段进行：第一段，谈心事，摆矛盾；第二段，解疙瘩，订章程，起草有关公社管理体制及若干政策问题的文件。会后各地可以一直回到公社去开会，结合正在展开的整社运动将郑州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县的会议可放到后面视情况需要再开。

关于注意给达赖复信问题的批语

（1959年3月15日）

中央：

十四日以谭冠三[1]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2]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下午四时

---

[1] 谭冠三，当时任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等等。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材料的批语

（1959年3月15日）

小平[1]同志：

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2]，及王任重同志的报告[3]，今天上午已送100份去北京，请你即看一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作参考。主要是《决议》，主张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的这一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坚决地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或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是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而来的，这样做有利于解决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团结、生产和人民公社的巩固、建设。第二，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立人民公社后已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第三，少数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过小，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可以继续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第四，公社要对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或管理区）加强领导，配备领导骨干。第五，公社对于公社化以后的各项账目，应建立专门班子加以清理。

[3]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9年3月11日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与河南的办法[1]有所不同。如你认为可发各地，请于今晚或明（十六）日办一下，或用电话，或用电报，或用飞机送去。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下午六时

---

[1]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指出，根据我省目前情况，应当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实行权力下放，以大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分级管理制度。

关于召开县以下各级干部会议等问题给王任重[1]的两封信

（1959年3月16日）

一

任重同志：

今日上午，请找各地委第一书记及几个县委书记商量一下：省的会议以后，是否应以几天时间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此种会议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然后再开公社代表大会，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是否应选举社的管理委员会（其成员如何组成）。下午，我们再商量一下。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二时

---

[1]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二

任重同志：

送上文件24件，极有味，好读。我劝你于今天上午看一遍，一气看完，有3—4小时就够了。

下午你再找地委书记少数县委书记座谈，谈县、区、乡、村如何开会问题。我们晚上再交谈。以为如何？花费这一天，不是于湖北工作没有用的，你试一试看吧！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党内通信

（1959年3月17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

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

---

[1]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2]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17—2011），江苏溧阳人，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1959年3月17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3月17日）

小平[1]同志：

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的报告[2]，很有参考价值，请即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3月16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河北省六级干部会议昨天下午结束。会议决定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原高级社已分为几个生产队的，必须作为一个经济核算和分配单位；原来一个村有几个高级社的，经群众同意，尽可能合并为一个经济核算和分配单位；村庄较小的高级社，经群众同意，也可与邻村合并为一个经济核算和分配单位。关于分配问题，会议讨论确定：公社和生产队的扣留比例（包括农业税），一般占总收入的40%左右。在扣留部分中，除农业税外，公社所得大体占总收入的4%至10%。为加强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省委还决定要坚决地下放一批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公社去，公社、管理区从原高级社调上来的干部，应一律放回生产队去。

转发《山东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17日）

小平[2]同志：

刚才请你转发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报告[3]，认为很有参考价值。现在又看到山东省委三月十六日下午八时的报告，认为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在目前时

---

[1] 指中共山东省委1959年3月16日晚8时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三次报告。报告指出：（一）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原则上以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生产大队（管理区）或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于原高级社小于现在的生产大队、大于现在的生产队的，采取两种办法分别处理：（1）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的，经群众同意，即以现在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2）经济条件悬殊较大、群众愿意分开的，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把生产大队适当划小，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我们认为，大体上各种扣留可约占总收入的47%左右（国家税收和上缴任务占7%左右，公社积累占18%左右，生产费用占22%左右），分配给社员部分约占总收入的53%左右。目前，公积金主要用于农、林、牧、副、渔等基本建设方面，由社和大队或生产队分级管理使用，一般社占2/3，队占1/3；公益金主要用于公共福利事业，一般社占1/3，队占2/3。在公共积累中，县联社可以从公社本身提取的部分中抽调3%至5%，最多不超过10%。毛泽东在批转山东省委的这一报告时，将报告题目改为《山东的经验》。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3月16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报告。

期，积累不可太多，而且公社三级都要有积累。湖北规定积累比例，有高有低，一般为百分之十八。此百分之十八，分配到公社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管理区为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生产队为百分之八，而县则不抽积累。此种办法，值得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时

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1]

（1959年3月18日）

你在北京的演讲词，这次你和张奚若的共同声明[2]，我都看到了。只要是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美国有些人，尤其是美国当局，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只是看到很近的地方。比如他们说，西太平洋他们要来管。我说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的国家自己来管。他们的军队要从西太平洋撤走，要撤的地方很多，如日本、菲律宾、朝鲜，还有台湾。杜勒斯说，我们要把他们赶出西太平洋。好像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好像西太平洋是他们的。我看他们的道理就讲不赢。他们终究要走的，他们的占领是暂时的。现在日本政府和美国站在一边，我们不高兴。但我们看来这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可能他们有另外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存在是暂时的，蒋介石的存在是长远的。按照他们的观点来看，那末我们的共同声明是错的了，社会党的观点是错的了，中国的观点也是错的了。我们和他们的看法不同。我们有信心，时间和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日关系暂时地、一时地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谈话的一部分。

[2] 指1959年3月17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的共同声明。

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现在这种做法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岸信介[1]一定要把政治、经济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们可以等他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我曾经要廖承志[2]同志把岸信介敌视中国的言论列了一个表。现在，我们是按岸信介的办法做事。他和蒋介石、美国站在一起，很好，就按他的办法办，他还不同意吗?

我们两国的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所以你们的方针不错。也许回国后，你们政府的人不赞成，说你们说空话，和中国人说把美国赶走，等等。我们说你们对，美国可以赶走，也应该赶走。它有什么道理把我们的土地、把你们的土地占领着呢？它所以那么猖狂，就是因为它比别人多几吨钢。美国人也是两只手，没有什么三只手。美国就是多几吨钢，但是，这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别人怕它，以为它是真老虎。说它是真老虎，我也承认，但它是要变质的，从真的变成纸的。你们日本的历史也是这样。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3]开始时，也就是说九十年以前，你们有

---

[1] 岸信介（1896—1987），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任日本内阁首相。他在任期内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1949年至1959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3] 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明治维新是从1868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什么钢，不是也没有？也受外国欺侮，也没有科学文化。就是这九十年你们发展起来了，经过了一些曲折，现在又受美国欺侮。但是，这也是暂时的。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浅沼稻次郎书记长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

1959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在列车上出席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1959年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

转发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经验的批语

（1959年3月18日）

小平[1]同志：

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的经验[2]，值得各省、县参考，请即发给各省、市、区党委。请各省、市、区党委仿照河南省委的办法，在各县举行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时，抓住一个典型县，取得经验，指导全省。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中共荥阳县委1959年3月16日9时关于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给郑州市委并报河南省委的第八号简报说，我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传达主席指示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决定，采取虚实并举，先务虚后务实，大胆放手鸣放辩论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紧接着解决体制和政策问题。第二阶段讨论1959年生产计划（着重解决包产指标），安排当前生产。开会的方法主要是县里会议与公社会议相结合、干部会与群众会相结合。做到上下配合，内外呼应，一放到底，说办就办，因而会议开得很成功，干部和群众的情绪都很高。根据我县的经验，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有意识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快，思想通得快，改善公社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使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见出席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代表。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向出席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代表挥手致意。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见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代表。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和出席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代表握手。

祝贺突尼斯独立纪念日的电报

（1959年3月18日）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布·布尔吉巴阁下：

值此贵国独立纪念日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阁下和突尼斯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阁下和突尼斯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谋求国家繁荣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祝中国和突尼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18日

毛泽东等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的电报

（1959年3月19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值此匈牙利人民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意。

四十年前，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下，继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匈牙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虽然它只存在了一百三十三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斗争充分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的革命精神，对当时正在争取自由解放的各国劳动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并且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

匈牙利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在十四年前，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重新赢得了解放。匈牙利人民继承了过去光荣的革命传统，以辛勤的劳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很短时间内，匈牙利已经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业农业国。近年来，匈牙利人民在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一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并且对制止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匈两国人民早就在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兄弟友谊。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中国人民一向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并且为他们的伟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在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历史性的日子里，我们坚信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将不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并且衷心地祝贺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3月19日于北京

对《四川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19日）

四川省委三月十四日报告（简报第五号）很好，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这是一个很可供各地研究和酌量采纳的文件。

毛泽东

1959年3月19日上午10时于武昌。我今日去长沙。

---

[1]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9年3月14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五号简报，毛泽东拟题为《四川的经验》。其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公社的管理体制。我省绝大多数是一乡一社，因此，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相当于原来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和部分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队（相当于原来农业合作社）三级，实行三级管理；一般以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为公社的基础（约200户到300户农民）。二、关于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国家税收平均约占6%左右，公社和管理区扣留公共积累约17.5%左右，生产费用约占20%至30%，管理费占0.3%，分配给社员的消费部分约占50%左右。三、关于粮食的分配和征购。拟按每人平均产粮1500斤为基础计算分配，留口粮600斤，征购300斤，饲料粮300斤，种子粮150斤，储备粮100斤，工业用粮50斤。四、关于劳动力的问题。第一，在保证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的前提下，实行统筹兼顾。第二，为

了节约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等机构。五、关于国家对公社投资和收回贷款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我省拟将去年银行收回的贫农合作基金1200万元，作为国家向公社的投资预支使用。六、对公社各项账务问题的处理原则，一般的可提倡不算旧账，但有些账还必须算。七、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公社问题的处理。对已建立的公社不宣布取消，但对公社的各项具体问题，仍可基本上按照原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一套办法处理。

介绍河南的经验[1]

（1959年3月19日、24日）

一

河南改变方针[2]，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下午九时于长沙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3月18日关于如何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给毛泽东、中央并发各地、市、县委的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中共河南省委3月19日转发的洛阳地委关于公社体制讨论的简报（第八号）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写这一批语时拟的。

[2] 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3月18日的报告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原定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次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则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在接到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表示完全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在向各地委、县委传达时指出，省委原规定可以改变，要走群众路线，听取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二

此件[1]很好，即发各省、市、区党委，转发各地委、县委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24日

---

[1] 指中共河南省委转发的洛阳地委1959年3月18日21时给各市委、县委并报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关于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各县生产队长和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主张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县委、公社及相当多的管理区干部，则坚持以大队（管理区）为主。其实有些县委干部是了解群众情绪的，之所以不敢改变政策措施，主要是怕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加上省委曾有“以大队为基础”的规定，因而采取了一面执行一面又拖泥带水的态度。17日晨传达了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以高级社为基础这条方针定了，会议都开得很顺利。河南省委在批转这一报告时说，洛阳地委关于公社体制问题讨论的简报很好，请将它向公社和大队干部作一次传达，让他们注意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走群众路线，要听取大多数人，特别是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正确的判断，问题的界限就会弄清楚。

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提纲[1]

（1959年3月）

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选举[2]

小队部分所有制[3]

大协作

---

[1] 1959年3月20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座谈，了解江西省六级干部大会召开的情况，并作了重要谈话。这是毛泽东写的谈话提纲。

[2]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4月主要搞生产，到5月再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只选现在公社这批人很危险，要选一批管理区的人当委员，一个管理区一个。大事一定要开管理委员会决定，不能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社主任两个人决定。这些人脱离群众很久了，群众观念很薄弱。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就是向群众要粮要猪的积极性。他们不懂得群众的心理状态，就是脱离群众。两头的话都不听，特别是下面的话不听危险，五亿农民啦！公社党委也要经过选举，要把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级的干部选到公社党委来，他们要占很大一部分。公社党委决定的大事，要他们参加决定。

[3]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

如何过渡[1]

供给制[2]、工资制

重点在穷队[3]

食堂太大不好[4]

敬老院[5]

破坏程度（牛少30万头，母猪少1/3，鸡少2/3）

山林破坏大（下放到队、组去管）

居民点（不要大，要便于生产）[6]

---

[1]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小集体如何过渡到大集体？总要有一个过程，我看不要急忙过，搞几年再看。现在还不能过，将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我看要另一种办法，要使得每个人不吃亏。将来是不是一下子过渡到公社所有制？也可以先搞以乡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现在一个公社一个区，几十公里，看都看不见。而且还要自愿，一时不愿意统进来的要让他们看几年。就是到了以公社为单位的大集体所有制，生产队恐怕还是一个核算单位。大工厂里的车间，也算一个核算单位吧！

[2]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对供给制你们有什么意见？有的地方提出搞半吃饭不要钱，也有的提出老人小孩不要钱，青壮年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我们中国人太苦了。你们现在不要动，可以研究一下，摸一个底，进行一些试验，多想点办法。

[3]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过去省委、地委、县委的重点都是在富队，现在要反过来，要以穷队为重点，帮助穷队搞好，使穷队逐渐变富。当然也不是根本不理富队，现在那些富队也是政府帮助他们翻过身来的。

[4]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食堂也不能办得太大，跑几里路吃饭，吃饱饭走回家肚子又饿了。

[5] 在谈话中，当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汇报有的敬老院强迫老年人入院时，毛泽东说，这些人真是冒失得很！搞敬老院，也能把老头子捉得来？

[6]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居民点不要太大，几百户就差不多，不然种田还要走很多路。总要有利于生产。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提纲

（1959年3月）

县、社会议如何开？

生产队太小，例如只有几十户。一百多户是可以的吧？

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是否应当承认？不承认，怎样？

如何当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

这两级不通的人，有多少？如何办？

半粮食供给制（例如250斤），是否应当正式规定，范围多大（是否占全省25%的食堂）？

非农忙时食堂散伙，在一部分地方，如何？

富裕中农不参加食堂，如何？

对大片麦、棉、油料、烟、麻、菜的种植计划，是否有不利之处？

对大协作，是否有不利之处？

具体问题的解决，有无文件？

宣布三、五、七年就可以由小集体到大集体过渡，有些人不想种果树了，不想植树了，不想搞长远计划了，怎么办？

多种作物安排问题，关系甚大。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安排，每队都要并举，按季节，作物参差不一，有利于劳动力的调节，有利于经济。

地、县、区、乡的重点问题：

过去说，抓两头，带中间。**实际只抓了富点**；现要转过来，抓穷点，要学枣阳县委1958年提出口号：大战五条冈，结果：棉花增两倍，粮食增一倍。

关于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的批语[1]

（1959年3月20日）

这个经验有用，可转各地。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3月17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第四十八号上。这辑简报登载了中央办公厅曹幼民发自济南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对公社管理体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今年小麦的分配、粮棉油统购等政策的意见。来信还谈到，关于怎样以最快的方法向群众贯彻上述意见，山东省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已摸到了一些经验：一是向群众贯彻得越快越有利；二是不要光摆解决思想问题的架子，而要着重把怎么办讲清楚。

对《山西省委的经验》的批语

（1959年3月20日）

此件[1]转各地参考。其中粮食分配问题（50斤粮食按劳动分给个人，450斤给食堂，按人定量，吃剩的余粮归自己）和生产小队应当有部分所有制问题，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于江西

---

[1] 指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17日关于山西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载于中央办公厅1959年3月18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第五十三号上。毛泽东批转这一报告时，将题目改为《山西省委的经验》。

对河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1]精神的十二条措施[2]的批语

（1959年3月20日）

此件简单明了，可转各地参考。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第四十三号上登载的河北省委办公厅1959年3月16日的电话汇报。汇报说，河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于3月15日结束，省委根据郑州会议决定的方针，提出了十二条措施：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1) 人民公社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2) 原有高级社已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并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开。(3) 由原来几个过小而经济条件又大体相同的高级社合并的生产队，只要干部和社员愿意，可合并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二、原来属于高级社的生产资料，原则上归由原社建成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和使用。生产队所有的产品、劳力等，应等价交换，不得无价调拨。三、1958年和1959年的分配比例：(1) 生产队每年上缴国家的农业税、公社积累和本队扣留部分最高不超过45%，其余分配给社员。(2) 在上述扣留比例中，农业税大体占1958年总收入的7%，公社积累占40%，其余由生产队支配。四、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1958年工资部分一般不能少于消费总额的50%，1959年一般应占到60%以上。五、社员工资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产多分的原则。六、所有人民公社和生产队都要及早确定1959年生产、收入的奋斗目标。七、搞好粮食征购。八、积极扶持困难的生产队。九、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十、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充实领导骨干。十一、妥善清理公社化后的账目和资产。十二、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

（1959年3月21日）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阁下：

欣逢巴基斯坦国庆，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巴基斯坦人民表示祝贺。祝巴基斯坦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21日

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1]

（1959年3月23日）

一

此件[2]可以发到县委，以供研究和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23日

---

[1] 本篇一是为转发桐城县委1959年3月19日晚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给安庆地委并报安徽省委的报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转发这一报告时写的一条批注。转发时毛泽东将报告的题目改为《桐城县的经验》，将批语拟题为《介绍桐城县的经验》。

[2] 中共桐城县委的这一报告说，我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在开法上注意了五点：（1）会前从县委到社队的各级组织，都分两套班子，一套开会，一套抓当前的生产和生活。（2）大会套小会，先重点解决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思想问题，使他们成为领导会议的骨干。（3）从县直机关抽出一些有水平和经验的干部帮助生产队一级干部领会政策精神。（4）抓住三级所有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先讨论，求源追根，把思想问题解决深透。（5）对各项实际问题认真研究出解决办法。

二

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毛泽东注
三月二十三日

转发《四川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24日）

四川的经验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四川的公社是以乡为单位建立的，公社党委即乡党委，相当于别省的总支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9年3月20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简报（第七号）。主要内容是：（一）对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补充意见：1. 关于公社权力下放到以哪一级为基础的问题。多数地区确定以管理区为基础，个别富队坚持以小社为单位分配的，不勉强合并。2. 关于积累比例问题。拟调整为管理区留30%到35%，公社留60%到65%，5%左右给县联社，生产队因系原来的小社，不需另提积累。3. 关于林木的处理问题。按不同情况分别划归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4. 关于工资问题。为了保护穷队的生产积极性，原则上尽可能使这些穷队不降低现有工资水平。5. 关于房屋使用问题。确定今后公社使用私人房屋应给少量租金。（二）对县的五级干部大会的具体安排：1. 各县一律召开五级干部会议。2. 会议采取大张旗鼓的开法。3. 要加强会议领导，同时注意照顾生产，做到会议生产两不误。（三）规定了目前工作中的几条具体措施。毛泽东在批转这一报告时，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四川的经验》。

转发《福建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24日）

福建的经验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其中第二、第三两段所说的问题[2]，应当引起充分注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福建省委1959年3月20日晚9时关于公社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的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福建的经验》。

[2]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中第二、三段所说的问题，即关于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和人民公社总收入的分配比例问题。报告指出，解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原高级社下属的生产队）的关系，即解决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广泛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的一个重大问题。但这种生产队又不能成为三级所有制的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因为它规模太小、力量薄弱，在许多方面不便于生产的发展，而群众也习惯以原高级社作为统一的分配和核算单位。因此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关于人民公社总收入的分配问题，福建省委同意中央指示的比例。公共积累部分，1959年拟提高为15%左右（公社10%，生产大队和生产队5%，生产小队由小型副业收入中另外积累百分之几）。社员的消费部分，坚持按劳分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供给部分今年不可过多，工资部分应当高于供给部分。

对浙江省委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的批语

（1959年3月24日）

一

此件[1]简单明了，发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24日

二

请尚昆[2]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另印发到会[3]各同志。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3月22日下发的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原则上应当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来的生产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二）定领导人员。各级领导人都必须经过群众同意，经过群众选举，方能正式担任领导职务。（三）定任务。公社对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和收购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同时制订自己的生产计

划，和国家收购任务一同下达到各基本核算单位。（四）定分配计划。人民公社应将国家税收、公社积累分配到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据此制订全年的分配计划，使干部和社员都心中有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五）定集体福利。（六）定劳动计酬方法。人民公社应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计算劳动报酬。（七）定劳动力。目前农村中用于农业的劳动力应占到总劳力的80%以上，尽量减少非生产人员。（八）定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在安排生产、使用劳力、管理财务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应给生产队以必要的权力。（九）定工业管理体制。公社现有工业，应根据规模大小、技术水平、服务范围等条件，分别确定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管理。（十）关于账目结算、土地、耕牛、农具、资金、种子、口粮、肥料等其他问题，也都作了政策性的规定。毛泽东在批转这一规定草案时，拟题为《浙江的十项规定》。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上海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2]

（1959年3月）

（一）组织章程

（二）小队部分所有制

（三）吃饭不要钱

（四）算账

（五）五月普遍选举

（六）今年分配、明年计划，年底搞一次

（七）35亿元（公粮及附加）绝对数问题

（八）县不要积累

（九）收款放款问题

（十）国家投资问题，10亿元

（十一）开会方式问题

（十二）管理费和不脱产干部的补贴问题

（十三）重点放在穷队

（十四）何时过渡，如何过渡?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这个提纲的前6条原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拟写的，毛泽东修改时增写了后面8条。1959年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了其中的前12条。

关于请上海会议[1]各同志阅读薄一波[2]发言稿的批语

（1959年3月26日）

少奇、小平[3]同志：

薄一波的发言[4]印出来了，我正在看。今天上午，请将薄的发言印本，发给各同志阅读，先有一点印象，下午三时或四时开会，大家听一波宣读他的讲稿，就会『有』获得一个较好的启发和理解了。须知有不少人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的，心理状态各不一样。请照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六日上午二时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指薄一波准备在上海会议上作的关于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稿。

介绍安徽的十项规定[1]

（1959年3月26日）

一

这个文件[2]，较之他省有许多新鲜东西，又是切实可行的。写

---

[1] 这是对中共安徽省委1959年3月24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15日至20日的情况简报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中共安徽省委的这期情况简报，题为《安徽的十项规定》。简报说，我省六级干部会议于3月15日至17日学习了中央关于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并结合安徽情况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要点如下：一、关于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按三种情况执行：（1）现在的大队就是原来一个高级社的，即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2）现在的大队是过去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仍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3）现在的大队由原来规模较大的高级社划分开的，一般不再合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公社的机构编制要进行压缩，行政管理人员要精减下放。三、工业、副业、基建等事业的经营管理范围，原则上应根据它们的性质、规模和公社各级的力量进行安排。四、关于包产问题，除生产队仍按以往办法实行包产外，生产队对生产组也应实行包产。五、关于收益分配问题，规定上缴国家7%，公共积累18%，生产费用20%，社员分配55%。六、关于伙食供给问题，采取供给制和补贴制两种办法。七、对过去的财务账目应结算清楚。八、对穷队首先应教育社员下决心，立大志，自力更生赶上富队，同时，国家在贷款、投资等方面予以支持。九、关于劳动力的分配比例，确定用于农业的占84%到86%。过去安排不合理的应及时调整。十、公社的各级干部都要参加劳动。

法也是一项改革，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

毛泽东

1959年3月26日

二

即印发。然后，用电话传至各省、市、区党委。

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9年3月27日）

一

少奇、小平同志：

新闻公报已改好[1]，请你们约集常委及其他几位同志，于今日上午看一下，斟酌文句。然后，叫吴冷西，连同政府命令[2]，军区布告[3]，用电话发至北京，译成藏文及外文，准备于三月二十八日用汉藏英俄各种文字广播，廿九日见报。政府命令应署明发布时间（廿七日）。命令和公报均有人名须查实填入。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上午三时

---

[1] 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修改见本篇二至五，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稿，后来发表在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于1956年3月20日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后来发表在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二

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这是西藏人民所热烈欢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已于1956年4月成立。但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进展。十七条协议[1]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中央为了等待这些反动分子的觉悟，还在1956年年底，就告诉他们，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

三

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

---

[1] 十七条协议，指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拉萨，给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1]佛爷架往南山，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得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领整个宇宙了。因此，他们非但不负责制止叛匪的骚扰，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

四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3月23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学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出走印度。

五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3月23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1]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党内通信[1]

（1959年3月29日）

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2]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城市各项事业每年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七级干部大会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委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9年3月28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3月26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南汇、川沙两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大体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鸣大放，揭露问题，分析原因，提高认识；第二阶段讨论管理体制、政策和具体贯彻执行问题；第三阶段组织一次生产大高潮。目前两县会议都在讨论管理体制和政策问题，同时又向会外群众作了广播。事实证明，召开一竿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群众的动态一是担心再变，二是顾虑下面的干部能不能贯彻主席和市委的指示，普遍关心工资问题。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对人民银行总行党组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批语

（1959年3月29日）

此件[1]写得很好，有恰当的分析，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交代，使人看得懂，不会头痛。

毛泽东

三月二十九日

---

[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1959年3月25日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并转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1958年冬季以来，银行在收回农贷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若干地方由于收贷过多，影响了公社资金的正常周转，给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有些地方去年在收购农产品的过程中，采用“放卫星”的方式收回贷款。第二，有些地方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公社一有钱存入银行，就自然地作为归还贷款，致使收回了一部分不应收回的贷款。上述错误的发生，从思想上来检查，主要是我们从业务上考虑问题多，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少。为了纠正上述问题，我们商定了以下四条办法：（一）对公社的农业贷款，取消存贷合一的办法，将公社存款账户与贷款账户分开。（二）去年12月以来收回的农贷中，属于未到期或不应收回部分，可以退还人民公社。（三）今后到期的农贷，应当收回的仍要继续收回，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收回。（四）农业贷款指标，建议只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社办工业）。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1]

（1959年3月30日）

一

此件[2]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及其附件的批语，毛泽东将这个批语拟题为《介绍山西经验》。本篇二至六是看陶鲁笳的报告时写的批注。本篇七是对陶鲁笳附送的中共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关于晋南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注。

[2] 陶鲁笳的报告说，山西省各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具有如下特点：一、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二、放手发动群众，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在此基础上，再采取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批评与群众性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相结合的方法，效果极好。三、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四、全民大讨论和当前的生产运动相结合。陶鲁笳在报告后面，还附送了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3月23日关于榆次市、太谷县五级干部会议开会方法的通报和中共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1959年3月28日关于晋南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

二

毛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1]

三

毛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2]

---

[1]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事实上，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举行以前，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的方针，已经展开了全民讨论。”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一般有三种方法：“（1）开全县性的电话会议或者有线广播会议。（2）各个公社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人，一部分是固定的（每县平均四五千人），另一部分是不固定的。会内会外，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利用大字报，内外交流，互通情报。大字报的内容，有批评、自我批评的，有建议或表示不同意见的，有报喜的……（3）县委临时派出工作组帮助领导较薄弱的公社。”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四

毛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1]

五

毛注：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2]

六

毛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

---

[1]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各县县委都按照省委的指示，在五级干部会议的头一天，向大家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有反动言论的人，约占到会人数的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社。后者则完全相反。[1]

七

毛注：讲得很好，正是这样。[2]

---

[1]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各县的材料，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对于当前的生产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思想运动的高潮，已经带动起了一个新的令人鼓舞的生产运动的高潮。"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赵雨亭的报告讲到："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开会不但不会影响生产，相反的，对生产还有很大的推动。开会的过程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也是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发动群众的过程，同时又是组织生产高潮的过程。"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

（1959年3月、4月）

一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2]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9年3月30日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报送的省委书记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等材料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王任重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1959年4月3日关于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的开法给毛泽东的信上写的批语。

[2] 指毛泽东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三月三十日）

二

这几个文件[1]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

---

[1] 指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报送毛泽东的四份材料：王延春等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在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三

此件[1]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四

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2]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

---

[1] 指王延春等1959年3月30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2] 指1959年3月间召开的部分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

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

四月三日下午六时

关于同意董必武[1]辞去现职改换工作的批语[2]

（1959年3月30日）

我和大家同意此信[3]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建议，将提到中央全会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个建议，是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交换意见的时候提出的，有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和各大区区长同志们参加。到会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认为对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实际则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毛泽东将这个批语的标题修改为《董必武同志的辞职书》。

[3] 董必武1959年3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中央全会将讨论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我去年10月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我已当选为人大代表并列名政协委员，将来在政协安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责任的名目就够了。这意思在1957年冬曾和彭真同志面谈过。特再恳主席在研究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时支持我的请求为祷！"

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上午六时

对班禅额尔德尼[1]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命令的电报[2]的批语

（1959年3月30日）

请小平[3]叫乔木[4]即予发表。

毛
卅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59年3月29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说：“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布告。”“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工作。”“我将竭诚努力，团结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满怀信心地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彻底粉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支持下所搞的一切无耻的叛国勾当。”这个电报后来发表在1959年3月31日《人民日报》上。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体制的几条原则[1]

（1959年3月31日）

毛注：（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四）先变乡，后变区。三、五、七年之后，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变到区不能定，现在设想，大概要在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变。因此，不要怕。

---

[1] 这是毛泽东在阅看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1959年3月28日给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的信时写的批注。信中说，山东省济宁地区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首先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前一段工作中县委应负的责任，紧接着展开大鸣大放，发言非常热烈，干部们都说毛主席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现在开的是五级通气会、团结会。鸣放中反映的情绪主要是怕再变，有人说“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谭启龙的信中还讲到怕变的原因在于：一、办初级社不到两年，生产刚有劲了，就转高级社；高级社不到两年，就转公社。希望将公社制度和各项政策用法律固定下来。二、国家统购政策曾宣布三年不变，实际上年年变；每年夏收前说不变，秋后就变了。希望上面定任务时估计足一点，定下来就不要再变。

第一批反映[1]

（1959年3月）

一

印度处于被动，它的反映对我们最有利。[2]

二

美国限于所谓“深切的同情”，大说其空话。[3]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印度和美国对西藏叛乱事件的态度的一组批语和批注，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印度报业托拉斯1959年3月29日发表一则消息，报道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公报说叛乱指挥中心在印度噶伦堡一事进行的辩解。这是毛泽东对这一报道的批语。

[3] 美联社1959年3月28日发表的一则电讯稿说：“美国星期六宣布，它对西藏人民遭到共产党中国的‘野蛮干涉’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是毛泽东对这一电讯稿的批语。

三

注：为什么不公开？谁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有这样“友好”的措施，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们才知道。[1]

四

注：可见六个月以前是有举动的。[2]

五

注：亲爱的印度朋友们，不要轻信那些西藏人，他们指挥西藏叛乱活动是秘密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可知道呢！[3]

---

[1] 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言说：“来自西藏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住在噶伦堡，其中有些人是在过去三四年到达的。印度政府一再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应该在印度领土上搞任何反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宣传活动。”毛泽东在报道中这句话的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最近一次警告大约是在六个月以前提出的。从那时起，这些人一直没有任何举动。”毛泽东在报道中这句话的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3]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都没有进行非法活动。”毛泽东在报道中这句话的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59年3月）

一九五五年说过，不要多久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句话现在看来不对……生产关系不仅包括所有制，还包括人与人的互相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工作等等。反动派反共反人民，有他们的世界观，在政治关系上要复辟，推翻我们，当时没有料到来一个反斯大林风，五六年“反冒进”，五七年右派进攻。

出现马鞍形不要紧。波浪式前进是客观规律。错误在于不该“反冒进”……五七年有马鞍形，库存多。五八年才能跃上去……只要不“反冒进”，出现马鞍形并不是错误。马鞍形总是要有的……不能每天都是高潮……事物前进总是有波浪。飞机、汽车往前开，都有波浪声。光、电、水，都有波，这是运动的形态。事物前进总是一波一波的。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1959年3月、4月）

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有几个问题。

组织章程问题。社、队、组都应有章程。来一次全民讨论。

小队部分所有制。

吃饭不要钱如何？要研究。供给制要和按劳分配相结合。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处理吃饭不要钱的问题。

算账问题。过去说一般不算账，现在要改过来，一般要算账，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边的。

公社委员的选举问题。委任制是危险的，应该由有生产经验的人当委员。要规定那些人不到场不能作决定。

征收要搞绝对数。多少议一下。多了不利。

县要不要积累？我看不要好。有些已经抓了一些。手很长。办工业赔了钱。两头抓，抓了财政部和人民，后者不要抓好不好？

银行贷款。贷款一律收回，其目的就是破坏公社，违反专款专用的方针。

投资，□亿元投资如何分配？投在谁手里，如何用？有些公社干部，以共产主义之名，行本位主义之实。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

人民就有利于国家。

农业指标，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指标定得太高，要留有余地，使下边能够超过，潜力让群众去发挥。

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计划是不是也有主观呢？

搞了十年的经验，才知道准备要一套一套地抓！

据说你们很忙，睡不成觉，忙什么呢？越搞越不落实。

老干部办工业。我看还如□□□，官这样做下去，怎么得了！去年□□搞□□□□万千瓦的发电设备，还不知道要合金钢管！

群众路线讲一万年。为什么不交给群众讨论？你们开会就找厂长、工业书记，不找车间主任，没有对立面。

我们党有一条群众路线。现在看来工业还没有，老是说不够。什么叫不够？秀才打官腔。

对事务的观察又深入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这个提法很好。

明年马鞍形，积蓄力量，后年来个大跃进！“天增岁月人增寿”，岁月过去了。经验还没有总结起来，余致力于工业凡九年，才知发电设备要无缝钢管。

搞工业，□□□□项。搞不成何必多搞！分散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

运输力量不足。什么叫短途运输？短多少？

以物易物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互通有无，一种是不好的。

来个狠，实事求是。你这个人不狠，听以不实。

一面搞钢铁，一面搞粮食。双管齐下，抓得狠，抓得紧，抓

得实。

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废品，像打麻将一样，就是靠“吃”和“碰”。上家的废品，是下家的粮食。

什么“可否”？犹豫不决。这两个字改为“一定”。

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节衣缩食，不可出口。自己少吃一点。

要搞增产节约。

全民办工业如何解释？全民办工业讲得太多了，全民办农业差不多。

工人阶级老底子是四百万人，大革命时（一九二六年）两百万人，经过二十三年增加两百万人。到一九四九年四百万人，解放八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每年平均增加一百万人。增加了八百万人。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一百零九年只有四百万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八年中间就增加了八百万人，去年一年增加□□□□万人，这是一种特殊现象。照这样搞下去，一年□□□□万。十年□万万，有人没有机器，一个人的事可能七八人做。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就业六百万人，包括“美国之音”等，只有六千万人。我们这样搞下去，十年□万万人，怎么得了！学徒一年二百一十六元，壮丁在城市赚钱，老弱在农村吃饭，壮者散在四方，留在城市，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这同马克思主义不合，同社会主义不合。

对上海会议纪要修正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4月）

一

送田家英[3]同志酌办。

要在今天改好，晚上印出，发给各省第一书记带回去。

毛

---

[1] 中共中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纪要的修正稿原题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后来进一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在4月2日至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

[2] 本篇三至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上海会议纪要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二

三种指标不适宜，只要包产指标与争取〈计划〉指标两种。[1]

三

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许多时间，急是不行的。要向广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讲明，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在将来，在把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改变成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时候，必须经济上不使任何一个生产队和任何一个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更有益处。变而对于所有的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有利就变，变而对于某些生产队和某些个人有损就不变。除了这个经济条件以外，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就是社员群众的自愿。

---

[1]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中“第八个问题”讲到1959年的粮棉生产指标时指出：“各地各级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指标的时候，应该注意要留点潜力给下面，以便下面超额完成。在计划指标之外，提出一个争取指标去动员群众，这也可以，但是，争取指标也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超越了客观可能，就起不了动员群众的作用。至于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产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包产指标一般要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20%左右，使包产单位和社员群众可以从超产部分得到较大的实惠，这有利于刺激群众的增产积极性。”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写了这一批语，批语中的“争取指标”可能是“计划指标”之误。纪要后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时，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修正稿中关于“争取指标”的提法。

四

也有少数地区，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做法，如果群众确实同意，也是可以的；如果群众不同意，就要改变，千万不可勉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

五

不管具体的情况如何，由上面强制规定所谓增产技术措施，例如强制规定种植的密度，那是很危险的。

介绍麻城的经验[1]

（1959年4月2日、3日）

一

这几个文件[2]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报送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报告等材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王任重3月31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的批语；本篇三是对王任重4月2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转发这三个报告时，均将批语拟题为《麻城的经验》。本篇四是在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上写的一条批注。

[2] 指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四份材料：王延春等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内外呼应，连成一气。会议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检讨之后，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

二

此件[1]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

[1] 指王延春、姜一（中共黄冈地委书记）、吴德简（中共麻城县委书记）1959年3月30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两天来，会议情况又有新的发展。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明算清账目的决心。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决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五、开广播大会，明确宣布1958年的收入，除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余下的都归生产队，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要在会上交代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三

此件[1]，连前两件[2]，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下午

四

毛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3]

---

[1] 指王延春、姜一、吴德简1959年4月1日24时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三次报告。报告说，几天来，麻城县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它关系到党的政策能否一直贯彻到群众中去，而算清生产队的账，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此说，算账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要采取“两头挤”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对生产队干部的教育，动员他们交代问题；另一方面要发动小队长，依靠他们帮助队干部弄清账目。总之，要靠思想教育、靠群众、靠算账，三者结合，才能弄清问题。

[2] 指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一次报告和第二次报告。

[3] 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讲到：“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9年4月3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当匈牙利解放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勤劳勇敢的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正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提前完成三年计划而进行着忘我的劳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坚定不移地为维护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对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阴谋、维护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匈两国人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始终是互相关注和互相支援的。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在各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都

感到由衷的欢欣。我们热烈地预祝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于北京

关于是否担任政协名誉主席问题的批语[1]

（1959年4月4日）

我没有上届是名誉主席的印象。如果上届没有就不要增，请查一下。如果有，可以照旧。[2]

毛泽东

四月四日下午六时

---

[1]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59年4月3日给毛泽东等写信，对八届七中全会上各组讨论《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草案）》的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讲到："毛主席仍应做政协名誉主席，这次也需要重选一次。"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这条意见而写的。

[2] 1954年12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1959年4月，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继续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9年4月）

多谋善断。

留有余地。

波浪式前进。

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形找〈势〉改变计划，如1956年十一月全会[1]，钱只有这『这』这么多，我是历来如此。

观察形势。

当机立断。

与人通气。

解除封锁。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

北戴河、武昌、北京、上海。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

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2]为副帅。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

[1] 指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2]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叫做秘书，三委二部[1]，然后再加几个部，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点通讯员呢？

李锐[2]怕鬼，应改。

一机部较好，冶金部较差，希望改过来。

都是好同志，我无偏心，但要批评，使同志们找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并号召学习海瑞精神。图为毛泽东等在主席台上。

---

[1] 三委，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二部，指冶金部、第一机械工业部。

[2] 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生产增长速度有高有低，是波浪式的前进[1]

（1959年4月5日）

我们过去反对“马鞍形”，重点是再反对“反冒进”。一九五七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因为一九五六年搞了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库存用枯竭了，一九五七年不得不调整一下。那一年这样做是必要的，不然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完成。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时候，我完全赞成调整。钱和材料（钢材、木材、煤等等）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

“马鞍形”这种事情将来还会有的，但是不要“反冒进”，“反冒进”不好。生产增长速度，可能一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两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三年高一点，一年、两年低一点，不能每年都是高潮。像我们开会，每天都是高潮是要死人的。波浪式地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给汪锋[1]的信

（1959年4月7日）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至三百万，对否？（十二）这

---

[1] 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四月七日

对印度新闻社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的批语

（1959 年 4 月 7 日）

一

即送周总理阅。

这个新闻社的这两篇报导[1]，是不利于尼赫鲁[2]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3]，请与吴冷西[4]一商。

毛泽东

四月七日

---

[1] 指新华通讯社 1959 年 4 月 5 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上登载的《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和《印度新闻社记者报道西藏叛国分子谈几年来准备发动叛乱情况》。在这两篇报道的目录旁边，毛泽东还分别批有“可阅”字样。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3] 《人民日报》1959 年 4 月 23 日以《印度新闻社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证实，噶伦堡是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为题，转发了印度新闻社的第二篇报道。

[4]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二

向字似乎是从字之误，从噶伦堡发出的报导[1]。

---

[1] 新华通讯社《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上登载的《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一文说：“印度新闻社的记者昨天向噶伦堡报道。”在这旁边，毛泽东写了这条批语。噶伦堡，印度北部边境的一个城市。

关于发表国外对西藏叛乱反应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4月8日）

刘、周、邓[1]：

此件[2]可以发表，似有益，请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可行?

毛泽东

四月八日上午十时

此件发表后，再将上月卅日至今日的动态加以分析，在报上发表。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外交部新闻司1959年3月31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上登载的《我公布西藏叛乱事件后的反应（之二）》。主要是介绍了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3月30日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和印、美、英报刊对西藏局势的估计。1959年4月3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再谈我国西藏局势》的报道，对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内容作过详细的介绍。

关于西藏平叛[1]

（1959年4月15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

---

[1] 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公开宣布“西藏独立”。17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19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并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1]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1]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

[1]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5%）。从1956年起支付定息。1966年9月停止支付。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1]。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2]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

---

[1] 1956年12月30日，周恩来在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说，毛泽东主席让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2] 西康，即西康省，1955年撤销。撤销后，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支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1]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2]。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

---

[1]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2]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1948年去美国，后到台湾。

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

---

[1]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是：双方互设商务代理处；双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和按惯例朝圣，并经一定山口、道路往来；关于两国外交、公务人员及国民过境事宜的规定等。协定1954年6月3日生效，有效期8年，1962年6月期满失效。

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

---

[1] 指《人民日报》1959年3月30日发表的达赖喇嘛3月11日、12日、16日先后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

[2] 指周恩来总理即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3] 尼赫鲁（1889—1964），当时任印度总理。

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9年4月15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越南和平恢复以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这一切成就感到极大的高兴。

“越南人民非常渴望祖国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曾经并且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正当愿望一定会得到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一贯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进行着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和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1]，为保卫印度支那地区和世界

---

[1] 日内瓦协议，是1954年7月20日至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的总称。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等。

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援，亲密合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般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越南人民的友谊，并且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两个批语

（1959年4月15日、16日）

一

恩来同志：

《政府报告》[1]已经基本上修改好，已照你的意见立刻付印，上午印好，下午请你立即分发国务院会议成员们阅读，明十六日上午可阅完，请他们签注修改意见。明十六日下午，请你召集国务院会议当面征集意见，晚上即交田家英[2]（不交乔木[3]，他有别事）开夜工修改，十六日晚上十二时以后，我与田家英核对一次，十七日上午交你最后审定付印，十八日下午即可向大会作报告。以上特告。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上午八时

---

[1] 指周恩来准备在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二

田家英同志：

第一页，第七页，第十二页，第二十五页，第三十七页、三十八页、三十九页、四十页，第五十页，都有一些修改[1]，请注意。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这次会议就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员名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图为毛泽东等在会议上。

---

[1] 毛泽东在这几页上所作的都是一些文字的修改。

中央转发吴芝圃[1]关于分期分批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4月16日）

一

此件[2]即转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仿照办理。

中央

四月十六日

---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2] 吴芝圃1959年4月15日请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转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任重同志转达的主席关于召开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意见，我们在省委全会上作了传达、研究和布置：（一）同意从现在起分期分批召开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一般在账已基本算清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开过后再开。（二）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干部，错误比较严重或没有能力担任工作的，一般占5%至6%，有的地方占8%至10%，甚至更多，需要在整社中予以撤换或处分。（三）严重违法乱纪应给以刑事处分的干部，一般县有3至4人，个别较严重的县有10人左右。经过严肃处理，既教育了干部，又平了民愤，效果极好。

二

刘、邓[1]即阅，尚昆[2]办。

毛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

（1959年4月17日）

总理：

此件[1]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在〈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时

---

[1] 指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959年4月9日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北京途经山东时，下火车在田野散步。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历城县大辛庄，查看小麦的田间管理。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大辛庄听取小麦管理情况介绍。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大辛庄的社员亲切握手。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视察了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第二生产队麦田管理区。图为毛泽东看麦苗生长情况。

195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天津武清县豆张庄查看小麦的长势。

转发周小舟[1]关于处理少数违法乱纪干部的意见的批语

（1959年4月17日）

尚昆[2]：

此件[3]请转各地方同志。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周小舟1959年4月14日请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转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日内即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执行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条指示。会后即可分批召开县的六级干部会议。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完全应该依法严肃惩处，现已处理了少数分子。但是我们认为不必集中在一次会议上处理，而以实事求是精神调查清楚后随即处理比较适当。至于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在公社代表大会上应该尽量改选掉。

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

（1959年4月1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西藏叛乱[2]，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中国有句老话：虱多不痒。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骂得太多了，也就不痒了。你们了解西藏问题吗?

巴叶塔[3]（以下简称巴）：我们想我们是了解的。这对我们说来并不奇怪。西藏的事在西欧不会有巨大的反应。有人想把西藏问题与匈牙利问题相比是困难的，因为二者不能相比。一八七〇年罗马教皇还是罗马国王，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占领罗马，曾向教皇开炮。现在西藏的教皇向共产党开炮并不奇怪。意大利国内在西藏事件上的宣传运动是人为的，没有群众基础的。

毛：炮开得好。

---

[1] 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2] 西藏叛乱，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发动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17日，达赖喇嘛和一些主要叛乱分子逃往印度。19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很快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之后又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3] 巴叶塔（1911—1990），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巴：当初是意大利国王指挥的，反对罗马教皇。

毛：四月十八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广大的西藏群众与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1]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两年经过了党的工作才转变过来。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也有些人看不清楚。大部分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西藏事件很好，我们很乐观。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这倒不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西藏的一些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我们放慢改革，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因此，打炮也是好事。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平叛总是要大叫大骂的，因为他们认为西藏实际上是他们的地方，不是我们的。他们的第一个论据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汉人。其实，我们国家里不是汉人的多得很，内蒙古是蒙古族人，维吾尔族是突厥族系的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汉人。在中国六亿七千万人口中，少数民族有三千六百万人。不仅一百二十万西藏人不是汉人，其他三千四百多万人也不是汉人。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马克思说过民族自决，但是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马克思主

---

[1] 匈牙利事件，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

1959年4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出席中意两党会谈公报签字仪式，邓小平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分别在会谈公报上签字。

工业界的新事[1]

（1959年4月）

一

此件[2]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阅』，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于北京

二

请尚昆[3]照上次样印发。[4]

毛

---

[1] 本篇一是对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王鹤寿报送的冶金工业部党组1959年4月16日关于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及附件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写这一批语时拟的。本篇二是对冶金工业部党组4月19

日关于华北钢铁系统五级干部会议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二次报告的批语。

[2]　冶金工业部党组1959年4月16日的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为了把这个迫切问题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商量，以便迅速发动全体职工，扭转生产局面，我们于4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地区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部、司局、厂矿、车间、工段五级干部1400多人。王鹤寿代表冶金部党组作报告，指出只要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就可以争取完成今年的钢铁计划。目前计划完成不好，不能只归咎于客观条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到会干部解除顾虑，大鸣大放，大胆揭露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各种妨碍生产的消极因素，提出各种积极措施。报告在后面还附送了4月16日各小组会议情况的综合简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报告题目改为《冶金部党组报告华北五级干部大会情况》。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这个批语写在冶金工业部党组1959年4月19日的报告上。报告说，华北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现在正以企业为单位，分组大鸣大放。总的看，各级干部都想努力完成任务，有些群众发动较好、生产任务完成也较好的企业干劲很足。同时大家也反映了企业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在批示印发时，将这个报告拟题为：《第二次报告（华北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大会上。

1959年4月，毛泽东和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在一起。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出会场。

对陶铸关于广东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4月20日）

尚昆[2]：

请以电话告陶铸，赞成他的意见。

毛泽东

四月廿日上午二时

---

[1]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59年4月18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从上海开会回来后，即按照指示布置全省各公社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接到主席在杭州的指示后，省委决定进一步加快进度，已通知各地、县，要各县立即召开一个社的代表大会，地委派人帮助，县委亲自掌握。省委在潮安搞的公社代表大会试点，已提前进行。5月初省委在潮安召开地委书记现场会议，交流经验，为全省全面铺开、分批召开公社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4月21日）

一

此件[1]值得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参考、仿行。

中央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

[1] 中共江苏省委1959年4月18日给中央、上海局并各地、市、县委的这一报告说，我们在4月11日至14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中全会精神，讨论了当前工农业生产、整社工作和城乡人民生活安排等问题。在生产方面，要求各地在抓紧整社的同时，抓紧夏熟作物的后期管理，不违农时地完成秋熟作物的播种，加强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继续大力开展积肥运动。在整社工作方面，经济账必须算，思想作风账也势在必算。首先解决县委书记的思想认识问题，然后由县委直接领导公社，彻底把账算清。在生活方面，要求各地安排好夏熟前的社员生活，防止部分地区可能发生的夏荒。为了完成今年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走群众路线，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今后三个月内要紧缩会议，全力搞好生产、整社工作。

二

刘、邓[1]阅，尚昆[2]办。

毛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陈赓[1]关于一九五九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安排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4月21日）

此件[2]阅过，很高兴。努力奋斗，以求实现。

毛泽东

四月廿一日

---

[1] 陈赓，当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2] 指陈赓1959年3月24日关于1959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安排情况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等的报告。报告说，据初步统计，在1959年需要安排试制、仿制的项目共达340余项，相当于1958年的123%。其中仿制项目下降到58%，自己设计项目增加到42%。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设计适合自己情况的装备，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李先念关于吕泗洋风暴事故后最近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4月24日）

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

[1]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李先念1959年4月20日关于吕泗洋发生风暴事故后最近综合情况给周恩来总理并邓小平副总理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吕泗洋发生风暴事故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委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渔民情绪已逐渐稳定，生产情绪也有很大提高。预计到本月21日，出海渔船可占总船只的70%。目前急需修船补网，所需物资，各省市正根据国务院通知，由本省市拨出，就地解决。国务院五办、水产部也正在予以协助。4月21日，周恩来将这一报告送毛泽东等批阅。

关于调演豫剧《破洪州》给周恩来的信

（1959年4月24日）

总理：

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1]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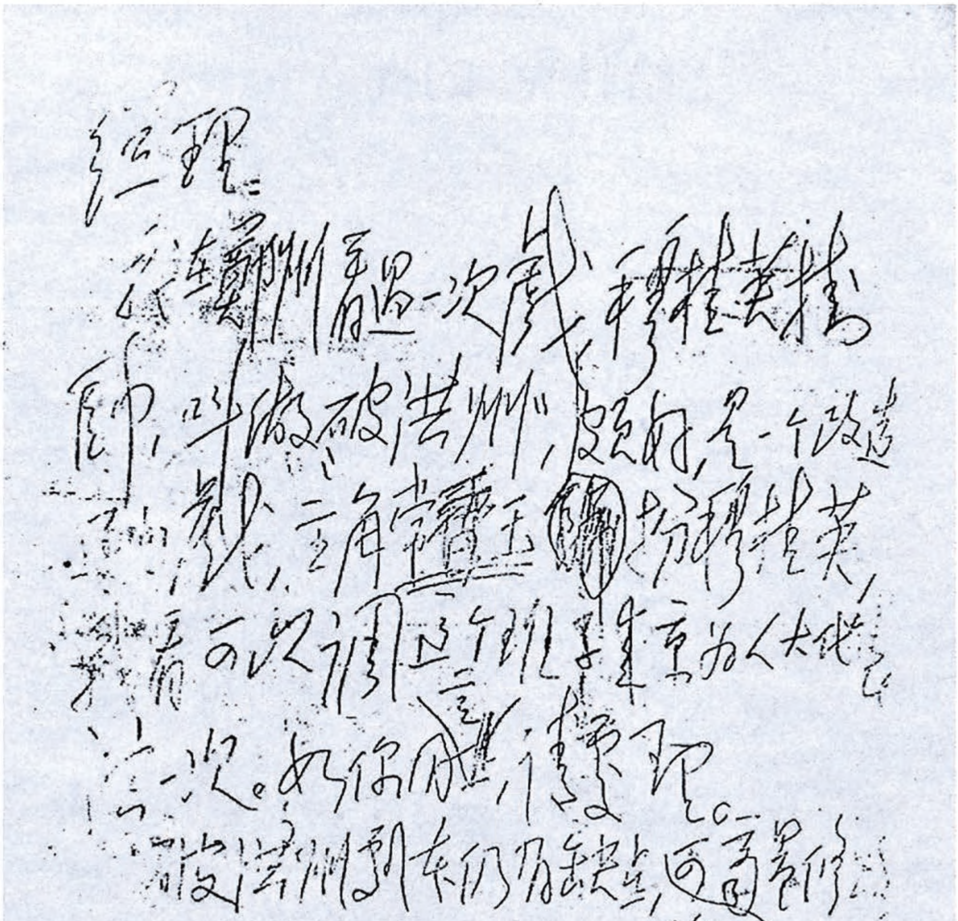
《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毛泽东

四月二十四日

---

[1] 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河南豫剧院院长。



总理：

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是一个改造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办理。

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可随后请人修改。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手稿。

为阅看《关于〈三国演义〉》前两部分给林克[1]的批语[2]

（1959年4月24日）

林克：

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3]，我想看一看。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这个批语写在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上，该版登载了吴组缃撰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主要是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总的倾向，把刘备和曹操处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不能表面地认为这只是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那是历史；作为文艺作品，它实质上还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人民跟统治势力的矛盾，反映了黑暗时代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在这里，文艺和历史必须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有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

[3] 《关于〈三国演义〉》（一）（二）分别载于1959年4月9日和15日《北京晚报》第三版。1959年5月13日，《北京晚报》又连载了《关于〈三国演义〉》（四）。

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的批语

（1959年4月25日）

一

乔木、冷西、彭真[1]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2]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

[2] 这里的“18日”可能是20日之误。《人民日报》1959年4月21日发表了新华社政治记者20日的一篇评论，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其中讲到：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1]短评[2]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3]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4]，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5]。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

[1]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第六版登载的三则新闻：《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公然在我领事馆前猖狂污辱毛主席像》《锡兰一群僧侣兴风作浪，竟到我驻锡使馆无理取闹》《挪威执政党公然诽谤我国，奥斯陆报纸恶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2]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登载的《原来如此!》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两篇短评。

[3] 指1959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评论。

[4]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5] 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印度报业托拉斯关于尼赫鲁24日同达赖喇嘛会见前后的几次谈话的报道。尼赫鲁说，达赖喇嘛告诉他，给谭冠三将军的几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还表示，和平共处原则仍然是好的。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文章。

二

刘、邓、周、林彪、陈毅[1]阅。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对外交部就印度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给驻印使馆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4月25日）

一

周、陈毅[2]同志：

太软，要极端强硬。对挪威[3]也要这样办，但硬性可略为降

---

[1] 本篇一是对外交部1959年4月23日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一指示稿的修改。外交部的这一指示稿说，4月21日电悉。印社会党人去我孟买领事馆示威并侮辱我主席像事，同意由你馆和孟馆以备忘录形式分别向印外交部及孟买地方政府提出，指出这是对我国元首和我国人民所敬爱的领袖的莫大侮辱，当暴徒进行侮辱时，警察在旁非但不干涉，且将围观者拉开，让记者拍照，显系纵容行为，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愤慨，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印度政府对此事迅速进行调查和作必要的处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件。

[2] 周，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指挪威执政党工党机关报《工人报》1959年4月20日发表由挪威总工会主席诺达尔和挪威工党主席基哈德森署名的“五一”文告，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公然的诬蔑和攻击一事。

低。对锡兰[1]也要如此办，硬性更要降低些。

毛泽东

四月廿五

二

要求印度政府对侮辱我国家元首的事件迅速予以处理，并予速复。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弄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政府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不达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也不能停止。

---

[1] 指锡兰十来名来历不明的僧侣1959年4月10日下午到中国驻锡兰大使馆提交所谓“抗议书”一事。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关于妥善安排渡过春荒的批语

（1959年4月26日）

此件[1]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959年4月23日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上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报告说，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工作。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部分地区农民外流现象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的春荒仍在发展。

对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决议稿的批语[1]

（1959年4月28日）

一

即送彭真同志：

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2]。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一时半

---

[1] 本篇一写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初稿）上；本篇二写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彭真1959年4月27日夜送审的决议修改稿上。

[2] 决议初稿第二页讲道："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毛泽东修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在旁边批示："解散政府应放在讨平叛乱之后。"

二

送彭真。略有修改[1]。

毛泽东
四月廿八日

---

[1] 毛泽东对决议修改稿主要是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1]

（1959年4月28日）

【新华社廿八日北京电】 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美国反动记者艾尔索普说，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的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胡适在这里实行了他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可是看不见他的所谓“小心的求证”。胆则大矣，心亦甚粗。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西藏的地形很高，空气较薄，也吓坏了很多对于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乐坏了世界上大部分资产阶级。前者说，恐

---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通讯社写的一篇电讯稿，题目是毛泽东拟的。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怕有些困难吧，汉人帮助藏人进行平叛战争，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必要，困难必多。后者说，一定不行，至少是『是』长期的。朋友们，敌人们，你们都错的。寇能往，我为什么不能往呢？这个世界屋顶共有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住人的地方在丘陵、溪谷，并不很高，拔海三千多公尺而已，为什么不能住人呢？叛乱前，我们只有二万人在那里，分布在一百二十公里中的若干要点，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叛乱后增加了两个半师及一批干部，只有二万多人。连前总共五万人，合于艾尔索普认为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四分之一。干部中有近万的藏族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平叛以后，要组〔建〕藏族劳动人民的自卫武装，少数是正规的，多数是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到那时，人民解放军留下一个师就够了，主力可以撤出。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里有一个文件，是人民解放军一三四师政治部向北京的报告[1]，讲的是人民群众帮助平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四师政治部1959年4月20日给总参、总政、中共西藏工委等的报告。报告说，我师自4月6日、7日开始向山南进军以来，沿途所见居民除个别地区外基本安定，基本群众对我军平息叛乱甚表欢迎。群众对叛匪十分痛恨，渴望解放。这进一步证明山南叛乱，还是上层问题。从现有材料分析：第一，基本群众从长期的反动统治带来的深重灾难与我军入藏八年来处处为人民办事的对比中，提高了觉悟，大部分是靠拢我党我军的。第二，中、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由于我党几年来的统战工作和祖国繁荣昌盛对他们的影响，大部分没有参加这次叛乱。第三，一般的头人，先前大都跑了，经过我党我军的宣传，现在也陆续回来了。由于向官兵进行了较深入的政策纪律教育，我师这次进藏以来，大部分分队遵守政策纪律，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上送俘虏时对叛匪骨干分子捆绑过紧等，已分别予以严肃处理。

叛的故事。照录全文，一字不改。我军政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应当改正。

转发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4月28日）

尚昆[1]同志：

（一）此件[2]转发各地和各党组，如前示；（二）请送一份给尤金[3]同志转送赫鲁晓夫[4]同志看一看；（三）以上两项处理，请告刘、邓、周。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中共西藏工委1959年4月24日给中央、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并发各分工委的这一综合报告说，自拉萨平叛胜利和国务院发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以来，拉萨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左派，对国务院的命令是积极拥护的；中派总的趋势是向左靠；右派目前的主要表现是无可奈何和恐慌不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派普遍情绪很高、很兴奋。昌都地区上层中的左派，听到国务院的命令后也大声叫好。群众的反映一般较好。在已平叛地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改革、生产、生活等问题；在尚未平叛的地区，最关心的则是平叛问题。宗教方面，喇嘛们普遍认为大势所趋，盼望早日安定下来。

[3]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4]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对《光明日报》发表《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资料的批语

（1959年4月29日）

乔木[1]同志：

此件[2]可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应发表此项资料[3]，还可说得详细一点，中外皆需要。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光明日报》1959年4月29日发表的该报资料室编写的资料《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这篇资料从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形式、领主对农奴的高利贷剥削和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三个方面反映了西藏社会制度。

[3] 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国内资料组编写的资料《黑暗、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

党内通信[1]

（1959年4月29日、5月2日）

一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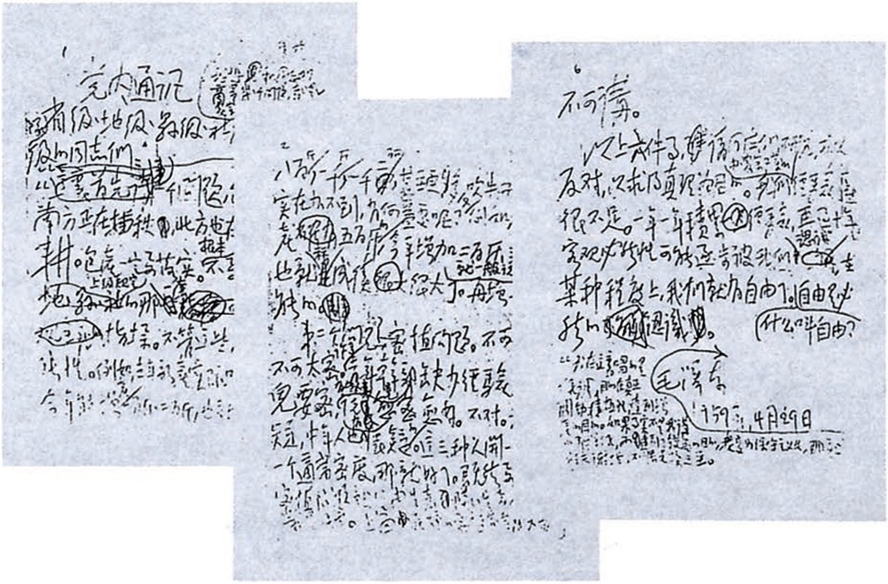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来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们的一封信；本篇二是毛泽东为征求对这封信的初稿的修改意见而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下发这封信的修改稿而写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级的同志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图为该信的手稿。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

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

---

[1] 八字宪法，指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

刘、邓、周、陈、林、朱、谭、彭[1]各同志：

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信》，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上午九时

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1]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2]。

毛

三

刘、邓阅后，交尚昆[3]同志：

---

[1]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 曾希圣1959年4月30日对毛泽东的这封党内通信初稿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关于“密植问题”。他写道：“由老农和中年、青年三者协商的办法很好。我的意见省里可以提出一个幅度作为下面参考。因为老农过于保守，青年则有一点冒进，他们争论很大，要有一个幅度，容易使下面的意见一致。根据我们去年经验：麦子因地、因时和种子的不同每亩可用25斤到35斤的种子。稻子可插2×5寸到4×6寸的密度。”二、关于“吃粮问题”。他写道：“必须杂以其他代食品，不仅节省粮食，还有益于身体。但蚕豆、豌豆是经济作物（做粉丝、豆酱等），是否可以不作粮食定。”5月2日，毛泽东对这封信进行修改时，采纳了曾希圣的意见，在“密植问题”中，加上了“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一句；在“节约粮食问题”中，将“杂以番薯、青菜、萝卜、蚕豆、豌豆、瓜类、芋头之类”一句，改为“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此件[1]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

毛泽东
五月二日上午

---

[1] 指毛泽东1959年5月2日对这篇党内通信的修改稿。

工作方法十六条

（1959年4月）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

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对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泄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

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钳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作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前进。过去讲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马鞍形，主要是反对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一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按速度来看，是增加了百分之□□，今年要确保□□万吨钢，煤有信心完成。农业指标，粮棉要很大努力才能完成，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

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

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钢）降低为□□万吨，上海会议又压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六、要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

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后来看了□□□同志的报告，又到天津找了□□□，到了山东找了□□□，到了吕鸿宾社，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不可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合，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

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作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作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既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廷[1]。有些同志生怕对自己不利，

---

[1] 原稿如此。

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痛苦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一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了吗？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得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1]，就有个来龙去脉。写

---

[1] 此公报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写的。

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代，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著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词写骈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道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道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门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门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

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嘛，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评。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好。[1]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嘛。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

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领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

[1] 此处可能有漏字。

党内通信[1]

（1959年5月2日）

一

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2]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

二

即送刘、邓、震林[3]阅，尚昆[4]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5]阅。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1959年4月13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王绍飞的

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很关心，干劲不大。其原因是：（一）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三）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所谓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即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着生产队的积极性。

[2] 即王绍飞的报告。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5]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

关于反击挪威报纸侮辱我国领袖问题的批语

（1959年5月4日）

乔木、冷西、浦寿昌[1]同志：

这是第二件[2]，第一件[3]请找出一阅，都是对我们进攻的。第一件说，挪报第二次登出在中国主席面部打大白□的漫画，并说毛『的』是比希特勒还坏的独裁者，人能骂神，不能骂毛，毛比神还利害吗？如果中国不屈服，继续胡闹，那末，西方将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的独裁云云。请你们找出前后几件都看一下，谈一下对策。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想一想，在西藏问题上和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浦寿昌，当时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

[2] 指中国驻挪威大使馆1959年4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挪威报界对27日我国正式向挪威政府递交照会抗议挪威工党和报纸恶意攻击、诽谤我国领袖一事的反应。

[3] 指中国驻挪威大使馆1959年4月25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挪威报界对我《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挪威工党和报纸恶意攻击、诽谤我国领袖的消息一事的反应。

革命反革命界线问题上闹清楚。这是好题目，不应放过。挪威两次漫画及其凶恶论点都应登人民日报，并加驳斥，引起挪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复，和我们的反报复。此种想法是否合理，请你们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谈一下。此件你们三人看后，送刘、邓、林彪、周、陈、陈云[1]六同志一阅，然〔后〕退还我。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上午五时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注意逃缅蒋军配合西藏叛乱在我边境扩大骚扰的批语

（1959年5月4日）

克诚[1]同志：

（一）第三件情报[2]应发给云南省委、军区并转有关地区各级党政军直至基层干部，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二）指示云南省委、军区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糊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毛泽东

五月四日上午五时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这份情报说，逃缅蒋军总指挥柳元麟今年2月中旬奉命赴台湾，蒋介石等亲自接见，指示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答应增加对所部的经费和补给，以巩固和扩充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部署，拟以云南西盟地区为重点，纠集匪徒，发动暴乱。在这份情报的题目旁边，毛泽东还批有“注意”二字。

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的谈话[1]

（1959年5月6日）

毛泽东接着说，已经讲很多了，我再讲你们的肚子就要饿了。

主席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主席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

---

[1] 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来自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36个代表团的团长、部分团员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外交部办公厅1959年5月13日印发了这次接见的谈话纪要。这是纪要中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狗、反动派。

主席说，尼赫鲁[1]是个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每逢大闹一次，都要引起反苏、反共的风暴，例如匈牙利事件[2]。那样的风暴，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是帝国主义巩固了，还是社会主义巩固了？匈牙利的同志们也在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1956年10月以前更巩固了。那时骂苏联，苏联现在怎么样？骂倒了没有？究竟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而生气勃勃呢？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有朝气？是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气呢，还是事件以后的匈牙利有朝气？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

主席说，今天请同志们来讲一点我们的观点，仅仅供参考。谢谢同志们。你们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们，这是非常好的友谊，非常感谢。还有兄弟国家大使馆的同志们，也感谢你们，好久未见，趁此机会见见。

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获得了相当一点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对中国的事情要加以分析。我们的胜利是第一方面，错误、缺点是第二方面，都要分析。你们要回去了，不带一点分析的眼光来看就会不准确。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 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政治事件。

习经济建设。你们都是我们的先生，有个大先生，那就是苏联。至少还要十年，再看我们的工作也许比现在做得好些。五年、十年以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欢迎再来，再看看是否比现在稍许进步一点。

对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5月6日）

一

即送刘、周、朱、林、陈、小平[2]阅，请尚昆[3]于明七日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

毛

六日

---

[1] 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本篇三是毛泽东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的一句话。毛泽东还为指示稿拟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的标题。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陈，指陈云，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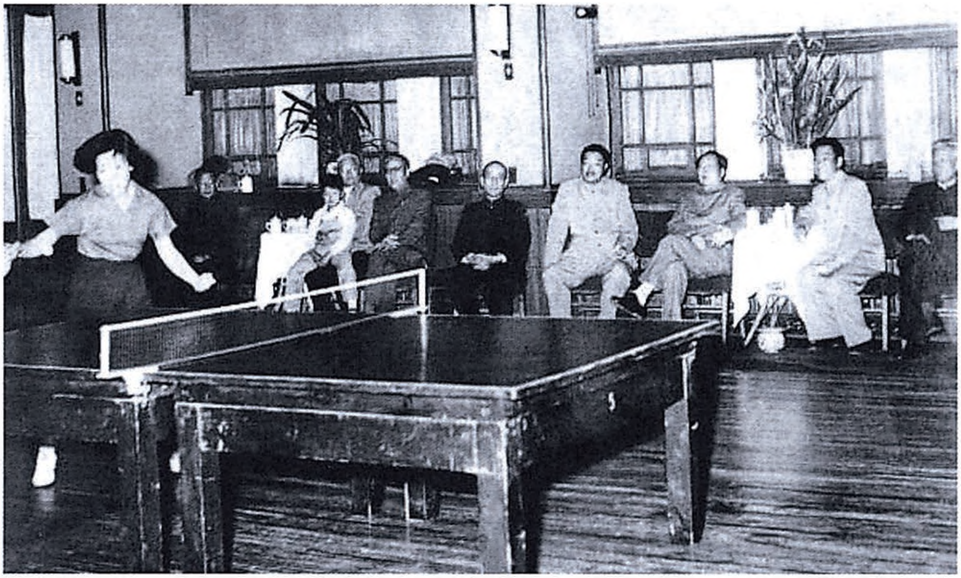
三

以上五条[1]，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

---

[1] 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指示稿的五条内容主要为：一、省、地、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做好麦收的一切准备，保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讨论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继续贯彻实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把群众动员起来，迅速掀起一个春播和夏收夏种的生产高潮。

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和参加乒乓球表演赛的优秀运动员合影。



1959年5月，毛泽东和刘少奇、贺龙、李富春等观看乒乓球运动员表演。

1959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乒乓球、排球、游泳、举重、田径等优秀运动员。图为毛泽东和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握手。

1959年5月，毛泽东和著名跳高运动员郑风荣握手。

1959年5月，毛泽东亲切接见世界冠军邱钟惠。

1959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打破百米蛙泳世界记录的运动员穆祥雄。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

（1959年5月7日）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索康、帕拉[2]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3]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多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

---

[1] 这是毛泽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詹东·计晋美等的谈话。

[2]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3] 西康，即西康省，1955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1]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2]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

---

[1] 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 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原为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甚至像刘文辉[1]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2]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3]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

---

[1] 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等职。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1959年时任林业部部长。

[2] 指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同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3] 铁棒喇嘛，是藏传佛教寺院僧职格贵的俗称。

治态度嘛！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薪巴”。）薪巴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薪巴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薪巴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薪巴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

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1]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2]、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3]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4]，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2] 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3] 指达赖喇嘛1959年3月11日、12日、16日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

[4] 指以达赖名义1959年4月18日和22日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

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1]，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2]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3]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

---

[1] 噶伦，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

[2] 阿旺嘉措（1894—1968），四川甘孜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1883—1968），青海循化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1903—1997），四川理化（今理塘）人，藏名洛桑泽旺，当时任甘肃省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3] 谿卡，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宗（相当于县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以下或相当于宗的农村基层组织名。基恰，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地区一级。

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全国各地你们都可以参观，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迟一些回去。总之，国家年年在变化，发展很大。今年是建国十周年，再有十年，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达赖对我们的同志说，他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他对陈毅[1]同志说，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有他们这些人，达赖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

---

[1]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对中央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5月7日）

一

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2]三同志商定的。

毛泽东

五月七日上午二时

---

[1] 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四是毛泽东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的一句话。毛泽东还为指示稿拟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标题。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这一指示。

[2] 李先念、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二

即送刘、邓、周、朱、林[1]阅，尚昆[2]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

三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

四

此事[3]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给社员分配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以便私养猪、鸡、鹅、鸭。经毛泽东修改后的指示稿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国庆的电报

（1959年5月8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十四周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过去一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目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满怀信心，为全面地实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一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热爱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十分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干涉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中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合作必将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从而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于北京

对中央转发湖北等省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59年5月8日）

即送刘、邓[2]阅，尚昆[3]办。

---

[1]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稿说，正确总结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将使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中央批转的文件有：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4月26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讨论纪要，河北省委5月3日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广东省委4月28日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指示稿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5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驻印使馆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

（1959年5月9日）

即送总理、陈毅[2]同志：

尼赫鲁[3]已表示歉意，对此事不要再追究了。再追究，印方必还是照样回答，我下文再不好作。请去电潘大使[4]，就此了事。

毛泽东

五月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1959年5月6日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给外交部的电报上。电报说，我们研究了印方关于此事的复照，并与驻孟买领事馆联系，再度核对了事实，建议向印方再度提出照会。理由如下：（一）印方复照称，毛主席肖像贴在孟馆墙上“只有一二分钟”，暴徒向肖像上投掷的只是“几个”西红柿和“两个”鸡蛋，显与事实不符。（二）印方复照称，警察在注意到暴徒侮辱行为时“立即干预并设法制止进一步的恶作剧”，亦非事实，系有意推卸责任。对此，似应向印方再度提出照会，着重指出其歪曲事实，并就印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表示我们的遗憾。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4] 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5月9日、11日）

一

即送刘、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

五月九日一时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5月3日关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边算账，边兑现，全面地、彻底地贯彻政策，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算账兑现后，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整个农村形势根本好转。政策兑现后，干部转变作风也开始兑现，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站在生产第一线；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解开和群众的疙瘩。干部过了三关后，轻松愉快，群众也心情舒畅，出现了一个扎扎实实的生产新高潮。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各省、市、区党委，并转地委、县委：

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

中央

1959年5月11日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1]

（1959年5月10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2]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3]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

---

[1] 这是毛泽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2]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3]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1]。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2]。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3]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4]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

[1] 1957年5月20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23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24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2]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1954年12月2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3] 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4] 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作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1959年，毛泽东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秘书长徐萌山亲切握手。

给周世钊[1]的信

（1959年5月10日）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时倚
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
此数语。

---

[1] 周世钊，又名东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正在北京参加1959年5月5日至14日举行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

中央转发孝感地委关于贯彻农业方面六个问题指示[1]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5月11日）

一

此件[2]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五月十一日

---

[1] 指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的党内通信。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5月9日批转的孝感地委关于贯彻毛主席对农业方面六个问题指示的反映给省委的报告。孝感地委5月7日的这一报告说，5月3日下午接到省委传达的主席指示后，正在开县委扩大会的11个县都在会上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干部群众反映热烈：（1）普遍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2）关于包产问题，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包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3）关于密植问题，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4）关于多种的问题，群众普遍欢迎，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5）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过日子就是要节约。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

二

即送刘、邓[1]阅，请尚昆[2]用电报发去，发到省、市、区党〔委〕一级。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分配自留地的规定的批语

（1959年5月11日）

一

此件[1]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五月十一日

---

[1] 指中共山东省委1959年5月8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的规定。这一文件说，根据中央指示，对自留地的分配问题，特作如下规定：一、自留地由社员个人使用经营，长期不动，用于种植饲料作物和蔬菜，供家庭饲养和食菜的需要。二、自留地标准，应按照中央规定的标准，即根据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人均占地的5%。三、为了迅速合理地分配自留地，应当宣布原来的自留地仍归原主经营。四、自留地应当留在村庄周围，以便于社员在休闲时间经营管理。五、原来的自留地，现在是集体经营的，可待收获后归还；或划归原主经营，收获后向集体归还工本费。六、社员应当首先服从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不能因经营自留地影响集体劳动。

二

即送刘、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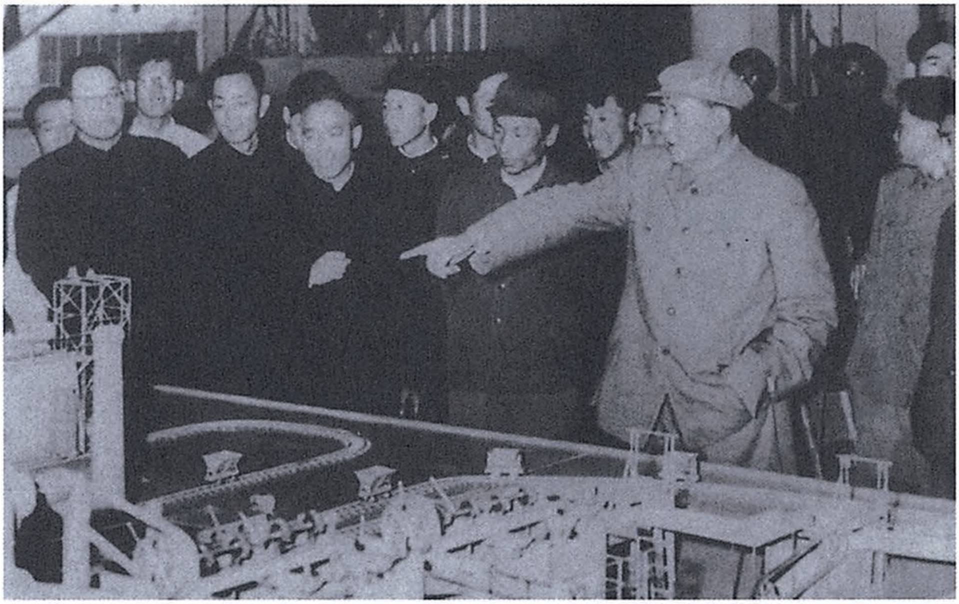
十一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59年5月11日，毛泽东参观河北省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革命展览会。



1959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工业展览会上参观秦皇岛市焦化厂红旗2号焦炉洗煤机模型。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1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5月13日、15日）
接见智利政界人士的谈话纪录（摘录）……………………………5
（1959年5月15日）
中央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农业指示的通知的批语…6
（1959年5月19日）
关于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的批语…………………………………8
（1959年5月21日）
对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批注………………………9
（1959年5月22日）
对江苏省重新布置钢铁工厂建设的批语……………………………11
（1959年5月23日）
对赵尔陆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3
（1959年5月30日、6月17日）
关于妥善解决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引起的矛盾问题的批语…………16
（1959年5月31日、8月5日）
转发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党委关于平叛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
的几点意见的批语……………………………………………………22
（1959年6月2日）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推广“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报告的批语 ………24
（1959年6月3日）
关于重印《逻辑指要》一书给章士钊的信 ……………………………26
（1959年6月7日）
对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当前算账和生产安排问题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30
（1959年6月）
同意陈云因病休养的批语 …………………………………………31
（1959年6月8日）
对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稿的批语 ………………………………………………………………33
（1959年6月9日）
对中央转发廖鲁言关于召开十四个城市蔬菜会议情况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34
（1959年6月9日）
转发兰州军区司令部关于五月份战果综合通报的批语 ……………35
（1959年6月10日）
对江苏涟水县一封来信的批语 ……………………………………36
（1959年6月10日）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 ………………………………37
（1959年6月11日）
对上海市委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40
（1959年6月11日、13日）
对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修改和代拟的补充指示稿 …………………………………………………………………44
（1959年6月）

对中央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的批语 ……………47
（1959年6月12日）
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问题 ………………………………………48
（1959年6月13日）
要政治家办报 ………………………………………………………52
（1959年6月13日）
对西藏工委关于进藏人员计划的批语 ……………………………55
（1959年6月15日）
中央转发陶铸关于从社员代表大会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56
（1959年6月17日）
关于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批语 ………58
（1959年6月17日）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 …………………………………………………59
（1959年6月20日）
转发张体学关于湖北分粮到户等情况汇报的批语 ………………60
（1959年6月20日）
转发洪学智、张国华关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61
（1959年6月20日）
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 ………………………………………………62
（1959年6月22日）
和毛宇居应对联 ……………………………………………………82
（1959年6月25日）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12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对新华社关于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准备工作的报道的批语……119
（1959年6月）

关于一九五九年市场供应情况的批注……………………………120
（1959年6月）
在关于印度和尼泊尔联合声明的报道上的批语………………121
（1959年6月）
对《参考资料》有关日本的几条消息的批语　……………………122
（1959年6月）
七律·到韶山　………………………………………………………123
（1959年6月）
七律·登庐山　………………………………………………………128
（1959年7月1日）
庐山会议讨论问题……………………………………………………132
（1959年7月3日）
发展副食品生产………………………………………………………136
（1959年7月3日、4日）
关于印发两篇论述经济工作的文章的批语…………………………140
（1959年7月4日）
粮食问题…………………………………………………………………142
（1959年7月5日）
对张闻天关于国际问题的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144
（1959年7月5日）
对章士钊来信的批语……………………………………………………146
（1959年7月5日）
印发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的批语……147
（1959年7月5日）
印发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的批语………148
（1959年7月5日）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49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报告的批语……………………150
（1959年7月10日）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51
（1959年7月10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八周年的电报…………………152
（1959年7月10日）
统一认识，搞好团结，承认错误………………………………………154
（1959年7月10日）
关于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给杨尚昆的信…………155
（1959年7月13日）
印发王青林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的批语 ………………157
（1959年7月13日）
对陕西省委召开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的批语…158
（1959年7月15日）
关于改变庐山会议人员分组办法的建议………………………………160
（1959年7月16日）
关于请彭真等来庐山参加会议给刘少奇等的信………………………161
（1959年7月16日）
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批语…………………………………164
（1959年7月16日）
转发兰州军区骑兵一师关于政治争取工作总结的批语………………167
（1959年7月16日）
对西藏工委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和周仁山关于边
境工作意见报告的批语…………………………………………………168
（1959年7月17日）

印发《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的批语………169
（1959年7月19日）
印发《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批语…………170
（1959年7月19日）
对一份关于苏联建设中遇到问题的材料的批语…………171
（1959年7月19日）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72
（1959年7月21日）
对国家计委商计局关于市场情况的研究材料的批语…………173
（1959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的电报…………174
（1959年7月21日）
印发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旧政权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76
（1959年7月22日）
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177
（1959年7月23日）
对《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的批语和修改…………191
（1959年7月24日）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93
（1959年7月26日）
对日本首相岸信介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的批语………201
（1959年7月27日）
在国务院秘书厅一份学习简报上的批语…………202
（1959年7月27日）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材料的批语…………203
（1959年7月27日）

关于编印逻辑学文集给康生的信……205
（1959年7月28日）

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206
（1959年7月29日、8月1日）

印发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等情况报告的批语……209
（1959年7月31日）

印发广东省委关于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材料的批语……210
（1959年8月1日）

给周小舟的信……212
（1959年8月1日）

给张闻天的信……214
（1959年8月2日）

印发河南、湖北两省关于抗旱情况报告的批语……216
（1959年8月2日）

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217
（1959年8月2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220
（1959年8月2日至17日）

关于庐山会议简报上应一律称同志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225
（1959年8月3日）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226
（1959年8月5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批语和修改……228
（1959年8月5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230
（1959年8月5日至17日）
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的批语………233
（1959年8月6日）
给刘松林的信…………………………………………………235
（1959年8月6日）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关于统一学员对人民公社认识的报告的批语　…237
（1959年8月7日）
对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稿的批语…………………………239
（1959年8月7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稿的批语…………240
（1959年8月7日至17日）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247
（1959年8月10日）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249
（1959年8月11日）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稿的批语………251
（1959年8月11日至16日）
给周小舟的信…………………………………………………253
（1959年8月12日）
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254
（1959年8月12日）
对辽宁省委关于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安排意见的批语…………256
（1959年8月12日）

对商业部党组关于支援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的批语……………257
（1959年8月13日）
印发鞍钢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经验的批语…………258
（1959年8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259
（1959年8月14日）
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 ………………………………………………261
（1959年8月15日）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62
（1959年8月15日）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265
（1959年8月16日）
关于枚乘《七发》 …………………………………………………269
（1959年8月16日）
一次讲话………………………………………………………………272
（1959年8月17日）
给赫鲁晓夫的信………………………………………………………275
（1959年8月17日、21日）
对张闻天来信的批语…………………………………………………277
（1959年8月18日）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信…278
（1959年8月19日）
对卡斯特罗关于发展中古关系的建议的批语…………………………280
（1959年8月19日）
中央转发青海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简报的批语……………………281
（1959年8月19日）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282

（1959年8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283

（1959年8月22日）

《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文章 ……………………………285

（1959年8月23日）

对黄克诚来信的复信和批语……………………………………286

（1959年8月24日）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288

（1959年8月24日、9月14日）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简报的批语……………292

（1959年8月30日）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94

（1959年8月30日）

对吴冷西报送的八届八中全会宣传计划和人民公社调查情况简报的批语……………………………………………………………296

（1959年8月31日）

印发《关于公社问题的材料》的批语……………………………297

（1959年8月31日）

在北京市委关于京郊涝灾和抢救情况报告上的批语……………298

（1959年8月）

关于阅看《人民日报》两篇文章给林克的批语…………………299

（1959年8月）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 …………300

（1959年9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302
（1959年9月1日）
在李富春关于国家计委等单位最近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304
（1959年9月2日）
转发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305
（1959年9月2日、3日）
中央关于团结一切在我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的指示…………………………………………………………………307
（1959年9月4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308
（1959年9月4日）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310
（1959年9月4日）
关于请班禅来京参加国庆问题的批语………………………………311
（1959年9月4日）
在西藏军区关于印军入侵雅斜儿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312
（1959年9月4日）
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313
（1959年9月4日）
关于发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报纸对我八届八中全会报道情况的批语…314
（1959年9月4日）
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316
（1959年9月5日）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第二次简报的批语…………………………………………………………………317
（1959年9月6日）

在反映有些省市揭发本地区个别高级干部右倾言行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319
（1959年9月6日）
对苏联《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的批语……320
（1959年9月6日）
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321
（1959年9月6日、10日）
关于请郭沫若修改《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胡乔木的两封信……324
（1959年9月7日、13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电报……326
（1959年9月8日）
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328
（1959年9月9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331
（1959年9月11日）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333
（1959年9月11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工业交通进展情况报告的批语……341
（1959年9月12日）
对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的批语……349
（1959年9月14日）
在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351
（1959年9月14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352
（1959年9月14日）
为北京火车站题名……354
（1959年）

关于肃反工作的一个批语……357
（1959年9月18日）
在驻阿联使馆关于非洲人士对中印关系问题看法的电报上的批语……368
（1959年9月30日）
在吴冷西关于充分报道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反应的报告上的批语……369
（1959年9月）
在肖华关于沈阳军区翻印毛泽东有关内部讲话的调查报告上的批语……371
（1959年9月）
反对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372
（1959年10月1日）
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388
（1959年10月2日）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390
（1959年10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397
（1959年10月5日）
关于中印关系和达赖喇嘛回国问题……399
（1959年10月6日）
在四川省委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01
（1959年10月6日）
关于审阅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问题的批语……403
（1959年10月6日）
在薄一波反映家乡人民公社情况的来信上的批语……404
（1959年10月8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解决水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05
（1959年10月10日）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406
（1959年10月11日）
对陈伯达《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的批语…408
（1959年10月11日、16日）
对石油部党组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报告的批语…410
（1959年10月13日）
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问题的批语………………………………………411
（1959年10月13日、15日）
关于推迟召开全国计划会议问题的批语……………………………413
（1959年10月15日）
对中央转发湖南整社试点经验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14
（1959年10月15日）
对福建省委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简报的批语…………417
（1959年10月16日）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418
（1959年10月18日）
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421
（1959年10月22日）
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的批语…………………………425
（1959年10月22日、23日）
关于研究广东对部分副食品实行派购办法的批语…………………427
（1959年10月23日）
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428
（1959年10月26日）
中央印发浙江省委关于各县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433
（1959年10月27日）

在驻苏使馆关于赫鲁晓夫海参崴讲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40
（1959年10月）
对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文情况报告的批语……442
（1959年10月）
在驻罗马尼亚使馆关于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问题的报告上的批语…443
（1959年10月）
对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的消息的批语………………444
（1959年10月）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　………………………………………445
（1959年10月）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447
（1959年10月、12月）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电报……………453
（1959年11月6日）
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尼赫鲁的信稿的修改……………456
（1959年11月7日）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关于财贸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457
（1959年11月10日）
给柯庆施的信………………………………………………………459
（1959年11月15日）
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给周恩来、彭真的信………………460
（1959年11月16日）
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462
（1959年11月19日）
关于随时选送有重要材料性文件的批语…………………………463
（1959年11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464
（1959年11月28日）
关于请彭德怀阅读有关文章的批语……………………………………466
（1959年11月28日）
对李先念在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给中央报告的批语…………………………………………………………467
（1959年11月30日）
对一九六〇年钢的增产量的估计………………………………………469
（1959年11月30日）
对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斗争情况等三个材料的批语………………470
（1959年11月）
介绍王国藩人民公社……………………………………………………471
（1959年12月2日）
关于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472
（1959年12月3日）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473
（1959年12月）
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477
（1959年12月）
对《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一文的批语……………………………………………………………………480
（1959年12月）
对广东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等三个材料的批语………481
（1959年12月）
在《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上的批语…………………………………483
（1959年12月）

对两篇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材料的批语……484
（1959年12月）
对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在河北、河南两省参观的报道的批语…485
（1959年12月）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的批语……486
（1959年12月）
为查《焚书坑》一诗作者给林克的信……487
（1959年12月11日）
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488
（1959年12月16日）
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语……490
（1959年12月19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情况报告的批语……492
（1959年12月20日）
对冶金部关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的批语……494
（1959年12月）
对四川江油县银行工作经验的批语……495
（1959年12月）
对山西省委关于干部整风运动进展情况报告的批语……496
（1959年12月）
对波兰《政治周报》主编谈波兰党内《令人不安的问题》材料的批语……497
（1959年12月）
对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收支情况调查等两个材料的批语……498
（1959年12月）

对《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文的批语……………………500
（1959年12月）
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501
（1959年12月27日）
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生猪发展情况报告的批语…………………………503
（1959年12月27日）
在一份介绍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材料上的批语…504
（1959年12月27日）
给钟学坤的信……………………………………………………………505
（1959年12月29日）

对中印关系问题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5月13日、15日）

一

加了一段[2]，是否妥当，请加考虑，或者会谈一下。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上午四时

二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外交部对于1959年4月26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先生的谈话的答复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一答复稿上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三、四是毛泽东为印发并向有关方面通报杜德的谈话稿和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稿这两个文件而写的批语。

[2] 即本篇二。

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1]，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

---

[1] 1954年9月8日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同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即《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也叫《马尼拉条约》。条约声言要用“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条约附有美国提出的《谅解》，说它对于“侵略和武装进攻的意义”“只适用于共产党的侵略”。其实质是美国干涉东南亚国家内政，镇压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称霸太平洋的一个工具。1955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2年11月8日，巴基斯坦宣布退出。1977年6月30日，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1]先生。

三

即退周、陈[2]阅办。

毛

十五日

四

总理、陈毅同志：

请考虑将印外交部4月26日来文[3]，我外交部5月16日去文[4]，发各驻外使馆、国内各省、市、区党委（西藏工委在内），另印发在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指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稿。

[4] 指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话稿的答复稿，正式印发日期为1959年5月16日。

京各同志如前示，使他们了解中央对中印关系的方针。另叫潘大使[1]找高士[2]同志阅读这两个文件一二遍，或径找给之。另召集兄弟国家大使在一处，向他们宣读、讲解一遍这两个文件。是否可行，请酌处。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下午六时

另叫陈家康[3]找尼赫鲁大使[4]向他宣读二文件，可缓三几天。

---

[1] 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2] 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

[3] 陈家康，当时任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

[4] 指前任印度驻华大使拉·库·尼赫鲁。

接见智利政界人士的谈话纪录（摘录）

（1959年5月15日）

教人是很好的事情，跟学生保持关系，是很愉快的，特别是当大学教授。要研究学问，就要当教授。

我有几篇哲学著作，就是因为教书需要我写，我才写的。因此当教授是好的。要备课，就要自己写讲稿，不用人家的课本最好。学生逼你上课，你总要贩卖一点东西。我现在还想当教授，现在正如你们所说的，我的知识增加了，可能当教授，或是讲师或是助教。

中央转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执行中央农业指示[1]的通知的批语

（1959 年 5 月 19 日）

一

这个文件[2]有参考价值，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5月7日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

[2]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1959年5月14日给各盟市委、旗县委并报中央的这一报告说，自治区党委讨论了毛主席关于农业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和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后，认为完全符合内蒙古地区的情况，各地必须坚决执行。对于几个具体问题规定如下：一、关于扩大播种面积问题。要尽量扩大农田播种面积，争取大面积丰收，提高总产量。要按照“八字”方针，订出各项增产措施，妥善安排劳动力。二、关于包产问题。包产既必须实事求是，又必须鼓足干劲，把指标订立在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基础上。三、关于喂养猪鸡鹅鸭和分配自留地问题。要宣传中央关于集体和家庭养猪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社、队应扶助社员养猪，完成任务后，宰、卖自由。自留地应在五月份安排到户。

二

刘、邓[1]阅，尚昆[2]办。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讨论北京市场供应问题的批语

（1959年5月21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阅，请书记处召集北京市委，对市场供应问题，讨论一次，如何？

毛泽东

五月廿一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1959年5月19日编印的《简报》第四十一期上登载的《目前市场的一些情况》，这个材料反映了北京市场供应比较紧张的情况。

对李先念[1]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2]的批语和批注

（1959年5月22日）

一

小平[3]同志：

---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59年5月3日下午在全国财贸书记会议上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主要内容是：第一，关于粮食调运问题。三季度粮食调出计划，各地必须坚决完成，不能推迟。第二，关于农村夏季粮食分配问题。在秋粮收获以前，农村每人留用夏粮，一般按照一百斤左右计算。第三，关于夏季粮食收购问题。国家应尽可能多购一些粮食，但不能收过头粮。第四，关于粮食销售问题。在城市，经过压缩以后的销售水平，在秋收以前不再提高；在农村，新粮登场后，国家基本上不再销售。粮食销售历来放易收难，因此秋冬紧一点，青黄不接季节就好过，工作就主动。这是一条重要经验。第五，关于粮食库存问题。省里挖了中央的库存粮食，要用中央规定的包干差额以外的粮食弥补。第六，关于储备问题。今后除正常的周转库存外，中央和省都必须搞点储备。第七，关于通过公社搞好购销问题。粮食购销都应该通过公社，指标基本分配到队，公社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第八，关于出口问题。粮食出口任务第一、二季度没有完成的，要加在第三季度的任务内一并完成。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此件请用中央名义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照办[1]。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

二

毛注：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2]

---

[1] 195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将李先念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 李先念的报告中讲到："四川提出工农商并举，我认为有一定道理。"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对江苏省重新布置
钢铁工厂建设的批语[1]

（1959年5月23日）

少奇、小平同志阅，请小平与陈云、王鹤寿[2]两同志商量，用

---

[1] 国家计委委员范慕韩等1959年5月16日给计委党组并李富春主任写信说，我们到江苏各地了解钢的生产情况后，感到江苏省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建设完成得不够好，最根本的问题是基本建设铺得太大、太多，未能集中有限的力量一个个地上，因而6个新建钢铁厂现在都还是“半拉子”，不能开始生产。现在江苏省委对这6个钢铁厂的建设已经重新作了布置：先保证把常州钢铁厂尽早配套投入生产；在上海帮助下把南京钢铁厂和无锡钢铁厂配好套，争取在7月份投产；其他3个钢厂暂停建设，把已有设备调剂给上述3个厂使用，下半年看情况再考虑这3个暂停厂的安排。我们认为江苏这样做是正确的。集中力量，保证钢铁厂一个一个地上，而不是一拥齐上，会大大减轻建设和配套的压力，也有利于保证钢的增产。这种情况并不是江苏省独有的，看来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各省钢铁厂的建设安排，真正做到缩短战线，集中力量，这是保证今年钢产量的有效措施。李富春5月22日将这封信转报中央、毛泽东，并附信指出，他认为江苏省委决心对钢铁工厂的建设采取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合理布点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建议冶金部帮助其他有类似情况的省市也采取这一措施。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央名义将江苏办法，通知各省、市、区仿照办理[1]。

毛泽东

五月廿三日

---

[1] 邓小平1959年5月26日代拟了中共中央指示，将李富春的信和范慕韩等的信一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对赵尔陆[1]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2]的批语

（1959年5月30日、6月17日）

---

[1] 赵尔陆，当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2] 赵尔陆的这一报告主要讲了以下三个问题：一、关于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问题。当前国民经济出现的一些脱节、失调现象，主因是计划指标高了。从工业方面讲，首先是钢铁指标定高了。钢铁指标一高，各方面都跟着高上去。各方面的要求分开看，似乎都可能达到，但加起来就超出了客观可能性。工业生产是一个大协作，各工业部门和整个工业内部，都是彼此依赖、互相制约的。因此，计划的制订必须有细致的综合平衡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看出计划指标是否适中，能否实现，才能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原则发展。在安排生产时，根据国家需要，保证重点是必要的，但重点也只能体现在一个年度或更长一些的计划中，孤立地保证重点，重点也突不上去。综合平衡工作，是一个反复过程，必须逐级做起。二、工业产品数量、品种和质量的统一性问题。当前这三者之间有畸轻畸重和脱节的现象，一般是重视数量而忽视品种和质量。其实这三者是联系着的，不能单纯强调一面，忽视一面。当前是否可以这样提，即争取在一定数量基础上，要求即或少些，也要全些，也要好些。三、关于制造和修配问题。修理和制造固然不能截然分开，但在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形成一个维护和修理系统。过去制造和修理之间有脱节现象，必须加以弥补。

[3] 本篇一写在赵尔陆1959年5月26日关于重工业生产建设方面几个问题的意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本篇二、三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6月15日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的这一报告上。

一

此件好，有相当的说服力，是一个工业界有了改进的文件，可以一读。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觉得头痛，没有逻辑（内部联系），没有论证，因而没有说服力的文件，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二月六日修改发出的那个今年计划的文件）[1]，是一个坏透了的文件，没有内部联系，没有合理论证，已经证明毫无用处。写这样文件的同志，根本不用脑筋，对于事物根本不懂，是个计划经济的外行，对所谓有计划按比律〈例〉的发展国民经济法则，一窍不通，今后应当认真改正。多想多读，多谋善断。谋之于主席、副主席、总书记，谋之于秘书、部长助理、副部长、司局长，谋之于省地县社直至生产小队长，谋之于反对派即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一点很要紧。就是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工作。这类不会做工作的同志，在全国可能有半数以上。特别坏的，可能有百分之二三十。这是一个大教育工作，期以十年，可能相当做好我们国民经济。我写这些，言重了一些，但是我认为必须说，应当说。我必须在这种时候，不怕得罪一大批同志，否则事情不好办。我不向同志们封锁我的意见，同志〔们〕对我封锁，我是大不高兴的，过去的封锁，必须改正。

毛泽东
1959年5月30日

---

[1] 指国家计委党组1959年1月25日提出、2月6日修改发出的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

二

此件写得很好。除已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外，加发中央各经济部门党组和各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
1956年6月17日

三

刘、彭真[1]阅后，尚昆[2]办理。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妥善解决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引起的矛盾问题的批语

（1959年5月31日、8月5日）

一

少奇、小平[1]同志阅后，送交水利部党组书记李葆华同志：

请水利部考虑派一位副部长级、有政治头脑、又有技术经验的党员同志，携此文件[2]去济南先找谭震林[3]同志（谭现在在济南），同他商量一下，因为这件事是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时由谭与曾希圣、吴芝圃[4]三同志会商决定的。然后去合肥，与曾希圣同志商量一下，然后去临淮冈现地加以调查，看情况究竟是否确如淮滨县同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淮滨县委、县人委关于安徽修筑临淮冈拦河水库不按标准施工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说，河南省淮滨县位于淮河中游，地势低洼，解放前洪水为患，解放后水患解除，群众歌颂为二次解放。安徽这次于临淮冈修筑拦河水库，不按主席曾经批示过的标准施工，工程设计超过原定规定，将会扩大中上游淹没区，使淮滨县蒙受重大损失，群众极为忧虑。电报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要求和条件，并强调水库蓄洪水位不得超过原定的25.3米。

[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志们所说那样，如果有必要召开会议的话，就召集两省水利当〈厅〉局级或副省长级各一人，淮滨县、临港县、临淮冈水利工程局各来一二人，开会妥为解决。

毛泽东
五月卅一日

二

尚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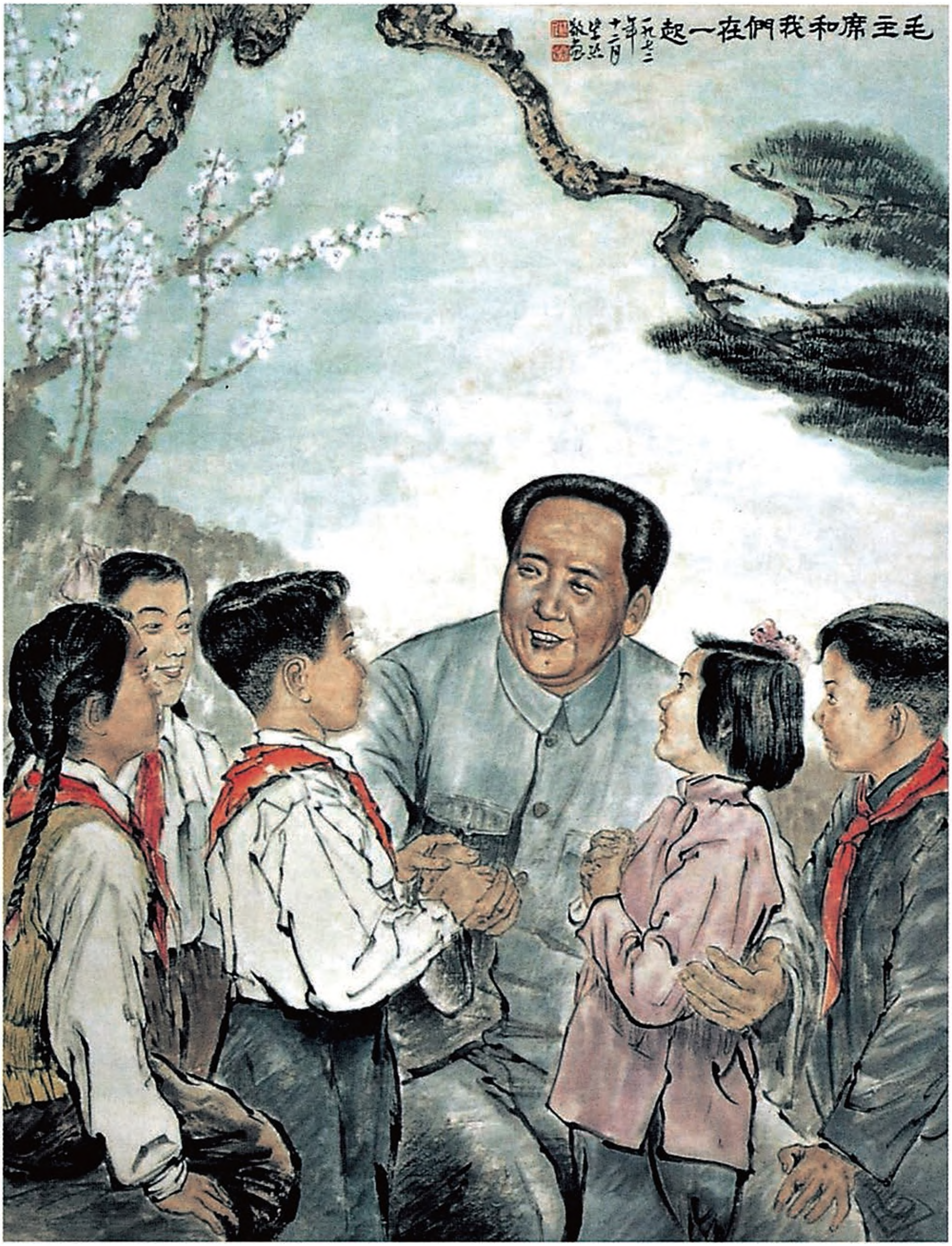
此件[2]应抄一份给吴芝圃同志。

毛
八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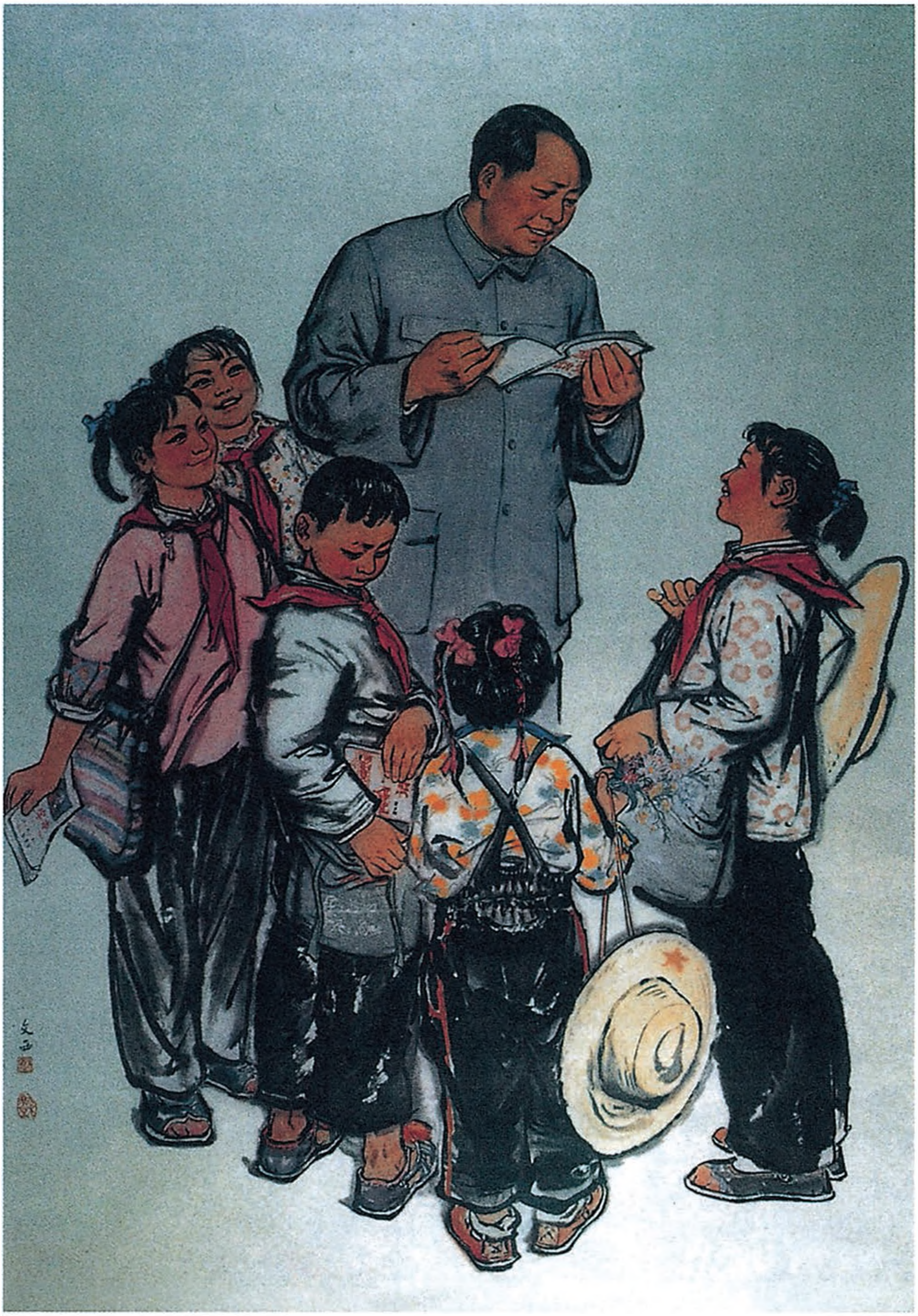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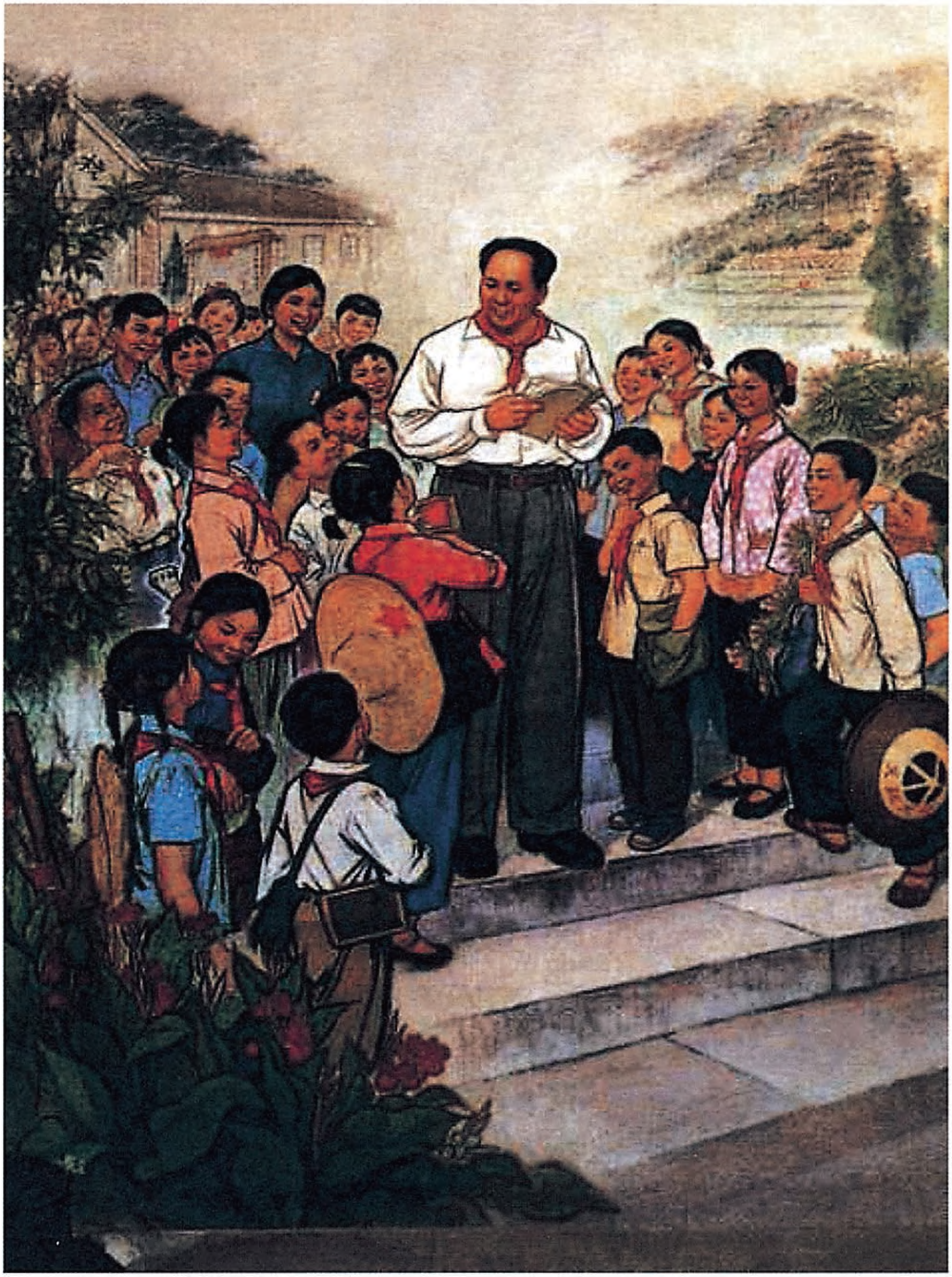
[2] 指中共安徽阜阳地委1959年7月2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省委转来河南省淮滨县委给主席的报告，水利电力部又决定要推迟建设临淮冈水库，因此将我们的意见和要求向你作一个报告。淮滨县给主席的报告中，提到水库的蓄洪水位不能超过25.3米。若如此，即使像1954年的洪水都能把水库冲垮，更不要说比这更大的洪水了。因此我们认为淮滨县委的报告是不合理的。至于水利电力部决定推迟修建工程，我们认为是没有理由的。这样做，在经济上和生产上都会带来极大的损失，也不好向群众做解释工作。此后，1959年10月15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安徽省委并河南省委的指示中指出，临淮冈水库工程问题，在庐山已经初步谈过，最近水电部又召两省同志交换了意见，对修建这一水库并使之具有相当防洪能力，取得了一致意见。现在争执的是水位如何确定的问题。为不耽误工程进行，我们同意安徽省可以在今冬按原设计修建控制水闸，并留出扩建的地方。在蓄洪水位未达成协议前，土坝坝顶应不超过25米。


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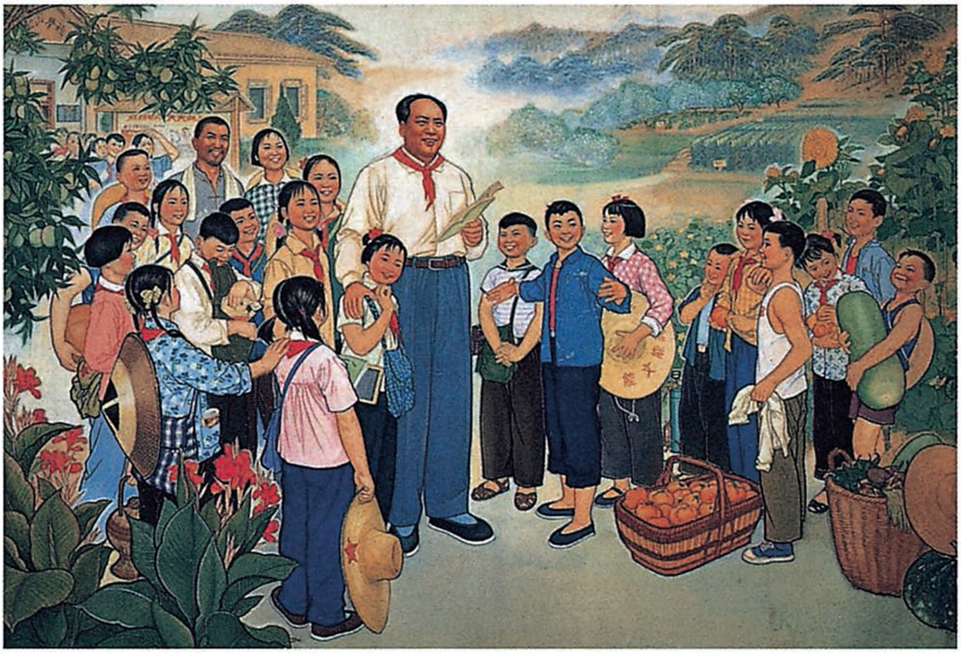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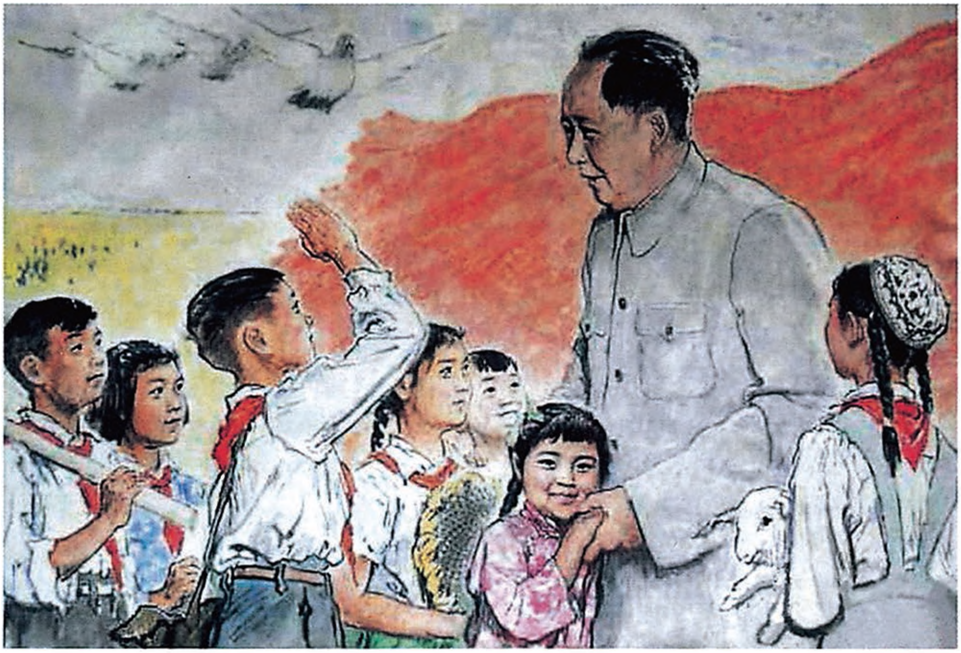
《关怀》（中国画）



《向毛主席汇报》（中国画）



《向毛主席汇报》（中国画）



《向毛主席汇报我们的成绩》（中国画）

转发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党委关于平叛中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批语[1]

（1959年6月2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部1959年5月28日转发的青海省军区海南指挥部党委关于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平叛、生产两大工作的安排问题。凡平叛任务较大的地区，应以平叛为主，在此前提下安排生产；叛乱基本平息但仍有残匪地区，应以生产与平叛并重；叛乱完全平息地区，在抓生产的同时，也要进行平叛斗争的宣传和阶级教育，积极做好支前工作。总之，不论以生产为主，还是以平叛为主，二者都应该统一起来，互相促进。二、关于对降、俘之敌的政策问题。（一）对投诚叛匪与战场俘虏应有严格的不同对待。（二）除阴谋叛乱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般最好不捕；非捕不可时，也要明捕、少捕，减少社会震荡。（三）尽快作一次案件清理工作，将错捕错判纠正过来，恢复和扩大政策影响。（四）案件检查应以改正错误、教育干部为目的，只对情节恶劣、错误严重的个别人才作组织处理。三、关于发动群众对敌斗争的问题。广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实质上就是争取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目前必须注意：（一）关心群众生活；（二）加强群众政治思想工作；（三）改善基层干部作风；（四）允许群众进行公开正当的宗教活动，尊重藏民风俗习惯。

一

克诚、谭政[1]同志：

海南指挥部党委这个文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有深刻的指导意义。请你们用军委名义转发西藏、成都、昆明三军区党委，并转所属平叛部队党委及地方党委，结合当地情况，加以研究，采纳施行。

毛泽东
六月二日

二

此件**先送**少奇、小平[2]同志阅，再送克诚办理。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谭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转发辽宁省委推广“包米食用增量法”经验报告的批语

（1959年6月3日）

一

各省、市、区党委：

辽宁这个经验[1]，可供你们研究和试行。并请你们研究，别的粮食是否也可以采用辽宁对包米那样的做法。在研究、试验和推广任何新办法的时候，一定要预先防止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

中央

1959年6月3日

---

[1] 指中共辽宁省委1959年6月1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关于黑山县创造“包米食用增量法”的经验。辽宁省委的报告说，黑山县大虎山卫星人民公社三台子管理区副业队食堂创造了一种“包米食用增量法”，就是先把包米煮到约六成熟，然后磨成汤子面，再做成饽饽和各种饭食。其好处是：(一) 提高了包米出饭量，节约了粮食。(二) 提高了包米饭的质量和营养价值。(三) 讲究卫生，好消化，饭食花样多。(四) 保证社员吃饱吃好。

二

刘、邓、林、彭真[1]阅，尚昆[2]办。

毛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重印《逻辑指要》一书[1]给章士钊的信

（1959年6月7日）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悉，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2]而增感，欲翻然而变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箸，为之筹策：

《逻辑指要》一书是一九一七年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举，拙作在征求之列。于是以一

---

[1] 《逻辑指要》是章士钊1917年的旧著，1943年在重庆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经修订于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章士钊1959年5月曾为此书写过一篇再版序言（后未采用），谈到该书再版的由来时说：“北京解放后，一日，主席毛公忽见问曰：‘闻子于逻辑有著述，得一阅乎？’予蹴躇答曰：‘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吾以此上呈一览，是侮公也，乌乎可？’公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 可能指金岳霖写的《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一文，载于《哲学研究》1959年第五期。金岳霖的《逻辑》一书也列入《逻辑丛书》，196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中收进了这篇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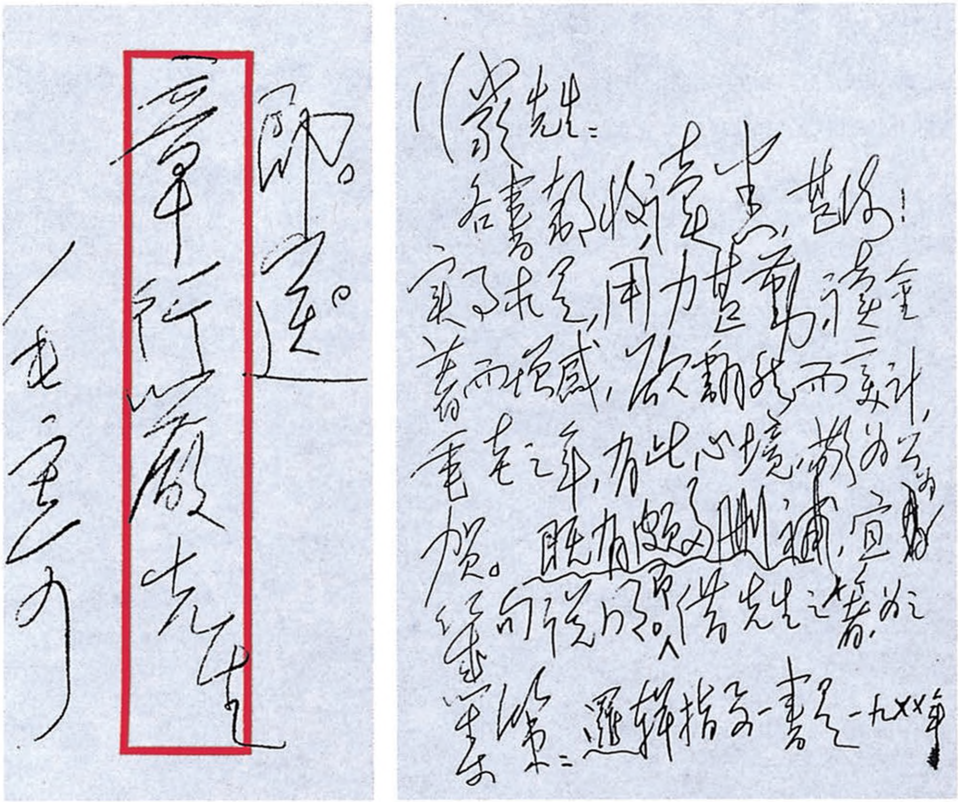
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臆核颇为吃力。全稿计削去不合时宜者大约二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只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稍感兴趣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学的范围及其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甚盛事也。鄙人对此，未能参战，然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今各派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读者对拙作有所批判，保卫正确论点，指出纰谬地方，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高兴这样办，我的建议作罢。

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前书未复，方以为歉。忽得六日信，极为高兴，倚枕奉复，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4〈6〉月7日，上午八时



面送

章行严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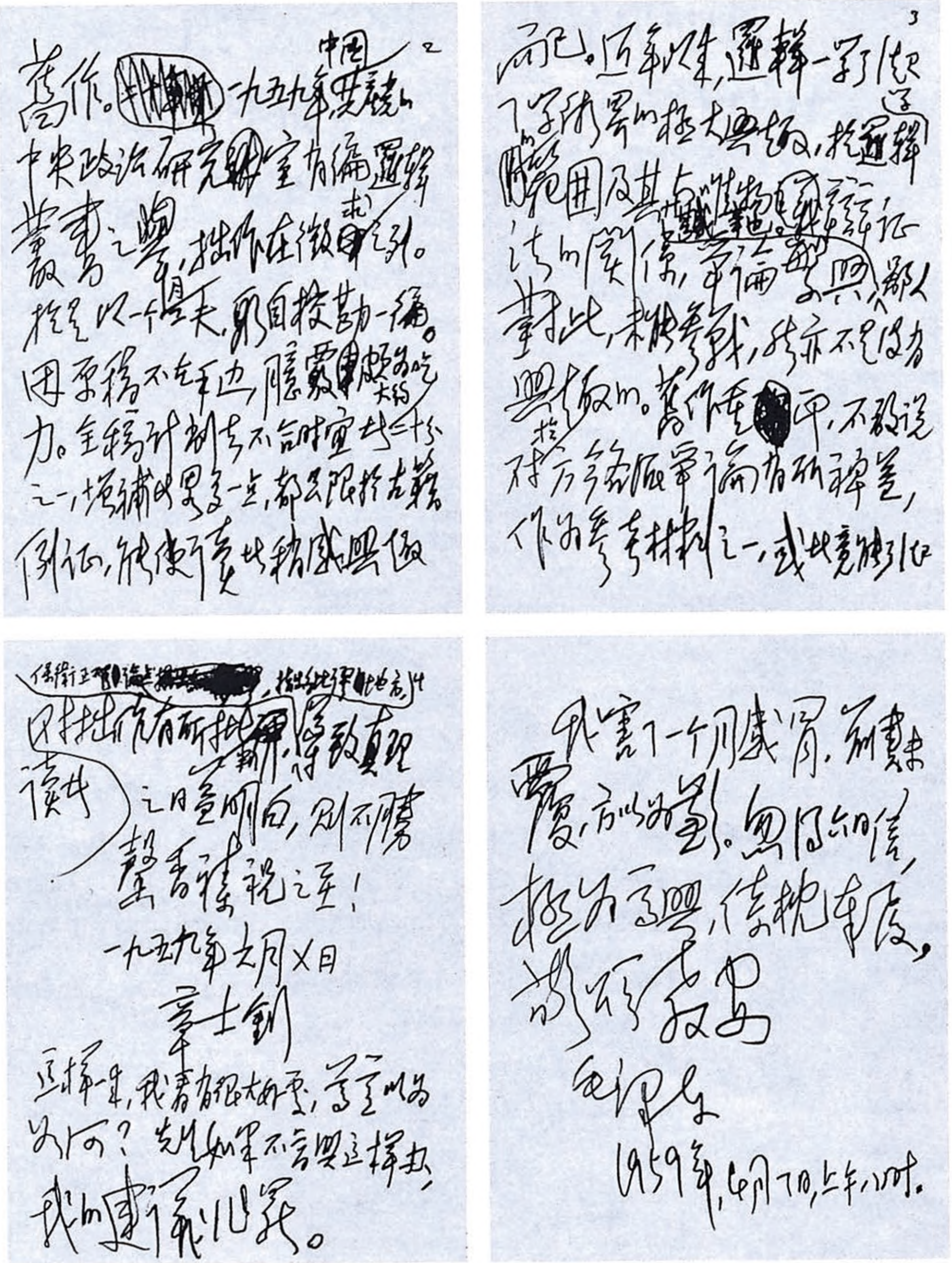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行严先生：

各书都收读，甚谢！实事求是，用力甚勤，读金著而有感，欲翻然而改计，垂老之年，有此心境，敬为公贺。既有颇多删补，宜[illegible]几句说明。[illegible]借先生之著[illegible]

[illegible]第二：逻辑指要一书之一九××年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2

旧作。一九五九年中国中央政治研究室有编逻辑丛书之议，拟作在徵求之列。於是以一个月工夫，躬自校勘一遍。因原稿不在手边，颇为吃力。全稿计删去不合时宜者大约十分之一，增补者略多一点，都是限于古籍例证，能使读者于此稍感兴趣

3

而已。近年以来，逻辑一学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于逻辑的范围及其与辩证法的关系，争论繁兴，鄙人对此，未能参战，我亦不是没有兴趣的。旧作重印，不敢说对于方兴的争论有所裨益，作为参考材料之一，或者竟能引起

4

读者对拙作有所批评，导致真理之日益明白，则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一九五九年六月×日

章士钊

这样一来，我看有很大好处，尊意以为如何？先生如果不赞成这样办，我们还可以商量。

我害了一个月感冒，刚才起来，所以迟覆。急忙作信，极为草率，[illegible]，

敬颂

教安

毛泽东

1959年6月7日上午八时。

毛泽东致章士钊的信的手稿。

对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当前算账和生产安排问题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59年6月）

即送刘、彭真[2]阅后，尚昆[3]用电报发去。

---

[1] 中共甘肃省委1959年6月2日给中央并毛泽东写报告说，目前我省的算账工作正在全面铺开，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我们充分认识到算账问题的重要性。省委认为有必要在6月份继续扎扎实实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全民算账的群众运动，用党的政策兑现洗去农民心头的不满，用深入的政治工作恢复群众对我们的信任，扭转当前的紧张局面。关于生产方面，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坚决、认真地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和毛主席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党内通信，迅速地把党的有关具体政策贯彻下去。6月3日，甘肃省委又向中央报送了临洮县算账成效显著，18天内粮食供应量逐日下降的情况报告。6月8日，中央将甘肃省委的这两个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出甘肃省委的意见是对的，这种按照本省实际情况办事的精神应该提倡。至于一省之内，由于各专区、县、社的情况不同，办法也可以不同，不必强求一律。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中央这个指示稿上。

[2]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意陈云[1]因病休养的批语[2]

（1959年6月8日）

一

刘、邓、彭真、周[3]、陈云同志阅，存尚昆[4]处。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职务由李、宋代理是适当的。

毛泽东

六月八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2] 陈云1959年6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写信说，他因病躺了两个星期，现稍能走动但说话困难，医生认为要三个月才能有所恢复，他拟同意休养三个月，并提议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职务由李富春代理，国家建委主任职务由宋劭文代理。本篇一是对这封信的批语。陈云在信中还谈了准备同意离京休息三个月的考虑和在离京前拟找财经小组几位同志谈一下市场问题与明年计划的方法问题的打算。本篇二、三是对这两个问题所作的批注。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指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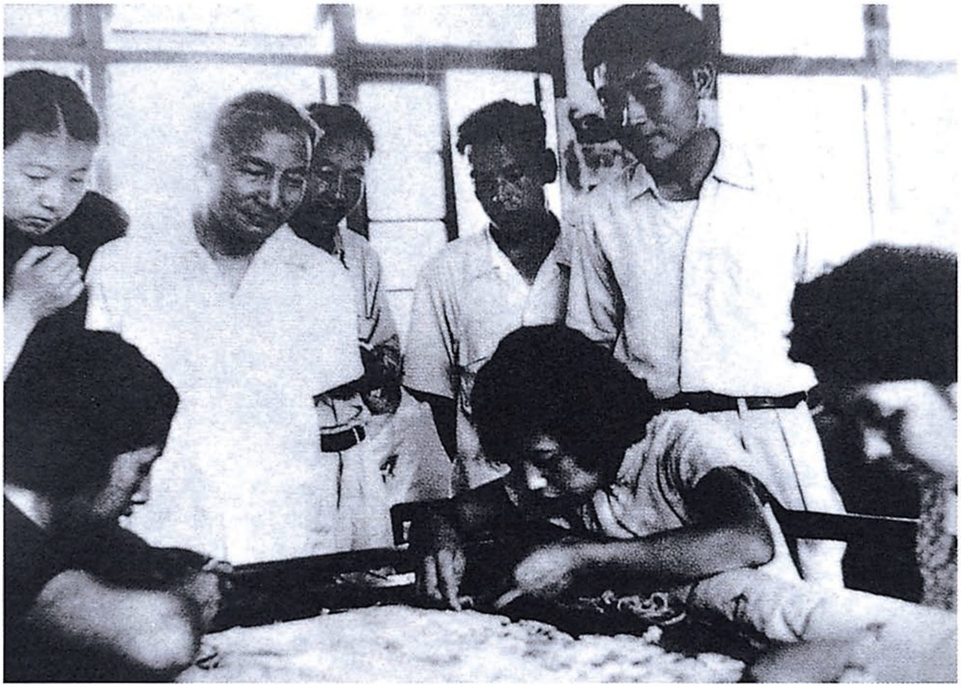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放心休养，不要顾虑。

三

说话困难，不谈为宜。



1959年五六月间，毛泽东采纳了陈云的建议，进一步压缩钢产量指标，将1959年钢产量指标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图为1959年夏天的陈云。

对中央关于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的通知稿[1]的批语

（1959年6月9日）

少奇同志阅后，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泽东
六月九日

---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陈正人为中央代拟的这一通知稿说，中央决定于6月18日在上海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会议，研究郊区农副业生产方针、如何更迅速有效地达到副食品供应自给、半自给以及如何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等问题，请各市委第一书记、市委农业书记及管手工业的同志一人到会，会议定为五至六天。毛泽东对这一指示稿进行了修改，主要是加入了关于手工业生产问题的内容。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转发廖鲁言[1]关于召开十四个城市蔬菜会议情况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2]

（1959年6月9日）

少奇同志阅后，尚昆[3]用电报告『告』发去。

---

[1]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2] 廖鲁言1959年6月3日给毛泽东、中央写报告说，5月底召集了北京、上海、天津等14个城市的蔬菜会议，了解到城市蔬菜供应仍然紧张，需要继续做好以下工作：（一）近郊区的农业生产方针应“以菜为纲”。（二）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标准能保证每人每天一斤，就算很好了。（三）要注意从土地、劳动力、运输条件、种子、水源等方面来落实城市蔬菜生产计划。（四）城市商业和农业部门应组织有关方面订立蔬菜产供销合同，共同保证按合同供应生产资料。（五）蔬菜供应机构的从业人员不能太少。（六）有些销行全国和外销出口的名菜，要专门组织生产基地。（七）猪、鸡、鹅、鸭、鱼、虾的生产必须尽力发展。1959年6月9日，中央将廖鲁言的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各大、中城市市委，指出报告所提各项意见是正确的，希望各地切实抓紧夏菜和秋菜的生产，抓紧副食品的生产，做好产供销工作，力求早日缓和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局面。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中央这个指示稿上。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转发兰州军区司令部关于五月份战果综合通报的批语

（1959年6月10日）

克诚[1]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西藏、昌都、成都各地，请酌处。

毛泽东

六月十日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兰州军区司令部1959年6月6日的这一综合通报说，5月份全区各平叛部队共作战□□□次，歼敌□□□□名，其中招降和战场投降的叛乱武装占歼敌总数的50%。这说明叛乱武装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内部矛盾日益加剧，只要我们能够抓紧政治争取工作，就能将大量叛众争取回来；对于有些叛首，经过反复交待政策，解除思想顾虑，也是可以争取其投降的。

对江苏涟水县一封来信[1]的批语

（1959年6月10日）

转寄江苏省委江渭清[2]同志一阅。

毛泽东

六月十日

---

[1] 指《中国青年报》编辑部1959年6月8日转达的江苏省涟水县一位化名东风的读者的来信，信中反映了当地农村“大跃进”以来弄虚作假，干部作风恶劣，农民生活困难，学生生活下降，耕牛减少，肥料不足，劳动力缺乏等实际情况。

[2] 江渭清，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1]

（1959年6月11日）

中国是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工农业水平不高，有许多人是文盲。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组织自己的经济，积极做提高人民文化水平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工业，使农业用机器装备起来。现在工作才开始做，仅仅是开始。至于做出成绩来，那需要时间，需要朋友的帮助，不是很短时间内所能做到的。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要提高经济、文化水平，建设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现在提出了“多、快、好、省”这个建设经济、文化的口号。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想很快是吹牛皮，你们不会相信，我也不相信。比如走路，总要花些时间。我们已经干了十年了，但是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工业才这么一点，农业还是手工业式的，也许再有十年才会有些进步。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日

---

[1] 这是毛泽东和秘鲁议员团谈话的一部分。

本是亚洲国家，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同他们打过仗，最近关系也不大好，但是人民间的交往还是有的，现在还有日本民间代表团在中国访问。虽然中国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日本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两国人民还是互相来往，人民间互相来往很自由、很自然。有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派代表团去南美洲访问你们国家的。

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怎么搞工业，比如炼铁、炼钢，过去就不大知道。这是科学技术，是向地球开战，当然这只是向地球上的中国部分开战，不会向你们那里开战。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

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真正认真搞经济工作，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1]。我就是一个。去年八月前，主要不是搞建设，而是搞革命。许多同志都是这样，把重点放在革命、社会改革上，而不是放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在与自然界作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是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美国炼的钢含硫量是0.04%，我们只有个别地方炼的钢含硫量达到0.037%，大部分地方炼的钢质量不好。这是新问题，不能调皮，要老老实实学习。如果粗心大意、调皮、充好汉，一定会跌跤子的。革命事业是不容易的，是科学，经济建设也是科学。

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比如社会主

---

[1]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义建设需要钢、铁等种种东西，缺一样就不能综合平衡。我们有些人办事时总是忘了一两个条件。比如炼铁，没有耐火砖不行，于是他们就把原来做盘子用的陶土拿去搞耐火砖，这样盘子就不够了，因此就要到另外地方去找耐火材料，把原来的陶瓷生产恢复起来。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每个行业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事业都可能碰到。农业也要综合平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个方面。

中国有希望就是了。这还要靠你们帮助，靠世界上爱好和平人民的帮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

对上海市委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6月11日、13日）

一

尚昆[2]：

本日看到上海市委六月六日关于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两大问题的情况分析和处理意见，我认为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文件。（一）请你即刻通知常委（不通知小平、陈云[3]）在京各同志（共5人[4]），富春、一波、先念、陈毅、德怀、克诚、子恢、廖鲁言、叶季壮、姚依林、程子华、王震、邓洁、贾拓夫、宋平、余建亭、宋劭文、彭真、李雪峰、刘仁、天津万晓塘、河北林铁、陆定一、康生、胡乔木、陈伯达、杨尚昆、吴冷西、李锐、王稼祥[5]，共计36〈35〉人，请他〔们〕立即阅读上海这个文件。未发给的，请你立即发送。限于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二时以前读完，并且想一想，同自己的秘书及一二个同事谈一谈。以便六月十二日下午召集他们到会，由我主持。（二）请你告李先念同志，叫他在两日内替中央写一个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国务院各党组、党委，军委各部，工、青、妇各党组〔的指示〕[6]，附上上海这个文件，转发他

们，一律仿照执行。此转文写好先给我看一下。此信，你办完后，送刘、周、林、彭、彭[7]、先念、陈毅六〈七〉同志一阅，然后存你处。

Good morning!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上午七时，倚枕书。

二

刘、周、彭真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去，另印如前示。

毛

十三日

---

[1] 指中共上海市委1959年6月6日关于当前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的生产、供应情况和今后安排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今年以来，上海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市场的基本情况。1. 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去年下半年即感不足，今年春节后更显紧张。2. 日用工业品市场基本是稳定的，但部分商品一直紧张，现在仍供不应求。3. 上海日用工业品的生产总值上升是快的。（二）在大跃进以后出现这样大紧张局面的原因，除了客观上存在着生产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和购买力增长的矛盾外，还有工作上的原因：第一，去年下半年以来，社会购买力有很大的增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很不正常的。第二，在生产的全面安排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以致一部分产品被挤掉

了，一部分产品被浪费掉了。第三，财贸工作中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点。（三）我们决定采取的措施：第一，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大搞副食品生产，力争今年有所改善，明年部分自给，后年光景更好，能更多自给。第二，大力发展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千方百计克服原材料困难，增加产量，提高质量，扩大品种，支援全国市场需要。第三，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大力压缩社会购买力，从各方面吸收社会游资，减少市场的压力。第四，切实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目前，迫切需要在群众中广泛展开一次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宣传运动。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正因伤休养。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正因病休养。

[4] 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5]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叶季壮，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华，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王震，当时任农垦部部长。邓洁，当时任轻工业部副部长。贾拓夫、宋平，当时均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余建亭，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宋劭文，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万晓塘，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

报》总编辑。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6] 中共中央1959年6月13日下发的这一指示指出，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紧张，是目前经济生活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有关党群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外乎是增加生产，增加商品供应；厉行节约，压缩社会购买力；做好商品购销工作，改善经营管理。上海市委的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中央方针的具体化。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大力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生产，抓压缩社会购买力的措施，上下一齐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本篇二就是对中央这一指示稿的批语。

[7]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彭，指彭真。彭，指彭德怀。

对中央关于自留地等问题的指示稿[1]的批语、修改和代拟的补充指示稿[2]

（1959年6月）

---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59年6月9日晚12时送审的中央关于社员私养家畜家禽、分配自留地、充分利用零星闲散土地和鼓励私人植树等四个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农业生产的五条紧急指示，中央建议各县用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出一张布告，把下面四件事向群众公布：第一，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畜家禽，所得价款和平时的粪肥收入，私有私养的完全归社员个人所得，公有私养的一定要给社员以合理的报酬。但社员要保证不耽误集体生产的出工数。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还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第二，恢复自留地制度。数量仍按原高级社章程规定，以不超过也不少于5%为原则，质量相当于原来归公的土地。自留地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但不得出卖、出租或私自转让。第三，鼓励社员利用空闲时间把零散土地利用起来，收入由个人自由支配。第四，屋前屋后的零星树木（包括竹木果树）仍然归还社员私有，并且奖励社员种竹木水果，谁种谁有。指示稿说，上述这种大集体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排。允许小私有，是保护社员在集体劳动时间以外的劳动果实，并不是什么“发展资本主义”。这些家庭副业搞起来，可能同集体生产、国家的市场管理发生某些矛盾，应该通过加强对社员的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正确加强市场管理和公社管理工作来加以解决。经验证明，禁止搞这些家庭副业、一切归公的简单办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6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直至生产队党支部下发了这一指示。

[2] 本篇一是对这一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这一指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三是代拟的补充指示；本篇四是对这一补充指示稿的批语。

一

即送刘、周、林、彭真[1]阅，尚昆[2]即刻用电报发去。此件是我同邓子恢、李先念、廖鲁言[3]三人商好后，由廖、邓起草的。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二

为了经营自留地和喂养家畜家禽起见，除家有老幼辅助劳力者外，要给全劳动力每月放假三至五天。家庭自办伙食者，还要给妇女劳动力每天二三小时的时间。

三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甘肃省委和吉林省委对于中央六月十一日关于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规定，提出了一些意见，要求按照各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地实际情况，在各县出布告时允许作某些改变。中央认为这是可以的。中央认为只要不违反六月十一日指示的根本精神，应当允许各地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作出适当的修改。

中央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八日

四

即送刘、周、彭真阅，尚昆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子恢、震林[1]、鲁言一阅。

毛泽东
六月十九日上午三时

---

[1]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关于重新建立手工业管理机构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59年6月12日）

刘、周、彭真、一波[2]阅，尚昆[3]办。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1959年6月10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稿说，手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注意恢复和发展，必须有专门的管理机构负责进行工作。为此，中央决定在轻工业部之下，重新建立全国手工业管理总局（和手工业合作总社合并成立），各省、市、自治区在工业厅之下建立手工业管理局，各专署、县也应建立相应专门机构。有经验的管理手工业干部必须归队，以加强手工业管理。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工农业指标及综合平衡问题[1]

（1959年6月13日）

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定得高了，使我们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中，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我在上海说过，我们党究竟有没有群众路线？我们的经济工作有没有经验？看来，群众路线是有的，但有一个时候可以说没有。比如吹“共产风”，这不是群众路线吧！现在一算账，一退回，还是以队为基础，这就合乎群众的意见了。过去一层听一层，一级听一级，横直是那么听，就是不听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意见可难反映上来。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12月武昌会议定的2000万吨钢，到了今年1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2000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在1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本来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定的1650万吨的指标还不可能，转成现在的1300万吨更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农业究竟增产多少？河北是增产三成，即30%。究竟有没有三成，我还怀疑。假定有三成，全国也只有

---

[1] 这是毛泽东在他召集的有少数中央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根据记录稿整理）。

4800亿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10500亿斤的指标，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今年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6000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4800亿斤的基础上。本来是富日子，也照穷日子过，这样安排好。

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至于要不要钱，一种人是吃饭要钱，一种人是吃饭不要钱。老、弱、五保户不要钱，其他的要钱。如果都不要钱，结果会是老弱在家吃饭，壮者出门赚钱。现在食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想出去跟省委书记谈谈。粮食要分给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参加，不愿意可以不参加。这样就主动了。

再有一个宣传问题还不主动。过去开了那么大的腔，现在要想一个办法转过来。乔木同志有个意见，跟我谈过，要再研究一下，看怎么逐步转过来。原来那么高的指标，现在吹了，不要了，宣传上怎么转？我们不能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2000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人的头脑有时候有一点昏也是难免的，有什么要紧？第二天就清醒了。（周恩来：现在人家说中国的数目字不可信了。）我们要让中国的数目字可信，现在不信，以后还是要信的。农业以后不要报账了。苏联的办法就是不报账的，他只报征购的账，全年产多少他就不报。

工业，明年的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按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搞一个马鞍形嘛。五六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至于把五七年的指标降低，完全正确，不降低不好。因为五七年降低了，五八年才有可能跃进。五七年不降低，五八年不可能跃进，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要存一点力量，人也缓和一点，不要那样

人为的紧张，每天这样紧张，每天完不成任务。现在鞍山的工人几个月没有吃肉了，粮食都是吃包谷，没有麦子，这样的情况要改变。要休息一下，要增加一点肉，粮食由包谷改成高粱，还要有些别的副食品。重工业劳动，没有粮食，没有肉，怎么行呢？

支援农业的问题，刚才谈了。这个问题过去有缺点，现在要搞个机构，管机械、化肥和水利。

新问题不断会出现，要随时准备。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会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出来了，这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粮食那么紧张，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

最大的成绩，是从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比如我这个人，在北戴河会议以前，报纸上关于工业的消息我看不进去，党内办工业的文件我被逼看一下，兴趣不大，主要注意力是搞社会关系，像整风反右，那些属于革命方面的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没有注意。现在工业方面的文件、报纸我开始看得进去了。政治局、书记处、各省委书记，也是从去年9月起注意搞经济了。权力下放也是我们干的，那个时候好像是权越放得多越好，现在又收回了相当一部分。人权、财权、商权、工权都要收。原来叫大家上马，结果多少人骑在了马上下不来，现在我看一直到公社都要控制。现在是无政府主义，或者是半无政府主义。王鹤寿跟我谈，薄一波等也跟我谈，说过去我是有片面性，只注意高炉、平炉的生产设备能力，（周恩来：主要是小高炉和小转炉。）煤的账不算，焦的账不算，矿石的账不算，容积也不算，运输也不算。真正一算，从

前那么高的指标就不行，只能是1300万吨钢，2000万吨铁。

最大的胜利就是认识到这些失败问题，就是这些主观主义，就是这些只注意高炉、平炉的设备而不注意煤、焦、耐火材料、运输等等。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不是综合平衡，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比如煤的问题跟农民有关，可是只搞工业用煤，农民需要的煤没有，名为支援农业，结果农民需要的煤没有，机器、化肥、水利都没有。最大的成绩是抓了工业，虽然出了些乱子。今年抓得比去年早几个月。去年是8月下旬才抓生产，实际抓是9月，9月到12月，实际只抓了4个月。现在是6月13号，今年还可以抓7个月，这7个月就要搞平衡。这一套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我们过去历来搞的是革命，没有搞过建设。这不是指三委、各部，他们是专家，而是说我们多数人没有搞过建设。各省委书记没有搞，我也没有搞，因为顾不过来。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才搞这些事。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打败仗，从这里学到了好经验，因为吃了亏嘛。现在的问题不是怪这个怪那个。现在我们的情况已经好了，指标已经落实了，这方面的主观主义已经不很多了，比较接近实际了，现在来讲这个话我看是更有把握了。现在粮食开始上市了，蔬菜上市了，鸡也长大了。现在又要抓猪肉，抓副食品，抓日用工业品。先念同志16号就要去上海开会，出了乱子就抓。我们历来是这样。出了乱子，共产党一抓就好了。

要政治家办报[1]

（1959年6月13日）

现在名气很糟。去年大出风头，今年不好，说我们是纸老虎，不讲信用。

这很好。

不仅敌人，而且朋友[2]也觉得我们不行。去年名气很大，人人怕我们，不但美英怕我们，很惊慌，朋友也怕，他们也感到了压力，为什么能这么跃进？现在不太怕了。英国说，三十年内中国不是值得重视的力量。朋友还说，中国不是高速度，说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自己不那么神气了。

去年三月，我在成都曾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去年从九月开始一直被动。大家头脑发涨，要搞四亿吨钢，大谈共产主义。去年十一月到郑州才发现，我狠狠批评了一下。当时大家都在风头上，要把指标从三千万吨落到二千万吨，也难。我在武汉会议上曾提，不要搞一千八百万吨也好，一千五百万吨也成。马克思写《资本论》一百年了，看来经验要自己取得。法则不能违反，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第三版。过去学了就完了，谁也没有注意价

---

[1] 本篇是毛泽东和吴冷西谈话的一部分。

[2] 朋友，指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

值法则，违反了它就头破血流。

现在失了信用，不要紧。苦战一年，再加一年。那时宣布跃进成绩，现在不要更正，将来再说。

《人民日报》办得比过去好，老气没有了。但吹得太大，有办成《中央日报》的危险，新华社也有办成中央社的危险。

《人民日报》，我只看一些消息，但《参考资料》《内部参考》，每天必看。《内部参考》是个好刊物，要改进，不要只看现象。大局在《内部参考》。怎样把《内部参考》变成报纸，是你们的工作。

《新闻工作动向》是好刊物。有一期反映了日本专家的意见，这很好。太照顾对象也不好。要吸引人看，要吸引人听。《新闻工作动向》上地方报纸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多反映。有的读者反对《解放日报》的编辑，读者是对的。口径不一致，是《解放日报》对还是毛主席对？[1]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完全可为我所用。[2]

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

---

[1] 这里所说的材料，都发表在《新闻工作动向》第四十五期上。

[2] 参见陈寿《三国志·武帝纪》。原文是：“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我在江西苏区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王明讥讽我。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那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反而可以多读点书，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

你们要政治家办报，不要书生办报。

对西藏工委关于进藏人员计划的批语[1]

（1959年6月15日）

已阅，退彭[2]。西藏十三万人的计划太大，中央没有批准。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下午十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9年6月15日10时送毛泽东审阅的一份情况简报上。简报说，西藏工委曾对西藏目前情况和今后改革中的政策问题作过专门研究，并估计到今年年底，进藏人员将从平叛作战前的2.2万人增加到13万人（部队8万、地方5万）。毛泽东的批语，是针对简报中的这一数字而写的。

[2] 彭，指彭德怀。

中央转发陶铸关于从社员代表大会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6月17日）

一

此件[1]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1959年6月17日

---

[1] 陶铸1959年6月15日给中共广东省委并转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中山县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已在全县铺开，现将我参加该县张家边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报告如下：（一）要解决口粮标准、干部作风等影响群众情绪的问题，进一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二）张家边群众对夏收后留够口粮的要求非常强烈。（三）对供给制和食堂的存废问题，必须迅即加以合理解决。（四）去年晚造和今年早造期间，由于在农业生产方针与技术措施上某些不当造成的群众对领导的不满情绪，如何加以彻底消除，是改进目前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五）必须使体制下放彻底，给予个人一定范围内的小自由，并迅速宣布固定不变。这是目前安定农民生产情绪与提高生产积极性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报告说，上述这些问题，在张家边有的解决了，有的还没有解决。要彻底解决问题，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社员代表大会真正充分发扬民主、暴露问题、全面分析、讨论彻底。

二

刘、彭真、震林[1]阅后，尚昆[2]办。

办后，退江青阅。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印发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批语

（1959年6月17日）

尚昆[1]同志：

此书[2]字太小，本子太重，现分订为五册，请用新华社现出的《内部参考》，或者宣传部出的《宣教动态》**那样的大号字**付印，印**200**本，分送中央一级、省市区党委一级的主要负责同志阅读，首先送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每人一份。另请给我四份。一个月内印出。请酌办。并请告少奇、彭真[3]、恩来同志。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中文译本。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如实公开报道灾情

（1959年6月20日）

乔木、冷西[1]同志：

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2]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

[1] 乔木，即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1919—2002），广东新会人，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18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〇一期。这一期登载了《广东水灾继续发展，全省工作中心转入抗洪救灾》和《广州市人民极度关心汛情的发展》两篇报道。

转发张体学[1]关于湖北分粮到户等情况汇报的批语

（1959年6月20日）

此件[2]请尚昆[3]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研究。粮食要分到户。另要大抓副食品、日用工业品，恢复手工业。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

---

[1] 张体学，当时任湖北省省长。

[2] 指张体学1959年6月16日晨关于小麦入库、分粮到户及抓手工业等情况的电话汇报。张体学说，湖北的小麦已快打完了，入库进展不算很快，正在抓。粮食以人分等定量到户后，情况大变，小队干部和农民欢天喜地，大队和公社干部仍有些不通。现在省委决定直接与群众见面了。可以办得通。渔民已经归队不少，湖里开始有人捕鱼了。抓了一下手工业之后，产品有所增加。同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将这一电话内容转报周恩来。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先念的报告上。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转发洪学智、张国华[1]关于西藏山南地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6月20日）

此件[2]请尚昆[3]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各军区。另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

---

[1] 洪学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张国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2] 洪学智、张国华1959年6月15日给中央军委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的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山南是西藏地区靠近边境的一个农业区。寺庙、贵族、政府三大领主除通过占有土地进行剥削外，还以各种不同名目向群众掠夺。二、目前在山南流窜的股匪约1000多人，主要是外区逃来的和本区少数坚决与我为敌的骨干和分子。活动特点是：（1）在军事上化整为零，分散隐蔽；（2）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新的蛊惑人心的破坏方式；（3）在组织上通过三大领主在各地的代理人或明或暗地控制群众。三、山南群众总的情况是好的，能积极支援平叛，进行生产。四、根据当前敌人活动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目前清剿的方针应是放手发动群众，政治争取结合军事打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吴芝圃[1]等人的谈话

（1959年6月22日）

吴芝圃（以下简称吴）：从去年麦收以后到春节，吃粮都没有计划。

□□□：乱吃乱调，无代价的。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认识是逐步深入的。

□□□：当时干部头脑也很热。

毛：大家头脑热，上上下下一齐热，一热就充公。

吴：群众也不摸底。

毛：有一些所谓观潮派，其实不是观潮派，他们是老实人。那些人比我们厉害，他们说："这样吃不行！"这个教训大啦，有公社教训、粮食教训、农业教训、工业教训。公社教训就是群众路线的问题，脱离群众，刮"共产风"。哪一件事情触怒了群众呢？就是刮"共产风"。

□□□：九、十两个月刮得厉害，到十一月就恢复了，到十二月那个路线就基本纠正了。

毛：刮过来容易，刮回去就难。河北省下了一个命令，三天之

---

[1] 吴芝圃（1906—1967），原名吴殿祥，河南杞县人。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内大车一定退回，不然撤职，说倒是说通了，就是不退。有一个区的党委书记说，我是拣坏的下放了四次，比如有一千辆大车，下放几十辆，都是不好的，其他都留下。说要撤职，几天工夫统统下放了。你们要用群众路线的办法，不要用不退就撤职的办法。

工业就是一个综合平衡问题，不能搞了这样，丢了那样。比如，搞钢就要铁，搞铁就要焦炭，焦炭还要看是什么焦炭。现在这种铁的规格不能持久，只能是一种过渡。含硫量零点二不行，零点一就应该是不合格。要逐步做到比如只有零点零五、零点零六、零点零七、零点零八。

明年钢恐怕要来一个“马鞍形”。所谓马鞍形，也是还要增加，不是不增加。今年是三千不行到两千，两千不行到上海的一千六百五十，现在是一千三百。假如做到，或者超过一点，那末明年搞多少呢？明年可能只能搞一千七百万吨，连今年人民代表大会的指标还达不到，也可能今年一千三百万吨，明年增加五百万吨，一年的指标两年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还有两年，后年还可以搞四百万吨，就是两千二百万吨，再有一年，两千六百万吨，就超过英国了。要把质量搞好一点。有些省，比如河南、安徽，一般说来是工业不发达的，现在已经是很快了，太快了我看搞不巩固。

□□□：工业比农业还被动，铺的摊子很大，结果是计划以外的、计划以内的都不行。

毛：不许有计划外的，不管县的工业，还有什么工业，都要纳入计划。

学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没有这场风，谁也不说去学。阎锡山的口号叫做按劳分配主义，他是欺骗人的，可以参考利用。

真正搞工业，就整个党中央同地方来说，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开始的。这不是讲你（可能是指杨蔚屏——记录注），你搞了多年了。也不是讲工业部门，三个委员会和各部。书记处抓这件事，中央抓这件事，是从去年八月才开始的，各省恐怕也都是这样。大办钢铁，将一军。农业抓得早一点，但是农业中间的问题不懂得的还甚多。

吴：去年这一年对农业好处很大，碰了一下子，碰出好多经验。适当密植普遍得到了证明，密植多了不成功。还有适当地上肥料，适当地浇水。现在证明，深翻只要一尺左右就可以了，就是拿一尺一二的一个铁锹铲那么一锹就可以了。肥料不像过去说的越多越好，多了吸收不了，不需要五万斤、十万斤肥料；有一万多斤、两万斤粗肥，再有一点细肥，就可以丰产了。

毛：就像人吃饭一样，吃多了也要死人。肥料主要一条是靠养猪，将来能不能办到一亩一猪?

吴：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希望一亩一猪，今年猪可以达到三千万头，我们有三百多万头母猪。

□□□：饲养技术确实提高了。

毛：前年、去年、今年粮食产多少？我老是问你们。

吴：前年是二百五十亿斤，去年报了七百零二亿斤，多了，实际只有四百五十亿斤到五百亿斤。

毛：我不信你那个五百亿斤，我信你那个四百亿斤，四百亿斤就是增加一百五十亿斤。今年能不能搞五百亿斤？

吴：假使天气没有什么变化，今年搞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今年种得多，种得早。

毛：今年的吃法、收法、管法、用法，都不同了。收要精收，

颗粒还家。管是分散管，农民个人的由他家里自己去管。吃法就是以人定量，自愿参加，完工吃饭，旷工找钱，吃饭不要钱同吃饭要钱相结合。粮食生产要抓紧，明年的春荒能够避免就好了。鉴于去年麦子种少了一点，今年你们打算种多少？

吴：今年只能适当地种，河南小麦就是种七千多万亩。

□□□：去年少种了一百万亩。

吴：今年大概落实是种七千五百万亩。种的时候虚报了一点，后来修路、修河又毁了一些。我估计种七千五百万亩可能多一点。

毛：今年秋天种多少麦子呢？

□□□：今年准备种八千万亩麦子。

□□□：最高的一年（一九五六年）是八千八。

毛：你们哪一年恢复八千八呀？

□□□：土地面积也少了，过去是一亿三千多万亩，现在是一亿二千多万亩。

毛：土地哪里去了？

□□□：挖河、修公路、修铁路、基本建设，都占了地。

毛：河不是每年都要挖。公路将来会更发达，工厂占地、房屋占地还要多。所以，一方面是广种薄收，同时要注意精耕细作。重点放在大面积高产，不放到少数“卫星”上。

吴：今年种小麦，连种杂粮，秋季可种八千万亩，今年比去年多种五百万亩。

毛：没有肥料怎么办？麦子要放底肥才好。

吴：现在的问题就是肥料问题。我们已经提出口号了，今年农业是肥料挂帅，搞积肥运动。现在是急抓一把晚秋追肥，再抓一把给麦子准备肥料。准备这三个月大量积肥。

毛：你要他积，开电话会议，他就虚报，说有那么多，实际没有那么多。

吴：不要求那么高，他就不虚报了。

□□□：还有个政策问题。集体积肥与个人积肥相结合，也是两条腿走路。个人集体，一致论价，有的给现钱，有的记工分。

毛：这好。

□□□：去年光是集体积肥，不讲个人积肥，连个人家里的厕所因讲卫生也消灭了，现在都又恢复了。

毛：好。粮食前年产二百五十亿斤，去年四百五十亿斤也许有吧，今年搞五百亿斤。

吴：今年的麦子是一百五十亿斤，还有三百五十亿斤。河南是一麦二秋。今年的秋种面积大，秋季是粮食作物近一亿亩，经济作物两千多万亩到三千万亩。今年许多空地都种上了，消灭荒地两百多万亩。

毛：不是不想种吗?

吴：荒地谁种谁收，小集体种小集体收，个人种个人收，不收公粮。

□□□：有的是伙食单位种。

毛：不收公粮，不统购。

吴：假如没有变化，今年粮食五百亿斤比较有把握。

毛：明年总要略微超过一点吧?

吴：明年六百亿斤，后年八百亿斤。我到下边看了一下，我们都下去看了。我跑了将近三十个县，从许昌专区、信阳专区、开封专区一直跑到新乡专区，大体上转了一圈。现在农业生产能够迅速总结一下经验，增产比较有把握。去年大跃进不能否认，基本建设

搞得很多。

毛：那个东西否认不得，几亿人民群众搞的，你否认他们的成绩呀？

吴：第一个基本建设是水利。

毛：你们修那么多水利，又用不上。

吴：用上了。

毛：叫做干渠、支渠、毛渠、农渠、荒渠，要挖这些渠，工程相当大。

吴：水库、灌溉渠道、坑塘，大轮廓都有了。我们去年把黄河扒了四个口，修了四个闸。

毛：得用不得用？

□□□：起大作用。

吴：得用，今年浇麦子两千多万亩，黄河两岸都有。

□□□：豫北两个，豫南两个。

毛：把黄河搞几个门，有时开门主义，有时关门主义。

吴：黄河水浇的地肥。

毛：不过你们这个省相当危险，泥沙那么一积，水位岂不会高起来？

□□□：我们用铁闸控制，防淤。原来的黄河老古道还需要淤。

毛：至少还可以淤一百年，不至要淤一两千年。黄河将来势必抬高，就是在天上走，泥沙淤积很多，两边的堤越筑越高，下面看黄河，好像从平地看高楼一样。现在开封附近就是那个形势，开封低。

吴：现在开封附近都变成最好的地了。黄河水一灌，今年有的增产一倍，过去百把斤，今年两百斤，有的增产一倍还多，濮阳就

是增产一倍还多。

毛：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从封丘到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

毛：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吴：伏羲氏也是在郑州那一带活动的。前年、去年的水利建设，打下个轮廓。今冬明春要把田间工程修一修，整理整理。此

外，翻地的经验有了，密植的经验也有了。把这几项综合起来，叫做田园化、河网化。

毛：比如绿化，你们这个绿化就很好，为什么不好?

吴：这是近三五年我们搬到郑州以后才绿化的。

毛：我说绿化要一百年，看样子不要，你们是左派，我是右派。但是要统统搞起来，得那么多年。

吴：我们在沙丘上搞了几片，改变过来了，很好。

□□□：现在开封郊区很好了，和主席第一次去看的时候可不一样了，开封变化大啦。

吴：我到原阳县看了七万多亩，他们是蓄水、排水、灌溉、航运、造林、水产、作物综合发展，搞得很成功。

毛：那个地方是周朝管的，晋文公强迫它割出去了。综合这种思想要普遍提倡。农业里头，有粮、棉、油、麻、丝、茶、果、菜、烟、蔗、药，这十一样要综合平衡，要都有一点，一个县要都有这些，至少一个专区得都有这些。

吴：还有桐油。

毛：还有椒，花椒、胡椒等，有多少个品种。油也有多少个品种，有油菜籽、芝麻、花生、大豆、棉籽、胡桃、葵花子的，还有大麻籽的。要普遍提倡发展油料，油料不足现在是个大事。总而言之，你们去搞综合平衡。这是讲农、林、牧、副中之农。至于林，无非是有计划地来造。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

吴：现在木料比钢材还重要。

□□□：现在缺木材的危险，已经很大了。

毛：人散发二氧化碳，树木吸收，它散发氧气，人吸收。树木又好看。每一个村庄侧边、房屋侧边都搞。陕西搞得不错，他们那

里工厂都用树林互相隔离。

牧业也多，马牛羊，鸡犬豕，还有骡驴。一个大牲畜，一个小牲畜。犬这个东西大概是不受人欢迎的。你们河南有没有马?

吴：马不少。

毛：马牛羊这三种东西，主要是牛。然后就是猪鸡鸭。要来他一个综合平衡。

此外还有个副业。要抓小集镇和城乡商品交流。搞点自由市场。开头难免混乱一下，无非是有黑市、高价，也没有什么可怕，然后来一个适当的管理。现在搞得这样死，不论哪一省，公社化以后，小东西买不到了。家庭副业，生产队搞的手工业，县城以外的小镇，都要活跃起来。你们去研究一下。河北省长刘子厚同志在邯郸地区走了几个县，他说：啊呀，不像样子，统统搞光了，城乡断流，不做生意了。省、县都要把手工业搞起来，把小市场恢复起来。国营工厂不要去搞那么多东西。听说邯郸地区有一百万斤杏子，就是三五日的事情，很快就烂了。你让农民自由去卖嘛，他不，要商业公司统统收购，哪有那么多人去卖呢?结果大批烂掉。

吴：河南的杏子没有收，还是农民挑担子卖。

毛：那好。但是你们还得去提倡一下。

□□□：农村商品没有过去供销社那个时候品种多了。

毛：还有渔业。你们有没有鱼?

吴：渔业大发展。

□□□：现在水库里都有鱼，有的鱼十几斤，就是捞不出来。

毛：无可奈何，能治水，不能治鱼。

□□□：原来库底没有清理好，现在一打鱼它就钻进去了，不好下网。

毛：工业方面，是一个综合平衡问题，要抓一个品种、规格，一个质量，一个管理。综合平衡，就是工业方面的农林牧副渔。你要搞钢铁，不能只看到小高炉、小转炉，要看到炼焦炉。不搞好洗煤、炼焦，质量没有法子提高。含硫百分之零点二的规格很快就要破掉，含硫多了对我们国家很不利。含硫应该是零点零七以下，不许超过零点零八，不然，炼出一大堆钢都不能用，重新要回炉，冤枉费了力。他们有几个口号，叫做宁可少一点，但是要好一点，要全一点，就是品种规格要多一点。有许多东西我们自己还不能造，要依靠进口。我们搞了十年，八年有综合平衡，第九年忘记了（北戴河会议以后），现在又恢复了，上海会议以后，到北京就落实了。为什么落实了呢？没有那个东西。炼一千三百万吨钢，就要两千万吨铁，炼两千万吨铁，就要七千万吨铁矿石，三亿四千万吨煤（包括民用，民用占九千万吨），回头一想，才晓得缺一样都不行。明年这一年跃进口号是不是放弃？但是明年这一年要着重在品种、规格、质量。数量也是重要的，但着重之点要放在品种同质量上，缓过一口气来。今年为什么搞成这样呢？就是因为去年把材料（无非是钢材、水泥、木材这些东西）用光了。挖掘潜力，现在又到处清仓，这是好事，但是也很危险，统统清光了，没有后备了。今年的头一个季度应该把指标放低。没有材料给他，你要他做那么多事情，等于不给他米要他煮饭。巧妇无米不能炊，蠢妇给了米也能做出饭来。有鉴于此，明年第一季度指标要低。去年一个大跃进，今年又是大跃进，一千八百项的基本建设，现在降到七百八十项，砍掉一千项多一点。过去的雄心太大了，其志可嘉，就是办不到。我们批评过“马鞍形”，那一年犯的错误主要是“反冒进”不妥，不是基建计划缩小不妥。一九五六年那一年大建设的结果，库里的东西

不多了，所以，一九五七年的建设只能搞那么多，先是一百一十亿，后头达到一百二十几亿，比头一年少一点。今年比去年还多。去年大跃进，搞了二百几十亿。今年原来打算二百八十亿，现在降到二百二十多亿，剩下七百八十项。明年大概这样的数目还可以维持，或者还可以加一点，但是不能加得太多。这两年稳步前进，好像造房子一样，把地基打稳固一点。

管理有各项，有什么财务管理，有什么定额管理，有什么安全管理，有什么质量管理。过去权力下放，统统下放到车间、工段，工人自己去管，工厂就不检查了。商业交给合作社了。这都是我们办的事，我也赞成下放。于是一下下放到省，省下放到地，地下放到县，县下放到社。至于把商业、银行下放到社，这是中央决策的，现在看起来不行，你归他，我们没有脚了。你们现在收回来没有?

□□□：银行收回来了，商业的权力还没有完全收回来。

毛：我看商业权要收回来。公社、生产队可以设零售店，取手续费。把国营经济跟集体经济两者配合起来。过去我们有那么个想法，使这两个因素混在一块，结果他就不听命令，公社不听你的。公社又不听老百姓的，又不听生产队的。生产队就怕公社了，老百姓也怕公社了。我们也怕公社了，他们不理我们，他们搞他们的，他们刮“共产风”，又不请示：我刮一点“共产风”可不可以呀?没有哪个公社请示过。极好的事情就是他们得到了教育，我们没有很久就把这个局面改变过来了。几个月，你们河南说是刮了两个月。将来党史上总要写一笔，刮了两个月“共产风”，然后就转过来了，不刮了。我们转得快，苏联同志很称赞我们转得快。副食品缺乏，日用品缺乏，我们立即就抓了。权力下放太多了，有四个权要收回

来，收到中央和省。哪四个权呢？一为人权。比如请工人，全国去年一年请了两千万。自从鸦片战争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到我们接收，只有一千二百万工人，去年一年就增加两千万，那还得了？难怪没有副食品，难怪没有肥皂。一为人权，二为财权，三为商权，四为工权，此四权者，一定得收回来，不能层层下放。人权是请多少工人都由中央、省市控制，都要有计划。不是计划经济吗？财权是一种什么内容，我就不大清楚了。他们讲有这样一个问题，比如你们这个地方有烟叶，说我这个许昌专区有那么多烟，你给我钱，我给你一百万担，结果他只有五十万担，但是钱拿去了。棉花也是这样。听说计划外的资金占百分之二十九，分散材料，还有动用流动资金。我说，在一个时期至少应该说是半无政府状态，横直是不要统帅，谁也不要问过谁，统统变成一个独立国。

吴：县管不了社，地管不了县，省管不了地。

毛：我从前担心县，他们自己也刮了一点风，比较被动。只有省跟地比较主动，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刮，他们又没有要人家的大车，而县多少要了一点。现在看来，县要得不多，县委的水平也比较高，一讲就通了。剩下就是公社。

你们铁的任务、钢的任务多少？我忘记了。

吴：铁最后是五十五万吨，钢很少，只有十万九千吨，完全是好钢。

毛：要搞好钢。河南一万年也没有炼过那么多钢，一九五九年搞十万吨，你们比蒋介石多一倍半，蒋介石只有四万吨钢。

吴：十万九千吨钢，两万吨钢材，五十五万吨好铁（含硫量零点二以下）。

毛：还要改进。总而言之，你们不要维持零点二。零点二，明

年一定崩溃，明年要降到零点一以下，比如零点零七、零点零八。

吴：我们铁的质量现在才高上去，但是不稳定。

毛：我看还是十五年或者较少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超过英国，还提这个口号。主要产品不只是钢这一项，钢锭这一项大概第二个五年计划可以超过，还有品种，还有质量，比如优质的钢、机械。机械赶不上英国就不行，煤炭现在比它多了，钢铁赶上还要几年。过去本来很适当的口号，现在不灵了，好像十五年赶上英国不过瘾。还有一个农业纲要四十条也不过瘾了，我看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机会把那个四十条标准定高一点，或是再搞个四十条，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现在还没有通过，好像就作废了。实际上，普遍的亩产要达到五百斤，还要一点时间吧？

吴：还得再过两三年。

□□□：全年亩产平均五百斤看来可以，单产不行。

毛：当然是讲亩产两季三季。

大家：那比较容易。

吴：亩产去年平均合四百多斤，今年合五百斤。现在要抓住几样：一个是把水利继续搞好。再一个是抓大面积丰产的经验，如田园化、河网化，综合发展。今年的麦子就是大面积丰产很多，万亩五百斤以上的，几万亩三百斤以上的，都有。去年卫星田对计算粮食产量作用不大。

毛：你说卫星田统统是美国卫星，走到半路就下来了，也不能那样讲，也有些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没有什么五千斤，两万斤，三万斤，但是有千把斤。

吴：没有七千斤的，推翻了，两三千斤的有。红薯万把斤的，三几万斤的还有。最基本的还是个劳力问题，有劳力就好。第二是

肥料问题，机械化问题。根据几年来搞农业的经验，还是集中力量搞肥料，搞工具改革。搞半机械化、机械化、工具改革，就可以节省人力，就可以搞好。再就是把水利整理好。有这几样，普遍变低产为高产，也是几年的工夫。我们今年的麦子高产已经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了。

毛：那才四分之一，再有四分之一，可以搞到百分之五六十。

吴：搞到百分之七十就很好了，农业还是可以搞上去的。

毛：我还想搞农业四十条，把指标略微提高一点，还是十二年，从一九五六年算起，明年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党代表大会今年不开了，到明年二三月去开。党代表大会先通过，四五月开人民代表大会再通过。

吴：农村养猪是个大问题。积肥，养猪，养牲畜，改革工具，整治水利，还是这几件事情。

毛：牲畜得拨粮。你们现在是四千八百万人口，算五千万，平均每人四百斤口粮，就是两百亿斤。你得留一点粮食给牲口和家禽（马、牛、骡、驴、猪、鸡、鸭、鹅）吃，要有一百亿斤给它们。

吴：用不了一百亿斤。

毛：给八十亿斤，少了不行。山东他们计划给八十亿斤，他们人口跟你们差不多，他们的口粮也是两百亿斤。

□□□：口粮两百亿斤，征收七十五亿斤，一百亿斤饲料，十亿斤的工业和服务业用粮。

毛：有一百亿斤的饲料，你们这个省就大兴旺了。然后是储备粮。

总而言之，别的我不管，拨一百亿斤饲料，你们这个省就会兴旺。你给了牲口饲料，它就拉屎，就是肥料。猪就是肉类产品，还

有猪鬃。牛就犁田，又是运输工具。马、驴、骡是运输工具。

吴：现在每一头猪只留八十斤粮食。

毛：你要一百斤肉，就得给一百斤粮食。如果要一百五十斤肉，你得给一百五十斤粮食。你们现在是八十斤粮食，还少七十斤。

□□□：还搞点别的东西吃，搞代用品。

毛：糠菜半年粮，猪还没有改善生活。

吴：猪、骡、马，将来可以多留一点饲料。

毛：你们跟各县商量一下，省委下决心搞一百亿斤饲料。几年以后，比如十年以后，一半一半，人吃多少，牲口吃多少，比如人吃两百斤，饲料两百斤。现在是人吃两百斤，饲料只有一百斤。过去饲料太少了。

吴：过去留也留一点，猪吃不到，人把猪的粮吃了。

□□□：实际上，把饲料解决了，人还省粮食。我们的城市供应，往年有鸡，有鸡蛋，有糕点，粮食吃不完，现在这方面少了，吃粮食就多了。

毛：你们搞糕点还要十亿斤粮食？

吴：用不了。

毛：工业用粮食搞一点，多搞一点糕点，市场就活跃了。

吴：一个饲料，一个工业和服务业用粮，解决了这两样市场就繁荣了。

毛：搞热闹一点，可以回笼货币，生意兴隆通四海。

吴：最近在订发展多种经济的方案，准备专门开个会。现在集体养的猪有七八百万头，准备今年年底达到一千五百万头。私人养猪准备平均一户一猪，就是九百万头。如有三千万头猪，就是一猪三亩地，积肥寻常是一猪两亩地。还有六七百万头牲口。一头牲口

两亩地，一头猪两亩地，这样肥料就差不多了。准备在二十五号开个多种经济会议，现在正做规划。

毛：多种经济会议，首先是农、林、牧、副、渔，每一类究竟有几项，开个单子。比如刚才讲的农就开了十一种，你们还加了一个胶，还加了一个漆，还加了一个桐油，变成十四种了。粮食要开个单子。农业里面的粮、棉、油、麻，这几项里头，每一项都有多种。粮食总有十几个品种。棉花也有多种，他们说有十二个品种，是根据绒的长短分的。麻有黄麻、青麻、大麻、芝麻。油刚才讲了，有那么多。要开个单子，做点规划。烟叶子也有品种，有什么云南种，还有本地种、四川种，有商品的，有老百姓用的，有烤烟，有不烤烟。经济工作的确是要搞细致一点，要各方面都考虑。过去一年我们的缺点，就是往往搞了一面，把另一面，或者几面，或者几十面，都忘了。搞起小高炉、小转炉，把洗煤、主焦煤、耐火材料、运输没有考虑进去，还有忘了钢的品种、质量。

你们的材料对我很有益处。特别是整个形势是稳定的、发展的、兴旺的。全省没有粮食恐慌，生产又很有希望，麦子已经到手了，秋收也很有希望，形势好，人心稳定。现在算账一来，把无偿占有的东西退还，开几级干部大会，人心这样拥护，干部又团结。你们在一百二十万干部里头，批评改正的是四十几万人，开除、处罚的只有三千六百人，刑事处分的仅七百二十人，这个政策好。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吴：食堂经过工作能够坚持下来。

毛：现在粮食归户，自愿参加，食堂能够坚持下来。搞食堂机械化、半机械化和什么自流水之类，以达到节约的目的。不仅是节

约人力，而且节约粮食、柴火、油盐。只要食堂能够达到节约的目的，群众会拥护的。

吴：昨天晚上跟前几天下去的两个同志谈了一下。他们两个，一个是到夏邑县，一个是到鄄城县。夏邑县是个人民生活比较困难的县，群众讨论的结果，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护食堂。坚决拥护的占百分之五十多到六十，包括有条件拥护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那百分之四五十是因为食堂办得不好，只要改进一下就好了。

□□□：七十多个人参加了自由辩论，也没有说是中央的政策，也没有说是省委的政策，也没有说是县委的政策，就是大家商量。

吴：大会套小会，完全自由。一个同志是到鄄城县看的，那里对食堂完全拥护。

毛：你们这个食堂机械化还没有普遍搞。

吴：机械化占百分之十几到二十。

毛：你们搞一套到庐山去看一下，好不好？

吴：我们已经搞了一个指示，准备搞个方案。我们也反复研究这个形势，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就是城市里供应紧张，也没有什么大紧张，只是猪肉、鸡蛋、肥皂紧张。

毛：供应稍微紧张一点有什么要紧？河北省前年（粮食年度）中央同各省调给他们二十七亿斤粮食，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只有七亿斤，他们进步很大。山东西部粮食紧张一点。湖北粮食相当紧张，恐怕也是有区域性的，有些地区比较好，有些地区紧张一些。他们那四个模范县垮了：一个叫麻城，一个叫孝感，一个叫红安，一个叫谷城。说是亩产两千六叫双千斤县，但是假的，结果大闹其粮食紧张，征购完不成。本来富是相当富，还不很富，却当富

日子过了。

□□□：去年麻城的庄稼长得确实不错，八九月间我到汉口去开协作会议，经过那个地方，看见庄稼长得好，就是收得不净，浪费了不少粮食。

吴：稻子吃并秧的亏了，几十亩搞到一块，实际上是减少了。

毛：此外，广东粮食紧一些，就是这么几个省紧。其他省粮食都不紧，是副食品、日用品、工业用品比较紧张。现在我们正在抓，在上海开五十一个城市的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的会议，你们这里也去人了，先念同志在那里主持。大家商量一下，究竟我们整个形势好不好？如果要亡国了，就当作亡国的局面来办。现在又没有亡国，这个国家还是兴旺的，有那么几个小泥鳅掀了一点浪，就以为了不起了，我就不信这个道理。

吴：我们研究了形势，认为农村现在已经是生产高潮了，比哪一年都好。农民今年收麦的秩序好得很，过去他们偷偷地割麦子，今年没有偷麦子的了。

□□□：今年没有吃青。

吴：过去是麦子熟六七成的时候就吃了，今年没有吃。

毛：我刚才讲的人权。工权、财权、商权，是讲国家。至于集体，它那个所有权就是基本的队有、部分的社有，生产权是在生产小队。要定下这一条：人吃一斤粮，给牲口吃半斤。

吴：大的牛、骡、马要吃三四斤。

□□□：牲口比人吃得多，最小的牲畜吃的也等于人的口粮。

吴：小牲口等于一个人，大牲口等于一个半人。

毛：要分类跟地方上谈谈，你们去布置一下。二十五号到武昌，中央会发通知的。

吴：主席在这里住两天吧，明天再走，看个戏。

毛：今天就走，到孝感，那个地方比较凉快一些。还要请王任重同志到那个地方来，今天下午、明天上午跟他谈一下。然后请陶铸、周小舟来。周小舟是要搞食堂的，李井泉也是要搞的，你们也是要搞的。如果食堂有几个省顶下来，基本不垮，就是说有七成不垮，垮掉三成，事情就好办了。至于春节食堂放一个星期的假，那也可以。

□□□：特别是妇女，普遍不愿意食堂散伙。有食堂，她经济上有地位，可以增加生产，也有收入，丈夫还要向妻子要钱。她不做饭，到地里干活，比干别的收入大。所以，妇女也很赞成食堂。妇女说：我才解放了几天，干净了几天，现在又要回到厨房里去，又要我窝囊去了。

毛：食堂，你们一个省顶下来，天下就顶下来了。大体上垮十分之七，留下十分之三。这十分之三能够坚持，搞一两年，其他的慢慢会起来。你们搞起食堂机械化这一套来，我看它就巩固了。你们可以搞小食堂。

吴：我们估计食堂能巩固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一点。也许垮得多一点，也难说。

□□□：一个食堂机械化，一个以食堂为单位种的菜、养的猪，它的力量很雄厚。

毛：家里也还可以种点菜，可以卖给食堂。

吴：我们现在觉得形势还是好。好的原因就是执行了党的政策，算了账，农民因算账得现款两三亿，有的一户就得四五十元。另外，牲口、猪、鸡都给他们，光农具就给了将近一千万件，房子退还的也不少。

毛：你们有篇账，我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看了。

吴：最后这个账还没有算清楚。形势比较好，群众心情比较舒畅。我们再进一步就是把制度稳下来，像自留地的制度，粮食分到户的制度，工资制度。

毛：搞个章程出来。从前那个卫星公社的章程不行了，那个东西有点“共产风”。

吴：这次到庐山可以拿几个社的章程。还有几天，我们在家里准备准备，再征求征求地、县各级党委的意见。我们最近已经放了一炮，就是坚决把粮食分到户，坚决留自留地。食堂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毛：不要去提倡食堂坚决垮台，是坚决自愿，坚决办好。

吴：最近还有一个争取秋季大丰收的指示，也快送来了。

毛：好，就这样，谢谢你们。

吴：主席什么时候走?

毛：我这是自由主义，现在就准备开车，开到广水，戏也不看了。

吴：我们去一个人。

毛：一个都不要，秘书都不要。我这个车上有管铁路的。

和毛宇居应对联[1]

（1959年6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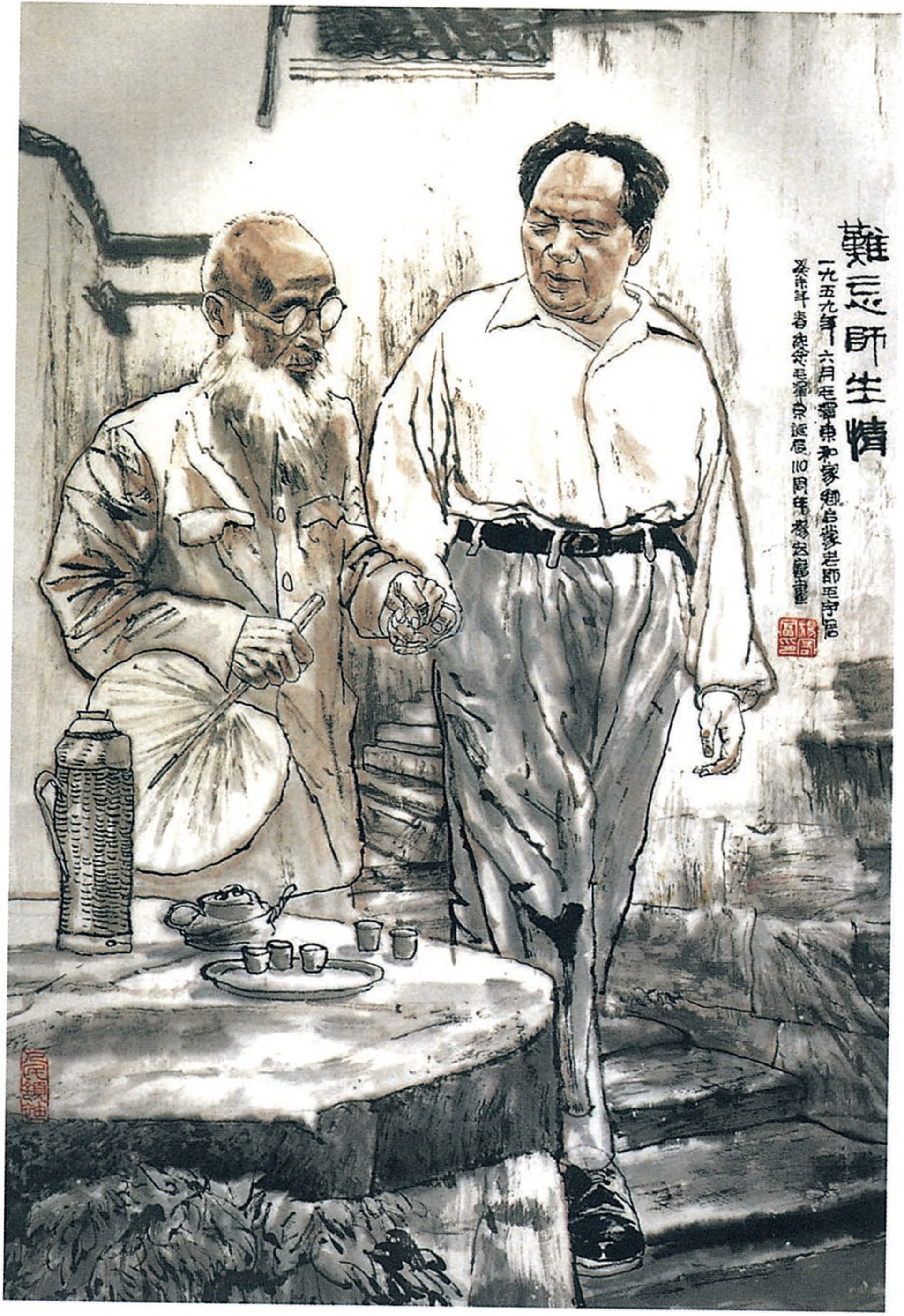
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宇居）
尊老敬贤，应该应该！（毛泽东）

---

[1]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当晚，毛泽东请当年的老师、同学、朋友和农协、赤卫队队员及烈士家属们吃饭。席间，毛泽东向对革命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一一敬酒。当敬到当年在南岸私塾教书的老师毛宇居老人面前时，毛宇居连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接着答道：“尊老敬贤，应该应该！”毛宇居（1881—1964），湖南湘潭人，又名蕊珠、禹珠、禹居。毛宇居和毛泽东共太高祖父，是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读私塾时的老师。1906年秋至1907年夏，毛泽东在距韶山冲上屋场约五华里的井湾里毛宇居的私塾里读书。毛宇居1926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古典文学功底较深，善于写作。1940年与毛国樵一同编修毛氏宗族四修族谱。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在乡间教书。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64年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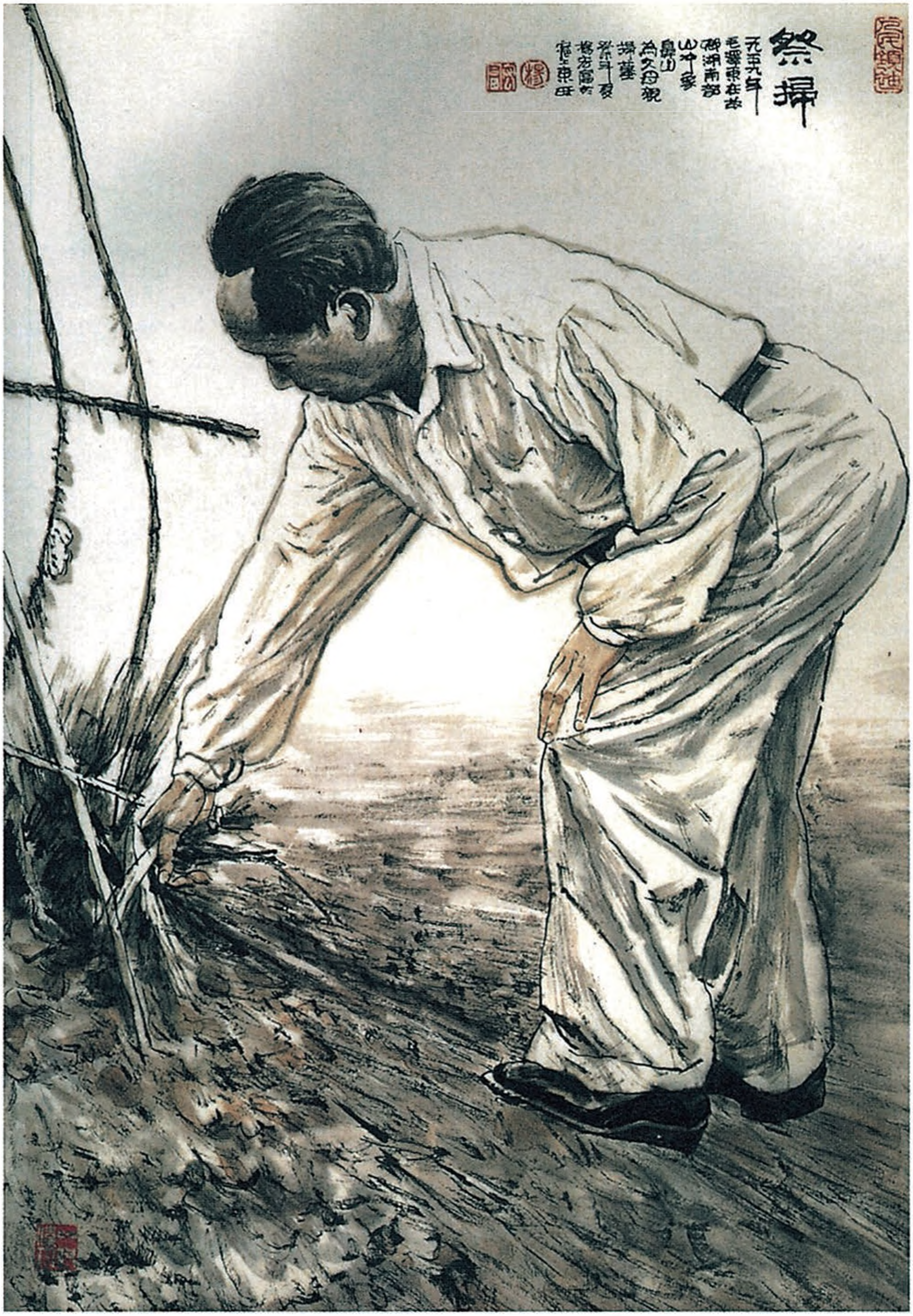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和他的私塾老师毛宇居携手同行。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和毛宇居携手同行。


難忘師生情
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澤東和家鄉啟蒙老師毛宇居
癸未年春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

《难忘师生情》（中国画）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故乡湖南韶山冲象鼻山为父母亲扫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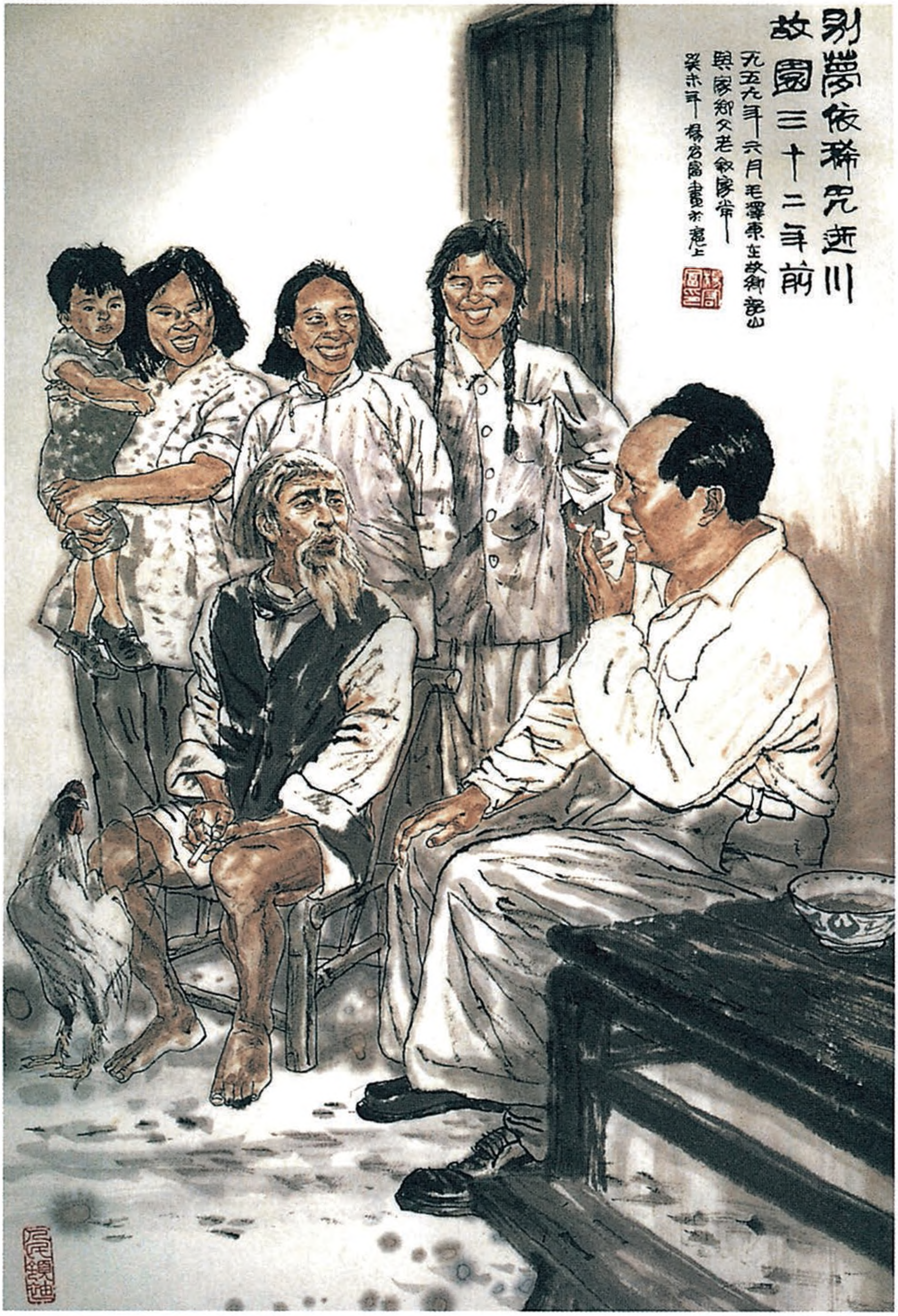

祭掃
一九五九年
毛澤東在故
鄉湖南韶
山沖家
鼎山
為父母親
掃墓
[illegible]丁亥

《祭扫》（中国画）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母亲墓前行鞠躬礼。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故居和家乡干部、群众合影。

1959年6月，毛泽东在故乡韶山和贫农社员毛霞生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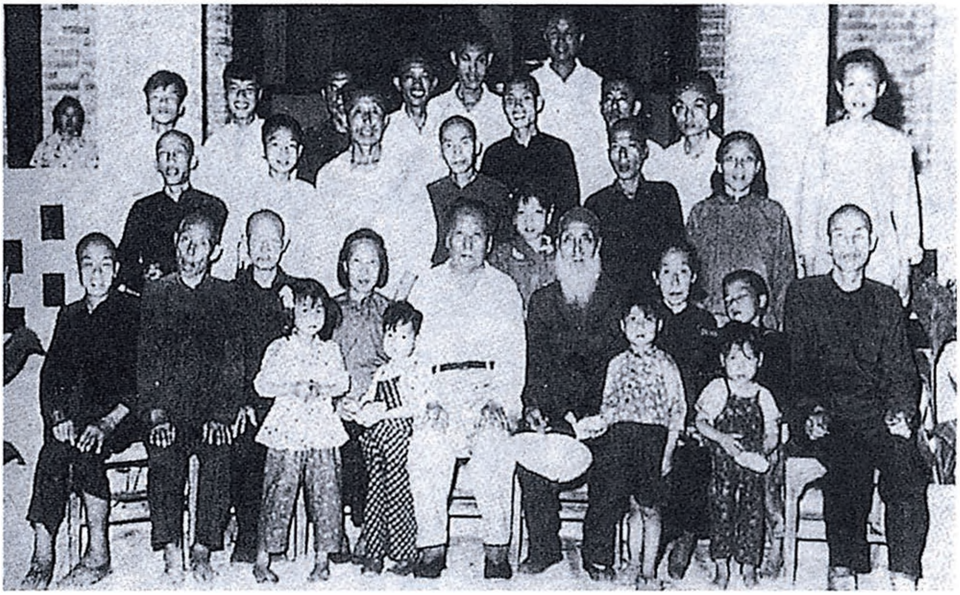

别夢依稀咒逝川
故園三十二年前
九五九年六月毛澤東在故鄉韶山
與家鄉父老叙家常
癸未年 楊名富畫於京上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中国画）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看望毛福轩烈士夫人贺菊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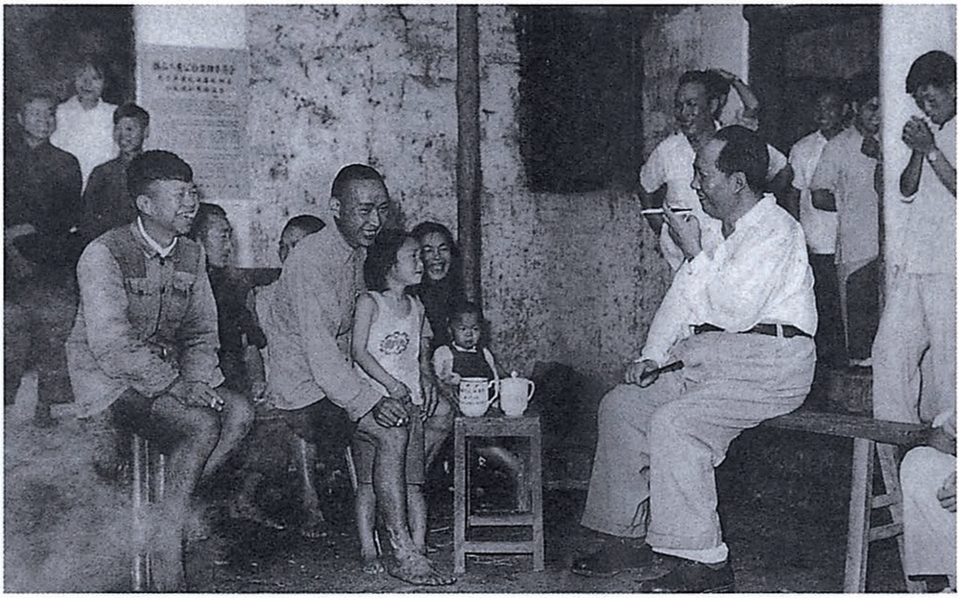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1959年6月，毛泽东和毛宇居等乡亲们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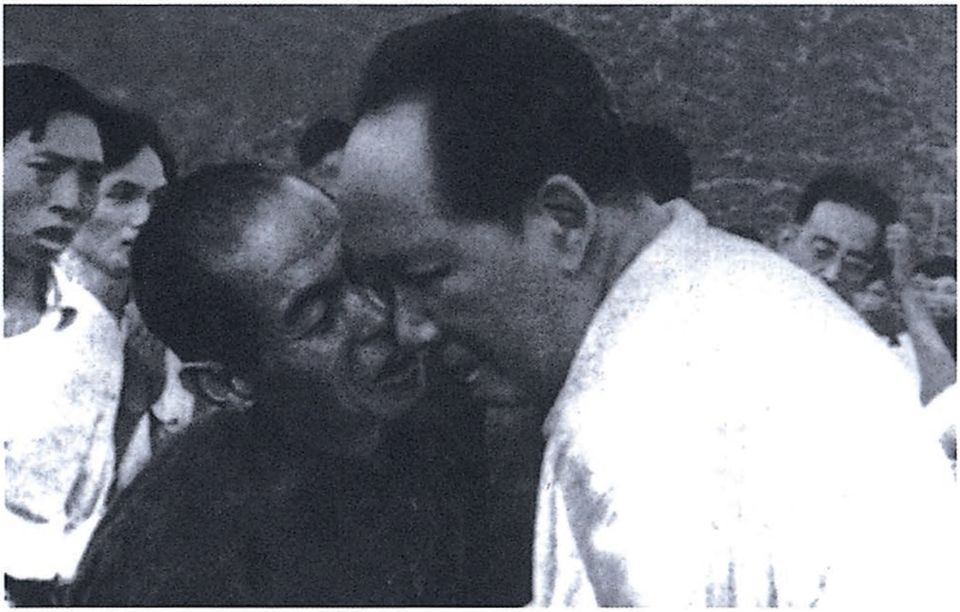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和乡亲们合影。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故居晒谷坪。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看望邻居李文贵。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看望邻居李文贵。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倾听乡亲们的意见。

1959年6月，毛泽东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1959年6月，毛泽东和乡亲们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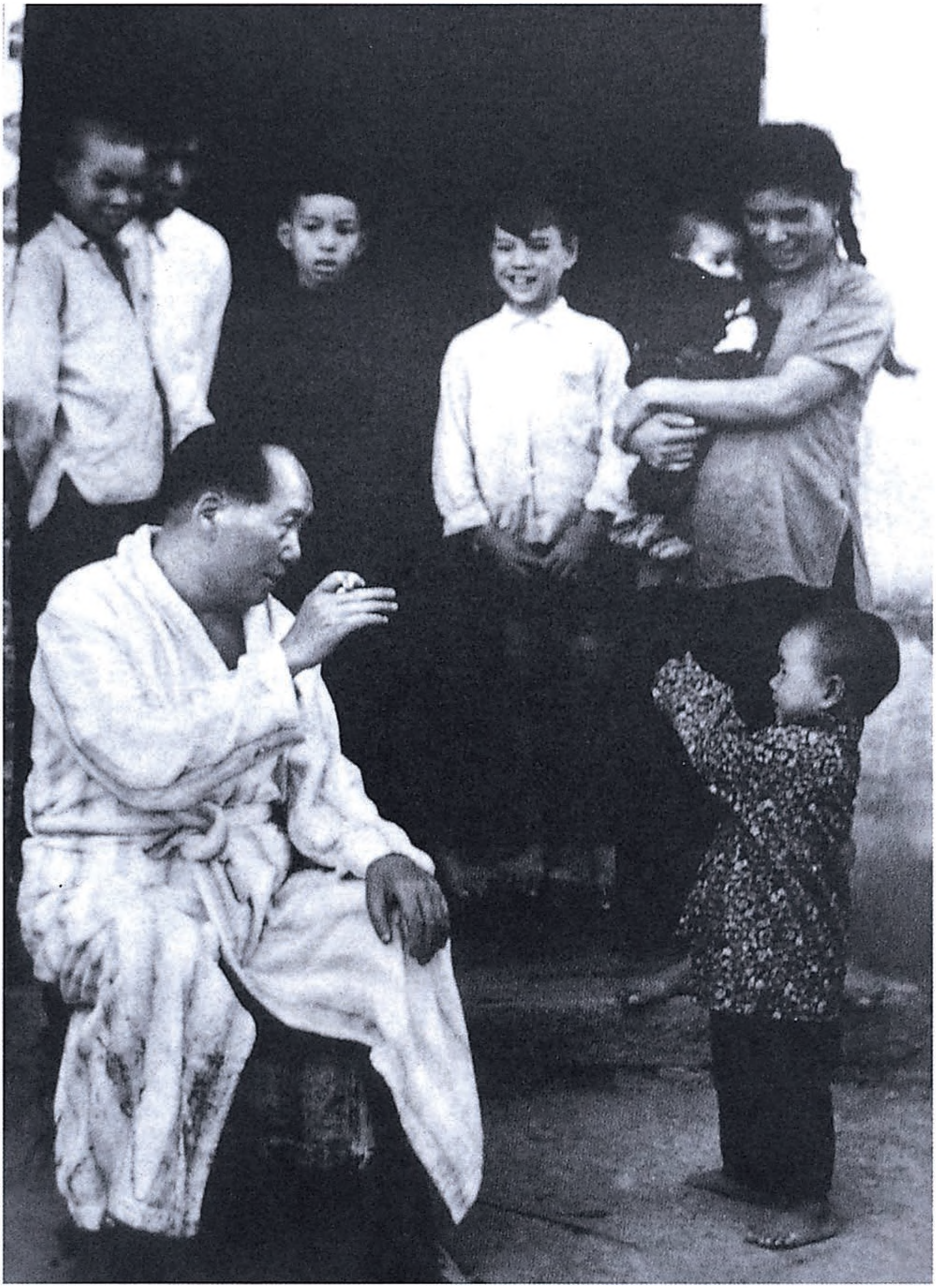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

195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水库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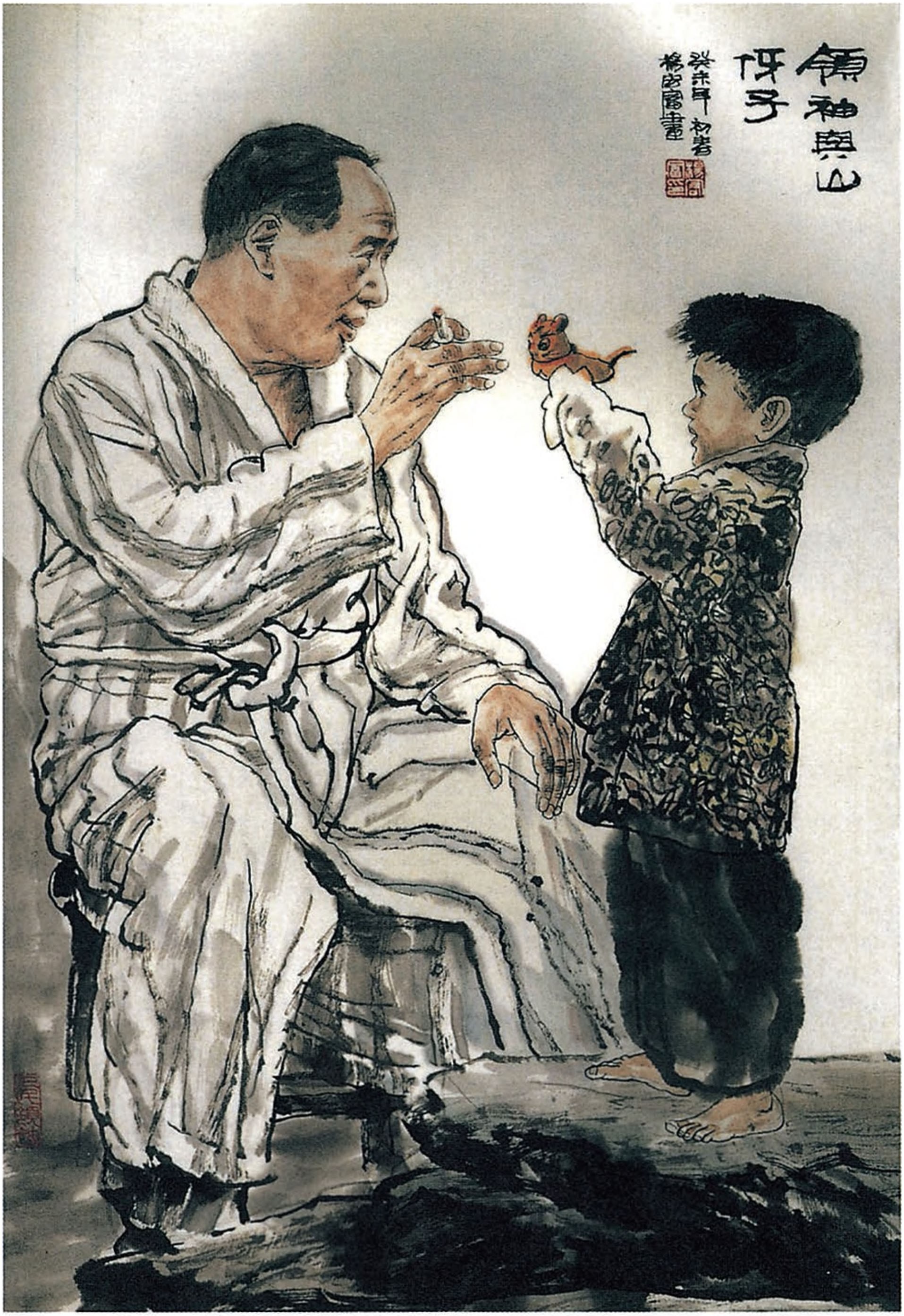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到牛头洲参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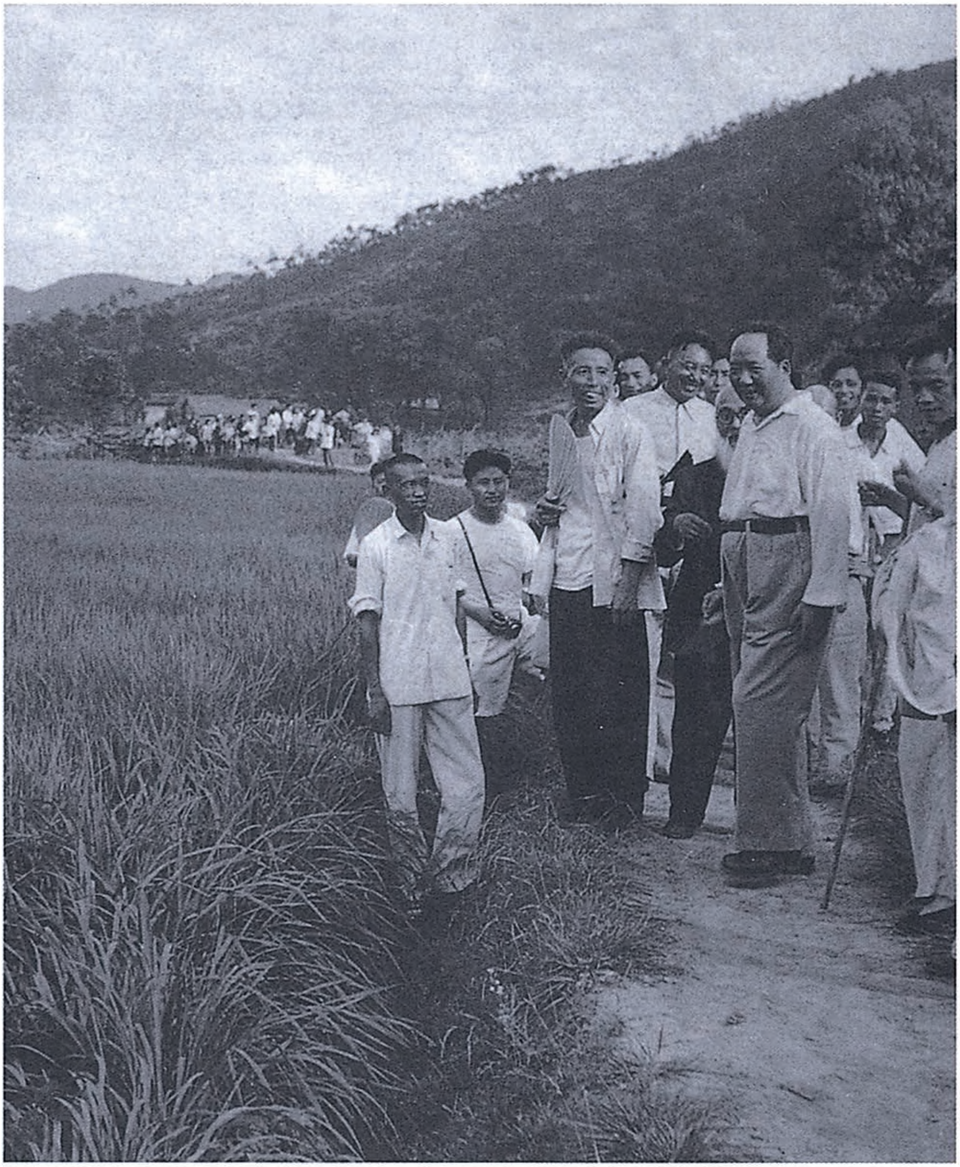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后走上牛头洲和小学生交谈。



1959年6月，毛泽东畅游湘江后在农家院内小憩。


領袖與山伢子
癸未年初春
楊宏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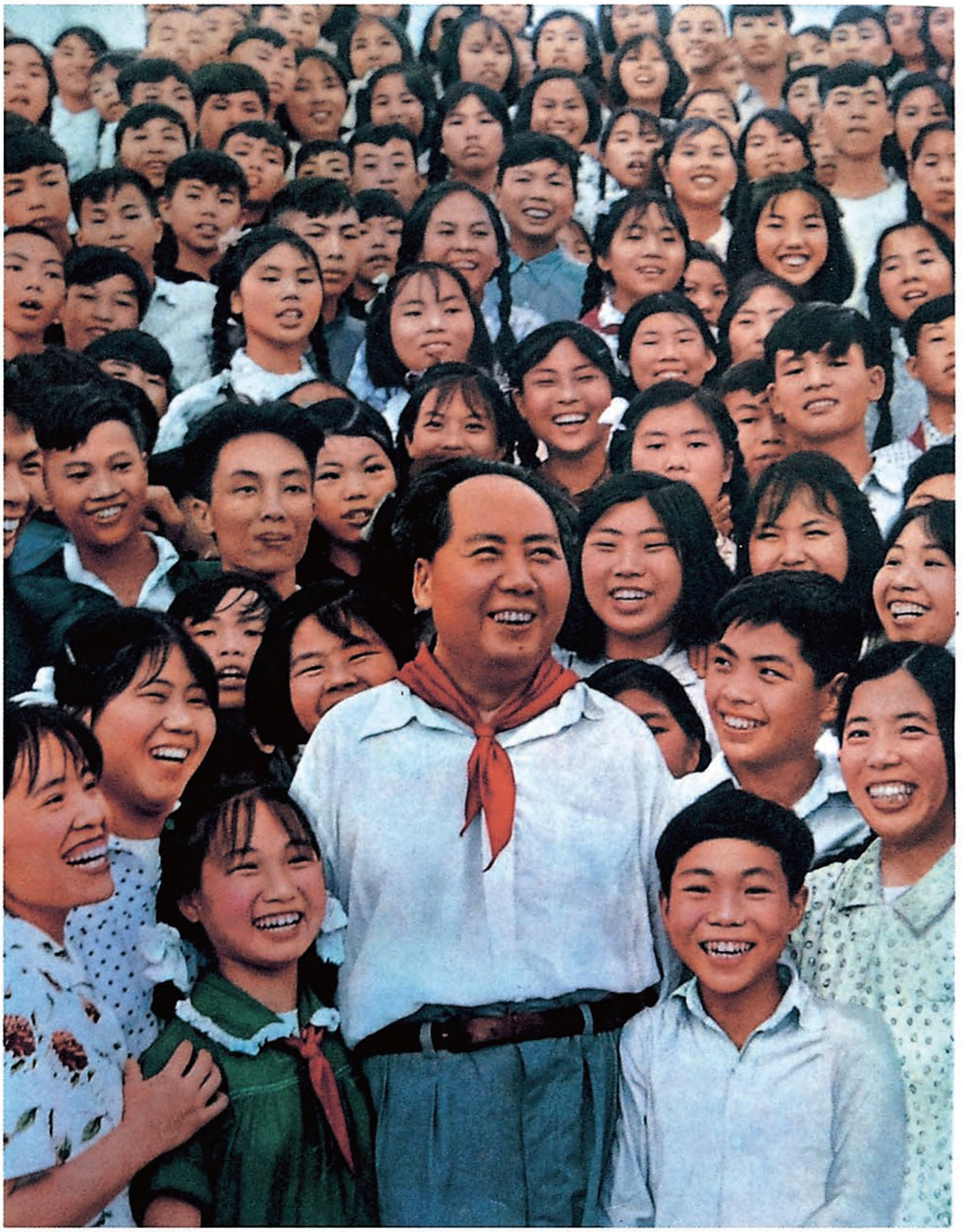
《领袖与山伢子》（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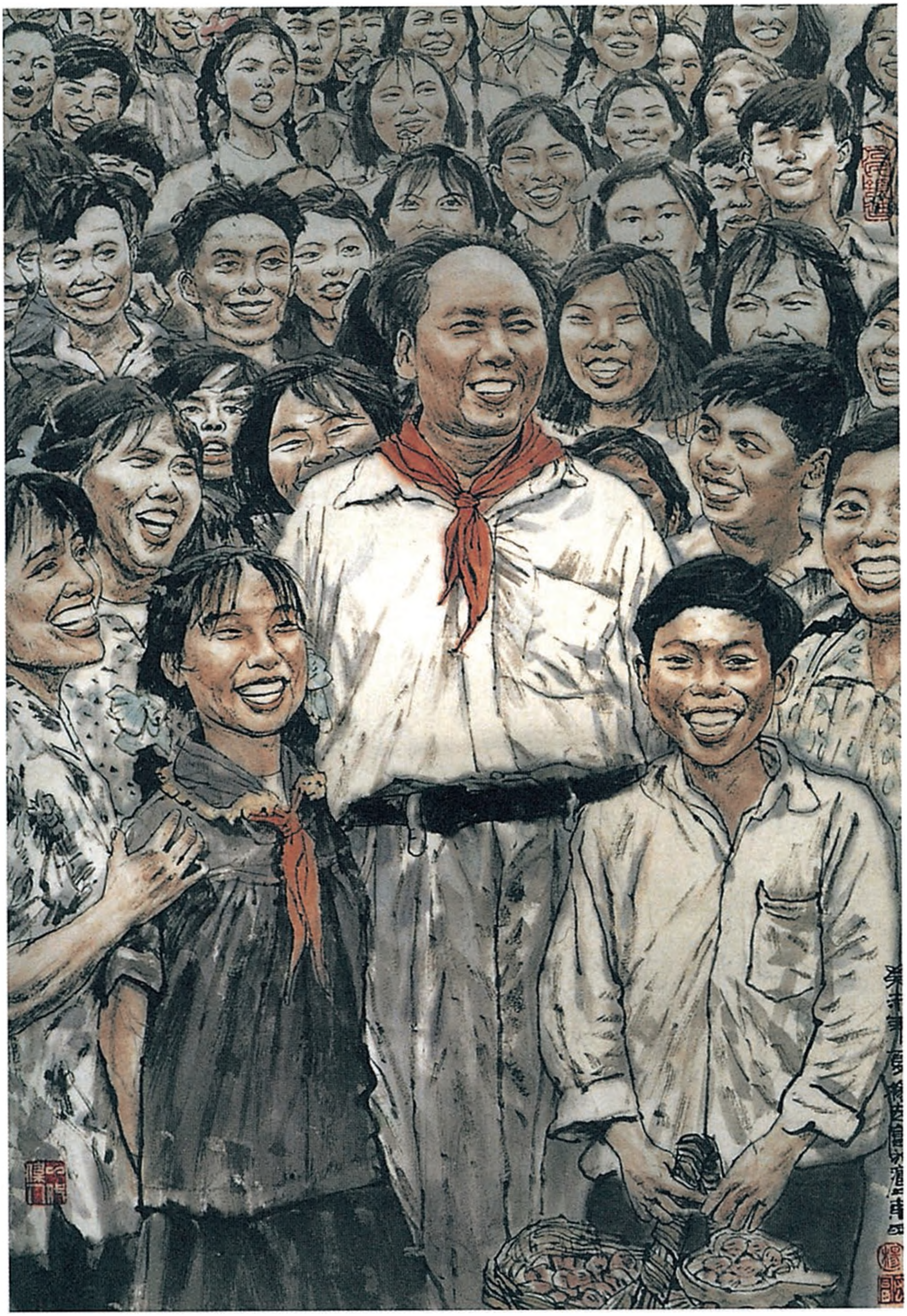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在韶山视察家乡稻田。

1959年6月，韶山学校的学生向毛泽东献花和红领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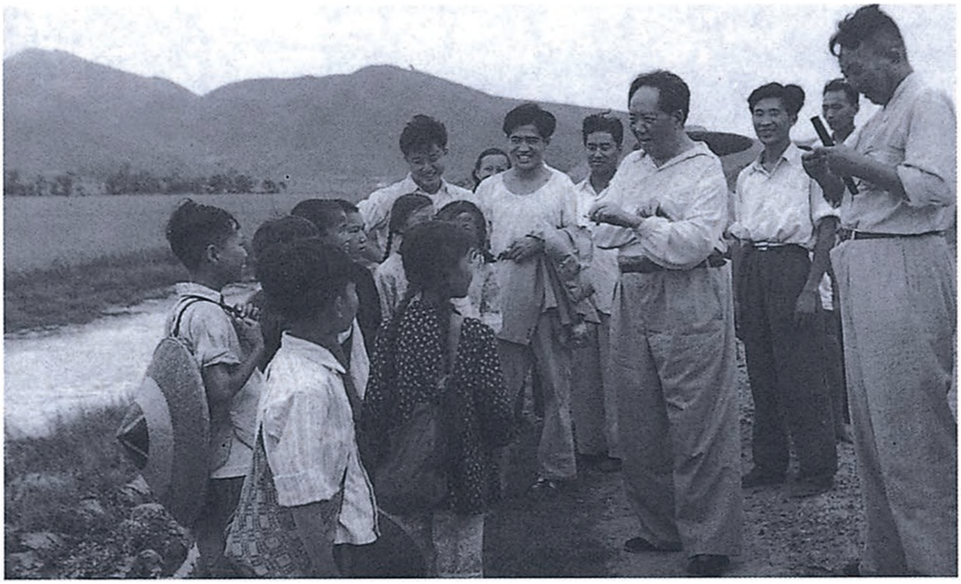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韶山学校的学生给毛泽东戴上红领巾。



1959年6月，毛泽东和韶山学校的师生在一起。



《韶山的孩子们见到了毛主席》(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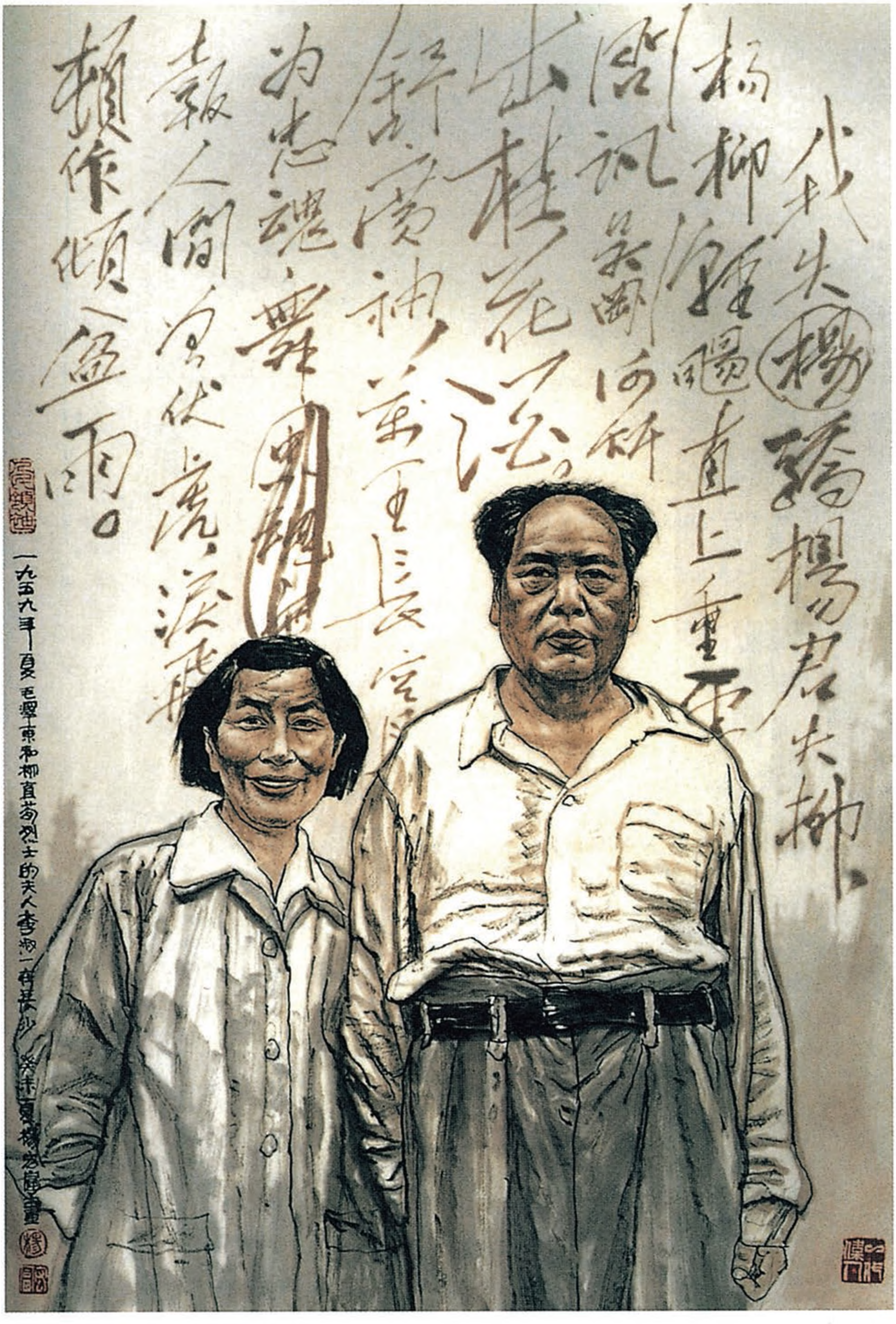


1959年6月，毛泽东离开韶山去长沙的途中和宁乡县的小学生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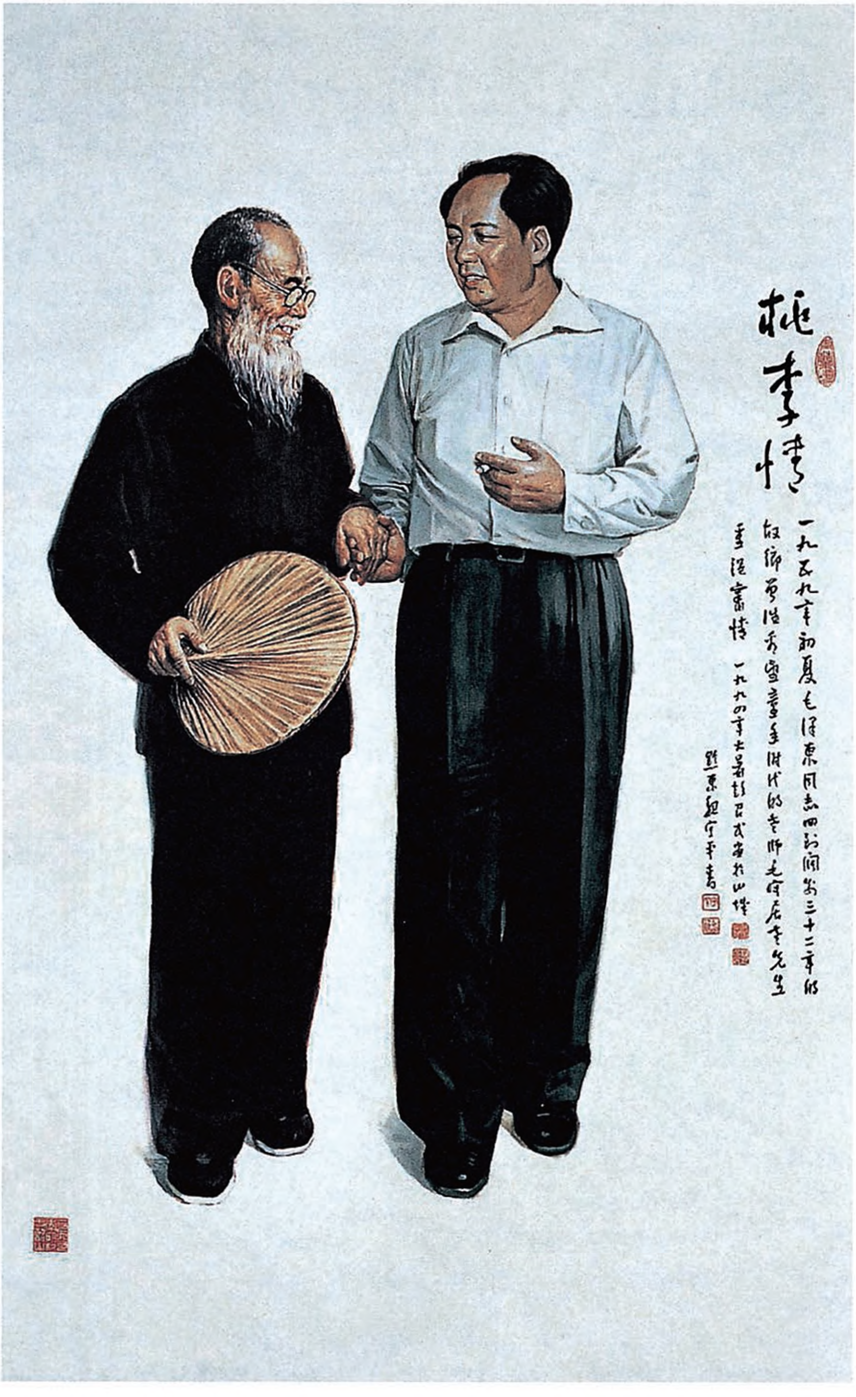
毛主席1959年6月27日在长沙接見湖南省地县委书記時合影 长沙云芳摄

1959年6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和湖南省地县委书记合影。

1959年6月，毛泽东和李淑一在长沙合影。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问讯吴刚何所有
出桂花酒。
舒广袖
万里长空
为忠魂舞
报人间曾伏虎，泪飞
顿作倾盆雨。
一九五九年夏 毛泽东和柳直荀烈士的夫人李淑一在长沙 癸未夏杨之光画

《与李淑一》（中国画）


桃李情
一九五九年初夏毛泽东同志回韶山阔别三十二年的
故乡看望青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老先生
一九九四年大暑彭召武画于韶山

《桃李情》（水粉）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1]

（1959年6月29日、7月2日）

一、读书。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八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来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不规定范围，大家不会读。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2]。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去年郑州会议提出读三本书[3]，问读了没有，说是读了一点，读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没有读。对县、社干部，山东、河北的想法，是给他们编三本书：一本是好人好事的书，收集去年大跃进中敢于坚持真理、不随风倒，工作有前进的，不说谎、不浮夸、实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

---

[1] 这是根据毛泽东1959年6月29日去庐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途中在船上同协作区主任委员的谈话和7月2日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2] 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 1958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王国藩，山东菏泽一个生产队。一本是坏人坏事的书，收集专门说假话的、违法乱纪的或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例子。每省要找几个，各省编各省的，每本不超过二万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从去年到现在的各种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系统地编一本书。三本书大体十万字左右，每天读一万多字，一星期可以读完。读完后讨论，不仅读，还要考试。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设法给县、社党委每年有一个系统思考问题的时间。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他们的缺点我们不要去学，但在去年，把苏联一些好的经验也丢了。

二、形势。国内形势是好是坏？大形势还好，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会议[1]的方针对不对？我看要坚持。总的说来，像湖南省一个同志所说的，是两句话：“有伟大的成绩，有丰富的经验。”“有丰富的经验”，说得很巧妙，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要注意质量，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种各样都要有。农业中，粮、棉、油、麻、丝、烟、茶、糖、菜、果、药、杂都要有。工业

---

[1] 八大二次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

中，要有轻工业、重工业，其中又要各样都有。去年“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这“两小”，其他都丢了。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我看了四个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体可以代表全国。今年夏收估产普遍偏低，这是一个好现象。

今年这时的形势和去年这时的形势比较，哪个形势好？去年这时很快地刮起了“共产风”，今年不会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转。去年人们的热情是宝贵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夹子？现在讲不清楚，促进派也讲不清楚。说得清楚就说，说不清楚就硬着头皮顶住，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

去年许多事情是一条腿走路，不是两条腿走路。我们批评斯大林一条腿走路，可是在我们提出两条腿走路以后，反而搞一条腿了。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三、今年任务。

四、明年任务。

五、四年任务。工、农、轻、重、商、交方面，过去是两条腿，后来丢掉了一条腿，重工业挤掉了农业和轻工业，挤掉了商业。如果当时重视一下农业、轻工业就好了。这几方面到底如何搞法？建设如何安排？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今后应由中央确定方针，再交业务部门算账。粮食有多

少？去年增产有无三成？今后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亿斤，搞到一万亿斤，要好几年。明年钢增加多少？增加四百万吨，是一千七百万吨。后年再增加四百万吨。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还要坚持。总之，要量力而行，留有余地，让下面超过。人的脑子是逐渐变实际的，主观主义减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过去搞过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两条腿，现在可以说是没有执行，或者说是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去是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提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重工业我们是不会放松的，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如果真正重视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安排好了轻、农，也不一定要改为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过去陈云[1]同志提过：先市场，后基建，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安排好了之后，就不会造反了。怎么才会不造反？就是要使他们过得舒服，少说闲话，不骂我们。这样有利于建设，同时国家也可以多积累。赞成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来管农业机械，搞农业机械设计院。现在这些事谁也不管，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人管不行。过去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左”倾时我曾说过，“炮是要打死

---

[1]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人的，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脚走的”。现在炮没有了，第二条、第三条还有，如果忘记了这些，不好办事。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

饲料要有单独的政策。现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过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两斤，牲口吃的要逐渐比人多。

农业问题：一曰机械，二曰化肥，三曰饲料。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工业要支援农业，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钢材支援农业，这次会议要定一下。粮食去年说增产三成，是否达到四千八百亿斤，我还有怀疑。今年说不增加了，我看增点还是可能的。以后每年增一千亿斤，一九六二年达到八千亿斤。

明年钢的指标是一千七百万吨，形成一个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多四百多万吨。后年二千万吨，大后年二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三百万吨，可以赶上英国。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万吨，可能少点，也可能多点，多了到二千八百万吨，少了到二千三百万吨也好。赶上英国，说的是主要产品，钢太多了不一定好。

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实事求是的积极性，一种是盲目的积极性。红军的三大纪律，现在有两条还有用：“一切行动听指挥”，即统一领导，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不搞一平二调。总的说来，群众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产主义风格有两种：一种是真要搞共产主义；另一种，这种占多数，是事情归他办，权力都归他，他就说是“共产主义”，归人家就是“资本主义”。山东曹县出现抢粮现象，这很好，抢得还少了，抢多了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对那些摧残人民积极性的官僚主义就是要整一下。

我们的国家是不会亡的，社会主义是亡不了的，蒋介石是回不来的。美国打来，我们最多退到延安，将来还会回来的。

六、宣传问题。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1]时，有人提出，利用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机会，把指标改了，后来没有这么做。现在看来失掉了点时机，但不要紧。指标改不改？看来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还拿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是否以后不公布绝对数字，可以学习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今后钢不算小转炉的，铁不算土铁。

七、综合平衡问题。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八、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九、工业管理问题。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十、体制问题。“四权”[2]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十一、协作关系。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

---

[1] 指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四权，指人权、财权、商权、工权。

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在这几项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办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的积极维持，一为湖北的提倡自愿。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暂时回去了。湖北拟从少到多，开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将来达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

十三、学会过日子。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湖北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农民批评有些干部，一不会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些地方生产不见得比别处多多少，但只要安排得好，日子好过。今年不管增产多少，估计增产一点，还是按去年四千八百亿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标准安排过日子。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十四、三定政策。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十八、团结问题。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对新华社关于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准备工作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6月）

退江青。此期我已全部看过。第一条新闻[1]，你可以看一看。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七八八期上登载的第一条新闻报道，题为《目前急需做好煤炭生产的准备工作》。报道说，据记者从煤炭工业部在抚顺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了解，生产准备不足，是当前煤炭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生产准备落后的原因，除生产成倍地增长，给掘进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外，主要是领导思想上有重产量轻掘进的片面观点，致使采掘不平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其次，违反技术政策，乱采乱掘，工程质量降低，巷道失修，对生产准备工作影响也很大。

关于一九五九年市场供应情况的批注[1]

（1959年6月）

毛注：没有根本好转，但是已经开始了好转。再有几个月，根本好转就会来了，这是明白无疑的。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59年6月11日关于1959年社会商品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平衡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今年全国工农业生产还在继续大跃进，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市场供应方面，不论粮食、副食品和日用工业品，供应情况都是比较紧张的。几个月来根据中央历次会议的精神，全党在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在日用工业品生产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好转。"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在关于印度和尼泊尔联合声明的报道[1]上的批语

（1959年6月）

尼泊尔不满印对它的控制，在这里，印度方面似已作出了一种让步，以便拉住尼泊尔。[2]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16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九三五期上登载的第一条新闻报道，题为《印新处报道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介绍了印度总理和尼泊尔首相1959年6月14日在加德满都发表的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

[2] 印度和尼泊尔的联合声明说到："总理和首相还确信，为了和平的利益以及为了民族的和人类的进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受到另一个国家的统治，殖民控制，不管什么形式，都应该结束。"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这条批语。

对《参考资料》有关日本的几条消息的批语[1]

（1959年6月）

林克[2]：

有两三条日本消息，值得一阅。

毛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9年6月18日编印的《东南亚和中近东情况》（《参考资料》专辑）第十八期上。这期资料登载了有关日本的几条消息。其中《〈香港时报〉评日本地方选举》的消息说，《香港时报》5月8日刊载了该报驻东京特派员芳亭写的题为《日本地方选举的总结》的通讯，指出这次选举结果显示日本保守势力有“退潮”的象征，日本舆论对选举中违法和贿选现象层出不穷极为不满。《美报掩饰日反动势力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的消息说，《纽约时报》5月10日发表一篇题为《日本的坚定》的社论，吹嘘日本反动势力的“胜利”，掩饰其在地方选举中的失败，为美日反动派打气。《东京裁判所对砂川事件的判决鼓舞了人民斗志》的消息说，《日本新闻周报》4月8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引起了影响的“对砂川事件的判决”》的文章，指出东京地方裁判所对砂川农民为反对扩大美军基地举行游行示威这一事件作出“美军驻扎在日本是违反宪法的”判决，大大鼓舞了日本人民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七律·到韶山[1]

（1959年6月）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32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2]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3]，
黑手高悬霸主鞭。[4]
为有牺牲多壮志，

---

[1] 韶山在湖南省湘潭县，是毛泽东的故乡。1927年1月，毛泽东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时曾回到韶山。三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5月21日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袭击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屠杀革命群众，这就是马日事变（旧时用韵目代日期，马日即21日）。当时韶山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拿着枪和梭镖，准备配合其他农民武装力量进攻长沙。后来反动军队大举进攻韶山，农民自卫军在英勇抵抗后失败。毛泽东在1959年6月25日至27日重返韶山，离1927年1月已经32年多。这首诗便是对于32年来的斗争和胜利的概括。

[2] 别梦依稀咒逝川，久别重归，又唤起了已依稀如梦的斗争和失败的回忆。

[3] 戟，古代的一种刺杀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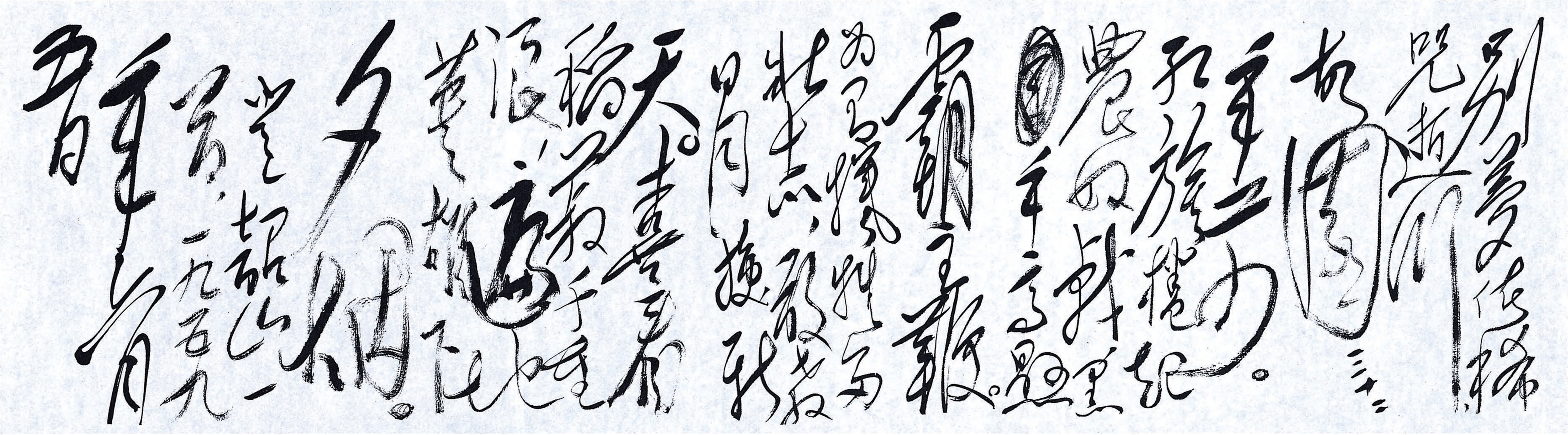
[4] 黑手高悬霸主鞭，黑手，反革命的血腥魔掌。霸主，指蒋介石。本句和颔联出句，是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1]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伟人故里》（诗意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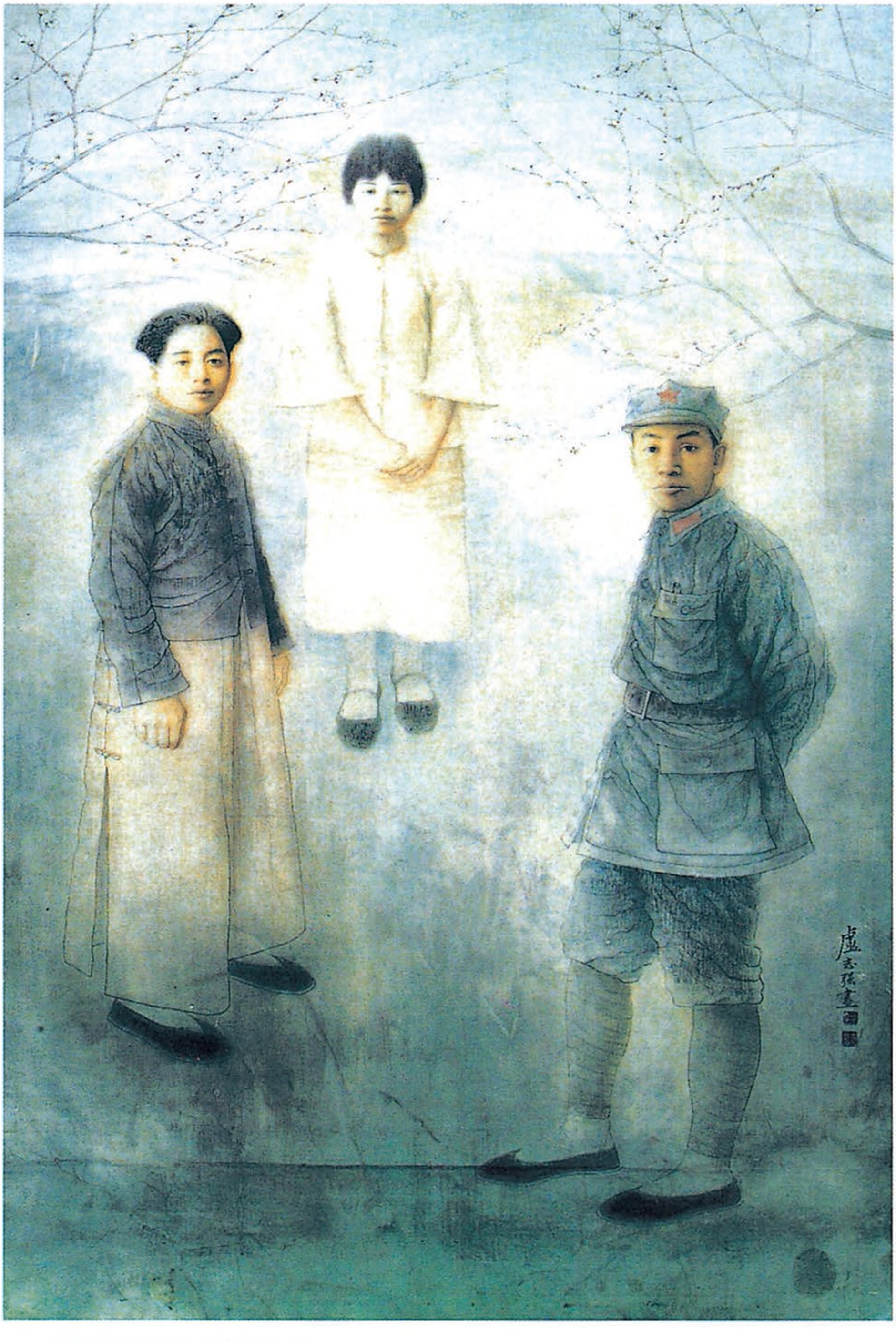
[1] 菽，豆类的总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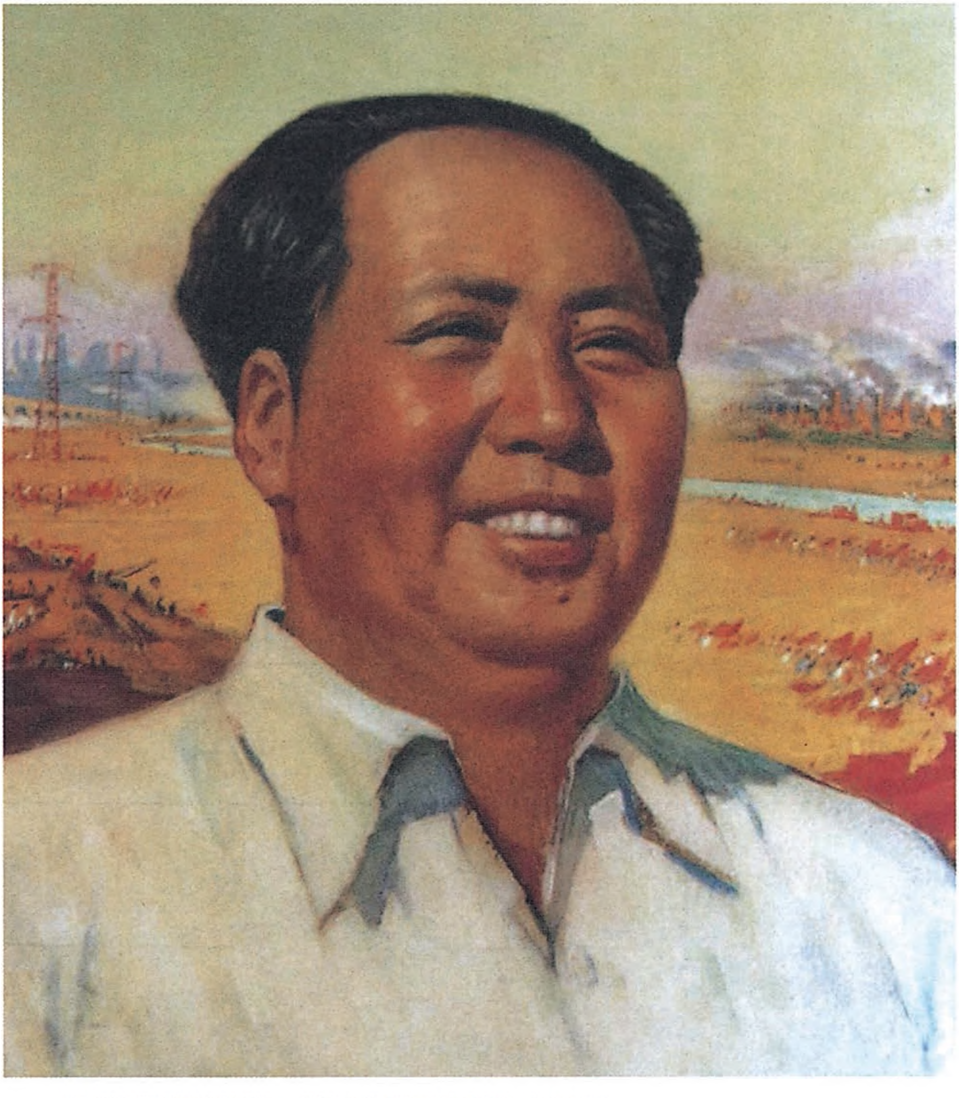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到韶山 [illegible]，一九五九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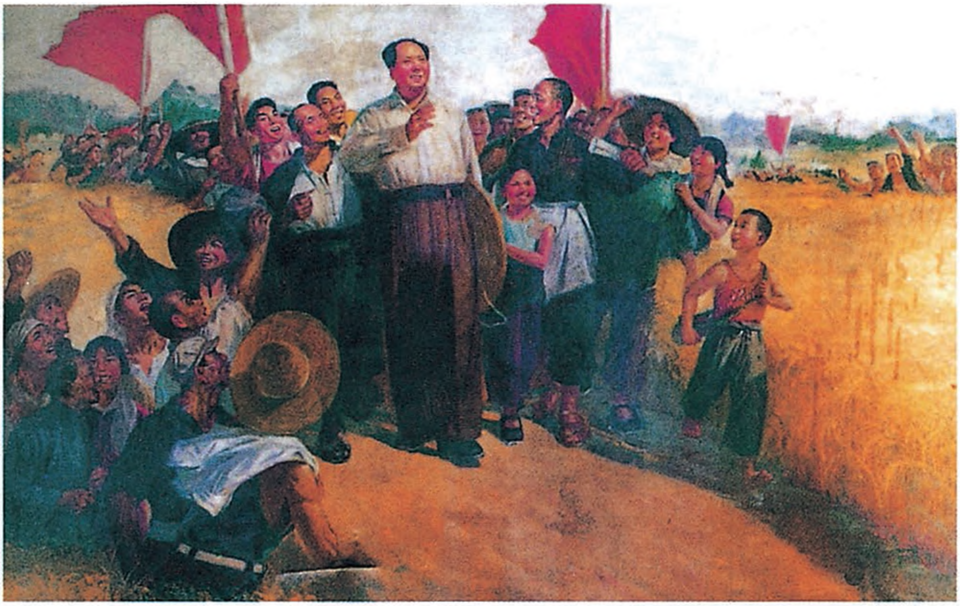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七律・到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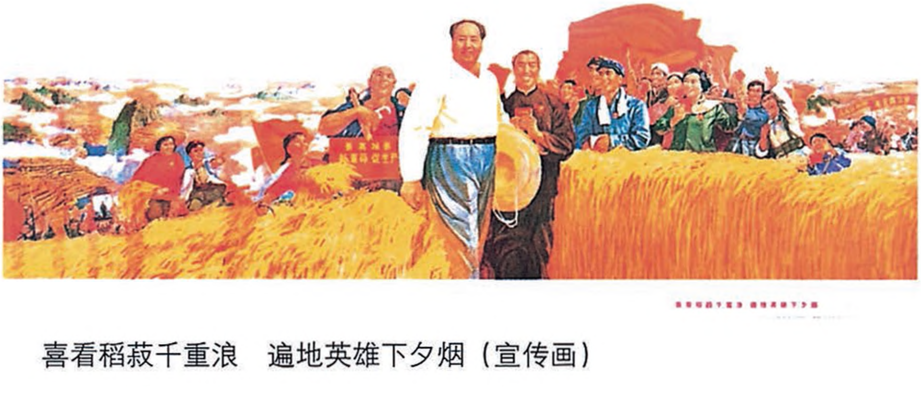
《别梦依稀》（诗意画）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油画）



《毛主席1959年回韶山》（油画）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宣传画）

七律·登庐山[1]

（1959年7月1日）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2]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3]浮黄鹤，
浪下三吴[4]起白烟。

---

[1] 庐山，在江西省北部，屹立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

[2] 跃上葱茏四百旋，葱茏，草木青翠茂盛，这里指山顶。庐山登山公路，建成于1953年，全长三十五公里，盘旋近四百转。

[3] 九派，见《菩萨蛮·黄鹤楼》注。《十三经注疏》本《尚书·禹贡》“九江”注：“江于此州界分为九道。”明李攀龙《怀明卿》：“豫章（今南昌）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毛泽东1959年12月29日在一封信上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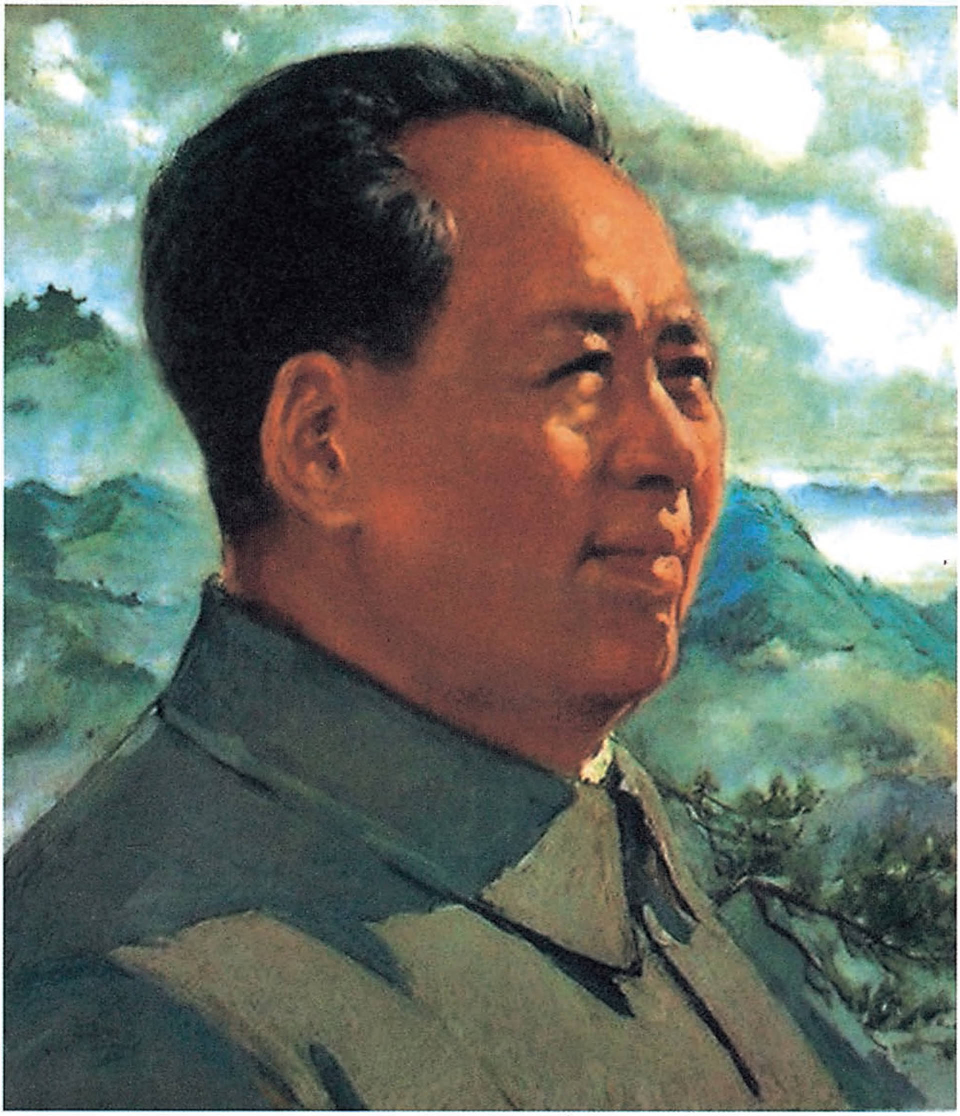
[4] 三吴，古代指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的某些地区，具体说法不一。这里泛指长江下游。毛泽东在1959年12月29日同一封信上说：“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

陶令[1]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2]里可耕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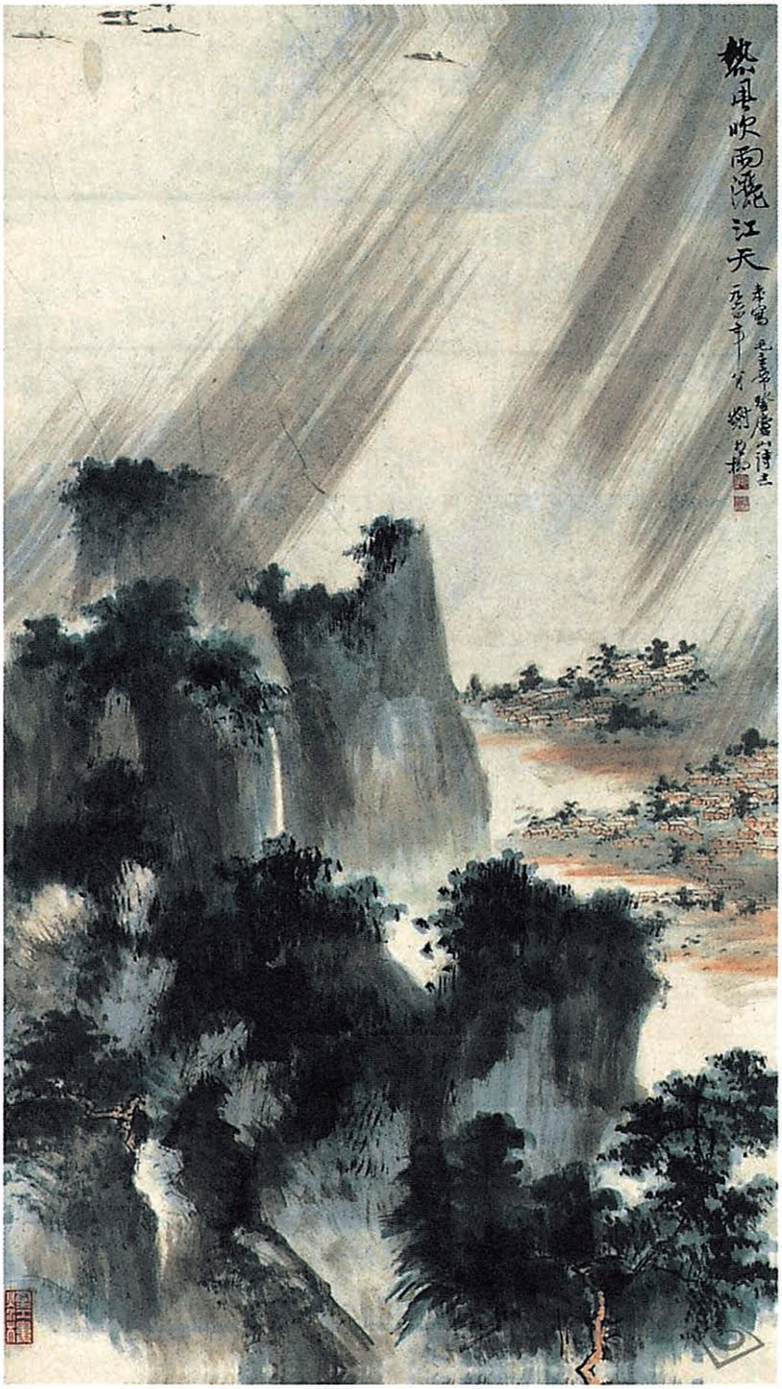
---

[1] 陶令，指陶潜（365—427），一名渊明，字元亮，东晋诗人。他曾经做过彭泽县令，故称陶令。据《南史·陶潜传》记载，他曾经登过庐山。他辞官后归耕之地，离庐山也不远。

[2] 桃花源，陶潜曾作《桃花源记》，文中说秦时有些人逃到一个偏僻宁静的“桃花源”（长满桃花的水源）地方避乱，从此与世隔绝，过着和平的劳动生活。直到晋朝才有一个武陵（湖南常德）的渔人因迷路偶然找到这个美丽幸福的奇境。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油画）



《热风吹雨洒江天》（诗意画）

庐山会议[1]讨论问题[2]

（1959年7月3日）

一

一、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县级主要干部，首先是第一书记，另读三本书：“好人好事”一本、“坏人坏事”一本、中央的政策和工作方法的文件一本。[3]三本书不超过十万字，七天能够读完。然后讨论三个星期，共学一个月。

每年轮训县社干部。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

[1] 指当时正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同各协作区主任座谈时，提出了在庐山会议上准备讨论的若干问题。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确定为十八个问题，印发庐山会议各同志。7月3日，毛泽东对这个提纲又作了修改，即本篇一。本篇题目也是毛泽东在这次修改时定的。

[3] 这是当时准备为县、社干部编印的三本书。

六、宣传问题。

七、综合平衡问题。工业和农业中都有。

八、群众路线问题。工业和农业中的。

九、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极大的问题，立即抓起，一年完成，某些两年完成。

十、体制问题。即人权、工权、财权、商权问题。四大下放权力[1]，现要收回，由中央、省市区党委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

十一、协作区关系问题。

十二、公社食堂问题。

十三、学会过日子问题。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立于不败之地。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产、定购、定销，三年不变。

十五、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

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基本核算单位。（即要它负担一部分发工资的任务。允许生产小队之间，由于生产和经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资、口粮、肉食上有差别。）

十七、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

十九、国际问题。

---

[1] 指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自1957年以来为改进财经工作的管理体制而下放的人、工、财、商四大管理权限。

二

尚昆[1]：

此件再印，换发，原发件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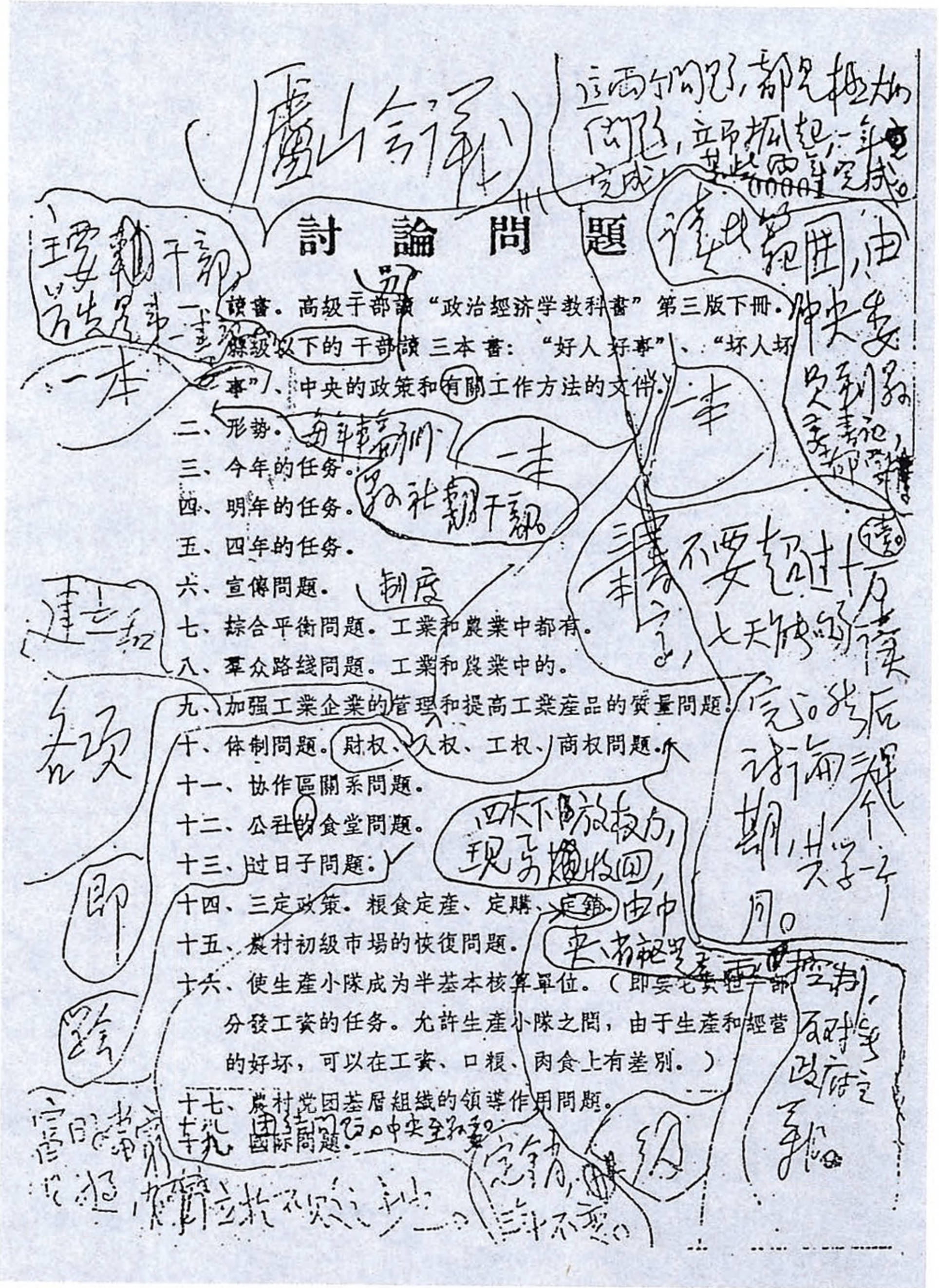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七月三日一时半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先后在庐山举行。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庐山会议上。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討論問題

一、讀書。高级干部讀“政治經济学教科書”第三版下冊。縣級以下的干部讀三本書：“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中央的政策和有關工作方法的文件。

二、形势。

三、今年的任务。

四、明年的任务。

五、四年的任务。

六、宣傳問題。

七、綜合平衡問題。工業和農業中都有。

八、羣众路綫問題。工業和農業中的。

九、加强工業企業的管理和提高工業產品的質量問題。

十、体制問題。財权、人权、工权、商权問題。

十一、协作區關系問題。

十二、公社的食堂問題。

十三、过日子問題。

十四、三定政策。粮食定產、定購、定銷。

十五、農村初級市場的恢復問題。

十六、使生產小隊成为半基本核算單位。（即要它負担一部分發工資的任务。允許生產小隊之間，由于生產和經营的好坏，可以在工資、口粮、肉食上有差別。）

十七、農村党团基層組織的領導作用問題。

十八、国际問題。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庐山会议讨论问题的手稿。

发展副食品生产[1]

（1959年7月3日、4日）

一

此件[2]阅过，有所修改，是一个好文件。请先念再打清样，校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对这一指示稿的修改；本篇四是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转发上述指示及李先念关于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的报告的通知稿。

[2] 指李先念代拟的中央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为了早日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中央特作如下指示：一、解决大中城市副食品供应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城乡并举，组织发展副食品生产。大中城市应坚决实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二、必须大力加强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的建设，明确郊区的生产方针。凡是城市郊区，都应当为城市生产副食品。三、发展郊区的副食品生产，应当以蔬菜和猪肉为纲，带动其他，全面发展。四、应当实行公私并举、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既要发展国营和集体经营的副食品生产，又要允许社员个人饲养家畜家禽和进行其他副食品的生产。五、发展郊区副食品生产应当发动群众，因陋就简，逐步克服遇到的困难。六、必须做好副食品的收购供应工作。七、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的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实行农工交商四项并举的方针。八、加强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丝毫也不应当削弱广大农村的副食品生产，相反必须继续加强。1959年7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对勿错。改处有错误时，请先念动笔改正，我不看了。然后送交刘、周、朱、谭震林、彭德怀、胡乔木[1]六同志阅过，交尚昆印发庐山到会各同志，另用电报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勿误为盼！

毛泽东

七月三日上午一时，书于床上。

送李先念。

二

大中城市党委，对于郊区农业生产，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必须实行农工交（交通）商四项并举的方针。既要管好工业（这是城市的重点），也要管好农业；既要管好生产，也要管好流通。为要流通，交通运输必须相应地办起来。城市当然以工业为重点，但现在是处于副食品严重不足的时期，必须强调郊区的农业。所谓农者，指的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定可以做到有菜吃，有油吃，有猪吃，有鱼吃，有菜牛吃，有羊吃，有鸡鸭鹅兔吃，有蛋吃。我们应当有志气、有决心做到这一项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应当有信心做到这一项事情。一切为了人民利益，望各级党委接到这个指示以后，精心筹划，立即动手办起来。不但大中城市，县城及四乡集镇都要照此办起来。各级党委要有一个专门管副食品的书记或精心从事的干部。

四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中央批准李先念同志领导在上海召开的关于彻底解决副食品问题及手工业问题的会议的报告[1]及代中央起草的指示[2]，现在发给你

---

[1] 指李先念1959年7月2日关于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们于6月18日到23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和手工业品生产会议。在副食品生产方面，会议一致认为，总的方针应当是城乡并举，除了乡村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支援城市以外，大中城市也应当执行“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的方针。在手工业方面，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国庆节至迟年底前，把日用手工业的品种、质量恢复到去年8月以前的水平，数量上则要争取超过。至于手工业的所有制，可以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大多数维持现状。只有少数单位需要退回到集体所有制，个别的需要退回到个体经营。手工业产品、服务方式、生产过程、所有制都要多样化，才能适合客观需要。在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的同时，对公社工业应当进行整顿。

[2] 即李先念代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

们，望你们彻底遵照执行。先发副食品指示，后发手工业指示[1]。

中央
一九五九年七月四日

---

[1] 中共中央关于手工业问题的指示，于1959年8月5日下发。

关于印发两篇论述经济工作的文章[1]的批语

（1959年7月4日）

尚昆[2]同志：

第2页起一篇，第8页起的一篇，共二篇，请即印发各同志[3]。这两篇分开印，不要连在一起。

毛泽东

七月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6月2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十七期上登载的《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和《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说，最近有些省市理论刊物公开发表了有关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其中山西《前进》杂志第六期社论《论社会分工与协作》一文指出：大跃进中出现了某些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不正常现象；在目前阶段各地区不应强调建立一套工业体系；对待手工业改组要慎重；不能盲目地发展“卫星”厂；不能片面强调人人当“多面手”。广东《上游》杂志第十一期发表了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总路线与工作方法》一文，指出广东经济建设速度一九五七年慢了一些，1958年下半

年又过快了一些；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广东最近两年仍要贯彻执行农业为主的方针；万事仰求人的情况还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北京《前线》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注意综合平衡，争取不断跃进》一文指出，现在国民经济出现许多不平衡，需要进行新的综合平衡工作。该刊第十一期还发表社论《产品和产值的计划要同时完成》一文，指出目前某些工业部门在制订计划时，不是先规定产品计划，而后算出产值计划来，而是先订一个产值的数字，再去凑产品计划，结果产值计划虽然完成了，产品却不符合需要，完不成国家计划。这样本末倒置，势必影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因此必须坚决按照国家的产品计划和社会的需要去安排生产。文章指出：1955年至1958年我国工业生产的发展波动较大；1957年增长缓慢的原因除了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上一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有些失调；1958年流动资产积累在生产积累中的比重下降，影响了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近几年来，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同加工工业以及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不完全相适应；原料工业资源用于基本建设部分的比重逐渐提高，而用于生产部分的比重逐渐下降。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正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各同志。

粮食问题[1]

（1959年7月5日）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但觉：（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

---

[1] 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7月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为印发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1959年7月4日《关于1959年至1960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写的批语。

[2] 指陈国栋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59年7月5日为报送这个报告给毛泽东的信。陈国栋的报告建议，在城市中继续执行粮食以人定量的办法，在农村中继续执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只是将粮食产量、购量、销量和农村留粮标准根据生产和消费变化的情况，作必要的和可能的调整。每年在定产基础上增产的粮食，国家只增购40%，农民得60%。如果减产，则相应地减少征购数字。报告认为，原定的粮食征购指标1155亿斤，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办到的。原定的粮食销售指标975亿斤，则偏大了一些，可以调整为855亿斤。只有这样，补充国家库存才有保证，才能把粮食工作的被动局面扭转过来。

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以上几点意见，只供同志们此次讨论的参考，切勿下传。不对之处，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七月五日上午六时

对张闻天关于国际问题的发言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7月5日）

一

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

毛泽东
七月五日

尚昆[3]办。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1959年6月27日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关于国际问题的发言稿。主要内容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问题，关于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间路线的问题，关于美英对外政策的变化的问题和对于国际形势的总体估计问题等四个方面。

[2] 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因此，在西方许多共同利害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致反对我们的。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甚至是某几个极重要的问题上，英美并不是一致对付我们，而是有严重分歧的。例如，打第三次大战问题，英国十分怕打，美国则有一部分人似乎有些想打。例如英国对苏联较美国为接近，这是因为西德攻击英国很凶，美国挤英国地盘又相当厉害的原故。例如在两个中国问题上他是一致的，而对于如果美中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战争的话，英国是坚决反对的。对英国的变化不能估计过高，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章士钊来信[1]的批语

（1959年7月5日）

井泉[2]同志：

信三件，请看一下。回去，着四川文史馆负责人认真处理一下。如无大不妥处，宜予吸收，使其整理所学，较为有益。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七月五日

---

[1]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1959年7月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顷得湘潭刘柏荣书，甚为惊诧。此君名朴，所治确如朴学，性分不甚高而用力极勤。钊不得柏荣消息已三年，悠悠岁月，始终见摒于文史馆门檐之外，殊难索解。"章士钊将刘柏荣给他的信转给毛泽东，请求一阅。刘柏荣，原为四川大学教授，后调入四川文史研究馆工作。

[2]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印发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7月5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请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七月五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1959年6月24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第一二四号上转载的这篇材料说，据四十二军政治部和海南军区政治部报告，有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表示抵触和不满，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攻击地方干部，对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各项规定也有不满，认为经济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

印发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7月5日）

此件[1]请尚昆[2]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七月五日

---

[1] 这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搜集整理的材料说，国家机关的党外人士在听了各部领导人传达中央“关于大力紧缩社会购买力和解释当前国内经济情况指示”的报告后，大多数人认为报告做得及时、正确、有说服力，解决了思想问题，相信党和政府的解释，认为当前的困难是暂时性的，是可以克服的。但也有少数人对于这个解释，仍有怀疑和不同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一）对去年大跃进仍有怀疑。（二）认为去年全民炼钢的口号不正确。（三）认为去年的群众运动有偏差。（四）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速度太快了。（五）对物资出口表示不满意。（六）对市场供应紧张的原因发生猜疑。（七）对宣传、解释工作有意见。（八）对现行政策发生怀疑。此外，也有人对厉行节约，紧缩开支，缓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提出了许多建议。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日

---

[1] 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6月22日给中央并各地、市、县委的这一报告说，我省整社算账工作已经在麦收前基本上胜利结束。整个算账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迅速的，始终实行了算账与生产相结合，加强领导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算清经济账与解决干部思想作风相结合，边清算边兑现，边鸣放边整改，不仅算清了经济方面的账目，同时也解决了干部思想作风上的问题，揭露出了不少坏分子。经过整社算账，整个农村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呈现了蓬蓬勃勃的新气象，出现了新的生产高潮。当前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整社成果，结合生产解决遗留问题。

印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各同志，予以讨论。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

七月十日

---

[1] 农业部党组1959年6月29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冬种准备会议于6月23日至26日召开，河北、上海等14个冬种任务比较大的省市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一）1959年全国小麦总产量预计700亿斤，与1958年实产数相等或略多，比1957年增长约50%，这说明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够连续跃进。（二）1959年冬播面积要求基本上恢复到1957年的数量，力争1960年小麦总产量突破1000亿斤大关。（三）要求各地在7月份和8月上半月内，把今年秋后播种冬麦等的计划肯定下来，面积和产量都要落实到包产单位。（四）到会各省市都根据今年小麦密植的初步经验，对今年冬播小麦，提出一个有相当幅度的用种量。（五）强调做好冬播前的准备工作。（六）南方有些对麦子等夏收作物不重视的地方，建议当地领导认真地抓一抓。此外，还应注意加强领导，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积极领导农民实事求是地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跃进。中央7月10日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印发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10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日

---

[1] 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6月30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我省大量办公共食堂，已有一年多的历史，在实际生活中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优越性是：（一）可以解放劳动力特别是妇女劳动力。（二）适合公社化后集体生产的组织形式。（三）便于改善群众生活。（四）办好了可以节约粮食、燃料和用具。（五）便于进行基本建设，实现炊具改革。（六）便于搞小集体副业生产。（七）便于搞好公共卫生。（八）可以养成集体生活习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文化学习。今后要进一步办好公共食堂，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第一，把中央关于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交给群众讨论，让他们从亲身体验中认识公共食堂的优越性。第二，教育干部和群众正确认识大集体与小自由的关系。第三，改善食堂的经营管理。第四，各级党委必须继续加强对公共食堂的具体领导。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八周年的电报

（1959年7月10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巴·贾尔卡赛汗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在进行着热情的劳动，在工业、农牧业等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特别是农牧业合作化的迅速完成，更为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蒙古人民所获得的各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一年来，中蒙两国人民间的亲密友谊和互助合作又有了新的发展。这种友谊和合作将进一步促进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并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亚洲

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祝蒙古人民共和国繁荣富强，祝中蒙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7月10日

统一认识，搞好团结，承认错误

（1959年7月10日）

团结问题。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有些同志对形势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

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根本不会错。

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

要承认缺点错误，从一个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是从全局来讲，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从总的形势来讲，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他们隔十年时间再来看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说应该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这一年来的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某些具体事实说来，确实有得不偿失的，但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

关于起草“庐山会议[1]诸问题的议定纪录”给杨尚昆的信

（1959年7月13日）

尚昆同志：

五人起草小组[2]，建议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3]六同志，成为十一人小组，先议两天，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十一人小组起草文件（名曰“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你们在几天

---

[1] 指当时正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指“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起草小组，原定五人：胡乔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吴冷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田家英（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

此信收到，**今天上下立即开会**动手**实行**。请少奇、恩来二同志到会，看此信，请他们二人加以考虑，是否同意。如果同意的话，立即施行。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上午五时

印发王青林关于山东日照县农村情况的来信[1]的批语

（1959年7月13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王青林1959年7月4日的这一来信说，山东省日照县去年的“共产风”刮得不大，大跃进使这个县的面貌焕然一新。去年农业大丰收，家禽家畜也大量增加。目前群众的生产劲头很足，已掀起了夏季生产的高潮。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每个生产小队都经营了不少菜园地，充分供应社员的需要。夏收后，绝大部分生产小队实行伙食供给制，食堂没有垮台，但也有个别的办得不够好。根据县、社、队的干部反映，这里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没有认真执行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直到现在还没有分给社员自留地。（二）夏季口粮还未全部分配到户。（三）群众养猪的积极性很高，但对长期吃不上肉不满意。（四）县、社干部认为现在的文件、会议太多，没有时间下基层，学习时间很少，无法提高。

对陕西省委召开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7月15日）

一

这是一个好文件[1]，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

[1] 中共陕西省委1959年7月7日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为了迅速改变目前市场供需关系紧张的状况，我们最近召开了县以上工农商交四个方面人员参加的市场问题会议。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围绕着解决市场问题，工农商交各个方面在会上都比较充分地暴露了各自的和相互间的矛盾，并且基本上解决了这些矛盾。在思想认识方面，进一步统一了对市场问题的看法，明确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二）解决市场供应紧张的根本关键在于增加生产，增加商品的供应量。因此会议用较长的时间和较大的精力来落实这些具体计划。在落实计划中，一是抓思想认识的提高，一是抓四个部门的相互衔接，综合平衡。（三）相信只要各个方面都能认真执行中央有关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增加生产和商品供应量，压缩社会购买力，改善经营管理，目前市场紧张的状况，在不要很长的时间内，是可以基本上缓和下来的。

二

毛注：各地都应当这样做。[1]

---

[1] 中共陕西省委的报告中讲到：“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除各按系统制订计划外，又随时进行互相衔接，综合平衡。”毛泽东在其中的“我们充分地利用了工农商交共聚一堂的机会”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关于改变庐山会议[1]人员分组办法的建议

（1959年7月16日）

少奇、恩来、尚昆[2]同志：

建议北京来的同志参加各大区小组的，即日改换一下，例如：参加华东小组的，改为参加中南、华南联合小组或他区，参加西北小组的改为参加华东或他处，如此类推。今日立即排出一个新表，明日起，照新表办事。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至于各区省委书记，是否也应有一部分人（例如一半或三分之一），也照此样，改入他区，以广见闻，请你们酌定，我无定见。是否由你们找各大区区长及中央少数同志，座谈一下，以利决定？谈一个钟头就够了。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上午六时

---

[1]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请彭真[1]等来庐山参加会议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9年7月16日）

少奇、恩来、尚昆[2]：

在北京的人，例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3]，若干部长，三委[4]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主持北京的工作，则由此间调动几位同志回去，或以在京二把手顶住几天。以上请酌。又陈云[5]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则不要来。此点亦请酌。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4] 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

[5]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正因病休养。

1959年7月，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游庐山。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水库。

1959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印发《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批语[1]

（1959年7月16日）

印发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封信时，拟题为《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信的主要内容是：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1958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1959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安排1960年计划，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四年赶英和超英的

跃进速度。1958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过一段混乱，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逐步走上了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在1958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的国度里，不是小事，而是大事。在全民炼钢中，浪费了一些资源和人力，是一笔较大的损失，但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因此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些是难以避免的。在伟大的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这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过去出现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加上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也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此外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也是促进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而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也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暴露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 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感到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产生浮夸风，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研究。当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有关系。2.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

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于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原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一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表现。在一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通过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必须并重，不可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的“左”的方面。经过去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否则，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的《彭德怀自述》一书附了这封信。

转发兰州军区骑兵一师关于政治争取工作总结的批语

（1959年7月16日）

彭德怀[1]同志：

此件[2]好，应发各剿匪区照办。特别是昌都区极需要此种作法。如同意，请交尚昆办理。

毛泽东

七月十六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部1959年7月10日转发的骑兵一师6月份政治争取工作的简要总结。其主要内容是：一、班玛地区6月份的政治争取工作阵势大，力量强，取得了较大战绩，叛乱武装归降与日俱增，干群信心越来越大。二、6月份的政治争取工作除宣传和体现党的政策外，还取得了以下两点经验：（一）贯彻党的平叛方针越自觉、越熟练，效果越大。在兵力部署上，应注意对叛乱武装施加军事压力，以利政治争取。（二）争取反动头人投降，派遣归降的头人去招降，都会愈加迅速地瓦解叛乱武装。三、在执行党的平叛政策上，还存在着对党的政策有怀疑，对投降人员看法不正确，以及对待俘虏与归降者界限不清等问题。为了大量开展政治工作，所属各单位接此件后，应立即组织学习，克服偏向，纠正错误。1959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兰州军区骑兵一师的简要总结和毛泽东的批语一并转发给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省委，西藏工委并兰州、成都、昆明、西藏军区党委。

对西藏工委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会议情况和周仁山[1]关于边境工作意见报告的批语

（1959年7月17日）

此两件[2]印发各同志一阅，可以知道一些西藏的情况。

毛泽东

七月十七日

---

[1] 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

[2] 指中共西藏工委1959年6月30日关于自治区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给中央的报告和周仁山6月29日关于边境工作的意见给西藏工委的报告。西藏工委的报告说，筹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为了贯彻执行经中央批准的西藏工委关于当前平息叛乱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而召开的，同时要对当前农村工作、牧区问题等方面的若干政策作出决议，然后公布执行。开会前张国华已同班禅、阿沛等开了四天小会，并进行了个别谈话，就若干政策原则反复地充分地协商。班禅等都同意西藏必须进行改革，他们反映了不少具体情况，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提出了若干意见，也讲了不少心里话。通过交谈和酝酿，最后在政策原则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们的心情基本上是舒畅的，给大会通过决议打下了基础。周仁山的报告说，他与江孜、日喀则分工委一起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了边境问题，大家认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边防工作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控制，打击叛匪，稳定群众，缓后一步再考虑进行民主改革的问题。

印发《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的批语

（1959年7月19日）

此件[1]印发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6月2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十五期上登载的《否定和怀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干部对1958年大跃进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跃进。认为工业上全民炼钢是得不偿失，农业上粮食不够吃，市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党的威信不如过去高了。二、工业跃进了，农业没跃进。认为“工农业没有并举”，国家“重视工业，轻视农业”。三、政治跃进了，经济上没跃进。特别是对“以钢为纲”的方针有看法，认为炼钢算政治账可以，算经济账就不行了，其害处是：第一，影响了秋收；第二，影响了工业生产；第三，砸了水车、锅，炼出钢来不能用；第四，国家赔了23个亿。“总之是劳民伤财，很不合算，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弄得全面紧张。”四、认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带来了副作用”。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一材料时，将材料的题目改为《天津一些同志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看法》。

印发《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的批语

（1959年7月19日）

此件[1]印发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特别是在与我国有工作关系的某些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我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谈论我们没有公开过的某些具体数字。这些议论的基本特点是抛开问题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但也有不少干部听了这些话后，表示怀疑或不同的看法。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建议领导上考虑是否有必要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外交部向兄弟国家党或驻华使馆作统一的说明和解释，以争取主动。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个材料时，将题目改为《苏联一些同志对我大跃进议论纷纷》。

对一份关于苏联建设中遇到问题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7月19日）

此件[1]印发各同志研究。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7月17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五十八期上登载的这篇材料说，苏联国家计委远景计划司司长瓦修金教授，最近对我驻苏使馆作了几次有关苏联七年计划的制定，以及在执行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解决办法的报告。其中讲到：一、远景规划中关于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苏联在建设初期，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后来因每年增长的百分数所代表的实际量增大了，速度就逐渐下降。苏联的计划工作者，在远景规划中也把发展速度订得越来越低，存在着右倾思想。二、对打破平衡的争论。苏联有些人已经习惯地认为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比例是固定不变的，这种不能打破旧比例的思想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表现最明显。三、农业发展问题。苏联的粮食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因而畜牧业发展不起来，至今肉类供应不足。四、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目前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只等于美国的一半，还有50%的工人从事手工劳动，而且七年计划后生产将增加90%，劳动力更显不足，因此必须大力革新技术，才能保证生产以高速度向前发展，很快赶上并超过美国。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7月21日）

印发各同志。是一个重要建议[1]，应当予以处理。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

---

[1] 中共中央军委1959年7月4日关于军事工业原材料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国防工业的发展遇到很多困难，其中最突出的是原材料的数量、品种、规格的保证问题，这已成为国防工业能否继续迅速发展的关键。形成原材料紧张的原因，主要是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及其品种与数量在发展上的不平衡，反映在材料供应上必然是品种不全，规格不符。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的原材料工业在继续提高产量的同时，挪出一部分力量，积极发展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品种和规格，提高质量，弥补空白。而解决这一矛盾，首先要有一个平衡的计划。在管理体制上，建议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汇总，统一筹划。在基本建设上同样要贯彻大、中、小企业结合的方针。只有加速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才能更快更好地解决供求矛盾。

对国家计委商计局
关于市场情况的研究材料[1]的批语

（1959年7月21日）

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并应研究。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

---

[1] 指国家计委商业计划局1959年7月9日对1959年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和1960年的展望材料。主要内容是：（一）对下半年市场形势的估计。在中央发出六一指示和召开大中城市副食品、手工业生产会议之后，市场全面紧张的状况即逐步停止发展。压缩机关、团体购买力已见效果，商品供应状况开始好转。（二）对1960年市场情况的初步估计。明年的市场情况决定于今年的农业生产，目前农业生产的全局是好的。因此明年粮食作物有可能避免出现类似今年上半年的过分紧张局面，但棉、麻等轻工原料供应估计仍比较紧张。副食品、手工业品的情况则会比今年大为好转。（三）对稳定今明两年国内市场的几点建议：（1）大搞野生植物和代用品的采集、收购工作。（2）充分地合理利用废次钢铁。（3）继续抓紧进行副食品的增产工作。（4）继续提倡节约。（5）继续控制社会购买力。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的电报

（1959年7月21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久以前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全面地总结了波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通过了1959—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指示。这个指示向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波兰人民展示了光辉的远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波兰人民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欧洲安全作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波兰人民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感到十分高兴。

中国人民深信，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波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谊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必将有助于我们两国的共同繁荣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合作。

祝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祝中

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7月21日于北京

印发阿里分工委关于接管旧政权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7月22日）

印发各同志。读后可以知道西藏极西部阿里地区一些情况，很有益。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共西藏工委转报的阿里分工委1959年6月26日关于接管原噶本各级政权工作的综合报告。报告说，阿里地区接管旧政权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解散和接管了原噶本政府和四个宗级政权四个世袭本堡。接管过程中，大体有以下三种情况：（一）对原噶本政府和普兰、日土两宗政府的接管工作比较彻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比较深入。目前中上层中进步和反动的都是少数，多数持中间观望态度。一般群众则欢欣鼓舞。（二）对泽布兰宗、达巴宗的接管不很彻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也不够广泛深入，坏分子的活动比较嚣张。（三）对仲巴洛强宗，因为交通不便，情况不明，无法直接前去接管，只派人送去了限期交来枪支、文件的命令，目前尚无动静。

反对两种倾向，维护党的团结[1]

（1959年7月23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点吧，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讲点这样的意见。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并和一部分同志们谈了话。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这里讲一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吴稚晖[2]说：孙科[3]一触即跳。因此有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话有三种，嘴有两用。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讲话之义务。长一对耳朵就要听。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有一部分同志就是不爱听坏话。好话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的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 吴稚晖，即吴敬恒（1865—1953），字稚晖，国民党右翼政客，积极反共。

[3]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孙中山唯一的儿子，其母是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党内一部分意见还没有讲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映，各地都有。所有右派的言论都拿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州军区的材料[1]。这些话都是会外的讲话。我们是会内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这是江西人的责任，房子太小呦！

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

---

[1] 广州军区据四十二军政治部报告（这个材料是彭德怀提供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有抵触情绪”。他们认为经济紧张是全面的，长期不能解决的。有的人讲怪话：“现在除了水和空气以外，其他一切都紧张。”“中国大跃进举世闻名，但我怀疑，市场紧张就是证明。”有人甚至认为我们的事业后退了，说：“一九五六年好，一九五七年较好，一九五八年成问题。”他们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优越性，说：“公社成立得太快了，太早了，不合乎规律。”“人民的觉悟没有跟上来，工人、农民和军官都对成立公社有意见。”“苏联建国四十年还允许私人有房子，我们建国不到十年，就什么都‘公有化’了。”“公社的优越性是宣传出来的。”他们认为经济生活紧张是由于路线上有错误，说：“去年不仅是工作方法上有问题，而是带有路线性质的错误，中央要负责任。”在少数连排干部中，也有类似情况，有个排长听战士唱《社会主义好》这支歌时，不耐烦地说：“算了，不要唱了，我看这支歌非修改不可。”海南军区一个指导员说：“什么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我看社会主义建设倒是一年不如一年！”有个排长讲怪话：“在公社劳动，还不如给地主干活，给地主干活有饭吃，还给钱。”讲这些话的人，都有名有姓有职务。

越好，越要听。我们在整风中创造了“硬着头皮顶住”这样一个名词。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顶多久？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们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

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春节前后，我看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多钟头，嵖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来看了。唐僧取经嘛。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专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经验，打破了罗斯福免于贫困的“自由”[1]。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月当中，三十万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

---

[1] 指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公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成个胖子不行。”林彪一天吃一斤肉还不胖，十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积分子及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者也可以，不愿搞的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笑容，这叫刮“共产风”。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共产风”，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东西要交回，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有，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地削剥人家劳动，破坏等价交换。宋江的政府叫“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拿的是土豪劣绅的，那个章程，我

看可以的。宋江[1]劫的是“生辰纲”，就是我们打土豪劫的是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到农民。我们已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归公，那也可以，因为那也是不义之财。我们刮共产风，取生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购买、挤垮，怎么能剥削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线，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未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

十分搞通的，未必有，几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懂，叫他们读，公社一级不懂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可以讲。通几分，可以不读书，用事实来教育。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发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有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我不反对扫文盲，柯老说全民进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得延长。还有南北朝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要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也是一字不识的人。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当宰相，为什么我们的公社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呢？我看大家可以学，讲讲，政治经济学不识字可以讲，讲讲就懂了。他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为看了一点，才有发言权，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

[1] 宋江，这里是口误，应该指的是晁盖。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作检查。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就听不进去，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个、两个星期，再反击。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如我错，我作自我批评。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哪一边，向哪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

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恩来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一个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都登出来，一年登到头，登得完登不完？还有文章长短，我看至少要一年，这样结果如何？我们的国家就垮台了，那时候帝国主义不来，国内人民也会起来把我们统统打倒。你办那个报纸天天登坏事，无心工作，不要说一年，就是一个星期也要灭亡的。登七十万条，专登坏事，那就不是无产阶级了，那就是资产阶级国家了，就是资产阶级的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没有人这样主张，我是用夸大说法。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不过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1]。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

---

[1] 左派是正确的，带引号的“左派”表示极左，是错误的。

了一些钉子了，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所以还是要讲。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第一方面的人要听人家讲，第二方面的人也要听人家讲。两方面的人都要听人家讲，我说还是要讲吗？一条是要讲，一条是要听人家讲。我不忙讲，硬着头皮顶住，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二十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马歇尔[1]八上庐山，蒋介石三上庐山，我们一上庐山，为什么不可以？有此权利。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无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满意了，一讲这个，吴芝圃[2]就紧张了，不要怕，河南等省有百分之五十的食堂还在，那也可以试试看，不要搞掉，我是就全国范围来讲的。三分之一农民，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二亿五千万，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南、云南、上

---

[1] 马歇尔（1880—1959），美国民主党人，美国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1945年12月曾被美国总统派为驻华特使，以“调处”为名，参与国共谈判，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1946年8月宣布“调处”失败，不久返回美国。

[2] 吴芝圃，当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海等等。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河北一九五六年公社化以前就有办的，一九五八年办得很快，曾希圣[1]说：食堂节省劳动力，我看还有一条，节省物质，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比如自来水，搞个东西不用挑，这样一来可以节省劳力，可以省物质，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科学院昌黎调查组说食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登徒子攻宋玉三条：漂亮、好色、会说话，不能到后宫去，很危险。宋玉反驳说：“漂亮是父母所生，会说话是先生所教，好色无此事。天下佳人不如楚，楚国出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增一分过长，减一分过短。……”登徒子是大夫，大夫就是今天的部长，是大部，如冶金部长、煤炭部长，还有什么农业部长，科学院调查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攻其一点的办法，无非是猪肉、头发卡子（少了）。食堂哪能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也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农业，办好工业，办好交通运输，办好商业，办好文化教育。

---

[1] 曾希圣，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说党不管党吗？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至少是一个时期不管计划。计划机关不只是计委，还有其他各部，还有地方，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地方可以原谅，计委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会议后开始不管了，名曰计划指标，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要多少铁，要多少交通，煤铁不能自己走路，要车马运，这点没料到。我这样的人，少奇、总理这样的人，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过去说总理、陈云，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1]还是我？我说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你说要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2]也觉得可行，我六月讲一〇七〇万吨，后来去做，薄一波[3]建议搞在北戴河公报上，我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看了很多讨论，大家讲还可以搞，铁还可以炼，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降低硫的含量，要为出真正好铁而努力奋斗。只要抓，也有可能。共产党有个方法叫抓，共产党和蒋介石都有两只手，共产党的手是共产主义者的手，一抓就抓起来了。钢铁要抓，粮油、

---

[1] 柯庆施，当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协作区主任委员。

[2]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3] 薄一波，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棉、麻、丝、糖、药，还有烟果盐，农、林、牧、副、渔有十二项要抓，要综合平衡，各地不同，不能每县都一个模子。有些地方不长茶，不长甘蔗，要因地制宜。苏联不是搞过回民地区养猪嘛，岂有此理。工业计划搞了一篇文章，写得还好。至于党不管党，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不搞综合平衡，搞什么去了？总理着急他们却根本不急。人不着急就没有一股神气，没有一股热情就办不好事情。

有人批评计委李富春[1]是“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不要像李逵，太急了也不行，列宁热情磅礴实在好，群众很欢迎。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有各种顾虑，这个我看要改，有话就要讲，上半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你们有话讲出来嘛！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么要紧。还讲过几条，甚至说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有些人就是怕讲得不妥挨整，这叫“明哲保身”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听不得坏话的，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的。如果你们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已经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四十亿人民币，“得不偿失”。第二个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嵖岈山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

---

[1] 李富春，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任。

什么如获至宝呢？要上《红旗》杂志呢？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这个没关系，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议要作决议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远点〕。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你们那大炮也相当多，放的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在河南讲起，江苏、浙江的记录传得快，说话不谨慎，把握不大，要谨慎一点。长处是一股干劲，肯负责任。比那凄凄惨惨戚戚要好，但放大炮在重大问题要慎重，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要快之事，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搬出马克思来，使同志们得到一点安慰。这个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见形势来了就说欧洲革命来了，无产阶级革命来了，后头又没有来；过一阵又说要来，又没有来。总之，反反复复。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宁时代才来，那还不是急性病？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也有呵！巴黎公社起义爆发之后，马克思就赞成了，但他估计会失败。他看出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只存在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的话，划不来。我们还有广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等等。我们现在的经济工作，是否会像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像万里长征那样，大部分根据地丧失，红军和党都缩小到十分之一，或者还不

到？我看不能这样讲，大家也是这么个意见，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都毫无例外地说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了？我看也不能讲。大部分没有失败，一部分失败了。就是所谓多付了代价、多用点劳力、多付一点钱、刮了一次“共产风”，可是全国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

现在要研究政治经济学，过去谁人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读。斯大林的书[1]，我读了一遍，根本没有味道。那个时候搞革命，搞什么社会主义经济。唉，一到郑州，我就读了两遍，我就讲学，就有资格讲学了，不过刚刚在火车上读了两遍，我讲了两章，没有造谣吧！现在不够，现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们的事业不能发展、不能够巩固、不能够前进。

如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老板[2]有点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老：有。）是否比较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个一〇七〇万吨钢，九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

[1] 指《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2] 谭震林，外号“谭老板”，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

对《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7月24日）

一

退胡乔木[3]同志。

毛
廿四日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7月23日印发的《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的第一部分。

[2] 毛泽东在草案中“过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一句之前，加上了“许多同志，主要〔是〕公社干部”等语；在“现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产生的缺点经过整社、算账，已经基本上得到纠正，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一句中，删去了“党在农村中的威信已经高涨”一语。

[3]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是“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

应安题目[1]。

二

全国职工人数由一九五七年底的二千四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五八年底的四千五百三十二万人。职工人数的增加虽然过多过猛，增加的职工中约有一半人需要返回农村去，但是就业增加，收入增加，人民群众是高兴的。

三

但是我们的经验还不够，我们的学习也还不够，因而在工作中还发生了不少的问题。我们已经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部分问题已经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部分问题还没有解决。

---

[1] 《关于形势和任务》修正草案共分六部分，送毛泽东审阅时每个部分还没有题目。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写的。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1]

（1959年7月26日）

收到一封信[2]，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一）段，篇幅不多。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

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3]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4]，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5]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

正自己的缺点错误。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与鼓劲两个方面。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进行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欢迎的。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后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六日

---

[1] 这是对李云仲1959年6月9日写给毛泽东的关于目前经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的一封信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李云仲的信中说，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问题，联系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一）我觉得最近一年来，我们在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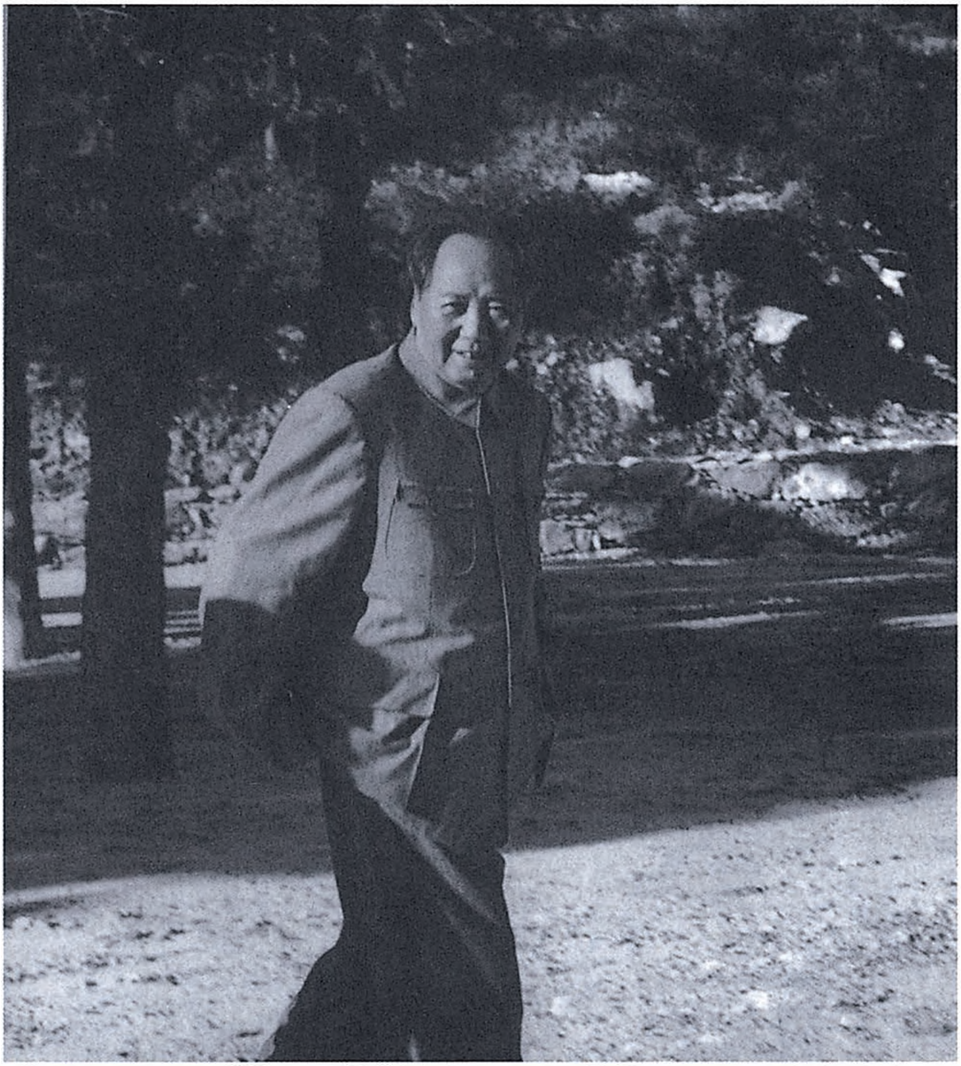
作中犯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思想战线上忽略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袭。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党内思想战线上不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这就是要时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的危害，时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袭。（转发这封信时，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了以下批注：“毛注：时而反对这样，时而反对那样，时〔然〕而后言，可见不是同时。”）但在一年来的工作中，我们多少有些忽略了这些历史经验，因而在一个比较短促的时间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潮曾形成一个主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办水利当然是好事，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但在水利建设高潮期间，似乎造成了一种气氛：认为在短期内，不管条件如何，我们什么都可以做到，什么也没有问题了。第二，以钢为纲的方针是对的，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实际上不是以钢为纲，而是以钢为一切。应该特别提起的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第三，人民公社运动无疑是一个方向，是解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形式。问题是要根据客观条件逐步地向前发展。而去年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即所有制问题上，可能是跑得太快了，具体结果是“一平、二调、三收款”。第四，去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达1900多个，为第一个五年的两倍，几乎每省都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由于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已一减再减，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看到这些浪费和损失是很痛心的。第五，由于到处都大搞钢铁，大办各种工业，大搞各种基本建设，去年职工增加了2100万。总之，这些方面不能发挥效果的社会劳动花费得太多了，我觉得这就是目前经济紧张的主要原因。我党的优良传统是对任何工作都要进行调查研究，典型示范，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作方法。但去年的一些重大运动，很少是按照上述方法进行的。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巨大，但同时“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思想却有所抬头，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也有所发展，可否考虑在党内，用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一些经验教训。（二）在各级干部中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增强党性，是当前党的政治思想战线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观主义在一些工作领域畅行无阻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够在党内形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

合情绪却很浓厚，这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第一，去年下半年以来，以钢铁为中心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很快，农业劳力抽调太多，对今年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六级干部会议以后，农民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下来了，但在所有制和分配方面还有些问题未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还未完全调动起来。第三，最近一个时期工业品的价格有些提高，但很多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未动，因此一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不上来。第四，农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许多地区不能保证供应。第五，农业生产计划制度要研究改善。过去常说农业计划是间接计划，实际上比直接计划还要死，农民自己毫无机动。（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第一，计划工作要做好综合平衡，但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一直是顾此失彼，而且往往是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而缺少检查。第二，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不能归咎于缺乏经验，而在于计划工作中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很严重。几年来对国民经济情况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各方面自下而上的讨论研究，也很少考虑具体经济计划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第三，在大的运动中，往往不能正确地坚持党的原则，各部门、各地区时冷时热，只是程度上稍有不同而已。当前计划工作中另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必须尽快编制长期计划，否则许多重大的问题不能解决。（五）关于体制问题。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体制下放了一些，这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一些作用。今年在工业、物资方面又收回去一些，现在看来问题很多。比如体制变化后的工作未跟上，造成产、供、销脱节，对生产和市场影响都很大。（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铺张浪费，最近又有发展，具体表现在：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第二，会议伙食标准太高。第三，领导干部生活上过分特殊的风气，有些地方仍未改变。

[3] 指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

[4] 指当时正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指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1959年，毛泽东在散步。

1959年，毛泽东在散步途中读书。

对日本首相岸信介关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的批语[1]

（1959年7月27日）

印发各同志。

我想请同志们看一下岸信介的话。他说："在完成长期计划当中，中国像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一样，固然也存在着困难，但是鉴于目前的成就，人们必须说：中国的远景并不是不顺利的。"[2]怎么样？这个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我国经济现状和前途的评论，不是说得相当正确吗？他比我们的一些悲观主义者，泄气主义者，就对同一事件的评论这一点来说，不是还要好一些吗？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对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1959年7月20日关于岸信介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给外交部的报告的批语。

[2] 岸信介的这段话是他在波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谈到中日关系时说的。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报告中转引了这段话。

在国务院秘书厅一份学习简报[1]上的批语

（1959年7月27日）

立即印发。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

[1] 指国务院秘书厅党委办公室1959年7月9日编印的第二十五期《秘书厅学习简报》。简报说，近两周来，我厅多数单位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压缩社会购买力的紧急指示过程中，空气较前大为活跃，议论很多，综合整理如下：（一）关于人民公社问题。1. 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2. 认为人民公社所有制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不太适应。3.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适应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吃饭不要钱也不符合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4. 人民公社的发展太急太猛了。5. 人民公社是群众运动搞起来的，但政策没有跟上去。有的有了正确政策，但在执行中又发生了偏差。（二）关于去年大跃进和全民大炼钢铁。1. 认为“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小土群”可以不搞，1070万吨钢的指标也可以不提。2. 钢的指标是领导上主观主义地规定的。3. 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只有钢满足不了经济生活多方面的需要。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材料[1]的批语

（1959年7月27日）

印发各同志。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七日

---

[1] 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1959年7月编印的《思想动态》第三十期上刊载的这个材料说，自5月初开学以来，省委党校学员在学习中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有近半数的学员对目前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现将他们对人民公社问题的主要看法汇集如下：（一）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的出现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是根据上级指示自上而下从主观愿望出发搞起来的，是人为的产物。（二）人民公社建立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有人虽然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适时的，但又认为全国公社化是快了，应分阶段发展。（三）认为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两大决议是“心血来潮”，是“左”倾思想的复活，其中许多提法是错误的，给下面造成了很多困难。（四）对“共产风”的来源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共产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中央和省、地委应负责任；有人认为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应由下面干部负责；还有人认为中央、省委有错，下面也有错。（五）对人民公社生产方

针和分配制度的看法：(1) 认为目前实行工农业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为时过早，行不通，公社应以农业生产为主，把工业放在从属地位；关于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有人认为公社化后商品生产不应扩大，而应逐步缩小。(2) 关于分配制度问题，认为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提得过早，应该取消。(3) 认为公共食堂不是共产主义因素，害多利少。(六) 对巩固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认识：有人认为实行三级所有，说明过去公社是搞快了，现在是纠偏；有人则认为实行三级所有制是使人民公社倒退，成了无权的空架子，权力下放，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经营思想。

关于编印逻辑学文集给康生[1]的信

（1959年7月28日）

康生同志：

信收到。就照那样办吧。我有兴趣的，首先是中国近几年和近数十年关于逻辑的文章、小册子和某些专著（不管内容如何），能早日汇编印出，不胜企望！姜椿芳[2]同志的介绍甚为有益，书目搜编[3]也是用了功的，请你便时代我向他转致谢意。

毛泽东

七月二十八日

---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 姜椿芳，当时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

[3] 指姜椿芳等编辑的《逻辑学论文集》第一至第六集。

关于研究人民公社问题的批语

（1959年7月29日、8月1日）

一

此三件[1]印发各同志。印时注意，将赫鲁晓夫的一篇（连同中央社的一则纽约消息[2]放在前面。三篇印在一起，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二

稼祥[3]同志：

此件[4]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毛泽东

八月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7月28日送阅的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第二八三〇期上登载的《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和第二八三一期上登载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等三篇文章。其中《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一文说，最近记者访问了受暴雨侵袭的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增江两个重灾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灾民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党群关系出现了近两三年来不曾有过的密切现象。《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一文说，苏联《真理报》7月21日发表了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县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其中有关公社方面的内容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现在我们已走上了康庄大道。集体农庄已成为农民的亲切的家。”《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一文说：广东省番禺县部分公共食堂停伙后，有些农民又自动串连办起一种小型的“新式公共食堂”，特点是参加户数较少，完全由社员自己管理，自负盈亏，并贯彻了参加自愿，吃饭多少自愿，吃菜多少自愿的“三自愿”原则，体现了合理负担、节约、互利等优点。目前番禺县许多社员正在酝酿组织这种“新式食堂”。

[2] 胡乔木送阅的第二八三一期《内部参考》还以《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为题，登载了中央社7月22日的一则消息。这则消息说：《纽约时报》今天在第一版上刊登了一则关于赫鲁晓夫批评整个公社制度的华沙电讯，认为赫鲁晓夫这番话是迄今为止一位苏联领袖对公社的想法所作的最直率的公开批评。在《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看来，赫鲁晓夫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暗指中国共产党人去年秋天的一些说法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曾说，建立公社是真正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这种看法似乎使俄国人感到烦恼，因为苏联报纸有三个月左右对于公社几乎只字未提”。

[3] 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 指本篇一及其附件。

印发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等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59年7月31日）

印发各同志。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无论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都是如此。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2]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辽宁省委转报的鞍山市委1959年7月25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8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上。鞍山市委的报告说，自7月17日开始贯彻中央和省委关于扭转当前钢铁生产下降局面的指示以来，鞍钢的群众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生产情况也随之趋向好转。为了保证完成8月份主要产品的生产指标和节约指标，目前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1)继续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彻底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大干苦干巧干，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三季度计划。(2)全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目前着重提高技术水平，精简企业多余人员，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3)继续抓紧解决原料、材料问题。(4)采取紧急措施，解决铁路运输暂时中断后造成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个报告时，将报告题目改为《鞍山市委报告》。

[2] 指当时正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印发广东省委关于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8月1日）

广东省委的这个材料[1]印发各同志。各省、市、区情况如何？是否同广东相似？你们注意了这个问题没有？你们是否认为广东省委的措施是适宜的？广东的措施是：关于农村副产品，坚决压缩供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7月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六十期上登载的《广东省委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现象》一文。文章说，广东省委最近批转了番禺公社党委《关于当前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的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到，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已经收获的农副产品，产量比去年大为增加，可是作为商品的部分少得可怜，有些产品原来商品程度很高的，现在也变成自给的了。这一现象是由农村公社的分配制度上的问题带来的，即采用了产品直接分配的方法，供给部分比例太大。这是目前农村副产品浪费过多，上市量减少，市场供应特别紧张的重要原因。广东省委认为，为了缓和副食品供应紧张情况，除了采取大力发展副食品生产和压缩购买力等措施外，还必须从分配环节上去解决问题，必须坚决压缩供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195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将广东省委关于纠正农村副产品自给部分过多现象的材料和毛泽东的批语一并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抄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指出各级地方党委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和农副产品收购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一、适当限制自给部分，尽可能按照城乡需要增加商品部分。二、适当限制供给部分，逐渐增加工资部分。三、切实做好农副产品的收购工作。

给部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方法，你们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照我看，是适宜的，你们以为如何？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一律采取措施，改变现状。请你们回去研究施行。

毛泽东
八月一日

给周小舟[1]的信

（1959年8月1日）

送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2]。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3]喋血于友于，张绣[4]剚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八月一日夜十时

---

[1]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丘迟，南朝梁人，官至司空从事中郎。善诗赋文章，曾作《与陈伯之书》。陈伯之，南朝梁人，曾为北魏平南将军。梁北伐，丘迟函劝陈归梁。陈后官至通直散骑常侍。

[3] 朱鲔，东汉初人。刘玄称帝后，被任为大司马。曾劝刘玄杀刘秀之长兄刘演。刘秀称帝后归降，官至少府。

[4] 张绣，三国时董卓部将。后降曹操，不久又反袭曹操，曹军败，长子曹昂在战斗中身亡。曹操征袁绍时，张绣再度归降，在官渡力战有功，任破羌将军。

如克诚[1]有兴趣，可给一阅。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给张闻天[1]的信

（1959年8月2日）

闻天同志：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方八面，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敖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讲完没两天，你就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被人们缠住脱不得身。自作自受，怨得谁人？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昔人咏疟疾词（这首曲子，调名《叨叨令》）云：“冷来时冷的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的在蒸笼里坐，痛时节痛的天灵破，战时节战的牙关挫。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同志，是

---

[1] 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成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不是？如果是，那就好了。你这个人很需要大病一场。昭明文选[1]第三十四卷，枚乘[2]《七发》，末云：“此亦天下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你害的病，与楚太子相似。如有兴趣，可以一读枚乘的七发，真是一篇妙文。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来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悃忱。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收载自秦至南朝梁诗文词赋700余篇，是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质量较好的诗文选集。

[2] 枚乘，西汉辞赋家。

印发河南、湖北两省关于抗旱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8月2日）

此两件[1]印发各同志。今年旱区达五六省，情况严重。广大群众在党领导下的伟大的抗旱斗争，已经起来。

吴冷西[2]同志：

各省旱情及抗旱斗争，请令新华社如实报导，鼓干劲，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人定胜天，争争〈取〉丰收。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情绪。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指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7月30日关于抗旱保苗情况给中央、国务院的简报和中共湖北省委7月28日关于抗旱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河南省委的简报说，我省进入7月以来，普遍呈现旱象，而且日趋严重。呈现旱象初期，省委就发出了抗旱保苗争取秋季丰收的紧急指示，各级党委立即投入了抗旱斗争。现在群众性的抗旱保苗运动已经形成高潮，取得了一定成绩。目前，旱象仍在向严重方向发展，抗旱保苗斗争进入艰苦阶段，省委要求必须同干旱斗争到底，保证抗旱斗争的彻底胜利。湖北省委的报告说，我省自7月以来，旱情发展非常迅速。省委决心要抗旱保丰收，已于7月16日发出了关于防旱抗旱的紧急指示，19日又召开了全省防旱抗旱紧急动员电话会议，明确以抗旱为当前工作的突出中心，提出了战胜灾害确保丰收的几个具体措施。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1]

（1959年8月2日）

中委、候补中委191人，到会147人，列席15人，共162人，会议议程：

（一）改指标问题：武汉六中全会决定了今年的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有人主张改指标，多数不同意，看来改也改不彻底，现在还有五个月，改了好经过人大常委会，高指标是自己定的，自己立了个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打破，打破了不符合实际的指标，钢、煤、粮、棉等。

（二）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上庐山前不清楚，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为的什么？前半个月是神仙会议，没有紧张局势。他们说没有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他们要自由，就是破坏总路线的自由，要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他们要求紧张的局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做坏了，自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纠正了刮“共产风”，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等一些“左”

---

[1] 这是毛泽东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的倾向。他们对于九个月来的工作，看不到，不满意，要求重新议论，否则就认为压制民主。他们对政治局扩大会议嫌不过瘾，说民主少了，现在开全会，民主大些，准备明年开党代表大会。看形势，如需要，今年九月、十月开也可以。五七年不是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吗？庐山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新来的同志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先开几天小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决议。

开会的方法，用大家所赞成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的团结，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在我们看来，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分裂。当时还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团结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犯错误的同志一条出路，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继续革命，不要像《阿Q正传》上的赵太爷，不许阿Q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要一看二帮，只看不帮，不做工作是不好的。我们反对错误，毒药吃不得，我们不是欣赏错误的臭味。批评斗争他们是使他们离我们近一点，使缺点错误离我们越远越好。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有分析，无非是两种可能，一个是能改，一个是不能改。所谓看，就是看能不能改，所谓帮，就是帮助他改。有些同志一时跟到那边去，经过批评说服，加上客观情况的改变，许多同志改变过来了，又脱离了那些人。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遵义会议上纠正了，以后经过十年时间，一直到七大，中间经过了整风，经过十年是必要的。一个人要改正错误要有几个过程。你强迫一下改正不行。马克思说：“商品是经过千百次交换才认识其两重性的。”洛甫开始不承认路线错误，七大经过斗争，洛甫承认了路线错

误。那场斗争，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出来了。大多数同志改好了。从路线错误来说，历史事实证明是可以改变的，要有这种信心。不能改的是个别的。可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见效的，要有好心帮助他们。对人有情，对错误的东西应当无情的，那是毒药，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不用武松、鲁智深、李逵的方法。他们很坚决。可以参加共产党，他们的缺点是不大讲策略，不会做政治工作。要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大辩论、大字报、中字报、庐山会议的简报。

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不少”一句出了问题，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刮“共产风”的问题没有了，“一平二调三收款”没有了，浮夸也没有了，现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向六亿人民、向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猖狂进攻的问题。现在要指标，越落实越好，反了几个月的“左倾”右倾必然出来，缺点和错误确是存在的，但已经改了，他们还要求改。他们抓住这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把总路线引导到错误的方面去。

对八届八中全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8月2日至17日）

一

送乔木同志：

有一点修改[2]，请你们斟酌。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本篇一、二、三是分别写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草案）第二、第三、第四次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晚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正稿上的批语；本篇五至八是决议草案中毛泽东历次修改之处的最后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毛泽东对决议草案第二次修改稿的修改，主要是将第一页“全国广大人民，正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下，满怀信心地为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伟大的胜利成果而斗争”一句，改为：“全国广大人民，正在总路线的伟大旗帜下，满怀信心地为争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此外，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二

即送陈伯达、王稼祥、胡乔木三位同志：

加了一段[1]，认为有必要，不知你〔们〕以为然否？请你们讨论一次。有小部分的分析及字句，与（四）节重复，如何调整一下，亦请斟酌。

毛泽东
八月六日九时

三

尚昆同志：

此件请印20份，发常委，彭真，伯达、稼祥、乔木，七个大区组长[2]及曾希圣[3]。

毛泽东
八月八日

---

[1] 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第三次修改稿上加写的这段话，后来几经修改，正式定稿为本篇五。

[2] 这次庐山会议按协作区分组开座谈会，由各协作区主任委员任组长。各协作区的主任委员分别是：欧阳钦（东北）、林铁（华北）、柯庆施（华东）、陶铸（华南）、王任重（华中）、李井泉（西南）和张德生（西北）。

[3]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四

有点修改[1]，在第2页，第3页，第4页，第5页。

毛
十七日

五

我国现在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依然存在。对于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虽已基本上改造完成，但是尚未彻底完成。资本家还拿定息。**此外，农村还有一小部分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还有私人活动的初级市场（当然，在国家和公社的正确的管理之下，这些成分不会向资本主义发展，而是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

---

[1] 毛泽东对胡乔木8月16日晚送审的决议修正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三页“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现了一小批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句中的“一小批”之后，加括号写了“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等字；在第四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这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一句之前，加写了“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一语。此外，在第二页、第五页，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习惯势力，还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彻底克服。地、富、反、坏、右等类分子的改造，离完成还很远。城乡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虽经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斗争给了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但是还远没有彻底消灭。他们的反动的思想活动和政治活动，在一部分富裕中农和知识分子中间尚有市场，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蠢动起来。总之，资产阶级残余的思想政治活动既然存在，就一定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而现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代表他们说话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个人野心家；有的是历史上犯了错误、受过批评、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动摇成性的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党的大多数、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总路线乘机进攻，这种进攻带着猖狂性质，形成了我们同他们的尖锐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现在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如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猖狂进攻那样的敌我矛盾。除了那些查明属实的暗藏在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需要开除出党以外，对于一般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他们善于自处，不走绝路，我们的政策恰当，把他们争取过来，重新合作，还是可能的。这些人还有一种模模糊糊地要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对帝国主义对于我国的压迫，是要反抗的。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惯于看风使舵，看见大势于他们不利，他们感到孤立了，只要我们留有余地，他们又可以过来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悲观主义思潮、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斗争，是波浪式的，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

阵，再低一阵，直到这一场斗争彻底熄灭为止，那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影响最后消灭的时候。

六

对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志，不管性质如何严重，党的方针仍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七

犯错误的同志必须用实际行动揭露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则应该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使他们获得进步，重新和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党的总路线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八

至于完全从拥护总路线的立场出发，向党的组织指出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的人，他们的动机和行为都是正确的，必须坚决保护，不允许有打击压制行为。

关于庐山会议[1]简报上应一律称同志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9年8月3日）

少奇、恩来、彭真、尚昆[2]同志，各组组长[3]同志：

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毛泽东

八月三日

---

[1] 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庐山会议所分各组的组长。

对湖南平江县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8月5日）

印发各同志。此件[1]很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儿，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的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又要吹回来的。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

---

[1] 指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1959年7月1日整理的湖南省平江县谈岑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情况的材料。材料说，稻竹大队6月初有63个食堂，后来解散了61个。20天后，又都恢复起来，办成了89个。散伙的原因是群众对食堂议论纷纷，评价不一，干部也有矛盾心理，而直接的原因则是因为口粮紧张。后来食堂恢复的原因有三：1. 部分社员提出要办。2. 有的生产队长、作业组组长感到食堂解散后，生产难于统一领导。3. 上级领导对解散食堂提出批评。从这个大队的情况看，对食堂的争论之点基本上都是经营管理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吸引大多数群众。

一类。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毛泽东
八月五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8月5日）

一

即送吴冷西同志。如六日来不及见报，七日见报也可[3]。

毛泽东
八月五日下午十一时半

---

[1] 这是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遵照毛泽东指示起草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稿。原题为《克服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

[2] 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对社论稿还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3] 这篇社论于1959年8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二

抓紧八、九两个月，进一步展开一个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在一部分干部中新近抬头的右倾情绪，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这是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经济战线上当前的迫切任务。

对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8月5日至17日）

一

退恩来同志。有一点增补[2]。

毛泽东

八月五日

二

退恩来同志。有一点修改。

毛泽东

八月六日上午四时

---

[1] 本篇一、二、三分别写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上。本篇四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晚送审的公报修正稿上。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一公报。

[2] 毛泽东在公报初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后来几经修改，正式定稿为本篇五。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周[1]看后，尚昆[2]办。

四

有一点修改[3]，在第2、第3、第4、第5页上。

毛
十七日上午四时

---

[1] 周，指周恩来。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毛泽东对胡乔木8月16日晚送审的公报修正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在第2页，将1959年上半年“市场供应状况曾经有些紧张”一句改为：“市场上一小部分商品的供应状况曾经有些紧张。”在第3页，将1958年“割打收藏工作进行得粗糙”一句改为：“割打收藏工作进行得有些粗糙。”在第4页，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从而使‘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可以争取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实现”一句，改为：“从而使‘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水平’的口号，可以争取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人民日报》1959年8月27日发表的公报上，又将“八年左右的时间”改为“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第5页，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句改为：“一步一步地踏实地又是跃进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五

八届八中全会在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以后指出，对于实现今年的继续跃进来说，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他们对于那些根据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本来可以完成的任务，不去千方百计地努力完成。他们对于几亿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估计过低，而对于这两个运动中由于经验不足而产生并且已经迅速克服的若干缺点，则估计过于严重。他们对于在党的领导下几亿劳动人民轰轰烈烈地进行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看不见党领导下的一切人民事业，成绩是主要的，而缺点错误则是第二位的，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已。全会要求各级党委坚决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中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坚持政治挂帅，充分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

印发《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1]的批语

（1959年8月6日）

---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5日送阅的《经济消息》上登载的四篇文章。其中《苏联专家近来的一些表现》一文指出，近来许多苏联专家对我党在经济工作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表示热烈拥护，他们感到最满意的是各地注意了生产指标的落实和提高产品质量。许多专家现在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积极，提出的建议也比过去增多。现在心情还不大愉快的是某些要“下马”的基本建设单位的专家。《王国藩社的生产情况一直很好》一文说，七年前曾被称为“穷棒子社”的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去年和其他农业社合并成建明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和生活都搞得很好，各项工作均名列前茅。远因是合作化以来，当地党组织一直坚持了勤俭办社的原则，逐年进行了农田基本建设，添置了耕畜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近因是当地党组织在大跃进高潮中工作踏实，坚持了群众路线，挡住了“共产风”，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鼓励私人养猪，办好食堂，实行“以人定量、节约归个人”的办法。以王国藩为核心的领导骨干一直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遇事找群众商量，向上级请示。《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一文介绍了中共长沙市委最近对郊区临福公社各阶层的政治思想情况调查，指出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一些新上中农和老上中农；真正反对我们的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但他们人数很少；占农村人口最多的贫农和新老下中农则是衷心拥护党，坚决走公社化道路的。《明年重工业方面要多搞些什么》一文介绍了国家计委一些同志最近在研究明年计划时，对调整重工业内部比例关系问题提出的一些看法：应当少增产铁和钢，多增产钢材；多进口石油和橡胶，多搞些这方面的基本建设，少搞些消耗石油、橡胶的机器和车辆；应多注意发展基本化学工业。

将这四篇印发各同志。请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将王国藩人民公社一篇印发所属一切人民公社党委，并加介绍，请各公社党委予以研究，有哪些经验是可以采纳的。据我看，都是可以采纳的。第一条，勤俭办社；第二条，多养猪（不养猪的回族除外）；第三条，增殖大牲畜；第四条，增加大农具；第五条，食堂办法；第六条，工作踏实，实事求是；第七条，有事同群众商量，坚持群众路线。这些都是很好的。我想，每一个专区总可以找到一个至几个办得较好如同王国藩[1]那样的公社，请你们用心去找，找到了加以研究，写成文章，公开发表，予以推广。《目前农村中讲闲话较多的是哪些人》这一篇，也值得一看。这同目前在庐山讲闲话较多的人们是有联系的。

毛泽东

八月六日

印时注意次序：1. 苏联专家……；2. 王国藩……；3. 目前农村中……；4. 明年重工业……。

---

[1] 王国藩，当时任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主任。

给刘松林[1]的信

（1959年8月6日）

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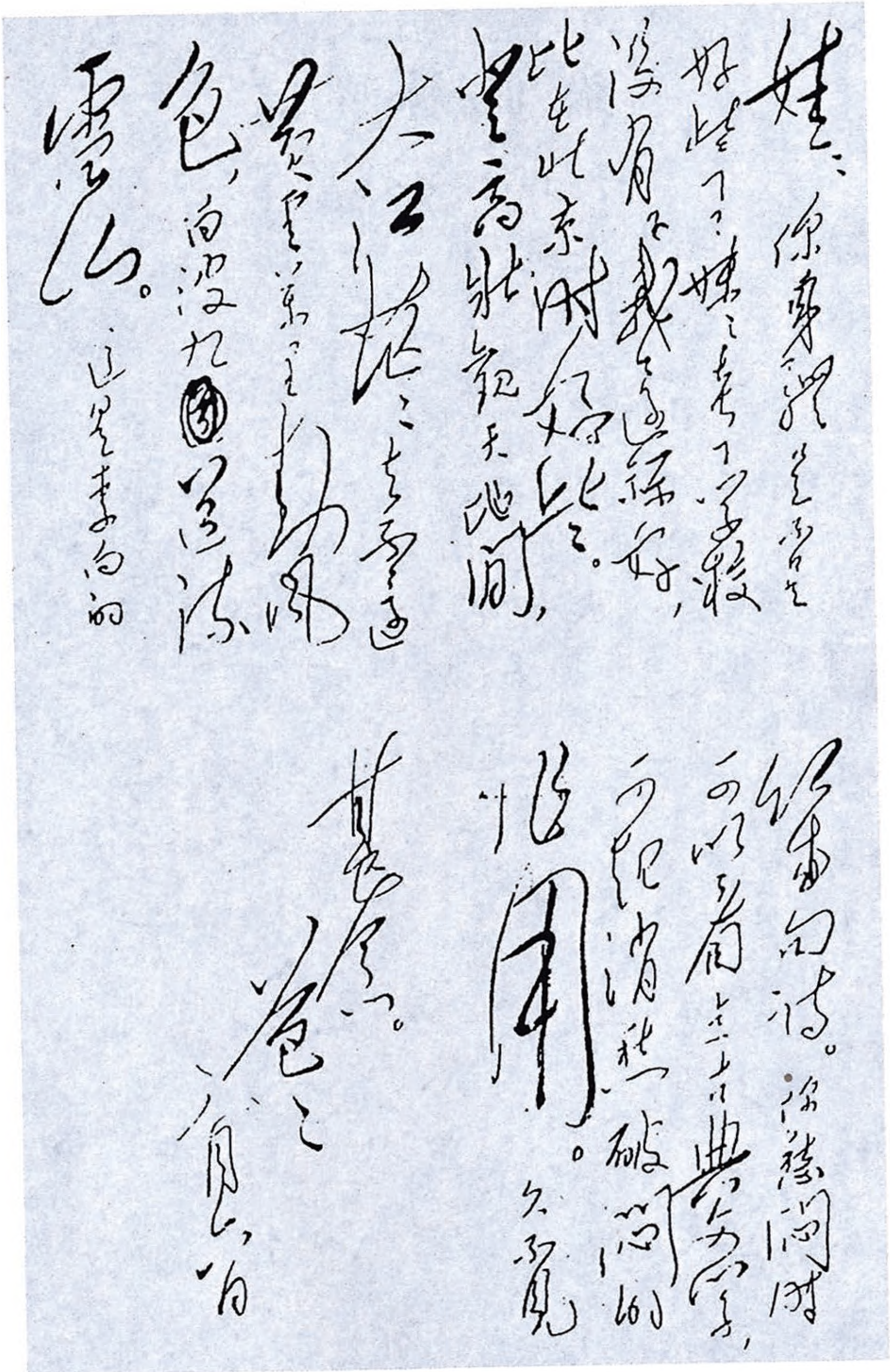
你身体是不是好些了？妹妹考了学校没有？我还算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愁闷时可以看点古典文学，可起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

[1] 刘松林，1949年10月和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结婚。当时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娃娃：你身体是否好些了？妹妹考上学校没有？我身体还好，比在北京时好些。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李白的几句诗。你发闷时可以看看古典文学，可以消愁破闷的作用。久不见，甚念。

爸爸

八月六日

毛泽东致刘松林信的手稿。

印发江西省委党校关于统一学员对人民公社认识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7日）

---

[1]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委给江西省委的这一报告说，党校学员关于人民公社的分歧认识暴露以后，我们认真分析了产生动摇的原因，在省委的指示下，决定采取辩论、读书、辅导、总结的办法，来解决学员们的思想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辩论开始后，持否定观点的人进一步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持肯定观点的人则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列举事例，说明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学校组织学员精读马恩列斯著作，从理论上弄清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等问题；在学习中，省委负责同志前来作了五次有理论有实际的总结性报告，指出了人民公社的现实作用和深远意义。第二阶段研究和辩论了主观如何反映客观、工作方法不适当就不能实现党的方针政策等实际工作问题。第三阶段则进一步辩论了人民公社中的生产方针、分配原则等实际问题。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全体学员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在一个总支82人中的调查统计，开始时有将近2/3的人有模糊不清的认识，有6个人认为我们的工作是搞糟了。经过学习后，持肯定观点的人更加坚定了，模糊不清的人清醒明白了，持否定观点的人没有了。从这一期的教学中，我们体会到：第一，从学员的思想情况看来，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怀疑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问题，这并不仅仅是个人认识上的问题，而且是党内外一部分人的思想的缩影。第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事物达到全面正确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在未认识到之前容易发生混乱。第三，这些干部中的分歧认识，肯定是可以统一的。1959年8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四三期摘要登载了江西省委党校党委的这一报告。

印发各同志。我们谈论的江西党校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两大问题的辩论，现在已经解决了。开头一阵乌云，结果一片晴天。庐山会议[1]上辩论的情况，和江西党校何其相似？江西党校持否定态度的在八十二人中有六个人，我们这里也是五六个人。我们这里持肯定态度的人比江西党校多得多，持模糊态度的也比江西党校较少，这两点是不同的。两处辩论的问题全然相同，都是大跃进与人民公社。阵线也相同，都分左、中、右。同志们可以看一下。报告写得好，一气可以读完。请同志们学江西的样，在省地县三级分批举行，一律照此大辩一场。时间秋季好，冬季好，春季也好，每一批时间两个月，读书与辩论并行，作一次新的整风运动，定有极大利益。

毛泽东

八月七日

---

[1] 指当时在庐山先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

对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59年8月7日）

退彭真[2]同志照发。

毛泽东
八月七日

---

[1]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稿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如果不彻底加以批判和克服，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是不可能的，各项建设事业的继续跃进是不可能的，今年调整后的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计划的完成，也是不可能的。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全面安排和节约使用劳动力、物力和财力。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959年8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指示下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团中央。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稿的批语[1]

（1959年8月7日至17日）

一

伯达、稼祥、乔木[2]同志：

增产节约决议初稿写好了没有？不要字斟句酌，有了一个轮廓就可印发常委及你们三人，看一下，提些意见，再改为第二稿，最后改第三稿，那就是字斟句酌的阶段了。我希望今天晚上能看到初

---

[1] 本篇一是为布置起草和修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等三个决议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草案）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晚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正稿的批语；本篇四是对胡乔木8月16日晚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正稿以及同时送审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修正稿的批语。195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稿，请即办。

八月八日，以一天时间改成反右倾机会主义那个决议[1]，主要把我写的第三节，同第四节不调和的地方，改得协调起来[2]，八日晚上交我看。以上两个决议，九号就要印发给一切同志付讨论了。你们则以九日、十日两天时间转到写第三个文件，即写关于彭张[3]错误的决议[4]，十日下午交给我看（初稿）。时间紧了，要加紧工作。以上即照办，为盼！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上午五时

---

[1] 指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2]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决议草案的第三节是毛泽东加写的，后来又略有修改。

[3]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4] 指《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发表在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二

乔木同志：

此件好。有一点修改[1]。即交尚昆[2]印20份，分发常委、彭真[3]、起草小组、各大区组长，征求意见。

毛泽东
八月八日

---

[1] 毛泽东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草案的修改，主要是将第3页讲到1959年上半年市场供应紧张“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地开始了逐步的好转”一句，改为：“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有更大改变。”将第6页“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一句，改为：“勤俭建国，勤俭办人民公社，勤俭办一切企业事业。”将第8页“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松劲情绪，为夺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一句，改为：“克服某些不坚定分子的右倾机会主义情绪，并且坚决打击这类分子的破坏活动，为争取今年的伟大胜利而斗争。”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三

有点修改[1]，在第3页，第4页（七年改为八年），第8页。

毛

十七日

四

即刻送刘、周、朱、林[2]、彭真、乔木阅，即刻看一下，如同

---

[1] 毛泽东对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修正稿的修改，主要是将第3页“但是由于人民购买力增长得更快，市场供应曾经显得比较紧张。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还将有更大改变”，改为：“但是由于人民购买力增长得更快，市场供应的一小部分商品，曾经显得紧张。这种情况，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已经迅速有所改变，今后一个时期必然会有根本的改变。”在此页，毛泽东还批有“注意修改处”字样。在第4页，将“我们就有可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一句，改为：“我们就有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在十五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人民日报》1959年8月27日发表这个决议时，又将其中“八年左右的时间”改为“十年左右的时间”。在第8页“为在两年内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斗争”一句中的“两年内”后面，加括号写了“即1958和1959”，并批有“注意修改处”字样。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意我的那一些修改[1]，即刻付印，务于今日下午至迟晚上发到各同志手里，以便他们明日带回去。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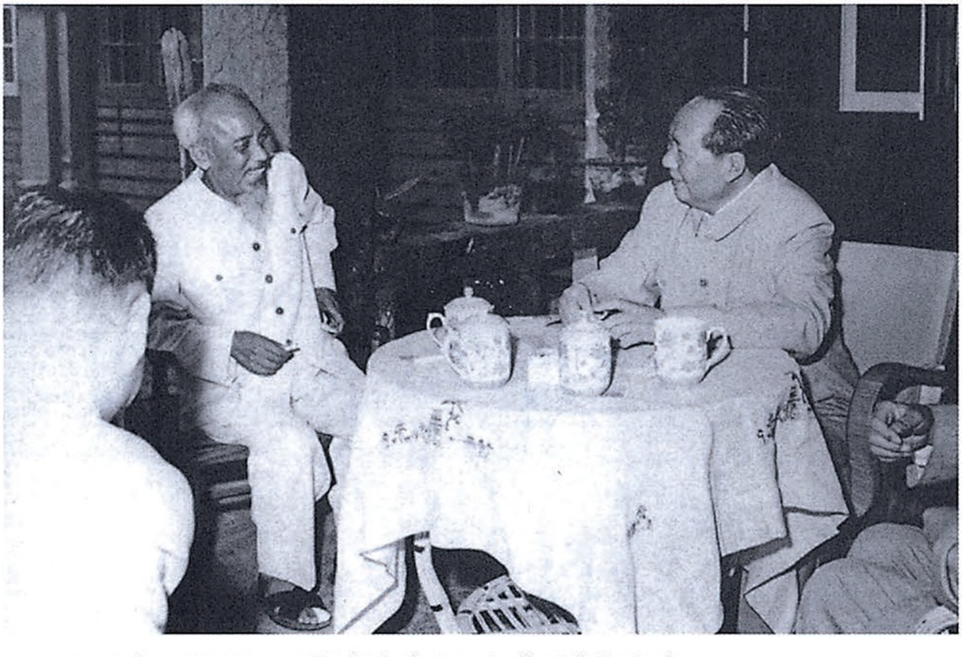
八月十七日上午四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朱德、周恩、胡志明等在庐山。

---

[1] 毛泽东对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送审的这3份文件均作了修改。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庐山。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在庐山和胡志明亲切交谈。

1959年8月9日，毛泽东在庐山和胡志明亲切握手。

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1]

（1959年8月10日）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2]；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3]。我怀

---

[1]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中共安徽省委1959年8月4日关于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给中央并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报告的批语。安徽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同志于七月初到无为县检查工作时，下令解散食堂，并以怀疑的心情责令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几个情况的变化，结果引起无为县工作上的混乱。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对张的这种做法很有意见，认为是违反中央方针政策的。现将无为县委和芜湖地委的报告转上一阅。”无为县委8月1日给地委并报省委的报告说：张恺帆于7月4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9日下午在下大队检查时，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的“三还原”，并要县委向下贯彻。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个食堂被一风吹散，只有120个食堂坚决不散。芜湖地委8月2日给省委的报告说：地委同意无为县委的报告。我们认为张恺帆提出的“三还原”，特别是命令解散食堂，是违背中央和省委关于办食堂的方针政策的。张恺帆指示县委办公室调查公社化前后的三个变化（劳动力、农具、房屋）和干部作风、各种发病情况等五项内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后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请省委加以研究。

[2] 这里指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

[3] 张恺帆，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的错误处分。

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显明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毛泽东

八月十日

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9年8月11日）

讲讲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人生观这个词，在外国书上看得很少。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观。其实世界观、人生观是一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所谓人生观就是社会观、世界观，包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部分。为了通俗起见，说人生观也可以。在一部分同志中，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就是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有个方法论，它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观察，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俄国有造神论、神论和迷神论，把精神来造人。是谁呢？是不是芦那察尔斯基、波格达洛夫，他的著作我看过，现在忘记了，马赫主义说，是奥地利和德国的，美国叫实用主义，又叫功利主义，是一个东西。他们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不承认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客观真理是固有的，不是个人主义的真理。由感性到理性，客观真理又变成主观真理。

主观真理是来自客观真理。同宗教不同，和主观唯心主义不

同。相反地，我们的这些同志一厢情愿相思，中国的一句话，叫自以为是，而不是实事求是。实事是客观真理，求是者是主观反映客观真理，要经过脑筋。要千百次反复地感觉，然后变成概念，山水草木、人马牛羊、鸡犬猪都是概念；人有资产阶级的人和无产阶级的人。男、女、老、幼都是概念，都是抽象来的。具体的人，张三、李四。如董老、林老、吴老，你们是老年人，你们的娃娃是青年人，你们的夫人叫女人。

历来犯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英国巴克莱的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流派，是最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个宗教家，一个大哲学家。他的名言：为什么有我，因为我想。我不想，我就没有。世界也是“我思则在”，否则世界上也没有了。他们是唯我主义。

为什么要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对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1]同志错误的决议》稿的批语[2]

（1959年8月11日至16日）

一

退胡乔木同志。有点小的修改[3]。

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

---

[1]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本篇一、二是分别写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决议》（草案）的两个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59年8月16日4时半送审的这一决议修改稿的批语，在这一稿上，决议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3] 毛泽东对胡乔木1958年8月10日送审的这一决议草案，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二

即退乔木同志：

即付印，今晚发给到会所有各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下午七时

三

彭真[1]同志：

即刻照此印发。其他三个决议[2]，一个公报[3]，请你督促即行做最后一次修改，务于明（十七）日下午发给各同志，以便十八日各同志动身回去时能带回去照办。

毛泽东

十六日五时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3]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

给周小舟的信

（1959年8月12日）

小舟同志：

昨谈甚快。请你将昨日所谈全部情况和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我[1]。希望今天能送给我，不然，明日送来也可。交我的秘书高智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上午六时

---

[1] 周小舟1959年8月13日早2时遵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8月14日毛泽东批示将这封信印发给八届八中全会各同志。

对辽宁省委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12日）

印发各同志。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如何？辽宁那样的反右倾、鼓干劲的部署，是否已经做了，效果如何？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不同程度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种歪气邪气打下去。辽宁做得很快，步骤也好，成效显著。他们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右倾机会主义

---

[1] 中共辽宁省委1959年8月9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接到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我们两次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决定采取如下措施加以贯彻执行：一、立即向各级党委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学习，对消极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使干部和群众鼓足干劲，掀起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二、召开了全省重点企业党政领导干部及市委书记参加的紧急会议，在正在召开的全省基本建设会议上传达中央和主席的指示，并部署下半年特别是八、九两个月的生产和基本建设工作。三、定于8月10日召开全省工农商学兵各个战线全体职工参加的广播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鼓足干劲，增产节约。四、上述工作完成后，立即派检查团到各地督促检查和帮助工作。同时大力提倡干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实际，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分子处于被动。这个经验，值得各地注意。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对辽宁省委关于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和安排意见的批语

（1959年8月12日）

印发各同志。各省应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一个较长期的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计划。辽宁省这个意见书[1]，可供各省、市、自治区参考。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指中共辽宁省委1959年8月7日关于辽宁省今后经济建设方针和安排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由于我省国民经济发展还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的状况，因此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应当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工业基础，大力挖掘企业潜力，更好地支援全国，并在此前提下，逐步扭转国民经济中某些不协调状况，使之更好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方针，打算作如下安排：（一）大力发展农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加化肥、农药生产。（二）我省重工业比例特别大，今后一般不再扩大生产规模。至于其中的薄弱环节和紧缺门类，应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统筹安排，逐步加强和弥补。同时注意加强煤炭、电站等先行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三）根据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可能，积极发展轻工业。（四）搞好城市建设，大力解决各城市严重缺水问题，适当发展城市煤气工业，注意有步骤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福利，适当控制城市人口增长。（五）大力发展水产事业。

对商业部党组关于支援抗旱、防洪工作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13日）

已阅，很好。退程子华[2]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

[1] 商业部党组1959年8月7日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为了积极支援各地抗旱、防洪工作，商业部目前已成立专门办公室，负责与有关省区联系，以便了解并及时督促检查救灾工作。在救灾物资供应方面，拟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在抗旱、防洪物资不足的情况下，要优先供应灾区。（二）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要求非灾区积极主动支援灾区。（三）受灾地区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地方资源，就地取材，就地使用，并进一步清仓，充分发挥现有库存力量。在已成灾地区，商业部门还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积极帮助灾民发展多种经济，做好灾民生产所需原料的供应和成品的推销工作，做好灾民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保证灾民药品的供应，并及早做好防寒取暖物资的准备。

[2] 程子华，当时任商业部部长。

印发鞍钢克服右倾松劲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8月14日）

印发各同志。请令各重点企业研究鞍钢的经验。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

[1] 中共鞍山市委1959年8月8日给辽宁省委的报告说，接到毛主席7月31日对鞍山市委《关于鞍钢当前生产和群众运动情况与八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的批示和省委常委8月3日至5日扩大会议的指示精神后，受到极大鼓舞，决心立即采取下列措施，进一步克服右倾松劲情绪，迅速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一、立即在广大干部和职工中，开展学习和宣传《人民日报》社论《克服右倾情绪，厉行增产节约》的运动，使他们从思想上充分发动起来。二、抓紧当前有利时机，迅速地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三、认真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四、加强薄弱环节的领导，抓紧重大措施的实现。五、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群众，深入生产，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分秒必争，按日、按班完成国家计划。辽宁省委1959年8月11日将这一报告批转各市委并报中央。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辽宁省委的报告上。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9年8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解放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忘我的劳动，发挥了无穷的创造性，以千里马的快速步伐，胜利地提前两年半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总产值计划。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朝鲜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限的欢欣和鼓舞。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为缓和远东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朝鲜人民广泛开展的要求美国侵略军队撤出南朝鲜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普遍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

持兄弟的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坚信美帝国主义一定会被赶走，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一定胜利。

一年来，中朝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合作，在谋求两国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事业中更加巩固和发展了。这对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事业具有重大作用。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自己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朝两国兄弟人民的亲密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8月14日

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

（1959年8月15日）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第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

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1]

（1959年8月15日）

一个文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拿起来一看，是我的几段话和列宁的几段话，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2]。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

---

[1] 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一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刘澜涛1959年8月2日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写信说："为了学习和研究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我同我周围工作的两位同志选择节录了毛主席和列宁有关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论述。""这本小册子，是由我编好后，经团中央同意后印的，现送上一份，请有暇时看看。"《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节录了毛泽东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7月3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列宁1917年8至9月《国家与革命》、1907年2月《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1921年10月《十月革命四周年》、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1907年7月《反对抵制》等著作中的一些论述。后来发表在1959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十七期上。

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湾〈弯〉”“一转湾〈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哪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那么，好吧，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1]，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请你们看一看：中国革命和巴黎公社，哪一个好一点呢？中国革命和1905—1907的俄国革命[2]相比较，哪一个好一点呢？还有，1958—1959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同俄国

---

[1] 巴黎公社是法国巴黎工人1871年3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成立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组织。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用无产阶级政权代替被摧毁了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创举。由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没有注意团结广大的农民同盟军，对反革命又过于宽大，使得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对起义的群众进行大屠杀。5月28日，巴黎公社失败。

[2] 指1905至1907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由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和没有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但它成为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预演。

1919年、1921年列宁写那两篇文章[1]的时候的情况相较，哪一个好一点呢？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2]，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

“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怎么样？我们的右翼朋友们。

既然分裂派和站在右边的朋友们，都爱好马列主义，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集纳文件提供全党讨论一次。我想，他们大概不会反对吧？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

[1] 指列宁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和1921年10月《十月革命四周年》两篇文章。这两章文章均被节选入《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文。毛泽东下文引用的几句话，均出自这两篇文章中被节选的部分。

[2]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1883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之一。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

（1959年8月16日）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2]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

---

[1] 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二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59年8月15日在一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铅印件上给毛泽东等写了一封短信说：“那个文件系刘澜涛同志和其他两个同志选集的，印时把北京来信漏掉了，没有把刘澜涛同志的信一道印上去。现送上给你看。”刘澜涛来信，指刘澜涛8月2日为送审《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小册子给彭真的信。后来印发《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的批语时，毛泽东批示将彭真和刘澜涛的信都附印在后面，并将彭真的信抄改了一遍。

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1]，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2]，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

---

[1] 高，指高岗，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指饶漱石，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2]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1]、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

---

[1]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罗章龙，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张国焘，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

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的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关于枚乘《七发》

（1959年8月16日）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1]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2]、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蹷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夫诺夫[3]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总之，一定要鼓干劲，反右倾。枚乘直攻楚太子：“今太子肤色靡曼，四肢委随，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齐姬奉后。往来游讌，纵恣乎曲房隐间之中。此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也。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

---

[1] 屈原，战国时楚国政治家、诗人。

[2] 宋玉、景差，均为战国时楚国辞赋家。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

[3] 巴夫诺夫，今译巴甫洛夫，苏联生理学家。

不废。虽令扁鹊治内，巫咸治外，尚何及哉?”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因为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这类毛病，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所从来者，至深远、淹滞、永久而不废。”这个法子，我们叫做“批判从严”。“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我们应当请恩格斯、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斯大林、李大钊、鲁迅、瞿秋白之徒“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讲跃进之必要，说公社之原因，兼谈政治挂帅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览观”，列宁“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枚乘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较低的阶层，有一条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当然，这是对于封建阶级上下两个阶层说的，不是如同我们现在是对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资产两个对抗阶级说的。我们的争上游、鼓干劲的路线，代表了革命无产阶级和几亿劳动农民的意志。枚乘所攻击的是那些泄气、悲观、糜烂、右倾的上层统治的人们。我们现在也正有这种人。枚

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1]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2]所收曹植[3]《七启》，张协[4]《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

[1] 刘濞，西汉诸侯，封吴王。

[2] 指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选的《文选》，收载了自秦至南朝梁的诗文词赋等700余篇，是现存我国古代第一部质量较好的诗文选集。

[3] 曹植，三国时魏国诗人。

[4] 张协，西晋文学家。

一次讲话

（1959年8月17日）

集体有一长，班有班长，连有连长，有三个党员是一个小组，要有个组长。没有集体不行，光有集体也不行，有集体就要有个长，不然就没有力量。鞍钢工厂和耕田不同，耕田慢一点快一点没关系。工厂技术那样复杂要听指挥。像乐队，没有指挥，一群人就不知所措。这就是生产秩序，生产秩序所需要的。交通警察不要不行，几十年、几百年以后，纪律将会更加森严，上街可能要排队。不信，请你注意健康，再活一百年，就可以看到。开会要有人发通知，要有秩序，散会也要有人宣布，这是必然性。至于姓张、姓李的来主持，那是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表现。有统一指挥，是社会斗争、自然斗争所必需的。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布朗基主义者“左”得不得了，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者搞起来的，但是群众超出了他们的意志，被迫不得不搞。反对的人并非完全不知道船要有船长，组要有组长，无非他们要搞派别活动，反对敌对的派别。列宁当时的政治局只有五个人，在困难的时期有人反对他，说他不民主，不召开会议。列宁说会还没有开，可是革命胜利了。常委会的同志年纪都大了，总要办交代，总要新的人来代替，不能是无政府主义的，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对破坏，无产阶级不破坏就不能建设。你要讲破坏，我就不能谦虚了。列宁说你

们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别，要你们来干是不行的。地方上也有这个问题。省、地、县都要建立一个领导核心，但要有一个过程，不然不行，每个县、公社都要如此。河北昌黎县委就没有一个领导核心。有意识地健全我们的领导机关，当挡的风挡回去，很有必要。彭德怀二十四日信没有通知讨论，我告诉两方面都要硬着头皮顶住，我们公道，□□到昨天以前还硬着头皮顶住。

这次会开得很好，逐步发展，中期、后期解决了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我建议地方的会议不必等都到齐了才开，到一半人就可以开，有老兵有新兵。这次会议是胜利的会议。避免了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马鞍形。大跃进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的，是群众的要求。革命和建设两个运动，搅在一起，是人与人的关系，又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比如农械问题，东北是工业化地区，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解决□%，其他地区也要力争嘛！国内形势是好的，有的同志欢迎中央的同志去看，有些同志不去看。同样一件事，可以有两种看法，有缺点可以改，并不难改。国际形势也是好的，印度、印尼要搞和平，但如果不准备夺取政权，是要犯错误的。这与和平民主新阶段不同，因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夺取政权。日本投降早了一点，再有一年我们就会准备得更好一些。社会主义时期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一化三改，一条是现在的建设路线。去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到今年七月的庐山会议，仅一年多，出了乱子，不是说路线不行了吗？经过这次会议，又说行了。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并非太平无事。将来风波还是有的，但总的趋势是好的，不管出什么乱子，无产阶级的劳动人民总要占优势，即使不占优势也是暂时的。现在建设有了保证，中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是团结一致的，但也要估计到不是那样风平浪静，

自然界的台风年年要来的，政治上的台风什么时候来，料不到，但一定时期内，总会有的，因为有阶级存在，精神上要有准备。世界和平的可能性很大，但不是没有战争的可能，一定要有准备。

给赫鲁晓夫[1]的信

（1959年8月17日、21日）

一

请总理带交陈毅[2]同志办。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二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您8月7日给我的信和附来的您同艾森豪威尔[3]所交换的信件副本已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转交给我。非常感谢您的这项通知。美国在被迫的情况下不得不邀请您去访问，这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又一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次重大的胜利。我深信，即将到来的您对美国的访问必将使美国好战分子们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祝您在争取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共产主义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对张闻天[1]来信的批语

（1959年8月18日）

印发各同志。印160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2]。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张闻天，又名洛甫。

[2] 张闻天1959年8月18日上午给毛泽东的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他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今天读到你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和机关枪及其他，更使我深为感动。”“因为没有得到你的通知，所以我没有去见你。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封信时，拟题为：“洛甫同志8月18日上午庐山临别赠言，给毛泽东。”

关于对人民公社进行调查研究问题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1]的信

（1959年8月19日）

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三位同志：

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不明真相抱着怀疑态度的人们，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起见，必须向『向』这一切人作战，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为此就需要大量的材料。请冷西令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将此信讨论一次，向各分社立即发出通知，叫他们进行对人民公社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每个省（市、区）选择五个典型，特别办得好的公社，例如广东省增城的石滩公社，河南省长葛县的坡胡公社（以上均见八月十八日《人民日报》[2]），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社[3]，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总之，实事求是，反复核对，跟县委和公社党委认真研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人民日报》1959年8月18日发表《靠大集体之力，兴大协作之风》一文，介绍了广东省增城县石滩公社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迅速修复被洪水冲坏的水利工程的事迹和河南省长葛县坡胡公社工农商协同作战，巧胜严重干旱，力争把灾年变成丰年的事迹。

[3] 指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当时的社长是王国藩。

究，不适当的，修改而又修改，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并且要跟地、县派下去的有能力的工作组的同志们一道去办。每省五个社，要派五个有政治、经济头脑而又文笔很行、思想很通的同志去，你们认为是否可以办到呢？请你们接信后，即日动员，一个月，二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我希望能于三十天、四十天内交来第一批，每省先送一个至二个典型公社，其余陆续交来即可，你们看，是否可以办得到呢？办不到，即延迟，总以情（情况）文并茂为原则。文字可长可短，短可三四千字，长可万余字，平均以七八千字为适宜。写好，一律交给我，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1]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请陈伯达同志立即组织几位熟习俄国革命初期所办公社的材料、具体情况（要详细材料）及其所以崩溃的原因的同志，一定要加以分析，提出论断。这也是极端重要的。目的在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此书出版及我的文章，国庆节不可能，最快要到秋天、冬天，最慢要待明春，因为准备工作来不及。此信你们看后，如以为可，交尚昆[2]同志立即用电报发给各省、地、县三级及新华社、人民日报指定从事此项工作的记者们，使他们知道我的意向，即为此问题要向世界宣战。另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九日，于庐山。

---

[1] 指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卡斯特罗[1]关于发展中古关系的建议的批语[2]

（1959年8月19日）

恩来、陈毅[3]同志：

这件事处理了没有？似宜派一位相当于公使或代办级的有政治头脑的同志去，以新华社分社长或记者资格驻古巴，是否可行，请酌。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武装部队总司令。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1959年8月4日给外交部、外办、中联部的电报上。电报说，在古巴期间，卡斯特罗两次接见了我们。在谈到古巴和中国的关系时，他说应当把事情想得远一些，建议设法在哈瓦那的新华社机构中增加一位中国方面的较重要的人，作为中国的非正式的代表机构，进行宣传和各种联系工作。这样逐步把各种工作进行起来，将来水到渠成，就可以正式替代蒋介石方面驻古巴大使馆。

[3]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中央转发青海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简报的批语

（1959年8月19日）

这个报告[1]很有用，发给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八月十九日

---

[1] 中共青海省委1959年8月13日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省委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扩大）于8月1日召开，首先讨论、布置了今年的粮油征购工作，然后根据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立即转入反对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斗争。省委决心用八、九两个月的时间开好这次会议（包括安排下半年生产工作在内），把反右倾斗争搞深搞透，对犯错误的人进行具体分析，弄清他们的错误性质，要求他们痛改前非，站到正确路线上来。同时通知各地，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学习中央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运动，并拟在十、十一月间集中进行州、县级党组织内反对右倾思想的斗争。省委在会议期间还对当前工业、农业、畜牧业生产作了具体部署，号召群众反右倾、鼓干劲，掀起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执行中央反对右倾思想指示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19日）

河北省的情况极好。发各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8月17日给毛泽东、中央的这一报告说，省委在接到中央8月7日下发的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进行了讨论，总的精神是：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彻底批判和纠正部分干部中的右倾思想，鼓起干劲，大战八、九月，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跃进计划，迎接国庆十周年。目前全省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为了彻底批判和克服右倾思想，省委确定：（1）各级党组织都要集中时间，展开对右倾思想的彻底批判，发动职工利用多种形式检查领导上的右倾思想，鼓足干劲，超额完成任务。（2）各地区召集重点企业的党政干部开会，对右倾思想进行检查批判，制订新的增产节约计划。（3）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促进增产节约新高潮。省委认为，检查批判右倾思想必须与当前的生产和工作密切结合，既解决思想问题，又使生产、工作迅速跃上去，而这一工作的关键则在于加强党的领导。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59年8月22日）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值此罗马尼亚解放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罗马尼亚工人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来，勤劳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马尼亚已经完全改变了解放前的经济落后状态，成为具有先进的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罗马尼亚人民为胜利完成1959年经济建设计划和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进行着忘我的辛勤劳动。

罗马尼亚人民始终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为维护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奉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外交政策。它在发展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友好联系、反对帝国主义的

战争和侵略政策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国际声誉。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欢欣和鼓舞。

中罗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建立了兄弟般的友谊。近年来，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关系正在进一步地发展和巩固。这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两国的共同繁荣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加强。

祝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日益繁荣和富强。

祝中、罗人民间的兄弟友谊如松柏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要多登科学讨论文章

（1959年8月23日）

航送伯达、乔木、冷西、家英[1]四同志：

此版右角甘薯问题[2]，很有兴趣，可以一看。这种讨论，是非常之好的。科学讨论，《人民日报》要多起来，要多得占篇幅五分之一左右，岂不是很好吗？请你们于衣食住行用五大要政讨论一下。一塘死水，需要搅动一下了。你们八月二十一日的信收到，做得好，写得好，我看后非常之高兴。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六时，倚枕

---

[1] 伯达，即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家英，即田家英（1922—1966），四川成都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9年8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的《关于甘薯翻藤问题的讨论》一文。

对黄克诚来信的复信和批语

（1959年8月24日）

一

克诚同志：

信[1]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

大进一步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

[1] 指黄克诚1959年8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本篇三就写在这封信上。

二

此信[1]及黄来信送刘、周、朱、林、彭真[2]同志一阅，尚昆[3]将我复信抄一份存底，连同黄来信归档。然后将我复信送与克诚。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三

刘、周、朱、林、彭真阅，退毛。

已复，欢迎他这种态度。

---

[1] 指本篇一。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议[1]

（1959年8月24日、9月14日）

一

少奇同志：

关于全国45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子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2]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70%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10%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提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45,000人左右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问题给刘少奇的信。本篇二是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为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书面建议，载于1959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原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

[2]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帽子，即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带〈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此外，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我月底可回。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于杭州

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

[1]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1959年9月17日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1959年8月29日，毛泽东参加李敏、孔令华的婚礼。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9年8月30日）

一

此件[1]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

---

[1] 中共贵州省委1959年8月27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1. 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得到解决。2. 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著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

中央
八月三十日

二

刘、彭真[1]阅后，尚昆[2]即办。要印几千份。

毛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8月30日）

一

发各省、市、区党委，在京各同志，各部、委党组。竞赛的方针提得很正确，全国都应当这样做。

中央
八月三十日

---

[1] 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8月28日给中央、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省委于8月23日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和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确定本省1959年工农业增产的主要指标，并且着重讨论了如何鼓干劲、争上游，开展劳动竞赛，把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的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环节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一个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群众运动。大家体会较深的是：（1）劳动竞赛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执行总路线的具体表现，因此在竞赛中必须树立总路线的思想。（2）开展竞赛必须是群众性的竞赛，竞赛的指标、措施，必须落实到群众当中。（3）竞赛中必须发扬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二

刘、彭真[1]同志阅，尚昆[2]办，如贵州例。

毛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吴冷西[1]报送的八届八中全会宣传计划和人民公社调查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9年8月31日）

电话告吴冷西同志：

信[2]及附件[3]看了，很好。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吴冷西1959年8月31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关于八届八中全会的宣传，都已拟订了初步计划，并且已经开始执行。《人民日报》社论计划中，还增加了两篇，一是论十年左右赶上英国，一是为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另外，我们还陆续补充了一些从理论上论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文章，将在第七版上发表。关于人民公社的调查，现正在积极进行。各省对此十分热心，大都书记挂帅，组织大批人马下去，准备从中选些好的典型材料送给我们。我们也已组织了50多人下去支援。

[3] 指吴冷西报送的《人民日报》关于宣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初步计划、新华社关于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的报道计划和关于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简报第一至五期。

印发《关于公社问题的材料》的批语[1]

（1959年8月31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1959年8月29日报送的3份材料：一、中央宣传部1958年1月7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四期上登载的《有关“公社”的一些资料》，内容包括：1. 对“公社”一词的解释；2. 公民公社，共产主义联合体；3. 巴黎公社；4. 苏联农业公社。二、苏联加·安·库尔巴诺夫关于十月革命初期一个公社情况的回忆。三、苏联大百科全书旧版中的“农业公社”释义。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些材料时，拟题为《关于公社问题的材料》，并将其中第二份材料拟题为《第一个俄国公社的回忆》。

在北京市委关于京郊涝灾和抢救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8月）

大问题。

江青阅。

老下大雨，菜量大减。

---

[1] 指中共北京市委1959年8月14日关于北京郊区涝灾和抢救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自8月6日暴雨过后，13日北京地区又下了一场大雨，郊区菜地受灾严重，近几天蔬菜上市量日渐减少，供应十分紧张。今后一段时间内，上市蔬菜还会减少。目前正在从各方面想办法，力求增加供应。

关于阅看《人民日报》两篇文章给林克[1]的批语

（1959年8月）

共两篇[2]，6版一篇，7版一篇，都可看。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1959年8月22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登载的哈尔滨经纬小学语文教师张兆英的《我怎样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和第七版登载的北京天文台筹备处副研究员王绶琯《射电天文学——打开宇宙秘密的新钥匙》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旁当，毛泽东都批有“林克阅”字样。

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1]的信

（1959年9月1日）

臧克家、徐迟二位同志：

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2]，录上呈政〈正〉。如以为可，可上诗刊。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

---

[1] 臧克家，当时任《诗刊》主编。徐迟，当时任《诗刊》副主编。

[2] 两首七律，指《到韶山》《登庐山》，当时均未在《诗刊》上发表，后来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

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毛泽东
九月一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9年9月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孙德胜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勤劳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近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提高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全面胜利，为越南人民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在越南人民正在以高涨的劳动热情为实现发展和改造经济、发展文化的三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和严格地履行日内瓦协议，为维护印度支那和平和实现祖国的统一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赞扬和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

坚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维护日内瓦协议和制止美国分裂越南、破坏印度支那和平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赢得最后的、完全的胜利。

一年来，中越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全面的互助合作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中还在不断地发展和巩固，从而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

祝中越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在李富春[1]关于国家计委等单位最近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9月2日）

电话告富春：

此件[2]及前件[3]均已看过。同意他们会议的安排。

毛泽东

九月二日

---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 李富春1959年9月1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从庐山开会回来已10天，除布置计委和各部着手搞明年的计划外，主要是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的决议。从8月26日起，国家经委、建委、科委和计委党组共同开会讨论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问题。30日下午又召集了扩大的四委党组会议，中心是要把思想搞透，特别是要克服计委干部中的混乱思想，认识总路线，维护总路线，在克服工作上的缺点错误过程中来贯彻执行总路线。在9月15日左右，争取先搞一个明年计划的纲要（准备提出以钢为纲的三个不同的方案作比较）。在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搞明年的计划工作中，要求计委的干部把方向和方法两个问题搞清楚，这样思想才能一致，方法才能提高，计划才能做好。

[3] 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贾拓夫1959年8月给中共中央的检讨报告。

转发湖南省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1]

（1959年9月2日、3日）

一

彭真[2]同志：

此件[3]可转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同时印发军委扩大会及外事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九月二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1959年8月30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上；本篇二、三写在湖南省委9月1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书面报告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1959年8月30日的电话汇报。汇报说，省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一、确定了今年主要产品的跃进指标。二、突出地抓了当前的生产。三、对于生活安排问题，强调当前主要是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口号是：鼓足干劲搞生产，精打细算过日子。四、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与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

二

此件[1]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一九五九年九月三日

三

刘[2]、彭真同志阅，尚昆[3]办，另印如前示。

---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9月1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书面报告。报告补充说，这次会议提出了抓好当前工作的几个关键：第一，迅速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第二，加强领导，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和扎扎实实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第三，坚持政治挂帅，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第四，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指挥生产。

[2] 刘，指刘少奇。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关于团结一切在我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的指示

（1959年9月4日）

一

此件[1]发给各有关部门和同志。

要团结一切苏联专家同志及其他外国专家同志，和我们一道，反右倾，鼓干劲，争取超额完成任务。即使有少数人在一个时期和我们意见不一致，也应好好说服他们。总之，要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好好团结一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同志，为总路线和大跃进服务。

中央

1959年9月4日

二

刘、周、林[2]、彭真阅后，尚昆办。

毛

---

[1] 指国务院外国专家局1959年8月26日整理的《苏联专家认为反右倾保守很好，希望能反彻底，并称赞中国人民干劲大》的材料。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转发上海市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一

此件[1]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办理。

中央

九月四日

---

[1] 中共上海市委1959年9月2日给中央的这一电话汇报说，我们从8月28日开始举行的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精神，反响很大，提高了干部们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今后会议准备分三个阶段进行：一、首先搞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本质，肃清其影响。二、通过学习，进一步认识与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讨论深入后，逐步联系、检查自己的思想认识，吸取教训，提高政治觉悟。三、认真讨论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贯彻总路线，总结去年以来的经验，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新高潮。以上每个阶段大约各需五天时间，一般规定半天开会半天工作。会议预计在15日结束。

二

刘、彭真[1]同志即阅，尚昆[2]立即以电报发去，今日办完为盼。可不另印。

毛泽东
九月四日上午四时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汇报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一

此件[1]很有参考价值，发各省、市、区党委。

中央

一九五九年九月四日

二

刘[2]、彭真同志阅后，尚昆[3]即办。

---

[1] 中共贵州省委1959年9月2日的这一电话汇报的主要内容是：一、贵州省委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形势、揭露矛盾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总的看来，绝大部分同志是拥护党的总路线的，有糊涂看法的同志，多数都主动作了检讨，得到了教育。二、有右倾思想和在大风浪中曾暂时动摇的同志，多数是对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从消极方面去理解，因而对去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制度发生了怀疑。三、从9月3日起，将重新划分小组，分别对问题严重的人进行批判。

[2] 刘，指刘少奇。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请班禅[1]来京参加国庆问题的批语[2]

（1959年9月4日）

少奇、恩来、彭真[3]同志：

现离国庆只有二十几天了，宜劝班禅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回拉萨，准备于九月二十日左右飞兰州，下旬来京参加国庆。如何，请酌定。张国华[4]宜于九月十日以前返回拉萨。请彭找张谈一下，准备起程。

毛泽东

九月四日

---

[1]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西藏工委1959年8月29日关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在日喀则开展民主改革的一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上。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在西藏军区关于印军入侵雅斜儿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周、陈[2]同志：

雅斜儿的印军跑了，廿六日跑的，是在廿五日migiiadm（米基顿）即朗久区一打[3]的影响之下跑掉的。请与总参谋部联系，侵地未跑的还有几处，告我为盼！又，雅斜儿在什么地方[4]，亦请查告。

毛泽东

九月四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1959年9月1日24时关于对雅斜儿印军侦察情况给总参谋部、外交部的报告。

[2]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1959年8月25日，一支印度武装部队侵入属于我国领土的朗久地区，袭击我马及墩（即毛泽东批语中的“米基顿”）边防哨所，挑起武装冲突。我边防部队为了自卫，被迫予以还击。

[4] 雅斜儿，位于东经93°12′，北纬23°38′，是在中国境内，而且在“麦克马洪线”以北。

关于注意发表国外对华评论问题的批语[1]

（1959年9月4日）

乔木、冷西：

（一）此件也似可发表；（二）日本及西方的一些有利评论，宜大量发表，污蔑评论，也要发表，加以驳斥。反华越恶毒，对我们越有利，因为敌人处在被动地位，不得翻身了。以上请酌。

再者：过一会，例如在国庆节后半个月的时候，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2]，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是否可行，请先想一下，届时中央再做决定。

毛泽东

九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1959年9月2日关于伊报刊对我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等文件的反应给外交部的报告上。报告介绍了伊拉克一些报刊纷纷登载我八届八中全会公报及有关文件，发表评论赞扬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情况。《人民日报》1959年9月5日发表题为《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鼓舞人类》的新华社电讯稿，介绍了伊拉克报刊的这些反应。

[2] 可能指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县波拉采夫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后来没有发表赫鲁晓夫的这一演说。

关于发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报纸对我八届八中全会报道情况[1]的批语

（1959年9月4日）

乔木、冷西[2]同志：

---

[1] 指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1959年8月31日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的电报和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1959年8月30日给外交部的电报。驻捷使馆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从8月28日到30日，捷中央各报继续报道了我党八届八中全会和人大常委会的情况，版面突出，标题也很有力。其着重点如下：（1）中国成就大。（2）人民公社好。（3）八中全会决议正确。（二）一些报纸发表了评论，主要之点是：（1）指出了八中全会的意义。（2）强调我国成绩伟大。（3）分析了我国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4）对我调整计划进行了评论。（5）关于反右倾斗争问题，除《红色权利报》外，其他各报没有提及。驻民主德国使馆的电报说，民德各党派、主要群众团体和军队的报纸，对我八中全会公报及决议均非常重视，其宣传口径和我公报精神基本上是吻合的。各报都强调我国去年是史无前例的大跃进，今年是继续大跃进。对我修改1959年计划问题，还作了解释工作和正面的估计。同时还有意识地帮助我们反击西方报纸的宣传。《人民日报》1959年9月5日发表题为《人民公社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和《中国以不可阻挡之势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分别介绍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报刊的上述反应。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此两件似可以通讯方式由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等发表，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请酌。

毛泽东
九月四日

视察人民大会堂时的指示[1]

（1959年9月5日）

一

人民大会堂的建成确实是成绩伟大，你们这么大的功劳，是不是立块碑吧！那将多大呀！照相吧！也站不下呀！

要向老红军学习，不为名，不为利，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红军打仗也没有礼拜天，没有休息，没有加班费，还是学习老红军吧，要和老红军一样。

二

大跃进就是好，有人说大跃进不好，十三陵水库，人民大会堂就是大跃进的产物。没有大跃进就没有大会堂。让那些右派来看看，究竟是不是大跃进！

---

[1] 1959年9月5日，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工程。本篇一是毛泽东视察了礼堂的一二层和上海厅后的指示；本篇二是毛泽东看了宴会厅，询问了工程情况后的指示。

中央转发河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八届八中全会精神的第二次简报的批语

（1959年9月6日）

一

此件[1]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九月六日

---

[1] 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9月3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简报说，省委全会八次会议已经结束了关于增产节约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同志们一致拥护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认为调整后的1959年国家各项主要指标是积极可靠的跃进指标，只要坚决反掉右倾思想，认真采取有效措施，是可以完成和超额完成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存在右倾思想和畏难情绪。会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了今年全省工农业的各项主要指标。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二

刘、彭真[1]阅，尚昆[2]办。另印如前示。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反映有些省市揭发本地区个别高级干部右倾言行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59年9月6日）

少奇、彭真[1]同志：

此件[2]似可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另印发北京各单位，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外事会议各同志，四委[3]各部会议各同志，农林财贸会议各同志。请酌办。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1959年8月30日整理的《有些省市揭发了本地区个别高级干部的严重右倾言行》的情况简报。

[3] 四委，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委员会。

对苏联《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1]的批语

（1959年9月6日）

陈伯达[2]同志阅，退毛。

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的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9月3日给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报送的苏联经济学硕士И·格洛托夫《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摘要。这篇文章原载于1959年9月2日《苏维埃俄罗斯报》。该文最后提到公社，认为“借助于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其公有化的水平，并不意味着将农业组合变成公社”，“而在共产主义下，公社作为一定所有制占有者的集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所有社会财富都是全民财产”。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1]

（1959年9月6日、10日）

一

陈伯达同志：

“驳谬论”[2]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

毛泽东

九月六日

座谈会上，此件给他们看。

二

本刊讯　本刊九月三日《驳……谬论》一文发表后，毛泽东同

志写信给陈伯达同志，请他约国家统计局的同志们开一次座谈会，加以讨论。陈伯达同志和国家统计局的同志及其他同志开了一次座谈会。现将陈伯达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回信[3]及国家统计局根据座谈结果写出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一文，刊载于此，以供读者研究。

三

冷西同志：

另件[4]请付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请他们于明日（十一日）登载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日下午七时

---

[1] 本篇一是为研究新华通讯社1959年9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二期上登载的《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的信。本篇二是为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发表陈伯达给毛泽东的复信和国家统计局《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拟写的“本刊讯”，毛泽东还为这篇“本刊讯”拟了《关于〈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的讨论》这个标题。本篇三是为在《内部参考》发表陈伯达的复信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给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的批语。

[2] 指国家统计局党委《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一文。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1958年国民经

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1958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1958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文章还列举了一系列统计数据，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3] 陈伯达1959年9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写信说，9月7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合适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对于某些论点，大家觉得还可以提得更妥切、更完全些。会上提到了以下几点意见：一、认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比例关系，是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对比关系。二、从去年大跃进中的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全部情况来看，可以肯定，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比例关系是适当的。第一部类内部、第二部类内部的比例关系，基本上也是适当的。三、比例关系基本上合适，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有某些个别或局部的暂时性失调。四、去年大跃进是按比例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的现象，经过调整，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五、解决个别的、局部的失调问题，调整某些比例关系，应采取积极的态度，从发展生产方面着眼。陈伯达在信后附送了国家统计局根据这次座谈会的内容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

[4] 指陈伯达1959年9月8日下午给毛泽东的信，国家统计局整理的《我国1958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资料》和毛泽东为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写的“本刊讯”。后来均载于1959年9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六八期。

关于请郭沫若[1]修改《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胡乔木[2]的两封信

（1959年9月7日、13日）

一

乔木同志：

诗两首[3]，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是为了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

九月七日

---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2]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3] 指毛泽东1959年6月写的《七律·到韶山》和7月1日写的《七律·登庐山》两首诗。

二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陈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1]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

[1] 指《七律·到韶山》一诗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电报

（1959年9月8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来，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忘我的劳动，把自己的祖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国家。最近以来，保加利亚人民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的高潮，正在信心百倍地为争取在三四年内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英勇奋斗。保加利亚人民一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所获得的这些巨大胜利和成就感到无比的兴奋。

在国际事务中，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同情和支持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并且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中保两国人民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兄弟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近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亲密合作有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合作将大大有助于促进我们两国的共同繁荣和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

（1959年9月9日）

一

此件[1]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计

---

[1] 指彭德怀1959年9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表示拥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批判，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允许他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上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极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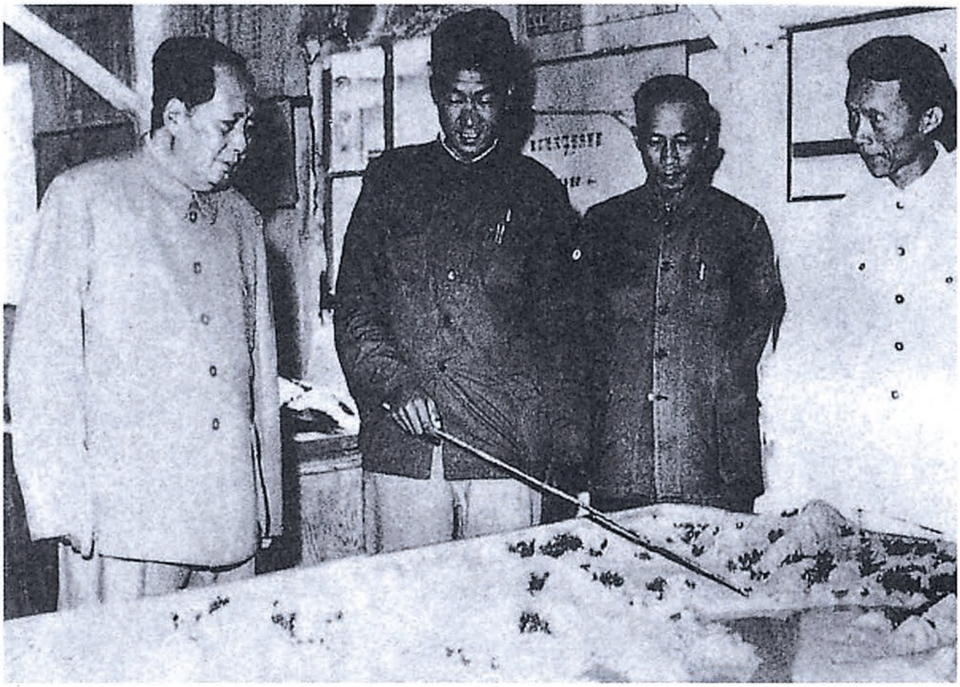
二

即送刘、周、朱、林、彭真[1]同志阅，请尚昆[2]办。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59年9月10日，毛泽东视察密云水库，听取张光斗等人汇报。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1959年9月11日）

会开得好。

起心不良，走到反面。

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要论这一点材料是充分的。

彭德怀不如孙中山。

高彭都是“军党论”，彭的“小资产阶级『阶级』狂热性”“得不偿失论”“人民公社搞糟了”“阶级关〔系〕紧张”“反‘左’比反右难”“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最多”等等，难道有一点点马克思主义气味吗？

同路人不可能不犯错误。借彭黄教育广大群众。大多数善良人能进入共产主义。

五次路线错误，极其严重。

阴谋分裂活动，违反铁的纪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团结旗帜的必要。为全民族在几个五年内建成强大国家，必需铁的纪律，必须团结起来。

形势极为有利。一个月『月』内，形势大变。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确是真理。

军队的任务。

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搞好，一定可以搞好的。

切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自古以来，理〈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没有好结果。

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觉悟。我们大家都要帮助他（其他人也一样）。我相信，他会改好的，只要他肯改，我们肯帮。

他把95%的同志的政治觉悟，低估了，把他自己的能力、威望，高估了。

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民主革命的同路人。他肯改，我们肯帮，一定会学好马克思主义的。孔子曰："假我数年，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学哲学（宇宙观，方法论）极为重要。

要准备听几年闲话；要诚恳待人，不讲假话；要靠拢大多数。如此就一定可以变过来。否则不能。

"人非圣人，孰能无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改也，人皆仰之。"

我也是一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欢喜我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门学问，没有学好。外国文，没有学通。经济工作，刚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改，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的心情就会舒畅一些了。

我学会了游水。一有意志，万事皆成。我劝同志们也和我一道学习。事务太多，时间不足，然亦可以挤一点。养成学的习惯，就能学下去。

我们战胜地球，建立强国，一定要如此，一定要如此。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目的一定可以『以』达到。

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1959 年 9 月 11 日）

同志们：

这个会开得很好。我说居心不良的人，他要走到他的反面。对于世界的阶级，对于世界的党，对于党的事业、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居心不良的人，他就要走到他的反面，就是他的目的达不到。比如讲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结果那个目的达不到，自己输了理，在群众中孤立起来。比如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很充分的，比如现在印发的很多材料、抗日时期的材料、长征末期的材料，比如挑拨离间。

抗日时期的材料，比如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抗日阵线不能分左中右，分左中右就错误的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阶级关系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提出这样的原则出来，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样的一些观点我看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欺骗人民的，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后来高饶彭黄反党联盟那些观点，比如“军党论”之类，挑拨党内的不正常

关系，认为这也有个摊摊那也有个摊摊。这样一些观点和行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行为。这一次大量揭发的在庐山会议多少年前的分裂活动，庐山的纲领，此外还有立三路线时期，都有许多材料的。主要是见诸文字的，大家揭发出来，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所以要论证我刚才讲的观点，他们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只是我们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要论证这一点，要把这一点加以论证，材料是充分的。现在我并不论证这些东西，因为要论证就要写文章，是要许多同志做工作的，我只是提一下。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同路人在各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庐山会议和这次会议，全国各级党组织都在那里讨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借这个事情来教育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得到提高，更加觉悟起来。完全证明大多数人，全党干部绝大多数，比如95%是不赞成他们的，证明我们党是成熟的，表现出这些同志对于他们这个态度的对待。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最近几个星期，省一级的会议暴露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那里捣乱，惟恐天下不乱。凡是出了乱子，他们就高兴，他们的原则是这样：“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工作顺利，他们就不舒服。一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高兴。”比如讲，猪肉不够，蔬菜不够，肥皂不够，女人头发卡子

不够，乘机就来了。“你们的事情办得不好呀！”叫做“你们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说组织开会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吭声，比如北戴河会议不吭声，郑州会议也不吭声，武昌会议也不吭声，上海会议吭了几句，我们听不到。等到后来事情发生了（他们认为事情发生了），你看又是蔬菜吧，又是猪肉吧，又是部分地区的粮食吧，又是肥皂吧，还有雨伞吧，比如浙江雨伞不够，叫做“比例失调”“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等。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当军阀的人他是当军阀了，还有不当军阀的人，比如□□□同志算个什么军阀呀，是个文阀嘛，学阀哟！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共产主义这个门。五次路线错误，立三路线错误，第一次王明路线，第二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这一次彭、黄、张、周路线，有些人是五次，有些人不是五次，比如□□□同志立三路线时候还没有来，就是彭、黄在立三路线的时候也是受打击的。这不是偶然的，五次路线的严重性。最后两次就是高、饶，彭、黄这两次，用阴谋的方法来分裂党，这是违反党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有纪律，他们不知道，列宁论无产阶级的党必须要有纪律，要有铁的纪律。对于这些同志是什么纪律呢？还是铁的纪律，还是钢的纪律，还是金、木、水、火、土，木头的纪律，还是豆腐的纪律？水的纪律就是没有纪律，还有什么铁的纪律呢？进行分裂活动，违反纪律，其目的、其结果，一定会是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另外一个专政。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团结起来，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们不，他们的人似乎越少越好，他们要搞一个他们的集团，要办他们的事，违反广大群众的意志。我在庐山会议讲了

他们不讲团结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他们就不能进行活动了。这个口号对于他们不利，所以他们不敢提，所谓团结者，就包括了犯错误的人，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团结起来，何况没有犯错误的人。他们要去毁坏他们，他们是毁坏政策，不是团结政策，他们的旗帜是毁灭。毁灭跟他们的意见不对的，他们认为是坏人，而这个所谓坏人，实际上是绝大多数，95%还要多。

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为了全民族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这一个目的。现在的任务是全国人民、全党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强大的国家，必须要有铁的纪律，没有铁的纪律是不行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请问，不然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可能不可能？在过去要革命，在现在要建设，可不可能呢？没有铁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团结就要有纪律。彭德怀在太行山的许多文件，请同志们拿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和彭德怀在太行山抗日时期发表的那些观点比较一下，一个是国民党人，一个是共产党人，时间一个是1924年，一个是1938年，1939年，1940年，共产党员比一个国民党员要退步，这个国民党人的名字叫孙中山，要进步。孙中山受共产党的影响，为什么发表那一篇呢？我最近找着看了一下孙中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宣言，那里面有阶级分析这样的思想。怎么会赞成共产党的铁的纪律呢？怎么会赞成无产阶级的纪律呢？没有共产党的语言，没有共同的立场观点，纪律是建立不起来的。我说彭德怀不如孙中山，至于张闻天也不如孙中山，孙中山那个时候是革命的，而这些同志是倒退的，是要把结成了的团体破坏，提出的口号是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阶级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些观点还有一些，比如……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了会的，批判了这

个东西。因为都是共产党的组织，马克思主义者。这一个集团来破坏那一个集团这是不许可的，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现在劝一劝犯错误的几位同志，你们要准备听闲话，我曾经劝过别人，比如罗炳辉同志，他那个时候犯过错误，他发非常大的脾气，我们后来劝他，你不要发脾气，你是犯了错误，你让人家讲，让人家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他不想讲的原因就是你改正了。你对人好，对自己的错误有自我批评精神，人家为什么要讲呢？他就不讲了。现在犯错误的同志，我劝你们要准备听闲话。一提起你们犯错误，不要触目惊心，准备人家讲你几年。我说长也不会，看你们改的情况，如果改得快，几个月就不讲了，改得慢，几年人家就不讲了，只要改，快慢都可以。要诚恳对人，不要讲假话，要老老实实，讲老实话。我劝犯错误的同志，你们要靠拢大多数，要跟大多数合作，不要只跟你们气味相投的少数合作。如果你们能实行这几条，第一你们能够听闲话，准备听，硬着头皮，你讲我就听，说你讲的对呀，我就是犯了那个错误呀！阿Q这个人有缺点的，缺点就表现在他那个头不那么漂亮，是个癞痢头，因为他就是讲不得，人家偏要讲，一讲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比如“那个癞痢头就放光”也讲不得，说“光了”，他就发火，“亮了”他就发火。作者描写一个不觉悟的纯朴的农民，阿Q是个好人，他并不组织宗派，但是那个人不觉悟，他是讲不得缺点，他没有主动。

你没有主动，大家就偏要讲。一讲就发火，发火就打架，打架打不赢，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人家说：“阿Q，你要我不打你，你就讲‘老子打儿子’，我就不打你了。”“好，老子打儿子。”等到

打他的人走了，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他又神气起来了。犯错误的同志要准备听闲话，多准备听一点。要对人老实诚恳，诚诚恳恳，对人不讲假话。再一个要靠拢大多数。只要有了这几条，我看是一定会改过来的。否则就改不过来。如果是闲话也听不得，对人也不诚恳，讲假话，又不靠拢大多数，那就难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这个话也不妥当，圣人也是有过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我们不是孔夫子，我看孔夫子也有过，就是凡人多多少少、大大小小都是犯一点错误的！犯错误不要紧的，不要把犯错误当成一个大包袱，了不起。只要改。“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也”，好像天狗吃掉太阳月亮一样。犯错误人家都看见，如果改了人皆仰之。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学习任务我非常赞成，这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学。时间不够怎么办？时间不够可以挤时间。问题是要养成学习的习惯，就能够学下去。我这个话首先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说的。第二是对我们所有的同志（包括我在内）。许多东西我没有学，我这个人缺点很多，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好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部分的学问我没学好。比如说外国文，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同志们，我决心学习，至死方休，死了拉倒。总而言之，活一天就学习一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环境，我想我也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我很难受，他出一些问题一问，我答不出来怎么办？他对中国革命各种事情一定感兴趣。还有自然科学也很不行的，技术科学也不行。现在学的东西很多怎么办呢？还是一样一样，多多少少学一点，钻一点，我说下了决心，一定可以学，不管年纪大小。我举个例子。游泳我是一九五四年才学

好的，以前就没有学好。一九五四年清华大学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每天晚上去，戴个口罩化装，三个月不间断，我就把水的脾气研究了：水它是不会淹死人的呀！水怕人，不是人怕水。当然有些例外也存在，但是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因此武汉长江是可以游泳的，我就驳了那些同志，反对我游长江的。我说你们形式逻辑都没有学，凡水都是可游的，除若干情况之外，比如说一寸之水就不能游，结了冰就不能游，有鲨鱼的地方就不能游，有漩涡的地方（如四川、湖北的长江三峡）也不能游，除若干情况之外，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由实践得来的这个大前提。比如武汉长江有水，结论是武汉长江是可游的。比如汨罗江、珠江有水，是可游的，北戴河是可游的，它不是水吗？凡水该是可游的，这是大前提。除了一寸之水不可游，一百多温度不可游，零下之水结了冰不可游，有鲨鱼不可游，有漩涡不可游。除此之外，凡水都是可游的。这是个真理。这是个真理，你不信吗？下了决心，只要你有意志，下了决心，我看万事都可以做成功的。我劝同志们学习。最近我们看天安门大礼堂，咦！那可有点文章咧！你们去看一回好不好（会场高声答应：好!）叫□□同志讲一讲，他这个人姓□，他一天跑一万里。只有十个月，许多人说不信，请个苏联专家说不信，到了今年六月，苏联专家说有可能，到了九月，他们大为佩服了，说中国确有大跃进。一万二千人，全国各地方调来的，全国各省的力量，技术力量，人的力量。完全不过礼拜天的，每天三班制，也不搞计件工资，许多人本来工作八小时，结果他做十二小时，不下工。多的四小时需不需要钱呢？他不要。还有一些人，工程没完成，他不下来，有的两天两晚不睡觉，坚持在那里，不是八小时，也不是十二小时，而是四十八小时就在工地上不下来。是不是要物质刺激呢？增加几块钱嘛，一小时一块钱嘛，他

不要，这些人不要。物质刺激还是物质刺激，无非是平均工资五十块，就是那么一点，但是他们为着一个共同事业而奋斗。一万二千职工，十个月搞成功这么一大片，这里面不仅是按劳取酬，而且有列宁所谓“伟大的创举——共产主义礼拜六”，有不计报酬的在内，同志们，你们都看一下，并且请□□同志给你们讲一下，不要多了，有半个小时就行，还有密云水库，我昨天到密云水库游了一回水，十九个县的人在那里搞的，十一个月完成全部工程百分之七十，二千五百万土方，二十万人，那也了不起呀，什么情况都要算钱呀！你们在那里开会每天算钱嘛，你们写了很多东西，讲话稿子，恐怕每篇都要三块大洋嘛，我现在并不否认，而且肯定按劳取酬，必要的按劳取酬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不可以完全禁止，稍超过一点就不行，如果超过一点就给钱，人民他不要，你算钱他不要，如果要算钱，我今天大概讲一个钟头吧！你们给钱咧！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两个东西，政治的作用必须与按劳取酬结合，我看这是个好东西。我们凡是下了决心，有坚决的意志，人们认为不能成功的，结果他成功了，就是我们这个大礼堂，很多人认为不能成功嘛，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多人都写，它要成功的，并且已经成功，或者在继续取得成绩。比如钢铁是要快，工业是要快，农业也是要快，学习也是这样，只要我们下决心，我看可以学好，不怕事务太多，时间不多可以挤，养成这个习惯。我们要战胜这个地球，我们的对象就是地球。至于太阳上怎么做工作，我们暂时不论，月亮、水星、金星，除了地球之外的八大行星，将来探一探可以，拜访拜访可以，假如能上去。至于工作，我们打仗，我看还是地球。建立一个强国，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要求我们建立大礼堂，很多水坝，很多工厂，我看一定要是这样。

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工业交通进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9月12日）

一

此件[1]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九月十二日

---

[1] 中共甘肃省委1959年9月6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我省工业交通战线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仍是继续跃进的形势，工业发展速度仍然是很高的。但自6月份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均呈节节下降的趋势，形成今年继续跃进中的马鞍形，主要原因是在部分干部中开始滋长着一种新的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了这种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又重新作了审查和调整，对主要行业和产品，都提出了新的增产节约指标。领导干部开始亲自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工人群众情绪更加高涨。目前我们提出的行动口号是：以反右倾、鼓干劲为纲，大战九月份，迎接国庆节，抓紧四季度，为在今年内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奋斗。

二

少奇、彭真[1]同志阅后，请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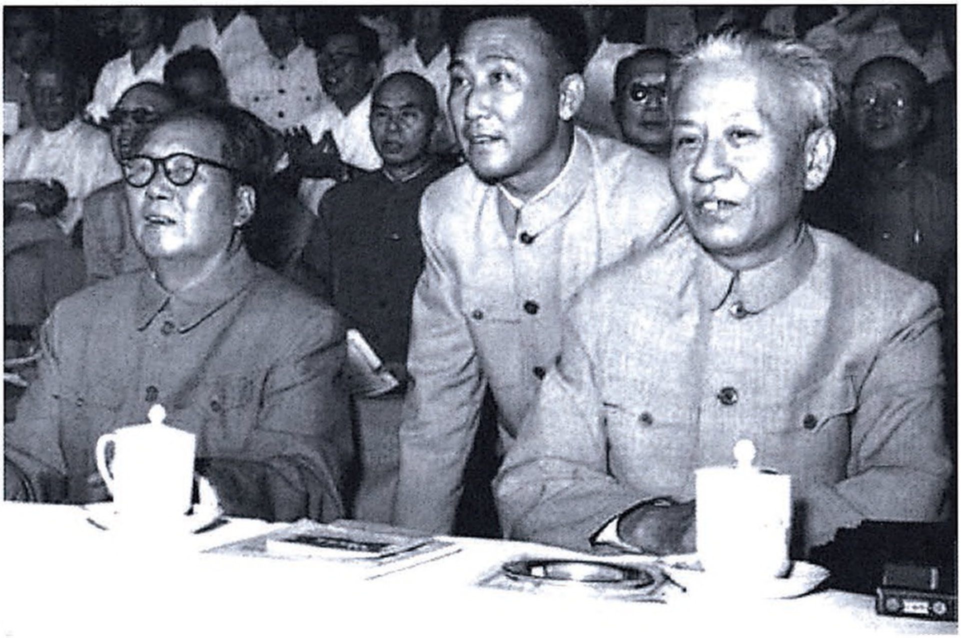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办。图为毛泽东在开幕式上。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开幕式上欢迎运动员入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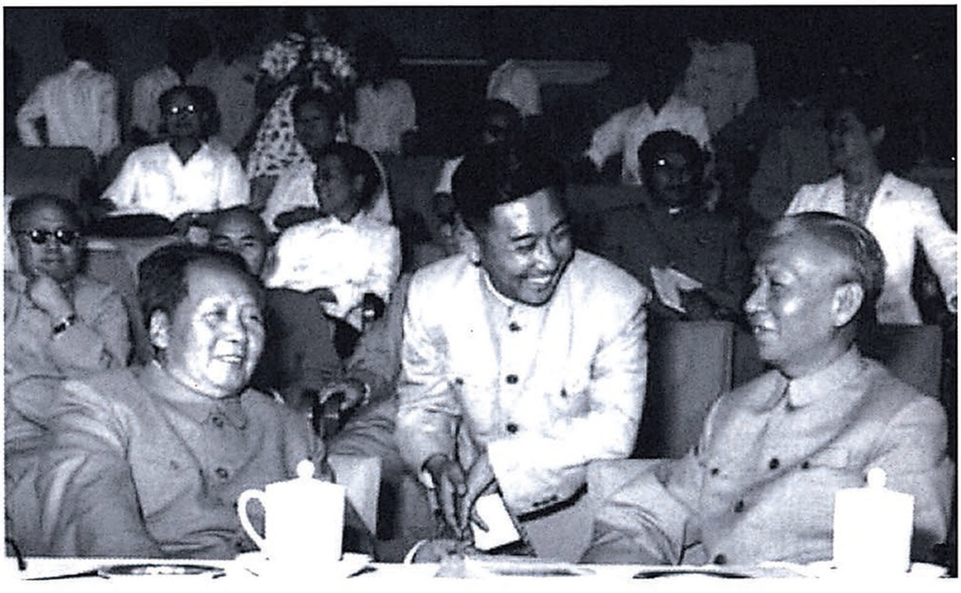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向运动员挥手致意。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主席台上。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上。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主席台上观看表演。中为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



1959年9月13日，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

1959年9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观看体育表演和比赛。

1959年9月，运动员向毛泽东等献花。

对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的批语

（1959年9月14日）

一

此件[1]看过，很好。

退刘少奇同志。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上午

---

[1] 指刘少奇1959年9月12日晨送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修正稿。该文是刘少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195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十九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二

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刘少奇为送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在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这条批语。

在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9月14日）

彭真[1]同志：

请用中央名义写一复电给甘肃省委，指出省委这个报告[2]是正确的。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中共甘肃省委1959年9月11日关于粮食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收割完毕；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夏粮征购工作进展迅速，争取于9月底全部完成征购任务。城乡供应也已本着“瞻前顾后，以丰补歉，细水长流，计划用粮”的精神作了安排。在正在举行的省委扩大会上，我们对粮食的生产、征购、供销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在收、管、用等方面加强工作，防止浪费，真正做到“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约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这样在粮食问题上，我们就能取得主动。1959年9月17日，中央复电甘肃省委并转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指出甘肃省委这一报告中的意见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1]

（1959年9月14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生产建设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日益改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空前巩固和强大。全国人民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党和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罪犯实行的惩办和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已经获得伟大的成绩。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上提出的建议。

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考虑上述建议，并且作出相应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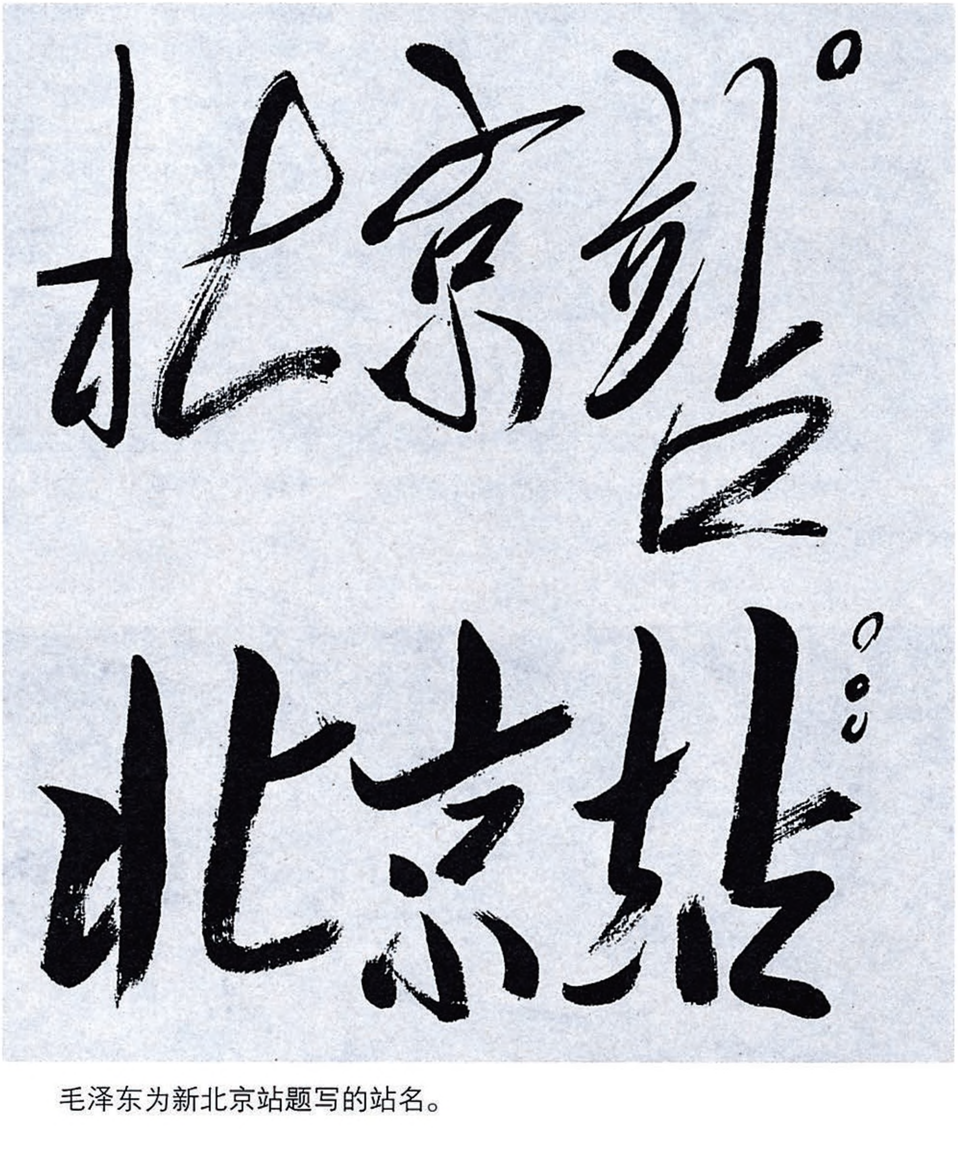
为北京火车站题名[1]

（1959年）

北京站

---

[1] 北京站现址1959年1月20日开工兴建，当年9月10日竣工，9月15日开通运营。北京站新站建成之始，毛泽东视察新建北京站后亲笔题写“北京站”站名。



毛泽东为新北京站题写的站名。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彭真（右二）、吕正操（左）等陪同下，视察新建的北京火车站。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等视察北京火车站。

关于肃反工作的一个批语

（1959年9月18日）

看法妥当，让他们活动，注意观察，大有可为。他们是在如来佛手掌中，跳不出去的，你们应当当作一件大事去办，积极而又艺术地去做观察和侦察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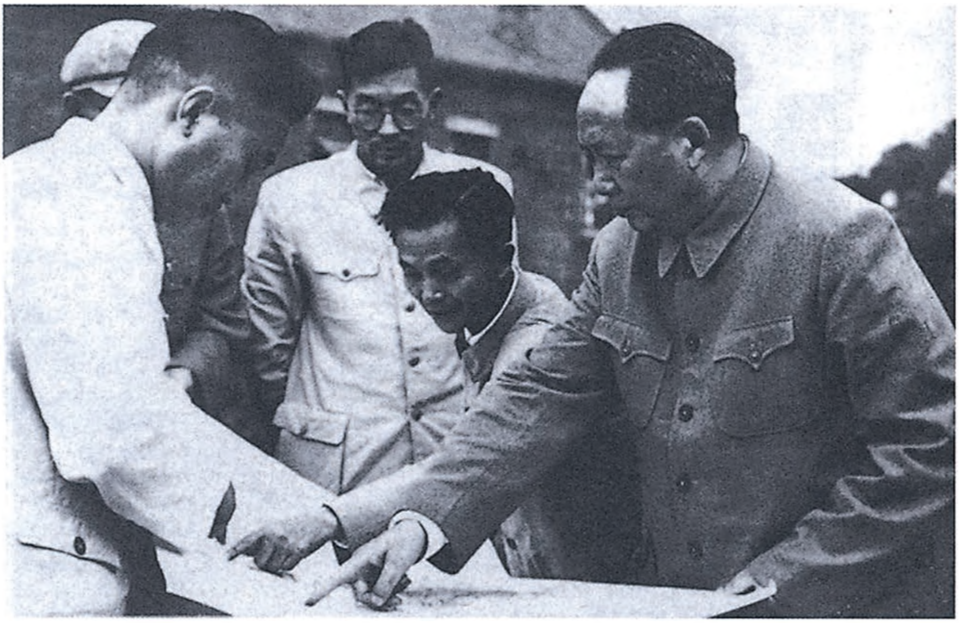
1959年9月20日至21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图为毛泽东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

1959年9月20日，毛泽东视察山东济南洛口黄河大堤。

1959年9月20日，毛泽东在济南洛口黄河大堤上留影。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冒雨在济南东郊看玉米。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所棉花试验田。



195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济南看济南城市规划图（右二舒同）。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视察邯郸市国棉二厂时，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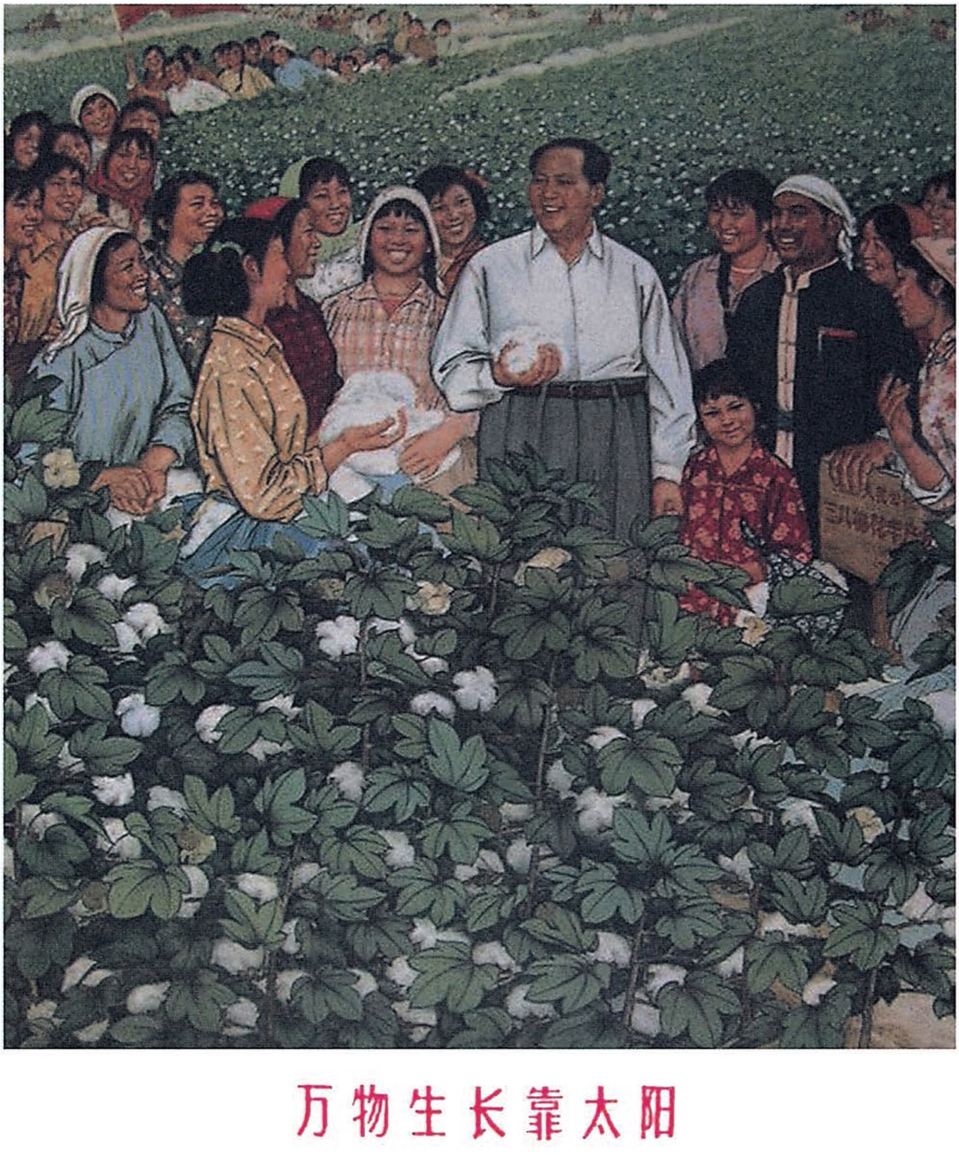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视察成安棉花丰产田，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看望正在摘棉花的女社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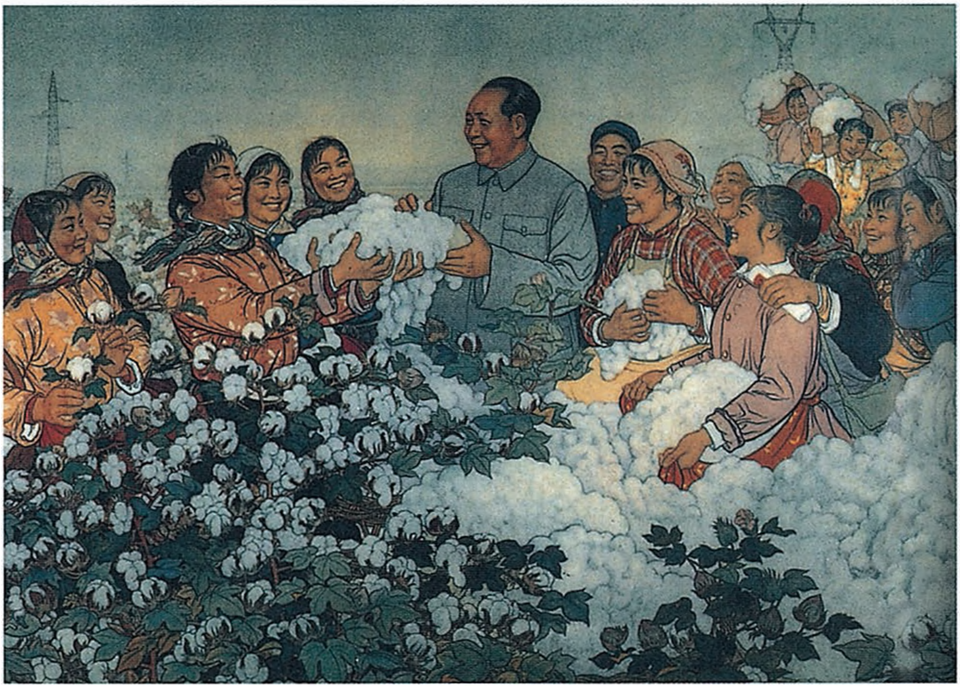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委书记林铁陪同下视察棉花田。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和棉农亲切交谈。

1959年9月24日，毛泽东视察成安棉田时和农民们亲切交谈。



万物生长靠太阳（宣传画）



《银花朵朵向太阳》（油画）

在驻阿联使馆关于非洲人士对中印关系问题看法的电报上的批语

（1959年9月30日）

似乎可以把这个情报[1]，读给高士[2]同志『们』听。请总理斟酌是否可行。

毛泽东

九月卅日

送总理阅后，退毛。

---

[1] 指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馆1959年9月22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据非洲某些人士称，他们看到我馆公报刊登的关于中印关系问题的一系列文件后，深信我方立场的正确，相信中印之间的一切纠纷都是由印度政府企图执行英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侵略政策而引起的。他们完全支持中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麦克马洪线，指出在非洲大陆，目前就存在着许多“麦克马洪线”，将来非废除不可。

[2] 高士，当时任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

在吴冷西[1]关于充分报道国外对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反应的报告[2]上的批语

（1959年9月）

刘、周、朱、林、陈毅、彭真[3]阅，退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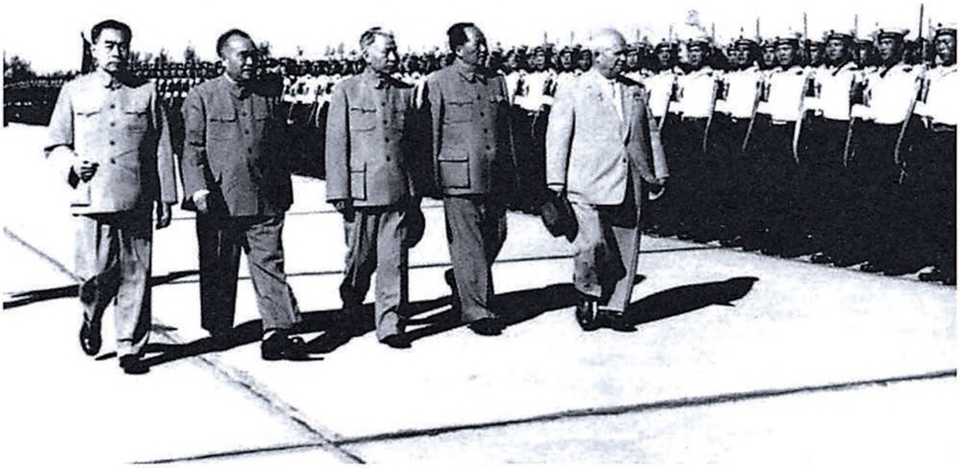
大多数兄弟国家是拥护我们的，朝鲜、越南、东德、捷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情况不清楚，似乎也比较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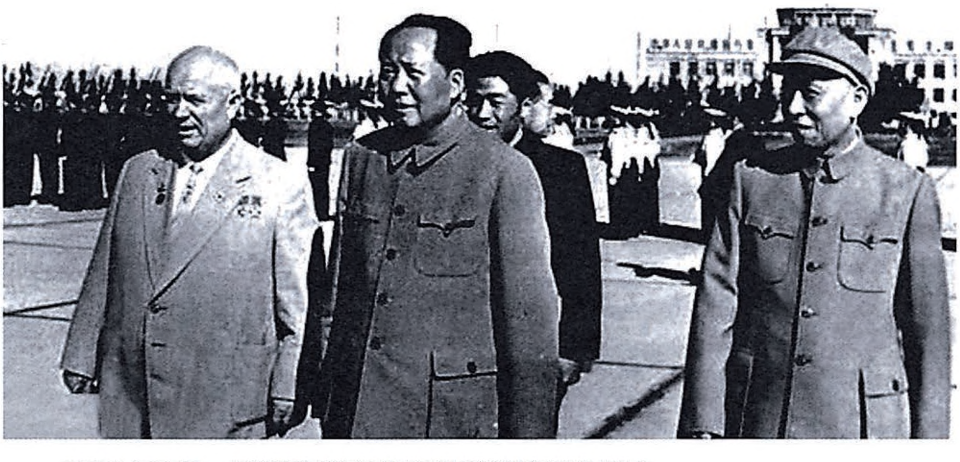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吴冷西1959年9月4日下午4时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下午我同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几位同志讨论了主席关于充分报道兄弟国家和西方对我八中全会反应的批示，决定采取以下措施：（一）以国家为单位，综合报道各兄弟国家报刊对我八中全会的反应。（二）对于亚洲和西方国家报刊对我有利的评论，也应大量收集、报道。（三）对于西方国家的污蔑性评论，将选择恶毒的有代表性的加以报道，并予以评论。毛泽东将吴冷西的报告批转给刘少奇等同志阅看时，拟题为《关于外国消息问题》。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9年9月，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1959年9月，毛泽东等在北京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在肖华关于沈阳军区翻印毛泽东有关内部讲话的调查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9月）

刘、周、彭真[2]同志阅，退毛。

出了这样一个乱子。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59年9月24日给总政并报中央军委的这一报告说，据调查，沈阳军区政治部去年12月22日将高等军事学院编印的《1956年4月以来毛主席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示》（其中包括主席在一些重要会议上的讲话29篇）翻印6100本，这些文件多半是根据参加会议的个人或几个人的记录稿凑起来的，未经中央和其他负责同志看过。其中有些文件涉及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如有失落，将造成严重损失。我已告沈阳军区立即全部收回这一文件，并告他们今后凡未经主席和中央审核的记录稿，只能按上级规定口头传达到一定范围内的干部，不能印成书面文件。建议总政对其他单位亦应进行检查，以引起注意。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乱印乱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讲话记录的指示，并将肖华的报告同时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反对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1]

（1959 年 10 月 1 日）

我们绝不要别国的一寸土地。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现在就去解放，晚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去解放也不要紧。就是只离我们大陆几公里的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准备马上去解放。美国的政策是要迫使蒋介石让出金、马，使台湾和金、马分开，这样台湾就离大陆更远了，便于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不赞成它这个政策，因此我们不忙于去解放金、马，而让蒋介石在那里。蒋介石也不赞成“两个中国”，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我们当时炮轰金、马也是蒋介石所需要的。不打一下，美国就要更多地欺侮蒋介石，不给钱，不给武器。一打，蒋介石就好说话了，说我们怎能在共产党的炮火下屈服。

美国并不喜欢蒋介石，它喜欢的是“副总统”陈诚和一些百分之百地赞成美国的人。蒋介石是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美国，还有百分之一不赞成。在美国很大的压力下，蒋介石本来打算不做“总统”了，后来还是我们告诉他做下去好，现在他又起劲了。可以说现在全世界只有我们是唯一支持蒋介石做“总统”的了。这个问题很微妙。如果以后我们又炮轰金、马，这是说蒋介石又需要了。你们不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诺沃提尼时谈话的一部分。

要怕，不会出乱子的。

在蒋介石同美国签订的条约中，并没有把金、马包括在内，因此美国对金、马并不承担有义务。美兵舰一直也是严格遵守了它自己的三海里的规定，从未越入三海里之内。我们对它警告六七十次，是警告它破坏了我们的十二海里的规定。美国很害怕蒋介石引起战争，杜勒斯曾要蒋介石一起发表声明，不向大陆进攻，蒋介石也同意了。

去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革命胜利，七月十五日美国出兵黎巴嫩，八月二十一日联合国通过了美国人撤兵的决议，八月二十三日我们炮轰金门。这一下使美国很紧张，转不过脑子来，把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在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的舰只和飞机，都往台湾海峡调遣。当时赫鲁晓夫同志还发了一个照会给美国，谴责美国自由地调动舰队，被美国退回了。现在美国却不得不请赫鲁晓夫同志去访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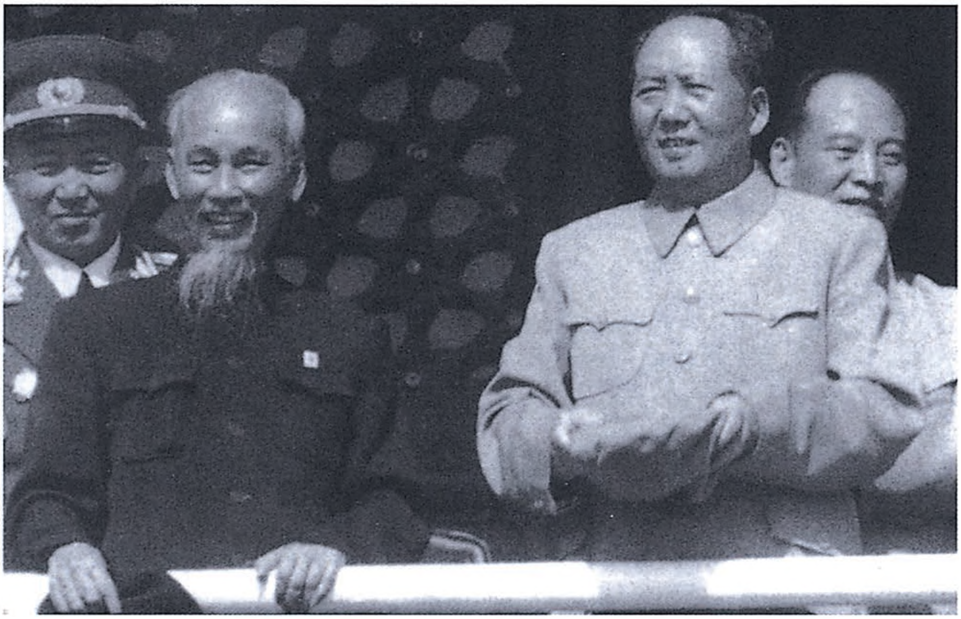
总之，美国霸的地方太宽，因而总担心，害怕丢掉了一点儿，什么瓶瓶罐罐都怕丢掉了，处于被动地位。东起台湾，西至西德、土耳其都在美国控制下，有美国的基地，所以它到处被动。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首都军民一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胡志明、赫鲁晓夫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胡志明等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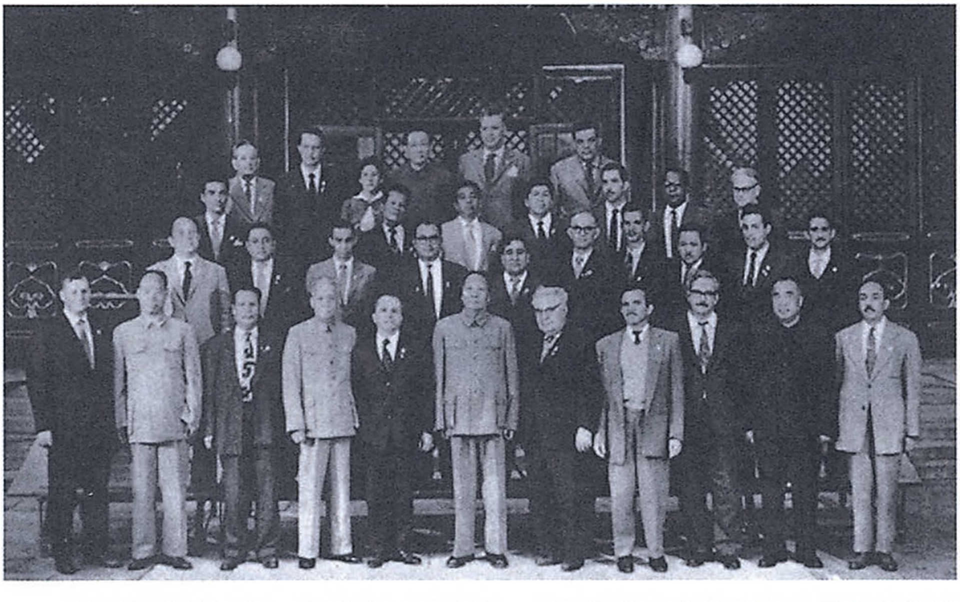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胡志明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天安门城楼上。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胡志明等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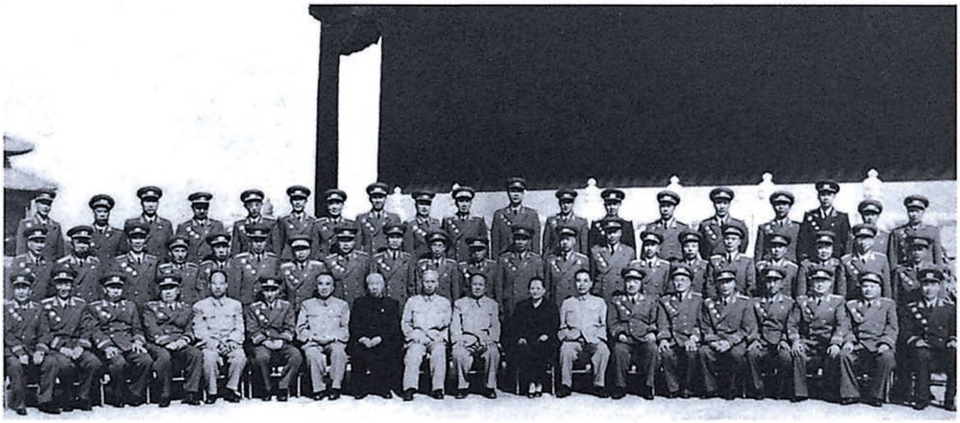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世界和平理事会代表团。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活动的拉美及加勒比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赫鲁晓夫等。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日本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代表团。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合影。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陈明仁握手。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贺龙接见受阅部队代表。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握手。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观看解放军将军合唱团演出时和女将军李贞亲切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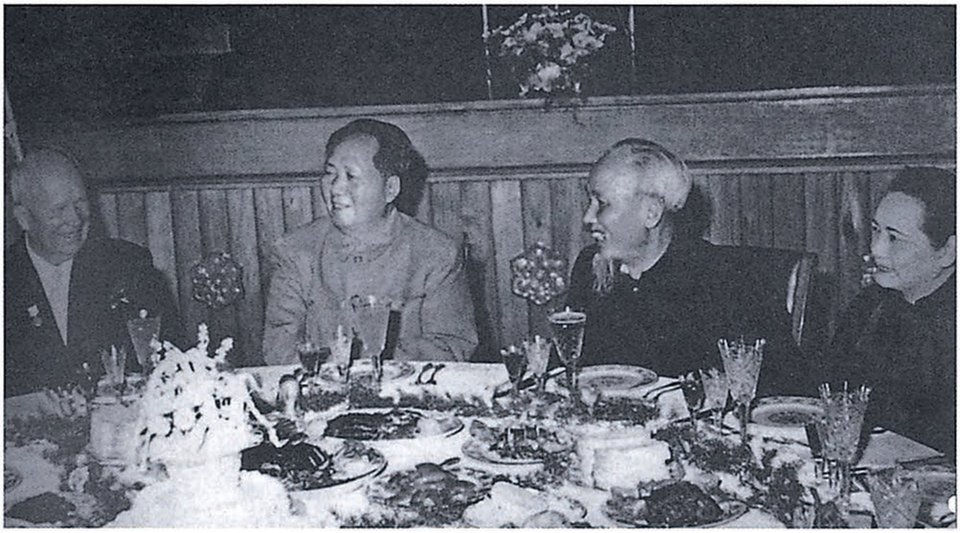
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前来北京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活动的少数民族观礼团的各族代表在一起。

1959年10月，毛泽东亲切会见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活动的胡志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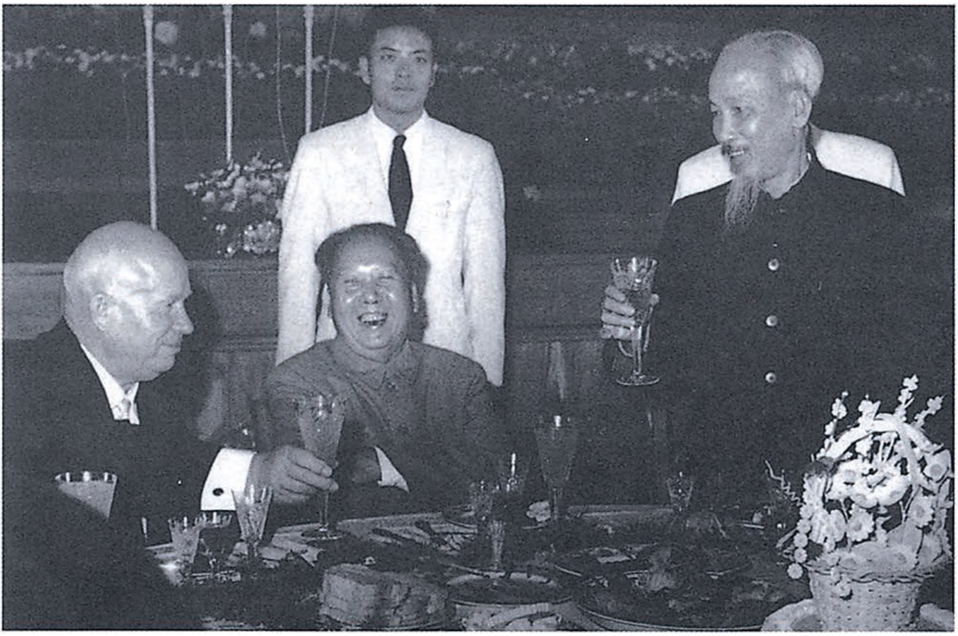
1959年10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胡志明在北京。

1959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赫鲁晓夫。

1959年9月，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胡志明在欢迎宴会上。



1959年10月，毛泽东、宋庆龄和赫鲁晓夫、胡志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宴会上。



1959年10月，毛泽东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在宴会上。

中国大陆同台湾的关系不同于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两个越南[1]

（1959年10月2日）

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先在日内瓦，后到华沙；先是一个星期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现在是两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美国曾经中断过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去了一封信，说不谈不好，并且提出了谈判时间。他们说，限定时间，他们不能遵守，但是谈判可以恢复。我们说谈判可以拖一年，后来金门一打炮，谈判就恢复了。谈判地点，根据美国的意见迁到了华沙。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时谈话的一部分。

打仗。

中国问题和德国问题不同，不仅因为人口多少不同，而且因为中国在战时是个同盟国，战后是个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德国是用国际条约，即用波茨坦条约[1]分开的。朝鲜三八线是在波茨坦会议上划定的，后来经过朝鲜战争，由金日成同志和我们志愿军同美国人谈判又重新划定了这条线。南越和北越是由日内瓦会议[2]决定的。而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分裂，并无任何国际协定来规定，因此英国对于美国侵台并不满意，甚至就连美国国内也有人不满。

---

[1] 波茨坦会议是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和外长在德国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的会议，也称柏林会议。会议同意设立中、苏、美、英、法五国外长会议，进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和商讨成员国间的有关其他问题。会议讨论了在苏、美、英、法占领德国期间，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包括解除德国武装，铲除或控制可供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摧毁纳粹党的一切组织和制度，逮捕和审判纳粹战犯以及德国的赔偿，对意大利、保加利亚、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政策等问题。8月2日，与会国签订了《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通称《波茨坦协定》。

[2]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1]

（1959年10月5日）

台湾问题很复杂，又有国内问题，又有国际问题。就美国说，这是一个国际问题。国际问题只能通过和平道路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我们还在同美国谈判，可是美国没拿出名堂来。以前我们在日内瓦谈，现在在华沙谈，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求美军撤出台湾，他们不干，我们只能等，他们要多少时间撤出，我们就等多少时间。我们不会首先同美国打起来的，同志们放心好了。就蒋介石说，台湾是一个国内问题。是否一定要用武力解决呢？也不是，我们准备同蒋介石谈判，但他不干。我们没有办法，可能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国内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有人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了起来。台湾只有一千万人口，几年不收回台湾（包括金门在内）也不要紧。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一个大中国，一个小中国。他们说，德国有东德、西德两个，为什么不能有两个中国？我们说德国是战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我们的敌人，按照波茨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巴西、阿根廷、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十七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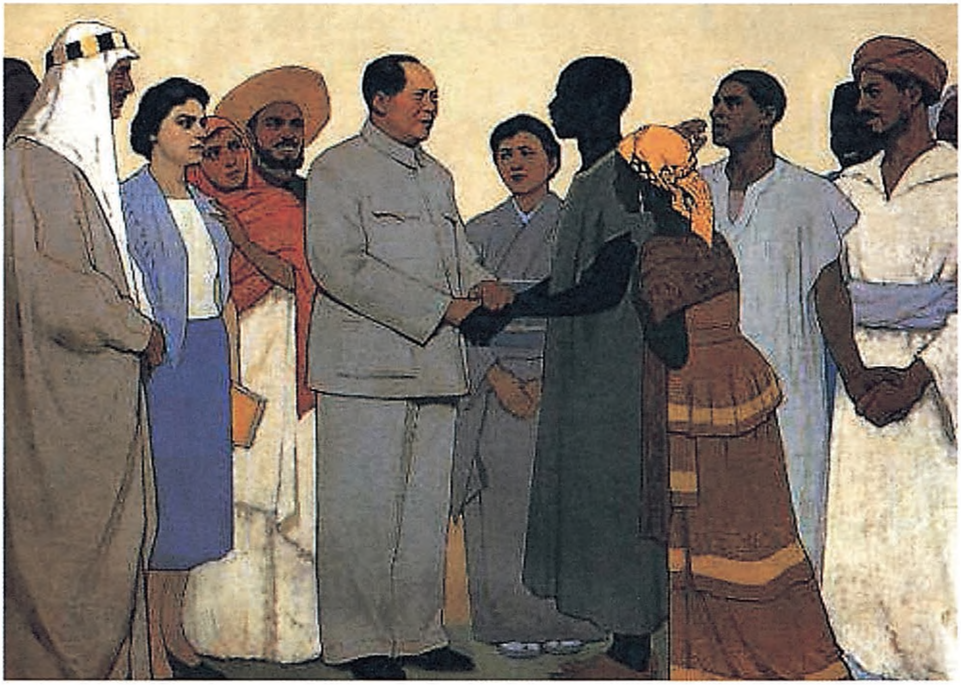
坦协定的规定分为两个[1]。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同盟国。按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参加的开罗会议[2]的规定，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国。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于1945年8月2日签订《柏林（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和《柏林（波茨坦）会议公报》，这两个文件通称为《波茨坦协定》。协定提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办法。其中，《克里米亚协定》规定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在德国各自占领区内实行最高权力，并共同处理有关全德事宜。1947年，美、英占领区合并成两国占领区。1948年，两国占领区同法国占领区合并成三国占领区。1949年9月，美、英、法为了分裂德国，在三国占领区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通称西德。同年10月，在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通称东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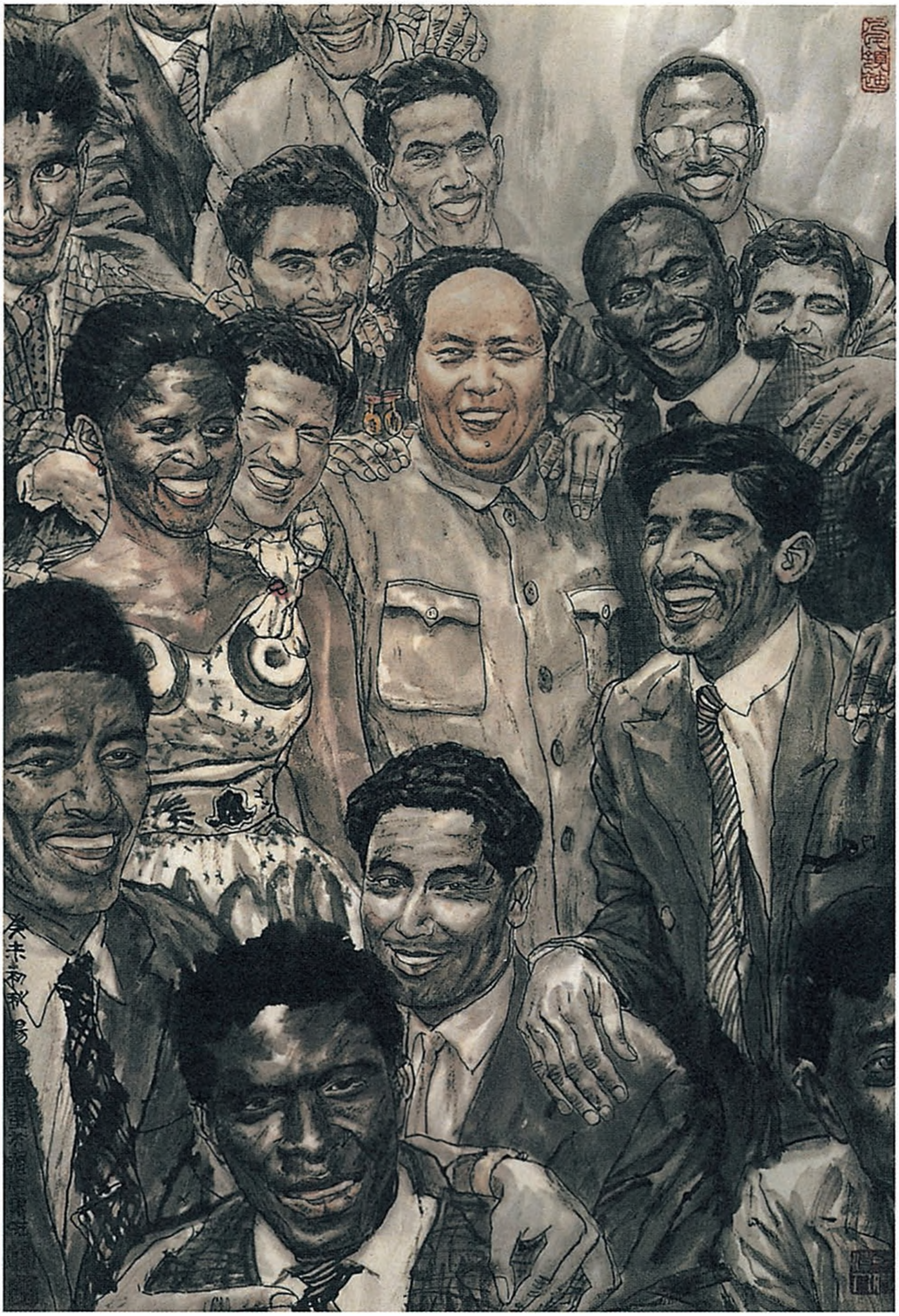
[2] 开罗会议，指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会议。会议商讨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及击败日本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同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中规定：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

1959年10月8日，毛泽东会见来我国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和参观访问的亚、非、拉各国来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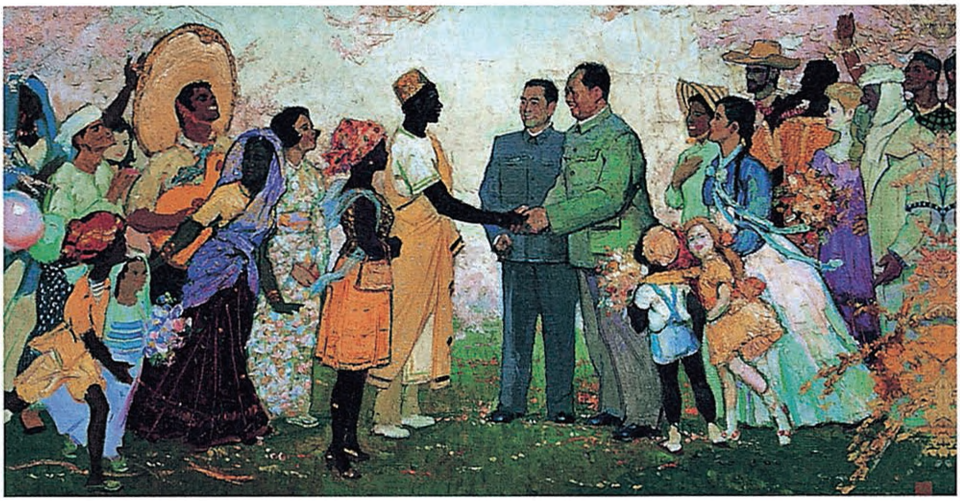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亚非拉人民在一起》（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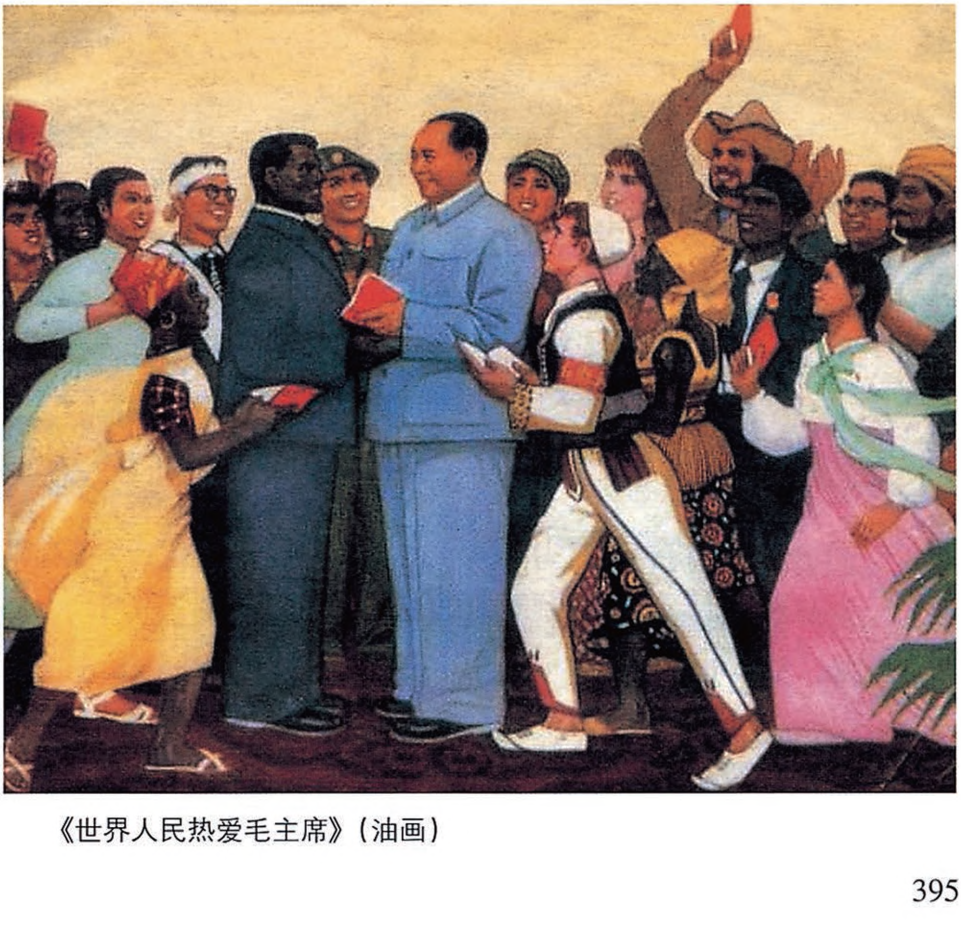
1959年，毛泽东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朋友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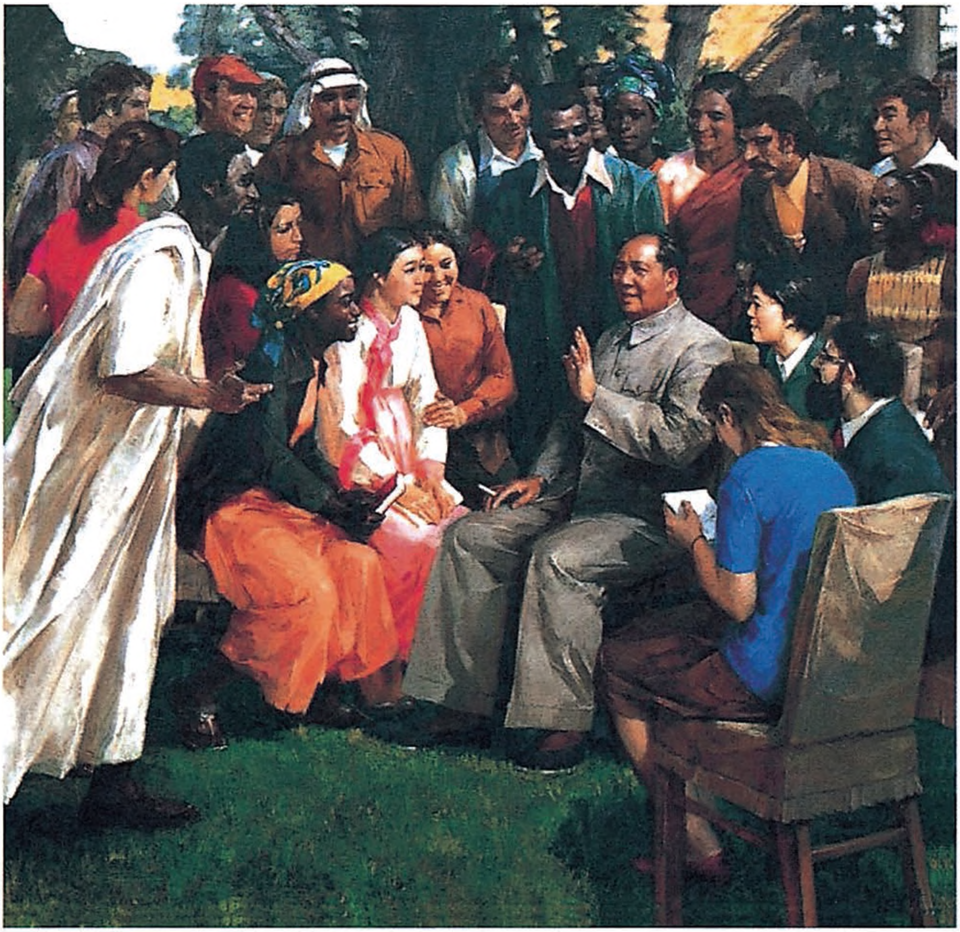
《有朋自远方来》（中国画）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油画）



《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油画）



《毛主席和外国朋友》（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59年10月5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是德国和平民主力量的伟大胜利，是当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十年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的十年。十年来，勤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不久以前提出的1959年至196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是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集体智慧的表现，它代表着全体德意志人民的崇高希望和美好的未来。毫无疑问，七年计划的实现必将进一步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定地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斗争，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且为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通过建立邦联达到重新统一德国进行了巨大的努力。这一切赢得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热烈赞扬和普遍欢迎。中国人民完全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德国人民统一自己祖国的神圣事业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同年同月诞生的兄弟国家。十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合作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全面发展和巩固。我们两国人民友好合作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起着巨大的作用。

祝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争取德国的和平统一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10月5日

关于中印关系和达赖喇嘛回国问题[1]

（1959年10月6日）

一

从上次同你[2]谈话到现在，隔了九个月。在这个时期，西藏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波浪。据我看，这是暂时的、局部的问题，因为在我们两国这样悠久的历史当中，友谊是主要的。最近这个时期的一点波浪是暂时的、局部的现象，应当这样看。它不会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也不应当使它妨碍我们的基本友谊。我们两国都是亚洲国家，虽然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无论如何，印度同西方国家是有区别的。现在，双方都同意对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这很好。争论总是要用谈判来解决。你对谈判的看法怎么样？有希望吗？

---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共产党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这时还给他保留了此前他所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个职位。

[2] 指高士（1909—1962），当时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

二

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1]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唯一的女活佛[2]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你[3]说，尼赫鲁听了你的话笑了，他认为我们不欢迎达赖。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2] 指桑顶·多吉帕姆，1942年生，西藏孟嘎（今尼木的一部分）人，桑顶寺活佛。

[3] 指古普塔（1914—1982），当时任印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会见中说："我曾经在国会里这样说过，对于达赖，不发生政治避难的问题，因为他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尼赫鲁听了我的话，笑了一笑，因为他认为中国选达赖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不是真要他，而是一个策略。"

在四川省委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10月6日）

少奇、彭真[1]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各地。另，黑龙江一件[3]，河南一件[4]，都有批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9年10月3日关于省委第一届第十一次会议（扩大）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第二阶段除了阅读文件、听报告、进行小组或联组讨论，并揭发批判右倾思想活动外，还进行了大会重点批判，揭发出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二）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具体讨论安排了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三）为了防止松劲情绪，省委于国庆节前发出指示，要求在第四季度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我省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3]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9月21日关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195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4] 指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9月29日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195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右倾分子，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关于审阅李六如[1]《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问题的批语[2]

（1959年10月6日）

定一[3]同志：

请你指定一位水平较高同志看一看这部书，如何？

毛泽东

十月六日

---

[1] 李六如，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李六如1959年10月4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兹将我所写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草稿送请审阅，如若无暇，拟请指定一位秘书同志看看后半部和140～147、273～278这十来页。并恳指示。"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从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写到大革命失败，信中请求审阅的，主要是该卷中有关毛泽东的部分内容。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薄一波反映家乡人民公社情况的来信[1]上的批语

（1959年10月8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

毛泽东
十月八日

尚昆[2]办。

---

[1] 薄一波，山西省定襄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59年10月7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河北省委关于解决水利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10日）

震林[1]同志：

此件[2]看了，请提到书记处会议上谈一下，予以批准。投资问题，请与有关部门及总理研究一下，然后确定。

毛泽东

十月十日

---

[1] 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10月6日关于解决河北省水利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为了具体贯彻执行我们今后3年的经济建设方针，从1960年至1962年，在水利上我们需要做好3件事：首先解决洪水灾害问题；其次解决沥水灾害问题；与此同时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为此共需国家投资12.7亿元，每年平均4亿元左右。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全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11日）

一

这是一个好文件[1]，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党组，以为参考。

中央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一日

---

[1] 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9月30日给中央并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9月16日结束，解决了以下问题：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今年上半年的形势，批判了右倾动摇情绪，提高了保卫党的总路线的自觉性。二、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检查和批判了在党内斗争中的错误态度，提高了保卫党的团结、维护党的核心领导和组织纪律的自觉性。三、根据总路线精神，检查和批判了安于中游的思想和对待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会议认为，贯彻八中全会决议主要应抓住以下三个环节：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落脚生根；今冬明春，在群众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持久、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1959年10月11日，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

二

刘、彭真[1]同志阅，尚昆[2]办。

毛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陈伯达[1]《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的批语[2]

（1959年10月11日、16日）

一

伯达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3]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好一点。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2] 本篇一、二是对陈伯达1959年10月9日送审的这篇文章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10月13日送审的这篇文章修改稿的批语。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二

原题没有抓住本质，改一下为好。[1]

三

伯达同志阅后，送周、朱、林[2]三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3]同志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

[1] 陈伯达这篇文章的原题为《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貌》，毛泽东在陈伯达10月9日的送审稿上将题目改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篇文章后来又改题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发表在《红旗》1959年第二十二期上。中共中央1959年12月13日还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2]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石油部党组关于石油工业当前生产情况和今后措施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13日）

送陈伯达[1]同志：

此件[2]值得一看。文中大部分，略加改造，似可在红旗上公开发表[3]。但余秋里同志已写长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我未看，不知其内容是否就是这个报告里所说的这些，如果是，则不宜再在红旗上发表。请找该文看一下，并与余秋里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2] 石油工业部1959年9月24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石油工业在1959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二）对保持石油工业继续大跃进，我们有两点经验：1. 对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和领导集团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2.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更深刻地认识到群众运动和集中领导相结合，就能最大限度地挖掘生产潜力。（三）为保证超额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做好油井的管理、勘探、设备检修和运输等方面的工作。

[3] 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后来将这篇报告略加改造，以《观大局·看主流·辨风向·调动积极因素——从一个环节看党的总路线在工业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1959年第二十一期上。

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问题的批语

（1959年10月13日、15日）

一

此件[1]及附件[2]，请陈伯达[3]同志看一下，提出意见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9年10月12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任务问题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前已报送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曾提出1960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任务，总的说来，应当是：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在1958年和1959年连续大跃进的基础上，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同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逐步消除重工业内部的薄弱环节，为今后年份更好更大地跃进创造条件。其中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提法，是否妥当？或者提以农业为基础，或者在党内提、党外不提，或者索性都不提，请你考虑见示。我觉得提以农业为基础是无问题的。

[2] 指国家计委党组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草案的报告。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二

此信[1]及附件[2]即送李富春、彭真、刘、周、朱、林、王稼祥、胡乔木[3]同志阅，阅后退毛。

在十月十六、十七两天看完，以十七或十八日在我处会谈一次。

---

[1] 指陈伯达1959年10月15日下午给毛泽东的信。毛泽东在信上加了一个题目：《关于经济口号的提法》。陈伯达在信中说，富春同志给您的信说到对农业的提法问题，这是一个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是可以公开的，似乎不宜在党内和党外采取不同的提法。我想可以继续保持您原来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科学的严格性，而且已深入人心。而在实际措施、计划部署、问题解释时，将您最近所说的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的意见，加以具体化，使同志们明确地认识这一问题。计委报告中关于“按照国民经济发展以农业为纲的方针，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似乎可以改为：“贯彻执行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1959年12月30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将这句话改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应当进一步地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按照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互相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薄弱部门，创造以后年份更好的全面跃进的条件。”1960年1月30日，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党组。

[2] 指陈伯达1959年10月15日下午来信中附送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摘编的《列宁论发展农业》《斯大林一九二六年论工业农业的关系》《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3份材料。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推迟召开
全国计划会议问题的批语[1]

（1959年10月15日）

即退李富春同志：

此件今天才收到，故计划会议时间宜改十月廿四日，以便计划大纲草案有时间送达地方并加以研究，再来开会。如同意，请即交尚昆[2]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二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59年10月9日晚给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一）国家计委关于拟订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大纲的报告，已根据政治局初步讨论的意见作了修改补充，如中央觉得原则上还可以，建议批转下去，作为编制明年计划草案的依据之一。（二）建议在本月18日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今年的经济形势和明年计划的方针、任务，拟出明年计划的草案。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转发湖南整社试点经验报告[1]的指示稿[2]的批语和修改

（1959年10月15日）

一

即送彭真[3]同志办。

毛

---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10月4日批转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整社试点座谈会的报告和湘潭地委关于韶山公社整社试点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

[2] 中共中央1959年10月15日的这一指示稿说，湖南试点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表明，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十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从这个材料中可以了解到，农村中一部分富裕中农和干部当中的少数代表富裕中农利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怎样猖狂地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和总路线，并且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的。不要以为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进攻只会发生在少数地区，而且人数不多，不足为患。他们虽只占富裕中农的一个部分，但危害却是很大的，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各省市区党委，都应该安排一个适当的时间，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一手抓政治，一手抓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进行整党、整团工作。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二

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在十个公社中选择十个大队结合生产进行**整社试点**即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经验[1]

---

[1] 这是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指示稿的题目，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处，毛泽东对指示稿还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1959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福建省委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简报的批语

（1959年10月16日）

这个文件[1]好。采取这种态度说话，甚为适宜。各地可以参照办理。讲过了一个〈次〉，可以再讲一次，如福建那样的办法。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想一想，酌量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

[1] 指中共福建省委1959年10月9日关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情况给中央的第四次简报。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于9月25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向他们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上午，宣读全会的两个决议及有关文件，并且听了毛主席9月15日在北京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录音。下午，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向他们作了讲话。到会人士听了传达后，大多数人表示拥护我党中央的决议，认为对自己教育很大，普遍反映提出反右倾、鼓干劲是十分必要的、适时的。但有一部分人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惊奇、猜测、疑惧和糊涂的认识。

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1]

（1959年10月18日）

整个国际形势是在好转。西方的高压政策、实力地位政策，或者说是冷战政策，已难以继续下去了。西方统治集团，比如美国集团、英国集团的大部分，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有恐惧。如果说冷战形势有所缓和，那是因为以往的冷战政策对他们不利了，所以才有些改变，才使形势缓和下来。但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有两手：使形势有所缓和，这是一手；另外一手，当缓和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挑起紧张局势。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们的“爱好和平”和我们的爱好和平是不完全一致的。比如美国垄断资本同日本垄断资本，日本垄断资本同日本人民，都是有区别的。垄断资本本身也有区别，有卖国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区别。即便一个集团内部，例如艾森豪威尔[2]集团内部，也不那么简单，也有两面性。我们有困难，他们也有，他们的困难比我们更多。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是可能的，而且和平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就是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你们应当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他们是一定有困难的，正因为有困难才要缓和，否则何必缓和呢？西方国家之间也不一致。西方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艾森豪威尔（1890—1969），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国家内爱好和平的人同他们的政府之间是有区别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区别。此外，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控制的。当然，也有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广大人民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是团结的，阵营加强了。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已不是那么容易。苏联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都靠在一块儿，而且巩固了。这样，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就不能不考虑。

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整个国际形势是向好发展，不是向坏。只是有个情况也要估计到，那就是疯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怎么办？所以，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坏，缓和之后又会搞紧张，搞突袭，打大战，等等。对这些情况都估计到了之后，我们说总的看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从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假如这种情况实现了，那时要打世界大战，他们就比现在更加困难了。那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要比现在大得多。西方国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条约而造成的许多矛盾，都很难解决。

如果反对修改日美“安全条约”[1]未能取得成功，条约修改了，那末，十年后这个条约还将提到日本人民的面前，那将会教育日本人民更进一步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

---

[1]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是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1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

一般讲，美、英、法同德、日是有区别的。就是说，美、英、法有不少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它们要守卫的地方很多，从台湾和南朝鲜到土耳其，都要守。从这一点上说，它们很富。美国没有殖民地，但有很多半殖民地，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朝鲜和台湾，要保守，要维持现状，以便继续控制下去。西德和日本就不同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殖民地被搞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未搞到殖民地。日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全被剥夺了。它们很不甘心，想继续侵占殖民地，但现在受美国的控制，还未准备好。它们想摆脱美国，再搞扩张。这些看法是否对，愿同你们交换意见。

对冒险集团要有个估计。最强大的就是美国冒险集团。他们在目前发动侵略战争还是有困难的，因为他们还未准备好。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岸信介[1]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你们党的纲领中有和平和独立的口号，这是最合乎实际情况的。

---

[1] 岸信介（1896—1987），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和班禅额尔德尼[1]等的谈话

（1959年10月22日）

现在你们的事情比过去好办了。过去有障碍，事情不好办，现在障碍没有了。

达赖[2]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你们和他们不同，爱国和改革这两条，你们都赞成。

我们的国家除了汉族外，还有五十一个少数民族[3]，他们聚居的地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比如鞍钢这样的大企业已经办起来了，各省各地的工业也都搞起来了，只有西藏还没有搞，因为西藏那时没有搞改革。铁的产量，除西藏外，各省都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增加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只有四万吨铁，像山东这样大的省没有一吨铁。西藏改革后也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3] 后来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

要办工业，要西藏人自己办，工程师、技术人员都要有藏族的，因此要注意培养藏族的科学技术干部。现在，是否已经开始培养这方面的干部?

改革的方针、办法你们都商量好了，是不是有些人觉得将来政策要变化？可能有些人有这个想法，这要请你们作些解释。

我们的方针是长期合作，不会随便丢掉原来和我们合作过的人。即使对达赖，我们现在还留有余地。他[1]是国民党，他[2]是“资产党”，我们合作十多年了，要继续合作下去，合作一辈子。有些右派，我们也还和他们合作。所以你们对那些不相信的人要作解释。到底我们团结起来有利，还是不利？我看，团结起来有利，对你们有利，对我们有利，对全国各族人民都有利。

跑到印度的人大部分在修公路，他们也许要在印度呆一辈子，也许有些人要回来。

从前释迦牟尼[3]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你们晓不晓得鸠摩罗什？他在后秦时出生在西域龟兹国，后来到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长安。中国大乘佛教[4]的传播，他有功劳。西藏过去有无《金刚经》？这个经的汉译本就是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翻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代六祖

---

[1] 指程潜（1882—1986），湖南醴陵人。原国民党元老和高级将领。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

[2] 指陈叔通，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

[3] 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

[4] 大乘佛教，佛教派别之一。

（慧能[1]）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西藏保存了一些寺庙吧？

群众起来，你们是否有些怕？你们不怕很好，因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群众就拥护你们。你们第一爱国，第二赞成改革，所以群众拥护你们，不斗争你们。你们的有些朋友怕，那也难怪，希望你们作些解释。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不会很长，再有几个月就会完成吧？以后是社会主义改造，搞合作化。总而言之，改革不是那么可怕，但是会有些变动。改革中不要打人，要说理。平叛以前，实际上是很乱，那么多叛匪，现在都肃清了，只昌都方面还有那么一部分，这部分恐怕不久也可以肃清。

以后各少数民族，都要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文化干部、政治干部。要注意培养这些干部。第一是政治干部，你们都是政治干部，但还要扩大这方面的干部。

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朋友们、同志们慢慢地熟了，那就好了。比如有些人开始到北京来，不知道北京究竟对你们怎样？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们究竟是害你们的，还是保护你们的？现在有个民族饭店，还有个民族文化宫，我们的首都是各民族的首都。

一个叛乱，一个平叛，问题解决了。靠你们办事，我们信任你们。听说你们有些要到地方上去参观？你们已经有四年没去过各地方了，去看看好。中国地方大，情况不是全一样，可以参考各地方的经验。

---

[1] 慧能（683—713），唐代高僧，佛教禅宗的南宗开创者，被推为禅宗的第六祖。传说他原是一个不识字的樵夫。

1959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阿沛·阿旺晋美。

1959年，毛泽东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帕巴拉·卓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谈话。

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问题的批语

（1959年10月22日、23日）

一

彭真、尚昆[1]同志：

这里[2]没有谈到中央直属机关各单位的情况，不知也有这三种情况没有？请你们抓紧办一下，使这个斗争深入下去。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二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0月1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〇二号转载的《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存在三种情况》一文。文章指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反右倾斗争的领导可分为三种情况：一、领导上既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也有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办法，对运动形成了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有80%。二、群众已经普遍发动，但领导缺乏决心和办法，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样的单位大约占10%。三、群众既未发动起来，领导本身也存在着问题，怯于开展斗争，致使运动进展很迟缓。这样的单位大约也占10%。本篇一就写在这份简报上。

二

已阅。送少奇、彭真同志阅后，退尚昆存。[1]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上午

三

尚昆同志：

中直要与国家机关密切联系，参考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劲头很大。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1959年10月23日关于中直机关开展反右倾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中直机关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党的总路线的整风学习运动总的情况还是好的，但在一部分机关中，开展得还比较缓慢，也不够有力。为此，我们对中直各机关提出了以下要求：一、必须认识这次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场极其深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机关领导同志必须下定决心，挂帅出马，抓紧进行。二、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贴大字报。发动群众的关键是领导以身作则，带头检查。三、必须反对不联系思想实际，泛泛学习文件的教条主义方法。四、必须不断地反对各种阻碍运动开展的右倾思想，把斗争搞深搞透。本篇三也写在这个报告上。

关于研究广东对部分副食品实行派购办法的批语[1]

（1959年10月23日）

李先念[2]同志：

广东派购办法，请你研究一下，看是否可以推广。你那里开什么会议没有？如有会议，可和较多的同志一道研究一下。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59年10月17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八九期上。该期登载的《广东实行派购办法，猪和家禽的收购量大增》一文说，广东商业部门在八、九月内贯彻执行中共广东省委和省人委关于实行猪、鸡、鸭、鹅和蛋品的派购办法的指示后，这些副食品的收购量大增。实行派购办法是根据市场情况和国家需要，对人民公社的各级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员派购一定数量的猪、鸡、鸭、鹅和蛋品，要求人民公社和社员向国家履行一定的交售任务。派购一般只占产量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产品仍归饲养集体和社员个人支配。由于这种办法兼顾了国家、公社和个人的利益，受到了社员的普遍拥护。

[2]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

（1959年10月26日）

你写的材料提出了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是同意中国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是重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战略问题，一个是策略问题。作为战略问题来说，从长远看，用和平手段能够消灭资产阶级政权是不可想象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够让工人阶级用和平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从策略上讲，首先可以说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表明我们不是好战的。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就被迫不得不使用暴力。不要散布幻想，不要在精神上解除自己的武装。不作精神准备，就无法教育人民，无产阶级自己也就没有革命干劲。用和平手段也是要斗争的。其实，革命的大量日常工作都是通过和平手段进行的。但作为革命家，在用和平手段进行日常工作的同时，要想到革命时机到来时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要每天去讲。在重要时机才提这个问题，提两条，一定要有两条：第一，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第二，假使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无产阶级被迫也得使用暴力。

马克思主义者知道，阶级斗争不经过战争是不能最后解决问题的。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明知如此，为何又要提和平手段？因为广大人民群众还不觉悟，资产阶级就利用这一点恐吓人民群众，说共

产党专讲暴力和战争。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1]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2]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我们在一九五五年和英共波立特[3]谈过这个问题，他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要修改中国同志的著作，要在我的选集的英文版中删掉两段讲革命一定要用暴力的话。[4]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意见，但

---

[1] 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2] 孟什维克，是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形成的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的机会主义派别。

[3] 波立特（1890—1960），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4] 1954年3月29日，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从英译本中删去。在这两段中，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波立特，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头两段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

结果他还是把那两段挖掉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会议宣言[1]又提到这个问题，也是提两条：无产阶级愿意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但是如果资产阶级使用暴力时，无产阶级被迫也要使用暴力。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共、意共对这个问题都提两条，日共、印尼共也提两条，大多数党提两条。讲清楚两条，可使资产阶级被动。我们并不是提倡武力，我们只是说你使用武力我们才使用武力。

但是在从理论上讲问题时，就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讲彻底。国家是暴力机关，无论奴隶制度的国家、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离开了暴力还叫什么国家。也有人拿中国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作为和平过渡的例子，其实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战争，打倒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发展到几百万军队，这才有了和平改造的可能。

革命用战争手段和用和平手段也是两条腿走路。实际上大量工作是用和平手段通过日常工作进行的，战争时间并不长，但最后解决问题还是要靠战争。不用两条腿走路，就不能夺取政权。

我们在一九四五年也努力争取过国内的和平，并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同时我们准备了另一面，发展了武装力量，有了一年的准备。一九四六年夏打起来以后，我们也不说绝对不要

---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宣言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各国共产党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任务，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之间关系的准则，并要求各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曾提出要“和平”。那时他们只有长江以南，他们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已经被消灭。美国劝他们谈判，以保住江南，准备力量再来打我们。

我们说，你们派代表团到北京来谈。代表团派来了，达成了协议，然后把协议送往南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这样很好，拒绝和平的责任就完全在他们身上了。他们第一天拒绝，我们第二天就过长江，一百万大军一夜渡过长江，到九月全国大陆基本解放，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们也还不放弃和平手段，我们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主张同他们正式谈判。但他们害怕谈判，美国更是害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在这种情况下，和平口号就很有用了。

现在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斗争通常是不流血的，但是当事物要发生质变时，就要流血了。经过长期的量变就要发展到质变。要是没有这种质变，旧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改变的。上层建筑主要指政权和军队、警察、法院等国家机器，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上层建筑是保护经济基础的。所以首先要用暴力把国家机器这些主要的上层建筑夺取过来，加以粉碎。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上层建筑，不能用武力解决，而是要经过长期的改造。

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用来保护经济基础的，当经济基础失掉保护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变生产关系，即旧的所有制等。当然这也要经过斗争，但不一定要经过战争。

下面谈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国际紧张局势是帝国主义制造的，但走向了它的反面。紧张局势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使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了，不利于他们保存资

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了。杜勒斯[1]的那一套对他们所要达到的这个目的是不利的，他们想走出这条很窄的路。如果紧张局势有利于他们达到保存资本主义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的，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有所改变。看来他们了解到这种不利，要有些改变，而且他们害怕战争。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对他们都不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他们将更加不利。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战争打起来对它是很不利的。

缓和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都有利，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兄弟党以及世界和平力量斗争的结果。再有十年和平是很好的，中国和苏联能再搞几个五年计划那好得很。

但是还要看到另一面，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军火工业和夺取外国的利益，需要一定程度的紧张局势。例如在赫鲁晓夫访美[2]以后，美国就在一些国家建立了火箭基地，又在联合国大叫大嚷西藏问题，可见他们还要制造紧张局势。所以我们要警惕。

---

[1] 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1956年1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2] 1959年9月15日至2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就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核试验、双边关系等举行了会谈。

中央印发浙江省委关于各县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27日）

一

此件[1]很好，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可登党刊。

中央

1959年10月27日

---

[1] 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10月18日给中央、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全省三级干部会结束以后，各县、市都召开了县、公社、生产大队和工矿企业支部的三级干部会，具体情况如下：（一）各县三级干部会，都以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联系实际，检查当地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抓住代表人物，开展了严肃的批判。（二）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的主要经验是：1. 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尖锐斗争。2. 要抓住重点问题，选择典型人物，展开思想交锋，力求把主要思想问题辩深辩透。3. 在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以后，多数县还用一段时间大立标兵，大鼓干劲。4. 对犯错误的同志坚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5. 各级党委都实行两套班子、分线作战的办法，做到整风、生产两不误。（三）下一步的工作是把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贯彻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中去，把增产节约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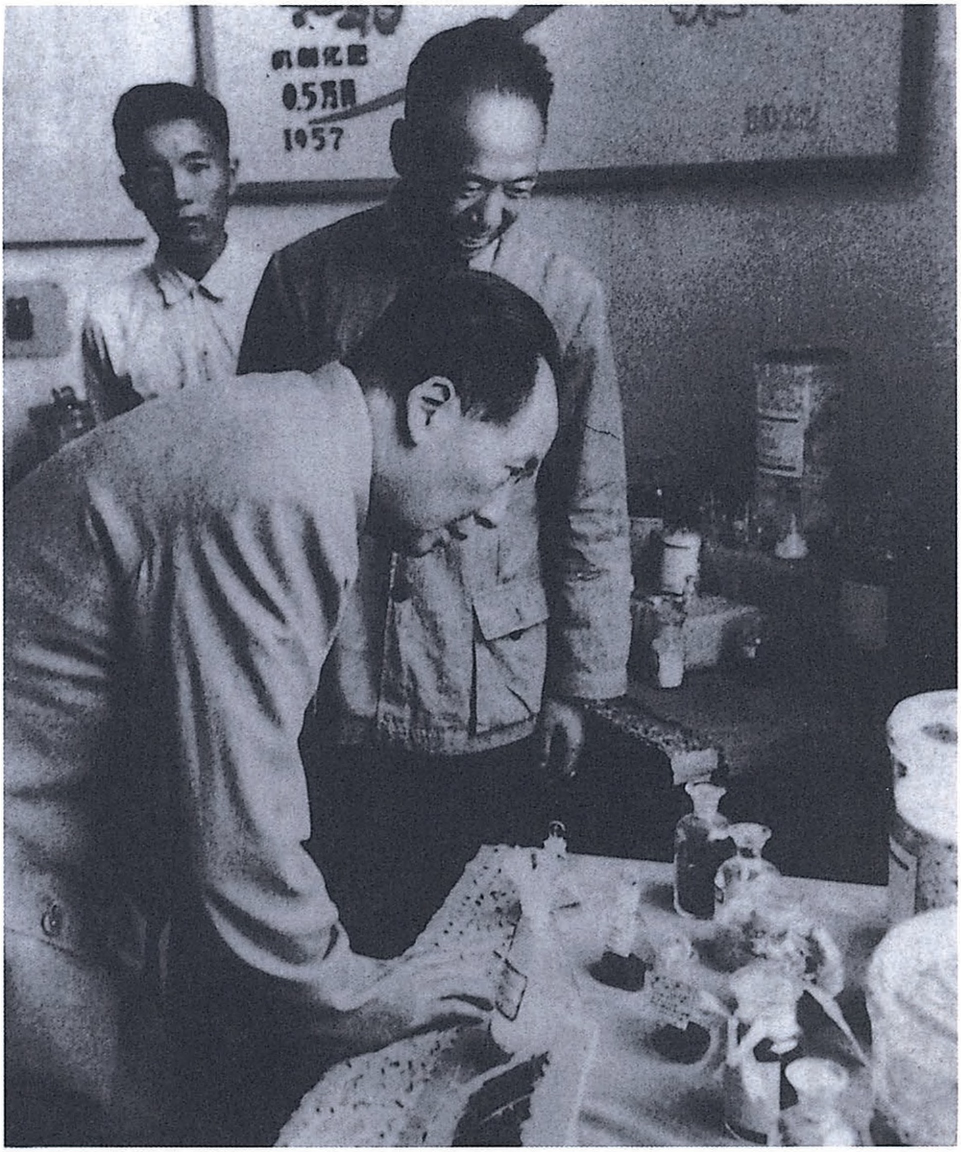
刘、彭真[1]同志阅，尚昆[2]办。办后退毛。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59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合肥市蜀山人民公社参观农民使用的沼气灶。



氮肥化肥
0.5万吨
1957

1959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合肥市蜀山化肥厂视察。

1959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合肥市蜀山人民公社时，向公社干部询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视察马鞍山钢铁公司。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看马鞍山钢铁公司炼出的生铁。

1959年10月29日，毛泽东和工人在一起。

在驻苏使馆关于赫鲁晓夫[1]海参崴讲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2]

（1959年10月）

一

此三件请刘、周、朱、林、陈毅、彭真、稼祥、康生、定一、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本篇一、二均写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10月8日给外交部的报告上。报告说，赫鲁晓夫本月6日在海参崴作了访华回去后的第一次公开讲话，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他强调今年9月的访美之行并没有改变他对美国的看法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其次，在谈到对战争的态度时他引证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害怕战争的话，然后又说："当然，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使他们被迫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免受侵略者危害的时候，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再次，关于中国之行，他说中国的情况很好，中苏友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友谊正日益发展和巩固。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再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

陈伯达、胡乔木[1]同志一阅，阅后退毛。

二

值得一看，想一想。两天内看完，以便在我处会谈一次。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苏联报刊摘登周恩来《伟大的十年》一文[1]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0月）

此件[2]值得一阅。

刘、周、朱、林、彭真、陈毅、伯达、稼祥、乔木、康生、定一阅，阅后退毛。

---

[1] 周恩来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5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二十期上。

[2]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10月9日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10月9日，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摘要刊登了周总理《伟大的十年》一文，摘登情况如下：（一）关于我国十年来的变化部分摘登较详尽。（二）对谈及我国十年来取得飞跃发展的原因、我党正确贯彻马列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阐述我党总路线、两条腿走路、人民公社以及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等内容，摘登非常简单。（三）对文章最后谈到我国的有利国际条件、支持赫鲁晓夫访美之行以及感谢苏联帮助等部分，摘登很详尽。（四）摘登中还有一些数字和文字翻译方面的错讹。

在驻罗马尼亚使馆关于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问题的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10月）

值得一看，看后想一想。

刘、周、朱、林、彭真、陈毅、稼祥、乔木、定一、康生、伯达[2]同志阅，阅后退毛。

---

[1] 指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1959年10月9日关于兄弟国家使节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问题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近来某些兄弟国家驻罗使节对与西方国家使节来往兴趣很大，强调要扩大同西方国家的接触。他们认为加强同西方国家使节的联系，有助于和平共处和改善东西方的关系。为此，他们分工合作，一方面对我们及其他兄弟国家使节进行工作，另一方面计划通过一定的形式，扩大同西方国家驻罗使节的接触。对此，我们已表明，和平共处不能完全抛开斗争，适当的接触是可以的，但不能抱过大的希望。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对赫鲁晓夫向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的消息的批语

（1959年10月）

各同志阅。

此件[1]刚到。请各同志即看一下。此外九月廿八日美国总统对记者会议的谈话[2]，赫鲁晓夫在十〈九〉月廿九日在莫斯科欢迎会上的演说[3]，是两个极重大的文件，值得一看。

---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59年10月15日送阅的一则新华社消息。消息说，根据塔斯社莫斯科14日讯，赫鲁晓夫写信给艾森豪威尔祝贺生日，并指出他在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开诚布公地进行的交谈给他留下了最好的印象。这使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有诚意而且作了必要的努力，来使苏美两国取得完全的互相谅解，建立永恒的友好关系，使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以利加强普遍和平。艾森豪威尔在复信中对赫鲁晓夫的祝贺表示感谢，并表示他和赫鲁晓夫一样，希望在美苏两国的关系中，他们两个人能使冷战的紧张局面得到某些缓和，并找到通向公正的和平的光明大道。

[2] 指艾森豪威尔1959年9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59年9月30日以《艾森豪威尔谈赫鲁晓夫访美》为题，报道了这一谈话的主要内容。

[3] 指赫鲁晓夫195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欢迎他访美归来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9年9月30日以《赫鲁晓夫报告访美观感和结果》为题，报道了这一讲话内容。

七言诗·赫鲁晓夫访美

（1959年10月）

西海如今出圣人，[1]
涂脂抹粉上豪门。[2]
一辆汽车几间屋，
三头黄犊半盘银。[3]
举世劳民同主子，

---

[1] 西海，泛指西方。《礼记·祭义》：“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圣人，这里是褒义反说，讽刺赫鲁晓夫。

[2] 豪门，指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世界。

[3] 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直接引用和浓缩赫鲁晓夫的话。1959年国庆期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0月2日，毛泽东等在中南海颐年堂和赫鲁晓夫举行正式会谈。赫鲁晓夫通报了他的美国之行，大肆宣讲他在美国受到欢迎的盛况，说这位农场主送他三头良种牛，那位资本家送他一盘古银币。还说，现在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都有好几间房子，住别墅，吃美馐。他认为，我们只能同美国在经济上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当时，毛泽东等在如何看待国际问题和美国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分歧很大。

万年宇宙绝纷争。[1]
列宁火焰成灰烬，
人类从此入大同。[2]

---

[1] 宇宙绝纷争，赫鲁晓夫认为，实现“三和政策”和“三无世界”后，世界上便再无纷争了。

[2] 大同，一种理想社会。这里是正话反说。

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1]

（1959年10月、12月）

一

吴冷西同志：

此件[2]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在吴桥县，集资容易，政策正确，

---

[1] 本篇一是为发表天津市畜牧局整理的《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庄生产队养猪积肥改变贫困面貌》一文给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的一封信。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写这封信时拟的。本篇二至五是为讨论、修改、发表这封信写的四个批语。

[2] 天津市畜牧局1959年9月5日整理的这篇文章说，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公社魁星庄生产队由于土质沙性大，肥料不足，历来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贫困。1958年以来，他们不甘贫困，分析了粪少、地坏，打不出粮食的原因，下定决心多养猪。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干部带头，集资买猪，盖简易圈棚，并对公养私养、育肥打菜等事情统一领导，全面安排，采取“男女老少，人人动手，谁打归谁，多余出售，队里不足，现款收购”等办法解决饲料问题，大干一年翻了身。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以猪为纲，“六畜”兴旺，粮食产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穷队变成了富队，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这篇文章和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后来载于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8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九期上。

干劲甚高，发展很快。关键在于一个很大的干劲。拖拖沓沓，困难重重，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这些都是懦夫和懒汉的世界观，半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雄心壮志都没有，这些人离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风格大约还有十万八千里。我劝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将不正确的世界观改过来。我建议，共产党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管理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党组织，将养猪业，养牛养羊养驴养骡养马养鸡养鸭养鹅养兔等项事业，认真地考虑、研究、计划和采取具体措施，并且组织一个畜牧业家禽业的委员会或者小组，以三人、五人至九人组成，以一位对于此事有干劲、有脑筋而又善于办事的同志充当委员会或小组的领导责任。就是说，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领导。大搞饲料生产。有各种精粗饲料。看来包谷是饲料之王。美国就是这样办的。苏联现在也已开始大办。中国的河北省吴桥县，也已在开始办了，使人看了极为高兴。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有人建议，把猪升到六畜之首，不是“马、牛、羊、鸡、犬、豕（豕即猪）”，而是“猪、牛、羊、马、鸡、犬”。我举双手赞成，猪占首要地位，实在天公地道。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我国的肥料来源第一是养猪及大

牲畜。一人一猪，一亩一猪，如果能办到了，肥料的主要来源就解决了。这是有机化学肥料，比无机化学肥料优胜十倍。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工厂。而且猪又有肉，又有鬃，又有皮，又有骨，又有内脏（可以作制药原料），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动物的粮食，动物是人类的粮食。由此观之，大养而特养其猪，以及其他牲畜，肯定是有道理的。以一个至两个五年计划完成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看来是有可能的。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今年已经成立了农业机械部，农业机械化的实现，看来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二

庆施[1]同志：

附件[2]请印20份，上午印出，发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六同志各一份，请他们收到即看一下，想一想，准备提出修改意见，下午或晚上到我处座谈一下。另14份交我处理。

毛泽东
卅一日上午九时

---

[1] 庆施，即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2] 指毛泽东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给吴冷西的信稿。

三

请彭真[1]同志送交吴冷西同志，在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四

送陈伯达[2]同志阅。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五

林彪[3]同志：

有暇时，请看一下这个文件。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1959年10月，毛泽东在全国群英大会上亲切接见马恒昌等全国劳动模范。

1959年10月，毛泽东接见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参观团团长阿生富。

1959年，毛泽东接见阿沛·阿旺晋美。

1959年，毛泽东接见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代表李明淑。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电报[1]

（1959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和全体苏联人民——进步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共产主义的建设者们，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的根本转折点，是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从资本主义枷锁下最终解放的指路明灯。四十二年来，苏联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日益壮大，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的日暮途穷，使人类更明显地看出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无不胜的生命力。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国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的电报。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二周年。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劳动，胜利地实现着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七年计划。1959年前三季度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完成令人信服地表明，苏联赶上和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时间，必将大大缩短。苏联成功地发射宇宙火箭和建立自动行星际站，为人类征服宇宙开辟了新的纪元。中国人民由衷地祝贺苏联人民所取得的这些辉煌成就。

一年来，和平力量空前壮大，战争势力日益孤立。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访问和苏联提出的关于全面和彻底裁军的建议，最近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裁军问题所通过的告世界各国议会书，都充分地表达了人类要求和平的愿望，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再一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苏联的这些和平倡议，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并且愿意同苏联人民以及各国人民一道，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

在不朽的马克思、列宁的旗帜下，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中苏团结和友谊，有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不久前，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庆典，是对我国人民的莫大鼓舞。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苏联人民一贯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人民将继续为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友谊而努力。

我们预祝你们和全体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对周恩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尼赫鲁的信稿的修改[1]

（1959年11月7日）

由于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而又非常漫长，距离两国政治中心很远或者比较远，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我担心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有可能出现。而只要出现了这类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就会被那些敌视我们两国友谊的人们所利用，以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59年11月7日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复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的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此外，毛泽东对这封信还有一些个别文字的修改。1959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这封信。

中央转发黑龙江省委关于财贸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1月10日）

一

各省、市、区党委，并发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

我们认为此件[1]很好，请你们考虑仿照黑龙江的办法召开一次财贸六级干部会议，由省、市、区党委切实抓紧会议的领导。首先由你们详细研究一下黑龙江省委的报告。

中央

1959年11月10日

---

[1] 中共黑龙江省委1959年11月5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我们于10月12日至28日召开了全省财贸系统的六级干部会议，情况如下：（一）会议是采取以虚带实，就实论虚，虚实结合的方法进行的。（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三）在批判右倾思想、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错误的同时，会议还检查了在财贸工作中贯彻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安排了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的工作。（四）这次会议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其根本的原因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指导下，实行政治挂帅的结果。

二

彭真[1]同志：

此件请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另印发中央各处。

毛泽东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给柯庆施的信

（1959年11月15日）

庆施同志：

此件[1]极好，请看一下。如有省书同志未走的，请你递给他们看一下。然后，交王稼祥[2]同志看一下。然后，交江华[3]同志看一下。在两天内看完，由江华退我。我准备请中央转发全国。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上午一时半

---

[1] 可能指安徽省国营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的材料。材料说，方丘湖农场去年小麦丰收后，即播种了1001亩绿豆，由于天旱，出苗不齐，估计要歉收，农场党组织根据当时养猪较多、饲料来源困难的情况，决定采取在绿豆青苗地放牧的办法养猪。放牧50天后，效果良好，具体表现在：一、田增产，猪增重。经过放牧后的田地再种小麦，由于猪粪多，比同等耕作水平但未经放牧的亩产提高了75%；同时在青苗地放牧的生猪，体重增长快，比圈猪提高了1.2倍。二、猪省料，田省工。放牧的猪不需再喂其他饲料，而实行放牧，也节省了运肥工。三、节省了饲料加工和管理费用。材料最后指出，种饲料直接放牧养猪、肥田的办法，适合地多人少、土地瘠薄的地区。安徽省目前正在积极选择适当地方，作进一步的试验。1959年12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四期登载了题为《方丘湖农场种饲料放牧养猪效果良好》的报道。

[2]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为转发华东协作区会议纪要[1]给周恩来、彭真的信

（1959年11月16日）

---

[1] 指华东协作区委员会1959年11月1日至10日举行的有全区各省、市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1. 1959年全区农业生产继续大跃进，人民公社经过一系列整顿，已经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2. 1960年农业生产力争更大的跃进。3. 在五至十年时间内由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基本上是公社所有制。二、关于工业生产问题：1. 1959年，华东协作区的工业生产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2. 1960年的有利条件更多，一定能够获得继续大跃进。3. 为了克服缺少原材料的困难，最重要的一条办法是大搞原料、材料的综合利用。三、关于财贸工作：1. 进一步加强党对财贸工作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2. 财贸部门首先必须支援生产，发掘潜力，保证生产计划的完成。3. 进一步做好收购工作。4. 进一步做好市场供应工作。四、关于教育和科学工作问题：1. 根本的问题是进一步加强党对教育和科学工作的领导。2. 继续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3. 必须巩固和发展高等教育。4. 积极筹办新的高级中学，办好初级和中级技术学校、初级和中级职业学校、中级业余学校。5. 继续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五、关于反右倾斗争问题：1. 各省、市的反右倾斗争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2. 必须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3. 目前应该注意掌握的是，领导上决心要大，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抓住重点，有破有立。4. 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 在今年冬季进行一次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这个会议纪要转发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恩来、彭真[1]同志：

华东协作区会议的文件和柯庆施同志给中央的报告[2]，现寄上，请予审阅。如果你们认为可行，请予批复。同时可以转发各协作区及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至于各协作区是否仿照华东办法在十一月内开一次会，由各协作区自己酌定。如果他们觉得十一月时间仓促，准备在十二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再开协作区会议，较为方便，我想也是可以的。

华东此次会议的纪要，共五件，我已看过，觉得可行，建议中央予以批准。

毛泽东

1959年11月16日

华东会议纪要寄上30本。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9年11月16日为送审华东协作区委员会会议纪要给中央并毛泽东的信。

对《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的批语

（1959年11月19日）

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喂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喂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二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关于随时选送有重要材料性文件的批语[1]

（1959年11月23日）

彭真[2]同志：

此四件已阅。有重要材料性文件，请随时选一些给我看看。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二时半

共四件，退彭真同志。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办公室1959年11月18日印发的《学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文件的情况简报》第一期上。该期登载了《中直机关反右倾斗争中重点对象的统计》材料。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59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同志：

欣逢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五周年纪念日，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最衷心和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无限愉快的心情看到：十五年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解放前，阿尔巴尼亚曾经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她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斗志昂扬地为实现修订扩大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进行着忘我的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飞跃前进。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再一次证明：人民一经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就一定能

够做出翻天覆地的事业。

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不渝地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并且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尔巴尼亚政府始终一贯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为维护巴尔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加强各国人民的友好团结进行了巨大的努力，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赞扬。

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中阿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一定会继续加强，中阿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也一定会日益紧密。

祝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请彭德怀阅读有关文章的批语

（1959年11月28日）

一

送彭德怀同志阅。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

二

此三件[1]可阅。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11月2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一七期登载的《青年科学家杨明汉培育水稻“千粒穗”成功》《一青年讲师培育成功一种普通分枝小麦良种》《金龙公社试验培育“牛精猪”成功》三篇文章。

对李先念[1]在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给中央报告[2]的批语

（1959年11月30日）

---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59年11月21日在第二次全国大中城市副食品生产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和11月25日关于这次会议情况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其中总结发言的主要内容是：（一）一年来，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副食品生产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蔬菜生产已经基本自给。（二）今后的副食品生产，仍然应当“城乡并举”。大中城市应当继续贯彻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三）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四）不可丝毫忽视蔬菜生产。（五）各地要大力发展油料生产，广泛开展多种经营。（六）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七）广大农村也要大搞副食品生产，发展畜牧业，积极支援城市。李先念在给毛泽东、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次会议检查了各地执行中央提出的大中城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副食品生产方针的情况，提出今后副食品生产的任务是：“在蔬菜已经基本自给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提高和适当发展蔬菜生产；大力发展以养猪为中心的畜牧业生产，在一两年内做到肉食蛋品的基本自给；同时，因地制宜地积极发展油料、水产、果品和其他副食品生产，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会议认为，发展畜牧业要在公私并举的原则下，强调以公养为主。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阅。建议转发各级党组织，研究实行。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对一九六〇年钢的增产量的估计[1]

（1959年11月30日）

实际可达到600万吨以上。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1960年计划问题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讲到，1960年几种主要产品较1959年增加的绝对数都是很大的，其中“钢四百八十万吨左右”。在这一数字旁边，毛泽东写了这条批注。

对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斗争情况等三个材料的批语

（1959年11月）

江青阅后，交林克[1]阅。

三件[2]都可看。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1月1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七四期上摘登的3份材料。其中《中央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日益深入》一文说，中央国家机关反右倾运动正往深入阶段发展，具体表现在：1. 群众发动得愈加广泛、深入。2. 重点批判对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细致。3. 领导核心健全有力或已经得到改进的单位占80%至90%。目前在中央国家机关中，仍有落后单位和落后面，主要是领导上存在右倾，不敢或不愿放手发动群众，以简单粗糙的方法来代替深入艰苦的思想工作。为此，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1. 必须继续大胆发动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开展斗争。2. 对重点对象要有计划、有步骤、深入细致地进行批判。3. 要加强领导。4. 运动必须有始有终，不能煮“夹生饭”。《十三个省农村整社工作动态》一文介绍了河北等13个省份进行整社试点工作的情况，指出在整社开始的地方，都普遍获得贫农和下中农的拥护。《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很快》一文指出，据12个省、区的材料看来，最近两三个月，农村公共食堂恢复和发展都很快，常年食堂也有很大的增长。目前各地在积极恢复和发展食堂的同时，开始大力抓食堂的巩固工作。

介绍王国藩人民公社[1]

（1959年12月2日）

此件[2]发给各人民公社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

---

[1] 这是为转发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关于王国藩人民公社的情况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王国藩，当时任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主任。

[2] 林铁1959年11月26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前几天我到王国藩人民公社看了一下，发现这个社今年生产的结果是五业齐跃进，全面大丰收。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依靠人民公社这个大集体的力量，鼓足了干劲，继承和发扬了勤俭办社的光荣传统，艰苦奋斗，改善了生产条件。从去年以来，这个社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积极开展了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建设。现在正在着手大搞社营经济，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关于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给刘少奇等的信

（1959年12月3日）

刘、周、彭[1]：

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2]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上午三时

今日派机去广州，明日林彪可到。

国际形势及对策讨论三天就够了。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稼祥，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

（1959年12月）

讨论的范围，以本人口气出之。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

1945年，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

1949—1951年，怀疑是否真革命，开始不愿订互助同盟条约，

后来也改变了。十年来帮助我们建设了许多工厂。

1953年，高饶彭黄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一次颠覆活动。[1]

1954年，取消了旅大军事基地和四个合营公司。

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2]。

1957年，中国整风反右，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秋季的莫斯科宣〔言〕，我们批判了朋友。

1958年，中国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

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

同年，高饶余孽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同年，1959，在三月至今，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

[1] 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认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加到彭德怀同志头上的“里通外国”等罪名。198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指出：“根本不存在黄克诚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问题。”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同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

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思〈志〉而存在。对表论[1]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

[1]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1959年12月1日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在明智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成为列宁主义的能手，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如果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骄傲自大起来，这就会合乎敌人的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本身，领导本身就会帮助敌人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主义。而这样做是不能容许的。”

在杭州期间的一次讲话提纲

（1959年12月）

中央、省委要团结一致

彻底裁军与禁止原子武器

外交方面要注意谨慎

碰钉子

理论方面

与对付考茨基比较

由外国纠正，**不宜**，**也危险**

（一）父子关系；（二）不愿学生超过先生；（三）留一手；（四）搞颠覆活动。

（1）骄傲自大；（2）领导犯错误；（3）歪曲马列；（4）动摇国际主义原则；（5）对和平悲观。

1959年，毛泽东在杭州三台山和工作人员合影。

毛泽东在杭州学习英语的地方。

对《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一文的批语

（1959年12月）

此文[1]请阅，送各同志。退毛。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三期上登载的《湖北省委召集五个公社工业书记座谈公社工业问题》一文。文章介绍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一、会议认为公社工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1. 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2. 支援了国家建设，增加了公社收入。3. 增加了公社资金的积累。二、确定1960年公社工业的发展方针是：集中力量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以农具和农产品加工工业为重点，全面提高和发展。三、必须从上而下地加强对公社工业的领导，完善公社管理体制。

对广东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等三个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此件[1]值得一阅。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一四号。这期简报共登载了3篇材料，其中《广东农村开展粮食分配问题的大辩论》一文指出，广东省委今年确定粮食分配的方针是：计划用粮，月月节约用粮，合理用粮，超额完成公、购粮任务，尽量多留饲料，多留储备，以丰补歉。各地用算账对比的方法，总结几年来粮食分配与使用的经验教训，算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合理用粮的好处和不执行这个方针的害处，用事实教育群众开展辩论，使广大群众真正自觉地贯彻执行省委的方针，在20天的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公、购粮任务。《河南农村整社工作的几点情况》一文的主要内容是：一、在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地都特别注意通过办展览馆的办法进行对比教育。二、关于重点批判对象的确定，各地都很慎重。三、关于重点批判的比例，各地认真贯彻执行了省委的指示，一般都控制在占社员总数的1%左右。《一个连队的社会主义思想大辩论》一文指出，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协同六十一师政治部，于11月初在一八一团二营六连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试点。为了给整个教育打好基础，他们首先向士兵进行了人民公社问题的教育，办法是先讲课，后辩论。讲课中集中讲透两个问题：（1）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批判了公社“搞早了”的观点；（2）公社制度有无比的优越性，批判了公社“搞糟了”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再发动战士对这两个问题分别进行辩论。辩论以后便进行群众性的自我小结，谈体会，谈进步。战士们普遍认为这次教育收获很大。

林克[1]阅后，送陈伯达[2]同志阅，退毛。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经济消息》第五十三期上的批语

（1959年12月）

伯达、林克、胡、邓、田[1]阅，退毛。

此期[2]全部可阅。

---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邓，指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田，指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1959年12月5日编印的第五十三期《经济消息》，主要登载了《大跃进的、协调的、看涨的计划》《钢铁煤炭计划第一本账已经超额完成》《城市副食品生产的任务》《关于养猪好处的一笔大账》《解决木材不足问题的重要途径》《各地大办土铁路》《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生产的大好形势》《农村“五冬”工作进入高潮》《有些职工对工业生产运动有错误看法》等消息。

对两篇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送陈伯达[1]同志阅。

此两件[2]可看。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2]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6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二八期上登载的《北京市工矿企业取消计件工资后劳动效率普遍提高》和《九龙山仓库取消计件工资后劳动效率提高一倍多》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指出，北京市工矿企业、交通、建筑业取消计件工资后，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生产上升了，效率提高了。取消计件工资后的主要问题是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了。最近中央决定年终仍发跃进奖，如果这样做，总的来说还可以保持原有的收入水平。后一篇文章指出，北京九龙山仓库过去一直实行旧计件工资制，阻碍了生产和工人思想觉悟的提高。取消计件工资后，生产面貌一新，劳动效率提高了一倍多，仓库管理工作也有很大改进。具体表现在：（一）改变了劳动组织，贯彻了“两参一改”。（二）开展了以半机械化、机械化和电气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三）把管理工作交给保管工人，大大增强了工人的责任感。

对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在河北、河南两省参观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2月）

一个有兴趣的报导[1]，宜一看。送各同志阅。退毛。

---

[1] 1959年12月7日编印的《外事动态》第一一五期上登载的这一报道说，外交部组织各国驻华使节、外交官于11月12日至21日到石家庄、郑州、洛阳等地参观，外宾们的反映是：一、一致承认我国发展速度快、建设成就伟大。二、对小洋群大炼钢铁的发展感到意外。三、认为人民公社发展情况良好。四、认为看到三门峡工程是这次旅行的高潮。五、承认各地物资供应充足。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的批语[1]

（1959年12月）

陈、胡、邓、田、林[2]阅，退毛。

城市人民公社应否普遍推广问题。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10日编印的《情况通报》第二二三号上。这期简报登载的《黑龙江省各城市基本上实现公社化》的材料说，黑龙江省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去年9月至11月间，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经过一年来的不断整顿、巩固，现在全省8个大中城市入社人口已达69.2%，市区和街道实际上已经开始走上政社合一的道路。城市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大发展了工业生产。（二）大大促进了郊区的农业生产，发展了畜牧、蔬菜等多种经营。（三）职工家属、街道居民普遍地组织起来，直接参加了各种生产和服务事业，许多城市基本上做到了无闲人。（四）空前推动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发展。（五）人民生活得到了提高。（六）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程度，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七）为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加速了过渡的时间。

[2] 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邓，指邓力群，当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田，指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林，指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为查《焚书坑》一诗作者给林克[1]的信

（1959年12月11日）

林克：

请查《焚书坑》一诗，是否是浙人章碣[2]（晚唐人）写的？诗云：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3]空锁祖龙[4]居。
坑灰未烬〈冷〉山东乱，
刘项[5]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阅后退毛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章碣，唐朝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曾中过进士，咸通乾符间有诗名，唐亡后流落不知所终。《焚书坑》是他写的一首七绝。

[3] 关河，指函谷关和黄河。

[4] 祖龙，指秦始皇。

[5] 刘，指刘邦，项，指项羽，均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16日）

一

各省、市、区党委，并转各地、县、社党委：

（一）现将农业部党组十二月十二日的报告[1]发给你们。（二）各级党组织都应设立一个畜牧业委员会或小组，省、地、县、社四级都应有一个不管别事、专管畜牧业的书记。（三）凡尚未召开养猪会议的，除禁猪民族区域外，都应迅即召开省的（市、区的）、地的、县的、社的养猪会议，总结经验，规定任务和办法。此种养猪会议或畜牧会议，一年至少开两次。

中央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

[1] 指农业部党组1959年12月12日关于当前养猪运动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自毛泽东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一封信在党内传达后，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养猪积肥的群众运动。已有14个省、市、自治区召开了有县委书记参加的养猪会议或电话会议，许多地方由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了领导小组、委员会或办公室等机构。

二

刘、周、邓、彭[1]即阅，尚昆[2]以电报发去[3]。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195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农业部党组的报告。

转发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情况和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19日）

一

彭真同志：

此件[1]可以转发各地供参考。请酌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12月12日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给中央的报告。主要内容是：（一）自8月上旬以来开展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实际上是党的又一次整风运动。对此我们提出了3条基本要求：第一，清除毒素。第二，提高觉悟。第三，健全队伍。目前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二）前一段运动表明，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确实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任务，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三）在斗争中，我们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采取重点批判与自觉交心相结合的方法。（四）下一阶段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对重点对象深入批判和处理。第二，组织专题辩论。第三，精读文件，联系思想自我反省。第四，各级领导骨干深入谈心，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作用。第五，提倡写心得体会。1959年12月26日，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二

还有政治，即阶级力量对比方面，起了重大变化。

中央转发上海市养猪工作大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20日）

一

此件[1]很好，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参考。可登党刊。

中央

1959年12月20日

---

[1] 中共上海市委1959年12月14日给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11月16日至22日，我们召开了全市养猪工作大会，根据主席关于发展畜牧业问题的指示作动员报告，广泛交流群众创造的养猪先进经验。会议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思想问题：（一）养猪上算不上算？算账后，大家都认为养猪总归上算。（二）养猪这么多，饲料从哪里来？结论是以青粗饲料为主。（三）造猪圈的材料缺少怎么办？答案是依靠群众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四）解决养猪劳动力的两个办法：一是合理安排农业、畜牧业劳动力比例，二是大闹工具改革。（五）会议还批评了一些错误论调。（六）宣传养猪光荣。经过反复讨论，市委最后确定了明年郊区农村以猪为主的全面发展畜牧业计划，并对种苗、饲料、猪圈、工具改革、防病防疫、饲养员、奖励、领导等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作了具体的讨论和安排。

二

送彭真[1]同志酌办[2]。

毛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195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的报告。

对冶金部关于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七年钢铁工业远景规划草案[1]的批语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退毛。

要件

---

[1] 冶金工业部1959年12月14日印发的这份规划草案指出，钢铁工业今后8年发展规划的要求是：一、继续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和土洋并举的方针，保证高速度的发展。二、在各大区建立起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基本上解决钢铁工业的布局问题。三、完全解决国民经济发展对钢铁产品品种的需要。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初步设想1967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至7000万吨或7000万至8000万吨。

对四川江油县银行工作经验的批语[1]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退毛。

四川江油县工作做得好。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1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三二号上。这期简报登载的《中央财贸工作部关于在最近召开几个会议的安排》的材料说，中央财贸工作部和财政、银行系统，准备在最近一两个月内，召开包括四川省江油县财政、银行工作现场会议在内的几个会议。江油县银行在农贷工作上，走在农时前面，积极帮助公社和生产队解决所需的生产资金和生产资料。在帮助穷队赶富队工作上，银行分派专人常住穷队，同吃同住同劳动，负责帮助到底。在储蓄工作上，大办食堂储蓄组，帮助群众安排生活开支。县财政部门坚持了从生产到财政再到生产的财政工作方针，各级都订了促进生产发展的规划，帮助企业解决产供销中的困难，帮助公社发展多种经营。他们在依靠党委，同各方密切协作，大搞群众运动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好经验。11月间，李先念同志在重庆听了中央财贸工作部工作组的汇报后，认为这些经验都很好，指示可商请四川省委在江油县召开一个现场会议。四川省委现已确定，这次会议于12月15日召开。

对山西省委关于干部整风运动进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退毛。

此件[1]可看。

---

[1] 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12月15日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这次整风运动有两个特点：一是把主要目标集中在各级党组织中有右倾思想的负责干部和当家作主的人身上，一是运动面广，几乎涉及每个党员干部。（二）这次整风运动是每个党员干部过社会主义关，在政治思想上重新排队的运动。因此，必须把运动进行到底，一切工作以整风运动为纲，夺取整风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的双胜利。（三）这次运动的收获是：1. 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许多过去认为不太重要的问题，现在都提高到两条道路的原则上来加以认识了。2. 在交心、批判中，揭发出了个别单位的严重错误。（四）对重点批判对象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妄图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党。还有一部分人，基本上是好同志，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所以在大风浪中不够坚定。（五）反右倾整风的效果立竿见影。不但参加整风的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经济建设的大好形势也步步高涨。

对波兰《政治周报》主编谈波兰党内《令人不安的问题》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送各同志。退毛。

此篇[1]可阅。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2月17日编印的《宣教动态》（总第六〇三期）上刊载的这篇材料说，波兰《政治周报》第四十四期发表该报主编拉科夫斯基撰写的题为《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文章，谈到了波兰党内的政治思想状况：（一）政治热情下降。（二）人们对党的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三）其他不良现象：1. 领导干部不管思想。2. 反对坏现象不力。3. 明哲保身，攻守同盟。4. 唯利是图。

对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收支情况调查等两个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

一

此两篇[1]可看，送各同志阅，退毛。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19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上登载的两篇电讯稿。其中《一九五九年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户收支情况调查》一文说，河北、北京等14个省、市、区最近对1959年农村人民公社和社员户收支情况作了一项预计调查，情况如下：一、农业生产继续跃进，多种经营空前发展。二、收入分配更趋合理。三、粮食分配情况良好。四、公社部分所有制正在迅速扩大。五、社员生活显著改善。另一篇《〈纽约时报〉妄评美共十七次代表大会》说，《纽约时报》12月1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共产党在表明向右转以后提名中西部最高领袖霍尔为领袖》的文章，其中讲到，霍尔在主旨演说中强调拟订美国共产党的战术和战略时考虑美国国家特点的重要性，他援引了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使马克思主义适应中国的情况的话，并且说，美国共产党也必须这样做。文章指出这是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第一次参照中国共产党的话而不是参照苏联党的方针来拟订它自己的方针。

二

成安县与磁县合并，现为成安公社，盛产棉花，今年九月我去看过。[1]

---

[1] 这个批语写在《内部参考》第二九三九期登载的《成安公社实行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方法》一文题目的旁边。这篇文章说，河北省磁县成安人民公社根据生产连年跃进的情况，将按比例分红制度改为固定增长比例的分配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首先，能因队制宜地确定社员增加收入的比例，使原来收入低的队多分一些，逐步赶上富队；其次，可多提些公共积累。

对《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一文的批语

（1959年12月）

送各同志阅，退毛。

此件[1]可看。

---

[1] 新华通讯社1959年12月20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九四〇期上登载的这篇报道说，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大农业国，农业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农业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消费的全部消费品中，农产品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占85%以上。因此农业的丰歉，对人民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二）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部门所占比重很大，因此农业的丰歉，对工业生产的影响也很大。（三）农业与国家积累资金的关系。农业除了通过农业税的形式外，在农产品加工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上，也间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四）农业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目前我国的出口物资中，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品占70%以上。这也是农业支援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部分地区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情况材料的批语

（1959年12月27日）

一

此件[1]极好。各同志阅。上午看过，下午讨论一下。

毛泽东

廿七日上午六时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22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五八号。这期简报登载了《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四川省顺江人民公社实行基本社有制的情况和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三年规划》和《广西柳州地委提出从十个方面发展社有经济》等3篇材料。其中第一篇材料说，中央农村工作部有关同志最近到东北三省了解人民公社过渡方面的情况，大体是：有一小部分的社、队（或管理区）已经由基本队有制改为基本社有制，或全民所有制，社有经济发展异常迅速；一小部分公社和生产队在所有制方面的转变，已经是势所必然。第二篇材料说，四川省内江县顺江人民公社在今春整社时，确定试行基本社有制，大大促进了公社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事业的飞跃发展。第三篇材料说，广西省柳州地委根据现有的经验，提出目前人民公社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主要是积极兴办社办企业，增加积累，农业、工业和副业综合发展。但在发展社有经济的同时，还必须抓好各大队各专业队的生产。

用后直接退毛

二

请田家英[1]同志找人民公社北戴河、武昌两个决议[2]，**下午带来**，为盼。

三

问题：五年社有化，十年国有化，是否有可能呢？[3]

---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3] 《东北三省已有少数公社、生产队过渡为全民所有制或基本社有制》的材料讲到："东北三省的公社经济发展都很快""估计大多数公社在两三年之后社有经济就可以占取优势"。毛泽东在此旁边写了这一批语。

转发江苏省委关于生猪发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12月27日）

彭真[1]同志：

此件[2]很好，请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七日

用后退毛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中共江苏省委1959年12月22日给中央、上海局的这一报告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就开始强调抓生猪生产。目前发展生猪生产，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今后准备进一步采取以下措施：一、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二、要求各级党委根据省委确定的发展生猪生产的奋斗目标，立即检查一次规划的落实情况。三、切实贯彻执行以集体养猪为主，公养私养并举的方针。当前主要抓集体养猪。四、发展生猪生产，在狠抓数量的同时，还必须狠抓质量；在狠抓圈存量的同时，还必须狠抓上市量。五、要大量发展集体养猪，首先就要大搞养猪基本建设。六、千方百计解决饲料问题。七、为了适应生猪大发展的需要，必须大力培养训练畜牧兽医技术人员，做好防疫工作。八、大抓牧具改革，逐步实现养猪半机械化、机械化。

在一份介绍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材料[1]上的批语

（1959年12月27日）

印10份，交我为盼。

毛泽东
廿七日上午六时

高智[2]办。

---

[1] 这份材料介绍说，在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人当中，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另一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而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人，则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是唯心的。上述双方从老子书中引证的话，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所作的解释各不相同；另一部分引文则各不相同。这篇材料还列举了《老子》一书中的十五段引文，分别介绍了持两种观点的人对这些引文所作的不同解释。

[2]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给钟学坤[1]的信

（1959年12月29日）

学坤同志：

信[2]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甚好，谢谢你的关心。你的工作和学习如何？尽心工作，业余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真才实学，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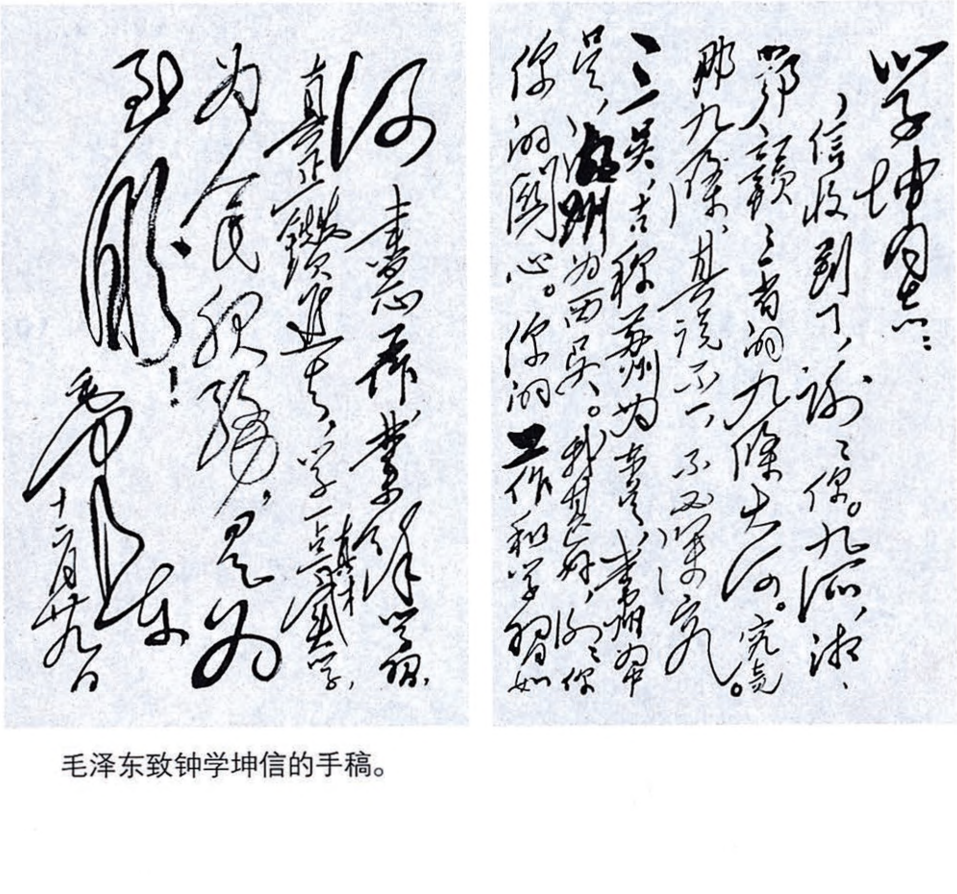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钟学坤，当时是庐山疗养院护士。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保健工作。

[2] 指钟学坤1959年9月下旬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向毛泽东请教如何理解《七律·登庐山》一诗等问题。



学坤同志：

信收到了，谢谢你。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三吴，古称苏州为东吴，常州为中吴，湖州为西吴。我们都好，谢谢你们的关心。你们工作和学习如何，甚念。希望努力学习，真正钻进去，学一点本领，为人民服务，是为至盼！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毛泽东致钟学坤信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毛泽东全集》第42卷
主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出版：润东出版社
承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852）23500066
电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址：www.enricheast.com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长：言臣
装帧：平装
开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面：544面
版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SBN：978-988-12907-0-0
定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3卷

润东出版社

张迪杰　主编

第43卷

毛泽东全集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3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3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3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浛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毛泽东等给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年贺电……………………1

（1959年12月30日）

给陈云的信……………………………………………………………3

（1959年12月30日）

给李讷的信……………………………………………………………6

（1959年12月30日）

给田士清的信 …………………………………………………………7

（1959年12月30日）

对《彻底驳倒富裕中农反对“八字宪法”的谬论》等三个材料的批语…9

（1959年12月）

对国家计委关于今后八年钢铁工业发展的初步设想的批语 ………11

（1959年12月）

对新华社的指示 ……………………………………………………12

（1959年12月）

对国家计委关于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超情况预测材料的批语…13

（1959年1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 ……………………14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七律·读报有感之一…………………………………………………59

（1959年）

七律·读报有感之二……61
（1959年12月）
为《星火燎原》题名……62
（1959年12月）
赠陈云同志联……63
（1959年）
江山如此多娇……64
（1959年）
为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题名……66
（1959年）
为《大众摄影》题名……67
（1959年）
为中国摄影学会题名……70
（1959年）
为《中国摄影》杂志题名……72
（1959年）
关于《红楼梦》的一组谈话……74
（1959年至1973年）
关于确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地点的批语……83
（1960年1月1日）
在关于国际情况的一期简讯上的批语……84
（1960年1月6日）
印发《外国资产阶级怎样议论中苏分歧》材料的批语……88
（1960年1月12日）
让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的一段话……89
（1960年1月13日）

印发冶金部党组关于钢铁企业“小洋群”情况报告的批语 ………90
（1960年1月13日）
印发《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材料的批语 ……………………92
（1960年1月14日）
给刘松林的信 ………………………………………………………93
（1960年1月15日）
对七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的批语 ……94
（1960年1月23日）
转发太原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的批语 …95
（1960年1月23日）
关于广泛阅读、讨论中国政府给印度政府照会的批语 ……………97
（1960年1月24日）
关于派代表参加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例会给赫鲁晓夫的复信…99
（1960年1月31日、2月1日）
在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上的批语……101
（1960年1月）
在关于台湾情况的一份内部材料上的批语……………………………102
（1960年1月）
对《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摘录的批语………104
（1960年1月）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106
（1960年1月）
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107
（1960年1月）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电报…………108
（1960年2月13日）

请罗光禄购买《哲学研究》杂志的批语……………………………111
（1960年2月15日）
给林彪的信………………………………………………………………112
（1960年2月20日）
对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交通生产情况报告的批语…………115
（1960年2月26日）
毛泽东等为祝贺藏历新年复班禅额尔德尼电………………………118
（1960年2月27日）
在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19
（1960年2月29日）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121
（1960年3月2日、3日）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126
（1960年3月2日、4日）
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129
（1960年3月3日）
为审阅中央转发广东、吉林、贵州省委报告的三个批语稿给
刘少奇、邓小平的信………………………………………………………132
（1960年3月4日）
在河南省委关于当前抗旱浇麦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33
（1960年3月5日）
关于干部中存在的三个大问题……………………………………………134
（1960年3月6日）
对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 136
（1960年3月8日）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140
（1960年3月8日）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部署报告的批语………143
（1960年3月14日）
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报告的批语………………147
（1960年3月15日）
中央转发湖南省农业生产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149
（1960年3月15日）
为审阅中央转发湖南、山东、江苏省委报告的三个批语稿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151
（1960年3月15日）
在黑龙江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汇报上写的几句话………………153
（1960年3月）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154
（1960年3月15日）
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领导的批语……………161
（1960年3月16日）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64
（1960年3月16日）
为审阅中央关于技术革命、食堂问题、卫生工作的批语稿和指示稿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167
（1960年3月16日）
关于修改李富春、李先念向人代会的报告的批语………………169
（1960年3月16日）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170
（1960年3月18日）

对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问题的批语……178
（1960年3月21日）
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179
（1960年3月22日）
关于反华问题……182
（1960年3月22日）
给田家英的信……186
（1960年3月22日）
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187
（1960年3月22日、23日）
转发聂荣臻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191
（1960年3月25日）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材料的批语……193
（1960年3月25日）
关于中央批转的文件字要印大一些的批语……194
（1960年3月29日）
对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稿的修改……196
（1960年3月）
对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98
（1960年3月）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201
（1960年3月30日）
对中央转发宁夏区党委关于纠正中宁县工作中错误问题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213
（1960年3月31日）

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215
（1960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220
（1960年4月2日）
对陆定一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教学必须改革》的批语……222
（1960年4月7日）
中央转发江苏省六级干部大会报告的批语……224
（1960年4月7日）
对吉林省委“三反”部署报告的批语和在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226
（1960年4月7日、11日）
关于阅读有关英、法、美、西德关系等五篇文章的批语……228
（1960年4月8日）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30
（1960年4月10日）
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筹备情况和安排意见报告上的批语……234
（1960年4月14日）
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235
（1960年4月）
中央转发中南协作区常委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39
（1960年4月18日）
中央转发《各行各业办机械是高速度发展机械工业的好办法》一文的批语……241
（1960年4月18日）
对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43
（1960年4月20日）

对冶金部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46
（1960年4月21日）
给杨开英的信……248
（1960年4月21日）
关于查找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发言材料等的批语……251
（1960年4月24日）
对薄一波关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报告的批语……253
（1960年4月24日）
对资本主义社会内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存在的论点的批语……257
（1960年4月24日）
给杨开英的信……259
（1960年4月25日）
对中央转发聂荣臻关于公开报道“四化”运动意见的批语稿的修改……261
（1960年4月28日）
读《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时写的批注……263
（1960年4月）
关于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的批语……269
（1960年4月）
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274
（1960年5月3日）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291
（1960年5月7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300
（1960年5月7日）

关于三大作风提法的批语……302
（1960年5月8日）
接见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时的谈话……303
（1960年5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305
（1960年5月8日）
接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代表团时的谈话……307
（1960年5月9日）
在《参考资料》第三五九〇期上的批语……320
（1960年5月12日）
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321
（1960年5月14日）
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324
（1960年5月17日）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寿辰的电报……329
（1960年5月18日）
和蒙哥马利的谈话……331
（1960年5月27日）
给卡斯特罗的信……345
（1960年5月30日）
对一份摘录南斯拉夫方面言论的内部材料的批语……347
（1960年5月）
对《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初步反应》一文的批语……348
（1960年5月）
印发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展览会总结报告的批语……351
（1960年6月4日）

对宦乡关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展望的批语…352
（1960年6月7日）
对《有关美国军事生产的一些资料》的批语……………………354
（1960年6月8日、9日）
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共中央的信…357
（1960年6月10日）
七律·读报有感之三 ………………………………………………360
（1960年6月13日）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农村“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的批语……363
（1960年6月14日）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367
（1960年6月14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四个文件的批语…………………368
（1960年6月15日）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371
（1960年6月18日）
十年总结……………………………………………………………372
（1960年6月18日）
对蒙哥马利《我同毛的会谈》一文的批语…………………………377
（1960年6月20日）
对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的批语………………………379
（1960年6月21日）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380
（1960年6月21日）
关于通知吴启瑞来上海给陈丕显的信………………………………388
（1960年6月22日）

对《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社论稿的修改…389
（1960年6月29日）
对蒙哥马利在德拉鲁公司宴会上的讲话摘要的批语……………………390
（1960年6月）
印发十六件关于目前形势的报道的批语……………………………………391
（1960年7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九周年的电报……………………392
（1960年7月10日）
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394
（1960年7月18日）
在《宣教动态》第五十期上的批语…………………………………………398
（1960年7月18日）
对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402
（1960年7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六周年的电报……………………………………413
（1960年7月21日）
在《内部参考》增刊第三十期上的批语……………………………………415
（1960年7月31日）
在关于辩论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两份材料上的批语……………………418
（1960年7月）
在苏联《政治自学》杂志发表有关国际问题文章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20
（1960年7月）
在关于近两日苏联对古巴、刚果局势态度的电报上的批语………421
（1960年7月）
在阿尔巴尼亚驻罗大使谈话摘要报告上的批语……………………………423
（1960年7月）

对《美军重视研究现代战争中“人的因素”》一文的批语………424
（1960年7月）
在可否将中苏分歧向使馆干部传达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425
（1960年7月）
在关于最近苏联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变化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26
（1960年7月）
在一份关于捷共学生党员与中国留学生谈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27
（1960年7月）
在一份关于萨瓦茨基提到加强与中国友谊的报告上的批语………428
（1960年7月）
在一份关于日夫科夫正在撰文批评中共“教条主义”的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29
（1960年7月）
对第一坦克学校部分学员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材料的批注…430
（1960年7月）
在一份关于西德扩军备战的材料上的批语…………………………432
（1960年7月）
在一位保共党员对中共看法的报告上的批语………………………433
（1960年7月）
印发《中国年》一文的批语…………………………………………434
（1960年7月）
在一位捷共工人党员谈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35
（1960年7月）
对阿登纳和戴高乐会谈的三条消息的批语…………………………436
（1960年8月2日）

关于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问题的批语……………………438
（1960年8月3日）
关于请各省市区报告雨情的批语……………………………439
（1960年8月4日）
对金门蒋军向我炮击的处置意见的批语……………………440
（1960年8月7日）
对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稿的批语………441
（1960年8月）
关于抄录昆明滇池对联的批语………………………………443
（1960年8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444
（1960年8月14日）
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446
（1960年8月20日）
关于酌情安排夏在伯等三人工作的批语……………………448
（1960年8月22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454
（1960年8月22日）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456
（1960年8月27日）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贯彻北戴河会议部署情况简报的批语……458
（1960年8月27日）
对阿里埃蒂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看法的批语……………459
（1960年8月）
转发黑龙江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461
（1960年9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463
（1960年9月1日）
给张维的信……………………………………………………466
（1960年9月2日）
给田士清的信…………………………………………………468
（1960年9月2日）
给吴启瑞的信…………………………………………………470
（1960年9月2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六周年的电报…………471
（1960年9月8日）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476
（1960年9月15日）
和夏基、狄克逊的谈话…………………………………………478
（1960年9月25日）
对谭震林关于晋冀鲁豫辽五省农业情况报告的批语……………483
（1960年9月26日）
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485
（1960年9月29日）
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的谈话要点…………………488
（1960年9月30日）
感谢几内亚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492
（1960年10月1日）
感谢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 ……………496
（1960年10月3日、8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电报……………498
（1960年10月6日）

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500
（1960年10月8日）
关于转发湖北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批语……………………………………501
（1960年10月10日、12日）
关于会谈国际形势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信……………………………505
（1960年10月14日）
对《麦克米伦的作用》一文的批语……………………………………………507
（1960年10月15日）

毛泽东等给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年贺电

（1959年12月30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当1960年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谨以个人的名义，并且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十分敬佩的心情看到，在过去一年里，兄弟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在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的七年计划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在为争取和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不懈努力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加强了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罪恶阴谋，大大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斗争的信心。

一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全面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给予的巨大援助表示由衷的感谢。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是两

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的可靠保证。中国人民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发展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合作，为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努力。我们衷心地预祝你们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在加速共产主义建设和捍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中，取得新的更辉煌的成就。

亲爱的同志们，祝你们新年愉快，身体健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给陈云[1]的信

（1959年12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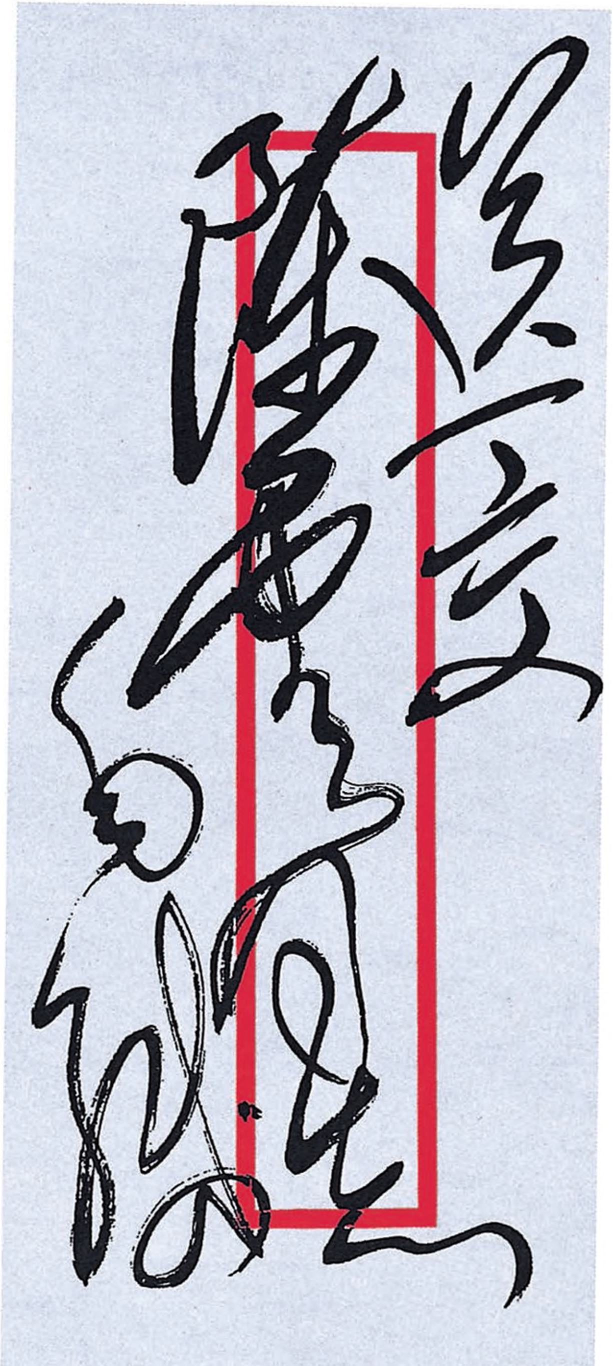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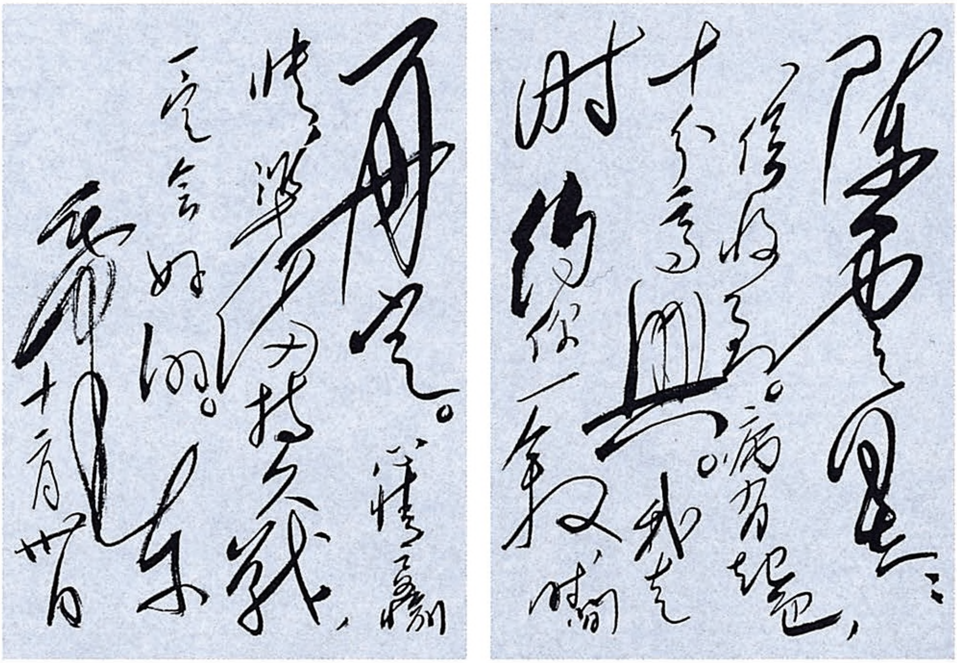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这时正在杭州养病。



毛泽东致陈云信的信封。



毛泽东致陈云信的手稿。

给李讷[1]的信

（1959年12月30日）

李讷：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慢慢积累。大部头书少读一点，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2]。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

父亲
十二月卅日上午六时

---

[1]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

[2]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带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写这封信时，毛泽东在杭州。

给田士清[1]的信

（1959年12月30日）

懋斋学兄：

惠书及诗收读，十分感谢！专复，顺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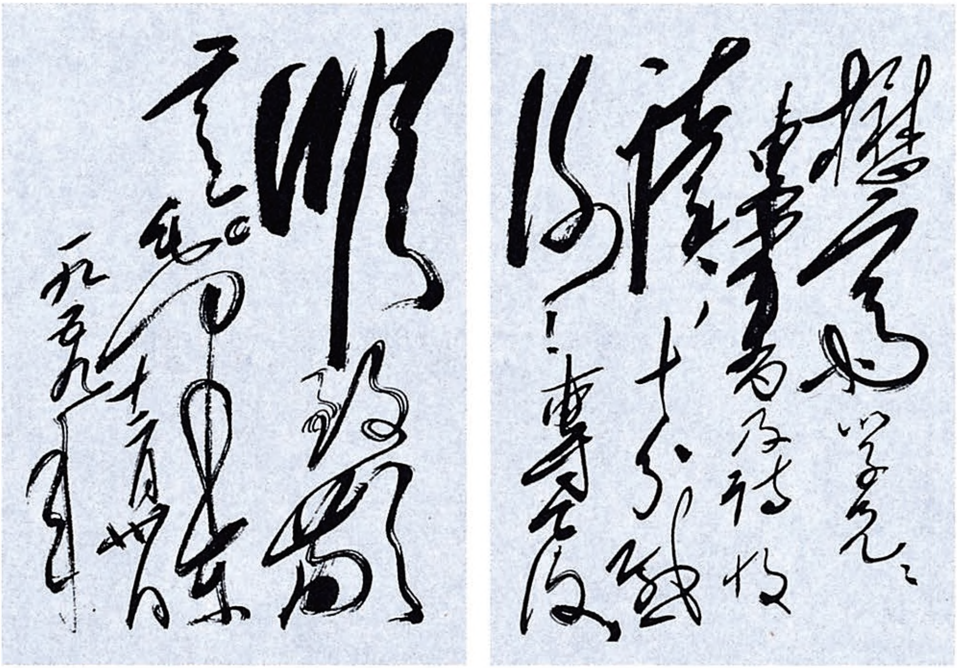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卅日

---

[1] 田士清，字懋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毛泽东致田士清信的手稿。

对《彻底驳倒富裕中农反对“八字宪法”的谬论》等三个材料的批语[1]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退毛。

教育富裕中农问题。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12月25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六六号上。这期简报登载了3篇材料，其中《彻底驳倒富裕中农反对“八字宪法”的谬论》的材料说，广东省的粮食生产特别是晚造生产今年又获大丰收，但相当一部分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上中农和老农民，却把丰收原因归结为“风调雨顺，规格下放，执行疏植，老农挂帅”等，企图反对党的领导和农业“八字宪法”，动摇广大群众对明年继续跃进的信心。因此，全省在农村开展了一场对农业“八字宪法”的大辩论。经过群众性的辩论之后，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冬季生产，为今后更全面地贯彻“八字宪法”和实现明年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打下了巩固的思想基础和技术基础。《河北深入检查农村整风整社工作》的材料说，河北省农村整风整社运动的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彻底搞臭了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道路，使广大群众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但在运动中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个别地区计划重点批判的面偏宽。由于政策交代不清，

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怕公社收回多留的牲畜、果林等，出现了杀猪宰羊、滥伐树木的现象。为了把运动搞深搞透，省委要求各地对少数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坚持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富裕中农，必须批深批透。《甘肃省委进一步加强农村整社运动的领导》的材料说，甘肃省农村整社运动已经全面开展，目前省委又作了进一步的安排和部署，指出整社的中心内容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即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富裕中农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方法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重点批判对象一般不超过总人口的1%，一律不戴帽子。

对国家计委关于今后八年钢铁工业发展的初步设想的批语[1]

（1959年12月）

各同志阅，直退毛。

要件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1959年12月印发的《计划工作简报》特第一期上，这期简报登载了《今后八年（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国钢铁工业的速度、规模和布局的初步设想》，主要内容是：（一）今后8年我国钢铁工业将持久地、高速度地向前发展。1959年我国钢产量将达到1370万吨到1380万吨，1962年将达到3000万吨左右，1967年将完全可能达到6000万吨，实行的结果达到7000万吨或再多一点也有可能。这样，今后8年钢的产量平均每年增长580万吨至700万吨，即每年平均增长20%到23%。（二）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不仅大大超过美国，而且也快于苏联。（三）经过8年努力，我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四）钢材的品种和质量将适应国民经济继续跃进和尖端工业的需要。（五）努力从材料、设备和投资上保证实现上述目标。

对新华社的指示

（1959年12月）

新华社这些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没有做什么（按：指发展国外分社）。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为什么不派？没有干部？中国这么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过去没帮助？

应该大发展，各个国家都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广播。

对国家计委关于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超情况预测材料的批语[1]

（1959年12月）

各同志即阅，下午直接退毛。

极要件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办公厅1959年12月27日印发的《计划工作简报》特第二期上，这期简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八年（1960至1967年）规划的初步设想实现后，我国不仅将远远超过苏联1937年的水平，而且将超过苏联1958年的水平。第二，在实现八年规划的基础上，再经过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即到1972年，我国将在主要产品的产量方面，接近或赶上苏联的水平。第三，到1972年，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我国也将赶上和超过美国。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1]
（节选）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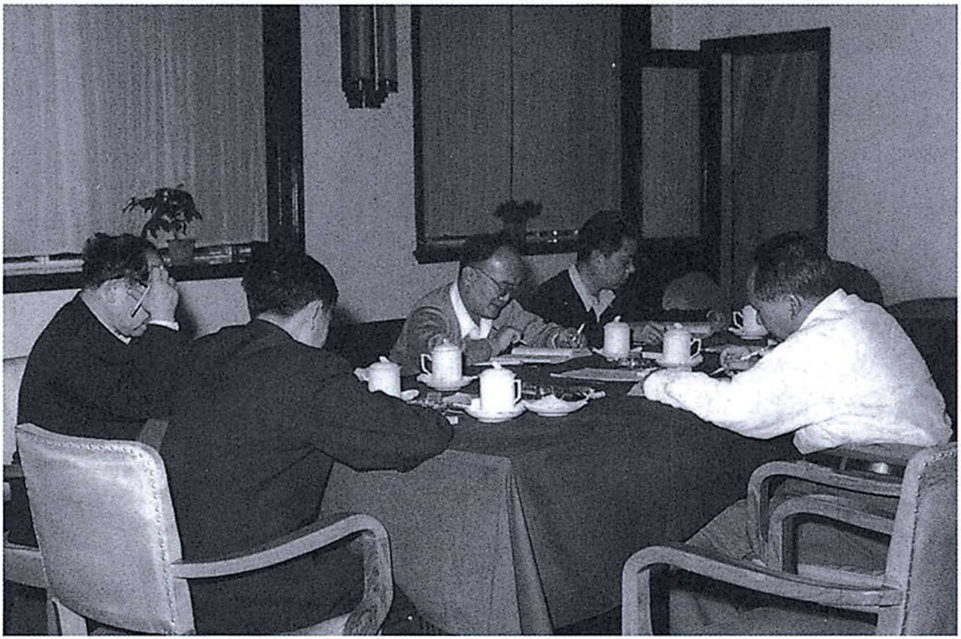
一　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们的主观运动的规律和外界的客观运动的规律是同一的。辩证法的规律，是客观所固有的，是客观运动的规律，这种客观运动的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成为主观辩证法。这个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是同一的。这是恩格斯多次阐明的论点。说思维和

---

[1]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以更好地认识与纠正当时出现的一些错误倾向，毛泽东给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写信，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同时提出也可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随后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一要求。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毛泽东拟定讨论的18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就包括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分别组织了读书小组。毛泽东组织的读书小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参加。这个读书小组从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通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毛泽东发表了许多谈话。

存在没有同一性，势必走到反对恩格斯的论点。当然，思维和存在不能画等号。说二者同一，不是说二者等同，不是说思维等同于存在。思维是一种特殊物质的运动形态，它能够反映客观的性质，能够反映客观的运动，并且由此产生科学的预见，而这种预见经过实践又能够转化成为事物。恩格斯举了这方面的例子。也可以拿我们的人民大会堂作一个例子。人民大会堂现在是事物，但是在它没有开始建设以前，只是一个设计的蓝图，而蓝图则是思维。这种思维又是设计工程师们集中了过去成千成万建筑物的经验，并且经过多次修改而制定出来的。许多建筑物转化成人民大会堂的蓝图——思维，然后蓝图——思维交付施工，经过建设，又转化为事物——人民大会堂。这就说明蓝图能够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够转化为客观世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和党的理论工作者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图为毛泽东等在杭州学习。

界；说明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人们的主观世界可以同客观世界相符合，预见可以变为事实。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1]。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教科书说，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规律”。[2]把事情说得太容易了。这要有一个过程。规律，开始总是少数人认识，后来才是多数人认识。就是对少数人说来，也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也要经过实践和学习的过程。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斯大林自己还不是对有些东西认识不清楚？他曾经说过，搞得不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发展到冲突的程度；搞得

---

[1]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原文是：“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2] 《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化，人们成为自己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人。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以后，能够完全自觉地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来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6页）

好，就可以不致发生冲突。[1]斯大林的这些话，讲得好。教科书比斯大林退了一步。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过去是八年到十年出现一次，经过多次的反复，就有可能

---

[1] 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7页）

使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规律。在土地改革中要实行平分土地的政策，也是经过反复多次以后才能认识清楚的。第二次国内战争的后期，当时的中央曾经主张按劳力分配土地，不赞成按人口平分土地。当时“左”倾冒险路线的同志认为按人口平分土地是阶级观点不明确，群众观点不充分，对发展生产不利。实践证明错的不是按人口平分土地，而是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因为按劳动力分配土地，对富裕中农最有利。当时，他们还主张地主不分田。既然地主不杀掉，却不给谋生之道，地主有劳动力，却不分给他们土地，这种政策，是破坏社会、破坏社会生产力的政策。富农分坏田，也是这种性质的政策。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土地改革中贫农总是打富裕中农的主意，他们的办法是给富裕中农戴上富农的帽子，把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这个问题经过反复争论和实践，结果证明，按人口平分土地是符合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中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

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

清楚的。例如要研究动物的一般规律，就必须分别研究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等等的特殊规律。

绝对真理包括在相对真理里面。相对真理的积累，就使人们逐步地接近于绝对真理。不能认为相对真理只是相对真理，不包含任何绝对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们忽然找到了绝对真理。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例如，保守和进步，稳定和变革，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也是两重性。生物的代代相传，就有而且必须有保守和进步的两重性。稻种改良，新种比旧种好，这是进步，是变革。人生儿子，儿子比父母更聪明粗壮，这也是进步，是变革。但是，如果只有进步的一面，只有变革的一面，那就没有一定相对稳定形态的具体的动物和植物，下一代就和上一代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人就不成其为人了。保守的一面，也有积极作用，可以使不断变革中的植物、动物，在一定时期内相对固定起来，或者说相对地稳定起来，所以稻子改良了还是稻子，儿子比父亲粗壮聪明了还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稳定，没有进步和变革一方面，植物和动物就没有进化，就永远停顿下来，不能发

展了。

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这里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能来到。

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例如，要有三年半的时间，要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同样有若干的部分质变。在解放战争期间，战争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个新的阶段同旧的阶段比较，都有若干性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一定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过渡到了共产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阶段的一些东西必然是要灭亡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阶段，也还是要发展的。它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难道那个时候只有量变而没有不断的部分质变吗？

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这一段[1]很有问题，不如斯大林讲得好。教科书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说法不合乎辩证法。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哪里有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只能说有对抗性的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不能说有不可以调和的矛盾和可以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没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没落的，所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是前进道路上的矛盾，这点教科书是说得对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然而，同以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事情不会弄到发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类冲突的地步。这些矛盾是发展中的矛盾，是社会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群众——共产主义建设者的积极活动，能够及时克服产生的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对社会发展进行着有意识的有计划的领导。”（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4页）

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1]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2]《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无产阶级哲学的发展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是这样。资产阶级哲学家都是为他们当前的政治服务的，而且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英国曾经出现了培根和霍布斯这样的资产阶级唯物论者；法国曾经出现了百科全书派[3]这样的唯物论者；德国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有他们的唯物论者。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唯物论者，各有特点，但都是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所以，有了英国的，还要有法国的；有了法国的，还要有

---

[1] 即《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2] 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国出版的中文译本，曾有将书名译为《帝国主义论》的。

[3] 百科全书派，是18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在编纂《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形成的派别。其核心是以主编狄德罗为首的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封建特权制度和天主教会，主张一切制度和观念要在理性的审判庭上受到批评和衡量。

德国的和俄国的。

二　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积极地参加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在一九〇五年提出了同资产阶级相区别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不只是要解决推翻沙皇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在推翻沙皇的革命斗争中如何同立宪民主党[2]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幼年的党，从主要意义上来说，就是指我们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的时候，没有看到资产阶级会叛变革命，而且也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叛变的准备。

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这里说，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在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被粉碎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个说法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就和孙中山建立了这种联盟。大革命失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这个联盟。但是，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因素

---

[1] 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的前身，1912年正式建立。

[2] 立宪民主党，又称人民自由党，俄国自由资产阶级政党，1905年成立。主张君主立宪，支持沙皇政权。

还存在，如宋庆龄、何香凝[1]坚持同我们合作。九一八事变[2]后，杨杏佛、史量才[3]也转过来靠近我们了。抗战时，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又建立了抗日的联盟；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同他们是反蒋反美联盟。

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

---

[1] 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今属海南）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孙中山夫人。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蒋介石的叛变行为。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廖仲恺夫人。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3] 杨杏佛（1893—1933），江西清江（今樟树）人。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后任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等职。九一八事变以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同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进行反蒋抗日的进步活动。1933年6月18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史量才（1880—1934），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1913年起任《申报》总经理，在蒋介石统治初期采取拥蒋立场，九一八事变以后政治态度逐步改变。上海一·二八抗战时，曾捐款支持抗日，并任抗日群众组织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后来又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4年11月13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国际[1]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的一个决议中说，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要反对资产阶级。这个决议没有区别中国资产阶级的两个部分，甚至认为中间派比蒋介石更危险。当时的“左”倾冒险分子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结果把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这个决议也没有区别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立三路线[2]就提出，一省或数省胜利之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他们不懂得，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之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这一段有问题。这里讲“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通过议会和平地取得政权是有现实的可能性的”。这里说“某些”究竟是哪一些呢？欧洲的主要国家，北美洲的国家，现在都武装到了牙齿，他们能让你和平地取得政权吗？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和革命力量都要有两手准备：一手是和平方法

---

[1]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1922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43年5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6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

[2] 立三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久，李立三又制订了组织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取得胜利，一手是暴力斗争取得政权，缺一不可。而且要看到，总的趋势来说，资产阶级不愿意让步，不愿意放弃政权，他们要挣扎。资产阶级在要命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用武力？十月革命，是准备了两手的。俄国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前，列宁也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取得胜利。七月事件[1]说明，把政权和平地转到无产阶级手里已经不可能，布尔什维克转过来进行了三个月的武装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资产阶级勾结十四个国家，发动了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和武装干涉。在俄国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三年的武装斗争，才巩固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至于中国革命，我们是用了革命的两手政策来对付反动派的反革命两手政策的。

说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尖锐，这不合乎实际。中国革命可尖锐呢。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接着没收了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中占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采取和平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利用他们的经济、文化来为社

---

[1]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奉行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7月16日，革命群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工兵代表苏维埃正式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武装夺取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经极力劝阻无效，决定参加示威。7月17日，彼得格勒50万工人、士兵和水兵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临时政府出动军队，屠杀示威群众，死伤400多人，同时逮捕和杀害布尔什维克党人，封闭《真理报》，解除赤卫队武装。这一事件称七月事件。此后，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

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改造过程中，还经过了“三反”“五反”[1]那样激烈的斗争。

列宁指出的那句话很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只有东德和捷克；其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都比较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革命都没有革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革命首先从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突破。十月革命时的俄国是这样的薄弱环节，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也是这样的薄弱环节。俄国和中国的共同点是：都有相当数量的无产阶级，都有大量的农民群众，都是大国。

这一段[2]值得研究，对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讲清楚。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

---

[1] “三反”，指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指1952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2]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在某些国家中，随着推翻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革命立刻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1917年10月俄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同时彻底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另外一些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中，最初主要是解决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要由每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有没有资本主义前的形式存在、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情况等等来决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0～331页）

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我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差不多，而封建经济则是更大量地存在。我们经过解放战争，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我们立即没收了占全国工业、运输业固定资产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转为全民所有。同时，用了三年的时间，完成全国的土地改革。如果因此说全国解放以后，“革命在最初阶段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只是后来才逐渐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对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长时期内是反帝反封建。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含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

的道路。另一方面，《共同纲领》[1]规定了各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宪法又给了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的保证，这些又使他们感到接受改造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并且能够在经济上、文化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现在，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实际上已经成了国家的雇员，对企业没有实际上的管理权。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拉住它，又整住它。中国民族资本家从来没有统一过，解放前有什么上海帮、广东帮、天津帮之类行会性的组织，解放以后我们帮助他们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把他们统一起来，又对资本家区别不同情况，分而治之。这几年每年还给他们一亿二千万元定息，实行大规模的收买，收买整个阶级，收买他们整个阶级的几百万人，包括家属在内。

教科书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问题，说得不对。它只说了我们对民族资本的改造政策，没有说我们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政策。对于民族资本，也没有说我们是经过了三个步骤，即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来实现对它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每个步骤来讲，如加工定货，也是逐步前进的。公私合营也经过了从单个企业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由于我们的国家一方面掌握了原料，另一方面又控制着市场，同时又对资本家贷给流动资金，这样就使民族资本家不能不接受改造。实行这样的改造政策，不仅生产没有受到破坏，而且有些私营工厂在过去几

---

[1] 《共同纲领》，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

年中还进行了部分的扩建。资本家由于在过去几年中有利可图，有些人也还自愿地向工厂进行投资。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例如，公私合营以后给资本家定息，就是一个新经验。

教科书的这个提法[1]不妥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是由于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内的因素是主要的。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帮助，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不能决定我们能不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只能影响我们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是前进得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的问题，有帮助可以快一些，没有帮助会慢一些。所谓帮助，包括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他们成功和失败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的学习。

教科书承认我们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的，但是，它没有写清楚我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和阶段，它也没有吸收我们所说的公私合营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这个意思。现在来说，已经不是四分之三，而是十分之九，甚至更多了。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社会主义革命要在俄国取得胜利，至少要有中等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是因为俄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的国家。现在，当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了胜利，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已经形成的时候，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前经济形式占优势的国家里，由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也可以胜利地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1页）

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1]。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三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2]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

---

[1] 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525页）

[2] 《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同时必须注意到，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在主要方面和基本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它在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是由每一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民族、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人民的传统，以及某一个时期的国际环境产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9页）

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我们的情况和他们不同，一条是有苏联的存在和帮助，这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但是，主要是国内的因素。我们搞了二十二年的根据地政权工作，积累了根据地管理经济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管理经济的干部，同农民建立了联盟，从他们那里得到了粮食和原料。所以，在全国解放以后，很快地进行和完成了经济的恢复工作。接着，我们就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同时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2]的建设。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

---

[1]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中共中央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于1952年提出的。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以下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2]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1953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个计划的编制，从1951年开始进行，历时4年，五易其稿，于1955年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执行的结果是，到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到1957年，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1]。

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当时还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2]，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进委员会”，要当社会主义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还搞了一个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3]。此外没提其他的具体措施。

---

[1] 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2] 指斯大林《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

[3] 指《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1月公布。1957年10月公布修正草案。后又经修改，于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后作为正式文件颁发。纲要全文共四十条，提出了我国农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以及农村商业、信贷、交通、邮电、广播、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规划。

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1]这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通过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来实现平衡。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我们对必要比例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教科书说“自发性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是不相容的”[2]，可以这样说。但是不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里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

认为对比例关系的认识，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

---

[1] 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原文是：“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

[2] 《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分配的必要比例是有计划地实现的。自发性和自流性是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存在不相容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5页）

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为什么教科书过去没有出版，为什么出版了以后要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还不是因为过去认识不清楚，现在也还认识不完善吗？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

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

这段[1]讲得好。“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这个当作任务来提，是对的。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因为消灭了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社会主义计划化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它要求经常总结共产主义建设的实践，利用科学技术的一切成就。用计划来指导国民经济，这就是预见。科学的预见基于对客观的经济规律的认识，并根据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业已成熟的需要。”（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2页）

私有制，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所以就有可能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以造成许多相对的平衡。

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

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教科书不讲这个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例如，经济发展了，到处感到技术人员不够，干部太少，于是就出现干部的需要和干部的分配的矛盾，这就促进我们多办学校，多培养干部，来解决这个矛盾。

这段[1]写得不对，既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种平衡，也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某种不平衡。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有不平衡的方面，也有平衡的方面。问题是这种平衡和不平衡，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衡和不平衡，在性质上不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例如解放初期，我们的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来人，地质勘探情况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极不平衡，经过几年来努力加强工作，这种不平衡已经走向平衡。但是，技术发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发展极不平衡，必然加深生产中的比例失调现象，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保证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有计划地发展科学和技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2页）

展的新的不平衡又出现了。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的技术部门出现以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更加显著，例如，我们现在要搞尖端技术，就感到许多东西不相适应。

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我们读书也是波浪式的，读书之前要做别的事情，读了几个钟头以后，要休息，不能无日无夜地读下去。今天读得多，明天读得少；而且每天读的时候，有时议论多，有时议论少。这些都是波浪，都是起伏。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有了头年的计划，又要有第二年的计划；有了年度的计划，又要有季度的计划；有了季度的计划，还要有月计划。一年十二个月，月月要解决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计划常常要修改，就是因为新的不平衡的情况又出来了。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各国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统计局的材料，说我国日用品销于农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三左右。不实行工农业并举，这怎么能行？我们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工农业并举，到现在已经四年了，真正实行是在一九六〇年。

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关于工农业的关系问题，要说工业向农业要求扩大市场，也要说农业向工业要求增加各种工业品的供应。要保证农民得到更多的工业品，保证农民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

这里说到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生产资料生产增长了九十三倍，消费资料生产增长了十七点五倍，问题是，九十三同十

七点五的比例，是否对发展重工业有利。这么多年来，消费品生产只增长了那么一些，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又不讲“物质刺激”呢？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

在农业区，我们也要搞工业。

这一段[1]的说法，原则上对。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拿我们的辽宁来说，这个省的工业很多，城市人口已经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过去因为总是把工业放在第一位，没有同时注意大力发展农业，结果本省的农业不能给城市保证粮食、肉类、蔬菜的供应，总是要中央从外省往那里运粮，运肉类，运蔬菜。主要的问题是农业劳动力紧张，没有必要的农业机械，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限制，增长较慢。过去我们因为看到这里的工业多，在给他们任务的时候，总是要他们多抓工业。没有了解到，恰恰是因为那里的工业比重大，更应该注意好好地抓农业、发展农业，不能只强调抓工业。工业发展了，城市人口增加了，对农业的要求也就更多了。因此就必须使农业能够和工业得到相适应的发展。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必须对农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更多地增加农产品的生产。

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3页）

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例如，一九六〇年估计可生产钢材一千三四百万吨，拿出十分之一的钢材来搞农业技术改造和水利建设，其余十分之九的钢材，主要还是用于重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在目前的条件下，这就是工农业并举了。这样做怎么会妨碍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发展工业呢？

这里说，“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1]，说得好。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曾经打断了城乡的旧的经济联系，在解放初期，全国普遍召开物资交流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城乡的经济联系，包括恢复过去的牙行、经纪等。

这段话[2]说得对。资本主义长期着重发展轻工业。我们把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公式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例如，中央和地方，以中央为主导；工业与农业，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上不去，

---

[1] 《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是以尽力发展国营工业和农民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为前提的。从小农经济的性质看来，农民迫切需要的同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是通过买卖的交换。在过渡时期，国营工业和小农经济之间的商业结合是经济的必然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6页）

[2]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国家的工业化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品的生产优先增长的规律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的。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为制造消费品部门的发展、为提高人民的福利创造前提。”（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5页）

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东欧各国过去几年都是这样的。从一九六〇年起，我们要增加农业所需要的钢材。

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例如，我国的东北和上海，因为那里的工业基础比较好，国家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相对地较慢一些。而另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而又迫切需要发展的地区，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却快得多。上海解放后十年共投资二十二亿元，其中包括资本家投资二亿元。上海原有工人五十多万，现在全市工人除了已调出几十万人外，还有一百多万，只比过去增加一倍。这同一些职工大量增加的新城市相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业基础差的地区的速度问题更加尖锐。

苏联的工农业劳动生产率，现在还没有超过美国，我们则差得更远。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

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社会主义竞赛这一节，一般写得不错。引用的斯大林的话也好。斯大林讲了先进者给予落后者以帮助，求得普遍的提高。普遍提高之后，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又要求进一步的普遍提高。

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大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根据统计，我国一九五八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六；一九五九年计划完成后，估计一定会超过百分之七十。即使这样，我们还可以不宣布实现了工业化。我们还有五亿多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如果现在就宣布实现了工业化，不仅不能确切地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而且可能由此产生松劲情绪。

我们现在还不一般地提自动化。机械化要讲，但也不要讲得过头。机械化、自动化讲得过多了，会使人们看不起半机械化和土法生产。过去就曾经有过这样的偏向，大家都片面追求新技术、新机器，追求大规模、高标准，看不起土的、半洋半土的，看不起中小的。提出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后，这个偏向才克服。

我们要实现全盘机械化，第二个十年还不行，恐怕要第三个十年以至更长的时间。在一个时期内因为机器不够，要提倡半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最近苏北发明一种挖泥的新技术，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样的办法，应该大大提倡。

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

反对分散建设资金，如果是说建设单位搞得过多，因而都不能按期竣工，这当然是要反对的。如果因此就反对建设中小型企业，那就不对。我国新的工业基地，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大量发展中小型企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今后钢铁工业在建设一些大型基地的同时，还要建设一批中型和小型的钢铁基地。过去的中小型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拿一九五九年来说，全国全年生产的生铁是二千多万吨，其中一半是由中小型企业生产的。今后中小型钢铁企业对钢铁工业的发展还要起很大的作用。许多小的会变成中的，许多中的会变成大的，同落后的会变成先进的、土法的会变成洋法的一样，这是客观发展的规律。

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极性。

我们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曾经说到，要用四个五年计划到五个五年计划来实现农业机械化。一九五九年以前，我们的农业生产，主要靠兴修水利。一九五九年我国七个省遇到很大的旱灾，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要不减产而能增产，是不能设想的。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末，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级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事在人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条件相同，经济条件相同，一个地方“人为”了，结果就好；一个地方“人不为”，结果就不好。例如，在河北省内，京汉路沿线的机井很多，津浦路沿线的机井却很少，同样是河北平原，同样是交通方便，但是土地的改良却各不相同。这里可能有土地利于或不利于改良的原因，也可能有不同的历史原因，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事在人为”。同在上海，有的养猪养得好，有的却养不好。崇明县，原来说那里芦苇多，不利于养猪，现在却看到芦苇多的条件下不但不妨碍养猪，反而有利于养猪。这些说明养猪多少、好坏这件事，同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同“事在人为”是密切相关的。北京昌平县过去常闹水旱灾害，修了十三陵水库，情况改善了，还不是“事在人为”吗？河南省计划在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以后再用几年，治理黄河，完成几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也都是“事在人为”。实际上，精耕细作，机械化，集约化，都是“事在人为”。

这最后一句话[1]讲得不对。拿我国来说，粮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也同样有这个问题。应该改成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建立必要的后备。这是一个任务，不能说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已经解决了。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这里把厉行节约，积累大量的物力和财力，当成只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要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难道困难少了，就不需要厉行节约了吗？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他们和我们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句话：“为了防止和消除国民经济中的个别比例失调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必要的后备。”（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27页）

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1]。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2]，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

[1] 《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同时，社会主义的分工可以使各个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平等成员，彼此取长补短，因而有可能节约财力和人力，消除国民经济中个别部门的不必要的平行发展，以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每个国家都可以集中自己的人力财力来发展在本国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有生产经验和干部的部门。而且个别国家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在工业中达到合理的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在粮食和原料生产上达到最适当的分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59页）

[2] 参见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文献》中的《答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质问》。新的译文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这段[1]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做工作。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

历史的规律是，只有经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阶级，只有消灭了阶级才能永远消灭战争。不进行革命战争，要消灭阶级，我们不相信。没有消灭阶级，要消灭战争武器，这不可能。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由于剥削的消灭，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根本改变了。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和企业领导人员间的利益对立消失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体力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他们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由此就产生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旨在不断改进生产的创造性的合作。"（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00页）

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当然我们是希望不打世界大战的，我们是希望和平的。我们赞成用极大的努力来禁止原子战争，并且争取两个阵营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争取十年、二十年的和平，是我们最早提出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这个主张，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很有利的。

四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科学社会主义部分所研究的，是阶级斗争学说、国家论、党论、战略策略，等等。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

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矛盾、斗争、分解是绝对的，统一、一致、团结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1]，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2]。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

[1] 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即产业革命。指17至18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从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过渡到采用机器的工厂制度的过程。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原文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2页）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以前，不存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封建社会中已经初步成长起来。在这点上，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有所不同。但是，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里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教科书在这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不承认矛盾是动力。

这一段[1]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个说法不妥当。矛盾才是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斗争的基本形式之一，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在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基础上，揭露和消灭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铲除一切官僚主义现象，发现加速经济发展的新的潜力，从而克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3页）

这一段[1]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

“决定因素之一”“根本方法之一”[2]，这个提法可以赞成。但是当作决定性动力，就不对了。要保证人们吃饱饭，然后人们才能

---

[1] 指《教科书》中以下一段话：“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和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消灭，苏联没有对抗性的阶级了，没有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以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同志式的合作为特征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间的阶级差别，同这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一样，日渐消失。可是资本主义社会却被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弄得四分五裂，很不稳定；而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在苏联的统治地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各族人民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些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赖以发挥的经济基础。而这些动力又反过来给予经济很大的影响，加速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页）

[2] 《教科书》中包含这个引文的那段话是：“在社会主义阶段，使工作者从个人的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之一。保证这种关心的，是工作者的报酬以他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转移。利用每个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对劳动结果的关心是社会主义经营的根本方法之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7页）

继续生产。没有这一条是不行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精神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

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教科书对于为前途、为后代总不强调，只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常常把物质利益的原则，一下子变成个人物质利益的原则，有一点偷天换日的味道。他们不讲全体人民的利益解决了，个人的利益也就解决了；他们所强调的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这种倾向，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1]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表现。历史上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英勇牺牲，他们也不是为个人的眼前利益，而是为他们这个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后代

---

[1] 经济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种机会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经济主义反对工人阶级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认为工人阶级只应当以罢工为手段，去进行争取改善经济状况和切身利益的斗争，否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作用。工团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思潮。20世纪初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地流传很广。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索烈尔、拉加德尔。工团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传工会高于一切和管理一切，幻想以工会代替国家机构。

的利益。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1]。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后，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

---

[1] 《教科书》中这句话的原文是：“社会主义企业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同志式的合作和社会主义的互助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2页）

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多少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

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趣和热情呢？

人民的需要是逐步满足的。

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了，也不能一下子完全满足需要，因为需要是不断被创造的。拿过去来说，没有文字，人们就没有对文具的需要，文字产生了，人们对文具的需要也随着创造出来了。拿现在来说，因为发明了电视机，所以人们对于它的需要也随着提出来了。

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

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

如果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先写生产资料私有制变革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把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民族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个体农民私有制，再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把个体的手工业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然后，再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矛盾，以及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和解决的办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本身有个变化、变革的过程，全民所有制本身也有变化、变革的过程，如体制下放、分级管理、企业自治权等。在我们这里，同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但是有的由中央部门直接管，有的由省、市、自治区管，有的由地区管，有的由县管。都是全民所有制，归谁管，归哪级管，只要一个积极性还是要两个积极性，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经常注意解决的很关重要的问题。人民公社管的企业，有的具有半全民半集体的性质。中央部门管的和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有没有这种自治权，对促进生产的发展，还是阻碍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

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七律·读报有感[1]之一

（1959年）

反苏忆昔闹群蛙[2]，
今日欣看大反华[3]。
恶煞腐心兴鼓吹[4]，
凶神张口吐烟霞[5]。
神州岂止千重恶[6]，

---

[1] 读报有感，阅读报纸产生的即兴感想。

[2] 苏，指苏联。反苏，1956年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苏的浪潮。反苏忆昔闹群蛙，即“忆昔反苏群蛙闹”，意思是说，记得过去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苏联，如群蛙鼓噪，喧嚣一时。

[3] 今日，现在。欣，喜悦。反华，即反对中国。1958年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又在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

[4] 恶，凶恶，凶狠。煞，凶神。恶煞，即凶神。腐心，形容痛恨之极。这里指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切齿痛恨苏联、中国。兴，发动。鼓吹，宣传，宣扬。这里指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叫嚣。

[5] 凶神，义同恶煞。亦指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张口，张开嘴巴。烟霞，中国神怪小说中常描述许多妖魔鬼怪，口吐烟雾或霞光等迷惑、杀伤对方。这里指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颠倒是非，迷惑人民的欺骗性宣传。

[6] 神州、赤县，中国的别名。岂，哪里。止，仅，只。重，层。千重，极言其多。恶，坏的行为。这里是反语，讽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口气。

赤县原藏万种邪[1]。
遍寻全球侵略者[2]，
惟馀此处一孤家[3]。

---

[1] 原，原来，本来。藏，隐藏。万种，极言其多。邪，坏的东西。这里也是反语，讽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口气。

[2] 侵略者，指帝国主义。

[3] 惟馀，只剩。孤家，古代国君诸侯自谦之称。这里指帝国主义作恶多端，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最后成为孤家寡人，落得凄惨的下场。

七律·读报有感之二

（1959年12月）

托洛斯基[1]到远东，
不战不和逞英雄。
列宁竟撇头颅后，
叶督[2]该拘大鹫峰[3]。
敢向邻居试螳臂[4]，
只缘自己是狂蜂。
人人尽说西方好，
独惜神州出蠢虫。

---

[1] 托洛斯基（1879—1940），今通译作托洛茨基，1903年起与孟什维克合伙反对布尔什维克。1912年组织反党的八月联盟。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任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多次对抗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列宁逝世后，1926年组织“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逐出境。1932年被开除国籍。1940年死于墨西哥。

[2] 叶督，指清代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字昆臣，湖北汉阳人。1857年，叶名琛任两广总督，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进攻广州。他采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错误办法，被英军俘虏，押至印度加尔各答，1859年吞石自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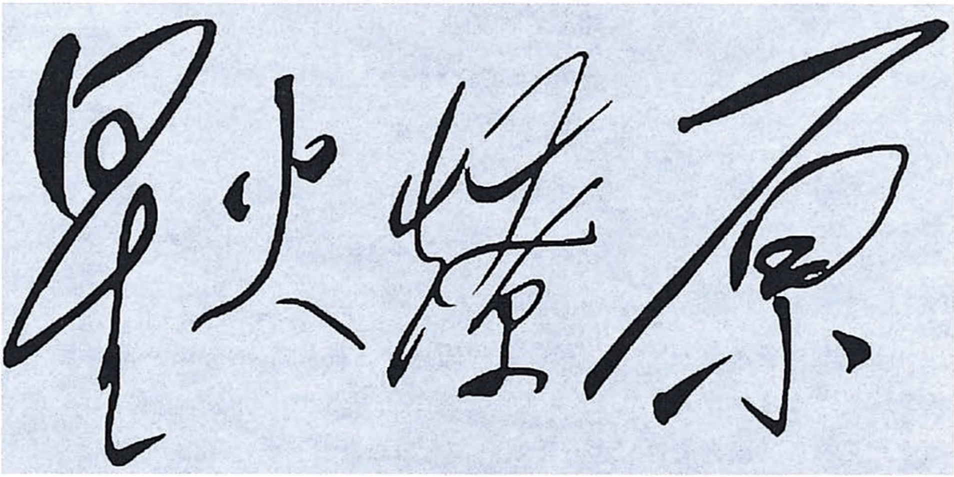
[3] 大鹫峰，措印度灵鹫山，为佛说法之地。这里指代印度。

[4] 螳臂，“螳臂当车”的省说。比喻不自量力。

为《星火燎原》题名[1]

（1959年12月）

星火燎原



毛泽东为《星火燎原》题写的书名。

---

[1] 《星火燎原》从1956年征文开始，到1982年成书，经历了26个年头。这部书受到了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热情关怀，也遭到过“四人帮”的干扰反对。其编辑过程之长，斗争之复杂是出版史上罕见的。《星火燎原》出版的一切版本用的都是毛泽东于1959年12月题写的书名。这是毛泽东惟一一次为一部书题写书名。

赠陈云同志联[1]

（1959年）

国乱思良将；
家贫念贤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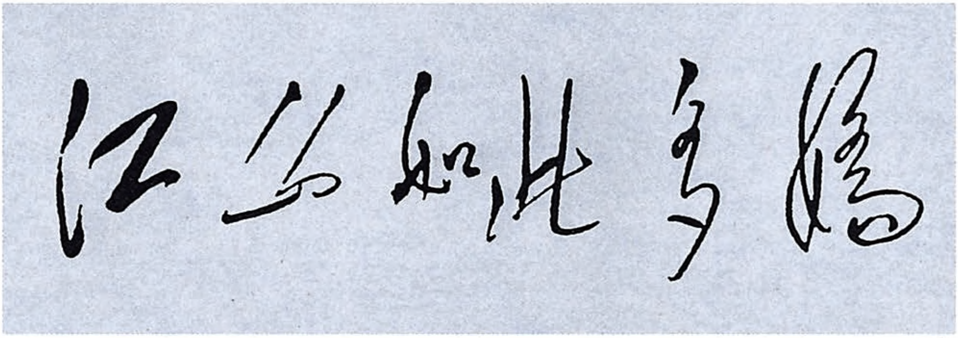
---

[1] 1959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同王任重等发表感想，有感于“浮夸风”的泛滥，而说了这副对联。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时实事求是，先安排市场，后安排基本建设，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念陈云。毛泽东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原名廖陈云。

江山如此多娇[1]

（195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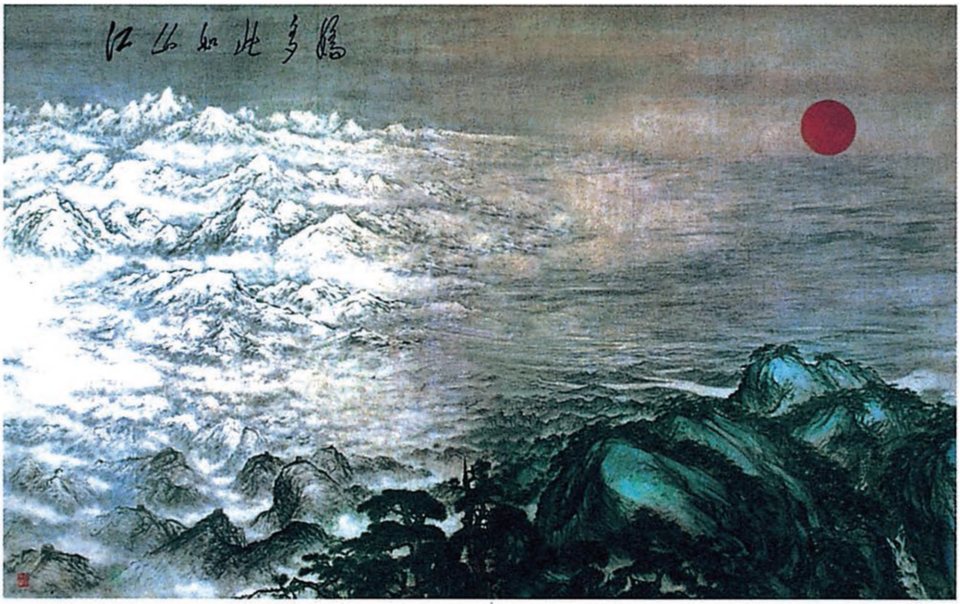
江山如此多娇



毛泽东为傅抱石、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所作国画的题词。

---

[1] 人民大会堂修建过程中，傅抱石、关山月以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为题，为人民大会堂迎宾厅创作了巨幅国画。这是毛泽东为傅抱石、关山月为人民大会堂所作国画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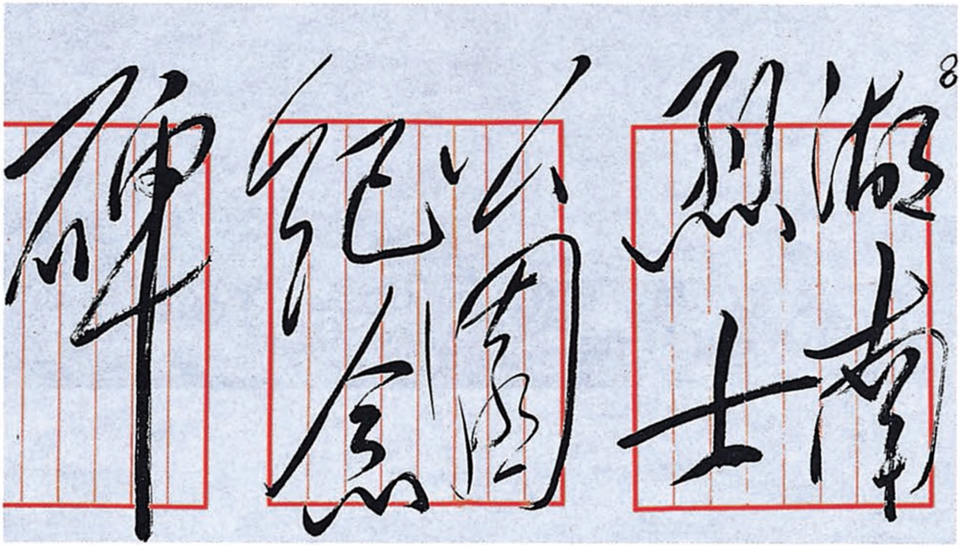


傅抱石、关山月以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为题，为人民大会堂迎宾厅创作的巨幅国画。

为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题名[1]

（1959 年）

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


8
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

毛泽东为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题写的碑名。

---

[1] 湖南烈士公园始建于1951年，1953年正式开园，公园纪念区内矗立着高达58.7米的烈士纪念塔，塔上镌刻：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这个碑名是毛泽东同志1959年亲笔题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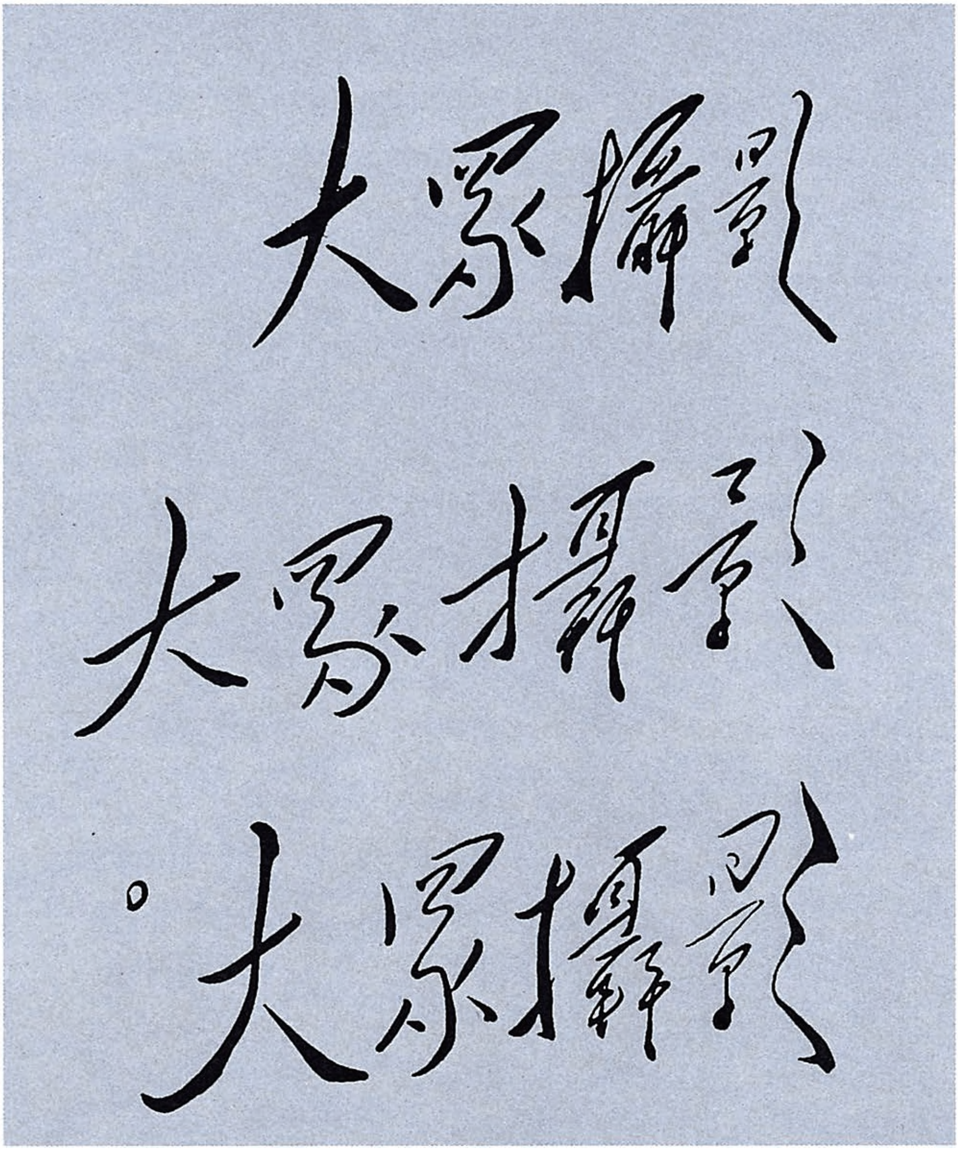
为《大众摄影》题名[1]

（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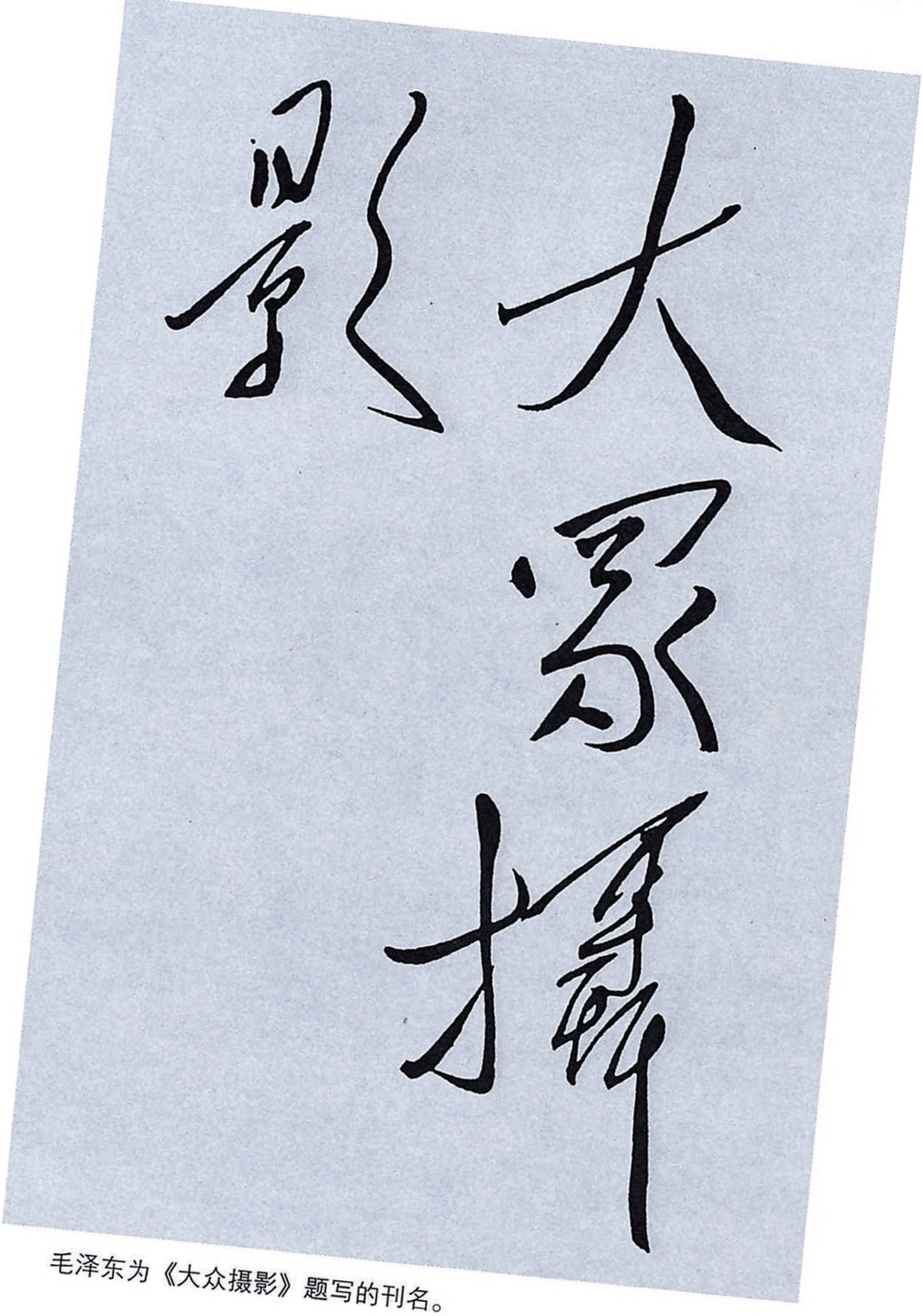
大众摄影

---

[1] 《大众摄影》创刊于1958年7月20日，中国摄影学会主办，当时的刊名是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题写的。1959年毛泽东为《大众摄影》题写刊名。


大衆攝影
大衆攝影
大衆攝影

毛泽东为《大众摄影》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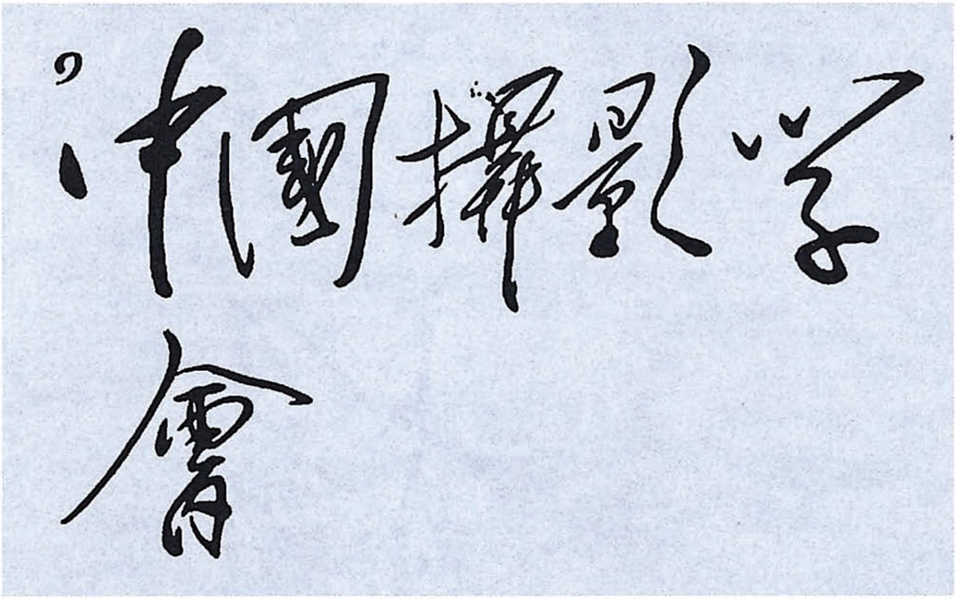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大众摄影》题写的刊名。

为中国摄影学会题名[1]

（195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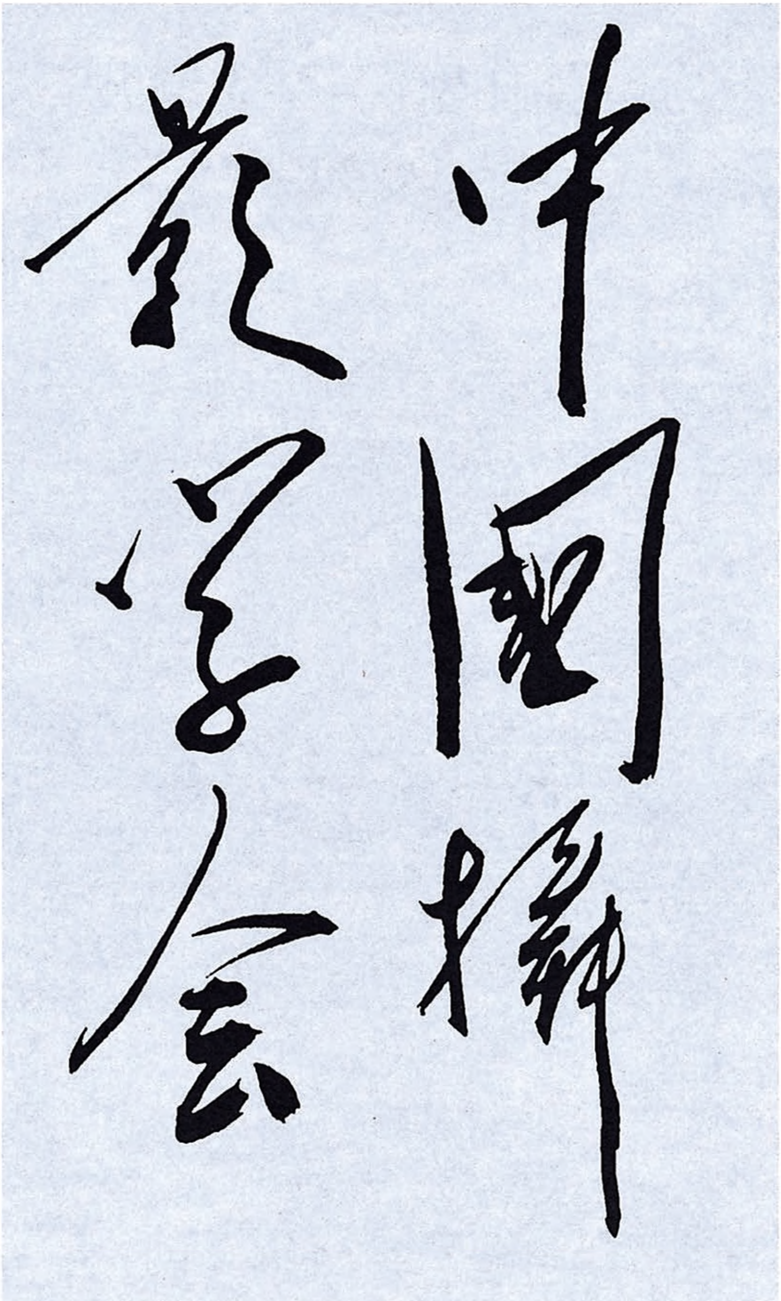
中国摄影学会



毛泽东为中国摄影学会题写的会名。

---

[1] 1956年12月中国摄影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中国文联礼堂召开，宣告了中国摄影学会的成立。1959年毛泽东为其题写会名。



毛泽东为中国摄影学会题写的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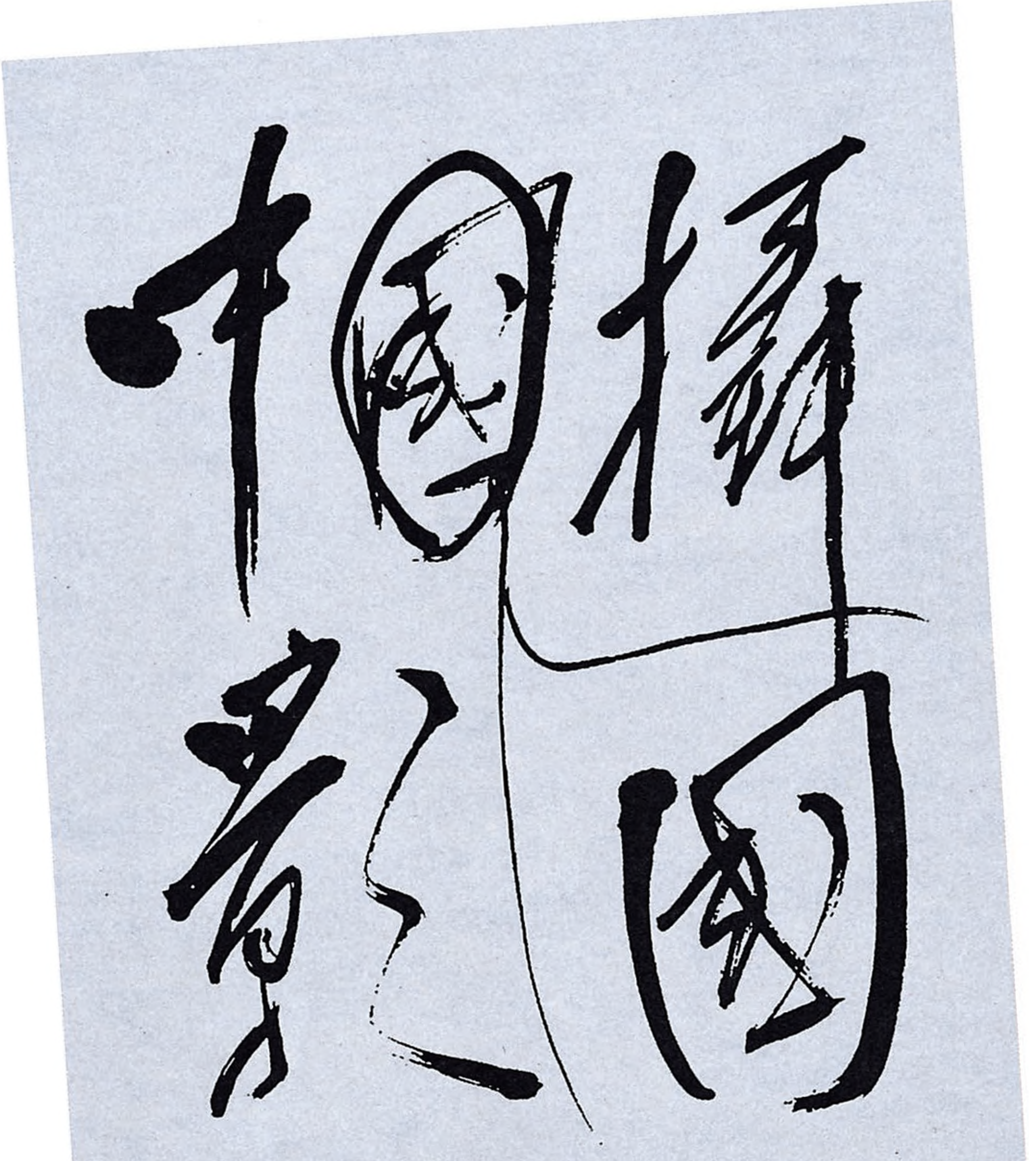
为《中国摄影》杂志题名[1]

（1959 年）

中国摄影

---

[1] 《中国摄影》杂志创刊于1957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专业性摄影艺术期刊。毛泽东为它亲笔题写了刊名。



毛泽东为《中国摄影》杂志题写的刊名。

关于《红楼梦》的一组谈话

（1959年至1973年）

一

《红楼梦》[1]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2]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二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

[1] 《红楼梦》，长篇小说，写于清乾隆时，前八十回曹雪芹作，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所续。

[2] 参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三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1]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你们看过《金瓶梅》[2]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3]是尊重女性的。

四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4]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

---

[1] 指《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2] 《金瓶梅》，即《金瓶梅词话》，明代兰陵笑笑生的长篇小说。

[3] 《聊斋志异》，清代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集，多为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4] 乾隆，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1736年至1796年在位，年号乾隆。

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五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1]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2]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3]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六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4]，《好了歌》和注[5]。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

---

[1] 《官场现形记》，清末李宝嘉的长篇小说。

[2]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3] 《西游记》，明代吴承恩的长篇神话小说。

[4] 即《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5] 参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1]，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2]，又出了个吴世昌[3]。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4]

七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

---

[1] 俞平伯（1900—1990），原名俞铭衡，浙江德清人，作家、学者。所著《红楼梦研究》，为“新红学派”代表作之一。王昆仑（1902—1985），原籍江苏无锡，生于河北，政治活动家，并从事《红楼梦》研究，著有《<红楼梦>人物论》。

[2] 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诗人，文学评论家。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红楼梦》时，将他写于1956年的《论<红楼梦>》节要作为代序。

[3] 吴世昌（1908—1986），字子臧，浙江海宁人，文学史家。研究《红楼梦》的著作有《<红楼梦>探源》（英文本）、《<红楼梦>探源外编》。

[4] 对《红楼梦》及相关课题的研究，称为“红学”。自清代至民国初年的著述，被称为“旧红学”。蔡元培著有《石头记索隐》，用小说中的人物去附会历史上实有的人物，被称为“旧红学”的最后一个代表。1921年，胡适发表长文《红楼梦考证》，注重用历史的方法，依据可靠的材料，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及家世、写作年代和版本等，被称为“新红学”的开创之作。

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1]手里衰落的。

八

许世友[2]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3]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

[1] 雍正，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8），1722年至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

[2] 许世友（1906—1985），湖北麻城许家洼（今属河南新县）人。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毛泽东谈话后的第二天，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3] 指《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1959年的毛泽东。

1960

1960年，毛泽东在校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关于确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地点[1]的批语

（1960年1月1日）

少奇、小平同志：

柯庆施、江渭清[2]二位同志不赞成在南京开会，他们考虑到有几种不甚妥善的因素，主张在上海开。富春[3]同志有信给我，赞成柯等意见，要我向中央建议改变地点。江华[4]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又口头向我转达了此意。请你们召集常委谈一次，考虑一下，是否可以改变地点，并用电话向柯等询问南京所以不宜开会的详细理由，是否有安全原因和房屋原因。再则是否也可以考虑另一地点，即广州，那里有温暖的好处，但时间要推迟三天到五天，因为一律要坐火车去，不能坐飞机。以上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一日上午五时

---

[1] 这次会议后来于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

[2]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3]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江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第一书记。

在关于国际情况的一期简讯上的批语

（1960年1月6日）

一

此件[1]请刘、周、朱、林、邓、彭[2]轮阅，以便讨论国〔际〕问题。

毛泽东

一月六日

二

看此三篇[3]。

三

值得看。[4]

四

可看。[5]

五

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

六

这三条值得注意，我们也要准备。

---

[1] 1959年12月23日编印的这期国际情况简讯，刊载了《印尼政府对陈毅外长建议的初步对策》《奈温访问我国的主要意图》《苏美会谈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若干新动向》《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并从经济上加紧控制台湾》和《资料：美国最近发表的有关对华政策的五个材料内容》等5篇材料。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苏美会谈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若干新动向》《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并从经济上加紧控制台湾》和《资料：美国最近发表的有关对

华政策的五个材料内容》3篇材料。其中第3篇所说的美国最近发表有关对华政策的5个材料分别是：（一）由加州31个团体组成的康伦公司起草的康伦报告。主要内容是建议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以分阶段“探索和谈判”的办法，来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二）洛克菲勒基金委员会报告。主张从长远打算，继续对中国采取“实力政策”，进行冷战。（三）霍普金斯大学报告。主要是从美国目前日益衰落的军事地位方面提出对中苏的政策。（四）外交学会报告。主张用军事力量支持外交政策，继续加强冷战。（五）美国记者斯诺1959年11月4日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主张由国共直接谈判解决台湾问题。

[4]　这个批语写在《苏美会谈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若干新动向》这一材料的标题旁。这一材料指出，美国近来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姿态，如华沙会谈的恢复、美国国务院连续3次发表放宽记者访华限制的声明，特别是美国国务卿赫脱最近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所表现的“中立”态度等，都被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可能改变的征候。美蒋人士对美国这一新的动向，有如下几点反应：(1)美众议员周以德认为，美国要实现裁军，非与中共打交道不可。(2)美国摩门教首领法兰希登认为，美国必须以较多的注意力注视中国在中共领导下的发展。美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也说，美国要想了解中国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进去同中共直接打交道”。(3)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政治处主任翟浩然认为，美工商业家同中国有多年通商的历史，故对中国市场颇感兴趣。(4)原国民党政府军政首要李宗仁及张发奎认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想以同北京打交道的求和手法来争取明年大选的胜利。据分析，美国以上一系列表态的主要意图是：在国际上抢夺和平旗帜，争取民族主义国家，继续推行其“两个中国”的阴谋。但其中也有为扩大与中国的接触留下后路的企图，估计今后美国可能更多地向我伸出触角，甚至利用华沙谈判向我进行一些新的试探。

[5]　这个批语写在《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并从经济上加紧控制台湾》这一材料的标题旁。这一材料说，美国为了推行“两个中国”的阴谋，正从外交、经济等方面加强对蒋帮的控制，美蒋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具体表现为：（一）美国力图贬低蒋帮的国际地位，使台湾成为一个“小中国”。其做法是：(1)公开宣传台湾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2)逐步削弱蒋帮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资格。(3)暗中怂恿其盟国对蒋故示冷

淡。蒋帮对美国上述做法则极力抵制：(1) 一再申明台湾和大陆是一个实体，不可分离。(2) 大力增派驻联合国人员和设法恢复在其他国际组织的会籍。在这一条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五。(3) 加强驻外机构，以稳固对外关系。(二) 美国从经济上加紧削弱蒋帮，以便达到完全控制的目的。具体做法是：(1) 削减美援。(2) 蓄意搞掉蒋帮的公营企业。(3) 积极扶植台湾地方资本。对此，蒋帮的对策是：(1) 力图减少对美援的依赖。(2) 限制美国资本渗透。(3) 极力排斥和打击地方资本。对这3条对策，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六。

印发《外国资产阶级怎样议论中苏分歧》材料[1]的批语

（1960年1月12日）

印发各同志[2]阅读和研究。其中有很多妙文。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

[1] 这篇材料载于1960年1月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资料，主要是摘录了过去一年多来外国资产阶级报刊有关中苏关系问题的言论报道，共归纳为16个问题。在其中以下几个问题的标题下面，毛泽东分别加上了着重号：一、苏联害怕战争，强调和缓、和解与和平共处；中国不怕紧张，“不放弃武力抵抗”，反对“和平主义”。二、苏联相信“美国政府和人民一样要求和平”，采取亲美政策；中国“并不信任美国”，坚持反美政策。四、苏联主张“引诱”民族主义国家“自发地走向社会主义”“拒绝煽动反帝火焰”；中国要联合反帝力量打击美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主张开展革命斗争。九、中国坚持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认为无须“打苍蝇”。十一、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感到“焦虑”。十二、人民公社是“对苏联领导的挑战”。

[2] 指当时正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让伍修权请苏联驻华大使转告赫鲁晓夫的一段话[1]

（1960年1月13日）

谢谢你在1960年1月8日的来信中关于苏联准备单方面宣布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内从苏军人员中裁减一百二十万人的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持苏联采取这一有利于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的斗争的步骤。我们也同意你来信中的这种估计，即帝国主义阵营还远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战争的狂妄阴谋，因此必须继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防御，揭露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以高度警惕性来教育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兄弟合作。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三日

---

[1] 这段话摘自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1960年1月13日晚同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稿。谈话稿中还有以下一段话："我已经把赫鲁晓夫同志的来信送给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刚才用电话指示我，把以下的一段话告诉大使同志，请你立即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印发冶金部党组关于钢铁企业“小洋群”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0年1月13日）

---

[1] 指冶金工业部党组1960年1月8日关于全国钢铁企业“小洋群”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从去年全国大跃进、大办钢铁以来，各地建立的钢铁企业“小洋群”，经过一年来的巩固、提高、发展和调整，已经逐渐成为钢铁生产战线上一支相当雄厚的力量。现在全国正常生产的“小洋群”企业共计1300多个，拥有6至100立方米的小高炉共约5万多立方米，担负了去年全国生铁产量2200万吨的一半。这些小高炉的利用系数、焦比和成本，不但能逐渐与大高炉媲美，而且有一些利用系数已经超过了大高炉。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洋群”企业是提供生产革新的宝库，是推动大企业技术革新的力量。它们常常比大企业更奋发，更有勇气创造新的生产方法。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冶金工业中最可宝贵的最突出的先进经验，是从“小洋群”企业中创造出来的。“小洋群”企业对冶金工业的推动作用，将比我们已经感受到的还要深远。经过调查研究，我们选择了400多个条件较好的“小洋群”企业，拟逐步培植成小型钢铁厂。其中将来有望发展成10万、20万、30万吨规模钢铁厂的，约有100个。1月9日，冶金工业部党组书记王鹤寿将这一报告连同《全国钢铁“小洋群”企业的分布及可能升级情况》材料一并报送毛泽东，同时还附送了世界钢铁产量、我国钢铁产量和有关钢铁工业发展速度的统计等3份材料。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王鹤寿的这一报告上。

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1]参考。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指当时正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印发《纳赛尔[1]与社会党全面破裂》材料[2]的批语

（1960年1月14日）

印发各同志[3]。看，阶级斗争是何等尖锐！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不可能有例外。社会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也还是存在的。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纳赛尔，当时任由埃及和叙利亚合并组成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2] 指中国驻大马士革总领事馆1960年1月4日关于纳赛尔与叙利亚社会党全面破裂的情况给中国驻阿联大使馆并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纳赛尔最近一举免除叙利亚社会党领导人胡拉尼等五人的副总统和部长职务，这表明纳赛尔同叙利亚社会党之间的关系已发展到全面、公开破裂的阶段。阿联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这种激化，是因为叙利亚人民同埃及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所促成的。纳赛尔同叙利亚社会党的关系破裂后，埃叙矛盾已转变成全体叙利亚人民反对埃及统治集团的民族性矛盾，这件事有可能成为埃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电报还对纳赛尔与叙利亚社会党的矛盾、埃及统治集团与叙利亚地主资产阶级和人民的矛盾，作了具体的分析。这个电报原题为《对纳、社关系全面破裂的几点看法》，毛泽东批示印发时，改题为《纳赛尔与社会党全面破裂》。

[3] 指当时正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给刘松林[1]的信

（1960年1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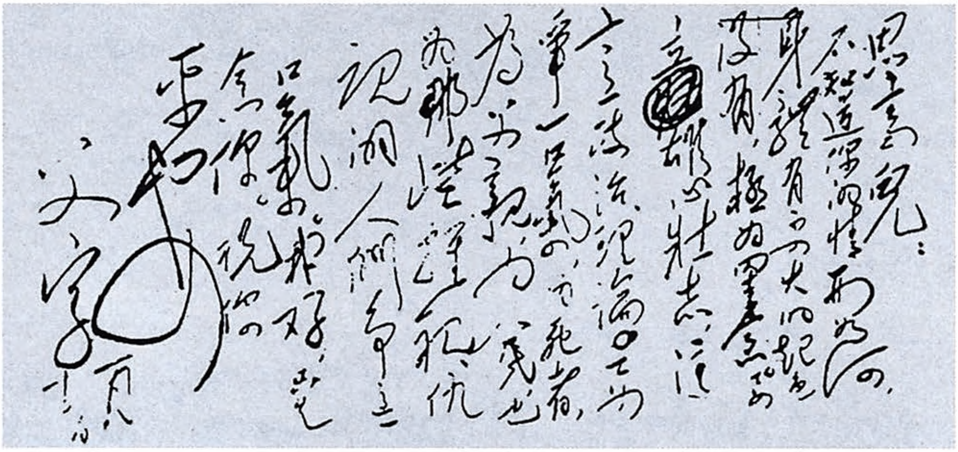
思齐儿：

不知道你的情形如何，身体有更大的起色没有，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2]，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平安

父字

一月十五日



毛泽东致刘思齐信的手稿。

---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当时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2] 指毛岸英，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对七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1]的批语

（1960年1月23日）

各同志阅，直退毛。准备谈一下此问题。

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1月11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十七号上刊载的《七个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对今年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的情况》一文。文章说，据国家经委对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广东、四川、陕西7个省市的了解和重庆钢铁公司等14个重点企业特派员的汇报，各地和各企业对今年第一季度工业生产的安排，不论产值或产量，除个别市和少数产品外，一般都不低于或略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生产水平。为保证一季度生产开门红，各地各企业都在抓紧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目前存在着以下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原材料供应还有缺口。（二）设备缺少维修材料或备件。（三）大型设备添置不足。（四）协作关系尚未落实。

转发太原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的批语

（1960年1月23日）

总理：

此件[1]请你看一下。我意可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所有中等城市党委，加以研究，参照办理。

毛泽东

一月廿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1月11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十七号上刊载的《太原市委关于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决议》（摘要）。其内容如下：一、太原市1960年初步计划工业产值较1959年增长47.2%，其中有的厂矿将增长1倍至5倍。为此，不少单位要求在1960年大量增加劳动力。这种单靠增加工人来增加生产的思想，必须坚决克服。太原市机械化程度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同全国比是较低的，但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只要充分运用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完全有可能减少以至消灭手工操作，逐步实现机械化，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二、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通过这一运动提高劳动生产率50%。具体要求和措施是：（一）从1959年12月起到1960年6月底，分两步将全市机械化半机械化程度由

42%提高到65%至70%。（二）开展这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 凡使用手工操作的单位，要大搞半机械化以至机械化。2. 凡已实现半机械化的单位，应力争向机械化和自动化发展。3. 针对生产中的薄弱环节，改进和自制关键性设备，以求在先进水平的基础上平衡生产能力。4. 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提高利用率。5. 改进工艺、工具和设备。6. 加强对工人的政治、文化和技术培训；加强科学研究，综合利用材料，降低消耗；改进设计，提高产品质量；扩大产品种类，提高产值。7. 改善劳动组织，压缩非生产人员，加强协作。8. 系统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三、为了在全市范围内迅速掀起运动的高潮，并尽快取得实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二）集中力量突击那些花钱少、见效快和在生产上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力争在生产上尽快地产生实效。（三）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克服重洋轻土、看大不看小、单纯伸手要钱等思想。（四）实行定项目、定措施、定人、定时间、定期检查等五定和分级负责组织实施的方法。（五）注意技术鉴定、定型和推广工作，并树立标兵，把技术革新和比、学、赶、帮的劳动竞赛结合在一起。四、充分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196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

关于广泛阅读、讨论中国政府给印度政府照会的批语

（1960年1月24日）

总理：

12月26日我政府给印政府的那个照会[1]，建议用中央宣传部名义发一通知，全党全团各级组织，都阅读及讨论一次。农村中似可不讨论，因他们多数人不能阅读。工厂中则可以讨论。请商常委酌定。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上午二时

---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59年12月26日关于进一步申述有关中印边界的事实和重申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地划定过？照会指出："整个中印边界，无论西段、中段和东段，都是没有划定过的。""中印边界之有待划定，是印度政府和英国政府在长期间所承认的，具有确凿无疑的证据。"（二）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在哪里？照会指出："中印边界虽然未经正式划定，但是双方都承认有传统习惯线，这就是根据双方历来管辖所及而形成的界线。"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关于传统习惯线的看法，无论在西段、中段或东段，都是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并且为大量事实资料所证明了的。而印度地图所标出的边

界线，除了中段大部分符合实际以外，其他根本不代表传统习惯线。东西两段的边界线，特别可以不容置疑地看出，是英国近代史上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三）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照会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印双方应该考虑历史的背景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在此以前，作为临时性的措施，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而不以片面行动，更不允许使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对于一部分争执，还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局部性和临时性的协议。”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二：甲、接受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这就是两国之间的整个边界确实从来没有划定过，因此，它还有待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乙、“在边界正式划定以前，必须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和确保边境的安谧”。这个照会全文载于1960年1月3日《人民日报》。

关于派代表参加华沙条约[1]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例会给赫鲁晓夫[2]的复信

（1960年1月31日、2月1日）

一

照发。[3]

毛泽东

一月卅一日

---

[1] 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8国于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签订的条约，有效期20年。条约规定设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组织。同年6月4日条约生效时，华沙条约组织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0年1月31日送审的复信稿上。送审稿所署的日期为“1960年1月31日”，毛泽东审批后，发出时周恩来将日期改为“1960年2月1日”。

二

亲爱的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您一月二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感谢您把召开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1]的决定通知我们。我们决定派康生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刘晓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伍修权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为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次会议。我们相信，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和缓，揭露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扩军备战阴谋，以及鼓舞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意志等方面，必将作出新的贡献。我们预祝会议成功。

致以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二月一日

---

[1] 这次会议后来于1960年2月4日在莫斯科召开。

在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给外交部的一份电报[1]上的批语

（1960年1月）

东德一位八十岁老教授（校长）说我国人民公社决议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任务和远景，他感到十分高兴。

---

[1] 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1959年11月4日的这一电报说，民主德国党政负责人和各民主党派在分别答谢我馆祝贺他们建国十周年的复信中，一致盛赞新中国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德共前身——德国斯巴达克团创始人之一赫·董克尔教授（某高等学校校长、80多岁）还特别称赞了中共中央1958年12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这个决议是我所知道的国际工人运动中唯一十分明确地区别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文件，同时它已经对第二阶段的基本发展原则作了很重要的指示。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以往和现在一直认为，我们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解决巨大任务时，决不应该忘记最终目标和宏伟的远景。中国同志特别在决议的第四和第五部分大大丰富了马列主义科学，这是很重要的。虽然我已年老，我仍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你们卓有成效的道路。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批示印发时“此下用中号黑体字”，印发的范围是当时正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在关于台湾情况的一份内部材料上的批语[1]

（1960年1月）

一

各同志阅，退毛。

二

很可看。

---

[1] 本篇一写在1960年1月12日编印的这份内部材料的目录页上。在其中《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元旦前后美又连续提出各种推行“两个中国”建议》《美特唐盛镐拉拢陈诚失败》3篇的篇名前，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本篇三、四均写在《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一文中。

三

这几句话，值得注意。[1]

四

极值注意。[2]

---

[1] 《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一文中说，元旦前后，蒋集团上层分子和官方报纸纷纷评述1960年国际局势的趋向，语调十分低沉。其中属蒋经国系的台北《大华晚报》写道："东西对立愈尖锐，情势愈紧张，对我们愈为有利；相反的，在和风荡漾、谈判频频的情况下，我们的处境便不免局促。""在一连串的国际谈判中，我们的地位和权益可能被涉及"，这将"对我们构成心理上的困扰"。在这几句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语。

[2] 《蒋集团焦虑一九六〇年日子难过》一文中说，蒋集团恐惧难以继续窃据联合国席位。台湾有关国民党报纸认为，"在未来五年至十年内，非洲大陆可能出现三十个左右的独立国家"，非洲在联合国的席位可能超过拉丁美洲，而目前非洲国家中同蒋集团维持外交关系的只有3个，同大陆有外交关系的却占多数。因此，蒋集团对非洲的外交，"包含有极大的危险性"。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语。

对《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摘录[1]的批语

（1960年1月）

一

各同志阅，退毛。

---

[1] 《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为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和波娜罗·奥佛斯特里特夫妇所作，1958年10月在美国出版。全书共3部，分18章，近20万字。杜勒斯临死前曾将这本书介绍给艾森豪威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对其中同当时国际形势关系密切的问题和有关美国反苏反共基本政策方面的内容作了摘录，并加了4个小标题：（一）资本主义同共产主义势不两立；（二）赫鲁晓夫的和平竞赛“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三）谈判“必须从实力出发来进行”；（四）美国共产党“是为法律所不允许的”。

二

说得对。[1]

---

[1] 《关于共产主义我们必须知道些什么》一书摘录的第三部分《谈判“必须从实力出发来进行”》中说：“从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出席会谈的代表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国家。更深刻地说，他们代表的是阶级斗争的某一方；而这在任何基本意义上说并不是可以协商的斗争。其所以不能协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因为：在资产阶级没有被消灭之前阶级斗争是不会产生和平的；而这个阶级‘决不会自动地放弃丝毫的权力和特权’。因此，会议桌——即使管它叫做和平桌——也不过是进行战争的另外一个场所罢了。”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下了这一批语。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1]

（1960年1月）

人类历史一百来万年中，资产阶级统治的三百年是一个大跃进。资产阶级都能够实现大跃进，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实现大跃进？现在，有些人不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你没有东西，人家怎么能够相信呢？要人家糊里糊涂相信我们，这是不能设想的。经过若干年，我们真正有了东西，而且经过多次反复，他们才会相信我们。

要长期保持大跃进，必须搞好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这一套两条腿走路中，工农业的比例关系是最主要的。

（一月九日）

我们能够管六亿多人口，其他地方我们都管不了。有些地方有我们的使馆，可以进行一切可以进行的活动，但是，也不等于我们能够当他们的参谋长。我们不能当美、英的参谋长，也不能当苏联的参谋长。要分几个阶段，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我们的人民搞进步起来，争取我们的经济接近美国和苏联那个时候的水平。这主要靠自己把工作做好。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争取人民，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

（一月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摘录。

关于科学奖金和学衔的指示

（1960年1月）

斯大林奖金我们没有就不要搞，追逐个人名利地位的事不要搞。我们打了那么多年仗还不是把蒋介石那个特级上将打倒了。勋章、博士那些东西不要搞了。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1960年2月13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志：

值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之际，请允许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对于中苏两国的繁荣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

十年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基础上，中苏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获得了全面的发展。这就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团结，有力地促进了我们两国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伟大的苏联人民正在加快步伐进行着规模空前的共产主义建设，七年计划的宏伟指标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已经在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重要的领域内获得冠军。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

中国的建设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度发展的新阶段。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各种形式的援助。在这里，我们谨代表我们党、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苏同盟是世界和平的强大堡垒。十年来，中苏两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共同斗争中密切合作，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成功，苏联政府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倡议和再一次单方面裁减一百二十万武装部队的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好战集团的阴谋，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热烈欢迎。最近，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缔约国高级会议和这个会议所发表的宣言，又一次就普遍裁军、对德和约等有关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这些事实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始终站在保卫和平斗争的最前列，并且一再对维护和平的事业作出了真诚的努力。今后国际紧张局势能否继续和缓，已经成熟了的国际问题能否得到合理的解决，显然取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是否真正具有和平的诚意。我们相信，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不管和平的敌人如何阻挠和破坏，维护和平的事业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我们两国根本利益的完全一致为基础的伟大的中苏同盟是一种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的完全新型的同盟关系。因此，它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兄弟关系，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妄想分裂中苏同盟、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迷梦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亲爱的同志们，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入第二个十年的时

候，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把巩固和发展中苏两国以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当作自己最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人民深信，在未来的年代中，伟大的中苏同盟必将对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祝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祝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兄弟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

请罗光禄[1]购买《哲学研究》杂志的批语

（1960年2月15日）

罗秘书：

请在今天到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做《哲学研究》杂志，1959年11月—12月综合号[2]，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五日上午五时

---

[1] 罗光禄，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2] 1959年12月10日出版的《哲学研究》第十一、第十二期合刊，主要刊载了陈伯达《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邢贲思《反右倾斗争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的斗争》、顾锦屏《认真研究列宁的伟大哲学遗产——〈哲学笔记〉》、黄远《战争规律和主观能动性》、世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原理吗?》、章沛《论形式逻辑同一律的客观基础》、周谷城《评〈逻辑推理中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关系问题〉》、冯友兰《论“六家”》、周建人《老子思想真的是唯物主义的么?》、张允侯《列宁的哲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等文。

给林彪的信

（1960年2月20日）

林彪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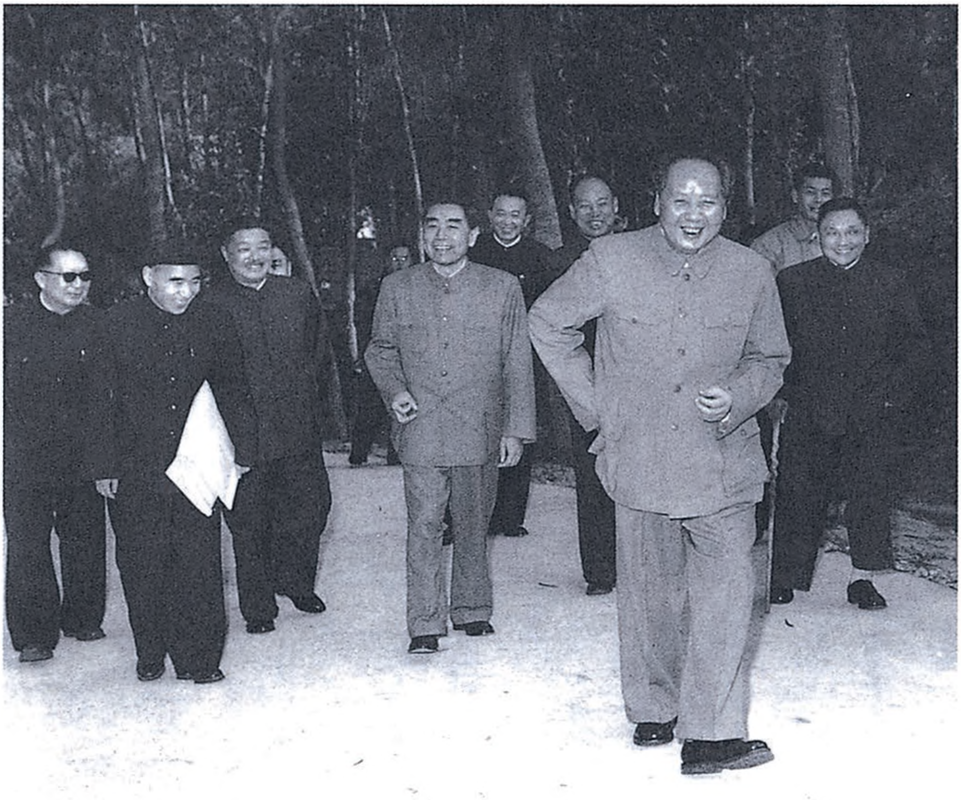
一个有关工业的非正式的文件[1]，送上请你一阅，有些意思。各位元帅都可以一阅，请你阅后转给他们。因是密件，请在阅后退回给我为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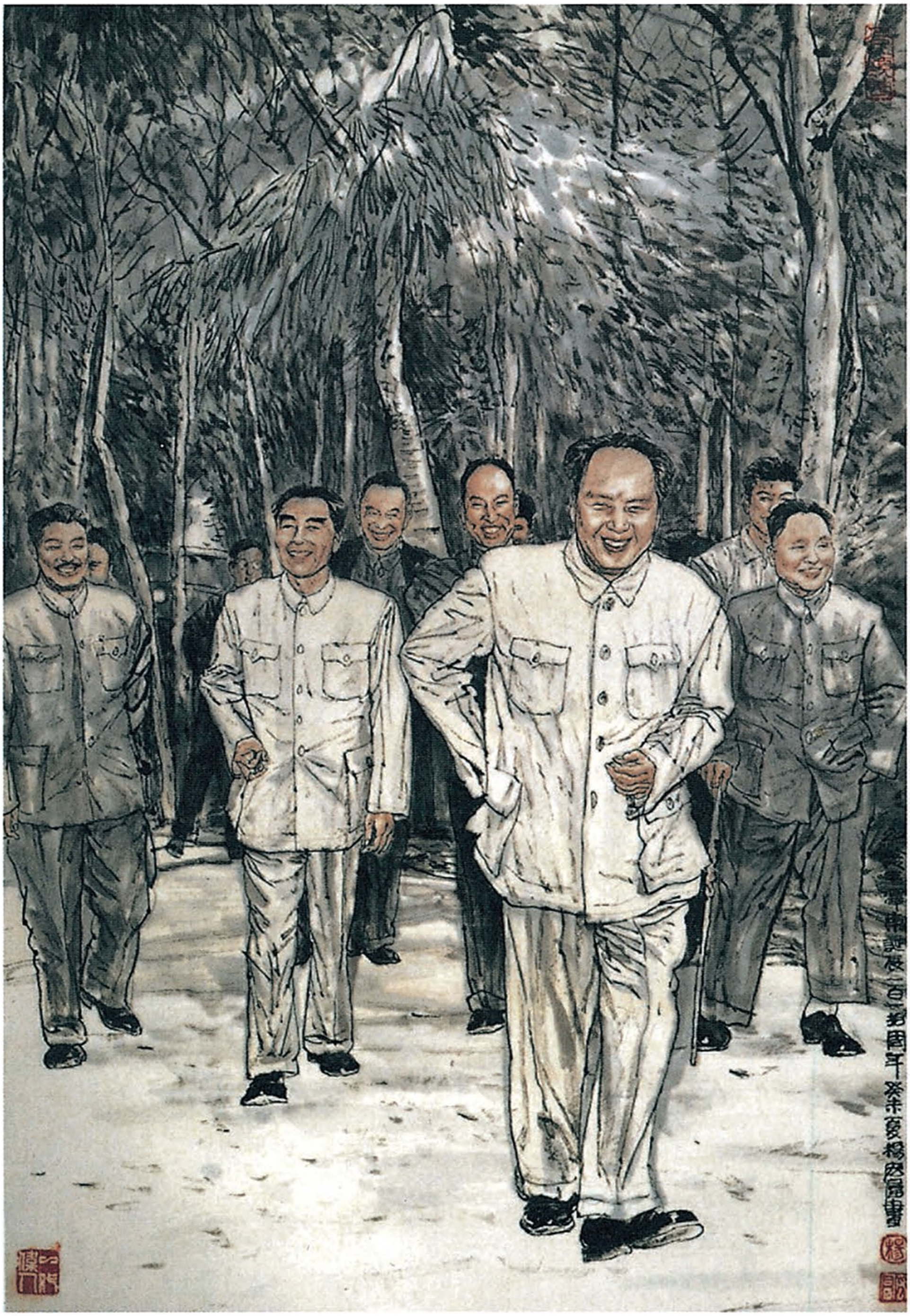
二月廿日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1960年2月14日邀集在广州参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的张霖之（煤炭工业部部长）、吕正操（铁道部副部长）、彭涛（化学工业部部长）、陈正人（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石油工业部部长）、刘澜波（水利电力部副部长）、顾卓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王光伟（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人座谈有关经济计划的几个问题的纪要。其中谈到：今年计划超额完成是肯定的；力争再用10年的时间搞到1亿吨钢，1960年努一把力，钢产量有可能搞到2100万吨；现在是农业和尖端技术逼着工业在量和质两方面迅速地发展；机械工业需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解决好和战结合、专业生产和通用生产结合、大中小型企业结合和洋土结合以及分工、材料等问题；大跃进要求既要搞技术的革新和革命，也要搞组织的革新和革命（也就是不断改进生产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企业的管理制度要继续改革；还有一部分规章制度的改革，是上层建筑的革命；技术的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上层建筑的革命，要同时并进，互相结合，要经常注意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等等。



1960年2月，毛泽东和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负责人在一起。


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癸未夏

《共和国的元勋们》（中国画）

对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交通生产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2月26日）

一

周总理：

这个总结[1]很好，这是一个新方法，应当继续做。一年总结六次，每两个月总结一次，经中央批准通报出去，一定大有推动作

---

[1] 指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1960年2月13日关于1月份和2月上旬工业、交通生产情况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的提纲。提纲指出，1月计划完成情况总的来说是很好的，实现了开门红。但生产有些被动，少数产品没有完成计划。2月上旬有所好转，但与季计划日产水平比较还有距离。要完成第一季度计划，还需要做许多艰巨的工作。当前生产中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交通运输。为了把现有的生产水平逐步提高上去，首先就要突破交通运输这个薄弱环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必须负责督促完成运输计划，加强运输的组织和协作工作，推广运输装卸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经验，大力增产运输设备。第二，对其他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当前的薄弱环节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第三，加强物资供应的管理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个统一领导、分级负责、调度灵活的物资供应网。1960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将这一报告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党组。本篇一就写在批转这一报告的中共中央文件上。

用。请你阅后，给你们读书会[1]各同志一阅，然后送薄一波[2]同志一阅。给少奇、小平、彭真[3]一阅。

毛泽东
二月廿六日

二

要大办小洋发电。[4]

---

[1] 指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建议，于1960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广东从化组织的读书小组。参加读书小组的，有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负责同志。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的口头汇报提纲中说："发电量虽然一直稳步上升，但是还不能满足需要，在全国四十个供电地区中，目前还有京津唐、安徽、重庆、湘中、郑州等十六个地区缺电，共缺电约三十万瓩。"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这一批语。

三

争取二千二百万吨钢。[1]

---

[1] 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的口头汇报提纲中说：“从目前生产情况来看，总的形势很好，但是钢铁、化工等主要产品要完成第一季度的计划，并且为全年争取完成二千万吨钢或者更多一点的目标而奋斗，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在文中的“二千万吨钢或者更多一点的目标”下面，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在旁边写下了这一批语。

毛泽东等为祝贺藏历新年复班禅额尔德尼电

（1960年2月27日）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你二月二十六日的来电[1]。当此藏历铁鼠年来临，西藏人民正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自己的彻底翻身和解放的时候，特向你和西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西藏人民在中共西藏工委和以你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新的一年中，在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彻底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所发动的反革命叛乱的残余、进行民主改革和发展生产方面，都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一九六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

[1] 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于藏历土猪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元1960年2月26日）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祝贺藏历新年的电报。

在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60年2月29日）

康、乔、田[1]阅后，由乔电告谭震林[2]，为中央起草一文件，将此报告[3]发给各有关学术机关及各级党委，直到公社，照此执行。

毛泽东
二月廿九日

---

[1] 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乔，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田，指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农业部党组1960年2月2日关于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情况给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中国农业科学院于1959年12月1日至20日召开了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会议，总结了1959年农业科学战线上的主要成就和经验，对1960年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建设性安排，对院属各研究所的工作，也作了具体部署。（一）1959年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是继续大跃进的一年。到10月底已完成3300多个

项目，占总数的87%。一个以人民公社为基础、遍及全国的农业科学研究网已基本形成。(二) 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两条腿走路”和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在系统地总结农作物大面积丰收经验、探求农业八字宪法增产规律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更加丰富了农业八字宪法的各项内容，对指导当前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在土壤普查、培育优良品种、改进农机具、植物保护、牲畜治病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组织编写了9本重要的理论著作和一批科技书籍，这是近年来全国农业科学研究的创举。(三) 关于农业科学研究的方法，已摸索出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针对生产需要安排研究课题，以任务带动学科；对一些尖端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采取多设基点、多种方法齐头并进搞试验；采取研究室、试验场与人民公社基点相结合的方法等。(四) 当前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学术思想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农业科学战线上的尖端学科和基础学科还很薄弱，布局也不平衡；技术力量的增长速度还落后于任务的要求。(五) 1960年的主要工作是：1. 继续总结丰产经验，进一步探求农业八字宪法的应用规律，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积极进行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研究和试点工作；以养猪为纲全面开展畜牧兽医的研究。2. 大力培养新生力量，开办各种类型的农业技术学校和训练班。3. 农科院在现有的基础上积极组建新的研究所，填补空白学科，并组织科研人员赴边远地区考察，提出当地发展农业科学的规划。4. 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结合科学实践不断批判农业科学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生产、科学上的重要问题。1960年3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报告。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1]

（1960年3月2日、3日）

一

高智同志：

此件[2]请印9份，发给总理、富春、康生、乔木[3]及中南五省在从化学习的五位第一书记[4]阅看，准备在三月三号下午讨论一下，在各省推广。

毛泽东

三月二日上午三时

二

印9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讨论。

毛泽东

三月二日上午六时

三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对于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中央建议这些同志想一想、分析一分析这样实际存在的两个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地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商业流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今年春季，建议各省、市、自治区都由党委领导，开一次四级、或者五级、或者六

级的干部会议，会期十天至十四天，如果是六级，则省、地、县、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到人，第五第六两级在一个公社内只到穷队富队的代表各一人，如一九五九年三月间开的那样，但是专门讨论广东文件中的五个问题。如有余裕时间，也可以讨论一些别的重大问题。春季会议，最好在三月三十日以前开完，因为三月除两广外还不是农业大忙的时候，四月就大忙了。这种会议，下半年再开一次。今年共开两次。广东省委已经发出通知，在三月上旬召开这种会议，讨论上述五个问题。

此件及附件，可在党刊上发表。

中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日

---

[1] 对中共广东省委1960年2月25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毛泽东曾于3月1日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建议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一次，如同意即以中央名义转发。3月2日上午3时，毛泽东批示机要秘书高智，将广东省委的这一指示印发在从化的周恩来等9位同志。这个批示即本篇一。随后，毛泽东将他3月1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稍作修改，成为中央转发广东省委文件的指示，于2日上午6时批示印发各同志。这个批示即本篇二。3日，在中央指示正式下发前，毛泽东对这一指示稿又作了一次修改，本篇三即毛泽东最后改定的指示稿。

[2] 指中共广东省委1960年2月25日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发给广州市委、海南区党委、各地市县委并上报中央和毛泽东。指示说，最近省委对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我省农村总的形势是十分良好、十分有利的，人民公社的发展是健

康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已经奠定了巩固的基础，达到了空前巩固的程度。但目前在公社所有制的过渡、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分配以及干部作风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全党重视的问题。为此，省委特作如下指示：一、目前我省人民公社的发展状况证明，去年郑州会议确定的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适合当前生产水平和群众觉悟的，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一定要继续贯彻执行。当前的问题，不是急于过渡，而是要明确方向，埋头苦干，积极创造过渡的条件。对有些地方想加快过渡的苗头，一定要注意防止和纠正。省委确定，过渡为基本社有制的公社，除已批准的36个外，今年不再增加，一定要严格控制住。二、积极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力量，是为过渡积极准备条件的核心，也是发展当前生产、提高整个公社的生产水平所必需的。但必须明确，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必须在整个公社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公社一级经济的比重，决不能孤立地发展，更不能削弱大队经济。必须认识在三几年内，发展农业生产主要还是靠大队。目前有些地方，在发展公社经济上，实际上在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必须及早引起全党严重重视，坚决堵死。对此，省委作了6项具体规定。三、全党必须重视搞好分配工作，这是关系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重大问题。省委确定：（一）对去年的分配工作，应普遍进行一次检查，该分的一定要保证全部分到社员手上。（二）应在生产发展和适当增加积累的前提下，使社员的收入水平，逐年有显著的增加。（三）要适当提高工资部分的比例，力争按月或按季发工资。（四）要坚持实行定额管理、评工计分、按劳动日发工资的制度和大队对小队的“三包一奖”制度。（五）对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生产，不应采取“大集中”的办法，重刮“共产风”。四、公社一级党委必须树立经济核算观念，学会经济工作，最大限度地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讲究经济效果。在公社一级必须建立严格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纪律，加强对公社财政开支的检查和监督。五、全党要树立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在目前的大好形势下，有些干部在工作作风上的某些缺点，又开始萌芽，主要表现为头脑发热，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缺乏实事求是、具体分析、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只谈高指标、大计划，说得多、做得少；方法简单化，不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不注意劳逸结合。对此，必须认真对待，加以纠正。

[3]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4] 指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他们当时正在广东从化参加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小组。

1960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在丰泽园门前交谈。

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0年3月2日、4日）

一

印9份，发各同志阅看，准备三日下午谈一下。

毛泽东

三月二日上午四时

二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2]，写得很好，现在发给你们研究，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的那种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

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在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中央
1960年三月四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贵州省委1960年2月24日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上；本篇二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贵州省委这个报告的批语。

[2] 中共贵州省委的这个报告说，1960年2月16日至18日，我们召开了3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我省农村公共食堂现有13万多个，固定的或基本上固定的占80%左右，不固定的约占20%。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批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一、巩固地树立了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团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二、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三、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执行了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四、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五、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成为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的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村创造了条件。不固定的食堂有3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的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现象。主要原因：一是基层组织有问题，有的被富裕中农把持，千方百计拖垮食堂，挖人民公社的墙脚。二是实际工作抓得不紧、不具体、不切实，听任食堂涣散下去。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不固定、不巩固的食堂立即加以整顿。我们决

定采取以下步骤：一、立即组织干部带着粮食供应指标下去整顿。二、充分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召开食堂代表会，建立食堂管理委员会，落实粮食安排。三、选举食堂管理人员。四、建立管理制度。五、以好的食堂作标兵，进一步把食堂办好。对于那些已经固定的食堂，也要按照标准整顿、提高。在分配制度上，由粮食供给制、半供给制改为伙食供给制。目前看来，食堂势必要适当扩大规模。为此，我们打算：一、在今年夏收时，务必把粮食抓到基本核算单位手里，口粮由基本核算单位定期发给食堂。二、在适当时机，把食堂交由基本核算单位管理，每个生产小队就办一个食堂，基本核算单位可以自己办一个，作为中心食堂。196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已将这一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3月6日，中央又将毛泽东起草的批语发给各地。

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0年3月3日）

一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转发你们研究和参考。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和遵行。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委、市委及县委。

中央

1960年3月3日

二

印发今日下午到会各同志[2]，准备谈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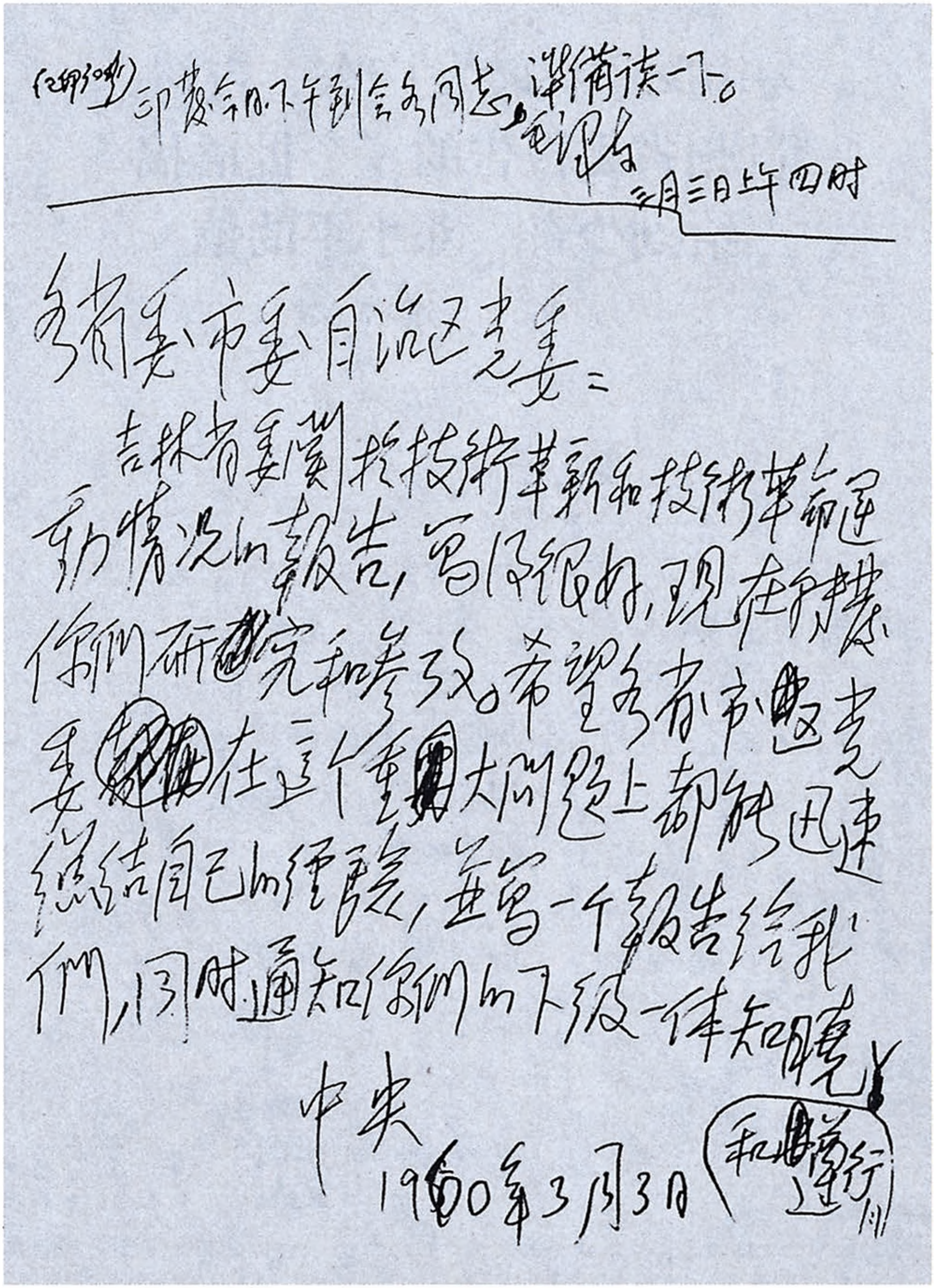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三月三日上午四时

---

[1] 中共吉林省委1960年2月26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这一报告说，近3个月来，我省以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连续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迅猛开展起来。这次运动比过去较为深入扎实，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运动的发展，有在原来的技术设备基础上从一般的改革进入全面技术改造的趋势。第二，已由推广单项的分散的先进经验，发展为系统的全面的先进经验配套，有计划、有领导、大规模、全面地加以推广。第三，不仅有一般的革新项目，而且开始向尖端科技进军。与此相联系，群众性的科研工作有了新的发展。第四，大搞综合利用，增产和节约原材料。在运动中，有以下几条经验值得重视，应加以研究，使之继续发展。第一，这一运动既是生产运动，也是群众性的思想运动，是职工群众的自我改造运动。第二，许多企业单位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的结合更加密切，一些科研部门和大专院校也加入进来，形成了新的厂内厂外“三结合”和全面大协作。第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要与当前的生产紧密结合，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以适应并促进群众运动的发展。第四，要从实际出发，贯彻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第五，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应该互相结合。根据当前运动发展的实际，我们提出了开展设备翻新、生产能力翻番的“双翻”运动口号，使这一运动同增产节约结合起来，向着更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到适当时机，还要着重进行巩固运动成果的工作。

[2] 指《为审阅中央转发广东、吉林、贵州省委报告的三个批语稿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所说的24位同志。



（已印10份）印发今日下午到会各同志，准备谈一下。毛泽东

三月三日上午四时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在转发你们研究和参考。希望各省市区党委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都能迅速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写一个报告给我们，同时通知你们的下级一体知晓。

中央

1960年3月3日

和谭速行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为审阅中央转发广东、吉林、贵州省委报告的三个批语稿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

（1960年3月4日）

少奇、小平同志：

此三件[1]，请你们审阅，并请提到中央会议上讨论、通过。如有不同意见，请加修改。在**三月十日以前**，**送到**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手里**，远地用飞机送。恩来、富春、康生、中央在广州学经济学的各部长、中南五省在此学经济学的五位第一书记[2]，共24人，昨天开了一次会，大家都同意这三个文件发出去。

毛泽东

三月四日上午四时

---

[1] 指毛泽东1960年3月3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稿、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稿和3月4日起草的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稿。

[2] 指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

在河南省委关于当前抗旱浇麦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1960年3月5日）

很好，各同志阅。有同样情况的，照样办理，是为至要。

毛泽东

三月五日

---

[1] 中共河南省委1960年2月27日上报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情况简报说，我省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小麦普遍出现旱象，而且正在向严重方向发展。2月初，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了抗旱浇麦的紧急指示，接着省委又连续召开了3次紧急电话会议，进一步布置和检查了这一工作。各地普遍召开了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会，建立了抗旱浇麦指挥部，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旱浇麦运动。2月23日，省委再次召开紧急常委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确认抗旱浇麦和抗旱春播为当前全省的中心任务，决定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一）向全省人民进一步进行大动员，迅速发动一个声势浩大的全民抗旱运动。（二）千方百计挖掘一切水源，保证小麦有足够的水量。（三）继续抓好群众生活安排，保证群众旺盛的战斗情绪。（四）在财力、物力上支持抗旱，解决抗旱急需的物资。（五）从省直机关抽调大批干部，由负责同志带领，分赴各地，协助抗旱，进一步促进抗旱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

关于干部中存在的三个大问题[1]

（1960年3月6日）

华东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江苏省委写的关于整风中三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应当提起你们大家一齐注意，并采取具体措施，逐步地解决这三个大问题。

中央

1960年3月6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3月1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〇三号上，题目是毛泽东拟的。这期简报以《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为题，摘发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报告中的部分内容。其中谈到，这次整风运动，使我们深刻地感到，党内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够，主要是缺乏不断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的革命方面，对小生产者和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比较普遍地认识不足。往往只看到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团结富裕中农的政策，而看不到要彻底改造小生产者的根本方向。因此，解决这一认识问题，是党的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第二，在高速度建设方面，比较突出的是对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够，有一部分同志不了解整个60年代都要连续跃进，都要高速度，积极创

造条件，坚决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农业的经营管理上，没有完全摆脱小农经济的影响，远远不能适应大跃进形势的要求。因此，在党内进行高速度建设的思想教育，克服小农经济的思想影响，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在政治思想革命方面，对于彻底消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确立与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波浪起伏的发展，认识不足；对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思想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重视不够。有的还对经济战线上的不断跃进与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的关系认识不清，因而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不断革命。因此，在党员干部中很好地确立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统一的思想，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加速建设，准备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0年3月8日）

一

送少奇同志再阅，即发。

毛
三月八日

二

本件[2]及两附件[3]，可登党刊。（附文二件）

三

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三种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公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

四

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个大城市，也不要在一个时期满街挂上人民公社的牌子（过去已经挂上者不取消）。但是一切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都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去进行，慢慢挂上公社牌子则是可以的。除这五个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

五

最好有一位书记专管城市人民公社。中央希望今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取得经验，下半年普遍推广。各城市应派一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等处去参观那里的人民公社。

---

[1] 本篇三、四、五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这个指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除此之外，毛泽东对指示稿还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2]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1960年3月6日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待全国各城市普遍进行了试验后，中央将总结各地的经验，规定一些办法。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在党委领导和职工群众的积极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它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又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能够大大改变城市特别是广大家庭妇女的面貌。但是在目前生活比较富裕的上层家庭中，还有相当多的人对城市人民公社有顾虑，不愿参加。对于他们，目前不要动

员参加。由于城市人民公社目前还处于试办阶段，各地关于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消息都不要登报，也不要组织群众性的庆祝游行。中共中央于3月9日下发了这个指示。

[3] 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城市人民公社组1960年2月22日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报告和中共河南省委2月28日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全总城市人民公社组的报告说，今年1月，我们对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的发展情况作了一些调查，情况如下：一、公社是根据香坊区大工厂多、职工及其家属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特点，按照“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原则建立的，公社在市区内设管理区和居民委员会，在农村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二、在组织生产大协作方面作出了突出的成绩。三、社办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四、社内的集体福利事业不断巩固和迅速发展起来。五、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为生产大队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创造了条件。六、公社已经制定了1960年更大跃进的发展规划。河南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1958年8月间，在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我省各城市也都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一年多来，我们对这些公社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巩固工作，使之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二）城市人民公社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第一，对城市是一次全面的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进一步广泛地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第二，发挥了城市的潜力，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推动了全面大跃进。第三，普遍办起了集体福利事业，把广大妇女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了。第四，群众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得到迅速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五，更便利于党对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的团结、教育、改造。第六，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三）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城市人民公社，使它真正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福利的统一组织者。第一，发展生产是办好城市人民公社的中心环节，今后应坚持贯彻执行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一齐抓的方针，大力搞好生产。第二，广泛发展集体福利事业，挖掘劳动潜力，保证生产大发展。第三，做好分配工作，规定积累与消费的适当比例，正确处理国家、公社和社员之间的关系。第四，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其逐步改造成为自

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五，完善城市人民公社的形式、规模和管理体制。第六，坚持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把领导权牢固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报告转发给各地研究参考。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3月8日）

一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1960年，毛泽东和河南省委书记宋致和亲切握手。

河南省委这个报告[1]写得十分好，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现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中央希望你们都应当随时做出自己工作的科学总结，一年至少做四次，每季做一次。专题性的总结也要做。一面报告我们，同时即下达所属一体遵行。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60年3月8日

---

[1] 指中共河南省委1960年2月29日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我省于2月4日至19日召开了省直系统各负责同志和地（市）、县、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及生产大队总支书记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和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是：（一）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和尽快争取粮食过关的问题。到会同志认为，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是贯彻执行总路线，保证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的最本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发展。会议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相结合的方针，根据1958年以来计划工作的经验，讨论确定了我省1960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是一个持续跃进的计划。（二）关于进一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会议认为，为实现1960年持续大跃进，必须以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为指导思想，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在运动中，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是要广泛开展变笨重劳动和手工操作为半机械化、机械化的群众运动，二是要积极地有计划地向高、大、精、尖、新方向发展。（三）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会议强调，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是实现持续跃进的根本保证。学习中要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大跃进的丰富经验，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提高领导水平。196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二

即送尚昆[1]带交中央审阅，转发。

毛泽东
三月八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部署报告的批语

（1960年3月14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中央同意这个报告的基本思想[1]。万人大会可以开，也可以少于一万人。现将江苏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央

1960年3月14日

---

[1] 中共江苏省委1960年3月9日关于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的部署给中央、毛泽东并上海局的报告说，我们确定在3月18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省、地（市）、县、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都来人，每个公社来党委书记1人和穷富大队、穷富小队的代表各1人，共约1万人，会期10天。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中央3月3日在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中谈到的5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次大会一方面要及时防止和纠正在这几个方面存在的缺点、错误，但同时也必须防止少数干部以右倾的思想情绪来理解中央的指示精神。会议要进一步认清当前的大好形势，总结冬春生产运动的成绩和经验，从正面讨论、弄清5个方面的问题，发动到会干部在明确过渡的方向、步骤、做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出进一步建设人民公社的一套办法，进一步鼓足干劲，掀起以春耕春种为中心的生产大高潮。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1960年3月14日，毛泽东视察南京军区某部。

1960年3月14日，毛泽东视察金华双龙水电站。

1960年3月，毛泽东在浙江金华地区视察时阅读《金华日报》。

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3月15日）

山东这个报告[1]写得很好。有调查，有分析，有研究，有办法。抓住二十个重点落后县，派二百多个得力干部，有强的领导者率领，每个重点落后县有二十多个干部下去帮助，办法很好。一定要把缺粮问题在短时间内彻底地认真地给予解决。中央建议：落后县、社、队领导干部实在不行的，当机立断，实行撤掉，换上好的。不要婆婆妈妈，优容养奸，贻误大事。

中央

1960年3月15日

---

[1] 指中共山东省委1960年2月27日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给中央并上海局的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一）对于社员生活安排问题，从省委到基层各级党委都是比较重视的。省、地、县、社共组织了4.5万名干部，由各级负责同志带领，分赴各地深入调查，重点帮助，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二）目前还有部分县、社、队在生活安排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其中有一小部分问题还相当严重，生活安排没有落实，人口外流和水肿病的情况已经出现。其主要原因：第一，在分配上，包产小队和基本核算单位之间的

矛盾普遍存在，这些单位往往还交织着思想、组织不纯的问题。第二，去年我省遭受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自然灾害，其中以旱灾最为严重。第三，一部分干部对农村形势盲目乐观，报喜不报忧，不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影响了生活安排的迅速落实。（三）省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当前农村工作的方针是：以继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以春耕生产为中心，全面安排好人民生活，带动各项工作不断跃进。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既要做好思想工作，又要切切实实解决问题。具体措施如下：1. 抓住重点，突出解决24个落后县、市的问题。除增拨粮食统销指标和救济款外，还派出260余名干部，分赴各县，坐镇包干，负责到底。省委生活福利办公室直接控制这些县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2. 粮食统销，既要保证缺粮地区的最低供应标准，又要尽量不突破调整后的统销指标。3. 拨出饲料2亿斤，有重点地解决牲畜饲料问题。4. 对社员生活已安排好的单位，要防止松劲麻痹情绪，干部要改变作风，加强与群众的联系。5. 在开展节约用粮运动的同时，大抓春菜播种和冬菜管理，因地制宜地多种早熟瓜菜。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中央转发湖南省农业生产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

（1960年3月15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现将湖南省有关农业十三个方面的情况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参考。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鲜东西，可以看到农业全貌。

中央

1960年3月15日

---

[1] 这个报告中关于农业生产13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水利运动、积肥运动、开荒改土运动、播种计划安排、劳动力问题、工具改革、干部深入情况、春收作物、生猪生产、生活安排、渔业生产、造林、木材生产。报告说，去年11月省委发出移山千座、开河万里的口号后，各级党委书记挂帅，共有35万干部、600万劳动力大搞水利。至今年2月底，全省整修新建各种水利工程88万处，其中新建水库3万座，比过去10年修建的水库增加了66%，大大改变了全省农田水利面貌。结合大兴水利，各地还大办了一批水力发电站。在积肥方面，去冬以来，各地大搞肥料基地，大抓养猪积肥。今春积肥高潮中，出动的劳动力达700万人。到目前为止，全省共积肥约200亿担，平均每亩达300担左右。去冬今春，全省改良了800多万亩亩产400

斤以下的低产田，开垦了500万亩荒地，深耕情况也比去年要好。关于播种安排，全年计划播种面积在1亿亩以上，争取全省粮食产量达到平均每人1000斤。目前参加田间生产的劳动力已达1000万人，占全省总劳力的70%，估计还可以从水利、交通及其他方面压缩七八十万人到农业生产上来。今年全省计划革新和推广各种新工具近2000万件，估计可节约8亿至9亿个劳动日。全省已有近13万县以上干部下到基层，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国家干部。他们一般都能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大搞丰产田，密切了党群关系。对穷队、落后队，各地都特别注意加强领导，干部包干负责，定期改变面貌。今年把春收作物当作一季生产来抓，比往年搞得好，作物普遍长势良好。全年计划养猪4000万头，各地大抓饲料和防疫工作，创造了不少高速度发展的先进事例。关于生活安排，决定对夏收前的用粮贯彻“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发给粮证，凭票开餐，节余归己”的制度，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目前全省投入渔业生产的共有13万余人，到2月中旬，出口水产品比去年一季度增长了六成。去冬今春，全省共造林2549万亩，目前已完成木材生产31万立方米，占全年计划的7.5%。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为审阅中央转发湖南、山东、江苏省委报告的三个批语稿给刘少奇、邓小平[1]的信

（1960年3月15日）

少奇、小平同志：

湖南文件一件，山东文件一件，我替中央各写了一个批语。[2]另外有江苏文件一件，是请求中央允许他们开万人大会的，我也替中央写了几句批语。[3]共三件，今送上，请提向中央会议通过，在七天至十天内发出，并送达各省市区第一书记手中。你们如感有不妥处，请加修改。[4]华东六省一市第一书记会谈，今日改〈开〉始，三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湖南文件一件，指湖南省农业生产13个方面情况的综合报告。山东文件一件，指中共山东省委1960年2月27日关于生活安排情况给中央并上海局的报告。毛泽东替中央各写的一个批语，分别见《中央转发湖南省农业生产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和《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报告的批语》。

[3] 江苏文件一件，指中共江苏省委1960年3月9日关于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的部署给中央、毛泽东并上海局的报告。毛泽东替中央写的批语，见《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部署报告的批语》。

[4] 毛泽东起草的这3个批语稿，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后，于1960年3月18日下发，内容未作改动。

四日可毕。我想请李井泉[1]同志于明十六日到此[2]参加一谈。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2] 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在黑龙江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汇报上写的几句话[1]

（1960年3月）

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节余归己，按月算帐，明明白白，帐单上墙，生产生活，两样都强，人心振奋……

---

[1] 这几句话写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1960年3月5日关于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汇报中说，目前，我省常年食堂占75%左右，季节性（农忙）食堂占25%左右。从性质上分，劳动力食堂占90%左右，全民性食堂占10%左右，但发展趋势是向全民食堂过渡。从现在的情况看，大多数食堂办得较好，一般都有菜园子，大多数养了猪，一部分养了鸡；食堂设备比较齐全，卫生情况较好，建立了一套制度；各地食堂都坚持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按月结账、账单上墙等制度；各级领导对食堂也抓得很紧，不少地方实行统一领导，分片包干，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

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语[1]

（1960年3月15日）

一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2]一件，《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3]一件，《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4]一件，都好，使人看了高兴。现在发给你们研究、参考、仿行。其中放在括号内的一些指示性的断语，是中央加上去的。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充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工厂、矿山、街道、机关、学校、团体、军队的公共食堂，一律照此办理。

中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五日

二

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了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中央指出，一部分不能到堂吃饭的，如老人，病人，孕妇，婴儿，则将他们的粮食送到他们自己手中。另一部分不愿参加食堂吃饭的人，例如少数富裕中农及其他阶层的人，也照这样办。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个省市争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但其他各省、市、区，暂时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也不要勉强，两三年内争取逐渐达到，是可以的），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定期结帐，帐单上墙，人人有底，乐意欢心等办法。

三

这个办法极好，应当普遍推行。

四

这个民主制度，各地都应建立起来。

五

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地逐步地实行解决，一律按照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七省市的办法去做为好。

六

他们应当研究，提出意见。

七

用植物秸、杆〈秆〉、根、叶大制淀粉，是一项大发明，全国一切公社，都应推行。

八

各地应当积极研究。

九

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从省到社，一律建立生活福利委员会，而以办好食堂为重点任务。

十

中央认为，这些办法极好。

十一

中央认为，以上各项制度和办法，都很好。

十二

中央认为，以上各项缺点，都应迅速改正，变三类食堂为一类食堂。

十三

中央认为，这样的统计极为有益，使读者对全国面貌，一目了然。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3月7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七号上刊载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3份材料替中央起草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修改的一段话（其中括号内是他加写的批语），修改处用宋体字排印；本篇三至九是毛泽东在《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加写的批语；本篇十至十二是毛泽东在《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加写的批语；本篇十三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中加写的批语。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些批语及有关附件。

[2]　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8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份材料说：在去冬今春农村整社运动中，各地都认真整顿和积极发展了公共食堂。但由于基础不同及其他原因，各省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目前大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各地确定办得好的标准可归纳为：（1）种了菜，养了猪，部分或全部副食品能够自给；（2）经营管理好，饮食花样多，吃得饱，吃得好；（3）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认真执行了按人定量、凭票吃饭、节余归己、定期结账等办法；（4）进行了炊具改革，做饭效率高；（5）讲究卫生，食堂设备比较齐全。经过整顿后，各地食堂的管理工作都有了显著加强。山东的大部分食堂，都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全省90%以上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大部分建立了粮食管理制度，西峡县还实行专仓保管、专账记载、专粮专用、专人负责的管理办法。（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三。）不少地区还建立了社员生活代表会制度，依靠群众办好食堂。（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

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四。）在办好食堂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有几个省认为，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的办法好，对于掌握粮食，减少浪费，搞好生活，巩固食堂有极大好处；而有一些食堂，把粮食分配到户，现在已没有吃的了，造成很大被动。（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五。）（2）食堂巩固了，社员自留地如何处理？河北省认为，应该采取限制和逐步削弱的办法：一是严格控制自留地的数量，二是将现有自留地划一部分给食堂种菜和饲料，三是小片开荒和零散闲地由生产队统一规划，适当分配给小队经营，一律不许社员开荒。其他各省，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提出意见。（在这一句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六。）（3）必须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河北省推行粮食增量法，大搞植物秸秆制淀粉，山东省已搞出淀粉2.7亿斤。（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七。）（4）有的地方已提出了如何全面安排群众生活的问题。黑龙江省委决定除了搞好食堂外，4月份要在全省农村大搞综合性的生活服务站，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八。）（5）办好食堂的关键还在领导。黑龙江省委决定从省到社都要成立各级生活福利委员会。甘肃省委指示，各级党委必须有一个书记经常抓公社的生活福利工作，而重点是办好食堂。河南各级党委都有一个书记抓公共食堂工作，而且派干部深入食堂大搞试验，亲自当管理员、炊事员。这是办好食堂的一条重要经验。（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九。）

[3]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1960年3月5日关于这一情况的电话汇报说，河南全省有农村公共食堂近3.6万个，就餐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其中办得最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占2.8%。这些公共食堂一般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的，各级党委都有一位书记在抓这项工作，不少党委和干部深入食堂大搞“试验田”。有的县提出三级书记进食堂，通过搞“试验田”、干部当炊事员和管理员，巩固了食堂。（在这一段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十。）目前，全省制订节约用粮计划的食堂，已占食堂总数的87%，有些地区实行了以人定量、凭票吃饭、节约归己的办法；食堂种菜、养猪、养家禽等生产已有很大发展，有些食堂还购置了炊具等食堂设备，扩大了基本建设；通过开展炊具改革，节省

了大批劳力和畜力，大大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关于不断改进食堂的经营管理，主要抓了以下工作：（1）领导深入食堂，发现问题，立即解决。（2）纯洁和调整食堂人员队伍。（3）建立和健全民主管理制度。（4）重视对炊管人员的培养、训练工作。（在这几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十一。）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少数食堂对计划用粮、节约用粮注意不够，有超粮食标准的现象。（2）春菜种植速度不平衡。（3）豫东有些地方烧煤供应有困难。（4）部分地区发现炊管人员有贪污偷盗、多吃多占的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在这几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十二。）

[4]　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统计整理的这一材料说，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其中90%以上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河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安徽7个省市；70%至90%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北京、新疆、浙江、广西、广东、河北、山西7个省市区；50%至70%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湖北、福建、江西、陕西、江苏、宁夏6个省区；50%以下的人口参加食堂的有甘肃、山东、青海、吉林、黑龙江、辽宁、内蒙古7个省区。在这一材料的最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十三。

1960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华东区省委会议，听取工作汇报，讨论农业生产问题。

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领导的批语

（1960年3月16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1]一件，《经济消息》第十期《关于技术革命大丰收》[2]一件，共两件，现在发给你们，并请你们发给一切城市党委、工矿党委和农村公社党委，一律予以研究和参考。这是两个重要的总结性文件，请你们予以重视。全总总结的是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等七个大城市的经验。这还很不够。武汉、广州、西安、兰州，各省省城，各省中等城市，例如唐山、石家庄、青岛、洛阳、黄石港、株洲、无锡、湛江、萍乡等成百个重要城市，都应当迅速作出总结，并且迅速予以推广。县办工业和公社工业也要择要作出总结，推广出去。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这种调查、研究、总结的工作，在今年三、四、五三个月内要基本做完。由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级地方党委及各部门党组分头去做，并要开规模较大的现场会议。今年一月间，一机部在哈尔滨召开的现场会议，大多数城

市未被邀请参加，连武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不邀请，致失普遍而迅速推广出去的效果，甚为可惜。今后应请有关部门予以注意，是为至要。

中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

[1] 全国总工会党组1960年3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最近全总召集上海、天津、沈阳、旅大、哈尔滨、太原、重庆7个城市和辽宁省总工会管生产的同志，座谈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感到一个以机械化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成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发展异常迅猛，预示着我国有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在生产上已经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节约了大批人力以扩大生产，保证了今年1月份的开门红，为实现全年的跃进计划奠定了基础。目前，各市党委根据已有经验订出了今年的初步计划，工业总产值和劳动生产率均有大幅度提高，看来今年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奇迹的一年。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效果，不仅表现在生产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职工群众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后，将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更加拥护和贯彻总路线。把这一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即向自动化半自动化方向迈进，将迅速改变我国技术落后的面貌。为保证这一运动获得更好的效果，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一）材料问题。所需材料主要靠自力更生，节约代用，不能占用生产材料。（二）企业管理问题。在劳动组织、技术供应和设计、机械维修、规章制度等方面需要作相应改革，以适应运动发展的需要。（三）工人教育问题。生产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后，要求工人有更高的文化技术水平，需要进行教育，以适应新技术的需要。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

[2] 这篇原题为《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的材料说，全国工

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已初步获得大面积丰收。具体表现在：1. 运动大大推动了当前生产。2月份全国主要工业产品绝大部分超额完成计划，很多企业提前完成一季度计划。新产品和尖端产品成批地涌现出来。2. 机械化程度显著提高，劳动力大量节省。工人的劳动强度减轻了，劳动条件改善了，因此，他们把技术革命称为“第二次解放”。3. 为原料、材料大量节约开辟了途径。4. 职工精神面貌也在起变化。许多工人日夜奋战，不计报酬，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和共产主义风格。目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全民性的群众运动，预计今年上半年大中城市的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部门基本上可以摆脱笨重的体力劳动，到年底基本上可以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已成为必然趋势。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材料。

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1]

（1960年3月16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于今年二月二日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全国卫生工作山西稷山县现场会议的报告》[2]及附件《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见》[3]，早已发给你们。据我们调查，未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

---

[1] 这个指示是毛泽东1960年3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3月18日下发。

[2] 卫生部党组的这个报告是1959年12月16日上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并转中央的。报告说，卫生部11月12日至21日召开的会议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进一步明确卫生工作必须从生产出发，配合生产，为生产服务的思想。二、大力做好人民公社的卫生工作，继续开展广泛深入的除害灭病运动。三、积极发展与提高农村卫生组织和卫生队伍。

[3] 卫生部党组报告的附件提出的主要意见有：一、做好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必须建立和健全医疗卫生组织。二、明确公社卫生院、卫生所的性质和任务。三、加强中西医的团结合作。四、人民公社社员的医疗制度和卫生机构的经营管理，目前以实行集体保健医疗制度为宜。五、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培养农村卫生人员。

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这三年内做出显著的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其办法：在省、市、地、县、社的有卫生部门及民众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党委会议及党组会议上，在本年三月内，至迟四月上旬，认真讨论一次，由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区党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手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批评右倾思想。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1]至于其他严重疾病，当然要按照计划一律除掉或减少。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1956年1月23日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二十七条说：“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懂这个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做这件事，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困难，事在人为，一定要争取在三年内做出大成绩，今年要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为此，各级党委，卫生部门党组，工会党组，青年团党组，妇联党组，今年一年，要为卫生工作开会四次，每季一次，每次三四小时即够，不要太长。以后年年如此。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上述会议开过后，立即召开，也是一年四次，每季一次，年年如此。请同志们一体遵行，切勿贻误。

中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十六日

为审阅中央关于技术革命、食堂问题、卫生工作的批语稿和指示稿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

（1960年3月16日）

少奇、小平同志：

替中央拟了两个批语，一个是关于技术革命问题的[1]，一个是关于食堂问题的[2]，现送上。请邀集有关同志谈一下，如同意，请迅速发出去。如有意见，请径作修改。另为中央草拟一个电报，是关于卫生工作的[3]，一并送上审核，并请迅速办理为盼！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

[1] 指毛泽东1960年3月16日为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和《经济消息》第十期《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两个材料替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稿。3月18日，中央下发了这一批语，内容上无改动。

[2] 指毛泽东1960年3月15日为转发《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和《一九五九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3个材料替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稿。3月18日，中央下发了这一批语，内容上无改动。

[3] 指毛泽东1960年3月16日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稿。3月18日，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内容上无改动。

附文三件。

另有关于转发山东文件一件，湖南文件一件，江苏一〈文〉件一件，共三件[1]，昨已送上，请查收到否？

---

[1] 指毛泽东1960年3月15日替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报告的批语稿和附件、转发湖南省农业生产情况综合报告的批语稿和附件，3月14日替中央起草的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部署报告的批语稿和附件。

关于修改李富春、李先念[1]向人代会的报告的批语

（1960年3月16日）

乔木[2]同志：

富春报告[3]修改进度如何？**务请你于三月十八日改**完，以便十九、二十两日由你帮助修改先念的报告[4]。先念报告现由吴冷西[5]在改，是否请伯达[6]先去帮他改一下，使你在最后两天审改时费力少一些。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八时

---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指李富春1960年3月3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4] 指李先念1960年3月30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

[5]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6]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1]

（1960年3月1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们同印度有过一些别扭，不要紧，马上就会过去的。我们的利害相同，都是不发达的国家。说中国侵略印度，是不真实的。人家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我们的土地相当多，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部分没有开发。自己国家的事情都搞不赢，哪里会要别人的土地？要别人的土地是犯罪的。我们侵略你们尼泊尔没有？你们尼泊尔一寸土地我们都不要。可以订个边界协定，立上界桩，是不是这样？

柯伊拉腊（以下简称柯）：是的，我已同周恩来总理谈过。

毛：你们赞成不赞成？

柯：需要正式划界。

毛：需要划一下界，划定了之后双方可以有一段地区不巡逻，这段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印度同巴基斯坦订了这样一个条约，它们双方不巡逻的地带很小，只有一公里。我们曾向印度提议，双方不巡逻的地区为二十公里，我们不去，他们也不要去，他们不干。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在条约上订一条，不巡逻地区多宽可以商量。如双方各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如双方各十公里就是二十公里，如双方各五公里就是十公里，这依你们之便，是不是可以这样？

---

[1] 这是毛泽东和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谈话的主要部分。

柯：可以考虑。

毛：可以考虑一下。行政管理可以由双方在各自地区的民政人员管，是否可以搞一点警察、民兵，由当地人民组成。就是不要正式军队，双方正式军队隔开一段，双方都安心。划界、不巡逻等都是为了永远保持边界和平友好，使双方安心，不怕对方侵略。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像我们同缅甸一样，订个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订了条约，如果我们破坏了，我们就输了理。我们是大国，从来不怀疑你们会侵略我们，但你们可能怀疑我们会侵略你们。如果订了条约而我们破坏了条约，那就是我们犯了错误。

柯：这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友好条约草案，我们将把它带回去同内阁商定，可能还要作个别修改。等周恩来总理四月底访问印度后到尼泊尔时在加德满都签订。

毛：很好。

我们已先后请你们两位总理来了，我们的总理也应该去，这是平等的。我们很感谢你们。今年我们就要在你们的首都建个使馆，这很好。你们在我们这里也建个使馆，人不要多，三四个人、七八个人就行了，花不了多少钱。你们八百万人中还抽不出来几个人吗？

柯：准备派的时候，人不会太多，因为派不起。

毛：听说你们修一条公路直达我们国家？

柯：没有。两年前曾要修一条路，后来没有资金，进行不下去。现在正由苏联技术人员帮助勘察，准备修一条由东到西的公路。

毛：你们来我们的国家，要经过外国。

柯：不经过，尼泊尔同西藏有山口可以通行，但不是正式公路。

毛：一年、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有一条直通的

公路。

柯：我们国内正在修公路的地方，都是经济发展有前途的地方。全国计划修九百英里（约合一千三百公里）。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尼泊尔王国首相毕什韦什瓦·普拉萨德·柯伊拉腊。

毛：很好。

柯：这次我曾邀请尼赫鲁[1]和周恩来总理去加德满都会谈，结果未能去成。

毛：因为尼赫鲁要我们总理去他们的首都新德里。开始我们主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张在仰光谈，而尼赫鲁不同意。现在我们已同意去新德里，所以也不能到你们那里去。谢谢你的好意，这是很好很好的好意。缅甸总理也是这样想，要中印两国总理去仰光，而尼赫鲁说他不方便，我们也就让步同意了。

现在缅甸总理邀请我们总理去仰光，首相阁下邀请他去你们的国家。这次周恩来总理先去缅甸，后去印度同印度总理谈判，然后再去你们的国家。他要去的第四个国家是柬埔寨，人家请了几次，我们欠了人家的债。还要去一个国家，就是胡志明[1]的国家，一共五个。这样，去年反对中国的浪潮可以渐渐平息下来。

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我们同你们，同缅甸、锡兰[2]、柬埔寨没吵过。真正同我们吵得厉害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它占着我们的台湾，还封我们一个“侵略者”的称号，那我们也封它一个侵略者。我们从没有侵占过美国一寸土地，檀香山和中国还隔着中途岛，日本我们也没有去侵占过，而美国却侵占着我们的台湾。我就不知道我们怎么成了侵略者?

现在有个国家要同你们“共同防御”我们，听说你们没有答应。对此我们很高兴。你说过，中印两国关系，由他们自行解决，你们不干涉。印度说我们侵略了你们，你曾发表声明说，没有侵略。有谣言说我们的军队侵入了你们的国境，到底有没有?

柯：正因为没有，才作这个声明。

毛：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

---

[1] 胡志明（1890—1969)，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 锡兰，今斯里兰卡。

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

你们的政策同我们的差不多。我们的大企业是苏联帮助设计、安装的，这样做由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九年已经十年。在这十年中，我们得到一些进步，现在要自力更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总照抄。我们不懂嘛，只好抄苏联的。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不照抄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自己找出了一套办法。你们也要经过这个过程。在一个时期抄外国的，这是必要的，抄一个时期之后就不要再抄了。学生在学校受教育，就是抄教员的，几年毕业之后就成了教员。你们一定有些可以当教员的。真的，这不是假话，没有一百年到一千年都当学生的道理。我们过去当学生，现在还在当学生，如尖端科学，苏联、美国、英国有，我们没有，这就要向它们学习。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你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柬埔寨也有许多长处。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我们东方人有一种自卑感，总觉得自己不行，白种人比我们强。这是一种迷信，要破除。既要破除迷信，又要向西方学习。破除迷信与向它们学习并不矛盾，如我们可以派留学生，进口它们的设备等。

我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东方人要向西方学习，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

柯：关于尼中边界问题，到现在还有分歧。以我们的观点，根据最近五十年历史情况，我们认为有四个地方有争议，现在是定下来的时候了。

毛：好。

柯：同周总理的会谈中决定了几个原则：一、以存在的传统习惯线为基础定界；二、考虑到边界双方管辖的实际状况；三、对个别有争议的地点，解决了好，解决不了，交联合委员会。

毛：好嘛！

柯：就原则来说是好的，而就个别具体地点来说，双方是有分歧的，这点使我们不是很安心。当我来杭州时，曾告诉周恩来总理，我来杭州不是以安心的心情来的。周恩来总理告诉我应该完全安心。

毛：应该完全安心。缅甸原来很怕我们，现在完全安心了。他们已知道了我们的心。

柯：我来时会见奈温[1]总理，他告诉我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应该坦率地谈。所以我就说出这些话来。

毛：好，那些争议容易解决，那些山口人都没有。关于喜马拉雅山的一些分歧，可搞个联合委员会来解决。

柯：对你们来说，目前的争议地点是无所谓的，而对我们来说是有所谓的，是个威信问题。

毛：可以解决，不要担忧。

柯：还有一个问题，是感情的问题。我们叫做萨迦–玛塔，西方叫做额菲尔士，你们叫做珠穆朗玛。这个地方一直在我们境内，可是周恩来总理说是在你们境内。

毛：这也不要不安心。

柯：是感情的问题。

毛：可以解决，一半一半。山南边归你们，山北边归我们。

---

[1] 奈温，即吴奈温（1911—2002），当时任缅甸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柯：山的顶峰呢？

毛：顶峰也是一半一半。不行？

如果解决不了，拖一拖也好。山很高，山可以保证我们边境的安全。你们不吃亏，我们也不吃亏。全给你们，我们感情上过不去；全给我们，你们感情上过不去。可以在上面立个界桩。

乌帕德亚亚[1]（以下简称乌）：谁去呀？

毛：困难啊！可以写在文字上。我们有人从你们那里爬山时，我们通知你们；你们有人从我们这里爬山时，你们通知我们。

乌：过去爬山，一直都是要拿尼泊尔的签证的。

毛：如有第三国的人爬山，从你们那边爬，签证由你们那里拿。

潘自力[2]：过去有人爬山是要经过西藏地方政府许可的，也有经西藏境内爬的。

罗贵波[3]：过去有些外国人爬山，是经过我国驻瑞士使馆签证的。

柯：不。

毛：长期的习惯是，从西藏爬山，就得有西藏地方的许可。

柯：还有其他一些争议。

毛：好解决。同你们好解决，同印度不同。同印度的争议是几万平方公里的问题。

柯：我们才几平方公里。

毛：这个山峰可以改个名字。不叫额菲尔士，那是西方人起的

---

[1] 乌帕德亚亚，当时任尼泊尔王国内政和司法大臣。

[2] 潘自力（1904—1972），陕西华县人，当时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和驻尼泊尔大使。

[3] 罗贵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名。既不要叫什么萨迦-玛塔，也不要叫什么珠穆朗玛，就叫做“中尼友谊峰”。

这个山峰是世界第一个高峰，八千八百多公尺。美国、苏联、印度都没有，只有我们两国有。你们内部开个会商量一下，提出意见。如不同意，就拖下来，将来再解决。

柯：是的。还有其他五个争议地点，不过主要有三个地方。

乌：问题是边界线靠北一英里，还是靠南一英里的问题。

毛：那还不好解决，连人都没有，好解决！

柯：如果在北京会谈中还解决不了，怎样再向主席提出呢？

毛：不要同我谈了，仍同周恩来总理谈。在他去你们的国家时再谈，他要同我通电报的。在联合委员会里要得到双方的同意。你们不同意，就坚持。你们坚持，我们有什么办法？能打仗？我们是乐观的。

柯：我们也是乐观的。

毛：我们要得到你们的友谊，你们也要得到我们的友谊，这是问题的中心。有了这个中心，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是不是？

柯、乌：是的。

毛：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你们也要安下心来，搞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这不好吗？

对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问题的批语[1]

（1960年3月21日）

同意。似应抄送苏联、朝鲜、越南各一份。如朝、越愿意签订同样条约和具有军事援助条款的友好同盟互相条约，我想也是可以的。此意见是否适当，请提向中央会议讨论决定。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一日

---

[1] 这是对周恩来1960年3月20日报送的外交部关于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等问题给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谢甫生的电报稿的批语。电报稿说，请答复蒙外长：我国政府热烈赞同蒙古政府提出的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的建议。如果蒙古政府同意，周恩来总理很愿意到乌兰巴托签订此项条约，具体日期待以后另行商定。随电附发《中蒙友好合作条约（草案）》一份，可在适当时间用此草案征求蒙方对条约具体内容的意见。3月24日，外交部发出了这一电报。

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3月22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1]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职工十多万，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2]，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3]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一九五九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4]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5]，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经将此报告批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给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

争。现在（一九六〇年三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现在把这个报告转发你们，并请你们转发所属大企业和中等企业，转发一切大中城市的市委，当然也可以转发地委和〔小〕城市，并且当作一个学习文件，让干部学习一遍，启发他们的脑筋，想一想自己的事情，在一九六〇年一个整年内，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中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共鞍山市委1960年3月11日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给辽宁省委转报中央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鞍山地区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已经形成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运动的主要特点有三：一是广大职工干劲很大，参加的人很广泛，进展很快；二是职工的首创精神大大发扬，短时期内就出现了重大的新技术和尖端技术；三是促进了生产继续跃进。（二）两个多月来所取得的初步经验：第一，必须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坚持政治挂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第三，全面规划，狠抓生产关键；第四，自力更生和大协作相结合；第五，开展技术革命和大搞技术表演赛相结合。（三）鞍山地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向高、大、精、尖、新和世界先进水平进军，各种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要力争赶上和超过国内外先进水平，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目前，鞍山地区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第一，大力改进操作技术，挖掘设备潜力，不断提高设备利用率。第二，普遍提高半机械化、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的水平。第三，

积极试制高、大、精、尖、新产品，掌握尖端技术。第四，大搞资源综合利用。第五，大力改善劳动组织和改进工艺过程，实现增产减人。（四）加强党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首先，要坚持政治挂帅。要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总结工作，继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坚持一长制、实行经济和技术挂帅、依靠少数专家办企业的资产阶级路线；批判教条主义和贾桂思想，进一步树立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其次，各级领导要改进工作方法，应抽出时间来学习和务虚，以虚带实。要切实精简会议，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亲临生产第一线。要抓两头带中间，除注意抓薄弱环节外，要特别注意插红旗、立标兵，不断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造成“学、比、赶、帮、超”的热潮。再次，要大抓技术表演竞赛，同时还要不断搞文化革命，举办业余文化学校、技术训练班等，迅速培养和壮大科学技术队伍。在运动中，要关心职工生活，使他们有充沛的精力从事革新创造。

[2]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3] 指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

[4] 这里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5] 指中共鞍山市委1959年7月25日关于鞍钢当前生产、群众运动情况和8月份工作安排的报告，毛泽东于当年7月31日将这一报告批发给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

关于反华问题[1]

（1960年3月22日）

附件[2]请同志们一看，这是我国在巴基斯坦开设展览会的一件材料。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一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960年3月14日关于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情况给外交部、外贸部并贸促会的报告和记者屠培林写的通讯《盛会难忘，友谊永存——记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3月25日，中共中央批示，将这个批语和两个附件一起下发到公社一级党委阅读。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3月14日的报告说，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的展馆自2月9日开幕，到今天观众已达50万人，不仅轰动了整个达卡城，连东巴其他城市及达卡周围的农村都卷入了参观中国馆的热潮。从留言簿和同观众交谈的情况来看，有98%以上的人从各种不同角度称颂我馆，有1%多一点的人，在称颂之余抱有若干怀疑，只有极个别坏分子说了些坏话。我国这次参加展出，粉碎了美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的造谣污蔑，促进了中巴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屠培林写的通讯说，2月29日，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国馆胜利闭幕。81天来，这里经常是人似潮涌。尽管印度某些反动分子在中国馆开幕前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抵制和破坏活动，可是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印友谊，绝非任何反动势力所能加以破坏的。81天里有300多万印度各阶层人民到中国馆参观这一铁的事实，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何等深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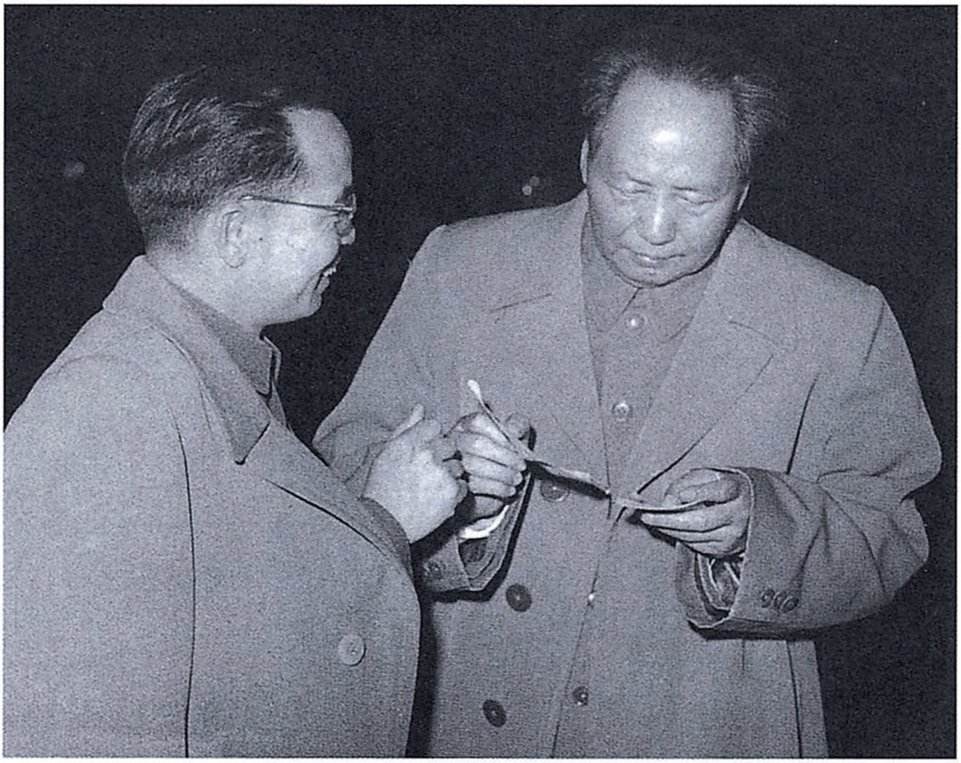
人，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假定说，一百个人中有十个人反对我们，全世界二十七亿人中，不过只有二亿七千万人反对我们。而有二十四亿三千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这后一种情形，如同一九四九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公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曾几何时，真相大白，共产党被人们认为最有纪律，最有道德，具有最适合人民愿望的路线和政策，而国民党则是一个最坏的党。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中真正反共的，最多不过百分之十，即是说，不过六千五百万人而已。而五亿八千五百万人则都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暂时怀疑的。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各国农业馆，在所谓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三百五十万人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我劝同志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发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他们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所以他们反华，对于我们说来，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一九四六年全力大进

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的。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请同志们想一想，假如上述占百分之十左右的坏人或半坏人，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我们岂不成了背叛马列主义、背叛人民的修正主义者吗？还有一层。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亏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恨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例如说，我们全党全民真正团结一致，我们的主要生产项目的总产量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接近或超过他们了，这种较大的间歇性就会到来，即是说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我们有苏联的先例可资借鉴。在过去几十年中，凡是反苏的都没有好结果。反得最凶的是武装进攻苏联，这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的猖狂进攻，其失败也最惨。因此，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个二十世纪的后四十年。如果给我们四十年时间的话，那时候世界情形

将起大变化，那百分之十的坏人或半坏人的多数或大多数很有可能被他们自己的人民所推翻，而我国则很有可能平均每人有一吨钢，平均每人有二千斤至三千斤粮食和饲料，多数人民有大学的文化程度，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和理论水平将提到比现在高得多，整个社会很有可能在那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



1960年，毛泽东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吴冷西交谈。

给田家英[1]的信

（1960年3月22日）

家英同志：

此书[2]内除已收者外，打圈的均拟收入，请印清样送我。

此书以前及以后类似此书各文的评论及几个重大战役的贺电，请与乔木[3]商量是否还有可收者，搜集一下，告我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二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正在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这封信是毛泽东校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写的。

[2] 指解放社1949年7月出版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书。书中收入了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社论和评论，起草的中共中央贺电和中央发言人的谈话等。其中有几篇经毛泽东圈定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3]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正在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

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60年3月22日、23日）

一

此件[2]请各同志看看。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要脱离群众。山东正在开一万二千人的大会，每个公社到六个人，这种办法似较好。

毛泽东
1960年3月22日

二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此件[3]请各同志阅读，并请转发到县级党委。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4]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5]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

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会。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帐，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当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中央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日

---

[1] 本篇一是对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1960年3月21日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会议情况》第二期的批语。

[2] 指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一期。这期简报说，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于今天上午听取省委第一书记舒同的报告后，有以下几点初步反映：一、关于过渡问题。无棣县一位公社干部说，听了报告后方向更明确了，原来急于求成，想秋后过渡，今天才知道过渡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枣庄市反映，干部中急于过渡的思想苗头较普遍，主要表现在合并核算单位上，都觉得越大越好。历城县在讨论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种认为过渡条件还不成熟；另一种认为过渡条件已成熟，应马上过渡。二、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安丘县一大队干部说："公社调了俺七十头母猪，也不给钱，社员不积极了，干部也不记工分，今天舒同同志报告句句说到我心里，这样办，公社定能越办越巩固。"三、关于生活问题。沾化县委第一书记反映，有几个公社水肿病较多，全县春节后因此病死了500人。缺粮原因是卖了过头粮，收得乱。无棣县委第一书记说，前段时间有的公社对生活情况反映不真实，主要是怕受批评，向上要粮怕说是右倾，怕算产量账。四、关于作风问题。这个问题对大家震动较大，特别是其中的贪污浪费问题。济宁市一位公社书记说："从五八年以来公社经济就很混乱，经济工作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有贪污行为，多的贪污一千多元。"讨论中，有的干部还反映了下面不讲真话的一些情况。五、关于非生产性建设问题。有些地方原计划盖办公楼、戏院、大礼堂，听了报告后，许多干部当即给家里打电话、写信，要求停止这些非生产性建设。

[3] 指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秘书处编印的《会议情况》第二期。这期简报反映的主要问题有：一、关于过渡问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1. 有的公社干部存在急于过渡的苗头，有的打算明年"走到社有制"，有的打算"秋后搞过渡"；2. 穷队盼过渡，富队怕过渡，生产不积极；3. 对过渡的根据和一些问题的政策界限认识不清。二、关于发展社有经济问题。对于一平二调，社干部与队干部有不同看法。例如队干部批评公社无偿上调物资，公社干部却有抵触情绪，顾虑算账问题。三、干部作风问题。有些县存在虚报浮夸现象；有的地方用大量生产资金和物料搞盖大礼堂、办公大楼和宾馆等非生产性建设；干部中存在吃喝浪费和贪污行为。

[4] 指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并下发的《郑州会议记录》。

[5] 指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形成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纪要于同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纪要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并且将《郑州会议记录》中关于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平调财物的旧账一般不算的规定，改为旧账一般要算，凡是县社调用生产队的劳力、资财，或者社队调用社员的私人财物，都要进行清理，如数归还，或者折价补偿。

转发聂荣臻[1]关于广州、重庆两市技术革命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3月25日）

聂荣臻同志给中央的信[2]，对于当前的技术革命运动，做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的总结，发给同志们研究、参考和仿行。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

1960年3月25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 指聂荣臻1960年3月16日关于广州、重庆两市工厂技术革命群众运动的若干情况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我此次外出，顺便对广州、重庆这两个城市工厂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了初步了解，觉得这次大搞半机械化、机械化、自动化运动，进展极快，创造了许多好经验，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一、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声势浩大，发展迅速，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特点是：（一）由于反右倾的胜利，运动声势大，动员面广，收效快，超过以往历次技术革新运动。（二）比过去目标

更鲜明，中心更明确，因此更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全面的、带方向性的技术改造。（三）这次变革是生产工具根本改造的过程，也是劳动者思想和技术水平变革的过程，因此影响比过去更深远。二、几个好经验。（一）大搞群众运动。在这次运动中，群众运动的方式又有了新的发展。如现场会结合专门技术问题的解决、结合技术经验的配套总结等。（二）土洋结合，即将较初级的技术和较高级的现代化技术相结合。（三）自力更生。从设计到鉴定的一系列过程都靠自己解决。（四）内外三结合。在厂内，实行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在外部，实行工厂与厂外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结合。（五）将解决当前的关键环节和长远、全面技术改造相结合。三、不断打破旧平衡，创造新平衡。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不怕先进环节突破旧的生产秩序。四、调整生产关系，使之跟上生产力的飞快发展。工厂的生产分工、专业和工厂内部车间的划分要合理；工厂的计划、生产组织与生产调度要及时调整，互相适应；劳动组织、劳动力调配和工资政策要处理好。五、运动要继续大发展。通过群众运动来革新技术，进行技术革命，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水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建设战线上的新生事物，前途不可限量。六、对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等名词的解释，有必要继续研究统一的口径。

关于印发哈尔滨市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材料的批语

（1960年3月25日）

印发各同志。这个材料[1]很好。各省、市、区可派人到哈尔滨去参观、学习；学成回来，仿照办理。

毛泽东

1960年3月25日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60年3月25日报送的《哈尔滨市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材料，载于新华社3月2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三〇一一期上。材料中说，哈尔滨东北农学院实验农场和市郊区香坊人民公社建成两条养猪自动线，一人可分别养猪2000多头和3000头，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其中东北农学院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加工室、母仔猪食堂、肥猪舍3个部分组成，由电力带动作业。香坊人民公社的养猪自动线由饲料粉碎、蒸煮、送食3个部分组成。这两条自动线的结构都不复杂，尤以香坊人民公社的自动线更为简便，设备多用木料制成。凡是有电源的国营农牧场和人民公社的大型养猪场，都可以全部采用。条件较差的地方，也可以采用一部分。

关于中央批转的文件字要印大一些的批语[1]

（1960年3月29日）

彭真、尚昆[2]同志：

中央有些文件，字印得太小了，使人看起来很不方便，也可能使读者感觉得文件不大重要。其实如经委会党组对一月一日至二月十日四十天工作总结[3]，卫生部党组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总结[4]以及本件[5]，都是很重要文件，应将字印得大一些，如中央多数文件那样。请酌处。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1960年3月21日转发《全国畜牧书记会议纪要》的中共中央文件上写的批语。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1960年2月13日关于1月份和2月上旬工业、交通生产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的提纲。

[4] 指中共中央转发的卫生部党组1959年12月16日关于全国农村卫生

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报告。

[5] 指中共中央转发的农业部党组1960年3月18日报毛泽东并中央审批的全国畜牧书记会议纪要。纪要中说，3月7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畜牧书记会议，分析了当前畜牧业形势，讨论了今后发展畜牧业的方针、任务、政策和具体措施，主要内容如下：（一）两年来，农业生产连续大跃进，畜牧业也有发展，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实现大跃进。庐山会议以来，各级党委对畜牧业的领导大大加强了，已经建立起一条有领导、有机构、有队伍的畜牧业战线，畜牧业与农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已越来越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了解，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已空前地调动起来。这一切都为畜牧业的大跃进奠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二）发展畜牧业的方针：以猪为首，猪牛（马）并重，全面高速地发展畜牧业，多养畜、多积肥、多打粮，支援农业高速发展。要辩证地认识养猪与增产粮食、种植业与饲养业的相互依存关系，走种植业与饲养业并重的道路。（三）1960年必须实现畜牧业的大跃进。会议提出的增殖任务是：猪的全年饲养量达到5亿头，年末存栏量比1959年翻一番；大家畜净增10%，羊净增26%，家禽增长一倍，家兔增长两倍。（四）发展畜牧业的几个政策问题。(1) 养猪继续贯彻“公养为主，私养为辅”的政策，两条腿走路。(2) 母畜是畜牧业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必须坚决加以保护。(3) 对于繁殖牲畜有显著成绩的人员和单位，要给予适当的奖励。(4) 役畜的淘汰和屠宰应严加控制，要规定最适宜、最经济的屠宰年限。(5) 价格政策是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工具之一，但畜牧业的大跃进主要是靠政治挂帅，计划推动。（五）发展畜牧业的几项具体措施。根本措施是料、水、繁、种、保、管、舍、工八个字。当前要突出抓紧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1) 抓紧牲畜的配种和保胎工作。(2) 饲料问题，特别要抓紧解决猪的粗精饲料。(3) 防疫问题，要注意防止疫病的传染，立即开展一个防疫运动。(4) 大搞工具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饲养定额。(5) 搞好集体饲养的经营管理，办好和发展畜牧场。(6) 加强畜牧区的基本建设。（六）加强畜牧业生产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政治挂帅，既要有专职领导，又要有专业机构和专业队伍，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畜牧业生产战线，广泛开展群众运动，实现畜牧业的大跃进。

对李富春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报告稿[1]的修改

（1960年3月）

一

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迫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不进行不断的改革。

二

这样一来，上下打成一片，成为完全平等的兄弟般的关系，也就进一步地激发了广大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自觉性。我们一定要把领导上的老爷式作风、官僚主义作风、命令主义作风，完全消灭得干干净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是短时间内所能完成的，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一年整风一次，彻底批判那些老爷式的和

---

[1]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60年3月16日报送毛泽东审阅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第三次修改稿）。3月30日，李富春代表国务院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载于1960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人们，把他们的缺点改变过来。

三

一九五九年党内一小部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党的总路线、生产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运动，他们进行宗派组织，实行分裂党的活动，从党内向党的大多数举行猖狂的进攻。这是社会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对李先念关于一九五九年国家决算和一九六〇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60年3月）

一

有些意见，待与先念一商。

二

十五个问题[3]中的一些问题应加进去[4]。

三

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少数看不清大势的人，对于当时的调整指标[5]，发生若干怀疑和顾虑。但是事实很快地作了肯定的答复。年度国民经济和国家预算的执行结果表明，他们的怀疑或反对是完全多余的和错误的。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0年3月16日印发的关于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草案报告的第四次草稿。3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在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载于1960年4月1日《人民日报》。

[2] 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毛泽东1960年3月中旬在浙江召集华东六省一市负责人等参加的会议上提出的以下15个问题：一、四化问题。二、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问题。三、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问题。四、农村人民公社的五个问题。五、农业问题。六、工业问题。七、小土铁路、小洋铁路问题。八、工业、交通、财贸、文教系统普遍支援农业问题。九、教育问题。十、农业纲要四十条提前完成的问题。十一、除四害问题。十二、三反问题。十三、干部回避问题。十四、外宾参观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情况的问题。十五、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4] 中共中央办公厅3月16日印发的报告第四次草稿中关于1960年国家预算安排的总的要求是："一九六〇年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应当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积极加速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进程，使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跃进得更好，并且为以后年份的全面跃进创造条件。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用比十年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大大提前实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任务。"根据毛泽东批注的意见，李先念作了补充和修改，在3月30日的报告中这段话改为："为此，一九六〇年应当进一步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结合起来，正确地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应当继续执行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全面安排的方针，并且进一步加强运输业、动力工业、采掘工业等部门；应当动员工业、交通、商业、文教各个系统的力量，无例外地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应当积极加速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进程，在各行各业中大搞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努力提高劳

动生产率；应当贯彻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的方针；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积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全面组织城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巩固和发展公共食堂；应当厉行增产节约，发动广大群众，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切实整顿干部作风，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用比十年更短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提前实现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任务。”

[5] 指1959年8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所作的若干调整。

1960年，毛泽东、朱德在中南海和群众在一起。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1960年3月30日）

一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下旬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1]，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

---

[1] 指毛泽东1960年3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第二期的批语。

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1]。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184次，电话会议56次，印发文件1074件，表报599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2]。同志们，这

---

[1] 指中共历城县委1960年3月14日为贯彻执行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师到田的指示给济南市委并报山东省委的报告。其中讲到克服“五多五少”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个部门的干部，既要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四）立即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去就地商量解决，而不要把人召集到机关里开会。

[2] 中共山东省委1960年3月22日将历城县委的报告转发全省各地市县委，人民公社党委及省委各部委、厅局各党组，指出历城县委提出的四条措施，都是可行的，各地应一律仿照执行。省级各部门，要认真检查一下自己工作中的“五多”“五少”情况，一定要精简会议、文件、表报，必须坚持领导同志“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做调查研究”，应当深入基层，深入“生产现场”，同地、县以及基层干部一起，会师到田。

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1]，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央

1960年3月30日

二

此件送刘、周、朱、彭、尚昆、仲勋、震林、澜涛、富春、一波、先念、定一[2]各同志阅。

---

[1] 指毛泽东1953年3月1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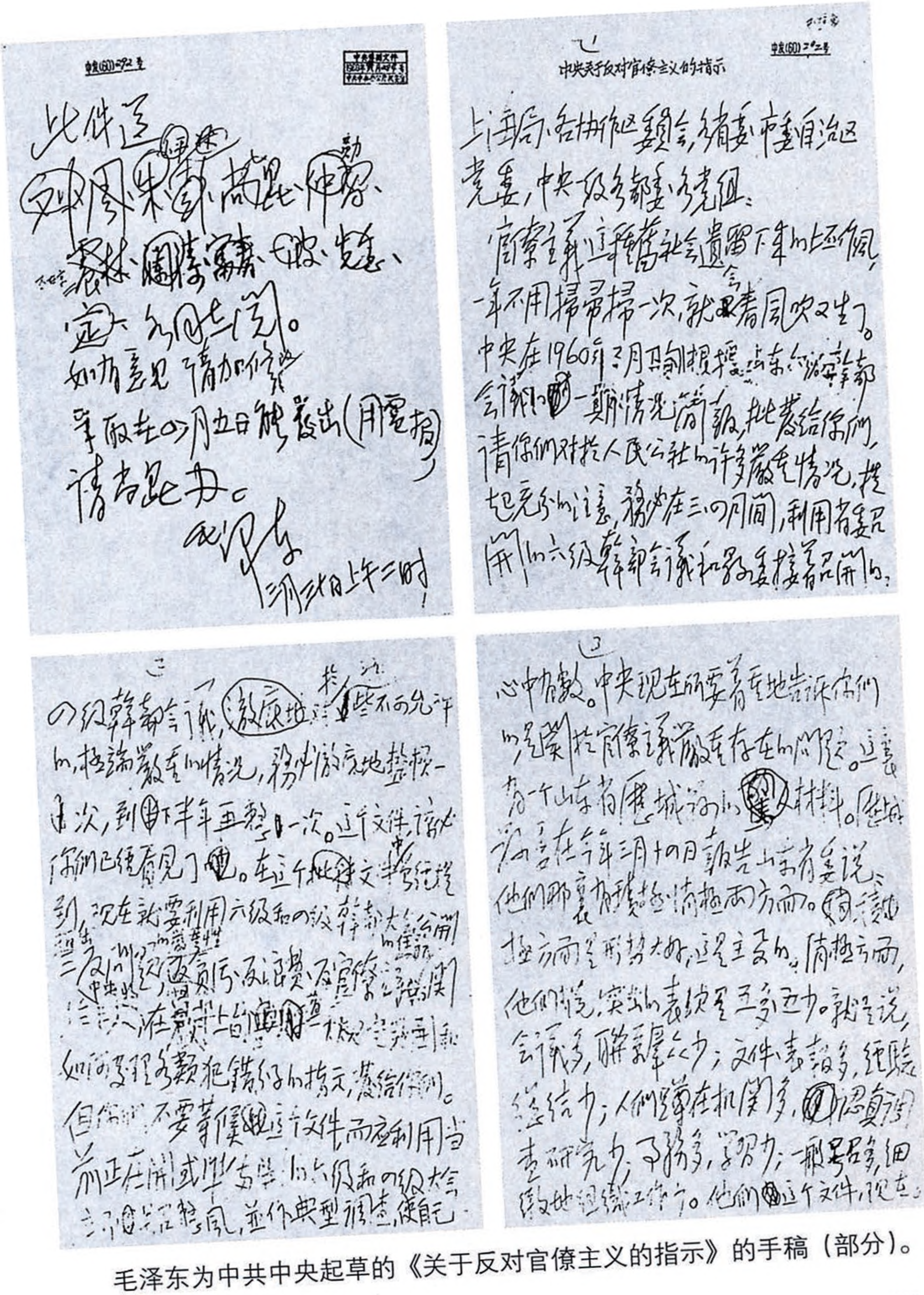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如有意见，请加修改。

争取在四月五日能发出（用电报），请尚昆办。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上午二时



中发(60)292号

此件送刘、周、朱、陈、彭真、仲勋、震林、[illegible]、富春、一波、先念、定一、各同志阅。如有意见，请加修改。争取在四月五日能发出（用电报）。请尚昆办。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上午二时

一

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中发(60)二九二号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1960年3月24日根据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

二

四级干部会议，放手让[illegible]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顿一次。这个文件，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批示文件中已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illegible]如何处理大多数犯错误的人的指示，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即将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illegible]，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

三

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调查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个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坐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illegible]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的手稿（部分）。

1960年3月，毛泽东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王国藩握手。

1960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夕，毛泽东再一次接见全国劳动模范孟泰。

1960年4月，毛泽东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交谈。

1960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1960年4月，毛泽东和四川省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果基木古亲切握手。

1960年4月，毛泽东会见历史学家周谷城。

1960年4月，毛泽东会见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阿沛·阿旺晋美。

对中央转发宁夏区党委关于纠正中宁县工作中错误问题报告[1]的指示稿[2]的批语

（1960年3月31日）

一

尚昆[3]办。

---

[1] 指中共宁夏区委1960年3月25日关于纠正中宁县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撤换县委主要领导成员问题给中央并发各地、市、县委的报告。

[2] 指中共中央关于同意宁夏区党委纠正中宁县工作中严重错误问题的报告给宁夏区党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的指示稿。指示稿说，中宁县的问题，虽然是个别的，但其性质是严重的。谎报成绩，隐瞒缺点，甚至对反映真实情况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是一种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凡有这类坏人坏事的单位，都应当接受中宁县的教训，及时地严肃地予以处理，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勇于向党的领导机关反映各种真实情况，并且向党内外一切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指示稿中加写的一句话。1960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并可登党刊。

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1]

（1960年3月）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通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

---

[1] 这是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部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主要是煤、铁问题。有煤有铁就有钢。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〇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就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比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

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一个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各省先摸一两个县，在六级干部会上提出。贪污的钱要退出来，贪污严重的要处理，一定要赔偿。公社的开支，要由党委集体决定，报县批准。我批的山东那个文件（指《中央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说："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念，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错误性质严重，民愤极大的，不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外部矛盾。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回避问题：

不做本地官。不要全部回避，一律回避破坏一些原则。应该相信多数是好的。大概限制在四分之一才好，主要负责人回避。

先派人去摸几个月，了解情况，然后反客为主，反主为客，请他走开。

有一部分人要坐班房。不要杀人。

外宾参观问题：

一定要使他们看好、坏两种，最好看好、中、坏三种，“强迫”他们看。如果来不及，看两种也可以，实在不行，也只好不看。

我跟德国人讲，公社有百分之五十是一类社，百分之三十五是二类社，百分之十五是三类社。四万个公社中，有六千个掌握在坏人手中。他听了之后，感到我讲了公道话。

三类社整好不难。先进与落后，一万年也有。外宾参观，中央发过指示，好坏都看，可以比较。

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

煤、电、水、盐、木材、石油、农副产品，主要是煤、木材的增产节约与综合利用。此外，还有拖拉机的方向问题。

反华问题：

读一个文件（指《关于反华问题》及附件），大家斟酌。反华，其实是大拥小反。把我们的事情办好，影响很大。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专列上主持召开天津会议。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0年4月2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值此匈牙利解放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五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56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进攻被粉碎了以后，在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匈牙利人民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特别巨大的成就。今天，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了。不久以前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在今后几年内完成社会主义奠基工作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任务。我们深信，勤劳智慧的匈牙利人民一定会以无比的劳动热情，胜利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不断地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也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以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针对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一方面坚持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破坏的阴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并且赢得了重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一向把匈牙利人民的每一项成就看成自己的成就，并且为这些辉煌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近年来，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高涨，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亲密合作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一年前我们签订的中匈友好合作条约，把两国人民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进一步用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对促进我们两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衷心地祝贺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下，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努力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日于北京

对陆定一在全国人代会上的发言稿《教学必须改革》的批语[1]

（1960年4月7日）

退陆定一同志。

已阅，很好。

毛泽东
四月七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1960年4月4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一发言稿指出，从现在起，我们想进行规模较大的试验，在全日制的中小学教育中，适当缩短年限，提高程度，控制学时，增加劳动。我们准备以10至20年时间，逐步地、分期分批地实现全日制中小学教育的学制改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树立这样的奋斗目标：力争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完成在青壮年工农群众中扫除文盲和在学龄儿童中普及小学教育，力争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基本上普及初中教育，同时大力发展高中、中等专业和高等教育，举办一部分速成的高等专科学校，发展各级各类的业余教育，为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队伍。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就必须进行教

学改革。1958年以来，我们在各地进行了改革学制、改革中小学课程和改革教学方法的试验，证明教学改革是实际可行的。现在，各省市正在依照自己的情况，做具体安排，进行较大规模的教学改革试验。教育和教学，必须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学校师生参加劳动，主要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改变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教育与实际脱节的状况，改变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件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坚决实行。我们对新学制的初步设想，是全日制中小学的年限缩短到10年左右，程度提高到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一年级。当然，教学改革光有试验还是不够的，还要准备物质上和思想上的条件。其中物质条件是：第一，必须提高教师的水平，这就要求对师范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注意组织现有教师的进修。第二，必须把现有的“二部制”学校逐步地分批地变成全日制的，然后再变为寄宿学校，这就要进行基本建设。第三，必须办好幼儿园、托儿所，这就要大大发展幼儿师范学校和训练保育护士的学校。第四，采用录音带、幻灯等新的教育工具，以及充分配备必要的仪器、模型等新式教具。第五，要有充分的纸张供应。思想条件主要是对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彻底批判和共产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必须反对拜倒在资产阶级教育学面前的那种奴才作风，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充分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的共产主义风格。1960年4月9日，陆定一根据这一送审稿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大会发言。4月10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他的发言。

中央转发江苏省六级干部大会报告的批语

（1960年4月7日）

一

各省、市、区党委：

江苏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现将他们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

中央

1960年4月7日

二

即送刘、邓、彭真[2]阅，请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

---

[1] 中共江苏省委1960年3月30日给中央和毛泽东并报上海局的这一

报告说，我省六级党员干部大会3月19日开始，前两天讨论当前形势，从22日起到28日止，讨论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过渡问题和发展社有经济问题。讨论的过程，是矛盾逐步展开和解决的过程。虽然采用了和风细雨、上下交心的方式，实际上仍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首先集中在“要不要过渡”和“过渡的条件”两个问题上。经过反复讨论，特别是回忆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的发展历史，认识到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求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过渡的迟早，不在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粮食生产、商品生产的增长，农村的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程度，社有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觉悟水平等条件。因此，在现阶段，要坚持以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积极地领导和帮助大队发展生产，积极地逐步地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到基本社有制创造条件。现在坚持三级所有制，正是为了将来消灭三级所有制。关于如何发展社有经济问题，也有争论。一是关于发展社有经济的办法。前一时期“一平二调”的现象已普遍露头，个别地方还相当严重。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用“一平二调”的办法来发展社有经济是行不通的，它直接影响大队生产的发展，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社队干部之间的团结，助长铺张浪费现象，因此“共产风”是刮不得的，但是共产主义风格必须大大发扬。二是关于发展社有经济的方针。一部分社队干部片面追求产值，一味设法抓钱，忽视了以粮为纲的方针，不愿意进行长远的农田基本建设。会议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反复讲清“以粮为纲，林牧副渔、社办工业全面发展”的道理，使大家认识到粮食不过关，日子不好过。要过粮食关，又必须大抓以水、土、肥带头的八字宪法，大抓农业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保证农业的高产稳收。三是当前领导的重点是抓队有经济还是抓社有经济？经过讨论分析，大家认为，目前全省社有经济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大队经济占到70%以上。因此，发展社有经济，必须建立在发展队有经济的基础之上。大队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更好地从原料、资金、劳力等方面促进社有经济的发展。社有经济发展了，又可以反过来支持大队经济的发展。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吉林省委“三反”部署报告的批语和在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上加写的话[1]

（1960年4月7日、11日）

一

此件[2]即送小平、彭真[3]同志阅处。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上午四时

用后退毛。

二

如果有些地方已在进行三反，而又注意到并不妨碍生产或反而有利于生产的促进者，亦可以由你们决定，照样进行。

---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60年4月7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部署“三反”问题报告的指示稿指出：“中央认为吉林

省委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今年在全国各省区争取一个很好的丰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其他各项工作都应注意到不要妨碍农业生产。因此，请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像吉林省委那样，切实考虑一下进行农村‘三反’运动的时间，力求把这个运动放在农忙的间隙去进行。如果目前春耕太忙，为了使干部能够集中精力领导生产，可以把运动推迟到农忙之后去进行，而在近几个月则只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即本篇二。4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2] 指中共吉林省委1960年4月2日关于部署“三反”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省六级干部会议自4月1日转入讨论作风问题，从初步揭露的情况来看，人民公社的干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是相当严重的。我们准备集中已揭露的材料，立即在会议上开展“三反”，作为这一整风运动的发端。目前全省春耕已经开始，我省无霜期短，适时早种是决定农业收成的关键，需要十分抓紧。鉴于“三反”尤其是反贪污问题必须集中领导，发动群众，进行细致的工作，如在春耕期间铺开，县、社领导对生产与整风恐难兼顾，因此省委讨论，拟在六级干部会议结束后，首先集中力量抓紧春耕播种工作，动员并组织省、地、县、社干部下乡下田，通过参加、领导、检查生产，对干部进行作风教育，同时进一步摸清农村干部作风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待春耕过后或挂锄期间再召开县的四级干部会，深入地开展农村的“三反”整风，一贯到底，一气呵成。关于城市机关、企业的“三反”，决定立即组织典型调查，经过研究，再提出方法、步骤。

[3] 小平，即邓小平。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关于阅读有关英、法、美、西德关系等五篇文章的批语

（1960年4月8日）

一

第47页到55页，有五篇文章[1]值得一看，希望同志们认真看一遍。英法将走向合作，对抗美德，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

四月八日上午七时

二

送少奇、恩来、林彪、小平[2]四同志阅，阅后退毛。

---

[1] 在新华通讯社1960年4月7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五二〇期第47至55页，毛泽东标有着重号的5篇文章分别是：一、《美报打击英国分化英法》。这篇路透社4月6日发自纽约的电讯说，纽约各晨报纷纷发表社论，评论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访问伦敦，希望他不要因为这次在英国受到的热情接待而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英国时的遭遇，并期待他对英国首相麦

克米伦施加影响，使英国不再指责西德。二、《美〈明星晚报〉谈西方矛盾，说英国反对西欧一体化并特别担心西德强大》。这篇新华社4月5日发自日内瓦的电讯说，美国《明星晚报》4月1日发表威廉·怀特的一篇文章，认为历史悠久的美英伙伴关系中最大的裂痕是美国支持一个被称为内部六国的由法国、西德统治的欧洲贸易集团，而对与之对立的由英国统治的、被称为外部七国的贸易集团则表示明显的冷淡。这可能是影响英美团结的一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三、《美国农业工人生活异常困难》。这篇3月17日发自纽约的本刊特讯说，最近美国关于《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工人状况》报告指出，一年来，美国农业工人仍像从前一样，不仅不能从当地救济金中领取失业保险津贴，而且也不能领取工伤事故保险津贴，并被剥夺了最低工资法所规定的权利，他们享受不到关于最低住房保证的规定，子女也被剥夺了正常学习的机会。据统计，忍受这种“几乎是奴役性”状况之苦的有100万农业工人。四、《戴高乐在伦敦继续参观访问》。这篇法新社4月6日发自伦敦的电讯说，法国总统戴高乐到达英国的第二天达到访问活动的高潮，晚间在伦敦法国大使馆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英国女王和政要。五、《〈泰晤士报〉发表社论集中攻击西德制造不安》。这篇新华社4月5日发自日内瓦的电讯说，伦敦《泰晤士报》4月5日发表了该报记者题为《英德关系造成了不安，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潜在危害》的报道，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西德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不大自然而已，可是这种关系目前已降到最低点，就连美国国务卿赫脱都不否认，西德由于它过去历史、地理条件，工业情况以及缺乏民主治理的经验，可能再次成为对欧洲的威胁。欧洲共同市场的其他成员国，在战时都是德国的受害者。共同市场正是改善英德关系的主要障碍。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4月10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山西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很好，揭露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给予解决的方针、政策和办法[1]，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对人民公社现存问题作了认真分析和适当处理的带系统性的文件，可供各地参考，并望结合自己的情况酌量予以采纳。本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央

1960年4月10日

二

刘、邓、彭、谭[2]阅后，尚昆[3]即办。

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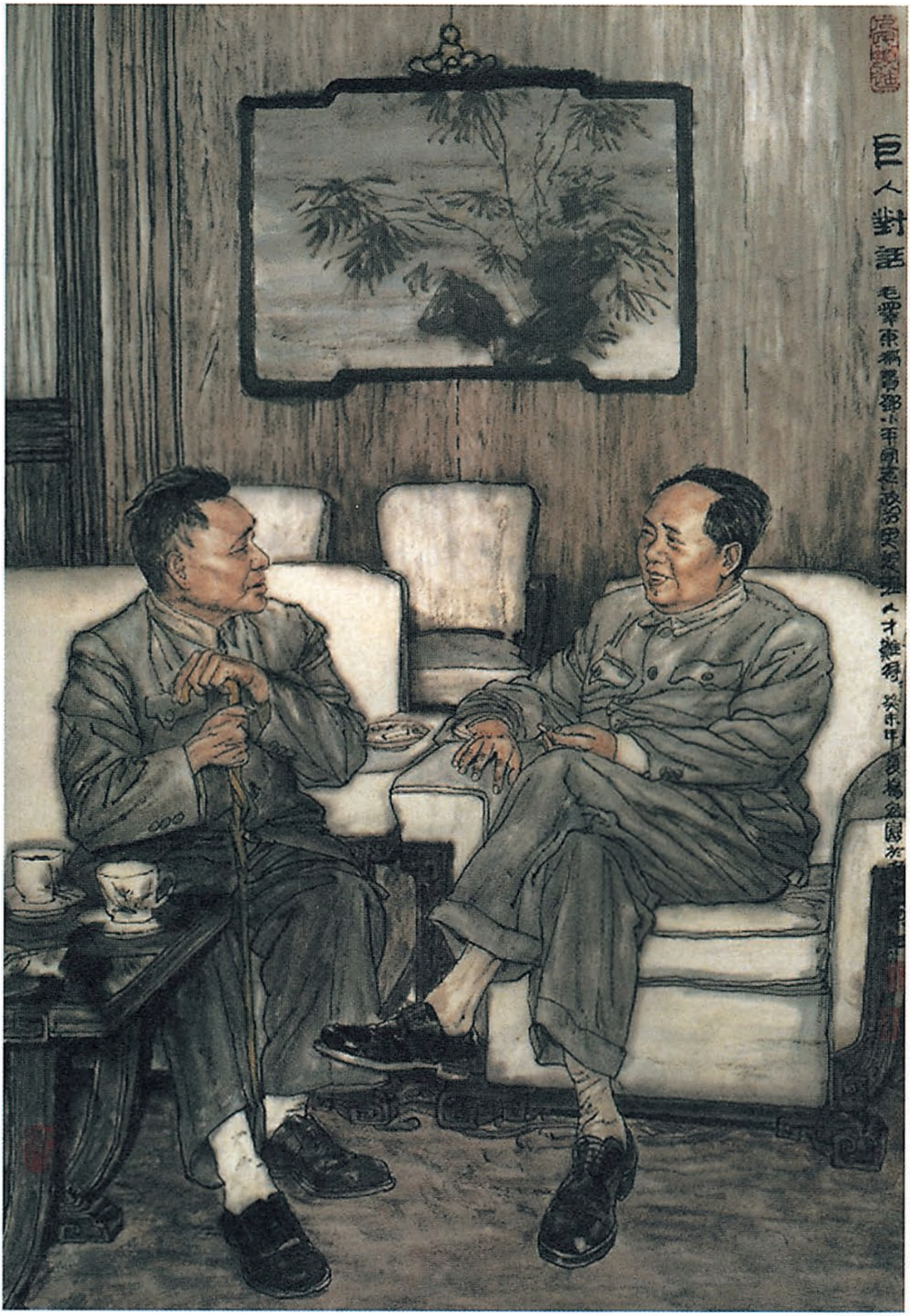
[1] 中共山西省委1960年4月6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毛泽东的报告说，我省六级干部会议开得及时，揭发出来的问题很多。一、关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问题。会前公社一级干部有三种态度：一是积极为过渡创造条件，二是抢先过渡，三是消极等待。通过这次会议的学习讨论，一致认识到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的发展水平和群众的觉悟水平，并大体同意过渡的条件有以下5条：(一) 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社员平均收入相当于县市营工业工人的收入水平。(二) 公社一级所有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社营经济产值占到全社总产值的一半以上。(三) 各个管理区的经济水平在共同高涨的条件下，大体趋于平衡。(四) 初步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大中型农业机械绝大部分为公社一级所有。(五) 群众有较高的觉悟，管理区有觉悟较高、能力较强的骨干。根据这些条件来看，当前全省实现由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条件还不成熟。为了摸索经验，全省有计划有控制地组织一些试点是必要的。目前省委批准试点的公社有34个。二、关于发展公社一级的经济问题。去年各公社制定的1960年发展社营经济的计划中，有70%的公社有“一平二调”的打算，其办法是：(一) 无偿抽调；(二) 低价收买，不等价交换；(三) 不付现金，有价无款；(四) 摊派发展社办经济基金；(五) 随意占用管理区的土地；(六) 随意抽调管理区的劳力。经过讨论，会议指出判别“一平二调”的界限有三，即不利于生产的发展，不等价，不自愿。社营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大、公、新。发展公社一级经济的资金主要来源有四：(一) 社营企业的利润；(二) 按规定向管理区提取的积累；(三) 国家投资；(四) 国家贷款。发展社营经济所需生产资料的主要来源有五：(一) 自力更生；(二) 向国家订购；(三) 按自愿等价原则向管理区订购；(四) 按规定抽调一定的劳力培植果园、林区等；(五) 将某一管理区首先转变为公社的直属企事业。三、关于分配问题。会议发现以下值得重视的问题：(一) 管理区积累偏大；(二) 公社向管理区提取的积累偏高；(三) 社员分到手的现金很少。为此，提出以下两条解决原则：(一) 除重点区外，必须保持社员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长，必要时可将积累比例适当压低；(二) 适当压低公社提取积累的比例，管理区的公积金应比上年有所增长。四、关于人民公社的财务管理和干部作风问题。过去浪费现象较为普遍：(一) 大搞非生产性的建设和购置；(二) 请客、送礼、设宴招待现象严重；(三) 随便浪费劳力，破坏

现有建筑；（四）随便扩大编制。此外，贪污现象也有所增长，有些干部作风十分恶劣。会议认为必须重申以下禁令：不准请客，不准送礼，3年内公社一律不准盖礼堂，不准随便增加编制，公社办公费不能超过规定，公社管理费用不能超过公社一级收入的1‰。另外还制定了公社财务管理制度草案。五、关于农村公共食堂问题。目前各方面工作做得较好的一类食堂占60%，二类食堂占30%，不巩固的三类食堂占10%。大家对书记挂帅办好食堂，贫下中农要在食堂管理委员会中占优势，粮食管理实行指标到户、统一保管等经验，极感兴趣。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0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巨人對話
毛澤東稱贊鄧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
癸未年

《巨人对话》（中国画）

在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筹备情况和安排意见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4月14日）

会前，请谭政同志与小平[2]同志商量一次。我意注重实际解决问题，对外不要大吹。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谭政和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1960年3月21日给周恩来并毛泽东和中央的这一报告说，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于3月17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有关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安排意见是：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5500人，其中民兵代表5040人，赤卫队、少先队、老民兵代表110人，军队准备退伍的士兵代表350人。二、会议准备在4月18日正式开幕，会期10天。会议方式以大会为主，结合中小会进行。拟请罗荣桓同志致开幕词，罗瑞卿同志作关于民兵建设问题的报告，林彪同志致闭幕词。三、建议开幕时请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到会，并接见一次到会代表，照相留念。另给到会代表发点奖品和纪念品。4月18日，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没有出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对《列宁主义万岁》一文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0年4月）

一

不透，宜加几句。[2]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在《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1960年4月14日送审的这篇《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中的批语；本篇三、四、五是写在此文4月16日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六是在4月16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句话；本篇七、八是对4月16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陈伯达在4月16日的送审稿上向毛泽东报告说：“已经把您的意见告诉小平等同志，经过商量后，作了修改。原来一共有十五页提到您的名字，现在只存下四处，其中除了纸老虎问题的一处外，都是谈的国内问题。”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1960年第八期上。

[2] 这篇编辑部文章的送审稿写道：“铁托所说的，是帝国主义为压迫本国人民、压迫全世界、进行扩充军备的‘国内建设’呢？还是社会主义为增进人民幸福、谋求世界持久和平的‘国内建设’呢?”在这段话旁，毛泽东打了一个问号，并写了这句批语。这篇文章公开发表时，这段话没有修改。

二

东南亚，西方会挑拨。[1]

三

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

---

[1] 这篇编辑部文章的送审稿写道：“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当然要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公开发表时，这段话修改为：“当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帝国主义进攻而被迫进行防御战争并举行反攻的时候，像苏联在反希特勒的战争中那样，为着追击和消灭这种从国外来的敌人因而越出国境，这应该不应该呢？毫无疑问，这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需的，完全正义的。根据共产主义者的严格的原则，必须是绝对地限制在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这样做。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许可、决不应该、也决不能够在不是受到国外敌人侵略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军队越出国境。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军队是正义的军队，在他们因为反击国外敌人而不得不越出国境的时候，当然会在他们所到的地方，发生影响，发生作用，但是，即使这样，在那些地方，在那些国家，也还只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才能够出现人民的革命，才能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

四

和平、战争，要有两手。

五

将各段要点，在首尾两处总提一下。

六

宣言中这一段话，说得很正确，情形正是这样。[1]

七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有可能，都应该越来越多地掌握这类为人民谋福利的新技术[2]。

---

[1] 这篇编辑部文章的送审稿写道：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说："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句话。

[2] 这里指原子能和火箭等类新技术。

八

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紧紧地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必须紧紧地依靠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即广大贫农群众，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然后才可能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

1960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和有关同志研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工作。

中央转发中南协作区常委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4月18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中南协作区在郑州召开的常委会议向中央所作的报告[1]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中央认为报告所提出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值得你们加以研究和参考。

中央

1960年4月18日

二

刘、邓、彭[2]阅后，尚昆[3]用电报出〈发〉去。

毛

---

[1] 中南协作区委员会1960年4月9日给中共中央的这一报告说，4月

7、8两日，我们召开常委会议，就下列问题初步地交换了意见。（一）今后三年计划问题。会议认为到1962年全国生产3800万吨至4000万吨钢是有可能的，中南地区力争达到610万吨至640万吨。（二）四化问题。我们将以更大的努力来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目前着重抓总结、推广和提高三个环节。（三）大搞“小洋群”和“小土群”问题。打算利用地方自筹资金和超产分成的材料，分批新建一些“小洋群”的煤井。小高炉的重点是提高利用系数。同时要兴修若干轻轨铁路和土铁路。有条件的人民公社还要搞一批“小土群”的煤、铁和土铁路。（四）体制问题。将继续下放一些企业，在不影响全局的情况下，帮助下面多搞一些自己的生产建设。（五）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问题。主要解决粮食、绿化、除四害、扫盲4个问题。（六）农业问题。主要抓粮食，同时抓经济作物与多种经营。一方面要大搞机械化、半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继续掀起养猪高潮。此外还要大搞土化肥。（七）生活安排问题。各省区应切实检查一下缺粮的社队，迅速予以调拨，粮食安排到食堂。要组织群众种菜。对所有的劳动者都要引导他们注意劳逸结合。（八）三反问题。要大张旗鼓地造成声势，使全体干部懂得三反的意义。三反运动分两步进行：省、地两级先进行反官僚主义作风，同时抓紧时间在县以下进行三反；县以下三反结束后，再进行省、地两级的三反。（九）干部回避问题。基层干部全部回避本地的办法，要经过一段试点和酝酿才能肯定是否妥善。但对少数坏分子和不胜任的干部必须坚决撤换，对少量不便于在本乡本土工作的好干部也应该调离本地，在基层干部中逐步配搭1/3左右的外地干部。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发扬民主，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发挥党的监察机构的作用，建立必要的财务等制度。（十）最近时期的工作安排。还未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省区，最近即将召开。各省区党委负责同志准备从4月到5月中旬深入基层，了解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各行各业办机械是高速度发展机械工业的好办法》一文的批语

（1960年4月18日）

一

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这是一个好文件[1]，发给你们遵照执行。可登党刊。

中央

1960年4月18日

二

送小平、彭真、富春[2]阅后，尚昆[3]发出。

---

[1] 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印的《计划工作简报》第十五期上登载的这篇文章说，以专业机械工业部为主，同时发动各行各业办机械，是保证国民经济大跃进、保证供应建设所需设备的好办法，也是机械工业继续大跃进的好办法。1960年，全国除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农业机械工业部两个专业部以外，还有铁道部和纺织部两个“半机械部”，以及煤炭部、水电部等17个“小机械

部”，这是一支强大的机械工业队伍，全部地或者部分地承担着本部门主要专业设备的制造，对全国机器设备的制造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国家计划产品中，大约有一半的产品是由这些部门全部地或部分地承担生产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机械工业日益繁重的任务仅仅由专业机械部来承担，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出路就在于采取统一规划、综合经营的办法，发挥各方面办机械的积极性，由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大家办机械。由需要设备的部门制造本部门的专用设备，可以更好地结合本部门的实际需要，最迅速地采用、吸取本部门和本地区经常出现的技术革新与创造发明，也便于发挥大家办机械工业企业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制造和修理密切结合，也更加有利于迅速培养和壮大机械工业的技术力量。这样，便可以使专业机械部门能够更好地集中力量发展高效率的、大型的、精密的、尖端的设备和新产品，更好地供应各行各业所需的通用设备和标准设备。因此，从中央到地方，以专业机械部门为主体，结合各行各业办机械，是我国高速度发展机械工业的正确途径，也是迅速建立完整的机械工业体系的最好形式。在各行各业大家办机械的情况下，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合理分工；二是要加强统一领导。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中央转发山西省委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0年4月20日）

一

少奇、小平、彭真[2]同志阅后，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泽东
廿日

二

另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三

经过1961年一年的努力，争取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是有可能的。

四

本件[4]及附件[5]，可登党刊。

---

[1] 本篇二、三、四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委关于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报告的指示稿中加写的三句话。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中共中央1960年4月15日为转发山西省委关于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报告的指示稿。其中指出："提前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提前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的重要关键之一，因此，推广万荣县的多快好省的扫盲经验是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山西省委已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这一经验，并且争取在一九六〇年实现无盲省。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即是说，除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和若干方言地区以外）也都可以而且应当普遍推广这一经验。只要各省市区党委下定决心，抓紧时机，在今年秋前试点和训练师资，在秋后就可以大规模地推广。"毛泽东审阅时，在这段话后面加了一句话，即本篇三。4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5] 指中共山西省委1960年4月5日关于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回生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他们决定经过重点试验，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取注音识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仅两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盲县。现在业余教育运动，已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参加业余高小、初中班的青壮年已达到86.5%，群众性的看书、买书、借书、写作形成了社会风气，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小组达到

322个。万荣县的经验证明，注音扫盲的办法，是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巩固与扩大扫盲成果的好办法，是加速工农知识化的捷径。推行这一办法，为改革工农业余教育和全日制小学教育，缩短教学年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了推广万荣县的经验，我们于去年12月在万荣县召开了有各专区、市、县教育行政干部、共青团干部和中小学校长、教师等共600人参加的现场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扫盲和业余教育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训练出拼音教师67600多人，参加汉语拼音学习的有328万多人。我们已经作出全面规划，力争在1960年实现无盲省。现已组织了若干学制改革试点，进一步为教学改革创造经验，同时着手准备编印大量的注音通俗读物，以便及时供应正在迅速展开的全民性扫盲和业余教育运动的需要。毛泽东在审阅时，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

1960年4月，毛泽东等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

对冶金部关于继续大办钢铁“小洋群”和“小洋群”升级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60年4月21日）

---

[1] 冶金工业部党组1960年4月18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并报毛泽东和中央的这一报告说，自1958年秋全国大办钢铁以来，各地建立的钢铁、矿山、炼焦、耐火材料“小洋群”及“小土群”，经过一年来的整顿、扶持与提高，已逐渐成长为钢铁战线上的一支雄厚的力量，它对支援“大洋群”生产、支援地方工业和农业，已经而且将继续作出巨大的贡献。目前它正向“小洋群”的高级形式——联合企业的方向发展，将对我国钢铁工业更高速度的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报告在分析了“小洋群”企业的产量和各种技术经济指标，以及它在整个钢铁工业中的巨大作用之后指出，“小洋群”更有意义的作用还在于：一、它是冶金工业进行技术革命的开路先锋；二、它的生长发展、创造革新，对人们的精神面貌、意识形态的改变，起着巨大的作用；三、它是今后数以千计的钢铁联合企业的生长点。为此，我们在今年2月召开了一次全国各省、市、区的冶金局长会议，着重研究了以下两个问题：一、在现有钢铁“小洋群”中，选择一批条件好的，使它们不仅增加炼钢和轧钢设备，而且逐步扩大为中小型联合企业。二、规划新建一批“小洋群”，使每一个有条件的县、社，都有一个或几个钢铁“小洋群”或“小土群”。196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冶金工业部党组的这一报告。

一

很好。文件值得一阅，阅后退还。

毛泽东
四月廿一日

二

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1]四同志阅。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给杨开英的信

（1960年4月21日）

开英同志：

久不见，甚以为念。你的情形好吗？有暇望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四月廿一日

1960年，毛泽东接见出席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的代表。

1960年4月23日，朱德和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1960年，毛泽东接见出席全国民兵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关于查找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发言材料等的批语

（1960年4月24日）

林克[1]：

第二篇[2]请阅，其中谈到五大城市书记在人大会上就人民公社问题发言[3]，请找〈你〉于本日找来给我一阅。另有钱学森关找〈于〉农业工厂化一项提案[4]，亦请找来。

毛泽东

廿四日上午六时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中共中央统战部1960年4月23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登载的第二篇文章，题为《天津市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在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动态》。

[3] 指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武汉市委书记宋一平、广州市委书记朱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发言指出，从1958年起，我们开始试办城市人民公社。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在大城市也是完全适合的，为广大人民所热烈欢迎。这是因为：一、它发展了生产，在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兴办了大批中小工厂。二、它发展了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增加了劳动人民的收入，从而改善了人民

的生活。三、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四、使广大妇女群众特别是家庭妇女走上了彻底解放的道路。五、促进了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度地发展，而且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工具。在组织城市人民公社的生产和生活的同时，我们应当继续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积极发展，把公社办好，但又要实行自愿原则，决不要要求一切人参加；对公共食堂，更应该采取积极办好又根据自愿的原则；个人生活资料和私人存款，仍然都归个人所有；办集体福利事业所需的房屋、用具，应提倡因陋就简、自力更生、政府加以辅助的精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加以解决。无论参加人民公社与否，生活必需品都应照常供应。

[4] 指全国人大代表钱学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提交的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试验工厂的提案。提案中说，我国农业生产（包括农、林、牧、副、渔等几个方面）现在有了很大发展，它在将来肯定要走向工厂化的。现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研究主要是在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里进行，这可以说是“土”的一条路，是一条很好而且主要的路，但不是唯一的路。还有“洋”的一条路，就是充分利用现代生物学，现代数学、物理、化学，现代动力、机械和自动控制技术，以及现代气体力学、流体力学的一切成就，即利用一切“高、精、尖、新”的科学技术成就，进行农业生产工厂化的试验，找出大大打破今天农业生产限度的方法。由于国家一时还不能供应大量的机械和动力，这项试验在近期还不一定能全部推广，但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肯定是可以立即推广的。而且为长远打算，我们有必要做这项探索性的研究，为农业生产工厂化打开道路。

对薄一波关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报告的批语

（1960年4月24日）

一

此件[1]送各省委、各大中城市党委、各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

二

小平、彭真[2]阅，尚昆[3]办。

毛泽东

廿四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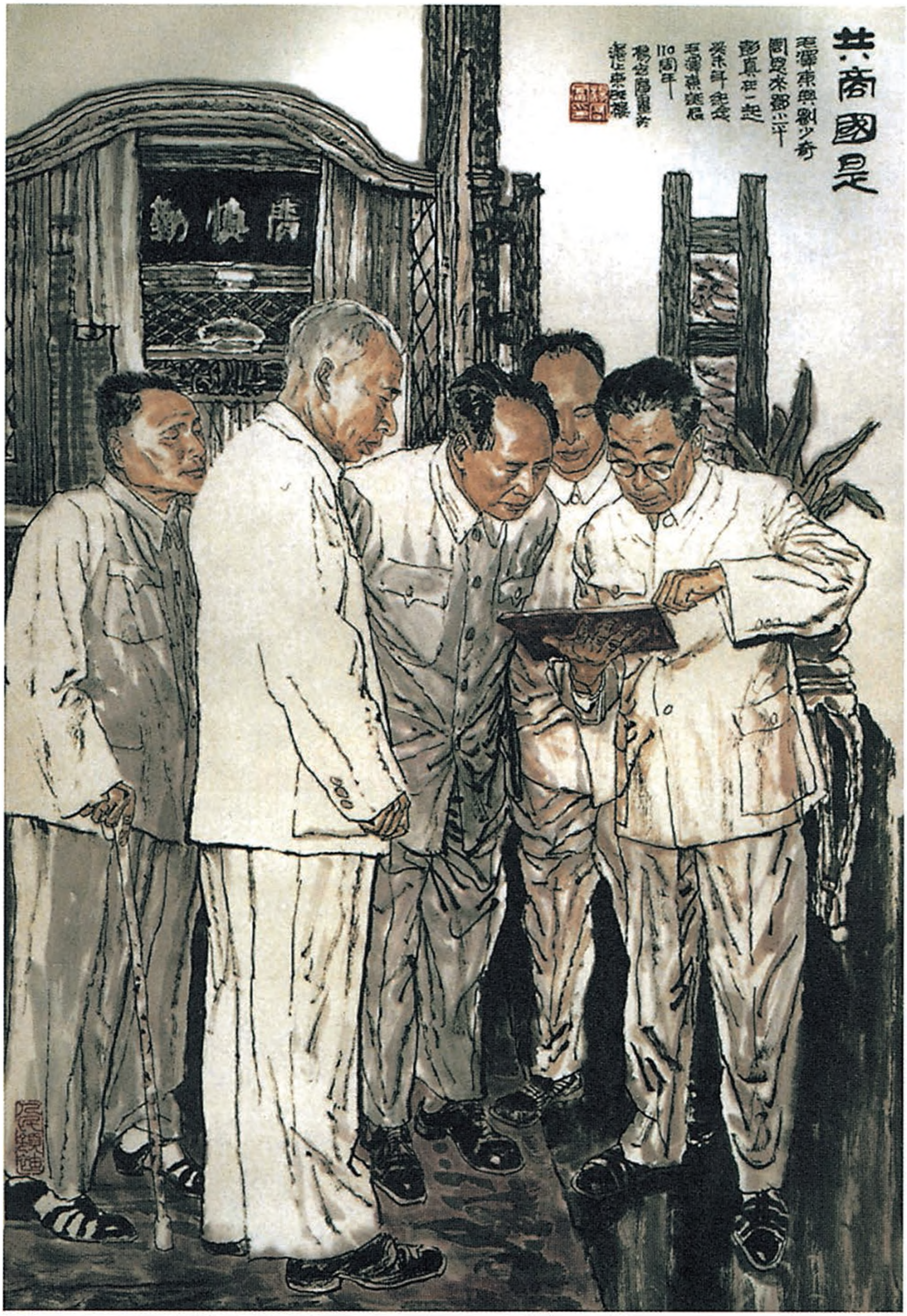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60年4月18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在这次工业书记会议上，我代表经委党组就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作了一个报告，指出这次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百花齐放，各有特色，而又有许多共

同的特点：1. 是全民规模的运动；2. 是全面性技术改造的运动；3. 是首先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解放笨重体力劳动和手工操作的运动；4. 是具有强烈科学性的运动；5. 是洋法和土法相结合、自力更生的运动；6. 是不断革命、不断飞跃的运动；7. 是既有丰富内容，又有多种多样组织形式的运动；8. 是同生产组织革命相结合的运动；9. 是同思想革命相结合的运动；10. 是同文化革命相结合的运动。这十大特点表明，这次运动比过去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标志着这一运动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可以从中观察出今后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经济和科学技术的新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我国经济战线上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重大胜利。为了使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自始至终地沿着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前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不断地大跃进，当前要进行的几项主要工作是：第一，保证超额完成今年国家计划的第二本账，这是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必须实现的主要目标之一。第二，大力进行原料、材料、燃料的增产节约和综合利用，这是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主攻方向。第三，加速农业的技术改造，是工业部门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的一项重大任务。第四，不断地改进管理工作，促进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的发展。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0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在一起。


共商國是
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在一起
癸未年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
楊悅浦畫於滬上樂陶樓
清慎勤

《共商国是》（中国画）

对资本主义社会内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存在的论点的批语

（1960年4月24日）

一

伯达、定一[1]同志阅后，退小平[2]同志。

毛

廿四日

---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二

此件[1]可看。

三

典型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走狗的论点。

---

[1] 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0年4月22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登载的《意共再生月刊载文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存在》一文。文章摘录了意共中央机关刊物《再生月刊》1960年第一期刊载的《资本主义社会内有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一文的以下主要观点：一、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结构应开始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并且是夺取政权的前提。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工厂、股份公司、生产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形式。三、无产阶级革命不是要去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使之爆炸，从而夺取政权，而是要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在这篇摘要上，还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

给杨开英[1]的信

（1960年4月25日）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2]（岸英[3]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二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

问候！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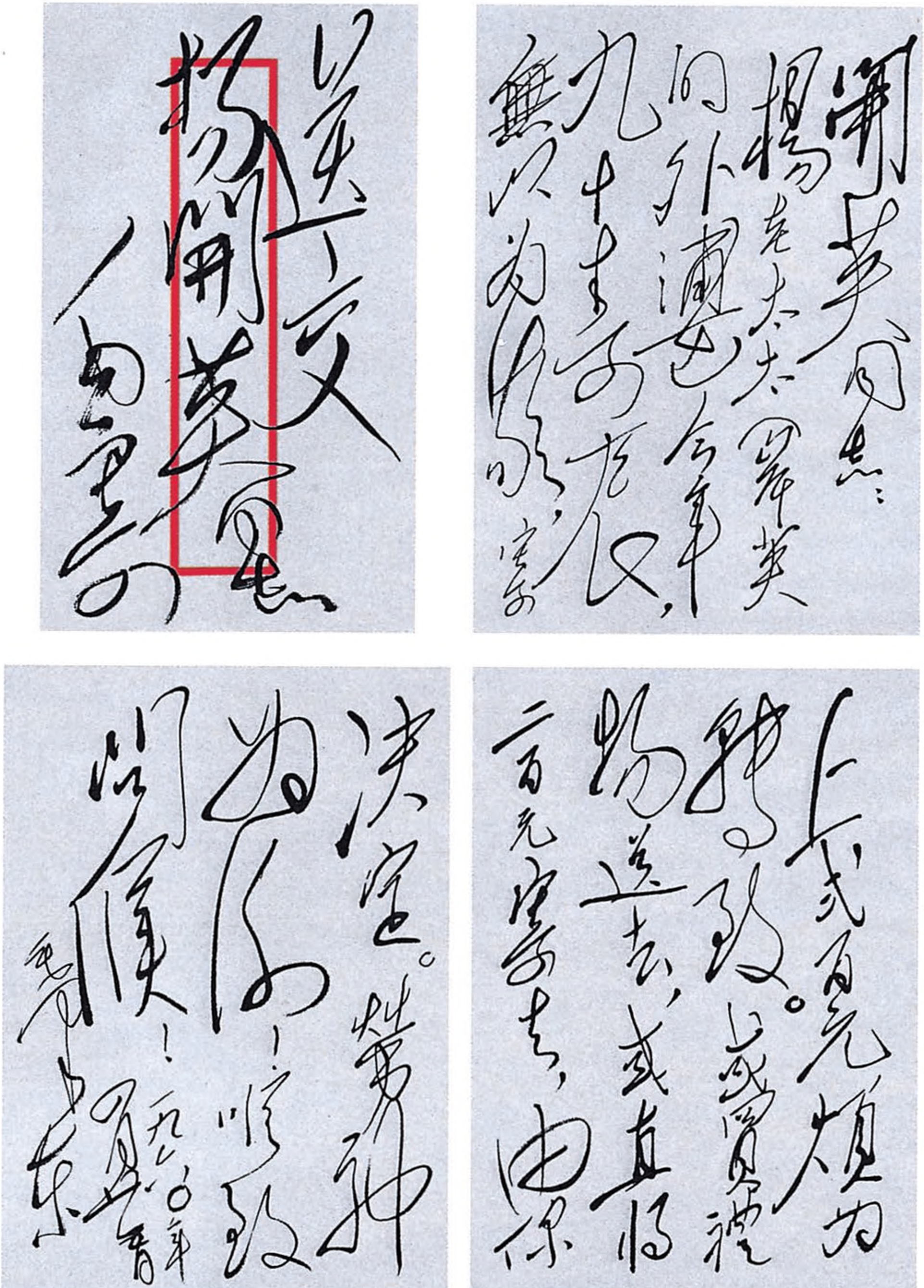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

[1] 杨开英，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的堂妹。

[2] 指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3] 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毛泽东致杨开英信的手稿。

对中央转发聂荣臻关于公开报道“四化”运动意见[1]的批语稿的修改[2]

（1960年4月28日）

在四化的宣传方面，必须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宣传指标，并且要善于藏一手，做十分，说五分，甚至只说一二分，有些极密部分则一分也不说。严格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

---

[1] 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1960年4月19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并中央的报告说，随着以“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宣传报道日益增多。我们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反对过去那种不敢提机械化、自动化的神秘观点，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这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要注意和防止把“四化”任务简单化，降低对机械化自动化的现代水准的要求。目前报刊上宣布一些城市要达到的机械化程度都很高，一般是年内就可以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这种说法值得研究。因为：（一）过早地这样宣布，把“四化”任务简单化了，和实际情况不符，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也不利。（二）各地的“四化”标准很不一致，标准偏松时，估计就可能偏高。百分比的计算方法也不统一，先公布出来，以后就不好改了。（三）由于我们的口径、尺度、算法和国外并不完全一致，为防止被动，全面的过高的数字以少公布或不公布为宜。今后对具体的机械化程度的宣传报道，都应留有余地，未实现的规划或偏高的估计，一般不发表，也不在报上公开宣传某市已基本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之类的说法。多做少说，对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也是有利的。

[2] 这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聂荣臻意见的批语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960年4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批语。

读《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时写的批注[1]

（1960年4月）

一

加民资。[2]

二

改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同情、亚非各民族人民的〔同〕情、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同情以及西方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同情。[3]

---

[1]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是古巴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在1959年10月的全会上通过的。毛泽东的批注，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0年4月13日印送的这个党纲草案的中文译稿上。对这个译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修改，本篇三、五、六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中写道：“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必须争取他们大部分留在革命队伍里，加强同他们的合作，中立他们中间的动摇分子，打击企图反对革命的分子。”在这句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和问号，并写了这一批注。民资，指民族资产阶级。

[3]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讲到“古巴革命的有利因素”时写道：“社会主义阵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同情、美国人民的支援等。”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一批注。

三

迅速、彻底、全部实现土改法，根据土改法的规定分配土地给贫农和土地不足的中农。

四

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1]

五

采取措施使工人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牺牲不致完全饱资本家的私囊，以符合劳资两利的政策。

六

规定生活必需的工资，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

---

[1] 这是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的纲领部分“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独立发展”一段中写的批注。

七

建立国内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人民军队的爱国人民阵线。[1]

八

手工业者、渔民是生产者，并非如此。[2]

九

是否可以互易？[3]

---

[1] 这是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的纲领部分“公民权利和政治制度”一段中写的批注。

[2]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中写道：“在城市和集镇，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渔民、小店主、小商贩、自由职业者等的状况并不比工人农民好些。他们依靠工人、农民创造的财富为生，因此他们的处境取决于总状况的命运。”在其中的“依靠”两字下面，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注。

[3]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在《民族独立和对外政策》一节中先后写道：“古巴也应该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关系，这对于加强古巴的独立以及根据民族利益发展经济有重大的意义。”“古巴在对外政策上应该考虑到同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团结、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毛泽东将第二句话挪到了第一句话前面，并写了这一批注。

十

外国银行是否无偿没收？[1]

十一

赎回和废除，如何解释？[2]

十二

是否分几个阶段组成较大规模的合作社？[3]

---

[1]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在《国有化》一节写道：“在古巴开办的外国银行是最强大最有决定作用的银行，它们利用自己的实力加深我国单一作物制和落后状况。把银行收归古巴所有并确立国家对贷款的领导不会使任何人损失一文钱，但却使国家掌握发展经济的巨大杠杆。”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注。

[2]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在《国有化》一节写道：“外国垄断组织和托拉斯根据他们通过压力和贿赂而取得的损害我国利益的殖民主义的租让权，今天还掌握很多财富。”“要赎回这些财富，第一步可以废除损害我国利益的殖民主义租让权，首先废除那些从被推翻了的反民族的独裁政权那里取得的租让权。”在这两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注。

[3] 这是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土地改革》一节讲到有关组织合作社的几段话旁边写的批注。

十三

小自由问题，小块宅旁私有土地的问题。[1]

十四

倒过来如何？[2]

十五

加钢、机器制造业。[3]

---

[1]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在《土地改革》一节写道："合作社应该反对个人主义，应该发扬农民的集体主义和合作精神，应该反对人剥削人的现象。"毛泽东在这句话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注。

[2]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独立发展》一节中先后写道："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稳定的关系将给古巴的出口包括糖的出口，提供稳定的和不断增长的市场和进口各种机器、工业器材、完整的工厂、燃料以及各种我们所需要的货物的源泉。""同拉丁美洲各国以及同最近获得解放的亚非国家的经济关系，对加强彼此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作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在这两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注。

[3] 《古巴人民社会党党纲草案》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独立发展》一节写道："在当前的经济计划中应该优先发展农业（为了使我们不必再每年进口一亿五千万比索的粮食）和轻工业，但也不应忽视在冶炼方面和铁、铜及其他金属方面可能做的事情，不应忽视化学工业，总之，只要有资源和有可能条件发展重工业，就不应忽视它。"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写了这一批注。

1960年，毛泽东会见古巴经济代表团团长格瓦拉。

关于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的批语

（1960年4月）

一

此文[1]须批评，意见见2页。

请尚昆与小平、陈伯达[2]同志商办。

---

[1] 指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库西宁1960年4月22日在莫斯科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4月26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摘登了这一报告的主要论点：一、只是重复帝国主义具有侵略性这样一个老的真理是不够的，教条主义的立场是落后的立场。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存在着强大的社会主义体系，出现了广阔的“和平地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和平力量已经更加团结，更加有组织了。因此，我们的任务在于，要充分利用有利于和平的新的因素，以使人类摆脱新战争的灾难。二、新式的战争武器开始显示出有利于和平的压力。列宁曾经预言：有一天，战争的破坏性有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根本成为不可能。三、帝国主义内部出现了头脑清醒的国际活动家，他们也意识到进行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是不理智的，这无疑对争取和平的胜利斗争是有意义的。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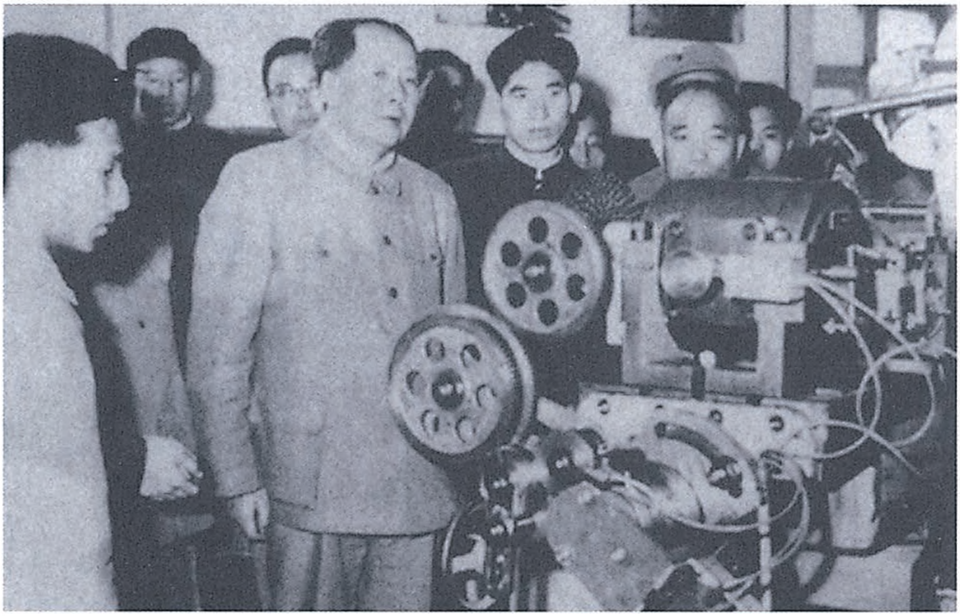
要写一篇《同库西宁同志商榷》的文章，有根据地有说服力地批评库西宁文章中错误观点，先给中央少数同志看看，加以修改，然后考虑是否可以公开发表，或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阅读。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津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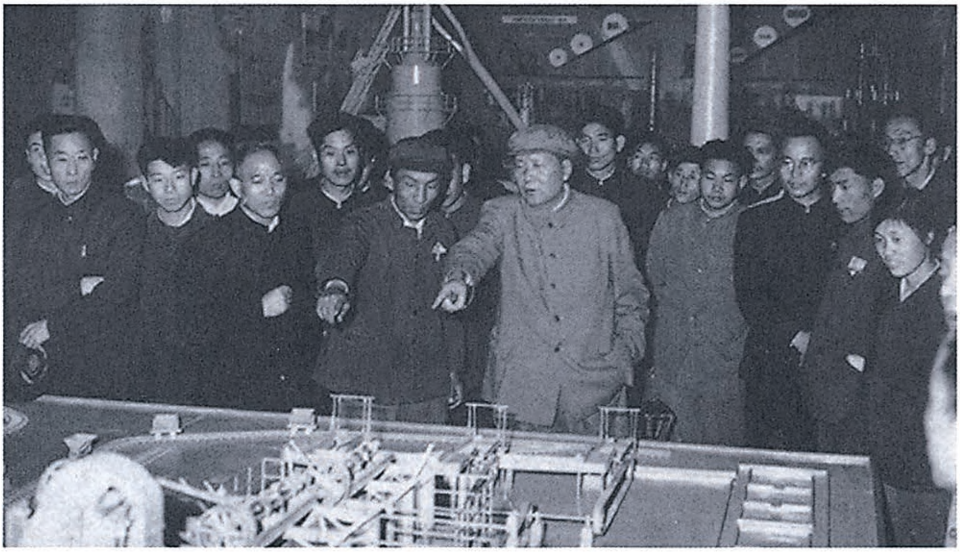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津和劳动模范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津和群众共度五一国际劳动节。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右一）等人陪同下，来到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参观河北省工业“双革”成果展览。



1960年5月1日，毛泽东参观河北省工业、交通运输展览馆。

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1]

（1960年5月3日）

欢迎各位朋友，你们好。我们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斗争就是对我们的帮助，谢谢你们！

帝国主义还在压迫我们中国，占领我们的台湾。美帝国主义不承认我们，它说看不见人民中国。它差不多每天都说我们很坏，可见它还是看见我们的，否则它怎么能说我们坏？它说我们犯的第一条错误是不该和蒋介石打仗，说蒋介石是好人，我们是坏人。正如同说你们古巴的巴蒂斯塔[2]是好人、卡斯特罗[3]是坏人一样。各国都有被美国认为是好人的人，但是人民看他们并不那么好，甚至很坏，这是因为美国同我们的观点不对头。

---

[1]．这是毛泽东1960年5月3日下午在济南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妇女代表团及代表时的谈话。他们是：古巴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巴西全国公务员工会和巴西全国银行职工联合会代表团；塞拉勒窝内和坦噶尼喀的妇女代表团及巴苏陀兰妇女代表；古巴、委内瑞拉和乌拉圭的妇女代表团及巴西、哥伦比亚、秘鲁、巴拉圭、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波多黎各、马提尼克的妇女代表。

[2] 巴蒂斯塔（1901—1973），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和武装起义。1959年他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3] 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1959年1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美国有钱，有枪炮，有原子弹。它说我们穷，没有钱，枪炮也少，也没有原子弹，所以它欺负我们。但是我们有民兵，你们古巴也有民兵，民兵比原子弹还厉害。当然你们古巴有正规军，中国也有正规军，苏联的红军更强大，苏联还有原子弹。苏联不愿打仗，我们也不愿打仗，要争取和平。但是帝国主义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它们不请我们当参谋长，所以它们的事情究竟怎么办，我们很难讲。

我们有一条，有人民的拥护。全世界最大多数人民站在我们一边，也站在你们一边，这要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九。最多有十分之一的人拥护帝国主义，我不相信有更多的人拥护它们。拥护帝国主义的人都是它们的走狗，如蒋介石、巴蒂斯塔等。各国都有它们的走狗，有的狗已不走了，如蒋介石就蹲在台湾不走了。蒋介石是从大陆走到台湾去的，巴蒂斯塔却从古巴走到美国去了。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三个大洲上，美国的走狗不多，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人，和帝国主义合在一起最多一百人中不过十人。

美帝国主义希望我们怕它，我们也有点怕它，因为它通过它的走狗要杀人。它杀人多了，人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抵抗。斗争的办法是它杀我，我也杀它。有了经验之后，我们不怕了，胆子也大了。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可怕，它在十个指头中最多只有一个指头。历史上从来就是没有枪的人战胜有枪的人。如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就是没有枪的人打倒了有枪的敌人，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来了。听说你们古巴“七二六运动”开头参加的人也是很少的，从墨西哥坐船回国只有八十二个人。所以还是没有武器的人强些，有武器的人如

巴蒂斯塔还是弱的。

究竟谁怕谁？究竟是美国怕你们古巴，还是你们怕美国？我看还是美国怕你们。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它们的人很少，做的事很坏，它们保护那些反动分子、走狗。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很欢迎。你们别以为我们想和美国开战，我们不想向美国开战，我相信你们古巴也不想向美国开战。如果美国要向你们古巴开战，这是帮助你们，锻炼你们。它怕你们古巴人民还不够坚强，所以要加紧锻炼你们。美国占领我们的台湾，这也是它要锻炼我们，使我们更加坚强起来。帝国主义在非洲的镇压也是锻炼你们，使你们更坚强。

美国现在在拉丁美洲采取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各种手法来镇压、欺骗。但我看人民是不怕的。人民的觉悟在提高，非洲是这样，拉丁美洲是这样，亚洲也是这样。中国过去有些人，特别是有钱的人，很相信美国，现在他们也慢慢地不相信了，觉悟提高了。

我们要区别美国人民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美国人民是好的，坏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都是这样，人民是好的，帝国主义分子是坏的。现在西德、日本的人民也都是好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是坏的。我们现在学会区别这两种人。就是帝国主义分子，我们也不是准备一万年不和他们来往。我们和美国在华沙谈判，已谈判几年了，还要谈下去。谈上十年、二十年，总会谈好的。

谢谢朋友们谈了这么多情况，使我懂得了很多知识。十年前，中国和大多数在座朋友的国家情况一样，也和去年一月一日以前的

古巴一样。我们国家解放还只有十年，人民正在组织起来进行建设，有一些成就，但还不算大。我们仍是很穷的国家，至少还要奋斗十年、二十年才能好一些。我们需要你们的援助和支持，同时我们也支持你们的斗争，要相互团结、相互支持。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的斗争也是你们的斗争，我们的胜利也是你们的胜利。我们和你们没有利害冲突，只有团结友好。东方人民正在起来，如南朝鲜人民半个月来正在进行很大的斗争，最近一周来土耳其有很多人起来，现在日本也有很大的斗争，那些地方都有美国基地。所以，美国这些基地都不稳固，人民团结起来就会战胜它的。

感谢各位朋友，并庆祝我们的团结和胜利，以及由现在的斗争到将来的胜利。大家来喝一杯酒，为全世界一切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人民的胜利干杯！同时我们支持大国会议[1]，反对世界大战。我们一面反对世界大战，一面支持各国国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用两只手，因为敌人也用两个办法和我们斗争。

---

[1] 大国会议指1960年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1960年5月1日美国U-2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四国首脑会议宣告流产。

1960年5月2日至5日，毛泽东在李先念、杨尚昆等陪同下视察山东。图为毛泽东和山东省委领导人亲切交谈。

1960年5月3日，毛泽东在济南西郊机场和14国外宾合影。

1960年5月2日至5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图为毛泽东在济南珍珠泉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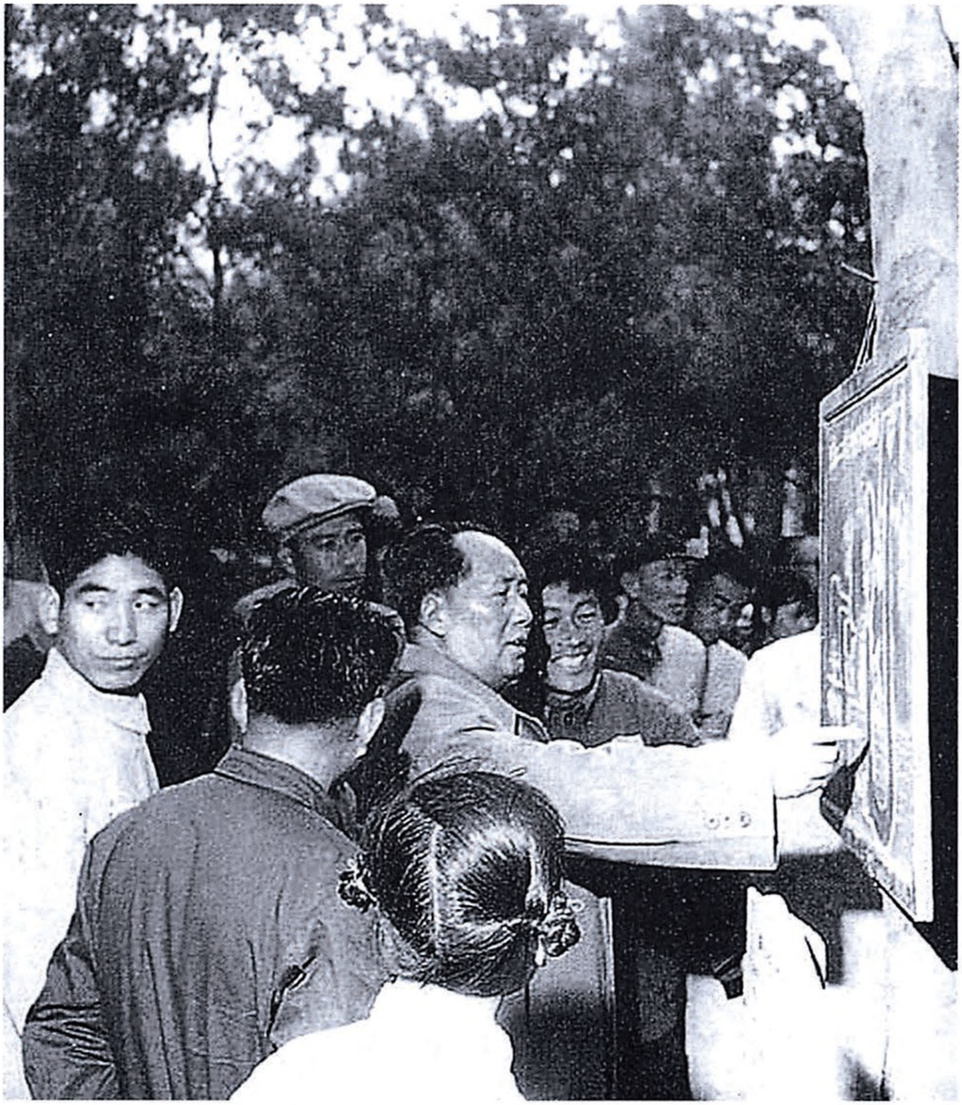
1960年5月4日，毛泽东参观济南珍珠泉。

1960年5月4日，毛泽东在济南珍珠泉参观山东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最新成就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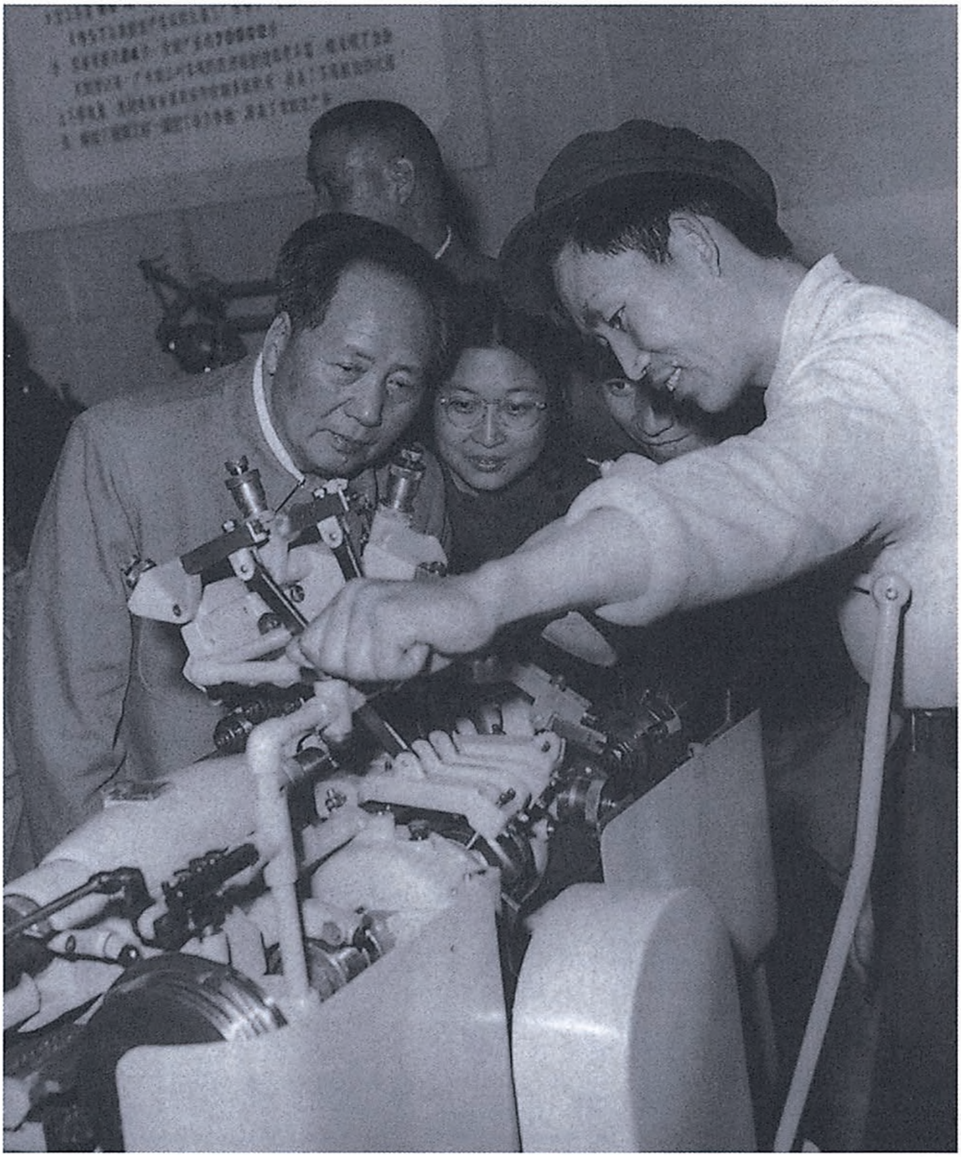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济南珍珠泉大院参观山东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图为毛泽东在听取展览会工作人员关于煤炭和污水综合利用情况的汇报。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上询问一参展医疗器械产品的性能。

1960年5月，毛泽东在山东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上观看炼铁炉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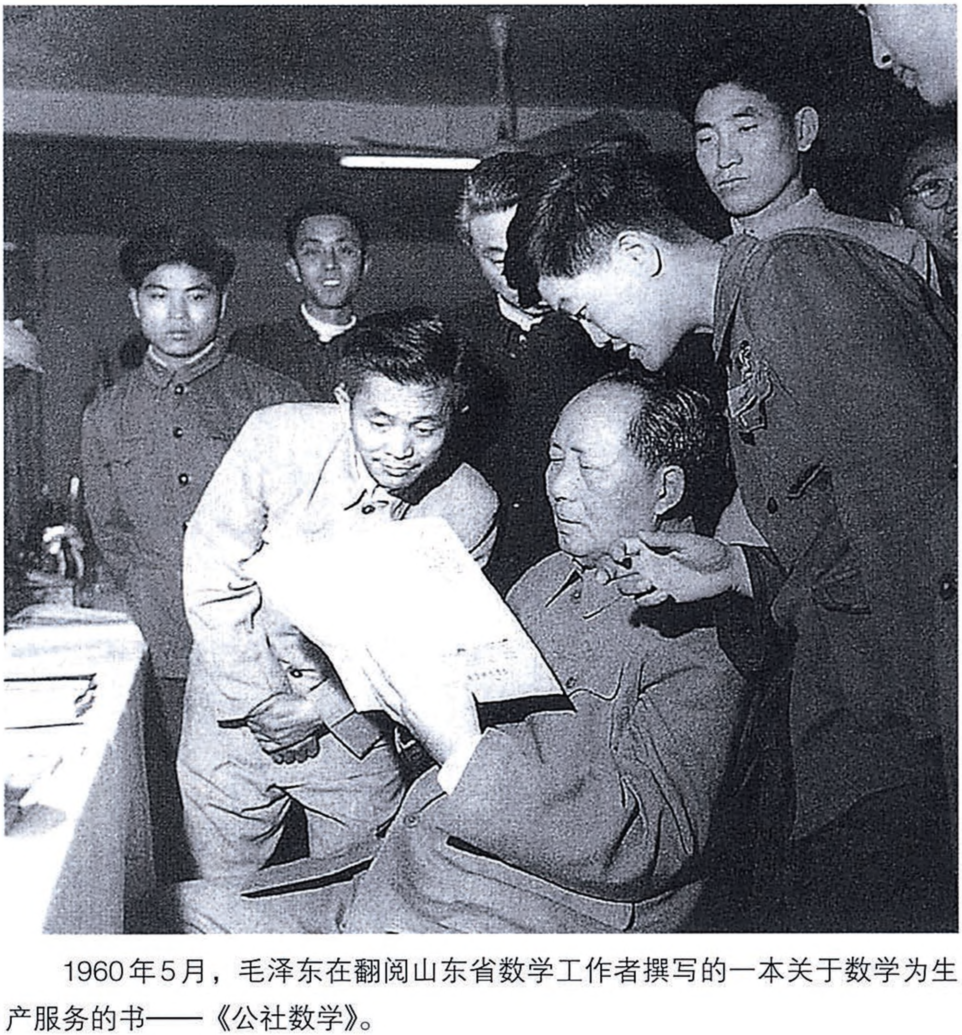
1960年5月，毛泽东在观看以煤气为燃料的内燃水泵示意图。



1960年5月，毛泽东参观山东省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展览会。

1960年5月，毛泽东和土发电机制造者五莲县农机厂工人宋学林握手。

1960年5月，毛泽东参观山东师范学院参展的物理学研究成果。



1960年5月，毛泽东在翻阅山东省数学工作者撰写的一本关于数学为生产服务的书——《公社数学》。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1]

（1960年5月7日）

欢迎朋友们。我们是朋友，我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不承认我国。它们实际上统治了中国一百多年，使中国变得很贫穷，变成一穷二白。穷就是贫困，白就是文盲多。我们这种状况现在开始有了改变。中国过去名义上是独立国，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斗争才得到解放，光武装斗争就进行了二十二年。整个中国大陆在一九四九年基本上解放了，只剩下台湾还被帝国主义霸占着。现在，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比如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对我们的威胁很大。

西方人说我们中国人不行，是有色人种。他们说有色人种就是不行的，是成不了事的，是不讲卫生和不高尚的。我们这个人种似乎和你们非洲人也差不多。西方人也说你们不行，但又不帮助你们发展工业，你们就是发展一点工业，也是属于帝国主义所有的。所以我们和你们的地位相同。

你们现在很好，团结起来了。整个非洲团结起来、觉悟起来了，或者正在一步步地觉悟中间。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你们团

---

[1] 这是毛泽东和非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活动家、和平人士和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

结起来、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帝国主义是怕你们的。帝国主义散布恐怖情绪，它们杀人，或者经过它们的走狗杀人。在中国是经过蒋介石杀我们。你们国家也可能有这样的人，秉承帝国主义的意旨办事。这样的人很少，顶多十个人中有一个，或者不到一个。所以，你们可能团结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或者更多。实际上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帝国主义每天都宣传它们的力量大，来恐吓我们。

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有一个时期怕美帝国主义，怕它的走狗蒋介石。因为他们杀人，或者用各种别的方法，比如把人抓起来，关在班房里头。总而言之，要使我们怕他们，消灭我们的斗志。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步一步地觉悟起来的，后来就慢慢地不怕了，跟帝国主义的走狗对打了。我们开始是手无寸铁的，又不会打仗，我们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个办法。你可以压迫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压迫你呢？十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可不可以团结起来把那一个人赶走呢？我们得出结论说，可以。一个人压迫我们九个人，我们九个人不团结起来把他赶走，这是没有道理的。结果我们闹了几十年革命，还不是得胜了？

我们的敌人蒋介石有巨大的外国援助，是美帝国主义援助的。他的武装很强大，有兵工厂，有外国人送的武器，如有军舰，有重炮，有坦克，有飞机。这些我们都没有，也没有重炮，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我们只有步枪和轻炮。我们那些东西是哪里来的？不是兵工厂造的，而是抢来的，是战争中得来的。美帝国主义经过蒋介石把枪炮送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枪炮。后来我们又有了坦克、重炮，我们就可以打大仗了。一九四九年，我们就基本上解放了大陆。那时他们的空军在我们头上轰炸，也没有把我们吓倒。后来变成他们怕我们，不是我们怕他们，不仅蒋介石怕我们，

而且美国人也有点怕我们，因为我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团结起来了。还是人要紧，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是次要的。只要把人团结起来，手里掌握着武器，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就怕我们。当然不是只有打仗这一种方法，还有别的方法。

你们在座朋友的国家有些不是用打仗夺取政权的，像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现在还在打仗，这个战争帮助了几内亚，几内亚的朋友们也是这样看的，因为法国有五十万军队被阿尔及利亚人吸引在他们的国家中，法国就没有好多兵了。帝国主义占的地方太多，管得太宽了。中国俗话说，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一个跳蚤都捉不到。因为帝国主义管得太宽，它们也就控制不住。美国现在在世界上占的地方也太多了。你看，在亚洲，还有拉丁美洲、非洲，有好多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它还要控制欧洲。这几天国际形势有一些变化。南朝鲜人民没有出路了，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李承晚[1]。南朝鲜人民一起来，一骂一轰，几十万人一示威，李承晚就垮台了。李承晚有七十五个师，而南朝鲜人民群众一枝枪也没有，可是他们一起来，李承晚就倒了。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解决，美国人还在南朝鲜，又选择了新的走狗，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还会发展下去。还有土耳其，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所以我们这几天接连举行群众大会，支援南朝鲜人民，支援土耳其人民。还有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再过两天，日本将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听说有几十万或几百万人起来反对岸信介[2]政府同美国订立的军事同盟

---

[1] 李承晚（1875—1965），1948年8月至1960年4月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2] 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条约[1]。我们也要举行群众大会支持日本人民群众。

你们可能有人会说，南朝鲜、日本、土耳其离美国很远，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怕美国，敢于起来反对它的走狗。但是，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2]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3]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欢迎古巴的人民政权。

非洲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更有世界意义。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都有革命；不只是在几百万人中间，而是在几千万或者更多的人口中进行了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完全同

---

[1] 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2] 巴蒂斯塔（1901—1973），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使古巴完全从属于美国。1959年1月1日，其政权被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

[3] 菲德尔·卡斯特罗，1959年起任古巴总理。

情你们，完全支持你们。同时我们认为，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认为，古巴的斗争帮助了我们，整个拉丁美洲的斗争帮助了我们，南朝鲜、土耳其、南越、日本这些国家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整个亚洲人民都帮助了我们。当然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帮助我们的，苏联是帮助我们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广大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帮助了我们。这就分散了敌人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因为你们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有义务支持你们。我们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同时，我们也支持大国会议[1]。四国首脑会议将在法国召开，这也是一种办法。按照我们中国的说法，这就叫两条腿走路。大国会议是跟它们在桌子上谈，这是一条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又是一条腿。两条腿可以站起来，走路就好走。少了一条腿就不好，就不能走路了。我们相信你们也赞成不要打世界大战，世界大战我们是反对的。但是我们同时赞成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有权利起来反对压迫者。要不打世界大战，就要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我可以举一些具体例子：阿尔及利亚牵制了法国五十万军队，假如打世界大战，法国参加的力量就很少了，因为它只有这么多军队。南朝鲜人民起来，就牵制着美国驻南朝鲜的军队。土耳其人民起来，将牵制着美国驻土

---

[1] 大国会议，指1960年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在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讨论苏美在欧洲进一步缓和关系和寻求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途径。会议期间，赫鲁晓夫要求艾森豪威尔对1960年5月1日美国U－2型高空间谍飞机侵入苏联领空事件公开道歉，遭到拒绝后退出会议，会议宣告流产。

耳其的军队。日本人民如果也起来，又可以牵制美国一部分军队。有些人说，要世界和平，就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免得帝国主义不高兴，因此各国都不要搞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我看还是两条腿走路。各国人民起来对压迫者进行反抗，这是一条腿，而且是一条重要的腿，也许是第一条腿；跟它们一起在桌面上开大国会议，讲什么裁军，解决德国问题等，这也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世界大战就难于打了。如果只有一条腿，要帝国主义不打世界大战，就没有保证。帝国主义是会搞欺骗的。帝国主义也有两条腿，有欺骗的一条腿，又有压迫的一条腿。对于帝国主义的欺骗，我们和你们一样是有怀疑的。但为什么我们又要支持大国会议呢？是借此看一看，就可以暴露它们那一条腿有病。

我赞成阿尔及利亚这位朋友刚才所讲的这种思想，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以及大体上和它相同的国家，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斗争。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比较有利。困难是有的，有时是很大的。我说过，中国的斗争光是武装斗争就有二十二年，你们的斗争才进行了六年。我们在革命斗争中，还犯过几次错误，比如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两次[1]，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三次[2]，使我们的力量遭到很大损失。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

---

[1] 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2] 指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后来我们的军队得到机会，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时候，已发展到一百万人。一九四六年，美国和蒋介石向我们进攻，美国不是亲自出马，而是用帮助蒋介石的办法，支援蒋介石打我们，曾经使我们丧失很多地方，丧失许多城市。蒋介石全面向我们进攻，我们采取后退的策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年打十个战役，虽然我们的地方丧失很多，但是敌人的军力被我们消灭了一百多个师，这时我们开始反攻。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队变为优势，蒋介石的军队变成劣势，其中大部分被我们消灭，我们解放了沈阳、北平、天津、济南、郑州等许多大城市。他们的地方被我们控制，军队主力被我们消灭。这时他们要求讲和，派代表到北平。我们就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我们知道他们讲和是骗人的，但是我们如果不讲和，老百姓不相信，似乎是蒋介石爱好和平，而我们爱好战争了。好吧，就讲和吧，派代表来吧！这时他们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同我们谈了三个星期，我们说，你们要缴枪，把政权交给我们。他们的代表签了字，派人回到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去，请求批准。他们说不行，不能缴枪，不能移交政权，这就撕破了他们的“和平”面目。他们今天拒绝签字，明天我们就渡过了长江，这一条腿就伸出去了。敌人经常欺骗我们，我们要看得清楚。有时需要接受谈判，在谈判中揭露他们。两条腿就是这么走的。不是投降敌人，而是要敌人投降。比如现在世界人民要裁军，我们赞成，看你美国裁不裁，你裁，那很好，不裁就证明你是欺骗。要揭露敌人，用各种方法揭露敌人。和平谈判实际上也是一种揭露敌人的方法，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不相信艾森豪威尔很爱和平，帝国主义者哪里会爱和平？他们爱的是殖民主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但是我相信，你们非洲两亿人口中还有一些人怕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还是有迷信的，或者说是有幻想的。因此你们还要向他们做工作，经过十年八年，慢慢地人就多了，两亿人口中可以有一亿人或者一亿多的人站起来，完全破除迷信，不怕帝国主义，胜利就有把握了。人常常是有很多迷信的，迷信帝国主义是其中的一种；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怎么不行呢？我相信，白种人可以干的事，我们都可以干，而且可以比他们干得好些。因为他们人数很少，只有几亿。并且对白种人要加以区分，他们并不都是坏人，只有十分之一的坏人，十分之九是好人，或者他们暂时受人欺骗，不觉悟，总有一天会觉悟起来的。这主要是指无产阶级，还有其他同情无产阶级的人，比如劳动者包括农民。真正怕核战争的，白种人也有，有些资本家就怕。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闹矛盾，所以我们有机可乘。它们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英国人并不那么团结，美国人和西德人也不是那么团结的，阿登纳[1]同英国人也不对头。所以全世界劳动者，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爱国人民，同盟军是很多的。

我们得出一条经验，在战略上不怕敌人。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十个指头已经砍掉一个、两个、三个了。在苏联，沙皇没有了，变成列宁主义的苏联了。中国也脱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除了这两国以外，还有十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原来的帝国主义的

---

[1] 阿登纳（1876—1967），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指头，也都砍掉了。剩下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已经独立，有些国家正在争取独立。可以说帝国主义剩下的这几个指头也受了伤了。比如，古巴就在美国旁边，把美国的走狗打跑了；阿尔及利亚有很大一块解放区；几内亚也独立了；非洲还有其他几个独立的国家。看来，很大的风暴正在非洲掀起来，同样的风暴也正在拉丁美洲酝酿。有人说，亚洲最近几年民族独立运动比较低落，可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发生了革命；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帝国主义没有胜利，埃及得到了胜利；最近几个星期又有南朝鲜、土耳其人民起来，看来日本人民也很有希望。所以现在帝国主义睡不着觉。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帝国主义正像中国一句俗话所说的：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大家要看一看中国的经验，我们很欢迎。有些经验也许可以作你们的参考，包括革命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可是我要提醒朋友们，中国有中国的历史条件，你们有你们的历史条件，中国的经验只能作你们的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由于团结我们一定会胜利。祝贺我们的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取得胜利。

---

[1] 指苏伊士运河事件。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0年5月7日）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威廉·皮克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同志：

当德国从法西斯奴役下获得解放十五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五年前，伟大的苏联军队粉碎了希特勒的法西斯反动势力，为德国人民开拓了走向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勤劳勇敢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最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又迅速地完成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这是德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巨大胜利。中国人民为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坚定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一向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

策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扶植下的西德军国主义的斗争中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为争取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德国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得到了广泛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一贯给予我国的有力支持。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和重新统一德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

关于三大作风提法的批语[1]

（1960年5月8日）

退谭政同志。以1939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朴素为宜。

毛泽东
五月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1960年5月6日给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谭政的报告说，对抗大时有关作风的三句话，我们计划好好宣传一下，但目前流行的提法不尽一致，一是1938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毛主席的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是1939年抗大三周年时毛主席文章中的提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请予指示，以求统一。毛泽东批示用1939年的提法，并将其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一句，改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接见拉丁美洲八个国家的代表和著名人士[1]时的谈话

（1960年5月8日）

毛泽东主席感谢这些朋友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主席说，中国人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样，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团结，依靠各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现在正在建设着自己的国家，改变着“一穷二白”的面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因此需要时间，需要和平，需要朋友。主席说，古巴的人民，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走狗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主席说，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主席对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主席说，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的斗争也帮助了古巴和拉丁美洲各国的人民。人民

---

[1] 毛泽东1960年5月8日下午在郑州接见了正在我国参观访问的来自拉丁美洲8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著名人士。他们是：智利工人统一工会代表团、哥伦比亚石油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哥斯达黎加工会代表团、厄瓜多尔工人联合会代表团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厄瓜多尔、秘鲁的文化、教育、政法等界的著名人士。同时被接见的还有古巴军队总督察威廉·加尔维斯·罗德里格斯少校和夫人。

是决定的因素，依靠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必能战胜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取得世界的持久和平。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0年5月8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值此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五年来，勤劳智慧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光荣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现已成为世界上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目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以高涨的政治热情和首创精神，为实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纲领和实现不久前党所提出的在十年内使农业赶上工业水平的任务胜利前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贯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并同各国兄弟党一道，对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着和平外交政策，积极支持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和平倡议，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且对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德军国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对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高涨，中捷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我们确信，中捷两国间的团结友好、互助合作关系的继续巩固和发展，必将大大促进我们两国的共同繁荣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我们衷心地祝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持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五月八日

接见伊拉克、伊朗和塞浦路斯代表团[1]时的谈话

（1960 年 5 月 9 日）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到我们国家看看。我们是团结的，是全民一致的。今天有好多人是伊拉克的朋友，你们的革命是一九五八年取得胜利的，这个革命曾经使帝国主义吓了一跳。你们七月十四号革命，十五号美国就下命令在黎巴嫩登陆，它为什么这么急？是怕跟着你们会有许多国家要解放。当时全世界人民都反对美军在黎巴嫩登陆。那是一种侵略，一种干涉。英军也占领了约旦。在全世界人民反对之下，他们后来不得不走路。那时我们中国人民很高兴你们解放，认为是有世界意义的事情。现在你们周围还有不友好的国家，他们的人民还没有解放，有许多国家还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譬如土耳其对伊拉克就是不友好的。在座的有伊朗朋友，你们国家的人民似乎还没有解放，只是由英国转到美国的控制之下。你们的国王站在帝国主义一边，压迫你们所有的人民。你们原来受英国控制，现在转变为美国控制。英国、美国两个国家在打架，争夺伊朗的石油。在座的有塞浦路斯的朋友，压迫你们的是不是英帝国主义，同时也还有美帝国主义？（回答：有英国人、美国

---

[1] 毛泽东 1960 年 5 月 9 日下午在郑州接见了正在我国访问的伊拉克文化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伊朗工会代表团及塞浦路斯劳工联合会代表团。

人、土耳其人。）一定有美国。你们三个国家，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一个在中间，都在亚洲西部。亚洲西部的国家都寄希望于伊拉克革命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支持伊拉克人民的，也是支持塞浦路斯人民的，支持伊朗人民的。土耳其最近发生了群众示威，有好几个大城市示威，反对政府，反对曼德列斯，这对你们有利。看来这个斗争会发展下去。南朝鲜人民起来反对李承晚，李承晚已经倒台了。在我们东边也有许多不友好的政府，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在东南也有南越、泰国，都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现在南朝鲜人民已经起来反对美国的走狗，也就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统治。日本人民也正在起来。今天是五月九日，日本朋友有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反对岸信介为首的政府同美国签订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1]。我们同你们一样，共同支持这个斗争，反对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美国在各国的走狗。

我们也是个被侵略者，人们却说我们是一个侵略者。但是我们没有占领外国一寸土地，我们台湾却被外国占领着。占领台湾的人不叫侵略者，叫做“和平爱好者”，叫做“有民主有自由的国家”。而我们这个国家，据美国人说，既无民主，又无自由；说中国人民都是当奴隶，人民公社就是奴隶主组织起来管理奴隶的团体；没有民主自由，进行强迫劳动，拆散家庭生活。他们很关心呀！（全场大

---

[1] 指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这个条约是用于代替两国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的，因而又称“新日美安全条约”。其主要内容是：“发展”日本“抵抗武装进攻的能力”；在“应付共同危险”时，日本负有保护驻日美军的义务；美国继续有权在日本驻军和使用军事基地；“鼓励两国经济合作”，等等。

笑）世界上第一个反对人民公社的就是那个死去的杜勒斯，现在美国当局也不欢迎人民公社，他们喜欢台湾，说台湾有民主，又有自由。似乎美国的工人阶级跟资本家一样都是美国的主人，台湾的人民跟蒋介石一样都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奴隶国家——就是你们所到的这个地方。

伊拉克也曾经为许多国家所不喜欢，现在也有许多人不喜欢，名义上承认你们，实际上要搞垮你们。伊朗总理摩萨台是怎样的结果，你们是知道的。他不是共产党，是一个爱国者，是伊朗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就是不愿意外国人统治伊朗，结果被英国人通过伊朗国王把他抓起来了。伊朗的人民党也没有合法权利。塞浦路斯的党到现在也没有合法权利。总而言之，帝国主义就是喜欢这么办的。帝国主义喜欢的人和我们喜欢的人不一样，他们喜欢的是蒋介石、李承晚、曼德列斯、岸信介[1]，喜欢伊拉克的费萨尔和伊朗的国王。（全场活跃）

世界上分成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集团，彼此结成一帮。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同费萨尔、曼德列斯、蒋介石、李承晚、岸信介以及伊朗的国王，他们团结起来反对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团结起来呢？我看，可以团结起来。一些人不觉悟，可以劝他们觉悟起来。我们的敌人数目很少。昨天同拉丁美洲的朋友谈过，反动派也就是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顶多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我们有十分之九或者还要多，包括西方国家中的劳动人民在内。西方国家的工人、劳动者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算什么种族？（回答：白

---

[1] 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总统，1961年在军事政变中下台，逃往美国。曼德列斯，当时任土耳其政府总理，1960年5月27日在政变中被捕。岸信介，当时任日本政府首相，1960年6月23日宣布下台。

种。）白种人多数是好的。苏联也是白种，东欧七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白种。黄种也有坏人，譬如蒋介石。（笑声）我们并不爱蒋介石，我们跟你们好，跟蒋介石搞不来。（全场活跃）李承晚不是黄种的吗？也是不好的。曼德列斯也是黄种，但土耳其广大群众不喜欢他，他走过大街，群众不让他过，他对群众说不要搞那个示威了，可是群众一起叫喊要他下台，他换了三辆汽车才逃脱。可见人们是以阶级来区分，不是以颜色来区分的。费萨尔同你们是一个种族的，你们不是不喜欢他吗？你们不是弟兄，而是敌对的。而全中国人民除了少数正在改造的坏分子以外，跟你们都是一致的。

至于中国现在的情况，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从事自己生活的建设，建设工作刚开始，需要各国朋友们的帮助，需要你们帮助，我们要互相帮助。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对中国的帮助。

美国人讲得好听，说要和平共处，爱好和平。可是五月一日美国飞机入侵苏联内地，从巴基斯坦起飞，飞到苏联的乌拉尔，有两千公里，被苏联打下来了，驾驶员被俘虏了。目的是进行空中照相，侦察苏联军事基地，照片也被苏联得到了。他们就是这样讲和平的。美国人讲和平的方法和我们不同，（笑声）在他们说来，侵略就是和平，讲和平的人就是侵略。我们被宣布为侵略者，可能你们伊拉克也是侵略者，因为你们侵略了费萨尔。（全场大笑）你们伊朗人民也准备侵略那个国王，他侵略你们伊朗人民好多年了，你们大概准备报复一下吧？只要你们报复，就叫侵略。（全场欢腾）塞浦路斯也是不安分的，因为英国要基地，你们不肯。但是，最后胜利你们会得到的。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很长了，看起来现在它还有一点势力，其实它是经不起考验的。我们希望它的寿命不长。它已经活了这么久

了，太老了，应该去见上帝了，上帝准备招待它。（全场大笑）但是我们仍然要准备艰苦的斗争，还有一段时间，上帝暂时还不准备请它去。（大笑）大概还有几十年，二十世纪还有四十年，给它这么点时间吧！（全场活跃，掌声）希望四十年以后，全世界看不见帝国主义，也看不见它在各国的走狗了！统统把他们送到上帝那里去。（外宾在笑声中说：不知道上帝是不是接受?）就把他们关起来，宣布无期徒刑，或者让他们死亡。（全场活跃）总之，他们做的事情太不好了，他们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我相信上帝不会饶恕他们的。（全场大笑）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人民决不会饶恕他们的，人民会把他们判处徒刑的，有些人要杀掉。譬如古巴从前的政府，曾经杀死两万古巴人民。□□□□逮捕了一部分反动分子，只判处两百多人的死刑，美国资本家就大叫起来，可是巴蒂斯塔杀死两万古巴人的时候，美国一声不响。费萨尔不知杀死多少伊拉克人民？（回答：很多。）帝国主义也是一声不响。如果你们现在的政府杀死一些坏人，帝国主义就要叫的。我们也杀过一些人。蒋介石杀死的不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中国人民，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说他犯了罪。现在联合国里还有蒋介石代表的席位，说他很好，很有道德，很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那有什么办法？那就让他这样办吧！蒋介石很有“道德”，我们是“侵略者”，因此在联合国里没有我们的席位。蒋介石为美国以及四十四个国家所承认，承认我们的不比他们多，就照这样办吧！我们还要活下去，你们看一看，中国人还是活着嘛，并且相当高兴。并不因为美国不承认我们，联合国不让我们进去就活不下去。这种状态是由他们决定的，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这种状态需要存在几十年吧，譬如说四十年吧！到二十一世纪，我看会起变化，那时帝国主义本身就会发生问题，蒋介石更

不消说了。

（在西亚朋友讲话以后）团结人民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蒋介石怎样被赶出大陆的？因为他脱离群众。人民中间最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只有他们是生产者，他们生产工业品和农产品，没有他们，我们就不能过生活。因此主要的基本的是团结工人和农民，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代表他们的意志。当然，还有别的人，我国就有民族资产阶级，还有知识分子。现在是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还同他们合作的。知识分子、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这些人是少不了的。他们有缺点但是可以改造。今天在座的人就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指翻译□□），他是一个穆斯林，今年五十三岁，是专门研究《可兰经》的。今天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开会，我们就不能脱离他。他信穆罕默德，我不信，但是我们两个并不打架。（全场大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为他（指翻译）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共产党，他拥护社会主义，而且拥护共产党，那好办事。他相信穆罕默德，他又不是共产党，那没有关系。有各色各样的人，并不都是共产党。我们有六亿五千万人口，但只有一千三百万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任务就是团结六亿五千万人。被打倒的阶级，我们也要改造，譬如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还有解放战争中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们，也是采取改造的办法。有一部分已经被赦免了，其中还有一个皇帝，他在北京，名叫溥仪，他从六岁到九岁统治全中国，统治我们，后来被推翻了。他现在很有进步，他已经被赦免，不是战争罪犯了，恢复了他的自由，他今年才五十三岁。他说他现在真正解放了，自由了。他现在在北京植物园工作。你们有兴趣可以集体找他

谈一谈。他是这样的人，我们也并不杀他，改造好了，还有工作能力，只是不能做国王就是了。

要战胜帝国主义，需要有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只是不包括敌人在内。这是我们的经验。中国的经验对外国来说只能有选择地有分析地来对待，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条件，我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我所讲的话只供朋友们参考。

祝贺我们的团结，祝贺我们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的团结。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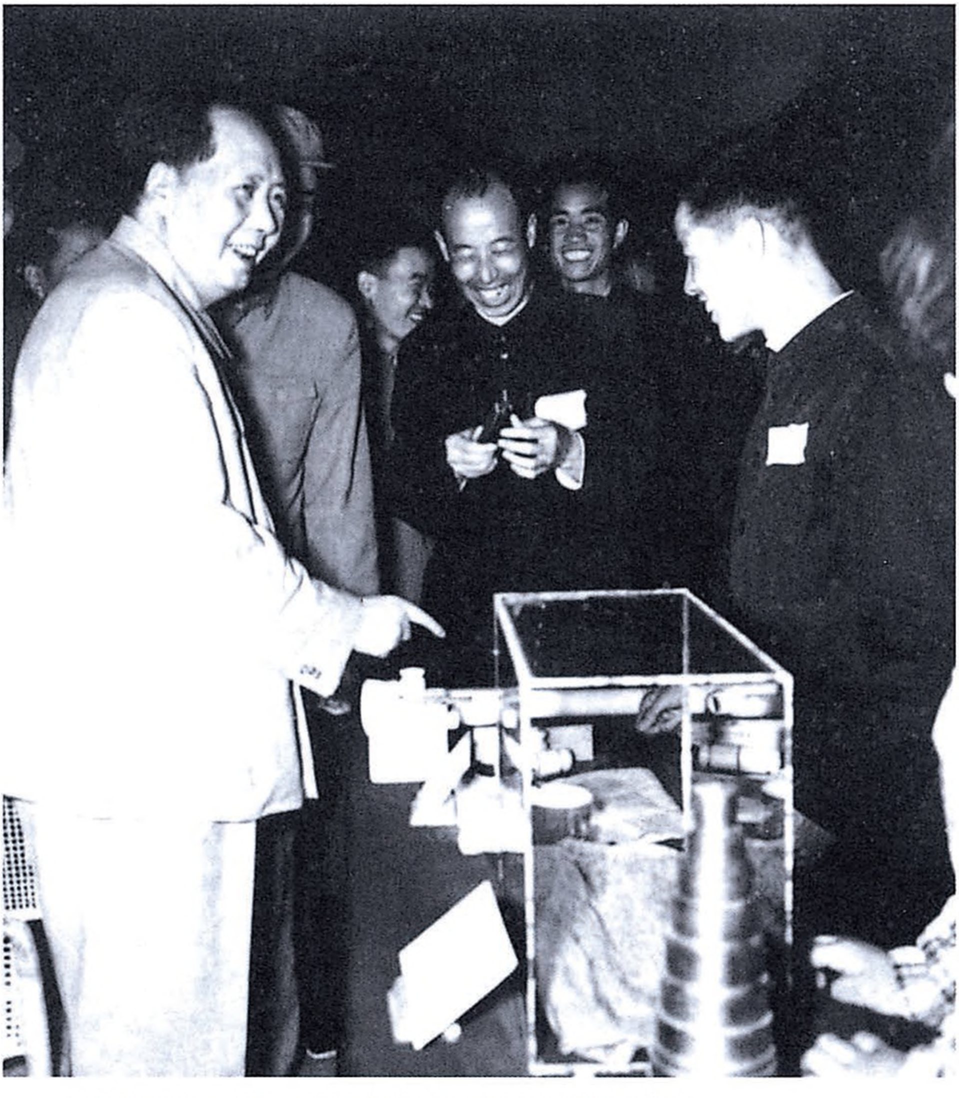
今天日本有几百万人进行斗争，祝贺日本人民斗争的胜利！

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郑州燕庄视察。

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郑州燕庄和干部群众亲切交谈。

1960 年 5 月 11 日，毛泽东在河南省工业展览馆称赞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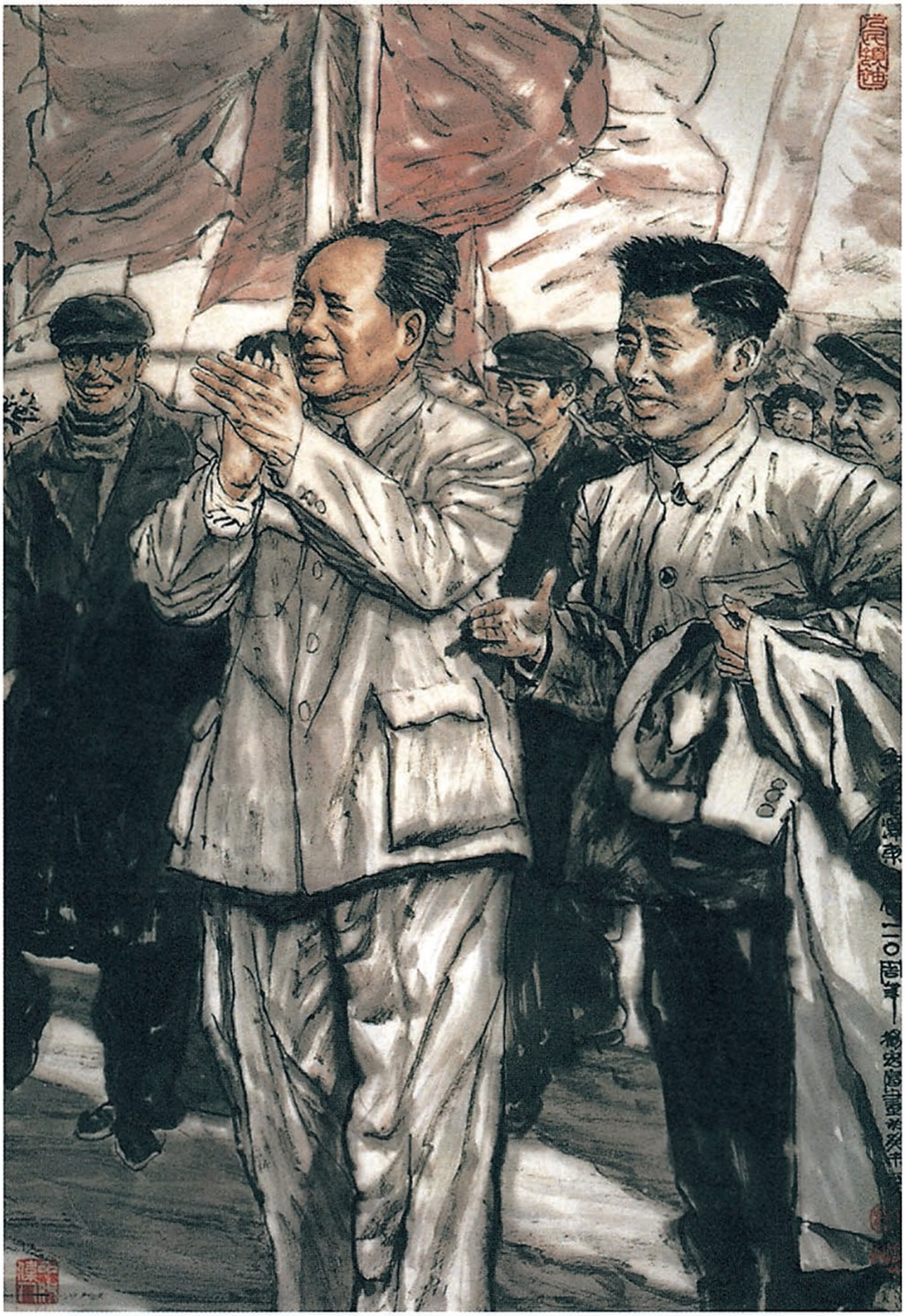
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参观郑州国棉四厂的无梭织布机。



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察看工人制造的新工艺品。

1960年5月11日，毛泽东接见河南省直机关干部。

1960年5月，毛泽东接见《河南日报》编辑部工作人员。



《种子与土地》（中国画）

在《参考资料》第三五九〇期上的批语

（1960年5月12日）

请总理看一看第45页美总统的谈话[1]，很重要。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

[1] 新华通讯社1960年5月12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五九〇期第45页上登载的《美新处报道艾森豪威尔11日记者招待会》一文中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5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共四点：一、搜集情报活动的必要性；二、搜集情报活动的性质；三、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一切活动；四、我们绝不能由于一次事件或今天世界局势的一种征兆而转移我们对当代真正问题的注意力。这个声明主要是借这次美机入侵苏联领空被击落事件向苏反扑，鼓吹为了防止“突袭”和“不希望再来一次珍珠港事件”进行这种挑衅是“必不可少”的，并乘机表示要在最高级会议上再次搬出为美搜集情报的“开放天空”计划；贬低苏联火箭威力，说美机不是在高空被打下的，诬称苏联公布的飞机残骸照片是假的；替自己推卸责任，表示政府机构不直接参与搜集情报的活动；反诬苏联也进行间谍活动；力图缩小飞机挑衅事件的影响，说什么不要因此“转移了对当代真正问题的注意力”；表示不改变访苏计划；再次叫嚷总统有权决定美国是否“保卫”金马，要下任总统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是否撤出金马问题上要仔细“考虑”。

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1]

（1960年5月14日）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2]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3]政府就是这样的政府，日本自由民主党的有识爱国之士，也对岸信介的反动政策表示不满。目前日本人民正在展开规模宏大的斗争，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日本人民在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中，觉悟一天天提高，觉悟的人越来越多。日本人民是很有希望的。中国人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日中友好协会、工会总评议会等访华代表团以及古巴、巴西、阿根廷访华代表团的谈话要点。

[2]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3] 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爱国正义斗争。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日本人民也支持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

最近美国派U-2型飞机侵入苏联，进行间谍活动，被苏联击落，苏联人做得很正确。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1]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我们支持首脑会议[2]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它的老家去。

---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2] 指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

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古巴学生代表团、巴西广播电视工作者代表团和阿根廷文化代表团。

1960年5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访华代表团、日本医学代表团和日本新闻工作者。

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屈服[1]

（1960年5月17日）

前几天，我看到古巴朋友，他们胜利较快，两年多就胜利了。开始时只有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一条船到古巴，不会打仗，打冒险的仗，结果八十二人就给搞掉七十人，剩下十二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就是其中之一。十二个人怎么办呢？他们就转入山区，改变了策略，这样就发展起来了。后来也还有些挫折，挫折教育了他们，最后取得了胜利。古巴人口比阿尔及利亚少，只有六百万人。美帝国主义离他们也很近，飞机去只要半小时。他们打了两年多，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取得了独立，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我对他们说，现在你们比我们强，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你们只打了二年多。他们是在一个孤岛上，要在各国找援助，拉丁美洲广大人民都在帮助他们，现在我们对他们也有帮助。他们那里美国干涉不干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两种可能：美国武装干涉或者不干涉。他们正在分配土地，三分之二已分配，再过些时就能分完。

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住主力，并每天消耗

---

[1] 这是毛泽东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2] 卡斯特罗指菲德尔·卡斯特罗，1953年起组织领导反抗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起义，1959年1月推翻独裁政府，建立革命政府。后任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敌人一点力量。你们的十万兵力能保持并发展，胜利就是你们的。法国人怕熬时间，你们不怕，已经熬了六年，要熬下去，再熬六年，不就胜利了吗？

你们自己讲，战争是长期的，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民。持久作战也是我们讲的，我们很赞成。以你们自己为主，这也是你们的方针，但别国有责任帮助你们。你们组织了各阶层的广泛统一战线，只要反对法国殖民者的都组织在统一战线内，你们叫民族解放阵线，这个名字就很好，可以团结许多党派。战争持久下去，就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发生，能保持团结就好，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使法国孤立，不使自己孤立。

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人数很少，他们最多只占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法国有四千五百万人，但不是统一的，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是被压迫的，你们要在法国人中做工作。你们在法国有四十万阿尔及利亚人，利用他们做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工作，来帮助你们。

美帝表面上强大，但有弱点，引起很多人的反对。南朝鲜的人民就起来反对美帝及其走狗，土耳其、日本的人民也广泛地起来了。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的革命[1]，伊拉克的形势对你们有帮助。谁也没有料到一九五九年一月一日古巴的革命取得胜利。许多事情料不到，我们未料到，帝国主义也未料到，但是它就要发生，你有什么办法？古巴革命对你们也有利。非洲，两年前和两年后有很大不同。我们见过许多非洲、拉丁美洲的朋

---

[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1958年7月14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友，他们情绪都很高，在拉丁美洲是反对美国，在非洲是反对法国、英国、比利时。

我们对所有反帝力量都支持，同时他们也支持了我们，这是世界反帝力量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总是光明的。作为你们的朋友，提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相信你们不会说我干涉你们内政。我们是共产党，帝国主义说革命都是共产党搞的，这是造谣。你们要搞革命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你们已经搞起来，我们才知道。你们要成立临时政府，我们也不知道，你们成立起来了，我们就承认你们。你们来过几个代表团，我们热烈欢迎。

我们是站在你们一边，不是站在戴高乐[1]一边的，我们不怕戴高乐生气。法国不承认中国，还有蒋介石代表在巴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支持你们，为什么不能同你们往来？美国占领我们的台湾，承认蒋介石，不承认我们，说蒋介石是“好人”，我们是“坏人”。戴高乐也说我们是“坏人”，并说你们是“坏人”，好吧，那我们就是“坏人”同“坏人”来往。

帝国主义不喜欢我们，说我们“侵略”，先是“侵略”了蒋介石，又在朝鲜和美国打仗，“侵略者”这个诨号就出来了。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它们说蒋介石、李承晚[2]很好。帝国主义愈说我们坏，我们愈高兴，我们愿一辈子挨骂，如果它们讲我们很好，那岂不是同蒋介石、李承晚一样了吗？帝国主义骂我们，也骂你们。你

---

[1] 戴高乐（1890—1970），法国军人、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曾任法国临时政府主席。1958年6月出任法国总理，12月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当选法国总统。

[2] 李承晚（1875—1965），1948年至1960年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们挨骂已五年半了，要准备挨帝国主义的骂，准备人民欢迎。帝国主义骂你们，但世界人民都欢迎你们。我们都是一党，革命人民都是一党和一条阵线。这里面还有各种不同，有的信仰共产主义，有的信仰宗教，有的不信这些，有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有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大家团结共同反帝。你们知道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们现在同我们一道工作，有选举权，并参加政府，只是不要蒋介石那一派买办资产阶级，还有封建地主。是不是将买办资产阶级分子和封建地主都杀掉？不是，而是给他们出路，比如分给地主一块土地，让他们自食其力。

美国侵略我国台湾，反而说我们侵略，它不侵略。美国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爱好和平”，它欺负社会主义国家，派飞机到苏联领空，被打下来了。美国“爱好和平”，它给戴高乐提供军火和飞机侵略阿尔及利亚，它爱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爱的是要把你们灭掉，把我们灭掉，甚至把戴高乐也灭掉，只剩下它，是不是？戴高乐同美国合作，但又有矛盾，我们在斗争中要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我们承认你们，苏联没有承认你们，是有原因的。苏联不愿同法国闹翻，闹翻了，美、法更会一起对付你们。所以，苏联是考虑到美、英、法的矛盾，为了争取英、法，才没有承认你们。我们就不能起这样的作用，我们不能拉戴高乐一把，因为我们同法国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又瞧不起我们。我们那么多人只有那么点钢，法国又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戴高乐看不起我们也有理由。那些人只看得见钱、钢和原子弹。我们很感谢你们看得起我们。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几枝破枪给你们。再过十年，我们钢多了，也有原子弹时，你们的情况也就变了。被压迫的人民就是要不

屈服，就是要有志气。现在不是戴高乐万岁，麦克米伦[1]、艾森豪威尔万岁，而是各国人民万岁。

1960年5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前排右四为团长克里姆·贝勒卡赛姆。

---

[1] 麦克米伦（1894—1986），英国保守党人，1957年至1963年任英国首相。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寿辰的电报[1]

（1960年5月18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敬爱的胡志明同志：

欣逢你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越南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致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

数十年来，你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越南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越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你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

我们衷心地祝贺你健康和长寿。祝你在领导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争取越南和平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总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的电报。对胡志明的七十寿辰表示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

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

和蒙哥马利[1]的谈话

（1960年5月27日）

蒙哥马利（以下简称蒙）：请你给我讲一讲你对今天的世界局势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国际局势很好，没有什么坏，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

蒙：这是很坏的。

毛：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

蒙：但这是很坏的。

毛：不坏，是好的。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2]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蒙：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

蒙：因此我认为局势是坏的。

毛：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

---

[1] 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2]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杜勒斯，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三种：冷战共处。

蒙：困难就在这里。在冷战中相处是困难的。

毛：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毛：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所以你做转化工作，我们欢迎。

蒙：是的。我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着紧张。

毛：这要有分析。冷战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转为热战。

蒙：有可能。

毛：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转为和平共处。

蒙：这不能够称为是冷战的好处。

毛：我们说有好处，因为美国制造紧张局势，就制造更多反对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鲜、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都反对美国人的控制。这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

蒙：我不能肯定美国在西方国家集团中制造了它的反对者，在西方集团中没有发生这种情况，虽然我希望发生这种情况。

毛：我不是指欧洲，欧洲是比较平静的。我是指南朝鲜、南越、日本、土耳其、古巴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非洲不能光责备美国，首先是要责备欧洲的殖民主义者。但是，美国要在那里取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地位而代之。因此，我说好的一面就在于使这些国家反对美帝国主义。这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

蒙：西方世界的领袖是美国，现在西方国家怕被这个领袖领到战争中去，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在上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等到战争打到一半才参加进来。可是现在西方国家却怕美国把它们带入战争。我们必须把这样一种情况改过来：现在的情况是，西方集团的领袖跟东方集团两个最大的国家根本谈不拢。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受到怀疑。

毛：只要美国的领导不削弱，由英国、法国来加强，就不可能改变局势。

蒙：我相信必然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况。

毛：你是英国人，你到法国跑过，你去过两次苏联，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有没有这种可能，英、法、苏、中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

蒙：是的，我想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美国的领导，英、法会害怕这样做。

毛：慢慢来。我们希望你们的国家强大一些，希望法国强大一些，希望你们的发言权大一些，那样事情就好办了，使美国、西德、日本有所约束。

威胁你们和法国的是美国和西德，还有在远东的日本。威胁我们的也是这三个国家。我们不感到英国对我们是个威胁，也不认为法国对我们是个威胁。对我们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蒙：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局势中，我们应首先采取哪一个步骤？我觉得首先应该从别国领土上撤走一切外国军队，这是需要时间的。

毛：主要是美国的势力，一部分在欧洲，一部分在亚洲。英国在德国只有四个师。

蒙： 只有三个。

毛： 而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包括在西德、英国、土耳其，还有在摩洛哥。在东方，美国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有军事基地；美国还在南越有军事人员，在泰国和巴基斯坦有空军基地。

蒙： 主要的问题是大家应该回到本国去。如果我们能做两件事，我们就有可能和缓紧张局势：第一，停止对欧洲的军事占领；第二，解决台湾问题。问题只能一个一个来。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毛： 但是人民在做。南朝鲜人民、日本人民，还有土耳其人

民，都在进行示威游行。土耳其刚刚发生了政变[1]，这总不能说是共产党搞的吧。

蒙：要同时做一切事情是没有好处的。我是个军人，我了解这一点。你也是个军人，你也应该了解这一点。

毛：你有三十五年军龄，你比我长，我只有二十五年。

蒙：我有五十二年了。

毛：可是我还是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

蒙：那很好。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

毛：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2]，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蒙：我也学过成吉思汗[3]，他强调机动性。

毛：你没有看过两千年以前我国的《孙子兵法》吧？里面很有些好东西。

蒙：是不是提到了更多的军事原则？

毛：一些很好的原则，一共有十三篇。

蒙：我们应当从两千年以前回到现在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回到伦敦以后，在结束欧洲的军事占领和解决台湾这两个大问题上动员世界的舆论？你是否同意先从这两个问题开始？

---

[1] 1950年，在土耳其自由选举中，曼德列斯领导的民主党获胜，取得政权。曼德列斯执政后，背弃诺言，抛弃民主和宪法，压制反对派。1960年5月27日，土耳其武装部队一批下级军官指挥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部队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曼德列斯政府，曼德列斯被处死刑。

[2] 克劳塞维茨（1780—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3] 成吉思汗（1162—1227），元太祖，名铁木真，军事家和政治家。

毛：好，我赞成。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这里也有两条：一条就是你这样做；另一条就是美国人非常自高自大，他们是寸土不让的。

蒙：我可以使美国非常为难。

毛：有可能。

蒙：我跟美国人很熟，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毛：我们的政策也是使美国为难。

蒙：在美国，我有很多朋友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很多强大的报界人士也会同意我的。我过去从来也没有设法使美国为难，我想现在就要使它为难了。

毛：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

蒙：我想应该对美国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老实话。

毛：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它有三百万军队，其中一百五十万在海外，包括在你们的英国和中国的台湾。我们在国外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没有一个兵。

蒙：主席同意不同意我跟周恩来谈的关于美国应该遵守的那几条原则？那就是：第一，美国应该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美国应该从台湾撤走；第三，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和蒋介石谈判。

毛：我知道，我也同意。我们不要同美国用战争解决问题。同蒋介石就不同了，但是如果他不用武力，我们也不用武力。

蒙：这点我是同意的。

毛：美国声明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问题，而不使用武力或不以武力威胁。它这个话是否可靠还是个假定，还要等着看。可是蒋介石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反对同中国共产党谈判，而我们早就表示我们愿意同蒋介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蒙：你认不认识蒋介石？

毛：他是我的老朋友，我怎能不认识？蒋介石就是经过我们的帮助才掌权的。在他没有掌权以前，我们同孙中山打交道。

蒙：毛主席同蒋介石是否在抗日的时候合作过？

毛：抗日合作了八年。后来他又同美国合作来打我们。

过去你们英国同日本有一个同盟，对付沙皇俄国。那时候，远东是你们的天下，中国主要是你们的势力范围。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改变的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你们就管不了啦，由美国管了。英国还同美国订了一项君子协定，把中国让给美国。这是克里浦斯夫人到延安时告诉我的。她说，在中国问题上，英国没有发言权了。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就消除了，中国人民的仇恨转向美国。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的美国军队有九万人。

蒙：可是过去的仇恨是针对英国的。

毛：过去是对着英国，同时也是对着日本。

蒙：我们曾经是最坏的洋鬼子。

毛：过去也有日本，后来就成为日本和美国。

蒙：你们反对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派了马歇尔将军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

毛：日本就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占了大半个中国。日本没有铁，没有石油，煤也很少。这三样东西都是美国源源不断地给日本

送去的。但是，美国扶植了一个力量，却造成了一个珍珠港事件[1]。

蒙：你们今天不怕日本了吧？

毛：还有点怕，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

蒙：日本是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国家。

毛：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本月十九日，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2]。

蒙：日本对中国有没有什么坏的意图？

毛：我看是有。

蒙：什么样的意图？

毛：当然主要是美国。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

我读过艾登[3]的回忆录。他讲到苏伊士问题、埃及问题和伊朗问题，也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问题。他说，美国在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时候，英国希望印度参加，美国坚决反对。美国说如果英国要印度参加，美国就要蒋介石和日本参加。

蒙：印度是不会参加的。

毛：那个时候，艾登想让印度参加来对付美国。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他想不通蒋介石怎么能同尼赫鲁[4]相提并论。

蒙：我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一下主席：中国大概需要五十

---

[1] 1941年12月8日，日本未经宣战，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大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击毁、击伤美国军舰19艘，飞机200余架，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当日，美国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2] 指《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3] 艾登（1879—1977），英国保守党人，英国前首相、外交家。

[4]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年，一切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人民生活会有大大的改善，房屋问题、教育问题和建设问题都解决了，到那时候，你看中国的前途将会怎样?

毛：你的看法是，那时候我们会侵略，是不是?

蒙：不，至少我希望你们不会。

毛：你怕我们会侵略。

蒙：我觉得，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以后，它应该很小心，不进行侵略。看看美国就知道了。

毛：对，很对，也可以看一看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英帝国。一百八十年前的美国呢，只是英国的殖民地。

蒙：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

毛：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到底是华盛顿[1]的北美强大，还是英帝国强大？但是，华盛顿用几枝烂枪，打了八年，把英帝国赶回去了。

蒙：美国革命是件好事。革命往往是件好事。如果不是美国革命，加拿大就不是今天的加拿大。中国的革命也是好的。所以革命可以是好的。

毛：你很开明!

蒙：我是个军人。

毛：外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别人不能去，没有权利也没有理

---

[1] 华盛顿（1732—1799），美国第一任总统，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任大陆军总司令，将武装落后、组织松散的地方民军整编训练成为能与英军正面抗衡的正规军，领导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

由硬挤进去。

蒙：我同意。

毛：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

蒙：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怎么样？那时中国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了。

毛：那不一定。五十年以后，中国的命运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中国没有上帝，有个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围还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占人家一寸土地，我们就是侵略者。实际上，我们是被侵略者，美国还占着我们的台湾。可是联合国却给我们一个封号，叫我们是“侵略者”。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对面坐着一个“侵略者”，你怕不怕？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

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蒙：这我不知道。西藏是在中国之内的。

毛：你们外交部做的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不能轻易地把正式代表权给英国，不能同英国正式互换大使。

蒙：这是需要时间和等待的。

毛：你们只要少许改善一下态度，我们的关系就会改善。

蒙：我觉得你提到的关于英、法、俄、中这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我同麦克米伦[1]和戴高乐[2]是很熟的。戴高乐曾要我下个月到巴黎去同他会见，我将把这一点告诉他。戴高乐是一个很好的人。

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蒙：人人都有缺点。

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蒙：海军也是这样。

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蒙：戴高乐会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而在法律上

---

[1] 麦克米伦（1894—1986），英国保守党人，当时任英国首相。

[2] 戴高乐（1890—1970），当时任法国总统。

戴高乐这样说是对的。

毛：阿尔及利亚人可不同意，他们要求独立。

蒙：麻烦就在这里，所以必须解决。但是法律上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阿尔及利亚问题应该解决。阿尔及利亚人告诉我，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有九十万军队，我觉得没有这么多，大概有五六十万。每天、每月、每年，法国都在阿尔及利亚消耗大量军费，这对法国很不利。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是必须解决。法国军队不能打仗，在越南他们也打不过胡志明[1]部队。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毛：他们在阿尔及利亚打了六年。开头阿尔及利亚只有三千名游击队，现在已经发展到十万人的军队了。

蒙：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戴高乐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可能被迫下台。

毛：也会决定他是否能够同英国和美国一道在欧洲有平等的权利。

蒙：他已经得到了。他曾经坚持这一点。

毛：不完全如此，美国人不干。我们看到麦克米伦到法国访问、戴高乐到伦敦访问时受到隆重接待，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国家能够合作。

蒙：麦克米伦可能是西方世界最好的政治领袖。

---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曾领导越南人民进行抗法救国战争。

毛：可能。至少他比艾森豪威尔好。

蒙：谁会比他更好呢？我是指在西方世界里。

毛：我们希望英国能够更加强大。

蒙：他在西方集团是最聪明、最老实的人了。

毛：人们可以看出，他比较有章法。

蒙：我衡量一个政治领袖的标准是看他是否会为了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你同意不同意这样一种标准？如果一个领袖为了取得很高的地位而牺牲他的原则，他就不是一个好人。

毛：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蒙：但是他也不能牺牲他的原则啊！

毛：这就是原则，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

蒙：他必须带领人民去做最有利的事。

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蒙：但是人民并不经常知道什么对他们最有利，领袖必须带领他们去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

毛：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1]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蒙：克伦威尔只代表少数人。

毛：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蒙：但是他失败了。克伦威尔去世并且埋葬以后，过了几年，人家又把他的尸体挖出来，砍掉他的脑袋，并且把他的头在议会大

---

[1] 克伦威尔（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主要军事、政治领导人，独立派领袖，资产阶级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他率军战胜国王军队，1649年宣布成立共和国，1653年自任“护国主”，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厦屋顶上挂了好几年。

毛：但是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蒙：如果不是克伦威尔的话，英国就不是今天的英国了。

毛：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但是耶稣有威信。

蒙：那是在他死以后，在他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很多的跟随者。

毛：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蒙：可是他被暗杀[1]了。

毛：印度的甘地[2]也是被暗杀的，但是他是代表印度人民的。

---

[1] 这里蒙哥马利的记忆有误，华盛顿是1799年12月14日在家乡芒特弗农病逝的。

[2] 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曾当选为印度国大党主席，长期领导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1948年1月30日遇刺身亡。

给卡斯特罗的信

（1960年5月30日）

尊敬的古巴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

我很高兴会见了您的战友、古巴起义军总督察威廉·加尔维斯·罗德里格斯少校，非常感谢您托他带来的热情的友好的问候。

古巴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尊敬。英雄的古巴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独裁统治。在革命胜利以后，你们又英勇地抗击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进行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繁荣民族经济所必需的土地改革和其他改革。你们是在最接近美国的地区进行正义的革命斗争。你们的每一个胜利，都沉重地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全世界争取和平和进步的人民，特别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从你们胜利的斗争中，大大增强了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中国人民和我本人，一直非常关心您所领导的古巴人民革命斗争。长期生活在革命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斗争，感到特别亲切。相同的遭遇和共同的斗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是相互支持、相互鼓舞的。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进步和胜利，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你们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每一次侵略、轰炸和破坏，都使我们极其愤怒。中国人民和古巴人民是共患难的战友。我们将继续用自己的胜利斗争和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来支持你们的正义事业。

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结局，已经确定无疑了。这是不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采取和准备采取各种穷凶极恶的手段，以图挽救他们的灭亡。在我们两国人民面前和世界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古巴和各国人民今后的斗争，仍然是艰巨的、复杂的、曲折的。但是，只要各国革命领导核心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人民前进。我们坚定地相信，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能够最紧密地团结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保卫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解放的正义事业的彻底胜利。

请您，尊敬的古巴总理，接受全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崇高敬意。祝您健康！祝中国和古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进！祝古巴人民革命事业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五月三十日

对一份摘录南斯拉夫方面言论的内部材料[1]的批语

（1960年5月）

一

“奇文共相赏，疑义相与析。”[2]可以一看。

二

康、杨、田[3]阅，退高智[4]。

---

[1] 1960年5月16日印发的这份内部材料，分别摘录了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领导人1960年4月在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大会上的报告、铁托在五一前夕对南斯拉夫《劳动报》编辑的谈话、南斯拉夫《战斗报》4月22日登载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一文及4月27日摘登《红旗》杂志社论时所加的按语、《共产主义者》周刊5月12日发表的社论《真正的目的》、《政治报》4月18日发表的评论《万隆的力量》等。

[2] 参见陶渊明《移居》。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陶渊明集》中作：“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3] 康、杨、田，指康生、杨尚昆、田家英。

[4] 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对《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初步反应》一文[1]的批语

（1960年5月）

---

[1] 1960年5月28日编印的一份内部材料上登载了此文。文中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抓住近日美机入侵苏联边界的挑衅事件，在5月16日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预备会上发表严正声明，要求美国政府谴责飞机挑衅行动，宣布放弃这种政策，惩办直接罪犯，否则，苏联就不参加会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悍然拒绝苏联的合理要求，拒绝对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拒绝作出不再重犯的应有保证，以致四国首脑会议于5月17日宣告破裂。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应是：（1）竭力把破坏会议的责任推给苏联，制造反苏气氛。（2）西方内部慌乱，叫嚷加紧扩军备战，互相争吵埋怨。美、英空军宣布处于“戒备状态”。（3）纷纷揣测赫鲁晓夫这次改变策略的原因。其中大部分是挑拨中苏关系，说赫鲁晓夫改变策略是由于受到“内部政治压力”和“中国的影响”。（4）对今后局势发展的前途作了各种猜测和分析，大都认为“局势恶化”，会议的“失败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大多举行了群众集会，支持苏联的严正立场，谴责美国破坏首脑会议的罪行。保加利亚有的报刊提到不该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和不现实的想法。波兰认为，近日来形势的发展表明，中国同志对于世界形势的估计有点道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随着技术进步而变化的。苏联《消息报》记者说：“现在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中国党关于帝国主义的本性不能改变及其有两手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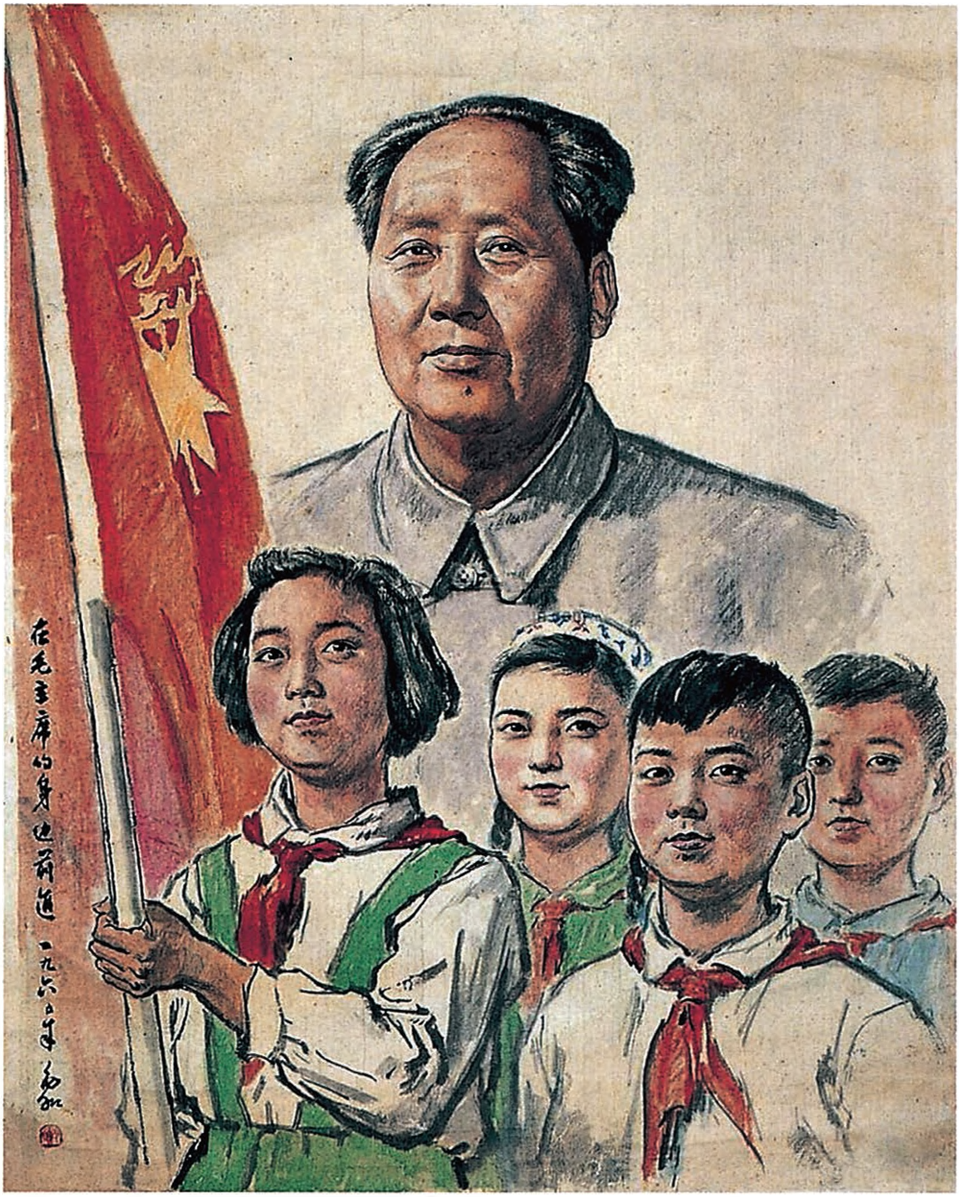
一

此篇可看。

二

康、杨、田阅，退高智。

毛


在毛主席的身边前进
一九六〇年 兆和

《在毛主席的身边前进》（中国画）

印发我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国际工业展览会总结报告的批语

（1960年6月4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请印发上海六月会议[3]各同志一阅。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960年5月14日给外交部、外贸部、对外贸易促进会并对外文委的报告。其中说，53天来，有75万人参观了我国在东巴基斯坦的工业展览馆。这次展览在东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指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举行。

对宦乡关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展望[1]的批语

（1960年6月7日）

印发上海会议[2]各同志。此件说得很好。

毛泽东
六月七日

---

[1] 中国驻英代办宦乡1960年5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对苏、美、英、法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后的国际形势作了分析和展望，主要内容是：（一）从美机侵苏事件到巴黎四国首脑会议流产，经过19天曲折、尖锐的斗争，彻底揭穿了“艾森豪威尔是和平爷爷”的胡说，深刻批判了一年来国际上流行的对西方帝国主义怀抱幻想、放弃斗争的错误政策，对全世界争取和平的人们是一次极其有力、生动的教育，对反帝反美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二）19天来，苏联对美帝的政策逐步由过去单纯的和解绥靖，转变到坚决揭露和强硬斗争，主要是由于美帝的蛮横进逼逐步促成的。（三）首脑会议散场后，赫鲁晓夫态度又突然软化。根据这种情况推断，苏联斗争策略的转变主要是谍机事件本身发展的逻辑结果，而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与和平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有了真正全面、深刻的新认识，因此摇摆和犹豫恐怕还不是一时所能避免的，当然也要看到有逐步转变的可能性。（四）这次斗争使美国在全世界大大丢脸，进一步动摇了美帝在西方阵营的领导地位，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起了西方阵营的混乱和争吵。（五）苏联的斗争也加深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混乱和争吵。（六）西方十分害怕这次斗争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中苏之间的团结，因此正把冷战

的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冷战的重点首先是加紧挑拨中苏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有关中苏关系的问题应该十分慎重地处理。

[2] 指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举行。

对《有关美国军事生产的一些资料》的批语

（1960年6月8日、9日）

一

此件[1]印发政治局会议[2]各同志阅读。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

毛泽东

六月八日

二

亲爱的赫鲁晓夫[3]同志：

此件送给你一看，值得严重注意。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呢？

毛泽东

1960年六月九日

祝你健康，我们两国永远团结万岁！

---

[1] 指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写的《有关美国军事生产的一些资料》。这份资料载于1960年5月25日出版的一份内部刊物，内容如下：一、美国军事部门有多少人在工作？据维克多·佩洛和卡尔·马曾尼合著的《金元与裁军思想》一书估计：1960年财政年度美国的军事及其他支出约456亿美元，将雇用约644万人。一些劳工研究协会的经济顾问则认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将达3700万人，其中包括军火及军事建筑方面303万人、部队中有250万人。二、军事采购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一个题为《军事采购和供应对经济的影响的背景资料》的报告说，目前有关国家安全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开支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是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国防采购对美国经济起了重大影响，在飞机制造业中，有90%依靠政府合同，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

[2] 指将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于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举行。

[3]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960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

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两点建议给苏共中央的信

（1960年6月10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收到了你们六月二日和六月七日两次来信，我们完全同意你们在六月七日来信上所说的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华沙条约缔约国[1]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推迟召开的意见[2]。

我们认为：在六月二十日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各兄弟党代表就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初步交换意见，然后根据各兄弟党中央商谈的结果，最后加以确定；同时，还可以对兄弟党代表会议的内容初步交换意见，但不作任何决定。这样的安排是适当的。

---

[1] 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8个国家。他们于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指出，缔约国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规定设立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和政治协商委员会等组织。

[2]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后来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后来于1961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

鉴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不但同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1]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实践密切相关，而且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密切相关，并为他们所十分关切。因此，我们建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十二国兄弟党的代表以外，最好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2]；至少应当包括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共产党的代表，例如包括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古巴、印尼、印度、日本、伊拉克、叙利亚、澳大利亚等十四个国家的党的代表。我们认为，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由社会主义各国的党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党共同讨论，取得共同的意见，是更为适当和更为有益一些。当然，可以考虑，这次会议的共同宣言[3]，仍然像上次莫斯科会议[4]那样，由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签署发表。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对这个宣言采取什么态度，可由他们自己决定。

为了很好地准备各兄弟党的代表会议，我们建议，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经过各兄弟党中央的同意，产生一个起草委员会，为会

---

[1] 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

[2] 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后来，有81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3] 这次代表会议的共同宣言，即《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由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一致通过，于1960年12月5日正式发表。

[4]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议准备宣言草案，以便各兄弟党能够事先讨论和交换意见。

对于以上两点建议，请你们加以考虑，并且希望将你们的意见告诉我们。

致

共产主义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0年6月10日

七律·读报有感之三

（1960年6月13日）

托洛斯基返故居[1]，
不战不和欲何如[2]？
青云飘下能言鸟[3]，
黑海翻起愤怒鱼[4]。
爱丽舍宫[5]唇发黑，

---

[1] 托洛斯基返故居，指赫鲁晓夫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当年的托洛斯基派如出一辙，好像托洛斯基的阴魂又回到了老家。

[2] 不战不和欲何如，指赫鲁晓夫集团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既不敢支持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战争，害怕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又不是真心诚意维护世界和平，而是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核武器与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这里意思是问赫鲁晓夫集团到底想要干什么。

[3] 青云，即高空。能言鸟，鸟名。1960年5月1日，一架U-2飞机从美国设在土耳其阿达纳的基地起飞，侵入苏联领空约2100公里后被击落，驾驶员鲍尔斯被俘。这里即戏指被俘并供认其间谍活动的美国驾驶员。

[4] 黑海，欧洲东南部和小亚细亚之间的内海。北岸、东岸属苏联，西岸属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南岸属土耳其。这里借指苏联。翻，翻腾。愤怒鱼，比喻苏联舰队。

[5] 爱丽舍宫，法国总统的官邸。新闻报道常用爱丽舍宫作为法国总统的代称。这里指1960年5月16日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会议第一次会谈。

戴维营里面施朱[1]。
新闻岁岁寻常出[2]，
独有今年出得殊[3]。

---

[1] 戴维营，美国总统别墅。1959年9月25日至27日，当时的美苏两国首脑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曾在此举行会谈。面施朱，指女人脸上搽胭脂，以取悦男人。这里指赫鲁晓夫在1959年12月25日至27日戴维营会谈期间向美帝国主义献媚。

[2] 岁岁，年年，每年。寻常，平常。新闻岁岁寻常出，即新闻寻常年年出。

[3] 独，只。殊，特别。

1960年，毛泽东在散步。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农村“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的批语

（1960年6月14日）

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现将广东省委关于“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1]，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广东省委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

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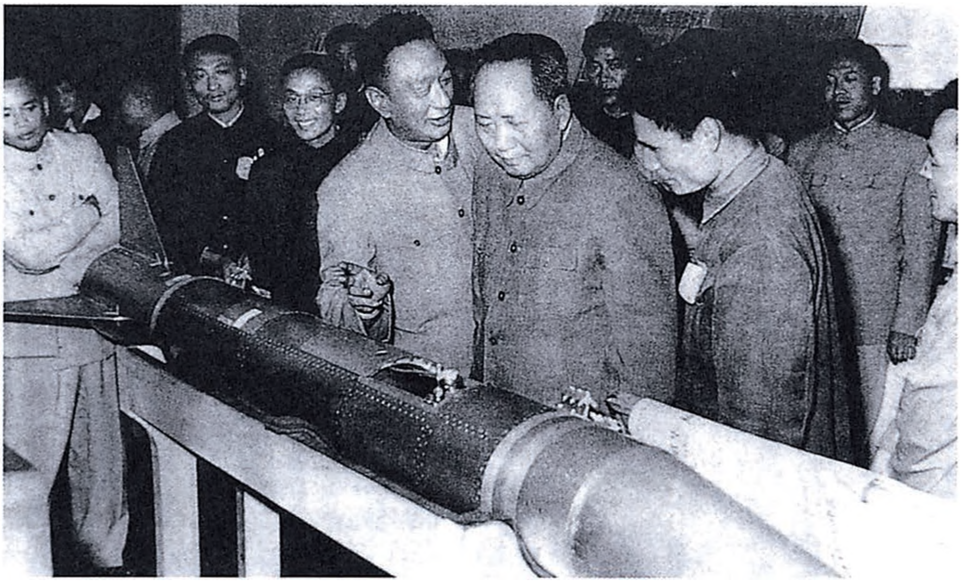
1960年6月14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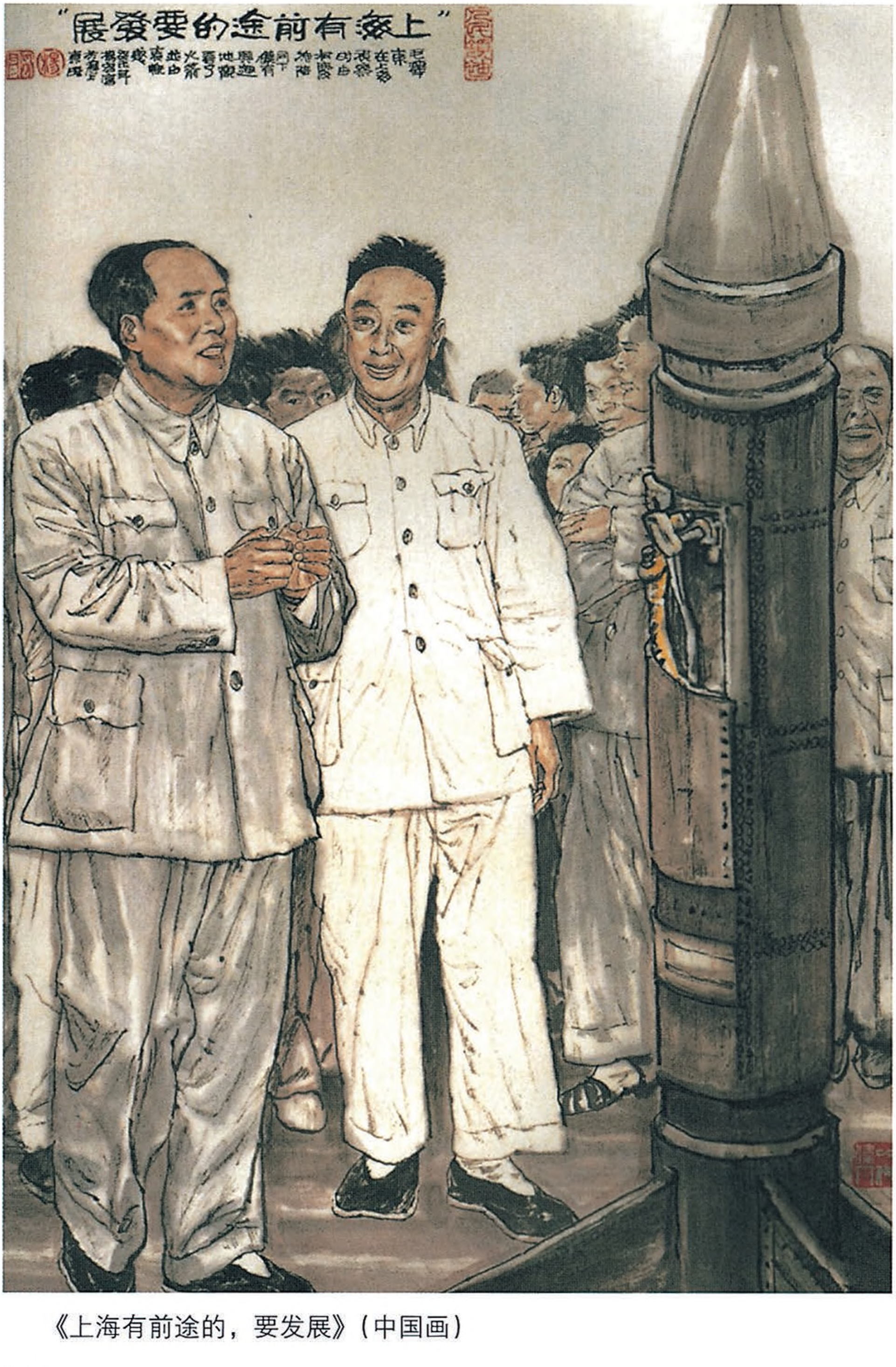
[1] 指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60年5月21日关于搞好农村“三反”彻底改进干部作风的意见和广东省委6月4日关于农村“三反”一定要大获全胜的报告。陶铸说，从我这次在汕头地区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看，总的说来这一地区今年的情况是好的，但是近一二年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铺张浪费的坏作风，在相当多的干部中大为滋长了，一部分公社以下干部的贪污腐化、铺张浪费、违法乱纪、强迫命令等行为，更是发展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根据中央首先搞好农村三级干部“三反”的指示，我省农村的“三反”运动已全面展开。为什么首先要在农村搞“三反”？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公社化以后，生产关系大改变，而公社的上层建筑却没有适应这种改变，公社干部的觉悟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极不适应。这次“三反”就是要解决

这个问题。搞好这次“三反”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方针是：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领导上积极为群众撑腰，把坏人坏事彻底揭发出来，边揭发边处理。运动一开始，首先要向群众公开宣布，这次“三反”是整干部的作风，他们有权利批评和揭发干部的问题，清查各种账目，公社各级领导对群众绝对不允许打击报复；其次要向群众讲清楚，涉及群众占一点小便宜的问题，一律不予追究；再次要对干部反复交代政策，促使有贪污行为和瞒产私分多得的人及早坦白，并退出贪污和私分的物款，对这样做了的人处理从宽，否则加重处分。公社干部不准单独搞食堂，要和社员一道吃饭，认真办好社员食堂。公社各级干部必须立即按规定参加劳动。在运动中，要特别注意审查“三反”的领导核心，贯彻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雇农积极分子。这次运动，对绝大多数干部，主要是教育提高，领导上要很好掌握政策，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解放与保护多数。处理面应控制在干部总数的3%以内，同时要吸收一批在运动中表现较好的骨干分子参加公社各级领导核心。我认为“三反”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此严重，省、地、县委都有责任。近两三年来我们的工作作风不深入，光靠开会、发文件、办刊物、要数字来指导工作，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相当多，这是应该承认的。今后除对公社干部每年进行一次整风外，最彻底的办法是改善省、地、县三级的领导作风。特别是县一级，必须深入到公社、大队、小队中去，进行具体的领导，以身作则，影响教育各级干部。我建议从现在起到1962年，要立即恢复土改和合作化时与下面干部、群众“三同”的作风。除省委已规定省委同志每年保证有4个月在下面外，地委同志应有6个月在下面，2/3以上的县委委员，4/5的县委常委、县委书记都要有7个月在下面。广东省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目前农村“三反”运动正在顺利展开，情况很好，但也有少数地区运动不深不透，需要补课。省委认为，现在必须继续加劲，使运动大获全胜。关键是要开好以小队为单位的社员大会，让群众鸣放深透，把干部作风整好。二、坚决转变作风。这是关系到人民公社制度能否巩固提高，生产能否飞跃发展的严重问题。目前转变作风的中心一条是走出办公室，跳出会议圈子，打掉官气，到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去，特别是到落后地区和落后队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为了彻底转变作风，希望各地根据省委颁发的农村工作干部守则十二条，制定自己的干部守则，作为纪

律。同时还必须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制度，堵塞漏洞，使管理工作跟上去。三、全力办好食堂，这应作为“三反”整改的中心。办好食堂最重要的是干部一律参加食堂，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县、社、大队、小队四级领导，均应派出较强的干部亲自抓生活；粮食统一由大队管理，按月发到食堂；食堂用地每人平均要有一分左右；食堂必须有集中吃饭的饭厅。四、突击扩种杂粮。要把一切能种的土地都种上，并利用现有耕地间种、套种。



1960年，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中国研究制造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上海有前途的，要发展》（中国画）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1]

（1960年6月14日）

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

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

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

[1]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四个文件的批语[1]

（1960年6月15日）

此四件可看，阅后收回。事物是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不依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者和半修正主义者的意志为转移。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政党领导之下，如果他们认识了客观事物（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规律，从而采取了正确的斗争方法，并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从事坚决的斗争，如果他们是这样的话，那末，他们的斗争就一定会胜利。阶级斗争如此，生产斗争也是如此。总之，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否则是不可能的。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者总是脱离人民群众，违反客观规律，因而他们迟早要失败。这一点还有疑义吗？完全没有了。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为印发《关于东南亚条约组织外长会议》《苏联当前的新

动态》《罗〈阶级斗争〉第五期全文转载苏文章》《对三篇文章的几点零星反应》这4件材料写的批语。这4个文件是印发给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个文件说，不久前召开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会员国外长会议重新估计了中国形势，认为中国将比西方预料的1970年提早5年成为核强国之一，整个世界核均势将要为之改变。东南亚、非洲、南美等地的民族独立运动，将更易接受中国的影响并更加发展起来。对于中苏矛盾，会议认为虽确实存在着，但不宜过于重视，目前还只能看作制定对华政策时的参考因素，而不能作为基本出发点。如何对付中国是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美国主张加强军事上反共反华，表示“迟干不如早干”，并建议建立东南亚条约集团总司令部和参谋部，以便统一指挥，策动各种反共颠覆活动。但是美国的这些冒险想法受到英、法、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坚决反对。有的国家甚至主张及早同中国谈判，把中国套进联合国。美国在会议中极为孤立，同意不做出“各国不得承认中国”的决议。第二个文件说，6月10日和12日，苏联报刊连续发表了谢夫略金关于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出版40周年的文章和马科夫斯基的同样内容的文章，这是当前新的重大动态。这两篇文章标志着苏联要从前一时期的辩解转入对我国进行反击，企图缩小我党的影响。他们自认为已经掌握了反帝反修正主义的旗帜，为批判所谓“现代左倾”创造了有利条件，便抓住列宁的一些词句作理论根据，给我国戴上“现代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压一压与中国有共同点的其他兄弟党。苏联这样做意味着在一个时期内将会与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论争，也有可能出现露骨的公开批评，其目的就是要在其内部和外部，缩小我国纪念列宁诞辰的3篇文章的影响，弥补前一时期威信上的损失。第三个文件说，罗共中央理论刊物《阶级斗争》今年第五期全文转载苏联《共产党人》第八期《在修正主义的老立场上》一文，6月5日《火花报》又发表对该文的述评。这篇述评主要是引述苏联的文章，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借机表明自己的态度，同时也对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苏联文章中有的提法未予采用，对其中一些强硬词句也避而不引或改为缓和的措辞，与苏联的做法比较，留有更多的余地。第四个文件说，最近波兰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武官说，中国同志为纪念列宁诞辰发表的几篇文章在波兰引起了很多人的谈论，认为很重要、很好。捷外贸部副部长说，目前亚洲特别是

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搞得很好，我看主要是受中国的影响，美帝国主义今天怕中国比怕苏联还厉害。在中国驻捷使馆工作的捷籍翻译看了刘长胜6月8日在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讲话后说，这一讲话强调不要对帝国主义存幻想，反对麻痹人民等，都是真理。

1960年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图为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1]

（1960年6月18日）

□□是一个革命的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敌人只是少数，这一点不但应当成为我们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应当成为我们长期对外工作的思想。全世界的胜利都是我们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上海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十年总结[1]

（1960年6月18日）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2]，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乡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3]。这个章程是基本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4]，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

---

[1] 这是毛泽东在1960年6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3] 指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

[4] 指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1]，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2]，基本正确，但只解决了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三千万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二千万吨，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3]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陈云[4]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5]规定一个一六五〇万吨的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6]规定指标为一三〇〇万吨，这才完全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五、六、七月

---

[1] 指毛泽东1958年11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又称第一次郑州会议。

[2]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3] 指1959年1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4]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5] 指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6] 指1959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出现了一个小小马鞍形。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但在农业方面仍然被动，直至于今。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1]，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基本上清醒了。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一九六〇年六月上海会议[2]规定后三年[3]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4]，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农业方面则犯了错误，指标高了，以至不可能完成。要下决心改，在今年七月的党大会[5]上一定要改过来。从此就完全主动了。同志们，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

---

[1] 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2] 指当时正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3] 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三年。

[4] 指周恩来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5] 指原准备在1960年7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后因故未召开。

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们。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一六五〇万吨。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1]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帐。如此等类。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当如此。

我试图做出一个十年经验的总结。上述这些话，只是一个轮

---

[1] 指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廓，而且是粗浅的，许多问题没有写进去，因为是两个钟头内写出的，以便在今天下午讲一下。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八时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蒙哥马利[1]《我同毛的会谈》一文[2]的批语

（1960年6月20日）

---

[1] 蒙哥马利，原英国陆军元帅，当时已退休。

[2] 载于1960年6月12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蒙哥马利在文章中详细叙述了他在5月下旬访问中国的经过和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情况。他说他30多年前到过中国，那时的旧中国正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它的领导人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对一些政界领袖的评论非常准确；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就是人民起决定作用，因此要求干部每年下基层工作一个月，保持和人民的联系，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国需要和平，从事长期而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也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大家团结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因此5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西方世界对新中国有许多错误的看法，毛泽东很重视与英国人民的联系，但中国人民仇恨美帝国主义的强烈程度使人感到吃惊；目前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大法宝”是全中国人民努力的基础，已使工作显著地加快，人人都充满干劲；毛泽东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人人献身和有目的感的国家；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有“充分的质量高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若入侵中国“要大倒其霉”。

江青：

此件[1]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的〔会〕谈，他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劲，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

毛泽东
廿日晨

---

[1] 指新华通讯社1960年6月16日下午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六六〇期上刊载的《英报刊载蒙哥马利访华第一篇文章》的报道。报道说，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6月12日全文刊载了蒙哥马利谈访华观感的第一篇文章，题为《我同毛的会谈》。

对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的批语

（1960年6月21日）

少奇、恩来、小平[1]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2]。

毛泽东

六月廿一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的由北京编译社翻译的内部读物《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一书。该书编入了蒙哥马利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在牛津大学的两次讲演稿和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过去、现在和未来；二、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先生会谈；三、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历史；四、战后的年代；五、日内瓦外长会议的实质问题。书中的主要论点是：西方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输给苏联，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军事思想的错误和美英之间的深刻矛盾；西方战后在同东方的全球性斗争中遭到惨重的失败；西方要注意外界的发展，未来的斗争已转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西方必须改变策略，承认东西方关系中的某些“现实因素”；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西方在当前斗争中最需要的是团结和领导，应彻底改革北大西洋联盟的机构；苏联坚持和平政策；在东西方关系中应先解决西柏林问题，采取渐进方式，通过小协议达成较大的协议；西方要改变策略，以图“和平取胜”。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1]

（1960年6月21日）

非常欢迎你们。对日本人民的英勇斗争感到很高兴。你们的斗争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都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你们斗争的对象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这个国家曾经控制着中国，援助蒋介石打内战，现在还占领着我们的台湾。在日本、菲律宾、南朝鲜、台湾都有它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占领的还有南越，巴基斯坦以西还有许多国家就不讲了。这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去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2]访华时在北京发表演讲，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火。现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去年的这种说法，斗争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年所没有想到的。这次斗争是从反对“安全条约”[3]爆发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在日本的代理人岸信介[4]，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因为条约是日美反动派在众议院强行通过的。就是说

---

[1] 这是毛泽东同日本文学代表团的谈话。

[2] 浅沼稻次郎（1898—1960），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社会活动家，为促进中日友好和两国关系正常化作出过贡献，1960年10月被日本右翼分子刺杀。

[3] “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4] 岸信介，当时任日本内阁首相。

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是提的政治口号，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并且，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斗争，如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六一五”惨案[1]发生的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抗议大会，率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牺牲者是东京大学学生，叫桦美智子，现在全世界闻名。她父亲叫桦俊雄，是中央大学教授，专攻法律。好像有好几千名教授都组织起来了，妇女也赶上去了，还有和尚等宗教界人士也出来了，工人、学生是主力。明天还要有更大规模的罢工。

日本有美国的军事基地，过去人们对它没有办法，既苦恼，又不能去打它。现在你们日本人民想出来一个好办法，就是进行全民性的群众斗争，除了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以外，其他所有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代理人进行斗争。中国过去基本上也是用这种办法。中国曾经还有武装斗争，但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并没有武装斗争，是反对巴黎和会的条约[2]，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事，当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两年后，一九二一年共产

---

[1] “六一五”惨案，是日本岸信介政府镇压示威群众的暴力事件。1960年6月15日，东京各界人士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国会批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日本。示威群众在游行中遭到武装警察的镇压和日本右翼团体的袭击，东京大学桦美智子等两名学生被打死，近300名群众被打伤。这次示威游行迫使艾森豪威尔原定6月19日访日无限期推迟。

[2]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共27个国家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称“巴黎和会”。和会名义上是为拟订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进行分赃，重新瓜分世界。会议签订了《凡尔赛和约》，通过了《国联盟约》。因和会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让日本继承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人民掀起五四爱国运动，迫使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党才诞生，开始人数很少，只有几十个人。一九二六年有北伐战争，那时和国民党合作，这段历史你们都很清楚。一九二七年北伐到长江一带，蒋介石反共，逼着我们打内战。我们因为党内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1]，没有准备而突然遭受袭击。中国地方大，打了十年内战。以后同日本军阀打仗，又和蒋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讲过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谢”日本“皇军”。但是日本现在没有负担了，因为日本没有殖民地，相反地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从有外国的军事基地一点来说是殖民地，但是还有个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被美国支配着，从这个意义来说，又是一个半殖民地。日本现在不欠谁的账了，相反地外国欠日本的账。这个外国就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法国。所以日本人民现在愤怒起来了。我同许多日本朋友谈过，我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家统治。现在谁

---

[1]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最初6年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在教育你们日本人民？是美帝国主义做你们的反面教员，同时它也做我们的反面教员。一九四五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日本没有关系。欺侮中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所以我们的仇恨目标转移了，不是日本而是转到美帝国主义身上了。相反地，我们中日两大民族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此必要，因为都受美帝国主义压迫，有共同立场。现在压迫中日两国人民的是美国。除了美国以外还有谁呢？是英国、法国吗？英国、法国过去在中国有势力范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没有了，美国就代替了英国、法国。

你们被压迫的历史不长，我们很长，有一百多年。但是你们的工业、经济、文化比我们中国发达。我们是落后国家，现在你们还可以看到落后的遗迹。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按人口比例比你们少。

你们在座的都比我年轻。世界上大多数事情，都是年轻的、比较不出名的、地位比较低的、财富比较少的人做出来的。比如，英国发明蒸汽机的瓦特就是工人出身。你们总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九五八年，我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上曾经谈过这件事。后来对全世界近三百年来搞发明创造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作过调查，整理出来的结果表明，这些人百分之七十都是不出名的、年轻的、地位比较低的、比较穷的。不知你们日本情况如何？难道好事情都是老头子、当大官的做的吗？我就不相信。包围哈格蒂[2]、赶走艾森豪威尔的就是那些年轻人，“六一五”惨案牺牲者桦美智子也是年轻

---

[1] 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

[2] 哈格蒂，当时任美国总统新闻秘书，1960年6月10日作为艾森豪威尔日本之行的先行官抵达东京机场时，遭到日本反美群众2.5万人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围困。

人。我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过，你们代表团的年轻成员竹内实写的一篇短文章[1]，写得很好。

我们总是同你们在一道的，总是同要求独立、民主、自由的日本人民在一道的，却同岸信介不是在一道。

世界上的事情在变化，变化得特别快。如四五年前我见过许多日本朋友，一提到美国的事情，他们都不开腔。我看那时日本朋友是在想问题，听我们说的话，他们不反对，愿意听下去，不替美国辩护。现在情况变化了，因为日本人民在日本各地行动起来了，比如写标语来反对“安全条约”，要求取消军事基地、撤回U-2型飞机，提出美国佬滚回去，甚至冲绳人民起来当面质问美国人：“你们究竟还要占领多久?”日本的各阶层人民都行动起来了，这有几百万人，是四五年前所不能设想的。我看日本的独立和自由是很有希望的。把美国军事基地取消，“安全条约”取消，日本的独立与和平是有保证的，亚洲的和平也有保证。祝贺你们取得的胜利。

胜利是逐步得来的，群众的觉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自己也是如此，在中学读书时并不知道马列主义。我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2]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过康德[3]的哲

---

[1] 指日本学者竹内实1960年6月17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愿中日两国青年的斗争友谊永远发展》一文。

[2] 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3]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人，近代西方哲学史上二元论、先验论和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等。

学。后来是客观环境逼得我同周围的人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研究马列主义。周恩来总理也是这样。我当时一则没有钱进大学，二则也读不下去了。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我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那时一心想当教员，并没有想当共产党员。后来反对军阀，受到《新青年》[1]的影响。《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后来教员当不下去了，逼得我搞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那时开始有共产党，这是一九一九、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事情。周总理在南开学校毕业后，跑到日本住了一年半，回来搞五四运动，军阀抓他，又跑到法国去搞勤工俭学，开始给《益世报》[2]写稿子，以后又搞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又有很多人跑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3]念书。

中国革命是经过很多曲折道路才成功的。一八四〇年发生鸦片战争。一八五一年到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经过十三年失败了。一八九八年康有为、梁启超参加的戊戌变法也失败了[4]。以后有许多

---

[1] 《新青年》，五四时期著名的刊物，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

[2] 《益世报》，是在中国的罗马公教（天主教）教会出版的报纸，1915年在天津创刊，1949年1月天津解放时停刊。周恩来曾为《益世报》撰写《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等文章。

[3] 中山大学，即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1925年创办于莫斯科，1929年改称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秋停办。

[4]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1898年（戊戌年）康有为、梁启超同谭嗣同等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维新，发动政变，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变法遭到失败。

人跑到日本，约一两万人。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袁世凯[2]要做皇帝。接着军阀混战。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三年二七大罢工。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一九二六年北伐。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我们转到地下，开始打游击。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打了二十二年仗，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战争时，斗争的目标改变了，过去是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变成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到一九四九年告一段落。新中国成立到去年是十年。这十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事情。这十年里有些成绩，但终究是时间短，成绩并不多。

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大都是亲身经过的历史，说明中国人民是

---

[1] 同盟会，指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兴中会与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成员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采用了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纲。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在他的领导下，同盟会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并联合会党、新军发动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辛亥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的全国性革命运动。在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同盟会于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2] 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清朝末年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职，成为北洋军阀首领。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出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1914年5月他宣布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实行独裁专制。1915年5月接受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12月称帝，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逐步觉悟起来的，我们这一辈人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相信，你们也会逐步觉悟起来。方才我说过，有些日本人四五年前不敢讲美帝国主义，但是去年浅沼访华时敢于发表演讲，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过了一年，日本人民就掀起了这样大规模的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应该说进步很快，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你们会比我们搞得快。我们搞了一百多年，从一八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共计是一百零九年。现在“安全条约”还没有反掉，反掉的是艾森豪威尔访日。“安全条约”现在还存在，但是会反掉的，可能还要有一段时间，也不好说是哪年哪月可以反掉，但总会反掉的。当然我并不是主张你们同美国开仗，可以不采取打仗的办法达到目的。这在别的地方现在还没有先例，也许你们会创造先例。

采取打仗或不打仗的办法达到独立的目的，过去先例也有。一百八十多年前，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华盛顿把英国赶走了，他是采取战争的办法。印度独立并没有打仗，英国人允许了印度独立。你们可以找到适当的办法，看来你们已经找到了办法，就是现在这个办法，成立一个“阻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包括一百多个团体，采取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方式。我们中国过去没有采取像你们这样的办法。

你们当中过去没有来过中国的可能对中国不熟悉，呆下去就熟悉了，你们会知道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

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学习，学习彼此的长处。

关于通知吴启瑞[1]来上海给陈丕显[2]的信

（1960年6月22日）

丕显同志：

再烦你一事。如有可能，请通知吴启瑞，到此一行，明、后两天内能到即可。只说你要见她。到时，请予以招待，我拟询问她一些事。

毛泽东

六月廿二日

---

[1] 吴启瑞，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长期在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因子女入学问题同毛泽东有过书信来往。

[2] 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对《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社论稿的修改[1]

（1960年6月29日）

一

帝国主义好战集团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在全世界上只是一小撮人。各国的工人、农民、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和平人士，都是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受害者，他们都站在或者可以站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方面来，他们占全人类的绝大多数。革命人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家看，斗争的结果，是落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的手里呢？还是落到不到百分之十的帝国主义及各国反动派的手里呢？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

二

只有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消灭了阶级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

[1] 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这篇《人民日报》社论于1960年6月29日发表。

对蒙哥马利[1]在德拉鲁公司宴会上的讲话摘要[2]的批语

（1960年6月）

江青阅。

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

---

[1] 蒙哥马利，原英国陆军元帅，当时已退休。

[2] 外交部办公厅1960年6月24日印发的这一材料说，蒙哥马利6月9日晚在德拉鲁公司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如下：1. 他在中国期间，看到了几千年延续下来的中国文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只有向前推进，并未受到损害。革命对中国是有益的，贪污、腐化、地痞、流氓和洋鬼子都被赶走了。当然也流过血，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但看来不流血也没有办法。2. 他曾同毛泽东讲过，革命使许多人掉了脑袋，固然不能算是件好事，但也不完全是坏事。为此，毛泽东称他是一位英国的开明元帅。3. 他所见到的中国领袖都是有学问的，并且是很有智慧的。西方所说的中国领袖对世界了解很少，是不正确的。他介绍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去读毛泽东有关战争的著作。4. 他在访问了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后，得出两个结论，一是西方国家既然无办法消灭共产主义，那么就必须找出办法同共产主义共存；二是在共存的同时，西方国家必须尽一切努力来保存自己的基督教文明基础，并把它发扬光大。

印发十六件关于目前形势的报道的批语

（1960年7月5日）

尚昆[1]同志：

这一批文件有趣，共十六件[2]，请**印成一本**（immediately[3]），发给各同志[4]为盼。

毛泽东

七月五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这十六件文件，包括：中国驻丹麦大使馆1960年7月1日关于丹共主席耶斯佩森谈访华感想给中联部并外交部的电报，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6月30日关于波兰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访谈话给外交部并中联部的电报，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6月29日关于匈内参刊登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招待会上的讲话给中联部、外交部的电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7月1日关于苏报及苏领导人继续大力宣传其对和平共处等问题的论点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6月29日关于苏报只字未提我《人民日报》29日评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社论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国驻加纳大使柯华7月2日关于加总统恩克鲁玛今日接见情况给外交部的电报等。毛泽东在批示印发时，将这些材料拟题为《十六件关于目前形势的报道》。

[3] 立即的意思。

[4]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0年7月10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鲁·曾德同志：

当蒙古人民革命胜利三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的祝贺。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农牧业合作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制定的以自力更生为主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鼓舞下，正满腔热情地为提前完成三年计划而奋斗。同时，蒙古人民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蒙古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和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一年来，中蒙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重大发展。不久前，以蒙古人民共和国上届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巴·贾尔卡赛汗同志为首的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代表团访问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访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蒙古期间，中蒙两国签订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经济技术援助协定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对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两国兄弟般的友谊和全面合作、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共同高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祝蒙古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蒙两国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日

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

（1960年7月18日）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四五年，苏联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这个道路。

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条。

要下定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2]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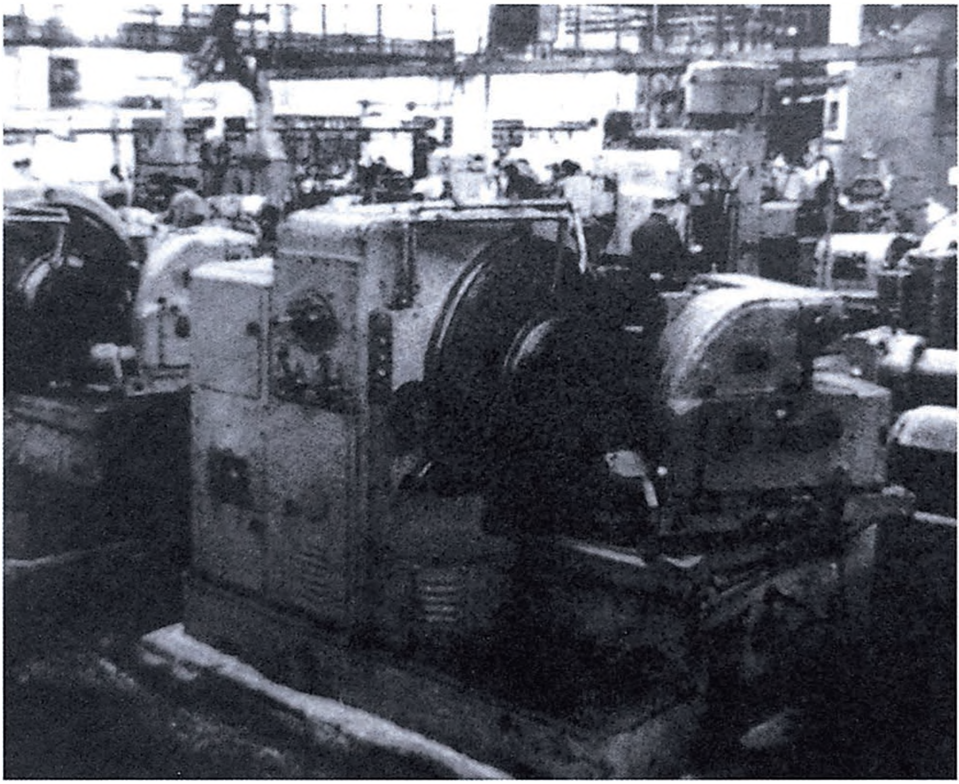
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满意，满意的只是社干部。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回去就照着这个意见做，不要忘记，不要面从心违。在自留地问题上〔按照〕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国际问题。



1960年，北戴河会议期间，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苏联专家，撕毁合同。图为因苏联专家撤走而停产的工厂。

苏联违反合同的行为打乱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尽管如此，毛泽东决定对给中国以帮助的苏联专家以礼相送。图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在送别苏联专家的宴会上同专家们交谈。

在《宣教动态》第五十期上的批语

（1960年7月18日）

尚昆[1]同志：

这一本[2]，条条都可看，都应看。值得深思。请印发各同志[3]。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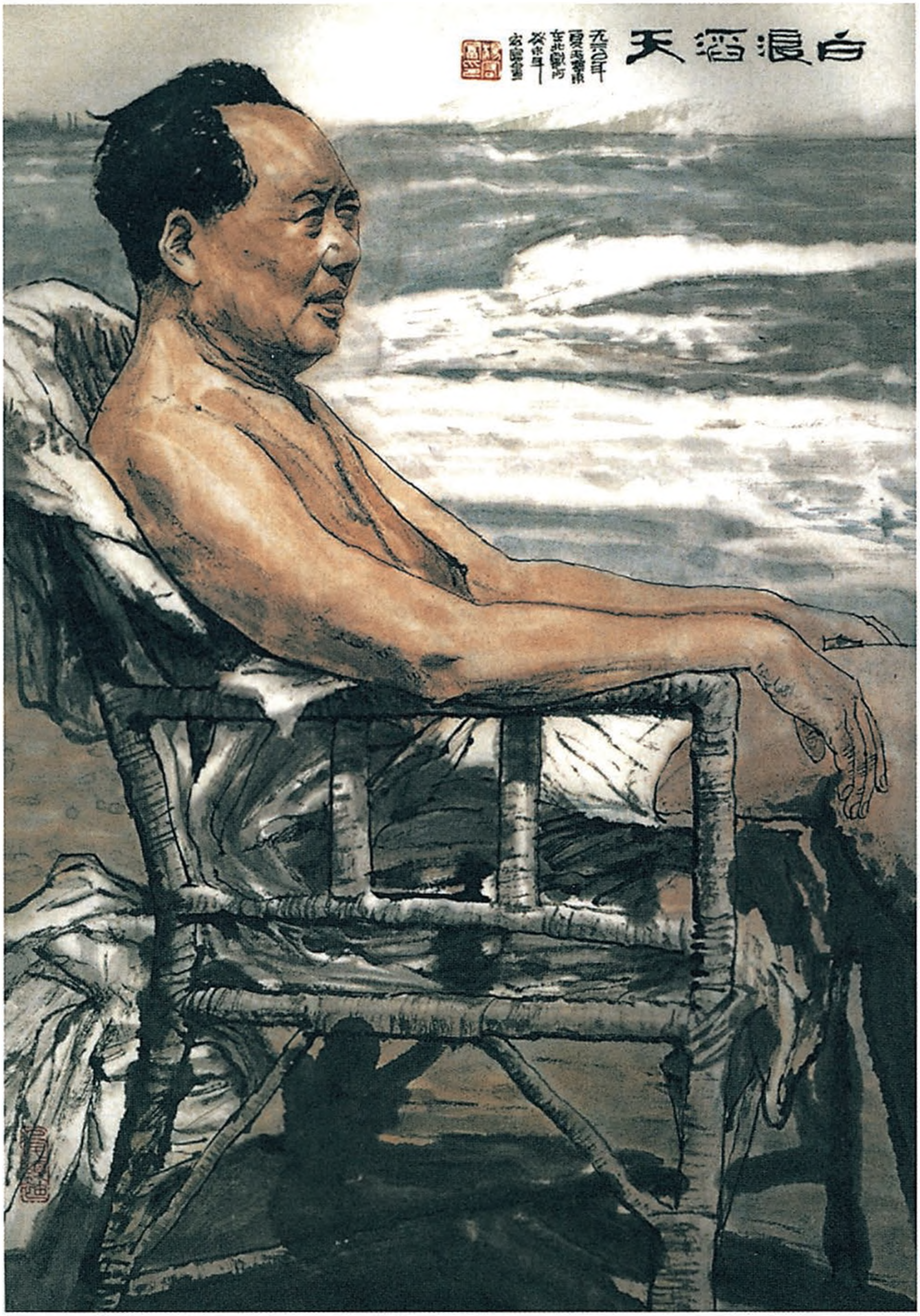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60年7月15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五十期（总第六五四期）。这一期共刊载了9篇文章，内容包括：捷共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持的观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德语专家擅自改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广播摘要，凡尖锐地论述战争和暴力问题的句段多被改动，尖锐抨击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地方被整段整句地删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意大利专家不同意播送《人民日报》评论《声援意大利人民的斗争》，认为意大利并不存在《人民日报》7月8日的这一评论中所说的“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和“意大利统治集团正企图走墨索里尼的老路”的情况；瑞典一听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信，问：为什么赫鲁晓夫不顾列宁讲的话呢？是否他要离开列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北京电台对这个问题怎样看？等等。

[3]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1960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小憩。

1960年7月，毛泽东和女儿李讷在北戴河海滨。


白浪滔天
五六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
癸未年

《白浪滔天》（中国画）

对周扬[1]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1960年7月19日）

一

周扬同志：

文件[2]看过，写得很好。驳人性论及继承遗产这两部分特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旺。前两部分和后一部分较弱，能改写一次，使与中间两部分相称，也是势如破竹，神气活现，那就更好。只有几天时间了，是否改得来？有一个办法，会期推到廿五日[3]，如何？请酌定。今日下午我想和我〈你〉谈一次。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上午四时

---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 指周扬准备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1960年7月18日修改稿），题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3]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按原定计划于1960年7月22日在北京开幕。

另，有一些小的地方，我给你作了一点修改[1]。

二

对我的诗词那一段颂扬[2]，不适当，请删掉。

---

[1] 毛泽东对周扬的报告稿所作的修改，除本篇三、四中宋体字部分外，还有以下几处：第1页，将中国人民“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个战线上创造着历史的奇迹”改为“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个战线上创造着伟大的成绩”，将“社会主义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跃进”改为“社会主义建设以高速度持续跃进”，将“中国人民正在迅速改变着自己国家的贫弱落后的面貌”改为“中国人民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变着自己国家的贫弱落后的面貌”；第13页，将“彻底打破对于文艺的垄断，使文艺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接受和运用”改为“彻底打破少数人对于文艺的垄断，使文艺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接受和运用”；第51页，将“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改为“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

[2] 周扬报告稿的第三部分中讲道：“作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在文学艺术创作上开辟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新的境界。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领袖，同时又是最伟大的诗人。他的诗篇深刻地刻画了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的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他的诗词是革命史诗和革命抒情诗的完美结合。磅礴的诗才和雄伟的革命气魄，浑然一体。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和乐观精神在他的诗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晶为最新最美的艺术形象。诗与人合而为一，毛泽东同志的诗词，是他的伟大人格的体现。”周扬的报告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这段话。

三

我国人民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是以客观上许可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准备条件在将来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四

我们应当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和全世界一切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家，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艺家，紧紧地团结起来，结成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反动同盟军的革命的文艺统一战线。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刘少奇在周扬陪同下接见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代表。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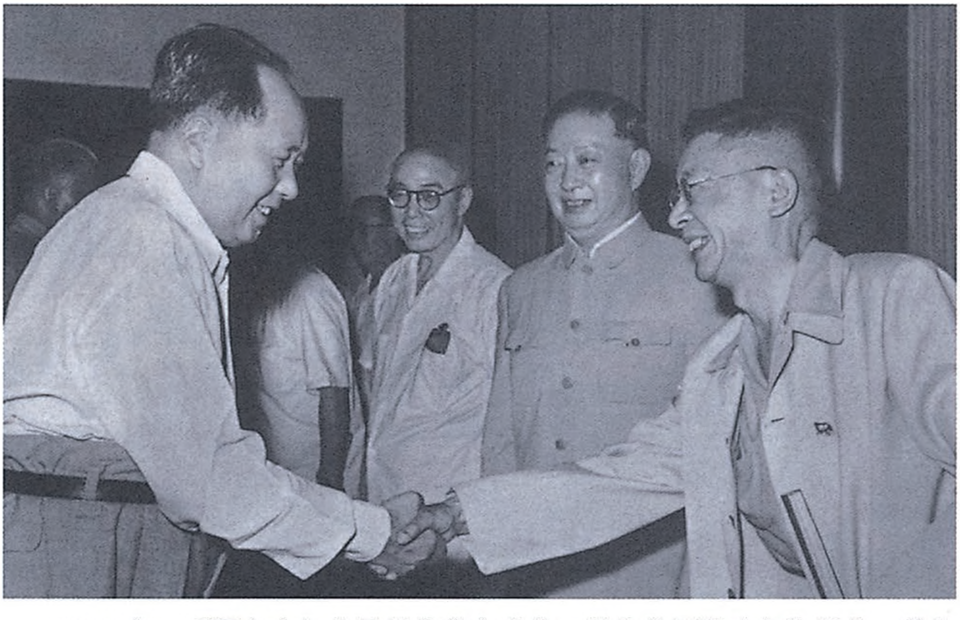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会见第三次文代会代表。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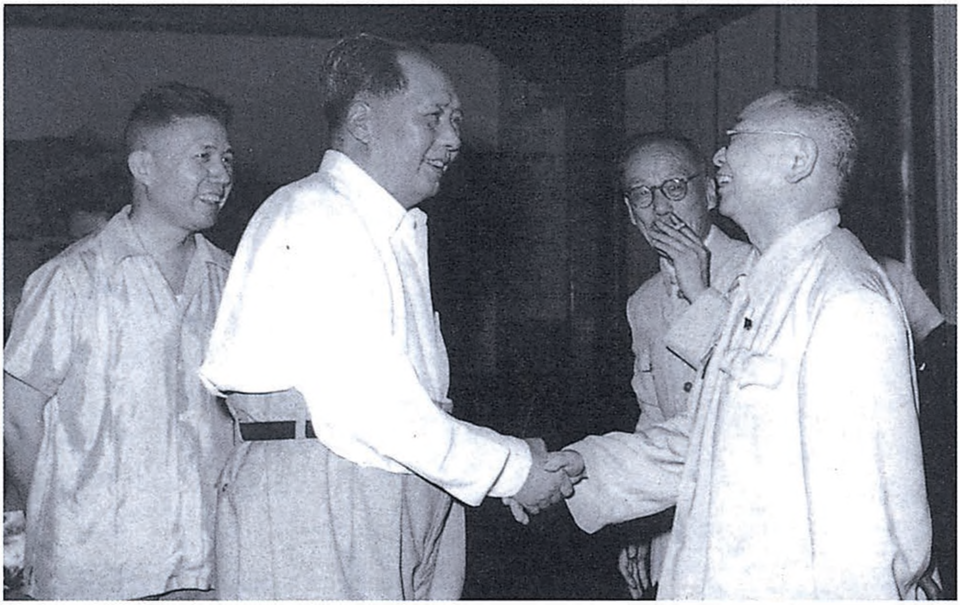
1960年7月23日，毛泽东亲切接见出席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代表。

1960年7月24日，毛泽东接见新闻摄影家石少华。

1960年7月，毛泽东和119岁的民间老艺人王维林亲切握手。



1960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作家老舍、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著名剧作家田汉。



1960年，毛泽东和戏剧家欧阳予倩交谈。

1960年，毛泽东和作家巴金（右一）、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右二）等握手。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0年7月21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值此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六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六年来，勤劳智慧的波兰人民在光荣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波兰已经成为拥有先进工业的社会主义的工农业国家。目前，波兰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而奋斗。

波兰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坚强的成员。人民的波兰在巩固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方面，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方面，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波兰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

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是牢不可破的。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正在不断发展，我们两国的互助合作关系有了多方面的发展。我们深信，我们两国日益发展的友谊和合作不仅符合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将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

祝波兰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7月21日

在《内部参考》增刊第三十期上的批语

（1960年7月31日）

尚昆[1]：

发一通知，要所有各同志[2]，将《内部参考》增刊第30期10篇文章[3]，全部精读一遍，对其中几篇最重要的，要读两遍。然后，各小组认真讨论一天。讨论时中央各部长都参加。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此件今日还我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 新华通讯社1960年7月28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增刊）第三十期上刊载了10篇文章。第一篇题为《〈新闻纪事报〉宣传赫鲁晓夫是“姑息分子”》。这篇新华社7月21日发自伦敦的电讯稿说，本日《新闻纪事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把赫鲁晓夫比作张伯伦，把艾森豪威尔比作希特勒，说就

像当年希特勒使张伯伦丢尽了面子一样，最近美国的U－2飞机事件，艾森豪威尔也使赫鲁晓夫丢尽了面子，尽管赫鲁晓夫采取了退出裁军会议的行动，但他实际上像张伯伦一样是个“姑息分子”，因为他仍然发誓要“和平共处”。第二篇题为《法〈快报〉说国际事态发展表明中国的分析正确》。这篇新华社7月15日发自巴黎的电讯稿说，法国《快报》周刊以《中国年》为题发表评论，说首脑会议的流产以及古巴、刚果等事件的发展表明，中国1960年对国际事态发展的分析和预见比苏联要高明和正确，中国所坚持的态度最后自然而然得胜。西方的连锁反应完全符合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机会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的那些分析。第三篇题为《合众国际社报道乌布利希在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讲话》。这篇合众国际社7月26日发自柏林的电讯稿说，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某些教条主义”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目前爱好和平的国家比帝国主义者强大。第四篇题为《〈法兰西观察家〉宣传赫鲁晓夫是“改良主义者”》。这篇《内部参考》本刊讯说，巴黎《法兰西观察家》6月23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认为赫鲁晓夫是改良主义者，他指望依靠社会主义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来逐渐削弱资本主义；毛泽东则是革命者，他不相信资本主义会不经过斗争而失败。第五篇题为《〈印度快报〉妄谈印共领导对当前国际局势持有不同看法》。这篇新华社7月25日发自新德里的电讯稿说，《印度快报》今天发表署名文章，说印共党内对世界共产主义政策的思想分歧已经公开化，以兰那地夫为领导的第一集团支持中国的立场；以高士和丹吉为领导的第二集团在党的高级委员会中占多数，他们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支持赫鲁晓夫；以南布迪里巴德为领导的第三集团目前还没有参加这次思想论争。第六篇题为《南越电台评赫鲁晓夫在罗工人党三大讲话》。这篇新华社发自河内的航讯说，南越《共和国电台》7月14日发表评论，认为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三大上的讲话同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讲话一样重要，其主要之点是认为列宁的理论“不能运用于当前许多场合”，并不止一次地“间接指责毛泽东的统治路线”。评论最后说：“我们先不要乐观地认为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相反，必须提高警惕。”第七篇题为《佐尔扎评〈真理报〉刊载苏斯洛夫讲话》。这篇新华社7月21日发自伦敦的电讯稿说，《卫报》今日刊载了佐尔扎的一篇文章，认为《真理报》发表苏斯洛夫的一篇讲

话，恢复了赫鲁晓夫长期来没有提到的关于战争危险的公式，表明在苏联领导中存在“新的斯大林分子集团”。第八篇题为《泰国报纸评中苏关系》。这篇新华社发自香港的航讯说，泰国《暹罗群众报》7月3日发表社论，其中讲道：“赫鲁晓夫有一个不幸，就是他有心腹之患，有为数不少的苏联军官反而支持毛泽东的见解。因此，赫鲁晓夫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国内政治，以免步马林科夫或布尔加宁的后尘。”第九篇题为《伊〈国家报〉宣传中苏“没有分歧”》。这篇新华社7月5日发自巴格达的电讯稿说，伊拉克《国家报》的一篇评论认为，帝国主义报纸关于中苏对战争和和平共处问题的态度的报道“同事实完全相反”，中国所有的报纸和它的政治家过去和现在仍然“完全同意”和平共处政策。第十篇题为《摩〈独立〉周刊评罗共三大》。这篇《内部参考》本刊讯说，摩洛哥《独立》周刊6月25日发表一篇文章，说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早已存在观点上的分歧，这些分歧已经产生愈来愈坏的后果。但在罗共三大上，赫鲁晓夫的目标完全同中国一致：主张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在关于辩论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两份材料[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湖北三个学校的党员辩论现代修正主义问题，正确者多，错误者少。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0年7月13日报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并转毛泽东审阅的两份材料。第一份材料是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部分师生和参加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的人们，对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和《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莫斯科宣言》的反映和意见。不少人认为，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过分地强调了“和平过渡”和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把争取和平作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首要任务提出来，而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没有表示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就违背了《莫斯科宣言》的精神。《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莫斯科宣言》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表明我们是在高举马列主义的革命旗帜。认为《莫斯科宣言》也有一些不完整、不明确甚至不妥当之处，与《莫斯科宣言》同时通过的《和平宣言》，有点和平主义的味道，《莫斯科宣言》体现的毛泽东思想较多一些，而《和平宣言》则更多地反映了赫鲁晓夫的观点，这说明在那个时候就有斗争。布加勒斯特会议公报也反映了这种斗争，并且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思想越来越发展了，这种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明朗化。第二份材料是关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党支部学习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3篇文章的情况。该支部共有党员37人，其中态

度明确、识别力较强的有21人，他们一致认为赫鲁晓夫有严重的修正主义观点，并列举了其在对待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对战争和裁军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对此，有的人表示了深切的忧虑，认为这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利，指出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我党当前最大的任务。在讨论中，未表示明确态度的有10人，而认为赫鲁晓夫的观点正确的有6人。可见，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没有市场的。

在苏联《政治自学》杂志发表有关国际问题文章的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越右倾，越把自己暴露在人民面前，不像样子。

---

[1]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60年7月16日给外交部的这一电报反映，苏联《政治自学》杂志第七期发表了该杂志编委维什让科夫、弗朗采夫等人所写的4篇关于国际问题的辩解性文章，说苏联的观点是“创造性地列宁式地对待革命理论的典范”。文章一面表示承认“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在我们时代保持其全部有效性”，一面断言“凡称自己为辩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凡采取创造性的马列主义立场的人，应该不仅看到现代帝国主义的量的变化，而且应该看到现代帝国主义和国际局势的深刻的质的变化，以免不加思考地重复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前，帝国主义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坚持认为现代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内存在明智派，可以孤立反动势力，并把他们“从政治舞台上排除出去”。电报说，该杂志是政治理论教育的普及刊物，在这一期发表大量国际问题的文章，是一个新的现象，表明苏联正在对国内广大人民进一步灌输其右倾观点。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关于近两日苏联对古巴、刚果局势态度的电报上的批语[1]

（1960年7月）

印发[2]。

狐狸尾巴，经常出现。色厉内荏，心绪不宁。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60年7月16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上。电报中说，继7月15日赫鲁晓夫复电刚果（利）领导人和莫斯科举行支持古巴的群众集会之后，今天赫鲁晓夫又致电刚果总理卢蒙巴，宣布支援刚果1万吨食品；同时塔斯社也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对美国干涉古巴不能置之不理；两日来苏联报刊也发表了一些苏联人民支持古巴和刚果人民斗争的言论，但规模不大。对苏联的这些做法，我们有以下看法：（一）由于帝国主义新的挑衅再一次证明了苏联对现代帝国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使苏联表现了一定的忙乱、急躁和矛盾的情绪，前后态度不尽一致，急于稳定局势。（二）苏联迫于形势，期望通过这些措施表明自己是支持殖民地国家的，以便掌握反殖民主义的旗帜。（三）当敌人进一步挑衅时，苏联不得不做出上述强硬的姿态，但其底牌还是想通过联合国求得某种妥协，避免事态扩大。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1960年7月，毛泽东会见智利青年代表团。

1960年7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智利著名和平友好人士、画家何塞·万徒勒里及其夫人。

在阿尔巴尼亚驻罗大使谈话摘要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好朋友，一个也就够了，何况还有十个，或者几十个！全世界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群众，是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或者可能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是不是呢？

---

[1] 指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1960年7月15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中说，阿尔巴尼亚驻罗马尼亚大使最近说，阿几百年来受外国侵略，从未屈服过，解放以后更加勇气百倍，因为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携手斗争。阿尔巴尼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很清楚地认识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社会主义阵营有足够的力量来反对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还是强大的，它还是有可能制造灾难，冒险发动战争，危险还是存在，而且是很大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美帝向四处伸手，结果是把绞索套在脖子上，最后一定被勒死。

对《美军重视研究现代战争中“人的因素”》一文的批语[1]

（1960年7月）

此篇印发[2]。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60年7月2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五十四期上刊载的这篇文章说，美军鉴于侵朝战争中士气严重不振的失败教训，以及美国青少年的意志和体质日渐减弱，近几年来他们不断强调“人的因素”，强调人的作用的言论有显著增加。美军对现代战争中“人的因素”的研究，有一套庞大的机构，并且同一些大学、研究所互相联系、配合。此外，美军还着重研究战俘问题、诱骗官兵以军队为职业的问题和消除对核子战争的恐惧问题，并认为必须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加强官兵和青年的“反共爱国教育”。二、提高军人的待遇。三、加强“核子信心教育”。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可否将中苏分歧向使馆干部传达的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坚决把列宁打倒。打得倒吗？笑话而已。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

[1] 中国驻南斯拉夫代办周秋野1960年7月17日给外交部的这一请示电报说，自布加勒斯特会议到这次苏共中央全会，以苏共为首的欧洲若干共产党和工人党已公开将斗争矛头转向我国，不分敌我，不照顾团结。苏联《真理报》不仅对我国的消息一点都不报道，连“中国”这两个字也都抹掉了。看来，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这些人，也想把列宁一起打倒。为保卫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一场公开的尖锐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南斯拉夫已看到这一形势，自6月下旬以来，基本停止了对我国的公开攻击，似有跳出这一圈子，站到一旁不和我直接交锋的样子。最近南报刊不断发表苏共等同我国的重大原则分歧的报道，我馆干部几乎天天接触到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此，感到对此问题有必要向我馆干部适当交代。可否交代及如何交代，特电请示。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关于最近苏联对中国大使馆的态度变化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态度有变化，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

---

[1]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60年7月18日给外交部苏欧司并报刘晓大使的电报说，自我国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3篇文章发表后，许多迹象表明苏联在政治上对我冷淡，在经济合作特别是在重要关键项目的合作和援助上，逐步采取措施对我施加压力。（一）对外交涉和政治关系方面：苏领导人、外交部正副部长没有一次主动单独找刘大使交谈和介绍情况，苏外交部远东司正副司长也极少主动约见我馆参赞；我使馆代办两次约见苏外交部副部长都被推托不见；重要外交文件迟迟不送我馆，正常交涉事务也一拖再拖，我方去年提出聘请原子能方面的苏联专家，历时数月，几经催促，尚无答复。（二）对外交际活动方面：对我馆举行的招待会故示冷淡；对我馆组织的参观不介绍情况，不让看有价值的东西；对我馆邀请看电影也不热情。（三）对外宣传方面：对我馆发出的公报和宣传材料，苏方无任何反应；苏报刊对我供应的稿件一般都不采用，报道有关我国的消息也极少。（四）在使馆各专业单位的业务工作方面：困难、限制和争论增加，许多协议拖延不执行；好几个国防尖端项目拖了一年多没有下文；对高、大、精、尖和机密项目控制愈来愈紧；对外事务联系管理更加集中，交涉谈判中困难增加；较机密的学术会议不再邀请中方人员参加。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一份关于捷共学生党员与中国留学生谈话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结论下早了。最早笑人的人是不妙的。我们的方针是：不怕孤立，后发制人。

---

[1] 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1960年7月18日给外交部并中联部的这一报告内容如下：（一）从我留学生听到的某些反映来看，捷共已在党员中进行了有关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的传达和对我国的所谓“批判”。7月13日，布尔诺军事学院3名学生党员曾向我在该院学习的留学生说：最近有位中央委员向我们作了传达，说你们纪念列宁的3篇文章中有许多反面的、消极的观点，主要在和平与战争问题上，你们不要和平共处。在布加勒斯特开会时，你们是孤立的，拒绝在公报上签字，4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批评了你们。你们为什么主张解决世界问题总是要用战争？还说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右倾机会主义指南斯拉夫，“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指你们中国。中国留学生当即回答说，我看结论下早了一点，还要让历史来证明谁对谁错。（二）从最近一些外事活动接触的情况来看，捷官方人士向我有意挑起争论的情况尚未发生，但在一些谈话中却使我们感到他们在暗示说：中国今天在“破坏”团结。这些情况表明，他们在内部传达中对我们作了各种歪曲，甚至是污蔑，同时又以闹不团结的大帽子对我们施加压力。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一份关于萨瓦茨基提到加强与中国友谊的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一个变化，在波兰可能发生。

---

[1] 中国驻波兰大使馆1960年7月18日给外交部并中联部的这一报告说，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在格隆瓦尔德战役5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到要加强与中国的友谊。萨瓦茨基说："我们将愈来愈紧密地团结在'人民团结阵线'内加强经济和国防力量，加强我们与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友谊。"这是继哥穆尔卡五一节讲话后波兰领导人再次将苏联与中国并提，并强调加强与中国的友谊。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一份关于日夫科夫正在撰文批评中共“教条主义”的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教条主义”越多，事情就越好办。“教条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

[1]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1960年7月19日给外交部的这一电报说，据可靠消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正在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一篇关于反对所谓教条主义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批评了中国党。另据在索非亚大学学习的一名苏联研究生说，赫鲁晓夫在苏联还有威信，在国内政策方面贯彻执行得很有效果，目前不会下台。赫鲁晓夫和日夫科夫目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矛头主要指向毛泽东。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第一坦克学校部分学员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材料[1]的批注

（1960年7月）

印发[2]。

注：着重看第一坦克学校三派人争论，大有兴趣。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学校工作处1960年7月7日整理的《第一坦克学校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三派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争论》材料。材料中说，第一坦克学校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军事队）部分学员从报纸上看到苏联关于裁军的建议及赫鲁晓夫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摘要后，议论纷纷。政治教员结合“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教学，引导大家围绕“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来看待战争与和平问题”展开辩论。辩论中形成了三派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1）现在摆在全人类面前的有两条道路，一是和平共处，一是核战争，谁也不愿意走后一条路，因此普遍裁军一旦实现，就能消除战争危险，实现永久和平；（2）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原理是相对真理，不是绝对真理，现在时代变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3）和平共处是我们的目的，可以通过和平共处挤垮资本主义，只要实现裁军，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就可以通过议会、谈判，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种意见认为：（1）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原理没有过时，帝国主义侵略本性至死不变；（2）和平共处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斗争手段，希望通过和平共处挤垮资本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有加强自己的国防和世界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并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才能

保卫世界和平；(3) 爆发战争和制止战争，并不取决于核武器，对战争胜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原子弹而是人，是政治。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前面两种看法都有道理。据了解，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占全部人数的31.6%，其主要代表人物没有经过战争锻炼，害怕打仗，不爱学习政治，贪图个人安逸，因此容易和某些修正主义观点发生共鸣。其他跟着跑的人主要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缺乏，对核战争有些胆虚，平时不大看报，害怕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会有碍中苏团结。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占全队的50.6%，他们中间3/4的人是工农出身，3/5的人打过仗，在和平环境中没有忘记阶级斗争；平时关心时事，经常看报，重视政治学习，又听教员说现代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脑子里有所警惕，增强了抗毒能力。持第三种意见也即中间派的人占17.7%，他们中间有的人是因为文化理论水平低，缺乏鉴别能力；有的人是觉得牵涉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暂不表态；有的人则是在等待领导出来讲话后再发表意见。经过反复辩论、阅读文件和进行教育之后，三派人逐渐起了变化，持第二种意见的人更加理直气壮了，吸引其余两派人向他们靠拢。但许多人由于理论水平有限，对错误批判不力。因此，深入系统地进行一次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教育和学习，是十分必要的。1960年7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将这一材料和《政治学院部分学员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反映》材料一起报送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毛泽东的批注就写在总政的报告上。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一份关于西德扩军备战的材料[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西德的扩军备战，值得一读。

---

[1] 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1960年7月17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目前西德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动向是加紧扩军备战，加速实现原子武装。对内大肆宣传民族复仇主义，对外加紧同美帝勾结。（二）扩军备战是当前西德一切外交活动的中心内容。（三）在内政方面，加强扩军备战的法律根据。（四）西德加速重新武装，增加了西欧国家的不安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特别是英德矛盾和英法矛盾。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一位保共党员对中共看法的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

[1] 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1960年7月23日给外交部的这一电报说，保祖国阵线报告员组干部绍代夫昨天来我馆索取《人民日报》社论《高举莫斯科宣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时，对我馆人员谈了以下看法：（一）《列宁主义万岁》一文中中国党的态度是那样明确、坚定和正确，而保共的态度就不明朗，应向中共学习。（二）中国党和毛泽东同志是制定目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方针政策的机关和人，我们非常重视中国党提出的看法和态度。（三）有些人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还认识不清，他们将来会认识到的，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我和一些同志很同意中国的看法，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我们天天讲和平共处，使人们失去警惕性，这很危险。（四）保加利亚人，特别是农村的人，对中国人民公社都很感兴趣。我了解它的性质，其中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五）希望中国使馆能更多地经常地提供一些材料，多介绍有关中国的东西。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印发《中国年》一文的批语[1]

（1960年7月）

印发[2]。

《中国年》这篇短文，值得一看。

请尚昆[3]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瑞士大使馆1960年7月22日给外交部的电报上。电报说，7月14日，法国《快报》周刊发表该刊社长塞尔万·史莱伯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年》的社论，指出巴黎四国首脑会议以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谈判这两件事情的破产，显示出中国对1960年世界事态的分析比苏联高明，每次都是中国所采取的态度占了上风。1960年前半年总的情况，就是事态同中国分析的一致和赫鲁晓夫因此站到北京的理论上来。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一位捷共工人党员谈话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60年7月）

印发[2]。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

[1] 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1960年7月24日给外交部的这一电报说，7月22日夜，在我参加捷国际电影节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捷列宁工厂一工人党员主动找八一制片厂厂长陈播交谈。他谈到：（一）继列宁之后，毛泽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理论家，他的思想同列宁的思想完全一致，他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人的范例。（二）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列主义，而捷共则运用不当，重犯苏联犯过的错误。（三）强调要维护哥特瓦尔德同志的事业。（四）对全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表示欢欣鼓舞，认为这种斗争能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五）期盼中国早日解放台湾。（六）称赞这次招待会没有请美国人的做法很好。

[2] 指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阿登纳[1]和戴高乐[2]会谈的三条消息[3]的批语

（1960年8月2日）

---

[1] 阿登纳，当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

[2]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3] 指新华通讯社1960年7月30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七四八期第17至22页上刊载的3条消息。第一条消息题为《阿登纳和戴高乐昨天上下午接连密谈》。其中法新社报道，阿登纳与戴高乐于7月29日在郎布依埃宫举行的秘密会谈“充满了信任和坦率”；德新社报道，这次会谈着重讨论刚果问题，戴高乐在会谈中表示支持西德对柏林问题的立场，即所谓“保持西柏林的自由”；合众国际社报道，西德有关人士认为会谈主要是“共同为西欧制定有远见的政策，旨在使它成为世界政治中的更有力的因素”；美联社报道，戴高乐将提出建立“欧洲联邦计划”。第二条消息题为《法报评法—西德会谈》。其中《解放报》认为，两国会谈是“不祥之兆”，阿登纳是想利用非洲殖民主义瓦解的机会把德国的利益打入非洲，并加强他用来破坏和平的“巴黎—波恩轴心”；《震旦报》鼓吹借机建立欧洲联邦；《战斗报》认为国际局势的发展可能迫使西欧加强团结和统一，现在该是建立欧洲共同阵线的时候了；《巴黎日报》说欧非关系将在会议中占显著地位，戴高乐将“说服阿登纳支持其在非洲的新民族主义”政策。第三条消息题为《路透社评阿—戴会谈》，说这次会谈的基本原因是由于不满意美国“对西方的领导中的弱点”，两位政治家将研究确保“小欧洲”国家之间外交政策方面进行有系统的和有组织的统一的办法。但西德政府官员对会谈可能产生的结果采取保留态度。

请各同志[1]注意看下面这些消息。世界局势将有变化。请你们看一下，想一下，议一下。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7页至二十二页

---

[1]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关于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问题的批语[1]

（1960年8月3日）

退罗瑞卿同志照办。[2]

毛泽东

八月三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1960年7月报告上写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的批语。

[2] 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关于在西沙群岛建立海军据点问题，1959年3月，中央和周恩来同志已有批示，即海军在北礁和宣德群岛定期巡逻成功后，可在永兴岛上建立海军据点。海军自1959年3月17日执行巡逻西沙任务以来，迄今已历时一年又四个多月，共巡逻20次。为加强海南岛和西沙群岛的防务，加速西沙地区的经济开发，我们认为目前在永兴岛进行海军据点的建设，是必要的和适当的。在建设步骤上拟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建设营房、仓库、码头、雷达站等工程；第二步，在有利时机视情况再正式成立海军巡防区。

关于请各省市区报告雨情的批语[1]

（1960 年 8 月 4 日）

印发各同志[2]。

请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同志，如河北一样，在三天内，查告分区分县雨情，各列一个表送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河北省1960年7月28日至8月3日雨情报表上。报表中详细列举了这几天内河北各县市的降雨情况。至8月2日，积水达311万亩，已排水200万亩，倒房10万间，砸死41人，死牲口91头。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金门蒋军向我炮击的处置意见的批语[1]

（1960年8月7日）

照办。[2]

毛泽东
八月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1960年8月5日报告的批语。

[2] 罗瑞卿的报告汇报了金门国民党军在一段时间内向我炮击的情况，并提出四点意见：（一）立即加强侦察措施，进一步查明敌人这一炮击的企图。（二）对敌人的零星炮击，我可暂不置理。（三）如敌继续打炮，对我造成危害，我即考虑采取压制或惩罚性的炮击，但这种炮击，应报中央军委决定。（四）不管敌人的炮击企图如何，我厦门前线部队均应适当加以戒备。

对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稿的批语

（1960年8月）

退尚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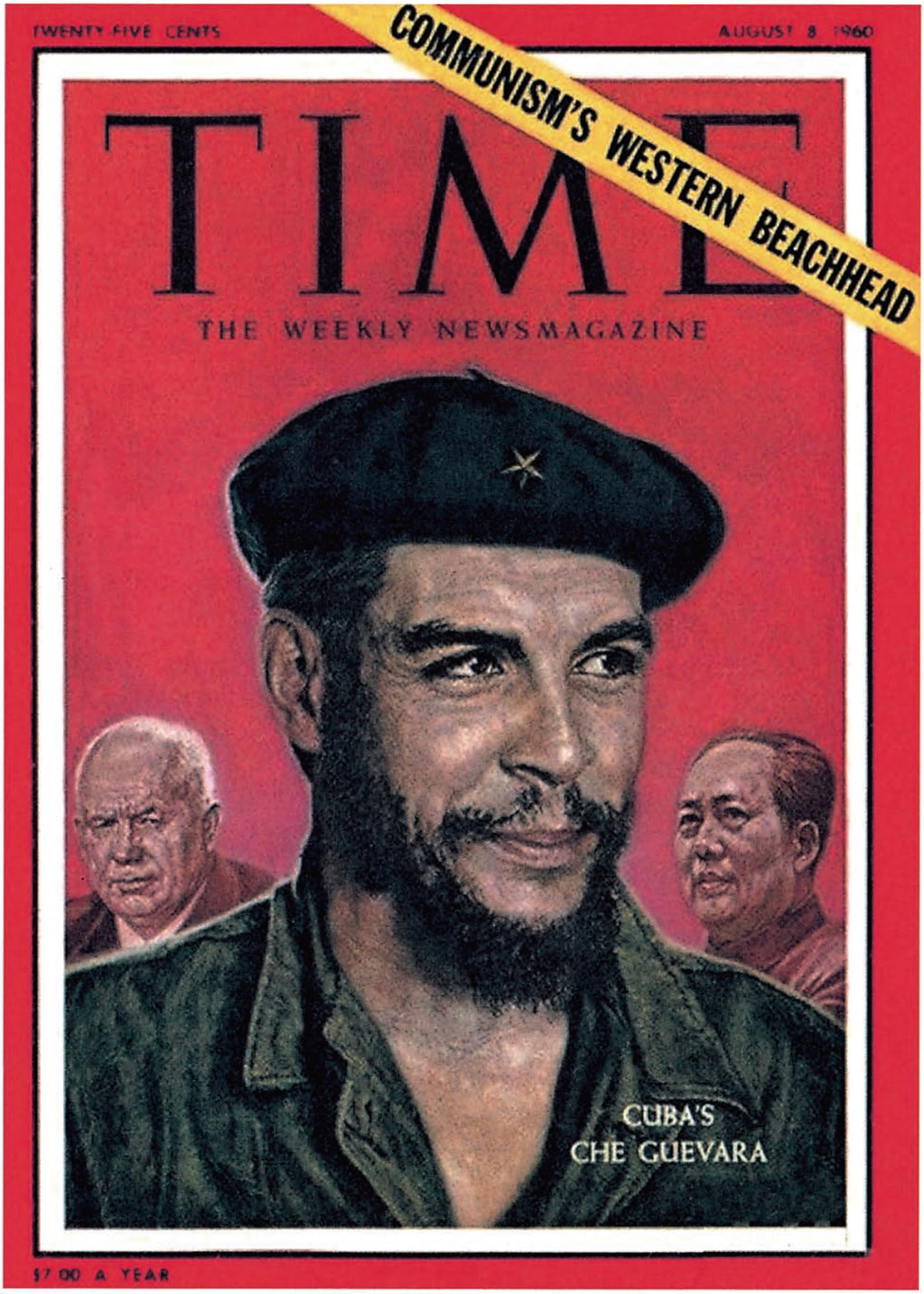
加一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必须完成。三反运动不能占农作时间，应放在农闲时间去做。

此句可加在原稿第八页第十行[2]。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中共中央1960年8月10日正式下发的《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在毛泽东指定的地方加上了这句话。


TWENTY-FIVE CENTS
AUGUST 8 1960
COMMUNISM'S WESTERN BEACHHEAD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CUBA'S
CHE GUEVARA
$7.00 A YEAR

1960年8月8日，毛泽东和格瓦拉、赫鲁晓夫一同登上《时代》封面。

关于抄录昆明滇池对联的批语

（1960年8月12日）

《两般秋雨庵随笔》[1]，请林克抄来为盼[2]！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清朝梁晋竹著。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毛泽东让他抄录的是《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四中的《昆明池对联》。昆明池，即滇池。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0年8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解放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五年来，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走过了艰苦而光荣的道路，在朝鲜北部地区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英雄的朝鲜人民在击败了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后，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迅速地恢复了饱经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朝鲜人民以旺盛的革命热情，掀起了全民性的千里马运动，沿着社会主义的光辉大道飞跃前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维护远东和世界

的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得到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普遍支持。最近，南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我们深信，在英雄的全体朝鲜人民坚持斗争下，美国帝国主义总有一天要从南朝鲜撤走，朝鲜的和平统一总有一天会实现。中国人民保证，永远同朝鲜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

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结成的兄弟友谊，在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中，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巩固。这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伟大友谊，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同时也加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渝地为发展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作出最大的努力。

祝朝鲜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8月14日

关于坚决地认真地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紧急指示

（1960年8月20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四川省委送来的《周颐同志关于南部、仪陇两次农村劳动力问题和“三反”情况的电话报告》和《南充地委、温江地委关于农村公社浪费劳动力的两个材料》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转发至县委，要他们仔细阅读，切实研究，如果本地也有类似现象，就应该像四川那样，派出专门小组到公社去加以检查和督促，务必采取坚决的办法，把县、社、管理区三级所浪费的不十分必需的劳动力，迅速动员和压缩到生产队中去，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以保证今年能够获得一个较好的秋收，并争取明年有一个比任何一年要好得多的夏收，这件事情刻不容缓，千万不可迟疑不决。

四川这几个材料说明，县、社、管理区三级浪费劳动力是极为严重的，甚至生产队本身也把许多应该用于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过多地使用于其他方面。四川省委和地委找到了这个窍门，进行了调查和清理，结果在五十五万人口的仪陇县，就可清出约四万人（约占全县总劳动力百分之十五以上），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南部县建兴公社就可挖出占全公社劳动力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压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鄂县友爱公社在调整前，生产队一级使用的劳动

力只有三千零三十五人，调整后增加到三千六百四十四人，即在农业第一线增加的劳动力，也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从这几个典型材料，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认真解决这个问题，农业的大量增产是没有希望的。

四川的材料还揭穿了一个“秘密”，指出“少数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农村活路重、生活苦，城镇劳动轻松，又能拿现钱，便想尽一切办法逃避农村”。“城镇占用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是基层干部的父母、爱人、兄弟、姐妹和舅子、老表、亲戚朋友，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使自己家庭生活舒适，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把他们的家属从农村搬到城镇，安插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逃避农业生产”。因此，“从这次清理劳动力的情况看，问题是复杂的，斗争是尖锐的”。材料指出必须在干部和群众中切实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力量，才能扫除某些干部包庇自己亲戚朋友逃避农业生产的障碍。上述这些分析是很生动的，是很正确的。中央还要着重指出，在我们国家中，必须经常注意防止形成一种特殊阶层。干部包庇亲戚朋友，安置较好位置，就是这个现象的具体表现的一种，也就是官僚主义的最主要的内容。千万不要忽略，在其萌芽时就要不断地加以批判和克服，不可任其滋长。

四川解决农业第一线劳动力的斗争，是结合农村“三反”进行的，其他各省区可以结合“三反”进行，也可以先对农业第一线劳动力问题作初步的清理，然后结合“三反”作深入的解决。总之，清出一切可能的劳动力去加强农业生产，是目前一件很迫切的事情，务必迅速动手，抓紧进行。

中央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酌情安排夏在伯等三人工作的批语

（1960年8月22日）

此信及附件，请秘书室寄湖南省委统战部酌量处理。另有田士清先生、蒋竹如先生二位也有同样的问题。这三人（夏在伯、田士清、蒋竹如[1]）是否有资格可以参加湖南省文史馆作为馆员，请省委统战部同志与湖南副省长周世钊[2]先生一商，因周先生知道这三人的情况，周在京开民盟会议，昨天我和他谈过此三人的问题。如不合资〔格〕，不要勉强列入。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八月二十二日

---

[1] 夏在伯、田士清、蒋竹如，均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1960年8月22日，毛泽东会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邓宝珊。

1960年8月，毛泽东和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主席季方握手。

1960年8月，毛泽东和九三学社副主席周培源亲切握手。

1960年8月，毛泽东和历史学家吴晗亲切握手。

1960年8月，毛泽东会见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

1960年8月，毛泽东看望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同志。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0年8月22日）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欣逢罗马尼亚解放十六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罗马尼亚工人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罗马尼亚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祝贺。

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罗马尼亚的国民经济正在蓬勃地发展。最近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1960年至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和远景经济纲要，更加鼓舞了罗马尼亚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忱和信心。

罗马尼亚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这必将促进我们两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繁荣和增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的力量。

祝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8月22日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0年8月27日）

此件[1]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参考，并发中央一级各党组。

中央

八月二十七日

---

[1] 指中共江苏省委1960年8月24日关于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情况给中央、上海局的报告。其中说，我们从8月16日开始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第一阶段讨论国际形势。与会者听了北戴河会议精神之后，有所震动，感到突然，也感到气愤，一致认为我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阐明了我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问题的原则和立场，举起了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义旗，揭露了修正主义的面目，在斗争的第一回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大家对代表团所进行的严肃、灵活的斗争，表示满意和拥护，决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顶住修正主义猖狂的进攻，在各条战线上争取更大的胜利。会议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目前出现一股修正主义的逆流，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个别人的思想品质问题，而是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在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长期以来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斗争，对资产阶级法权甘之如饴，逐渐形成了一个高薪阶层；在那里的

农村，由于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还保存着甚至发展着一个富裕农民阶层；在西欧一些老殖民主义国家里，则存在着工人贵族。这些阶层都只想保存既得利益，怕战争，怕革命，这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在世界范围内，已经经历了15年的和平时期，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极力以核子恐怖威胁群众，散布和平主义，因而在部分不觉悟的群众中，普遍存在怕战争的情绪，这是修正主义者乞求和平的思想基础。我们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必须吸取以下教训：一、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二、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培养与扩大理论队伍，坚决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加强第二代、第三代的思想教育工作，培养接班人。三、坚持一年一度的整风。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战斗力。1960年9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贯彻北戴河会议[1]部署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0年8月27日）

此件[2]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八月廿七日

---

[1] 指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中共河南省委1960年8月24日关于贯彻北戴河会议的部署给中央的报告说，8月17日至22日，省委常委听取了北戴河会议精神的传达，对中央关于保粮、保钢和保证完成外贸的三个重要指示作了研究和部署。常委们一致认为，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马列主义的原则，对国际上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长期的、彻底的斗争。在斗争中，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为了系统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省委决定于8月26日召开工作会议，会期8天到10天，先传达和讨论形势问题，然后具体研究如何在河南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安排今年后4个月的工作。9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这一报告。

对阿里埃蒂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看法的批语

（1960年8月）

一

江青看，仔细地慢慢地看，很有好处。

毛

二

一篇好谈话[1]。

---

[1] 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0年8月1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载的《委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阿里埃蒂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看法》的材料。材料说，阿里埃蒂在我国东北参观后回到北京，坦率地谈了一些他对布加勒斯特会议的感想和意见。他说：“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的方式很坏，我和拉丁美洲国家有些党的代表（如巴西、古巴）都感到很惊奇。事前我们中央并不知道要开这样一个会，要讨论这些问题。”“在我们对一系列文件没有很好阅读以前，在对中国党的观点和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以前，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

要大家发言，表示对这些问题的态度。讨论的时间也很短促。”因此，他认为：“五十一国党的会议，是在大家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让大家去讨论和指责中国党在其国内的政策和工作。”他说会议上表现的“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是会上并不是请参加党的代表把会上的问题和意见带回去告诉各党的中央，加以讨论后再发表意见，而是要求参加会的个人，作为党的代表表示态度”。他认为“赫鲁晓夫在会上讲话的态度很傲慢”。他说：“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讨论方法，助长了许多人对某些问题抱着的固有偏见。”“这个会议的方式使人害怕，不敢坦率地讲话，怕讲错了话。”“会上有些问题不一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讨论的，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赫鲁晓夫的报告中有些材料是不应该提的，如苏联援助中国多少卢布问题。”“经济援助同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等问题有什么关系呢?”“赫鲁晓夫的这种提法是把思想问题和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思想上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帝国主义不会改变战争政策，“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并不排斥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期间夺取政权。”“美国为什么不和古巴和平共处?”“如果委内瑞拉驱逐美帝势力，实现完全的独立，美帝能够与委内瑞拉和平共处吗?”“苏共二十大以后，苏共和英共都提出和平过渡，但我们从来不认为委内瑞拉能实现和平过渡。”“个别国家虽可能和平过渡，但个别例子不能定为规律。”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说“你们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可是还有人批评你们”，“一些政治领袖应该到中国来看一看，逐个问题研究研究”，“不了解情况随意提出批评，是很危险的”。

转发黑龙江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1]精神报告的批语

（1960年9月1日）

尚昆[2]同志：

此件[3]请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以供参考。

不发新疆、黑龙江。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上午一时

---

[1] 指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中共黑龙江省委1960年8月29日关于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说，8月20日，我们召集了省委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精神。主要是：（一）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大家认为这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处心积虑准备的一个大阴谋，是他们企图打击我党的整个阴谋活动中的一个步骤。由于真理在我们一边，由于我党代表团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遭到了失败。（二）大家分析了现代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认为在苏联国内有高薪阶层的存在，农村中个体

经济比重很大，存在富裕中农，提倡物质刺激，没有彻底进行政治思想上的革命，追求享受，文艺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媚美、崇美和和平主义思想泛滥，这是产生现代修正主义的温床；苏联和欧洲一些国家，过去受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者的影响较深，过去虽然作过斗争，但没有彻底肃清，一遇适当气候就死灰复燃。（三）大家认为对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和艰巨的，但现代修正主义者是注定要失败的，他们不可能担当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革命的重心已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已移到中国，我党应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四）大家表示要将义愤化为力量，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勤俭建国，坚决执行中央关于保粮、保钢、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保证完成外贸任务，努力攀登科学技术尖端的高峰，给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以更有力的打击。（五）我们已通知各地干部加紧学习有关文件，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在这次会议上已组成3个领导小组，准备在9月初分3片向县委书记以上的党员干部传达中央规定的7个文件。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0年9月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全体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在1945年8月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又遭到法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越南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周围，进行了九年英勇抗战，终于打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越南北方的解放。越南人民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解放之后，越南北方人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越南北方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58—1960三年计划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指标而奋斗。我们深信，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一定能

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一贯维护日内瓦协议[1]，为和平统一自己的祖国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美帝国主义一直控制着越南南方，竭力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但是它的这些罪恶活动正在激起越南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并且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发展同亚非和平中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一切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赞扬和支持。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庆祝光荣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庆祝越南人民在十五年中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我们衷心地预祝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预祝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

---

[1] 指1954年7月20日至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以及《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这些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恢复和平，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尊重这三个国家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的和平统一、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9月1日于北京

给张维[1]的信

（1960年9月2日）

楚珩兄：

惠书收读，甚为高兴。下次赴沪时当图良晤。你应好好养病，不要忧虑。如有困难，率直告我，不要藏在脑中。

祝你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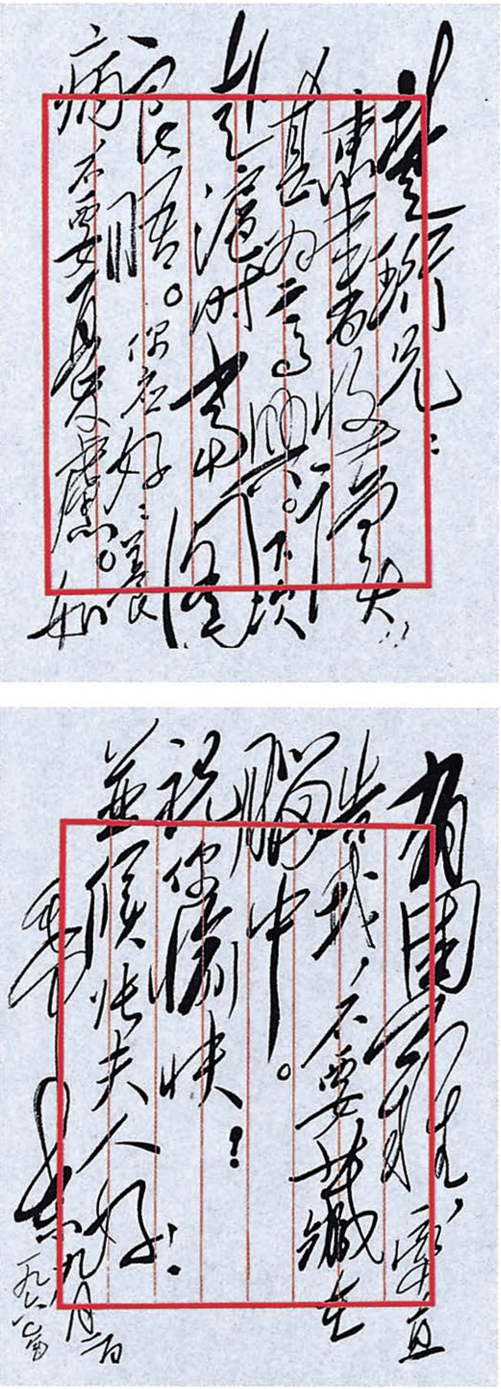
并候张夫人好！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

---

[1] 张维，字楚珩，早年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毛泽东致张维信的手稿。

给田士清[1]的信

（1960年9月2日）

懋斋学兄：

前后收到两信，极感高谊。“欲东”之志，已与周东园[2]兄筹商，并已致函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请其酌情处理。[3]专此敬复。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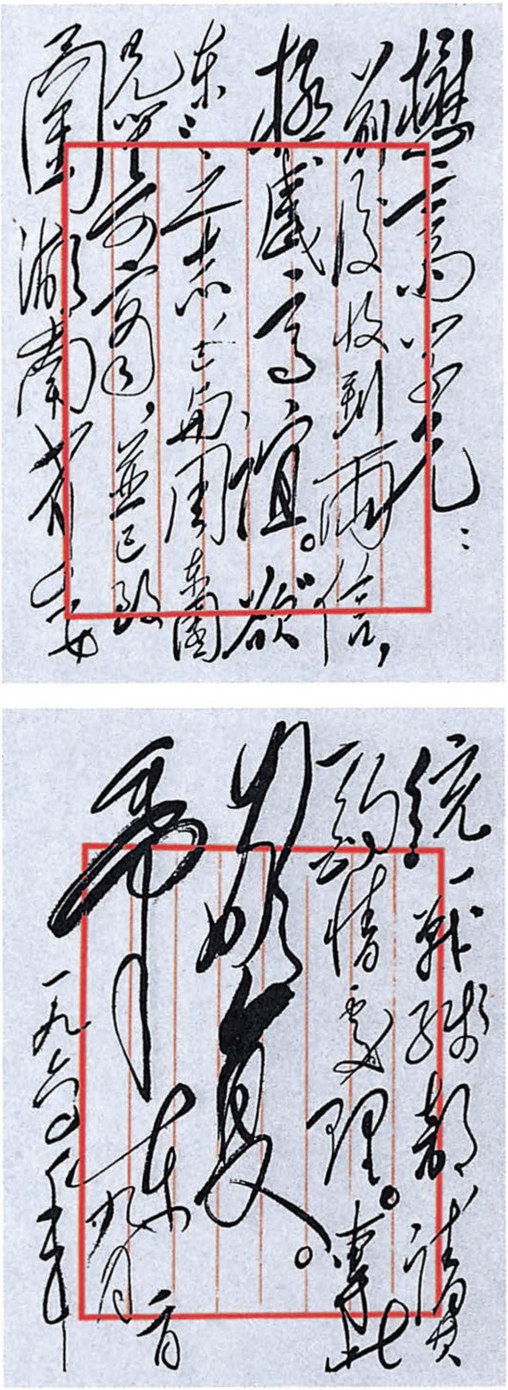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

---

[1] 田士清，字懋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2] 周东园，即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3] 参见《关于酌情安排夏在伯等三人工作的批语》。



[illegible]先生：
前后收到两信，
极感高谊。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统一战线部，请
酌情处理。专此
[illegible]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illegible]

毛泽东致田士清信的手稿。

给吴启瑞[1]的信

（1960年9月2日）

启瑞同志：

七月十九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选集及照片，已寄去了，收到时请告。

祝你健康！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九月二日

---

[1] 吴启瑞，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数学教师王立庵的儿媳，长期任教于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0年9月8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当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祝贺。

中国人民以愉快的心情关注着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保加利亚人民正在为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着辛勤的劳动，这个计划的完成将使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更加繁荣和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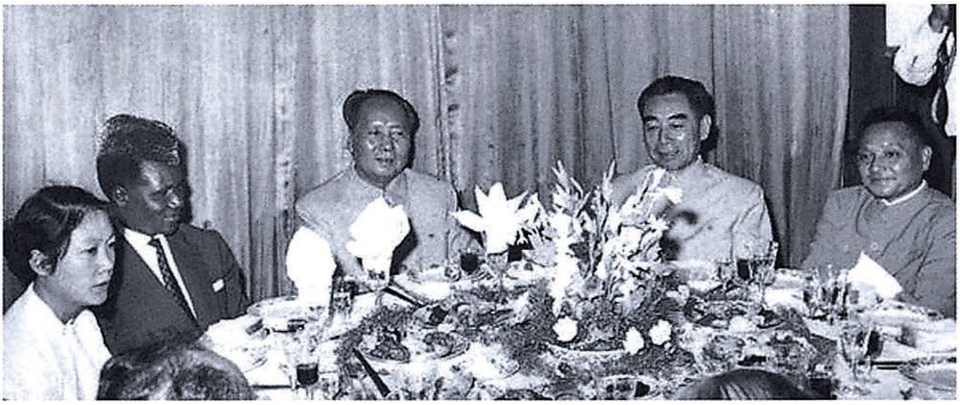
中保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兄弟友谊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壮大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中国人民将努力维护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关系。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祝中保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更加巩固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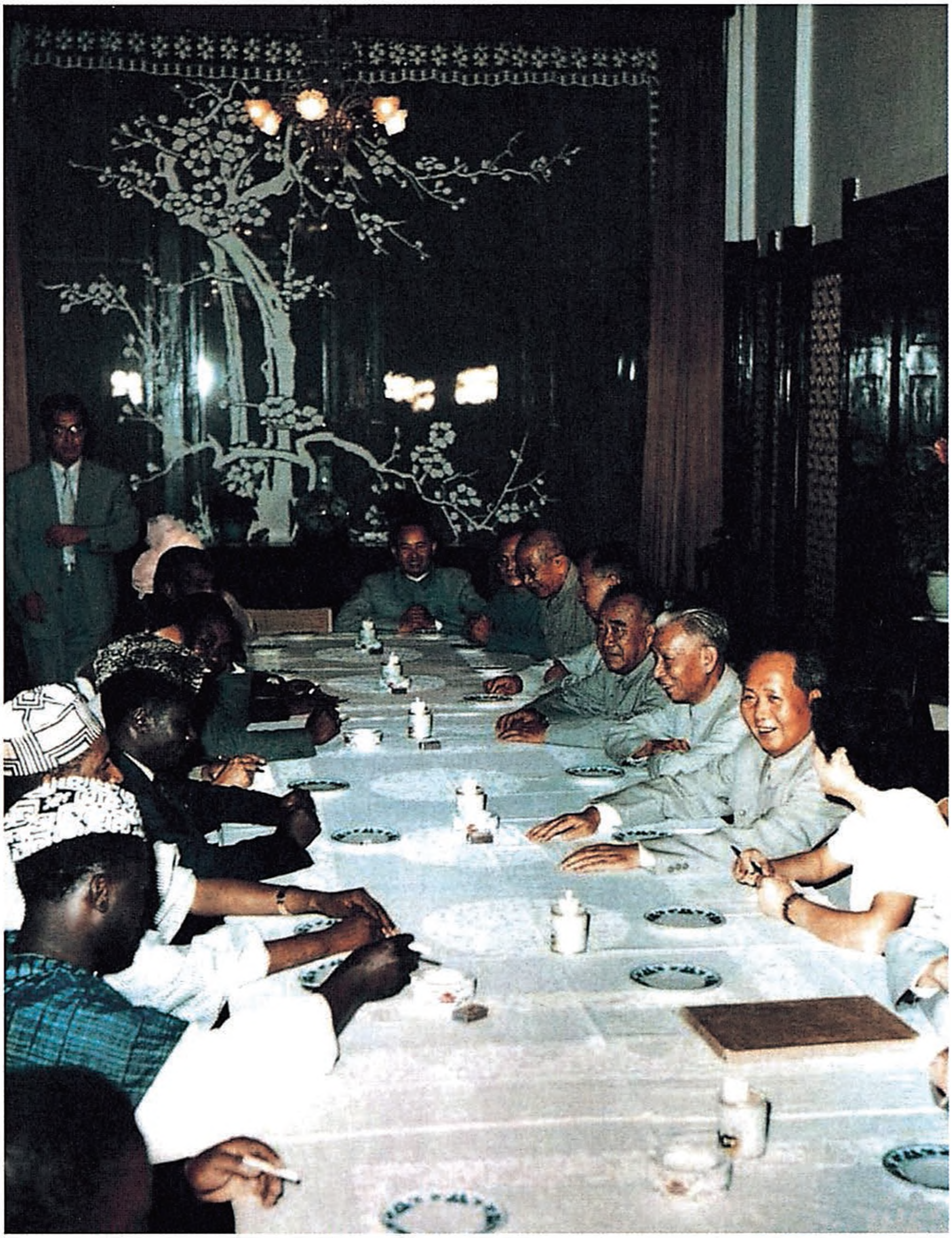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9月8日于北京

1960年9月，毛泽东亲切会见来访的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



1960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宴请来访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

1960年9月，毛泽东和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宴会上。



1960年9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几内亚民主党中央总书记、国家总统塞古·杜尔。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传达北戴河会议[1]精神报告的批语

（1960年9月15日）

一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和党组：

安徽的报告[2]写得很好，特发给你们研究。

中央

1960年9月15日

二

刘、邓、周[3]阅后，即发。

毛

---

[1] 指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指中共安徽省委1960年9月7日关于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给中央和

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鉴于当前农业生产紧张，我省决定分三批开会传达北戴河会议精神。第一批已向县团级以上干部作了传达。到会干部经过讨论，对我党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有了共同认识。（一）关于斗争的性质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我党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和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斗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关系到要不要马列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要不要殖民地解放斗争胜利的问题，因此必须斗争到底。（二）关于斗争前途问题。会议讨论了这场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为任何急躁情绪都是有害的。但大家坚信，真理在我们一边。目前我们虽然在形式上居于少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必然能团结多数，取得最后胜利。各国党也必然能够在这场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三）关于斗争的方针、方法问题。大家一致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把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团结出发经过适当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大家认为在斗争中要讲究策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这样才能教育群众，争取多数，孤立修正主义。（四）关于我们的责任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要踏踏实实地把国内工作做好，国际问题的解决决定于做好国内工作。要战胜修正主义，既要靠政治，也要靠经济，因此我们的责任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会议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对当前的工作进行了研究和安排。认为当前必须进一步开展以粮、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粮、油、棉和煤、铁、钢的生产指标。为此要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干部和劳动力加强生产第一线，并进一步改进工作方法。机关应当有2/4的干部到生产队、车间蹲点；1/4的干部下乡巡回检查；1/4的干部在机关坚持工作。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

和夏基、狄克逊的谈话[1]

（1960年9月25日）

一

夏基（以下简称夏）：首先，我必须说，在若干原则性的问题上，像我们时代的性质、防止战争、帝国主义的本性、和平过渡、普遍和全面裁军以及其他问题上，我们完全支持中国党的立场和主张。对于另外有些个别问题，我们不很清楚。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原则方面的分歧，只能有利于阶级敌人，这是使我们纳闷的事情。和中国同志一样，我们希望分歧经过讨论之后，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获得解决。中国党和苏联党必须团结。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是的，团结是必须的。就我们这方面说，我们当然主张团结。有些人却不愿团结。他们是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者，任何党里都没有什么完全一致。你是不是认为你们党是完全团结和一致的呢？

夏：是的。

毛：你认为你们党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吗？

夏：希望它能够。

毛：在下层干部中有没有反对的意见？

---

[1] 这是毛泽东和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劳伦斯·路易斯·夏基、主席理·狄克逊谈话的一部分。

夏：也许有。但就我党政治委员会的同志来说，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在目前阶段，我们还没有在下层中讨论这个问题。

毛：有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好的。在中央委员会里有大多数的支持是好的。

夏：在中央委员会里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将是可能的。在狄克逊同志和我离开澳大利亚的前两天，我党政治委员会开了两天会。我们在新西兰共产党的汤赖同志和曼森同志所作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了讨论。我党政治委员会的十一个成员一致支持中国党的立场和主张。

狄克逊（以下简称狄）：事实上我们前些时候研究了中国党的为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而发表的三篇文章，我们决定支持中国同志。

毛：我们知道你们党曾和英国党辩论过。我们党和英国党也曾在和平过渡这个问题上有过辩论。

夏：这也是我们党和英国党辩论的主题。

二

夏：苏共是普遍和全面裁军的倡议者。

毛：我还不了解普遍和全面裁军是什么意义。

夏：我也不了解。苏共提出了这个口号之后，我们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像我们那个小国家，还不是什么帝国主义大国，可是我们的资产阶级老是在嚷扩军备战。在许多地方，战争事实上正在进行，澳大利亚政府派军队到马来亚去插手，屠杀游击队。这个政府目前正计划通过一项法律来加强对人民的压迫。这是针对我们党和整个工人运动的。朝鲜战争时，我们的同志因反对朝

鲜战争，支援中国而被捕，他们只判坐牢几个月。但按照政府……这一案件就得判死刑。

毛：什么案子要判死刑？

夏：按照这项法律的条文，支援……死刑，犯“叛国罪”的终身监禁，有破坏活动的监禁七年。这都是为战争作准备，那些家伙当然不是在考虑什么普遍和全面裁军，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准备战争。在美国这次党选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双方都宣扬扩军备战，他们竞赛谁能更好地扩军备战。因此，苏共的意见完全是梦想，是不现实的。

三

夏：有些人抱着梦想，认为裁军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援助不发达国家，认为帝国主义可能自动解除武装，但是，帝国主义者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假如他们解除武装，工人阶级就会罢工来夺取政权。

毛：是啊！如果真是那样，这岂不是奇事呢！

夏：让我们看看澳大利亚的形势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形势吧。为了赚钱，资本家正在扩军备战，例如在澳大利亚这样的小国中，去年钢铁公司获利二千万英镑，而在澳大利亚的美资通用汽车公司却获利一千五百万英镑。与此同时都是：教育存在着持久危机，医院缺乏，道路一团糟。并且，虽然时常闹旱灾，却毫无蓄水计划。资本家不在这方面投资，因为没有厚利可图，垄断资本获得巨额利润，而社会制度却倒退。扩军备战能为资产阶级带来巨大的利润，但是教育事业等等是获利很少的。资产阶级从事前者而不从事后者，这是自然的道理。

毛：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

四

毛：不抵抗暴力的保证正好投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工党是反对阶级斗争的。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必须是一个主张阶级斗争的党。

夏：共产党所以存在的理由就是要进行阶级斗争。

毛：不然的话，为什么共产党不去加入工党呢？

狄：在我党的历史上，党内经常出现右倾机会主义思想，那些人想搞垮共产党。他们要共产党加入工党，要把共产党变成工党的翼，或具有推动力量的团体。一到历史上的重要关头和阶段，右倾机会主义总要出现。我们党和英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就存在分歧，一个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分歧，而另一个是关于对待工党的态度的分歧。英国共产党提出了组成一个左翼工党政府的口号。当然，在他们看来，这样一个政府是会容纳共产党的。可是我们并不设想改良主义者会有那样的大度量，以至能够容纳共产党。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英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散发了许多材料，散布这种思想，搞得我党最后不得不批评英国共产党。波立特同志对我们的批评很生气，他问我们敢不敢公开批评他们。我们说："敢。"这样，一个公开的辩论就发生了。我们同英国共产党的辩论继续了十几年，然而分歧当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希望中苏两党间的分歧不会像澳大利亚党和英国党之间的分歧那样长久存在。我党和英国党之间的分歧没有产生很大影响，但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必定会有

很大的影响，两者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五

毛：他们能向我们施加压力，他们能召回专家，施行经济封锁等等。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不存在可能，《中苏友好》那个杂志已经停刊。两国之间的贸易是否继续，我们还不能断言，贸易的数量必然会减少。因为撤退专家，就使按他们计划而修建的工厂发生困难。

夏：赫鲁晓夫高喊反对美国向古巴施加经济压力，但是他本人却向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施加经济压力，这比美国干得更坏。

对谭震林[1]关于晋冀鲁豫辽五省农业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0年9月26日）

此件[2]请书记处认真讨论一次。如认为可行，可转到下边去。拖拉机等重型农具，南方应让北方先行，否则问题不能解决。

毛泽东

1960年9月26日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谭震林1960年9月23日关于晋冀鲁豫辽五省农业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的报告。报告中说：“这五省共有耕地四亿九千三百六十四万亩，其中畜耕占百分之三十七，机耕占百分之八点一，人力耕种占百分之五十五。晋冀鲁豫四个省的拖拉机和排灌机械有近百分之四十不能开动，其中有的不配套，有的无零件，有的无燃料，有的因技术不熟练而损坏。农民通常用的小农具也缺很多，原因一是废钢铁都被收集去炼钢，二是原来打农具的手工合作社变成工厂后不再造小农具。为此，我们确定今冬明春集中力量把现有机器修好配好，大造小农具，同时要求明、后两年给这五个省十万标准台拖拉机，改变人拉犁的现象，使机耕面积由百分之八上升到百分之四十九。但这比原来计划分配给这五个省的数字多三万二千五百台，需要中央作出决定。”10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谭震林的这一报告，指出上述5个省负担钢、铁、煤的生产任务较大，又是棉花和花生的主要产区，3年来役畜死亡很多，中央同意明后两年内分配给10万标准台拖拉机。

送富春[1]酌处。

---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1]

（1960年9月2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时，建议你们在昆明设总领事。当时在你们看来，昆明是个黑暗的地方。现在你们设了总领事，可以了解昆明是一个很光明的、对你们很友好的地方。

吴努（以下简称努）：是的。交朋友初次见面总是不熟悉，没有见面前总是互相不信任的，见面后，互相疑惧的心理会自然消除。

毛：缅甸有一支队伍跑到我们这边来。你曾对我提过这件事。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他们现在在贵州，从事农业生产，其中有些人已跟中国妇女结了婚，他们不肯回去。

毛：他们很希望我们能武装他们打回去，我们告诉他们可以收容他们，但不能武装他们，中缅必须友好。他们有几十个人，是克钦族[2]吧？

努：是克钦族。

毛：现在要签订中缅边界条约了，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

努：中缅边界条约能很快地完成，这完全是由于两国的友好，不然是完不成的。这种友好不是一般的友好，只是一般的随随便便

---

[1] 这是毛泽东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的一部分。

[2] 克钦族是缅甸民族之一，多数居住在缅甸北部克钦邦，与中国景颇族同源。

的友好就不能保持长久，只有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友好，才能永久存在。

毛：你讲得很对。互不损害，我不损害你，你不损害我，这是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是互相有利。过去有一个时期，中缅边界搞得相当紧张。后来我们派了个将军去边界看了看，发现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以后情况就好多了。双方军队都驻在边界上，不如后退一些好，何必那样紧张呢？

努：是这样的，上次见主席时谈到此事。

毛：完全没有必要紧张，队伍隔远一点好，双方在边界各隔二十公里。这一点，现在我们和尼泊尔已达成协议。

周：跟尼泊尔已经实现了。

毛：这样做，对印度还有困难，他们觉得对他们不利。尼泊尔不怕，就达成了协议。我们在西藏剿匪时和尼泊尔发生点误会，责任在我们这方面。我们已经道歉，作了赔偿了。公事公办，是则是，非则非。中缅边界上没有发生过打死人的事吧？

周：中缅边界上也发生过一两次这样的事件，但作为边民纠纷，由双方地方上很友好地解决了。

努：在瓦邦发生过，但是由于在发生之前两国就有友好的基础，事情没有发展得那样严重，中国方面损失大些，不过中国没有提出要赔偿。

毛：友好嘛！事件不是双方上边造成的，是边民冲突。

努：边界冲突是可以防止的。主席讲得对，双方军队隔远些，并且对边民加强友好教育就行。相信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毛：听说你们给我国一百万边民送了大米和盐？

周：送给了二千吨大米、一千吨盐，已准备好了，后天就给

边民。

毛：这就是友好的表现。我们怎么回礼？送什么？

周：我们给缅甸一百二十万边民送花布和瓷盘，明年一月四日我们去仰光，双方换文时发给缅甸边民。吴努总理还邀请了陈毅[1]同志、罗瑞卿[2]同志和他们两位的夫人。

努：欢迎他们参加一月四日的独立节，并希望泼水节再去。

毛：泼水节在什么时候？

努：关于泼水节的情况，周总理阁下知道得很清楚。

周：今年我参加了他们的泼水节。昨天我们三人坐敞篷车，也“泼水”了。

努：昨天风很冷，吹得脖子发硬了。

毛：雨落得很好，对种麦子很有好处。

努：我很高兴。

毛：这两年雨水少些，受点旱灾，今年比去年严重，希望明年有个好收成。

努：我也是同样的心情。

---

[1]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2] 罗瑞卿（1906—1978），四川南充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国防部副部长。

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的谈话要点[1]

（1960年9月30日）

（一）阿尔及利亚人民已经英勇地进行了六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你们在地中海岸、在大西洋旁开辟了一个民族解放的战场。全世界要求解放的人民，首先是整个非洲人民，都会向你们学习。

我们对你们的正义斗争很钦佩，中国人民都很钦佩。由于你们战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你们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援助，你们的斗争绝不是孤立的。中国人民支持你们，整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都支持你们，还有西方国家革命的人民也支持你们，你们的朋友很多。戴高乐[2]也有朋友，那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3]，中国的蒋介石也是他的朋友，他们互相承认，早已建立了外交关系，而我们则同你们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没有找过法国政府，它也没有来找我们，也许有一天它要来找我们，但我们有两个

---

[1] 这是毛泽东1960年9月30日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的谈话要点。这个谈话要点由周恩来于10月6日面交阿巴斯。

[2]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同时宣布成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联邦德国和西班牙分别于1955年、1982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条件：一个是要它同蒋介石断绝外交关系，一个是不能干涉我们对你们的援助，如果把干涉我们对你们的援助当作建交的条件，我们决不干。

你们目前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是你们是有前途的，未来是属于你们的，而帝国主义则是没有前途的。你们要对付法帝国主义，还要对付美帝国主义。你们要看到它们各有各的困难。法国要维持80万军队，每天要耗费30亿法郎，这样长期持续下去，它是要垮台的。美国虽然比较强大，但它控制的地方太多做坏事太多，到处遭到人民的反对。你们有持久的条件，只要有持久的决心，坚持斗争，能够保存住自己的力量，尽可能使自己少牺牲一些，最好再能发展一些，这样，十年、二十年，民族解放的旗帜不倒，就大有希望。只要你们把枪拿稳了，我看你们不会被一阵风吹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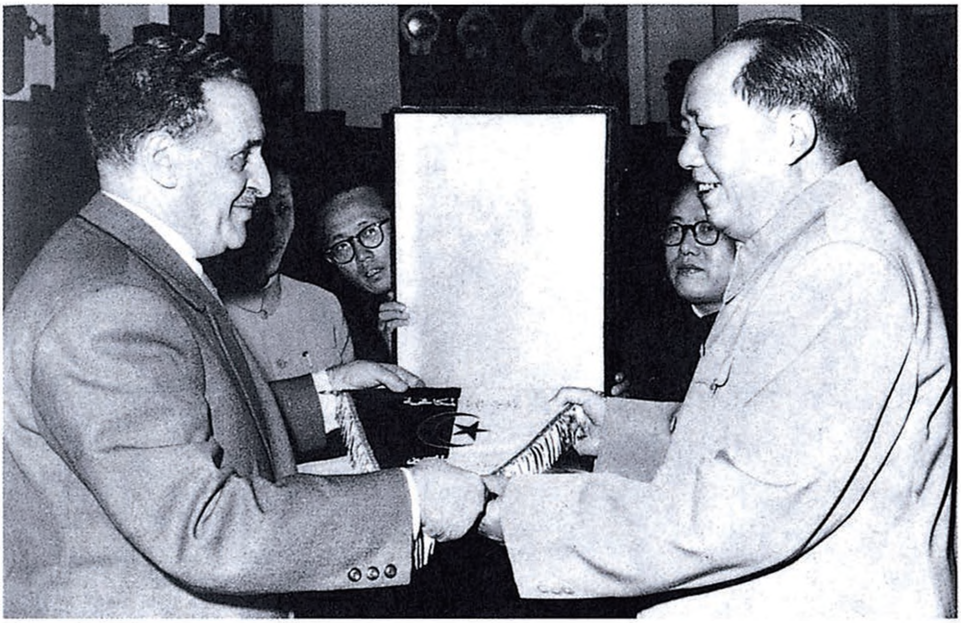
（二）我们赞成你们要求公民投票和要求法国撤兵的作法，但是对联合国出兵的问题则需要慎重。刚果的经验很值得研究。看来，要联合国代替比利时，还不如比利时在那里好些。因为比利时是一个国家，它的名声已经坏透了，将来容易对付；而联合国则有许多国家，主要是美国，把它请来了，它就不走了。解放一个民族并不那么容易，不是走了一个比利时，就算解放了。美国利用联合国侵略刚果也教育了刚果人民，刚果人民最终还是要取得胜利的。

总之，只要斗争能够持久下去，就是有利的，如果不能够持久，谈判也是没有条件的。法国政府现在不愿同你们谈判，但总有一天他们要谈的，那就是在你们的力量比现在发展和壮大了好几倍的时候。蒋介石开始也不肯同我们谈判，后来谈了，也签订了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定，但后来又都被他撕毁了。到了1949年春天，蒋介石的主力已经被我们消灭了，这时他真的想谈了，我们就要他派人

到北京来谈。我们提出的条件同法国现在向你们提出的条件一样，就是全部缴械投降。他不肯接受这条件，我们就渡过长江解放了中国大陆。因此，对戴高乐总要想办法整痛他，迫使他坐下来谈判。

（三）我们打了二十二年，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打击面只有5%，一般不超过8%，我们同日本人打了八年，抓到的日本人一个不杀，不但不杀，而且不虐待、不侮辱他们，也不拿他们的东西，而是加以教育。建议你们的打击面也不要太大，大概是5%到10%就好，不管是对法国人还是对阿尔及利亚人都是如此。我们过去有汉奸，你们也有阿奸，阿奸有大、中、小，有罪恶大的，有罪恶小的，需要加以区别；处决的应该是极少数，其中有些可以判刑，强迫他们劳动生产。对抓到的法国人需要多进行工作，每年抓到几百几千，教育好了的放回去，没有教育好的留下来继续教育，分批放回去。当然，放回去的有的还要来打，那就抓了来再放回去，第三次抓了来再放回去。这样，慢慢地就建立了信任，再上战场他们就会交枪的。这样做，团结面就比较广，打击面就比较小，同情我们的人就会增多。对下面的干部需要进行长期的经常教育，使他们认清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重要意义。

中国的经验，哪些对你们有用，哪些没有用，要经过你们的考虑，你们有你们自己的特点，我们不希望你们抄袭我们的经验。



1960年9月30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费尔哈特。

感谢几内亚总统祝贺我国国庆的电报

（1960年10月1日）

科纳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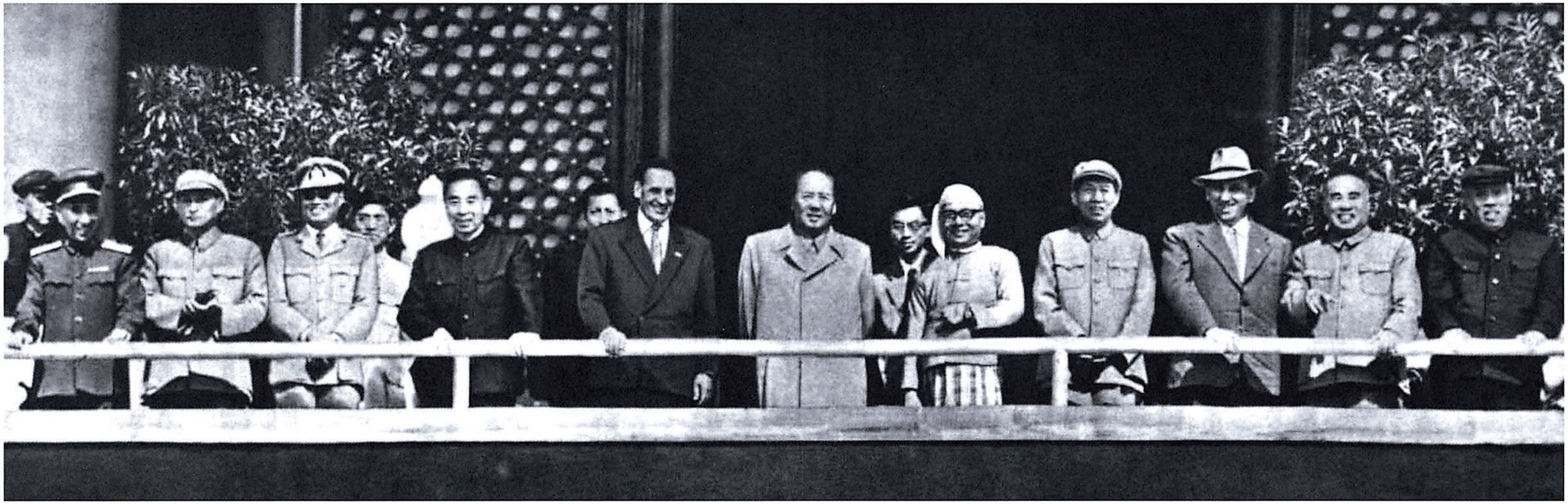
几内亚共和国塞古·杜尔总统阁下：

衷心地感谢阁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一周年的时候，给我们的热情的贺电。

当此几内亚共和国国庆之际，请接受我诚挚的祝贺。祝几内亚共和国，在总统阁下的领导下，在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的国家方面，获得新的胜利和成就。祝中几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

1960年10月1日于北京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国来宾在庆祝建国十一周年大会主席台上。

2P

4P2-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0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锡兰共产党总书记克尼曼。

1960年10月，毛泽东接见贵州省少数民族参观团。

感谢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祝贺我国国庆的复信

（1960年10月3日、8日）

一

国务院外事办公室：

要复一信致谢。请你起草后，送我一阅，然后缮正发出。

毛泽东

十月三日

二

尊敬的比里·帕侬荣先生：

感谢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祝贺，感谢你对中国人民和我本人的良好祝愿。

中泰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尽管目前在我们两国关系中还存在着来自美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方面的严重障碍，但是，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种障碍必将消除，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必将得到发展。

正如你指出的那样，目前形势十分有利于全世界人民。我相信，泰国人民决不会容忍外国侵略势力的长期压迫，他们终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同各国人民的斗争相配合，挣脱美帝国主义军事条约的锁链，获得完全的民族独立。

祝你身体健康，祝你在促进中泰两国人民友好、维护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成功。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十月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的电报

（1960年10月6日）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值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一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人民致以兄弟般的祝贺。

十一年来，勤劳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们感到高兴。目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正在为加速发展国民经济和提前完成七年计划而努力。我们深信，七年计划的完成，将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更加繁荣昌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德军国主义、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向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德意志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德两国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视这

种友谊，并且将努力增进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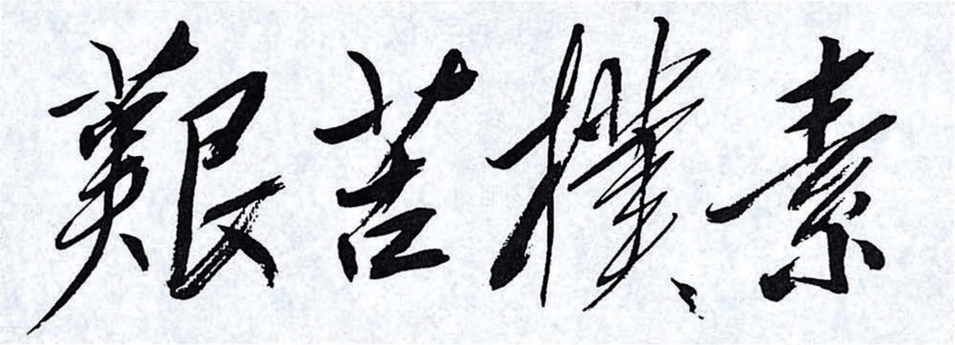
祝德意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争取祖国在和平、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0月6日于北京

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词

（1960年10月8日）

艰苦朴素。



毛泽东为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的题词。

关于转发湖北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批语

（1960年10月10日、12日）

一

富春[1]同志：

湖北沔阳县一平二调问题至今未解决、粮食减产、问题严重文件[2]一件，福建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在该县城门公社一个社即坚决压下2000多人（占总劳力45%）下去生产文件[3]一件，以上两个文件极好。请你即令书记处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志日内即为中央起草一个有力的指示（要有几百字，几句话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县、社的注意）。草好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十月十日上午一时

二

已阅[4]。即送富春同志办。

毛泽东
十月十二日

---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1960年9月18日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给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并书记处各同志的报告。报告说，为贯彻省委“十条政策”，我们同沔阳县委在通海口公社搞试点，发现各方面仍然存在着极其严重的问题，其中“共产风”、乱指挥生产、粮食、自留地等问题最为严重。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至省级，下至小队；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至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许多生产队粗略计算一下，“共产风”中的各项损失，人均达50元左右，多的达100多元，相当于社员一年到两年的分配收入。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采取了靠电话统一指挥生产的办法，公社统一安排农活，全社一齐行动，群众称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粮食方面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有的生产队还几次缩减社员的自留地。上述问题，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给生产队造成惊人的损失，全公社的粮食连年减产。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这次试点中，我们采取了下列做法：(一)关键是领导下决心。这次县委组织了一支从县委书记到各公社副书记在内的400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工作队一和群众见面，就大讲政策，表达领导决心，边宣传政策，边揭发问题，边算清账目，边组织兑现。经过10多天的工作，比较彻底地处理了“一平二调”问题，初步处理了贪污浪费、违法乱

纪、官僚主义等问题。（二）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先抓住一两件事立即处理兑现，带着群众去要账。以兑现作宣传，把群众调动起来。（三）把兑现抓到底。问题全面暴露以后，就采取集中处理、集中兑现的办法，从县到生产队都成立兑现办公室或小组，负责核账和兑现。（四）明确地划清政策、是非界限。（五）和生产扭在一起。即把群众通过兑现政策调动起来的积极性，扭到生产上来。凡这样做了的，就出现出勤、工效、开荒、种菜、公物还家的高潮。目前县委正在总结推广试点的经验。

[3] 指中共福建省委1960年9月30日批转的闽侯县委第一书记常登榜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城门公社大搞群众运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经过5天工作，第一步已经结束，情况如下：（一）城门公社在大好形势下，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生产第一线劳动力逐年减少。两年来共减少了2600多人，对农业持续跃进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次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从各方面压缩出劳动力2079人（占农业生产第一线现有劳动力的45%），加强了农业生产第一线。（二）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关键在于各级领导狠下决心，发动和依靠小队干部和广大群众，坚决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三）清理劳动力，做到合理布局，必须根据绝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战线，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坚持“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制”的根本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研究确定各行各业清理和安排劳动力的办法。（四）劳动力到达农业生产第一线后，必须做好一系列安置工作，使他们得到合理使用，发挥作用。（五）在城门公社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县大挖劳动力潜力，全县初步计划可压缩劳动力28200余人，目前已压缩了16900余人。县直机关也制定出了初步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方案。

[4] 指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委两个文件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纠正强迫命令、浮夸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是彻底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是在公社中贯彻实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关键问题。解决了这类生产关系的关键性问题，就会大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

的发展。同时，为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地安排劳动力，必须在农业战线上保持和配备足够的劳动力。须知在当前的条件下，我国还不能立即全面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只能够首先在一些局部的地方逐步实现这种机械化，因此，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头等要素。”“现在中央发给你们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关于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这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如果不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就不能够实现党中央所提出的关于以农业为发展国民经济基础的这个基本方针，就会使这个方针变为空谈。反之，如果实事求是地、迅速地处理这两个根本问题，那么，就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目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并且将同时有利于工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继续跃进。”“要实事求是地、彻底地解决上述两个根本问题，看来不能够只依靠各级的干部会议，还必须由省、地、县和公社党委下最大的决心，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并且明确地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的指示下达到公社的生产队和各经济部门的基层单位，使党的各种政策和方针直接同群众见面，用领导和群众的‘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够如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那样，收到切实的效果。”这一指示稿经毛泽东审阅后，于1960年10月12日下发。

关于会谈国际形势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的信

（1960年10月14日）

刘、周、朱、林、陈云、陈毅、富春、伯达、冷西[1]九位同志：

请你们看十月十二日下午版《参考资料》47页~59页，联合国大会辩论赫鲁晓夫提议裁军问题，苏方大败的情况。[2]希望下午四时以前看完，拟在下午四时左右会谈一下国势〈际〉形势。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上午三时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新华通讯社编印的这期《参考资料》第47至59页内容的总题目为《联大十一日下午通过由政委会辩论裁军问题》。其中谈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今天的会议上首先发言，他在指责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人为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之后，建议各国首脑在联大直接讨论裁军

问题，或者明春在欧洲举行联大紧急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代表支持苏联的建议。美国代表则攻击苏联的这一建议是为了“发表长篇演说”，是为了“宣传”，表示愿意恢复十国裁军谈判，鼓吹由联大政治委员会辩论裁军问题。加拿大外长为美国帮腔，建议由十国在一个中立国主持下进行裁军谈判。英国代表叫嚷遵守联合国“既定程序”，应先由政委会辩论裁军问题。加纳代表则表示将在表决时弃权。赫鲁晓夫在会议上第二次发言，指责西方无意裁军，表示如果决定先由政委会辩论裁军问题，苏联将保留是否参加辩论的权利。在他结束这番谈话之后，美国代表再次攻击苏联。随后，联大以62票赞成、12票反对、24票弃权通过了由政委会辩论裁军问题，并以13票赞成、54票反对、31票弃权否决了苏联要求由大会直接讨论裁军问题的建议。

对《麦克米伦的作用》一文的批语

（1960年10月15日）

一

哈希[1]是一个有头脑的美国记者。此文[2]值得研究。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

[1] 哈希，当时任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联合国特派记者。

[2] 指新华通讯社1960年10月6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十八期（增刊）上刊载的哈希的《麦克米伦的作用》一文。文章说，赫鲁晓夫最近几周的行动说明，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俘虏。如果要从他面临的许多问题中脱身出来，他就需要西方的帮助。西方许多专家认为，赫鲁晓夫为了向国内批评他的人证明他“并不喜爱资本主义”，被迫对西方进行了一系列粗暴的口头攻击，同时采取了一些很严重的粗暴行动。上述观点与目前在西方战略界日益得到推崇的另一理论是合拍的，即认为苏联的社会正在变化，在苏联的新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提供一种更愉快、更舒适的人类生活，共产党人正在受人类的愿望和利益的腐蚀。这种情况使得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坚信，现在不应该烧毁东西方之间的一切桥梁，比以往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联络路线的畅通，因为关闭这种路线非常容易使赫鲁晓夫不可挽回地投入中国的怀抱，从而导致中国人所说的世界战争。麦克米伦希望恢复举行最高级会议，以此作为和平的保障。

二

打送刘、周、朱、林、陈、富春、伯达、冷西[1]八人。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陈，指陈云，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3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4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王海容《我的经验》一文的修改和批语……………………………1
（1960年10月17日）
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3
（1960年10月17日）
对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二批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的请示报告的批语…6
（1960年10月20日）
和斯诺的谈话…………………………………………………………8
（1960年10月22日）
对中共中央答谢古巴人民社会党的电报稿的修改 ………………19
（1960年10月22日）
关于为黄绍竑、刘王立明摘掉右派帽子的批语 …………………20
（1960年10月26日）
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21
（1960年10月26日）
印发胡乔木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生产的建议的批语 ……22
（1960年10月27日）
印发河北省关于农村口粮标准、办好食堂和分配等问题的措施的批语 …23
（1960年10月27日）
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24
（1960年10月28日、29日）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报告的批语…27
（1960年11月2日）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的批语和修改…30
（1960年11月3日）
在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稿上的批语…36
（1960年11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电报……………………37
（1960年11月6日）
对《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一文的批语……42
（1960年11月11日）
对《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等文章的批语………44
（1960年11月12日）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5
（1960年11月15日）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47
（1960年11月15日）
在林彪不同意军队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报告上的批语………52
（1960年11月15日）
在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二次报告上的批语……53
（1960年11月20日）
中央转发四川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情况简报的批语…55
（1960年11月23日）
对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问题的报告的批语…………57
（1960年11月25日）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59
（1960年11月28日）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 …63
（1960年11月28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66
（1960年11月28日）
关于资本家下放问题的批语 ……………………………………68
（1960年11月29日）
给黄炎培的信 ……………………………………………………74
（1960年12月5日）
《红旗》编辑部给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的信…76
（1960年12月6日）
转发《代食品会议情况反映》的批语 ……………………………79
（1960年12月12日）
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和中央转发这一决议
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80
（1960年12月14日、21日）
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部署报告的批语 ……………84
（1960年12月22日）
印发关于河北省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简报的批语 ……………………86
（1960年12月23日）
印发谭震林关于粮食情况报告的批语 ……………………………88
（1960年12月23日）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 …………………………………89
（1960年12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91
（1960年12月24日）
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当前市场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93
（1960年12月25日）

为杨颖题词 ……………………………………………………95
（1960年12月25日）
要结合实际总结革命战争经验 ……………………………97
（1960年12月25日）
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信 …………………………99
（1960年12月26日）
印发人民来信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的批语…………101
（1960年12月28日）
印发《在粮食问题上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文的批语……………………………………………………102
（1960年12月30日）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103
（1960年12月30日）
印发关于美、英、苏农业劳动力负担情况资料的批语…………106
（1960年12月30日）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107
（1960年12月30日）
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12
（1960年12月31日、1961年1月1日）
给毛岸青的信…………………………………………………114
（1960年）
给林克的信……………………………………………………115
（1960年）
为《新湘评论》题名…………………………………………116
（1960年）

请林克查找现、战二韵所在声部的批语……………………………………117

（1960年）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等对信阳问题批示的文件的批语……………………………………121

（1961年1月5日）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123

（1961年1月9日）

关于推广锦州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经验的批语……………125

（1961年1月10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27

（1961年1月13日）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32

（1961年1月18日）

给田家英的信…………………………………………………140

（1961年1月20日）

对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42

（1961年1月20日）

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144

（1961年1月23日、24日）

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150

（1961年1月23日）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58

（1961年1月24日）

对《光明日报》《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166

（1961年2月15日）

对罗瑞卿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考察报告的批语……………168

（1961年2月27日）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170
（1961年2月）
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原来的反“左”割断了……171
（1961年3月5日）
解决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172
(1961年3月5日）
不要老是要下面报“账”不要发那么多文件……173
（1961年3月5日）
公社划小不划小主要应听群众的意见……174
（1961年3月5日）
关于请朱德、陆定一参加南三区会议等问题的批语……175
（1961年3月10日）
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和批语……177
（1961年3月11日）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180
（1961年3月13日）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82
（1961年3月13日）
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一次座谈会记录的批语……186
（1961年3月16日）
对南海县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上调任务包干办法的批语……188
（1961年3月16日）
对南三区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的批语……189
（1961年3月17日）

对《华东几个同志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91
（1961年3月17日）
印发两份农村见闻材料的批语……193
（1961年3月18日）
印发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经验的批语……194
（1961年3月19日）
印发《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的批语…195
（1961年3月19日）
印发《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的批语……197
（1961年3月22日）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
（1961年3月23日）
对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的修改……209
（1961年3月23日）
在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211
（1961年3月29日）
关于查找南宋几部诗文集的批语……214
（1961年3月）
为《南宁晚报》题写报头……215
（1961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216
（1961年4月3日）
关于请王任重、王延春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的批语……218
（1961年4月11日）
印发胡乔木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调查材料的批语……220
（1961年4月15日）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报告的批语……………………223
（1961年4月15日）
和古巴文化代表团的谈话……………………………………………225
（1961年4月19日）
给臧克家的信……………………………………………………………226
（1961年4月24日）
给邓小平的信……………………………………………………………227
（1961年4月25日）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232
（1961年4月27日）
对杨朔《樱花雨》一文的批语…………………………………………237
（1961年4月）
为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起草的通知和批语…………………………240
（1961年5月4日）
对张平化关于湖南工作来信的批语……………………………………242
（1961年5月5日）
给李井泉、陈正人的信 ………………………………………………243
（1961年5月6日）
转发周恩来关于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汇报的批语……………………245
（1961年5月7日）
关于下连队调查极为有用给林彪的批语………………………………246
（1961年5月7日）
转发李井泉关于粮食问题来信的批语…………………………………247
（1961年5月9日）
转发胡乔木关于湖南调查来信的批语…………………………………248
（1961年5月9日）

关于胡乔木推迟返京、继续调查的批语……250
（1961年5月9日）
转发邓小平、彭真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的批语…255
（1961年5月13日）
给张平化的信……257
（1961年5月14日）
转发李井泉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来信的批语……258
（1961年5月15日）
对王任重关于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来信的批语……260
（1961年5月15日）
转发阎红彦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的批语……262
（1961年5月16日）
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65
（1961年5月28日、30日）
转发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调查材料的批语……268
（1961年5月29日）
印发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的批语……270
（1961年6月1日）
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第二、三阶段日程安排的批语……272
（1961年6月3日、4日）
对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274
（1961年6月4日）
对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示稿等的批语和修改……276
（1961年6月11日、17日）

印发关于王国藩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材料的批语……279
（1961年6月11日）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281
（1961年6月12日）
给刘松林的信……288
（1961年6月13日）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289
（1961年6月13日）
给邓小平的信……294
（1961年6月22日）
对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295
（1961年6月）
给张维的信……301
（1961年7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电报……302
（1961年7月10日）
在关于日本经济政策和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份材料上的批语……305
（1961年7月13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七周年的电报……307
（1961年7月21日）
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的电报……309
（1961年7月25日）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310
（1961年7月30日）

关于同意会见古巴桑切斯少校的批语……………………………………312
（1961年8月9日）
祝贺苏联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的电报…………………………313
（1961年8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314
（1961年8月14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六周年的电报……………………………………317
（1961年8月16日）
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321
（1961年8月19日）
搞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一套，还要碰钉子………………………………323
（1961年8月23日）
给胡乔木的信………………………………………………………………324
（1961年8月25日）
在林彪关于总政选印《毛选》部分文章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326
（1961年8月29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335
（1961年9月1日）
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337
（1961年9月6日）
给董必武的信………………………………………………………………339
（1961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七周年的电报…………………341
（1961年9月8日）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343
（1961年9月9日）

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上的批语……………………344
（1961年9月）
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345
（1961年9月16日）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上的批语…………376
（1961年9月16日）
在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上的批语…379
（1961年9月17日）
和蒙哥马利的谈话…………………………………………………381
（1961年9月23日）
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不会用的…………………………………400
（1961年9月24日）
邯郸谈话会记录……………………………………………………404
（1961年9月27日）
给中央常委的信……………………………………………………408
（1961年9月29日）
关于召集中央局书记讨论“队为基础”问题的批语……………416
（1961年10月4日）
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的谈话……………………………417
（1961年10月5日）
对胡耀邦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420
（1961年10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422
（1961年10月6日）
对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24
（1961年10月7日）

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427

（1961年10月7日）

为日本访华朋友们题词……432

（1961年10月7日）

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假说》一文的批语……433

（1961年10月9日）

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贺词……434

（1961年10月14日）

对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材料的批语……436

（1961年10月15日）

在《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上的批语……437

（1961年10月16日）

为发展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题词……439

（1961年10月16日）

关于转发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经验的批语……441

（1961年10月22日、23日）

对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等的批语……444

（1961年10月30日）

为李家骥题词……446

（1961年10月）

七绝·屈原……448

（1961年秋）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449

（1961年11月6日）

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两件事……451

（1961年11月11日）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453
（1961年11月17日）
关于选看一些材料给江青的批语……456
（1961年11月19日）
对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调查报告的批语……458
（1961年11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461
（1961年11月28日）
给臧克家的信……464
（1961年11月30日）
既要有总路线，还要有具体政策……465
（1961年11月）
关于了解江苏省经济工作的经验给李先念、姚依林的信……467
（1961年12月15日）
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469
（1961年12月20日）
给张仙朋的信……470
（1961年12月24日）
给周世钊的信……471
（1961年12月26日）
给臧克家的信……474
（1961年12月26日）
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的批语……478
（1961年12月27日）
卜算子·咏梅……480
（1961年12月）

印发《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几首诗的批语……………………491
（1961年12月29日）
给刘松林的信……………………………………………………493
（1961年12月29日）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494
（1961年12月31日）
对一篇关于人道主义文章的摘报的批语…………………………496
（1961年12月）
七律·答友人 ……………………………………………………497
（1961年）
七绝两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502
（1961年）
七律·改鲁迅诗 …………………………………………………504
（1961年）

对王海容《我的经验》一文[1]的修改和批语[2]

（1960年10月17日）

一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

---

[1] 这是毛泽东的侄孙女王海容1960年7月应《中国青年》杂志社之约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谈了她高中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学徒工的经历和体会。毛泽东阅改后为这篇文章拟题《我的经验》，并在标题下加了“徒工王波”四个字。这篇文章后来载于1960年12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二十三期。

[2]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我的经验》一文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他在文章中加写的一段话；本篇四是毛泽东在王海容1960年8月1日给他的秘书叶子龙的信上写的批语。王海容在信中说：“《中国青年》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当学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的文章，以便帮助广大的青年徒工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够得到主席公公对青年徒工的指示和希望。稿子我已写好了，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一点点时间替我修改一下。”

二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十一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

三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

四

找王海容今天下午三时—五时来这里一谈。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上午

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60年10月17日）

富春[1]同志：

此件[2]很好。请你阅后，送陈伯达[3]同志一阅，并请他找几个人看一下，研究一下，替中央起草一个电报[4]，将此件介绍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党组（因为牵涉到工业、商业、交通、教育各方面），予以研究，大力推行，迅速办理。

毛泽东
十月十七日

另外，请书记处统计一下，各省、市、区压缩劳动力到农业第一线，各有多少，共有多少，何处成绩大，何处成绩小，告我为盼！

---

[1]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山西省委1960年10月12日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内容如下：（一）今年农忙的4、5月份，全省参加田间劳动的劳动力大为减少，只有240万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而且

女多男少，老多壮少。不但数量减少了，而且质量降低了。(二) 在农忙季节占用劳动力过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基本建设战线，林牧副渔四业，生活福利方面、县和公社两级的工业及其他企事业，脱离生产的青少年学生增加过猛。(三) 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生产战线。必须首先统一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明确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四) 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采取的措施是：(1) 为保证钢铁生产方面需要的劳动力，工业企业要改善劳动、生产组织，精简管理机构，压缩非生产人员，充实生产第一线；削基建，保生产；从城市人民公社中为大工业补充一部分劳动力；今后三五年内一律不得从农村抽调劳动力。(2) 必须保证在农忙季节有80%以上的劳动力参加田间劳动。(3) 坚决压缩县、社、管理区占用的劳动力，充实田间生产。(4) 水利等农村基本建设主要放在农闲时搞。(5) 县、社工业，要精简一部分劳动力回农业生产战线。(6) 适当控制中等学校以至高等学校的发展速度。从今年开始，农村高小毕业生一半升学，一半回农村生产。(7) 县社脱产、半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一律解散，所有人员回队参加农业生产。(8) 全省要动员城镇30万人回农业生产战线。(五) 截至9月下旬统计，已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达110万人，使参加田间生产的人数达到370万，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4%。(六) 为防止今后各系统再从农业方面挤劳动力，必须严格遵守劳动力调配计划，严禁私招乱用。(七) 为把压缩回农村的劳动力及农村的青少年和壮年稳定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最重要的是把公社办得更好，具体应做到：(1) 坚持人民公社以队（管理区）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2)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分配政策。(3) 加强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特别是劳动管理工作。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中共中央1960年10月27日下发了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村劳动力问题的报告的指示，指出："农村劳动力问题是目前发展农业生产的一大问题，是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持续跃进的一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人是每天要吃饭的，不论办工业、办交通、办教育、搞基本建设，办任何一项事业，都离不开粮食。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当忘记这个最简单的、千真万确的道理。""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认真地研究山西的报

告，参考山西的经验，从各方面研究，严格遵守党中央历次颁布的关于节约劳动力的各项指令，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业缺乏劳动力的严重状况。”

对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二批特赦和减刑战犯名单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60年10月20日）

此件[1]送少奇、富春[2]同志阅看，在书记处通过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日

---

[1] 指公安部党组1960年10月17日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首批战犯特赦后，我们对继续关押的战犯进行了“改恶从善”的教育，多数人向着好的方向转化。根据中央关于每年特赦一批战犯的指示，今年特赦战犯名额以比去年增加一些为好，拟为50名，比去年多17名。同时，为有利于加强已判刑战犯的改造，并为今后的特赦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今年还提出21人的减刑名单。被特赦战犯的安置，仍按去年的原则，有家可归者一律释放回家，无家可归者暂不安排工作，立即给以生活安置。今后释放的战犯，均应把生活安排好，给以必要的适当照顾，并有人负责教育管理，以利进一步改造。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1960年10月，毛泽东等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代表。

1960年，毛泽东和贺龙亲切交谈。

和斯诺[1]的谈话

（1960年10月2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是哪一年离开延安的？

斯诺（以下简称斯）：一九三九年。一般说来，我对美国的情况不十分了解。我在中国住了十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又是驻苏联和欧洲的战地记者，只在一九五〇年我才真正住在美国。在这个期间，美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技术方面，这种变化尤其巨大。

毛：我们在对美国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点。科学院应该有一个所，至少有一个专门研究美国问题的组。要有一批人专门研究美国，注意美国各阶层的情况。除了上层的以外，你所说的那些中层、下层的舆论我们也要注意。

斯：关于台湾问题，不知主席有没有看到在美国所进行的一场激烈辩论？是肯尼迪[2]和尼克松[3]两个人关于马祖和金门问题以及美国对远东政策问题所进行的辩论。

---

[1] 斯诺，即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作家、记者。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毛泽东会见了他。1937年，他发表《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复社出版中译本时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新中国成立后，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3次到中国访问。

[2] 肯尼迪（1917—1963），美国民主党人，当时是美国参议员、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3] 尼克松（1913—1994），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副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196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为其签名。

毛：看了一些。

斯：他们争论得那么激烈，报上经常出现马祖和金门的名字，所以有一个人就编了一个笑话，说人们已经忘了两个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忘记了他们叫尼克松和肯尼迪，而以为他们叫马祖和金门。

毛：他们拿这个问题用在他们的竞选上面，这是因为美国人怕打仗。这两个岛靠大陆太近，肯尼迪就用这点想争取选票。

斯：但是，这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舆论有很大的分歧。一般说来，人们对这次竞选反应冷淡，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很多人反对美国的现行政策，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毛：尼克松有他的想法，他说非保护这两个岛不可。他也是为了争选票。这个问题使美国竞选有了生色。尼克松讲过了头，他说

得好像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美国国务院说没有义务保护这两个岛。究竟保护不保护，要看时局，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由总统作决定。这是艾森豪威尔[1]两年前的声明。

斯：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根据美国的宪法，新总统在十一月初选出后，还不马上上任，而要等到明年一月。他们说，如果肯尼迪当选，而中国却在十一月六日去占领金门和马祖，那时怎么办?

毛：他们是这样提问题的?

斯：直到明年一月，艾森豪威尔还是总统。

毛：我们不是这样看待这两个岛屿的。我们对这个问题有过公开声明，就是让蒋介石守住这两个岛屿。我们也不切断他们的给养。如果他们给养不够，我们还可以接济他们。我们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是台湾和澎湖列岛，包括金门和马祖，这都是中国的领土。关于这两个岛屿，现在在蒋介石手里，还可以让他们守住。看来，美国竞选的人还没有查清这个材料。

斯：很可能。

毛：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争的?我们要的不只是金门、马祖这两个岛屿，而是整个台湾和澎湖列岛。这个问题可能要搅很长的时间。现在已经搅十一年了，比方再过两个十一年吧，或更长的时间，都有可能。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放弃台湾。它不愿意放弃，我们也不去打，我们和它谈判[2]，先在日内瓦，后来在华沙。它在台湾，我们也不会打。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这条道理美国政府早已知道。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我们过去有过公开声明的。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的，美国可以放心继续霸占台湾。

---

[1] 艾森豪威尔，当时任美国总统。

[2]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

今年已经是十一年了，又过十一年，再过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吗？也许在第三十二年，美国会放弃台湾的。

斯：我想主席是要等到蒋介石的士兵都成了三条腿的人的时候。

毛：主要是美国政府的问题，不是蒋介石或者其他人的问题。蒋介石的人如果成了三条腿，台湾还是有人的，还是有两条腿的人。人是能够随便找到的。

斯：主席是否真的认为，美国的立场还要十一年，甚或二十二年才会有改变？美国的局势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要变起来也会是很快的。这种变化当然同外来因素有关。总之，局势会起变化的。

毛：也许。你在你的文章里有一条，说我们对美国承认中国的兴趣比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小，好像我们对进联合国的兴趣要大一些。我看，不是这样，不能这么讲。在联合国里，是不应该由蒋介石代表中国的，应该由我们代表，早就应该如此。但是，美国政府组织了多数国家，不让我们去。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并不急于进入联合国。急于要我们进入联合国的是另外一些国家，当然不包括美国在内。英国现在不得不听美国的话。但是，英国的本意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外无法无天，不如把我们套在联合国里守规矩好。有相当多的国家希望中国守规矩些。你知道，我们打过游击，野惯了。那么多规矩，令人难受，是不是？不进联合国，对我们有什么损失呢？没有什么损失。进联合国有多少好处呢？当然，有一些好处，但说有很多好处就不见得。有些国家争着要进联合国，我们不甚了解这种情绪。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联合国”，我们的一个省就比有的国家大。

斯：我也经常这样说。

毛：他们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就和国民党那时对我们的经济

封锁一样。很感谢国民党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搞，致使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搞生产。国民党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还给我们发饷，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就实行封锁。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们自己搞生产，不依赖他们。现在美国也对我们实行封锁，这个封锁对我们有益处。

斯：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主席就对我说过：我们有八点要感谢国民党的。一点是，因为共产党发展太慢，所以国民党就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我们更快地发展；另一点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新兵太少，所以蒋介石就把更多的人关到监狱里去，等等。后来，主席的这几点意见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愈是压迫人民，人民的力量就发展得愈快。

1960年，毛泽东会见斯诺。中为马海德。

毛：就是这个道理。

斯：你在你的一篇文章[1]里说：帝国主义的规律是，反对殖民地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他们对中国的封锁肯定是失败了。但是，这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这种想法。现在他们又在酝酿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我认为，这也是要失败的。很难理解他们想从此得到什么结果，不过看样子，他们还是要对古巴实行禁运的。

毛：现在是部分的禁运，这对古巴没有多大影响；有可能走到全面禁运，影响就比较大些。但是他们要把古巴卡死也不可能，古巴是有路可走的。现在古巴总比过去我们在延安好。

斯：在你一生中，当你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你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毛：我们是有过那样的时候的，比如，打败仗的时候，当然不高兴。我们打过败仗的。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2]，那是最大的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也克服了。我们用适当的政策，把张国焘率领的部队争取过来了。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合在一起了。还有

---

[1] 指《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

[2] 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长征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擅自率部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并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8年4月，他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

贺龙率领的部队[1]，是在我们这一方面的。

斯：主席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北京，外地去过哪些地方？

毛：我在北京一年顶多四个月。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你去过西安，我就没有去过。新疆、青海、宁夏、甘肃、云南、贵州，我都没有去过。我每到一个地方，愿意看一看，和工人、农民、干部谈一谈。

斯：主席访问美国的可能性如何？

毛：（对马海德[2]）你们在医学上发明一个延长寿命的办法。我今年六十七岁，如果把我的寿命延长到九十七岁，那我就有希望访问美国了。

斯：我相信主席不必等到九十七岁就会访问美国的。

毛：也许我错了，你正确。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是我错了。事情很难预先料到。我没有想到，抗战胜利后只要四年，解放战争就会胜利。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提持久战，提战争的长期性，不敢提要打几年。打了两年后，我们肯定地说，解放战争打五年就可以了，那是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结果三年就胜利了。

斯：我记得在保安[3]的时候，曾经问过主席革命要多少时间才能取得胜利。

---

[1] 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令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2] 马海德（1901—1988），祖籍黎巴嫩，生于美国，1933年来中国从事医疗工作，1936年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顾问。

[3] 保安，今志丹县。

毛：那时还没有抗日的事情。

斯：我提出，两年吗？当时主席笑了一笑。后来我又问，五年？十年？当时主席说至少十年。我当时觉得那等于永久也胜利不了。

毛：你太性急了。结果我们用了十二年多。

中国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实在难以忍受。自己没有工业，粮食不够得进口，棉花得进口，工业品也得进口。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是很穷的，就是工人、贫农、雇农，革命主要是靠这些人。还有百分之二十是城市里的小资产阶级，农村中的中农和富裕中农。剩下的百分之十左右就是地主、富农、城市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国有文化的主要是这一部分人。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是识字的，就是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富裕中农。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去都是文盲。当然文盲不等于就没有文化，他们有些人会做很好的手工艺品，我们这房间里的雕刻可能都是不识字的人干的。

斯：对，不识字不等于没有文化。我看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十年内使全国的文化水平这样迅速提高的原因。我回到中国以后，发现已经无法区别农民、工人、城市居民、学生和所谓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了。

毛：区别还是有的。只能说有所改变，生活水平也有所改善，但还没有基本改变。美国人的情况我不知道，欧洲人每人每年要吃上几十公斤的肉。中国人基本上是吃素的，肉类也吃一点，但吃得不多。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要几十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

斯：主席刚才讲的正好回答了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你们十年来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也许要不了那么长时

间。也许我在时间计算方面又过分乐观了。所以我想问，主席认为中国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方面达到美国现有的水平？美国现在每人每年平均收入是两千美元，也就是说五千元人民币左右。

毛：那就难计算。半个世纪够不够，现在也还不能回答。美国独立有一百八十五年了，美国的建设花了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除了独立战争[1]时期的反英战争和为了解放黑奴而进行的南北内战[2]以外，你们国内就没有经历过什么战争。你们的地方特别好，气候和地理条件都很好，两个大洋保护着你们。但主要条件是你们一百七十多年前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国内没有过封建地主所有制。

斯：十年来你们一直生活在巨大变革中。你们觉得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而感觉不出自己的发展速度。我的情况不同，我在四十年代离开中国以后，现在又回来，对我来说，这些变化是惊人的。在写报道时，除非我加上许多背景材料，否则很难使人相信我看到的一切。

毛：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基本变化。中国的变化主要是在革

---

[1] 独立战争，指1775年至1783年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年5月殖民地代表召开会议，任命华盛顿为殖民地反英军队总司令，并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1783年双方签订《巴黎和约》，正式承认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

[2] 指南北战争，是1861年至1865年由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代表北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并采取其他民主措施，激发了工人、农民和黑人的革命斗志，因而联邦政府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命方面，这方面是基本变化了。至于建设方面，现在才刚刚开始。你如果讲得神乎其神，人家就不相信你，因为不合乎事实。比如我看到外国报纸上有人说，中国现在没有苍蝇、没有蚊子了。这就不合乎事实。

所以，说有所改变是正确的，说基本改变了是不符合事实的。你说人的精神面貌改变了，这是合乎事实的。革命工作的结果，把人解放出来了。至于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过去的十年才是开始。

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有很多科学项目，我们还没有着手进行。因此，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但是，比起蒋介石统治时期，我们是前进了一步。比蒋介石时期好，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还要多少时间呢？还要几个五年计划才能基本上解决机械化的问题和工农业扩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中国有进步，初步有些成就，但是并未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面貌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斯：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你们就会达到工业化的目标。到那个时候，由于原子能和电子学的广泛应用，世界的经济基础将会有很大的改变。当然到那个时候，或者比那个时候要早得多，中国也会有原子能。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要得到原子能，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中国一旦有了原子弹，就会马上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毛：不会的。原子弹哪里能乱甩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甩，乱甩就要犯罪。

斯：尽管中美之间现在并没有和平条约和协定，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实际上处于半战争状态，但是全世界的和平每天都取决于中国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首先是对中国人民的，其次也是对全世界的，而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您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毛：对。不管美国承认不承认我们，不管我们进不进联合国，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是要担负的。我们不会因为不进联合国就无法无天，像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我们要维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战。我们主张国与国之间不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但是，维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点我们是要坚持的。虽然如此，我们不打。美国人在那里，我们去打吗？我们不打。美国人走后，我们就一定打吗？那也不一定。我们要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台湾问题。我国好多地方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北京就是用和平方法解决的，还有湖南、云南、新疆。外面有一种说法，好像在各国共产党中，中国共产党特别调皮，不守规矩，不讲道理，是乱来的。你来了几个月，那种话不可全信。你讲过外面有人说，中国是一个大兵营和一个大监狱。对蒋介石的中国这样说，确实是像的，当时北京、南京、上海确实都是兵营。解放后，通过改造、教育，中国大有不同了。

斯：我的确能够说，我的印象是中国现在同过去大为不同了。

对中共中央答谢古巴人民社会党的电报稿的修改[1]

（1960年10月22日）

祝您们在进一步加强革命力量的团结，保卫与推进革命的斗争中，在菲德尔·卡斯特罗[2]英雄领袖的领导下，在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和战争势力、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胜利。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古巴万岁！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万岁！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1960年10月22日答谢古巴人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的电报稿的修改。

[2] 菲德尔·卡斯特罗，当时任古巴政府总理。

关于为黄绍竑、刘王立明[1]摘掉右派帽子的批语[2]

（1960年10月26日）

送总理、富春阅。

黄绍竑、刘王立明二人以摘掉右派帽子较为有利。请总理、富春最后确定。如今后发现他们又有严重反动，甚或反革命行为，那时酌情再处，我们仍有主动。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二时

---

[1] 黄绍竑，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刘王立明，曾任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

[2] 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1960年10月14日关于当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单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黄绍竑从划为右派分子后，没有发现什么反动言论。刘王立明划为右派分子后，学习积极，承认自己的思想感情有问题。反右前（1956年8月）她在世界妇女节制会上抵制过台湾代表，驳斥帝国主义污蔑'中国贩卖鸦片'的谰言。我们反复考虑似以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为有利。是否摘掉，请中央决定。"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将这一报告转送周恩来审阅后再送毛泽东等。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富春的报告上。10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当年拟摘掉属于中央审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名单，黄绍竑、刘王立明均名列其中。

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1]的批语

（1960年10月26日）

请刘、周[2]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毛

廿六日上午

---

[1] 指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1960年10月21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将这一调查材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李富春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印发胡乔木关于推广小球藻等粮食代用品生产的建议[1]的批语

（1960年10月27日）

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研究、推广。

毛泽东

1960年10月27日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60年10月27日写信给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有其重大意义：1. 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 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3. 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此外，它几乎不与农作物争地、争水、争肥、争劳力。因此，我想建议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及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公社），在各省农业会议上讨论，并逐级负责作出安排。南方可以终年生产，北方冬天要修温室，现冬天就要到来，更是时不可失。”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这个建议。

印发河北省关于农村口粮标准、办好食堂和分配等问题的措施的批语

（1960年10月27日）

此件[1]印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参考。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指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1960年10月20日口头汇报的要点，主要内容如下：（一）关于农村口粮的安排，坚决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明年全省包产产量为182亿斤，力争增产20亿斤，征购54.6亿斤。增产的20亿斤全部为储备粮，其中2/5为小队所有，2/5为大队（基本核算单位）所有，1/5为公社所有。公社动用储备粮，要经过县里批准；小队和大队的储备粮，实行民主管理，采取大队、小队、群众三级商量和两把锁的制度，防止浪费和损耗。（二）办好食堂采取两个措施：一是专门给食堂拨出菜地，社员自留地在外，这样办好食堂有物质基础；二是派最好的干部认真办食堂，建立制度，杜绝各种不合理现象。（三）今年分配坚决做到“两卡”“一抓”“七落实”。“两卡”，一是卡总收入70%给社员；二是卡分配给社员的部分中工资占70%，供给部分占30%。“一抓”，即抓财务管理。“七落实”，是指分配中的征购、口粮、工资、种子、饲料、肥料价款、超产奖励等项目落实。（四）对于处理“共产风”问题，决心按中央新精神办理，彻底清理和偿还公社化以来“一平二调”的部分，并立即组织工作组搞试点。

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1]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1960年10月28日、29日）

一

田家英[2]同志：

写得很好，略有修改[3]，请你及伯达[4]同志加以斟酌。如认为可以，即可付印。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上午

---

[1] 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而作的，发表在1960年11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十、二十一期合刊上。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常务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3] 本篇三、四、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二

退田家英同志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九日上午

三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当时有一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在好几年内占领了党的领导机关，把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大批正确领导同志打下去，使这些同志抬不起头来。“左”倾冒险主义者否认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看不到中国革命必须经过的由小到大、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急于夺取大城市。

四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胜利，在当时革命力量削弱到只剩下十分之一的情况下，迅速地重振起来，保证中国革命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五

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和摧毁革命人民的国家机器，而革命人民的神圣任务，就是保卫、发展和强化这个革命的国家机器，以达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在随后打倒那敢于向革命力量进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目的。

中央转发安徽省委关于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0年11月2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发中央各部委、各党组：

现将安徽省委1960年10月28日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认真看一遍，吸取安徽经验，结合你们自己的情况，定出办法，迅速施行，越快越好。我们希望你们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月两个月内，开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并向中央都写一个报告，是为至要。

中央

1960年11月2日

二

恩来、富春、震林[2]同志阅后，两天内请富春用电报发出，勿误为盼！

附件用后退我。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二时

---

[1]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各县召开五级干部大会贯彻政策情况给中央和毛泽东并华东局等的这个报告说："从十月初开始，我们以县为单位分别召开了生产组长以上的五级干部大会，全面检查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风、巩固人民公社的一系列指示及各项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到会干部及社员代表，全省共计三十六万五千余人。会议的开法是：（一）由县委书记作报告，总结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指出某些社队中存在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检查县委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的缺点，表示领导决心。（二）讲解省人民委员会两次布告所宣布的各项具体政策，其中包括加强生产小组责任制；固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实行定产量、定措施、定工分、定奖惩的制度；加强耕畜、农具的保养和使用；认真执行评工记分、超分奖励办法；保留社员必需的自留地；合理处理社员私人积肥；充分利用空隙地，交生产小组集体种植，用于改善社员生活；大量种菜；大量养猪；干部要参加劳动；实行劳逸结合。（三）在弄清政策、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群众性的检查评比，表扬好干部，揭发和处理坏人坏事。（四）各级领导订出贯彻执行政策的具体措施，安排好当前的生产。为把会议精神贯彻到群众中去，县的会议结束后，各地都分别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单位召开社员大会，普遍进行传达，逐条讲解省人委的两次布告。同时，抓紧政策兑现。由于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政策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人人兴高采烈，

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目前在贯彻政策中，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我们已责成各级党委普遍进行复查，保证中央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及各项政策落实兑现。”

[2] 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的批语和修改

（1960年11月3日）

一

恩来同志：

作了一些修改[2]，有几点是重要的。请你召集富春、震林、鲁言、正人、伯达[3]谈一下，最后酌定。

毛

三日早

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4]

二

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在1967年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完成的一年以前，坚决不变）。

三

实现了基本社有制，甚至像现在的国营工厂一样，变为全民所有制，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即是说，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而不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四

在现阶段，在很长的时期内，至少在今后二十年内，人民公社分配的原则还是按劳分配。

五

一心一意地发展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力争1961年多打粮食，获得大丰收。并且力争以后几年，例如说，一连六七年（1961年至1967年）使粮食和农业作物得到大丰收，使粮食问题基本过关，至少初步过关。中央相信，这是有可能的，只要大家努力执行中央政策，端正工作作风，就可以做到。

六

这个文件，除宣读外，各级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开办训练班，学习一次，二次，三次。今冬一次，明冬一次，后冬一次。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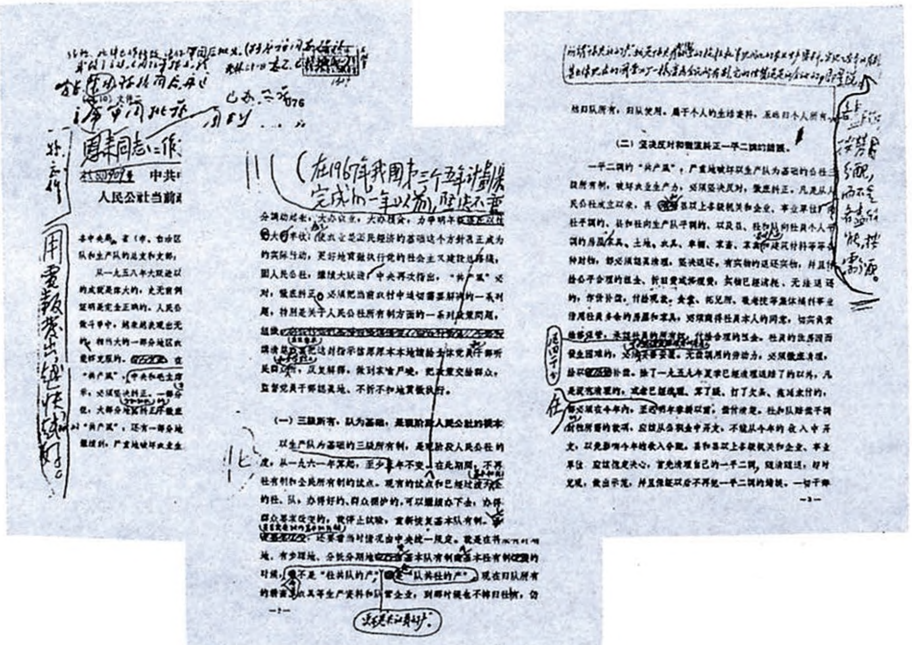
[1] 周恩来1960年10月31日送毛泽东审阅的这个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指出，“共产风”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必须把当前农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政策问题，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一系列政策问题，向各级党组织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把政策交给群众，发动群众监督党员干部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指示信的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2] 本篇二至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此外，在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的第四页上，毛泽东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在当前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一句中的“必须在一定时期内稳定下来”，改为“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在第七页上，将“养猪应该两条腿走路，公养和私养并举，公养猪应该以小队和食堂为主，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一句中的“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改为“社员户养猪也应该鼓励”；将“公积金和公益金合计的比例，一般以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到十为宜”一句中的“百分之五到十为宜”，改为“百分之五左右为宜”。在第八页上，将“对于收入少、公积金少的穷队和遭灾歉收的队，他们扣留的公积金，公社提成的比例可以更低一些，也可以不提成”一句中的“可以更低一些，也可以不提成”，改为“应该更低一些，或者不提成”。在第十页上，将“三五年内，县以上各级各单位都不许再从农村抽调劳动力”一句中的“三五年内”，改为“五年内”。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中，以上各处都遵照了毛泽东的修改。

[3] 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正人，即陈正人，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4] 毛泽东在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稿的最后一页上，将下发日期改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一紧急指示信。



1960年11月3日，受毛泽东委托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党全国。图为毛泽东对指示信的批语和修改的手稿。

1960年11月3日，毛泽东会见南非共产党主席达杜。

1960年11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北京亲切交谈。

1960年11月，毛泽东设宴欢迎胡志明访问北京。

1960年11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宴会上亲切交谈。

在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稿[1]上的批语

（1960年11月3日）

退富春[2]办。

---

[1] 周恩来1960年10月23日报送毛泽东等核阅的这一中央通知稿说，中央曾多次指示全党同志不请客，不送礼，不讲阔气，不讲排场，各地区各部门执行这一指示是有成绩的，但也有少数地区和部门执行得不够坚决。为纠正一切铺张浪费现象，再作如下规定：（一）一切机关、厂矿、企业、部队、学校、团体、人民公社，都不准向任何单位和个人赠送或变相赠送礼物。（二）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只能对直接主管部门送一份样品。不许以献礼或其他任何名义赠送上级领导机关或其他单位和个人。（三）中央和地方各级负责人下去视察和参观时，当地负责人不得迎送，严禁组织群众迎送；生活招待一切从简，禁止举办宴会和特殊招待，吃饭应按标准收取费用和粮票。（四）精简会议。凡不需要或者可以不开的会议，应当一律不开；凡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应当不开；凡性质重复、任务相同的会议，应当合并召开；凡必须召开的会议，应当压缩参加人数，并且严格执行财政部规定的会议开支标准。（五）从中央机关到人民公社，今后7年内，一律不准新建招待所和其他非生产性建设。如遇特殊情况需要新建时，须报中央或省、市、自治区批准。现有招待所必须精简人员和设备，提高使用效率。在审阅时，毛泽东将这一通知稿的下发日期改为“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日”。

[2]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三周年的电报[1]

（1960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最彻底的革命，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纪元。四十三年来，世界局面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社会主义已经在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占土地面积四分之一的地区取得了胜利。现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空前强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各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蓬勃发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勃列日涅夫的电报。祝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

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空前孤立，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历史已经证明，还将继续证明，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道路。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大团结和坚持不懈的斗争，是挫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有力保证。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胜利实现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七年计划方面，在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这些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人民将继续同苏联人民一道，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中，携手前进。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正在改变着自己国家的面貌。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兄弟般的援助。对此，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坚如磐石的中苏友谊和团结，是任何力量破坏不了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妄想破坏这个友谊和团结的任何企图，过去没有得逞，现在和将来也永远不会得逞。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继续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继续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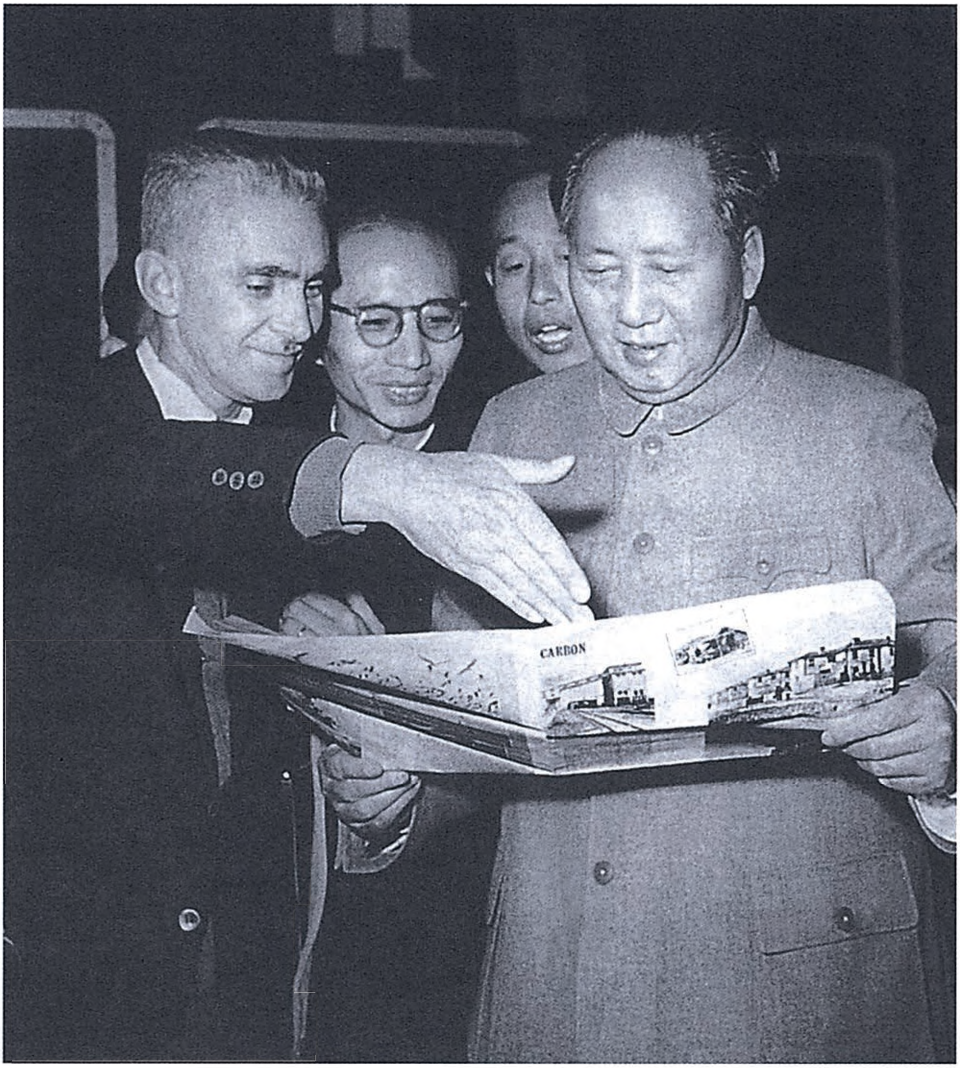
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共产主义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1月6日于北京

1960年11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外国新闻工作者。

资料图片



1960年11月，毛泽东和来华访问的巴西记者在一起。

对《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1]一文的批语

（1960年11月11日）

退陈伯达[2]同志：

此文看过，可用。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一日廿四时

---

[1] 指拟在《红旗》1960年第二十二期上发表的《工农业并举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规律》的社论稿。社论稿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农业放在经济问题中的首要地位，同时又讲过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个创造性的新概括。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发展农业，这两件事是互为条件、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正是正确地表述了农业需要同工业密切地同时并进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规律。为更好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进一步处理农业发展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关于农业生产力的问题，主要是在各个经济部门更合理地安排劳动力，使农业生产第一线保持足够的劳动力；一个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主要是坚持和巩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这将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目前农业发展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为此，我们要积极推行农业技术改造，但在目前只能在局部地方逐步实现农业

机械化。因此，保证足够的农业劳动力是保证农业发展的头等要素，也是保证工业和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头等要素。农村中劳动力的合理安排，最重要的是解决农业和非农业两个方面的安排问题。不能任意地从农业生产方面抽调劳动力。党中央提出在各个经济部门合理安排劳动力，使农业生产第一线能够保持和配备足够劳动力这个方针，是一个掌握经济规律的问题。在社会生产中，劳动力的节约是最大的节约，我们要避免劳动力浪费。妥善地解决劳动力节约和合理分配，就农村来说，这是同坚持和巩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分不开的。三级所有制，是现阶段人民公社最好的根本制度，是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根本制度，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稳定下来。1960年1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十二期发表了这个社论。

[2] 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对《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等文章的批语[1]

（1960 年 11 月 12 日）

请林克[2]找到这些刊物和报纸（载了那些人的文章的），送我一阅。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0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上，该版在《学术动态》栏目中登载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的讨论》和《河南哲学工作者讨论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两篇述评。第一篇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哲学工作者就错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以及质变状态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是由薛靖在《新建设》1960年第六期发表的《统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一文引起的。继而言立在《新建设》第七期上发表不同意见。以后，《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又发表了周书文、吴秉元、唐凯麟、砢几等人的讨论文章。现在这个讨论已初步展开。文章还简要介绍了他们的不同观点。第二篇说，据《中州评论》十八期报道，河南省一些哲学工作者8月底到9月初对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但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统一性也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多数人不同意上述意见，认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不是矛盾双方的统一性，而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60年11月15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1960年11月10日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的第一页上。中央五人小组的这一报告说，中央一级机关各单位对抽调万名干部下乡的工作，决心大，行动快，迅速掀起了下乡上山支援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据11月9日统计，已初步确定下放干部10176人，占中央机关干部的7.33%。这次干部下放农村，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大力宣传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掀起了要求下放的高潮，做到了大多数干部心情愉快，树立了改变农村面貌的壮志，使留下的干部也受到了教育。为确保下放干部政治好，身体好，完全自愿，到农村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准备在名单公布后，拿出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些干部组织起来，学习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政策和决议。同时对每个人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了解和审查，凡不符合条件的坚决调换，对确实不愿下去的也决不勉强。宁肯下放人数少些，也不能降低质量。对下放干部的分配，重点加强农村，适当照顾其他基层。到农村去的重点是那些农业生产任务重、问题多、基层严重不纯的地区。这些干部下去后，原单位的党组织要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次下放的干部，一般要下放3年，少数编内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采取轮换办法。五人小组的报告讲到对这次下放的干部要进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大讲形势”，毛泽东在“大讲形势”4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一

总理：

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以上请你酌定。

毛泽东
十五日晨

二

全国大好形势，占三分之二地区；又有大不好形势，占三分之一的地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五个月工作的转变，一定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邪气下降，正气上升。

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1960年11月15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1]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2]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3]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4]，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

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二

即送周、朱、富春、震林、先念、伯达[5]同志阅后，请富春办。

因文件较长，只能印送，请富春注意，印送越快越好。不发西藏、新疆。

毛泽东

11月15日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0年11月12日关于纠正“五风”给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并毛泽东的报告。其内容如下：（一）送上《沔阳县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和《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的变化》两个材料。看看这两个材料，可以使人早下决心，更坚定地去纠正“共产风”。（二）省委宣传通海口公社的经验后，全省大部分县都已先后进行了试点，少数县已向面上铺开。（三）为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指示”，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已于11日开始。会议围绕“苦战三年，总结经验”这一主题，采取群众路线、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先集中揭发错误，然后再作全面评价，目的是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接受3年来的教训，使全党思想一致，团结一致，去战胜当前的困难，夺取农业丰收。这次会议中，讲对讲错，一律不记账，不戴帽子；要求地、县委首先批评省委，然后县委批评地委，最后是省、地、县三级作自我批评。总之，要建立

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制度。会议打算开10天左右，开长开短，以解决问题为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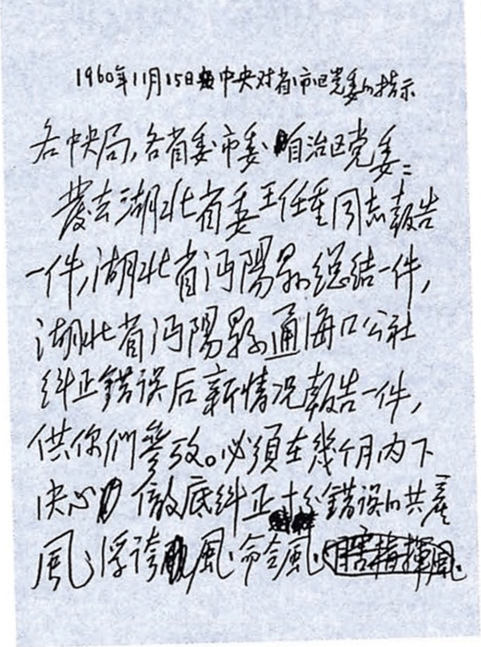
[2] 指中共沔阳县委1960年11月3日关于贯彻政策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一) 我们以贯彻省委“十项政策”为中心，开展了群众性整风整社运动。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已基本结束。这个阶段，主要是解决“共产风”和瞎指挥生产的问题。从揭发情况看，全县所有公社，问题都极为严重，在经济、政治上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二) 对过去所犯的政策错误和作风问题进行了纠正，有的还在继续纠正。对“共产风”中的损失，坚决兑现，物在还物，物不在赔钱。其他政策问题，根据省委“十项政策”一一作了检查处理。干部强迫命令、瞎指挥，都向群众作了深刻检讨。(三) 经过整风整社，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干群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密切起来了。生产形势变了，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四) 这次整风整社的经验，就是通海口公社总结的五条：领导下决心，干部、群众“两头挤”，把兑现抓到底，明确地划界线，与生产扭在一起。此外，我们也有些新的体会：运动必须坚持分批展开，要不断壮大干部队伍；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反对政策兑现中的“恩赐观点”和少数干部包办代替的做法；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一方面正确掌握政策，一方面紧紧地依靠群众；必须把政策、作风、生产、生活紧紧地扭在一起，以处理“共产风”为重点全面贯彻“十项政策”。经验证明，纠正“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哪里搞得彻底，哪里工作就能前进。

[3] 指中共沔阳县委第一书记马杰1960年11月9日关于通海口公社贯彻政策后变化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通海口公社经过这次贯彻省委“十项政策”、坚决纠正“五风”之后，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群众心情舒畅，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消除了，对党的政策信任了，普遍树立了兴家立业、当家做主的思想，人人关心生产，爱护公物，生产队则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经营条件。干部作风有了显著改变，参加劳动已开始形成制度，通过生产了解了实际情况，克服了工作上的主观主义；通过处理“共产风”，干部的政策水平有了提高，纠正了强迫命令、瞎指挥，使党群关系密切起来，干部工作也好做了。这些变化，大大推动了生产和生活，使得生产出现高潮，生活面貌发生了改观，鼓舞了社员群众夺取明年大跃进的信心。今年冬季，将根据中

央“十二条指示”，继续开展整风整社。

[4]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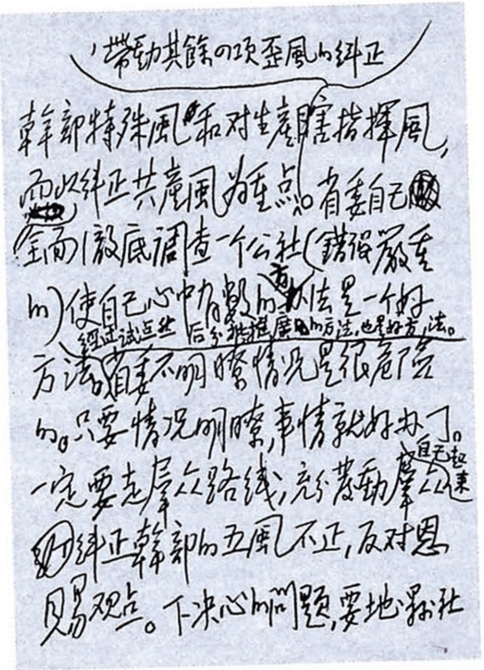
[5] 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先念，即李先念，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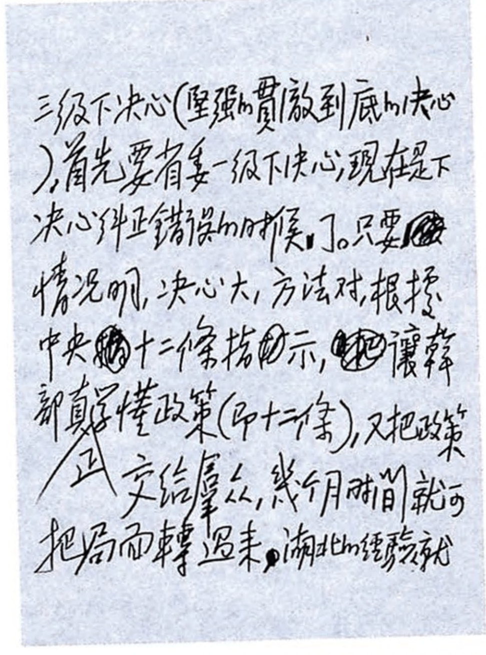
1960年11月15日中央对省、市、区党委的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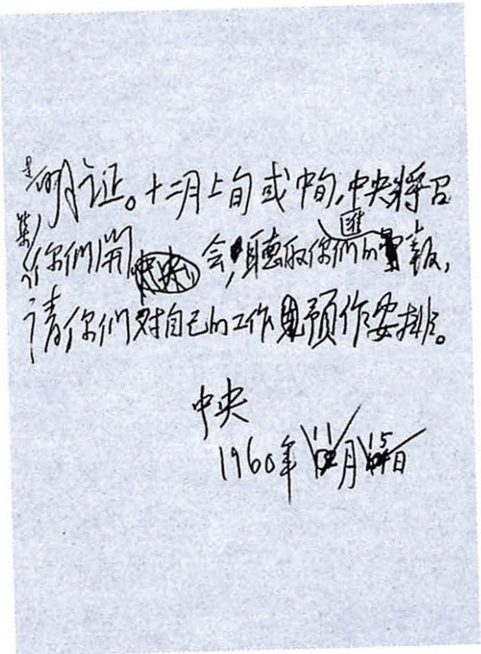
发去湖北省委王任重同志报告一件，湖北省沔阳县总结一件，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公社纠正错误后新情况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



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办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然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方法。省委不明瞭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瞭，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



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懂得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



是明证。十二月上旬或中旬，中央将召集你们开会，听取你们的汇报，请你们对自己的工作预作安排。

中央

1960年11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的手稿。

在林彪[1]不同意军队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60年11月15日）

请富春告肖华[2]照林彪同志意见[3]办理。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 林彪1960年11月10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说：送上总政治部关于通令各地驻军向各地党委反映地方情况的建议一份。我认为这个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顾虑这个通令发下去后，各地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容易弄坏，对于党的统一领导等不利，会造成军队在党外来干预党的工作的情况。军队干部对地方工作并不比地方同志熟悉，且很容易受家庭和富裕中农的影响，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在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工作中，如该地党委规定要军队担任反映地方情况的任务，军队可照指示负责反映，这作为局部的具体做法是可以的。如该地党委并未规定军队这项任务时，则军队不可任意干预。军队对地方的意见只能向军队政治部反映。考虑到上述情况，因此我不同意通令军队把反映地方情况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在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1]的第二次报告[2]上的批语

（1960年11月20日）

---

[1]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2] 中共甘肃省委1960年11月5日给中央、西北局的这个报告说，我省三级干部会议从11月6日开始，在肯定大跃进以来成绩的基础上，严肃检查了省委在执行中央有关农村人民公社方针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从会议头几天揭发的材料来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在我省是相当普遍、严重的。省、地、县、社各级和工农商学兵各部门，都向公社和生产队伸手拿东西，都有“平调”。全省560个公社，“共产风”刮得严重的占29%，没有刮的只占1%。“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挫伤了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耕畜、劳力大量减少，耕作粗糙，播种面积缩小，产量下降，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与1958年冬季的“共产风”相比较，去年以来的“共产风”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大量平调社、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平调了社员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特别是大办食堂时平调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数量很多。去年算账以后之所以又刮起“共产风”，根本原因是干部思想认识有问题，特别是省委在执行中央方针政策上有缺点和错误。在讨论中，大家检查了以下四种思想：（一）急于过渡。（二）不能正确理解政策与任务的关系。（三）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广，盲目执行。经过讨论，大家认为，判断一种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刮“共产风”的做法，不仅是方法上、作风上的错误，在方向上也是一种严重的偏差。纠正这种错误的主要方法，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严肃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

一

可看，应看。

二

陈伯达[1]同志：

此件送上一阅，请于阅后退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上午七时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中央转发四川省委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1]的情况简报[2]的批语

（1960年11月23日）

一

各中央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

[1]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2] 中共四川省委给西南局并报中央、毛泽东的这一简报的内容如下：一、接到中央11月3日的紧急指示信后，各试点公社都采取了干部会、社员代表会和社员大会等形式，原原本本地逐条予以宣读讲解。虽然不同类型的试点公社各有不同的反应，但总的情况是好的，都很快地起到了安定人心、激发群众积极性、推动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的作用，使部分干部的一平二调“共产风”和其他歪风开始有所收敛和改变。二、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拥护的重点各有侧重。少数人则表现出了程度不同的顾虑和抵触情绪，其中大多是乘一平二调之机手脚不干净，或在工作上、作风上有严重错误的人。另外还有一些地、富、反、坏等分子乘机破坏和富裕农民浑水摸鱼。三、试点中已经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正确、及时的，因而具有强大的威力。省委决定，凡生产进度慢、任务完成不好的地方，立即进行中央规定的十二条政策的宣传，表明兑现的决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当前的生产和工作，做出成绩，以便集中力量在12月份开展整风整社运动。

发去四川省委1960年11月20日简报一件，供你们参考。

中央

1960年11月23日

二

周、富春、震林[1]阅后，即用电报发去，然后交伯达[2]一阅，原件用后退毛。

---

[1] 周，指周恩来。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对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60年11月25日）

周总理：

此件[1]如未看过，请看一下，退回子恢同志。子恢同志最近考察了山西、河北、安徽、江苏四省，有些好的意见，你有暇时，可找他一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五日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60年8月26日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的问题给中央并上海局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在讨论中央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时，具体讨论了重点商品粮地区的问题。我们认为，除了进一步加强领导，深入发动群众改造落后队以外，还必须从负担政策、粮价和使用国家扶助穷队资金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支持这些地区发展生产。近几年这些地区不断发生问题，今年春季发生饿、病、逃荒现象的也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在一些问题特别严重的地区，几年来生产发展很慢，有的甚至停顿下来，致使群众情绪低落，生产力受到一定破坏。除了领导和工作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于负担过重，收入少。商品粮重点县中，有10个县1959年粮食征购任务平均每亩负担在300斤以上。商品粮重点产区，农业税又比其他地方重，

越是人均产量高的地方，农业税率就越高。此外，粮价低也影响了这些地区农民的收入。我们研究了这些情况后，认为要大办粮食，必须采取以下措施：（一）根据几年来的情况，在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合理调整各县市之间的征购任务。（二）降低重点商品粮地区的农业税率，原则上不超过定产产量的11%。（三）有重点地调整粮价，准备把产商品粮1000万斤以上的公社，每斤提高一分钱。（四）国家扶助穷队的资金，主要用在重点商品粮地区，帮助这些地区的穷队发展生产。11月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给毛泽东写信说："你那天说没有看到《浙江省委关于重点商品粮地区存在问题》的报告，现将此电报查出送上，请收阅。"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邓子恢的来信上。

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批语

（1960年11月28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1960年11月25日报告[1]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

---

[1] 指中共甘肃省委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给中央、西北局并发各地、市、州委和各县委的第四次报告。报告说，我省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执行中央政策问题，研究不够，领会不深，贯彻不力，甚至产生了一些偏差。例如，急于由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忽视小队小部分所有制和小队工作，对发展生产队的经济重视不够，收益分配政策定得不恰当等。第二，在指导人民公社发展生产和农村工作安排方面，没有把安排工作和贯彻政策结合起来，提出的任务大，要求急，对需要考虑多，对可能考虑少，等等，因而出现一些违反政策的事。第三，关于领导作风问题，对农业估产偏高，要求过高过急，作了一些不恰当的宣传，助长了“五风”的出现。

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1]，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1967年以后

---

[1] 指毛泽东1958年8月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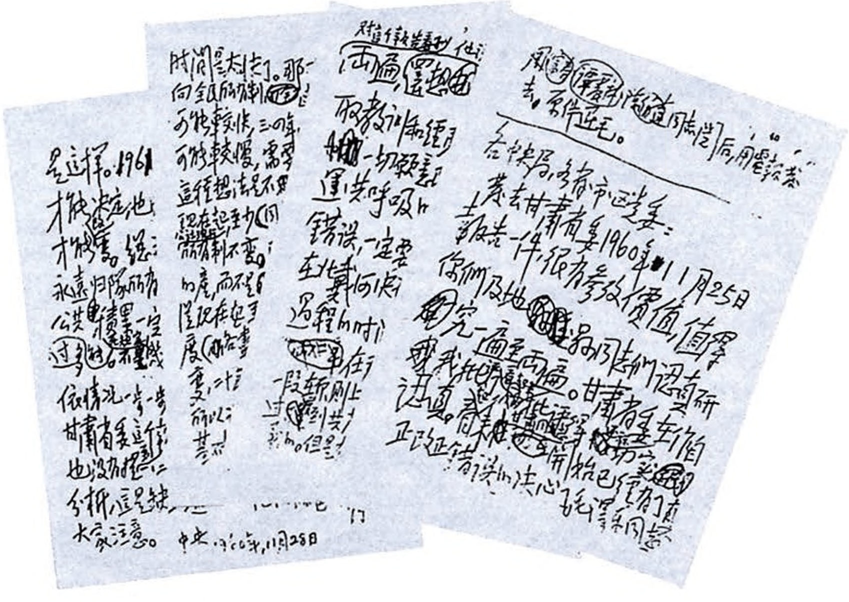
1960年11月28日

二

周、富春、谭震林、陈伯达[1]同志阅后，用电报发去。原件退毛。

---

[1] 周，指周恩来。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的重要批示》的手稿。

中央转发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的报告的批语

（1960年11月28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浙江省委1960年11月20日报告[1]一件，供你们参考。中央认为这个报告反映了浙江的实际情形，对各地有参考价值。

中央

1960年11月28日

二

周、富春、震林、伯达[2]阅后，用电报发去。不发西藏。除中央批语外，原件也不发浙江。原件用后退毛。

---

[1]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执行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紧急指示信给中央、华东局报告的主要内容如下：（一）9月底、10月初，省委根据中央大办

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讨论了今冬明春的工作，以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为主题，开展整风整社。会后，多数领导干部深入下去，进行整社的试点工作。11月4日，接到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当即传达下去，已普遍和群众见面，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大大推动了当前的生产。但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还存在着怕变等忧虑。目前我们正在把运动逐步引向深入，踏实解决思想问题、各项政策问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问题。（二）11月14日，省委常委开会，讨论了中央指示，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深刻体会到“五风”的严重危害。“五风”屡反屡犯的根源是我们对发展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现阶段人民公社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这两个根本问题理解不深，执行不坚决。在讨论中，大家指出：1. 过去对坚持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三级所有制认识不足。对农村中出现的严重情况，没有着重从所有制和政策方面来检查，而简单化地认为这是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过这次讨论，才认识到这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违背了这个客观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只有认真解决这个思想问题，把所有制踏实稳定下来，不乱出新花样，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2. 对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过去也认识不足。由于我们对农业产量估计过高，在实际工作中不自觉地削弱了农业这个基础。一方面，在安排劳动力和安排计划中，忽略了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安排；另一方面，又不承认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不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办事。3. 对干部中的“五风”，过去虽然反复进行批评，但没有抓到根本问题。从领导上来检查，一是对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的各项政策认识不够明确，对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不够；二是在任务要求上过多、过死、过急，不实事求是，使得有些干部不敢讲真话，以致滋长起虚报浮夸和强迫命令的作风。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上到下，大家一齐检查，一齐改正。（三）今后工作安排。1. 省委决定在11月至12月，先后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以县为单位举行的五级干部会议，着重解决对中央指示的认识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彻底揭发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划清思想、政策界限，表扬好的干部，批评处理极少数严重违法乱纪的坏分子。2. 从现在到明年2月底以前，在全省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整风整社运动。3.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对极少数坏分子，及时严肃处理。属于思想作风问

题的，留待运动后期，按中央指示的原则加以处理。

[2] 周，指周恩来。富春，即李富春，震林，即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0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亲爱的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六年来，勤劳、勇敢和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霍查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战胜了重重困难，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且以高速度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从而根本改变了自己祖国的面貌。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经提前一年实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工业生产指标和农业合作化的任务，并且以更高的热情和信心迎接规模宏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我们深信，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辉煌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和战争阴谋，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正义斗争，对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维护世

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高举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同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忠诚，赢得了各国共产党人的尊敬。中国共产党因为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样一个坚强的战友而引以自豪。

中阿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兄弟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国人民始终团结一致，密切合作，互相支持。中国人民深深感谢阿尔巴尼亚人民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加强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兄弟友谊，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完全符合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利益。我们深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今后共同斗争中，必将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衷心地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胜利。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1月28日于北京

关于资本家下放问题的批语[1]

（1960年11月29日）

恩来同志：

第四、第五、第六页请看一下，资本家下放农村很紧张，似以下放城市企业为好，如何，请酌定。童少生的意见似可考虑。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九日五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1960年11月25日编印的一期内部刊物上。这期刊物的第四、第五页刊载《北京市资产阶级分子对精简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普遍感到紧张、恐慌》一文。文章说，北京市资产阶级分子对下放农村安家落户不仅中下层有震动，而且上层也有震动。有的上层人士说："现在真是紧张得不得了，我是衷心地跟着共产党走，但越来越感到困难。"东城区工商联负责人说：我实在过不了这三关，一是劳动关，二是个人主义关，三是生活方式关。在中下层，由于下放的可能性更大，有的感到前途茫茫，有的心情紧张，精神恍惚，甚至有咒骂共产党的。近来装病请假、领取定息、吃团圆饭、抢购商品的人有所增加。这期刊物的第六页刊载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童少生对私方人员下放的若干具体建议。建议说，私方人员的下放可采用几种办法，第一种是采用现在干部下放的办法，由国家机关管起来。他们在公社劳动，虽然工资领得多，但不直接在公社拿，公社不会有意见，这些下去的人保持了原薪，也可以安心。第二种是下放到工矿，等于从一个工业区调到另一个工业区，这没有什么问题。第三种是采用重庆的办法，把年老的集中起来搞农场，干部或年轻的轮流下去。第四种是采用在原系统或原单位搞蔬菜基地的办法，工资仍在原单位领取。

河南党外人士反映一条[1]，可以看看。

---

[1] 指这期内部刊物上刊载的《河南一些党外人士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一文。文章说，河南一些党外人士阅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后，政协曾经组织他们进行座谈。座谈中，一般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政策，有人认为这是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对症良药。不少人相信中央的政策贯彻下去后，农村一定会起很大的变化，农业问题可望得到解决。他们都表示，向他们传达党内文件，让他们全面了解农村问题，是党对他们的信任，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干部一样”，因而很受感动。在学习中，还有人谈到，这次“中央是以纠正偏差来刺激生产积极性”，这个指示“对于稳定生产情绪会起很大作用”，过去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也有人认为“底下干部闹得太不像话啦”，“不整也不行啦”。

1960年12月3日，毛泽东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

1960年12月，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黎笋。

1960年12月，毛泽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阮志清亲切握手。

1960年12月，毛泽东和胡志明观看中国文化部举行的欢迎胡志明及越南代表团的演出。

1960年12月，毛泽东、胡志明和演员们握手。

给黄炎培[1]的信

（1960年12月5日）

任之先生：

惠书收读，甚谢！阿尔及利亚总理阿巴斯回去后对法新社记者讲了一篇话，叙述我规劝他不杀俘虏的政策[2]对于瓦解敌军有很大的效力。这篇谈话登在不久前出版的《参考资料》[3]上，现在找不到了。现在找到十二月三日下午版《参考资料》第41页[4]寄上。美国刊物上所载的这些话，就是阿巴斯总理对法国记者所说的，可以一阅。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五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参见《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总理阿巴斯的谈话要点》。

[3] 这篇谈话登在新华通讯社1960年11月22日下午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三九七四期上，题为《法〈快报〉记者评述阿巴斯对他谈毛主席的谈话》。

[4] 此页刊载了新华通讯社1960年11月12日发自日内瓦的电讯稿《美〈民族〉周刊注意毛主席对阿巴斯谈俘虏政策》。其中说到，美国《民族》周刊本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恐怖的手段和效果》，摘要如下：阿尔及利亚

战争打破了这样的幻想——酷刑已经随着宗教裁判而过去了。在这个可怕的战争中，阿尔及利亚人擅长使用暗杀手段，而法国人则使用酷刑，但都没有收到效果。在过去一两个星期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受到极其不同的两方面人士的劝告。巴黎大主教和法国军队的副主教发表了一封教书，谈到了罗马天主教在这方面的责任。毛泽东在阿巴斯访问北京时对阿巴斯发表的父辈般的谈话补充了这位红衣主教反对军事上使用残酷手段的说教。据突尼斯《行动》报报道，毛先生对阿巴斯先生说，在对日本和对国民党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从未杀过一个俘虏。毛的忠告是值得深思的，虽然它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忠告。

《红旗》编辑部给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的信[1]

（1960年12月6日）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2]，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3]，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0年12月6日

---

[1] 这封信是毛泽东于1960年11月28日写的。12月6日，他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信中个别地方也相应作了修改。

[2] 这篇文章是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

员会写的，题为《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文章说，哈尔滨机联机械厂利用旧机床部件、汽车变速箱、工字钢和钢轨等，根据具体加工对象，拼凑成各种积木式的活动机床，解决了小厂不能制造大设备的困难，使工厂产值跃增了7倍。对于这一经验，我们专业的师生连续两年进行了研究、总结和提高。机床是用来切削加工的机器，存在着切削刀具与工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着机床的发展和变化，无论车、铣、钻、刨、磨床等，都是如此。一般地说，在这一矛盾中，工件系统经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的主要方面也转向刀具系统。在一般大型机床中，工件越大，机床也就越大。积木式机床抓住了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把工件系统与刀具系统分开，使之固定在地面上不动，省去了工件运动的部分，这样刀具系统就不受工件大小的影响，小机床也能干大活，解决了缺少大机床的困难。由此可见，积木式机床是符合机床发展规律的，它使加工大型零件机床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从工件系统转化到刀具系统，是带有普遍意义的机床发展方向，对今后的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主要是：(1) 根据对切削过程基本矛盾的认识，可以进一步研究积木式机床通用的积木块和特殊积木块问题，为大量生产机床创造条件。(2) 精密、特种机床和一般机床的主要不同点也在于工作部件，可以将它们和积木式机床联系起来，设计一些特殊的工作部件，就可以在普通机床厂生产精密和特种机床。(3) 进一步研究“以小干大”的积木式机床对解决大型零件的加工问题，具有很大意义。(4) 许多新的加工方法，由于在加工的同时也改变工件的性能，这必将引起机床的进一步革命。(5) 用通用的传动及支承部件加上特殊的工作部件来组成机床的原理也适用于其他机器。(6) 认清了机床的矛盾发展，不仅使我们在科研中明确方向，而且使我们决心在机床教学中来一次彻底的改革。《红旗》杂志1960年第二十四期转载了这篇文章。

[3] 《红旗》杂志1961年第九、第十期合刊发表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机床及自动化专业教师集体讨论、侯镇冰等人执笔写成的一篇较长的文章，题为《再谈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和机床的“积木化”问题》。

1960年12月9日，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由刘少奇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归来。

转发《代食品会议情况反映》的批语

（1960 年 12 月 12 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请你用电报发给各省、市、区党委阅读。虽然已过去一个月了，但是仍然有用。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姚依林1960年11月12日整理的关于代食品会议情况的材料。其要点是：（一）各地代表一致认为谭震林副总理的报告明确了推广代食品的方针、政策，解决了很大问题。有的说，过去对粮食、蔬菜只重视数量，没有强调质量，只考虑如何用代食品填饱肚子，现在才懂得还要注意营养。今后要根据每种作物的不同养分来安排生产，为此要求科研部门提供各种作物所含养分的资料。（二）对于大搞代食品，各地劲头很大，一些干部已打电话回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三）关于如何开展推广工作问题，各地都进行了讨论，打算建立机构，安排劳力，做好生产计划，进行技术培训。（四）大家一致认为，开展这一运动，必须做好思想工作，改变群众对菌类的看法，同时要解决一些实际问题。1960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区党委转发了这个材料。

对《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1]和中央转发这一决议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0年12月14日、21日）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1960年10月20日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草案中说，9月14日至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作出如下决议：（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发扬三大民主；（三）大兴“三八”作风；（四）开展兴无灭资斗争，反对不良倾向；（五）思想工作要着重抓活的思想；（六）把党支部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七）加强青年工作；（八）政治指导员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九）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十）大力加强军事技术、业务和科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十一）积极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好民兵工作；（十二）加强党委对部队政治思想的领导；（十三）改进政治机关的工作方法；（十四）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

[2] 本篇一是为审阅、印发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1960年10月20日）写的批语；本篇二、三是对这一决议草案的修改，本篇四是对这一决议修正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本篇五是在这一决议修正稿中加写的文字；本篇六是在中央转发这一决议的指示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2月21日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一

刘、朱、周、邓、彭[1]各同志：

此件经过修改，修改处并已征得军委及总政方面几个同志（罗、肖、刘志坚[2]）的同意，现送上，请审阅。希望在十天左右时间内阅完，交尚昆[3]印发党、政、军、民各系统，先发军事系统。文件虽长，但不难读。修改是陈伯达、田家英诸同志的一个小组进行的。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二

会议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实现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

---

[1] 刘，指刘少奇。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肖，指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就仍然存在。

三

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四

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好好学习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用以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

五

民兵必须注意成分的纯洁。民兵必须放在可靠的党员干部的领导之下。

六

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

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过去军队中理论研究工作的方法是读死书的方法，那是不正确的，十月军委扩大会议已指出了这一点，中央认为是正确的。

中央转发湖南省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部署报告的批语

（1960年12月22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湖南省委1960年12月18日报告[1]一件，供你们参考。

中央

1960年12月2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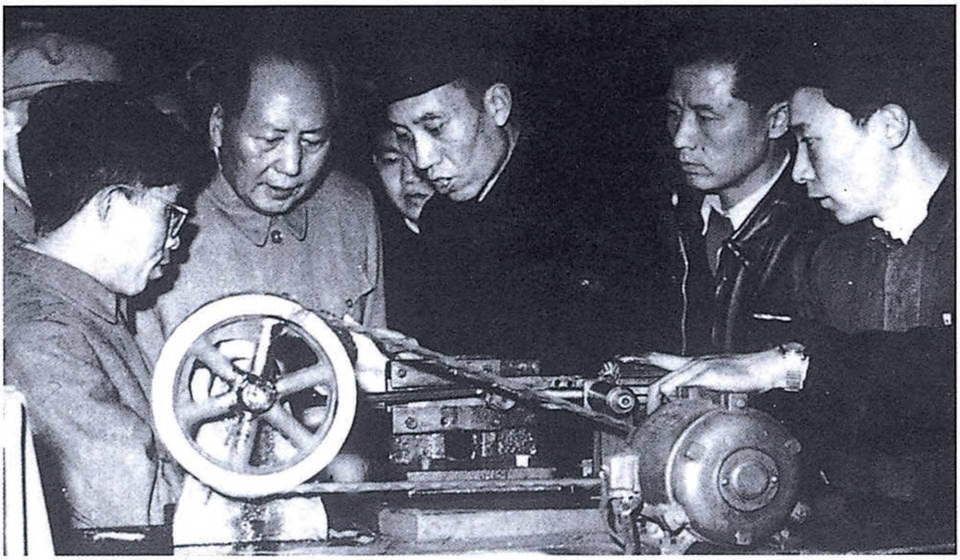
---

[1]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南局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说，我们准备在明年春耕大忙之前，从根本上把目前农村工作的被动局面彻底扭转过来。办法是坚决采取湖北省通海口公社的经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分期分批，由点到面。先搞情况严重的社队，再搞问题较多的社队。全省计划分三批铺开。已从11月初开始试点，大部分可在12月下旬告一段落。这批试点对后面两批的工作关系极大，我们要求不得潦草结束，一定要扎实搞好。与此同时，各县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彻底解决领导上的问题。明年1月初可铺开第二批试点，1个月后，再铺开第三批。在集中力量搞点的同时，面上的工作由公社党委召开作业组组长即生产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来解决。对中央十二条指示，凡公社力所能及的，都要作出具体规定，贯彻执行。搞好这次运动的另一个关键，是整社工作队的干部不仅数量要大，而且质量要好，带队骨干的政治水平和理解能力一定要高于现有公社书记的水平。因此在组织整社队伍时，应对现有工作队进行认真的整顿。

二

刘、邓、彭真[1]阅后，交尚昆[2]用电〔报〕发去。另印发到中央会议[3]各同志。不发西藏。

毛



1960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汽车电器厂视察。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印发关于河北省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简报[1]的批语

（1960年12月23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河北工作组关于三个人民公社调查的简报，题为《鲜明的对照》，载于中央办公厅1960年12月15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六六四号。简报说，最近我们在河北省唐山市着重考察了丰润县王官营公社、玉田县沙流河公社和亮甲店公社。这三个公社两年来同样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但由于对党的政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工作作风，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中王官营公社地处丘陵山区，土地瘠薄，水利条件不好，两年来却保持了连续跃进，年年增产，生活安排好，群众情绪高，劳力外流很少。这主要是他们贯彻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的方针。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一）坚持以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二）劳力安排保证农业生产第一线；（三）大种高产作物和广种多收；（四）公社干部作风踏实，联系群众好，头脑比较清醒，不乱出新花样。沙流河公社自然条件比王官营公社好得多，粮食产量原来也高。但从1958年起，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外流，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现象大量增加。这种现象主要是“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造成的。直至最近，他们对于错误还不敢大胆揭露，采取隐瞒态度，党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至今未和群众见面。亮甲店公社土质肥沃，地势低洼，去年遭受严重水灾，估产过高，购了过头粮；干部作风恶劣，乱搞反瞒产，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今年3月，他们在一部分队进行“三反”，初步改变了干部作风，纯洁了组织，比较认真地解决了一平二调的问题。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丰收，人均产粮近800斤。目前群众情绪已安定下来，外流人口也纷纷回来了。以上三个公社的事实，证明了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

一

各位同志：

此件请你们迅速一看，并加以讨论。全国的情形，我看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好的、坏的、中等的三类。此件可以一直发到公社，请你们办理。

毛泽东
1960年12月23日于北京

二

伯达[1]即阅，送尚昆[2]印发到会各同志[3]。

---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印发谭震林关于粮食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0年12月23日）

印发各同志[2]，研究、讨论，是否适宜。

毛泽东

1960年12月23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1960年12月12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上。谭震林的报告说，今年粮食总产量估计为3700亿斤，或者略多一点，入仓量估计为3200亿至3300亿斤，全部统计好要到明年1月底。由于事前认识不足，在10月底以前吃粮指标还没有完全落实，前松后紧现象严重，农村口粮都很低，城市统销标准和出口也无法再压。根据这种情况，目前农村工作除认真做好整风整社工作外，首先必须抓紧粮食入仓工作；第二，要抓紧安排生活，认真办好食堂；第三，要认真做到最近3个月少吃，才能保证明年春季不发生闹粮事件。鉴于今年的经验，明年必须采取前紧后松的办法，夏收一开始就抓紧过秤入仓，计划用粮，采取低标准、瓜菜代、农忙多吃、农闲少吃的政策。争取明年丰收是一件大事，要达到比今年多收是完全可能的。明年农村口粮必须控制在每人每天1斤，城市统销每月42亿斤，这个计划是留有余地的。在批示印发时，毛泽东将谭震林的报告拟题为《粮的情况和用粮计划》。

[2] 指参加即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应当充分地批判地利用文化遗产[1]

（1960年12月24日）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

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你们提到中国的画家在抄袭西方的画法，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这种抄袭已经有几十年、近百年了，特别是抄袭欧洲的东西，他们看不起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拼命地去抄袭西方。我们批评这种情

---

[1] 这是毛泽东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况已有一段时间了，这个风气是不好的。不单是绘画，还有音乐，都有这样一批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如此，但要好一些。在这方面，我们进行过批评，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

毛泽东等祝贺中德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60年12月24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德两国所签订的友好合作条约，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发展的里程碑。它对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重大的贡献。

中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两国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加强和发展两国的友谊而努力。

祝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2月24日于北京

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当前市场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60年12月25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

[1] 中共陕西省委给西北局并报中央的这个报告说，目前我省市场总的形势很好，但许多主要商品的货源供应比较紧张，与群众需要尚有很大差距，如不及时解决，市场可能发生波动。为此，省委已成立市场领导小组，通盘布置，分批解决。当前突击抓，平时定期抓，个别问题随时抓，至少每月抓一次。对当前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的主要商品，省委已采取凭证定量供应等特殊措施，分别予以解决；对缺门商品和明年上海等三大城市对我省减少或停止供应的商品，我们本着自力更生的精神，大抓商品生产，力争逐步达到自给，所需原料纳入国家计划，由各主管部门负责供应。小商品生产实行五定办法，并以产品定厂名。农副产品的生产，特别是棉、油、烟、糖等经济作物和蔬菜，由农业部门安排好明年生产计划，任务落实到公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当前正在抓紧农产品和野生植物的采收，以增加货源；同时大抓商品分配，依靠群众做好供应工作，坚决反对私分商品、随便照顾、自立规章和商品供应“走后门”；迅速恢复农业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原料就地加工，节约运力。在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应加强修理服务。同时要广泛开展经济工作宣传，号召全省人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支援国家建设，争取我省市场情况的好转。

发去陕西省委1960年12月22日关于抓紧解决市场问题的报告一件，供你们参考。请各省、市、区党委在市场方面，仿照陕西的办法，切实抓紧解决。

中央
1960年12月25日

二

刘、邓、彭真、先念[1]、周总理阅后，尚昆[2]用电报发去，并印发到会各同志[3]。

毛泽东
廿五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为杨颖[1]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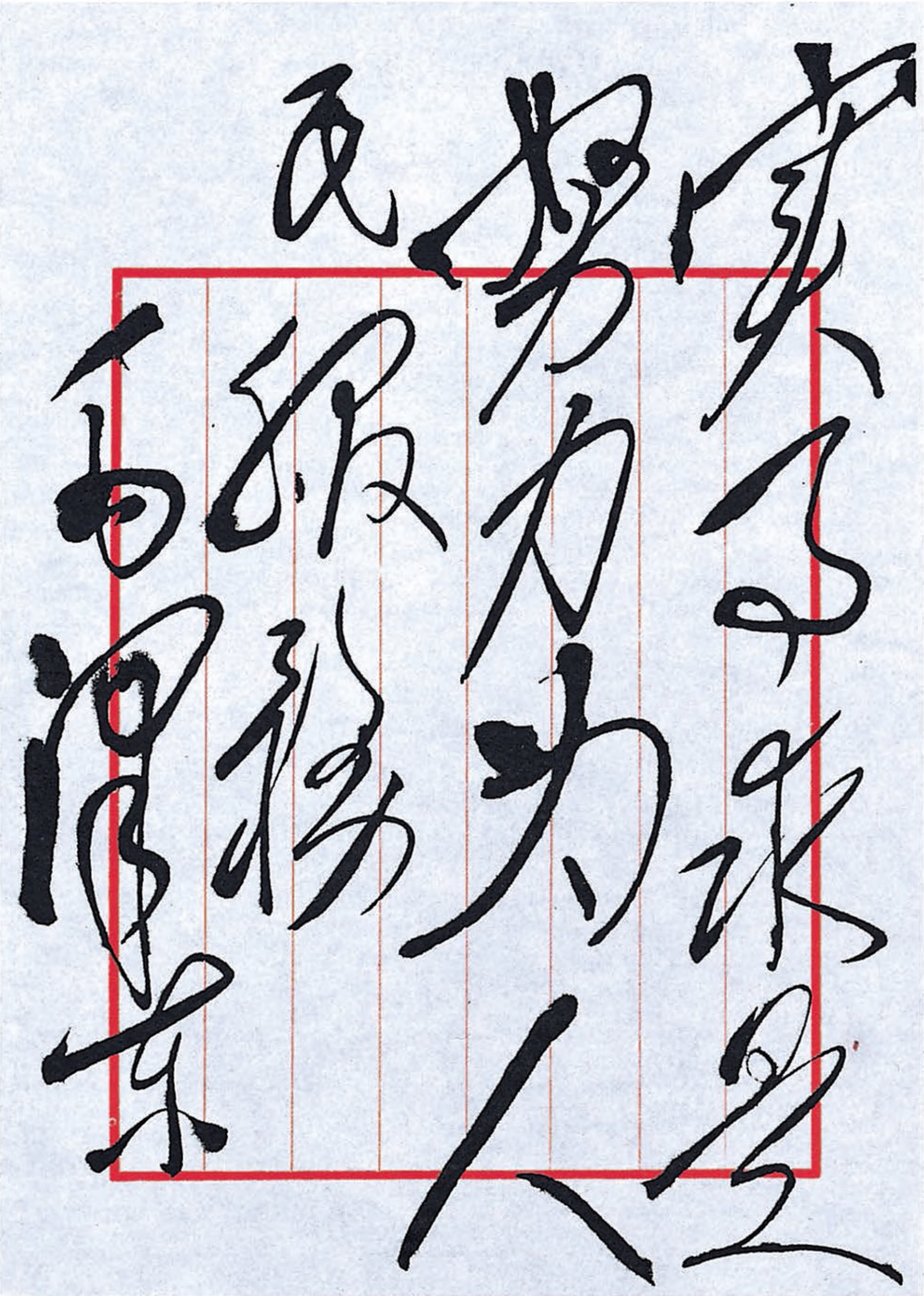
（1960 年 12 月 25 日）

实事求是，努力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

[1] 杨颖，当时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处长。



实事求是

努力为人

民服务

毛泽东

毛泽东为杨颖的题词。

要结合实际总结革命战争经验[1]

（1960年12月25日）

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2]。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还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呢？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

---

[1] 这是毛泽东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2] 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他们被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诬为“江西罗明路线”，遭到错误斗争。

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1]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能睡觉。准备了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

[1] 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信

（1960年12月26日）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1]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2]，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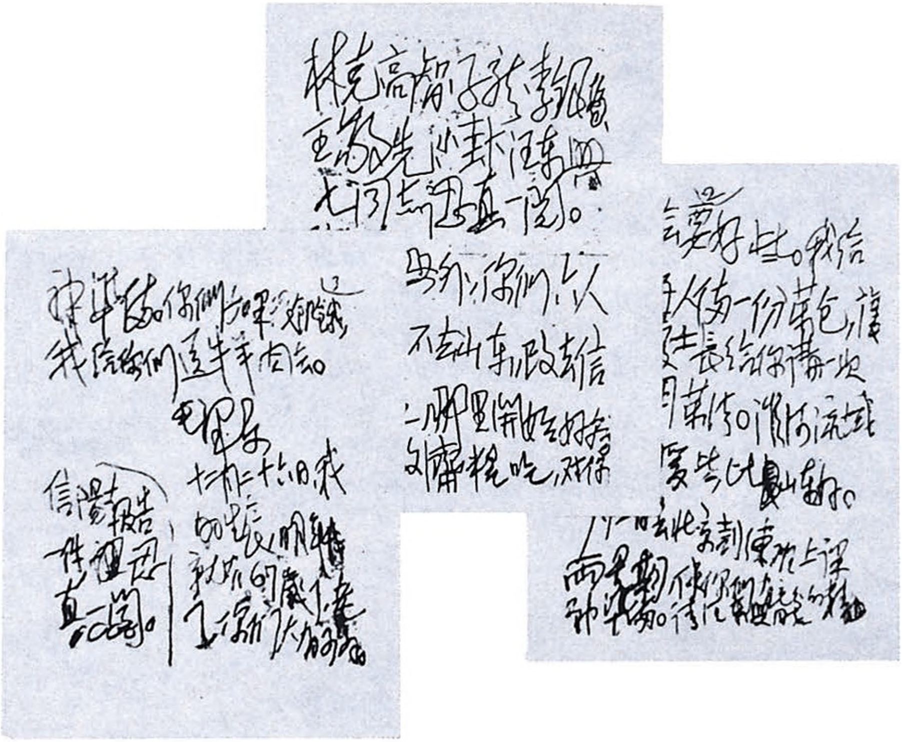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
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
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高智，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子龙，即叶子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李银桥，当时任毛泽东的卫士长。王敬先，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小封，指封耀松，当时是毛泽东的卫士。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2] 后来中共河南省委安排林克等6人去了许昌专区。

信阳报告[1]一件，认真一阅。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67岁生日。在纷至沓来的灾情面前，毛泽东心里惦念着劳动群众。这天，他写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派他们下去调查，以求了解真实情况。图为该信的手稿。

---

[1]　指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印发人民来信对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反映的批语

（1960年12月28日）

此件[1]印发各同志[2]。信内所提问题，请各组予以讨论。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0年12月17日整理的材料。材料中说，自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后，我们陆续收到各地的有关来信40多件。这些来信一致对中央指示信表示了极大的拥护，认为完全反映了农民当前的希望和要求。由于政策深入人心，社员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来信还提出以下问题：一、对政策能否兑现尚有怀疑。二、对指示信中规定超产主要奖现金不感兴趣，要求奖实物。三、对增产增购有意见，要求定产定购。此外，个别来信还提到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大，不利于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私养猪没有时间，农村干部要求实行休假制度等问题。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印发《在粮食问题上进行思想教育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一文的批语[1]

（1960年12月30日）

此件印发各同志[2]。锦州的经验很好，可在各工矿企业中推行，机关、学校、部队中也可推行。请各组同志讨论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60年12月26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一三期上刊载的这篇文章说，辽宁省委工业部10月24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辽宁省从五六月份以来，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闹粮的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闹粮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取这一办法的单位，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四〇一厂原有85%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9000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省委10月30日转发这一报告时指出，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办法在于深透的政治思想工作，进一步树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同时在干部中狠反右倾畏难情绪。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

（1960年12月30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1961年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最热烈最衷心的新年祝贺。

过去的一年是以社会主义阵营为核心的世界和平和进步力量进一步强大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进一步削弱的一年。刚结束不久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鼓舞了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深信，在新的一年里，各国人民必将取得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过去的一年，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世界强大和平堡垒的苏联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苏联人民的每一个成就和胜利都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一年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

好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不久以前，以刘少奇主席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苏联进行的国事访问，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久经考验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衷心地预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今后的共产主义建设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更为光辉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亲爱的同志们，祝你们，祝全体苏联人民新年快乐！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0年12月30日

1960年，毛泽东在北京。

印发关于美、英、苏农业劳动力负担情况资料的批语

（1960年12月30日）

一

印发各同志[1]阅。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二

陈伯达同志交来的参考资料[2]，他说未经详细研究。

---

[1]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摘抄的这份资料，内容如下：(一) 1958年，美国每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30个人消费的农产品。(二) 同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供应了全国需要农产品的50%，平均每个劳动力要供应26.7人的消费。(三) 同年，苏联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负担6.4人的消费。

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1]

（1960年12月30日）

退赔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认真退赔。大多数都要由各地自己退赔，县、社一定要拿出一部分实物来退赔，现在拿不出实物的，可以给些票子，这就叫兑现。十二条[2]已经向农民讲了，现在农民鼓着眼睛看着我们能不能兑现，不兑现不行。在两三个月内把兑现问题解决了，农民积极性就来了。

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平调农民的劳动果实，比地主、资本家剥削还厉害，资本家还要花点代价，只是不等价，平调却什么都不给。一定要坚决退赔，各部门、各行各业平调的东西都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都没有，公社只要有几个人、几间茅屋能办公就行。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它不是白手起家的，是“黑手”起家的。所有县、社的工业，房屋，其他财产等，凡是平调来的，都要退赔，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县、社干部可能会不满意，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得到农

---

[1] 这是毛泽东1960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插话的主要内容。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

[2] 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12条。

民满意，得到工农联盟。我们在井冈山时期红四军的布告中就讲平买平卖，“八项注意”中就有买卖公平这一条。平买平卖就是等价交换。我们历来主张买卖公平，等价交换。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搞来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搞来的？那不是白手起家的，要坚决退赔。县、社两级和有关部门都要退赔，有实物退实物，有钱退钱。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就得到了一头。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谁平调了谁赔。社、县、省这一头赔了，少了，那一头就有了；这一头空了，那一头就实了。那一头就是几亿农民。要纠正“共产风”，就要真兑现，不受整、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苦一下、痛一下，这样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一平二调是上面搞出来的，谁搞谁负责。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退赔也要有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方面，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应当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赔。退赔要让县、社两级干部思想上搞通，不通就不能改正。

这几年我们有些东西搞多了，搞快了，自己挨整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看来“五风”[1]中最普遍、危害最大的是“共产风”和瞎指挥风。首先要把它们整掉。究竟哪些是生产瞎指挥风要搞清楚，不然就会变成无指挥、无计划。

贪污赃款一定要退，一年退不起，两年，三年，不行十年也一定要退。东西赔光了，要以自己的劳动来偿还，不这样贪污现象消

---

[1]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灭不了。

机关、部队、学校圈用群众的土地，要坚决退还，机关、工厂的花园，通通都拿来种菜。今后发展副食品生产，只能开荒地，不能占用农民土地。李世民[1]胜利后封功臣，就是采用圈农民土地的办法。清军入关后也是如此。现在是军队、学校都圈地，又不给人家钱，这实际上是封建残余，一定要纠正。

现在这个时候不要讲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有的同志提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这几句话是好的。把问题弄清楚了，群众也清醒了，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也就明白了。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我们搞了十八条[2]，十四句话[3]，也搞了六条指示[4]，这些就是为了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交通，大办文教，又大刮起“共产风”。这就是前后矛盾，对不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叫大家去平调，但没有塞死漏洞。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很重要。以后不要前后矛盾，不要一

---

[1] 李世民，即唐太宗（599—649），626年至649年在位。

[2] 指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3] 指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59年3月5日通过的《郑州会议纪要》规定的作为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的十四句话。

[4] 指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问题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

面反，一面又刮；一面反，一面又提倡。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庐山会议[1]后，估计今年是好年成。一以为有了郑州会议决议[2]，有了上海会议十八条，“共产风”压下去了，对一个指头的问题作了解决；二以为反了右倾，鼓了干劲；三以为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四以为年成逢单不利逢双利。没有料到，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厉害，一九五八年只有四五个月，今年是一整年。敌人破坏也增加了，大办也不灵了，“共产风”大刮了。问题最大、最突出的是大搞工业，县以上工业抽调了五千万劳动力。一九五七年是二千四百万，一九五八年是四千四百万，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又增加了六百万，合计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二千六百万。当然，劳动力不完全都是从农村调来的，但是不管从哪里调来，总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比如吃粮就增加了嘛！

有几条经验教训：一、“共产风”必须反，不能掠夺农民，这是

---

[1] 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批评意见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在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八届八中全会后，错误地在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对彭德怀所做的错误结论。之后，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所做的错误结论也得到纠正。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2] 指《郑州会议记录》。

马列主义不许可的。二、几个大办又刮起了“共产风”，一说老风占的多，一说新风占的多，不管哪个多，总之是大刮，看起来只能中办、小办。三、抽调了大批劳动力，县以上工业就调了几千万。这三条经验教训，是主要的。要承认这些经验教训，不然就改不了。新增加的二千六百万人不回去，怎么得了？压下去是有困难的，但一定要压下去。

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要考虑到明年是不是还有天灾，天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不然明年又可能转不过来。

陈云[1]同志说的几条我都赞成。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今后几年都要注意。总之口粮标准不能高，好日子当穷日子过，有了储备，才能抗御灾害。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还要加上我刚才说的几条，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总的说来，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把整风搞好，把抽掉的劳动力压下去，把“共产风”搞掉，把坏人搞掉，几个大办变成中办、小办。这样粮食生产多了，就可以多吃点粮了。还有，多产的要多吃一点，要有差别。

分析起来还是大有希望，过去三年的经验教训很有帮助，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就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1]和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0年12月31日、1961年1月1日）

一

发给各同志[3]。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

毛泽东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

刘、周、朱、陈、邓、彭真[4]即阅，尚昆[5]印发。

三

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整社，一边抓生产救灾，一边抓群众生活。这三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

---

[1] 指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报告说，从12月8日至14日，我们先后召开了地委常委和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对今后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作了部署。(一) 我区整风运动已普遍展开，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结合整风，广泛宣传贯彻了中央关于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普遍开展生产救灾工作，安排群众生活，发放大批救济物资，采取各种措施减轻疾病的蔓延，开展多种经营，执行半日劳动半日休息制度，活跃集市贸易，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二) 必须根据上级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这一补课任务是艰巨的，应该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1. 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2. 要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3. 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4. 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5. 组织处理工作是体现政策和巩固斗争成果的重要环节，必须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既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6. 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7. 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三) 对当前要做好的几项工作作了安排。

[2] 本篇一是对中共信阳地委报告写的批语，毛泽东为这个报告拟题：《一个重要文件》；本篇二是在中央1961年1月1日转发信阳地委情况报告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对中央指示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5]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毛岸青[1]的信

（1960年）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全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2]和她的妹妹少华[3]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4]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市委同志，医疗组织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是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

---

[1] 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当时在大连治病。

[2] 思齐，即刘思齐，现名刘松林，1949年10月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

[3] 少华，即张少华，现名邵华，1960年与毛岸青结婚。

[4] 娇娇，即李敏，毛泽东的女儿。

给林克[1]的信

（1960年）

林克同志：

冯契[2]著《怎样认识世界》一书，中国青年出版社印行，1957年出版，我想找四、五、六、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请你找一找。如找不到此书，则找别的青年人能够阅读的哲学书，要薄本小册子，不要大部头。

请你办一办，几天之内找来送我为盼！

毛泽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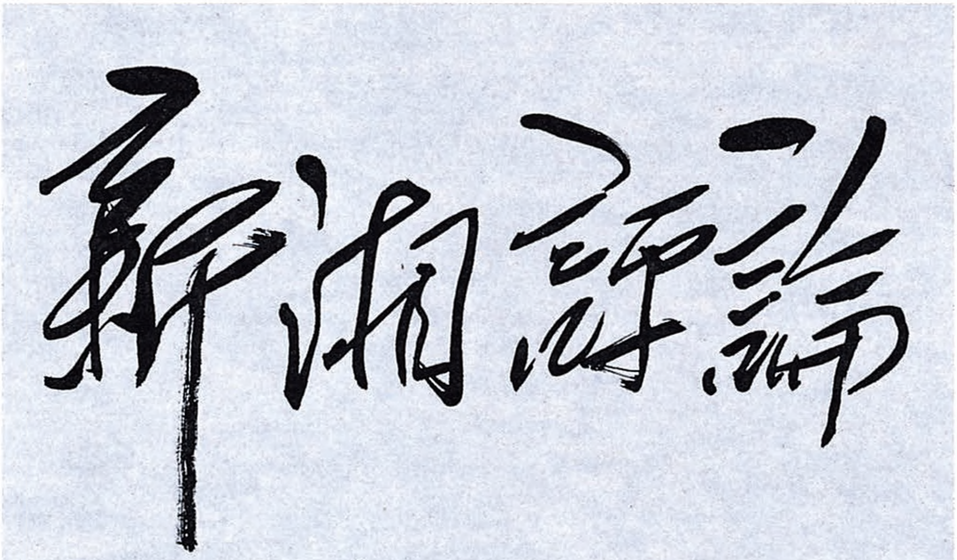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冯契，当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为《新湘评论》题名[1]

（1960年）

新湘评论



毛泽东为《新湘评论》题写的刊名。

---

[1] 《新湘评论》是中共湖南省委主管主办的机关刊，是党和人民的喉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毛泽东1960年亲笔题写《新湘评论》刊名。

请林克[1]查找现、战二韵所在声部的批语

（1960年）

林克同志：

现、战二韵，请你细心找一下，在去声。我找了老一会，不见，怪哉！或在上声也未可知。[2]

毛泽东

廿九日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现、战二韵，均在去声部。

1961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等对信阳问题批示的文件[1]的批语

（1961年1月5日）

---

[1] 指中共河南省委1961年1月3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和中南局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给各地委、郑州市委的指示。指示说，1月1日晚接到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从北京电话传来毛主席对信阳地委报告的批示（见《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之一），又于2日早晨接到中南局对这一报告的批示，省委常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些批示对于指导我省正在开展着的整风整社运动，特别是对于第三类县、社、队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揭开盖子，迅速夺回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任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省委要求各级党委根据主席和中南局的指示，学习信阳地区的经验，进一步分析本地区的阶级斗争形势，明确指导思想，不断进行分类站队，凡是属于被敌人篡夺领导权的县、社、队，一律采取信阳地区的办法，坚决地、迅速地夺回领导权，把民主革命补课搞彻底，绝不能有“夹生饭”。目前，我省的整风整社运动已经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全省局面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运动发展还不平衡。为了加强对整风整社运动的具体领导，上级党的组织要具体地帮助下级党的组织分析情况，分类站队，分清问题性质，划清界限，正确贯彻政策，讲究策略步骤。凡是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盖子已经彻底揭开的地方，应当十分注意总结和传播经验，并且要不断地整顿和纯洁整风队伍，以提高队伍的政策思想水平，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政策和违法乱纪现象，必须及时地严肃处理，并且要以实际事例教育干部，端正政策，改进作风。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河南省委1961年1月3日文件一件，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注意分别第一、第二类县、社、队和第三类县、社、队的不同情况，随时总结经验，予以指导，而把注意的重点放在第三类县、社、队方面。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数日前已发给你们参考，谅已收到。

中央

1961年1月5日

二

刘、邓、彭[2]阅，尚昆[3]办，同时印发到会[4]各同志。

毛

---

[1] 指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中共中央于1961年1月1日批转了这个报告。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指当时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1]

（1961年1月9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1961年1月8日关于拟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关于全国党政干部适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研究了各省的一些类似的规定和宪法、刑法草案、党章等，并与许多同志交换了意见，现拟了一个稿子送上，请看可否印发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拟稿中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三）保护人民财产，侵占损害人民财产要赔偿；（四）保护公共财产，贪污盗窃假公济私要赔偿；（五）用人要经过组织，不许任用私人；（六）对人要讲公道，不许陷害好人包庇坏人；（七）对上级要讲实话，不许假报成绩隐瞒缺点；（八）对下级要讲民主，不许压制批评压制上告。毛泽东将胡乔木的报告拟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经反复讨论、修改后，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下发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在党内公布。这次公布的“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印发各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一）是否目前颁发？目前是在全国20%的县、社、队夺取政权的问题，是否缓一下再发为宜？（二）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面作用。以上两项，请予讨论。

毛泽东

一月九日

关于推广锦州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经验的批语[1]

（1961年1月10日）

值得推广，但要注意解决一些实际上存在的问题。下面各

---

[1] 这是在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1961年1月9日关于锦州市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的经验报告上写的批语，毛泽东为批语和报告拟了一个题目《锦州经验是否值得推广?》。黄火青、周扬的报告说，锦州四〇一厂去年5月到7月，发生了职工闹粮问题。闹粮的原因主要是人们的心理紧张。造成心理紧张的原因有三：（一）城市副食品和蔬菜供应紧张；（二）这个工厂的职工家属绝大部分住在附近农村，农村粮食定量低，对职工有直接影响；（三）这一时期，工厂招收了七八百名盲流人员，这些人成分极其复杂，进厂后在工人中散布紧张情绪，扰乱了工厂秩序，引起工人不安。针对这种情况，厂领导于8月初，一方面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了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与少数闹得特别厉害的人在小组会上进行了辩论，逮捕了3个进行政治破坏活动的分子；另一方面加强了食堂工作，解决了贪污、浪费和无计划用粮等问题，实行了民主管理，保证职工按计划吃够自己的定量，而且吃得较好。在上述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接着进行了调整粮食定量的工作，号召职工节约粮食，压低了部分职工超过标准的部分。现在的实际问题是：一、职工家属的定量低，对职工仍有很大影响，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加强家属工作。二、一部分由工人中新提拔的干部，因为变换工种，吃粮标准下降幅度过大，应该有所照顾。三、对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照顾不够。四、全厂还有20多个浮肿病人。

件[1]，印发各同志[2]研究。

毛泽东
一月十日

---

[1] 指周扬1961年1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和他随信向毛泽东报送的关于锦州市四〇一厂解决职工闹粮问题的经验报告、中共中央办公厅1月3日编印的《情况简报》上刊载的《目前学校工作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情况》、中央宣传部1961年1月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二期上刊载的《从关心群众生活和耐心教育着手进行治安工作的一些好办法》。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

（1961年1月13日）

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们是向着摸清底的方向去做，这就进了一步。省委的书记、常委、委员，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就摸底吗？如果摸底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应该说，也比过去进了一步，在动，在用试点的方法去了解情况。

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一个省委第一书记，又要调查农村又要调查城市，这就要好好部署一下。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了解情况，要用眼睛看，要用口问，要用手记。谈话的时候还要会谈，不然就会受骗。要看群众是不是面有菜色，群众的粮食究竟是很缺，还是够，还是很够，这是看得出来的。

---

[1] 这是毛泽东1961年1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这次会议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

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工作，并不那么困难，时间并不要那么多，调查的单位也不要那么多。比如，在农村搞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搞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商店、一两个学校，加在一起也只有十个左右。这些调查并不都要自己亲身去搞。自己亲身搞的，农村有一两个、城市有一两个就够了。要组织调查研究的班子，指导他们去搞。比如宝坻县江石窝的调查，就不是我们中央去搞的，是中央农村工作部搞的。我看，这是他们的一大功劳。沔阳县通海口的材料，是湖北省的同志搞的；信阳的调查，是信阳地委搞的；灵宝县的调查，是河南省委的同志搞的。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一个公社平均有三十个生产队左右，他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不可能嘛！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

我们讲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

第二条决心大。这次会议我们开了二十几天，情况逐步明了了，决心逐步增大了，但是决心还是参差不齐。有些同志讲到要破产还债。这个话讲得不那么好听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要破产还债。县、社两级，如果为了还债，破产了，那就再白手起家。无产阶级

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来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是不是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都有那么大的决心破产还债呢？我看还要看。将来会出现各省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也是不平衡规律。要看究竟哪些省破产还债，彻底退赔，能将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个省内几十个县或者一百多个县里头，也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的。

第三条方法对。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注意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调查研究，情况明了来下决心，决心就大，方法也就对。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这三条里头没有提方针、政策，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方针、政策。有了好的方针、政策，你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没有。郑州会议的方针政策是对的，只有一条不对，就是不要算账。郑州会议是三月初开完的。有浙江的经验，有麻城的经验，到了四月上海会议就搞了十八条，决定旧账坚决要算。我写的那个批语[1]还早嘛。那两个月我动笔批的文字有两万字以上。打笔墨官司没有多少用，两万字也好，再加一

---

[1] 指毛泽东1959年3月30日在陶鲁笳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的批注。

倍也好，不起作用。底下县、社、队封锁，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省、地两级没有像现在这么一致的认识。有个同志讲，郑州会议是压服的，不是说服的。那也是了，那个时候认识上有个距离。

关于农业，我只讲这么一点。

工业呢？我们已经摸了一些底，还要继续摸底。大体上今年的盘子，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缩短工业战线，缩短重工业战线。除了煤炭、木材、矿山、铁道等，别的都要缩短。特别是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今年不搞新的基建，只搞正在建的或急需建的项目；正在建的和急需建的项目也不是今年统统都搞，其中有一部分今年也不搞，癞痢头就让他癞痢头。

至于长远计划，现在还作不出来。我们还要再搞十年才能作。

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军队行军有大休息、小休息，劳逸结合，有劳有逸。两个战役之间也要休息整顿。我们这次会开了二十多天，当然相当累了，但也不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开会。这次会不算“神仙会”，是相当紧张的会，但也不那么十分紧张，文件也比较少。过去我们开一次会议，决议很多，以为这些决议会灵，其实并不那么灵。会议的决议，多不一定灵，少也不一定灵，关键还是在于情况明不明，决心大不大，方法对不对。

今天看了一条消息，说西德去年搞了三千四百万吨钢，英国去年钢产量是两千四百万吨，法国前年搞了一千六百万吨，去年是一千七百万吨。他们都是搞了很多年才达到的。我看我们搞几年慢腾腾的，然后再说。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实一点。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我们要做巩固工作，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规格，提高

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

总之，我们对国内情况还是不太明，决心也不大，方法也不那么对。我们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区的底，二十七个地方分开来摸。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自治区又按地、县、公社分头去摸。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对实际情况就不摸底。不摸清一个农村公社，不摸清一个城市公社，不摸清一个工厂，不摸清一个学校，不摸清一个商店，不摸清一个连队，就不行。其实，摸清这么几个单位的情况就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要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1年1月18日）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又通过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

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出了乱子的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上。

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二百四十亿斤粮食，硬说有四百五十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

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地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小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地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

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去年一年国际情况比较清楚，对国内问题也应该聚精会神调查研究。工人阶级要团结农民大多数，首先是贫农、下中农和较好的中农，依靠他们对付地主反革命。三类社、队要成立贫下中农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主持整风整社，并临时代行社、队管理委员会的职权。我们党内也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应该纯洁党的组织，经过整风、整顿组织，使党纯洁起来，使绝大多数党员都代表贫农、下中农的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富裕中农的利益，坚持不剥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刮“共产风”是非常错误的，是剥夺农民的，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须坚决退赔。经验证明，只要退赔，群众就满意了，情况就改善了。

这次工业计划比较切合实际，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延长了农业、轻工业战线。与农业有关的基本建设还要搞，有的重工业，像煤、木材、矿石、铁路还要搞。上下一本账，不搞两本账，不要层层加码。总之，要实事求是，使一切从实际出发。粮食要过秤入库，不搞四高，搞低标准、瓜菜代，坚决退赔，整顿“五风”，不准不赔，不准不退。

城市也要整风，正在搞试点，还要一两个月才能搞出来，也要搞十二条。

今年计划看来比去年高不了多少。有人建议钢仍然搞一千八百四十五万吨到一千九百万吨，也增加不了多少，这个提法有道理。

第二个五年计划钢的指标，早已超额完成，还剩两年，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在质量上好好跃进一下，数量上不准备多搞。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会说大跃进垮台了，他们要讲就让他们讲，他们讲坏话也好，讲我们好反而不好。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要搞质量、规格、品种，搞企业管理制度、技术措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成龙配套，要搞调整、充实、提高，就是要在这方面努力。英国、日本的钢，暂时还比我们的多，再有七年，我们总会赶上他们，并且还会超过他们。能否超过西德，还要看一看。讲打仗，斗地主，我们有一套经验，搞建设还比较缺乏经验，我与斯诺谈话就谈到这一点。凡是规律总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找到，我们只希望不要像民主革命花二十八年才成功。其实二十八年也不算很长，许多国家的党同我们同年产生，现在也还没有成功。搞建设是不是可以二十年取得经验，我们搞了十一年，看再有九年行不行。曾想缩短很多，看来不行。凡是没有被认识的东西，你就没法改造它。

工业还是要鼓干劲，不然几次会议一开，劲就没有了。泄了两三个月的气，然后再开一次鼓干劲的会，反右倾。大家回去以后，要实实在在地干，不要老算账。搞计划要好好调查研究，搞清情况，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坚持总路线。有人说现在不用多快了，这不对，搞粮食就要多快嘛，搞工业讲质量、成龙配套等等，也是要搞多快嘛！

团结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核心。庐山会议有少数人闹不团结，我们希望和他们团结，不管他们的错误有多大，只要他们能改。他们讲你们也有错误，不错，错误人人皆有，但错误大小轻重不同，性质不同，数量质量不同。不要一犯错误就抬不

起头来。有的同志工作职位降低了，降低了也好。一年来有进步，不管真假，总是值得欢迎。地方工作的同志有的也犯了错误，欢迎他们改正。

河南、甘肃、山东三省问题比较严重，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现在情况明了就好了。有些地方政权也夺回来了，面貌已经开始一新。甘肃也开始好转，其他各省也总要烂掉若干县、社、队，大体是百分之二十左右，严重的超过百分之二十，好的不到百分之二十。不光是因为粮食问题。林彪同志讲，军队有一万个单位，烂掉了四百个，占百分之四，这并不是因为粮食问题。这种情况在城市、工厂、学校一定会有。对一、二类干部，要按政策清洗出去，死官僚要改造，变成活官僚，长久活不起来的也要清洗。这些人是少数，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其中也有糊涂人。我们也糊涂过，不然在民主革命时期，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南方根据地丧失，白区力量丧失，要长征，是因为不了解情况。

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是个新问题，我们缺少经验，要开训练班，把县、社、队干部轮训一遍，使他们懂得政策。如果一个省只有一个县委书记能讲清政策，不训练干部怎么行？每个县都要有一个县委书记真正能懂政策，弄清政策，那就好了。现在中央下放了八千多个干部帮助农村整风整社。大多数农村干部是好的，可靠的。如果大多数是国民党，我们还能在这里安心开会吗？所有一切可团结的人要团结。就是对反革命分子也不能都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才杀，有的要关起来，管起来。杀人要谨慎，切不可重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如过去搞根据地时杀人多了一些。延安时规定一条，干部一个不杀。现在还关了一个潘汉年，绝对不杀。杀了就要

比，这个杀了，那个杀不杀？总是不开杀戒。但是不是说社会上一个不杀？有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民愤很大的人，不能不杀几个。至于中央委员犯了错误就不牵涉杀不杀的问题，还是留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要与各兄弟党团结，要和苏联的党团结，要和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资料图片

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图为悬挂八字方针标语的沈阳重型机器厂的车间。

给田家英[1]的信

（1961年1月20日）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2]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3]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一篇文章。1961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期间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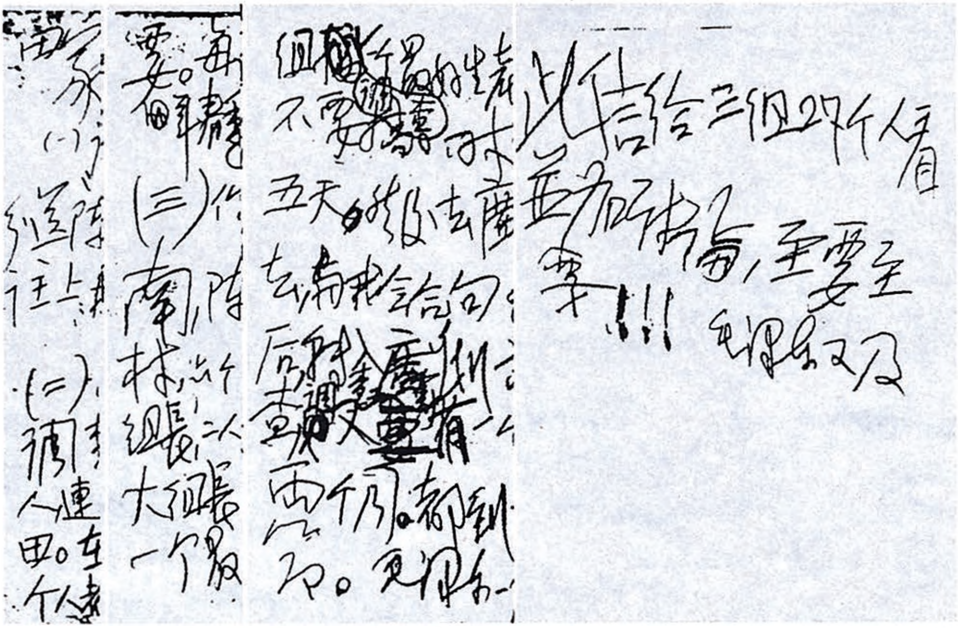
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毛泽东致田家英信的手稿。

对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1 年 1 月 20 日）

一

剩下的两年都这样做。

二

即送乔木、冷西：

已阅，很好。即刻发稿，明日（廿一）在全国见报[2]。同时，

---

[1]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1961年1月19日晚送审的公报稿中一段文字旁写的批语，这段文字是：“重工业方面，由于三年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大大超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水平，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巩固和提高的方针。”本篇二是在胡乔木、吴冷西1月20日送审的公报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在1月20日送审稿中加写的话。

[2] 1961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公报》。

立刻翻成几种外文，今夜广播。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六时五十分

有一点修改[1]，请注意。

毛
又及

三

所有这些工作，全会认为，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张旗鼓地去进行。

---

[1] 胡乔木、吴冷西1月20日的送审稿中写道：“鉴于这种种情况，许多地方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已经在农村和城市的工作人员中进行整风运动，并且已经收到成效。全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进行这一运动，帮助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并且纯洁组织，把经过认真考查确属混入党内和政府机关内的极少数坏分子清除出去，同时防止和制止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即本篇三。此外，毛泽东还在送审稿中“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一语前加了“以队为基础的”几个字。

对何其芳《〈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语[1]

（1961年1月23日、24日）

一

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严重的天灾，一部分没有改造好的地主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篡夺某些基层组织的领导权，实行复辟，小而至于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

---

[1] 《不怕鬼的故事》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一本小册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2月出版。1961年1月16日，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将他为该书写的序文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处修改。本篇一、二、四、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六是毛泽东加写的两段话。此外，毛泽东还将这篇序文的写作日期改为1961年1月23日。1月24日晨，何其芳将毛泽东的修改稿誊清打印后再次送审，毛泽东又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七。

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1]

二

所以，在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者看来，世界上什么都不可怕。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被打倒的阶级实行复辟或企图复辟，特大的天灾，以及一般工作和斗争中的困难、挫折等等，一切都不可怕。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对这一切完全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藐视。

三

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爱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

---

[1] 在何其芳1961年1月16日的送审稿中，这段话的原文是：“世界上并没有过去的故事里所说的那种鬼，但是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而至于帝国主义、反动派，小而至于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鬼类’。”第一次审阅时，毛泽东将文中的“大而至于帝国主义、反动派”改为“大而至于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国际修正主义，国内天灾、人祸，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复辟、篡夺地方政权和经济组织”。《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对这段话又作过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四

毛泽东同志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在精神上武装了全国人民，加强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在今后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最后战胜国内反动阶级残余力量、争取建成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继续鼓舞着我们，使我们同样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五

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都不过是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和曲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六

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

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0年1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1]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七

即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2]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3]。另请着手

---

[1]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3] 这篇序文后来分别载于1961年2月5日《人民日报》和1961年《红旗》杂志第三、第四期合刊。

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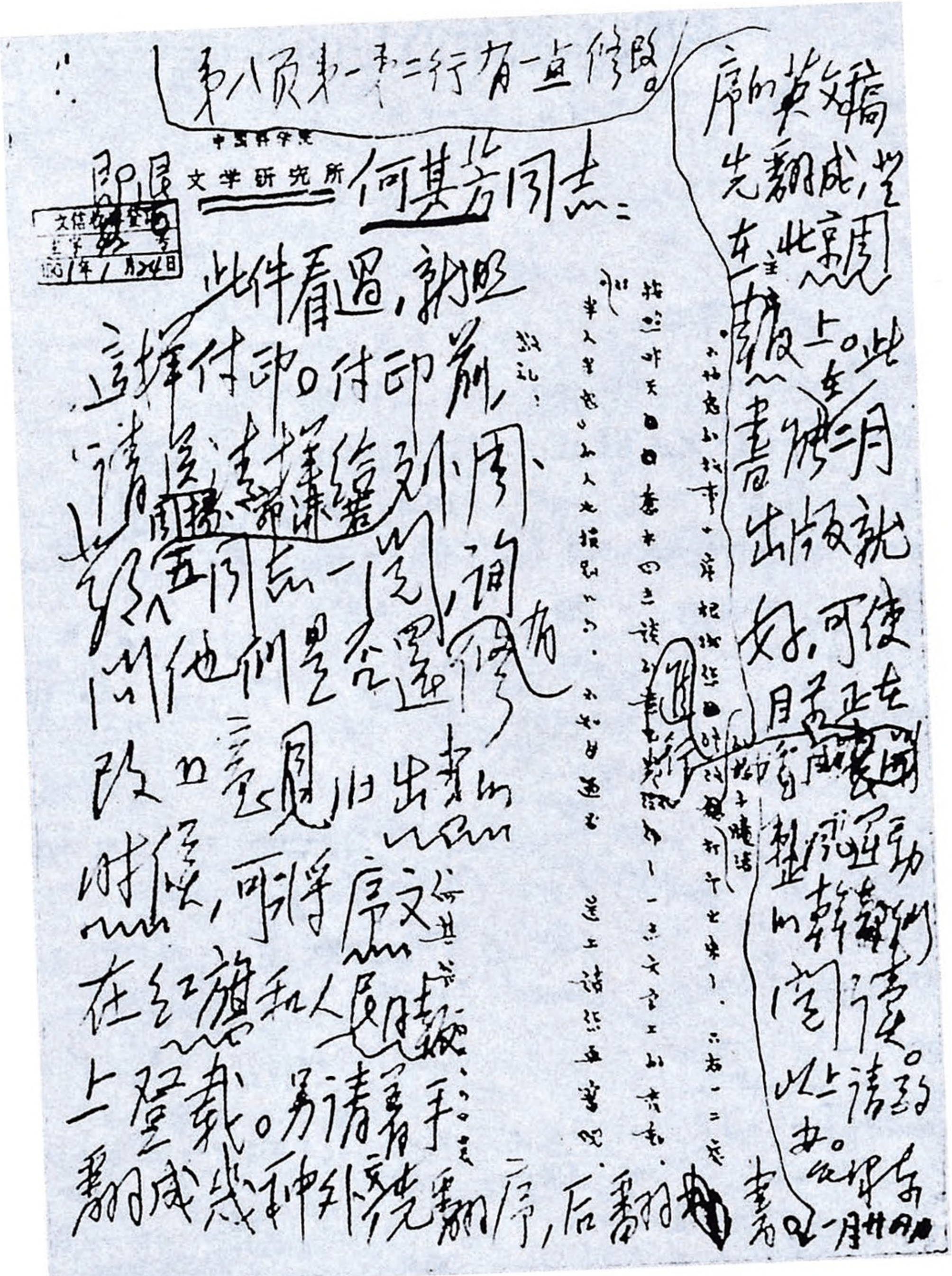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1]。

---

[1] 这一次只是个别文字上的修改，1月23日对此处已作过修改，两次修改的综合，即本篇五。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毛泽东对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文的批示的手稿。

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

（1961年1月2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来了几个月了吧！到各地看了一看吗?

班禅额尔德尼（以下简称班禅）：去年国庆节前来到北京，参加了建国十一周年国庆典礼后，同李部长等去南方各地参观了两个月。

毛：看一看好。我们国家还有困难。这方面有成绩，那方面有缺点，总的很好。过去农业和轻工业方面差一点，赶不上发展的需要。我们准备用两三年时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轻工业方面。重工业则采取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和规格的方针。把薄弱门类补齐。在人民方面，连续三年大跃进，现在要搞劳逸结合。就像打仗一样，打了一次大仗以后，就需要休整一下。采取这些措施，估计有两年最多三年的时间把农业、轻工业提上去，情况就会好转。好起来并不是说农业就可以过关，农业过关至少得有十年左右或更多一点时间。苏联搞了四十三年，农业还没有过关。我们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有这个问题，粮食、棉花、油料及其他农产品不够。

你们那里才进行了平叛[1]和改革，基本上做得好，也发生了些

---

[1]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发动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17日，达赖喇嘛和一些主要叛乱分子逃往印度。19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很快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

毛病，不仅日喀则发生毛病，各地都有。毛病是“左”。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在内地也是这样。

达赖[1]利用康巴人[2]搞叛乱，有从西康[3]、青海逃进西藏的几千万把人，他们以山南为根据地，后来同藏北黑河[4]等地叛匪南北两路打拉萨，目的是赶张国华[5]走路。逼得我们平叛嘛！

现在你们那里要纠正“左”的偏向。第一是现在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社，搞互助组，发展生产，使农民安定下来，生活得到改善。你们那里同内地不同，是由封建农奴制度进到个体所有制，经过个体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以后再看。

第二是把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对爱国上层三千多人要搞好团结，真正实行赎买，长期合作，给他们安排一定的职位，安排好他们的生活。思想改造不要急，要作为长期的任务，要他们自觉地改造，急了改造不好。不要动不动开斗争会。北京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他们自己开会，自己讨论改造，是和风细雨地开会。这种会取个名字叫“神仙会”，是个好办法。

第三是宗教方面，听说你的意思是保存一部分脱产喇嘛，我同意你的意见，留那么几千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这样看，过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2] 康巴人，指聚居在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在内的地区的藏族，又称康巴或康人。

[3] 西康，即西康省，1955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4] 黑河，今那曲县。

[5]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第一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去西藏一百二十万人口中间有十一万多人当喇嘛，养活不了，太多了，对发展生产和人口都不利。我还不清楚，过去十一万多人当喇嘛，是不是都念经?

班禅：不是的。寺庙喇嘛中，真正懂得宗教的，对佛学经典有研究的人，大都是中间阶层。寺庙上层喇嘛中很少有人真正研究经典，下层喇嘛是寺庙的奴隶，忙于支差干活，没有时间学经，有些连字也不识。下层喇嘛中有些人是为了避差当了喇嘛的，有些人是迫于生活而当了喇嘛，还有些是被派差当了喇嘛，比如有的地方一家有三个儿子，必须送一个去当喇嘛。派喇嘛差的情况，在大寺庙中比较少，小寺庙大部分都派喇嘛差。

毛：我赞成有几千人学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你看是不是他们同时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比如你，在宗教方面是专长，如果不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和缺少一般知识，那你的领导工作就很难做。

班禅：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曾给李部长谈过，专门学佛学经典的那批人，必须使他们学点政治、科学和文化知识。如果他们光学经典而不学政治和科学，完全钻到经典里去，因为这些经典本质上是唯心的东西，那末即使他们政治上不反动的话，也会自然地同革命对抗。

毛：佛学不可不学。我们办了个佛学院，两年毕业，专搞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再拿两年专门研究佛学。政治上好，在佛学方面却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我国现在有佛学学问的人，你当然是一个，其他除了喜饶嘉措[1]以外还有谁?很少吧?

---

[1] 喜饶嘉措，当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李维汉：还有阿旺嘉措、赴朴初[1]等几个人。

周恩来：喜饶嘉措去东南亚佛教国家访问，那些国家流传的是小乘佛教[2]，因他懂得小乘，同他们很说得来。

毛：西藏是大乘[3]，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4]，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释迦牟尼[5]讲的是什么经，是大乘吧？

班禅：释迦牟尼讲的经分为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的是小乘，中期讲的是大乘。

毛：《莲华经》和《金刚经》你们西藏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6]著的书还多吧？

班禅：有很多，传说他著的经典共有五百个大象驮的那样多，这可能有些夸大，不过他讲的经事实上是很多的。从梵文译成藏文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西藏的佛经，有从梵文译成汉文，而后从汉文译成藏文的，但是从汉文原著译成藏文的很少。藏文中有关于医学、算术等方面的不少的书，是从汉文译成藏文的。西藏也有《金刚经》，那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

毛：《金刚经》这一部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

[1] 阿旺嘉措，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2] 小乘佛教，佛教派别之一。

[3] 大乘，即大乘佛教，佛教派别之一。

[4] 密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

[5] 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

[6] 孔夫子，即孔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班禅：佛经对于世界的看法，尽管它本身仍然是唯心的，但是同其他教派有很大的不同。

毛：刚才我讲的是务业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信教，我们不懂得宗教。我赞成有一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西藏像喜饶嘉措那样有学问的人不多吧！

我在前面已经讲了三个问题。一、西藏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二、对上层要安排好生活和职位，思想改造要和风细雨。三、宗教问题，有几千人学经，学政治和各种知识；同时使他们懂得过去有十一万喇嘛，现在留下几千人专门学经，有近十万人从事生产，这对发展经济和人口有很大好处。

第四个问题，反右必出“左”，不仅日喀则有，西藏其他各地都有，正在纠正，必须纠正。斗错了的赔不是，有些坏人挑拨离间的，要处理坏人。比如你的父母，没有正式斗，有些群众到家里去搜查了，计晋美、拉敏[1]等人的家也搜查过，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应向他们赔不是。你们是爱国进步人士，从香日德起就同我们合作。那时我们的军队到了青海，你们怀疑，怕我们整你们，跑了，以后回来，我们合作了。没有解放军护送，你们也回不去。九世班禅就死在玉树。我们一起合作了这样久，从一九五一年以来，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针上，我们都是一致的，始终一致合作。请你代我问候你的父母、计晋美和拉敏，他们是好人，是爱国进步的。

---

[1] 计晋美，即詹东·计晋美，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拉敏，即拉敏·益喜楚臣，当时任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主任委员。

我们信任你，信任和你一道做事的那些人。你们还怀疑不怀疑？

班禅：没有。

毛：可能还有一点，将来再看，你可以看事实，再看十年，看是真信任还是假信任。你们和达赖集团的历史不同，有很大区别。我们同你们没有打过仗，同达赖集团打了两仗。第一仗在昌都[1]，消灭了他们的主力。不久达赖跑到了亚东。以后订了协议[2]，达赖是很勉强的。他们派了两路代表，一路是阿沛[3]，由昌都到北京来，另一路在印度加尔各答时，尼赫鲁[4]不让来，他们也不想来。后来看到不行了，这才来了。阿沛是被我们说服了，他真正爱国，同我们合作。

第一次打的结果，是签订了十七条协议。第二仗就是平叛。他先打我们，想赶我们走，逼得我们没法子，不得不平叛。在那以前，我们想说服他，同时也知道他同印度的关系。那时在你们看来，会觉得我们信任达赖比信任你们还大，如决定不打第一枪、六年不改革。处在你的地位，是会那么想的。我们考虑到当时一百二

---

[1] 指昌都战役。195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准备进军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统一。6月，中共中央确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解放西藏谈判的10项条件。西藏地方政府拒绝谈判，并将藏军2/3的兵力调集在昌都及其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人民解放军被迫于10月6日发起昌都战役，至24日结束，昌都获得解放。

[2] 指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3] 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1951年4月下旬到达北京，是西藏地方政府派来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首席全权代表。

[4]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十万人口中，信达赖的是绝大多数。前藏、后藏、昌都、康区[1]、阿里，还有青海、甘肃的一部分地区，群众对他有很大的迷信。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打第一枪。不经过一个过程，没有法子，群众无法了解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他们先在康区，以后又在拉萨，几千人先打我们，我们才由被动转为主动，才进行平叛，才能在群众中说明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达赖要叛乱的阴谋，从一九五五年由北京回去后就开始了。一九五七年初他从印度回来，到一九五八年布置了两年。

这第二仗，你是参加了的，同我们合作打的。

第五个问题，什么时候成立自治区。由筹委会变成正式的地方自治区政府，今年是不行了，我看是明年或后年。主要是个选举问题。现在先搞个选举法，搞个条例。现在积极筹备选举，准备在明年，最迟后年，开全藏人民代表大会。这个会的任务是决定自治区工作的方针、政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政策，选举自治区政府，通过一个自治区自治条例，也就是那里的基本法。

你们回去就筹备，先把县、乡两级人民政府，用选举的办法建立起来，以后就好选自治区的人民代表了。这样好不好？

班禅：好。

毛：第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西藏工委同你的关系要搞得更密切一点。我已经同张代表[2]，还有工委的一个副书记郭锡兰同志谈了。工委过去也有缺点，同你商量事情，你就那么满意吗？（对张经武说：整个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各方面的情况，

---

[1] 康区，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在内的地区。

[2] 张代表，指中央驻西藏代表张经武。

应使他充分了解。）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就向他们讲，听说你有这个作风，很好。你所想的，他们不知道不好。工委给我们汇报说他们对你满意，觉得你讲真话。有时你同他们开个座谈会，把你的牢骚也发出来，双方一讲就通了。

前藏和昌都方面的事，过去你没有管，平叛前也不好管。现在我劝你要关心这两方面的事情，同这两方面的上层和劳动人民多联系，多了解情况，这样经过若干年，你的威信就可以建立起来。你进藏九年中，有七年不管前藏和昌都，从一九五九年起才管了，今后应该联系他们，熟悉情况。

我和在座的同志们都有这个经验，并不是人民一开始就信任我们，很长一个时期并不信任，干部也在看，看我们到底做坏事还是做好事。经过工作，大家觉得我们为人民服务还不错，慢慢地才信任和选择我们。我们年纪大了，你年轻，才二十几岁，很有希望，像是早上的太阳，我们是下午的太阳。我们在没有去见上帝以前，还有事可做，帮助你们做点事。唱戏要有老生，小生总比老生活跃得多。

我现在非常高兴，西藏有好几千青年干部，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左右，这是好事，是很好的事。西藏人中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还要有文教、医疗、宗教等各方面的干部，而且还要有科学技术干部。将来逐步发展起来，在每个专区有个中学，各县都有小学。汉人要学藏话，藏人要学汉话。在这里的大学里也要有藏人学习。藏人要有开飞机、办工厂、开汽车、搞地质、搞气象等各方面的人才。

各兄弟民族都如此，先是汉人帮助，慢慢地本民族的人才出来了。

班禅：培养藏族干部问题，是很重要的，但西藏的人口太少了，今后还要更多的汉族干部去帮助。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1]

（1961年1月2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在中国还呆些日子吧？我看到日本朋友就高兴。对浅沼[2]先生遇难，我们表示哀悼。

黑田寿男（以下简称黑）：浅沼先生作为社会党代表团团长来中国，发表了很好的讲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继承浅沼的精神并继续发扬他的精神。

毛：浅沼先生抓住了日本同美国关系的本质，也抓住了中国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和北美加拿大各民族的问题的本质。当时我曾对浅沼先生说过，对这种论点赞同的人有时少一些，有时多一些，但过些时候总会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

美国没有办法在各国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各国的协助者，这就是它的同盟军，也就是各国最反动的一小部分人。在中国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一部分人，在你们国家就是岸信介[3]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

黑：去年在日本掀起了很大的反对“安全条约”[4]运动，代表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

[2] 浅沼，指浅沼稻次郎。

[3] 岸信介，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日本内阁前首相。

[4] “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垄断资本的政府站在同我们相反的立场上反对我们，用暴力通过了“安全条约”。在这期间，中国举行了很大的游行集会支援我们，我们表示感谢。

毛：我们彼此支持，国际斗争总是彼此支持的。你们是处在最前线。

前年浅沼访华时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即使一时没有多数人同意，但等到人们了解的时候，总会得到多数人赞成的，要有这样的信心。过了一年，即到了一九六〇年，日本就发生了那样巨大的变化，反对“安全条约”的运动达到那样的高潮，已经发展成为全民性的斗争了。

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正常，贸易也停了。我同浅沼先生率领的代表团在武汉东湖会见时，就说过中日关系中断是暂时的现象，过一个时期就会发生变化。贸易方面现在已经开始变化，政治方面还不一定。政治有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同日本大多数人民历来是友好的，战后友好关系还有发展；就是同自由民主党的政府，同垄断资本的关系还不成，还要等候。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松村[1]、三木[2]、高碕[3]、河

---

[1] 松村，指松村谦三（1883—1971），日本自由民主党前顾问、前众议员，1959年以后5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1962年9月访华时同中国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

[2] 三木，指三木武夫（1907—1988），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1958年曾任日本内阁经济企划厅长官，在对外关系上积极主张发展日中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3] 高碕，指高碕达之助（1885—1964），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前众议员、参议员，20世纪60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日中贸易。

野[1]、石桥[2]，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的直接同盟军。自由民主党内部有矛盾，反主流派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你们看这话是否有点道理?

黑：反主流派今后如果对中国有更多的理解，对反对“安全条约”更坚决一点，那时就可以说是间接同盟军。

毛：欧洲国家同美国也有这样的问题，它们同美国并不完全一致。世界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主要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你们对非洲、拉丁美洲做什么工作没有?

黑：我们有亚洲团结委员会，以这个团体为中心在开展活动，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拥护和平的斗争，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我们愿意今后进一步动员起来，加强这一活动。

毛：非常有必要。

黑：今年在亚洲，主要的问题是老挝问题。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美国就利用日美“安全条约”，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最近日本各工会、各政党、各群众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开了大会，反对美国使用日本军事基地干涉老挝的内政，并且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要求美国停止这种干涉行为，也向日本政府示威，要求日本政府不让美国使用日本基地。

毛：这很好。

黑：现在日本政府同韩国政府在进行谈判，把南朝鲜政府看作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来解决朝鲜问题，这就妨碍了朝鲜的和平统

---

[1] 河野，指河野一郎（1898—1965），20世纪60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农林大臣、建设大臣等职。

[2] 石桥，指石桥湛山（1884—1973），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前内阁首相，20世纪60年代初期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1972年12月他当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1959年、1963年两次访问中国。

一。美国利用日韩谈判加强南朝鲜、台湾、日本的军事力量，加强东北亚军事同盟。进行了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的日本人民，正在反对日韩谈判。

毛：反对很有必要。

最近同美国有关系的菲律宾、台湾、南朝鲜、南越举行“外长会谈”，日本政府因为害怕日本人民，没有去参加。由此可见，日本人民去年的斗争使日本政府很害怕，伟大的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现在看来，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处在第一个高峰之后和第二个高峰之前，斗争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处于低潮，是在酝酿第二个高潮。你们知道中国几十年的斗争，就是波浪式的发展，而不是每天、每月、每年都在直线发展的。所以你们所领导的人民运动，是大有希望的。可是，有人感到现在运动搞不起来了，有些悲观埋怨；也有部分人可能进行指责，说你们左派过去的斗争搞错了。在这样的时候，用我们的话来说，左派就要硬着头皮顶住。例如，中国辛亥革命[1]以前，一九一一年四月黄兴[2]在广州领导

---

[1] 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革命。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外国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没有能力发动广大人民的力量比较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中国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

[2] 黄兴（1874—1916），湖南善化二都（今属长沙县）人。1904年在长沙组织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1905年与孙中山筹划成立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先后领导了同盟会发动的多次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1913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的军事暴动失败了，牺牲的烈士都葬在黄花岗。失败之后连黄兴本人也跑到了香港，认为失败了，不行了，没有希望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政府。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1]，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过了十年，俄国革命就胜利了，这时“造神派”的卢那察尔斯基也当了列宁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他也不要造神了。我看你们的历史中也会找到这样的事例。

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的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现在非洲也如此。日本的垄断资本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七八个资本主义大国中还是比较薄弱的。原因是：第一打了败仗；第二受美国的统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看这两方面对日本人民都是有利的：

第一，战败了，殖民地都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党应当了解，这个失败不是耻辱，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耻辱，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打败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耻辱，你们应当展开争论。有部分人不这样看，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

---

[1] 造神派，是1905年至1907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种宗教哲学思潮，其代表人物是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他们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主张“改善”马克思主义，鼓吹创造一种“无神”的“社会主义”宗教，宣称只有宗教才是社会主义的组织力量，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1912年后，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造神派学说迅速破灭。

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所以得出那样的结论。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第二，被美国统治也要分析。我看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外力的压迫是不会觉悟的。现在日本不仅有本国垄断资本的压迫，而且有它的同盟者美国的压迫，这就很快地教育了日本人民，使日本人民团结起来；并且迫使日本人民做出选择，要么当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奴隶，要么起来争取独立和自由。我老早说过，我总不相信，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会长期受人欺负，短时期受压迫是可能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也是由国内敌人和国外敌人教育过来的，其中也包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教育。日本的南乡三郎[1]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末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日本的经济、文化都走在中国的前面，据说冈山县就有七所大学；我们有个无锡，文化比较发达，但也没有七所大学。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县可以同日本

---

[1] 南乡三郎，1955年出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1956年曾两次访问中国，1958年作为日本通商使节团代表来华参加签订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

比的。中国要赶上日本还要一定的时间。

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捉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

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捉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他们怕老百姓起来。例如有许多日本友人来中国访问，政府不能禁止；我们去日本，他们也不能禁止，但可以给予种种限制，因为日本政府同蒋介石有外交关系。另外，他们也怕共产党。高碕邀请廖承志同志去访问日本，廖承志同志，你什么时候去？

廖承志：现在还没有定。

毛：最近总工会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了。我们民间来往、交流是很好的，可以增进了解，相互交换意见，交流经验。贸易已经订了些民间合同，大的买卖也开始做了些。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日本交换些东西。中日两国很近，运费也便宜。

黑：完全同意。今年民间交流会更多起来。

不管池田[1]政府是否愿意，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会多起来，

---

[1] 池田，指池田勇人（1899—1965），1960年至1964年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两国人民间的亲善关系会加深，一定会签订友好条约。

毛：很好，有发展的前途。

黑：我们年初就来中国，也是为了两国人民的亲善。我们从中国朋友那里听到许多有益的话，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情况，对我们有很大好处，表示感谢，并祝主席身体健康。

毛：请向日本社会党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们问好。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向来访的巴西共产党和洪都拉斯共产党学习考察团介绍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情况。

对《光明日报》《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

（1961年2月15日）

一

好文章[1]。

---

[1] 指何明1961年2月11日在《光明日报》第三版上发表的《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文章说：“到实际中、到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要虚心，不要事前先定出个主观主义的框框。带着框框下去，就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或者只看到、听到自己所要看、所要听的情况，把事情看走了样子。虚心，是非常要紧的；框框，是害人害事的。可是，指导原则和框框却是两回事。”文章联系中国哲学史上宋尹学派和荀子的有关思想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然后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以及党的总路线为指导，去进行调查研究。这不是框框。这是从实际抽出来而又经过实际证明了的真理，是‘望远镜’，是‘显微镜’，是解剖‘麻雀’的解剖刀。但话还得说回来，不要只是记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往客观事物头上硬套，那是直接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是说，那就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而是自己造的框框。”“框框乎？指导原则乎？要分清；不要带着框框，而要带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原则去进行调查研究。”

二

陈伯达[1]同志：

何明[2]是谁？1957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3]，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来』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4]、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晨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2] 何明，即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社哲学史组组长。

[3] 可能指《光明日报》1957年8月10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

[4] 艾思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编辑。任继愈，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罗瑞卿[1]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考察报告[2]的批语

（1961年2月27日）

退林彪同志。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指罗瑞卿1961年2月10日关于几个地区部队情况的考察报告。报告说，最近我在昆明、成都、重庆、武汉等地看了几个连队，并同一些团、师、军和大军区的负责干部谈了话，听了几个单位的汇报。现将一些问题和意见报告如下：（一）两忆三查运动，大多数单位已进入结束阶段，正在把运动落实到创造四好连队和争做五好战士的工作上。这次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结合学习毛主席著作比较好。运动的实际效果表明，两忆三查是毛泽东思想和部队实际结合的一个最好的活的教育方法，是在新的条件下的新式整军运动。（二）今年的军队整风，在基层主要是切实搞好创造四好连队的运动；机关整风，主要是在去年整得不彻底的单位进行补课。今年整风的重点应是民兵工作。（三）今年应当结合创造四好连队和继续培养三八作风，认真地抓一下连队管理工作。（四）军事训练部门应当重视和研究加强部队的锻炼问题，想方设法将我们军队的战斗经验和传统传给新提拔起来的干部。应该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五）连队战士生活中也有些具体问题如洗澡、理发、做饭等，需要认真研究解决。（六）干部家属问题，大体上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目前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干部的家属在政治上、作风上存在严重问题，建议总政治部认真抓一下。

此件已阅，很好。建议每个军区派有能力的人去调查一两个连队，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如何，请酌。

这几天牙痛，谈话待过几天通知你。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

1961年2月，毛泽东和部分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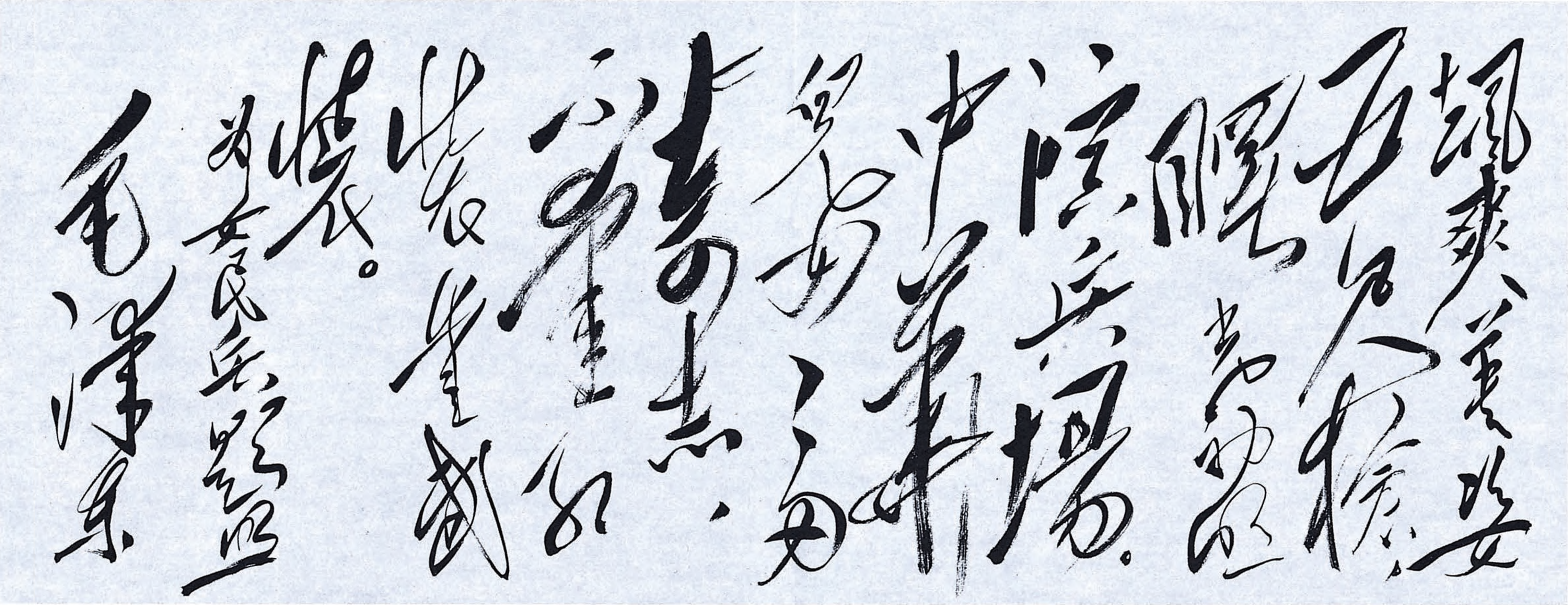
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1961年2月）

飒爽[1]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

[1] 飒爽，形容敏捷勇健。唐杜甫《丹青引》：“英姿飒爽来酣战。”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为女民兵题照

毛泽东

毛泽东手书《七绝·为女民兵题照》。

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1961年3月5日）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但是接着在群众中间反右就坏事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的，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但由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庐山会议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了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右，结果就反出了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解决了队与队、人与人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1961年3月5日）

田家英同志在浙江调查了一个生产大队，有二百多户，十一个生产小队，里面有富队，有中等队，也有穷队。因为是一个大队，所以在分配的时候，统统拉平了。这么一来就发生问题了。现在他们建议把这个生产大队分成三个大队，每个大队八十几户，有三四个小队。过去二百多户的生产大队望不到边，这一头不知道那一头干什么，也很不好管理。现在分成三个大队，把经济基础差不多的小队分在一起，几个富队在一起，几个中等队在一起，几个穷队在一起。这样队与队之间经济情况都差不多，不发生拉平的问题。这是解决队与队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还有在一个队里面人与人之间分配拉平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

不要老是要下面报“账”
不要发那么多文件

（1961年3月5日）

我们过去老是要下面报“账”，什么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少肥，明天又搞了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后来横直就是那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来，一点也不实在。包括我们中央发文件在内，也是那样。今后不要发那么多文件，要适当压缩。不要想在一个文件里边什么问题都讲。为了全面，什么问题都想讲，结果就是不解决问题。文件不要批得过多。过去我也是个热心家，也批了许多文件。比如我就批了贵州关于食堂问题的那个文件，结果对各省影响很大。又比如，每年到春耕时，中央就要发指示，国务院就要发命令。今年不发了好不好？这都是多余的，每年有那么几个文件就行了。就像少奇同志批的纪登奎关于河南灵宝的经验那一类文件有一些就行了，不要多了。我就不信，每年发那么多文件你们都看了，各省的同志都看了？肯定有许多没有看。

公社划小不划小主要应听群众的意见

（1961年3月5日）

工业企业有大、中、小，太大了就不好管。农业不比工业，公社大了就更不好管。因为公社里男女老少都有，不像军队那样，有组织有纪律，还都是男的。

公社划小不划小，分不分，不要只听干部的意见，主要应听群众的意见。有些干部肯定不愿意分，他会找出许多理由来，说什么没有房子，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有许多困难等等。我们只要得到了群众也就得到了干部。我们把生产指挥权下放有什么不好？如果按有些干部的意见，社员自留地也不能留，平调的东西也不要退赔，生产指挥权也不能下放。那样，我们就得不到群众，就不能取信于民。

关于请朱德、陆定一[1]参加南三区会议[2]等问题的批语

（1961年3月10日）

一

陶铸[3]同志：

（一）请邀朱德、陆定一两同志参加我们的会；（二）陆定一同志在新会、花县两处参观后给我的信[4]，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三月十日早上

二

鲁言、田家英、陈、胡[5]阅，退毛。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南、西南、华东3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

[3]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4] 指陆定一1961年2月27日关于参观新会县人民公社的情况和3月1日关于参观花县人民公社的情况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第一封信说，23日在新会县同县委第一书记党向民座谈，主要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农村工作在过去一直都是顺利的，农业是增产的，到了人民公社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些问题。党向民说，人民公社以来，他感觉有三点不同：第一点，没有经过试点。过去，无论土改、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都经过试点，试点时很谨慎，规模小。试点本身就是对群众很好的宣传。群众看到新办法比老办法更有利于生产，就自然而然地赞成新办法了。而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过去那种试点过程，立即全面铺开，一哄而起。第二点，以前因为经过试点，中央规定的办法很具体。人民公社则不然，办法不具体，不细致，有的问题反复多次。第三点，过去管理制度规定得严密，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不严密。以上这些话，我认为是中肯的，它使我想到现在许多地方采取新的措施时，也务必稳妥一些，先试点，后推广。第二封信说，昨天去花县参观，才知道那里不仅3年来年年增产，而且全县6个公社，有3个公社坚持了以社有制为基础的试验。这种试验，近来很少听说了，但花县信心十足。看来，在人民公社运动中，信阳一类的地区是一个极端，花县一类的地区又是一个极端。一个坏极，一个好极。花县虽然不大，但其成功将有极大意义，横扫那些对人民公社运动的悲观情绪。

[5] 鲁言，即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胡，指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对《调查工作》一文的说明和批语

（1961年3月11日）

一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1]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2]。

毛泽东

1961年3月十一日

---

[1] 《调查工作》一文的石印本，最初是由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农民赖茂基于1957年2月捐献的，当时保存在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1958年11月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提出要收藏此件，并登录在文物清单上。1959年8月，由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于1960年底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1年1月送毛泽东阅看。

[2] 毛泽东在批示印发这篇文章时，对正文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并将标题改为《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毛泽东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间确定为1930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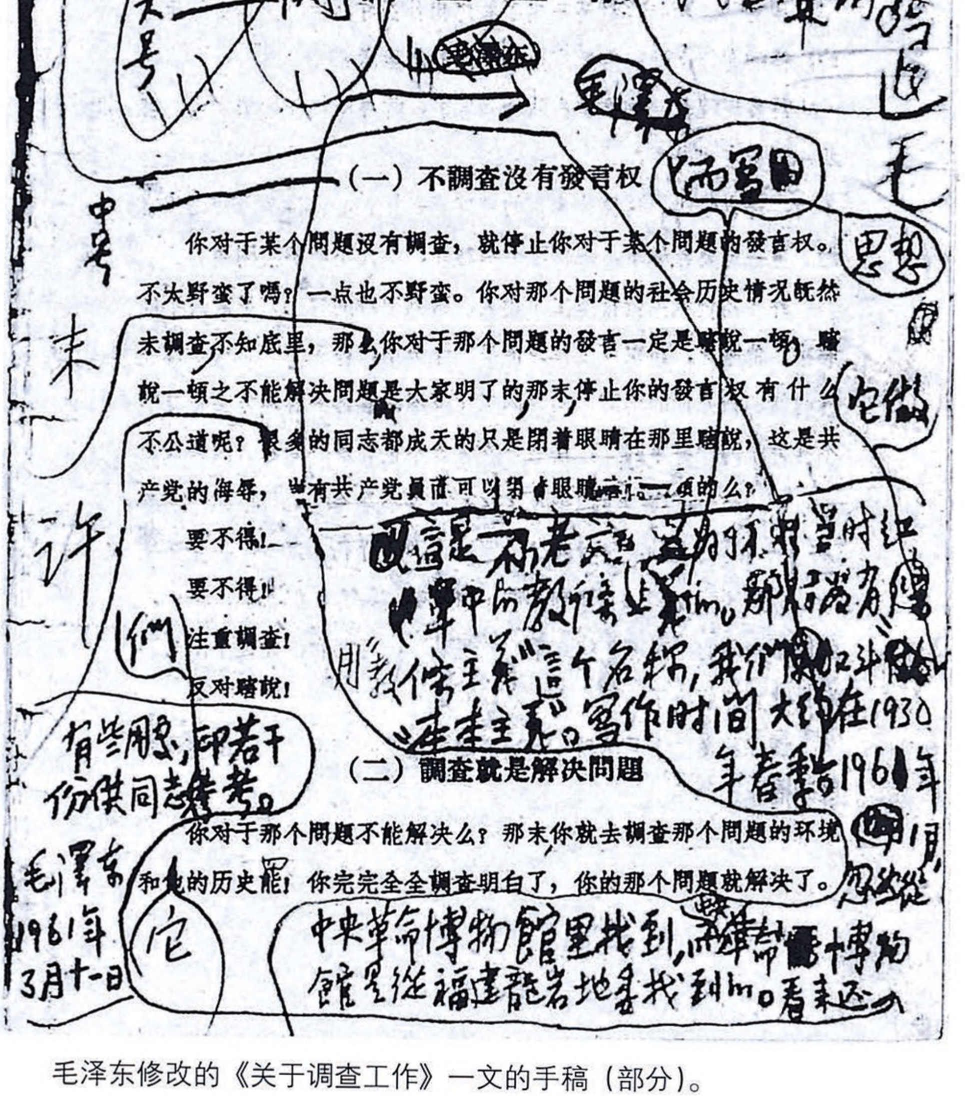
二

送林彪[1]同志阅，1930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已经三十年不见了。

卷号
顺序号

关于调查工作

大号

毛泽东

（一）不调查没有发言权

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社会历史情况既然未调查不知底里，那么你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很多的同志都成天的只是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么？

要不得！

要不得！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1961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革命博物馆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1961年3月十一日

（二）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环境和它的历史罢！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的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手稿（部分）。

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1961年3月13日）

刘、周、陈、邓、彭[1]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2]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3]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做指导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北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称北三区会议。

[3] 陶铸（1908—1969），湖南祁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1]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2]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

[1] 指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当时毛泽东正在广州召集这三个地区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称南三区会议。

[2] 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1]

（1961年3月13日）

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就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稿，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气读下去，要压缩到八千字左右。这次会议讨论一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你们回去再调查，下次会议作决定。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

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2]，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

---

[1] 这是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这三个地区所属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南三区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召开。

[2] 指《关于调查工作》。

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

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2]他们会后还要回

---

[1] 指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率调查组分别在广东、湖南、浙江做农村调查。

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发那么多表格，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猪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没有增加。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1]，武昌会议的决议[2]，郑州会议的记录，上海会议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3]。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有些食堂难以为继。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

---

[1] 指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2]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3] 指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六条。

得散伙。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

对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一次座谈会记录[1]的批语

（1961年3月16日）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1961年3月15日报送的一个座谈会记录。记录中说，3月14、15日，广东省委和北京来的调查组，同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党总支书记梁纪南、公社宣教委员苏品芳就有关人民公社的几个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一、社队规模问题。蒙坑大队原来是两个高级社，一个收入高，一个收入低，公社化后合成一个基本核算单位，拉平了，原来收入高的很有意见。最近他们按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分为两个大队，解决了穷村同富村的矛盾，两边对生产、积肥都积极了，对耕牛、农具也都爱惜了。座谈中，对于其他大队内各小队之间的贫富差别，他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解决办法：（1）对富村的包产指标可以低些，使它能够多得超产奖励；（2）帮助穷村多搞些副业，增加收入；（3）中等村发展了生产，也能增加收入。他们认为，基本核算单位太小了也不好，理由是领导能力差，人少力量小，积累有限，不容易扩大再生产，不好搞多种经济，没有多大的发展前途。二、分配问题。过去搞三七开，事实上不劳动者也可以得食，因此可以考虑打破这个框框，全部实行按劳分配，用公益金和公益粮补贴困难户，这样就可以调动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三、食堂问题。他们主张粮食分到户，农忙办食堂，这样生产队菜地就有可能给市场提供更多的菜，社员也能养猪、积肥。四、定征定购问题。征购粮要定下来，使农民心里有底，至少3年不变，能5年不变就更好。定征定购后，生产队的超产部分，可以留出一定的比例作为储备粮，要逐步使队队、社社、县县都有储备粮，同时也要逐步使家家户户都有粮食储备。

一个重要文件，印发各同志[1]讨论。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一时

---

[1]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南海县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上调任务包干办法的批语[1]

（1961年3月16日）

印发各同志[2]。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61年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上。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在整风整社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和大队、生产队经营积极性大大提高，但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仍有意见。生产好的队认为超产不能多吃，减产队也和自己一样按标准吃粮，这是“共产风”没有彻底反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沥西大队试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为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整个大队的生产面貌完全改观。

[2]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南三区会议[1]情况简报第三号的批语

（1961年3月17日）

此件[2]印发各同志[3]。此件提出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研究。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指1961年3月10日至13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

[2] 指1961年3月13日编印的南三区会议情况简报第三号。简报摘要登载了会议各组12日下午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的发言。其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指出：（一）从山东情况看，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有一个公社的示范章程性质的条例。（二）提议再搞一个党内文件，着重解决党内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领导方法上几个未解决好的问题，以供领导掌握。（三）对目前农村形势需要加以分析，要使全党认清现在的形势，肯定中央十二条等政策完全正确，肯定几个月来整风抓对了，提高全党信心，只要继续抓下去，大有希望。目前领导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1）必须及早下决心把工业和各项事业过多的劳动力砍下去，压缩城镇非农业人口，否则各项事业与农业关系摆不好，粮食问题无法解决。（2）坚决把许多权力，特别是生产权下放到小队和农民，让他们对生产负责，发挥积极性，不能再瞎指挥了。（3）领导要真正吸取教训，特别

是一定要按照主席讲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检查我们为什么不从实际出发，不能正确执行政策。党内生活不够健康，使下情不能上达是个很大的问题。此外党内还有许多问题，如党政党社关系、干部民主作风、监察工作以及教育提高干部等，都要予以解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认为，为了把3年来人民公社的丰富经验加以比较系统的总结，搞两个文件比较好，一个是条例或示范章程，一个是党内指示。条例或章程除了肯定人民公社已有的正确经验，防止和克服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做法外，还可以参考高级社行之有效的一套政策（如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自留地、家庭副业等）、制度和办法，使之条例化。党内指示可以包括3个方面：1. 要大讲形势，大鼓干劲。2. 继续讲清以农业为基础的问题，主要是讲农业与其他生产部门的关系，最好能够规定一定的具体的比例。3. 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干部的思想教育，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加强群众对干部的监督，改进干部的作风，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学习等等。4. 全党干部，特别是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动手，进行调查研究，痛改不切实际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少犯或不犯错误。中南小组在讨论工作条例草案第三部分（生产大队问题）时，认为实行四固定“一般至少十年不变”这个规定太死了，可否改为“这一**制度**在相当的时期内不变”；包产问题最好规定包产的时间，可以一年一包，也可以两三年一包；对于如何发挥生产队的积极性，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充分利用资源，合理使用劳力，放手经营多种零星副业，是一个极重大的政策性问题，在工作条例上要强调一下。

[3]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华东几个同志[1]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批语

（1961年3月17日）

此件[2]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3]研究。讨论公社条例[4]问题时，请认真考虑这些意见。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柯庆施，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谭启龙，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

[2] 指南三区会议文件《华东几个同志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内容如下：（一）组织规模问题。调整社、队规模，要

根据生产和收入水平、地理情况、原来的基础、群众自愿等条件，由群众充分讨论决定，做到有利生产，便利群众。调整以后，稳定一个时期，同所有制一样，至少7年不变，以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队不宜过大，一般20户左右；生产大队一般维持原来高级社的规模；公社的规模以相当于原来的乡为宜。（二）管理体制问题。公社要集中力量抓农业生产，商业、文教、卫生、金融、工业等工作，有些要收归县以上部门管理；公社对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主要是抓政策、方针，抓计划，抓生产资料的供应，以及其他生产队不能解决的问题；对于农活安排、技术措施等，主要由生产大队和小队当家，公社不能瞎指挥；要发扬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三大民主。（三）党政社关系问题。党的领导主要是抓好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经常性的全面安排，要实行以下的领导方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最基本的方法是了解情况（调查研究），掌握政策，做出样子（典型示范）。（四）干部问题。应当认真选好、管好、教育好干部。公社、大队、队三级干部都要实行民主选举，要依靠领导考察和群众监督管好干部，要教育干部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五）经营管理问题。要恢复高级社时期的一系列好的经营管理办法。群众的意见是：1. 生产管理权要交还生产队和小队，上面不要乱指挥。2. 选好当家人。高级社时期有些干部对经营管理有经验，以后被撤职，现在社员要求这些人再当干部。报告还列举了目前农村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其他几个问题：一、粮食征购要定下来，"三定"不定，人心不定。二、农村生产资料供应，国家不可能全包下来，应组织各县、社、队之间有计划地进行物资交流。三、进一步压缩城镇人口和农村非农业人口，争取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四、社有经济的管理应当建立一定的群众监督制度，一部分应当收归县管。

[3]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4]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草案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通过。

印发两份农村见闻材料的批语

（1961年3月18日）

印发各同志[1]。这两个材料[2]都可看。河北省的工作大有起色。但交河县太大了，九十多万人，应分为两个县。公社也太大，只有二十三个，四万多人一社，太大了。交河整风还未贯彻，12条[3]群众还不知道，应当加紧整社。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1年3月11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八十期上刊登的《杨放之同志谈农村见闻》和《河北省和北京郊区农村的新气象》两份材料。这两份材料反映了春节期间农村群众生活安排得好、群众生产情绪高的情况和目前农村工作中还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3]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

印发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经验[1]的批语

（1961年3月19日）

印发各同志。这个问题有普遍性，请各地同志注意研究四川的经验。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1961年3月17日报送毛泽东的材料，题为《群众拥护哪一种分配方案？——四川省南充市火花公社一九六〇年决算分配的经验》。材料说，火花公社第三管理区是一个收入水平较高的管理区，南充地委农村工作部2月份在这个管理区发动群众讨论了1960年决算分配的问题，提供群众讨论的3种分配方案是：（1）只包老小两头，劳动力全部按劳分配；（2）包老小两头，照顾困难户，其余劳动力实行小部分伙食供给；（3）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实行小部分的伙食供给。讨论的结果，赞成第三种方案的人最多，占81.2%。理由是：（1）可以解决10%的困难户的问题。（2）劳动力强的可以多劳多得，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南充专区500多个公社中，实行第三种方案的公社最多，占76.84%。四川省委已经把火花公社的决算分配经验批转各县参考，指出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既要考虑当地的生产和收入水平，又要照顾绝大多数社员的意见。不论采取哪种方案，供给部分都不能超过三成。

印发《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1]的批语

（1961年3月19日）

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2]研究采纳。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报送的《关于东北地区农村人民公社和农业生产的若干问题》材料。这个材料说，在3月15、16日的小组会议上，东北的同志根据北三区会议期间东北小组的酝酿、讨论，对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办好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目前农村人民公社有一部分规模偏大，体制上存在一些问题，不能使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得到更充分的调动。因此，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做好对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的调整工作。目前农村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如下：一、人民公社的组织规模问题。调整的原则是有利于加强领导，发展生产，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增强团结，并照顾历史和自然条件。根据这一原则，公社大体上一乡一社，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生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初级社。二、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同意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并适当扩大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三、分配问题。主要是克服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吃、多劳多得，适当缩小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公社最近几年内从基本核算单位少提或不提公积金。四、食堂问题。

积极办好，自愿参加，适当划小。五、公社财务问题。加强公社各级财务管理，建立和健全财会制度，杜绝贪污浪费。六、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待遇问题。实行“定工生产、定额补助”，严格控制误工补工的范围。七、农村商业问题。恢复供销社组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办商业。八、农村手工业问题。恢复手工业合作社组织，为农业生产服务。九、劳动力问题。继续压缩城市人口，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十、畜力问题。留够饲料，建立饲料基地，压缩一批城市畜力回农村。此外，还有农村运力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粮食定购问题、调整工农业产品差价问题、合理分配城乡人民公社生活资料问题、奖励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增产问题、调整农业税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党组织问题等，一共是18个问题。

[2] 指当时正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印发《一些社员和干部对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意见》[1]的批语

（1961年3月22日）

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毛泽东

三月二十二日

---

[1]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1961年3月22日报送的一份关于农村分配问题的调查材料，主要内容如下：一、河北省霸县堂二里一位贫农说，“别看现在出勤的不少，但不出活”，“主要因为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另一个贫农小组的代表说：“按劳分配就是好，多劳可以多得，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也不能叫困难户过不去，大伙也要帮助他们，劳力多的也不会干活不积极。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供给制是暗的帮助，好像是该着替他们干的。”二、广东省高鹤县环城公社云益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实行供给、工资三七开和工分带粮以后，只要在派工等方面对人口多、劳力少的各户加以照顾，他们也不会超支。有一位贫农代表说：“实行三七开，不光劳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生产搞不好，供给部分再大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另一位贫农说：“口粮按人发，有些社员就不出工，实行了工分带粮，出勤的立即增多了。”高鹤县委的干部说：“我们作过调查，有80%的人要求供给与工资三七开，并实行工分带粮。”这份调查材料是由两位跟陈伯达一起来广东作调查的工作人员写的，他们来前还在河北调查过上述问题。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1年3月23日）

《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篇文章有些人可能会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文章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依靠些什么人，团结些什么人，打倒些什么人，这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必须要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

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了一条错误的路线[1]。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

---

[1]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在关于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红军任务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会议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前委书记。

线[1]。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2]。

文章第二节讲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3]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4]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〇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不必再讲了。

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

---

[1] 1929年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红军法规等问题，会议开了3天，由于认识不一致，未获结果。

[2]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提出了建党建军的根本原则。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书记。

[3] 指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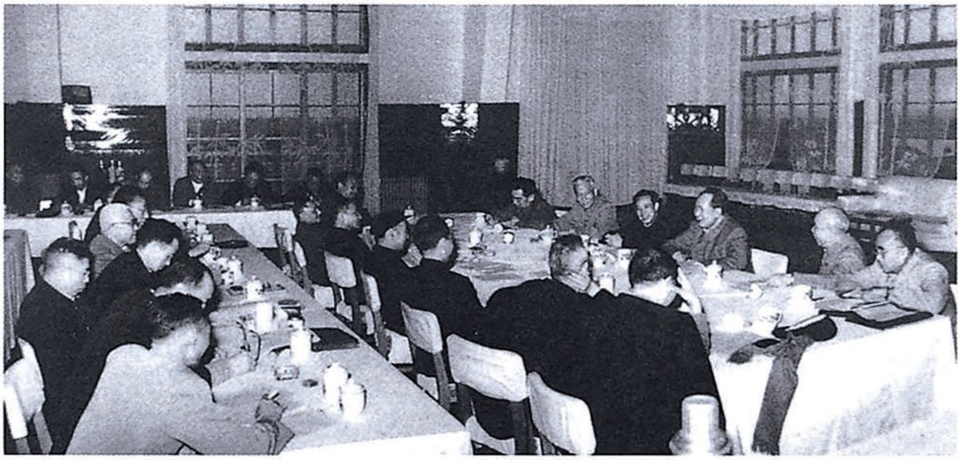
[4] 刘安恭（1899—1929），四川永川人。1929年被中共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到红四军指导工作。后担任中共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在红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

第三节讲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

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现在呢？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最近，中央的文件提到农村要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会，需要重新夺取政权的那些地方，更要建立强有力的贫农、下中农代表会，因为现在还存在着阶级。剥削阶级，在我国大部分地区是被消灭了。地主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不是一点也没有了？要做调查研究，可能还在有一些地方没有打倒，还在当权。大体上说，从去年十一月开始，过去的五个月，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再把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恰当地解决了就好了。至于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这一点平均主义还要。农民自己说，人是有眼睛的，不会看着他们饿饭，不照顾他们。有一位同志在小组发言讲，现在的核心问题还是争取农民，把农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这话说得好。我们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大部分在农村，城市只一亿多一点，农村五亿多，一与五之比。没有农民拥护，不管你修多少铁路，搞多少钢铁，也

会搞翻的。



1961年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上。

第五节讲调查工作的纵断法和横断法。[1]这两个名词我只用了一次，写出这篇文章之后我自己也没有再用过。我也不希望同志们以后写文章、讲话再用它，因为不好懂。纵断法的特点是什么呢？我在文章里说：“近来红军第四军的同志们一般的都注意调查工作了，但是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只是收集许多材料，没有观点，没有思想，“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你站在山顶上看城郭，只能看见很小很窄的街道，许多房屋，街道上有许多人往来。至于这些人是些什么人呢？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分不清楚，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共产党员也分不清楚，甚至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分不

---

[1] 《关于调查工作》原文第五节中有“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这篇文章收入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经作者校订删去了。

清楚。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这是纵断调查法。这种调查法可以作我们的辅助手段，达到一些次要的目的，不是我们的主要手段，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

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料想到后来的王明路线[1]，当时立三路线也还没有出现，瞿秋白同志的盲动主义[2]是有了。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

底下是第七节，讲调查的技术，也就是调查的方法。第一点是要开调查会，做讨论式的调查。你可提出几个方案，跟他们讨论，跟他们研究，这个方案好，还是那个方案好。要做讨论式的调查，

---

[1] 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2] 指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27年8月7日，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11月，主持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无间断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断言“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从而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1928年4月，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

才能得出近乎正确的结论。第二点是讲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各种人都要，经验多的人要，经验少但思想进步的人也要。从职业上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士兵也要，甚至流氓也要。第三点是讲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人多有人多的好处，但开调查会人太多了比较困难。第四点是讲调查的纲目。纲目要事先准备，按纲目发问，这就要有一定的时间。第五点是讲要亲身出马。这里讲，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都要亲身出马。我讲得很宽，那个时候也有点无法无天了。一定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第六点是讲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全国了解两个乡，南方一个，北方一个，对中国的农村就有一个基本概念了。工业不同，要分行业。比如煤矿、冶金、机械等，各了解一个厂矿就差不多了。煤矿，中央有四百多个，你去全面彻底地了解一个就好办了，别的地方也是掘煤嘛。冶金、机械行业也是这样去了解一个工厂。这是重工业，还有轻工业，工业比农业复杂一些。深切地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不然就不容易找到门路。第七点是讲要自己做记录。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现在我不反对派调查组结合当地同志进行调查，这回我就派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结合当地省委的同志来搞。我是间接

的，并没有直接调查。现在有这样的便利条件，过去这样的调查难于办到，那时我们全部人马只有几千人。

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

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建国后这十一年我做过两次调查，一次是为合作化的问题，看过一百几十篇材料，每省有几篇，编出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有些材料看过几遍，研究他们为什么搞得好，我调查研究合作化问题就是依靠了那些材料。还有一次是关于十大关系问题，用一个半月时间同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讨论，每天一个部门或两天一个部门，听他们的报告，跟他们讨论，然后得出十大关系的结论，这是向上层人们，向各部部长调查。

现在全党对情况比较摸底了，中央、省、地各级对下面的情况比较摸底了，我看应该这样说。为什么又讲不甚了了呢？比较摸底，但还是不甚了了，我是讲“不甚”，不是讲你全不了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

---

[1]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毛泽东1955年主持编辑的。这部书共收入反映各地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材料176篇，毛泽东为其中104篇写了按语，并为全书写了序言。该书在1956年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究。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兵少觉得很不好办，开头不了解情况，每天忧愁。我跟彭德怀[1]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对彭德怀说，红一军团的四军、三军打正面，打两路，你的红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

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早不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现在我来提倡一下。今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2]上讲过一次，九中全会[3]上又讲了一次，这次会议还得讲一次，不然又说我没有讲。有些问题得当面交待一下。比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至于调查研究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就不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讲清楚这一点。此外，还有什么横断法、纵断法之类的名词，可以不用。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4]他们讲

---

[1]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和前委书记。

[2] 指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3] 指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4] 赫鲁晓夫（1894—1971），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

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所谓策略路线是包括很宽的，包括政治路线的。比如，依靠些什么阶级，联合些什么阶级，打倒些什么阶级，就属于策略路线的问题。文章讲到商业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对这两个阶级我们的认识始终模糊，就是写文章这个时候，还是模糊的，对他们没有具体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政策，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调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列宁写这本书是为了批判当时的唯心主义造神派的“经验批判主义”。我那篇文章批评社会科学研究专从书本子里面讨生活是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正是失败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一些知识分子倒退了，蜕化了，变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他们专从书本里讨生活，不到工人、农民、社会中去调查，不到群众中去调查，不在斗争中逐步深入调查研究。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

是看过的，《孙子兵法》当时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1]上，凯丰[2]说：你那些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出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你们有些人不是学过四大教程吗？每次打仗都是用四大教程吗？如果那样就完全是教条主义嘛！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

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

---

[1] 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2] 凯丰，即何克全（1906—1955），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局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一九三〇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那个秀才，年纪相当大了，很有味道，看我尊重他，就跟我讲了许多事情。我在《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还说过，第一次使我晓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谁呢？就是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狱吏。我跟他谈了一两天，他谈我记。我首先讲明来意，就是要调查究竟这个班房里头情况怎么样，他就讲了各种复杂情形。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此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我发动各省来的学生抄写民歌，每人十首，十人百首，百人千首，三百人就有三千首民歌，还有一个人抄写了几十首的。其中包括内蒙古、黑龙江的，只是没有青海、新疆的。我对他们说：你们抄写民歌，我发纸，每人发几张纸。一个人长到十几、二十几岁，总能记得一些民歌。从这些民歌里面可以懂得许多东西。这几千首民歌后来丢了，非常可惜。

对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的修改[1]

（1961年3月23日）

一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二

请发至地方县级，军队团级，城市发至区级及大工厂党委，大学党委，大报党委。

---

[1] 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信是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起草的。本篇一是毛泽东为这一指示信加写的标题；本篇二是毛泽东为指示信确定的印发范围；本篇三是对指示信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毛泽东还将指示信的日期署为“1961年3月23日”。当天，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一指示。

三

中央认为，最近几年的建设成就是伟大的，证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具体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造成了一些损失。这些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下去的时候也是走马看花，不求甚解，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政策的恶劣作风，又有了抬头。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全党各级领导同志决不可忽略和忘记这个付出了代价的教训。

在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1961年3月29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1年3月2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一三期上转载的山东省召开公社体制问题座谈会的情况材料（原载于山东省委办公厅3月17日编印的《农村工作情况》第五号）。这个材料说，最近，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召开了4次关于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会。在这几次座谈会上，县、社的同志都一致要求把目前的大县、大社划小。从会议反映的情况看，几年来之所以普遍发生严重的瞒产私分，乱偷乱拿，小队不重视大田生产，社员生产不积极，不爱护耕畜、农具及公共财产，除了经营管理跟不上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小队和小队之间的经济水平不平衡，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平均主义。目前的生产队，从形式上看权力很大，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计划、包产、分配等权力都在生产队的手里，但实际上劳力、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是由生产小队管理使用，各项生产任务是由小队承担，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也都取决于生产小队，所以生产小队才是真正的“实力派”。经过座谈讨论，大家认为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根据四权统一的原则，核算单位应当就是直接的生产单位。在核算单位以下，设常年固定的只包工不包产的生产小队，不设包产单位。因此，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一般应相当于原来的小高级社和大初级社，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小核算单位和大包产单位。生产队的户数一般以五六十户为宜，生产小队一般以10户左右为宜。生产队对生产小队应当实行地片、劳力固定，耕畜、农具也应固定给小队使用。

陶铸、陈伯达[1]同志：

你们一到，请即看此件。下午一时左右，我们谈话时，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上午四时

阅后退毛。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961年3月，毛泽东和陶铸、曾志在广州珠岛合影。

关于查找南宋几部诗文集的批语[1]

（1961年3月）

找南宋张元干[2]的《归来集》。

找南宋张孝祥[3]的于湖集、词。

找南宋洪皓[4]的诗文集。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61年3月17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一九八期增刊的封面上。

[2] 张元干，南宋初词人，著有《归来集》《芦川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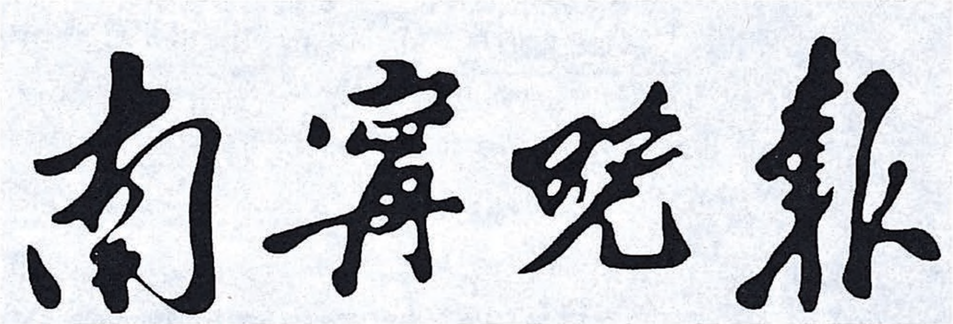
[3] 张孝祥，号于湖居士，南宋豪放派词人，著有《于湖集》《于湖词》等。

[4] 洪皓，南宋初官吏，工诗词，著有《鄱阳集》《松漠纪闻》《帝王通要》等。

为《南宁晚报》题写报头[1]

（1961年3月）

南宁晚报



毛泽东为《南宁晚报》题写的报头。

---

[1] 《南宁晚报》由南宁日报社主办，创刊于1956年9月15日，创刊初名是《南宁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改名为《南宁日报》。1961年3月1日，中共南宁市委《南宁日报》改名为《南宁晚报》，毛泽东亲自题写了报头。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4月3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兄弟的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近年来，勤劳勇敢的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取得的伟大成果，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我们深信，在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基础上，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

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4月3日

关于请王任重、王延春[1]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的批语

（1961年4月11日）

汪东兴[2]同志：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主要是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湖南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些同志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3]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4]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

---

[1]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2]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此时随毛泽东在长沙。

[3] 指中共中央1960年11月3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12条。

[4] 指"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晚也；见兔顾犬，未为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此件同时送湖南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及少奇同志，谭震林、胡乔木[1]二同志。

毛泽东

1961年4月11日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印发胡乔木[1]报送的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等调查材料的批语

（1961年4月15日）

张平化[2]同志：

胡乔木同志来信[3]一件及附文四件[4]，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5]各一份，送我20份，为盼。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4月15日上午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正在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2]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3] 指胡乔木1961年4月14日为报送关于解决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报告等材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韶山大队准备在后天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食堂、山林、房屋、包产等问题。昨天我们抽时间去了一趟湘乡县，发现经

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该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对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的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发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进行。湘乡原被认为是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看来，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湘潭。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可以比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4] 指胡乔木向毛泽东报送的4份材料：一、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看来，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我们和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一起，研究了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的一个坚决要散的食堂。经过5个晚上的讨论，这个食堂在分散时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房屋、菜地、柴山、养猪、困难户等，都一一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个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我们认为，韶山公社解决旺冲生产队食堂问题的经验是好的，可以推广。二、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六十条）的情况简报。简报说，自中央调查组入社以来，全社各队层层召开了干部会、党团员积极分子会、社员会等，对农业六十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一）第20条，关于“三包一奖”制，包产指标一定要落实，要留有余地。社员对此积极拥护，但对超产实物奖励办法，持有不同意见。对于增产部分，一部分社员主张按倒四六分成，即生产队六成，大队和国家得四成，国家比大队要少得。大部分社员主张把产量包死，按今年三定任务加增产增购任务，若再多增产也不增购。（二）第26条和第27条，关于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问题。大家一致认为这是刺激生产发展的好办法。（三）关于第33条，大家一致认为按劳分配是调动社员积极性的最好办法。对供给与工资的比例问题，绝大部分社员赞成按三七

开分配。许多生产队提出，大队三七开，生产队全部按劳分配。（四）第34条，关于公共食堂，多数人不自愿办。我们认为，对于群众确实不自愿办的，应积极帮助做好分散工作，全面安排社员生活。三、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伙后的情况简报。简报说，农业六十条与干部、群众见面后，杨家生产队召开了管理委员会，一致同意马上散食堂。接着又开了社员会，经过讨论，从第二天起就正式分伙做饭。据干部和部分社员向我们反映，散食堂以后出现了如下情况：第一，节省了很多福利工。第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第三，增加了肥料。第四，节省了烧柴。第五，社员用粮更加灵活，更加精打细算，能节约用粮。第六，为吃粮、吃菜而互相怀疑、“扯皮”的人和事少了。由此看来，真正是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如早散为好。四、毛华初访问东茅塘生产队的调查材料。材料说，4月1日，我回到曾在20多年前居住过的家乡东茅塘访问。乡亲们普遍反映，食堂办得不好，房子又挤又破，锅灶没有了，生活不如前几年了，山林破坏太严重。在访问中，大家对以下几个问题谈了看法：第一，食堂问题。大家主张目前仍维持全年指标到户，按月发粮，食堂煮饭，自己种菜，到插秧后再分伙。第二，养猪问题。大家认为只要每人有七厘到一分自留地，粮食到户，有细糠碎米，经过今年和明年，就会发展起来。第三，山林的管理问题。大家认为只要按高级社时的办法去管就能管好。具体做法是：山权属公家，包给私人培育管理。看来这个办法值得研究采纳。对树木，也可以研究一个包管、包培育、分成奖励的办法。

[5]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这时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湖南帮助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中央转发西北局关于调查研究问题报告的批语

（1961年4月15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西北局四月十一日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报告[1]一件发去，

---

[1] 中共中央西北局给中央的这一报告说，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后，西北局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了广州会议的指示精神和毛泽东1930年春《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会议一致认为，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非常恳切，语重心长，对大家教育极深。大家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了几年来的工作，痛感过去对调查研究重视不够，做得很差。加强这一工作，在今天已不是坐而言的问题，重要的是起而行的问题。会议决定，西北局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一书记要亲自动手，西北局机关的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地轮流下去，书记处的大多数同志和各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带领干部下去。目前，调查研究的重点是农村，同时也要用一定的力量进行城市调查。调查的内容和力量，要按照全面规划、各有重点的原则进行统一组织。下去之前，认真地组织干部进行学习，强调调查研究工作要有正确的立场和态度，虚心向下级干部和群众学习。要密切结合当地的中心工作，在农村主要是结合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12条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贯彻执行，通过调查研究，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着的两个平均主义和其他问题，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争取今年的农业丰收。

供你们参考。

中央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

小平[1]同志阅办。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和古巴文化代表团[1]的谈话

（1961年4月19日）

毛主席向古巴朋友们说：中国和古巴是两个友好的国家，我们相互帮助，相互支持。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最大的一个，它不但压迫我们，也压迫你们。它压迫全世界人民。在一些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中，都有一些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不但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主席最后在送别古巴朋友的时候，特别嘱托他们向古巴人民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致以亲切的问候，并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

[1] 指以古巴教育部部长阿曼多·阿特·达瓦洛斯为首的古巴文化代表团。

给臧克家[1]的信

（1961 年 4 月 24 日）

克家同志：

来信及附文收到。此事不忙，待我返京面谈再作决定为宜。我颇有一些事想同你谈一谈。

祝健进！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杭州

---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给邓小平[1]的信

（1961年4月25日）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2]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3]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4]，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正草案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即《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手工业三十五条》）等。

[3] 广州会议，指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

[4] “五风”，指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1]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2]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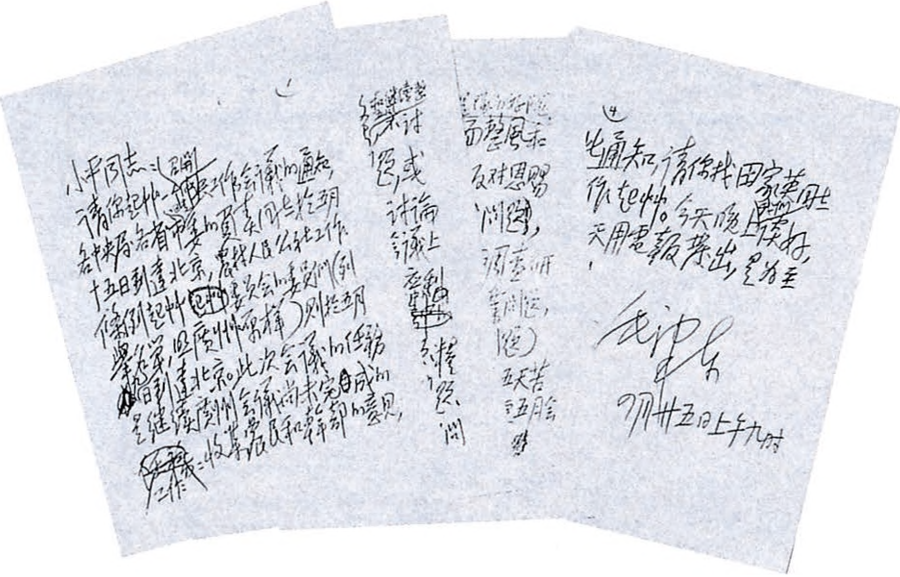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

[1] 这次会议即后来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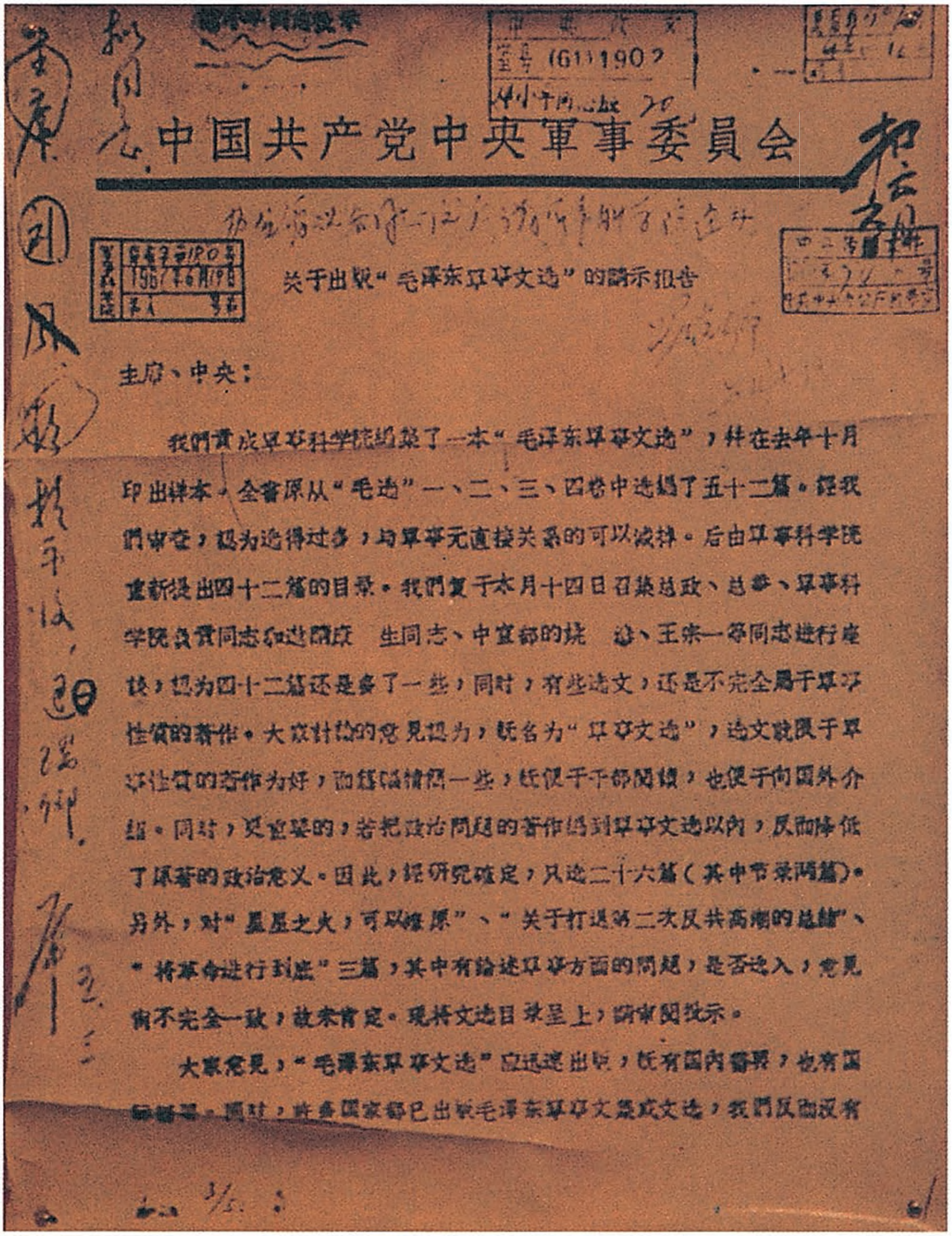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
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
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到
广州参加起草的）则于五月
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
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
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

先通知，请你找田家英同志起草。今天晚上写好，
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要。

毛泽东
四月廿五日上午九时

毛泽东致邓小平信的手稿。

1961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老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爱国战线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交谈。



(61)1902

中国共产党中央軍事委員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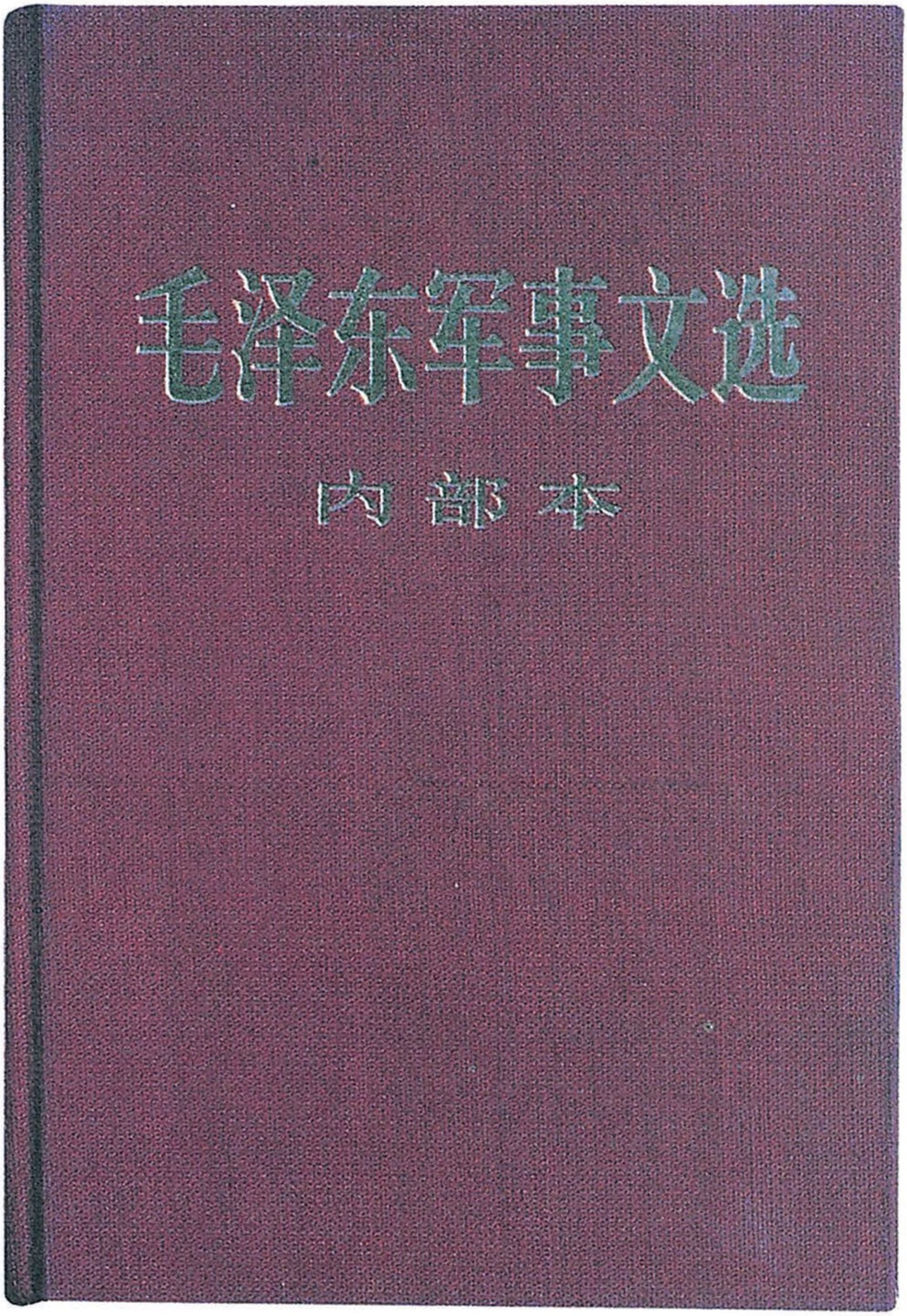
关于出版"毛泽东軍事文选"的請示报告

主席、中央：

我們贊成軍事科学院編纂了一本"毛泽东軍事文选"，并在去年十月印出样本。全書原从"毛选"一、二、三、四卷中选編了五十二篇。經我們审查，認为选得过多，与軍事无直接关系的可以減掉。后由軍事科学院重新提出四十二篇的目录。我們复于本月十四日召集总政、总参、軍事科学院負責同志和进修院　生同志、中宣部的姚　溱、王宗一等同志进行座談，認为四十二篇还是多了一些，同时，有些选文，还是不完全屬于軍事性質的著作。大家討論的意見認为，既名为"軍事文选"，选文就限于軍事性質的著作为好，而篇幅精悍一些，既便于干部閱讀，也便于向国外介紹。同时，更重要的，若把政治問題的著作編到軍事文选以內，反而降低了原著的政治意义。因此，經研究確定，只选二十六篇（其中节录两篇）。另外，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結"、"将革命进行到底"三篇，其中有論述軍事方面的問題，是否选入，意見尚不完全一致，故未肯定。現將文选目录呈上，請审閱批示。

大家意見，"毛泽东軍事文选"应迅速出版，既有国内需要，也有国际需要。同时，許多国家都已出版毛泽东軍事文集或文选，我們反倒没有

1961年4月，毛泽东、邓小平对军事科学院关于出版《毛泽东军事文选》请示报告的批示。


毛泽东军事文选
内部本

军事科学院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1]

（1961年4月27日）

非洲是斗争的前线。亚洲有些地方也是斗争的前线，如阿拉伯国家，又如印度尼西亚和帝国主义的矛盾还未解决，越南附近的老挝斗争很尖锐，越南南部斗争也很尖锐，再就是南朝鲜最近有群众运动。所有这些斗争的性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又如日本，去年有大规模的群众斗争。艾森豪威尔想去日本访问，但没有去成，日本人民向他关门了。我们那时候在台湾海峡用打炮的方法欢迎他，他到台湾那天，我们的大炮开了一天。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美国霸占了台湾，所以我们也是一个斗争中的国家。美帝国主义到处捣乱。但你们非洲那里目前捣乱的主要是英国、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荷兰等帝国主义。还有拉丁美洲，我最近见了古巴文化代表团，是在本月十九日。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就在那天，古巴把侵略者消灭了。你们知道这消息吗？古巴打了胜仗。拉丁美洲有两亿人口，你们非洲也有两亿人口，阿拉伯国家有八千万人口。我们都应该团结起来。我听到有消息说，这次万隆亚非人民团结理事会议上，要把亚非团结扩大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团结。

---

[1] 这是毛泽东和几内亚、约旦、南非、塞内加尔、北罗得西亚（今赞比亚）、乌干达、肯尼亚外宾的谈话。

革命是有可能胜利的。原来没有胜利的国家，如几内亚不是已经胜利了吗？非洲还有些国家已经胜利了，如阿联[1]原来是英国属地，它也独立了。在亚洲，印度尼西亚原来是荷兰殖民地，它也独立了。我们中国是所有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现在独立了，但台湾还没有解放；台湾只有九百万人口，而中国解放了的地方有六亿多人口。又如古巴已经独立了。古巴的情况很值得研究，它距美国那么近，只有一百八十公里，独立了两年多，真正动员了全国人民来驱逐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我国也是一个例子。中国革命单是武装斗争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打了二十二年。

中国经过许多艰难困苦，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又胜利，又失败，经过这些曲折，最后取得胜利。失败的时候是政策上犯了错误。我们党曾经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就是同蒋介石合作的北伐战争遭到了失败。后来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武装斗争，但斗争中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叫它教条主义的错误，后来又批评了这种错误。没有这些错误和纠正错误，就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取得胜利。这些教训不仅是我们的，也可以供所有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的朋友们作为国际经验来研究参考。犯错误是一件坏事，但也有好处。比如人们生病，有些病菌会给他们免疫力，像肺结核，得过它以后，不会再犯；又如伤寒症也是这样，得了一次不再得。我们犯过右的、“左”的机会主义错误，所以我们的党和人民有可能找到正确的路线。

---

[1] 阿联，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叙利亚脱离阿联，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71年阿联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

帝国主义为非洲人民创造了斗争条件，创造了埋葬帝国主义的条件，创造了非洲人民独立自主的条件。如它使非洲人民中产生了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又如，它为了自己的利益使一部分非洲人受到教育，这些人变成知识分子，我看你们都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为你们开办学校，本来他们的目的是要培养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后来有些人走到革命一方面去了，发生了分化。拿中国来说，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培养的知识分子，有的跟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跑了，有的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先进分子，还有的是中间派。帝国主义迫使我们走反对帝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使你们掌握了语言工具。你们有的讲英语，有的讲法语，大体上就是讲这两种语言。这些语言已变成殖民地通用的了，也许你们非洲各地用本地语互相听不懂，但你们可以利用英文、法文。利用英文、法文团结起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世界上就是这么回事，帝国主义教育出反对它的人。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对此自己并不自觉。如我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时候，有许多人是在日本学习过的，他们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中有许多将军是由日本军事学校出来的；还有些不是将军，是搞文化、政治工作的，如廖承志同志，他会讲日本语。现在日本情况不同了，已变成为战败国了，它被美国控制着。

我刚才说过，革命是可能胜利的。举了几内亚的例子，也举了

古巴的例子，还举了我国的例子，说明革命必须依靠群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有正确的路线，才能胜利。几内亚民主党就是一个联系群众的政党，杜尔总统是联系群众的领袖。人民觉悟起来需要一个过程，他们的觉悟不是一天所能提高的，要经过自己实践，得到了经验教训，才能有所提高。只要有领导核心，如有几内亚民主党及其他革命政党作为团结、宣传的核心，人民群众觉悟就会逐渐提高。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现在觉悟提高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已逐渐清楚。在早几年他们对美帝国主义认识还不够，现在也逐渐了解了。美国说它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殖民地。这一条看起来似乎有点像，它没有殖民地，可以拿来欺骗人，但它的殖民地实际上比英国、法国要广得多，或可称为半殖民地，如它用泛美组织[1]来控制拉丁美洲，用北大西洋集团[2]、中央条约组织[3]、东南亚条约组织等军事集团来控制广大的欧洲和亚洲，

---

[1] 泛美组织是由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1890年4月，1910年改称泛美联盟。1948年4月又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即受到美国的操纵和控制，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联合谴责美国的经济掠夺和贸易歧视政策，美国在该组织中的霸主地位日趋衰落。

[2] 这里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同时宣布成立。

[3] 这里指巴格达条约组织，是英、美两国为控制中东地区和遏制苏联而筹组的军事集团，1955年11月根据《巴格达条约》成立。其成员国有土耳其、伊拉克、英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1959年3月伊拉克正式宣布退出。随着成员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分歧的日益扩大，1979年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也相继宣布退出，同年9月28日该组织解散。

现在又利用联合国组织侵略非洲，如在刚果[1]。

我们的斗争你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支持。我们支持全世界所有人民的斗争，包括你们的斗争，团结所有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朋友，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政党。

---

[1] 刚果，今扎伊尔。

对杨朔《樱花雨》一文的批语[1]

（1961年4月）

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

---

[1] 《樱花雨》是著名散文作家、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杨朔写的一篇旅日游记，载于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第八版。文章把美军在日本的势力比作摧残樱花的风雨，而把日本人民比作在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毛泽东的批语，写在这篇文章的标题旁。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苏步青、谈家桢、陈望道、周谷城、周同庆、谭其骧、刘大杰、朱东润、卢于道9位复旦教授及上海各界代表。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和劳动模范欢度五一劳动节。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陈望道、周谷城教授。

1961年5月1日，毛泽东视察上海电机厂时和工人们在一起。

为推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起草的通知和批语

（1961年5月4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因有几省负责同志提议推迟几天召开，以便多做几天调查研究工作，向群众寻求真理。中央认为可以推迟几天。现决定：起草委员会各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其助手，于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特此通知。

中央

1961年5月4日

---

[1]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

二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你与在京各同志商酌。如以为可，即用电报发出。

毛泽东

五月四日上午三时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本篇一。

对张平化[1]关于湖南工作来信的批语

（1961年5月5日）

小平同志：

此信[2]请印发中央常委、书记处各书记。五月工作会议[3]时，是否印发到会各同志，那时再定。这信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诚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

毛泽东

五月五日，在上海。

---

[1]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张平化1961年4月14日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信中说，主席4月11日给汪东兴同志的信，已印发省委书记处各同志，并在省委常委和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作了传达和讨论。半年来我省的整风整社运动有一定成效，但只在一些动手较早、领导较强的重点县做得比较好，大部分地区还不彻底，一部分地区甚至根本没有解决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第一是恩赐观点。不少的地方不是真正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由群众当家做主来解决问题，而是由少数人站在上面“发政施仁”。第二是主观主义。我们有若干政策性的具体措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例如过分强调办公共食堂、供给部分过大、征购任务过重等。所有这些错误，应当由省委、首先应当由我负主要责任。

[3]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

给李井泉、陈正人[1]的信

（1961年5月6日）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2]，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

[1] 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1961年4月25日通知中提出的关于农村工作中的若干关键问题的调查题目。这些题目包括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给农民留一定数量的柴山作为自留山的问题，三包一奖问题，耕牛、农具归大队所有好还是归生产队所有好的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等问题。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转发周恩来关于公共食堂等问题调查汇报的批语

（1961年5月7日）

此报[1]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毛泽东

五月七日上午四时四十分于上海

---

[1] 指周恩来1961年5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话汇报的记录稿。周恩来在汇报中说，我到邯郸已有5天了，5天中找了一些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社员谈话，开了座谈会，有4个问题需要汇报。（一）食堂问题。绝大多数甚至于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都愿意回家做饭。我正在一个食堂搞试点，解决如何把食堂解散好和安排好社员回家吃饭的问题。（二）社员不赞成供给制，只赞成把五保户包下来和照顾困难户的办法。（三）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并有所发展。具体做法是，包产到小队，以产定分，包活到组。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多劳多得的原则。这个办法势在必行。（四）邯郸专区旱灾严重，看来麦子产量很低，甚至有的颗粒无收，棉花和秋季作物还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恢复人力和畜力问题。

关于下连队调查极为有用给林彪[1]的批语

（1961年5月7日）

徐业夫[2]同志：

请用电话告林彪同志：他在四、五两月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五月去杨村七天，下连调查，极为有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益的。十天后，我返京找他长谈一次（两小时）。请他好好保养身体，是为至要，是为至要。

毛泽东

1961年5月7日，在上海。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转发李井泉[1]关于粮食问题来信的批语

（1961年5月9日）

李井泉同志此信[2]，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9日上午2时，于上海。

---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李井泉1961年5月8日关于粮食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在南充、内江两地同干部、社员谈话和座谈时，听到的反映都比较强烈，主要是感到口粮标准低，要求增加口粮；按高级社时的分配办法，实行粮食三定；口粮按人口分配后，多余的粮食按劳动工分分配；及早宣布、固定国家征购任务。在我省两年来粮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这个要求的出现是很自然的，也是合理的，这需要在小春分配中解决，以利于大春生产，争取今年的粮食丰收。我们对于粮食分配的原则是：大队统一掌握粮食，各级共同负责保管，按低标准供应，分期分批到户，超产队适当增加口粮，奖励粮按照工分分配。

转发胡乔木[1]关于湖南调查来信[2]的批语

（1961年5月9日）

胡乔木同志此信，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9日上午3时，于上海。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胡乔木1961年5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们调查组最近同湖南省委一起，对农业六十条提出了初步的修改意见，准备再调查一下以前没有很多了解的商业和手工业问题。现将最近调查情况简要报告如下：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112个减为6个，其中5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另一个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业，恐怕也难持久。对于在短短的3天时间内基本上解决全公社的食堂问题，群众反映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有的甚至说这是“第二次解放”。湖南省委对解决食堂问题决心很大，预计最近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解决。二、农村商业问题。省委已决定原韶山的5个公社作成立供销合作社的试点。原供销部的工作人员虽对由国家干部转为集体干部感到震动，但显著改变了对社员顾客的态度，马上到各生产队去征求意见。韶山供销社最近即可成立，属公社领导，独立核算。三、农村手工业问题。为了调动手工业工人的积极性，恢复市场供应，中南局各省委都决定，恢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建议各省都可以进行一些试点工作。四、

城市居民食堂问题。我们在湘潭市调查发现，这类食堂实际上是强迫参加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农村。湘潭市委已就这个问题写了专题报告，省委准备在最近迅速解决这个问题。五、国营工厂企业参加和领导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样做势必要增加人员，分散精力，实在困难，而且对附近农村的生产也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六、我们在长沙还附带问了一些城市工商业调查和城市整风的情况。这方面确有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迫切要求解决。对此，需要进行专门深入的调查。

关于胡乔木[1]推迟返京、继续调查的批语

（1961 年 5 月 9 日）

湖南省委转胡乔木同志：

你的信[2]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改为五月二十日到京。小平[3]同志：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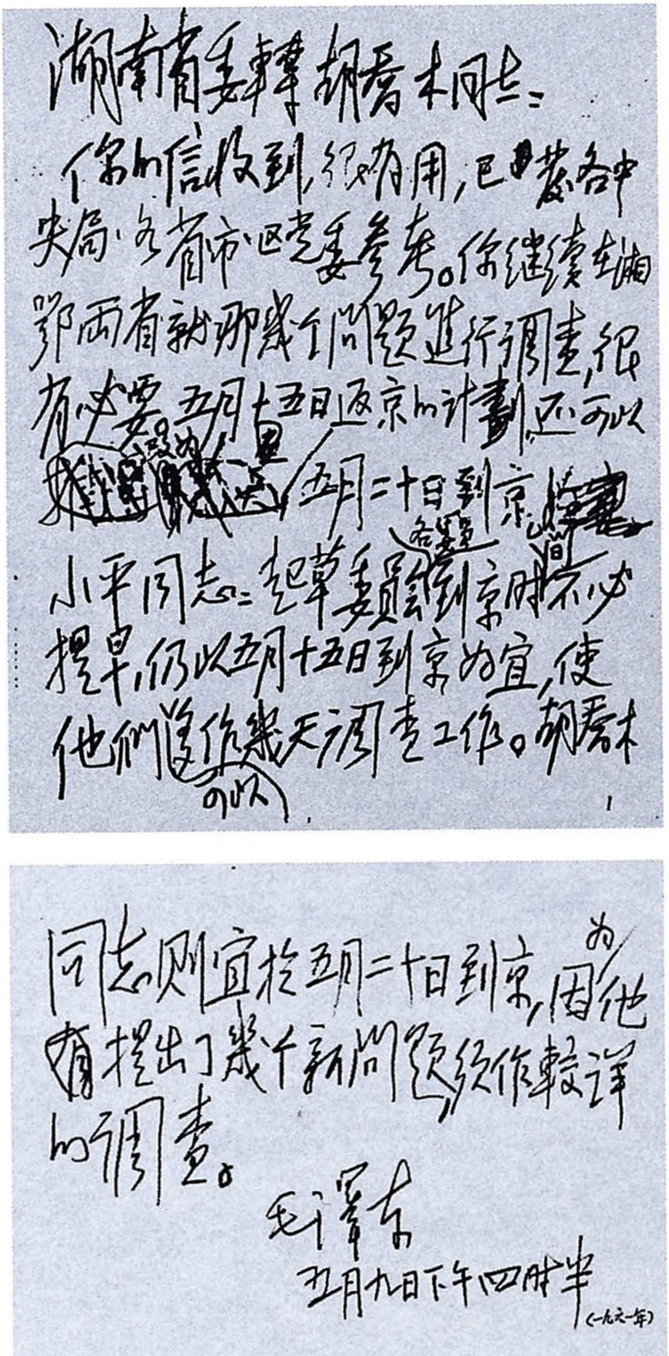
五月九日下午四时半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胡乔木 1961 年 5 月 8 日给毛泽东的信。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湖南省委转胡乔木同志：

你的信收到，很有用，已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参考。你继续在湘鄂两省就那几个问题进行调查，很有必要。五月十五日返京的计划，还可以推迟于五月二十日到京。

小平同志：起草委员会各委员到京时间不必提早，仍以五月十五日到京为宜，使他们可以多作几天调查工作。胡乔木同志则宜于五月二十日到京，因为他提出了几个新问题须作较详的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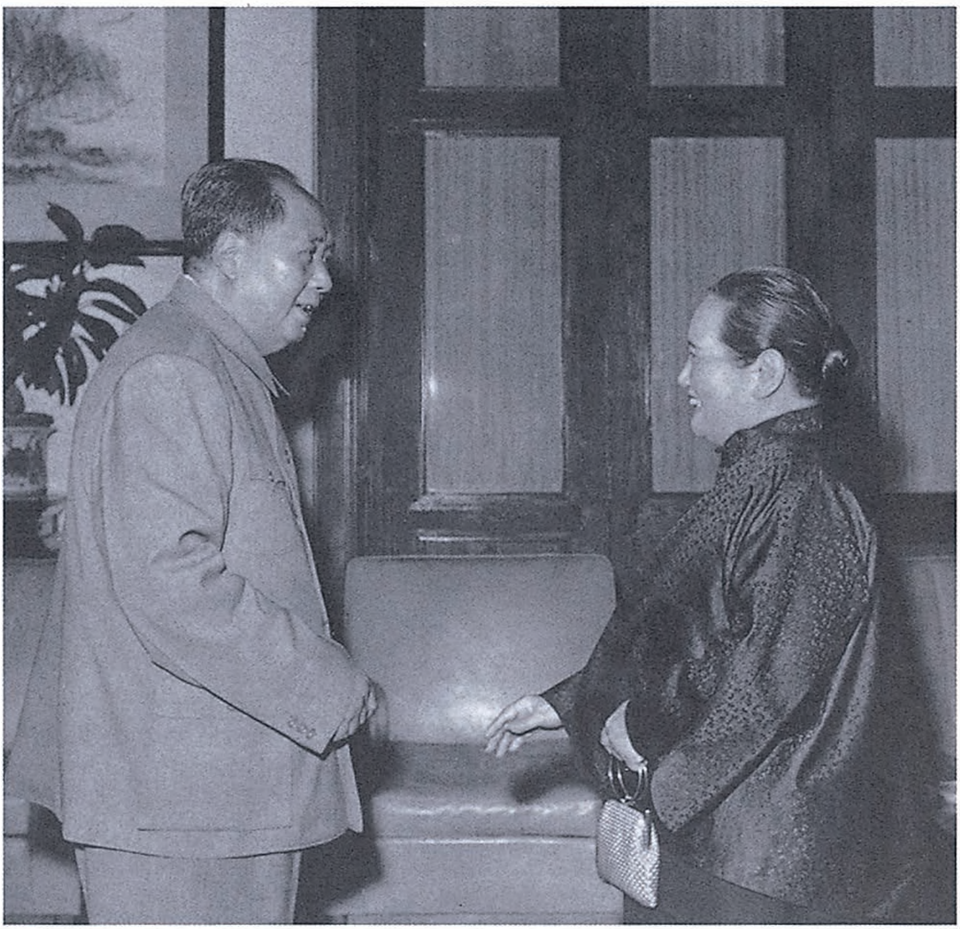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五月九日下午四时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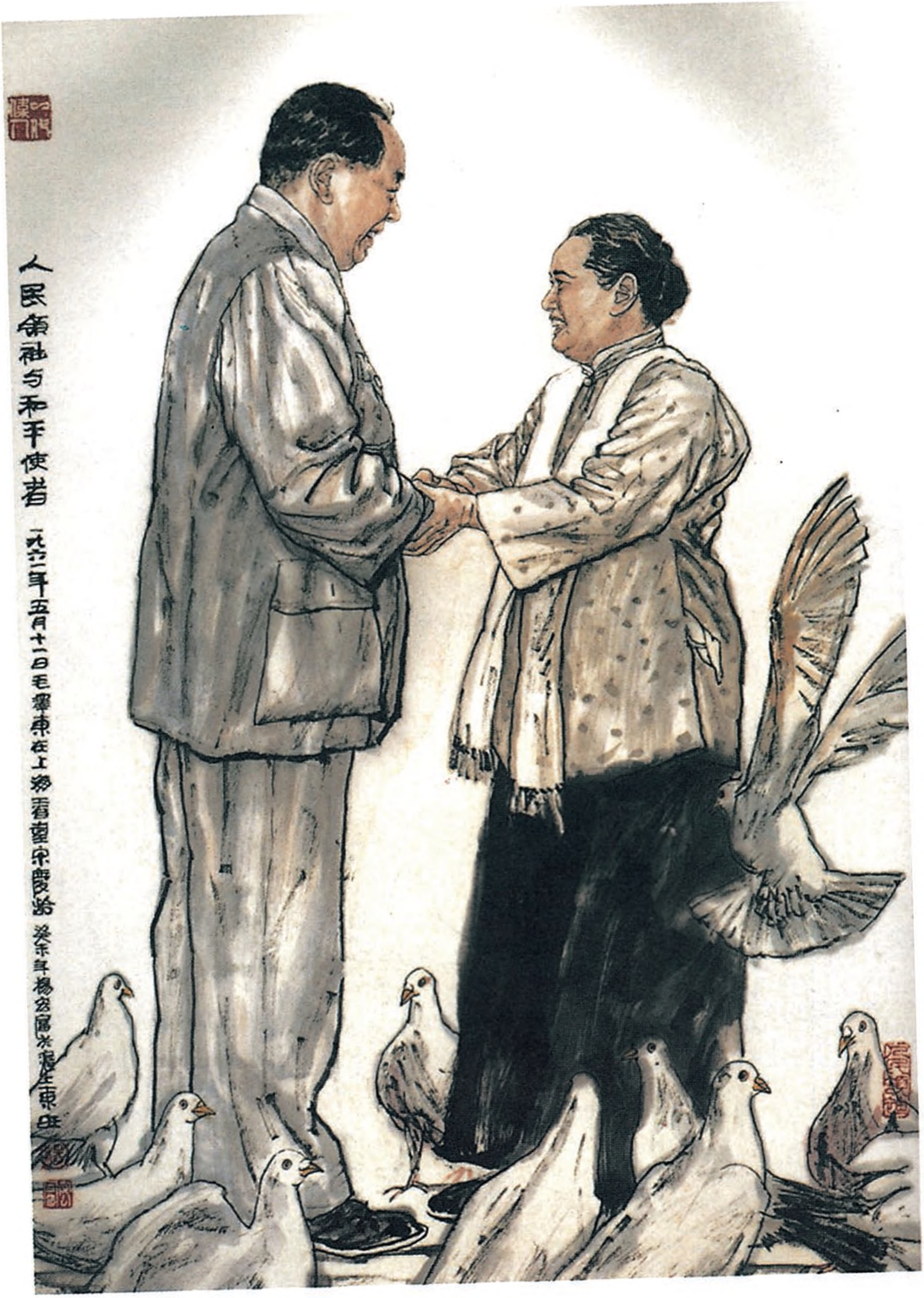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

毛泽东致胡乔木、邓小平信的手稿。

1961年5月11日，毛泽东在上海孙中山故居会见宋庆龄。



毛泽东和宋庆龄在一起。


人民领袖与和平使者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上海看望宋庆龄
癸未年杨宏富

《人民领袖与和平使者》（中国画）

转发邓小平、彭真[1]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的批语

（1961年5月13日）

此信[2]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13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2] 指邓小平、彭真1961年5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5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及各县一个多月的调查情况来看，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农业六十条指示后，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许多措施还需要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一、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问题。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分调整完毕。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实行责任制，使农民心里有了底，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二、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多数生产队赞成对包产部分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对包产指标高的队，超产粮的征购比例也可以低于40%。征购后的余粮，应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

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三、关于供给制问题。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四、关于“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问题。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的，一些实行“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单位，因没有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一般都减了产。五、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自愿结合的。六、关于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牲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可以加强社员对牲畜的爱护，减少死亡，同时繁殖也会较快。七、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供应原料、工具，推销产品，组织生产。

给张平化[1]的信

（1961年5月14日）

此信[2]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

[1] 张平化（1907—2001），湖南酃县（今炎陵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张平化1961年5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汇报了他到一个生产大队作调查，同群众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情况。

转发李井泉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来信[1]的批语

（1961年5月15日）

---

[1] 指李井泉1961年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试点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关于恢复供销合作社的问题，我们在南充县新民区结合整风进行了试点工作。这个区的供销合作社于1958年春同国营商业进行了合并，不久又将原来由小商贩组织起来的合作企业打乱合并，与国营商业统一核算，实际上过渡为国营商业性质。这些改变，在加强统一管理，增加国家部分收入，支援工业大跃进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脱离群众，阶级界限不清，部分物资城乡交流不畅，经营管理水平降低等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消极因素。第一，国、合商业合并前，供销合作社指导集体经济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活动办法，如合同、奖励、留量、返还、民主评级、协商议价等减少了，更多地搬用了国营商业的计划调拨、统购、派购的工作方法，这就使某些干部更容易滋长强迫命令和不等价交换的恶劣作风和行为；在农产品采购中，估买估卖、压级压价、掠夺农民。第二，国、合商业合并前，供销合作社要定期召开社员代表会议，理、监事会议，报告工作，检查缺点。现在，这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也无形中废止了，削弱了群众对供销社购销业务工作的支持和监督。第三，小商贩合作企业性质改变后，在工资制度上，一般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固定工资制，这就助长了很大一部分小商贩的消极经营思想，使服务质量降低，小商品经营减少，影响城乡物资交流，甚至营业亏本。事实证明，这样做也是不能完全适应的。为了更好地促进国营经济与人民公社经济，发挥集体商业的纽带和桥梁作用，恢复集体所有制的供销合作社，是完全必要的。同时，为了适应当前农村副业和集市贸易的情况，应加强对小商贩的利用改造，对小商贩的组织也要作相应的调整。

一

此件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15日

另印发到会[1]各同志。

二

小平[2]阅后发。

用保密电话。

---

[1]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王任重关于湖南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来信[1]的批语

（1961年5月15日）

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各同志。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原件退毛。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已于4月26日结束。通过这次会议，大家感到思想解放了，苦闷消除了，心情舒畅了。地委书记们认为，过去上边规定的框框太多、太死，束缚了人们的头脑，同时也要求今后划几条大杠杠，使大家有所遵循，不致左右为难。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在会上检查了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到会同志感到满意。从这次会议看来，湖南的主要问题是：第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反右倾斗争是非界限不清，一部分好同志被打击，党内斗争中出现的偏向没有及时纠正，使得强迫命令的作风发展起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第二，对1959年粮食估产过高，征购、外调过多，导致农民口粮下降，挫伤了生产积极性。这也是1960年减产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

1960年生产上的瞎指挥，是造成农业减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第四，1959年大办水利时缺乏必要的控制，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事先没有经过勘查设计，结果劳民伤财，没有用处。这次会议对几个重大政策问题作了决定：第一，粮食征购50亿斤稻谷，外调5亿至6亿斤大米。第二，农业税定为10%，超过的一律减下来。第三，生产大队从可分配部分抽出5%左右供给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余全部按劳分配。第四，食堂绝大部分已经散伙了，只有少数地方还有农忙食堂。

1961年5月，毛泽东和航空兵二十四师主要领导合影。

转发阎红彦关于调查农村人民公社几个问题来信[1]的批语

（1961年5月16日）

一

阎红彦[2]同志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毛泽东

1961年5月16日

二

小平[3]同志：

此信请你阅后，用保密电话发去，另印发到会[4]各同志。

毛泽东

五月十六日下午三时

---

[1] 指阎红彦1961年5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从4月16日起，我在思茅地区作了些调查研究，参加了普洱、景谷两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同一些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进行了座谈，并找了若干社员听取意见。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一、社队规模问题。我省的社队规模，一般都是偏大的。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居住条件、经济联系、民族关系，该大就大，该小就小。山区应基本上以村寨为基本核算单位。在一个公社内，可以有的核算单位是大队，有的是生产队。以调查和试点推算，预计全省调整后，社队都将增加两倍以上。二、公共食堂问题。群众反映很强烈。我重点调查了3个食堂，群众意见主要有3条：一是浪费大，二是平均主义，三是办食堂和发展私人养猪、家庭副业有矛盾。省委其他同志所作的几十个食堂调查，都说明了同样的情况。省委考虑还是根据群众自愿，不能有任何勉强，群众真正要办的就办，群众真正不愿办的就不办。当然即使要散，也要有准备地散，避免发生混乱。三、关于分配“三七开”问题。根据我的调查，多数地区群众都不主张实行部分供给制，但都一致同意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其开支大体占总收入的2%至3%，最多不超过5%。这实际上是扩大公益金的办法。一部分地区群众仍愿意除包五保户、照顾困难户外，对全体社员实行部分粮食供给制，供给部分大体上也只占到分配给社员部分的10%至15%。我觉得上面两种办法都可以实行，全省不必强求一律。四、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问题。多数意见是归生产队所有，我认为这样做对大队并无损害，还可以大大加强生产队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五、山林分级管理问题。现在的问题一是所有权不清、责任不明，二是管理制度废弛。调查中大家认为只要迅速确定林权，明确所有制，加强管理，山林恢复起来很快。六、实物分配问题。社员要求实物按工分分配，多劳多吃。

[2] 阎红彦，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蚌埠火车站和省、市负责人，警卫，接待人员合影。

196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蚌埠车站和乘务员亲切交谈。

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一文[1]的批语和修改[2]

（1961年5月28日、30日）

一

此件印发工作会议[3]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毛泽东

1961年5月28日

二

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

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时，请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之一。

毛泽东

1961年5月30日

三

目前我们许多领导机关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纷纷派出调查组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是很好的。有些人过去没有做过调查工作，现在工作里出了很多毛病，在未经过派出的机关、党委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对政策、态度和方法等方面反复讲明，并有一个强有力的组长以前，出毛病、闹笑话、成灾难，一定是难免的。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人员戚本禹1961年5月12日写的《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材料说，我们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几位同志，利用业余时间摸了一下各级领导机关来该厂做调查工作的情况，发现去冬来厂做调研的，简直是凤毛麟角，而今春来的却如雨后春笋。总的说来，这些调查组来厂后，一方面帮助领导了解了一些情况，另一方面也帮助工厂做了一些事情，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调查工作中，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1) 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 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 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 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 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 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 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 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 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也

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要真正做好，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镀一层好看的金颜色，因此每一个做调查研究的同志，都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深入下去，和群众打成一片，以求真正了解一些实际情况，解决一些实际问题。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为报送这一调查材料给毛泽东写的报告中说：“这个材料提出了一些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间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年来，我们的队伍很大地扩大了，人员复杂，作风不纯，有些很好的事，在某些地方，某种场合，往往办成不好的事。”本篇一就写在田家英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印发这个材料时，拟题为《调查成灾的一例》。

[2] 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毛泽东和青年文艺工作者在一起。

转发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1961年5月29日）

印发工作会议[1]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2]，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

毛泽东

五月二十九日

尚昆[3]办。

---

[1]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带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辽宁省委调查组1961年5月5日写的调查材料之四，题为《农村商业要办活一点》。材料说，我们会同省、市商业部门的同志，在海城牛庄公社和其他一部分社队，对农村商业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在这期间，鞍山市又召开了一次财贸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也反映了不少意见。一、关于农村商业体制问题：(1) 改变农村商业体制势在必行。自1958年公社化以后，农村商业工作就由两条腿（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变成一条腿，由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一种所有制，农村的商品交易就由包括集市贸易在内

的三条渠道变成一条渠道。从最近两年多的情况可以看出，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作为商品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国营商业部门实行统一牌价，价格不尽合理，影响社员个人和集体物资的出售，造成人为的紧张；基层商业部门面向群众，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作，做得不及以前了；社员群众对于供销社的关系已经疏远，不关心、监督和支持了，供销社经营管理水平也因此而下降了。(2) 改变体制的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国营商业的性质不变，加上一条民主管理、群众监督。这是一部分基层商业工作人员提出的办法。第二种意见是国营商业吸收集体和个人的投资，增加集体所有制的成分。这是商业部门一部分中层干部的想法。第三种意见是恢复供销社的原有性质，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农民一致同意这种办法。看来，第三种意见是一种比较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3) 国营商业与集体商业要有适当的分工。分工应当以刺激商品生产、活跃农村市场和便利群众购销为原则。办法可以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对集体商业的活动，不宜限制太多太死。(4) 必须贯彻执行勤俭经商的原则。二、怎样把农村商业工作做活一点？解决体制问题是一个根本环节，在政策上作某些调整也很重要。大家反映的意见如下：第一，要求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以奖励生产。第二，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第三，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目前有一些农村手工业品的收购价格，甚至还没有原料费高。第四，设法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凡是农村需要而又能够生产的，一般应就地加工。办法是逐步把农村的油坊、豆腐坊、粉坊、酒坊恢复起来。第五，在某些商品的供应上，要求适当照顾农村的产妇、婴儿、病人和老人的特殊需要。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为报送这个材料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读了胡耀邦同志带领的调查组所写的这个材料，觉得非常好，可以在商业工作问题上，引人深思。”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陈伯达的报告上。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印发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的批语

（1961年6月1日）

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1]，印发工作会议[2]各同志研究。湖南的问题[3]在各省、市、区大体相同，有普遍性，所以值得大家注意。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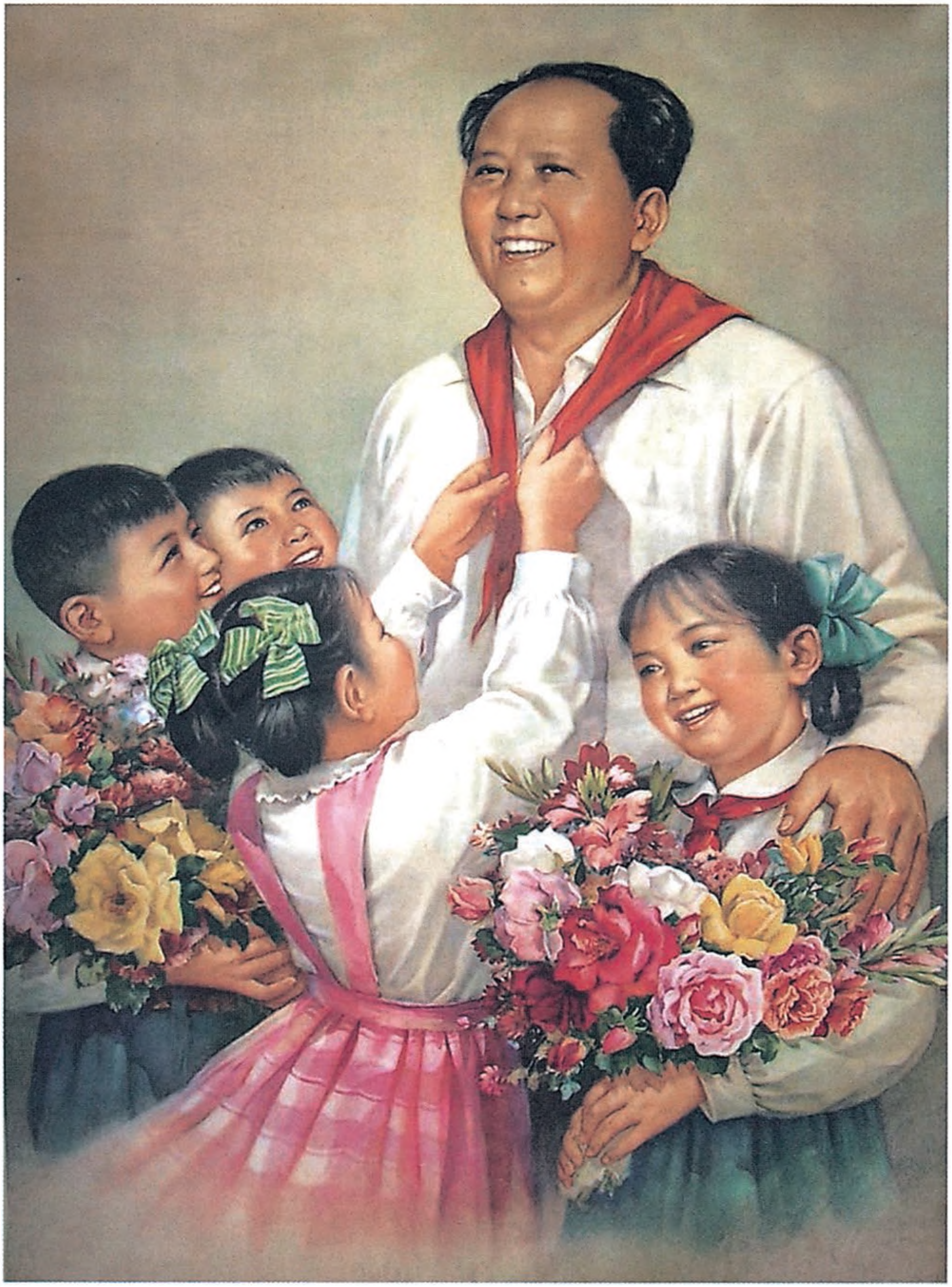
1961年6月1日

---

[1] 指毛泽东1961年4月11日关于请王任重、王延春来湖南帮助解决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汪东兴的信；张平化1961年4月14日关于湖南农村工作问题给毛泽东、刘少奇等的信；王任重1961年5月10日关于湖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1961年5月11日关于在湖南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给毛泽东的信。刘少奇的信中汇报了他在长沙福临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调查到的一些情况，并对社员住房问题，退赔问题，巩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制问题，在一部分乡村中建立公安派出所和巡回法庭问题，机关干部、军官和职工在乡家属问题等，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2]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3] 参见毛泽东1961年4月11日给汪东兴的信。信中讲到湖南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宣传画）

关于中央工作会议第二、三阶段日程安排的批语

（1961年6月3日、4日）

一

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工作会议『在』讨论调查等四个问题，早已过去了。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讨论粮食、六十条、手工业条例、山林条例、商业条例[1]等五个问题之后，还要讨论湖南工作的四封信[2]，调查组下

---

[1] 六十条，指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在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讨论和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于6月19日正式下发。手工业条例，指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6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一草案。山林条例，指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6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一草案。商业条例，指这次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并通过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6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一草案。

[2] 指毛泽东1961年6月1日批示印发的关于湖南工作的四封信。

去要遵守长辛店支部戚本禹同志的十多十少问题所提出的意见[1]。这是第二阶段，大约七天（一号起）可以够了（要休息一天）。第三阶段以四天时间讨论城市问题。五月廿一日以来十几天时间的工作，讲一讲会取得了什么成绩，鼓足干劲，干下去。再就是七月下旬或八月上旬（似以八月上旬为较好）庐山会议[2]的时间问题和题目问题（城市整风和工业两个问题），一天就够了。这样8号或9号就可以结束了。以上你们如果同意的话，就请通知各中央局同志转三大组各同志。

毛泽东
六月三日上午十时

二

同意这样安排[3]，十二号结束会议。

毛泽东
六月四日上午

---

[1] 指戚本禹1961年5月12日《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中提出的关于克服调查研究工作中“十多十少”问题的意见。

[2] 指后来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

[3] 1961年6月3日，邓小平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毛泽东转报如下建议：正在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七号结束第二阶段，十一号结束城市工作（要四天），十二号庐山会议等问题。故八、九号不能结束。如城市工作只讨论两天，则十号可以结束”。对此，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此外，他还将邓小平的建议拟题为“四号起，九天工作安排问题”。后来这次会议于6月12日闭幕。

对中央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工作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61年6月4日）

---

[1] 指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于1961年5月15日代中央起草的关于举办“抗大”式政治学校训练一批革命的知识青年派到农村工作的指示稿。指示稿说，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农民群众，使农民逐步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是我们党的一项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最近农村许多三类社队的出现，证明没有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工作，同农民结合起来，在乡村中就很难建设社会主义，很难防止地主富农的复辟。为进一步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发展农业生产，迫切需要训练一批具有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比较熟悉党的方针政策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充实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干部队伍，改进公社和生产大队的管理工作。今年高中毕业生约有15万人、初中毕业生约有120万人不能升学，从中挑选3万到5万人，从今年下半年起，举办“抗大”式的政治学校，加以短期训练，派到农村参加工作或参加劳动，对加强人民公社工作有很大好处。这是一项具有深刻的革命意义的措施。必须在今后几年内，持续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对这项工作予以足够重视，并且采取积极的办法做好这项工作。6月3日，刘少奇将这个指示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如认为可用，请批告小平同志提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一下。”经讨论后，中共中央于1961年6月23日发出了这一指示。

小平[1]同志：

此件请提交工作会议[2]讨论一下，如得同意，即可发出。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对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示稿等的批语和修改[1]

（1961 年 6 月 11 日、17 日）

一

即退田家英同志。两件都已看过，很好，请即送小平[2]同志照办。

毛

11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1961 年 6 月 10 日报送的由他起草的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示稿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赵明、曾源 1961 年 2 月关于王国藩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调查材料的批语；本篇二是在田家英 6 月 10 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稿上所作的一处修改（用宋体字排印）；本篇三是在 6 月 15 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在 6 月 15 日送审的这一中央指示修改稿上所作的一处修改（用宋体字排印）；本篇五是在 1961 年 6 月 15 日下发这一指示的中共中央文件上写的批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二

半年多以来，全党同志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我们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工作面貌，已经大大改变，或者说正在迅速改变。

三

退尚昆[1]即办。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四

各级党委都要把调查研究定为经常的工作制度。要真正认识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到群众中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五

江青精读。两个好文件[1]，可以为各级干部的学习教材。现在是一定要重新教育一切上中下干部的教育〈时候〉了。

---

[1] 指中共中央1961年6月15日下发的《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和6月19日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印发关于王国藩[1]社西铺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材料的批语

（1961年6月11日）

这个经验[2]很好，印发会议[3]各同志参考。

毛泽东

1961年6月11日

---

[1] 王国藩，当时任河北省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社长。

[2]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赵明、曾源1961年2月关于王国藩社西铺生产大队粮食生产与畜牧业生产相结合的调查材料说，西铺生产大队是一个有174户人家的村子，王国藩就是在这里办起“穷棒子社”的。现在这个村是王国藩领导的建明人民公社的一个基本核算单位。这个村由个体生产时期到合作化时期以至现在，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结合得好，互相促进，因此粮食和畜牧业生产一直在稳定地上升。而与西铺村一路之隔的东铺村，由于畜牧业逐年下降，粮食产量也不断下降。西铺村与东铺村粮畜发展的相互关系，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粮多、畜多、肥多，畜多、肥多、粮多的道理。西铺村生猪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坚持了公养与私养同时并举、以私养为主的方针，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社员养猪。在整个畜牧业的发展上，则贯彻了自养自繁的方针。

[3] 指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这个社在河北省北部的迁安县[1]。

---

[1] 应是遵化县。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1]

（1961年6月12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

[2] 指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和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1]。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2]。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〇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会议[3]，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4]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

---

[1] 1959年4月2日至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会议纪要《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中，仍肯定人民公社办食堂和实行供给制的做法。

[2] 指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问题写给六级干部的信中讲的6条。

[3] 指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 指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内容共12条。

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2]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要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3]、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

---

[1] 指1961年1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

[2] 韩文公，即韩愈（768—824），河南河阳（今孟县）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3] 指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1]，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2]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

---

[1] 指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历时3年多。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次整风，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2] 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1]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2]、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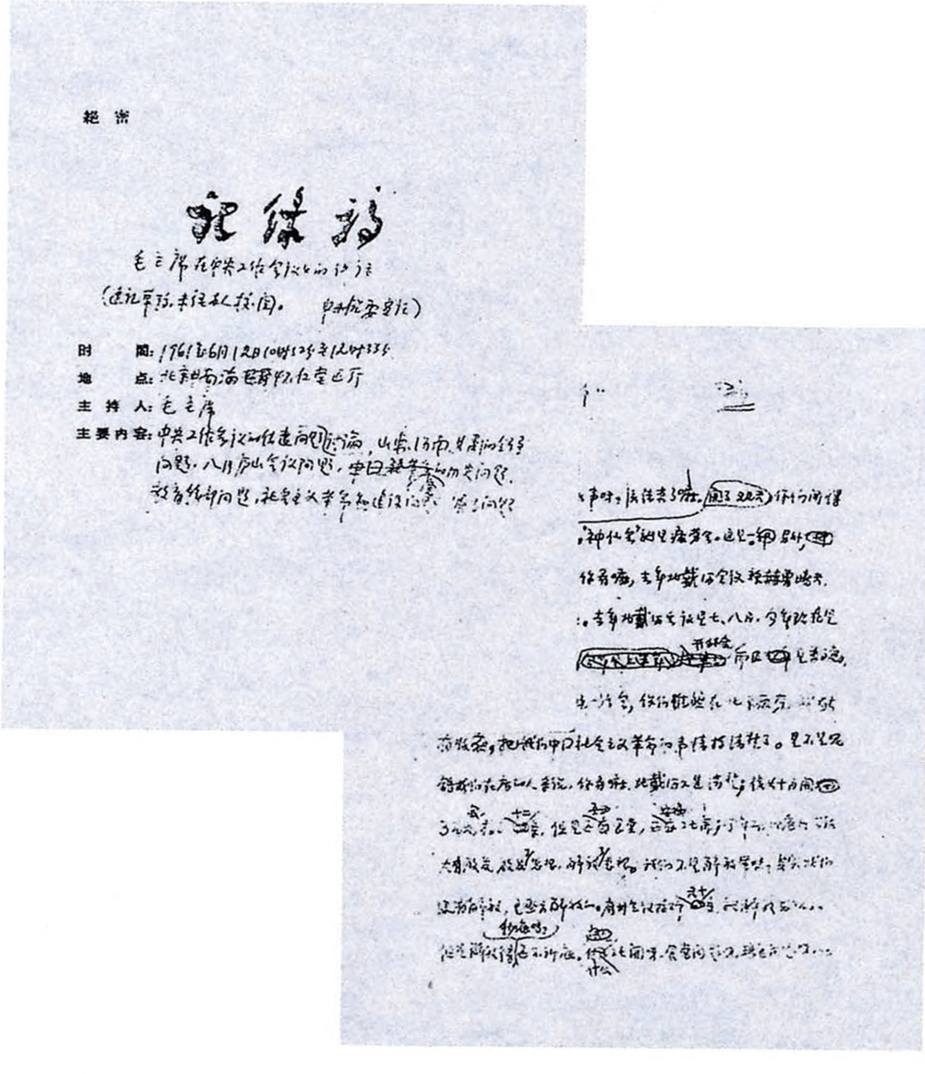
---

[1]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60条。

[2]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絕密

記錄稿

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校阅。 中办机要室记）

时 间：1961年6月12日10时15分至12时35分

地 点：北京中南海[illegible]仁堂西厅

主 持 人：毛主席

主要内容：中央工作会议的任务问题的讨论，山东、河南、甘肃的经验问题，八月庐山会议问题，中国[illegible]的历史问题，教育干部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等等问题

1961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图为会议纪要。

给刘松林[1]的信

（1961 年 6 月 13 日）

女儿：

你好！哪有忘记的道理？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2]，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

问好。

父亲

六月十三日

---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 年 10 月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 年 11 月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1957 年 10 月至 1961 年 8 月，刘松林在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读书。

[2] 1962 年 2 月，刘松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结婚。

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1]

（1961年6月1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上一次总统来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你们没有联合国问题，只有西伊里安[2]问题，这是与我们不同的。

阿哈默德·苏加诺（以下简称苏）：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目前外界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中国大陆同台湾成为整体，作为一个国家进入联合国；另一种主张认为中国可以先进入联合国，然后在联合国里同朋友们一道进行斗争，使得在联合国中只有中国，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台湾归还中国。不久前我同陈毅元帅谈话时，曾把这两种主张转告给他，并说明这不是印尼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阿哈默德·苏加诺谈话的一部分。

[2] 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岛西半部及其近海岛屿，今伊里安查亚省。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荷兰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霸占这一地区。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过谈判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却屡遭阻挠和破坏。为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印尼人民展开声势浩大的收复西伊里安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同意谈判。1963年5月1日荷兰政府将西伊里安主权交还印度尼西亚。

观点。不过陈毅元帅已经明确表明只接受前者，而不接受后者；只愿意一步走，而不愿意分两步走。

毛：只能一步走。

苏：我愿意很好协助，为实现一步走而奋斗。

毛：如果台湾归还中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中国，那末台湾的社会制度问题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

苏：这是否就像苏联同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情形一样呢?

毛：不一样。

苏：我不是说社会制度方面，而是指能不能像乌克兰同苏联那样在联合国有两个代表。

毛：不行，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乌克兰，还有白俄罗斯在联合国有代表，这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乌克兰同白俄罗斯都参加联合国，苏联也在联合国里，因而苏联在联合国拥有三票。苏联当时碰到许多困难，不能不这样做。但是这样并没有两个苏联的问题。

1961年6月，毛泽东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一起。

1961年6月，毛泽东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一起。

1961年6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亲切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

给邓小平[1]的信

（1961年6月22日）

小平同志：

此件[2]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减，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现在城镇人口要减少二千万以上，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1961年6月19日报送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

对刘少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1]

（1961年6月）

一

第二件事是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件事情已经做了十二年，现在还要继续做下去。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2]，为了实现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则需要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3]。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翻身的道路了。[4]

---

[1] 这是对1961年6月23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文件印发的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96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内容又有所修改。

[2]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原文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3]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原文是“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4]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

二

在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中，人民民主革命得到了彻底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第一步的胜利[1]，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的大事。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2]，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3]，不能不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欢呼。

---

[1]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

[2]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

[3] 1961年6月23日印发的讲话稿上，这句话的原文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不能不产生伟大的影响”。

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

1961年，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和何香凝在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等和陈叔通等在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 年，毛泽东、周恩来和献花的学生代表在建党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和献花的学生代表欧阳元在一起。

给张维[1]的信

（1961年7月9日）

楚珩兄：

惠书读悉，甚以为慰。送上照片三张及薄物一份，尚祈哂收为幸。

顺祝贵体早日康复，并问夫人安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九日

---

[1] 张维，字楚珩，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来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电报

（1961年7月10日）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四十年来，英勇的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胜利地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具有农牧业和工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在胜利地进行了发展国民经济和文化的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基础上，正满怀信心地执行着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制定的宏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使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蒙古人民共和国坚持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蒙古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中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看成是自己的胜利，并为之欢欣鼓舞。

中蒙两国是亲密的兄弟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两国人民一直相互同情，相互支援。我们两国的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是牢不可破的。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极大地鼓舞了世界人民为争取社会主义、民族解放、民主和世界和平的斗争。我们深信，在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基础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的关系，必将日益发展。

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蒙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7月10日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

在关于日本经济政策和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份材料[1]上的批语

（1961年7月13日）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2]四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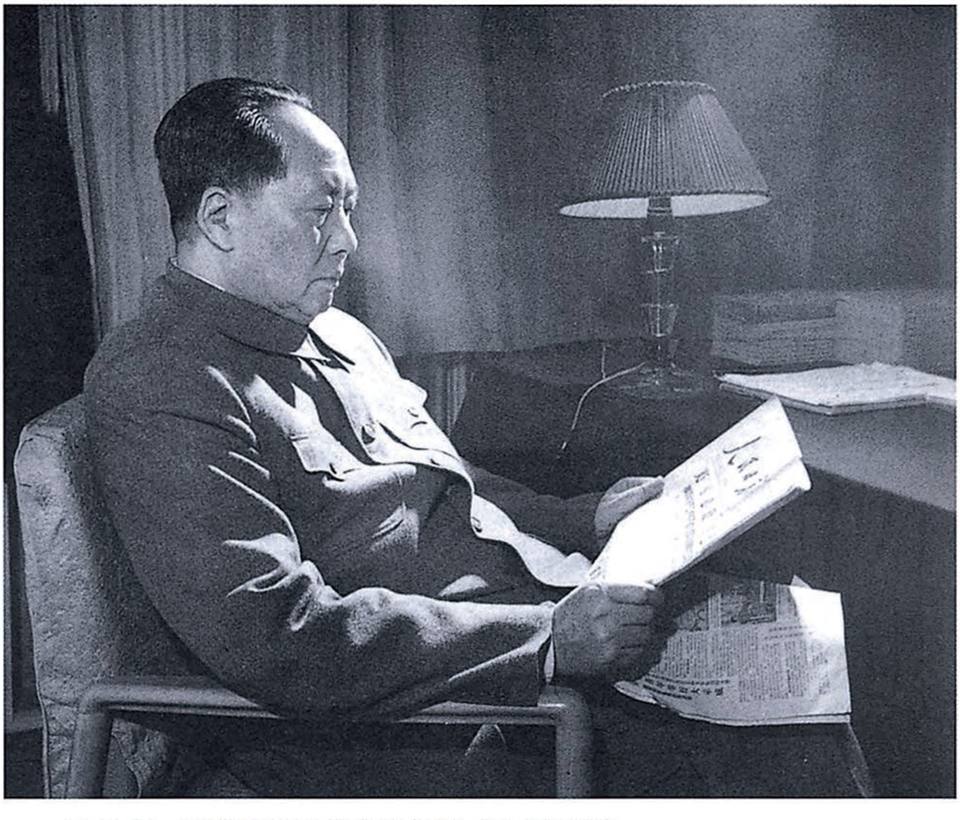
---

[1] 指1961年7月6日印发的一份内部材料。材料中说，日本金融财政事情研究会1960年2月根据防卫厅的要求，提出题为《从经济政策来分析防卫产业》的内部报告。该研究会理事长福田赳夫现任自由民主党决策机构政务调查会会长，顾问山际正道现任日本银行总裁。报告要点为：一、日本国防和军火生产的出发点：（1）日本的国防体制应不同于欧洲和美国，只能从局部战争的观点出发。（2）必须更加重视武器生产与国力的关系，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已超过了日本国力所能及的地位。（3）必须贯彻日美共同分担日本国防的想法，采取日美共同防御的体制。二、今后日本国防和军火生产的发展方向：（1）日本国防的重点是保持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海上补给力。（2）日本军火生产应以能与民需品同时生产的军需品为限。（3）需要装备高性能战斗武器的空防由美国分担。三、目前日本国防和军火生产中所存在的偏向：（1）陆军兵员相对过多，空军飞机负担太重。（2）军火生产政策忽视地面、海上战斗力的发挥，与国内外形势发展背道而驰。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

毛泽东
七月十三日在杭州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住地阅读《人民日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1年7月21日）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波兰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一年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新的成就。目前，波兰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一年来，波兰人民和波兰政府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以及维护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波兰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波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和团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我们深信，这种友谊和团

结，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1]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2]的基础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而对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祝波兰人民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7月21日

---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

[2]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八周年的电报

（1961年7月25日）

古巴《革命报》：

在“七·二六”古巴人民武装起义的光荣节日，我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向古巴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并且大大地鼓舞了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中国人民把古巴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看作是对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支持；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将永远得到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1年7月25日

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

（1961年7月30日）

同志们：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再则，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不过同江西这类的半工半学不同。江西的工，是农业、林业、牧业这一类的工，学是农、林、牧这一类的学。而党、政、民机关的工，则是党、政、民机关的工，学是文化科学、时事、马列主义理论这样一些的学。所以两者是不同的。中央机关已办的两个学校，一个是中央警卫团的，办了六七年了，战士、干部们从初识文字进小学，然后进中学，然后进大学，一九六〇年，他们已进大学部门了。他们很高兴，写了一封信给我，这封信，可以印给你们看一看。另一个，是去年（一九六〇年）办起的，是中南海党的各种机关办的，同样是半工半读。工是机关的工，无非是机要人员，生活服务人员，招待人员，医务人员，保卫人员，及其他人员。警卫

团是军队，他们有警卫职务，即是站岗放哨，这是他们的工。他们还有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些，与文职机关的学校，是不同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三周年纪念，主持者要我写几个字。这是一件大事，因此为他们写了如上的一些话。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七月三十日

1961年，毛泽东在散步。

关于同意会见古巴桑切斯少校的批语[1]

（1961年8月9日）

业夫[2]同志办。可以见，如对方能推迟回国时间二三天，可于十五日或十六日见面，地点临时通知。

毛

九日早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1961年8月3日关于拟请毛泽东接见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古巴人民社会党今年5月通过我国驻古巴使馆向我党提出，以中拉友协名义邀请古巴炮兵学校校长桑切斯少校，在访苏之后到中国访问。我们表示同意。桑切斯已于7月31日到达北京。他在出国前曾对我使馆人员说，他非常敬仰毛主席，到京后又多次表示敬仰毛主席之意，希望能见到毛主席。鉴于桑切斯是1956年跟卡斯特罗乘“格玛拉”号游艇在古巴登陆的81人之一，是冲破巴蒂斯塔军队包围的12个英雄之一，在今年4月反对美国雇佣军入侵的斗争中很坚决，并且受了伤，此次是第一次来华访问，我们意见，如毛主席能抽出时间接见他一次比较好。

[2] 业夫，即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祝贺苏联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的电报

（1961年8月9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在苏联胜利发射第一个载人宇宙飞船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苏联又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载人宇宙飞船，在人类征服宇宙空间方面，创造了新的奇迹。这一光辉成就，将大大鼓舞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祝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攀上新的高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61年8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8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朝鲜解放十六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开展了全民性的千里马运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朝鲜人民在1960年提前一年全面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现在，正在满怀信心地为胜利实现宏伟的七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把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看作是中国人民自己和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成就。

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支持朝鲜政府关于和平统一朝鲜的各项主张，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爱国正义斗争。我

们深信，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的最后胜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对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近，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来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是对我国人民的有力支持和巨大鼓舞。我们两国所签订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全面加强了我们两国的互助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从而对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祝兄弟的朝鲜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8月14日

1961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金日成。

祝贺印度尼西亚独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8月16日）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加诺总统阁下：

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十六周年的时候，谨向你和印度尼西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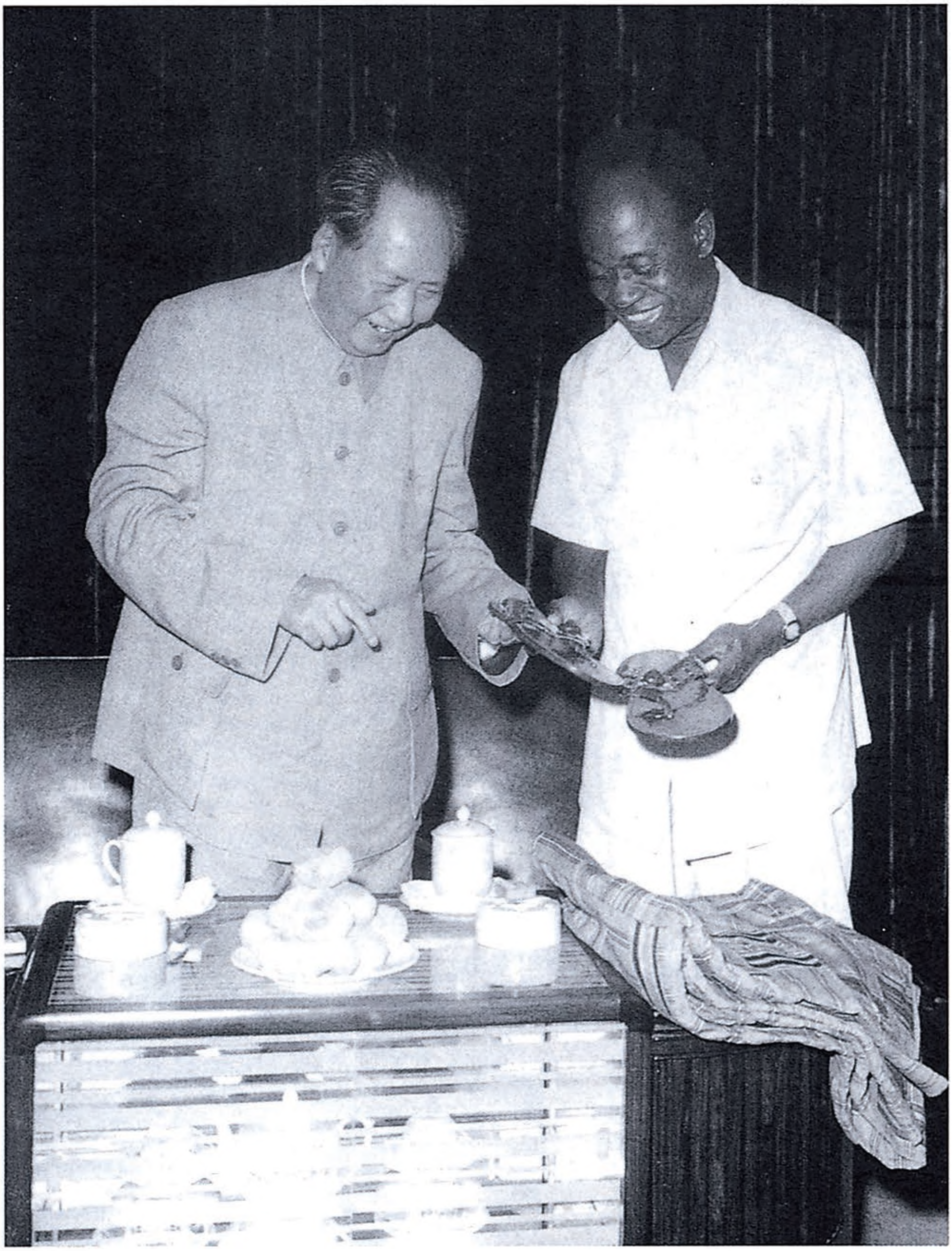
祝印度尼西亚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建设自己国家的崇高事业中，获得新的胜利和成就。祝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

1961年8月16日

1961年8月18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巴西副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

1961年8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



1961年8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并观看他赠送的礼物。

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1]

（1961年8月19日）

对国际问题，我们的看法同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2]的看法一样。莫斯科会议还不到一年，是去年十一月开的。世界大战究竟打不打？声明上已有回答，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你们会说：你没有回答问题呀，你没有肯定到底打不打呀。问题在于：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各国劳动人民的力量很大，资本主义也怕灭亡，因此有可能不打。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每天说不会打，使大家睡觉，使大家认为是共产党说不会打了，一个早上忽然打起来怎么办？还不如说帝国主义要打，准备好对付帝国主义要打好一些。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及干部学习团谈话的一部分。

[2] 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声明就国际局势、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斗争的迫切问题，分别作了阐述。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民族解放运动是防止世界战争的重要力量。声明还重申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正确性。

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古巴现在准备着，美国虽没有直接进攻，但组织了它的走狗登陆。古巴面临的美帝国主义直接参加进攻的危险并没有过去，他们在那里准备着。

搞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一套，还要碰钉子

（1961年8月23日）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时期的右倾错误，就是说，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延安整风，才搞出了一套为大家所公认的理论和具体政策。对于民主革命，即阶级斗争，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我们都有了一套经验。

讲到社会主义，我们则不甚了了。人民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讲如何搞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出的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不会。会不会遭到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已经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还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只有搞了社会主义，才会有社会主义的经验。

给胡乔木[1]的信

（1961年8月25日）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2]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3]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4]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八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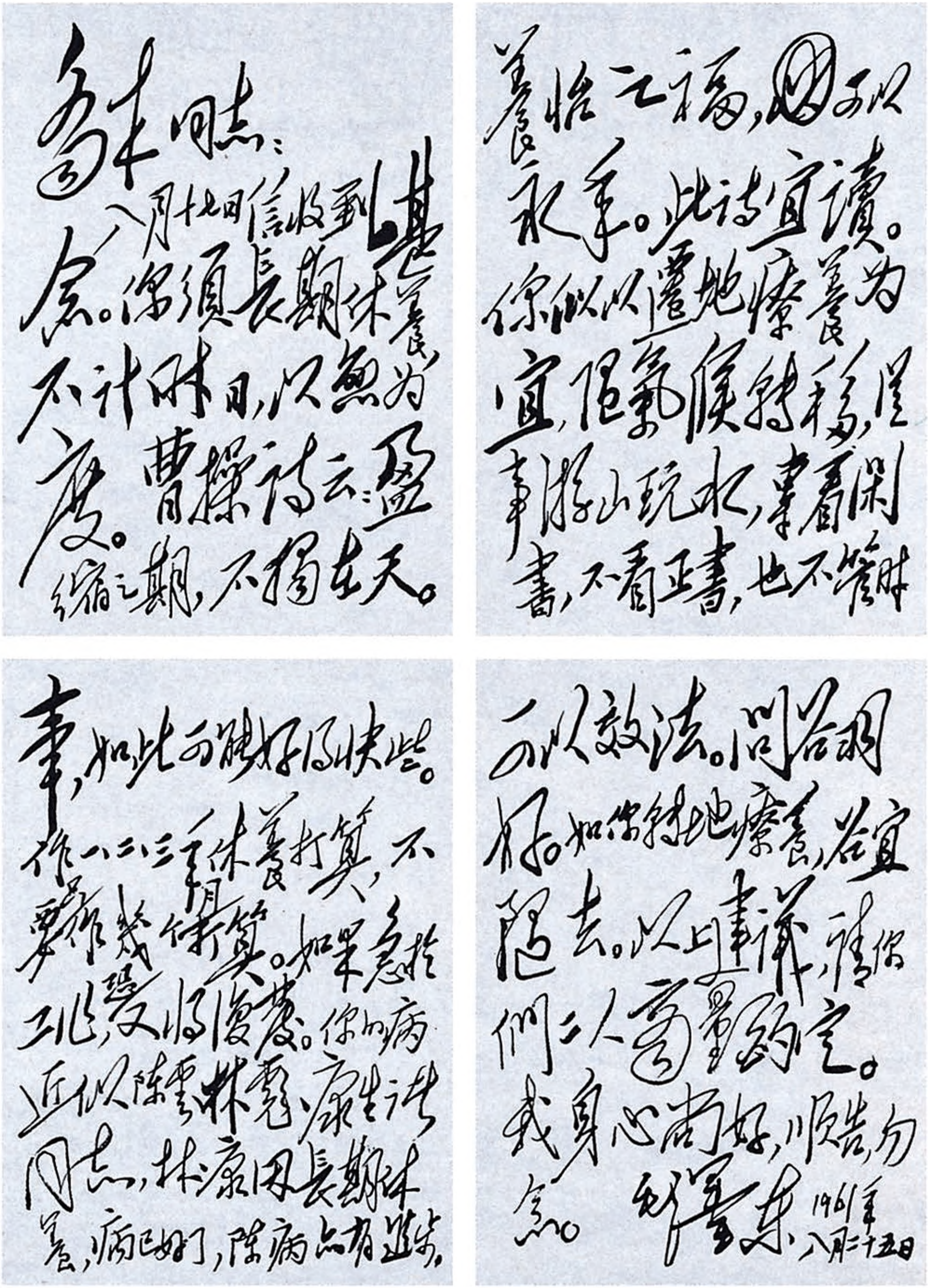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参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曹操集》中作："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3]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4] 谷羽，胡乔木的夫人。



乔木同志：

八月廿四日信收到，甚念。你須長期休養，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诗宜讀。你似以遷地療養为宜，随氣候轉移，专事游山玩水，專看闲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又将復发。你的病近似陈雲、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陈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谷羽好。如你转地療養，谷宜随去。以上建議，请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1961年八月廿五日

毛泽东致胡乔木信的手稿。

在林彪关于总政选印《毛选》部分文章的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961年8月29日）

田家英[2]同志：

请你看一下。如大体可用，即退回林彪同志办理。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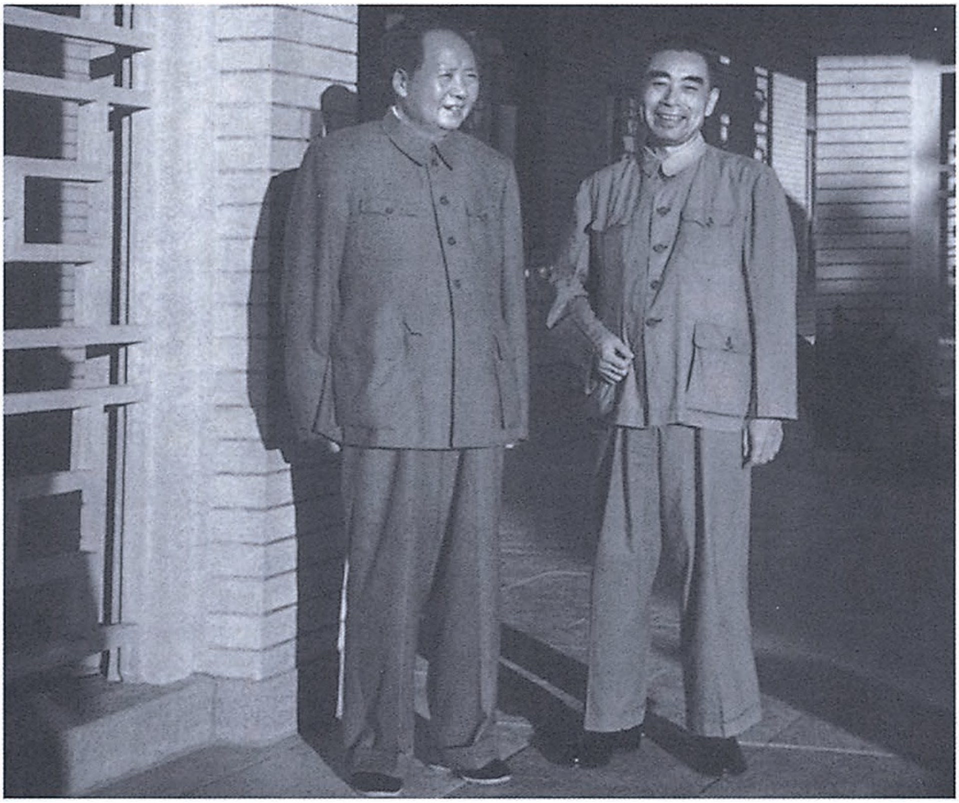
八月二十九日

---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1年8月2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军队广大士兵热爱和迫切要求读毛主席著作，但由于书籍缺乏，且不善于选择必需读的文章。为着解决这一问题，总政从《毛选》中抽选了一部分文章拟印发到连队，以适应现实需要。但所选文章和章节，不知是否恰当，盼主席交有关人员予以审查。如有意见，即请指示，如无指示，即由总政出版了。"同年，总政宣传部即编印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印发到班，每班两本，供士兵学习。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庐山举行，讨论通过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图为毛泽东等在大会主席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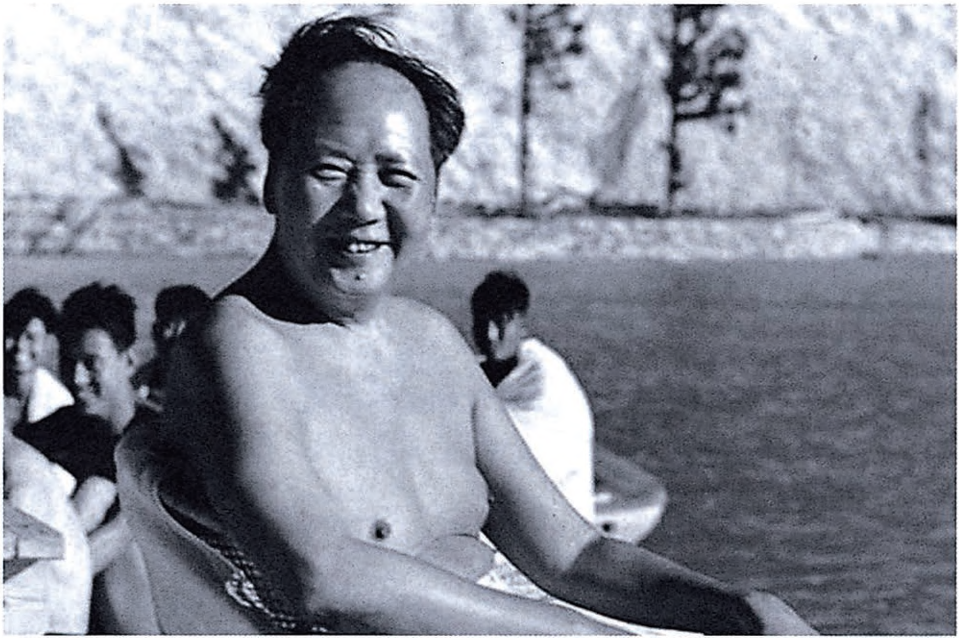


1961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和陈云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在庐山亲切交谈。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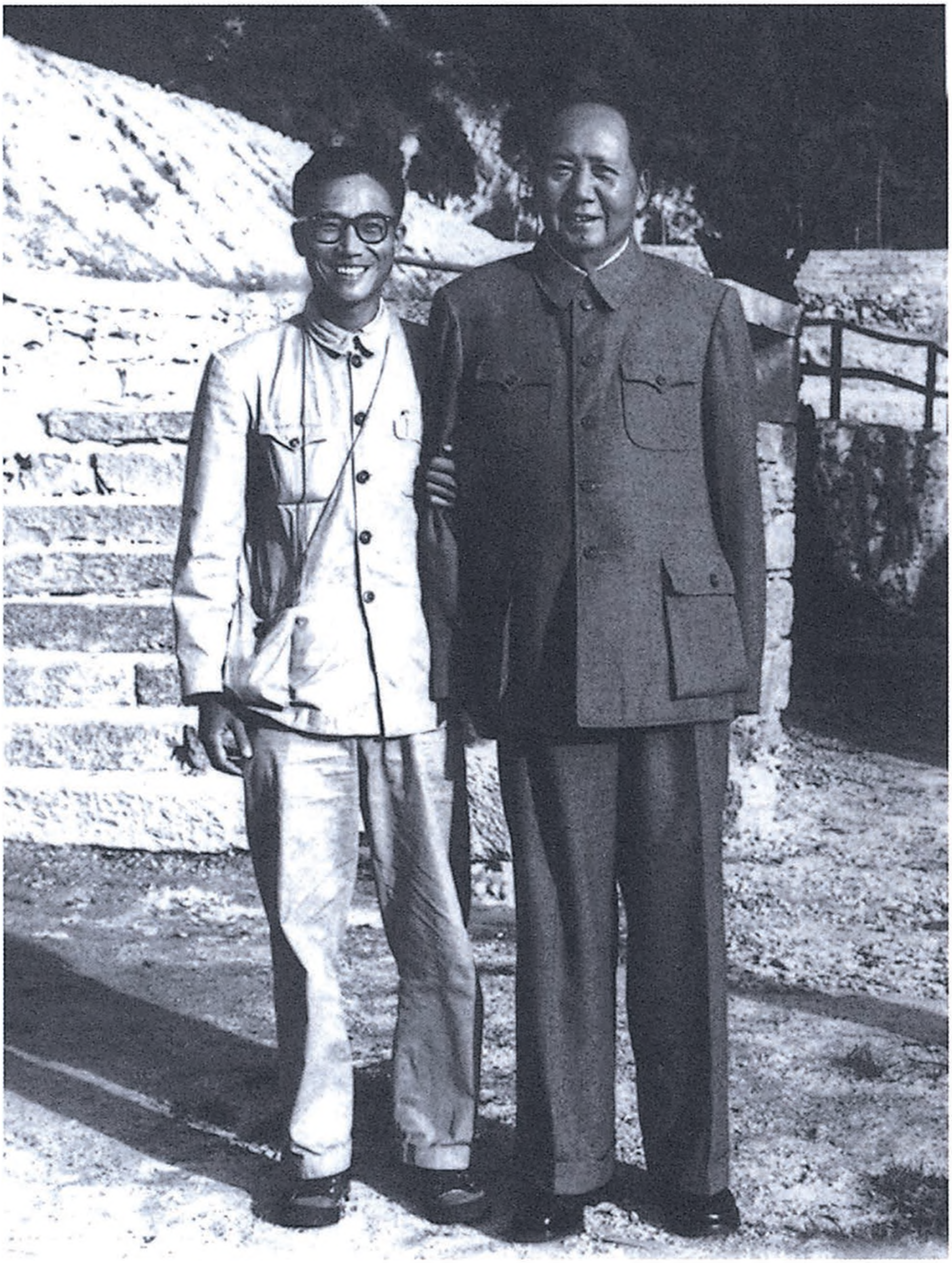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水库游泳。

1961年，毛泽东和江青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和新华记者林克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散步。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和《文汇报》记者徐大刚合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和《南方日报》记者曹桂江合影。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1年9月1日）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值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为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每一个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民主共和国坚持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一贯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规定，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为维护印度支那的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由于美帝国主义的阻挠，日内瓦协议的条款，未能完满实施，越南人民和平

统一祖国的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完全同情和坚决支持越南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南越卖国集团的恐怖统治、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并且深信，这一斗争必将获得最后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悠久的传统友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铸成了我们两个兄弟邻邦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几年来，中越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不断发展和扩大。最近以范文同总理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在我国的友好访问，进一步加强了中越两国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两国人民亲密的兄弟友谊，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和平的事业。

祝兄弟的越南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像长江、红河一样长流不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9月1日

对各地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1年9月6日）

此件[1]很好，印发各同志[2]。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冬春两季六个月整风整社，训练干部，也在这一次省委扩大会上作出布置，主动权就更大了。生产、征购、生活安排，同时并举，就更加主动了。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编印的《农村简讯》第一七五号上登载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主要内容如下：一、基本情况。自农业六十条初步贯彻执行以来，农村形势已经明显好转。二、存在的问题。（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3年、5年甚至10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

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于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三、各地的部署。（一）普遍对贯彻实行农业六十条的方法、步骤、退赔、甄别、粮食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并发了指示。有些地方对于社办工业、自留地、养猪等具体问题，根据中央的政策原则，作了具体的规定。（二）各地县的三级干部会，一般可在8月中旬开完，同时普遍作出了分期分批轮训干部的规划。（三）普遍要求在8、9两月内，以退赔、在夏收中坚决实现各项分配政策、大力加强经营管理工作等，作为贯彻农业六十条的主要内容。（四）进行秋后系统地整风整社的准备。

[2] 指当时正在庐山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给董必武[1]的信

（1961年9月8日）

必武同志：

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2]，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顺祝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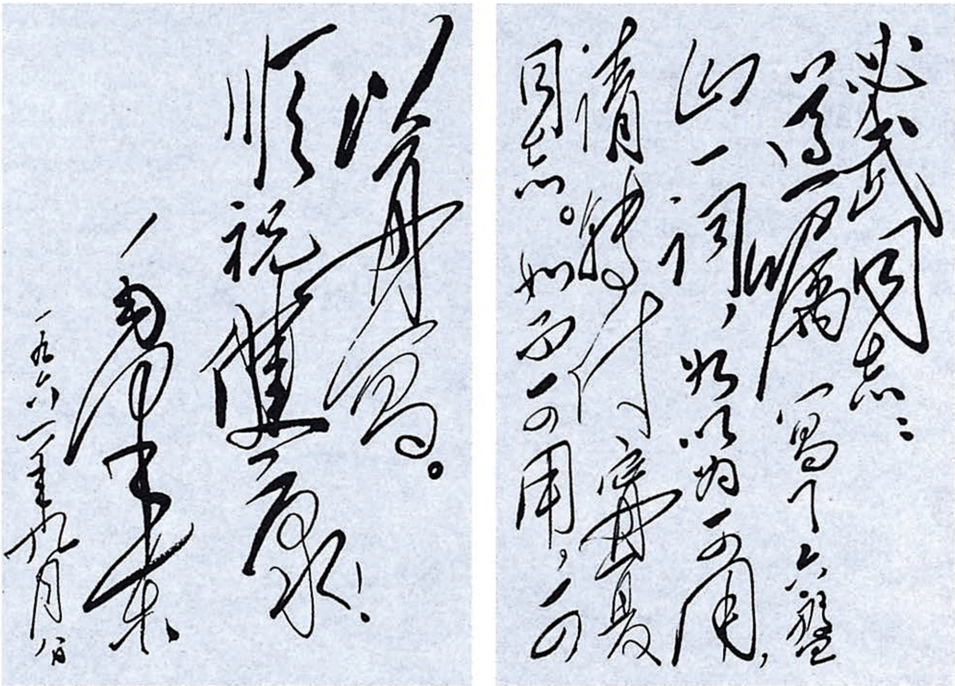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指毛泽东1935年10月作的《清平乐·六盘山》。



必武同志：

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们。如不可用，可再写。

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日

毛泽东致董必武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1年9月8日）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保加利亚共产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一年中，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巴尔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了积极的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所获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保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兄弟友谊，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我们深信，在1960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的指导下，这种友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祝

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9月8日

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1]

（1961年9月9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2]。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

[1] 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仙人洞，在庐山佛手岩下，牯岭之西，高约两丈，深广各三四丈，传为唐朝仙人吕洞宾所居，故名。李进即江青。

[2] 仍从容，指飞渡的乱云。

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上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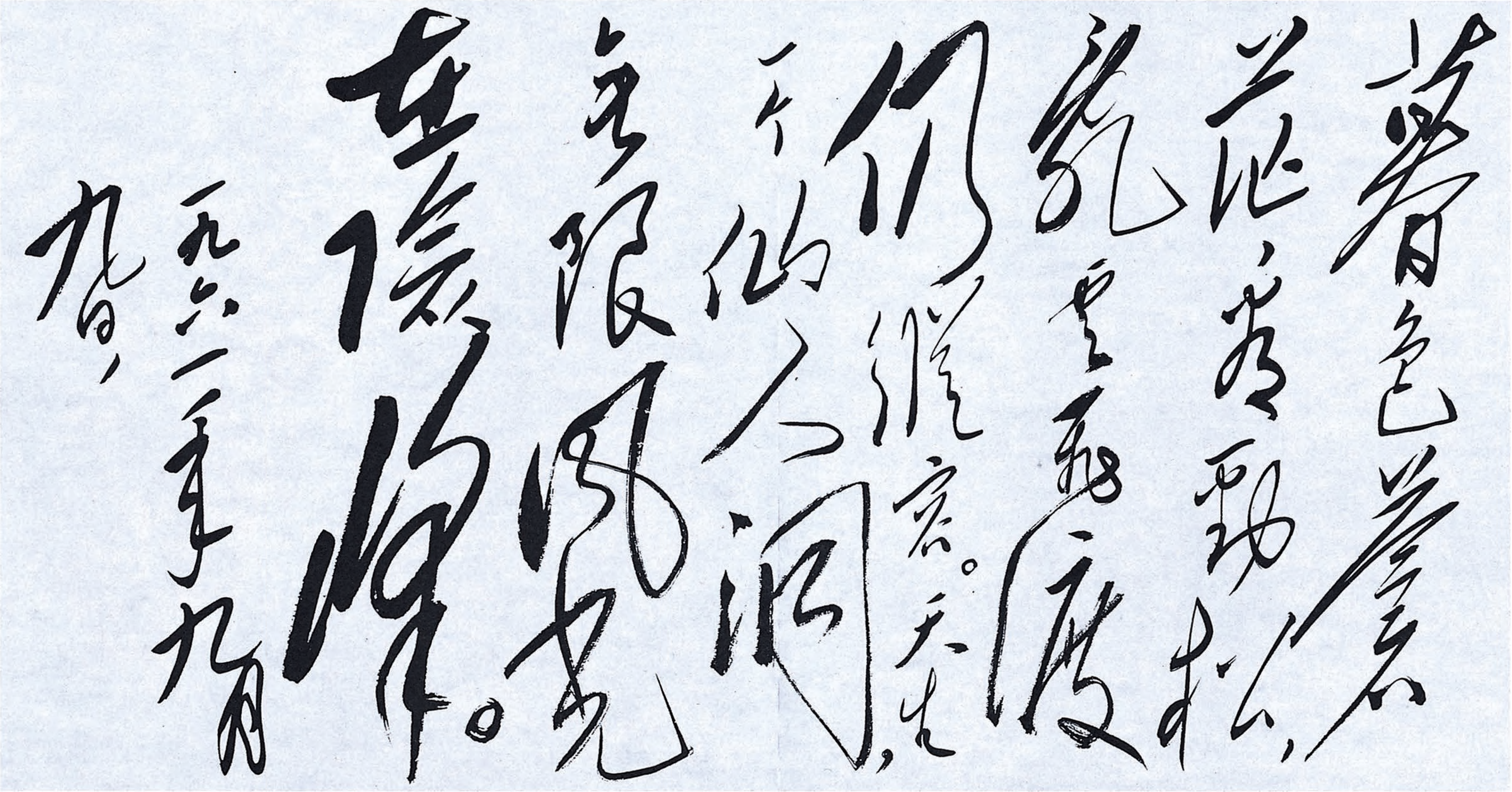
（1961年9月）

这个插句可以不要[1]。

毛

---

[1] 1961年9月13日印发供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修正稿）》指出："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其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是这次印发的修正稿中新加的。毛泽东在审阅经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修改后的这一决定（最后定稿）时，删去了"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这9个字，并写了这一批语。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

毛泽东手书《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1]

（1961年9月16日）

登高壮观天地间，
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
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庐山谣一诗中的几句。

登庐山，望长江，书此以赠庐山常委诸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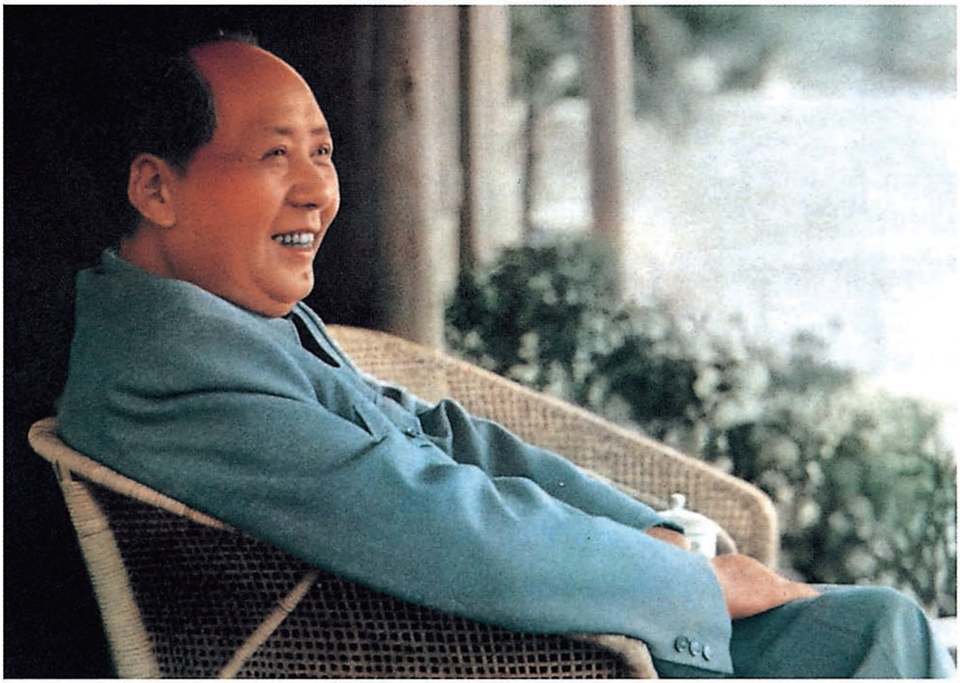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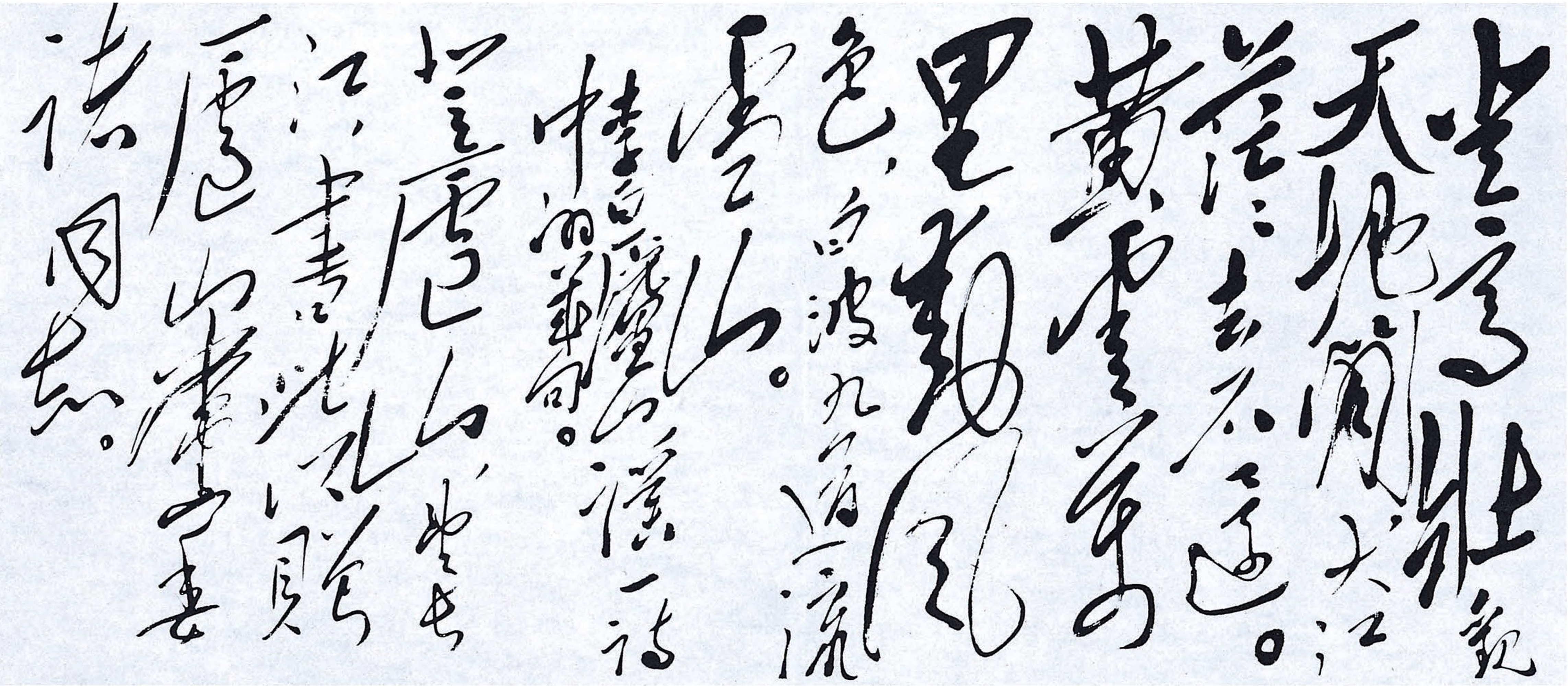
---

[1]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他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4句，赠中央常委各同志。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李白庐山谣一诗

[illegible]

诸同志。

毛泽东在庐山书赠中央常委的诗句。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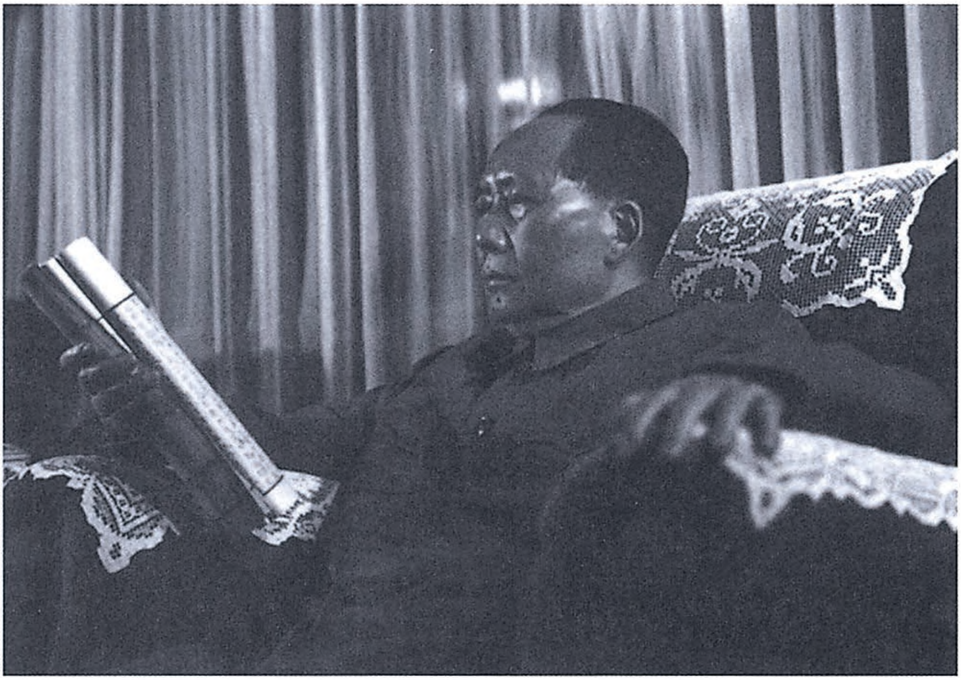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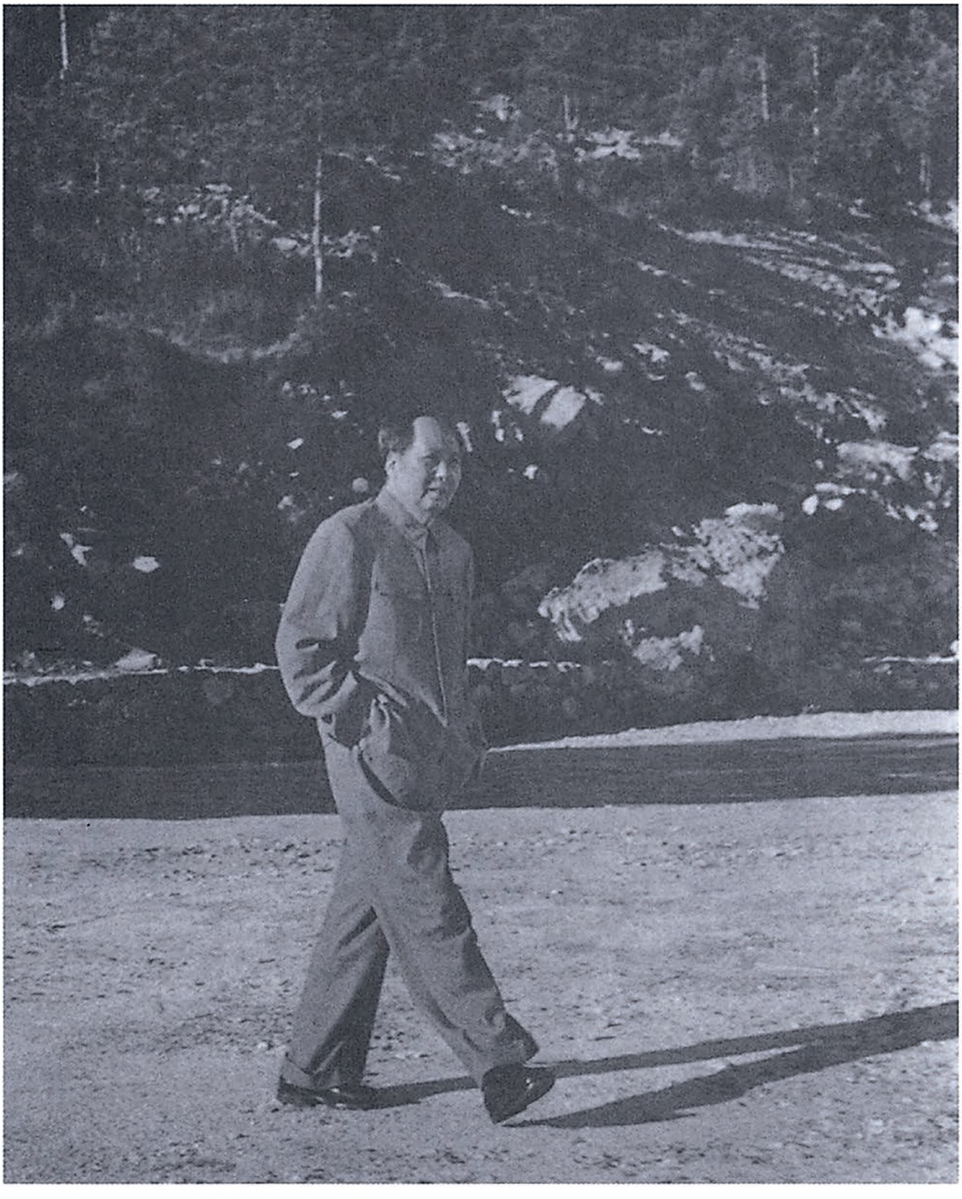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查阅图书。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查看世界地图。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寓所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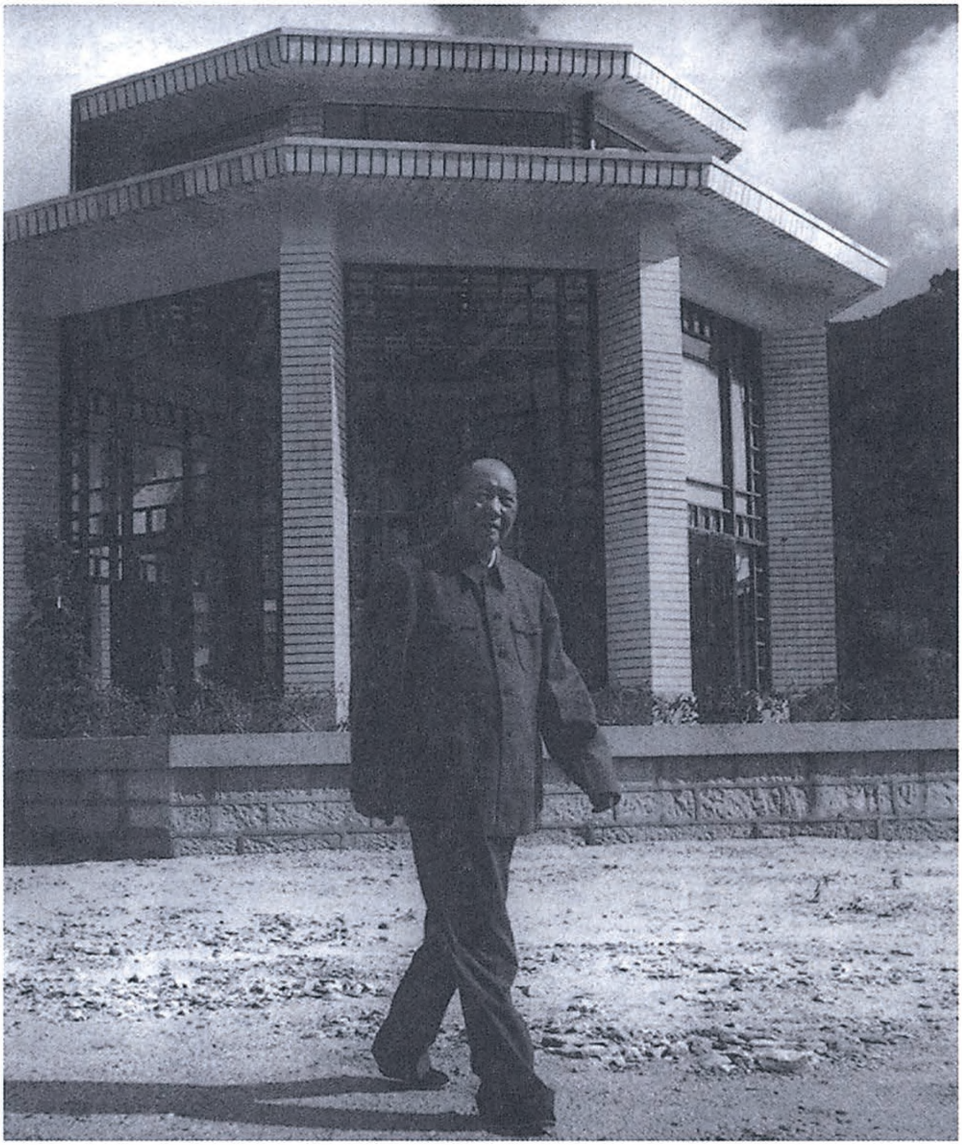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寓所读书。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散步。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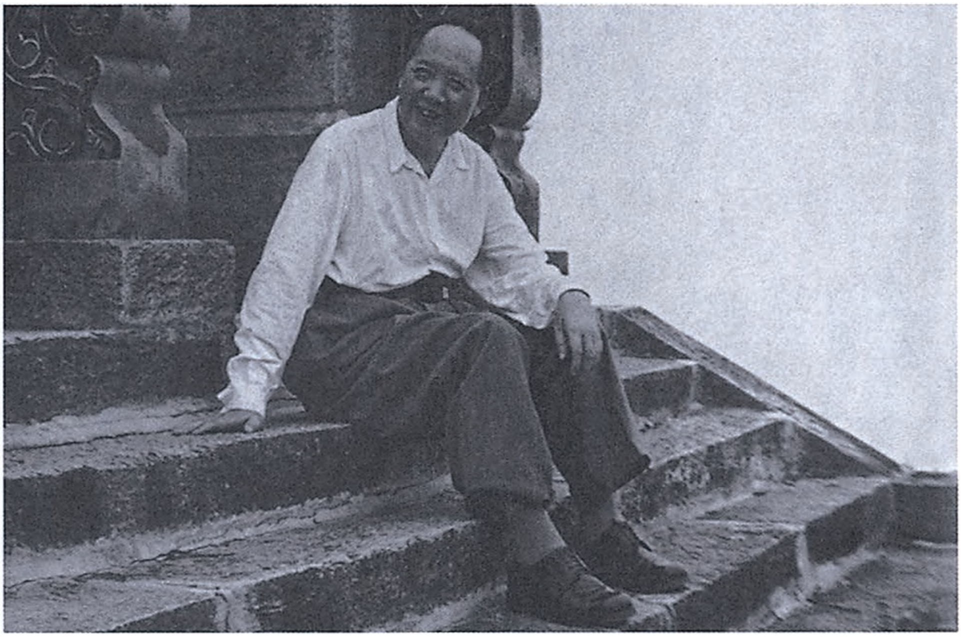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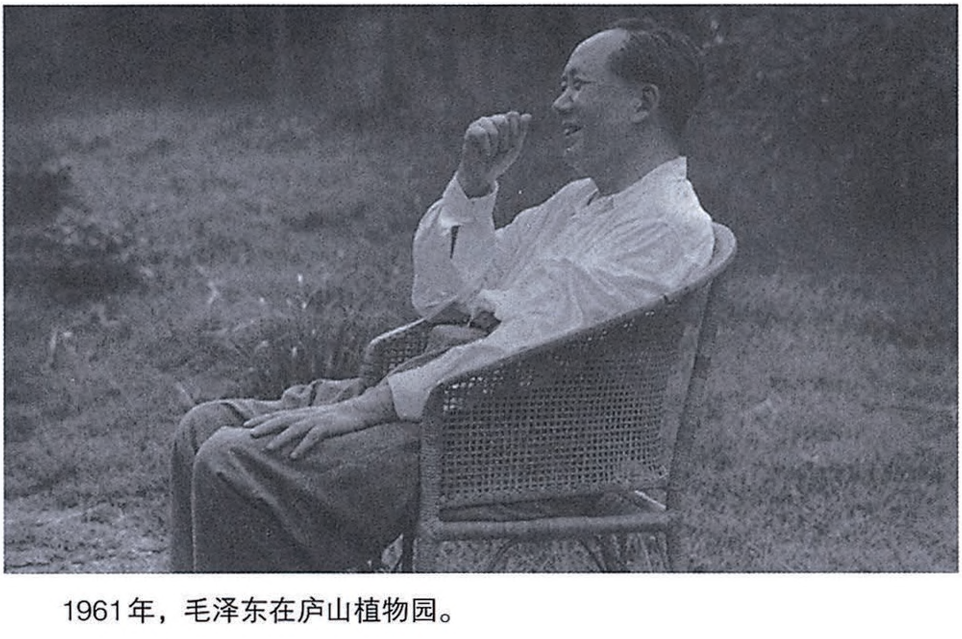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含鄱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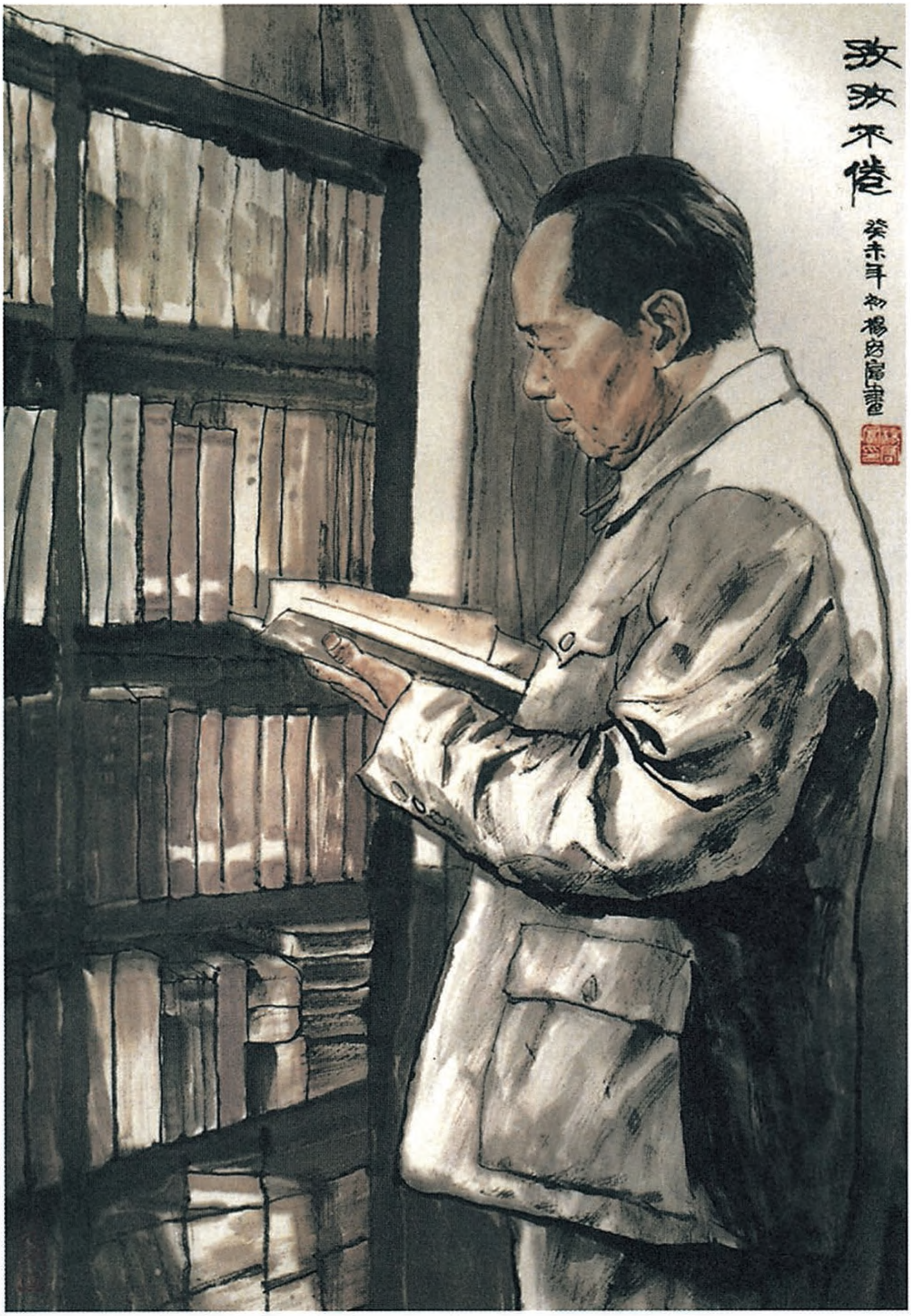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植物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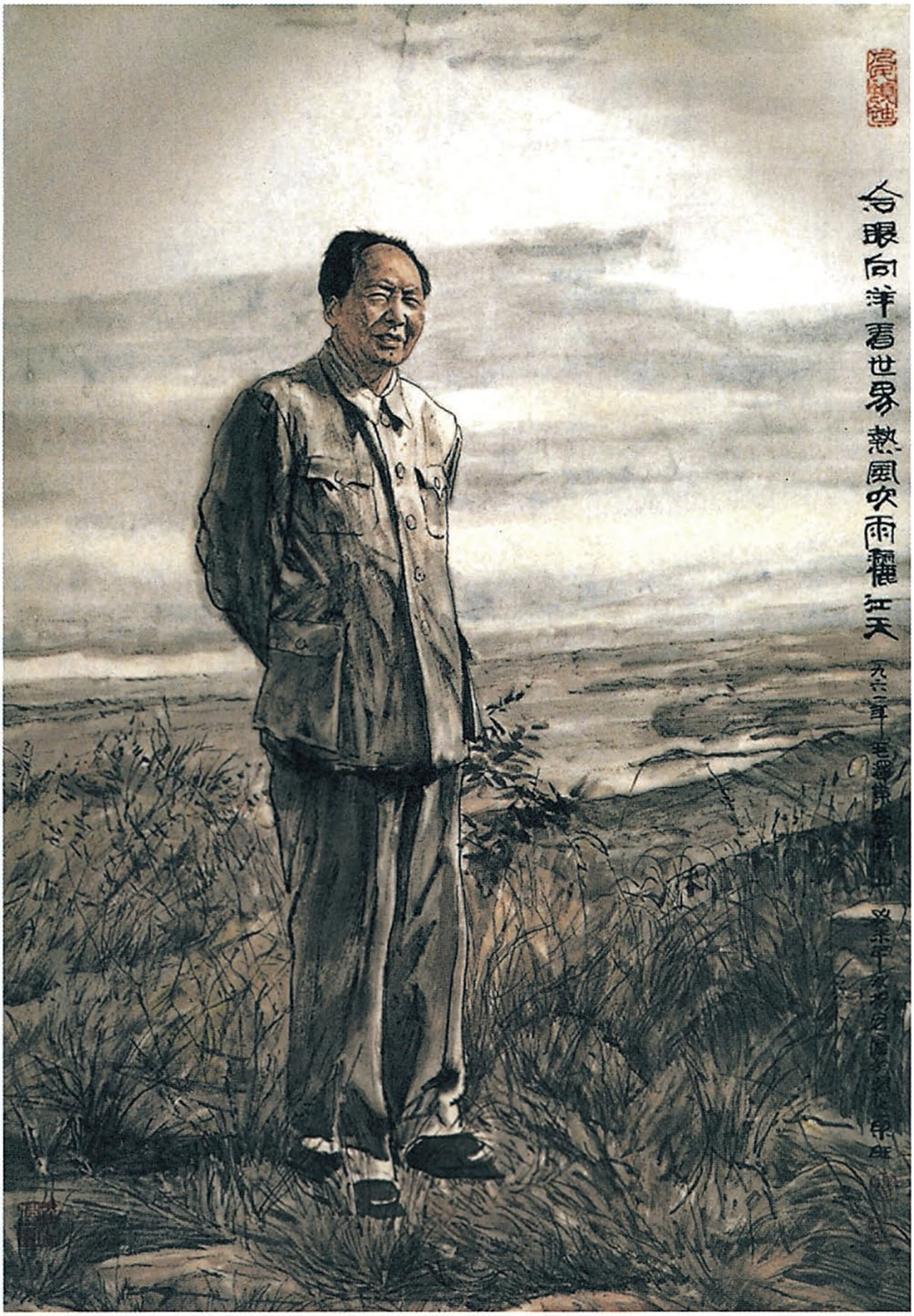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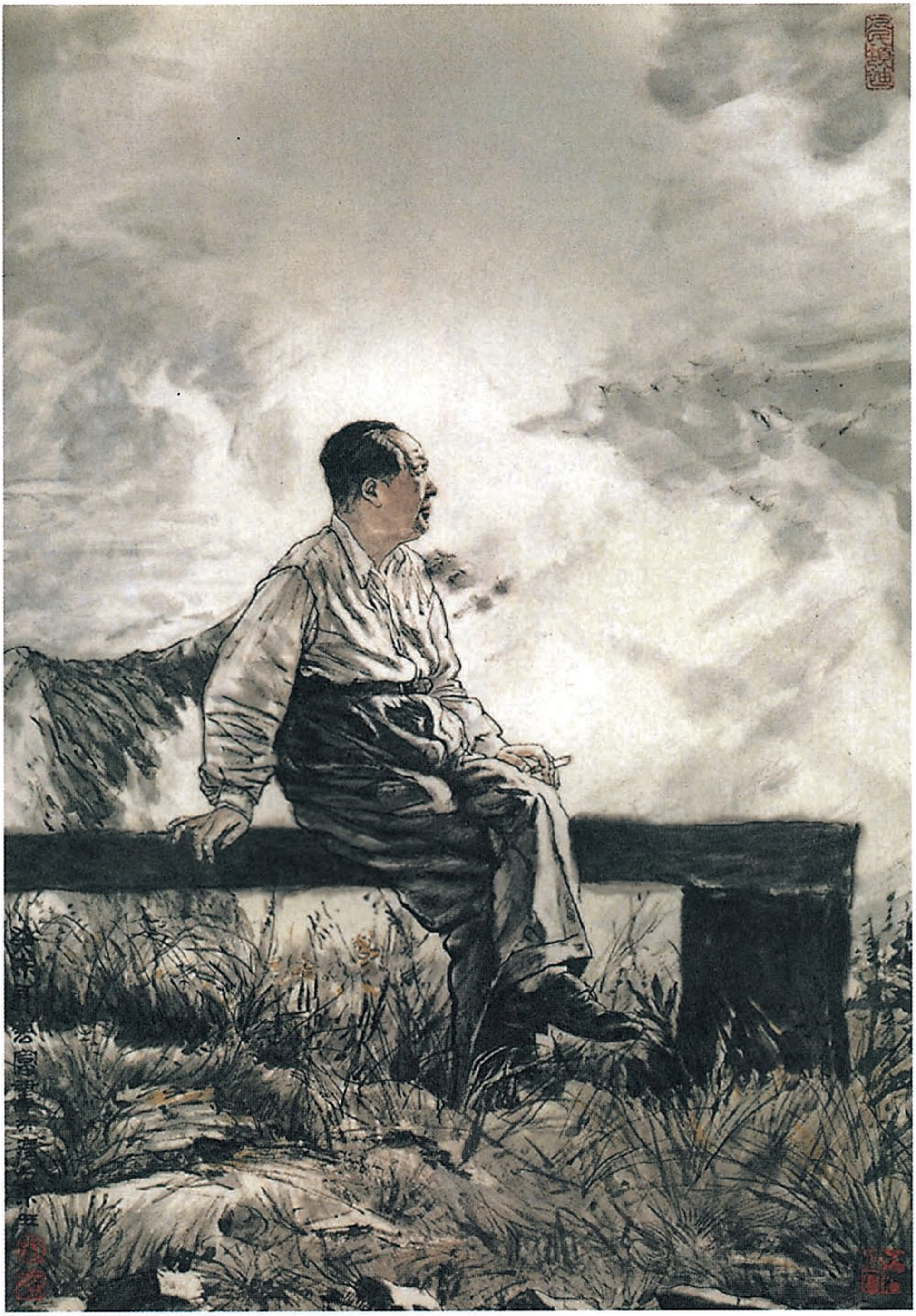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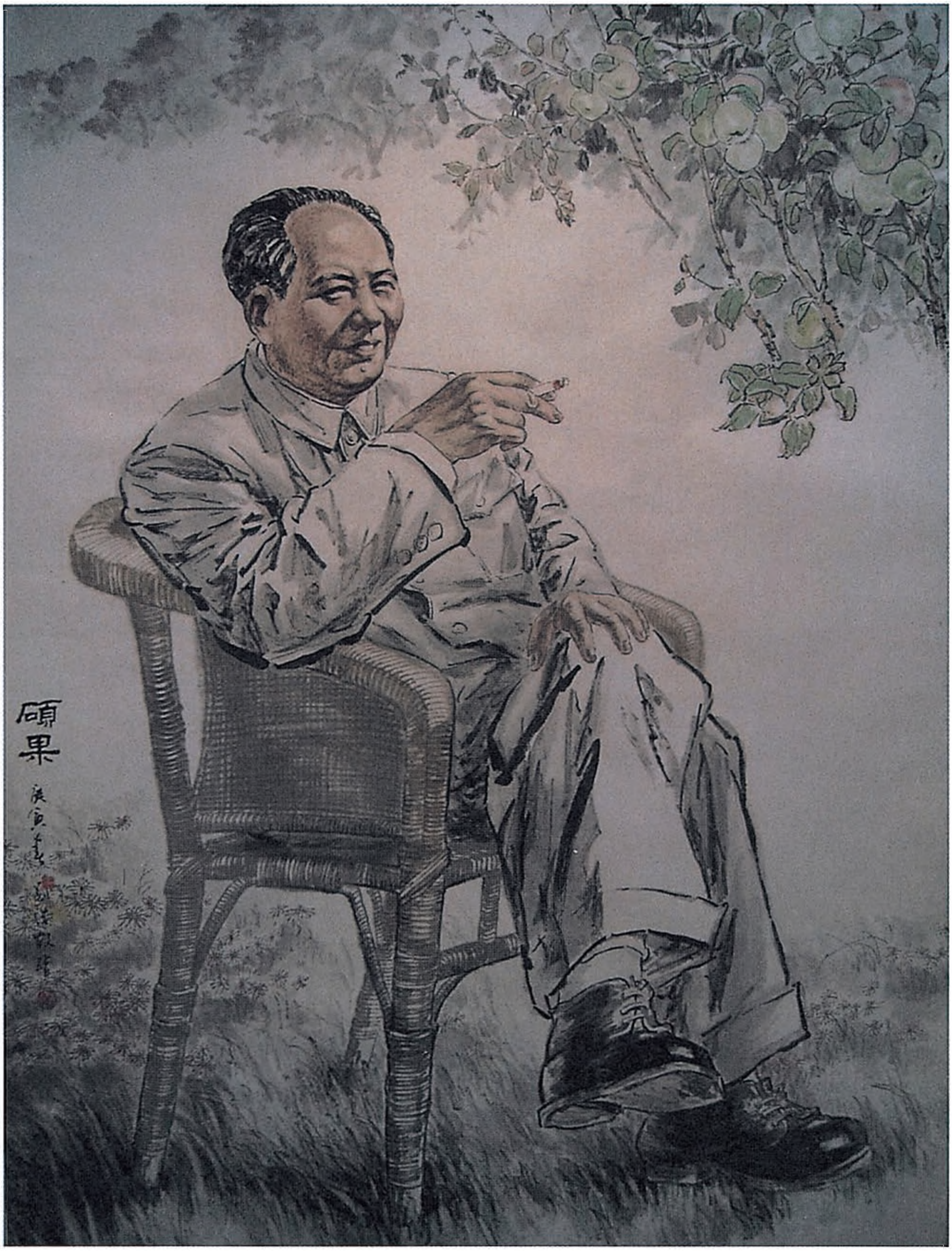
《孜孜不倦》（中国画）


冷眼向洋看世界
熱風吹雨灑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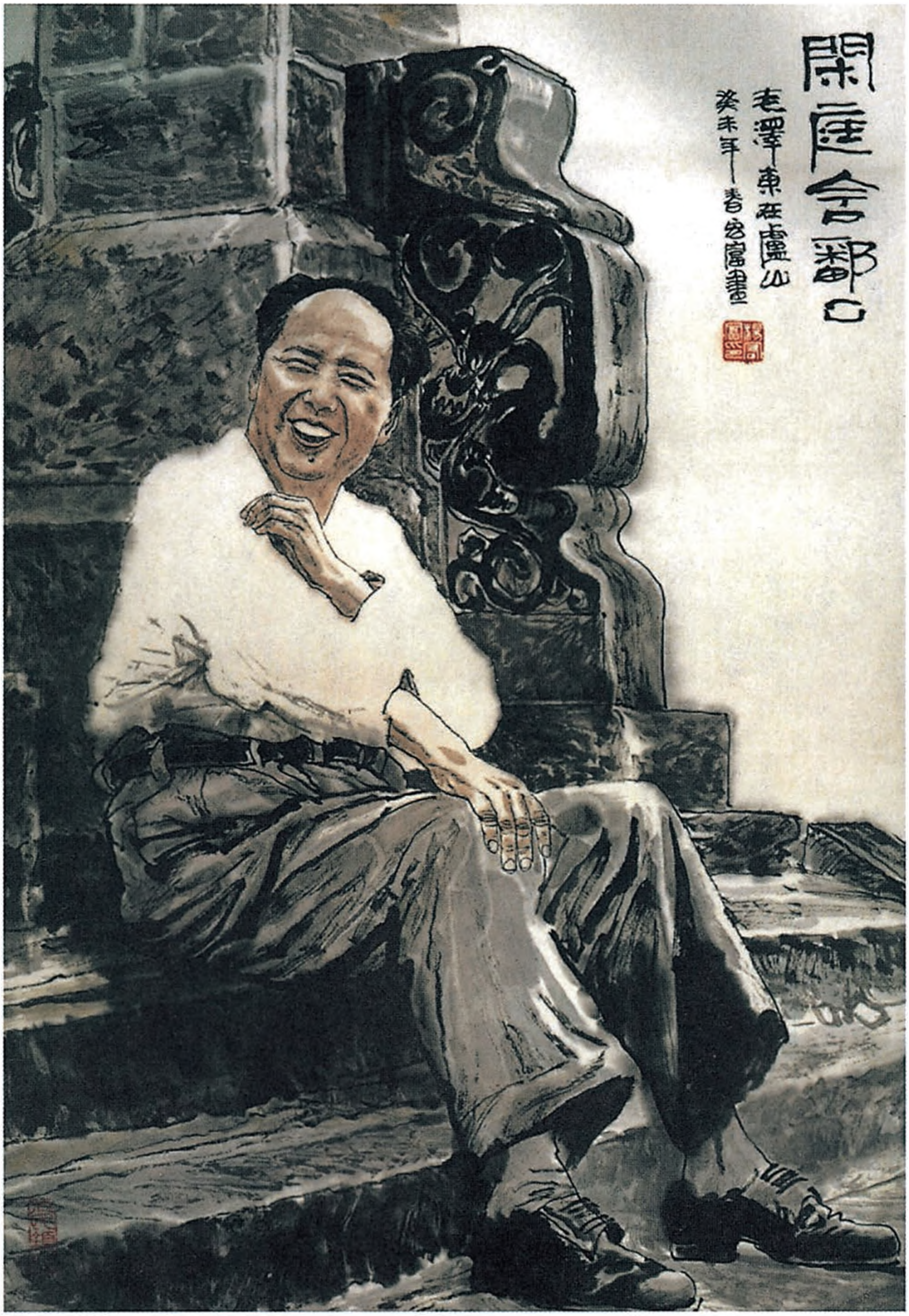
《冷眼向洋看世界》（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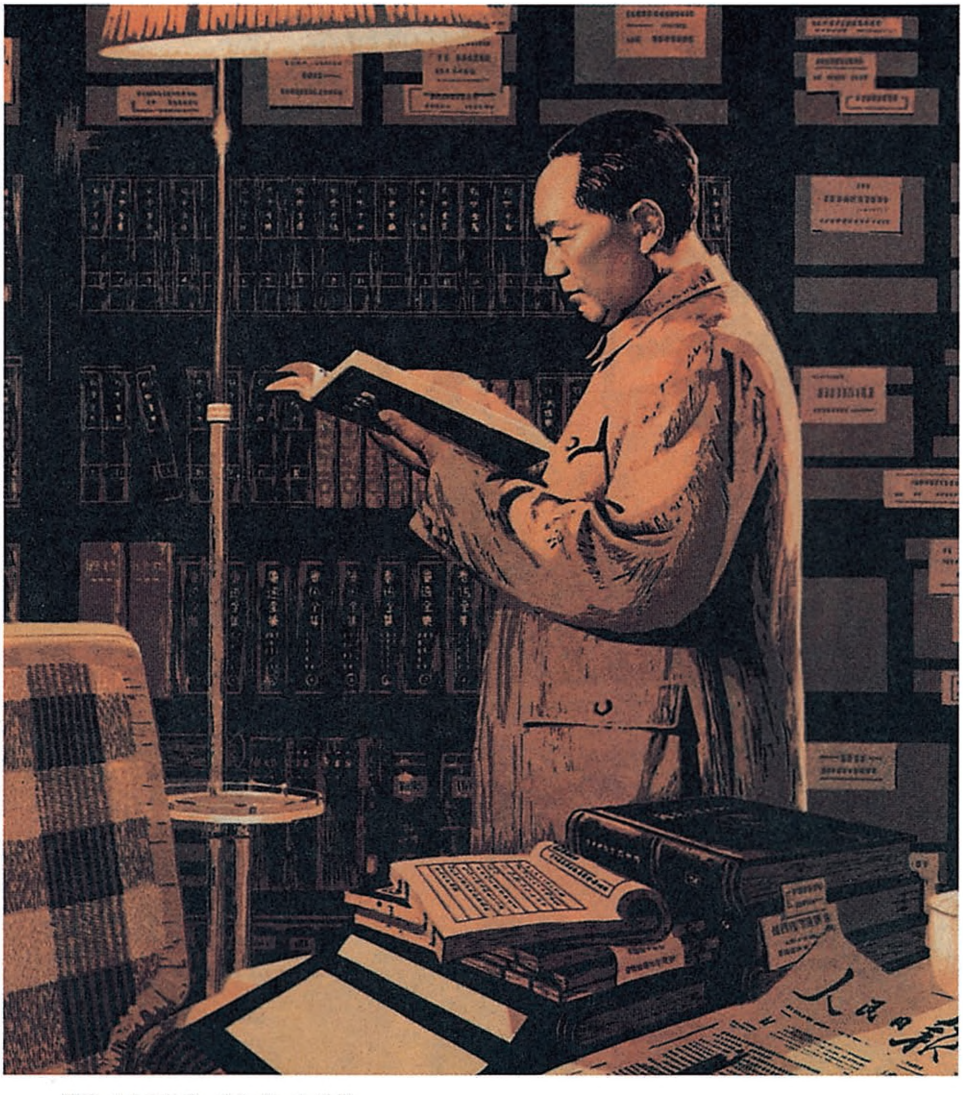
《暮色苍茫看劲松》（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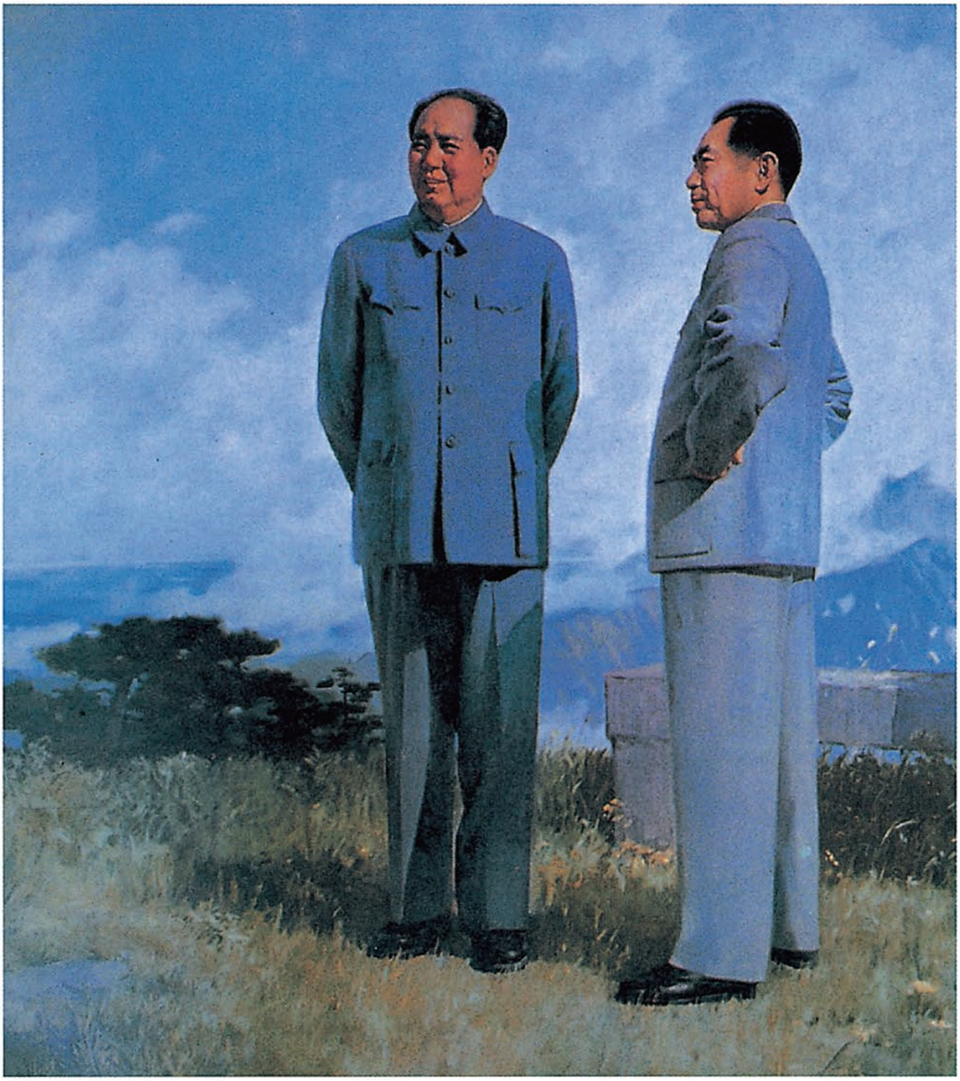
《硕果》（中国画）


閑庭含鄱口
毛澤東在廬山
癸未年春宏富畫

《闲庭含鄱口》（中国画）



《伟大导师》（套色木刻）



《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和周恩来》（油画）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1]上的批语

（1961年9月16日）

林克[2]同志：

此本已看，下本[3]待阅。请先将此本送交田家英[4]同志。田家英同志：折页处有修改与恢复，共有六处[5]，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

[1] 这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编辑的供干部学习的材料，主要是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关论述。目录如下：一、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二）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三）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几个问题：（一）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二）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不能剥夺农民，巩固工农联盟；（四）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计划工作；（五）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最终还是要依赖于消费品的增长，依赖于个人消费；（六）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七）坚持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三、加强学习，克服主观主义：（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

（二）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三）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四）右的和“左”的错误都是脱离实际；（五）成绩和错误都有两重性；（六）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编辑的供干部学习的另一本材料《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

[4]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5] 毛泽东所作的6处修改和恢复分别是：一、第15页摘录了毛泽东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以下一段话：“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二、第25至26页摘录了毛泽东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以下一段话：“现在问题是县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客观规律，客观法则（外文法则和规律是一回事），违反它，要整得头破血流。”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话中“客观法则（外文法则和规律是一回事）”。三、第40页摘录了毛泽东1956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的以下一段话：“各部门搞指标计划，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本来作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叫盲目性，叫作‘左’倾冒险。我想，全党在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是包含着一种不清醒的头脑。”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话中的“是包含着一种不清醒的头脑”。四、第36页摘录了毛泽东1958年12月11日在武昌会议上的一段谈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观潮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对于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这段话在送审稿上原已删去，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恢复”，并删去了其中的“观潮

派，算帐派，属于这一类”。五、第39页摘录了毛泽东1960年6月18日《十年总结》一文中以下两段文字：“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改造。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送审稿上原已删去了这两段话，毛泽东在旁边批示“恢复”，并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上面引用的即是这次修改过的文字。对于这两段话，毛泽东后来又有修改。六、第44页摘录了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一段讲话：“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是我们很好的教员。”这段话在送审稿上原已删去，毛泽东审阅时，在旁边批示“恢复”。

在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指示稿上的批语

（1961年9月17日）

退彭真同志：

指示[1]及总则[2]已阅，很好，只在指示有一些小的修改[3]。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晨三时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指示稿。指示稿中指出，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3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过去3年大跃进中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改进工作中的缺点，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于我国工业的今后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好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以便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和总结试行经验以后，使这个条例完善起来。

[2] 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总则，共6条：一、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又是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有按照国家规定独立进行经济核算的权利。二、国营工业企业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增加社会产品，扩大社会主义积累。三、国

营工业企业必须严格遵守社会主义的节约原则，认真实行经济核算。四、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是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的管理原则，也是国营工业企业内部的管理原则。五、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必须发扬民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全体工人、技术人员、职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主人翁责任感，把实行集中管理和开展群众运动正确地结合起来。六、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组织，是企业工作的领导核心。除总则外，《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还包括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工资、奖励、生活福利，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协作，责任制度，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党的工作等10章，共70条。

[3]　毛泽东对这一指示稿的修改，主要是在第1页讲到“这个条例草案的目的，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把我们领导工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最近三年多的经验，系统地加以总结，制定出一个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和能够更好地为总路线、大跃进服务的，管理企业的规章制度”一段话中，删去了“用毛泽东思想”6个字。此外，还将这一指示的下发日期署为1961年9月16日。

和蒙哥马利[1]的谈话

（1961年9月23日）

蒙哥马利（以下简称蒙）：谢谢主席让我再一次来中国访问。我这次到中国来访问有好几个特别的理由。最近西方世界散布了很多谣言，说中国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一切都很不好，人民在挨饿，他们要造反，中共中央对问题的控制有所松弛。但是，我曾到各地去旅行，到过内蒙古、华北、华中、黄河、长江，在农村同农民谈话，在城市同市长、工人谈话。在整个旅途中，我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来支持那种说法。我很清楚，同旧中国相比，解放以后，新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要克服很多困难，比如在粮食方面，交通运输方面，水利方面等等。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我认为广大的人民——农民和工人——他们牢牢地团结在中国领导人的周围。因此，我得出结论，他们完全可以面对和克服这些困难。我想问的是：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主要考虑的是哪些问题。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就是这两个问题？

蒙：这是头两个问题。当我回到西方去以后，我要纠正他们的

---

[1] 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子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盟军指挥官之一。后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力量副司令等职。1960年、1961年曾两次访问中国。

错误概念，指出他们讲的都是谎话。

毛：首先谈对中国的看法问题。你来看了两次，这次看得多一点。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在内。要取得经验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搞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

蒙：你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指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吗？

毛：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孙中山没有完成这个革命，我们接过来，到一九四九年把它完成了。我们的党打了二十二年的仗，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最初，仗怎么打法，我们没有经验。各种军事问题，政治问题，还有根据地的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一开始我们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一九四九年取得了胜利，前后是二十八年。在这二十八年中，到一九四五年全党思想统一了，取得了比较完全的经验，经过了二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召开了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了经验，才能够在后来反对蒋介石的进攻，夺取了政权。

那时的困难比现在大得多。第一，党内有几次分裂。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闹过好几次。南方的根据地完全丧失了，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蒙：在什么时候？

毛：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经过犯错误、打败仗和长征，最后剩下来不到三万人。

蒙：那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毛：对。后来我们到了陕北，以后又夺取了延安。后来抗日战争开始了。我们同国民党打了十年，在一九三七年，国共又进行

合作。

蒙：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人。

毛：对付日本人。我们那时在延安做了整顿内部的工作，即整风运动，把党内的思想统一起来，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

关于外部所造成的困难，无论是在同国民党打内战的十年，或者是同日本人打仗的八年抗战期间，我们的根据地都是分割的，互不联系。先是被蒋介石分割，日本人打进来后，被日本和蒋介石两方面分割。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过程才能取得经验，统一思想，使犯过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同志都心服，形成全党一致的一条总路线，在总路线之下又有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路线。这样才有了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一整套政策。

蒙：是逐步形成的。

毛：是慢慢出现的，时间比较长，经过了二十四年，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五年。

那个时候，我们的情况还很困难，根据地是分割的，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不仅有帝国主义，国内还有强大的蒋介石。

蒙：蒋介石那时有二百万军队？

毛：不，后来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经过长征后，我们的军队不到三万人，但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比较正确，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包括游击队在内。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打击的锋芒对着我们。那时，他有四百多万军队。我们的解放区还是分割的。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对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但是，到一九四九年，打了四年左右，我们就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军队取得了优势。开始的时候，我们采取退却的方法。你们英国有过

敦刻尔克[1]。那时你们把法国丢掉了，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英国国内的军队稀稀拉拉。希特勒是个笨蛋。他如果接着从敦刻尔克渡海追击，你们就会非常困难了。

蒙：他需要渡过英吉利海峡。一个岛国有它的好处。英吉利海峡保护了我们。

毛：保护了我们，使你们有时间重新组织军队，然后你们就反攻了。你们什么时候更强些？是在敦刻尔克之前？还是在敦刻尔克之后？我看还是在敦刻尔克之后。

蒙：对。当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时候，英国军队根本不能同任何人打仗。在和平的年代里，政客们总是不照顾军队，而一旦发生战争，又求救于军队。在敦刻尔克以后，英国是单独对付法西斯轴心国家的联合力量。美国没有参加战争，它是站在一边，看哪一方将取得胜利。

毛：就是。那时法国有个贝当，控制了法国全国；另外还有一个戴高乐，在英国组织政府。是贝当强还是戴高乐强？戴高乐当时没有地盘，后来才有了北非。法国被德国占了，北非也被占了。后来戴高乐靠了英国和美国的帮助，才有了北非，那就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

我们也有我们的敦刻尔克，每个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敦刻尔克，那是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这两年。当时，我们保卫延安的部队只有两万五千人，而胡宗南的军队有二十五万人。美国帮助蒋介石。那时英国和法国在中国都没有份。蒋介石的绝大部分武器和财政经济援助都是美国给的。

---

[1] 敦刻尔克，法国港口城市。1940年5月27日至6月4日，30多万英法联军从这里逃出德军三面重围，撤回英国本土，为后来的反攻保存了实力。

蒙：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问题？

毛：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蒙：当时按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

毛：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就是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你们做得很不错。

毛：还可以。

我们需要重新训练干部，这件事情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干社会主义干了十二年，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由完全没有经验到现在初步取得经验。这里包括接受苏联的经验和苏联的帮助在内。

蒙：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

毛：一开始就看到了。

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

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路线？

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经验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过去局部性的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

蒙：还有几年歉收累积起来的影响。

毛：对。所谓旱灾，不是说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旱。今年旱灾最重的是四川、湖北、安徽，就是长江流域。

蒙：像中国这样面积广大的国家，总有一些地方会遭到灾害。一般地说，是北旱南涝，但是在个别的地方，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毛：今年主要是长江三省旱。

蒙：水利灌溉工作进行得怎样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消自然灾害的影响？

毛：还差得很远。中国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天吃饭。要逐步来。

蒙：那就是说，中国的全部面积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有一百万平方公里。在这一百万平方公里中，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得到灌溉。

毛：这一百万平方公里是可耕地，有已开垦的和未开垦的。

蒙：我在访问刘主席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在中国历史上，连续三年的旱灾大约每一百年发生一次。前一次是在八十多年以前发生的。

毛：恐怕是这样。

蒙：尽管收成不好，还有几年累积起来的影响，我想由于你们的配给制度，所有的人都够吃吧？当然不是说吃得非常好。

毛：有足够吃的。各地情形不同，丰收的地区吃得多些，减产地区吃得少些，重灾区更少，但是都过得去。我们用各种办法救灾。湖北三千二百万人口当中，有五百万人口的地区，也就是六分之一的地区，是重灾区。

蒙：但是你们的配给制度和分配制度可以保证不发生饥荒，人人都有足够吃的。我在各地旅行时，没有看到一起营养不良的事例。

毛：大体是这样。

蒙：所以西方讲的全是胡说，是假的。我回去以后要告诉大家，中国人人都有吃的，只是要收紧一点裤带。这并不稀奇。我们在战争年代里也这样做过。事实上，我在这次旅行中，唯一看到营养不良的人的时候是在九龙。在香港有许多来自中国的难民，每年有四万人左右，但是其中没有发现一起营养不良的事例。

毛：你问我对中国怎样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这比我们在前一个阶段用二十四年的时间才找到全党同意的路线来打败蒋介石，要缩短一半。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

蒙：你们在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的有能力的人派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去？

毛：根本没有。搞大工厂，我们完全没有经验，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会搞。我们只会办小工厂，搞农业。大工业我们没有办法。

蒙：但是你们得到了苏联的技术帮助？

毛：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人

员，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蒙：我在这次旅行中，去过包头、太原、西安、洛阳，这些都是从小城市发展成大城市的。例如太原本来只有四十万人口，现在有一百五十万。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去的？

毛：技术工人是从大城市去的，主要是上海，其次是天津、沈阳、鞍山、大连。包钢的工人就是从鞍山去的。

蒙：我看到的工厂中，技术工人一般都是年岁较大的，但是工人中绝大多数是年青人。这些年青人是不是从农村去的？

毛：年青人是本地找的，从乡村招来的。

蒙：他们愿意去吗？愿意到新的地方去工作吗？

毛：开头有点怕。他们从上海到包头、西安这些地方去，就如同你们英国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去一样。起初他们听说北方冷，没有吃的。他们的母亲为他们准备了吃的、穿的。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并不那么冷，也有东西吃，就乐于住下来了。

蒙：包头冬天是很冷的，冷到零下三十度。

毛：一年有那么几天，并不全都那么冷。

蒙：新的大城市也会在供应、交通运输方面遇到不少麻烦。主席认为将来的城市应该有多大？

毛：看来，城市太大不好。有几十万，如四十万到五十万，就好了。

蒙：中国的运输系统似乎很不发达。有人告诉我说，全部铁路干线只有两万五千英里长。像中国这样一个辽阔的国家，应该发展

铁路线。我觉得就应该有一条铁路从西安到延安，再延伸到包头。

毛：应该这样办。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这需要时间。

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

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

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蒙：你们的六亿五千万人口中，农民是不是有六亿？

毛：没有那么多。农民大约有五亿多，城市人口有一亿多。我们想保持这个比例。

蒙：我觉得这个比例很好。

我读过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作为一个军人，我觉得主席关于军事问题的著作很有趣味。

毛：我们是同行。我们的问题曾经是怎样以弱小的军队战胜强大的军队。

蒙：英国在同希特勒德国打仗的初期，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

毛：对。但是有一个不同，你们有同盟国，有苏联，有美国。我们没有，只好靠自己。而蒋介石有强大的同盟国——美国。

蒙：不！在战争的初期，我们没有盟国。

毛：你们起初有法国，后来法国亡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也一个一个倒下去了。你们本来还有波兰、巴尔干半岛，但是也丢了。

蒙：对。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欧洲的灯光一个个地灭了。

我对于由孙中山开始而后来由毛主席接着完成的革命很感兴

趣。孙中山似乎没有懂得，要使革命成功必须唤醒群众。同时他也似乎不懂得要在广大农民群众的基础上建立红军。但是毛主席却在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上建立了红军。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毛：基本上对。

蒙：既然主席领导的革命是以五亿农民为基础的，因此，在革命胜利后，首先就必须改善农民的处境。

毛：就是这样。

蒙：否则你们就不能存在下去。

毛：对。孙中山没有提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不提这两个口号，人民怎么会跟你走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开始时是反对你们英国，后来是日本，到了后期才是美国。你们退出中国是在日本打进来之后，在一九三七年。那时，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日本走了以后，主要的敌人就变成美国，直到现在。我们的主要敌人不是欧洲人，不是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对你们，我们已经没有仇恨，我们欢迎你们。对于日本人，我们也没有仇恨了，每年都有大批日本人来。

蒙：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倒是非常奇怪的。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他们认为对日本可以无恶不作，但是现在却对日本采取好事做不完的态度。

毛：它要扶植日本的一部分人，日本的亲美派。

蒙：我在广州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看到主席当年怎样在那里训练干部，然后把他们派回农村，宣传革命的道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想法。孙中山就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他不懂得要进行革命必须派干部到广大的农村去，向农民宣传革命。

毛：对。

蒙：我在主席的一本书里读到这样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对这句话应怎样理解？

毛：就是说，革命要经过战争。

蒙：主席是否认为这句话现在还适用？

毛：恐怕对有些国家还有效。我还相信这句话。

蒙：我有一次问一个非洲的酋长，怎样保证实现酋长继承的制度。他说：“这要由我的剑来保证。”

毛：英国的革命经过战争没有？

蒙：有过一次，即在克伦威尔推翻查理一世的时候。那时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内战。但是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革命似乎很不费力，吃一顿午饭的时间就可以搞完一次革命。

毛：那不算革命，那叫政变。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

蒙：古巴的革命没有用多长时间。

毛：三年不到。但是法国的革命比英国的复杂，反反复复，经过多次战争。

蒙：我记得上次同主席谈话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不是一切革命都是坏的，有的还是好的，如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

毛：我不是这样讲的。

蒙：不，当时是我这样讲的。

毛：我当时说，凡是推翻剥削和压迫、执行人民的意志的革命都是正义的。美国的革命虽然对你们英国不利，但当时美国必须进行革命。

蒙：美国的革命对英国也不无好处。要不是美国革命，那部分保皇党分子就不会北上，英国也就不会得到加拿大。要不是由于克伦威尔的革命，英国今天的情况也会很不相同，也许还会保留查理一世时的政治制度。往往要通过革命才能扫去旧政权的许多暴虐。

毛：我看，革命会使流血痛苦短些，损失少些。例如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仗，一共二十二年，其中同日本打了八年，牺牲很大，但还是很快就恢复过来了。革命不是哪个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干。

蒙：根据我的了解，先是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然后到了一八八〇年左右，孙中山无法容忍了，于是开始进行革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通过革命扫除暴虐。现在，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

毛：对，多少年还要遗留下去。

蒙：你们的工作做得很不错。

毛：做了一点，还不多，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譬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

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

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见共产主义了。他们（指在座的年青人）可以看得见。

蒙：主席今年多大岁数了？

毛：六十八了。你呢？

蒙：七十四。

毛：我比你小六岁。

蒙：这不算什么。我同刘少奇主席进行了一次很有趣的谈话。

毛：在上海，我就给你介绍过刘少奇主席。这次你看见了。

蒙：对，刘少奇主席通知我去见他。他同周恩来总理同岁。他头发都白了，比周恩来总理显得老些。他非常聪明，是一个思想家。为什么他会显得比周恩来总理老？是不是因为他过去的生活更艰苦些？

毛：差不多。个人的特点不同。少奇的白头发比我还多。

蒙：你的头发不算白。

毛：有一部分白了。

蒙：刘少奇主席看上去很尊严，一头白发。我既不吸烟也不喝酒。

毛：我不喝酒，只吸烟。

蒙：我愿送你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

毛：谢谢你。

蒙：我现在想跟主席谈谈关于三项原则[1]的问题。这三项原则我以前都单独地提过，这一次我把三项原则作为一揽子提出。多年来，我可以说是坐在头排位置上观察国际政治。我参加过西方防御机构的工作。我认为西方把自己陷入了一个烂泥坑，而西方的政治领袖们似乎找不到摆脱这个泥坑的办法。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

毛：不是整个西方，缺乏常识的只是美国。

---

[1] 指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提出的和缓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大家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有两个德国，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撤退到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去。

蒙：还有别的人。

毛：别的人是跟着美国走。

蒙：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呼唤要一个和平的世界。但是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去，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主席读过我昨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宴会上的演说吗？

毛：读了。

蒙：你对我一揽子提出的三项原则有什么看法？

毛：一揽子提出更有力量，比分别提出更好，各国人民能更好地理解。反对的人会不少，欢迎的人更多。多次提出，一次、两次、三次、十次、二十次，总可以见效。你不是说要活到一百岁吗？那还有二十几年。在你去见上帝之前看到解决是有希望的。三项原则提得对，提得好。

蒙：我要动员世界舆论。不仅动员东方集团的舆论，还要动员不结盟国家和西方国家的舆论。怎么做呢？我离开中国以后，下星期就准备到加拿大去，十月六日我准备在多伦多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这次广播演说全加拿大的电视台都可以转播，美国的一些电台也会转播。

毛：那好。

蒙：然后，我要回伦敦去，在十月十六日的晚上，再作一次电视广播演说。那是一次星期一晚上例行的广播节目，观众有一千五百万人。这两次演说，是会有作用的，但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毛：凡有机会就讲。

蒙：如果东方集团在那个时候对我的三项原则表示态度说：“对，我们同意，这是很好的意见。”如果中国和莫斯科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那是很有帮助的。中国在国外没有军队，但是苏联有。

如果赫鲁晓夫也能出来说：“只要美国、英国、法国从欧洲、德国撤出它们的军队，我也把军队撤回苏联去。”要是他也这样说，那就更好了。他从来没有断然这样说过。

毛：他说过。

蒙：我是说他没有“断然”这样说过。

毛：一个中国，两个德国，撤军，他都是赞成的。

蒙：我曾经建议陈毅元帅跟葛罗米柯去说一说，希望苏联也和中国一样响亮地支持我的三项原则。

毛：你是不是去苏联走一走？

蒙：我现在不能去。

毛：今年不能，明年去。你到那里去讲三项原则，就可以使他们有机会公开支持你。

蒙：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当你要使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千万不要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一下子得罪许多人。我这次在中国提出三项原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如果我到苏联去，就会得罪更多的人，所以我不去。请陈毅和葛罗米柯在东方讲，我到加拿大和伦敦去讲。

毛：你对陈毅说了没有？

蒙：说了。

毛：那可以。

蒙：我可以在西方推动这件事。但是，我不想在东方再起多大的作用。莫斯科是在东方，所以我不想去。我在本国有很强的地位，如果我在共产党东方旅行太多了的话，那末英国人民就会说，这个家伙怎么搞的，这将损害我的地位。如果我想推动这件事情，我就必须维持我的地位。

毛：你的地位不会动摇。你的基本思想是要和平。

蒙：人民是会跟我走的。他们会赞成我的主张，尽管西方有很多人不同意你们的意识形态。

毛：如果不同意，他们不信就完了。

蒙：对，我主张彼此不要干涉内政。西方国家一遇到问题，它们的做法就是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朝鲜就是如此，还有老挝，还有印度支那。它们以为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不然，我说大家都把军队撤走，让朝鲜人自己来决定他们要什么不要什么。

毛：对。

蒙：这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做法。

我跟斯大林很熟悉。第二次大战以后，我到莫斯科见斯大林的时候，曾经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我请他把两者的区别给我解释一下。他说，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又问他，那你们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他说，不，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必须要有极丰富的产品以供分配，我们还没有那么富，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也是这样？

毛：中国也是这样，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

蒙：那么你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党叫做共产党，而不叫社会党呢？

毛：因为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目标。

毛：很难说，至少是半个到一个世纪后的事。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蒙：你们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吧？

毛：没有什么极端的形式。

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有过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工党决不会说，他们的社会主义跟你们的相同。

毛：跟我们的不同。

蒙：那你们的是更极端的形式。

毛：是两种。他们的那种不是社会主义。

蒙：是右翼的？

毛：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跟工党朋友、跟艾德礼谈过，说他们的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是正常的，是苏联类型的，同苏联基本上是一样的。

蒙：我可不那么认为。我觉得苏联的革命是少数人把必要的一些人枪毙了以后夺取政权，而不是在广大的农民的基础上从下而上进行的。

毛：不能那么讲。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也是群众的暴动，先在首都爆发，后来发展到其他城市。工人和农民都组织起来，参加了这个革命。

蒙：今天谈话非常有趣，不过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回来谈谈？

毛：明晚我到别处去了。

蒙：今天谈话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要好好地想一想，把这些问题想通，还要着手写演讲稿，并且准备将来在报上发表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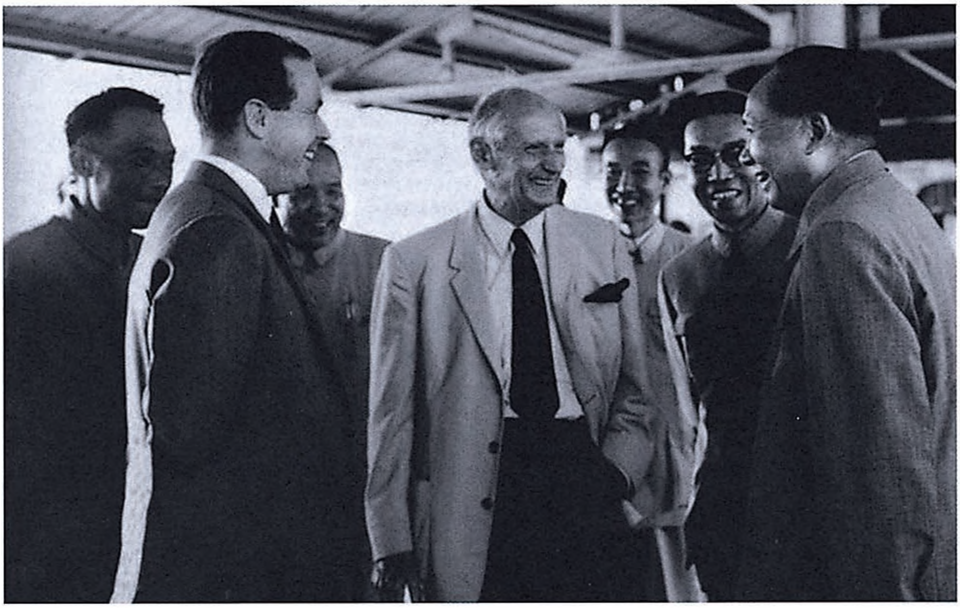
毛：你明天到广州去吗？

蒙：我宁可在这里多留一天，广东太闷热。我在二十六日必须

赶到香港，因为我同尼泊尔国王和王后有约会，共进晚餐。我希望明天能够在这里安静地过一天，不安排任何节目，以便我起草稿子和休息。这次旅行使我很疲劳了。

毛：你应该好好休息。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



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英国著名元帅蒙哥马利。

1961年9月，毛泽东和蒙哥马利深切交谈。

核武器是吓人的东西，不会用的[1]

（1961年9月24日）

蒙哥马利（以下简称蒙）：现在人们都在谈论核武器的问题，争论很多。我在北京也同刘少奇主席谈起中国的核政策。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纽〈钮〉，几下子就打完了。

蒙：刘主席告诉我说，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

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蒙：我也想，在你们的各项事业的安排中，发展核武器恐怕要摆在很后的地位。

毛：就是，我们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我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工业才开始有一点。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有雄厚的工业

---

[1] 这是毛泽东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的一部分。

基础。我们像穷人、叫化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面跑一跑。

蒙：我的看法是，正因为有核武器，才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毛：我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

蒙：现在英国有很多人示威游行，要求禁止和销毁核武器。我对他们说，首先是撤退外国军队，然后裁军，最后一件事才是销毁核武器。

毛：是不是能够像禁止化学武器那样达成一个协议，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大家都不用？核武器也不用？

蒙：现在还做不到，首先必须消除东西方之间的猜疑和互不信任。为此就要把军队撤回到各自的国土上去。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时间去访问日本的原因，我必须首先推动实现我的三项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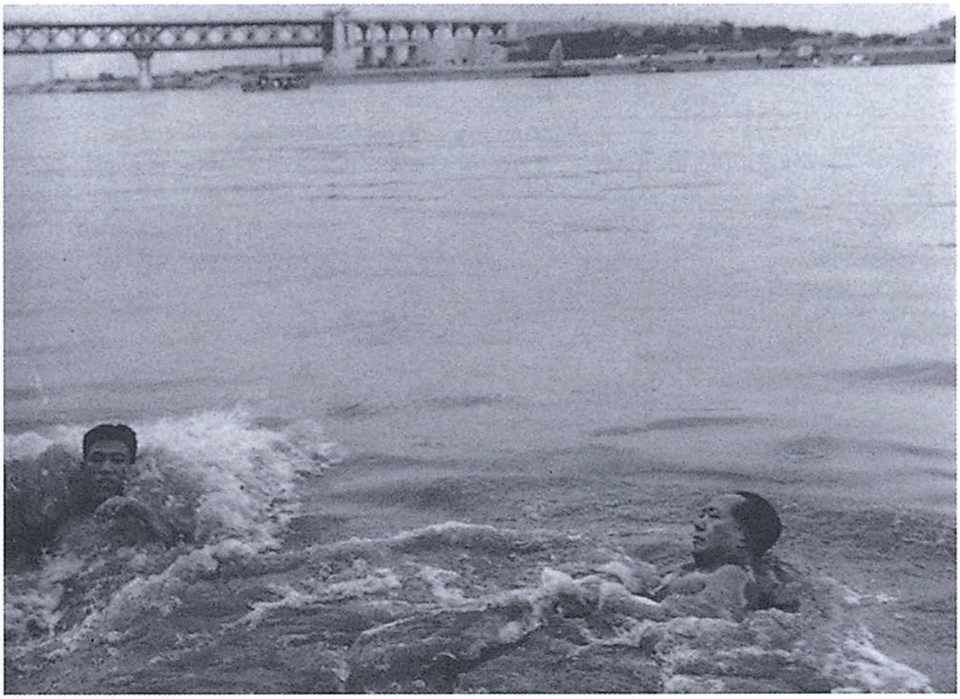
毛：那好，三项原则实现了，再禁止核武器。

蒙：我跟陈毅元帅讲过，希望他和苏联讲一讲，要他们也出来支持我的三项原则。

毛：他要到日内瓦去参加老挝问题的那个会[1]，可能碰到葛罗米柯，找个机会谈一谈，我赞成。

---

[1] 指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又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1954年日内瓦协议规定了老挝的中立地位和尊重老挝主权、独立、统一、领土完整和内政不受干涉等原则。但是美国违反协议，对老挝进行干涉和侵略，并于1960年挑起老挝内战。为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柬埔寨、老挝、越南、南越、中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另外还有印度、加拿大、波兰、泰国和缅甸。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横渡长江。

1961年，毛泽东在武汉和王任重、胡耀邦交谈。

邯郸谈话会记录[1]

（1961年9月27日）

刘子厚	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王路明	省委候补书记，管农业
康修民	石家庄地委书记
庞　均	邯郸地委书记
胡开明	张家口地委书记
刘　琦	邢台地委书记
李悦农	保定地委书记
周　兴	山东省委书记，管农业
程怀仁	山东农村部副部长

不行三包一奖，行大包干制：大队有机动粮。这种机动粮，如国家急需，交一部分给国家；再以一部分支援一些遭灾的及生产不好的队（用借的方法）；再一部分作贮备粮。

另有公积金，公益金，一部分管理费，一部分生产费。

---

[1] 这是毛泽东1961年9月27日在邯郸召集的座谈会上所作的记录。9月29日，毛泽东批示印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研究、讨论。10月7日，中央将这一座谈会记录及其他一些有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材料一同下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帐。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

反对意见：（1）退到初级社；（2）不利于基建；（3）征购辫子太多；（4）有些遭灾队不易支援；（5）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6）要变动时困难太多。其实，这六条反对意见，都可以回答。

保定专区唐县峒龙公社：

十一个生产大队。

都是大包干。

名义上对县对区都实行三包一奖，实际上是大包干。被评为“右倾”，他们也不改。群众拥护。粮食年年增产。牲口比一九五七年相当，并很胖，猪保持一九五七年水平。国家征购一年比一年增多，大队统一交，下死上活。

四种人：

（1）投机商；（2）热心自留地、小片开荒，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3）懒汉；（4）盲流分子。对以上四种人群众最痛恨，要设法制住他们。

大队应管之事：

（1）征购；

（2）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等；

（3）学校（小学）；

（4）必要的基建，如水利；

（5）必要的救济；

（6）必要的补助；

（7）民兵，治安保卫；

（8）作物安排（计划管理）；

（9）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1961年9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及古巴统一革命组织政治局委员马丁内斯·桑切斯会谈。

1961年9月，毛泽东到钓鱼台国宾馆回访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

给中央常委的信

（1961年9月29日）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

---

[1] 指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1960年12月30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信中说，五公公社1960年比1959年减产50%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一是违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征购任务不断增加，社员的口粮指标下降，使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农活质量普遍下降。对于怎样争取明年的大丰收，怎样能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二、坚决贯彻因地制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多作调查研究。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切实加强培根固本的具体工作。四、应促进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让牲畜出境的限制。

[2] 指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小队矛盾问题的座谈意见》。这个材料说：几年来普遍发生严重的瞒产私分、社员生产不积极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小队和小队之间的经济水平不平衡，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平均主义。解决的办法，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根据“四权”统一的原则，核算单位应当是直接的生产单位。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

五日的报告[1]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郸座谈纪录[2]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3]，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4]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61年9月25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给中南局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过程中，一部分社员和基层干部提出：如果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穷队与富队的矛盾问题，很难解决。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完成国家征购和按比例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试点经验证明，这样做，解决了以队为单位生产却以大队为单位分配的矛盾，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目前情况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可能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请求允许进一步开展试点。

[2] 指毛泽东1961年9月27日在邯郸召集的谈话会上所作的记录。记录中提到：“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

[3] 河北省的一批材料，共5件。第一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1961年8月17日关于在保定地区调查分配大包干的情况给省委的报告。第二件是中共保定地委1961年9月8日关于分配大包干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报告。第三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1961年8月18日关于唐县峒龙公社张显口生产大队执行分配大包干情况的简要说明。第四件是中共张家口地委1961年8月25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试行收益分配大包干情况给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的报告。以上4件对实行分配大包干给予了肯定。第五件是河北省藁城县岗上公社良村生产大队制订的1961年“三包一奖”粮食包干合同。

[4]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60条。

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1]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2]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3]。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4]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5]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6]，并在这个

---

[1] “三包一奖”，是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简称。

[2]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召开。

[3] 指邯郸谈话会记录中的“大队应管之事”(9条)：一、征购；二、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等；三、学校（小学)；四、必要的基建，如水利；五、必要的救济；六、必要的补助；七、民兵，治安保卫；八、作物安排（计划管理)；九、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4]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29条规定的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的自主权：有权因地因时种植；有权安排农活；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选留和管理本队的种子；有权调整本队的劳动定额；在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和牧场的条件下，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有权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各项副业生产。

[5] 指1961年3月15日至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6]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61年3月15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毛泽东3月16日在材料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1]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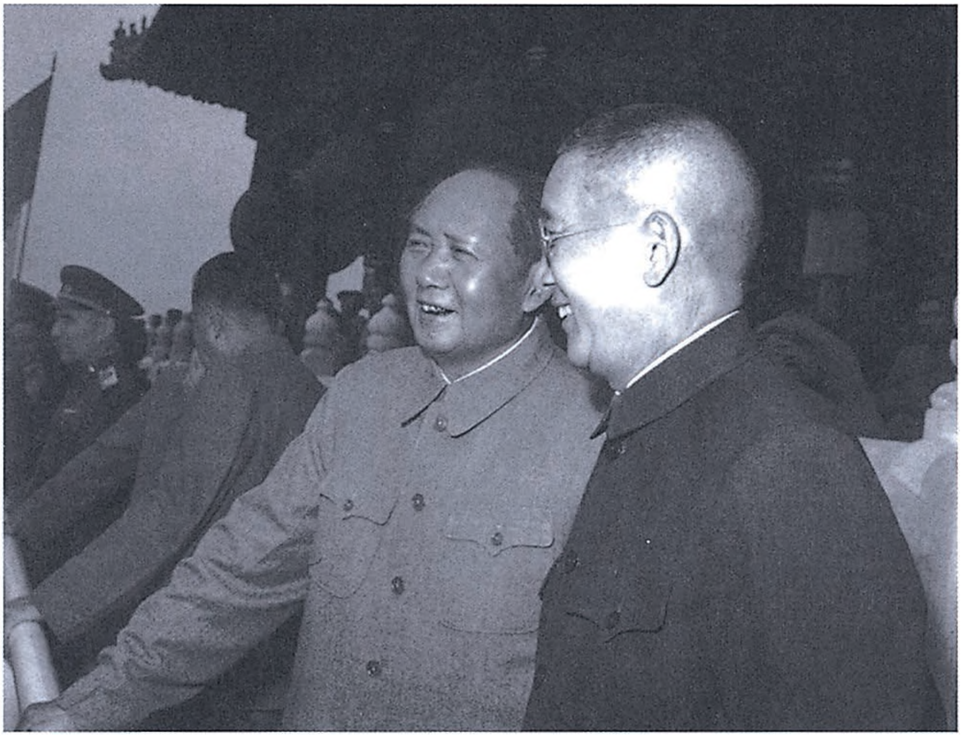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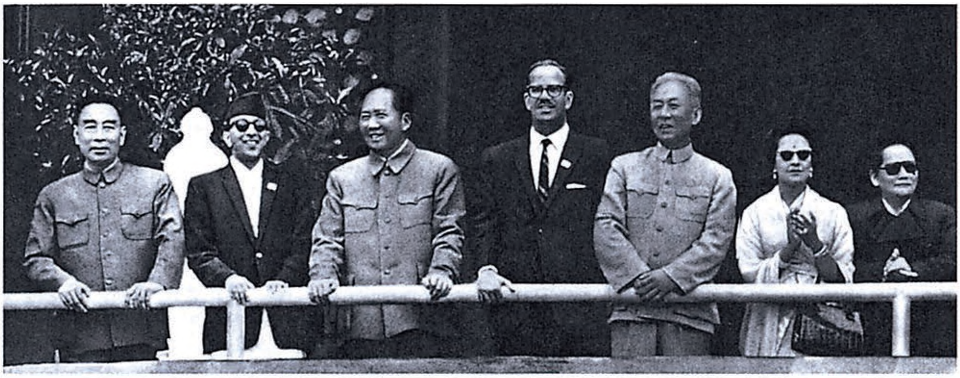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于1961年10月7日发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次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为基本核算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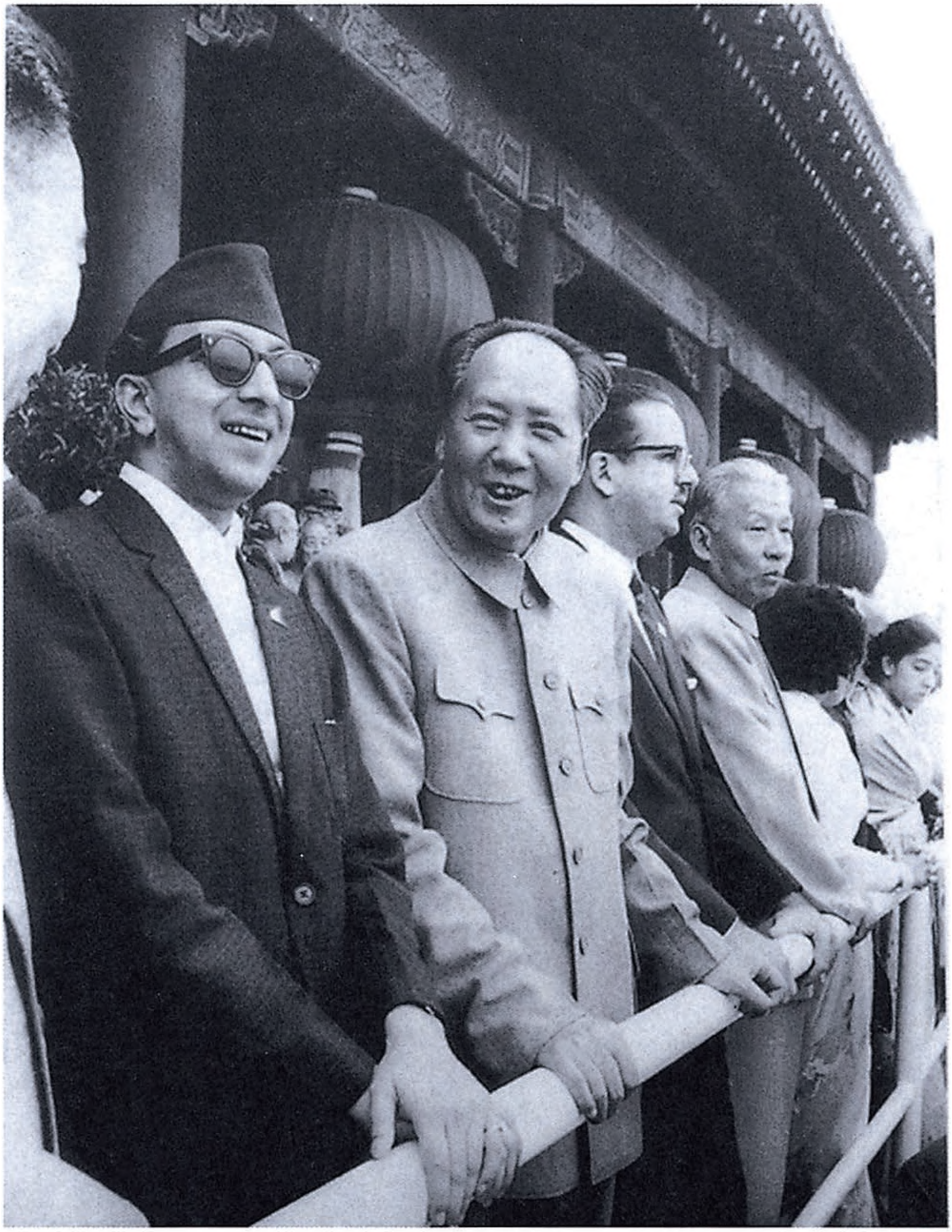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建国十二周年庆祝大会上。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及王后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1年10月1日晚，毛泽东陪同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观看国庆焰火。

1961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和留尼汪共产党总书记保罗·维尔吉斯等合影。

关于召集中央局书记讨论“队为基础”问题的批语

（1961年10月4日）

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1]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2]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泽东

十月四日晨五时

---

[1] 柯老，指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井泉，即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澜涛，即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任穷，即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

[2] 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以便中央作出决定。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和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的谈话

（1961年10月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陛下身体好吗？问题都解决了吗？

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以下简称马）：都已经谈好了。

毛：公平合理吗？

马：是的，我们同意。

毛：双方都同意就好。我们双方有良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你们好起来，你们也希望我们好起来。我们不准备损害你们，你们也不准备损害我们。

马：我们完全知道。

毛：不能说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高或低，我们是平等的。

马：我们很欣赏这种伟大的说法。

毛：不平等待人是不应该的，我们称它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公开教育党员和人民不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但有时也会出一些问题，有些干部以不平等态度对待别人。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些教育，并作适当处理，使他们改正缺点。我们国家什么情况都有，旧的也有，新的也有；落后的也有，先进的也有。

马：中国是一个辽阔的国家。

毛：还可以看到许多落后的痕迹。例如农业就是落后的生产部

门，拖拉机很少，实现机械化还得要很多年。我们主要依靠手工业，近代工业开始有一些，但不多。十二年前，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太少了。帝国主义统治我们实际上有一百多年，它们就是从中国拿东西走，不在中国建设什么。例如钢铁，从清朝开始到蒋介石失败为止，这段时间在蒋介石控制的地区每年只生产四万吨钢。可以说我们没有钢铁、机械工业和地质工作。我们当时地质工作人员只有二百多人，现在已有十几万人了。发现地下的财富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国家究竟有些什么。要钻探，打洞进去，这不是用手工所能办到的，需要用机器深钻，钻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或者更深，要用很多钢管，要有钻机，还要有经过训练的技术工人。钻探石油就得如此，不然就得依靠进口石油。别的东西如煤、铁和有色金属也一样。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农业、畜牧业，解决吃的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搞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就不能炼钢，也不会有机器，这就不行了。你们国家面积很大。

马：约有十四万平方公里。

毛：人口也不少。

马：约有九百多万人。

毛：比澳大利亚的人口还多。希望你们好好搞，一天天富起来，强起来。

马：我们正在努力发展，争取从友好国家例如中国得到援助，希望这次在途中同周恩来总理进一步商谈。

毛：好，再谈一谈。你们可以慢慢地好起来。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从没有到有，从少到多。你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就是要有时间，过几十年，就更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要搞得好一些至少要几十年。蒙哥马利元帅说需要五十年时间。我说

至少要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欧洲、美洲花了几个世纪才到今天的程度，我们用一个世纪超过就算好了。

对胡耀邦[1]农村考察报告的批语

（1961年10月6日）

此件[2]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毛泽东

十月六日

原件退毛。

---

[1] 胡耀邦，当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2] 指胡耀邦1961年10月2日报送毛泽东等的农村考察报告，题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说，我带了3名工作人员，从9月4号到29号，在黄河、淮河平原农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车外，行程约3600里。观感如下：（一）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二）水灾和水利问题。所到地区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为什么水灾严重？原因有两条：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设有问题。今后不同的地区必须有不同的水利建设方针。（三）另一种灾荒和教训。为什么同样土质、气候条件而且紧相邻的县、社、队，却有好有坏？坏的地方主要是“五风”伤了元气，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错过时机，吃了未能“见事早、抓得紧”的亏。（四）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五）调动

生产队小集体积极性的关键。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六）经营管理要更细，多劳多得要落实。（七）一种起过作用但具有危险性的做法。我们在安徽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许多生产队实行了一种叫做计划、分配、大农活、抗灾、用水看水五个统一下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的实际内容就是按劳力分等，把田长期分到户管，包死产量，超产全奖，减产受罚，遭灾减免。许多群众通俗地把它叫做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听说，别的省也有少数地方自发地实行了这种办法。对此，我们的意见是：1. 在一些“五风”刮得严重的地方，这种做法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确实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2. 这种做法已出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矛盾和纠纷。3. 这种责任制有两个前提，一是“五统一”，二是各户对产量要负完全责任，这两个前提势必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发展下去，最终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4. 这种做法如大家还要干，仍可试行，但要允许不同意的地方不这样做，更不要把它说得绝对，避免被动。如果要转过来，也要有准备、有计划地转，不要造成混乱，使生产再受损失。（八）完全恢复生产力的决定一环，在于能解决多少生产需要的大牲口。（九）市场、中小城镇生产和职工生活。农村集市都开放了，很活跃，但有些地方也有点乱。怎样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对此，我们感到：1. 集体商业似乎要加快一点建立，并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货易货，以此来抵制和缩小各种投机者的捣乱。2. 对盗窃国家财产和谋财害命的大盗窃犯必须法办。农民对小件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乡供求关系更加紧张，职工生活下降很大。对此要发动大家，自己动手加以解决。（十）要教育干部把团结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间还有隔阂，主要是因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还没有平反，心情不舒畅；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检讨未过关，觉得出力不讨好。这件事在有些地方还得很好地抓一下。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1年10月6日）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欣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西德军国主义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扶植下，已经复活起来，日益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同时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继续顽固地阻挠对德和约的缔结，坚持对西柏林的非法占领，并且正利用它们一手制造的所谓“柏林危机”，加紧扩军备战，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再一次郑重表示：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华沙条约缔约国关于缔结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的坚定立场和合理主张。我们相信，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正义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德两国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我们两国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深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莫斯科会议声明[1]的基础上，中、德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0月6日

---

[1]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对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61年10月7日）

---

[1] 中共中央这一指示稿指出：“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很需要研究。这个问题，在今年三月的广州会议上曾经初步考虑过，现在应当重新考虑。”“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集体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各级党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都要亲自下乡，并且派得力的工作组下去，广泛地征求群众意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各县还可以选择一两个生产大队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但是目前还不要普遍推广。在试行的时候，必须注意使生产资料，特别是耕畜农具，不受损失。中央准备在今年十二月的工作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请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十一月底以前，把你们调查研究的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1961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指示。

[2] 本篇一写在这一指示稿的手抄件上，毛泽东将此件拟题为《中央指示（草稿，待讨论）》；本篇二写在这一指示稿的铅印件上，毛泽东将标题改为《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本篇三是毛泽东在这两次稿上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一

照印发各同志。

二

请彭真[1]同志办。

毛泽东
十月七日一时

三

附去毛泽东同志召集的邯郸谈话会纪录[2]和河北省的五件材料，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3]，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邯郸谈话会记录，指毛泽东1961年9月27日在邯郸召开的座谈会上所做的记录。

[3] 指中共湖北省委9月25日对此事的报告及其所附的两件材料。

山东省的两件材料[1]，广东省一件材料[2]，请你们参考。从这些材料看来，就大多数的情况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

---

[1] 山东省的两件材料，指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座谈意见》（原载于山东省委办公厅1961年3月17日编印的《农村工作情况》第五号，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作了转载）和山东省委10月5日关于“三包一奖”问题的情况报告。山东省委10月5日的报告说，关于“三包一奖”问题，我们利用各地、市委第一书记在省开会的机会，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大家反映，自今年春季广州会议后，在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反对平均主义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在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这个办法时发生了一些矛盾，主要是各生产队之间，由于大队统一分配，存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义，结果就闹瞒产私分；“三包”实际上包不住，大队搞的一套基本上是无效劳动。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各地都摸索出了一些办法，名目很多，性质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把分配权交给生产队。在座谈中，除烟台地区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办法外，其他8个地区都认为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是势在必行。他们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1) 干部、社员都很高兴，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特别是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了。(2) 大队干部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只要有三四人就够了。(3) 社员对分配心中有数，真正做到“一年早知道”，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瞒产私分的问题完全解决了。(4) 可以增加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商品量。(5) 对保护和增加牲口、农具，恢复农业生产有利。同时，大家还反映，改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也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注意解决。

[2] 广东省一件材料，指中共广东省委调查组1961年3月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办法后的情况报告。

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1]

（1961年10月7日）

我非常欢迎朋友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你们也会感到中国人民是你们的真正朋友。朋友有真假，但通过实践可以看清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

现在不仅你们受压迫，我们也受压迫。我们在国际上没有发言权。日本政府进入了联合国，我们还没有。美帝国主义占领你们的领土冲绳，在你们国内设立了军事基地，你们的国家处在半占领状态。我们的台湾处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的。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

我听说你们来到北京感到非常高兴。在我们这里，我们热烈欢迎你们。但是在你们那里，情况就不同了。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在于美国在日本的朋友，即日本的垄断资本集团。中国也有反对你们的人，那就是蒋介石集团。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

分”。日本的岸信介[1]和池田勇人[2]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要扩大团结的范围，把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以外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积极地向他们做工作，对一切有机会做工作的国家都进行工作，希望你们也这样做。假使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那末百分之十就是二亿七千万人，剩下二十四亿三千万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这些情况你们都知道，不是说我比你们高明。

我们对人民要做工作，因为并不是二十四五亿人口都有觉悟，人民的觉悟是逐步提高的。比方，贵国人民觉悟起来也有一个过程。去年日本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垄断资本，掀起了一个大高潮。今年斗争有些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要悲观。有高潮，有低潮，再有高潮，再有低潮，是波浪式前进的。看起来是低潮，但实际上是在酝酿一个新的高潮。尽管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但是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革命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最后的胜利属于人民。日本人民是有希望的。

怪得很，人民手里最初没有武器。中国人民从前也是没有武器的，但最后取得了胜利。我原来是个小学教员，过去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共产党，也没有想过要进共产党。后来被压迫的环境迫使我们成立了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只有几十个党员，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那时谁也看不起我们，说共产党吹牛皮，根

---

[1] 岸信介（1896—1987），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任日本内阁首相。他在任期内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 池田勇人（1899—1965），1960年至1964年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本不在话下。十二个代表中有几个人变质了，例如陈公博[1]、周佛海[2]，后来当了汉奸。周佛海是在你们日本留过学的。还有一个变成了托派，此人现在在北京，叫刘仁静[3]，他曾经到土耳其见过被苏联驱逐的托洛茨基[4]。还有一个张国焘，后来是个背叛分子，此人现在在香港。还有几个人牺牲了。现在剩下的，只有董必武副主席和我，还有一个李达[5]。一九二一年那个时候，党员人数很少，关键问题是能否团结群众，有无正确的政治路线。

你们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我劝你们要研究失败的经验，当

---

[1] 陈公博（1892—1946），广东乳源人。1921年7月以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

[2]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1917年赴日本求学。1921年7月以留日代表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期间，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3]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1921年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4] 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1927年11月被清除出党。1929年1月被驱逐出苏联。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5] 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哲学家。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等职。

然同时也要研究成功的经验，这样可以做比较。除了研究中国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军事路线以外，一定要研究中国革命所犯的“左”倾和右倾的错误。

在座的有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文学家，有的还是中国历史研究家，希望你们能够研究中国历史的曲折道路。

你们到中国来，我们感谢，所有的中国人民都感谢。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就把我书写的一首鲁迅的诗送给你们。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诗不好翻译，可以请郭沫若[1]翻译一下。今天就谈到这里吧。我向日本人民问候。

---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

1961年，毛泽东接见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时和团长三岛一握手。

1961年，毛泽东会见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

为日本访华朋友们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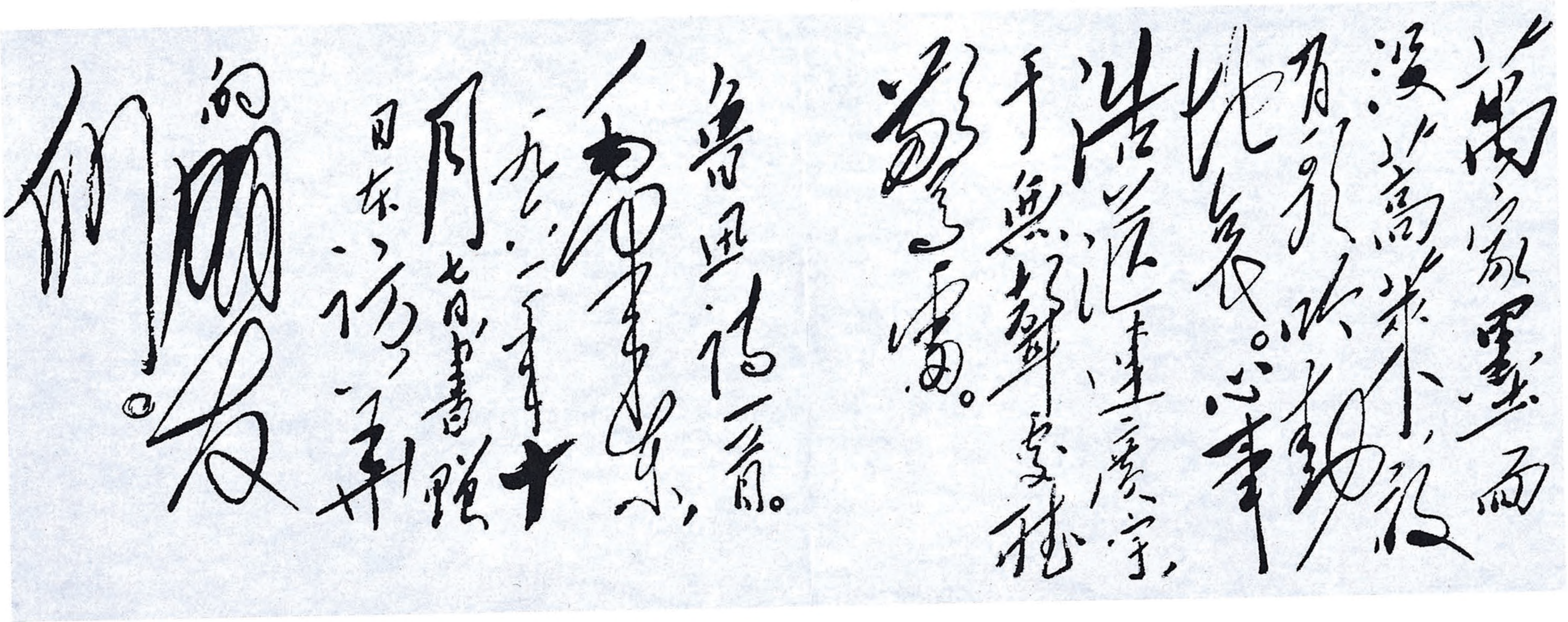
（1961年10月7日）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鲁迅诗一首。毛泽东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书赠日本访华的朋友们。

---

[1] 1961年10月7日，日本以黑由寿南为团长的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和以三岛一为团长的民间教育家代表团来到中国。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们并题词。



萬家墨面没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

魯迅詩一首。

毛澤東，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書贈日本訪華朋友們。

毛泽东为日本访华朋友们的题词。

对《光明日报》发表的《论假说》一文的批语

（1961年10月9日）

陈伯达[1]同志：

此文[2]可以一阅，阅后还我。请调查一下，作者是一个什么样人，在何处。

毛泽东

十月九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2] 指《光明日报》1961年10月6日发表的《论假说——谈谈假说的一般特征和它的形成》一文。文章共分“什么是假说”“假说是科学发展的形式”“假说的内容结构”“假说与世界观”“形成假说的步骤”“假说产生的根源”和“形成假说应该注意的事项”七个部分。作者张巨青是武汉大学哲学系讲师。

对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贺词

（1961年10月14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体中国人民，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1]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的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苏联的工业和农业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不断的提高。苏联载人宇宙飞船两次遨游太空，并且胜利地返回地面，为人类征服宇宙的事业作出了光辉的贡献。苏联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无可置辩地表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比的优越性。

你们党的这次代表大会将要通过的新的纲领，提出了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的计划。我们相信，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在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苏联人民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缓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普遍裁军和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支持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一切成就，对于正在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全世界人民都是不可估量的鼓舞。

中苏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一向存在着亲密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和友谊，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是永恒的，是久经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

我们衷心地祝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圆满成功。祝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斗争中，取得新的伟大的成就。

伟大的苏联人民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四日

对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材料的批语

（1961年10月15日）

陈伯达同志：

此件[1]请一阅。你到唐山去时，请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阅后退毛。

---

[1] 指国家经委生产办公室1961年10月9日整理的《目前开滦煤炭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材料，载于中共中央办公厅10月11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一〇期。材料中指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一、采掘关系，企业管理，设备器材，生活与思想问题。前两个问题主要是煤矿内部问题，后两个问题与外部关系较多。人和物的工作问题经常交替成为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人的工作做得好些，物的工作就突出了。物资供应工作好一些，不做好人的工作也不行。从最近情况看，影响煤炭生产水平上不去的主要是人的问题。二、经过转正、晋级和增加劳动保护用品等一系列工作后，工人队伍比以前更加巩固了，绝大部分工人对煤矿还是留恋的。三、目前职工除了对设备、工具质量差，材料供应不足有意见外，考虑较多的还有生活问题，包括粮食不够吃、物价尤其是蔬菜价格过高、工资等级规定的范围太窄等问题。此外，还存在基层干部待遇较低的问题。四、目前干部当中病号很多，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上的批语

（1961年10月16日）

此件[1]已阅，除关于六十条者[2]、已圈掉不用〔者〕[3]外，其他

---

[1] 这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编辑的供干部学习的材料，主要是摘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文件中关于党的生活的若干论述。目录如下：一、执政党的地位，对我们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按照党章办事，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三、严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四、正确进行党内斗争；五、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六、加强党的团结。

[2] 《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第42页上摘录了毛泽东1958年1月31日《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以下两段话："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遍〈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待人的条件之一。"在审阅时，毛泽东删去了这两段话。

[3] 《关于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学习材料）》第44页上摘录了毛泽东1959年3月17日《党内通信》中以下一段话："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这段话在送毛泽东审阅时即已删去。

都可用。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送田家英[1]同志。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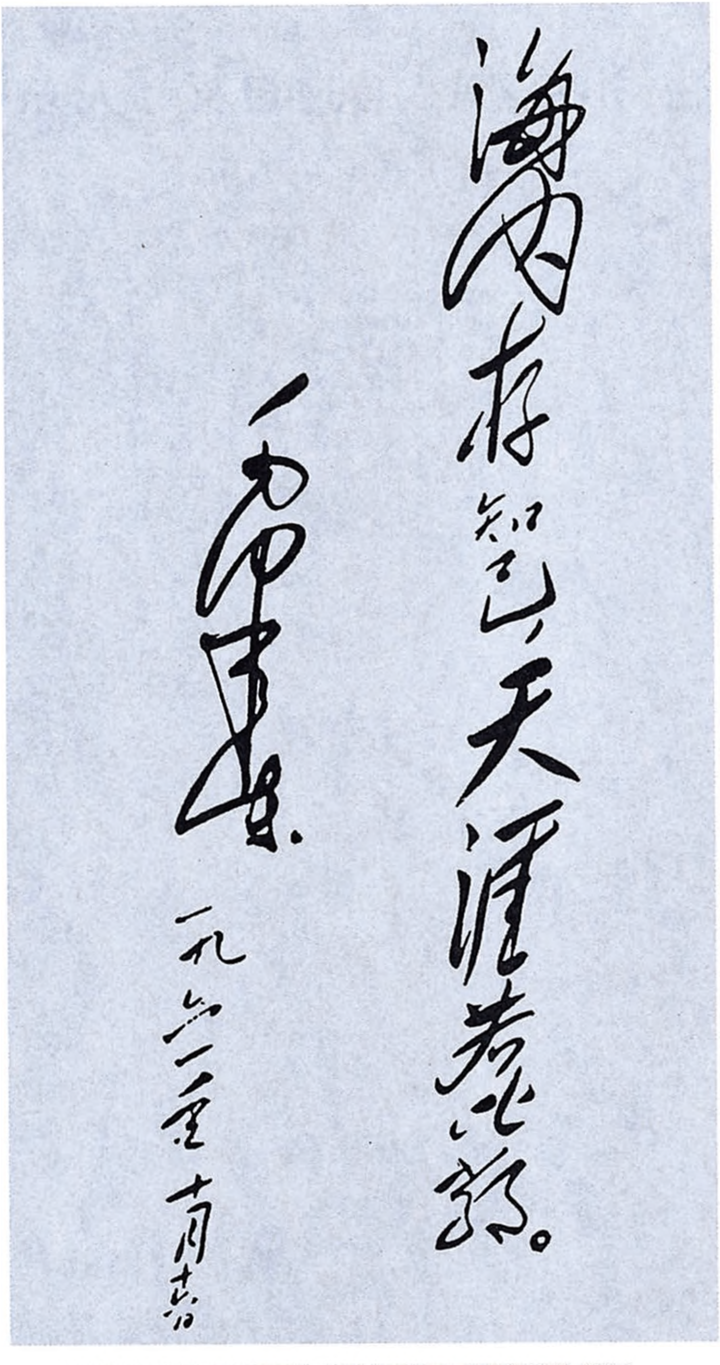
为发展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题词

（1961年10月16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

毛泽东为发展和阿尔巴尼亚的友好关系的题词。

关于转发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经验的批语

（1961年10月22日、23日）

一

尚昆同志：

河北省委所送《南宫县经验》[1]一件，请你为中央起草一个转发指示[2]，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1961年10月22日晨

---

[1] 指中共邢台地委1961年10月6日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促进粮食征购和种麦运动的通报。通报说，南宫县分两批召开小队长以上四级干部会议，把大包干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具体表现为：一、贯彻大包干政策后，小队产量报实了，给完成征购任务奠定了物质基础。二、大包干政策调动了生产队、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种麦运动。三、大包干教育了减产队，促使他们向先进队看齐。以上事实证明，实行大包干、实物按劳分配加照顾，是进一步克服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重要政策，是推动征购、种麦的动力。

[2] 杨尚昆1961年10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转发邢台地委关于南宫县贯彻大包干政策通报的指示稿。本篇二就写在杨尚昆起草的这一指示稿上。

二

少奇、小平[1]阅后，请尚昆用电报发出。

毛泽东
十月二十三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1961年，毛泽东迎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后回到北京的周恩来。

1961年，毛泽东、刘少奇迎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归来的周恩来。

对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1]等的批语

（1961年10月30日）

一

即送刘、周、朱、陈、林、邓[2]阅后，交尚昆发。

毛

卅日

---

[1] 指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1961年10月30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指示稿说：“当前农村工作是繁重的，各地必须集中力量做好粮食征购、农副产品收购、秋收种麦、生产救灾等各项工作。因此，对于改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目前还是按照十月七日中央的指示，只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不要普遍推广。关于实行分配大包干的办法，除少数地区由于各级领导已经有了直接经验，干部和群众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实行了对当前工作确实能起推动作用的，可以分批推行以外，多数地区，仍应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批推行。”“为了使牵动的面不要太大，各地的秋后分配和年终分配，一般地都按照原来决定的分配方案进行，不要轻易变动。”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材料[1]部分，各同志可以不看。

二

这些材料都可转发[2]。

毛泽东
十月卅日

---

[1] 指杨尚昆报送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指示稿时附送的另外四个文件：一、中共中央东北局1961年10月26日关于东北三省实行大包干办法的电话汇报。二、中共中央西北局10月23日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三、中共江苏省委10月24日关于贯彻执行大包干政策给中央、华东局的请示报告。四、中共广东省委10月18日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南局的报告。

[2] 1961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将杨尚昆附送毛泽东的这四个文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题为《中央转发关于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贯彻执行大包干办法的四个文件》。

为李家骥题词[1]

（1961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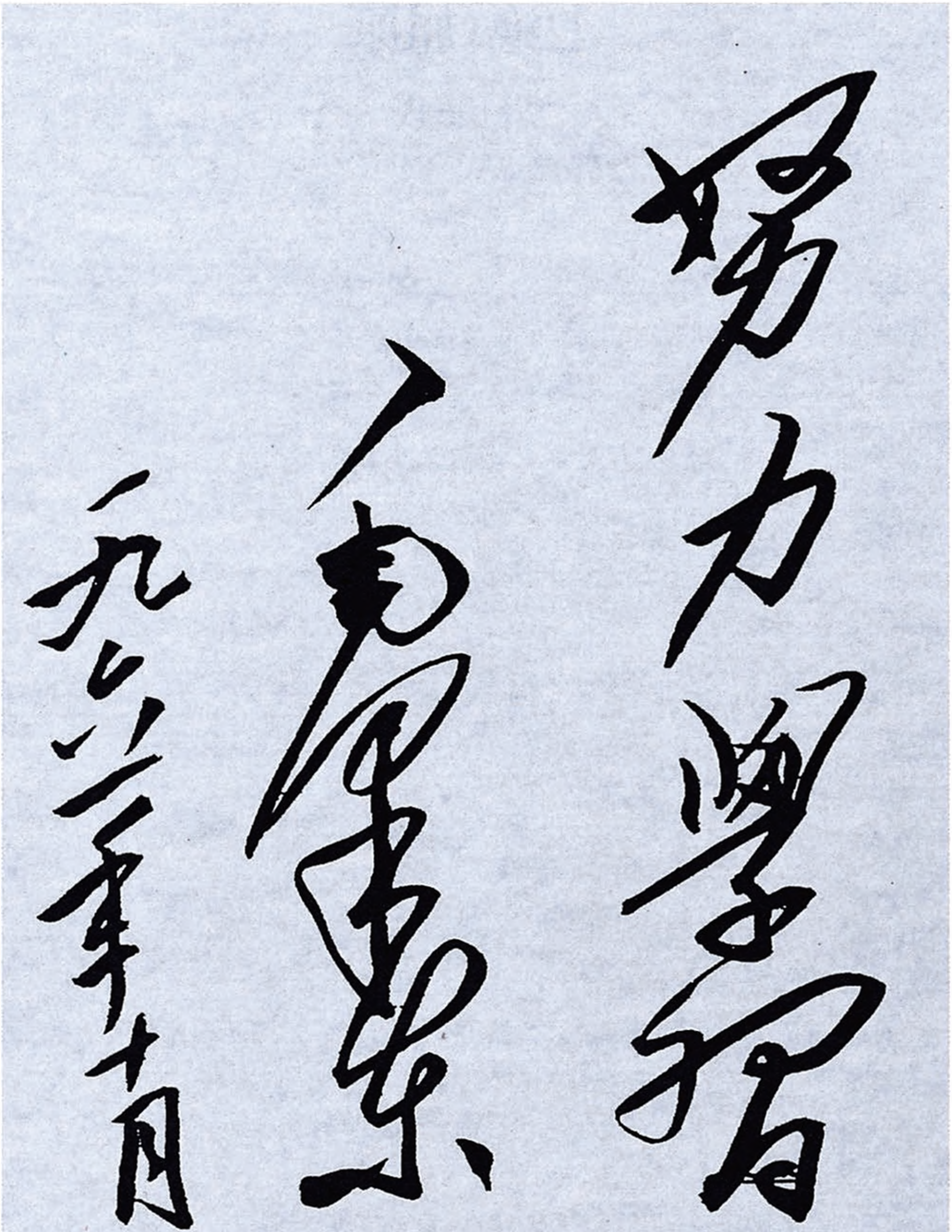
努力学习。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月

---

[1] 李家骥，山西盂县人。当时任毛泽东的卫士。1961年10月，为响应毛泽东到基层工作的号召，他提出到东北支援油田建设。李家骥启程到大庆前，毛泽东给他题写了“努力学习”四个字，并落下了自己的名字。



努力学习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月

毛泽东为李家骥的题词。

七绝·屈原

（1961年秋）

屈子[1]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2]
艾萧太盛椒兰少，[3]
一跃冲向万里涛。[4]

---

[1] 屈子，指屈原。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楚人，是我国最早的大诗人。曾辅佐楚怀王，官至左徒、三闾大夫，遭谗去职。楚顷襄王时被放逐。因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深感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汨罗江而死。

[2] 手中握有杀人刀，喻指屈原作《离骚》所发挥的战斗作用。

[3] 艾萧太盛椒兰少，艾萧，即艾蒿、臭草，这里比喻奸佞小人；椒兰，申椒和兰草，皆为芳香植物，这里比喻贤德之士。

[4] 一跃冲向万里涛，指屈原在悲愤和绝望中投汨罗江而死。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1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它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沿着这条光辉的道路胜利前进。

几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无限的喜悦。

中苏两国人民有着亲如手足的深厚友谊。我们两国无论在建设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中，或者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始终密切合作，相互支持。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是久经考验的，是任何力量所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力量继续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为加强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实现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宏伟纲领方面取得新的成就。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万岁！

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1月6日于北京

苏联和保加利亚的两件事[1]

（1961年11月11日）

从这两件事[2]，可以看出各兄弟国家的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所表示的感情的深度和广度。修正主义者一心一意要孤立中国，究竟被孤立的是谁呢？修正主义者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而我们

---

[1] 这是对新华通讯社1961年11月编印的《内部参考》国际版第一九五期、二〇〇期上分别登载的《我歌舞剧院演出轰动了列宁格勒》和《保人民敬仰毛主席热爱中国》两篇文章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上述两篇通讯所报道的情况。前一篇通讯说，我国中央歌舞剧院在列宁格勒的演出，轰动了这个城市。观众赞叹我艺术成就时，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这种情绪在周恩来副主席在苏共二十二大讲话全文发表以后表现得特别强烈。观众留言簿上出现了过去少见的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留言，如："光荣属于中国！""伟大人民的伟大艺术！""只有伟大的人民才能有如此丰富而全面的艺术！""伟大的兄弟般的中国人民万岁！""光荣属于中国人民！我们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10月14日，首次上演舞剧《宝莲灯》，观众鼓掌、叫好达20分钟之久，演员谢幕15次。后面演出的各场票也很快售空，剧院不得不卖站票。21日晚第一幕休息时，一大群买不到票的人不顾层层阻拦，冲进场内，欢呼此举为"攻克柏林"。从苏联著名艺术家到普通观众纷纷向我们表示，演出的成功"简直出乎意料"。后一篇通讯说，从9月30日到10月5日，保加利亚约10个州（市）的17个工矿企业和农业社等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二周年的集会。新华社记者采访了一些庆祝活动。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保加利亚人民敬仰毛主席，热爱中国。

（所谓教条主义者）却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及其在各国的同盟者，总之，一切剥削、压迫人民的反动派及其走狗，在全世界不过几亿人，只占百分之十以下，而革命人民及其同盟者则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达到二十几亿人之多，这是毫无疑义的。印度反动派反华，印度人民并不反华，他们痛恨本国的反动派。1960年，中国农业展览会在印度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帮助，就是证据之一。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1961年，毛泽东会见出席世界记者大会的代表。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
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2]犹可训，
妖为鬼蜮[3]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
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

[1] 1961年10月，浙江省绍剧团在北京演出根据《西游记》第二十七回白骨精故事改编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过戏作了一首诗，借以反对当时所说的现代修正主义。本诗的主旨与郭诗相同（这也是毛泽东此后大多数诗词的主题），只是不同意郭诗敌视被白骨精欺骗的唐僧的看法。郭读本诗后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两诗句中多用《西游记》故事，因为流传较广，现不加注。

[2] 愚氓，氓，古义通“民”。愚氓，愚蠢的人。

[3] 鬼蜮，蜮，古代传说中水里一种暗害人的怪物。鬼蜮，即鬼怪，后来比喻阴险作恶的人。

附：郭沫若原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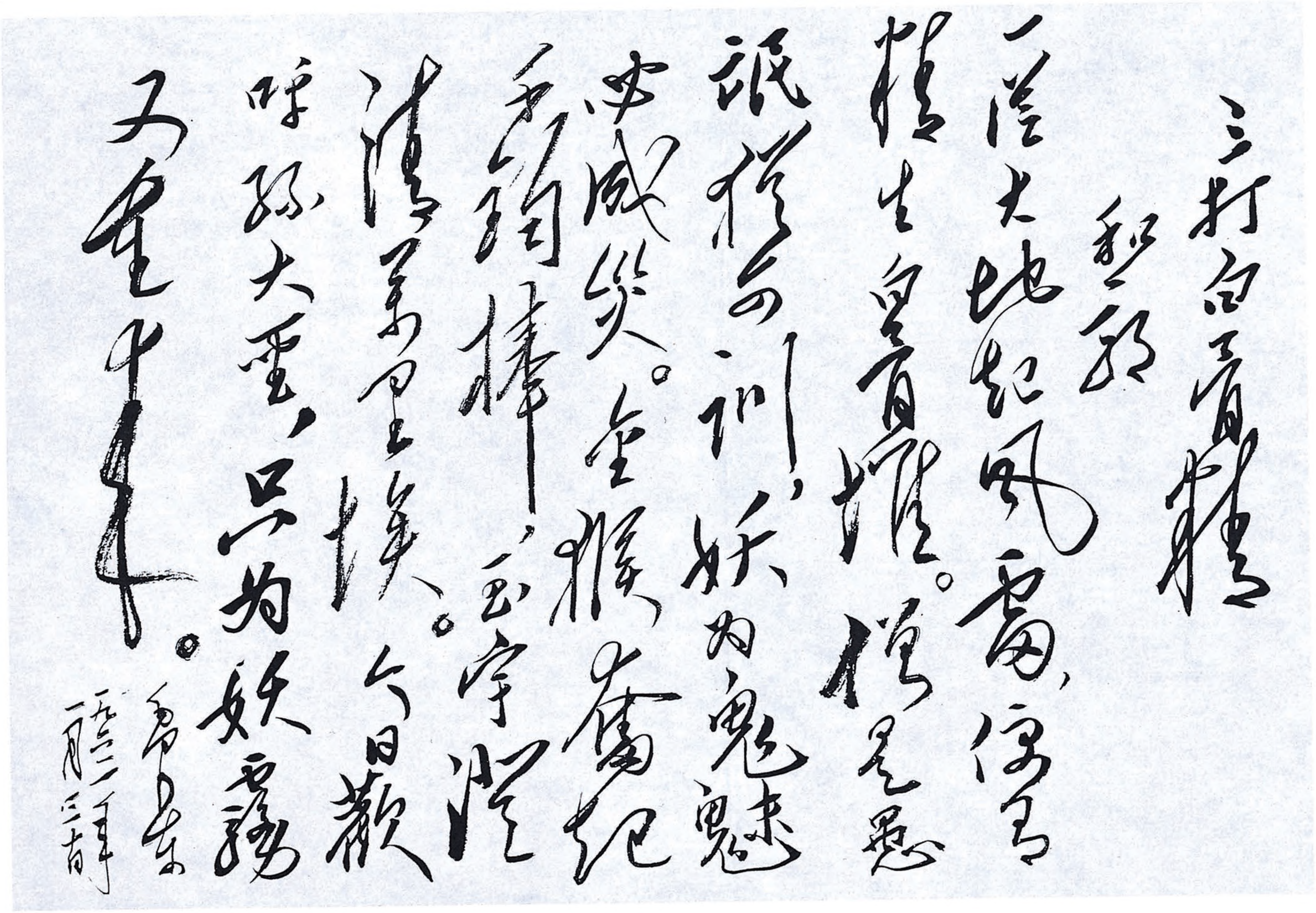
七律·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
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
精逃白骨累三遭[1]。
千刀当剐唐僧肉，
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
猪[2]犹智慧胜愚曹。

---

[1] 累三遭，接连三次。

[2] 猪，指猪八戒。



三打白骨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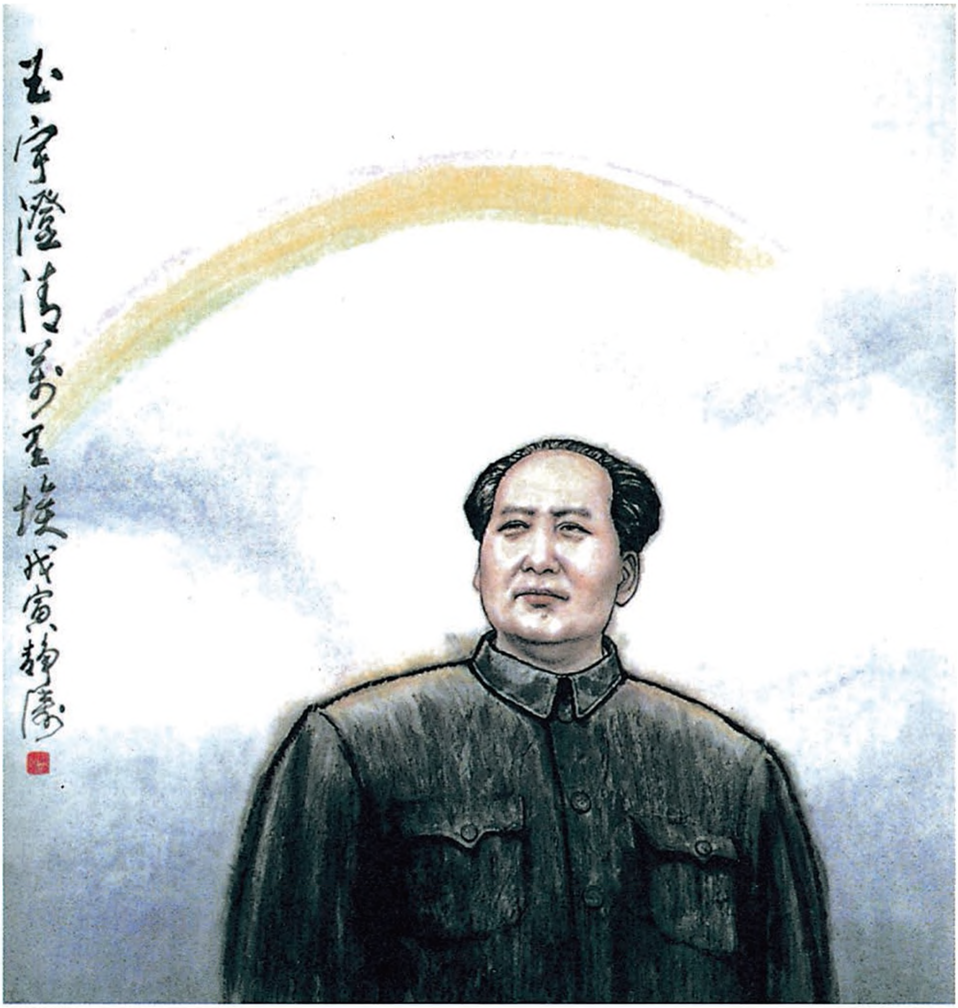
和郭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为妖雾又重来。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泽东手书《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玉宇澄清万里埃
戊寅静濤

《玉宇澄清万里埃》（诗意画）

关于选看一些材料给江青的批语

（1961年11月19日）

一

一批材料[1]，送给江青，从中选一些看，不必全看。我好，勿念。最近信已收到，待另复。

毛泽东

1961年11月19日

---

[1] 这批材料共有5种：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1961年4月29日编印的一份内部刊物上刊载的5篇材料。在其中的第四篇《美国军事家说西方国家无法对付毛主席的持久战战略》一文标题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并批示“江青阅”；在其中的第五篇《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一文标题旁，毛泽东加了着重号，该文讲到赫鲁晓夫有三点令美国人难以置信，毛泽东在这三点旁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二、毛泽东1961年4月15日批示印发的几个重要文件。三、中共中央1961年5月17日印发的《中央书记处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四、中共山东省委1961年4月4日关于宣读讲解人民公社条例草案试点情况给中央、华东局的报告。五、中共中央办公厅1961年4月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四二号刊载的河南省潢川县两个生产队干部和少数社员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反映。在第二、三、五种材料上，毛泽东均批示“江青阅”；在第四种材料上，毛泽东批示“送江青阅”。

二

这三条[1]都可以解释。

---

[1] 指《美国认为赫鲁晓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革新者”》这一内部材料中所说赫鲁晓夫令美国人难以置信的三点。这三点分别是：（1）目前国际形势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空前有利，为什么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却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放弃世界革命”，这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2）西方仍有着“广泛的（军事）联盟体系”“核打击力量，和遍布全球的基地网以对付共产主义集团”，赫鲁晓夫有什么理由断言“猎获物已放进口袋”或“资本主义包围已不再存在”？（3）赫鲁晓夫真正相信资本主义可以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吗？“历史证明除非得到武装征服的支持或者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就在附近，非暴力的革命策略从来没有能够使任何一个国家落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难道赫鲁晓夫根本没有从共产党人过去40年的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吗”？怎么能够设想他会相信“美国有可能在得不到苏联武装力量帮助的情况下实现一次共产主义革命”？

对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调查报告[1]的批语

（1961年11月23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中央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二

总理、小平、彭真、震林[2]阅后，尚昆[3]用电报发去。另印发中

央各部委党组若干份。

毛泽东

廿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1961年11月9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给毛泽东并报华东局、福建省委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我于10月24日离京南下，28日晚抵达福建龙岩。经过郑州、南昌时，分别听取了河南、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汇报，到龙岩后又派工作组在几个大队进行试点。兹将试点中发现的问题和处理办法报告如下：一、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认为这对克服平均主义、官僚主义，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调动社员积极性，发展农副业生产都有极大好处。但也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不再改变。二、在体制下放后，对小队规模一般都作了调整，除了原来规模很小的大队（如三四十户）不再分小队外，一般大队所属小队都比以前增多了。但也有许多群众存在越小越好的偏向，还有一部分人企图把小队划小后将来可以进一步实行单干。为此我们对今后小队划分规定了几条原则：首先，确定现有小队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其次，有些范围太大、需要划分的小队，规定小村一村一队，大村一村数队，但小队应以30户左右为宜。再次，应授权公社，各小队划分应经过公社批准，未批准前不得擅自划分，以免引起混乱。三、小队改划以后的土地调整：公社化时各小队所领土地与初级社时期未有变动的，现在可以基本不动，个别调整；公社化以来各队土地已按劳动力多少重新搭配的，则需要调整。至于耕畜，也应随土地多少适当调整，叫做“牛随田走”，犁耙等大中型农具则跟牛转移，新式农具仍归大队所有。四、关于新三包，即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上交问题，各队情况不同，上交多少也不一样。五、体制下放后，小队会计不足，需要迅速

健全人民公社会计辅导员制度，开办会计训练班；至于过去的债务等，一般仍由大队负责处理，待小队划分、冬耕结束后再分别清理，这叫“新账从新起、旧账以后算”。六、体制下放后，大队主要负担以下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政权方面的工作，如分派征购、抚恤救济、小学教育等。第二，党与政治工作。第三，联村社工作，如水利建设，护林防火，办好供销社，处理公益金、五保户等。第四，办好大队企业。七、关于粮食分配。大家一致同意河北省关于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的办法，认为这是当前提高社员出勤率的关键。八、关于山林问题。有林木的山，不应划归小队所有，以免群众因对林权不相信而大量采伐。至于荒山，则应完全划归小队所有，并发证立界，以确定所有权。靠近乡村的荒山，可以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1]

（1961年11月28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七年来，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久经考验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敌人的坚决斗争中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表现了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发挥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巨大的成就。现在，阿尔巴尼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的电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七周年。

亚人民正以忘我的劳动热情，为实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进一步发展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我们深信，紧密地团结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周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光荣成员，它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南前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贯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信守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1]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2]，坚决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毫不调和的原则性的斗争，对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我们两国人民不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及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都相互支持、紧密合作。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

---

[1] 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

[2]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阵营的利益的。中国人民将坚持不渝地为发展中阿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作出最大的努力。

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1月28日

给臧克家[1]的信

（1961年11月30日）

克家同志：

惠书收到（两次），因忙未能如愿面谈，还是等一会儿吧。我近日要外出走一遭，不久回来。明年一月内看找得出一个时间，和你及郭沫若[2]同志一同谈一会儿。那时再通知你。

祝好！

毛泽东

1961年11月30日

---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2] 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既要有总路线，还要有具体政策[1]

（1961年11月）

单有总路线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这些政策，要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完善起来。如无政治、经济、文化、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善的政策，总路线即不可能完全实现。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书记处书记安斋库治时谈话的一部分。

1961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会见胡志明主席。

1961年11月，毛泽东在北京亲切会见胡志明。

关于了解江苏省经济工作的经验给李先念、姚依林[1]的信

（1961年12月15日）

李先念、姚依林二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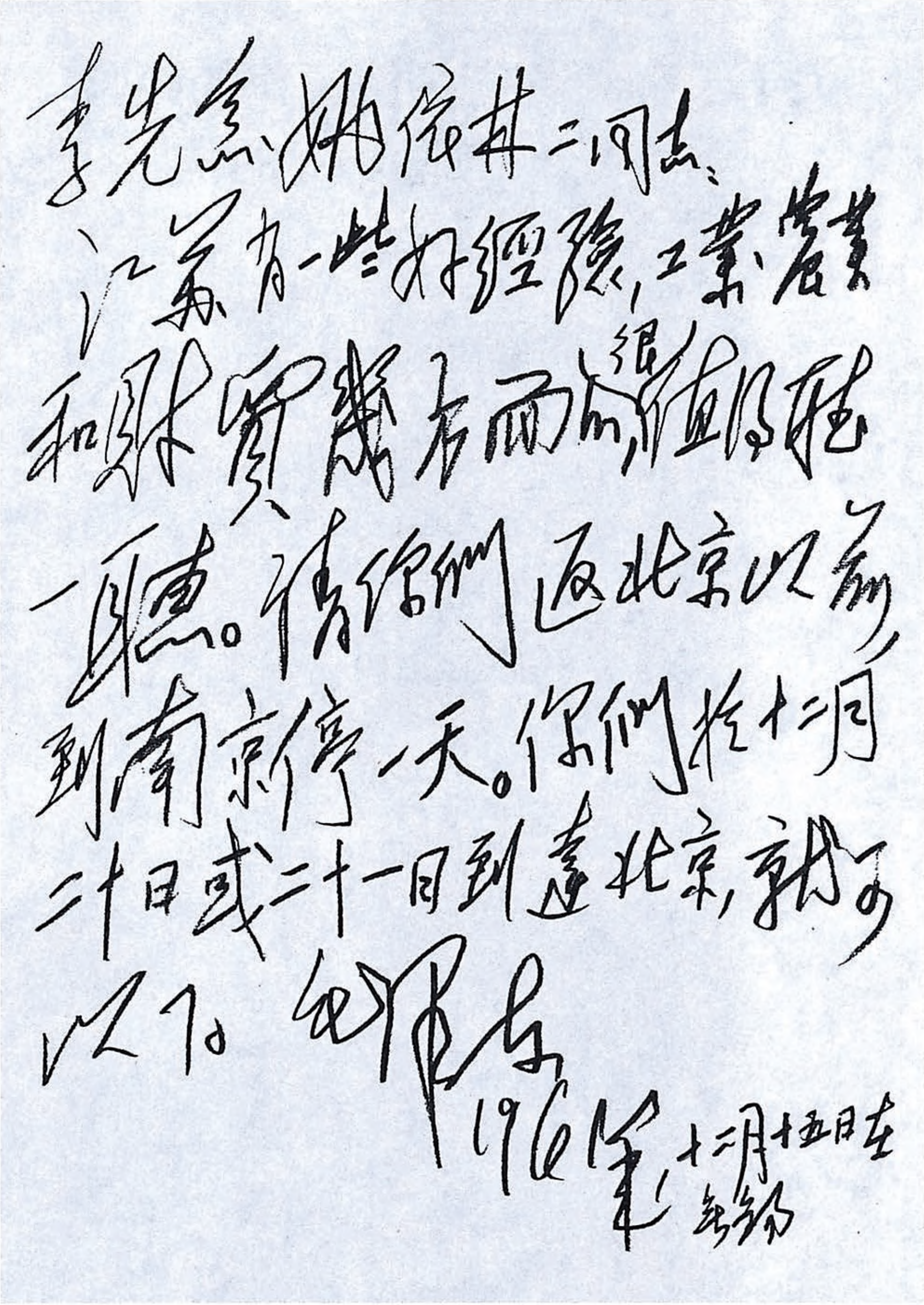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请你们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们于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到达北京，就可以了。

毛泽东

1961年十二月十五日在无锡

---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贸办公室主任。姚依林，当时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商业部部长。



李先念、姚依林二同志：

江蘇有一些好經驗，工業農業和財貿幾方面，很值得你一聽。請你們返北京以前，到南京停一天。你們於十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到達北京，就可以了。

毛澤東

1960年十二月十五日在無錫

毛泽东致李先念、姚依林信的手稿。

过去走了弯路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

（1961年12月20日）

对于过去走了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几个大办都是中央决定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报来的，但是谁叫中央相信你们呢？我们的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同时还要看到，这些错误也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是有个过程的。问题是我们认识的过程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

给张仙朋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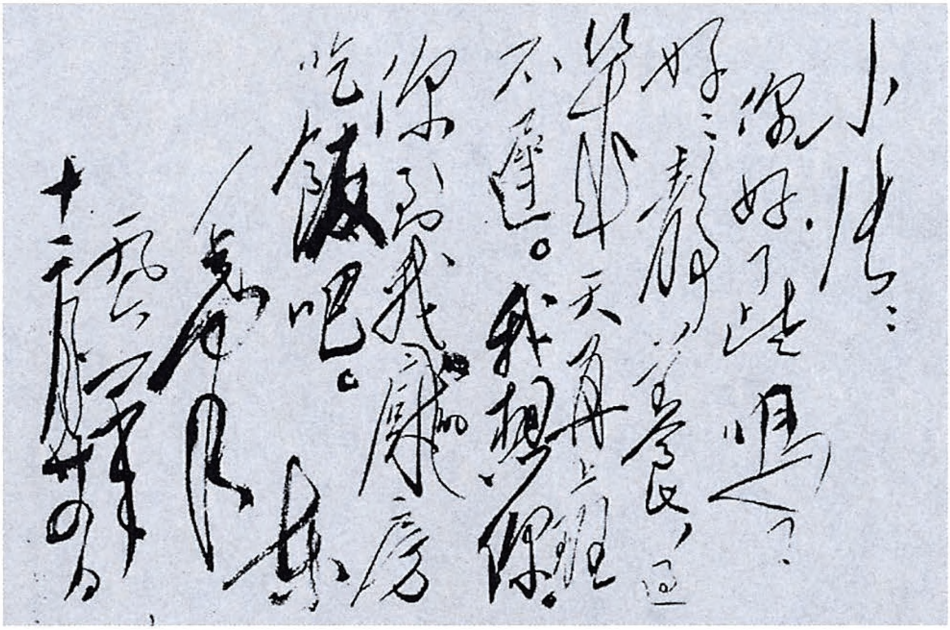
（1961 年 12 月 24 日）

小张：

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四日



小张：

你好了些吗？好好静养，过几天再上班不迟。我想你，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

毛泽东

十二月廿四

毛泽东致张仙朋信的手稿。

给周世钊[1]的信

（1961 年 12 月 26 日）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2]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3]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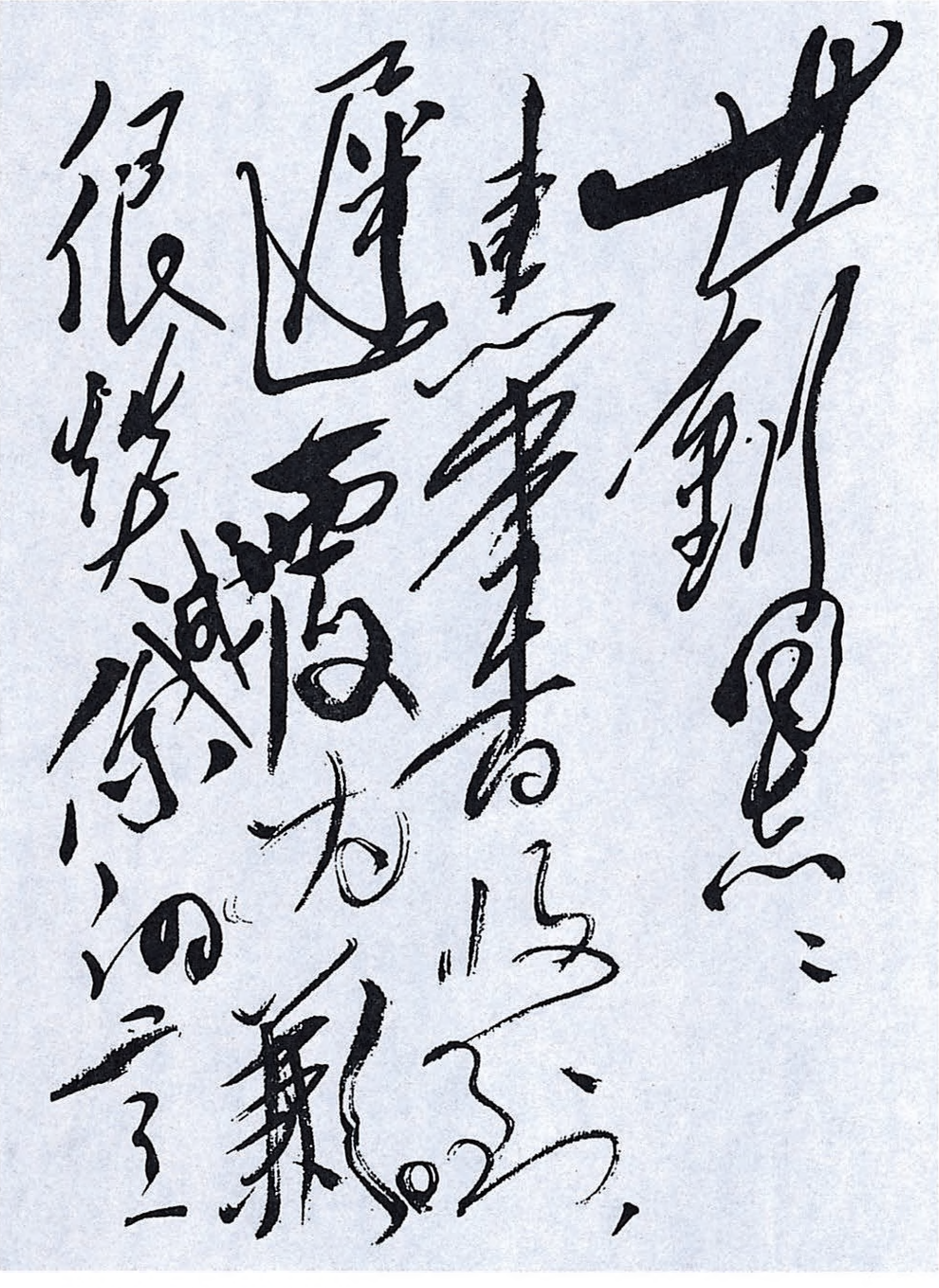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

[1] 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参见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全唐诗》卷七百六十四），下句原为“暮雨千家薜荔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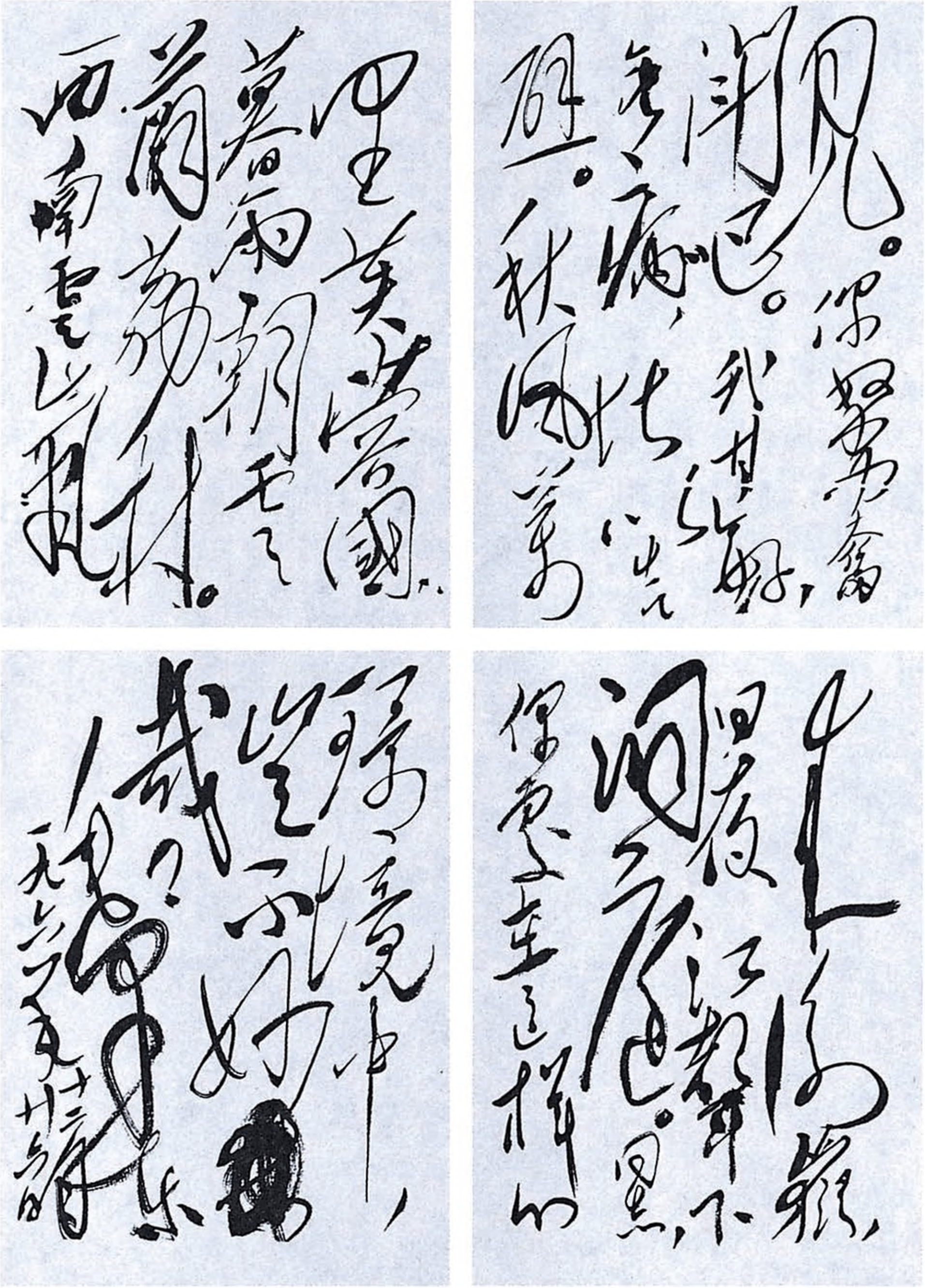
[3] 这是湖南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望湘亭上的一副对联，录自清末诗人黄道让的七律《重登岳麓》（《雪竹楼诗稿》卷六），上句原为“西南云气开衡岳”。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给臧克家[1]的信

（1961年12月26日）

克家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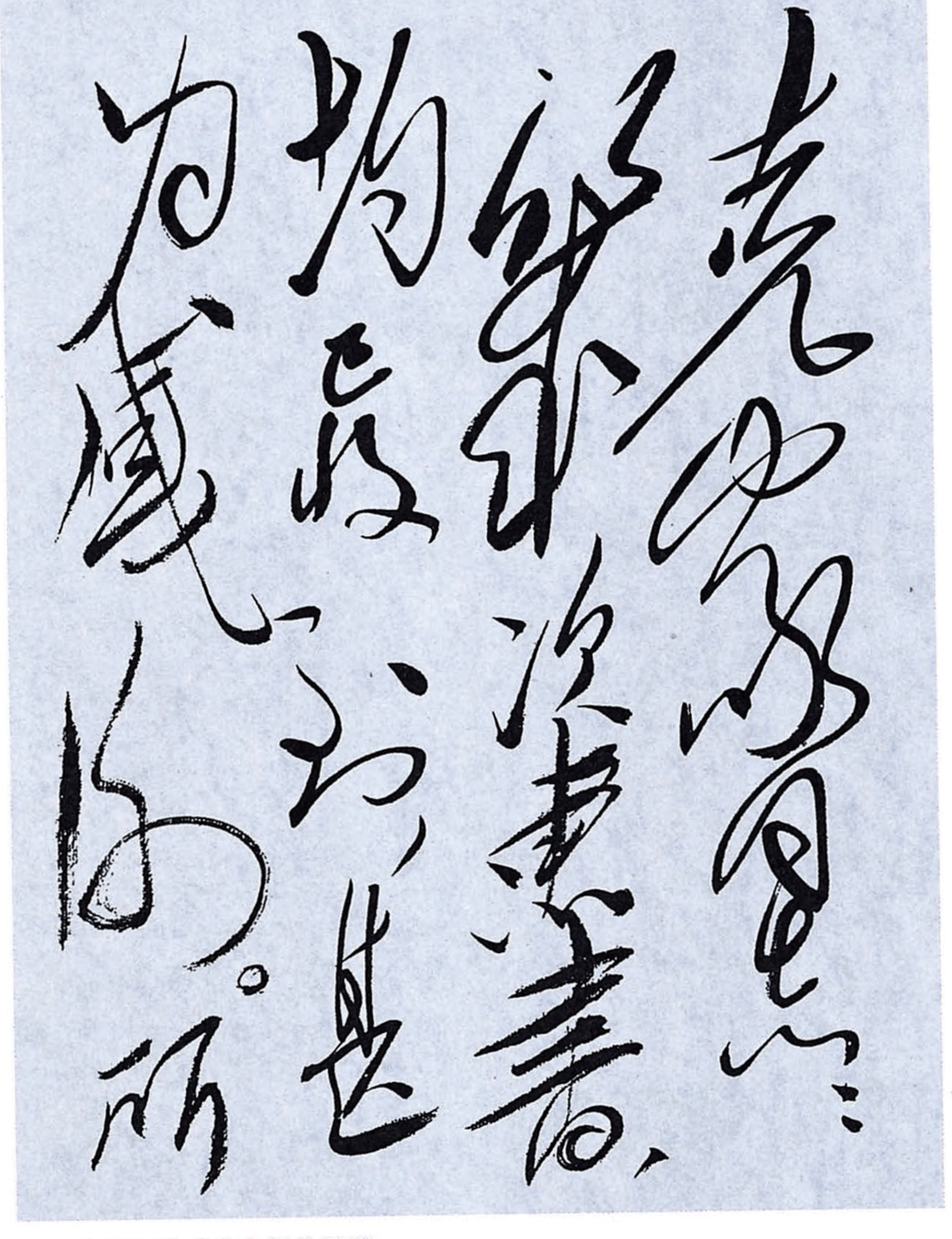
几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所谈之事，很想谈谈。无耐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而且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专此奉复，敬颂撰安！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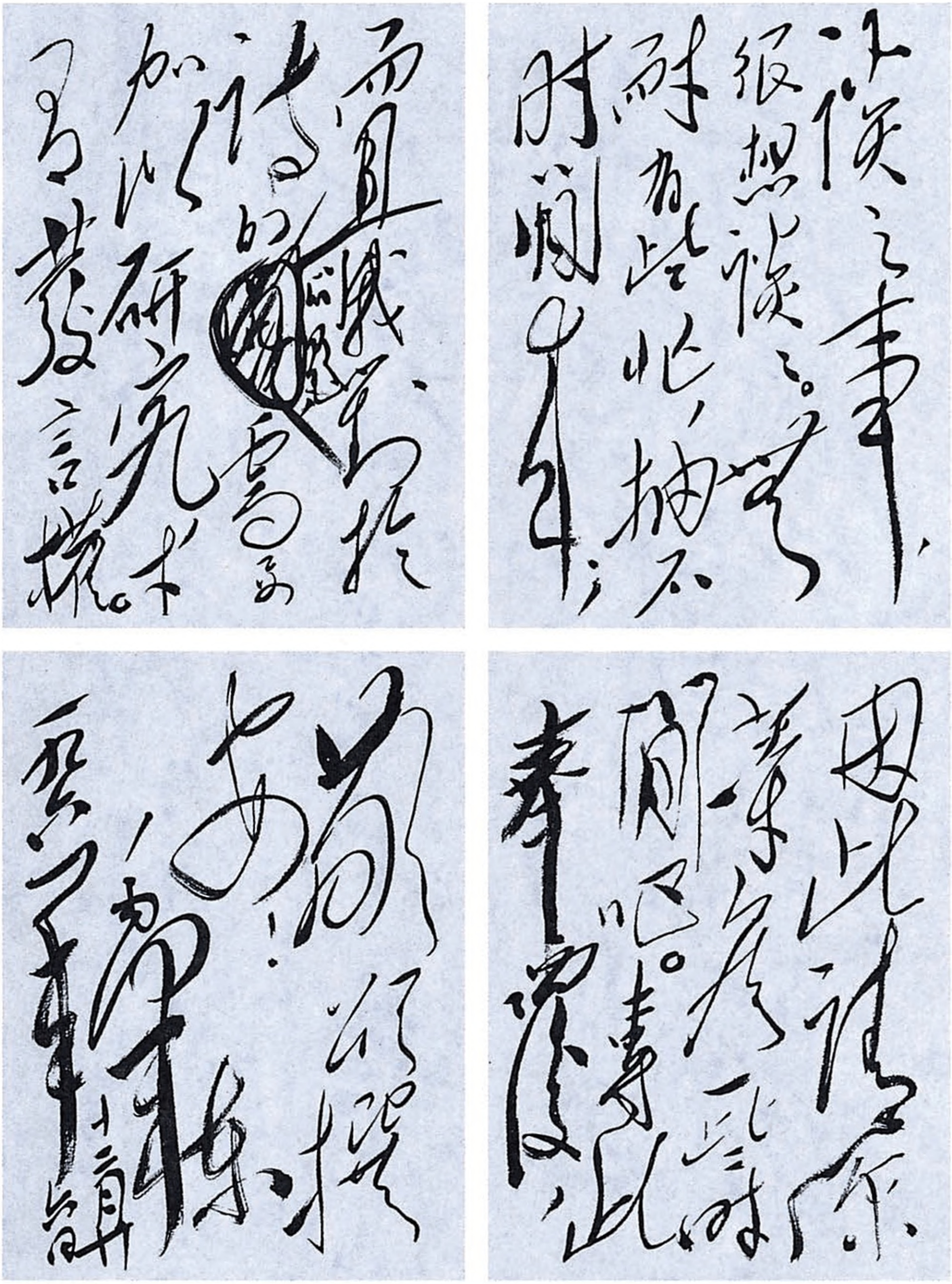
---

[1] 臧克家，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克家同志：
[illegible]录[illegible]书、
均已收到，甚
为感谢。
[illegible]

毛泽东致臧克家信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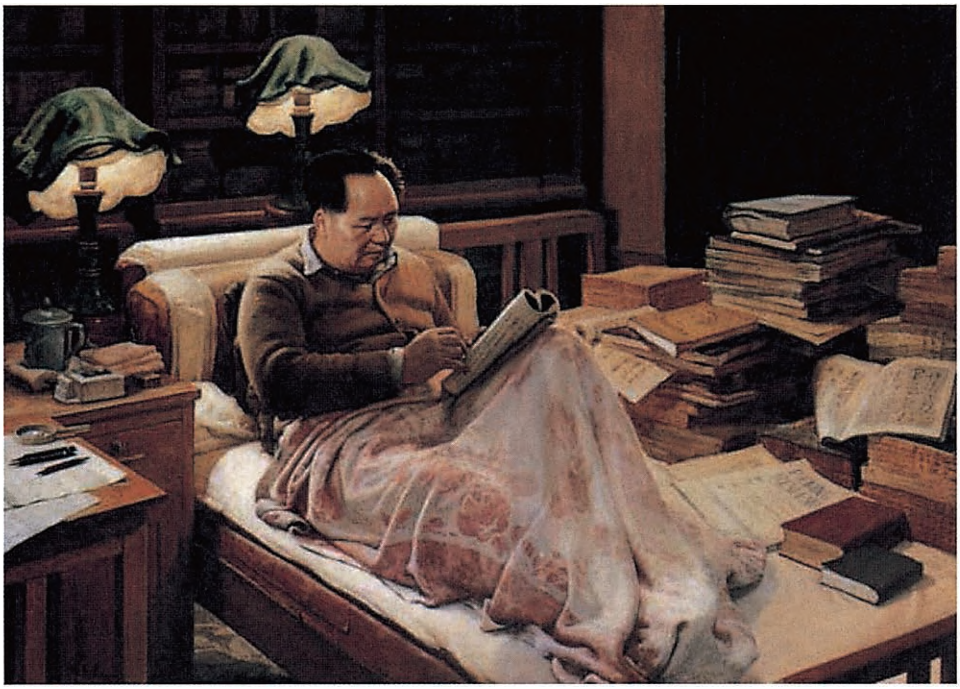


误读之事，很想谈谈。但时有些忙，抽不时间，等；而且我对于诗的学习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illegible]。专此奉复，顺祝撰安！

毛泽东

[illegible]一年[illegible]月十二日

毛泽东致臧克家信的手稿。



《艰苦奋斗，求索真理》（油画）

印发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的批语

（1961年12月27日）

尚昆同志：

此件[1]请即办。可以印发到会[2]各同志。在发之前，请问一下联络部，此件是否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共同商量过。[3]如未，应和他们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通知稿。通知稿说，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5日作出三项反共裁决，确认麦卡伦法和史密斯法党员条款符合美国宪法，美国政府有权勒令美国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进行登记，有权逮捕和监禁任何共产党人，从而实际上宣布美共为非法。美国政府现已确定在明年2月1日对美共进行审讯。这是美国统治集团加紧实行法西斯化的严重步骤。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明年1月10日左右发表党的声明，并从明年1月中旬起，以半月左右时间，开展一个支持美共反迫害斗争的宣传运动，以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支持美国的革命力量。通知稿中还明确规定了开展这一宣传运动的几项措施、宣传内容和注意事项。这一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于1961年12月21日报送中央。12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通知。

[2] 指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3]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一科1961年12月27日注明：“主席批示的问题已问过中联部，此件陆定一同志已与在京的美共同志商量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好好商量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七日

1961年1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委内瑞拉加拉加斯市议会代表团。

卜算子·咏梅

（1961年12月）

读陆游[1]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

[1]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爱国诗人。他生在封建统治阶级向外来侵略势力委曲求和的时代，爱国抱负不为时用，晚年退居家乡。他在《咏梅》词中表现出孤芳自赏、凄凉抑郁的调子。本词用陆游原调原题，但情调完全相反，所以说“反其意而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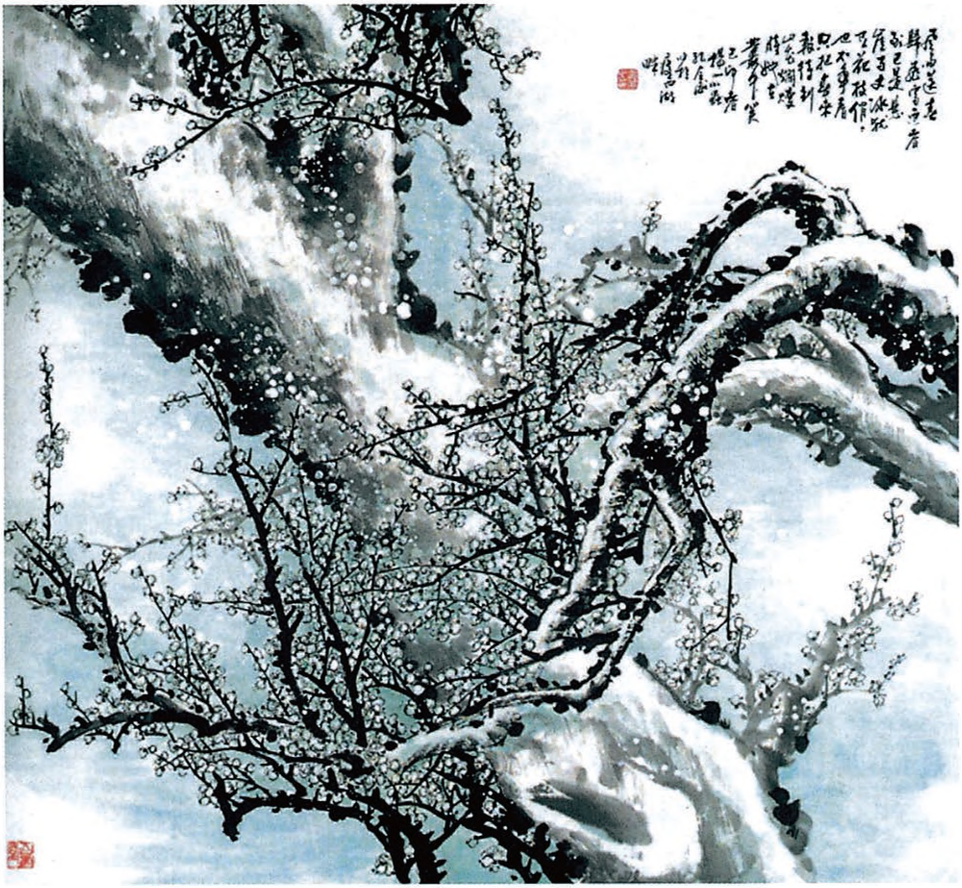
附：陆游原词

卜算子·咏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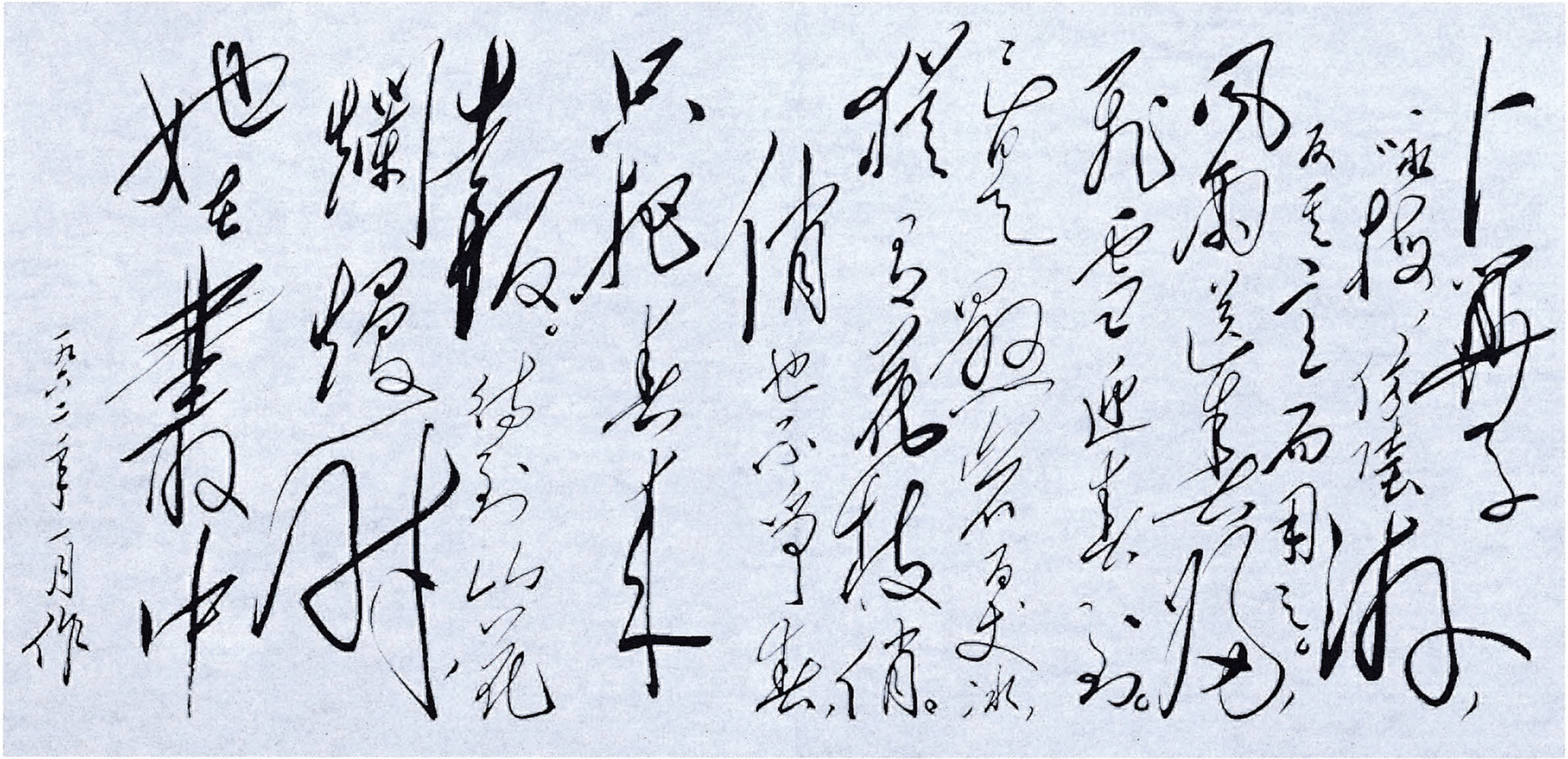
驿外[1]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

[1] 驿外，指驿站附近。古代官办的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住宿和换马的处所，称驿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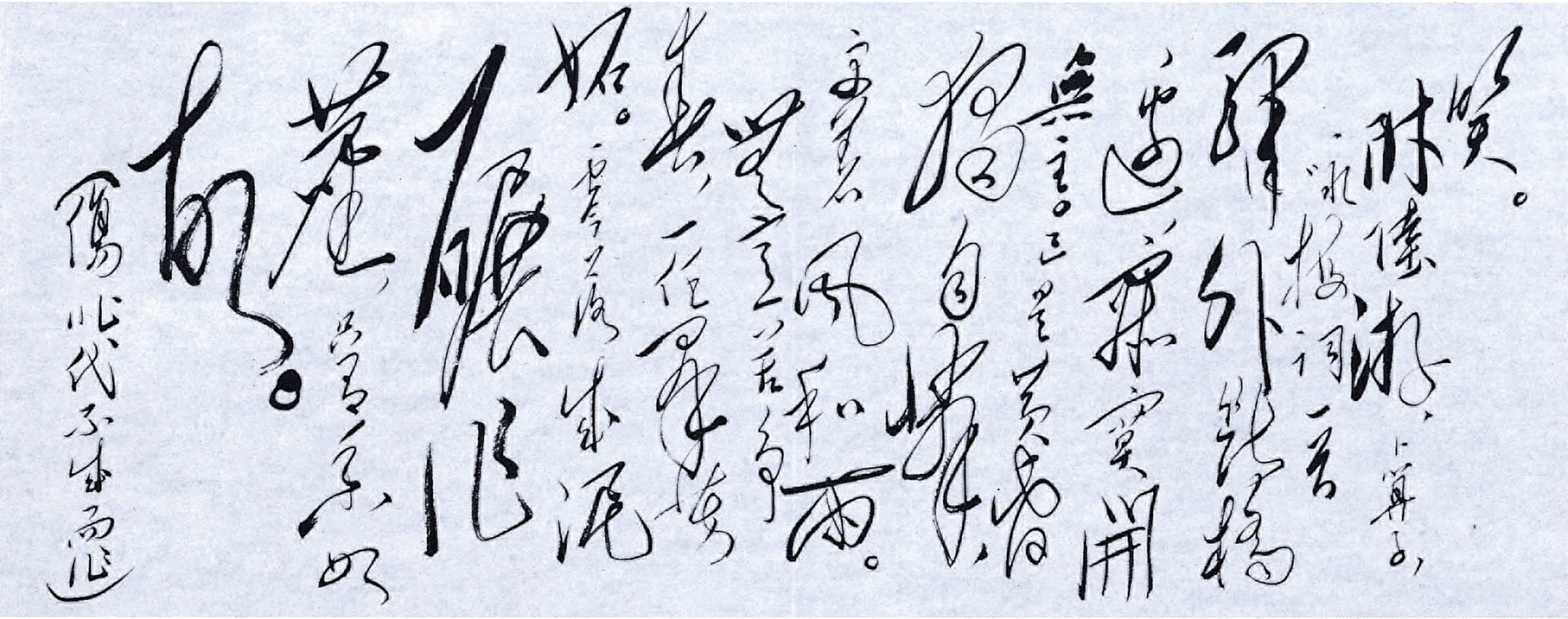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己卯春

《风雨送春归》（诗意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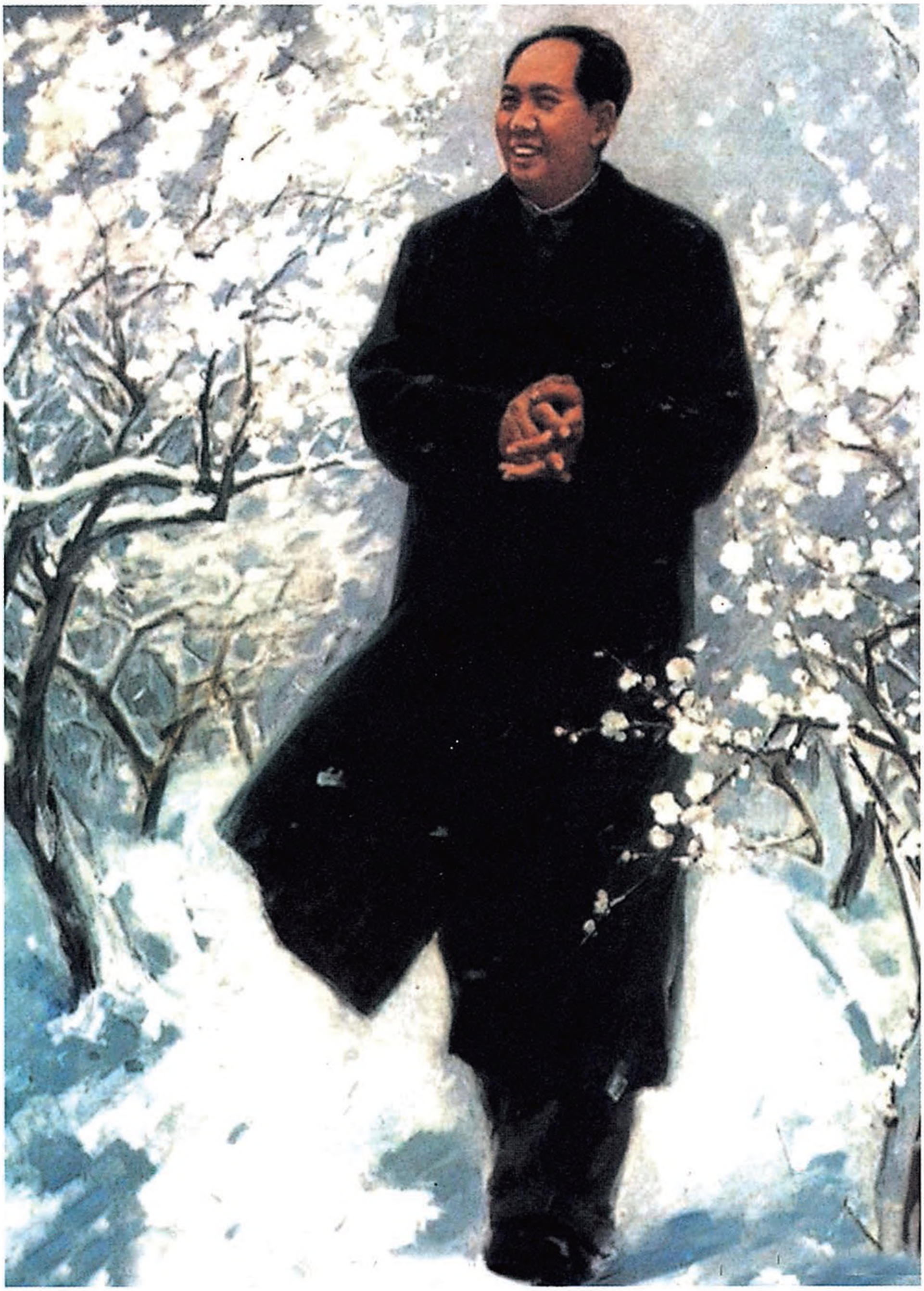
卜算子
咏梅，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一九六二年一月作

毛泽东手书《卜算子·咏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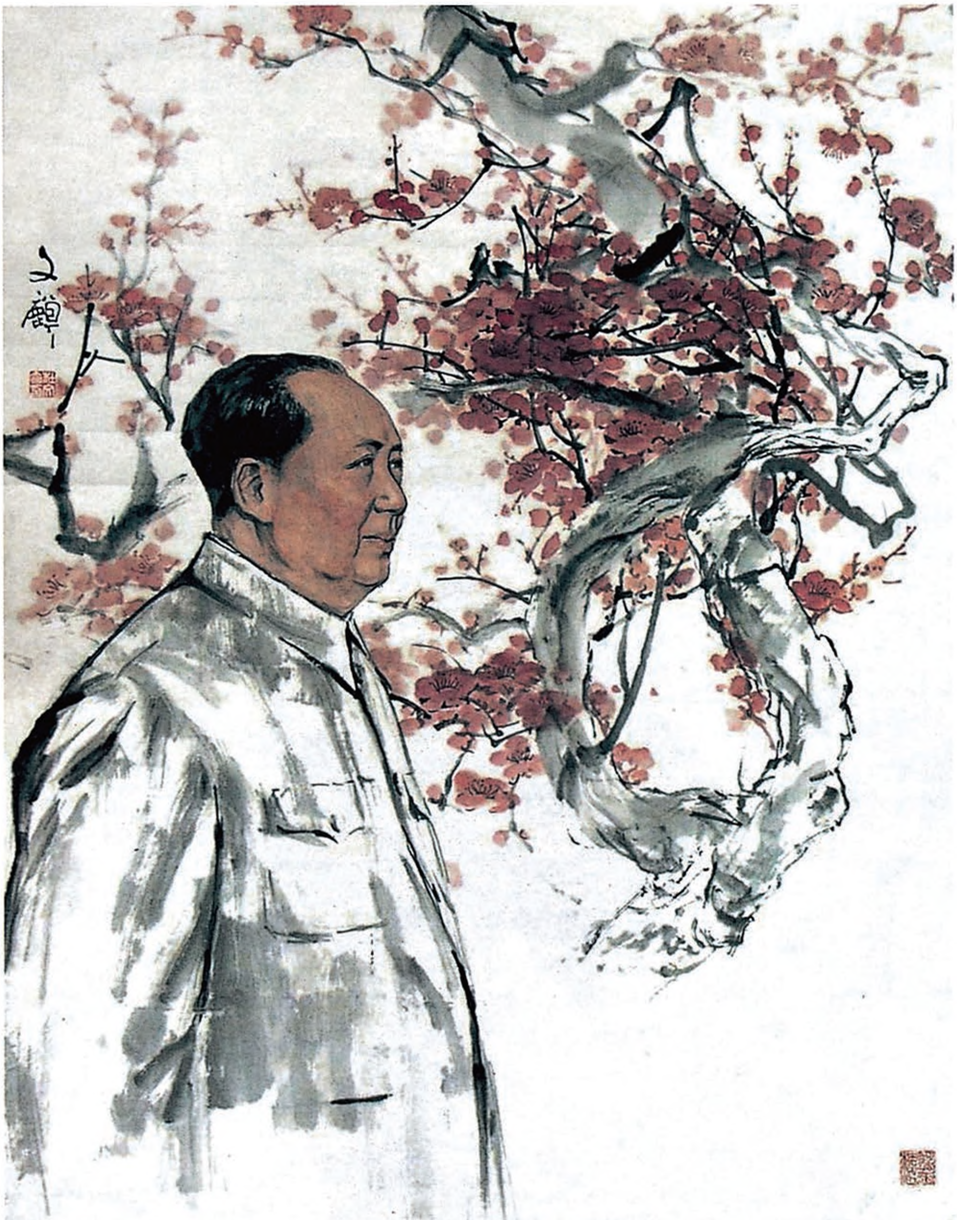


贤。陆游，卜算子，咏梅词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此代不甚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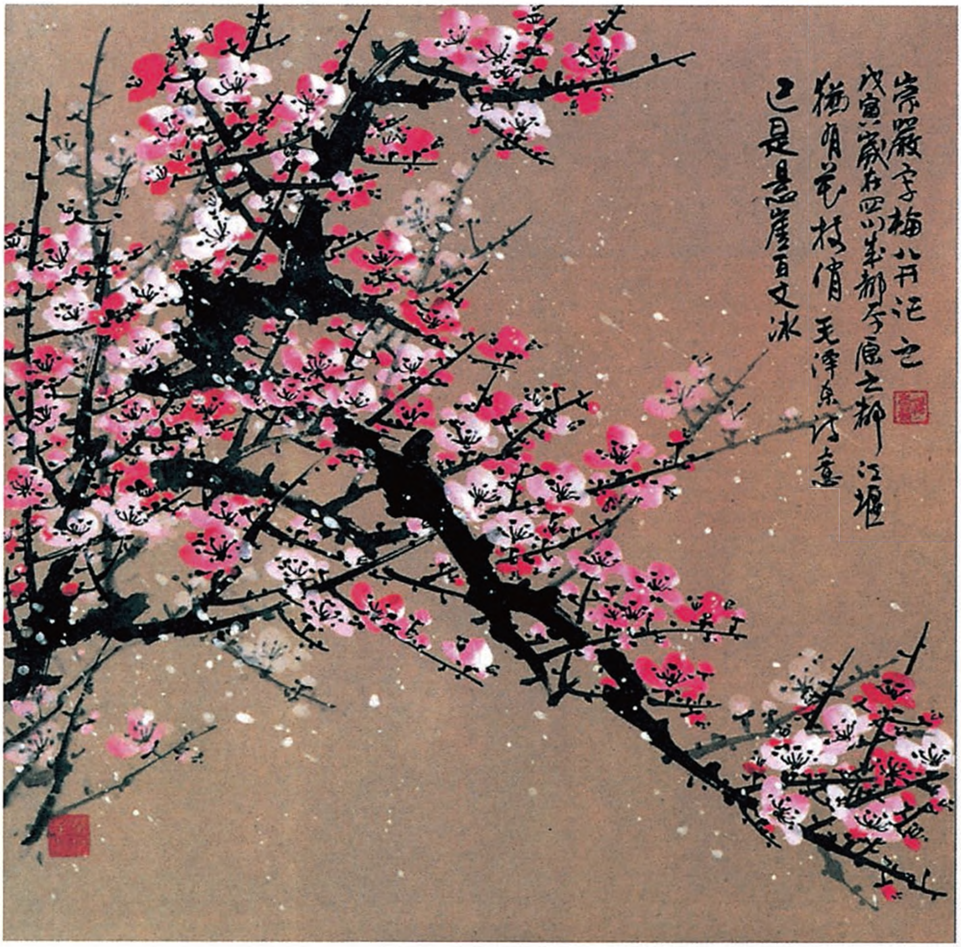
毛泽东手书陆游词《卜算子·咏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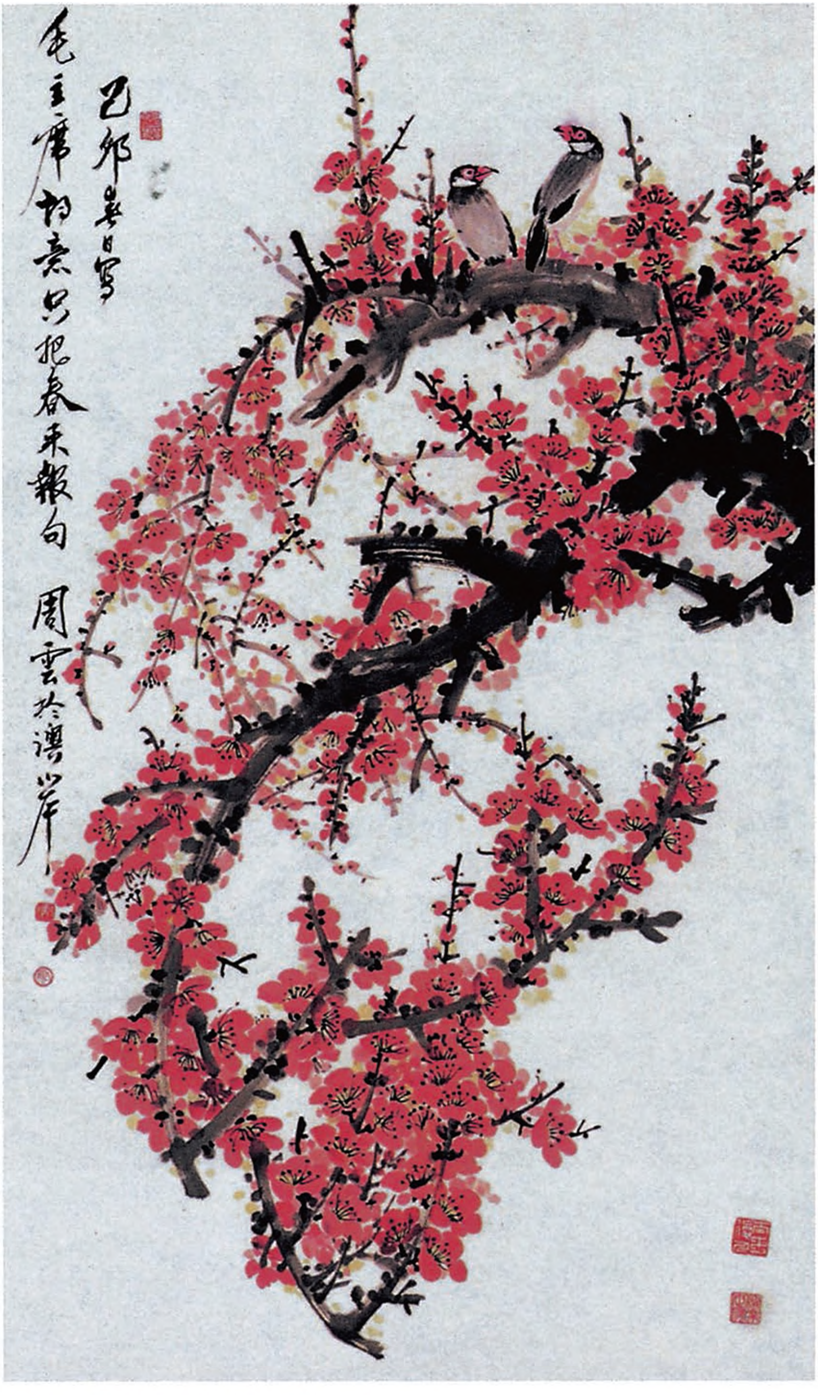
《飞雪迎春》（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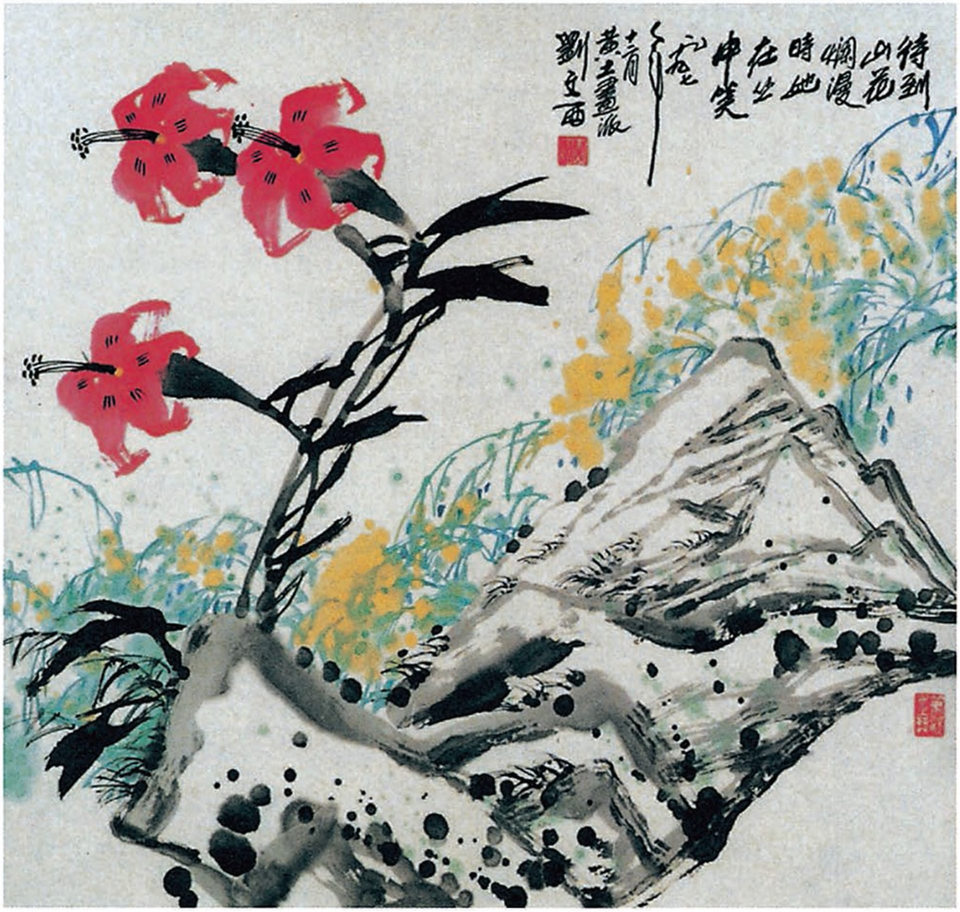
《迎春》（中国画）


崇嚴寫梅八开记之
戊寅歲在四川某都子居之柳江堰
猶有花枝俏 毛澤東詩意
已是悬崖百丈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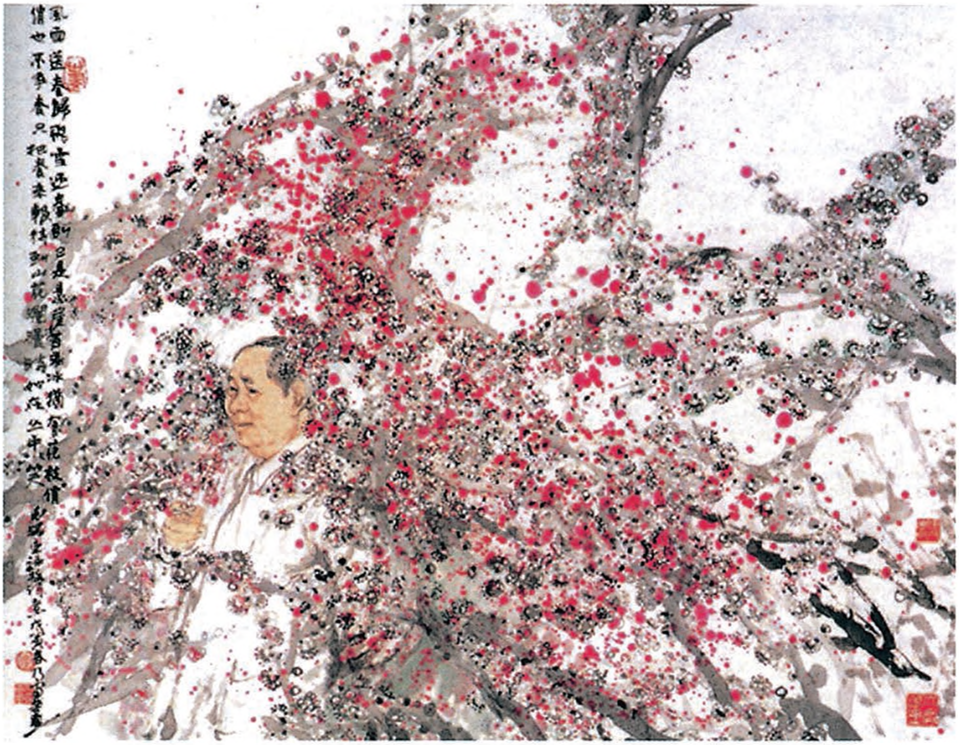
《犹有花枝俏》（诗意画）


己卯春日寫
毛主席詞意只把春来報句
周雲於潭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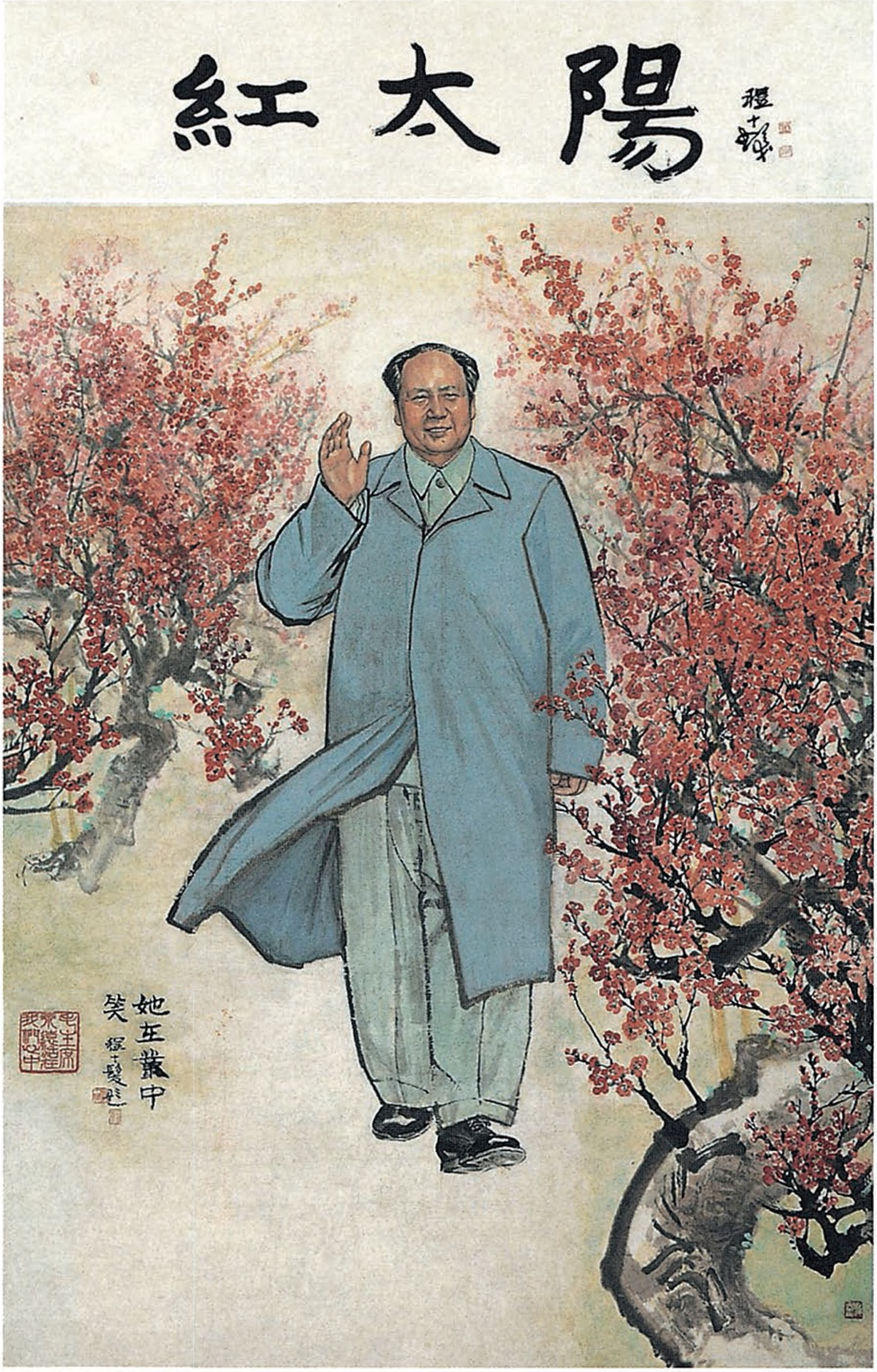
《只把春来报》（诗意画）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黄土畫派
劉文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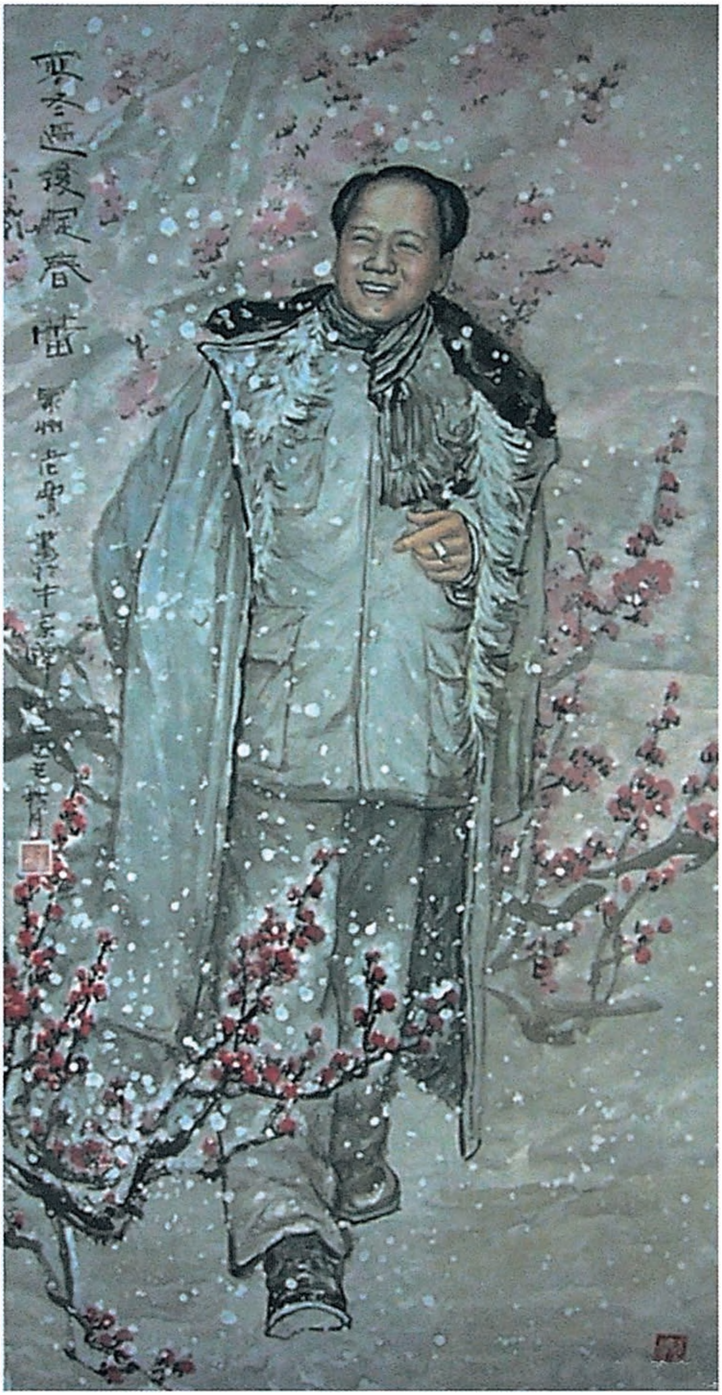
《待到山花烂漫时》（诗意画）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她在丛中笑》（诗意画）


紅太陽
程十髮
她在叢中笑
程十髮

《红太阳——她在丛中笑》（中国画）



《寒冬过后绽春蕾》（中国画）

印发《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几首诗[1]的批语

（1961年12月29日）

一

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2]。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

---

[1] 指《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8日第四版上登载的几首诗：一、著名教育家吴研因的《赏菊》：“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枝竞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红老紫百千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题诗句待重温。”二、全国人大代表钱昌照的七律二首。第一首是《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第二首是《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

[2] 指参加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二

徐业夫[1]同志：

请即印这几首诗发给各同志。

毛泽东
廿九日上午

1961年，毛泽东和江青在一起。

---

[1] 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给刘松林[1]的信

（1961年12月29日）

女儿：

信已收到，很高兴。我身体尚好，勿念。你要注意休养。希望你写点日记。

祝好！

父亲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

[1] 刘松林，原名刘思齐，1949年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此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科研部任俄文翻译。

毛泽东等给苏联领导人的新年贺电

（1961年12月31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1962年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一年来，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比兴奋，并祝贺兄弟的苏联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在建设共产主义和捍卫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大国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是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事业的根本保证。不断巩固和加强这种团结，在目前尤其具有重大意义。久经考验的我们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团结，

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而不懈地努力。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祝你们身体健康，并祝全体苏联人民新年快乐。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1年12月31日

对一篇关于人道主义文章的摘报[1]的批语

（1961年12月）

为哪一些阶级的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范围是全世界呢？还只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数的工人、贫苦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呢？还是以“全民”为幌子，进行欺骗，实则只是为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呢？

---

[1] 新华通讯社1961年12月2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十七期《每日要闻》栏目中登载的一条消息说：波兰《文化评论》刊登哲学家兼政论家沙夫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表现了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本质和内容”，它的目的是“发展个人和为个人的幸福创造条件”等。沙夫认为“人道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精华，而个人幸福的主张则是人道主义的精华”，并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规定为三个“辩证关系”，即“爱与恨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由和对自由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民主和专政之间的辩证关系”。

七律·答友人[1]

（1961年）

九嶷山[2]上白云飞，
帝子[3]乘风下翠微[4]。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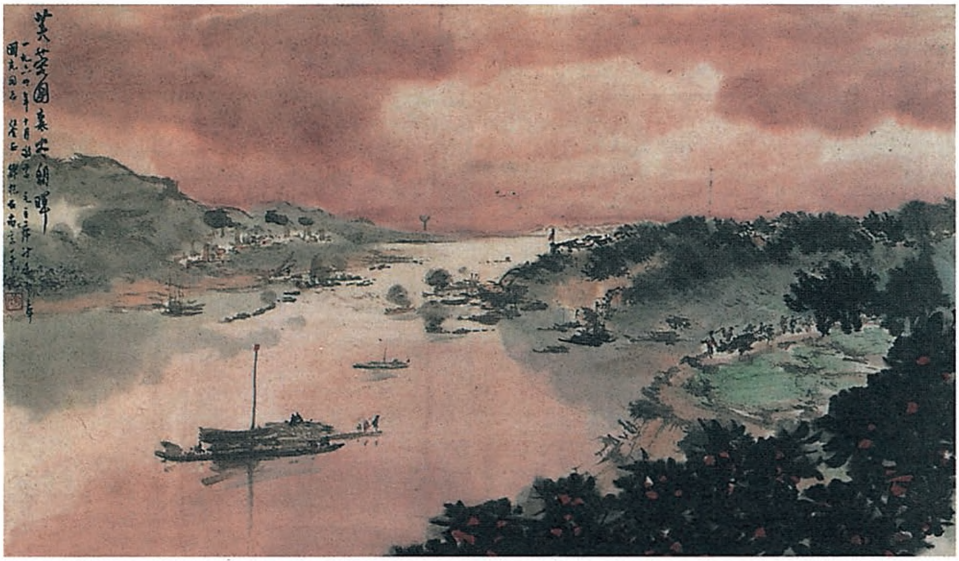
[1] 这首诗写毛泽东对湖南的怀念和祝愿。友人即周世钊。本诗毛泽东手迹原题为“答周世钊同学”，后改为“答友人”。周世钊（1897—1976），湖南宁乡人，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曾加入新民学会。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解放后与毛泽东信件来往颇多，并有诗词唱和。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的信中，在引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开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岳麓山联语）以后说：“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可以跟本诗印证。

[2] 九嶷山，又名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宁远县城南60里。古代传说：尧帝有二女，名娥皇、女英，同嫁舜帝。舜南游死于苍梧，即葬其地。二妃寻舜至湘江，悼念不已，泪滴竹上而成斑点，称为湘妃竹。所以下文有“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句。

[3] 帝子，即指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

[4] 翠微，轻淡青葱的山色，指“未及山顶”的高处（参见《尔雅·释山》疏）。

洞庭[1]波涌连天雪[2]，
长岛[3]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4]
芙蓉国[5]里尽朝晖。



《芙蓉国里尽朝晖》（诗意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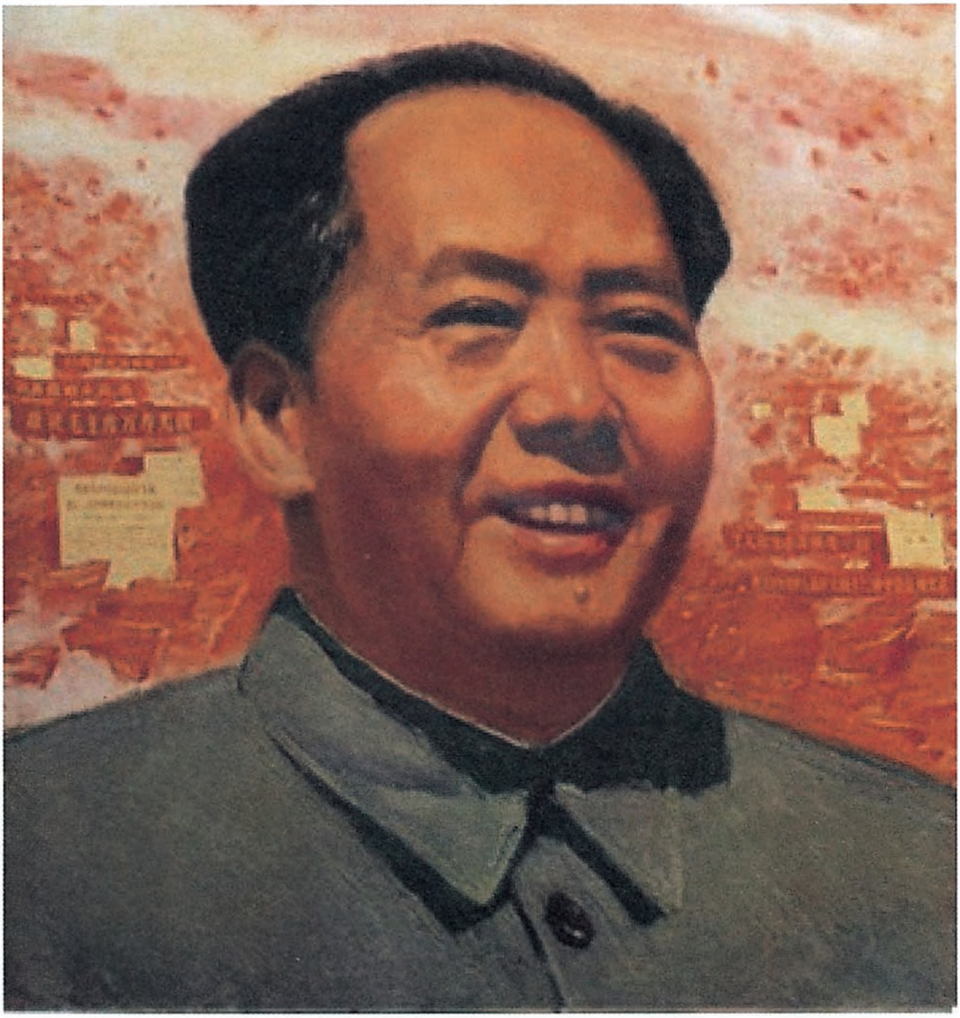
[1] 洞庭，洞庭湖，在湖南省北部。

[2] 雪，形容白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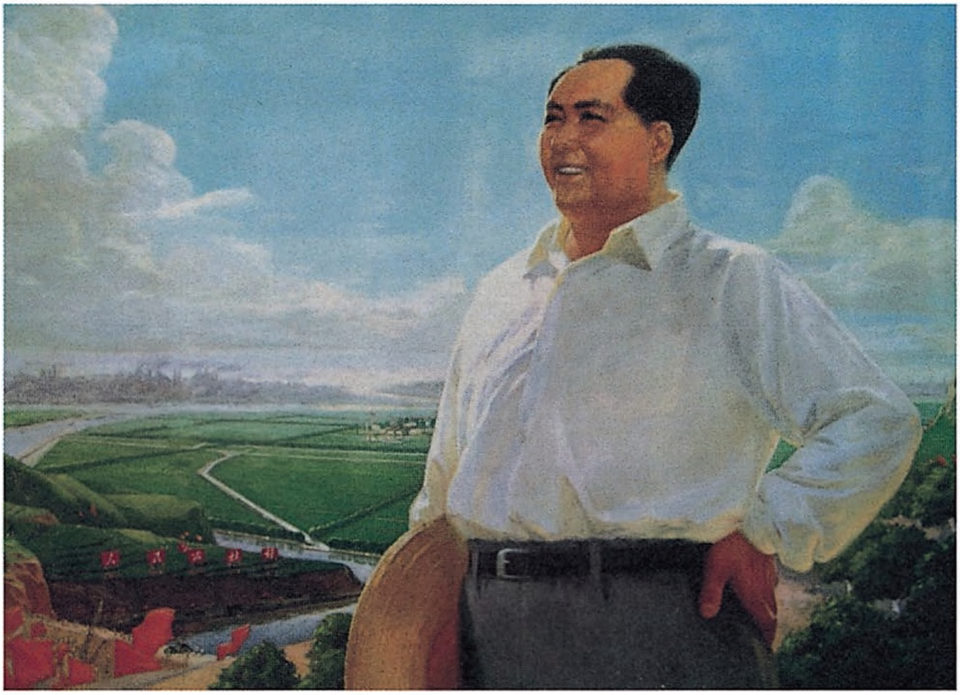
[3] 长岛，长沙橘子洲（见《沁园春·长沙》注），代指长沙。

[4] 我欲因之梦寥廓，化用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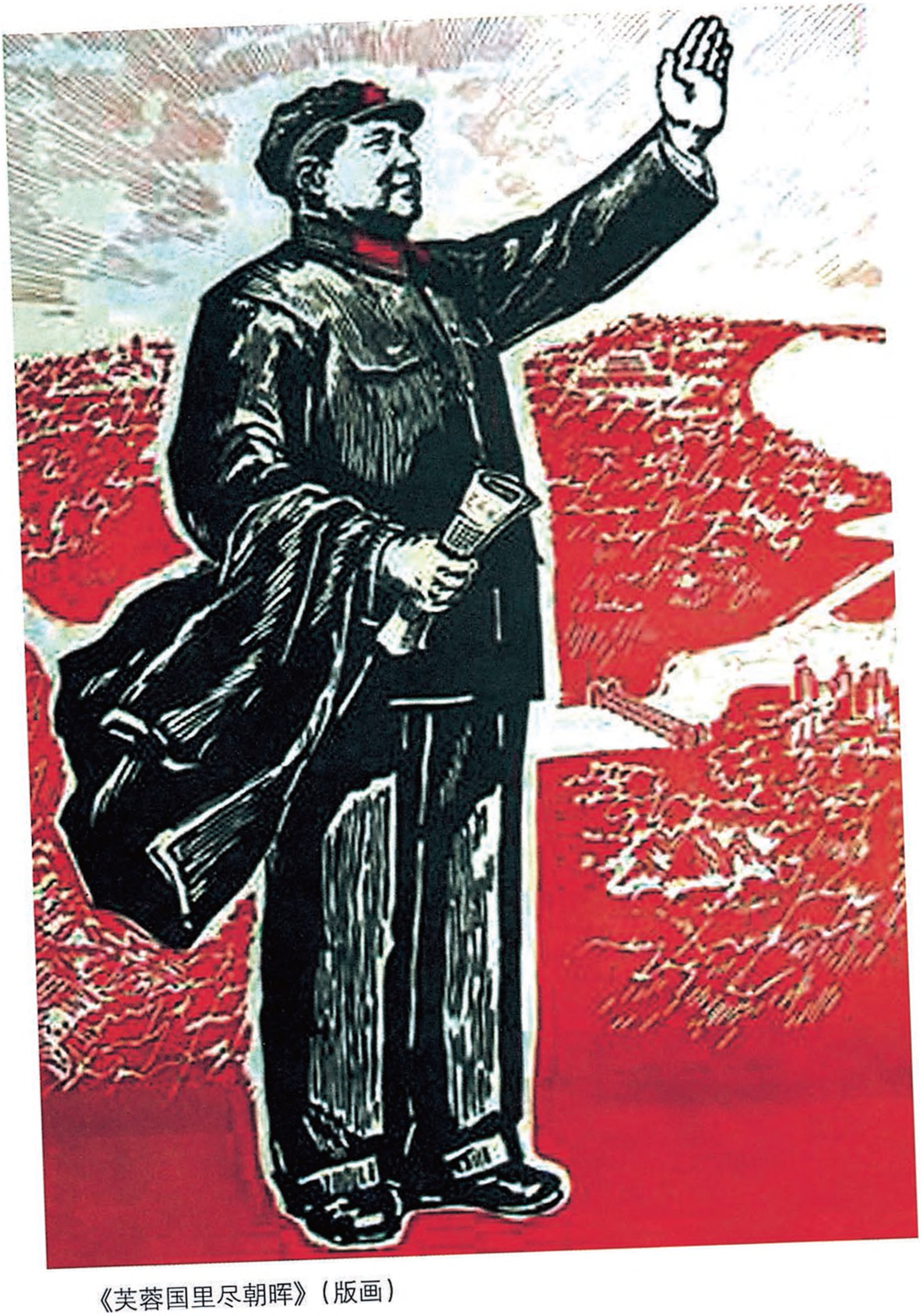
[5] 芙蓉国，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芙蓉国是说芙蓉花到处盛开的地方，这里指湖南省。



《芙蓉国里尽朝晖》（油画）



《芙蓉国里尽朝晖》（油画）



《芙蓉国里尽朝晖》（版画）

七绝两首·纪念鲁迅[1]八十寿辰

（1961年）

其一

博大胆识铁石坚，
刀光剑影任翔旋。
龙华喋血不眠夜，[2]
犹制小诗赋管弦。[3]

---

[1]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2] 龙华喋血不眠夜，指1931年2月7日深夜，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龙华秘密杀害包括“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白莽、冯铿在内的革命青年共23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说：“在一个深夜里……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几句：惯于长夜过春时……”喋血，血流遍地。

[3] 犹制小诗，指鲁迅作《七律·无题》诗：“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赋管弦，指配上音乐。

其二

鉴湖越台名士乡，[1]
忧忡为国痛断肠。
剑南歌接秋风吟，[2]
一例氤氲入诗囊。[3]

---

[1] 鉴湖越台名士乡，鉴湖，在浙江省绍兴市城西南两公里。附近有山阴（今绍兴）人陆游吟诗处的快阁。清末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亦是山阴人，自号鉴湖女侠。越台，即越王台，春秋时越王勾践在会稽（今绍兴）为招贤纳士而建。本句是说，鲁迅的故乡绍兴是古今名人荟萃之地。

[2] 剑南歌接秋风吟，剑南歌，指陆游的诗集《剑南诗稿》所收诗作。秋风吟，指秋瑾作的《秋风曲》诗和被清政府杀害前书写的唯一供词“秋风秋雨愁煞人”。接秋风吟，与秋风吟一起。

[3] 一例氤氲入诗囊，一例，意即一律，一样。氤氲，形容烟或云气很盛，这里比喻陆游、秋瑾与鲁迅的诗篇富有诗味和爱国热忱。诗囊，装诗稿的袋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称，李贺“背一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

七律·改鲁迅诗[1]

（1961年）

曾惊秋肃临天下，[2]
竟遣春温上舌端。[3]
尘海苍茫沉百感，[4]
金风萧瑟走高官。[5]
喜攀飞翼[6]通身暖，
苦坠空云[7]半截寒。
悚听自吹皆圣绩，
起看敌焰正阑干[8]。

---

[1]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诗即《亥年残秋偶作》。

[2] 秋肃，秋天草木凋零的肃杀凄凉景象。临天下，降临天下。

[3] 春温，春天的温暖。上，这里是流露的意思。舌端，指语言。

[4] 尘海，尘世如海，指广大的人世间。苍茫，旷远迷茫。沉，浸沉、沉没。百感，各种各样的感慨。沉百感，无数感慨，沉埋心底。

[5] 金风，秋风。我国古代以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解释季节的变化。秋天属金，故秋风称金风。走，跑的意思。高官，大官。走高官，为“高官走”的倒装。

[6] 飞翼，飞鸟。

[7] 空云，空中云端。

[8] 阑干，横斜的样子。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4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5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2

（1962年1月3日）

给黄炎培的信……………………………………………………………8

（1962年1月6日）

给巴西总统古拉特的信…………………………………………………9

（1962年1月7日）

给李讷的信 ……………………………………………………………11

（1962年1月9日）

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 …12

（1962年1月10日、24日，2月23日）

给毛岸青的信 …………………………………………………………18

（1962年1月12日）

给康生的信 ……………………………………………………………20

（1962年1月12日）

对《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的批语 ………………………21

（1962年1月12日）

对《毛泽东军事文选》外文版一条注文的批语 ……………………23

（1962年1月22日）

四言诗·开“出气会”……………………………………………………24

（1962年1月29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5
（1962年1月30日）
对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 ……………………………………………………………55
（1962年2月11日）
对邓小平报送的中联部三个文件的批语……………………………59
（1962年2月23日）
对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61
（1962年2月24日）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 ……………62
（1962年2月至4月）
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的修改 ……………………………………………………………68
（1962年2月）
对一个工人关于物价上涨的来信的批语 ……………………………69
（1962年3月4日）
对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71
（1962年3月20日）
对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 …………74
（1962年3月21日）
给邓小平等的信 ………………………………………………………75
（1962年3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捷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77
（1962年3月26日）
祝贺野坂参三七十寿辰的电报 ………………………………………79
（1962年3月28日）

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 ……………………………………………………81
（1962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 …………………………………85
（1962年4月3日）
对中央转发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87
（1962年4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五十寿辰的电报 ……………………………………89
（1962年4月14日）
关于研究苏联《教师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批语 ……………………91
（1962年4月16日）
关于修改六首词给陈白尘的信 ………………………………………………92
（1962年4月24日）
给臧克家的信 …………………………………………………………………93
（1962年4月24日、27日）
《词六首》序一……………………………………………………………………95
（1962年4月）
《词六首》序二……………………………………………………………………96
（1962年4月27日）
关于赛福鼎是否回新疆工作问题的批语 …………………………………98
（1962年4月27日）
在一篇谈中苏分歧及西方对策的文章上的批注 ……………………99
（1962年4月）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103
（1962年5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112
（1962年5月8日）

代拟的给陈宗娥的信……114

（1962年5月12日）

关于不参加苏联东欧七国领导人会议的批语……115

（1962年5月15日）

对中央转发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116

（1962年5月24日）

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的修改……118

（1962年5月）

给邵华的信……121

（1962年6月3日）

应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123

（1962年6月8日）

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的修改和批语……124

（1962年6月11日、12日、18日）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126

（1962年6月19日）

给彭真的信……133

（1962年6月22日）

在陶铸报送两个文件的信上的批语……134

（1962年6月27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电报……136

（1962年7月10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一周年的电报……138

（1962年7月10日）

给张人惕、张人价的信……140
（1962年7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八周年的电报……142
（1962年7月21日）
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的批语……144
（1962年7月22日）
对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批语……148
（1962年7月23日、8月24日）
对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一篇文章摘要的批语……150
（1962年7月25日）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51
（1962年7月31日）
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批语……153
（1962年7月31日、8月24日）
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155
（1962年8月）
在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上的批语……157
（1962年8月2日）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情况报道的批语……159
（1962年8月2日）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一篇通讯稿的批语……161
（1962年8月2日）
对《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的批语……162
（1962年8月2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63
（1962年8月6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168
（1962年8月9日）
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176
（1962年8月10日）
在中央组织部七月份综合报告上的批语………………………177
（1962年8月12日）
对邓子恢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178
（1962年8月12日）
对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要点的批语………………………………181
（1962年8月13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183
（1962年8月14日）
对公安部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的对策报告草稿的批语…185
（1962年8月15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电报……………186
（1962年8月15日）
对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的批语…188
（1962年8月16日）
对胡开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报告的批语………189
（1962年8月16日）
对李先念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的批语……………191
（1962年8月17日）
对中央军委工作报告的批语……………………………………192
（1962年8月18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193
（1962年8月22日）

对邓子恢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的批语…195
（1962年8月26日、29日）
对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的批语……………198
（1962年8月27日）
对巨任吾给毛泽东、刘少奇来信的批语……………………………199
（1962年8月29日）
对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稿的批语…………………………201
（1962年8月31日、9月14日、10月7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203
（1962年9月1日）
对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的信的批语……205
（1962年9月4日）
对谷城、光化、襄阳三县旱灾情况报告的批语 ……………………207
（1962年9月8日）
对陶鲁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要点的批语………………………209
（1962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八周年的电报……………211
（1962年9月8日）
关于改善生产队经营管理问题的批语………………………………213
（1962年9月8日、25日）
书赠毛岸青、邵华联…………………………………………………216
（1962年9月17日）
对冶金部关于解决品种质量问题的报告的批语……………………218
（1962年9月14日）
给杨尚奎的信…………………………………………………………220
（1962年9月14日）

对《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的批语……………221
（1962年9月15日）
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222
（1962年9月18日）
对《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的批语…………………………223
（1962年9月24日）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224
（1962年9月24日上午）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对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235
（1962年9月24日）
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236
（1962年9月26日）
对《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的批语………………………………240
（1962年9月29日）
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241
（1962年9月29日）
对李先念关于改进商业工作问题的来信的批语…………………244
（1962年9月30日）
对西南组讨论商业问题决定的情况简报的批语…………………246
（1962年9月）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247
（1962年9月）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248
（1962年9月）
关于电台的指示……………………………………………………250
（1962年10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254
（1962年10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电报…………………256
（1962年10月6日）
对《恐“敌”病一例》的批语……………………………………………………258
（1962年10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国庆的电报……………………………………259
（1962年10月31日）
对罗瑞卿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的批语…261
（1962年11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周年的电报…………………263
（1962年11月6日）
给杨开智的信 ……………………………………………………………………265
（1962年11月1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日和解放日的电报……………………267
（1962年11月27日）
在一份外交信稿上的批语………………………………………………………271
（1962年11月27日）
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的批语…273
（1962年12月14日）
对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批材料的批语………………274
（1962年12月22日）
关于请刘晓等来杭州一谈给刘少奇等的信 ……………………………276
（1962年12月25日）
《冬云》诗一首和给林克的信 ……………………………………………277
（1962年12月26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280
（1962年12月29日）
对《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的批语…………282
（1962年12月30日）
对《文艺报》刊载的三篇文章的批语…………283
（1962年12月3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的电报…………284
（1962年12月31日）
毛泽东等向苏联领导人祝贺新年的电报…………288
（1962年12月31日）
批评新华社…………290
（1962年）
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名…………291
（1962年）
为邱桂荣题词…………293
（1962年）
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295
（1962年）
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299
（1963年1月3日）
给李讷的信…………300
（1963年1月4日、15日）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303
（1963年1月6日）
在中组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306
（1963年1月8日）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307
（1963年1月9日）
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311
（1963年1月12日）
对《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社论稿的批语…313
（1963年1月25日）
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稿的批语和修改……315
（1963年2月）
对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323
（1963年2月15日）
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的插话……325
（1963年2月19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331
（1963年2月20日）
和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332
（1963年2月23日）
为学习雷锋题词……335
（1963年3月5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批语和修改……339
（1963年3月5日）
不得人心，武器再强也不免失败……341
（1963年3月22日）
给周世钊的信……343
（1963年3月24日）

在张干来信摘报上的批语……346
（1963年3月24日）
给戴毓本的信……347
（1963年3月28日）
给张维的信……348
（1963年3月31日）
对《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的批注和修改……350
（1963年3月）
为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的标题……353
（1963年3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356
（1963年4月3日）
给毛岸青的信……358
（1963年4月5日）
关于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稿的批语……359
（1963年4月9日、20日）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361
（1963年4月12日）
关于刘晓工作安排问题的批语……362
（1963年4月20日）
为《学理论》杂志题词……363
（1963年4月）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365
（1963年4月、5月、6月）
把海军工作做好……371
（1963年5月2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372
（1963年5月4日）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上的批语……377
（1963年5月8日）
对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的批语……379
（1963年5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383
（1963年5月8日）
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385
（1963年5月9日）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388
（1963年5月10日）
我们不靠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391
（1963年5月22日）
给黄炎培的信……394
（1963年5月26日）
给周世钊的信……395
（1963年5月26日）
给张干的信……396
（1963年5月26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修改…400
（1963年5月）
对印发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稿的修改……407

（1963年5月）
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08
（1963年5月）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412
（1963年5月）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414
（1963年5月）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421
（1963年至1965年）
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计划调整和执行情况报告（草稿）的批语…426
（1963年6月26日）
关于发表中共中央声明的批语…………………………………………430
（1963年6月30日）
为中国美术馆题名………………………………………………………431
（1963年6月）
对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普遍发到农村支部的请示的批语………………………………………432
（1963年7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二周年的电报………………………433
（1963年7月10日）
对《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团结的社论稿的修改………………………435
（1963年7月）
对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稿的修改………………………………………436
（1963年7月）
对《人民日报》为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写的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439
（1963年7月19日）

关于赦免在押国民党军将领等问题……444
（1963年7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的电报……447
（1963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电报……450
（1963年7月25日）
接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452
（1963年7月26日）
关于在党内传达中苏两党会谈记录的批语……459
（1963年7月28日）
对一篇评中苏分歧的文章的批语……460
（1963年7月31日）
杂言诗·八连颂……461
（1963年8月1日）
关于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的批语……468
（1963年8月7日、8日）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470
（1963年8月8日）
接见非洲朋友时的谈话……473
（1963年8月8日）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476
（1963年8月9日）
对谭震林关于全国水旱灾害情况报告的批语……481
（1963年8月9日）
关于印经典著作大字本的批语……482
（1963年8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483
（1963年8月14日）
在《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上的批语……………………485
（1963年8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486
（1963年8月22日）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488
（1963年8月29日）
关于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的批语……………………………………491
（1963年8月29日）
悼念杜波依斯逝世的电报……………………………………493
（1963年8月29日）
关于越南南方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494
（1963年8月30日）
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499
（1963年8月、9月）

1962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1]

（1962年1月3日）

感谢日本朋友，感谢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一切朋友，因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处于同样的地位。美帝国主义欺侮日本人，欺侮中国人，可以说，全世界大多数人民都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侮。就我们两国和附近一些国家来讲，我们的台湾受到美国控制，第七舰队就在那里；你们日本的许多军事基地是在美国控制之下的，美国在日本有军港，有空军基地，甚至海军陆战队也有基地；南朝鲜是美国控制，南越是美国控制，老挝是美国控制，泰国也是美国控制。此外，就连英国、法国也都受美国欺侮。

人民不信任美国的走狗。一切美国走狗都没有好下场。拉丁美洲有许多美国走狗，但是，人民都不信任他们。例如，大家都知道古巴的巴蒂斯塔[2]，人民不信任他，把他赶走了。南朝鲜的情况也很值得研究，人民不信任李承晚，美国把他换掉，现在又换了朴正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谈话的主要内容。

[2] 巴蒂斯塔（1901—1973），古巴前总统。执政期间实行独裁统治，引起国内人民的反抗和武装起义。1959年他的独裁统治被推翻。

熙[1]。朴正熙这些人对美国也不满，南朝鲜的七十万军队控制在美国手里，现在朴正熙等人争取到十几万军队脱离美国控制而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被迫做了这样一个让步。美国控制得厉害，军权在美国手中，他们也不高兴。在台湾，美国想扶植蒋介石的反对派，以胡适为首，被蒋介石打下去了。蒋介石把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美国军事顾问团不能到团以下去，只能在上面活动。蒋介石不让美国陆军在台湾登陆，他对美国说，你们来第七舰队、来空军就够了，我有陆军，你们还派陆军来做什么？在南越，吴庭艳[2]也恐慌，只许美国派军事顾问团，不许派军队。蒋介石和吴庭艳是经常互相联络的，蒋介石告诉吴庭艳说，万万不能让美国陆军进入你们的国家，来了军队你就没有命了。泰国的沙立[3]也不让美国驻军。泰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国家，美国要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泰国不让。他们同美国之间还是有矛盾。因为他们沾上了美国的边，就臭了，人民就不信任了。美国看到人民不信任李承晚这些人了，就把他们换掉，情况就是这样。

西德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同日本相似，但是西德人民没有日本人民这样的反美、反帝、争取民主和平的强大潮流。西德垄断资本想勾结美国又想抗拒美国，这点同日本相像。我们把这些地方都称

---

[1] 朴正熙（1917—1979），1961年7月出任南朝鲜即韩国国家复兴最高委员会主席。1962年3月起，先后任南朝鲜即韩国代总统、总统。

[2] 吴庭艳（1901—1963），原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3] 沙立（1908—1963），泰国前武装部队最高司令。1958年发动政变后上台，实行军事独裁统治。1959年2月任总理。还担任“反渗透特别委员会”及“国家安全和剿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

做中间地带。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以外，都算中间地带。但是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如英、法、比、荷等国；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中间地带国家各式各样，各不相同，但美国统统想把它们吞下去。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压迫者、剥削者、欺侮者。美国在中国、在日本、在各国的忠实走狗和美国一起，是矛盾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日子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日本的松村谦三[1]、石桥湛山[2]、高碕达之助[3]等人，他们不大喜欢美国，同池田等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

[1] 松村谦三（1883—1971），日本前自由民主党顾问、众议员。1959年以后5次访问中国。中日恢复邦交前，他是日中贸易日方总联系人。1962年9月访华时同中国缔结日中综合贸易协定。1964年继高碕达之助负责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宜。

[2] 石桥湛山（1884—1973），日本前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20世纪60年代初期多次任日中经济贸易展览协力会会长。1972年12月当选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顾问。1959年、1963年两次访问中国。

[3] 高碕达之助（1885—1964），日本自由民主党人，前众议员、参议员。20世纪60年代初期任日本内阁通商产业大臣、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积极促进中日贸易。1962年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同廖承志签订发展日中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

1962年1月，毛泽东接见日本友好人士安井郁夫妇。

法帝国主义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来讲不是同盟者，而是敌对者，是压在阿尔及利亚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它有六十万军队在进行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战争。对非洲来说，英国、法国、比利时、葡萄牙不是朋友。可以利用的一点是，它们同美国有矛盾。英、法在非洲和亚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在那些形式上独立的国家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者来代替旧殖民主义者。比如美国想取得阿尔及利亚，因为阿尔及利亚南部撒哈拉沙漠地带有很大的石油矿。法国正在那里开发，它的石油资本家集团同美国石油大王有矛盾。

你问古巴革命的性质，我认为，古巴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是

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巴蒂斯塔集团、买办资本、封建主义的斗争。今后它走哪个方向还得看。它反帝、反封建是肯定的、坚决的。那里没有强大的民族资本，只有小型的民族工商业。这种情况就像当年日本统治下的中国东北一样。过去日本垄断资本在中国的东北不扶植中国民族资本，只建立为日本大工业加工的几十人、几百人的小工厂，所以日本人走后东北就没有像上海、天津、北京那样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阶级。法国在越南也是如此。日本在朝鲜也是这样，不让朝鲜人自己搞自己的工业，而由日本人自己搞了一些。中国东北的鞍钢也是日本人自己搞的。恐怕非洲也是这样，帝国主义不让本地人办大工业。比如在几内亚，只有几个大工厂，都是外国人办的。

很高兴看到日本人民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反对垄断资本压迫的斗争。日本人民反美日“安全条约”[1]和反政治暴力行动法[2]的斗争，一个浪潮接着一个浪潮地发展，真令人高兴。祝日本人民的斗争在一九六二年有进一步的发展。我有一个直接的感觉，从一九五〇年开始，我差不多每年都见着日本朋友，感到日本朋友近几年的精神面貌同一九五七年以前有很大改变。在头几年，从你们脸

---

[1] 日美“安全条约”是1951年9月8日日本和美国在旧金山缔结和约的同时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条约以维持日本“安全”为由，规定美国有权在日本驻扎军队和建立军事基地。1960年1月，日美修改了该条约，重新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2] 指《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1961年6月，日本池田政府为了进一步实施《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提出了《防止政治性暴力行为法案》。该法案于6月2日在日本众院法务委员会强行通过后，3日和6日，各有400万人在全国展开统一行动，反对这一法案。在人民强大压力下，池田政府于7日放弃在国会会议中强行通过这一法案的计划。

上看到有忧愁、有困惑，斗争的气概受压抑，不敢表现出来；以后，特别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以来，情况不同了，日本人民起来了，不怕美国了。美国压在你们头上，过去你们谨慎小心，近几年你们同它斗起来了。到中国来的日本朋友精神面貌的变化，反映了日本人民斗争情绪的增长和实际斗争的发展。

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这个鬼了，不怕池田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面向廖承志[1]）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

[1]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1949年至1959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给黄炎培[1]的信

（1962年1月6日）

任之先生：

一月五日惠书收读，甚为感谢！出去调查一番，必有益处。天寒，尚望注意珍摄。

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给巴西总统古拉特的信

（1962年1月7日）

巴西合众国总统若奥·贝尔希奥·古拉特先生阁下

亲爱的总统先生：

以罗伯托·莫雷那[1]先生为首的巴西工会代表团在我国访问以后，即将回国。我趁他们回国之便，请他们带这封信给你，向你表示新年的良好的祝愿。

我至今十分愉快地回想起去年八月你访问中国期间我们所进行的友好谈话。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在谈话中一再强调巴西人民维护民族独立的决心。在你离开中国以后不久，巴西人民掀起了一场保卫巴西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巴西内政的斗争。中国人民十分关切地注视这场斗争，并且热烈地祝贺巴西人民所取得的胜利。

在你就任巴西总统以后，你不止一次地重申，巴西的外交政策是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并且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外交政策首先对于制止美帝国主义对古巴的干涉和侵略，保证拉丁美洲各国的独立发展，并且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的外交政策，也肯定地有利于促进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有利于维护世界和

---

[1] 罗伯托·莫雷那，当时是巴西瓜纳巴拉州木器工会的领导人。

平。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完全支持巴西的这种外交政策，并且将像过去一样，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和巴西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不懈的努力。

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崇高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于北京

给李纳[1]的信

（1962年1月9日）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

[1]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

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2年1月10日、24日，2月23日）

一

田家英[3]同志，告少奇、小平、伯达同志：

---

[1] 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是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书面报告。报告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形势和任务；第二部分是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第三部分是党的问题。这个报告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他的机要秘书徐业夫1962年1月9日报送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月9日修改稿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徐业夫的信中说："这个报告，今天又作了修改。少奇同志指示，把这个报告在今天晚上送给主席一阅。这个报告的第三部分，再过几个小时就送来。请主席看这个修改稿。"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1962年1月23日报送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修改稿第一部分的通知上写的批语。本篇三、四、五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修改稿第一部分的修改。本篇六是毛泽东在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月15日修改本上写的批语。本篇七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月15日修改本第14页上一段话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此两部分[1]已经看过一遍，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还没有看。其他一百多同志，可能也是这样。因此建议：推迟三天做报告。在此三天内（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扩大工作会议的同志们，先分组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那个问题及别的问题（例如总理[2]报告的二十二大[3]问题）。请考虑一下是否适当？

毛泽东
一月十日上午十时

二

即送田家英同志：

在第一章中有几处[4]作了一些修改。

毛泽东
一月廿四日

用后退毛。

---

[1] 指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修改稿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2] 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3] 指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4] 见本篇三、四、五。

三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只有革命人民坚决地进行斗争，才能够推倒他们，而使人民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四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尼赫鲁[1]之类的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演出一次新的反华大合唱。这个反华大合唱，很不得人心，很少听众，任凭他们怎样使劲地唱，归根到底，也不可能唱出什么大的名堂来。即是说，他们不可能阻止马列主义在世界上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革命在世界上推广和发展，他们不可能阻止社会主义在中国和各国的发展。

五

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逐步发展的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例如说，几十年的时间，不可能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六

少奇同志：

二月十七日的信及两个文件[1]，均已看过，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三日

人大会期，照恩来提议，以移至三月二十日报到，看两天文件，然后开大会一天，随即开座谈会。开一次生动活泼的大会极为必要。

毛泽东又白

七

大家记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的两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尖锐地指出了人民公社工作中的“一平二调”、平均主义等错误。他又曾尖锐地指出，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

[1] 2月17日的信，不详。两个文件，指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报告和讲话，均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首都各界人士欢度春节。

1962年，毛泽东和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一起。

给毛岸青[1]的信

（1962年1月12日）

岸青儿：

寄来的信，收到，甚为高兴。你现在住院治疗，望遵医嘱，不要变方法治疗、休息。一切待今年上半年机会成熟时，就会解决的。我好，时有点小毛病，一下子就过去了，忽〈勿〉以为念。

祝好！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

---

[1] 毛岸青，毛泽东的儿子。

1962年，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在一起。

给康生[1]的信

（1962年1月12日）

康生同志：

八日惠书收到，极高兴。请告郭沫若[2]同志，他的和诗[3]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近作咏梅词[4]一首，是反修正主义的，寄上请一阅。并请送沫若一阅。外附陆游咏梅词一首。末尾的说明是我作的，我想是这样的。究竟此词何年所作，主题是什么，尚有待于考证。我不过望文生义说几句罢了。

请代问郭老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

---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3] 指郭沫若1962年1月6日在广州作的七律：“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弭大灾。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哪怕妖精亿度来！”这是他读了毛泽东1961年11月17日作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后写的。

[4] 指毛泽东1961年12月作的《卜算子·咏梅》一词。

对《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的批语

（1962年1月12日）

江青：

此件[1]可以看一下，可以明白这个问题的历史情形。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1月10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上登载的《关于列宁“遗嘱”的一些材料》。材料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提出列宁“遗嘱”，攻击斯大林“过于粗暴”“乱用职权”，说列宁“及时地从斯大林的身上看出那些不良的品质”“提出过应该研究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的问题”。二十大后，公布了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记录。材料指出，所谓列宁“遗嘱”，就是指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封信当时没有发表，列宁是准备把它交给他死后召开的那次党代表大会的。列宁逝世后，1924年5月23日至31日，俄共召开了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申斥了托洛茨基在会前发表的“四十六人政纲”，也向各代表团宣读了列宁“遗嘱”。“遗嘱”说：“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

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经过讨论，代表大会一致主张要斯大林继续留在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岗位上，并决定不公布这个“遗嘱”。此后，反对派不断利用列宁“遗嘱”，作为攻击斯大林和俄共领导的武器，并且造成一种空气，似乎俄共中央隐瞒了列宁的“遗嘱”。对托洛茨基等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里有过驳斥和说明。他在1927年10月23日写的《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一文还引用了“遗嘱”中讲到“斯大林太粗暴……”的一整段话。1927年7月，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上提议，请求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撤销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把列宁患病时写的信件（包括“遗嘱”）在《列宁文集》中公布，十五大通过了这个提议。查《列宁文集》，里面没有收入列宁“遗嘱”。材料还就以下4个题目作了资料摘录：（一）俄共十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等问题的指示作出决议；（二）俄共十三大宣读了列宁“遗嘱”，决定不公布；（三）托洛茨基利用列宁“遗嘱”攻击斯大林；（四）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列宁“遗嘱”问题的论述。

对《毛泽东军事文选》外文版一条注文的批语[1]

（1962年1月22日）

照办。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2年1月10日给他的报告上。报告说：主席的军事文选，由编译局组织了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的翻译，现已基本译完，大约在3个月内可以分别出版。为了适合外国读者的需要，我们增加了一些注释。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建立游击根据地的条件之一是地区广大，在小国进行游击战争的可能性便很小甚至没有。鉴于这批外文本主要是在亚、非、拉美各国发行，那些地区的国家，有的已经有过胜利的游击战争，有的还在进行或者可能发生这种战争，所以我们准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加一条注释，说明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各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已经同我国抗日战争所需的条件不完全相同，国家幅员大小，已经不是游击战争能否最后胜利的决定性的条件。这条注文已请康生看过，现在请主席审阅。

四言诗·开“出气会”[1]

（1962年1月29日）

白天出气，
晚上看戏；
两干一稀，
大家满意。

---

[1] “出气会”，即七千人大会。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1月30日）

同志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意见。后来又由少奇同志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

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图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大会主席台上。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省委、地委、县委的同志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对同志，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

---

[1] 参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1962年，毛泽东、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接见参加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

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

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交谈。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

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党内党外都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

---

[1] 这段话引自毛泽东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

1962年2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全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大会主席台上。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

样的事情，我讲的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

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1962年，毛泽东、李先念、乌兰夫、李富春在会议期间交谈。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

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196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陈云在会议上交谈。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1]的时候那么厉

---

[1]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同志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一些作公安工作的同志，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

---

[1] 这四句话是1962年9月28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阅同意，加进了这四句话。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述毛泽东的错误时指出：“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

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要联合的是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例如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作家、艺术家、演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或者附属于资产阶级或者附属于无产阶级。对于知识分子，是不是只有革命的我们才去团结呢？不是的。只要他们爱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并且要让他们好好工作。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这些人，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下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人民的内部，要实行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要压迫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百分之五。这些人是我们要强迫改造的。他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我们站在哪一边？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占全人口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一边呢？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在国内是如此，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各国的人民，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总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人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

国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

来，要更强些。刘少奇同志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

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〇年让他来了。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干了十一年了吗？是干了十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〇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说，过了五十年我们就会壮大起来，而且会“侵略”人家，五十年内还不会。他的这种看法，一九六〇年他来中国的时候就对我说过。我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

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

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信苏联威廉斯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同志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下

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和后四年。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我们已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1]，工业企业七十条[2]，高等教育六十条[3]，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4]，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作条例[5]。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6]。我们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

---

[1]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60条。

[2] 指中共中央1961年9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70条。

[3] 指中共中央1961年9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

[4] 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1961年6月提出、中共中央7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

[5] 中共中央1961年6月19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40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1962年着手起草，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6] 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3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制定了一些条例[1]。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

---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1961年6月19日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11月17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军人委员会工作条例》。

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1]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同志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

---

[1] 八大二次会议，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也要看到，我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象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个问题，我只简单地讲几句。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

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人们会问：苏联被修正主义者统治了，还要学吗？我们学习的是苏联的好人好事，苏联党的好经验，苏联工人、农民和联系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好经验。至于苏联的坏人坏事，苏联的修正主义者，我们应当看作反面教员，从他们那里吸取教训。

我们永远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我们始终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起来。

国际修正主义者在不断地骂我们。我们的态度是：由他骂去。在必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回答。我们这个党是被人家骂惯了的。从前骂的不说，现在呢，在国外，帝国主义者骂我们，反动的民族主义者骂我们，各国反动派骂我们，修正主义者骂我们；在国内，蒋介石骂我们，地、富、反、坏、右骂我们。历来就是这么骂的，已经听惯了。我们是不是孤立的呢？我就不感觉孤立。我们在座的有七千多人，七千多人还孤立吗？（笑声）我们国家有六亿几千万人

民，我国人民是团结的，六亿几千万人还孤立吗？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已经或者将要同我们站到一起，我们会是孤立的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1]基础上和平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

---

[1] 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3年12月至1954年4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秀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1]，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

---

[1]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旋转，推翻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伽利略（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1632年发表《关于托勒玫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支持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动说，次年被罗马天主教法庭判罪。达尔文（1809—1882），英国生物学家。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

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1]，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

---

[1]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1947年7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同志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

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同志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同志，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同志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有些同志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

会顺利得多。（热烈鼓掌）

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对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62年2月11日）

一

田家英[2]同志，并请告小平[3]同志，刘、周[4]：

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5]。苏联现在四十三年[6]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二月十一日于上海

二

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短期内的事情，而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三十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

---

[1] 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的主要内容有：一、近3个月来，全国各地普遍地进行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的结果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完全符合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要求，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欢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在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已经势在必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很多好处。(1) 能够比较彻底地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2) 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有了很好的保障。(3) 更适合当前农民的觉悟程度。(4) 更有利于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二、在全国各地农村，绝大多数的人民公社，都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就整个农村来说，人民公社的体制，又不应当强求一律。现阶段大体上将会存在两种形式：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仍然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管确定哪一种形式，必须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办事。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一个长时期内，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问题应向广大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反复说明。三、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改变为生产队以后，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完整的集体经济组织，公社内部仍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队仍然是生产大队这一级经济组织的组成部分。生产大队仍然在全大队范围内，实行统一领导，它成为各生产队的联合经济组织，既执行经济方面的职权，还要在公社的领导下，执行行政方面的职权。四、基本核算单位下放以后，农业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将主要从生产队体现出来。比起过去，生产队在财务管理和分配方面的权力是扩大了，生产经营方面的权力也有扩大，因此，它的任务也就更重大。它既要正确地规划生产，又要统一核算收支；既要做好生产组织工作，又要做好财务工作；既要积极完成国家的农产品征购任务，又要切实安排好社员生活。五、调整基本核算单位，是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应妥善解决下列问题：(1) 规模；(2) 干部；(3) 土地；(4) 耕畜、农具；(5) 大队企业；(6) 林木；(7) 水利；(8) 债务。六、调整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工作，应当争取时间，立即动手，宜早不宜迟。中央要求各地，力争在春耕开始前后，把这项工作大体做完。在改变基

本核算单位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做细致的工作。要有准备，有步骤。先经过认真的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再分期分批，逐步推广。绝不能一哄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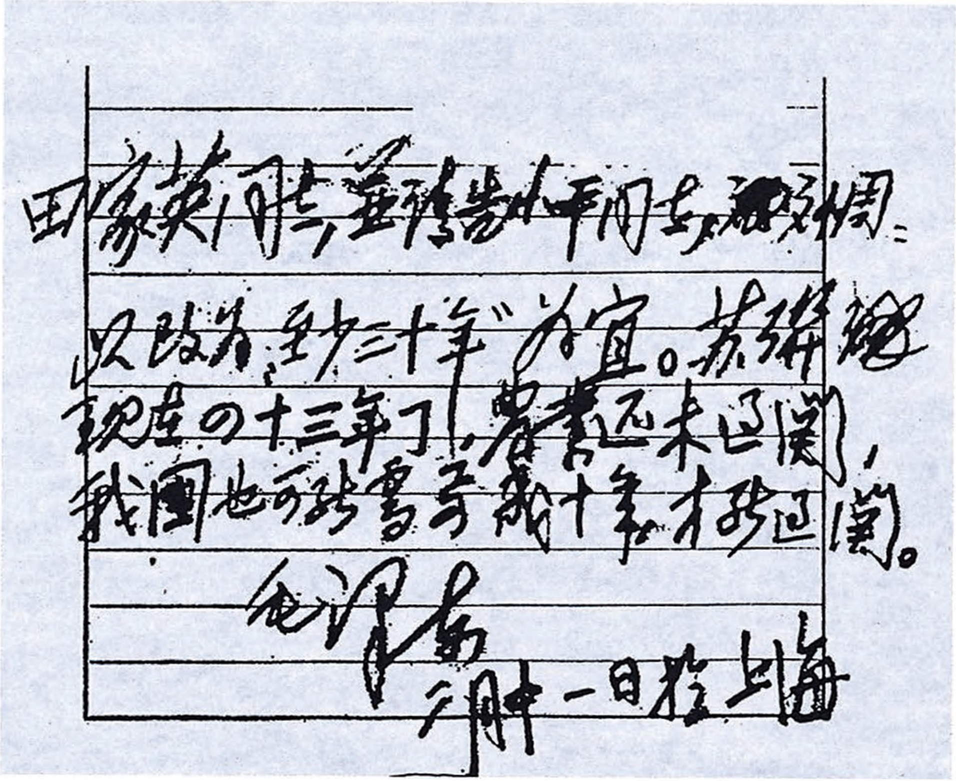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5] 田家英1962年2月8日向毛泽东报送的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田家英报送指示稿时写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邓小平“主张把下放后不变的时间写成二十年。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将指示稿中的“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见本篇二。

[6] 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算起，应为44年。



田家英同志，并转告小平同志及各同志：

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粮食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毛泽东

二月廿一日在上海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草案）时写的批语的手稿。

对邓小平[1]报送的中联部三个文件的批语[2]

（1962年2月23日）

一

小平同志：

此件[3]已看过。请你们先讨论一下，以初步意见告我。我还在考虑这个问题，还提不出意见。待三月中旬我到北京，同你们研究这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本篇一是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1962年2月14日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邓小平在王稼祥信上写的意见的批语。邓小平的意见是："主席：这个文件送你先看。我们还没有讨论，主要是目前由我们建议召集国际会议，是否适当的问题。最好能将你的意见先告诉我们。"

[3] 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3个文件和王稼祥为报送这3个文件给邓小平并报毛泽东、中央的信。这3个文件是：（一）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1962年2月14日关于起草给兄弟党的信和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问题向王稼祥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二）中共中央致兄弟党中央的复信稿；（三）中共中央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口信稿。刘宁一、伍修权的报告中提出，最近接到一些国家兄弟党的来信，其中有的建议召开兄弟党会议，我们考虑采取统一复信的办法，表示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既讨论苏联、阿尔巴尼亚关系问题，也讨论世界和平理事会以及其他问题。这样，不管兄弟党会议开得成开不成，我党都处于主动地位。

个问题。

毛泽东
二月廿三日

二

我在研究此点。

对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

（1962年2月24日）

邓小平同志：

全文看过，很好。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林彪、恩来、朱德三同志的讲话[2]，请紧催，速送来，看一下，以便早日印成一本，早日下达。

毛泽东又及

---

[1]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2年2月6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这篇讲话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

[2]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朱德在这次会议山东组会上的讲话。

对《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整理稿的批语[2]

（1962年2月至4月）

一

田家英[3]同志：

我看还是我的那个原始讲话好。请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机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讲话来，我和你每人有一本，两人对照一起修改，有两天就改好了。如有三份，可以叫林克[4]参加。如你身边有一份，就不要北京再送了。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五时

二

田家英同志：

改好了（初步地），请你看一遍，看还有什〔么〕错误没有。看

完后，即送江青看，然后还我。

毛泽东
廿六日上午四时半

三

田家英同志：

此件请印清样7份。最好今天印出交我。原稿还我。印时，校对清楚。

毛泽东
三月十日

四

田家英同志：

在第三页上加了一句[5]，请酌。

毛泽东
三月十四日下午二时二十分

五

照此付印，共印九份，分交刘、周、邓、彭、伯达[6]各一份，请他们看一遍（刘、周、邓，请他们看第二遍），提出修改意见。另交田家英、林克、江青、毛泽东各一份存阅。印后板〈版〉折〈拆〉掉，原稿毁掉。

毛泽东
三月廿日

六

少奇、小平同志：

此件已请陈伯达等几位同志[7]读了一篇〈遍〉，有些修改，我看过了，认为修改得好。现送上请审阅。如认为可用，请交尚昆[8]同志处理。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九时

---

[1] 这个讲话1962年2月至4月整理修改后，同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147号文件印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

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解放军总政治部。1966年2月3日，毛泽东将这个讲话送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阅读，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2月4日，王任重阅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对讲话文字方面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并说："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主席在讲话中所指出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这是当务之急，也是经过'四清'运动和领导干部蹲点之后，能够逐步做到的。"2月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写了给彭真的批语："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这个讲话经过修改后，又送毛泽东审阅。2月12日，毛泽东写了批语："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同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6〕103号文件将这个讲话印发全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学习。中央在印发这个讲话的通知中指出：讲话"着重讲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党的生活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学习这个文件，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纠正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各种不良倾向"。1978年7月1日，这个讲话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整理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写给田家英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整理稿的第一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整理稿的第三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整理稿的第五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五是毛泽东在这个讲话的第七次整理稿上写的批语。本篇六是毛泽东在陈伯达等修改的这个讲话整理稿上写的批语。

[3]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4]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5] 毛泽东在讲话整理稿第五次稿的第三页上“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这一段话后加写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一句。

[6]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7] 指陈伯达、胡绳、吴冷西、邓力群。

[8]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2年，毛泽东在上海。

对《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关于刘少奇同志报告的决议（草稿）》的修改[1]

（1962年2月）

一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充分地讨论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及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常委几个同志的讲话。参加这次会议的全体同志，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及这些讲话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对于过去四年工作中的伟大成绩和主要缺点、错误的估计，对于这四年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及这些讲话所提出的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和今后的奋斗目标。

二

会议一致认为，中央提出的加强集中统一、加强和恢复民主集中制、反对分散主义的方针，是很适时的，是完全正确的。

---

[1] 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对一个工人关于物价上涨的来信的批语[1]

（1962年3月4日）

先念[2]同志：

请你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可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如有结果，请告我。

毛泽东
三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2年2月23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三期上。这一期登载了上海市工人金祥根1962年2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最近物价不断提高，真使人坐卧不宁。我们工人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10多年来积蓄的一些钱，眼看着一天天地贬值，心里比刀割还难过，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不想再储蓄了。为此，我提出两项建议：（一）政府尽最大努力稳住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每月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

[2]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1962年3月，毛泽东和湖南调查组全体成员在武昌合影。

对林彪[1]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1962年3月20日）

一

田家英、罗瑞卿[2]二同志：

此件[3]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一）是否应当送给林彪同志再看一遍，请瑞卿酌定。我意要送他看。如送，请瑞卿办理。

（二）同时送少奇、恩来、小平[4]三同志看一遍，并征求他们的修改意见。如有修改，到北京最后酌定。如无，即交尚昆[5]办理，不要再送我看了。

（三）我在第一个问题部分，有一些小的修改[6]，请你们酌定。

（四）此件没有什么特殊秘密，可以和别的同志的讲话一同发给那些人看或者读给另一些人听。这个问题向高级中级干部保守秘密，不让他们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质准备，是极为有害的。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九时

二

落后的国家能够变为先进的国家，……只要一个国家变成团结的国家，只要这个国家有先进的领导，不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的时间就可以翻过来了。要超过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尽多一百多年，也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优胜于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才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水平，我们肯定在几十年内，至多在一百多年内，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它。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3] 指林彪1962年1月29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这个讲话谈两个问题：一、关于党的工作。林彪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而且情况已经在开始好转，今后必然会继续好转下去。造成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工作上的一些错误，使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减少了，但我们取得了经验。全党来了个大学习，使我们党员、干部的质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依靠和相信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我深深

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是他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反之，他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事情就要出毛病。二、关于军事工作。林彪说，首先是对于战争的看法，现在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修正主义者一方面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战争不能避免，那就要毁灭全球。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定要爆发的。只不过是大战还是小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可能；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参加的大战会不会发生，有两个可能，而小战就只有一个可能，一定要打。关于战争的前途，修正主义者认为战争要毁灭全人类；我们则认为战争的前途不是两个都消灭，而是一个消灭一个，我们胜利，敌人失败。我们对战争的方针，第一是不挑衅，不主动发动进攻；我们要争取和平，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第二是不搞单纯防御。就是说，我们不挑衅，你打来的时候，我打防御战；但是，我们不是打单纯防御的防御战，而是打进攻防御战，让你进到适当地点的时候，我们就向你进攻。先是你向我进攻，然后是我向你进攻。根据这种作战方针，我们就应该有一系列的措施，这种措施有军队应该做的，也有地方应该做的。现在主要讲军队本身应该怎样准备。庐山会议以后，军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主席思想为指导方针，处处按毛主席的意图、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来办事，向毛主席请示，向毛主席报告，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一我们的思想。

[4] 少奇，即刘少奇。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5]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6] 即本篇二，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整理稿的批语

（1962年3月21日）

恩来同志：

此件[1]由田家英[2]同志主持，有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3]及其他几位同志参加，集体读过两遍，作了一些小的修改。然后我又读了一遍，觉得很好。现送上，请酌定，即办。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一日

第八、第十两页中的问题[4]，请着重研究一下。

---

[1] 指1962年2月7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整理稿。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第8页中有一段叙述美国农业发展速度的情况，第10页中有一段对照美国来谈我国的煤炭、钢铁工业在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速度的问题。这两段文字经研究后，均已删去。

给邓小平[1]等的信

（1962年3月25日）

小平、尚昆、冷西[2]同志：

林克[3]下放，我这里缺少一个替我看国际资料的人，也没有人帮助我读英文了。因此，请你们替我从新华社国际部编辑及翻译同志们中，找一位适当的人。年龄不要太大，以25—28岁之间、又有过翻译英语新闻一段经验的为宜。又是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又性格较温和，说话不甚刺耳。英文程度，有中等水平即可。说明初来**只是试用**，如不行，仍回原职。他作林克的助手，林克回来，他就下放，他回来，林克再下放，如此循环下去。还有，要能保守机密。

此外，我这里的两位秘书，文化、政治水平都低，不能很好地替我**阅选**内部文件，更不能向我**提意见**，需要有一位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同志来帮助我。此人最好是在地方群众工作中有过实际经验的。如能找到，也要讲明**试用**，不行另换他人。至于“收发”性质的秘书，有一人够了，可以减去一人。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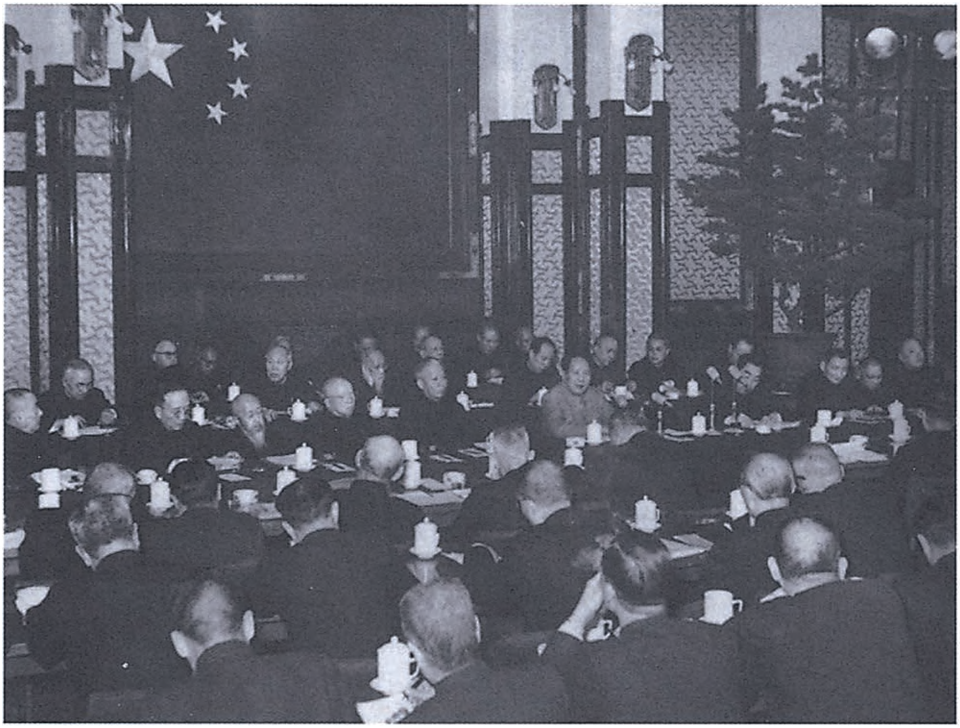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3]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以上两事，请你们费心一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五日



1962年3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等祝贺中捷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62年3月26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威廉·西罗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德涅克·费林格同志：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五年前，中捷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捷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重大的发展。这个条约的签订，不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而且对促进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今后还将继续起着积极作用。

中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珍视中捷两国的友谊和团结。在未来的岁

月中，我们将始终不渝地为巩固和加深中捷两国的友谊和团结而努力。

祝中捷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3月26日于北京

祝贺野坂参三[1]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2年3月28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野坂参三同志：

您是日本人民和日本共产党的久经考验的坚强不屈的战士，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的朋友。我以个人的名义，为您的光荣的七十寿辰，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在这个时候，您从远道来到了延安，同我们一起。您代表了日本人民的利益，代表了日本共产党人的意志，认为日本侵略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同时也是日本人民自己的敌人，认为日本军国主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您不断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黑暗统治的真象〈相〉，指出了日本人民应该走的道路。您当时所写的政论，教育了日本人民，也帮助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您回到自己的祖国，同日本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为团结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占领者，摆脱美帝国主义者加给日本民族的枷锁，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和持久的斗争。

---

[1] 野坂参三，当时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美帝国主义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反对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发展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加深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相信，坚决以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终归是要失败的。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不论还要经过多少曲折和困难，日本人民终归要赢得胜利，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爱国者坚持的正义事业终归要赢得胜利。

当您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为您祝福，同时也为日本人民祝福。

致以兄弟的敬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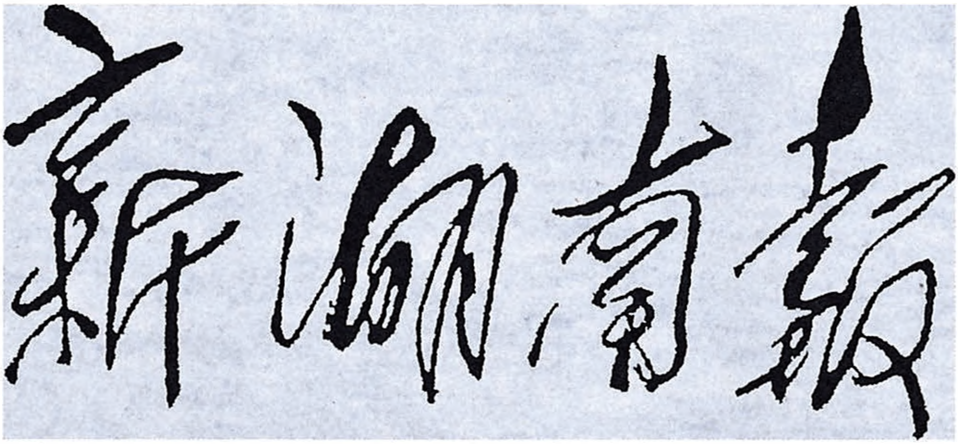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1962年3月28日

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1]

（1962年3月）

新湖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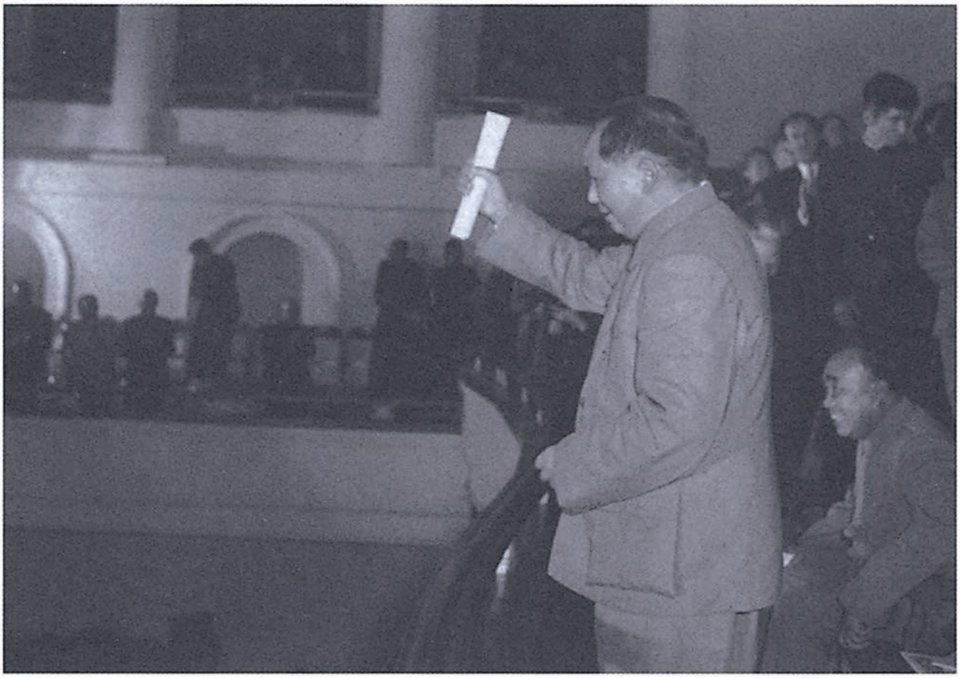
毛泽东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的报头。

---

[1]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新湖南报》题写报头，启用于1962年4月4日。

1962年3月，毛泽东、宋庆龄、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参加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

1962年3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阿沛·阿旺晋美。



1962年3月，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二楼向楼下代表致意。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4月3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一年来，兄弟的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为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忘我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真诚地祝匈牙利人民继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匈两国是社会主义兄弟之邦。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因此是永恒的和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同匈牙利人民一起，为加强中匈两国的团结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

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胜利而继续奋斗。

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4月3日

对中央转发财贸办公室关于财政信贷报告[1]的指示稿的批语

（1962 年 4 月 12 日）

即送总理[2]：

此件及附件、附表[3]，均已看过，认为很好，可即发出。

毛泽东

四月十二日

附件、附表留我处备再阅。

---

[1] 指中共中央1962年4月12日批转国务院财贸办公室3月25日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针的报告的指示稿。指示说，中央批准财贸办公室的这一报告，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平衡收支、消灭赤字的各项措施。请立即照此布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认为，当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比1962年2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时的估计，还要更大一些，这是当时所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全党必须下定决心，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包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紧缩企业、事业、行政费用和国防费用，增加某些高价商品，以便完全消灭赤字，真正达到收支平衡。按照这次批准的1962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今年我们可以用的钱只

有这么多。各地方、各部门必须按照中央批准的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迅速地落实到每个用钱单位，逐级负责，层层控制，只许减少，不许增加。报告对4年来的财政收支作了初步检查，揭开了4年财政收入有虚报、年年有赤字的实际情况，这于认识困难，总结经验，改进工作，很有好处。报告中提出资金分配的排列次序，先安排生产和流通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和信贷资金，再安排基本建设资金。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2]　总理，指周恩来。

[3]　附件，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3月25日关于1961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1962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分三大部分：一是1961年国家预算、信贷计划执行情况和4年来财政的简单回顾；二是1962年财政信贷指标的安排；三是执行1962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的几点意见。附表有3个：一是1962年国家预算收支指标调整表（草案）；二是1962年信贷收支计划表（草案）；三是1962年现金出纳计划表（草案）。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五十寿辰的电报

（1962年4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亲爱的金日成同志：

在你五十岁生日的时候，我们谨向你——朝鲜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热爱的朋友，致以真诚的、热烈的祝贺。

几十年来，你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献给了朝鲜的独立、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的实际。你领导着英雄的朝鲜人民，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坚定地捍卫着远东和世界的和平；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重大的努力。

作为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和亲密战友，你一贯为加强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而不遗余力。在中国人民困难的三十年代里，你亲自率领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女，用鲜血支援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朝鲜卫国战争的艰苦岁月中，你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我们两国人民热

情奋发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中，你又不断地为增进中、朝两国的友好团结和互助合作关系作出宝贵的贡献。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鲜血凝结起来的，中朝两党两国的团结像钢一样的坚固。中朝友谊与日俱增的发展，同你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人民以有你这样真诚的朋友而自豪，并且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衷心地祝你健康长寿。祝你在领导朝鲜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4月14日

关于研究苏联《教师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批语[1]

（1962年4月16日）

康生[2]同志：

请研究一下这篇文章[3]，是对还是错？以其结果告我。可找几个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1962年4月15日编印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〇一〇期的目录页上。这一期摘引了苏联《教师报》发表的《同志们，想一想这点！》一文。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3] 指苏联《教师报》发表的题为《同志们，想一想这点！》一文。文中说：苏联学校在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落后于实际生活的要求，培养了没有劳动训练、不能创造财富的人。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实行劳动综合技术教育方面起了消极作用，到1937年，学校工场关闭了，教学计划中的劳动课也取消了，这显然离开了教育和培养青年的列宁主义立场。本来在教育工作者中应当进行关于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讨论，遗憾的是，有些同志不十分关心这种讨论，教育科学院理论刊物对此也避而不谈。人们在期待着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和教育科学院把教育思想引上同对斯大林个人迷信后果作具体斗争的道路。但是这方面的工作现在还不够明显。

关于修改六首词[1]给陈白尘[2]的信

（1962年4月24日）

陈白尘同志：

请你斟酌修改，然后退我，你为何不给我认真地修改一次呢？要我写字，似乎可以，你们的刊物五月几时出版，几时交稿呢？请告为荷。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

[1] 指《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采桑子·重阳》（1929年10月）、《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2月）、《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7月）、《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这6首词后来在《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上发表。

[2] 陈白尘，当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

给臧克家[1]的信

（1962年4月24日、27日）

一

克家同志：

数信收到，甚为感谢！同时在两个刊物发表，不甚相宜，因为是《人民文学》搜集来的。[2]另有几首，可以考虑在《诗刊》上发表。《诗刊》五月号何时排版，请告确期。

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

毛泽东

1962年4月24日

二

克家同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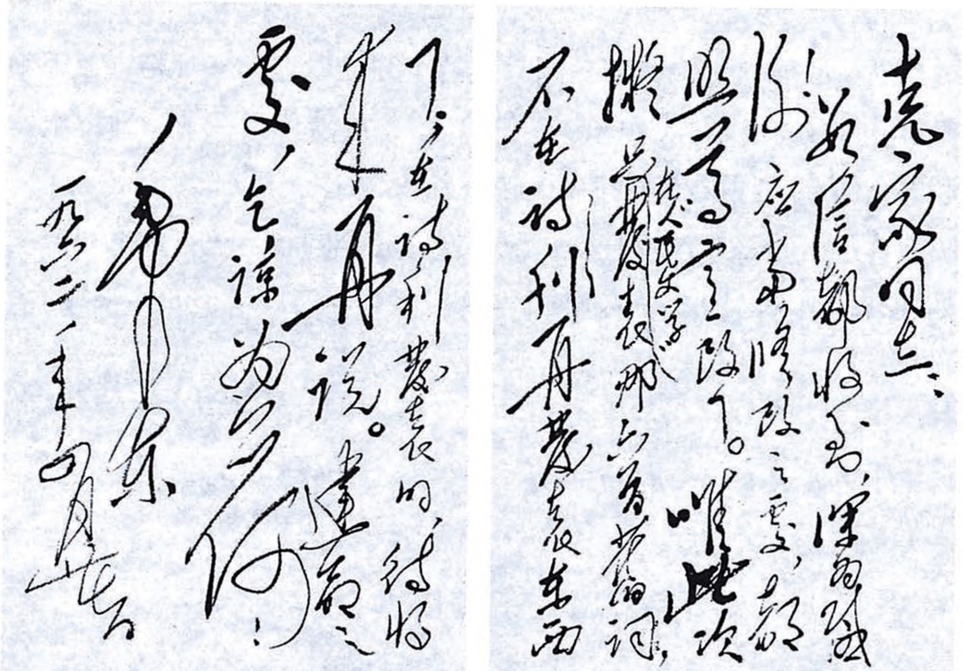
[1] 臧克家，当时任《诗刊》主编。

[2] 指《人民文学》编辑部同志搜集的毛泽东过去写的诗词10余首。1962年4月，毛泽东从中选了6首词，略加修改后，交给《人民文学》发表。

数信都收到，深为感谢！应当修改之处，都照尊意改了。唯此次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来再说。违命之处，乞谅为荷！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



克家同志：
数信都收到，深为感
谢！应当修改之处，都
照尊意改了。唯此次
拟只在人民文学发表那六首旧词，
不在诗刊再发表东西
了。在诗刊发表的，待将
来再说。违命之
处，乞谅为荷！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致臧克家信的手稿。

《词六首》序一[1]

（1962年4月）

这六首词，年深日久，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搜集起来，要求发表，[2]因以付之。回忆了一下，这些词是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文采不佳，却反映了那个时期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作为史料，是可以的。

---

[1] 这是毛泽东为《词六首》在《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发表所写的序，后未发，改刊了另一则较短的序。

[2] 1962年1月1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最近我们辗转搜寻，找到了您的几首诗词。正因为是辗转搜寻到的，所以不知是否有讹误，也不知您是否愿意将其发表，或者是不是还需要修改，因此抄寄一份给您，请您指示，并请注上题目和写作年月。"

《词六首》序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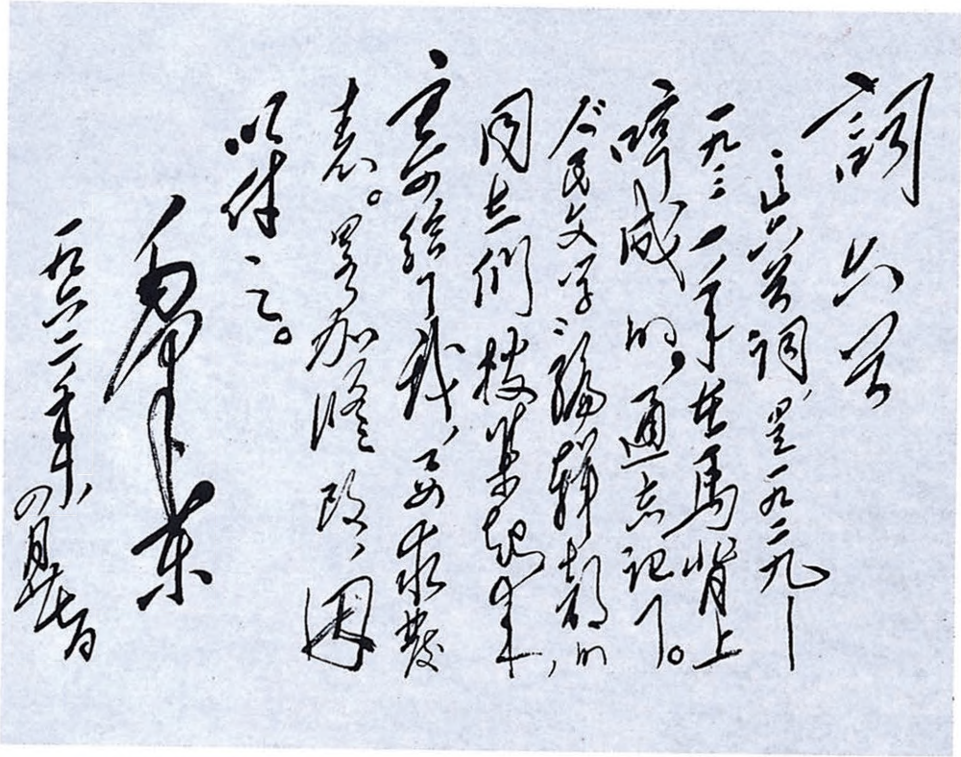
（1962年4月27日）

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人民文学》1962年五月号发表《词六首》时所写的序。



詞六首

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四月廿七日

毛泽东为《词六首》写的序言。

关于赛福鼎[1]是否回新疆工作问题的批语[2]

（1962年4月27日）

总理：

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斟〈酌〉定。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

[1] 赛福鼎，即赛福鼎·艾则孜，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在北京工作。

[2]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送阅、统战部转报的赛福鼎对解决北疆群众外逃问题的意见上。赛福鼎在意见中说，同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对塔城等地部分群众外逃事件原因的分析和处理的意见，提出必要时让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是会有帮助的。毛泽东批示后，中央即决定赛福鼎回新疆工作。

在一篇谈中苏分歧及西方对策的文章[1]上的批注[2]

（1962年4月）

---

[1] 指新华通讯社1962年4月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四三〇期（增刊）摘译的《华盛顿邮报》记者罗伯茨3月25日发表的文章，题目是《西方在逐渐明白共产党的分裂的影响》。文章说：美国政府只是在过去几个月才开始认识到中苏分歧包含的“严重危险和大好机会”。目前需要的是制订“最成熟的美国的政策”。美国应准备找寻“同共产党政权利益一致的某些方面”，并谋求建立一个日益接近于我们在成立联合国时所预见到的那一种世界。美国必须对各国共产党国家加以区别，不是把它们当作一个清一色集团的一部分，要采取步骤，对苏联执行在“坚定的基础上奉行友好”的政策，继续孤立中国。西方有必要继续改进它的军事地位，以便转而帮助赫鲁晓夫，支持他向毛泽东提出的论点。西方应参加共产党内部关于马列主义前途的讨论，不应只限于进行“消极的批评”。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中《谈西方对策》一节所写的批注。所说“八条”是毛泽东对文中关于西方在奉行与苏联友好政策方面能做些什么所提建议的归纳：（1）肯尼迪的空间合作建议；（2）美苏领导人互相发表电视演说；（3）肯尼迪访问苏联；（4）承认外蒙古；（5）不把核武器给西德；（6）劝阻南斯拉夫或希腊对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7）向波兰和捷克保证承认它们同德国接壤的边境；（8）给东欧国家经济援助，而不像目前那样只援助波兰和南斯拉夫。本篇二中“矛盾”二字写在下面一段话的旁边：“西方对共产党的倡议作出软弱的反应，就会鼓励俄国人提高要从冒险中得到的好处，并且使赫鲁晓夫丧失他一直用来对付毛泽东的这一理由：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很大的。相反的，西方具有实力将使赫鲁晓夫得到他所需要的理由，使毛泽东和其他同样想法的共产党人相信，世界战争的危险比他们设想的要大。”

一

八条都是攻势，暴露修正主义于世人面前

二

矛盾

1962年4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合影。

1962年4月28日，毛泽东接见全国青联第四届委员。

1962年5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的谈话

（1962年5月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是来自友好国家、友好政府的代表团，欢迎你们。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与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不管是独立或没有独立正在斗争中的人民。非洲正出现一个很大的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非洲有多少人口？二亿吧？二亿人民要翻身，不管已经站起来或者将要站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也是二亿人口，亚洲的十几亿人口和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我们不是孤立的，到处都有我们的朋友，你们也不是孤立的。你们来中国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是十分欢迎你们的。来了几天了？

凯塔（几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凯）：我们是四月十九日来的。

毛：她们呢？（指妇女代表团）

凯：她们是四月二十五日来的。

毛：听说你们明天要走了。

凯：她们不走。

毛：欢迎。他（指柯庆施）是上海的主人，柯庆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你们是民主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样，对吗？

柯庆施（以下简称柯）：你们为何不多住几天？

凯：我们的日程排得很紧，国内工作很多，5月15日以前要完成改组党的各级机构，如有时间，我们很愿意在中国访问一个月。

毛：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是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是一个有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领导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捣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捣你们的鬼。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

凯：没有。

毛：如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

凯：有些国家的技术人员有这种情况，中国专家没有这种情况，他们都工作得很好。

毛：是不是有比你们几内亚专家薪水高、特殊化的情况？（对叶□□说）恐怕有，要检查，待遇要一样，最好低一些。

叶□□：周总理正在要方□同志检查。

凯：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但直到现在中国专家并没有过分的要求，有些国家的专家要比几专家高两三倍，相反，中国的专家没有过分的要求。

毛：驻几内亚大使是谁？是柯华吗？（旁人答：是的。）

凯：只有中国专家和越南专家待遇一样。

毛：是否有人损害你们的民族利益？搞颠覆活动？

凯：有，但不是中国人。对搞颠覆活动的人，我们也不是听任他们去搞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们要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回击，我们

不愿意做人家的尾巴。过去发生的事件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你们也是知道的。

毛：你们做得对。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把他们赶掉。我们希望你们站住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经济上站住脚，不要被人颠覆掉了。你们站住脚我们高兴。你们倒台我们不高兴。因为你们是一个革命的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在非洲有很大的影响。经过你们，可以在非洲许多国家做工作，使他们得到解放。你们也有这个责任，不要自己独立就不管别人了。我们也一样，不能因为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了。所谓管别人是指友好的支持、帮忙。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还有些困难，能帮的忙不大。再过五年、十年我们的情况可能好一些，那时的帮助可能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人太多，这么多人要吃饭，要穿衣，所以现在还有不少困难，但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而是能够克服的，正在采取措施克服。我国的经济、文化与你们差不多，差不多是在没有什么遗产的情况下搞起来的。你们是法国的殖民地，我们是几个国家的殖民地。你们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了吗？

凯：关于跟法国建交的问题，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我们独立后与法国双方互派过代表，进行过谈判，想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至今还未解决，我们希望能够解决。

毛：你们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好吗？

凯：好的。

毛：与马里呢？

凯：非常好。

毛：与索马里呢？

凯：差一些，还没有外交关系，往来较少。

毛：与加纳呢？

凯：好的。

毛：与摩洛哥和突尼斯呢？

凯：跟摩洛哥和突尼斯也好，但有些不同。非洲有两个不同的集团，即卡萨布兰卡集团和蒙罗维亚集团。

毛：蒙罗维亚集团？

凯：卡萨布兰卡集团是阿尔及利亚、加纳、几内亚、马里、利比里亚和摩洛哥六国集团。蒙罗维亚集团是过去非洲马尔加什联盟的国家。卡集团较进步，蒙集团不大进步，与殖民主义联系较多。

毛：蒙集团是否属于法属共同体？

凯：是的。我们与卡萨布兰卡集团关系好一些。跟蒙罗维亚集团的有些国家，如塞内加尔、利比里亚、象牙海岸等国，边境相连，遭遇和问题都差不多。我们认为非洲分为这样两个集团并不符合非洲人民的利益，所以杜尔总统向所有非洲国家采取外交措施，提议召开非洲国家首脑会议，5月要开会，要协调相互的立场，取得一些共同点，取得合作。正如主席所说，进步力量应该支持邻国人民，非洲许多国家与殖民主义势力有联系，与欧洲共同市场有联系，而不是与兄弟的邻国有联系。我们预备开会讨论非洲共同市场问题，以便发展非洲自己的经济，摆脱非洲殖民主义势力的控制。非洲所有国家首脑会议5月份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如果几内亚提议的非洲首脑会议有结果，可以使非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毛：非洲国家要联合，另外还要一个更大的联合，即亚、非、拉美三大洲的联合。

凯：我们也意识到这种大联合的重要性，因此首先非洲国家自己要联合，以便在大联合中起积极作用。我们不少非洲国家正在受痛苦，还在受殖民主义的痛苦，特别是经济上受新殖民主义的痛苦。要实现大联合，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毛：几内亚有多少人口?

凯：几内亚国家很小，有四百万人口。

毛：土地面积多少?

凯：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十二人到十三人。

毛：很大的土地，有很大的发展前途。有森林吗?

凯：很多，特别是矿产的前途很大，我国有丰富的铁矿、铝矿、铬矿，是非洲矿产最丰富的国家，还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可以用来发电，以便在当地自己提炼矿砂。

毛：听说你们在建造一座大水坝?

凯：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法国人已有此计划。法国想在孔库雷河上建造一座大水坝，每年可发六十亿度的电，用此电力提炼铝。法国组织了国际公司，并与国际银行建立了关系，以便取得资金。1958年几内亚独立了，法国认为不安全，就放弃了这个计划。独立后，几内亚政府想搞，苏联原则上同意与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援助几内亚建设水坝，但现在苏、几政治关系复杂化了，恐怕不准备搞了。

毛：还没有搞吗?

凯：没有搞，杜尔总统访华时经过莫斯科，苏原则同意援助，但至今没有动静。

毛：听说有个货币问题，解决了没有?

凯：我们在1960年建立了几内亚法郎，目的是退出法郎区，建

立独立的货币区。这种法郎不能兑换外币，以避免殖民主义者掌握大量几内亚货币兴风作浪。但有些邻国以几法郎投机，他们从几带出大量货币，换美元和英镑，或以低于官价出售几法郎，压低币值，或贩运货物到几内亚来换取几币搞投机。所以几政府在今年4月决定取消旧币换新币，在外国的旧币一律作废。

毛：你们自己能印钞票吗?

凯：不能。

毛：在哪里印呢?

凯：起初在捷克，最近一次在英国印。现在正设法自己弄到印钞票的机器，以便保证不断地印自己的钞票。

毛：几内亚妇女有选举权吗?

卡玛拉（几妇女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卡）：有的，在党内、政府内都有。

毛：党里有妇女领导人吗?

卡：党的街道委员会、村委员会和省委员会都有妇女领导人，恩迪阿依、贡代二位都得到了独立勋章。

毛：你们的革命是群众性的，党也是群众性的。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女的太少了，女的有，但比例是男的多、女的少，地方党委也是如此。你们走在我们前面去了。

凯：我们的比例也少，十七个政治局委员中只有两个女的，政府中只有一个部长是女的，就是卡玛拉夫人。我们那里也仅仅是开始，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妇女受到双重压迫，不仅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而且男女不平等，女的上学机会不多，革命胜利后男的还有封建思想，女的积极斗争，现在有女的市长、村长等。

毛：慢慢来。

凯：她（指卡玛拉夫人）想一下子解决问题。

卡：他想阻拦。（全场笑）

毛：我们与你们的情况差不多，比较接近，所以我们同你们谈得来，没有感到我欺侮你，你欺侮我，没有什么优越感，都是有色人种。有人想欺侮我们，认为我们生来就不行，认为我们没有办法，命运注定了，一万年该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不会管理国家，不会搞工业，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科学文化也不行。他们不想一想，这种状况是他们造成的，经济、文化水平低是他们造成的。管理国家过去是他们代替我们管理的。本国人讲管理是可以的，但要学，学多少年，慢慢来，可是你们不是慢慢来，而是一下子就取得政权，我们也是，夺取了政权再学嘛！不会管理慢慢就会管理了，有错误就改嘛！难道只有我们有错误，西方国家没有错误？他们的错误比我们更大，他们犯了反革命的错误。我们根本上没有错误，我们是革命。没有工业可以逐步搞工业，没有现代化的农业可以逐步搞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文化水平也能一年一年提高，例如地质人员，你们现在开始有了吗？

凯：以前的地质人员都是别国的，现在有许多几留学生在别的国家培养。

毛：我们国民党、蒋介石遗留下来的地质人员只有二百人，现在十三年来有了十几、二十万人。（问柯庆施：各省都有吗？柯说：有。）能搞起来的。难道只有西方国家能搞，我们就不能搞起来吗？

凯：杜尔总统也认为争取独立首先要自己相信自己，管理国家也是一样。只有打铁，才能成为铁匠，只有学了才会，管理国家慢慢能学会。如1958年独立时，几学生只有三万二千人（指在学校

的），现在有十二万。

毛：增加了三倍多。你们过去可能没有大学。

凯：没有，很少有机会上大学，上大学要到巴黎去。当时殖民主义者对培养当地的干部没有兴趣，只有二百个大学生，现在有一万五千个大学生，各省都有。

毛：比例不小，四百万人口中有一万五千人。

凯：现在科纳克里正在搞技术高等学校，培养地质、农业等技术人才。一方面继续向外国派，另一方面尽量在国内培养高等学校的学生，使能适合本国的条件。

毛：今晚你们有何活动？

柯：晚上我们要举行宴会欢迎他们。

毛：他（指柯）是主人了，我们这就告一段落，好吗？

凯：我们没有别的话。在北京已与许多负责同志讲过，现再一次向主席表示：几内亚对于中国的友谊和合作寄以极大的希望，对中国为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这次谈判印象很深，中国政府领导人很谅解我们，谈判进行得顺利，得到了积极的成果。再一次表示两国关系是巩固的，代表几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表示感谢。

毛：我们感谢你们，这是互相支持，我们很抱歉，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

凯：你们已尽了你们的能力。非洲有句话：援助的方式比援助的东西更重要。

毛：我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友好、坦率、诚恳、不讲假话，讲老实话。以后继续往来。你们来过中国吗？

凯：他们都是第一次，我1960年陪杜尔总统一起来过，到过北京、武汉、广州、上海等地。主席在北京接见过我们。到上海时柯

市长举行了宴会，我们还参观过上海汽轮机厂，宋庆龄副主席在上海接见了我们。

毛：你们回去后替我问候塞古·杜尔总统，问候你们中央的各位领导人，祝他们好。

凯：在我们离开这儿前，再一次祝主席身体健康，祝主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七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谨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高兴地看到，一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取得了新的成就。我们衷心地预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继续取得新的胜利。

中捷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加强，对促进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起着积极的作用。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巩固和发展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中国人民将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道，为

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而继续奋斗。

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5月8日

代拟的给陈宗娥的信[1]

（1962年5月12日）

宗娥：

你1961年6月27日给我的信，我于今天早上才收到。在北京压了十个半月，真是岂有此理！至于你说，去年三月有信，则至今未收到，正在查询。我已两年不在北京了，患了重病，不习北方气候。现病略为好些，忽〈勿〉以为念。闻你如此重病，又如此困难，心极不安。今送上五百元，以济眉急。如有所需，望随时告我。有病不要性急，越急越坏。安心治疗，是为上策。有信请写：北京中南海17支局109号信箱徐业夫[2]同志收转江青。祝你健康！

云鹤[3]

1962年5月12日

---

[1] 这封信是以江青名义写给曾在毛泽东家做过保姆的陈宗娥的。

[2] 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云鹤，即李云鹤，江青的原名。

关于不参加苏联东欧七国领导人会议的批语[1]

（1962年5月15日）

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2]，不派代表。是否应以我们的态度，告诉朝、越、蒙三国，请你酌定。

毛泽东

1962年5月15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2年5月12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对外交部5月10日关于不参加波兰倡议举行的苏联、东欧七国领导人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件上。外交部报告说：波兰驻华大使5月6日拜会周总理，面交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邀请我党和政府派相当级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由波党与苏共协商后倡议举行的保、捷、德、波、罗、匈、苏七国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会议。会议目的在于讨论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间的经济合作问题。会议将于本年5月31日起在莫斯科举行。波方希望我将对此事的答复告波兰及会议东道主苏共中央。根据来信，这次会议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参加。我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国不宜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建议以毛主席和周总理名义函复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予以谢绝，并指出他们排除阿尔巴尼亚于会议之外是不对的。信件拟由陈毅副总理交波兰驻华大使，并将信件副本交苏联驻华大使转交他们的党和政府。

[2] 指周恩来1962年5月12日对外交部请示报告的批示。

对中央转发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1]的指示稿[2]的批语

（1962年5月24日）

退总理，照办[3]。

毛泽东

五月廿四日

---

[1] 中央财经小组1962年4月30日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说，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今年计划调整方案，着重注意了以下4点：（一）尽可能地挤出一部分材料来增产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二）尽可能地安排较多的原料、材料和燃料，增加日用品的生产。（三）根据农轻重的方针和实际的可能，降低绝大多数重工业产品的指标，比原计划分别降低5%到20%。（四）进一步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工作量从原计划的60.7亿元降低为46亿元。这样调整的结果：196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从原计划的1400亿元降为1300亿元；工业总产值从950亿元降为880亿元，其中，生产资料总产值从550亿元降为470亿元，生活资料总产值从400亿元上升为410亿元；农业总产值从450亿元降为420亿元。农业总产值基本上是根据中央2月16日下达的粮食2885亿斤、棉花2063万担等主要指标估算出来的。但是，最近各

地报来的粮食和棉花的计划数字，都比上述数字低。今年的农业总产值能否有420亿元，要看春耕、夏收和中耕的情况，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估计。

[2] 中共中央1962年5月转发中央财经小组这一报告的指示稿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7日到11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且决定：在县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中，口头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和方针；地委第一书记和相当于这一级以上的干部，到省委和中央各部委去阅读中央财经小组的书面报告。军队中传达和阅读的范围，由总政治部比照这个规定办理。中央认为，中央财经小组的这个报告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当前国民经济的重要情况。我们对于财政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对于克服困难的快慢，从总的方面，可以说认识清楚了。但有一些具体的困难还没有认识清楚，今后也还可能出现一些现在没有预料到的困难。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逐步地克服困难，全党目前必须抓紧的主要工作，一是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坚决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一是加强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领导，加强各方面，特别是工业对农业生产的支援，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把主要的领导力量分为两部分，在统一的领导下，一部分人抓精简工作，一部分人抓农村工作。中央的指示和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1962年5月2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254号文件发至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

[3]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2年5月19日在报送中共中央批发中央财经小组这一报告的指示稿时，写了一封信，请李富春阅后即送毛泽东审批。信中说，财经小组报告的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时已看过，在五一节政治局常委会上，主席说同意这个方针。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就是按这个方针开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约富春同志（他现在上海）去杭州当面报告一次。这个文件，主席如同意发，请告田家英或林克以电话告杨尚昆办。

对郭沫若《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1]的修改[2]

（1962年5月）

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初以为是写一天的事。后来又觉得不对，是在写两次的事，头一阕一次，第二阕一次。我曾在广州文艺座谈会[3]上发表了意见，主张后者（写两次的事），而否定前者（写一天），可是我错了。这是作者[4]告诉我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5]，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6]，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在接近娄山关几十华里的地点，清晨出发，还有月亮，午后二三时到达娄山关，一战攻克，消灭敌军一个师，这时已近黄昏了。乘胜直追，夜战遵义，又消灭敌军一个师。此役共消灭敌军两个师，重占遵义。词是后来追写的，那天走了一百多华里，指挥作战，哪有时间和精力去哼词呢？南方有好多个省，冬天无雪，或多年无雪，而只下霜，长空有雁，晓日不甚寒，正像北方的深秋，云贵川诸省，就是这样。“苍山如海，残阳如

血”两句，据作者说，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由此看来，我在广州座谈会上所说的一段话，竟是错了。解诗之难，由此可见。

---

[1]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他1962年5月1日写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刊载于《人民文学》同年五月号。这期《人民文学》发表了毛泽东的《词六首》。

[2] 郭沫若在《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中有一段话说：“我对于《娄山关》这首词作过一番研究，我起初也觉得是一天的事。曾经把新旧《遵义府志》拿来翻阅过，查出了由遵义城至娄山关是七十里，恰好是一天的路程。清早由遵义城动身，晚上到达娄山关，那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进一步考虑，却发现了问题。红军长征第一次由遵义经过娄山关，是在1935年1月。第二次又经过娄山关回遵义，是在当年2月。就时令来说都是冬天。为什么词的上阕写的却是秋天？‘西风’‘雁叫’‘霜晨’，都是秋天的景物。这怎么解？要说主席写词不顾时令，那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才进一步知道：《娄山关》所写的不是一天的事。上阕所写的是红军长征的初期，那是1934年的秋天；下阕所写的是遵义会议之后，继续长征，第一次跨过娄山关。想到了这一层，全词才好像豁然贯通了。‘西风烈’，不仅是自然界的西风，也隐喻着受着帝国主义支持的敌军力量的相对强大。在这时拂晓的长空中，有下弦的残月，天上有南飞的归雁，地上有长征的红军。马蹄声零碎，喇叭声呜咽，气氛是悲壮的。但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和红军中树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的革命便来了一个转折点。《娄山关》这一首词就是遵义会议前后的革命气势的生动反映。在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又以百倍勇气重新迈上征途，尽管眼面前有多少道铁门关也要雄赳赳气昂昂地超越过去。前途的障碍是很多的——‘苍山如海’。流血的斗争是要继续的——‘残阳如血’。但尽管这样，必然有胜利的明天！我对于《娄山关》一词作了这样的解释，我虽

然没有当面问过主席，不知道我的解释究竟是否正确，但在广州的诗歌座谈会上，我很高兴同志们是同意了我的见解的。或许有人会问：一首词中所说的一朝一夕为什么所表示的不是一天？这在我们中国的诗歌中倒并不是稀罕的例子。例如屈原的《离骚》里面便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飧秋菊之落英’，或‘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所谓朝夕都不限于一天。”毛泽东阅后将这段话全部删去，改写成本篇的文字。

[3] 指1962年2月初在广州召开的诗歌座谈会。

[4] 指毛泽东。

[5] 过去有一种说法，遵义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1935年1月9日召开的。前些年，经过考证确定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这样中央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而不是在遵义会议召开以后。

[6] 刘湘，1933年任国民党军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34年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

给邵华[1]的信

（1962年6月3日）

你好！有信[2]，拿来，想看。要好生养病，立志奔前程，女儿气要少些，加一点男儿气，为社会做一番事业，企予望之。《上邪》[3]一篇，要多读。余不尽。

父亲
六月三日上午七时

---

[1] 邵华，原名张少华，毛泽东的儿媳。毛泽东写给她的这封信无上款。

[2] 指毛岸青、邵华各自写给毛泽东的信。

[3] 《上邪》，乐府汉《铙歌》十八曲之一。上，指天；邪，通“耶”，语气词。上邪，指天为誓的意思。其词为：“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1962年，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等在中南海家中。

应抓紧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1]

（1962年6月8日）

在科学研究中，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汇报工作时谈话的部分内容。

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1]的修改和批语

（1962年6月11日、12日、18日）

一

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军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

二

林克：

昨晚修改的稿件[2]，应请少奇同志召集常委各同志及彭真、瑞

---

[1] 这篇电讯稿1962年6月18日先以内部电报发给各级党委，6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题为《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

[2] 指新华社关于蒋介石匪帮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的电讯稿，修改情况见本篇一，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卿、肖华、定一、冷西[1]各同志，全文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上午三时

三

各级党委：

现将准备发表的为着揭露蒋匪帮军事冒险计划的新华社新闻电稿一件，先用内部电报发给你们。望即据此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至于何时公开发表，中央将按照情况需要决定。

中央

六月十八日

（此件发至县级及团级）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1]

（1962年6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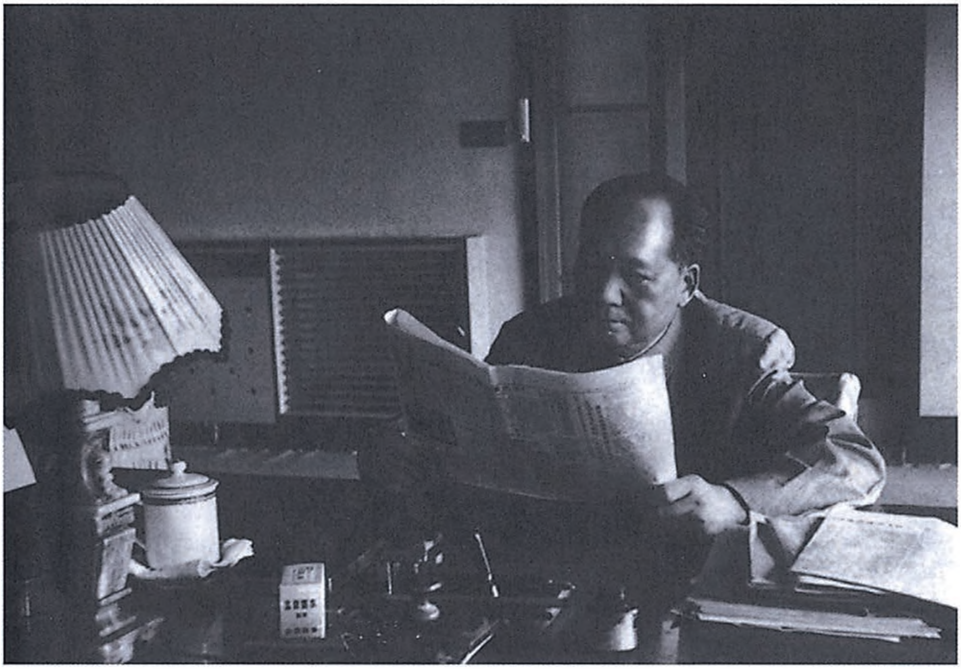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

---

[1] 这是毛泽东对广州军区负责人的指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谈到军事问题时指出：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组织，就是有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要有兵有官。政治，就是要做政治工作。有政治部，有政委，有教导员，有指导员，做人的工作。要讲清楚，打起仗来不要慌张，一慌张还能打仗？无论是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军事，就是要有手榴弹，有轻武器。趁和平时期，要搞点枪，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一个兵工厂。

1962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团长朴金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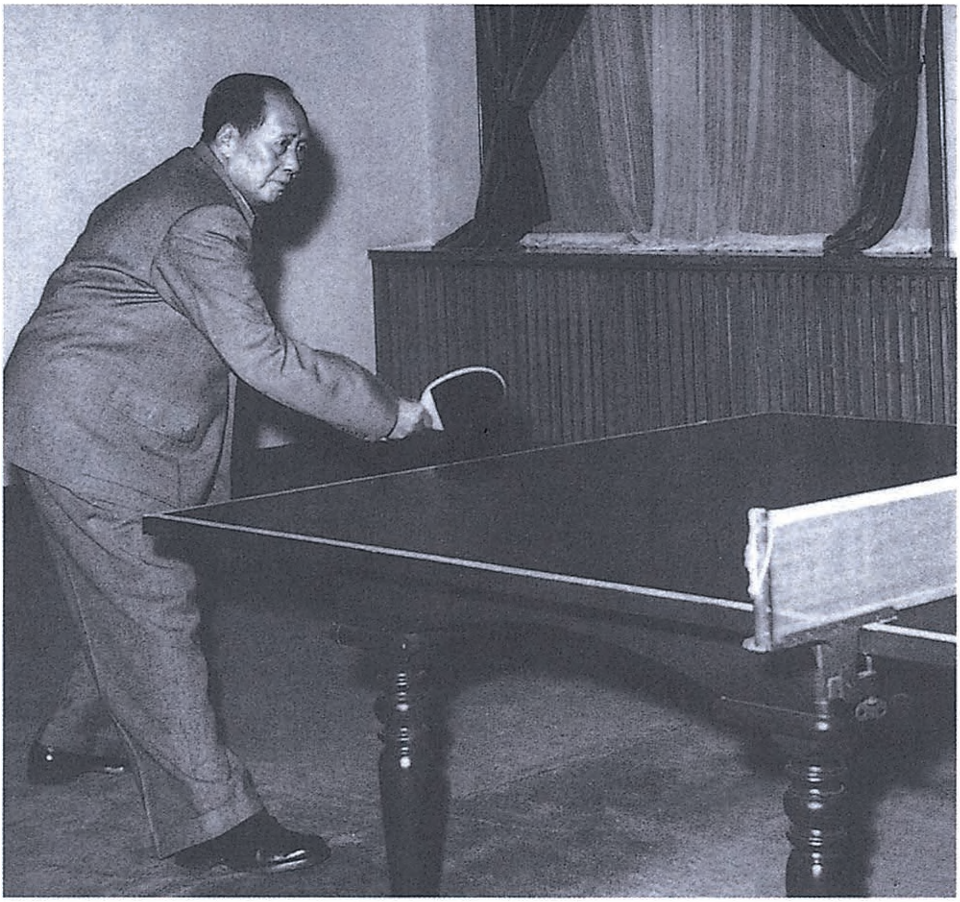
1962年6月21日，毛泽东在武汉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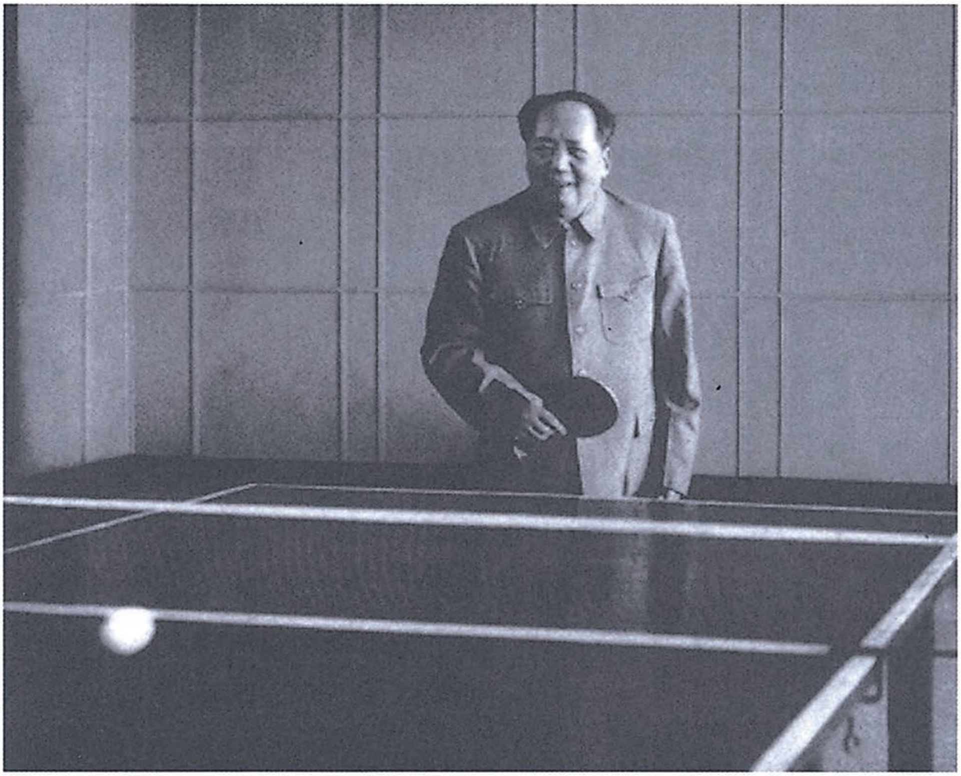
1962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看报。

1962年，毛泽东在阅读《解放军画报》。

1962年，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



1962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住所打乒乓球。



1962年，毛泽东在打乒乓球。

1962年，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湖边。

给彭真[1]的信

（1962年6月22日）

彭真同志：

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2]请你安排。

毛泽东
二十二日上午四时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是毕尔·阿里·穆罕默德·拉希迪，毛泽东1962年7月15日在北京会见了他。卡博代表团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卡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毛泽东于1962年6月29日在武汉东湖宾馆会见了他们。

在陶铸报送两个文件的信[1]上的批语

（1962年6月27日）

汪东兴[2]同志：

此两件已看过。请告陶铸同志，可以用电报立即发到中央，请中央讨论批示。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一时

原件你可以看一下，然后退我。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1962年6月24日夜给毛泽东的信说：“会议多开了两天，直到今晚十二时才结束。我拟于明早返穗。兹将会议的两个文件（备战问题纪要和关于改进工农业商品交换与减轻生产队负担的请示报告）呈上。请审阅、批示！”

[2]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1962年6月2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希斯尼·卡博。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电报

（1962年7月10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亲切、最热烈的祝贺。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我们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以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结晶，是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新的光辉的里程碑。这个条约，充分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全面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保障两国的共同安全以及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真诚愿望和坚定意志。一年前，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相继签订，不仅是苏联、朝鲜和中国三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生动地标志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的团结和友谊。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同兄弟的朝鲜人民一道，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新胜利，为反对帝国

主义和争取持久和平的新胜利，携手合作，奋斗到底。

英勇勤劳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千里马的豪迈步伐，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同时，他们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东方前哨的强大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永远是对于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有力支援。中国人民有着像朝鲜人民这样肝胆相照、风雨共舟的亲密战友而感到自豪。

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珍视并且不断努力来加强这种团结和友谊。中国人民将坚决履行自己的一切义务，捍卫我们的共同事业。

祝中朝两国人民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10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一周年的电报[1]

（1962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蒙古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一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的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就感到衷心的喜悦。

中蒙两国是兄弟邻邦。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一直相互同情、相互支援。我们深信，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祝中蒙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10日于北京

给张人愓、张人价[1]的信

（1962年7月19日）

人愓、人价二位同志：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来信收到。惊悉有晋[2]先师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此致唁。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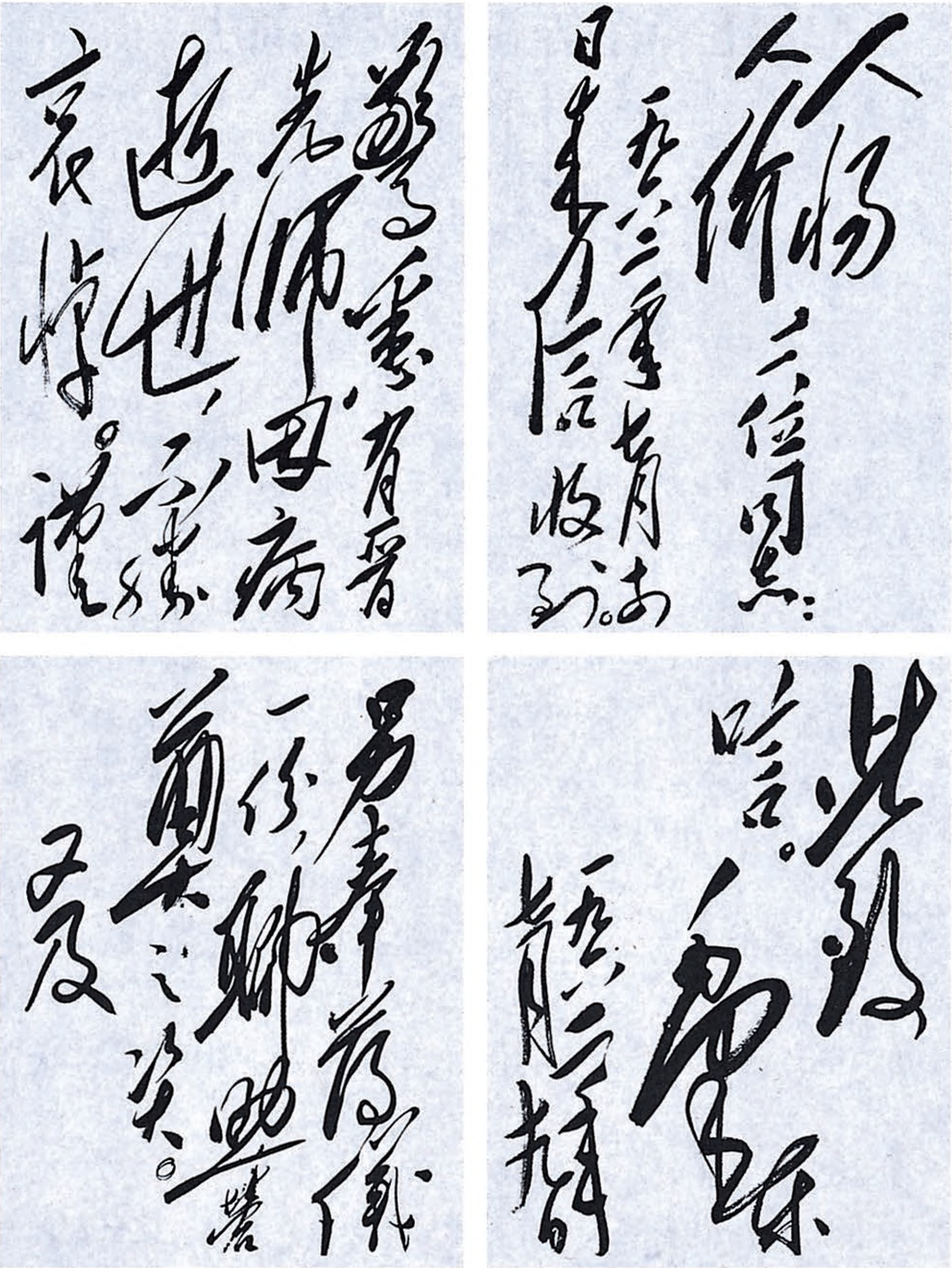
另奉薄仪一份，聊助营奠之资。

又及

---

[1] 张人愓，当时是长沙市税务局干部。张人价，当时是湖北财经专科学校教授。他们都是张有晋的儿子。

[2] 有晋，即张有晋，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数学教员。



人惕、人价二位贤：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来的信收到。惊悉有晋先生因病逝世，不胜哀悼。谨致慰唁。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另奉薄仪一份，聊助丧葬之资。

又及

毛泽东致张人惕、张人价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2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波兰人民、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兄弟的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和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波兰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十分高兴。

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我们深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指导下，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中波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友好和互助合作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国人民将同波兰人民一起，

为加强中波两国的团结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为争取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胜利而继续奋斗。

祝波兰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7月21日

关于印发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记录[1]的批语[2]

（1962年7月22日）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3]。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1962年6月7日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这个记录原载《中南通讯》1962年第五期，分四个部分：一、对目前龙胜县形势的估计。执行农业六十条以来，多数人积极寻找改进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办法，以求迅速增加生产，改善生活。这是龙胜县目前形势的主流。据分析，目前全县生产队中，大约有60%至70%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性质；有20%至30%基本上属于单干，不过还保留着某些集体经济的因素；还有大约10%完全是单干。原来估计全县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二、对龙胜县目前存在的几种生产管理形式和性质的分析。生产管理形式大致有五种：（一）生产资料集体所有，

劳力与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用，庄稼统一收打，收入统一分配；在生产劳动方面，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实行这种严格的经营管理责任制，其优点是责任分明，又比较简便易行，应该认真总结提高，加以推广。（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生产短期安排，四定小包工。这种几年来的老办法，群众不满意，必须予以改进。（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计划，统一分配；按劳力或按人头基本固定田块，少数农活统一派工，集体操作，多数农活长年责任到人。对采取这种形式的生产队，从实质上看，应当分为两类：一类基本上还是集体经济，一类很可能基本上已经是变相单干了。（四）居住深山的单家独户和生产组，经过批准包上交。这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形式，仍然是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主义性质。（五）明显的单干。有的叫“包产到户”，有的叫“分田到户”。其中有一部分耕牛还是集体所有，对五保户还有一些照顾，对困难户还有某种帮助，总算还保留了一点点集体经济的因素。以上五种形式，是比较粗略的分法。对于每一个生产队，究竟它属于什么性质，是集体经济还是单干，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主义的，或者兼有两种因素，又以何者为主，何者为次，必须根据各队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谨慎地加以判断。三、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集体经济最基本的是四条：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至于什么叫集体劳动，很多人都还不很清楚或者很不清楚。集体劳动的意思，主要是指劳动力由生产队统一调配，而不是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去干。所以，不能单纯从集体操作农活的多少，来确定是不是集体生产。四、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根本原则是自愿和示范这两条。工作重点是努力办好一批生产队，做好示范工作，而不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硬性地去“纠”或“扭”那些单干户。第一，对目前出现的各种生产管理形式，要根据上述四条原则准确地判明它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谨慎对待。第二，从各方面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必须逐步做好的工作是：明确和稳定所有权，继续克服“共产风”；适当调整征购任务；改进和调整农副产品收购中的换购与奖售工业品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发展多种经营。

[2] 毛泽东的批语连同这个座谈会的记录，1962年7月22日作为中共

中央文件中发〔62〕409号发至省、地级。

[3] 指即将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这次会议于1962年7月25日至8月24日举行。

1962年，毛泽东在火车上阅读《大众电影》杂志。

对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批语[1]

（1962年7月23日、8月24日）

一

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毛泽东

七月二十三日

---

[1] 本篇一写在《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毛泽东批示后，这个决定（草案）连同批语一起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一，印发参加会议的同志。决定（草案）共11条。本篇二写在《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1962年8月17日的修正稿上。毛泽东批示后，这个决定（草案）修正稿连同批语一起作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一，印发参加会议的同志。9月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决定共12条。10月11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2〕515号文件将这个决定发到人民公社。

二

印发各同志[1]讨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

[1] 指即将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这次预备会议于1962年8月26日至9月23日举行。

对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一篇文章摘要的批语[1]

（1962 年 7 月 25 日）

陈云、邓子恢、田家英三位同志阅。阅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一篇，在第五页上。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阅后退毛。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通讯社1962年7月24日编印的《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第一一一〇期上。这一期第5页刊登了波兰《政治》周刊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波兰农业合作化发展道路的文章的摘要。文章说，农业小组目前是波兰农业社会化的中心环节。农业小组组员目前已达100万户。1965年农业小组积累资金将达250亿兹罗提。在此基础上他们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农业小组是一种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组织。1970至1975年波兰农业将完全电气化和机械化，为此必须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在最近15至20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现在可以说有三种农村集体化的类型：（1）大规模地采取劳动合作化的形式；（2）建立国营农场；（3）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大规模地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工农业高度发展水平上可以不必付出很大代价。大规模地建立国营农场，这意味着国家要通过赎买的形式接收农民的土地，给农民以土地赎金。建立合作社——国家农庄的最便宜的道路是通过农业小组升入高级合作化劳动形式。

对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62年7月31日）

印发各同志[2]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财贸办公室斟酌修改。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

[1] 指国务院财贸办公室1962年7月28日关于粮食问题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根据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的精神，研究了粮食工作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认为要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调动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争取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必须动员和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支援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以外，还必须在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和兼顾城乡人民生活的原则下，继续适当地减轻国家对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并且把粮食征购任务在一定水平上固定一个时期。这是粮食工作方面目前急需解决的一个方针性的问题。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1961年到1962年度粮食收支的情况。二、1962年到1963年度的粮食收支计划。三、关于调整今后粮食征购任务的方案。四、今后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方针、政策共讲了10点：（一）继续实行少购少销、收（包括进口）大于支的方针。（二）集中主要力量，支持粮食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首先是大力支持主要产粮区的恢复和

发展。（三）从销于农村的粮食中，挤出一部分来增加对经济作物区的粮食供应，合理地提高经济作物换购粮食的比例，支持经济作物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四）大力支持国营农场，切实整顿国营农场，使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能够逐年向国家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食和经济作物。（五）有领导地、适当地开放农村粮食自由市场。（六）继续执行国家关于农业税负担三年不变的规定。（七）争取逐年增加一点国家粮食库存，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突然事变。（八）进一步加强国家关于粮食管理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的制度。（九）取消公社、生产大队提取机动粮、自筹粮的办法。（十）认真负责地、切切实实地加强粮食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据这个报告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意见，中共中央于9月23日作出关于粮食工作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2〕495号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总政治部。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稿的批语[1]

（1962年7月31日、8月24日）

一

印发各同志[2]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3]同志领导的起草委员会斟酌修改。

毛泽东

七月三十一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2年7月31日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初稿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8月24日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8月6日修改稿）上写的批语。修正草案共9章60条。8月25日，毛泽东的这一批语连同修正草案8月17日修改稿，作为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印发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各同志讨论。9月27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在这次全会通过。10月11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2〕516号将这个修正草案发到人民公社。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二

印发各同志[1]讨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四日

---

[1] 指即将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中央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1]

（1962年8月）

一

党在农村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使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已经或正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地区发生了“单干风”，已经有一小部分生产队改变方向，分户单干了。

二

对于党内的思想问题，必须采取民主讨论分清是非的方法，以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目的，但是必需容许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有充分发展〈表〉意见和保留意见的权利。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1962年8月1日关于正确对待单干问题的规定草稿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一小部分生产队陷于瓦解状态，这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曲折，这种曲折是不可避免的。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几十年几百年内，也是还会有的。只要就全国来说，只占一小部地区、社队和人数，也是并不可怕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占了极大的优势。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还将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可能要继续几十年到几百年。

在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来信[1]上的批语

（1962年8月2日）

印发各同志[2]。

---

[1] 指钱让能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根据太湖县一年多来实行责任田的结果，我认为“责任田”的办法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六十条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重要补充。不过，它与省常委1962年2月20日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是相违背的。我想保荐它，是因为有了它，农业生产就如鱼得水。太湖是一个三类县，1958年至1960年期间，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破坏，人民群众奄奄一息。1961年3月，这里90%以上的地区推行了责任田，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过去的荒、逃、饿、病、死，一瞬而基本变成了熟（荒地变熟地）、回（外流回归了）、饱（人民基本吃饱了，有的地方吃得较好而有余）、健（体质健康了，生病的少了）、生（妇女怀孕了）。太湖一个最差的大队桥西大队的农业生产，1961年与1960年比较，粮食增长了81%，油料增长了6.5倍；棉花增加了10倍，生猪、家禽也是几倍的增长。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是我10多年来（除土改外）第一次见闻。责任田的具体办法是，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它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法，不是搞单干，不是发展资本主义，它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仍是按劳取酬，集体劳动方式也没有改变。它能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农民起码占80%以上，甚至于占90%以上。

[2] 毛泽东的批语连同钱让能的信，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安徽太湖县县委宣传部钱让能同志给我的一封信。请大家研究。

毛泽东

八月二日

1962年，毛泽东和家乡亲属在一起。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情况报道[1]的批语

（1962年8月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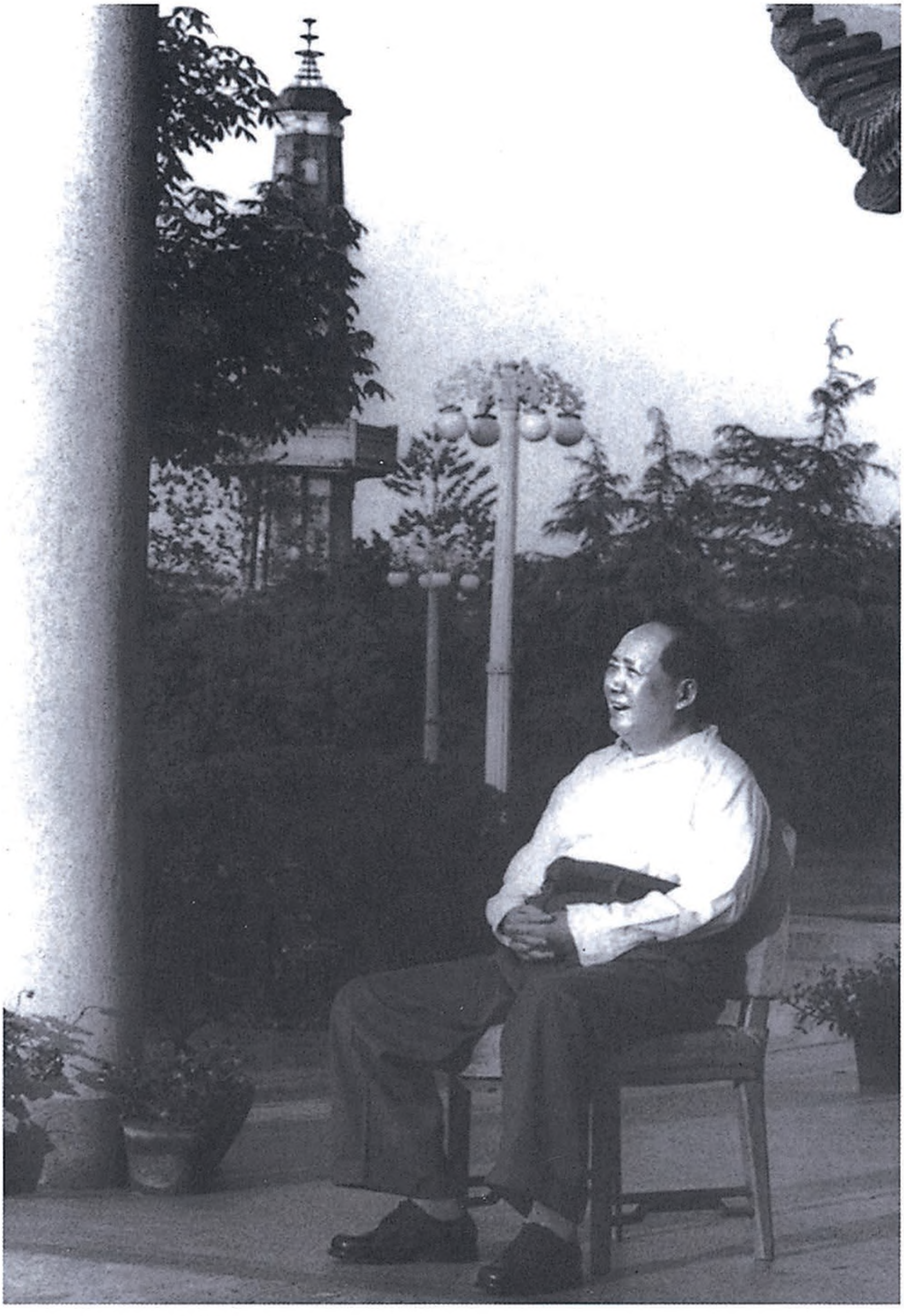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的经济混乱情况，印发大家一阅。请大家讨论一下，走南斯拉夫的道路好，还是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指新华社1962年7月28日由贝尔格莱德发来的一份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摘要的综合报道。报道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上的讲话中透露了他们在工业、农业、内外贸易、财政、南盟的组织和政治思想等方面存在着许许多多使他们烦恼的重大问题。米尼奇说，由于五年计划的指标任务与经济制度之间失调，建议取消1961至1965年的五年计划。科马尔说，近三年来农业生产停滞，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缺乏，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在“加强”。布尔基奇抱怨外汇外贸“改革”破产，没有能推动本国的生产。斯坦鲍利奇说，自发势力渗透进了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队伍中，一些人打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南盟纲领中确定的原则，而南盟经常忘掉思想斗争。兰科维奇的工作报告说，某些盟员对南斯拉夫制度的某些实质问题不了解，对南盟纲领中的观点看法有些不稳定，在反对“消极现象”时，必须同削弱南盟统一，使人们意志消沉的乱批评作斗争。铁托在会议结束时讲了话，他除对兰科维奇的报告表示满意外，对其他各个讲话都愤怒地加以训斥，说在这些讲话中找不到今后怎样摆脱困难和经济如何发展的答案。



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

对新华社关于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一篇通讯稿的批语[1]

（1962年8月2日）

南斯拉夫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请同志〔们〕讨论一下。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2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题为《南斯拉夫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一篇新华社通讯上。通讯说，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铁托23日透露，最近召开的南盟中央全会未能提出使南斯拉夫摆脱经济困难的办法。上面有些人怀疑工人自治，认为它行不通。在这之前，铁托曾发表过几次讲话，承认在南斯拉夫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工资差额巨大，企业内部利润的分配十分悬殊。国内许多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市场处在被分割的状态。对外贸易赤字很大，目前有外债10亿美元。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地方主义、沙文主义等，青年中有金钱至上主义的现象。南斯拉夫劳动人民对现在的处境存在严重的不满。这篇通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的批语

（1962年8月2日）

尚昆[1]同志：

此件[2]请印发各同志[3]。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一个美国农场主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看法》一文。该文介绍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1962年4月2日这一期刊载的该杂志记者对衣阿华州农场主加斯特的访问记。加斯特曾访问苏联3次。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访问过他的农场。访问记说，据加斯特看来，苏联农业方面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直到1955年才开始对农业进行大量投资。1955年的苏联农业大致相当于美国农业1930年达到的水平。赫鲁晓夫的真正问题是对现代农业所需要的资金数量估计得过低。另一个根本问题是，苏联没有美国这样的运输网。苏联有了适当的投资，就能够以与美国同样的百分比提高农业产量，并且在1970年能够把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从目前的40%或50%降低到25%甚至20%。但在大面积单位面积产量上，苏联总也赶不上美国，因为苏联的耕作季节太短，气候太干燥。赫鲁晓夫应该冷却军备竞赛，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

[3]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2年8月6日）

先开工作会议，为中央全会准备文件。从明天起，开始讨论，刘□□建议成立核心小组，还有许多小组，解决六个大组不能畅所欲言的问题。核心小组有常委、书记处，再加大区第一书记，中央各口负责同志，共二十三人：毛、刘□□、周、朱□、邓□□、彭□□、富春、先念、谭□□、伯达、陆□□、富治、谷牧、罗□□、陈毅、杨□□，加上各大区第一书记。

一、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阶级？在外国有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党是全民的党，不是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了，全民专政没有对象了，只有对外矛盾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否也适应？这个问题是否谈一下？我同几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话，了解到有的人听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右派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认为没有阶级了，不要改造，不承认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资产阶级不承认阶级斗争，孙中山就不讲阶级，说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有没有阶级，这是个基本问题。

二、形势问题，也要谈一下，国际问题要找几个人准备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广大人民群众各阶层、民族资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

国内形势谈一谈。究竟这两年如何？有什么经验？过去几年有许多工作没搞好，有许多还是搞好了，如工业建设、农业建设、水利等等。有人说，农村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这个说法对不对？工业上半年不那么好，有主客观原因，下半年怎样，还要看一看。有些同志过去曾经认为是一片光明，现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了，是不是一片黑暗？两种看法哪种对？如果都不对，是不是应有第三种看法？不是一片黑暗，基本光明，有黑暗，问题不少，确实很大。回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形势问题，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是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三、矛盾问题。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哪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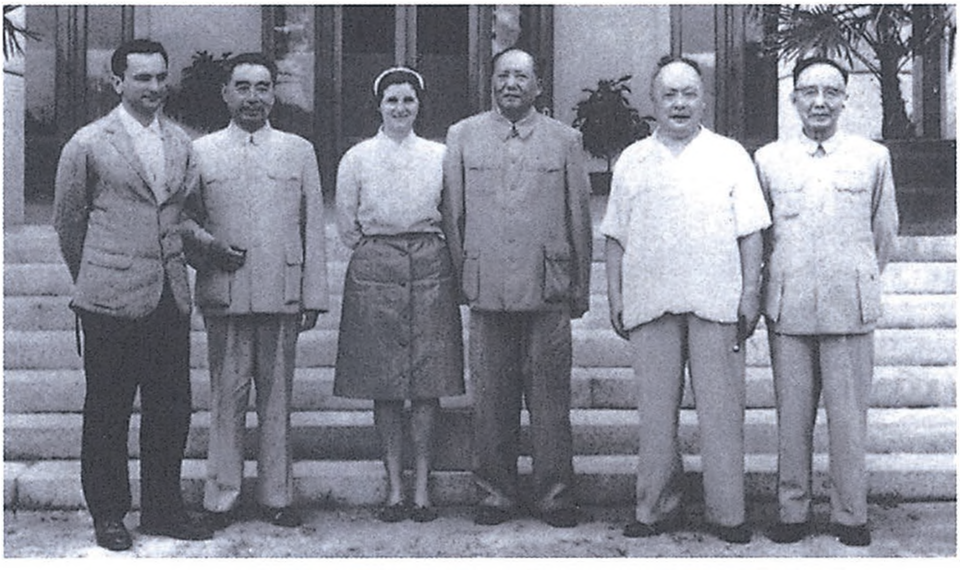
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再有，生产和分配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积累过多，消费就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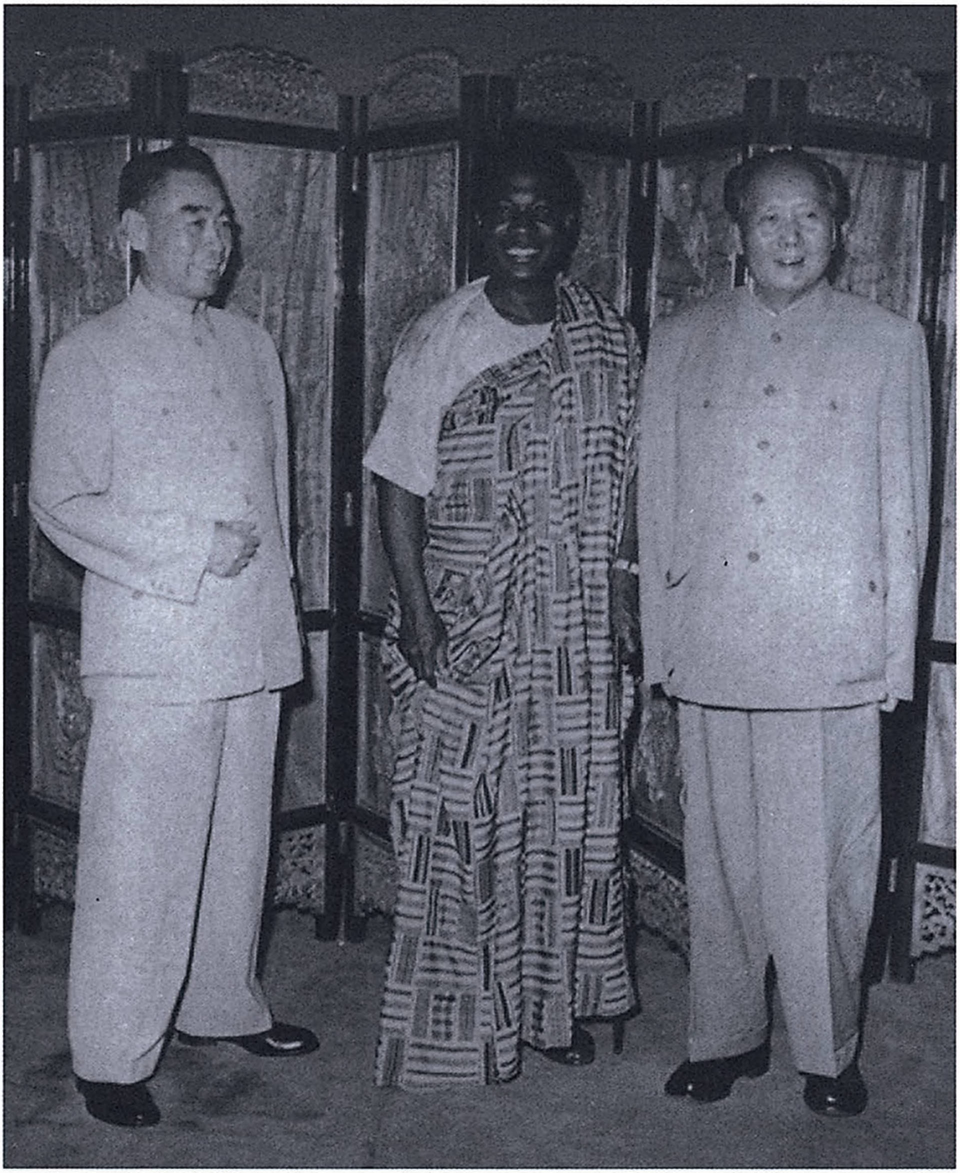
再有，集中与分散的矛盾，七千人大会之后，我看没有解决，还要继续做工作，民主与集中的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达到集中的目的。要让人家讲话，不民主，集中不起来，还要做工作。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敌对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积累过多，民主与集中还要做工作。阶级存在不存在？国内形势如何？矛盾，一个是敌我矛盾，一个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个肃反问题，还有反革命存在，要看到，看不到不好，看得太严重也不合乎事实。

1962年8月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会见拉丁美洲朋友。



1962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会见巴西著名经济学者平托和夫人。



1962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加纳总统恩克鲁玛。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

（1962年8月9日）

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二十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

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还有南斯拉夫的方向。（有人插话：国民党在台湾搞了一个政纲，土地收为农民所有，但又保护地主。）各地方、各部专搞那些具体问题，而对最普遍、最大量的方向问题不去搞。

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

（有同志揭露邓子恢的问题）派干部下去，而思想不“定一”，不讨论就走，这种办法不好。为什么不请邓子恢来？他不来，我们对台戏唱不成。建议中心小组再加五个人：邓子恢、王稼祥、康生、吴冷西、胡绳。

资本主义思想，几十年、几百年都存在，不说几千年，讲那么长吓人。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搞得干干净净？历代都是如此。苏联到现在几十年还有修正主义，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实际是反革命。

《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有一段按语讲资产阶级消灭了，只

有资本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讲错了，要更正。

有困难，对集体经济是个考验，这是一种大考验，将来还要经受更重大的考验，苏联经过两次大战的大考验，走了许多曲折的道路，现在还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困难比苏联的困难更多。

全世界合作化，我们搞得最好。因为从全国说，土改比较彻底，但也有和平土改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坏分子与马步芳[1]分子。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不等于解决了意识的反映。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高级合作化、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消灭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七年提出思想政治革命，补充了不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

苏联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八年单干了近十年，没有出路，斯大林才提出搞集体化。一九三五年才取消各种购物券，他们的购物券并不比我们少。

找几个同志把苏联由困难到发展的过程，整理一个资料。这事由康生同志负责，搞一个经济资料。

动摇分子坚决闹单干，以后看形势不行又要求回来。最好不批准，让他们单干两三年再说，他们早回来，对集体经济不会起积极作用。

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

---

[1] 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历任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西北行营副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场。

（康生同志插话：现在的价格，低出高进，不利于集体经济。）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由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思想上有了分歧，领导要有个态度，否则错误东西泛滥。反正有三个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买办阶级，美国资本主义农场，平均每个场有十六户，我们一个生产队二十多户。包产到户，大户还要分家，父母无人管饭，为天下中农谋福利。

河北胡开明[1]，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个“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一九六〇年以来，讲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么。

有没有阶级斗争？广州有人说，听火车轰隆轰隆的声音，往南去的像是“走向光明”“走向光明”，往北开的像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有人发国难财，发国家困难之财，贪污盗窃。党内有这么一部

---

[1] 胡开明，曾任河北省省长，主张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

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

每一个省都有那么一种地方，所谓后解放区，实际上是民主革命不彻底。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

民主革命二十八年，在人民中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力量比较集中，妇孺皆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以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

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两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对这些人应让他们讲话，让他们讲出来，讲比不讲好，言者无罪，但我们要心中有数，行动要少数服从多数，要有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说："要正确处理单干，纪律处分，开除党籍……"我看带头的可处分，绝大多数是教育问题，不是纪律处分，但不排除对带头搞分裂的纪律处分。

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

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1]），就要代表富裕农民。

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

我们这政权包了很多人下来，也包了大批国民党下来，都是包下来的。

罗隆基说，我们现在采取的办法，都是治标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是不搞阶级斗争。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和平过渡，就是稳不过渡，永远不过渡。

---

[1] 曾希圣（1904—1968），湖南资兴人，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安徽农村不少地方曾实行了包产到户。

我在大会上只出了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有的只露了一点意思，过两天可能顺成章。

三年解放战争，猛烈土地改革。土改后，对两种资本主义的改造很顺利。有的地区的民主革命还是不彻底，比如潘汉年[1]、饶漱石[2]，长期没发现。

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是资本主义残余，国外是屈从帝国主义的压迫，莫斯科宣言上这两句话是我加的。

一九五七年国际上有一点小风波，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六月刮起十二级台风，他们准备接管政府，我们来个反攻，所有学校的阵地都拿过来了。反右后，五八年算半年，五九年、六〇年大跃进，六一年开始搞十二条，六二年搞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

过去分田是农民跟地主打架，现在是农民跟农民打架，强劳动力压弱劳动力。

有这样一种农民，两方面都要争夺，地富要争夺，我们要争夺。

小资产阶级、农民有两重性，碰到困难就动摇，所以我们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就是共产党领导。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两千万人[3]，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

---

[1]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后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判刑，终获平反。

[2] 饶漱石（1901—1975），江西临川人，20世纪50年代初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因参与高岗组织反党集团而于1955年3月被开除出党。

[3] 指因经济困难和调整而从城市、工厂返回农村的人口。

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有事情总是同各省、市和各部商量，可是有些部就是不同中央商量，中央有些部做得好，像军事、外交，有些部门像计委、经委，还有财贸办、农业办等口，问题总是不能解决。中央大权独揽，情况不清楚，怎样独揽？人吃了饭要革命，不一定要在一个部门闹革命，为什么不可以到别的部门或下面去革命呢？我是湖南人，在上海、广州、江西七八年，陕北十三年。不一定在一个地区干，永远如此。中央、地方部门之间，干部交流，再给试一年，看能否解决，陈伯达同志说不能再给了。

财经各部委，从不做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谢天谢地，最近组织部来了一个报告。

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

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

关于领导机关应加强
请示报告工作的批语[1]

（1962年8月10日）

此件[2]值得一阅。中央对国内很多情况不清楚。许多领导机关封锁消息，不作论证性的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实行独立王国。而国外使馆消息，却如此认真而迅速。请同志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把这个十几年的老毛病改一改呢？如果再不改，那就只有执行纪律的一条路了。

毛泽东
八月十日[3]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党委1962年8月5日关于阿尔及利亚情况和使馆的看法给外交部的报告上。

[2] 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党委给外交部的这个报告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阿尔及利亚民族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和当前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的矛盾，也提出了使馆党委的一些分析和看法。

[3] 毛泽东批语的时间手稿上写为“8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上印为“8月11日”。

在中央组织部七月份综合报告[1]上的批语

（1962年8月12日）

印发各同志[2]。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现在部长安子文同志在经过批评之后，觉悟了，这就好了。希望毛病不要重犯。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62年7月29日给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常委的7月份综合报告中检讨说，长期以来，没有向主席和常委报告工作，反映情况，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今后，一定引以为戒，努力改正。报告主要讲干部队伍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认为在干部队伍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一部分干部的精神状态不正常，二是干部队伍过于庞大。报告对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邓子恢[1]关于农村工作政策意见的批评[2]

（1962年8月12日）

此件[3]是一九六一年夏季庐山会议时印发文件之一，现在重印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中共中央办公厅1981年3月9日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对1962年批判邓子恢的问题，国家农委党组在这个报告中说，1962年春天，邓子恢从巩固集体经济出发，根据调查所得材料，除主张贯彻执行稳定小队所有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保留“小自由”，固定生产队的粮食征购任务若干年不变外，还强调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他提倡的责任制形式，主要是由生产队向作业组实行包工，零星小活也可以包到人；此外，只是对田间管理和一些集体不便进行的技术活，可以包到户，联系产量，超产奖励。他的这些意见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说成是“提倡包产到户”，刮“单干风”，并联系过去的事又对他进行了批判，说他是为1955年对他的批判搞翻案。实际上邓子恢并不是提倡包产到户和鼓吹单干，而是想找到一种将集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形式。其实，回顾当时实际情况，在一些经济极端困难的地区，允许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是必要的，也不算什么错误。至于1953年邓子恢针对有些地方农业合作化中急躁冒进的情况提出了必须注意防止急躁冒进的意见，无论从当时或事后来看，都是正确的。

[3] 指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61年8月24日编印的《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毛泽东对这个材料曾写过批语。

发给各同志[1]。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那时还是正确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二部分的十条措施[2]，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单干问题），对形势的看法（第一部分的十条分析[3]）也很正确。过了一年（其实只有十个月，即一九六一年八月到一九六二年五月底为止），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就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

---

[1]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2] 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二部分列举的10条：（一）许多地方群众留粮和国家征购的数字都不能落实，群众普遍要求把征购任务定下来，3年、5年甚至10年不变。（二）退赔普遍不彻底。（三）一部分地区还没有按照规定给社员留足自留地。（四）平均主义思想依然存在。（五）在一部分生产力破坏严重的地区，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对集体生产丧失信心，以致发展到“按劳分田”“包产到户”“分口粮田”等变相恢复单干的现象。（六）在经营管理方面，发现了一些错误做法。有些地方在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中，把全年一半以上的农活包工到户，结果导致变相的“包产到户”或“部分产量包到户”，损害了集体生产。（七）有的地方在分社、分队中，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八）去冬今春改造的一部分三类社、队中，错排队、错划成分、干部处分面过宽等问题，尚未处理。（九）干部思想认识和作风上的问题还很多。（十）群众虽然对农业六十条热烈拥护，欢欣鼓舞，但是还普遍存在怕变的心理。

[3] 指《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材料第一部分基本情况中分析形势所列举的10项表现：（一）初步调整了社、队规模。（二）退赔已经部分兑现。（三）进一步确立了以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四）给社员分配和补充了自留地，发展了家庭副业。（五）普遍恢复了“三包一奖”和定额管理、评工记分等制度。（六）过去用行政命令方式组织起来的“全民食堂”大部分有领导地解散了，真正出于群众自愿的食堂巩固下来了。（七）普遍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的办法。（八）多数地方对于今年夏收分配比较重视。（九）各地普遍重视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十）各地对于恢复和发展生产有了更大的信心。

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我们欢迎子恢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核心小组会议上所作的声明。他说，他在最近几天，已经觉得自己的单干主张是不正确的了，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没有联系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他那时，在城市，则主张依靠资产阶级，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则是不够的，所以我在那会议上给他指出了这一点。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

对陶铸[1]在中南组发言要点的批语[2]

（1962年8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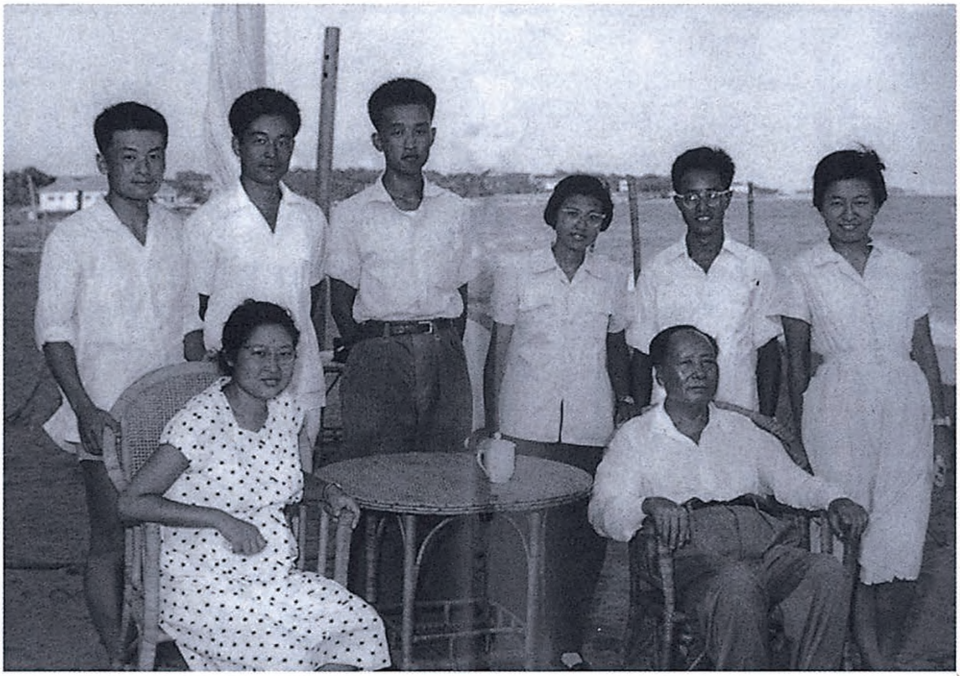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8月12日印发的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上，这份简报刊登了陶铸8月10日在中南组的发言要点。陶铸说，我认为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一开始就提出几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下面讲一点个人的认识：（一）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承认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不承认，那怎能叫做共产党？可是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少数同志确有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现象，特别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想搞阶级斗争，企图另找“出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肯定是长期的。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只要富裕中农作为一个阶层存在一天，这个斗争也就会存在一天，而且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在中南地区，已经分户单干的尽管不算多，闹单干的或想搞单干的还大有人在，决不可低估。对于已经分户单干的，首先要表明党的坚定态度，教育广大干部和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具体工作上，则必须采取谨慎的步骤，不能简单粗暴。关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形式，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重视，加以解决，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着。（二）形势问题。国际方面，形势大好。国内形势的好转，对国际形势影响很大，所以，首先还是要把国内工作做好。做好国内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恢复与发展农业。农业恢复了，工业随之也可以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三）对几个矛盾问题的认识。陶铸着重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积累与消费的矛盾、统一与分散的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谈了自己的看法。

已阅，很好。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1962年8月，毛泽东和李敏、孔令华、李讷等在北戴河。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8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朝鲜解放十七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般的全体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七年来，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保卫自己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坚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创造了伟大的业绩。现在，朝鲜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跨上千里马的气概，信心百倍地为实现宏伟的七年计划和攻占今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六个高地而奋斗。中国人民像对待自己的成就一样，为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预祝朝鲜人民在已有的胜利基础上，进一步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东方前哨，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朝鲜人民为迫使美国侵略军撤出南朝鲜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这一爱国正义斗争，直到朝鲜人民取得最后胜利。

中朝两国是兄弟盟邦和亲密战友。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几年来，随着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密切合作，随着两国领导人的互相访问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两国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像长白山一样巍峨永存，像鸭绿江水一样长流不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14日

对公安部关于当前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我们的对策报告草稿[1]的批语

（1962年8月15日）

印发各同志[2]。如有意见，请提交谢富治[3]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

[1] 公安部党组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报告（8月8日草稿）说，今年以来，主要是4月以后，一部分城市盗窃、抢劫和凶杀案件有些上升，少数城市治安秩序一度比较混乱，反革命分子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暴露。对当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我们拟采取边暴露边打击的方针，这样既可以适当地暴露敌人，打得准，打得狠，又使安全有比较可靠的保证，不至影响社会秩序。具体做法上我们完全赞成中央的指示，在依靠群众的基础上，主要采取侦查破案的办法，一般地不搞群众镇反运动。这次打击反革命分子现行破坏活动的重点放在大中城市、东南沿海、铁路交通沿线和一部分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暴露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统统追查出来，严肃处理。在处理时要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同时，必须继续加强治安工作。公安机关在自己的一切活动中，都要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党委的领导。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3]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党组书记、公安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电报[1]

（1962年8月15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成功地连续发射了“东方三号”和“东方四号”载人的卫星式宇宙飞船，实现了在宇宙空间的联合编队飞行，并且使飞船顺利地返回地面，这是苏联人民在征服宇宙空间方面的新的重大的胜利。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无比的兴奋。我们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向驾驶宇宙飞船的宇宙航行员尼古拉耶夫少校和波波维奇中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苏联人民的这一新胜利，是对人类征服宇宙空间的又一次伟大贡献，它再一次显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威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大大鼓舞了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的电报。祝贺苏联“东方三号”和“东方四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

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和争取人类进步的斗争。我们衷心地祝苏联人民在征服宇宙空间的宏伟事业中继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15日

对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稿[1]的批语

（1962年8月16日）

印发各同志[2]讨论。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8月16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8月10日稿），全文共6条，内容包括干部交流的意义、范围、对象以及工作计划、步骤等。决定说：为了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有计划地、系统地、多方面地交流经验，为了帮助各级主要领导干部扩展眼界，丰富经验，提高领导水平，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对各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下之间、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有计划地进行交流，并且把定期交流干部作为我党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交流的范围和对象，主要是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同年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全文由6条增为8条，关于交流范围和对象将“公社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改为“县以上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

[2]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胡开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报告[1]的批语[2]

（1962年8月16日）

印发各同志[3]讨论。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

[1] 中共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1962年8月8日上送的这份报告说，农村人民公社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特别是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还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生产队没有建立起生产责任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和基层干部、社员商量了一个办法，这就是：生产队组织长期的固定的生产组，实行“三包”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是：一、由社员自愿结合组成一个六、七、八户或六、七、八个劳动力的生产组，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二、生产队把全部土地都分到生产组，耕畜、农具也尽可能分到生产组使用，在一般情况下长期不变。三、根据土地好坏，首先进行土地分等，评出常年每亩产量数、用工数和投资数，然后计算出全组的土地总产量、总用工和总投资数，签订“三包”合同，认真执行。四、到了秋后，包产以内的全部产量，由生产组交生产队统一分配；包产以外的超产部分，完全归生产组按劳分配。报告还说，“如果把包工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辅助的办法，例如在生产组中把某些少量的、技术性强的作物（如烟叶）和留种地，包给个别有经验的社员去负

责经营管理，那是有好处的”。

[2]　这个批语写在胡开明1962年8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关于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加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我于7月30日华北局的农业工作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的建议。发言稿已由华北局抄送中央一份。现在我又把它打印了一下。特再送您一份，请予抽空审阅为盼！”

[3]　指当时正在北戴河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1962年8月，毛泽东会见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

对李先念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的批语[1]

（1962年8月17日）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八月十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李先念1962年8月16日上送关于等价交换问题的口头汇报提纲给毛泽东的信上。提纲说，目前市场方面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存在着两个市场、两种价格。计划市场的价格低，自由市场的价格高，两者悬殊很大。在国家同农民之间和农民相互之间的两种交换形式中，农民吃亏的不等价是主要的，国家吃亏的不等价是次要的。在当前生产不足、物资有限的情况下，短期内难以找到根本解决两个市场、两种价格和等价交换问题的办法，只能采取一些过渡性的措施。现在我们设想的有以下几项：第一，有步骤地、适当地缩小统购派购的范围，以便集中物资力量，换购主要农产品。第二，逐步提高粮、棉、油换购中国家供应主要商品的比重。第三，在国家完成粮、棉、油的统购任务以后，开放粮、棉、油的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自由交易，调剂余缺，并且由供销合作社适当地经营贩运。不允许私营商贩经营粮、棉、油。第四，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在农村自由市场的领导作用。第五，对粮、棉主要产区的生产队迫切需要的中小农具，尽可能做到平价供应。第六，在国家财力物力可能的条件下，加强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支援。在采取上述经济措施的同时，还要强调政治挂帅，不断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动员他们帮助国家共同克服目前的暂时困难。

对中央军委工作报告[1]的批语

（1962年8月18日）

发各同志[2]。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总之，党、政、军、民，都是很好的，是天下无敌的。看不出这一个本质，就是机会主义者。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1962年8月10日关于军委5月至7月的工作情况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这3个月军事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一）采取紧急措施，准备粉碎美蒋匪帮对我东南沿海的可能进犯；（二）在中印边境西段，同印度的蚕食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提前进行1962年度的征兵工作。在5月下旬至6月中旬的紧急备战中，部队士气高昂，各参战部队都做到了“一声令下，立即出动”，党政机关密切配合，全力支援，人民群众积极支前，团结对敌。以上工作现在均已大体告一段落。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1]

（1962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获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并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和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喜悦。

中罗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中国人民将始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的电报。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八周年。

终不渝地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加强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并同罗马尼亚人民一起，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而奋斗。

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8月22日

对邓子恢[1]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2]的批语

（1962年8月26日、29日）

一

印发各同志[3]。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

二

看来，单干论在我们的军事干部中还有一点市场，但是不占多数，占绝对多数的同志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

[1] 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1962年8月20日送毛泽东阅示的对邓子恢所作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反映。反映说，5月31日和6月1日两个上午，邓子恢在总后礼堂作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干部3000余人。听报告后，有些人有意见，提出了疑问：一、觉得报告“有气”“有情绪”。有的干部对他所说的“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很不满意，认为这样讲影响不好。二、对报告中说单干也有一定的优越性，不少同志认为不妥当。三、认为报告对农村形势的分析有问题，使人感到农村问题成堆。四、报告中有些讲法和中央口径不大一样。如说农民的自留地、小开荒、借地将要增加到不超过耕地总面积的20%，这和六十条的规定不一致。与此同时，也有些同志认为这个报告在有些方面讲得深透，“很解决问题”，有的还“很欣赏这个报告”。这主要是：一、对批评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很感兴趣。二、认为对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讲得细、讲得新。三、对他的“敢讲话”表示赞扬，认为“很有风格”“思想很解放、很大胆”。此外，还有人说邓子恢的作风好，他“经常下去作调查，掌握了很多材料，比一般干部了解的情况具体”。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1962年，农业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图为贵州省锦屏县三江公社给社员分配超产奖励。

1962年，河南漯河的牲畜市场。

对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1]的批语

（1962年8月27日）

请尚昆[2]印发到会各同志[3]讨论。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各同志可不再发。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1962年8月26日报送毛泽东的这一试行草案共40条，对以下8个问题作出了规定：(一) 商业工作的方针；(二) 坚持等价交换原则，推广农产品收购合同制度；(三) 改进国营商业工作；(四) 恢复供销合作社；(五) 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六) 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七) 恢复同农村商业有关的农产品加工作坊；(八) 改善商业企业的经营管理。陈伯达为报送这个草案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此件在北戴河重发给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各同志。听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草案对商业工作问题，提出了许多解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可以根据一年来的经验和最近大家提的意见，作些新的补充和修改。"中央准备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再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巨任吾[1]给毛泽东、刘少奇来信[2]的批语

（1962年8月29日）

应令其治疗疾病，病好后分配适宜的工作。至其所犯案件，应

---

[1] 巨任吾，即向明，原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因所谓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1963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向明问题的甄别情况报告说，省委1955年9月向中央作的“关于检查领导情况及对向明同志处理意见的报告”和1957年6月向中央作的“关于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专案审查总结报告”是错误的，决定予以撤销，恢复向明的党的生活。1963年5月，向明写出书面报告，同意山东省委作出的结论，并表示“深感满意”。文化大革命中，向明又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80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复查，并报中央书记处通过，认为过去认定他“在政治上、组织上、精神上积极支持饶漱石，参加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是不能成立的。中央决定撤销对向明所作的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结论和给予他的处分。

[2] 巨任吾196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信中说，我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被指控犯有“反党反人民罪行”，于当年10月6日被责令“进行隔离反省”。1961年12月28日，虽然被宣布“解除隔离反省”，但组织上一直没有对我的案件作出结论，对于过去指控的是非也没有作任何说明，而现在却要分配我到某经济研究所工作。为此，我不能不再次请求对我的问题作出相应的结论，同时还要说明我身患多种疾病，健康状况极坏，故请求治疗，以便在今后能够支持工作。

根据实际情形，加以据〈处〉理，不枉不纵。

毛泽东
八月二十九日

1962年，毛泽东看望刘少奇一家人。

对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稿[1]的批语[2]

（1962年8月31日、9月14日、10月7日）

---

[1] 中共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8月31日，第一稿）共有7个部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9月27日通过的这个决定，增加了1部分，共有8个部分。《决定》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商业工作的基本出发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正确地利用价值规律，通过适当的购销形式，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逐步保障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应。现阶段我国商品流通有3个渠道：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集市贸易。国营商业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商业的主体和领导力量。合作社商业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集市贸易是农民之间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场所，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要，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必要补充。另外，为了组织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内市场，《决定》还对商业方面的集中统一、分级管理问题作出了规定。关于商业经营管理制度和有步骤地整顿充实商业部门工作人员队伍等问题，《决定》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28日稿）》上写的批语。毛泽东将“28日”改为“8月31日”。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决定》（9月9日，第二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先念和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1962年10月5日给毛泽东的信上写的批语。信中说：“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稿子，作了一些修改。现在把修改本子送上，请审批。”

一

请尚昆[1]同志印发全会各同志[2]讨论。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二

印发各同志讨论。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三

此件[3]即送周[4]阅，再送刘、朱、邓阅，请邓办理。

毛泽东
十月七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3] 指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的修改稿。

[4] 周，指周恩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2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十七年来，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展开爱国竞赛运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斗志昂扬地执行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并祝越南人民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履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和侵略，已经激起全体越南人民的无比义愤，并且遭到越南南方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我们再次重申，越南人民反对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南越、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祝越南民主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越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62年9月1日

对李富春关于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的信[1]的批语

（1962年9月4日）

共三件[2]，印发各同志[3]研究。

毛泽东

九月四日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62年9月2日写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中说：明年计划，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虽然不讨论，但粮食、棉花、木材、煤炭这四个重要生产指标需要及早定下来。这四个指标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关系到整个农、轻、重的安排，是决定明年支援农业、加强国防、改善市场和争取财政经济进一步好转的最重要的物质条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为此，我建议由恩来、小平、彭真等同志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找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书记，议一议这四个指标，大致能定一下，以利于编制明年计划，早做生产准备工作。我个人意见，明年木材生产必须有2350万立方米，棉花生产至少2000万担以上，争取2400万担，这经过努力是完全可能的。关于支援农业问题，希望各省、市、区能在10月中旬提出明年和今后的切合实际的具体意见，然后由计委汇总平衡，编制全国的计划，提供下次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2] 指：一、李富春给毛泽东的信，见本篇注释一。二、国家计划委员

会党组1962年8月16日关于安排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主要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执行今年计划的主要情况。（二）编制明年计划的问题。报告最后说，明年的经济形势，肯定要比今年更好。三、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1962年8月10日关于支援农业的报告。报告讲了4个问题：（一）支援农业，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造，实质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必须坚决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三）1963年支援农业的安排；（四）加强调查研究，迎接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造的新高潮。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谷城、光化、襄阳三县旱灾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2年9月8日）

共十一件[2]，印发各同志[3]阅。这些都是灾情的报告，可以看到干部的努力，群众的积极性，人心的稳定，虽有减产，也有增产，即在灾区也不是一片黑暗。中国人是可以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的。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湖北查灾工作组刘忆中1962年9月3日关于谷城、光化、襄阳3个县旱灾情况给周恩来的报告说：我们在谷城、光化、襄阳三个县看了8个区，13个生产大队。总的情况是：干旱严重，减产程度很大，稻谷地区比杂粮地区严重，丘陵地区比平原地区严重，粮食作物比经济作物严重。这13个大队大体可分为3种类型：一、特别严重的，秋季无收的面积占80%左右，有收的产量为数不多，群众根本分不到口粮。二、严重的，秋季无收的面积占50%左右，口粮水平每人每月平均4至6斤。三、一般的，秋季无收的面积占30%至40%，口粮水平每人每月平均10斤左右。受灾严重的地区，地委县委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不少工作，群众情绪基本稳定，生产积极性也很高，目前正在翻耕送肥，积极准备冬播。但今冬明春群众生活安排还有困难。

[2] 指湖北查灾工作组刘忆中1962年9月3日关于谷城、光化、襄阳三个县旱灾情况的报告，山东灾情调查工作组同日关于山东灾情的报告，陕西灾情调查工作组同日关于陕西灾情的报告，甘重斗同日关于四川灾情的报告，中央农村调查工作组1962年9月2日关于黑龙江海伦县情况的报告，翟自强1962年9月4日关于湖南省衡山县今年受灾情况的报告，国务院湖南工作组刘春同日关于灾情调查情况的报告，广东工作组同日关于广东雷州半岛灾情的报告，国务院吉林工作组关文启1962年9月3日关于吉林白城子地区灾情的报告，国务院贵州工作组姜凯风1962年9月4日关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灾情简报，内蒙组马夔翁1962年9月3日关于内蒙古灾情的报告。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的同志。

对陶鲁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要点[1]的批语

（1962年9月8日）

陈伯达同志：

此件值得一看。我看是讲得对的。

毛泽东

九月八日

退毛。

---

[1] 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62年8月2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要点刊登在商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简报第十一期上。要点说：一、商业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在购销活动中正确处理我们同农民的关系问题。因为，农村是我国国内市场最广阔、最主要的场所。二、商业战线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当前，商业工作中有以下几个重大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收购农产品的购留比例问题。（2）工农业产品的等价交换问题。（3）收购农产品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奖售或换购工业品的比例问题。（4）收购农产品时，对待集体经济单位和社员个人的关系上的问题。（5）工商关系问题。（6）商业队伍不强，经营管理不善，物资损失严重。

三、对市场物价问题，华北小组一致同意第三个方案，即采取大部不动、小部调整的方针。现在农民迫切要求提高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所能换购到的工业品比例，我们认为，第一步要力争达到50%，第二步达到80%以上。解决目前存在着的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矛盾，根本关键也在于发展生产。我们要重视利用价值法则，促进工农业生产。四、开放农村集市贸易，可以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办法是：把供销社的工作搞得更活一些，在集市贸易上，能够有吞有吐。对集市贸易的领导，应当以经济措施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管理，同时，在群众中还要经常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教育，以利于打击和防止投机倒把活动。五、促进棉花生产是当前十分尖锐的问题，文件中要表示中央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六、文件可能有三种写法：(1) 只写当前的问题；(2) 只写长期的根本性的问题；(3) 既写当前的，又写长期的。我主张兼顾二者，侧重当前。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2年9月8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安·于哥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保加利亚人民、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同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对此，中国人民感到高兴。

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一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不断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对于促进我们两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同保加利亚人民携手合作，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共同事业

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

关于改善生产队经营管理问题的批语[1]

（1962年9月8日、25日）

一

陶铸、任重、平化、延春[2]同志：

此件[3]请一阅，阅后我们谈一下。

退毛。

二

印发各同志[4]。请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注意研究，并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改善生产队的经营管理问题。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他的侄子、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省

农林水办公室副主任毛华初1962年8月7日来信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年9月9日来信上的批语。张平化的信中说，毛华初的信和毛主席的批示我已读过。华初信中提到的生产队经营管理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生产责任制属于经营管理的具体形式问题，在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有利于调动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等原则下，应当允许多种多样。华初提到的“产量责任制”，我们也作过一些酝酿。现在看来一般地提倡“产量责任制”，容易发生错觉，如果领导骨干不强，确有滑到包产到户的危险。但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统一分配的前提下，某些部分农活、部分作物，实行联系产量评定奖罚或者以产记工，作为整个生产责任制的一种辅助形式，是可以允许的。目前群众中有许多好的经营管理经验，需要我们加以总结和推广。现送上王延春寄来的《介绍一个经营管理搞得很好的生产队》的材料，请审阅。省委准备同各地委、市委书记讨论后加以推广。王延春寄来的材料是湖南省委工作组总结的汉寿县洲口公社小港大队第十三生产队的经验。材料说，这个生产队几年来集体经济得到巩固，生产获得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经营管理上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严格的生产责任制。生产队根据各种农活的不同情况和各个时期生产的需要，按照统一安排和群众自愿相结合的原则，组成临时的劳动小组，实行临时的小段的季节的或者常年的包工以及专业性的包工，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个人操作，有的责任到组，有的责任到人。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其他副业生产，牲畜、农具、水利和其他公共财物的管理，也都实行责任制。在推行生产责任制中，生产队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二、实行民主办队；三、加强劳动纪律；四、实行勤俭办队；五、学习总结农民群众耕作的经验。

[2]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平化，即张平化。延春，即王延春，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3]　毛华初1962年8月7日信中写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一共讲了5个问题：（一）关于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的问题；（二）经营管理问题；（三）自由市场和交换问题；（四）干部教育工作问题；（五）整顿党团支部工作。在第二个问题中，他说：目前农业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上，实行产量责

任制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具体做法为：统一经营，分户管理，产量到丘，责任到人，统一分配，按产奖罚。

[4]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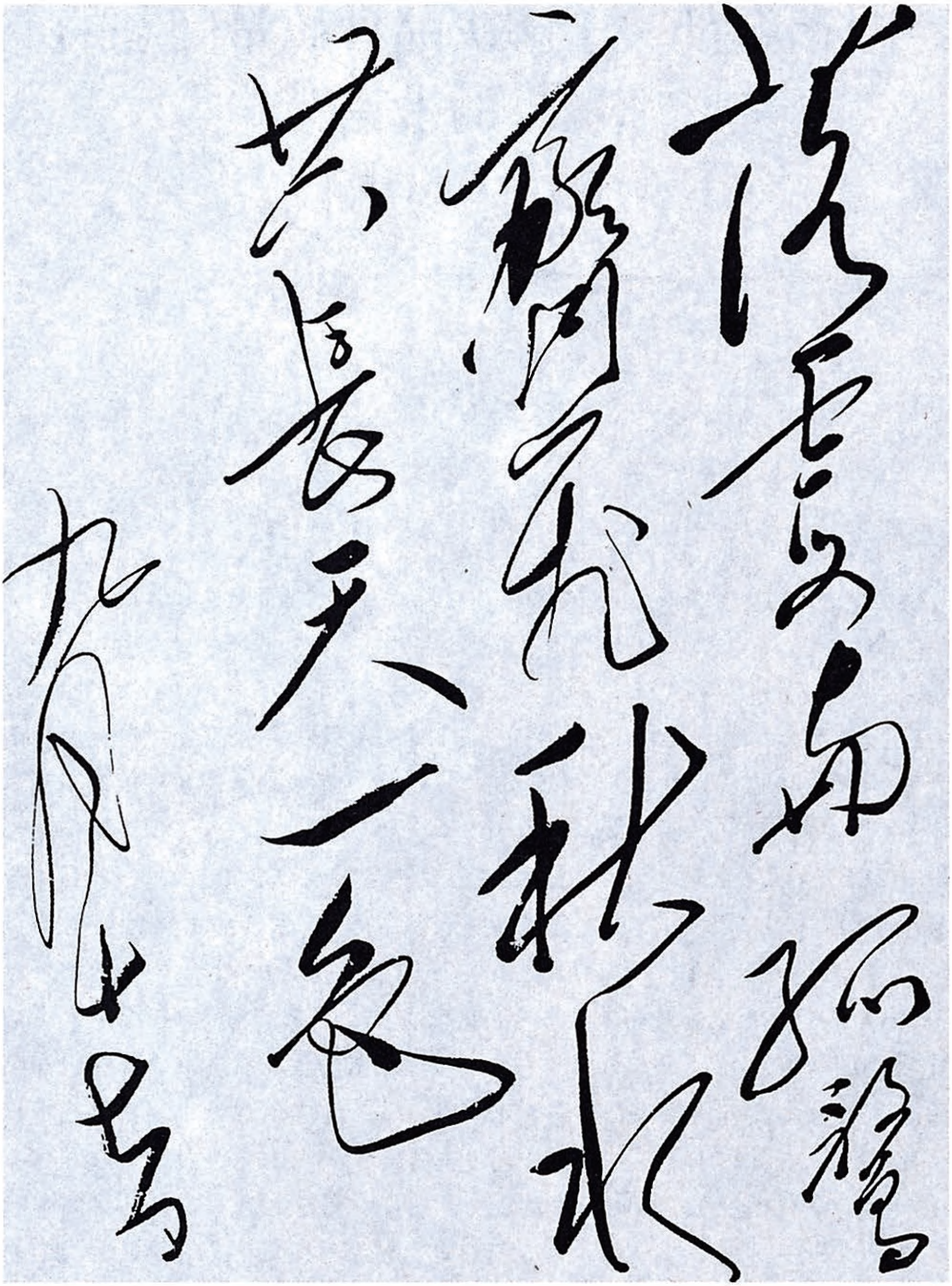
书赠毛岸青、邵华联[1]

（1962年9月17日）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

[1] 1962年9月17日，毛泽东在和毛岸青、邵华谈话时，一边背诵王勃《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中的佳句，一边评论，兴奋不已。他坐到桌前，欣然提笔，挥毫写下了这副联句赠给他们。现在毛泽东手书的这副摘句联悬于滕王阁高约3米的立柱之上。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杨开慧所生。邵华，毛岸青之妻，1938年生于陕北延安，1960年和毛岸青结婚，在军事科学院工作。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毛泽东书

毛泽东书赠毛岸青、邵华的联句。

对冶金部关于解决品种质量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2]

（1962年9月14日）

江青阅，很重要。

退毛。

九月十四日

---

[1] 冶金工业部党组1962年9月11日关于解决品种质量的情况和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近几年来在品种质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1）目前冶炼的钢种已达850个（1957年为372个），合金钢比例将从1957年只占3％增至今年占8％，优质钢今年将产200万吨（1957年为70万吨）。（2）轧制钢材中的短线品种将从1957年占钢材总量的42％增为今年占56％，其中24个稀缺品种将从1957年占钢材总量的15％增为今年占28％。（3）冶金系统已有7个专门的研究院，技术人员约4000名，今后将逐年增加到1万人。（二）修正主义不要我们自力更生。苏联不给我们高级合金钢的技术资料，又禁止苏联专家向我们传授这方面的技术。重要轧机也不给我们，企图要我们永远依靠它，受它的控制。（三）农业技术改造和国防尖端用的品种目前还不能完全做到自力更生。一般机械所需金属品种现在我们能解决90％以上，比较高级的化肥、电站设备、飞机所需金属品种我们能解决80％，还有10％至20％的品种有待今后攻坚解决。（四）需要时间，很有希望。我们估计，金属品种的大致齐全，需要20余套关键性的轧机，它的

制造、安装和技术掌握要在1970年左右可能达到目标。同时，还需要解决各个品种的数量使其达到适当的比例。

[2] 这个批语写在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1962年9月11日随送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现在写了一个关于冶金工业的品种质量及有关自力更生问题的报告，主要是想从最近几年来的品种质量有很大进步这个侧面，说明目前我国所达到的水平。如主席能抽出时间，我希望找主席谈一次。

给杨尚奎[1]的信

（1962年9月14日）

杨尚奎同志：

邵式平同志提出的几项意见[2]，请你与刘俊秀及其他在京同志谈一下，提出你们的意见。中央搞的农业和商业等文件，是否已将邵的某些意见包括进去了？《人民公社六十条》之外，是否还要搞一个《试办章程》？请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杨尚奎，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江西省省长邵式平1962年8月7日对巩固农村集体经济问题提出的三条意见：（一）建议中央搞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试办章程草案。在组织上要明确社员的权利、义务和人民公社的民主集中制。干部应由民主选举，要规定只有社员才能当选为公社干部。原则上必须由社员自己负责办好公社，社员有权选举干部，干部必须接受社员监督。不称职的干部，社员经过法定手续，可以罢免。这是当前巩固集体经济的必要措施。（二）交换问题。产品交换权与所有权要相适应。既然生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基层供销社就应以公社为单位，以生产单位（集体所有）为交换单位，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有好处的。（三）非农业人员下放到公社仍然是非农业人口，吃国家供应粮，这等于没有下放。城市人员转移，也等于没有下放。这样并没有因下放人员而减轻国家安排粮食困难的程度。

对《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与发展线索》一文的批语

（1962年9月15日）

少奇[1]同志：

此文[2]可一阅，如你有时间和兴趣的话。阅后交陈伯达[3]同志一阅。然后还我。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所谓伦理学，或道德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是讨论社会各阶级各不相同的道德标准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其基本对象是论善恶（忠奸、好坏）。统治阶级以为善者，被统治阶级必以为恶，反之亦然。就在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

[1] 少奇，即刘少奇。

[2] 北京大学教授周辅成写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62年9月9日《文汇报》上。文章讲了以下四个问题：伦理学来源于阶级斗争；为奴隶制社会生活所决定的特点；围绕“中庸”“和谐”为中心的表现形式；争论的问题与派别。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为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1]

（1962年9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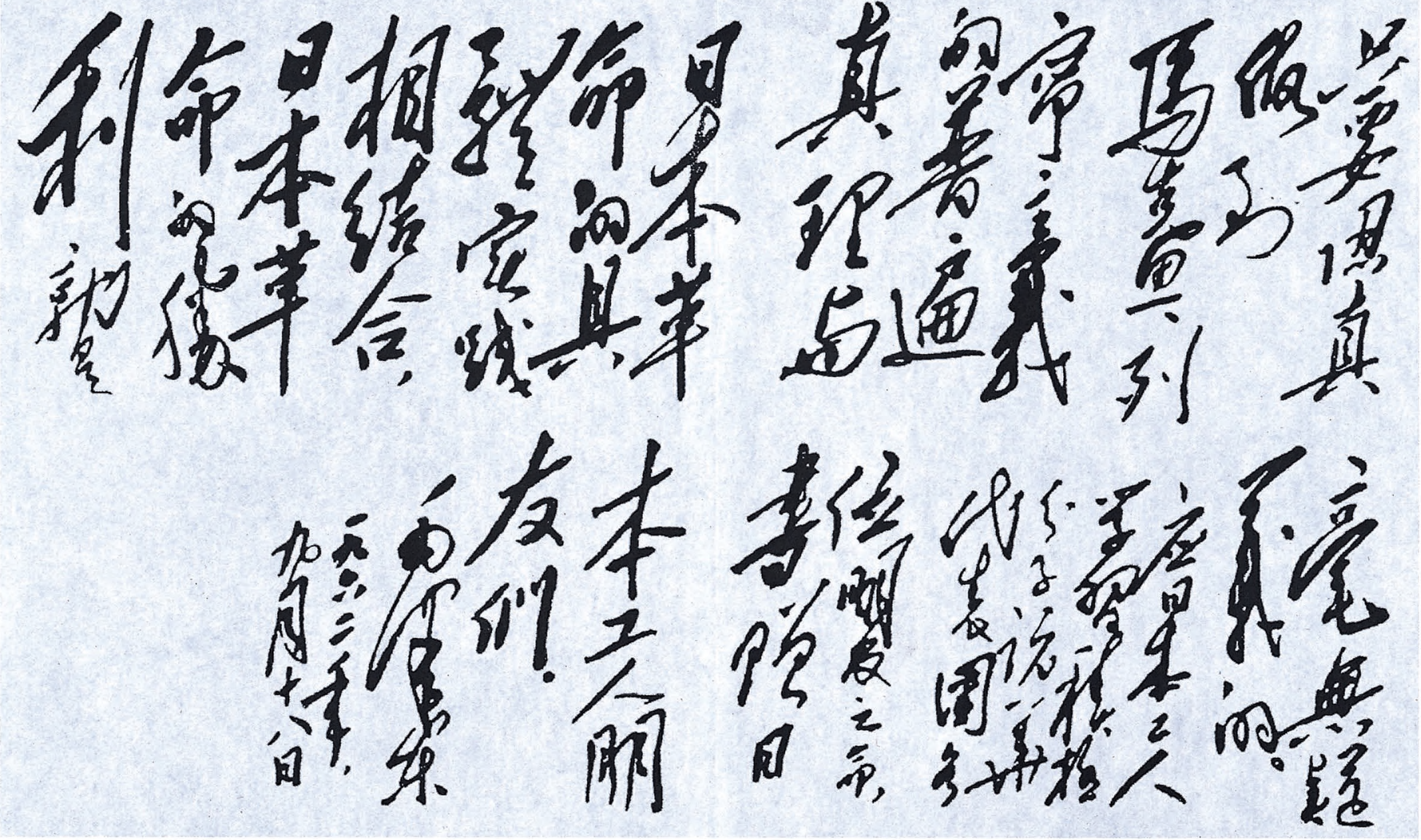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

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

[1] 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接见了由日本工人教育协会副会长宫川实率领的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且为日本工人朋友们写了这个题词。当时对题词没有报道。1968年，在这个题词六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用第一版一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题词，刊载了题词手迹。



只要認真做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義的。應日本工人學習積極分子訪華代表團各位朋友之命，書贈日本工人朋友們。

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

毛泽东为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

对《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的批语[1]

（1962年9月24日）

印发各同志[2]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2年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载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一文的上方。文章作者是红旗杂志社编辑阎长贵。文章说，只要工作就可能犯错误受挫折，谁要是怕犯错误和怕受挫折，而不敢做工作，那么这样的人也就永远不会很好地工作。人们正是在“吃一堑，长一智”，接受了错误和挫折的教训而变得聪明起来的。有些人以为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殊不知不做工作本身就是最大的错误。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2年9月24日上午）

现在是十点，开会。

这次中央全会解决了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农业问题；二是商业问题，这是两个重要问题，还有工业问题、计划问题，这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三个是党内团结问题。有几位同志讲话，农业问题由陈伯达同志说明，商业问题由李先念同志说明，工业计划问题由李富春、薄一波说明。另外，还有监察委员会扩大名额问题，干部上下左右交流问题。

会议不是今天开始的，这个会开了两个多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到北京差不多也是一个月。实际问题在八、九两月，各个小组（在座的人都参加了）经过小组，实际上是大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不需要很多时间了，大约三天就够了，二十七号不够就开到二十八号，至迟二十八号要结束。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阶级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因为阶级问题没有解决。国内不要讲了。国际形势，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存在，那是资产阶级国家，是没有解决阶级问题的，所以我们有反帝任务，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就是要支持亚、非、拉三大洲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这么多

的人，但不包括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如尼赫鲁，也不包括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日共叛徒春日庄次郎，主张结构改革论，有七八个人。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重提阶级斗争。

那末，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是要复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如英国、法国等都曾几次反复。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这种反复，如南斯拉夫就变质了，是修正主义了，由工人、农民的国家变成一个反动的民族主义分子统治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就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

面。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

国内形势：过去几年不大好，现在已经开始好转。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因为办错了一些事情，主要由于认识问题，多数人没有经验。主要是高征购，没有那么多粮食，硬说有。瞎指挥，农业、工业都有瞎指挥。还有几个大办的错误。一九六〇年下半年

就开始纠正。说起来就早了，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了，然后十一月、十二月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然后四月上海会议，就注意纠正。这中间，一九六〇年有一段时间对这个问题讲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压我们，注意反对赫鲁晓夫了。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开始，他就想封锁中国海岸，要在我们国家搞共同舰队，控制沿海，要封锁我们。赫来我国就是为了这个问题。然后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赫支持尼攻击我们，塔斯社发表声明。以后赫来，十月在我国国庆十周年宴会上，在我们讲坛上攻击我们。然后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围剿我们。然后两党会议，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还有一个华沙会议，都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争论，一九六〇年一年，与赫打仗。你看，社会主义国家，马列主义中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根子很远，事情很早就发生了，就是不许中国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是阻止中国革命，说不能打内战，要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就要灭亡。当时我们没有执行，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后，又怀疑中国是南斯拉夫，我就变成铁托。以后到莫斯科，签订中苏同盟互助条约，也是经过一场斗争的，他不愿签，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签了。斯大林相信我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呢？是从抗美援朝起。一九五〇年冬季，相信我们不是铁托，不是南斯拉夫了。但是，现在我们又变成“左倾冒险主义”“民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了。而南斯拉夫倒变成“马列主义”者了。现在南斯拉夫可行啊，吃得开了，听说变成了“社会主义”，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实也是简单的。道理就是一条，就是阶级斗争问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反马列主义的斗争问题，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

问题。

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都是好的。开国初期，包括我在内，还有刘□□，曾经有这个看法，认为亚洲的党和工会、非洲的党，恐怕受摧残。后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不是我们所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斗争，无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是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出现了古巴革命，出现了阿尔及利亚独立，出现了印尼亚洲运动会，几万人示威，打烂印度领事馆，印度孤立，西伊里安荷兰交出来了，出现了越南南部的武装斗争，那是很好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苏伊士运河事件，埃及独立，阿联偏右，出现了伊拉克，两个都是中间偏右的，但它反帝。阿尔及利亚不到一千万人口，法国八十万军队，打了七八年之久，结果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所以，国际形势很好。陈毅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

所谓矛盾，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各国人民反对反动资产阶级，各国人民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各国人民同修正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作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

工作问题有几个文件，有工业的、农业的、商业的等，有几个同志讲话。

关于党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资产阶级问题，

我看还是照我们原来的方针不变。不论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时的那个路线，只要认真改变，都表示欢迎，就要团结他，要团结，治病救人，惩前毖后，团结——批评——团结。但是，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敲一下吐一点，不能采取这样的态度。为什么和尚念经要敲木鱼？《西游记》里讲，取回的经被黑鱼精吃了，敲一下吐一个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要采取这种态度，和黑鱼精一样，要好好想想。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认识错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面来，我们就与你团结。在座的几位同志，我欢迎，不要犯了错误见不得人。我们允许犯错误，你已经犯了嘛！也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不允许犯错误，不许改正错误。有许多同志改的好，改好了就好嘛！李维汉的发言就是现身说法。李维汉的错误改了，我们信任嘛！一看二帮，我们坚决这样做。还有很多同志，我也犯过错误，去年我就讲了，你们也要允许我犯错误，允许我改正错误，改了，你们也欢迎。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的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广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们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

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工作问题，还请同志们注意，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说："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这一操，就被扰乱了，工作受到影响。二十天还不够，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门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现在已经组成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把问题搞清楚，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也没有杀嘛。不要因阶级斗争干扰我们的工作，等下次或再下次全会再搞清楚。把问题说清楚，要说服人。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我们开杀戒，只是对那些破坏工厂、破坏桥梁、在广州边界搞爆破案、杀人放火的人。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得不好就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

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方向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请刘少奇宣布那几个人不参加全会。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人不参加。

（刘少奇宣布：政治局常委决定五个同志不参加全会：彭、习、张、黄、周[1]，是被审查的主要分子，在审查期间，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因为他们的罪恶实在太大了，没有审查清楚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也不参加重要会议，也不要他们上天安门。主要分子与非主要分子要有分析，是有区别的。非主要分子今天参加了会议。非主要分子彻底改正错误，给他们工作。主要分子如果彻底改正错误，也给工作。特别寄希望于非主要分子觉悟，当然也希望主要分子觉悟。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以使我们有清醒的马列主义的头脑。

一九五九年八届九中全会胜利粉碎了彭反党集团向党的进攻。十中全会又一次揭露彭反党活动的一高饶反党分子成员习仲勋。

官僚主义小则误国误民，大则害国害民。

第一，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主观瞎指挥的官僚主义。

第三，忙忙碌碌，不抓政治，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发展严重了，一种革命意志衰退、腐化、堕落，一种是互相勾结，敌我不分，官僚主义是修正主义的温床。

---

[1] 彭、习、张、黄、周，指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

治官僚主义的办法：接触群众，接触实际。

三自：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夜郎自大。

一高：高官厚禄。

一爱：爱形而上学，爱好资产阶级思想方法。

爱好形而上学，缺乏两分法，这表现在爱讲成绩，不讲缺点，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

遇事不作全面分析，扶得东来西又倒。

1962年9月，毛泽东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

1962年9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空军击落国民党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

1962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在听取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关于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情况的汇报。

1962年9月，毛泽东接见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的低空导弹部队某部营长岳振华。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
对工业支援农业的指示

（1962年9月24日）

搞了四年，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不大自觉，不大愿意。巩固集体经济有两方面：一是政策，二是支援农业。从长远来说是农业的技术改造，总的是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科学的研究，没有抓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说：科学院是搞尖端的。

要抓农业技术改造。

民主与集中，集中与分散，分散主义首先是中央（指综合部门）。农业机械化要搞个文件，二十五年左右实现机械化，同时实现工业化。有的同志在困难面前躺下。是消极好，还是鼓足干劲好？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提起注意。

对困难发生消极情绪是不是思想问题？

计委、经委、工交各部要加强支援农业。要抓紧改，这是机会，还来得及。

对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1]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2年9月26日）

一

印发各同志[3]。如有修改意见，请向中央书记处提出。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

二

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共、反人民、反对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反对中华人民共

---

[1]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于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这个公报9月27日在全会通过，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草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三、四、五、六、七是毛泽东对全会公报草稿的修改。本篇八是毛泽东在9月26日印发的公报稿（八届十中全会文件四十二）上写的批语。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同志。

〔和〕国及其他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独立国家而进行的种种罪恶活动，其结果适得其反，只是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的面目，使他们更加陷于孤立。

三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持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主要危险的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要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四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五

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团结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统一战线。

六

尽管过去几年连续遭到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其他困难，国民经济的情况，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又会好一些。

七

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八

有一些修改[1]，请小平[2]同志再议一次。

毛泽东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

1962年9月28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阮文孝。

---

[1] 即本篇五、六、七。此外，毛泽东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外事简报》第一三七期的批语

（1962年9月29日）

送王稼祥、伍修权、刘宁一[1]同志：

此件值得一阅。国内外修正主义都要里通外国。我们做国际工作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一点。否则一定会上当。如有必要，请你[2]找若干做外事工作的同志（例如十几个人，有外交部、外办、外交学会、对外文联[3]等处的同志参加）关〈开〉一次座谈会，以日本事件及其他事件（多得很）为例，引起警惕。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

[1]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伍修权、刘宁一，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2] 指王稼祥。

[3] 即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关于检查右派分子甄别试点问题的批语[1]

（1962年9月29日）

刘、周、邓[2]三同志阅。请邓查一下，此事[3]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六月、七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阅后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9月2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上。这期增刊登载了反映国家机关党委曾确定几个人为右派甄别试点对象的材料。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宣教动态》增刊第六十三期登载的这个材料说，今年六七月间，国家机关党委曾向几个单位分别布置了个别右派的甄别试点工作，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人的甄别试点工作，有的没有进行，有的刚开了个头，或者只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就停止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17日对中央统战部7月26日“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复示（中发〔62〕429号文件）指出：“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只是对于其中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即确实不曾有过右派言论、行动的，才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但是报告中所提‘如果右派分子本人和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包括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应该进行甄别’的意见，是不妥当的。”

付还，查后告我。

毛

九月廿九日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和江青接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夫人哈蒂妮·苏加诺。图为毛泽东和苏加诺夫人握手。

1962年9月29日，毛泽东、江青接见苏加诺夫人哈蒂妮·苏加诺。

对李先念关于改进商业工作问题的来信[1]的批语

（1962年9月30日）

刘、周、邓[2]、先念、富春、震林、一波[3]各同志阅。我认为此信写得很好，接受批评，认真办事。这样就有主动了，就不是见事迟，动手慢了，就不是官僚主义了。其他部、委也应当采取此种态度。附件[4]可看可不看。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62年9月28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主席9月22日批示我们注意西南小组讨论商业问题简报的内容，我们觉得西南小组以及全会其他小组对商业工作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很宝贵，很重要。我们要切实检查，认真改进。经请示邓小平同意，我们打算在国庆节后，立即召集商业、粮食、供销社、外贸、财政、银行各部党组成员开会，检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讨论如何具体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特别是抓支援农业、改善经营管理、改进工作作风问题，坚决扭转见事迟、动手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以便鼓足干劲，做好工作。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4] 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简报西南组第41号。

退毛。

毛泽东

九月卅日

1962年9月，毛泽东和阿根廷民间艺术团合影。

对西南组讨论商业问题决定的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2年9月）

李先念、陈伯达[1]二同志阅。此件[2]内容请注意。

退毛。

---

[1] 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9月21日印发的八届十中全会简报西南组第41号。简报说，9月20日上午西南小组继续讨论“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9月9日第二稿）”，并对当前商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一、几年来商业工作是有成绩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努力的。在目前物资少的情况下，商业工作有一定的客观困难，但对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不能忽视的。例如，大量商品物资霉烂损坏，浪费损失十分惊人。而有人对此竟满不在乎，这是值得注意的。有的经济情报，很快地就被敌人窃取。不少商业人员贪污腐化，队伍组织不纯，领导作风上的特殊化和官僚主义也是严重的。在价格、商品分配流转环节和经营管理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不少问题。对于商业工作中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商业部门应当认真检查，并向全会作一交代。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9月9日第二稿）”对商业工作的成绩作了足够的估计，另外建议对商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需要进行批评和整顿，在文件中也讲一讲，以促使商业工作的改进。“决定”中规定的方针政策，如何组织实施，一些重要问题如何解决，建议另开专门会议研究，作出具体规定。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

（1962年9月）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1] 这是毛泽东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62年9月）

此二件[1]，江青阅。退毛。

可看，很好。

---

[1] 其中一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2年9月16日印发的八届十中全会简报华东组第20号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9月14日下午在华东组的发言。陈毅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都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要批驳这种意见。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另一件不详。

1962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电台的指示[1]

（1962年10月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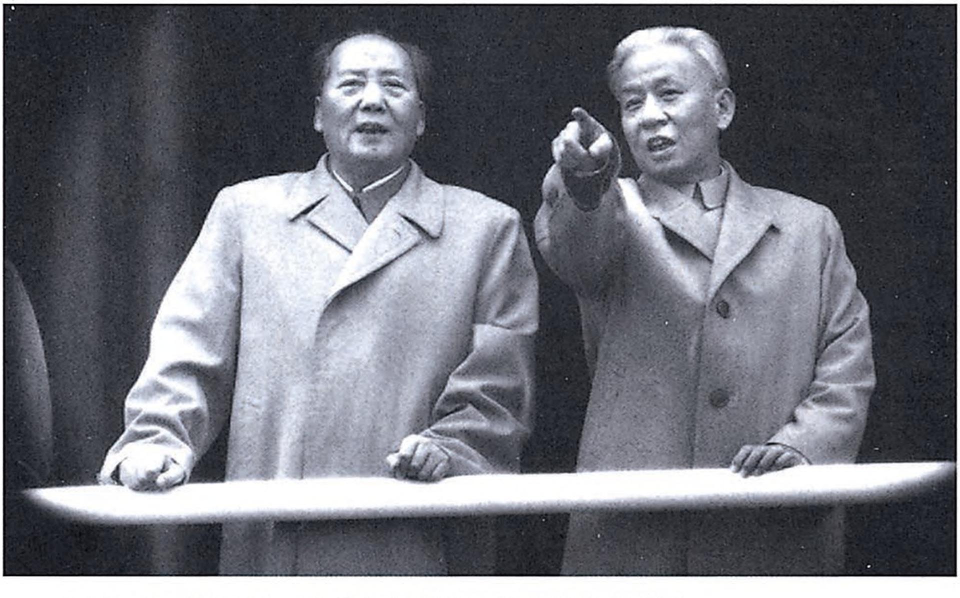
最近中东许多国家发生政变。搞政变的人开始就要夺取电台，向全国和全世界说话，原政府的声音人们就听不到了。我们的电台怎么样？是否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要从部队调一个强的干部去。

---

[1] 这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周恩来讲话的一部分。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庆祝建国十三周年大会主席台上。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度国庆节。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2年10月6日，毛泽东接见前来北京参加国庆庆祝活动的少数民族参观团。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1]

（1962年10月3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值此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的签订，对促进我们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两国经济与文化建设的共同高涨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相信，随着中蒙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我们两国的这种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关系，必将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中蒙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

日益巩固和加强。

祝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蒙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电报

（1962年10月6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德国统一社会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热烈的祝贺。

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德军国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现在，美帝国主义正积极支持西德军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侵略挑衅，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和平。这一切不仅遭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我们再次重申：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关于缔结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的严

正立场和合理主张。我们深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以及争取和平解决德国问题的正义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

中德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中国人民将始终不渝地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增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并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一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促进人类的进步事业而奋斗。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六日

对《恐“敌”病一例》[1]的批语

（1962年10月8日）

刘、周、朱、邓、瑞卿、富治[2]同志阅。此事拟在常委会上谈一谈。

毛泽东

十月八日

阅后退毛。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2年10月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348号上登载的《恐“敌”病一例》材料。材料说，据黑龙江省北安市委宣传部反映，今年8月间，该市双泉公社党委书记邱玉林夜间鸣枪赶狼，当地许多社、队干部和社员群众，听到枪声后误认为“敌人攻来”，惊恐万分，纷纷逃避。这种“精神状态”很值得注意。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富治，即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国庆的电报

（1962年10月31日）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理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费尔哈特·阿巴斯阁下，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书记穆罕默德·赫德尔阁下：

值此阿尔及利亚革命武装起义纪念日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和阿尔及利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1954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革命武装起义标志着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气概，通过七年多的武装斗争，愈战愈强，终于取得了民族独立。阿尔及利亚人民这一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极大地鼓舞了非洲和世界其他各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我们深信：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理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将会团结一致地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以及建设自己祖国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阿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胜利看成是对自己的有力支持。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

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并将永远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到底。

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对罗瑞卿[1]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2]的批语

（1962年11月3日）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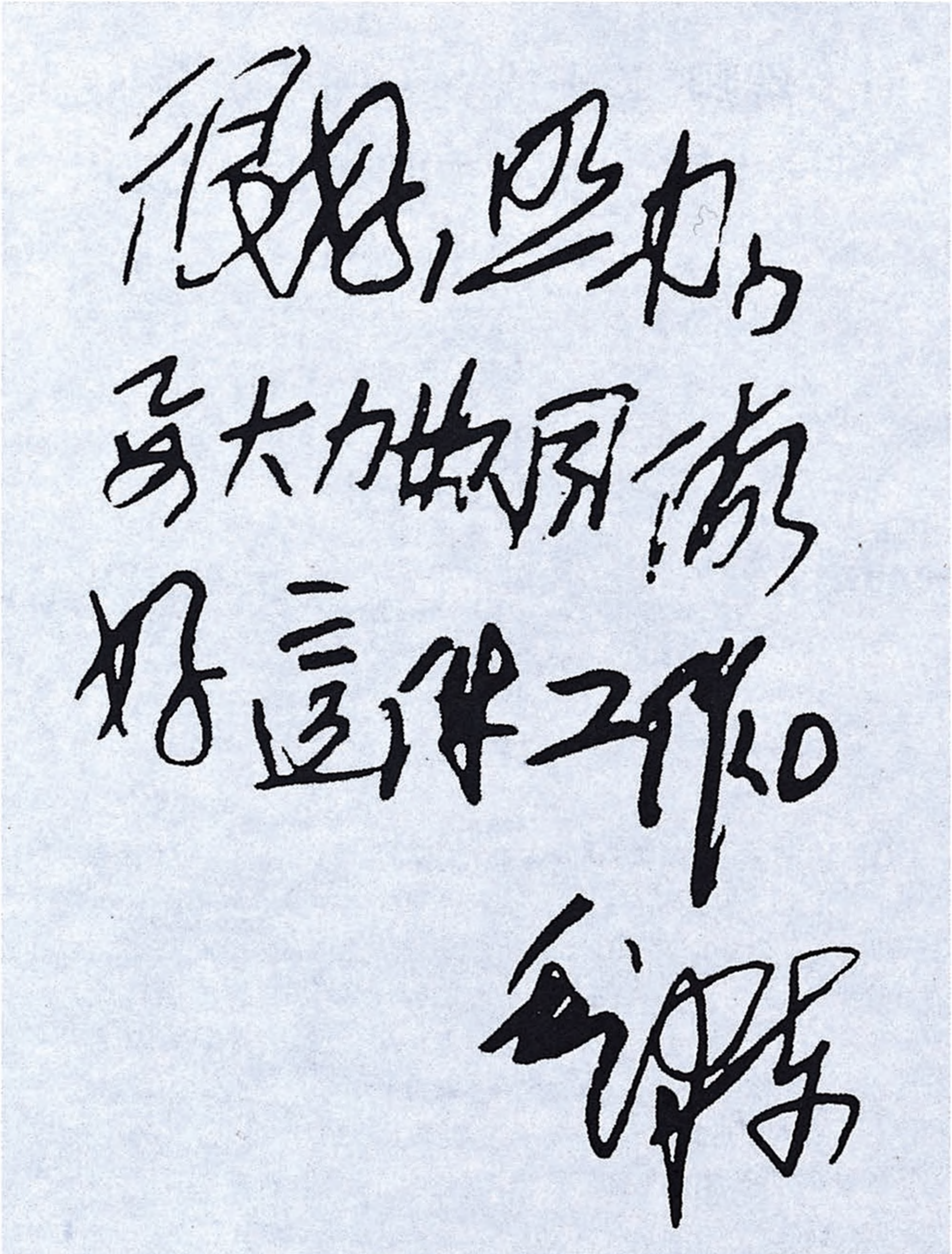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罗瑞卿1962年10月30日给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实现原子弹爆炸，是全国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水平的集中表现，绝非哪一个部门所能单独办到的。因此，除了二机部本身要做艰苦努力外，还必须取得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的密切配合，以及全国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援。现在，离预定的日期只有两年的时间，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随时检查、督促计划执行情况，并在必需的人力、物力上进行具体调度，及时解决在研究、设计和生产建设中所遇到的问题。这个建议在10月19日国防工业办公室向中央常委汇报时，刘少奇同志已原则同意。我们考虑最好由周恩来总理抓总，贺龙、李富春、李先念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



很好，照办。
要大力协同做
好這件工作。
毛泽东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准二机部关于争取两年内实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图为毛泽东批示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2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衷心的祝贺。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开辟了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纪元。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沿着十月革命所指明的争取彻底解放、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大道，向帝国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巨大胜利。现在，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正在蓬勃高涨，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个革命洪流奔腾前进。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叛乱，打败了德国法西斯的进攻，克服了各方面的重重困难，胜利地把苏联

建设成为具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对维护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现在，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正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无比的欢欣。

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我们两国的兄弟友谊和团结的加强和发展，符合于中苏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最高利益。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继续为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为维护和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竭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人民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到底。

祝兄弟的苏联人民在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巨大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给杨开智[1]的信

（1962年11月15日）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2]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

敬祝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

[1] 杨开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 杨老夫人，指杨开智和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等接见金融、铁道兵、财贸等专业会议代表。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日和解放日的电报

（1962年11月27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欣逢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五十周年和阿尔巴尼亚解放十八周年纪念日，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和最诚挚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五十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为了反对外国统治者的残酷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且赢得了民族的独立。后来，在反对法西斯的伟大解放斗争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又进行了英勇无畏和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法西斯侵略者，终于使自己的祖国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并且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八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表现了伟大的英雄气概，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艰苦奋斗

的革命干劲，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周围，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我们坚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阿尔巴尼亚人民向着自己既定的伟大目标胜利前进。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坚强的一员。它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南前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世界人民热烈的赞扬和崇高的评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一贯忠实于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以南斯拉夫铁托[1]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毫不调和的原则性的斗争，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各种斗争考验中已经证明了，阿尔巴尼亚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英雄的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荣的、战斗的、坚强的党，它不愧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坚贞的战斗队。中国人民对于能有这样坚强、这样亲密的战友而感到自豪。

中国人民和阿尔巴尼亚人民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我们两国人民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在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中阿两国人民一向同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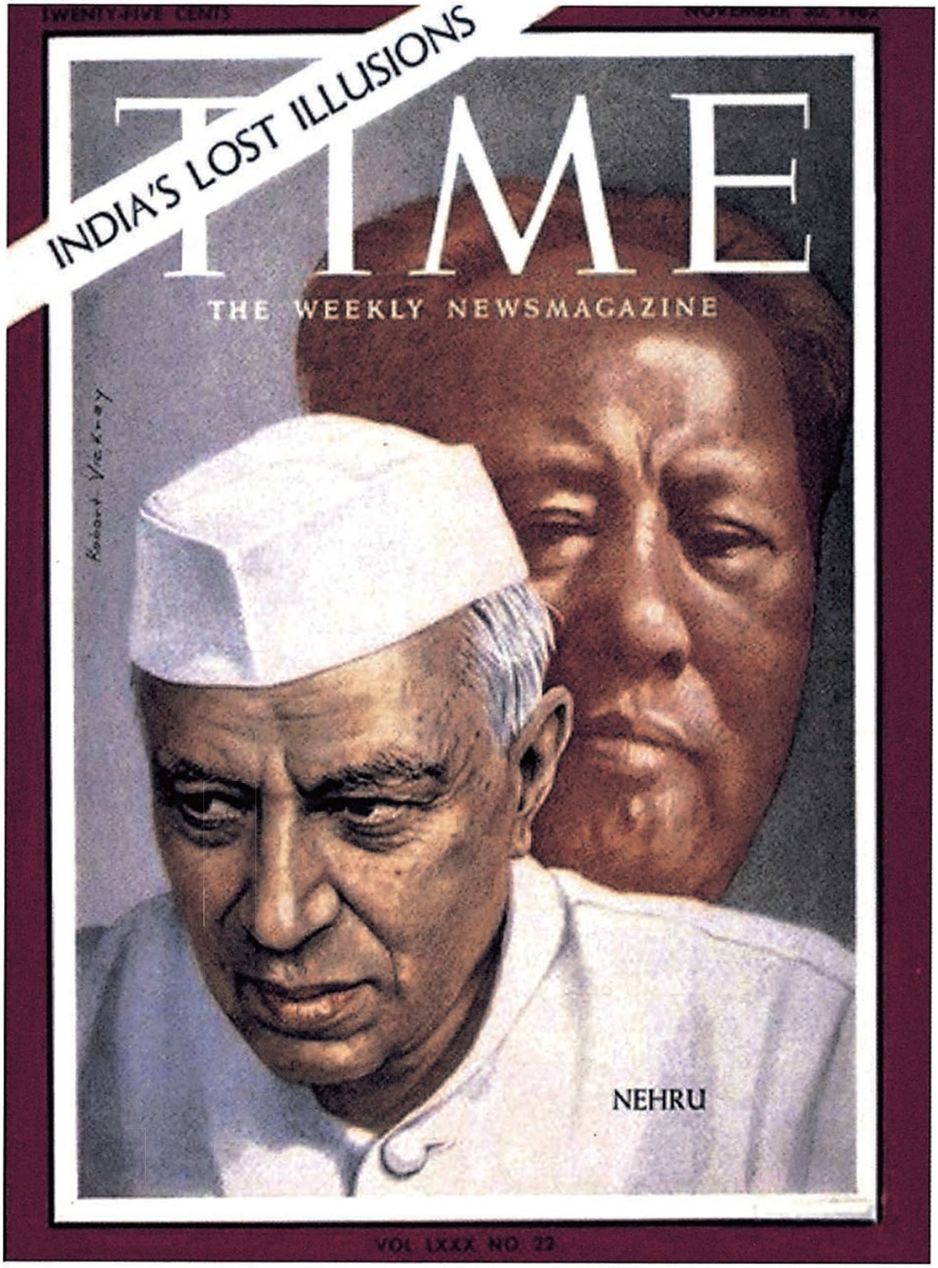
---

[1]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共和国总统。

苦，共命运，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TWENTY-FIVE CENTS
NOVEMBER 30, 1962
INDIA'S LOST ILLUSIONS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Robert Vickrey
NEHRU
VOL. LXXX NO. 22

1962年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1962年11月30日，毛泽东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一同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在一份外交信稿[1]上的批语

（1962 年 11 月 27 日）

总理：

近几天一些外交文件，在措词方面有些欠当，这就是一件，我改了一点[2]，请你再阅。

毛

廿七日早

---

[1] 指外交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2年11月27日给缅甸联邦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的信稿。

[2] 毛泽东在审阅这份信稿时，将“阁下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持的公正态度……对巩固亚非国家的团结、维护亚洲的和平，也将是珍贵的贡献”一句中的“珍贵的”改为“有益的”；将“中印边境上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已经开始有了好转机”一句中的“原先十分险恶的局势”改为“原先的那种局势”，将“转机”改为“缓和”；对“仅仅中国一方面采取这种行动，还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冲突不再起，也不利于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一句，删去“完全有效地”，将“防止冲突不再起”改为“防止冲突的再起”，删去“也不利于”。

1962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

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文的批语

（1962年12月14日）

小平[1]同志：

此文[2]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零时廿五分

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人民日报》原题为《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团结对敌》的一篇社论稿，毛泽东审阅时改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篇社论在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时，题目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对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一批材料[1]的批语

（1962年12月22日）

一

柯老[2]：

此件很重要，请你印发会议各同志[3]。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62年12月1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〇九期刊登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材料。材料的主要内容有：一、恩格斯逝世到斯图加特大会；二、哥本哈根大会到巴塞尔大会；三、大战爆发到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四、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五、昆塔尔会议；六、齐美尔瓦尔得的破产与第三国际的建立。另有附件：一、巴塞尔大会宣言；二、关于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政党的叛变的几个文件；三、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宣言；四、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几个文件。

[2] 柯老，指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同志。

二

古诗一首。咏后唐李克用[1]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崇〈存〉勖诗。

三垂冈[2]

英雄立马起沙陀，
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
连城犹〈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
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瑟〉三垂冈下〈畔〉路，
至今人唱百年歌。

---

[1] 李克用，唐朝沙陀部人，曾封为晋王。后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他被尊为太祖。

[2] 《三垂冈》这首诗为清朝诗人严遂成所作，毛泽东将它写在这一期《宣教动态》最后一页的空白处。

关于请刘晓[1]等来杭州一谈给刘少奇等的信

（1962年12月25日）

少奇、恩来、小平[2]同志：

我想请刘晓、伍修权、赵毅敏、廖承志[3]四位同志来杭州一谈，听取他们所知的情况和意见。他们可以缓缓南来，沿途（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作点调查研究，在年初（一月六日以前）到杭州即可。如你们及他们四位都同意的话，请即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五日

---

[1] 刘晓，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2] 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伍修权、赵毅敏，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

《冬云》诗[1]一首和给林克[2]的信

（1962年12月26日）

一

冬云诗一首

雪压冬云[3]白絮飞，
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泄，
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
更无豪杰怕熊罴[4]。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

---

[1] 这首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发表时，“高天滚滚寒流泄”一句改为“高天滚滚寒流急”。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冬云，作诗日期12月26日（作者的生日），在当年冬至后的第四天。旧说“冬至一阳生”，所以诗中说“大地微微暖气吹”，这里是比喻虽在冬至，大地并没有完全被寒流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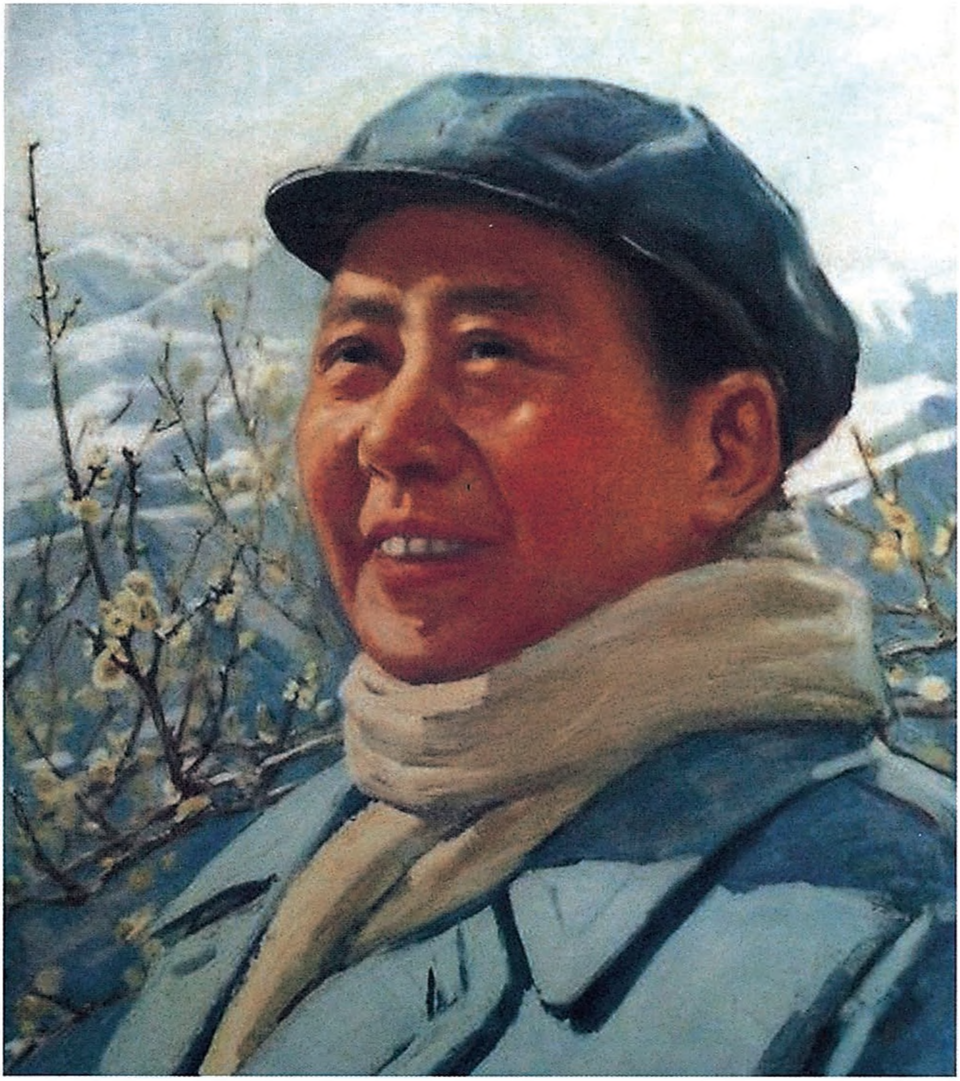
[4] 罴，熊的一种，现在叫马熊或人熊。

二

林克同志：

请将诗一首付印，于今天下午印成50份，于下午六时前交我为盼。

毛泽东
廿六日晨七时



《梅花欢喜漫天雪　冻死苍蝇未足奇》（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2年12月29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当此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五年前的今天，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君主政体，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开辟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祝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对《陶里亚蒂[1]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的批语[2]

（1962年12月30日）

小平[3]同志：

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上午二时

---

[1]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 这篇文章发表在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文艺报》刊载的三篇文章的批语

（1962年12月31日）

江青：

这里有三篇文章[1]，值得一看，看后退我。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四时半

周信芳、盖叫天两文[2]也已看过了，觉得还不坏，盖文更好些。

---

[1] 指1962年12月11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十二期刊载的张光年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歌手》、肖三的《第一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之歌》和时乐蒙的《唱着革命的战歌前进！》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是纪念《国际歌》作者鲍狄埃和狄盖特的。

[2] 指《文艺报》第十二期刊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的《必须推陈出新》和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的《“吾日三省吾身”》两篇文章。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的电报

（1962年12月31日）

哈瓦那

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革命胜利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最热烈和最诚挚的祝贺。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当代一个极其伟大的革命事件。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他们伟大的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武装斗争，推翻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古巴的反动统治，并在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后，又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西半球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英雄的古巴人民，一直坚持不渝地对全世界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近，古巴人民又一次沉重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严重的战争挑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古巴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周围，不畏强权，不怕暴力，坚

持革命原则，坚持五项正义要求，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保卫了古巴的独立和主权，保卫了古巴的革命，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荣誉，为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古巴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路线的胜利，这对于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我们坚信，英雄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阴谋。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古巴人民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古巴共和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站在古巴人民一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和古巴革命政府的正确路线，永远同兄弟的古巴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奋斗。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62年，毛泽东会见古巴工会代表团。

1962年，毛泽东会见古巴工会代表团。

1962年，毛泽东接受古巴文化代表团赠送的礼品。

毛泽东等向苏联领导人祝贺新年的电报

（1962年12月31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1963年新年来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衷心的、热烈的祝贺。

在过去的一年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喜悦。我们衷心地预祝兄弟的苏联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在建设共产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在新的一年中，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竭尽一切努力，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苏联人民在一起，坚持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

原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胜利而奋斗。

祝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万古长青，祝你们身体健康，祝全体苏联人民新年快乐！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批评新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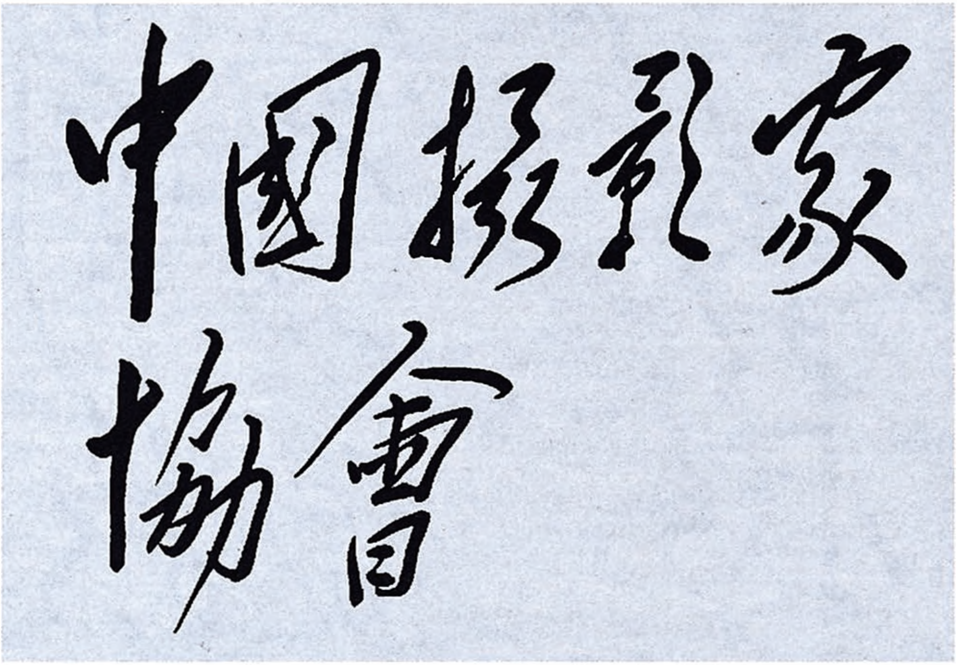
（1962年）

《内部参考》登那么多包产到户的材料是错误的，今后不要再登。办内部参考要有方向。

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名[1]

（19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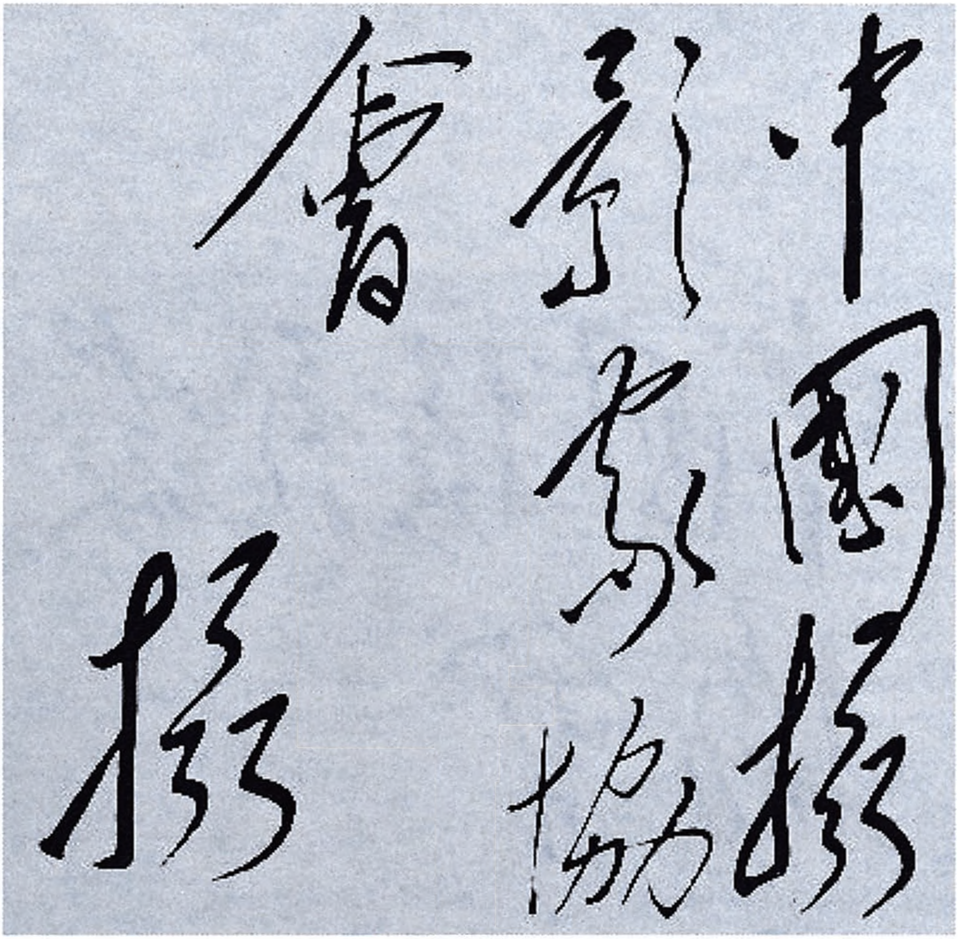
中国摄影家协会



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的会名。

---

[1] 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于1956年12月，当时定名为“中国摄影学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摄影组织。在1979年的全国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更名为“中国摄影家协会”，简称“中国摄协”。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给“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了会名。



1962年，毛泽东在杭州为“中国摄影家协会”题写的会名。

为邱桂荣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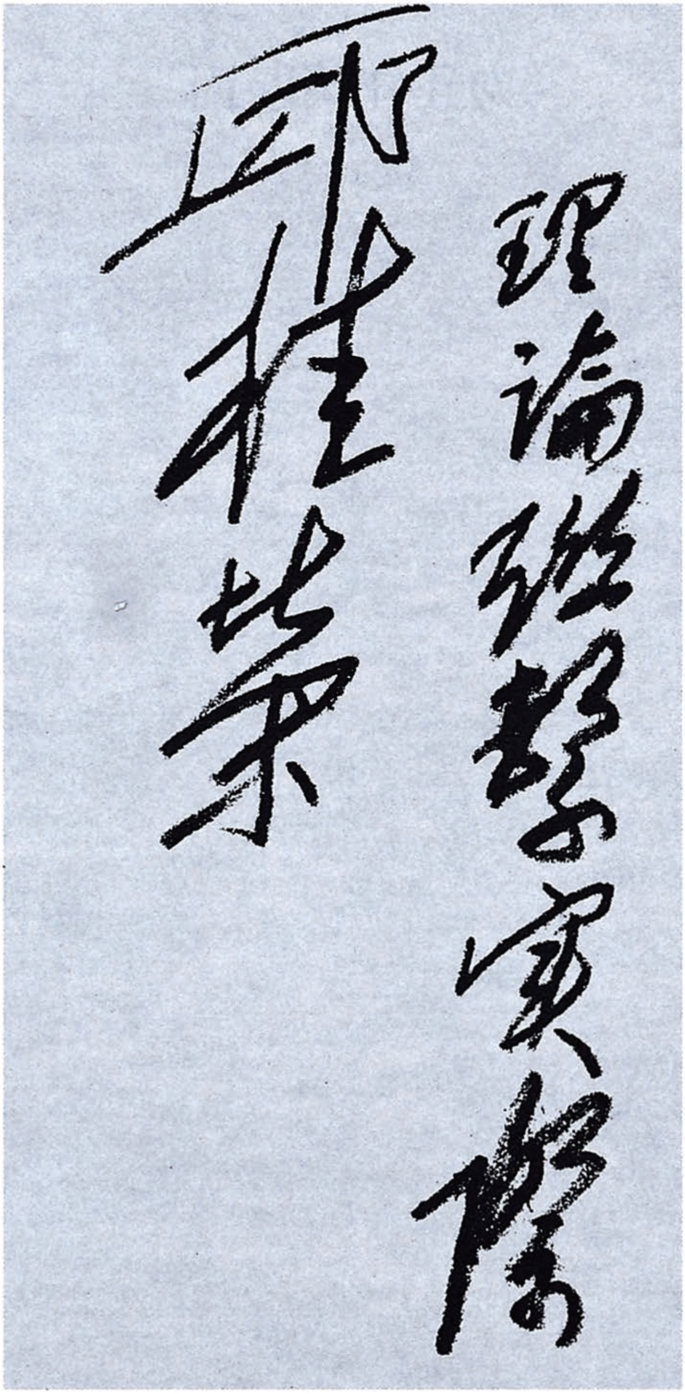
（1962年）

理论联系实际。

邱桂荣

---

[1] 这是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邱桂荣写的题词。



理论联系实际

邱桂荣

毛泽东为邱桂荣的题词。

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1]

（196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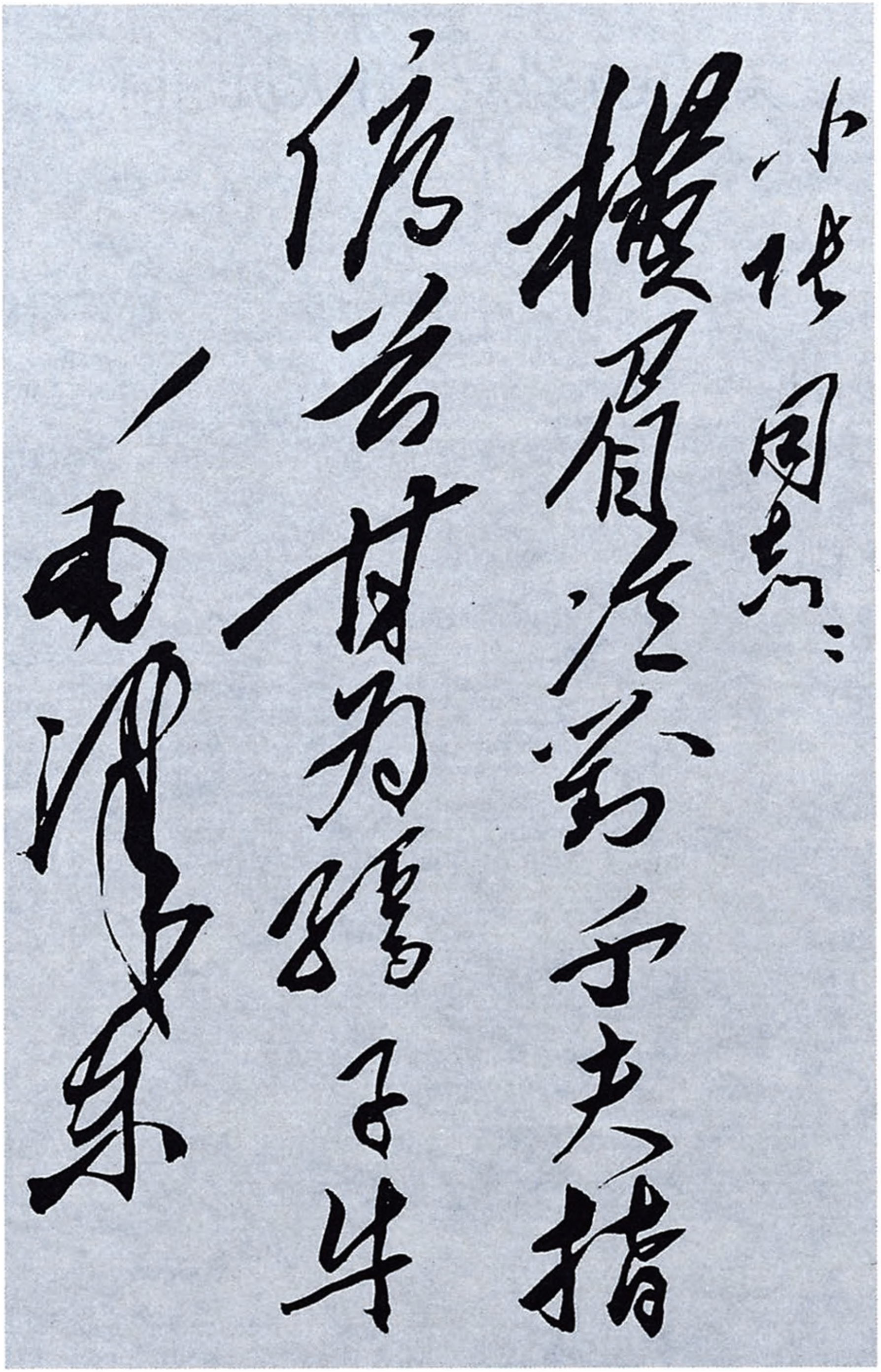
小张同志：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毛泽东

---

[1] 现在所见有一件手书：上款为小张同志，后面有冒号，下款为“毛泽东”。小张同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工作。



小张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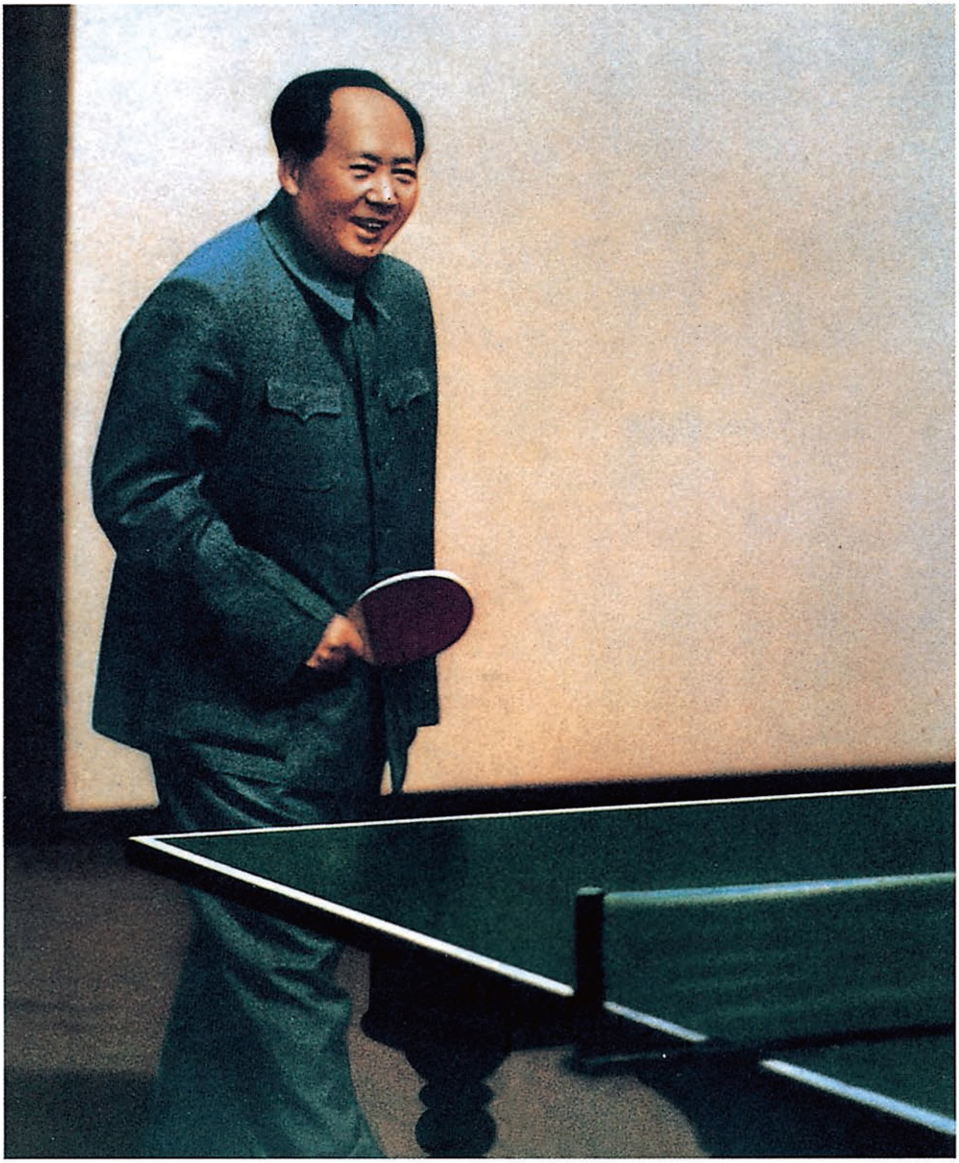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毛泽东

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小张同志的题词。

1963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打乒乓球。

关于送阅《史记·项羽本纪》的批语

（1963年1月3日）

《项羽本纪》，送各同志阅，几天还我不迟。

这个新版《史记》[1]，标号及注解，都很醒目，好看。

毛泽东
一月三日

---

[1]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西汉司马迁撰写，全书共130卷。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新版《史记》，指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点校本。

给李讷[1]的信

（1963年1月4日、15日）

一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了。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干部子弟（翘尾巴的）吃不开了，尾巴翘不成了，痛苦来了，改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2]，好，你不会再做河伯[3]了，为你祝贺！

爸爸

一月四日

---

[1]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当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

[2] 秋水篇，即《庄子·秋水》。李讷当时在学校里正学习《古代汉语》中“庄子”课程。

[3] 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庄子·秋水》中的主人公之一。

二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们多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爸

一月十五日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锦江俱乐部花园。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

（1963年1月6日）

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本来是观念论者，接受唯心论，以后接受青年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学说。阶级斗争的实践使他和恩格斯一起，创造了马克思主义，把整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改造过来。经过了哲学的革命、经济学的革命、社会学的革命，形成了阶级斗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阶级社会是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以这样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历史唯物论。在旧社会，接受旧社会的遗产，加以改造，使唯心辩证法变成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变成辩证唯物论，唯心论的历史观变成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经济学也是如此，由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也是如此，接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好的内容，如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加以改造，变成阶级斗争的学说，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

---

[1] 1963年1月6日下午5时至6时半，毛泽东在杭州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谈话。日方参加者有：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伊井弥四郎、冈正芳，中央委员、日共北海道委员会委员长西馆仁，中央委员、中央宣传教育文化部副部长冈本博之，中央委员平苇信行。中方参加者有：廖承志、伍修权、赵毅敏、江华等。这是毛泽东和日共中央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级专政，建立政党。这是常识，全体共产党员都知道。但是现在几十个党的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的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哪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都说自己是全民的党、全民的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孙中山和蒋介石也都是这样说的。美国反动派也说自己是全民的。日本也是如此，垄断资本说他自己代表全民。

只有共产主义者从来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从来不说他代表全民。他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不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也不代表小资产阶级。他代表无产阶级，引导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变成农民的党或小资产阶级的党。我党在很长期间，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认为代表农民，托派也这样说。其实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它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

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绝大多数人口的是共产党，不是社会党，更不是自由民主党。

1963年1月7日，毛泽东会见锡兰总理西丽沃·玛班达拉奈克夫人。

在中组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3年1月8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请准备印发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八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中共中央组织部1962年10月23日关于各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报告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各地对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普遍地引起了重视，做了许多工作，过去削弱和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有了很大转变。但是各地区贯彻中央指示还很不平衡。还有一些地方不能充分发扬民主，集体领导不健全，党内生活不正常。另外，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的极端民主化和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开始滋长。因此，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一、继续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地学习毛主席和中央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指示，全面领会和掌握指示的精神。二、按期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党委会、常委会以及领导干部的组织生活会，健全组织制度。三、为了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必须使党委摆脱行政事务，采取一系列措施发挥政府和各部门的作用。大权必须独揽，小权应当分散。四、加强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检查。报告最后建议中央尽早把党的工作条例草拟出来。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1963年1月9日）

小小寰球[1]，
有几个苍蝇碰壁。
嗡嗡叫，
几声凄厉，
几声抽泣。
蚂蚁缘槐夸大国[2]，
蚍蜉撼树[3]谈何易。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4]，
飞鸣镝。

---

[1] 寰球，指全地球。

[2] 蚂蚁缘槐夸大国，唐李公佐小说《南柯太守传》载：有个叫淳于棼的人，梦见自己在“大槐安国”做了驸马，又在南柯郡当了20年太守，权势显赫。等到妻子死后，官被解除，槐安国用车子送他回家。醒后追寻梦游之处，原来是在一株住着一堆蚂蚁的大槐树穴中。

[3] 蚍蜉撼树，蚍蜉，大蚂蚁。撼，摇动。这是对不自量力的人的嘲笑。唐韩愈《调张籍》：“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4] 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长安，唐朝都城，即今西安市。前半句化用唐贾岛《忆江上吴处士》一诗“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句，表示秋风已起虫子不好过了。鸣镝，古时一种射出去能发声音的箭，也叫响箭。这里借喻革命力量的声讨。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四海翻腾云水怒，
五洲震荡风雷激。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
全无敌。

附：郭沫若原词

满江红

沧海横流，
方显出英雄本色。
人六亿，
加强团结，
坚持原则。
天垮下来擎得起，
世披靡矣扶之直。
听雄鸡一唱遍寰中，
东方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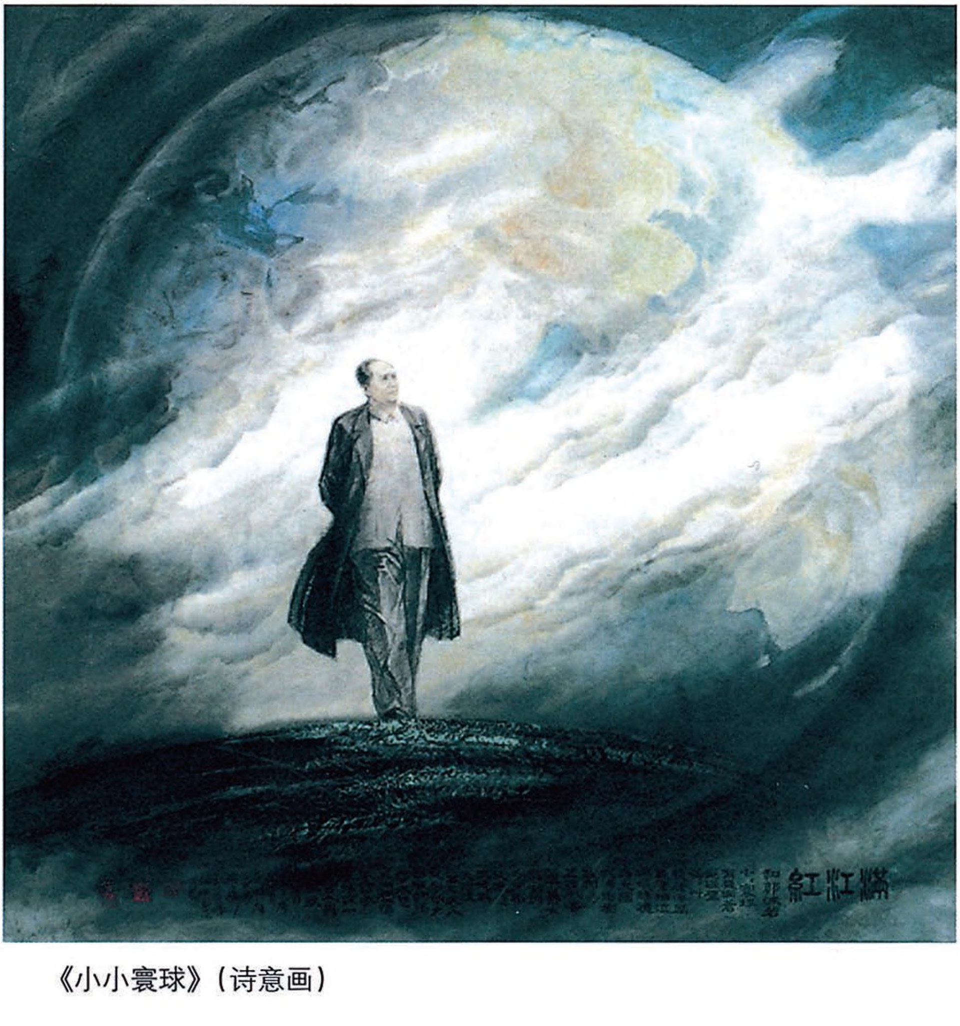
太阳出，
冰山滴；
真金在，
岂销铄？
有雄文四卷，
为民立极[1]。
桀犬吠尧堪笑止[2]，
泥牛入海[3]无消息。
迎东风革命展红旗，
乾坤赤。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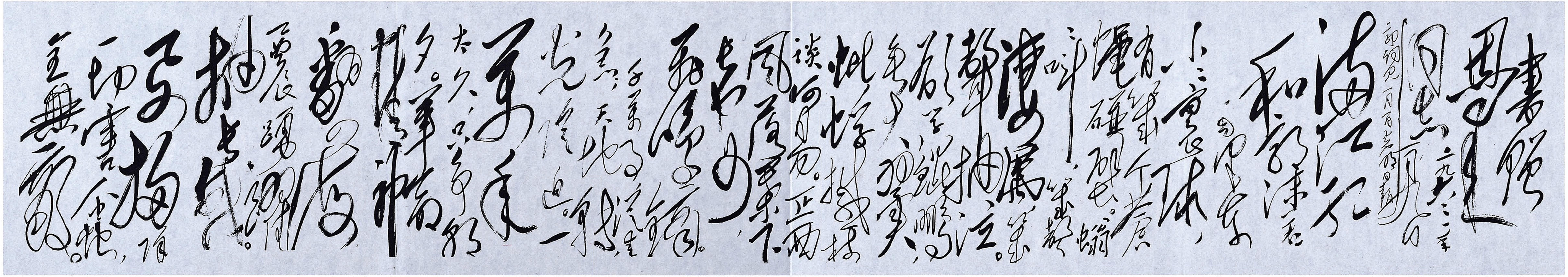
[1] 立极，树立准则。

[2] 桀犬吠尧堪笑止，桀是夏代最末一个帝王，是个暴君。汉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桀之犬可使吠尧”（参见《汉书·邹阳传》）。堪笑止，可笑已极。

[3] 泥牛入海，宋僧道原《景德传灯录》：“我见两个泥牛斗入海，直至如今无消息。”



《小小寰球》（诗意画）



毛泽东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1]

（1963年1月12日）

凡是马列主义政党都不会接受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但是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我们党的第一任书记陈独秀就是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成了托派，大概在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时期病死的。今天，我们有少数党员和干部还受到修正主义的影响，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还有资产阶级残余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存在。旧的官僚资本被我们没收了，民族资本被我们赎买了，但资产阶级的人还存在。十三年来，资产阶级中间的很多人接受了改造，愿意跟我们走，但另一部分人就不接受改造，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此外，我们社会里还有一个比较活跃的阶层，就是农村的富裕中农。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代表，不过不占优势，是少数，要改造他们也很困难。美国人说我们好洗脑筋，但这些人的脑筋是洗不清的。你们（指卡瓦略夫妇）在中国住了三年，正是我们困难的几年，你们是知道一些中国的情况的。

（外宾插话略）

---

[1] 1963年1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接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巴西专家卡瓦略夫妇。谈话在座的委方参加人：委共政治局委员埃·马查多和罗德里格斯、左派革命运动领导人萨埃斯、民主共和联盟代表纳胡尔；中方参加人：杨尚奎、李启新。这是毛泽东和卡瓦略夫妇谈话的一部分。

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比去年会更好一些。我们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不会做教育工作。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十三年的经验中，和过去革命时期一样，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要和平道路，不要革命。老的修正主义者说，列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冒险分子”。

在十九世纪时，还没有无线电，打电报也要通过海底的电线。资产阶级学得会的东西，我不相信无产阶级就学不会。

我已经说过，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农村中的富裕中农，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现代修正主义是战后和平环境滋长起来的思潮。

对《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社论稿的批语

（1963年1月25日）

小平[1]同志：

廿四日送来的社论[2]，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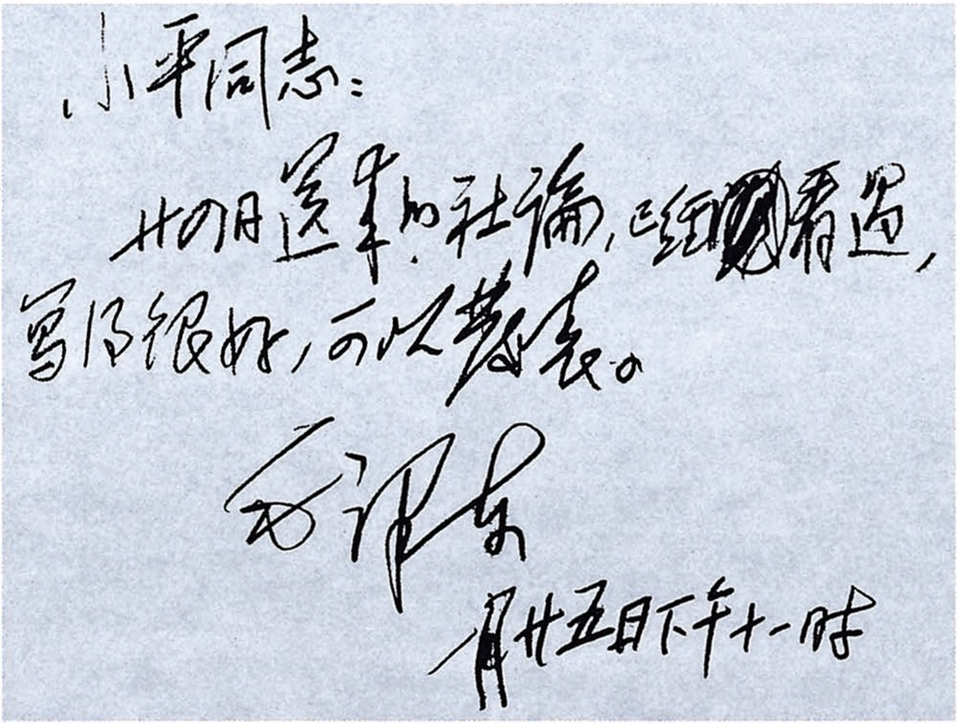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下午十一时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邓小平送毛泽东审阅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篇社论发表在1963年1月27日《人民日报》。



小平同志：

廿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illegible]~~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毛泽东

月廿五日下午十一时

毛泽东致邓小平信的手稿。

对《再论陶里亚蒂[1]同志同我们的分歧》[2]稿的批语和修改[3]

（1963年2月）

一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4]

二

要提一下一月三十一日我们的那篇文章[5]，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一篇。

三

送陈伯达同志：

古巴的看法[6]是正确的，值得一看。

毛泽东

二月六日

四

此件[7]也值得一看。

五

伯达同志：

再打清样送我一阅。

毛

六

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我们只好公开回答他们。

七

伯达同志：

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八

现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为我们对他们再一次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概念化”“缺少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立场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巧语掩饰他们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那时再作适当的处理。总之，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

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奴隶主们向奴隶们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隶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九

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十

陈伯达同志：

有了一点修改。第二章的题目都换了，你看如何？再打清样送我看。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毛泽东

二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十一

请伯达阅后，加以斟酌，再打清样送我看。

毛泽东

十八日上午七时

十二

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

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十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四

伯达同志：

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我在第八章，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日上午

---

[1] 陶里亚蒂，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2]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一文，原载《红旗》1963年第三、四期，《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1日至3月4日发表。

[3]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旗》杂志总编

辑陈伯达1963年2月3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初稿上的批语和修改。其中一是毛泽东为这篇文章改拟的题目；二是毛泽东在送审稿的第一部分“引言”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在1963年1月31日《内部参考》第四三一期刊载的《波党刊载文谈古巴人对苏古分歧的看法，说分歧在于苏古对目前世界基本矛盾的实质看法不同》一文上写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同一期《内部参考》刊载的《英报报道戴高乐向赫提出“全面改组欧洲”建议，传赫表示欢迎或暂不拒绝》一文上写的批语。《内部参考》上这两篇文章是毛泽东批给陈伯达作修改文章参考的。本篇五和六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3日以后送阅的这篇文章第一部分“引言”清样稿上的批语和修改。毛泽东2月16日又在五中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本篇七、八、九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4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上的批语和修改。其中九是为文章第二部分改的标题，原标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二次大论战”。本篇十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5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上的批语。本篇十一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7日送审的这篇文章的清样稿第八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上的批语。本篇十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7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第八部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中加写的、随后又作了修改的一段话。本篇十三是毛泽东为陈伯达2月18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第八部分改的标题，原标题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本篇十四是毛泽东在陈伯达2月19日送审的这篇文章清样稿上的批语。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他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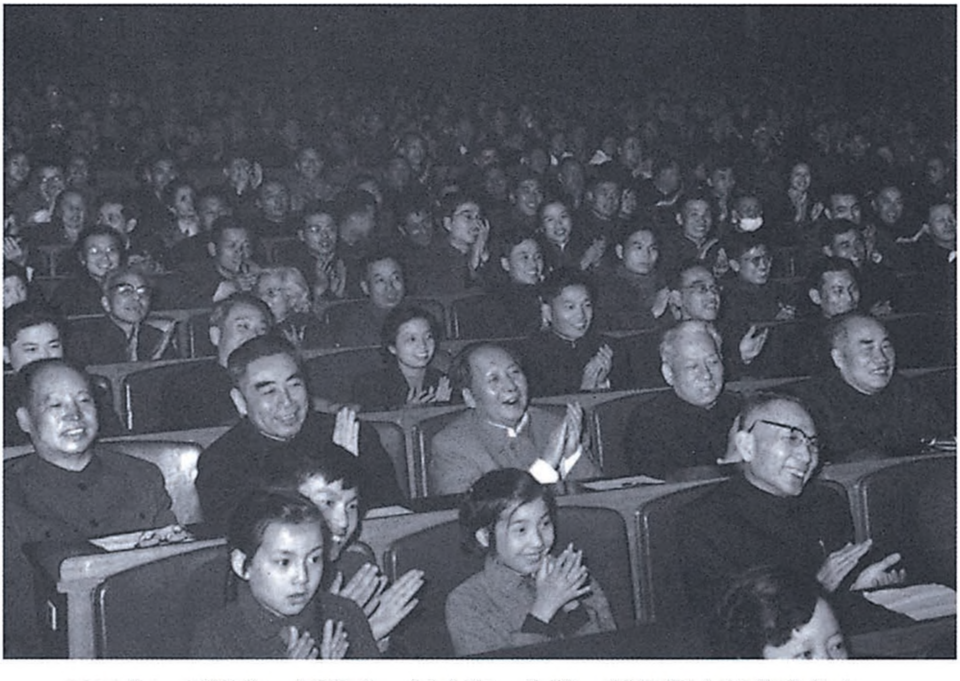
[4] 这篇文章发表时，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5] 指1962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6]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刊物《政治》周刊1962年第五十二期刊登的一篇哈瓦那通讯，根据在古巴听到的说法将苏古分歧列举如下：（1）苏古分歧不在于对古巴危机这种或那种策略性解决办法，而在于对目前世界基本矛盾的实质抱有不同看法。（2）古巴认为目前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殖民地革命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3）古巴认为，对帝国主义说来，冲突的主要地区和攻击目标不是早已开始建设社会主

义的国家，而是正在争取解放的国家。(4) 苏联强调用和平经济竞赛战胜帝国主义，而古巴认为殖民地解放和革命将带来帝国主义的灭亡。(5) 拉美某些人士对局势缓和、谈判和共处政策的胜利等说法抱怀疑态度，古巴不承认肯尼迪的“保证”。(6) 对古巴说来最重要的结论是，对帝国主义不能执行退让政策。

[7] 指1963年1月31日《内部参考》上刊载的《英报报道戴高乐向赫提出“全面改组欧洲”建议，传赫表示欢迎或暂不拒绝》一文。该文说，戴高乐曾向赫鲁晓夫提出一项“全面改组欧洲”的建议，内容为苏联直接同欧洲结盟，东欧实行非军事化及美军撤离法国。据说，赫对法建议表示欢迎，或至少暂时不予拒绝。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在春节晚会上。

对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1]的批语[2]

（1963年2月15日）

湖南报告很好，印发会议[3]同志研究。河北的经验[4]也很值得介绍，请河北省委同志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写一个不长的报告，印给会议同志们看。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2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给中南局、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前一段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绩是显著的。但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当前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不论农村或城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嚣张的，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黑风”刮得很大。为此，我们于去年12月下旬对全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进一步部署，决定把重点放在阶级教育上面，强调彻底地揭开当前阶级斗争的盖子，针锋相对地展开斗争，教育干部，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刮“东风”，打击敌人，遏止“黑风”。在运动中，我们坚持从上到下、先内后外的原则，先教育干部，后教育群众。先解决内部问题，后解决外部问题。教育干部的方法，是自上而下，层层训练，层层放包袱，层层搞深搞透。领导带头，一层一层地搞，这是最基本的经验。各地一般是由县委分三批训练各级干部，第一批集中训练

县、区、社三级骨干，第二批集中训练大队骨干，第三批分片训练生产队骨干。一般过程是：第一，彻底揭开阶级斗争及其在党内反映的盖子。第二，动员大家放包袱。第三，正确处理问题。在群众中开展运动时，强调由点到面、有条不紊地进行。具体做法是：第一，召开贫农座谈会，一面大讲阶级斗争，揭发敌情、“黑风”，一面由干部向贫农交代自己的问题，听取贫农批评。第二，树立贫农优势，造成强烈的社会舆论，把“黑风”搞臭。第三，处理问题强调划清两个界限，即敌我界限、严重与一般的界限。一个多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极其显著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打退了敌人的气焰，遏止了“黑风”，进一步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当前生产。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1963年2月14日为报送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

[3] 指当时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4] 指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中所说的做法。

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的插话[1]

（1963年2月19日）

一

印军可以攻到我这里来，我不能去呀？这里头还有一点怕鬼的味道，包括我这个人的思想。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谷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2]，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

---

[1] 本篇一至十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汇报时插话的主要内容。

[2] 总理，指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

二

中国人民是有斗志的。当然，也有个别怕死鬼。除了少数怕死鬼外，多数是能打的，有战斗精神的。

特别是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是一到就打。一三〇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也是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就是你这个将军[1]也是临时派去的嘛。开头谁想打呀？没有想打嘛。你十号走，二十号打仗，从动身到打仗，中间只有十天。你说，有仗打就去。我听说你有病，没有仗打你就不去，一听有仗打，你这个病就没有了。你身体也是不好，应该休养。

三

我们要注意，在座的同志们，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当然，我也在内。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你们也不必每一个都上前线。总是要参与，总是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

---

[1] 指张国华。

四

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现在在南越，美国的近代化要被原始的打垮的，你看嘛。

我看印军白天也不行，晚上也不行，防御也不行，攻击也不行。你还夸奖它一点。它那个白天有什么好呀？打固定阵地，应该承认它那个炮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达旺，它打那么多天，我们一共只伤亡三十二人，它有什么好呀？我横直隐蔽起来嘛。

对印军士兵拼刺刀这一点，还是要称赞的。

对外作战，部队不懂外国话，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以后跟外国人打仗，我们可以学点外国话。

现在要练兵，每年要有七八个月。

这次战斗中，我们没有逃掉一个人去。过去怕发生政治事故，怕我们的官兵跑到它那边去。印度人也说捉了我们的俘虏，结果他们现在就交不出一个人来。

这次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

五

这个通讯比过去大有进步，头一天打的电报，隔一个晚上，第二天一起来，电报都来了，通讯这么快呀。现在你们接到电报跟我们是同时接到的。比如，十一师先头团给它的师部，给你们指挥所，给我们北京的电报，是同时发来的嘛。

六

要注意近战、夜战。对付帝国主义的军队，我不相信当了面近战、夜战，我搞不赢你。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怕拼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米或者一百米这样的射击。

七

最基本的原因你还没有讲到。最基本的原因是，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军队，不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是国民党领导的军队。然后，就是你所讲的，三年以来憋了一口气。工人农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能打胜仗呀？不能把进攻的敌人打下去呀？别的星球上的，如果来了怎么办，现在我们没有经验。地球上的，我看就是要把它整下去。我们打了这么多年仗，敌人也见过不少，一个中国蒋介石，一个日本，一个美国，现在又有个印度。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吴庭艳[1]他也不能来，他现在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是这么一点敌人。

八

军队里头的党支部恐怕比地方的党支部要好，因为军队比较集

---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中。现在我们要注意地方的党支部。城市机关、学校、工厂、街道的党支部，农村以大队为单位的党支部，真正要起到先锋队的作用。

包括在瓦弄，我们统共亡了八百人，重伤大概是四五百人，其他轻伤很快就好了。重伤的还有作用，只要他不死，他可以起教育作用。除掉死的，得到教训、得到锻炼的，就是两万七千多人，包括西面，就是三万二千人以上。我看，分一些人放到各师去，由各师抽一些人跟你们对换。你们参战的这三万多人，我看留一半就行了，你搞出一万五千人来，分到全国，特别是分到前线那些部队，特别是分到值班师，分到那里头去，讲这些故事，当教员。

九

这次战斗中西藏老百姓表现很好。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到解放了；因为他们不是有钱的，而是穷人，无产者半无产者；因为我们对西藏的劳动人民是用同志式的态度。不然，他们这么干呀？

十

外国一个兵要有七个人的后勤部队保障。如果照这样，我们是三万二千人作战，三七就是二十几万人，那还了得。

关于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还是老话，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如果是围城，就要十倍；如果是野战，就要五倍。在具体的战术动作上就不止了，就要占绝对优势。

部队要加强迫击炮、六〇炮，还有什么四〇火箭筒。

边打边像。一定要有样，我看不一定。中国革命开头就没有我们这个样，无非是洪秀全、北伐战争那一套。共产党打仗就是边打边像个样，过去没有样。苏联有个样。十月革命以前有什么样呀？那个样还不是十月革命创造的。

侧后迂回，这不仅是印军怕，从古以来，哪一个军队都最怕这一手。

打扫战场花了一个多月，他不出来，躲在森林里头。这是个新问题，没有料到。

十一

张国华还没有讲那个西面。西面很艰苦，那是多少米深的雪，这么困难，我们都能够克服。我们要在全党全军，在人民中间，讲这个经验。

十二

看来我们的军队还是要政治工作，抓四个第一，抓三大民主，加强薄弱环节，搞好党的建设。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3年2月20日）

此件[1]印发会议各同志[2]。请各同志连同湖南那个报告（已印），一起加以研究。两个报告各有特点，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的同志们认真研究一下。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2月17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报告说，为了深入地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我省农村开展了整风整社运动，对农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去年10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有省、地（市）、县三级干部参加；接着，各县又召开县、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会后，各地又以公社为单位，训练了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全省约300万人。然后，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讲解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三个文件（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毛主席关于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精神，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约有80%的社员受到了教育。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和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

（1963年2月23日）

（苏修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毛泽东，毛泽东称不适。因再三要求，毛泽东着睡衣接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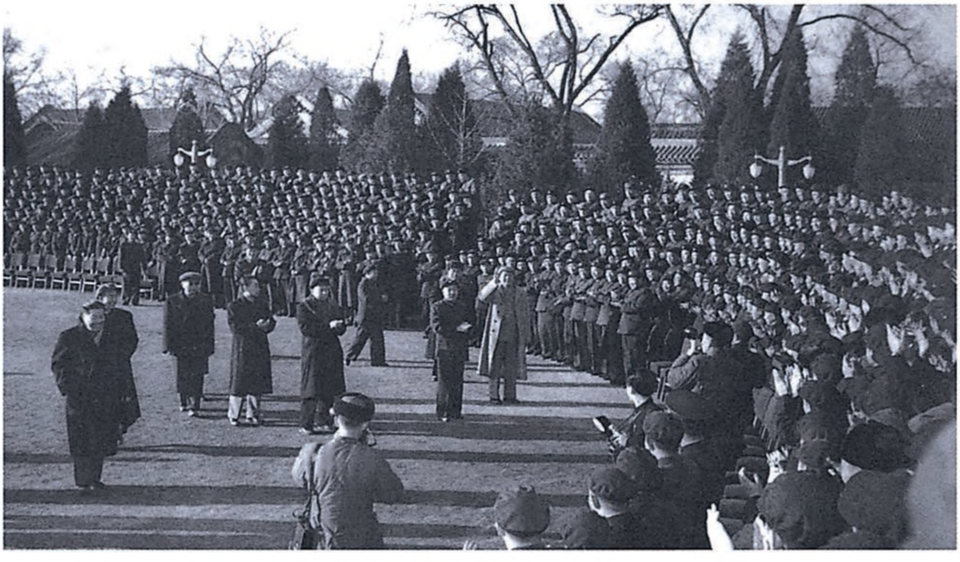
契： 听说你们要发表文章，不必要的，感到很沉重。

毛： 不必要，你们为什么发表那么多文章？没有什么沉重的，不过互相论战，不过是唇枪舌剑而已。

契： 请你到莫斯科去谈一谈，可以吗？

毛： 我已经老了，不中用了。老而不死，破套鞋去不成了。

1963年2月27日，毛泽东接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代表。



1963年2月27日，毛泽东接见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代表。

1963年，毛泽东接见人民解放军炮兵、铁道兵、公安部队全体代表。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李富春接见会议代表。

为学习雷锋题词[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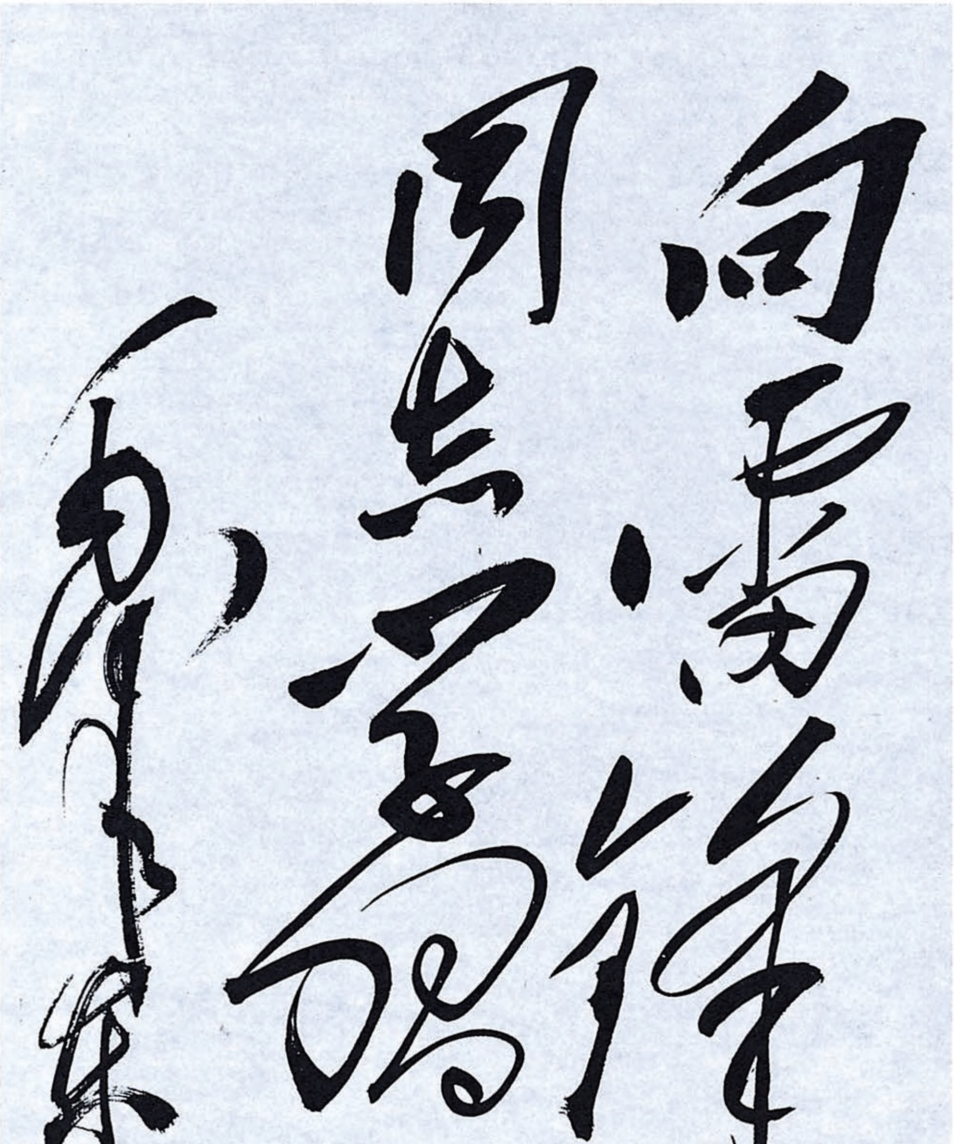
（1963年3月5日）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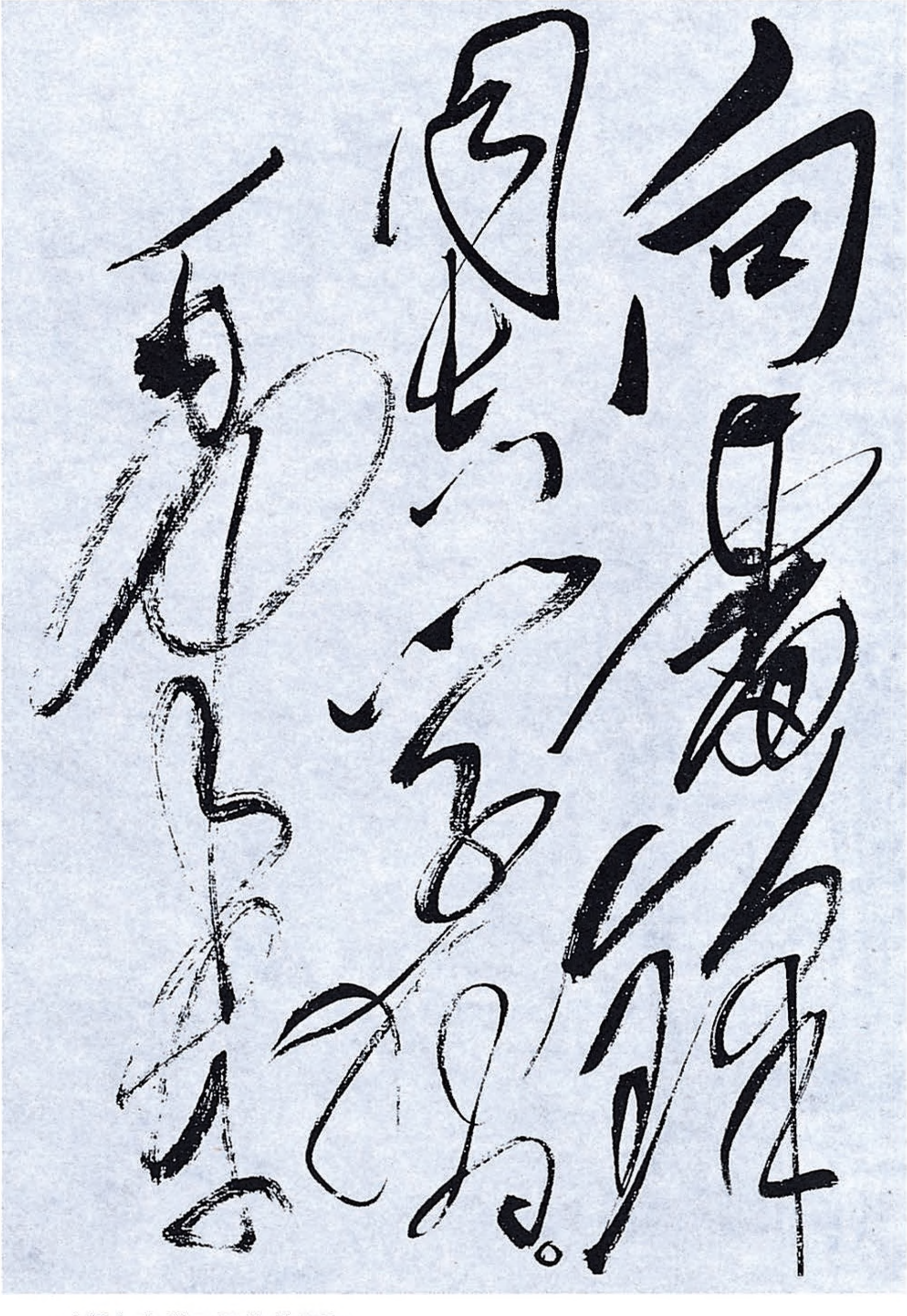
[1] 这是毛泽东1963年2月应《中国青年》杂志要求为学习雷锋专辑写的题词，最初刊载于同年3月2日出版的《中国青年》，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1962年8月不幸因公牺牲。



向雷锋同志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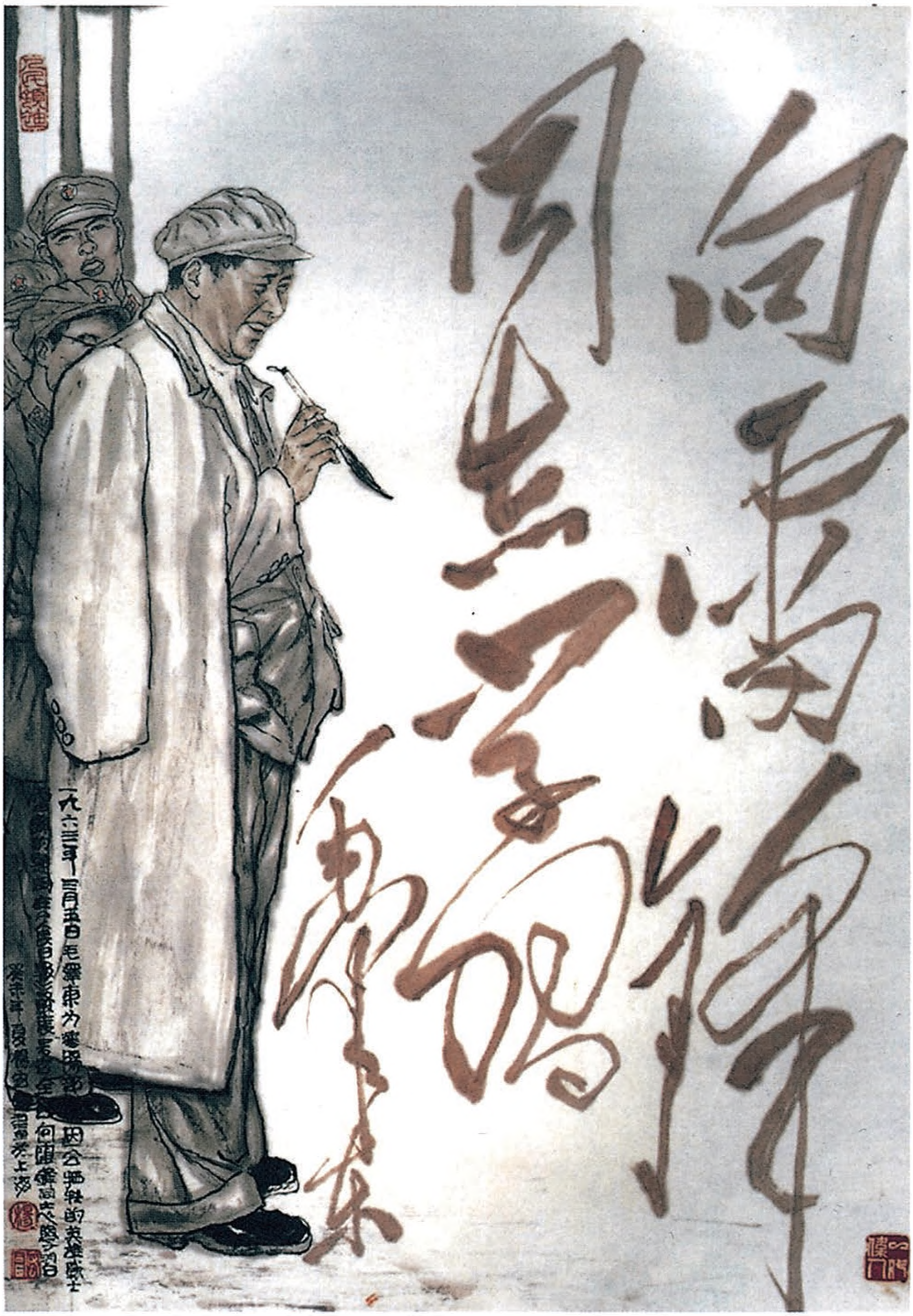
毛泽东

毛泽东为学习雷锋的题词。



向雷锋
同志学习。
毛泽东

毛泽东为学习雷锋的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
毛泽东

《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国画）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评美国共产党声明》[1]的批语和修改[2]

（1963年3月5日）

一

康生[3]同志：

请考虑是否要加上反对教条主义的意思。

毛泽东

五日

二

在美国共产党内和党外，都有不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和教条主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

[1] 这篇社论在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送审稿第一页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对文内一段话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3年3月10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参加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的气象代表团。

1963年3月16日，毛泽东和来访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若昂·阿马索纳斯握手。

不得人心，武器再强也不免失败[1]

（1963年3月22日）

一

中国人民高兴见到你们。你们在最前线，进行了英勇斗争，美国很怕你们。美国是那么个大国，可是怕你们这个小国，拿你们没有办法。直接进攻，又怕世界舆论。还有一条，怕陷进去出不来，是不是啊？

南越游击队规模并不很大，可是美国人拿他们没办法。他们过去几千人，现在有了一万五千人。美国过去说几个月可以解决问题，现在没有期限了。

我们抗美援朝，也有苏联的帮助，苏联卖武器给我们，那时斯大林还在。斯大林就是一九五三年朝鲜停战前不久逝世的。不过，那时他们是在后面帮助，主要是朝中两国人民和十六国军队打仗，其中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的，等等。

这说明帝国主义强大还是强大，但是可以战胜的。对付帝国主义，你们是有经验的，我们也是有经验的，和美国人、日本人都打过。就是要准备打仗，没有准备就危险。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古巴武装部军训部长费尔南德斯少校时谈话的一部分。

二

我们革命时没有空军，没有海军，也没有重炮兵。只是在革命过程中，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才有了大炮，都是美国供应蒋介石的。缴了些坦克，但没有组织坦克部队。空军始终没有。我们的空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开始建立的，和你们一样。

可是你们的敌人巴蒂斯塔[1]有重炮，有空军，有海军，比你们强，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就是不得人心。那时根本无人援助你们，尽管美国援助巴蒂斯塔，也不免失败。简单的道理，和蒋介石一样，不得人心。人民不赞成他，那有什么办法？武器再强也没办法。这道理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十月革命也是这样胜利的，布尔什维克手中是没有武器的，是从敌人手里夺取的，是列宁指挥的。

三

联系群众永远不会失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脱离群众，他们总有一天要失败的。

---

[1] 巴蒂斯塔，曾任古巴总统，1959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

给周世钊[1]的信

（1963年3月24日）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寄数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因忙迟复，尚祈鉴谅。为学校题字，时间已过，可以免了吧。你到京时，我适外出，未能晤面，深致歉怀。嗣后如有所见，或有诗作，尚望随时见示为盼！老校长张干[2]（忘其别甫，是否叫作次仑?）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3]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方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蒋竹如[4]兄处，亦乞见时代为致意。他给我的信都已收到了。顺问

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三月廿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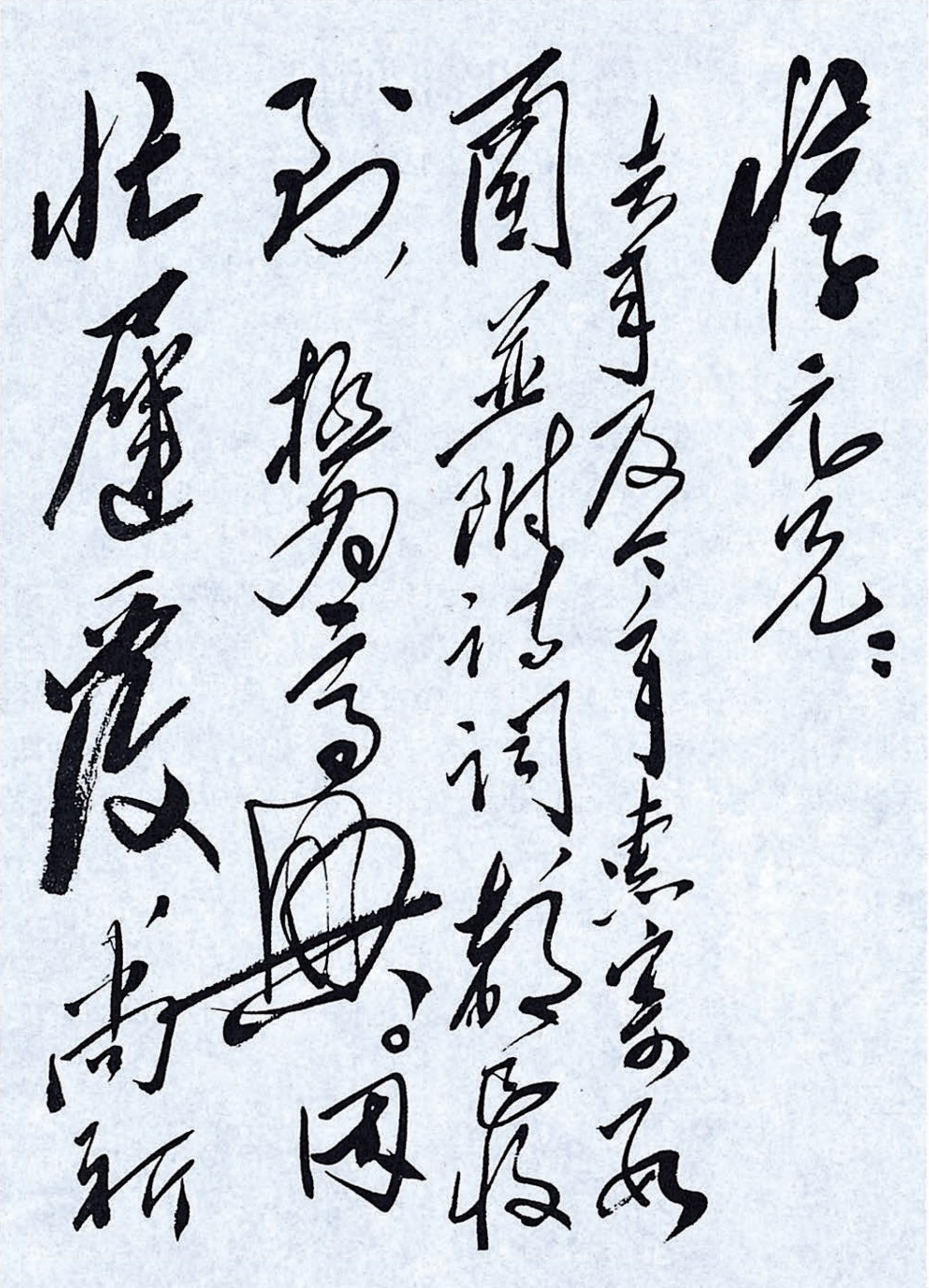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张干，字次仑，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3] 应为张干的外孙女张琼英。

[4] 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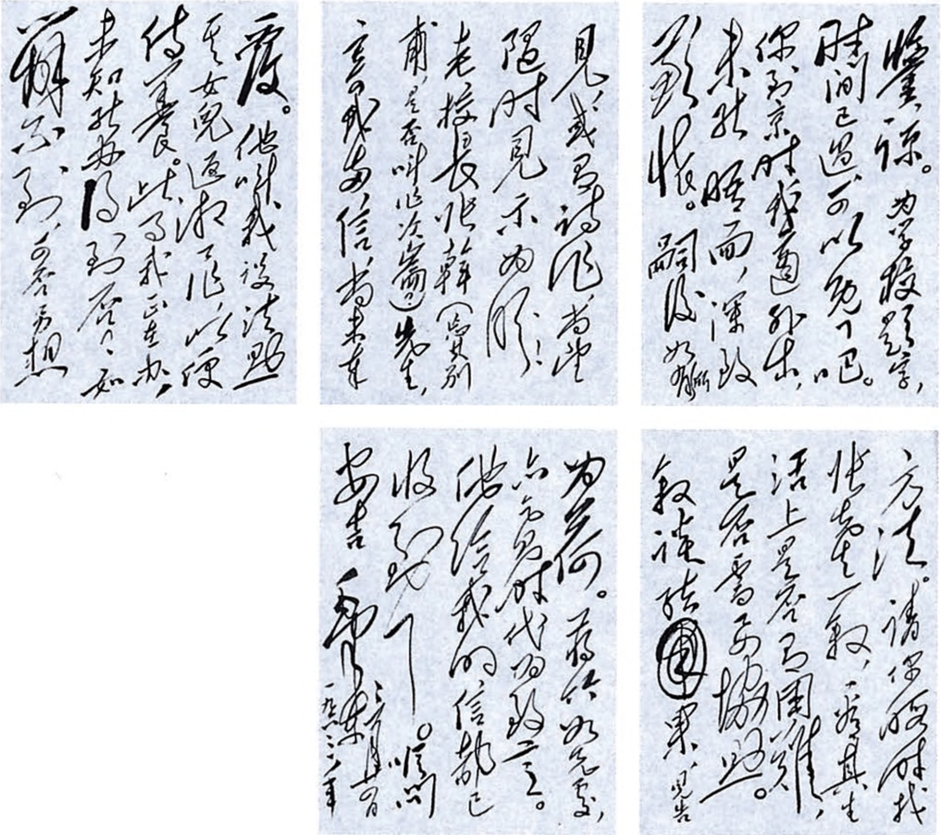


惇元兄：

去年及今年惠书两函并附诗词都已收到，极为高兴。周

壮健康复，为祈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周世钊信的手稿。

在张干[1]来信摘报上的批语[2]

（1963年3月24日）

请中央组织部商山西省委，酌情处理。写信人张干，是我四十五年前师范学校的校长，现年大约八十以上了。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

[1] 张干（1884—1967），字次仑，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送的张干来信摘报上。摘报说，张干说他和他的女儿金铸，都需要人照顾。请求主席帮助，将他的外孙女张琼英从山西调回长沙工作。

给戴毓本[1]的信

（1963年3月28日）

毓本同志：

去年十月的信早就收到了，很是高兴。近情如何，望告。生活上如有困难，不妨见示。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三月廿八日

---

[1] 戴毓本，湖南衡山人，五四运动后曾在毛泽东等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

给张维[1]的信

（1963年3月31日）

楚珩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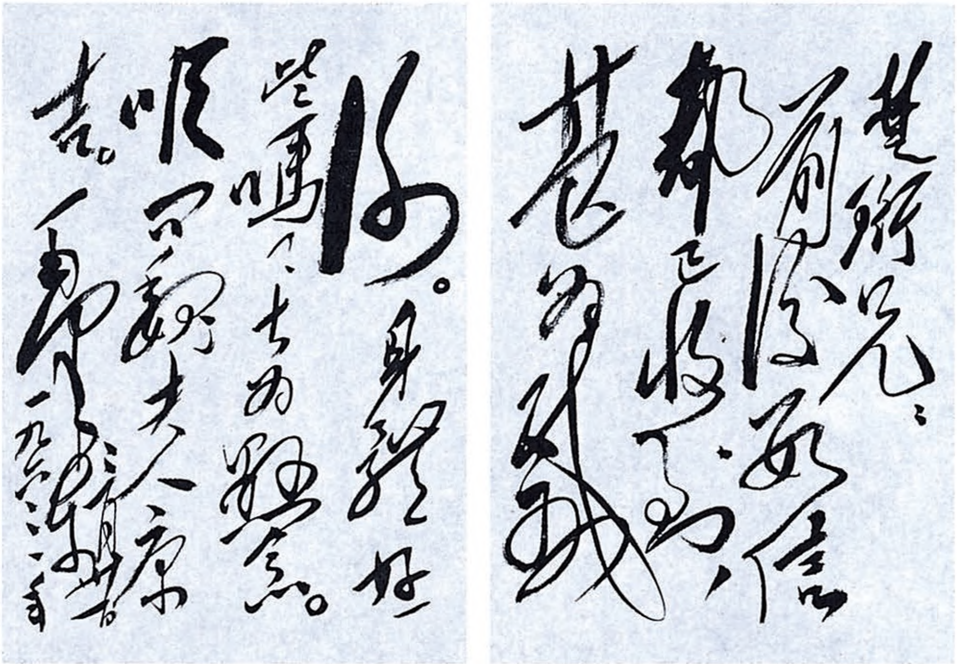
前后数信都已收到，甚为感谢。身体好一些吗？甚为悬念。顺问魏夫人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三月卅一日

---

[1] 张维，又名张楚珩，湖南浏阳人。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来往。当时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张维兄：前后两信都已收到，甚为感谢。身体好些吗？甚为挂念。顺问候夫人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

毛泽东致张维信的手稿。

对《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1]一文的批注和修改[2]

（1963年3月）

一

仅仅依靠公安部，不依靠党和群众去肃反。

二

他们在党内关系不是平等的，各级领导人具有特权。

三

（不明确）

四

他[3]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中，在对待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犯了一些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不适当地干涉某些兄弟

党和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替各国党制定纲领、具体政策以至人事安排，用强制的办法推行他的“左”的政策，因而引起了许多严重的后果。

五

哪三条罪名?

六

日本党似应当说得更好一点。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3年3月15日印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各同志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共讲了三个问题：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二、争论的问题和性质；三、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

[2] 本篇一写在《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一文以下一段话旁边：斯大林“在党内党外的斗争中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的方法，对反党分子和群众中的一些不满分子，缺乏具体的严格的分析，把他们一律看作是同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反革命分子，一律叫做人民公敌，一律用镇压的方法去对待他们，造成了肃反的扩大化，错捕错杀了许多（注：毛泽东将‘许多’改成‘一些’）好人，犯了严重的（注：毛泽东将‘严重的’三字删去）政治错误和组织错误”。本篇二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段话旁：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组织以及群众组织、经济组织中，没有正确地实行或者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党章

上虽然规定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各级党委的实际生活是个人专断，没有真正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定。由于他在各方面都强调实行一长制，因而在国家的、经济的、群众的组织中也都在实际上实行个人专断”。本篇三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句话旁：斯大林“在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对于中间阶层，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具体指“对于中间阶层”这六个字不明确。本篇五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段话旁：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给我们来信说，他们要同中国好，只是不能同阿尔巴尼亚好，希望中国不要管阿尔巴尼亚。来信给我们安上了三条罪名，说什么我们坚持‘特殊立场’，但是中苏两党两国还是要合作，要团结，双方的分歧是可以消除的，是可以妥协的”。这段话中的“三条罪名”，是指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的他们所担心的三条：1.“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反列宁主义的行为受到了中国报刊的支持”；2.“中国代表们在国际民主组织中采取自己的特殊的立场”；3.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行与兄弟党集体制定的共同方针不同的路线的趋向日益明显”。本篇六写在这篇文章以下一句话旁：“日本党内个别的人虽然表现不好，但它的领导核心是坚定的”。本篇四是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此外，他还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3] 指斯大林。

为中央转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的标题[1]

（1963年3月）

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中央批语[2]、山西省委批语[3]、昔阳县材料[4]）

---

[1] 本篇正文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和省委批语的指示稿重新拟写的标题。原标题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

[2] 指中共中央1963年3月23日为转发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和省委批语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后来，这个指示连同山西省委批语和昔阳县材料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六印发。

[3] 指中共山西省委1963年1月29日对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材料的批语的摘要。批语说，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劳动能否形成社会风尚，关键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有决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从1963年起，全省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的补贴工分，必须按照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规定，不得超过总投工数的2%。要把这件事作为今年整风整社的一项重要内容。

[4] 指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的摘要。报告说，1959年以来，昔阳县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

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补贴工分一年比一年少。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据统计，去年县级机关下乡干部在生产队所做劳动日，每人平均62个，公社干部每人平均82个。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使干群关系像鱼水一样密切，带动了广大社员积极参加集体劳动，恢复了清早上地劳动的习惯，也有助于迅速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报告还介绍了中共昔阳县委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1）加强思想教育，提高干部觉悟，注意经常检查。（2）把劳动态度作为选拔大队、生产队干部的首要条件。（3）县、社负责干部，带头参加劳动。（4）坚持实行定工劳动、定额补贴的制度，每年春天落实到人。（5）大队干部固定到一个生产队或作业组，按他们的劳动底分同社员一样分地、分活，评工记分。（6）评比竞赛，层层树立标兵。（7）自上而下改进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严格控制会议、表报，为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创造条件。

1963年春，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李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陈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记者舒世俊一起交谈。

1963年3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后和新华社记者李琴亲切交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4月3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
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值此匈牙利解放十八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匈牙利人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作了不懈的努力。祝匈牙利人民今后在各方面继续取得成就。

中匈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是相互支持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致力于增强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增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中国人民将同匈牙利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争取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共同努力。

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

1963年4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接见全国妇女工作会议的代表。

给毛岸青的信

（1963年4月5日）

亲爱的岸青儿：

前后各信都已收到，因忙未复，你会谅解我的心情吧。我爱你，我念你，我对你好。你不要误会。你的病要改性急，是为至盼！

父亲

一九六三年四月五日

关于对苏共纲领的意见《备忘录》[1]稿的批语[2]

（1963年4月9日、20日）

一

伯达[3]同志：

这些都已看过，写得很好。未完部分，请续寄来。

毛泽东

四月九日上午二时

---

[1] 这个《备忘录》初稿说，苏共领导人把苏共二十二大纲领当成国际共产党人的共同纲领，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举行两党会谈的时候，对苏共纲领提出自己的意见。备忘录就下列问题阐述了意见：（一）关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三）关于所谓“全民党”；（四）关于所谓“物质刺激”；（五）关于所谓“新型的国际分工”；（六）关于所谓“一切为了人”和“人道主义”。这个备忘录后来没有发出。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备忘录》的部分手抄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陈伯达1963年4月13日送阅的《备忘录（初稿）》铅印件上写的批语。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二

已阅一遍。

毛泽东
四月廿日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1]

（1963年4月12日）

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这种方法。

---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所作的指示。

关于刘晓工作安排问题的批语[1]

（1963年4月20日）

总理：

下去了解情况，是刘晓同志本人的要求，我也认为有此必要。他身体情况不宜下放，可以发表为外交部副部长，每年仍可以一段时间到一些省、市作些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

四月二十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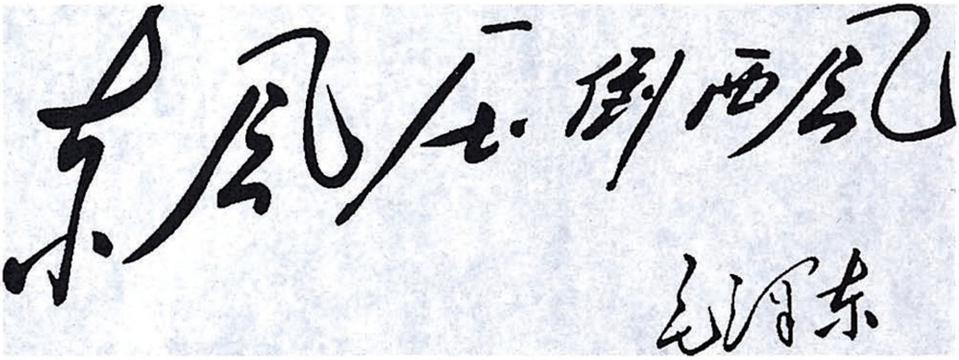
[1]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党委1963年4月16日关于刘晓任命问题给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中央已于1962年12月20日任命刘晓为外交部副部长。后因刘晓外出休养，暂时未将此项任命报请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现在，刘晓拟于4月20日左右返京，我们拟即提请国务院任命，并在报上公布任命消息。妥否，请批示。

为《学理论》杂志题词[1]

（1963年4月）

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



东风压倒西风

毛泽东

毛泽东为《学理论》杂志的题词。

---

[1] 这是毛泽东为1963年第4期《学理论》杂志的题词。

1963年4月2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接见全国专业工作会议的代表。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3年4月、5月、6月）

一

林克[2]：

讨论对苏复信，请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3]四同志于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给苏共中央复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四、五、六、七、八是毛泽东对复信1963年5月19日草稿的修改。九、十、十一是毛泽东对复信5月21日稿的修改。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复信5月19日草稿和5月21日稿中同一段文字先后两次的修改。本篇十二、十三、十四是毛泽东对复信6月5日稿的修改。其中本篇十二是毛泽东为复信拟的标题。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在同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7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同时再次全文发表这封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人民了解中苏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修改时加写的文字。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本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来杭州。请你通知，叫他们如期来此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早上四时

二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

三

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独立地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独立地进行群众工作，不断地扩大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动力量，才能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且把革命引导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

四

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

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五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内，甚至几百年内，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六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

七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同时，各国共产党人也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

八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这样的党，那就绝不可能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九

只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争。

十

认为世界两个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赛”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一切其他矛盾（即包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垄断资

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相互之间的矛盾），都会随着两个体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现什么“没有战争”“和平合作的新世界”。

十一

共产党人在争取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和革命左派（在个别国家，则还有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中间派）的同时，必须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和各国工人群众中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

十二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十三

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国防；

十四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把海军工作做好[1]

（1963年5月2日）

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已经看过，认为很好，照此执行，每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希望海军各级党委同志们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错误，同其他军种一样，把海军工作做好。有错误并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了。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海军问题报告的批语。

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工会代表团和档案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1963年5月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到中国有多久了？是一起来的吗？

各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团长）：新闻代表团四月二十一日到中国，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和工会代表团都是四月二十六日，档案代表团四月三日。

毛：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你们的国家是很好的国家。我们两党、两国的关系也很好。我们两党、两国，修正主义都攻击我们。对修正主义的攻击要分析：第一是坏，攻击我们当然不好，第二也好，修正主义骂我们，这对我们有好处，修正主义不骂我们就不好了。修正主义不援助我们，经济上不援助我们，撤走专家，这也要分析，第一是不好，撤走专家，不帮助了，当然不好；但也是好事，让我们自己干，自力更生，对吗？要自力更生，要不怕困难。

你们到过□□吗？有机会最好到那个国家去看看，不一定就是你们去。他们建立了重工业，他们自力更生。我们的农业还没有过关，他们过关了，他们的农业比我们好。我们的朋友不少，帝国主

义、反动派、修正主义要孤立我们，但孤立不了。

我们是多数，他们没有多少人，多数人民并不赞成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各个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并不见得很欢迎修正主义。这方面的情况你们知道一些。人民是好的，包括修正主义领导国家的人民，干部中也不都是坏的，不是一块铁板，并不都是修正主义者，是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坏。

你们在中国还有多久？

团长：工会代表团还有一个月，新闻代表团和青年联盟代表团还有二十天，档案代表团六月七日走。

毛：你们可以到处走走。前几年我们的情况不好，最近一两年比较好一些，现在政治、经济情况都比较好些了。但还有困难，困难不少。社会上和党内还有些问题。困难可以克服，正在克服中，问题在解决。

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会生长资本主义因素。有些共产党员挂了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子，这不是多数，但有一部分是如此，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铺张浪费。浪费问题很大，这个问题如能适当解决，就可以搞几十亿美元。美国人不会借款给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借给我们，我们有个办法，就是向官僚主义者借款。(外宾笑了)

马马基[1]（以下简称基）：美国借款给他们——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毛：你们有一个“好”邻居[2]，他们锻炼你们，他们反对你们，南斯拉夫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着你们。

---

[1] 马马基，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

[2] 指南斯拉夫。

基：但是我们的朋友很多，我们的人民很坚强，因为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毛：即使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你们也不会灭亡。

卢鲍尼亚[1]（以下简称亚）：但我们感到幸运，中国给了我们国际主义的援助，鼓舞了我们。

毛：但是援助很少，有些科学技术关键问题，我们自己也没有解决，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技术，所以不能完全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过意不去。再过五年到十年，我们会好一些。

基：修正主义企图破坏我们的五年计划，而你们是帮助我们。

毛：你们原定的五年计划有没有修改？

吉贝罗[2]（以下简称罗）：有的，一般说项目有些增加，大型项目有增加。

基：五年计划有些改动，但总的说增加的比减少的多。去年冬季的天气对农业的影响很大，雨下得多了，涝了。

毛：春季生产怎样了？

基：直到三月还在下雨。

毛：你们雨下多了，我们有些地方少了。

基：如果有可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雨送一些给你们。（全场笑）

亚：沈阳很久没有下雨，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一到就下雨了。

毛：很好。你们可以到郊外去看看。这里[3]春季生产还可以，

---

[1] 卢鲍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团长。

[2] 吉贝罗，工会代表团团长。

[3] 指上海。

有麦、油菜、蚕豆和豌豆。

亚：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上海，看到一路上庄稼长得很好，尤其是从山东到上海这一段，很深刻的印象是农民没有荒废一寸土地。

毛：这是因为我们土地不够，平均每人只有五分之一公顷，长江以南每人只有十五分之一公顷。我们是寸土必争，否则没有饭吃。这里一年要种两次，冬季种麦，夏季种稻。南方有的地方不种麦，种两季稻子，早稻和晚稻。东北只有一季麦子，只有一百二十天无霜期。这些地方[1]比较好。上海是北纬三十一度，你们在北纬多少度?

亚：我们和北京一样，纪诺卡斯特城[2]和北京在一个北纬度。

毛：北京是北纬四十度。请你们问候霍查同志和谢胡、卡博、巴卢库、阿里雅和凯莱齐等同志。这些同志我都认识。

亚：一定转达您的问候。我们出国时，同志们也一再要我们向毛主席致以最衷心的问候，祝您身体健康。

毛：谢谢。

亚：您身体健康，这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毛：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骂我们，我们要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一起，反对他们。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难道还孤立吗？印度还是反动派统治，但印度人民对我们很好。

亚：我们有些同志过去来过中国，这次再来，看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感到无限鼓舞。我一九五七年来过中国，这次再来，不认识北京了。十大工程是世界上绝妙的杰作，只有像中国人民这

---

[1] 指上海附近。

[2] 纪诺卡斯特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霍查同志的故乡。

样有才能的人才建造得出来。也看到上海的工业展览会，使我们十分惊奇，生产出很精密的仪器，还有重工业，这使我们十分鼓舞，欢欣愉快。我们在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你们党以自己的英雄气概鼓舞了我们。我们劳动党和霍查同志也一再指示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和中国青年的会面，使我们受到了革命的鼓舞。

毛：不是一国支持一国，而是互相支持。不是一国帮助一国，而是互相帮助。有了你们站起来反对修正主义，全世界人民都高兴，不仅中国人民。

亚：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毛：都是国际主义义务，你们是国际主义义务，我们也是国际主义义务。国际主义应当如此，应当坚持马列主义，应当互相支持。

你们今天还有什么活动吗?

外宾：主席的接见就是最重要的活动。

毛：今天谈得不多，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亚：主席接见我们，不仅是给我们，而且是给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劳动党和青年的荣誉，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大事。

毛：我要谢谢你们来看我。

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上的批语[1]

（1963年5月8日）

这几个文件[2]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南通讯》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做法特辑》的封面上。封面目录原列有六个文件，毛泽东选取了其中四件，即《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作法》《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拟了一个标题“四个好文件”。《中南通讯》在这个《特辑》上加的编者按说，要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重要的是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到大队一级，每个大队最少应有两个人参加。接着开好公社（或区）的三级干部会议，开到生产队一级，可吸收贫下中农代表参加。这两个会议，都是为了训练干部，搞好“样板”。然后以大队为单位，再一次武装干部，经过扎根串连，组成强固的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深入到群众中开展运动。

[2] 指毛泽东所说的“四个好文件”。后来，这四个文件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四印发。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作法是：第一步，分析阶级斗争形势，大揭阶级斗争盖子，统一认识，提高觉悟。第二步，领导层层带头，自觉地放下“包袱”。第三步，民主讨论政策界限，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第四步，总结会议经验，研究下一步如何串连发动和组织阶级队伍，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安排生产和群众生活。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和花明楼公社的作法与此大体相同。

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对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1]的批语[2]

（1963年5月8日）

这两个报告都好。请同志们注意研究和参考。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

[1] 指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毛泽东、中南局的两个报告：一个是1963年4月16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另一个是1963年4月22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前一个报告说，自2月8日作过一次报告以来，经过这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中广大群众，特别是贫农、下中农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大大提高，到处出现了社员热爱集体、关心集体、多出工、多投肥的新气象，大部分地区生产颇有起色。为了促进这个新的高涨形势，更全面、更深入、更扎实地组织农业生产高潮，我们因势利导地把社会主义教育深入一步，通过修订生产规划，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总路线教育和阶级斗争的再教育，大鼓革命干劲，统一思想认识，集中力量发展集体经济，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估计4月底或5月初各专区可全面转向抓经营管理。但在这一段组织生产高潮中，在修订规划和改进经营管理的工作上，仍然突出地暴露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分田单干、雇工放债和各种“黑风”上面，而且还表现在经营方针、生产计划、劳动力管理、收益分配等许多方面。因此，今后还必

须继续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教育。不大抓总路线的教育，不把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干劲组织到发展集体经济上去，生产高潮仍然不可能搞起来，群众的政治热情和劳动热情也会渐渐低落下去。在具体做法上，我们充分运用前段运动的经验，同样是从教育干部入手，从上而下，由党内到党外，一层一层地训练、揭盖子和解放思想。大部分地区把训练干部和搞试点结合起来，各级干部会上都搞一个大队的试点，层层训练，层层搞点，通过试点，既有助于解决思想问题，又学会了组织生产高潮的方法。后一个报告说，我们最近派工作组到零陵专区进行了调查。（一）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明确地提出了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口号，在依靠贫农、下中农的基础上，巩固地团结了其他中农，取得了反“黑风”的巨大胜利。（二）这几年对依靠贫农发生动摇的最根本原因，是对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农村阶级情况缺乏经常的调查和分析，对依靠贫农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思想不明确。（三）零陵地区在树立贫农优势的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主要有四条：第一，教育干部重新认识贫农。第二，从政治上充分发挥贫农的主人翁精神。第三，从组织上树立贫农优势。第四，从经济上帮助贫农翻身。（四）零陵地区普遍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这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是广大贫农、下中农的要求。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是党支部领导下的贫农、下中农核心组织，是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和助手，是党联系贫农、下中农和广大社员的桥梁。它的主要任务，一是带头执行党的政策，在工作中出主意，支持和监督干部；二是串连发动贫农、下中农，代表他们的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三是经常向贫农、下中农社员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阶级教育；四是按照党的政策实现贫农同中农的团结；五是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同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五）今年春天，省委向全省各地介绍了零陵专区的经验，要求各县做好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的试点，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几个月来，全省已有半数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根据重点调查，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代表小组能够发挥作用。

[2]　毛泽东1963年5月8日对中共湖南省委两个报告的批语连同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三印发。

1963年，毛泽东和陶铸在杭州。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刘庄丁家山。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
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值此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八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对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

中捷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团结，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一起，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主

义事业的新胜利而共同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

转发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1]

（1963年5月9日）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2]，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1963年4月编印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毛泽东在审阅这批材料时，将封页上的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省七个材料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的附件七印发。

[2] 这七个材料是：（一）中共平阳县城西人民公社委员会书记廖锡龙写的《我们是怎样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二）钱天镇写的《应四官劳动好、工作也好》，应四官是中共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支部书记；（三）章轶仲写的中共金华县汤溪公社汤溪大队支部书记、老劳模陈双田访问记《怎样才能更多地参加劳动?》；（四）中共桐庐县委副书记娄秉宜写的《严如湛同志三下后进队》，严如湛是中共桐庐县俞赵公社俞家大队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五）中共瑞安县委书记季殿凯写的《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六）中共余杭县委农村工作部的调查报告《余杭县五常公社大队干部参加劳动好》；（七）中共青田县委书记袁长泽写的《五年来干部坚持种试验田的体会》。

中央曾在今年三月二十三日发出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无例外地参加生产劳动的模范事例，并作了批语。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些同志是注意了，例如浙江，在全省党代表大会上着重讨论了并且作了具体安排；其他地方，则反映尚少。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并普遍宣读山西昔阳县那个文件。各省、市、自治区，一定有自己的好范例，应当选出一些（不要太多）让干部学习。我们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困难呢？并不很困难。只要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调查研究收集了可靠的材料，明了了情况，下定了决心，政策和方法又都是正确的，又有政治上强有力的几个同志作为核心领导，那末，就一个公社的范围来说，有几个星期就够

了，就一个县来说，有几个月也就够了，就一个省来说，分批分期，搞好搞透，大约需要一年、二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因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

中央关于抓紧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批示

（1963年5月10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现将宋任穷同志报告[1]一份，河南省委报告[2]一份，发给你们研究和参考。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第一步，只用了二十几天时间，就训练了十五万多干部。第二步，还要训练一百五十万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然后才是全面铺开，作为第三步。在采取头两个步骤时，并经过试点。这种分步骤地进行工作并经过试点的方法，是正确的。报告所说的其他各项政策也是对的。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宋任穷同志所讲的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教育青年群众这件事，是普遍可行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

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上半年做不完，可以在下半年做。今年做不完，可以在明年做。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中央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日

---

[1]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在东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坚持了正面教育为主的方针，较普遍采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第二，在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深感要有意识地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用村史、合作化史、工厂史、贫下中农和老工人的家史教育青年，学习雷锋等先进人物的事迹，展览革命斗争、阶级斗争的实物，读红色书籍等，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2] 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给中央、毛泽东并报中南局的报告说，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按照中央和主席的指示，部署了全省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个运动分为三步：第一步，开好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第二步，开好公社（区）的三级干部会议，这两步都是为了训练干部，组成干部队伍；第三步，在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经过扎根串连，组成阶级队伍，打击敌人。现在，运动已经进行20多天，第一步基本结束，训练了大队以上的干部15万多人；第二步正在进行，受训练的生产队以上的干部和贫农积极分子150多万人；第三步的试点已经开始，并取得了初步经验。报告说，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组成强大的阶级队伍。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最有效的方法是扎根串连，回忆对比，进行诉苦，启发阶级觉悟，调动阶级感情。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并不等于阶级队伍已经完全组成，还要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问题。解决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应当在一致对敌的口号下进行。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问题，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除极少数蜕化变质分子外，都应当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干部凡有缺点、错误的，一定要诚恳作自我批评，向群众彻底检讨，坚决改正，积极退赔，说到做到。经济退赔要本着过去从宽、今后从严，思想批判从严、经济处理从宽的精神，既要使群众通得过，又要使干部生活过得去。展开对敌斗争，要划清政策界限，分别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讲究策略。

我们不靠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1]

（1963年5月22日）

一

一九五八年，赫鲁晓夫[2]到中国来了一次，就是为了建立共同舰队的问题。我对他说，可以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把一万八千公里中国海岸线全部交给你。他说，把海岸线交给我以后你们干什么？我说我们搞游击队嘛！他说搞游击队干什么？我说你把全部海岸线都搞去了，堵住了我的鼻子，我不搞游击队怎么办？第二个办法是全部海岸仍旧归我管，你帮我们搞海军，建立好了也归我们管，全部费用归我们出，战时共同使用。这两个办法由你选择。两个办法他都不赞成。全部归他，觉得不好意思；全部归我们，他又不干。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过去占领大连、旅顺的办法。过去他们在那里有海军基地，朝鲜战争后他们撤回去了。我说，你们可以再回来。他觉得这也不大好，因为他们撤出大连、旅顺是两国政府发表过声明的，再回来不好。

建立长波电台是他们建议的，目的是为了侦察整个太平洋地区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时谈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的敌情。但是他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苏联出建设费百分之七十五，只许我们出百分之二十五。为这个电台的建设费问题，谈来谈去，谈了不知多少次。我说，建立电台的费用我们一个钱也不要你们出，苏联可以卖电台的器材给我们，电台归我们管，共同使用。这就谈不拢了。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

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在印度问题上对我们施加压力。他单独发表了一个声明，名义上是中立，实际上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他们在帮助中国建设工厂的整个时期，总是有一部分最关键的技术不告诉我们。

这一年他从戴维营回来就来教训我们，那一次也是谈得不欢而散。他受美国总统的委托，一定要我们把七八个美国特务释放。我说一个也不放，要照我们的法律办事。这几个美国人是空中特务，被我们飞机打下来的。美国始终不肯同我们达成任何妥协。我们把大部分美国人都放走，只剩下这几个了，他们是严重的犯罪分子。那个时候，赫鲁晓夫神气得很，因为他带来了戴维营精神。

二

那是一九六〇年，那一年也恰好是我们最困难的一年。我们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了五百万吨粮食，给了苏联一些。就在那一年，他们撤退专家，撕毁协定，在我国边境制造挑衅事件，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这么一点压力。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我们死了几百万、上千万人，也没有把我们吓倒。日本投降以后，美国人帮助蒋介石进攻我们，延安也丢了，大一点的城市统统丢光了。但是战争的结局是，美国人跑光了，蒋介石也跑

了。然后是朝鲜战争，美国猖狂到要把战争打到鸭绿江边，我们和朝鲜人民一道，把美国人赶了回去。

三

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也没有氢弹，我们要研究和制造这种武器。但是到研究制造出来那一天，同美国和苏联比较，还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也不到。我们不想用原子弹、氢弹在战争中取胜。怎么能用这种武器打胜帝国主义呢？还是要搞常规武器。我们也不打出国境，只是他们侵略进来，我们才以防御战把他们打出去，那时才发生出国境问题。如果我们打败了，也不会投降，至少可以保持一个游击区。我不相信中国会永远是个游击区，总有一天会把帝国主义赶出去。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才出国境。他们从哪里来，我们就往哪里去。

给黄炎培[1]的信

（1963年5月26日）

任之先生：

前后两信，并附著作、报告数种，均已收到，甚为感谢！《八十年来》[2]一书，尚未卒读，其余均已看过了。高年盛暑，尚望注〔意〕保重。敬祝

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六日

---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2] 这是黄炎培写的一本记载他80年来亲目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所接触到的事事物物的书。1963年内部印成小册子，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给周世钊[1]的信

（1963年5月26日）

惇元兄：

信收到，甚谢！复信一封，人民币二千，请转致张次仑[2]先生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张次仑，即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给张干[1]的信

（1963年5月26日）

次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惇元[2]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3]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

早日康复。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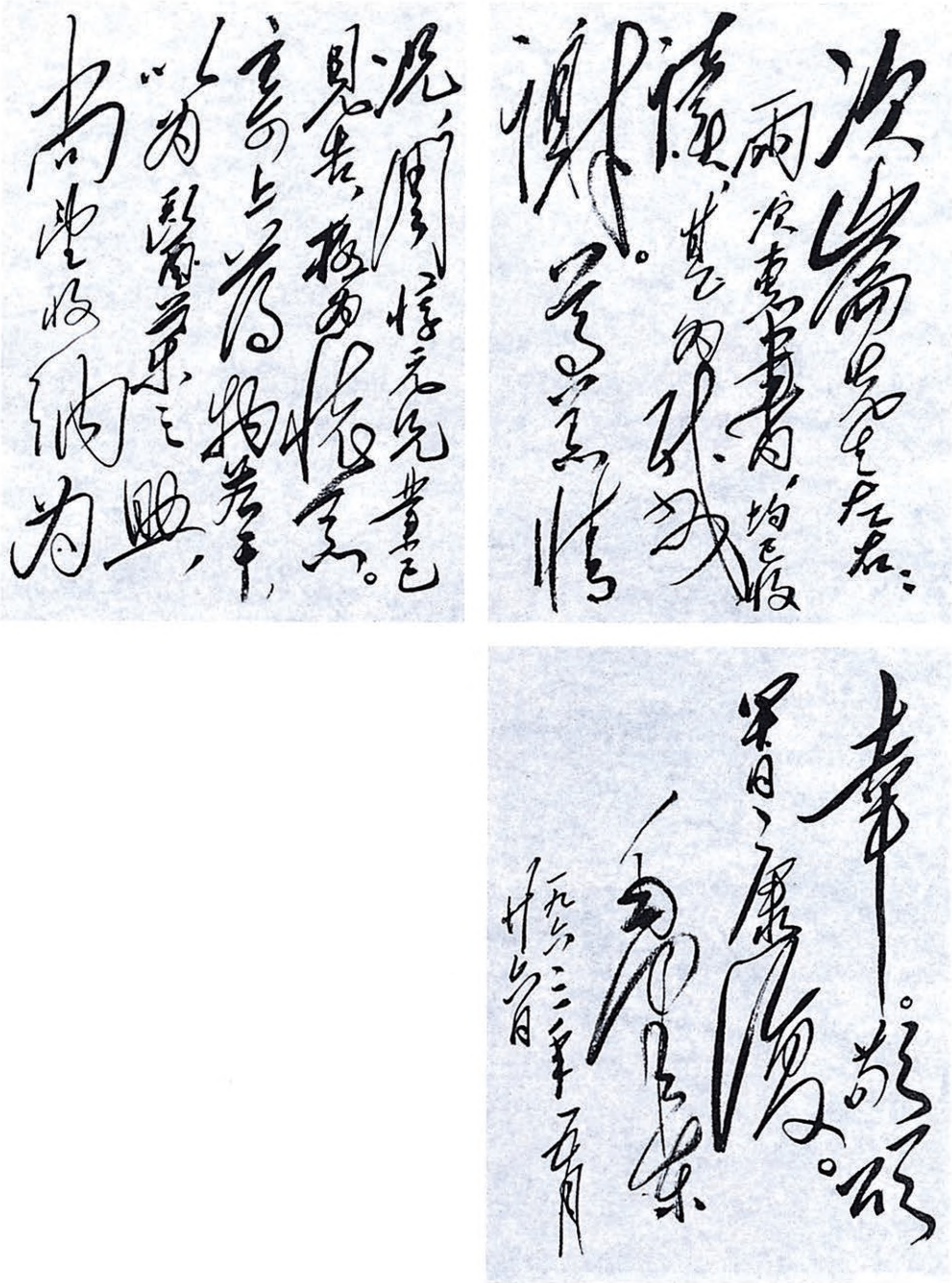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五月廿六日

---

[1] 张干（1884—1967），字次仑，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2] 周惇元，即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3] 指请周世钊转交的人民币两千元。



次崙先生左右：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先生情况，周惇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敬颂

早日康复。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五月廿六日

毛泽东致张干信的手稿。

1963年，毛泽东在武汉。

1963年，毛泽东在武汉。

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稿的修改[2]

（1963年5月）

一

目前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中央已经作出决定或指示的以外，还有若干问题需要作出决定，有些则是在过去指示中提出来

---

[1]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中央为印发这个决定（草案）的通知一起，作为中发〔63〕347号中共中央文件（即《前十条》），于1963年5月20日向党内印发。决定（草案）提出的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是：（一）形势问题。（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五）依靠谁的问题。（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八）“四清”问题。（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这里前九个问题的题目是毛泽东拟的，其中第九个问题的题目毛泽东原写为“干部参加劳动”，中央文件改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这一决定（草案）稿时加写的前言部分。二至五、七至九是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第三稿进行的修改。六是毛泽东对决定（草案）第三、第四稿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十是毛泽东在决定（草案）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了，但是不明确，不系统，尚未引起人们注意，需要重新加以明确的系统的说明。这些问题共有十个，都是互相联系的。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是经过了建国以来的十三年的实践，才能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文件，特别是在近三年中，即一九六〇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1]起，直到今天，才能写出现在这个决定。可见认识客观事物，需要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主要内容有十二条：（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90%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

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

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附在这个决定后面的有下列一些材料：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东北局宋任穷同志报告一件，河南省委报告一件，湖南省委报告两件，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县委、区委、社委报告四件，重发山西昔阳县材料一件，河北省材料两件，浙江省材料七件，共计二十件。材料虽多，但是好看。最好先看材料，后看本决定，因为这些材料极为重要，写得很好，本决定基本上是根据这些材料作出来的。没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作出这样一个有系统的决定。

目前农村工作中的十个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

二

形势问题。党中央在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1]以后，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指示[2]，除去一部分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党中央公布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并且对六十条作了适当的修正，进一步地对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有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各省农业生产的情况，都是一年比一年好。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重大的影响。所有这一切，说明了一部分同志过去对于农村形势，对于农业生产的情况抱有的各种悲观情绪，是没有根据的。

---

[1] 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

[2] 指中共中央1962年2月13日下发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

三

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当前社会中揭发出来的很多事实，证明上述阶级斗争的论断[1]是正确的。

四

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地方，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五

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引用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发现。

六

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应当说，上述阶级斗争的各种严重现象，并不是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注意到了。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

七

教育的办法，就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六十条修正草案，中央现在作出的决定，同当地的具体情况，具体事例，具体工作结合起来，向干部和群众讲解，启发他们，让他们能够掌握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懂得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学会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直接同群众见面，解决多年存在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问题。

八

毛泽东同志在今年二月中央会议上介绍了湖南和河北的成功经

验[1]。他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些地方原来没有注意抓紧社会主义教育工作，或者没有抓着要点，或者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但在二月会议以后，也抓紧了，也抓着要点了，找到好的方法了。

九

"四清"问题。河北保定地委的同志到农村进行调查，发现了农民迫切要求社、队认真地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目前社、队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亦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必须予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

[1] 指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2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2月17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中介绍的经验。

对印发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稿[1]的修改

（1963年5月）

这个决定（草案）要一直发到农村和城市党的基层组织支部。但在“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城市中由省、市、区党委控制，暂时不要将本决定（草案）下达。在农村中，则由各省、市、区党委控制，分期分批地下达，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这个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则暂时不要下达。

---

[1] 中共中央1963年5月20日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说，现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七个附件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按照决定（草案）中的规定，订出计划，经过试点，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有步骤地去推行，争取在两三年内全部办到，并且力求办好。在推行中切实注意调查研究，随时总结经验报告中央。准备在7月下旬（或8月上旬）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个决定（草案），然后提交中央全会正式通过。这个决定是关于我们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几项基本建设的重要文件，它的基本原则不但适用于农村，而且适用于城市。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通知稿时加写的文字。

在关于四清运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3年5月）

先看二十个材料引起大家讨论，先看三天。各中央局、省开会也是如此，不要传达中央文件有一个框框。不要性急，横竖准备搞它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搞三年。这样一个大的运动需要时间，不要性急。

这个革命运动是土改以来第一次最大的斗争。这样全面、这样广、这样深远是几年没有的。“三反”“五反”搞城市，一九五七年反右是思想战线上的，反高饶是党内的。全面的、党内党外的这样的阶级斗争是十几年来没有的。这次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这样理解有好处。这是土改以来第一次大斗争。开始要训练县以上的干部队伍，再训练大队以上的干部，还有训练生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没有蚂蚁的地区不要硬去找蚂蚁。譬如一类社队过去进行了阶级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你一定去找地富活动，没有一个例外也不好。

人民内部矛盾是大量的，差不多都有，大的小的。河南材料说到一个支部很好，另一材料说的一个公社干部经过洗手洗澡真正一尘不染的只有两个人，不能说这个支部不好，还是百分之九十五以

上。现在看来我们干部真正一尘不染是有的，但不能说太多。铺张浪费、多吃多占，一点没沾上的少，大多数沾了，洗手洗澡交待就好了吗？这次“四清”“五反”大家都出点汗，洗温水澡，轻松愉快，才能轻装上阵，一致对敌。为什么轻松愉快？一致对敌，我们身上不干净没有力量，搞干净就能团结一致对敌。有的干部多吃多占，有的和地富女儿勾搭，不洗就不能对敌。有些人对敌斗争有劲，对人民内部矛盾就不大积极，有顾虑。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多吃多占，上了当的，只要自己说出来，又退了赃，不算贪污分子。将来机关、工厂、企业也可以这样办。当场宣布不算贪污分子，可不公布姓名。东北局有几个贪污一百元、二百元，自己讲了，开大会宣布不算贪污。至于贪污大的案处理，大约不过上万元，如自己交待了又退了，处理可以减轻。既要有严肃性，又要有政策性，“四清”“五反”一定要有，不反不行。一定要交待清楚，不退赃物赃款不行。但要退得合情合理，多吃多占的退的时候，不要退得太挖苦了。使干部生活过不下去也不好，有的已吃了用了，教育他向群众检讨一下退出若干，参加劳动，这样群众不会叫一次退出，分期分批退，不至于使生活不好过。还可以采取自报公议。这个政策很复杂，看起来自己好。

这次运动中间要换一批。劳动好的人，看来是少数。处分的，也是少数。议论干部受处分的可能不到百分之一，不要太多了，要多做教育工作。加强运动的领导，有的时候需要靠各地区县社队广大干部，上面去的人不要包办代替，要把广大干部发动起来，要依靠广大干部去搞。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方法，发动广大干部的方法，来的力量大。

一个坚决把运动搞起来，一个怕搞乱了。

（□□同志讲：我懂主席心情，第一要搞，第二要搞好。经常向主席反映情况，得到主席指示，不要搞乱了。）

三个伟大革命斗争，不搞好不行，一定要搞好。

注意总结经验，回去中央局开十天会，搞一个月工作，到七月中央局再开一次会，总结一下经验，摸一下情况，到七月底八月中央开会，除这个外还要搞工业。

要有强的领导才能发动运动，分期分批，一批批搞不算落后。这次运动将要大大提高各地的自觉性，中央局、省、市、县的人下去一起来运动。

“四清”历来不清，阶级斗争粗糙，这次运动，要提高自觉性，要忠心诚恳地帮助社队把工作搞好，帮助干部洗温水澡，帮助“四清”搞好，除了个别不行的，烂了、蜕化变质的帮不上去，或太坏了，要派工作队代替他们搞，除此要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搞。

你们对干部怎么样？我不清楚。现在看起来对干部要说服教育，特别是用实际证据来说服教育。照理说有，拿出实际证据来说，也有阶级斗争实际证据，昔阳县实际证据，浙江参加劳动，四个好文件是实际证据。检查一下我们是否照理说多，证据说比较少。

你们有机会去一个区搞十几天。（我们说：没有。）你们下去干部是否很紧张？熟了就不很紧张，多尊重人家，不要指手画脚，“三不”，对干部我们要团结他们，要洗手洗澡，要抓一下。

这次运动会出现杀人灭迹。

发动群众搞“四清”是厉害的事情，河北经验，有些公安机关搞不清，发动群众“四清”搞出来了。有人讲阶级斗争靠公安部门搞，人民内部靠监委搞，当然要靠，但除此还要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这个运动抓起纲领就好办了，分期分批搞，搞第二、第三批不算不名誉，还是名誉。

（众议：有地方走过场，雨过地皮湿。）走了过场再搞嘛，就是不要伤人，不是敌人当敌人，不是……

（众议：乱子一点不出不行，主席同意我们的看法。十九日大厦跳楼死人，黑龙江有个地富杀死三十八人，去年枪毙了反革命十三人。）上海死一人，在厕所吊死，留字“过路君子”说好为他申冤，根本没斗他就死了。

要坚持说服教育，分期分批试点，划清界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有强的领导，只要有几条搞好就可少出乱子。

不打无准备之仗，材料没准备，兵没练好，不要搞。这一仗是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要像解放战争时来打仗，辽沈战役、锦州、淮海、过长江战役。不要打百团大战，不要像皖南事变那种打法。

第二是解放战争几个战役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次打仗打好了是全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革命贡献更大了。

关于《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的批语

（1963年5月）

《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一文和省委的批语都很好，一并发给你们参考。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农业合作化以来的无数事例证明：凡是办得好的社、队，无例外的都具备有社、队的领导干部经常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的特点。反之，凡是办得不好的社、队，往往具有一个相反的特点，即这些社、队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和社员在一起积极参加劳动，因而脱离群众，不能抵抗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袭，生活特殊化，贪污、多占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的甚至逐步蜕化变质，堕落成为富裕农民和资本主义分子利益的代言人，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一规定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大队和生产队干部的补贴工分不得超过生产队工分总数百分之二的规定根本行不通。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

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这个县的县、社两级干部一九六二年在生产队工作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六十二个，公社级每人平均八十二个。他们到哪里下乡工作，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并且一直坚持不懈，经过几年的努力，才逐步形成风气。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

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要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

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

（1963年5月）

一　形势问题

生产的形势，一年比一年好。阶级斗争形势是严重的，尖锐的。（列举农村阶级斗争情况）为什么农村出现这样严重的情况？有三个原因，一个是阶级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认识原因。

阶级原因：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有阶级的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历史原因：一方面是有的地区民主革命任务尚未完成，有的地区社会主义革命未完成。封建地主没有打倒的地方，是重新革命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工作历史方面的原因。土改以后，我们就没有再搞阶级斗争。“三反”“五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都搞了一下，但不是这样的做法。苏联在一九三二年以后，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又搞了二次肃反，此后十六年当中不搞阶级斗争，他们的集体化依靠谁？不搞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可靠的社会基础。

华北局机关“五反”搞得好，说是“清水衙门’，但是一清就清

出好多专案来。

认识原因：阶级斗争是客观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怎样领导阶级斗争？

二　认识问题

十中全会后，跑了十一省，只有□□、□□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人都不讲。二月会议后，情况有了变化。河南五个月没有抓阶级斗争，二月会议以后，抓得很好。有变化，但并不是都通了，有个地委书记，二月会议以后，就不通，下去试点以后才通。

我看了湖南第二个材料，现在才懂得一点，即搞规划、生产经营时，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我问了许多人，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都回答不出来。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不识字的农民也懂得这一点。比如说，你问农民，他知道张三是地主，是压迫我们的，有了“张三”“地主”这两个概念，就可以推理：地主是剥削人的人。农民的认识是从生活中来的，不识字也可以懂哲学。成吉思汗就不识字。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这就是精神变物质。马克思就是一言，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不是一言可以兴邦吗？赫鲁晓夫也是一言，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这不是一言可以丧邦吗？

哲学要在实际工作中讲，要在开会中讲。要告诉你身边的同志，哲学并不难。军事学也不难，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

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少数的几个人是从军事学校中出来的。翻了军事书，看了欧洲战史，和中国情况对不上。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半年的入伍生，派出来当连长，根本不能打仗，听班长的。班长说怎么打就怎么打。军事是从实践中学的，所以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看得那么神秘，不要把哲学看得那么神秘。我看过雪峰一部分日记，此人就懂得一点哲学。

大学生学习五年就学好哲学？我不相信。许多哲学家都不是大学学习的。中国的哲学家中，王充、范缜、付玄、柳宗元、王船山、李贽、戴东原、魏源……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黑格尔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他的学问很广。康德是一个天文学家，他的天体论到现在还有价值。马、恩、列、斯也都不是专门搞哲学的。

山沟里出哲学。醴陵那样好的报告，不出在湘潭，不出在常德，而出在醴陵。在困难中、在斗争中才能够出哲学。逆境出哲学，顺境能够出哲学吗？三国的黄盖兄，醴陵人；程颐、程颢的老师周廉溪，是宋代的大理学家，朱熹和他是一个系统的，也是醴陵人，是醴陵专区的道县人。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派。唐代的大书法家怀素，也是这里的。柳宗元从三十岁到四十岁，整整十年都住在醴陵，当时叫做永州。他的山水文章，和韩愈辩论的文章，都是在那里写的。

所以要破除迷信，不过要注意，不要像前几年那样，把不应该破的也破了。

事物有现象、有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统一。本质是看不到的，要透过现象去抓到本质。比如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会产生修正主义。又比如平常我们走路看不到蚂蚁，

大踏步就更看不到了，要蹲下来才能看到蚂蚁，就能看到很多东西。否则不仅新鲜的萌芽的东西看不到，就是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也看不见。比如阶级斗争和干部不参加劳动是大量存在的，有些人却看不见。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有的人是主观主义地大胆假设，主观主义地小心求证。河北各地委下去调查研究，只有保定地委是科学的，其他都是主观主义的。保定地委开始并不是去搞“四清”，而是去搞分配的，群众不同意，提出搞“四清”。保定地委听了群众的意见，改变了计划。搞了“四清”，这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讲哲学不要超过一小时，讲半小时以内，讲多了就糊涂了。

我在莫斯科会议上讲了哲学，莫斯科宣言写上了，在国内反倒没有人讲。

三　要点

运动的要点是什么？是十个问题，其中一部分是认识问题，是要高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解决的。还有一些问题是普遍工作要解决的，普遍工作中的要点有以下几点：

1. 阶级、阶级斗争。用什么方法进行阶级斗争？一定要用阶级观点去分析问题，最先写四大家族的是曹雪芹。《红楼梦》写的贾、史、王、薛大家族，他们是奴隶主，三十二人。写奴隶女，鸳鸯、晴雯、小红等，都是很好的，受害的是这些人。林黛玉不是属于四大家族的。

2. 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的方法有两大条：

第一条是让中央的精神和干部、群众见面，讲解清楚，结合当

地的具体情况、具体工作、具体事实，让群众揭盖子。

第二条，要让老一辈重新回忆受压迫、受剥削的历史，激发阶级感情，让青年一代知道革命斗争果实来之不易，让他们续一续无产阶级的家谱。

3. 依靠贫下中农。依靠谁的问题，一万年也有，到将来总还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先进和落后、左中右的矛盾。在今天依靠谁？总得有一个阶级。依靠全民？说依靠全民，实际上是依靠少数人。有人说“地富听话，中农调皮，贫农糊涂”。地富怎么不听话？又送东西，又送女人，可是他是要你听他的话。

什么叫心情舒畅？贫农、下中农受到压抑，不能抬头，心情怎么能舒畅？贫农、下中农不舒畅，干部怎么能够舒畅？

资产阶级说他们后继无人，怎么说后继无人？黑格尔的后继人是马克思，资产阶级的后继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抓“三自一包”，想卷土重来，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打击他，打掉他的基础，不让他拉后继人。

四　四清

什么叫贪污？五十元？一百元？二百元？只要坦白了，退了赃，就不算贪污。

赃要退，也要合情合理，退到手脚干净，又要退到让干部能够生活。这样做究竟退多少？是不是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

惩办要控制在百分之一。

今年不要开杀戒，明年再说。罪大恶极的也先放慢一些，现行反革命按规定办理。群众要求非杀不可的，是有道理的，你领导可

以等一等嘛！

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解决贪污、多占问题，也可以了解生产情况，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参加劳动，势必脱离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昔阳干部劳动很好。昔阳在山上，很穷，很穷就革命。

要把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先进劳动者、劳动积极分子手里。

（有人说，有些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

劳动模范不参加劳动，还算什么模范？取消好了。有的因为会多，接待访问太忙，这个问题要解决，你们可以到田间去访问嘛！

县干部也要参加劳动，基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就跟国民党保甲长一样吗？你们是做大官的，也有做小官的。小官权也很大。过去一个团长，给不少办公费。现在我们基层干部，一个参加劳动，一个“四清”，不愿意干就回家当老百姓去。

干部参加劳动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就少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时候都有，一万年都有，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就没有对立统一了。

贪污揭发得越多，我越高兴。你们抓过虱子没有？身上本来很多，抓得越多越高兴。

五　方法

要采取积极态度。

1. 要注意训练和教育干部；

2. 不要着急，今年搞不完明年，明年搞不完后年。土改不是搞了三四年吗？有的人不信，不要去责备他，你一围攻，他一着急，

就乱来。要慢慢地说服，着什么急？我们革命胜利比苏联还不是晚三十多年？

3. 要试点，要踏踏实实地搞深搞透，要防止敷敷衍衍地走过场，一定要搞试点；

4. 要区别不同情况，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不要一起搞。（讲了西汉陈平的故事）（对李□□）你四川那么大一个省，一下子能够搞得了哇？

5. 精简。要精简一些干部下去搞劳动锻炼，搞阶级斗争锻炼。我身边原有二三十人，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对江□□说，江苏四千多万人口，省直机关工作人员五千，可以精简一千五百人或两千人。这是一个老问题，长期没有解决；

6. 要抓住重点。“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记》。”《香山记》是讲庄王的女儿（即观世音菩萨）的故事，七个字一点，开头两句就是这个。天和地可以隔开，天和地都不唱，单唱《香山记》，就抓阶级斗争。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1]

（1963年至1965年）

一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处在领导工作岗位的同志和许多从事一般工作的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革命的认识论，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他们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既然这样，那他们的调查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当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二是毛泽东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封信的主要部分。刘少奇在1964年9月25日将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9月8日给他的信和他9月23日的复信稿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天给他写了这封信。本篇四是1964年10月18日毛泽东再阅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修改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五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本篇六是毛泽东重读自己的旧作《长冈乡调查》时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七是毛泽东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第一编第三章第一节《两种对立的发展观》旁写的一个批注。

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一九六三年五月）

二

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三

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四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八日）

五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1]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

[1] 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200万年。

六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1]，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自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一九六五年）

七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

---

[1] 指1931年初至1934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等人。

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以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此类推。

（一九六五年）

1963年6月16日，毛泽东会见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长崔庸健。

对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计划调整和执行情况报告（草稿）的批语

（1963年6月26日）

送恩来[1]同志修改。此件[2]已看过，可用。但杭州会议几段话（见第6页，第35、36、37页，第41页）[3]，暂时不要采用。另在第1页关〔于〕春季作物的说法，应改写一下。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六日

---

[1] 恩来，即周恩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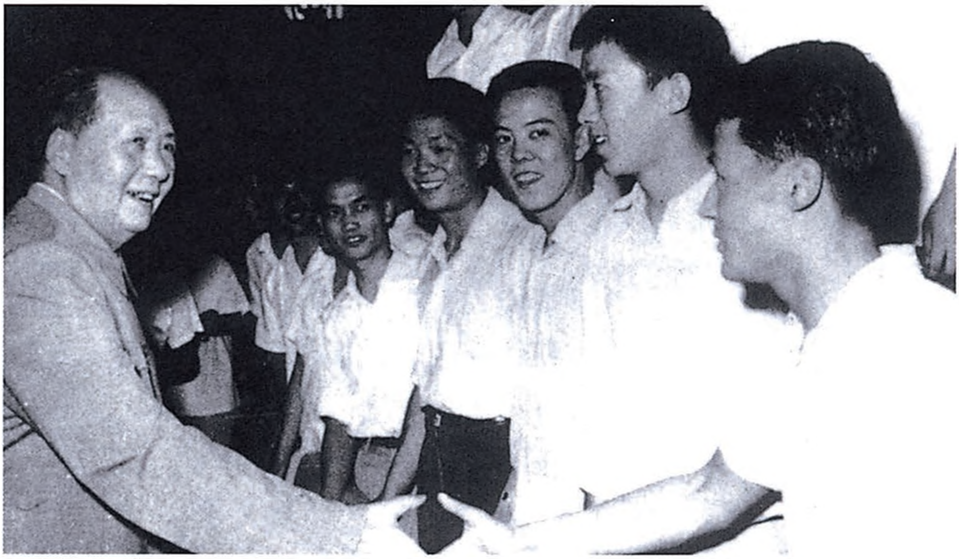
[2] 指周恩来1963年6月9日报送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两年的调整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草稿）》。7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会议作了这一报告。

[3] 第6页上的一段话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第35页至第37页上的两段话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第41页上的一段话是：“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

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1/4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1963年6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中国运动员参加27届世乒赛获得的奖杯。



1963年6月29日，毛泽东接见参加27届世乒赛的运动员。

关于发表中共中央声明[1]的批语[2]

（1963年6月30日）

康生同志：

已看过，同意小平同志意见。

毛泽东

卅日下午七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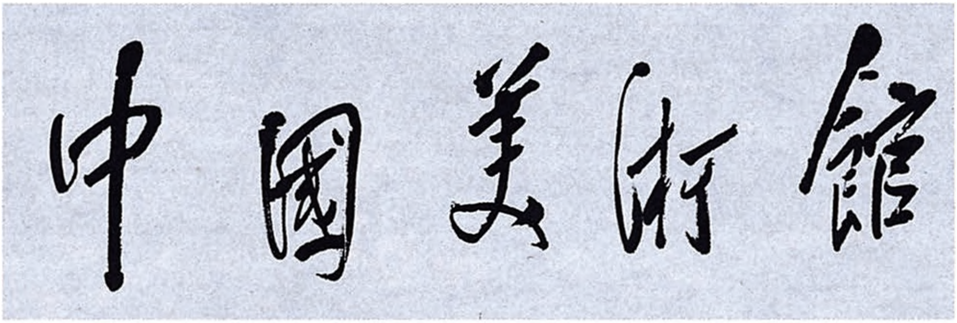
[1]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7月1日声明。声明说，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总书记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参加7月5日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声明还对中共代表团提出要求，并期望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这个声明在1963年7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这个批语写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6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赫鲁晓夫的报告全文已收到译出，其中攻击中国党的一段，另纸抄上。邓小平说，原中共中央声明稿可以定下，不要改了。在今晚8时政治局通过后，今晚即可广播，明天即见报。所说赫鲁晓夫报告，是指他在苏共中央6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全体会议上发表的长篇讲话。

为中国美术馆题名[1]

（1963年6月）

中国美术馆



毛泽东为中国美术馆题写的馆名。

---

[1] 中国美术馆建成于1962年。最初取名“中央展览馆”，是毛泽东在题写馆名时改为——中国美术馆。1963年6月，毛泽东题写“中国美术馆”馆额，明确了中国美术馆的国家美术馆地位及办馆性质。

对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普遍发到农村支部的请示的批语[1]

（1963年7月5日）

刘、周[2]再阅。退谭震林[3]办。

一定要有政治上强的工作组到达地方，才可以发到支部，由内到外，普遍宣读，否则一律不要发。

毛泽东

七月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湖南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树青建议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普遍发到农村支部的请示报告上。在送毛泽东批阅前，刘少奇、周恩来、谭震林已阅过。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3]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3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值此蒙古人民革命四十二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祝蒙古人民在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

近几年来，中蒙两国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互助合作，有了很大的进展。一九六二年，中蒙两国政府本着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顺利地签订了两国边界条约，为加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同蒙古人民一起，为不断加强中蒙两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斗争的新胜利而共同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日

对《人民日报》关于加强团结的社论稿的修改[1]

（1963年7月）

我们只有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的义务。我们没有放弃原则、扩大分歧、制造分裂、认敌为友的权利。

---

[1] 这篇社论稿原题为《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社论于1963年7月1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对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稿的修改[1]

（1963年7月）

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再一次发表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发表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以便让自己的党员和中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双方的观点，进行比较和研究。其他全国性报纸和省市级以上的报纸，也将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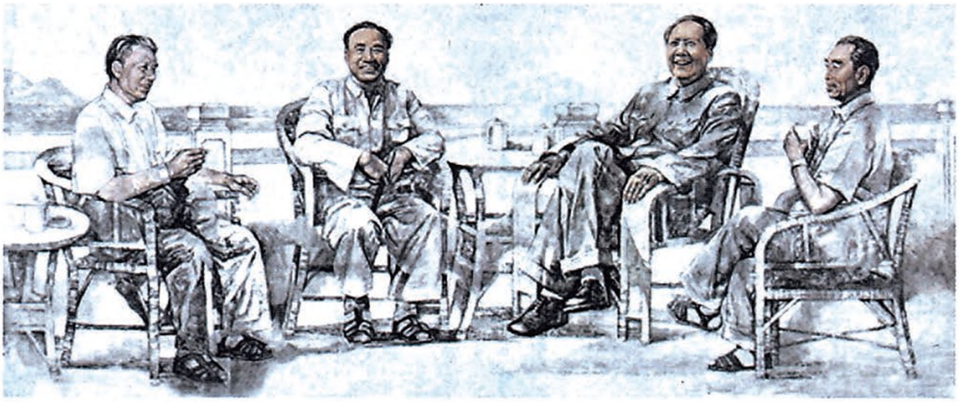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还决定，再一次以多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同时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信虽然早在六月中旬广播了，那时可能有些人没有收听到，又很可能有些反对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人们不愿意收听，现在我们再广播一次，希望上述两类人，特别是反对我们的人，耐心地听一听，以便这些人手中有材料，可以对我们作出像样的批判。老实说，这些人过去对我们的一切批判，都是不像样子的，都是不能说服人的。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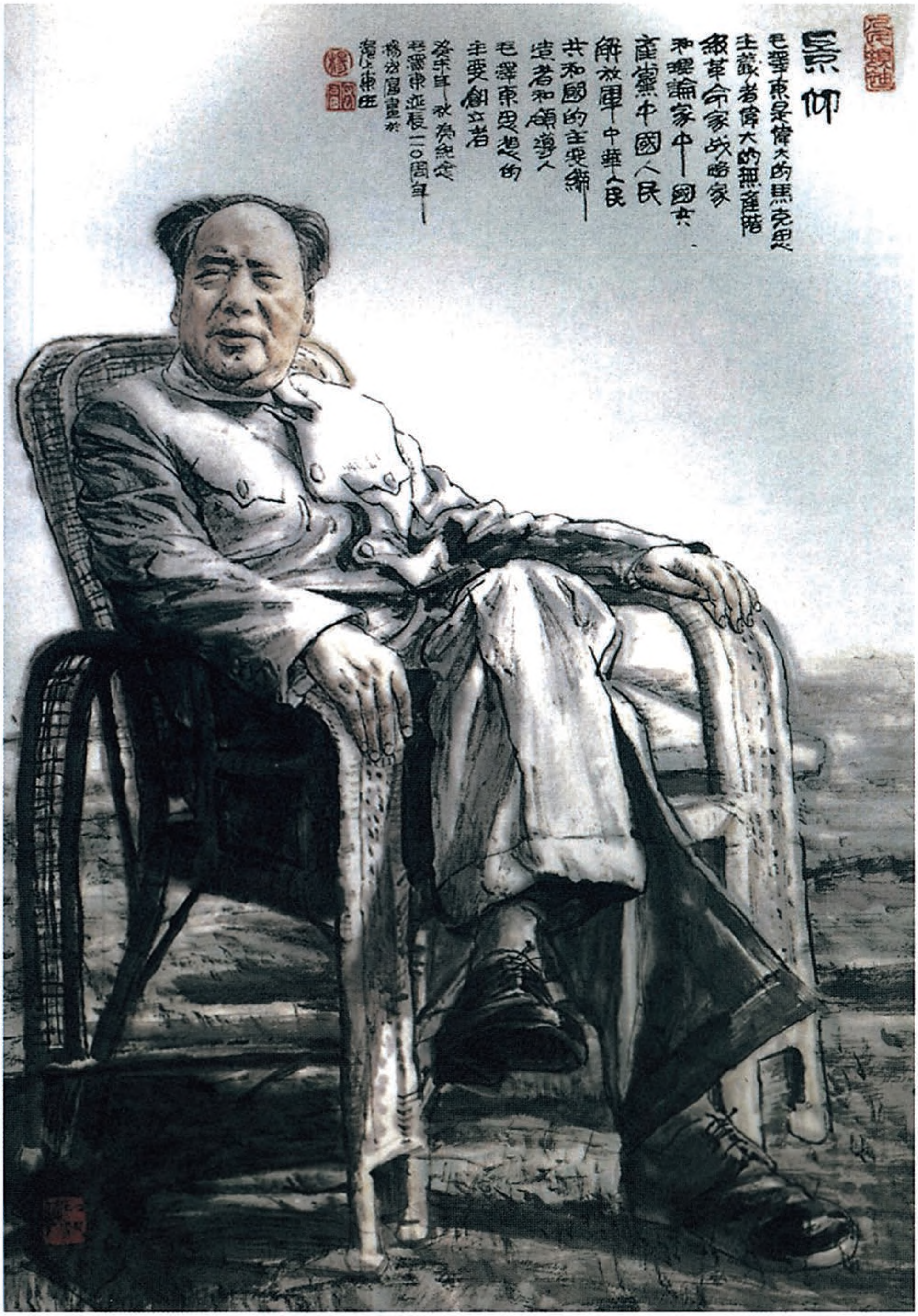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声明7月18日下午稿的修改。声明发表在1963年7月20日《人民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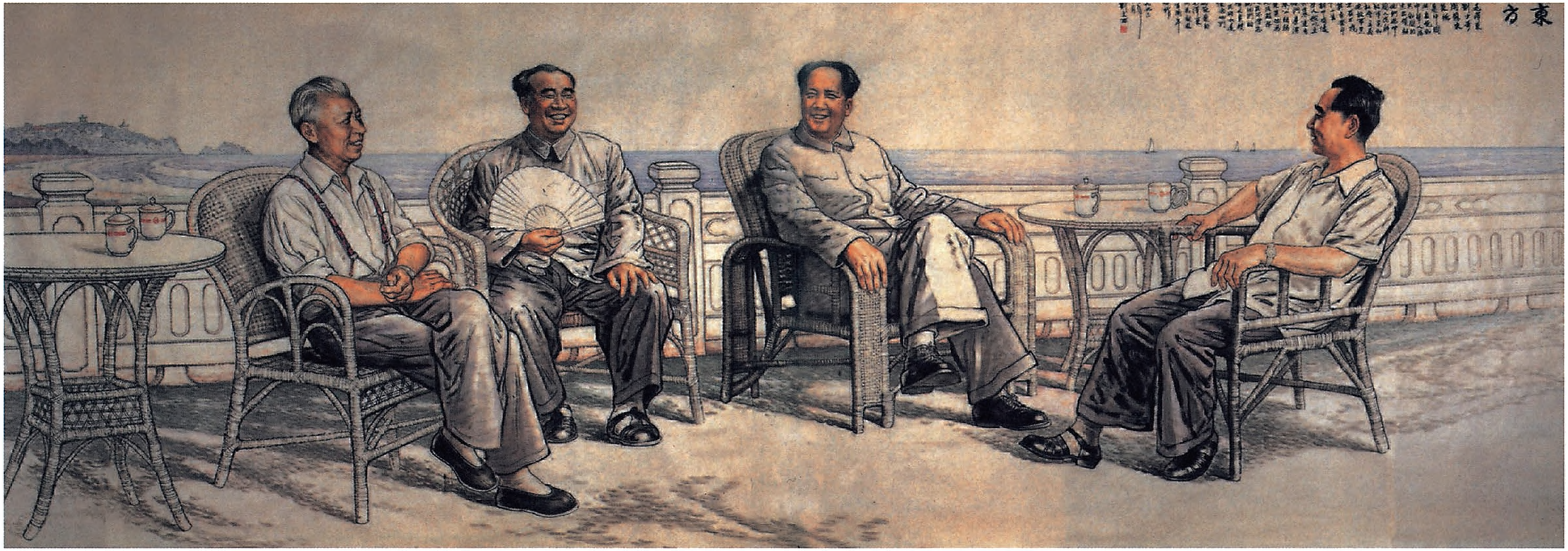
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就不能发展唯物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



《世纪伟人》（中国画）


景仰
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
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
級革命家戰略家
和理論家中國共
產黨中國人民
解放軍中華人民
共和國的主要締
造者和領導人
毛澤東思想的
主要創立者
癸巳年秋為紀念
毛澤東誕辰一二〇周年
楊炳富畫於
濟南東田

《景仰》（中国画）



《东方》（中国画）

对《人民日报》为刊登苏共中央公开信写的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

（1963年7月19日）

一

尾页有修改[1]。

毛

十九日下午一时半

---

[1] 即本篇二，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二

类似这样的情况[1]，通篇皆是，总共有七八十处的样子，举不胜举，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

[1] 指编者按中所列举的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采用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制造攻击中共领导人的事例。例如，关于核战争问题，说中共领导人不惜通过世界核战争，牺牲亿万人，来取得社会主义；关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问题，说中国领导人对它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关于把思想意识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的问题，本来是由苏联造成的中苏经济贸易联系缩减，却反而责怪到中国方面。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共举行双边会谈。图为毛泽东到机场迎接中共代表团回国。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首都机场。

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在机场。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在机场。

1963年7月，毛泽东和早年相识的师长、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交谈。

1963年7月，毛泽东和全国妇联副主席许广平握手。

关于赦免在押国民党军将领等问题[1]

（1963年7月20日）

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打我们。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几百万军队被我们消灭了，剩下几十万残兵败将逃到台湾。北平城解放是没有经过战争的。接受改编的军队由傅作义[2]将军率领。傅作义将军还在，还在政府里工作。他是我们水利电力部的部长，也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的干部都得到了工作。我们对待这些人，只要他们不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同他们合作的，哪怕是那些同我们打过仗、被俘的将军。有好几十位国民党将军现在在我们这里，大部分已经得到赦免。没有必要对他们采取不人道的方法，就是说没有必要杀死他们，也没有必要把他们长期地关在班房里。过了一个时期，就可以赦免他们，使他们取得公民权，并且可以得到工作。有些年老的可以得到养老金。愿回台湾的，可回台湾。为什么他们很少回台湾？有些人家属

---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驻中国大使佩雷拉及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在台湾，为什么不去？他们可能害怕台湾当局会杀他们。因为台湾多次宣布说他们被我们杀掉了，如果一回去，就证明没有被杀。无论将、校、尉，没有一个被我们杀了的。台湾害怕他们这些人回去宣布这个消息，说我们只要他们不抵抗或者是战争完了，一个不杀。台湾怕军队知道这个消息。至于打仗时候的伤亡，双方都有。比如说徐州这一仗，即淮海战役，双方参加的队伍各有几十万人。那次伤亡的是一小部分，大部分没有伤亡。特别是徐州附近的最后一仗，没有怎么打，对方军队就缴械了。

二

这位司徒雷登[1]，我也见过，谈过话。那时是在重庆，他刚从北平日本监狱里放出来。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美国政府政策的问题。美国政府开头是讲调解，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调解。他们说对双方都不帮助，不帮国民党打共产党，也不帮共产党打国民党。他们大使到过延安，接我到重庆去，这个人叫赫尔利[2]。后来美国总统的特使、五星上将马歇尔[3]也来中国调停，停留了好几个月。他到过延安，我跟他谈过一次。后来证明那是一个骗局，目的在于使蒋介石能有时间调遣和集结军队向我们进攻。后来美国的假面具撕破了，它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帮助武器，帮助财政，这笔账算不清楚，可能有几十亿美元。到我们解放军解放南京时，美

---

[1] 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2] 赫尔利，1944年11月至1945年11月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3] 马歇尔，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在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国大使司徒雷登不走。我们还派了黄华同志去见他。黄华同志过去是外交部的司长，现在是驻非洲加纳的大使。他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司徒雷登是他的校长。

英国承认我们，但是美国不承认。美国也不让法国，不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承认我们。例如说拉丁美洲各国，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只有一个古巴。在欧洲，同我国有外交关系的比较多一点，例如英国、瑞士、荷兰，北欧的挪威、瑞典、丹麦、芬兰等。亚非国家承认我们的又比较多一些了，但是泰国、菲律宾、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到现在还没有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

日本政府实际上同我们有往来，日本广大人民同我们友好。他们感觉我们对他们好，包括一些过去打中国的将军，比如被俘的将军和没有被俘的将军中间有许多人也对我们好。日本有个问题，就是受美国控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受美国控制，那里有美国军事基地。日本现在没有殖民地，它的殖民地被美国夺去了，比如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泰国，过去都是日本的殖民地或在战争中占领的地方。再如南越也是日本占领过的地方。

现在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美国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拉美，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伸到亚洲，伸到印度去了。美国的手伸到非洲，伸到欧洲，伸到澳洲[1]。这种情况会引起一种变化。这些被控制的国家和人民总有一天要起来反对美国。

---

[1] 这里指大洋洲。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值此波兰国家复兴节十九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波兰人民、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九年来，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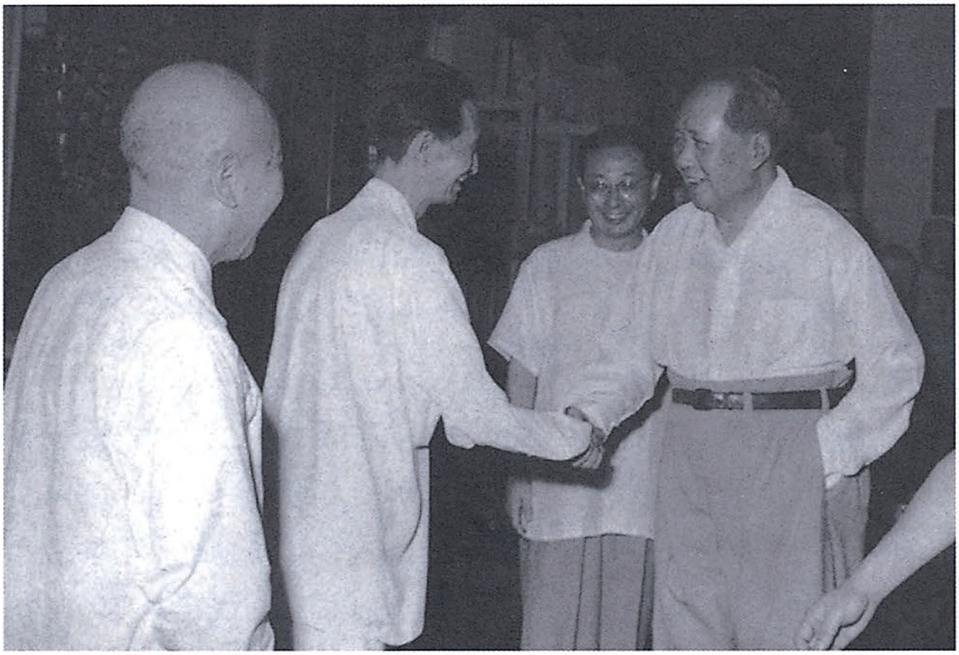
中波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维护和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增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增强中波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并且同波兰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社

会主义的斗争的新胜利而努力。

祝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波兰政府的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1963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希尔。



1963年7月23日，毛泽东接见作家邵荃麟。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电报

（1963年7月25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欣逢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谨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十年前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领导古巴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发动了对蒙卡达兵营的英勇袭击，为古巴人民揭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此后，古巴人民经历了艰巨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美帝国主义走狗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并且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美洲大陆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古巴人民又不断地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胜利地击败了美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武装侵犯，这不仅保卫了古巴革命的果实、国家主权和尊严，而且对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当代伟大的历史事件，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革命经验和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写下了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两个哈瓦那宣言，提出了古巴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战斗的革命纲领，大大地鼓舞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信心。我们深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洪流，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必将在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

美帝国主义者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决不会放弃对古巴的干涉和侵略。我们深信，古巴人民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和坚强斗争，在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挫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活动，战胜各种困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中国人民重申：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古巴人民最忠实和最亲密的战友。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的战斗友谊是经得起一切严峻考验的。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取得更大的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接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的谈话[1]

（1963年7月26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文化代表团到什么地方去看一下没有？

奥斯明[2]（以下简称奥）：到上海、广州、武汉去参观过。

毛：一共有多少时间？

奥：刚好二十六天。

毛：代表团是什么时候到的？

佛利斯·库左拉（以下简称佛）：上个礼拜天到的。

张□□（以下简称张）：周总理昨天接见时，希望青年代表团到延安去看看。

佛：昨天中央的同志对我们讲，可以到延安去参观。

毛：那个地方很落后。到落后的地方去看看，也有好处。文化代表团来签订文化协定，签好了没有？

奥：前天中午（二十四日）已签了字，我们非常满意。

毛：非常满意吗？

奥：是。非常满意。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古巴文化、工会、青年学生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奥斯明，指奥斯明·费尔南德斯，当时为古巴全国文化委员会代表团团长。

毛：协定包含些什么内容？

奥：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两国互派代表团访问的事情，古巴方面将邀请中国杂技艺术团去访问，同时我们也要派艺术团来中国。另外，双方要互派语言留学生，交换影片、书刊以及其他文化资料等。

毛：我们的影片，恐怕不那么高明。

奥：电影是教育人民群众的有力工具，我们相信，中国电影能够起到这个作用。

毛：影片的作用是不小，但我们的好片子太少。

奥：中国的电影事业，像其他经济建设事业一样，正在飞快地向前发展。

毛：我们的胶片还不能够完全自造。你们能够制造胶片吗？

奥：古巴不出胶片。

毛：是进口吗？

奥：进口。古巴的电影，主要是些记录片和短片。

毛：慢慢发展下去，就会搞长片。我们的杂技，是历史上留下来的玩意。

奥：到哈瓦那去的，是由武汉的杂技团组成的，我们亲自到武汉去看过他们的节目。

毛：杂技团去过古巴没有？

张：没有去过。以前，去过歌舞、京剧团。

毛：杂技团过去不是去过吗？

张：那是到拉丁美洲巴西等国访问。当时，古巴革命还未成功，我们的艺术团进不去。

毛：古巴革命进展很快，几年之内，就战胜了敌人。我们的革

命时间很长，搞了二十几年。有本国的敌人，也有外国的敌人。外国的敌人是日本，我们和他打了八年；国内的敌人是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四年。日本没有打进来以前，和蒋介石打了十年，日本投降后，又打了四年。蒋介石后面有美帝国主义支持。后来，又在朝鲜和美国人打了差不多三年。有很多人怕美国人。在我们国家，也有很多人怕美国。打了三年之后，怕美国的人少了。现在，美国人又在越南南部打，越南南方人民只有很落后的武器，而美国有很多新式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直升飞机、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但是，打了五六年，越南人民和军队在发展，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他们不怕美国人了。这些经验很值得讲一讲。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兵还不如日本兵。我们和日本打了八年。美国的士兵还是有战斗力的，他们武器多、武器好，但是，他们不喜欢打仗。美帝国主义为了霸占全球，用战争威胁全世界人民，作各种战斗准备。一种是核战争，这种战争有可能打，也有可能不打；另一种是常规武器的战争。他们的方针是打常规武器的战争，在越南打的就是这种常规战争。过去和我们、朝鲜人民打的，也是这种战争。那时，他们不是没有原子弹，而是不敢打；现在原子弹更多了，可是在越南南部也不敢打。美国现在的三军参谋长泰勒[1]，此人就是在朝鲜和我们打过仗的。他写了一本书大家有机会最好看看，书名是：《音调不定的号角》。在这本书里，他批评杜鲁门[2]和艾森豪威尔[3]过去不重视常规武器的战争。他认为，又要打原子战争，又要打常规战争。叫喊打原子战争，但又不打，这就叫作

---

[1] 泰勒，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2] 杜鲁门，1945年4月至1953年1月任美国总统。

[3] 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至1961年1月任美国总统。

音调不定。泰勒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当过陆军参谋长，后来因为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辞职不干了。肯尼迪[1]当选为总统后，他又起来了，当了陆、海、空三军的参谋长。

据您们看，全世界人民现在还那么怕美帝国主义吗？

奥：从我们来看，现在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在拉丁美洲，如委内瑞拉、秘鲁等国，人民的革命战争日益高涨。他们国家虽然很小，进行常规武器的战争力量不够，但还是在那里进行斗争。他们不怕美帝国主义，敢于反对在美国支持下的独裁反动统治。

毛：他们和你们一样。如果只是怕，把手缩回来，让人家抓住关在监牢里，或者杀掉，那革命的火焰就熄灭了。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人怕美国。但是，怕又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能解除武装吗？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无所谓怕不怕，因为敌人已经打来了，怕又有什么用？打的结果，我们胜利了，可见不必那么怕，怕美国是多余的。除美国之外，还有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如法国，他们在越南北部打，结果胡志明[2]同志打胜了；在阿尔及利亚，阿民族解放军也打胜了。他们打了七年，经历了许多困难，法国军队多到八十万之多，而阿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人。他们很多人都同我讲过，包括现在的议长、过去的总理阿巴斯。你们知道阿巴斯吗？

奥：知道他的名字。

毛：他们对我们谈过很多，谈过他们的困难，阿牺牲了九分之一的人口，就是说，九百万人口中死了一百万。另外，法国军队领

---

[1] 肯尼迪，当时任美国总统。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导机关还出版我写的小册子，企图打败阿民族解放军。我告诉他们，我写的小册子，是人民战争的小册子，反人民战争的那一方面，不可能利用，他们想利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国内战争时期，蒋介石也利用我写的小册子，想把我们打败，结果还是不行。美国人也想利用我们的办法，他们有很多人研究中国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但是在朝鲜战争中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在朝鲜战争中，除美国外，还有十五个国家参了战。包括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哥伦比亚等，当然，主力是美国。美国去了一个师，土耳其去了一个旅，哥伦比亚去了一个营，他们是凑起来的。他们到朝鲜来，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子。打了两年半快三年，谈判就整整谈了两年，当时是一面打，一面谈。谈判的地方就是双方交界的一个小地方——板门店。

奥：我们在朝鲜时到过那个地方。

毛：朝鲜很可以去看一看。要研究那个时候怎么一面打，一面谈；怎么用很少的人和武器，战胜了拥有强大武器的敌人。

奥：我们在朝鲜呆了十天。

毛：在朝鲜看过防御工事没有？

奥：我们在朝鲜访问时，去了开城和板门店，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展览馆中有一个一二一一高地模型，山头被敌人打去了两公尺。

毛：我们用各种办法对付敌人，山地有山地的办法，平原有平原的办法。不管敌人武器多么好，多么强，因为他们是反对革命，不利于人民的，不可能得到胜利。他们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失败。最后，所有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要灭亡，我们在座的人

就是证据。美国支持的反动派巴蒂斯塔[1]，不是也失败了吗？你们在和反动派斗争中，有外国援助没有？

奥：只有七支步枪。

毛：是啊！没有任何外国援助，就是步枪，而且很少，也胜利了，我们中国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你们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因为敢于和他打，终于打胜了。

恩来[2]同志劝青年代表团到延安看看，是有理由的。延安虽然很落后，但在当时是我们领导机关的所在地。蒋介石在南京、上海，南京是一百万人口的城市，上海是七百万人口的城市，那里住着外国人，很容易得到外国人的援助。延安城和附近只有七千人。看来，不是大城市打胜小城市，而是小城市打胜大城市；不是大城市打胜乡村，而是乡村的人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不是有大炮、飞机、坦克的敌人打胜我们，而是只有步枪、轻炮、手榴弹的人民军队打胜了敌人。起初，我们没有大炮，打到第二年，就有了大炮，打到第三年，大炮更多了。是哪里来的呢？是美国的，是蒋介石运输给我们的。后来，我们也有了坦克，也是蒋介石送的。当时就是没有飞机，现在的空军是解放以后建设起来的。没有空军也可以打胜有空军的。飞机的作用很小，打不死几个人，破坏不了多少工厂和房屋。你们有人到过伦敦没有？

奥：我们代表团中，有一个同志到过。

毛：伦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很危险的地位。英国军队从敦克尔克撤退后，军队毫无组织，海岸线没有防御了，空军不能防卫伦敦了，海军也不能保卫运输线，陆军、空军损失很大。当

---

[1] 巴蒂斯塔，曾任古巴总统，1959年其独裁政府被推翻。

[2] 恩来，即周恩来。

时，希特勒的空军猛烈轰炸伦敦，可是并没有破坏多少。据我们这里看过的同志讲，后方陆、海、空军很快就恢复了。所以说，空军的作用不大。在战争当中决定胜负的还是步兵、陆军。你们在战争中，敌人有无空军？

奥：他们猛烈轰炸解放区。

毛：作用大不大？

奥：唯一的效果，就是敌人费了很多钱。

毛：我们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也曾大编队轰炸延安。有一次，炸死了一头猪，一个人也没有炸伤、炸死。另外一次，在乡下打死了两个老百姓。今天谈得太多了吧！

奥：我们非常渴望听到毛主席的谈话。

毛：我今天是谈了一点历史，以后有机会再谈。

关于在党内传达中苏两党会谈记录的批语[1]

（1963年7月28日）

小平同志：

单是念不够，似应印发，十七级以上干部每若干人一本（例如三人或五人一本），以便他们讨论研究。三个月后，一律收回。请酌定。

毛泽东

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报送的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现在，有不少单位提出要求，希望了解中苏两党会谈的情况。这种要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考虑，可否将两党九次会谈的记录，在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中念一次。这对党内干部的反修教育，是有好处的。

对一篇评中苏分歧的文章[1]的批语

（1963年7月31日）

吴冷西[2]同志：

这篇文章，似可发表。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全文都好。

---

[1] 指新华社1963年7月31日《参考资料》上刊载的《柬埔寨电讯报》发表的《赫鲁晓夫是否改变态度了?》一文。文章指出，在中苏分歧中，苏联歪曲了中国关于核战争问题的观点，在和平共处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恰恰和西方国家不谋而合。人们本来希望中苏之间取得妥协，但赫鲁晓夫同西方接近的既成事实，使这种希望完全化为乌有。这篇文章在1963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杂言诗·八连颂[1]

（1963年8月1日）

好八连，天下传。
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
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
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
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
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
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傲霜雪。
纪律好，如坚壁。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6周年时为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题写的杂言诗。1949年5月，这个连队进驻上海南京路，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批准授予该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军事好，如霹雳。
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
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观看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演出的《雷锋》后接见演员。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观看话剧《雷锋》后接见演员。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和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和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和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雷锋》剧组合影。

关于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的批语[2]

（1963年8月7日、8日）

一

浦寿昌同志：

声明稿可用。请即请人翻译成英、法两种文，于明（八）日下午二时前，连同原稿交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八时

---

[1] 这篇题为《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由毛泽东署名，在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本篇一写在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周恩来办公室秘书浦寿昌1963年8月6日为送审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修改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本篇二写在这篇声明的铅印稿上。

二

请少奇、小平[1]同志阅后，交新华社办。

毛泽东
八日十时

---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1]

（1963年8月8日）

现在在古巴避难的一位美国黑人领袖、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分会前任主席罗伯特·威廉先生，今年曾经两次要求我发表声明，支援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我愿意借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黑人共一千九百余万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绝大部分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他们一般只能从事最笨重和最受轻视的劳动。他们的平均工资只及白人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他们的失业率最高。他们在许多州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K党[2]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在美国南部的十一个州，集居着美国黑人的百分之五十左右。在那里，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是特

---

[1] 这个声明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

[2] 三K党，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恐怖组织。1866年由美国南部奴隶主为镇压黑人和维护奴隶制度而建立，成为美国反动势力推行种族主义、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工具。

别骇人听闻的。

美国黑人正在觉醒，他们的反抗日益强烈。近几年来，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群众性斗争，有日益发展的趋势。

一九五七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为了反对当地公立学校不准黑人入学，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当局使用了武装力量来对付他们，造成了震动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一九六〇年，二十多个州的黑人举行了“静坐”示威，抗议当地餐馆、商店和其他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离。

一九六一年，黑人为了反对在乘车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举行了“自由乘客运动”，这个运动迅速地遍及好几个州。

一九六二年，密西西比州的黑人为争取进入大学的平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遭到当局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今年，美国黑人的斗争是四月初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开始的。赤手空拳、手无寸铁的黑人群众，只是由于举行集会和游行，反对种族歧视，竟然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和最野蛮的镇压。六月十二日，密西西比州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甚至惨遭杀害。被激怒了的黑人群众，不畏强暴，更加英勇地进行斗争，并且迅速地得到美国各地广大黑人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目前，一个全国性的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斗争，正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展开，而且还在继续高涨。美国黑人团体已经决定在八月二十八日举行二十五万人的向华盛顿的“自由进军”。

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引起了美国统治集团日益严重的不安。肯尼迪政府采取了阴险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继续纵容和参与对黑人的歧视和

迫害，甚至派遣军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装出一副主张“维护人权”、“保障黑人公民权利”的面孔，呼吁黑人“忍耐”，在国会里提出一套所谓“民权计划”，企图麻痹黑人的斗志，欺骗国内群众。但是，肯尼迪政府的这种手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黑人所识破。美国帝国主义对黑人的法西斯暴行，揭穿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自由的本质，暴露了美国政府在国内的反动政策和在国外的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呼吁，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开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美国压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种中的反动统治集团。他们绝不能代表白色人种中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开明人士。目前，压迫、侵略和威胁全世界绝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和支持他们的各国反动派。他们是少数，我们是多数。全世界三十亿人口中，他们最多也不到百分之十。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接见非洲朋友[1]时的谈话

（1963年8月8日）

毛主席在接见时，同非洲朋友进行了极其亲切友好的谈话。他在谈话中除了谴责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以外，还谴责了南非殖民者当局以及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种族歧视。毛主席说："在非洲、亚洲和全世界各地都有种族歧视的现象。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我们的团结不是种族团结，而是同志、朋友的团结。我们要加强团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他们的走狗，为争取完全彻底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

毛主席介绍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经过以后说："可以证明，人民的革命是能够胜利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能够打败的。整个非洲现在都处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浪潮中。不管已经获得独立的国家，或者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总有一天是要获得完全彻底的独立和解放的。整个中国人民都是支持你们的。非洲人民正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世界人民都在一天天觉悟起来，全

---

[1] 毛泽东接见的非洲朋友有：以巴苏陀兰（今莱索托）大会党总书记古德弗利·科利桑为首的巴苏陀兰大会党代表团、科摩罗民族解放运动主席阿里·穆哈默德·沙米、以留法黑非洲学联外事书记达松社为首的留法黑非洲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驻开罗代表特赖诺斯·马孔贝、怯尼亚（今肯尼亚）作家加亨格里。接见时，毛泽东发表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所有革命的人民，都能够团结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毛主席说：“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接见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并观看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会代表团赠送的礼品。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会见非洲朋友。

受压迫的人民总是要起来的[1]

（1963年8月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见到你们很高兴。昨天我见了一批非洲朋友。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觉得平等。我们不把意见强加于你们，你们也不强加于我们。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斗争中的经验。

舍马克（以下简称舍）：几天来，我们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富有内容的会谈，我对会谈的结果感到很满意。我确信，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加强。

毛：谈政治、经济，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舍：我们谈了一般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两国关系。双方就联合公报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达成了协议。

毛：我们的经济搞得还不行，现在还不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们正在努力，几年或几十年之后，总会有所进步，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更多更好地满足外国朋友的需要。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人民，在争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共同努力，争取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你们知道，我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对西

---

[1] 这是毛泽东和索马里总理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马克的谈话。

方国家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又好像存在。杜勒斯[1]说过，中国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为什么中国存在呢？在朝鲜战争中，有中国人同美国人打仗，所以西方国家感到中国的存在。为什么中国又不存在呢？它们认为，中国是个情况不好的国家，不需要几天就要垮下去，就会崩溃、垮台，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好像不存在。西方对非洲也是这样的看法。它们认为，非洲是非洲人的地方。如果非洲是西方人的，那末非洲不就是不存在了？现在它们好像开始看见有一个非洲存在着。非洲几十个国家已经独立，没有独立的国家的人民也在斗争。西方对亚非国家是很头痛的，对拉丁美洲也很头痛。这三大洲过去都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后备，现在它们感到这三大洲有些起哄，在闹地震。

舍：这是真的，它们觉得这些地方出了岔子，违反它们的意志。

毛：你们就是不服从意、英、法的意志。

舍：我们独立不久，非常珍视我们的独立，我们自己要负起责任，确立我们自己的人格。过去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被支配者，现在我们要做历史的主宰。过去西方殖民者不把我们当做人，只把我们当做东西。

毛：他们只看到东西，因为东西有用。人能够为他们生产财富，所以才有用，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不为西方国家生产财富而为自己生产财富，所以它们就天天骂我们，特别是美国。你们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美国吧？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是美国，英、法、意、西德要排到后面去。美帝国主义在我国周围建立很多军事基地来包围我们，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同日本有外交关

---

[1] 杜勒斯，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系吗？

舍：有外交关系，但日本在索马里没有使馆。

毛：我们同日本没有外交关系，因为日本不承认我国，它跟着美国走。

舍：是日本政府，不是日本人民。

毛：日本人民很好，我们同日本人民关系很亲密。美国反对中国的也不是美国人民，我们和许多美国人有来往。我们同英、法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

舍：对我们说来，斗争对象主要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然后才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这些国家把非洲看做是它们的势力范围，美国要过问非洲就等于过问它们的内政，未经它们的同意，美国很难做什么事情。它们认为非洲既然过去是它们的殖民地，它们就有权保持势力范围。现在非洲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独立了，非洲人是非常珍惜自己的人格的，决不让非洲成为人家的势力范围。

毛：把非洲国家当做势力范围，这种过去的老规矩不行了。现在非洲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些国家通过战争取得独立，如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它的几万军队与法国的几十万军队打仗，几十万军队失败了，几万军队胜利了。为什么几万军队能战胜几十万军队呢？在几万军队后面有几百万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法国的几十万军队得不到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支持。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其中有一百万法国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跑了。还有阿联[1]为维护苏

---

[1] 阿联，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简称。1958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1961年9月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7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伊士运河的主权，曾同英、法打过仗，结果英、法被打跑了，现在苏伊士运河控制在阿联手里。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阵地在缩小，大大缩小。如果它们在非洲的阵地大大缩小了，在中国大陆它们也管不着了。听说你们不喜欢驻北京的英国代办。

舍：对个人我们没有怨气，我们反对的是英国政府的政策。过去英国有七次拿我国的领土做交易。当时我们无能为力，因为我们还没有独立。可是，在我们独立后，英国再把我们的领土给别人时，我们就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所以现在英国在索马里就无法保持它的影响。

毛：这样很好。当英国和法国用战争夺取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也和英、法断了交，最近才恢复。几内亚独立后，也同法国断过交，去年才恢复。

舍：是。这些都是同过去统治者搞关系的经验教训。

毛：美国不承认我们，日本同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英国、荷兰同我们只是半建交关系，法、意、西德迄今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还有跟它们走的土耳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也与我们没有外交关系。

现在美国还在占领我们的台湾，假如：第一条，美国把台湾交还给我们；第二条，联合国让我们进去，赶走蒋介石；第三条，取消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做起生意来；第四条，两国互相承认，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一国的问题，我们要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这是它们最恨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我们的武器不

多，没有原子弹，经济也不发达，但是我们赞成全世界人民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到那个时候，世界人民才会安宁，我们自己也才会最后得到安宁。你们不信吗？帝国主义总有一天会被打倒的。

舍：我们相信。人民会为自己的解放而努力。如果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的人民不是自己起来，而靠外国参加的话，那就等于内政遭到干涉。

毛：受压迫的人民自己总是要起来的。

舍：自由主要靠当地人民自己去争取。

毛：完全赞成。我们认为，支持就是声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必要时给予武器援助。如对阿尔及利亚，我们就给了武器援助。

舍：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表明他们要独立，呼吁帮助。如果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表明要独立，那怎么办呢？

毛：那没有办法，毫无办法，只有等待人民觉醒，起来斗争。中国等了一百多年，大陆才解放，台湾也许要等几十年。全世界统统解放还要等更长时间。对台湾，我们也不准备用武力去解放，原因之一是在台湾有美国军队，我们军队进攻，就要同美国打仗。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这一点也许你们不了解。

舍：如果香港人自己要解放，把英国赶走，能拒绝帮助吗？

毛：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对谭震林[1]关于全国水旱灾害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3年8月9日）

这个报告[2]的内容及其同1956、1960、1961、1962年的比较数字，应在报上发表[3]。

毛泽东

八月九日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谭震林1963年8月7日关于全国水旱灾害的情况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报告。报告说，7月下旬以来，冀、鲁、豫、苏北、皖北的水灾形势近似1956年，抗灾条件好于1956年。今年夏收前，全国水旱灾害面积有1.1亿多亩。目前仍在受旱的近4000万亩，这次水灾可能受淹面积估计为8000万亩左右。全国到这次水害为止，累计受害面积可能达到2.3亿亩左右。1961年为9.2亿亩，1962年为5.7亿亩。

[3] 周恩来1963年8月9日接到这个批语后，当面报告毛泽东，建议灾情比较情况暂缓在报上公布。

关于印经典著作大字本的批语[1]

（1963年8月14日）

周扬同志：

同意用照相放大胶印的办法。但请注意封面不用硬纸；大书（例如《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反杜林论》）过去例作一卷或两卷，现应分装四卷或八卷，使每卷重量减轻。

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周扬的报告说，规定干部阅读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的书目问题，已由陆定一同志主持召集会议讨论过一次，并初步拟定了一个书目，现已送请陈伯达审阅，最后商定后再报主席。印经典著作大字本事，出版方面同志的意见，以采用照相放大胶印为好。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8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值此朝鲜解放十八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经过长期英勇斗争，在十八年前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开辟了朝鲜历史上的新时代。朝鲜人民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历尽艰辛和充满战斗的道路。朝鲜人民十八年的历史，是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犯和挑衅、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荣历史。

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气概，克服重重困难，迅速把自己国家建设成为具有自主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国家。今天，朝鲜人民继续高举朝鲜劳动党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千里马运动的旗帜，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满怀信心，为攀登社会主义建设的新

高峰，奋勇前进。中国人民衷心祝贺兄弟的朝鲜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为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军占领南朝鲜、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这一正义斗争，并且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朝鲜人民。

今年六月崔庸健同志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标志着中朝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领导人所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鼓舞着我们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鼓舞着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决心同朝鲜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四日

在《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上的批语

（1963年8月19日）

康生[1]同志：

这篇文章[2]可以一阅。你谈的一个美国教授写的那篇哲学文学〈章〉，我已看了一遍，觉得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列宁哲学思想的人。

毛泽东
八月十九日

---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2] 指1963年8月16日《光明日报》上刊载的署名章凡的文章《列宁批判马赫主义的相对主义——学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札记》。这篇文章讲了三个问题：一、辩证法与相对主义的对立；二、科学发展同相对主义的对立；三、相对主义必然导致唯心主义。章凡，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的笔名。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以乔治乌—德治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奋斗，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争取实现国民经济六年计划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在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国和罗马尼亚是社会主义兄弟之邦。一年来，我们两国本着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平等互利、互助合作的原则，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有了良好的发展。这种发展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是符合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利益的，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的。中国人民一向珍视同

罗马尼亚人民的友谊，并且相信，通过双方的努力，中罗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祝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反对美国—吴庭艳[1]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1963年8月29日）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2]，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

---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2] 1963年5月8日，越南南方顺化市约两万名佛教徒为抗议吴庭艳集团禁止举行佛祀仪式，进行游行示威，遭到当局武装镇压，当场被打死12人，伤17人。6月11日，西贡市70多岁高僧广德法师为抗议当局对佛教徒的迫害而焚身自杀。6月16日，西贡堤岸70万市民不顾当局的镇压，为广德法师举行葬礼。此后，又有4名僧尼焚身自杀。这次从佛教徒开始的斗争，很快扩大为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市民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斗争。吴庭艳集团进行了更加残酷的镇压。他们焚烧寺院，封闭学校，甚至动用毒气弹等武器来对付示威群众。8月20日，南越当局宣布全国戒严，继续逮捕佛教徒和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从而激起了各阶层群众更广泛的抗议行动。

进行坚决的斗争。

与越南南方全体人民为敌的美国—吴庭艳集团，现在发现他们自己处在越南南方全体人民的包围之中。不论美帝国主义使用什么样的灭绝人性的武器，不论吴庭艳集团使用如何残暴的镇压手段，吴庭艳政权终将不能逃脱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结局，美帝国主义终将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南朝鲜李承晚的下场，就是一个先例。死心塌地让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的奴才，到头来只能为美帝国主义殉葬。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1]，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2]，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

---

[1] 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朝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傀儡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2] 指1961年5月16日至1962年7月2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会议，又称“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会议最后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的议定书》。

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越南南方人民就是这样做的。

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的爱国正义斗争，不论在政治上或者军事上，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们中国人民是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的。

我深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通过斗争实现解放越南南方的目标，并且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我希望，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进步人士，都站到越南南方人民一边，响应胡志明主席的号召，支援英勇的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反对美、吴反革命集团的侵略和压迫，使越南南方人民免于被屠杀，并且获得彻底的解放。

1963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以阮氏萍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

关于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1]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的批语[2]

（1963年8月29日）

送刘、周、小平[3]同志阅后送新华社办（今晚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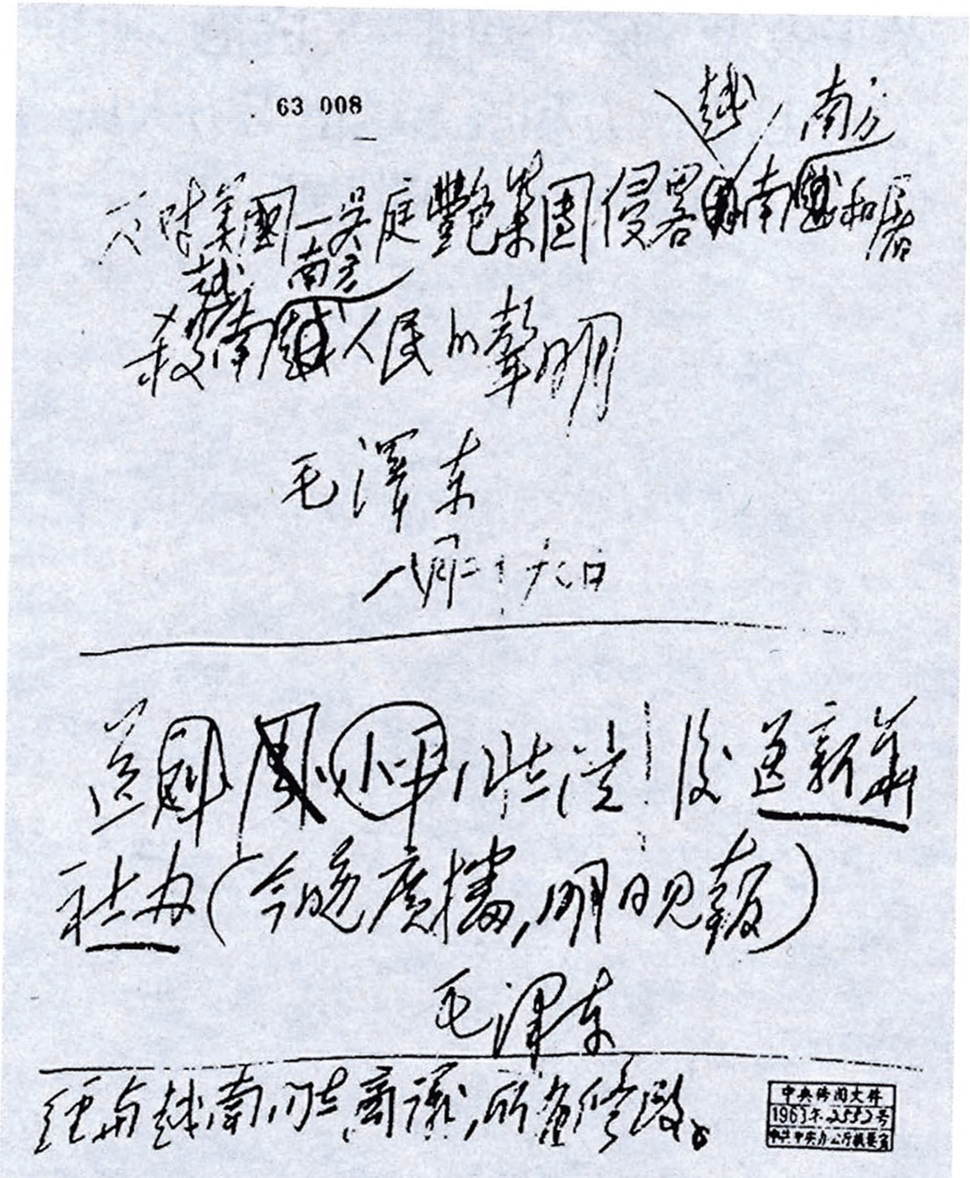
经与越南同志商议，有所修改。

---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2] 这个声明在1963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声明的题目是毛泽东拟定的。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63 008

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送周、~~[illegible]~~、小平、康生阅后，送新华社发（今晚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经与越南同志商议，所有修改。

中央特阅文件
1963年3583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

毛泽东关于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的批语的手稿。

悼念杜波依斯[1]逝世的电报

（1963年8月29日）

杜波依斯夫人：

我沉痛地获悉杜波依斯博士逝世的消息，谨向你表示深切的哀悼。

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

[1] 杜波依斯，美国著名黑人学者，1963年8月27日病逝。

关于越南南方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1]

（1963年8月30日）

一

你们的战争是国内战争，又是国际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吴庭艳[2]没有美国帮助就不行。中国过去打蒋介石，也是这样。形式上是国内革命战争，实际上主要是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国当时的革命任务，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反对封建主义，第三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没有帝国主义撑腰就不行。他们自己没有武器、也没有钱。我们打蒋介石的时候，蒋介石的武器和财政预算、军事费用，大半都是靠美国供给。

蒋介石是有名的运输大队长。吴庭艳是你们的运输队长。看到你们的材料，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你们从敌人手中拿到不少枪支。

仗打大以后，你们打算怎样处理俘虏？抓得多了，少数释放，大部分留下来用。这些人受过训练，包括少数中下级干部，大部分

---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南方局负责人阮梅菊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可以改造了留下来用。要取得胜利，敌军工作很重要，俘虏政策很重要。敌军军官和技术人员也有一些人有爱国心，可以教育。被我们俘虏的蒋介石军队营一级的军官，少数人有爱国心，俘虏后经过教育，就同我们一起闹革命。其中有些医生、无线电和其他方面的技术人员，有经验，培养起来很有用处。军官工作做得好，将来可能有整营过来的。一九二八年，有一位毕占云[1]带兵起义。这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他的意识很坚决。

我们的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是一九三〇年被俘的，他是我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创立人。从他决心同我们一起闹革命之后，我们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才算是建立起来。俘虏过来的医生、医务人员，留下来同我们在一起的也不少。

越南南方目前的战争和以前以越南北方为主要战场的战争不同。那时的抗法战争，有法国军队参加，没有美国军人参加。现在南越的战争，对方主力军是吴庭艳军队，美国军人不是主力。怎样瓦解吴庭艳军队，是取得南越革命战争胜利的一个主要问题。要好好努力创造条件。大家都是越南人。吴庭艳军队的战士大都是劳动人民，下级军官有可能少数是劳动人民，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即使不是下层出身的，也可以改造。蒋介石的高级军官，有的就投过来同我们合作。张治中[2]就是蒋军中一位有名的将军，他来同我

---

[1] 毕占云，原国民党军营长。1928年9月在湖南桂东率部起义，加入红军。

[2] 张治中，1949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同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签字后，脱离国民党政府。

们谈判和平，和谈被蒋介石破坏，他留下来了。高树勋[1]是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带兵的将军，他手下有几个师的兵，他被俘释放，后来才投过来。傅作义[2]也是一位有名的将军。那时他和他的军队被我们围困在北平，北平的东西南北，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和热河，都在我们手里，他没有别的出路，因此派人出城谈判。他把军队全部交出来，都改编了，分散在我军各部队，干部则集训后听任分配使用。傅作义现在是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在当时的绥远省，有一个军也归他管辖，军长叫董其武[3]，也过来接受改编。改编后，大多数干部是我们的人，那支部队也就共产化了。还有在新疆带兵的陶峙岳[4]，原归张治中管辖，也起义投诚。在长沙的陈明仁[5]，是国民党一个军长，同我们在东北打过硬仗，当我军渡长江后继续南下时，程潜[6]起义，他也带兵过来了。他是黄埔一期生，是受到蒋介石培养的。我们的元帅和大将，有些也是黄埔生或是旧军官。罗瑞卿是黄埔七期生，现在是大将，当总参谋

---

[1] 高树勋，原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1945年10月在平汉战役期间率部起义。

[2] 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3] 董其武，原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率部在绥远起义。

[4] 陶峙岳，原国民党军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25日率部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

[5] 陈明仁，原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

[6] 程潜，原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在长沙起义。

长。林彪是黄埔五期生，现在是元帅、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徐向前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元帅。他们三个人原来就是共产党员。我军中有少数黄埔军校出身的将军，原来不是共产党员。有了这些人，对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有好处。所以，不但要对士兵和下级军官做工作，有条件也要对高级军官做工作。我们有几位元帅，原来也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你们现在在南越进行民族解放战争，有少数高级军官可能在局势发展、敌方进一步分化时投向你们。

二

你们在斗争中取得不少胜利，取得很多经验。你们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各项政策和斗争策略都很正确，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群众很勇敢，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你们领导同志看得远，能分析问题，既准备迎接好的情况，也准备对付坏的情况，比我们一九二七年的领导高明得多，也比我们一九三四年的领导高明。你们在斗争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的群众，都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

你们准备进行长期斗争，准备打九年、十年，也准备局势发展得较快些，胜利来得较快些。发展得较快，他们里头的高级军官要发生分化，这就不单是打的问题。打，一次消灭他们一个连两个连，积少成多。统治阶级到了某个时候，不能照原样维持下去，内部有可能起变化，有人出来争领导权。统治阶级里头出来争领导权的，还是要打反共的旗帜。出来争权的人会说，你反得不好，我来反。南越局势发展了，有这个可能。谁要反共，他就离不开美国，离开了美国就不行。你们是不是可以争取另一派，左倾的、倾向你

们的、进步的民主人士，让他们同你们合作，成立中间的过渡的政权。如果一时没有理想的人物，开头也可以争取较次要的人物来起作用。这种人投向你们，要一步一步来，可以先搭关系。你们还在农村的时候，他们不会过来。在这个时候，好好训练很多干部，使广大群众也得到锻炼。你们有大城市了，他们才会过来。到那个时候，他们过来就欢迎，不怕他们。要耐心等待，创造条件。

你们、我们两家很友好。两党、两国、两军的关系都很友好，很密切。这次你们来得好。南越斗争的许多情况和好经验，我们以前不知道，不了解。现在很高兴。你们的战略策略很正确。

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1]

（1963年8月、9月）

一

中央认为，只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关系，才能有效地实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才能真正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工业，才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

在解放以后，能不能够实现大的跃进？能不能够使我国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跃进为先进的伟大的工业国？

---

[1] 这是毛泽东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稿的修改。其中一至四是1963年8月在这个文件初稿上的修改，五是1963年9月在这个文件初稿上加写的一段话。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如何进一步地实现党的总路线的要求，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工业，逐步地接近世界工业和技术的先进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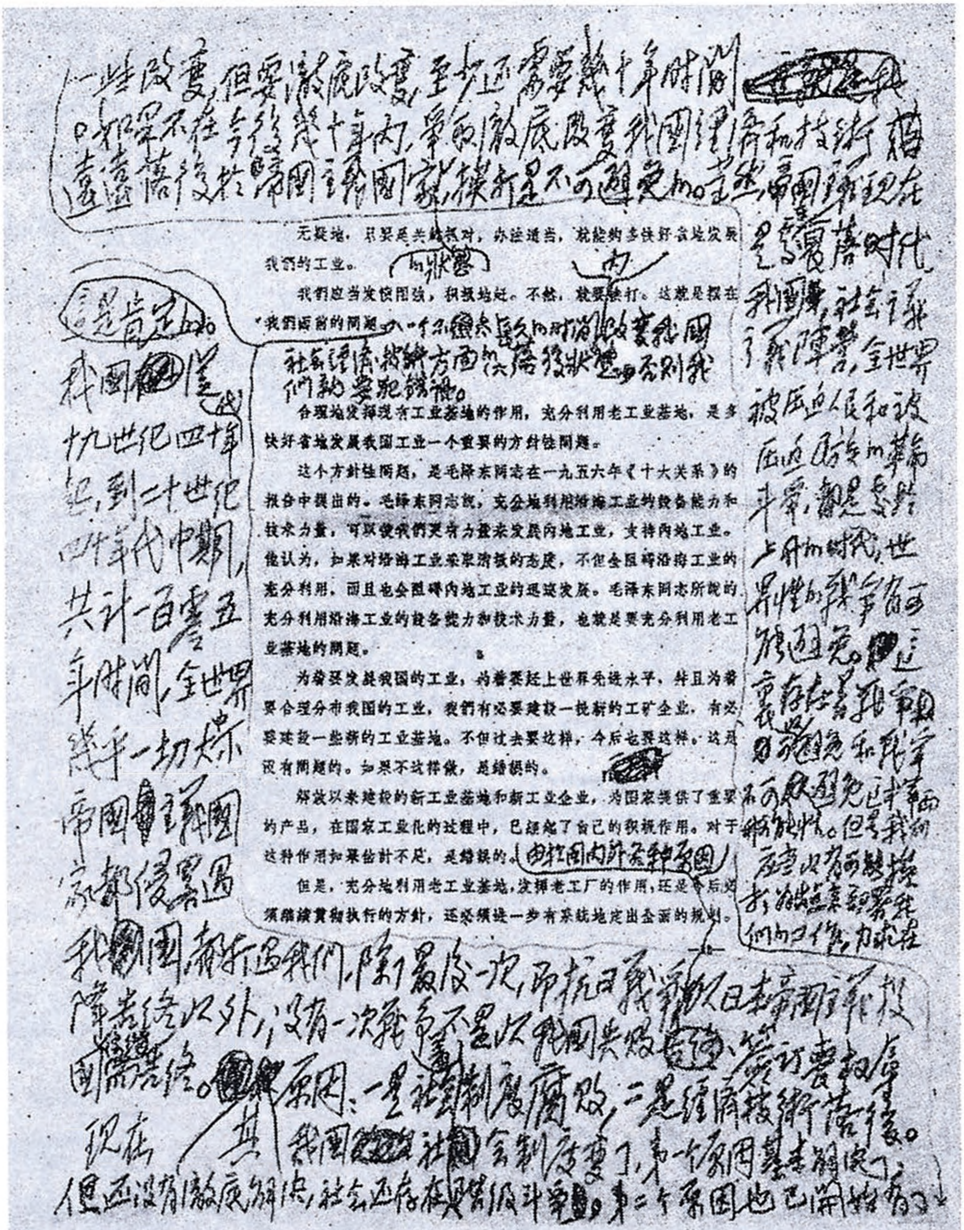
四

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

五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

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及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

这是肯定的。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

无疑地，只要是关键所对，办法适当，就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我们的工业。

我们应当发愤图强，积极地赶。不然，就要挨打。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一个不很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还要犯错误。

合理地发挥现有工业基地的作用，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工业一个重要的方针性问题。

这个方针性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六年《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的。毛泽东同志说，充分地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内地工业，支持内地工业。他认为，如果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的态度，不但会阻碍沿海工业的充分利用，而且也会阻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也就是要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的问题。

为着要发展我国的工业，为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且为着要合理分布我国的工业，我们有必要建设一批新的工矿企业，有必要建设一些新的工业基地。不但过去要这样，今后也要这样。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不这样做，是错误的。

解放以来建设的新工业基地和新工业企业，为国家提供了重要的产品，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起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对于这种作用如果估计不足，是错误的。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变化

但是，充分地利用老工业基地，发挥老工厂的作用，还是今后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的方针，还必须进一步有系统地定出全面的规划。

是没落时代，我国是社会主义了，有了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高涨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但是还存在着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

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

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话的手稿。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5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6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电报 ……………………1
（1963年9月1日）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4
（1963年9月3日）
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的批语 ……………………………………………………………8
（1963年9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0
（1963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九周年的电报 ……………13
（1963年9月8日）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15
（1963年9月）
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参考消息》第一版上的批语 ………22
（1963年9月26日）
关于讨论新疆问题的批语 …………………………………………………23
（1963年9月28日）
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和增强民族团结 …………………………………26
（1963年9月28日）

对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 ……………………28
（1963年9月30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学艺术的指示 ……………………31
（1963年9月）
两个中间地带 ……………………32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 ……………………42
（1963年10月6日）
祝贺恩维尔·霍查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44
（1963年10月15日）
对《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一文的批语 ……………………46
（1963年10月31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的电报 ……………………47
（1963年10月31日）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批语、通知和对《后十条》的修改 ……………………50
（1963年10月至11月）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的电报 ……………………57
（1963年11月6日）
祝贺柬埔寨王国完全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59
（1963年11月8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 ……………………61
（1963年11月15日）
给林彪、聂荣臻等的信 ……………………67
（1963年11月16日）

给林铁的信和题词 ……………………………………………………69
（1963年11月17日）
对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75
（1963年11月18日）
对谢富治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77
（1963年11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78
（1963年11月22日）
为桑托斯题词 ……………………………………………………80
（1963年11月24日）
和古巴诗人、作家及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 ……………………………………………………81
（1963年11月26日）
给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复信和对复信的批语 ……………………89
（1963年11月25日、26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92
（1963年11月28日）
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95
（1963年11月）
关于武装斗争的一些经验…………………………………………107
（1963年12月5日）
关于编诗词集给田家英的信………………………………………110
（1963年12月5日、6日）
在张爱萍、李天佑关于对付蒋军袭扰问题的报告上的批注………112
（1963年12月9日）

对王鹤寿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报告的批语……114
（1963年12月11日）
在《苏联学术界近年对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一文上的批注……115
（1963年12月）
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117
（1963年12月12日）
不会打仗可以学会打仗……120
（1963年12月12日）
关于解决部分群众就业和生活困难问题的批语和信……121
（1963年12月13日）
给周世钊的信……123
（1963年12月13日）
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124
（1963年12月13日、30日）
给张维的信……129
（1963年12月14日）
关于在部队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给林彪的信……130
（1963年12月14日）
关于在基层配备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批语……134
（1963年12月14日）
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的谈话……137
（1963年12月16日）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140
（1963年12月16日）

对《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43
（1963年12月21日）
中央转发江苏关于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情况报告的指示和批语……145
（1963年12月23日）
给林克的信……148
（1963年12月24日）
在莫文骅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的报告上的批语……150
（1963年12月25日）
给胡志明的复信和关于复信的批语……152
（1963年12月26日、27日）
对希尔斯曼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的批语……158
（1963年12月28日）
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语……160
（1963年12月30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五周年的电报……161
（1963年12月31日）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164
（1963年12月）
论反对官僚主义……168
（1963年）
为《公安部队报》题写报头……172
（1963年）
为国家科委题写“发明证书”……174
（1963年）

关于公安工作问题的两个批语……………………………177
（1964年1月1日、2月15日）
在中南海元旦联欢会上的讲话……………………………181
（1964年1月1日）
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182
（1964年1月9日）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184
（1964年1月12日）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86
（1964年1月17日）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191
（1964年1月27日）
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193
（1964年1月27日）
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199
（1964年1月28日）
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201
（1964年1月28日）
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202
（1964年1月28日）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210
（1964年1月30日）
给周世钊的信…………………………………………………216
（1964年1月31日）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
上加写的一段话………………………………………………217
（1964年1月）

谈报纸革命化问题……………………………………………………220
（1964年1月）
几段插话………………………………………………………………222
（1964年1月）
对试生产出浓缩六氟化铀^{235}合格产品情况报告的批语……………228
（1964年1月）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 …………………………………………229
（1964年1月至12月）
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231
（1964年2月3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通知》的批示…233
（1964年2月5日）
和钱学森等的谈话………………………………………………………234
（1964年2月6日）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236
（1964年2月9日）
春节谈话纪要……………………………………………………………240
（1964年2月13日）
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语……………………252
（1964年2月15日）
给章士钊的信……………………………………………………………255
（1964年2月15日）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 ………………………256
（1964年2月23日、24日）
关于推迟富马首相访华日期的批语………………………………………259
（1964年2月26日）

送给李讷的四句话……260
（1964年）
和毛远新的谈话纪要……261
（1964年2月）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263
（1964年2月）
改革学校课程设置和讲授方法……264
（1964年3月10日）
在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上加写的两段话……267
（1964年3月17日）
给华罗庚的信……268
（1964年3月18日）
给高亨的信……270
（1964年3月18日）
对苏共中央致印尼共中央信的批语……272
（1964年3月19日）
关于同意《大公报》出“经济评论”专刊的批语……273
（1964年3月21日）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274
（1964年3月22日）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写作情况的说明……277
（1964年3月25日）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79
（1964年3月28日）
在听取一次汇报时的插话……281
（1964年3月）

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的批语……289
（1964年3月至1965年5月）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293
（1964年4月3日）
对外交部党委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情况报告的批语……295
（1964年4月6日）
关于准备同日共代表团谈话给林克的信……296
（1964年4月8日）
对新疆地区备战方案的批语……297
（1964年4月9日）
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298
（1964年4月15日）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310
（1964年4月16日）
政策正确就能团结人民多打胜仗……313
（1964年4月16日）
对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的批语……316
（1964年4月24日）
对新华社的指示……318
（1964年春）
贺新郎·读史……319
（1964年春）
对公安部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情况报告的批语……322
（1964年4月24日）

对为播发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324
（1964年4月26日）
在谢富治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325
（1964年4月28日）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328
（1964年4月30日）
对《人民日报》理论工作的批评……331
（1964年4月）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332
（1964年4月）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333
（1964年5月8日）
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节录）…335
（1964年5月10日、11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338
（1964年5月15日）
对宋任穷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报告的批语……345
（1964年5月18日）
对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的批语……347
（1964年5月18日、6月25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349
（1964年5月25日）
对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一篇文章的批语……350
（1964年5月28日）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351
（1964年5月）
关于下乡蹲点组织“四清”工作队给吴冷西的批语………………353
（1964年6月3日）
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354
（1964年6月4日）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355
（1964年6月6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359
（1964年6月8日）
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讲话…………………………………………361
（1964年6月8日）
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364
（1964年）
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373
（1964年6月14日）
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大比武汇报表演时的谈话要点…………376
（1964年6月15日、16日）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390
（1964年6月16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393
（1964年6月16日）
接见桑给巴尔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话…………………………396
（1964年6月18日）
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408
（1964年6月）

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409
（1964年6月23日）
和王海蓉的谈话……419
（1964年6月24日）
中越两党两国要共同对敌……426
（1964年6月24日）
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433
（1964年6月24日）
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434
（1964年6月26日）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435
（1964年6月27日）
为《体育报》题写报头……438
（1964年6月30日）
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440
（1964年6月）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41
（1964年）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42
（1964年）
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444
（1964年7月2日）
关于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的批语……446
（1964年7月4日）
教育制度要改革……447
（1964年7月5日）

为首都民兵师题字……449
（1964年7月6日）
为登载两篇文艺理论文章写的编者按……450
（1964年7月7日）
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头……451
（1964年7月7日）
为《思想战线》题名……453
（1964年7月7日）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455
（1964年7月9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四十三周年的电报……461
（1964年7月10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463
（1964年7月10日）
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476
（1964年7月）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477
（1964年7月14日）
对林彪同杨成武等两次谈话的纪要的批语……482
（1964年7月15日）
关于建设地方武装和备战问题……483
（1964年7月15日）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486
（1964年7月15日、20日、25日）

对空军再次击落敌U-2飞机的报告的批语　……………………490
（1964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复兴节二十周年的电报……………………493
（1964年7月21日）
对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495
（1964年7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一周年的电报………………498
（1964年7月25日）
给范瑾的信…………………………………………………………501
（1964年7月29日）
关于题写《湖南日报》报头给张平化的信…………………………502
（1964年7月29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3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欣逢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武装斗争，取得了八月革命的历史性的光辉胜利。自从一九五四年和平恢复以来，越南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为发展独立自主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奋勇前进。中国人民为越南人民的胜利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维护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越南南方人民向美国侵略者及其走

狗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武装自卫斗争，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树立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

最近，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和人民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吴庭艳[1]集团残暴统治和血腥镇压的正义斗争。这一斗争得到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坚决支持胡主席就越南南方形势发表的声明。我们坚信，越南南方人民一定能够赶走美帝国主义，推翻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守卫着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前哨，对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维护东南亚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维护一九六二年关于老挝的日内瓦协议，坚决支持老挝的独立、和平和中立的政策。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际威望的日益增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总是真诚地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相互援助，相互支持。今年五月，刘少奇同志在访问越南期间，受到兄弟的越南人民隆重热烈的欢迎和亲切友好的接待，我们对此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次访问，生动地体现了中越两国人民亲如手足的兄弟情谊，标志着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两国领导人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对于反对以

---

[1] 吴庭艳，当时任南越傀儡政权“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越南人民团结一致，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像长江、红河一样永流不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一日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1]

（1963年9月3日）

我们困难的时间只有两年半，就是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情况就好起来了。粮食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多万吨。今年情况更好一点。虽然今年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和河南有水灾，但是全国可能比去年增产粮食一千万吨左右。现在我们正集中力量搞棉花、油料、烟叶和糖料。我们已经找到一条道路。我们有两种经验，错误的经验和正确的经验。正确的经验鼓励了我们，错误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这个时候，苏联撤走专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们的工业建设搞出了许多自己的经验。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

---

[1] 这是毛泽东和由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的一部分。

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口号就是在延安整风时提出的。这个口号写进了一九五七年莫斯科宣言，那里面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要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

1963年9月3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向毛泽东赠送礼物“天堂鸟”标本。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

1963年9月，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妇女代表团。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的报告的批语[1]

（1963年9月6日）

送小平[2]同志，由书记处议处。

毛泽东

九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1963年9月5日为报送中组部关于加强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和培养第一把手接班人问题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报告说，今年以来，特别是“五反”运动开展以后，我们和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对中央管理的干部进行了了解，对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情况做了调查。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的基本状况是好的。但是，有一部分单位的领导班子很不健全，很不精干，战斗力不强，特别是第一把手的接班人还衔接不上。从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班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是健全的，没有形成坚强有力领导核心的只是少数。省、市、自治区的部、厅、局和地、市委的领导班子情况就比较差一些。领导核心不够坚强的单位很多同没有第一把手或第一把手挂不起帅来直接有关，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机关第一把手的接班人问题，

已经是当前一个十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真正成为健全的、精干的、具有高度指挥作战能力的司令部，从而带好整个干部队伍，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央组织部提出：一、调整、交流和提拔一部分干部，把地委以上各级领导核心充实和加强起来。要使这些单位既要有胜任全面工作的第一把手，又要形成比较齐全、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既要有久经锻炼的、经验丰富的老骨干，又要有后起优秀的新生力量。二、进一步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培养提高工作。首先，要把各级领导核心的学习搞好。第二，所有的领导干部都必须经常地深入群众，蹲下来，进行调查研究，不断地增加实际经验，提高工作水平。第三，培养新生力量和接班人，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四，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三、积极地妥善地做好对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的安置工作。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3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朝鲜人民长期反帝革命斗争的重大胜利，在朝鲜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中，都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英雄的朝鲜人民不仅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而且在朝鲜停战以后，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反对美国侵略军霸占南朝鲜、争取祖

国的和平统一，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朝鲜人民，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一切革命的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朝鲜人民在朝鲜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千里马的精神并且根据自力更生的方针，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忘我的劳动。在战后短短的十年内，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朝鲜，已经在美帝国主义的侵朝战争所造成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现在，我们看到，朝鲜人民在执行七年计划前三年任务的斗争中，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比的高兴。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的国际威望一天比一天提高。

朝鲜劳动党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朝鲜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引导朝鲜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朝鲜劳动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久经考验的朝鲜劳动党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原则性和革命战斗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表示极大的尊敬和钦佩。

中朝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中朝两党、两国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是在长期革命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中朝两党、两国都决心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到底，把反对帝国主义、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共同理想、共同事业和共同斗争的胜利，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团结一致，紧密合作，并肩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 年 9 月 8 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迪·加涅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保加利亚人民、保加利亚共产党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进行了辛勤的劳动，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对此感到高兴。

中保两国人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一直同富有革命传统的保加利亚人民紧密团结，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保加利亚人民的友谊。我们希望，中保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加强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自己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保卫世

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九月八日

1963年9月9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主席姆·威廉斯。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3年9月）

一

即送康生同志：

同意十三日见报[2]。有一些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日上午七时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3年9月10日为送审《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修改稿给他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本篇二至十四是毛泽东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9月2日稿、9月5日稿和9月10日稿的修改。其中，9月2日稿的原标题是《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毛泽东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修改时加写的文字。

[2]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在196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3年第十八期上发表。

二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三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1]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

四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五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六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七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八

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九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

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十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1]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2]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

十一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

[1] 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61年任美国总统。肯尼迪，美国民主党人。1961年1月起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遇刺身亡。

[2] 伊凡雷帝，即伊凡四世，俄国第一个沙皇。

十二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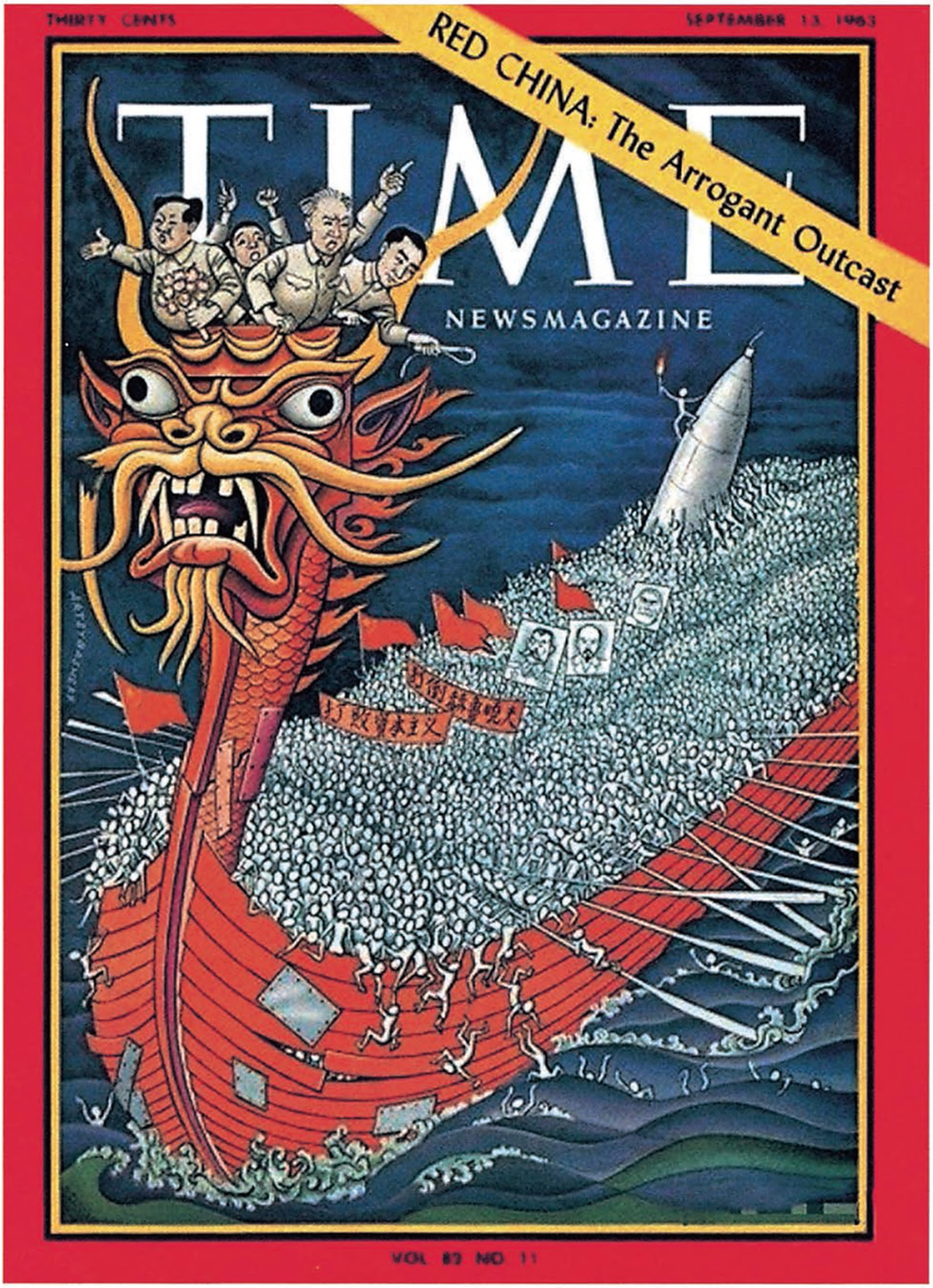
十三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

十四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资料图片


THIRTY CENTS
SEPTEMBER 13, 1963
RED CHINA: The Arrogant Outcast
TIME
NEWSMAGAZINE
VOL 82 NO 11

1963年9月13日，毛泽东第六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和毛泽东一起在“龙舟”上领航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一年9月，中苏论战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

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参考消息》第一版上的批语[1]

（1963年9月26日）

第一版、第四版都应研究。

毛泽东

廿六日

江青阅。

只看不研究，毫无用处。并且要反复看几遍。

---

[1] 这一期《参考消息》第一版上，毛泽东画圈的文章有：法新社记者马居斯《中国的物质条件和粮食情况已大大改善》、法新社电讯《苏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新阶段》；第四版上画圈的文章有：共同社报道《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到处碰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富布赖特主张美应同中苏都保持关系》、美国记者巴雷特报道《美帝国主义害怕一个强大的中国》。

关于讨论新疆问题的批语

（1963年9月28日）

请王恩茂[1]同志今日（廿八日）留一天，明日（廿九日）返新疆。今日下午，我想请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肖华、谢富治[2]、周总理、朱德、陈毅、杨成武[3]共九位同志谈一次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早晨

---

[1] 王恩茂，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新疆军区政治委员。

[2]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3]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63年，毛泽东会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鲍尔汗。

1963年，毛泽东和赛福鼎·艾则孜交谈。

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和增强民族团结[1]

（1963年9月28日）

新疆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我们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比国民党统治时期好，而且要比现在的苏联好。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有积累，但积累不能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任务不能过重，征购不能过头。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物资供应，如布、茶、糖以及其他日用品，要比其他地区充分一点。请总理[2]告诉先念[3]同志。

要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汉族干部要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要教育汉族干部和人民，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要相信各民族干部和人民的绝大多数，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只要是劳动人民就应该相信和团结。要很好安置进到新疆的汉族劳动人民。要解决好在新疆的汉族劳动人

---

[1] 这是1963年9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朱德等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和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王恩茂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的谈话的一部分。

[2] 总理，指周恩来。

[3] 先念，即李先念。

民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民族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需要在汉族劳动人民中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教育汉族劳动人民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动员汉族劳动人民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搞好同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关系和团结。要帮助解决到新疆去的汉族劳动人民的婚姻和其他困难问题。

对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1]

（1963年9月30日）

一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我们一贯主张坚持原则，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我们坚决相信，目前的分歧，总有一天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得到正确解决的。

二

我们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体和个人，表示敬意！

三

我们衷心地希望各国朋友们对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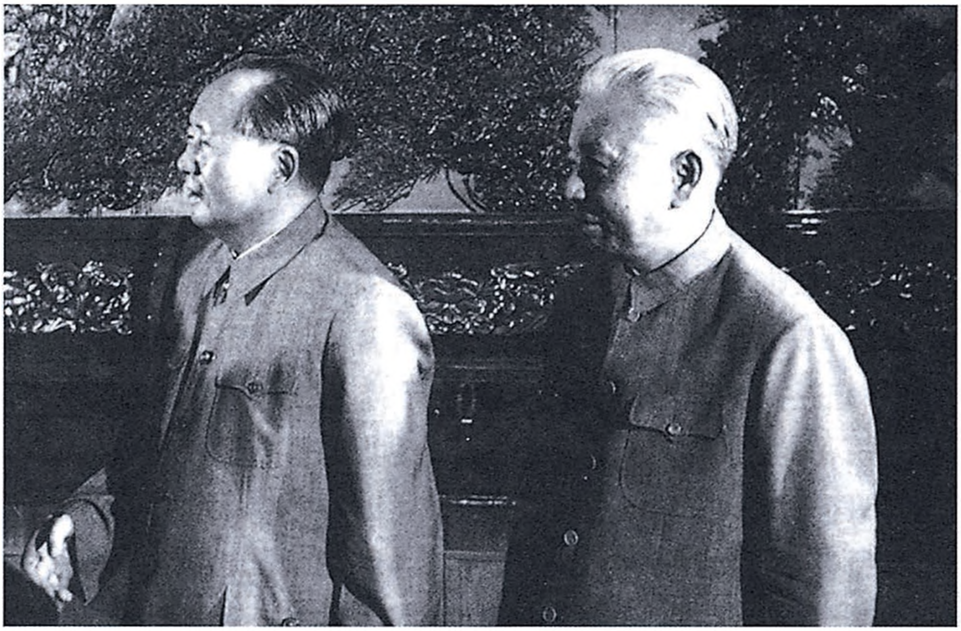
---

[1] 周恩来这篇讲话发表在196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见，指出我们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朋友们，同志们，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不管一小撮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如何兴风作浪，他们绝对不能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196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接见外宾。



1963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起。

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大会堂送别客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文学艺术的指示

（1963年9月）

戏剧要推陈出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两个中间地带[1]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

一

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2]。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3]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4]。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节录；本篇二是毛泽东同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的节录；本篇三是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谈话的节录。

[2] 参见《红楼梦》第六回。

[3]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4] 参见《红楼梦》第二回。

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1]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2]，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二

我们同苏联有外交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但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好，也不如中国同池田[3]派的关系好。这很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而自由民主党是受美国控制的。从国际地位来说，日本同美、苏比，占第二位。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法、西德、意大利等。我

---

[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2] 六国共同市场，即欧洲共同市场，是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于1958年1月组成的国际垄断联盟。

[3] 池田，指池田勇人，当时任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内阁首相。

们还是有工作可做。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英国同美国比较好，但也不是那样团结。法国使美国感到恼火。西德的地位重要起来了，这样一来，势必会同美国发生对抗。

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

（一九六四年一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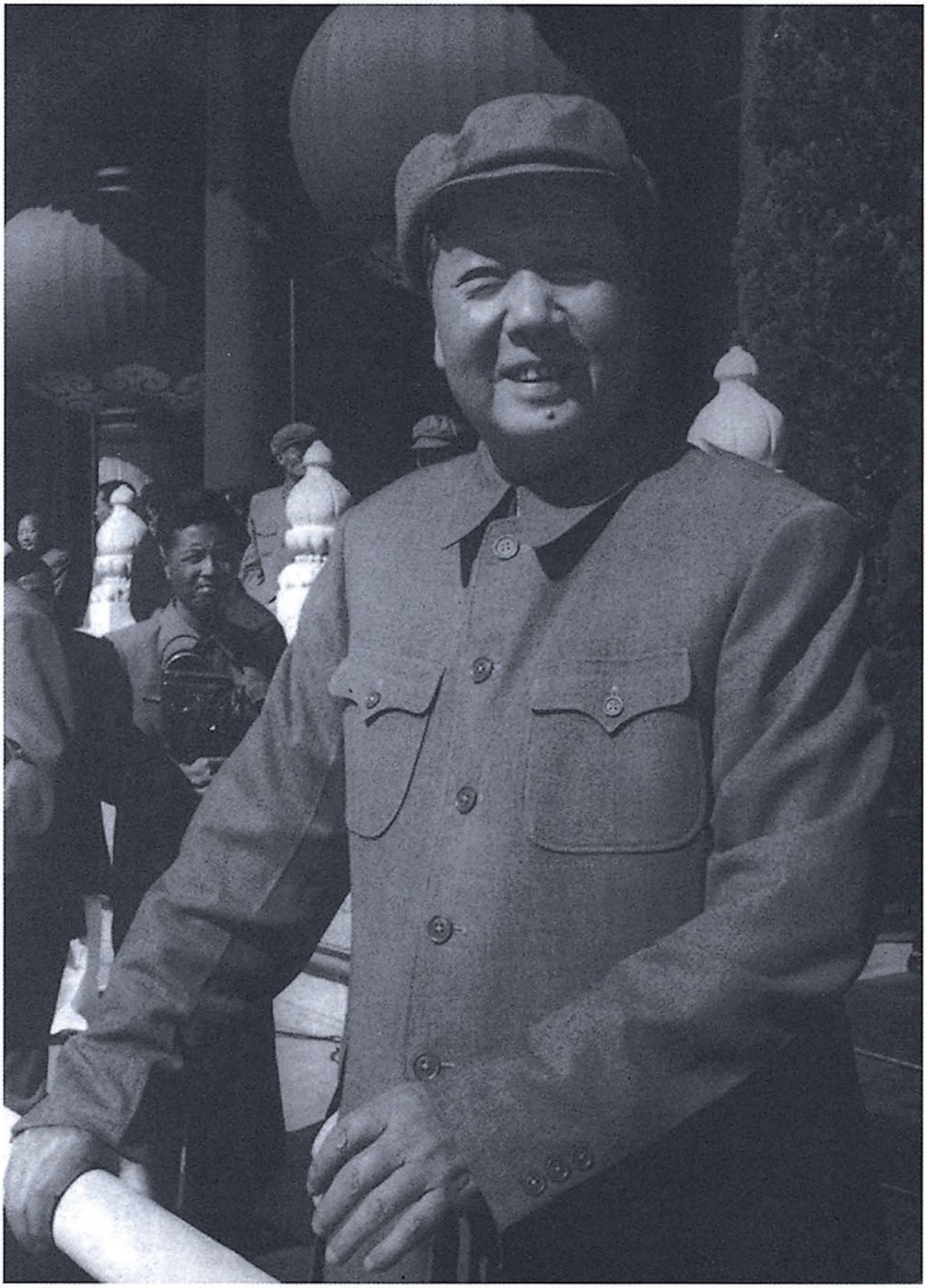
三

美国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的手伸得太长了。驻在这里的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美国有十二艘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艘。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驻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六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之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它把手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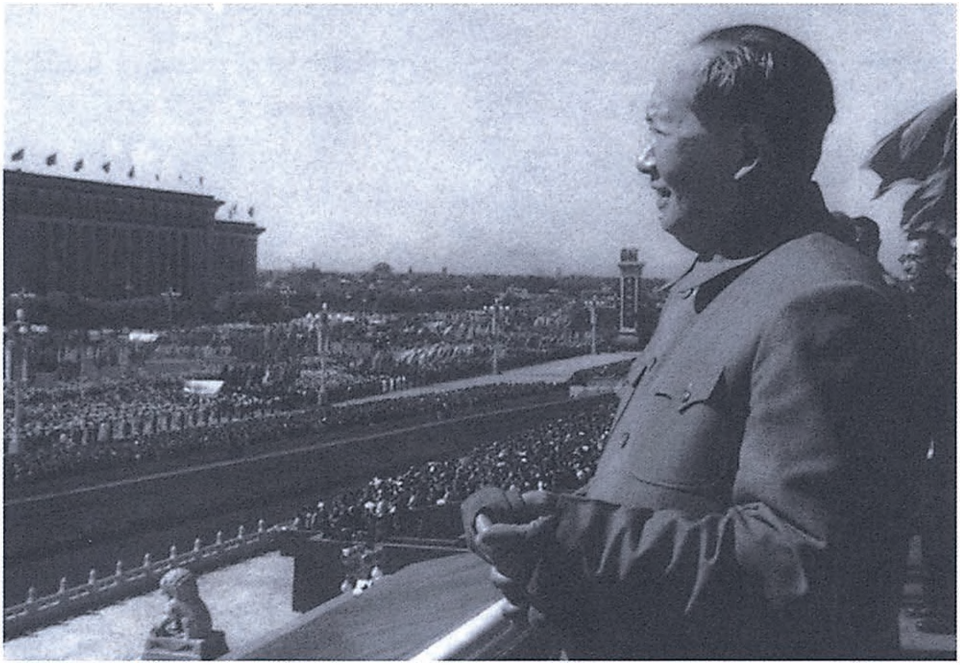
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有的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人依靠美国，但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日本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赶走。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度国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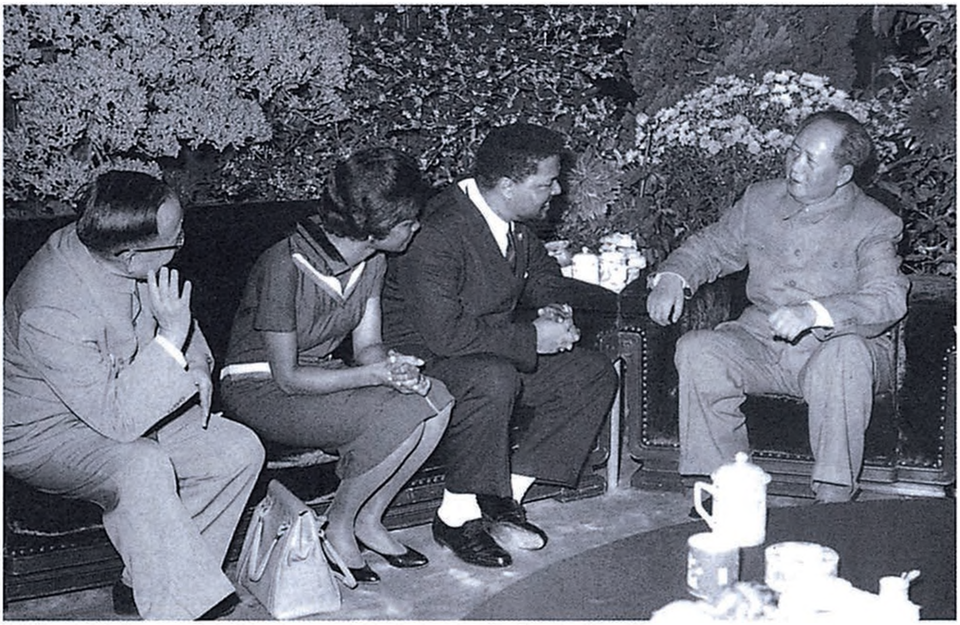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1963年10月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和夫人。

1963年10月5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国宾馆回访尼泊尔王国国王马亨德拉和王后。

1963年10月，毛泽东和来访的日本自由民主党国会议员石桥湛山交谈。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3年10月6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兄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高兴。

现在，西德军国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正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罪恶活动，威胁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威胁着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再次重申，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西德军国主义、争取签订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使西柏林局势正常化的正义斗争。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维护

和加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我们希望，中德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增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努力。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六日

祝贺恩维尔·霍查五十五岁生日的电报

（1963年10月15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亲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你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阿尔巴尼亚人民敬爱的领袖、中国人民亲密的朋友，致以衷心的、兄弟般的祝贺。

你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对法西斯的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以你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地领导着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为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着顽强的斗争；高举革命的旗帜，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你和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祝中阿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祝你，亲爱的霍查同志，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1963年10月13日，毛泽东接见古巴土改委员会领导人。

1963年10月24日，毛泽东接见坦噶尼喀贵宾。

对《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一文的批语[1]

（1963 年 10 月 31 日）

写得很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月卅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和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1963年10月30日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给毛泽东的报告上。这篇文章在196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10月31日）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总书记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哈吉·本·阿拉阁下：

值此阿尔及利亚革命九周年之际，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谨向你们，向阿尔及利亚人民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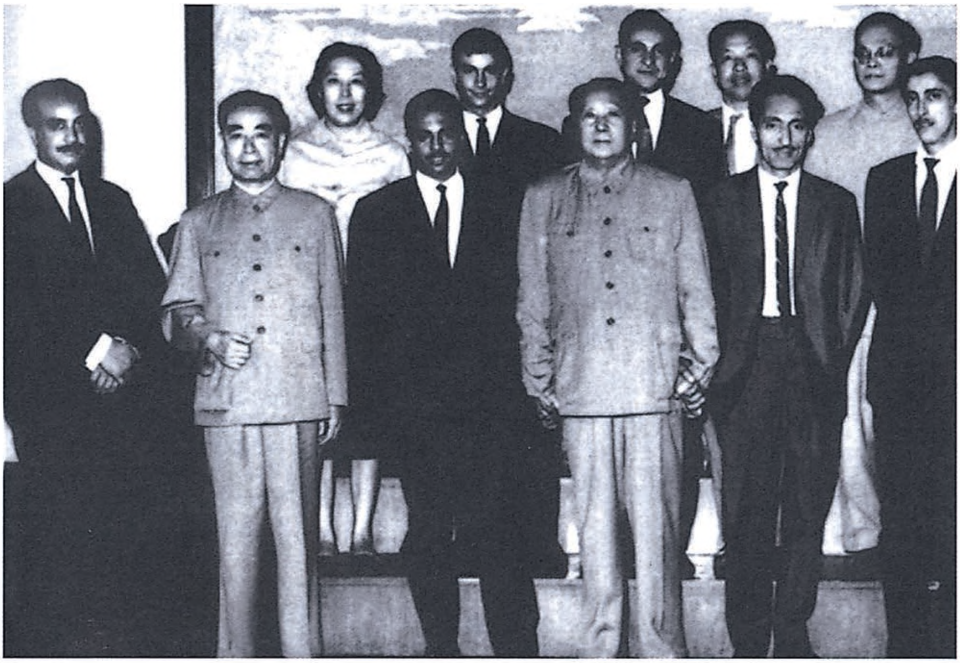
阿尔及利亚人民通过七年多的武装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这是当代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独立以后，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的领导下，继续胜利地发展着自己的革命事业，在肃清殖民主义势力、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并且在支持非洲人民解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人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阿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阿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又获得了令人鼓舞的发展。中国人民一向把阿尔

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胜利，看作是对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力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完全可以相信，在维护独立、建设国家和发展革命的事业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可靠的朋友。

祝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1963年，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1963年10月，毛泽东接见湖南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并合影留念。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1]的批语、通知和对《后十条》的修改[2]

（1963年10月至11月）

一

刘、周、朱、邓、彭、瑞卿、伯达、富治、尚昆、家英[3]同志

---

[1]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

[2] 本篇一、二、四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写的三个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本篇五至九，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通称《后十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富治，即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家英，即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阅，并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二

印三十份，发给各同志研究，准备修改意见。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三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在今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1]这个重要文件之后，十月间，我们又同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省委、若干地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分别开会商量，然后，我们又同华东局领导人，华东各省委的领导人再商量了一次。大家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为最有利。因此，在九月文件上作了修改，加进了点、面结合的一段[2]，此外，还有一些小的修改[3]。由于这一改变，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通知，也要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改变。五月二十日的通知规定，中央“决定（草案）”[4]，凡是暂时不准备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县、社和大队，暂时不要下达。现在改为：（一）五月二十日的“决定（草案）”，九月的“规定（草案）”这两个文件，要向全国农村每个支部发出二本，由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领导干部负责向全体党员和全体农民宣读，要讲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文件由各省、市、区党委负责印发。“决定（草案）”原有的七

---

[1] 这个文件原题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1963年11月14日改为现题。

[2] 即本篇七。

[3] 主要指本篇五、六、八、九。

[4] 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通称《前十条》）。

个附件[1]，这次不再重印，各地可以选择一些在本地区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好的典型材料印发。在党内外宣读“决定（草案）”和“规定（草案）”的时候，对这些典型材料，可以只读有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四清”方面的一、两件。（二）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一切党支部都要发给二本，由市委、区委指定负责干部用口头向一切人宣读，使他们懂得党的政策。（三）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人民警察，照此办理。（四）民主党派成员，由统战部召集大会小会宣读，并发给他们阅读。（五）对农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坏、右，也要宣读和讲解这两个文件，以利于对他们的教育和改造。（六）效果如何，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

---

[1] 这七个附件是：一、湖南、河北省委报告两件：（1）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2月8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2）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2月17日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二、东北、河南报告两件：（1）宋任穷1963年4月10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2）中共河南省委1963年4月15日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三、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1）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4月16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2）中共湖南省委1963年4月22日关于树立贫农优势和建立贫农、下中农代表小组问题的报告。四、四个好文件：（1）河南省偃师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2）湖北省武昌县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3）河南省临颍县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4）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河北省材料两件：（1）中共保定地委1963年4月4日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进行“四清”工作给省委的报告；（2）中共河北省委1963年3月31日转发邢台地委关于建立健全贫下中农委员会的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和保定三个大队贫下中农委员会活动情况的典型材料。六、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七、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发扬成绩。（七）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这样一来，一切党内外干部，一切战士，一切人民，都会大进一步；地、富、反、坏、右的大多数人，也会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八）本通知要向党内各级党委直至支部宣读。（九）本通知不要向党外宣读。

中央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四

已阅。退尚昆即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早

五

领导带头，洗手洗澡。省、地、县三级领导机关的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首先“洗手洗澡”，端正阶级立场和改进思想作风，才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顺利进行，否则是不可能的。领导干部中有些同志手脚不干净，群众就不佩服，叫下面搞“四清”，决难搞好。因此，省、地、县三级干部都应当首先参加“五反”运动。

六

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

七

必须注意点面结合，积极做好面上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点上的工作要做得细致，时间长些，需要三个月左右。面上的工作，起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初步打击阶级敌人的作用，时间只要二十天左右就够了。其所以必须点面结合的理由，是因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由点到面，分期分批铺开的，暂时不系统搞运动的社、队，在一个时期内占大多数，而且由于点上运动的开展，对面上必然引起很大的震动，如果我们放松了广大面上的工作，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

八

中央主管农村工作的部门，应当根据各地的经验，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草拟出一个贫、下中农组织章程。

九

在这次运动中，除了行凶报复、杀人、抢劫、放火、放毒因而民愤很大的这一类现行犯必须立即逮捕法办以外，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基本上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少数必须逮捕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也要先放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借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到运动的后期，经过审查、批准，再依法逮捕。捕人，要严格掌握两条标准，第一，罪恶大，证据确凿，又不悔改；第二，绝大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实行这两条，我们就不会在捕人问题上犯错误了。对于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我们所以基本上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不捉”的方针，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依靠广大群众向他们实行专政，实行监督、斗争和教育，比较把他们捉起来和杀掉，更加符合于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利益。第一，因为他们的绝大多数是可以被觉悟了的群众采取正确的方法改造成为好人的；第二，他们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部分；第三，对于争取他们的子女有利。至于就一个省、一个专区的范围来说，总是会有少数罪大恶极又不改悔的分子被多数群众要求逮捕，又会有个别分子被要求处以极刑，那是完全必要的。杀人，必须严格按照过去的规定，经过中央批准。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6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四十六年前，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开辟了争取彻底解放的康庄大道。

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继续高举十月革命的旗帜，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粉碎了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勇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对于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进步事业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人民又以高度的劳动热情，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建设自己祖国的宏伟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地维护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中国人民坚信，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苏联人民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团结，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创造自己美好未来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祝贺柬埔寨王国完全独立十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8日）

金边

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

欣逢柬埔寨王国完全独立十周年纪念日，谨向殿下，中国人民尊敬的朋友，表示热忱的祝贺。

柬埔寨王国在殿下的领导下，奋发图强，从事国家建设，不畏强暴，捍卫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表示十分钦佩。我深信，柬埔寨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取得更大的成就。

祝中柬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日益增进。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八日

1963年，毛泽东、刘少奇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

（1963年11月1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很欢迎同志们。你们来了几天了？

阿拉尼特·切拉（以下简称拉）：十天了。

毛：走北路来的，还是走南路来的？

拉：最近是从朝鲜来的，我们在朝鲜住了一个月，在朝鲜是休假。到朝鲜是从北路走的。

毛：他们让你们过？

拉：让我们经过了，但对我们冷遇。

毛：冷遇啊！请抽烟。（外宾说：不会抽。）朝鲜的同志们很好，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拉：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毛：这几个月在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更加发展了。你们坚决地站稳了立场，并且取得了胜利。你们的国家是被他们包围的。你们对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回去时，问候你们的领导同志们好，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其他同志。

拉：一定转达。

毛：请喝点茶。除了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卡博、阿利雅、巴卢库等其他同志，也替我转达问候他们。

拉：一定转达。

毛：你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拉：我们今年的收成情况是：去年冬天雨下得多了，造成今年夏收不好；但今年春耕春种搞得好，所以今年秋收是好的。可以说今年是个好的年成。

索弗克利·巴巴华西里（以下简称里）：今年的天气对我们的秋耕秋种是有利的。

毛：很好。今年我们有点灾，一般说来是增产的。如果没有南边的旱灾和北边的水灾，那今年是个大丰收。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万吨。今年有好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不好。

拉：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布达佩斯。听说那里的人民意见很大，有抱怨情绪。他们今年的收成不好，政府向美国买粮食。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人民，现在也许告诉了。

毛：你们是否最近就要回国？

拉：现在预定二十六日离开中国。

毛：今天是十五日，还要到外边去？

张鼎丞（以下简称张）：还要到上海、杭州、广州、昆明，从那里离开中国回去。

毛：好，到那些地方去看看。

拉：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们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毛：交换意见嘛。

拉：是帮助了我们。

毛：互相交流经验。你们阿尔巴尼亚同志到中国来，中国同志都是很欢迎的。

拉：我们具体地看到了。虽然在阿尔巴尼亚早已知道你们会欢

迎我们的，到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

毛：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

拉：是第一次。

毛：你们两位都是做政法工作的吗？

拉：不，我是司法工作者，他（指巴巴华西里）是在党中央当视察员。

毛：没有去东北看看？

拉：时间有限。我们在朝鲜停了一个月，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现在想利用这些时间到中国南方看看。要到中国各个地方都走一趟，这是一件难事。

毛：我刚才从南方回来。南方的秋收还没有完全结束，现在大概差不多了，广东可能还没有收完。你们这次到不到广东去？

黄火星（以下简称黄）：要去广州。

毛：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作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即使不是一年一次，几年就要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几十人、几百人的机关，过几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了。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

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比较少，大概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捉，一个也不杀。

对罪大恶极的，罪恶很大，人民群众要求把他们捉起来，就非捉起来不可；有破坏行为，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比如放谣言啊等等，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都不捉，依靠群众来监督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看来，这个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的情况不同，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

司法工作是不容易做的。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都是专政的工具。

拉：毛泽东同志，我们同你们的同志谈了些问题，他们还把我们带到北京监狱去看了，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我们感到你们教育人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毛：不是每个地方都做得好的。

拉：也可能你们的工作还有缺点，但基础是正确的。

毛：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

里：对于你们用的这种方法，感到受益不少。

毛：第一条，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捉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三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又是一些劳动力，可以参加社会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

不恨我们。

但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或者要求把他杀掉。我们这些同志是把矛盾上交，从下面交到上面来。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教育，一面让他们劳动好。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监狱吗？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

他们看了哪个监狱？

黄：北京市的监狱。

毛：那些人有工作做吗？

黄：那里有塑料厂、鞋厂、袜厂等等。

毛：他们学了技术，放出去以后好劳动。

拉：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很对的。我们国家的劳改营里也有些劳动，但没有你们开展得这样广泛。我们监狱的工作是薄弱的，虽然，在我们监狱中关的人很少，是那些非常危险的分子。尽管这样，对这种人还是要采取教育的方法。

毛：对！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回去，有破坏活动就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照样破坏；放二次，他再破坏；放三次，他再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工作。或者把他们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把家属也接来。

张：刑满了可以把家属搬来，安置就业。

毛：对，就是安置就业。有些人是自己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回

到当地名誉不好，他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熟人了，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家属也搬来，等于迁居了。这样的也不少。

黄：北京市那个监狱，也有就业的，有四百多人。

毛：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拉：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

毛：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几岁了，他现在有职业了，听说还重新结了婚。

拉：听说他还写了本书，叫《我的前半生》。

毛：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们觉得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对这个人，我们也还要看。

谈到这里好不好？现在让我们照相吧！

给林彪、聂荣臻等的信

（1963年11月16日）

林彪、荣臻、□□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中调出一部分强的又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须适合各个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

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与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给林铁[1]的信和题词

（1963年11月17日）

林铁同志：

遵嘱写了几个字[2]，不知是否可用？浪陶〈淘〉沙一词[3]，待后再写。

此祝

康吉！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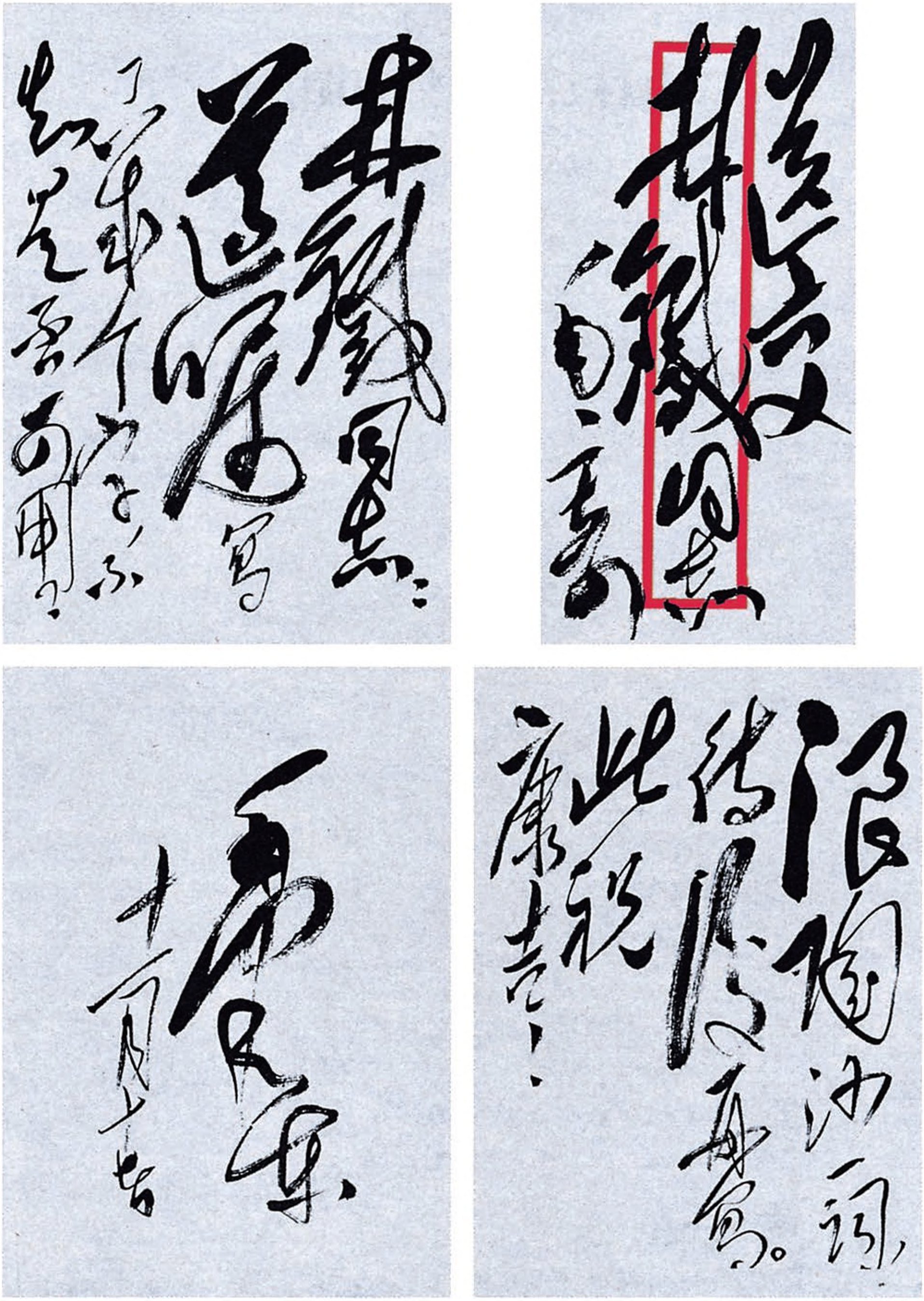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

[1]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毛泽东应林铁要求为即将在天津举办的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写的题词。

[3] 指毛泽东1954年夏写的词《浪淘沙·北戴河》。



林铁同志：

遵嘱写了[illegible]，不知是否可用。

[illegible]交

林铁同志

毛泽东寄

很[illegible]词，待[illegible]再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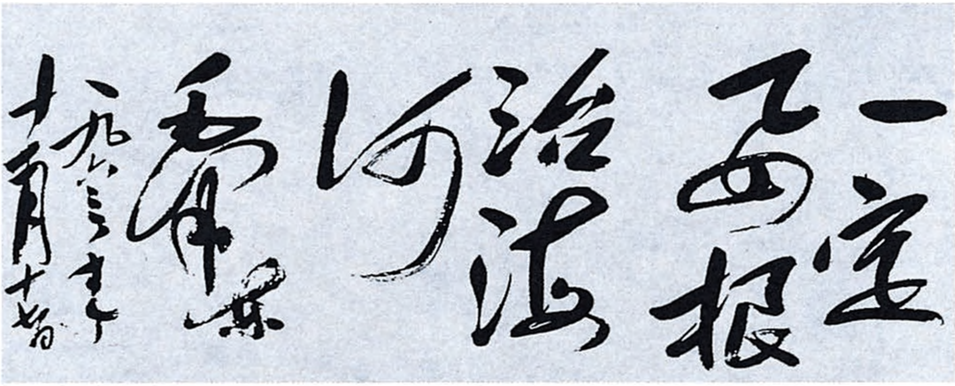
此祝

康吉！

毛泽东

十一月[illegible]

毛泽东致林铁信的手稿。



一定要根治海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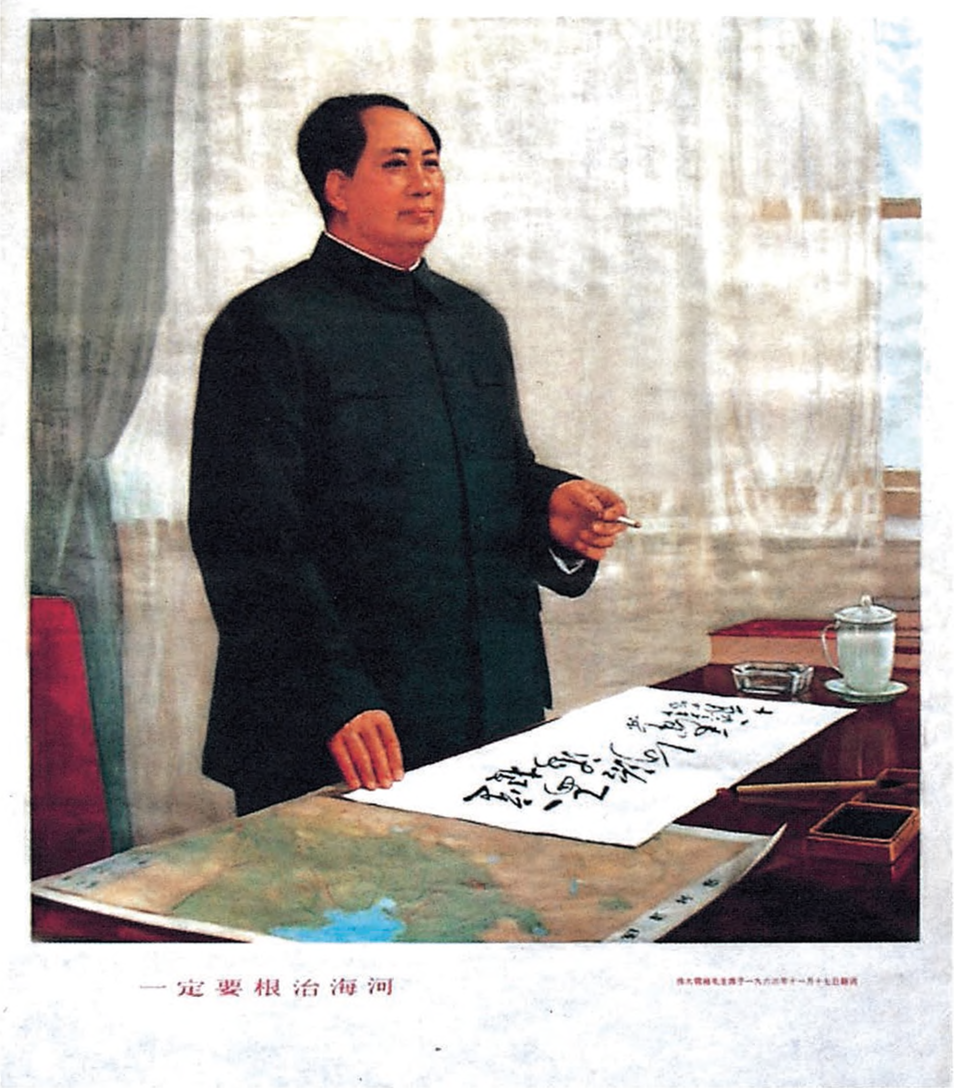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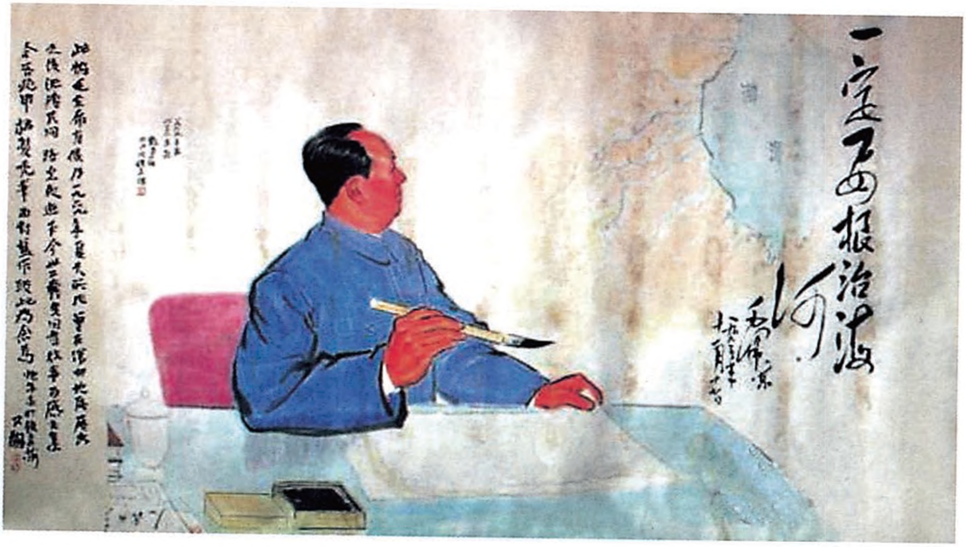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写的题词。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查看河北水利规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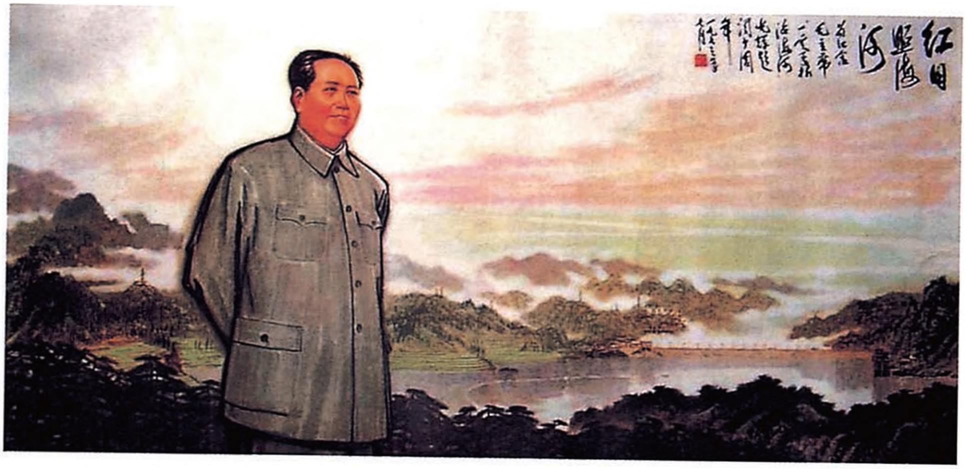
1963年，毛泽东在火车上查看河北水利规划图。


一定要根治海河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题词

一定要根治海河（宣传画）


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泽东

《一定要根治海河》（中国画）



《红日照海河》（中国画）

对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3年11月18日）

一

即送康生同志：

在最后一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二时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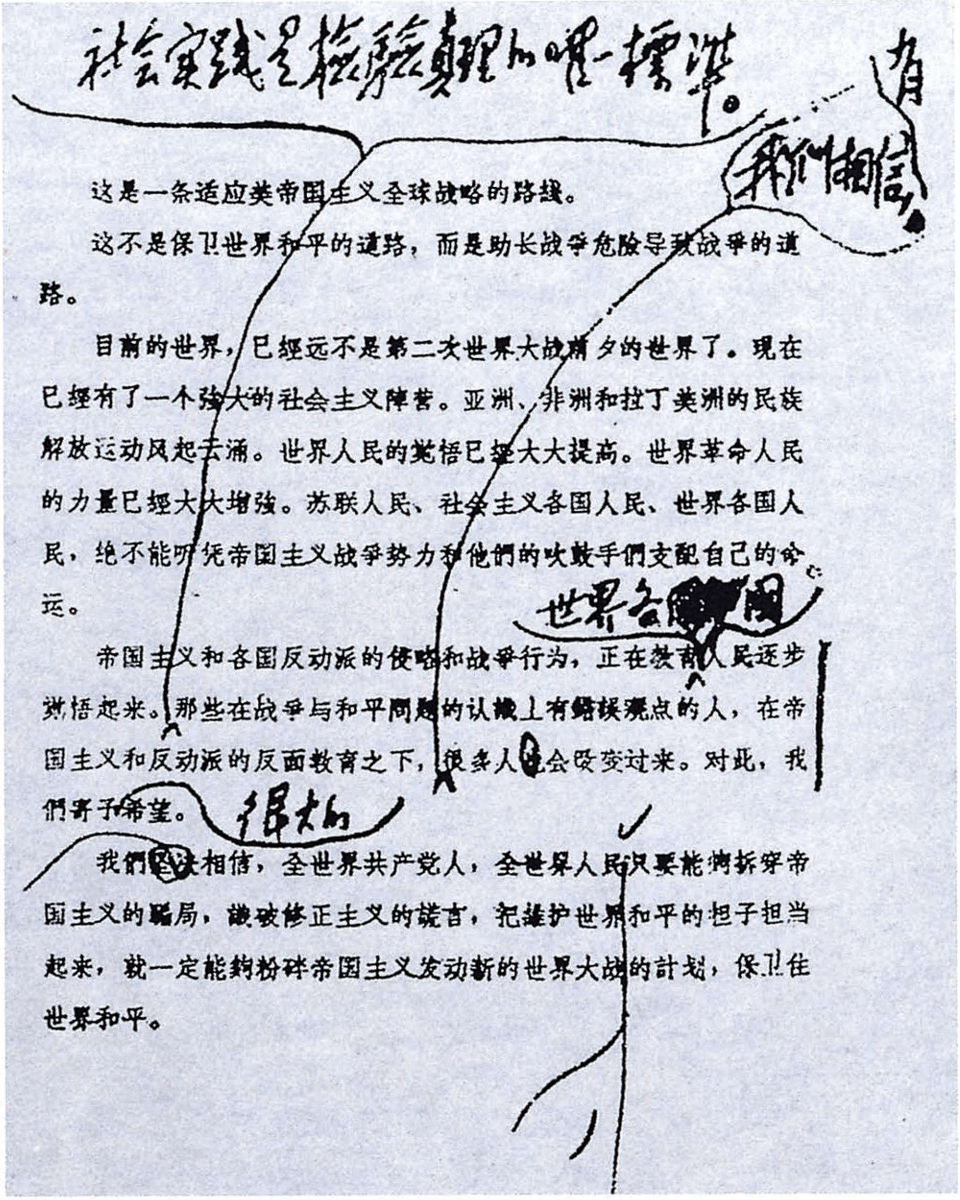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争行为，正在教育世界各国人民逐步觉悟起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上有错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

---

[1]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在1963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3年第二十二期上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定稿第一页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教育之下，我们相信，有很多人会改变过来。对此，我们寄予很大的希望。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有

我们相信

这是一条适应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路线。

这不是保卫世界和平的道路，而是助长战争危险导致战争的道路。

目前的世界，已經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了。现在已經有了一个強大的社会主义陣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世界人民的觉悟已經大大提高。世界革命人民的力量已經大大增強。苏联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世界各国人民，绝不能听凭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和他們的吹鼓手們支配自己的命运。

世界各国

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侵略和战爭行为，正在教育人民逐步觉悟起来。那些在战争与和平問題的认識上有錯误观点的人，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面教育之下，很多人也会改变过来。对此，我們寄予希望。

很大的

我們堅决相信，全世界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只要能够拆穿帝国主义的騙局，識破修正主义的謊言，把維护世界和平的担子担当起来，就一定能夠粉碎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計划，保卫住世界和平。

毛泽东修改《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手稿（部分）。

对谢富治[1]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

（1963年11月20日）

富治、彭真[2]同志：

此件[3]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县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4]，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

[1]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3] 指谢富治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

[4] 指浙江省诸暨县的经验，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通过说理斗争，制服敌人，把“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内部肃反的方针推广到用来处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22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签订十周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十年来，我们两国在友好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全面迅速地发展了两国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关系，大力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促进了两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繁荣和高涨，而且对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现在，中朝两国人民都在以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我们两国人民紧紧

地站在一起，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着坚决的斗争。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随着我们共同事业的发展，中朝两国久经考验的兄弟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必将得到不断的巩固和加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为桑托斯题词[1]

（1963年11月24日）

为了莫三鼻给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

毛泽东

1963. 11. 24

---

[1] 这个题词是毛泽东1963年11月24日会见莫三鼻给（今译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外事兼组织书记、葡属殖民地民族主义政党会议秘书长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时写的。

和古巴诗人、作家及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

（1963年11月26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古巴同志，欢迎古巴诗人。

比达·罗德里格斯（以下简称比）：形式上我是一个诗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革命者。

皮塔·桑托夫大使（以下简称皮）：主席身体好吗？

毛：夏天有些感冒。到南方走了一个月，身体好一些。在北京要看很多文件，到外面去可以爬山，可以接近群众。

皮：主席脸色比去年还好。

毛：去年何时见过？

皮：您接见古巴军事代表团时见过。

毛：大使身体好吗？你们二位（指比达夫妇）怎样？

比：我们身体很好。我们非常幸福，在中国我们变得更年轻了。

毛：你们到中国多久了？

比：两个月了。到南方访问了一个月。我们在上海时，听说主席也在上海。

毛：那时正是南方秋收的季节。

比：在上海，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鲁迅故居。鲁迅是我们长期以来钦佩的文豪。

毛：鲁迅是中国革命文豪。他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

比：不久以前，古巴全国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选集》十万册。这在古巴是个大数字，在中国是微不足道。古巴一本书，一般出三万册就很多了。这说明，古巴人民对鲁迅是多么崇敬。

毛：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采用了“落文”为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比：对敌人不能给以喘息的机会。

皮：这是真理，可用在生活各个方面。

比：我们很荣幸地访问了您的故乡韶山。

毛：那是个小地方、穷地方，山多地少，可以去看看。

比：韶山对我们来说，不是值得去看看，而是应该去看看，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去瞻仰了一个产生革命根源的地方。

毛：过去韶山穷人很多，常侵犯大地主，被大地主称为土匪。我们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直到今天，蒋介石还称我们是“共匪”。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侵略者”。我看这些名字倒不错。他们说我们，第一侵略中国，因为我们反对美国侵略中国；第二侵略朝鲜，因为我们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仗；第三侵略西藏；还说我们侵

略越南、老挝。大概也说你们在侵略古巴吧!

比：他们是如此说的。

皮：的确，鲁迅著作、毛主席著作在“侵略”古巴。

毛：哈哈！美国说你们要“侵略”拉丁美洲。我看值得“侵略”一下。

比：美国害怕古巴星星之火燃烧起拉丁美洲的大火。

毛：那个哈瓦那大会影响很大，尤其是第二个。古巴革命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使古巴能存在下去；第二个任务是帮助拉丁美洲革命取得胜利，让美国的“后院”烧起火来。每个国家都有革命党，有些所谓革命党不革命了。但总有革命的人，如在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都有革命者。你们国家旁边的两个国家海地、多米尼加也有革命者。很多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跑。这不要紧，总有革命者起来。古巴即如此。“七二六运动”开始并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吧?

皮：不是。

毛：有马列主义者参加，如格瓦拉同志。你（指比达）多大年纪?

比：五十四岁。

毛：你和格瓦拉的年纪差不多吧?

比：大一些。

毛：比罗加呢?

比：小一些。

皮：格瓦拉四十五岁，他是古巴革命领导成员中最老的一个。

比：古巴革命几乎是青年人搞起来的。

皮：有点像中国革命，开始时领导同志都很年轻。

毛：一般说来，年轻人比较进步，但并非都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步。有许多人到后来不革命了。生活把他们抛到后面去了。他们失去了革命的敏感，害怕革命。其号称为革命党，一谈革命就害怕，这算什么革命党。他们不愿接近人民，接近最贫苦的下层人民，即工人与贫农。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如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是共产党员或很少是共产党员。十四年来，一部分经过改造，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还保留自己的老观点。文学艺术工作者也是如此。改造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小部分人基本上不可能改造。不要紧，他们是少数，让他们带着右派观点去见上帝吧！我不清楚你们国家的情况，可能也有这几类人。

比：完全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斗争，同样的改造过程。我们的革命青年能看到革命前景，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革命，也有的在胜利后参加革命。另有一部分人在观望。

毛：让他们看看。北京也有一些人在观望；革命到底谁胜谁负？他们要看看。反修斗争究竟如何？他们也要看看。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要看看，每个大风浪，他们总要动摇。

比：他们的“耐心”太大。

毛：他们只好看看，我们也只好看看。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怕他们，不欺他们，不杀他们。你（指大使）在北京住了几年？

皮：三年。

毛：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动。依靠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的人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

张：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毛：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啦！

张：溥仪今年五十七岁了。

比：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毛：他很不满意他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皮：向主席提一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的前景如何？

毛：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斗我们不赢，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阶级。美国出了这样的乱子，即一个总统白天被人打死了。你们国家下了半旗没有？

皮：没有。

毛：奏哀乐没有？

比：没有。

毛：我们没有下半旗，没有奏哀乐，也没有打电报吊唁。

皮：我们得到国内的指示：如果中国同志下半旗，我们也下半旗。

毛：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你们国家改变了制度，不是换了巴蒂斯塔个人，巴蒂斯塔没有死吧？

皮：没有。

毛：但他对古巴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法解决，除非革命。其次为这一垄断集团与另一垄断集团的矛盾。还有所谓盟国问题，美国与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矛盾，美国与尼赫鲁、铁托也有矛盾。你（指大使）到过印度吗？

皮：在印度呆过几天，深刻的印象是，印度与中国有鲜明的对比。印度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印度人民，百分之九十不赞成尼赫鲁的统治。印度半数以上的人很穷苦，印度的状况比缅甸还差。你（指大使）到过缅甸吗？

皮：没有。

毛：总之，世界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分子对肯尼迪之死如同丧亡了父母一样悲痛呢？这反映了世界不稳，一些依靠资产阶级“明智”派的人，“明智”派一倒就吓慌了。这些所谓的“明智”派就是在你们猪湾（即吉隆滩）登陆的指挥者，也是去年十月加勒比海事件的主持人。吉隆滩事件，艾森豪威尔未做过。只有你们有警觉。你们领导者提出一手拿砍刀（割甘蔗，生产用的），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能放弃这口号。美国奈何不了你们。依我看来，是美国怕你们，不是你们怕美国。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当然，小的也有点怕的，说一点不怕也不真实。美国飞机每天在上空飞，那么多海军陆战队，又有关塔那摩基地，如何不令人担心？但大局说来，是大的怕小的。在南越，美国与南越统治者的力量不小，可是胜利没有希望，美国与南越统治者怕南越人民的游击战。你（指大使）想不想去南越看看？

皮：我去过越南民主共和国。

毛：到越南了解越南南方人民如何搞游击战，使美国人如此惊慌。你（指比达）就要回去了吗？

比：明天走。

毛：可惜没有抽点时间到越南去看一看。

比：这也需要我再来一次。

毛：下次来，到越南北方调查南越游击战的情况。再去看看朝鲜人民共和国。看看他们如何搞自力更生的。他们经过大破坏，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美国把朝鲜炸得稀烂。但是，现在不仅工业，而且农业都解决了问题，真该去看看这两个国家。中国经验当然应该研究。朝鲜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战后只有七百万人口，被美国搞去了二百多万（战争死亡的不算），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今，十年来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发展了，人口也增加很快，由七百万增加到一千二百万。

皮：我们占了毛主席很多时间。主席谈到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美国与盟国的矛盾、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美国发生肯尼迪事件，主要因素是内部矛盾。这是否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应予以更大的注意？帝国主义一贯玩弄两手，一手和平，一手战争。有人说肯尼迪之死是主张战争的人干的，当然我不是说肯尼迪是明智派。

毛：也可能，但现在搞不清楚。美国不暴露谁杀死肯尼迪。可以设想肯尼迪事件对共产党有利一些，民主党受到一次大打击。共和党有好几派，究竟哪一派干的，不知道。现在总统约翰逊能否当选还是个问题。他的威望不及肯尼迪。这个人要钱，名声不好，是个大贪污分子。我国搞“五反”，他是“五反”对象。（众笑）

张：主席该休息了吧？

毛：没有关系，多谈一会儿。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古巴的变化，你们自己看到了。古巴就在美国门口几十海里，起了变化，谁能说古巴没有起变化呢?！中国变化了，这也是事实，我是知道的，你们也看到了。北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就来不了嘛！非洲也起了很大变化，亚洲也起了很大变化如印尼、柬埔寨等，小小的柬埔寨竟敢拒绝“美援”，为何有此大胆？只因为：第一，美国要他的命；第二，国内人民的觉悟；第三，法国、中国帮助他们。柬埔寨人口跟古巴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口。现在发生了怪现象，美国每年“援助”柬埔寨三千万美元，过去共“援助”了三亿几千万美元，柬埔寨感到“美援”是危险的东西。它在收买干部、腐化干部，并搞颠覆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柬埔寨拒绝“美援”。好吧，就谈到这里。

给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复信和对复信的批语

（1963年11月25日、26日）

一

致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兄弟
苏加诺总统：

我很高兴地接到和阅读了您十月二十三日的来信。

您在来信中，强调中苏两国团结的重要作用，表示对于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感到不安和忧虑，并且希望通过协商很好地解决意见分歧。对您的这种好意，我和我的同事都非常感谢。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珍视中苏团结，珍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珍视一切革命政党和革命力量的团结，珍视全世界革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团结。我们一贯竭尽自己的努力，维护和加强这种伟大的团结，以利于共同对敌。

这些年来，对于中苏意见分歧，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通过平等协商消除分歧。今后，我们仍将坚定不移地采取这种态度。亲爱的朋友和兄弟，您可以相信，我和我的同

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都将一如既往，为加强中苏团结，加强一切革命力量的团结，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衷心支持您在来信中阐述的“对己须和、对敌须打”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是我们在处理敌我关系问题方面一贯坚持的立场。

我和我的同事，作为您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朋友，十分敬佩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割断世界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而作的积极努力和重大贡献。

我们一贯赞同您提出的“我们热爱和平，但我们更热爱独立”的战斗口号。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这种意见，即在印度尼西亚，在中国的台湾地区，在整个东南亚，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尚未完成而必须继续进行。

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党和我国人民，为你们解放西伊里安而感到很大的高兴。我们支持你们反对“马来西亚”这个新殖民主义计划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佩服你们冲破一切阻力而创议和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壮举。

亲爱的朋友和兄弟，让我在这里为您祝福，为印度尼西亚人民祝福。您可以相信，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道，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相互支援，携手前进。

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二

请尚昆[1]同志即办。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上午二时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3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十九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现在，阿尔巴尼亚人民，正以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满怀信心地为胜利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我们深信，钢铁般地团结在劳动党周围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援下，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取得更加光辉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加强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团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

争，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起了重大的作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朋友遍天下。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定不移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一贯忠于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现代教条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久经考验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原则性和革命战斗精神，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深表敬佩。

中阿两国、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久经考验、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旗帜，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祝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1963年11月29日，毛泽东观看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接见演员。

对周扬[1]《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2]的批语和修改[3]

（1963年11月）

一

退周扬同志：

讲得好，完全同意。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

[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是周扬1963年10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后来在196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

[3]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扬1963年10月31日为送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讲话稿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说，这次会议有党内外社会科学工作者、党委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约500人参加。会上印发了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少奇同志在越南党校的讲话，作为会议的主要学习文件，另外还发了一些其他文件和正反面材料，并拟请少奇同志在会上讲话。这是学术界一次反对修正主义的学习和动员大会，大家情绪甚高。本篇二至二十一是毛泽东对这篇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1963年11月，毛泽东接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全国工业交通企业财务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除害灭病卫生运动总结会议的全体人员。

三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对工人

革命运动的经验的总结，通过同敌对思想的论战，奠定了它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剩余价值的学说，发现了阶级斗争是人类从进到文明时期以来整个历史发展的动力，发现了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

四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想要篡改和抛弃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企图，就已经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出现了。

1963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

五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似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科学和科学史本身，就是说明这种对立统一、对立斗争，因而得到发展的。

六

你们看，统一的事物，一分为二，变为相互斗争的两部分了。

七

有什么奇怪呢？庞大的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它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走狗，因为它反革命、反科学、反共产主义、反人民，势必从它的宝座上跌下来。列宁领导的“无名小卒”们要起来代替他们了。

八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不顾曾经强加于他的“狭隘经验论”的嘲笑，政治上的打击和孤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用新条件下的革命新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1963年11月，毛泽东接见历史学家翦伯赞。

九

在中国，大家都亲眼看见了，因为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左翼革命家手里，广大群众拥护这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庞然大物被打倒了，被人看不起的人们（他们领导了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最广大的群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事物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化。

1963年，毛泽东接见农业、医学科技工作者。

十

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革命党派愈来愈寄希望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派别、小组和个人，他们的思想愈来愈成为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成为当代世界人民革命的旗帜。

十一

苏共领导违反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正确原则，首先把内部争论公开在敌人面前，在自己的一次代表大会上，擅自宣布另一个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所谓“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后又用种种恶劣行为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不同意他们错误路线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他们自以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曾经猖狂了好几年。其实这是一个很不聪明的，适足以败坏他们自己的声誉，使他们自己的日子不大好过的办法。如果他们再不回头，改正错误，他们的日子是肯定会更加不好过的。谓予不信，拭目俟之。

十二

现代修正主义者们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三怕革命人民。他们胆小如鼠，对于他们所称为“教条主义者”的人对他们的批评所作的反

批评不敢让他们本国的人民看到，严密封锁，就像封锁“瘟疫”一样。即此一端，就可以断定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未来日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了。

十三

真正的革命家，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是大无畏的，是不怕孤立的，是不怕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咒骂的。因为他们知道，代表未来的不是那个看起来可怕的庞然大物，而是自己这些小人物。一切大人物都是小人物变成的。起初好像孤立的人们，只要他们手里有真理，他们最终总会要胜利，这就是列宁和第三国际。而因为丧失真理，失掉群众的拥护，有名的大人物和大团体，势必会衰亡，会变小变臭，这就是伯恩施坦[1]和第二国际。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它的反对方面转化。

十四

在欧洲、北美和澳洲，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为着维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日益同社会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使他们自己从形式到本质都变成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并且用开除党籍等等制造分裂的方法对待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这种时候，那里也势必产生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这种过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共产党人中，也在发生。有些一时认识

---

[1]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

不清，被修正主义蒙蔽，跟着修正主义跑的人，终有一天要被事实教训过来而同修正主义分手，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来。

总之，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出乎现代修正主义者和现代教条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变化正在发生。他们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十五

在这个伟大时代里，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领导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将战胜革命道路上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着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

十六

老修正主义者曾经热衷于“回到康德[1]去”的时髦口号，伯恩施坦公然说辩证法是妨碍正确认识的“陷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以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2]等人为代表的俄国哲学

---

[1] 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2] 波格丹诺夫，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政治家、文艺批评家、哲学家。

上的修正主义，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产生了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情绪，他们认为只有求助于主观唯心主义和神学才是一条好出路，曾经公开主张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和马赫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和宗教结合起来，使革命家变成“造神派”。当时第二国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这种反动倾向，受到了列宁彻底的批判。他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大著作，就是为了批判造神派的。

十七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

十八

敢不敢正视和承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和全世界人民的矛盾，敢不敢正视和承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中都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敢不敢正视和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两类矛盾（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是能不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辩证法的试金石。

十九

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

族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一国内部各个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应当而且可以调和、融合起来。

二十

我们对欧洲十四——十六世纪从意大利发生的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到十九世纪中期为止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在历史上所曾经起过的积极的启蒙的作用，给以充分的估价。在当代也有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愿意同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联合的关系。

二十一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历来强调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1963年，在全国医学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亲切接见湘雅医学院第二任校长张孝骞教授。

关于武装斗争的一些经验[1]

（1963年12月5日）

一

搞革命总是要自己创造经验。过去我们都不会打仗，也没有准备上山打游击。我是搞工人、农民运动的，职业是小学教员。但是敌人要抓我们，杀我们，我们被迫上山打仗。不论如何打还是不会，从来没有学过。我们向蒋介石学，向敌人学，打了十年。后来日本人打进来，我们又跟日本人学打仗。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过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

搞武装斗争，要学会消灭敌人。一百个消灭不了，也要消灭它五十个，只要缴了枪和子弹，就不蚀本，就是赚钱。如果只是把他们赶走，不是把他们消灭，那就不合算。如果能够割掉一个指头，就只存下九个指头，再割掉一个指头，就只存下八个指头，再割掉一个指头，就只存下七个指头。这样，敌人就会怕我们。敌人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指头是一个一个地割掉，一下子都歼灭，是不可能的。打仗基本上就是用这个办法。打歼灭战，就要选择时间和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地点。

再讲一条，武装斗争要搞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半个指头都割不下。搞根据地，对封建地主不要一概而论，不要大中小地主一下子统统打倒。首先要打最恶劣的，从打最坏的开始，就是指当权派。同农民仇恨不深的，暂时可以不动。也可以不马上分配土地，先实行减租减息的办法。根据地搞起来，就可建立政权，建立农民协会，建立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建立生产合作组织，建立民兵。我们有相当时间，有的同志不理解这个问题，打了就走，这叫做流寇主义。到处跑，把猪、鸡吃完就走，这样不行，不能成功的。

二

因为城市是帝国主义进行侵略的据点，一下子夺取不容易。小市镇或许有可能，但往往敌人来了也要退出，反复多次。主要是消灭敌人力量，不消灭敌人力量，地方是守不住的。

此外，还要有单独的农村政治经济纲领，因为总的纲领不可能写得很具体。建立了根据地，就可以减租减息，但还不马上没收土地，要群众起来之后，消灭了很多敌人，才谈得上分配土地。敌人如果很强大，一下子消灭不了，游击队走了，敌人就杀人，你分地农民也不敢要。古巴在革命胜利前，根据地就没有分地，因为只打了三年。我们国家大，战争时间长，打了二十二年，所以在战争中就实行了土改。这也是在打了几个大胜仗，有了人口达数百万的根据地之后。你们按具体的情况办，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你们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你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语言、服装都要和群众一样，使他们

感到是可信任的朋友。城市知识分子有一个缺点，我自己也是如此，就是不熟悉农村情况。开始农民不信任我们，农民受了做官的压迫，我们虽不是做官的，但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农民，农民还是不信任。如果没有打胜仗，他们也不大信任。打胜仗之后，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信任。

三

还有一条，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国际援助为辅。有国际援助也可以，没有也可以，要靠自己。像古巴一样，他们的武装斗争，没有外国支援，他们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从敌人手上夺来的。我们打仗也全靠敌人，枪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还俘虏了很多敌人补充到部队中去。敌人的兵，受过训练，会打仗。我们的兵没有受过训练，如果编入一些俘虏，就会打仗。根据地就是训练干部的学校。我们的许多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其他许多元帅、将军，起初都不会打仗，是在战争中学习起来的。

我们过去没有什么元帅、将、校、尉等的称号，只有司令员、军长、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军官与战士一样。但是后来就有了很多称号，衣服也比士兵好。我看这样不好，还是和战士一样好。不靠元帅、将军称号吃饭。我不是元帅、将军，而是党中央主席，也不应靠这个职位吃饭。群众不管你是什么官，也不看你穿什么衣服，只看你的政策。他们也不管你是什么党，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共产党的政策错了，他们一样要骂你。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是很蠢的，知识是从群众中来的。我们如不进行调查研究，就什么也不懂。这就是我们的一些经验。

关于编诗词集给田家英[1]的信

（1963年12月5日、6日）

一

田家英同志：

“钟山风雨”一诗[2]，似可加入诗词集[3]，请你在会上谈一下，酌定。

“小小寰球”一词[4]似可收入集中，亦请同志们一议。

其余反修诗、词，除个别可收入外，都宜缓发。

《八连颂》[5]另印，在内部流传，不入集中。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毛泽东1949年4月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3] 指当时正在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书名为《毛主席诗词》。

[4] 指毛泽东1963年1月9日写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5] 《八连颂》，是毛泽东1963年8月1日写的赞颂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杂言诗。

二

田家英同志：

今天或明天开天〈会〉讨论诗词问题，我现再有所删节改正，请康生[1]同志主持，提出意见，交我酌定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五时

---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

在张爱萍、李天佑[1]关于对付蒋军袭扰问题的报告上的批注[2]

（1963年12月9日）

一

敌人小、中、大袭扰足以锻炼我军民的战斗能力，是好事，袭扰越多越好。故第八项[3]措施，暂时不应采取，将来视情况再说为宜。

毛 注

二

此项[3]在现阶段不应当做，将来看情况再说。

毛 注

十二月九日

---

[1] 张爱萍、李天佑，当时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本篇一是对张爱萍、李天佑1963年12月2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和中央军委的报告的批注。报告说，我们接到总理11月27日关于应该进一步研究蒋匪可能袭扰的新特点、新花样和我们的新对策的指示后，总参各部门马上行动起来，30日总参党委召开办公会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又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根据总理指示精神和各种迹象看来，蒋匪可能的突击袭扰破坏活动除上次报告中所估计的以外，还有以下可能：1. 花样增多。占领我某些空白岛屿，或对我设防较薄弱岛屿、大陆突出部地区等突然袭击。在海上抢劫我运输船只，破坏我海上运输，抓我渔船，破坏渔业生产。在我纵深的劳改犯集中地区或偏僻山区，空投小股武装，策动暴乱等。2. 规模逐步扩大。蒋介石有可能采取由小到中、到大的做法，由几十人至两三百人的小搞，发展到几百人至千把人的中搞，进而到几千人、万把人以上的大搞。3. 地区可能更广。蒋匪袭扰地区不仅有闽、粤、浙，而且会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区和中缅、中尼边境。4. 次数可能更多，越来越频繁。5. 方式更加狡猾，规律难以琢磨。为此，我们目前应以对付敌人几十人、几百人、以至上千人的袭扰活动为主，同时又必须准备对付敌人搞更大一些规模的袭扰。在具体措施上，除上次已报告者外，我们补充以下几点：1. 反蒋匪袭扰破坏活动的关键在于加强部队战备工作，充分发动、依靠民兵和人民群众，并把两者密切结合起来，加强军民联防。2. 加强对情况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加强直接的观察、警戒和巡逻。3. 对兵力薄弱而又可能遭受敌人袭击的某些技术侦察分队和距大陆较远的岛屿，适当地增加兵力和火力，构筑工事。4. 在可能遭敌袭击的主要地区，控制必要的机动兵力和车辆、船只，及时给予支援。5. 公安、港务、渔业部门应加强对港口和船只的管理。6. 可能遭敌袭击的公安哨所、民兵队部及个别地方党政机关，应做些必要的自卫工事。7. 各军区及省军区、分区、人武部，海、陆、边各军、师要派得力干部深入下去，具体检查和帮助。8. 建议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宣传上采取相应的配合措施。本篇二是对报告中所提第八项措施的批注。

[3] 指张爱萍、李天佑报告所说的对付敌人小、中、大袭扰须补充采取的措施中的第八项。

对王鹤寿[1]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报告的批语

（1963年12月11日）

薄一波同志：

此件[2]请你看一下。别的工业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请你查告我。看来学解放军，并且调一些解放军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是一个好办法。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

[1] 王鹤寿，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中共冶金工业部党组书记。

[2] 指王鹤寿1963年12月9日关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今年我们在企业里，除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增产节约、“五反”运动以外，主要抓了两件事：一是开展“经济活动分析”，一是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济活动分析是在一个企业或班组里，拿它这一个月的各种经济指标（产量、质量、成本、品种、消耗、回收率、劳动生产率等）与上月比，与最好的季度比，与别的企业、班组比，与世界先进水平比，从这种比较中找出差距以及产生差距的原因。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就是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的方法，发扬主席过去所批示的《鞍钢宪法》精神。这不仅使我们找到了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决了许多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效果是显著的。

在《苏联学术界近年对控制论哲学问题的讨论十分热闹》[1]一文上的批注[2]

（1963年12月）

一

调和派

慎重派

二

这是一种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否认不依〈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平衡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和平在一定条件下能控制，因为敌对的双方都不愿意打仗。到了新的条件下，双方中的一方，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自己认为非打不可了，不认〈能〉控制了，仗就打起来了。

---

[1] 新华通讯社1963年12月11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增刊）第六三九期上登载的这篇文章，介绍了苏共二十二大以来，苏联对控制论的哲学问题讨论的情况。文章叙述了苏联学术界对控制论广泛讨论、从否定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介绍了1962年6月举行的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哲学讨论班关于控

制论哲学问题的联合理论会议对控制论的定义、机器能否思维、生物体的模拟和人工创造、控制论逻辑、控制论和社会等问题的不同意见。1963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苏联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宣称：控制论“影响了世界观的发展”，是“科学知识中、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整个一个时代”，“对劳动的性质和人类生活的整个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2] 本篇一中“调和派”三个字是毛泽东在文中“认为说机器能够思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与其把机器同人对立起来，倒不如更多地研究人和机器的共栖问题”这段话旁写的批注。“慎重派”三个字是在文中“认为机器模拟思维的问题还需要实验研究；机器与人不同，在于人能进行创造性活动，今后控制论要研究创造性问题”这段话旁写的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文中所述布尔则夫以下观点写的批注，布尔则夫认为，应当利用控制论去解决人类社会调整的问题，控制论在争取和平中也应起作用，和平是能够也应当被控制的。

关于文艺工作的批语[1]

（1963年12月12日）

一

彭真、刘仁[2]同志：

此件[3]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

---

[1] 这两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1963年12月9日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上。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3] 指《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抓曲艺工作的材料。这份材料说，上海市委很注意曲艺等群众艺术工具，柯庆施曾亲自抓曲艺工作。一个是抓评弹的长篇新书目建设问题，他说，有没有更多的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不错的长篇现代书目，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能不能占领阵地的问题；另一个是抓故事员的问题，故事员在市郊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讲革命故事，起到了红色宣传员的作用，很受群众的欢迎。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一活动，并可在城市中推广。

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二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3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文艺演出。

1963年12月，毛泽东和文艺工作者在一起。

不会打仗可以学会打仗[1]

（1963年12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开头时很小，只有几十个知识分子。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只有几个人。其余的，有的被敌人杀了，有的叛变投敌了，有的消极不干了。但这几十个人，经过几年，就发展成五万人，有了广大的工人农民运动。当时我们没有准备搞武装斗争，不觉悟，没有事先准备好应付我们的同盟者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到了他叛变之后，我们才懂得了他的办法是杀人。所有的工会、农会都被关了，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当时我们从未打过仗，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军事对于我们是个生疏的部门，我们不懂。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我们一赶，只好去打。是谁教会我们打仗的？是敌人。我们的武器也是敌人送来的。没有任何外国援助过我们一支枪，全部武器都是国民党送给我们的。打一个胜仗，枪也抢过来了，人也俘虏过来了。对俘虏的士兵，我们给他们政治教育，让他们参加我们的部队，干部则放回去。但一些技术人员可以留下，例如医生、无线电技术人员等，还是用得着的。

总之，不会的东西可以学会，不会打仗可以学会打仗，不会建设根据地可以学会建设根据地。根据地是我们的学校，可以在那里训练干部。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秘鲁共产党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时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解决部分群众就业和生活困难问题的批语和信

（1963年12月13日）

一

柯老、丕显[1]同志：

此件[2]请阅。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暂〈渐〉

---

[1] 柯老，指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3年12月12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四期上登载的《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一文。该文说，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有显著增加。从目前趋势看，来信还在逐步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减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精减职工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回乡的老、弱、病、残职工；另一种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减后断了生计，现在只好“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是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无靠，他们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思想极为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工作或学习，还有些人搞投机倒把等，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了反动团体。

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

刘、邓、彭真[1]同志：

我在《群众反映》第84〔期〕上写了几句话[2]给上海柯、陈二同志，送上请阅。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尚昆[3]加封寄去。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即本篇一。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给周世钊[1]的信

（1963年12月13日）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2]兄的信，表示生活极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五百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即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又及。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田仁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和批语[1]

（1963年12月13日、30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中央各人民团体党委，各部委会党委、党组：

现将湖南省委李瑞山、华国锋两同志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六日写的一个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2]以及附在上面的湖南省委一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这个指示当时以中发〔63〕862号中共中央文件在党内印发，1977年9月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本篇二是毛泽东1963年12月13日为转发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华国锋关于参观广东农业生产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写的批语。本篇三和四是毛泽东同月30日在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稿的标题页和打印件上写的批语。

[2] 李瑞山、华国锋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说，我们省委的几位同志和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等32人，于10月29日至11月5日参观了广东省的农业生产。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广东省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到处有大面积高额丰产的记录，到处有观摩学习的人群，到处是建设新农村的景象。通过参观，大家都感到扩大了眼界，解放了思想，开阔了胸襟，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同时，也学习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现在的问题是，应当把广东的经验和湖南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和推广。

九六三年十二月七日写的一个指示[1]，发给你们研究。中央认为，这种虚心学习外省、外市、外区优良经验的态度和办法，是很好的，是发展我国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的重要方法之一。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只研究成绩一方面，不研究缺点错误一方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外省、外市、外区、别的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组织得力高级中级干部去虚心地认真地加以考察，以便和本省、本市、本区、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进。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对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

---

[1] 中共湖南省委批转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给湖南各地、市、县委，省委各部委，各厅局党组的指示说，最近，李瑞山、华国锋带领各地、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参观了广东省若干地区的农业生产，他们把学到的经验和体会，扼要地写成这个参观报告。省委认为，这个报告很重要，必须一直发到公社党委和厂矿党委。各级党委的同志必看，管农村工作的同志必看，管工业和其他各部门的同志也要看。今冬还要把这个报告向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宣读。工业部门最近到上海去参观学习的同志，也应该写出同样的报告，印发给大家阅读。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照照镜子，展开讨论，把从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学来的经验，很好地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中去。学习外地的经验要和总结自己的经验相结合。应当看到，每个县、每个地区，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总结这些单位的经验，把本地的经验和外地的经验结合起来，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地加以推广，就会更有成效地改进工作，发展生产，使先进单位更加先进，一般的和落后的单位逐步赶上先进单位。在这里，领导亲自搞试点是特别重要的。只有做出了样板，树立了旗帜，才能更快地带动全面，掀起学习先进的高潮，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谈得不深刻，敷衍几句了事。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这应当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通常识。但是，中央和各地同志中，有许多人却很少认真地用这种观点去思索去工作。他们的头脑，长期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不能解脱。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两分法）、矛盾着对立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就是人们固步自封、骄傲自满，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对自己的两分法），更怕别人批评。中央有几十个部，明明有几个工作成绩工作作风较好的部，例如石油部，别的部却视若无睹，永远不去那里考察研究请教一番。一个部所管企业事业，明明有许多厂矿、企业、事业、科学研究处所及其人员，工作做得较好，上面却不知道，因而也不能提倡人们向那些单位学习。同志们，中央在这里所说的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的同志是指一部分同志，不是指全部同志。但是，应当指出，有大量的好同志却被那些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爱好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同志们，亦即官僚主义者，所压住了，现在必须加以改革。凡不虚心地认真地对本地本单位本人作分析，对别地别单位别人作分析，拒绝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方法的同志，要进行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以便把不良情况改变过来。把向别部、别省、别市、别区、别单位的好经验、好作风、好方法学过来这样一种方法，定

为制度。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请你们加以讨论。以后还要在中央工作会议及中央全会上加以讨论。湖南省委过去在一个时期内，不作调查研究，主观主义地下达许多指示，往下灌的东西多，由下面反映上来的真实情况少，因而脱离群众，产生很大困难。从一九六一年起，他们开始改变了，以至情况大好起来。但是他们认为还是远不如广东和上海，所以他们派遣大批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省和市的干部，组成两个考察团，分别到广东上海去学习。这一点，请你们注意研究，是否也可以这样办。中央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当这样办。如有不同意见，请你们提出。

中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

刘、邓、朱、彭、瑞卿、康生、伯达、一波、先念、富治、震林[1]同志：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富治，即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湖南这个文件[1]似可转发，有很大好处。请审阅处理。或者开一次会，议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三

送少奇、小平二同志再阅。

四

少奇、小平同志：

此件改了几个字，请再阅后，连同湖南文件，即可印发。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时间仍写十二月十三日。

---

[1] 指李瑞山、华国锋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

给张维[1]的信

（1963 年 12 月 14 日）

楚珩同志：

多次来信并附件都收到了。深情厚意，关心政治、卫生工作和我个〔人〕养生之法，极为感谢！久未作复，尚乞原谅。

敬祝病体逐渐康复。

并问魏夫人好！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

[1] 张维，又名张楚珩，湖南浏阳人。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来往。当时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

关于在部队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给林彪[1]的信

（1963年12月14日）

林彪同志：

你的信早收到了。身体有起色，甚为高兴。开春以后，宜到户外散步。你对两个文件[2]的看法是正确的。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均已走上正确的轨道。可以预计，更大的发展是会到来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运动两个文件，十一月中旬就发出去了，本月上旬各省已有反映，在一些地方的生产大队全体队员及五类分子[3]（有的多到七百多人听讲）开会时向他们宣读，分组讨论，效果很好。军队如能照此办理，那也一定会好的。由团营两级**理解力强的军政干部**向连队一切人员分几次宣读、讲解，讨论，由群众提出意见，讲解员解答疑难问题，是会成为一个大规模社会主义政策教育运动的。军、师两级也可派一部分强的干部下去，杂在团营干部中，向连队宣读、讲解，作为军官当兵的一种形式。至于高级首长，例如瑞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2] 指《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

[3] 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

卿、肖华、杨勇、廖汉生、许世友、黄永胜、刘亚楼[1]等等同志也应该择一二个连队去作一二次讲解。讲解要连〈联〉系环境，先要对准备去讲解连队的情况作一些大略的调查。不知已按你的意见作了布置没有？据我从北京几个军事基层单位的少数同志接触，他们尚不知道此事，没有看过文件，也没有听过宣读。此事其实不难，只要由总政下一通知，叫各军区各兵种印发文件，每一个支部一本，传下去，由团营合组宣讲队伍，分头下到连队，照本宣讲，以排或班为单位进行讨论，自由发言，容许讲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意见，就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例如几个星期，因为不能耽误操课任务，宣读文件只能夹在正常操课中间去做，所以需要几个星期。如果暂停操课，那就一二个星期够了）出现一个高潮，提高政策水平。一次宣讲之后，过几个月再作一次宣讲，使人们得到更深理解。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是否可以如此做，请你和罗、肖诸同志商酌处理。

祝好！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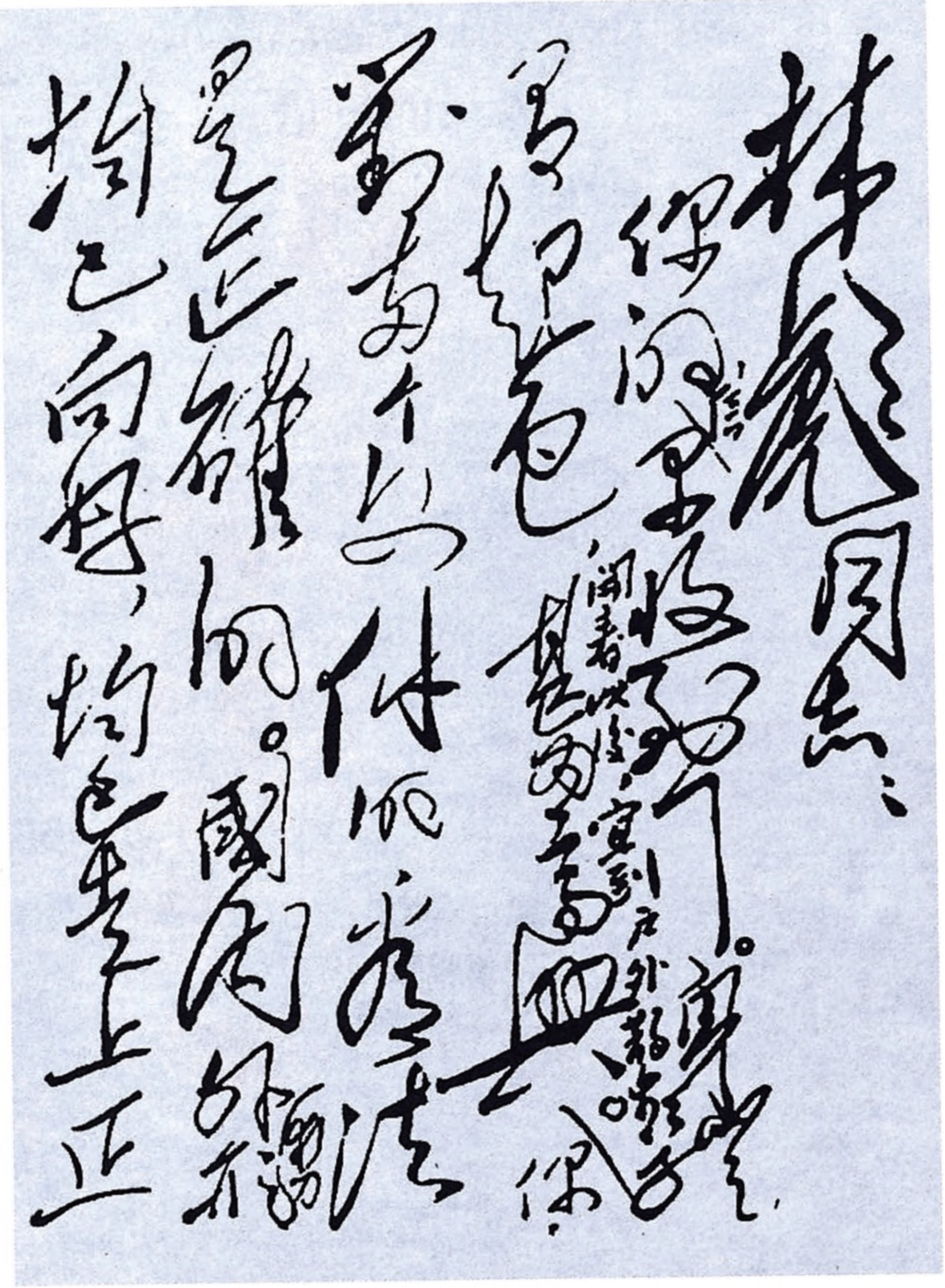
---

[1]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廖汉生，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许世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刘亚楼，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

曹操有一首题名《神龟寿》的诗[1]，讲养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又及

---

[1]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作的《龟虽寿》一诗为："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毛泽东致林彪信的手稿（部分）。

关于在基层配备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批语

（1963年12月14日）

少奇、小平、彭真[1]同志：

这个文件[2]请你们看一看。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否在生产队里设一个政治委员，或者叫政治指导员，或者叫宣传员，让一个不脱离生产的小知识分子（高小毕业生有的是，初中生也可找到），把思想政治工作，在几亿农村人口中抓起来。在城市工业、商业、居民方面也仿军队办法从上到下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指

---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3年12月13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八十三期上登载的《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一文。此文是黑龙江省北安县委宣传部符金声11月来信的摘要。来信说，目前农村的政治思想工作，虽然上面一般都有布置，但往往落实不到基层。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不能落实到生产队的原因是：（一）认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二）上面有的机构设置不当，使一些职能部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却把下面党组织的主要负责同志牵扯在行政事务圈子里拔不出来。（三）生产队没有政治思想工作队伍。因此建议：（一）撤销类似生产办公室那些党政不分的重叠机构。（二）每个生产队应像军队的连队那样，配上一个政治委员，专门负责生产队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的工作。

导员。此事书记处议一下。然后常委再议。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院内看文件。

1963年，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

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的谈话

（1963年12月16日）

（当聂荣臻汇报到苏联撤退专家后，我们科学技术发展更快时）

毛泽东：这等于抗战时何应钦不给我们发饷，各根据地生产出来的比发的要多得多。

（当聂荣臻讲到社会科学时）

毛泽东：社会科学也要有一个十年规划。社会科学落后了，这回没有搞规划，社会科学也要投一点资。

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曾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是哪里办的？

（有人回答是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办的。）

（当聂荣臻汇报到农业和医学科研时）

毛泽东：黄淮海，要组织几万人搞。

几万人按军事编制编成工程兵，使我们的铁路工程兵从十二万发展成二十二万。为了修森林铁路，没有工程兵不行。

农业产量到几百斤不登报，我们只登增产措施。预防感冒的药，《参考消息》上说英国人研究出来了。我一年总要感冒几次，这种药应该研究一下。感冒究竟是什么原因？致病的到底是病毒，还是一种什么细菌？

允许公开犯错误，但要公开改正。

（当聂荣臻汇报到二十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时）

毛泽东：要有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

（当聂荣臻汇报到进口书刊一年要四百万美元时）

毛泽东：买外国书刊只有四百万美元，还不算多嘛，划得来，可以花一千万美元。

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这是我们自己的出版社嘛！

（当聂荣臻汇报完后）

毛泽东：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科学研究是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得理论的人才，也可以从工人农民中间来培养。我们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学理论，如医学方面、生物学方面。

（当谈到十年要投资三十亿时）

毛泽东：每年三亿，不多嘛。

（当毛泽东谈到利用激光搞反导弹武器时）

毛泽东：“死光”，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批人吃了饭不做别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军事上除进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武器的研究，也许我们将来在作战中主要是防御。进攻武器，比原子弹的数量我们比不赢人家。战争历来都需要攻防两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就没有多大用

处。我们准备做一些蠢事，要搞地下工厂、地下铁道，逐年地搞。

（当人们都站起来准备散会时，有同志问：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包括不包括社会科学?）

毛泽东：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商品、战争、辩证法等，是观察了千百次现象才能得出理论概括的。

关于工业部门学解放军的信[1]

（1963年12月16日）

林彪、贺龙、荣臻、瑞卿、肖华[2]同志：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3]和三八作风[4]。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据薄一波同志说：现在已有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正在学习石油部学解放军的办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学解放军的详细报

---

[1] 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邓、彭、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诸同志阅后，送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肖华同志阅。此信阅后存瑞卿处。”这里的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彭，指彭真。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4]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告，他们主张从上到下设政治部、处和指导员。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要这样做，政治干部的来源，我想有四个办法解决：一是从解放军调出一部分强的而又可能调出的政治干部和懂政治的军事干部送到工、商、农部门中去（先着重工业部门）；二是由工业及其他部门派得力同志到解〔放〕军的军师团去学习几个月；三是由他们派人到现在莫文骅[1]管的政治学院去当学生，按期毕业，回去工作；四是他们自己抓起来做，将解放军一套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办法，拿去略加改变（必需适合各个不同部门的情况），作为自己的东西去实行，现在已有四个部这样做了。看来这第四项办法是主要的，因为解放军不可能调出很多的干部。但解放军要给他们以帮助，是肯定的。请你们考虑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们谈一下（有个别管工业的同志参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针确定下来。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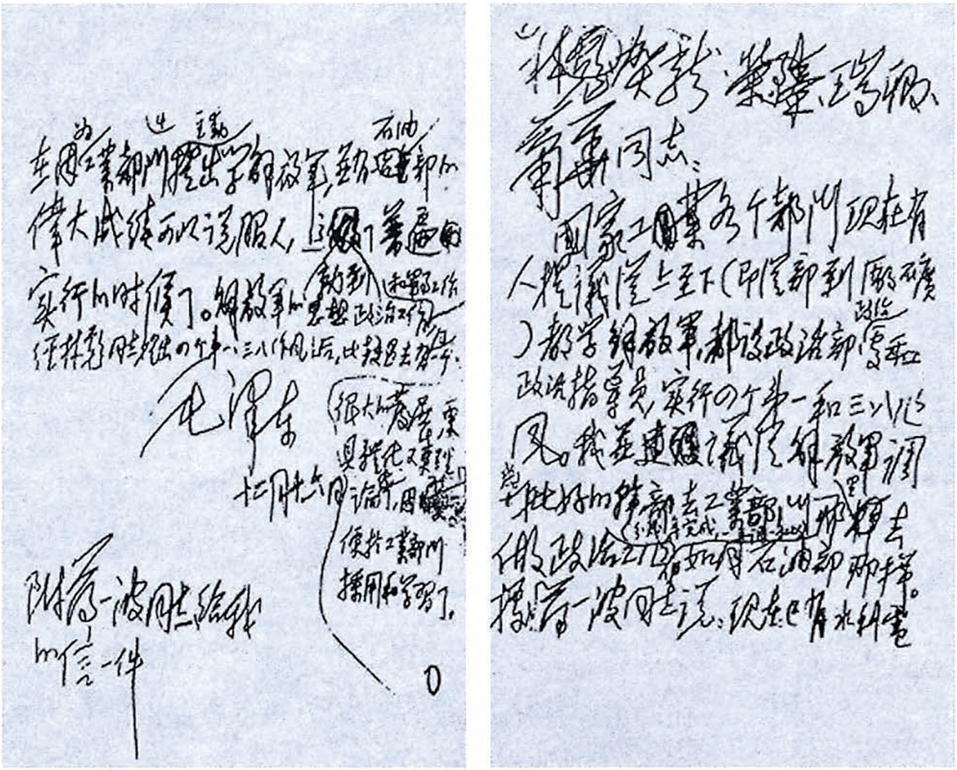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附薄一波同志给我的信[1]一件。



毛泽东致林彪等信的手稿。

---

[1]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63年12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你12月11日关于王鹤寿同志的报告给我的批示，已于13日收读。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业各部的同志，查询各部学习解放军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并讨论怎样加强工业企业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学习解放军，调一批解放军的好干部到工业部门工作，确是加强工业企业政治工作的好办法。几年以来，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做的，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且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企业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其他工业部门如水利电力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也正在开始学习石油部的经验。

对《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2]

（1963年12月21日）

一波同志：

报告已看过。请你考虑，可否印发到会同志研究，并加以讨论。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一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63年12月19日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说，根据你12月11日的批示，对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情况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真地抓了，确实抓起来了。石油工业部就是这样。另一类是抓了一些，但是抓得不够经常，不够系统，还没有找到一套适合于本部门情况的方法，因而成绩不大。石油工业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抓得比较好，就是由于他们能够结合石油工业的具体情况，成功地运用了解放军的成套的政治工作经验。他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把做好人的工作、使人革命化放在第一位，正确地处理人和人、人和物的关系，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过程中去，做到科学实验中去，做到日常生活中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促进生产的发展。为落实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的指示，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工业、交通各部，都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

验，用毛泽东思想、革命精神把全体职工重新武装起来。所有工业部门都要仿照解放军的办法，从部到企业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二）拟出一个工业、交通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三）从中央各个工业、交通部门所属的企业中，选拔优秀领导干部分别到政治学院或军队中去学习政治工作经验。（四）目前，先从军队抽调300名到500名熟悉政治工作的干部，到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和重要的企业担任政治工作。（五）中央工业、交通各部建立起政治工作系统以后，似有必要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管理工业、交通部门政治工作的机构。

[2] 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1963年12月20日为送审关于工业、交通部门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

1963年1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陈文成。

中央转发江苏关于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情况报告的指示和批语[1]

（1963年12月23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军委总政，中央各部委党组、党委：

（一）江苏省委十二月二十日的报告，请你们研究参考。

（二）请你们把这件事认真抓起来，争取在春耕以前，在农村、城市、军队、机关、学校（小学除外）普遍讲解一次，并且略作讨论，粗线条地解决一些问题。

（三）要随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缺点，给予指导。

（四）农村中分期分批进行点上的工作，同时进行，不要放松。

中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

刘、邓、朱、彭、震林[2]同志：

比较各地报来的情况和意见，以江苏此件[3]为较好，故予以转发。震林前拟指示不发，改发此件。

毛泽东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中共江苏省委报告，要求各地在春耕前普遍讲解一次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指示，这个指示以中发〔63〕848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党内印发。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写的批语。一和二均写在中共江苏省委1963年12月20日给中央、华东局并告各地、市、县委的报告上。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中共江苏省委1963年12月20日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下达后，我们除了立即组织县以上机关干部和1.7万名工作队队员学习这两个文件外，并部署各地先在县、市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读讲解，还要求地、市委的负责干部亲自深入一两个社队向群众试读讲解。目前，已有42个县、市的三级干部会议和23个面上或点上的先行公社，进行了这一工作。中央两个文件，一经与基层干部和各阶层群众见面，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映，澄清了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疑虑和猜测，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央这两个文件，称作是建设社

会主义的“好章程”，干部自我革命的“好镜子”。他们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认为，中央把文件发到大队、生产队，每一次都会发生巨大的威力。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决定“十二条”，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两年的生产搞得一年比一年好；这次贯彻这两个文件，一定会出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发展的局面。基层干部听了这两个文件的宣读讲解，提高了阶级觉悟，弄清了一些过去长期没有弄清的问题。广大贫下中农听了宣读讲解后，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中农听了宣讲后，情绪开始稳定，开始向贫下中农靠拢。地主、富农子女听了宣讲后，十分感动，普遍感到有了前途。地富反坏分子对于向他们宣讲中央两个文件，普遍感到意外，说这两个文件是“两好”政策——对四类分子好，对四类分子子女好，开始认识到只要劳动守法，自己有前途，子女也有前途。根据各地试读中央两个文件的实践，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宣讲中央两个文件，一般应先读《决定（草案）》，然后再读《规定（草案）》，弄清具体政策。二、在县、社三级干部会议上宣讲两个文件，可以大会宣读讲解，也可以分大组宣读讲解。三、在群众中宣读讲解，一般应先党员、积极分子，后一般社员，再四类分子。四、在宣读文件时，进行重点复述讲解，帮助干部、群众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这是必要的。但是，不能随意发挥，曲解文件的精神。五、要训练好宣读讲解的骨干。

给林克[1]的信

（1963年12月24日）

林克同志：

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他』在旧金山的一篇对华演说，另史蒂文森[2]在联合国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的两篇对华演说，以共〈上〉共三篇文章，请你找来给我为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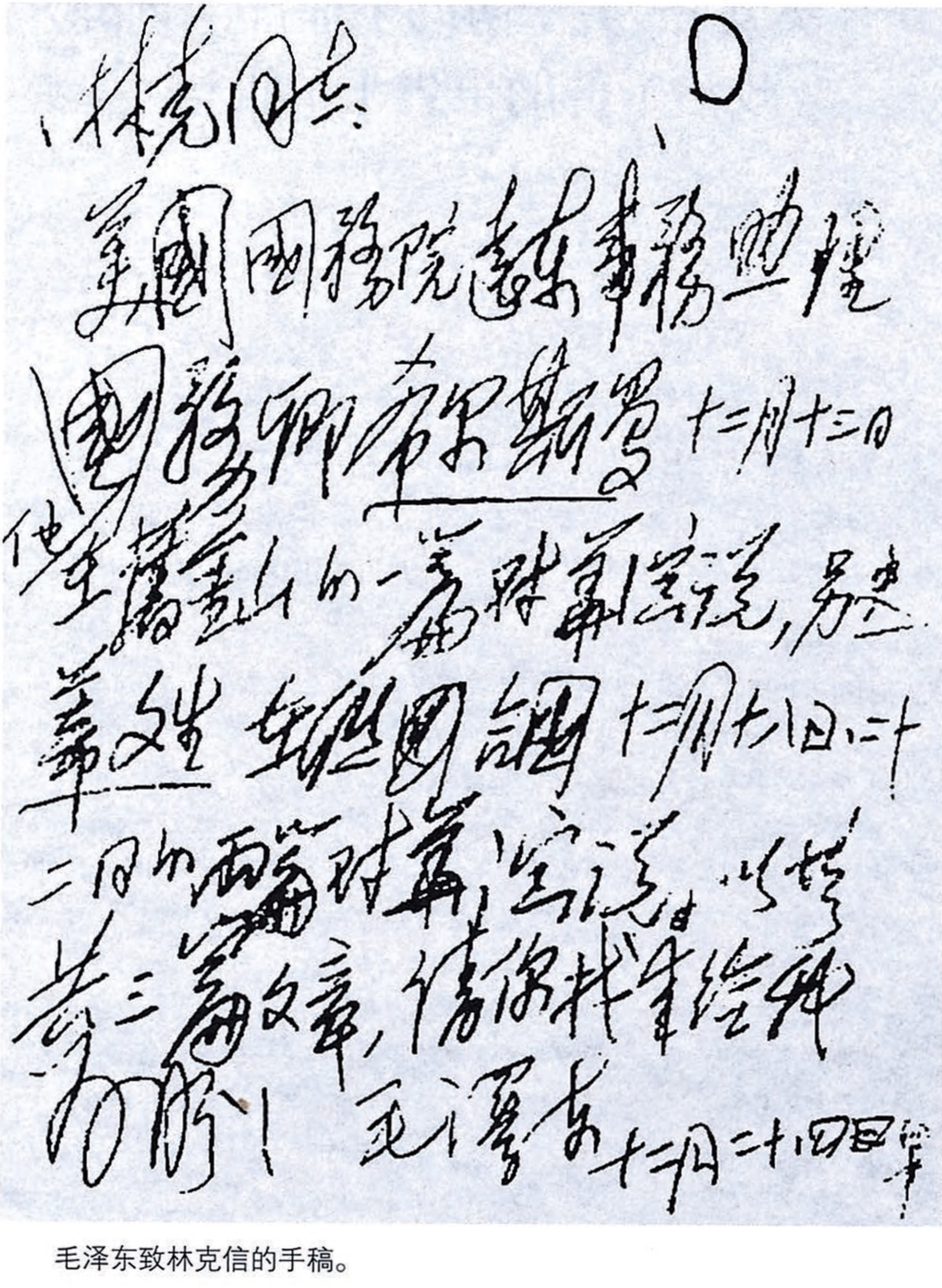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早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史蒂文森，当时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林克同志：

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十二月十三日他在旧金山的一篇对华演说，另史蒂文生在联合国十二月十六日、二十二日的两篇对华演说，以上共三篇文章，请你找来给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致林克信的手稿。

在莫文骅[1]关于协助工业部门训练政治干部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3年12月25日）

此件[2]中，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习惯称号（如林总）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林彪同志）。此事沿引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的作风。官长同士兵之间，上级同下级之间，造成了某些不

---

[1] 莫文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

[2] 指莫文骅1963年12月22日给肖华（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林彪（中央军委副主席）、罗瑞卿（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报告。报告说，“我们学习了《中央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毛主席12月14日给林副主席的信和毛主席12月16日给林总、贺总、聂总、罗总长、肖副主任的信”，院党委常委作了初步研究，大家一致表示要坚决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认真向兄弟单位学习，以适应国内外形势均已向好和大发展即将到来的新局面。毛主席指示政治学院要担负一部分协助工业系统训练政治干部的任务，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和有力的鞭策。我们一定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总政的嘱托。协助工业系统训练一部分政治干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地向地方干部学习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虚心学习他们的宝贵经验，学习他们的优良作风，进一步改进工作，提高教学质量。报告还提出了协助训练工业系统政治干部的初步设想，包括招生名额、学制、学习内容、时间安排等问题。

自然和某些隔阂。地方也是这种情形。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给胡志明[1]的复信和关于复信的批语

（1963 年 12 月 26 日、27 日）

一

请少奇、小平[2]再阅后，交尚昆[3]办。

毛

廿六日

二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几次来信，都已收到，甚为感谢。中苏谈判，几个月后可以开第二次会，目前几个月内还不宜开，因为没有什么新鲜的话好讲。在十一个党会议上共同商定政策以后，中苏就可以开会了。看来不止谈三四次，可能要谈十几次或几十次，谈几年到十几年，才能谈

---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2]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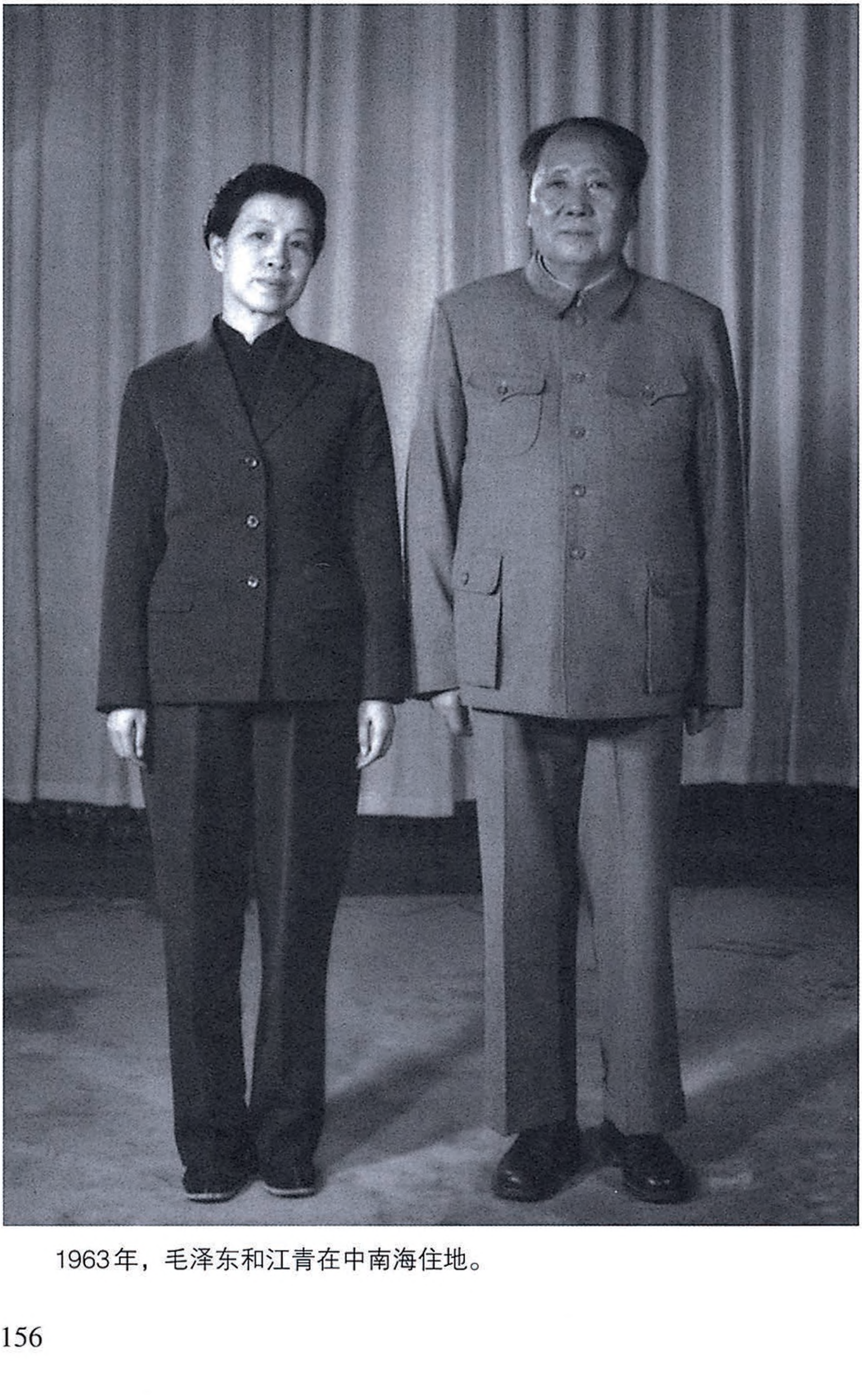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出个有利于革命有利于真正团结的结果来。对此我们是有耐心的。目前国际形势很好，料想你和你的战友们也感觉到了。听说你们的中央全会开得很好，谨致热烈的祝贺。新年将到，敬致贺忱。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和李敏、孔令华在中南海住地。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和李敏、孔令华、王海容、毛远志等在中南海住地。



1963年，毛泽东和江青在中南海住地。

1963年，毛泽东和毛岸青、邵华在一起。

对希尔斯曼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的批语

（1963年12月28日）

刘、邓[1]、外交部，外办的同志们：

这篇分析[2]很好。建议写一篇文章[3]公开发表，要认真研究亚洲情况，进行合理的批评。在半月内写好，多次研究、修改，采取攻势。同时将希尔斯曼的演说发表。半个月不行，一个月两个月也可。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八日

阅后退毛。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外交部1963年12月26日编印的《新情况》上登载的《美国对华政策新诠——对希尔斯曼12月13日演说的几点看法》一文。文章说，12月13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就美对华政策发表演说，这是约翰逊上台后美国官员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首次政策性文件，也是长期以来美官方关于对华政策的一篇全面阐述。文章对希尔斯曼的演说作了分析，并就其主要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介绍：（一）对华基本估计。

认为：1. 中国是“一个敌视西方、威胁邻国的激烈的敌对力量”，美国在远东面临的“最大最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2. 中国坚持革命路线，“已达到危险的程度”，但不会轻易冒险。3. 中国的政权和领导巩固，目前看不到会改变对外政策和对美政策。4. 从长远看，中国存在和平演变的可能。（二）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1. 美国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要中国不对“自由世界和邻国进行颠覆或发动侵略”。这就需要在中国周围建立一个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稳定远东。2. 要中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此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条件。3. 继续执行不承认中国和对中国大陆“禁运”政策，继续中美会谈，保持谈判接触。4. 长远的方针是“采取保持实力和坚定而又准备谈判的政策”，“最好地促使中国大陆发生一些变化”。（三）“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质。这篇演说虽然调子比较和缓，还提出了所谓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但它并不说明美国对华政策上有什么改变。希尔斯曼所说的“门户开放”是指我国改变政策而言，换言之，是以我国改变政策为前提的。（四）一些新的提法。1. 实际上带有批评口吻地承认美国过去对中国的估计和政策不现实，要求“冷静地估计一下”中国问题，呼吁“彼此谅解和尊敬”。2. 目前重点，更多着眼于稳定远东和亚洲局势，以在外围遏制中国为主。3. 肯定中国有和平演变的可能，鼓吹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长期政策。4. 肯定其“长期行之有效”的对苏政策，长远说来，对中国也适用。从以上几点看来，希尔斯曼的演说在保持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情况下，似也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某些灵活松动的做法留有余地。（五）背景和意义。这篇演说明显地为美国对华政策作了辩解和说明。据西方透露，这篇演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集中研究的结果。它是美国政府制定的当前对华政策的蓝图。看来这篇演说中所说明的对华政策很可能是两党取得一致、各主要集团所同意的，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似将保持有效，不会有多大变动。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的处境很不好过，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很大，不能不作出必要的澄清。

[3] 《人民日报》1964年2月19日发表了观察家文章《在死胡同中徘徊的美国对华政策》。

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的批语[1]

（1963年12月30日）

这个文件[2]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3]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63年12月30日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

[2] 指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15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3] 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五周年的电报

（1963年12月31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欣逢古巴解放五周年的光荣节日，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谨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五年来，屹立在社会主义阵营最前线的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坚强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入侵、颠覆破坏等一系列阴谋，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巨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支持了拉丁美洲、亚洲、非洲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古巴人民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胜利地推进着自己的革命，在西半球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对古巴人民这些辉煌成就至为钦佩。我们深信，英雄的古巴人民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

难险阻，获得新的更加巨大的胜利。

中古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支持被压迫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一向把古巴人民斗争的每一个胜利，看做是对自己的支持和鼓舞，并且把支持古巴人民坚持五项要求，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和发展革命的斗争，看成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英雄的古巴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而继续奋斗。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祝中古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63年，毛泽东在北京。

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1963年12月[1]）

记得当年草上飞，[2]
红军队里每相违[3]。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4]

---

[1] 1963年12月，这首诗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

[2] 记得当年草上飞，这句借用传唐黄巢《自题像》诗句。草上飞，指红军在战争中行动迅速。

[3] 每相违，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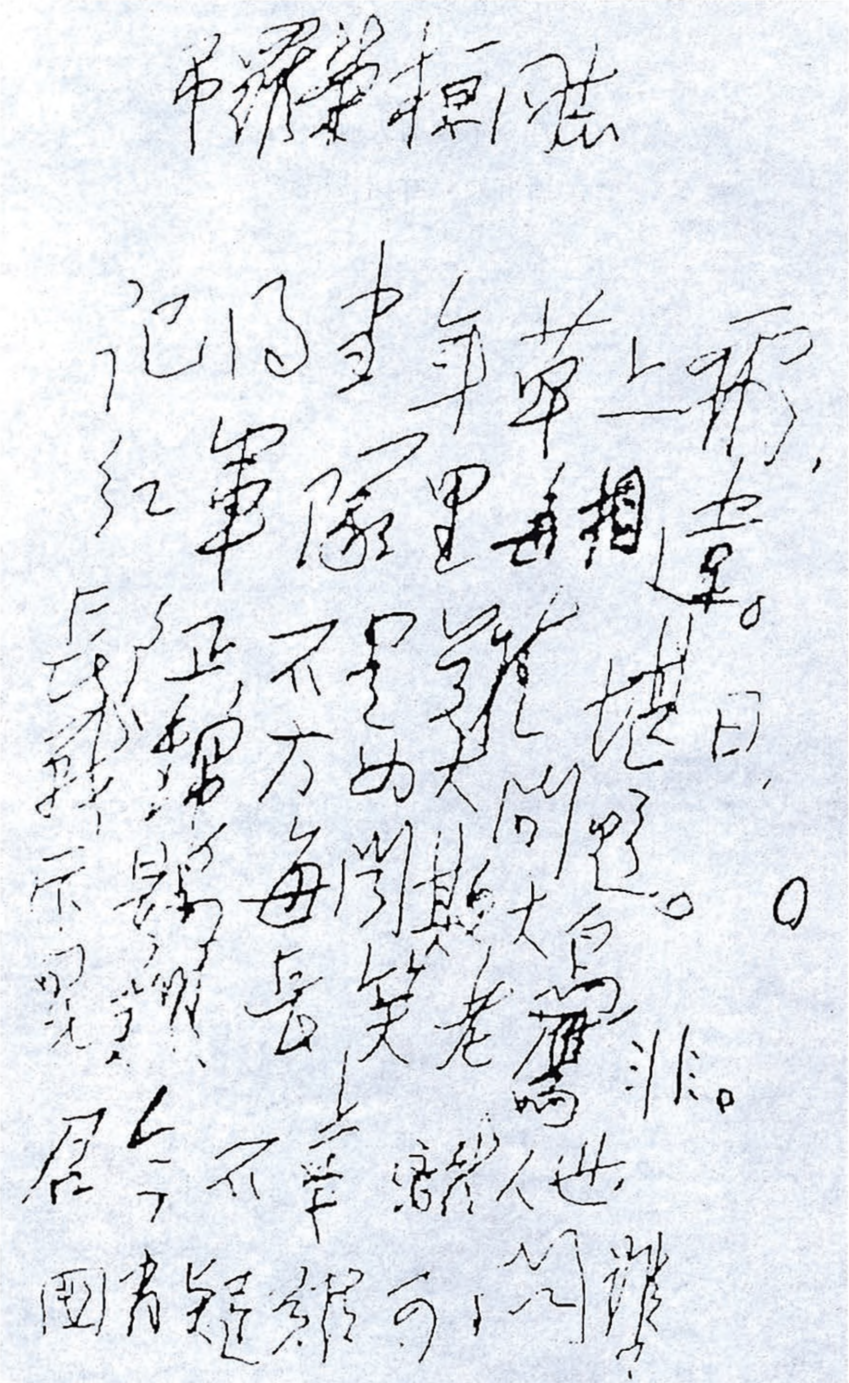
[4]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贵州、四川境内率领中央红军迂回作战，四渡赤水，出敌不意地威逼贵阳转入云南，胜利地渡过金沙江，从而摆脱追堵的几十万敌军。在迂回过程中，部队经常需要急行军。林彪曾在同年五月在四川南部会理城郊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夜写信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这样“走弓背路”要“拖垮军队”，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林的这个要求被政治局会议完全拒绝。这个问题的解决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战锦”是指1948年9月、10月间攻打锦州，即辽沈战役的第一个和关键性的大仗。毛泽东在9月7日为中央军委写的给林彪、罗荣桓等的电报早已详细说明攻打锦州的重大意义和同先打长春的利害得失的比较，但林彪仍然找出种种理由来一再反对。罗荣桓是主张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的，所以诗中特意提及。

斥鷃每闻欺大鸟，[1]
昆鸡长笑老鹰非。[2]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

[1] 斥鷃每闻欺大鸟，斥鷃，蓬间雀，在蓬蒿中飞起来不过几尺高。《庄子·逍遥游》说，斥鷃笑鹏鸟飞得太高，认为自己在蓬蒿中飞翔，也是飞得最好了。

[2] 昆鸡长笑老鹰非，昆鸡，古说即鹍鸡或鵾鸡，一种大鸡。《尔雅·释畜》：“鸡三尺为鵾。”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鹰和鸡》中说，鹰因为低飞而受到鸡的耻笑，认为鹰飞得跟鸡一样低；鹰答道：鹰有时比鸡还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



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泽东手书《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资料图片

罗荣桓同
周恩
挽
刘少奇敬挽

1963年12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高级将领，到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

论反对官僚主义

（1963年）

我们这些机关高高在上，官僚主义是容易犯的弊病，有了官僚主义，必然对上闹分裂主义。比如“跃进号”抓了才清楚的。下边也闹地方主义，根子都是官僚主义。前年下放权力那么多，文件是我起草的，造成了分散主义。有人说要反对，顶不住，问题还是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个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东西。党外部长和我们一道，也希望借助一下你们的归劝。

官僚主义，思想上是和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因此官僚主义也必然联系到这些主义。总之，要集中地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三月一日，中央“五反”指示中说：“官僚主义在抬头”。我看带有普遍性。

我归纳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

一、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作调查研究，因而脱离实际，脱离领导。不作政治思想工作，不抓具体政策，上脱离领导，下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然祸国殃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二、狂妄自大，骄傲自满，空谈政策，不抓业务，主观片面，

不听人言，蛮横专断，强迫命令，不顾实际，盲目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三、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但是做事不调查，对人不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这是无头无脑，迷失方向的官僚主义。

四、官气熏天，唯我独尊，不可亲近，望而生畏，对干部颐指气使，作风粗暴，动辄骂人。这是官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五、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六、不学政治，不钻业务，遇事推委，怕负责任，办事拖拉，长期不决，工作上讨价还价，政治上麻木不仁。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七、遇事敷衍，得过且过，与人为争，老于事故，上捧下拉，两面俱圆，八面玲珑。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八、政治学不成，业务钻不进，人云亦云，语气无味、尸位素餐，领导无方，滥竽充数。这是无能的官僚主义。

九、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十、送文件不看就批，批错了不承认，文件听别人读，别人读他睡着了，心中无数，不和人商量事情推来推去不负责，对下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误事的官僚主义。

十一、机构庞大，人事庞杂，层次重叠，浪费资产，人多事乱，遇事团团转，不务正业，人多事少，工作效率低。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十二、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会议多不传，报表多不用，往来多不谈。这叫“五多”的官僚主义。

十三、图享受，好伸手，走“后门”，怕艰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做官全家享福，内外不一请客送礼。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十四、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房子越来越大，陈设越来越好，生活要求越高，供应越多，分配东西越多，价钱越低。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十五、自私自利，假公济私，以私作公，监守自盗，知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十六、争名夺利，向党伸手，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同志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权夺利的官僚主义。

十七、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上下隔离，互相排挤，既不集中，又不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十八、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个人利益、派别利益高于一切，损大公肥小私。这是闹宗派的官僚主义。

十九、革命意志衰颓，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吃饭，摆官架子，好逸恶劳，游山玩水，既不用脑，又不动手，不关心国家和人民利益。这是蜕化的官僚主义。

二十、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压群众，包庇坏人，敌我不分，作奸犯科。这是助长歪风邪气的官僚主义。

总之，使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使党的路线政策受损失。不作为普通劳动者，不同群众同甘共苦，政治上空谈，不老实，不负责任，不能、无用，埋头于事务主义，搞特殊

化，自私自利，闹不团结，搞宗派，最后发展蜕化变质。

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

思想根源：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既有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也有封建的家长制。（红楼梦四大家族，农奴主四十人，官僚占三分之二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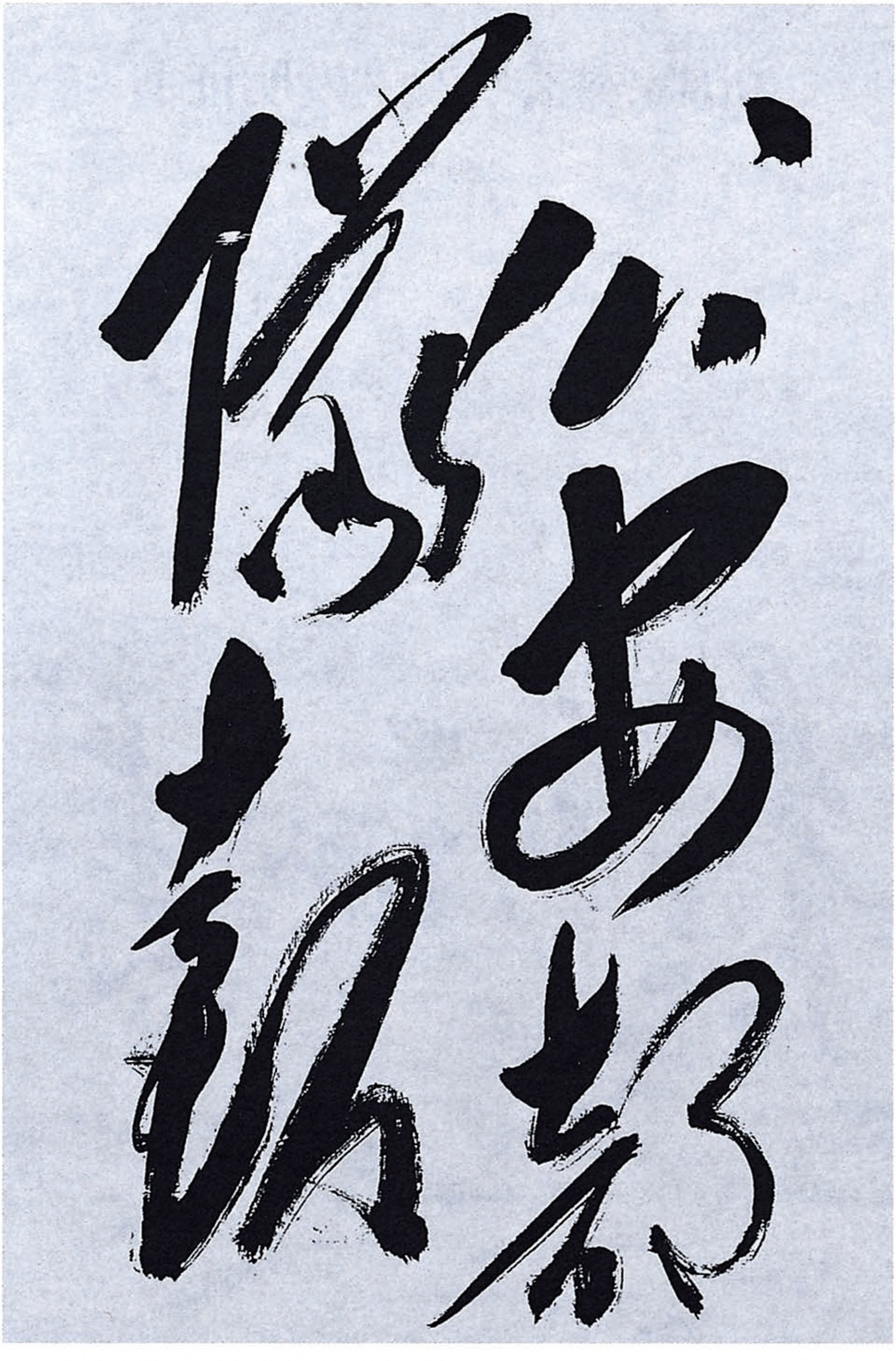
阶级社会根源：新的资产阶级，老的资产阶级，还有城乡封建势力。在国际上有资本主义包围，而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起来了。

历史根源：我们的革命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国家机器，但旧的统治势力，传统影响，旧人员包下来，政策是对的，但带来了副作用，一九五一年“三反”重点是反贪污，一九五七年重点是反右，去年主要是批判了分散主义，所以历年来没有把官僚主义当成重点来搞。现在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是肥沃的，也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土壤。

为《公安部队报》题写报头

（1963 年）

公安部队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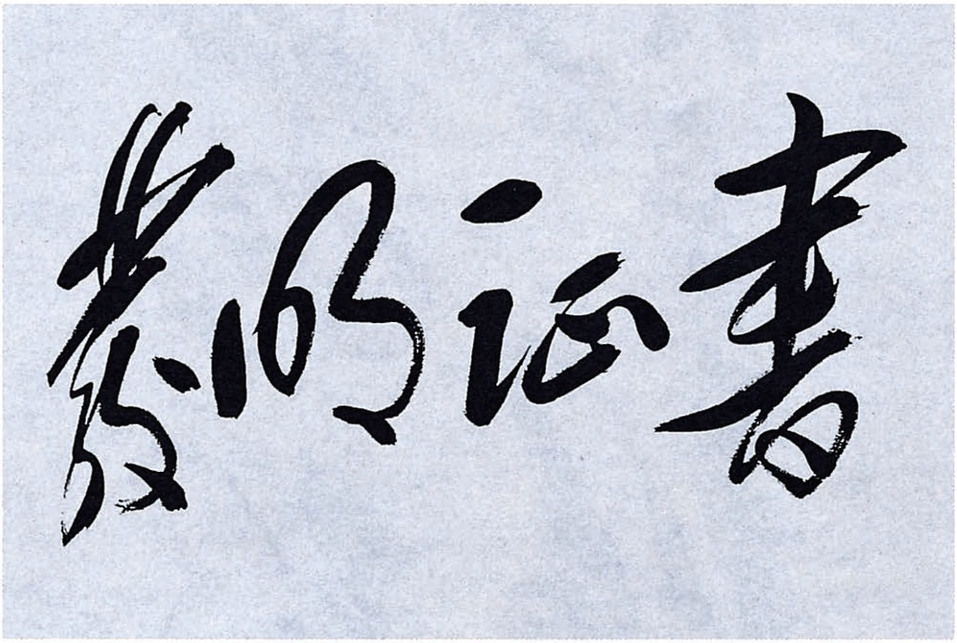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公安部队报》题写的报头。

为国家科委题写“发明证书”

（1963年）

发明证书



毛泽东为国家科委题写的“发明证书”。

1964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公安工作问题的两个批语[1]

（1964年1月1日、2月15日）

一

谢富治同志：

报告[2]已看过，很好。

---

[1] 本篇一写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63年12月30日为报送公安部党组1963年第三次综合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本篇二写在谢富治1964年2月12日为报送公安部党组关于在城市中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指示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

[2] 公安部党组1963年12月30日的报告说：自5月杭州会议提出要把地、富、反、坏分子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任务以后，我们先后派出10多个工作组，同各省、市、区公安厅局的领导干部下去蹲点，研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对敌斗争问题。半年多的实践证明，基本上实行“一个不杀，大部（95%以上）不捉”，依靠群众力量，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须的和可能的。城市中如何执行这一方针，企业、学校、机关内部和街道上怎样依靠群众清理专政对象，同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改造他们，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我们正在摸索。1964年，我们除继续抓紧打击现行破坏的斗争和治安管理工作外，应当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无论农村和城市都要依靠广大群众实行专政、加强对四类分子改造和预防犯罪的指示，并准备在2月中旬召开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若干同志是否下去若干县、社、厂矿调查一个短时间，为二月公安工作会议准备得更好一些。城市工矿也宜派几个工作组去。

毛泽东
一月一日

二

已阅。退谢〔富〕治同志。此件[1]很好，照办。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公安部党组1964年2月12日的报告在分析了厂矿企业内部敌我斗争的情况后提出，对于敌我斗争情况严重的单位，不充分发动群众，只靠专门机构进行政治清理，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为此，有些城市党委，运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结合“五反”运动，并在“五反”运动中专门划出一段时间，开展群众运动来处理敌我斗争问题，较好地完成了政治清理任务。这是依靠群众斗争，有效制服和改造敌人的好方法。对于企业内部新查出来的和原来留用的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斗争后，应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留在原单位，交给群众监督改造，不要清洗到社会上去。在企业内部进行政治清理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那些思想极端反动的分子，一般的可以通过领导谈话、小组会批评的方式，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同敌人坚决决裂。把他们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争取、挽救他们，不轻易将他们划为新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年内，俟城市党委腾出手之后，在全国所有城镇中，无例外地认真地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很必要的。

1964年1月1日，毛泽东观看豫剧现代戏《朝阳沟》后和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握手。

1964年1月1日，毛泽东、朱德和豫剧《朝阳沟》演员在一起。

在中南海元旦联欢会上的讲话

（1964年1月1日）

马列主义原来是外国的，和中国革命结合了，我们就创造性地发展了它，也就成为我们自己的了。

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信[1]

（1964年1月9日）

阿克拉

加纳共和国总统、人民大会党主席兼总书记克瓦米·恩克鲁玛阁下：

首先，我对于加纳人民的敌人又一次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暗害阁下的罪恶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对您平安脱脸〈险〉感到无限的高兴。请您接受我个人和中国人民的最亲切的慰问。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非洲各国的人民领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暗害阴谋活动表明：他们是不甘心于自己在非洲的失败的，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非洲各国人民的独立和进步的事业。事实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疯狂挣扎只会使非洲各国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坚定地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自己国家的繁荣进步而奋斗。

中国人民将永远支持加纳人民和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祝加纳共和国在阁下的领导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国

---

[1] 恩克鲁玛1964年1月2日下午离开总统办公厅时有人企图进行暗害，幸平安脱险。这封慰问信由正在加纳进行友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月11日拜会恩克鲁玛总统时转交。

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胜利前进。

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1]

（1964年1月12日）

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美帝国主义不仅对巴拿马人民犯了严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划扼杀社会主义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夺和压迫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镇压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在亚洲，美帝国主义霸占着中国的台湾，把朝鲜南部和越南南部变作它的殖民地，对日本实行控制和半军事占领，破坏老挝的和平、中立和独立，阴谋颠覆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进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决定把美国舰队派到印度洋，威胁东南亚各国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力图取代老殖民主义者的地位，掠夺和奴役非洲各国人民，破坏和扑灭民族解放

---

[1] 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记者发表的谈话。

运动。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

美帝国主义甚至对它在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国，也实行“弱肉强食”的政策，力图把它们踩在自己的脚下。

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1]、艾森豪威尔[2]、肯尼迪[3]到约翰逊[4]，是一脉相承的。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要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要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到处横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地位，使它自己越来越陷于孤立。美帝国主义手里的原子弹、氢弹，是吓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挡的。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

[1] 杜鲁门（1884—1972），美国民主党人，1945年至1952年任美国总统。

[2] 艾森豪威尔（1890—1969），1953年至1960年任美国总统。

[3] 肯尼迪（1917—1963），1961年至1963年任美国总统。

[4] 约翰逊（1908—1973），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1]

（1964年1月17日）

现在，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爱德乐：关于美国到底主要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这个问题，美国报刊自己是这样说的：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他们是这样说的，我看到过这样的话。但是，帝国主义者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因为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他们也看不起你们和其他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外国同志，认为你们不过是些知识分子，只会吵吵闹闹，在《北京周报》或广播电台工作而已。他们看不起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有利。

不过，他们也在注意我们，美国驻东京的记者罗德里克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的。

无论如何，苏联还是一个大工业国，是两大核强国之一。中国

---

[1] 这是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美籍专家柯弗兰、爱德乐和中国籍专家爱泼斯坦等谈话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除了有手榴弹，只是多了几个人。在赫鲁晓夫看来，多几个人，只不过是一堆肉。而且他还说，现在中国是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大家喝清水汤。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他那里裤子太少而清水汤太多的时候。他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讲这种话，是为了向人民说：看，我们国家多了不起，裤子不少，清水汤不多。

关于美国是否在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我们过去讲过，现在也还是那样看。可以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你们不信，自己张开十个手指去抓抓跳蚤试试!

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第一个“第三世界”中，有一个地方叫南越，美国就是没有办法把那里的人民压下去。而且这样的事以后还会不断地出现。

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据统计，从苏共二十大[1]以来，苏共

---

[1] 苏共二十大，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

主席团的老人已换得剩不了几个。这个现象说明那里不稳定。东欧也是这样，例如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都是不断换领导人。有些人是在激烈反华之后下台的，而下台之后就不反华了，例如于哥夫、西罗基[1]。为什么呢？他们反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所以被赶下台以后就不反了。这说明了两点：第一，有些人反对中国并不是真心的；第二，中国现在有了一个地位，能引起人家反对，刺激人家写文章和发表讲话来攻击。我们有了资格，有人要靠反华来保住自己的地位。

实际上，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2]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已经感到赫鲁晓夫不对头，但是从那时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我们是采取帮助他的态度，因为我们当时考虑苏联人民要换一个领袖是不容易的。

后来，在一九五八年发生了海军基地问题[3]。那年赫鲁晓夫来过北京一次。为什么来呢？苏联驻华大使同我们谈海军基地问题谈

---

[1] 于哥夫（1904—1991），1956年至1962年任保加利亚总理。西罗基（1902—1971），1953年至196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2] 指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

[3] 1958年6月28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翻了，赫鲁晓夫只好自己来收拾。我对他说，把中国的海岸线都给你好了。他说，那你做什么呢？我说，我上山去打游击。他说，打游击没有用。我说，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击怎么办？

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的中印边界事件[1]，赫鲁晓夫在访美前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在中印边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访美后，他又到北京来了。这次他谈到台湾问题，要我们用苏联过去对远东共和国[2]的办法来对待台湾。我对他说，远东共和国是你们建立的，蒋介石集团可不是我们搞起来的。另外，他还要我们放那时关在监狱里的四五个美国犯人。两个问题都没谈成，他说：“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对我说过，你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从苏共二十大到去年七月，我们比较被动。现在我们转入了反攻，有大闹天宫的势头，打破了他们的清规戒律。他们的那些清规

---

[1] 1959年8月，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西藏的朗久而发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印边界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此后，印度军队先后在中印边界西段和东段越过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不断挑起边界事端，并进而发展为在中国境内建立军事据点。中国政府多次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建议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均遭拒绝。1962年10月，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武装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实行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入侵。为了进一步谋求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发表声明，宣布从次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政府还主动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人员，交还战斗中缴获的武器。

[2] 远东共和国，又称赤塔共和国，是1920年苏俄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建立的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当时，苏俄在西伯利亚已经控制贝加尔湖以西的地区，而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则被日本干涉军占领。列宁下令成立赤塔共和国，以它作为苏俄控制区和日军占领地之间的缓冲地带。1922年10月，日军被迫撤出西伯利亚。同年11月，赤塔共和国并入苏俄。

戒律，可不能完全服从！

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可是他们偏偏怕我们的“空话”。口里说我们讲的是空话，实际上是把它当成瘟疫，封锁得那么厉害，甚至把过去用来干扰美国之音的电台也用来干扰我们的广播。

现在他们要求停止公开争论，紧张得很。我去年三月间对苏联大使说，你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专讲空话、假革命、民族主义，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你们当然应该批评，就放手批评好了。他说这样下去不得了。我说，打打笔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天不会塌下来；第二，山上草木照样长；第三，女人照样生孩子；第四，河里的鱼照样游，不信，你到河边去看看。他们最近的来信还引了我这一段话。

停止争论不是一方说了就算，而必须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协议。双方不止是两个党，而是几十个国家的党。因此，争论很难停下来。

1964年1月18日，毛泽东会见李敦白、爱泼斯坦、斯特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1]

（1964年1月27日）

日本人民在一月二十六日举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最近，日本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美国F—105D型核飞机和核潜艇进驻日本，要求撤除一切美国军事基地和撤走美国武装部队，要求归还日本的领土冲绳[2]，要求废除日美“安全条约”[3]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日本全体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中国人民衷心地支持日本人民的正义斗争。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园寺公一和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赤旗报》驻北京记者高野好久的谈话。

[2] 冲绳，即冲绳岛，是日本领土琉球群岛的主要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5年6月为美国军队攻占。1951年，根据旧金山对日和约的规定，日本当局同意把冲绳交给美国托管。此后，日本人民为使冲绳归还日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972年5月15日，根据美、日两国政府协议，美国将冲绳的行政管理权归还日本。

[3] 日美“安全条约”，即《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

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日两国人民要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要联合起来，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一切爱好和平国家要联合起来，一切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人士要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挫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保卫世界和平。

美帝国主义从日本滚出去，从西太平洋滚出去，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和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和大洋洲滚出去，从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及地方滚出去！

对《毛主席诗词》若干词句的解释[1]

（1964年1月27日）

一、“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2]

这句是指：在北伐以前，军阀统治，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二、“到中流击水”[2]。

“击水”指在湘江中游泳。当时我写的诗有两句还记得：“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那时有个因是子（蒋维乔），提倡一种静坐法。

三、“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3]

“旌旗”和“鼓角”都是指我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

四、“一枕黄梁再现”[4]。

指军阀的黄粱梦。

---

[1]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组织翻译出版英译本。1964年1月，毛泽东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作了口头解释。这是英译者对毛泽东的解释所作记录的要点。

[2] 参见《沁园春·长沙》。

[3] 参见《西江月·井冈山》。

[4] 参见《清平乐·蒋桂战争》。

五、“国际悲歌歌一曲”[1]。

“悲”是悲壮之意。

六、“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2]

“枯木朽株”，不是指敌方，是指自己这边，草木也可帮我们忙。“枪林逼”也是指自己这边。“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是倒装笔法，就是：“飞将军自重霄入，枪林逼。”

七、“莫道君行早”[3]。

“君行早”的“君”，指我自己，不是复数，要照单数译。会昌有高山，天不亮我就去爬山。

八、“离天三尺三”[4]。

这是湖南常德的民谣。

九、“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5]

这首词上下两阕不是分写两次攻打娄山关，而是写一次。这里北有大巴山，长江、乌江之间也有山脉挡风，所以一二月也不太冷。“雁叫”“霜晨”，是写当时景象。云贵地区就是这样，昆明更是四季如春。遵义会议后，红军北上，准备过长江，但是遇到强大阻力。为了甩开敌军，出敌不意，杀回马枪，红军又回头走，决心回遵义，结果第二次打下了娄山关，重占遵义。过娄山关时，太阳还没有落山。

---

[1] 参见《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2] 参见《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3] 参见《清平乐·会昌》。

[4] 参见《十六字令三首》。

[5] 参见《忆秦娥·娄山关》。

十、“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1]

把山比作“细浪”“泥丸”，是“等闲”之意。

十一、“天若有情天亦老”[2]。

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

十二、“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3]

是指渔船不见。

十三、“泪飞顿作倾盆雨”[4]。

是指高兴得掉泪。

十四、“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5]

人坐在地球这颗行星上，不要买票，在宇宙里旅行。地球自转的里数，就是人旅行的里数。地球直径为一万二千七百多公里，乘以圆周率，即赤道长，约四万公里，再折合成华里，约八万里。人在二十四小时内走了八万里。

十五、“牛郎欲问瘟神事”[5]。

牛郎织女是晋朝人的传说。

十六、“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5]

“红雨”指桃花。写这句是为下句创造条件。“青山着意化为

---

[1] 参见《七律·长征》。

[2] 参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3] 参见《浪淘沙·北戴河》。

[4] 参见《蝶恋花·答李淑一》。

[5] 参见《七律二首·送瘟神》。

桥”，指青山穿洞成为桥。这两句诗有水有桥。

十七、“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黑手高悬霸主鞭。”[1]

“咒逝川”“三十二年前”，指大革命失败，反动派镇压了革命。这里的“霸主”，就是指蒋介石。

十八、“冷眼向洋看世界”[2]。

“冷眼向洋”就是“横眉冷对”。

十九、“云横九派浮黄鹤”[2]。

“黄鹤”不是指黄鹤楼。“九派”指这一带的河流，是长江的支流。明朝李攀龙有一首送朋友的诗《怀明卿》：“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憔悴侍臣颜。”李攀龙是“后七子”之一。明朝也有好诗，但《明诗综》不好，《明诗别裁》好。

二十、“浪下三吴起白烟”[2]。

“白烟”为水。

二十一、“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2]

陶渊明设想了一个名为桃花源的理想世界，没有租税，没有压迫。

二十二、《七律·答友人》的“友人”指谁？

“友人”指周世钊。

二十三、“九嶷山上白云飞”[3]。

“九嶷山”，即苍梧山，在湖南省南部。

---

[1] 参见《七律·到韶山》。

[2] 参见《七律·登庐山》。

[3] 参见《七律·答友人》。

二十四、“红霞万朵百重衣”[1]。

“红霞”，指帝子衣服。

二十五、“洞庭波涌连天雪”[1]。

“洞庭波”，取自《楚辞》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叶下”。

二十六、“长岛人歌动地诗”[1]。

“长岛”即水陆洲，也叫橘子洲，长沙因此得名，就像汉口因在汉水之口而得名一样。

二十七、“芙蓉国里尽朝晖”[1]。

“芙蓉国”，指湖南，见谭用之诗“秋风万里芙蓉国”。“芙蓉”是指木芙蓉，不是水芙蓉，水芙蓉是荷花。谭诗可查《全唐诗》。

二十八、“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2]

是云从容，不是松从容。

二十九、“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3]

郭沫若原诗针对唐僧。应针对白骨精。唐僧是不觉悟的人，被欺骗了。我的和诗是驳郭老的。

三十、“蚂蚁缘槐夸大国”[4]。

“大槐安国”是汤显祖《南柯记》里的故事。

三十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4]

“飞鸣镝”指我们的进攻。“正西风落叶下长安”，虫子怕秋冬。形势变得很快，那时是“百丈冰”，而现在正是“四海翻腾云水怒，

---

[1] 参见《七律·答友人》。

[2] 参见《七律·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3] 参见《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4] 参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五洲震荡风雷激”了。从去年起，我们进攻，九月开始写文章，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三十二、“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

你要慢，我就要快，反其道而行之。你想活一万年？没有那么长。我要马上见高低，争个明白，不容许搪塞。但其实时间在我们这边，“只争朝夕”，我们也没有那么急。

---

[1] 参见《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对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修改[1]

（1964年1月28日）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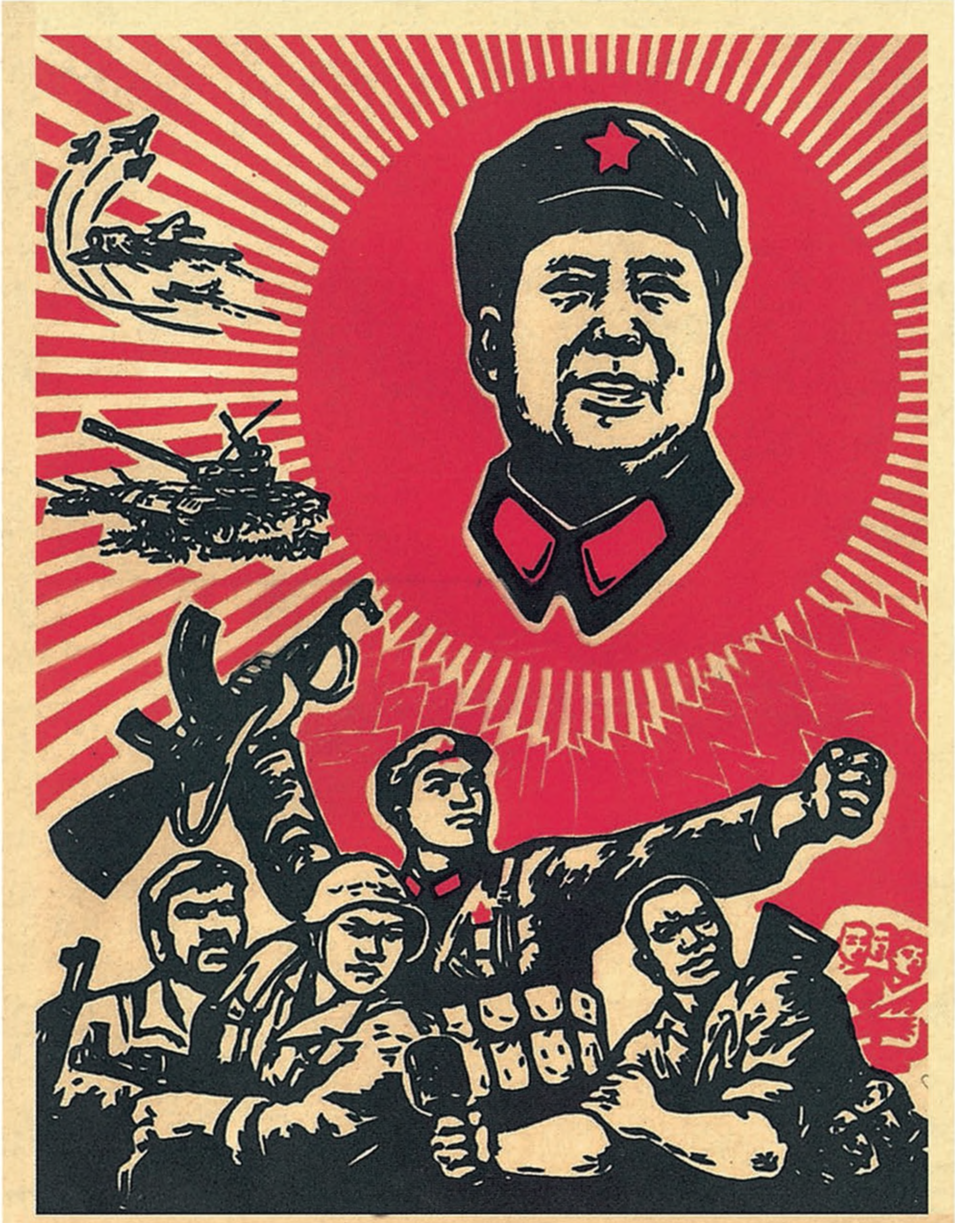
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也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和“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物。

二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

[1] 本篇一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1964年1月28日审阅七评苏共中央公开信（1月28日稿）时加写的。本篇二加写在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月28日稿）以下一段话之前：“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正在促使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各国的革命者和各国革命人民动脑筋，想问题，促使他们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地思索本国革命问题和世界革命问题。经过这场大论战，人们终将能够明辨是非，区别真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假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必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为题，在1964年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4年第二、第三期合刊上发表。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宣传画）

关于注意我内部是否有苏联和蒋帮布置的人的批语

（1964年1月28日）

肖华、徐子荣[1]同志：

此件[2]值得注意。我国军队、公安部队、机关中和社会上是否有被苏修布置的人，请你们研究一下。至于蒋匪帮是否有其布置的人，则更值得注意。谢富治[3]同志如未外出，此件应请他看一下。

毛泽东

一月廿八日

阅后退毛。

---

[1] 肖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1964年1月27日印发的《阿破获一叛国案简况》。简况中说：阿尔巴尼亚1963年8月侦破了一起叛国案，成员有一教授，国防部一中校、一大尉，一演员以及工程师、技术人员等共8人。据悉，该叛国集团的任务是为苏联提供情报，暗杀领袖。

[3]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

接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和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1964年1月2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代表团有几个人？

本·阿卜杜拉（以下简称阿）：十二个人。

毛：来了多少时间？哪一天到北京来的？

阿：一月十七日到北京的，十三日就离开阿尔及利亚了。

毛：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参观？

阿：还要到上海去两天，杭州两天，广州两天，然后回国。

毛：到广州从南路回去吗？

阿：是的。

毛：你们是从南路来的，还是从北路来的？

阿：从南路来的，经过开罗、仰光和昆明。很希望在中国多呆几天，因为国内有工作，已经延长了几天，现在不得不回去了。

毛：你们胜利了，我们很高兴。你们的胜利是个典型，大胜利，是少数战胜了多数，法国几十万军队被打败了。为什么少数能变成多数呢？原因就是你们有群众，人民群众能够战胜帝国主义。

阿：我们胜利还不久。

毛：阿尔及利亚现在是有一千二百万人口吗？有人也说是一千万。

阿：一千二百万。不过阿尔及利亚从来没有进行过人口调查。过去法殖民统治者把阿尔及利亚人民当狗看待，多一二百万、少一二百万，对他们说算不了什么。

毛：过去你们临时政府告诉我，阿尔及利亚有一千万人口，包括一百万法国人。那么本国人只有九百万，战争上又牺牲了一百多万，只有八百万不到一点。人民一定会胜利。人口在打过仗之后也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说这话的。

我们党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五十七个党员，在一九二一年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十二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人，那十个人或者牺牲了，或者叛变了，可是革命力量发展了，越来越大了。我们的革命一共花了二十几年才胜利，从一九二七年打仗打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由五万党员降到几千党员。那时我们没有经验，蒋介石叛变革命，同我们打了十年国内战争。大革命失败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右倾。然后在战争中党壮大了，军队壮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有了三十万党员，三十万军队，根据地的人口也有几千万。这时又产生了“左”倾，他们要打大城市，社会政策不对，只要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不对，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分开，提出的一切政策也就不对，结果又失败了，被迫举行了万里长征。万里长征不是我们愿意干的，这是政策失败了，没办法，从南方跑到北方。这一来三十万军队剩下不到三万，被搞掉百分之九十以上，三十万党员只剩下几万，所有大城市的组织差不多都完了，又是一个大失败。可是这两次失败，一九二七年右倾失败，及以后的“左”倾失败，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阿：主席所讲的这点，在我们来中国以前就认识了，失败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另一面，可以从失败中得到经验，所以也可以说失败是成功的基础。

毛：我们就是这么看。没有这两次失败，中国革命不能胜利，不能总结经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使我们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

第一次失败，是没有看到朋友变成敌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第二次失败，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全看成敌人。这两次党内关系也不正常。我们就总结经验，所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政策就比较正确了。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由两万五千军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根据地的人口由十几万发展到一亿多。胜利时日本人跑了，美国人又来了。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一切大城市和铁路、矿山资源都在他手里。国民党向全国解放区发动进攻，占领我们很多城镇和乡村，我们把延安都失掉了，许多外国朋友也认为我们不行了。延安是个小城市，这个小城市只有几千人口，是山区，我们拿它做根据地，后来这个根据地也失掉了，很多人都认为共产党没有希望了。后来我们采取正确的退却政策，退却一年的样子，退却过程中消灭了国民党八个旅，一直到一年以后，我们才可以举行反击。解放战争一共用了三年半时间，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现在蒋介石还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我们还被叫“土匪”。（全场大笑）法国人昨天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们胜利之后，法国人才承认你们，那也好嘛！有些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意大利、比利时、西德、日本，主要是美国，他们的政策是孤立我们，那时我们与你们一样。你们在没有同法国签订埃维昂协定之前，你们的情况也不那么好，好像很孤立的样子，其实你们并

不孤立，有什么孤立的？突尼斯的关系与你们搞得不好，不久前摩洛哥的关系也搞得不好，我看没有什么要紧，同情你们的人很多很多，中国人民同情你们，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人民都是同情你们的。你们在欧洲也有朋友，法国人中也有你们的朋友。

法国政府过去不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上的事情是会起变化的。当法国人跑了的时候，你们多困难，没有粮食，没有教员，没有医生，没有药品，工厂开工资金不足，现在你们也还在困难阶段，没有工程师，没有技术员；要有地质工作人员，要勘探石油，要勘探各种矿产，但是要有个过程才能建立这样的地质工作队伍。总之，你们是会搞起来的，由没有到有，由少到多，由不会、不懂，到学会、到懂，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讲这个话的。比如军队，我们没有，现在有了，你们也没有军队，现在也有了。又如打仗，谁会？我就不会打仗，还不是学会的。军队的事，打仗的事，能由没有到有，由不会到会，为什么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就不能搞起来？困难可以克服，不会的人可以学会，没有的东西是可以有的，不要那么多迷信，要破除迷信，只要肯干，我是不大信迷信的，过去也有过迷信。很多是敌人教会了我们的，必须团结国内人民，只要依靠人民就有出路。

脱离群众是不行的，是不是这样？过去的一些领导人，你们不要了，我们有一个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才清楚，就是他们脱离了群众。是这样吗，不知对不对？

阿：主席的分析很正确。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于一九六二年二月在的黎波里举行了会议，在会议上起草和通过了一个纲领。那时

出现了一个多数和少数，多数中不包括过去临时政府的某些领导成员及其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对中国朋友们来说，这没有什么秘密，世界报也谈到过。那就是少数人不愿意服从多数，不愿意接受多数人的观点，可以明确指出，当时出现的多数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广大人民的意志。后又经过选举产生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任命了现政府。

毛：革命中总有一部分人，他们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但再进一步他们就不干了。我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他们干，反对封建主义的时候他们干，他们自认为共产党员，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一到搞社会主义他们就不干了，他们就反动了，有这么一部分人。哪一个党内都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在革命转变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过去多数是进步的，少数是落后，如果政权掌握在落后分子手里，那就危险了。你们现在正要建立一个党，不久开党的代表大会？

阿：在这个问题上，阿卜杜拉希德·日拉伯兄弟是我们党中央领导成员，他可以谈一谈。

阿卜杜拉希德（以下简称德）：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决定举行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刚才本·阿卜杜拉兄弟谈到一九六二年的黎波里会议，那是在战争中阿尔及利亚内部分歧斗争的表现。当时说的分歧是斗争方法上的分歧，是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斗争。在一九六二年的黎波里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大会上出现分歧意见，领导方面存在的真正矛盾表现出来了，方法上的分歧不是实质，实质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在的黎波里会议上的潮流，是进步的潮流，是向前进的潮流。但能否说的黎波里会议之后什么矛盾都解决了呢？不能这么说，由于我们斗争的需要，在经济建设时期又

出现了新的矛盾，因为我们的斗争是继续发展的，需要革命的纲领，革命的领导集团，使我们不断前进。

我们这样的思想意识是在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斗争中不断建立起来的，将来还要向前进步，要建设社会主义，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必须是明确的选择，我们正在准备报告，将来在党代表会上提出。

毛：什么时候开？

德：日期还没有定。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特别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武装斗争的经验和独立后在本·贝拉兄弟领导下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准备在大会上总结一九五四年以来的革命经验，这些总结是重要的，将使我们了解过去的经验是什么，这样也能使我们明确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意识中，今后选择哪一方面。这个大会将为我们奠定不可动摇的社会主义基础。这是独立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是历史性的会议，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历史转折点的会议，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

毛：你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吗？

德：是一起来的，分开接待。

毛：只一个人吗？

德：一个人。本·阿卜杜拉兄弟领导的法律代表团是来中国学习法律方面的经验的。我是中共中央接待，负责另一方面的工作，学习另一方面的经验。

毛：不能学习，我们也是在摸索过程中，有很多错误和缺点，要全面分析再接受，不要认为中国什么都是好的，中国也有不好的一面。有进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工作中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我们这几十年就是这么过来的，经常犯错误，改正错误，不隐瞒错误。你们（指陪见人）不要隐瞒错误，只介绍正确的

东西，不介绍走弯路和错误的方面。中国农业很落后，工业现在与先进国家比还差得远，在我们的社会上和党内，干部也有变化，有的变成了贪污分子，实际上是资本家，我们的政策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惜时间不够，不能细致地介绍我们的政策。像你们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我们应该把一切经验毫无保留地介绍给你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人的政策，我们也犯过错误。你们看见过我们的监狱没有？

阿：我们看过北京监狱。

毛：我们的监狱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指陪见人）北京监狱是那个办得好的吧？办得不好的不让你们看。（向陪见人）要让他们看一个办得坏的。就是应该这样介绍，有好的，也有坏的。人民公社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得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使办得不好的办得好起来。军队里也可以看看。军队是专政工具的主要工具，你们是搞法律工作的，不看军队不好，你们国家如果没有军队，你们的法律工作还能搞吗？没有军队的保卫，你们就不能生存。还要看看警察和公安部队。（向陪见人）与军委和公安部联系一下，让他们看看军队、警察、公安部队以及民兵的情况。你们大家都是搞法律工作的，专门在法律条文上做文章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光靠监狱解决不了问题，要靠人民群众来监视少数坏人，主要不是靠法院判决和监狱关人，要靠人民群众中多数监视、教育、训练、改造少数坏人。监狱里关很多人不好，主要劳动力坐牢就不能生产了。今天我们讲不完了，没有时间，只能介绍些要点。你们还过几天走？

阿：我们在北京只有二十四小时了。

毛：有些问题可以到上海去解决。可以告诉他们，说是我讲

的，既要介绍正确的方面，也要介绍错误的方面；既要介绍好的方面，也要介绍坏的方面。这样才是好的方法。

阿：从现在起我们就采取这种方法。

毛：（对陪见人）给各地要讲清这个问题。

阿：我也应该表示，在这里介绍的情况没有什么隐瞒，他们向我们介绍了胜利的经验，也讲了失败的原因。

毛：好嘛，应该这么做。我讲我们过去的历史，就讲了我们是怎么犯错误这一点，错误对我们很有益处，教育了我们。从成功的方面学得经验，也从失败的方面学得经验。我看你们总结你们的历史也会是这样的，总有代表比较正确的一面。回去后告诉你们的本·贝拉总统和其他朋友们，你们真的搞社会主义，我很高兴，那我们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斗争的同志，而且是搞社会主义的同志。搞社会主义要团结大多数人，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人，团结一切干社会主义的人。

阿：我代表阿尔及利亚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全体成员向主席表示感谢，感谢给予我们的荣誉和骄傲。代表团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向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亲切的祝愿。现在请允许我们把这把刀送给主席，这是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胜利的象征。

毛：很有意义的礼物，这东西是对付敌人的。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1]

（1964年1月30日）

欢迎你们。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就是说，不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讲得很粗。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你们国家的本钱比我们的大，你们的原子弹都已经制造出来了，可能已经成批地生产了吧？我不反对你们生产原子弹。大批大批的原子弹在美国、在苏联，它们经常拿在手上晃着吓唬人。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希望你们把什么禁运战略物资也反掉。现在卖给我们的只是些民用物资，战略物资还不卖，美国不让卖。我说，总有一天会突破这个缺口。如石油，因为是战略物资，现在还不许你们拿此做生意。粮食，生意我们已经做成了，因为它不是战略物资。英国卖给我们一些飞机，你们也可以做这生意。有些普通军火为什么不可以做点生意呢？

美国吓唬一些国家，不让它们跟我们做生意。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我们不信

---

[1] 这是毛泽东和法国议员代表团的谈话。

它们那一套，我不迷信。也许你们是有神论者，我是无神论者，啥也不怕。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法国是小国，中国是小国，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难道一切事都要照它们的办，要到它们那里“朝圣”？从前我们也照办过，那是在斯大林的时候。一九五七年，我还去过一次莫斯科。那时，苏联还不是公开反对我们。现在不去了，因为它撕毁了大批合同，不讲信用，公开反对我们，同美国配合起来搞。这很好，我很赞同。美国、苏联这些大国来反对我们，总有个什么道理，我们也一定有一点东西值得它们反。现在，西哈努克[1]不吃美国这一套了。柬埔寨这个国家只有五百多万人，但敢于跟美国斗争。

你们可以在亚洲和我们合作，同美国顶一顶。美国到处不得人心。本月二十六日，日本一百多万人示威游行反美。我曾经同你们前总理富尔先生谈过，希望你们把欧洲的工作做好，例如，使英国、西德、比利时、意大利等等国家同美国隔开一些，同你们靠拢一些。你们不是说要建立“第三世界”吗？“第三世界”只有一个法国，那不行，太少了，要把整个欧洲团结起来。英国，我看总有一天要起变化。美国人对英国人也不那么客气。在东方，你们可以做日本的工作。如果把英国拉过来，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和日本，就可以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

你们不要学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英国同我们只有一个分歧，就是它对台湾的地位不肯定。第一，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台湾，这是好的；第二，英国现在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这也是好的；第三，英国同美国都搞“两个中国”，这点上表明

---

[1] 西哈努克，即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生，当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

它是美国的代理人。我们同英国已有十来年的外交关系，它也像你们那样，要我们派个大使去，它派个大使来。我们说不行，再搞十五年，甚至几十年也可以，我们不派大使去。联合国进不了，那也不要紧。十五年没有进联合国，我们也活下来了，再让蒋介石“大元帅”在联合国呆上十五年、三十年、一百年，我们照样活下去。要我们承认“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个半中国”，那都不行。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进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事先讲个清楚。我见富尔先生时，也同他讲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外交部发表过声明，也在瑞士和你们打过招呼，取得了协议。你们同国内有什么密码通讯吗？在外国跑，没有个密码通讯可不方便。

你们要同英国区别开来，要痛痛快快地把话讲个清楚。我是个军人，打过二十二年仗，戴高乐[1]将军也是个军人，讲话不要弯弯曲曲，不要搞外交手腕。

法国已经不是希特勒[2]的法国，我们中国也不是日本的中国了。过去，从北京到南京，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强占。日本人被赶走后，美国人又来了，我们把美国人、蒋介石都赶走了。那时，我

---

[1]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武装占领。

[2] 希特勒（1889—1945），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1933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积极扩军备战。1939年9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大举进攻苏联。1945年4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们啥东西也没有，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坦克，更没有原子弹。我们就是有些步枪、手榴弹、轻炮。感谢美国人给我们运来一批重炮，当运输大队长的是蒋介石。我们没有兵工厂，也没有任何外国援助。你们没有到我们那个小地方——延安去过吗？那里很落后，只有农业，一点点手工业。那时，我们说美国和蒋介石是纸老虎。我们也说，希特勒是纸老虎，他最后倒了嘛，死了嘛。现在我们说有两个大纸老虎，就是美国和苏联。我说得灵不灵将来瞧。请你们记住，我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说过，它们是大纸老虎，但是不包括广大的苏联人民、广大的苏联党员和干部，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美国人民有一部分人受了欺骗，总有一天他们要同我们友好的。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当年希特勒占领了几乎整个欧洲，多大的势力！这你们都经历过。

什么全面、彻底裁军，你们相信不相信？没有那回事，现在是全面彻底扩军。减少一些步兵是可能的，把省下来的钱用来制造原子弹。你们法国已经能爆炸原子弹了。我们比你们落后了一步，现在原子弹还没有爆炸，但是总有一天要爆炸的。

还有一条我们跟你们是共同的，什么三国条约[1]，我们不参加。那是一种欺骗、讹诈，是压我们的，只许它们有，不许我们有。事先我们两国并没有交换过意见，你们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参加。

有些亚洲国家的人，反对你们到亚洲来支持西哈努克；对南越，只许美国占领它，不让你们来帮助。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东京说，戴高乐将军想拿着橄榄枝打进亚洲，但是没有打进来。美国一

---

[1] 指1963年8月5日美、苏、英三个发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手拿橄揽枝，一手拿剑，在越南南方打了几年，越打人民的斗争就越发展。它的剑在那里杀死了两个人，一个叫吴庭艳[1]，一个叫吴庭儒，做法很恶劣。我看你们也不高兴吧？做这样的事干什么！现在扶植起来的所谓新政府照样不行，美国的政策太错了。我们中国四川省有一句俗话，叫做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捉不到。

我们双方还可以对日本做工作。日本总有一天要把美国赶跑的。我说的不光是指日本共产党，还指日本的大资本家，现在日本有些大资本家对美国很不舒服。英国问题麻烦一点，哪一天它不当美国的代理人就好了。

我们不反对你们同美国好，对你们来说，也是又团结又斗争。我们同美国在台湾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恢复外交关系。即使恢复了外交关系，美国如果还像今天这样到处干涉、控制，我们还是要反对。我们要求美帝国主义从亚洲滚出去，从非洲滚出去，从拉丁美洲滚出去，从欧洲滚出去。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人去干什么？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2]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

---

[1] 吴庭艳（1901—1963），原“越南共和国”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1963年11月1日在美国策划的军事政变中，同其弟吴庭儒一起被击毙。

[2] 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联邦德国于1955年，西班牙于1982年，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于1999年，正式加入该组织。

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会见法国议员弗朗哥·贝纳尔等客人。

给周世钊[1]的信

（1964年1月31日）

惇元兄：

两次惠书及大作两首，另附余同学信，均已收到。寄上2000元，请分致1500元赠李[2]先生作医药费，500〔元〕给余同学。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俟见面时详说可也。

敬祝平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 李，可能是李漱清，辛亥革命前是韶山的进步教员，毛泽东常去他家看书、请教；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徐冰《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总结》[1]上加写的一段话[2]

（1964年1月）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

[1]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1963年5月27日作的这个检查总结，主要是不点名地批判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自1956年以来在政策理论方面提出的若干意见。总结共分七个部分：（一）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生过的原则性错误，主要是对于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想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这种主观上想比较快、比较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客观上却起了保留它的作用，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二）关于人的改造问题。应当肯定十几年来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这种改造的长期性，即使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或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同他们在思想上有时甚至是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也还要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另外，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长期存在，小生产者

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还没有消灭，必然会恢复和再生长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必须坚决予以打击。（三）关于资产阶级“左派”的问题。过去说资产阶级左派在政治立场上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已经从资产阶级中分化出来，这是错误的。（四）关于民主党派的性质问题。过去我们曾提出五年或更长一点时间内，把民主党派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的政党，在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基层各级组织，基本上建立起巩固的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各民主党派怎么也不能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政党。1962年全国统战会议期间提出的，对民主党派今后一般不再叫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党，模糊了民主党派的阶级性质，应当加以纠正。（五）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问题。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界、华侨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广泛的联盟。它一方面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是阶级的联盟。不能说，统一战线已经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了。（六）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工作问题。1962年7月我们提出的，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和右派分子本人或其家属要求甄别的就进行甄别的意见，是错误的。那样做客观上必然会形成对右派分子普遍甄别平反，这势必导致否定1957年反右斗争的伟大成绩，后果是严重的。（七）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工作的估计。几年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执行了中央和主席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认识上，长期存在着一些原则性的错误，主要是阶级观点不够明确，缺乏阶级斗争的长期观点和全局观点，把资产阶级人们和民主党派的社会主义改造看得过于容易和简单了。这个总结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中共中央于1964年1月13日以中发〔64〕26号文件批转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中央各部委、各党组。1980年8月18日，中央统战部在关于为李维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复查报告中，建议撤销这个中央文件。同年11月20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了这个建议。

[2]　毛泽东这段话加写在徐冰作的检查总结中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部分以下一段话之后：“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这些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我们国内来，不只会影响原来的资产阶级人们，甚至也会使一些共产党员变质，对

于资产阶级和它的思想就不能完全彻底干净消灭之。阶级社会在我们国家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的存在也有百多年，花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差别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对世界也会发生伟大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遥遥无期，还是把时间放长一点好，我们从来就有欲速则不达的谚语。”这段话中的“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是毛泽东加写的，“甚至几百年”，是毛泽东改写的，原稿为“甚至上百年”。

谈报纸革命化问题

（1964年1月）

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是报社人员的革命化问题。革命化就是肃清一切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有些错误思想容易看得出来，有些就不容易看出来，比如《文汇报》的《胆与识》一文的错误容易看出来。（此文表扬“年青一代”敢于批评将军）不革命化的另一表现是头脑中缺乏辩证法，往往把问题说死了。

革命化是立场、观点问题。报纸究竟要宣传哪些东西，究竟要系统宣传哪些东西，能不能选择得好，都是革命化问题，解放日报的干部那么多，为什么写不出好东西？要革命化一定得下基层，参加实际斗争的锻炼，要使人革命化，同时要使机务革命化。

报纸一定要抓思想。

（在谈到《解放日报》的好处时）

好在比较注意抓思想，比较抓思想工作。一张报纸从头到尾都要思想化。你们（《解放日报》）过去和现在，这一点做得不够，常常把一些好的东西，当另件处理，有时候又把一些一般的东西当作大东西处理了。

依靠什么人办报？要依靠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办报，好的东西应该让群众自己写。

你们要善于抓住活的东西，把它提到理论高度，宣传活的哲

学。报纸要有各种议论。

国际消息。

外宾接待消息，地方报纸可以少登一些，这样，可以让出地方来宣传活人活事活哲学。

要总结报纸工作的经验。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对柯庆施同志讲）

革命化的三个意思：（1）要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2）要下去实践，同工农结合；（3）要学习唯物辩证法。

几段插话[1]

（1964年1月）

一

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方法，不好，要改。比如说，企业里用了那么多的人，干什么！人是要吃饭的，要消耗的，不像孙猴子吃铁砂，拉铁屎。用那么多人，就是不按经济法则办事。

生产出来的物质，必须按合同收购。商业部门说是因为计划变了，不收购；是谁变的计划？国家变的，就由国家收购。总之，不能积压在工厂里头。

---

[1] 本篇一是在谈到工业问题，要建立“托拉斯”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谈到企业管理不好的原因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在谈到专业化和协作、制造主机和辅机的关系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在讲到树立标兵，领导不要埋没英雄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五是在讲到报纸应该怎样宣传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六是在讲到石油部的经验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七是在和日本人谈到对垄断资本反美的态度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八是讲到不用武力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九是在讲到苏联现在请南斯拉夫以观察员身份列席经互会议时讲话的一部分。本篇十是在谈到介绍工人中间的模范人物时讲话的一部分。

二

解放军一道命令，可以通到底，行得通。说解放军所以搞得好，是由于共产党领导。那经济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呀，为什么搞得四分五裂？抢钱、抢物质、发生冲突[1]，多年不得解决？商业为什么不能按经济渠道经营管理，为什么只能按行政设置机构？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企业跟军队一样，一通到底嘛！党委管思想、管政治、管仲裁[2]、管人，实行监察嘛！

三

主机和辅机的矛盾，是对立物的统一。资本家办一个工厂，管工厂的资本家总是少数，做工的工人总是多数。少数和多数的矛盾，也是对立物的统一。

四

我说高官厚禄、固步自封有的是，比如有的部的报告就说他们也有多少模范、典型、标兵，但多年没有发现，这不是被固步自封的官僚主义所压住了！现在被压住的，没有发现的还很多。要改变这种情况，抓活人活事。

---

[1] 抢钱，指按利润分成，抢物质，指按物质分成，发生冲突就是闹关系。

[2] 管仲裁就是管冲突。

五

《文汇报》《光明日报》办得比较好，有些议论方面的文章，也有科学研究、哲学、历史研究等方面的文章。《人民日报》单纯些。（它担负人家不担负的任务。）报导国际消息，一礼拜几次也就可以了。要写点新鲜事物，活人活事。加上一版，专门报导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写“活”哲学，不要写“死”哲学。现在写文章，引语太多，看了就心烦，少引一些可以。我写文章很少引马、恩、列、斯。要写活的哲学。许多老粗懂得哲学，最近解放军发现一个炊事员写的文章说，他从前烧饭每顿用二斤四两煤炭，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掌握了煤炭的客观规律，每顿只用六两煤炭。

六

过去封建皇帝时代，还可以据理力争。我们解放军有一条，真理在谁手里，就服从谁，在伙夫手里就听伙夫的，在班长手里就服从班长的。真理不是谁的官大、官小来决定的。

七

（一）日本垄断资本现在有变化，八番钢铁托拉斯、富士钢铁托拉斯、东海渔业托拉斯，反美反得很紧张。过去只纺织业来反，现在垄断资本家也反了。这一件事，对日本共产党来讲，是个新问

题。过去讲得太死了，切记不要讲死。我讲了法国的经验，戴高乐掌握了民族独立的旗帜，掌握了反美的旗帜，而法共则去欢迎艾森豪威尔，为肯尼迪流泪，所以戴高乐上台，倒不了。苏加诺也是大资本家，但他掌握了反美和民族独立的旗帜，所以他能维持。而印尼共产党就把这些接过来。希特勒上台后，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收复失地，抓民族独立的旗帜，德国共产党台尔曼未表态，失败了。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是两个拳头作战，一手反美，一手反共。你们要给他放松一头。日本垄断资本家提出反美，要美国撤走基地，要反控制，你们应该把这些接过来。日本目前的形势是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就是要跟垄断资本家在反美问题上搞统一战线。我们也跟四大家族[1]搞过统一战线。这样做，可能麻痹了工人。但我们也要想想工人的心理，资本家反对美国控制，工人有事做，工人是同意的。我们跟蒋介石的经验也是。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同蒋介石是采取两手：又团结，又斗争，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以斗争求团结。反共高潮只三次，一打，他退回去了，我们还是联合。不联合，哪能发展这样快，这样大，从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人？如果日本不投降，这一政策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在这中间发展，我们要趁这个空子发展嘛！

（二）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是带普遍性的，许多人脑子里有这个问题。解答这一问题，还是要用阶级分析。这是从斯大林时候就包下来的。联共党史写了，宪法也写了，只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民一致，不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外的不一致，不提还有资本主义分子，还有未改造的知识分子；此外，也不

---

[1] 四大家族，中国垄断资本家，指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

提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高薪阶层，工人贵族。问题不在于赫鲁晓夫一个人，而在于这个基础，基本问题，即有新的资本主义产生的基地。所以，只说反赫鲁晓夫不行，打倒一个，还有第二、第三、第四个……不只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欧洲十几个国家都出了修正主义，代表什么？代表工人贵族。我说工人阶级的广大贫苦阶层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少数工人贵族出修正主义。

八

台湾海峡，两重性。这是国内问题，谁人都不得干涉。我们也是两手，和平解放或者武力解放。不管哪一手都是内政问题，谁也不能干涉。我们用武力解决，并未说死。

九

经互会要去，南斯拉夫参加，我也去。现在形势变了，赫鲁晓夫的指挥棒不灵了。南斯拉夫你参加，我也参加。将来要把经互会转到抵抗苏联的控制。大西洋公约国家反对美国控制，以法国为代表嘛！东欧国家也反对苏联控制，并且正在发展……现在指挥棒不灵了……要看到这一形势。

十

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

但是，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汉朝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刘静劝他不要建都洛阳，要建都长安，他立刻去长安；鸿沟划界，项羽引退，他也想到长安休息，张良说什么条约不条约，要进攻，他立即听了张良的话，向东进。韩信要求封假齐王，刘邦说不行，张良踢了他一脚，他立即改口说：“他妈的，要封就是真齐王，何必假的。”而项羽则有三次错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那时他有四十万军队，刘邦只有十万人。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1]。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文的也有几个好的，如李世民。我们中央上过大学的也很少，过去上了大学的就算做官了，还革什么命。现在有许多新的好的典型，要提倡。

《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年画）

---

[1] 徐州，那时叫彭城。

对试生产出浓缩六氟化铀^{235}合格产品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4年1月）

已阅[2]，很好。

---

[1] 这是毛泽东对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1964年1月15日报告的批语。

[2] 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的报告说：我部生产浓缩六氟化铀^{235}的气体扩散工厂，第五批主机投入运行后已于1964年1月14日上午开始取得合格产品。这一产品的生产，为我国原子武器的制造，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报告还提出，要继续遵循主席“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和周总理“实事求是，循序前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指示，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谦虚谨慎，兢兢业业，稳扎稳打，为更好地完成今后的任务而奋斗。

《人民日报》要重视理论工作[1]

（1964年1月至12月）

一

《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

抓哲学，要抓活哲学。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列宁就很少引人家的话，而用自己的话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要处处都引。

（一月八日）

二

《人民日报》要搞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人民日报》对教学改革问题发表过文章没有？《文汇报》上一篇文章《不可能什么都懂》，可以看看，

---

[1] 本篇是毛泽东对吴冷西几次谈话的一部分。

可以转载。

（三月二十二日）

三

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今天（二十日）二版关于设计讨论的四篇小文章[1]全看了，编者按也写得好。大白菜也上了头条[2]，很好，要继续努力。《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有些短的、生动活泼的、思想性强的文章，要学习。

（十二月二十日）

---

[1] 指《关于“用革命精神改进设计工作”的讨论》专栏第六期登出的四篇短文章：《带着党的政策下现场》《走出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放下“施工指导”的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不能把工厂看成静止不变的东西》。“编后”的题目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2] 指1964年12月5日一版《卖菜札记》和短评《领导还是被领导?》。

关于《人民日报》要注重思想理论工作的批语[1]

（1964年2月3日）

少奇、小平[2]同志：

《人民日报》历来不注重思想理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文章很少，自然科学文章更少，把这个理论阵地送给《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月刊。这种情况必须改过来才好。现在他们有了

---

[1] 这个批语写在人民日报编委会1964年1月31日关于增加学术文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为了改变学术文章少的状况，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条标准为准则，坚决贯彻执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增加学术论文，活跃学术讨论风气。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以哲学为重点，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加强思想评论，就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中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反复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计划地组织有关哲学问题的讨论。三、有准备地积极参加学术界的讨论。四、自然科学方面，以农业科学为重点，组织科学论文，为农业增产服务。同时组织有关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知识性的文章。五、约请省委和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撰写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总结性的文章。报告还说，《人民日报》发表理论和学术文章，每周有三个版，每月约16万至18万字，比一般期刊在数量上多一倍，大部分文章又需要到外面去组织，工作比较繁重，人力深感不足，请中央批准增调10个到15个较有理论修养的干部。

[2]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改的主意了，请书记处讨论一下，并给他们解决干部问题为盼！

毛泽东

二月三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1]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通知》的批示

（1964年2月5日）

大庆油田的经验虽然有其特殊性，但是也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贯彻执行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坚持政治挂帅，坚持群众路线，系统地学习和运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把政治思想、革命干劲和科学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把工作做活了。这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主要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交通、财贸、文教各部门，在党、政、军、群众团体的各级机关中也都适用或者可做参考。

---

[1]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

和钱学森等的谈话[1]

（1964年2月6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们搞原子弹也有成绩呀！

钱学森（以下简称钱）：我有所闻。

毛：怕是不止有所闻吧。

钱：对原子弹确实只是有所闻，我是研究运载工具的。

毛：是的。你们搞了个一千公里的，将来再搞个两千公里的，也就差不多了。

钱：美帝在东南亚新月形包围圈上的有些基地，有两千八百公里的距离。

毛：可以到夏威夷？

钱：夏威夷更远了，不止四千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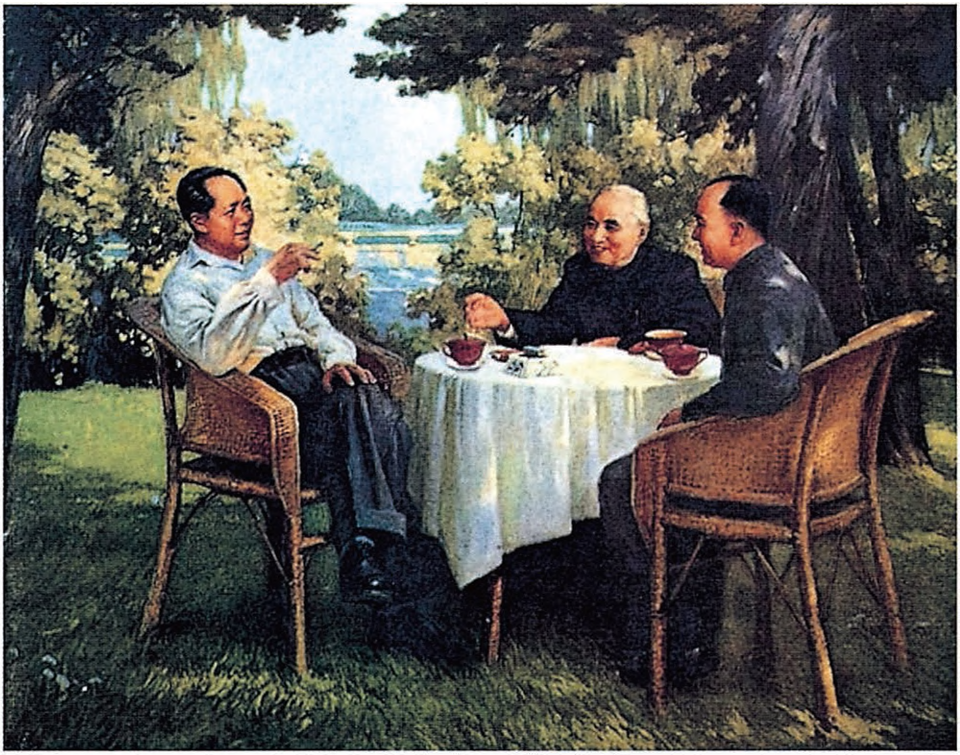
毛：总要搞防御。搞山洞，钻进地下去就不怕它了。

钱：我们正在遵照主席的指示，先组织一个小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小组，准备研究一下防弹道式导弹的方法、技术途径。看来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技术条件不够，还不能开展设计工作。

毛：有矛必有盾。搞少数人，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等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和钱学森、李四光在一起》（油画）

接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夫妇时的谈话

（1964年2月9日）

什么都是可以分开的。譬如说，过去认为原子不能再分，后来科学发达了，知道原子可以再分成原子核和电子，还利用电子发电。后来又进了一步，知道原子核还能再分，而且那里面复杂得很，可以分成好多部分。电子能不能再分呢？理论上是可以分的。虽然实际上我们对电子世界还懂得很少，科学家还没有把它分开，但是，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经说过，电子是可以再分的，我不懂这门科学，但是我相信这个道理。

科学是无限的。无限大的世界和无限小的世界都有无限的工作可做……

任何社会无论今天和将来，都一分为二，总是由矛盾推动社会发展。在现在，是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已经十四年了吗？但是还是阶级斗争在推动我们的社会前进。过了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以后，建成了社会主义，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是什么推动社会前进呢？那时是先进集团同落后集团的斗争。一万年以后还是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不可能设想铁板一块，都正确，没有一点错误。没有错误，哪里有正确？

社会是复杂的。根据马克思主义、根据对立统一的规律，一百

万年或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有正确和错误的。社会结构也是分成几百个阶段或几千个阶段前进的。我就不信在一百万年以后，所有的人就都是那么文明、高尚、道德，都是圣人，没有肯定，没有否定。

而且一个阶段代替另一个阶段也是要通过斗争的……

在中国，还是有保持原状的人，还有人反对我们，还有人表面上不反对我们，但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人表面上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心里不满意。将来也还会有这样的人。改造社会和改造人是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一个社会总是一分为二，有正面，有反面。如果我们这一代什么都改造完了，那么下一代干什么？如果说再过一万年社会改造得十全十美，每个人都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样的人，那么一万年之后的人干什么呢？一万年之后，还是会有量变、质变，还是会有飞跃，还是会有社会革命。我就不相信在进入共产主义后，社会经济将永远是同样的一种经济，人永远是同样的人。现在当然还没有人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就不相信会是那样。

实际上，社会总是复杂的，一个统一体总是可以分的，至少可以一分为二。

现在，美帝国主义代替了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在泰国、老挝、南越，它代替了法国；在南朝鲜和台湾，它代替了日本。它到处都要伸手，我们就要反对。有人骂我们用肤色来划分人。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同蒋介石团结起来？为什么你们不支持美国的统治者？为什么□□□同志不喜欢英帝国主义？各国都是用阶级来划分的。

…………

任何社会、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仅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一分为二，而且无产阶级也一分为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有修正主义者好，没有就不好。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必一分为二，从来是一分为二的，从马克思的时候起，就是如此。

就是你们和我们，也是一分为二的。你刚才不是讲，你们过去以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只应该有团结而不应该有斗争吗？这种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你们思想中错误的一方面。但是你们思想中正确的那个方面占主要地位。因为你们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你们的党的脱产干部很少，你们的大多数干部都是靠自己劳动吃饭的，这样就减少了官僚主义。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这里的官僚主义可不少！应该让威尔科克斯同志看看我们关于城市“五反”的文件，看看官僚主义危害多大。“五反”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这个文件应该翻译成外文，给你们带回去，让你们的中央委员都能看到。

中国的社会是一分为二的，谁也不能说中国是不能分的。不能说只有光明的一面，而没有黑暗的一面。不能说只有正确的一面，而没有错误的一面。不能说只有马列主义的一面，而没有修正主义的一面。不能说只有廉洁的一面，而没有贪污盗窃的一面。否则就不符合事实。

对外国同志介绍情况时，只说好的，不讲坏的，这是不正确的，不是真正马列主义的态度……

列宁、斯大林的时候是肯定阶段，现在是否定阶段。但是事物的发展会走向否定的否定，修正主义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势必如

此。广大的苏联人民、党员和干部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但需要时间，或者十年八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

我是从修正主义对我们的好处和帮助谈起，联想到我们历史上错误的政策和机会主义路线对我们的好处，以及党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我们的封锁，断绝经济关系和大举进攻对我们的好处。这个道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人总是认为敌人的压迫、杀人、被打入地下、党的组织缩小等等，是坏事。认为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猖狂进攻，是坏事。日本过去进攻中国，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有些日本资产阶级的代表，现在见到我们就道歉，说：对不起得很，我们过去侵略了你们。我说：不，没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都起来反对你们。就是因为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所以中国人民都起来了。

所以，日本侵略中国，有两重性：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是，杀中国人，破坏村庄，抢人物质；好的一面是，激起了中国人民，强迫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否则我们的一百二十万军队建立不起来，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建立不起来，也不能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吃饭、穿衣、住房子的问题，枪炮问题也不能解决。我们的枪炮是他们送来的，后来是美国人送来的。我们军火的主要来源是美国。其次是蒋介石的兵工厂，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很少。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的军火工业才开始发展，有了十万工人，开始制枪、小型的炮、步枪和机关枪，制造子弹和炮弹。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没有飞机、坦克、大炮，没有外援。但是我们打败了有飞机、坦克、大炮和有大量美援的敌人。

春节谈话纪要[1]

（1964年2月1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今天是春节，开个座谈会，谈谈国际问题、国内问题……

你们看我们国家会不会倒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民主人士怕不怕原子弹？原子弹一摔无非是重新回延安，整个陕甘宁边区有一百五十万人，延安城有三万人。人总要被骂才好公开答复，国民党倒有一个时期聪明，不公开骂，发了一个文件，限制异党办法，限制共产党，你知道吗？

章士钊（以下简称章）：不知道。

毛：你们消息不灵。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牺牲了一万七千多人，以后又搞了几次反共高潮，教育了党。蒋介石不是好人，一有机会就整我们。抗战后，讲谈和平，叫我去重庆谈判，也是各下各的令。就在谈判期间打了一个上党战役，消灭了高树勋三个师。

□□□：高已入党，人是会变的。

---

[1] 1964年春节，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杨秀峰、蒋南翔、陆平16人参加。这是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康生（以下简称康）：宣统皇帝来拜年了（在政协）。

毛：宣统皇帝应好好团结，光绪、宣统都是我顶头上司。宣统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

章：宣统的叔叔载涛，听说生活很困难。

毛：载涛这个人是陆军大臣，到法国留过学，我知道他，但不熟悉。是否通过你帮助他，生活有所改善，食无鱼不出，还是让他改善生活。

当走狗不好当，尼赫鲁太不行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输定了。现在还神气，还张牙舞爪，但是他们脱离群众，苏联修正主义日子不好过，修正主义到处碰壁，在罗马尼亚碰壁，波兰不听，古巴是听一半不听一半，听一半是无可奈何，不出石油不出武器。帝国主义日子也不好过。日本反美，反美不仅是日本共产党、日本人民，还有大资本家。不久前北制铁所拒绝美国调查。戴高乐反美也是资产阶级要求。与中国建交也是他们主动的。

毛：你知道沈崇事件吗？

章：是沈从文吗？

毛：不是，是北大一个女学生，被美军强奸，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浪潮。现在美帝到处做坏事，到处遭到反对。

人是要挨骂的，他们愈是骂我们，我们愈好。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蒋介石愈是公开骂我们，我们愈好。最近蒋介石不大公开骂了。帝国主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说我们讲空话，骂我们宗派主义、假革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登我们的讲话？那就是说明我们有些东西。最近，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四点：1. 停止公开论战；2. 再派专家来；3. 中苏边界谈判；4. 扩大贸易。边界可以谈，二月二十五日就开始。生意可以做一点，不能太多，苏联的

物品笨重、价贵，还要留一手。

康：质量差。

毛：一笨二贵三差四留一手，我们和他们做生意吃亏，不如同法国资产阶级好办，还有一点商业道德。

过去工作中有错误，第一是瞎指挥，第二是高征购，现已改正。现在走到反面，由瞎指挥到不指挥，这就没有干劲了。要鼓起劲来，所以要学解放军，学大庆。石油部在大庆搞了一个大油田，投资少，时间短，收效大。

每个部门都要学解放军，高等学校也要学解放军。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人是工作队，搞了一套好经验。他们的工作比各地方、各部门都搞得好些，很值得学习。在工作方法上，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也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以批评为辅。在我们工作中有很多好人好事、好的典型，要表扬。

去年河北大灾，南方干旱，本来收成好，下了暴雨损失了二百亿斤粮食，去年总计还是增产一百多亿斤，今年还要搞得更好。现在学解放军，学石油部，学习城市、乡村、工厂、学校、机关的典型，克服工作中的错误，把今年的工作搞得更好些。

今天开个座谈会，谈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是根本，国内搞不好，国外就不好谈了。现在有些国家要与我国建交，如刚果、卢蒙巴的刚果搞起了游击战，并没有什么新式武器，关公的青龙偃月刀，张飞的丈八长矛。

邓小平（以下简称邓）：还有黄忠的箭。

毛：无非是关张赵马黄的武器，没有新式武器。我们过去也是没有的。南昌起义两个师丢了，朱德、陈毅、林彪带残部上了井冈山。我根本不会打仗，一九一八年在北大图书馆，八块大洋一个

月，不管衣食住行。章士钊不愿当袁世凯的官，让他当北大校长，他跑到北大办报。黄炎老，你是立宪派的人？

1964年2月13日（春节），毛泽东邀请党内外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方法要改变。

黄炎培（以下简称黄）：我是革命派，不是立宪派，参加同盟会的。

章：他是革命派的。

毛：陈叔老，你是研究系，章士钊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当总长，现在你们都跟我们一起了，在新中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我们今年的工作想法做得更好一些，不但是中央希望，也是你们的希望。许德珩，你是工业部的？

□□□：他的部大有希望。

毛：黄老，你的家族像各党各派，民盟、民进、共青团，你的儿子黄万里写的“贺新郎”词写得好，我欣赏。九三学社中一人诗

写得好，也欣赏。孩子十几人不大认识，你是郭子仪。

毛：各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搞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要发扬成绩，树立标兵，多表扬，同时还要批评错误。以表扬为主，批评为辅。我们的事业有好多好人好事，需要表扬。

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现在工业有了进步，我看教育工作也要改一改，现在还不行。我看教育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要改变。今天有中央同志、党内同志、党外的同志、科学院的同志。现在邓小平同志谈谈。

邓：现在教育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学制的问题，就是学制太长了。现在七岁上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有的六年，一般的五年，共十七八年，到二十四五岁才大学毕业，然后再劳动一年，见习一年，出来已二十六七岁了，比苏联多两三年，苏联中小学十年，大学四五年，二十四岁进工作岗位。年岁大了，学文的问题还不大，学自然科学的就显得太长了。特别是搞原子能科学的，搞尖端科学的，毕业的年龄就太大了。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学自然科学的到廿四五岁就可以做出贡献。例如美国、苏联搞自然科学，搞原子能有成绩的人，一般都是二十四五岁，这个年龄脑子最好使，而这个年龄我们的学生还在上大学，未进入工作岗位。二十六七岁才工作，对于发展科学不利。学制特别长，应考虑学制问题。

毛：可以缩短一些。

邓：最近林枫同志有个意见，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十六岁中学毕业。如果小学六年，十七岁中学毕业。问题是设备不行，每年大学只招十二三万人到十五万人。其他的人十六岁就可以就业。中学毕业后搞二年职业教育，十八岁到工厂、农村就业，就比较接近。或搞二年预科，这样就可以和大学衔接起来，到二十四五岁就

可以工作。总之要搞得短一些。现在中央专门研究学制，建立了小组，由□□同志负责。采取这样的意见完成国民教育，一般是十五六岁就可以毕业了。不过有个问题，是当兵，不够年龄，但可以当预备兵。

毛：这不要紧，不够当兵年龄也可以过军事生活，不仅男生，女生也可以当兵，搞红色娘子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可以过半年到一年的军事生活，十七岁也可以当兵。

邓：这样文科学校问题不大，理工科问题大一些。大学搞一到二年的预科，中学毕业后可升到大学预科，或者进修职业学校，受二年教育，到十八岁再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就比较接近。如考理工科也比较接近，到二十三四岁毕业走上工作岗位。

毛：现在书念多了害死人。现在的课程太多，负担太重，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中小学生近视眼成倍增加，这样非改不行。

□□□：课程多而繁重，老师作业留得多，学生无法应付，紧张得不得了，没有课外活动和阅读时间。

毛：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时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参、荀子、孟子等四大贤人。学生只是成天读书，不搞点文化娱乐、体育活动、游泳，不能跑跑跳跳，又不看课外读物……那是不行的。

邓：学生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没有用。

毛：历史上的状元很少有出息的。唐朝有名诗人李白、杜甫既非进士，又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还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都不是进士、翰林。蒲松龄是一个

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权，反而不行了，就出了内乱。汉献帝、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生，而刘邦是个草包。

邓：课程过多、作业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现在的考试办法……

毛：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做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甚至冒名顶替。冒名顶替的也不过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会，你写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试点，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人死。先生讲课有的啰啰嗦嗦，允许学生打瞌睡，你讲得不好，还一定让人家听，与其睁着眼睛听着没味道，还不如睡觉，可以养养精神，可以不听，休息一下脑筋。

邓：学制缩短了，可以抽出时间搞劳动或当兵。可以考虑优秀生跳班，不能老压在那里。我的小孩同一个班有一个同学，原来是优秀生，后来跳了班还是优秀生，可见跳班是可能的。关于学制问题，请□□同志搞个专门小组研究。

毛：让□□、□□□都参加这个小组。现在我们搞得太死了，课程太多，考得太死，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教育办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不赞成读那么多书。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害死人，

要停止。

陆定一（以下简称陆）：现在教育厅长正在开会，有两个问题要研究：一是学生负担太重，门门有课外作业；二是教育学三套办法：孔夫子一套、苏联一套、杜威一套。

毛：孔夫子可不是这样。我们丢掉了孔夫子的主流，他只有六门课，礼、乐、射、御、书、数。（毛主席问章士钊：书是书法还是历史?）

章：是书法吧。

毛：是历史吧。如书经、汉书。

陆：现在中小学以升学为唯一目标，毕业后不肯劳动，问题很大，要解决一下，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其次还要两条腿走路。河北省去年发大水，教育厅很紧张，很多房屋塌了，想来想去办简易学校，结果中小学人数反而增加了。

毛：大水冲垮了教条主义，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搞掉。

陆：别的地方搞正规化，单式教学，不肯搞复式教学，学生人数下降，贫下中农人数下降，贫下中农失学的人数很多。河北省有了好经验。广东省新会县调查了十几所农业中学、普通中学。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国家一年花一百二十元；农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一年只花六元八角。农业中学毕业生就业没有问题，普通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就业就麻烦得很，所以中小学都要两条腿走路，同时要注意提高质量。以前就是苏联一套办法，一九五八年冲击了一下，劳动多了一些，又忽视了学习，改了就好。文艺也是如此，现在水平较高，如果没个五年八年，就没有现在的水平。

毛：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都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

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陆：现在中小学教师中有百分之二点几的坏分子，中小学还有出名的坏分子。

毛：那不要紧，可以转业。

陆：现在最坏的学生上师范，好学生进理工。今后可考虑师范文科不直接招高中毕业生，可招高中毕业后劳动过一两年的学生。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也要下去。哈尔滨□□学校有经验，把教师下放一两年，原来不好劳动的回来后都不错，成了骨干。

毛：应该下去。现在有些人不重视下乡劳动。明朝李时珍就是跑来跑去，上山采药。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孔夫子出身于贫农，放过羊，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是个吹鼓手，他什么都干过，人家死了，他给人家吹吹打打，也可能做过会计，会弹琴赶车，骑马射箭，“御”是驾车，就是当汽车司机。教出了颜回、曾子等七十二贤人，有弟子三千。他自小由群众中来，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官，也不太大。鲁国有一百多万人口，长期人家瞧不起他，周游列国时，人家骂他，这个人爱说老实话，说他吃不了苦，挨不了骂。后来子路做了孔子的侍从保镖，他不准人家说孔夫子坏话，谁说了他就揍人家，从此不好的声音不再入耳了，群众不敢接近。孔夫子的传统不要，丢了。我们的方针正确，方法不对。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有不少问题，这一套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

陆：小学五年是有把握的。

毛：小学也不要念得太长。高尔基只读过二年小学，学问完全是自学的。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卖报出身，发明了电，瓦特是工人，发明了蒸汽机。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都是在实践中自修成的。

林枫（以下简称林）： 将来学制经过教改，学生到了二十三四岁走上工作岗位是可以的，七岁入学太晚，可以提到六岁，就造房子有问题。小学改为五年可以解决一些房子。中学四年，预科一两年，大学因各科性质不同，可以多样化，大学每年招生十四万到十五万人，可以办一两年的预科。

□□□： 入大学前可拿出一段时间，进工厂，到农村劳动劳动。

毛： 还有到军队去锻炼。

林： 文科可以，但理科有数理化问题，劳动二年恐怕忘掉了。

康： 苏联中学毕业后劳动二年后进理化科，不衔接。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和郭沫若交谈。

林： 大学除个别学校外，分三种学制：六年主要是医，五年制

理工科，四年制文科。多数大学四年就行了，将来学制要多样化形式，多种学制。城市中学办两种，一种是升大学的，一种是毕业进专科，两年就毕业。

毛：对了，要多样化。

林：课程问题主要是不集中，还有过去研究的那个问题，好些课程是学好几遍，中学每学期八九门课，考试多，很紧张。

毛：现在一是课多，二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不一定要考。如高中学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慢慢体会，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行了。

彭真：现在是灌输，死记、死背。

陆：现在有两派意见：一是主张当堂讲深讲透，另一派是主张当堂能学懂、学会、学少点。现在不少学校就是前一派，前者不是办不到的，主张那么搞，把思想僵化了。

毛：课程讲得太多，是繁琐哲学。四书、五经的注释很繁琐，现在都消化不了。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释现在统统消灭了。我看用这种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无论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苏联也好都要消灭，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如佛经那么多，唐玄奘考证的《金刚经》就比较简化，只有一千多字，现在还有。另一个鸠摩罗什考证的字太多了，灭亡了。五经、十三经不是也行不通吗？注释得很多。结果没人读，十四、十五世纪搞了繁琐哲学，十七、十八、十九世纪才进入启蒙时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也不能读得太多，读十几本就行。读多了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孔夫子的书里没有农业知识，因此他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洋教条、土教条都要反对，要创自己

的路。

□□□：还有一个是政治问题，学生的伙食问题，需要改善。每月吃十二块五，要多花四千万元。

毛：多花四千万元也可。

□□□：多增二至四元。

毛：念书多了，念死。梁武帝早年不错，以后书念多了就不行了，饿死在台城。

1964年新年联欢会上，毛泽东和负责两弹基地建设的陈士榘等高级将领亲切交谈。

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语[1]

（1964年2月15日）

陆定一[2]同志：

（一）此件[3]看过，很好，可以立即发下去。

（二）三十本书[4]，大字，线装，分册（一部大书分成十册、八册，小书不分册，中本书仍要分成几册）一事请你督促迅速办一下。希望今年办成。可以吗？你想一下告我为盼。每部印一万份、两万份或者三万份好吗？我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63年12月31日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拟请中央批发两个材料的请示报告上。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3] 指中宣部拟请中央转发的两个材料和代拟的中央批语草稿以及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草案）。两个材料是：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李曼村、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张伯祥1963年6月18日关于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学习情况的报告；总政宣传部、空政宣传部工作组1963年11月1日关于空军几个单位高级干部读书情况的汇报。6月18日的报告中说，高等军事学院高干读书班的学习方法是：以个人读书思考为主，加上必要的辅导和漫谈讨论，联系对毛泽东思想的领会，有重点地通读《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列宁论合作制》《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4本书。学员们通过学习，取得了如下收获：(1）对若干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阶级斗争规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对毛泽东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更深的认识。(3）进一步认识了新老修正主义之间的关系，增强了反修斗争必胜的信心。(4）提高了学习兴趣，为30本书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1月1日的汇报中说，南京、沈阳两军区空军机关和空军几个军的领导学习得比较好。具体做法是：(1）带着问题看书，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当前现实斗争，特别是反修斗争结合起来。(2）把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对同类问题的论述连贯起来学习，对照起来思考。(3）个人业余学习、固定学习日和举办短期读书班三种方式并举，因单位和个人而异，灵活运用。(4）自学和必要的辅导、讨论相结合，在认真自学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辅导和组织讨论。经过学习，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主要表现在：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有了更多的了解。二、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史上，进一步看清了反修斗争的胜利前途。三、更深刻具体地理解、领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四、从伟大导师们的革命风格和战斗精神中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1964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两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的不少人，虽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但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因而不善于总结经验，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的领会，也往往受到一定限制。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以增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各地党委对高级干部读书一事，应该像部队的一些领导机关那样，很好地加以提倡和推动。

[4] 指提供干部选读的30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的著作。其中，马克思著作8本：《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附恩格斯：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书简》。恩格斯著作3本：《自然辩证法》导言、札记和片断，《反杜林论》（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附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列宁著作11本：《怎么办?》《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论战争、和平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与战争》《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的3篇文章（《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斯大林著作5本：《论反对派》《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普列汉诺夫著作3本：《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给章士钊[1]的信

（1964年2月15日）

行严先生：

送上人民币二千元，请为转致载涛[2]先生为荷。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五日

---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载涛，即爱新觉罗·载涛，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叔父，清末曾任军谘大臣。当时是第三届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2月23日、24日）

一

送康生、陈伯达[2]二同志：

看过，有了一些改正[3]，你们看如何？请你们邀几个同志商量一〔下〕，开会讨论，是一个好事。

注意：再印一次，明天下午带来为盼。

又及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4年2月23日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第7次稿时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2月24日审阅中共中央复信第8次稿时写的批语；三至五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复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后来在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3] 即本篇三、四。

二

即送康生同志：

又有一些小的增补，主要是在第五个问题[1]上，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时半

三

为了世界和平，为了革命利益，究竟是应该团结世界上各国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派及其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还是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美苏合作？

四

尽管分歧已经发展到今天这样严重地步，中国共产党仍然愿意为恢复和加强团结竭尽自己的努力。你们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信件中，只是空唤停止公开论战，没有提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具体措

---

[1] 指复信中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毛泽东所作的增补见本篇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文字。

施。我们现在向你们提出以下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的建议，请你们考虑之后予以回答：

五

在这场大论战中，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感到兴趣的人们，觉悟越来越高，眼睛越来越亮，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大大高涨，他们自己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

关于推迟富马首相访华日期的批语[1]

（1964年2月26日）

彭真[2]同志：

以推迟十五天为好，因为周、陈[3]在三月十五——二十日之间可能有重要会议要参加。

毛泽东
二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正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镇1964年2月24日关于老挝王国政府首相富马访华事宜给外交部的电报上。电报说，富马首相拟于3月15日访问我国。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富马首相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对我国的友好访问，改于4月4日至8日进行。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送给李讷的四句话

（1964 年）

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三、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四、在命运前头的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

和毛远新的谈话纪要

（1964年2月）

以前我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又是中央委员，也做过国民党的部长，但我到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深感农民知道东西很多，知识很丰富，我不如他们，应向他们学习。你至少不是中央委员吧？你怎么能比农民知识多呢？回去告诉你们政委，就说是我说的，今后每年到农村去一次，这样大有好处！

你就是不懂得辩证法，不懂一分为二，以前把自己看得了不得，现在又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都是不对的。

对犯错误的人要鼓励，当犯错误的人知道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指出他的优点，事实上，他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洗温水澡，热了受不了，冷了也受不了，温水最合适。对犯错误的青年，不要开除，开除是害了他，对立面也弄没有了，溥仪、康泽这样的人也改造过来了，青年人有些是党员，有些是团员，还改造不过来？开除太简单化。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左派”？看到一个文件表扬了你，有人捧你并不是好事，像你那样的青年人要多挨些骂，骂少了不好，什么事都是这样逼出来的。我写《实践论》《矛盾论》，就是逼出来的，如果现在让我写，我就写不出来。

什么叫先进？先进就是做落后人的工作，对周围的人要分析，

我到哪里都想打听，都想交朋友，你们青年人要学辩证法，学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比如我吧，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

（1964年2月）

最近两个下放干部来我这里，谈到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化工厂思想政治工作做得不活，领导者水平不高，据说有一个犯人经过教育以后，坦白了全部问题，结果加重了刑期，这样做犯人就有顾虑了。不坦白反而可以早出去，坦白了却加重了刑期，此事如果属实，就奇怪了。坦白应该从宽。他不骗你了，应该从宽嘛！是不是有这样的事，谢富治同志或徐□□，可以去这个厂子了解了解。这样的工厂很重要，应有一个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去领导。

改革学校课程设置和讲授方法[1]

（1964年3月10日）

刘、邓、彭[2]阅后，请尚昆[3]办。

此件应发给中央宣传部各正副部长，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及管教育的同志每人一份，团中央三份。并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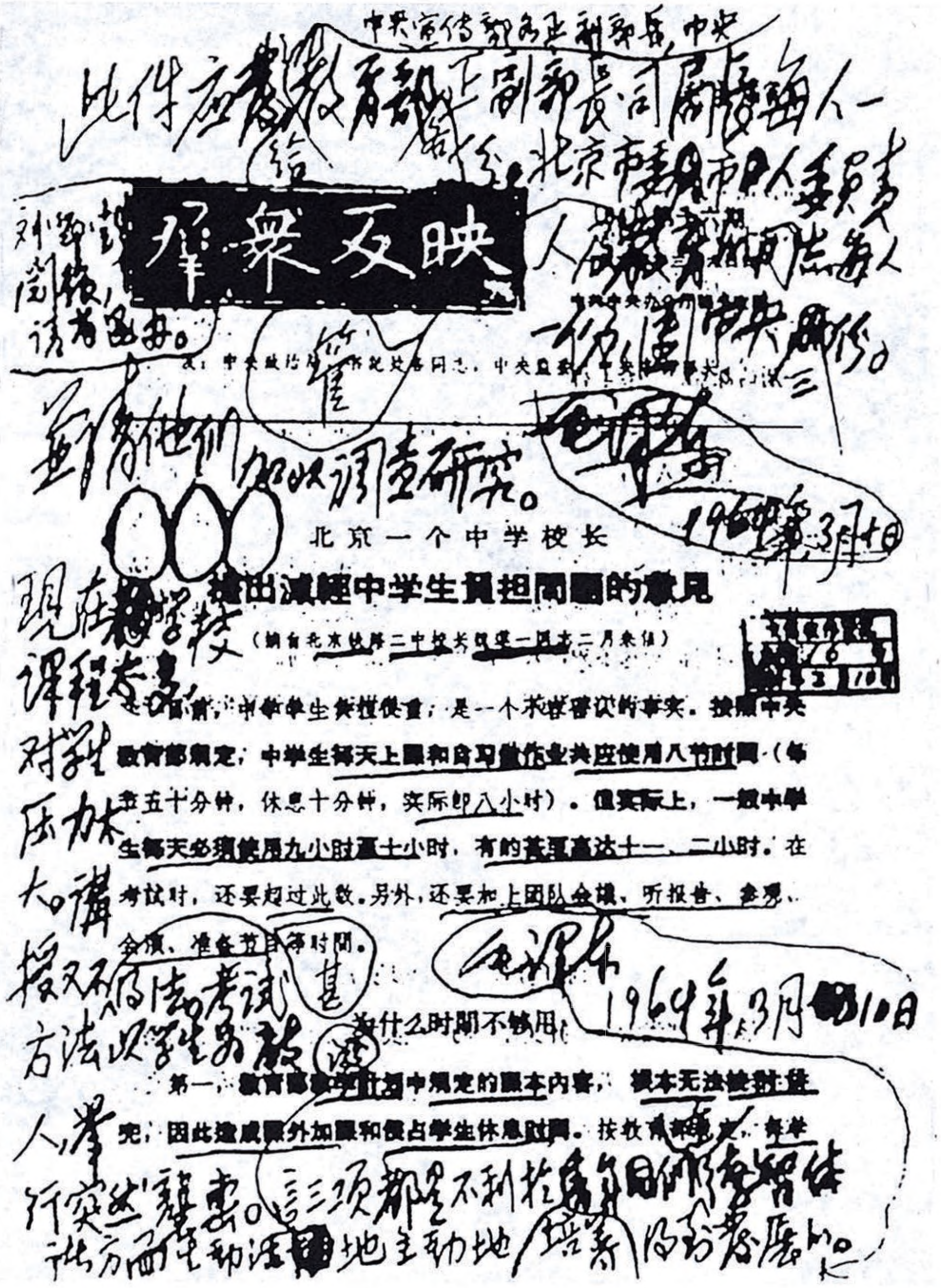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4年3月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十六期上写的批语。这一期《群众反映》摘登了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1964年2月关于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意见的来信。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尚昆，即杨尚昆（1907—1998），四川潼南（今属重庆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此件应发给教育部正副部长、司局长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负责人、各级教育部门负责人一份，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中央……一份，要请他们加以调查研究。

刘、邓、彭阅后请退毛。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群众反映

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中央直属……

北京一个中学校长

提出减轻中学生负担问题的意见

（摘自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同志二月来信）

目前，中学生负担很重，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按照中央教育部规定，中学生每天上课和自习做作业共应使用八节时间（每节五十分钟，休息十分钟，实际即八小时）。但实际上，一般中学生每天必须使用九小时至十小时，有的甚至高达十一、二小时。在考试时，还要超过此数。另外，还要加上团队会议、听报告、参观、会演、准备节目等时间。

为什么时间不够用？

第一，教育部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本内容，根本无法按时讲完，因此造成课外加课和侵占学生休息时间。按教育部规定，每学……

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毛泽东

1964年3月10日

毛泽东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批示的手稿。

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机场迎接访问十四国归来的周恩来。

1964年3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首都民兵在一起。

在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上加写的两段话[1]

（1964年3月17日）

一

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2]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二

为此原故，我们要写这篇文章，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

[1] 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题，在1964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4年第六期发表。本篇一写在这篇文章送审稿前言部分的开头；本篇二写在送审稿前言部分的末尾。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给华罗庚[1]的信

（1964年3月18日）

华罗庚先生：

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肃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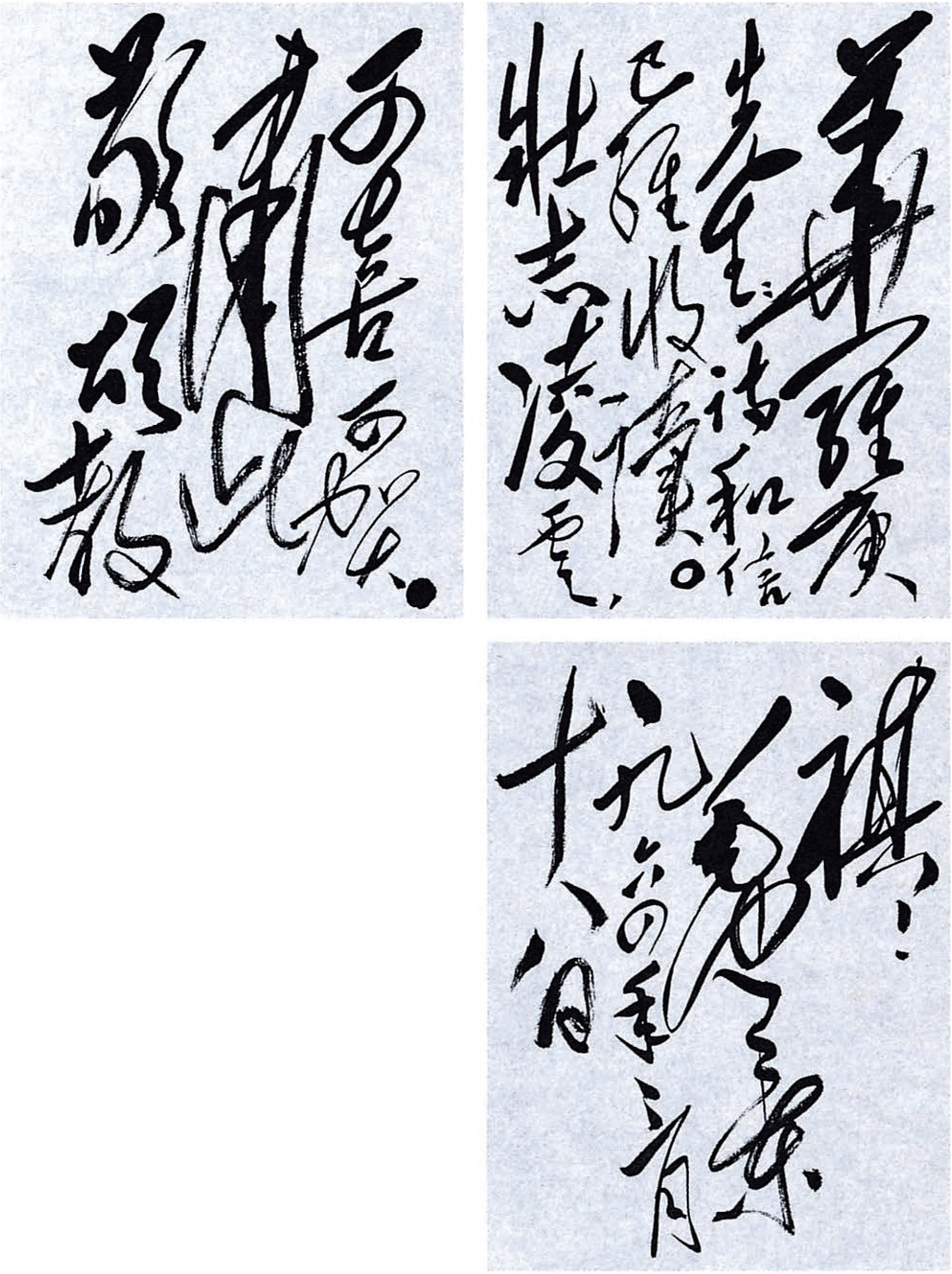
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

[1] 华罗庚，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华罗庚先生：诗和信已经收读。壮志凌云，可喜可贺。专此。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八日

毛泽东致华罗庚信的手稿。

给高亨[1]的信

（1964年3月18日）

高亨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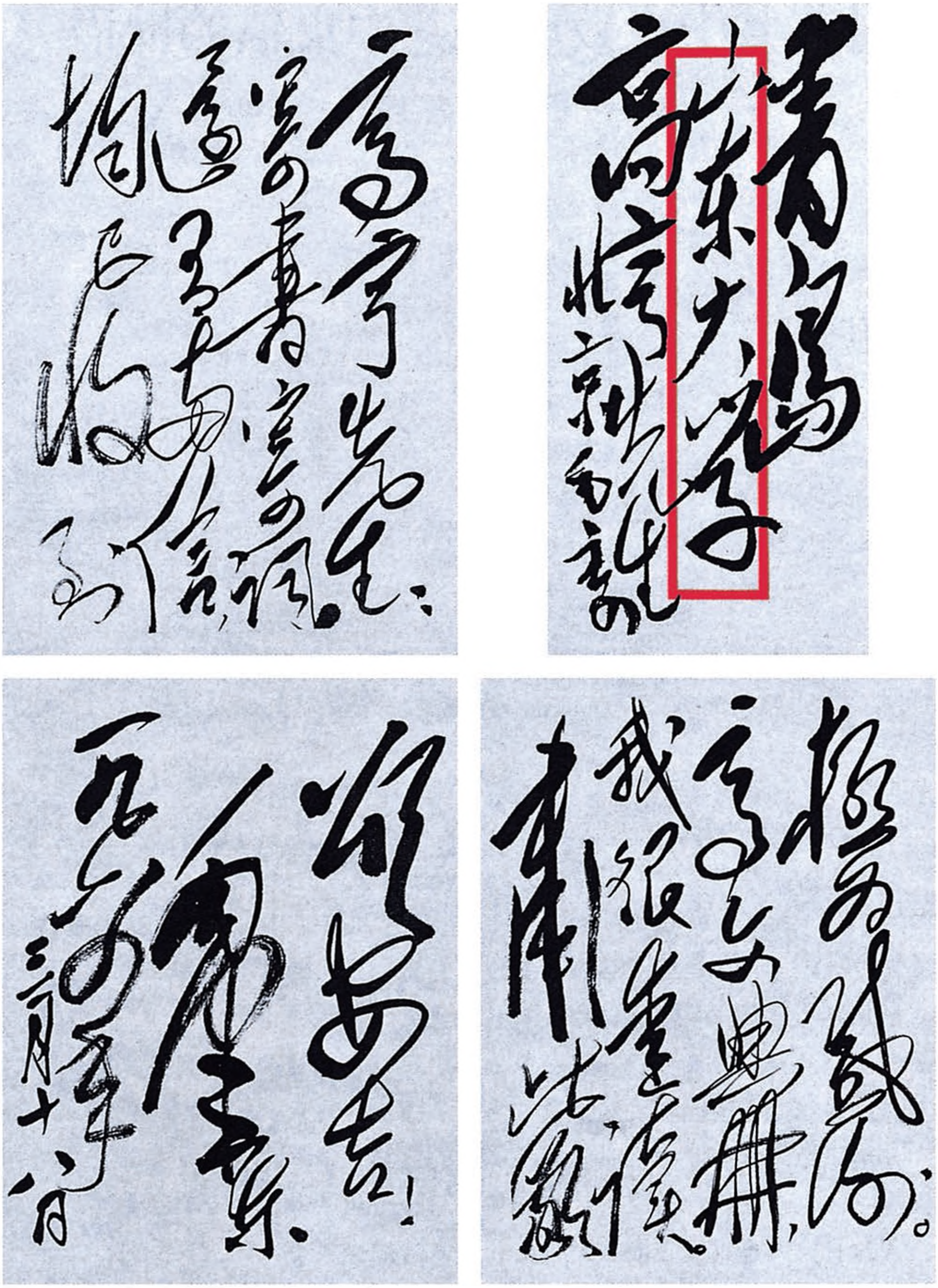
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

[1] 高亨，文字学家。当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



高亨先生：

寄書寄詞，還有兩信，均已收到，極為感謝。高文典冊，我很愛讀。肅此。敬頌

安吉！

毛澤東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

青島

山東大學

高亨先生

北京毛緘

毛泽东致高亨信的手稿。

对苏共中央致印尼共中央信的批语[1]

（1964年3月19日）

江青阅。

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阅。

虚声恫吓，毫无办法，苏修已走入一个死胡同。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刊载苏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给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的中共中央联络部文件上。信中称，苏共中央曾于1963年11月29日致信中共中央，迫切呼吁停止公开论战，但近几个月来，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发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社会主义兄弟关系的广泛运动，他们的报刊天天刊载对各国共产党，首先是对苏共进行卑鄙粗劣的诽谤的文章，并利用各种组织在全世界散发和用各种外语广播这些文章。2月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登载的文章达到了高峰。为此，苏共中央决定在这一次中央全会上讨论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全会有关这一问题的报告和材料将予以公布。我们认为开展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以及他们的颠覆和分裂活动是必要的，坚决反对北京的分裂活动是苏共中央的国际义务。

关于同意《大公报》出“经济评论”专刊的批语[1]

（1964年3月21日）

此件送康生、吴冷西[2]二同志阅后，退李先念同志照办。

毛泽东
三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1964年3月14日关于似可同意《大公报》出一“经济评论”专刊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主席指示《人民日报》要写理论性文章。《大公报》是中宣部确定为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报纸，他们想出一个“经济评论”专刊，似可同意。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中央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1]

（1964年3月22日）

一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地方各地委、县委，各大、中工厂、矿山、交通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党委、党组，各大、中学校党委，科学、文化机关党委、党组，省、专区、县三级政府党委、党组：

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需要几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解放军也要学习地方的经验。中央的三个社会主义教育文件（五反指示，决定草案，规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县以上机关以外，其余两个（即所谓双十条）应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发问，答问，由粗到细，由浅入深，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央以中发〔64〕208号文件下发。二是他在这一指示稿上写的批语。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深入调查研究，直到确实解决问题。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这种队伍，要使一切能讲（即能看懂文件）会讲（即政治水平较高，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同志都得到机会去讲。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现将两个文件发给你们。一个是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的报告[1]，一个是孔夫子故乡山东曲阜县委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的报告[2]。请你们研究这两个文件，从其中可以得到许多启发。

中央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报告说，全军从1963年12月16日开始宣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到今年2月中旬基本结束。这次教育，大体经过以下三个步骤：（一）由高级首长和各级领导干部原原本本地向官兵进行宣讲，让党的政策不走样地同群众直接见面；（二）发动群众进行专题讨论，深入解决官兵的模糊认识和思想疙瘩；（三）总结提高，使教育落到实处。通过这次教育运动，在部队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2] 中共曲阜县委关于颜家村大队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说，这个大队从1963年12月1日至今年2月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四清”和干部洗手洗澡、对敌斗争、组织建设、生产建设4个阶段。

二

刘、周、邓、彭、贺龙、陈毅、康生、伯达、定一、冷西[1]各同志阅后，尚昆[2]处理。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写作情况的说明[1]

（1964年3月25日）

退田家英同志。

---

[1]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1930年8月曾印过石印单行本。这篇著作长期散失，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未能收入。1957年2月，由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献出。

1959年8月，这本小册子由福建龙岩地区文教局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于1960年年底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于1961年1月送毛泽东阅看。3月11日，毛泽东将这篇著作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印发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1964年经他亲自审定，编入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为了确定文章的写作时间，负责选读本编辑工作的田家英在3月25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毛泽东当晚将这篇文章的最后审定稿退田家英，把文章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并写了这个说明。对把文章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田家英表示怀疑，请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整理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年5月。1991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增补了这篇著作。

此文是在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

毛泽东

1964年3月25日

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4年3月28日）

一、我四五十年前看过一本《香山记》，开头两句是“不唱天来不唱地，单唱一本《香山记》”，唱这个就不能唱别的。

二、我们有十年没有搞阶级斗争了，五二年搞了一次，五七年搞了一次，那只是在机关、学校，这一次要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至少用三四年时间。我说至少三四年，不然五六年。有些地方，打算今年完成百分之六十。不要急，欲速则不达。当然，这不是说可以慢吞吞的，问题是运动已经起来了。河南太急。说这是第二次土改，有道理。

三、（有人汇报，工作组以包青天自居）

包公还不是帮助土豪劣绅？

（有人汇报有的工作组打人）

包公就是打人。

四、试点失败了，不奇怪，失败了还要干。要特别注意总结失败的教训。

五、（有人说，有人主张用学大庆、学解放军代替“四清”）那是代表不搞阶级斗争的那一派。大庆难道就不搞反贪污，反浪费？就不反盗窃？

六、中央“五反”指示没有谈阶级斗争。

七、牛鬼蛇神要让它出来，出来一半还不行，出来一半还会缩回去。

八、关于四权下放，证明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意见是对的。周兴不同意他的意见，说不能下放到队。实际上是少数人的意见代表多数人的意见。

九、（有人说，大学教授下乡“四清”，说自己什么也不懂）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

十、人家把机关枪都交出来了，就不要再逮捕他了。逮捕是把矛盾上交，上面又不了解情况，还是放到群众中监督的好。

十一、除了年老有病的，文化很低读不懂文件的，以及政治威信很低，像彭德怀那样的，都要宣读文件。

十二、一九四七年，《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就是我口讲，有人记下，又经过我修改的，那时我得了一种不能写东西的病。现在写东西都是由秘书写，自己不动手。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由别人代笔的。例如总理出国讲话，就是黄镇、乔冠华他们搞的。有了病，自己口讲，叫人家写，也是可以的。自己总是不动手，靠秘书，不如叫秘书去担任领导工作好了。

十三、一九三三年我在古田调查，是反映农民的意见，是农民的意见，从我的嘴说出来的。

北京是不出意见的。工厂没有原料，出不来成品，我们就是靠你们的原料来加工。

在听取一次汇报时的插话

（1964年3月）

看到你的信，你们想找我谈一谈。最近因为搞反修斗争等等，好久没有找你们谈了。

你们看，我们跟赫鲁晓夫斗争，能否取得胜利？我们跟敌人斗争了一辈子，敢跟帝国主义斗争，也打败了帝国主义，我们就不能打胜赫鲁晓夫？

我们现在主要是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至于反动派，如尼赫鲁，那不算什么！

（谈到有人在一九六〇年上海会议上提出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问题时）

真理，一切真理，开始的时候，总是在少数人手里，总是要受到多数人的压力。四百年以前，波兰人哥白尼，他是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发现了地球是动的。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以科学的日心地动学说，推翻了在天文学上统治了一千余年的地心天动学说。当时宗教界群起而攻之，都反对他，说他是异端，他是一直受压迫的。他的《天旋论》，一直到他临死前才出版，他高兴了。当时意大利的伽利略，是一个卓越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意见，从一六〇九年起，他自制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星球是不是动的，但是，他受到当时宗教界的迫害，受到罗马反动法

庭判罪。另一个人是被火烧了。烧死一个人算什么！真理还不是在他手里头?！烧死一个人，地球还是动的。发明安眠药的是德国人，是个药店子的药剂师。他们几个人在药店试验，开始他们的目的，是想减少妇女生育的痛苦。他们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有一次八个人都中了毒，几乎死了，但终于发明了安眠药。可是德国人不准他们制造和推销。法国人买了他们的发明的专利权，把这个药剂师请到法国，开欢迎会，这才推广了。也很奇怪，在那一个地方不灵，在别的地方就灵起来了。这种事情也很多，比如说，佛教是印度发明的，可是在印度并不那样吃得开，到中国和其他地方就灵了。又比如，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和苏联就不灵，到中国就又灵了。达尔文，他本人也是信仰宗教的，他的《物种由来》出来之后，受到宗教界的迫害，都反对他。

（谈到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时）

最近我们讨论了一次，批了两个文件，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委员，都到群众中宣读，用一两年的时间读完。我批了，凡不是年老有病的（比如徐老、吴老），凡不是不认识字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就是说不是右派，比如彭德怀不要去了），都去读。军队中的将军们都下去读了，说行嘛！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行?

实际上，向群众宣读文件，就是向群众学习。你要到哪一个地方宣读，你就要首先进行调查研究。

“四清”“五反”，这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头脑中并不产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个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开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来群众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们接受了。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

（谈到全国现在正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

《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苏区斗争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的长征。《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有些文章应该再写，把新的东西写进去。“两论”是几十年前写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发展了，内容更丰富了，应该重写。

（谈到一九五八至一九六〇年三年大发展中间的经验教训时）

大有好处。不经过这么一次是不行的，是学不会建设的。搞全国规模的建设，我们没有经验。革命时期，我们有些根据地搞经济建设的经验。那时，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三个：一要吃，二要穿，三要盐。因此，就必须发展生产。这就是我们当时搞经济建设的由来。

土地改革纲领（一九三三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十年工夫。不费十年工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八个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给我的，说应该这么样办。

我们学会革命，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七大。用了二十五年的工夫。延安整风的时候，我们知道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也知道了三次“左”倾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我们总结了这些经验。所以，我们到抗日战争结束时，能够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民兵还不在内。七大开得很好，统一了思想，团结了全党。当然，也还有些问题，比如高岗、彭德怀，但我们还信任他们。彭德怀以后当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六年跟国民党是小打，一九四七年七月就开始反攻，每月消灭它八个旅，可灵咧！到一九四八

年，逐步打下了石家庄、济南，以后就是三大战役。

学会打仗，是用了十五年的工夫。我开始不会打仗，也没有想过要打仗。大革命失败了，我们当时有五万党员，分成几部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敢干、逃跑了，只剩下一两千人。七大统计时，还有八百人。这几年，除了老死的，只有六百人了；井冈山的人也只有三十个人了。在那个时候，逼上梁山，非拿起枪学打仗不行。也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进过军事学校的是少数。学会打仗，主要是蒋介石这个“老师”教给我们的。他把苏区打垮，叫我们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多人。而这两万多人，还并不都是长征来的，是经过陕甘边境庆阳、关中的云阳和东征发展来的。当时我说，这两万多人是比三十万人强了，而不是弱了。走了两万五千里，腿“讲话”了，发言了。这样我们的脑子就要想一想，遵义会议就开成了，才改过来。学会打仗，什么都是逼出来的。

（谈到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要学他们的革命精神、打歼灭战时）

不能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打个歼灭战，没有这么个□、□年工夫不够。至少四年，去年一年，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不能急。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也大概需要□□年、□□年，才能全学到手。也不能急。有的省今年就要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完，太快了。你没有那么多好干部嘛！工业基本建设也是这样，也不能太急，□年、□年建成（指年产□□万吨以上的煤井，过去一般要□年才能建成），这就算是多快了，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

（谈到什么叫作拥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我说，石油部做出伟大的成绩，它既振起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万吨石油；而且不只是□□万吨石油，还有□□万吨的炼油厂，质量是很高的，是国际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说服人嘛！

（谈到某同志革命意志衰退，需要提拔青年干部时）

有些人到底是有病，还是革命意志衰退？还是一礼拜跳六次舞?！还是爱美人，不爱江山?！说是病得不得了，不能工作，能病得那样厉害?！……像某些同志，到底是爱美人，还是爱江山?！我看叫他搞□□不一定能搞好，要给他配个“宰相”。

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那时是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干事时只有十七、十八岁。周瑜死时才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事实上，年青人打败了年老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谈到大寨生产队的陈永贵时）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全国人代会开会时，我的一个同学□□□，现任湖南省副省长，他要跟我谈一谈。他说，现在了解到了，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的，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善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

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是不识字的老粗；刘邦，也不认识几个字，是老粗；朱元璋也不识字，是个放牛的。我们军队内，也是老粗多，知识分子少。许世友念过几天书！□□□没有念过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念过高小，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当然，没有几个知识分子也不行。林彪、徐向前、□□□、□□□……我们算是中等知识分子了。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谈到现在风气不错，大家都愿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愿意向别人学习时）

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我这个人也是一分为二的。我是个小学教员，小时候也信过神仙，跟我母亲朝过山，在十月革命以前并不知道有马克思，知道有马克思是以后的事情。

哪里有没有错误的人呢？我们有些同志就是喜欢形而上学。什么叫做形而上学？就是片面性，就是只准说好的，不准说坏的，只爱听好的，不爱听坏的。前年，一九六一年，□□部门就是听不得批评。像□□□同志，这是个好同志，但就是不愿意让人家看他们的坏的，只愿意让人家看好的，生怕触着痛处。

马克思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的哲学，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学来的，经济学是从英国李嘉图等学来的，又从法国学了空想社会主义。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从这里一分为二，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请问，马克思他小时候，是否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我们这个党也是一分为二的。

在反一次“围剿”之前，有人说，搞军队非打人不可，不打人怎么能带动军队?！那时，军阀主义可厉害咧！士兵说：“爱兵爱兵，连长骑马。”这句话不对，连长应该骑马。

彭历来是闹分裂的。在中央苏区时，立三路线来了，他们可

“左”咧！要打大城市，打九江、武汉、长沙。我说不行，他们说非打不行。当时有个吉安地委书记李文林，也给中央写了信，说分土地、土地革命发展和巩固并重是农民意识，说先打吉安后打九江要断送革命。这是说非打九江不可，“左”得很！十年内战，党内斗争可厉害了。

五中全会选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那时张并不是中央委员。现在查，张是不是党员，何时入党，何人介绍，都查不出来。但是，那时却选他为政治局委员，反而不让我这个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

长征到遵义会议，情况有些改变。王明路线，应该有个分别，遵义会议前和会议后不同。

跟四方面军会合，我们讲老实话，告诉张国焘，说我们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有三万人了。讲老实话嘛！那时四方面军还有八万人，张国焘就向我们要领导权，我们不给。张国焘他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以后，就到了陕北。抗战中间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有王明路线，还有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之类的东西。七大前，开了斗争彭德怀的会议。他在庐山会议不是说，你们骂了我四十天，我也骂你们二十天。延安斗争会，你们参加了嘛！他就是不分散（指百团大战），要搞集中。实际上，那时一个排分散出去，就可以发展成一个团、一个师。

解放以后，还不是一分为二？高饶反党集团，一九五三年是一个大暴露。财经会议时，他们说，□□、□□等是一个宗派。我谈了，中国革命就是许多山头闹成的，没有山头，哪有革命？我们那时又没有共同纲领。

彭与高岗是在陕北结合到一起的。没有想到，邓华也跟他们搞

到一起。邓华跟我谈过话，他觉得井冈山没有山头，很没味道，以后就找彭去了。死了的那个陈光，也感到没有山头，不满意。

一九六二年，又闹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各部门可不稳呢！邓子恢要搞“包产到户”。王稼祥过去从来是有病，那半年没有病了，就是要“三和一少”。可积极哩！我们现在就是要“三斗一多”。统战部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并且定了五年计划，软绵绵地，软下来了，就是向资产阶级投降。那时他们在国际上是要搞“三和一少”，在国内是要搞“三自一包”。彭德怀的反攻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习仲勋他们的《刘志丹》一书，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谈到读书时）

愚公移山，是有道理的，在一百万年或者几百万年以内，山是可以平的。愚公说得对：他死后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再生儿子，孙子也再生儿子，子子孙孙一直发展下去，而山不增高，总有被铲平的一天。

哲学讲半个钟头就行了，讲久了反而讲不清楚。书也不要读得太多，读几十本就够了，越读多越不清楚。

（谈到农村粮食收购、换购的）

有些地区不搞基本口粮，我不赞成。要搞基本口粮。

对《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1]的批语[2]

（1964年3月至1965年5月）

一

刘、周、邓、彭、康、陈、冷西[3]各同〔志〕阅。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阅后退毛。

二

送陈毅[4]同志一阅，退毛。

三

此件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5]三同志一阅，请提意见，以便修改。其中关于临时中央不合法的问题，已在一九四五年七大前的中央会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6]上不提了，即承认其是合法的了，这样做于全党有利。其中又提了总理[7]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我自己在一九四一年（可能是这一年的春季，因为文内没有提到欧洲战争）写好[8]，只给弼时、少奇[9]两人看过，自己也忘了。1964年，忽然有人把原稿的照片（在革命历史博物馆[10]找到的）送给我看，我才记起确曾写了此文。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日

四

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现在年深月久，这个不利于团结的问

题不存在了，干部不会因为看了这篇文章怒发冲冠，不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从而破坏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了。此文究是何年写的，记不起来，大概是一九四〇年，或一九四一年的上半年吧，因为文中没有提到希特勒[11]发动世界大战。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

[1] 指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一篇长达5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的文章。这9个文件是：（一）《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9月20日）；（二）《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1931年9月22日）；（三）《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年12月11日）；（四）《中国共产党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五）《中央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1932年2月26日）；（六）《中央致各级党部的一封信》（1932年3月30日）；（七）《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年4月4日）；（八）《中央为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给各苏区党部的信》（1932年4月14日）；（九）《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1932年5月11日）。文章着重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予以展开，根据9个文件写成9个部分，亦称为9篇文章。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9个文件，都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发出的，时间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这些文件大致反映了王明等人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政策的内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初稿写出后，曾作过好几次修改。初稿题目是《关于和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后来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内容上也作

了一些较大的调整。1965年5月，毛泽东又对它作了重要修改，增加了一些文字，标题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这篇文章最初没有打算发表，1965年1月，毛泽东在征求修改意见的信上写道：此文“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2]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1964年3月25日分别在印有“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标题的封面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1965年1月2日为送阅这篇文章写的批语。四是毛泽东1965年5月12日修改这篇文章后写的批语。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4]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5]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

[6] 指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7] 指周恩来。

[8] 经仔细查对这篇文章的内容，其中有几处提到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早披露的一些情况，说明它应当完成于这次会议之后。

[9] 弼时，即任弼时，少奇，即刘少奇，当时他们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0] 应是中央档案馆。

[11] 希特勒，德国法西斯首领。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1]

（1964年4月3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匈牙利人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匈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共同事业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深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基础上，不断加强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有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的电报。祝贺匈牙利解放十九周年。

利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祝匈牙利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

对外交部党委关于部机关干部理论学习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4年4月6日）

退陈毅同志。

此件已阅。这样做很好。不知我各驻外使馆，亦有理论学习否？

毛泽东

四月六日

---

[1] 指外交部党委关于外交部机关干部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从1963年3月到1964年3月，外交部机关举办了五期十七级以上干部轮训班和两期十八级以下干部小轮训，学习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经过学习，收获很大。主要表现在：（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了更多的了解，对现代修正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提高了反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二）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对党的路线、政策的理解。（三）增强了阶级观点，提高了在我国防止修正主义的自觉性。（四）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信心，提高了兴趣。一年来，理论学习所以能坚持下来，取得成效，除了机关上下都感到形势逼人，非学不可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实行了一套短期离职轮训制度，把集中轮训、分散学习、业余自修三种形式结合起来。为了使轮训学习作为一项经常的制度坚持下去，在具体安排上必须注意：（一）工作与学习通盘安排。首先服从工作，但又要保证学习。（二）轮训时间短，做到长流水不断线。

关于准备同日共代表团谈话给林克[1]的信

（1964年4月8日）

林克：

日本代表团[2]，何日经武汉去越南？我想同他们在武昌谈一次话。在〈再〉问明白为要。

毛泽东

四月八日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指由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1964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他们并谈了话。

对新疆地区备战方案的批语[1]

（1964年4月9日）

退罗瑞卿同志，照办。[2]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四月九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1964年3月15日呈送的1月21日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报告的批语。

[2] 关于新疆地区备战方案指出：在新疆地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确在加紧制造边境紧张局势，其企图可能有二：一是防御性的，二是进攻性的。根据当前形势和具体情况看，上述两种可能前者较大，后者较小。但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做好应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进攻的一切必要准备。其向我进攻时，可能采取大打、中打、小打三种规模，大打的可能性较小，中打、小打的可能性较大，尤其是小打随时都可能发生。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应立足于大打，以确保主动，有备无患。新疆地区的备战方针，根据主席指示，新疆地区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一是经济问题，二是政治问题。只要把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再加政治上挂了帅，依靠劳动人民群众，新疆地区就更加巩固了。在军事方面，我们在新疆地区的备战，必须贯彻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准备持久的战略思想。报告对基本决心、部队的编组、部署及任务、国防工程建设、调整和加强新疆军区指挥机构、各种保障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接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4年4月1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来了多久了？

马利克·本·纳比（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长，以下简称纳）：已经八天了。

毛：听说最近你们签了一个文化合作协定。

纳：签了两个协定。一个文化协定，一个电视广播协定。（注：该团在北京签订了中阿文化合作协定一九六四年度执行计划及两国广播和电视合作协定）

毛：这次你们代表团有许多专家？这位（指一团员）是干什么工作的？（团长向主席一一介绍代表团成员）我们很欢迎你们。中国人民对你们的来访是很高兴的。你们的胜利是一个大好事。非洲有你们一个国家是打出来的。你们给非洲树立了一面旗帜。这不仅是对非洲、对亚洲、对拉丁美洲都有很大影响。它指出一件事：很弱的，很小的力量，比如军队，可以打败号称八十万人的帝国主义军队。那时看来你们还没有八万人，大概只有三万人。现在好多法国人走了，有一百多万居民也走了。是不是这样？

纳：是的。

毛：学校里没有教师，医院里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两年以前，还是……

纳：一年半以前。

毛：现在好些了嘛。现在有些教员了嘛，有些医生了嘛，有些工程师了嘛，工厂也可以开起来了，农庄也可以办起来了。看起来你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你们这些人不是（知识分子）吗？不是有教授吗？有专家吗？这还只是讲你们文化方面啰，没有讲经济方面，也没有讲医务方面。你们有些工作是不是军队的人在做？

纳：军队现在参加了大的工程和地方管理工作。

毛：我们也一样。我们的文化可能没有你们的高。

纳：我们想正好相反。

毛：我们国家过去文盲很多。一百个人里有八十个不识字。我们的军队多数是由受压迫的、没有多少文化的人组成的。他们打了十几年的仗，一面打仗，一面学习文化，解放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学校。但是基础文化他们根本就没有学过。他们就跟国民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合作。国民党走，知识分子不跟他们走。工程师也不跟他们走。他们说他们从大陆带了二百万人走了，主要是军队。他们过去有几百万军队，打到后来，带了三十万军队走了。现在听说大约有六十万人。蒋介石的军官都是军事学校毕业的。我们的军官在军事学校里毕业的很少，只有个别的。大多数的军官是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的。就是这支工人、农民的军队打败了知识分子的军队。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就是没有知识，就像法国的军官没有知识一样。（笑声）那时候你们有一个总理，叫阿巴斯，和我谈过。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法国军队也用我的打仗的书来教育法国军官，想消灭你们。

本·科比（副团长，以下简称科）：（笑着点头称是）他（指拉齐兹）还写过这方面的。

毛：我跟阿巴斯说，法国军队是压迫人民的，是用不了我们的经验的。听说美国的军队也用我们的材料教越南南方的反动军队打越南人民。因为我们的经验是人民军队作战的经验，是人民军队积累起来的经验，归根到底，他们用不着。（对拉齐兹）你写过些什么书?

拉齐兹：我写过一篇文章，讲法国军官想利用毛主席的著作来打我们的这个问题。但是他们是为封建主来打人民，而主席的著作是教我们为了人民去打封建主。

毛：对的。结果法国没有打赢，你们胜利了嘛！比如中国，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你们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吗？古巴不是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胜利了吗？我们花了二十二年的时间打仗，你们花了七年时间，古巴只花了三年时间。情况不同，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你们根据你们的情况，敌人的力量，所以要花七年时间，古巴的情况只要三年。我们根据我们的情况花了二十二年。有些账不能挂在敌人身上，要挂在自己身上。我们的党犯过很多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过几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个是把南方根据地统统丢掉，那不能怪蒋介石，只怪我们自己。统统丢掉，跑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路。跑到北方，把南方根据地丢掉。军队由三十万人减少到两万人。这时我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事情好办了，舒服了。这样就可以总结经验了。这两万军队后来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了八年，又发展到一百几十万，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万万，党员由几万发展到几百万。你们到中国来研究，要研究这一段历史，要研究我们失败、犯错误这方面。你们还没有研究过吧?

纳：主席先生，我们到中国来，将从中国领导人的意见中吸取

教益。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四十年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但最能打动我们的是中国的成就，而不是失败。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在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机构。我们这几天看到了政治机构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先到了广州，现在又到了长沙，当然，我们的旅程不是完全按照历史顺序的。

既然主席先生提到了我们同胞阿巴斯，我想用我和我的同志的名义说明一下。阿巴斯是属于你们称之为买办阶级的那个阶级。以本·贝拉为首的领导集团正在清除其错误。我们正在按照主席刚才讲的革命传统这样做。

毛：他现在不干了，不跟你们合作了。

纳：我们不仅希望改进我们的政治机构，而且特别要改进我们的思想方法。

毛：这个好。

纳：我想我不必花太多的时间来讲法国殖民主义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因为上次和周恩来总理讲话时已经谈过了。周总理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讲话的习惯是短的。我们把毛主席说话的这种规则，看成我们自己的规则。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主席充分了解当时的局势。

毛：他们都走了更好。你们那里更干净。在一张白纸上更好写字画画。你们的负担更少。你们重新干起，白手起家。帝国主义做过的事，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人民也能做到。我就不相信就只有欧洲或北美、日本的资本家才能做到。第一条，我们人多，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总是占多数。第二，在这些人里头，总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和干部，他们不会的可以学会。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看，你们克服了法国八十万军队的困难，难道现在在经济方面、文化方

面、政治方面遇到的困难不能克服吗？我提到政治方面，是因为还有反对你们的，也有要推翻你们的人，有没有？

纳：在我国的周围有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国内有新老殖民主义的仆从，他们反对我们新型的民主和自由。

毛：国内没有吗？

纳：在殖民主义统治时期，他们扶植一些资产阶级，用来压迫人民。这些资产阶级就成了当地的官僚阶层。他们想要实行对人民的控制。这批资产阶级是殖民主义一手制造的。

其中一部分，在经济方面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人就是右派分子，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反动；还有一种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反动。这是些自称有进步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实际上是托派。阿共就是这一派。正如您所知道的，阿共是受法共领导的。

毛：你们的共产党老是埋怨我们不跟他们说话，说他们没有政治地位。我们说：“你们名为共产党。革命嘛，你们不参加，你们反对，等到后来革命有点希望了，你们又说要参加，那时已经晚了。”所以你们的共产党和我们谈不来。（笑声）我们和你们谈得来。这有点和古巴相似。

纳：感谢主席对我们的健康力量表示信任。我的同志们和我，会把这一点转告我国的革命者。

毛：你们把阿巴斯，还有贝勒卡塞姆清洗掉是有道理的。那些人不行了。所以要靠你们，靠你们的党。听说，民族解放阵线最近要开大会？

纳：本月十六日开。

毛：那你们什么时候回去？

纳：二十一日。

毛：今天十五号，还有四五天。你们怎么安排？上海还去不去？

纳：我们等丁□□先生解决这个问题。

毛：（对丁□□）时间不多嘛，要看他们的方便，少走几个地方也可以，不要搞得太疲劳。（转向团长）你们是从广州来的，还是从北方来的？

纳：我们是从香港到广州之后去北京的。

毛：少看一点也可以。

纳：我们对知识的渴求是很高的。在中国作一次旅行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当中许多人不一定有机会再来，所以要尽可能多带一点收获回去。

毛：看中国要看两方面，就是成功的方面和缺点、错误的方面。不了解这方面也就不了解那方面。正如你们也有这两方面一样。你们是经过曲折道路走过来的。为什么阿巴斯、贝勒卡塞姆跟不上了呢？

纳：这是因为——这也是中国之行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我国的革命运动所处的条件不一样，虽然有政治上的准备，但缺乏思想基础。我们在中国长沙了解到。三十多年来，毛泽东主席最关心的是培养干部，是建立能够产生革命思想的中心。

毛：你们现在进行对人的教育、思想教育，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我们也是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的，是有几十年经验的。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在干部中间，什么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什么叫买办资产阶级，是比较清楚的。怎样对付它们的政策，也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经过曲折，犯过错误。至于怎样搞社会主义，就不清楚了。所以现在要重新对老干部、新干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胜利了十四年，我们又重新抓起了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自己不懂，怎么教育别人呢，现在情况好了一些。

纳：至于我国的革命形势，我还想补充一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自发形成的，是在青年中自发形成的。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这对我国的革命思想是可以适用的，是和我国革命思想吻合的。就是说，我们经历过幼稚病的阶段。

毛：我们也犯过幼稚病，犯过三次之多。最后一次把我们南方根据地丢掉了，还跑了一万多公里，就是长征。那时我们叫“教条主义”。就是不根据中国实际，专门抄书本，抄教条，抄外国的经验。我们也有过几次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拿现在的话就叫修正主义。那是从资产阶级来的思想。你们将来再把我们的这段历史研究一下，也不要很多时间，个把星期就够了。（对周□□）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谈话。你们参加没参加反陈独秀、王明的斗争？

周□□（以下简称周）：反陈独秀时我们正是个娃娃，是个小鬼，反王明的后期倒是参加了。

毛：第一任总书记是陈独秀，这个人后来是托派。后来好几届书记也都不行。所以跟你们也差不多。我们这个党也不是顺畅走过来的，是经过艰难困苦过来的。现在我们党内也不是什么都是好的。有许多党员挂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许多干部也是这样。我劝你们要了解这方面，可能对你们会有用处。

纳：我和我的同志们相信，主席先生讲的意见是真理。因为您领导了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正是您讲的这些黑暗势力，足以摧毁革命事业。在我们这里，（还不止是阿尔及利亚，而是在整个阿拉伯集团）没有建立起监督的标准，来识别表面上革命，实际上可能把革命毁掉的分子。我讲这个话，并不是以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团

长的身份，而是以作家的身份讲的。

毛：你是位作家，有什么著作？

周：他有十五本著作。

毛：那方面的？

周：政治方面的多一些，其中有一本叫《亚非主义》。

毛：噢。

纳：谈到《亚非主义》这本书，我正想说明一下。因为不知道主席今晚就接见，所以把书放在宾馆，没能带来。对我个人来说，来中国的目的几乎就是为了要把这本书送给主席。为了弥补这个不凑巧的情况，现在我是否可以回去拿？

毛：可以吧。（对周）他们明天在这里吗？

周：（对团长）可由我转交。明天去韶山，主席的旧居。

纳：对于我和我的同志们来说，能到主席旧居，这将是访华之行的光辉顶点。

毛：那个地方，解放后我只去过一次。离开三十几年了。过去不是我不愿去，而是国民党不让我去。（笑声）

纳：我们在中国很幸运，能够看到中国革命各个阶段。首先在广州看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后来在北京我们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在那里，看了长征的经过。听说你们把长征称作英雄——在这里，英雄是指事，而不是指人了。在我们离开博物馆时，发现门口处写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决定革命形势的是人，而不是武器。同时，还看到林彪讲的一句类似的话。

毛：就是人干出来的嘛！开始我们一件武器都没有，现在有了政权，可以自己开工厂了。制造武器的是人，使用武器的也是人，夺取武器的还是人。你们现在尚未达到制造武器的阶段，但是有修

理武器的工厂。这些工厂以后可以变成制造厂。可以从轻武器入手，一直发展到制造重炮、坦克。你们一定会发展到那个阶段的。我就不相信，只有法国人能制造大炮，阿尔及利亚人民不能制造。法国人积累了二百年经验，你们只几年。你们会比法国人快。法国有四千万人口，你们有一千多万。但是，为什么你们一千多万人口的国家打败了四千多万人口的法国呢？所以你们是很有希望的。

我跟你们的谈话和对法国议员代表团讲的就不同。我就不对他们讲什么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现在还犯的错误就更不讲了。（笑声、掌声）因为我们希望你们如实了解中国情况，不要只了解片面的。法国资产阶级代表，他们不愿意听这一套。讲革命经验对他们无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和他们讲干什么呢？你们是革命党，我见了革命党，就介绍两方面的经验。我只对你们讲。对别国的革命党也讲，但不包括你们的共产党。他们不会来，来了我们也不讲这一套。

纳：因为阿共是多列士的门徒，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生。这个区别很大。

毛：跟法国共产党我们也讲不来。他们也没有代表团来。现在共产党不一致，有点小矛盾，不大也不小。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和你们的党（指阿共）怎么能谈得来呢？再如法共，他们天天反对我们，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又说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你们现在和我这个托洛茨基主义谈话，（笑声）跟我这个教条主义谈话。（笑声）他们只是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

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意见要谈吗？

纳：刚才我讲到，我们关切中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发展，现在它已发展到了人民公社的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我们也知

道，这引起了某些共产党的批评。但我们相信，这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好的“王牌”。

毛：可能是，但还要看。现在还在试验过程中，最后的结论是以后的事情。有些共产党反对我们的措施。说我们不行了。这跟帝国主义一样。帝国主义也反对我们人民公社这一套。帝国主义反对，法共他们也反对。可能有些好处也说不一定。要不然，假如一点好处也没有，那他们为什么反对呢？只好欢迎了。这就是说，我们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的共产党是不准备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

我们也不忙作结论。究竟是人民公社崩溃，还是发展？要再看。前一阵子，帝国主义说中国政府要崩溃，现在又不大讲了。看样子中国还没有崩溃。我这个人倒是会崩溃的，快要见马克思了。我们的医生就是不能保证我还能活几年。这是客观规律，人总是要灭亡的，是辩证法。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但是一个人灭亡，一群人灭亡，并不等于一个国家灭亡。现在马克思不在了嘛，恩格斯不在了嘛，后来又有了列宁、斯大林。现在这二位也不在了嘛。世界就灭亡了吗？不但没有灭亡，还更加发展了。中国革命胜利了，你们的革命胜利了。古巴的革命胜利了。这就是规律。（对团长）你多大年纪了？

纳：五十九岁。

毛：还年青嘛。（对副团长）你多大了？

科：三十一岁。

毛：我们总还能活几年。你们活得更长些。

科：我们衷心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尽可能的长寿。

毛：说“尽可能的长寿”，这话好。只可以尽可能活得长一点，

不可能不死。中国历史上还没那回事。

你们回去后，请代我问候你们总统，说我祝福他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克服困难，向前发展。

纳：主席先生，非常感谢您接见了我们。您牺牲了您的时间，本来您还有极其重要的工作。我想向您表达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敬意。是您领导了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我想表示的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有发自内心的友好感情，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就是殖民主义。他们的斗争所处的条件，也几乎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你们是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战胜了敌人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也是从法国军队手里夺取了武器打垮法国军队的。我们要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敬意。

毛：要向你们国家的人民表示敬意，向你们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敬意。你们的本·贝拉总统的全名怎么写？（翻译用纸条写好，主席阅毕收存。）

纳：谢谢您，再一次向您表示衷心的敬意。感谢您的热情接待。

毛：谢谢。再见。

1964年4月15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阿尔及利亚文化代表团。

毛泽东等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

（1964年4月1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在你七十寿辰的时候，我们向你祝贺，祝你健康和长寿。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于生长在列宁主义故乡的、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一向怀着深厚的兄弟情谊和最大的尊敬，对他们在十月革命以来的几十年间所获得的伟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苏两个伟大兄弟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从根本上说来，只要我们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就决不会放松他们的反苏、反华、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政策。我们坚决相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要求，由于全世界各国革命人民的要求，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从长远看来，总是要紧密地团结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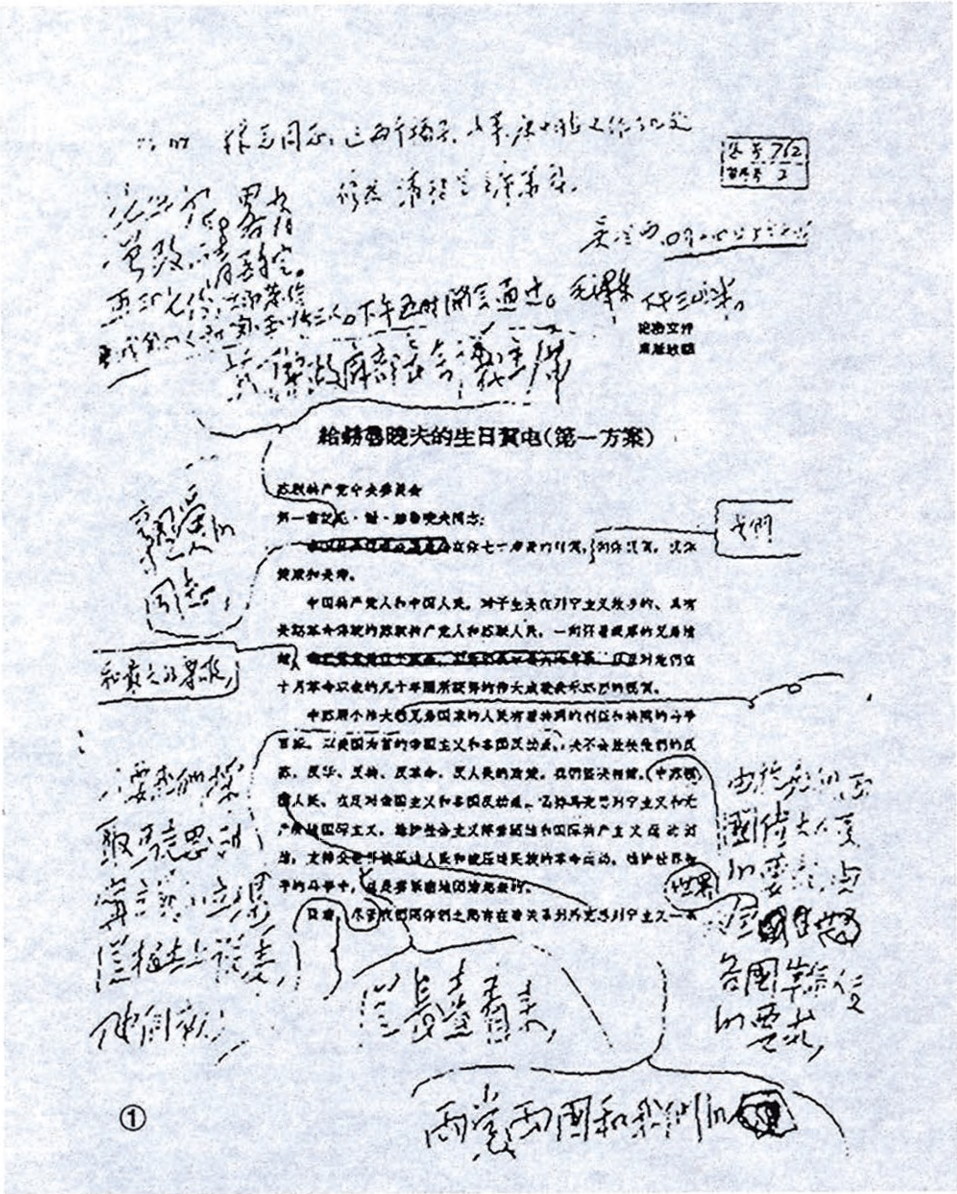
尽管目前我们同你们之间存在着关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系列原则问题的分歧，存在着不团结的状态，但是，我们坚决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一旦世界发生重大事变，中苏两党、两国和我们的人民就会站在一起，共同对敌。

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他们总是会失败的。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

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



給赫魯曉夫的生日賀电（第一方案）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

①

毛泽东修改的祝贺赫鲁晓夫七十寿辰的电报的手稿。

政策正确就能团结人民多打胜仗[1]

（1964年4月16日）

一

要团结人民，同人民站在一边，并把自己武装起来。没有武装，有一天要被打倒的。什么叫政权？主要是军队。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权。什么叫独立？没有军队，就没有独立。什么叫自由？没有军队，就没有自由，人家就要压迫你们。什么叫平等？没有军队，谁同你们讲平等。

二

敌人集中兵力，你们就分散，到敌人力量小的地方去活动。你们要准备搞三至五年，力量大了，假如政策正确，就能建立革命根据地，团结人民，少犯错误，少打败仗，多打胜仗。当然错误不可能不犯，败仗不可能不打，假如政策基本正确，几年力量就大了。那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们力量大了，可能看轻敌人，容易犯冒险主义错误，受到一些挫折。如果受到挫折，那是很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刚果（布）特使安托万和刚果（利）非洲团结党政治局委员米都迪迪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好的事，你们就会总结经验，纠正政策中的缺点和错误。另一种情况，你们实力大了，帝国主义和走狗就会来骗你们，请你们的人又去当副总理，他们又会来这一手。

我所讲的是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的。我们犯过右的错误，也犯过“左”的错误。同蒋介石打仗，有了三十万军队，认为了不起，打大城市，采取不适当的措施，结果受到了损失。

我们总结了犯右的错误和“左”的错误的经验，以后比较好一些，政策比较适合情况。因为我们犯错误，从高峰上摔下来，力量很小了。后来，总结经验，又发展了。这时，美国人看得起我们了，蒋介石也看得起，请我们去谈判。我和周总理都去了，到蒋介石那里去。美国大使到我们根据地来接我们去谈判，要我们加入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也是说“和平建国”“两党合作，共同建国”。美国有一个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1]，在中国呆了很长时期，作出了决议，“和平建国”“两党合作”，要我们把一百二十万人编成十二个师。结果证明他这一套都是假的。蒋介石准备好了以后，把一切谈判决议统统撕毁。日本投降以后这几年，我们打了三年半，把蒋介石赶到台湾，美国人也走了。

我们又在朝鲜跟美国军队打了三年。不要怕什么美国军队，它那些士兵打仗时要喝牛奶、吃饼干。我们的士兵没有饼干、牛奶，一天吃上两三顿饭就了不起了。我们的士兵如果一天有一斤面、五钱油、一斤蔬菜，就是很好的生活，通常是三钱油，有时还少于此数。

---

[1] 马歇尔，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在中国“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支持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三

你们已经是取得政权的党，也要注意。你们自己武装不够，要逐步扩大，武装要掌握在可靠人手里，也要准备发生困难。帝国主义要把你们颠覆掉，你们怎么办？你们就怪自己的命，痛哭流涕吗？只要有人，就可以想办法。

小，没有关系。主要是要继续斗争。力量不在于人多少，不要把自己看小了。你们八十万人，小国，别人这么说，但我们不能这么说。法国就是怕这些小国。阿尔及利亚和法国哪个大？还不是阿尔及利亚打败法国人！就是因为他们坚持武装斗争，打了七年，开始只有几百、几千人，最后也不过几万正规军。法国逐步增兵，最后听说到了八十万军队。那时，我们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法国不承认，它一定要打，最后结果还不是法国人跑了。现在世界上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只要有斗志，能团结，采取正确的政策，他们就害怕。

对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报的批语[1]

（1964年4月24日）

汪东兴、林克[2]阅后，送江青，江青阅后送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定一[3]阅后，退毛。

这是一批好材料[4]，易看，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看了大有

---

[1] 这个批语写在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1964年3月4日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期上。

[2] 汪东兴，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3] 少奇，即刘少奇。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4] 指湖南省贫下中农代表会议资料处编印的《会议简报》第一至第八期。第一期刊登的是与会代表的构成以及他们参加会议的心情、所抱的态度和提出的要求。第二期是对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所作报告的初步反映。第三期是五个地区分组讨论阶级路线问题的情况。第四、第五期是各地区代表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受到深刻、生动的阶级教育的情况。第六期是分组重点讨论党和贫下中农互相依靠问题的情况。第七期是参观社会主义阶级教育展览会反映续志。第八期是宜章县梅田公社车头大队代表黄世贵在小组会上关于如何长贫下中农志气的发言。

益处。这个问题要在五月会议[1]一谈。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

[1] 中共中央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

对新华社的指示

（1964年春）

你们新华社只有几千人，太少了，恐怕是世界通迅社中最小的吧！可以办得更大一些。

贺新郎·读史

（1964年春[1]）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2]，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3]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4]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5]

---

[1] 1964年春，这首词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做医护工作并曾帮他保存诗稿的同志的回忆。

[2] 石头磨过，把石头磨成石器。石器时代是人类的“小儿时节”。

[3] 铜铁炉中翻火焰，指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青铜器和铁器都要用炉火来冶炼和翻铸。

[4] 不过几千寒热，这里作六字句，是此调的一体。赵朴初提出，照词律，这里一般是七字句，当作“不过是几千寒热”，可能写漏一个字。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只经过几千年，和石器时代经过几十万年不同，说明人类的进化越来越快。

[5]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前句用唐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句：“尘世难逢开口笑”。全句指人类过去的历史充满了各种苦难和战争。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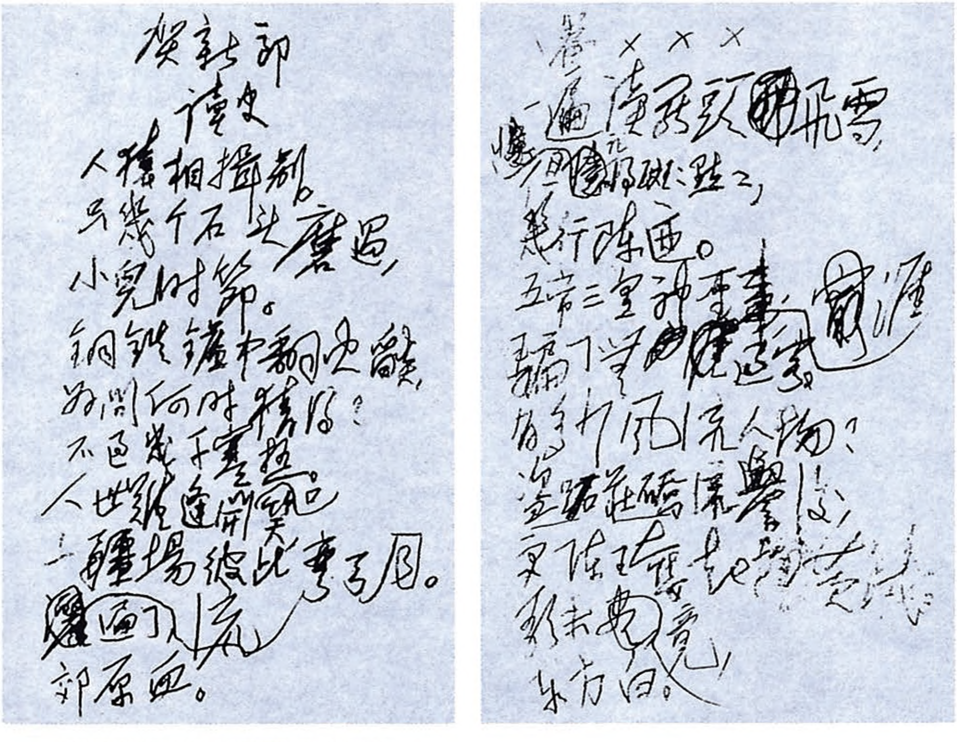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1]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屩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2]
歌未竟，
东方白。

---

[1] 五帝三皇神圣事，传说中国上古有三皇五帝，具体说法不一，总之都被认为是最高尚最有才能的神圣人物。

[2] 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盗跖，跖被古代统治阶级污蔑为“盗”，后来袭称盗跖，春秋时人。庄屩，战国时人。近人多认为他们是当时被压迫阶级的起义领袖。《荀子·不苟》称盗跖“名声若日月”。同书《议兵》称楚国在垂沙一战被齐、韩、魏三国打败，将领唐蔑被杀，“庄屩起，楚分而为三四”。流誉，流传名誉。陈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他进占陈县(今河南淮阳县)，称王。挥黄钺，挥动饰以黄金的大斧。《史记·周本纪》曾说周武王用黄钺斩商纣。这两句是用来概括中国几千年历史上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斗争。



贺新郎
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
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
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蹻流誉后，
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歌未竟，
东方白。

毛泽东手书《贺新郎·读史》

对公安部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4年4月24日）

刘、周、邓、彭[1]阅。这个材料[2]可以一看，看后，退回徐子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公安部党组1964年4月7日关于调查处理胡芷芸案件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遵照你的指示，现已查明，下放干部胡秀云反映的问题，完全属实。北京市北苑劳改化工厂的劳教分子胡芷芸坦白了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宽大，反而受到加刑处分（延长劳教一年）。胡芷芸，女，1955年考入北京医学院，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1959年9月因仍不认罪，被开除学籍，送劳动教养。1963年11月她劳动教养期满，中队干部根据党的政策和她思想确有改造的情况，提议给她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但是，北苑劳改化工厂领导和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处却根据删掉了胡自我批判内容的片面摘抄的材料，把她的坦白说成是散布修正主义，坚持反动立场，决定延长她一年劳动教养期限。这就导致了坦白不是从宽反而从严的怪事。经过检查，市公安局劳改处和化工厂的领导进行了自我批评，并对胡芷芸的问题作了重新处理，宣布撤销原来延长劳教的决定，摘掉右派帽子，按期解除劳动教养，并拟适当安置工作。4月上旬，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将公安部党组这个报告面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对汪东兴说，你看确有此事吧！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服劳役的，只有压服不行。其实，抓紧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4月13日汪东兴向公安部门作了传达。

荣[1]同志。

毛泽东

四月二十四日

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

---

[1] 徐子荣，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对为播发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反华文件写的《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1]

（1964年4月26日）

康生、冷西同志：

按语看过，很好。可在今日广播，明日见报。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六日上午零时五分

---

[1] 这个批语写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4月25日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稿给毛泽东的信上。这个编者按是为发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而写的。这个按语1964年4月27日和28日两次在《人民日报》上刊登。27日，在按语下全文刊登了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反华报告、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决议、苏联《真理报》4月3日的反华社论。28日，在按语下刊登了赫鲁晓夫最近期间的反华言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按语最后声明：对“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以前和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予回答”。

在谢富治汇报劳改工作时的指示

（1964年4月28日）

谢富治（以下简称谢）：去年我们着重抓了改造，然而生产是近年来最好的一年。但劳改工作中改造与生产的关系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究竟是人的改造为主，还是劳改生产为主，还是两者并重？是重人？重物？还是两者并重？有些同志就是只重物，不重人。其实人的工作做好了，物也就有了。

谢：我在浙江省第一监狱守硕中队，向犯人宣读了双十条，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也在乔司农场五大队宣读。读后，绝大多数原来不认罪的犯人认罪了，许多顽固犯人也有转变。

毛：大概那些人是比较有用的。他们为什么对双十条感兴趣？

谢：他们懂了党的政策，感到他们自己特别是家庭和子女有了前途。

毛：是啊！有前途改造就有信心，不然，一片黑暗，改造就没有信心了！

谢：许多干部起初反对向犯人宣读双十条，但读了以后，犯人反而好管了，因而干部也就改变了。

毛：许多干部不赞成读双十条，是怕读了以后，他那一套不灵了。他不相信能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新人，过去红军军官带兵靠

打人、骂人、关禁闭、枪毙等等。当连长、排长如果不打人，不骂人，不摆威风，他就没有法子带兵了。这种事情搞了多少年，后来总结了经验，逐渐改变，兵反而好带了。做人的工作，就是不能压服，要说服。现在，你的那一套在劳改中开始见效，但才是个开始，也要搞多少年才行。

毛：对，原有的劳改干部水平不变。

谢：劳改干部质量较弱，但任务重，劳改工作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都有。

毛：是啊，你一样都不行，怎么能改造人？（谢富治同志说了经过蹲点研究，提出劳改工作的“四个第一”“二个为主”“二个从宽从严”。对刑满就业人员的处理，提出“四留、四不留”，要求劳改干部对罪犯要“四知道”时。）

毛：这很好，其他地方怎么办呢？

谢：准备经过试点，逐步推广。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的改造工作都做得较好，释放后，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都表现很好。

毛：在一定条件，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以后，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只靠强迫压服。

1964年4月28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爱·弗·希尔。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4月30日）

一

康生、冷西同志，并请告中央常委各同志：

同意这封信，只在第7、8、9页上，作了一点增改[2]。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来信的复信稿的批语。这个批语写在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吴冷西（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4年4月29日为送审致苏共中央的复信稿和致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的复信稿给毛泽东的信上。对信中“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和自去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内部交换的信件，拟在5月6日或7日见报”一句，毛泽东批注：“8日或9日见报为好”。1964年5月7日，《人民日报》以《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来往的七封信》为题，公布了中共中央1964年5月7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以及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信。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4年3月7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

[2] 即本篇三。

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

毛泽东
四月卅日

二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好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公开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公开分裂吗？

同志们，我们是反对分裂的。在你们扬言要抛出的法宝统统都抛出来之前，在双方的论点和意图都弄清楚之前，在准备工作充分做好之前，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国际会议只能导致分裂，我们是不能同意的。

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不仅今年五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是不可能的，就是在今年十月举行也太早了。我们认为，中苏两党会谈以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五月较为适宜。到那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

三

至于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我们认为，这个会议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大会，而绝不应当成为一次分裂的大会。为此必须作好充分的准备工作，而不应当匆忙召开。这是我们一贯的态度，也是全世界许多兄弟党，包括一些同我

们存在着思想分歧的兄弟党的共同态度。这个态度，过去曾经得到你们的赞同。你们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我们的信件中，就曾经赞成要创造条件，使这个会议“不是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是导致所有兄弟党、所有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真正团结和一致”。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决裂，你们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我们劝你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

现在没有第三国际那样的国际组织，没有第三国际组织那样的有权召集国际会议的常设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也不允许由任何一个党或几个党，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这样做是非法的，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的后果的。对于这点，你们、我们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是知道的。如果苏共中央一意孤行，悍然不顾我们和很多兄弟党的劝告，一定要召集一部分赞成你们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路线的党，急急忙忙地开一个这样的会议，把它当作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话，那么，你们就将处于被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人民和一切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的大声斥责的地位，你们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而把你们标榜的所谓团结的旗帜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你们愿意干这种事吗？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对《人民日报》理论工作的批评

（1964年4月）

《人民日报》的理论工作是应付我的，谁管理论版？（答：陈浚。）让王若水管好了，他的文章多吗？

关于胡芷芸案件的指示[1]

（1964年4月）

你看，确有此事吧！有些人只爱物，不爱人，只重生产，不重改造。把犯人当成劳役，只有压服不行。其实，抓紧思想政治工作，以思想工作第一，做好这一面，不仅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会促进生产。

---

[1] 这是1964年4月，毛泽东和公安部副部长汪东兴谈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1]

（1964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约·列纳尔特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十九周年的时候，谨向你们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捷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政府总理约·列纳尔特，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的电报。祝贺捷克斯洛代克解放十九周年。

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的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五月八日

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1]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节录）

（1964年5月10日、11日）

（当谈到一九六五年全国人口估计达到七点二亿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人口是否报多了？我看，不一定有那么多。“一九七〇年人口将要增长到八亿”，这是个大问题。

（当谈到工业生产指标，例如钢只搞质量好并合需要的品种一千六百万吨时）

毛：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工业要为农业服务。当然工业本身还有个相互关系的问题。

（当谈到搞化肥增产棉花和建设维尼纶工厂哪个经济效果好些时）

毛：搞维尼纶的投资可能大些，但机器可以一直用下去嘛；还有，棉花的播种面积，总是有限的，但还是要搞。

（当谈到铁路交通在第三个五年内只能搞那么多时）

毛：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

（当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的矛盾时）

---

[1] 这次汇报由李富春主讲，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等补充。

毛：横直被没有钱挡住了。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从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人的寿命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嘛。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搞多了，不行，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钱也是工人创造的价值，农民创造的价值。就是有了钱，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财政收入你们不要打得太满了，打满了危险！过去我们吃过亏，把收入打得满满的，把基本建设战线拖得长长的。

（当谈到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同各方面还不相适应时）

毛：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摔跤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

这些，在这次会议上[1]，都要说服地方同志。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建设事业只能搞那么多了，只有那么多钱。我们的财政除了支付工资（包括支付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折旧、维持简单再生产等以外，积累并不多，只能搞那么多了。

（当谈到外贸要逐年减少粮食进口，增加新技术进口时。）

毛：很好，必须从明年起就这样做。这样好，必须如此，而且有可能。

（当谈到各方面势头很大，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时）

毛：要少而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要把基础工业同各方面的关系摆好。要记住过去几年的教训。要采取像一波同志所说的“赶猪办法”，走一百里路，是越赶越壮好些，还是越赶越瘦好些？当然是越赶越壮好。因此，必须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过去

---

[1] 指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讲是讲了，但没有做。这几年做得好些，要保持下去。搞经济建设越搞越急，行么？还是要少而精，而且要打歼灭战。

接见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1964年5月15日）

维托·卡博（以下简称博）：受到主席接见，感到幸福，这不仅是我们，而且是全体阿尔巴尼亚妇女的光荣。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什么时候到的？

博：四月二十七日。

毛：大使什么时候来的？面孔很熟。

大使（以下简称使）：十年前，当你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向你呈递过国书。

毛：你第二次来，欢迎你。他们几位（指阿电影工作者）是干什么呢？

博：电影工作者。

毛：我们两国团结起来。我们两党团结起来。很多马列主义政党（不是挂名的，是真的，就是修正主义所说的，“教条主义”的）团结起来。我们挨骂，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有人骂就好。

博：敌人咒骂，我们就感到舒服。

毛：没有人骂就是不舒服。许多事情别人不知道，这一骂就骂出来了，现在要辩论，要公开论战，许多人开始注意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开始注意研究谁是谁非。是修

正主义对，还是“教条主义”对。你们、我们被称为教条主义，挨了很多骂：又是假革命、新托洛茨基主义、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者……头上帽子很多。

博：他们除了谩骂，别无他法。

毛：可是他们不敢在报上发表我们的文章。他们说他们很有理，可是不敢把我们、你们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我们要和他竞赛，我们说，我们发表你们多少，你们发表我们多少，好不好，他们不敢。

博：他没有理。

毛：就是。他无理，他不敢。他们说我们无理。说我们是“教条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那你们把我们的东西发表啊，发表了，你们可逐条地批驳。可是他们就是不敢，胆小得很，说他们是纸老虎有道理。

博：对！对！对！

毛：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

博：修正主义是他们的同谋。

毛：中国人都欢迎你们。

博：我们到处都受到非常热情的欢迎。每到一处，欢迎都变成了友谊、热情的示威，告别时含着眼泪。这使我们感到不是小国小党，而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这是你们党进行工作的结果。

毛：你们站住了，未被压下去，是一个伟大胜利。阿尔巴尼亚四面受敌人包围，压不下去。他们提出无论如何要停止公开争论，你们赞成吗？

博、使：我们从来不同意。

毛：他们要停，提出哪怕是三个月也好。

博：赫鲁晓夫要争取时间。

毛：他们通过罗马尼亚向我们提出要停止公开争论。（此时团结报记者进来，主席站起来说："欢迎你，你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告诉他们：你们一走，我们就发表文章。我们的文章还没有写出来，就发表了其他兄弟党的文章。对他们的公开信还没有评完，只写了八篇文章，还要几篇才能评完。现在他们有新的提出来，又要时间。他们就想要开会，要五月中苏两党开会。对不起，我想大概明年五月差不多。他们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说，把你们的"集体措施"拿出来我们看看呀。

博：他们还会继续走下去。

毛：也许会搞什么"集体措施"，我们准备着。什么措施，你去搞吧！

博：中国是巨人，在东北我们看到好多东西啊！

毛：中国是个落后国家，开始有一点工业，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开始积累了一些农业的经验，再有几个五年计划要好些。越整我们，也许越好点。

（问□□□同志）你这位同志是谁？

陈：□□□。

毛：现在搞文艺，去过延安吗？

陈：去过，见过主席几次。现在是搞电影工作。

毛：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社会还有许多意识形态未改造，现在正在做此工作。

（问陈）你什么时候入党的？

陈：一九三二年，在上海。

毛：那时是土地革命时代，长征是一九三四年。今天在座的有

的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博：契布里耶、齐乌是文教部副部长。

陈：还有作曲家、导演、摄影工作者。

毛：你们都是搞意识形态工作的。

博：群众组织也做意识形态的工作，也是执行党的路线。

毛：我们党是工人农民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不肯让位，死也不肯。就要用赶的办法，但也不能太粗暴，粗暴了，人不舒畅，要用细致的方法战胜老的，老的还有其市场。主要的是我们要以新的东西代替它。你提倡的，不会一下子实现的，没那么回事，你提倡你的，他实行他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已经提了几十年了，可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同志，嘴里赞成，实际反对。现在是不是好些了？

陈：好多了。

毛：包括一些党员、党外人士，爱好那些死人，除了死人就是外国人，外国的也是死人，反映死人，又反映活人。你们国家可能也有这些问题？

博：也有。有过去的残余，有外来影响。

毛：很顽固。

博：特别是妇女。

毛：妇女要分青年、老年、中年，老人迷信，因为她们一辈子受过许多苦，把希望寄托在神上。她们的下一代比她们好点。你们去杭州参观一下灵隐寺，每天有许多人去烧香，有老头子、老太太，跟着他们的，还有她的儿子、女儿、孙子。他们是去真正烧香的，但他们的儿子、孙子、孙女是去玩的，不是真正烧香，是去逛

逛杭州的。

看情况也要看条件。在武汉、上海、杭州可看到木船、轮船工人不信神了，旧社会中轮船工人就不信神了，木船还信，敬龙王，因为没有保障，有风浪会翻船。妇女生孩子也是如此，医院有保证，她不信神了。没有医生，没有保证，还得信神。（问□□□同志）你们注意了吗？如果没有医生，叫她不信，就不行。

博：没有科学知识，不可能消灭迷信，因此要培养干部，逐步消除迷信。糟糕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通过电台、音乐、文学影响我们。

毛：这种影响要逐步地加以抵制。我们、你们的国家可以不进口修正主义的文艺作品、资本主义的文艺作品，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用什么代替它。

博：我国特别小，人少更重要。

毛：你们国小，可是在世界上表现却不小，很厉害，你们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苏联为修正主义所控制。什么叫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苏联已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当然不能说整个社会结构都变成了资本主义，它还来不及，还有抵抗力。修正主义既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就不能代表马列主义真理，只能代表少数人。苏联国内阶级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地存在着。反对赫鲁晓夫的，就要被关进疯人院。这是法西斯专政，很值得注意。我们这样国家要掌握好，我不能保证中国一百年后不出修正主义。

博：个别的会出，但以你们现在领导，不会发生的。

毛：我们争取。

齐乌：你们不是正在以革命精神教育青年吗？

毛：以阶级斗争进行教育，承认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存在，适

当进行阶级斗争，不流血的，不是开战，但少数破坏分子也得整，反革命、破坏分子、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我国社会情况相当复杂，不要简单地看问题，我常劝外国同志不要简单地看中国。有光明的一面，是主要的，也有黑暗的一面，虽然是次要，但要注意，社会是由这两面组成的。要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有两三千万人，比你们国家人口还多。

博：可组成一个一个的师。

毛：可是他们是分散的，其中程度不同，我们有办法使他们守规矩，少数不守的，有办法制服。

博：专政。

毛：专政总有一个对象，不要信赫鲁晓夫的话，他说专政无对象了，全民党、全民国家是骗人的，没那么回事。他提出这些口号，是掩盖他进行资产阶级复辟，骗人的。要揭露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欺骗，你们大概赞成吧?

博：完全同意。

毛：有阶级才有党，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代表那个。可能两个不同阶级由一个党代表。国家就是专政的工具，不然就不应叫国家。专政还要多少年？现在说不定，可能几百年。要搞共产主义各取所需，帝国主义不打倒不可能。

博：还有修正主义。

毛：还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还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文化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条件具备才有可能。这次谈得太多，太久了。

博：谢谢，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毛：问题扯太宽了。向霍查、谢胡、卡博同志和其他同志们问好。

1964年4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谢胡、卡博。

对宋任穷[1]关于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报告[2]的批语

（1964年5月18日）

少奇、小平[3]同志：

此件请阅。阅后印发工作会议[4]，予以讨论。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

---

[1] 宋任穷，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

[2] 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关于农村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汇报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党支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据辽宁省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铭新汇报，经过“四清”运动，该支部十分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认为这是能否好好把住江山的大事。为此，他们对全大队的男女青年逐个进行分析，从中挑选出14名出身好、品德优、有文化的积极分子，作为支部内定的重点培养对象。支委分工对他们进行个别培养，并根据条件分别安排他们担任一定职务，经常吸收他们列席党的一般性会议，听党课，学习毛泽东著作。经过这些办法的培养教育，他们的阶级觉悟、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得到提高。14人中已有6人具备了入党条件。支部决定把这项工作经常抓下去。报告说，何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汇报提出了农村政治工作、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准备在东北地区再次提出加强教育青年的问题，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培养接班

人的重要意义，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在进行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并整顿过党组织的地方，帮助党支部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办法，对培养接班人作出规划和安排。这个报告后面附有中共营口市委整理的关于盖平县太阳升公社何屯大队党支部培养接班人的情况简报。

[3]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中共中央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

对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的批语[1]

（1964年5月18日、6月25日）

一

少奇、小平[2]同志：

此件[3]请阅。阅后即印发工作会议[4]，讨论、修改，并确定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1964年5月15日为送审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二写在田家英6月24日为送审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修改稿和中央关于印发这个条例的指示稿给毛泽东的信上。

[2]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第一稿），全文共17条。条例对协会的性质，基本任务，会员，各级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它同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的关系，同社、队组织的关系，它的经常工作等，都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经过修改后，196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393号文件发出，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贫农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全文共18条。中共中央在印发条例（草案）的指示中说：组织贫下中农协会，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项组织方面的基本建设。县和公社的党委，大队和生产队的党组织，都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帮助贫农、下中农组织把条例（草案）中的规定切实地贯彻执行，使它们能在生产建设、巩固集体经济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常工作中，充分地发挥作用。

[4] 指中共中央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工作会议。

下来。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

二

退田家英同志，照办。

毛泽东
六月廿五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1]

（1964年5月25日）

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打仗没有什么巧妙，简单说就是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得赢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集中五个指头割他一个指头。割掉一个，他就少一个，事物是可以分割的，以后有机会又可以割一个，又少一个，只剩八个了，然后有机会再割一个，总之要割掉。所谓割掉指头，就是把敌人搞过来，除打死打伤之外，把官兵、枪支、弹药都夺取过来，这就叫打得赢就打。那么打不赢呢？就走，走得远一点，使敌人不知你到哪里去了。

重要的是政治、根据地、人民群众、党、统战工作，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和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两个学习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一篇文章的批语[1]

（1964年5月28日）

陈伯达[2]同志阅。这是一篇好文章，用简单的语言，说清楚了一个大问题。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4年5月27日《参考消息》登载的文章摘要《号召击败美国对南越的侵略，并揭露赫鲁晓夫和美共领导的两面手法》旁边。这篇摘要摘自美国《锤与钢新闻通讯》1964年4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说，赫鲁晓夫叛徒集团言不由衷地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越，但他们同时又称赞约翰逊总统是爱好和平和合乎情理的。这种两面派的政策是说明修正主义投降行径的又一个例子。美国共产党领导附和赫鲁晓夫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假装同情受到侵略的人，一方面又称赞约翰逊政府。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在四个副总理汇报时的插话

（1964年5月）

一、一定要很好地注意阶级斗争。农村“四清”是阶级斗争，城市“五反”也是阶级斗争。城市不要吹牛，“五反”工作不能在今冬明春结束，要准备三五年才能结束。城市也要划成分。至于如何划法，将来是要定出标准。不能唯成分论，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阶级。

二、关于第三个五个计划。一定要把干劲鼓足，一定要把后备留到，不能凭我们的年龄来定计划。计划一定要有客观根据。我七十多岁了，比你们大些，但是不能凭着我们在临死以前看到共产主义来定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我看还是注意数量多了，而质量没有更多的注意。

计划绝不能凭主观愿望，一定要有客观根据，要切实可靠。

三、自力更生问题。自力更生十分重要，不仅一个国要自力更生，就是一个工厂，一个人民公社、生产队也都要自力更生。在人民公社管理工作中，真正有成绩的是靠自力更生的那些公社，凡是有贷款的公社和生产队办得就要差些。现在我们全国真正自力更生的公社有三个，一个是江苏的陈永康公社，一个是山西的陈永贵公社；另一个是山东的曲阜的陈□□公社，他们从来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完全靠自己力量搞起来的。

四、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干部一定要参加劳动。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领导干部要蹲点，不能只靠听汇报。部长都要蹲点，不然就不开会……

五、今年的小麦估计可以比去年增加五十亿斤。看来今春多雨，是利多害少的。

六、第三个五年计划要从农村搞那么多人进城当工人，不是个办法。

关于下乡蹲点组织“四清”工作队给吴冷西的批语

（1964年6月3日）

此件[1]送吴冷西同志一阅。阅后退我。

你应当下决心在今冬明春这段期间，在北京农村地区，或天津郊区蹲点，至少五个月。家里工作可以间或抽时间回来处理。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抽出一批人和当地干部合组一个工作队，包一个最坏的人民公社，一直把工作做完，以后并成为你们经常联系的一个点。还要在一个冬春，参加城市五反。千万不要放弃参加这次伟大革命的机会。

毛泽东

六月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1964年5月30日下午在中央工作会议华北组会上的发言。发言指出，今冬明春的一批“四清”，是华北地区“四清”的第一次大决战，是搞好今后“四清”的关键一仗。干部蹲点，参加“四清”运动，各行各业都应当认真实行。失掉参加这场革命斗争的机会是很可惜的。文教、财贸、工交等战线的干部，除了参加“五反”以外，都应当有计划地下乡参加一下“四清”。最好搞一期，蹲点五六个月。如果我们的年青一代不下乡，不了解农村，不会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共产主义是搞不成的。因此，城市各个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和团体，都有必要好好计划，把“五反”、生产和参加“四清”加以统一安排。

对林彪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谈话的批语[1]

（1964年6月4日）

江青阅。并于六月五日去找林彪同志谈一下，说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很好的，并且很及时。

毛泽东

六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4年6月2日编印的《工作通讯》第一三一期上。该期通讯登载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同年5月9日在听取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傅钟和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关于全军第三届文艺会演情况的汇报后，对部队文化艺术工作发表的谈话。谈话说，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部队文艺工作必须密切结合部队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文艺工作的关键还是要抓创作，搞好创作要做到领导、专业人员和群众的三结合，领导上要出题目，分任务，统筹安排。文艺工作者搞好创作，要有学习毛主席著作、深入生活和练基本功这三项过硬功夫。创作人员要做到边看、边想、边写、边改。革命的文艺要有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两者不是混合，而是化合。部队文艺工作要行行出“状元”，“状元”是比出来的，要先在军区比，全军范围比，然后在全国比，也要争取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水平。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1]

（1964年6月6日）

制定计划的方法，过去基本上是学苏联的，比较容易做：先定下来多少钢，然后根据这来计算要多少煤、多少电、多少运输力量，等等；根据这些再计算增加多少城市人口、多少生活福利，是摇计算机的办法。钢的产量一变少，别的一律跟着削减。这种方法是一种不合实际的方法，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能增加那么多，别的就都落空。打仗，也计划不进去。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不晓得他什么时候要打。还有各国的革命，也难计划进去。有的国家的人民革命成功了，就需要我们的经济援助，这如何能预计到？

要改变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学上了苏联的方法以后，成了习惯势力，似乎很难改变。

这几年，我们摸索出来了一些方法。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时先看可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

收成，如何计划？五年中，按一丰、二平、三欠来定。这样比较切实可靠。先确定，在这样能够生产的粮食、棉花和其他经济作

---

[1] 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于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物的基础上，可能搞多少工业。如果收成好些，那就更好。

还要考虑到打仗。要有战略部署，各地党委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沿海不是不要了，也要好好安排，发挥支援建设新基地的作用。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农业。

基础工业，现在主要解决品种、质量问题。去年钢的数量虽然比过去少了，但品种比过去多了，质量比过去好了，用处比过去还大。关键不在数量。苏联就是以数量为标准，如果钢的数量标准完不成，就好像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行了。他们年年要增加产量指标，年年搞虚夸。其实数量计划完不成，国家垮不了台。有一定的数量，品种更多了，质量更好了，基础就更巩固了。

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不是说可以不要工业支援。水利、化肥、农药都是需要基础工业的。

要按照我们掌握的客观的比例关系安排计划。

计划不能只靠加、减、乘、除。计算出来了，各部门、各地区，就分数字、争人、争钱、打官司……要政治挂帅，要有全局观点，不是根据那个地区自己的愿望，而是根据客观存在，事物本身的规律，来安排计划。

不要老是争钱，争来了钱，就乱花钱。周信芳一个月一千七百元工资，不演多少戏，还存钱在香港。有的年青演员就作“十年的计划”，要赶上周信芳。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政策，必要时可以收买，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收买？钱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围的人。苏联的高薪阶层，先出在文艺界。

争取几年内做到不再进口粮食，节省下外汇来多买技术设备、技术资料。

不能乱花钱。不要看到情况好转了，又随便“大办”。“留有余地”过去说了多少次，不照办。这两年照办了。不要情况好了又不照办了。

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可以做到半工作半劳动。这办法值得提倡。懒是出修正主义的根源之一。

文艺界为什么弄那么多协会摆在北京？无所事事，或者办些乱七八糟的事。文艺会演，军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这个协会，那个协会，这一套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一定要深入生活。老搞死人、洋人，我们的国家是要亡的。要为工人、贫下中农服务。体育，也要对革命斗争和建设有益处的。

一般干部中，“三门”干部很多（出家门、进学校门、进机关门），“三门”不能很好培养干部。国家将来靠这种干部掌握，就危险。靠“小学门、中学门、大学门”干部也不行。不读书不行，读书太多了也不行。本事，光靠读书不行，要靠实践。我们的国家主要靠在实践中读书的干部掌握。

各省都要搞军事工业。要从工业、农业、文教挤出钱来。不要办那么多正规学校。清华，学生一万多，教职员、家属四万多。这样，领导精神会大大浪费。

院士、博士，不一定要搞。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作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讲话。图为1964年的毛泽东。

要自学，靠自己学[1]

（1964年6月8日）

要自学，靠自己学。肖楚女[2]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就是拿小册子叫人家看，什么广东的农民运动、广西东兰县的农民运动，就是这些小册子给人家看。现在学校不发讲义，我是讲大学，叫学生记笔记，叫学生死抄。为什么不发讲义？据说是怕犯错误。其实还不是一样，死抄就不怕犯错误？应该印出来叫学生看、研究。你应该少讲几句嘛！主要是要学生看材料，包括乌龟壳、青铜器。你讲历史就应该把材料给人家。材料不只发一方面的，两方面的（正、反面）都要发，新学、旧学都要发嘛！把新民校报、苏报印下去，单发梁启超的不行。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

---

[1] 这是毛泽东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肖楚女，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1926年1月曾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3月参加筹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任教员，10月底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杀害。

了几个礼拜，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出来后，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嘛！人家看嘛！现在的教员懒得很，蠢得很。（有人说写出讲义发给学生，教师就没有讲的了。）这样好嘛！自己不讲，腾出时间来，可以研究问题。

关于加强三线建设的讲话[1]

（1964年6月8日）

一

我们要注意越南南方的游击战争。那里只有一千几百万人口，还没有我们一个省的人口多，但是能打仗，游击战争打得非常好。难道我们就不行？假使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地方，怎么办？我们一个省能不能打游击战争？我看各省都可以打。

我们沿海各省要搞手榴弹厂、炸药厂、军工厂。讲了几年了，都没搞起来。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你送去。每个省都有一、二、三线嘛！军工部署也要考虑一下，只搞大的不行。每个省，就是讲沿海的广西、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还有黑龙江，那是对修正主义的，都要搞点地方的，属于地方所有的军工厂。现在地方不搞军事了，反正中央包了，打起仗来怎么办？子弹、轻武器、炸药，武装民兵都不够。打起仗来，要搞地方部队，第一、二线的省都要搞。不然，事情一来，措手不及。第二线就是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吉林、河南、山西、宁夏。敌人可以空降，但总是孤立的，到二、三线总是困难的。一打起仗

---

[1] 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来，准备打烂，准备丢掉城市，各省都要有办法。

光有武器，没有子弹、炸药怎么办？就是这一点，请你们各大区、各省注意。现在没事，打起仗来怎么办？将来敌人打进我们的国土，我敢肯定，不如南越。现在省、地、县委都不讲武了，只讲文了。

二

还有个问题，要搞第三线基地。那些地方摊子要少铺，中央的摊子也要少一些。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还有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一些军事工业，准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黄色炸药以大区为单位搞。

军事演习训练，在北京搞一次射击，请省委书记都来看一看。我也没看过，也去看一看。

三

我们对赫鲁晓夫开始没有准备他会叛变。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十月革命，我们知道修正主义出在苏联有伟大意义。南斯拉夫出修正主义不行，苏联是搞了四十多年，列宁领导的，南斯拉夫是偶然的，苏联不是偶然的了。

我们已经出了，白银厂、小站[1]，过去我们不注意上面的根子。

---

[1] 指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和甘肃省委和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

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修正主义中央。

搞一、二、三线，打起仗来准备打烂。

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草。钱就那么多，这就不要把摊铺得那么大，铁路两头铺就快些。

对共青团九大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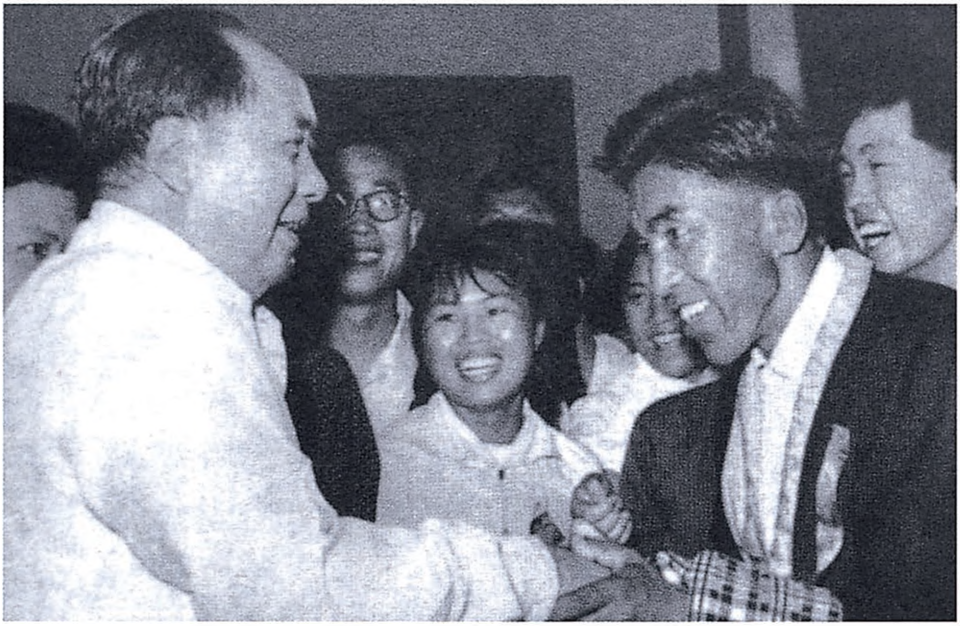
（1964年）

有为青年多得很，青年一代要打败老一代，我们的未来就是他们的，不要为名望、知识所惧怕，青年人要敢想、敢说、敢做，要从各种狭隘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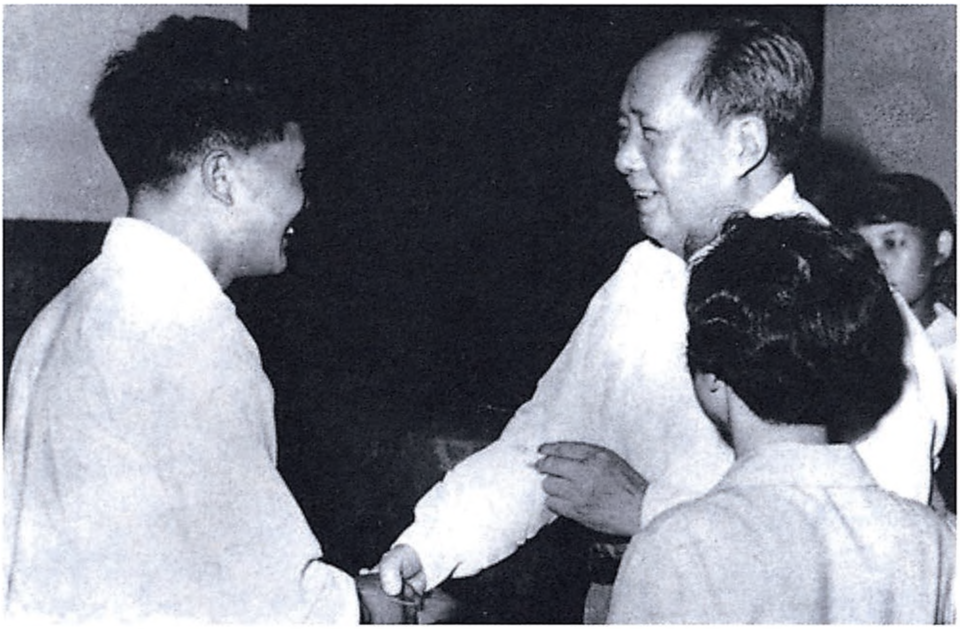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共青团九大开幕式上。

1964年6月1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4年6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等出席共青团九大开幕式。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登山运动员贡布亲切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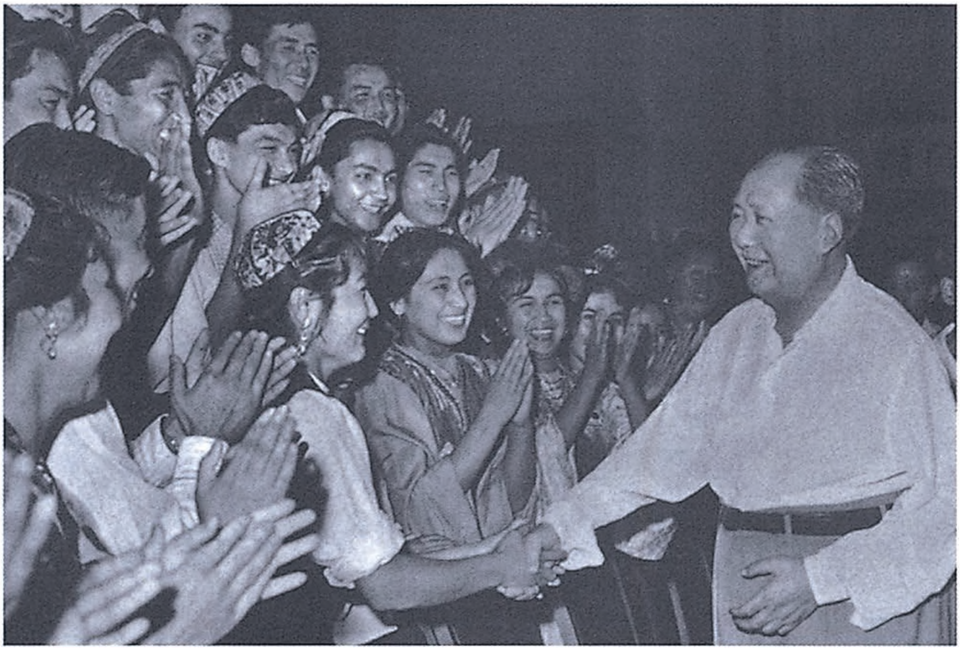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九大代表时和董加耕握手。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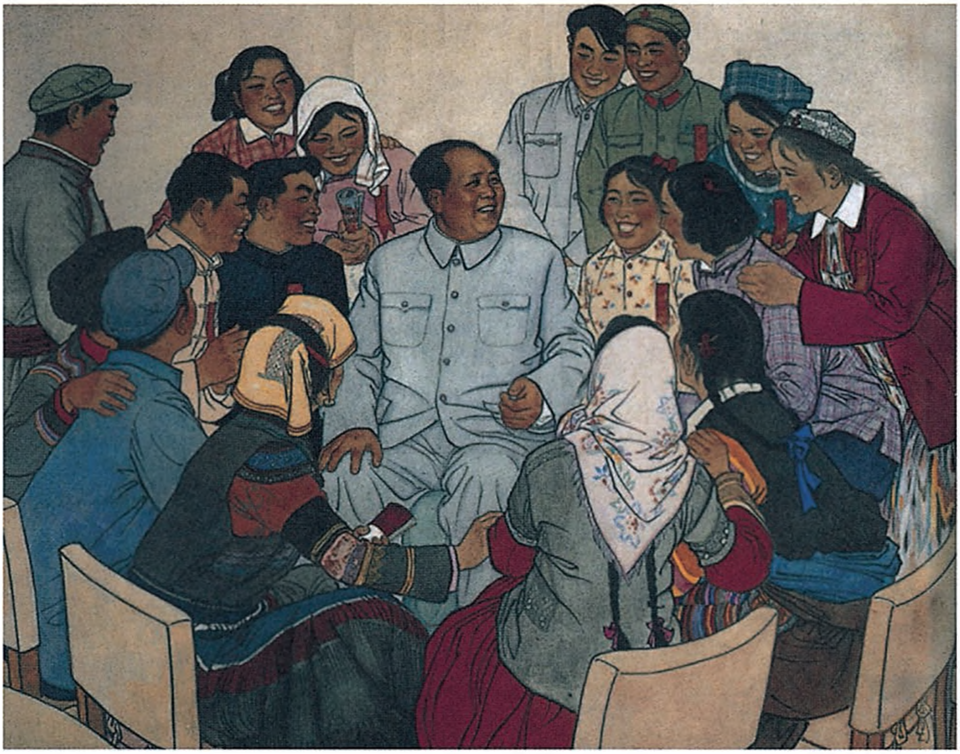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徐建春亲切交谈。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亲切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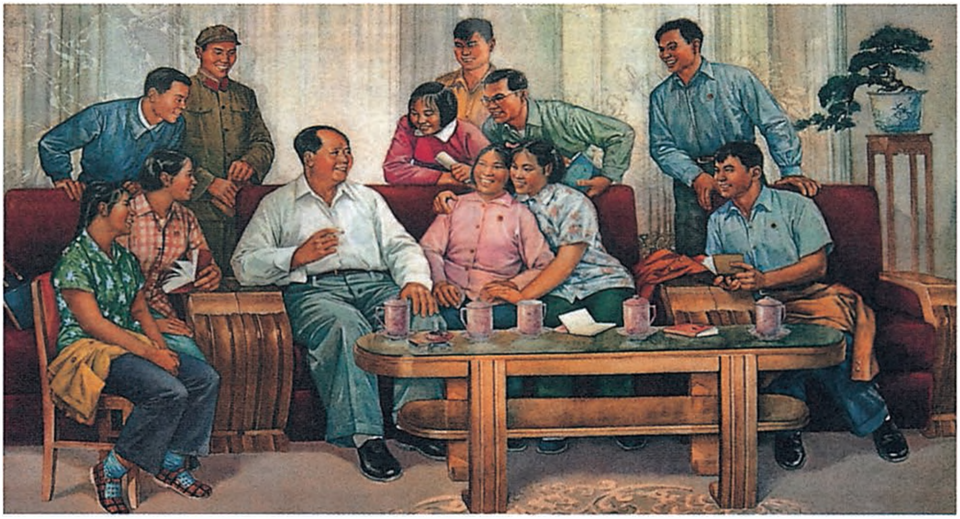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中央戏剧学院新疆班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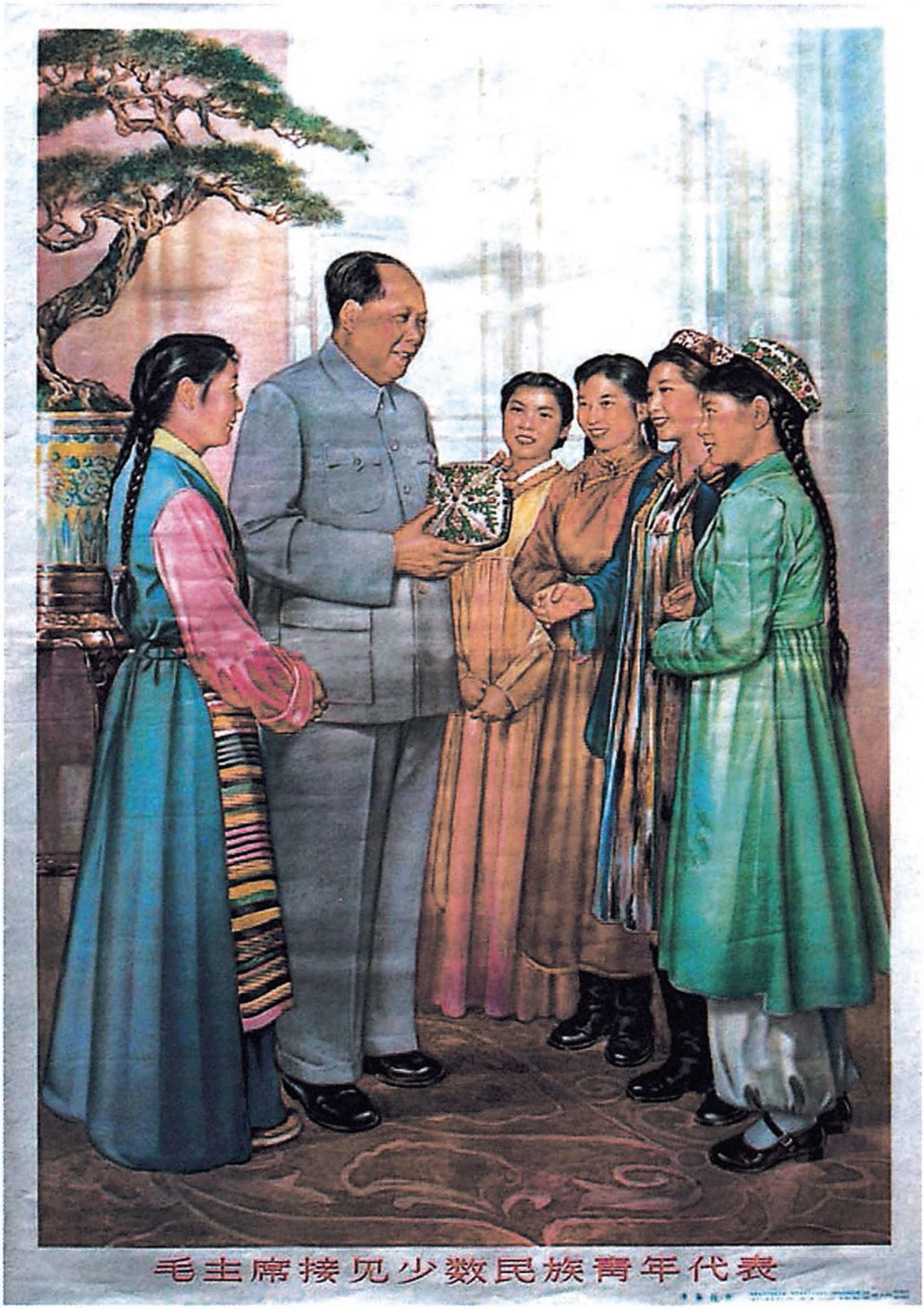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和共青团九大代表在一起。



《毛泽东和青年人在一起》（油画）



牢记主席话　永做革命人（宣传画）


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青年代表

毛主席接见少数民族青年代表（宣传画）

反对外来干涉，实行八项原则[1]

（1964年6月14日）

现在非洲的问题是要独立，要反对外来干涉，要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独立。我们都要反对外来干涉。我国现在正在进行建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用几十年。对整个非洲来说，要赶上西方国家的水平，也要几十年。如果我们几十年能赶上，就算很快了。西方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几百年的建设历史。它们几百年建成这个样，我们几十年赶上，时间不是并不那么长吗？我们要有信心。有人说有色人种就不如白种人。我看，他们说得不对。有色人种觉醒起来之后，可能还要做得比西方更好一些。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地方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人民中也有很多人是不反对我们的。在美国人民中就有很多人是赞成我们这一方的，如美国专家有一些在我们这儿当编辑、翻译，也有的在我们的外国语学校帮我们教学。我们抗日战争时，就有个加拿大的医生[2]在我们这儿工作，后来牺牲了。要把他们的

---

[1] 这是毛泽东和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拉希迪·姆·卡瓦瓦谈话的一部分。

[2] 指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于1938年年初来中国，3月底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由于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

政府、垄断资本家同广大人民分开来看。

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第一条，你们有人民；第二条，你们在非洲是个大国，有很好的土地，可以搞农业和畜牧业；第三条，可能有很多地下矿藏。这几条中，首先一条是你们有人民，有很好的人民。

你们非洲很有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注视着你们起来。不要讲很久以前的历史，就讲十年前和十年后就大不相同。十年前，埃及在一九五二年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苏伊士运河还没有收回。十年前还没有开万隆会议。世界变化相当快。

历史和未来不仅属于非洲人民和亚洲人民，而且属于所有欧洲、美洲各国人民。我讲的是人民，不是那些大资本家。

我们一定要实行八项原则[1]。如果我们不执行其中任何一项，

---

[1] 指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时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那就不行，对你们不利，对我们也不利。到外国去剥削人家，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自己还是被压迫者，这就是说台湾还没有解放。自己还是个不发达的国家，去打外国人的主意，像话吗？如果哪个中国人在你们那儿做坏事，你们就告诉我们，我们把他撤回来。你们也可以把他赶回来。

我们派出去的人，可能有不好的。我们要检查工作，如果发现有人对外国态度不好，就必须责令他改正错误；如果他不改，就调回来。我们也有跑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人，他们看不惯社会主义，想跑，跑一点也可以，我们人本来就太多了。

我们之间相互平等，讲真话，不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大比武汇报表演时的谈话要点[1]

（1964年6月15日、16日）

一

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叫做夜老虎？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二

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

[1] 本篇一至六是毛泽东在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大比武“尖子”分队和民兵汇报表演时谈话的要点。

三

子弹可以多造一些。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了嘛！

四

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地搞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五

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战士的身体要很好，体力要好。连队人数一定要充实，人少就合并，也要充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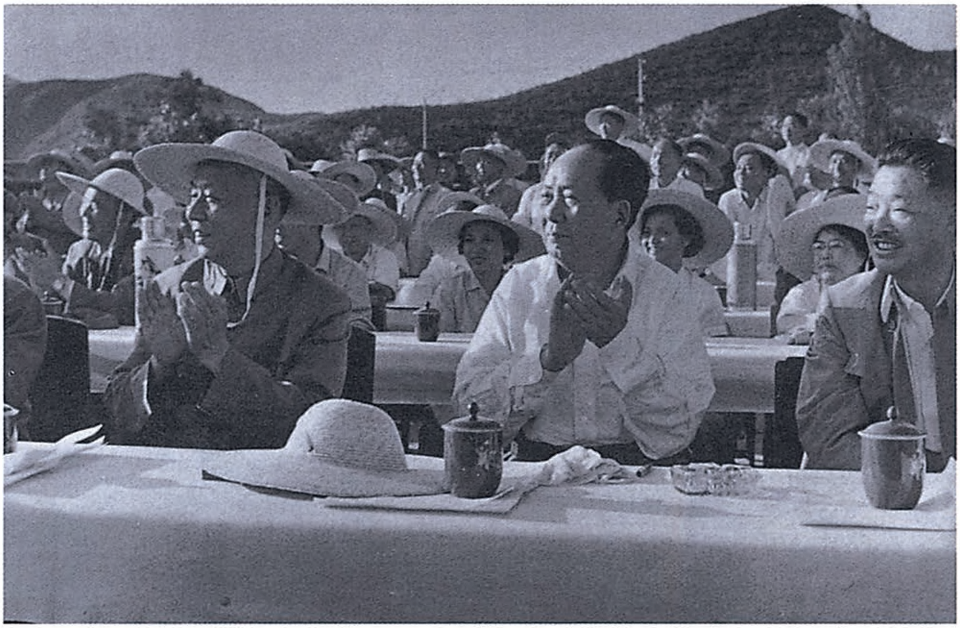
六

要从困难着想，不管什么问题只要从困难着想就不怕，所以不妨把困难想多一点，想尽。一九四五年七大时，我讲了十七条困难，其中有一条是“赤地千里”，不知是否讲够了。不要只看到好的方面，要两分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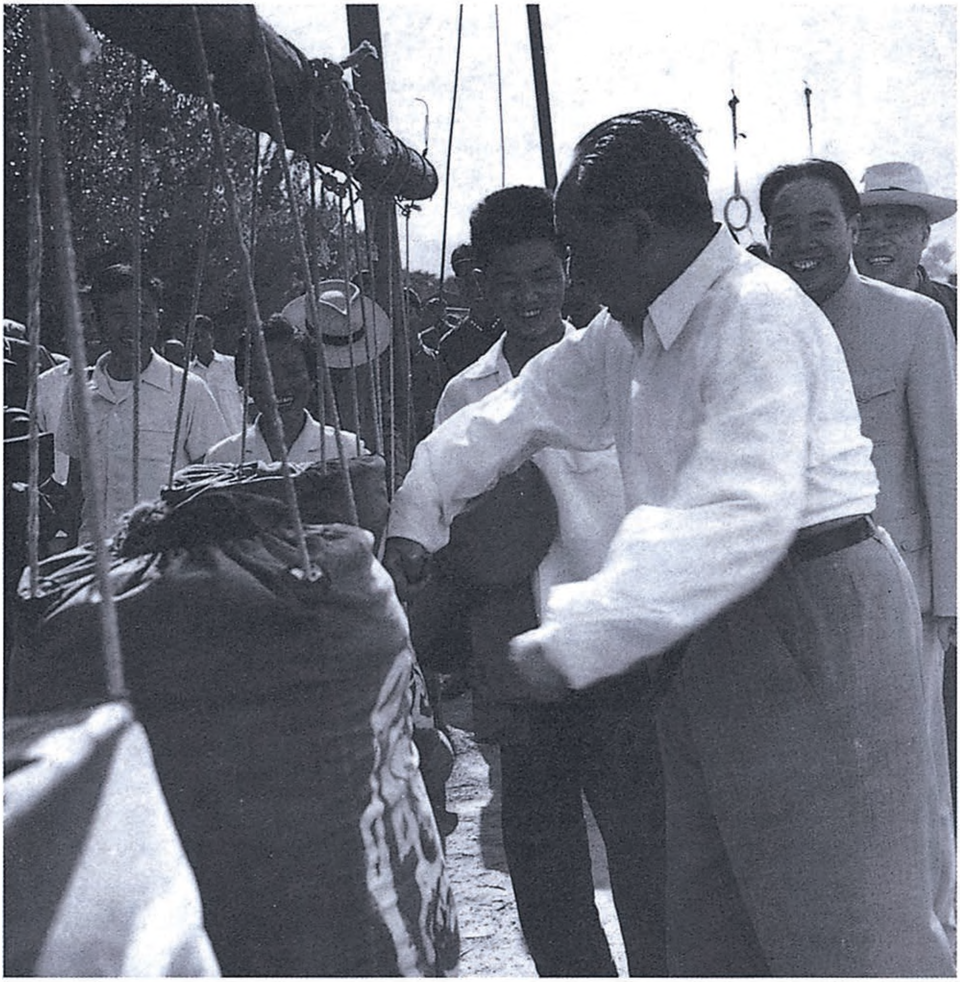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在贺龙的陪同下，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1964年6月，毛泽东等前往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1964年6月15日至16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郊区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军事训练汇报表演，并接见参加军事表演的部队官兵。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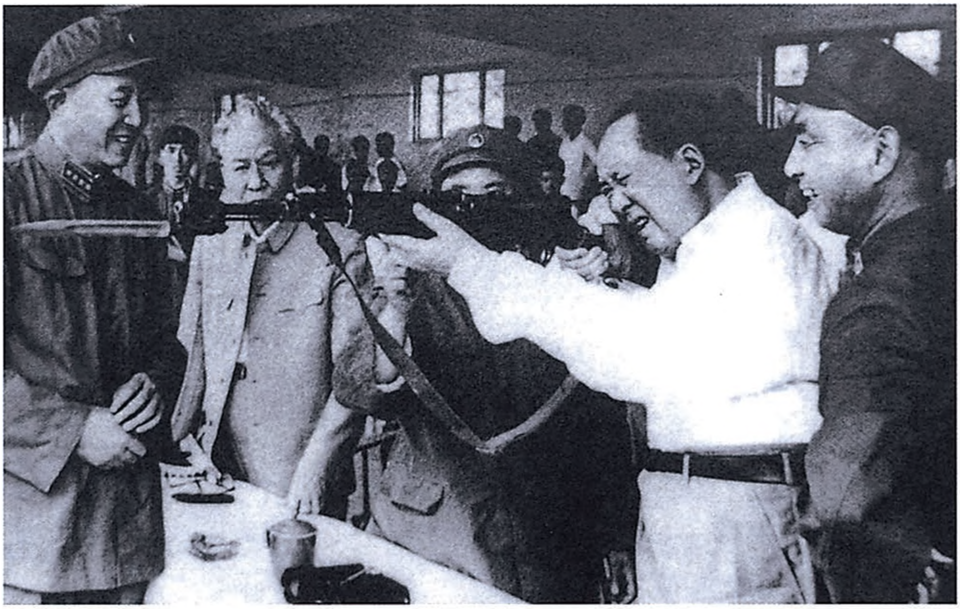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现场。

1964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陪同下接见北京军区表演分队。

1964年6月，毛泽东视察炮兵部队。

1964年6月，在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会上，总参谋长罗瑞卿向毛泽东讲解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1964年6月，毛泽东举起“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做瞄准姿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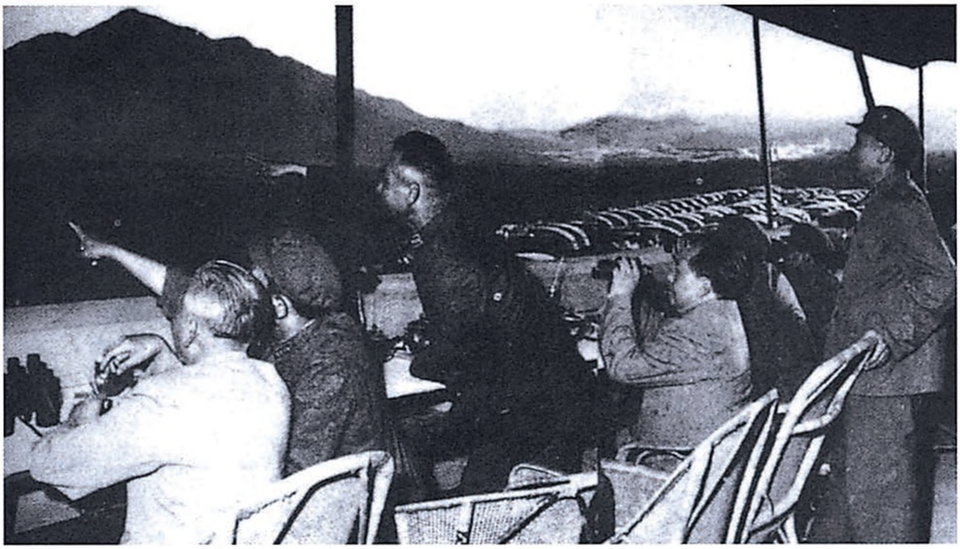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会上。

1964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会上。

1964年6月，毛泽东观看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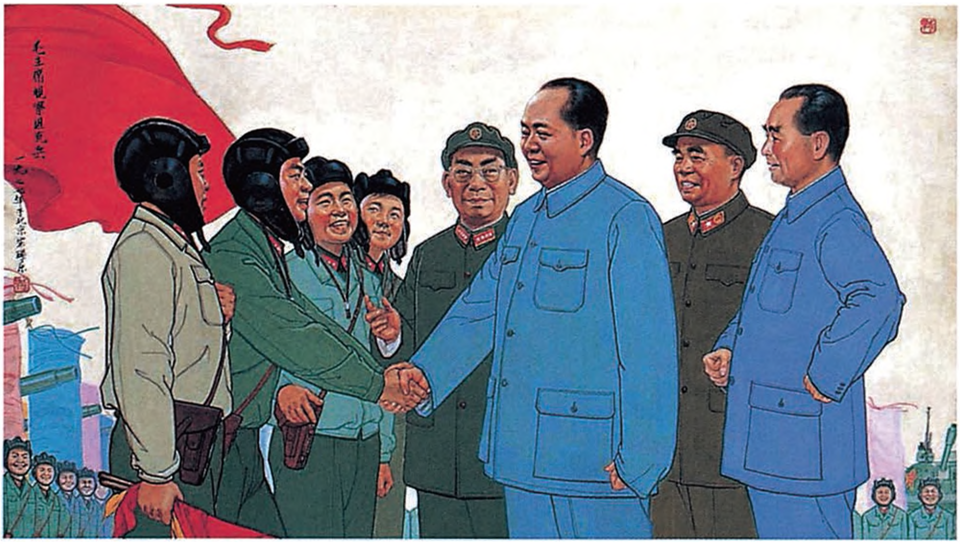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工程兵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方队。

1964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解放军军事表演。



1964年6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坦克部队实弹射击。

1964年6月，毛泽东和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在一起。



《毛主席视察坦克部队》（水粉）

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1]

（1964年6月16日）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2]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3]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

---

[1] 这是毛泽东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3] 高，指高岗。饶，指饶漱石。彭，指彭德怀。黄，指黄克诚。

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

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难忘的教诲》（油画）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

（1964 年 6 月 16 日）

一

地方党委要搞军事。由大区领导，各省要定个计划，包括民兵、军工厂、修理厂。省委第一书记都是政治委员嘛，不行使职务。你们可以作顾问。多少年来，政治委员是空头政委。太平世界了，不搞军事了！一旦发生战争，就会手忙脚乱。

北顶南放[2]，我看不一定。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走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从广东来，得到什么东西？也不一定。

二

至于打法，无非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歼灭战。

---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北方一些地区要立足于顶住敌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则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北顶南放”。

还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所以各省要搞民兵、地方部队，省、地、县都要搞，不要靠中央，不要只靠几百万解放军。这么大的国家，这么长的战线，不靠，你就会打主意了。“守土有责”，守不了，还不走！北京军区一搬出去，城里要有卫戍司令，城里有人民。敌人进了城，就不会打原子弹了。你进城，我也进城，搞巷战，爬房子，总之要跟你斗。要把民兵好好整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什么叫组织？就是民兵，有基干民兵、普通民兵。组织有战士，有班长，有排，有连，有人说当过三个月的民兵，精神面貌就大大不同了。这叫组织。总要有人，有兵有官。政治，要有政治工作，有政委、政治部、教导员、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要讲清楚，不要慌张。一慌张还能打仗？无论是打枪、打炮、打原子弹，都不要慌张。原子弹打下来了，就见马克思。怕什么！干部也死不完的，不死的就跟他干。

三

军事。要有手榴弹、手枪，有轻武器，赶快搞一点，趁着和平时期，趁这十年内搞一点。基本的是每省要搞个兵工厂。四川也可以搞一点，你不用，支援别的省嘛。自己要搞一点。战时割断了，中央就顾不上了。现在军事工业是曹操人马八十三万，抽一点去。你们搞个计划，十年之内的。

四

总而言之，是要准备打。还有不要慌张，原子弹如果落到头上，走路也走不赢，死就死，不管躺着死，走着死。总之，对帝国主义不要怕，要教育人民，不要怕它。

接见桑给巴尔[1]专家米·姆·阿里夫妇的谈话

（1964年6月1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先照个相吧？

（照相，然后坐下）

毛：你们是非洲来的，桑给巴尔的？

米·姆·阿里（以下简称阿）：是的。

毛：（对江□□）你讲的是什么？

江□□：英文。

毛：（对阿里）听说你在中国有几年了。

阿：是的，有四年了。

毛：你为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帮助了中国人民搞广播事业。

金□□：他帮助我们办了斯瓦希里语广播，帮助我们培养了斯瓦希里语的干部。

毛：好！

阿：北京电台也帮助了我们的人民，帮助他们了解世界情况。

毛：听得到吗？

阿：听得很好，不仅桑给巴尔听得到，而且整个斯瓦希里语地

---

[1] 桑给巴尔，现为坦桑尼亚的一部分。1964年4月，桑给巴尔和坦葛尼喀合并为坦桑尼亚。

区都听得很清楚。

毛：有几个国家？

阿：有坦噶尼喀、肯尼亚、乌干达一部分，还有刚果。

毛：哪个刚果？大刚果？

阿：几乎两个刚果。

毛：啊，肯尼亚、坦噶尼喀、桑给巴尔，两个刚果。

（阿里给主席点烟）

毛：谢谢你！（用英文讲）你为什么要回去？

阿：这是国家的需要。

毛：国家要你回去。你们这回来的联合共和国代表团里面，有你们的一个部长，你遇到过他吗？

阿：是巴布，我见过他。

毛：我是头一次见到他。他很高。

阿：是的。

毛：他现在在坦噶尼喀的首都工作？

阿：他没有去，将来可能去。

毛：你们过去是朋友？

阿：是的。实际上是他把我介绍到中国来的。

毛：你走了，就没有人啰。

阿：还有，还有六个桑给巴尔人工作。

毛：你们两个人走了，还有四个？

阿：不，我是说还有六个。一个在电台，四个在外交出版局，一个在外语学院。

毛：都是桑给巴尔的，有没有坦噶尼喀的？

阿：有一个，他在中国画版社工作，翻译斯瓦希里文。

毛：你们那里的气候同我们这里的不同吧？

阿：是的，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那里不下雪。

毛：几个冬天了！

阿：可是我已经习惯了。

毛：你们那里是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南纬度还是北纬度？

阿：实际上是在赤道。

毛：在赤道上不是很热吗？

阿：是的，但是我们那儿只是一个小岛，不太热。

毛：海洋性气候。

阿：是的。

毛：你有中国朋友吗？

阿：很多，很多。

毛：到外地去参观访问过没有？

阿：去过。一九六一年去了哈尔滨、广州、上海、杭州以及其他地方。最近还荣幸到井冈山去了一趟。

毛：哦，爬到山上去了。

阿：瑞金我也去了。

毛：哦。

阿：我看到了第一次苏维埃政权的所在地。我们同井冈山的人民进行了交谈，同老干部，老区人民交谈。他们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

毛：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我们在那里。到现在三十七年了！后来转移到瑞金去了。瑞金地区比较大，有几百万人口——不只是瑞金一个县，有几十个县，在那里打过很多胜仗。后来万里长征到了北方。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到了陕西北部。甘肃也到

过。也到过山西，过黄河到太原附近。山西靠近河北省。后来打日本，主要以延安为中心，在长江以北各省。后来发展到满洲。日本走了，蒋介石又来了，蒋介石打我们，我们就同他打，打了三年半，打垮了蒋介石大部分军队，百分之九十的军队。剩下的都跑到台湾去了。他历来是靠美国保护的。现在还是靠他们的（美国的）第七舰队。所以美国同我们还和不了。美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帝国主义，也是最大的帝国主义，它对你们也有影响。

阿：是的，美国现在正想一切办法渗入桑给巴尔。

毛：坦噶尼喀、桑给巴尔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还是半殖民地?

阿：英国把桑给巴尔殖民地了，把它叫做“保护地”。

毛：有个国王，叫苏丹。

阿：正是因为有个苏丹，所以叫“保护地”。

毛：坦噶尼喀呢?

阿：叫做“领地”。

毛：那就没有什么国王啰？是英国直接管辖?

阿：是的。

毛：还有肯尼亚、乌干达呢?

阿：肯尼亚是殖民地，乌干达有国王，也叫做“保护地”。

毛：南北罗得西亚呢?

阿：没有国王，是殖民地。

毛：现在那里白人还不少啰?

阿：是的，在坦噶尼喀、肯尼亚有移民。住肯尼亚，因为气候比较凉，有许多移民。

毛：有多少，听说有几十万。

阿：是的，有几十万。

毛： 听说有三十万。

阿： 是的。

毛： 肯尼亚有多少人口？三百万？

阿： 八百五十万。

毛： 有这么多？

阿： 是的，坦噶尼喀的人口还要多，有九百万。

毛： 有一千万。

阿： 可能，我的数字是很久以前的人口统计。

毛： 你去过坦噶尼喀吗？

阿： 只是路过。

毛： 到过肯尼亚吗？

阿： 到乌干达去时路过。

毛： 现在回去走哪一条道？

阿： 经过巴基斯坦、肯尼亚，也可能经过坦噶尼喀再到桑给巴尔。那儿有两条航线，一条直达线从肯尼亚到桑给巴尔，另一条从肯尼亚经过坦噶尼喀到桑给巴尔。

毛： 你的皮肤颜色看起来同坦噶尼喀人有点不同。

阿： 是的，坦噶尼喀人更黑一些。

毛： 还有个马达加斯，那里的人的皮肤同非洲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一样。

阿： 嗯。

毛： 希望你们今后有机会再到中国来。

阿： 中国已经是我们的家了。

毛： 来旅行、观光。就谈到这里吧？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阿： 有，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现在非洲人民的斗争，正在蓬

勃发展，斗争越发展，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越大。但是这个斗争还要走很长一段道路。我虽然读了不少文件，但是还希望您谈谈您对非洲人民斗争的前景有些什么看法。

毛：我对非洲的情况不太熟悉。但依我看，过去十年、十一年，从一九五二年埃及推翻法鲁克王朝起，非洲的变化是很大的。英国人、法国人，他们不甘心被打败的，进行了对苏伊士运动的攻击。另一个地方是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阿尔及利亚以少数军队抵抗几十万法国军队。结果，法帝国主义失败了，阿尔及利亚胜利了。最近不久，你们国家也有变化，你们国家只有三十万人口，敢于起来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也不敢怎么样。坦噶尼喀也独立了，英国军也走了。肯尼亚呢?

阿：肯尼亚也独立了，但兵变以后英国军队还在。

毛：还有吗?听说非洲国家军队去了。

阿：这是在坦噶尼喀。

毛：哦，在坦噶尼喀。

阿：在肯尼亚情况有点不同。肯尼亚与英国有协定，英在肯有基地。英国军队到年底才撤走。

毛：他们最终是要走的。

阿：对!

毛：在刚果，我说的是大刚果，有个卢蒙巴，是个民族英雄，被整死了，但斗争还在发展。在最近大半年，斗争有发展。在西南非洲、安哥拉、葡属殖民地，斗争也在进行。我对非洲虽然不熟，但我看来，根据过去十年的情况，可以说，在今后十年会有更大的变化。可能你们也是这样看。我们要从历史看，从发展看嘛！困难一些的是南非。那个地方有三百多万白人。他们是不愿意走的。那

个地方要解放。恐怕时间要长一点。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三大洲，现在都有革命形势，这三大洲占世界人口的最大多数。这是事实。这是世界的大多数，欧洲、新西兰、澳洲和北美洲是少数。（阿里给主席敬烟）

阿：现在非洲没有共产党。您认为在非洲建立共产党的时机是否成熟？您对非洲的统一战线有什么看法？

毛：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要看那个地方有没有产业工人。我看，在非洲有工业，很多国家有工业，有的是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有的是非洲人自己建立起来的，有矿山、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工业。现在虽然没有共产党，但总有一天会有的。现在也不是没有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有，摩洛哥有，南非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不是革命的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修正主义的党，如阿尔及利亚的党，还不如民族解放阵线，因为他们进行民族解放战争，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解放战争的，它听法国共产党的命令。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是反对我们的，反华的，阿尔及利亚政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是同我们合作的。不知道什么理由他们反对我们，有什么利害关系反对我们，我们不懂。

还有个例子，亚洲的伊拉克共产党，也是反华的，只注意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不注意他们自己面临着政变的危机。就是去年，来了一次政变，把卡塞姆杀了，把党的总书记也杀了。你知道这件事吗？

阿：知道，在报上读到过。

毛：杀了许多共产党，杀了许多修正主义，也杀了许多进步人士。你说，为什么伊拉克共产党反对我们？

阿：听指挥棒。

毛：听指挥棒，搞和平过渡。

再有一个是巴西，也不赞成我们，因为我们不同意和平过渡。几个月以前发生了政变，把总统赶跑了。修正主义党的领袖被判了八年徒刑。这个党的领袖到中国来过，叫普列斯特，是个很有名的共产党员，后来成了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不管你是不是修正主义，他们是不管的。有九个中国人被捕，六个是贸易工作者，三个是新闻记者。

这就是说，修正主义不反对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妥协。非洲工人阶级会得到教训的。可能出现一些修正主义的党，也可能出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党。

统一战线的问题，是反帝不反帝的问题。反帝的都要团结起来。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来讲，就是看他反帝不反帝。至于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名义上的），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经济，那就是另外一件事了，这不仅是触动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且要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譬如讲，现在，阿尔及利亚有可能走社会主义。老的一批人跟不上，包括临时政府的总理阿巴斯，贝勒卡塞姆，他们跟不上人家。

阶级斗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讲阶级斗争的，社会上有阶级斗争。我们同国民党有两次统一战线。一次是北伐，那是一九二七年。第二次是打日本的时候，第一次统一战线，北伐打到长江流域，国民党得到了政权，就反对我们，我们只好同它打，上了井冈山，后来到了瑞金。

后来，日本人打进来了。蒋介石感觉再要同我们打下去不行了。就建立了第二次统一战线。这次统一战线有八年之久。一方面国民党同共产党团结，反对日本；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每天反对我

们。我们怎么办？这一边有日本，那一边又有国民党。所以我们采取了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团结为主。这样，同国民党维持了八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打我们，统一战线就破裂了。破了就破了嘛，我们打胜了，他们打败了。我们没有大城市，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军队人少，没有空军，没有海军，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只有轻武器，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缴来的。

这样岂不是没有统一战线了吗？把他赶到台湾去了，但是，还有统一战线。其实，我们的统一战线更广泛了。我们中国有八个民主党派。国民党在的时候，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与我们接触不很广泛。在解放以后，他们都不走。我们把他们都团结起来。在北京的大学教授，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在上海、广州的大学教授都不走，他们感觉到跟着国民党没有前途。

基本的统一战线是同工人、农民的统一战线。也是在解放后，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实现。

国民党代表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我是讲它的后期。国民党曾经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那时，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是中国唯一的、最进步的政党。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是后来才有的，一九二一年才有共产党。后来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次的统一战线。

后来，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打了十年仗。它变成了帝国主义，美国、英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为什么它变成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我们还可以同它形成第二条统一战线呢？因为日本打进来了。

日本侵入东北的时候，国民党还打我们。只是在日本打进关内，向大陆进攻时，它感到同共产党不讲和不行了，所以才形成第

二次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

蒋介石是站在美、英、法一边的，反对日本、希特勒、墨索里尼，一派帝国主义打另一派帝国主义。德、意、日三个国家变成了战败国。要看什么条件，那时美、英、法，我们也可以同它们合作。在战后就发生了变化，美国想控制世界。日本变成了战败国，意大利、德国变成了战败国。英法削弱了。非洲为什么起来呢？就是因为帝国主义削弱了，英法削弱了。

大概非洲对英、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对广大人民来说，都不会有什么好感的。为什么我们同你们非洲人、黑人讲得来呢？我们有共同点。

阿：我们非洲人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我们看到中国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斗争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在中国解放之后，我们更加了解中国。

我们的斗争不断发展，因为中国给了我们许多经验，中国给了非洲人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发表了许多支持我们的声明。近几年来，我们能到中国来，参观了许多地方，对我们很有帮助。

苏联修正主义告诉我们要和平共处，裁军，说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说要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来援助我们。但是，我们的斗争要靠自己的力量。

毛：对！

阿：在这方面，修正主义越来越同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在您看来，他们勾结到什么程度？

毛：可能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又勾结，又有矛盾。修正主义同修正主义也有矛盾。修正主义有几十个党，但并不

是很团结的。帝国主义之间也不是很团结的。你看，法国同英国就不是很团结。日本垄断资本家，日本政府首先打了美国的珍珠港，以后占领了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打到印度的东部，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朝鲜就不再讲啰，本来就是它的殖民地。现在这些地方都独立了，有的还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美国控制下的有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日本也是在美国半控制之下。你说，日本，不要说人民，就是大资产阶级，他们会舒服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美国帝国主义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没有矛盾。

我们说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家受美国欺侮，我们反对欺侮。很有一些人听得进去中间地带的说法。

这个话不是现在才讲的，是一九四六年就讲了。那时候没分第一、第二，只讲了中间地带，讲苏联同美国之间是中间地带，包括中国在内。一九四六、一九五六、一九六四，……十八年了，话讲了十八年了。那时我们在延安，是同美国记者讲的，她叫斯特朗。

阿：我认识她。

毛：她七十几岁了！那时美国代替了德、意、日，想控制世界，它的目的是侵略中间地带，不是打苏联。反苏是个口号，是烟幕。与反华的性质一样，其目的是要整中间地带，以反华为口号。

阿：我担心主席的时间。请允许我表达我的感情。到中国来以后就一直盼望着有这一天，今天终于实现了。我的感情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毛：你看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没有？

阿：看过，也看过您的著作。

毛：我是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学来的。

阿：您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您的著作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更加易懂。

毛：比较通俗一些。

阿：这是我的感觉，您的著作写得很通俗。

毛：我也没有多少著作。

阿：不，很多。

毛：好，就说到这里吧！

阿、阿夫人：再见！

毛：再见！

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

（1964年6月）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有鬼无害处”，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待。《人民日报》一面讲阶级斗争，进行反修宣传，一面又不对提倡鬼戏的事作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要在报社开一个会，把这个问题向大家讲一下，同新华社的同志讲一下”。

《人民日报》的政治宣传和经济宣传是做得好的，反修宣传是有成绩的，但是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判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过去《人民日报》不搞理论工作，据说是怕犯错误，要报上登的东西都百分之百的正确。据说这是学的苏联《真理报》。事实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报纸。《真理报》现在正走向反面，不是不犯错误，而是犯最大的错误。《人民日报》不要怕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就改，这就好了。

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1964年6月2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以前都没到过中国吗？

席尔瓦（以下简称瓦）：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毛：第一次来过以后就能再来啦！我们两国记者和两国人民互相联系，这是好事。我们两国政府还没有建立关系，你们政府大概会有困难。也许你们的政府不高兴我们。

瓦：不，他们并不是不高兴。前不久智利政府向中国卖了铜和硝石，这就是一个证明。

毛：有生意吗？

瓦：是。

毛：那好。

瓦：不久前在圣地亚哥举办了中国经济展览会，引起了智利人民很大的兴趣。许多工人、学生、职员都去参观。他们看到了原来以为中国不能生产的许多机器和其他产品。

毛：我第一次从你口里知道中国在圣地亚哥举办了经济展览会。看来，我这个人官僚主义很厉害。

瓦：早在上一世纪，就有中国人到达我们的海岸，他们很勤劳，很受尊敬。我们的政府是主张民主的，而且实行民主。对其他国家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比如，我们和古巴就有外交关系，而且

哈瓦那有智利的大使馆。

毛：有吗？过去巴西在古巴有大使，现在还有吗？

瓦：没有了。

毛：巴西发生了变化。

巴斯克斯（以下简称斯）：巴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毛：巴西政变当局把中国人抓起来了，九个人中七个是做生意的，两个是记者。他们把中国人抓起来，不知对巴西统治集体有什么好处。

斯：毫无好处。

毛：他们可能得到一些美元。

瓦：可能是这样。

毛：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做这样的事干什么？

瓦：我要向毛主席谈到这样的情况，拉丁美洲的报纸经常受到美国佬通讯社的影响，他们经常制造一种气氛，说中国要挑起战争或准备战争。但是，我们在中国的参观中亲眼看到的一切，证明中国人热爱和平，渴望和平，不要战争。昨天我们有机会得到陈毅副总理的证实。中国是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我们看到并证实中国人民是在和平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

毛：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〇年在广东开始的鸦片战争，又如八国联军的战争，英国等八个国家的军队占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在旅顺、大连等地打的。以后日本占领了

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过仗，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1]。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去，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

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派军阀混战，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我们的军队原有三十万人，这时只剩下两万多了。恰好是在人数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我们的军队又有了发展。日本人走了之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到现在，我们搞建设只有十五年的时间。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

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

---

[1] 指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沙俄为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的一次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奉天（今沈阳市）、辽阳地区和旅顺口一带，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沙俄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经美国调停，同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三省南部的支配地位；日本对于朝鲜的独占地位，也在《朴次茅斯和约》中得到沙俄的承认。

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又如阿尔及利亚，是我们叫本·贝拉[1]革命的吗？以前我们认都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他。是他们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求支持，我们就给他们支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反美战争。还有一次，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朝鲜时，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是不会放弃它的，就是说，我们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法国在当时已是共和国。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胜利在哪一年？

---

[1] 本·贝拉，指艾哈迈德·本·贝拉（1918—2012），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之一。1956年因积极参与组织发动全国反法武装起义，被法国殖民当局监禁。1958年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成立时，被缺席推选为第一副总理。1962年获释回国，同年9月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成立，任政府总理。1963年9月当选第一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64年4月任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

斯：一七八九年。

毛：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是起义的日子，还是胜利的日子？

斯：是起义的日子。

毛：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都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十九世纪的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主要一条还是我们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你们那么喜欢美国资本家吗？

斯：我们不喜欢。

毛：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

瓦：它永远做不到，但在经济上可能做到。

毛：这是指在经济上，许多时候也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都不能容忍他，把他推翻了。甚至稍微不听美国话的吴庭艳，美国竟把他杀掉了。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是被美国肯尼迪[1]政府杀掉的，没过一个月，肯尼迪也见上帝去了。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它是侵略者；它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侵略者、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来看。美国在中国周围布满了军事基地，而且侵占了中国的台湾。我们没有占领美国的什么岛屿，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

---

[1] 肯尼迪，1960年至1963年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3日被刺身亡。

——中国。我们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年仗，把它们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它们现在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就同不能从地球上把你们智利搬走一样。它们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它们要搬走也不行。

毛：你们智利有多少人口？

瓦：有七百万，相当于北京的人口。

毛：北京城市人口只有四百多万，你们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上海有七百多万人口。你们去过上海吗？

斯：去过。这次在中国旅行还去了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南京、无锡、杭州。

毛：你们去了不少地方，花了多少时间？

佩雷斯（以下简称雷）：二十七天。这次旅行，非常有兴趣，在智利对中国了解很少。这次参观了工厂、学校、农村等。

毛：还参观了工厂、学校？

雷：是，除了工厂、学校，还参观了人民公社、矿山、石油、钢铁、汽车制造等工厂和上海工业展览馆。

毛：中国的工业建设对我们说来才刚刚开始，和我们的人口比较起来，还很不相称。因此外国人说中国是很落后的，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了。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也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工夫，你们国家的工业是不是比我们先进一些？

瓦：也不。我们的工业发展根据人口看，还可以。我们有纺织工业、冶金工业，但比起鞍钢来还差得多。

毛：应该按人口比，我们虽然有鞍钢，但按人口比还很不相称。

瓦：不管怎样，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毛：有点成就，不算很大，有一点。

瓦：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和主席所说的相反。我们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干劲十足，抱着牺牲的精神，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毛：这一点是真的，中国人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你看我们的警察很少，只有不多的交通警察。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持交通。

斯：这一点已深深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毛：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军队和武装警察，就会发生抢劫、偷盗。现在北京抢劫现象没有了，偷盗还有一点，也不多了。

瓦：在这样有七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觉悟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毛：人民自己来批评那些小偷行为，靠人民自己维持秩序。

斯：我们看到在街上，在学校，少先队员维持秩序，使我们深受感动。

毛：解放初期北京还有些车祸，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车祸了，汽车压死人的事可以说很少了。

雷：实在是这样。

毛：的确比初解放几年起了变化，我们训练司机避免车祸，也教育行人不要乱闯。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贪污分子，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我们把它叫做整风。要做到政府工作人员不贪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这少数人教育过来，总相信多数人是好的。无论哪一国的人民，做坏事的总是少数，并且做坏事的人也可以改变。甚至跟我们打过仗的，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可以改变。经过改造，他们不那么反对我们了。还有一个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他现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现在自由了，可

以到处跑啦。过去当皇帝，好不自由。

斯：过去他只能看小山的景致，现在他解放了。

毛：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人是可以改变的。但不能强迫，要劝他自觉，不能强压。美国人说我们“洗脑筋”。脑筋怎么洗法，我还不知道。我的脑筋就是洗过的。我以前信过孔夫子、康德那一套，后来不相信了，信了马克思主义啦！这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帮了我的忙，是他们给我洗的。他们是用枪屠杀了中国人民。譬如日本在中国就不知杀了多少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后来美国和蒋介石又发动了全国性的反对我们的战争。

他们都是些给人洗脑筋的人，使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从而起了变化。你们说是谁把卡斯特罗的脑筋给洗了？（众笑）

瓦：关于洗脑筋这一点，我要亲自向主席说：你们不仅只洗掉我们脑筋里美国的谎言，也使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

毛：你们过去大概对中国不太清楚吧？看一看就清楚了。你们每五年来一次，看看我们有没有进步。

瓦：主席，你作为马列主义的最高领袖，可以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因为有这样的国家：全国人民守纪律，努力工作，在中国全力进行建设。在这十五年中已清除了在几个世纪里遭受的贫困、压迫和掠夺，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相信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毛：不能估计太高，我对我们的工作不那么满意，我们的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我们那么多人口，还不相称，这是事实。我们是比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进了一

步。还有一件事实，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来。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感到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要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并且公开说出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们不是那么有好感。但是，除了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他们不干涉我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是不做。他们想派新闻记者来，这也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能来中国，美国记者就来不了。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的，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加十五年就是三十年，如果还不够，就再加嘛。

瓦：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抽空接见我们，我们能听到主席亲口和我们谈话，我们将把这些话带回去，作为对我国人民的问候。

毛：问候你们国家的人民，问候愿意跟中国交朋友的一切人。

瓦：我们有许多人愿意跟中国交朋友。

毛：我相信这点，你们就是证明。

瓦：我们在智利也接待过三个中国去访问的记者代表团。

毛：中国有记者到过智利吗？

瓦：在座的常□□先生就参加了中国访问智利的第一个记者代

表团。

毛：他（指常□□）所在的报纸《大公报》有六十二年的历史了。过去为满清皇帝服务过，替北洋军阀服务过，替蒋介石服务过，现在替人民服务。

斯：我所在的报纸，也是一九〇二年创办，和《大公报》同年创办，但是现在还没有为人民服务。

毛：将来可以为人民服务，《大公报》的社长王云生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不是共产党员，过去他为蒋介石服务过，也为别人服务过，现在为人民服务。过去很多这样的人，差不多全部是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等等，许多人都是国民党的，但都没有走，我们不跟这些人合作就没有教员，就不能办报纸，也没有唱戏的艺术家，没有画画的美术家。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其中有许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团结在一起。

斯：这些都是中国人。

毛：对！但有些中国人就不那么和气，比如蒋介石，他也是中国人。（众笑）那么多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都为人民服务。我们把他们团结起来，敌人就不高兴。就谈到这里为止吧！

瓦：今天能见到主席，感到非常荣幸和幸福，因为到了中国没见到主席，那就等于没有到中国。

毛：你们要见我，我就见你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和王海蓉[1]的谈话

（1964年6月24日）

一

王海蓉（以下简称王）：我们学校的阶级斗争很尖锐，听说发现了反动标语，还有用英语的。就在我们英语系的黑板上。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他写的是什么反动标语？

王：我就知道这一条："蒋万岁"。

毛：英语怎么讲？

王：long live蒋。

毛：还写了什么？

王：别的不晓得，我就知道这一条，章会娴[2]告诉我的。

毛：好嘛！让他多写一些贴在外面，让大家看一看，他杀人不杀人？

王：不知道杀人不杀人，如果查出来，我看要开除他，让他去劳动改造。

毛：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

---

[1] 王海蓉，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

[2] 章会娴，章士钊之女，王海蓉的同学。

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你们学校有多少人？

王：大概有三千多人，其中包括教职员。

毛：你们三千多人中间最好有七八个蒋介石分子。

王：出一个就不得了，还要有七八个，那还了得？

毛：我看你这个人啊！看到一张反动标语就紧张了。

王：为什么要七八个呢？

毛：多几个就可以树立对立面，可以作反面教材，只要他不杀人。

王：我们学校贯彻了阶级路线，这次招生，百分之七十都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其他就是干部子弟、烈属子弟等。

毛：你们这个班有多少工农子弟？

王：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干部子弟，其他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他们表现很好，我向他们学到很多东西。

毛：他们和你的关系好不好？他们喜欢不喜欢和你接近？

王：我认为我们关系还不错，我跟他们合得来，他们也跟我合得来。

毛：这样就好。

王：我们班有个干部子弟，表现可不好了，上课不用心听讲，下课也不练习，专看小说，有时在宿舍睡觉，星期六下午开会有时也不参加，星期天也不按时返校，有时星期天晚上，我们班或团员开会，他也不到，大家都对他有意见。

毛：你们教员允许你们上课打瞌睡、看小说吗？

王：不允许。

毛：要允许学生上课看小说，要允许学生上课打瞌睡，要爱护学生身体，教员要少讲，要让学生多看。我看你讲的这个学生，将来可能有所作为。他就敢星期六不参加会，也敢星期日不按时返校。回去以后，你就告诉这学生，八九点钟回校还太早，可以十一点，十二点再回去，谁让你们星期日晚上开会呢！

王：原来我在师范学院时，星期天晚上一般不能用来开会的。星期天晚上的时间一般都归同学自己利用。有一次我们开支委会，几个干部商量好，准备在一个星期天晚上过组织生活，结果很多团员反对。有的团员还去和政治辅导员提出来，星期天晚上是我们自己利用的时间，晚上我们回不来。后来政治辅导员接受了团员的意见要我们改期开会。

毛：这个政治辅导员做得对。

王：我们这里尽占星期日的晚上开会，不是班会就是支委会，要不就是级里开会，要不就是党课学习小组。这学期从开学到我出来为止，我计算一下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不开会的。

毛：回去以后，你带头造反。星期天你不要回去，开会就是不去。

王：我不敢，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日一定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

毛：什么制度不制度，管他那一套，就是不回去，你说：我就是破坏学校制度。

王：这样做不行，会挨批评的。

毛：我看你这个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你怕人家说你破坏制度，又怕挨批评，又怕记过，又怕开除，又怕入不了党。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就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带头造反。

王：人家会说我，主席的亲戚还不听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

毛：你这个人！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呢？你说就是听了主席的话，我才造反的。我看你说的那个学生，将来可能比你有所作为，他就敢不服从你们学校的制度。我看你们这些人有些形而上学。

二

王：现在都不准看古典作品。我们班上那个干部子弟他尽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我们同学对他看《红楼梦》都有意见。

毛：你读过《红楼梦》没有?

王：读过。

毛：你喜欢《红楼梦》中哪个人物?

王：谁也不喜欢。

毛：《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懂四句话：“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薛家）。”这四句是读《红楼梦》的一个提纲。杜甫有一首长诗叫《北征》，你读过没有?

王：没读过。《唐诗三百首》中没有这首诗。

毛：在《唐诗别裁》上。（当时主席把书拿出来，把《北征》这首诗翻出来要王阅读。）

王：读这首诗要注意什么问题？要先打点预防针才不会受影响。

毛：你这个人尽是形而上学，要打什么预防针？不要打！要受点影响才好，要钻进去，深入角色，然后再爬出来，这首诗熟读就行了，不一定要背下来。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毛：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你读过《聊斋》吗？

王：没有。

毛：《聊斋》可以读。《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知识分子”英语怎么讲？

王：不知道。

毛：我看你这个人，学习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识分子，又不会讲“知识分子”这个词。

王：让我翻一下《汉英词典》。

毛：你翻翻看，有没有这个词。

王：糟糕，你这本《汉英词典》上没这个词，只有“知识”这个词，没有“知识分子”。

毛：等我看一看。（王把字典送给主席）只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这本《汉英词典》没有用，很多字都没有。回去后要你们学校编一部质量好的《汉英词典》，把新的政治词汇都编进去，最好举例说明每个字的用法。

王：我们学校怎么能编词典呢？又没时间又没人，怎么编呢？

毛：你们学校那么多教员和学生，还怕编不出一本词典来？这个词典应该由你们来编。

王：好，回去后我把这个意见向学校领导反映一下，我想我们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三

王：外宾跟你讲英语，你能不能听懂？

毛：我听不懂，他们讲得太快。

王：那你接见时讲不讲英语呢？

毛：我不讲。

王：你又不讲又不听，那你学英语做什么？

毛：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文和汉文作比较，如果有机会还准备学点日文。

四

毛：假如敌人把你活捉去了，你怎么办？

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毛：对了。你回去读一二十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点唯物主义的东西。看来你这个人理论水平不高。在学习上不要什么五分，也不要搞什么二分，搞个三分四分就行了。

王：为什么不搞五分呢？

毛：五分累死人了。不要那么多东西，学多了害死人。譬如说

汉高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四海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写得好，很有气魄。写诗的汉高祖就没读过什么书，但是能写出这样好的诗来。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没有什么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辈，而完全靠自己。

1964年6月，毛泽东等观看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歌舞团演出的舞剧《义静烈火》后和演员们合影。

中越两党两国要共同对敌[1]

（1964年6月24日）

一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们两党两国要合作，共同对敌。你们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你们的事。就是说，我们两家无条件共同对敌。你们负担很重，我们现在负担比你们轻，要分担，必须做好准备。朝鲜战争时，我们也先做了一些准备。我们派遣五个军到鸭绿江边。现在看来，当时准备得还不够。五个军，每军三个师，一共十五万人以上，不到二十万人。后来我们继续增加。现在，对南方战线，我们也应做好准备，不要像朝鲜战争时那样，要准备得更够、更好。你们现在在南越的条件比南朝鲜好，老挝的条件也比南朝鲜好。

刘少奇（以下简称刘）：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与当年不同。那时刚把蒋介石打垮，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没有搞多少。

毛：你们对各种可能都要做准备。第一是像朝鲜战争那样，准备它出兵打北越。准备好了，它不来，那好嘛。第二是它不来北越，在南越范围内打。

---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会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率领的越南友好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刘：还有一种可能，美国的军队不来进攻北越，美国飞机来轰炸。

毛：准备好就不怕，发生什么情况都不怕。听说美国正在帮阮庆[1]扩大军队。阮庆的伪军扩得越大越好，它是你们打击的好对象。光是吃伪军，用不着我们，我们就在后方。你们把伪军吃得差不多了，美国就更孤立。那时，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

文进勇（以下简称文）：我们派去南越的军人，是秘密派去的，因为是同一个国家的人，不用志愿军的形式。

毛：是不是派干部去？有没有派军队去？

文：以派去干部为主，也派去一些军队。营级以上的军队干部差不多都是从北方派去的，也派一些连级、排级干部去搞一些技术工作。连级和连以下的指挥员和其他干部，一般都由当地干部担任。

毛：这样好。革命军人应该样样都会干，不单要会搞军事工作，也要学会搞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要会做群众工作。

文：我们南方的同志有时在西贡市外二十公里处搞文艺演出晚会，连西贡都有很多人出来看，多的时候来了一万多人。他们骑自行车、驾摩托、乘汽车来，有时一来就是几千辆车。他们回去时，一辆车也没有丢失。

毛：南越的情况的确和南朝鲜不同。你们在南越搞武装斗争，第一是负担重，第二是搞得好。你们有进行锻炼军队的好机会。我们打完仗后就没有什么仗打。最近这几年中，只在边境同印度打过一阵子，只有五个师打过仗。

---

[1] 阮庆，当时任南越政权“总理”。

杨成武[1]**（以下简称杨）：**实际上只有四个师打过，并且不是全部都打过。另外在阿里地区有一个团打过。

毛：只打了十几天，中间还有空隙。没有对象就无从打。在中印边境，我们开头让他们开进来，他们很猖狂。等他们侵入得很远了，我们才回手，一追就是几十公里。

刘：以后就老实些了，不敢来了。

毛：我们把捉到的俘虏全部放回去，把缴获的枪炮、车辆也交还，并把我们的军队撤到传统习惯线之后二十公里。以后，他们也不敢派兵来打了。我们现在在哪里都没有战争。我们得不到更多锻炼的机会，我觉得有点可惜，我是一个“好战分子”嘛。在人家看来，你们也好打仗，也不是那么文明的。

文：革命战争一定要打。

毛：你们有机会在南越战争中训练军队，很好。进行革命战争，不单军队，人民也得到锻炼，党也得到锻炼。

陈子平[2]**（以下简称陈）：**人家因此称我们为“冒险分子”。

毛：谁是冒险分子，要具体分析。你们在南越的军队全部北撤，吴庭艳[3]他们就到处杀人，只好再打起来。不打，坐着等吴庭艳来杀死，才算不冒险吗？你们重新搞两手斗争是正确的。你们提过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我们赞成，我们也负有责任。现在你们还是搞两手，目前实际上是武装斗争为主，政治、外交斗争为辅，我们赞成。

---

[1]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陈子平，当时任越南驻中国大使。

[3] 吴庭艳，1955年至1963年11月任南越政权“总统”兼“总理”和“国防部长”。

还有一个怕不怕美国的问题。如果你怕了，美国就客气，那么怕也好。如果怕了，美国就撤退，那怎么不好？问题是，你越怕它越欺负你，该怎样办？只好不怕，只好干。不是我们也不是你们请美国来，是美国自己硬要来。我看，你越不怕，它就越不敢任意欺负。

刘：你不怕，他们反而更加看重你。中国不怕，越南不怕，他们就不能不在行动之前多考虑考虑。美国总统约翰逊、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别人大叫打中国、打越南时，也说过好几次话。他们说到越南就说到中国，分不开。看来，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

毛：以前，美国和蒋介石也分不开，和吴庭艳也分不开，我们都不怕。失败的终归是他们，而不是我们。

二

毛：打得不痛不痒，不好解决问题。索性闹大了，好解决问题。现在在南越和老挝，敌人军事上还占有优势，问题还不好解决。几年之后，革命力量越打越大，反革命力量越打越小，问题才能在较好的条件下解决。

重要的是消灭敌军有生力量。中国有个蒋介石，你们知道吧。他的本性是不变的。他认为他占有军事优势，就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选举他当总统，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就被赶回来。他发动了对我们的大进攻，包括攻打延安。延安和延安以北的所有县城，除了两座以外，全都被占了。我当时退出了延安，但是不离开陕北。蒋军离我们党中央和总司令部最近时相距只有两里地。他们当时并不知

道我们离他们这样近。我身边的主力只有三个排，这里那里打打枪，他们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蒋军接近延安时，有人说，离我中央所在地二十里就该走。我说不忙。离十里时，我也说不忙。离二里时，我说可以走了。走到哪里去呢？到敌人背后。那里没有蒋介石的军队，老百姓是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在陕北打了一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终于，我们不但回到延安，并且把解放区扩大了。在战争中，有时敌人来打比我们去打更好。

三

毛：同美国军人打仗，慢慢会习惯。你们不但能够打死、打伤、俘虏美国军人，并且能够打落美国军用飞机，也能够打沉美国大小兵舰。听说你们在西贡的饭店炸死了几十名美国军人。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

文：有这回事。我们有些工作队专门打美国军人。

毛：有没有抓到？

文：有。一些美国俘虏后来释放了，现在还有大约十个人。

毛：俘获后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然后释放，这样好。对伪军，你们抓了放走，还是用来补充自己的部队？

文：一部分释放，一部分补充。释放回乡的，有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民兵组织。

毛：抓了俘虏，把一部分释放，一部分补充到自己的部队里，好。他们都受过军事训练，只要再给他们加上政治训练就可以用。我们同蒋介石打仗时，有时用三分之一俘虏打，有时用三分之二俘虏打。只需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来，换上五角红星，就可

以指挥他们打。他们有的来不及换帽徽就参战，也扯下青天白日帽徽，要求换，怕被打死之后被误认为是蒋军。为什么能够这样呢？因为士兵本来就来自人民。

四

毛：他们（指贺龙[1]等）都没有进过军校学军事，就带兵打仗。我也没有学过。我不是说现在不要开军事学校，是说闹革命搞武装斗争不一定先学会军事，主要是在战争中学。可能你们南方当连长、营长的也是在战争中学的。

文：团级干部都在北方进过军校。营级干部也是从北方去的。连级、排级和班级干部都是就地提拔的，都没有学过。

毛：我们的少奇同志参加革命前学过一年，是在军阀的学校学的。

刘：进的是湖南讲武堂。一个朋友约我一道去报考，我考上了，他没有考上。那时我还不满十八岁。

毛：过去你们没有进过军事学校，法国军队打不过你们。蒋介石的军官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们的军事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带兵打仗以前都没有学过军事，有一部分后来在教导队受到一点训练。军区司令以上的，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前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

贺龙：参加革命战争后进过我们自己办的军政学校。杨成武在陕北上过学。

杨：在瓦窑堡进过红军大学。

---

[1]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毛：一九三六年，红军大学要我去讲革命战略问题。好，我就看参考书，考虑怎样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写讲义。我看了国民党的军事材料，看了日本、俄国和西欧国家的一些军事著作，其中包括克劳塞维茨[1]的军事著作，也看了一点苏联编的军事资料和中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等，主要是总结中国十年内战的经验。写的讲义题目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没有写完，还有关于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党的工作等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主要部分写好了，我就不讲了。有书，你们看就是了。红军大学的同志帮了我的忙，他们不叫我教书，我就不会去写。当教员也有好处，可以整理思想。

还有一件偶然的事是，一九三七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叫我讲哲学，我就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有几个晚上没有睡觉。写出来之后，讲过一次。讲时规定，不准看书，不准记笔记，因为又看又记就不注意听。我只讲了两个小时。以后再没有机会当教员。他们来请我当教员，我就得研究，看书，思考问题，总结经验，这也有好处。

今天讲多了。我也是小知识分子，同你们差不多，不是大知识分子。我说这些，是为了说清一点，军事这一门看来似乎很深奥，使人望而生畏，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是证明人。

---

[1] 克劳塞维茨，普鲁士军事理论家，主要著作有《战争论》。

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1]

（1964年6月24日）

中国保健工作是学苏联的。我不能完全听保健医生的话。我同我的医生有一个君子协定，我发烧时请你，我不发烧时不找你，你也不找我。我说，我一年不找他，算他的功劳大，如果每个月都找他，这就证明他的工作没有做好。我对医生的话只听一半，要他一半听我。完全听医生的话病就多了，活不了。以前没有听说有那么多的高血压、肝炎，现在很多，可能是医生给找出来的。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坐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我们的保健工作学了苏联的，把专门医生变成不专门的，不多看各种各样的病，不好，要改进。

---

[1] 这是毛泽东接见越南外宾时关于保健工作讲话记录稿的一部分。

对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4年6月26日）

已阅，讲得好。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办公室1964年6月24日为送审江青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给江青的信上。1964年6月23日，周恩来等接见了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演出团、观摩团主要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并召开了座谈会。江青在座谈会上讲了话。她说：对京剧演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那是不能设想的，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15年的现实生活，要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在不妨碍主要任务的前提下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如何着手呢？我认为关键是剧本。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另一方面是移植。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要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剧团的条件是否合适。

对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的批语

（1964年6月27日）

此件[1]送刘、周、邓、彭、康生、定一、周扬、吴冷西、陈伯达[2]同志阅。阅后退毛。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

1964年6月27日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64年5月8日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草稿。报告说，今年2月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在政协礼堂举行迎春晚会，部分节目庸俗低级，引起了群众不满。陆定一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随后，全国文联、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曲艺工作者协会、舞蹈工作者协会、民间文艺研究会和摄

影学会等10个单位的全体干部集中20多天进行了整风。这次整风，主要检查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贯彻执行党的文艺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问题，一是机关的革命化问题。在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有一个时期，主要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前，各单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方向模糊、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不清的问题。在文艺创作方面，没有积极组织作家、艺术家创作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许多作品不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有些协会的刊物编辑部，登了不少脱离时代、没有多少社会意义的东西，甚至还发表了一些借古讽今、发泄对现实不满情绪的坏作品。二、在文艺理论批评方面，旗帜不鲜明，战斗性不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有力的宣传。三、在文艺队伍方面，对队伍的落后的一面估计不足。忽视了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忽视了文艺工作者思想改造的长期性；没有重视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在机关的革命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文联和各协会的党组织不健全，思想不革命化，缺乏无产阶级的战斗作风，机关内政治空气稀薄。二、在工作人员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相当严重。比较普遍和突出的是个人主义思想，不少人图名求利，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三、有些单位人员复杂，队伍不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经过检查和讨论，文联和各协会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进一步明确文艺方向，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目前着重抓报告文学、现代剧目、曲目和革命歌曲等创作，迅速反映当前斗争；同时，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和帮助作家、艺术家长期深入群众生活，努力创作比较深刻地概括时代、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典型人物的作品。要整顿文艺队伍，大力培养青年作家、艺术家。二、改进文艺刊物，加强刊物的战斗性，使刊物真正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宣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培养青年创作队伍的坚强阵地。同时加强评论队伍。三、文联和各协会党组成员、业务骨干和所有的干部，分期分批轮流下放，参加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者参加农村文化工作队，以改造思想，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对群众的文化生活进行调查研究。四、组织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五、加强党组，调整党组成员，健全领导核心。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

1964年，毛泽东和李先念、杨尚昆、乌兰夫、邓子恢、张鼎丞等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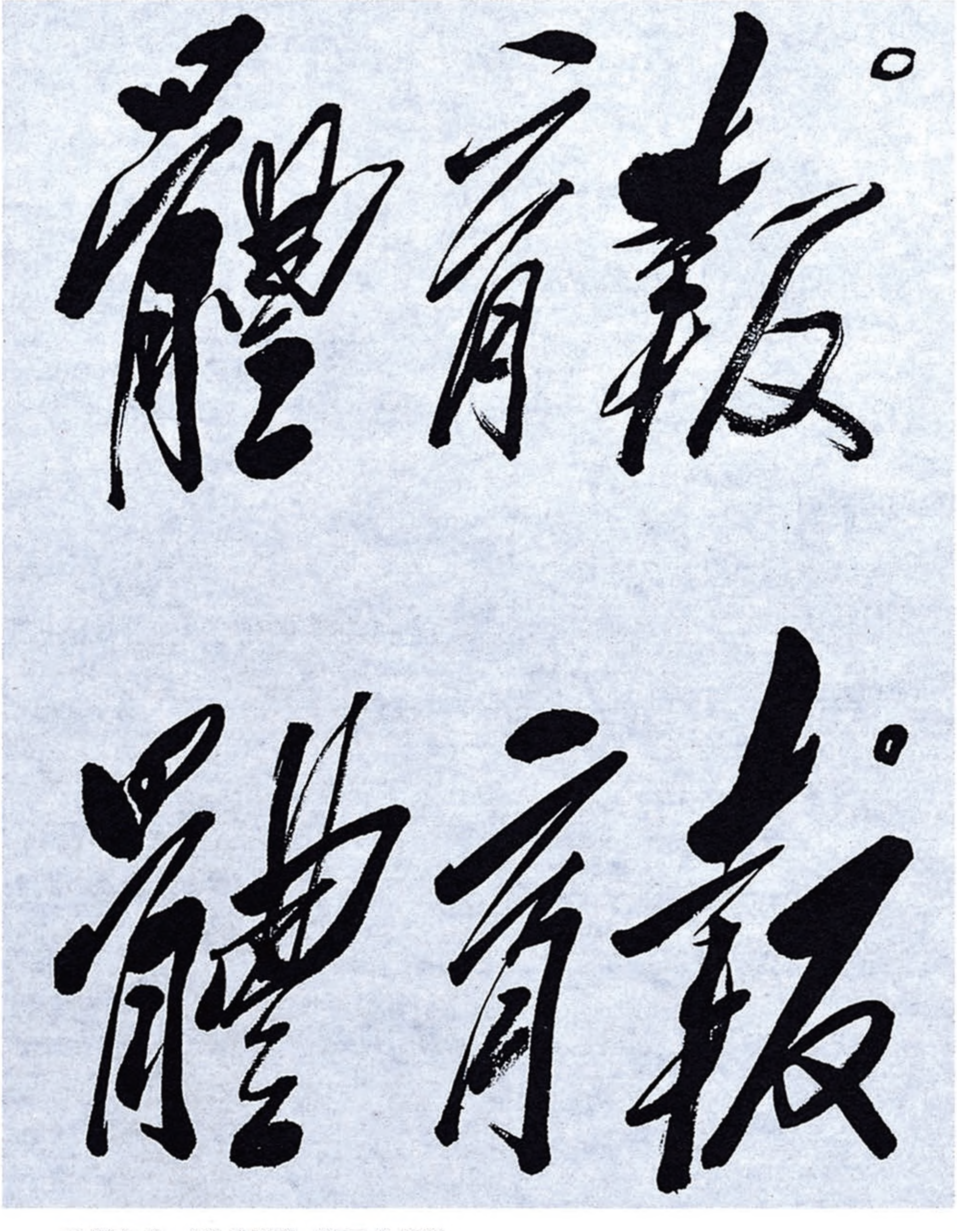
为《体育报》题写报头[1]

（1964年6月30日）

体育报

---

[1] 《体育报》创刊于1958年9月1日。《体育报》创刊六周年前夕，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写了报头。



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的报头。

畅游十三陵水库时对青年的谈话

（1964 年 6 月）

在七级大风里，你们游过吗？

一人高的浪里，你们游过吗？

游泳是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海去锻炼。

这很好，部队要学会游泳。

会休息，才会持久。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

将来打仗还是要靠两条腿。

有许多地方通不过去，看起来只有两只脚有用。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

在通县的，据说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越多就越蠢。

学四十多天文件，搞繁琐哲学。我历来反对这样学。我看这是个迷信，要开大会斗争。

不能纠缠在文件上，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来就打，也打了胜仗，也打些败仗。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们是靠着《三国演义》打仗的。谁能照着书本打仗？林彪也好，贺龙也好，罗荣桓也好，开始就是内行？还是打仗中学会的？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专在那里学，怎么学得会？总要打才能学会，不打不会。

（在谈到有同志学了两个月文件才进村时）

越学越蠢！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正式军官训练，学四大教程。我不相信这些行。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出来还是不会打仗。林彪告诉过我，他出来当连长，就不会打仗。班长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因为班长有经验，只好听班长的话。打了几次就会打了。

第二十条太长了，太繁了。书太厚就没有人读，文章太长就没有人看，不要搞繁琐哲学。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

向来讲话不要鼓掌，要允许人们打瞌睡、养神。我过去读书就看小说，老师一查，就把课本放在小说上。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先生不对，不如看小说。后来就发明可以打瞌睡。你不要讲我这个人没有创造，还是有一些。这样一来，就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有了讲义就不要再讲了。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接见《万水千山》剧组。

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1]

（1964年7月2日）

一

看了北京军区、济南军区的尖子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

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每师先搞一个团，每团先搞一个营，每营先搞一个连。然后再普及，做到全会。

部队要练夜战、近战，练二百米硬功夫，每团要培养一个夜老虎连。

二

各省要搞兵工厂，先搞修理，再搞制造，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事不能全靠中央和军委，各省要准备自己管自己。有人说怕敌人不来用不上，不是浪费吗？

---

[1] 本文的一、二是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谈话的一部分。

那不对，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不是浪费，敌人不来也不是浪费，你说浪费就浪费，浪费也不可惜，一定要搞。当然，我讲每省搞一个兵工厂，有的也不一定每省搞一个，如青海可以同甘肃合着搞一个，宁夏可以同内蒙或者陕西合着搞一个，河北、四川、云南这些省，每个省都要搞一个。

要搞好地方武装，民兵要搞好“三落实”[1]，不能都指望军委。

北京这么多人，更要准备好。这个问题请彭真[2]同志考虑。

北京的地下铁道要修，在城墙底下修，城墙不要再拆了。

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再打它一仗，也好。

---

[1] 指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关于注意报道提拔新生力量[1]的批语

（1964年7月4日）

吴冷西[2]同志：

怀柔县一渡河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做法，各省可能都有，要广泛采访、转载，在几年之内做到每县，每社，每个工厂、学校、机关都有报道，但要是真实的，典型的。固步自封的反面材料，也要登一点。这个问题，报社和通讯社应当讨论一下。并与各省、市、区联系，要他们也一样做。

毛泽东

七月四日

此件并送彭真、安子文、定一、瑞卿[3]四同志阅。

---

[1] 指1964年7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关于北京市怀柔县一渡河党支部提拔新生力量的报道。报道说，几年来，该支部先后提拔了30岁以下的干部17名，分别担任了党支部副书记、副大队长、大队会计、团支部书记等职务。老干部随时随地注意对他们进行教育、严格要求，帮助他们不断提高。

[2]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3] 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教育制度要改革[1]

（1964年7月5日）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

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

---

[1] 这是毛泽东和他的侄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学生毛远新谈话纪要的一部分。

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

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的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

为首都民兵师题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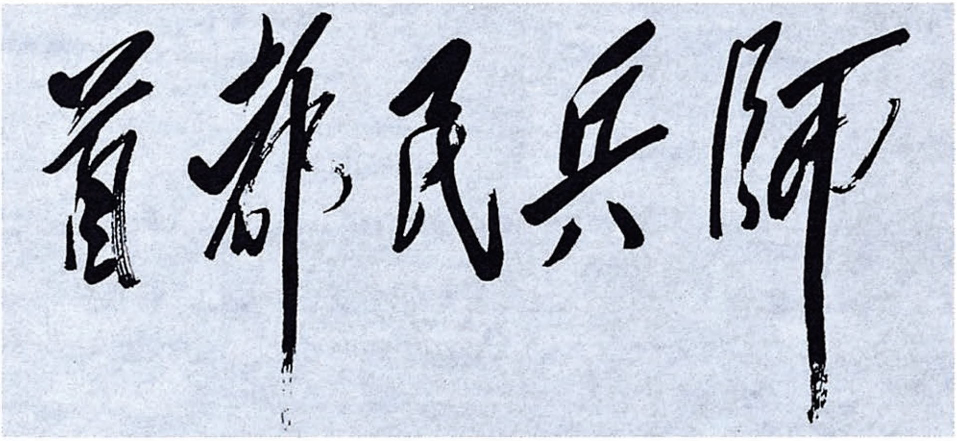
（1964年7月6日）

写了三张，以供选用。[1]

毛泽东

七月六日

首都民兵师



毛泽东为首都民兵师题的字。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1964年4月9日给中央办公厅的信上。信中说："北京卫戍区提出，今年是建国十五周年，参加国庆游行的民兵队伍前有'首都民兵师'五个大字的牌子，想请毛主席亲笔写五个字，不知能否办到，希望能帮助解决。"

为登载两篇文艺理论文章写的编者按[1]

（1964年7月7日）

这两篇文章[2]，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3]驳周谷城[4]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反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放〈方〉向。这两篇批判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编者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

---

[1] 这个编者按后来没有发表。

[2] 指姚文元写的《评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观》（载1964年5月10日《光明日报》）和金为民、李云初写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载1964年7月7日《光明日报》）。

[3] 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4] 周谷城，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他写的文章的题目为《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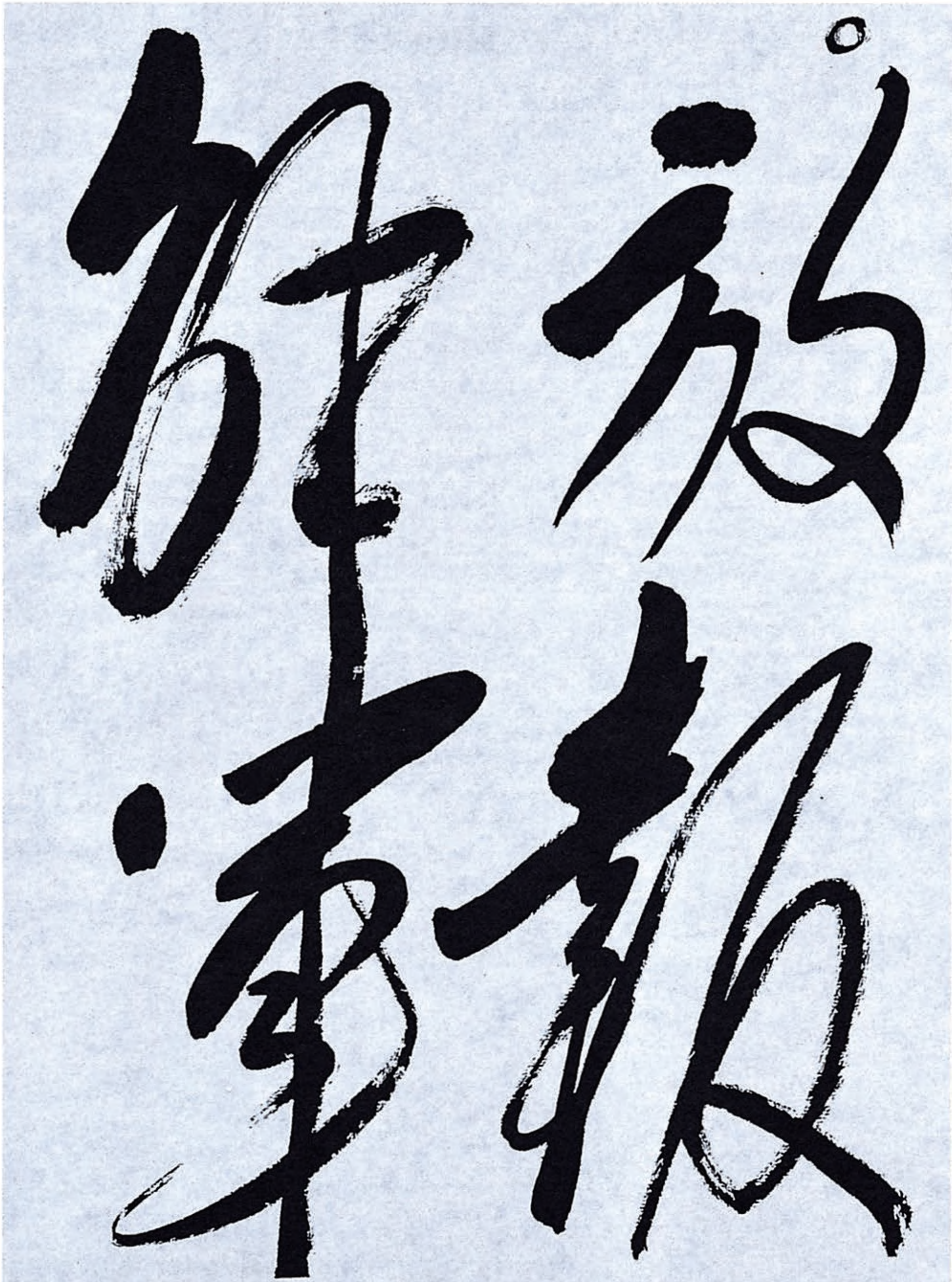
为《解放军报》题写报头[1]

（1964年7月7日）

解放军报

---

[1] 1956年1月1日，《解放军报》正式创刊。1964年7月7日，毛泽东为《解放军报》题写了报头，并提议从当年的八一建军节启用。同时，毛泽东给贺龙同志写信："贺龙同志：解放军报的报头和思想战线几个字写得不好，报名改写过。现写上，请择用。毛泽东 1964年7月7日 换改时候，可在〈再〉小一点为宜。"



毛泽东为《解放军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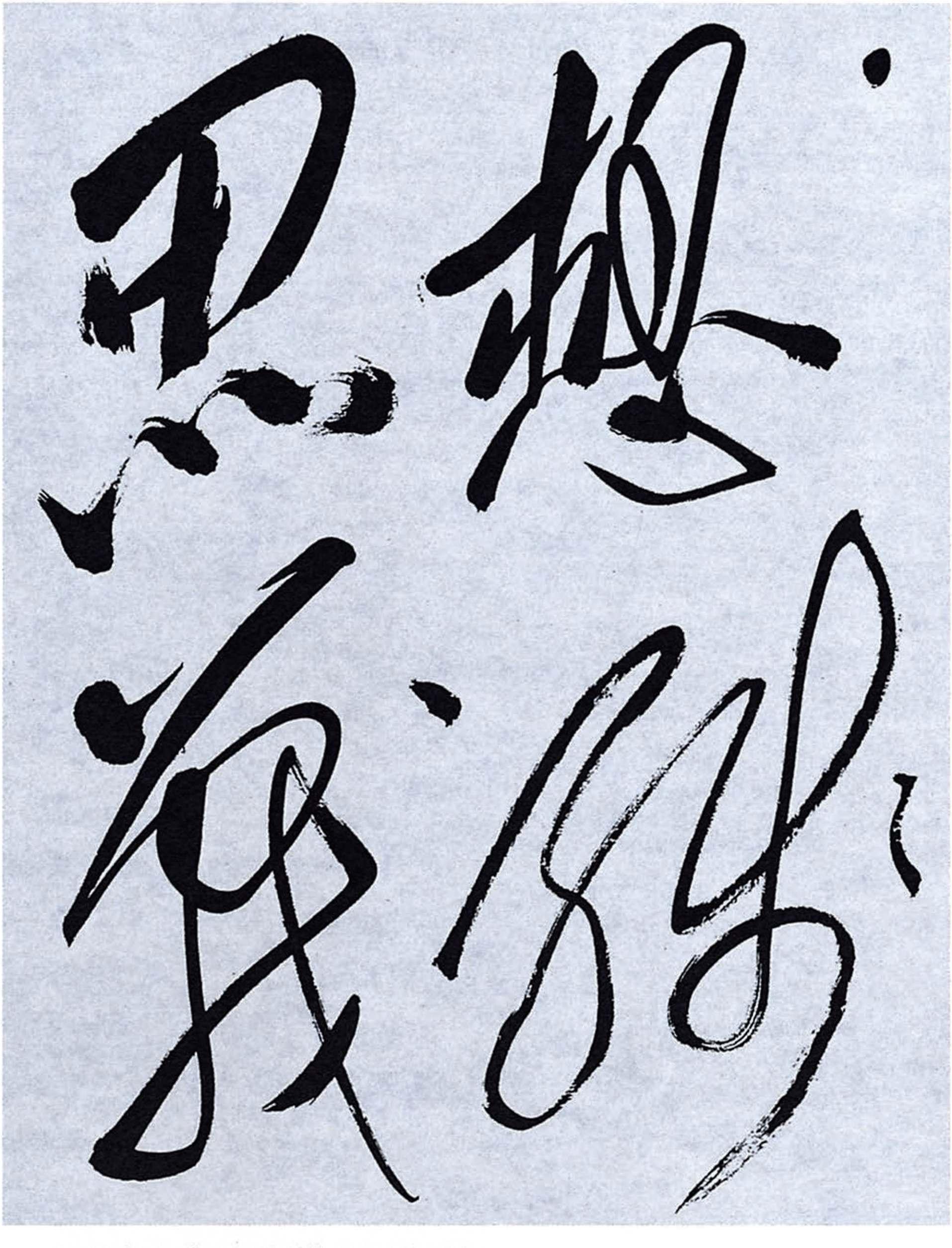
为《思想战线》题名[1]

（1964年7月7日）

思想战线

---

[1] 《思想战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刊。毛泽东为其题写刊名。



毛泽东为《思想战线》题写的刊名。

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

（1964年7月9日）

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这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几年的历史来看，就知道亚非拉人民将来的前途。比如中国吧，在十九年以前，日本军国主义霸占了我们大半个国家，我们同它打了八年仗。抗战胜利后美国人来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我们在解放前要对付的敌人，有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还有它们的走狗汪精卫[2]、“满洲国”的康德皇帝[3]、蒋介石。我们解放后，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

---

[1] 这是毛泽东和在朝鲜平壤参加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2] 汪精卫（1883—1944），浙江山阴（今绍兴）人。1925年在广州任国民党政府主席。1927年7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1938年3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12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

[3] 康德皇帝，即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北京人，清朝末代皇帝。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被迫退位。193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下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934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苏军俘虏，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9年12月被特赦释放。1964年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我们的第二个教员，帮了我们忙的是美帝国主义。第三个帮了我们忙的教员是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军队同他打了四年仗，从过去一百二十万发展到五百多万。蒋介石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军队统统被我们消灭，只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军队跑到台湾去了。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情况。

现在日本人民有很大的觉悟，发动了很大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本国垄断资本的运动。是谁使他们起来的呢？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压迫和剥削把他们教育出来的，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教他们这样做的。我说，日本垄断资本也不是完全赞成美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有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不满意这种占领，因为在美帝占领下，日本不仅丧失了殖民地，而且自己也受美国控制。现在不仅日本人民，而且一部分日本垄断资本家也开始反对美帝国主义。

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历史，近十几年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是非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独立了。一九五八年前，我很少见到非洲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每年经常看到非洲朋友。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比如埃及，一九五六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事件，是英、法联军强大些，还是埃及军队强大些？英国、法国那样强大，为什么一打就跑了呢？现在苏伊士运河究竟在埃及人手里，还是在英、法帝国主义手里呢？再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打了八年仗，法国在战争后期出动了八十万军队，民族解放军只有三四万军队，究竟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强大些，还是法国帝国主义强大些？再讲讲古巴，是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巴蒂斯塔强大些，还是卡斯特罗强大些？卡斯特罗军队八十多人从国外乘船回古巴登岸，激战后剩下的十二人，躲在农民家里，后来又起来搞游击战争，他们经过两年多，就取得了胜利。至于对越南反对法国的侵略，对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的侵略，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这样岂不要得罪法国政府吗？不，胡志明胜利了，本·贝拉胜利了，法国却承认了中国。所以说，世界上的事情在发生变化。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我们法国人失败了，你们美国人要打，也要像我们一样失败的。"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你们看吧！三年也好，再长一些时间也好，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它走，也可以文明一点走。请它走它不走，怎么

办？那就学卡斯特罗的办法，学本·贝拉的办法，学胡志明的办法，也可以学中国的办法。所以，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讲到人民，不是讲反动派，是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压迫、剥削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比如你们在座的亚非各国人民的代表，你们压迫中国人民了吗？你们剥削中国人民了吗？我们没有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压迫你们吗？能剥削你们吗？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干，那末中国政府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如果有的中国人不尊重你们，不讲平等，在你们国家捣鬼，那末你们可以把这样的中国人赶走。这就是亚非拉人民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最根本原则。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关系，不是老子对儿子的关系。要巩固团结，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不管什么人，不管是黑人、白人或是黄种人，不管他信什么宗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或佛教，也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对帝国主义走狗的，都应该团结，只不包括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内的走狗。

至于如何打败国内反动派的问题，我认为或者用文的办法，或者用武的办法。有些国家要号召广大人民起来用武力反对反动派，因为反动派手里有武器。这就要按照各国情况，利用适当时机，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武器同机器差不多，都是人手的延长而已。是人拿在武器手里，还是武器拿在人手里？当然是后者，因为武器没有手，哪个武器有手？我打了二十五年仗，包括朝鲜战争三年。我原来是

不会打仗的，不知道怎样打，是通过二十五年的战争过程学会打的。我从没有看见过武器有手，只看见人有手，而人用手掌握武器。

我们的“名誉”很不好，美帝国主义者说我们是侵略者。他们说我们侵略了中国，这确实是“侵略”了蒋介石，但那是蒋介石先侵略了我们嘛！又说我们“侵略”了朝鲜，那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打到了鸭绿江边，我们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还说我们侵略了印度，那是因为印度打进了我国几十公里，它打了好几年，我们才自卫还击。一打就打回了老国境。在几千公里的老国境线，印度人跑光了，没有军队，那我们就撤回来了，撤到帝国主义规定的所谓新国境线[1]，这条线我们是不承认的。我们从这里后退二十公里，设立了缓冲地区。帝国主义者还说我们是好战分子，原因是我们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现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国人，我们也支持过本·贝拉打法国人。哪个地方需要支持，我们就支持，因此就“名誉”不好，当了“好战分子”。

安哥拉朋友问，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要防止哪些幻想和危险？由于安哥拉现在还没有解放，仍要搞武装斗争，你们现在只能搞革命，经济建设只能在根据地搞一些。葡萄牙是不会帮助你们的。美国的帮助是别有用心的。如果说要防止幻想，我想要防止对美国的幻想。至于建设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危险，现在很难说。如果要说防止危险，就是防止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的危险。至于实际工作犯些错

---

[1] 指麦克马洪线。它是1914年3月英国殖民主义者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同西藏地方当局以秘密换文方式制造的一条非法边界线。该线将位于中印边界东段历来属于中国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中国政府从未批准或承认这条边界线。1953年，印度基本上侵占了该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误，那是难免的。哪个政党都要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就犯过很多错误，犯过重大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就是了。错误能帮助人头脑清醒。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四十三周年的电报[1]

（1964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四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蒙两国是社会主义的兄弟邻邦，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三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的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上，为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努力。

祝蒙古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蒙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细迫兼光等的谈话

（1964年7月1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朋友们。对日本朋友，十分欢迎。我们两国人民应当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互相帮助，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文化上也要互相帮助。你们是经济、文化、技术都比我们发达的国家，所以，恐怕谈不上我们帮助你们。是你们帮助我们的多。

谈到政治上，难道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互相支援吗？而是互相对立吗？像几十年前那样互相对立吗？那种对立的结果，对你们没有好处，对我们也没有好处。同时，另外讲一句相反的话：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二十年前那种对立，教育了日本人民，也教育了中国人民。

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你们，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教员，也是你们的教员。结果日本的命运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美帝控制吗？同样的命运在我们的台湾，在南朝鲜、在菲律宾、在南越、在泰国。美国人的手伸到我们整个西太平洋、东南亚，它这个手伸得太长了。第七舰队是美国最大的舰队，它有

十二只航空母舰，第七舰队就占了一半——六只。它还有一个第六舰队在地中海。当一九五八年我们在金门打炮时，美国人慌了，把第三舰队的一部分向东调。美国人控制欧洲，控制加拿大，控制除古巴以外的整个拉丁美洲。现在伸到非洲去了，在刚果打仗。你们怕不怕美国人?

佐佐木（以下简称佐）：让我代表访问中国的五个团体简单地讲几句话。

毛：好。

佐：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并作了有益的谈话。我看到主席很健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进步，为领导全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日夜奋斗，在此向主席表示敬意。

毛：谢谢!

佐：今天听到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讲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非常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过去那一套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你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觉醒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分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有一千一百多人（指战犯）回到日本，写来了信。除了一个人之外，都对中国友好。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怪的。这一个人叫什么名字?

赵安博：叫饭森，现在当法官。

毛：一千一百多人，只有一个人反对中国，同时也是反对日本人民。这件事值得深思，很可以想一想。你（指佐佐木）的话没讲完，请再讲。

佐：毛主席问我们怕不怕美国人。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正在为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而工作。而日本，今后才搞革命，才搞社会主义。要使日本革命成功，就必须击败事实上控制日本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美国。因此，我们不仅不怕美国，而且必须同它斗争。

毛：说得好！

佐：这次我们来中国，同周恩来总理、廖承志先生、赵安博先生以及其他中国朋友一起，就日中问题，就围绕日中问题的亚非形势和世界形势，世界的帝国主义、新旧殖民主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得到了教益，并且找到了许多共同点。我们回国以后，一定要促使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加强日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毛：这个好！

佐：日本社会党和日本的人民群众认为，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因此，它必须同关系很深的中国保持密切的联系，希望中国把日本当作亚洲的一员，同我们进行合作。

毛：一定，互相合作。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都反对美帝国主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有许多人反对（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也反对（美）帝国主义。戴高乐反对美国就是证明。我们现在提出这么一个看法，就是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你们的垄断资本

是你们反对的，可是他们也不满意美国。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人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依靠美国。我看，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也会把骑在头上的美国人赶掉。因为日本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敢于跟美国作战，跟英国作战，跟法国作战；曾经轰炸过珍珠港，曾经占领过菲律宾，占领过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曾经打到印度的东部，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夏天蚊子很多，台风很大，没有深入进去，打了败仗。日本军队在那里损失了二十万人。这样一个垄断资本让美帝国主义稳稳地骑在自己的头上，我就不相信。在这里，我不是赞成再轰炸珍珠港，（众笑）也不是赞成占领菲律宾、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当然，我也不赞成再去打朝鲜和中国了。日本完全独立起来，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愿意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人们，建立友好关系，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互相往来，建立兄弟关系，岂不好吗？

刚才你说到你们日本要革命，将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话讲得很正确。全世界人民都要走你所讲的这条道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埋葬到坟墓中去。

还有朋友提问题吗？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商量商量，这是座谈会。你们不是有五个团体吗？

佐：（对日本人说）各团出一个代表讲话吧！

黑田（以下简称黑）：我与其说是提出问题，不如说是谈一谈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毛：好！

黑：日中友好运动，开始时只有社会主义者和从事工人运动的人参加。最近，逐渐包括了广大的各阶层人民。这是日中友好运动

的变化、特征，也是一个前进，值得注意。从政党来说，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是革新政党（在日本革新政党包括社会党、共产党），现在保守党中的一部分人也下决心参加日中友好运动了。从国民的阶层来看，过去参加日中友好运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和中小企业者。最近，连垄断资本中的一部分人，也要日中友好，特别是下决心搞日中贸易。

毛：我也知道，是个很大的变化。单是搞中小贸易，不搞大贸易，不和垄断资本搞贸易，意义就不完全，也不算大。

黑：保守党内和垄断资本中有一部分人也开始搞日中友好和日中贸易，当然也有跟美国走的，因此在保守党和垄断资本内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这是最近的突出的情况。而且，这一部分垄断资本和保守党，不能和我们完全一样，这样要求他们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里就必须有斗争，那些没有决心向前看的一部分垄断资本家和保守党的背后，有美国的力量。美国在操纵他们。因此，同这部分反动的保守党和反动的垄断资本家进行斗争，实际上也是和美国进行斗争。整个说来，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成了国民运动。日中友好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民对中国抱有亲近感，有的表现出来，有的潜在着。这样一种感情是促进日中友好、恢复日中邦交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日本人对美国没有这种感情，对英国、苏联也没有这种感情，对中国却有特殊的感情。

毛：中国人民也是这样，高兴和日本人民的代表们亲近，关心我们两国的关系。你们可以看到，到中国什么地方都可遇到中国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知道时代不同了，情况变化了。中国的情况变了，日本的情况变了，世界的情况变了。昨天我接待了几十位亚洲、非洲的朋友，也在这个地方（指接见的场所）。有十五位非洲

的黑人和阿拉伯人，有十五位亚洲朋友，有一位澳洲朋友。今天你们是三十位朋友，昨天是三十一位。其中有日本朋友，就是他（指西园寺公一）。有两个泰国的代表。这个国家跟我们现在是对立的。这个国家来了两位代表参加平壤的经济讨论会。但是没有印度人。（会场活跃）你们以为印度人都是反对中国人的吗？不是。印度广大的人民同中国广大的人民是互相友好的。我相信，印度的广大人民也是和日本的广大人民友好的。就是他们的政府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控制，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很大。有三个国家援助印度以武器来打我们。这就是美国、英国、苏联。你说怪不怪？苏联过去与我们是很好的。自从一九五六年二十大以后，就开始不好了，后来就越来越不好。把在中国的专家一千多人统统撤退。几百个合同统统撕毁。首先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既然你反对，我们就要辩论。他们现在又要求停止公开辩论，哪怕停止三个月也好。我们说三天也不行。（众笑）我们说，我们过去打二十五年仗，这里包括国内战争、中日战争二十二年，朝鲜战争三年，一共二十五年。我说，我这个人是不会打仗的，我的职业是教小学生的小学教师。谁人教会我打仗呢？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皇军，第三个是美帝国主义。对这三个教员我们要感谢。打仗，并没有什么奥妙的，我打了二十五年仗，我也没有受过伤。从完全不懂到懂，从不会到学会打仗。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这二十五年中，我们的军队和中国人民死伤总有几百万、几千万。那么，中国人不是越打越少吗？不！你看，现在我们有六亿多人口，太多了。要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公开辩论，是不会死人的。打了几年了，一个人也没有死。我说我们也准备打二十五年。我们请罗马尼亚代表团转告苏联朋友。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是来做这工作的，要停止公开争论。听说

现在罗马尼亚和苏联也打起笔墨官司来了。(笑)

问题就是一个大国要控制许多小国，一个要控制，一个就反控制，等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东方各国，日本和东方各国势必就要反控制一样。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也许你们赞成，让他们控制吧?(外宾表示不赞成)

细迫兼光（以下简称细）：我曾经长期坐过监狱。像我这样善良的好人被关在监狱，对有病的妻子，也不能照料。对这样恶劣的政府，我没有办法像主席那样宽大。这次来中国访问是从神户坐中国的“燎原”号货轮来的。日本的友好团体租了小船，打旗、奏乐来欢送。但日本警察方面的小船也在那里转来转去，采取了另外一种行动。我们来中国后，中国的政府要人和人民一道来欢迎我们。希望日本也能早日成为一个政府和人民能一起欢迎中国朋友的国家。

毛：你们从上海登岸的?

细：是的。像日本政府那样的坏政府应当早日打倒，建立一个人民政府，否则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友好。我不能宽恕欺负我的政府。我年纪大了，想在我的遗嘱里告诉我的孩子，要他们打倒政府。

毛：多大年纪了?

细：六十七岁。

毛：比我小嘛！你活到一百岁，所有帝国主义都垮台了。你们恨日本政府、日本的亲美派，跟我们过去恨国民党政府亲美派——蒋介石是一样的。蒋介石是一个什么人物呢？曾经和我们合作过，举行过北伐战争，这是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事。到一九二七年他就杀共产党，把几百万人的工会、几千万人的农会，一扫而光。蒋介石是第一位教会我们打仗的人，就是指这一次。一

打就打了十年。我们从没有军队发展到有三十万人的军队，结果我们自己犯错误，这不能怪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只好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座的，有我，还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军队有多少呢？

从三十万减到二万五千人。我们为什么要感谢日本皇军呢？就是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二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呀！

荒哲夫：我提一个问题。先生刚才说两大国要控制世界。现在，日本有一个奇妙的现象。日本的冲绳和小笠原群岛被美国占领，但在北方，在我居住的北海道的左边有个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了。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被占领的。据说，千岛是根据我们没有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划归苏联的。我们长期同苏联交涉，要求归还，但是没有结果。很想听听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毛：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让外蒙古名义上独立，名义上从中国划出去，实际上就是受苏联控制。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就是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提的，一九五四年他们在中国访问的时候。他们又从罗马尼亚划了一块地方，叫做比萨拉比亚。又在德国划了一块地方，就是东部德国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国人都赶到西部去了。他们也在波兰划了一块地方归白俄罗斯。又从德国划了一块归波兰，以补偿从波兰划给白俄罗斯的地方。他们还在芬兰划了一块。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他们在边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见就是都不要划。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

有二千多万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两亿。

你们日本人口有一亿，可是面积只有三十七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曾我（以下简称曾）：在三十个人当中，我们这一批人（社会主义研究所代表团）最年青，都是在第一线活动的。我们很想了解革命政党的建党和党风。我们都是社会党的左派。我们同社会党中央的改良主义者、结构改革论者进行斗争。

毛：你们有多少人？

曾：全团十一人。从我们年青人看来，我们觉得社会党的干部、议员行动迟钝。也许因为他们年老。（主席插话：包括我在内了。）我们很想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风和党风，请讲讲。

毛：这个问题应该说我比较熟悉。我们这一批人参加过一九一一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领导的，当过兵。从那时和那时以后，我读过十三年书，有六年读的是孔夫子的，有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干过学生运动，反对过当时的政府。干过群众运动，反对过外国侵略。就是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党。既不知道马克思，也不知道列宁。因此就没有准备组织什么共产党。我相信过唯心主义，相信过孔夫子，相信过康德的二元论。后来，形势变化了，一九二一年组织了共产党。当时全国有七十个党员，选出十二个代表，在一九二一年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我是代表之一。其中还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叫陈公博，后来他们都脱离了共产党，参加了汪精卫政权。另一个，后来成了托派。这个人现在住在北京，还活着。我活着，那个托派还活着，第三个活着的就是董必武副主席。

其他的都牺牲了，或者是背叛了。从一九二一年组织党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只晓得革命，但怎么革命，方法、路线、政策，啥也不懂。后来初步懂得，这是在斗争中学会的。比如土地问题吧，我是花了十年工夫研究农村阶级关系。战争嘛，也是花了十年，打了十年仗，才学会战争。党内出右派的时候，我就是左派。党内出“左”倾机会主义时，我就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后来，又花了十年时间。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四年，我们又用整风的办法，我们叫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路线，说服那些犯错误的同志。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的七次党代会上，终于将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发动进攻时，用四年的工夫把他们打败。

你们的问题是党的作风吗？首先是政策问题——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组织方面的政策。单有简单的口号，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是不行的。

我说我的历史是从不觉悟到觉悟，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有神论到无神论。如果说我一开始就是马列主义者，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我什么都懂，也不正确。我今年七十一岁了，有很多东西不懂，每天都在学习。不学习、不调查研究，就没有政策，就没有正确的政策。可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曾相信过唯心论，有神论，而且我打过许多败仗，也犯过不少错误。这些败仗、错误教育了我，别人的错误也教育了我。就是那些整我的人，教育

了我。难道要把他们都抛掉吗？不！我们统统团结了。比如陈绍禹（王明），他还是中央委员，他相信修正主义，住在莫斯科。比如李立三，你们有人会知道，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我们这个党，几朝领袖都是犯错误的。第一代，陈独秀，后来叛变成了托派。第二代，向仲发和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向仲发叛变，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陈绍禹，他统治的时间最长——四年，为什么把南方根据地统统失掉，三十万红军变成了二万五千，就是因为他的错误路线。第四代是张闻天，现在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当过驻苏大使，当过外交部副部长，后来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义。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我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么四代，那么危险的环境，我们党垮了没有呢？并没有垮。因为人民要革命，党员、干部大多数要革命。有了适合情况的比较，正确的政治方面的政策、军事方面的政策、经济方面的政策、文化方面的政策、组织路线的政策，党就可以前进，可以发展。如果政策不对，不管你的名称叫共产党也好，叫什么党也好，总是要失败的。现在，世界上的共产党有一大批被修正主义领导人控制着。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共产党，现在分成两种共产党，一种是修正主义共产党，一种是马列主义共产党。他们骂我们是教条主义。我看那些修正主义的共产党还不如你们，你们反对结构改革论，他们赞成结构改革论。我们和他们讲不来，和你们讲得来。

佐：毛主席在百忙之中，对我们进行了有意义的谈话，谢谢。

毛：我讲了多久啊？两个多小时啦。

细：谢谢毛主席进行了富于教益的谈话。上次我随铃木茂三郎来时，毛主席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日本有一句谚语：“虽读论语，却不知论语之所以然。”由于毛主席贤明，所以虽然没有看过

《孙子兵法》，但是也懂得兵法，我们是无法和毛主席相比的，不过，听了主席的谈话，我想，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从我们周围许多教员那里学习。

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你们的很好的教员，逼你们想问题，开动脑筋。不过马克思主义也要读几本，修正主义的书也要读，唯心论也要读，美国实用主义也要读。不然我们就无法比较。你们如果不读结构改革论的文章和书，你们就不懂结构改革论。什么叫结构？就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第一项，根本的、主要的，就是军队。你要改革它，怎么改革？意大利人发明了这个理论，说要改革结构。意大利有几十万军警，怎么改法？第二个是国会。今天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国会议员。国会，实际上是政府和垄断资本的代表占大多数。如果你们占了多数，他们会想办法的，什么修改选举法等等，他们是有办法的。比如，发签证不发签证，还不是你们的政府管。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发，他不发。今年八月六日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的大会，有个是不是发签证的问题。并不是向你们发不发的问题，你们已经来了，还不是发了。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结构改革论，也不相信什么三国条约。全世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的政府都签了字，只有几个国家的政府没有签字。有时候多数是错误的，少数是正确的。四百年前，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说地球是转动的，当时全欧洲人没有一个人相信。意大利的伽利略相信这个天文学，他也是物理学家。结果，和你（指细迫）一样，被关在监狱里。他是怎么出来的呢？签了一个字，说地球是不转动的。他刚出了班房，就说地球还是转动的。你（指细迫）没签字，你比他好。至于你对你的妻子没能照顾，那样的事多得很。我有兄弟三个，有两个被国民党杀死了。我

的老婆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我有个妹妹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侄儿也被国民党杀死了，有个儿子被美帝国主义炸死在朝鲜。我这个家庭差不多都被消灭完了，可是我没有被消灭，剩下了我一个人。中国家庭被蒋介石消灭的不知有多少，整个家庭被消灭的也有。所以你（指细迫）不要悲伤，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

对《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稿的修改[1]

（1964年7月）

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

---

[1] 这篇文章送审时的题目为《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改为现在的题目。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本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1964年7月14日）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类社会矛盾性质完全不同，处理方法也应当不同。正确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将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将使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巩固和发展。许多人承认对立统一的规律，但是不能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不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有敌我矛盾，而且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懂得正确地区别和正确地处理这两类社会矛盾，这样也就不能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

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大错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对于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反对命令主义和恩赐观点。我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作阶级分析，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在农村中，在农业集

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不断地教育人的运动中，要善于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打败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导下，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在科学、文化、艺术、教育队伍中，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也是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要经过文化

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同时，普遍组织和训练民兵，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产物。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属于社会主义各国人民，而且属于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

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的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民族利己主义，甚至热衷于同帝国主义合伙瓜分世界，那就是蜕化变质，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对林彪同杨成武等两次谈话的纪要的批语

（1964年7月15日）

罗瑞卿[1]同志：

此件[2]已看过。准备十六日或十七日请总理、彭真、贺龙[3]、瑞卿、杨成武、叶剑英、聂荣臻、陈毅、伍修权[4]九同志专谈一次军事问题。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指罗瑞卿1964年7月14日转报给毛泽东的林彪7月10日、12日两次同杨成武等人的谈话纪要。谈话中说，毛泽东6月16日在十三陵的指示等是经过慎重考虑、根据最新情况提出来的，我们应该据此修改我们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作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各总部应该认真传达研究、贯彻执行，用它把我军的战略思想完全统一起来。

[3] 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4] 叶剑英，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聂荣臻、陈毅，当时均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关于建设地方武装和备战问题[1]

（1964年7月15日）

一

要搞地方武装。有些省要搞一个兵工厂。先搞修理，后搞制造，要能造轻武器和炸药。现在要从中央兵工厂的几十万工人中分出十万人给各省，组建省的兵工厂。然后，再招收十万新工人补充中央的兵工厂。

全国一百多个师，要给沿海、沿边的十几个省每省一个师作骨干。拿十个或十一二个师出来给各省，归军委和省委、省军区双重领导。平时搞民兵工作，战时以营为单位分散，用民兵补充扩大，对敌作战，归各省领导。各省有一个师，他们的劲头就大了，打起仗来，各省可以自己搞，中央哪能顾得那样多？被分割了，你不独立作战还行？这些师分给谁？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各一个。（周恩来、彭真[2]：安徽也要。）好。一百多个师，拿十一二个师分到各省去把基干民兵搞好，有事时以这个师做骨干就可以和敌人斗。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

二

我们的打法是，我能吃下你时，就吃你；吃不下你时，也不让你吃了我。时机不成熟，我主力不同你硬拼，同你脱离接触。等到我能吃了你的时候，就把你吃掉，一口一口地吃，最后把你吃掉。无非你占了我什么地方，听起来名誉不好。名誉不好就名誉不好，主要不是名誉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的问题。（罗瑞卿[1]：第二次世界大战，敌人打到了莫斯科城下。）敌人打到莫斯科困难一些，打到北京还容易一些。就是失掉了北京，也不要紧。失掉了，我们也不到重庆，民主人士可以去。我们到北京、太原之间的山洞里去，就在这里同敌人斗。让敌人轻视我们好，不要紧。蒋介石历来就是轻视我们的。进入延安时，他二十五万人，我们二万多人。我身边只有一个连三个排，是汪东兴[2]带的。离敌人二十里、十里也没走，只离几里才走。他不到宝塔山，我就不走。有人说要走，我说不走，因为还有工作没有做好，司令部没有组织好，队伍没有凑起来，怎么打仗呢？他到了宝塔山，我才走。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我就是不走。结果怎样呢？一个人都没有死，最后还不是敌人失败了。所以，什么事都不要怕，不要慌慌张张。

不要看美国人很凶，他很怕我们。解放战争快胜利的时候，他天天计算我们离青岛有多远，我们一接近，他就溜了。从青岛溜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

[2] 汪东兴，解放战争时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时任中共中央机关三支队副参谋长等职。

了，从别的地方也溜了。美国人很凶，可就是溜得快，跑得快。只有英国人蠢，他不溜，以后又派船来接，被我们捉住，后来才又逃跑的。[1]所以敌人轻视我们，看不起我们，没有什么要紧。让他轻视有什么要紧？可能还有好处。

三

沿海、沿边有些省要搞兵工厂，造轻武器、造子弹。平时学会制造，积累一些材料。新疆要逐步储备兵工材料。又会造，又有材料，需要时就可以造。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

一有战争征候，工厂就要搬家，疏散到山里去。上海这么多工厂还能留给敌人吗？不能。

攀枝花、酒泉两个钢铁基地，没有落实。这两个基地一定要落实。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集中修一条成昆路。必要时也可将内昆路的铁轨拆掉，先修成昆路。

---

[1] 指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紫石英”号事件。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时，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0多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后于7月30日夜逃出长江。

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7月15日、20日、25日）

一

（一）还要多讲几句，以驳〈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2]

（二）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4年7月15日审阅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初稿）时写的批语；二、三、四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稿的修改。中共中央1964年7月28日给苏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在同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召集权问题这段文字修改为：“第四，关于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集者。你们的来信说，苏共负有召集国际会议的‘特殊责任’，并且引证了1957年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但是，你们所引证的这个决议明明写着：‘委托苏联共产党在和各兄弟党协商的条件下负责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就是说，必须同各兄弟党协商，才能召集会议。毛泽东同志在提到由苏共负责召集国际会议的时候，正是以事先同各兄弟党协商为前提的，丝毫也不意味着你们可以独断专行。我们还要指出，1960年兄弟党会议确定了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因此，召集国际会议必须得到兄弟党的一致同意，绝不能把一部分兄弟党的意志强加于另一部分兄弟党，硬要它们同意开会。如果你们胆敢破坏这个原则，不同所有的兄弟党商量好，取得一致的协议，你们就根本没有权利召集国际会议。”

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1]

二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如果是忘记，这就表现你们的记忆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没有看懂，这就表现你们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们不是明明写着，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吗？

---

[1]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国际会议加写了一段文字：“自从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到一九五七年，一共有十四年。在这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开过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会议。这并没有妨碍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相反的，在这十四年中，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欧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各种类型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三

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1]和一九六〇年声明[2]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在两次兄弟党会议的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一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在一九六〇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四

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

[1] 指1957年11月10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195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在1960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当说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像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对空军再次击落敌U－2飞机的报告的批语[1]

（1964年7月21日）

刘亚楼同志：

此件[2]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毛泽东

七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1964年7月18日关于请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将空军再次击落敌U－2飞机的报告转送毛泽东的信上。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徐深吉、副司令员王辉球1964年7月17日关于再次击落敌U－2飞机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并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在详细介绍空军七月七日在漳州击落敌U－2飞机的情况后，总结了这次战斗的一些新特点、新经验以及在党政军民密切合作下，从军事、政治、技术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等。

1964年，毛泽东接见连续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指战员。

1964年，毛泽东亲切接见空军地空导弹第二营英雄营长。

1964年，毛泽东亲切接见边防自卫反击作战战斗英雄吴元明。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复兴节二十周年的电报[1]

（1964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在波兰复兴节二十周年的时候，谨向你们和兄弟的波兰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波兰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

中波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人民今后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的电报。祝贺波兰国家复兴节二十周年。

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波兰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植下的西德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复仇政策的斗争。

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对彭真[1]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的批语

（1964年7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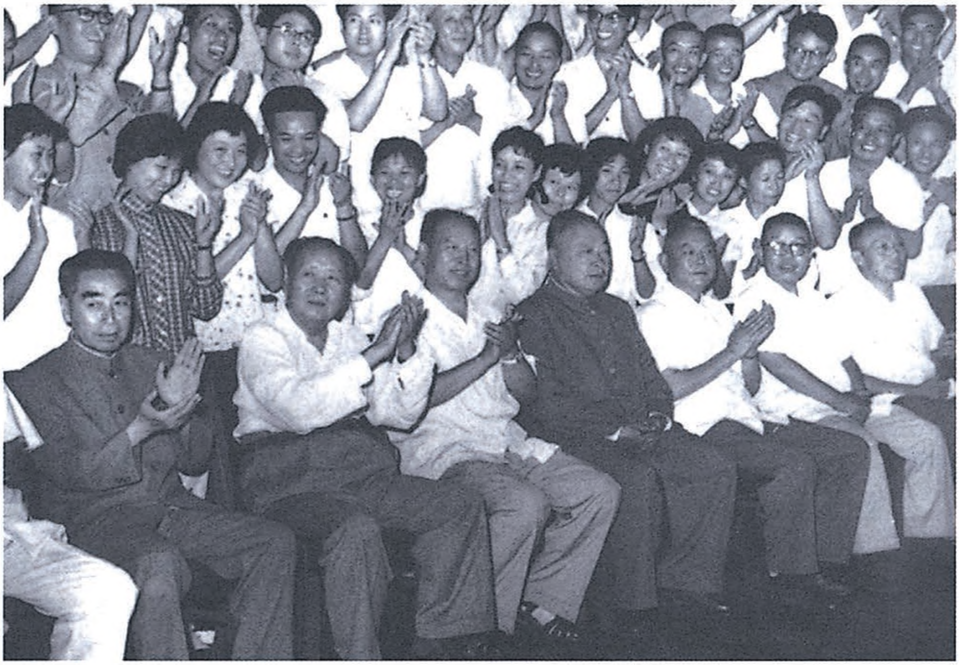
退彭真同志。此件[2]已阅，讲得很好。

毛泽东
七月廿三日

---

[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彭真1964年7月1日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主要内容是：一、京剧一定要改革，非改革好不可。怎样改呢？（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服务。（二）要为多数人，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服务，不要为旧社会的“遗老”、“遗少”、地富反坏右少数人服务。（三）重点要演活人，演工农兵，演英雄人物，少演死人，少演帝王将相。（四）要把京剧的革命的思想内容和京剧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谐地统一起来。（五）战略上要藐视，坚信一定能改好；战术上要重视，从剧本、导演、演唱，以至于每一幕、每一场、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唱、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要十分认真。二、要保证京剧改革好，必须有两个前提：（一）京剧的作者、导演、演员必须深入工农兵，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同工农兵建立血肉联系。（二）京剧工作者思想要革命化。



1964年7月17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1964年7月，毛泽东接见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

1964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和参加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合影。

1964年7月，毛泽东观看京剧《芦荡火种》后和演员握手。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一周年的电报[1]

（1964年7月25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一周年这个光荣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英雄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兄弟般的、热烈的祝贺。

十一年前，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下，举起了武装革命的大旗，在古巴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揭开了光辉的一页。古巴人民沿着七·二六开辟的武装革命的正确道路，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推翻了美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且坚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拉丁美洲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古巴统一革命组织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等的电报，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一周年。

革命胜利以来，英雄的古巴人民在以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理为首的古巴革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事实充分显示了掌握了自己命运的、敢于斗争和敢于胜利的人民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不可战胜的。

社会主义的古巴，是在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古巴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卡斯特罗同志和革命政府的周围，高举革命的旗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旗帜，坚持两个哈瓦那宣言的革命路线，坚持五项正义要求[1]，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卫了古巴的独立和主权，保卫了古巴的社会主义。古巴革命胜利的巩固和发展，大大鼓舞和支持了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大大鼓舞和支持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

中国和古巴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人类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任务，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古巴革命胜利后，中古两国的友好关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重大的发展。不论地球上今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古巴人民、同拉丁美洲和

---

[1] 指古巴政府1962年10月28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一）停止经济封锁和美国为了反对古巴而在全世界各地施加贸易和经济压力的措施。（二）停止一切颠覆活动，停止从空中和海上投掷和运送武器和爆炸物、组织雇佣军入侵、输送间谍和破坏者，所有这些从美国和某些帮凶国家的领土上进行的活动。（三）停止从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基地上进行的海盗攻击。（四）停止美国军用飞机和军舰一切侵犯古巴领空和领海的行动。（五）撤除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和归还被美国占领的这块古巴领土。

全世界人民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共同奋斗到底。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节节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给范瑾[1]的信

（1964年7月29日）

范瑾同志：

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

[1] 范瑾，当时任北京日报社社长。

关于题写《湖南日报》报头[1]给张平化[2]的信

（1964年7月29日）

平化同志：

《新湖南报》[3]报头写得不好，宜改换为《湖南日报》，使与《湖北日报》相一致。现写了两张，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退回重写。如可用，则以在今年国庆节改换改〈为〉宜。请你酌定。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七月廿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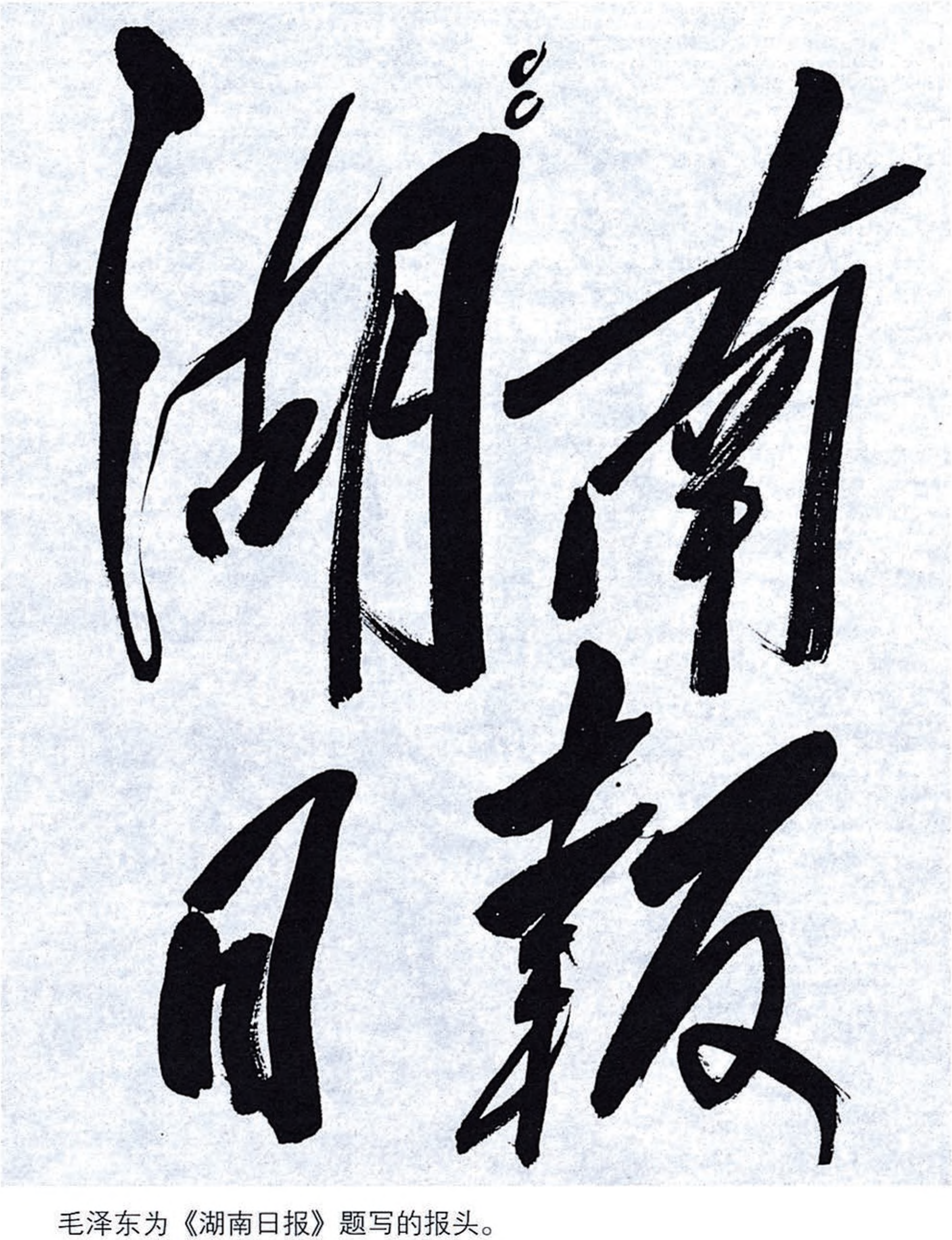
湖南日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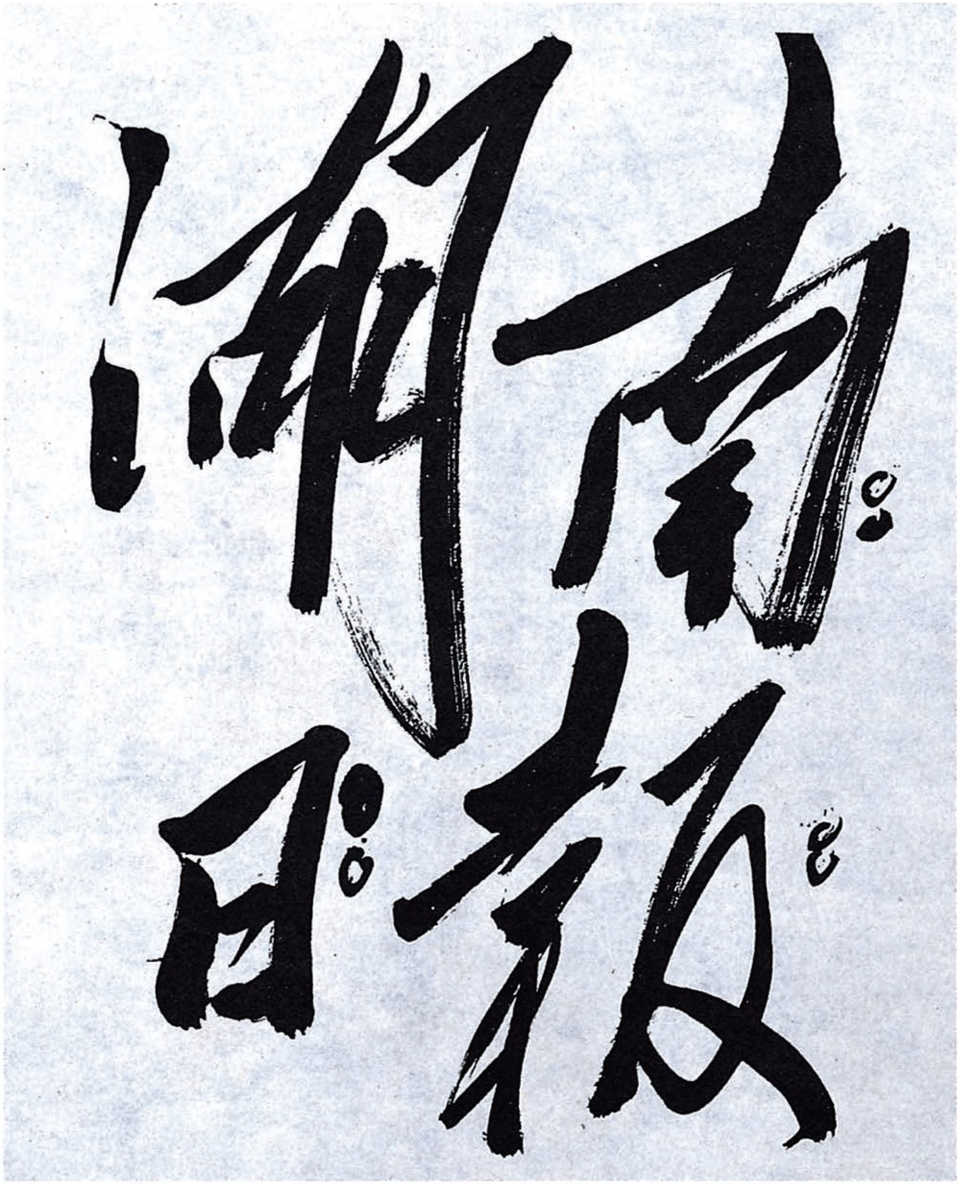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1964年7月29日还为《新华日报》《北京日报》《天津日报》题写了报头。

[2] 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3] 《新湖南报》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1964年10月1日改名《湖南日报》。



毛泽东为《湖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毛泽东为《湖南日报》题写的报头。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名：《毛泽东全集》第46卷
主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出版：润东出版社
承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852）23500066
电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址：www.enricheast.com
地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长：言臣
装帧：平装
开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面：544面
版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SBN：978-988-12907-0-0
定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7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7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7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和给万晓塘的信……………………1

（1964年7月29日）

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3

（1964年7月29日）

对汪东兴报告的批示…………………………………………5

（1964年7月）

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6

（1964年7月）

关于找《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林克的信……………………7

（1964年8月3日）

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8

（1964年8月6日）

对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经验的通报的批语………………………9

（1964年8月6日）

毛泽东等悼念萨瓦茨基逝世的电报 ……………………………11

（1964年8月8日）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 ……………12

（1964年8月10日）

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报告的批语 ………………16

（1964年8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17
（1964年8月14日）
给刘少奇的复信和批语 ………………………………………………19
（1964年8月18日）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21
（1964年8月18日）
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的批语…35
（1964年8月18日）
和李雪峰等的谈话 ……………………………………………………36
（1964年8月20日）
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 ……38
（1964年8月22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47
（1964年8月22日）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 ……………………………………………………49
（1964年8月24日）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 ……………………56
（1964年8月25日）
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的批语 ………………………………………67
（1964年8月27日）
关于改变计划工作方法的批语 ………………………………………69
（1964年8月27日）
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语 …70
（1964年8月27日）

在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南、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的信上的批语……72
（1964年8月27日）
对两份学术资料的批语……73
（1964年8月27日）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75
（1964年8月29日）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批语……85
（1964年8月）
和毛远新的谈话……88
（1964年8月）
关于团结方法的讲话……95
（1964年8月）
减字木兰花·经长沙忆往*……98
（1964年秋）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电报……99
（1964年9月1日）
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话……102
（1964年9月4日）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的谈话……103
（1964年9月4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113
（1964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的电报……115
（1964年9月8日）

给康生的信……117
（1964年9月9日）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118
（1964年9月10日）
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驻华大使时的谈话（摘录）…119
（1964年9月10日）
对李维汉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主要言论摘录的批语……121
（1964年9月11日）
和计划领导小组的谈话……122
（1964年9月12日）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23
（1964年9月14日）
邀请日共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的信……124
（1964年9月15日）
对有关赫鲁晓夫攻击毛泽东谈话的一个材料的批语……126
（1964年9月17日）
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的谈话……127
（1964年9月20日）
关于立即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批语……136
（1964年9月21日）
毛泽东等悼念格罗提渥逝世的电报……137
（1964年9月22日）
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138
（1964年9月25日）
为《北京晚报》题写报头……140
（1964年9月25日）

给范瑾的信……142
（1964年9月25日）
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的批语和修改……143
（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
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语……146
（1964年9月27日）
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48
（1964年9月29日、30日）
对王海容来信的批语……151
（1964年9月30日）
对图加林诺夫《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组成部分（范畴）》摘译件的批注……156
（1964年9月）
应做好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准备……161
（1964年10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167
（1964年10月6日）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169
（1964年10月8日）
关于重新起草复本·贝拉信的批语和复本·贝拉的信……171
（1964年10月13日、18日、24日）
毛泽东等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任职的电报……175
（1964年10月16日）
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摘录）……180
（1964年10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81
（1964年10月16日）
对《一个立志务农的教授女儿和家庭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材料的批语……184
（1964年10月）
在刘少奇关于严肃处理农村中打击报复事件的信上的批语……185
（1964年10月）
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报告的批语……186
（1964年10月22日、27日）
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 ……188
（1964年10月22日）
对陈伯达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4
（1964年10月23日）
给泰国前总理比里的复信和对复信稿的批语……196
（1964年10月24日）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后现场观察情况报告的批语……198
（1964年10月27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的电报……201
（1964年10月31日）
对《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告》的批语……203
（1964年10月）
接见西南非妇女代表团的谈话（摘录）……204
（1964年10月）
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写的批注……205
（1964年10月）

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209
（1964年10月）
对川汉线选线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信件的批语和批注………211
（1964年10月、12月）
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批语………………………214
（1964年11月1日、8日）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的电报………217
（1964年11月5日）
对《人民日报》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社论稿的批语和修改…222
（1964年11月6日）
对刘宁一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224
（1964年11月6日）
对湖南省委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的电报的批语……………………………………………………………226
（1964年11月7日）
为方志敏烈士墓题名……………………………………………227
（1964年11月9日）
对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的批语……229
（1964年11月12日）
给林铁的信………………………………………………………231
（1964年11月17日）
对广东省委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报告的批语……………………232
（1964年11月）
在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报告上的批语……………………234
（1964年11月22日）

祝贺日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电报……………………………235
（1964年11月23日）
对胡乔木十六首词的批语、修改和书信…………………………237
（1964年11月23日、12月2日、30日）
对林彪关于军训工作的讲话稿的批语……………………………244
（1964年11月26日）
在反映香港观众赞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材料上的批语…245
（1964年11月26日）
对王任重关于县区社机关“四清”具体作法的意见的批语………247
（1964年11月26日）
对《两个老贫农的谈话纪要》的批语……………………………249
（1964年11月26日）
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250
（1964年11月26日）
对陈家康关于支持刚果（利）斗争的几点建议的批语……………252
（1964年11月27日）
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253
（1964年11月28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257
（1964年11月28日）
为《实践》杂志题名………………………………………………260
（1964年11月29日）
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名………………………………………262
（1964年11月）
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名………………………………………………263
（1964年11月）

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题名……………………………264
（1964年11月）
为《辅导员》杂志题名……………………………………265
（1964年11月）
为《工人日报》题写报头…………………………………267
（1964年11月）
为《工程兵报》题写报头…………………………………268
（1964年12月1日）
对离职休养老干部安置情况材料的批语……………………270
（1964年12月2日）
对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的批语…………………271
（1964年12月5日）
对陶铸的信和蹲点报告的批语和批注………………………273
（1964年12月10日）
对国家计委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报告的批语………276
（1964年12月12日、13日）
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279
（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
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83
（1964年12月13日）
对张平化汇报蹲点情况的信的批语…………………………287
（1964年12月14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289
（1964年12月15日）
对高扬文的蹲点报告的批语…………………………………292
（1964年12月19日）

对中央转发高扬文的蹲点报告的批语和批注……293
（1964年12月19日）
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296
（1964年12月20日）
对《核子劫后生机未灭》一文的批语……317
（1964年12月25日）
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中央通知的批语和修改……318
（1964年12月、1965年1月）
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摘录）……323
（1964年12月25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326
（1964年12月27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328
（1964年12月28日）
对政府工作报告（摘要）稿的批语……337
（1964年12月29日）
给田家英的信……339
（1964年12月29日）
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340
（1964年12月3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六周年的电报……341
（1964年12月31日）
为《洛阳日报》题写报头……344
（1964年12月）

为北京电视台题名……346
（1964年12月）
为《中学生》报题写报头……347
（1964年12月）
为《中国少年报》题写报头……349
（1964年12月）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350
（1964年12月）
为《河北农民报》题写报头……352
（1964年12月）
为《辽宁日报》题写报头……354
（1964年12月）
为《福建日报》题写报头……355
（1964年12月）
为《中国少年》题名……357
（1964年12月）
为《青年报》题写报头……358
（1964年12月）
为《中国青年》题名……359
（1964年12月）
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360
（1964年12月）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361
（1964年）
和江西省委同志的谈话记录（摘录）……362
（1964年）

关于划阶级问题的指示……363
（1964年）
关于依靠贫下中农的问题……365
（1964年）
《双十条》和《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367
（1964年）
蹲点问题……369
（1964年）
论实事求是……370
（1964年）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372
（1964年）
《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375
（1964年）
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377
（1964年）
为《西安日报》题写报头……379
（1964年）
为《农村四清报》题写报头……381
（1964年）
十六字令·八首……382
（1964年）
七绝·贾谊……385
（1964年）
七律·咏贾谊……386
（1964年）

对贺龙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稿的批语和修改……………………391

（1965年1月3日）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392

（1965年1月3日）

给勃列日涅夫的答谢电………………………………………………………400

（1965年1月5日）

和斯诺的谈话…………………………………………………………………404

（1965年1月9日）

对徐寅生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的批语…………………………………424

（1965年1月12日）

对反映我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问题的来信的批语…………………………426

（1965年1月12日）

给周世钊的信…………………………………………………………………427

（1965年1月12日）

对全国人大代表马建猷来信的批语…………………………………………428

（1965年1月13日）

中央关于学习周恩来同志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摘录）…………………430

（1965年1月14日）

对保定地委“四清”工作团关于新城县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报告的批语……………………………………………………………………………431

（1965年1月15日）

对军委贯彻执行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通知的批语………………433

（1965年1月15日）

对李富春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的批语………………………………………435

（1965年1月21日）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37
（1965年1月21日）
搞好三线建设打起仗来就不怕了……439
（1965年1月23日、24日）
对关于“九评”中一个问题的提法的来信的批语……442
（1965年1月26日）
和苏班德里约的谈话……443
（1965年1月27日）
关于研究和评论《军事战略》一书的批语……444
（1965年1月30日、2月5日）
对赵朴初的《某公三哭》散曲的批语……446
（1965年1月31日）
在一份《情况简报》上的批注……447
（1965年1月）
对中央军委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报告的批语……448
（1965年1月）
关于开发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问题的批语……449
（1965年1月）
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时的指示……451
（1965年1月）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453
（1965年1月）
关于欢迎李宗仁回国的批语……454
（1965年2月3日）

对杨勇等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的批语……………………455
（1965年2月4日）
祝贺哥穆尔卡六十寿辰的电报……………………………………………457
（1965年2月4日）
听取汇报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时的指示…………………………………460
（1965年2月11日）
对赵尔陆关于三线建设动力问题报告的批语…………………………462
（1965年2月13日）
对中央关于正确处理工交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关系问题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464
（1965年2月13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466
（1965年2月13日）
对观察家评论稿《联合国往哪里去?》的批语 ………………………468
（1965年2月14日）
在听取汇报时的指示…………………………………………………………470
（1965年2月21日）
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代表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471
（1965年2月22日）
正面教员与反面教员…………………………………………………………472
（1965年2月）
对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报告的批语…………………………………473
（1965年2月25日）
对《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的批语…………………………474
（1965年2月25日）

对刘彬关于鞍钢情况报告的批语……………………………………475
（1965年2月28日）
在关于攀枝花钢铁企业建设问题报告上的批语…………………………477
（1965年3月4日）
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 ……………………………………478
（1965年3月4日）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481
（1965年3月10日）
关于《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的批语和修改……………………482
（1965年3月11日、17日、18日）
毛泽东等悼念乔治乌–德治逝世的电报 ……………………………493
（1965年3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上升二号”宇宙飞船飞行成功的电报………495
（1965年3月21日）
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496
（1965年3月23日）
毛泽东等祝贺齐奥塞斯库等当选的电报……………………………499
（1965年3月25日）
打仗的办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501
（1965年3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507
（1965年4月3日）

为《天津日报》题写报头
和给万晓塘的信[1]

（1964年7月29日）

万晓塘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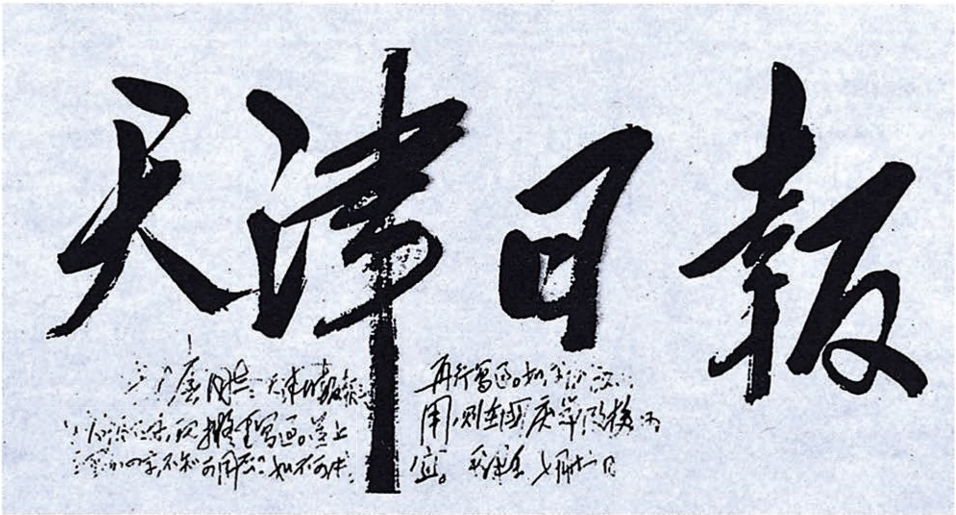
《天津日报》报头写得很不好，现拟重写过。送上重写的四字，不知可用否？如不可用，再行写过。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

毛泽东
七月二十九日

天津日报

---

[1]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重新给《天津日报》题写了报头。



毛泽东为《天津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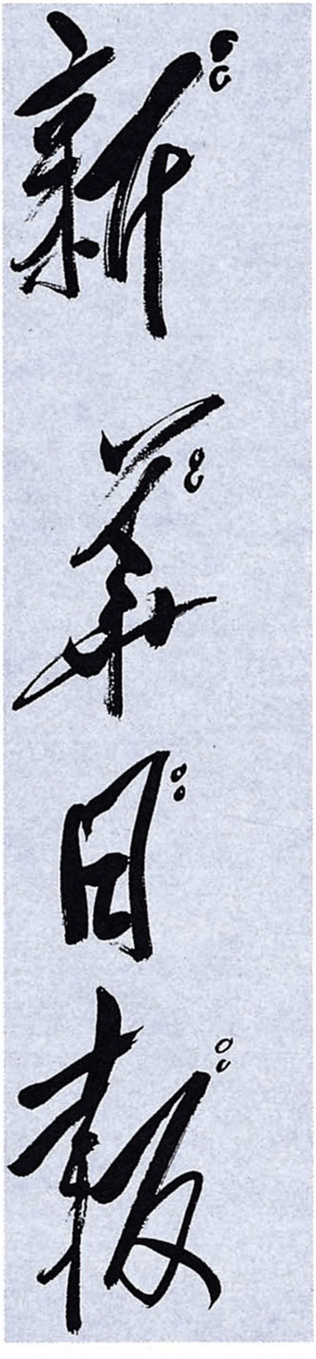
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1]

（1964年7月29日）

新华日报

---

[1]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第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头。



毛泽东第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的报头。

对汪东兴报告的批示

（1964年7月）

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功夫养花弄花。

全国解放已经十几年了，养花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过去发展了，现在要改变。我就不喜欢房里摆花，白天好像有点好处，晚上还有害处。我的房子里的花早就让他们撤了，以后再让他们把院子里的花也撤了。你们在院子里种了一些树，不是满好吗？还可以再种。你们的花窖要取消。大部分花要减掉，只需少数人管理庭园。今后庭院要多种树，多种果树，还可以种点粮食、蔬菜、油料作物。北京市区中的公园和香山要逐步改种这些果树和油料作物，这样既好看，又实惠，对子孙后代有好处。

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1964年7月）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关于找《共产党宣言》等三本书给林克[1]的信

（1964年8月3日）

林克同志：

我要找一部金圣叹[2]批的《水浒传》再看看。

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请你办一办。

毛泽东

八月三日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

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1]稿的批语

（1964年8月6日）

汪东兴[2]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3]得重新考虑。

毛泽东

八月六日上午六时

---

[1] 这个声明在1964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汪东兴，当时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3] 可能指毛泽东原计划骑马沿黄河考察的行动。

对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经验的通报的批语[1]

（1964年8月6日）

瑞卿[2]同志：

此件看了，很好。是否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部队中的大多数人都可以试验学游泳？军委是否已发出了指示[3]？

毛泽东
八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昆明军区司令部1964年7月27日转报十四军对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经验的通报给总参谋部的电报上。通报总结了一二六团泅渡金沙江的经验，主要是：一、树立敢于战胜江河、勇于锻炼的雄心壮志，充分掌握在不同情况下的思想规律及其变化，发动群众，做好思想工作。二、针对部队实际基础，贯彻循序渐进的方法。三、狠抓先行，拿出样板，以点带面。四、运用骨干，普遍开展高带低活动，调动大家水上练武的积极性。五、组织严密，落实措施，尤其是干部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

[2] 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先后发出了《全军迅速开展游泳训练》和《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把游泳训练开展得更好》两个文件。

条件不好，主要是：（一）有血吸虫及其他毒害的河流、池塘；（二）有大旋涡的河流地段；（三）有鲨鱼的海中。此外，部队中总有一部分人不适宜于游水的，不要强令人人都下水。

毛泽东等悼念萨瓦茨基逝世的电报

（1964年8月8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爱德华·奥哈布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惊悉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波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中国人民的朋友亚历山大·萨瓦茨基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1]的批语

（1964年8月10日）

朱、邓、彭、康[2]阅。请书记处考虑一下，此建议[3]是否可行？并以决定告知卫生部。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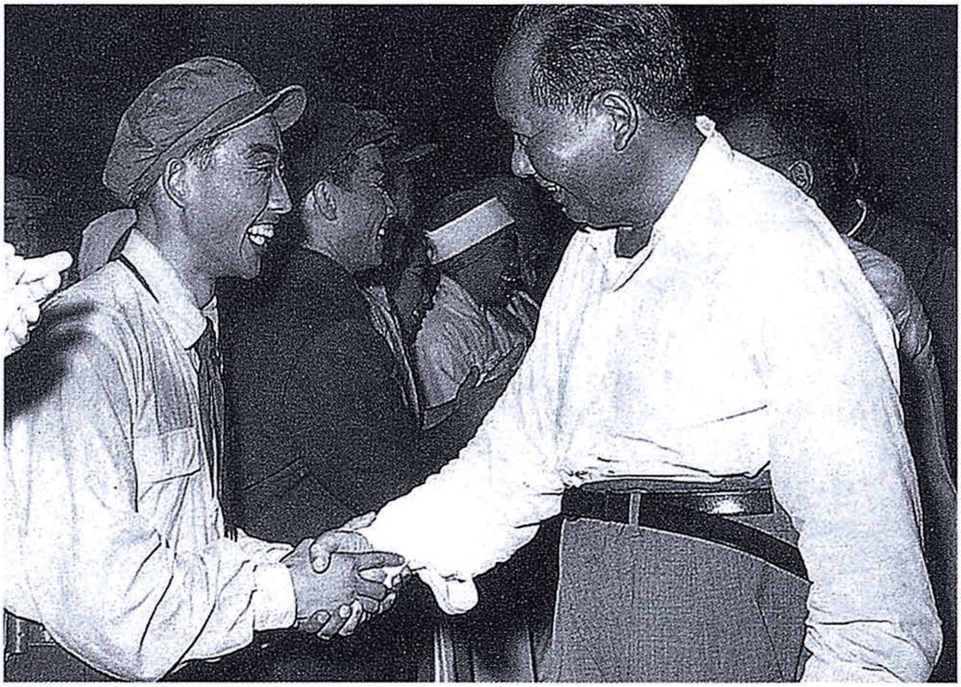
[1] 卫生部党组1964年7月29日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给毛泽东的报告说，今年6月24日，主席在接见越南外宾时，对我国的高干保健工作提出了批评。主席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保健工作严重地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并致使一些医生、护士长时间脱离病房工作、门诊工作。主席还说：“一个人，如果不动动，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门乘车不走路，就会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顾，是高级干部生病的四个原因。”确实，我们的高干保健工作的一套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消极的作用，必须加以改变。为此，提出以下改进办法：一、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把保健医生、保健护士调回医院去参加病房和门诊工作。今后中央领导同志有病需要医生出诊时，通知保健局或北京医院，由北京医院临时派医生出诊。二、对于没有严重疾病的人，提倡经常到户外活动，锻炼身体，积极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切实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使卫生防疫和医疗保健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加强北

京医院对医疗保健工作的管理，加强对医务人员的思想教育，提高医疗工作质量。三、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做法。毛泽东在审阅这一报告时，除写了本篇收入的批语外，还写有两条批注。在第一项改进办法旁，毛泽东批注：“保健局应当取消。”在第二项改进办法旁，毛泽东批注：“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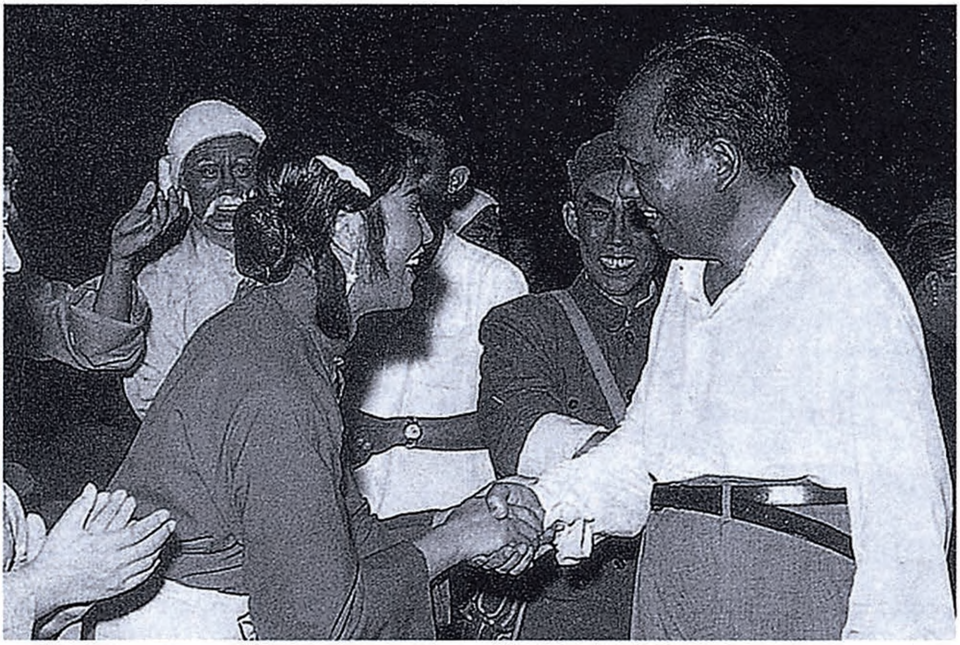
[2] 朱，指朱德。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卫生部党组在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的三条改进办法。

1964年8月1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并接见了全体演员。



1964年8月10日，毛泽东观看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后，和演员握手。



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观看山东省淄博市京剧团和青岛市京剧团合演的现代京剧《红嫂》，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

1964年，毛泽东接见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演员。

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报告的批语

（1964年8月12日）

退罗瑞卿、杨成武[1]同志。

此件[2]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3]，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

[1]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1964年4月25日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这个报告由杨成武5月9日转报给罗瑞卿并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罗瑞卿又将它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彭真。

[3] 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1964年8月19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国务院专案小组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十九周年的电报

（1964年8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欣逢朝鲜解放十九周年，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英雄的朝鲜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开辟了朝鲜历史的新纪元。十九年来，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革命路线，不仅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树立了自力更生的光辉榜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贯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大大地提高了自己国家的国际威望。

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和巨大成就，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持和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

解放的斗争。中国人民为兄弟的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每一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预祝朝鲜人民在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朝两国间日益巩固和发展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四日

给刘少奇的复信和批语

（1964年8月18日）

一

少奇同志：

八月十六日来信[1]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

---

[1] 刘少奇1964年8月16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建议：一、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二、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其中3/4以上的人员应当分到县里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县以下的“五反”，1/4以下的人员去各大中城市进行“五反”。这样，工作队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和掌握运动的火候，对于把运动搞深搞透有更多的保证，也可少出乱子。来信还说，在城市和农村，对于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新富农，要有一些具体办法来反对他们。

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二

即送邓、彭、康生、朱德、贺龙、荣臻、瑞卿、伯达、冷西[1]阅后，请尚昆[2]印发。

---

[1]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荣臻，即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1964年8月18日）

一　阶级斗争与哲学的关系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

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去农村五个月，去工厂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粱、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会，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一段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国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

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叫《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

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他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

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工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两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派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

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实验过电。

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

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他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元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得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二　关于分析和综合问题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

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历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

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

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书上从来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为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沙子，米里有沙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三　关于社会发展问题

康生：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

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

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会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

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

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四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

《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对公开放映并组织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报告[1]的批语

（1964年8月18日）

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中共中央宣传部1964年8月14日给中央书记处的这个报告说，《北国江南》和《二月》是两部思想内容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其共同特点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温情主义，抹杀和歪曲阶级斗争，着重表现中间状态的人物并以这种人物作为时代的英雄。为清除电影界、文艺界的错误观点，提高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观众的思想认识和辨别能力，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公开放映这两部影片，并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和批判。《二月》放映时改名《早春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批判被否定了。

和李雪峰等的谈话

（1964年8月20日）

我们不会搞社会主义，大家没有搞过嘛，我没有搞过，你们会吗？搞了十几年，有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现在才有了些经验了。经过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略微动了一下。到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搞了第一个十条。前面的序言是我写的，说人认识事物是不容易的，正确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可不容易啦，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南昌有一个研究科学的青年说，物质变精神可以理解，精神变物质大部分可以理解，但变石头则不可能。例如大理石有许多种，有自然的大理石，有人造的大理石，人造的大理石不是石头？人民大会堂的大理石很多不是山里的，是人造的。人为什么能造大理石？因为理解了大理石的化学构成。什么叫大理石？是石灰石，是碳氧化钙。几千年来，老百姓知道，把石灰石一烧，一氧化碳挥发了，剩下生石灰，放在水里会发热，变成氢氧化钙。认识这个化学过程，人就可以造石灰，精神就可以变石头。所以，化学这门学问是一门精神的学问。写在书上变成思想，然后再变成物质，可以造各种肥料嘛！电石也是一种石头，即碳化钙。通过电产生高温，使碳和钙结合起来，就成了电石。

人是由蠢慢慢变聪明的。无论什么人，都是由不知到知，由少

知到多知。至于全知的人，没有那回事。马克思知得多一些，但也不是全知，我们就不用说了。单是社会科学有几百门，你能全知？戏有几百种，你能都懂？河北的戏有七十种。你们都熟悉吗？有的看也没看过。评剧、梆子、老调，《追鱼》男角是女的演的。内蒙的戏我没看过，山西的在晋西北看过《打金枝》，女的唱老生。

全知也不合理。全知等于不知，一样都不精嘛！自然科学有几百门，怎么学得了？一个人只能活几十年。社会科学就分很多门类，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分好多门，政法又是公安、法院、检察，公安又分侦察、审讯、民警、消防，一个公安部长都学得会?！我看部长没有学过消防。社会科学，又分上层建筑，又有经济基础，又有生产力。上层建筑有党、军队、政府，又有教育、文化、报纸，又有唱戏、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电影，可多啦。唱一出戏，有旦角、老生、花脸、小生、丑，丑又分男丑、女丑、文丑，旦又有老旦，你去学，学得了那样多？

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外宾的谈话[1]

（1964年8月2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各位朋友。很感谢你们来到我们国家访问。这是头一次见到你们，但是我们的思想有共同点。民族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也可能不同，但我们的根本是反对帝国主义、新的和老的殖民主义。你们认为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大家鼓掌表示同意）我们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是没有原子弹、氢弹的。这里有法国朋友么？（法国人示意有）有英国朋友么？（无人答）喔，没有。法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你们是反对发动原子战争的，是不是这样的？（法国人带头鼓掌）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既然不准备使用，为什么要生产呢？这是我们作为防御的武器。现在一些核大国，特别是美国，拿原子弹吓唬人，美国有那么多原子弹，也只使用过两次，就是在长崎和广岛。这里有日本朋友么？（西园寺点头）他们的国家是受害的。美国在日本丢了两个原子弹，但是因此使美国的名声不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美国的名声不好，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反对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反对那些在越南南方的外国军队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时的谈话。

干涉别人内政，打“特种战争”。法国政府说，法国政府过去在越南打仗是打败了的，你们美国又在打，照法国人看来，美国人也要打败的。因此法国反对用战争办法解决越南问题、老挝问题，主张和平谈判。

法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日本也取得了一定的资格来讲话。第二次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原子弹战争。在座大多数代表的国家同我们一样，是没有原子弹的，我们跟法国有外交关系，在反对美国侵略这一点上，我们有共同点，不但跟在座的法国朋友有共同点，跟戴高乐也有。（大家笑）这就是说，世界已经起了变化，不再允许侵略和干涉别的国家，侵略干涉别国是要失败的。

在座的各位代表了人类大多数人口，你们的理想是要胜利的。当然我讲的还未成事实，是不是会胜利，要靠斗争。但是我可以讲讲我自己的经验。我是一个当小学教员的，读了很多孔夫子的书，他的道理是封建主义的。后来就读资本主义的理论，熟悉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大革命，华盛顿领导的大革命，民主革命的思想，也读过法国康德的二元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更不知道。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使我离开我原来的工作去搞政治了。依我看来，还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国内反动派压迫人民，因此，使我们这些人一下子就跑到共产党一边去了。孔夫子的道理也不信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也不信了，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搞起了工人罢工、学生运动，组织了工会，后来又组织了农民运动组织。那时，我们跟国民党合作，我还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在国民党的宣传部工作。那个时

候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还在世，我听过他演讲，跟他谈过话。孙中山夫人现在还在上海，她是我们国家的副主席，她不是共产党。这里有一位廖承志，他是个共产党员，（转向廖问）你是搞什么工作？哦，和委会副主席。他（指廖）的父亲是国民党，是中央委员，国民党的左派，被右派暗杀了。他很早就只有母亲，没有父亲了。

毛：你父亲是哪年死的?

廖：一九二五年。

毛：（让大家抽烟）他的母亲在北京工作。你母亲多大年纪了？

廖：八十七岁。

毛：她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是一位艺术家，能画画。我这是讲怎样使我参加到共产党当中来。我没有准备打仗，更不知道原子弹，也没有无线电。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呢？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一九二七年我们有五万党员，蒋介石背叛革命，搞白色恐怖，到处杀人，这五万党员中有一批被杀牺牲了，另一批投降了蒋介石，第三批没有被杀，也没有投降，不干了，五万人只剩下几千人，这几千人就打游击，以后打了十年。那时候我们不懂打仗，谁教我们的呢？还不是蒋介石！我们也没有枪。谁给我们枪呢？还不是蒋介石！蒋介石也没有多少枪炮，是背后的帝国主义给他枪炮，主要是英国和美国。这样我们就有了枪炮，一打就打了十年，军队到了三十万人。我们叫作工农红军。这十年中间，我们犯过错误，后来我们打败了，国民党打胜了，我们就走路，一走就走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相当于地球的直径，由南方走到北方。这不能怪蒋介石，只能怪自己犯了错误。军队由三十万剩下两万五千人，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那个时候，腿走那么远也是

难受的。（大家笑）那时候没有扩音设备，也没有茶，也没有水果吃，仅仅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一升米。

可是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这个时候比过去更弱了，相反，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得到了教训，以后就是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打了八年，又跟蒋介石合作，不打仗了，一齐跟日本人打了。我们的军队打了八年以后，由两万五千人扩大到一百二十万。以后日本投降了。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日本人民。我们中国人民也对胜利作了贡献。日本军队走了，美国人来了。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就打内战，打了四年。一九四九年蒋介石说不打仗了，他跑了，（大家笑）他就到台湾去了。我跟你们讲了历史的变化。讲了多久？（看表）讲得太长了吧？（外宾中有人说："很好。"）就是讲，世界在起变化。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是可以打败的。人民总是要胜利的。我就不相信人民不能胜利。我看你们也不相信你们不能胜利，你们是失败主义者吗？（外宾中许多人答："不是。"）我们要的是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大家鼓掌）我要讲的就是这么一点，也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问大家）你们有什么话要讲？

孟德斯（巴拿马）：不知道能不能提几个问题。你对修正主义有什么具体的意见？修正主义目前提的问题你看有什么出路？前景是什么？

毛：我看修正主义没什么出路。修正主义是适应帝国主义的要求，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要求，而不适应广大人民的要求。他们一时好像是多数，将来会证明他们不是多数，而是少数。修正主义他们不讲革命，不讲反对帝国主义，有时候讲几句反帝，那是假的，这里有阿尔及利亚、法国的朋友，你们国家的共产党就是修正

主义领导的党，我们跟他们谈不来，我们反而跟本·贝拉谈得来。（鼓掌）反而跟戴高乐总统谈得来，我们跟戴高乐不是一切都谈得来，是在反美这一点谈得来。（鼓掌）还有什么问题，想一想？

易卜拉欣（约旦）：我们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很复杂的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如何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土是个问题。我们很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党对我们的支持。希望听到毛主席的意见。

毛：就是站在你们那一边嘛。（鼓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应该回到家乡去。我们和以色列政府到现在还没有外交关系，你们是大多数嘛！整个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和政府都是反对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去嘛！我们不赞成你们就是犯错误，所以我们赞成你们。问题他们不是一个以色列，而是谁站在以色列背后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也是个美国的问题。（问外宾）还有问题没有？

琼斯夫人（特兰尼达）：在美国所有的黑人，非洲血统的人都非常感谢主席支持黑人的声明，针对美国当前形势更加尖锐化，美国更失去其世界地位的情况，请就此声明再说几句话。

毛：黑人是美国国内的少数民族，但是人数也不少，有两千万人。他们反歧视、反压迫的斗争正在发展，总有一天要胜利。美国无产阶级总有一天要觉醒。就是要大多数白人无产者、半无产者、进步人士和黑人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一个国家里面要分阶级的。例如在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跟蒋介石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他不喜欢我们，我们也不喜欢他。但都是黄种人，中国人，都讲中国话，写中国字。有人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就应当同蒋介石团结，而不是同你们团结。在座的这里有不同

肤色、不同国家的人，但是在反帝，特别是反美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不管彼此认识不认识，在今天同你们见面以前我一个也不认识。没见过的人可多哩！难道都见过么？我们国家七亿人口，我就没都见过。（问法国外宾）你们法国几千万人，你们也没有都见过，难道几千万人你们都见过么？（大家笑）不可能的。（问大家）还有问题吗？

恩朗（喀麦隆）：毛主席知道我们非洲人正在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一向很满意中国领导人支持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今天希望毛主席对非洲局势，特别是刚果局势讲几句。

毛：非洲的局势是很好的局势，对人民有利的局势。在非洲有蓬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使修正主义不高兴，帝国主义更不高兴。刚果应该是刚果人民的刚果，应该是卢蒙巴那样的人的刚果。卢蒙巴身体死了，他的思想没有死。我们支持刚果人民的斗争，不是偷偷摸摸地支持，是公开支持，公开支持他们的斗争。我们在报纸上公开登载双方的情况，就是讲压迫他们的一面和反抗压迫的一面都提，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被压迫的人民一面的，就是说，我们是有偏向的，有人看来这是不公正的，你们为什么不两方面都相好呢？对帝国主义走狗也相好，对卢蒙巴、对正在斗争的人民武装力量也相好！我们不干，我们只跟一方面好。要说我们有偏向，我们就是有偏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偏在大多数阿拉伯人民一边，在东京大会上，我们偏在你们一边。

东京大会我没去，他（指刘宁一）去了。他叫刘宁一，他就是个有偏心的人。（大家笑）他不是两个会都参加，只参加了一个。（大家笑，热烈鼓掌）我看你们也有偏心的，只参加了一个会，不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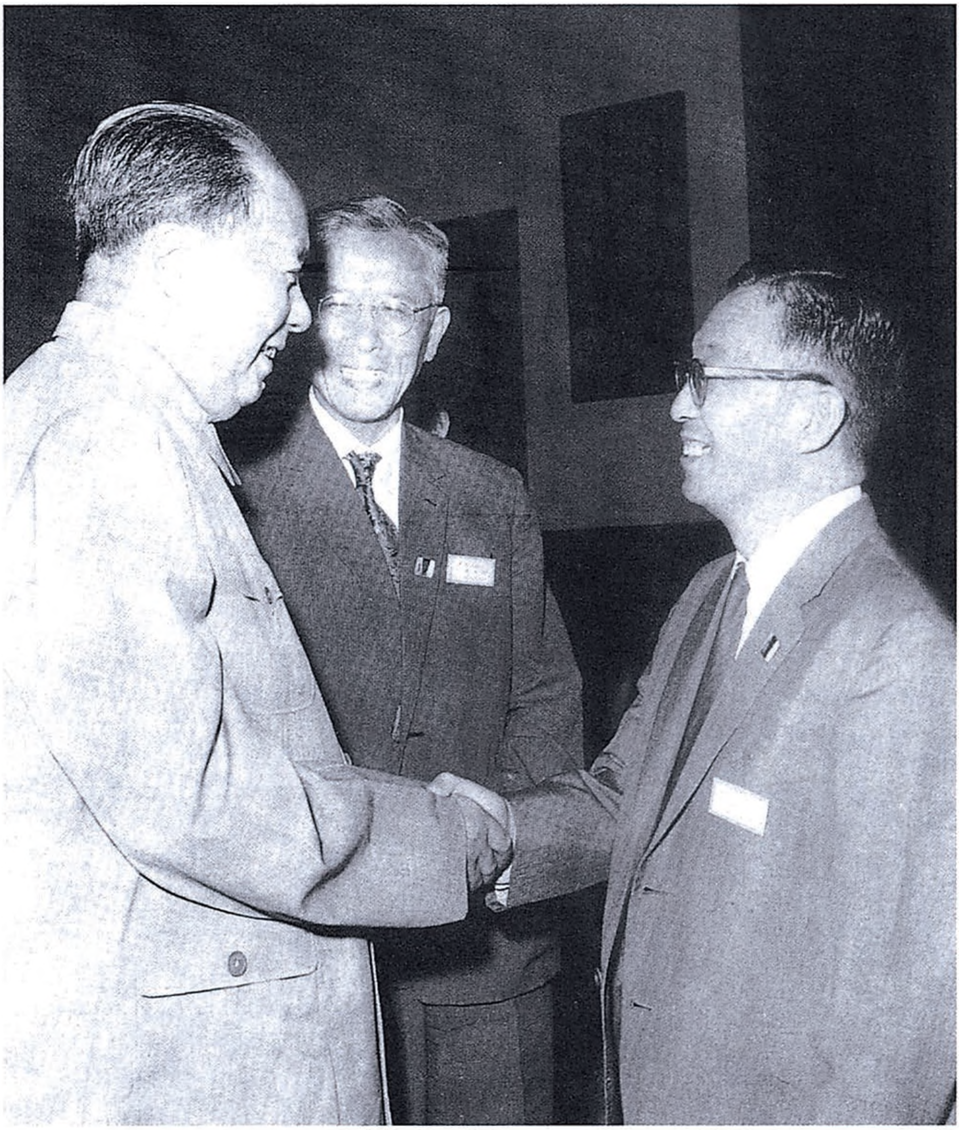
加另一个。（大家又笑）因此我们大家团结起来。（问外宾）差不多了吧？

瓦达达（乌干达）：现在南非人民受压迫，南非统治者武装到牙齿，受美帝国主义支持。非洲各国领导人是反对南非统治者的，可是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不团结，依主席看来，南非人民取得胜利的前景如何？

1964年8月22日，毛泽东会见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应邀访华的各国代表。

毛：要很快胜利可能有困难。要经过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因为南非与别的地方形势不同，甚至同阿尔及利亚也有所不同。阿尔及利亚人民打了八年仗，他们胜利了，南非可能要更长的斗争，更曲折，也许要超过阿尔及利亚人民取得胜利的时间。也许不需要像中国人取得胜利的这么多时间，我们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包括朝鲜战争三年，就是二十五年，所以我们这些人半辈子都耗费在打仗上了。无论如何总是要胜利，有全世界人民支持南非人民。南非有一千万非洲人，三百万外国人。三百万外国人中也有一部分同情

非洲人。我问过南非朋友这个问题：是不是三百万外国人都反对你们？他们说，不是，有一些进步力量帮助他们，甚至有高级知识分子，如律师，帮助他们辩护。我就劝他们要向外国人做工作，不要以为三百万外国人都是不好的。全世界白色人种大多数是好的，顶多有百分之几是不好的。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或者现在已经觉悟，或者现在还不觉醒，将来总会觉醒的。他们是好心的。有人说我们团结有色人种，反对白人，在座有不少白人，你们白人朋友是代表大多数白人的，也并非所有有色人都是好的，蒋介石就不好！（大家笑，鼓掌）（主席做一手势）好，完了吧。



1964年8月2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4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毛雷尔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八月二十三日是罗马尼亚人民光荣的节日。二十年前，罗马尼亚人民在以乔治乌-德治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地举行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反动统治，为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罗马尼亚人民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十年来，勤劳智慧的罗马尼亚人民在以乔治乌-德治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团结一致，辛勤劳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本国的资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罗马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为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六年计划、为争取国民经济的进一步高涨而斗

争。中国人民为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衷心的喜悦，并且预祝罗马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继续取得新的胜利。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为保卫欧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关系，对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罗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友谊在不断加强，两国本着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平等互利、互助合作的原则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不断增进。这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力量的加强。我们深信，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在今后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1]

（1964年8月24日）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2]。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3]，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人对事物的认识，总要经过多少次反复，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要积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会引起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

---

[1] 这是毛泽东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的谈话。

[2] 指《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第三期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

[3] 参见《庄子·天下》。

跃。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最近艾思奇[1]在高级党校讲话说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道理中国的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2]没有讲清楚，墨子[3]讲了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但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4]都没有讲清楚。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前面那一段话[5]是我写的。我讲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我还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6]。

---

[1] 艾思奇（1901—1966），云南腾冲人，哲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

[2] 老子，相传即老聃，姓李名耳，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春秋时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庄子（约前369—前286），名周，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战国时期哲学家。

[3] 墨子（约前468—前367），名翟，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

[4]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北宋哲学家。李卓吾，名贽（1527—1602），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明代思想家、文学家。王船山，即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哲学家。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

[5] “双十条”，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本篇中所说的那一段话，指毛泽东1963年5月审阅前10条稿时在10个问题前面加写的文字的主要部分。1964年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6] 这句话在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时在第十个问题中加写的一段文字里。

现在，我们对许多事物都还认识不清楚。认识总是在发展。有了大望远镜，我们看到的星星就更多了。说到太阳和地球的形成，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康德的星云假说[1]。如果说对太阳我们搞不十分清楚，那么对太阳与地球之间这一大块地方也还搞不清楚。现在有了人造卫星，对这方面的认识就渐渐多起来了。我们对地球上气候的变化，也不清楚，这也要研究。关于冰川时期问题，科学家们还在争论。

于光远：方才主席谈到望远镜，使我想起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

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认识工具”当中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如镢头是手臂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富兰克林[2]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中国人说人为万物之灵。动物中有灵长类，猴子就是灵长类动物，但也不知道制造棍子打果子。在动物的头脑里，没有概念。

于光远：哲学书里通常只以个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但在实际生活中认识的主体不只是一个一个的人，而且常常是一个集体，如我们党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这样的看法行不行？

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最初工人阶级是一个自在的阶级，那时它对资本主义没有认识。以后就从自在阶级发展到自为阶级，

---

[1] 星云假说，是德国哲学家康德1755年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种学说。这一学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2] 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

这时它对资本主义就有了认识。这就是以阶级为主体的认识的发展。

地球上的水，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最早的时候，地球上温度那么高，水是不能存在的。《光明日报》上前两天有一篇文章[1]，讲氢、氧化合成水要经过几百万年。北京大学傅鹰教授说要几千万年，不知道《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鹰讨论过没有？有了水，生物才能生长出来。人就是从鱼进化来的，人的胚胎有一个发育阶段就像鱼。

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每一个人都要死，因为他是发生出来的。人类是发生出来的，因此人类也会灭亡。地球是发生出来的，地球也会灭亡。不过，我们说的人类灭亡、地球灭亡，同基督教讲的世界末日不一样。我们说人类灭亡、地球灭亡，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到更高阶段。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

事物在运动中。地球绕太阳转，自转成日，公转成年。哥白尼的时代，在欧洲只有几个人相信哥白尼的学说，例如伽利略、开普勒[2]，在中国一个人也没有。不过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落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也写到“太仪斡运，天回地游”[3]。

---

[1] 指《光明日报》1964年8月21日发表的郁之的文章《氢和氧化合成水是“合二而一”吗?》。

[2] 开普勒（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著有《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3] 参见张华《励志诗》。

什么东西都是既守恒又不守恒。本来说宇称守恒，后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发现，至少在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质量守恒，能量守恒，是不是也这样？世界上没有绝对不变的东西。变，不变，又变，又不变，这就是宇宙的发展。既守恒又不守恒，这就是既平衡又不平衡，也还有平衡完全破裂的情形。

发电机是一个说明运动转化的很好的例子。煤炭燃烧的化学运动放出来的热，转化为使水蒸气体积膨胀的运动，然后又使发电机的转子旋转，这是机械运动，最后发出电来。

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

事情往往出在冷门。孙中山是学医的，后来搞政治。郭沫若[1]最初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历史学家。鲁迅[2]也是学医的，后来成为大文学家。我搞政治也是一步一步来的。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了七年学堂，以后当小学教员，又当了中学教员。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没有听说过，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我搞军事更是这样。我搞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的宣传工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也讲过打仗的重要，可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要去打仗。后来自己带人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先打了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

---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早年曾在日本学医。

[2] 鲁迅，原名周树人（1881—1936），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早年曾在日本学医。

仗。于是总结经验，总结了十六个字的打游击的经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谢谢蒋委员长给我们上课，也要谢谢党内的一些人，他们说我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是这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却使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

我们这些人不生产粮食，也不生产机器，生产的是路线和政策。路线和政策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比方说，"四清""五反"[1]就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老百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要同群众密切联系，要同青年工人、老工人密切联系。

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我们身体的各种细胞都不断地在更新，现在我们皮肤上的细胞就不是我们生下来时皮肤上的细胞了，中间不知换了多少次。

曹雪芹[2]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3]手里衰落的。康熙[4]有许多儿子，其中一个是雍正，雍正搞特务机关压迫他的对手，把

---

[1] "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年至1966年5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五反"，指1963年3月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2] 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梦阮，满正白旗人，清代小说家。

[3] 雍正，即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1678—1735），1722年至1735年在位，年号雍正。

[4] 康熙，即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1722），1661年至1722年在位，年号康熙。

康熙的另外两个儿子，第八个和第九个儿子，一个改名为狗，一个改名为猪。

“分”很重要，庖丁解牛。恩格斯在说到医学的时候，也非常重视解剖学。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

细胞起源问题要研究一下，细胞有细胞核、细胞质和细胞膜。细胞是有结构的。在细胞以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之前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从非细胞变成细胞。苏联有个女科学家[1]研究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果。

---

[1] 指勒柏辛斯卡娅（1871—1963），苏联科学院院士、细胞学家。

接见非洲和拉丁美洲青年学生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4年8月2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你们。

你们是哪些国家的朋友？

（这时外宾起立，分别向主席作自我介绍）

你们是正在念书的，还是读完了？

日拉尔：已经念完了。

（其他外宾答：还正在念书。）

毛：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喝茶。愿抽烟的抽烟，不抽烟的不抽烟。（全体笑）

谢尔盖·巴里奥（以下简称奥）：我想了解一下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秘鲁的看法，希望我们秘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对我们秘鲁有什么希望。

毛：先要问你，你有什么意见。（主席笑）你们国家的情况，我不太清楚。

奥：毛泽东同志讲对我们国家的情况了解得少，我知道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家离你们的国家很远，而且我们的政府禁止人民到中国来，所以到中国来的秘鲁人是很少的。不管怎样，我们国家在拉丁美洲是有悠久历史的，并且在将来，毛泽东同志很快可以

听到，它能够在拉丁美洲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声音。

毛：什么很重要的声音？

奥：革命的声音。

毛：革什么样的命？

奥：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反对压迫阶级的，反对压迫民族的革命。

毛：一切资产阶级都反对吗？你们国家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爱国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啊？

奥：在我们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的一些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很弱的，大部分是跟帝国主义的利益、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紧密联系的。因此，它们和革命的利益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毛：我赞成你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给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些人。其他的人，首先是工人、农民，然后是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能有少数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人是比较少的，同这些人应该结成统一战线。这样，反对的对象，革命的对象，就比较少一些，革命的力量就比较大一些。你赞成不赞成啊？因为压迫人的人在世界上总是少数，一百个人中间只有几个，这样就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是整个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共同的问题。在欧洲、北美大体上也是这样。譬如在美国，譬如在英国，工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美国那些大工会的领导人，他们是帮助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有很大一部分现在还不觉悟，但是将来他们会觉悟的。

所以我们只反对帝国主义者同它在各国的走狗，其他的人，我们不反对。我们并不反对整个美国人嘛。他（指谢尔盖·巴里奥）又

不赞成了。

还有什么问题?

阿里乌: 我们是黑非留法学联、西井学生总会的代表,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向毛泽东主席讲几句话,并且通过毛泽东主席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我们想请毛泽东主席知道非洲的情况,并且就您知道的一些问题给我们一些答复,正像刚才毛泽东主席给秘鲁的朋友的答复一样。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我们愿意借这个机会,对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在地理上,非洲和中国是离得很远的,但是我们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老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多年的斗争使我们同中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我们在中国虽然只呆了几个星期,但是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中国正在热情地进行建设,中国的人民群众也在参加建设工作。非洲曾经是许多国家的殖民地,譬如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已经给了这些国家许多独立,但是人民并没有真正地参加建设工作。我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和中国的其他领导人对非洲国家的一贯支持。我们非洲的学生正在进行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因为我们进行了这个斗争,我们才同中国学生联合会建立了关系,正因为这个斗争才使我们来到中国。通过这次座谈能够使毛泽东同志了解非洲的情况,同时希望毛泽东同志对非洲的情况发表一些意见。

毛: 还有非洲朋友要问吗?

艾克洛(以下简称洛): 我认为,我们非洲现在面临着另外一种危险,这是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主席是不是能够同意社会主义阵营中一个国家的问题,这个国家过去曾经是我们很好的同盟者,现在是修正主义。过去我曾经有机会在法国念书,现在又在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捷克念书，在那里，我每天都看到修正主义直接的影响。我们在捷克已经念了三年书，但是在这三年内，他们要求我们不要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譬如在一些会议上，我们所见到的就是让大家跳舞，不帮助我们提高政治觉悟，就是应该怎样武装起来，争取我们的自由。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委内瑞拉的同学过去每年都组织一些讨论委内瑞拉国内斗争情况的会议，自从去年以来，委内瑞拉和捷克建立了商务关系以后，就禁止再组织这样的会议了。他们对委内瑞拉的朋友说：你们在这里可以读书，回国以后不要再参加解放斗争。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喀麦隆人民联盟的留学生，自从捷克和阿希乔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在那里的喀麦隆的留学生就不能再举行任何集会了。不论在布拉格，在莫斯科，都是一样。去年我曾被邀请去参加喀麦隆人民联盟的一次支部大会，他们的负责人曾同当局协商，但是并没有得到结果，后来这个集会只是在学生的一个房间里举行了。当然，现在非洲在国外的留学生，有些还没有觉悟。他们仍然认为，不谈政治，不谈反帝，是一件好事。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我曾同捷克和平委员会的一个人谈话。他说，现在已经争取了一切行动，来反对黑非留学生联合会，但是我们认为，黑非留法学生联合会是一个先进组织，捷克当局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呢？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我们非洲正面临着一种修正主义的危险。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要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大家都愿意参加这个斗争的问题，而他们有些人却把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争论说成是北京和莫斯科之争。我们认为，这不是北京和莫斯科之争，而是世界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是不是要同帝国主义妥协的问题。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不知道毛泽东主席是不是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不是北京和莫

斯科之间的争吵，不是两个国家首都之间的争吵，而是世界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正像秘鲁的同志已经讲过的一样，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争的问题，也就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非洲已经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统治，现在是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合作、同帝国主义共处的问题。

毛：帝国主义是压迫各国人民的一些集团，各国被压迫人民怎么能够跟它们和平共处呢？

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老殖民主义的问题是各国走狗的问题。不管那些人如何，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无所谓革命，就无所谓革命的胜利。不谈政治，单跳舞，是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众笑）修正主义要你们服从他们跟帝国主义妥协的路线，它也要我们服从，它要全世界各国革命的人民都服从，我们是不服从的。我们也不服从帝国主义，也不服从新、老殖民主义，也不服从修正主义。也不服从它们各国的走狗。譬如在中国就有那么一个走狗，顶著名的人物是蒋介石，我们能够跟蒋介石合作吗？蒋介石现在在大陆上有他自己的朋友，就是地主阶级的残余，资产阶级的残余，同这些人不能合作，要教育他们，在劳动中改造他们。如果他们要造反，譬如破坏、烧房子、破坏牲畜、搞投机倒把、杀人、暗杀革命者，我们必须进行镇压。我们的方针就是这样，比较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吞吞吐吐。无论见效的，没有见效的，只要他反对我们，我们就反对。

你们知道，譬如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古巴的革命、越南南方的革命，我们都是公开支持的，刚果（利）的武装斗争，我们也是公开支持的，冲伯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们不跟他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站在刚果（利）人民的一边。譬如加纳，我们支持加纳人民的

斗争。帝国主义者两次暗杀他们的总统，我们是反对那种惨无人道的暗杀行为的。

整个拉丁美洲的革命是有希望的，不仅你们秘鲁，你（指谢尔盖·巴里奥）不是问我秘鲁的前途怎么样吗？秘鲁的前途和整个拉丁美洲的前途一样，是要用革命斗争去推翻帝国主义同它的走狗。我说的是大的、忠实的走狗，而不是跟帝国主义联系较少的那些人。这样，我们的统一战线反而会扩大一些。

还有问题吗?

埃内斯加（以下简称加）：我们在这里代表拉丁美洲革命组织的海地、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的代表首先向毛泽东主席表示感谢，感谢您接见了我们，并且通过您表达我们对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走狗所进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表示崇高的敬意。

毛：谢谢。

加：我们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努力也表示敬意。同时，我们代表海地、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的革命组织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我们这些国家的解放斗争所给予的支援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解放斗争也给予了同样的支援。我们深信，中国一定会站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一边的。

我们同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该团结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民。我们革命运动组织的总路线，也就是要建立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我们国内要建立这样一种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有困难的。古巴革命给我们各国人民的革命提供了一个榜样。古巴的人民使我们拉丁美洲广大人民认识到，他们可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且也使那些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懂

得，这些革命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我们所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有深刻的政治意义的，现在这些革命运动已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进行了。因此，这些资产阶级就要选择，要不就投靠工人、农民，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要不就跟帝国主义一块去平分利益。

我们相信，最后由于工人和农民强大的联盟，这些资产阶级将不再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而投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同时，这也包括一些中间的阶层，主要是指进步的知识分子。有些国家的困难会多一点，有些国家的困难会少一点。我们也深信最后胜利将属于我们各国人民。

毛：讲得对，我赞成，最后胜利总是属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这已有许多证据。譬如古巴不是胜利了吗？当然还没有最后胜利，中国不是胜利了吗？也没有最后胜利，最后胜利要全世界帝国主义倒下去了，全世界各国人民都翻身了。

我们周围的许多国家都有美帝国主义的军事基地，我们的台湾还没有解放。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状况就算最后胜利了吗？没有。这是几十年的事情。美帝国主义不打倒，这些军事基地不撤走，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南越、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的垄断资本或者是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

拉丁美洲、非洲和整个亚洲，还有欧洲、北美、大洋洲如果不解放，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解放了，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算是暂时地解放了，譬如中国、古巴、阿尔及利亚、北越、北朝鲜。但是，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敌人。所以我们要跟你们团结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

在座的各国朋友的思想也一致嘛？

□□□：不一致。有马列主义者，有民族主义者。

毛：不完全一致不要紧，有些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有些现在还不相信，甚至有些人信宗教，但是，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现在帝国主义的头子是谁呢？就是美帝国主义。当然，在非洲说来，法国、英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这些国家是有影响的。在拉丁美洲，美国的影响是主要的，我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可以团结起来。

修正主义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还妨碍我们反对帝国主义，那我们也不赞成，要批评他们。现在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仍在欺骗人民，因此我们要做批评工作。刚才那位朋友（指艾克洛）讲得好，他就做了批评工作。

你（指艾克洛）是那个国家的？

洛：是多哥的。

毛：多哥在哪里？

王□□：在西非。

毛：是属于哪个国家的？

□□□：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

毛：你们国家独立了没有？

洛：名义上独立了，现在所谓的独立，就是有一个国歌，有一个国旗。

毛：你们认识了这一点。所谓名义上的独立和实际上的独立有区别嘛！

要做群众工作。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人、农民结合，不对工人、农民做工作，团结工人、农民，而是脱离工人、农民，那就不

好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属于无产阶级，就属于资产阶级，它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它可以替这个阶级服务，也可以替那个阶级服务。譬如我们中国的北京有一个北京大学，你们去看了没有？

□□□：没有去，因为放假了。

科西·加普逊（以下简称逊）：访问过人民大学。

□□□：在上海看了什么大学？（答：没有看。）

日拉尔：在西安看了交通大学。

毛：无论哪个城市的大学、中学、小学，那里的教授、教员，以及行政工作人员过去都是国民党的，很少有我们的教授，很少有我们的教员，那些人都是替国民党服务的，都是亲帝国主义的，有些亲日本帝国主义，有些亲美帝国主义，有些亲法国帝国主义，有些亲德国的，有些亲英国的。解放的时候，只有很少的人跑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教授、教员都留下来了，替我们服务。现在有些人已经进步了，赞成马克思主义了，有些人还处于中间状态，是中间派，此外有少数人思想很右，他们的脑筋还是旧的，大概占百分之几的人数，他们赞成修正主义，不那么公开讲就是了。有极少数的人希望蒋介石再回来，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但是不妨碍大局，因为左派和中间派联合起来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你们会问，为什么中国解放十五年了，有许多人还是中间派，有一部分还是右派呢？外国人说我们“洗脑筋”，为什么这些人的脑筋还没有洗好呢？（众笑）思想工作就是这样不容易做的，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强迫他们洗脑筋，（众笑）只能劝说他们，只能说服他们，不能压服他们，要他自己逐步了解，逐步觉悟起来。他们这些人是不跟工人、农民接近的，他们脱离群众。现在我们想些办法使

他们同工人、农民接近。

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这是我们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脱离人民群众，不要脱离你们国家占最大多数人口的工人和农民。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交朋友。如果没有工人、农民做朋友，你就不了解工人、农民的思想状况。这就是说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知识分子要接近群众，做调查研究，是不那么容易的。第一条，知识分子过惯了城市生活，他就不想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工作，赶也赶不下去。（众笑）他们成了习惯。第二条，到乡下去做调查研究，去了并不等于真正交好了朋友。因为知识分子有知识分子的派头，摆一副老爷架子，农民看不惯，摆一副老爷架子去接近工人，工人也看不惯。开始他们弄不清楚，不知道你们是帮助他们的，还是伤害他们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要经过一个过程。譬如讲组织工会，举行罢工，经过一个过程，工人才相信，你是帮助他的，而不是伤害他的。同农民说话，绝不能摆起一副知识分子的架子，看不起他们。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知识分子就某一点说来，是比较有知识的人，但是不如工人、农民的知识多。

因为我们读的书，无论你读的是什么书，读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好，资本主义的书也好，或者封建孔夫子的书也好，都是书本上的东西。这些书本都不教我们怎样革命，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书教我们怎样革命，但是也不等于读了书就知道如何革命了。

读革命的书是一件事情，实行革命又是一件事情。我借这个机会讲一点我的经验，也许你们不赞成，将来可能有一天你们会想起我今天讲的这些话。

解放以前，中国只有几百万工人，大约有四百万工人，有几万

万农民。剥削者和压迫者全中国只有几千万，占百分之五左右，大约只有三千多万。那么我们站在哪一边呢？是站在少数剥削者方面，还是站在几万万农民同几百万工人方面呢？这个问题在开头我是没有搞清楚的，因为我读的是孔夫子的书，资本主义的书，后来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又组织了共产党，这就下决心赞成马克思主义了，世界观就改变了，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了唯物主义者，逐步地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什么叫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呢？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和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讲多了，到时间了。

逊：我的讲话我相信所有的同志都会赞同。就是我们感到今天能够同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会见，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切话，都很受感动，也非常感谢。我们听到他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对整个世界局势作出结论，斗争应该如何办，提供了许多建议，对这点我们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也很感动。毛泽东同志还给我们说，不管我们读多少革命的书籍，谈多少革命的话，如果我们不深入农村中去，向群众学习，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就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同时，我们感到毛泽东同志对非洲的事物是非常关心的。我们感到中国一贯是帮助非洲人民进行革命，帮助世界各国人民进行革命的。我们可以向毛泽东主席表示，我们将高举革命的旗帜，一直到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后摆脱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枷锁为止。谢谢主席。

毛：就谈到这里吧！还有什么问题？

外宾：希望毛泽东主席在《毛主席诗词》上签上您的名字。

毛：可以。

（外宾请毛泽东签字。最后外宾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1]的批语[2]

（1964年8月27日）

小平[3]同志：

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4]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

[1] 1963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根据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并根据一年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经验，中央对这个草案进行了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形成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经征求意见并作修改后，中共中央1964年9月18日以中发〔64〕600号文件印发给全党。在印发修正草案的通知中，中央指出了一年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新经验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一）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进行到底。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六个条件，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好还是不好的主要标准。（二）领导人员必须亲自蹲点，蹲在一个大队，从头到尾地做完全部运动的工作，并且要这样地蹲点两次。（三）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是不是放手发动群众，是不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是彻底或者不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分界线。（四）解决群众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基础。（五）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以后，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就不能依靠。（六）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地区，都必须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在土地改革时候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必须清查出来，他们所有的过多的房屋和家具，应当没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贫、下中农，也可以归集体所有，集体使用。（七）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体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解决“四清”问题和对敌斗争问题。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组织建设。在第一个阶段就要为第二个阶段做好准备，注意团结好的和比较好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在运动中培养一批新的骨干。通知要求全党仔细研究和认真执行修正草案。在今年秋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要把这个修正草案同中央的决定草案（即第一个十条）一起，在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中深入地进行宣读和讲解。工作队都要按照这些文件的规定进行工作。

[2]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1964年8月1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8月17日修改稿上。刘少奇在送审时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大区书记会议。

关于改变计划工作方法的批语[1]

（1964年8月27日）

小平同志：

此件[2]可印发此次到会同志[3]及各省、市、区委及中等〔城市〕市委同志阅看和研究。并准备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予以讨论。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1964年8月20日关于计划工作方法问题同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杨波的谈话记录稿上。陈伯达在谈话中对计划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一）在工业中采用新技术，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要从实现社会主义的新工业革命、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全局着想，抓住要点。（二）发展我国的建设事业，需要研究改进某些财政制度，拿出一部分建设新企业的资金用于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作用可能更大。（三）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在搞好第三线建设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搞好第一线和第二线，以便让第一线和第二线能够对第三线投进更大更多的力量。（四）改变拖拖沓沓的作风。

[2] 指陈伯达1964年8月20日关于计划工作方法问题的谈话记录稿。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大区书记会议的同志。

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语[1]

（1964年8月27日）

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2]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3]和少奇同志意见[4]的。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七日

请小平[5]办。

---

[1]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通称“桃园经验”），是王光美1964年7月5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1964年9月1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527号文件转发了这个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它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普遍的意义，为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但是，由于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不同，那里的问题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大区书记会议。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4] 刘少奇1964年8月19日为报送代中央拟的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稿给毛泽东并中共的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这个报告确实很长，但不难读，各地同志和工作队同志愿意要这种详细的材料，不愿意压缩过多。”

[5]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南、江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两个文件的信上的批语[1]

（1964年8月27日）

小平[2]同志：

请印发到会各同志[3]。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

[1] 刘少奇1964年8月19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中说：“湖南和江苏的两个文件，拟转发各地，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审阅批发。”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共益阳地委《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湖南省委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另一个是《淮阴地委秘书长张景良同志在中共江苏省委四届四次全会（扩大）上的发言》，内容是涟水县高沟公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委与工作队发生的争论及其教训。中共中央8月20日转发了这两个文件，要求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农村、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队员阅读。中央在转发的批语中指出，迎丰公社和高沟公社虽然进行过社会主义教育试点，但工作队和地、县委都没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或者不够坚定，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运动搞得不深不透，因此工作队离开后，发生了很大的乱子，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大区书记会议的同志。

对两份学术资料的批语

（1964年8月27日）

伯达[1]同志：

此两件[2]可一阅。不关心哲学，我们的工作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1964年8月编印的文艺、学术资料之十四和十五，题目分别为《杨献珍等同志关于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点》和《冯友兰继续散布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

1964年8月28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多·加耶戈斯·曼塞拉。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4年8月2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欢迎你们。

潘迪（以下简称潘）： 能够同您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会见，我们教育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感到非常高兴和十分荣幸。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种快乐。

毛： 谢谢。我没有什么伟大，跟你们差不多，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们还差一些。

潘： 我们都把您看作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

毛： 可能你们看得不对。你们的国王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人。

潘： 马亨德拉国王的确是我国最伟大的领袖，在他执政期间，我们的国家很好地向前迈进了。

毛： 你们的国家有进步，有发展。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以及某些人强加给你们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也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某些人的不正确影响。

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牛、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粱就是小

米，菽就是豆子，黍就是黍子）。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太多。

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击。（众笑）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现在要改革还有很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多。

这可能泼了你们的冷水，你们希望看好的，而我专门讲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都没有，比如说，拿工业方面的地质学来讲，旧社会给我们留下来的地质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有二十多万了。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近实际。搞理科的，也就是搞纯科学的就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要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历史的也好，学经济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请喝茶。你们国家的人民是不是也喝茶？

潘：我们也喝茶，但是要加糖和牛奶。

毛：我们不加糖也不加牛奶，没有这个习惯。

大多数人民喝白水，根本不喝茶。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要喝茶。

潘：中、尼这样比较冷的地方需要喝茶，以增加热量。

毛：西藏的人民以吃牛羊肉为主，他们要喝茶。以粮食为主的地方可以不喝茶。同时茶叶也没有那么多，供应不了。你们国家产茶叶吗？

潘：产得很少。最近几十年才有此习惯，现在不仅有钱的人，一般的人也喝茶。

毛：茶叶相当贵，很穷的人是喝不起的。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文化也是落后的。（问□□□部长）普及教育的情况怎么样？

□□□：城市基本上普及了，农村还不行，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的一般只达到百分之六十几。

毛：比解放前的情况好，城市基本上普及了，但是乡村还没有。

□□□：尼泊尔在马享德拉国王执政以后，文化教育有很大的发展。克伊腊克先生是一位诗人、老教育家。

克伊腊克（以下简称克）：我对教育工作很有兴趣。我从事教育工作有五十多年，我的兴趣就是扫除文盲。

毛：这很好。我也当过几年教员，当的是小学教员。后来闹革命，就当不成小学教员了。那时组织工会、搞罢工、组织农民协会，同农村的恶霸作斗争。然后蒋介石搞白色恐怖，把我们赶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打又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吗？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国人又来了，支持国民党向我们进攻，又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鲜战争就是二十五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这门学问我没有学过，也没有看过什么兵法，自己也没准备去打。谁叫我去打的呢？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们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杀人，我们这些人只好上山。当时没有枪，就从蒋介石那里夺取武器。也没有外国援助。是外国人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再援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还是有外国援助的。（笑声）

（□□□向毛泽东介绍代表团几位团员的身份。）

毛：你们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诚欢迎的。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

潘：我们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使我们感到像在亲人家里一样。

毛：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说小国不行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小国自己也要有信心。大国有大国的缺点，小国有小国的长处。你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没有屈服过。帝国主义没有能够征服你们，可是征服了我们的国家。怎样征服法？就是让中国政府听外国人的命令。清末皇帝是听外国人命令的。孙中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几个月便垮了。然后，袁世凯作皇帝，他也听从外国人的命令。

然后，就是北洋军阀专政，造成中国的分裂。他们之间打了多年的仗。然后，就是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打胜仗。然后，就是国民党杀共产党，我们就跟他打了十年。

蒋介石统治中国，他开始是听英国人的，后来是听美国人的，因为英国人不行了。然后日本人打进来，打了八年。日本人走了，又同国民党打了四年，全国才获得解放。现在蒋介石还在台湾，美国人管着他。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而我们却没有权利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批评我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能够加入联合国呢？头一个“侵略者”是我。说我们主要是“侵略”了中国，然后是“侵略”了朝鲜，然后听说是“侵略”了印度。我们跟印度打了几星期仗，为什么后来把兵撤回来呢？因为他们的兵都散了，没有兵了，打仗没有对象了！（笑声）现在我们撤回到边界以后二十公里的地方。印度人现在好一些了。比较守规矩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连袁世凯都没有承认，他要我们承认，岂不荒唐？我们事实上不越过这条线，而且从这条线后退二十公里。

我们同你们两国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很好，很容易讲得通，同缅甸也很容易讲得通，很容易解决。同巴基斯坦也容易讲得通，很容

易解决。同阿富汗也签订了边界条约。就是印度这个朋友很难讲得通。

马拉（以下简称马）：为什么？

毛：我也不知道。印度人民是友好的，印度政府中有一些坏人。印度人民的生活并不怎么好。印度人民对我们，对你们都是好的。

听说印度同你们的关系比较好一些了，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赞成。

关系老是那么紧张不好。现在印度政府同我们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坏了，首先他们的军队不越过麦克马洪线了。过去他们越过这条线到这边来，越过了几十公里，把我们向这一边挤，现在比较规矩一点了。这就算好。

你们这个国家要通过外国才能进口和出口，人员往来也要通过外国，所以你们同外国的关系搞好一些是好事。所谓通过外国，就是说通过印度。在关系紧张的时候，印度就是捣乱，比如机器运到你们国家，他们进行破坏，甚至把一些零件拆掉。现在不知道情况改善了一些没有？

潘：现在稍好了一些，例如，我曾买了一台中国收音机，拔针是坏的，许多人买的拔针也被搞坏了。

毛：所以你们要开一个后门，现在后门还没有通。

潘：中国政府帮助我们修筑的从加德满都到科达里的公路修通以后，就有一个后门了。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开辟别的道路。

毛：这可能是有益处的。

巴斯尼亚特代办：团长已经说过，我们正在探索各种通道，除了加德满都到西藏边界的一条以外，还有一条路，通过巴基斯坦的

达卡。

巴特（以下简称巴）：我们这次来中国就没经过印度，而是直接经过达卡来的。

毛：等几条路都通了，那时印度可能就比较尊敬你们了。

（代表团的团员们频频点头）

巴斯尼亚特代办：我曾去过拉萨，这使我相信，从加德满都到西藏的路修通以后，对中尼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起重大作用。

克：中印是两个大国，而我们是小国。你们两个大国打架，我们就害怕，你们两国和好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毛：主要问题还不是一条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因为我们进军西藏，后来又进行了改革，印度政府就不高兴了。因为就是那位麦克马洪先生，在几十年前背着中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一个协定。所以在印度政府看来西藏是他们的。

克：您刚才说中印关系正在改善，这是很好的消息。我们希望中印的争执问题能够友好解决，那处于二者之间的我们，日子便好过了。

毛：现在不大吵架了，双方对骂的也少了。

马：希望最近的将来，中印的边界争端能够得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

毛：这是可能的。

马：这是个好消息，令人非常高兴。

毛：两个国家应该和好。

马：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样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以便让我们多少能学到

一点。

毛：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发来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中国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开始时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知道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情况，同你们要研究你们国家的情况一样。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全国解放，整整花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

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订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以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所以在教育科学中有心理学、教育学这两门科学。

巴：主席阁下，中国学校，向青少年进行“五爱”的教育，教育他们爱祖国，爱邻居（原话如此），爱科学，等等，这给我以很深的印象。我个人一直这样想，只有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以这样的精神教育每一个人。

毛：你的意见怎么样？

巴：刚才我已经说过，我对此印象很深。另一件给我们很深印象的事情是，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清华大学，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谈到他们怎样把高等教育同实际结合起来。

我国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念了很多书，但是不大了解实际。

毛：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如果只有书

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设什么小说工厂。（笑声）文科要把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律的，如果不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为工厂。

所以比较起来，我国的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授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教室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上和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中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是懂得一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的时候就不大懂。在运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这里我讲的是形式逻辑。还有，比如学文学的要学语法，读的时候也不大懂。要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语法的用处。人们是按照习惯写文章，习惯讲话的，不学语法也可以。我国几千年来就没语法这门课，但是古人的文章有些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语法。

至于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学什么修辞的（对克伊腊克），你是先学了修辞学再写文章的吗？（笑声）

克：不，思想上得到启发，或者说有了灵感以后，就进行写作，而不是先学修辞学。

毛：我就是不理修辞学的。我看过修辞学，但是不理它。照修辞学上说的办法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清规戒律太多。

各位还有问题吗？

克：要爱一切人，而不要仇恨任何人，这是生活中的一条原则。照此原则行事，日子就会过得很好。中、印好比两头大牛，尼泊尔好比在旁边的一只小牛犊，大牛打架时，小牛犊就怕得要命，担心被粉碎了。中、印和好了，我们就很高兴。小牛犊就能平安无事了。

毛：只能爱大多数的人。比如说，我们爱蒋介石，但是他不爱我们，（笑声）他要吃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大半个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那我们没有办法，只好打。

克：实行自尊、自学、自制（克制自己）的三条原则，就可以使自己获得独立的主权。我们看到中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尊、自爱的精神，这是使中国成为伟大国家的因素。

毛：这个对。

克：我个人为了祖国和人民，受过许多痛苦。因此很高兴看到中国发展起来。

毛：你们正在发展，我们看到了也很高兴。

克：让我们两国手携手地向前迈进。可是最重要的是和平。你们打了那么多年仗，在时间、金钱和精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要是把这些时间、金钱和精力节省下来，中国的进步会更快一些。

毛：可惜我们的敌人不给我们时间，请他走他也不走。没有办法，只好打。英国人自己走了，日本人就是不走，到了一九四五年，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才走的。蒋介石也是不想走的。那时北京城我们是不能进来的，只有美国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才能进来。

后来他打败了，我们就来了。你们也就来了。（笑声）你们的国家承认我们，但是不承认蒋介石。你们过去同蒋介石建立过外交关

系没有?

巴：没有。我们的政府支持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

毛：做得对。蒋介石本身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但是他却看不起你们，甚至也看不起尼赫鲁，有一段时间，同印度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蒋介石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笑声)

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潘：好，对于您的接见，请允许我再一次表示感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今天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毛：再见。请你们转达我对国王陛下的问候。

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的批语[1]

（1964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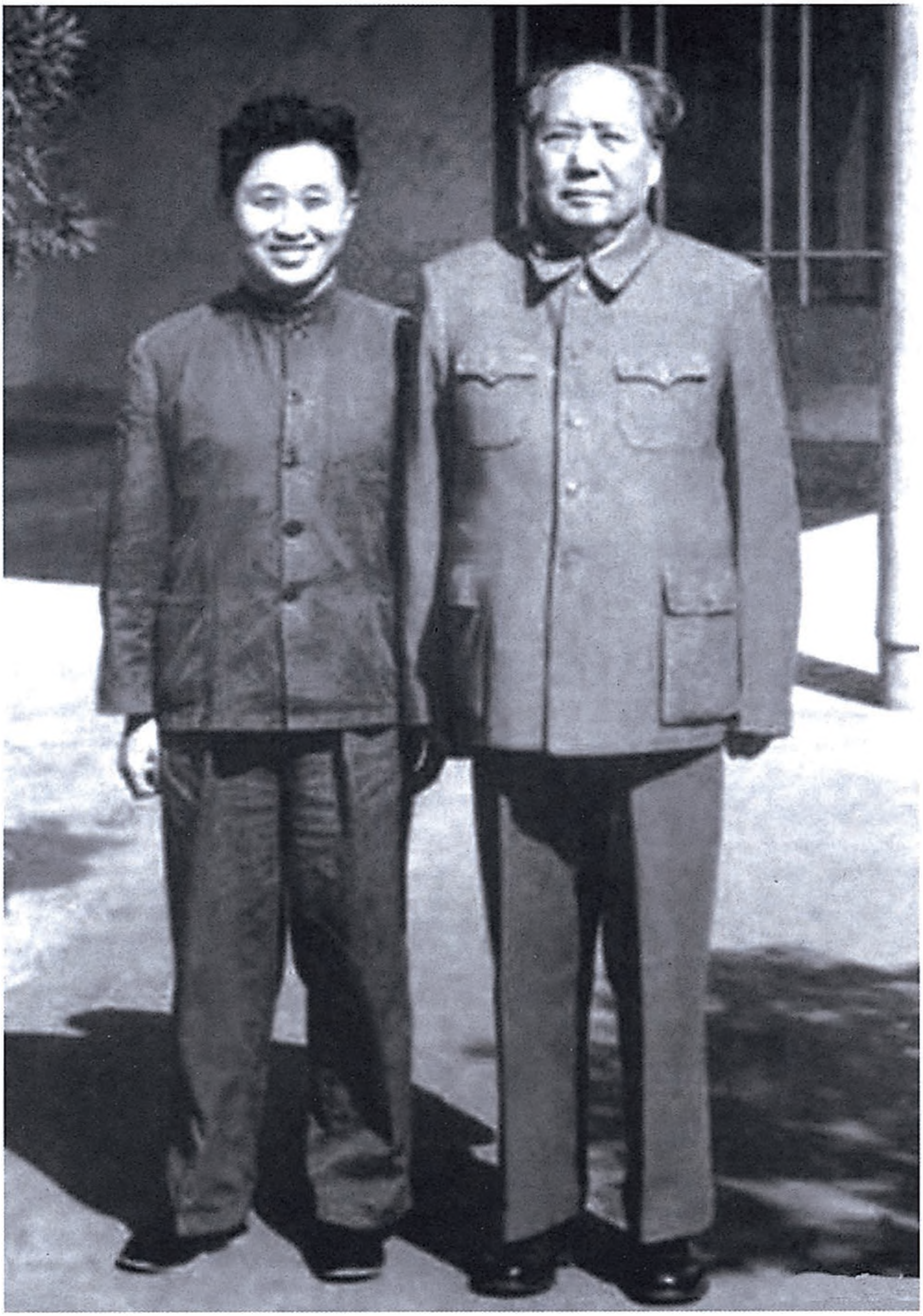
江青阅，此文[2]有些道理。

---

[1] 这个批语写在《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上。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在1964年7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这期反映主要选编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蔡尚思说，对李秀成既不应该全盘肯定，也不应该全盘否定。我基本上同意戚本禹的意见，可和他的看法又不完全相同。他的有些看法比较片面，比如在分析李秀成投降原因的时候，说李秀成盖忠王府太奢华浪费，是为了个人享受；又说李秀成早就有了投降的念头。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吴泽说，目前报纸讨论把李秀成的问题仅仅放在真投降、假投降上面，容易把问题简单化。有人说，李秀成的投降是因为怕死，这是没有说服力的。李秀成的投降，只是一根线上的一个点，我们要想了解这个点，就需要把它放在一根线上来考察，而要了解这根线，又不能不把它和整个面联系起来，这样看问题才能全面。这里的线，指的是李秀成的一生；这里的面，指的是太平天国的整个历史。李秀成的投降和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是有关系的。本来，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是要分化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最后不是走向失败，就是向封建转化。太平天国也是这样。它后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际上各方面都在发生变化，逐步走向封建化的道路。既然太平天国后期已经逐渐封建化，李秀成的阶级界限当然也就日益

模糊了。所以等到李秀成被俘以后，这时的李秀成已经不是当年起来闹革命的李秀成了。加上被俘以后，太平天国大势已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认为“天数”已定，以至对曾国藩抱有幻想，写下了《自述》。这就是李秀成投降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

[2] 指《光明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问题讨论的反映（10）”中选编的复旦大学蔡尚思、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对李秀成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1964年，毛泽东和卫士周福明合影。

和毛远新的谈话

（1964年8月）

一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半年有没有进步？有没有提高？

毛远新（以下简称新）：我自己也糊里糊涂，说不上有进步，有，也只是表面的。

毛：我看还有进步。你现在对问题的看法不是那样简单了，你看过“九评”没有？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看了没有？

新：看过了。（接着把“九评”上所讲的接班人五个条件的主要内容讲了一下）

毛：讲是讲到了，懂不懂？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当讲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

毛：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新：我当然要学马列主义。

毛：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

道吗?

新：马列主义就是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

毛：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你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毛远新汇报说，在工厂实习听到一些工厂“五反”运动情况，受到教育很大）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校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接着问学院的政治思想工作如何，毛远新讲了自己的看法，并说开会、讲课形式上轰轰烈烈的，解决实际问题不多）

毛：全国都大学解放军，你们是解放军，为什么不学？学院有政治部吗？那是干什么的？有政治教育吗？（毛远新说明了政治教育情况）都是上课、讨论有什么用处？应当到实际中去学。你们就是思想第一没有落实。你们一点实际知识也没有，讲那些东西能听懂？

（当讲到接班人的第二条时）

毛：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

新：我还有点希望吧？

毛：有希望，好，超过我的标准就更好。

（当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

毛：你们开会是怎么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当讲到接班人的第四条时）

毛：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当讲到接班人的第五条时）

毛：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毛：你们学校最根本的是四个第一不落实，你不是讲要学习马列主义吗？你们是怎么个学法？只听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要到实际中去学习。

新：工科学院与文科学院不一样，没有安排那么多时间去接触社会。

毛：不对，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到农村

去搞“四清”，从干部到学员全部都去。对于你不仅要参加五个月的“四清”，而且要到工厂搞上半年“五反”，你对社会一点也不了解嘛！不搞“四清”你不了解农民，不搞“五反”你不了解工人，这样一个政治教育完成了，你才算毕业，不然军工让你毕业，我是不承认的。阶级斗争都不知道，你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呢？你毕业了，我还要给你安排这一课，你们学院就是思想工作不落实，这么多反革命，你没感觉？陈东平在你身边你就不知道。

新：陈东平是在家休学收听敌人广播变坏的。

毛：听敌人广播就那么相信？你听了没有？敌人连饭吃都没有，他的话你能相信？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能看得起他（指陈东平）？什么是四个第一？（远新讲了一遍）知道了为什么抓不住活思想？听说你们学院政治干部很多，就是不抓基层，当然思想也抓不住。学院当然有成绩，出了毛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军工才办了十年，军队办技术学校我们也没有经验，好像二七年我们打仗一样，开始不会打，老打败仗，后来就学会了。

毛：你们学校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怎么样？

新：过去就是分数概念，学习搞得不主动。

毛：你能认识就好，这也不能怪你，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全优，那样会把你限制死了的。你姐姐也吃过这个亏。北大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也是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水平最高，人家就把那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就有那样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他的讲课底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当让教员去研究。讲稿也对学生保密？到了

讲堂上才让学生抄，把学生限制死了。我过去在抗大讲课就是把讲稿发给学员，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学生，主要是自己钻研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过去公开号召大家争全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不一定就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连举人都考不取的人有真才实学。唐朝最伟大的两个诗人连举人也没考取。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去培养、训练分析问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上，不要跟在教员后面跑，受约束。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的问题，教员就那么多本事。离开了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问题教员能回答百分之五十，其他就说不知道，和学员一起商量，就是不错的。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反对注入式教学法，就连资产阶级都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打击对象就好了。教改的关键是教员。

二

（有一次毛远新动员毛泽东去看科学成就展览）

毛：现在忙，不能去看，看详细了没有时间，走马观花又没意思。

你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不然，平时怎么很少听你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来？

（毛泽东又问毛远新平时看什么报）

毛：要看《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战士写的文章，实际活泼，又能说明问题。“合二为一的讨论”你看了吗？

新：很少看，看不懂。

毛：是嘛，你看看这份报纸，（毛泽东递给一份《中国青年报》），你看工人是怎样分析的，团的干部是怎么分析的，他们分析得很好。

毛：你们政治课主要是讲课，光讲课能学到多少东西？最主要的是到实际中去学习。你为什么对专业感兴趣，对马列主义不感兴趣？研究历史不结合现实不行，研究近代史不去搞村史、家史就等于放屁！研究古代史要结合现实，也离不开挖掘、考古，尧、舜、禹有没有？我就是不信，你没有实际材料证明嘛！商有乌龟壳证明可以相信。钻到古书堆中去学，越学越没有知识了。

三

（毛泽东特别提倡在大风大浪中游泳，并让毛远新天天坚持去）

毛：你敢不敢到浪里去游泳？（在北戴河游泳）

新：敢。（立即就游出去了）

毛：（毛远新回来后）还敢去吗？（毛远新又游出去了）

新：（回来后）这次差点没回来。

毛：水你已经认识它，已治服它了，这很好。你会骑马吗？

新：不会。

毛：当兵不会骑马不应该。（毛泽东叫毛远新去学骑马，毛泽东也经常练习骑马，还叫秘书、工作人员也去学）

毛：你会打枪吗？

新：有四年没摸了。

毛：现在民兵打枪打得很好，你们解放军还没打过枪，哪有当

兵不会打枪的？

（有一次游泳天气较冷，水里比较暖和，毛远新上来后，觉得有点冷）

新：还是水里舒服。

（毛泽东瞪了毛远新一眼）

毛：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

1964年，毛泽东和毛岸青夫妇在一起。

关于团结方法的讲话

（1964年8月）

在团结问题上，我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能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要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有人支持。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一个篱笆要有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要有绿叶扶持。你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个宣言，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逐步地学了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

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就是要帮助他，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正像希特勒、沙皇、蒋介石也都是不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相互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来，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他们最后必然要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如此。要用辩证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来说的。在策略阶段上来说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妥协了吗？

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建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公开谈判。有些人似乎认为，一进入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入共产党，就要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或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房间里头与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判呢？可不可以从团结愿望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公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跟帝国主义谈判，（对帝国主义也是要同他们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再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四十二国是不是公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公开谈判？实际上是公开谈判，

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下接受大家一致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们斗争，一只手跟他们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人一条出路，跟他们讲妥协，这叫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不可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不可以加以分析时，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着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二个对立的统一，中子里头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处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统一的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里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在全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会议上谈这个问题，需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党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是优点，第二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普通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减字木兰花·经长沙忆往*

（1964年秋）

四五十年，
风雨如晦不重见。
过眼飞云，
横竖茫茫一线天。

休要夸口，
豪杰劫后是民愿，
海天环顾，
一路走来一路烟。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电报[1]

（1964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在兄弟的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在越南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光辉照耀下，为胜利完成宏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中国人民为越南兄弟所取得的每项成就感到欢欣鼓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电报。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

舞，并祝越南兄弟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对维护东南亚和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一贯严格遵守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为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最近，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的武装侵犯，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挑衅行动。但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斗争中久经考验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的。英雄的越南人民以坚决的行动，对美国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必须对它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严重罪行负责。它欠越南人民的这笔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美帝国主义既然采取了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步骤，它就不能期望越南民主共和国放弃反侵略的行动权利，也不能期望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放弃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利。正义完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边。中国人民坚信，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下，一定能够粉碎美国侵略者的战争挑衅和一切阴谋诡计。越南南方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血腥统治而进行的武装自卫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国和越南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亲密邻邦。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越两国间日益巩固和发展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为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在反修报告会上的插话

（1964年9月4日）

蛇是引出来好打，还是钻黑洞里好打？（对苏斯洛夫报告我们赞成发表，它不发，出了八评后引出来了）

一九五六年以来，苏联骂斯大林，我们一论、二论发表后，他就失去了主动权。

点名不光我们两家，东欧也点名了。（苏批评罗自力更生，罗回击，用我们评苏联的话）不是内部的事，正在电台上干，公开干了。

控制、反控制的冲突，第一位的不是中国，而是东欧国家。（罗已作了同苏断绝经济关系的准备，自己不能制造武器，要求我国去人到罗访问，不讲话都可以使人震惊，去了不讲话，握握手都很重要）

准备两手，准备破裂，争取拖。哪天出事，不是出于意料之外。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苏关系）

南昌暴动轰轰烈烈，剩下几个大人，以后发展了三十万人。长征剩下几万人，以后发展起来。山不在高。（巴西老党四万人，成立新党六千人。是四万人可靠，还是六千人可靠）

有了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才能万岁！

不注意一定出修正主义。注意可能出，可能不出。准备出，可能不出。

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的谈话[1]

（1964年9月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你们啊！你们是今天到的？

宋西·德沙坎布（团长，以下简称宋）：我们是今天到武汉的。

毛：这里天气很热，习惯吗？

宋：请让我向主席报告，这里的天气并不热，因为我们是南方人。

请让我们这些子孙向您问候！请问主席身体健康吗？

毛：勉勉强强过得去，眼看就不行了。快要去见马克思了。（众笑）

你们好，都是年轻人。你们的斗争是英勇的，你们是在前线，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前线。你们学会了走群众路线，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工人、农民以及爱国人士共同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你们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要做群众工作就要和群众一样。要跟群众交朋友，首先就要精神一样，然后就是穿衣服要一样，他们穿什么衣服，你也穿什么衣服。吃饭要一样，他们吃什么，你们也吃什么。同他们一起劳动。不然，他们要怕你们的。你们是知识分子，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他们就搞不清。如果是他们的朋友，他们穿衣、吃饭、住房

---

[1] 这是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的谈话。

子、劳动就得一样。有一两个月就熟悉了。你们这样就可以团结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

我不是单讲你们文工团，军队也一样，你们能够做到，帝国主义就不能。反动派尽是剥削群众、压迫群众的。军队要作战，也要做群众工作。我们的军队就是这样。我们搞了几十年，定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听指挥各干各的就不行。你们文工团也有组织纪律吗？也听指挥吗？

□□：他们的纪律很好。

毛：没有纪律，文工团就搞不好嘛！第二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军队怎么办呢？穿什么？吃什么？不能到工人、农民那里去要啊。除了向敌人要外，我们政府还要收一点税，收点粮食税，收点商业税。不收一点税就不行。收来后，一部分归军队，一部分还要归老百姓，给老百姓利益。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党，是工人农民的政府，是工人农民的军队。我看你们也是这样。你们是工人农民的文工团、革命的文工团，不是反革命的文工团。你们的党、你们的军队，是革命的党、革命的军队。让大多数人——工人、农民和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你们看美国那么大的势力，在印度支那有四五十万军队，现在美国也为难。在南越有人民解放军，他们的军民关系好。祝他们胜利，也祝你们胜利！再有十年、十几年就会取得胜利的。

我们搞了几十年，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犯过几次错误。比如右倾错误就犯了两次。“左”倾错误犯了三次。你们好，你们没有犯我们犯过的错误。

宋：因为我们吸收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的经验，所以就没有犯类

似的错误。

毛：犯错误，看犯什么错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损失就大。比如一九二七年犯过大错误，损失很大，五万名党员剩不到一万了。要纠正错误，就是拿起枪来打仗，这样我们就有活路了。有了几块根据地，三十万军队，这时候头脑发昏了，又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把南方根据地统统丢了。开始万里长征到北方。然后三十万军队剩下两万。这个时候就舒服了。为什么舒服了？就是犯错误的人抬不起头来了。我们用说服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把他们团结起来。一个也没有丢掉。最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你们到中国来看到一些好的东西。但我们的错误也要看到。不了解我们的错误，对你们不利。胜利了，搞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十五年，我们的文化界比不上你们。有几百万人，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界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教师也有不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界唱戏的、画画的、唱歌的都有，新闻界好一些，电影界也有。现在他们受不了了。现在又整风，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整他一年、两年睡不着觉我就高兴。

你们从南方来，认为中国一切都是好的，没有那么回事。我就不相信。你们年轻，经验不多，觉得什么都好。一个社会有黑暗一面，有光明一面，当然我们光明面是主要的。我们的军队、政府和党都比较好。现在全国有地主、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三千五百万。比你们全国人口还多。所以很难说找不出缺点来。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这个人这么糊涂？搞了十五年，还没有搞好？就是因为我糊涂，并不高明，并不比你们高明，信不信？不信啊？

宋：我很难理解。

毛：我这个人有缺点、有错误。二十年前我就讲过，文艺要为

工农兵服务。可是这十五年我们没有抓好，这还不是怪我不行？现在我改正错误。

过去忙了那方面的事情，就忽略了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我要来抓一抓。今年文化界可不太平噢。整风不是把他们统统丢掉，改正错误就可以。

少数人不改怎么办？不改也可以。为什么可以呢？因为是少数人。我看一百年也有人不会改的。他不改也不能把他枪毙。我们如何争取？一百人有三十人为工农兵服务就行了。现在右派和反革命分子最多不过百分之五，有百分之六十五是中间派，是大多数。我们要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我们也有文工团，文工团也不都是好的。演戏的全国有多少？

□□□：全国约有三千多个剧团。

毛：统统演古的。表演的戏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是缺乏反映工农兵的、反帝的。

你们看过我们的京戏没有？

宋：我们从前看过中国戏。这次到中国来，我们在北京也看过。

毛：是京戏吗？

宋：我们在北京看的是京剧现代戏。

毛：这是少数，是开始。这方面我不相信样样都好。

宋：我不容易理解。

毛：事实就是这样。看过旧京戏没有？

□□：没有看过。

毛：帝王将相搞点看看嘛。就比较嘛，也有一部分绘画、电影、音乐、照相是好的，可惜不多。

我们这个党也是不纯的。有人做官当老爷，有大老爷，有小老

爷。有的支部书记，那是老爷，在一个乡当支部书记像个土皇帝，可厉害呐，特别严重。我们站在大多数农民方面，不站在少数地主、富农方面。可是他们实际上是站在地主、富农方面的。建设社会主义十五年了，还有国民党。你们两位（指宋西和副团长巴巴）年纪大一点，是能够理解的。他们（指主要演员）年纪轻，不容易理解。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嘛，还不少呢！三个指头中就有一个指头。我们现在已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还要搞几十年。把老的改造了，又产生新的出来，有些贪污分子，今天说不贪污了，退了赃，可是明天还照样贪污。

毛：（面向外宾）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你们南方：老挝、泰国、南越、柬埔寨、印尼、缅甸、马来亚、日本、南朝鲜……你们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帮了全世界人民的忙。

你们表演的什么节目？

□□□：昨天晚上，□□□看了。

□□：节目都是战斗性的。

毛：好！

你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以为是小国，小国又怎么样呢？小国同样出英雄。你们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叫什么名字？

宋：艾地。

毛：这个同志，我问过他是什么地方人，他说他是苏门答腊西南一个小岛的人，是个少数民族。你说地方那么小，为什么能当印尼党主席呢？他对我说，你不要看我们的地方小啊，印尼的语言是以它那个地方为标准的，那是印尼共产党最活跃的地方。马克思就是少数民族，他是个犹太人。耶苏也是个犹太人。过去犹太人就是一个少数民族。中国的孔夫子住在鲁国，也只有几十万人。他办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学校，大家都不理他，后来到各国去找工作，人家也不理睬他。没有办法，就只好流浪。他是宣传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那时候人人都说他是个圣人。他是中国第一个教育家……讲得太远了，离开题目了。

宋：刚才主席所讲的问题我们很关心。如果不提出这些例子来谈，就不容易理解。因为它关系到执行文艺路线的问题。

毛：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不改造不行。过去我们没有抓紧。谁战胜谁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有些人不懂，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你们看苏联搞了四十多年，现在资本主义复辟了。列宁建立的党，列宁建立的苏联，四十多年后，资本主义复辟，搞修正主义。我们还只搞了十五年，将来马列主义会胜利。教育青年是个大问题。如果我们麻痹睡大觉，自以为是，资产阶级就会起来夺取政权，资本主义复辟。马克思主义不克服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克服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复辟。挂共产主义的招牌，实行资本主义政策。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十年、几十年也不好解决。

请你们回去向你们党中央转达，我们是有希望的。赫鲁晓夫不是好人，但他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认识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变成修正主义的。他不仅帮了中国人的忙，也帮了你们的忙，帮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忙。

世界上有三种坏人：一种是帝国主义，第二种是修正主义，第三种是各国反动派。你们那里反动派还有力量。叫什么呀？叫什么富米·诺萨万、西何·库帕拉西……富马看来也是靠不住的，但还要拉他一把。所以苏发努冯同志去巴黎开会是正确的。我认识你们的领导人很少。一个是苏发努冯，一个是凯山。

差不多了吧？你们讲，你们讲。

宋：首先让我向主席报告，我们见到您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听了您对我们讲的话，将它当做一种教育。

毛：我讲的不是教育，是经验。你们回去不能硬搬中国这一套。

宋：我们将您的讲话看做对子孙教育一样。

毛：是对同志。

宋：我讲的话是从内心讲的。今天有机会来见主席是毕生最荣幸的象征。我们很久以来就听到您的名字，想找机会见您。我们觉得您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领袖，也是为反对殖民主义争取解放斗争的人民的领袖。

毛：不是领袖，是朋友。

宋：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是外来的，而修正主义是内部最危险的敌人。

我们今天有机会拜访您，感到十分荣幸，也是老挝人民的荣幸。我们正在遵循以苏发努冯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进行斗争。我们在抗法斗争中经过八九年。后来美帝国主义进来了，因此，我们又起来进行反美斗争。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因此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尤其是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帮助，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毛：讲得好。

宋：我们今天有机会见到您，也就是由于我们革命人民和革命先烈二十多年斗争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的同志没有机会来亲自见到主席，但他们为我们见到您创造了条件。我们还很年轻，我们不会辜负先烈们所给我们的恩惠。所以我们在这里宣誓，要做革命的接班人！

毛：对的。

宋：目前我们的任务很重，因为美帝国主义从各方面来破坏我们。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认为文艺是一条革命路线，是从政治思想上向敌人斗争，为人民服务的。我将尽最大的努力从事这项工作。

今天非常高兴，因为拜访了主席，从主席的谈话中获得了很多经验。文艺战线上不进行革命是不行的。因为要通过艺术来进行思想革命工作。旧文艺服务于旧社会，而新文艺则为新社会服务。怎么使旧文艺为新社会服务呢？我看我们在北京看到的京剧现代戏，内容都是革命的。没有看旧戏，因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艺术。这一点是我们刚学到的。

这是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新任务，我们为接受这个新任务而感到荣幸。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主席工作忙，有党务工作，有国家工作，但是还抽出时间来抓文艺工作。

过去在老挝有人看不起演戏的，认为演戏的不是好的。

毛：你们自己认为怎么样？

宋：现在我们有些人还是看不起这种工作，甚至他们的父母也不让自己的子女来演戏。

毛：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宋：我们这个文工团从建立起来已有三年时间，在党中央和苏发努冯主席的领导、关怀和教育下，我们很年轻，也贡献了一点力量。群众赞扬说：我们文工团是一个有民族性、革命性、斗争性的文工团。

毛：这个好。

宋：尤其是到中国来表演，受到中国同志热烈欢迎。

毛：那就好。

宋：在中国我们受到了男女老少热烈地欢迎。从基层干部到国家领导人都支持我们的演出。

毛：你们来多久了？

宋：我们到中国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前几天还到过沈阳、鞍山，虽然在鞍山只演两个晚上，场子小，票子少，可是有许多观众在戏院外听我们的广播。

毛：好哇。

宋：我们看见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他们一致支持我们。

毛：应该支持。不支持是错误的。不支持的无非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宋：我们正处在激烈的斗争中，没有什么比知心朋友更宝贵，没有任何东西比朋友的支持更为宝贵。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把感想带回老挝去，向老挝人民进行宣传。我们将把在中国学习的经验带回去工作，把您的话带回去，好好向党中央汇报。

□□：好吧，是否照个相留作纪念？

毛：好哇。

（合影后，毛泽东请外宾向身在北京但这次没有来的团员们问候。当毛泽东送老挝同志们出门口的时候，宋西和其他客人恋恋不舍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并说：“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1964年9月，毛泽东接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时的合影。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4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看到，勤劳勇敢的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周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坚决贯彻了建立自主民族经济的革命路线，在短短的时期内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牢固的自主民族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家。朝鲜人民的这一光辉成就，是朝鲜劳动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朝鲜实际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深信，兄弟的朝鲜人民在执行国民经济七年计划的任务中，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美

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为保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它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

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军霸占南朝鲜，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南朝鲜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不断地震憾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朴正熙集团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坚信，朝鲜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一年来，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在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合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发展。这种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实现我们共同的伟大革命理想而斗争到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的电报[1]

（1964年9月8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特莱科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的时候，谨向你们和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保加利亚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

中保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不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特莱科夫的电报。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周年。

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继续努力。

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九月八日

给康生[1]的信

（1964年9月9日）

康生同志：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卅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1]

（1964年9月10日）

戴高乐总统七月二十三日批评了西德[2]。我看这个批评相当好，也让西德考虑一下，就是听美国话太多了。还有英国，我看也值得批评一下，它跟美国太靠拢了。

几个大国手里拿着核武器，口里也讲和平。你们也有了核武器，但不多，刚开始有。我们还没有核武器，但谁吓唬我们都是不行的，我们从来就不接受强大力量的威胁。不接受这样的威胁，在我们力量再小的时候也是如此。

我们很欣赏法国这种独立政策。不能跟着少数大国转，它们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把英国算在美国那边也可以，但是英国保守党里也有人不赞成英国政府的政策。世界在变化，不是一两个大国所能管住的。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来管，不能允许任何外国人干涉。你们说我们也参加了对东南亚的干涉，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用“空话”来干涉，就是鼓励和支持那里反美的游击战争。这不是秘密，是公开的。全世界任何地方有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那里的压迫者的游击战争，我们都毫不掩饰地支持。

---

[1] 这是毛泽东和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谈话的一部分。

[2] 1964年7月23日，法国总统戴高乐在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干涉印度支那事务，并批评联邦德国政府当时奉行的外交政策不是“欧洲的和独立的政策”。

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驻华大使时的谈话（摘录）

（1964年9月10日）

佩耶[1]**（以下简称佩）：**他最近去北京大学访问过。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不是一所好大学。

佩：我见到了校长、系主任、教授和学生。他们谈到了他们的活动，我认为，他们在研究和公民精神方面是热情洋溢的。

毛：这是他们告诉你的，但是他们告诉你他们做的和他们实际做的不一定是一样的。这不是一所好大学。

杜阿梅[2]**：**我很荣幸在西安访问过一所技术学校，用了两个小时，同学生谈了话，其中有个学生迫切要求入党，他说，入党是不容易的。在这个学校我看到三个女学生，两个是医生的女儿，就是资产阶级的女儿，但她们思想都社会主义化了，毛主席的著作她们都能背诵出来，我提的问题她们可以用毛主席著作中的话来回答。

毛：当然，他们对你说得好。但是不要听了就信。未来将会告诉你这些学生是好是坏，好不好，要看将来。判断他们的将是现实的生活，而不是书本上学到的东西。现在他们所学的只能当做资料，同过去上学一样，老师讲的话我们后来都不一定做。文科有语

---

[1] 即吕西恩·佩耶，法兰西共和国首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

[2] 即玛丽·皮埃尔·杜阿梅。

法和修辞这二门，写起文章来，就不照那个写。语法还有点用，修辞学就不一定有用，修是修，用得不多，谁写文章照修辞学写呢？

佩：换一点课程，更加活跃一点的。

毛：对，更加活跃的，更加实用的，合乎事实的。

对李维汉在民族宗教问题上主要言论摘录[1]的批语

（1964年9月11日）

徐冰同志：

希你坚持阶级立场，团结大多数同志，叫他们千万不要动摇。

毛泽东

九月十一日

退徐冰同志。

---

[1] 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1964年9月3日印发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即罗迈）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主要言论摘录共分八个问题：一、改革和平叛问题；二、宗教问题；三、区域自治问题；四、班禅问题；五、上层统一战线问题；六、新疆问题；七、民族关系、民族主义等问题；八、社会主义民族问题。这个言论摘录当时是用来批判李维汉的。1964年9月3日，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为报送这个材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送上罗迈同志关于民族宗教问题的言论，文字不多，还容易看。请审阅，如认为可以，则请送主席阅。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我们另外送。"彭真将徐冰的信和李维汉言论摘录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写了批语。

和计划领导小组的谈话[1]

（1964年9月12日）

工作方法，这是思想问题。来的计划是一本书。问题是思想从哪里来的，始终没有搞清楚。计划是从哪里来的？我看是俄国的书本，再加上自己脑筋的“想当然”。我看要上谋中央、下谋群众，还要谋前后左右。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央计划领导小组谈话的一部分。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

（1964年9月14日）

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不会走日本人的老路。日本人吃亏，就是吃亏在先搞东北。那时全国来了一个抗日救亡运动，“七君子”等等，轰轰烈烈，使得我们有了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它以后才逐渐增兵华北，才搞山东，慢得很！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才进攻汤恩伯[2]。武汉不是早就占领了！但它也是到一九四二年以后，才向湖南长沙一带进攻。一直到这时，它才懂得中间突破。

---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时讲话纪要的一部分。

[2] 汤恩伯，1942年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

邀请日共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的信[1]

（1964年9月15日）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国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热诚地邀请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遣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五周年国庆典礼。

我们深信，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光临，将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兄弟团结。

我们衷心地希望，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受我们这一邀请。至于代表团人数和由哪一级领导人率领，请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我们希望早日得到关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成员的通知。

谨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五日

---

[1] 同样内容的邀请信还发给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1964年，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会见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

对有关赫鲁晓夫[1]攻击毛泽东谈话的一个材料的批语[2]

（1964年9月17日）

刘、周、彭、朱、陈[3]阅，退毛。

还是上一次谈过的老话。以威胁为防御。色厉内荏。全世界多数舆论，都不以为然。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

[1]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的一个材料上。材料的内容是赫鲁晓夫1964年9月15日接见日本议会代表团时，攻击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谈话。

[3]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指朱德。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4年9月2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你们。

布马扎（团长，以下简称布）：主席同志，我代表全体团员表示，今天是伟大的日子。因为我们有机会见到主席。我们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和我们见面。我在这里向您转达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本·贝拉、阿尔及利亚政府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兄弟敬意和友情，特别感谢你们在我国解放战争时期给予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在建设时期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临来之前，本·贝拉总统委托我转达他给你一封信件（布马扎把信交给毛泽东），并口头转达：阿尔及利亚人民钦佩中国人民、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在建设自己国家中所表现的胆量和智慧，你们的方针对全世界人民，对所有革命的国家都有指导意义，我们从中国人民那里获得鼓舞。本·贝拉总统还要我口头告诉毛主席，我们为有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我们感谢你们在解放斗争中和独立后给予的同情和帮助。同时我代表全体团员感谢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的接待，我们经济代表团的任务是要加强中阿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你们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一使命，让我们看到许多东西，使我们了解了你们的国家，我们感到非常满意，这次访问对

我们有很大教育。法国有句成语："凡是结束得好的事情，本身就是好事情。"在结束我们对中国的访问时，我们会见了主席，就表明了这一点。

毛：感谢你们。感谢整个代表团的朋友们。我们支持你们，你们给我们的帮助更大。整个非洲人民支持你们，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在内）支持你们。你们打了八年仗，牺牲很大，值得各国人民支持你们，你们在整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做出了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对各国有很大影响。而且你们正在支持尚未独立的国家。自己国家刚刚解放就支持别国。例如支持刚果，这是一种国际主义精神，所以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语言。我们经常注意你们的活动，注意你们国家在本·贝拉总统领导下的活动，例如镇压反革命。反革命不镇压就不得了。不镇压反革命，政权就不能巩固。以后还会有反革命的，他们从国内颠覆你们的政府，破坏你们的经济，甚至于暗杀你们的领导人。这些人代表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国内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代表广大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利益，你们就非同那些反革命分子作斗争不可。说现在是搞建设，还不如说是搞革命，搞社会革命，我们的国家也一样，一方面在建设，一方面在进行社会革命。同你们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有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及知识分子中的右翼分子，他们同我们捣乱。你们以为我们把蒋介石赶走，我们的国家就太平了吗？并不是这样。你们看到的是表面，时间很短，没有深入社会去调查研究。这是大使的任务，我曾向大使说过，要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社会，要作社会调查。不要只看表面。例如我国工厂增加，工人也增加，就混进了国民党的中将、少将、上校、地主、富农、警察、宪兵等。

在农村也有他们的人，他们从这个省跑到那个省的农村，说是难民、是贫雇农，其实是逃亡地主。我们估计有百分之五左右的人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百分之五就是说有三千多万人，比你们全国人口还多。他们为什么不造反呢？因为他们分散在各地方。如果都集中起来，三千万人就不得了。你们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反对你们的人，也是分散在各地，所以你们可以消灭他们，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注意这件事情，警惕他们就好了，要记住这点。

我们支持你们建立代表大多数人的党。听说你们正在开始建党。我和大使讲过，建党的原则是建立在百分之几的少数剥削者，还是建立在百分之九十的被剥削者，还是建立在不被剥削也不剥削别人的基础上。听说你们把阿巴斯软禁起来了。是建设阿巴斯的党，还是建设本·贝拉总统所主张的那样的党？如果大批党员都是阿巴斯那样的人，他们不代表工人、农民，那么将来还得革命，总会有人起来革阿巴斯那样人的命，阿巴斯还算文明一点，他没有拿起枪打，如果拿起枪来打，那就更厉害一些。

关于我国经济建设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如尽搬外国经验，工厂要越大越好。其实不然，现在我们正在把工厂缩小，化一个工厂为几个小工厂。你们到沈阳看过什么工厂？

布：我自己去朝鲜了，我在沈阳看了展览会，看了模型，代表团部分人参观了钢铁厂、机床厂和自行车厂。

毛：鞍山这个工厂太大了，十几万人，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搞，从采矿、炼焦、炼铁、轧钢都是它。我们这条道路是错误的。我劝你们不要抄这条经验。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多，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

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有些兄弟国家把专家撤走。这一来我们不得不自己干。技术、资金从哪里来呢？任何国家不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技术从哪里来？都得靠自己，当然从外国购买一些技术如我们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进口一些技术，但是要付款，不然他们不给。只好把建设拖长一些。要很快建设先进的工业、农业、国防、研究技术是困难的，把时间放长一些就可能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公债，现在不发了，正在还。我们欠苏联的外债，明年就可还清，明年再还一千七百万外债就没有了，至于内债，国内公债到一九六八年就还完。现余很少了，欠了一身债是不好过。这个你们考虑过没有？

布：考虑过。我们也这样想过，欠债就往往不那么自由。

毛：说话就不那么响亮。还是请工人、农民帮忙，工人和农民会帮助你们的。工人、农民帮助你们打败了帝国主义。过去八年打胜仗，并非外国帮助你们打的胜仗，外国帮助顶多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工人、农民力量很大，他们能帮助你们战胜那么强大的帝国主义，他们会帮你们镇压反革命，巩固政权。请问如果没有广大工人、农民帮助，你们能不能镇压反革命？你们有一支很好的军队，这些军队主要是工人和农民，我也有一支军队，我们的军官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文化的，他们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而国民党的军官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在军官学校学过的，可是哪一个打胜了，哪一个打败了呢？我们同三个敌人打过仗，第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是日本，和这两个敌人一共打了二十二年。第三个是美帝，在朝鲜打了三年。我们那时三个军的炮还抵不过他们一个师的炮。他们的空军白天黑夜轰炸，使我们运输很困难，可是最后还是我们

和朝鲜人民军把美国军队打败了，所以美国不喜欢我们，美国说我们坏。从前法国也说我们很坏，就是因为我们支持胡志明打了奠边政府。我们也支持你们，你们胜利了，法国人就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们不胜利，法国人是不会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支持你们的不是我们，而是阿联，第一个承认你们临时政府的不是我们，也是阿联。谁劝说我们尽快承认你们的临时政府呢？我同你们说，是你们的阿拉伯兄弟国家，那时叫埃及。没有它，有武器也运不去。现在阿联也支持刚果武装斗争。阿联同你们一道反对以色列的侵略。以色列人才有多少？以色列有一百多万人，不是以色列的问题，而是它背后的帝国主义的问题。是工人和农民帮助了古巴领导人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夺取了政权。你们依靠工人、农民不仅在战争中获得了胜利，而且可以，也一定可以把你们的国家建成一个强盛的国家。这是你们的内政，外国人的话只是一种参考性质的资料，究竟怎么搞好，由你们自己决定，谁也不能干涉。请问一九五四年的革命是外国人帮助你们决定的，还是你们自己决定的呢？那时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题。我听说你们看到胡志明打败了法国，就考虑到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打败法国呢？你们采取了胡志明的经验。大使不是要去越南吗？

阿大使：我们要先回国，十月一日以后准备去。

毛：总之，只有依靠群众才有可为，脱离群众就很危险。最可靠的是本国的群众。是你们怕法国人还是法国人怕你们？事实已经证明，是法国人怕你们。是你们强大还是法国强大？看起来法国是强大的，它有四千多万人口，当时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的有一百万之多，一切重要工业、农业都控制在法国人手里。法国人不但有陆军，还有海军和空军。你们没有海军，一架飞机也没有，同我们一

样，陆军也不及法国的十分之一。

但是你们打胜了，这个道理很可以想一想。我也经常同外国人举你们的例子，说明依靠群众实际上比强大的帝国主义更强大。你们知道我们亚洲有战争，就是在南越，那里遇到的敌人是一个比法国更强大的帝国主义。现在美国怕南越，他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打下去还是退出来？谈判还是继续打？是扩大战争还是缩小战争？南越人也只有一千万多一点，可是美国和他所支持的傀儡是不得人心的。不管怎么讲，我看美国总是要失败的。

我感谢本·贝拉总统给我的第二封信。第一封信我还没有回答，请你回去代我问候他，我收到第二封信很高兴，我还要回他的信。

布：非常感谢你的讲话，我们非常注意听你刚才的话，我要再次讲，刚才你提到的问题。不论是国内或国际问题，中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你提到的许多看法，我很满意地说，由于一些提法是你这样有经验的领导人讲的，就更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国，从革命角度来说是年轻的，从经验上来讲，与中国革命的经验比较，我们的革命是处于初级阶段，刚才你提到，胡主席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应该说他的胜利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并证明了农民和劳动者所说的一句话：不一定需要像殖民主义者那么多的武器也可以打败帝国主义。那时在阿有两派，一派是改良主义，主张用和平主义的方法；另一派是革命派，主张用暴力的方法。北越的胜利给阿尔及利亚开展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

那一派中有阿巴斯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在这问题上打了赌，我们赢了。我们一开始就支持了越南的斗争。阿尔及利亚、奥兰等港口的工人拒绝装卸武器，为此，同法国的左派组织搞得很

僵，因为他们对越南的支持是犹豫的。

毛：那时奥兰和阿尔及利亚等地都有抵制装卸的活动吗?

布：每次装卸时都有这样的活动，我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如果去越南时，一定会遇到不少我们认识的越南人，他们过去在法国和我们一道共同斗争。

毛：他们对你们一定会很友好的。

布：越南战争有好处。他们的斗争帮助我们加强了我们所维护的观点。我们也利用一些别国的经验，如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和中国长征的革命。我想你们一定从法国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他们埋怨说阿尔及利亚在游击战这一方面运用毛泽东的著作来进行斗争。

关于建立革命的党的问题，不久以前，我们开了代表大会，通过纲领，使我们能澄清一些问题，继续前进。纲领中写着阿尔及利亚革命主要是依靠农民劳动者、革命知识分子。另外，在党员成分方面，主要从农民劳动者、革命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但不是说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幻想，我们知道要经过一个阶段。

毛：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阶段。

布：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在国内仍然存在着外国特权分子，特别是需要高超技术的工业部门和石油部门。外国掌握这些部门的事实对我们是个威胁。他们同从内部进行颠覆的活动是同样危险的。

毛：在工业部门没有自己的技术人员来代替他们，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处理。你们的经济同法国的关系很大，这是应该注意到的。听说百分之七十五的对外贸易是同法国进行的，没有一段相当长的过程，要脱离法国是不可能的，那么法国就要利用这个关

系来压价，暂时你们也得容纳他们。同时开辟另外的道路，使他们将来同你们平等贸易。例如石油你们还不能自己开采，那么只好让他们来开采。是不是能顺利地培养自己的石油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

布：我们和苏联合办了一个石油学院，准备培养二百个工程师。我回国后还准备和罗马尼亚石油部负责人共同考虑培养石油技术人员问题。所以法国也提出要帮助我们培养干部。

毛：法国过去是不培养的，如在越南过去没有多少技术人员，同日本在我们东北一样，根本不培养技术人员。帝国主义可挖苦得很。你们有苏联、罗马尼亚培养技术人员的条件下，法国才可能帮助培养技术人员。

布：现在阿尔及利亚只有三个石油工程师。

毛：有三个人就好！

布：这三个人是在战争中培养出来的。

毛：有三个就了不起，可以培养出三十个、三百个。听说你们有五十万人在法国，这是个有利的条件，这五十万人中可能有一部分技工或工程师。

布：他们都是有技术的工人，特别是在纺织方面，我们建设工厂快开工时，可从法国搞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回来。

毛：所以有希望。困难是有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管多么大的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帝国主义欺侮你们非洲人，说你们不行，帝国主义也瞧不起我们亚洲人，说我们不行。我不相信，我和你们一样不相信。你们北非人、东非人和西非的人都是很聪明、很勤劳、很勇敢的人。帝国主义也看不起我们亚洲人，看得起日本人，就是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到外国去，人家就问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现在还有这样情况。

布：但现在必须承认中国人所做的都是伟大的事业。

毛：现在还不行，中国经济上还没有站起来。大概再有一百年，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同的。看起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但是两个民族。你们今天怎么安排？

□□□：下午游览参观，晚上有晚会。明天到杭州，再到广州，然后回国。

毛：还有什么意见？

布：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同您讨论问题。这是我们期待很久的日子。

毛：很希望看到你们，我感到你们有个特点，你们比我们年轻。你们是刚升起来的太阳。

布：但我们觉得毛主席永远年轻，思想总是明智开朗，看问题很清楚。你的话我们都详细记录了下来，回去要汇报，要向党的干部传达。这次谈话很有教育意义。谁知道可能有一天在阿尔及利亚或非洲看到您。

毛：我也希望。

布：二十年前亚洲人、非洲人都受人欺侮，过去亚洲人、非洲人都被歧视。如对中国和日本不同对待，非洲人也如此。他们也想分化我们，说有一部分是好的，另一部分是坏的。但现在我们自由了。

毛：你们解放了。亚洲问题还大，美军基地在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南越、泰国，在太平洋西岸包围我们，威胁着我们，也威胁着当地人民，也威胁着印度尼西亚和锡兰。帝国主义受伤了，但是还没有死，要多少年，恐怕要一百年吧！那是下一辈子的事，但是我相信帝国主义总有一天要死亡的。

关于立即准备进行核试验的批语[1]

（1964年9月21日）

已阅，拟即办。

毛泽东

九月廿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4年9月21日为尽快批示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关于将在10月进行正式核试验的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周恩来说，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于本月16、17日开了两次会，讨论关于核爆炸及其有关问题，急需待主席回来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作决定，时间以不迟于9月24日为好。因为如决定今年爆炸，以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为最好，而事前准备时间至少需要20天。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毛泽东等悼念格罗提渥逝世的电报

（1964年9月22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维利·斯多夫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教授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惊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坚强战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中国人民的朋友奥托·格罗提渥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请向格罗提渥同志的家属转达亲切的慰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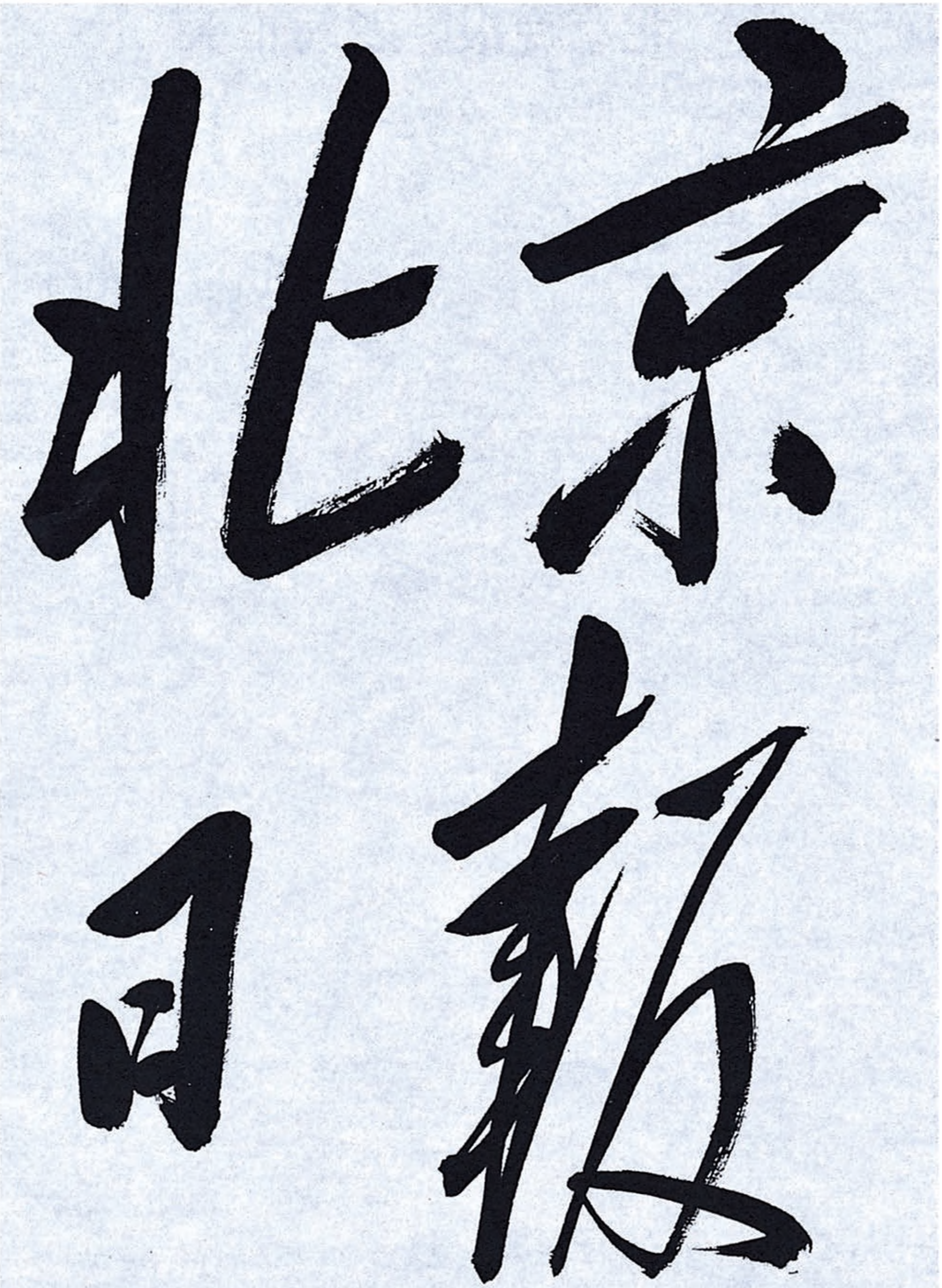
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1]

（1964年9月25日）

北京日报

---

[1] 《北京日报》创刊于1952年10月1日，为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毛泽东于1964年再次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



毛泽东第二次为《北京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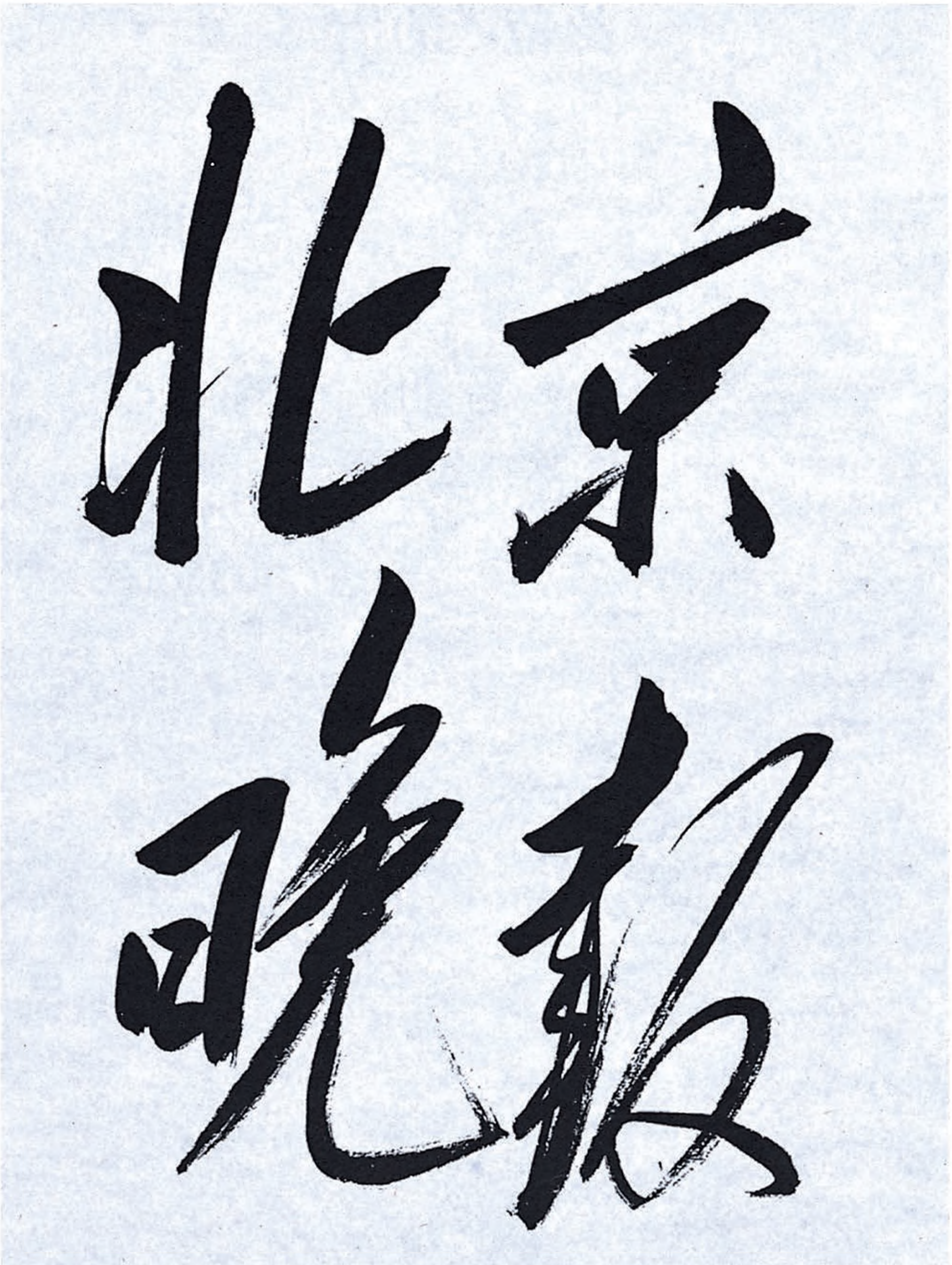
为《北京晚报》题写报头[1]

（1964年9月25日）

北京晚报

---

[1] 《北京晚报》是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并主管的综合性晚报，于1958年3月15日正式创刊，1964年由毛泽东题写报头。



毛泽东为《北京晚报》题写的报头。

给范瑾的信

（1964年9月25日）

范瑾同志：

写了一张[1]，不知可用否？原写的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的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如觉不妥，还是用原写的。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五日

---

[1] 指新写的《北京晚报》报头。

对刘少奇给江渭清复信[1]的批语和修改[2]

（1964年9月25日、10月18日）

---

[1] 指1964年9月23日刘少奇给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9月8日来信的复信。信中说，你对我在北京和你的谈话有某种误解。要各地、市、县委的干部认真学习研究省委书记的一篇讲话在原则上不是错误，问题在于你的讲话不值得各级干部学习，它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你已经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你对于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党本身的当前情况，实际上比过去了解更少了，但是你自以为比过去多了。对于外省的先进经验也觉得没有十分必要去认真学习了。因此，就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这个问题不只是你们那里有，中央的许多部门，许多负责同志，许多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程度不同地都有这个问题。要解决它，就要我们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去直接参加和观察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就能够听到群众的呼声，当然也要听基层干部和其他干部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刘少奇给江渭清的复信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1964年10月16日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于同年10月20日以中发〔64〕672号文件发至县团级党委。本篇三是毛泽东10月18日再次阅看刘少奇答江渭清信时改写的一段话。

一

少奇同志：

你的信及附件[1]都看过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其原因之一，是不懂马克思的认识论。因此，不厌其烦地宣传这种认识论，是非常必要的。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如果不是这样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第二个十条的修改，就是这样地请教群众得来的，就是我们不自以为是，有错必改这样一种态度得来的。如果在你的信上加上一小段理论性的话，可能更使人们信服些。如何，请酌。

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

[1] 指江渭清1964年9月8日给刘少奇的信及江渭清同年7月27日在江苏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和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同年7月28日关于善始善终搞好第二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

二

少奇同志：

我再看了你给江渭清信的全文，觉得实在好。只有第8页上，有两句话[1]，觉得重复，其实是一个意思，“认识了客观真理”，即是变成了主观真理，不是两件事。不能用“并把它变为……”这一句，这一句是重复的。上次我已感觉到，但未改。现在改了，是否妥当，请你酌定。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

三

所谓认识客观真理，即是人在实践中，反映客观外界的现象和本质，经过渐变和突变，成为尚未经过考验的主观真理。要认识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观真理是不是真正反映了客观真理（即规律性），还得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

---

[1] 这两句话是：“我们就能够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并把它变为主观真理。”毛泽东删去了后一句，并接着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三。

关于《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1]的批语[2]

（1964年9月27日）

定一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

---

[1] 指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由于长期地、大量地、无批判地学习西欧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不愿意为工农兵演出，认为他们听不懂音乐，演出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我们迫切希望能引起领导的极大重视，采取坚决的措施，从根本上制止资产阶级思想的继续泛滥。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是学校教学工作上只教继承，不教批判，或者“抽象的批判，具体的继承”以及技术至上，主科的个别教学，无法对教学进行细致的检查和监督。我对学校工作的最大意见是学校没有能够坚决贯彻阶级路线，院内师生的阶级成份十分复杂，工农子弟少得可怜。学校说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借鉴西洋工具和技术，为社会主义和工农兵服务，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彻底清除师生中十分严重的崇洋思想。来信最后说，学校的办学方针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教学中的中西比例如何安排？在我们的教材中、舞台上，应不应该彻底赶走帝王将相、公爵、小姐、夫人，而换上我们的工农兵。这些，我们都希望中央能有明确指示。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4年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七十九期上摘登的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同年9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信的摘要题为《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

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对彭真在国庆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9月29日、30日）

一

刘、周[2]、彭再阅。有一点修改。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早

二

在这里，必须指出，我们还有缺点、错误，还有困难。我们的

---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典礼上的讲话（1964年9月26日稿）的批语和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对按毛泽东意见修改后的彭真讲话稿的批语。彭真9月29日夜为送审讲话稿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主席：这里已经按照你的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刘、周、邓都赞成你的意见。"这个讲话在1964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

工作越是有成绩，越要注意检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的事业发展得越顺利，越要看到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目前，我们在工业、交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党务工作等方面，虽然都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也都存在着不少缺点、错误和困难。事实上，各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困难，每年每月都有。原有的缺点、错误和困难克服了，新的缺点、错误和困难又会产生，又要去努力克服。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对待任何事物，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而不要用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和错误；既要看到顺利的条件，又要看到困难的条件。如果不这样，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不好的，是很有害的。我们的同志和人民，永远不要骄傲，不要固步自封，不要自以为是，永远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对外国，永远不要大国沙文主义，一定要尊重别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一定要平等相处。对兄弟党，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大党小党一律平等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原则，绝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各族人民，不但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灾害，而且可以战胜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复辟活动和一切国内外敌人的进攻。一切缺点、错误和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中外关系是一定可以遵照正路发展的。

三

已阅。

即退彭真照办。

毛泽东

卅日二时半

对王海容来信[1]的批语[2]

（1964年9月30日）

一

送陆定一[3]同志酌处。

毛泽东

---

[1]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的王海容1964年9月28日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对学院教学改革的一些意见，说："在改革的某些具体做法上或某些措施上还有不少的偏差，存在一定的问题，我认为如果现在不及时纠正，那么将影响学生全面地掌握知识。"

[2] 本篇一写在王海容来信的信封上；本篇二写在王海容来信的第一页上；本篇三写在来信的第二页反映外国语学院教学改革中存在问题的那段话旁。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二

定一同志：

这封信有些事值得注意，在第二页上，请看一看。

毛泽东
九月卅日

此人叫王海容，是个女孩子，很有些志气，是人民代表王季范的孙女儿，也是我的外孙女儿。你如果想找她谈谈，可叫我的秘书徐业夫送她去。

又及

三

请派人调查一下，及时改正。

1964年9月30日，毛泽东和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及其夫人交谈。

1964年9月30日，毛泽东和马里共和国总统莫迪博·凯塔交谈。

1964年9月，毛泽东会见原刚果（布）工会联合会领导人儒利昂和夫人时，和其小女儿亲切握手。

1964年9月，毛泽东、陈毅和外宾交谈。

对图加林诺夫[1]《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的组成部分（范畴）》[2]摘译件的批注[3]

（1964年9月）

一

（消灭了吗？——毛注）

二

（发展了吗？——毛注）

三

（矛盾重重。四十七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两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而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即贫民、农民，则不相〔信〕他们，向他们进行尖锐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城乡两部分资产阶级，虽然都是资产阶级，是

联合起来掌权的，但是亦有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城市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近日事件就是斗争的表现。我国亦大量地存在这样情况，也是矛盾重重。不过，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毛注）

四

（胡说——毛注）

五

（胡说——毛注）

---

[1] 图加林诺夫，当时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教员。

[2] 这是图加林诺夫主编的《苏联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辩证法规律作用的特点》一书的第二章，为图加林诺夫撰写。这本书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

[3] 本篇的五个批注都写在《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送阅的《红旗》杂志编辑部哲学组对图加林诺夫撰写的第二章的摘译件上。第二章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是从对立到差别，从差别到统一和融合；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不是矛盾的关系，而是差别的关系。摘译件说：“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就是第二种过程（对立转化为差别）的鲜明例证。城乡剥削阶级的消灭和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就是这种转化的一些阶段。如果说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里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

系还带有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那么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差别（本质差别）的关系，即整个说来是不矛盾的关系。我们社会的基本阶级之间产生的某些局部的和暂时的矛盾，并没有提供根据可以用矛盾（即使是非对抗性的）这个范畴来表明他们的关系。”本篇一写在这段话的“城乡剥削阶级的消灭”九个字后面。本篇二写在这段话的“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九个字后面。本篇三写在这段话的“如果说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里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还带有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那么现在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差别（本质差别）的关系，即整个说来是不矛盾的关系”后面。摘译件还说：“苏联最主要的社会关系（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关系）的特点现在已经不是矛盾（即使是非对抗性的），而正是差别。差别（而非对立）是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苏联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社会范畴。”本篇四写在其中“而正是差别”五个字的后面。本篇五写在这段话的末尾。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应做好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准备[1]

（1964年10月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很感谢你们。你们在前线，你们进行英勇的斗争。我们和你们的敌人是一个，就是美帝国主义。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到中国大陆上来，在你们那里打，不仅在南方打，而且打了北方。其实你们也打了他们。

范文同（以下简称范）：是他们先打我们。

毛：是他们先打你们。

范：可能还会再打。

毛：还会打。现在不知美国要打多少时间。它要打多少时间，就跟它打多少时间。看来，美国是可以打的。过去你们的事实证明法国是可以打的，现在你们正在证明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的。过去我们的事实也证明过，蒋介石是可以打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的。朝鲜战争证明美帝国主义也是可以打的。你打了它，它舒服了。如果不打，它就不高兴。

范：可能是这样。

毛：你愈把它打得彻底，它就愈舒服。比如法国，你们打了它，它就要和你们谈和。阿尔及利亚把法国打得很痛，法国就和阿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

尔及利亚讲和。事实证明，打得它愈痛，它就愈舒服。

今年八月间，我跟黎笋[1]同志谈过，那时正是第一次北部湾事件之后。我曾告诉黎笋同志，我们中国有些同志过于积极。他说，不是这样，中国几十万、几百万人示威游行很好。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派军队帮你们的忙，太积极了不好，不利于斗争。我们中国深入进去，有个时机问题，有个地点问题，还有你们要不要我们去的问题，如何打法的问题，语言不通等许多问题。我说，还是稳当一点好。兵可以摆在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地区。

范：黎笋同志回国后向中央作了报告。

毛：看来你们是赞成吧！我看，越南南方不是要我们去的问题，也不是要你们北方派很多军队去。

范：我们也是这样想。

毛：黎笋同志说，你们打算派去一个师，可能现在还未派，何时派，要看时机。美国打不打北方，现在没定。现在单单南越问题还解决不了，再打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它要考虑一下。美国说了许多吓人的话，说要追击，要追击到你们国家之内，还要追击到我们国内，又要打我们的空军。我看，这个话的意思是要我们不要大打，只要我们的空军不去打它的军舰，就不发生追击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美国的心里有鬼。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怕美国，美国也怕我们，他们怕得更多一些。

范：很对，他们更怕我们一些，他们比我们头痛。

毛：美国的问题是世界性问题，不仅是东南亚这一块地方，还有欧洲问题、非洲问题、拉丁美洲问题、同盟军问题，等等。法国

---

[1] 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不赞成它，日本也不赞成它。第二次北部湾事件后，整个欧洲都不理它，日本也不理它。隔了很长时间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美国政府搞得不对。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第二次北部湾事件是九月十八日。

毛：我们不要性急，我们总参的同志有些着急。我跟他们说，不要那么急。

范：我们也有这样的想法，美国存在着很大困难，扩大战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们考虑，设法把南越的战争限制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在“特种战争”的范围内战胜敌人。力争不让美帝国主义把南越战争变成为局部战争，力争不使战争扩大到北越。我们必须采取很巧妙的做法，不要去惹它。我们中央政治局曾就此作出决定，今天向毛主席报告。我们认为，这样是可以做到的。

毛：可以。

范：如果美国发动局部战争，我们就要打，而且要打胜。

毛：可以打胜。南越有几十万军队，你们能够打它，消灭它一半，直到全部消灭它都有可能。美国不可能派很多兵到南越。现在在南越的美国军队都是海军系统的，是海军系统的一些部队。不过在海军方面，西太平洋比欧洲多。在地中海有第六舰队。西太平洋地区包括夏威夷、檀香山和你们那里，是第七舰队。现在有四艘航空母舰在你们附近。八月二日，它们被你们吓跑了。当年金门打炮时，美国在台湾海峡集中了十二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这次又要调第六舰队到东方来，刚走到半路一看没事，就宣布在新加坡休息，后来又到菲律宾休息，又回到地中海。美国就是这样紧张。

至于美国冒险把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问题，如何打法，我和黎笋同志谈过。当然，沿海要建工事，最好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

美国打不进来。如果美国决心打进来，也可以打得进来。你们的打法要注意，不要用主力跟它拼，把主力留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们地方大，人口集中在河内地区，怎么办呢？我看如果美国决心要打，打进来了，还是采取我们过去对付日本的办法，它想到什么地方，就让它到什么地方。它的后方空虚，过去我们在日本占领区的后方建立了许多根据地。在朝鲜战争中也是这样。美国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才出兵，打了一个美国不知道的仗。打响了，美国败了，才知道我们出了兵。美国会记住这个教训，要打你们时它也会注意这点。比如过去法国人，他们在河内一带没有被吃掉，但在奠边府被吃掉了。奠边府也不是你们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不知道法国人为什么上了这个当。因此，看看情况再说。

我们准备美国打进中国大陆。但要打，它也要利用蒋介石、南朝鲜帮助，单是美国人是不会来的。我们不怕。还是这个办法，在沿海建工事，也准备它打进来。中国领土相当大，它想到哪里就让它到哪里，这个办法比较好。我们和它打游击战，可以吃掉的就吃，要想吃掉它就要把它引进国境。每次吃得不要太多，跟吃饭一样，如果一口吃得太多，就嚼不烂。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就可以嚼烂了。这个办法美国人最怕。我看和美国、日本这样的国家打，只有用这个办法。过去希特勒打苏联一直打到莫斯科附近，后来苏联还是一口一口地把希特勒吃掉。

现在，我们在云南、广东、广西、湖南地区摆了两个梯队，第一梯队、第二梯队。吸取了在朝鲜战争初期军队准备少了的教训，这次我们的军队摆得多一些。这都是谈一些想法。既要准备，又要谨慎，按兵不动，不要那么急躁。我们的空军、海军都按兵不动，在我们国内演习、训练。这点和你们一致。你们北方的主力也是按

兵不动，你们的海军、空军也是按兵不动，不去惹人家。南方不同，那里能吃掉就吃掉它。现在美国人究竟如何解决，也没有个章程。

刘少奇（以下简称刘）：美国人已经通知他们在纽约见面。

毛：是吗？

刘：他们已经答复，纽约见面不好，提出要在日内瓦见面，在日内瓦会议上谈。

范：据苏联驻越大使说，一方面见吴丹[1]，一方面见腊斯克[2]。加拿大驻越南国际委员会代表也多次谈，想办法让我们和美国人会面。

毛：谈一谈也有好处。你们已经有谈判的资格了，谈成谈不成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也取得了谈判的资格，我们正在和美国谈判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地点在华沙，已经谈了九年多。

周：已经谈了一百二十多次。

毛：还要继续谈下去。在日内瓦会谈时，有一次，美国不想谈了，把它的代表撤回了，留下了一个负责通讯联络的人。我们整了它一下，去了一封信，叫它派代表来谈，给它限定时间，后来还是来了。不过它不按我们规定的时间，晚了几天，说我们是最后通牒。那时，我们内部也有人说，不必限定时间了，限定时间就是最后通牒，也不必说那些厉害的话，不来如何如何。后来，杜勒斯[3]宣布第一条来，第二条不按我们限定的时间来。

这次你们到北京来做了工作，和印度支那的几个方面都进行了

---

[1] 吴丹，当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2] 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 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接触，又和非洲及古巴接触。这种接触很好。

有一次我接见你们的南方代表团，团长对我说，在和法国人打仗时，有的人就怕敌人的空军。现在南方人民对敌人的空军不怕了。空军办不了事，打不死多少人，破坏不了多少房子。我们打了二十多年，没有空军。空军杀死的人很少，杀伤敌人主要是靠陆军。美国空军也是这样。部队晚上行动，空军作用很小。当然，白天作战，空军能起些作用。我们国家有一点空军，但很弱，海军也弱，主要靠陆军。敌人不怕我们的空军、海军，怕我们的陆军，怕我们的老百姓。

就谈到这里吧！

范：黎笋同志已经把毛主席的意见向我们中央作了报告。我们曾把南北越问题通盘作了讨论，与毛主席的意见一致。南方要打，北方要作好准备，但要慎重。

毛：我们的意见一致。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4年10月6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在积极支持西德军国主义，肆无忌惮地进行敌视和孤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侵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威胁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次重申，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中德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不

仅完全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遵循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加强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而奋斗。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友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月六日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1964年10月8日）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1964年，毛泽东、江青、周扬等观看文艺演出。

关于重新起草复本·贝拉信的批语和复本·贝拉的信[1]

（1964年10月13日、18日、24日）

一

打官腔，不能用。本·贝拉又有第二次来信。请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发去。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

[1] 本篇一、二、三是毛泽东对重新起草给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的复信的批语。其中本篇一写在外交部1964年9月10日关于建议以毛泽东名义复信本·贝拉并附代拟稿的请示报告上。本篇二写在本·贝拉1964年9月1日致毛泽东信的译文上。这封信是巴希尔·布马扎访华时9月20日面交毛泽东的。本篇三写在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1964年10月23日送审的为毛泽东代拟的给本·贝拉的复信稿上。本篇四是经毛泽东改定的给本·贝拉的复信。

二

退外交部。

本·贝拉总统来了两封信，应一起写一封回信，要用亲切的生动的语言写，不要用曾经起草的那种风格写（已退回外交部，请重写）。是否请乔冠华同志起草，送我修改后发去？请酌办为盼！

又，凡来信都应回答。乃比里前总理[1]对我国的祝贺信，也应回答。

毛泽东
十月十八日

三

即退外交部办，打印，下午送我签字。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十五时

四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

---

[1] 指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

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亲爱的兄弟：

收到你两封来信，我非常高兴。在这段时间里，你派来了穆罕默德·亚拉大使常驻我国，派来了巴希尔·布马扎[1]先生，来商谈我们两国的经济合作问题，派来了阿玛尔·乌兹加尼[2]先生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我同他们见了面，谈了话。对于你通过信件和使者所表达的深厚情谊，我很感谢。

我一直注视着伟大的阿尔及利亚人民革命。自从你们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深信，真正强大的是坚持革命的阿尔及利亚人民，而不是腐朽的法国殖民主义者。你们打了七年多仗，经过了种种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对你们的革命斗争尽我们的可能给予支援，但终究是有限的。你们的斗争支持了我们。你们的武装斗争，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作出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你们的胜利是对中国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巨大支持。我们支持你们，你们支持我们，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都是相互支持的。

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来中国访问的阿尔及利亚朋友，听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了革命，有些人甚至变成了反革命。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革命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随着革命的深入，总有一些人要落伍甚至叛变，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是如此。我很高兴地知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

[1] 巴希尔·布马扎，当时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2] 阿玛尔·乌兹加尼，当时任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务部长。

在你的领导下，正在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你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你们正在致力于建设一个革命的党和一支革命的军队，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逐步地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和本国反动势力，镇压反革命，初步地巩固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作为完全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阶段。你们这样做，在我看来，是完全必要的。然后有可能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我衷心地希望你们在推进革命和进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和成就。

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的纪念日就要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节日。陈毅[1]元帅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祝贺你们。他是我的战友，也是你的朋友，他将向你转达我的热烈的问候。你答应到中国来，我希望看到你。全中国人民准备热烈欢迎你。

亲爱的艾哈迈德·本·贝拉兄弟，请接受我崇高的和诚挚的敬意。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毛泽东等祝贺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任职的电报

（1964年10月16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得悉勃列日涅夫同志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同志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衷心地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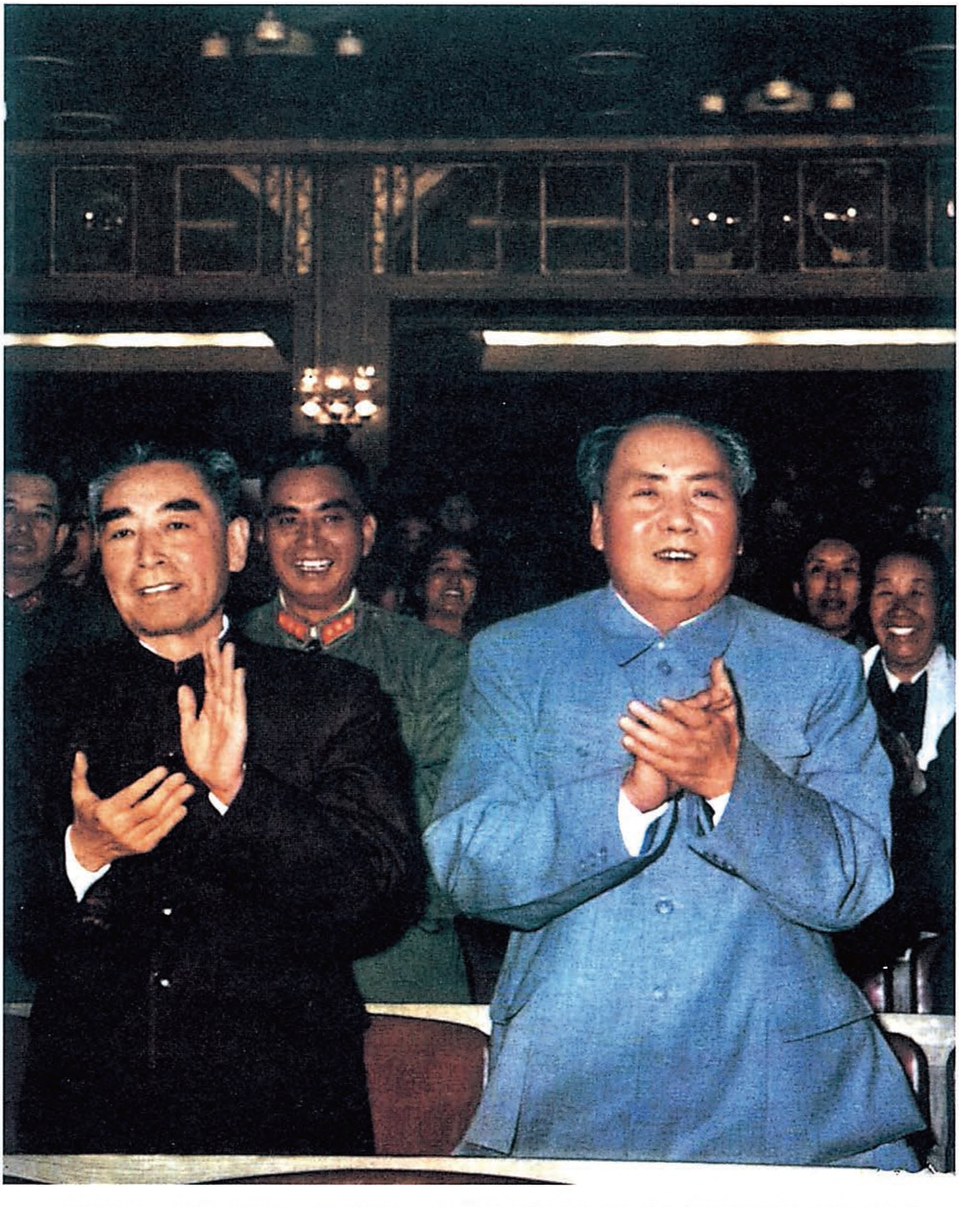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最近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和顺利着陆，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又一项伟大成就。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表示衷心的庆贺。

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

祝中苏两国人民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于北京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196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彭真等接见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的全体人员。

1964 年 10 月 16 日，毛泽东和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合影。

1964年，毛泽东和扮演江姐的演员握手。

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1964年10月16日）

我这个人老早就讲了，要为劳动人民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讲了二十几年。可是以后没有去抓。只要你不去抓，他就照例不动。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为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服务。……资产阶级掌握文化、艺术、教育、学术；可顽固啊！尽是他们的人，我们的人很少。这种情况再过几年可能会在你们国家出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964年10月16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绝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

产各种核武器。

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

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依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险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大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对《一个立志务农的教授女儿和家庭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材料[1]的批语

（1964年10月）

江青、李讷[2]阅。

---

[1] 共青团南京市委提供的这个材料刊载在共青团中央办公厅1964年10月16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三十四期上。这个材料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高中毕业生、共青团员黄桂玉自述的摘要，反映她立志务农，为了能参加农业生产，投身到劳动人民中间去，将自己锻炼成为革命的接班人，而同家庭展开激烈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到江苏省盱眙县马坝公社插队的经过。

[2]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

在刘少奇关于严肃处理农村中打击报复事件的信[1]上的批语

（1964年10月）

已看过。待各同志看完，即开会。

---

[1] 刘少奇1964年10月19日给毛泽东并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的信中说，过去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搞得不深不透，坏干部和阶级敌人对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的打击报复已经发生很多。对于这种反革命的报复行为，是不是放一个时候，让他们的罪恶更大时再来处理？我认为不宜这样作。因为这会在政治、经济、生产诸方面都造成很大的损失。现在应当怎样处理？我的意见是，立即由中央和省委派遣干部，再加一部分地委、县委干部，组成巡回检查组，下去检查和处理。对于犯有比较严重打击报复贫下中农和反攻倒算行为的党员干部，在调查确实后，一律撤职、开除党籍，情节严重者逮捕法办，个别民愤很大者判处死刑。在上面支持这些坏人的公社、区委、县委干部，在查明确实后，也撤职和开除党籍。这样，是否处分和开除党员干部太多？我认为不应当怕多，当然，也要注意不要冤枉好人，要严肃与谨慎相结合。在打击报复、反攻倒算事件严重的地方，双十条规定的处分干部党员不超过2%的规定，恐怕不能再适用了。不严厉处分这些坏人，就不能团结群众的绝大多数。这类事件蔓延起来，将来处分的人势必更多。请主席召集常委各同志就这个问题讨论一次，是否可以，请酌定。

对广东省委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报告的批语[1]

（1964年10月22日、27日）

一

刘、周、邓、彭、瑞卿[2]各同志：

广东省是动起来了，请总理约瑞卿谈一下，或者周、罗和邓、彭一起谈一下，是否可以将此报告转发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广东省委1964年10月18日关于国防工业和三线备战工作给中南局并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美帝国主义目前正在积极准备扩大对越南北方发动的侵略战争，广东省加紧进行战备工作是十分必要的。省委经研究打算：（1）加速地方军事工业建设；（2）从广州等前沿城市中迁建部分民用工业到三线去，后方电力工业要有相应发展；（3）加强国防公路和国防通讯网的建设；（4）做好物资储备与仓库建设工作；（5）加速后方农业和山区经济的发展；（6）适当加强三线的文教和卫生建设。本篇二写在林彪10月26日为转送这一报告给毛泽东写的短信旁。林在信中建议将此报告转发全国各省，以使各省的备战工作更加落实。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瑞卿，即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并向中央提出一个合乎他们具体情况的报告。无非是增加一批建设费，全国大约需十五亿左右，分两、三年支付，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阅后退毛。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二日

二

刘、周、邓、彭阅，退林彪[1]同志。

只看他[2]给我的短信就够了。真是小说上说过的“英雄所见，大抵略同”。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

[2] 指林彪。

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

（1964年10月22日）

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都欢欣鼓舞，热烈赞扬我国人民的这个重大成就，支持我国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而采取的正当措施。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深信，社会主义中国手中的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他们把中国人民的这一胜利，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胜利。

中国的核试验长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不到三小时之内就发表声明加以反对，并且说中国的原子弹意思不大，不足以动摇美国的核霸权；接着，他在十八日的电视演说中再次对中国进行攻击。这一次他却说，“不应该把这件事等闲视之”。美国政府在重大的国际事件上，表现得如此罕见的慌乱，前言不搭后语，正好说明了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是对美国核霸王的当头一棒。

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是建立在核垄断的基础之上的。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进一步打破之后，美国的核讹诈政策就吃不开了。

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当然使美帝国主义感到万分恼火。他们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掌握核武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约翰逊，这一回却装出一副假仁假义的姿态，似乎美国之所以反对中国拥有核武器，并不是由于中国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而是出于对中国人民利益的关怀。

据约翰逊说，中国的核武器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悲剧”，因为中国的“有限的资源”被用来制造核武器，而不能“用来改善中国人民的福利”。

约翰逊的意思无非是说，中国是个穷国，搞不起核武器。帝国主义总是低估人民力量的。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起，它们就一直在嘲笑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说中国这也搞不成，那也搞不成。似乎中国人民不听凭他们的摆布，不依靠他们的援助和恩赐，就什么也干不了。但是，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是勇敢勤劳的。我们深深地懂得，如果不能有效地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一切资源，就都不过是帝国主义的囊中物；我们的和平劳动，就毫无保障。正是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迫使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抵制美国核威胁的手段。中国实现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如果说是什么悲剧的话，不是别人的悲剧，而是美帝国主义的悲剧：它要使中国人民沦为核奴隶的迷梦破灭了，它的核垄断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

约翰逊还装出十分关心中国安全的样子，说什么中国有了核武器，“只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长期以来，美帝国主义一直对中国人民进行核威胁，甚至把核武器摆到中国的大门口。配备着核武器的美国第七舰队在中国沿海晃来晃去，美国在中国周围建立了一

个又一个的核基地，美国军政头目嚣张跋扈地扬言要向中国扔核弹。照约翰逊的说法，美国的核威胁能够增加中国人民的安全感，而中国人民拥有对付美国核威胁的核武器，反倒会增加中国人民的不安全感，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人民要想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应当彻底解除武装，托庇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除此别无出路。

老实告诉你，约翰逊先生，中国在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慑服于你们的核威胁。中国现在有了核武器，固然可以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安全感建筑在核武器上。中国有比原子弹更强大的东西，这就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高度觉悟和坚强团结的六亿五千万人民，和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依靠这些，我们就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约翰逊不仅断定中国的核试验对中国人民没有好处，而且“对和平事业没有帮助”。

照约翰逊说来，似乎只有在核大国的把持和垄断下，才能保持世界和平；一旦中国有了核武器，打破了核大国的垄断，天下就要出乱子。但是谁都知道，美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发动侵略、称霸世界；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保卫自己、维护和平。为什么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有了核武器，倒是和平的“福音”，而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有了核武器，却成为人类的“灾难”？美国为了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拼命发展核武器，已经二十年了，进行过几百次的核试验。为什么你们这种疯狂的核军备竞赛，就是对和平事业有帮助的，而中国为了自卫进行核试验，就是对和平事业没有帮助的呢？真是颠倒是非，岂有此理！

约翰逊说了这么多，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只应该美国有核武器，中国不应该有核武器。这真是一脸恶霸相，十足流氓腔。

老实说，中国并不醉心于拥有核武器。只要美帝国主义不搞核武器，中国也不搞；可是，只要美帝国主义手中还有核弹，中国就非有不可。不管约翰逊欺骗也好，恫吓也好，污蔑也好，都改变不了中国人民的这个主张。

当然，中国手里的核武器同美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一向是根据中国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来确定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有了核武器之后，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既不会用这个东西去吓唬别人，进行任何冒险；也不会把它当作参加“核俱乐部”的入场券，做任何损害世界人民革命利益和世界和平利益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五年的历史，证明了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各国人民革命运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中国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约翰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竟然说中国要以自己“少量的核力量”来同美国的“强大的（核）武库作交易”。总统先生，你完全想错了。中国发展核武器，并不是想以此作为资本来同你们讨价还价，做一笔什么买卖，而是要打破你们的核垄断，进而消灭核武器，以便永远消除笼罩着人类的核战争危险。这一点在中国政府十月十六日的声明中是说得明明白白的。

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过去，当中国没有核武器的时候，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现在，中国有了核武器，我们还是这样主张。在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中

国政府立即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政府的这个立场，最鲜明不过地说明了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抵抗美国的核威胁，归根到底，是为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中国政府还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中国政府的关于首先达成不使用核武器的协议的具体建议是现实的，是合情合理的，是简单易行而不牵涉到监督问题的。如果有关国家都愿意承担这个义务，就可以立即减少发生核战争的危险。这就向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最终目标迈开了重大的第一步。在这之后，可以讨论停止一切核试验，禁止输出、输入、扩散、生产、贮存和销毁核武器问题。显然，美国政府如果还有一点和平的意愿，就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个建议。

约翰逊在他的声明和电视演说中，避开中国政府的建议，而夸夸其谈，说什么要中国参加三国禁止部分核试验条约；要通过核查的协议来结束一切种类的核试验；要争取避免核扩散；要其他无核国家接受美国“核保护伞”的庇护。约翰逊提出这么一大套东西，拿腊斯克攻击中国的话来说，不过是一种烟幕，用来掩饰美国不敢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顽固而又虚弱的立场。

三国条约[1]的作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检验，早就真相大白

---

[1] 三国条约，指苏、美、英于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正式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

了。它是巩固美国核垄断地位的骗局。早在三国条约签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上当。现在我们有了打破美国核垄断的手段，还能指望我们会自己钻进这个圈套吗？这简直是异想天开。

约翰逊好像十分热心于防止核扩散。事实上，真正在搞核扩散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国自己。约翰逊政府正在积极推行所谓多边核力量计划，把核武器交给北大西洋集团国家，特别是西德复仇主义者的手中。美国的这种做法，既是为了准备核战争，也是为了加强对它的盟国的核控制。为了反对美国的核威胁，为了反对美国在它的侵略集团中间扩散核武器，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响应和支持中国政府的主张和建议。美国核垄断的局面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这对于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是大有好处的。防止核战争、禁止核武器的希望，绝不在于巩固美国的核垄断，而在于打破这种核垄断。把美国核垄断的地位打破得越彻底，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的。

核武器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既然人类能够制造核武器，也就一定能够消灭核武器。我们深信，通过各国人民的联合斗争，核战争是能够防止的，核武器是可以禁止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团结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要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为争取实现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而奋斗到底！

对陈伯达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10月23日）

一

已阅。

毛泽东
十月廿三日

二

我们办工业，必须把眼光放到全世界，不能只看到苏联的那一套。凡办事，要看得到，抓得起。要有这两种能力。凡办事，首先要看得到。如果连那件事看都没有看到，当然谈不到抓的问题。有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伯达1964年10月20日为送阅他的两个讲话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两个讲话稿：一是陈伯达同年9月16日在讨论发展电子工业问题座谈会上的插话摘要，一是陈伯达同年10月7日在科学院党组会上关于科学研究机构改革问题的讲话要点。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前一个插话摘要时修改的一段话，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许多人，对于当前已经出现了苗头，甚〔至〕大量出现了的事实，缺乏看到的能力（感觉和理解），当然谈不到抓起来做的问题。至于抓得起，是指抓全局，更需要有一种大的能力，普通叫做有魄力。有些人对于某些事，不是没有看到，甚至著书立说，长篇大论。至于做，他就抓不起来了，或者抓了片断面，忘了全面。说到抓，既要抓得起，又要抓得对，又要抓得紧。抓不起，等于不抓。抓不对，就要坏事。抓得不紧，也等于不抓。看也有看得对不对的问题。看得不对，等于不看，或者还要坏。面向全世界，既看得到，又抓得起，又抓得对，又抓得紧，雷厉风行，又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就可靠，就可以很迅速地发展我们的工业。大庆油田，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给泰国前总理比里的复信和对复信稿的批语[1]

（1964年10月24日）

一

尊敬的比里·帕侬荣先生：

感谢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节日的贺信。

四年前的同一个节日，我曾经在答复你的贺信中说：如你所指出那样，目前形势十分有利于全世界人民。现在，这种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形势是越来越明显了。整个世界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全世界人民一定会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正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已经亲身体会到自己解放自己的方法必须是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它的仆从进行坚决的斗争。我相信，日益觉醒的泰国人民也会卷入世界反美斗争的浪潮中，美帝国主义终将要从泰国滚出去。

祝愿你为维护民族独立，和促进中泰友好而斗争的工作获得进一步开展。祝你和你的夫人身体健康。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审定的给比里的复信。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1964年10月23日为送审毛泽东复比里信的代拟稿给毛主席办公室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二

退承志办。

拟稿可用。请再打样送我签名，发出。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

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后现场观察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4年10月27日）

只有工事、矮墙、坚房等物，就能防御核爆，不致伤人。[2]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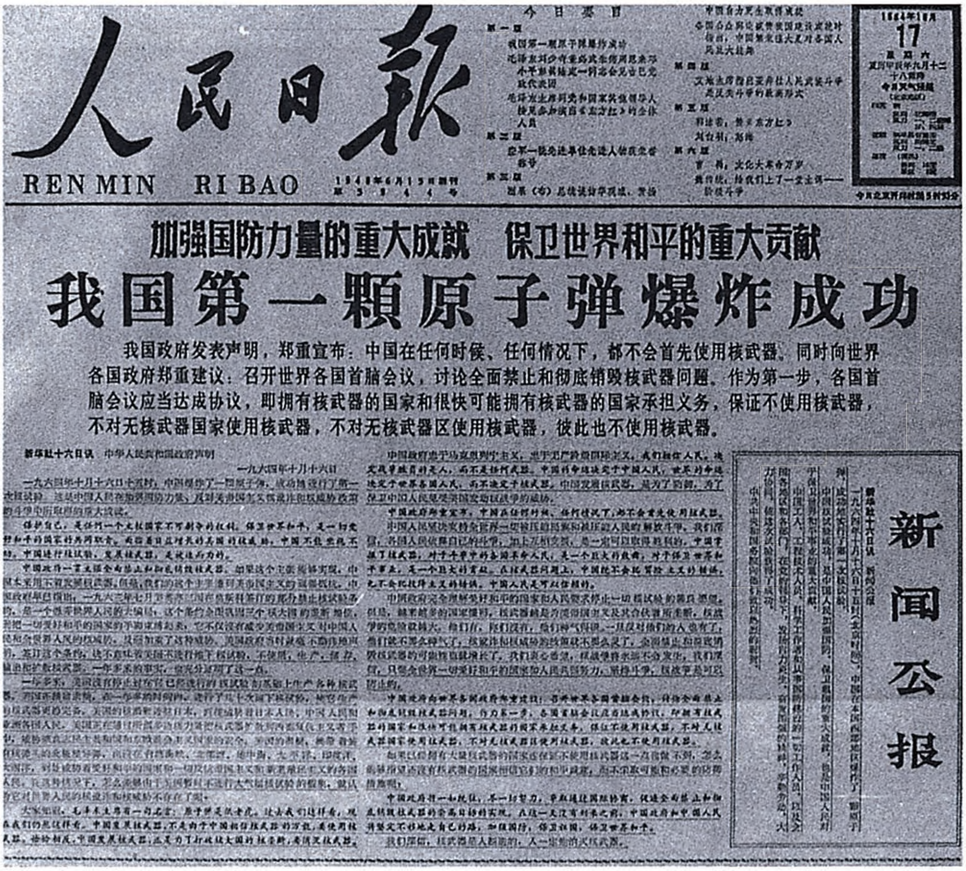
十月二十七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张爱萍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1964年10月26日报告的批语。

[2] 张爱萍和刘西尧的报告说：据我们这两天在原子弹试爆现场观察效应试验情况，初步认为，地面暴露的有生物，在一定的距离内，多数将陆续死亡；在一定的距离外，虽不致死亡，但将丧失战斗力。地面暴露配置的各种作战武器，在一定的距离内，大部分被破坏或在短时间不能使用；在一定的距离外，只要稍加防护（如野战掩体），基本上没有影响。各种工事、掩体，特别是地下工事，对原子弹爆炸有很好的防护能力。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加强国防力量的重大成就　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时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新闻公报

1964年6月17日，《人民日报》关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道。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的电报

（1964年10月31日）

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总书记艾哈迈德·本·贝拉阁下，

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议长哈吉·本·阿拉阁下：

在阿尔及利亚革命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向阿尔及利亚人民、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一日，英雄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行了革命武装起义，从此开辟了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新时代。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建立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当代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事件。它为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树立了一个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榜样。独立以后，勤劳勇敢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在艾哈迈德·本·贝拉总统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下，继续将革命推向前进，在巩固民族独立、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和

本国反动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事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斗争，并且为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非洲团结、亚非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衷心地预祝阿尔及利亚人民在今后的斗争中取得新的胜利。

中阿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日益发展。中国人民和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将永远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并肩前进，共同奋斗。中阿两国人民兄弟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对《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报告》的批语[1]

（1964年10月）

江青阅。

八月间的材料。到十月中旬发生突变，赫鲁晓夫[2]倒台，末尾几条结论，有些估计不足。

---

[1]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给外交部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些表现；二、苏联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势力猖狂泛滥的一些情况；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同人民群众的矛盾。报告在最后提出了五点看法：1. 广大人民群众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矛盾，目前反映较多的还是在经济生活方面。2. 苏联的健康力量目前还没有有理论、有经验的强大组织。3. 人民的觉悟程度还不够高，认识上还有许多模糊之处。4. 赫鲁晓夫在领导集团内部还能掌握局势，但他的内外政策不断遭受失败，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必然会有所增加。5. 苏联人民的认识水平、理论水平、实际斗争经验会逐步提高、丰富，会逐渐形成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强大的组织，发生更强有力的行动，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14日和15日，他的这两个职务被先后解除。

接见西南非妇女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1964年10月）

要请你们给我们的青年人讲讲课，使他们不要忘记世界上受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剥削、压迫的人民。

在北京找些青年人跟你们会见一下，少年儿童、中学生、大学生，给他们讲一讲，召集几千人开个会，请你们给我们青年人做做教员，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要请你们给他们讲讲。你们要告诉他们，“中国青年朋友们，不要忘记我们，你们是吃蜜糖长大的，不要忘记我们还在受苦”……

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1]写的批注

（1964年10月）

第五篇

统一封建国家重建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

第五章　隋唐佛教宗派

哲学（下）

---

[1]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主编的这本书是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出版的。这里选摘的是毛泽东有批注的部分。任继愈（1916—2009），山东平原人，中国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第一节　华严宗[1]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1）华严宗的唯心主义范畴

…………

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科学地指明了人类认识过程中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别与一般有内在的联系，不可分割。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

何其正确

…………

有必要读一下列宁的指示：

“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

---

[1] 华严宗，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实际创始人法藏被唐武则天赐号为“贤首大师”，也称“贤首宗”。华严宗对世界持客观唯心主义的看法，其代表思想是“四法界”说。华严宗认为，理为性，事为相，一切事物都是本体“理”显现出来的幻象、假象。所以归根到底，各种事物互相包容，圆融无碍，没有差别和对立，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中国哲学史上，华严宗比较注意阐释范畴，有概念辩证法的因素；对后世哲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有较大的影响。

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8页）。

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可以看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不可知论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的真相，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他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

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总起来看，华严宗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流派中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它涉及到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等等。从认识论上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只是由于他们从颠倒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对待事物，一切都被歪曲、颠倒了。它不但不能促使

认识的深刻化、接近科学，相反，倒是引导人们向反科学的道路迈进了一步。

我们认为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性质和内部联系在思维上的反映形式。对立的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客观事物本身矛盾运动的反映。而一切唯心主义者和我们恰恰相反。他们首先否认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也否认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本性的反映，在他们的哲学体系里，对立的范畴只能是概念游戏。范畴不再是认识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的工具，而是把范畴当作论证唯心主义的工具。因此，范畴在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支配下，必然脱离认识的实践，范畴成了一套空洞的概念。

不够严肃

满江红·庆祝我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

（1964年10月）

小丑下台，
应欢送，
礼炮轰隆。
原子弹说爆就爆，
其乐无穷。
十年丑史归尘土，[1]
一阵惊雷卷巨风。
笑老修大势去矣，
敲丧钟。

忆往昔，
来势汹；
众喽罗，
瞎起哄。
君不见，
人民自古是英雄。

---

[1] 十年丑史归尘土，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年兼任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被迫辞职。十年是取其整数。

螳臂挡车千钧[1]力，
庄生梦蝶[2]一场空。
看东方，
火炬赤旗舞，
万里红。

---

[1] 千钧，表示极重。

[2] 庄生梦蝶，《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意思是说，庄周作梦，梦见自己化为蝴蝶，自由飞翔，欣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不久醒来，仍然是庄周。

对川汉线选线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信件[1]的批语和批注[2]

（1964年10月、12月）

一

退一波同志。

二

周说得对。必须同时戡〈勘〉察三条线上的地下资源，即煤、铁、其他金属及森林情况。毛注

三

一波同志：

你的意见很对。资源、线路都要用两三年时间认真调查，确有根据，才能比选。不可草率从事。也不可拖拖延延，不认真紧张地从事调查。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

[1] 请示报告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和铁道部部长吕正操1964年10月3日关于川汉线选线问题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并报毛泽东和中央的；信件是薄一波同年10月17日关于川汉线选线问题给周恩来并毛泽东和中央的。请示报告说，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和中央关于停建湘黔线改修川汉线的指示。按照这一指示，我们与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武汉设计院研究了川汉线的选线和设计方案。一、线路方案有两个：第一方案即沅江方案，由汉口经长江埠（已通车）、应城、沙洋，在宜都过长江，再经临澧、常德，沿沅江至沅陵，再沿酉水经保靖、花垣、秀山、酉阳，再沿乌江经彭水、南川到重庆。全线建筑长度约1300公里。第二方案即澧水方案，汉口至临澧一段与第一方案相同。从临澧起沿澧水经慈利、大庸、永顺至保靖，再接第一方案至重庆。线路建筑长度比第一方案缩短约50公里或稍多一点。从图上比较，似以第一方案为好，它地势较缓，工程较易，沿线人口多，粮食及其他资源也较丰富，而且从常德向东接京广线，从沅陵向东南接湘黔线均较近。线路究竟采用哪个方案，尚需现地勘察，详细比较后才能确定。二、线路标准，拟按一级干线设计。三、决定立即将湘黔线的技术力量调下来，补充扩编后，去沿线勘察。四、川汉线长江以北一段（东段）明年下半年即可开工，中段、西段待初步设计做出后，后年也可施工。五、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必须像作战一样，指挥员亲临前线，深入实际，摸清情况，充分发动群众，采取统一领导、现场指挥的办法。薄一波的信中说，根据中央批示，送上川汉线方案示意图一份。这个图的三个方案（澧水方案、沅江方案、缩短澧水方案运距的方案）基本上是根据航测图绘制的。第四方案（清江方案），铁道部在1958年后设计过。资源情况是根据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经济调查处来的，其中铁矿是冶金部调查的。这都是初步估算，不经过进一步勘察，是不能得出可靠结论的。我觉得必须三条线（一、三方案算一个方案的选线）同时同样进行实地勘察。不能像过去主观上先定一线，名曰选线，而实际上只在航测图上选。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李富春、谷牧（国家经委副主任）、薄一波对李井

泉、吕正操关于川汉线选线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抄清件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写的一个批语所表示的意见，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中写的一个批语是：“有哪些地下资源，望先与地质部、冶金部联系研究后标图送阅，以便在现地勘察线路时，进行矿藏勘察。”本篇三是毛泽东在薄一波信上写的批语。

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批语[1]

（1964年11月1日、8日）

一

彭真[2]同志，请转谷牧同志：

要在明年二月开全国设计会议之前，发动所有的设计院，都投入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中去，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以三个月时间，可以得到很大成绩。请谷牧同志立即部署，并进行几次检查、督促，总结经验，是为至盼！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二

退彭真同志：

请告谷牧，他的这个部署很好。

毛泽东

十一月八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64年10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四〇八号上。简报摘登了建筑工程部副部长宋养初1964年10月24日关于有些设计单位开展群众性的设计工作改革运动给薄一波并李富春的信。本篇二写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谷牧1964年11月2日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具体部署给彭真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宋养初在信中说，近两三个月以来，已有14个设计院先后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工作的改革运动。他们在做法上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组织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入手，然后分析检查项目，总结经验教训，最后提出改革设计工作的具体办法；第二种是以批判典型人物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结合着工作革命化来开展运动，同时结合解剖“麻雀”，改革设计管理工作和规章制度；第三种是从贯彻勤俭建国方针入手，检查设计项目图纸的质量情况，发动群众讨论，并到现场总结经验，最后对标准、定额、手册等规章制度进行改革。

这些单位在改革运动开始时，都遇到一些思想障碍，一部分人思想顾虑较多。目前思想障碍已经扫除，运动正在逐步深入。看来，在设计工作会议召开以前，从下边先开展这样一种群众性的改革运动，可以充实设计工作会

议的内容，同时也可以提高设计人员的觉悟水平和政策水平。这对将来进一步实现设计工作的革命化大有好处。

谷牧在报告中提出的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具体部署是：

一、所有设计院首先是在北京的设计院，要立即动手，做好准备，分期分批地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各部首先要集中力量切实地抓好一个设计院，及时总结经验，以指导和推动其他单位。二、今后3个月主要是充分揭发设计思想、设计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为开好明年2月的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作准备。设计院的划阶级、整顿队伍等方面的工作，等到适当时机再进行。三、开展设计革命运动，大体要采取发动群众揭发问题；选择重点设计项目，解剖“麻雀”，检查和分析存在的问题；最后改革规章制度这样三个步骤。四、各部都要由一位副部长主持，并组织一定的专门力量，负责进行这项工作。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4年11月1日，毛泽东会见阿富汗王国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4年11月5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最诚挚、最热烈的祝贺。

在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四十七年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在十月革命光辉旗帜的指引下，沿着争取彻底解放的道路胜利前进。现在，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历史洪流，正在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最后统治，迅速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

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伟大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下，为建设和保卫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和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苏联人民在一个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征服宇宙空间方面，把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这充分显示了苏联人民的伟大创造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国人民为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坚决相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英雄的苏联人民，在建设和保卫自己祖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中，取得新的胜利，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一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两国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的团结越巩固，世界革命人民就越高兴，我们的敌人就越害怕。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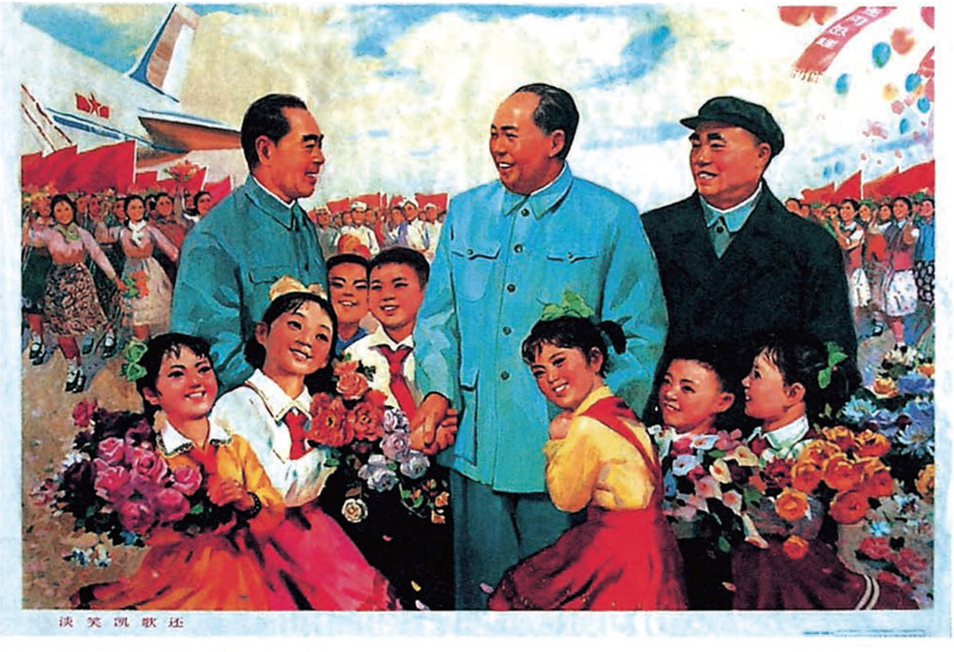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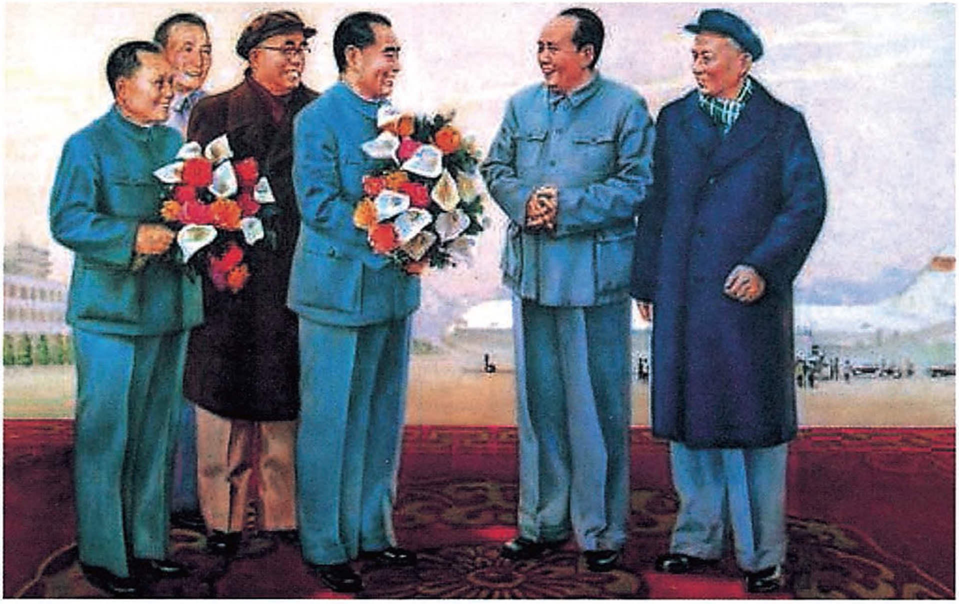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

1964年11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从苏联归来的周恩来、贺龙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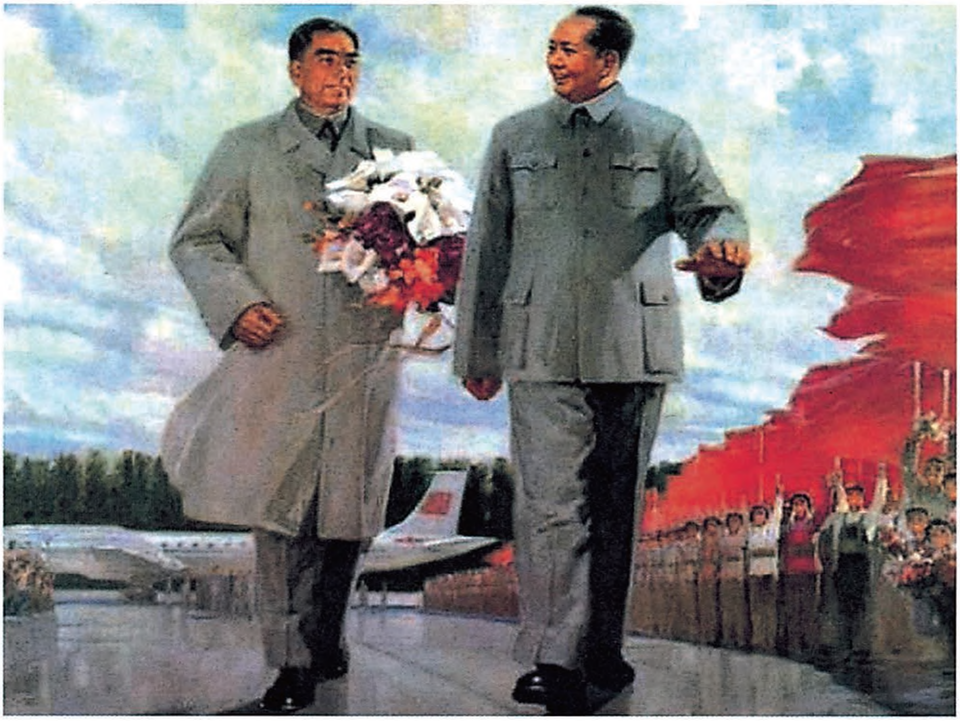
1964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热烈欢迎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



谈笑凯歌还（宣传画）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在一起（宣传画）



《胜利归来》（油画）

对《人民日报》纪念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社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11月6日）

一

退吴冷西同志。

已阅，写得好。

在第四页上，有一点修改。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二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极端仇视中苏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穷凶极恶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1964年11月5日为送审《人民日报》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社论稿《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社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在同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

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把中苏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看作是它征服世界的最大障碍。为此，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分裂中苏团结、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团结，以便各个击破。

对刘宁一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64年11月6日）

一

可用。有一些小的修改。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二

这一句，不宜在这个时候讲。

---

[1]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刘宁一1964年11月6日在北京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1964年1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1964年11月5日送审的刘宁一的讲话草稿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讲话稿中“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代”一句写的批语，毛泽东将这一句删去了。本篇三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

三

美国刚刚举行了总统选举，约翰逊连任总统。在竞选期间，有一种说法，说什么民主党的约翰逊是和平的候选人，共和党的戈德华特是战争的候选人，他们两人实行两种根本不同的政策。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美国的两党制和总统选举，从来就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愚弄人民的把戏。

对湖南省委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大队、生产队由贫协行使权力的电报[1]的批语

（1964年11月7日）

送少奇[2]同志阅。

此件请你考虑，似应批准。还可考虑发给各地，将他们一军。大多省、区是还没有搞起各级贫协来的。

退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

[1] 中共湖南省委1964年11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说：“在社教地区，发现有的大队、生产队干部躺倒不干，消极抵抗；有的领导权被那些和平演变过去的人掌握；有的被打进来的敌人掌握。障碍当前工作，破坏社教运动。有鉴于此，我们准备用省人民委员会、省贫协筹委会名义发一通知，在上述三种地区，由贫协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是否可行，请中央复示。”随电附有通知的草案。1964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716号文件向县团级党委发出关于在问题严重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批示说：“中央同意湖南省委的意见并同意这个通知草案。望湖南省委照此办理。”“现将湖南省委来件转发各地，各地亦可参照湖南省委意见酌情办理。”

[2] 少奇，即刘少奇。

为方志敏[1]烈士墓题名

（1964年11月9日）

已写一张，请汪东兴同志转去，不知可用否？[2]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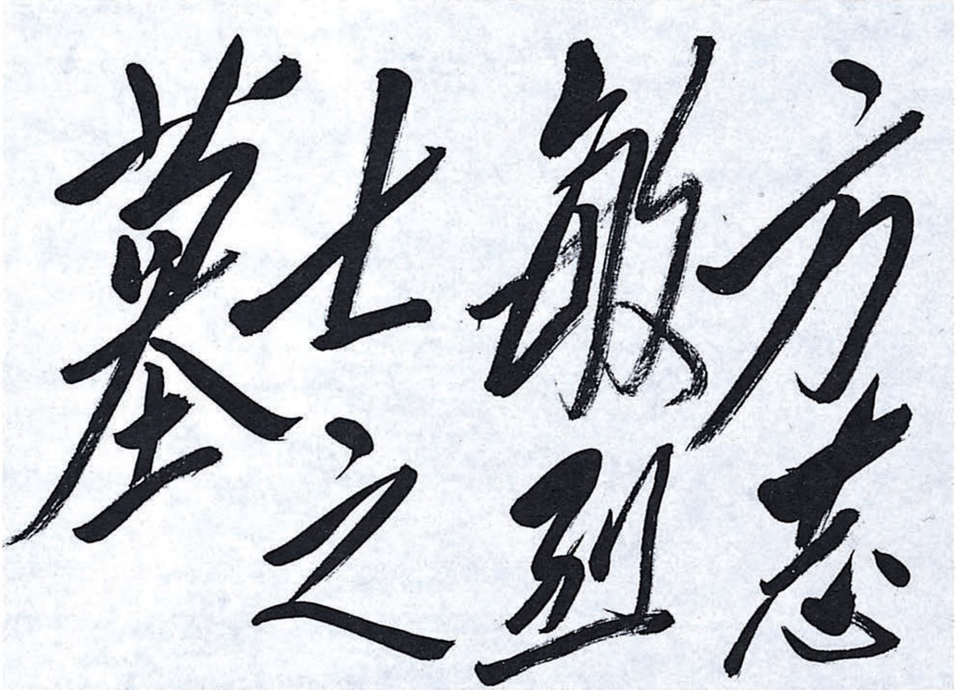
十一月九日

方志敏烈士之墓

---

[1] 方志敏，江西弋阳人，闽浙赣边区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1935年1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被捕。同年8月，在江西南昌英勇就义。

[2] 这个批语写在江西省副省长王卓超1964年5月21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信上。信中说，请毛主席为“方志敏烈士之墓”题字。究竟写几个什么字，请你与主席商量、研究决定。



方志敏烈士之墓

毛泽东为方志敏烈士墓题写的墓名。

对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4年11月12日）

少奇、小平、彭真[2]同志：

---

[1] 中共中央军委1964年11月4日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说，会后，各军区、各军兵种、高等院校和各总部党委，都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讨论，同时各单位都结合传达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具体安排了自己的工作。军委目前的主要工作是：1. 抓战备落实。准备在今年12月召开一次作战会议，讨论修改全军的作战计划，并研究各项战备工作的落实问题。2. 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准备工作。总的安排是：在明年上半年以前，由军以上领导机关选择一些不同类型的单位先行试点，摸清情况，取得经验，准备明年下半年在全军普遍展开。对文艺队伍、政治理论教员队伍进行一次整顿，开展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修正主义理论观点的斗争，并坚决把隐藏在军队文艺和政治理论队伍中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去。3. 抓领导干部蹲点。要求师以上领导干部，都要分期分批下基层去蹲点，每人每年一至二次，每次一个月左右。4. 抓院校的整顿。5. 抓明年年初整顿机关的准备工作。6. 抓军队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的改革问题。目前已提出初步方案，发给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征求意见，然后由军委讨论决定，报中央批准。

[2]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件可一阅。这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请你们注意军事，不要把它忘了。

退毛。

给林铁的信[1]

（1964年11月17日）

林铁同志：

遵嘱写了几个字不知是否可用；浪淘沙一词待后再写。此祝康吉！

毛泽东

十一月十七日

---

[1] 1964年，林铁给毛泽东写信，请他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并为他题写浪淘沙一词。这是毛泽东给他的回信。

对广东省委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报告的批语[1]

（1964年11月）

很值一读或两读。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广东省委1964年11月13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中央、中南局的第一次报告上。报告首先汇报了省委常委下去蹲点一个多月的情况和体会。这次蹲点使常委们对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和尖锐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对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右倾思想，则是一次充分的揭露和有力的鞭策。他们深感内疚地说：自己的“官”做大了，官僚主义大大发展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已经形成一堵高墙，隔断了自己同广大贫下中农群众的联系，对农村的真实情况完全不了解了。今后，一定要坚决革掉官风，打掉官气，下最大决心，把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深搞透、搞彻底。关于社教运动，报告说，这段工作大致可以肯定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工作队必须旗帜鲜明，一进村就要高举阶级斗争、“四清”、依靠贫下中农这三面大旗，以革命的姿态出现，树立“三同”“四清”的新作风，敢于同“四不清”的干部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二、不要急于扎根，更不要孤立、静止地去扎根。三、要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把对群众的思想发动、组织串连和实际行动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四、在思想发动中，要用阶级斗争新形势、新特点的思想武装贫下中农，把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到反对和平演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上来。五、

要用最大力量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培养一个革命的领导核心。六、要充分注意发挥贫协的作用，培养贫协独立活动的能力，树立贫协威信，使贫下中农看到自己的力量。七、要以贫协为核心，组成广泛的“四清”外围队伍。

为了保证运动搞深搞透，达到高标准，当前我们必须突出抓住下面几个问题，透彻地加以解决：第一，坚决反对右倾，彻底揭开农村阶级斗争的盖子。第二，要认真带好工作队，不断整顿工作队，使之锻炼成一支真正配得上搞大革命的高质量、过得硬的战斗队伍。第三，要十分重视做好培养革命的领导核心的工作。第四，要采取正确的工作方针和方法，坚决把“四清”搞彻底。

在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报告上的批语[1]

（1964年11月22日）

亚楼同志：

此件[2]已阅，很好。闻你患病，十分挂念。一定要认真休养，听医生的话，不可疏忽。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1964年11月22日为报送关于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的报告给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信上。信中说，特呈上报告一份，请口头转报主席，或者呈主席一阅。如有指示，请告知我们。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司令员吴富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1964年11月20日关于击落美军无人驾驶飞机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简要介绍了我空军1964年11月15日在广东遂溪地区击落美国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经过，并对这次高空平流层作战作了初步总结。

祝贺日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电报

（1964年11月23日）

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向你们的党代表大会致以热烈的兄弟的祝贺，并且通过你们的大会，向兄弟的日本共产党，向斗争中的伟大的日本人民致以最亲切、最崇高的敬意。

日本共产党是富有战斗性的坚强的日本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日本人民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突击队。日本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日本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高举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垄断资本的革命旗帜，指引着日本人民革命斗争胜利前进。

近几年来，日本人民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鼓舞之下，持续不断地掀起了气势磅礴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英勇斗争。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英勇地站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为亚洲和世界和平作了巨大的贡献。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的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日本共产党一向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一向为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努力。日本共产党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党、两国人民在共同斗争中一贯相互支持和相互鼓舞。日本共产党在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和团结的事业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共产党和日本人民可以深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这一边，支持你们的伟大的正义的斗争。

我们坚决相信，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和鼓舞之下，日本各阶层人民将会更加坚强、更加广泛地团结起来，日本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将会更加扩大、更加发展。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取得新的伟大的胜利。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繁荣的日本一定要实现。

谨祝日本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成功！

光荣的、伟大的、英勇的日本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对胡乔木十六首词的批语、修改和书信[1]

（1964年11月23日、12月2日、30日）

一

请加斧削。如以为可，请予发表。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1964年10月25日（后改为12月5日）关于请发表几首词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加写的话。本篇二至十是毛泽东对胡乔木十六首词的批语和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有个别文字上的修改。本篇十一是毛泽东在胡乔木12月2日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十二、十三是毛泽东为发表胡乔木《词十六首》写的两封信。《词十六首》发表在1965年1月1日《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1965年1月号。

二

基本上还适用。[1]

三

万里风云会，只用一戎衣。[2]

四

长埋碧血。
初试锋芒。
西子羞污半面妆。
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3]

---

[1] 胡乔木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内杭州一首，借指文化革命。但国内至今庙坟尚如此之多，毒害群众，亦觉须加挞伐。令人高兴的是，杭州孤山一带成堆的坟墓，经过广大群众热烈讨论和领导的决定，已经在12月2日分别情况迁移和平毁，西湖风景区内各种反动的、封建的、迷信的、毫无保存价值的建筑和陈设，也正在有计划地清理和改造。词中的一些话现在对于杭州基本上已经不适用了。"毛泽东针对最后一句写了这个批语。

[2] 这是对《水调歌头·国庆夜记事》一词的修改，原文为"万里千斤担，不用一愁眉。"

[3] 这是对《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的修改，原文分别为"长埋血泪。""小试锋芒。""西子犹污半面妆。""天共我，舞吼风奇剑，扫汝生光！"

五

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敌了，且与事实不合，故不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庙，连一个也未动。[1]

六

情景异今宵，天风挟海潮。
英雄不识艰难字。
佳气盈天地。[2]

七

不必加注，读者不会误会。[3]

---

[1] 这个批语写在《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的旁边。

[2] 这是对《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一词其二的修改，原文分别为“风景异今宵，长歌意气豪。”“此生不晓艰难字。”“天地盈佳气。”本首词题目原为“中国原子弹爆炸”，毛泽东将它改为现题。

[3] 胡乔木在《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一词其四“霞旗扬四海，壮志惊千载：愿及雾偕亡，消为日月光！”句旁加注说：“这里的‘愿及雾偕亡’，是说我们主张，把我们的核武器和帝国主义的核武器一齐销毁。不能作别的解释。”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注。

八

魔倒凯歌高，长天风也号。[1]

九

星星火种东传，燎原此日光霄壤。
喜当年赤县，同袍成阵。
生机旺。
北辰俯仰。
八方风雨。
要同舟击楫，直须破浪，听风雷吼。
目醉琼楼，神驰玉宇。
忽火飞梁坠。
万年粪秽。
相煎如虏。[2]
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

---

[1] 这是对《菩萨蛮·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原子弹爆炸》一词其五的修改，原文为“魔尽凯歌休，濯缨万里流。”

[2] 这是毛泽东对《水龙吟》前四首的修改，原文分别为：“当年火种东传，何期此日光霄壤。”“喜绿阴千里，从前赤地。”“生机壮。”“北辰同仰。”“八方晴雨。”“但同舟击楫，直须破浪，听风雷吼。”“目醉千珠，魂惊九死。”“忽火飞梁墜。”“百年粪秽”“相煎如釜”。

旧侣。幸良师三径，长蛇封豕，作妖魔舞。[1]

相煎如虏。

十

膏牙爪。

动河山。

妖氛初扫。

乘摇空雪浪，漫天雹雨，指冰山倒！[2]

十一

这只是一点开始而已。[3]

---

[1] 这是毛泽东对《水龙吟》一词其五的修改，发表时这段又改为：“膏肓病重，新汤旧药，怎堪多煮？恨别弓惊，吞声树倒，相呼旧侣。看后车重蹈，愁城四望，尽红旗舞。”

[2] 这是对《水龙吟》一词其七的修改，原文分别为：“诛牙爪。”“动山河。”“妖氛直扫。”“乘摇空浪猛，前冲后涌，指冰山倒！”

[3] 胡乔木12月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沁园春》一词在此（指杭州）曾给林乎加和陈冰看过，后来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见同霍士廉、曹祥仁谈了，得到了他们的完全同意。省委已决定对西湖风景区进行改造。《浙江日报》已登了十几篇读者来信，要求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彻底整顿，把所谓苏小小墓等类毒害群众的东西加以清理。这是您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张，在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高潮中总算有希望实现了，所以在此顺便报告。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写了这个批语。

十二

送《人民日报》吴冷西[1]同志：

请在新年（一月一日）发表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

这封短信，不可刊出。

十三

送《人民文学》刘白羽[2]同志：

此件已送《人民日报》于一月一日发表，你们可以转载。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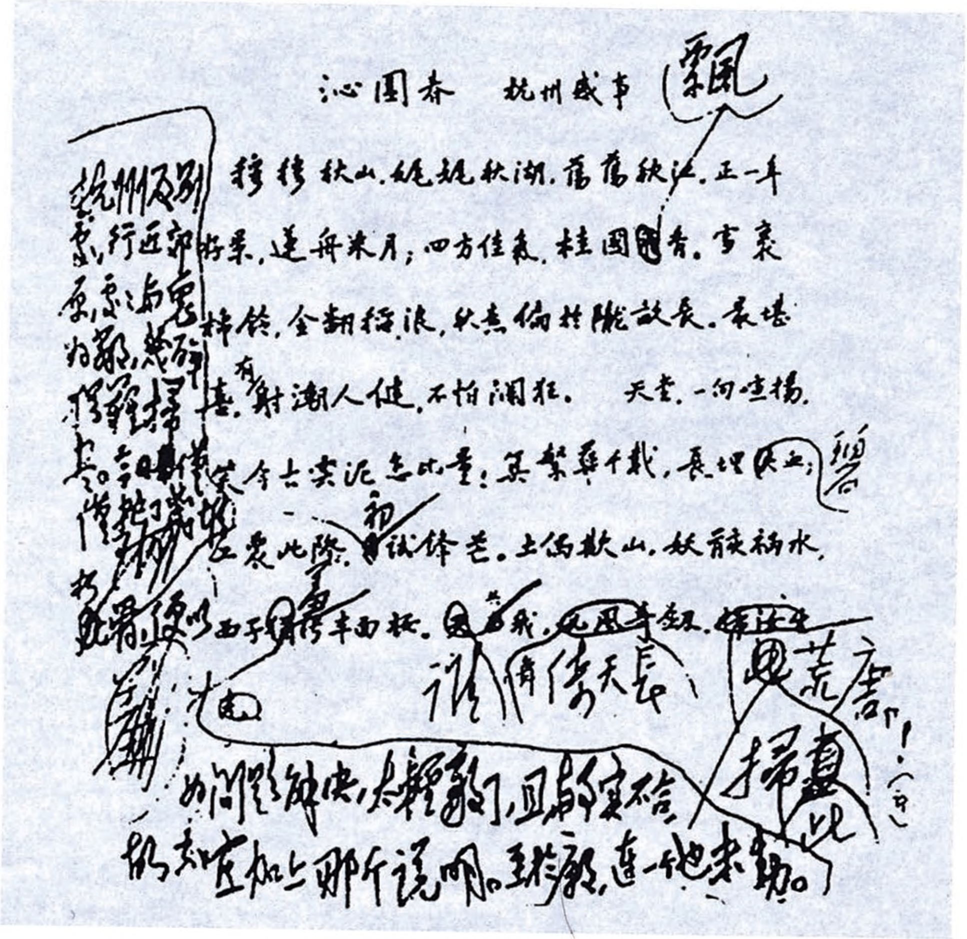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卅日

这封短信，不要刊出。

---

[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刘白羽，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沁园春　杭州感事

穆穆秋山，娓娓秋湖，荡荡秋江。正一年好景，莲舟采月；四方佳气，桂国飘香。雪裹棉铃，金翻稻浪，秋色偏于陇亩长。最堪喜，有射潮人健，不怕澜狂。

天堂一向宣扬，笑今古云泥怎比量！算繁华千载，长埋碧血；工农此际，初试锋芒。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

杭州及别处，行近郊原，处处与鬼为邻，几百年犹难扫尽。今日仅仅挖了几堆朽骨，便以为问题解决，太轻易了，且与事实不合，故宜加上那个说明。至于鬼，连一个也未动。

毛泽东亲笔修改和批注的胡乔木的《沁园春·杭州感事》的手稿。

对林彪关于军训工作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4年11月26日）

刘、周、邓、彭[2]阅后，退林彪同志。

此件[3]已阅，很好。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4年11月22日印发的全军军训工作会议文件之十七上，这个文件题为《林总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指林彪1964年11月21日在听取军训工作情况汇报时的讲话。讲话说，这几年军事训练工作有成绩。已有的成绩要巩固住，不能减弱，不能退下来。对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对普及工作的指示很重要，一定要把它搞好。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训练都重要，都要搞，不要谁把谁挤掉，两方面都要照顾到。各军种、兵种都要搞天天练，各有重点，各有过硬的本领。特等射手应该多打几发子弹，培养尖子不要一般要求。每个连要有十个左右的特等射手，每班一个，战时他的任务是打特殊目标，打敌人的指挥员、观察员等，一打就要打准。特等射手不宜多，应在优等射手中选拔。军事训练的基本方针、原则，军委已经定了，这些是不变的，就是要搞近战、夜战，困难复杂条件训练，练过硬本领，抓基础等等。

在反映香港观众赞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材料[1]上的批语

（1964年11月26日）

一

送刘、周、邓、彭[2]阅。

---

[1] 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1964年10月31日至11月9日首次到广东省宝安县深圳公演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受到来自香港的7000多观众的热烈赞扬。此次香港观众热烈要求到深圳看戏是前所未有的，有些人头一天下午5时起排队，露宿一夜等待买票。香港工人组织要求包一场《红色娘子军》让工人观看，有些工人宁愿少领一天的工资，甚至可能被开除，也要来看戏。更出人意料的是，香港观众对《红色娘子军》的赞赏远远超过《天鹅湖》，不论观众之间的交谈或是座谈会上的发言，大家对芭蕾舞剧进行的改革都一致加以肯定，认为它不但继承了古典的传统技巧，而且丰富了芭蕾舞的内容、技巧和表演方法。《红色娘子军》原定演出四场，后在观众的强烈要求下，增演了两场，每场演出，观众的热烈的情绪和场面在内地也是少有的。《天鹅湖》则比原定演出三场减少了一场。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二

人们要革命。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

对王任重关于县区社机关“四清”具体作法的意见[1]的批语

（1964年11月26日）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4年11月15日在该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就县、区、社各级机关“四清”的具体作法讲的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是：一、坚持派工作队。县、区、社三级都要派强而有力的工作队去搞。二、扎根串连。先从科员、办事员、勤杂人员和一些新提起来的副科长中精选占10%左右的积极分子，以后随着斗争的发展，再串连一两批，最后达到20%~30%。三、三结合。把发动群众、领导干部洗手洗澡放包袱和查账调查三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四、方法要机动灵活。既要背靠背地揭发，又要面对面地批评、斗争，特别要注意多做个别工作，多开小型会议。此外，还可以出壁报、大字报，办实物展览。五、开好贫下中农代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要以贫下中农为主，叫干部列席参加，交代问题，接受批评，以便把群众有权监督干部、干部有义务接受群众监督的制度和风气在运动中树立起来。同时，通过这些代表会，逐步把县、区、社三级的贫下中农协会建立起来。六、在运动过程中，各级党政机关都要重新建立健全领导核心，领导干部要大调整。新的领导核心大体上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原来的好干部和比较好的干部，一种是新提拔起来的干部，一种是调进来的干部。通过这次运动，要从干事、科员当中提拔一批真正优秀的年轻有为的干部，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要下这样的决心，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不管好坏，一律重新改组。区、社干部一律要回避本区、本社，到别的地方去工作。

一

刘、周、邓、彭、富春、一波[1]阅。

二

我看这个意见好。如果你们已经看过这个材料，也可以再看一遍。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对《两个老贫农的谈话纪要》的批语[1]

（1964年11月26日）

刘、周、邓、彭[2]阅后〔退〕毛。

这两个贫农同志是我们全党的老师。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64年11月21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八十七期上。这一期登载了广东省中山县一个大队的贫农吴才添、陈二妹夫妇同年9月26日至10月15日同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多次谈话的记录。吴才添夫妇是土改时候的老根子，土改以后一直受干部的排斥打击，现在生活非常贫困。他们的谈话反映了当地农村的许多情况，揭发了本队干部以至公社干部中存在的许多严重的“四不清”问题，对工作队如何发动和依靠贫下中农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一些政策性的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

（1964年11月26日）

一

打仗没有目标，部队拥上去了，打什么？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盲目地上，盲目地下，战略思想不明确，没有敌情观念嘛！[2]

二

要研究斯大林的经验。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厂，三不准备打游击战，只是仓促撤退。要研究蒋介石的经验，他没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国生活的，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才保住重庆。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沙——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听取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2] 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汇报到1958年至1961年西南地区一些建设项目“上马”“下马”都有点盲目性，没有明确的战略布局思想时，毛泽东讲了这一段话。

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当时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三

我研究土地革命，搞了十年，那是一九二七年前后几年的事。开始那个很不像样的纲领，到现在还保存着。取得打仗的经验，也花了十年的工夫。你看打仗，开始不就是几句话嘛！叫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后又发展了，什么“诱敌深入”，慢慢地就有了经验。现在取得经验，不需要那么长时间了。

内战期间，我们犯了错误，丢了南方，都跑到北方。不丢掉南方，我们就到不了北方，就不能建立那么多根据地。北方人口多，幅员广，大平原，不犯错误就不能来。看来犯错误也是有好处的，一犯错误就到了北方。陈独秀那个错误是不能不犯的，不犯错误，蒋介石不杀人，谁上山？我就不上山。一犯错误，蒋介石一抓人，大家就上山了。

对陈家康关于支持刚果（利）斗争的几点建议的批语[1]

（1964年11月27日）

即送刘、周、彭、邓[2]：

应照陈家康的意见办理，应迅速开五六十万人的大会[3]，在天安门开，我也准备出席，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收电》外收（64）戌942号上。这一期《外交部收电》刊载的是中国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陈家康1964年11月26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说，由于美帝国主义与比利时反动政府勾结，伙同冲伯集团军队于24日进占斯坦利维尔，使刚果（利）局势再度紧张，非洲国家和人民对美、比干涉极为愤怒。今晚10时广播的我国政府声明，已表示愿同非洲国家一起支持刚果人民的斗争。为此，我们建议：一、迅速采取行动，同非洲友好国家加强接触。二、对苏米亚洛要求军援事似可给以肯定答复。三、为壮大声势，似可考虑在北京举行声援刚果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群众大会。刚果（利），即今扎伊尔。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这个大会于11月29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参加的有首都各界70多万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关于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

（1964年11月28日）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刚果（利奥波德维尔）[1]，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美国一直企图控制刚果。它利用联合国军在刚果做尽了坏事。它谋杀了刚果的民族英雄卢蒙巴，颠覆了刚果的合法政府。它把傀儡冲伯强加在刚果人民头上，并且派遣雇佣军镇压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它又同比利时、英国结成一伙，对刚果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美帝国主义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控制刚果，而且要把整个非洲，特别是新独立的非洲国家，重新投入美国新殖民主义的罗网。美国的侵略，遭到了刚果人民的英勇抵抗，激起了非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义愤。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它侵略南越，干涉老挝，威胁柬埔寨，叫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它力图扼杀古巴革命。它要使西德和日本成为美国的两个重要核基地。它伙同英国一道制造所谓马来西亚，威胁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国。它占领南朝鲜和中国的台湾省。它控制整个拉丁美洲。它到处横行霸道。美帝国主

---

[1] 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即今扎伊尔。

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

刚果人民的正义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中国人民支持你们。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支持你们。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人民的斗争证明了这一点。越南人民的斗争正在证明这一点。刚果人民的斗争也必将证明这一点。加强民族团结，坚持长期斗争，刚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必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1964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支持刚果（利）人民斗争的大会上。

1964年，毛泽东在支持非洲人民反帝斗争的群众大会上。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1]

（1964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年前，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战胜了纳粹法西斯侵略者，取得了祖国的彻底解放，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上揭开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二十年来，英勇不屈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钢铁般地团结在以恩维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共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人民会议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以及阿尔巴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的电报。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

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周围，披荆斩棘，奋发图强，经历了各种严峻的考验，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热烈祝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并且预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为实现宏伟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继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努力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红旗，坚决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对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对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正在不断加强和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正在日益增进。这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助于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和力量的加强。我们深信，中阿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在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

必将获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永恒的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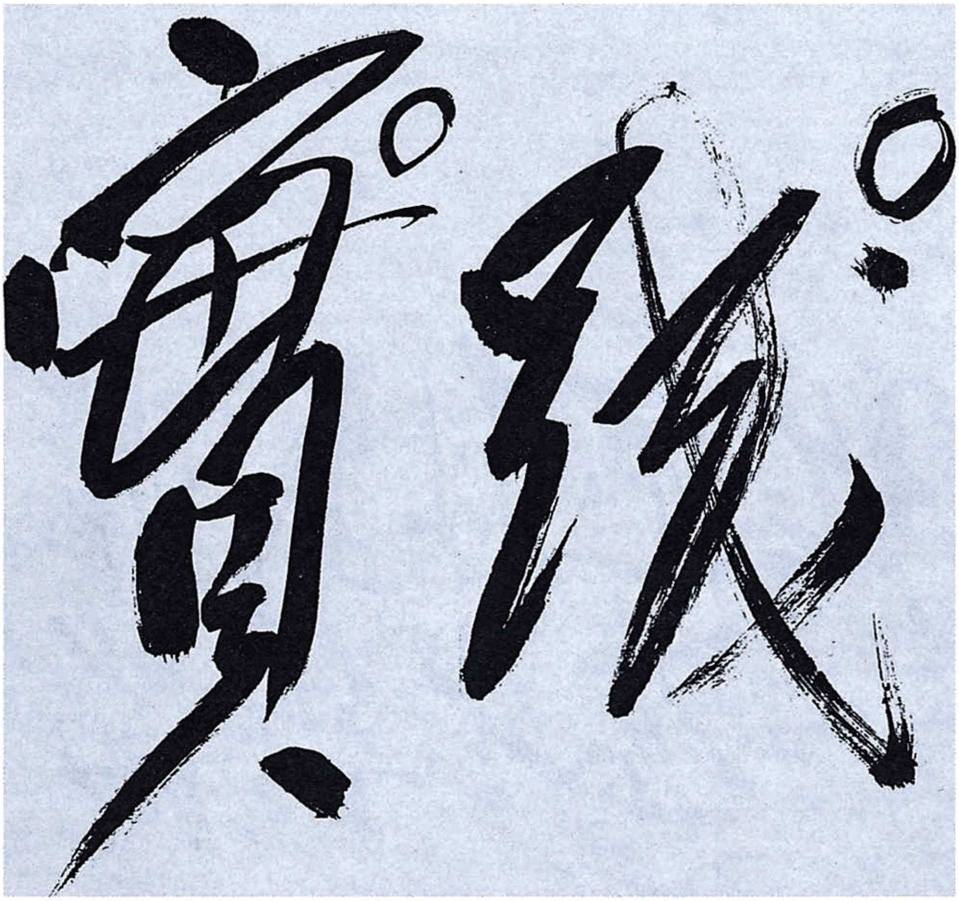
为《实践》杂志题名[1]

（1964年11月29日）

实践

---

[1] 《实践》杂志，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主办，1959年创刊之初，封面刊名采用了毛泽东文稿中用铅笔书写的“实践”二字。1964年11月29日毛泽东为《实践》杂志题写刊名。在题写的刊名右边写着：“送内蒙古党委同志们。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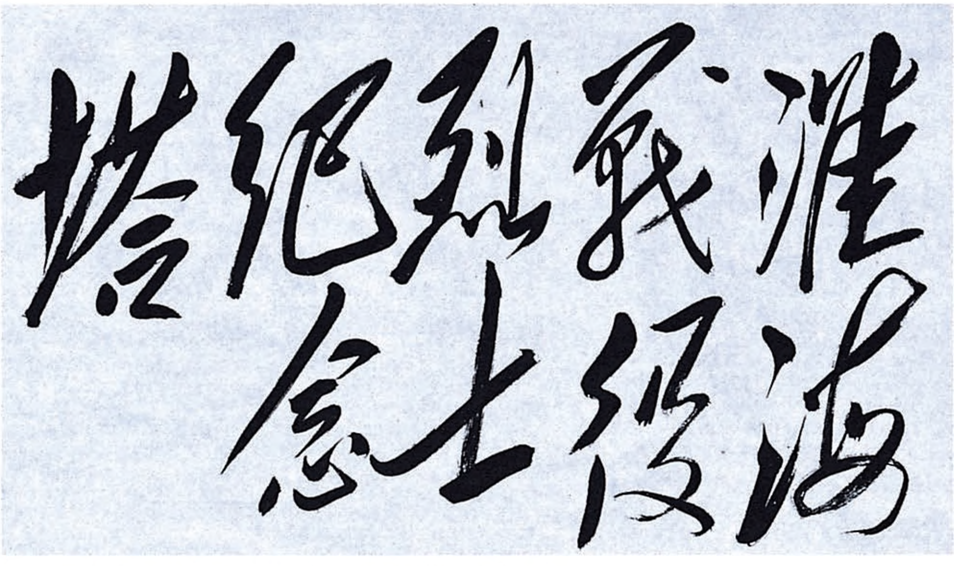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实践》杂志题写的刊名。

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名[1]

（1964年11月）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毛泽东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写的塔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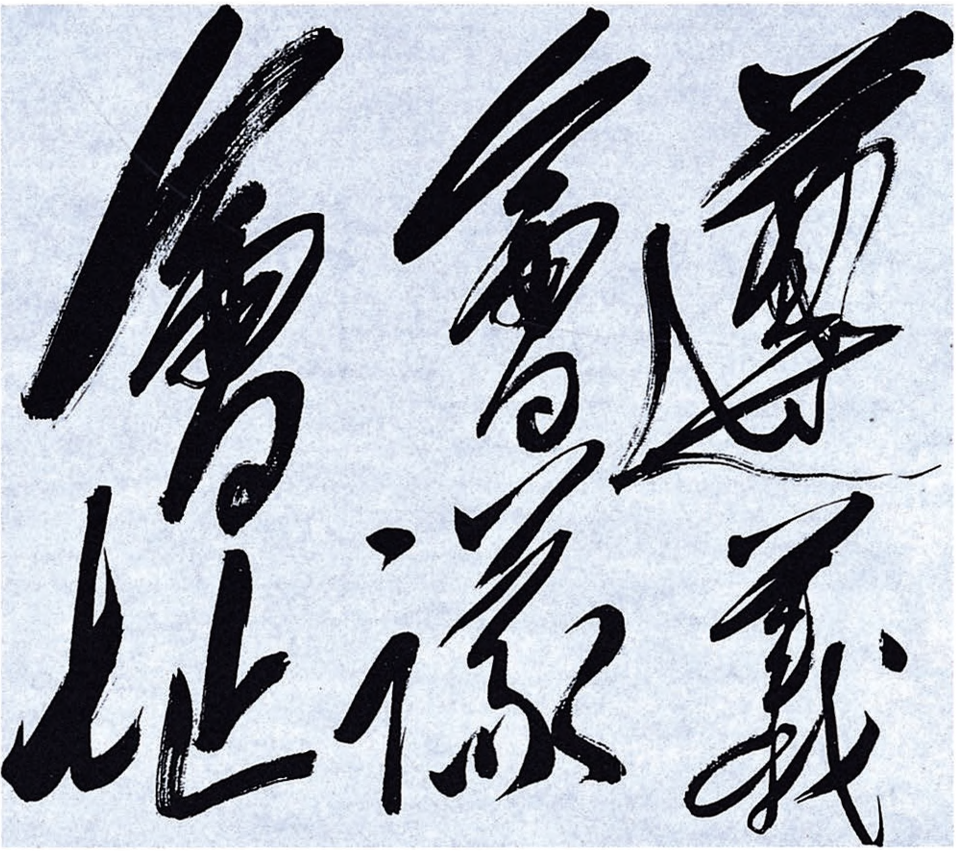
---

[1]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1959年4月4日由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省徐州市兴建，1960年4月5日奠基，1965年10月1日建成开放。1964年11月，毛泽东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题字：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

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名

（1964年11月）

遵义会议会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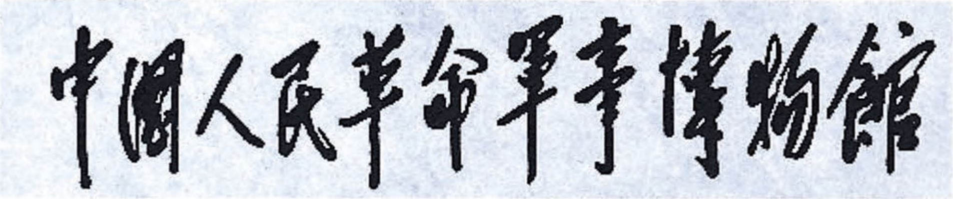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遵义会议会址题写的名字。

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题名[1]

（1964年11月）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题写的馆名。

---

[1]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于1958年，是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1959年3月12日，经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批准，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0月1日开始内部预展，1960年“八一”建军节正式对外开放。毛泽东亲自题写馆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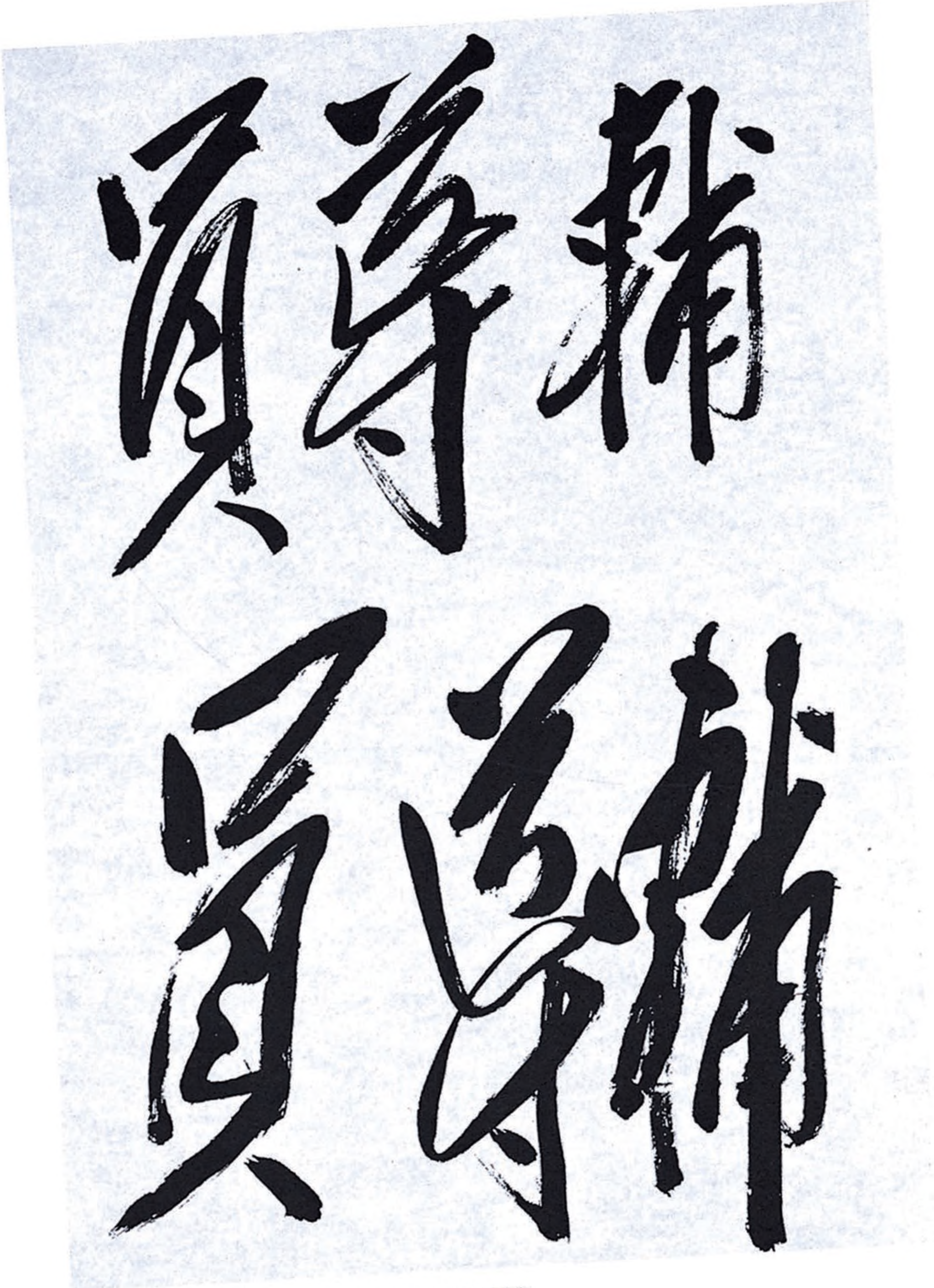
为《辅导员》杂志题名[1]

（1964年11月）

辅导员

---

[1] 《辅导员》杂志于1954年7月12日创刊，是共青团中央主办、主管，指导全国少先队工作的机关刊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刊，由毛泽东题写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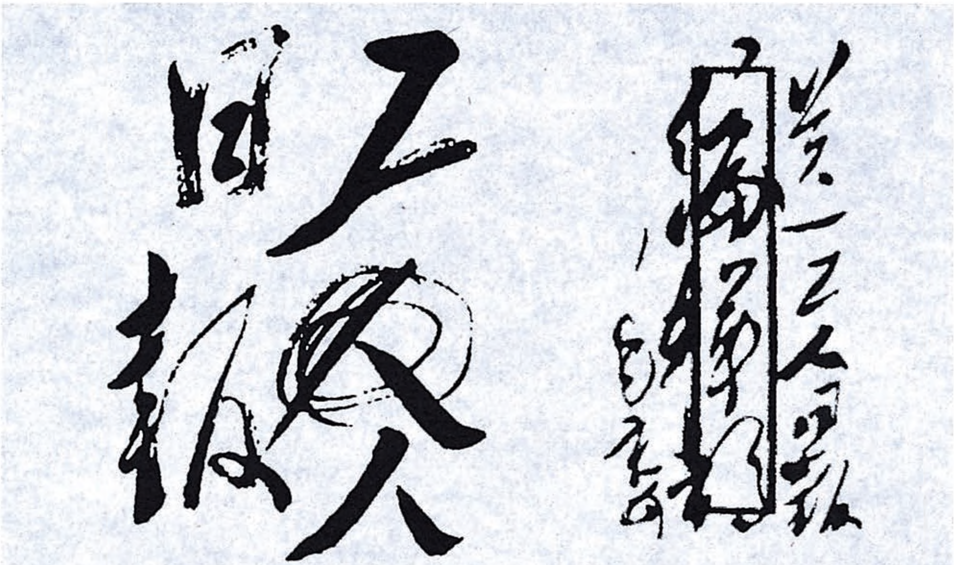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辅导员》杂志题写的刊名。

为《工人日报》题写报头

（1964年11月）

工人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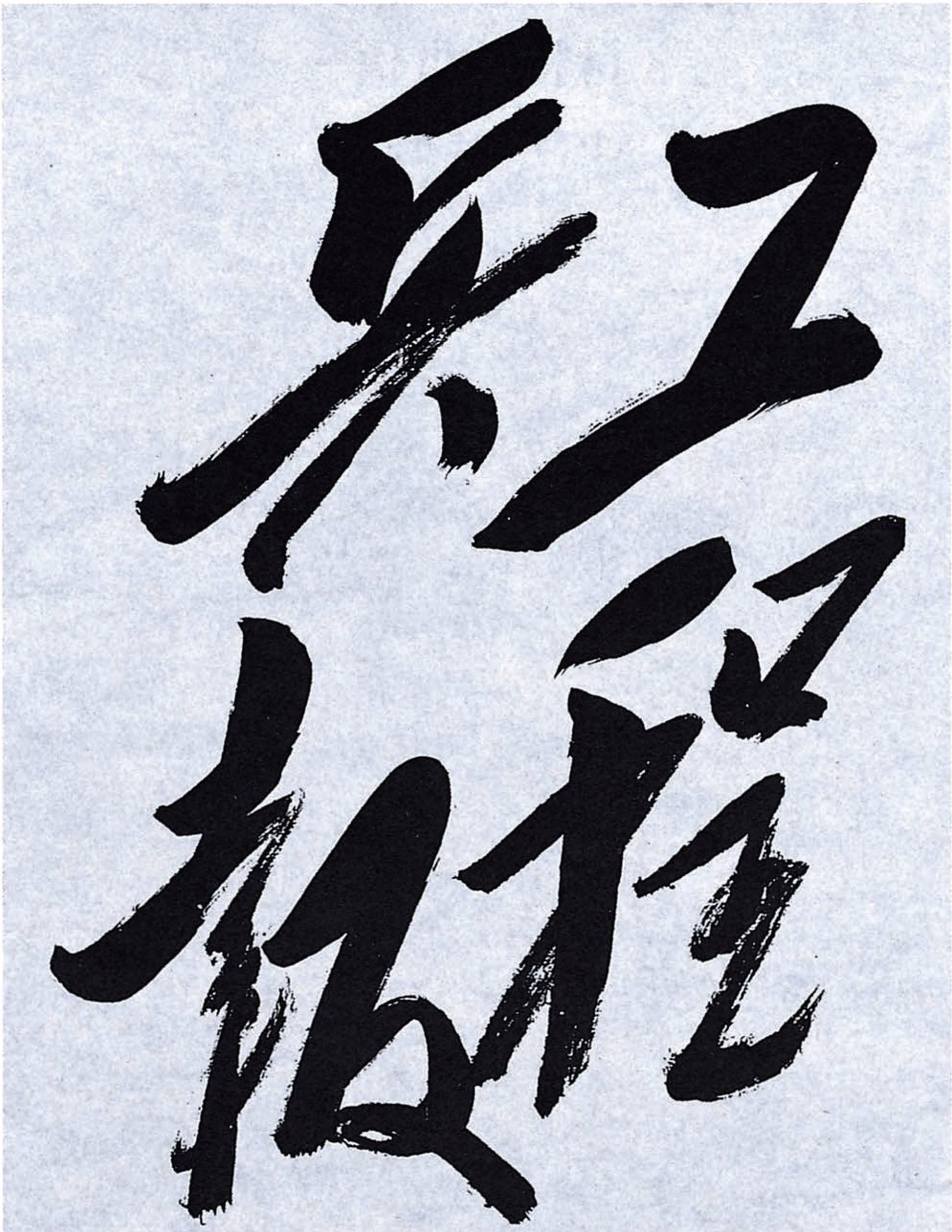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工人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工程兵报》题写报头

（1964年12月1日）

工程兵报



毛泽东为《工程兵报》题写的报头。

对离职休养老干部安置情况材料的批语[1]

（1964年12月2日）

一

刘、周、邓、彭、贺[2]阅，退毛。

二

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1964年11月25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第六十五期刊载的《离职休养老干部安置的情况和问题》材料上。材料说，自总政治部1962年12月下发《关于妥善安置年大体弱老干部的通知》以来，各级党委对部分年大体弱老干部离职休养的审批、安置工作抓得较紧。这项工作当前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离职休养干部中有不少思想问题尚未很好解决。二、离职休养干部的住房，多数没有落实。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对谢富治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1]的批语

（1964年12月5日）

一

一波[2]同志：

---

[1] 指中共辽宁省委沈阳冶炼厂工作队1964年11月12日报送的《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的简报。这个简报是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率领工作队在沈阳冶炼厂蹲点的报告。报告中说，冶炼厂职工在两个半月的“五反”运动中，初步揭发的严重问题是：一、打击报复和把头作风；二、领导干部特殊化；三、不讲阶级路线，任用坏人；四、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群众对第四个问题意见最大。他们揭发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有八种表现：（一）弄虚作假，欺骗国家；（二）损公利厂，不顾整体；（三）损人利己，剥削友邻；（四）贱买贵卖，唯利是图；（五）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六）奖金挂帅，物质刺激；（七）科学实验，为名为利；（八）胡花滥用，浪费惊人。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有三个危害：（一）阻碍技术革新，阻碍生产发展；（二）腐蚀干部队伍，腐蚀工人阶级；（三）破坏团结，破坏协作。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是：（一）苏联旧企业框框和修正主义的影响。（二）资本主义（包括封建主义）旧势力的影响。（三）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毛泽东在这句话后面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2]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此件是否可以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领导同志看看，请酌定。[1]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二

送朱、贺、罗、陈毅、定一、康生、冷西[2]阅后，退一波。

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而要这样做，必须派政治上很强的工作队分期分批去做。谢富治同志这个报告很可一看。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

[1] 中共中央1964年12月7日以中发〔64〕775号文件将谢富治的蹲点报告和毛泽东关于这个报告的批语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委、党组。

[2] 朱，指朱德。贺，指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对陶铸的信[1]和蹲点报告[2]的批语和批注

（1964年12月10日）

一

少奇同志：

可以印发。

毛泽东

十二月十日

又，在报告第6〈5〉页上，我批注了几句话[3]，请你看看。

二

此两句有语病。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是各级干部除少数人以外，在这次下去蹲点以前，根本没有下去认真蹲过点，没有作出过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他们有些人不出办公室，谈不到视听见闻。有些人下去了，甚至蹲点了，却是蹲在基层干部、富裕中

农、富农地主那里。这些人是有视听见闻的，可是只视听见闻了剥削阶级一方面；而对被剥〔削〕阶级一方面，即广大的贫下中农；则根本没有什么视听见闻。——毛注

---

[1]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64年11月6日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真正做到搞深搞透的意见给刘少奇的信。信中说，一、要使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取得彻底的胜利，并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不组织一支坚强的阶级队伍，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可能的。二、这次社教运动中，生产队要彻底搞好，这是我们农村社会主义阵地的基石，但同时必须把大队与公社两级彻底搞好。只有这样，生产队这个基石打好之后，才能巩固下来。为此，社教运动应当以公社、大队为重点，全面彻底地调整这两级干部，特别是这两级的领导核心。为保证新的领导核心不再变坏，要建立农村的政治工作系统，使它有充分的权力，保证能监督公社、大队两级的领导干部，能领导农村党的工作和贫协的工作，真正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三、今后省委常委每年用一至两个月时间，地级主要领导干部用两至三个月时间，轮流到各个县蹲点，深入到生产队，住在真正的贫下中农家里，专门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农村真实的情况和干部情况。县级主要领导干部则要每年拿出四个月时间到下面去蹲点。四、鉴于农村已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除彻底搞好社教运动从根本上防止这种新的两极分化外，还必须从经济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帮助生活确实困难的贫下中农，使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并能同大家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2] 指陶铸1964年12月1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到花县一个主产队蹲点近两个半月，了解到这几年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在的生产队已经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出现了以七户干部为代表的新的富裕农民阶层，他们同一户上中农、一户富农、四户地主联合起来对贫下中农进行严重的剥削。这种新的两极分化，新的富裕阶层，新的剥削决非花县所独有，而在广东省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遏止和杜绝农村的“和平演变”，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不能取得彻底胜利的。

[3] 见本篇二。毛泽东的批注，写在陶铸报告中以下一段话的后面：“我们过去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形势与新特点，盲然无知，特别是近几年存在着‘宁右勿左’‘怕左不怕右’的右倾思想，障碍了我们的眼睛，闭塞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对阶级斗争中出现的这样严重的情况，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对国家计委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报告[1]的批语[2]

（1964 年 12 月 12 日、13 日）

一

富春[3]同志：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又，十五年计划，此文内未见提及。

二

已阅。退彭真[4]同志。

这个程序问题写得还好。缺点是粗枝大叶，只见几根骨头，没有皮毛血肉。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

[1] 指国家计划委员会1964年12月7日提出的《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编制长期计划包括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设想。前者要具体些，但仍是纲领式的；后者主要是战略布局和总的奋斗目标（包括工农业生产的主要指标和四个现代化可能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准备在今冬明春广泛征求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门的意见。明年一二月份先搞一些反映专题研究的长期计划简报，向中央报，以能及时得到指示。明年三四月份拟定计划纲要，五六月份提交中央讨论。简报的题目，现在想到的主要有：（一）财政收入、支出的分配和基本建设的规模问题；（二）基本建设投资的分配问题；（三）三线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四）一、二线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区的后方建设问题；（五）现有企业（主要是一线地区的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综合利用和迁厂问题；（六）技术革命和各行业的技术政策问题；（七）发展农业问题；（八）轻工业和市场问题；（九）国防工业的建设和各方面协作以及和战结合问题；（十）冶金工业的建设问题；（十一）煤、电、油和建筑材料的规划问题；（十二）铁路、公路、航运、邮电的建设问题；（十三）机械工业的规划；（十四）外贸和援外问题；（十五）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试行和推广，包括劳动、工资、奖励制度的改革，劳动力的规划，教育事业的规划；（十六）国家储备问题；（十七）财政体制和计划体制。以上这些题目是简报的主要内容，也是编制长期计划要进一步研究、落实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体现毛主席的思想，体现战略布局、农轻重的方针、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自力更生和勤俭建国的方针以及技

术革命等。这些问题摆好了，就可以体现总路线，做到多快好省，也可以看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进度了。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李富春1964年12月7日为报送《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彭真送阅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3]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4]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陈正人[1]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2]

（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

一

送少奇、薄一波同志酌处。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二日

---

[1] 陈正人，当时任农业机械部（1965年1月改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2]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在薄一波同年12月10日为送阅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的来信和报告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1965年1月15日在薄一波这封信上再次写的批语。薄一波在信中说，陈正人的信和报告都写得很好，很有内容，提出了问题，拟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各党组一阅，可否，请指示。本篇三、四、五是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的信中写的批注。本篇六是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搞社教一个多月情况报告中写的批注。毛泽东的四个批注和1965年1月15日的批语及陈正人给薄一波信的摘要，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将它们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同志。

二

退薄一波同志：

此件[1]太长，似可不发。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三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2]。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

---

[1] 指陈正人1964年11月25日关于农业机械部驻洛阳第一拖拉机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一个多月来的工作情况给河南省委、国家经委、中央工交政治部、农机部党组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2] 指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给薄一波信中说的以下一段话：“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不断斗争的过程。而克服我们企业管理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是促进上述过程的前提条件。”

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注

四

为什么不可以劳动四个到五个下午呢？剩下还有两个整天和四个到五个上午做别的事。——毛注[1]

五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注[2]

---

[1]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信中以下一段话之后：“这一次在这里，‘三同’实行得更认真一些。同吃，在厂职工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同劳动，固定岗位在总装工部第四小组，每星期劳动两个下午，并准备拜这个组的组长为师傅，学习装配修理拖拉机。”

[2] 这个批注写在陈正人信中以下一段话之后：“目前我所注意的问题，主要放在社教运动方面。有关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准备放到后一步来研究。因此，这次送上的报告，只讲到运动有关的一些情况。这封信，我也只说到到厂后若干感想。如有新情况和新问题，再给你写信报告。（只有把社教搞彻底了，才能搞好管理。这样抓是对的。——薄一波注）”

六

这些人[1]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

[1] 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4年12月13日）

一

伯达[2]阅后，送总理[3]。有了几处修改[4]，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二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1964年12月11日为送审向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第四稿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至七是毛泽东对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政府工作报告的详细摘要在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总理，指周恩来。

[4] 即本篇二至七。

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三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

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四

后来居上，理所当然。我国具有很多优越条件，我们应当更有信心用比较不太长的时间，赶上和超过科学技术先进国家的水平。简单地说，我们必须用几十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资产阶级用几百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水平。

五

也有不少同志不蹲点，不调查，不研究，有事不同群众商量，高高在上，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数，满足于发号施令；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像这样的“同志”，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也没有，就不可能做到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就不可能实行民主集中制。这些“同志”应当立即改变作风，鼓起革命精神，“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调查研究，认识问题，承认自己的错误，从广大群众那里听取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同群众一道解决那里的问题，总结那里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个别指导，从而也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一般号召，使生产建设的群众运动能够开展得更好。不这样做，最后总是被群众抛掉的。

六

我们从来相信，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是要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可以勉强跟着走的，是坚决拥护或者是可以勉强地拥护我们党所制定的符合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路线和政策的。

七

这个协会，是贫农下中农在共产党领导下自愿组成的革命的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它监督和协助必要时是领导甚至代替人民公社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进行工作，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生产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贫下中农人数和在生产中的劳动力数，在农村中总人口数和总劳动力数当中，占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他们是大多数。而且贫协一经组织，富裕中农和其他一些愿意上进的人，就急忙靠拢，就把这些对社会主义经常处于动摇状态的人们也团结起来了。

对张平化汇报蹲点情况的信的批语

（1964年12月14日）

少奇同志：

此信[1]很好，似可印发，请你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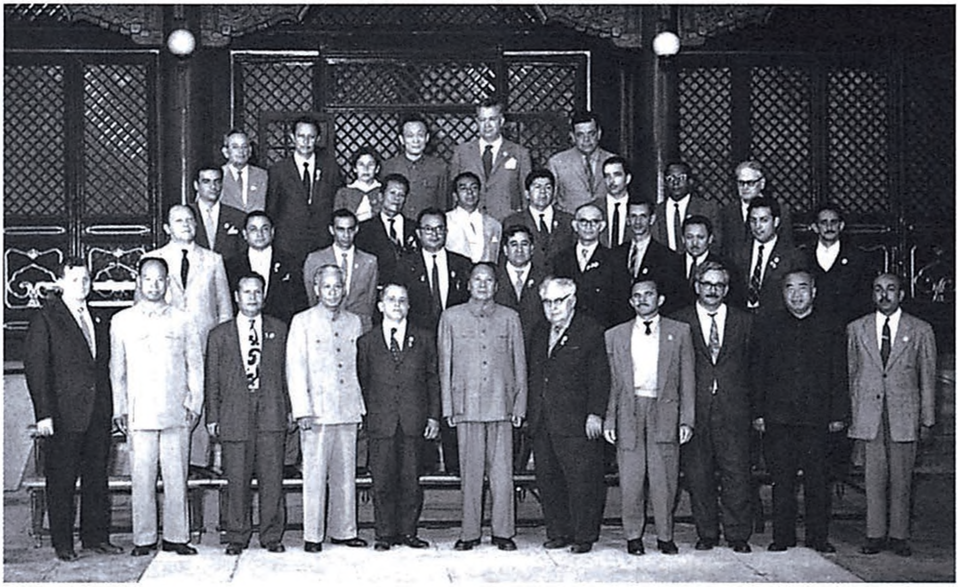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

[1] 指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1964年12月6日汇报在湘潭县良湖公社良湖大队蹲点情况给刘少奇的信。随信还附有张平化在省委全会上作的“良湖大队社教运动的三个月”的报告和印发省委全会的良湖大队三个材料。张平化在信中说，这次蹲点比过去的任何一次“蹲点”，对我的教育都要深一些。首先证明了我过去根本不了解基层的情况，这次蹲点才看到了基层情况的严重。良湖大队和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其他69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要多于1/3。你给江渭清的信，对我也基本适用，关键在于不了解情况，又自以为了解，而且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保证高标准。但运动中证明工作队的质量太差，领导骨干太少。我们决定：在已经展开的300个公社、4000个大队的范围，再集中骨干力量分批打歼灭战，以工作分团为单位，先搞好一个公社，然后分批搞好其他公社；或者以一个公社的工作队为单位，先搞好一、二个大队，然后分批搞好其他大队。估计我省完成第一期的时间，半年不够，可能要一年。以一个县为单位，把各级各行各业都搞好，像湘潭这样的大县，可能要两年时间。我们有个想法：宁愿时间长一些，决不降低标准去赶进度。搞好一社是一社，搞好一县是一县。

1964年12月14日，毛泽东和来访的拉丁美洲九国代表就国际共运问题进行会谈。



1964年12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拉美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合影。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

（1964年12月15日）

（有些地方提出，出现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叫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农民不容易懂，还是叫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好，农民懂得。

（加强社教工作队的领导问题。战线是不是要缩短些？）

要短容易，收缩嘛！

（关于农村整党、建党问题）

我早就赞成。……

（要发展一批党员）

还是从贫下中农、工人积极分子中去发展党员。

（下边借反资本主义来反对贫下中农。）

让他搞嘛！你不让他搞，他憋不住。要反群众，他就暴露出来了。

（机关干部家属中有不少四类分子，要清理。这是个普遍的问题。）

反革命、恶霸、四类分子，就那么多嘛！几千万，几百万，分散各地，总是少数。只有那么多，有是有，清是要清，多是不多。

（领导干部蹲点，还是蹲在大队的好。）

抓中间，吃两头。

（这次社教运动中，有些地方还查出不少黑地。）

我看瞒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就算好的。

（我看查出来，过三五年再征购。）

粮食五年到十年不征购，以后增产再增购一些。粮食还是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否则，阻止人家报黑地。

（要把干部不脱离生产的制度固定下来。）

反官僚主义，要跟班生产。

（科室人员有半天的工作时间也就够了。）

还要注意文牍主义。

能够四、五小时劳动，厂长、党委书记事就少了，开会、文件也会少了，工作就能做好了。

（会议结束时）我们的会议，每天下午三点半开大会，大家可以在大会上发言。上午开小会。你们如果秘密谈，出简报我也不看。你们要畅所欲言，冲口而出。讲的不对，有什么要紧？大家可以原谅嘛！

1964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对高扬文的蹲点报告的批语

（1964年12月19日）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斗争的经验证明，要办好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抓好阶级斗争。不把领导权紧紧地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手里，不振起广大职工群众的革命精神，生产斗争、科学试验，都不可能搞好。抓阶级斗争要克服各种右倾思想，不怕伤害与那些“四不清”干部的和气，不怕触及上级领导，不怕妨碍生产。要有革命的决心，要抓住不放，要一直抓到底，做彻底的革命派。白银有色金属公司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只要阶级斗争搞得好，搞深、搞透，不但不会妨碍生产，而且必然促进生产斗争、科学试验的大发展。

随着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发展，必然要引起企业管理上一系列的革命。一些旧的口号、旧的指标已经过时了，要用新的口号、新的指标来代替，现行的管理制度（如工资制度、劳动组织、管理机构等等），凡不适应新的情况的，都要作适当的改革。

对中央转发高扬文的蹲点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

（1964年12月19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高扬文1964年12月8日关于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阶级斗争带动生产斗争给国家经委并报中央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高扬文报告末尾写的批注。报告说，在阶级斗争胜利形势带动下，白银公司今年生产斗争的三大任务：生产铜二万吨（国家计划一万六千吨）；精减三千人；上缴利润六千万元（国家计划五千三百万元），已经在12月5日完成。他们把两个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作法和经验是：一、阶级斗争是核心，首先必须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二、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斗争。三、在生产斗争中也要敢于革命，彻底革命。四、以不断革命精神，组织生产高潮。五、经常用阶级斗争胜利的实例，向广大职工进行活的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六、充分发挥老工人的作用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七、在革命运动中，培养三八作风，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同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党委，各大、中型企业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把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结合起来的七项作法和经验，对于所有的工业、交通、商业企业，基本上都是适用的，请你们参照办理。”

二

要把原本上薄一波同志那些批注[1]印上去。我在原本末尾也批了几句话[2]。

毛泽东
十二月十九日

---

[1]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64年12月12日在高扬文报告上写了五条批注：一、在报告讲到白银公司今年生产斗争的三大任务已经于12月5日完成之后，批注："去年三月工作队进厂时，他们计划年产量是五千吨。进行阶级斗争后，今年达到二万吨。"二、在报告讲到"今年八月份我们提出劳动组织革命，生产工人精简三分之一的口号时，许多同志还认为是瞎吹，但经过九月份露天矿、冶炼厂试点之后，全公司很快形成高潮，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个任务"之后，批注："工人阶级获得阶级斗争的胜利后，随之而来的工厂要进行一系列的管理上的革命：劳动组织、工资改革、产品设计、技术革新……等等。"三、在报告讲到"去年和今年后半年，我们都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力量，用于阶级斗争，结果阶级斗争的高潮带动起生产斗争高潮；精神变物质，阶级斗争胜利成果变成生产斗争胜利成果"之后，批注："只有把阶级斗争的仗打好，才能打好生产斗争的仗。对头了。"四、在报告讲到"在斗争胜利发展过程中，我们的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开始提出的口号或指标，过不了几天，就变成不起鼓舞群众作用的落后的口号和指标了"之后，批注："群众发动起来后，形势逼人！"五、在报告讲到"过去，技术人员也不被重视，从来也没有人向他们进行教育"之后，批注："技术人员中的阶级教育是很重要的。"

[2] 即本篇二。

二

这个报告写得清简节约，又具体生动，又概括，是一个好报告。有些报告写得太长，结果无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丢下了。

——毛注

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讲话

（1964年12月2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总理报告，你们连“赶上”都不敢提，我给你们加了个“赶上而且超过”。加了一段“孙中山一九〇五年就说可以超过”。这样讲了可以不登报。近代史也得看看。《孙中山全集》没有包括汪精卫、胡汉民、章太炎他们的文章。你得看《新民丛报》，你得看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特别要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骨头很少，水分很多。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他是个讲演家、煽动家，讲得慷慨激昂，博得给他鼓掌。我听过他的讲演，也跟他谈过话。他是不准人驳的，提不得意见的。实际上他的话水很多，油很少，很不民主。我说，他可以做六十年前的好皇帝，没有民主。他一进场，全场都要站起来的，叫孙先生。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他给右派解释共产主义时，画了个太极图，里面画了个小圈，写上共产主义；外面又画了个圈，写上社会主义，最后外面又画了个大圈，写上民生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义里头。总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苏加诺讲“五基”也是把社会主义包括在他的“五基”里头。

毛：湖南有个缅云山，你认得吗？他开始说，孙文没有学问，叫孙大炮，不如黄克强有学问，黄先生好，因为黄是秀才，能写一手苏东坡的字。后来他一到广东，见了孙中山，回来后一下大变了，说：“可了不起，孙先生！”

余秋里做计委副主任不行吗？他只是一个猛将、闯将吗？石油部也有计划工作嘛！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

周：去冲破一潭死水。

毛：你赞成吗？我们现在有些人从来不作总结，只管小事，不管大事。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封来信（指第二版“正确的设计从哪里来?”这一栏里的四封信），是谷牧组织的吧?

□□（以下简称□）：不是，是胡绩伟他们。

毛：我全部读光了。按语谁写的?

□：按语是胡绩伟写的。

毛：不是谷牧写的？过去《人民日报》我从来不看的，学蒋介石办法，不看《中央日报》。

现在好了，《人民日报》上白菜是怎样长的之类的东西少了，有些议论了。让胡绩伟参考《中国青年》《解放军报》。它里面有不少思想性的东西。有些小孩子专看《人民日报》，我说，你们又不看《中国青年报》，不看《解放军报》。

（□□来了。）

毛：你开讲，你挂帅。你不讲，我们散会。

□：开了几天会，几个同志发了言，讲了不少问题。提出了问题，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大家蹲点了，是件大好事。讨论一下嘛！

毛：讨论一下有什么矛盾。

□：大家下去蹲点，认识一致了。

毛：时间短了。

□：还是初期，还是第一次，还没有看到发动群众的成熟经验。还看不到群众发动之后是什么样子，要看到群众发动之后才行。

毛：要省、县、社、大队、小队发动了群众，都成立了贫协，才行。

□：农村我知道些，对城市了解很少。农村材料我看得多一些，这几天我对城市工厂的材料努力看，也还是初期的经验。

毛：白银厂的经验是比较成熟的。

□：白银厂搞了两年，高扬文这次的报告，我也看了，看来还要深入。可以再写个总结性的东西。总之，大家蹲点还是第一次的初期的经验，所以很多问题还讲不出来，有了第二次、第三次的经验，就有头绪了，要有比较，你们懂得点农村以后，再作个比较，就会懂得的。现在看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了。有的单位要搞两年，具体做法不一样，等到将来再搞，你们就懂了。一个县可以搞两年，城市大厂恐怕也得两年。

毛：要两年呀！打长一点，搞三年也好，横直是要把问题彻底解决。也可能缩短。

□：湘潭、山东就是。陈正人提出洛阳拖拉机厂也要搞两年，不要赶时间。

毛：把问题解决。

□：熟练了，不用这么长的时间。有个问题，农村方面主要矛盾是什么？

□讲，农村已经形成富裕阶层、特殊阶层。他讲主要矛盾是广大贫下中农与富裕阶层、特殊阶层的矛盾。

□□□说，还是地富反坏、坏干部结合起来与群众的矛盾，是

吗？（□□：是。）

毛：地富是后台老板，台上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主要是这些坏干部顶在他们头上，他们穷得很，受不了。那些地富，已经搞过一次分土地，他们臭了。至于当权派，没有搞过，没有搞臭。他是当权派，上边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这是头一回。当权派后头有地富反坏，或者是混进来的四类分子。有些坏干部与地富关系不很密切。地富反坏混进组织，包括划漏的地富变成贫农、共产党员。那也是当权派，不属于过去的地富，地富臭了，这一部分就不同了。

毛：如□□□讲的湟中县，是马步芳的参谋长。

□：这在西北也是少数。

毛：在西北是少数，在全国也是少数。

□：怎么划要讨论一下，统一语言。怎么讲主要矛盾？

毛：还是讲当权派。他们要多记工分嘛！“五大领袖”嘛？你“五大领袖”不是当权派！

□：陶□提出这个问题，各方面有反映。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就有人不赞成，我就听到过。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多数情况是劳动人民出身。在立场、经济、思想、组织上“四不清”，他们同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有的被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富当了权的；还有已经摘了帽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当了权的。

毛：后两种哪种多？

□：还是漏划的多。

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

□：有些小队干部也坏了。

毛：小队干部多数不是党员，岂有此理。一个大队只有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党员，党员太少了。他死也不发展。他搞久了，搞出味道来了。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

不整党没有希望。

周：机关也是这样，你建工部刘秀峰，你统战部李维汉，你政协张执一，还不都是党员，非搬开不可。我们在民主人士中宣布了，他们很震动。

毛：共产党是有威信的。也不要提阶层，那人就太多了，吓倒了人，得罪的人多。就提党委！地委也是个党委，县委也是个党委，公社也是党委，大队党委会、支部委员会，无非左、中、右，我相信右的是少数，特别右的只占一部分，左的也是少数，中间派油水多，要争取，你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说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拉有打，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们多年没有讲过这一套了。

□：这是统一战线的策略。

毛：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都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

□：实际如此，不要出去讲。

毛：还有少数烂掉了的，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

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有人说还有云南。）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不提富裕阶层，叫新的剥削压迫分子，或者只提什么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如果他们结成一体也可以叫集团。

毛：不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全了。你们研究一下。分子嘛！分子也有团，有分子团哩！

□：他们跟广大群众的矛盾，这些少数人压迫剥削多数人，被压迫的总是多数，总要革命，全世界压迫者少数，压迫厉害，孤立了。信心就在这里。

毛：被剥削、被压迫、不满的人多，因此就要革命。

□：有几种情况要区别清楚。一种是地富站在前头的，应打倒，一种是漏划的地富分子，是阶级敌人，这种人不会干好事，把材料弄清后，处理也容易，凡是过去的地富反坏分子，混进党内来的，照四类分子处理；还有一种贫下中农，过去土改，革过命，后来被地富拉过去了，站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对这些人要严肃斗争，彻底退赔。

毛：第三部分是主要的，是多数。

□：漏划的不少，和平土改区多。

□：地主劳动五年改变成分，富农劳动三年改变成分，有些摘了帽子的又坏了，这个规定不行了，要改。

□：那好办，再戴上。

□：搞土改时我们提过中立富农的政策。

毛：我们犯了错误了，认识不足，当时为了稳定中农，对富农只搞掉他们的封建剥削的那一部分，这次没有反映过去侵犯中农的

材料，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就要侵犯中农。有没有把中农划成富农的？你晋西北就搞中农嘛！

□：晋西北有一个查三代的错误，没收粮食是为了度灾荒。

□：一部分戴帽子的，一部分漏划的，还有一部分原贫下中农，现在当了权变坏的。原贫下中农（主席：以至中农）多数可以争取，提高阶级觉悟，但你不要把他们的财产、手表、自行车、新房子搞掉，群众不满意。退赔要搞。

毛：你讲第三部分。

□：不退赔，也不利于教育干部。

□：搞掉，教育了新干部。干部不能当了，多数要争取，少数要戴帽子，恐怕这个政策要定下来。

毛：少数恶劣的，要戴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

□：我看，这些人总而言之不是共产党。但主要是整共产党。管你劳动人民出身的、漏划的地富……总而言之，搞的结果，戴帽子的户数不能超过7%～8%，人数不能超过10%。

李雪峰（以下简称李）：是包括现在的在内？

毛：你们看。否则，得罪的人太多了。要知道，他们也不是一块铁板，是有变化的，有富有贫，有升有降，有好有坏，有当权有不当权。我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右。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划成20%，七亿人口，划20%多少人？恐怕要发生“左”的潮流。

李：能争取的干部还是要耐心地争取，不然贫下中农的比例就要减少很多。

毛：群众起来划，影响你们走群众路线，群众要求多划，干部也要多划。结果不利于人民，不利于贫下中农。“四不清”干部，贪

污四五十元的、一百元的是多数，先解放这一批，我们就是多数嘛！犯了错误的，对他们讲清楚道理，还是要革命的。那个报告中讲的车间主任、工段长、小组长，都是老工人，犯了错误讲清楚，让他们做工作嘛！

□：有个富裕阶层“三大件”之类。

毛：他们先富裕，用扣工分等办法，自行车、毛衣，还有后富裕的贫下中农。

□：现在还是□□□讲的“四清”好，可适用于机关。

毛：原“四清”叫作“一清”，就是经济。挂谁的账，是河北的发明权？（大家议论：“四清”这个含义，在第一个十条中已经从正面提出，是主席加的，以后又经□□□的报告，河北省委从反面也提出。）

□：华北把社教统统叫“四清”。

李：我们先讲经济上“四不清”，政治上“四不清”，后来加上组织上，□□□同志报告，连思想四个“四不清”。

毛：我没有这个印象。你们把□□□压低我不赞成。我最早看到的是□□□的。

康生：□□对“四不清”的提法很好。他的那个报告我很欣赏。

□：你账挂到河北账下，□□□也是河北人嘛。地富反坏当了权都坏，不会有什么好的。问题是贫下中农当权。

毛：只要把一百到一百五十元的解放出来。

□：那不一定，几百元的不少，几千元、一千斤粮食的也相当多。恐怕要把一千元的解放出来，退赔还要退赔。

毛：挤牙膏，挤不净，那有什么办法？留一点也可以。挤得那么干净？宽大处理嘛！

□：能挤多少就一定挤多少。一个剥削群众，一个剥削国家，还是退赔，退赔从严，要彻底，特别恶劣的，一直抵抗到底，没收。

毛：国家也是人民的，我们自己没有东西，退赔从严，对！要合情合理好。不必讲“彻底”。

□：打击面究竟多大好？定百分之几恐怕有利。地富分子有些老实的也可以摘帽子，那是极少数，地富子女情况不同，有分家的，有没有分家的，有表现好的，有表现一般的，有表现很坏的。

□：打击面控制到百分之几有利？一开始，分化“四不清”干部就需要。地富有一部分表现好的，也不能戴了。贫下中农和中农中极少数的戴帽子，也有好处。比如有的给戴上新恶霸分子的帽子。但多数应分化、争取。不能当干部、党员。不是打击对象，还是争取对象。

□：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将来新剥削分子多吃多占。

毛：多吃多占，复杂得很哪！主要是我们这些人，汽车、房子有暖气、司机，我只四百三十元，雇不起，又要雇请秘书……

□：要退赔多少？

□：退赔搞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毛：群众知道的，搞到一定程度就行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有的地方只有十几户，没有一个虱子，一定要捉虱子？

□：一个大队定一两个这样的分子，可以不可以？有些要戴帽子，戴了什么分子的帽子，就好办了，戴帽，以后可以摘。

毛：叫分子，留点出路，好嘛！不涉及家庭，还可以摘嘛！其他劳动好的，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

□：搞得好的，主动的，不戴什么分子的帽子。

毛：陈平宰肉甚均。他做宰相时贪污，周勃等人就告他贪污，

说给钱多的做大官，给钱少的做小官……刘邦就找他谈，说人家告你贪污。他说，我养的人多，我是没有钱呀！刘邦说，给你四万两黄金，搞统一战线。有了四万两黄金，就不贪污了。《鸿门宴》这出戏现在不唱了。马□□演得激昂慷慨。贪污历来举他（陈平），特别是曹操。目前正在火头上，我又怕泼冷水呀！

□：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群众是懂理的。

毛：有时也不然，群众起来了，有盲目性，我们也有盲目性。过去武汉时代群众发动起来了工厂关门，减工资，失业了，盲目性。

□：我当时就怀疑。

毛：现在怕泼冷水，你们掌握气候。现在还是反右。十二月不算，明年一月、二月、三月……至少再搞五个月。一不可太宽，不可打击面太宽，二不可泼冷水。不要下边宣布！喔，讲了牙膏不可挤得太净，贪污分子也可以做宰相了。

□、李：对敌应包括严重“四不清”干部，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上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地富。（前者）叫贪污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可以。对“四不清”干部就是要退赔，没有搞清楚……

毛：没有搞“四清”的地方，可以先借一些出来，借给国家，救济贫穷的；然后再搞，搞出贪污来，就不要还了。

□：大体上能退赔到多少？能不能退赔到百分之七八十？只退赔到百分之五十，大概过不了关。

毛：问题是现在还有实物存在没有，如果没有那个东西，就挤不出来，有就挤。无非“四大件”，金、银、房子、地下藏的什么。

李：严重“四不清”，投机倒把跟……

□：城市更不同，“三原政策”合营，统战部历来不搞资产阶

级，每次运动都要下一个保护资方人员的通知。新老在一起，严重的在上边、工厂、公司。因此第一步目标要鲜明，要集中力量整部、整厂、整党。例如一个部先整党组成员，一个厂先整党委书记、厂长等。要明确规定这一条，否则当权的干部会滑掉。

毛：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找到了问题。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毛：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先搞豺狼，后抓狐狸，不讲阶层。不然你强调资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或强调下面的小偷小摸，或强调不当权的资本家出身的学生，那干部们精神就很大，斗呀！后果是干部很容易滑掉。就搞不成了干部。例如：白银厂的根子在省委、冶金部，不把根子搞清，白银厂好不了的。

毛：冶金部根子是谁?

□：我没听说冶金部根子是谁。

□：王鹤寿嘛。

□：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目前主要是“四不清”……以“四不清”的干部、当权派为主。

□：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毛：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马下来，然后改造。

□：重点是党。

毛：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

□：北大整陆平，资产阶级教授出来保护陆平。□□□同志在延安不是说右吗？清华搞得好，发动了群众。

毛：你姓陆的，□□□整□□，我是站在你这方面的。□□还可不可以当校长？不能，□□□□□嘛！看来清华比较好。（有人问：“四清”与“四不清”是农村主要矛盾，这样提行不行？不行！）（又有人问：这些富裕阶层……是什么性质？）

毛：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因为我们搞了民主革命，给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给社会主义也开辟了道路，你们蹲点就是开辟……横直我们搞不完，留给下一代，不要拿我们这些人的年纪做标准。

□：两类矛盾交织在一起，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人家贪污盗窃，还社会主义？

□：有的没有虱子，有的虱子很小。有个策略问题，坏干部布置了。

毛：你整他，他不布置？

□：“四不清”干部造了很多谣，说什么“先整群众，后整干部”。应明白地讲是干部。

毛：这有什么，先整干部嘛！

□：干部多吃多占的要退，所有社员的不退。不只是贫下中农不要搞。这样，群众的顾虑解除了，其次再解放多占些的干部，干部同社员一起分了的，只退干部多占了的部分。

毛：一分为二嘛！一个群众，一个干部。

□：然后再集中搞少数严重的。

毛：有那么多步骤，我就不赞成你安源开始联系小职员嘛！你那安源，官志远、朱锦堂、朱少兼两个老婆我们联系他，一直联系他。粤汉铁路要成立工会，一个人不认识，找到一个工头，也是两个老婆，后来也枪毙了。

□：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不要上当。扎根串联，雪峰同志讲的，扎在真正老贫农身上，这是对的。但开始扎的不一定是好的，勇敢分子也可以利用一下。

毛：勇敢分子也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老实根子，不一定工作队开始就能找出来，找出来的不一定是好的，要到一定的火候才出来。根子不要告诉他是根子。

毛：什么根子不根子，横直搞社会主义。

□：积极分子一批一批出来，经过斗争，到那时他是老资格了，你说他不是老资格？

毛：李立三不是老资格？到紧急关头不干了，才请我们国家主席去。

□：不只李立三，蒋先云也跑了，李立三认识他的人多，因为宣布胜利是他宣布的，那时我们活动不准杀人，你如果杀人，我们就停工。

毛：那个矿一停，三天水就满了。

□：凡搞剥削历史，有人不赞成的。找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一开始是不会找准的，□□□那里就换了百分之三十多嘛！恐怕还是在斗争中逐步发现。

毛：你专搞老实人，不会办事。……

□：干部与贫下中农还是同时搞。背靠背，他不知道什么，干部揭发干部，群众另外揭发，消息也会走露。

毛：有消息灵通人士嘛！为什么赵紫阳住的那个老贫农家喂条狗？怕人听。

□：先背靠背，后坐主席团台上，让贫农先参加干部“洗澡”会，不能一下子就当主席。

毛：他不没读过孙中山的《民权初步》。搞个勇敢分子当主席行不行？总而言之，把那个流氓无产阶级说得那样坏，不行。军队中有个时期要洗刷他，我就不赞成。

□：五反的经验还是少。工厂核心烂掉的恐怕不是少数。基层、中层都有问题。要整顿领导核心，中层干部也要整，基层干部也要整。

毛：王鹤寿有没有转变？

□：有进步。

毛：已变好，我很高兴。此人跟我有些关系，学解放军，学大庆，没有他，我不知道。

□：总之，一脱离体力劳动，方向就错了，要参加劳动。

□：能不能实现“三同”是能否蹲下点，能否联系群众的主要关键。特别要参加劳动。一参加劳动，问题就解决了，重庆钢铁厂，任白戈在那里蹲点，他们“三定一顶”实行得好，有些干部只学到了炼钢的本事。

□：那批人有技才，不应该脱离生产，做工作，给点时间就行了。

毛：每天要几小时？

□：小组长有半小时、一小时就够了，车间主任有一小时、两

小时也就够了。

毛：科室人员统统下去，大庆几万人，各种舆论，一个死命令都去劳动了。这次□□骂呀！要大家蹲点。我骂娘不灵，□□一骂，还是下去了。

□：干部中大部分是老工人，应该批评、争取。

毛：所以要下死命令。要有秦始皇。中国的秦始皇是谁？就是□□□。我当他的助手。

谢富治：有个人多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有个奖金，本是工人的工资组成部分，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工厂里好人多，干部不比我们下去的弱。抽出训练，他们的任务吃不饱嘛！你抽出20%，你们搞出经验来，我们有办法了。工厂搞“五反”的干部，就从工厂中抽。工厂人多，拿出训练骨干分子。谢富治就是这样搞的，陈正人也训练了四百人。

毛：全国都要搞，你那个厂抽出一半人来，另搞一个厂子。一个厂办两个工厂。

□：工厂技术员、工程师也要参加阶级斗争，注意参加运动，才能又红又专。

毛：也不那么专，他不联系群众，不参加劳动，听意见听不到，或者望一望，不下苦功夫……下一个死命令，余秋里办法，六万人里有七千人，各种各样议论。……

□：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参加劳动耽误了研究工作”“我刚升起来，又让我去劳动”……

毛：还是下个死命令，统统下去。

□：要组织革命委员会，现在工会贪污的很多，不行了。

□：洛阳拖拉机厂搞“五反”代表会。

□：工会系统恐怕不行了，重新组织，从扎根串联，发现好的，重新组织，用什么名义都可以，就是要革命，开始组织20%~80%的积极分子。

毛：有30%就了不起了。

□：此外，工厂、机关多出来的人，如何处理，都交上来，怎么办？

□：不能上交，还是雪峰讲的，三勤夹一懒，自己处理。

毛：还是在工厂中三勤夹一懒好，李雪峰同志讲的嘛！不是我讲的嘛！以邻为壑，不是办法。就在这个工厂，一分为二，三勤夹一懒嘛！怕什么！适当分散。

□：把那些坏人戴上帽子，放在乡下，劳动好了。

□：有家可归的，是否可以回家些去？

毛：有家可归的，你们去江西多少万人，不是又跑回去了？工厂搬就好了。集中几千，只几十个干部管，你说那40%就没有办法？都要交，我看交哪里去，交到他（指总理）那里去了。

□：我还想这么一种意思，前途无限光明，一个乡几万人，一个厂……昨天李雪峰同志讲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如果领导得好，真正搞好，马列主义、提高文化、认识论、毛泽东思想，可以出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一个大工厂，一个县，一个大城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搞不好了，不得了，就会变颜色。江西兴国、上杭出那么多干部。

毛：还有永新。

□：苏联的基洛夫厂，以前叫镰刀与锤头工厂，十月革命后，全国都有他的干部。搞好了一个大工厂、一个大县、一个大市，就

可以出办法，出干部，可以改造全国、全世界大的精神面貌变了。一个大工厂影响全市、全国、全世界。现在工作队慢慢搞下去，一直搞下去，对我们的新型人物……

毛：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了，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

□：机关也一样，无限光明。基本问题要有强的领导核心，有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体系、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搞好了坚持下去，人的、自然的面貌大大改变。再多少年一直这么搞下去，世界要改变。就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大贡献。十月革命生动活泼，斯大林建设了社会主义，后来死气沉沉，赫鲁晓夫又这么一搞……世界上还没有在社会主义下放手发动群众搞革命斗争的经验。冰岛共产党记者问我：如何资本主义才能不复辟？

毛：两种可能。一种复辟，一种不复辟。

□：我答复他们的办法：发动群众搞“四清”“五反”，工资不要太高，半工半读，逐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三种事。开始这样做。毛主席讲三项伟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避免修正主义，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去参加，形成那么一种作风。现在开始，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搞好了，那三分之二就会过来。

毛：我们希望搞好，搞成一个像样子的国家。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搞不好，那怎么办？也没有什么。不要性急，不要希望我们在时都能搞好。大概一个省的三分之一搞好，那三分

之二不搞也可以。那三分之一动起来，那三分之二也动了。你湖北七十一县，三分之一就是二十四个县，也就好了。

□：但要搞好一个县、一个厂……不付出劳动不行，没有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认识论不行……

毛：历来讲认识论不联系具体工作，离开具体工作讲认识论，那讲哲学干什么，有什么用处?!

□：有了可以造成……

毛：不是一切人心情舒畅，总有一部分人心情不舒畅，地富反坏不舒畅，“四不清”干部一定时期也不舒畅，不然他们为什么封锁?

□：是否杀人？我看还是个别杀……点上一般杀人不利。一杀，面上非要恐慌不可。但不是一个人不杀，什么时候杀也要考虑。

毛：就是要震动。杀多了哩！多了有什么害处？一、以后找他使用，活材料没有了；二、得罪了他家人，杀父之仇。要杀的可以先关起来。不可不杀，不可多杀，杀一点，震动，怕震动干什么，就是要震动。还有一条，杀错了死者不可复生。

□：像天津历慧良要杀，也没有材料可用，家庭……不杀，得罪了广大群众。

毛：京剧界就发生问题。

□：地富儿子劳动算什么成分?

毛：是社员，当然是农民嘛！你社会主义不让人家参加，一家独占?

李：贫农、中农也叫社员，这个称呼不能解决成分问题。

周：一般农民嘛！就叫农民。

毛：你们再争论争论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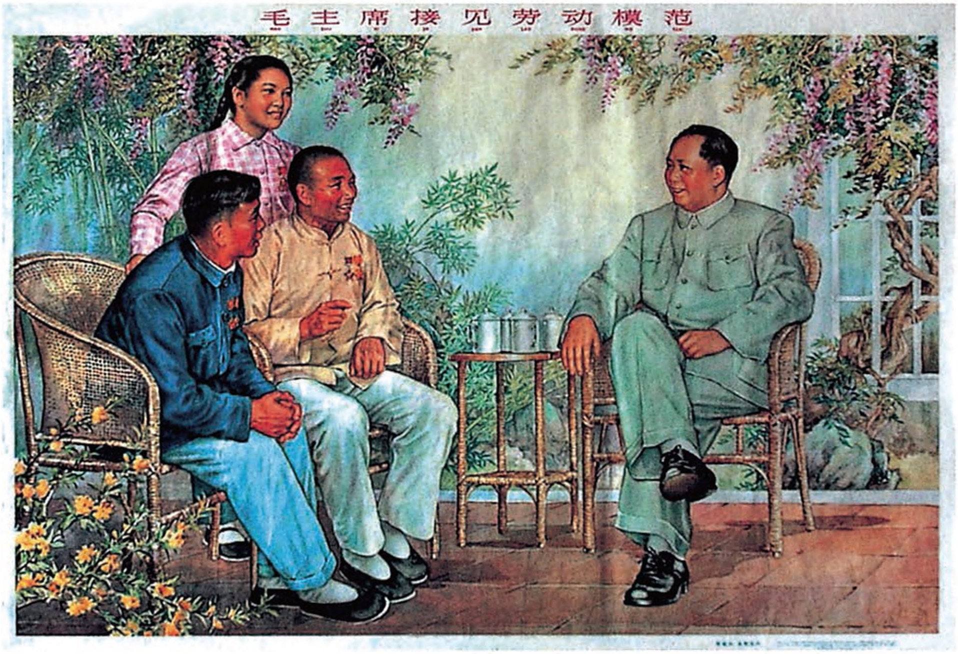
1964年12月底，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1964年12月底，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和郭沫若握手交谈。

1964年12月，毛泽东会见著名沪剧演员丁是娥。

1964年12月，毛泽东接见辽宁劳动模范尉凤英、李素文等。

1964年，毛泽东和著名歌剧演员王玉珍（右三）亲切交谈。



毛主席接见劳动模范（宣传画）

对《核子劫后生机未灭》一文的批语[1]

（1964年12月25日）

已阅[2]。退罗瑞卿同志[3]。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1964年12月24日呈送信的批语。

[2] 指罗瑞卿呈送的香港《新闻天地》刊载的一篇题为《核子劫后生机未灭》的署名通讯。通讯说：就科学家理论上而言，核子爆炸后的地区，因大量辐射尘的浸染，将寸草不生，动物灭绝。最近美国科学家一行，回到六年来被封锁的西太平洋比基尼岛和恩利威吐克环礁“核子靶场”时，却见杂花生树、好鸟飞鸣、鼠跳鱼跃、海藻漂浮，而莫不惊叹大自然在劫后复苏的伟大活力了。才知道所谓“核子爆炸后放射性永久存在，将使一切动植物的生机绝灭”的说法，未免过甚其辞。

[3] 罗瑞卿1964年12月27日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主席口头指示，此件可作为参考资料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同志和人大代表。

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和中央通知的批语和修改[1]

（1964 年 12 月、1965 年 1 月）

一

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十一时

二

照发。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廿七日

三

照改的（第二页倒数三行）文字[2]，重印。

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3]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

毛泽东
十二月卅一日

四

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五

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

六

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

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七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在一次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过：

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准是什么？

1. 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

2. 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

3. 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4. 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5. 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

6. 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

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认为这几条用以衡量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否做得好的标准，是适当的。现在我们也认为是适当的。

八

退陈伯达同志处理。

在十二页上加了“公安”二字[4]。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以中发〔65〕26号文件发给全党。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64年12月24日第二稿时，这个文件的题目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题下括号内写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未定稿，请同志们提意见，以备修改”。全文共十六条。当日晚10时，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这个文件，并附言：“请主席审阅！是否照这个改稿印发，请批示！”毛泽东审阅后写了本篇一的批语。12月27日，这个文件又送给毛泽东审阅，但文件最后加上了一个第十七条：“上述各条，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题目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括号内的文字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毛泽东当日将括号内的文字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将所署时间“12月24日”改为“12月27日”，并删掉“二稿”两个字，同时在题目上方写了批语，即本篇二。12月2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1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纪要。12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中发〔64〕811号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在修改后的中发〔64〕811号文件封页上，毛泽东写了本篇三的批语。同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5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经过修改的纪要。1965年1月，中央继续开会讨论并修改这个纪要，将原来的十七条增加至二十三条，其中新增加的有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思想方法等七条，删去了集团问题一条，文字上也作了许多修改。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以中发〔65〕2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纪要。中央在印发纪要的通知中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本篇四至七是毛泽东对纪要1965年1月8日稿的修改。本篇八是毛泽东1965年1月14日写在纪要1月12日稿上的批语。

[2] 这段文字原是：“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划的或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

其他坏分子。”陈伯达改为：“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4] “公安”二字加在“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民兵工作，各方面都有所前进”一句中的“卫生”之后。

和参加“亚非文学交流座谈会”的亚非作家的谈话（摘录）

（1964年12月25日）

我们这个国家，有些好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譬如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刚刚触动它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不然我们就没有知识分子，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他就相信他们的，不相信我们的，我说那些人叫做坏人。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死外国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的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希望你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当然，历史遗产要接受，但是要批判地接受。你们看，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接受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好东西，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好东西，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批评了古典哲学，接受了古典哲学的好东西，创造了唯物辩证法。我们也应当这样做，接受古典遗产的时候，就要接受好的，批判坏的。

人一脱离群众，就没有好结果了。人民群众总是占大多数，剥削者、压迫者总是极少数。还有一条：人是会改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马克思这个人，从前是唯心主义者，后来起了变化，起初是

形而上学的，后来学了辩证法，学的也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也是变过来的。恩格斯和列宁，也都是有这个变化，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没有受到大学教育，我原来当小学教员的，不知什么原因把我抛到革命中来了，大概是帝国主义教会了我们，教的方法是用杀人、压迫、剥削。你们是讲文的，我是讲武的，因为打了几十年仗，先生就是蒋介石，还有日本法西斯，还有美国，（当初）我们什么也不懂。现在修正主义又来整我们。赫鲁晓夫很快下台了，留下做反面教员多好！

现在美日反动派已在教育日本人。各国都是一样。没有激烈斗争，教不好人。

（回答凯尔的问题）团结起来，击败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搞了一辈子，就是这件事。

（回答普端纳）美国说他是福利国家，究竟谁得到福利？还不是垄断资本！他收买一些工贼，组织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右派。一些共产党也不像话，他们听社会党的话，说我们不好。他们亲帝国主义，亲反动派，他们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叛徒。我国就出了这样的人，共产党反对共产党，这事不足奇，我们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变成托匪。共产党历来是招收一批，跑出一批。志贺义雄不就跑出去了吗？不足为奇。他们能起一种作用——反面教员的作用。过去我们有五万党员，白色恐怖一来，剩下一万，一部分杀掉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不干了，我们变成少数。有时正确方面常常是少数。达尔文时代，只有一个人相信是会进化的。达尔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不是从大学学的生物学，他是到处跑。正确的开始总是少数，共产党当初只有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其余都是蒲鲁东、巴枯宁等等。所以你们不要怕孤立，有一个正确的就行了，何况你

们还有许多人。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都是可以打倒的，这一条也是破除迷信。他们心是虚的，是脱离群众的。我们有亲身经验，你们也有经验，他们是可以打倒的，我们还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倒得这么快。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时的插话[1]

（1964年12月27日）

（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总结。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是清官与贪官的问题。《四进士》就是反贪官的嘛！）

巡抚出朝，地动山摇，可了不起哩！

（封建时代的清官实质上是假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

清朝刘锷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

（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党外矛盾交叉，党内有党。国民党也有此问题。）

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

（主席强调，要听各方面的话。好话，坏话，特别是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这是工作做得好坏的准则。）

---

[1] 括号内为陈伯达发言的有关内容。

讲话长了怎么办？李雪峰同志说的话，讲长了打零分。讲长了，让他讲长嘛！横直没人听嘛！

（许多人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能忘本嘛！我这个人不参加革命，顶多是个小学教员、中学教员而已。）

大官是从小官来的，小官是从老百姓来的。我们都是从老百姓中来的，还是老百姓嘛！“蒋委员长”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河南人氏，只知有母，不知有父，还不是老百姓变的？

（主席常说，不要自以为是。乡干部当权，就以为自己的意见对。）

不要当了权，就是自己的意见对。自以为是，没有自以为不是的。为什么要开会？就是意见不一致。一致了开会干什么？

（不怕官，只怕管嘛！）

小官怕大官，大官怕洋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12月28日）

没有多的讲。这个文件（指“二十三条”）行不行？

第一条，性质问题，这样规定可不可以？

有三种提法，前两种较好？还是第三种较好？

常委谈过，又跟几位地方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

因为，运动的名称即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矛盾交错的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十中全会，搞了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

六二年上半年，刮了“单干风”，还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刮得可凶啦！“单干风”，邓子恢是一位，另外还有几位。有些同志听进去了；还有的听了，不答腔，不回答问题。

搞社会主义，搞了许多年，而有些同志听了不答腔，不能回答问题。

四、五月间，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讲形势好，只有军队同志说形势好，我直接听到的是许世友、□□□，间接听到的是杨得志、韩先楚。当时是五月，就是说形势不好，有那么一股空气。

到六月，我到济南，有几位同志说形势很好。时间隔了一个月，为什么变了？五月末割麦，六月割了。

为什么在北戴河我要讲形势？因为那时有人说，“不包产到户，要十年八年方能恢复”。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所以，提出“有没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

因此，政治局常委觉得，大家讨论了也觉得，第三种提法较妥，较为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

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毅同志说，他也是当权派，只要你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还当你的外交部长。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就是要讲点民主。

天天说要民主，就是不民主。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民主。

军队本来早就有三大民主。堡垒打不开，找士兵、战士、班长开会，大家议，怎么打？办法就出来的。这就是军事民主。

政治民主——三大纪律。

经济民主——伙食，要由战士管伙食。现在还管不管？不能单叫司务长管。连里有两个人。一个文书上士，一个司务长。文书上士叫师爷，搞抄写的，就是搞表报的，可了不起了！因为他认识几个字。

好话坏话都要听。好话，爱听，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上我讲过“老虎屁股摸不得，老子偏要摸”，后来认为那句话不那么文明，搞成另一种形式了。老子者，就是劳动人民、下级干部。我们这些人就是不大好摸的，你想揭他的疮疤，疮疤可不容易揭!

正确的话、错话都要听。正确的要听，错了也得听下去。人家批评你批评得错了，有什么问题呢?！你本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责任在批评者，你听着，有什么问题呢?！你不听，那不好。正确的，批评得对的，要听。人家批评错了，那更要听了。还有一

个，特别是那些反对你的话，要耐心听。做到这个，比较困难。

要让人家把话说完，这也是有点困难。他讲那么长，水分很多，米很少，是稀饭。我就受过很多次这样的灾难。有人讲了两个钟头，还没出题目，我问他要我帮他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在延安，有一次找我谈话，讲了两点钟不着边际，我问他，你来找我谈，要我帮你什么忙！他才出题目。另外，有的同志，他就是训话，我出题他不答题，我只好听训。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世界上有这种人，专门训人的，对我这种人，他就要训，长篇大论地训。

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宣传者，许多概念连接起来。鼓动者，一个概念一个口号。比如罢工，提出一个口号，简单得很，就叫鼓动。写文章，作报告，长篇大论，叫宣传。贴标语，叫鼓动（专为一种事动员）。

□□□发明这个道理，他说讲了两次，一次是五十分，一次是零分，人家不愿意听了嘛！我历来提倡，听讲话，不要鼓掌。不爱听的，可以打瞌睡。你讲的没有味道，他还不如打瞌睡，保养身体，还是保养身体免受这场灾难为好。还有一个办法，看小说。我从前在学校听课时就是这样。这就把教员整倒了。（讲了念书时的故事）这也许是我的毛病，也许是因为先生讲的不引人注意，我就看小说，后来发明了打瞌睡。不要说我这个人没有发明，我也有发明。（大家笑）用这种办法，我整了那些不是交谈式，而是训话式的人；整了那些老师，他只爱讲，不能让学生提问题，不是提问题启发学生。上课有了讲义，就不必讲了，让学生去看，再出点题目，让学生讨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我就主张不再念的，后来说有些人不识字，还是念好，我让了步，还是念了，也鼓掌了，这种会，

鼓掌，我也赞成。

在同志们，不要使人怕。对敌人，要使他怕。在同志中，使人怕，那可不行！使人家怕，总是你有鬼，不然为什么使人怕你呢？凡是使人怕的，大概道理少一点。

过去军队里，班长带兵有三个办法：打人、骂人、关禁闭，别无办法。他不搞民主。后来我们说不许打人、骂人，禁闭现在也取消了。逃兵，逃了算了，何必捉！捉回枪毙，岂有此理！人家为什么逃？无非是在你这里过不下去了。跑了算了。如果你要把他捉回来，那就向他承认错误，请他吃顿饭，有猪肉吃，并且对他说，你还想逃，你就逃之，不想逃，就蹲下来。不能用打人、骂人、禁闭、捉逃兵的办法。逃兵让他逃，他的积极性已经不高，留他有何用！逃到外国，有什么了不起？中国那么多人。无非是出去骂我们一顿。骂我们的人多得很。赫鲁晓夫、肯尼迪并不是中国人，他也骂。音乐家付聪，逃到英国去了，我说是好事。这种人留在国内又有何用？

我只讲这两点：一是性质问题，二是工作态度。

1964年12月，毛泽东接见陈永贵、邢燕子等劳动模范。

1964年12月，毛泽东和董加耕、邢燕子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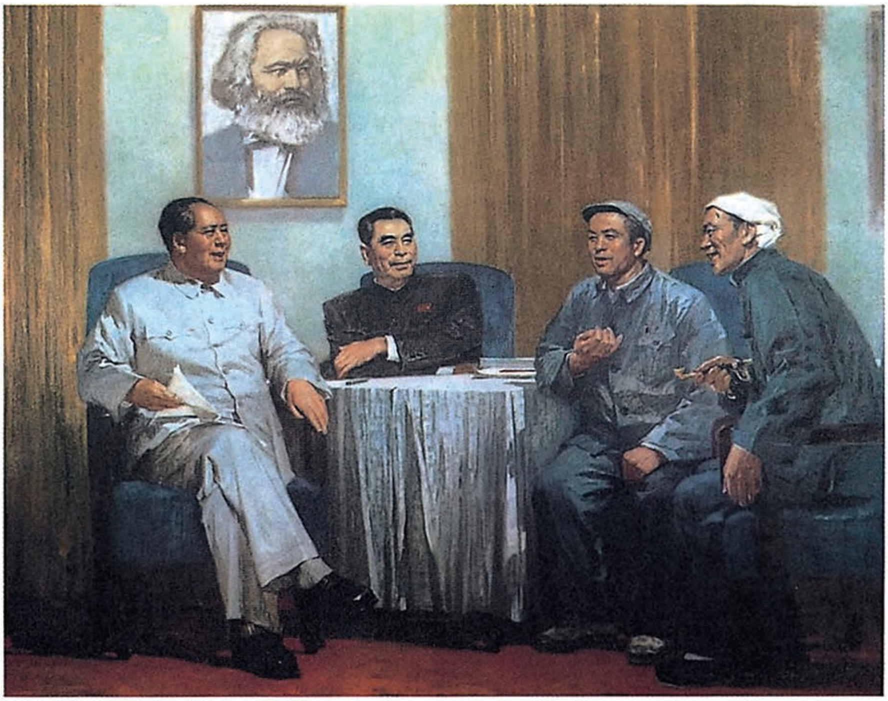
1964年12月，毛泽东和陈永贵亲切握手。

1964年12月，毛泽东和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在宴会上。

1964年12月，毛泽东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接见农民代表陈永贵和科学界代表钱学森。

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图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会议结束时会见全体代表。

1964年12月，毛泽东接见农民代表陈永贵。



《中国人民有志气》（油画）

对政府工作报告（摘要）稿的批语[1]

（1964年12月29日）

一

即送总理：

第一部分[2]已看完，作了一些修改[3]，即把可能使外国人害怕而又不必要的字句改了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六时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总理1964年12月27日为报送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摘要）稿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政府工作报告（第三次摘要）稿后两部分写的批语。政府工作报告（摘要）在196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指政府工作报告摘要稿的“国民经济的成就和今后的建设任务”部分。

[3] 对第一部分的主要修改是，将“我们已经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句，改为“我们已经有一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认为是先进水平的了”。

其余部分[1]，今晚阅后送上。

二

即送总理：

后两部分，已看过，无意见，可照发。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下午九时半

---

[1] 指政府工作报告摘要稿的后两部分“社会主义革命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

给田家英[1]的信

（1964年12月29日）

田家英同志：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三垂冈》[2]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诗歌颂李克用[3]父子。

---

[1]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2] 《三垂冈》这首诗为清朝诗人严遂成所作。

[3] 李克用，唐朝沙陀部人，曾封为晋王。后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他被尊为太祖。

对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记录稿的批语[1]

（1964年12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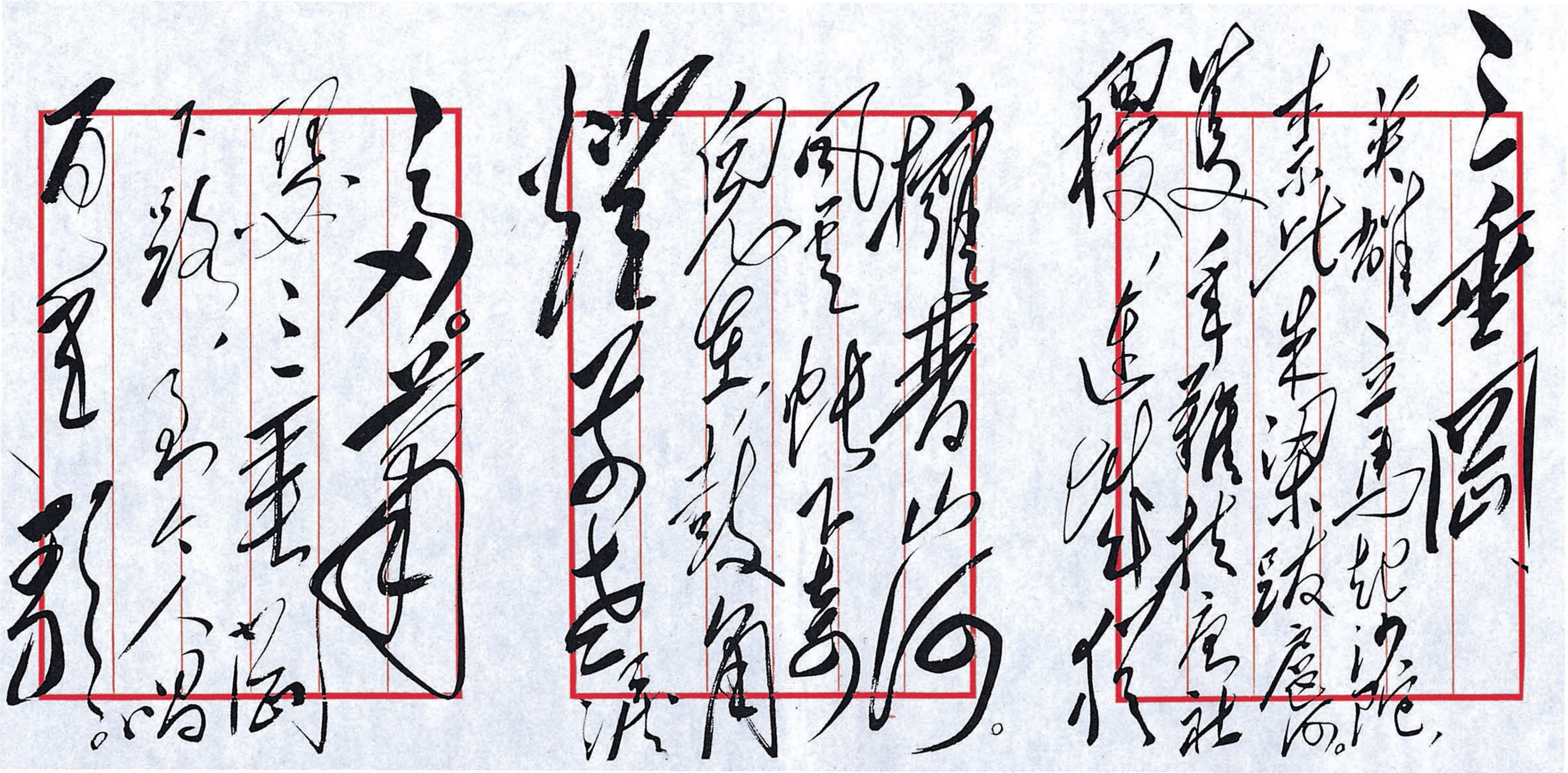
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副总理各同志看看。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毛泽东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1964年12月30日报送他12月11日同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的谈话记录稿给毛泽东的信上。陈伯达同余秋里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的工业革命问题。陈伯达说，外国报刊说电子技术正在实现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有可能由中国来完成。我们必须采用一系列新的技术。另外，要改变工业管理机构，要搞一系列设计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搞政治设计，进行政治领导，不搞技术、工艺设计。余秋里说，在我们那里，实际上是部党组在搞这种设计，要以主席思想挂帅，要合乎总路线要求，要通过讨论确定工作方针、战略部署、技术政策。我的理解，工业革命，首先是思想上、方法上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统帅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思想上、方法上的革命，就没有技术上的革命。陈伯达说，我们不能老是在人家的后面赶人家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水平。余秋里说，这是跟着人家跑，我们应当根据主席思想，闯出自己的路子来。



三垂冈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毛泽东手书《三垂冈》。

2P

340—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六周年的电报

（1964年12月31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解放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高兴地看到，英雄的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领导下，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气概，同贪婪的美帝国主义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胜利地保卫了革命的果实，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英雄的古巴人民，团结一致，继续奋斗，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不少的成就。古巴人民的斗争再一次表明，站起来了的人民，只要敢于斗争，不怕困难，他们就一定能够坚持胜利前进。

古巴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两个哈瓦那宣言的革命精神，激励和鼓舞了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志和信心。日益高涨的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有力地支持了革命的古巴人民。我们深信，胜利必定属于团结起来，敢于坚持革命斗争的古巴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中国和古巴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斗争，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怀着关切的心情，注视着古巴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并且将永远坚定地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古巴人民的五项正义要求，坚决支持古巴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祝中古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祝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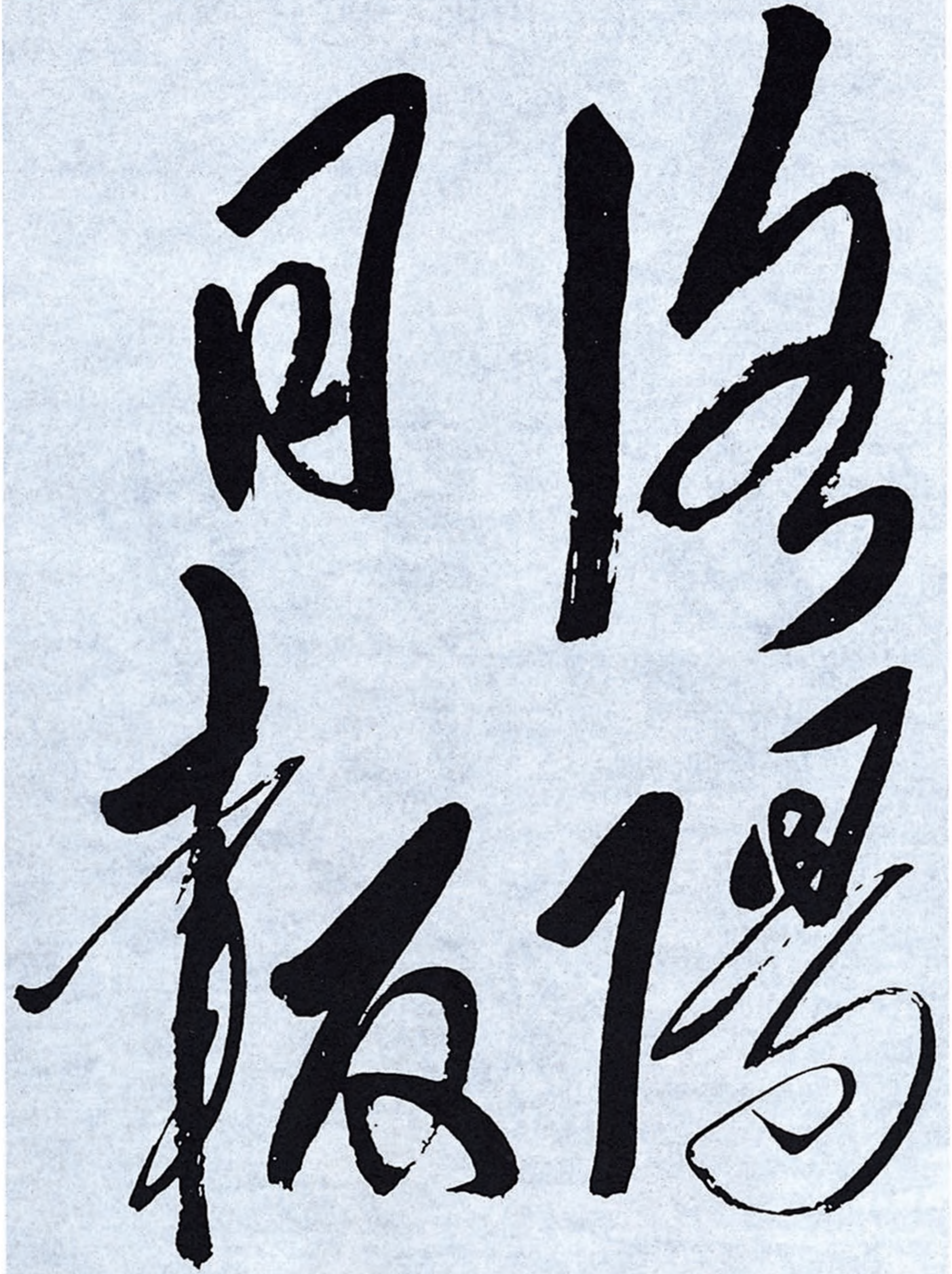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964年12月31日，毛泽东接见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副团长王鸿喜。

为《洛阳日报》题写报头

（1964年12月）

洛阳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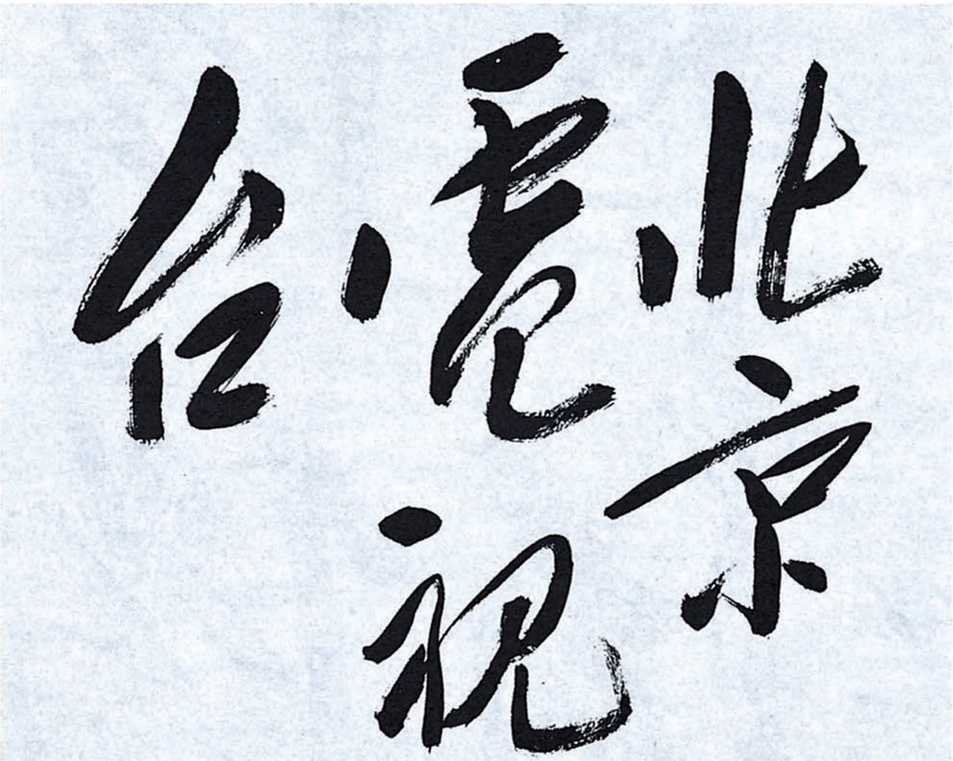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洛阳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北京电视台题名[1]

（1964年12月）

北京电视台



毛泽东为北京电视台题写的台名。

---

[1] 北京电视台创建于1958年，是我国首台电视频道。1964年12月，毛泽东为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题写台名。1965年元旦起，毛泽东题写的台名作为台标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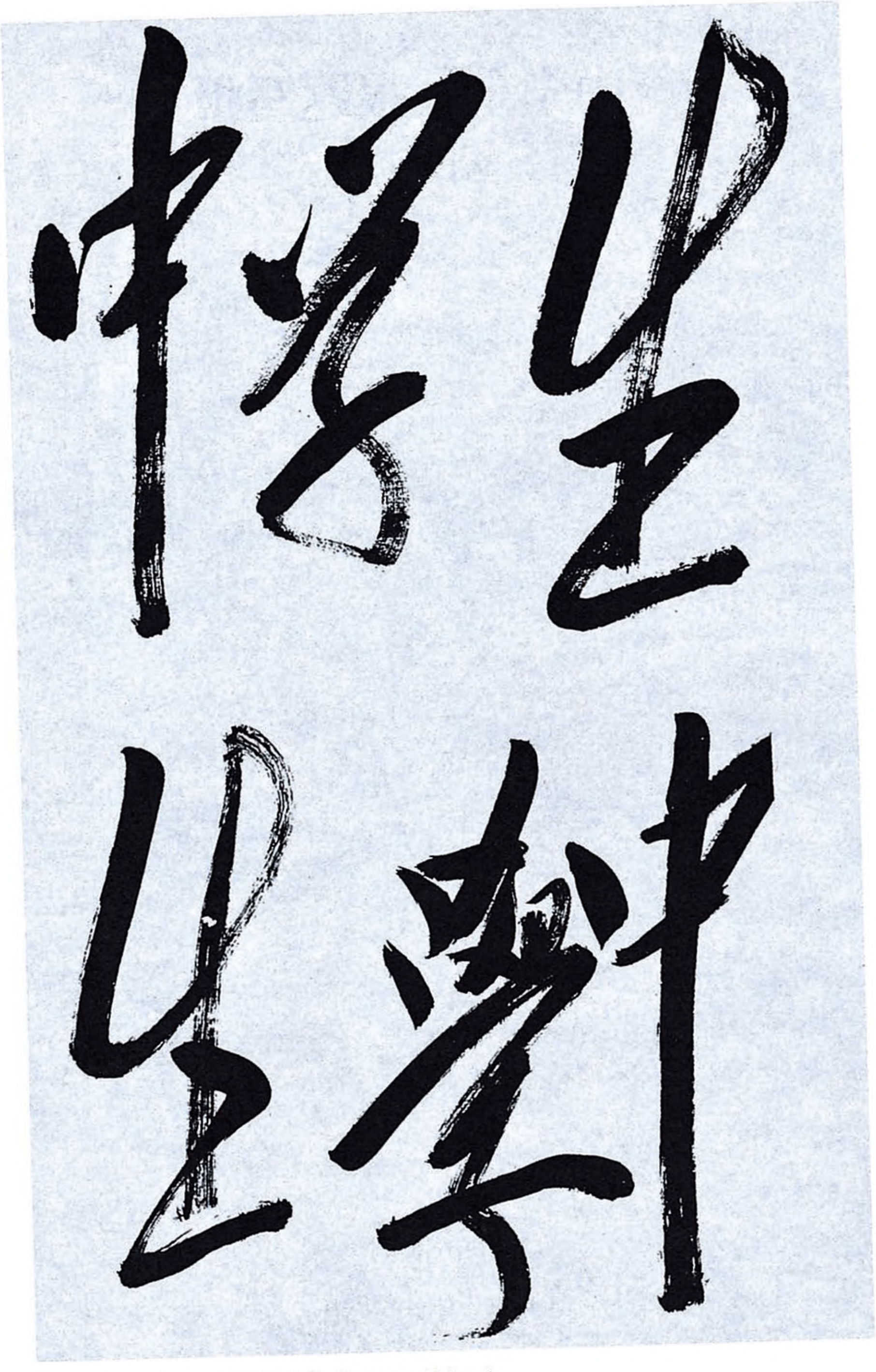
为《中学生》报题写报头[1]

（1964年12月）

中学生

---

[1] 《中学生》创刊于1930年1月，由我国著名教育家夏丏尊、叶圣陶创办。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学生》呵护备至。毛泽东于1964年为《中学生》题写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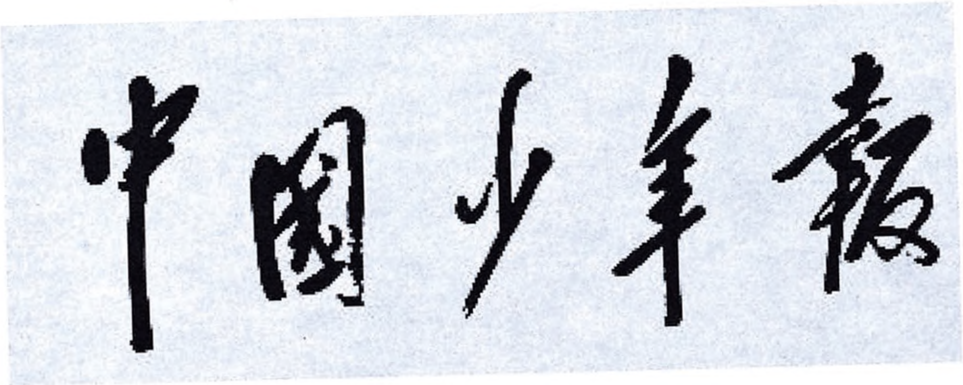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中学生》报题写的报头。

为《中国少年报》题写报头[1]

（1964年12月）

中国少年报



毛泽东为《中国少年报》题写的报头。

---

[1] 《中国少年报》创刊于1951年11月5日，毛泽东题写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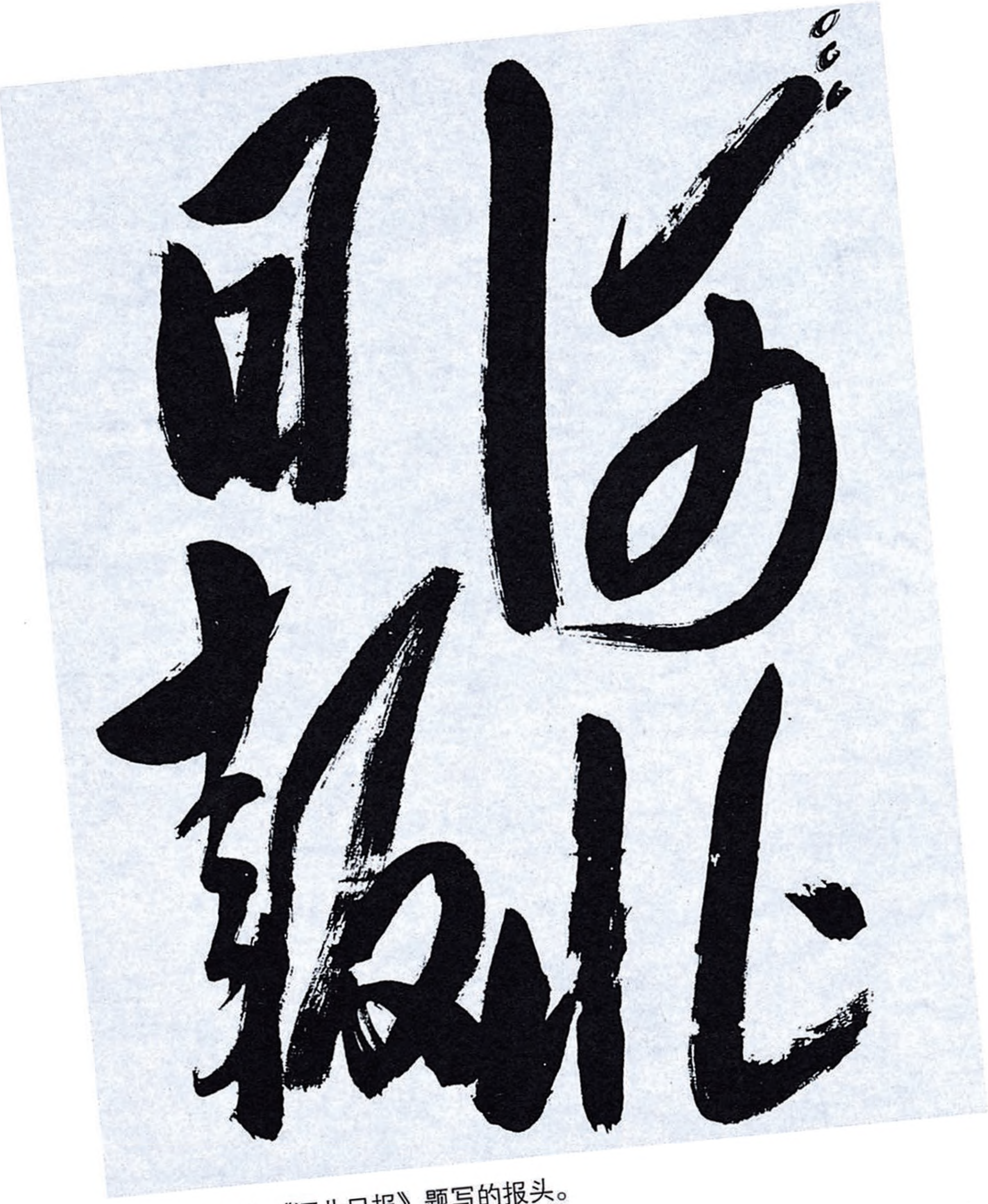
为《河北日报》题写报头[1]

（1964年12月）

河北日报

---

[1] 《河北日报》创刊于1949年8月1日，是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1964年冬，应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之请，毛泽东为《河北日报》题写新报头。



毛泽东为《河北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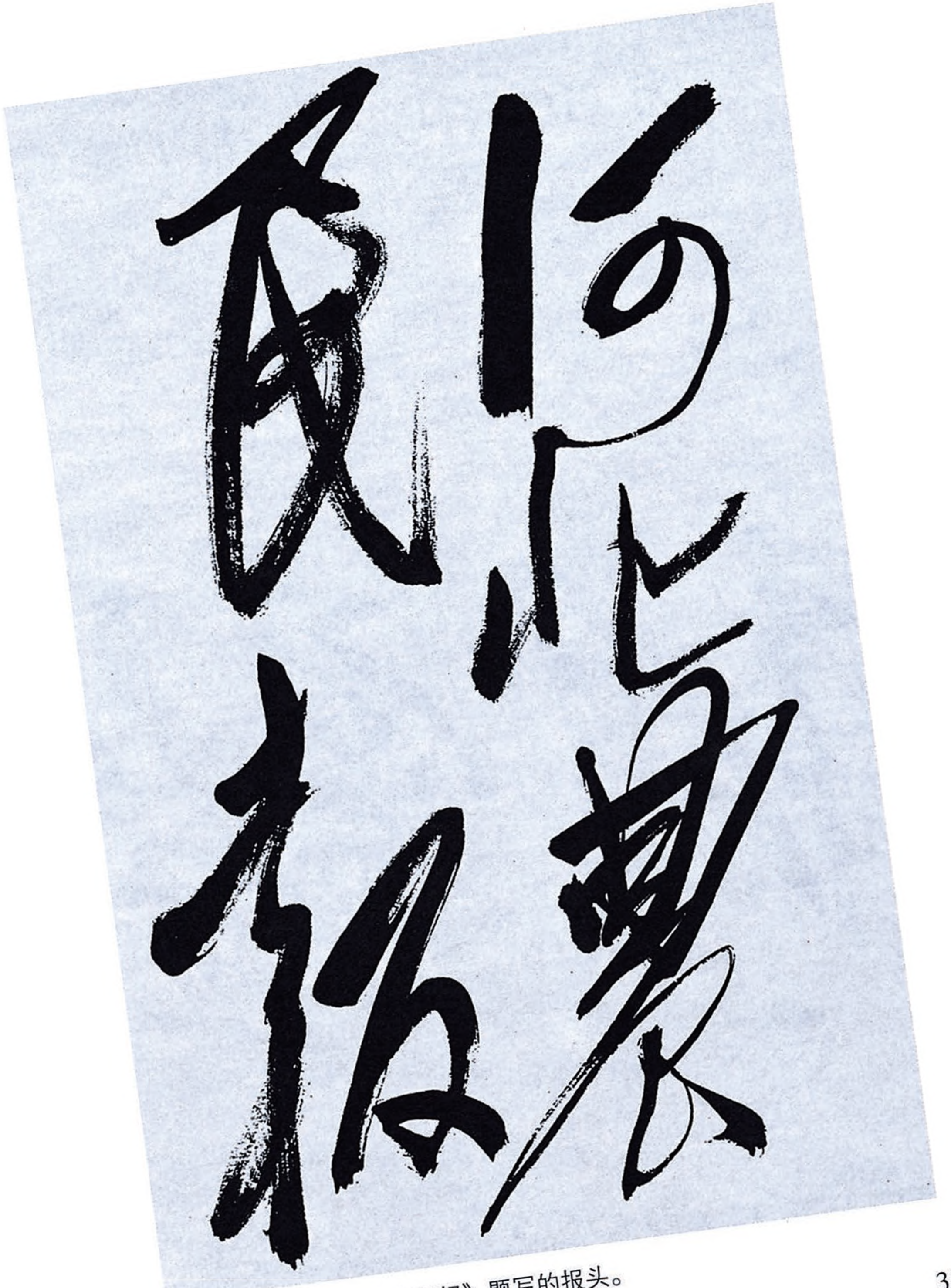
为《河北农民报》题写报头[1]

（1964年12月）

河北农民报

---

[1] 《河北农民报》创刊于1964年7月1日，由毛泽东题写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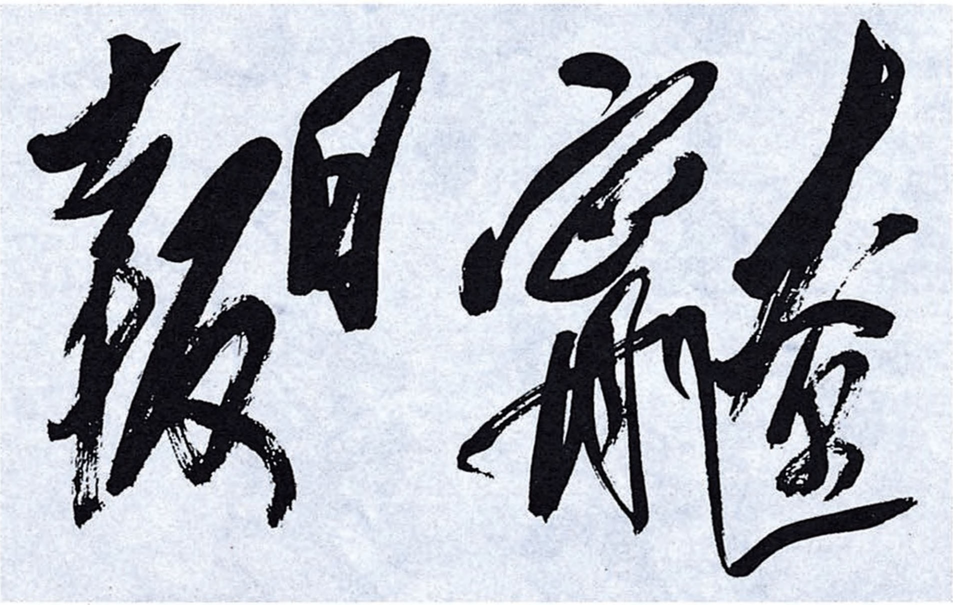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河北农民报》题写的报头。

为《辽宁日报》题写报头[1]

（1964年12月）

辽宁日报



毛泽东为《辽宁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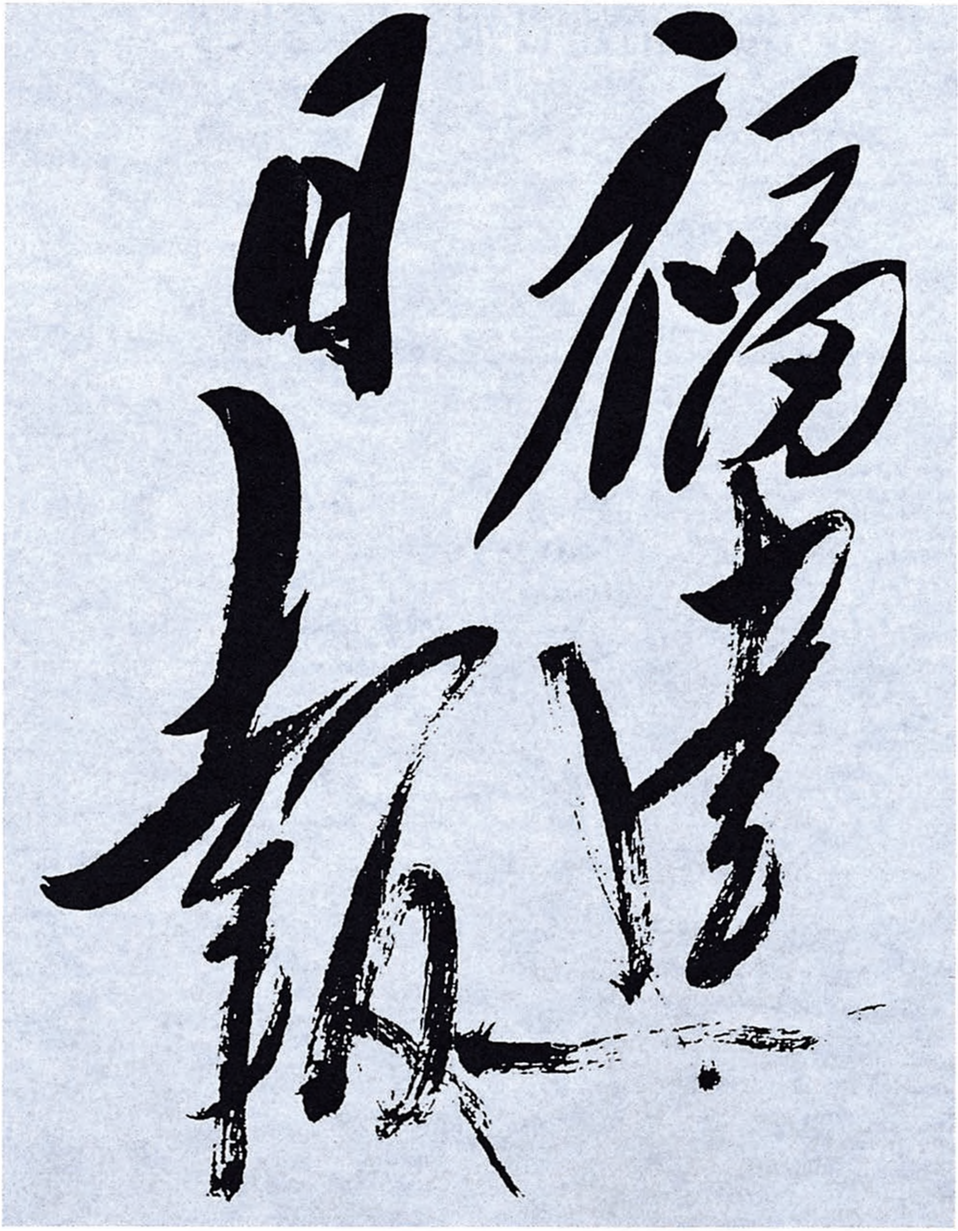
---

[1] 《辽宁日报》是中共辽宁省委机关报，前身是《东北日报》。毛泽东为其题写报头。

为《福建日报》题写报头

（1964年12月）

福建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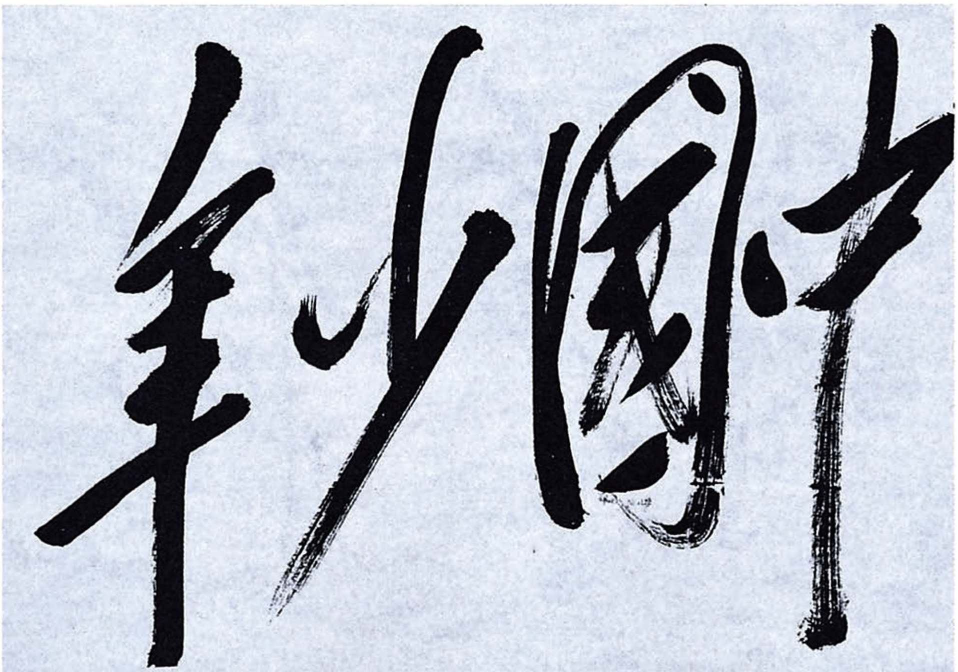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福建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中国少年》题名

（1964年12月）

中国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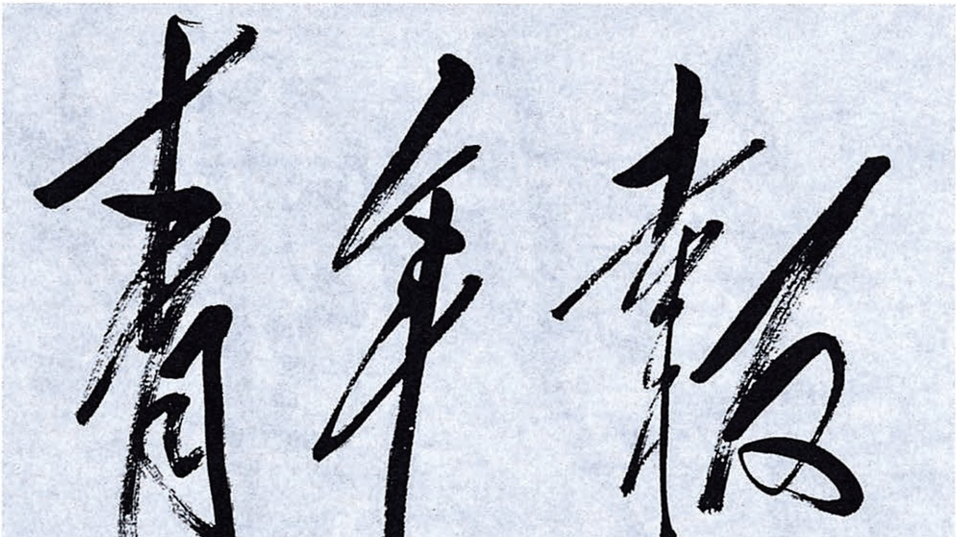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中国少年》题写的刊名。

为《青年报》题写报头

（1964年12月）

青年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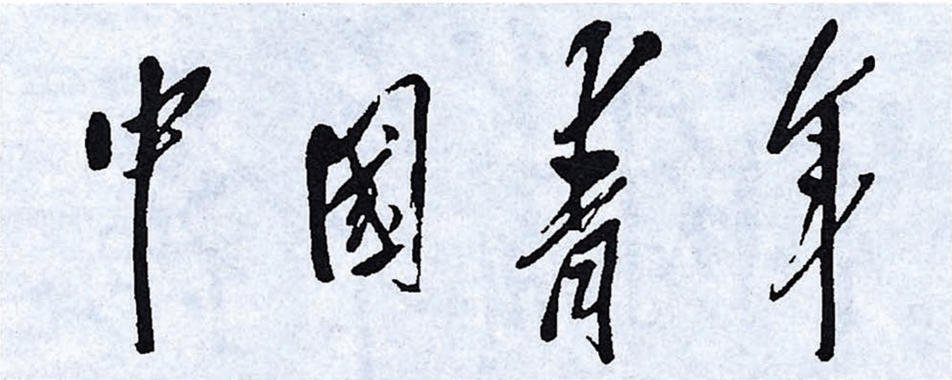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青年报》题写的报头。

为《中国青年》题名[1]

（1964年12月）

中国青年



毛泽东为《中国青年》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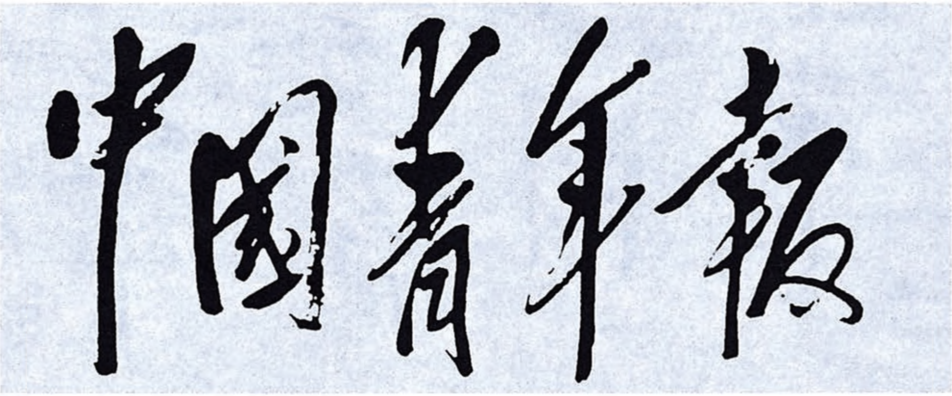
---

[1] 1964年12月，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1965年1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上使用了这个刊头。

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1]

（1964年12月）

中国青年报



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报》题写的报头。

---

[1] 1964年12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中国少年报》《辅导员》《中学生》五种报刊题写了名字。事后又为《中国青年报》重写了一次。并嘱咐：“如不满意，再写一次。”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中国青年报》题写报头。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

（1964年）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实现了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最后解决。

和江西省委同志的谈话记录（摘录）

（1964年）

湖南还提出农村要建立儿童团、少先队、青年联合会，因为现在农村有不少高小程度的小知识分子。

（少先队）为什么要按学校组织呢？还是按行政村组织好，还可以把地富儿童组织起来，使他们受教育。

关于划阶级问题的指示

（1964 年）

划阶级有必要。坏人虽是少数，但他们占据了要害部门，当了权，这不得了。……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区别，主要是本人表现。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

阶级出身和本人表现，也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地富子弟要团结，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也要改造，只要愿意改造，就应当要他们，都要嘛。如果只论出身，那么马、恩、列、斯都不行。例如马克思也要先学唯心论，后来才学唯物论，才搞出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两个先生。

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查出来，像白银厂一样，把那些坏人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一些人主要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信任，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有的只是剥削阶级出身，那就要看表现好坏。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把已经存在的阶级

斗争现象研究提高为理论，加以宣传，把工人阶级从分散的变成为有组织的，从自发的阶级变成自觉的阶级。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么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一些。阶级斗争的现象存在了几千年，资产阶级也说是有阶级斗争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要斗倒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的，我自己也是先学地主阶级的，六年读孔夫子的，七年读资产阶级的，共计十三年，那时二十几岁，对马克思根本不知道，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知道马克思，读马克思的书。

关于依靠贫下中农的问题

（1964年）

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们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边。剥削者不过一、二、三、四、五，按七亿人口计算，百分之五就是三千五百万人，剥削六亿六千五百万人口，要算这个基本账，到底站在哪一方面。不管赫鲁晓夫说我们是小资产阶级，总之，他是修正主义，他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我们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这一边。

我赞成省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共产党又不代表它。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年团，省应该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

贫下中农代表会议，也要有一部分中农的积极分子参加，使他们感到有他们的份，湖南就是这样开的。

我们这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有的地委书记也忘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有权，能管中农，也能管地主、富农。

修正主义跟我们不同，我们依靠工人、农民中的大多数，就算工人中有百分之八到十五的坏人，坏人还是少数，而且要加以分析。农村中贫下中农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可以带动中农，改造地富

中的好的，再加上地富子女，使少数人孤立起来，其中有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

《双十条》和《六十条》为什么能调动人的力量？

（1964年）

因为它解决了人民内部的矛盾，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把力量组织起来。人是生产力诸要素的首要因素。人，劳动手段（包括畜力、农具、肥料等），劳动对象，这是生产力的三大要素嘛，实行了《六十条》《双十条》，还是原来的那些人、畜、农具、土地等等，但是结果却大不相同了。

（当讲到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后“贫下中农心正，地富心服”时）

那也不一定。贫下中农心正，以后有可能正，也有可能不正。地富心服，也不一定都服。

（当讲到“小站有个假劳模不劳动，一年得一万五千多工分、二千元”时）

那是剥削阶级了，撤职，一定要撤。账目要算清楚，一定要退赔。

还有小霸王之类，也要整。

贪赃枉法，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事情就是这样复杂，没有才怪哩。有个对立面也好。

（当讲到曲阜陈家庄陈玉梅被打下去，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把亩产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时）

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会起变化的，把好的打下去，比如把莫洛托夫打下去，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莫洛托夫上来，又从三百斤翻到六百斤。陈玉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这么惨。像陈家庄那样，砍树铲葡萄，把房子里的桌椅都搬掉了，好人上台，又都变了。赫鲁晓夫也要把苏联变成这样砍树铲葡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给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陈玉梅、大寨陈永贵。

不要只看到阴暗面，凡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十的模范，带动大多数，整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坏人。

有些支部，被不好的老党员霸着。他们有一条顶县委的办法：你知道有多少中央委员，姓甚名谁，答不上来，他就说你问题解决不了。上面的人根本下不去，不了解情况。

蹲点问题

（1964 年）

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调查没有研究，实在气得要死。红军到一个地方，屁股坐不住，吃了就走，当时林彪同志说要有“灵活战术”，大家反对说这叫新花样，“步兵操典上没讲，步兵操典是人家经过流血写出来的，搞什么新花样”。

蹲点不蹲点，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一不请教工人，二不请教技术人员，这怎么行？不了解情况，为什么不学？应该懂些嘛。搞了几年了，恐怕就是不蹲点，毫不知道。可以到白银厂学习，没有到工厂学习，不向工人学习，不向技术人员请教，总是内心无主。蹲点也要采取比较法，比学赶帮，首先是比较法嘛，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也是比较嘛。

论实事求是

（1964 年）

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必须有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具有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

一、实事求是，就是要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下，一切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研究和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根据和向导。

二、实事求是，必须从实际出发，善于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决定方针、政策、路线。根据新的革命形势提出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三、实事求是，就是一切工作都要服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利益出发，实行某种改革，要完全根据人民的自觉自愿，既要耐心地等待群众的觉悟，让群众有所比较和选择，由群众自己下决心，又要积极地创造条件，做出榜样，进行宣传，说服群众，既要从本质发现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的积极性，又要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进行一切工作。

四、实事求是，就是要客观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认清事物的现象与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创造力量，至于个人的革命事业中，不过是一个小小螺丝钉。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

我们，任何一个成就，都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个人离不开集体的，个人想做一点事业，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如果我们真正深刻理解到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我们便会自觉谦虚起来。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可以提高我们对前途和方向的认识，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的思想从狭隘范围里解放出来。当人们的眼界看到脚下，而看不到高山和大洋的时候，他是会像“井底之蛙”那样自负不凡的，但当他的头抬起来，看到宇宙之大，事物之变无穷，人类事业雄伟壮丽，人才之多和知识之无限，他便会谦虚起来，我们所从事的天翻地覆的大事业[1]。

---

[1] 原文如此，疑缺字。

小资产阶级的通病

（1964年）

一、在日常生活上的表现：

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生活上吊儿郎当，毫不紧张，不严肃，不守纪律，不爱护公共财物，不顾团体利益，大家睡觉，他要唱歌，大家起床，他又要睡觉，大家开会，他开小会，上课他要活动，该活动，他要看书，高兴时嘻嘻哈哈，不高兴时死气沉沉，触发自己留恋的心情就悲痛难过，甚至伤感流泪，所谓“见花落泪，望风伤感”，生活中吃不得苦，怕劳动，怕碰钉子，以幻想代替现实。

二、在工作中：

情绪忽高忽低，和兴趣主义投机时，则热情奔放，消极时则垂头丧气，好高骛远，不肯埋头苦干，好做领导工作，否则就认为大才小用，埋没英雄，做一行怨一行，这山望着那山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肯干，就是干起来也是无计划，事情逼到头上来——粗枝大叶，应付差事，强调工作困难，不去研究克服，强调个人发展，不顾工作需要。

三、在学习上：

对学习不重视，就是学习还是乱抓一把，茫无头绪，虎头蛇尾，学习就是不从实际出发，往往满足于一知半解，空洞教条，缺

乏研究精神，学习内容喜好文艺的、不正确的小说，而不学习理论和实际问题，好唱大道理。

四、在写作和谈话上：

脱离实际，总喜欢从主观出发，不看对象，夸夸其谈，藉以骇人听闻，实在言之无物，在写作上要么就不写，要么就连篇累牍，洋洋得意，所谓不鸣则罢，一鸣则惊人，实在不切实际，无病呻吟，写几篇抒情文章，就像有些学校的墙报，什么“秋夜怀念”呀，“可爱的月亮”呀，甚至以自己的感情来代替群众的感情。

五、在待人接物上：

情绪相投时，则无话不谈，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性格不合则清高孤独，不理睬，所谓“话不投机半句多”，对别人则多疑而苛刻，对自己则无原则的宽容，平时爱打听别人的秘密，作为知己朋友谈话的材料，爱拉乱谈，说谈家，批评家，当时不说，背后乱说，人家出了乱子则幸灾乐祸，人家有了优点则嫉妒风生。

六、在男女关系上：

对男女关系问题，说起来津津有味，不是严肃地研究讨论，而是求得知识上的愉快。要谈恋爱不是政治第一，而是感情第一，甚至抱有自由主义态度。

七、在团结观点上：

重视个人利益，固执己见，个人利益高于群众利益，领导能力强就服从，否则就看不起，发牢骚，闹分裂，你有一套，我也有一套，所谓文人相轻，行动自由，不管团结，允许不允许，就开路一马司。

八、在政治斗争上：

夸大个人英雄主义作风，忽视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斗争性

不强，不坚持原则和立场，易犯调和主义，不是过“左”就是过右。

九、群众观念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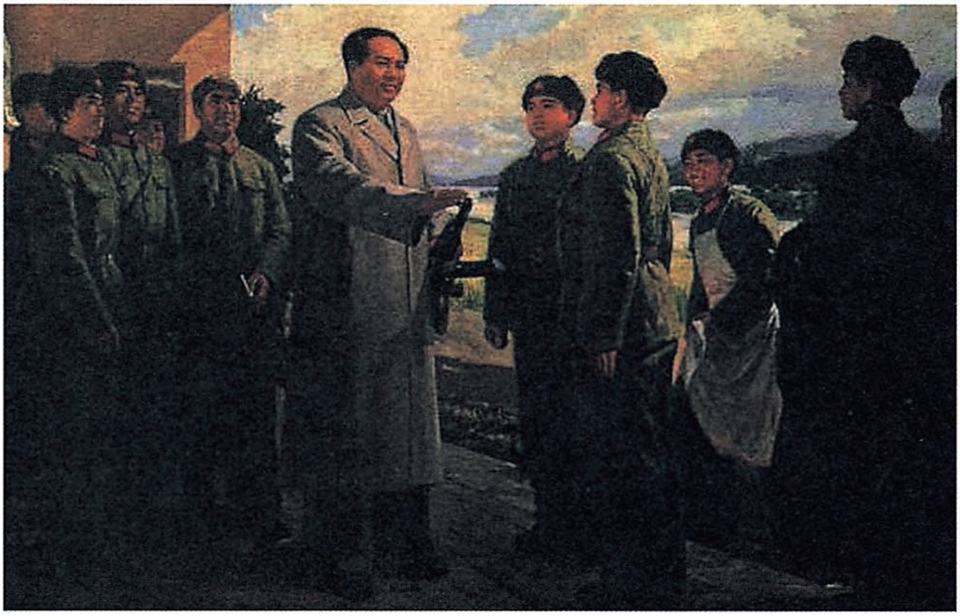
喜欢爬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不深入群众，对阶级没有明确的爱和憎，只是站在当中，对劳动大众可怜，对地主无所谓。

《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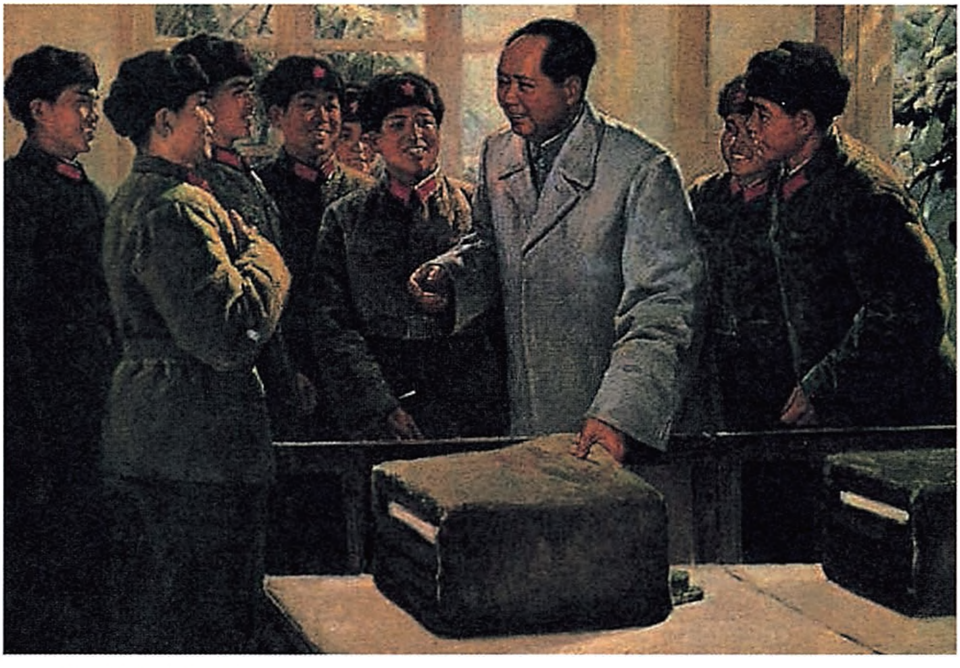
（1964 年）

现在全国学习解放军、学大庆，学校也要学习解放军。解放军好，是政治思想好，也要向全国城市、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的先进单位学习。

国家工业各部门，现在有人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习解放军。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看来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提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还有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



《伟大的教导》（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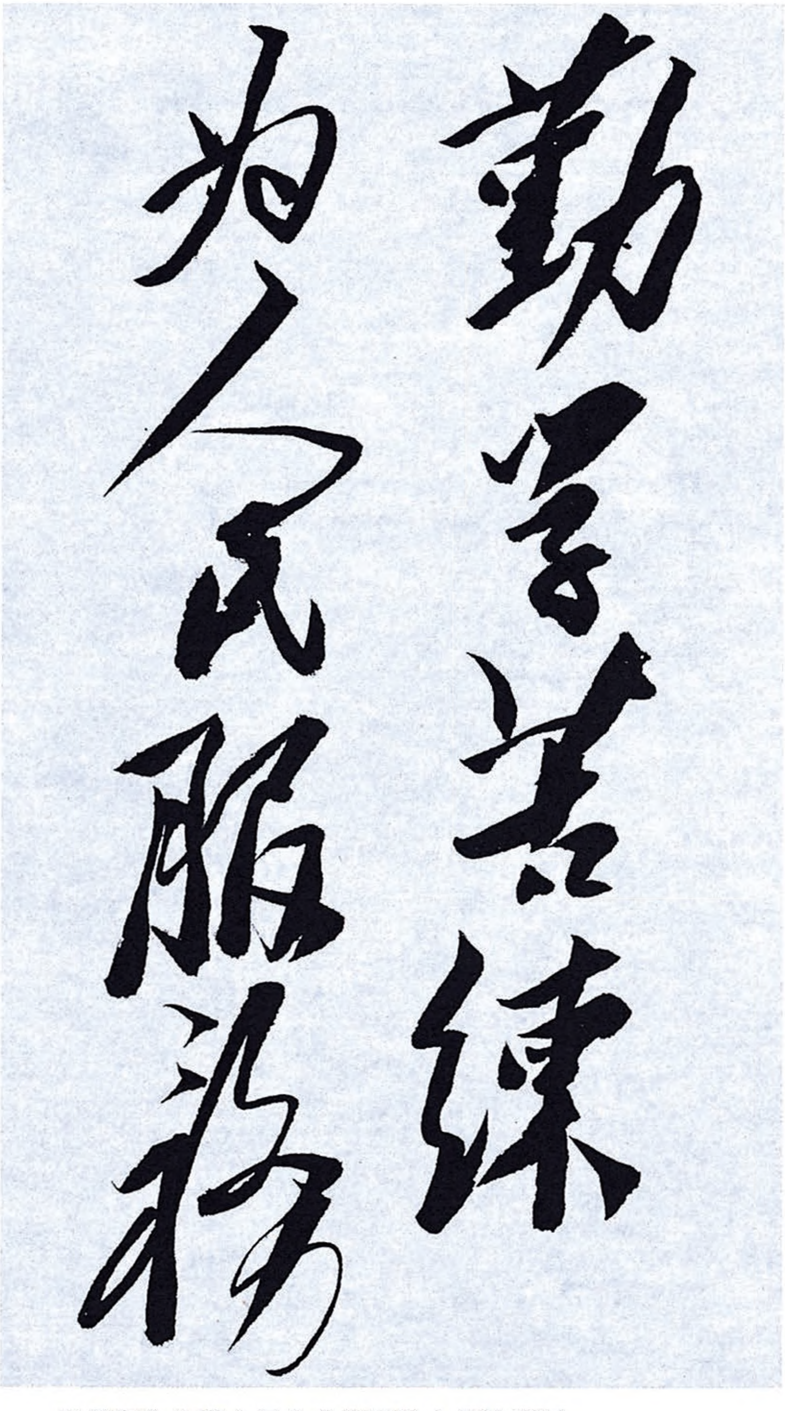


《温暖》（油画）

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

（1964年）

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



勤学苦练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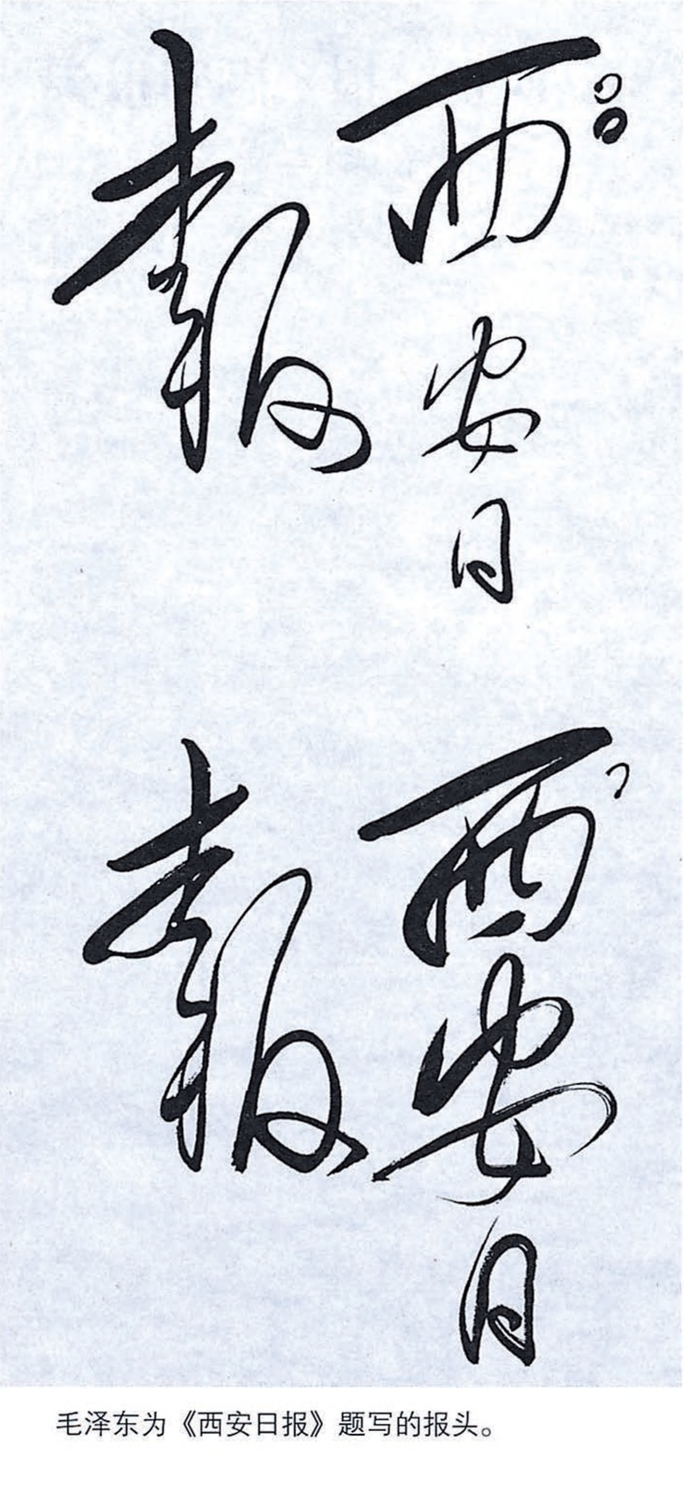
为《西安日报》题写报头[1]

（1964年）

西安日报

---

[1] 《西安日报》作为中共西安市委机关报创刊于1953年7月1日，1981年改为《西安晚报》，1994年1月1日复刊。在出刊期间，该报曾几易报头。1999年12月26日，经市委批准，该报启用了毛泽东题写的“西安日报”报头。



毛泽东为《西安日报》题写的报头。

为《农村四清报》题写报头

（1964年）

农村四清报

十六字令·八首

（1964年）

龙[1]，
隐雾驱云驾长风，
骤雨霁，
天际起霓虹。

灯[2]，
黑沉迷途指归程，
红光闪，
万众获重生。

泉[3]，
杳然无底是灵源，
清澈澈，
谁人藏心间。

---

[1] 龙，指革命者。

[2] 灯，指革命行动。

[3] 泉，指革命热情。

水[1]，
群众饥渴饮且醉，
被颠倒，
从此夜生辉。

雷[2]，
孤夜深深独不寐，
隆隆轰，
斩断万年碑[3]。

秋[4]，
百花杀尽犹未休，
狂飙动，
神州落荒流。

枪[5]，
荧光冥冥过冷芒，
忽而怒，
平地三尺浪。

---

[1] 水，革命理论。

[2] 雷，革命运动。

[3] 碑，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4] 秋，指革命年代。

[5] 枪，指革命武装。

花[1]，
可怜羞弱不胜压，
昨夜雪，
娇藏在冰崖。

---

[1] 花，指革命女将。

七绝·贾谊

（1964年）

贾生才调世无伦，[1]
哭泣情怀吊屈文[2]。
梁王堕马寻常事，
何用哀伤付一生。[3]

---

[1] 贾生才调世无伦，本句借用李商隐《贾生》句：“贾生才调更无伦。”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初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迁为太中大夫。文帝想任他为公卿，因遭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才调，指才气、才能。

[2] 吊屈文，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后，渡湘江时有感于屈原忠而见疏，作《吊屈原赋》，“因以自喻”。

[3]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贾谊后被征拜为梁怀王太傅，因梁怀王堕马而死，他认为自己“为傅无状”，忧郁自伤，不久去世。毛泽东非常赞赏贾谊的才华，认为他因哀伤而死不值得，并感到很惋惜。

七律·咏贾谊

（1964年）

少年倜傥廊庙才，[1]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2]
胆照华国树千台。[3]
雄英[4]无计倾圣主[5]，

---

[1] 少年倜傥廊庙才，本句是说，贾谊年少有才，豪爽洒脱，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据《汉书·贾谊传》载，贾谊18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文章，为郡人所称；20多岁任博士，一年之内超迁为太中大夫。廊庙，指朝廷。廊庙才，指才能和才气可任朝廷要职的人。

[2] 胸罗文章兵百万，胸罗文章，指贾谊胸有锦绣文章。他的政论文如《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策略和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才能。兵百万，比喻贾谊的治国策略好像统军韬略，能指挥百万军队。

[3] 胆照华国树千台，胆照，肝胆相照。华国，即华夏，这里指汉王朝。树千台，指建立众多的诸侯国。汉制设立“三台”，即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建立众多的诸侯国则势将设立“千台”。贾谊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他在《治安策》中指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4] 雄英，出类拔萃的人。

[5] 圣主，借用古代称颂帝王的惯用语，这里指汉文帝。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1]，
空白汨罗步尘埃。[2]

---

[1] 长沙傅，指被贬谪为长沙王太傅的贾谊。

[2] 空白汨罗步尘埃，空白，徒然说。汨罗，即汨罗江，在湖南省东北部。这里化用屈原自沉汨罗江的典故。步尘埃，即步后尘。贾谊虽没有投江而死，但因梁怀王堕马死而忧伤死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后尘，尤其是屈贾的政治命运相同，都是因谗遭贬，壮志未酬。

1965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对贺龙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言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65年1月3日）

一

有两处[2]改了几个字。

毛泽东

一月三日二时

二

我国人民和军队，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培养起来的革命精神，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革命传统和革命作风，是我们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军队独有的精神力量。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贺龙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题目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永远是我国国防建设的指针》。

[2] 毛泽东对贺龙发言稿的一处修改，见本篇二，另一处修改是对发言稿中一个用词的修改。

关于“四清”运动的一次讲话

（1965年1月3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就开会。有的同志说，打歼灭战怎么打法？一个二十八万人的县集中一万八千人，搞了两个月没打开，学文件就学了四十天，学习那么多天干什么？我看是繁琐哲学。我不主张那种学习。光看是没有用的。（刘□□：河南有几万人集中在几个地方，搞了四十多天，是反右倾，搞清楚一些问题。）（刘子厚：我们集中也是反右倾放包袱。）有成绩没有？文件一天就读完了，第二天就议，议一个星期就下去。主要是在农村学，向贫下中农学习。我的一个警卫员，二十一岁，他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这次下来才知道了些东西。”就是学一个礼拜文件，下去就进村，向贫下中农学习么，他说还有几怕，怕死人，怕扎错根子，怕这个怕那个，那么多怕就不行。二十八万人的县有一千八百个干部，还说少了，要那么多人，我看是人多了。工作队那么多人，你又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县的二十八万人？依靠那里的好人？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个坏的，还有二十七个是好的。有二个坏的，还有二十六个是好的。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呢？一万人两万人搞一两个月还搞不起来。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就是没依靠好，如果依靠好了，一个县十几个人就够了。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那么革的。一两万人搞一两个小县，倾盆大雨，

几个月还搞不起来。以前安源煤矿办工会，……安源工人我们一个都不认识。一去就公开讲：有哪些人愿意进夜校。开始找到了工头，他有两个老婆，是否搞了俱乐部?（□□□：没有搞。）搞了三个月，罢工就罢起来了么。

我看一进村和群众见面后，开门见山宣布几条就行了：

一、向社员宣布我们来不是整你们的。还有一部分老实的地富是否也可以宣布，不是整你们的，除了一部分漏划地富、一部分有严重问题的反革命和投机倒把分子以外，小偷小摸统统免了。开门见山讲是整我们党的内部，不是整社员。宣布我们来意不是整你们的。你们有什么不对的事你们自己去谈，我们不听你谈。社员中有严重的，极个别的也可以谈谈，这是极少数。

二、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的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有多吃多占的，有多吃多占很少的，也有什么都没有的，几十元的，一百元、二百元以内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经过群众批准就拉倒，也只有这一点么！你讲出来没有事了，不讲出来就有些事了。

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退赔得好，可以不戴帽子，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

我看进村以后个把月要开个大会，以县为单位开个大会，一个小队来一个小队长，两个贫下中农；一个大队来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公社来书记、社长。分几次开，一次开一天就行。先讲来意，话不要讲长，讲半个钟头就顶多了，讲一个钟头大家就不愿听了，让他们下去传达。二十八万人的县，三千多个小队。一个生产队三个人，一万人上下，一次开不起来分两次三次开，一次开一天。开个万人大会，就安民了。这样冷冷清清，搞那么多工作队，几个月

搞不开，又没有经验，不会工作的人占大多数。通县去了两万多人搞一年多还没有搞开，有不会工作的，有做官的，我看这样革法，革命要革一百年。工作队里去了一些教授，不如助教，助教不如学生。书读得愈多愈蠢，啥也不懂，就是这个事，此外没有了。

这样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要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不浓厚了。这个搞法和我们过去搞法不一样。要几个月歼灭敌人，我看方法要改，不依靠群众，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

你们（指刘子厚）张承先、地委书记李悦农带队，几个月搞不起来，想个办法吧！为什么搞不起来！（刘：是强调扎根串连搞慢了，我在任县是大会小会结合搞的）干部会、贫下中农会可以在大队开，也可以去县里开。去年湖南省开了一个全省的贫下中农代表会，结果不错，今年增产粮食二十亿斤，我看起作用了。那么怕，怕扎错了根子，你钻到那里头去了。进村要开大会，贫下中农包括漏划的地主和富农统统都来，宣布几条，双十条不要一条一条地那么念。

真正的领导人、好人要在斗争中才能够看出来，光靠访贫问苦看不出来。访贫问苦，我就不相信。一不是亲戚，二不是朋友。粤汉路组织罢工，我在长沙。我们不认识一个人，还不是找了两个工头，一个叫朱绍廉的有两个老婆，他也要革命，因为工头受压迫，工资少，不够用，这个人后来还不是英勇牺牲了。哪里是这样的扎根串连的方法？你去发展，去搞群众运动，去领导群众斗争，在斗争中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么，然后在斗争中造出自己的领袖来。（刘子厚讲了他自己去任县蹲点开斗争会的办法）这些斗争大会也应该讲去年分配，讲工分，注意生产。南方有，北方没有？有灾救

灾，无灾清工分，搞当年分配，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头。“四清”是清干部，清少数人。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也有清的吧！身上没有虱子，一定要找出虱子来！（刘□□：一个高潮一个高潮地来，不能拖延，拖延反而搞不彻底。）一个时期，文件学习四十天，搞繁琐哲学。我跟前那个警卫员来信说：学了四十天文件，仍然不懂，下去蹲了点才懂了。我历来反对这样读文件。学文件四十天是迷信。要开大会，搞斗争，搞地县的三级斗争会。

谢富治那个办法值得采取。抽出百分之二十的人来训练。六千人的工厂总有五千人不依靠，为什么不依靠五千人，只依靠你们工作队的五百人呢？我看有你一个人就行了。一个部长依靠五千人还搞不开？不要纠缠在文件上，训练那么久？搞斗争么。过去我们打仗，一拉起就打。有打胜的，有打败的。什么书也没有。有人说我带《三国演义》打仗的，谁照着书来打仗？林总过去打仗是内行，□□过去也是内行。□□□也是内行。内行也好，外行也好，要打才能学会。你不打仗光在那里学，怎么能行？（问谢富治）你们搞了一千多人的训练班是不是也是学双十条？怎么学？学多久？（答：也学了点，很快就搞斗争了。）为什么不可以大队为中心或以社为中心开训练班？所谓训练班就是斗争会，就是要在会上了解情况，了解各种人物，进行调查研究。要把斗争的人斗得差不多了，然后指定个把人作总结。总而言之，我的意思是依靠工农群众。河北省新城县张承先、李悦农当了多少年干部不懂群众运动。那么多人冷冷清清没有搞开。李□□是保定地委书记，他首先提出“四清”，他下去要搞别的，群众要搞“四清”。他听群众的，……就是一九六二年提出搞“四清”的保定地委书记李□□，原因是那时有个压迫在前面，打仗也好，搞农民运动也好，搞工人运动也好，工厂有资本

家，农村有地主豪绅。国民党政治军事都在压迫着我们，我们无法可想，只好依靠群众。那时党员干部又少。几千人万把人的工厂，一个党员也没有。有一个就可以搞大革命、搞罢工。粤汉铁路一个党员也没有，可以搞大罢工。你后来建党么。现在进了城，当了官，就不会搞群众运动了。

为什么过去上军校的人打起仗来不翻书，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是正式军官学生。学生训练，操一操，练一练，就毕业了。林彪同志说：出来当连长根本不会打仗。班长有经验，听班长的话。他说怎样就怎样，打上几次就会打了。我不相信学了就会打仗，一个知识分子读了几年书就会打仗。不会打仗是合乎情理的。打几年就会了。我们工作队是否出了些主意？（刘□□：贫下中农的主意多，我们也出一点，主要是群众的。）要听他们的。要听群众的，要听贫下中农的。就是发动群众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命。要搞大的，小的刀下留人。（刘：一个是把群众发动起来，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到一定时候，工作队要掌握住火候，要善于观察形势。何时进攻，何时后退等等）等于罢工一样，什么时候罢工，什么时候复工。打仗也是一样，还是进攻，还是退却，实在不行你不退啊！有时候双方都退。比如打高兴圩，蒋、蔡向赣州退，我们向山沟里退，各退各的。

（问陈伯达）天津开了多大的会？（陈答：略）不得了，糟糕！多浪费时间，就不要开么！（陈插话：略）一千多户去那么多工作队，人多展不开。搞人海战术不行。一千多户你依靠七八百户就搞起来了。有一个陈伯达就够了。嫌人少再带一个去，无非是宣布：我叫陈伯达，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开个会。无罪的是多数人，有罪的是少数人，依靠多数人么！

（总理插话：刚才陈毅讲张茜学了两个月才进城）越学越蠢。反右倾，结果自己右倾。张茜在哪个县？（□□□：句客县。）我历来反对学文件，一个文件几个钟头就看完了，你带下去学么。下去一不要学文件，二不要人多，三不要孤立地扎根串连。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我身边的娃娃学四十天文件还不知道讲些什么，下去才知道。另一个在通县说教授不懂，助教好一点，学生更好一点。我对孩子讲，你读十几年书越读越蠢。什么也不读，你向大家说，我二十几年是靠吃蜜糖长大的，什么都不懂，请叔叔伯伯大娘指导。还是学生比助教好，助教比教授好。教授书读得太多了，不然怎么是教授。这些人下去是阻碍搞“四清”的。他们的目的是不要搞“四清”的。

一个是谢富治的经验，办训练班搞斗争。一个是河南经验“三结合”开斗争会。他们搞斗争也搞了一个月四十天。他们不是读文件，而是搞斗争，发动群众，了解情况。总而言之，搞斗争。（□□□：我所在的那个大队，搞了两个月，搞出两万多元，十几万斤粮食）还是有油水搞，向他们借点钱用，他们的钱多得很，群众还是有希望的。照顾五保户也好，搞生产也好。会不能开得太小了，有的生产队十几户，十几、二十几个人，讲话打不开情面。一个大队十几个生产队开大会顶多也是几百人么！

现在搞不起来，其原因就是不开大会，不宣布来意。

从来没有看到要这么多人，那么多人我就不相信能搞好。

总之，要依靠群众，不能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不了解情况。或者没有知识，有的做了官，阻碍运动。工作队本身有的人就不能依靠。现在已摆成这么个阵线，一个通县，一个新城县。谁叫人少，

我就砍一半，再叫人少，再砍一半。通县二万人砍一半分到别处去。一个县有五千人还不行吗？（康生插话：扎根串连是邓老发明的。……）啊，是邓老发明的！神秘化么！不宣布来意。要宣布我们做的事，生产、分配、工分，搞这几件事。“四清”讲一点，清不清，群众讨论。有就清，没有就算了。群众的不清，开个会要有几百人，小队十几户人少，以大队为单位开。说县里开了会了，讲出去可灵哩。县委书记问题严重的，当工作队到别的县去。照现在搞法，我看太繁琐了。你陈伯达那个是一千多户，开始几个人也搞开了。以后加了五百人，要那么多人干什么？（邓□□插话）讲长一点，反对急躁情绪。讲五、六年，三、四年，两、三年完成岂不更好。方法很重要，一个县集中一万多人是多了。一九二七年搞农民协会，一个县一个人，是农民自己搞起来的。没有好几个干部。农业部、财务部、武装部……七八个哩，开始都是些勇敢分子，包围县城的也是那些勇敢分子，要求过分彻底，实际上不能那么彻底，当权派少数人是混进来的，是严重的，大多数是能够争取改造过来的，还有用处。过分了，群众不一定赞成。我们想开一点，可能快，不能那么太彻底。（刘插话）工厂中要可靠工人占优势。

工作队不一定太干净，一定要把有问题的人开除出去吗？不一定。工作队中可以有贪污、投机倒把的人，只要他交待就行。我们这些人对贪污、投机倒把没有知识，没有经验，他们有经验，没有他们还不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向问题没有解决，如何打法？这样多人反而搞不开。不如陈伯达的办法。靠人海战术不行，要出问题。

王□□提出干部交换问题，从这个县到那个县，这个社到那个社。来了新人不摸底，群众敢讲话。新社长、新书记来了，就敢讲

以前的。很快就可以搞开的，为什么要很久？

现在是工作队不要那么纯洁。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没有群众运动。一万多两万多人在一个县还嫌少？（刘□□、邓□□……）

贫下中农协会就是要把问题搞清楚，跟陶□他们说。

给勃列日涅夫的答谢电

（1965年1月5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

在我七十一岁生日的时候，承蒙来信祝贺，谨致衷心的谢意。

祝伟大的苏联人民在今后各项建设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

祝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祝中苏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五日

1965年1月5日，毛泽东在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和李四光亲切握手。

1965年1月，毛泽东亲切接见生化学家彭加木。

1965年1月，毛泽东和宗教界政协委员在一起。

1965年1月，毛泽东亲切接见武汉杂技团著名演员夏菊花。

和斯诺的谈话[1]

（1965年1月9日）

斯诺（以下简称斯）： 我来这里见主席之前曾看了主席的军事著作，联系南越军事专家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说，现在南越战争[2]已经进入到运动战阶段，像中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我们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全国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起，那时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我们的军队也有一百多万。从规模上说，现在南越战争还没有那么大。你可以劝劝美国政府，何必这么搞？它一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人就学会打仗。但是，叫它走，它又不走。就说吴庭艳吧，我和胡志明[3]都认为他还不错，应该帮他维持几年。可是美国将军认为吴庭艳很讨厌，把他干掉，这样天下就太平了？

斯： 当然现在南越解放军的人力不如中国的八路军和后来的解

---

[1] 这是毛泽东同美国进步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的一部分。

[2] 南越战争，即越南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为了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破坏日内瓦协议，在越南南方扶植建立以吴庭艳为总统的亲美的“越南共和国”。1961年，美国对南越发动由美国出钱出枪、南越吴庭艳集团出人的“特种战争”，镇压越南南方军民的武装反抗。1965年年初美国一面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连续轰炸，一面向越南南方增派大量军队，把侵越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

[3]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放军，但是西贡[1]也没有蒋介石那么多的军队。

毛：没有那么多，也不懂得打仗，比蒋介石更差。

斯：是不是可以认为，南越有足够的力量能单独克服外来的干涉和反对当地反动派？

毛：我看是可以的，至少比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候的条件好。我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没有外国直接干涉。现在南越的好处就是有两万名美国人在那里，这就能教育大部分的人民和军队里的战士以及部分军官。现在反对美国军队的那些人，并不全是解放军，吴庭艳也不赞成美国，现政府军队中也有些人不赞成美国。

斯：很明显。

毛：他们吵得厉害。

斯：有可能使南越军队的一部分人参加越共？

毛：是的，像傅作义[2]一样，像新疆的陶峙岳[3]和湖南的程潜[4]、

---

[1] 西贡，这里指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其统治中心在西贡。

[2]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安昌村（今属临猗）人。曾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1949年1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等职。

[3] 陶峙岳（1892—1988），湖南宁乡人。曾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9月率部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4]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军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与陈明仁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南省省长等职。

陈明仁[1]一样。

斯：从我前次来中国后，国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非洲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否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重要？

毛：你说呢？我也不大清楚，我又没有到处走。你到处走，是怎么想的？我想请你当教员，把国际情况讲一讲。

斯：我相信主席可以回答，我无法回答，或者只好等主席的下一本书了。从主席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主席特别重视的那些事件，从这里是否可以认为帝国主义和亚非拉的新兴力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毛：我看美国总统也是这么说的。前任总统多次说，美国、加拿大、西欧问题比较少，问题严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2]多次讲话都讲这个问题。他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有消息说，他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当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阿尔及利亚人问我，我的著作他们利用，法国人也利用，怎么办？说这话的是当时的总理阿巴斯，他访问过中国。我说，怎么利用？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救其失

---

[1] 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政府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官。1949年8月与程潜率部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

[2] 肯尼迪，1960年至1963年任美国总统。

败。法国人也没有因为看我的书而挽救其失败。现在我们也研究美国的军事著作。美国驻南越大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写了一本书，叫《不定音的号角》。看他那本书的意思，他是不大赞成核武器的。他说，在朝鲜战争中没用过，在中国解放战争中没用过，他怀疑以后的战争能够用这种东西制胜。他要争陆军的人数和用费，但是同时说也要造核武器，二者平行发展。他说陆军是需要的，要保持八十至九十万人。陆军要坚持陆军的人数，空军要多搞飞机、多搞核武器，海军有海军的主张。他代表陆军，要争取陆军的优先权。现在他又得到在南越实验的机会。他是去年六月去南越的，还不到一年，不如在朝鲜呆得久。他会取得经验的。我已经看到美国军队怎么对付南越游击战争的条例，无非是讲南越游击战争的许多长处和许多缺点，然后说消灭游击队是有希望的。

斯：美国人的弱点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毛：可能是。就是南越政府不得人心，无论吴庭艳政府也好，当今政府也好，都是脱离群众的。帮助这种不得人心的政府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仅我讲的话他们不听，你讲的话他们照样也不听。

斯：过去没有听我的话，所以我认为他们才有那么多的失败。现在可以看到亚非拉同发达国家在军事、经济方面的距离越来越大，同时，新殖民主义的所作所为使距离更大了。这是不是主要矛盾？所以法国的政策有改变，是不是不仅为了抵抗美国，还为了适应这个主要矛盾？

毛：我也同法国人讲过。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我问他们第三世界究竟包不包括法国，他们说不包括。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例如发达的英、法、德、意、日之间，就发生两次世界

大战，这还不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打吗？其目的是争所谓不发达的国家。它们为什么要打，是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吗？你没有参加这个战争，你们前任总统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任总统也参加了。

斯：那时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

毛：呆了多久？

斯：两年半。战争结束后，在英国、法国呆过。我从未打死过人，我倒有几次几乎被打死。

毛：那么危险！也跑到前线去？

斯：战地记者是战争的附属品。在俄国我没到过前线，在德国、法国到前线去过，打斯大林格勒时去过斯大林格勒。

毛：打前还是打后？

斯：希特勒军队投降时去的。

毛：那时希特勒可了不起，差不多占领了整个欧洲。除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一线以东之外，整个欧洲几乎都被他占领了，但是英国不包括在内。他还占领了北非洲。希特勒犯了错误，如果敦刻尔克[1]之后他的军队跟着进去，英国也毫无办法。这是一位英国首相[2]在日内瓦告诉我们周恩来总理的。那时英国根本

---

[1] 敦刻尔克，是法国北部一海港城市。这里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军队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事。1940年5月，德军进攻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侵入法国，击败英、法军队。英国远征军22万人、法军20万人被迫退到比利时、法国沿海地区，面临被歼灭的危险。5月27日至6月4日，英军及部分法军共30多万人从敦刻尔克地区越过英吉利海峡撤往英国。虽然撤退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但保存了有生力量。

[2] 指艾登。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他任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1955年至1957年任英国首相。

没有兵了，到处没有设防，可是就是因为有英吉利海峡，德国不敢过去。

斯：希特勒急于打俄国。关于中美关系改善有没有希望？

毛：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斯：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毛：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多少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打到我。

斯：在延安时？

毛：好多次。在长征路上也有一次，过了大渡河，遇上飞机轰炸，把我的卫士长炸死，这次血倒没有溅到我身上。

过去我当过小学教员，你是知道的，不仅没有想到打仗，也没有想到搞共产党，同你差不多，是个民主人士。后来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搞起共产党来了。总之，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这是事实。

斯：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

毛：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

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斯：美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封建主义，南北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反封建。

毛：就是为了争劳动力，所谓解放黑奴就是开放劳动力市场。

斯：美国南方封建主统治时间虽然不长，但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是很深的。

毛：现在南方还比较落后一些。

斯：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主席一定会听到有人说，主席认为如果发生一场核战争，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全部消灭，中国还留下几亿人口。

毛：你说怎么样？

斯：实际上已由主席间接回答了，在中国同苏联的论战文章里也提到了。

毛：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斯：我恐怕也忘了，不过我记得有一篇文章里说到，这是撒谎，是硬把这些话加到主席身上的。

毛：怎么说的？

斯：说如果发生核战争，中国还会留下几亿人口。这是一位南斯拉夫人在五十年代后半期访问中国时，主席向他说的。

毛：我记不起来了，可能我说过。我记得说的是，我们是不要打仗的，我们没有原子弹，如果别的国家要打，全世界可能遭殃。遭殃无非是要死人，死多少，谁也不知道，总要死一些。我不只是说中国。我就不相信原子弹能把全人类毁灭，什么都毁灭了，找不

到任何政府谈和了。这是同尼赫鲁[1]在北京的一次谈话里谈到的。他说他是印度原子能委员会主任，他知道原子武器的厉害。我说可能不是如他所说，核战争后会找不到任何政府谈和。这个政府倒下去了，那个政府又会起来，总会有人起来的。我没有说过全世界都会毁灭。听说你们有个电影叫《在海滩上》。

斯：那是假想小说，说全人类毁灭了。

毛：这怎么得了啊！赫鲁晓夫[2]说，他手里有一种弹，一种什么死光[3]，可把整个人类、动物、植物统统消灭光，后来又说没有讲过，几次否认。我不否认我说过的话，你不要替我否认这个所谓谣言。

斯：我的书里也说主席也可能这么说的，目的是看看对方的反应怎样。

毛：这是因为有一位大国政治家说，那时将找不到任何政府了，我反驳他的意见。

斯：就是在这样情况下第一次提的？

毛：是的。这是一九五四年十月的事。美国人说什么原子弹毁灭性严重，赫鲁晓夫也说得很神气，他们都超过我，我比他们落后了。是不是这样？相当落后。最近看见报道说许多美国专家访问比基尼岛[4]，他们登陆后看到老鼠照样在跑来跑去，鱼照样在湖里游

---

[1] 尼赫鲁，1947年至1964年任印度总理。

[2] 赫鲁晓夫，原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3] 死光，即激光。

[4] 比基尼岛，是马绍尔群岛中的一个珊瑚岛，1947年成为美国托管地，曾经是美国的核试验基地。

来游去，井水还能喝，植物茂盛，鸟类很多，专家在进岛时要开辟道路，砍掉树木。这是在这个岛经历过十二年的核武器爆炸试验，隔了六年再去的。爆炸之后大概有一两年生物是倒霉的，然后又生长起来。为什么老鼠根本不受影响，没有毁灭？因为它们钻到洞里去了。植物为什么那么多，不受影响？大概死了不少，剩下一点又生长起来，经过几年又大大发展起来。

斯：我看过一部电影，在氢弹爆炸不久，生物都死光了，海龟跑到岸上去下蛋，但是不生小海龟。

毛：过几年可能又会生的。对人类是不是也这样，就不知道了。

斯：甲虫生命力最强。

毛：总之，对那地方的鸟、树、海龟说来，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可能人类要比它们脆弱一点。

斯：人对自己制造的毒素更易受灾。蚂蚁认为自己统治世界，它是世界之主。

毛：什么人在蚂蚁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蚂蚁还是比较大的动物。细菌是在做人所不能做的事。全世界只有这么多的人，三十多亿。但是据土壤学家告诉我，每亩地里含有细菌四百公斤。没有细菌不能造成土壤，也不能生长植物。所以不要看它那么小，什么人的身体里它都能钻进去，不管你是总统也好，新闻记者也好，它可厉害了。

斯：细菌根本看不见的。

毛：人离开它是不能生活的，不知人体中有多少细菌，医学上说，有大肠杆菌，口腔里有真菌，没有它对人很不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一致的意见。美国专家在比基尼岛的调查是很好的材料，我们把这个材料印发给人大代表看了。

斯：这是公开报告？

毛：不是，是一个中国人引用美国专家材料写的一篇通讯，那篇通讯登在香港的《新闻天地》上。

斯：虽然如此，主席并不是认为核战争是件好事？

毛：对。根本不要打核战争，要打就用常规武器打。

斯：看来亚非拉地区越来越近代化，革命越来越发展。

毛：可能。

斯：亚非拉国家的革命是不是可以在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下完成？

毛：完成就难说了，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

斯：关于印尼退出联合国问题，中国表示支持。这是否会为其他国家退出联合国开创先例？

毛：开先例的是美国。美国不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提出要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才能进入。中国没有进入联合国，不是也很好吗？印尼退出联合国，也是它觉得参加联合国没有什么好处。

斯：能不能说中国不想进入联合国？

毛：不能。如果联合国三分之二的国家要我们进去，而我们不进去，不是要说我们是民族主义者了吗？但我们要联合国撤销中国是侵略者的诬蔑，同时要指出美国是侵略者，你看这个理由行吗？中国作为一个侵略国家怎么能进联合国？说美国是侵略者，它不会同意的。现在我们还不想进去，美国也不愿意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了，美国会感到碍手碍脚。在这点上，双方是有一定的共同之处的。现在还是让蒋委员长留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吧！这些话你可不要报道，我们还没有公布过。

斯：是不是可能有一个没有美国的联合国？

毛： 亚非会议[1]就没有美国参加。

斯： 还有新兴力量运动会[2]。

毛： 中国很大，自己要办的事很多，也很忙。中国也是一个“联合国”。我们这个“联合国”接待你，那个联合国还没有接待过你吧？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中国？

斯： 再过几天就走。这次我回去，约翰逊[3]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你有什么口信要捎给他吗？

毛： 没有。

斯： 我也可以把这句话捎给他。

西方有些“毛学”专家，互相展开争辩，观点各有不同。我不久前在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北京问题专家”的会，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对马列主义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 是一些什么人？出版商吗？

斯： 主要是大学教授，俄文、中文专家。辩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是，《矛盾论》是不是真的在一九三七年写的，是不是在《辩证唯

---

[1] 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埃及等，共29个亚非国家。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反殖民主义斗争、世界和平以及与会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发表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

[2] 新兴力量运动会，是1963年11月10日至2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新兴力量国家及地区参加的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运动员。

[3] 约翰逊，当时任美国总统。

物主义》[1]小册子之前写的。

毛：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

斯：当时有时间做研究工作？

毛：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

斯：《矛盾论》是讲演的一部分？

毛：就是。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我讲课的时候，不准他们看书，也不准他们做笔记，我把讲义的大意讲了一下。

斯：是在写《辩证唯物主义》小册子以前几年？

毛：我不记得写过那样一本小册子。其实，《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实践论》是讲认识过程，说明人的认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向什么地方去。

斯：这两篇文章是同时写的吧？

毛：先后不久。

斯：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吗？

毛：不是一九三八年，三八年忙起来了，是一九三七年。

斯：现在我可以告诉那些教授们，主席自己是怎么讲的。教授们在进行学术性辩论时，可能还坚持他们的看法。主席看过黑格尔[2]的文章吗？

---

[1] 指1937年7月、8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哲学而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后来，毛泽东将其中的两节，整理成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

[2]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辩证法大师。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法哲学原理》等。

毛：看过一些，还有费尔巴哈[1]的。海克尔写的一本书[2]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斯：什么时候读的？

毛：那很久了，是打游击战争的时候。

斯：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毛：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一百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斯：一千年是很长的时间。

毛：今后的一千年比过去的一千年可能变化大。

斯：深刻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毛：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斯：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毛：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

---

[1] 费尔巴哈（1804—1872），德国古典哲学家，唯物主义的代表。主要著作有《黑格尔哲学批判》《基督教的本质》等。

[2] 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海克尔（1834—1919），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卓越代表之一。他在《宇宙之谜》一书中，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试图根据最新的科学成就建立严整的唯物主义体系。

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现在中国强调在青年中保持革命精神。重要的是否在于给类似国家树立榜样，促进其他国家革命，以使中国革命得到最后的安全？

毛：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资本家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你刚才说的最后这一点，很难讲。你讲有什么安全？现在不是在说裁军吗？究竟哪一年裁军了？不是讲普遍、彻底裁军吗？过去苏联讲，现在美国也讲，我们也赞成过普遍裁军。事实上，现在是普遍、彻底扩军。嘴里说普遍裁军，实际上普遍扩军。

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这样，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有那么多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稍微有一点也好，做些科学实验。

斯：主席曾经说过，在江西打倒土豪劣绅时，他们说苏维埃先生是个很坏的家伙。而且在中国整个革命发展过程中，西方都在讲社会主义先生制造很多麻烦，现在又归结于中国的原子弹。

毛：这证明我的“名誉”不好，中国政府、中国党的“名誉”都不大好。他们为什么要反对中国，搞反华高潮？我们还措手不及，突然肯尼迪不见了。越南人民还措手不及，吴庭艳不见了。再一个措手不及，赫鲁晓夫下台了，真是天晓得，而且搞得那么彻底，他的书、照片一概收起来了。

斯：好多欧洲的党批评苏联党用这种办法把赫鲁晓夫搞下台。

毛：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毛：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斯：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毛：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斯：在俄国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毛：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斯：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曾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

毛：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是会接近起来的。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

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会发生大战。

毛：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斯：美国常说，南越战争要扩大到北方。

毛：最近腊斯克[1]纠正了他的说法，说他没有讲过这种话。

斯：当然，我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听我的话。美国有一位议员叫丘奇，他现在提出对美国干涉别国的政策要进行一次大辩论。他是约翰逊的好朋友。美国统治者不了解主席，我本人恐怕也不了解。

毛：怎么不了解？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有历史作证。我国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

斯：打南越战争的美国人在说，如果美国撤出南越，中国将占领整个东南亚。

毛：怎么占领法？我们的军队去占领，还是当地人民去占领？中国人还是占领中国。

斯：中国在南越有没有军队？

毛：没有。

斯：腊斯克说，如果中国和北越放弃在东南亚的侵略政策，美国就撤出南越。

毛：我们没有什么侵略政策可以放弃，我们没有侵略。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

斯：过去说中国受俄国支持，现在说南越受中国支持。

毛：中国内战取得胜利，主要是靠美国的武器，这证明没有什么外国正面的支持。实际上，南越是从美国取得武器。去年以来，

---

[1] 腊斯克，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他们不仅能取得武器，还补充兵力，经常俘虏南越伪军。这同过去我们兵源之一是蒋介石的军队一样，他们是受过训练的，是被抓来强迫当兵的，一经俘虏就能参加我军作战。

斯：为什么？

毛：他们是被国民党抓壮丁抓去当兵的，他们不喜欢国民党。

斯：还有一点，中共和全国老百姓是一致的。

毛：被国民党抓去当兵的是贫苦农民。我们的办法是，花几天工夫开诉苦大会、祭灵大会，谁家有人被国民党害死，就把死者的名字写在纸上祭灵。这样解决问题后，他们就参加了我们的军队，换上一顶帽子。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戴我们的帽子呢？因为他们怕打死了以后，被人错认为国民党的兵。从头上这顶帽子就可以认出来他们是我们的人了。

斯：在很大程度上，南越就是这种情况。

毛：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美国独立战争差不多有二百年了吧？

斯：美国独立战争时有很多革命家，提出的口号同后来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一样。那时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共和国。当时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同今天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一样。

毛：华盛顿的“名誉”不好，我们可以追认他为“共产党”。

斯：中共会把他看成是个反动的人，所以不会让他参加党。

毛：不能参加共产党是一件事，那时还没有共产党，华盛顿所

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1]也一样。

斯：林肯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也是伟大的人。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毛：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斯：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毛：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斯：主席能否给美国总统也提些建议？

毛：这不好提。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斯：美国军队差不多有一半在外国。看样子，好多在外国的美国军队变成了当地人民的人质。

毛：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这使美国政府处于困难的境地。要美国撤兵困难，不撤也困难。哪里有点风吹草动，它就要派兵，就这么调来调去。有的时候我们故意这么一叫，例如打金门几炮，就是因为我们打那么几炮，它觉得第七舰队不够了，把第六舰队开过来一部分，把旧金山的海军也开一部分过来。我们又不打炮了，

---

[1] 林肯（1809—1865），美国共和党人，1861年至1865年任美国总统。他领导了反对南方奴隶制的战争，颁布了著名的《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

美国军队来了没事干，又要开回去。所以美国军队是可以调动的，叫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有点像蒋介石的军队，叫它怎样就怎样。

斯：美国军队总要有点事干才行。

毛：有事干的。美国垄断资本就要到有些地方去帮反动派的忙，叫它不帮不行，一定要帮，最后它一定要走，像帮助蒋介石一样。过去上海、青岛、天津、唐山、北京都有美军，后来都走了，而且走得很快，我们军队同它还隔好远，它就赶快走。那时英国就很蠢，派军舰到南京去接兵，被我们打着了。[1]问题是中国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蒋介石总打败仗，又有强大的解放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美国就呆着不走。

斯：只有在同样情况下美国才会从南越撤走？

毛：美国在南越的军队现在不走，可能再打一两年，但美国感到没有味道了，走了也难说。

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周恩来总理的话，总理同我说，美国军队撤走前，不可能通过开会解决南越问题。是这样的吗？

毛：我不晓得总理怎么讲的，恐怕两种可能性都要讲。军队撤出前可以谈，军队撤出以后也可以谈。或者根本不谈，南越把美军赶走。甚至谈了美军还不走，像它在朝鲜那样。在日内瓦也是谈过

---

[1] 1949年4月20日至21日，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4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中英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0多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江中，其他3艘英舰逃走。7月30日夜紫石英号军舰逃出长江。

的。日内瓦会议[1]后，美国把兵开进南越代替法国军队。老实说，美军留在南越是件好事，它锻炼了南越人民，使解放军壮大。只有一个吴庭艳是不行的，就像中国单有一个蒋介石是不行的，必须要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而且占领八年之久，才能锻炼中国人民。

---

[1] 日内瓦会议，指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5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12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3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对徐寅生[1]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2]的批语

（1965年1月12日）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3]，印发中央工作会议[4]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

[1] 徐寅生，当时是中国男子乒乓球队运动员。在1963年第二十七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他和队友一起为我国赢得男子团体世界冠军。

[2] 指徐寅生1964年9月28日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讲话。讲话包括四个部分：一、这几年来是怎么打球的。过去打球没有责任心，后来慢慢懂得了为谁打球的道理。平时抓紧训练，根据对手练出一套有效的技术，加上思想要

过硬，要打好这场球，才能比较顺利地获胜。在比赛时，要多想有利条件，少想不利条件；多从国家利益考虑，少想个人得失。二、雄心壮志问题。树立雄心壮志要靠平时努力。要承认自己是个打球的材料，别人可以打好球，自己下决心去提高，也能打好球。要为国家荣誉去“搏”，敢于挑担子，万一输一场也要顶得住。三、信心问题。信心的基础是打外国人，明确这一目标，带着“敌情”观念练好技术，带着为祖国争取荣誉的心去打球。信心要靠平时事事处处来建立和培养。四、当前女队存在的五个主要问题：1. 主要技术过硬抓得不好；2. 女子的技术发展方向不明确；3. 训练中“敌情”观念不强；4. 要敢于学习和善于学习；5. 训练和比赛中怎么开动脑筋。

[3] 国务院副总理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贺龙1964年10月10日对徐寅生在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讲话批语说，徐寅生讲话中有几个问题我认为提得很好。首先是为谁打球的问题，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其次，是怎样从战略上藐视敌人，从战术上重视敌人，灭敌人的志气，长自己的威风；再次，运动员也要像解放军那样，思想上经常有杆枪，时时事事联系到怎样打好球，临场要抛开个人的得失。总之，要胸怀雄心壮志，平时刻苦练球，比赛敢打敢拼。他还提到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平时练球要和比赛，特别是国际比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要敢于破旧创新，不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对于各个运动队来说，都有普遍意义。应该赶快把它印出来，让每个人都好好学习，对照一下个人和本队，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启发。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间召开的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的全国工作会议。

对反映我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问题的来信[1]的批语[2]

（1965年1月12日）

贺龙、瑞卿同志：

此件所说，可能是许多院校的通病，请你们认真处理。自从去年林彪同志提出整〔顿〕院校以来，可能有些进展，因而像此信的作者也敢于说话了。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教研室主任许啸子关于我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问题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目前我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正如主席对军事工程学院批评的那样，是“四个第一”没有落实。主要表现在：一、学院的教育管理方法助长学员的骄、娇二气，也培养了他们在学习上不动脑筋的习惯。二、教材资料陈旧，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学上满足于轰轰烈烈的形式，不注意内容的改进。教学部门与生产部门脱节，互相封锁。三、科学研究搞不起来。教员缺乏实际知识，搞科学研究和实验室建设的人员时间没有保证。四、机关庞大，人浮于事，学员很少，经济上很不合算。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5年1月8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一期登载的题为《我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很严重》的一封群众来信摘要上。

给周世钊[1]的信

（1965年1月12日）

惇元兄：

寄上三千元，请你酌处。他们两人或者不要送得太多，或者要送此数。如果不要送得太多，剩下来的即存你处，有人要，由你酌送。

敬礼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二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对全国人大代表马建猷来信的批语

（1965年1月13日）

印发工作会议[1]同志们。这位人民代表的信[2]写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评是正确的。今后千万不要做那些违〈危〉害人民利益的

---

[1]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2] 指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1965年1月3日在北京开会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将深藏心里已5年的隐忧疑问，大胆向您反映。一件事是：1958年夏湖北等省放出了水稻亩产数千斤的高产，我省组织参观团前往取经，我在参观中发现这些高产是浮夸、虚报，仿学必然造成生产上的巨大损失。于是向参观团的领导提出，但却当即遭到批判。参观后给省委写报告也不准讲调查了解的实情，只能按公社书记介绍的写。回省后，我用私人信函向有关领导反映参观见到的真实情况。泸州专署的一位副专员曾对我说："你何不写信告到毛主席那里去。"结果，到了1959年即有人来追查这位副专员同我的谈话。我对此一直想不通，难道不准一个革命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吗？难道向主席反映情况的内容还有什么限制吗？另一件事是：1959年3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4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们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道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还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

蠢事。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三日

中央关于学习周恩来同志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摘录）

（1965 年 1 月 14 日）

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科学技术，我们都吸收过来，为我们所用。拒绝向外国学习是不对的，当然迷信外国，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也是不对的，不论是迷信苏联，还是迷信西方，都不对，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尊重科学，破除迷信。

引进新技术不是一味摹仿，照抄照搬。学习外国必须用独创精神，结合起来，引进技术必须同自己钻研结合起来。对于进口的技术装备，必须加以研究，一般从仿制做起，进而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改进和提高。

对保定地委“四清”工作团关于新城县贫下中农代表会的报告的批语[1]

（1965年1月15日）

即刻印发。并请各同志[2]回去后印发到县级作为参考。

毛泽东

1965年1月15日上午四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保定地委“四清”工作团党委1965年1月13日关于新城县贫下中农代表会给党中央、毛泽东并华北局、河北省委的报告上。报告说，为了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迅速打开全县“四清”运动的局面，我们于1月9日召开了新城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由地委工作团党委负责同志，分头作了“四清”动员报告。报告主要讲了四方面问题：一、大揭新城县阶级斗争的盖子和严重“四不清”的事实；表明了彻底“四清”的决心，并宣布县、社、队全面开始“四清”，上下左右一齐搞。二、宣布“四清”运动只清“四不清”干部，不整社员。揭穿了少数坏干部和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控制、恫吓社员的种种活动，解放了社员群众。三、积极教育干部，对干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提出要求，指明出路。我们只孤立和打击少数既犯有严重错误，或犯了罪而又拒绝接受教育，抗拒或破坏“四清”的人。四、“四清”落脚到建设上。既要把“四清”搞好，又要搞好冬季农、副业生产，安排好群众生活，争取今年大丰收。大会对全县震动很大，广大贫下中农和社

员群众认为，这次大会最顺心的是，“四清”只清“四不清”的干部，不整社员；这次大会最痛快的是，上下左右一齐搞“四清”，“四不清”的根子扎到哪里，就挖到哪里；这次大会最长劲的是，上自中央下至生产队，各级都建立贫协，贫下中农当家作主，有权力撤换坏干部，再不怕打击报复了。大会的精神和声势，通过贫下中农代表和干部群众的广泛传播，使新城县的“四清”运动打开了局面。今后，我们将选择适当时机，召开群众大会，对少数性质极端严重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及民愤极大的新恶霸，进行揭发批判，追赃退赃，依法处理，以体现争取多数、打击极少数坏人的政策精神，促进运动的新高潮。

[2] 指当时在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对军委贯彻执行林彪[1]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2]的通知的批语[3]

（1965年1月15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1965年1月12日贯彻执行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通知上。通知说，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是一个很适时、很重要、抓住关键问题的指示。全军1965年的各项工作，都应根据这个重要指示来进行安排，务必使之落到实处。

[3] 指林彪1964年12月29日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时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所作的指示。林彪说：1964年在军事训练上有的搞得过于突出，时间也占得多了一些，冲击了政治；有的过分强调抓军事技术，忽视政治思想工作；有的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要加以纠正。1965年应当着重抓政治思想工作，首要的是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思想，大兴三八作风，发扬三大民主，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继续抓四好落实。军事训练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军事训练中真正的尖子，真正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普及和推广。但是，要纠正训练工作中一些不适当的要求和作法，使部队的训练正常化。部队的生产要搞好，但1965年的生产指标不要增加了，不要因为生产搞得太多，挤掉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事训练工作。1965年的工作，总的是把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继续落实。另外增加两条：一是蹲点，二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两条是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也是更好地把地方同志的经验学过来。

林彪同志：

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结〕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

毛泽东

1965年1月15日

对李富春[1]关于计划工作的报告的批语[2]

（1965年1月21日）

印发政治局（请彭真[3]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

---

[1]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 这个批语写在李富春1965年1月6日关于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上。报告说，1964年12月26、27两日上午，我和薄一波、李先念、余秋里等邀集各中央局的十几位同志一起座谈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和编制长期计划的问题。我传达了主席、少奇同志最近对计划工作的批评，同时对计委过去工作的主要错误和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并对计划如何革命的问题讲了一些意见。各中央局同志着重谈了以下问题：一、计划工作革命，除各级计委要轮换一些人外，最主要的是要总结经验，改进思想作风。发挥人的积极因素，挖掘工农业生产的潜力。二、必须改革规章制度和管理体制。经过讨论，共同商定：1. 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十五年远景规划的重点，是准备战争，依靠第一、二线，努力建设第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建设各省后方。农业，第一是靠大寨精神，抓见效快的，第二是抓三线的农业。2. 计划工作的革命要走群众路线，鼓励大家创造经验。各地方、各部门在各项管理制度方面所创造的经验，只要是合乎客观经济规律的，都要认真总结，大胆提倡和推广。3. 初步商定了中央和地方在经济、计划工作上的分工意见。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1]小计委（由秋里自选五、六、七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一日

---

[1] 余秋里，当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问题的报告[1]的批语

（1965年1月21日）

同意照办。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一月廿一日

---

[1] 卫生部党组1965年1月20日给毛泽东的这份报告说：根据您对组织城市高级医务人员下农村和为农村培养医生的指示，党组立即进行讨论，并邀人大、政协卫生方面的部分代表进行了座谈，大家表示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一、组织高级医务人员分期分批到农村开展巡回医疗，培训基层卫生人员，首先去社教重点县，配合“四清”运动，以便在社会实践中改进医务人员的思想作风。今后组织城市医务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医疗，定为一种制度。二、关于为农村培养卫生人员的问题，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 继续办好原有16所专科学校，并拟在52所五年六年制的医学院中，选择条件适宜的15所，缩短学制，增加招生。在230所中级卫生学校中，将20所有条件的，过去办过专科的，开设三年制的专科。此外，拟将14所中医学院的六年学制缩短为三年或四年。三年制专科学校的教学方针，拟第一年少而精地

学习基础理论，后两年结合实际边看病、边学习。这样的学生可以从城市来，也可以从公社来、回公社去，拿公社工分，不由国家发薪。（二）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员的训练工作，使生产队有能治小伤小病，进行助产，搞群众卫生运动的卫生积极分子。

搞好三线建设打起仗来就不怕了[1]

（1965年1月23日、24日）

一

部队不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

二

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抓三线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以前我们没有飞机、大炮，又没有黄色炸药，还不是打赢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

[1] 本篇一至五是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余秋里汇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情况时讲话和插话的一部分。

三

军事我懂一点。自从遵义会议以后，经过长征到党的七大，思想比较统一了。胡宗南[1]进攻陕北，我们在王家湾，只剩下咱们几个人了，任弼时、陆定一[2]劝我走，我说不走。我那时还有一个连，等敌人靠近了，我先撤出一个排，它搞不清我有多少队伍，以后再撤出一个排，我还有一个排的预备队。距离十五里了要走，他俩要我向东，我说向西，因为敌人就想把我们赶到东面去。果然嘛！敌人后方总是空的。要说艰苦，刘邓大军[3]渡黄河南下，插入大别山，那才艰苦。

四

全面内战开始后，各个解放区的军事斗争也都是如此。让敌人进来，形式上对敌人有利，敌人可高兴了。不到一年，敌人被我一块一块地吃掉，它没有饭吃。各个根据地都一样，如陈粟[4]退到胶

---

[1] 胡宗南，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指挥所部进攻陕甘宁边区。

[2] 任弼时，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3] 刘邓大军，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

[4] 这里指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部队。

东半岛。国民党军沿路都要收复，它占领了些地方。我们只坚持一年时间，就实行了战略反攻。刘邓大军出击大别山，整整一年。那时好多人可悲观了，都说，不行呀！究竟谁不行，是蒋介石不行，还是我们不行？蒋介石占领的地方，除台湾以外，我们都占领了。

搞军事工作要先搞战略。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四大教程我根本不管，我也不懂。我只研究战略、战役。放点敌人进来，能吃掉就吃，不能吃掉就放在那里。

各省都要注意搞三线建设。兵工厂搞起来，地方军搞起来，搞五年，每年才花六亿元，军队同志就放心了。设想如果出现了像日本占领时候的情况，到处被占领了，你没有两手怎么成？军械、武器不但运输有困难，数量也不够。

五

老百姓怎么防空？就是每个房子都挖个洞，自己挖，平时当仓库，藏东西，战时飞机来了，当防空洞。最好挖些地道，这里丢了炸弹，还可以跑到那里，还可以打仗。北京等各大城市都可以这样搞，分多少年完成。不然，一个原子弹打来，我们只好统统跑掉，安安稳稳让他们占领。我们要使他们到处遇敌，乡村有民兵，城市也有民兵。比如我这个房子，床下为什么不能挖个洞？大家都挖，学华北的地道战。

对关于“九评”[1]中一个问题的提法的来信[2]的批语

（1965年1月26日）

送康生[3]同志阅。如有时间，请你们讨论一下。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

[1] 指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2] 指建筑工程部办公厅编辑部第一副总编高阶平1965年1月25日关于“九评”中提到的一个问题给江青的信。信中说，在我们发表的“九评”中曾谈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出的社会”，后面紧接着又引用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我认为这两种提法都是不妥当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管是在它的前期或后期，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因素存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地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了政权之后才出现的，它只能建立于资本主义社会完结之后，而不可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在当前反修的大好形势下，在我们这样重要的文章中，引用和提出这些话都是不妥当的。第一，因提法不确切，容易被歪曲。第二，很可能使人产生“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错觉，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第三，这种提法作为整个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来说也是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的。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和苏班德里约[1]的谈话

（1965年1月27日）

好的拿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照搬。这样才有希望。

军事学校办得一塌糊涂，正在整理。过去没有军事学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学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学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它。我们各军区的司令过去都是老粗嘛。

进军事学校的时间太长了。蒋介石办的黄埔军校，五个月入伍训练，四个月学校毕业。蒋介石的军队主要就是这些人还比较能打，陆军大学毕业的实在不能打。

我们有陆军大学吗？（□□□：有高等军事学校。）那就危险了。（□□□：现在要缩短时间了。现在我们大体上就是实现抗大的方针，四至六个月毕业。工程技术学校，要学技术，可能时间长些。）

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

是革命斗争培养干部。

---

[1] 苏班德里约（1914—2004），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关于研究和评论《军事战略》一书的批语[1]

（1965年1月30日、2月5日）

一

杨成武、雷英夫[2]同志：

请找一位有政治军事头脑的同志，将此书[3]研究一下，然后写一篇评论，不要长，有一万字左右就可以了。写好后给我一看。又美国一些战略书也可用此办法。可与情报部合作。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12月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用的《军事战略》一书的扉页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杨成武、雷英夫关于研究和评论《军事战略》一书的问题给他的请示报告的第一页上写的批语。

[2] 杨成武，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雷英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

[3] 指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由苏军总参谋长瓦·达·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

二

杨成武、雷英夫同志：

此件[1]已阅，很好。如三个月完成觉得免〈勉〉强，可以推迟时间，但不要超过六个月。

毛泽东
二月五日

---

[1] 指杨成武、雷英夫1965年2月4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一月三十日指示敬悉。我们领会主席所赋予的评论索科洛夫斯基主编的《军事战略》一书和评论美国战略书的任务，是一件大事，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已组成一个包括总政宣传部、总参作战部、军情部和三部有关同志在内的研究起草小组，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主席所赋予的任务。由于这件事工作量较大，缺乏经验，故时间可能稍长一点，我们争取三个月左右将第一篇稿子送呈主席审阅。

对赵朴初[1]的《某公三哭》[2]散曲的批语[3]

（1965年1月31日）

很好。同意明天见报。送姚溱[4]同志办理。

毛泽东

一月卅一日

---

[1] 赵朴初，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2] 赵朴初写的散曲《某公三哭》指：一、哭西尼（1963年11月）；二、哭东尼（1964年5月）；三、哭自己（1964年11月）。发表在1965年2月1日《人民日报》。“某公”指赫鲁晓夫，“西尼”指肯尼迪，“东尼”指尼赫鲁。

[3]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1965年1月31日关于发表赵朴初写的《某公三哭》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赵朴初的《某公三哭》散曲已排出清样。如认为可以，拟在明天见报。请于今晚退姚溱同志办。

[4] 姚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在一份《情况简报》上的批注[1]

（1965年1月）

究竟哪一些意见不完〔全〕对呢？这种模棱两可的按语等于不说，或者有意对信的作者泼下半瓢冷水。

---

[1] 这个批注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64年12月30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四九七号所载的《是不是有了框框》一文的按语中。河北省永年县小龙马公社马西胡大队工作队员翟玉生，12月19日以《是不是有了框框》为题，写信给邯郸地委“四清”工作总团领导同志，反映工作队进村18天，孤立地搞扎根串连、访贫问苦，没有向广大贫下中农交代来意，也不敢向他们讲政策，群众不了解工作团的意图，运动冷冷清清。工作分团领导采取全公社“统一行动”的方法，要求各大队、生产队“一二一”地走路，要开什么会一块开，干什么工作一块干。他对小龙马分团党委的指导思想和领导方法是否符合中央和主席指示的精神，表示怀疑，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总团办公室将这封信印发各分团党委参考，并加按语说：“翟玉生的来信，有的意见是对的，有的意见也不完全对”，但他这种“勇于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提出看法的精神，是对革命事业负责的表现，值得鼓励”。毛泽东在“翟玉生的来信，有的意见是对的，有的意见也不完全对”这句话后边，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

对中央军委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65年1月）

同意。

---

[1] 中共中央军委1965年1月12日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给毛泽东并党中央的请示报告说，经军委办公厅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和军委第223次办公会议研究，并征求了各军区、军兵种、院校党委的意见，一致同意取消军衔制度。军衔制度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与我人民军队的本质不相适应。九年来，实践证明，这一制度不符合我军的传统作风，等级表面化，助长了干部的等级观念和名利思想，不利于我军的革命化建设，不利于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同时，也增加了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不少繁琐事务。鉴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军衔制度，采取“名存实亡”的办法，大将以下各级军衔一律取消，元帅军衔予以保留。军衔制度是根据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制定的。取消军衔制度，必须修改兵役法和军官服役条例。在中央批准取消军衔制度后，再按法律手续报人大常委会通过。取消军衔制度，在军队人员思想上不会引起太大的波动，但也必须和对待薪金改革一样，在部队进行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

关于开发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问题的批语[1]

（1965年1月）

同意总理意见[2]。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1964年12月31日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1965年1月2日关于开发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问题的意见的打印件上。李富春将国家计委1964年12月30日关于鄂西地区铁矿资源情况的简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陈伯达、罗瑞卿、余秋里阅看，并写上了自己的意见："从鄂西铁矿的情况看，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攀枝花铁矿和鄂西铁矿都要开发，但究竟以何者为先、为快，很值得研究。现已要冶金部积极地进一步了解情况，并做开发前的准备工作，再作全面比较。"

[2] 周恩来总理1965年1月7日在这个打印件上批的意见是："开发攀枝花的战略方针早定，错在推迟了战役部署。现在西南三线第一个战役已经开始，不应再有动摇。开发鄂西铁矿应与豫西铁矿和湘西以及武汉的工业联在一起，另组成一个战略单位或方面，进行勘察和部署，不要拿它与开发攀枝花作比较。我提议这一战略方面由王任重挂帅，计、经委抽一人为副，其余同意罗、余、薄的意见。"罗瑞卿的意见是："如果两者能同时并举固好，但如有困难，必须先搞攀枝花。同时并举如需要分次序，也应把攀枝花放在首位。这是大的战略问题，不能再变了，也不要再受别的影响推迟了。"余秋

里的意见是：“总的，我认为攀枝花一定要放在首位，即便鄂条件好些，估计也可能部署得开。我准备迅速约有关同志研究此问题。”薄一波的意见是：“应力争攀枝花和长阳同时并举。矿山和铁路同时并举。攀枝花区矿山铁路已经部署了，应积极进行。”

听取谷牧、余秋里汇报计划工作时的指示

（1965年1月）

（一九六五年一月谷牧、余秋里向毛泽东汇报计划工作，当讲到敢想敢干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不要讲了半天，又是设计，又是试制，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有。

（汇报到今年钢可以搞到□□万吨时）

毛：不是有一个消息吗，英国人听说我们搞调整、巩固，就害怕了。你不搞冒进，搞质量，搞品种、规格，他就怕了。数量慢慢上去，不要急。

（讲到□□建设时）

毛：□□建设要抓紧，就是同帝国主义争时间，同修正主义争时间。

（汇报到我们的技术要赶上和超过国际水平时）

毛：是的，我们要有……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都要超过。我说过，原子弹响了，人类即使死一半，也还有一半。斯诺同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辟谣，我说不要辟谣。我只说

过战争打起来人死一半，还有另外一半。有比我更厉害的，美国的一个影片形容得很厉害呀！赫鲁晓夫比我说的多得多嘛！他说有毁灭人类的武器，什么死光。我不是说中国，而是说全世界死三分之一，总而言之，死一半！□□建设，我们把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了，那时打起来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来怎么办？我们就用常规武器跟他们打。从前我们没飞机、大炮……又没有黄色炸药，还不是打赢了！打起来还可以继续建设，你打你的，我建设我的。

（讲到设计一定要采用新技术时）

毛：设计要做比较，哪些花钱少，办事多，哪些花钱多，办事少。设计人员是在家里设计，还是到现场设计？我看了一万二千吨水压机设计的文章，有些设计经过一次、二次，甚至几百次的失败，不经过失败是不会成功的。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65年1月）

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关于欢迎李宗仁[1]回国的批语[2]

（1965年2月3日）

总理[3]：

似应欢迎李宗仁回国。去年向美报投书问题，无关大局，不加批评，因他已自己认错了。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

柯西金[4]何时到京，盼告。

---

[1] 李宗仁，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1月31日印发的关于廖行健（李宗仁的桂林同乡）在香港谈李宗仁动态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程思远（曾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1月25日报告，廖行健在香港对他说，李宗仁准备从美国经香港回到祖国。李为表示离美决心，已登广告出卖其新泽西州的房子，预定四五月间赴欧洲。他对去年在纽约《先驱前锋论坛报》投函事，非常追悔，惜已补救无及。现在回国是李唯一可行之路。可否先指示方针，俾李有所遵循。

[3] 总理，指周恩来。

[4] 柯西金，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5年2月10日率领苏联代表团到达北京。

对杨勇[1]等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2]的批语

（1965年2月4日）

杨勇同志：

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是为至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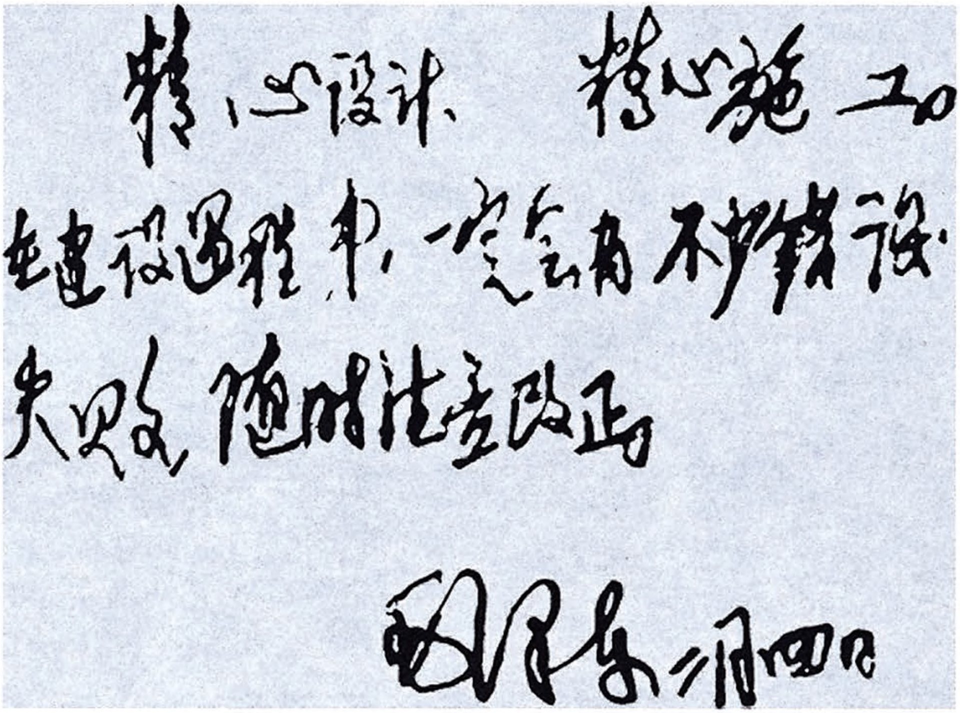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二月四日

---

[1] 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组长。

[2] 指杨勇、万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武竞天（铁道部副部长、北京地下铁道领导小组副组长）1965年1月15日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给彭真、李富春并中央的报告。报告包括建设方针、线路方案、防护等级、工程造价、筹建工作五个部分。



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

毛泽东　二月四日

毛泽东关于北京修建地下铁道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祝贺哥穆尔卡六十寿辰的电报

（1965年2月4日）

华沙

波兰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哥穆尔卡同志：

在你六十寿辰的时候，请接受我对你的衷心的祝贺。你的长期的工作，是同波兰党和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密切相联的。我们热烈地祝贺，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并将继续取得新的胜利。祝贺中波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必将不断地增进和加强。

祝你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

1965年2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代理团长阮明芳亲切握手。

1965年2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黄北亲切握手。

听取汇报工业交通会议情况时的指示

（1965年2月11日）

人就是要逼，一逼就逼出来了。他不办怎么样？（答：另请高明。）办法就是要你干，你不干，“自有后来人”，有人干。[1]

这些地区都建设起来，就不怕了。……要搞些□□万吨规模的钢厂，搞它十个，二十个。这种小钢厂恐怕是有用的。[2]

你政治部是党的工作机关，是在党委领导下嘛！是党委领导下的政治部嘛！过去总政管下边军区党委，部为什么不可以管直属企业。……像鞍钢这样的党委的领导该怎么办？像鞍钢就应以部为主，重要的直属企业应算是我们的野战军嘛！是主力嘛！不是地方军，不能乱插手！[3]

---

[1] 1965年2月11日由□□向毛泽东汇报工业交通会议的情况和问题。这是讲到工业的任务一是支援农业，一是支援国防，需要大家来逼时，毛泽东作出的指示。

[2] 这是讲到要搞好□□省份的建设时，毛泽东作出的指示。

[3] 这是讲到建立政治工作机构时，毛泽东作出的指示。

1965 年 2 月 11 日，毛泽东会见访问越南途经北京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对赵尔陆[1]关于三线建设动力问题报告[2]的批语[3]

（1965年2月13日）

总理：

此件我看了两次，觉得很重要，似可发给小计委及有关各部委

---

[1] 赵尔陆，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

[2] 指赵尔陆1965年1月21日报送的关于三线建设的动力问题的报告。报告说，动力问题是三线建设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三线地区现有发电能力很小，远不能适应工业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为了探索一条解决工业用电问题的途径，我们结合这次三线踏勘选厂工作，对三线地区的动力资源情况和现有大小规模不同的水电站、火电站，作了一些调查，请教了一部分省、地、县的有关同志，从而受到了很大启发。经过研究、探讨，我们对三线电站建设提出下列具体意见：一、贯彻执行“小而分”的方针，以星星点点地建设中、小型水电站和火电站为主。二、原则上有水搞水电，有煤搞火电，两者都有就采取水电、火电同时并举，但应以发展水电为主。三、水电站的建设采取低水坝、小库容，省投资、早见效，梯级开发，综合利用，对上游不淹田、不移民，对下游无危害的建设方针。四、火电站的建设，在煤矿附近有一定水源的情况下，采取小规模、多布点、电站靠近煤矿的建设方针。煤可以出了煤窑就进锅炉（矿口电站），架设输电线路送电。

[3] 这个批语写在赵尔陆1965年1月21日为报送关于三线建设动力问题的报告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上。

和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研究，总结过去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以利今后。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对中央关于正确处理工交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关系问题的通知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65年2月13日）

一

同意，照发。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二

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大多数（包括车间级、工厂级及其以上）干部，只整那些顽固不化的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极少数人。

---

[1] 中共中央关于正确地处理工业、交通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群众关系问题的通知稿说，目前，在工业、交通企业发现有些单位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过程中，班组长（包括一小部分小的工段长）同工人群众的关系很紧张。这个问题，在运动中必须及时地正确解决。为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中正确地处理企业中班组长同工人群众的关系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一、在运动中应当满腔热情、循循善诱地帮助班组长提高觉悟，提高工作能力，自觉地克服缺点、错误，改进作风和工作方法。对于那些群众意见较多的班组长，可以在运动中的适当时期，采取同工人群众开小型交心会、民主会的方式，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目的。二、班组长必须认真地参加劳动，一律不要脱离生产。应当明确适当的生产岗位，规定合理的劳动时间和定额。三、今后，对于班组长，要结合改进领导方法和管理制度，逐步实行定期的民主选举，选出后由行政领导加以任命，连选可以连任。要在班组实行四大民主（政治民主、生产民主、财务民主、军事民主）。同时，要教育工人群众遵守劳动纪律，服从生产指挥。但不允许用任何借口去整工人群众。四、对于班组长中极少数坏人、没有改造好的封建把头和蜕化变质分子，应当进行适当的批评和斗争，根据不同情况，有区别地加以处理。五、在这次运动中，各级领导必须引导群众集中精力解决两条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不要乱追男女关系，更不要拿到群众会上去斗争。至于极少数恶霸、流氓和其他坏分子奸污妇女和军属的罪行，应当个别处理，或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196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95号文件将这个通知发至企业党委和工作队。

[2] 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央通知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5年2月13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传统的革命友谊和团结对敌的共同愿望而签订的。这个条约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伟大的中苏同盟的巩固和加强，有利于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有利于确保我们两国的共同安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

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特别加紧武装日本和西德军国主义，力图把日本和西德变成为它在亚洲和欧洲发动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和核基地。现在美帝国主义正在悍然走上武装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进一步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冒险道路，轰炸越南人民的美国强盗头子大叫扩大战争。这不仅是对越南

民主共和国的侵犯，也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侵犯。这不仅是对印度支那和平的挑战，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挑战。当前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美帝国主义是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主帅，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大敌当前，我们中苏两国人民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旗帜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的反美武装斗争，坚决支援日本人民和德意志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和西德军国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援古巴人民和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斗争，坚决支援全世界人民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这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推卸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国人民一贯维护中苏友好团结，信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义务。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情况，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都将坚决地同伟大的苏联人民站在一起，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站在一起。

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于北京

对观察家评论稿《联合国往哪里去?》的批语[1]

（1965年2月14日）

写得很好，照此发表。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5年2月14日送审的拟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观察家评论稿《联合国往哪里去？——评戴高乐的讲话》上。评论说，对于联合国的现状，世界上多数国家是不满意的。法国总统戴高乐2月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批评联合国的讲话表明，即使在北大西洋集团内部，也有人认为联合国作为美国家天下的局面应该结束了。现在，从东方到西方，要求彻底改组联合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种各样的方案已经提了出来。不管哪种方案，一个共同之点，就是要求结束美国把持和操纵联合国的局面。联合国必须改正错误，彻底改组，已经成为当前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这篇文章在1965年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1965年2月19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共和国总统尼雷尔，并观看他赠送的礼品。

在听取汇报时的指示

（1965年2月21日）

我们现在有些东西保密得太过分了。技术上很落后，你给人家，人家不要，这个问题也要一分为二。一、有的非保密不可，如……要保密；二、有些加工技术，有什么密可保?！根本不要保密。

接见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代表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的指示

（1965年2月22日）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解放军报社全体同志。

正面教员与反面教员

（1965年2月）

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有反面教员，这就是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者、美帝国主义者和我们党内犯“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人。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对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的报告的批语[1]

（1965年2月25日）

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

毛泽东

二月廿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65年2月16日关于出版《蒋介石言论集》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上。报告说，蒋介石的言论，1961年由中华书局筹划编辑，1963年拟定初稿。但这个初稿只选收蒋介石有代表性的言论，而且大部分是摘录，所收资料很不完备，所以迟迟没有出版。最近，我们根据主席的指示，对出版蒋介石的言论重新作了安排，拟编辑出版全集，目的主要是提供一部比较系统的、全面的反面资料。编辑出版的计划是：一、书名拟定为《蒋介石言论集》，按时间顺序编排，分集出版。二、版本一般应以较早的本子为准。个别难于理解的文字，可酌加简要的题解或注释。三、此集由中华书局和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辑，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出版时，写一个前言，说明出版的目的。计划在今年年底出齐。四、各集拟印5000册，控制发行。主要发给有关领导机关和研究工作者。

对《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的批语[1]

（1965年2月25日）

已阅。同意照办。

毛泽东

二月廿五日一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1965年2月24日为送审《赫鲁晓夫言论》第三集出版者说明给毛泽东的短信上。信中说，此件如认为可用，拟于25日夜间广播，26日见报。出版者说明指出，赫鲁晓夫下台之前，我们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第一、二集，收集了赫鲁晓夫1932年到1953年的言论。从现在起，我们按照预定计划，把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以后，直到他1964年10月下台的公开言论，全部陆续予以出版。出版《赫鲁晓夫言论》，可以使人们看到什么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和破产的历史，同时也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一面镜子，来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这篇出版者说明在1965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

对刘彬[1]关于鞍钢情况报告[2]的批语[3]

（1965年2月28日）

---

[1] 刘彬，当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在鞍山钢铁公司蹲点。

[2] 指刘彬1965年2月23日关于鞍钢情况给薄一波的报告。报告说，现在，鞍钢的形势很好。1965年是争取鞍钢工作转变带有关键性的一年，在这一年对工作提出的具体要求主要有五项：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分期分批全面完成。二、以搞好品种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组织生产新高潮。在提高产品质量问题上，今年继续抓住生产为使用服务这一基本思想，在管理上实行两个改革。第一，把单纯按计划指标组织、考核生产改为在计划的指导下，按合同组织生产，检查、考核生产。第二，把搞好质量的标准，由单纯用国家标准衡量，改为以用户使用满意为标准。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今年拟减少1/4以上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30%以上。三、在基本建设工作上，今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基本完成鞍钢厂内填平补齐的骨干工程；二是完成设备大修的大会战。这是鞍钢生产上的两个老大难问题。在基本建设方面继续进行三项改革：第一，把按金额计算工作量，改为按工程项目计算工作量。第二，取消施工单位的上交利润制。第三，改革体制，甲乙方合并，培养一支大力协同的好队伍。四、大学毛主席著作，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在抓活的思想的同时，揭发与克服经营管理上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苏联的错误影响，逐步实现企业管理革命化，力求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企业。五、政治工作以继续抓思想、抓积极因素、抓作风为主，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以上这些今年工作的初步设想，待中央工业书记会议后再作修正与布置。

[3]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1965年2月26日为送阅刘彬关于鞍钢情况报告给毛泽东的信上。

已阅，退薄一波同志。此件写得很好，比王鹤寿[1]同志过去写的报告，大有进步。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

---

[1] 王鹤寿，原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当时任中共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兼鞍山钢铁公司党委书记。

在关于攀枝花钢铁企业建设问题报告上的批语

（1965年3月4日）

此件[1]很好。

毛泽东
二〈三〉月四日

---

[1] 指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副部长徐驰1965年2月23日关于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建设问题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报告。报告说，自从本月9日开会决定成立攀枝花指挥部以来，我们进行了以下工作：一、指挥部的干部班子正在调集和商办。二、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所需大型设备35项已与一机部研究商定。三、组织有关的部去攀枝花进行现场设计，各部已经同意，第一批设计人员3月初可到达攀枝花现场。四、施工力量正在安排落实。五、攀枝花钒钛铁矿的冶炼试验正在顺利进行。六、需由国外进口的设备清单已经提交有关部门。七、需要陆续进入施工现场的施工设备及维修设备清单已经提出。从现在情况看，攀钢建设的进度可能提前一到两年。

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1]

（1965年3月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以下简称阿）： 是的。

毛： 互相照顾彼此的利益。你们没有损害我们的企图，我们也没有损害你们的企图。

阿： 这一点我们很了解。我们双方都是为了各自人民的利益，有很多事要做。我们过去受外国统治，现在要赶上去。我们需要和平，需要友谊。

毛： 中国也是。

阿： 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我们过去主要是受英国统治。

毛： 中国过去受过十三个国家的侵略。有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主要是日本。

阿： 日本倒没有到过巴基斯坦。

毛： 还有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主要是美国。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打我们，帮助南朝鲜打北朝鲜，打到我们的边境上来，我们不得不派志愿军出去。当然美国人也能打，但是比日本人要差一点。

阿： 日本人很厉害。我也有同日本人作战的经验。

毛： 你打过仗?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时谈话的一部分。

阿：那是在缅甸。那时我们的军队受英国控制，英国统治印巴地区。我们是在一九四七年独立的。

毛：一九四七年？我们比你们晚两年。日本人走了，美国人又来了。那时我们的指挥中心在延安。延安只有七千人口，还包括郊区，其实是个乡村。我们还有根据地，分成十几个地方，统统被敌人隔离。

阿：你们那时候的斗争情况，我读过不少有关的书，也读了毛主席的书。现在我们的军事参谋学院和战术学校还把毛主席的著作作为教科书。现在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参加一次大的战争，面对的是人口多、装备好的敌人。因此，就不能抄袭英美的作战方法，就要学习主席的经验，当然，也要创造自己的方法。那样，我们就敢于同比我们多三倍的敌人打仗。

毛：你们地方宽，人口多。我们打仗的方法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日本人也好，美国人也好，统统打不过我们。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其实，他打他的，他们找不到我们；我打我的，我们找得到他们。一个师一个师地打，打弱的，打孤立的。一部分一部分地吃，他们就少了。我好用十个指头作比方，我打他一个指头，不打他九个指头，他少了一个指头，就握不起拳头来了。然后，找机会再一个一个地割，割到他剩下半个指头，蒋介石就跑到台湾去了。

阿：主席的方法实验过了，我们的方法还没有实验。真打了，还不知道怎么样。我们打仗的方法也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起来：守的时候要用火力，不要用人体去扑；进攻时，要进攻弱点，全力以赴。

毛：打一个指头，我用三四个指头。具体说，就是集中优势兵力。

阿：对某个地方要使用优势兵力。

毛：有时候一个战役，消灭一个师，又来一个师，割了一个，又来一个，再割一个。这样连续下去，将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掉。

你们也要搞一套简单的书本，只要两万字，最多三四万字，发给官兵，就行了。军事学的本本越厚越没有用。

阿：主席说得很正确。书厚了，谁也不看了。我们后来把英国的军事书籍全烧了，只留简单明了的小册子，主要是如何战胜敌人。

1965年3月4日，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

"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

（1965年3月10日）

请赵毅敏同志将中文、英文各一份寄我对读。请告陈平[2]同志：我读了他们的声明，感到很高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又鲜明又有力的声明。

毛泽东
三月十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1965年3月5日关于马共中央委托我党将其有关国际共运的声明转交其他左派党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3月4日下午，在京马共中央负责同志委托我部送交中共中央的《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有中文、马来亚文、英文版本各一份。另送这三种文本的声明各十份，请中方代转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印尼、日本、缅甸、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十个马列主义兄弟党。报告提出了准备转交的具体办法，请予批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1月31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声明的主要内容是，揭露苏共领导在赫鲁晓夫垮台后，仍坚持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出公开论战能够帮助分清是非，有助于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真正团结。这个声明在1965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

[2] 陈平，当时任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

关于《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一文[1]的批语[2]和修改

（1965年3月11日、17日、18日）

一

送康生同志：

作了一点修改[3]，请考虑是否可用。

毛泽东

三月十一日

---

[1] 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的这篇文章，原题为《评莫斯科的分裂小会》，毛泽东1965年3月11日审阅时，标题改为《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文章分四个部分，原来没有小标题。3月18日在毛泽东处研究，决定加上以下小标题：一、这是一个什么会议；二、苏共新领导做了一些什么事情；三、回答几个问题；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的轨道上团结起来。这篇文章在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5年第三期发表，发表时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2]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稿的两次批语。其中一写在这篇文章的3月10日改稿上；二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1965年3月17日为送审此文修改稿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我们回来后，又同小平、彭真同志一起，修改了一下。如主席今晚看，我们明天即回京；如主席明天看，我们后天回去。"当时毛泽东在武汉。

[3] 见本篇三至六，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退康生同志：

已阅，同意。并同意你们明天回北京。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下午九时

三

苏共领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软硬兼施，七拼八凑，总算是开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会议。这个会议，充满着凄凉和零落的景象。它是一个分裂的小小的会议，它是一个很不像样子的会议。

四

苏共新领导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提出的某些口号接过去，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已经有了变化，似乎已经不同于赫鲁晓夫[1]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了。

这种情况，同美帝国主义将苏共领导的一些主要口号接过去，何其相似乃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缓和

---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14日和15日，他的这两个职务被先后解除。

紧张局势，全面彻底裁军，两大国主宰世界，共同援助印度，共同支持各国反动派，共同利用联合国来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共同反华等等口号或阴谋计划，就被美帝国主义全部接过去了！苏共领导同美帝国主义打得火热，互通情报，共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以便共同维持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反对世界上一切革命者。

五

为了顺利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为了进一步巩固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就必须继续揭露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帮助那些不明了真相的人去明了真相，帮助那些在革命道路上犹豫不定的人同革命人民一道前进，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把那些替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做帮凶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孤立起来，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六

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赫鲁晓夫的演出不过是一支很短的插曲，比较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1]或者考茨基[2]的演出要短得多。今后任何人要表演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也只能同赫鲁晓夫差不多，是一支很短的插曲。

---

[1]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首领。

[2] 考茨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七

小平、彭真[1]、康生同志：

今天，你们如能留一天，我还想同你们谈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上午四时

再请韩先楚、陈再道[2]两同志留两天，十九日谈一次，二十日飞京，不知是否可能？请韩、陈二同志酌定。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2] 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

1965年3月14日，毛泽东和来访的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握手。

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在武汉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

1965年3月19日，毛泽东会见在华工作的美国专家艾德勒（中）、柯弗兰。

1965年3月，毛泽东在东湖。

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

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散步。

1965年，毛泽东在武汉。

毛泽东等悼念
乔治乌–德治逝世的电报

（1965年3月20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

惊悉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格·乔治乌–德治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怀着极悲痛的心情向你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格·乔治乌–德治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忠实儿子、敬爱的领袖，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战士。他领导罗马尼亚人民举行了“八·二三”武装起义，引导罗马尼亚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坚持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逝世不仅是罗马尼亚人民的重大损失，而且是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重大损失。

在这不幸的时刻，我们相信，罗马尼亚工人党和罗马尼亚人民将化悲痛为力量，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在胜利的道路上继续前

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同罗马尼亚人民团结一致，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争取世界和平、人民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

毛泽东等祝贺苏联“上升二号”宇宙飞船飞行成功的电报

（1965年3月21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由别利亚耶夫上校和列奥诺夫中校驾驶的“上升二号”苏联宇宙飞船成功飞行和顺利着陆，中国人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这是苏联劳动人民的伟大成就。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兄弟的苏联人民、苏联科学工作者、飞船船长别利亚耶夫和宇宙航行员列奥诺夫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衷心地祝愿兄弟的苏联人民在征服宇宙空间的事业中，继续获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我们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1]

（1965年3月23日）

亚洲所有的革命者和政党应当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一两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团结起来，力量就大了。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在同帝国主义对抗，我们希望你们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

美国的手比我们长，到处侵略。一九五八年美国军队在黎巴嫩登陆，英国军队在约旦登陆，造成局势紧张。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英军队才被迫撤走。后来，黎巴嫩还发生了内战。在你们地中海有美国的第六舰队，在我们周围有美国的第七舰队。美国总共有四个舰队：第七舰队最大；其次是第六舰队；第二舰队分布在美国西海岸，是第七舰队的后备；第一舰队在美国东海岸，是第六舰队的后备。另外，美国在摩洛哥和利比亚等地有军事基地，英国在亚丁和波斯湾也有军事基地。

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我们是同美、英、法合作的。日本降后，美国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打我们，当时英、法已经没有力量来管我们的事情了。美国没有直接参战，它在中国沿海港口驻扎了一些军队，当我们消灭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快要解放那些港口时，它的军队撤走了。后来，我们在朝鲜战场上遇见了美国军队，打了三年。现在，越南人民也遇见了美国军队。看来，美国是喜欢打仗

---

[1] 这是毛泽东和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的。朝鲜和越南离美国那么远，它还要派兵来。

我们两国都受过殖民主义的压迫。你们过去是法国管的，我们过去是受好几个帝国主义管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一块，英国一块，日本一块，后来都被我们赶走了。日本同我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十四年，在中国其他地方打了八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有帮助，使中国团结起来反对它，促进了中国的革命。现在美国军队占领我们的台湾，还占领南朝鲜和日本的许多地方，并在越南打仗，美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亚洲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比如越南人民，从前不知道怎么打仗，现在学会了。这就是帝国主义给我们的好处。帝国主义也会有好处，你们信不信？

帝国主义有时通过它的走狗教育人民，如中国的蒋介石。我们这些人就是受过蒋介石教育的，他用内战的办法教会我们打仗。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现在，非洲正在发生战争，如刚果[1]、安哥拉和葡属几内亚[2]等地。阿尔及利亚打了八年仗，才取得独立。在苏伊士运河也打过仗[3]。你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法国人被迫退却而取得了独立的，是这样的吗？

---

[1] 刚果，今扎伊尔。

[2] 葡属几内亚，今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3] 指苏伊士运河事件。1869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6年7月27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我们在外表上样子不同，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我应当说明我是不信教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合作。我小时候信过多神教，长大后就不信了。中国也有上帝，但是同你们的上帝不同，穿的是中国服装。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互不损害对方。我们不颠覆你们，你们也不颠覆我们。我们是友好国家，有共同目标，第一是反对帝国主义，第二是建设国家。

哪个地方发生革命，我们就支持。帝国主义非常恨我们，说我们好战。其实，任何国家的问题，只有当地人民起来革命，才能解决。外界支持是必要的，但是它只占第二位。比如南越，人口只有一千四百万，可是人民打得很好。

阿拉伯民族是有战斗性的，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应当说，各个民族都是有战斗性的，团结斗争，就能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国家革命胜利经历了二十二年战争，先同国内敌人作战，并进行了长征，后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最后同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派作战。这期间，我们自己也犯错误，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纠正了错误，我们就胜利。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一个政党同一个人一样，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许多例子证明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革命是可以胜利的。

毛泽东等祝贺齐奥塞斯库等当选的电报

（1965年3月25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高兴地获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基伏·斯托伊卡同志当选为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伟大的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成就。罗马尼亚人民在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罗马尼亚人民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我们预祝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光荣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下，今后在各个战线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

胜利。

中罗两国人民是兄弟，是战友。我们坚信，我们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必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打仗的办法主要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1]

（1965年3月24日）

帝国主义就是怕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叫做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它在全世界进行侵略，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它在我们邻近的国家越南南方搞侵略，它没有办法应付，就不断扩大战争来吓唬人。越南人民是不会被吓倒的。它也吓唬我们，威胁我们。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说，很好，已经有十几年没有打仗了。我们的军队里，连长还有打过仗的，排长就没有打仗的经验。我们又不会到它那个国家去，它如果能送上来就好了。过去的战争都是送上来的。首先是国内反动派，我们打了十年，对手是蒋介石。以后是日本人，打了十四年。日本人帮助了我们，蒋介石也帮助了我们，帮助我们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是谁先教会我们打仗？就是蒋介石。蒋介石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送给他武器，又转到我们手上。我们犯过错误，叫做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曾同蒋介石合作，一同打过北伐战争，我们党那时发展到五万人。后来蒋介石叛变，杀掉好多人，最后我们只剩下几千人。一部分被杀掉，一部分投降了，另一部分不干了，被吓倒了，剩了几千党员继续同蒋介石斗争。因为蒋介石打我们，我们就跟他打。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由艾哈迈德·舒凯里率领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我们拿起了武器。我们没有什么武器，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一打就打了十年，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都是在偏僻地区，在山里头。后来有了三十万军队。在地方上，在军队里，在根据地，在蒋介石统治区，党员也不下三十万。你看，蒋介石不是帮了我们的忙吗？从没有军队到有了军队，而且还有了几十万党员。但是以后我们又犯了错误，这次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打了一些没有胜利把握的仗。结果蒋介石把南方根据地都占去了，我们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外国人认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很光荣，我们也说光荣，没有被消灭掉。可是，那是犯了错误的结果，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五千人。这就有收获了，头脑清醒了，高兴了。想一想，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犯了错误。这时候，腿说话了，因为腿发痛，路走多了。这就是我们犯的错误。于是我们清算了错误。日本人打进来了，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也说要打日本，又要同我们合作了。他以为我们只有二万多人，把我们送到日本人那里去可以消灭掉。我们把二万多人并成三个师。我们改编了军队，又创立了十多块根据地。几年之后，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共有八年时间，日本投降了，那时我们已发展到一百万多一点的军队，都是用日本武器装备起来的。我们不去蒋介石统治区，如果去了，就要被消灭。中国地方大，日本兵少，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但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看住，我们就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这不是日本人帮了我们的忙吗？所以说帝国主义总是做好事，就是说帝国主义帮你们的忙。它还会继续帮忙，帮亚洲的忙，帮非洲的忙，帮拉丁美洲的忙，教育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步觉悟起来。

我们这些人开头不觉悟，不懂得打仗。开始时，我相信的是孔夫子，相信的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因为学校教的是这一套，就相信

这一套。后来革命了，孔夫子不行了，资本主义也不行了，我们就成立共产党，只有几十个党员。当时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现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副主席董必武[1]，一个是我。第一次大会多少代表？十二人，其中有几个后来当了日本走狗，几个当了叛徒，几个牺牲了。你们到中国，就要问一问，中国革命是怎样走过来的？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话讲得很好。我在延安，他说要我去，他说国共共同建国，订了协议，过了一年，所有的协议都被他撕毁了。我们又被迫打仗。打仗的办法就有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军事道理，简单地说就这么两句话。什么叫你打你的？他找我打，但他又找不到，扑了个空。什么叫我打我的？我们集中几个师、几个旅，把他吃掉。这就是说，人有十个指头，我先吃个小的，用五个吃一个，九个先不管它。吃了个小的，我就走了。他不就少了一个指头吗？第二次又吃一个，还有多少？八个，少了两个。然后又吃了一个，又少了一个，又吃了一个，又少了一个。蒋介石有四百多万军队，再加上四百多万补充兵员，最后剩下几十万人到台湾去了。这就叫我打我的。就像吃饭一样，总要一口一口地吃。你总不能把一碗饭一下子就吃进去吧！不能把一只鸭、一只羊、一只牛，统统一口吃了下去。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作各个击破。这就是欧洲和中国古书里说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

我们的将军百分之九十大字不识，或者只识很少的字。蒋介石的将军都是大学毕业，什么陆军大学、黄埔军官学校，那样的学校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我们只有少数人进去过。我们的国防部长林彪就是蒋介石的学生，总参谋长罗瑞卿也是他的学生，还有几个，但是很少。战场就是学校。军事学校我不反对，可以办，但不要学得太长了。一读两三年，太长了，几个月就行了。什么海、陆、空学校，不怎么高明。有些现代科学需要长一些时间学，例如导弹、原子弹，这是讲研究和制造。单单武器的使用和训练士兵不需要很长时间。训练炮兵，一个月就行。训练驾驶员、飞行员，几个月就够了，最多一年。主要是在战场上训练。和平时期要在黑夜里训练。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你不是说读了我写的文章吗？这些东西用处不大。主要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有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帝国主义最怕这种办法。打得赢我就把你吃掉，打不赢，我就走掉，你找也找不着。我们开头时用游击战的办法，进攻的时候用，防御的时候也用。根本办法是打运动战。打蒋介石时，从小仗打到大仗。后来我们用三十万军队消灭他五十万军队，我们用三个指头吃他五个指头。我们是少数，怎么能吃得掉？怎么吃法呢？还是一个个地吃，结果把它吃掉了。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用打，又不让他走。例如打北平，他们有几十万军队，但北平东西南北四面的军队都消灭了，他没有办法了，就同我谈判。这个将军叫傅作义[1]，现在是我们的水利部长。你们在北京有没有看见过他？他没有办法了，只好同我们接头。我们要他的军队开出北平，全部改编，我们就吃下来了，取得了胜利。他们的士兵都是训练好的，很多士兵编入了我们的军队，当无线电兵，当医生，还有当下级干部。所以我们的军队里有蒋介石的军队。我们俘虏了日本人，

---

[1] 傅作义，原国民党军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1949年1月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

也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训练。

你们看阿尔及利亚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起初只有两三万军队，法国军队从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五十万，最后达八十万之多，有空军，有海军。革命军少，武器又差，就是因为整个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游击战，为阿拉伯国家创造一个典型例子，打败了帝国主义。这就是弱者打败强者，少数打败多数，没有文化、被看不起的人打败文化高的人。我看你们这些难民大有希望。因为是难民，没有地方呆，你们就想革命了。有地方呆的人民也想革命，例如阿尔及利亚、阿联[1]、也门、伊拉克、叙利亚[2]。我昨天同叙利亚代表团谈话，他们给了我一些很好的知识。你也给我知识。我没有什么说的，就是这么一些。书厚了，就不记得了。话长了，也不记得了。

帝国主义把革命送给中国，帝国主义把殖民地人民训练出来。它料不到被训练的人中有一部分会是反对他们的人。蒋介石给我们训练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有些外国人在中国上学，学军事，我劝他们早点回去，不要学太长，几个月就行了。课堂上尽讲，没有什么用处。回去参加打仗，最有用。有些道理只要讲点就行了，不讲也可以。大多数时间呆在本国，或者根本不出国，就呆在那里，比如越南南方、刚果。我这些话不是什么伟大人物的话。你说我是大人物，我根本不是大人物，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帝国主义教育了全世界人民，全世界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学会了如何消灭帝国主义。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强迫你们相

---

[1] 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时指埃及。

[2] 叙利亚，1958年2月同埃及合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961年9月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信。有少数人读点书是必要的，懂得点军事知识，懂得点社会科学，懂得点自然科学。不懂得科学，革命也不能成功。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5年4月3日）

布达佩斯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在匈牙利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向兄弟的匈牙利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四五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人民，粉碎了德国法西斯奴役的枷锁，推翻了霍尔蒂二十五年的血腥统治，获得了几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解放后，匈牙利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颠覆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匈牙利人民在前进道路上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非常高兴。

中匈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持，相互合作。我们坚信，中匈两国人民将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目前首先坚决击败美帝国主义对越南人民的侵略，为争取世界和平、

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祝匈牙利人民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7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8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口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口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坚决打击入侵海南岛上空的美机……………………………………1
（1965年4月9日）
对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2
（1965年4月13日）
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代表时的指示………………………4
（1965年4月21日）
关于反空降和战略战术问题…………………………………………5
（1965年4月28日）
对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报的批语…………………6
（1965年4月29日）
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7
（1965年4月）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9
（1965年5月8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11
（1965年5月11日、12日）
对关于第二次核试验试爆时间的报告和新闻公报稿的批语 ………15
（1965年5月12日）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电报 ………………16
（1965年5月15日、20日）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五寿辰的电报 ……………………………………19
（1965年5月18日）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23
（1965年5月）
对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指示纪要的批语 ………36
（1965年5月25日）
念奴娇·井冈山……………………………………………………………………37
（1965年5月）
为《山西农民》题写报头 ……………………………………………………39
（1965年5月）
为郭国群题词 ……………………………………………………………………41
（1965年5月）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42
（1965年5月30日）
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内部材料上的批语 ……………………………43
（1965年6月2日）
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材料上的批语 ……………………44
（1965年6月7日）
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 …………………………………………………………46
（1965年6月9日）
对《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的批语 ……47
（1965年6月11日）
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48
（1965年6月16日）
给章士钊的信 ……………………………………………………………………51
（1965年6月26日）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 ……………………………………………………54
（1965年6月26日）
对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两个文件的批语和修改 ………………56
（1965年6月29日、7月10日）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 ……………………………………58
（1965年7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 …………………59
（1965年7月10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稿的批语…61
（1965年7月11日）
对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 …………………………62
（1965年7月12日、15日）
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锻炼的指示 ………………………64
（1965年7月15日）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 ………………………………………67
（1965年7月18日）
给郭沫若的信 …………………………………………………………69
（1965年7月18日）
给章士钊的信 …………………………………………………………72
（1965年7月18日）
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名 …………………………………………75
（1965年7月18日）
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 …………………………………………76
（1965年7月18日）
对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北九个材料的报告的批语 …………………77
（1965年7月19日）

和医务人员的谈话 ……80
（1965年7月19日）
给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的题词 ……82
（1965年7月20日）
在全国公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84
（1965年7月20日）
给陈毅的信 ……85
（1965年7月21日）
给华罗庚的信 ……90
（1965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92
（1965年7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电报 ……94
（1965年7月25日）
对首批援越高炮部队开赴越南问题请示信的批语 ……96
（1965年7月25日）
给于立群的信 ……97
（1965年7月26日）
和李宗仁及其夫人的谈话……101
（1965年7月27日）
关于毛泽民出生年月的批语……103
（1965年7月27日）
对中央转发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报告的通知的批语……104
（1965年7月29日）
对一篇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的批语……106
（1965年7月）

对《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的批语……107
（1965年8月1日）
关于查找杜牧全集的便条……108
（1965年8月1日）
对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09
（1965年8月2日）
在接见汇报卫生工作同志时的谈话……110
（1965年8月2日）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116
（1965年8月3日）
给康生的信……123
（1965年8月5日）
打仗主要靠自己创造经验……125
（1965年8月5日）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131
（1965年8月8日）
关于找韩昌黎全集的便条……136
（1965年8月10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137
（1965年8月14日）
给李先念的信……139
（1965年8月15日）
对击沉国民党军“剑门”“章江”两舰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140
（1965年8月15日）
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141
（1965年8月17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145
（1965年8月22日）
对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的批语…………147
（1965年8月24日）
为钟学坤题词………………………………………………………150
（1965年8月30日）
在中组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上
加写的话……………………………………………………………152
（1965年8月）
为《西藏日报》题写报头…………………………………………154
（1965年8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155
（1965年9月1日）
对胡乔木二十七首诗词稿的批语…………………………………157
（1965年9月5日、15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162
（1965年9月8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的电报…………164
（1965年9月8日）
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摘录）…………………166
（1965年9月14日）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167
（1965年9月15日）
为《空军报》题写报头……………………………………………169
（1965年9月15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时的谈话……………………………171
（1965年9月18日）

在外交部给印度政府的复照稿上的批语……………………………172
（1965年9月19日）

对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174
（1965年9月24日）

给邓颖超的信………………………………………………………176
（1965年9月25日）

念奴娇·鸟儿问答 ………………………………………………178
（1965年秋）

对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名单（草案）的批语……………181
（1965年9月30日）

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182
（1965年9月）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183
（1965年9月）

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184
（1965年10月1日）

对外交部关于陈毅出访五国概况汇报的批语………………………192
（1965年10月）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194
（1965年10月6日）

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96
（1965年10月10日）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200
（1965年10月20日）

对总政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的批语……203
（1965年10月28日）
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的批语……204
（1965年10月30日）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205
（1965年10月）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的电报……207
（1965年11月6日）
对林彪所提五项原则的批语……209
（1965年11月20日）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210
（1965年11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214
（1965年11月28日）
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的批语……216
（1965年11月）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218
（1965年11月）
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220
（1965年11月）
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222
（1965年11月）
为《郑州晚报》题写报头……223
（1965年11月）
批判罗瑞卿……224
（1965年12月2日）

给陈伯达的信……225

（1965年12月2日）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226

（1965年12月2日）

反对折中主义……227

（1965年12月2日）

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232

（1965年12月2日、7日）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235

（1965年12月14日）

关于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语……236

（1965年12月18日）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238

（1965年12月21日）

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244

（1965年12月21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电报……246

（1965年12月31日）

在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四期上的批语……248

（1965年）

关于礼宾工作的指示……250

（1965年）

重读《长冈乡调查》时写的批注……252

（1965年）

七律·洪都……254

（1965年）

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头……………………………………………255
（1965年）
卜算子·悼艾地同志 ………………………………………………257
（1965年12月）
在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的批注…………………258
（1965年）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265
（1966年1月10日）
给章士钊的信………………………………………………………267
（1966年1月12日）
给周世钊的信………………………………………………………269
（1966年1月29日）
对有关《海瑞罢官》问题七个材料的批语…………………………270
（1966年2月5日）
为焦裕禄题词* ……………………………………………………271
（1966年2月7日）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272
（1966年2月6日、12日）
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274
（1966年2月8日）
和毛远新的谈话……………………………………………………275
（1966年2月18日）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277
（1966年2月19日）
诱敌深入要做两手准备……………………………………………280
（1966年2月21日、22日）

为罗丽华题词……………………………………………………………282
（1966年2月24日）
对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发言稿的批语…………………………284
（1966年2月、4月）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286
（1966年3月12日）
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290
（1966年3月12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92
（1966年3月20日）
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303
（1966年3月）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的批语和修改…………………………………………………………304
（1966年3月、4月）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311
（1966年3月、4月）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316
（1966年4月14日）
对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词中一段话的批注……………………318
（1966年4月14日）
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319
（1966年4月23日）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320
（1966年4月）

对《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修改和批语 327
（1966年4月）
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329
（1966年4月）
对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的指示……………………………………330
（1966年4月）
中国是否会出修正主义……………………………………………332
（1966年4月）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时的谈话（节录）……………333
（1966年5月5日）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335
（1966年5月7日、14日）
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的批语……………………342
（1966年5月11日）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加写的几段话 ………………………343
（1966年5月16日）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的批语和批注…………346
（1966年5月17日）
关于同意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批语……………………349
（1966年5月30日）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350
（1966年6月1日）
在杭州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354
（1966年6月10日）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365
（1966年6月30日）
七律·有所思 ……………………………………………………367
（1966年6月）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371
（1966年）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建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稿的批语……………………………………………………372
（1966年7月2日）
给江青的信……………………………………………………………376
（1966年7月8日）
对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请示信的批语……380
（1966年7月10日）
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话…………………381
（1966年7月10日）
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382
（1966年7月12日）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383
（1966年7月16日）
工作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397
（1966年7月21日）
在会见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402
（1966年7月22日）
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 ………………………………………405
（1966年7月）

对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批语……406
（1966年7月、8月）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414
（1966年7月25日、8月4日）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416
（1966年7月31日、8月1日）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418
（1966年7月）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420
（1966年7月）
关于打人问题……421
（1966年8月1日）
不许镇压学生运动……422
（1966年8月4日）
炮打司令部……425
（1966年8月5日）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436
（1966年8月5日）
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437
（1966年8月5日、9日、11日）
对李达来信的批语……442
（1966年8月10日）
在中央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443
（1966年8月10日）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445
（1966年8月12日）

对陈伯达、康生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请示报告的批语…448
（1966年8月15日）
给刘少奇的信……………………………………………………………449
（1966年8月15日）
对林彪三篇讲话稿的批语…………………………………………………450
（1966年8月16日）
为北京大学校刊题名………………………………………………………451
（1966年8月16日）
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的谈话……………………………452
（1966年8月18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北大附中红卫兵谈话纪要……………………………486
（1966年8月18日）
革命要靠自己……………………………………………………………488
（1966年）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493
（1966年8月20日）
对薄一波来信的批语………………………………………………………495
（1966年8月21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496
（1966年8月23日）
对谢富治关于公安部机关精简设想的批语………………………………497
（1966年8月26日）
关于传阅文件问题的批语…………………………………………………498
（1966年8月26日）
在李富春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报告上的批语…499
（1966年8月28日）

对关锋、戚本禹反映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500
（1966年8月28日）
在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来信上的批语……………………………502
（1966年8月30日）

坚决打击入侵海南岛上空的美机[1]

（1965年4月9日）

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驻青岛的那个师调去海南岛没有？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地配合起来打。

---

[1] 1965年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9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在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坚决打击美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将海南岛地区的海军航空兵改由空军统一指挥。周恩来审阅修改这一报告后，杨成武即呈交毛泽东。这是毛泽东对该报告的答复。

对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65年4月13日）

已阅，同意。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5年4月10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4月9日修改稿）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指示稿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这样，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只要我们做好一切准备，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指示稿还对目前的具体备战措施和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事项提出了要求。中共中央4月14日以中发〔65〕208号文件将这个指示发至县团级党委。

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

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代表时的指示

（1965年4月21日）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不要地、富、反、坏之类，要贫下中农，中农子弟进步的可以要。地富子弟进步的也可以，真打起来他们会分化的，一部分组织维持会，插白旗，杀共产党。一部分跟我们走。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会分化，不会全跟敌人。就是要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关于反空降和战略战术问题[1]

（1965年4月28日）

一

在纵深地区，都要准备敌人空降，都要有防空降的准备。这种空降是为了扰乱我们的后方，配合正面的进攻。空降的兵力不会很多，一个地区无非是一、二个师，或者一个小的集团。所以这些纵深要地，有山的要打点洞子，没有山的要堆点山，做点工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

二

打仗并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走，你就打不着我。打，我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总之，要打歼灭战，总要打死人，抓到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

[1] 本篇一和二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等汇报作战问题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报的批语

（1965年4月29日）

江青：

此件[1]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我今日离此[2]去别地爬山。又及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5年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五十八号登载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摘报说，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报告：1964年棉花生产在上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预计可收购3100万担，比1963年增加1000万担，超过了1957年度（2700万担）的水平。由于棉花收购增多，供应上比较主动。今年安排供应纺纱用棉2438万担，可纺纱630万件，比上一年度增加41%。絮棉平均每人供应四点九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二两。国家储备200万担外，周转库存比原计划增加210万担。拟从1964年度收购的棉花中拿出200万担，作为战略储备。还打算从1965年度新棉中再拿出100万担作为战略储备，要求在1965年年底全部入库。

[2] 指武汉市。

关于劳改工作的指示[1]

（1965年4月）

一

劳改犯办了很多事情，要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没有几个贪污分子不行，这样大的国家没有几个反革命分子不行。

他们可有才能！没有才能，反革命干什么？在一定条件下他能做很多事，凡有功的，可以摘掉帽子，有的还可以奖励。二十三条为什么规定这么一条：工作队的成员不一定要十分干净，有坏人不要怕，有些人政治上不好，但很有才干，改造嘛！改造不了也不要紧，只要把他们引到正路，就很有用，我们不会贪污，不懂贪污，也不懂技术，他们懂得这些，只要我们知道他们，政治挂帅，可以让他们办很多事，可以发挥他们的作用。就是要调动他们，他们中间可有才能，他发明真空电炉，是高级产品，我们不行，他行。

二

改造要抓紧，不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不要想在劳改犯人身上搞

---

[1] 本篇一是1965年4月，关于王灿文发明真空冶炼电炉的指示；本篇二是1965年4月，在十四次公安会议期间对劳改工作的指示。

多少钱，要抓改造，让他们寄点钱回家。

第一是思想改造，第二是生产，劳改工作干部不能太弱，要训练。训练两个星期就行了。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5年5月8日）

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博胡斯拉夫·拉什托维奇卡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约瑟夫·列纳尔特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和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九四五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下，在苏联的援助下，赶走了德国法西斯占领者，取得了民族独立和祖国解放。我们高兴地看到，解放后，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粉碎了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成就。

中捷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兄弟友谊。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深信，中捷两国人民将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为支

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祝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捷两国人民兄弟般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

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

（1965年5月11日、12日）

一

请徐秘书[1]用电话告总理，同意发表这个声明。[2]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下午十一时半

二

最近，多米尼加共和国发生了推翻卡夫拉尔卖国独裁政权的政变。美国约翰逊[3]政府派出了三万多武装部队，进行血腥镇压。这

---

[1] 指徐业夫，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1965年5月1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电告毛泽东：北京明日召开群众大会，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斗争。我们建议以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武装斗争。现将声明稿全文电告，请予批示。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声明全文见本篇二。

[3] 约翰逊，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是美帝国主义对多米尼加人民的严重挑衅，也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

目前，爱国的多米尼加人民正在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的战斗。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我深信，只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多米尼加的反美爱国斗争，在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是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

美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控制、干涉、颠覆和侵略。这一次，美国政府把什么“睦邻政策”“不干涉原则”等等骗人的鬼话一股脑儿摔在一边，对多米尼加共和国进行了赤裸裸的干涉和侵略，这就更加暴露了美帝国主义强盗的原形。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打的是“保卫自由”的旗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这就是用飞机、兵舰、大炮屠杀别国人民的自由。这就是任意侵占别国领土的自由，任意蹂躏别国主权的自由。这就是江洋大盗杀人劫货的自由。这就是把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踩在自己脚下的自由。他们在多米尼加是这样，在越南是这样，在刚果（利）[1]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这样。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还打着“反共”的旗号。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做美国奴隶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保卫本国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人，就是反对一切不愿意受美帝国主义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人。过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

---

[1] 刚果（利），即今扎伊尔。

条英机[1]都是这样。现在，美帝国主义更是这样。

在美帝国主义眼里，什么联合国，什么美洲国家组织[2]，什么别的玩意儿，统统都是它手掌里的工具。对于这些工具，它用得着就用，用不着的时候就一脚踢开。踢开了，还可以捡起来再用。用也好，踢开也好，都是以有利于它的侵略目的为转移。

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使多米尼加人民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必须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美国武装干涉多米尼加，激起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新的反美浪潮。英勇的多米尼加人民，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亚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非洲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在支持你们，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联合起来，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联合起来，所有爱好和平的国

---

[1] 希特勒，德国纳粹首领。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首领。均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日本战犯。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侵华事变，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日本陆军大臣和内阁首相，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并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侵略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捕，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2] 指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其前身是美洲共和国国际联盟，成立于1890年，1910年改称泛美联盟。1948年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从成立之日起，实际上即受到美国的操纵和控制，成为美国向拉丁美洲扩张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权益联合谴责美国的经济掠夺和贸易歧视政策，美国在该组织中的霸主地位日益衰落。

家联合起来，所有受到美国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联合起来，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

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必胜！

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必败！

对关于第二次核试验试爆时间的报告和新闻公报稿的批语[1]

（1965年5月12日）

退总理[2]。同意[3]。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上午九时

---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65年5月11日呈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张爱萍、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国防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刘西尧等关于第二次核试验预定起爆时间的报告以及新闻公报稿的报告的批语。

[2] 这里指周恩来。

[3] 周恩来的转呈报告说：从5月12日到13日大概有20多小时的好天气。经与罗瑞卿、杨成武、刘杰等同志商定，已告前方准备行动。前方来电，已定明日行动。行动后的新闻公报，已经常委各同志审阅，现送上请核。1965年5月14日10时，第二次核试验成功进行。5月15日，新华社正式发表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的新闻公报。

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的电报[1]

（1965年5月15日、20日）

一

同意。

毛泽东

五月十五日

二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在伟大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庆祝它诞生四十五周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向光荣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65年5月14日报送的以毛泽东名义祝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诞生四十五周年的电报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这个电报的全文。

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英雄的印度尼西亚人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富有创造性和战斗性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伟大旗手，是密切联系群众、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突击队。

四十五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始终高举反帝革命的旗帜，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印度尼西亚反帝革命的历史上，在东方革命的历史上，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广大人民，联合其他民主爱国力量，展开了粉碎美、英帝国主义合伙制造的新殖民主义产物“马来西亚”的革命斗争，坚决支持苏加诺总统和印度尼西亚政府退出美帝国主义操纵的联合国和在国内打击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果敢行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人民一贯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最近，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越抗美运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一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也同现代教条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兄弟党关系中独立和平等的原则，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迪·努·艾地同志为首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善于从本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出

色地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度尼西亚化，独立地制定符合印度尼西亚人民根本利益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指引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斗争不断地胜利前进。

中国共产党以有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这样亲密的坚强的战友而感到十分自豪。我们两党的革命团结和我们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斗争熔炉中，经过了千锤百炼，经受了严重考验，是任何力量都破坏不了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必将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坚定不移地同你们站在一起，并肩前进，共同战斗。

我们坚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必将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和扩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进步力量，把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引向新的高潮，引向新的胜利。一个完全独立、民主、繁荣、先进的印度尼西亚必将屹立在世界上。

光荣的、伟大的、英勇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

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五寿辰的电报

（1965年5月18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亲爱的胡志明同志：

在你七十五寿辰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你，亲爱的主席同志，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你是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久经考验的领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老战士，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几十年来，你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革命的旗帜，领导越南人民为祖国的解放事业，进行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你对越南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尊敬。

目前，英勇的越南人民正在越南劳动党和你的英明领导下，以决战决胜的英雄气概进行着气壮山河的抗美救国正义斗争。越南人民的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捍卫越南自己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也支援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斗争，支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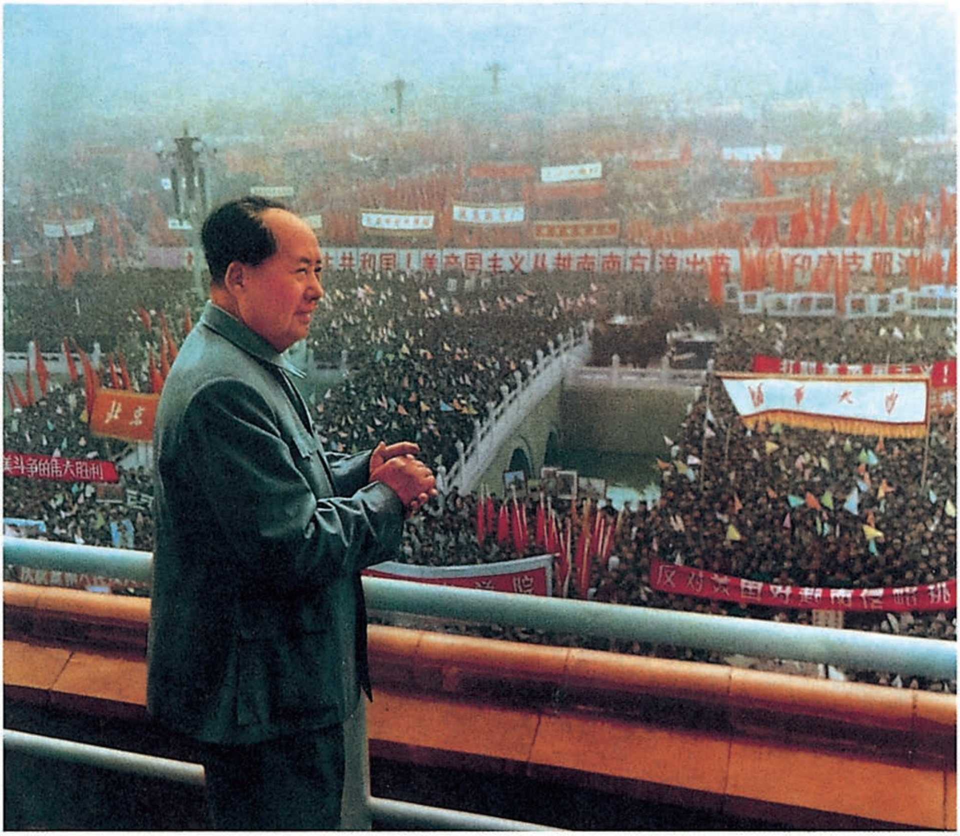
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人民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也都站在你们一边。伟大的越南人民必胜，万恶的美国侵略者必败。

亲爱的主席同志，我们衷心祝你健康、长寿。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1965年，毛泽东和胡志明在一起。

1965年，毛泽东和胡志明亲切交谈。



1965年，毛泽东在首都各界人民声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上。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1]

（1965年5月）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2]，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

[1] 重上井冈山，1965年5月下旬，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游览视察。22日，先后到黄洋界和茨坪。在茨坪居住期间，了解井冈山地区水利、公路建设和人民生活，会见了老红军、烈士家属、机关干部和群众。25日写了这首词。29日下山。

[2] 黄洋界，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另四个是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1]
可上九天揽月[2]，
可下五洋捉鳖[3]，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

[1]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这次重来，已经过去了38年，他却觉得只是弹一下指、挥一下手的短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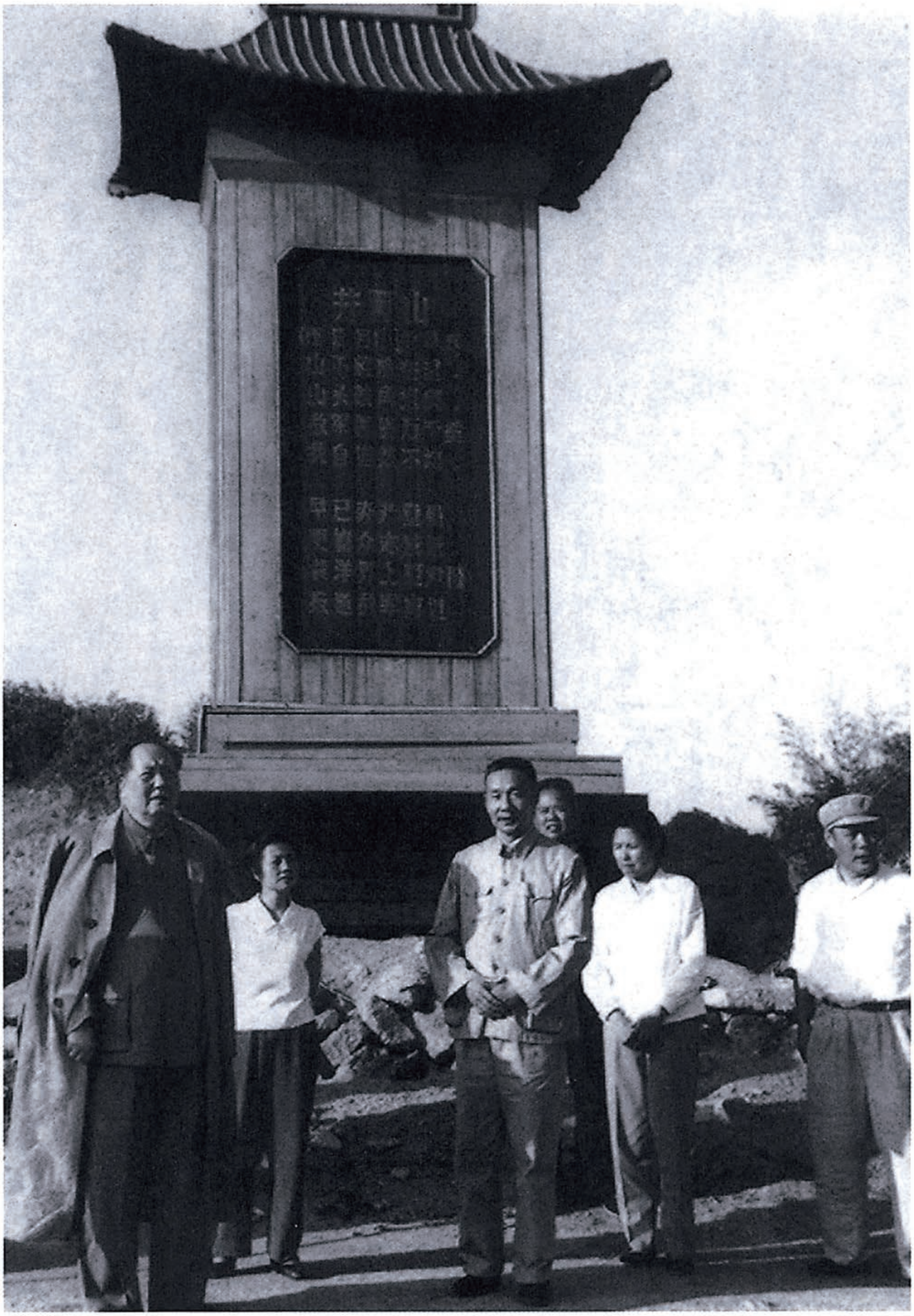
[2] 九天揽月，九天，天的极高处。《孙子·形》：“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揽月，摘取月亮。唐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览同揽。

[3] 捉鳖，喻擒拿敌人。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四折：“管教他瓮中捉鳖，手到拿来。”

1965 年 5 月 21 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途经茶陵时和茶陵县负责同志合影。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和永新县干部亲切谈话。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毛泽东和张平化等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前。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茨坪宾馆。

1965年5月，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在江西井冈山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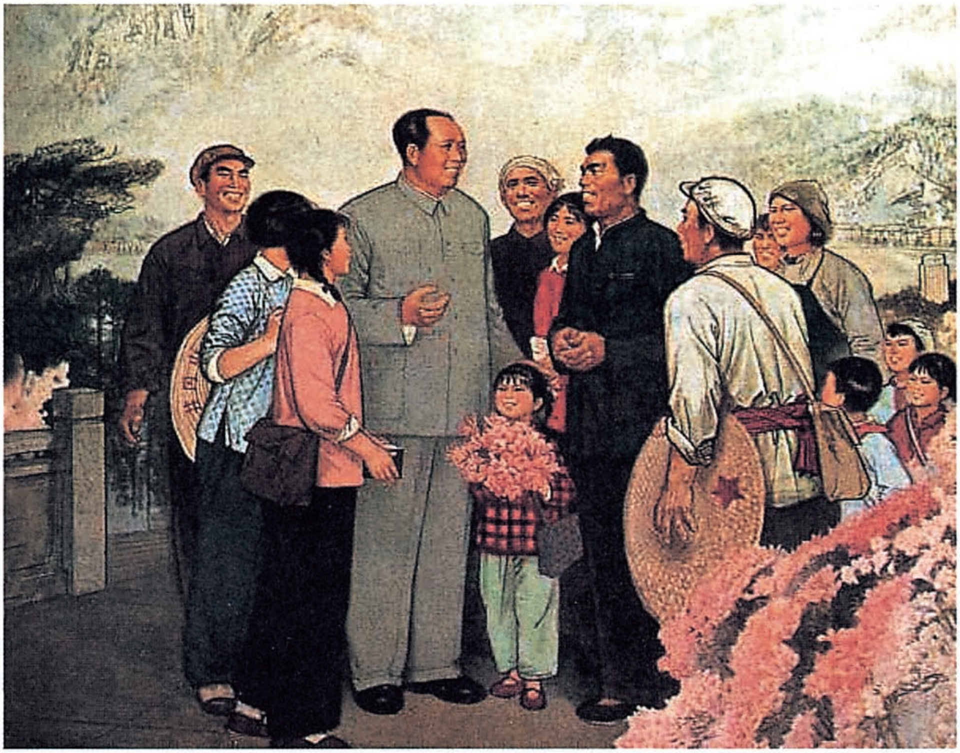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漫步。

1965年5月，毛泽东漫步井冈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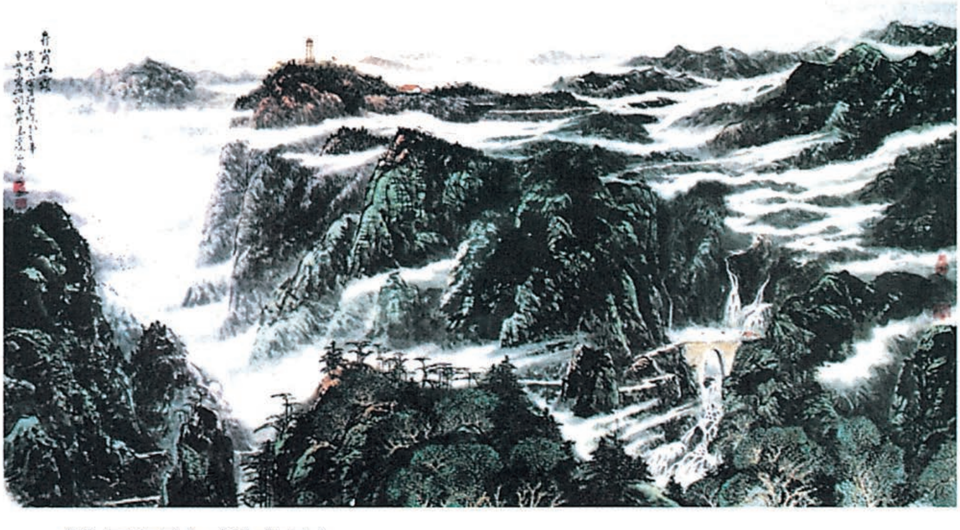
1965年5月，毛泽东和警卫员王宇清在井冈山合影。

1965年5月，毛泽东会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和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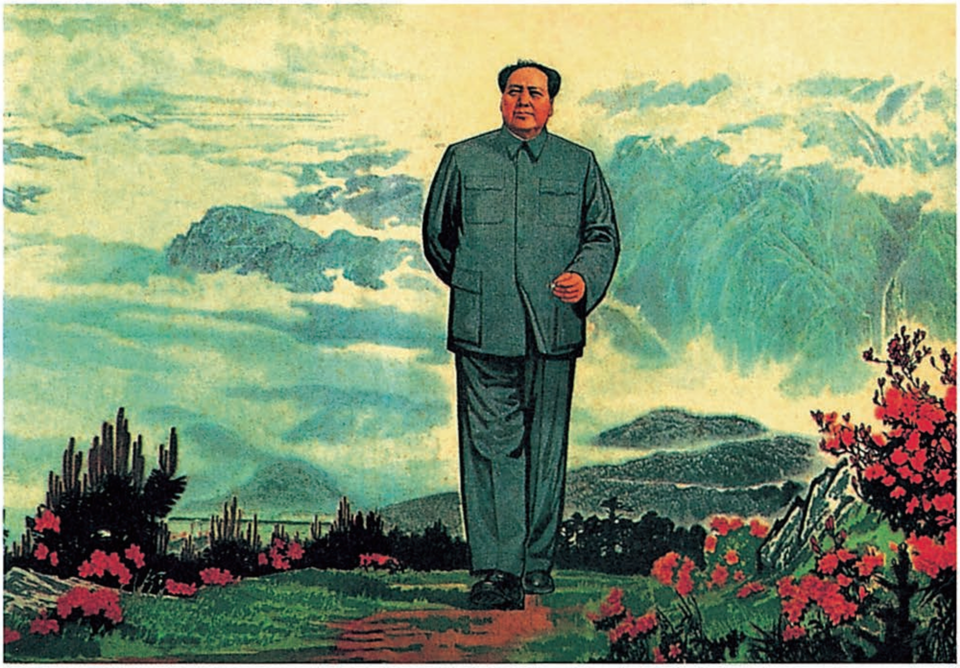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会见当地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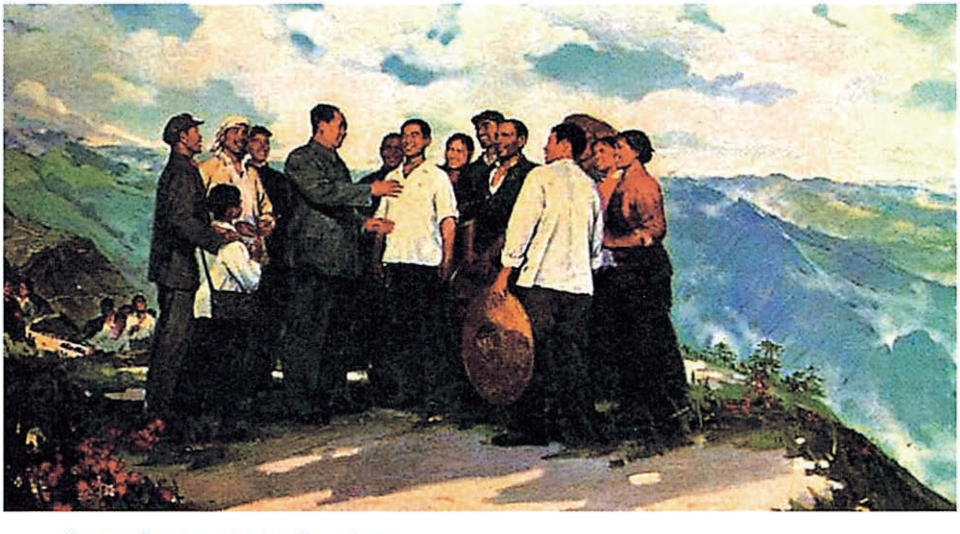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井冈山人民在一起》（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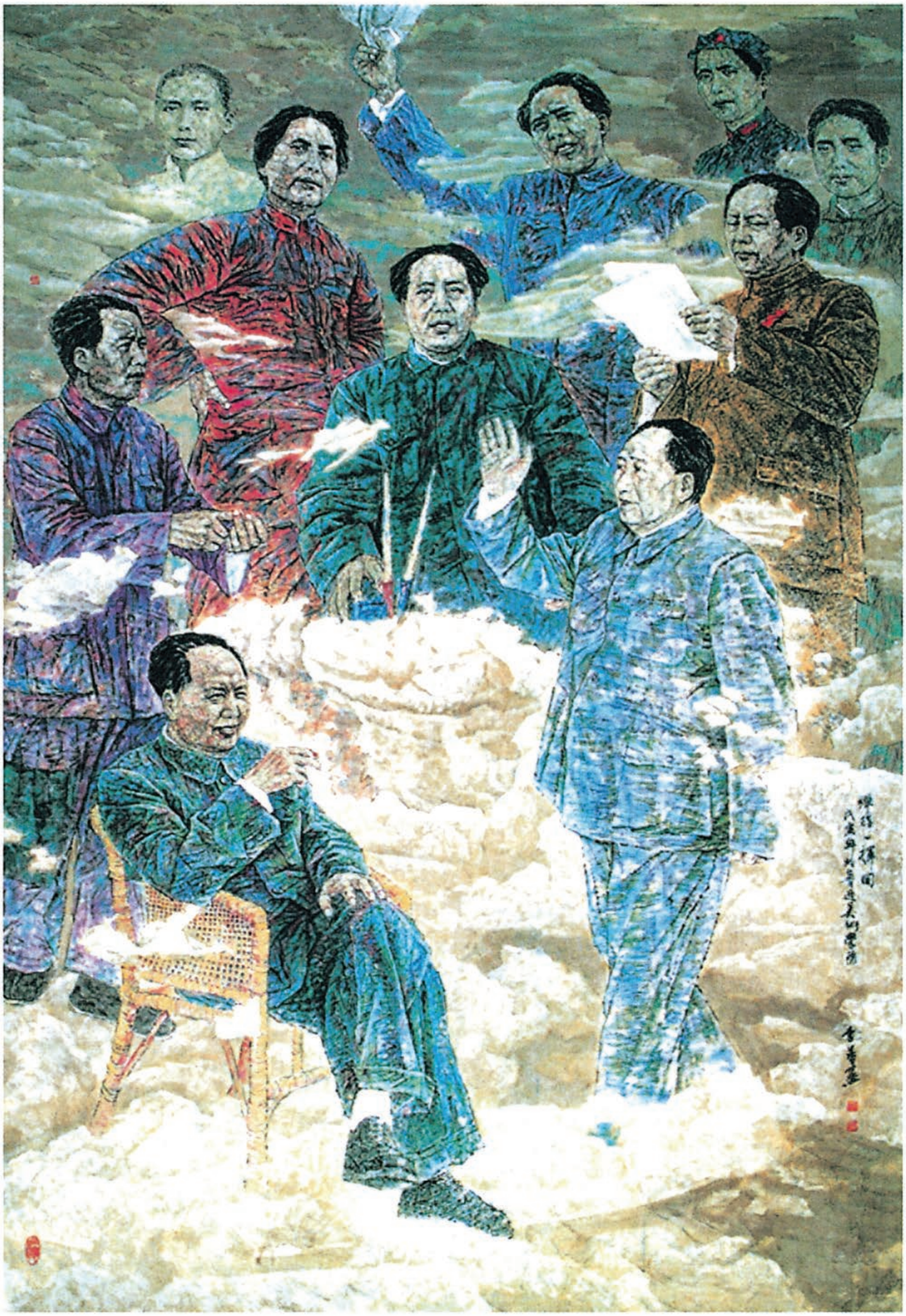
《井冈颂歌》（诗意画）



《重上井冈山》（油画）



《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油画)



《弹指一挥间》（诗意画）

对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指示纪要的批语

（1965年5月25日）

此件[1]已阅，退林彪同志。所提各项意见[2]，都同意。所谓十三项物质准备工作，如有文件，盼送给一阅。

毛泽东

五月廿五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1965年5月21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常委在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同志时的指示纪要。这次会议是为贯彻执行毛泽东1964年在十三陵谈话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而召开的。纪要说：1965年5月19日，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同志接见了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同志。在听取罗瑞卿和几位小组长汇报时，他们分别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

[2] 指示纪要提出的主要意见是：一、要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从各方面来打，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易来打，就有可能争取推迟战争，甚至使战争打不起来。二、要从战略上考虑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对增加兵员，要从全局来考虑，军队搞得太多，就要影响国家经济建设。三、备战工作要有重点，现在必须搞好工事，搞好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先从部队抽一点力量去搞工事。四、要从军事思想、物质基础和军队的政治工作三方面做好打仗的准备。

念奴娇·井冈山

（1965年5月）

参天万木，
千百里，
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
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1]前，
黄洋界上，
车子飞如跃。
江山如画，
古代曾云海绿。[2]

弹指三十八年，
人间变了，
似天渊翻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

---

[1] 五井碑，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总称五井。明清以来立有五井碑，现已毁。

[2] 古代曾云海绿，有人说，这里古代曾经是海。

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
万怪烟消云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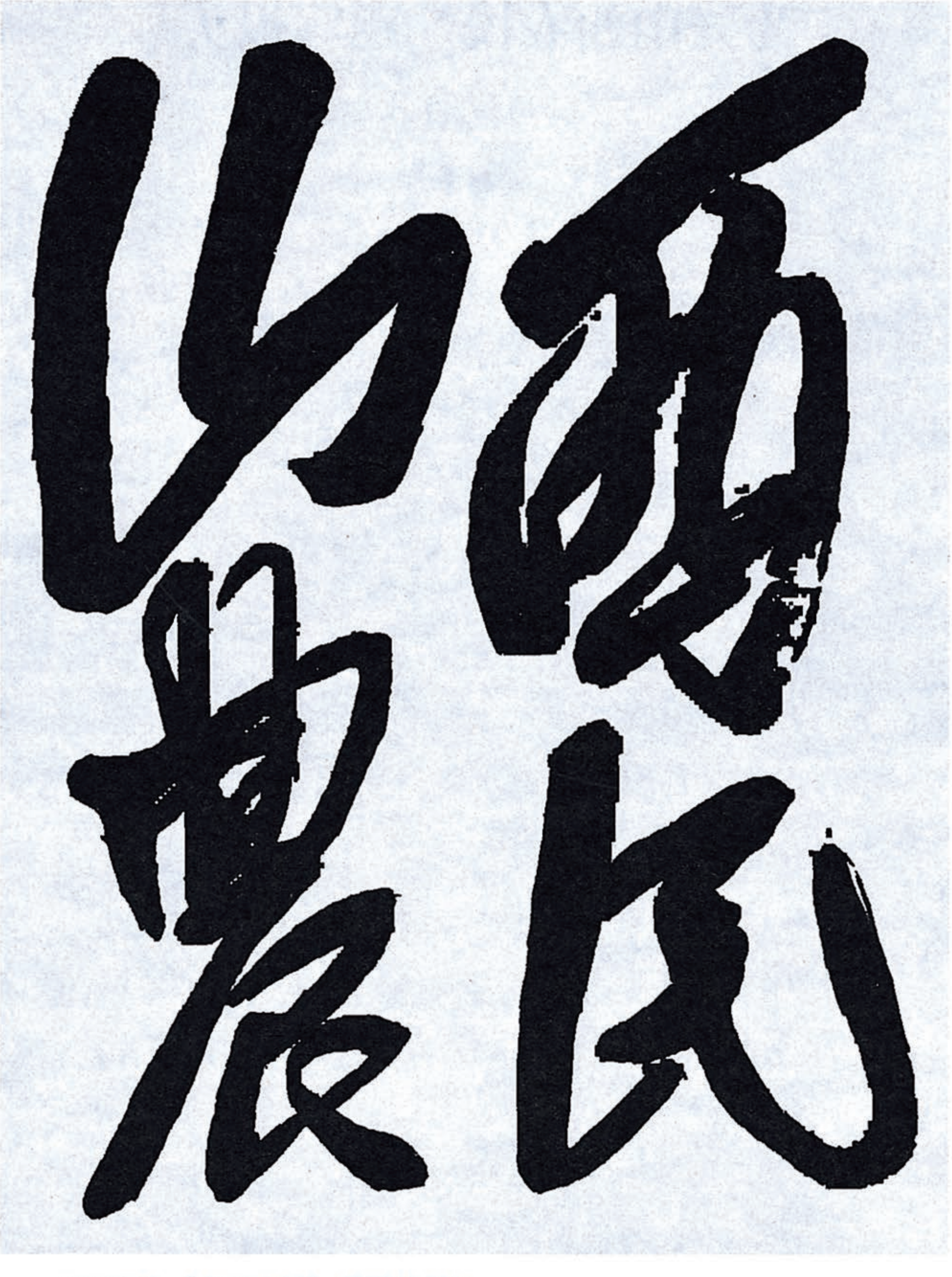
为《山西农民》题写报头[1]

（1965年5月）

山西农民

---

[1] 《山西农民》报是山西省委创办的第二张报纸，也是全国创办最早的农民报之一。毛泽东为其题写报头。



毛泽东为《山西农民》题写的报头。

为郭国群[1]题词

（1965年5月）

加强学习，力求进步，好好为人民服务。

---

[1] 郭国群，当时在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

毛泽东等祝贺中蒙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

（1965年5月3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蒙古人民革命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祝中蒙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在国际关系研究所一份内部材料上的批语[1]

（1965年6月2日）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2]了。

毛泽东
六月二日于杭州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际关系研究所1965年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十五期登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上。文章说，约翰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策划的各式各样的和谈阴谋已经一一破产，逐步扩大轰炸北越的战争讹诈一手也未收到预期效果。现在，是否要把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线，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争吵大大地加剧起来。他们的争吵表明，约翰逊政府确确实实是在积极准备进一步扩大战争，打算同中国进行一场较量。但这一政策在国内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也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很大压力，因此，约翰逊政府将加强“和谈”攻势，企图以此争取舆论，摆脱困境，为进一步扩大战争创造“政治资本”。同时在“和谈”攻势的掩盖下，继续加紧扩大战争的各种准备。估计美国目前暂时还不会把轰炸扩大到河内、海防一线，但对目前轰炸区域空袭的强度将进一步增加。

[2] 指1965年4月14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在《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材料上的批语[1]

（1965年6月7日）

江青阅。共四件[2]，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六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一七三期登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的材料上。材料说，去冬到今春，山西省为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广大贫农、下中农，进一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性，发现和培养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积极分子和基层组织的骨干力量，在各县比较普遍地举办了农民讲习所。现在看来，举办这种讲习所效果很好。省内先后举办这种讲习所的县（市），有97个。截至今年3月底，共训练了92901名学员，每期学习时间为20天左右。学习内容是以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和“九评”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5个条件等12篇文章为基本教材。在春节以后，还普遍增加了“二十三条”的学习内容。学习方法是从学员的思想实际和当前阶级斗争实际出发，搞思想运动。整个思想运动分5个步骤：第一，报告当前国内外形势，明确学习目的，解除思想顾虑，调动学习积极性；第二，结合学习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

的文件，发动学员回忆诉苦、讲三史（家史、村史、社史），议三史，明确阶级观点，调动阶级感情；第三，结合学习有关社会主义性质和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文件，揭发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破坏活动及其危害，划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明确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第四，结合学习有关思想革命化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文件，照镜子，找差距，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提高争当革命接班人的自觉性、积极性；第五，总结学习收获，进行小组鉴定，巩固与扩大学习成果。学员主要是贫农、下中农，其他中农出身的学员约占2%。这种讲习所，在县里一般有一名县委常委领导，他们抓的关键，一是抓挑选学员，二是抓办学人员革命化。经过学习，学员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自觉性普遍有了很大提高，他们中90%以上已成为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成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

[2] 除上述一件外，另三件不详。

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1]

（1965年6月9日）

我过去也当过记者，办过报纸，做过小学教员，就是不会打仗，没有上过军事学校。谁教会我打仗的？蒋介石用杀人的办法强迫我们拿起枪来同他们打仗，我也就学会打仗了。人们说我是“好战分子”，一点也不错，我打了二十二年仗。我现在还想打仗，不过不是想出去打，而是要敌人打进来。

现在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这点在人民中间要进行宣传。看来，帝国主义是准备打的，不然军火商发不了财。他们以为是会打胜的，实际上打起来对我们有利，他们一定会失败，这一点他们没有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个中国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打出个印度尼西亚和几十个民族主义国家。如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就没有了。世界上总是没有武器的人打败有武器的人，没有武器的人在打仗中间会建立起独立的陆、海、空军。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合作国会议长阿鲁季·卡塔威纳塔和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把反对赫鲁晓夫[1]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的批语[2]

（1965年6月11日）

康生、冷西同志：

此文[3]已经看过，写得很好，照此发表。

毛泽东

六月十一日

---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14日和15日，他的这两个职务被先后解除。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和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1965年6月9日为送审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给毛泽东的信上。

[3] 指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为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写的《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在196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1965年第七期发表。

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

（1965年6月16日）

一

我看你们那么多项目，投资那么多，不仅各部、各地提的要求高了，你们定的指标也高了。安排得少一点行不行？在你们的汇报提纲里边讲，“打起仗来，你打你的，我建我的”，实际上真正打起来，劳动力、粮食、运输都要转过来。你打你的，我建我的，只能是你打你的，我建我可能建的那些部分。我们过去有经验，抗战期间脱离生产的人数不能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三。一百个人只能养两三个人，多了就不行，就没有饭吃了。要精兵简政。打起仗来，部队也不要搞那么多，特别是后方部队还要搞些生产。

二

华东开会，许世友[2]讲，要把敌人完全顶住，不准它进来，在沿海打光。我说，你不给它点好处，不使它感觉到有点味道，这不成，那样它就不来了。要使它感觉到有一点味道。请问，一个国家

---

[1] 本篇一至六是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2] 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打仗，这么大国家，纵不是像日本人那样长驱直入，也要给它一些味道，才会给我们机会打大胜仗。我看，就是怕它不进来，它只在边沿上搞一下，那就实行许世友的建议，在边沿上把它整下去。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人家得不到好处不行，那样就不能诱敌深入。第五次反“围剿”，不诱敌深入，敌人只好筑堡垒。让敌人筑，你筑你的堡垒，我不放一枪，到后面找个地方休息去，把你的堡垒置于无用。比如筑到会昌，何不让他筑，我们统统撤退，到后方去练兵，让他筑到瑞金，他后边守的人就少了。然后到别的地方，到那些没有堡垒的地方去打，或者到有堡垒但守的人少的地方去打。姜太公钓鱼钓不到，就是因为不给鱼东西吃。你钓鱼不给些东西不行。你拿破仑不到莫斯科，怎么会打败仗？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诱敌深入，它进来之后，也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要包围得太多了，太多就歼灭不了。三个师五个师歼灭它一个师，那样才能吃掉它。

斯大林格勒之战也算是诱敌深入，但我看他不是自觉地诱敌深人，而是被迫的。斯大林格勒之所以能守住，一是敌人不能救援；二是敌人后方沿线要兵守；三是集中力量吃它一坨，不到处去吃。再加上气候太冷，冬天又有大雪。

三

城市防空，过去有，后来取消了，不对。不能认为城市防空这套是从苏联来的，就全面否定。我看国家一个钱也不出，你修就修，不修就拉倒。今天挖一点，明天挖一点，就成了。当然，也要搞个计划，搞点简单图纸，帮助解决点工具。挖出的土方如何处理，也得有

个办法。一家挖个洞可以，几家联合挖个洞也可以，有什么了不得?(插话：先在北京试验一下。）不！各个大城市都开始搞。

四

三线建设也要准备两手，一个是搞起来，一个是搞不起来。搞不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抗日战争时期打日本，后来打蒋介石，一直到抗美援朝，我们不是也打胜了吗？美国人比蒋介石厉害，也厉害不了多少。我们没有准备好，他们来了怎么办？也还不过是蒋桂八九个王牌师。我看，能顶得住就顶，顶不住，那就请吧！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五

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六

打起仗来，工厂也要搞点农业，这是工农关系问题。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否则他就不同你一起打仗了。大军南下时，我们有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老百姓高兴了，后方巩固了，加强纪律性听话了，不胜才怪呢！

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

给章士钊[1]的信

（1965年6月26日）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2]。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3]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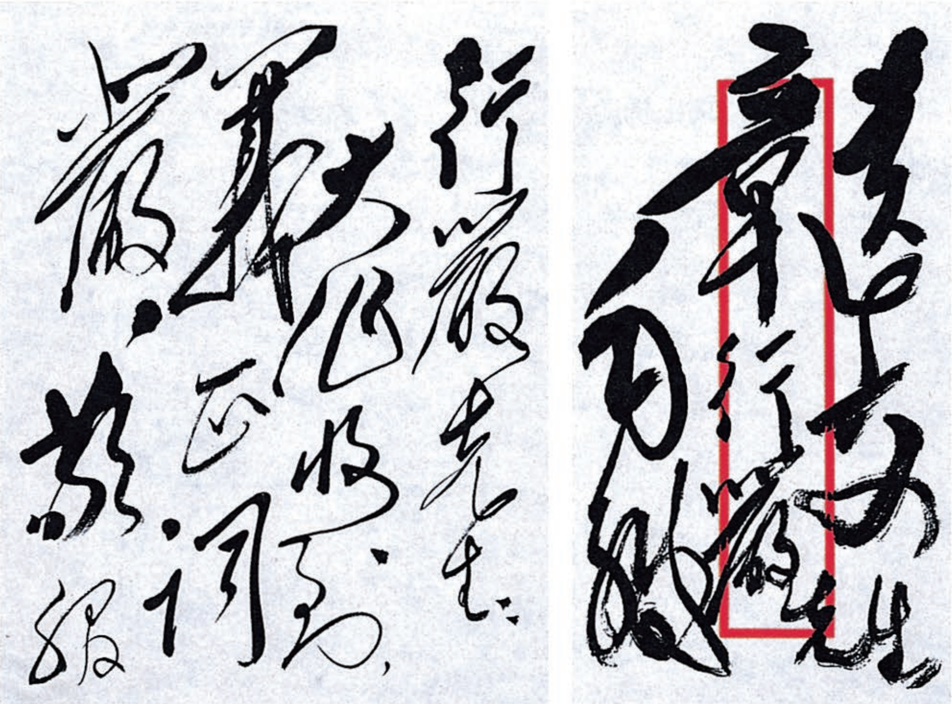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六月廿六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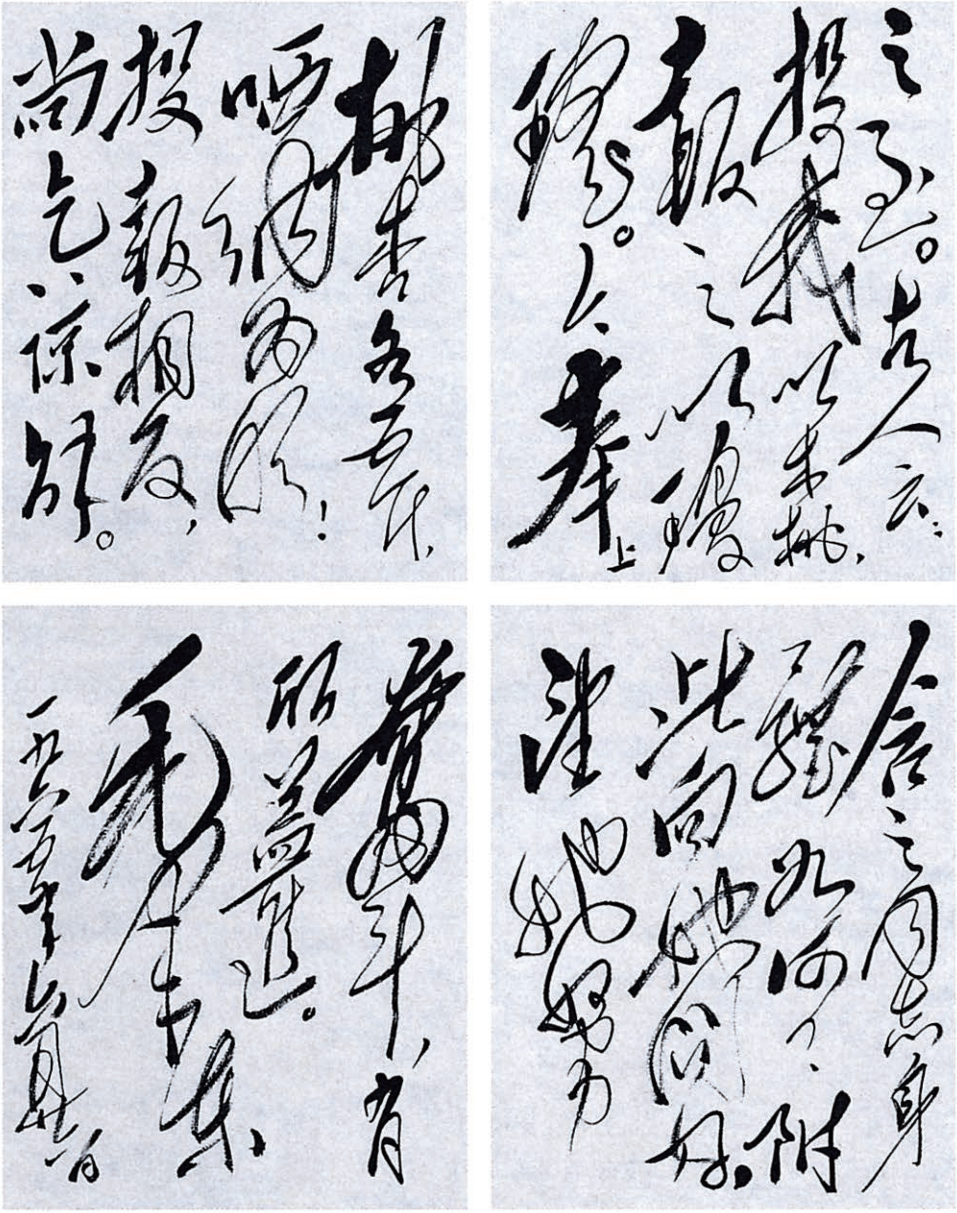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参见《诗·卫风·木瓜》。

[3] 含之，即章含之，章士钊的女儿。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请她[illegible]

[illegible]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

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

（1965年6月26日）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2]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3]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通存在的病，怎样预

---

[1] 这是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和医务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2] 华陀，东汉时期著名医学家，医术精湛，成为后世神医的代名词。

[3] 李时珍（约1518—1593），字东壁，晚年自号濒湖山人，蕲州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之一，其所著《本草纲目》是本草学集大成的著作，对后世医学和博物学研究影响深远。

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肯定造成医生与病人间的隔阂。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二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六五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还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对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两个文件[1]的批语和修改[2]

（1965年6月29日、7月10日）

一

谢部长：

此两件[3]都已看过，照此办理。会议如有好的意见，可以吸收。

毛泽东

六月廿九日

二

改了几句[4]。

三

少数改造好、对生产建设有特殊贡献的犯人或刑满留场人员，像锦州电机厂搞出真空冶炼和电子轰击炉的工程师王灿文（留场人

员）这种人，可以减刑、提前释放或摘帽子，还可以给以工程师待遇或者其他适当的经济待遇。

四

主席讲，天下太平，很好。天下大乱，也不见得是坏事。乱（指战争）有乱的极大好处，例如我党经历过二十五年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不算在内），还不是都打胜了。

---

[1] 指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65年6月11日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和公安部党组1965年7月9日关于第十四次公安会议的报告。谢富治的讲话就下列四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要上交问题；二、公安工作备战问题；三、教会和反动会道门问题；四、公安队伍的“四清”和政治工作问题。公安部党组的报告提出了需要中央正式批准的几个具体问题：一、关于捕人、拘留和劳动教养的控制问题；二、加强改造工作问题；三、关于民警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谢富治1965年6月28日为送审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谢富治1965年7月10日为送审中央转发第十四次公安会议两个文件的通知代拟稿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公安部党组报告第二个问题“加强改造工作”中的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四是毛泽东对谢富治讲话记录稿第二个问题“备战”中的一段话的修改。

[3] 一件指谢富治在第十四次全国公安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另一件指中央防空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的南宁、个旧、湛江三市动员群众挖防空洞、壕效果很好的材料。

[4] 参见本篇三、四。

关于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的批语[1]

（1965年7月3日）

陆定一[2]同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共青团中央办公厅1965年6月25日编印的《团的情况》（增刊）第十八期登载的《北师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一文上。文章说，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反映，最近他们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二年级一个班调查，发现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体育锻炼运动量过大，课余活动多，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身体健康。

[2]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

毛泽东等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的电报[1]

（1965年7月10日）

乌兰巴托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同志，

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同志：

在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蒙古人民、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蒙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今后仍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同蒙古人民一起，为加强中蒙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扎·桑布的电报。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四十四周年。1921年蒙古人民在苏俄红军的援助下于7月8日解放库伦，击溃温甘伦白匪军，取得革命胜利。7月11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策、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

祝兄弟的蒙古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稿[1]的批语

（1965年7月11日）

康生、冷西[2]同志：

此件已阅，写得很好。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7月10日的这份复信稿，据理驳斥了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1965年4月17日来信中对中方不同意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所进行的攻击和诬蔑，指出：我们细心地观察了你们几个月来在越南问题上所进行的种种活动，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企图在政治上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兄弟国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企图实行军事上的控制，把我们套在你们的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你们4月3日提出的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就是贯彻你们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复信稿还对苏方提出把分歧撇在一边、采取联合行动的说法进行了批驳。指出：你们所说的“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对李宗仁[1]回国问题的报告的批语和修改[2]

（1965年7月12日、15日）

一

总理[3]：

---

[1] 李宗仁，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7月9日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上写的批语。调查部意见说，程思远于6月28日抵达瑞士，向李宗仁转达了在京所谈各节。国内建议，为了李的安全，回国前不要在欧洲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可在回国后再考虑。李同意这个意见，并表示将在7月20日偕其妻郭德洁同程思远一起经巴基斯坦回国。但程思远建议，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说明回国原因和反帝爱国立场。我们意见，对此可考虑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李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第二个方案，同意李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我们倾向采用第一方案。本篇二、三是毛泽东1965年7月15日对中央调查部关于李宗仁回国后发表声明问题给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的电报稿的批语和加写的话。其中本篇三写在电报稿下面一段话之后："李回国后的简短声明稿，仍请李拟定告国内。如李认为需要抵沪商量后才好拟稿，也请李决定。"

[3] 总理，指周恩来。

似以第二方案[1]为较好，稿子[2]事前商好，并无坏处。请再酌。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二

总理：

你去上海是否多留几天，同李[3]面商声明稿，并同机回北京。李回国，你似应到机场欢迎。

毛泽东
十五日早

三

可在上海住几天，商量好简短声明后，再来北京。

---

[1] 指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7月9日关于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提出的第二个方案。

[2] 指李宗仁的书面声明稿。李宗仁1965年7月20日抵达北京时在首都机场发表声明。这个声明在1965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

[3] 李，指李宗仁。

对军队文工团到农村、工厂去锻炼的指示

（1965 年 7 月 15 日）

军队文工团只知道军队的事不够，还应知道工人、农民的事。因此也应同地方文工团一样，要到工厂、农村去，特别要到农村去锻炼，去参加“四清”。

1965年7月16日，毛泽东会见应邀访问中国的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

毛泽东等接见内蒙古自治区乌兰牧骑文艺宣传队。

关于绘画使用模特问题的批语[1]

（1965年7月18日）

一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2]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3]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二

齐白石、陈半丁[4]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5]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6]。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1965年5月12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问题给江青的信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

泽东在这封信最后一页上写的批语。信中说，关于使用模特问题，我们从油画专业出发，提出几点意见：一、资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必须彻底批判。模特写生是资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中技术训练体系的核心。因此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废除模特制的决定的基本革命精神是可以理解的。二、在党的文艺教育方针指导下，必须逐渐完备无产阶级艺术教育体系，建立一套新的和它相适应的技术训练体系。模特写生作为解决美术基本功的初步训练方法，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三、美术创作是以表现工农兵斗争生活、表现人物为主的。对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它不只解决描写人物的写生能力，而且也可以有助于解决一般的写生规律。在新的技术训练体系中，不宜排斥人物写生，不宜排斥课堂作业，不宜排斥少量的人体写生。男女人体都应该在技术训练中占少量的比例。四、从废除模特制以后，在教学活动中，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应届毕业生的创作质量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据我们所知，美术学院不少教员和学生也都为此而担心。因此，我们建议在美术学院“四清”运动第四阶段中，用毛泽东思想、用真正彻底革命的精神，用和旧传统决裂的精神，发动群众对使用模特问题进行民主讨论，以求得妥善的解决，把新的艺术教育体系稳步地建立和完备起来。

[2] 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恩来，即周恩来。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3] Model，英语单词，汉语一译“模特儿”。

[4] 齐白石，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陈半丁，画家，当时任中国画院副院长。

[5] 徐悲鸿，画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6] 刘海粟，画家，当时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

给郭沫若[1]的信

（1965年7月18日）

郭老：

章行严[2]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3]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安吉！并问力群[4]同志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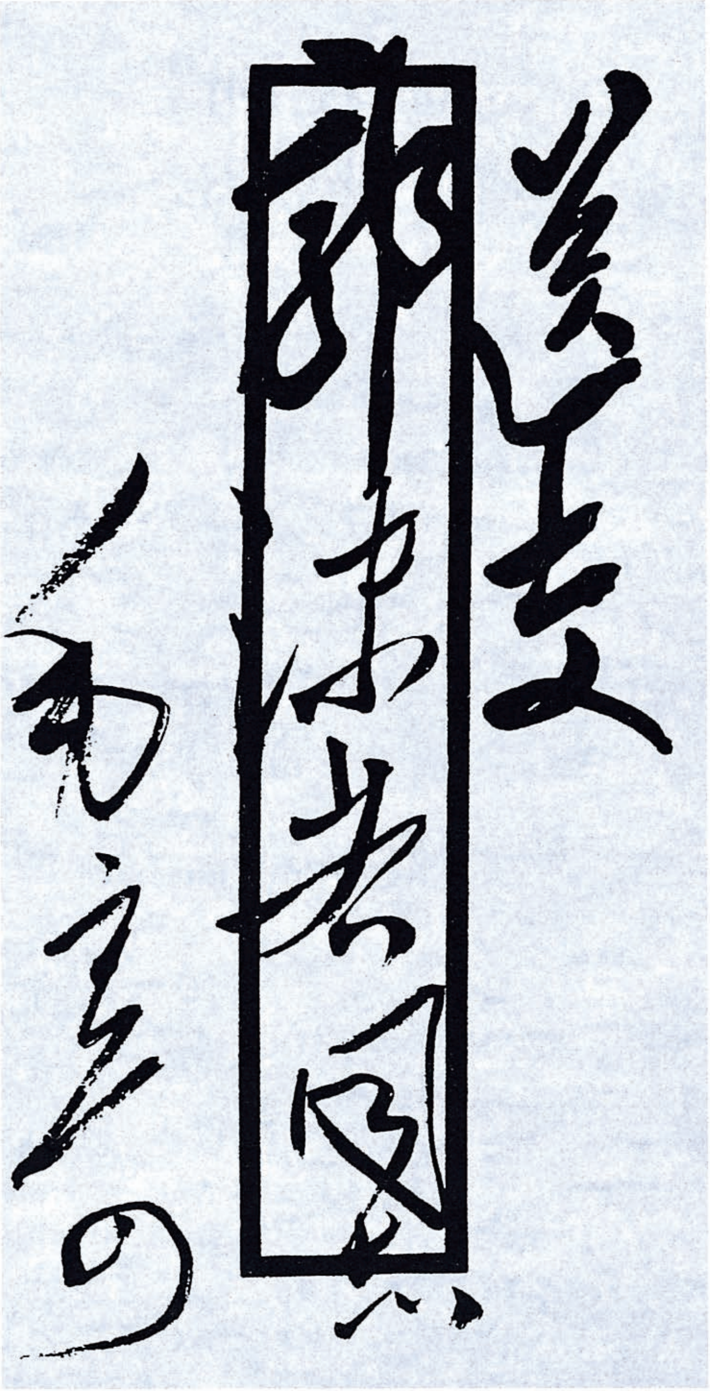
---

[1] 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2] 章行严，即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3] 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4] 力群，即于立群，郭沫若的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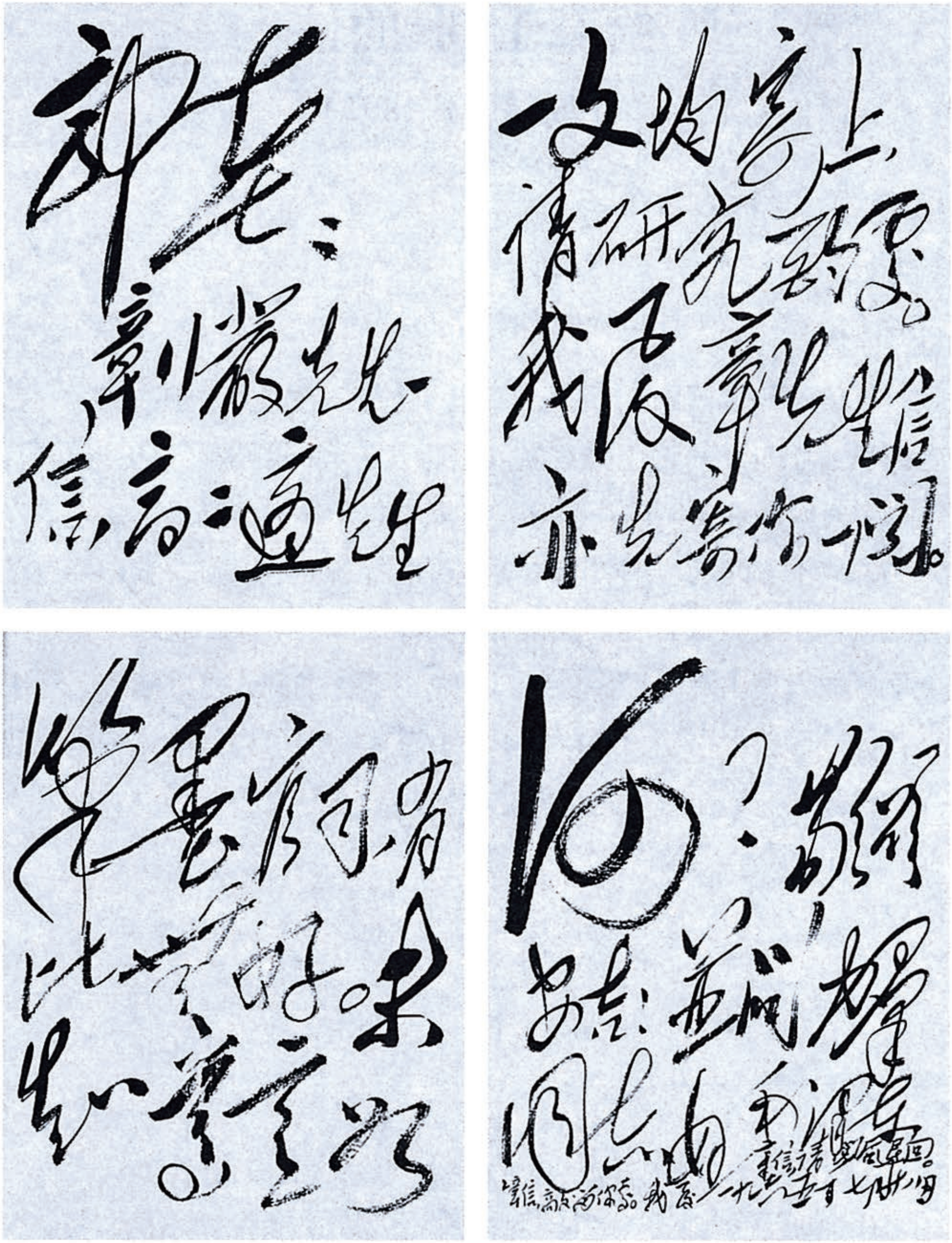


送交

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

毛泽东致郭沫若信的信封。



郭老：

章行严先生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敬颂

安吉！并问

立群同志好。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致郭沫若信的手稿。

给章士钊[1]的信

（1965年7月18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3]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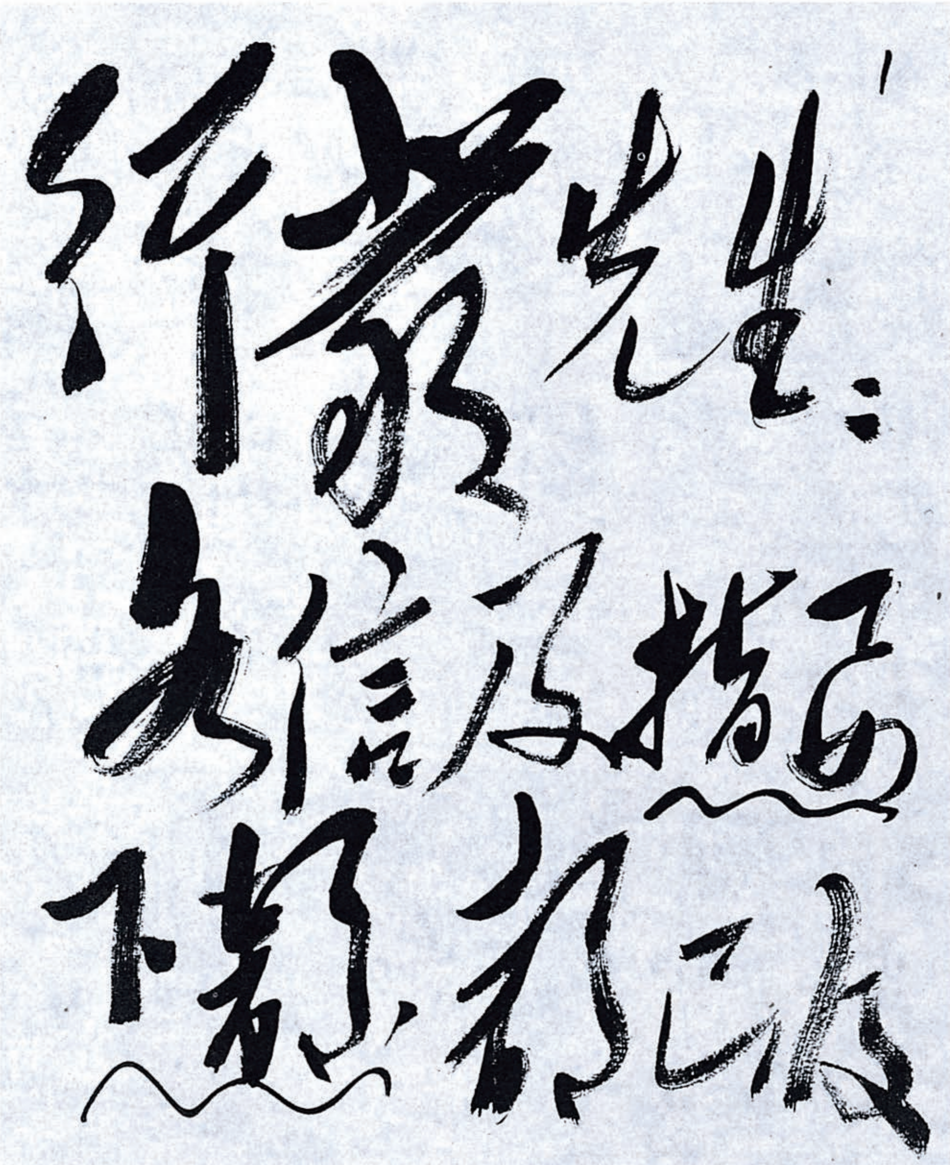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

[1]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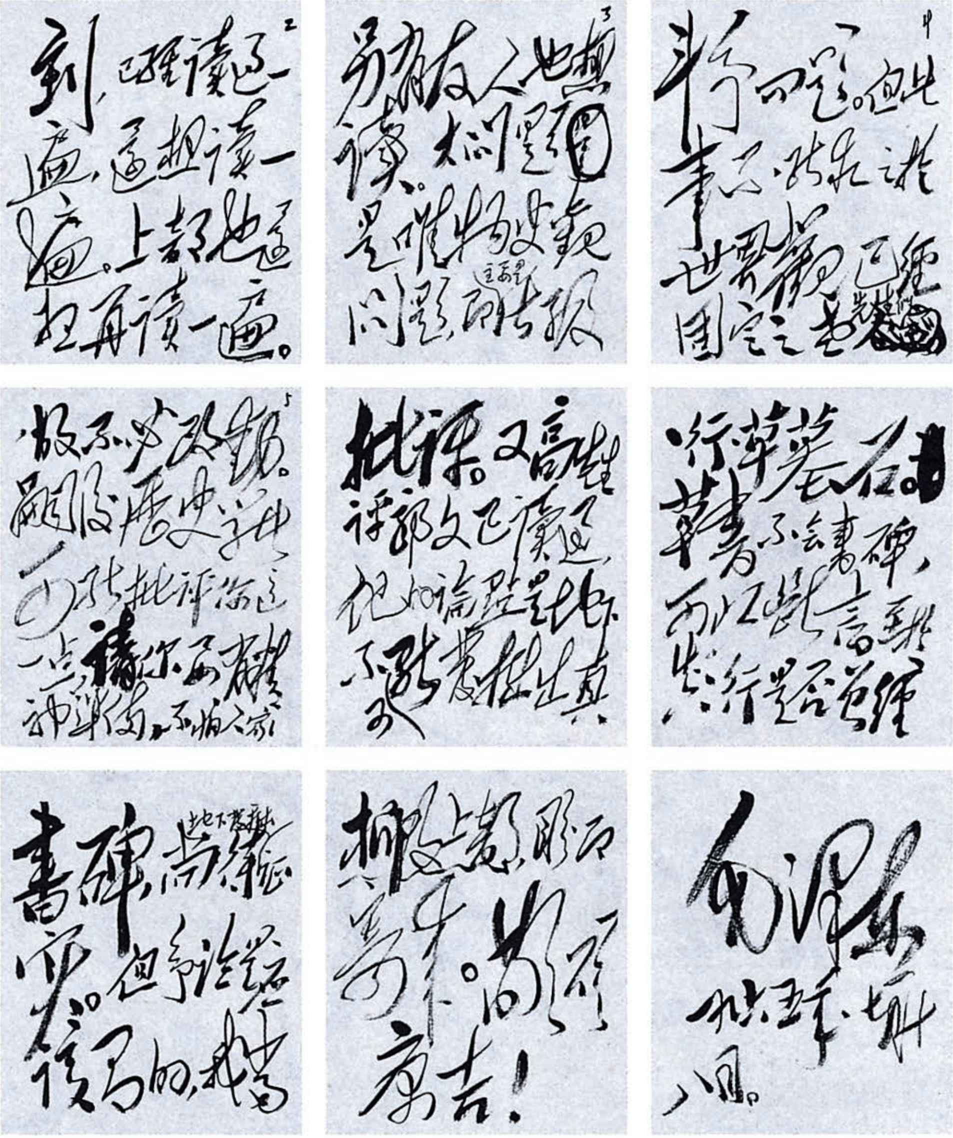
[2] 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 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行严先生：
大信及指要
下部均已收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部分）。



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兰亭是否是右军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柳文上部，盼寄来。敬颂康吉！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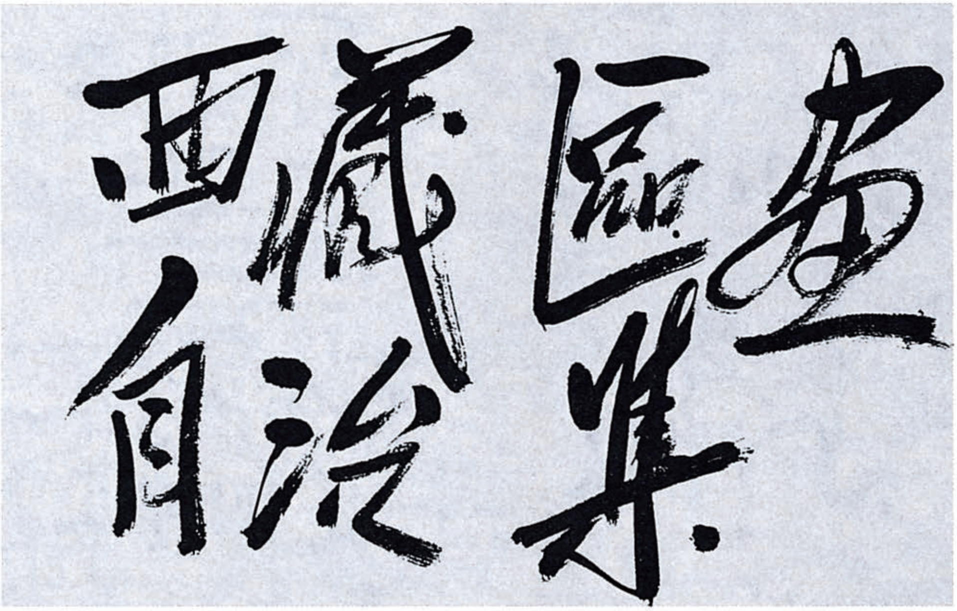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毛泽东致章士钊信的手稿（部分）。

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名[1]

（1965年7月18日）

西藏自治区画集



毛泽东为《西藏自治区画集》题写的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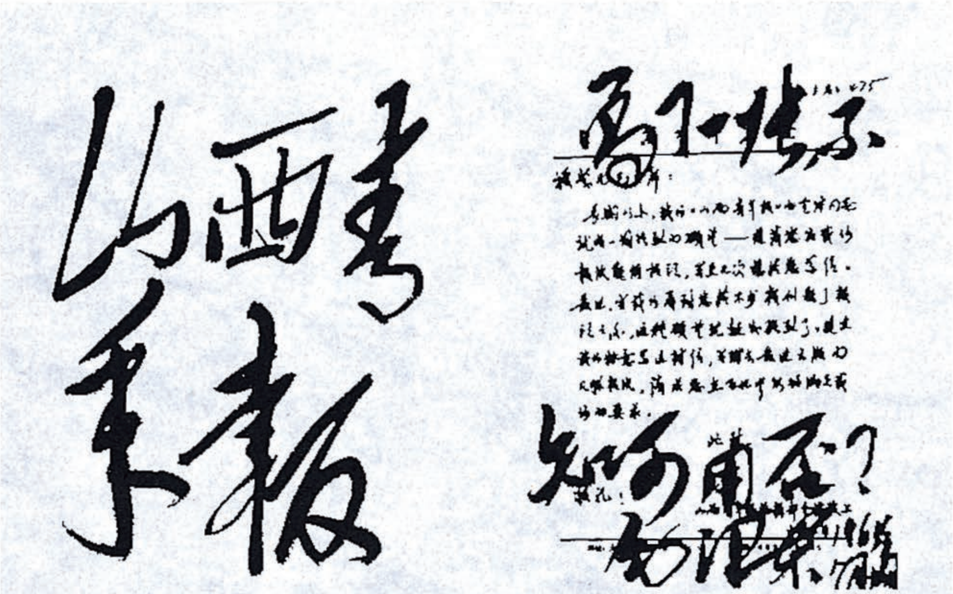
---

[1] 《西藏自治区画集》，专为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出版。毛泽东为本书题写书名。

为《山西青年报》题写报头[1]

（1965年7月18日）

山西青年报



毛泽东为《山西青年报》题写的报头。

---

[1] 《山西青年报》1949年创刊，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为《山西青年报》题写了报头。

对刘少奇关于转发湖北九个材料[1]的报告的批语[2]

（1965 年 7 月 19 日）

少奇同志：

九件材料及你所写指示[3]，都已看过，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

[1] 指湖北省孝感县县直社教分团、卧龙区区直工作队和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工作组 1965 年 5 月至 7 月分别总结整理的九个材料：一、《湖北孝感县组织县委工作队的情况和作法》；二、《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配备半脱产干部的情况和作法》；三、《湖北孝感县卧龙区区、社干部实行轮流值班、轮流蹲点的情况和作法》；四、《湖北孝感县卧龙区直精简机构的初步方案》；五、《湖北孝感县卧龙区清理区、社干部带家属住机关的情况和作法》；六、《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实行大队干部轮流值班的情况和作法》；七、《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建立贫下中农核心小组的情况》；八、《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财务公开的情况和作法》；九、《湖北孝感县卧龙公社群益大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

[2]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 1965 年 7 月 11 日关于转发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王任重从孝感寄来九个材料，每个材料都不长。我看都很重要，对“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

如何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作法。是否可以转发各地参考，以便各地党委都来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附在后面，请主席批示。

[3]　指刘少奇为转发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代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四清’运动后，县、区、社、队如何进行工作，如何精简机构和减少脱产人员，是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切实地加以解决。王任重同志从孝感县寄来的这九个材料，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具体作法，现将这九个材料发给各地参考，望各地党委都来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为了改进领导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应当重新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现在联系实际来学习那篇文章，会有更深刻的体会。”1965年7月20日，这个指示同湖北孝感的九个材料一起以中发〔65〕447号中共中央文件向全党印发。

1965年7月，毛泽东、刘少奇在中南海。

和医务人员的谈话

（1965年7月19日）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得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得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毛：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毛：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

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人。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给北京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高殿英的题词[1]

（1965年7月20日）

好好学习，努力为人民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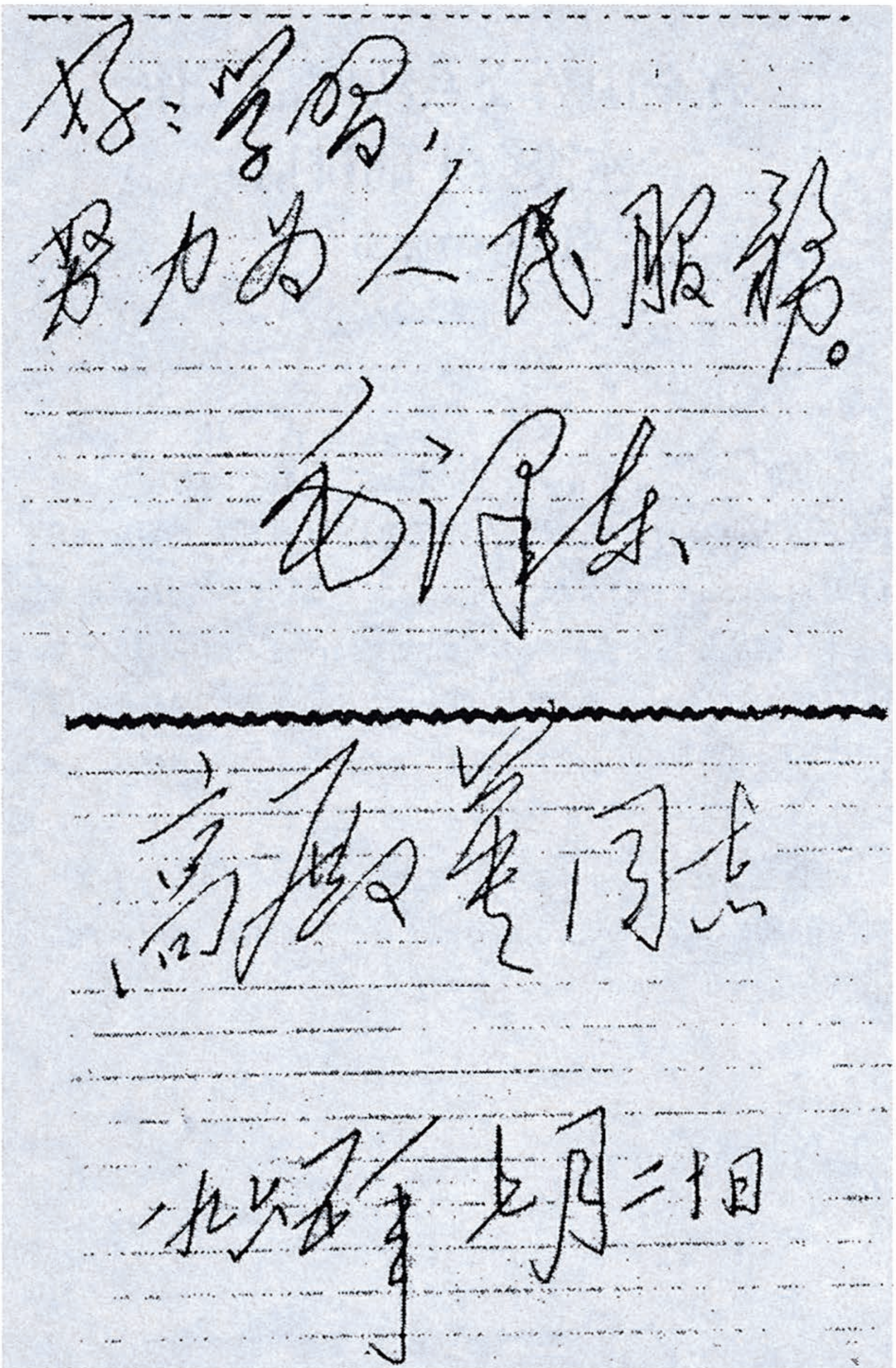
高殿英同志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高殿英学习雷锋的笔记本上写的题词。



好好学习，

努力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高殿英同志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日

毛泽东为高殿英的题词。

在全国公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5 年 7 月 20 日）

社会的渣滓，也是不可少的，社会上没有这些渣滓才怪呢！我看一万年也会有的，不然就没有正确的了，真理是对谬误而言，唯物论是对唯心论而言，辩证法是对形而上学而言。一万年以后，形而上学，唯心论还是有的，不然社会上就没有矛盾了，斯大林晚年就犯了这个错误，他只是强调苏联社会各阶级人民的一致性，而否认了不一致性。他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矛盾了，这是指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实际上隐藏了深刻的矛盾。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结果事物走向了反面，肯定变成了否定。当然，否定又变成了否定之否定，这就是说，苏联人民不可能长期被修正主义统治下去。

给陈毅[1]的信

（1965年7月21日）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2]善七律，董老[3]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

[1]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的诗词作品集有《陈毅诗词选集》。

[2] 剑英，即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他的诗词作品集有《远望集》和《叶剑英诗词选集》。

[3] 董老，指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的诗词作品集有《董必武诗选》。

西行[1]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2]翼展，哪得鸟途[3]通。
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4]
风雷驱大地[5]，是处有亲朋[6]。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7]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

---

[1] 1965年春，陈毅所作的诗《六国行》组诗七首寄呈毛泽东，同年夏陈毅收到毛泽东的回信，信中谈到了诗歌的一系列问题，并为其修改了第一首，即《西行》。西行，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阿联、缅甸等亚非六国。

[2] 因：因为，由于。鹏，传说中的大鸟。这里喻指飞机。

[3] 得，能。鸟途，意思是说路途险阻，只有鸟能飞过。

[4] 钟，古代的一种圆形的酒壶。千钟，极言其多。仞，古代的长度单位，历代说法不同。万仞，极言其高。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意思是说从飞机上俯瞰大地，大海仿佛酿造的千钟美酒，高山如同栽种在菜畦上的高大的青葱。

[5] 风雷，风与雷；喻指全世界蓬勃兴起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运动。驱，行进。大地，指世界。驱大地，即驱于大地。

[6] 是处，所有地方，也就是处处的意思。亲朋，亲戚朋友。指同情、支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各国人民。

[7]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属河南），唐代诗人。

直言之也”[1]，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2]，“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3]。韩愈[4]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5]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6]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

[1] 参见宋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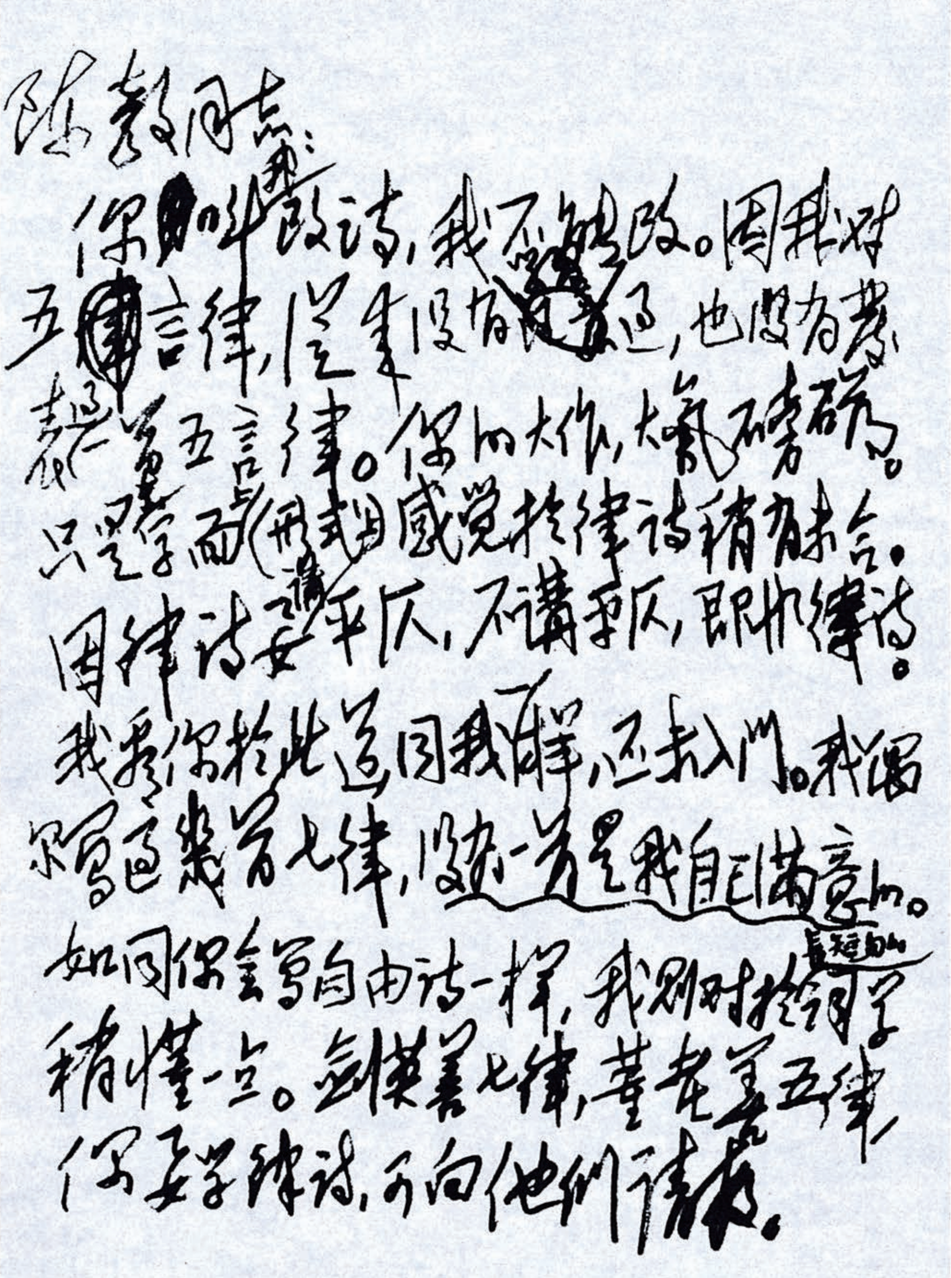
[2] 参见宋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3] 参见宋朱熹《诗集传·周南·葛覃》。

[4] 韩愈，唐代文学家、诗人。

[5]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西南），生于碎叶（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北部），唐代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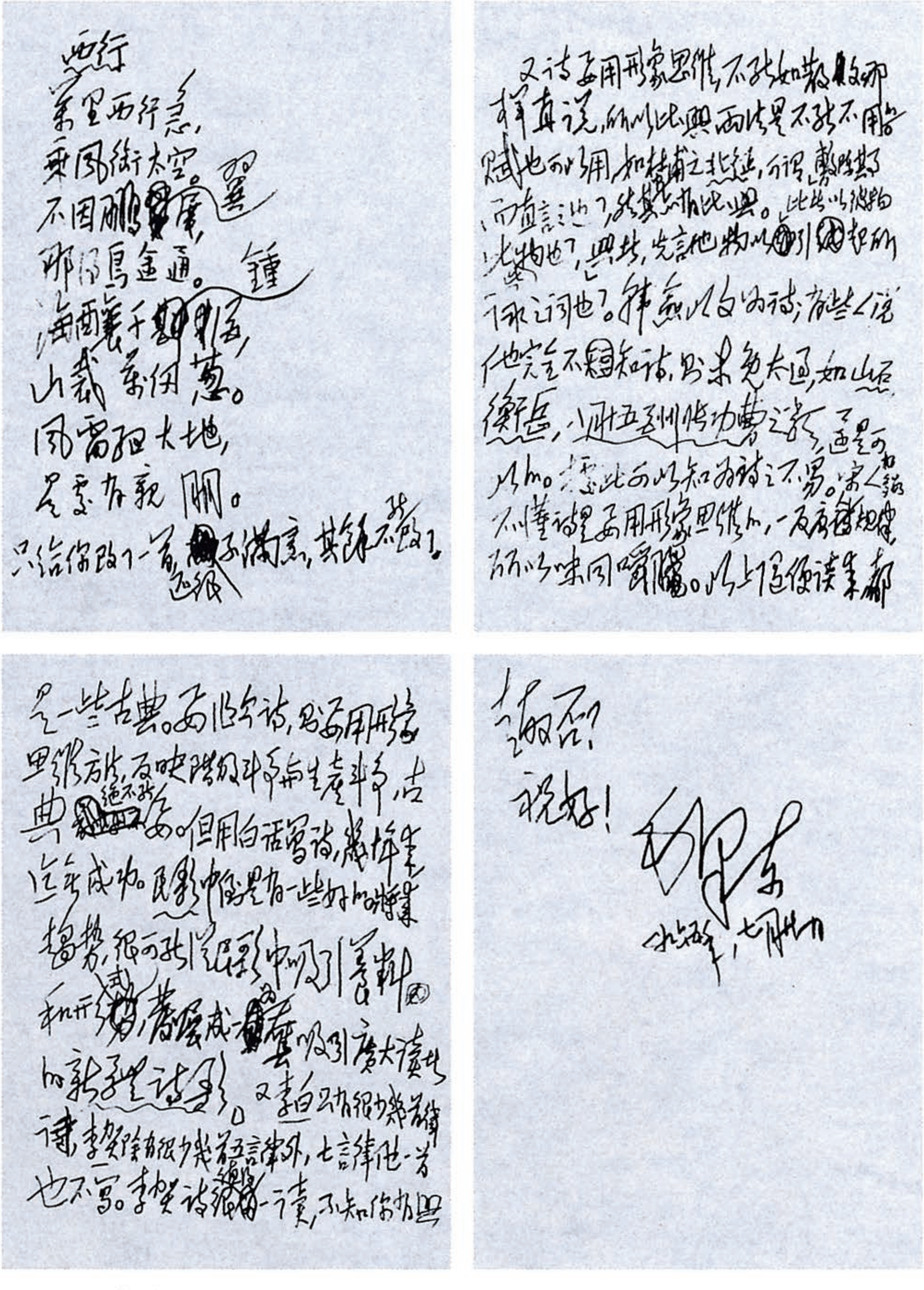
[6] 李贺（790—816），字长吉，福昌（今属河南宜阳）人，唐代诗人。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毛泽东致陈毅信的手稿。



西行

万里西行急，
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
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
山栽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
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

毛泽东致陈毅信的手稿。

给华罗庚[1]的信

（1965年7月21日）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2]，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敬颂教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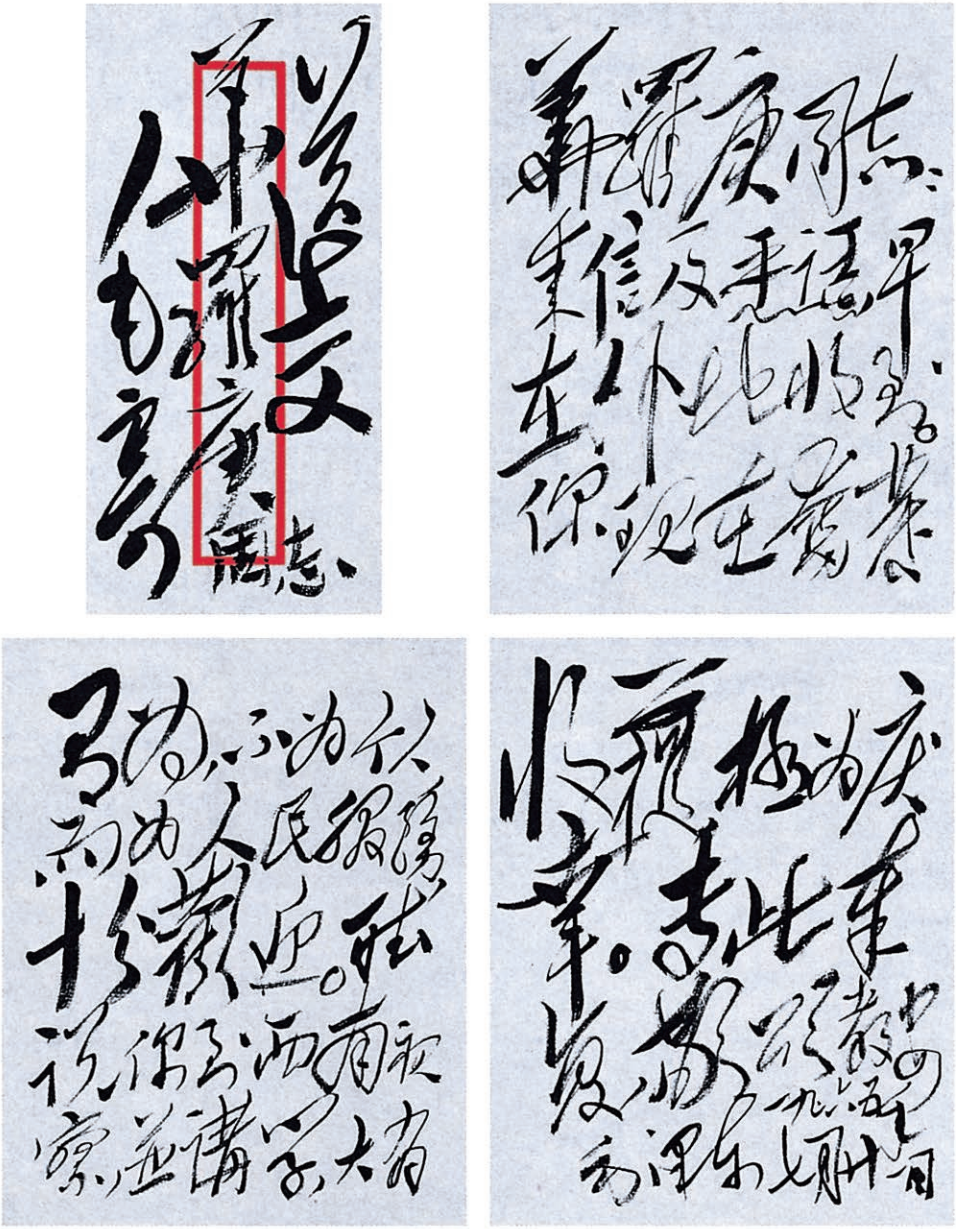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

[1] 华罗庚，数学家，当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

[2] 《平话》，指华罗庚所著《统筹方法平话》。



送交

华罗庚同志

[illegible]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手诗早已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复，敬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毛泽东致华罗庚信的手稿。

毛泽东等祝贺波兰国庆二十一周年的电报[1]

（1965年7月21日）

华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奥哈布同志，
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同志：

在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庆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向你们和波兰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关怀波兰人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和平所进行的斗争，对于波兰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感到无比高兴。我们把你们的成就看作是自己的成就。

我们两国人民一向存在着深厚的友谊，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保持着不断的发展。我们希望，中波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两国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波兰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奥哈布、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的电报。祝贺波兰国庆二十一周年。

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们愿借此机会重申，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波兰人民反对西德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

祝波兰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祝中波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人民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5年7月25日）

哈瓦那

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人民庆祝武装起义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兄弟的古巴人民、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十二年前古巴人民发动的七月二十六日武装起义，开辟了古巴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革命胜利以后，古巴人民坚持斗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政策，保卫了自己的祖国和革命的果实，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古巴人民的革命和胜利，两个哈瓦那宣言的革命精神，鼓舞了拉丁美洲人民争取解放的斗志和信心。现在，拉丁美洲人民反美帝、反独裁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正在走向新的高涨。

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的，是经得住考验的。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

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古巴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前进。

祝古巴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对首批援越高炮部队开赴越南问题请示信的批语[1]

（1965 年 7 月 25 日）

瑞卿同志：

此信[2]看过，照办。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1965年7月25日请示信的批语。

[2] 指罗瑞卿1965年7月25日的请示信。信中说：援越部队两个高炮师拟应越方要求，于8月1日由两个方向向越南境内开进。另为增强越南北方北线铁路的防空力量和锻炼部队，在北线加了一个五七高炮团。

给于立群[1]的信

（1965年7月26日）

立群同志：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六日你给我的信，以及你用很大精力写了一份用丈二宣纸一百五十余张关于我的那些蹩脚诗词，都已看过，十分高兴。可是我这个官僚主义者却在一年之后才写回信，实在不成样子，尚乞原谅。你的字好，又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

敬问暑安！

并祝郭老[2]安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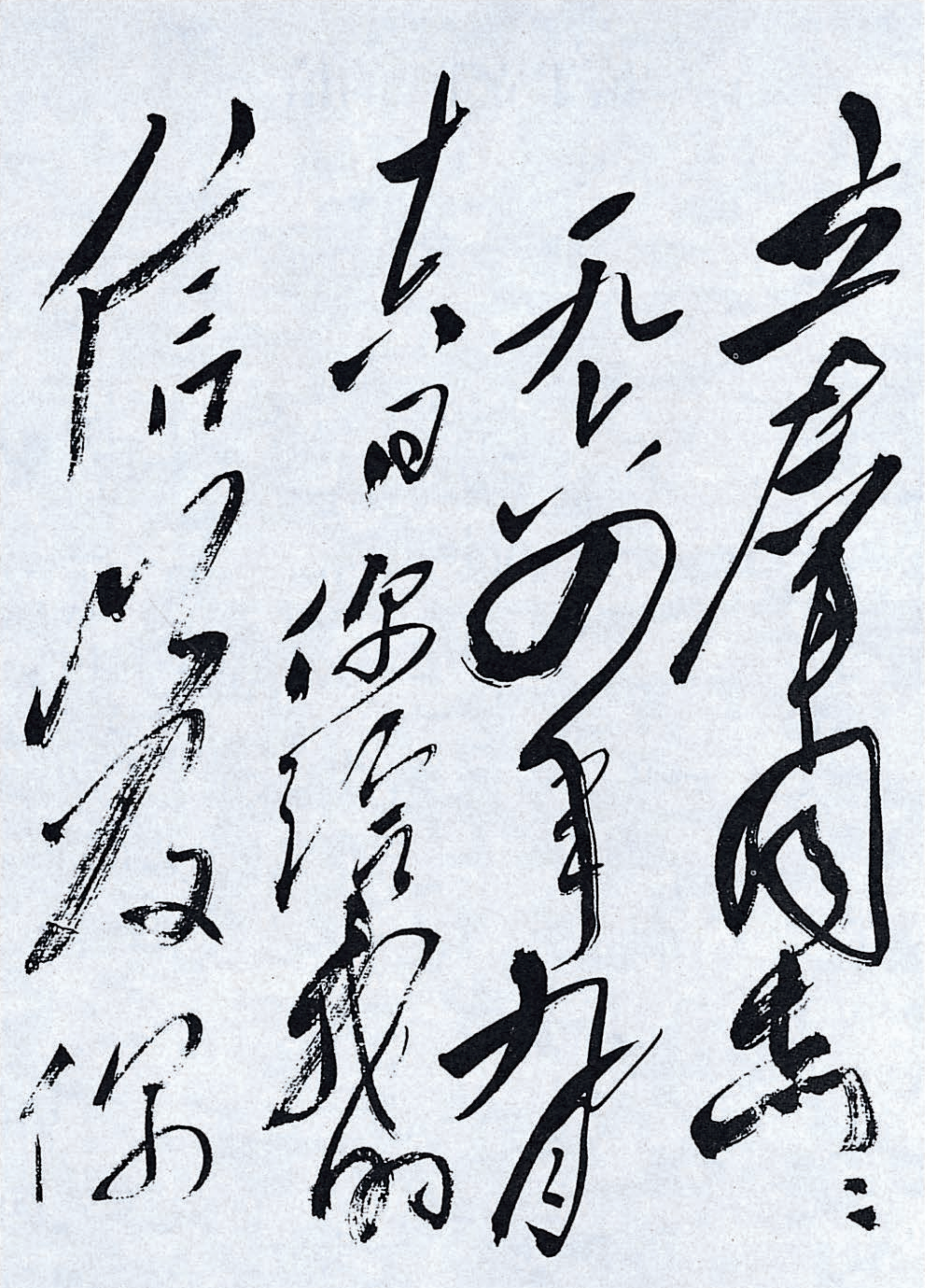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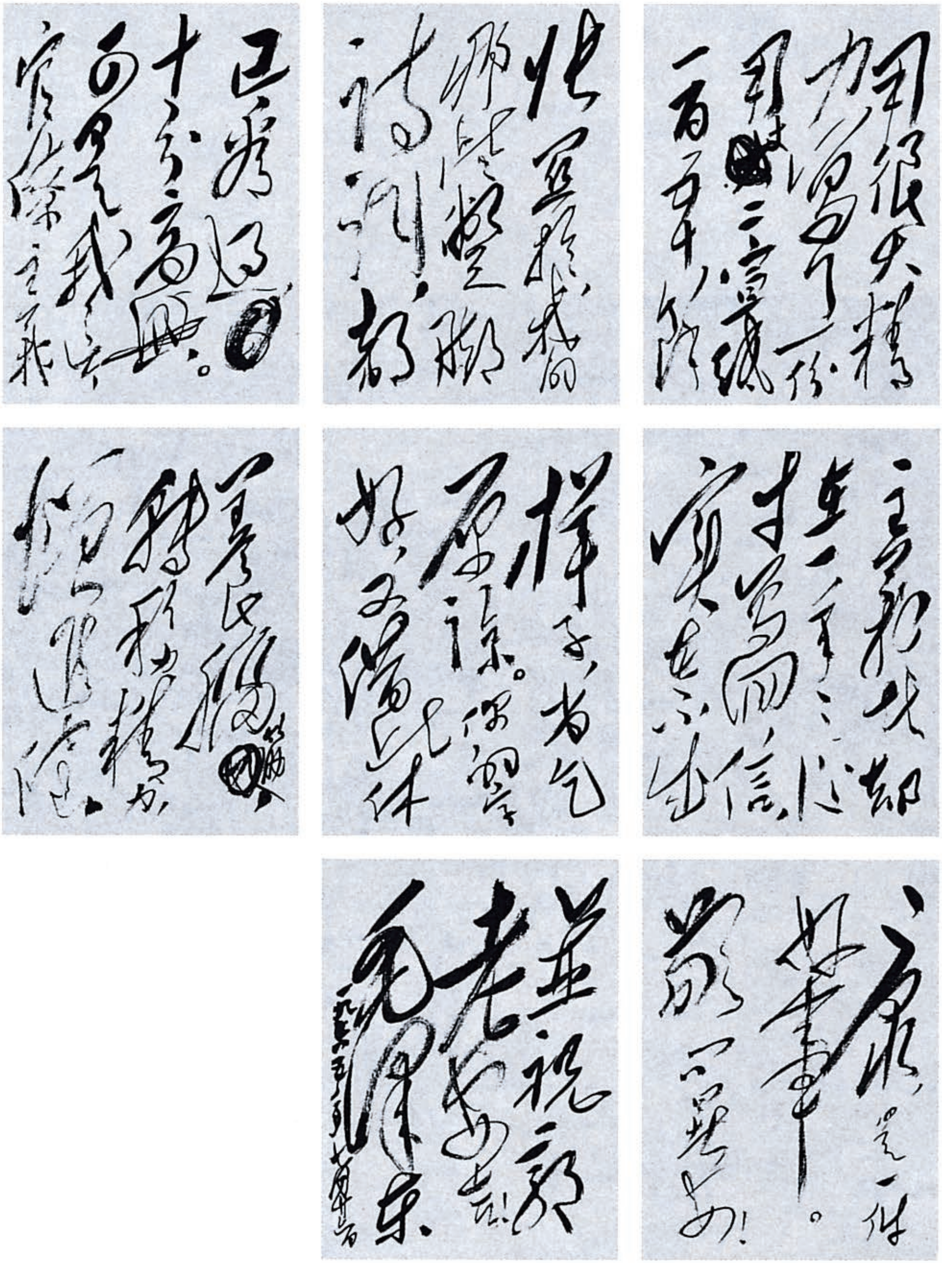
---

[1] 于立群，书法家，郭沫若的夫人。

[2] 指郭沫若，历史学家、文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毛泽东致于立群信的手稿。



毛泽东致于立群信的手稿。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应邀访问中国的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奈温。

和李宗仁[1]及其夫人的谈话

（1965年7月27日）

【新华社二十七日讯】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接见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

毛主席同李宗仁先生及其夫人热烈握手。

毛主席说：你们回来，很好，欢迎你们。

李宗仁先生说：我们回来后都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高兴。

毛主席说：祖国是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还得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先生对毛主席说，在海外的许多人士都怀念祖国，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来。

毛主席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主席建议李宗仁先生到全国各地去看看。

---

[1] 李宗仁，原为国民党桂系首领。1948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崩溃后去美国。他偕夫人郭德洁1965年7月从海外归来，20日到达北京。

1965年7月，毛泽东会见回归祖国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1965年，毛泽东会见李宗仁夫妇。

关于毛泽民出生年月的批语[1]

（1965年7月27日）

质忠同志：

你想错了。毛泽民是我的二弟，少我两岁。

毛泽东
七月廿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1965年7月2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我在新疆看了烈士陵园，其中毛泽民同志出生年月是1895年6月。在我的记忆中泽民同志比主席大一点。是否有误，请主席指示。

对中央转发谷牧[1]关于设计革命运动报告的通知的批语[2]

（1965年7月29日）

退彭真[3]。

---

[1] 谷牧，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1965年6月14日批转谷牧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通知上。通知说，全国各设计单位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了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半年多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设计革命运动的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领导带头检查，主动承担责任，启发设计人员自觉革命；并且运用解剖麻雀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同时组织设计人员下楼出院，深入现场，联系实际，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促进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最后把思想革命落实到设计工作的改革上去。中央认为，在知识分子集中的部门，采用这种办法来进行“四清”运动，是一个比较好的、成功的经验。这种做法可供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等部门参用。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党委，必须加强对设计革命运动的领导，经常督促检查，认真总结经验，注意防止偏差，保证运动更健康更深入地发展，争取新的更大的成就”。这个通知和谷牧的报告，中共中央以中发〔65〕375号文件发至省军级党委。按照毛泽东的批语，中央1965年10月3日以中发〔65〕604号文件发出关于扩大印发中央批转谷牧同志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的通知，要求将6月14日中央通知和谷牧报告“印发给所属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大城市区委，各大中工厂党委和各大小设计院学习和研究执行”。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已经看过，此件[1]很好。但似应发到地委、中等工业〔城市〕市委以及重要工厂党委。各大小设计院都要印发。

请酌定。

毛泽东

七月廿九日

---

[1] 指谷牧1965年3月16日在全国设计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设计革命运动的报告。报告讲了四个方面：一、当前设计革命运动的情况。1964年11月1日，毛主席发出关于开展群众性的设计革命运动的号召，这是我国设计工作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情。毛主席的号召，调动了全国20多万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很快就在全国各设计单位形成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的高潮，设计工作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1) 群众发动得比较充分。(2) 正在形成一种革命化的新作风。(3) 开始进行规章制度的改革。(4) 设计革命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二、设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1) 贪大求全；(2) 许多建筑设计不符合勤俭建国的方针；(3) 因循保守，不重视采用新技术；(4) 缺乏战争观念；(5) 设计方法繁琐，效率低，周期长，影响了建设进度。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有苏联的“框框”问题，有资产阶级设计思想的“框框”问题，有设计队伍的作风问题，也有我们领导上的问题。从领导工作的角度看，有以下几条经验教训：(1) 我们过去对设计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条重要战线。(2)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用毛泽东思想去占领设计工作阵地的深刻意义，使设计工作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3) 没有认真总结设计工作的经验教训，至今还没有开创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设计工作的道路。(4) 设计部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对于这一特点认识不足，领导工作一般化。(5) 对各设计院的具体领导也很不够。三、这次设计革命运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1) 政治挂帅问题，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的问题。(2) 设计工作的作风问题，也就是树立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革命化的作风问题。(3)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4) 整顿设计队伍问题。(5) 健全领导班子问题。四、设计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关系以及运动下一步的做法。

对一篇谈李宗仁回国问题的材料的批语[1]

（1965年7月）

此人谈得不错，海人〈外〉许多人都想回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调查部1965年7月30日编印的《调查通报》第八七二号登载的台湾一位人士认为“李宗仁回国是毛主席爱国不分先后号召的胜利”的材料上。材料中说：这位人士曾就李宗仁回国事，私下与人长谈。他说，李宗仁回国，是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一次胜利，是毛泽东“爱国不分先后”这个动人号召的胜利，影响无疑是很巨大而又深远的。李宗仁这个抉择，聪明而正确。他的勇气是应该佩服的。从个人出处说，“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做给蒋介石看，也可以泄一下多年的积恨。从大处看，中共政权坚如磐石，回去还有什么不安全？就是个人的身后历史，最后还可以得到弃暗投明的褒扬。老实说，我是同情李宗仁的，他下此决心并不容易。据我观察，李宗仁这次回去，是他多年苦闷、徘徊、观望、等待的结果。香港、台湾都有许多不得意于蒋家王朝的人，这些都是大大小小的李宗仁，他们看到李的行动及北京的反应，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不过条件未熟，时机未至，不能有所表示而已。这些不得意的人，因李回去引起不同程度的动摇，“李能为之，我亦能为之”。不过，台湾人士不易有所行动，非待蒋死后不可。香港则不同，他们动摇之后，就会有新的想法。下次章士钊来港时，可做的文章就多了。李回去影响大且深远，其意义即在此。

对《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的批语[1]

（1965年8月1日）

少奇同志阅后，寄福建省委叶飞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是如何部署的，盼告刘少奇同志和我。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5年7月28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五十一期上。这一期登载的《四清工作队员的一些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运动时间拖得太长。福建南安县一个队员反映，他们那里的运动已有9个多月，经过运动，该县面貌已根本改观，生产形势很好，新的领导核心也建立起来了。但是省委有些领导人还说，搞运动不要受时间限制，似乎时间拉得越长，运动就越彻底，使工作队员感到遥遥无期。二、工作队员体质普遍下降。福建南安县一些工作队员反映，由于长期生活比较艰苦，最近两个月来，工作队病号突增，约占总人数的30%以上。许多人已躺倒不能工作了。大部分是水肿、肝病、胃病，营养极度缺乏。三、农忙季节不宜搞“四清”。浙江省委工作团一队员反映，目前已到夏季大忙季节，可是这里的“四清”运动还在进行。群众不止一次地向工作组反映：“农忙时间，生产这么紧张，夜晚哪里熬得了！”“最好农忙季节不要搞，到农闲再搞。”工作队员也很疲劳，入夏以来，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来信建议，农忙时期不要搞“四清”运动，要关心工作队员的劳逸结合，准许体弱有病的同志回去调换。

关于查找杜牧[1]全集的便条

（1965年8月1日）

找唐人杜牧之全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八月一日

---

[1] 杜牧，字牧之，唐朝文学家，著有《樊川文集》。

对卫生部党委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的报告的批语[1]

（1965年8月2日）

请书记处处理。

毛泽东

八月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卫生部党委1965年8月1日关于进一步改革北京医院工作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上。报告说：今年6月26日，主席对卫生部提出了严格的批评。目前，我们正在根据主席的批评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指示，检查我们的错误，并研究制定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措施。现先就北京医院的进一步改革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请审核批示，以便立即着手执行。一、彻底改变北京医院的性质，取消北京医院的名称，改称东单医院。取消该医院专门承担高级干部及高级干部家属医疗的任务。今后，该院和市内其他医院一样，完全向群众开放，并负责划区公费医疗任务。二、集中在原北京医院的高干及高干家属医疗任务，今后根据划区原则，分别由包括东单医院在内的各个划区医院负担。今后，还拟加强和增设市区门诊部，负责群众和干部的医疗工作。中共中央8月14日以中发〔65〕495号文件将这个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中央各部门并告总政治部，要求各地区对于类似北京医院的这种老爷医院，必须同样进行改革，纠正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

在接见汇报卫生工作同志时的谈话

（1965 年 8 月 2 日）

（八月二日，钱信忠和张凯[1]向毛泽东汇报了卫生工作的相关情况）

钱信忠、张凯（以下简称钱、张）：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和批评很中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根据主席指示作了检查，请主席再给我们一些指示。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要讲的都已讲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钱、张：近来我们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讨论，打算组织城市卫生人员下去做几件事情。第一件，除给农民治病外，就是为农村生产队培训不脱产卫生员。

毛：训练多长时间？

钱、张：半个月左右。

毛：半个月太短了吧？

钱、张：他们主要学会些针灸，常见病的治疗和一些预防工作，训练后还要带他们做。

毛：带很重要，带多长时间？

---

[1] 钱信忠（1911—2009），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张凯（1912—1996），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卫生部副部长。

钱、张：城市医疗队下去可一直带，共带三四个月。

毛：这还可以，带三四个月，学会治十几种病。

（当汇报到搞一些半农半读训练班时）

钱、张：我们还在农村搞了一些半农半读训练班。

毛：半农半读怎么搞的？

钱、张：采取农忙不学，农闲多学的方式。

毛：多长时间？

钱、张：二年，三年。

毛：二年就是读一年书，三年就是读一年半书，这个办法好。

（当汇报到根据中央、主席指示作了检查时）

毛：现在有多少卫生技术人员？

钱、张：共有一百四十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其中公社和医生联合集体办的六十万，拿国家工资的八十多万。

毛：这个队伍不小！

钱、张：主席批评我们只为城市人口服务，很对，现在高级医务人员百分之八十在城市，其中百分之七十在大城市，百分之二十在县城，只有百分之十在农村。经费，包括县在内农村占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七十五用在城市。

毛：你们用了这么多人力，这么多钱，为那么少的人服务。

钱、张：主席指示后我们才清醒了。

毛：你们研究过神医没有？

钱、张：我们没有研究过。

毛：神医有三个好处：神药它保险，不会害人，没有毒；第二个好处是省钱，几个铜板就可以了；第三是给病人精神的安慰，病也就好了。

钱、张：许多病不治也可以好。

毛：比骗人的医生要好。

钱、张：通过四清和医疗队下乡，了解到农村卫生队伍很复杂。

毛：怎么复杂?

钱、张：有许多人过去不是医生，看些医书就加入医务人员队伍里来了。

毛：看些什么书?

钱、张：看些中医书，看些药方。农村医务队伍中，政治情况复杂、技术水平低的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毛：坏人不多吧!?

钱、张：真正坏人占百分之五左右，但政治技术水平低的较多，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个队伍如果没有新生的力量，取消他们还不容易。

钱、张：现在正在召开医学教育会议，讨论主席、总理指示，要办三年制卫生学校，为农村培养医生。

毛：高等教育要学五年，读那么长时间书，值得研究。

钱、张：现在想两条腿走路，办三年制，多在农村办，在农村招生。

毛：招什么生?

钱、张：大部分招高中生。

毛：初中还不行吗?

钱、张：目前农村高中生还不少。

毛：招中学生还不行吗?你们不在城市招了吗?

钱、张：城市也招一些，主要在农村招。我们体会，主席认为读五年书时间太长，至于招生不一定强调高中生。

钱、张：医生的政治思想重要，只有技术没有政治不行。

毛：这一点很重要。医生一定要政治好，招些政治好的中学生就可以了。

（钱忠信、张凯又汇报了城市问题）

毛：你们对城市是不是服务得好？

钱、张：也没有服务好，要求愈来愈高。

毛：怎么愈来愈高？

钱、张：以北京来讲，五十多万干部公费医疗，八十多万工人劳保，还有家属。

毛：工人不是“老爷”，工人还是要为他们服务的。

钱、张：工厂医务工作没有搞好，工人也都到医院去看病。

毛：你们为什么不在工厂设不脱产卫生员呢？小厂可以设卫生员，大厂设医务所。

钱、张：非正式医生开不了假条，要请假还要到医院去，经医生开证明才行。

毛：这涉及劳保问题，要好好考虑。

钱、张：城市医院压力大，公费医疗包下来，一个钱不出，到处看病。

毛：看了病，拿了药，还不吃。

钱、张：刘主席、总理指示城市要组织医务人员下农村的问题，每年下去三分之一。

毛：怎么下去？多久？

钱、张：轮流下去。下去后城市医疗卫生工作仍较重。我们打算高等医学院校学生三年后就一边工作一边上课。护士也一面工作一面学习。

毛：光会念书是不行的。

毛：你们对打仗考虑了没有?

答：中央指示后考虑了。

毛：怎么考虑的?

钱、张：组织了几十个医疗队，随时准备赴前线服务。现在的医院对战争没有训练。组织医疗队训练，有的地方已开始了。

毛：打仗了还能都到北京医院看病？要考虑到打仗。你们分科那么细，打起仗来怎么办？打起仗来还不是什么都要看，只会内科不会外科怎么行!

钱、张：过去部队青年人多，疑难病可能不多，有的也许不认识，但医学科学是发展的，要有一小部分力量搞尖端。

毛：搞科研的人看不看病?

钱、张：一部分人看病，一部分人不看病。

毛：什么人不看病?

钱、张：搞基础学科的，如搞生理、药理、生化的，研究理论不看病。

毛：理论还是要结合实际啊!

钱、张：定一同志说百分之五搞尖端就可以了，现在共有科研队伍一万人，其中技术队伍五千人。

毛：科学尖端还是要搞的。

(当谈到各级党委应当多抓卫生工作时)

毛：这话很对，党委是集体领导，什么都要管。卫生部门是为人民服务的，当然要抓，党委也要研究卫生工作。

(钱忠信、张凯又请示农村卫生员工分问题。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补贴工分不超过百分之二。卫生员的补贴工分社员同意给，但

六十条没有规定。）

毛：给群众办好事，没有问题，农民会同意的。现在干部参加了劳动，百分之二已用不了，有的地方只用百分之一，工分不成问题，农民会同意的。

（钱忠信、张凯又请示主席，建议中央今年召开一次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中央召开，可以找省、市领导同志参加）

毛：可以。

（当谈到药品问题时）

毛：药品应当降价。

毛：天津计划生育不要钱。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你们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后，要搞节制生育。

（最后，钱忠信、张凯请示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没有什么了，就按你们讲的办吧。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

（1965年8月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马尔罗（以下简称马）：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来总理。

毛：喔，你到了延安。

马：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旁边，感到很激动。

毛：你说得太好了。

马：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艰苦的环境，人们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蒋介石住宅的照片，对比了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毛：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强者的。

马：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领导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们比。

毛：我听说你打过游击。

马：我是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领导农民军队反对德国。

毛：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当时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不是强的，而是弱的。

马：这很有意思，农民都没有打过仗，不知如何打，但他们能当很好的战士。拿破仑手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毛：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果不打赢仗，谁听你的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败仗，多打一点胜仗。

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农民习惯于打败仗，打胜仗的不多。

毛：我们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甚至整个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跑到北方来。

马：尽管如此，但人民对红军的怀念仍然存在。

毛：以后在北方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发展了军队，发展了党，发展了群众组织，北方人民得了土地。我们解放了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城市，队伍逐渐扩大到几百万，由北方向南方打。要讲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人。我们在一个时期甚至跟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

马：为什么蒋介石要进攻你们呢？

毛：他想把我们吞掉，他认为他可以。

马：他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弱？

毛：我们有许多根据地，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军队有一百万左右。蒋介石却不同，他有四百多万军队，有美国的援助，我们的根据地很大，但根据地是分散的，也没有外部的援助。

马：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即蒋介石只相信城市的力量?

毛：他有城市，有外国援助，同时他在农村的人口比我们多。

马：我曾去过俄国，曾同高尔基谈过这个问题，同他谈了毛泽东，那时您还不是主席，高尔基说，中国共产党最大困难是没有大城市。当时我问他，没有大城市是会失败还是成功?

毛：高尔基回答了你没有?（马尔罗摇头）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不能答复你。

马：高尔基常说各地农民都一样，但我认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提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中国变成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国，如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武器、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变为中国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

毛：需要时间。

马：我们希望你们有你们需要的充裕时间。

毛：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各种朋友，你们就是朋友的一种，同时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我们同艾地有共同点，同你们也有共同点。

马：这些共同点是不一样的。

毛：有一点是一样的，例如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对于英国的

两面派，你们比英国明朗。

马：实际上反对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只有法国。

陈毅（以下简称陈）：英国人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而你们反对。

马：英国有马来西亚问题。

毛：英美俩要交换。

马：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结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场。每天援助阿尔及利亚几亿法朗，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们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法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真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毛：当然啰，一个是你们的盟国，一个是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是美国，对你们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盟国是苏联，对我们也不怀好意。

马：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们的。我认为现在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内容很不同了。

毛：他还进一步说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毛：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毛：是的。

马：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毛：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你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真相信马克思主义？

马：法国社会党党员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职员，在这方面他们是强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职员们组成的。另外，还有些党员是南方的葡萄种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说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绝对数少，占人口比例也不及中国。法国的共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真正无产者中间寻找力量。

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又偏向于苏联。

毛：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马：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党内冲突很严重，法共就像最赖的人一样，两面都想应付，你们可能已看到很多这种情况了。

陈：他们并没有应付我们。

毛：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

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 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 为什么有作家？

毛： 有一部分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的。

佩耶（以下简称佩）： 我有一种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毛： 你来了多久了？

佩： 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许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华中、华南，荣幸地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没有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毛： 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没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体，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佩： 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毛： 一定有矛盾。

马： 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毛：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马：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举行党代表大会就要确定一个目标。是不是农业问题？因为我感到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是走上健全道路了。

毛：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

马：我在西安参观了纺织厂。在法国，纺织厂同革命有很大关系，一七八九、一八三〇、一八四〇、一八五一年都是这样，特别在里昂，因为纺织工人是最穷困的。我在西安看到该地的纺织业已达到解放前上海的水平，大部分机器是中国造的，机器多，工人少。显然中国共产党能在纺织工业执行它要执行的政策。但相反在农业方面，可耕地很少，使中国政府处境困难，现在农业方面是否考虑发动一次超过人民公社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毛：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改变。

马：你考虑可以增加些耕地面积吗？

毛：可以增加一些，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做，今天就不多谈了，请回去问候你们的总统。

马：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同周总理、陈副总理谈过了，不再向主席重复了。今天谈的是戴高乐总统阁下最关心的基本问题。感谢今天的接见，并转达戴高乐总统阁下的问候。（出门时）

毛：我接见过法国议员。

马：我最不相信议员的话。

毛：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你这样明朗。

马：可能是因为我更负有责任的缘故吧。

给康生的信

（1965年8月5日）

康生同志：

章士钊[1]先生所著《柳文指要》[2]上、下两部，22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3]抑韩[4]，翻二王、八司马[5]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6]而颂阳湖[7]，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

---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柳文指要》是一部对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著作。

[3] 柳，指柳宗元，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4] 韩，指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

[5] 二王，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顺宗时任翰林学士，联合王伾等人进行政治改革。改革失败后，王叔文被杀，王伾遭贬。八司马，指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韦执谊。他们支持唐顺宗进行政治改革，失败后八人均被贬为远僻地方的司马，故有八司马之称。

[6] 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时方苞开创，其后，刘大櫆、姚鼐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他们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古文家韩愈、欧阳修等人的作品，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7] 阳湖，指阳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恽敬、张惠言等开创。恽为江苏阳湖（今武进）人，后继者亦多同县人，故名。他们源于桐城派，但对桐城派古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

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85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

打仗主要靠自己创造经验[1]

（1965年8月5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读过十三年书，读了六年孔夫子，是封建主义的，后来七年是资本主义的，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学到。那时候，马克思、列宁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也教过三年书，是小学，当过小学校长，所以我也有点经验。我是小学教师出身的。

我是信过上帝的。我信的是中国的上帝，不是外国的上帝，是信多神教的。中国到处有神，房子有神，门有神，山上的石头也有神，水也有神，叫龙王。神的组织总是按照人的组织来建立的。人有皇帝，天上也有皇帝；人有文官，天上也有文官；人有武官，是打仗的，天上就有天兵天将，都是按照人的模型做成的。德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第一个看透神是人的思想意识的反映。他的书必须看。当然，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列宁说，不读资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书，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也应该读唯心主义的书。我是相信过康德的，也看过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书，看过柏拉图的书，看过苏格拉底的书。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率领的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〇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打了十三年仗，在这十三年之前还有六年，一共十九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文化纲领。花了十九年的时间，你看，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现在你们开始到农村去。我认识农村，也经过十年的时间。

艾地（以下简称艾）：是不是可以请毛泽东同志讲讲农村工作是怎样做的？

毛：我的经历和你差不多。我读了十三年书，当了三年的小学教师，可是对马克思、列宁都不知道，因为当时还没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马克思、列宁，才读了一些小册子。我也读过考茨基的书，当时考茨基还是革命者。

形势逼我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一九二〇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是湖南省的负责人。一九二一年我们党成立，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十二个人。在这十二个人中间，有一批人牺牲了，有一批人叛变了，现在剩下两个，就是我和董必武[1]同志。那时候所谓革命是糊里糊涂的，只晓得要革命，但如何搞法不懂，对中国、世界的情况不清楚，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清楚，糊里糊涂。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多得很。

党成立后，闹了几年，后来又搞了国共合作，我们帮助国民党打天下，进行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杀人了。那时候我们的农民协会有一千多万会员，工会有一百多万会员，还有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陈独秀[2]领导下，我们（包括我自己）没有精神准备。当然，我们有一点准备，但没有充分的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准备。在几个月之内，所有的工会、农会和纠察队都被一扫而光。我这个人不能逞英雄，没有资格，因为我没有准备去打仗，就是蒋介石请我去打仗。他们杀人，我们也杀人。

蒋介石、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好教员，他们的教学方法是杀人。当时我们研究了一下，为什么他们能够杀我们呢？无非是他们有两只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他们手里有枪。我们共产党人也有两只手，所缺乏的就是枪支。怎么办？能不能夺取敌人的枪呢？那就这么办，夺取敌人的枪来打敌人。我们不能只靠外国，迷信“国际路线”是不行的。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同志领导，当时我们有两个半军，实际上不到两个半。

艾：一个军有多少人？

周恩来：一万多人。

毛：不到两万，一万五千人左右。起义以后，他们不把部队拉到靠山的地方，而是带到海边，等待苏联的援助，江西也不要了。敌人一袭击，被消灭了大部分，只剩下八百人。这一段历史，你们也要晓得。不要靠上帝，不要靠外国，要靠自己。

十年内战，我们三十万军队只剩下两万五千人，犯过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而第三次是最严重的。什么邓小平[1]、刘少奇、毛泽东，都不算数，一点权力都没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而他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同志是“宗派主义者”，是“反党集团”。在十年内，我这个人一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赶出红军。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

---

[1] 邓小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杀掉。他们要夺取大城市，想很快取得胜利，结果是把南方所有根据地都丢了，白区的地下党也是差不多统统被消灭。后来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现在全世界都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伟大，你们相信吗？我是相信，又不相信。那是因为犯错误，不得不跑，跑的结果，三十万人只剩二万五千人。这时我们就得到教训。长征走了一年，剩下的人不多了，但这些人是很宝贵的。

有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经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十年内战根据地缩小的经验，才有可能写出几本军事著作，才有可能写《新民主主义论》，才有可能在日本投降那年的上半年开个团结的代表大会，并使所有犯错误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重新当选。

艾：毛泽东同志是怎样安排工作和学习时间的？

毛：我的生活方式是“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人睡觉，我也睡觉。昨晚我因为要见你们，考虑要谈什么问题，到现在还没有睡觉。

我身体很好，你信不信？如果我睡得多了，像那天睡了九小时，那就倒霉得很，身体就不舒服。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是由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等做的。邓小平同志是总书记，周恩来同志是总理，他们工作得比我好。我有一点“官僚主义”，那是必要的。如果不这样，反而是不好的。

艾：晚上工作，白天睡觉有什么好处？

毛：这是习惯。打仗时，晚上来很多电报，电报答复完了才能

睡觉。别人说我同美国人不一致，我是不同意的。他们起床，我也起床，他们睡觉，我也睡觉。这一点美国人还不知道就是了。

对美国不能妥协，他要打，我们就打，我们已有了准备。一旦战争发生，一个原子弹就可以把这个大会堂毁掉，这样我们就解放了，可以回到过去的生活，但不能请客了。

我们这些同志大多数也是军人。打仗并不是很困难，一打就会。敌人就是我们的教员。

艾：我们的同志由于处理工会问题和其他问题，所以往往把开会讨论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的时间挤掉了。一旦发生战争，这种情况就会改变。

毛：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下狠心把它丢掉，认真打仗。过去中国有个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主任，林彪[1]同志、罗瑞卿[2]同志、徐向前[3]同志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在我们党内，读过军事学院的人很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没有进过军官学校的。不要迷信军事科学。只要去打仗，一点也不难学会。

艾：毛泽东同志在参加打仗之前，是否看过有关军事的书？

毛：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包括恩格斯写的书，也包括我自己写的书。主要是靠自己创造经验。蒋介石的军官多数进过学校，我们的军人百分之九十五没有进过学校。当然，没有百分之五

---

[1] 林彪，1925年冬入黄埔军校第四期。

[2] 罗瑞卿，1926年冬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该校是黄埔军校的分校。

[3] 徐向前，1924年4月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的知识分子也不行。但不一定要先学军事，然后再去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艾：虽然如此，我们还要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

毛：到了打仗时，要把它撇在一边，要自己创造经验。

接见几内亚教育代表团、总检察长时的谈话[1]

（1965年8月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是从几内亚来的？

贡代·塞杜（几内亚教育部部长，以下简称塞杜）：是的。我们之中有些人来了十天。我们是几内亚政府和党派出的两个代表团，来中国和中国朋友们接触。我们来了以后，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想尽一切办法孤立中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孤立不了的。我们把中国的胜利看成是我们自己的胜利，我们要加强同中国友好的甚至兄弟般的关系。

毛：我们都是友好的国家，有你们帮助我们，我们就不怕了。你们非洲有两亿多人口，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我们两国是走在一个方向的。你们都是头一次到中国吗？

法迪亚拉（几内亚总检察长，以下简称法）：我已经来过一次，享受过中国好客的接待。

毛：你来过一次了！

法：我是在一九六〇年来的，当时我参加了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地访问过中国，当时受到了主席的接

---

[1] 这是毛泽东接见以教育部部长贡代·塞杜为首的几内亚教育代表团和几内亚总检察长法迪亚拉及夫人时的谈话。

见，我还保存着接见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很好的纪念。

毛：你是跟总统一起来的吗？

法：我是在总统进行国事访问离开中国几天后参加亚非拉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随后我又和韩幽桐同志和她的爱人一起参加了索非亚国际法律工作者会议。一九六〇年访问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五年又获得了大跃进。

毛：没有大跃进，小小的进步。

法：还是大跃进。

毛：（分别问贡代·塞杜和法迪亚拉）你先到，还是你先到的呢？

法：贡代·塞杜部长先到。上一次，我访问中国，呆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索非亚。这一次，我计划在中国呆一个月，准备十三号去外地参观，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毛：到处走走好。

法：谢谢，我已经跟我的朋友们说过，非常感谢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主席的邀请。

毛：邀请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来看，我们都邀请。不过你们要注意，中国的经验不都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好的，有一部分是坏的。

法：主席很谦虚。

毛：不是谦虚，这是实际问题。世界上没有哪一块地方，哪一个国家只有优点没有缺点。没有哪一个人不犯点错误，也许只有上帝不犯错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见过他。我们的工作，无论哪一项工作，都正在改造过程中，教育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过去自己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我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人统统收下来，逐步加以改造。有一部分人改好了，另一部分人还是照他们的老样子。你叫改造，他们不听你的。法院、检察工作也是一样，

到现在还没有颁布民法、刑法、诉讼法。（毛泽东问韩幽桐：现在搞了没有？韩回答：正在搞。）大概还要十五年。

法：在我看来，规定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有了精神，办法就有了。规定不过是把已经做过的工作明确下来，规定是次要的。

毛：你这个讲得对。现在正在做些工作，譬如改造反革命分子，改造刑事犯，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不只十五年，过去根据地也有些经验。

法：在这一方面，一九六〇年我和中国检察长、政法学会会长谈过这个问题，中国重视战犯的改造问题。我们几内亚也有同样的情况。把战犯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需要动员人民，把司法机关和人民结合起来，我们两国的问题是相同的，当然其结果是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我们现在还在试验阶段。你们无论在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例如你们把最后一个皇帝改造成为公民，使他为人民的事业而工作。主席先生，你信任人民，认为改造人是可能的，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两国的社会条件有所不同，但是目的是一致的。

毛：（面向贡代·塞杜）你是搞教育的。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的问题，还有方法问题。采取教育的政策，还是采取丢了不要的政策；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他们的方法。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不性急，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绝大多数的人是可以进步的。

塞杜：非常正确。

毛：要相信这一点，如果有些人不相信，可以试点。（毛泽东对

韩幽桐说：将来把这些写进法典里去，民法、刑法都要这样写。）要把犯罪的人当作人，对他们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譬如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不能以生产为第一，就要以政治改造为第一。要做人的工作，要在政治上启发人的觉悟，发挥他的积极性，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就会办得更好。不仅犯人自己能够自给，而且还能给家里寄点钱。现在我们的劳改工作还有缺点，主要是我们的管理干部不太强，有些地方的方针不对。

法：我看他们还是很强的。这个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充满着希望。因为改变一个机构比较容易，要改造人们的思想比较困难。

毛：这个问题不决定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要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不要把劳动和生产放在第一位。不要赚犯人的钱。

法：这点同意。在我们那里有同样的问题，做一件事首先要教育干部才能收到效果。

毛：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塞杜：这很正确。

毛：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我们的法院工作、检察工作是为犯人服务的，不是要犯人为我们老爷服务的。

塞社：这是正确的，我们很同意。

毛：整个来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给我们饭吃，吃了饭不为人民服务，干什么？大使是哪一年来的？

卡马拉·马马迪（以下简称卡马拉）：一九六三年来的，来了两

年半了。我刚来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陪一个代表团去上海，在上海受到了主席的接见。

毛：（微笑）你这次穿的是白衣服，我不认得你了！

卡马拉：是的。上次在上海我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

毛：是不是谈到这里。我也没有什么道理跟你们讲。你们回去后，请向你们的领导人杜尔总统问候。

关于找韩昌黎[1]全集的便条

（1965年8月10日）

韩昌黎全集找来一阅。

毛泽东
八月十日

---

[1] 韩昌黎，即韩愈，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后人编有《昌黎先生集》。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5年8月1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解放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二十年前，英雄的朝鲜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终于摧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解放。二十年来，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高举千里马运动的旗帜，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感到无比的高兴。

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是在长期革命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这种团结和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

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久经考验、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斗争，携手前进。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

给李先念[1]的信

（1965年8月15日）

先念同志：

“**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2]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

[1] 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 指李先念1965年8月2日在给毛泽东等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纠正当时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意见。他提出，“初步打算今后几年内把粮食征购任务稳定下来”，粮食征购“畸轻畸重的，要进行调整，做到公平合理”，并说：“要达到公平合理的要求，还须要下一番苦功夫”。

对击沉国民党军“剑门”“章江”两舰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65年8月15日）

已阅[2]。退林彪[3]同志。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南海舰队政治委员方正平1965年8月9日关于击沉国民党军“剑门”“章江”两舰战斗经验总结报告的批语。

[2] 李作鹏、吴瑞林、方正平的报告说：这次战斗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取得胜利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军委、总参和广州军区首长正确的指挥，决心果断，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援、民兵的密切配合。参战部队充分发挥了人的因素，发扬了我军英勇顽强，近战、夜战的优良战斗作风，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的思想。这次战斗的胜利也证明了小艇不仅能够打大舰，而且也能够击沉敌舰。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这次战斗的有功单位、有功人员代表。毛泽东说：“你们打得好。”“蚂蚁啃骨头，我们向来就是用这种方法消灭敌人的。”

[3]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关于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1]

（1965年8月17日）

少奇[2]同志阅后，退还罗瑞卿[3]同志。

请军委讨论一下：（一）此件可否发到全军参考；（二）全军从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像郭化若[4]那样的病人，也去浙江搞了一期社教，大有好处，他给了我一个报告，总结了十条经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1965年7月22日关于学员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罗瑞卿并报总政治部、国防科委、黑龙江省委的报告上。报告说，遵照毛主席关于必须学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的指示，我院组织应届毕业学员和干部1072人，于去年11月下旬至今年6月底，参加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地区阿城县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大家坚持“三同”“四清”，认真完成各项任务，经受了实际锻炼和考验，绝大多数同志表现很好，无论在自我思想改造还是在开展工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运动，学员们不仅增强了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阶级感情上有了鲜明的变化，而且在思想方法、政策水平、群众工作和社会活动能力上也都得到了提高。

[2] 少奇，即刘少奇。

[3] 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4] 郭化若，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验[1]，现送给你们一阅。我看也可以转发一下，以供老同志们参考。这位同志的思想，几十年来同我总是有些格格不入。现在我看他是通了），一律分期，在两年内（可分四期，每期半年，全军搞完），都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以上是否可行，请你们研究决定。

请用电话告林彪[2]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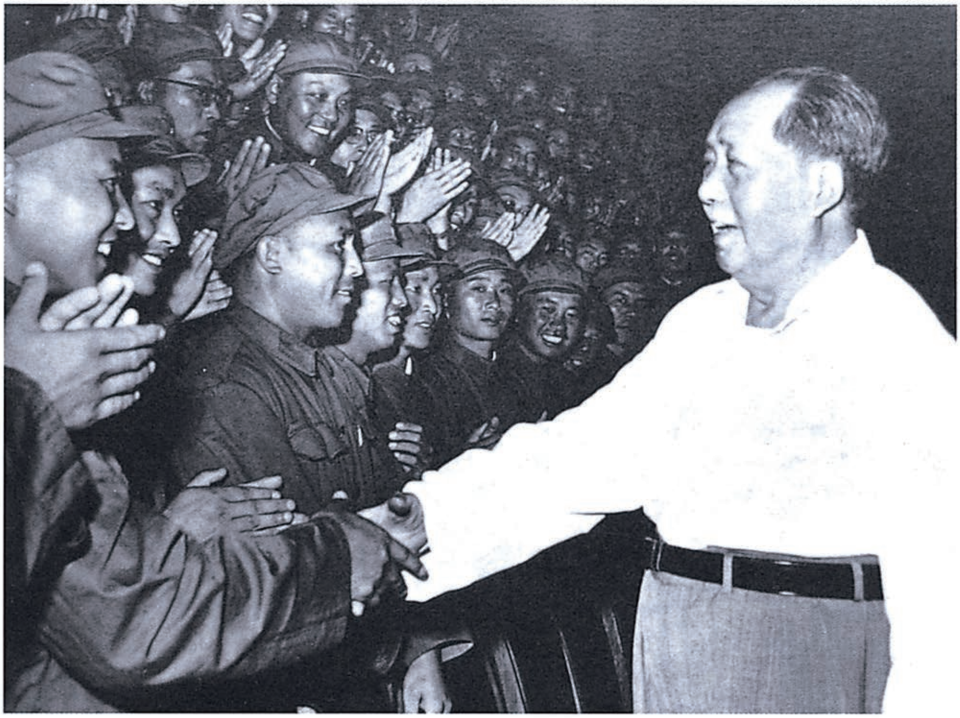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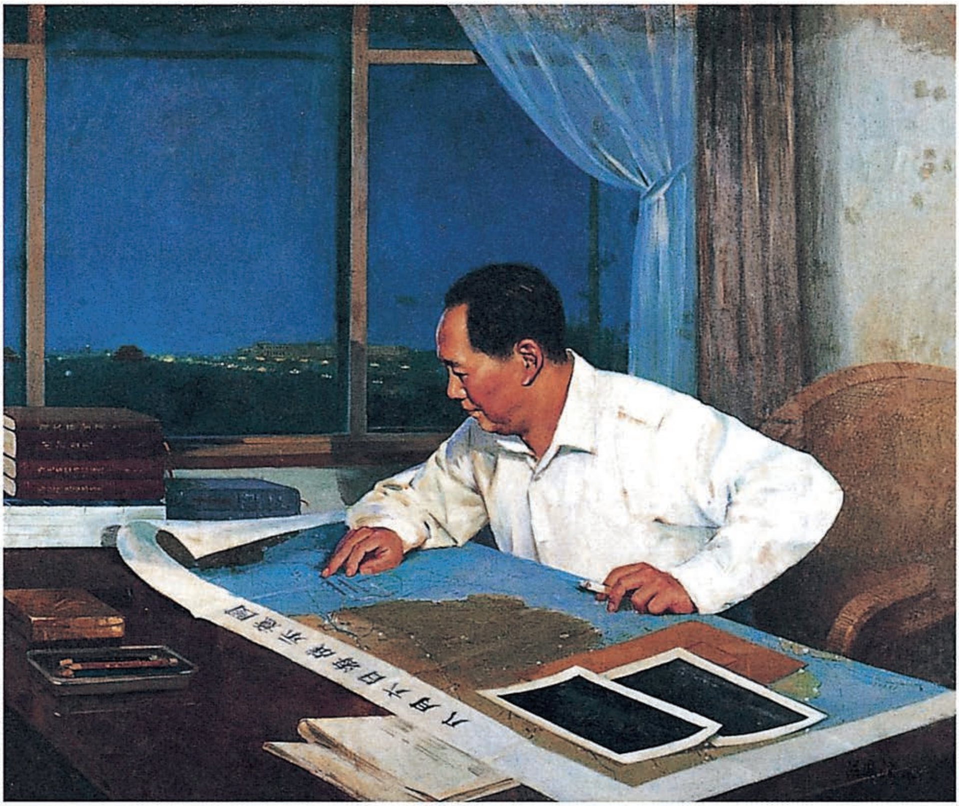
---

[1] 指郭化若1965年7月31日关于在浙江省萧山县靖江公社黎明大队参加5个月社教运动的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所说的10点体会，主要内容是：①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主席号召下乡就下乡，改正过去不大听话的错误。②看看十五年来农村新面貌，向接近实际迈出第一步。③接近贫下中农群众，复热了阶级感情，稍减些脱离群众的危险。④走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前线，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有助于自己的思想改造。⑤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身份同贫下中农一起在农田里愉快地劳动，亲切地交谈，群众把我们看成自己人了。从中真正理解到劳动不但是愉快的，也是生活所必需。⑥可以学到生产斗争的经验，“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处处向贫下中农请教，可以学到许多生产知识。⑦得到一次实习机会，参加人民公社五年建设规划的草拟工作，这里面有许多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不到的问题。⑧可实地向地方同志学习，这次学到地方工作同志许多优良作风，也初步了解一点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情况。⑨对干部好作交代，取得了发言权，不是“空口讲白话”。由各单位调来编写战役学的同志听到我下乡蹲点都很关心，说：“他能下乡蹲点，我们更应该去。”蹲了点回去，对部队社会主义教育也将有帮助。⑩好向子女交代，以身作则，对他们也有了发言权。学了一点阶级斗争，好在家庭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以补学校教育不足之处。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八六海战有功部队的代表。



《光荣归于毛泽东》（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965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基伏·斯托伊卡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在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罗马尼亚人民、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以高涨的热情，团结一致，辛勤劳动，在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最近，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进一步繁荣罗马尼亚的五年计划和十年电气化计划，展示了罗马尼亚发展的光辉前景。我们深信，罗马尼亚人民在实现新的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中，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罗马尼亚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罗马尼亚政府为维

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捍卫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进行了巨大的努力。

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友谊。我们两国的关系，是符合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的，是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的、平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关系。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们深信，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对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的批语

（1965年8月24日）

少奇同志：

此件[1]有些新鲜办法，可以纠正过去一些缺点（如一个大省的各级社教办公室，竟有一万工作人员），大概各地也有类似情况。请你考虑，是否可以通知一下。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8月2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二九九号登载的《湖南各级社教领导机构实行革命化》的材料。材料说，湖南省第二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要开始了。这一期铺开的面大，工作队员相对地减少了，包括企事业单位的工作队和各级社教办公室在内，平均每个大队只有8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烦琐哲学，使工作队集中精力做好工作，省委农村社教办公室经与各地同志研究后，提出如下几点意见：一、取消一切不必要的报表。二、不要抽工作队的人员参加各部门的会议。三、尽量压缩社教简报。四、简化报批、立案手续。五、大力减少社教办公室的人员和事务。今后支援社教地区的粮食、棉布、化肥、农药、款物等一律由各级政府部门办理，日常经济工作应由省、地、县、区、社原有机构去领导。中共中央1965年8月25日以中发〔65〕526号文件将这份材料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重点县社教工作团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党委，军委总政，要求他们参照湖南的办法，纠正各级社教领导机构所存在的一些缺点。

1965年8月26日，毛泽东和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共产党书记处书记砂间一良交谈。

1965年8月2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会见在北京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和其他日本朋友。

1965年8月26日，毛泽东会见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23个日本青年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参加联欢的其他日本朋友。

为钟学坤[1]题词

（1965年8月30日）

学习白求恩[2]，
学习雷锋[3]，
为人民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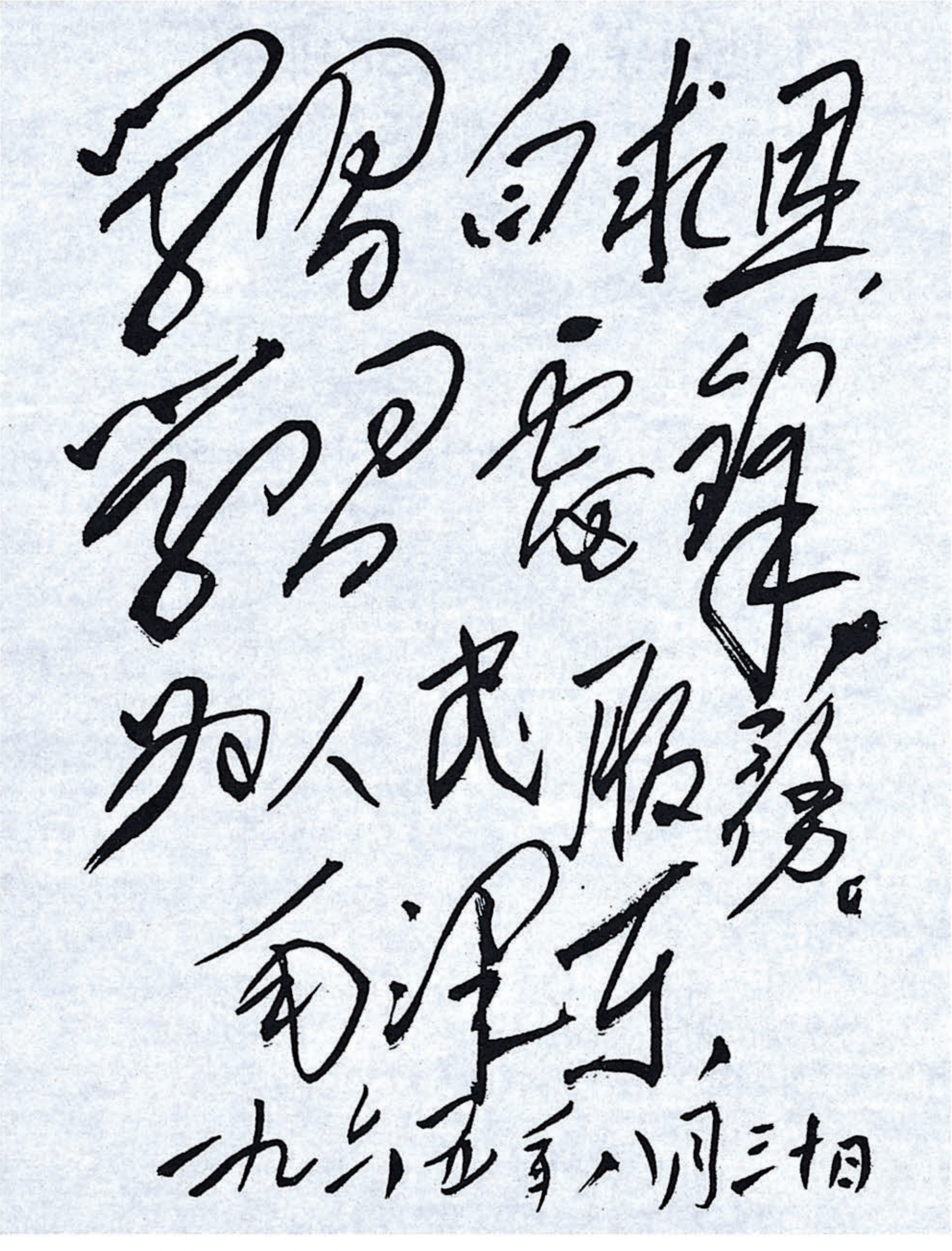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

---

[1] 钟学坤，原是庐山疗养院护士，庐山会议期间，曾在毛泽东处做过保健工作。毛泽东的题词写在她的日记本上。

[2] 白求恩，即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的医生。1938年来中国帮助抗日战争，1939年11月因给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

[3] 雷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工程兵第十团运输连班长，1962年8月不幸因公牺牲。



学习白求恩，
学习雷锋，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毛泽东给钟学坤的题词。

在中组部关于在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问题的报告[1]上加写的话[2]

（1965年8月）

北方老干部在南方的革命和建设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这点必须肯定。但在提拔新干部问题〔上〕注意不够，现在应当改变。

---

[1] 中共中央组织部1965年8月21日给毛泽东和中央的这个报告中说，最近，中央和毛主席指出，南方好多地委和县委书记都还是南下的北方老干部，新生力量提拔得很慢，已经十五六年了，还提拔不起来，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应该把这些南下的北方老干部分期分批地调整一些到其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或者调一部分回北方。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在最近召开的各中央局组织部长座谈会上，我们讨论了南方各省区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一）各级党委要认真讨论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正确领会主席的指示精神，大力培养、大胆提拔本地干部中的新生力量。要制订培养提拔的具体计划，并且要一个一个地落实到人。（二）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要同“四清”运动，同调整领导班子结合起来。提拔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地、县委正副书记和正副专员、县长。首先解决县一级的问题，争取在两三年内基本完成。地专一级时间可放长一些。（三）在培养提拔本地领导干部的时候，对北方籍的领导干部要作适当调整。（四）对南下的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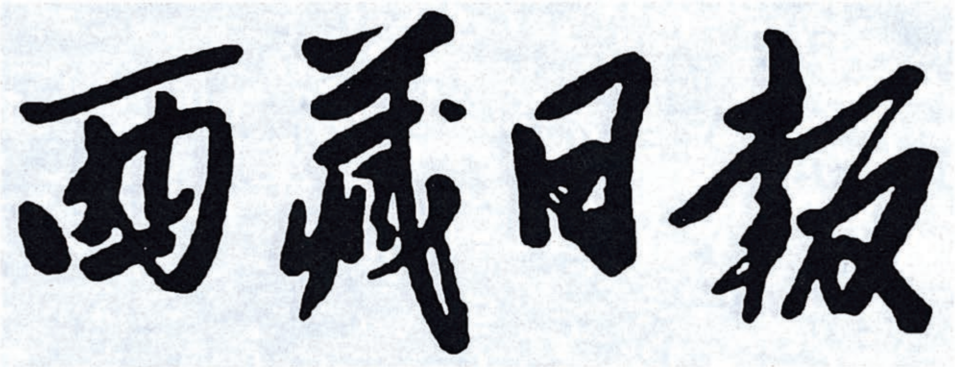
方籍干部中一些年老体弱、长期患病、丧失或基本丧失工作能力的，需要予以妥善安排。他们多数应当就地安排，少数必须回北方的，可以回北方妥善安排。（五）各有关地区党委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不要搞突击，不要呼呼拉拉一下换，影响工作，影响团结。

[2] 这段话写在中组部报告中以下一句话之后：“应该坚决地放手地逐步提拔那些本地的优秀干部到县、地以及省的领导岗位上来加以培养和锻炼。”

为《西藏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8月）

西藏日报



毛泽东为《西藏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西藏日报》的前身是中共西藏工委的《新闻简讯》。《西藏日报》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机关报，于1956年4月22日创刊。西藏和平解放后的第一张日报。《西藏日报》为汉文版和藏文版两张大报。汉文版报头由毛泽东同志题写，藏文版报头由阿沛·阿旺晋美题写。毛泽东题写的“西藏日报”四个大字刊登在1965年8月31日《西藏日报》第2911期的头版头条。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5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年前，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没有过的人民自己的国家——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以后，越南人民高举革命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并在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从兄弟的越南人民的胜利斗争中获得巨大鼓舞，并为他们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目前，越南人民正在抗击着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勇地进行着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越南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

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民坚强地屹立在反美斗争的最前线，狠狠地打击、削弱和牵制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从而也就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保卫和平的革命斗争。

现在，在越南战场上，英勇善战的越南人民越战越强；美帝国主义不断遭到失败。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已经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进一步戳穿。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衷心赞扬和钦佩。全世界人民都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坚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能击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最后的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情同手足的亲密战友。越南人民的斗争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持。中国人民坚决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人民已经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决心同越南人民一道，为挫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并肩斗争到底。

祝越南人民在保卫北方、解放南方、争取祖国统一的伟大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越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对胡乔木[1]二十七首诗词稿的批语[2]

（1965年9月5日、15日）

一

康生[3]同志转乔木同志：

这些词[4]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胡乔木送阅的二十七首词稿上写的批语。二是毛泽东在胡乔木9月10日为送阅诗词二十六首给康生的信上写的批语。信中说，词二十七首本多仓卒之作。经主席修改后，我又作了一些修改，并拟删去其中的《定风波·读报》四首（平淡而又过时，改不好）和《生查子·家书》六首中的后两首（有些酸气）。另外，最近写了律诗五首，想补在后面，虽也有些晦涩，但在时间上较新鲜些，不知可用否？请一并阅正，并代转主席为荷。三是毛泽东1965年9月5日在《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两首词左侧写的批语。四是毛泽东1965年9月15日在《水调歌头·赠海岛战士》一词下方写的批语。五是毛泽东同日在《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左侧写的批语。六是毛泽东同日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右侧写的批语。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指胡乔木写的二十七首词。

略为改了几个字[1]，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先登《红旗》，然后《人民日报》转载[2]，请康生商伯达、冷西[3]办理。

毛泽东
九月五日

---

[1] 毛泽东这次所作的修改有：将《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一词其二中的“南针仰”“兔死狐藏”“万国舞霓裳”分别改为“方针讲”“兔死狐伤”“万国换新装”；将《梅花引·夺印》中的“不竖红旗定是不回还?”改为“不插红旗定是不回还”；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一中的“为保金瓯风景美，鞋踏破”改为“为保金瓯颠不破，鞋踏烂”；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二中的“练兵塞上美风光”“猎猎军旗意气共飞扬”“多少英姿年少尽戎行”改为“练兵塞上好风光”“猎猎军旗天际看飞扬”“多少英姿年少事戎行”；将《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其四中的“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时代洪流腾巨浪”改为“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时代洪流翻巨浪”；将《采桑子·反“愁”》一词其二中的“怎见人间多壮观”改为“怎见人间是壮观”；将《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二中的“流水不长流，毒菌纷传种”“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改为“化为百炼钢，只有投群众”“流水片时停，毒菌争传种”；将《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三中的“不耐雨和风，纵美何堪数”改为“如此嫩和娇，纵美何足数”；将《七律四首·七一抒情》其二中的“滚滚长江万里长”改为“滚滚江流万里长”；将《七律四首·七一抒情》其三中的“勇士乘槎薄太空”改为“勇士乘风薄太空”。

[2] 作者后来将二十七首词中的六首删去，另外加上律诗五首，定名为《诗词二十六首》，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十一期和1965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

[3]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二

康生同志转乔木同志：

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1]，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思再改[2]。如不妥，即照原样。唯“南针仰”一句须改[3]。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上午三时

---

[1] 毛泽东这次所作的修改有：将《江城子·赠边防战士》一词其二中的“胜天堂”改为“胜家乡”；将《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中的“休向健儿夸核弹，欣欣犹是比基尼”改为“休向英雄夸核弹，欣荣试看比基尼”。

[2] 指胡乔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二和其四中三处文字：对其二中“春玉碎”三字，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宜改。”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春汛怒”三字。对其二最后一句“沧海云天长浩荡”，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此句宜改。因承上句，不解所谓。”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一入沧溟喜浩茫”。对其四中的“装饰造”三字，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三字酌，又不明朗，宜改。”作者在发表时将它改为“兄弟难”三字。

[3] 毛泽东将《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一词其二中的“南针仰”改为“方针讲”，并在旁边写了批语：“不使人误以为仰我南针，故改。”

三

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1]，中学生读不懂。

唐、五代、北宋诸家及南宋每[2]些人写的词，大都是易懂的。

四

要造新词，天堂、霓裳之类，不可常用。[3]

---

[1] 指胡乔木词中以下两处：（一）《生查子·家书》一词其二“斗争如海洋，早晚云霞涌。流水不长流，毒菌纷传种。青春只一回，转眼能抛送。铁要炼成钢，烈火投群众”中后两句，毛泽东看后将它改为：“化为百炼钢，只有投群众。”并写了批语：“这几句好。但下二句较晦，故改之。”（二）《生查子·家书》一词其四中“刮骨去脓疮，剁脚争良玉。风险为人民”三句，毛泽东看后写了批语：“此三句宜改，方免晦涩。”作者将它改为“顺水好行船，终向下游去。若要觅英雄”。毛泽东1965年9月15日再阅改后的这三句时，写了批语：“好。”

[2] 每，疑为“某”字。

[3] 胡乔木在《江城子·赠边防战士》和《六州歌头·一九六五年新年》词中分别用了“胜天堂”和“万国舞霓裳”，毛泽东看后写了这个批语。

五

改得好。[1]

六

好句[2]。

---

[1] 作者将《念奴娇·重读雷锋日记》一词其一中的“堪恨利锁名缰，蝇营狗苟，也混英雄汉。天下尚多奴隶血，何日乐园同建？不锈螺钉，投身伟业，有限成无限”改为“君试共我高翔，人间尽看，何往非前线？四海尚多奴隶血，小我何堪迷恋？身是螺钉，心怀天下，有限成无限。”毛泽东看后写了这个批语。对这首词其四的“如君红透，羞杀营营辈。花落结为千粒子，一代红巾争继”几句，毛泽东看后写批语说：“好。”

[2] 指胡乔木《七律·七一抒情》一诗其四中的“头颅不向寇仇低。自由合洒血成碧，胜利从来竿作旗”。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

（1965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朝鲜历史的新纪元。十七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今天，朝鲜人民一手拿镰刀、锤子，一手拿武器，继续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和千里马的豪迈步伐，为实现七年计划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同时，同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强地保卫着革命果实。朝鲜人民的斗争和胜利，对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像对待自己的成就一样，为朝鲜人民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

朝鲜人民为反对美国侵略军霸占南朝鲜、实现祖国统一和粉碎“韩日条约”，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最近，南朝鲜人民，再次掀起了反美爱国斗争的怒潮，有力地冲击着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深信，美帝国主义终有一天要被赶出南朝鲜，朝鲜三千里锦绣河山一定能够统一。

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日益发展。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战斗团结和兄弟友谊是牢不可破的。这种团结和友谊必将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支援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斗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祝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争取祖国统一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祝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965 年 9 月 8 日）

索非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托·日夫科夫同志，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格·特莱科夫同志：

在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向你们，向兄弟的保加利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深厚的基础。维护和加强这种友谊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为加强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而继续努力。祝保加利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保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九月八日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出席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

和黑非洲留法学生联合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1965年9月14日）

事情总是有麻烦，不能怕麻烦。革命也可以叫麻烦。革命就是麻烦，搞经济建设也是麻烦。怕麻烦什么事情也搞不成，不怕麻烦什么事情也可以搞成。……知识分子就是要能够跟人民的大多数结合起来。跟他们结合的时候就有麻烦，你要跟他结合，他不跟你结合，这个麻烦得很！这些人听话，那些人又不听话，就有这些麻烦。不能怕这些麻烦，无非是在长期的斗争中跟群众站在一道，群众最后会了解你们的，会信任你们的，会在那些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劳动人民很需要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但是，不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不高兴，不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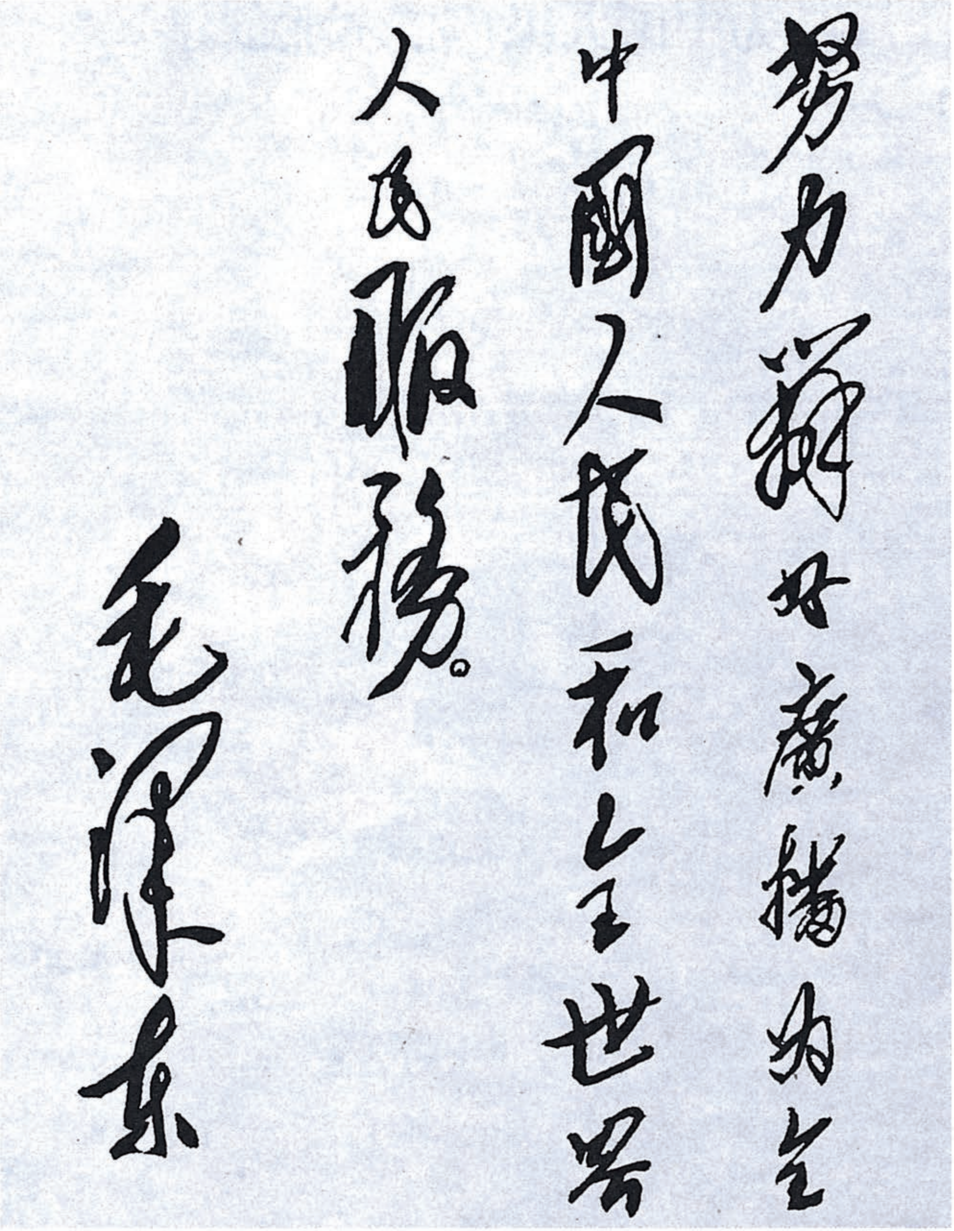
你或者是比他们高一等，站在他们头上，那他们不喜欢。他们喜欢那种平等的人，用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跟他们一道参加劳动，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又有知识，他们喜欢这样的人。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

（1965年9月15日）

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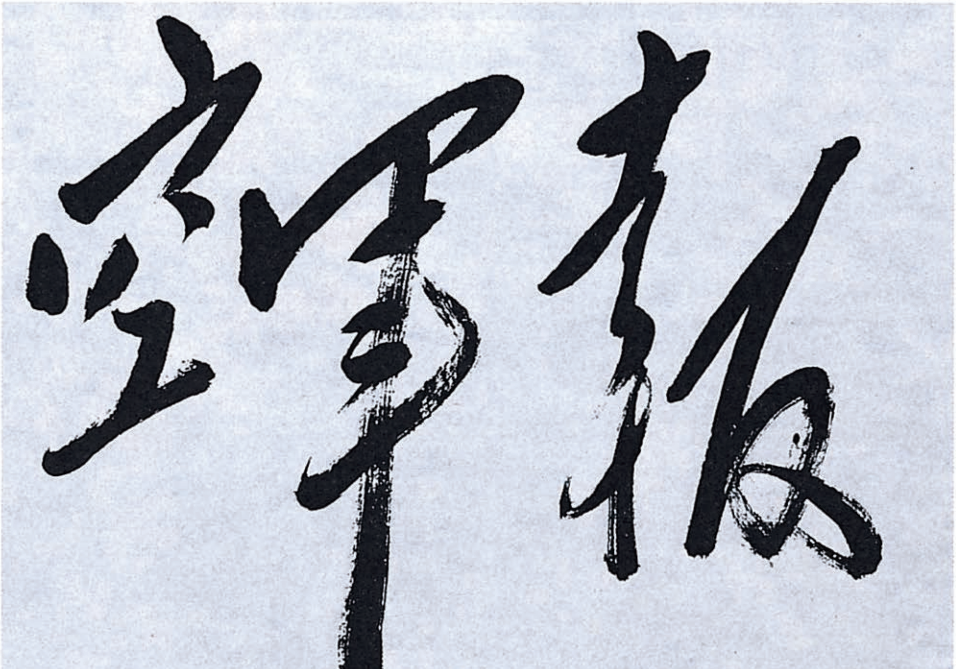
努力辦好廣播為全
中國人民和全世界
人民服務。
毛澤東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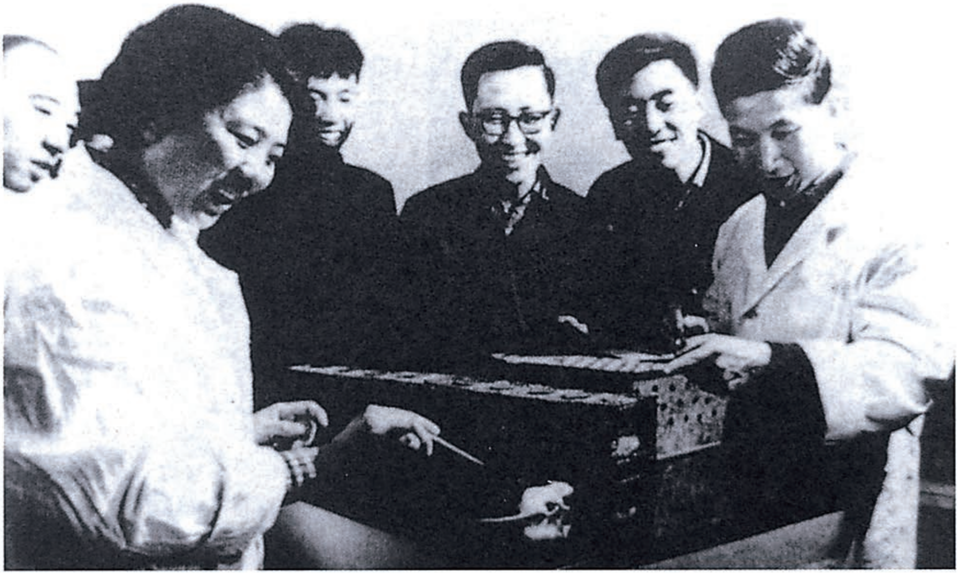
为《空军报》题写报头

（1965年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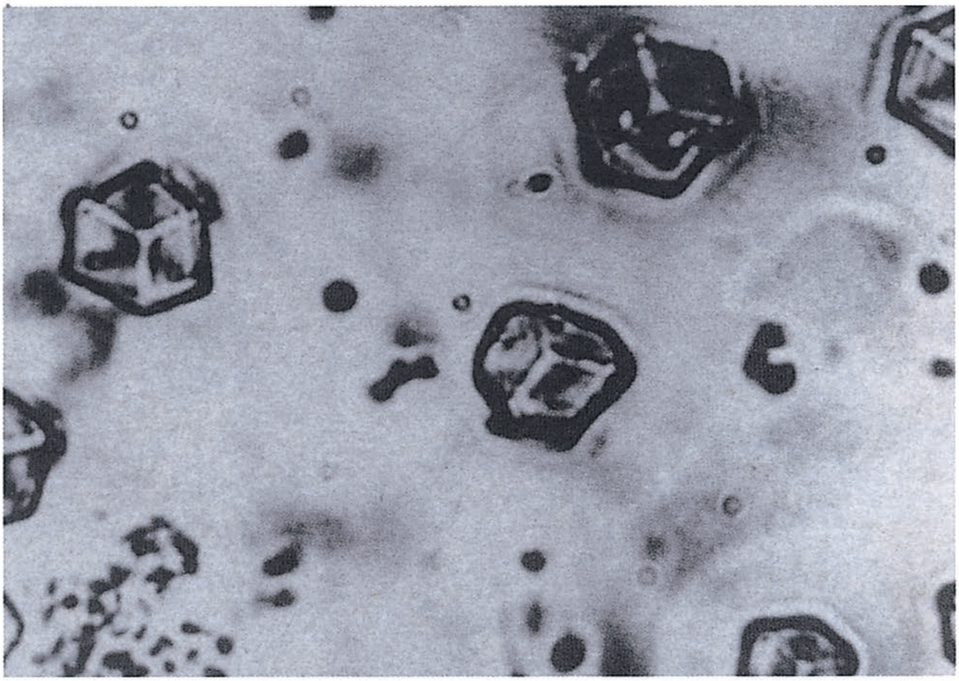
空军报



毛泽东为《空军报》题写的报头。



1965年9月17日，中国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



中国首次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代表团时的谈话

（1965年9月18日）

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错误的，比如劳动改造工作，就还有缺点，主要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干部的政治水平不高，劳改农场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造他们，思想工作第一，工业、农业的收获多少，是否赚钱是第二位的，过去很多地方把它翻过来了，把搞业务放在第一，思想工作放在第二，甚至思想斗争很薄弱，如果把对反革命分子、刑事罪犯的思想改造得很适当，这样的话，业务（工业、农业）不要去催促，也是会搞得很好，但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在外交部给印度政府的复照稿[1]上的批语

（1965年9月19日）

总理[2]：

只限一天，太匆促了，事实上印度方面办不到，也难得到各国和印度人民同情。改为限两天内折（拆）掉如何？或者改为在三天内，即二十一日午夜[3]。这样可能获取各国和印度人民的同情，更好些。请酌定。

毛泽东

十九日四时半

---

[1] 印度政府外交部1965年9月17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发来照会，说印度人员从未越过锡金边界到中国领土进行任何骚扰和袭击。“1962年9月，在中印边界的锡金一侧修建了一些防御工事。自从1962年11月停止敌对行动以来，这些工事并未加以占据。”“虽然印度政府深信它的军队没有在西藏境内修筑工事，它并不反对对锡金——西藏边境上据说印度人员在西藏境内修筑了工事的那些地点进行一次联合调查。”“如果发现在边界的西藏一侧有任何工事，不会有人反对拆毁它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5年9月19日草拟了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复照稿报中央审批。复照说，

“关于印军在中国、锡金边境越界修筑工事的事实，中国方面掌握有大量的、充分的证据，足以向全世界证明这一点，印度政府心里也是明白的。现在已经没有必要进行调查。印度政府来照也承认不排除在中锡边界的中国一侧可能有印方的工事，并且不反对对可能有的这种工事加以拆除。这就实际上表明印度方面确实有侵略工事设在中国境内和边界线上。中锡边界是确定了的边界。中国边防部队对于印军在哪些地方越界建筑了工事是了如指掌的。中国政府坚决要求印度政府拆除这些侵略工事。为了给印度政府以这样做的机会，中国政府愿意把9月16日照会规定的期限延至9月22日午夜以前。”复照还强调指出，“中国政府最后重申：印度政府必须在1965年9月22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送回被劫走的中国边民，归还被抢走的牲畜，保证今后不再越境骚扰。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这个复照在1965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

[2] 总理，指周恩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965年9月19日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复照稿中原来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9月19日午夜以前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所有侵略工事，后按照毛泽东意见，将限期拆除的时间改为“二十二日午夜”。

对中央高级党校关于杨献珍[1]问题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2]

（1965年9月24日）

彭真[3]同志：

都看过了。此件[4]尾页（16页）上，列举附件四份，去掉侯、孙两份，剩下两份，漏掉杨的“说明”一份，应添上。[5]

毛泽东

九月廿四日

---

[1] 杨献珍，当时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校委会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1965年6月9日关于杨献珍问题和处理意见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送上《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和附件四份，还有杨献珍的书面说明一份。从1964年7月到10月，我们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发动全校学员和工作人员对杨献珍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一年来，我们同他开过多次座谈会和个别谈话，对他进行耐心帮助，希望他认识错误，自觉革命。但他的态度一直很坏，毫无悔改之意。由于他错误严重，至今仍不回头，我们认为他不适宜再继续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工作，建议中央撤销他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和校委会委员职务。中共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将高级党校校委会的原报告以中发〔65〕592号文件

发至全党。1979年8月27日，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作出关于杨献珍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认为原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的报告是错误的，建议中央撤销中发〔65〕592号文件，对杨献珍错案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复查报告说，杨献珍在主持高级党校工作期间，虽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干部教育和办党校的方针，成绩是显著的。康生等人给他扣上的反动帽子及诬陷他的各种罪名和强加给中央高级党校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等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了这个复查报告。

[3]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指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委会1965年3月1日关于杨献珍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叙述了自1964年7月以来中央党校全体学员和工作人员揭发批判杨献珍的情况，列举了杨献珍的十条所谓“主要错误”。

[5] 报告尾页上列举的四个附件是：一、关于杨献珍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安插同乡亲属的调查材料；二、关于侯维煜同志问题的材料；三、关于孙定国问题的材料；四、杨献珍的书面检讨。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去掉了其中的二、三两个材料，即关于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侯维煜问题的材料和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问题的材料。将原来的附件四改为附件二，另外加上附件三“杨献珍的书面‘说明’”。

给邓颖超[1]的信

（1965年9月25日）

邓大姐：

自从你压迫我写诗[2]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3]。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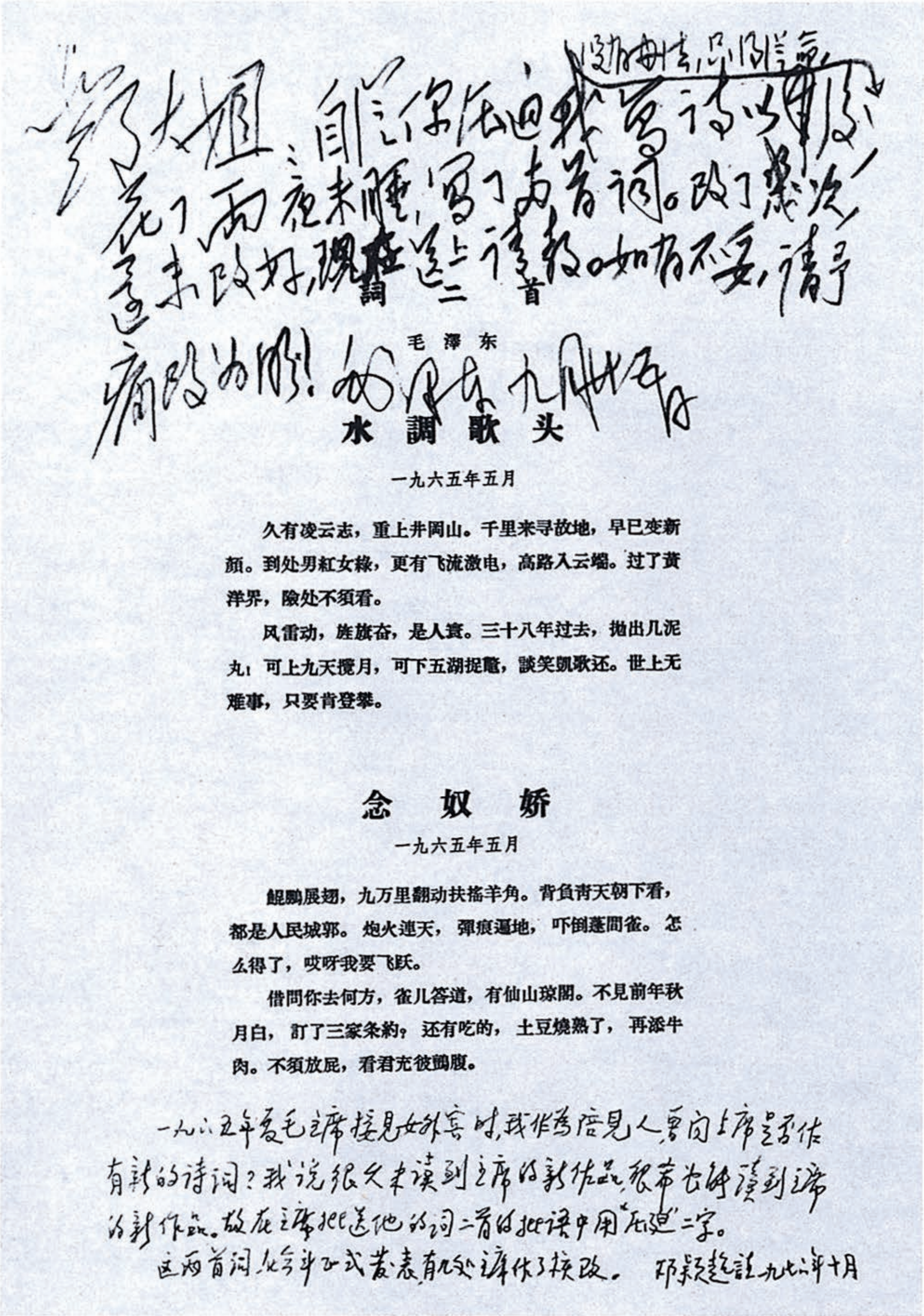
九月廿五日

---

[1] 邓颖超，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

[2] 1965年夏，毛泽东会见外宾后，邓颖超作为陪同人，曾问毛泽东是否作有新的诗词，并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毛泽东以诙谐语言所写的“你压迫我写诗”，说的就是这件事。

[3] 指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首词1976年在《诗刊》一月号公开发表时有所修改。



邓大姐：自从你压迫我写诗以后，没有办法，只得从命，花了两夜未睡，写了两首词。改了几次，还未改好，现在送上请教。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毛泽东 九月廿五日

詞 二 首

毛澤东

水調歌头

一九六五年五月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千里来寻故地，早巳变新颜。到处男紅女綠，更有飞流激电，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險处不須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抛出几泥丸：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湖捉鼈，談笑凱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念 奴 娇

一九六五年五月

鯤鵬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搖羊角。背負青天朝下看，都是人民城郭。炮火連天，彈痕遍地，吓倒蓬間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問你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瓊閣。不見前年秋月白，訂了三家条約。还有吃的，土豆燒熟了，再添牛肉。不須放屁，看君充彼鵬腹。

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见外宾时，我作为陪见人，曾问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诗词？我说很久未读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读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他的词二首的批语中用“压迫”二字。

这两首词后来正式发表有几处都作了修改。邓颖超注 一九七六年十月

毛泽东致邓颖超信的手稿。

念奴娇·鸟儿问答

（1965年秋）

鲲鹏[1]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2]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3]。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

[1] 鲲鹏，这里指大鱼变成的大鸟，作褒义用。

[2] 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往）南冥也。”意思都是说大鹏在向南海飞的时候，凭着旋风的力量，翻动翅膀，飞上九万里高空。扶摇和羊角都是旋风的名称。

[3] 蓬间雀，即《庄子·逍遥游》中的“斥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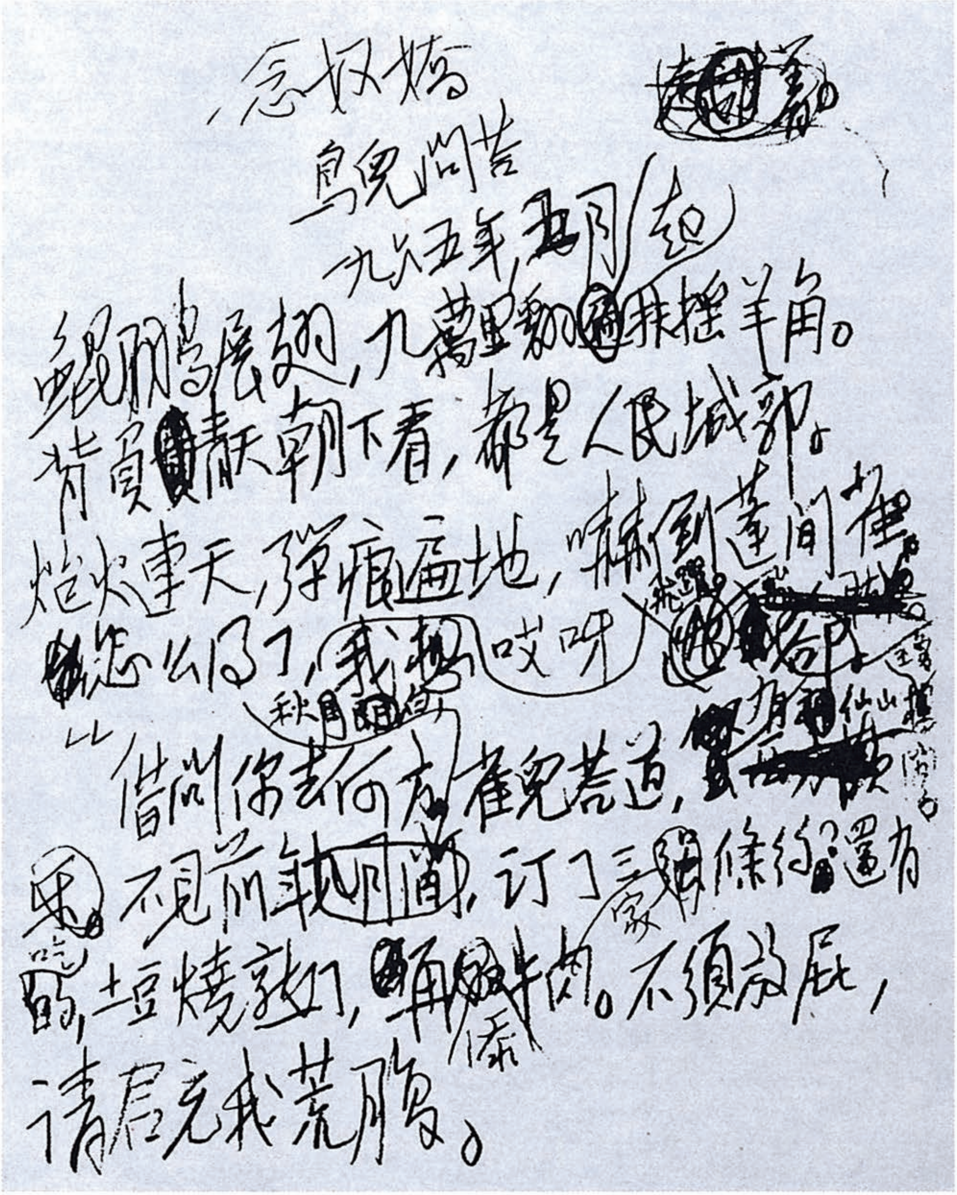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1]。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2]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3]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

[1] 琼阁，琼楼玉宇，仙人住处。

[2] 订了三家条约，指苏、美、英三国1963年8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3]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64年4月曾在一次演说中说“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



念奴娇

鸟儿问答

一九六五年五月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民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你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

请君充我荒腹。

毛泽东手书《念奴娇·鸟儿问答》。

对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名单（草案）的批语[1]

（1965年9月30日）

没有陈云[2]，似应加入。

毛泽东

九月卅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5年9月23日关于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纪念会的有关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提议筹备会在辛亥革命纪念日召开，请刘少奇主席讲几句话，讲话稿已由彭真告钓鱼台准备。报告还附有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周年筹委会的名单（草案）。根据毛泽东的批语，陈云列入了筹委会名单。

[2]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民族工作的一次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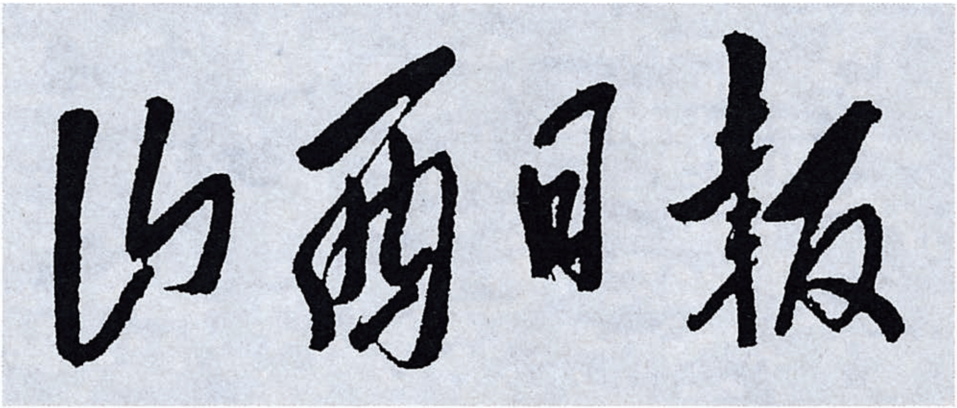
（1965年9月）

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为《山西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9月）

山西日报



毛泽东为《山西日报》题写的报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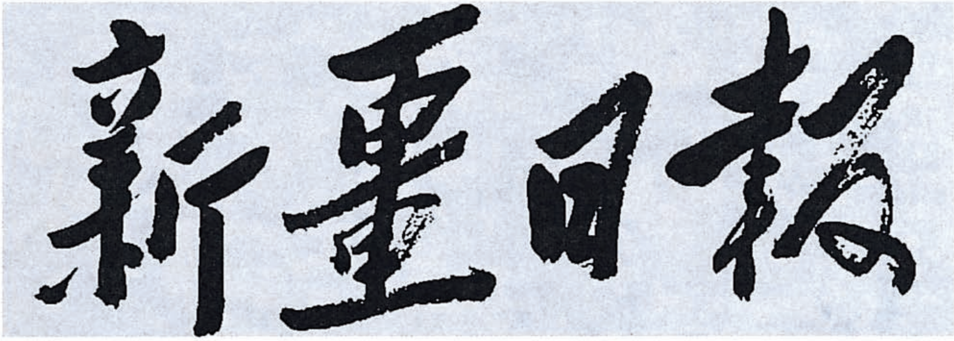
---

[1] 1965年9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为《山西日报》第二次题写报头。

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10月1日）

新疆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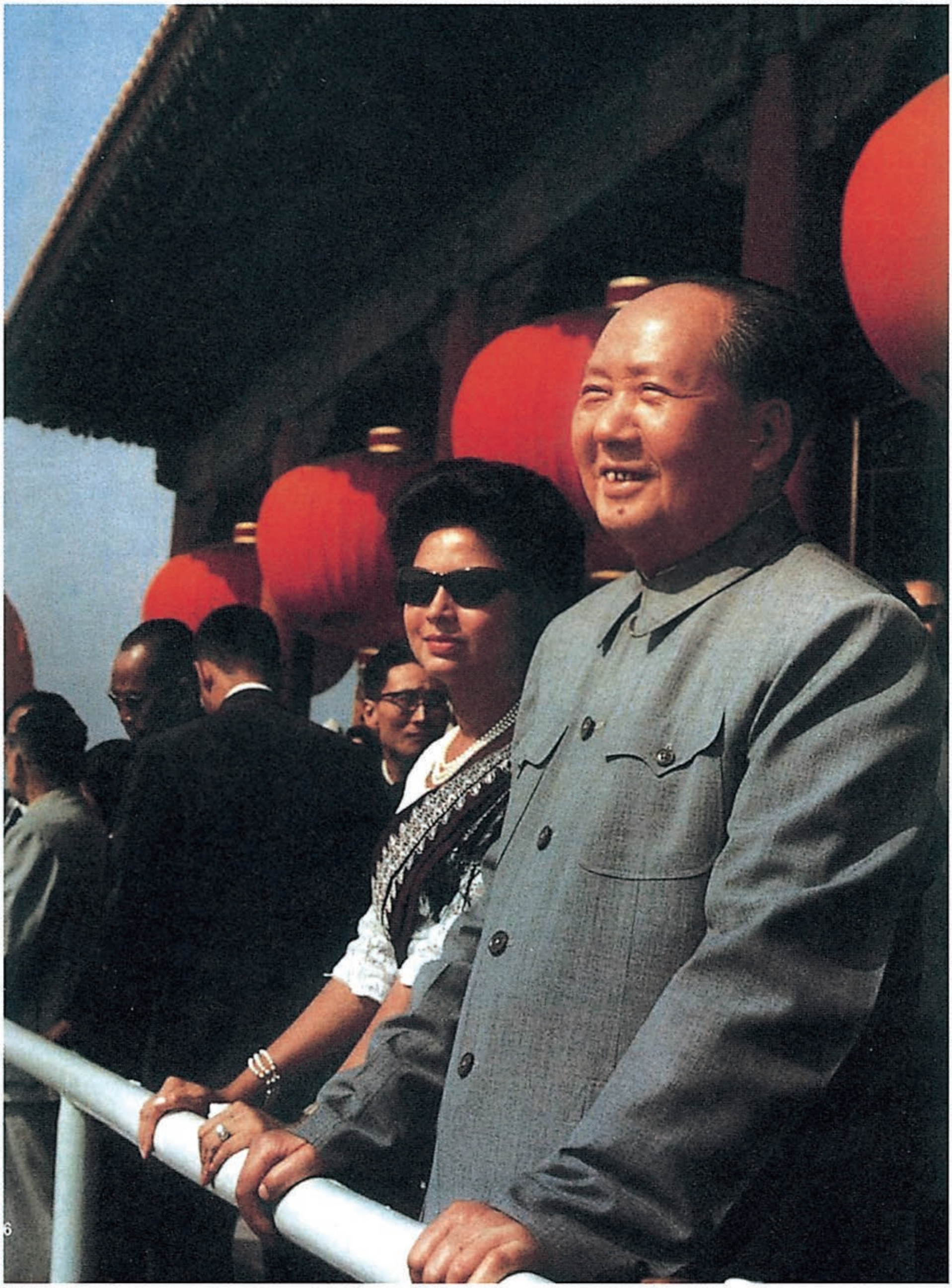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为《新疆日报》题写的报头。

---

[1] 196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时，毛泽东为已成为自治区党委机关报的《新疆日报》题写了报头。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新疆日报》题写报头。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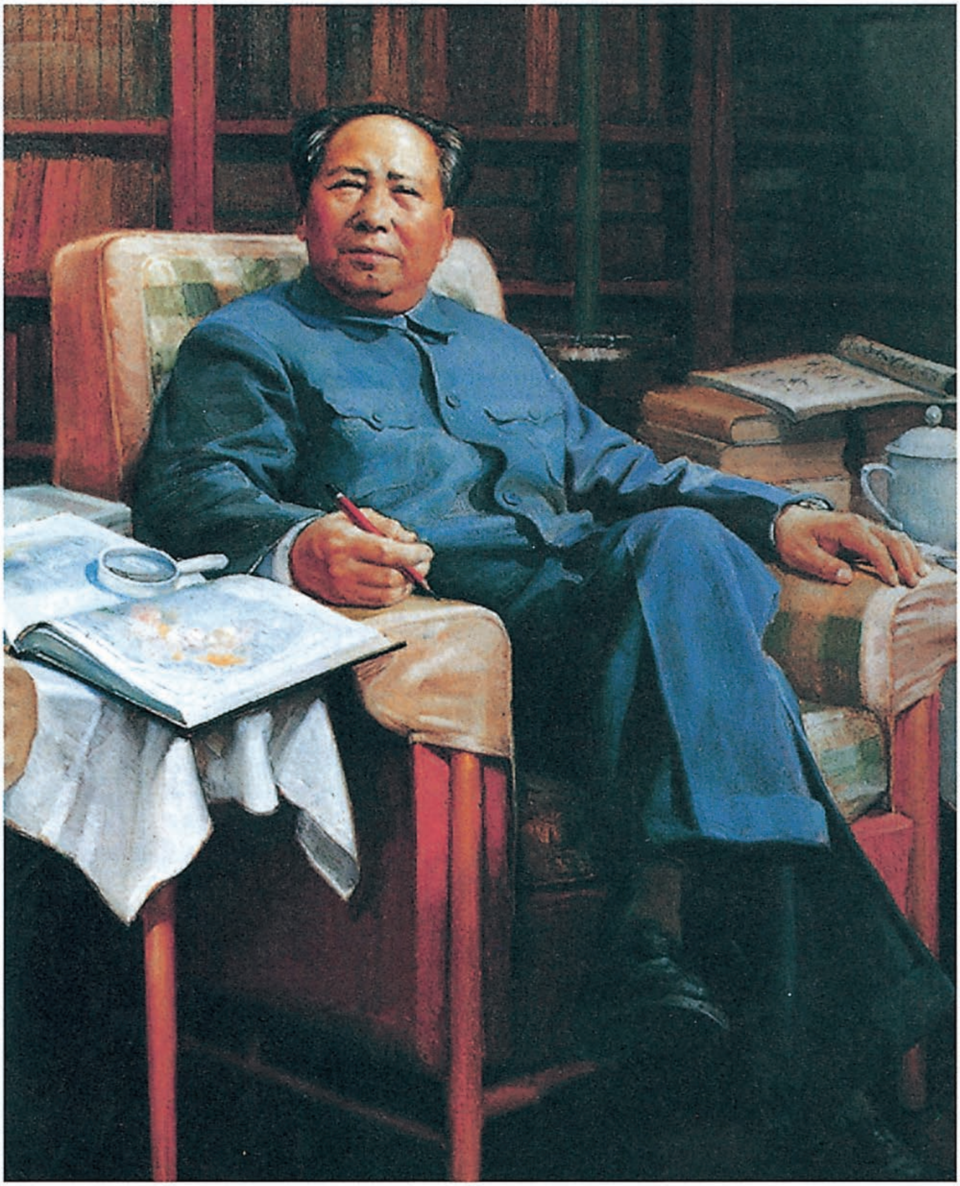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莫尼克公主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及莫尼克公主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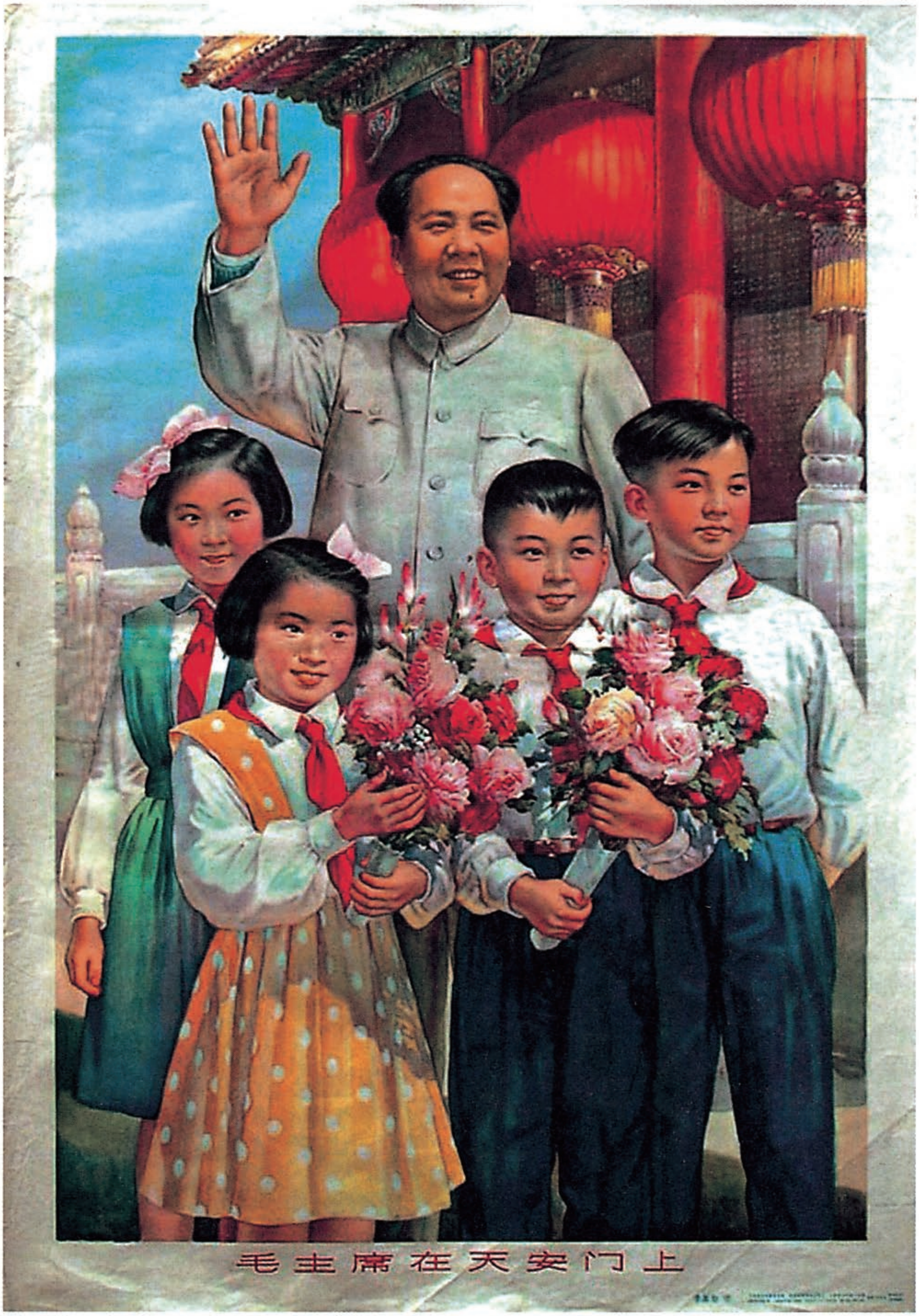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彭真、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人民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南海》（油画）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传画）

对外交部关于陈毅出访五国概况汇报的批语[1]

（1965年10月）

江青阅。

可以明了亚非各国当前形势。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5年9月30日印发的外交部文件第九三〇号关于陈毅出访五国的概况汇报上。汇报说，陈毅副总理于1965年9月4日应邀访问马里，顺道访问了巴基斯坦、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四国，于9月18日返国。途中经过喀布尔时，还曾应邀与阿富汗首相作了会谈。所经各国，态度友好，礼遇很高。访问中，除同马里领导人着重研讨了马里经济形势外，主要是就当前国际形势，向这些国家领导人阐明了我们的立场和主张，并同对方交换了意见。现在报告以下几个问题：一、这些国家经济困难，政局不稳是普遍现象。二、他们同情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但对越南人民能否打败美国缺乏信心，均认为以和平解决为上策。三、对召开二次亚非会议一般都不积极，对会议的基调、开法、会址等也是态度各异。四、普遍认为中苏争论削弱了世界反帝力量，不分是非地要求中苏和解。五、在印巴冲突问题上，巴基斯坦要求我给予有力的军事支援，但又怕我支援“过于有力”。其他国家一般都同意克什米尔实行自治自决，但又主张印巴停火，和平解决。六、政治会谈的初步印象是，他们对我采取反帝、反修立场，以真正国际主义的态度和方式支持并在经济上援助新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表示钦佩、重视，但又认为我过于革命，不讲究策略，怕引起中美大战，担心于

他们自身不利。七、对马里的经济困难问题，既提出了增产节约、开源节流等治标措施，也着重指出了政治问题是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八、关于今后工作的若干意见：（1）亚非会议以推延召开为好；（2）对亚非特别是非洲工作急需加强，如何在经济、外交、宣传三方面密切配合，灵活运用，尤为当务之急；（3）应大力开展争取非洲知识分子的工作；（4）对亚非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还须给予经济援助，但似应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国家作为重点，着重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出样板。

1965年10月6日，毛泽东和泰国前总理比里·帕侬荣亲切握手。

毛泽东等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电报

（1965年10月6日）

柏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维利·斯多夫同志，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主席约翰尼斯·狄克曼教授博士，

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柯伦斯教授博士：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中国人民一向关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并为你们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西德已经变成欧洲新战争的策源地。西德军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军备战，千方百计地谋求核武装，妄图孤立和吞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欧洲和世界和平。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争取缔结对德和约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

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和西德军国主义、维

护欧洲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祝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增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月六日

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

（1965 年 10 月 10 日）

你天天说打仗，他不来打怎么办？那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大小三线搞起来就好了。还是延安那一套，“靠山傍水扎大营”。不然，不就要斩马谡了吗？不过不是我们来斩。哪个来斩？还是美国人。

解决要等打起来，要敌人丢了原子弹才能解决问题。美国现在还没有丢原子弹，它一丢原子弹就能搞得更好。美国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地方大，打起来总有些地方他到不了。无非是大三线、小三线要搞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总有些地方敌人不能到。抗战时，日本人去不了。内战时，蒋介石去不了。过去内战时期，还不是那么多军队，总有的地方到不了的。随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只有项英[2]他不听我们的，陈毅[3]跟他斗争。项英不赞成搞边区，要靠国民党，结果失败了。陈毅同志执行中央方针，到敌人后方去，搞边区，靠打游击，发展了几十万军队。那时我写了《抗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项英，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陈毅，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率部挺进苏北开辟根据地。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所以我提出游击战争是战略问题，改变了战争形式嘛。游击战争问题，洛川会议争论不休，提出山地游击战（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当时有好多人想不通，华北军分会就反对，写了文件，吸收平型关战斗的经验，说要打运动游击战。那还不是老一套，集中起来歼灭敌人。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都是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抗战时我们只有三万人，不能集中力量消灭日本人，只能占地方，发展力量。是分散开来，扩大占领地，搞根据地，还是集中起来打呢？是于我们国家有利，还是不利？有一种说法甚至说如果太原、石家庄失守，就要亡国。为什么这样？他们把过去多少年的阶级斗争都忘了，阶级力量对比看不见了。我在上海、太原失守后写了一篇文章，说要反对两个投降主义。不讲阶级斗争，敌我力量的对比就看不清楚，大的看不到，只看到小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大问题。

现在搞大三线、小三线，我看比较主动。小三线小边区，大三线大边区。如果打起来，敌人总不能全部占领，不能占领所有乡村，中小城镇也不可能全部都占嘛。抗战时日本人到不了西安、重庆。最好日本人迟投降一年，可是他们不听我们的。现在敌人听不听话，也不一定，要放在两个可能上。一个可能按我们讲的早打、大打，一个可能它不来，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不是列宁那个时候了，列宁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是个妥协条约，为的是保存力量。现在是我们要胜利，南越打了一年了，我们搞计划，不能放在不敢打上。余秋里[1]报告提准备五年，我说要争取三年半或更多一点时间（今年下半年算在内）。为什么要三年半？主要看看美国总统选举时是什么腔调。不要那么怕美国，要作点宣传。

---

[1] 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

范文同[1]说美国人比法国人好打得多，美国人学会了一条，就是学会缴枪。有伪军时，美国人是先打死伪军然后再缴枪。不然，他们也怕面子不好过。现在有些人怕美国。打美国人还要作点宣传，不宣传怎么行？好像北方人到南方，说蚊子有多大，说蛇有多厉害。为什么有几亿人在南方生活着？其实，有些北方人到南方去了，安了家，立了业，讨南方的老婆，习惯了，现在不愿意回北方了。在座的就只有两个北方人[2]。我一到南方，到你[3]广州就感冒，在湖南半个月讲不出话来，嗓子哑，到井冈山开始好转，下了山就好了。去年，我在湖北，也是细菌钻进去了。细菌它才无孔不入呢。

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

[1] 范文同，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

[2] 指在座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3] 指在座的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

1965 年 10 月 10 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国庆观礼的工业和农业劳动模范、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各少数民族青年学习参观团的成员。

胜利的信念是从斗争中得来的[1]

（1965年10月20日）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进行侵略。

不久前，日本的《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登载了日本记者从南越发回来的几篇报道，美国报纸说这些报道不公正，于是展开了一场争论。我说的不是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的报纸。这就可见舆论的方向是不利于美国的。最近，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示威发展起来了。目前主要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在闹。

不过，这些都是外部条件。实际上，解决问题还是靠你们打仗，当然也可以谈判。过去在日内瓦曾经谈过，但是谈了以后，美国人可以不算数。我们和蒋介石、美国都谈过。腊斯克[2]就说，美国和中国谈判的次数最多。可是，我们要啃住一条，它一定要从台湾撤走，其他问题都好解决。这条它不答应。中、美两国已经谈判十年了，还是重复老话。这一条，我们放松不得。美国曾想和我们

---

[1] 这是毛泽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2] 腊斯克，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交换新闻代表团。它说，从小事情开始，大的问题好解决。我们说，要从大的问题开始，小的问题才好解决。

原来你们曾按照日内瓦协议，把在南方的武装力量都撤出来。结果，敌人就在那里杀人，你们又重新搞起武装斗争来。一开始，你们是以政治斗争为主，武装斗争为辅，我们赞成。到了第二阶段，你们是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同时进行，我们也赞成。第三阶段，你们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我们又赞成了。依我看，敌人在逐步升级，你们也逐步升级。在今后两三年内你们可能会困难一些，但也难说，也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应该把这点估计进去。做好了一切准备，即使发生最困难的情况，也不会离原来的估计相差太远，这不是很好吗？所以，根本的就是这两条：一是争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阿尔及利亚的经验可以供你们参考。大概是当他们打到第四五个年头时，有些领导人就有点忧愁了。那时他们的总理阿巴斯来和我们谈。他们说，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很少，只有一千万，已经死了一百万；敌人的军队有八十万，而他们的正规军只有三四万，连游击队算在一起不到十万。我当时对他们说，敌人一定要垮台，坚持到胜利之后，人口会增加起来的。后来经过谈判，法国撤了军，现在已撤完，只留下一点海军基地。阿尔及利亚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你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对于发动群众和进行人民战争的问题，你们和我们同阿尔及利亚有所不同。

我在文章中讲的人民战争，有些属于具体问题，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情况，你们的很多方法和我们过去的不同了，应该有所不同。我们打仗也是逐步学会的，开始时打了些败仗；不像你们这样顺利。

你们和美国谈些什么问题，我还没有留意到。我只注意如何打美国人，怎样把美国人赶出去。到一定时候也可以谈判，但总是不要把调子降下来，要把调子提得高一点。要准备敌人欺骗你们。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对总政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1]、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的批语

（1965年10月28日）

退林彪同志。此件[2]已阅，很好。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

---

[1] 指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1965年10月14日关于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的情况和意见（草稿），主要内容是：（一）今年前9个月全军政治工作的概况。主要是执行林彪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着重抓了十件大事：1. 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印发选读本114万册，语录500万册。学习方法多样化（天天读，经常读，小整风，讲用会，上政治课，干部半日学、集训等）。2. 大抓战备政治工作。3.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4. 进行院校整风。5. 进行文艺队伍整风。6. 军队干部参加地方社教运动和贯彻民兵工作“三落实”。7. 抓紧培养选拔革命接班人。8. 进行几项制度改革。9. 狠抓基层骨干轮训，进行四好初评。10. 整顿机关作风和克服连队忙乱。（二）对今冬明春全军政治工作的意见。总的要求，仍然是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加强战备。几件主要工作是：1. 大学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从根本上加强战争准备。2. 抓好部队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工作，搞好部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 继续狠抓四好运动，搞好四好初评。4. 整顿机关。5. 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接班人的工作。

在全国第二批城市“四清”部署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

（1965 年 10 月 30 日）

江青阅。大有希望，明冬后春可完。

毛泽东
卅日上午五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65年10月30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三六五号上。简报说：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第二批开展城市“四清”运动的单位共有16100多个，职工6955000余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0%左右。二、参加第二批城市“四清”运动的工作队共计282000多人。新老队员的比例，有的地区老队员占40%至50%，有的地区只占20%左右。工作队员与参加运动职工人数的比例，据两个大区的统计，中南为1：20，东北为1：26。简报还附有部分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蹲点名单。

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摘录）

（1965年10月）

我看了三篇文章，写得都很好。学哲学就要学这些有实际的哲学，我们老一辈不行了。

资产阶级讲天赋人权，哪里有天赋人权，都是革命来的，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斗争来的。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的不懂历史，学文科的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哲学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恩格斯讲辩证法是二条，斯大林讲四

条，我看就一条——对立统一。什么叫综合？我说综合就是把敌人吃掉。什么叫分析？吃螃蟹就叫分析，把肉吃了剩下壳。分析和综合分不开，什么事情都有两重性，有对有错，杨献珍这些人应该下去，帮助他们改造。形式逻辑是一门专门科学，和辩证法合在一起不实际。总之，大学文科非改革不行，不然就要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等祝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的电报

（1965年11月6日）

莫斯科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伊·米高扬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兄弟的苏联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四十八年前，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四十八年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取得了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各国人民沿着十月革命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

伟大的苏联人民从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一天起，就经受了种种严峻的考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苏联人民战胜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叛乱，并且在一个不长

的历史时期内，把自己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粉碎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疯狂进攻，保卫了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苏联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中国人民一向为兄弟的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中国人民衷心地祝愿苏联人民今后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荣道路，继续前进，并且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成的。这种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兄弟的苏联人民一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为维护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为反对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为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

对林彪[1]所提五项原则的批语[2]

（1965年11月20日）

此件已阅。同意五项原则。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退林彪同志。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1965年11月16日给毛泽东的电话报告记录上。报告说，“我根据海、空军最近的情况，提出了五条原则，拟作为明年全军工作的方针，用以统率各种业务和任务。”随电话报告记录还附送了载有林彪提出的五项原则的1965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通讯。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军委11月25日作出决定：“把这五项原则作为1966年全军工作的方针，望全军遵照执行。”决定正式颁布时对林彪提出的五项原则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这五项原则是：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1]

（1965年11月25日）

现在世界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不仅是日本的广大群众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美国本身也有广大的青年群众起来反对美国政府侵略越南的政策。这个事情是从今年二月美国的空军轰炸北越开始的，搞了几个月后，最近美国进行了规模比较大的群众斗争，有十万青年学生上街游行，反对侵略越南。

像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青年学生上街游行，这是一种征兆，它预示着广大阶层要起来作斗争。特别是大学生，他们家里总是不那么很穷的，甚至他们也都反对本国的反动派。他们的斗争会影响广大群众，会影响其他阶层，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中国革命的过程也是如此，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五四运动是学生运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组织示威游行，火烧了那时的政府部长的房子。革命开始时并不要多少人。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几乎全部是知识分子。就在那一年，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

[1] 这是毛泽东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的一部分。

大会[1]十二个代表参加。在这以前，我也不是共产党人，可能比你们现在的知识还要差。原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知道有马克思主义，有列宁，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比较先进的，在十月革命以前日本就翻译过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

现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一种是像你们跟我们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的运动；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所谓反对我们，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也反对日本人民。所谓“三矢计划”[2]是日本的一些教授揭露的。美国在日本的基地搞什么细菌武器的秘密，也是日本的教授揭露的。可能那些教授也并不是什么共产党员，他们是出于良心，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黑暗面。

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

---

[1]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国内各地和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12人以及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大会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 “三矢计划”是1965年2月10日由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在日本众议院揭露的一项秘密军事作战计划。该计划是1963年日本“防卫厅”经过周密策划后秘密制订的。这个计划设想在“第二次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日本和南朝鲜三方军队共同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作战。同时在日本国内实行“国家总动员体制”，制定“战时立法”，以镇压爱国民主力量。

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所以，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可是美国还没有像你们一样有几百人到我们中国来看一看，你们是经过三个月的斗争的嘛，美国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美国的青年学生要到中国来，美国政府阻止他们来，他们还没有达到经过三个月的斗争来中国看一看的程度。美国的青年学生要来中国，我们欢迎。但是，他们的新闻记者要到中国来我们就不欢迎，或者说我们对大部分的不欢迎，只对个别的欢迎。在这一点上同日本跟我们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同日本相互派了新闻记者，相互派了贸易办事处。说你们的政府那么坏，我看比美国政府稍微好一点，也比我的老朋友蒋介石好一点。我们跟蒋介石没有经济往来，也没有人员往来，当然他不是什么外国人。

1965年11月25日，毛泽东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电报

（1965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二十一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久经考验的领导下，英勇顽强，艰苦奋斗，不断地把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阿尔巴尼亚人民即将胜利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并且正以更高的热情和信心准备迎接明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预祝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今后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成就。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

国人民的反帝革命运动，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为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和作用正在与日俱增。

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不渝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促进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坚强队伍，赢得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的尊敬和赞扬。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是牢不可破的。我们深信，这种革命的友谊和团结必将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祝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1]的批语

（1965年11月）

一

江青阅，退毛存。

二

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物资去。并要大量地送。[2]

---

[1] 指外交部办公厅1965年11月6日印发的文件《越南南方领导同志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有三件：一、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长山1965年8月31日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二、越南南方中央局副书记、中部地区书记武至公1965年3月和4月两次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三、武至公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全文（1965年6月整理）。这个谈话全文包括12个问题和2个附件：（一）南方革命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二）人民武装力量情况。最后是记者附注的情况，其中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战斗力和供应情况等。

[2] 这个批语是针对记者附注中所说的以下情况而写的：中部中区山区主力部队供应比较困难，山区地广人稀，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不富裕，很少副食品，不种蔬菜，战士们一般没有副食吃，白饭加盐巴（盐每月每人供应半公斤，从平原运盐进山全靠人力背，很困难），有时吃些野菜（因为人多，野生东西也很快吃光了），营养不足。战士们常年露营森林，雨多潮湿，日夜温差大，没有房屋、吊床、雨布过夜，蚊子特别多，许多战士没有蚊帐。由于营养不良，蚊虫猖獗，战士们发疟疾很多，预防和医治的药品又很少。按规定战士每年供应一套衣服，但有些部队不能保证。这样，使战士们的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1]

（1965年11月）

一

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三五年内要把这件事情办好，把大小三线搞起来。二十亿元不够，三十亿元也可能不够。后方建设起来，敌人如果不来，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棉布存一点，反正要穿。枪炮子弹如果用不着，只好当废铁用。打洞，不过用了点劳动力。

三七高射炮有没有？其他炮有没有？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自力更生。中央既没有粮，又没有布匹，现在还有点枪炮，打起仗来枪炮也没有了。我们历史上，就是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冲突这两次靠后方供应了点枪炮。其实真正打起来，中央什么也没有，只有发号施令。

敌人登陆要找弱点。青岛工事修得那么好，敌人为什么要在青岛登陆？龙口、成山头，过去日本人就登过陆。越是认为他来不了的地方，设防薄弱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登陆了。

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他。先消灭他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山东、安徽、江苏视察时同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等谈话的一部分。

一个营，再一个团，再一个师。

二

越南仗打得这么好，我们能不能打好？你们看美国人怎么样？只要我们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不主动“挑衅”，就可以把大小三线建设起来，就不怕了。

津浦线一带有没有驻军？有没有地方师？抗战时期，我们只有三个师，现在地方有十几个师了。将来打仗都依靠中央是靠不上的。地方有一个师就好办了。

三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现在军队就是搞些生产，不大做群众工作了。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你们这些省市委书记同志，过去都是在军队里的，现在搞地方工作，就不大问军事了。军队的同志搞了军事，也不问地方工作了。这都不对。搞地方工作的要管军事，搞军队工作的也要管地方工作。

一个地方师拨给你们了吧？有了地方师，有了小三线，地方就有了东西了。中央有了大三线，也就有了东西了。

美国人来不来，要做两手准备。美国人对我们有些怕。越南海岸线很短，美国也只敢占据几个沿海城市，不敢纵深发展，一怕补给线长，二怕被吃掉。中国海岸线有一万多公里，敌人占领了上海，敢不敢占领苏州？

路过济南在火车上听取汇报时的指示[1]

（1965 年 11 月）

毛泽东：你们有没有钢?

答：准备搞□□吨，将来再发展到□□□万吨。

主席：哦，搞□□□吨，那好。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但是你们不能随便造反，不能造马列主义的反，否则你们就会吃亏，会成为修正主义。一个省也造不起反来。一个省搞点钢！搞□万吨左右的钢铁厂，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再一翻□□万吨。但是要有条件。没有条件就不能炼钢。

---

[1] 1965年11月，毛泽东去华东路过济南，在火车上，有关领导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报告时的指示。

1965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

在听取汇报时的插话[1]

（1965年11月）

就是这批人出现修正主义。

现在的教育要改革，一个小孩子要学习十六七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五年……

……要办抗大式的学校，……

……社教就是大学……

现在学生马、牛、羊、鸡、犬、豕都不分，怎么不出修正主义？

初中学生一学期劳动一周太少了，小学也可以搞点轻微劳动，看起来还是搞半耕半读好。

课程负担重，为什么学那么多东西？我看要砍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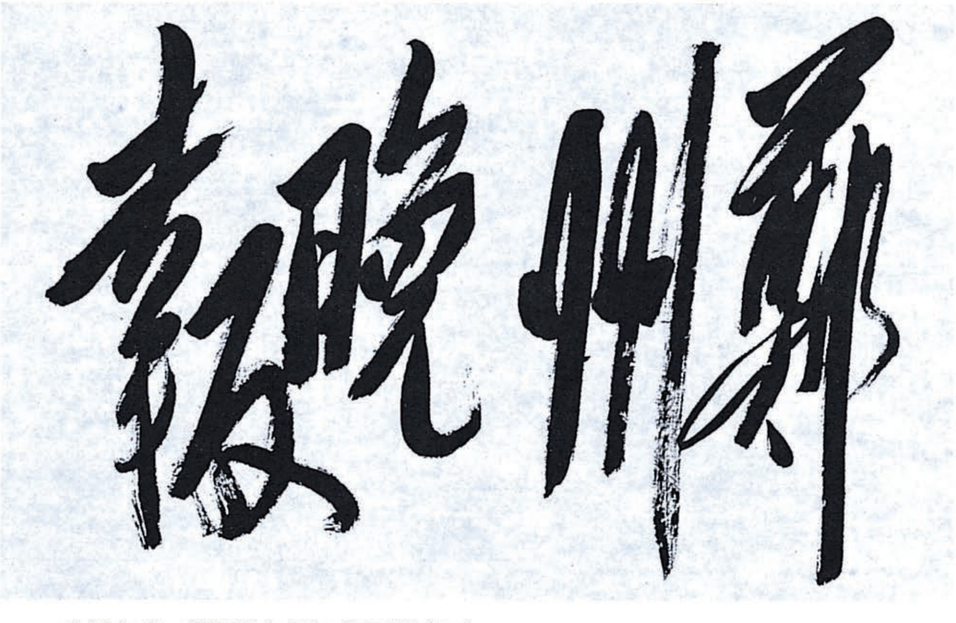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没有受过锻炼时插话的一部分。

为《郑州晚报》题写报头[1]

（1965年11月）

郑州晚报


毛泽东为《郑州晚报》题写的报头。

---

[1] 《郑州日报》是中共郑州市委的机关报。《郑州日报》创刊于1949年7月1日。1963年10月22日，即郑州解放28周年之时，《郑州日报》改为《郑州晚报》。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报头。

批判罗瑞卿

（1965 年 12 月 2 日）

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给陈伯达[1]的信

（1965年12月2日）

伯达同志：

乔木[2]修改的那九篇文章[3]，不知看了没有？请交来人带回，我想查一件事。如未看完，改日送上，再请斟酌。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似指毛泽东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写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文章分九个部分，又称为九篇文章。

对林彪同志一封来信的批语

（1965年12月2日）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反对折中主义[1]

（1965年12月2日）

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那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2]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中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辨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呢？这是他对折中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

[1] 这是毛泽东对浙江省委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2] 腊肉骨头，我国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都有过年腌制腊肉的习俗，在腊月把猪肉腌制起来，吃完肉后就剩下骨头，后指"吃起来没肉，丢了可惜"，同"鸡肋"。

现在我来讲一讲折中主义的特点。

折中主义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两点论即一分为二）。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看到它的两个方面。例如在总结的时候，既肯定成绩，又看到缺点；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败的教训。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不是把它们看作都一样，各占一半，半斤八两，而是严格地把它们分为主要的方面和次要的方面，分为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例如，林彪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领域中四对矛盾的分析，人和物的关系，两个都重要，但活的思想更重要，活的思想第一。这就是重点论。有第一和第二，统帅和被统帅的关系。又如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两个都重要，但主要的是解决思想问题。

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重点论，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事物的主要方面规定的。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淆起来，就认不清事物的本质，就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进行工作。折中主义用二元论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就是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了。他们把事物的两方面，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等同起来，不分第一和第二，不分主要和次要，不分主流和支流，结果就掩盖了事物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使人在工作中分不清是非界限，把人们引到错误的路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政治与业务这一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是政治，把政治抽去了，就等于把灵魂抽去

了。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到处碰壁。所以政治第一，政治统帅业务，不能平起平坐。如果把它们并列起来，就是折中主义。

把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或者主张轮流坐庄的思想和看法，这些人认为既要突出政治，又要突出业务，“今年突出政治，明年突出业务”“闲时突出政治，忙时突出业务”等等。这是一种折中主义的倾向，是错的。

第二个特点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结合论。折中主义惯用的手法，就是把各种对立的观点，对立的名词，对立的事物，无原则地结合起来。这种无原则的结合就是混合，就是调和，就是折中主义。

折中主义的混合论、调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论是根本不相容的。折中主义的混合论和调和论是不分敌我，不分阶级，不分是非。例如现代修正主义主张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对立的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主张取消军队，主张不要斗争，主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不叫工人罢工，不叫农民斗地主，而搞什么和平过渡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折中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不要斗争，不要革命的。

折中主义不分敌我，不分是非，就是斗争的调和论和混合论。如有的人就不搞阶级斗争的，他们对不法资本家不批评、不斗争，敌我不分。你们浙江不是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地主分子表现得很不老实，一个党员职工批评了这个地主分子，这件事经理知道了，经理就找这个党员谈话，批评这个党员说：“地主分子本来就想国民党，你这样一斗他，他就更想国民党，以后不要斗了。”这个经理好人主义讲人情，看到别人有缺点，见到有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事，明知不对也不批评，不斗争，听之任之。这种不讲是非，不讲思想

斗争，只求一团和气，只求得无原则的暂时团结的态度是混合主义，调合论，就是修正主义、折中主义。一旦臭味相投，很容易混到那个臭水坑里去。好人主义也不少，大家要小心一点，提高警惕。

第三个特点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和代替辩证法。折中主义在判断事物的时候，总是这样也对，那样也对。他们惯用这种手法来冒充辩证法，这样就容易打“马虎眼”，容易偷梁换柱，浑水摸鱼，容易欺骗群众。例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文章里批评折中主义的时候说：“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如有人说：“我既不是单纯业务观点，也不是单纯的政治观点，在我那个单位既突出政治，也突出业务，只有业务和政治都突出，这才是全面观点。光强调突出政治或者突出业务都是片面的。”他这种讲法，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考虑得很全面，既照顾了政治，又照顾了业务。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彻头彻尾的折中主义。这不过是以全面的面目出现，它卖的完完全全是折中主义的货色，所以很容易模糊群众，很容易蒙蔽群众。

第四个特点，有折中主义倾向的人，总以为自己很有政治，其实他的脑子里政治缺得很，少得可怜。这些同志所谓很有政治，充其量不过是“口号在嘴上，保证在纸上，决心在会上”而已。他们在小声地喊了一句突出政治的话以后，唯恐人家把突出政治的话听去了，于是紧跟着高喊：“要突出业务。”好像不这样做，就很不舒服似的，这些人唯恐政治思想工作做好了，刁难政治干部。实在感到奇怪。

第五个特点是哲学上的折中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它把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

与技术的关系搞错了，把灵魂抽去了，其结果就一定是：小则是单纯的业务观点，大则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以上讲的是折中主义的五个特点。

凡是有折中主义观点与倾向的人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之点，这就是从他们思想深处来说，是反对突出政治的，他们不是把突出政治放在第一位。

1965年，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

在兰州军区党委一个报告上的批语[1]

（1965年12月2日、7日）

一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2]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

此件如转发时，请先给少奇、恩来、彭真[3]同志一阅。

二

林彪同志：

将此信[4]一同印发。

毛

十二月七日

彭真同志暂不来此，可以不送阅了。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5年12月2日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报送的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上写的批语。林彪在这个报告上写道，“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本篇二是毛泽东在林彪12月3日给他的信上写的批语。

[2] 指中共兰州军区委员会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报告说，9月中下旬，五十五师奉命紧急备战，向中印边境出动，后因情况变化，转而进行了为时一周的摩托和徒步行军演习。从战备和演习中看到，部队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比较落实的方面有：一、几年来部队由于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阶级教育，开展四好运动，特别是今年贯彻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各方面产生了巨大效果，从根本上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增强了贡献于革命战争的决心。部队接受任务后，思想稳定，斗志旺盛，求战心切，纷纷要求打头阵，当尖兵，对阶级敌人表现了高度的阶级仇恨。二、进一步树立了常备不懈的思想，养成了快速、紧张的战斗作风。接受任务后，部队集结快，零散人员收拢快，思想发动、组织调整、物资发放快。三、对部队的活思想抓得

较深较细。抓住有代表性的问题，能较快地弄清事实，耐心说服，加以解决。四、狠抓政策纪律。基本上做到了“部队走到哪里，把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把好事做到哪里，把好影响留在哪里”。在备战和演习中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有：一、部分干部坚信突出政治的根子还扎得不牢，在工作多、时间少的情况下，“转向”的苗头时有出现。二、平时战备思想不够落实，战备形势教育有片面性。三、平时对基层新干部的培养工作还抓得不紧，领导指挥能力低，办法少，在这次战备中表现得很突出。四、政治工作本身还有形而上学和烦琐哲学，图形式，走过场，乱提口号，乱要统计数字。

[3] 少奇，即刘少奇。恩来，即周恩来。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4] 指林彪1965年12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12月2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对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

关于机要保密、警卫工作的指示[1]

（1965年12月14日）

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

[1] 这是毛泽东1965年12月14日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质忠谈话的一部分。这段话后来编入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毛主席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指示》。在毛泽东批示同意的中发〔1972〕33号文件《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引用了这段话的第一句。

关于印发《论十大关系》的批语[1]

（1965年12月18日）

送交小平、彭真[2]同志照少奇[3]同志意见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此件[4]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

---

[1] 这个批语写在刘少奇1965年12月15日为印发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一文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天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同志办理。"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3] 少奇，即刘少奇。

[4] 指当时报送毛泽东审阅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整理稿。中共中央1965年12月27日以中发〔65〕751号文件将这一讲话记录整理稿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1975年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经毛泽东同意，在胡乔木主持下，按照讲话原意对这篇讲话记录稿进一步作了整理，并报毛泽东审阅同意。《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记录整理稿，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1]中。

---

[1] 中共中央1965年12月27日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批语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作的《论十大关系》，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件，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很好的论述，对现在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为此，特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

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1965年12月21日）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三篇文章。

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反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的措施。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一些文章，讲到历史工作者一定要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还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们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兄弟姐妹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七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三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

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男人、女人不见了，大人、小人不见了，中国人、外国人不见了，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能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写书不能像现在这样写法。比如讲分析、综合，过去的书都没有讲清楚，说“分析中就有综合”“分析和综合是不可分的”，这种

说法恐怕是对的，但有缺点。应当说分析和综合既是不可分的，又是可分的。什么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为二的。

分析也有不同的情况，比如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分析。我们过去是怎样分析国民党的？我们说，它统治的土地大，人口多，有大中城市，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农民，脱离士兵。他们内部有矛盾。我们的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土地少，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但是我们联系群众，有三大民主，有三八作风，代表群众的要求。这是最根本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来。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他们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的。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

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了。这些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最近有人写关于充足理由律的文章。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没有充足理由？罗素有没有充足理由？罗素送我一本小册子，可以翻译出来看看。罗素现在政治上好了些，反修、反美、支持越南，这个唯心主义者有点唯物了。这是说的行动。

一个人要做多方面的工作，要同各方面的人接触。左派不光同左派接触，还要同右派接触，不要怕这怕那。我这个人就是各种人都见过，大官小官都见过。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陈伯达插话：主席除外。）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哲学研究工作。要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的历史过程。先搞近百年史。历史的过程不是矛盾的统一吗？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有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辛亥革命以前，有孙中山和康有为的斗争。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有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斗争。后来国民党内部又不断地发

生分化和斗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辩证法过去说是三大规律，斯大林说是四大规律，我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内容和形式、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

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好比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这种说法还可以研究。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国民党骂我们是“匪徒”“共产党是匪徒”“张三是共产党”，所以“张三是匪徒”。我们说“国民党是匪徒，蒋介石是国民党，所以说蒋介石是匪徒”。这两者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当然可以推论，但是结论实际上包括在大前提里面。现在有些人把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混淆在一起，这是不对的。

上面要靠党的领导 下面要靠广大群众[1]

（1965 年 12 月 21 日）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政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单靠首长不行，你能管这么多吗？许多事你们看不到的，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所以要发动人人负责，人人开口，人人鼓动、人人批评。每个人都长着眼睛和嘴，就应该让他们去看，让他们去说。群众的事情由群众来办理就是民主，这里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单靠个人来办，一条是发动群众来办。我们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来治，而不是靠少数人来治，一定要发动人人开口。每个人既然长了嘴巴，就要负担两个责任，一个是吃饭，一个是说话。在坏事情坏作风面前，就要说话，就要负起斗争的责任来。

---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和陈伯达、艾思奇等的谈话。

没有党的领导，单靠首长个人来领导，事情一定办不好，一定要靠党和同志们来办事，而不是靠个人来办，群众要发动，要形成群众动手动口的风气。上面要靠党的领导，下面要靠广大群众，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好。

毛泽东等祝贺古巴解放七周年的电报[1]

（1965年12月31日）

哈瓦那

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

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同志：

在古巴解放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向古巴人民、古巴共产党和古巴革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古巴革命的胜利，是古巴人民团结起来、艰苦奋斗、英勇斗争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次可耻的失败。它证明了，革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我们祝愿，英勇的古巴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捍卫民族独立和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中古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古巴共和国总统奥斯瓦耳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的电报。祝贺古巴解放七周年。

义的原则为基础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古巴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前进。

祝中古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在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四期上的批语

（1965年）

一

1965年，《哲学研究》第二期[1]，赵纪彬[2]，《论语新探》[3]。

二

孔门充满矛盾论。[4]

---

[1] 这一期登载了赵纪彬《关于“一”“二”范畴的形成过程问题》一文，它是作者《释一二》一书初稿的第二章。《释一二》一书是就《经》《子》中“一”“二”及其孳乳各字的演进史迹，探索先秦辩证法观与形而上学观的斗争及发展规律，共分十一章。

[2] 赵纪彬，当时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教授。

[3] 《论语新探》，赵纪彬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

[4] 这是毛泽东在1965年《哲学研究》第四期第44页赵纪彬《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源及其矛盾调和论的逻辑归宿》一文标题上方写的批语。这篇文章讲了六个问题：一、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和”“同”字

义的转化；二、有若、樊迟思想中的“和”“同”新字义；三、从“民不服”看“举贤”“德治”的阶级斗争意义；四、“仁”的矛盾调和原理与“一以贯之”的方法论；五、“闻一知十”与“闻一知二”两种矛盾观的对立；六、孔门的支派萌芽及其思想斗争的逻辑前景。这篇文章是作者《释一二》一书初稿的第三章。

1965年，毛泽东和王海容在一起。

关于礼宾工作的指示

（1965年）

一　宴会

我们招待外国人的宴会规格太高，而且不看对象，千篇一律都要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就不吃这些东西。这是西太后和《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那些人吃的。我们请外国人，热菜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宴会的时间不要太长，我们又要同外国人谈话，又要同他们吃饭，我们陪不起。听说外国人的宴会就比较简单。

二　礼品

我们送外国人的礼物，花钱多，规格高，吃穿用的东西多，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少，其实送礼不在多少，而要送有民族的特点，又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送礼自然要大方，但不能没个边，大手大脚，大少爷作风，不能靠多送礼品的办法拉友谊，友谊要靠政治，外国人送我们的礼品就比较简单，艾地同志来，送我一根“金鸡毛”，约多同志送我一个小孩玩的弹弓，这种礼品就很好，礼品就是来表示意思，也不能靠礼品过日子。

我们给外国人送礼花的是国家的钱，外国人送给我们的礼品也要归国家。不应归个人所有，送给我的礼品要好好处理，有展览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找个地方陈列出来，没有展览价值的一些日用品，可以内部作价处理（收回来的钱归公）或者交给国家使用，还有一些吃的东西，可以分给工作人员尝尝。

三　礼节

外交礼节，不能学洋人那一套，什么黑衣服、薄底皮鞋等等，都是从外国人那里学来的，我们是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习惯，外国人到中国来是看你的政治，看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看群众的情绪，人家不是来看你穿什么样的衣服，穿什么样的皮鞋。

重读《长冈乡调查》时写的批注[1]

（1965 年）

一

乡村的工人是手工业工人，如建筑（泥水匠）、打铁、造纸、裁缝、木匠、篾匠、剃头师父等，人数很少，叫他们单独组织工会，领导广大农民，农民是不服气的。他们因为不能不为农业服务，出外当红军，脱产做政府工作的也较少。除造纸业有几人至十几人的工厂手工业外，其余都是个体工人，自有工具，有些还是半农半工的人；土地改革中，工人怕失业，分了一些的土地，他们大体相当于贫农，所以农民不认为他们是自己的领导者。工人方面，也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可以领导广大的农民。反而觉得怕农民不请工，或者少请工，自己有失业、半失业的危险，所以他们在土地革命中坚决要求分田。只是因为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一定要在乡村中及在落后的小城镇中（那里只有手工业，没有机器工业），命令工人领导农民，而工农双方都不理解这个大道理，因而始终没有真正实行过。这件事闹了多少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以后，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重读自己1933年11月写的《长冈乡调查》时，在“此次选举”一节中“选民登记”这段文字后面写的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此次选举”一节旁边写的一段批注。

才没有再闹这种笑话了，因为那时的领导路线改变了。（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注）

二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1]，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

[1] 指1931年年初至1934年年底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人。

七律·洪都[1]

（1965年）

到得洪都又一年，
祖生击楫[2]至今传。
闻鸡[3]久听南天雨，
立马曾挥北地鞭。
鬓雪飞来成废料，
彩云长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
江草江花处处鲜。

---

[1] 洪都，旧南昌府的别称。隋、唐、宋三代曾以南昌为洪州治所，又为东南都会，因而得名。这里指江西省南昌市。

[2] 祖生击楫，祖生，即东晋名将祖逖。公元304年匈奴族刘渊在黄河流域建立汉国。中原大乱，祖逖率领亲党数百家来投镇守建邺（今南京市）的晋元帝司马睿。313年祖逖要求率兵北伐，被任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中流击楫，立誓收复中原。击楫，敲打船桨，后用以形容有志报国的抱负和气概。

[3] 闻鸡，这里化用闻鸡起舞的典故。《晋书·祖逖传》：“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祖逖和刘琨年轻时都有大志，互相勉励振作，因此听到鸡鸣就起床舞剑。后以“闻鸡起舞”比喻有志之士奋起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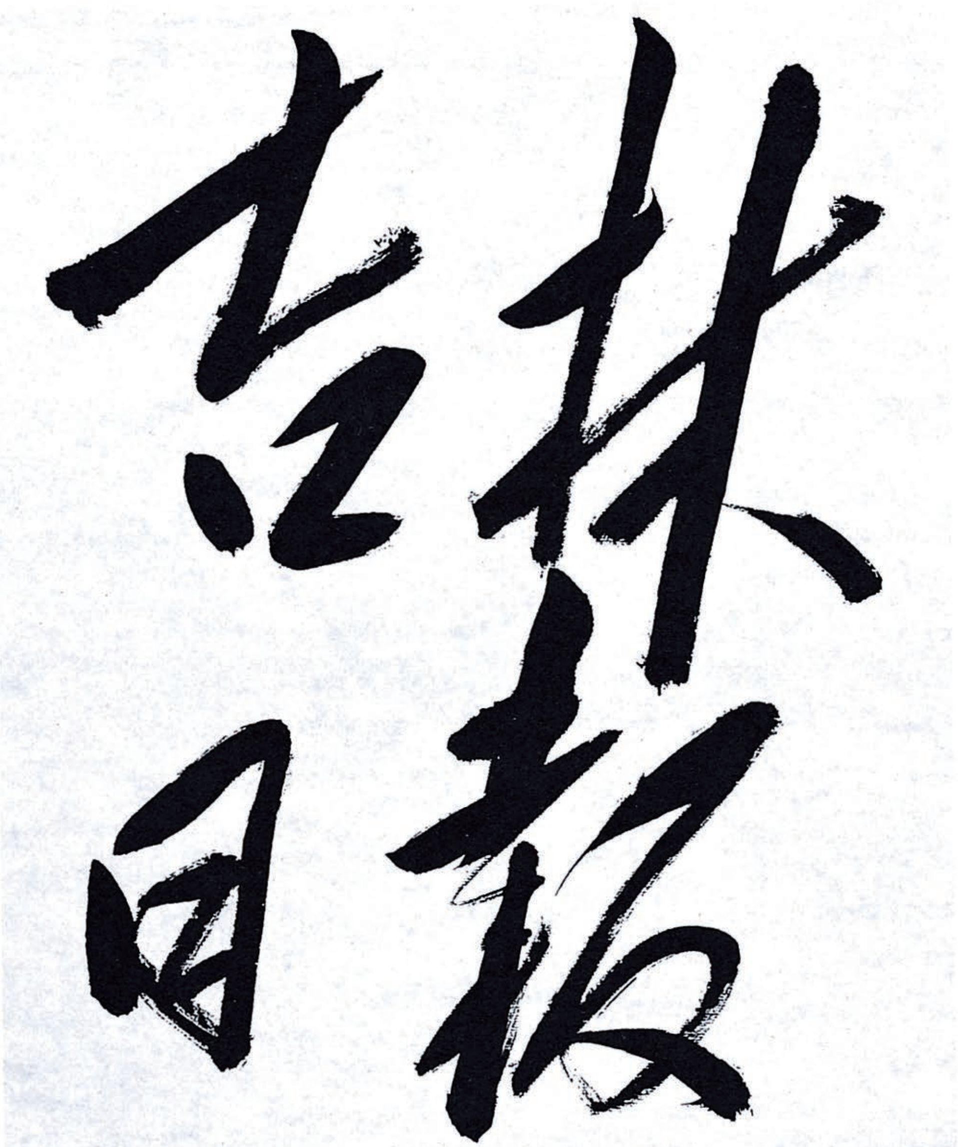
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头[1]

（1965年）

吉林日报

---

[1] 《吉林日报》由中共吉林特别支部创办于1945年10月10日，当时报名为《人民日报》。1950年5月23日，毛泽东为《吉林日报》题写报头。1952年正式使用毛泽东题写的《吉林日报》报头。1965年2月2日毛泽东重新题写报头。



毛泽东为《吉林日报》题写的报头。

卜算子·悼艾地[1]同志

（1965年12月）

疏枝立寒窗[2]，
笑[3]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
春来反凋残[4]。

残固不堪残[5]，
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
蓄芳待来年[6]。

---

[1] 艾地（1923—196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

[2] 疏枝，指梅花。梅花开放时有花无叶，开花后始生叶，故其枝条稀疏。立寒窗，指梅花在冬末早春时开放，天气寒冷，人们常栽于窗前庭院中，以供观赏。

[3] 笑，欢笑。形容花儿绽开，似人显露笑容。

[4] 反，反而。凋，凋谢。残，残缺，毁坏。凋残，花木枯萎，凋谢。

[5] 固，固然，本来。不堪，不能忍受，表示程度之深。残固不堪残，梅花已经凋零得非常厉害了。

[6] 蓄芳待来年，意思是说梅花每年都有开放的时候，现在虽然凋谢了，但是明年还会再开放，比喻只要不断地积聚力量，革命运动终会重新崛起。

在李达[1]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的批注[2]

（1965年）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武器

第三章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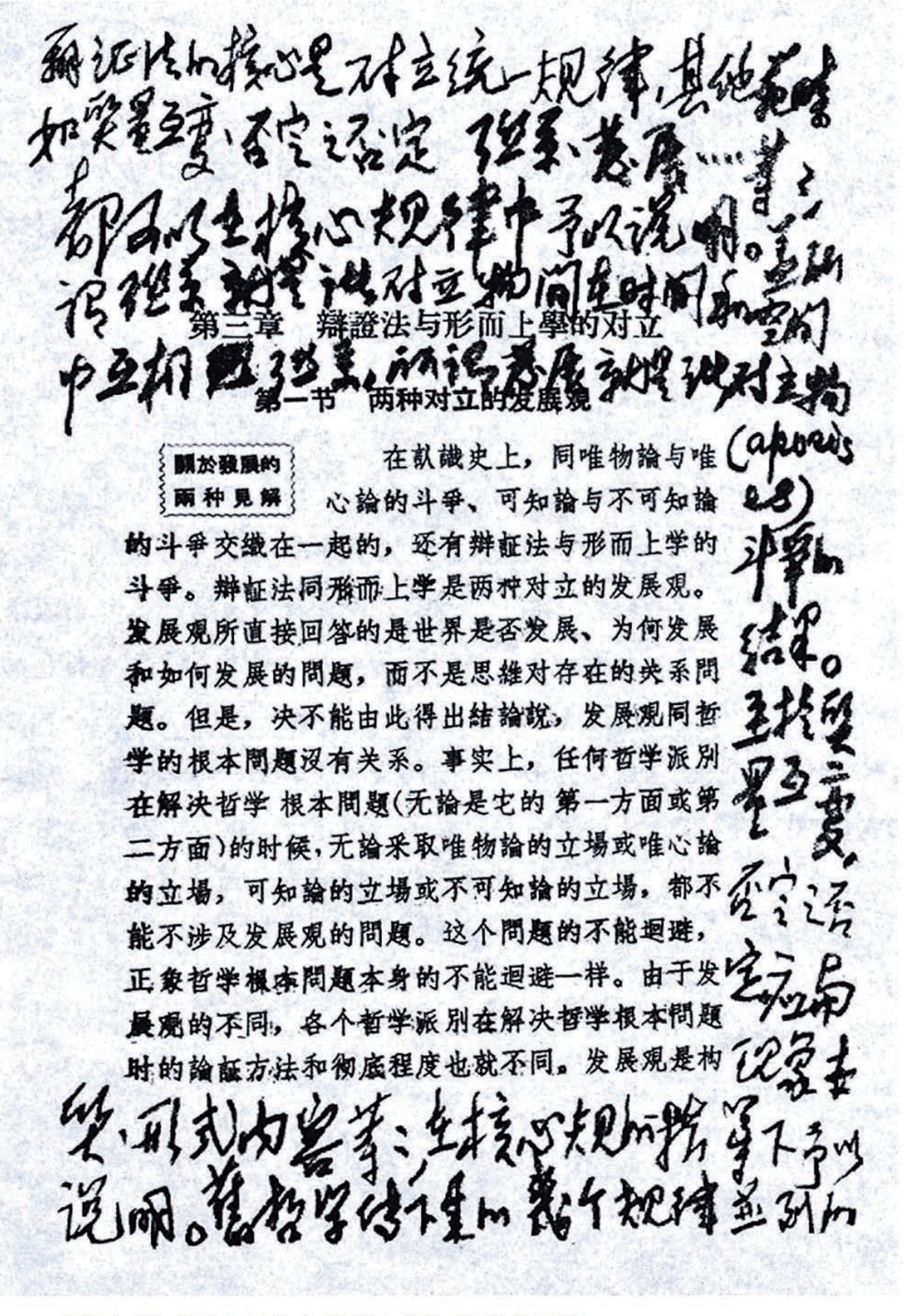
关于发展的两种见解

在认识史上，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由于发展观的不同，各个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根本问题时的论证方法和彻底程度也就不同。发展观是构成一定

---

[1] 李达，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

[2] 本篇中左侧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写的两个批注。



第三章　辩證法与形而上學的对立

第一节　两种对立的发展观

關於發展的兩种見解

在認識史上，同唯物論与唯心論的斗爭、可知論与不可知論的斗爭交織在一起的，还有辯証法与形而上学的斗爭。辯証法同形而上学是两种对立的发展观。发展观所直接回答的是世界是否发展、为何发展和如何发展的問題，而不是思維对存在的关系問題。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发展观同哲学的根本問題沒有关系。事实上，任何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根本問題（无論是它的第一方面或第二方面）的时候，无論采取唯物論的立場或唯心論的立場，可知論的立場或不可知論的立場，都不能不涉及发展观的問題。这个問題的不能迴避，正象哲学根本問題本身的不能迴避一样。由于发展观的不同，各个哲学派别在解决哲学根本問題时的論証方法和彻底程度也就不同。发展观是构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着，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aporias)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

毛泽东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批注的手迹。

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就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就（Anorises）[1]斗争的结果。至于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应与现象本质、形式内容等等，在核心规〔律〕的指导下予以说明。旧哲学传下来的几个规律并列的方法不妥，这在列宁已基〔本〕上解决了，我们的任务是加解释和发挥。至于各种范畴（可以有十几种），都要以

哲学体系的必要的有机的成分，是世界观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毛泽东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观表述为互相对立的宇宙观（即世界观），就表明这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也是哲学上极为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论述哲学根本问题之后，必须论述两种发展观对立的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都把发展观概括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列宁说：“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是：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2]前一种观点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后一种观点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在这一节里，我们将论述这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这种对立的历史根据以及这种对立同哲学根本问题的关系。

---

[1] 括号中的外文是毛泽东写的。

[2] 这段话引自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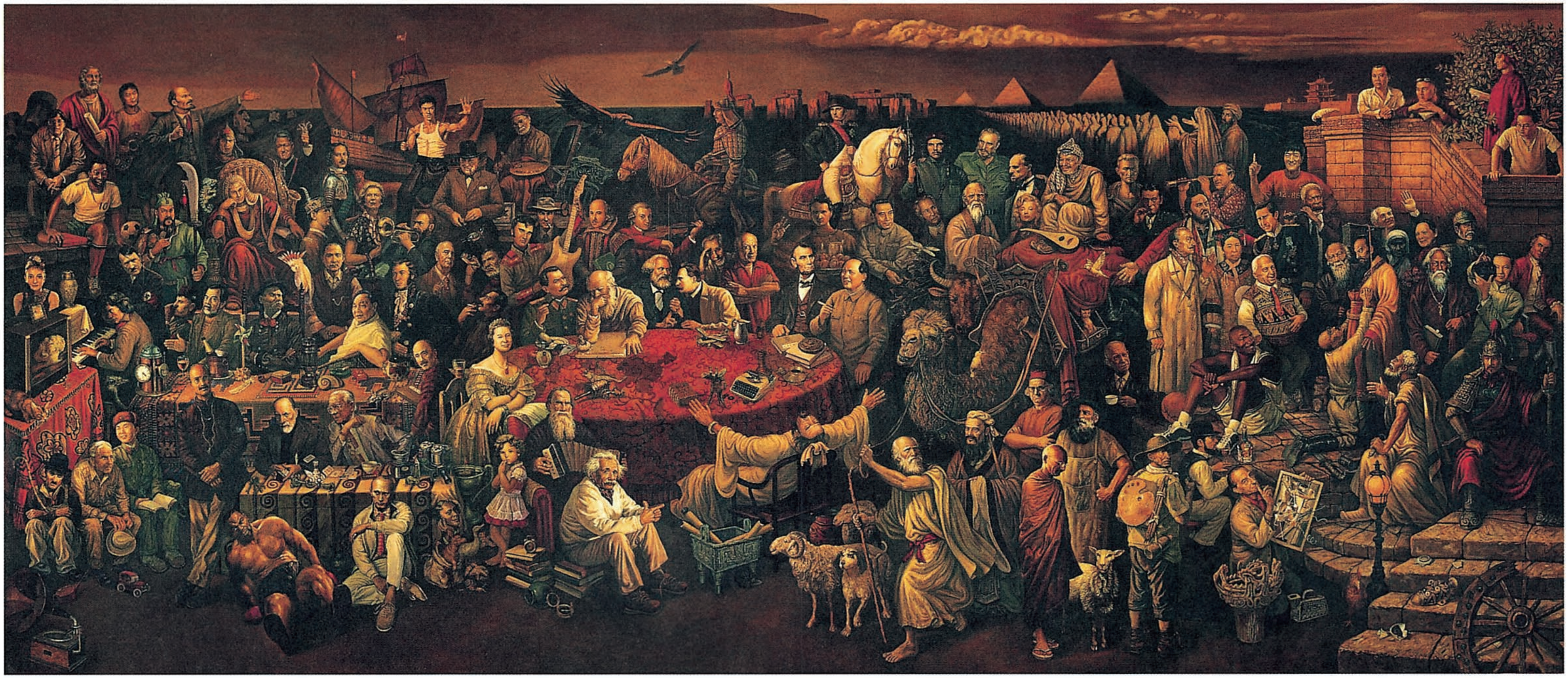
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去说明。例如什么叫本质，只能说本质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如等〈此〉类推。

不必抄斯大林

两种发展观互相对立的焦点

两种发展观的根本对立，集中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孤立观点和联系观点的对立。



《与但丁讨论神曲》（油画）

1966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

（1966年1月10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阿尔巴尼亚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继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阿尔巴尼亚解放日之后，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生活中又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二十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阿尔巴尼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在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今年开始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努力。中国人民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上，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对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越来越大，国际威望越来越高。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人民革命的事业中，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一向紧密合作，互相支持，结成了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我们这种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友谊和团结，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并将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日

给章士钊[1]的信

（1966年1月12日）

行严先生：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惠书及附件均已收读，极为感谢！三国志[2]一部亦已收到，可作纪念，便时乞代致谢意。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3]，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有当，请酌定。顺颂

春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

---

[1] 章士钊，字行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 《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写的一部纪传体魏、蜀、吴三国史，分魏志、蜀志、吴志，共六十万卷。三志原本各自独立，后世将它合为一书。

[3]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1965年8月5日，毛泽东曾将这部书稿批转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阅读。12月5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因此书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过，所以我提了几点意见，用纸条标出。请主席看看，是否需要作词句的删改。”《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在197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1]一件，均附上。又及

---

[1] 指康生1965年12月5日给毛泽东的信。

给周世钊[1]的信

（1966年1月29日）

东园兄：

数接惠书及所附大作诗词数十首，均已收读，极为高兴。因忙，主要因懒，未及早复，抱歉之至。看来你的兴趣尚浓，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谨复，顺颂

安吉！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一月廿九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又名东园，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对有关《海瑞罢官》[1]问题七个材料[2]的批语

（1966年2月5日）

江青：

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毛泽东

二月五日

---

[1]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创作的新编历史剧，1960年年底完成，1961年年初开始上演。1965年年初，江青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发展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政治批判运动，这一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这一冤案平反。

[2] 这七个材料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1966年1月分几次报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2月1日，彭真转报毛泽东等。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七个材料的目录页上。七个材料分别是：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三、汇报关锋等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五、关锋在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为焦裕禄题词*

（1966年2月7日）

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关于重新印发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批语[1]

（1966年2月6日、12日）

一

彭真同志：

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

---

[1] 七千人大会，指中共中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各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7000多人。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曾作为中发〔62〕147号绝密文件印发。1966年2月4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给毛泽东写信说："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我读了一遍。我认为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有迫切的意义。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引导这个高潮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本篇一就写在王任重的来信上。本篇二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66年2月11日报送的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彭真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大家（任重同志参加）讨论了两次，提了些小的修改意见，供参考。请核定。"这个讲话，中共中央1966年2月12日发至县团级党委，1978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1]是好的。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六日

二

彭真同志：

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二时四十分

---

[1] 王任重1966年2月4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对毛泽东的讲话稿提出了6条纯属文字方面的修改意见。彭真2月11日送审的这一讲话修改稿中，采纳了王任重的修改意见。

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

（1966年2月8日）

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

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

（彭真说要对左派“整风”）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和毛远新[1]的谈话

（1966年2月18日）

在谈到军事工程学院先搞二三年，然后搞二年半工半读并结合预分时，毛主席说：

理工科还要有自己的语言，六年中先搞三年试试看，不一定急于搞二年。尖端科学搞三年，要有针对性才行。三年不够，将来再补一点。有针对性才能少而精，有针对性才能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六年搞成三年，这样做以后，步骤稳妥，方向对头。

新事物，干它几年，不断总结经验才行。

理工科有它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语言，要读一点书。但是也有共性，光读书不行。黄埔军校就读半年，毕业后当一年兵，出了不少人才，改成陆军大学以后（没有记下读几年），结果出来尽打败仗，做我们的俘虏。

理工科我是不懂的，医科我多少懂一点。你要听眼科大夫说话，神乎其神，但人总有一个整体。

科学的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但讲课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习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

尖端理论包括通过实践证明了的，有的基础理论中要去掉通过

---

[1]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曾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和教员。

实践证明没有用的和不合理的部分。

讲原子物理只讲坂田模型就可以了，不必要从丹麦学派波尔理论开始。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坂田都用辩证法，你们为什么不用？人认识事物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医学讲心理学，讲神经系统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看不对，应该先讲解剖学。数学本来是从物理模型中抽出来的，现在就不会把数学联系到物理模型来讲，反而把它进一步抽象化了。

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批语

（1966年2月19日）

任重[1]同志：

此件[2]看了，觉得很好。请送少奇同志，请他酌定，是否可以

---

[1] 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66年2月5日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其中指出，实现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就会出现革命性的飞跃，农业落后于工业的矛盾，才能获得解决。而农业的大发展，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巩固的基础，它对于巩固工农联盟，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对于备战、建设、防修，都关系极大，因而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在我省，实现农业机械化，要走孝感县金星大队的道路，也就是大寨的道路，即是在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自力更生，勤俭创业，用本省生产的农业机械，来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要发扬大寨精神，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保证增产和增加社员收入的原则下，采取以集体办机械为主、国家扶助为辅，“以机养机”、分期购进，国家扶助、无息贷款等办法，逐步实现机械化。要做好这一工作，关键在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今年一定要办好十七个公社的试点工作，并作出全面规划。规划不光是指标要求，而且是组织一个革命飞跃的行动纲要。从今年算起，我们要力争在五年、七年、十年内（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就是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实现农业机械化。

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1]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二十五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至于二十五年以后，那是无止境的，那时提法也不同了，大概是：在

---

[1] 刘少奇1966年2月23日给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说："我赞成将湖北省委这个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主席批语也一并转发。此外，中央还可加一个批语。"1966年4月10日，中央转发了湖北省委的文件、毛泽东的批语和刘少奇的信，并加了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批语。中央的批语指出："毛泽东同志很早就指出了我国农业的发展道路，是要在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他最近又提出各省、市、自治区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作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争取从今年起，用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任务。这个任务是同他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思想紧紧联系着的。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先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到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局部地区的灾荒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毛泽东同志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战略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动员广大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非常适时，非常重要。机不可失，我们应当立即抓紧这项工作。""中央认为，实行农业机械化的具体步骤，应当由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直接负责，特别是省一级要有必要的主动权。湖北现场会议以后，各地党委应当按照具体情况，作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农业机械化计划的初步草案，内容包括分批分期、分别轻重先后缓急、由点到面、由低到高、土洋并举等措施，并同国家统一计划相结合。这种计划草案经过酝酿，然后提交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过去二十五年的基础上再作一个二十五年的计划吧。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十五年。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我们抓得不大好。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

诱敌深入要做两手准备[1]

（1966年2月21日、22日）

一

诱敌深入，过去灵，过去对日本人灵，现在在越南不灵了。敌人不会轻易长驱直入，要做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

诱敌深入，怕不灵。可以搞小的诱敌深入，例如几十公里之内。第一线要顶几个月。我看美国不会走日本、希特勒的老路。像日本、希特勒长驱直入的办法，美国不敢搞，它没有多少兵，它怕死人，怕我们消灭它，所以要有第二手准备。完全不让它上岸也不行，我们海岸线那么长，这里不能登陆，那里可以登陆。过去德国人在青岛设了防，日本人就是从龙口登上来，从背后占领青岛的。

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日本人长驱直入，除西北、西南地区以外，差不多交通要道都占了。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使后方有所准备。

---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二

诱敌深入有两个深度，差不多了，还要看形势。这是还没有同敌人打仗以前的想法，打起仗来，你晓得敌人怎么搞，现在可以这样设想。反正要在第一线顶几个月、半年的时间，使后方有所准备。还要考虑顶不住。我们不能一点空子也没有，你设想得很周密，但敌人不从你设防周密的地方来，它钻你的空子上来。它要钻你的空子怎么办?

三

利用城市打，也是个办法。采取斯大林格勒的办法。总不能把城市空起来，上海人口七百万，搬到哪里去！工厂要搬出一些。沿海城市要多修几层工事，它突破一层，还有一层。还要注意城市翼侧的设防。战争开始，可以采取这个方针，打几个月，看情况再说。美国搞空降，只能搞近距离的空降，远距离的空降，它没有把握，力量也不行。

四

一个国家要消灭另一个国家，只要军队存在，人民大部存在，敌人就没有办法。因为要消灭一个国家，首先是消灭军队，然后是征服人民，强占土地。

为罗丽华[1]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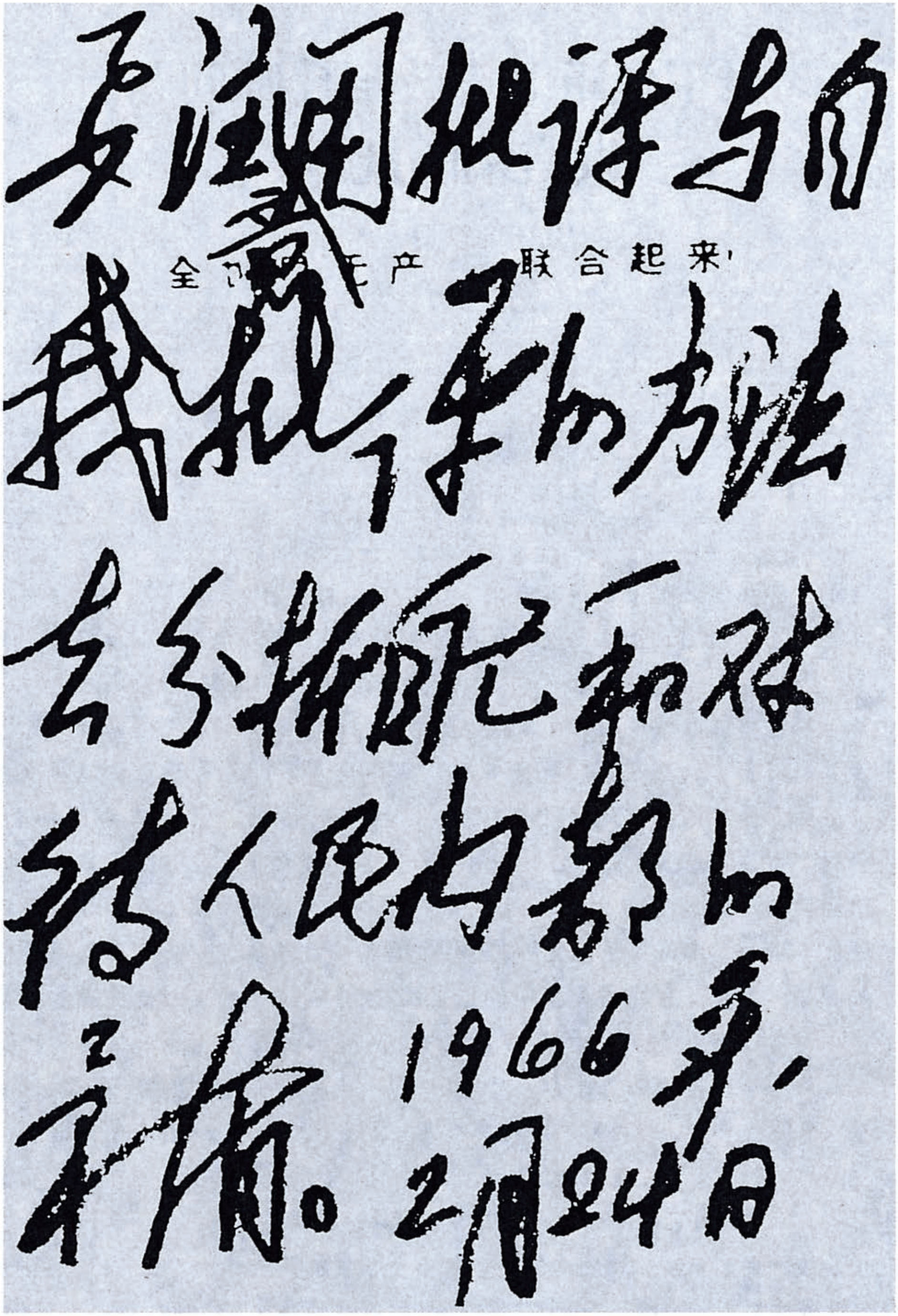
（1966年2月24日）

要注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自己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1966年2月24日

---

[1] 罗丽华，当时是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要学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分析研究和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1966年2月24日

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罗丽华的题词。

对王任重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发言稿的批语[1]

（1966年2月、4月）

---

[1] 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66年1月24日在湖北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农村有许多地方是工分挂帅，不是政治挂帅；许多工厂、商业单位则是奖金挂帅，其实质是物质刺激。对这些不合乎毛泽东思想和生产发展的制度都可以改。工厂可以把奖金加到工资里去，只要不超过工资总基金就可以。原则有两条，一条是不增加国家开支，另一条是工人的实际收入不减少。以后只搞精神鼓励，不搞物质刺激。农村的基本办法是搞底分制，按人评底分，反对搞烦琐哲学，主要靠政治挂帅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搞政治挂帅，要有一系列的措施跟上去，否则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本篇一写在王任重这一发言的铅印稿上。4月10日，中共中央加批语转发了王任重的发言稿，指出：“任重同志的发言，是讲政治挂帅的，他的意见提得很好。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现在实行的一些奖金制度等，是不符合政治挂帅精神的。我们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是靠工资、工分以外的物质奖励，而是靠毛泽东思想，靠政治挂帅，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之是靠人们的政治觉悟的不断的提高。但是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牵涉的方面和问题很多，需要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全面考虑，通过群众路线，逐步解决。请中央有关各部委和各省市区党委找几个工厂、商店、生产队等单位，选择条件比较成熟的问题，在今年试点，以便取得典型经验，逐步全面解决这个问题。”本篇二就写在中共中央这个批语稿上。

一

少奇[1]同志：

此件请你看看，是讲政治挂帅的。

毛泽东
二月廿五日

二

同意。

---

[1] 少奇，即刘少奇。

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

（1966年3月12日）

少奇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1]收到。小计委[2]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五年、七年、十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七天至十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五年、七年、十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

---

[1] 指刘少奇1966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的文件和主席的批语，已印发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并发给包括计委、经委在内的各有关部委及华北局有关同志研究。在有各在京副总理参加的中央常委会上谈了这个问题，大家意见，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对有关各方面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加以讨论，以使各地方的努力更加符合实际。周恩来同志已要小计委派人到湖北，同省委共同研究他们提出的方案，先在湖北进行试验。

[2] 小计委，是1965年年初毛泽东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一个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研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问题，拟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任务等。后来在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由小计委的同志实际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

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以上者），在超过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

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1]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七十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七天至十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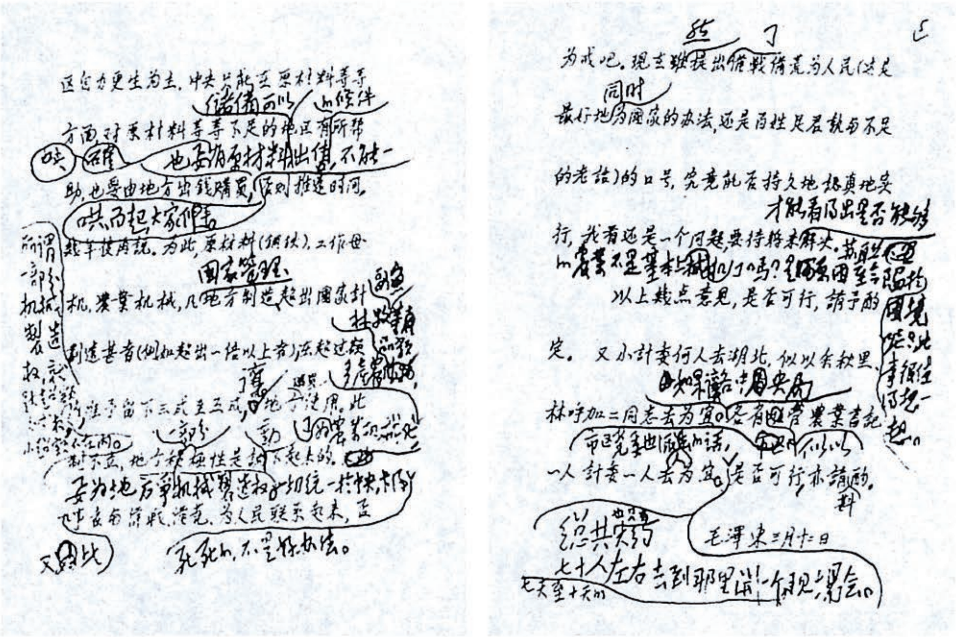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

[1] 余秋里（1914—1999），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小计委负责人。林乎加，1916年生，山东长岛人，当时是小计委成员。

[2] 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为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设想等文件加写的批语中指出，为了推动农业机械化工作和交流经验，“中央和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商定，于今年4月下旬或5月初在湖北召开现场会议，除各中央局派人参加外，每个省、市、自治区党委参加会议的同志是管农业的书记一人，计委一人，或者再去一位主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同志，西藏去一人即可。会前，中央将派小计委的同志到湖北先进行调查研究，同湖北省委一道，着手现场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具体时间，届时另行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也可先派一二人到湖北参观，同时各地可以总结本地区若干单位农业机械化的典型经验和一般农机具的生产、供应、修配、管理情况，带到现场会议上交流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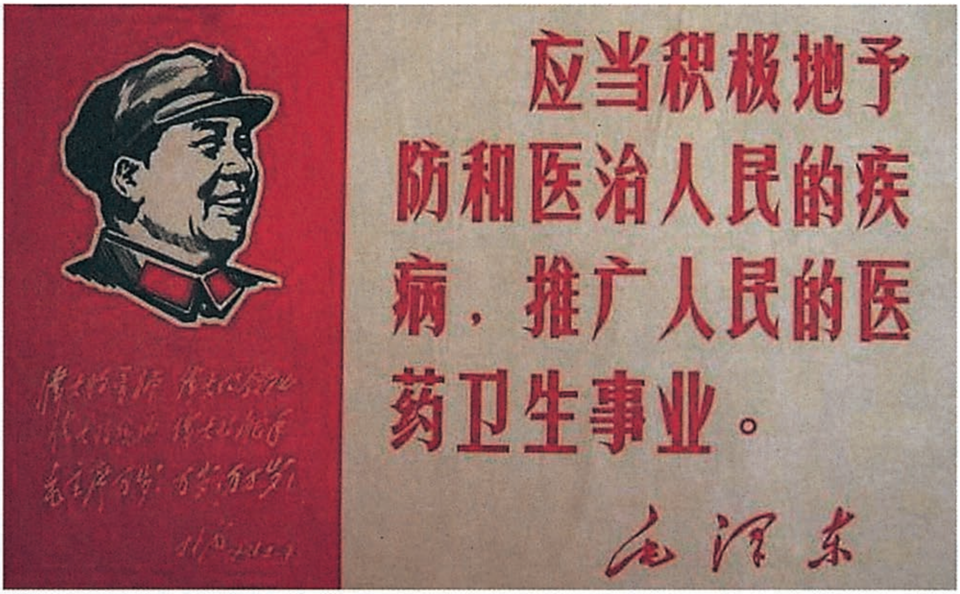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的手稿（部分）。

看了“人工喉”“断手再植”“止血粉”等文章后对医务工作者的指示

（1966年3月12日）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血吸虫病的检查与治疗应该免费。过去医务人员就是不接近群众，不相信群众。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说：“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要在医务界大力系统的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林彪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毛泽东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宣传画）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

（1966年3月20日）

（一）关于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

苏联二十三大我们不参加了。苏联是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开这个会。我们靠自力更生，不靠它，不拖泥带水。要人家不动摇，首先要自己不动摇。我们不去参加，左派腰板硬了，中间派向我们靠近了。二十三大不去参加，无非是兵临城下，不打，就是笔墨官司。不参加可以写一封信。我们讲过叛徒、工贼。苏联反华好嘛，一反我们，我们就有文章可做。叛徒、工贼总是要反华的。我们旗帜要鲜明，不要拖泥带水。卡斯特罗[2]无非是豺狼当道。

有人问：这次我们没参加，将来修正主义开会，我们还发不发

---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 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1926年8月13日出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他1950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领导发动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在法庭上发表了举世闻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年，他流亡美国、墨西哥，在墨期间筹划“七·二六运动”。卡斯特罗1956年回到古巴，在马埃斯特拉山区创建起义军和根据地。1959年1月，他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卡斯特罗1962年起担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1965年该党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后，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贺电？

发还发，发是向苏联人民发。

（二）学术问题、教育界问题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过去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改变了过去苏区的政策。这个政策是灵的，正确的。应该把他们区别开，如果把他们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都是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要保几个人，如郭老、范老[1]，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上斗争。

现在每一个中等以上的城市都有一个文、史、哲、法、经研究部门。研究史的，史有各种史，学术门门都有史，有历史、通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都有史，没有一门没有史。自然科学史我们还没有动。今后每隔五年、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讲道理，培养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们手里。范老是帝王派，对帝王派将相很感兴趣，反对青年研究历史，反对一九五八年研究历史的方法。批判时，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2]

---

[1] 郭老，即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文学、史学界权威。范老，即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当时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两人同为国学名家。

[2] 吴晗，明史专家，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曾编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翦伯赞，历史学家，当时任北大副校长，反对姚文元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

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现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包下来了，拿定息，当教授、校长，这批人实际上是一批国民党。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1]，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2]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报纸、文艺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3]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4]的弟弟。他的文章是一九六四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5]、翦伯赞等人。

---

[1] 《前线》，北京市委刊物。此处的“你”指彭真，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

[2] 廖沫沙，当时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曾于1961年8月31日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有鬼无害论》。

[3] 尹达，原名刘火翟，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当时任考古研究所所长。《人民日报》在1966年3月2日转载《红旗》1966年第3期他的文章《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作者自注文章作于1964年8月。

[4] 赵毅敏，原名刘焜，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关系更加恶化。1962年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

[5] 罗尔纲，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曾在1964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忠王李秀成投降实为苦肉缓兵之计》，认为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假投降曾国藩。

中专、技校、半工半读，统统到乡下去。

文学系要写诗、写小说，不要写文学史。你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写等于学作文，学作文就是以听、写为主。至于写史，到工作时再说。不要只读死东西，不搞应用。我们解放军的军长、师长，对宋朝、明朝、尧舜不知道，同样打胜仗。读《孙子兵法》，没有一个人照他那样打仗的。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半工半读，搞四清。不要压青年人，让他冒出来。戚本禹[1]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好的坏的都不要压。赫鲁晓夫我们为他出全集呢！

林彪：我们搞物质建设，他们搞资产阶级的精神建设。

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还是尹达讲得对。尹达讲，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

---

[1] 戚本禹在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判了翦伯赞“超阶级”的“历史主义”观点。戚本禹在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并与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的商榷》一文，文章根据李秀成自述，提出李秀成“形容自己是‘骑在虎背，不得下骑’”“做了元帅以后的李秀成并没有保持他艰苦朴素的作风”。“忠王府是个未完的工程，几千个工人长期建筑了三年多，到苏州陷落时仍未竣工”“李鸿章见了忠王府也不禁叹道：‘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同一时代，同一种历史条件，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一种人宁死不屈，慷慨赴义，另一种人投降变节，屈膝媚敌”，断定李秀成是真投降，“认贼作父”，《人民日报》在1964年7月24日作了摘要转载，毛泽东看了戚的文章后，专门调读了《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写下批语：“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

的、学问多的。

朱德：打倒那些权威。

陈伯达：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培养新生力量，树立无产阶级权威，培养接班人。

现在的权威是谁？是姚文元[1]、戚本禹、尹达。谁融化谁，现在还没有解决。

陈伯达：接班人要自然形成。斯大林搞了个马林科夫，不行，没等你死，他就夭折了。

就是不要这些人接班，要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

（三）工业体制问题

有些问题，你们想不通。你们能管得了那么多？在南京，我和江渭清谈了，打起仗来，中央一不出兵；二不出将；三有点粮也不多，送不去；四又没有衣服；五有点枪炮也不多。各大区、各个省都自己搞去。要人自为战，各省自己搞。海军、空军、地方搞不了，中央统一搞。打起仗来还是靠地方，你们靠中央，靠不住的。

---

[1] 姚文元，当时任上海《解放日报》的编委，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说，吴晗身为明史专家却不惜歪曲历史史实编造出一个完美形象的假海瑞，剧中的“退田”和“平冤狱”都不是史实，历史上的“退田”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保护了一些中小地主和富农，而剧中却说成是保护贫雇农，历史上退休内阁首辅徐阶的儿子徐瑛只被判处充军，也不是海瑞判的，而剧中却说海瑞“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身为共产党员不去提倡阶级斗争，却去鼓吹“清官救民”的封建论调，把剧中的贫雇农说成只会恳求“大老爷与我等做主”，向海瑞叩头高呼“大老爷为民做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很明显，吴晗是用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改造了这个人物。

地方搞游击队，还是靠斗争武器。

华东工业有两种管法。江苏的办法好，是省不管工业，南京、苏州就搞起来了，苏州十万工人，八亿产值。济南是另一种，大的归省，小的归市，扯不清。

刘少奇：如何试行普遍劳动制？普遍参加劳动，参加义务劳动，现在脱产人员太多，职工八十万，家属也是八十万。

现在要作普遍宣传，打破老一套，逐步实行。

我们这个国家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有“大国”也有“小国”，如西藏、青海就是“小国”，人不多。

周恩来：要搞机械化。

先由中央局，省、地、市等你们回去鸣放。四、五、六、七四个月，省、地、市等都要鸣放。大鸣大放要联系到“备战、备荒、为人民”，不然他们不敢放。

周恩来：怕说他们是分散主义。

地方要抓积累，现在是一切归国库。上海就有积累，一有资金，二有原料，三有设备。不能什么东西都集中到中央，不能竭泽而渔。苏联就是吃竭泽而渔的亏。

彭真：上海用机器支援农村，由非法变合法。

是非法要承认合法，历史上都是由非法变合法的。孙中山一开始是非法的，以后变合法；共产党也是由非法变合法的。袁世凯是合法变非法的。合法是反动的，非法是革命的。现在反动派就是不

让人家有积极性，限制人家革命。中央还是“虚君共和”[1]好。英国女皇、日本天皇都是“虚君共和”。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只管大政方针。就是大政方针也是从地方鸣放出来，中央开个加工厂，把它制造出来。省、市、地、县放出来，中央才能造出来。这样就好，中央只管虚，不管实，或是少管实。中央收上来的厂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彭真：办托拉斯[2]，把党的工作也收归托拉斯，这实际上就是工业党。

四清都归你们，中央只管二十三条[3]。

---

[1] “虚君共和”，毛泽东认为中央高度集权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构想。这一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彻底贯彻，建构了中国计划体制中的中央高度集权，形成地方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体制，从而使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别于苏联模式。

[2] 托拉斯，20世纪60年代初期，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建议试办托拉斯〔垄断企业〕，1964年2月26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提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试办托拉斯，4月30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我国试办的第一个托拉斯企业正式成立。1964年4月，国家经委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草拟了《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报告(草稿)》，获得批准。1964年和1965年全国共试办了16个全国性和区域性托拉斯，但试办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全国或跨地区的托拉斯与地方的矛盾，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与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托拉斯同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矛盾。托拉斯是和毛泽东的“虚君共和”主张相对立的。

[3] 1964年年底到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讨论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什么军区政治部，你们有什么经验？军队还是靠地方军，以后才变成正规军的。我没有什么经验，过去三个月总结，半年总结，还不都是根据下面报告？搞兵工厂都是靠地方搞出来的。中央只生产精神。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央什么也没有，没有一个人、一粒粮、一颗子弹，只有来源于你们的实践经验，根据你们打胜仗、打败仗的经验，出点精神。现在是南粮北调、北煤南调[1]，这样不行。

周恩来：国防工业也要归地方。总的是下放，不是上调。中央只管尖端。

飞机厂也没有搬家，打起仗来，要枪，也送不出去。一个省要有个小钢铁厂。一个省有几千万人，有十万吨钢还不行，一个省要搞那么几十个。

余秋里：要三老带三新：老厂带新厂，老基地带新基地，老产

---

[1] 南粮北调，北方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等省区及北京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这些地区无一例外地都要调入粮食，江浙、两广、两湖一带南方自然条件好，粮食生产充足。国家长期实行南粮北调政策，进口的粮食也主要是接济这些地区。尽管如此，这里农民的口粮和收入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方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频发，其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从1968年开始，国务院全面部署华北地区打机井的工作，并以此作为扭转南粮北调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以后几年，每年以30多万眼机井的速度持续建设。这是在华北平原上一项宏大的农田基本建设，国家在计划中给予资金补助，并提供设备材料，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文革”中，华北大地上打了近200万眼机井，1亿多亩耕地提取地下水灌溉，大大改变了十年九旱的农业生产条件，加上化肥工业的发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扭转了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南粮北调局面。北煤南调，我国煤炭资源多集中在山西、陕西及内蒙古西部，而用煤“大户”则集中在华东、华南地区，从而形成了北煤南调的格局。

品带新产品。

林彪：老带新，这是中国的道路。

这好像抗战时期带游击队一样。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个人主义。

彭真：小钢厂有四千个，给中央统光了。

你分人家的干什么？统统归他们。

彭真：明年搞个办法。

等明年干什么？你们回去就开个会，凡是要人家的，就叫他去当副厂长。

周恩来：现在搞农业机械化，还是借东风的。八机部搞托拉斯，收上来了不少厂子。

那就叫八机部的陈正人[1]去当厂长嘛！

有的对农民实在挖得苦，江西一担粮收税三回，我看应该打扁担。一文一武开个会，对苛捐杂税准许打。

中央计划要和地方结合起来。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统死。

刘少奇：把计划拨出一点归地方。

你用战争吓唬他。原子弹一响，个人主义就不搞了。打起仗来，《人民日报》还发得出吗？要注意分权，不要竭泽而渔。现在是上面无人管，下面无权管。

陶铸：中央也无权呀！

现在我们允许闹独立性。你对官僚主义就闹嘛！要像戚本禹等人那样闹独立性，对错误的东西闹独立性，你宣传部长不要压嘛！学生要造反，要允许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众运动，让学生鸣放。

---

[1] 陈正人，当时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原农业机械部，1965年1月改称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

我赞成挖他们的墙角，包括挖部长的墙角。有一个化学教授的讲稿，给学生读了几个月还不懂，大学生问他，他也不知道。学生就是要挖他的墙角。吴晗、翦伯赞就是靠史吃饭的。学生读过的明史，吴晗没有读过呢！俞平伯[1]一点学问也没有。

林彪：还是要学毛主席著作。

不要学翦伯赞的那些东西，也不要学我那些。要学就要突破，不要受限制；不要光解释，只记录；不要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

林彪：列宁也是抄。我们现在要提倡学毛主席著作，是撒毛泽东思想的种子。

那这样说也可以，但不要迷信，不要受束缚，要有新解释、新观点，要有新的创造。就是要教授给学生打倒。

林彪：这些人只想专政。

吉林的一个文教书记，有篇文章对形象思维批判，写得好。《光明日报》批判《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批判得好，把大是大非讲清楚了，《官场现形记》是改良主义。总之，所谓“谴

---

[1] 俞平伯，著名红学家，和胡适并称“新红学派”的创始人，解放前20世纪20年代即已成名，1923年俞平伯出版《红楼梦辩》，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是高鹗续作，但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毛泽东对《红楼梦》不仅喜欢，而且颇有研究，也堪称一位红学家，对于《红楼梦》，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评判，俞平伯用实用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描写了很精细的历史、有丰富的社会史料，俞平伯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俞平伯认为《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高的。

责小说”是反动的，反孙中山的，保皇的，使地主专政。他们是要修正一下，改良一下，是没落的。

把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发到各省去议，在这里就不讲了。

对中共代表团与日共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1]

（1966年3月）

正如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2]强调指出的，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以苏联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在反对我们的时候，不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者，而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这种说法，正是指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国际革命党派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而不是别的。

---

[1]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以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为团长的日共代表团于1966年2月至4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并由双方代表团起草小组起草了联合公报草案。本篇是毛泽东对1966年3月27日送审的公报草案中一段文字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后来这个公报草案未能达成协议。

[2] 1957年宣言，指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十二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1960年声明，指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

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和修改[1]

（1966年3月、4月）

---

[1] 这篇纪要原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审阅后写给江青的两个批语；本篇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1966年4月1日送审的中央转发这一纪要的指示稿上写的批语；本篇五、九是写在纪要上的两个批注；本篇四、八、十二、十八是在纪要中加写的话；本篇六、七、十、十一、十三至十七是对纪要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对这个纪要，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修改，主要有：把“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改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把“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为“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删去“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高峰”“解放军是主席亲手缔造的”等语句。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纪要。1979年5月3日，经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请示，中共中央批准同意，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对因纪要影响而受到错误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

一

江青：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二

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泽东
三月廿四日

三

已阅，同意。

退彭真同志。

四

此件[1]未经本人看过，据说本人还要研究修改。

五

去掉一句。[2]

六

毛主席的这四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3]

---

[1] 指纪要中提到的《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1956年8月24日）。这篇谈话经过整理1979年9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后编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2] 纪要中讲到江青这次“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大家一致认为等于进了一次短期训练班”一句，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四篇著作，指纪要中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一句，原为“够我们无产阶级用几百年的了”。

七

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

八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1]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九

这样较妥。[2]

---

[1] 指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2] 纪要中讲到近三年来出现了许多“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毛泽东审阅时，将引号内的文字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并写了这个批注。

十

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1]

十一

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2]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

---

[1] 这句话原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

[2] 王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1931年11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11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已经在全党占领导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

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十二

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十三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十四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

十五

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

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

十六

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做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

十七

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

十八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批评[1]

（1966年3月、4月）

一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的谈话

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2]。

《前线》也是吴晗、廖沫沙、邓拓[3]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杭州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2] 1962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撤销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

[3] 邓拓，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拒绝在北京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文、史、哲、法、经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批判，到底有多少马克思主义？

二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到三十日的谈话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定[1]，吴晗发表这么多文章，从不要打招呼，从不要经过批准，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偏偏要打招呼[2]？难道中央的决定不算数吗？

---

[1] 关于阶级斗争的决定，指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2] 1966年3月11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杨永直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1]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去年九月[2]，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要保护左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

[1] 1964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文化部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1966年2月1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2] 中共中央于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10月10日，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了话，提出要战备。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又说，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三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讲话

我不相信，在文化革命中的问题只是吴晗问题，后面还有一串串“三家村”[1]。文化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触及很广泛，涉及面很宽。朝里有人，比如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部都发生这方面的问题，朝里都有人。各大区、各省市都有。

在党中央各部门，包括大区、名省市，朝里是否那么干净？我不相信。

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四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的讲话

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攻。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的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

---

[1] 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1961年9月20日开设《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由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轮流撰稿，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统一署名“吴南星”。这里的“三家村”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集团。

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落叶下长安”[1]，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斗不倒。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问题就大了。

---

[1] 唐朝诗人贾岛在《忆江上吴处士》中有一名句，“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毛泽东在1963年1月9日写过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其中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这里指修正主义者处于萧条凄凉的境地，我们进攻的号角就要吹响了。

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

（1966年4月14日）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譬如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1966年4月12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这期摘要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介绍了中国音乐学院抽调一年级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到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北京分公司试行在工厂办学、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公社试行半农半读的情况。毛泽东的批语当时没有印发。

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所以有人说，共产党“无学有术”，而他则是“有学无术”。这话从形式上看来是有些对的。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完〔全〕错误。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山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1]有同志说：“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这是古今一条规律。经、史、子、集成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状况，就宣告它自己的灭亡，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人还去理它，其他的人根本不知道有那回事，这是一大解放，不胜谢天谢地之至。因此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

---

[1] 这是晚唐诗人章碣写的七绝《焚书坑》。原诗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对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开幕词中一段话的批注

（1966年4月14日）

这一段话[1]讲得准确，请同志们经常地讨论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注

---

[1] 指毛泽东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的以下一段话："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196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把毛泽东关于机要保密工作的一些指示辑印在一起，准备发给参加全国机要保密会议的人员学习。毛泽东审阅时，在这段话后面，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

对高教部党委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情况简报的批语

（1966年4月23日）

此件[1]好，发各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

[1]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1966年4月19日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简报说，高教部党委于4月17日召开北京、天津十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了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会上，北大等学校汇报了前一时期学术批判情况，提出目前在批判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从学术观点上批判得多，从政治观点上批判得少，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会上对今后深入开展这一运动作了如下部署：(1) 各院校领导必须明确，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教育战线彻底清除资产阶级专家垄断教育的斗争，是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2) 目前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当前学术批判结合起来，通过学术批判来推动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3) 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师生和教职员工积极参加这场战斗。

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1]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6年4月）

一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3]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

---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1964年7月设立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五人组成。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学术批判中出现的问题，会后整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2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汇报提纲。

[2] 这个通知稿即后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发表在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3] 指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为首的起草小组起草的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1966年4月12日稿），由周恩来等于1966年4月12日从北京报送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

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二

恩来、小平[1]、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

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

[1] 恩来，即周恩来。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三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1]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四

已阅。
退康生办。[2]

五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3]，隶属于政治局常委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6年4月12日报送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对这个通知稿，毛泽东后来又作过多次修改，见本篇五至十一。

[2] 这是对康生1966年4月18日报送的通知修改稿的批语。康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通知》第四页第七条末句，按主席指示，作了修改，请审阅。”

[3]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重新设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之下。

六

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1]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

---

[1]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八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九

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十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一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

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1]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哪一个文件是错误的，哪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哪些成绩，有哪些错误。

---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对《毛主席诗词》（注释本）中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修改和批语[1]

（1966年4月）

一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央红军由福建汀州（长汀）进军江西。七月，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准备第二次攻取长沙，结果未能攻入。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的条件下，敌人已有准备，进攻长沙是不正确的。但当时由于蒋、冯、阎在河南大混战，南方湘赣诸省在半年之内，除长沙、南昌诸城之外，其余地方都无强敌。所以红军乘此机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1966年4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在主席诗词注释本中，有两三处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请示。（一）对《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一词，根据总政几位同志的建议，参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其注释，作了一个题注，不知是否适当？请批示。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题注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二）《水调歌头·游泳》一词中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据袁水拍同志告主席意见，仍作“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三）《七律·送瘟神》一诗中的“千村薜荔人遗矢”，据读者来信和查阅有关典籍，拟改作“千村薜荔人遗矢”。以上两处正文的更动，未知可否？请一并指示。在这两条后面，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本篇三写在胡乔木给毛泽东请示信的信封上。

会，攻取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第一次敌人的“围剿”准备了条件。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说服，中央红军的干部终于改变作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等地，使红军力量和农民土地革命斗争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首词是写红军在进军中的豪情壮志的。[1]

二

可以。

三

已阅。

退乔木。

---

[1]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中，对这条题注稿作了修订。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又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现在的文字是：“1930年6月，红军第一军团（开始称第一路军）由福建省汀州（长汀）进军江西省。8月，从江西向湖南进军，在浏阳东北同彭德怀领导的红军第三军团会合，并决定共同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9月，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未克。守敌强而有备，红军不宜攻坚。同年夏由于蒋、冯（玉祥）、阎（锡山）正在河南等地混战，数月之内江西、湖南一带，除长沙、南昌等大中城市外，都无强敌。因此，毛泽东说服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改变当时立三路线的党中央指示的夺取湘鄂赣三省省会的冒险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峡江、新喻（今新余）等地，占领了大片地区，扩大了部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准备了条件。这首词写的是红军6月、7月进军中的豪迈心情。”

对林一山关于修建长江三峡工程报告的批语[1]

（1966年4月）

已阅。

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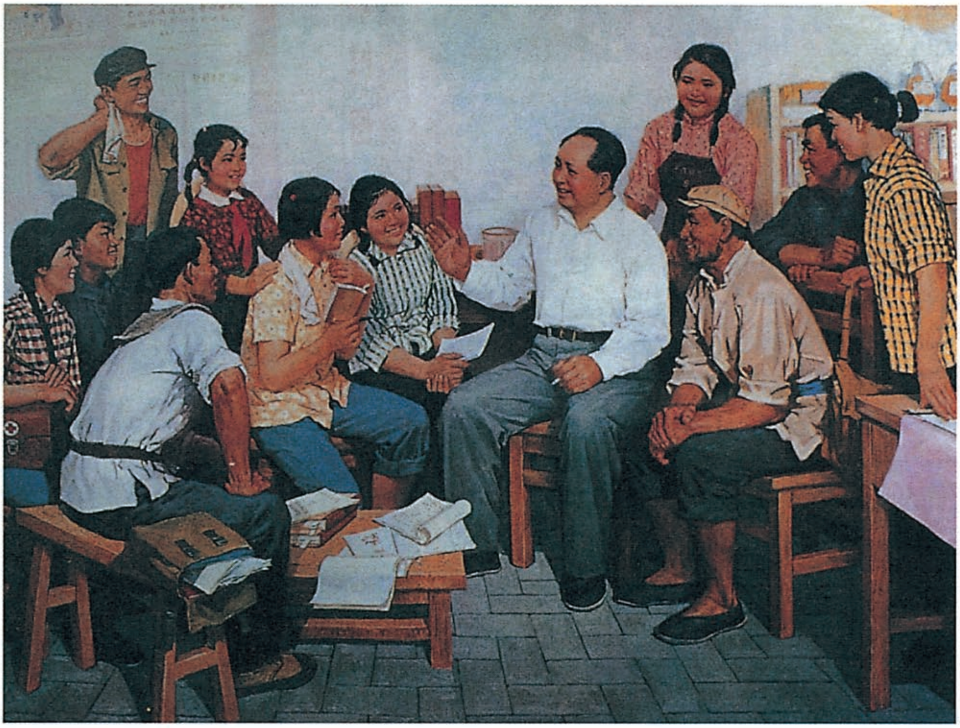
---

[1]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1966年3月9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报告说，长江规划和三峡工程的研究，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按照主席所指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和“有利无弊”的方针进行工作。三峡水利资源综合利用效益极大，但要积极开发，就必须解决建设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问题，这也是有人反对近期建设三峡的一项重要根据。最近几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们着重研究了建筑物防护、水库淤积和分期建设等三个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分期建设更符合于“有利无弊”的方针，大大增加了近期建设三峡工程的可能性。三峡水利枢纽的规划设计原则是：综合利用，合理安排防洪、发电、航运，充分利用水利资源，除害兴利，在其他防洪工程配合下，逐步达到根治长江的目的。在实现各项水利目标的程序上，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实现。分期建设可以用较少的投资额、较短的工期，尽早地发挥效益，有利于国家资金的合理使用，同时也有利于工程防护。报告在对三峡工程的防淤、防空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论证后提出，根据当前国家经济发展情况，三峡工程宜早不宜迟，建议中央将这一工程列为第三、四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建设项目。4月10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将林一山的这个报告及其他两份相关的报告一起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王任重的送审报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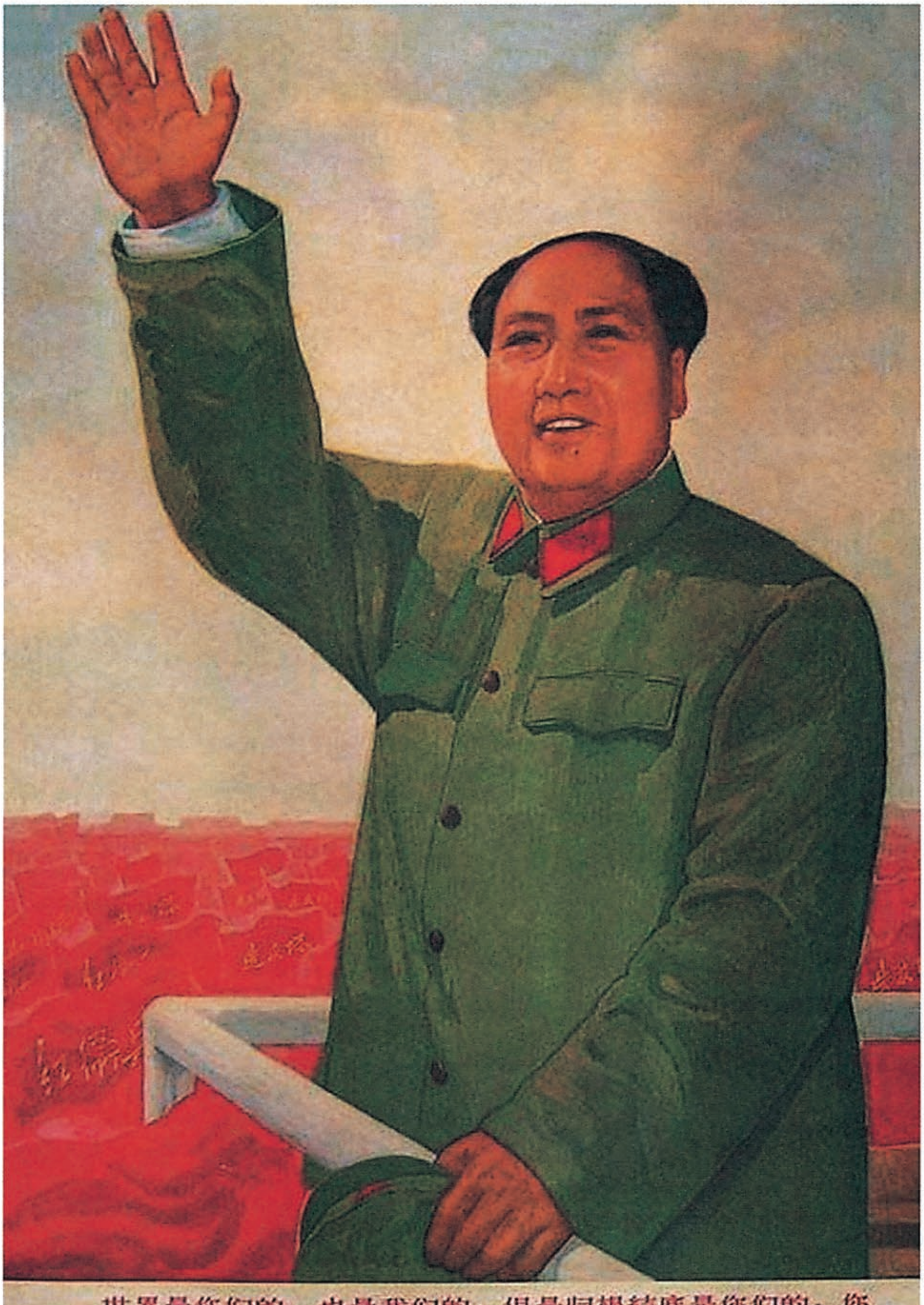
对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的指示

（1966年4月）

这方面的革命要靠青年，党中央号召你们青年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你们青年批判到哪里，党中央就支持到哪里。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油画）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宣传画）

中国是否会出修正主义

（1966年4月）

中国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当权派的问题，一是出，一是不出；一是早出，一是晚出。还是早出好，搞好了可能不出，在中国出修正主义是困难的。

书记处也是分化的，彭、陆、杨、谭、罗等都当过书记处书记，是不断分化，合乎辩证法。有人怕得要死。不分化是主观愿望。中央有，各省也会有。

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代表时的谈话（节录）

（1966年5月5日）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

[1] 赫鲁晓夫（1894—1971），曾任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生前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斯大林去世后发布秘密报告，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全盘否定斯大林，并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那就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

（1966年5月7日、14日）

一

林彪[1]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2]，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军委总后勤部1966年5月2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说，从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1]；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2]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

[1] 指1963年至1966年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2] 大跃进时期，1959年9月26日，在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发现了世界级的特大砂岩油田！当时正值国庆十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欧阳钦提议将大同改为大庆，将大庆油田作为一份特殊的厚礼献给成立十周年的新中国。1960年3月，大庆油田投入开发建设。大庆油区的发现和开发，证实了陆相地层能够生油并能形成大油田，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石油地质学理论，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面貌，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二

林彪同志：

此件[1]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2]，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要请中央加个批语[3]。请你酌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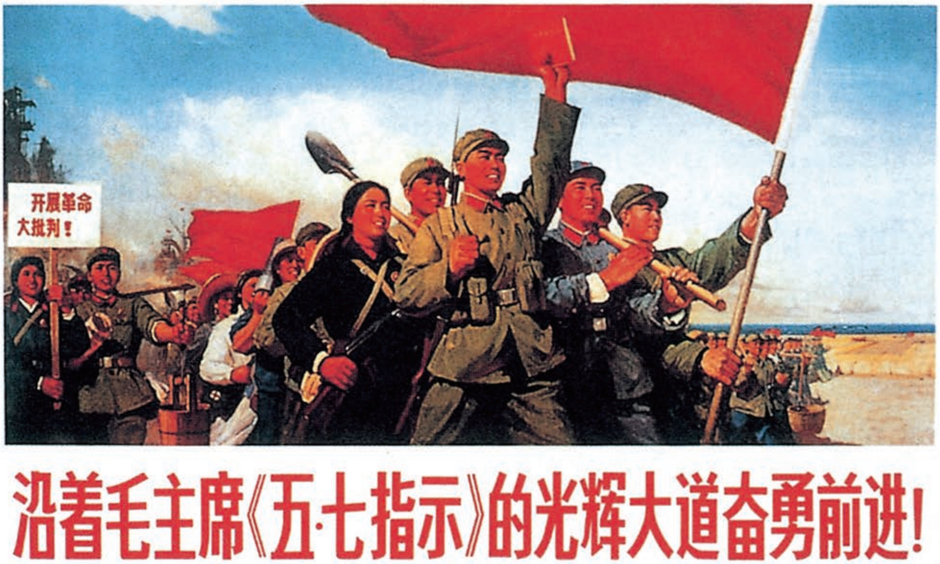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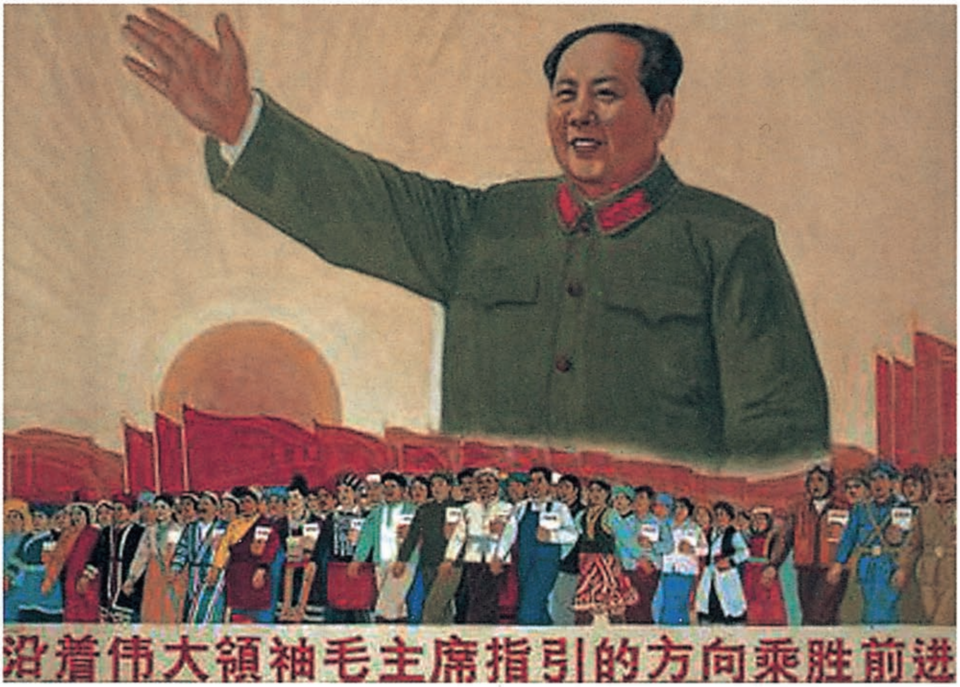
[1] 即本篇一。因写于1966年5月7日，后来通称为《五·七指示》。

[2] 指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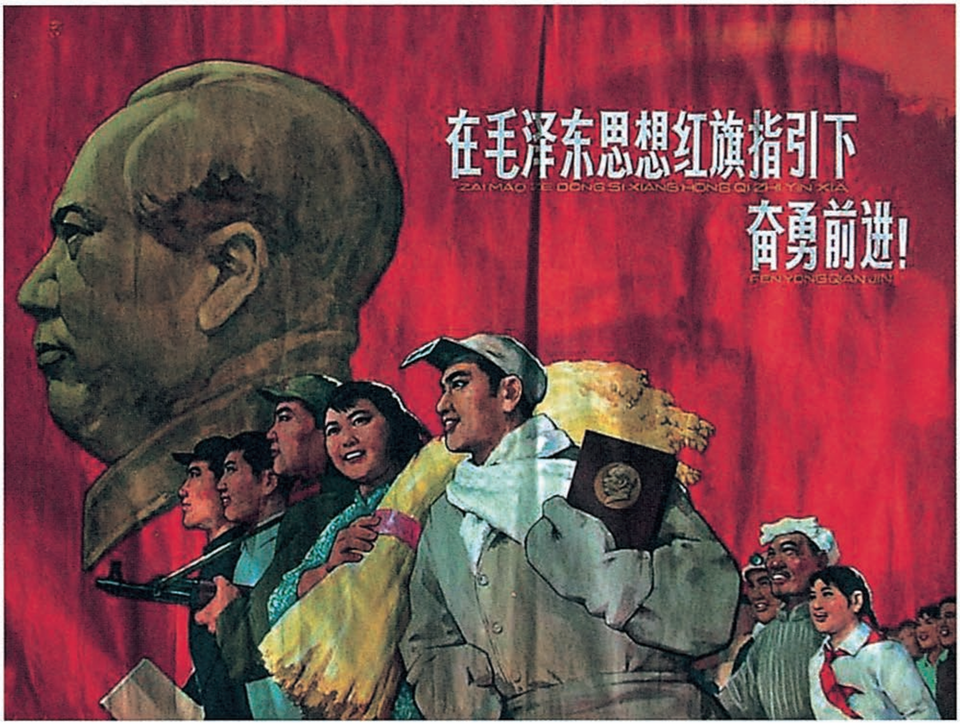
[3]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5日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开展革命
大批判！
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奋勇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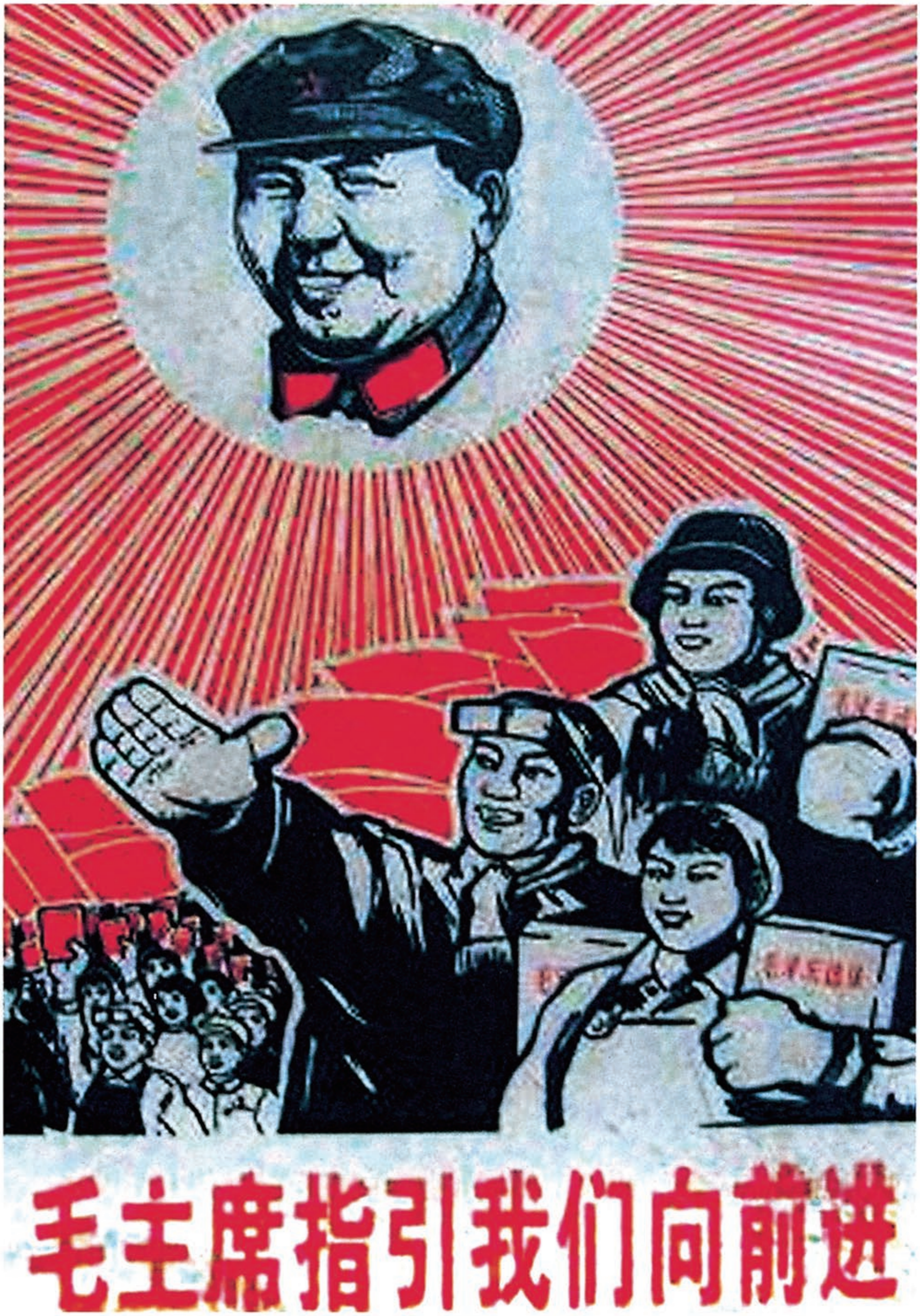
沿着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大道奋通前进！（宣传画）


沿着伟大領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乘胜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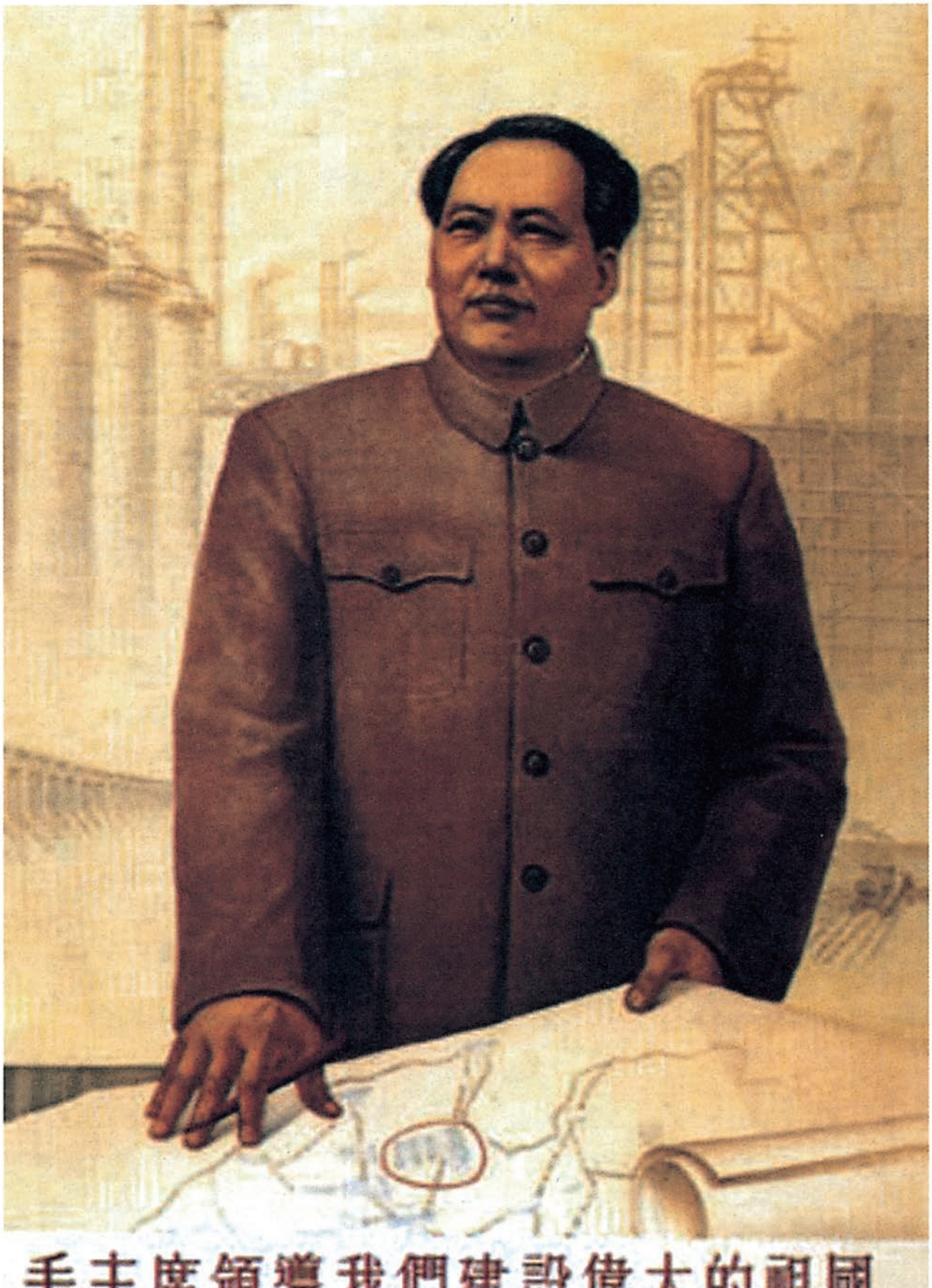
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乘胜前进（宣传画）


在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
ZAI MAO ZE DONG SI XIANG HONG QI ZHI YIN XIA
奋勇前进！
FEN YONG QIAN JIN

在毛泽东思想红旗指引下奋勇前进！（宣传画）


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宣传画）


毛主席領導我們建設偉大的祖國

毛主席领导我们建设伟大的祖国（宣传画）

印发张恩慈对北大“四清”运动意见[1]的批语

（1966年5月11日）

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2]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

[1] 指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1966年5月5日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个材料对北大“四清”工作队、北大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对北大“四清”运动的领导以及北大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看法。毛泽东批示印发时，将题目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

[2] 少奇，即刘少奇。1966年5月13日，他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这次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

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加写的几段话

（1966年5月16日）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1]，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

---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1964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领导下开展文化革命方面的工作，组长彭真（中共中央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这个“五人小组”起初并没有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一直只称为“五人小组”。1966年2月12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时，才出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名词。

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的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

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对章士钊关于暂不出版《柳文指要》来信[1]的批语和批注

（1966年5月17日）

一

刘、周、邓阅。送康生[2]同志，与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计划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时间，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择一可也。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

[1] 《柳文指要》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所著的一部专门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1965年，章士钊将这部书稿送毛泽东审阅。同年7月18日，毛泽东复信提出意见，并于8月5日将书稿批给康生阅读。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将书稿连同康生的意见和来信一并退给章士钊。5月10日，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暂不出版《柳文指要》一书。信中说，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记载，“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的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柳文指要》一书，后经作者修改，197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二

不可能这样快。[1]

三

此语说得过分。[2]

四

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羊头、卖反共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3]

---

[1] 这个批注写在章士钊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开一阖速战速决”一句话旁。

[2] 章士钊的信中说，“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毛泽东在其中的后半句话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3] 章士钊的信中说，《柳文指要》“这一类著作，放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毛泽东在“痛加批判”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五

何至如此。[1]

---

[1] 章士钊的信中说，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书而“成为大众向上的绊脚石。换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反而不知不觉间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毛泽东在其中的“堕入反党反人民的黑线之内，得受膺惩”旁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这个批注。

关于同意派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的批语[1]

（1966年5月30日）

同意这样做。

毛泽东
五月卅日廿三时

---

[1] 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66年5月30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信末还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播发《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的批语[1]

（1966年6月1日）

康生、伯达[2]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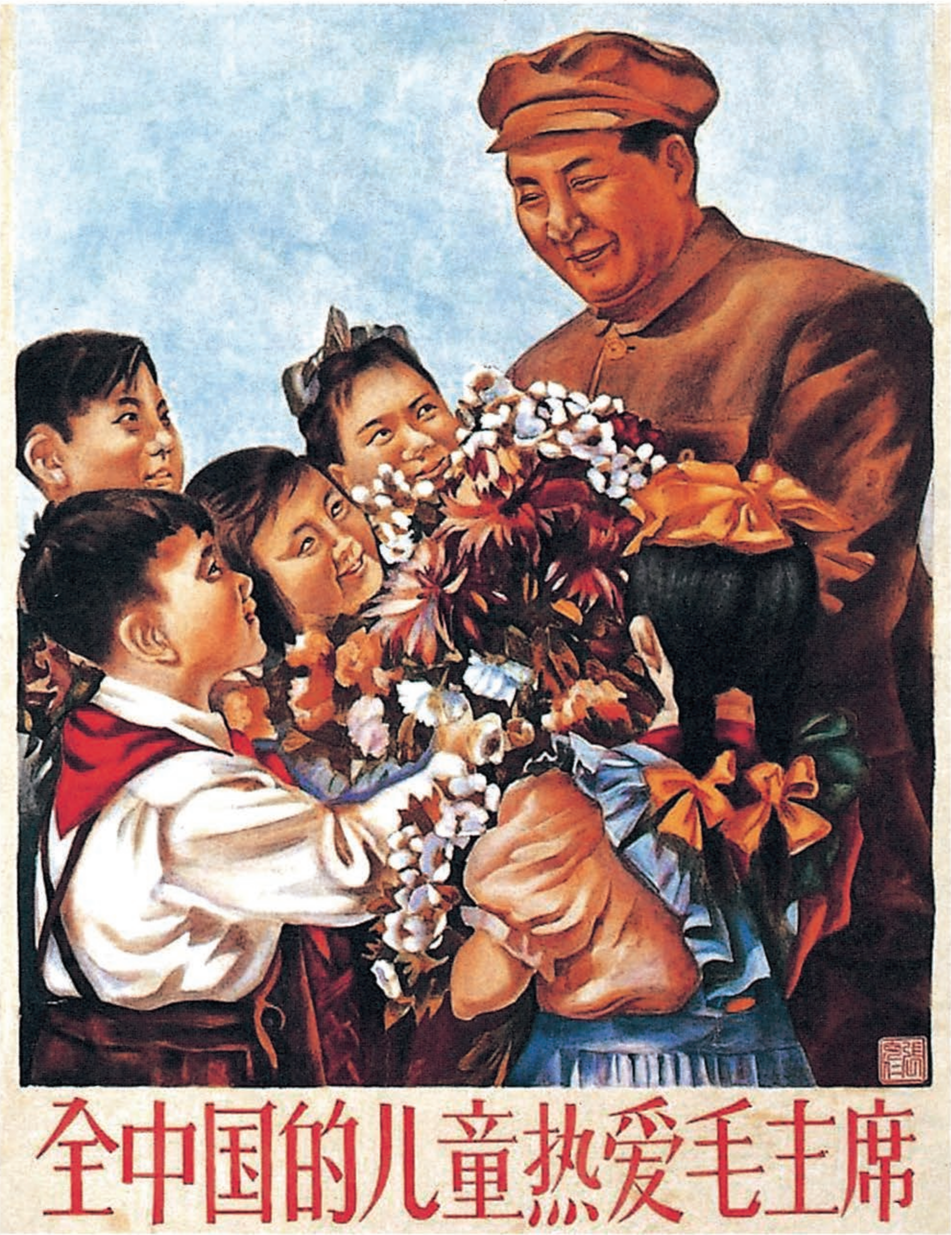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六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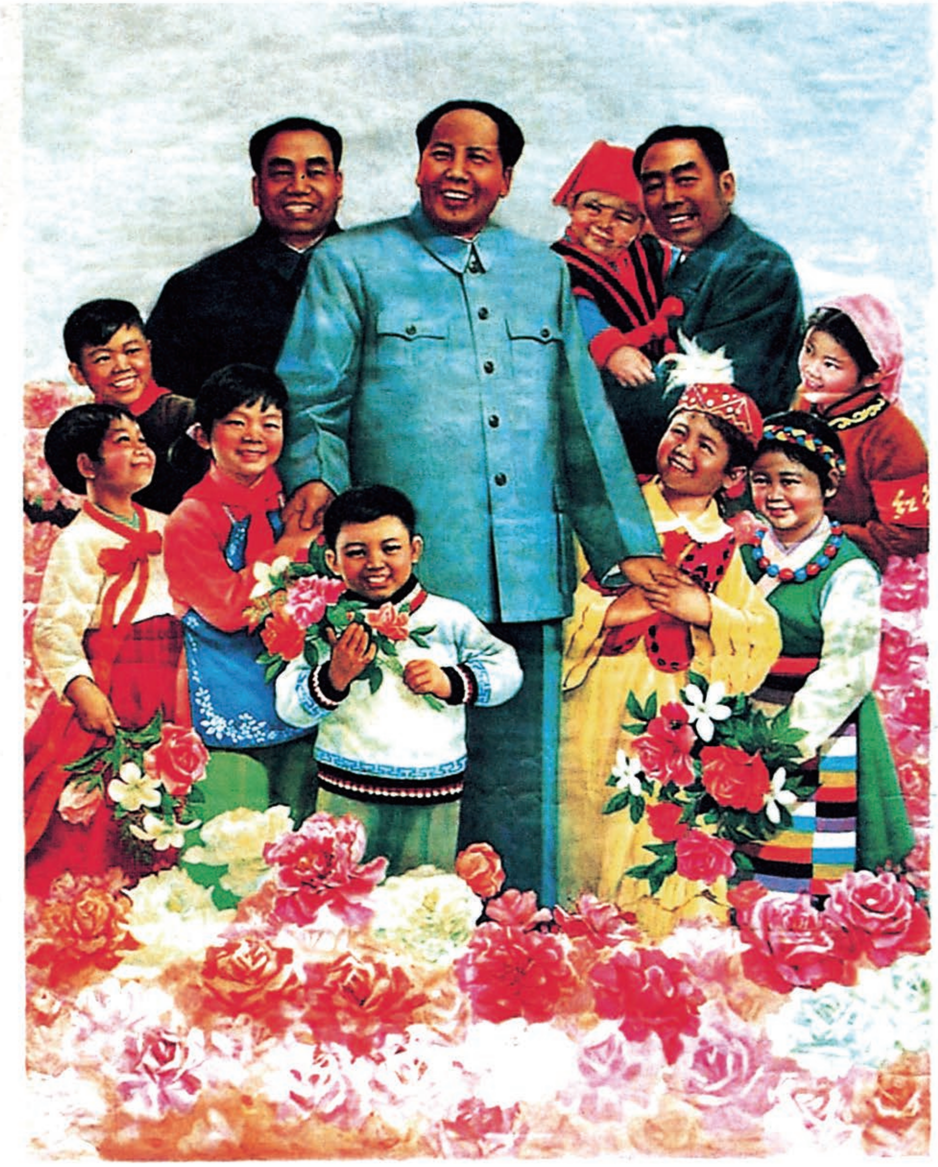
---

[1] 这个批语写在《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该期简报登载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新华社6月1日全文播发，《人民日报》等报刊6月2日刊载。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彭佩云，当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此后不久，他们均被错误地撤销领导职务。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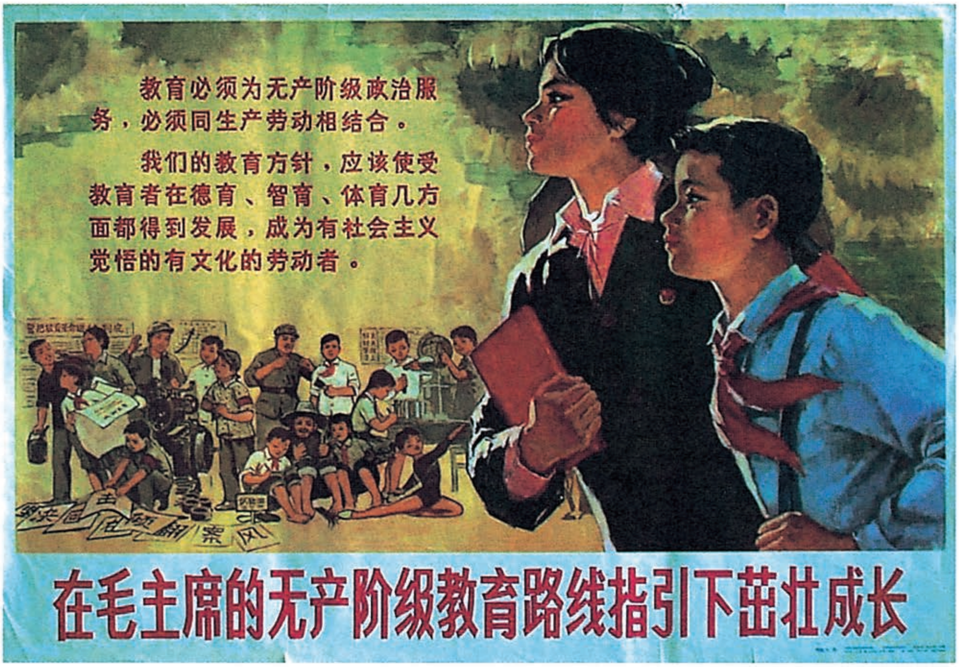

全中国的儿童热爱毛主席

全中国的儿童热爱毛主席（宣传画）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我们在一起

79年春节敬向[illegible]

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茁壮成长（宣传画）

在杭州和胡志明的谈话（节录）

（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自古以来，总是没有经验的人民打胜有经验的军队；没有枪的打胜有枪的；很少的人打胜很多的人。你们不也是这样？八月革命时你们有多少人？

胡志明（以下简称胡）： 党员共有五千多人，没有多少军队。

毛： 你们的军队开始恐怕只有几百人，以后有千把人。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你不是在帮我们的忙吗？那时，我们工人、农民有几千万人，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里。农民有农民自卫队，工人有纠察队，可是没有准备敌人杀人。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四个月工夫，一扫而光，跟印尼现在的情况差不多。五万党员剩下一万不到，十个人中只剩下两个。另外的四万哪里去了？一批被杀了；一批投降了；一大批不干了，吓破了胆，不敢活动，离开了党。只有八九千人继续干。我这个人是被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打胜仗。军队发展到三十万，包括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但是，在十年中遇到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是瞿秋白；第二次是李立三、向忠发；第三次是王明。结果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当时，我们这些人被赶出军队。我是一次被“开除”党，三次被赶出军队。其实是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

有谣言说被开除出党，成为民主人士。我是井冈山的书记、地区的特委书记，支部也不能参加了。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整我，后来又说师长可以当。就是这样，当了半年多的民主人士。后来搞清了，没有开除出党，又当起党代表，当起政治委员了。那是一九二八年。他们说，我犯的错误，第一是烧房子烧得少了；第二是杀人杀得少了；第三是话讲了，我为什么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他们到处发通知，说我是“左”倾机会主义，什么枪杆子里还能出政权。后头又有几次，遭到内部同志不谅解，把我赶出红军。当老百姓了，做地方工作，在福建。那时，林彪同志同我一道，赞成我。他是在朱德领导下的队伍里，他的队伍拥护我。我自己的秋收暴动的队伍，却撤换了我。同我有长久关系的撤换了我，同我不大认识的拥护我。你看，怪不怪呢。

胡：天下无奇不有。

毛：你有这套经验吗？你是一帆风顺，开始就当党的领导者。

胡：你说得对，我是一帆风顺，没有遭受过反对。

毛：你有马克思保佑。你的马克思主义比我多。

胡：我不承认。

毛：为什么人家不反对你?

胡：我们是党小、国家小、军队小。党和军队的其他领导人年纪都比我小，这也是个原因。

毛：你是老资格了，也有一个坏处，你没有受过挫折，没有经验。

胡：对。

毛：所有的人都叫你“万岁”。我这点跟你不同。

胡：正因为这样，你的经验多。

毛：许多次是把我打倒。有一次是在江西，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打胜了，却说我犯了错误，一贯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丝毫的马列主义。有丝毫也好，丝毫都没有。他们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列主义路线。说我打仗也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应该打大城市，我不打。如你们说现在不打大城市也是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你打，人家一攻，又得退出。现在你们这八十万敌人，能机动的不过二十万人而已；其他六十万，要守公路、机场、海港和大小城市。就在这一点上，你们会胜利的。

胡：向你报告，现在我们在西贡周围有几个营。

毛：但不要去打西贡、岘港。其他省城也暂时不占。占了人家来恢复，又得跑出来。

胡：现在我们有一种特工部队，到市内去打美国大使馆、打飞机场的就是这种部队。我们不准备现在就去打大城市。

毛：这个好。偶然进去一下又出来好，如像打岘港那样。因为有你们的人作内应，铁丝网、壕坑等都有人破坏。搞几百人进去，突然袭击；外面打炮。几个钟头后，几百人又出来。这样好，以前我们也打过很多次。一些小城打进去了，可以收集很多资料，有敌人的报纸、图书馆；也可以扩大兵源，几天内扩大几千人。如像我们打过江西的吉安。我们有三万人，敌人只有一个旅，几千人。我们住了十天，就扩大了一两万军队。以后，我们还打过福建的漳州，是我让林彪去的。歼灭敌人一个师，得了许多武器、弹药，还得了陈嘉庚的许多胶鞋，他是新加坡华侨大资本家，做橡胶生意的；也得了一批马列主义的书。国民党为什么会有马列主义的书呢？他们的图书馆也有，是为了研究我们用的。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还有世界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史、德波林的历

史哲学等。

毛：德波林这个人我很熟悉。斯大林批评他是孟什维克。他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列宁开创了哲学的新阶段。当他八十岁以后，赫鲁晓夫发给他勋章，这一两年才死去的。以前批评德波林的人，现在又成了修正主义者，如米定、尤余、罗森塔尔等人。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比你们的河内坏。我不能过问，刘少奇同志不能过问，周恩来同志不能过问，邓小平同志不能过问。罗瑞卿的问题，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列宁不讲辩证法的三个原则。“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抄黑格尔的，主要是恩格斯抄的，列宁就不抄。他说，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但要解释和发挥。他没有来得及解释和发挥。我们是遵守列宁的原则，不搞三个原则。斯大林违反了列宁的原则，搞了四个原则，叫“联系”“质量互变”“发展”“对立统一”。我们也不听斯大林说的，我们相信列宁。我不过是遵守他的指示加以解释和发

挥。按照这条规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列宁虽料到会出季诺维耶夫、托洛茨基、佰哈林等反对派，但他的办法是不杀人。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掌握政权不到八年的时间，列宁死了。在这段时间中，他主要搞理论去了。工会工作做了一点，不多。农民工作根本没有做，农民运动的纲领都没有搞。十月革命时，临时用民粹派的纲领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开会时，列宁说，对这个纲领不要讨论太多。民粹派对自己的纲领是不能执行的，提出“到民间去”，也不适。以后民粹派成了富农的代言人。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七十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要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胡：现在中国的四个省正在帮助越南的七个省，如广东帮助我们的广宁省等。

毛：帮助些什么？

胡：帮助搞农业生产、水利、改良稻种、牛种，还帮助办小型

发电厂、小工厂，搞改良农具等等。

毛：你们的炼钢厂搞起来了吗？

胡：已开始投入生产。敌机也已开始在附近轰炸。

毛：年产钢多少？

胡：很少，还没有轧钢设备。

毛：你们那里有煤矿、铁矿吗？铁砂从哪里去的？从中国去的吗？

胡：越南有煤、有铁。中国也去一点。

毛：没有钢，没有机械工业，国家就没有整套的工业。

胡：可能你还记得，是我在见你后，在你的鼓舞下，才建钢厂的。

毛：我最关心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

胡：我们太原钢厂的设备和专家都是中国的。

毛：可以从小型开始，逐步发展。有个十几年，就可以搞成。小型轧钢机可以从中国弄去，炼钢可以采用新的技术。我们已经开始搞用氧气炼钢。有些新技术也可以从中国弄去。初步，不要搞急了，搞多了，我们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亏，一年搞了一千七百个基本建设项目。搞了几年不行，然后缩小下来，变成七百多个。你看，减了一千个，有的已经搞成了，没有搞成的基建单位，就像瘌痢头一样。那时就是贪大、贪多、贪全。可惜你没有到锦州去看看。那里搞了许多小工业。没有资金，干部、工人每人凑一点，没有钱盖房子，就搭个草棚。现在出了许多新产品。有些大工厂，很落后，比如鞍钢，有十六万工人，年产五六百万吨钢，但它有落后的一面。

毛：……陈独秀，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共七年的时间；

后来他跑了，跑到托派那里去了。第二朝瞿秋白，他是“左”的，只搞了三四个月。我刚才说的把我赶出政治局，有人造谣说我被开除出党，当了民主人士，也是这个时候。第三朝，李立三、向忠发，搞了几个月，“左”得很，要打大城市。第四朝是王明，他的时间最长，统治了四年之久。他没有到根据地去过，但他的人马去了。五个根据地都有他派去的人；国民党统治区也有他的人；彭真就是执行王明路线的。第五朝是张闻天。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是国民党的人。

胡：过去他们参加过国民党？

毛：在第一次大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个不算。我也参加过，是党要我们参加的。对他们，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只是一种怀疑。他们都有一个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胡：他们被国民党收买了吗？

毛：彭真被国民党抓过，怎么出来的，我们不清楚。为什么他们混进党内这么久没有看出来呢？他们的错误我们发觉过，如彭真在延安办党校就犯过错误。在晋察冀时也犯过错误，现在才揭发出来，过去不知道。聂荣臻知道，他是晋察冀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也是晋察冀的。彭真到晋察冀不到两年时间，执行王明路线。这个时候的王明路线同十年内战时不同，十年内战时王明路线是“左”的，主张打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王明路线是右的，是投降主义。后来王明也跑了，去莫斯科，是我们送去的。他现在还用假名字写文章骂我们。此外，跑了的还有张国焘，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现在香港当特务。在井冈山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接替我的政委、后勤部长，也都叛了党，跑到国民党方面去了。你看，几朝都是叛变。陈独秀叛变了，瞿秋白被捕后

写了自首书。向忠发（实际上是李立三路线）被捕之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相当蠢。王明被捕后也成了叛徒。他被捕了几次，怎样放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在东北，他被日本人抓过；在上海，被蒋介石抓过！然后放出来。饶漱石在新四军时被抓过，怎么放出来的不清楚。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胡：留下来不是危险得很吗？

毛：就是危险得很。但不到一定的机会，他们不自己暴露，我们不整他们。如彭德怀，历次犯错误，我们只是批评批评，但他记仇。抗美援朝时，他当了司令员，回国后又当了七年国防部长。他拉走了几个将军呀？将军、文官被他拉走的不到十个人。我们党这五朝，领袖都不好，革命失败了嘛。两次大失败：一九二七年陈独秀领导时大革命失败；一九三四年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五千人，还不是失败吗？但党并没有被消灭，军队还有两万五千人，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又变成了一百万人。这时，我们有了经验了。经过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瞿秋白、李立三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我们有了经验，使我们能够作出总结了。所以，要感谢这些人教育了我们。首先要感谢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第二要感谢右倾机会主义者、“左”倾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否则，单单靠马克思主义是教育不了我们的。

毛：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的，已经七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无官不贪，只

有多少之别，没有真正的清官。

胡：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当知县可了不起。

胡：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那是他来不及贪，当上一两年知县，我看他不大贪也小贪。

康生：无官不贪，官与贪是分不开的。

毛：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文艺界又分好多界，有戏剧界、电影界、音乐界、美术界、雕刻界；戏剧界又分京戏和几百种地方戏。

毛：今天，我只睡了两个小时，因为心里有事，要见你这胡伯伯。我打听你几点钟睡，知道你五点钟起床，好，我七点见你。前天我睡了八个小时，昨天睡了八个小时，今天睡两个小时够了。夏天，有时我几天不睡觉。庐山会议时，我没有睡觉，讲了话之后，去游泳，回来又讲，是整彭德怀。现在，主要是看大字报；报纸也很热闹。大字报厉害得很，有群众性，轰轰烈烈。你可以到浙江大学去看一看嘛，晚上，化装去，戴上口罩去看一看嘛；这是发动群众整反动分子的一个好办法。

胡：一九五七年时我也在中国看过大字报。

毛：没有这一次深入、广泛。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中国有的，越南也有。中国搞的，越南也要搞，虽然越南的规模要小一些。越南的情况同中国是一样的。

毛：可能都是一样。你们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这些人还不都是旧知识分子。党内的人也是来自五湖四海，各种人都有。我们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入党的。他们没有经过什么风浪，没有经过斗争，其中好的也有，坏的也有。

胡：所以有矛盾。

毛：就是有矛盾，我同很多人有矛盾。

胡：从你谈的历史情况来看，问题真是复杂。

毛：斗争很复杂，但党并没有灭亡。

胡：听了毛主席、刘主席等同志的谈话，我吸取了一些经验，也比过去更加担忧了。

毛：一方面要担忧，一方面要乐观。党不会灭亡，天塌不下来，山上的树木照样长，水里的鱼照样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若不信，你看看嘛。难道出了赫鲁晓夫，天就会塌下来，山上的树木就不长，水里的鱼就不游，女人就不生孩子了吗?

我就不信。事物的发展不断地转向它的反面。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的接班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死后还有斯大林一代。斯大林没有料到，他死了之后，赫鲁晓夫反对他，而且反得那样不近人情。

1966年6月，毛泽东和胡志明在杭州。

关于暂不发表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问题的批语

（1966年6月30日）

少奇、小平[1]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2]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3]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4]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5]，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

---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讲话。这篇讲话后来在1978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3]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书记处书记。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5] 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最初为十二条，曾一度扩展为二十三条，最后确定为十六条，在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1]，值得参考。

毛泽东

六月三十日二时

---

[1] 中共中央华东局1966年6月21日给中央、毛泽东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中说，6月3日至6日，华东局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和讨论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关于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在运动中，要进一步组织工农兵和干部大学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会议研究了以下政策和部署：一、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二、坚定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和打击右派。对于只有个别缺点的左派，应加以保护，不要混淆斗争目标。要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或写过一些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要注意把资产阶级“学阀”“权威”，同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对于右派，要抓要害，抓要害的单位、要害的人物，特别是要首先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报上点名公开批判要慎重，要准确。干部的撤职免职以及在报上公开批判的，均应按照干部管理的范围，由上级批准。三、重新组织革命的文化队伍。四、“四清”运动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五、加强党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各级党委的领导，应当采取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单位的运动，派不派工作组，什么时候派工作组，应当根据情况的发展需要来考虑。报告最后指出，当前各级党委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文化大革命，全面安排工业、农业、财贸、小三线建设等项工作。

七律·有所思

（1966年6月）

正是神都[1]有事时，
又来南国[2]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
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
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3]
故国[4]人民有所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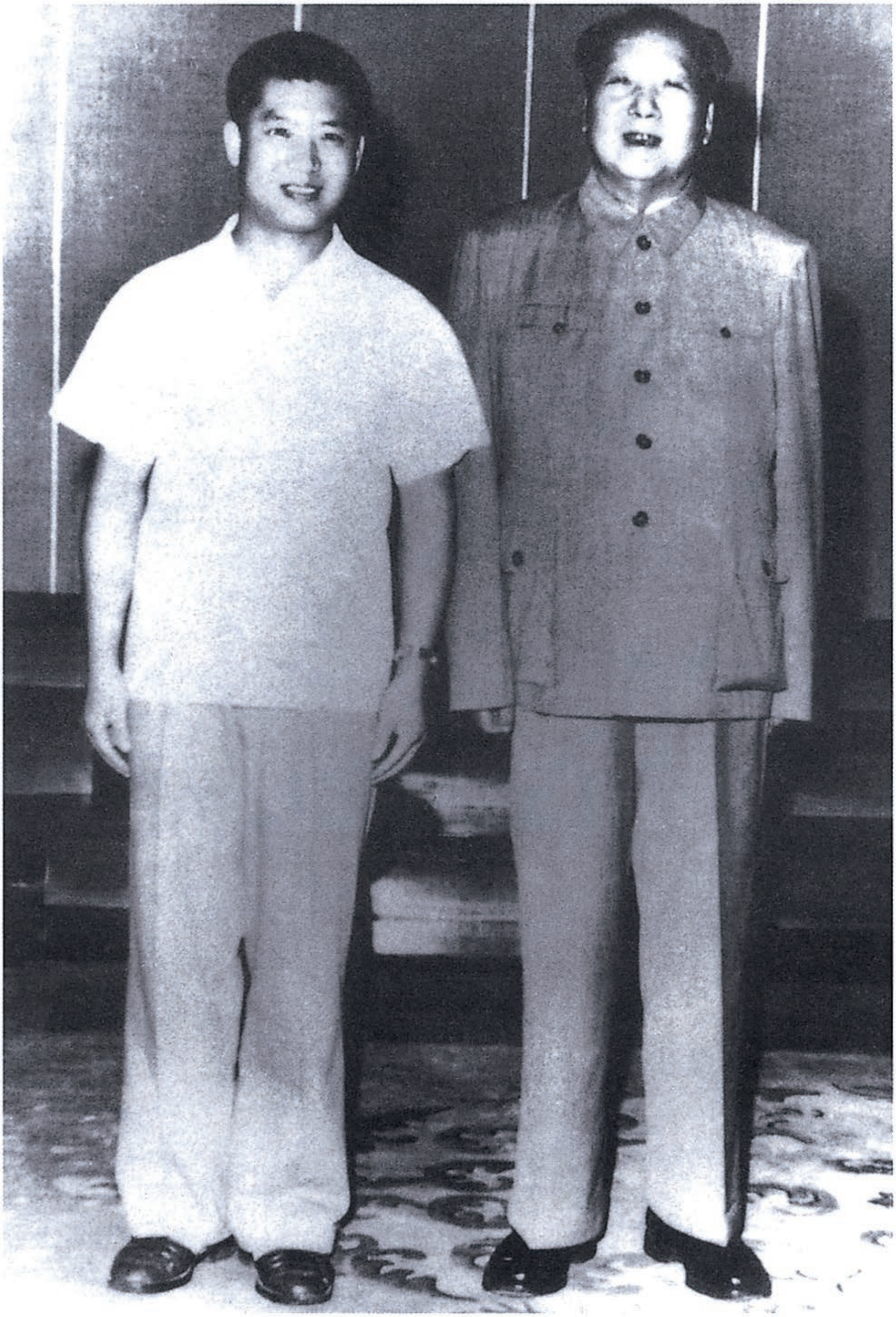
[1] 神都，古谓京城。这里指首都北京。

[2] 南国，中国南方的泛称。作者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在南方巡视。1966年5月15日至6月15日在杭州；途经长沙于17日到韶山滴水洞，在这里住了11天；28日赴武汉。

[3] 凭阑静听潇潇雨，化用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词“凭阑处潇潇雨歇”句。阑同栏。潇潇，骤急的雨势。

[4] 故国，即祖国。

1966年6月21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和中央警卫局张耀祠、湖南公安厅厅长高文礼、警卫处处长曲琪玉合影。



1966年7月1日，毛泽东和厨师于存在武昌留影。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和湖南省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合影。

必须组织和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

（1966年）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组织、发展无产阶级左派队伍，并且依靠他们发动群众，团结群众，教育群众。[1]

---

[1] 1966年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的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中，在“毛主席教导我们”后面引用了这句话。《人民日报》7月3日转载了这篇社论。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交企业和基建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稿的批语

（1966年7月2日）

少奇、小平[1]同志：

六月三十日给我的信和通知[2]，已经收到看过。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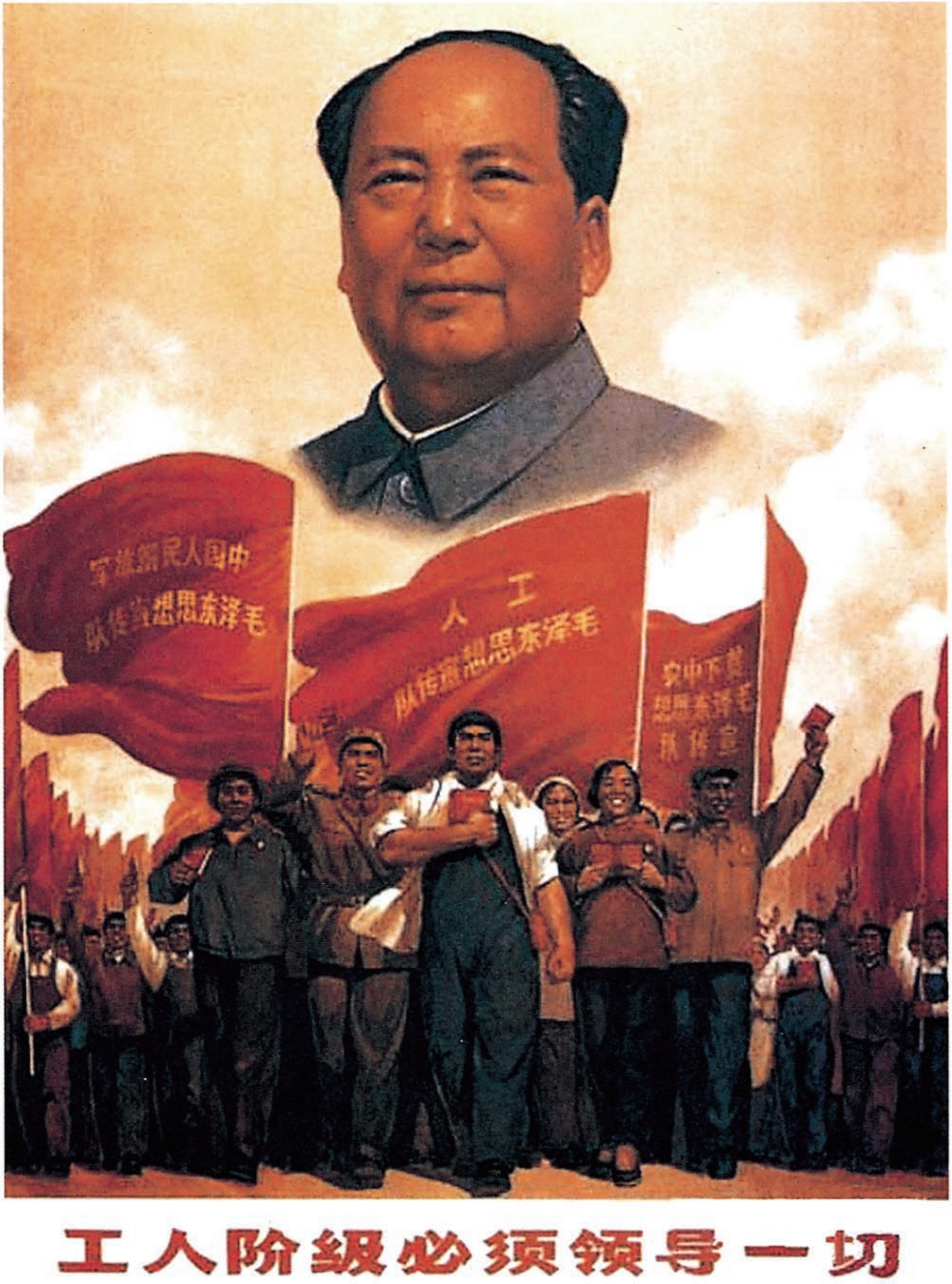
七月二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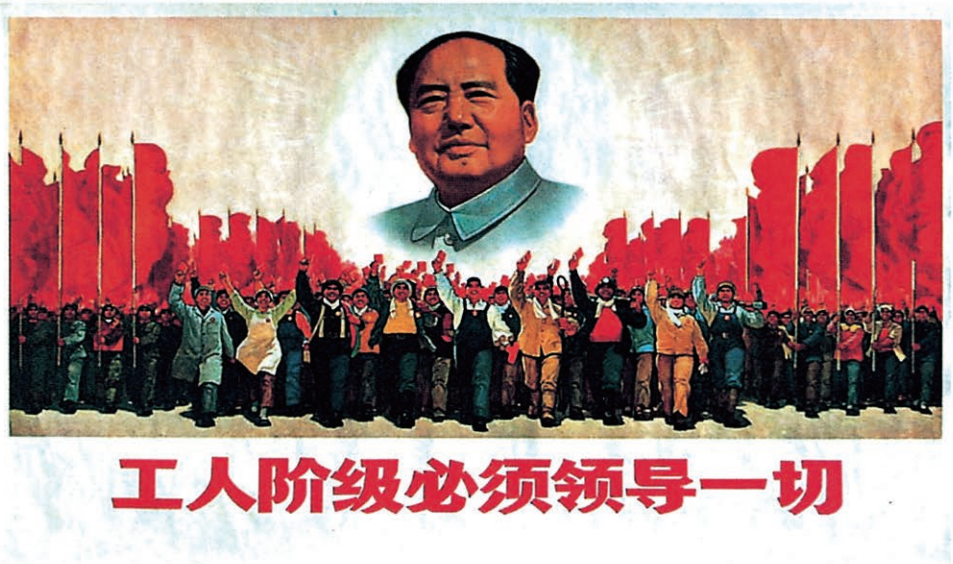
[1] 少奇，即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6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和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好，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完不成。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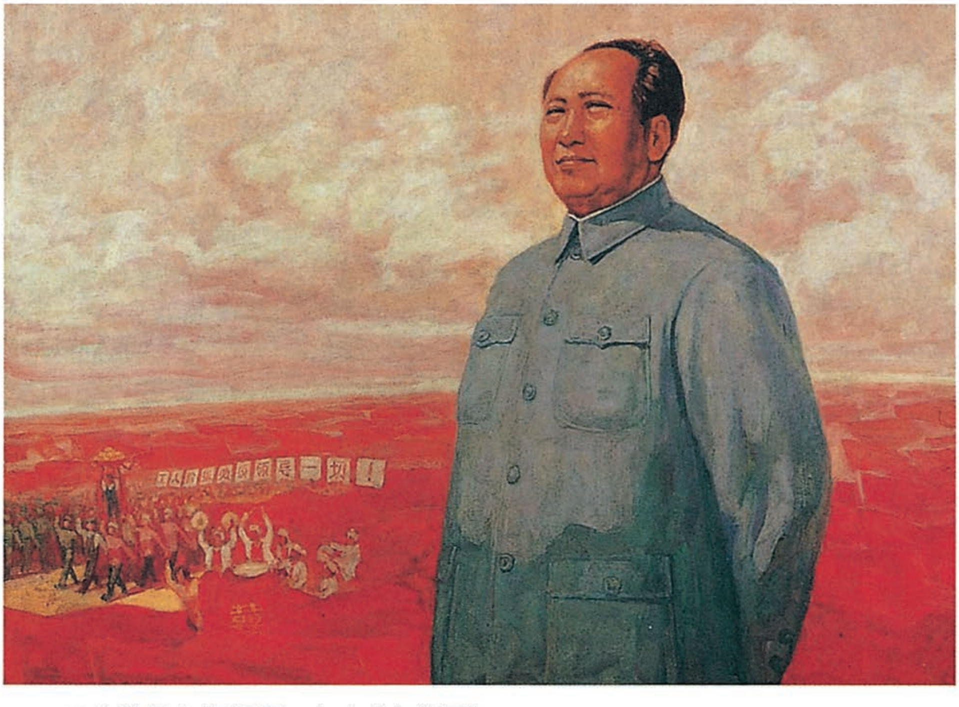
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即中共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刘少奇、邓小平送审的通知草稿指出，目前各地党委需要用很大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教育方面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根据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通知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保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1966年7月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工人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贫下中农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给江青[1]的信

（1966年7月8日）

江青：

六月廿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2]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3]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4]，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5]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6]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廿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7]，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8]，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

---

[1]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2] 魏，指魏文伯，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陈，指陈丕显，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3] 指上海市。

[4] 1966年7月12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国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7月17日，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一些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5] 指杭州市。

[6] 指毛泽东家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

[7] 指武汉市。

[8] 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

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2]，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3]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

---

[1] 《后汉书·左周黄列传》中这几句话为：“‘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2] 指毛泽东1966年4月16日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3] 指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1]，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

---

[1] 1972年5月，毛泽东的这封信曾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之五印发。1972年10月1日、1973年9月2日和1975年3月1日，《人民日报》曾先后发表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1]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

[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岛、澎湖列岛及其周围的大小岛屿。

对陶铸、张平化关于中宣部的组织和工作问题请示信[1]的批语

（1966年7月10日）

陶铸同志：

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毛泽东

七月十日

---

[1] 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和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平化1966年7月5日给中央和毛泽东的这封请示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彻底改组部的领导。二、新的工作方针。今后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三、目前工作的抓法。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并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揭露问题，结合扩大队伍，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抽出一部分力量，抓在9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

在接见日本、古巴、巴西和阿根廷朋友时的谈话

（1966年7月10日）

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我们要团结起来，把美帝国主义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赶回他的老家去。

1966年，毛泽东和湖北省委领导人及东湖客舍工作人员的合影。

对北京语言学院七名学生来信的批语

（1966年7月12日）

伯达、康生[1]酌处。

此件[2]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

[1]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指北京语言学院7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1966年6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我们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以前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就会逐步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彻底的改革：1. 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2. 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3. 凡是违犯党纪国法，做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4. 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5. 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之三印发。

畅游长江时的谈话[1]

（1966年7月16日）

一

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

二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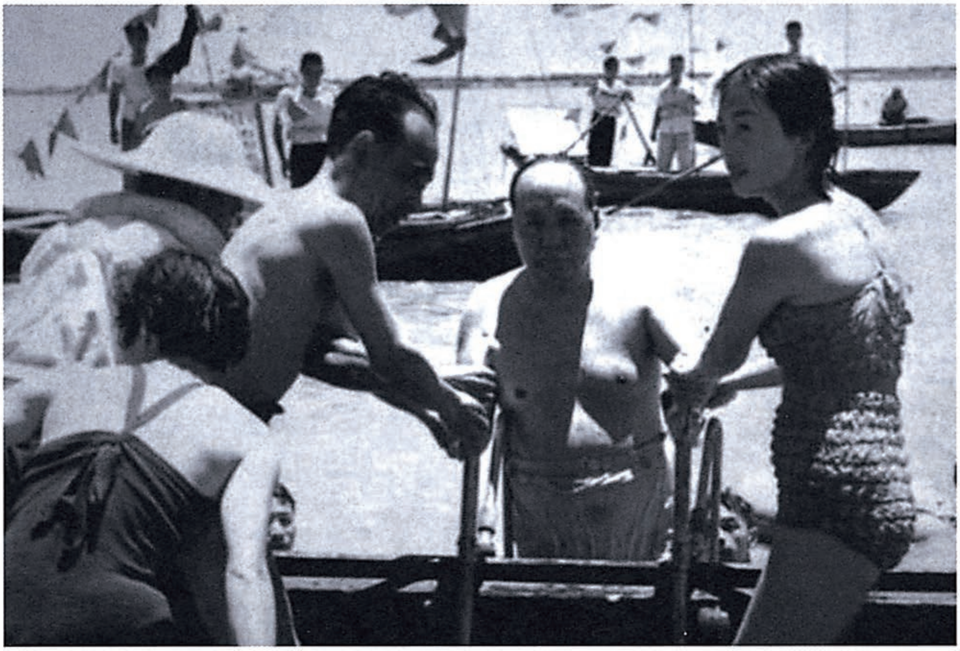
---

[1]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第五次畅游长江。本篇一、二是他在畅游长江时的谈话，摘自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新闻稿《毛主席畅游长江》。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716”舰艇上观看横渡长江的游泳健儿。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1966年，毛泽东最后一次畅游长江后上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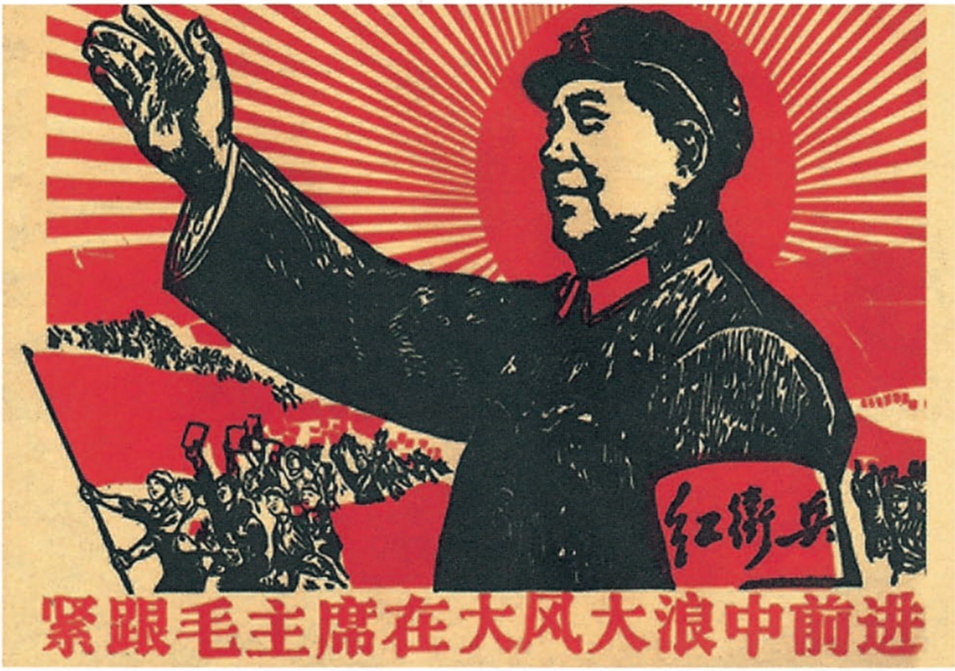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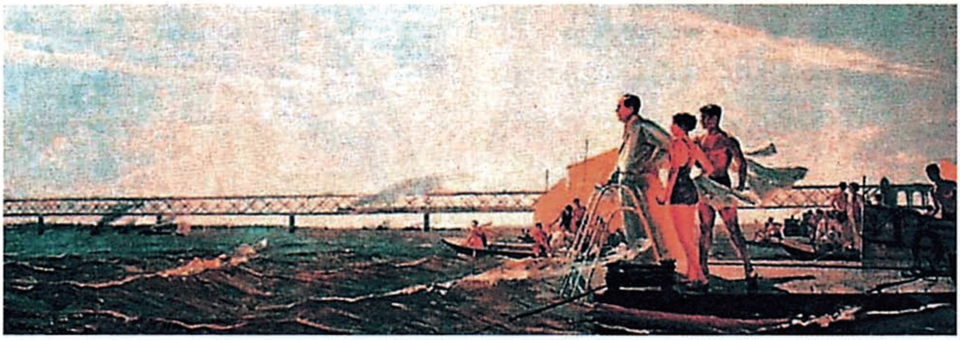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

1966年，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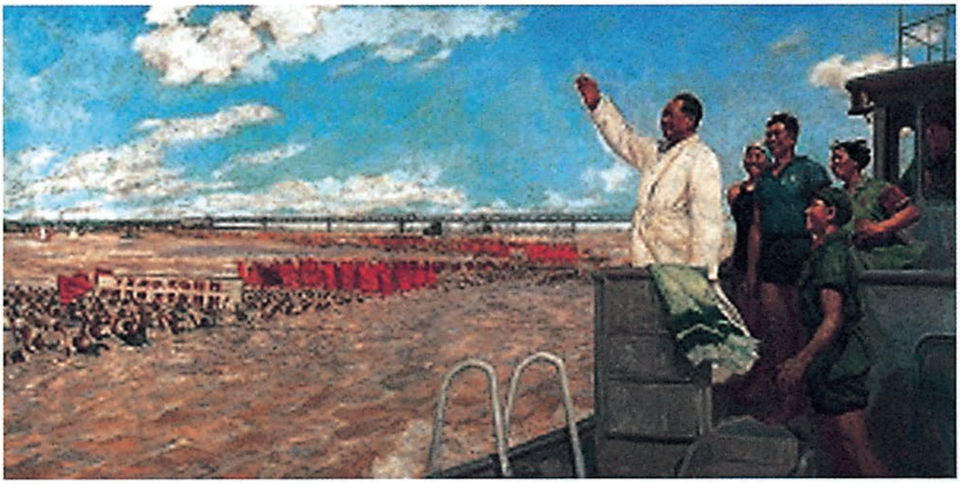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在武汉合影。


紅衛兵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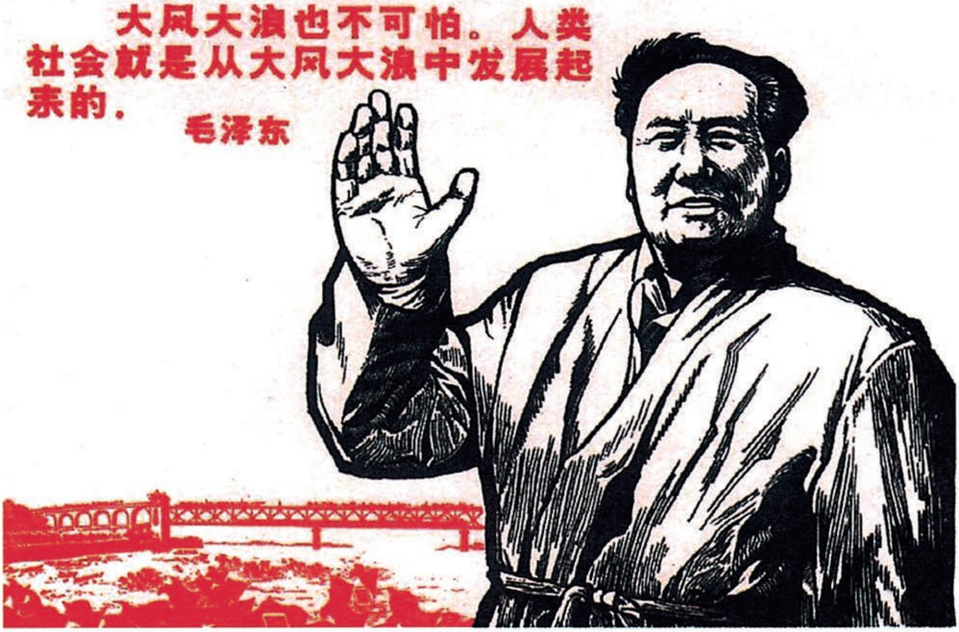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宣传画）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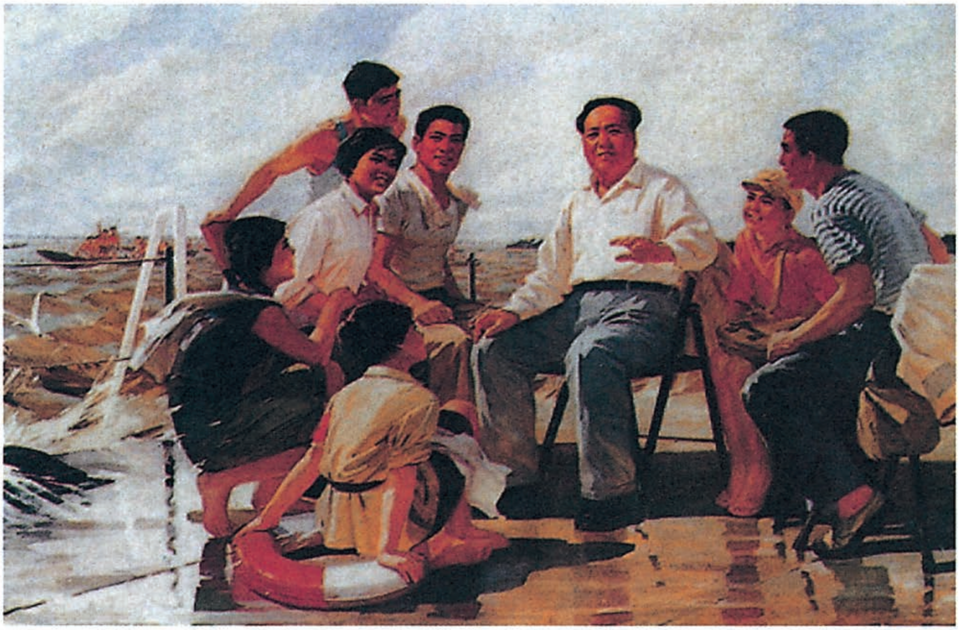


毛主席带领我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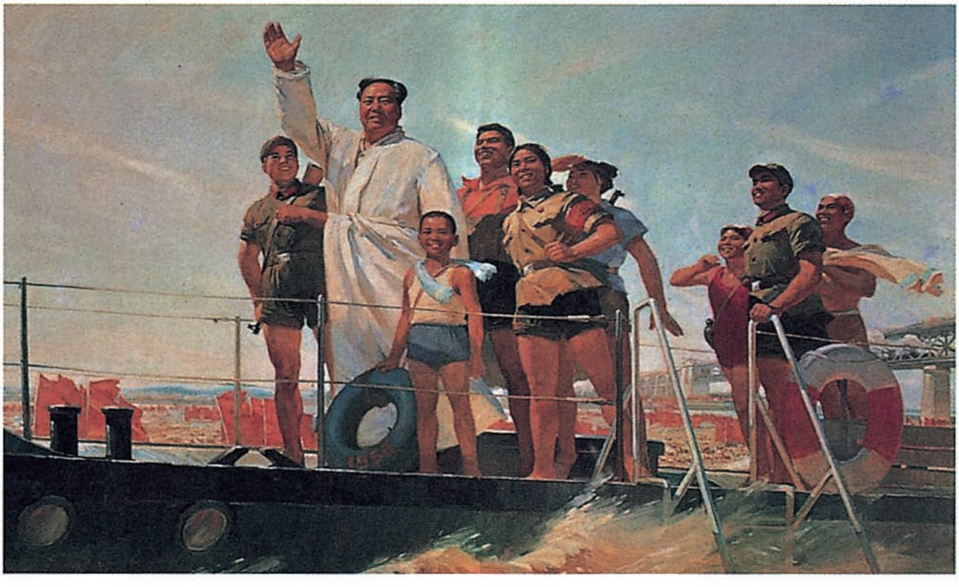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
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
来的。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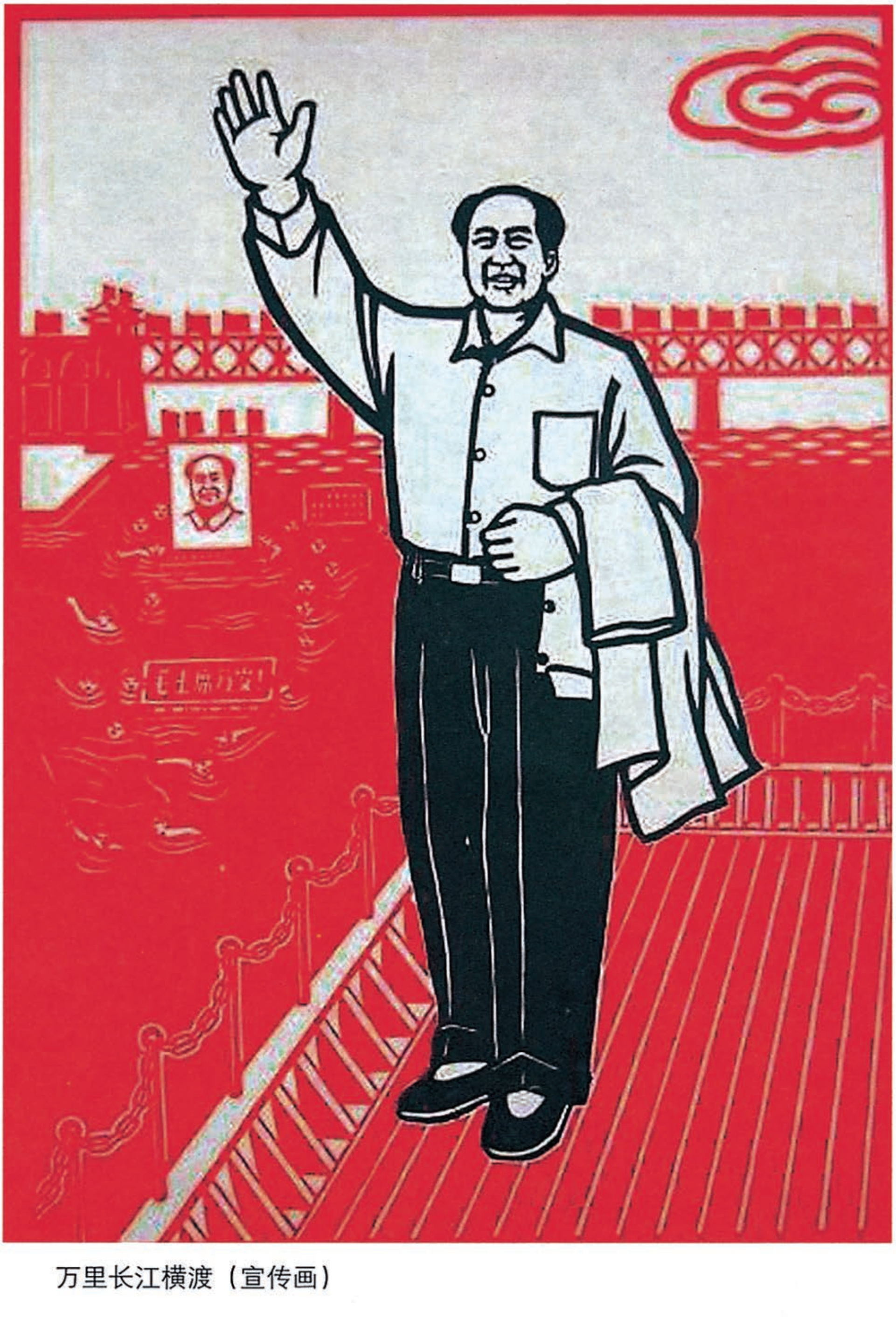
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发展起来的。（宣传画）



《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成长》（油画）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油画）



万里长江横渡（宣传画）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接见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以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

1966年7月17日，毛泽东和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及国际组织的观察员合影。

工作组要撤，文化革命要依靠革命师生[1]

（1966年7月21日）

开两个会，一个是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另一个是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行，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六月一日公布大字报[2]，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3]写了那么多书，你们谁看过，小平看过吗？

邓小平：没有。

哦，没有，知道你也没有。那么你能斗得了他吗？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

陈伯达：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几个理论和方针，他们把放手

---

[1] 这是毛泽东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的联席会议上的谈话。

[2] 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毛泽东于1966年6月1日批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3] 翦伯赞，历史学家，当时任北大副校长。

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乱弹琴！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闹事就是革命。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

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1]有多大斗头？李达[2]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哪个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

康生：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

---

[1] 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2] 李达，原任武汉大学校长。曾出席中共一大代表大会，后因故脱党，但仍坚持研究马克思主义，1948年年底，李达接毛泽东信函，“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1949年，又重新入党，毛泽东是他的历史证明人。

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据说南京《新华日报》被学生包围了，就不得了了，好像闯了多大的祸，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革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你们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和吴德[1]来了吧？

李雪峰：我在。

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大字报，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讲话有什么了不起？学生们围上来，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刘少奇：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你搞了一两个月了，却一点感性认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嘛，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怕什么，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这一点大多数人都通了，你还不通？

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

---

[1] 李雪峰，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可能来不及了，要加就加中央社论和通知。

周恩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另外，我提议教科书加上毛主席的著作。

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1]那样可搞个训练班，当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李雪峰：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除你外，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报表。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邓小平：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究竟是谁掌握呀？我看还不如有些学校呢！你们没想想，学校的学生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就要闹事嘛，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是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正在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吗？我看文件上要

---

[1] 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编校、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影响深远。

写明只有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就斗他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

在会见大区书记
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

（1966年7月22日）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做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子。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批、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像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靠本校本单位，不能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搞成联络员？搞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

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感性知识，那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上中央来。（康生插话：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1]是否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去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的话。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六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有写，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向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

---

[1] 匡亚明（1906—1996），江苏丹阳人，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政治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行了。（康生插话：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些部门改成科，没有办）。是呀，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局长、处长，不管事的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有人插话：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争论“六·一八”事件是不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有的说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四十多人提出要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关于北大“六·一八”事件[1]

（1966年7月）

“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

[1]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全校性的大规模暴力斗争，60多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罚跪和殴打等。后来，北大工作组制止了这些斗争。

对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批语[1]

（1966年7月、8月）

---

[1] 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月间曾作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是写在7月16日草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7月26日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写在陈伯达8月3日晚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对陈伯达8月7日送审稿的批语。这一决定的7月16日草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内容共23条。后来几经修改，在7月29日作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时，改题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内容压缩为16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8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称“十六条”）。决定中有几段话收入了经毛泽东审定、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这几段话是：“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此外，1967年6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在“毛主席指出”后面，登载了决定中的以下一段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一

伯达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1]。

毛泽东
七月廿一日

---

[1] 1966年7月16日印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共19页。在第18页，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在第19页，将“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二

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1]。

供讨论用。

三

伯达同志：

改得很好，可即印发。[2]

毛泽东

八月三日下午九时

---

[1] 指陈伯达1966年7月26日晨报送的决定修改稿。毛泽东在这次修改稿第7页“各单位党的领导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党的领导要同群众一起”两句中的“党的领导”后面，分别加上了“和革命群众中的骨干分子”11个字。此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2] 这是对陈伯达1966年8月3日送审的决定修正稿的批语。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中说：“今日上午，康生、陶铸、王任重、张春桥等同志和我，考虑小组会上的意见，对这个稿子，又作了些修改。请审阅批示！”

四

伯达同志：

《决定》中“无名小卒”，以改为“无名青少年”较妥，请酌定。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二时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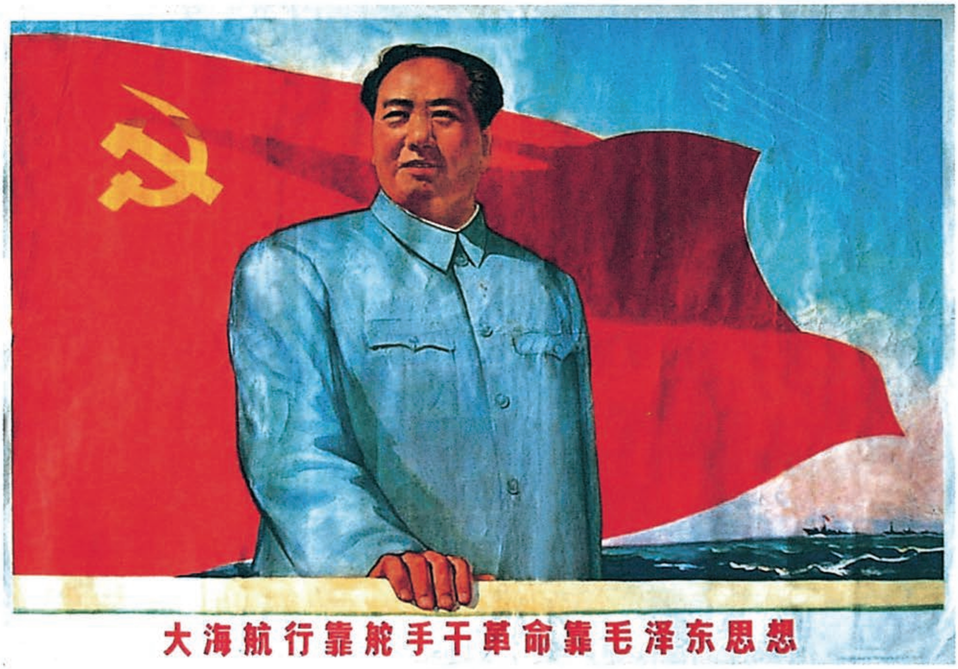
即送伯达同志：

同意修改之处。在第十页上改了几个字，请酌定。[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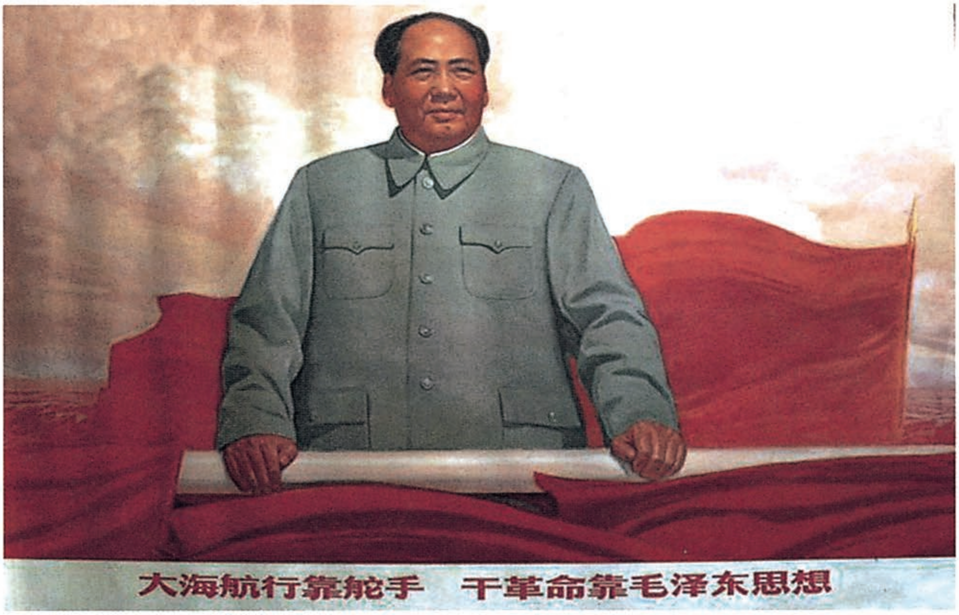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十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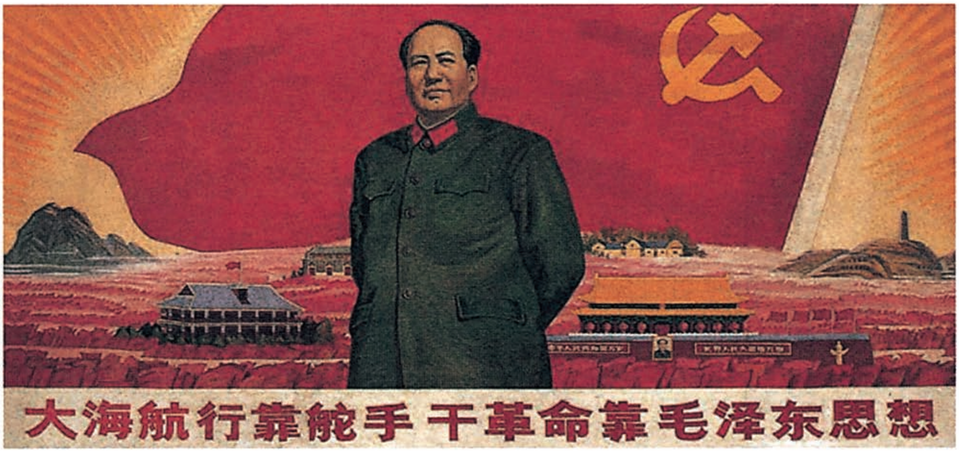
[1] 陈伯达1966年8月7日送审的决定修正稿第10页写道：“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只要他们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在这次运动中，都应该继续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和作风，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划这样一条大杠杠，是必要的”一句，并将“对一般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改为“对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将“可以帮助他们不断改造”改为“可以帮助他们逐步改造”。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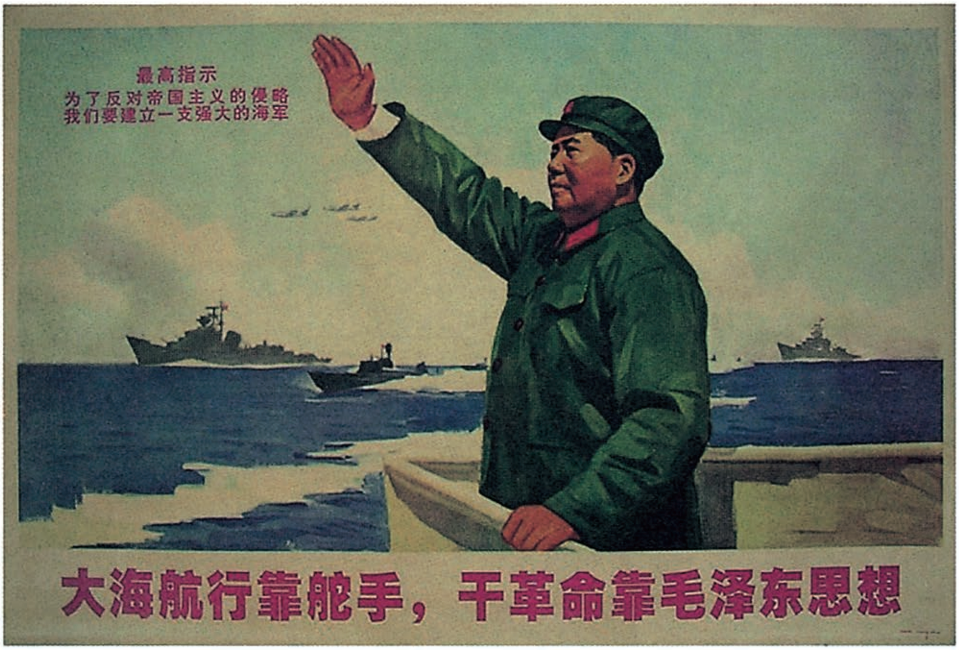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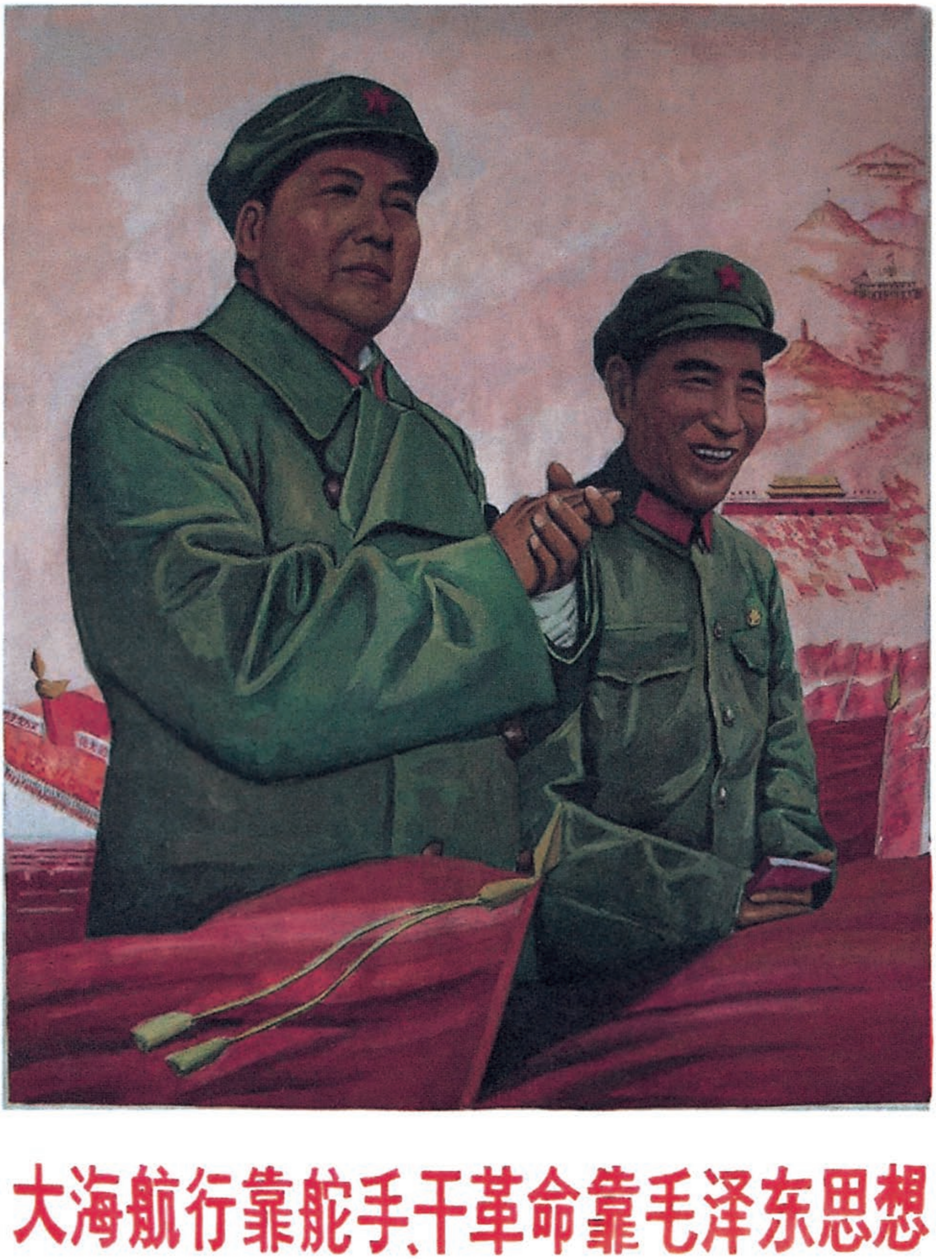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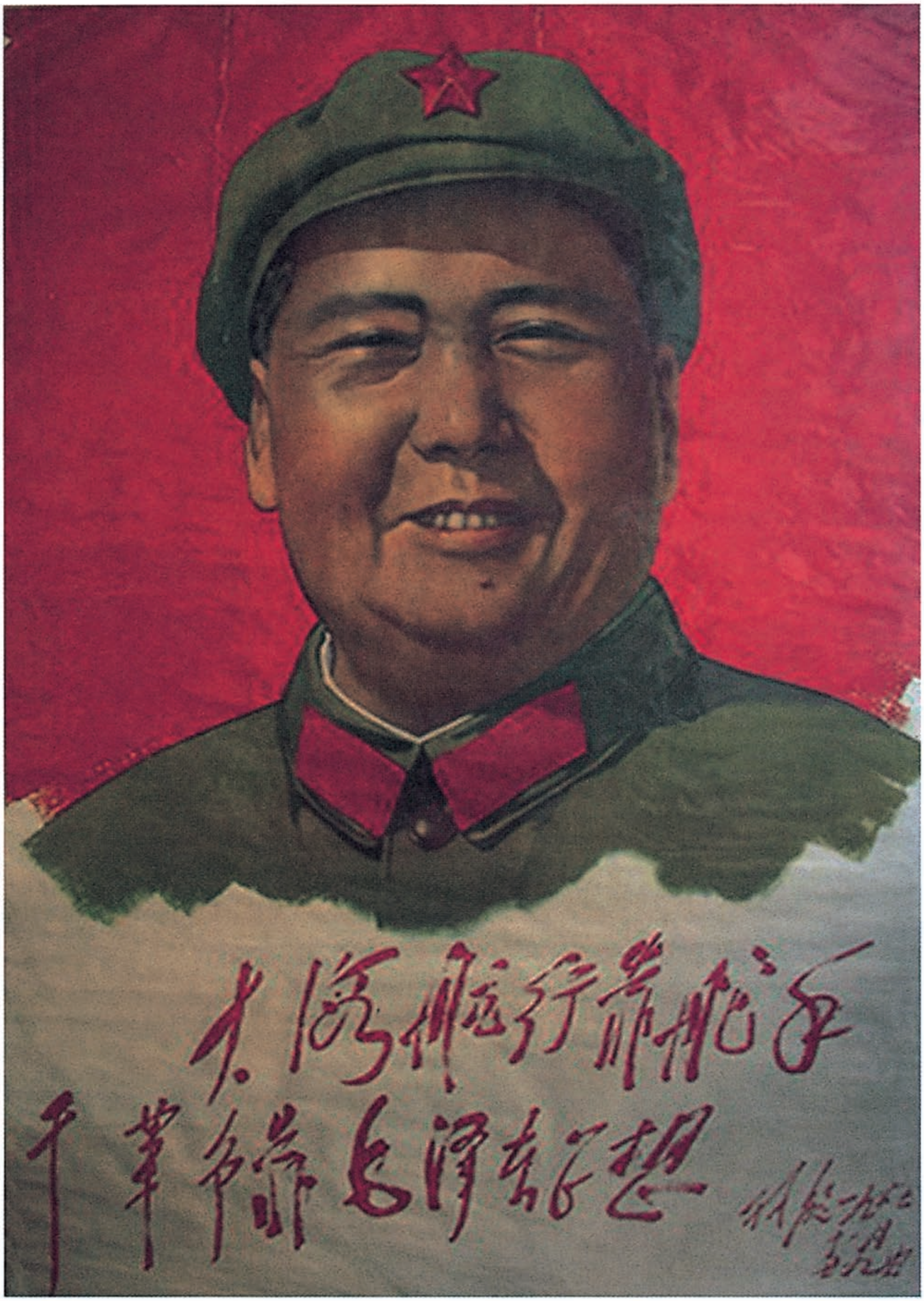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最高指示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我们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林彪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宣传画）

关于不要用“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词语的批语

（1966年7月25日、8月4日）

一

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

此件[1]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

---

[1] 指题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会议愤怒声讨文艺界黑线总头目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将此稿第5页“他竭力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指示”一句中的“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这篇电讯稿发表在196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指控为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予以彻底平反。

二

可发各省、市、区党委注意掌握。[1]

毛泽东

八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7月29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7月28日上午，中宣部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7月25日的指示，作了讨论。大家建议采取如下步骤：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二、外国朋友赞扬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应按照他们的原话报道，不要用推论的方法去“加码”。有些不符合主席此次指示精神的话，仍可报道，但不要用在标题上。三、“反党黑帮”必然会利用我们改变提法的机会向党反攻，从根本上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应当揭露他们的阴谋。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中央指示。如认为可行，目前应传达到什么范围，亦请中央考虑决定。8月4日，中共中央将陶铸的报告发至省军级。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

（1966年7月31日、8月1日）

一

各同志[1]：

请考虑此件[2]及附件[3]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

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

[1] 指刘少奇，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张春桥，组员王力、姚文元、关锋、戚本禹，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15人。

[2] 即本篇二。这封信没有发出。

[3] 指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1966年6月24日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7月4日写的大字报《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7月28日，他们将这两张大字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两张大字报后来载于1966年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题目分别改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人民日报》8月24日予以转载。

二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

（1966年7月）

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

（几个少先队员给他爸爸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的分数，好的给奖品。）

（毛泽东叫陈伯达转告这些小朋友，大字报写得很好！）

我向大家讲，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充分发挥出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他站在镇压学生那边。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本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2]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的谈话。

[2] 指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政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现在要把革命闹到底，从这方面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这样才能赶上，不然，就只能靠在外面。

有些同志斗别人很凶，斗自己不行，这样自己永远过不了关。

靠你们自己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生活不行。

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有些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有人提出，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

怕什么？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一个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对共青团中央的批评

（1966年7月）

有人讲团中央“三糊”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1966年7月3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暑期物理讨论会的33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代表。

关于打人问题

（1966年8月1日）

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同学间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不许镇压学生运动[1]

（1966年8月4日）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2]。这与陆平、蒋南翔[3]有什么分别?!

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就是听不进；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自己下命令要学生起来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1966年6月初到7月底的50多天中，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历来的官办政治运动的方式搞文革运动，方法包括：派工作组、给群众进行“左、中、右”排队、把敢于给领导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反革命”、整他们的黑材料等等，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如西安交大六·六事件、清华大学六·七事件、广西六·八事件、北京地院六·二〇事件、北师大六·二〇事件、林院《谈话纪要》事件等学生与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和党委镇压学生的普遍现象。仅清华大学就有800多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

[3] 陆平，原任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原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两人都镇压本校的文化革命运动。

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

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许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对“六·一八”的批语[1]有意见，说不好讲。

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2]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大

---

[1] 1966年6月18日，上午9点到11点，北大工作组正在开会，群众离开工作，揪斗了40多名校领导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动。工作组制止了他们，“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做法会被而且已经被坏人利用”。并规定今后“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参见《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20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加批语后转发各地：“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2] 雪峰，即李雪峰，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贴出来后，李雪峰当晚赶到北大，随后召开会议指出：“北大出现了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我很不满意。文化大革命不是你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而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贴大字报也要经过批准才行，不要把内部和外部问题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党内问题贴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要内外有别嘛。”“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我们搞文化革命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北大要组织好，炮火要猛，要打中要害，但要有组织，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并把讲话稿上报中央。

字报不要贴在大门外给外国人看见。”其实除了机密的地方，例如国防部、公安部等不让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么要紧？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和告状，而且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在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的行动看来，我不相信（现在的中央）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炮打司令部[1]

——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2]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3]，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4]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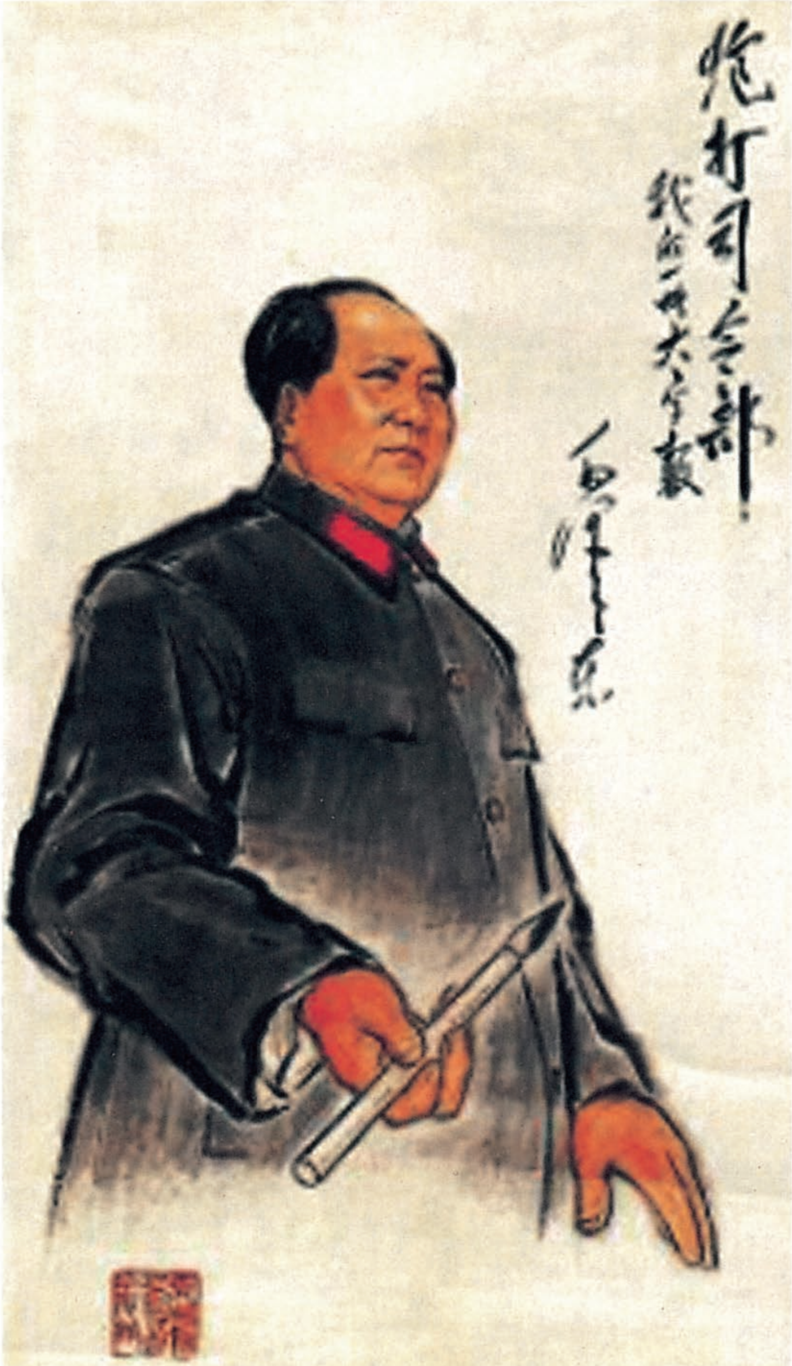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这张大字报中所说的“司令部”，实际上是指“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性的所谓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字报中所说的“在五十多天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实行白色恐怖”，是指“文化大革命”初期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这件事，后来被错误地指责为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当时对党内

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在1968年9月向中央报送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于10月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这次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1969年10月，刘少奇在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11月12日被迫害含冤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复查结果，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议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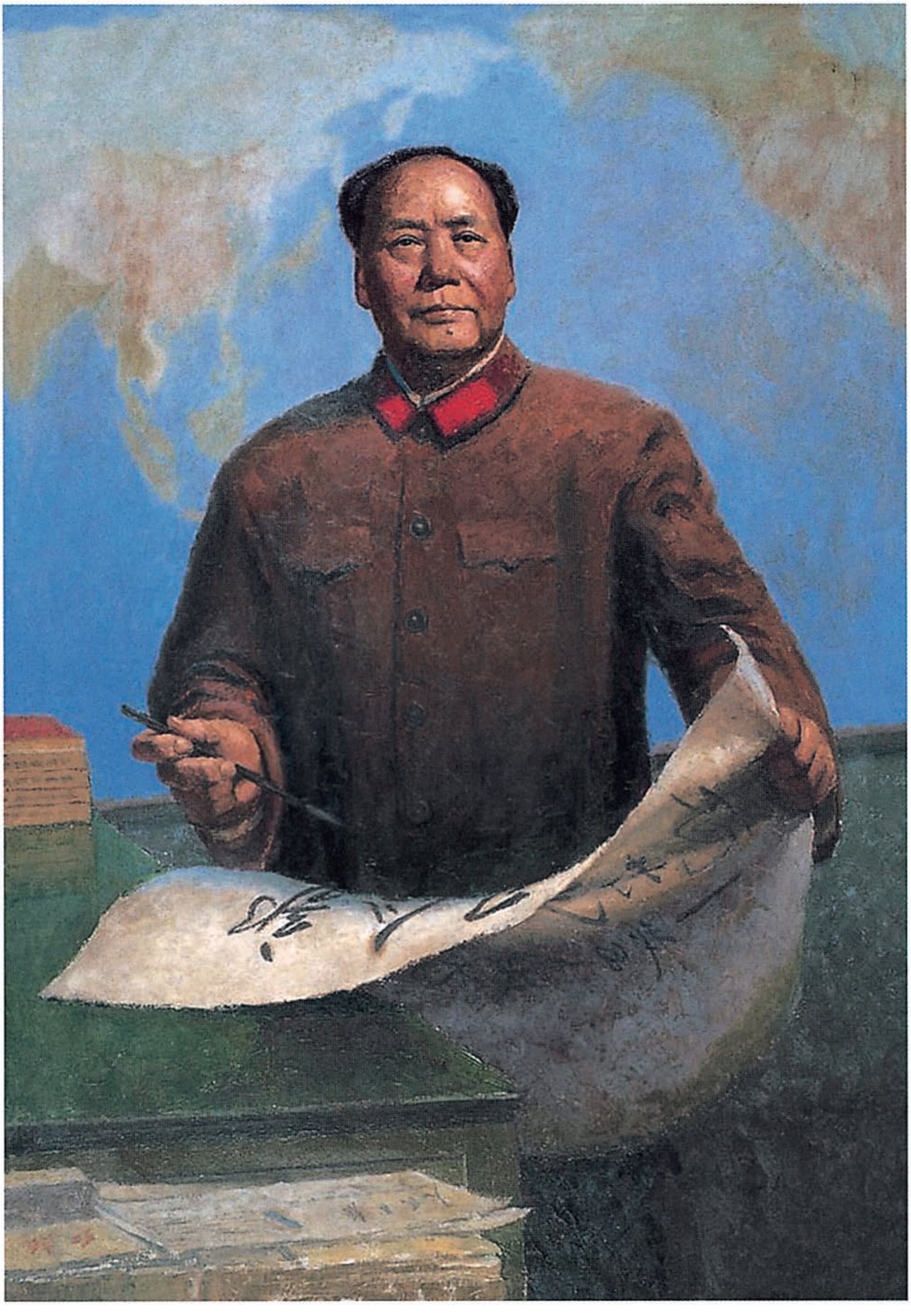
[2]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3] 指《人民日报》1966年6月2日发表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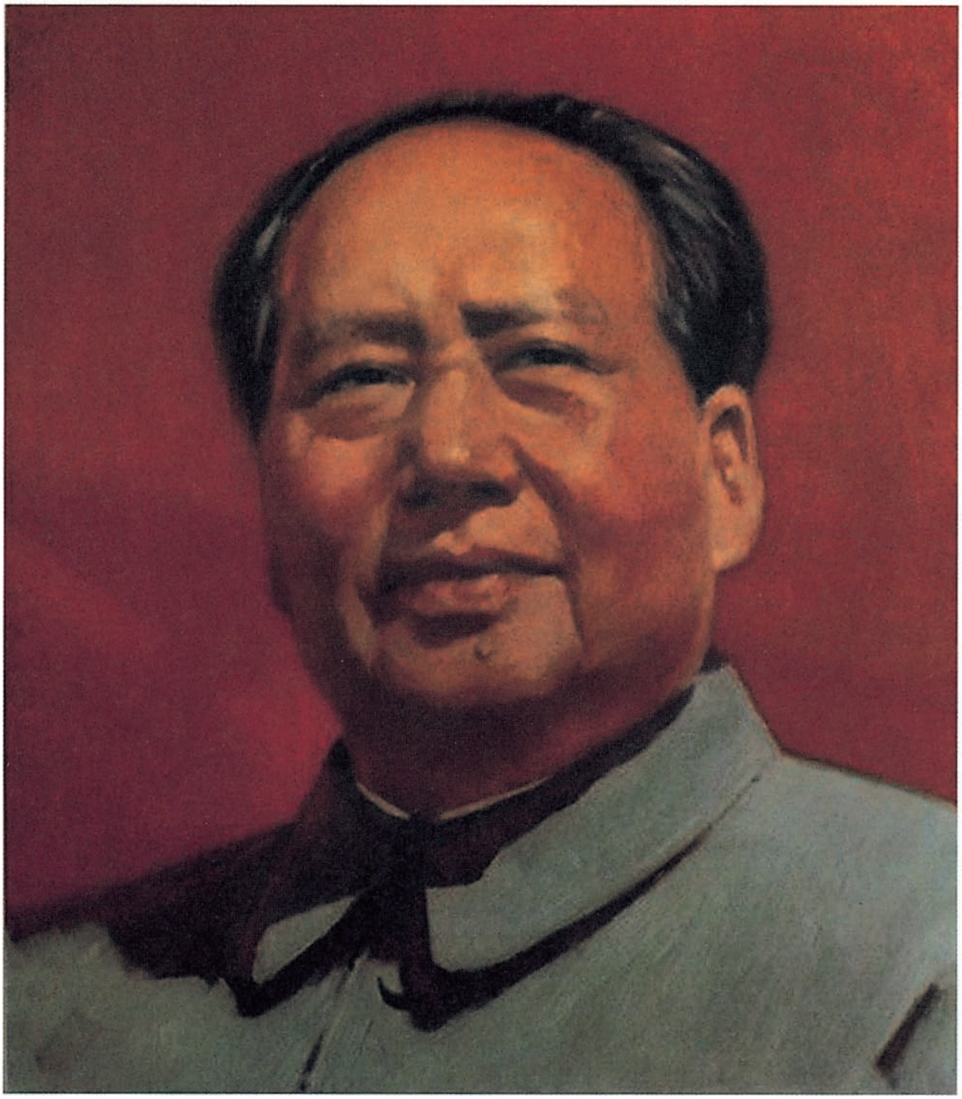
[4] 本篇原写在一份1966年6月2日的《北京日报》上。这一天的《北京日报》转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毛泽东后来作过两次修改，并加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炮打司令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1966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1967年8月5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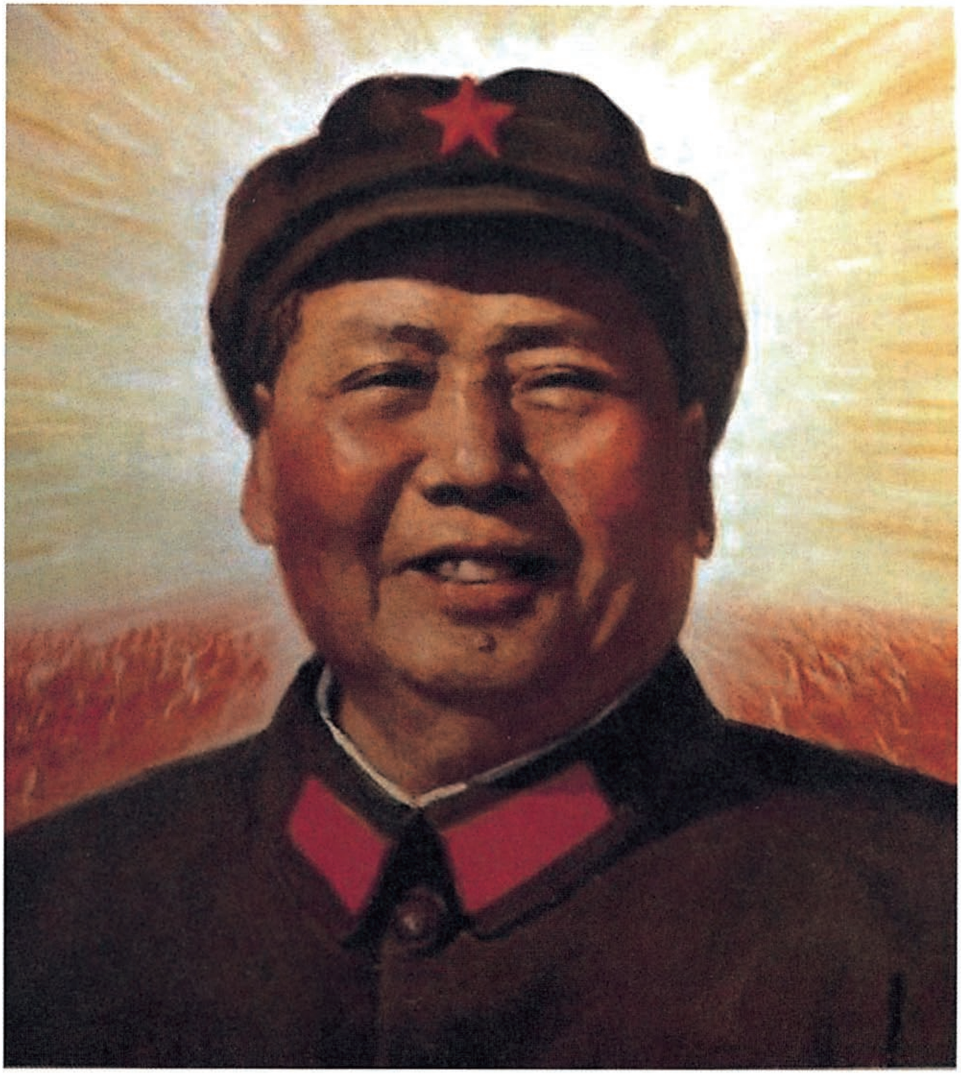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国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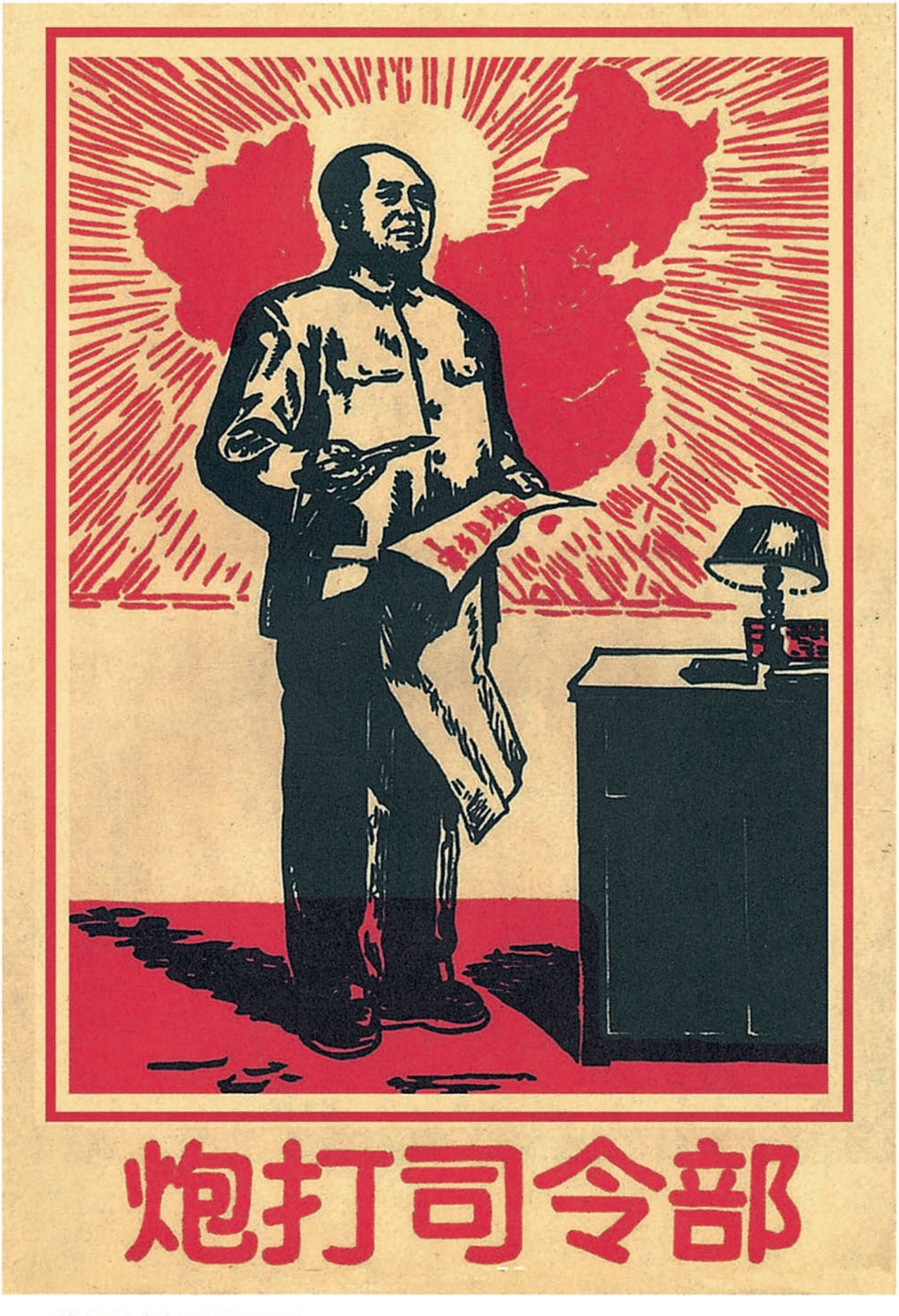
《炮打司令部》（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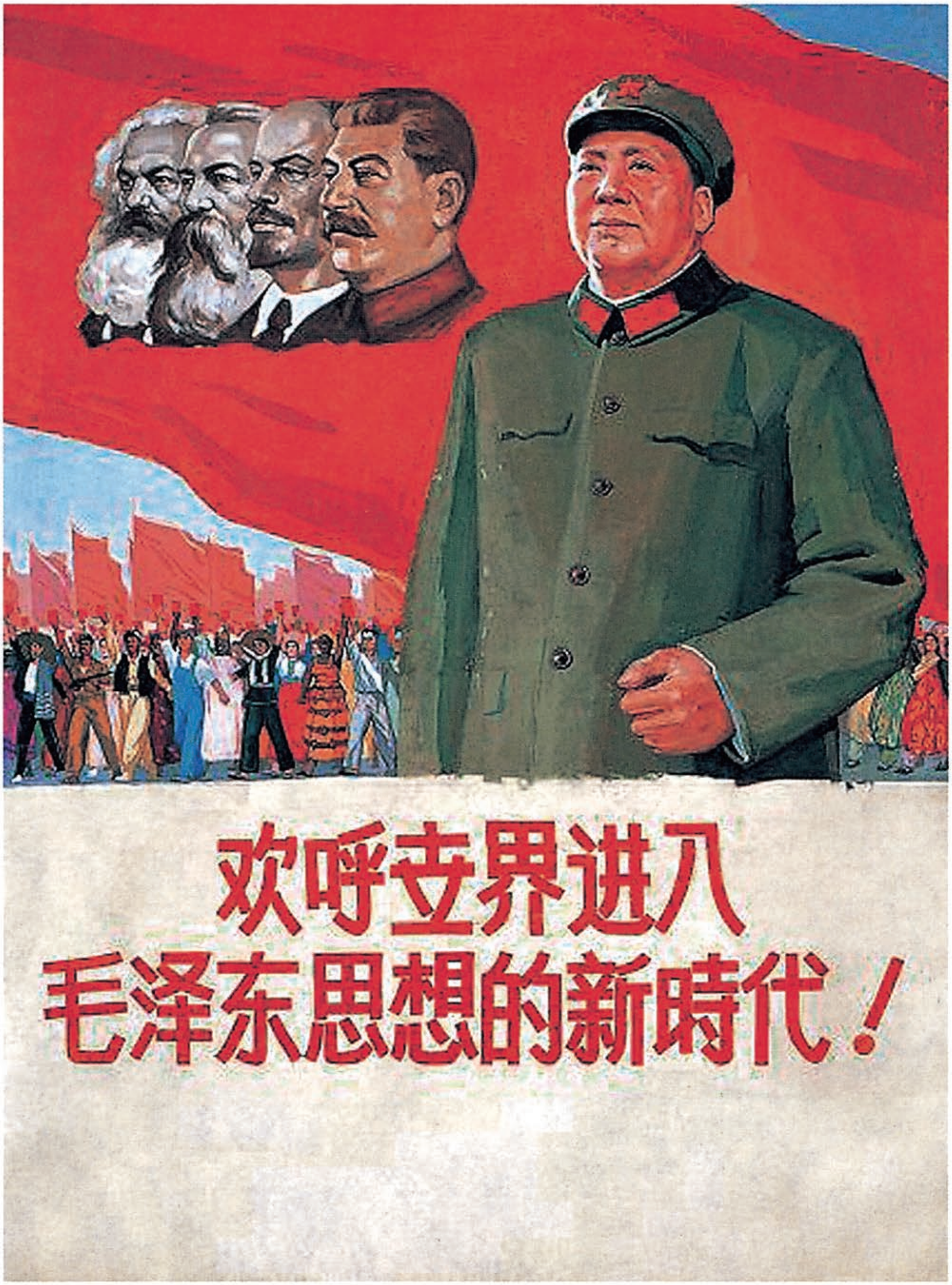
《炮打司令部》（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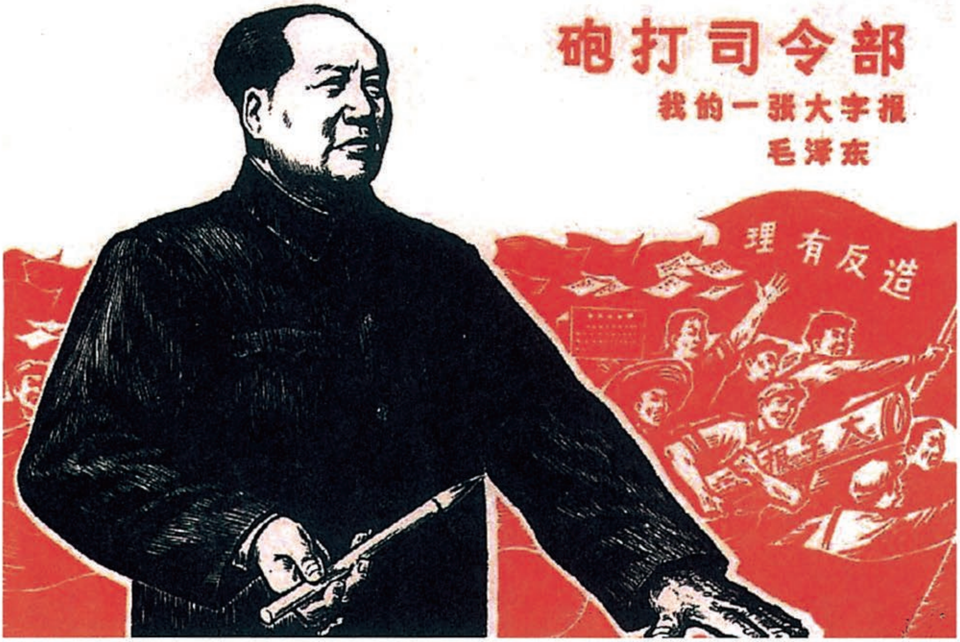
《世界革命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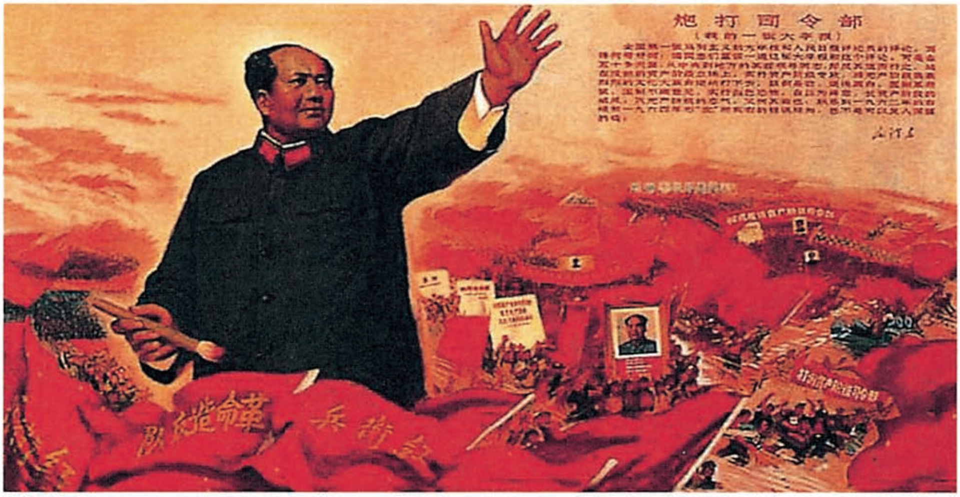
炮打司令部（宣传画）


欢呼世界进入
毛泽东思想的新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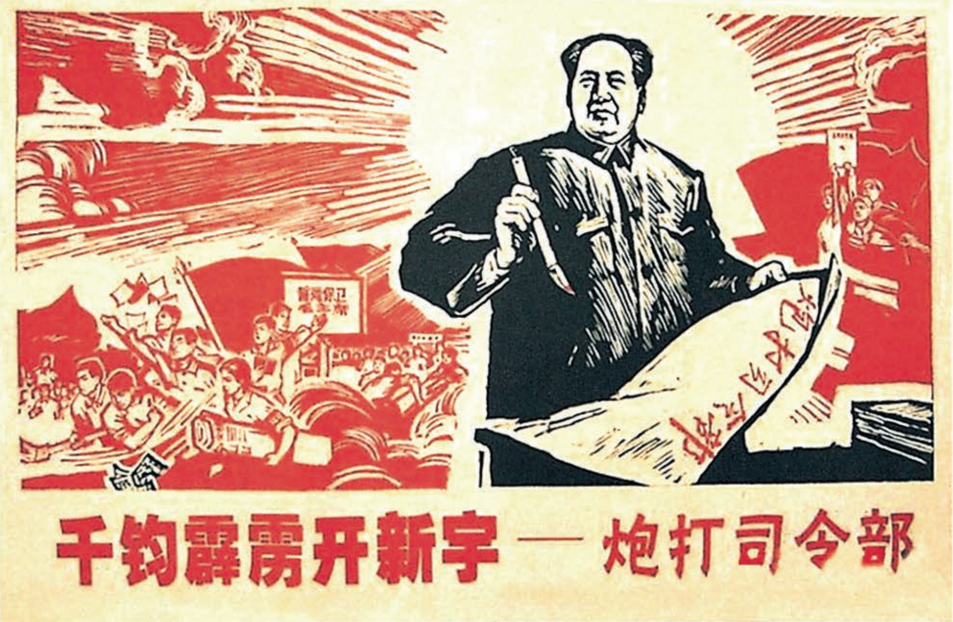
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画）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造反有理
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宣传画）


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革命造反队
红卫兵

炮打司令部（宣传画）


誓死保卫毛主席
炮打司令部
千钧霹雳开新宇——炮打司令部

千钧霹雳开新宇——炮打司令部（宣传画）

毛泽东晚年搬进中南海游泳池居住。他经常在这里游泳。

在《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一文中加写的批注[1]

（1966年8月5日）

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1966年8月5日注。

---

[1]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人民日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而写的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此文时，毛泽东在其中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无条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句后面，加括号写了这个批注。这篇文章及毛泽东的批注后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

对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6年8月5日、9日、11日）

一

康生同志：

改得好。我只在第五页上去掉一句[2]。

毛泽东

八月五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1966年8月5日送审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上；本篇二写在康生8月9日送审稿上；本篇三写在康生8月11日送审稿上；本篇四是在8月9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本篇五是对8月9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六是对8月5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五、六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于8月12日经全会通过，发表在8月14日《人民日报》。

[2] 毛泽东在康生1966年8月5日送审的公报稿第五页去掉的一句话是“全会热烈拥护刘少奇同志代表我国发表的声明”。其中所说的声明，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6年7月22日发表的有关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援越抗美的声明。

二

康生同志：

有些修改[1]，请酌定。其他都同意。

毛泽东

八月九日下午

1966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席台上。

---

[1] 毛泽东对康生1966年8月9日送审的公报稿的修改，除本篇四、五外，还将“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划时代的新发展”一句中的“划时代的新发展”，改为“一个发展”。

三

康生同志：

可照此印发。

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

四

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所进行的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正在促进各国人民的革命活动。美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貌似强大，实际上是很虚弱的。从长远看来，他们都是纸老虎。

五

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六

我们一定要百倍地提高警惕，防止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的突然袭击。如果它们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七亿中国人民，就一定要打断侵略者的脊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

1966年8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

对李达来信的批语[1]

（1966年8月10日）

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

毛泽东

八月十日

---

[1] 李达，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大学校长。当时被错误地打成所谓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戴上“叛徒”“地主分子”的帽子，并被开除党籍。1966年7月1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解救他。毛泽东见信后即写了这个批语。8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接到毛泽东的批语后，立即批示：“即送任重同志。”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8月24日，李达受迫害致死。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湖北省委的决定，为李达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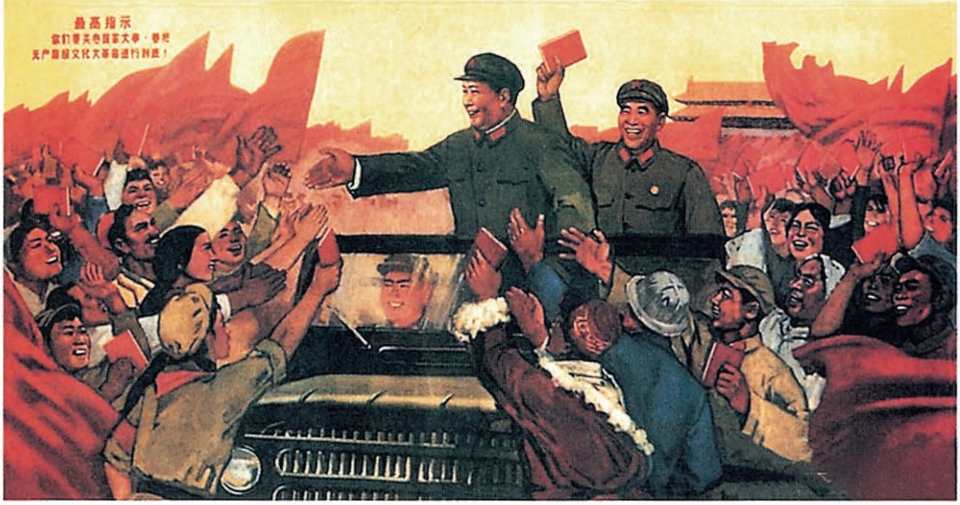
在中央接待站会见首都群众时的讲话

（1966年8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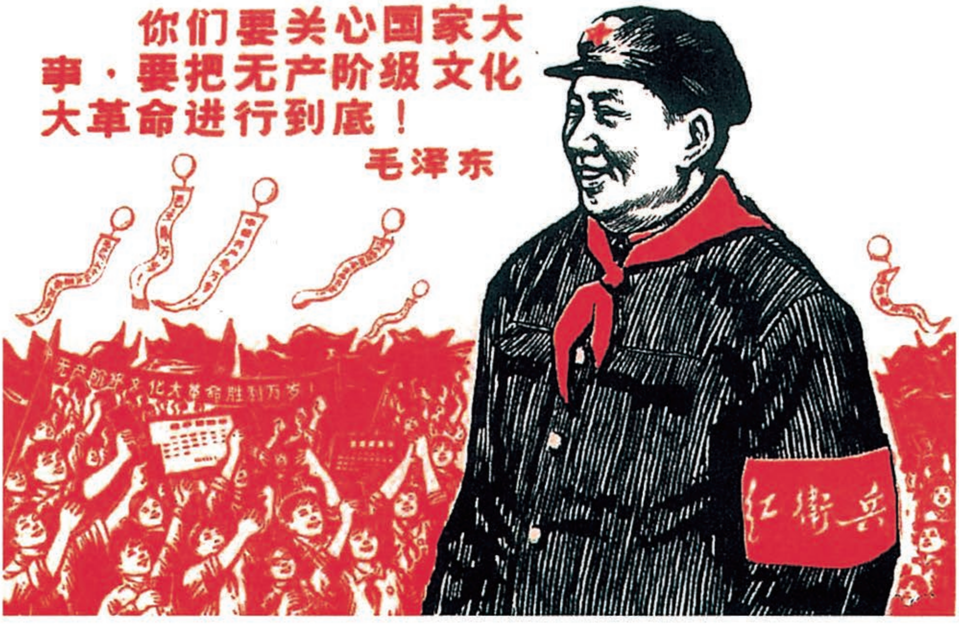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

---

[1] 据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11日电讯稿报道，毛泽东于10日下午7时15分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会见前来庆贺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的首都群众，向大家说了这句话。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
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红衛兵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1966年8月12日）

关于第九次大会的问题，恐怕要准备一下。第九次大会什么时候召集的问题，要准备一下。[1]已经多年了，八大二次会议[2]到后年就十年了。现在要开九次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建议委托中央政治局同它的常委会来筹备这件事，好不好？

至于这次全会所决定的问题[3]，究竟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要看以后的实践。我们所决定的那些东西，看来群众是欢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关于文化文革命，广大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支持我们的，而过去那些方针，广大的革命学生跟革命教师是抵抗的，我们是根据这些抵抗来制定这个决定的。但是，究竟这个

---

[1]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于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举行。

[2] 指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3]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议题是讨论和批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际国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措施，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

决定能不能实行，还是要靠我们在座的与不在座的各级领导去做。比如讲依靠群众吧，群众路线，还是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依靠，一种是不依靠；一种是实行群众路线，一种是不实行群众路线。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都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可能比过去好一些，因为过去没有这样公开的决定，并且这次有组织的保证。这回组织有些改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常委的调整，就保证了中央这个决议以及公报的实行。

对犯错误的同志总是要给他出路，要准许改正错误。不要认为别人犯了错误，就不许他改正错误。我们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一看二帮，团结——批评——团结。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如果不开这次全会，再搞几个月，我看事情就要坏得多。所以，我看这次会是开得好的，是有结果的。

1966年8月，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友好代表团。

对陈伯达、康生[1]关于李雪峰不再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请示报告[2]的批语

（1966年8月15日）

林、周、陶、刘、邓[3]、雪峰同志阅，请林主持开会谈一下。雪峰市委暂时似可名义上不动，实际工作交与吴德[4]主持，需要华北局支持时去支持一下，似较好，请酌。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廿二时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陈伯达、康生1966年8月15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我们请主席考虑，雪峰同志是否可以集中力量管华北局，不必再兼北京市书记，市委书记可由吴德同志接任。"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3] 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陶，指陶铸。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他们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4] 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市长。

给刘少奇的信

（1966年8月15日）

少奇同志：

给续范亭信[1]及我在信上建议改写的话，印象都不深了，如找到，请再给一阅，阅后送还，可否请酌。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

[1] 指刘少奇1943年6月28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兼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的信。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后，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和提法批注了自己的意见，并于当年12月17日给刘少奇写信说：“一气看完了你这一篇，前后看了三遍。并且率直批上了我的意见。”“我也没有研究透彻，不能说我批的全都无错，还请你看后告我。”1966年8月15日，刘少奇将他给续范亭的信及毛泽东的批注一起送毛泽东。

对林彪[1]三篇讲话稿的批语

（1966年8月16日）

林彪同志：

这三件[2]都看了，都赞成。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下午七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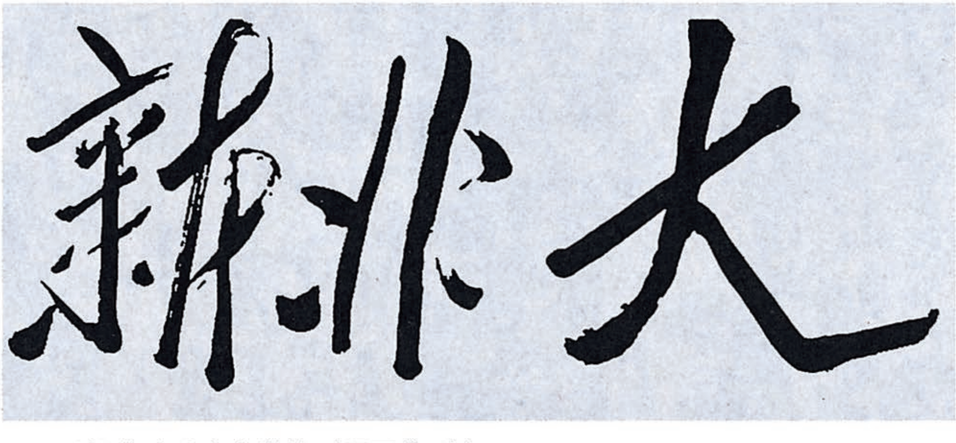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指林彪1966年8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稿、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和8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

为北京大学校刊题名

（1966年8月16日）

新北大



毛泽东为北京大学校刊题写的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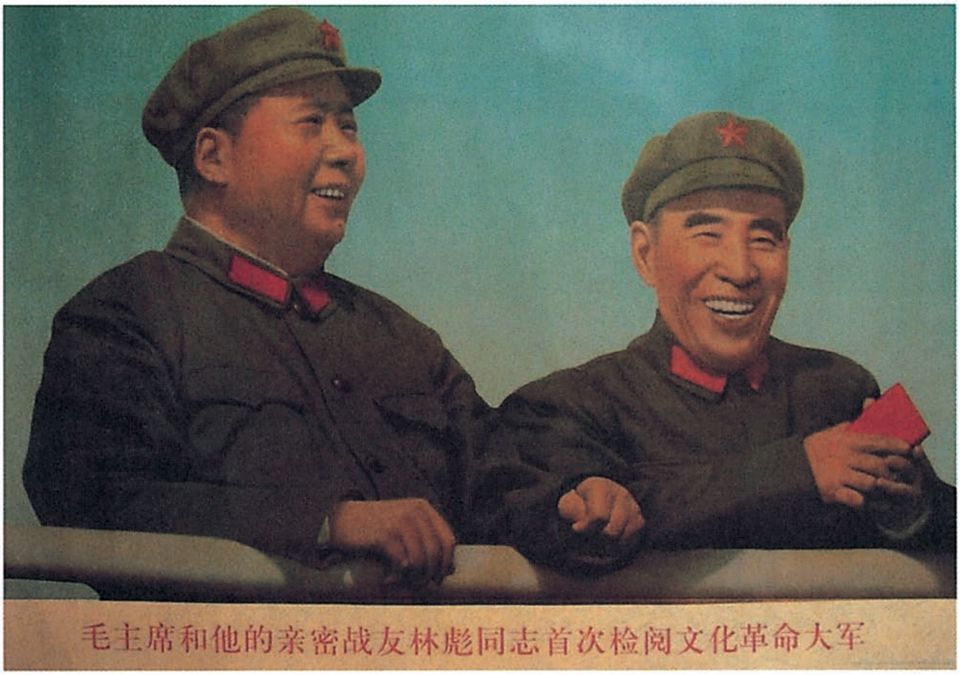
在首都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同林彪的谈话[1]

（1966年8月18日）

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

[1] 1966年8月18日，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本篇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庆祝游行队伍时同林彪的谈话。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首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首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和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交谈。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林彪等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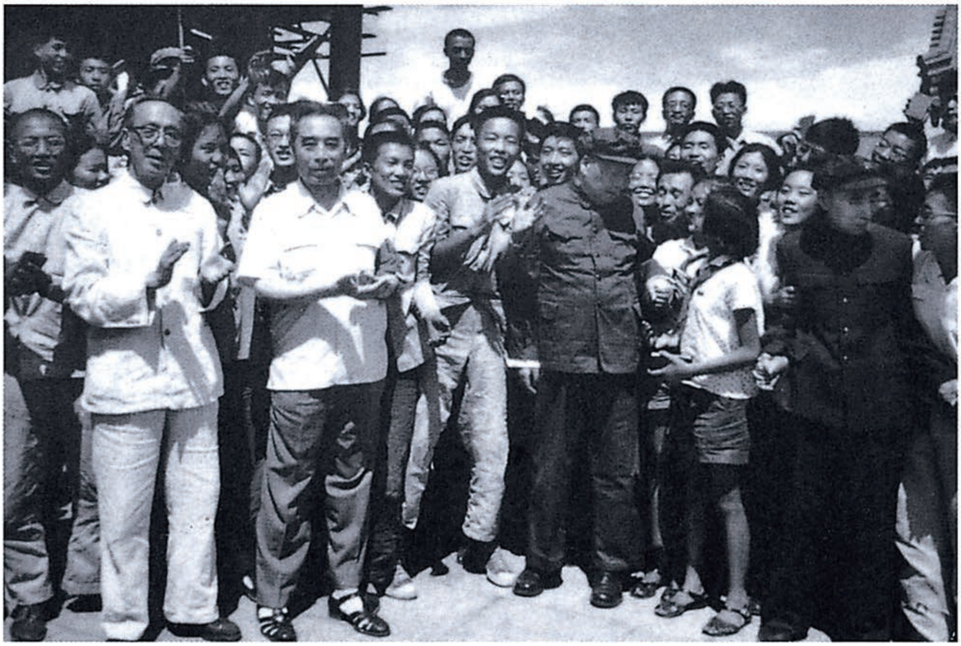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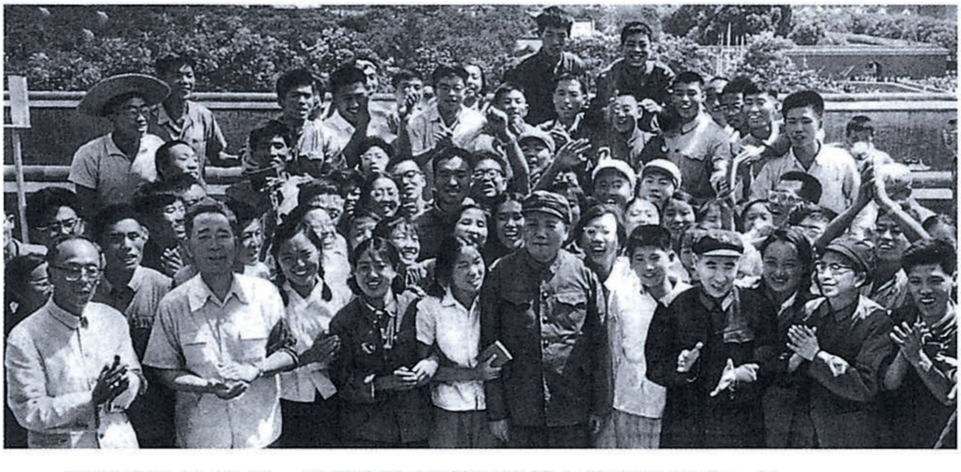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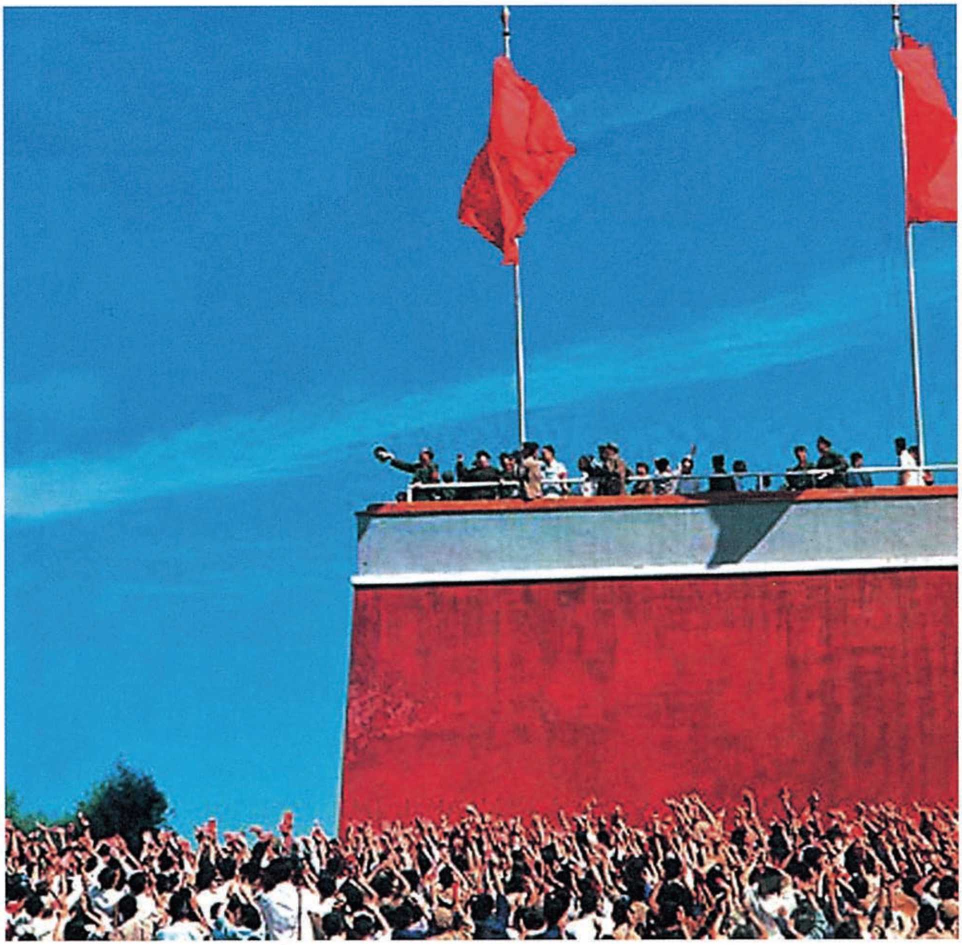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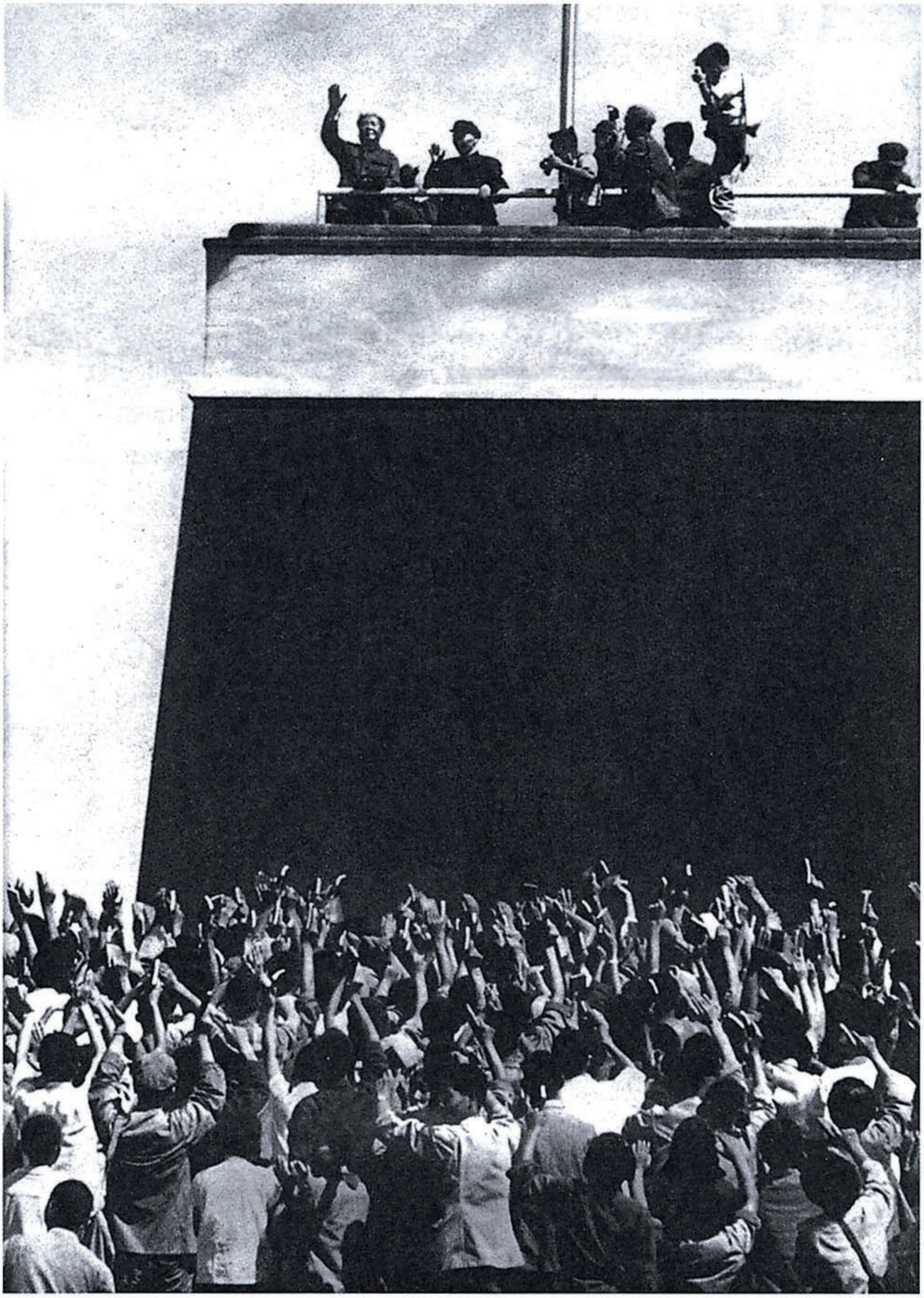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革命师生。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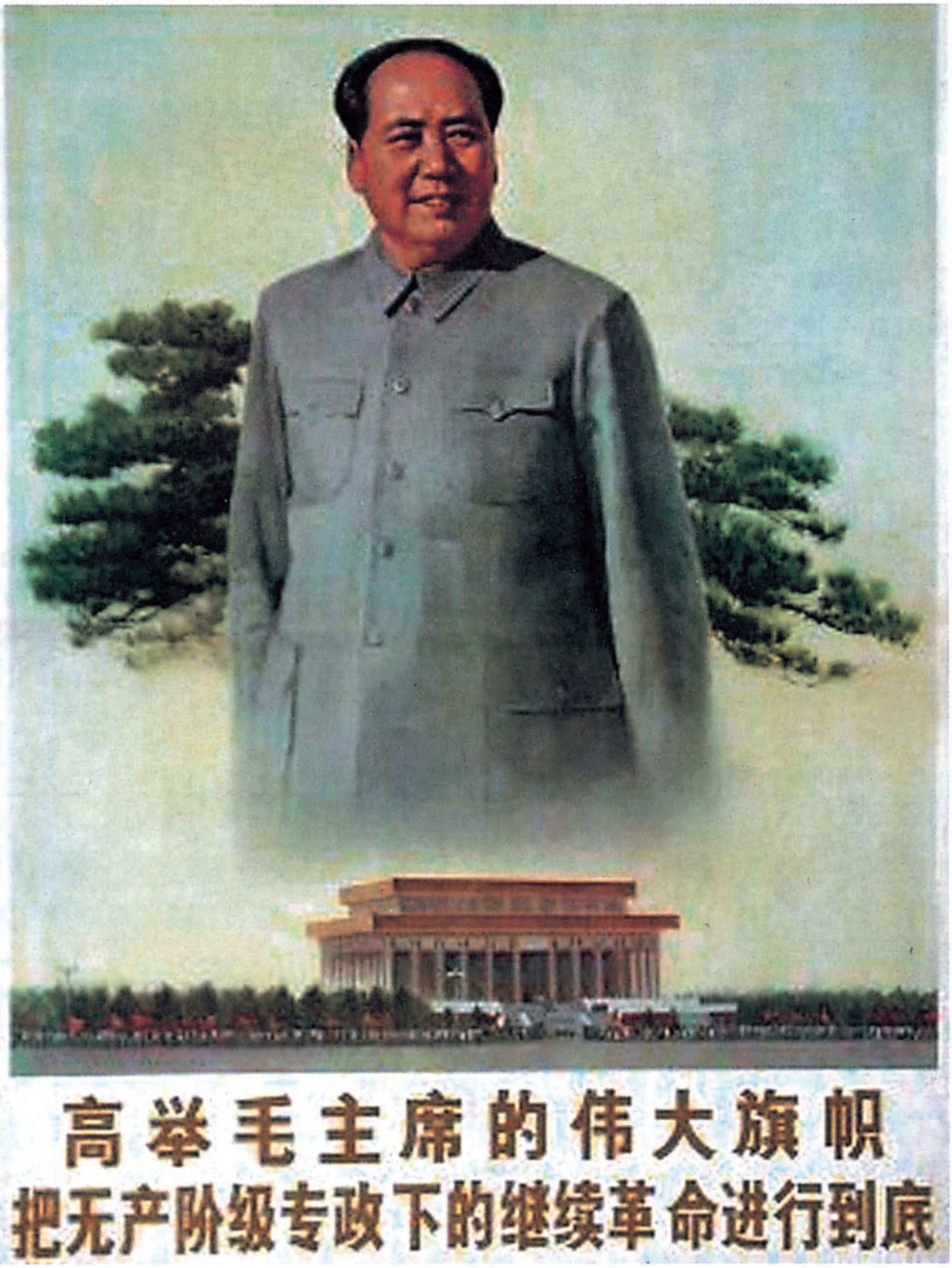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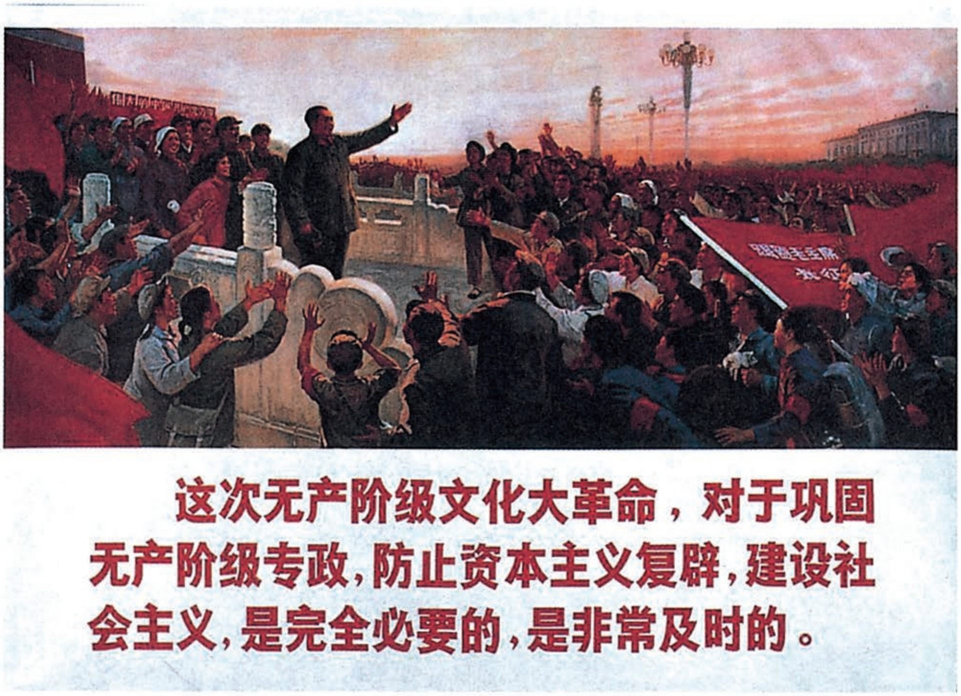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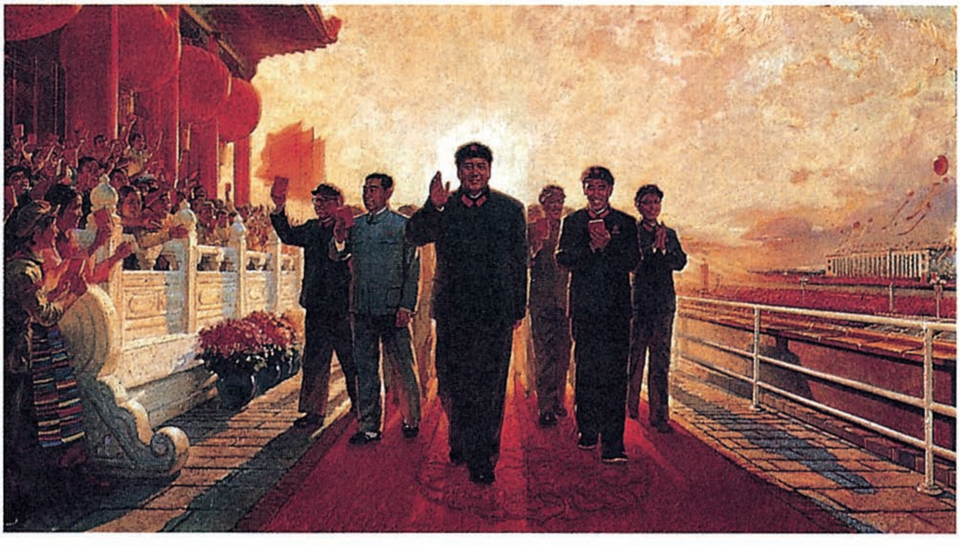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代表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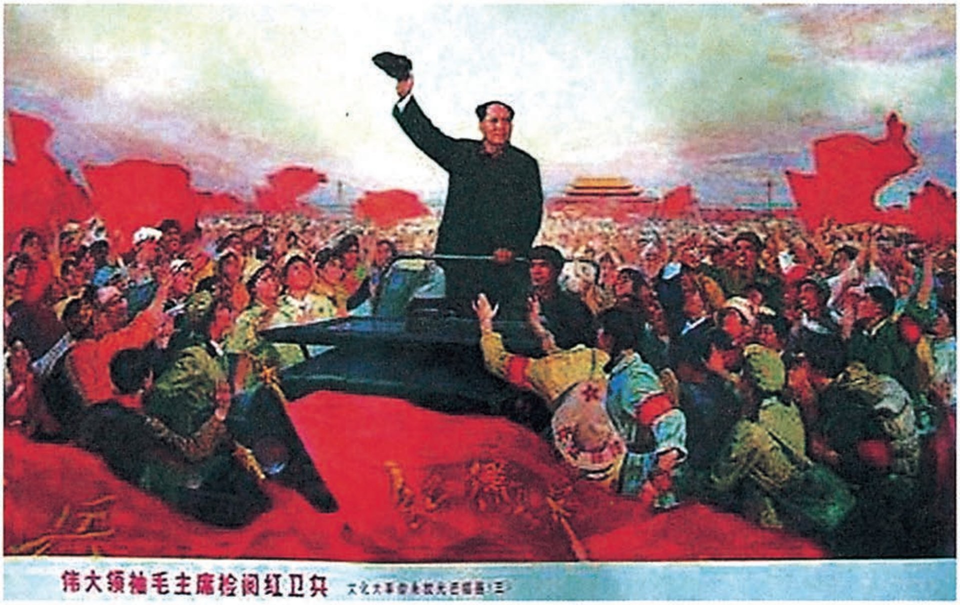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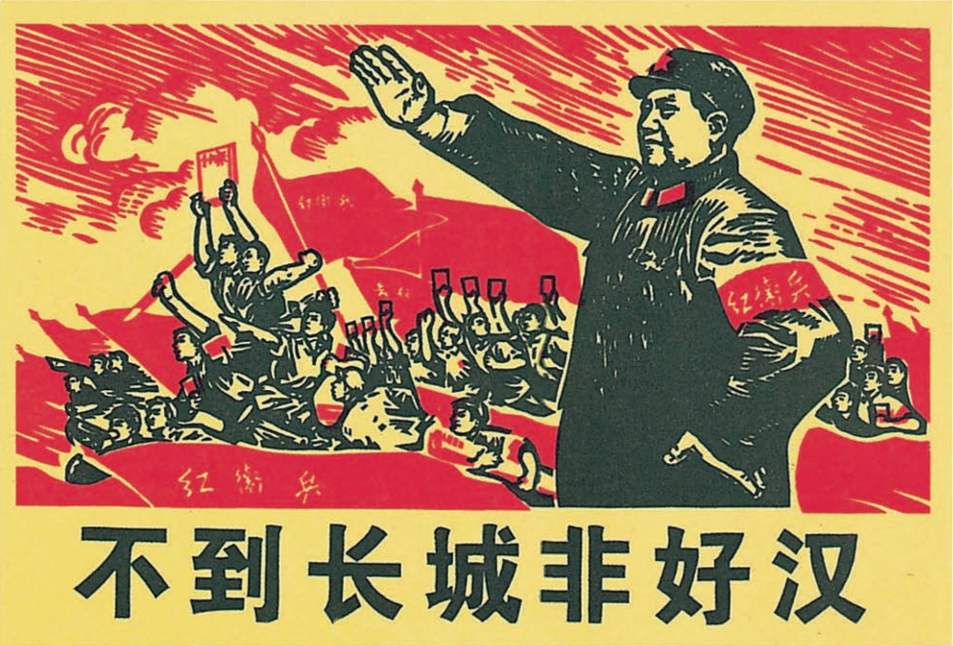
要把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宣传画）


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红卫兵

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宣传画）


红衛兵
红衛兵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到长城非好汉（宣传画）

在天安门城楼上
和北大附中红卫兵谈话纪要

（1966年8月1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陆平现在干什么？

□□□：陆平在北大扫地。

毛：陆平只能扫地，就像我一样，我到了你们学校也只能扫扫地，别的干不来，我是你们的勤务员。

毛：张承先也是个坏人，把你们红旗拆散了，你们要把红旗拉起来。你们发展多少人啦？

□□□：又发展了。

毛：这就对头了。

（□□□问主席身体好不好）

毛：我身体很好，我去长江里游泳，有个青年同志肝疼了，我就上来了。要不然可以游三四个小时。

（□□□问主席下一步应怎么办？）

毛：你们一斗二批三改，按十六条办事。

（毛问□□□是否会游泳）

□□□：才学会，游得不好，只会游十几米。

毛：那不叫游泳，那叫闲庭信步。（毛做了闲庭信步的动作）你要能这样，就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你们老怕别人批评，马克

思主义就是压出来的，经风雨，发展兴旺起来。

江青：不能让她出风头，要让她谦虚。

毛：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要让人家革命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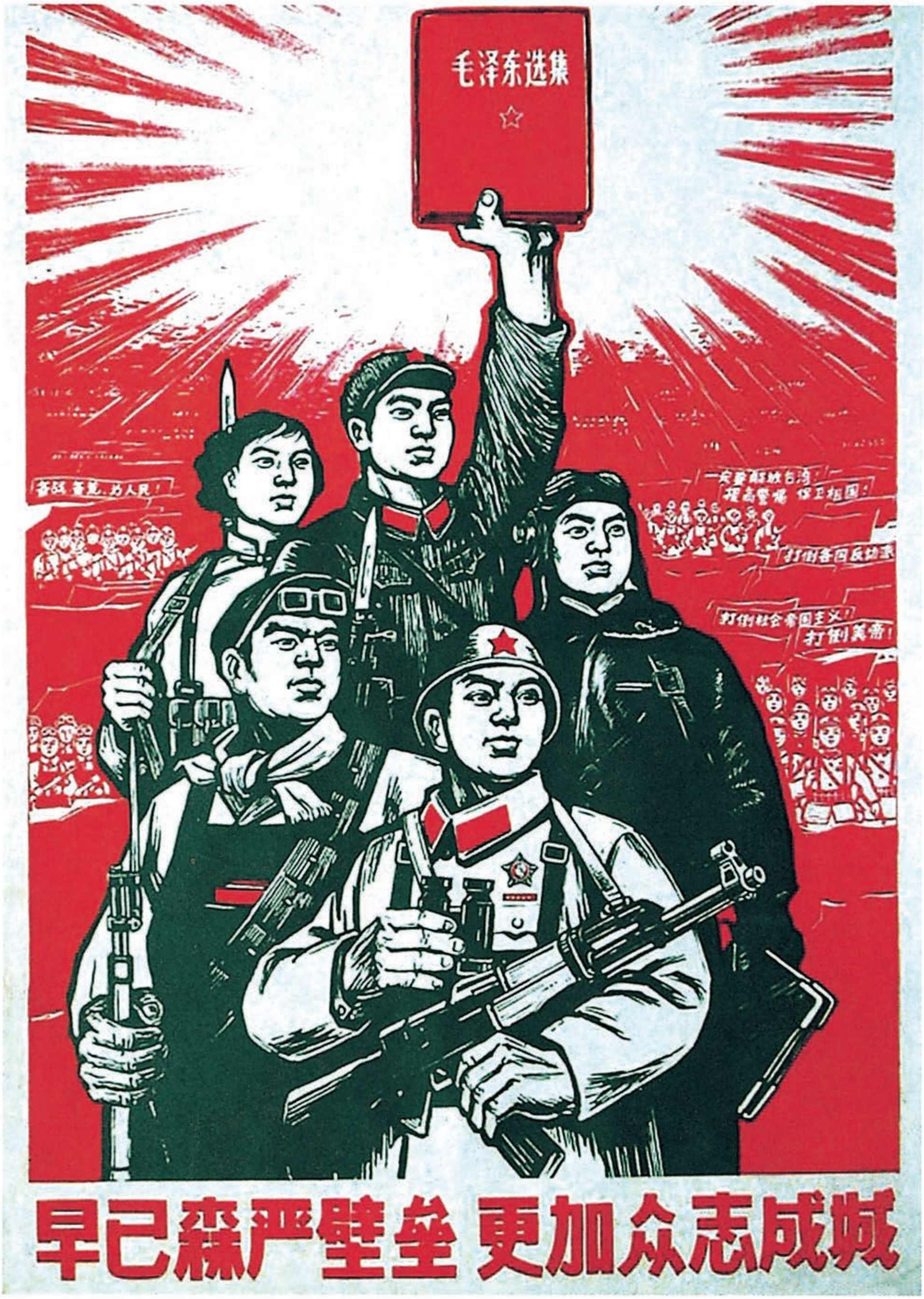
革命要靠自己

（19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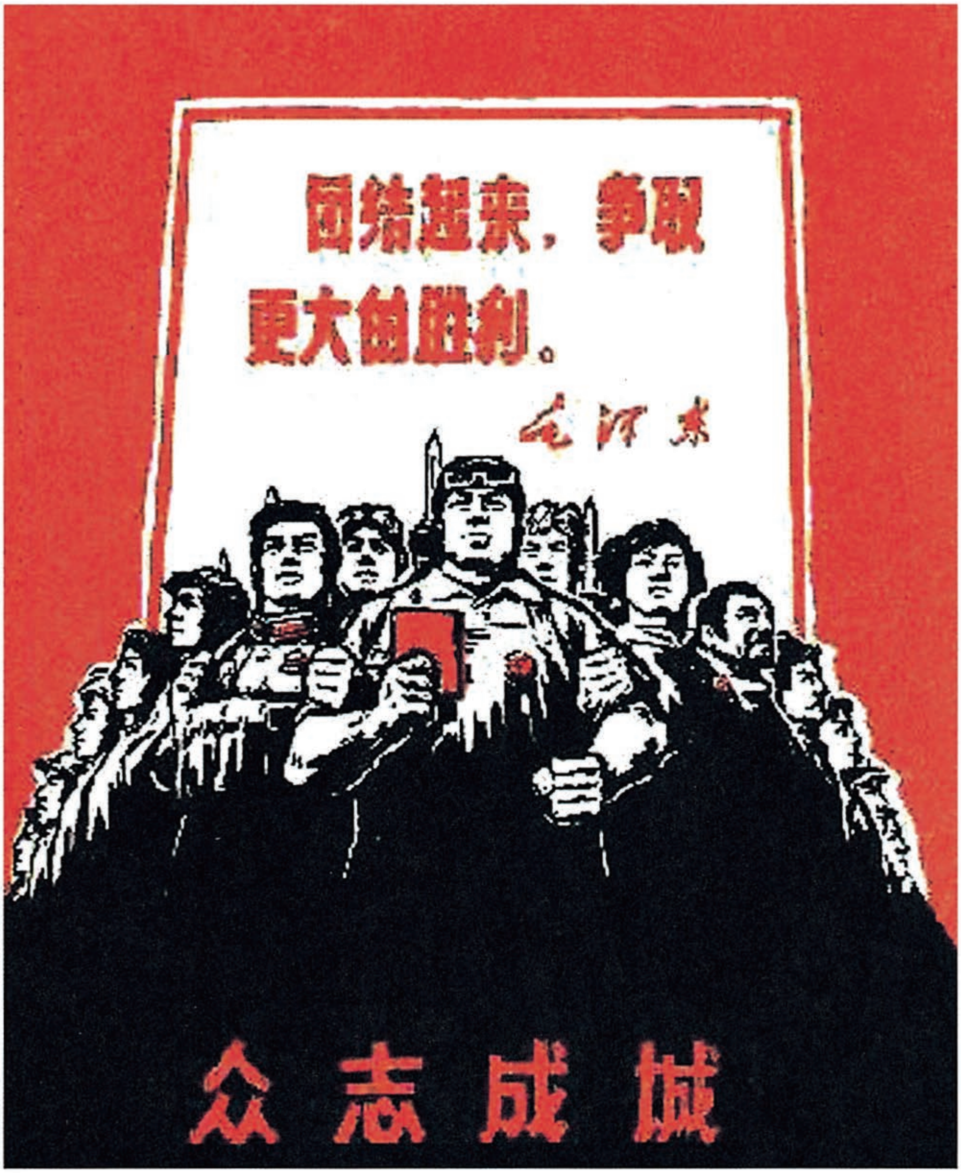
革命要靠自己。[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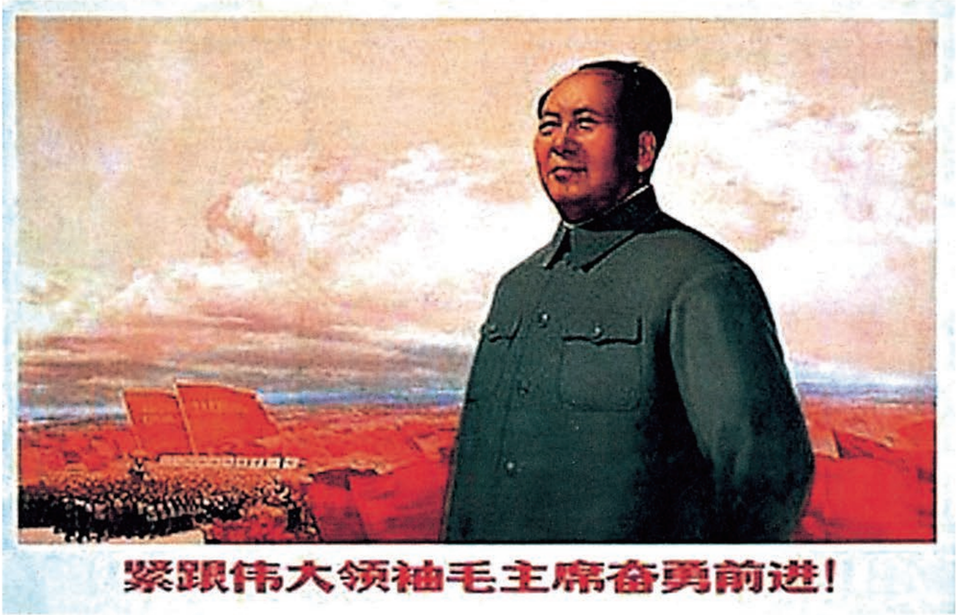
[1] 这是周恩来1966年8月18日在首都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毛泽东的话。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选集
备战 备荒 为人民！
一定要解放台湾！
提高警惕 保卫祖国！
打倒各国反动派
打倒社会帝国主义！
打倒美帝！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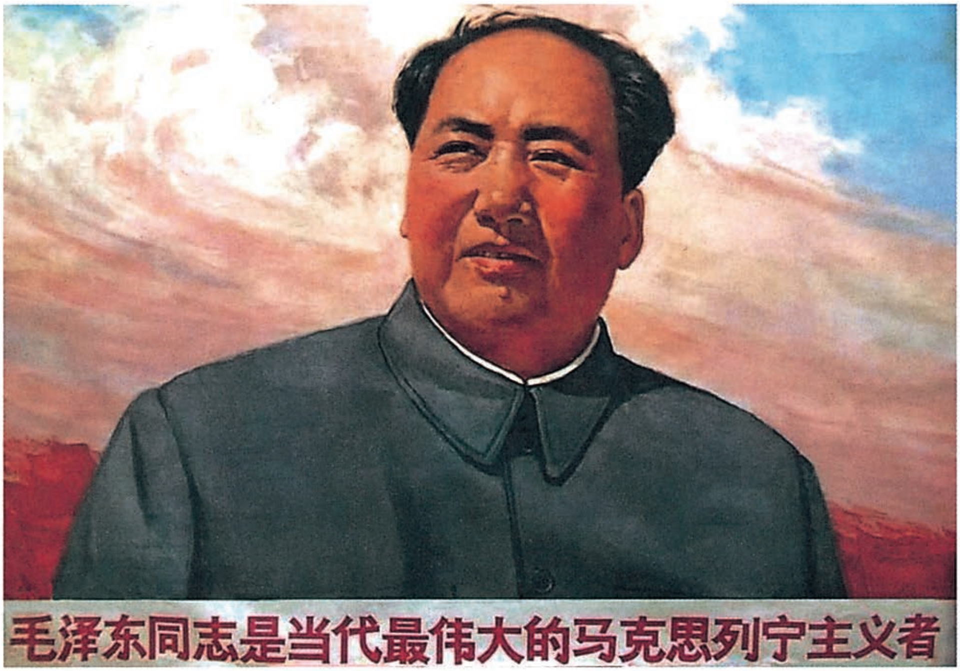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宣传画）


团结起来，争取
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
众志成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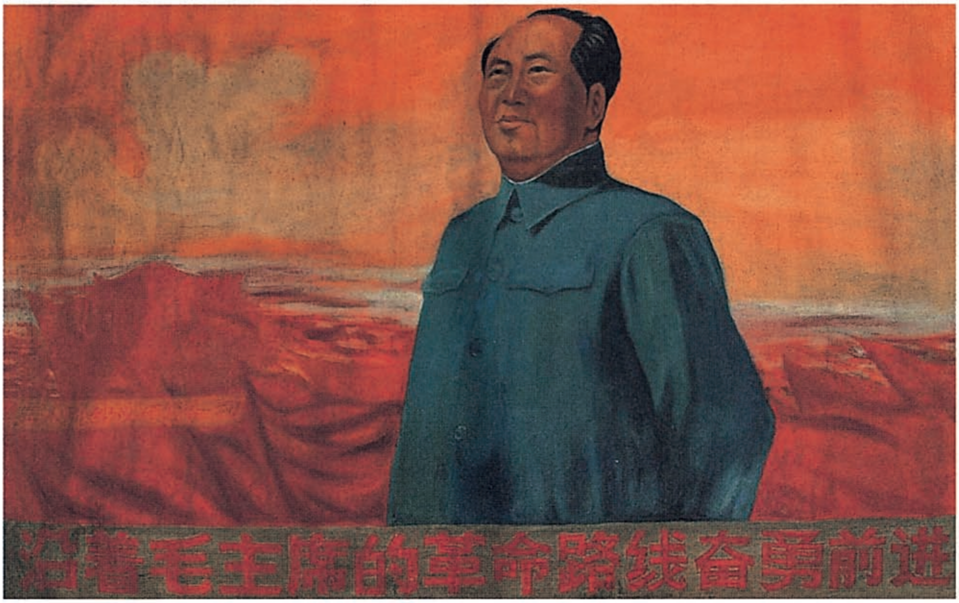
众志成城（宣传画）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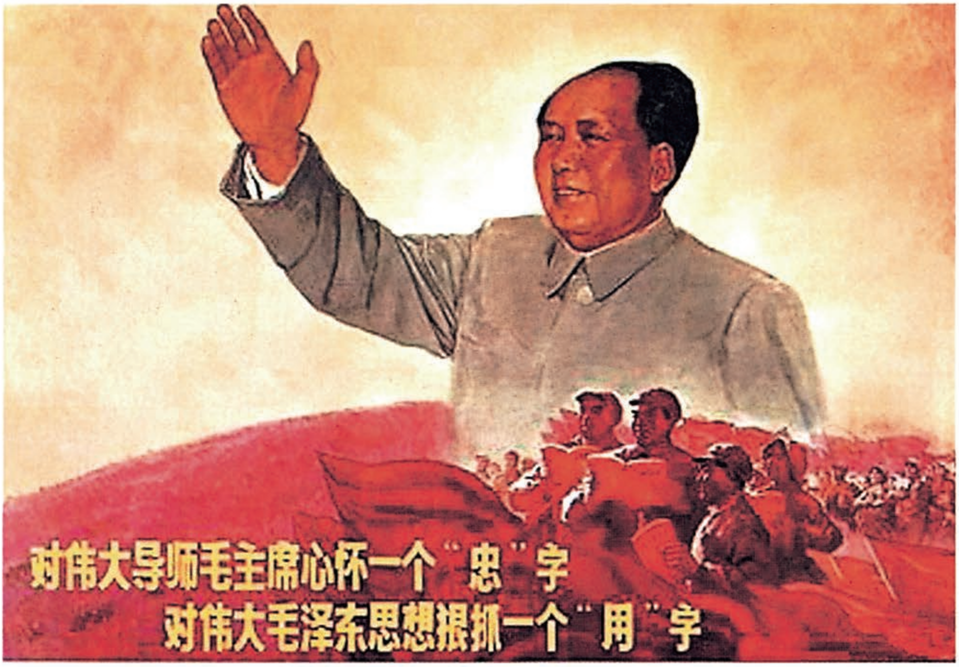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宣传画）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宣传画）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宣传画）


对伟大导师毛主席心怀一个“忠”字
对伟大毛泽东思想狠抓一个“用”字

对伟大导师毛主席心怀一个“忠”字，对伟大毛泽东思想狠抓一个“用”字。（宣传画）

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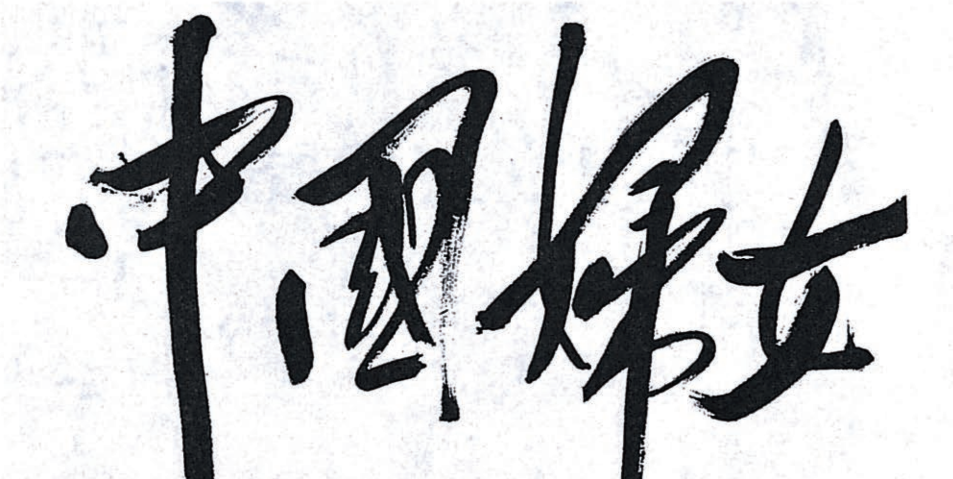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20日）

中国妇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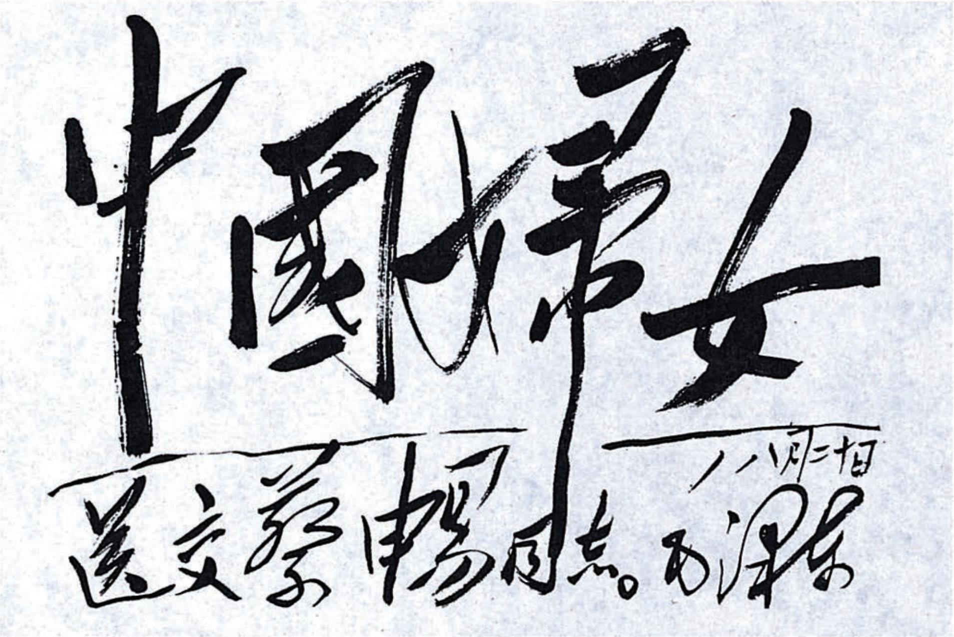
送交李畅同志。

毛泽东

八月二十日



毛泽东第二次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



中國婦女

送交蔡暢同志。毛澤東

八月二十日

毛泽东为《中国妇女》杂志题写的刊名。

对薄一波[1]来信的批语[2]

（1966年8月21日）

印发常委、文革小组及薄一波同志。

请一波同志将一个请求和一个设想，先用书面告我，然后谈话，可以缩短谈的时间。你是一个爱讲长话的人，我有点害怕听三四小时那样的长话。

毛泽东

八月二十一日夜

---

[1]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使他得到了平反昭雪。

[2] 这个批语写在薄一波1966年8月21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8月18日天安门上主席跟我握手并亲切勉励要我好好革命时，我深受感动。”“最近主席如果有时间，希望找我谈一次。我想主要谈两个问题：（一）工交各部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情况；同时检查我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及我的一个请求。（二）我对改革工业体制的一个设想。”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8月23日）

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乱它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运动。要提倡文斗，不要武斗。

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出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为什么反对不得？我出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有些问题要快些决定，如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写大字报上街有什么要紧？外国人照相就照相，无非是照我们的落后面，让帝国主义讲我们的坏话有什么要紧?!

对谢富治关于公安部机关精简设想[1]的批语

（1966年8月26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研究。我看这个设想是好的，应在下一次会议上谈一下。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

[1] 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1966年8月25日关于公安部机关的精简问题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今年4月主席在杭州关于公安部应砍掉2/3的指示精神，我们在5月间发动处以上干部就精简问题进行了鸣放辩论。经过几个月的酝酿，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解决精简问题已完全成熟了。目前公安部有行政编制1400多人，机构庞大。根据公安工作主要是依靠党、依靠群众的根本路线和上虚下实的原则，我们设想，把现在的12个局合并为6个，90个处合并为30多个，行政编制由1400多人减到400多人。企、事业单位现有7000多人，分别交给有关单位。我们还设想，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期，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彻底革命，力争把行政编制减到二三百人。

关于传阅文件问题的批语

（1966年8月26日）

陶铸[1]同志：

传阅文件，应注明退何人存档。

毛泽东

八月廿六日下午二时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在李富春关于国务院八个口机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报告[1]上的批语

（1966年8月28日）

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泽东

八月廿八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1966年8月21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写报告，汇报了国务院八个口（外事、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两个多月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对这些单位如何贯彻“十六条”，搞好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了十条意见。在8月29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此发表意见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

对关锋、戚本禹反映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6年8月28日）

此件[1]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2]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

---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关锋、戚本禹1966年8月26日给副组长江青的报告。报告中说，北京市的红卫兵在8月18日百万人大会后有了很大发展，各大、中学普遍建立了组织。当前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有一些缺点，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例如捉人、打人的现象很多，特别是捉了、打了一些好人和中间群众；抄家的范围宽了一些；对群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干预得多了一点。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的活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积极出来领导运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破坏文化大革命；（二）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报告提出了新北京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等四点建议。8月27日，江青将这个报告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个报告上。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陶鲁笳，当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966年，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爱·弗·希尔。

1966年8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比利时共产党中央书记格里巴。

在章士钊反映被抄家情况来信上的批语[1]

（1966年8月30日）

送总理酌处[2]。应当予以保护。

毛泽东
八月卅日

---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1966年8月30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8月29日晚被抄家的情况，请求毛泽东帮助，“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最要紧在不发生重复搜索”。毛泽东阅信后即在上面写了这个批语。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写的《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记载，9月1日，毛泽东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来信收到，甚为系念。已请总理予以布置，勿念为盼！”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信件和批语后，当即办理，并于8月30日下午2时在信封上批注：“已办。周注。”同时，他还亲笔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领导干部和著名民主人士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8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ＩＳＢＮ：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9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风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浍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6年8月31日）

七绝·炮打司令部* ……………………………………………23
（1966年8月）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24
（1966年8月）

对杨寅田大字报的批示 ………………………………………27
（1966年8月）

关于工作组 ……………………………………………………28
（1966年8月）

关于北航《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坚持斗争问题的指示 ……29
（1966年8月）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稿的批语…30
（1966年9月1日）

对傅连暲来信的批语 …………………………………………31
（1966年9月3日、12月28日）

对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的批语 ………33
（1966年9月4日）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 ………………………34
（1966年9月7日）

对《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 ……………… 36
（1966年9月7日）
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 37
（1966年9月8日）
关于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 ………………………… 38
（1966年9月9日）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 ……… 39
（1966年9月）
关于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一事给林彪等的信 ………………… 42
（1966年9月13日）
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
的批语 ……………………………………………………………… 43
（1966年9月14日）
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 …44
（1966年9月15日）
对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 46
（1966年9月15日）
关于中央文革 ……………………………………………………… 57
（1966年9月）
就左派队伍问题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 59
（1966年10月1日）
关于按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批语 ……………………………… 90
（1966年10月7日）
接见在京部队时的指示 …………………………………………… 91
（1966年10月13日）

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92
（1966年10月、11月）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102
（1966年10月24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09
（1966年10月25日）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21
（1966年10月25日）
在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时的指示 …………………………124
（1966年10月27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各大区同志的一段谈话……………………125
（1966年10月）
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126
（1966年10月）
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35
（1966年11月4日、7日）
对参加接见全国各地师生、红卫兵的一些负责人的谈话…………139
（1966年11月10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通知稿和补充通知稿的批语…151
（1966年11月16日、12月2日）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153
（1966年）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54
（1966年11月）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171
（1966年11月28日）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173
（1966年11月）
对中央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174
（1966年11月、1967年2月）
对《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新闻稿的批语………176
（1966年12月3日）
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185
（1966年12月6日）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186
（1966年12月15日）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200
（1966年12月25日）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201
（1966年12月26日、28日）
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203
（1966年12月26日）
给周恩来的信……………………………………………………………213
（1966年12月27日）
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　…214
（1966年12月28日）
对《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指示》的批示……………………215
（1966年12月29日）
赞扬参加接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工作…………216
（1966年12月）
关于复员转业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220
（1966年12月）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的四点指示……………………………221
（1966年12月）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民主…………………………………222
（1966年12月）
要保护和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224
（1966年）
和林彪的一段谈话（摘录）…………………………………225
（1966年）
赠叶剑英联……………………………………………………226
（1966年）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指示…………………………231
（1967年1月1日）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的批语…232
（1967年1月6日）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233
（1967年1月8日）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234
（1967年1月9日）
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237
（1967年1月9日）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238
（1967年1月10日）
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份材料的批语………240
（1967年1月11日）

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的批语…242
（1967年1月12日、13日）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245
（1967年1月1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246
(1967年1月16日)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247
（1967年1月21日）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上的批语…248
（1967年1月21日）
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的批语…249
（1967年1月21日）
对广播系统夺权的指示………………………………………250
（1967年1月23日）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251
（1967年1月23日）
对张春桥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252
（1967年1月23日）
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253
（1967年1月）
要节约闹革命…………………………………………………254
（1967年）
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问题的批语……………………………255
（1967年1月26日）
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56
（1967年1月、2月）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60
（1967年1月27日）
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261
（1967年1月27日）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上的批语……………………262
（1967年1月27日）
关于外国朋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263
（1967年1月28日）
对谭震林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264
（1967年1月30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
和修改…………………………………………………………265
（1967年1月30日）
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269
（1967年1月31日）
和周恩来谈夺权问题…………………………………………270
（1967年1月）
和外宾谈如何看大字报………………………………………272
（1967年1月）
关于接管的指示………………………………………………273
（1967年1月）
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就医的批语 …………………274
（1967年2月2日）
对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的批语………………………275
（1967年2月2日）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277
（1967年2月3日）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上的批语 ……………………………278
（1967年2月7日、8日）
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280
（1967年2月8日）
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289
（1967年2月9日）
关于播发《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批语…292
（1967年2月9日）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和补充规定稿的批语………………………………………………………293
（1967年2月）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296
（1967年2月12日、18日）
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的批语…302
（1967年2月14日）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303
（1967年2月14日）
对谭震林给林彪的信的批语………………………………………304
（1967年2月17日）
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305
（1967年2月18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307
（1967年2月18日、22日）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309
（1967年2月19日、3月23日）

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稿上的批语……………………311
（1967年2月20日）
对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的批语…312
（1967年2月20日）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313
（1967年2月24日、28日）
关于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等问题的批语………315
（1967年2月27日）
对张日清《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的批语…317
（1967年2月27日）
关于夺权的提法的指示…………………………………………318
（1967年2月27日）
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319
（1967年2月28日）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的指示…………………………………………320
（1967年2月）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321
（1967年2月）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322
（1967年3月3日）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323
（1967年3月7日）
对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材料的批语……………………325
（1967年3月7日）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326
（1967年3月7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 ···327

（1967年3月7日）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329

（1967年）

对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报告的批语 ·····························330

（1967年3月9日）

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331

（1967年3月10日）

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336

（1967年3月）

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布告的指示稿的批语···················337

（1967年3月）

对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的批语···············339

（1967年3月）

对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341

（1967年3月16日）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342

（1967年3月19日）

对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稿的批语···················344

（1967年3月19日）

对聂荣臻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请示报告的批语···345

（1967年3月20日）

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347

（1967年3月20日）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348
（1967年3月23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的批语……………351
（1967年3月23日）
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上的批语……………352
（1967年3月27日）
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文的批语……………353
（1967年3月29日）
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354
（1967年3月30日）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一文的批语…358
（1967年3月30日）
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 ……………359
（1967年3月）
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360
（1967年3月）
对报纸工作的指示……………361
（1967年3月）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362
（1967年3月）
关于批判《修养》的谈话……………363
（1967年3月、4月）
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等问题的指示……………365
（1967年3月）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366
（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381
（1967年4月1日）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382
（1967年4月4日、6日）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386
（1967年4月）
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390
（1967年4月19日）
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391
（1967年4月23日）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393
（1967年4月23日）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批语和注文……394
（1967年4月23日）
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399
（1967年4月）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400
（1967年4月）
和某同志的一段谈话……401
（1967年4月）
关于军管问题……402
（1967年4月）

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403
（1967年4月）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404
（1967年4月）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405
（1967年4、5月）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408
（1967年5月1日）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 ………………………………………416
（1967年5月1日）
“五一”节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418
（1967年5月1日）
在“五一”节中南海晚会上的谈话……………………………………422
（1967年5月1日）
对棉粮工作的指示………………………………………………………423
（1967年5月1日）
关于大批判问题的指示…………………………………………………424
（1967年5月2日）
对《〈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批语和修改…425
（1967年5月4日、6日、7日）
对张香山关于《矛盾论》中一段引文翻译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428
（1967年5月4日）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430
（1967年5月7日）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432
（1967年5月7日）

关于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材料等的批语 ···433
（1967年5月7日）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434
（1967年）
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435
（1967年5月9日）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437
（1967年5月10日）
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439
（1967年5月11日）
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来信上的批语·····························440
（1967年5月13日）
对北京市革委会重要通告的批语·······································442
（1967年5月）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写的批语···446
（1967年5月14日）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449
（1967年5月18日）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452
（1967年5月23日）
关于江青不宜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批语·································453
（1967年5月26日）
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454
（1967年5月27日）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456
（1967年5月28日）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上的批语……457
（1967年5月29日）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458
（1967年5月、7月）
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461
（1967年5月）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462
（1967年5月）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463
（1967年5月）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467
（1967年5月）
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469
（1967年5月）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470
（1967年5月）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471
（1967年5月）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472
（1967年5月）
老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474
（1967年）
关于夏收的指示……475
（1967年6月3日）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480
（1967年6月18日）
对一封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讲阔气、讲排场等问题来信的批语…481
（1967年6月21日）
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483
（1967年6月29日）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484
（1967年）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485
（1967年6月、11月）
看到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487
（1967年6月）
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488
（1967年6月）
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489
（1967年6月）
有了错误就改……………………………………………………………491
（1967年6月）
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492
（1967年6月）
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的谈话（节录）…………………………493
（1967年6月24日）
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496
（1967年6月）
对姚文元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指示………………………………………497
（1967年6月）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的谈话……………………498
（1967年6月）
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499
（1967年7月1日）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500
（1967年7月5日、13日）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502
（1967年7月6日）
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503
（1967年7月6日、12月6日）
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06
（1967年7月7日）
在听了氢弹工作会议汇报后的讲话………………………………507
（1967年7月7日）
毛泽东等悼念阮志清逝世的唁电…………………………………510
（1967年7月8日）
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的批语……………………………………………………………511
（1967年7月12日）
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的批语………………512
（1967年7月13日）
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514
（1967年7月13日）
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话………………………………………515
（1967年7月13日）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518
（1967年7月25日）

对林彪[1]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2]

（1966年8月31日）

退林彪同志：

这样修改[3]很好。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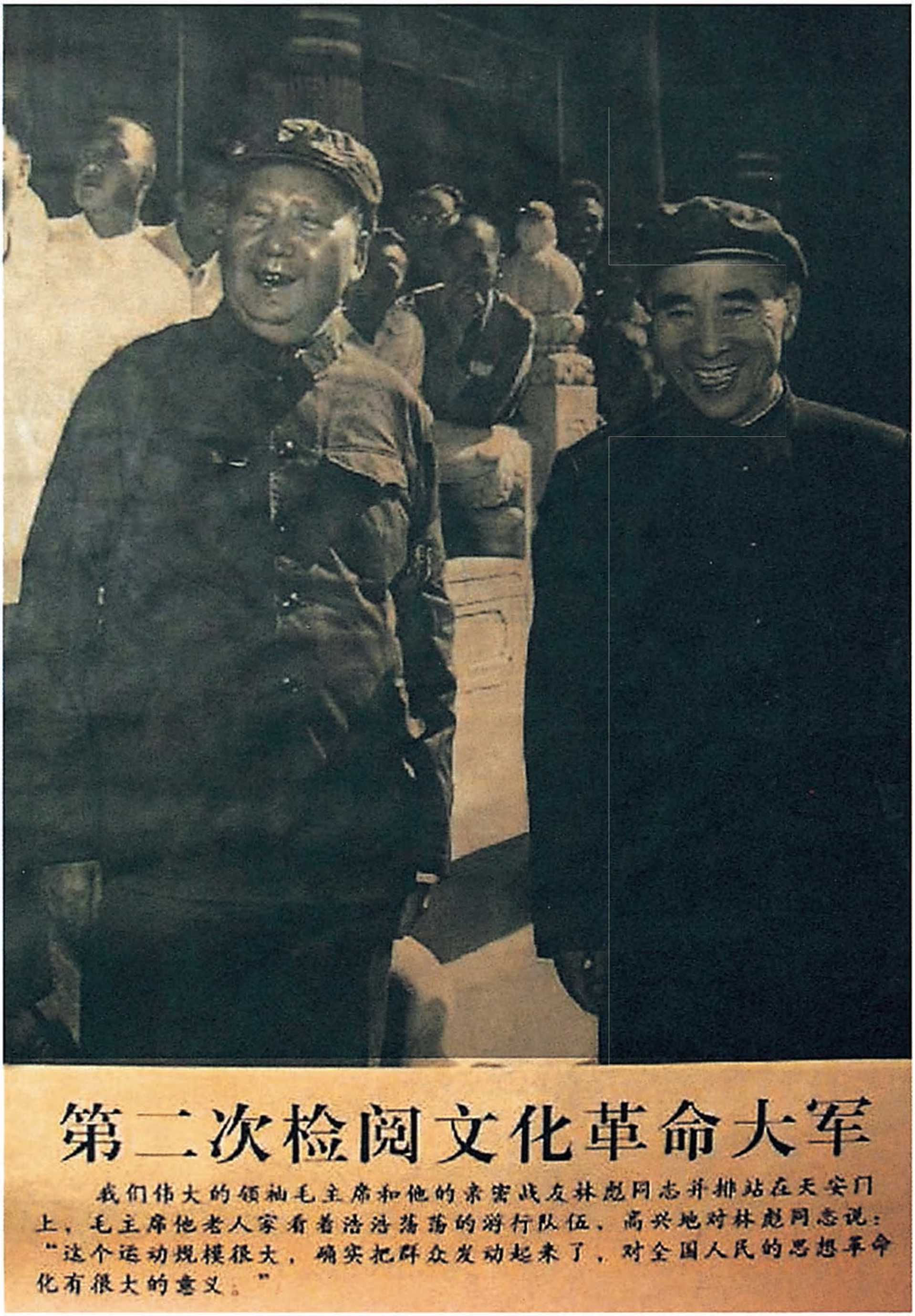
八月卅一日上午十一时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1966年8月3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北京及全国各地的五十万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和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是毛泽东对林彪8月31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

[3] 指林彪在送审的讲话稿中加写的两句话，即在讲话稿中“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这段话后面，加写了“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第二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并排站在天安门上，毛主席他老人家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高兴地对林彪同志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第二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资料图片

1966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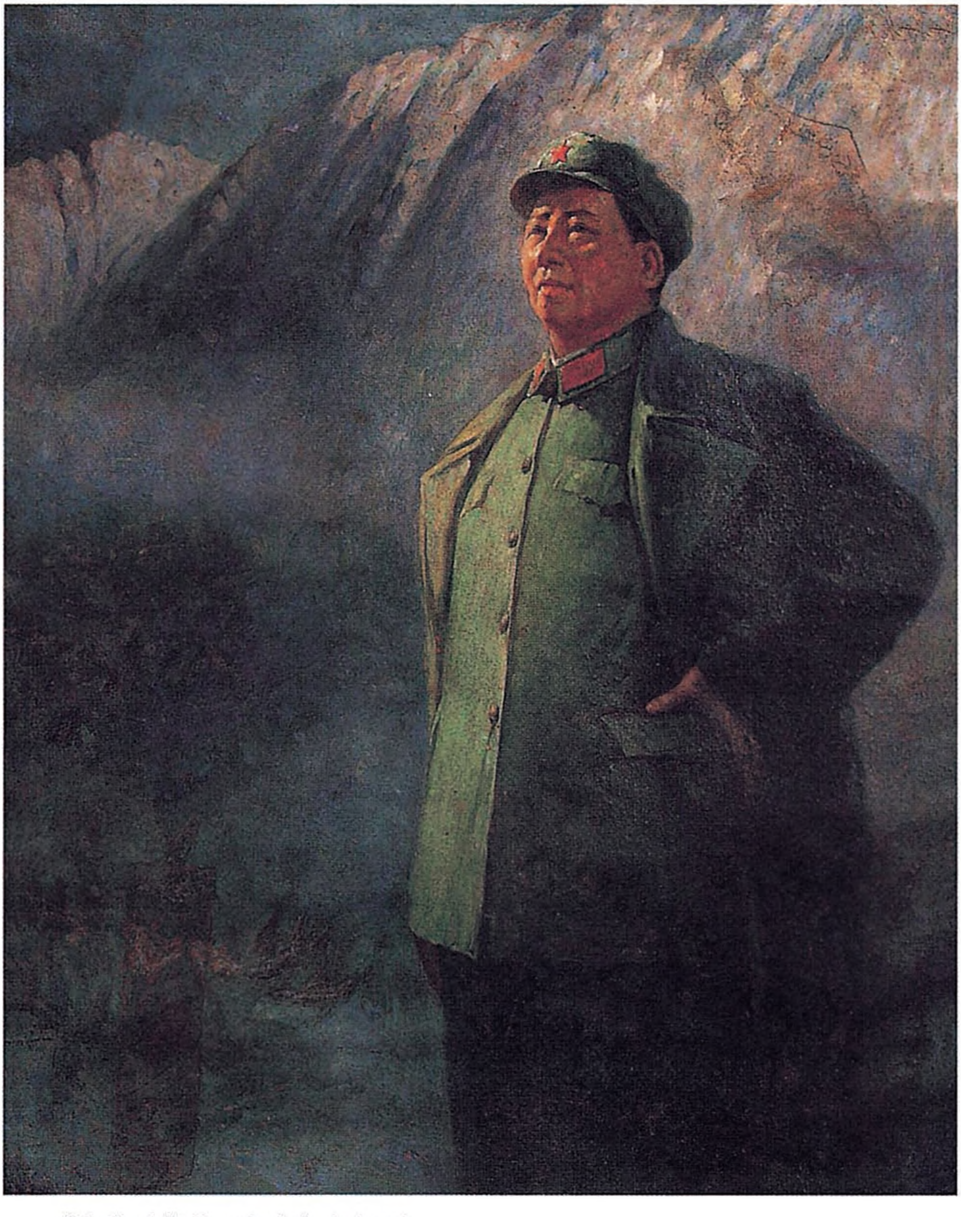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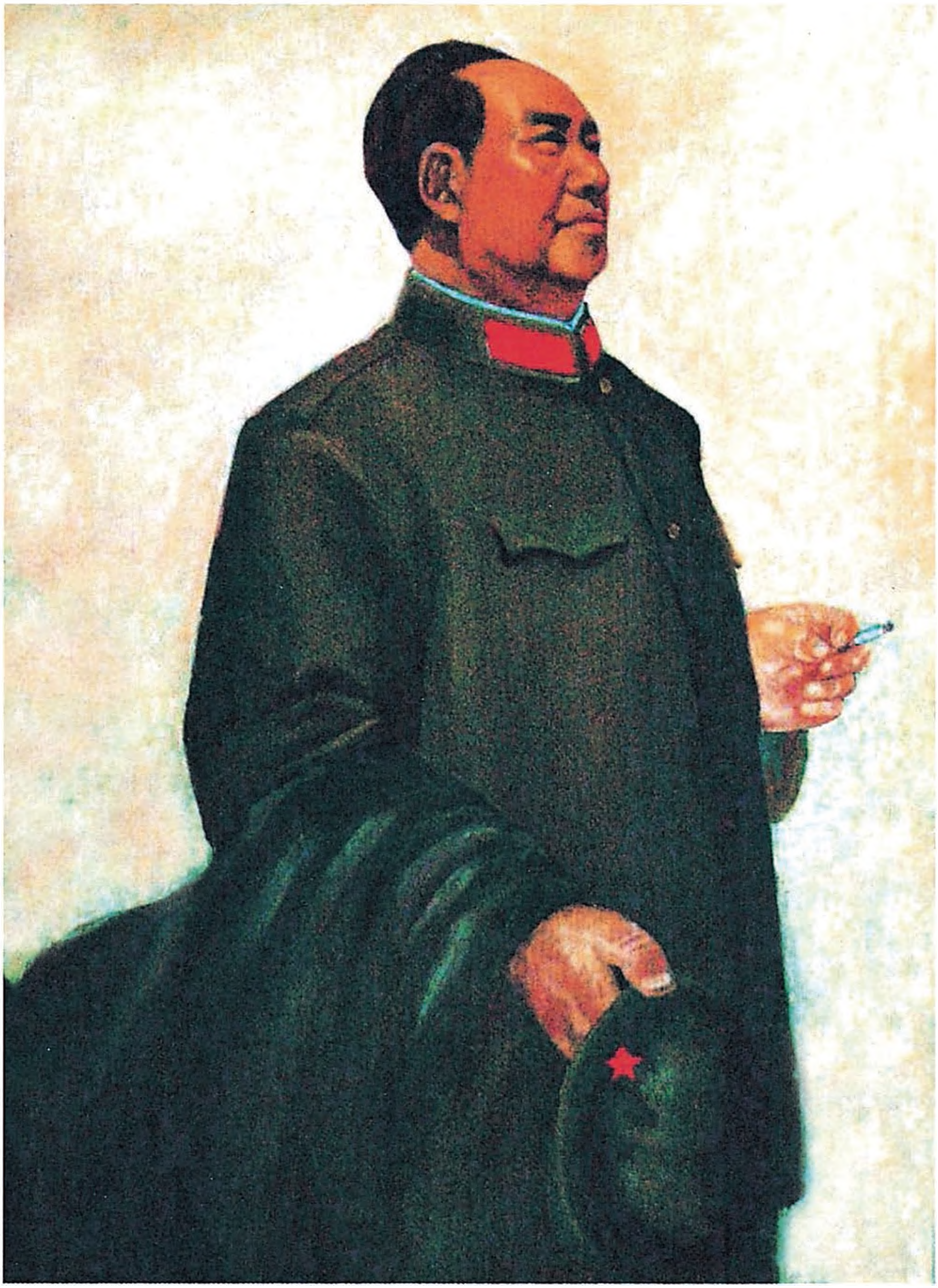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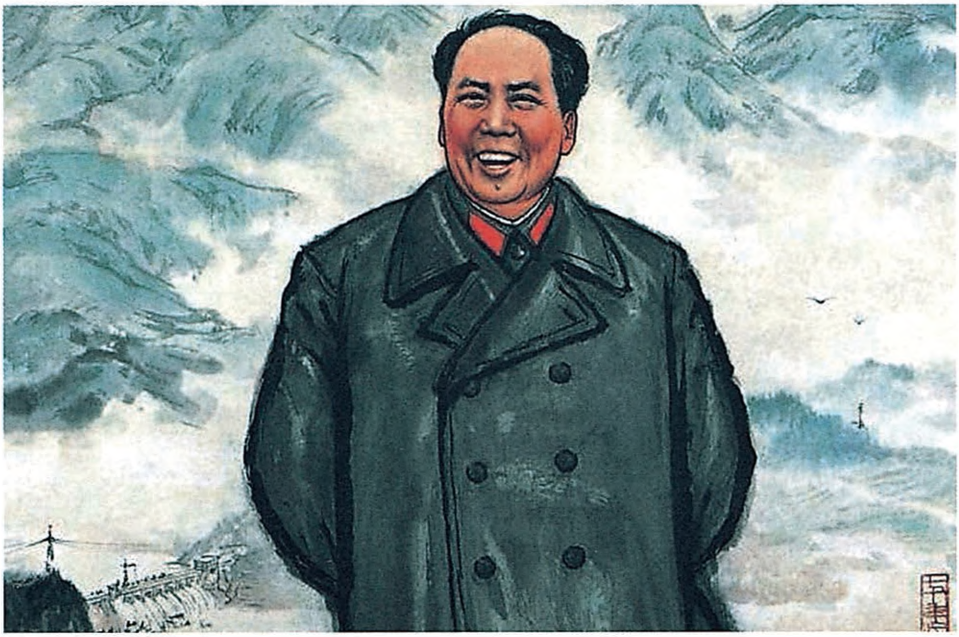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和革命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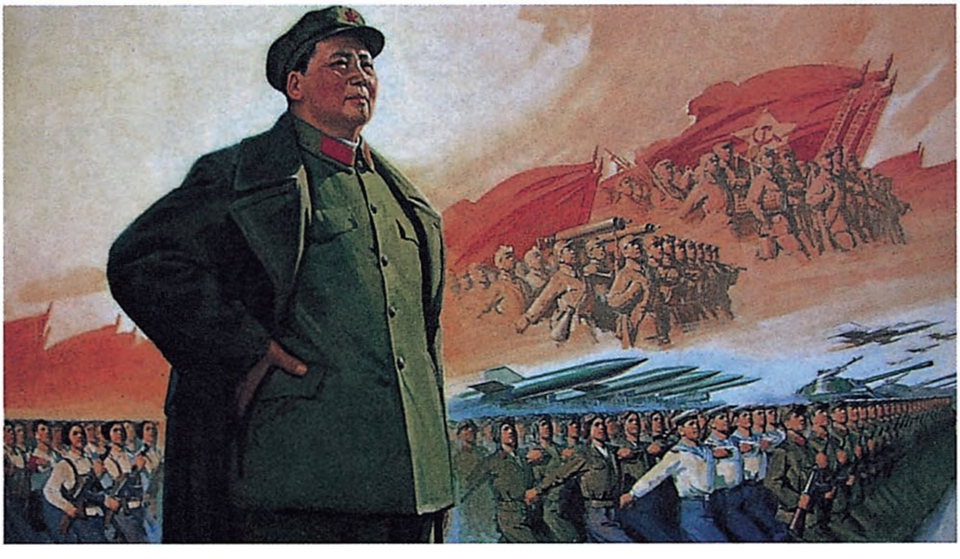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油画）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油画）



《文革时期的毛泽东》（中国画）



人民军队（宣传画）

七绝·炮打司令部[*]

（1966年8月）

人民胜利今何在？
满路新贵满目衰。
核弹高置昆仑巅，
摧尽腐朽方释怀。

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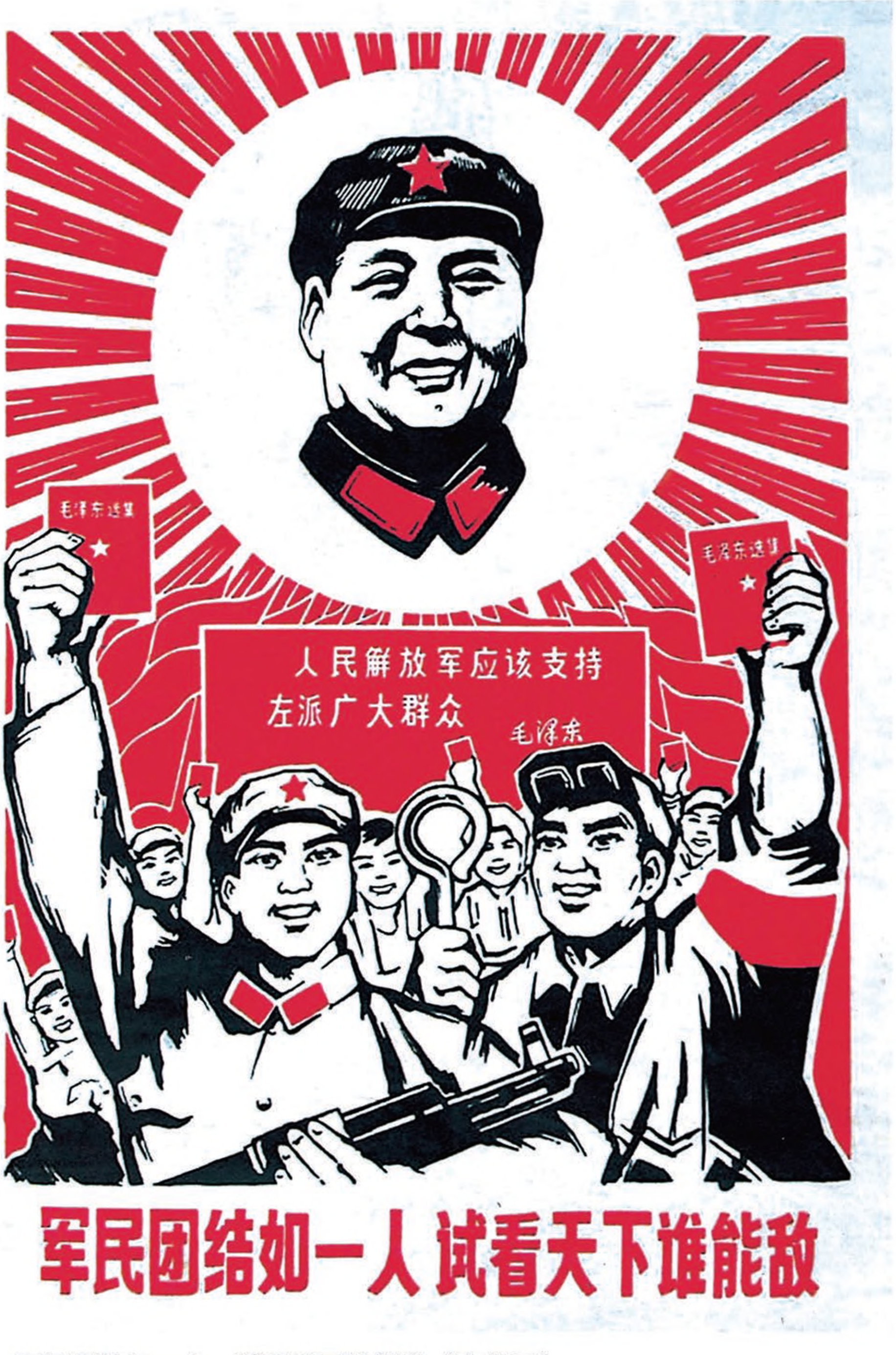
（1966年8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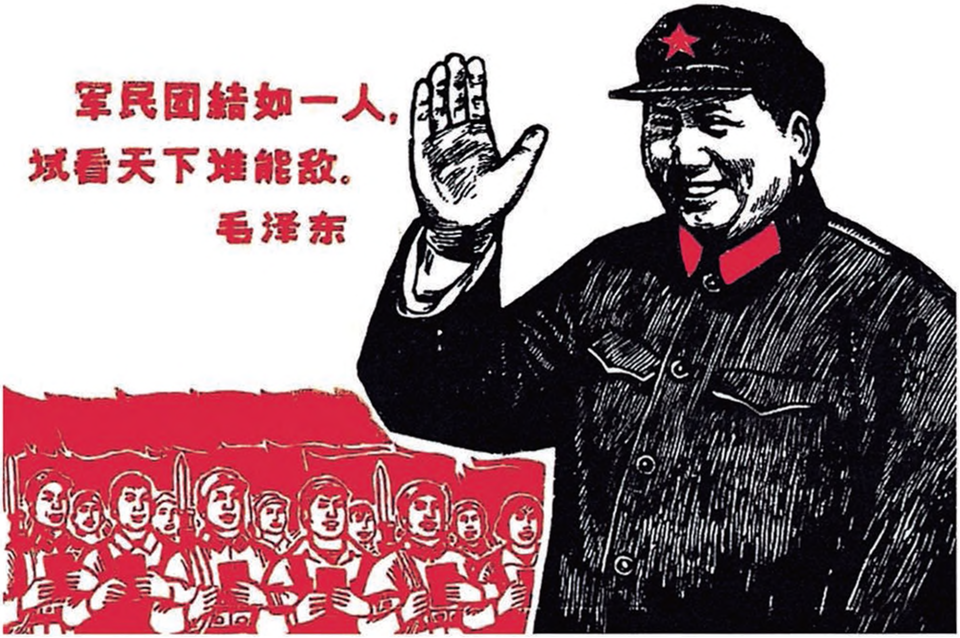
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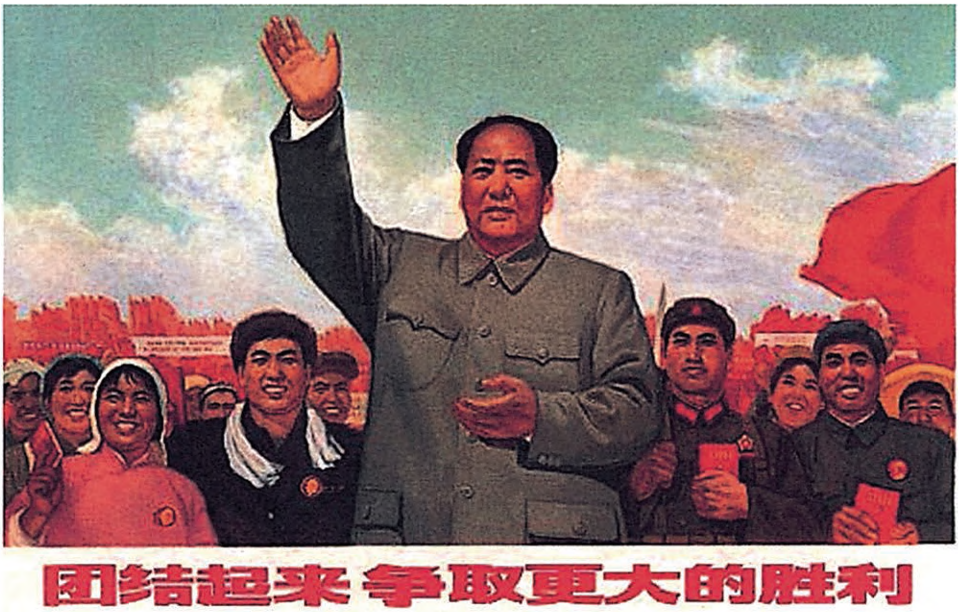
[1] 这是《人民日报》1966年9月5日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引用的毛泽东的两句话。此前的8月29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过：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
左派广大群众
毛泽东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宣传画）


军民团结如一人，
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宣传画）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宣传画）

对杨寅田大字报的批示

（1966年8月）

印发全会（指十一中全会）各同志。将杨寅田大字报题目用特号字，全文用老五号刊出。

关于工作组

（1966年8月）

全国的工作组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犯了普遍性的方向和路线错误。

关于北航《红旗战斗队》在国防科委坚持斗争问题的指示

（1966年8月）

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知稿的批语[1]

（1966年9月1日）

退总理。此件不发。

毛泽东

九月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6年8月30日送审的通知稿上。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通知稿中把这些部门和单位分为十六类，一一列出。二、对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三、重要档案应加以封存。四、此通知发至县团级，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布。

对傅连暲来信的批语[1]

（1966年9月3日、12月28日）

一

送陶铸同志酌处[2]。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

毛泽东

九月三日

二

傅医生：

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

---

[1] 本篇一是对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1966年8月28日来信的批语。傅连暲在信中向毛泽东反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帽子，请求给予保护。本篇二是对傅连暲12月12日来信的批语。傅连暲在这封信中讲到自从对他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包括全国政协常委的待遇）都被取消，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

[2]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66年9月3日，他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即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按主席批示，对傅加以保护。”

谈不到，等将来再说。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

毛泽东又及

对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告西北局的两份电报的批语[1]

（1966年9月4日）

照发。

毛泽东

九月四日

---

[1] 本篇是对周恩来1966年9月4日送审的三份文件的批语。三份文件中有两件是中共中央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并西北局的电报，当日分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1966年第四五一、四五二号下发。这两件电报分别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方针。王恩茂同志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北京学生们解释新疆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是加强维汉民族的团结，防止苏修和少数民族主义者的挑拨利用。”“为了保障边境安全，不使苏修有机可乘，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机关、企事业等单位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以满足群众要求，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办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进行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经过说服，动员他们离开。此事望你们严格掌握。”赛福鼎，当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王恩茂，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1]

（1966年9月7日）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2]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3]，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1966年9月4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3] 196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决定。

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1]，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2]，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3]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

毛泽东
九月七日

---

[1] 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

[2] 郭影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3]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对《关于长沙、青岛、西安等地情况报告》的批示

（1966年9月7日）

林彪、恩来、康生、伯达、江青等同志：

此件请看一看，青岛、西安、长沙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然后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之外，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我看谭启龙和这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

对四位美国专家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

（1966年9月8日）

林彪、总理、陈毅、陶铸、伯达[1]五同志：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2]，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八日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总理，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伯达，即陈伯达。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调查组1966年9月7日抄录的阳早等四位美国专家给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我们坚决反对政治、生活上的特殊待遇，坚决要求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容许成为修正主义分子。为此，我们要求：1. 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 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 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5. 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 我们的孩子和中国人的孩子受到同样待遇和严格要求。7. 生活待遇和同级工作人员一样。8. 取消特殊化。

关于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的批语

（1966年9月9日）

退陈毅[1]同志：

这个批评文件[2]写得很好，值得一切驻外机关注意，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可以先从维也纳做起。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九日

---

[1] 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外事办公室主任。

[2] 指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组1966年9月8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中涉外问题情况简报》第九号上登载的一位奥地利人写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信。信中除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行为表示赞赏外，还对中国派驻维也纳使馆有关人员的衣着和用车过于高级豪华提出批评，希望“向有关当局报告并且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与这期简报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共青团中央机关文革筹委会、临时书记处9月8日印发的《一坦桑尼亚群众来信对我外事活动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提出尖锐批评》的材料，批评我驻坦使馆在外交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毛泽东的批语写在第九号简报上。

对中央关于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稿的批语

（1966年9月）

一

陶铸[1]同志：

标语、口号太多，是烦琐哲学，要大精简，各有十几条就够了，至多总共不要超过三十条。多了，谁也不记得，不看作一回事了。请再议削，印出交来。[2]

毛泽东

九月十日

---

[1] 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宣传部部长。

[2]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0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1966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标语、口号的通知稿上。通知稿除提出国庆节挂像、抬像的三条规定外，还列举了标语60条、口号40条，共100条。毛泽东在审阅时，对标语作了大量的删减。

二

陶铸同志：

省得多了，不知送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没有？如未，请送他们议一下。[1]

毛泽东
九月十二日

三

林彪[2]同志阅后退陶铸同志照办。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下午

凡事要思索，不宜仓猝作出决定。

---

[1]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1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修改后的标语与口号合在一起，共30条。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凡大事要征求较多同志的意见。请陶、周、任重[1]注意。标语、口号由100条改为23条，较好，是一教训。毛又及[2]

四

同意。[3]

五

同意。[4]

---

[1] 陶，指陶铸。周，指周恩来。任重，即王任重，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4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陶铸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遵示送文革小组讨论，又修改了一次，特再送陈审阅。"这次修改稿的标题改为《关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挂像、抬像办法和口号的通知》，其中口号被压缩为23条。

[3]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5日晨2时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这次送审稿对23条口号又作了个别内容上的修改。

[4] 这个批语写在陶铸1966年9月16日送审的通知修改稿上。这次送审稿上加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两条口号，最后定稿为25条。9月17日，中共中央将这一通知下发到县团级。

关于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一事给林彪[1]等的信

（1966年9月13日）

林彪、总理、陶铸[2]同志：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3]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十九时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总理，指周恩来。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3] 据196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新华社15日电讯稿报道，毛泽东于15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又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及首都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1]的批语

（1966年9月14日）

少奇同志：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2]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十四日

---

[1] 这个检讨提纲修改后，改在1966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对林彪[1]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6年9月15日）

一

很好。改了一点，请林酌定。

二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1966年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首都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师生和红卫兵。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分别发表讲话。本篇一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9月15日晨送审的林彪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对这个讲话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派。炮打司令部，就是炮打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斗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很明显，一小撮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我们不同，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为首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他们的专政，他们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我们能容许他们这样干吗？不能，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识破他们，不要让他们的阴谋得逞。他们只是一小撮人，但是他们有时能够欺骗一些好人。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一起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一起（宣传画）

对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6年9月15日）

一

同意。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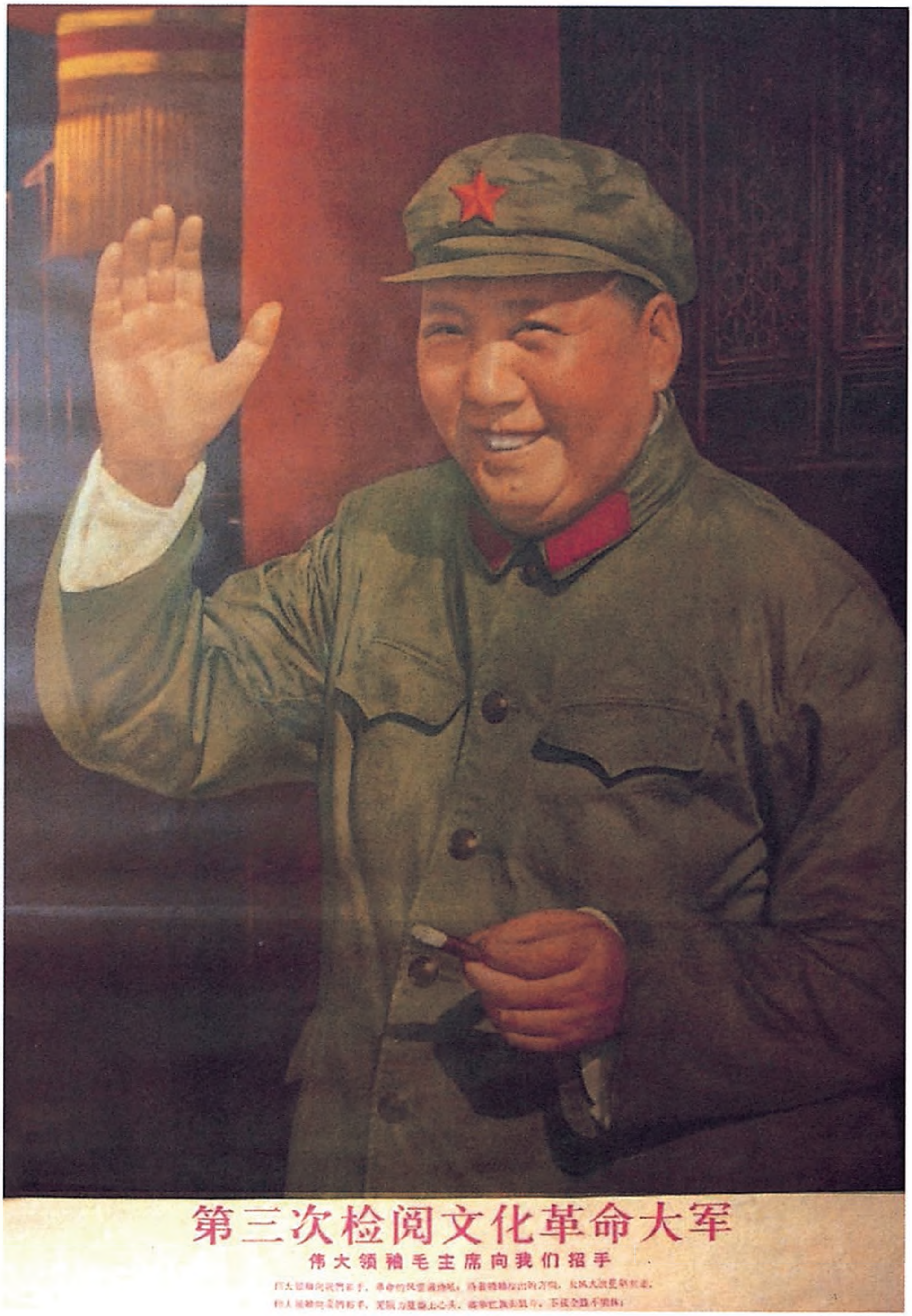
可以由两个人讲。

毛泽东
十五日上午十点半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1966年9月15日晨2时送审的周恩来讲话稿的批语。周恩来9月14日将这份讲话稿送陶铸时提出：“我仍主只由林彪同志一人讲即可，已函请主席批示。”陶铸在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我意明天还是由林总与总理两个都讲较好。请主席批示。”本篇二即是对此事而写的。9月15日下午，周恩来根据这个讲稿在接见大会上作了讲话。其中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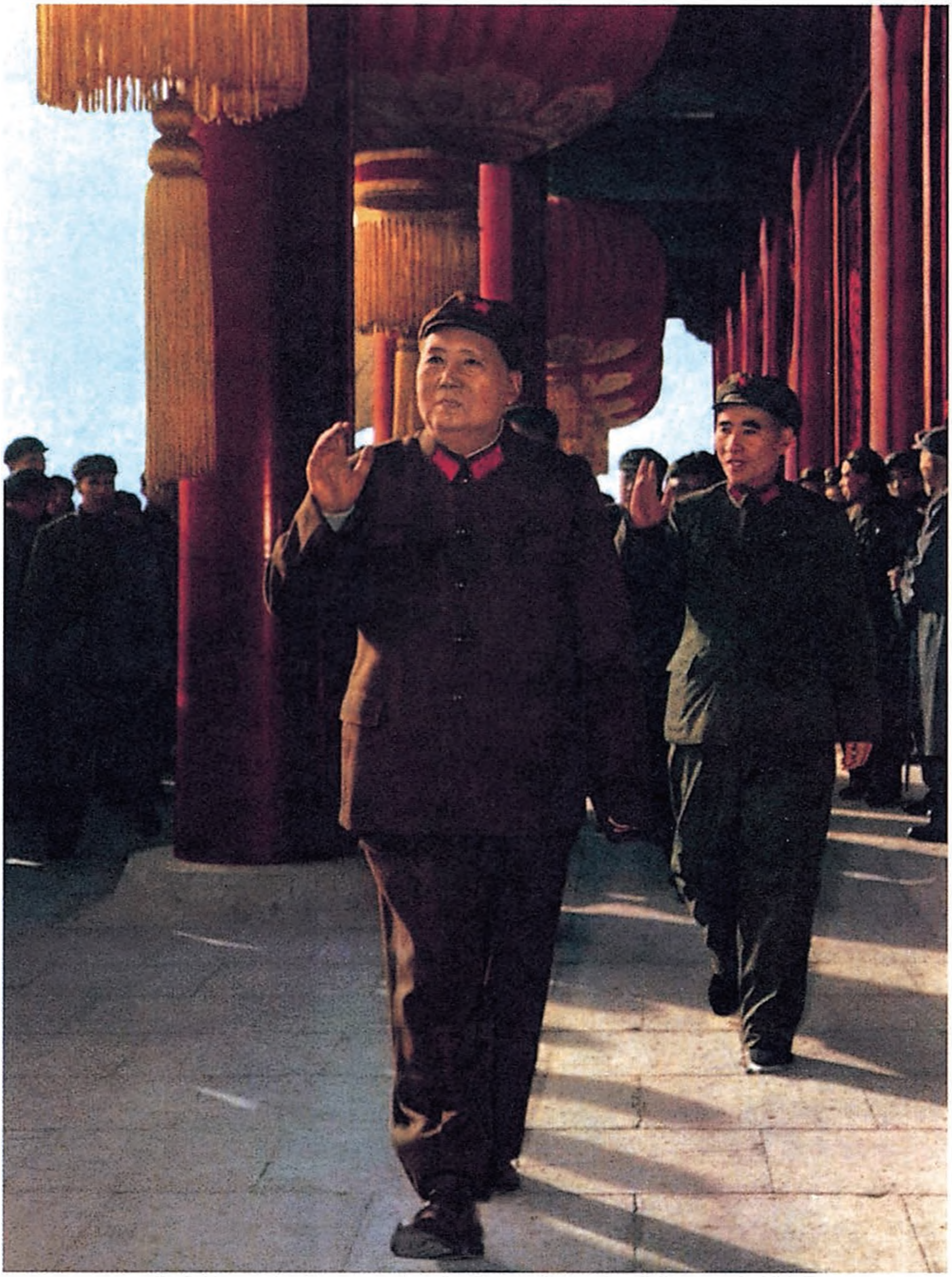
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第三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招手

第三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宣传画）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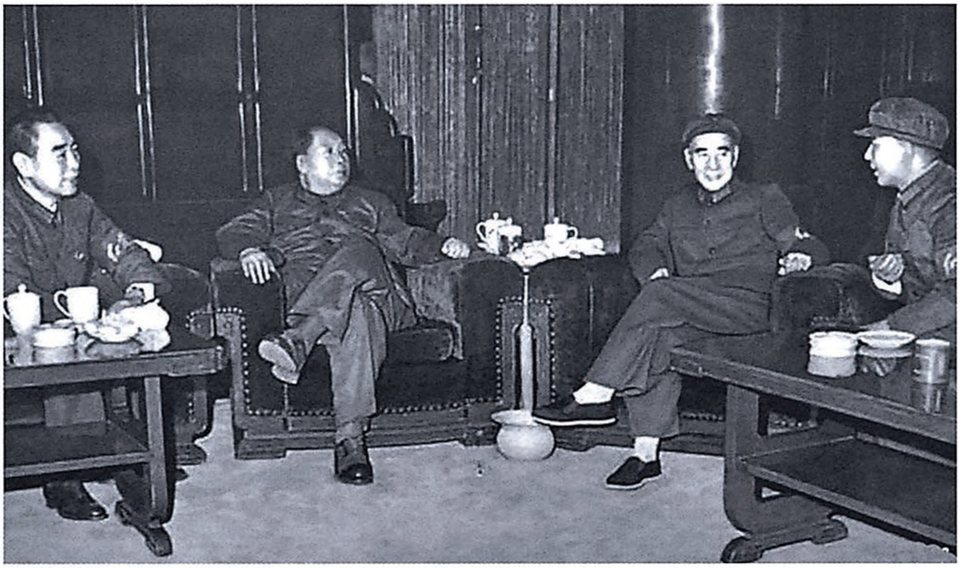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林彪、焦守云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等在一起。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林彪等在一起。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看报。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厅看报。

关于中央文革

（1966年9月）

中央有很多部没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这个部得改一改。

1966年，毛泽东在北京。

就左派队伍问题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1]

（1966年10月1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看左派有多少？

答：上海好一点，左派队伍大。

毛：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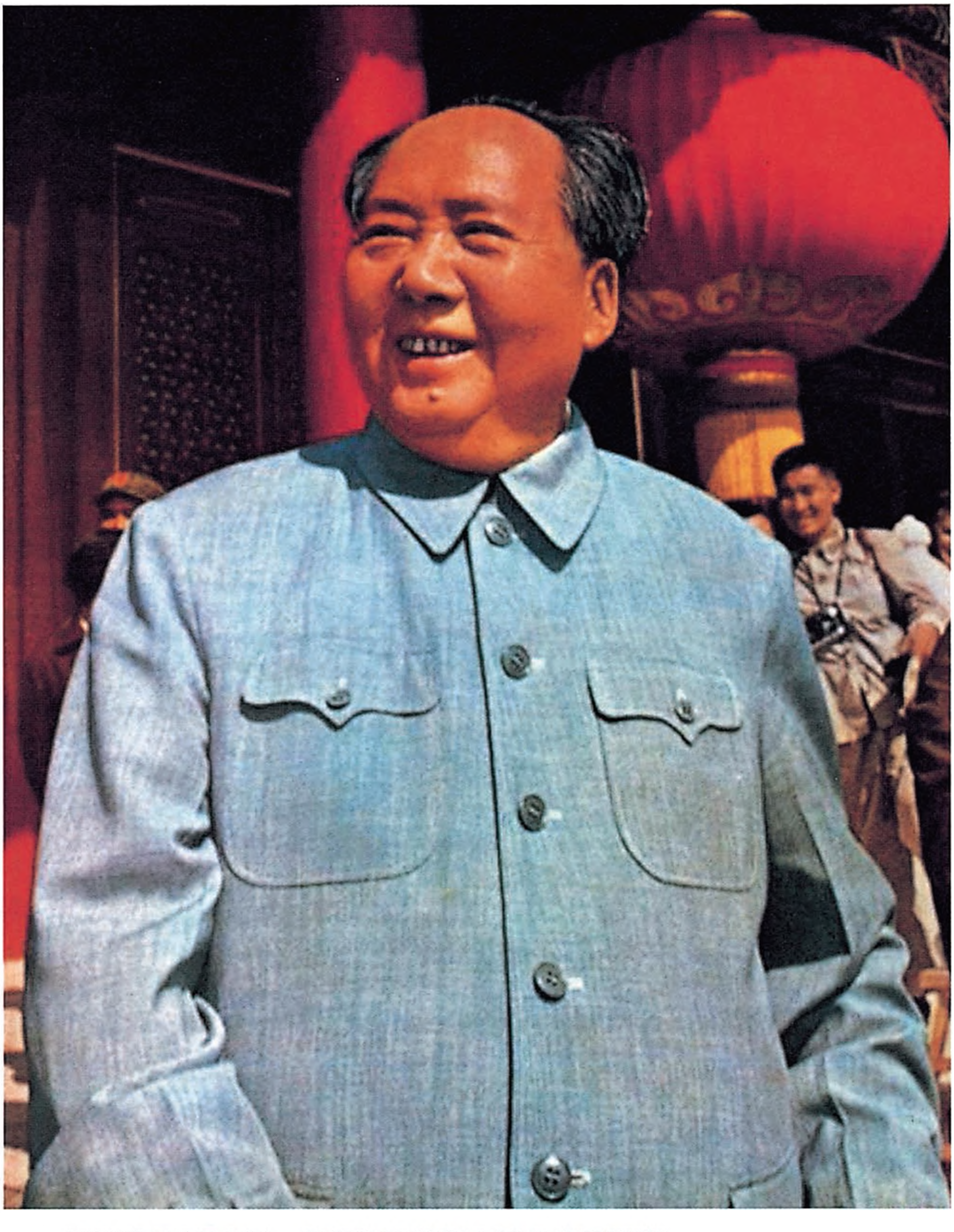
答：工人有40万、50万、60万。

毛：左派不会多，大概占10%。

答：后期可能多一点。

---

[1] 这次谈话是1966年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上看焰火休息时进行的，张春桥1967年6月16日在上海革委会扩大会议上传达此次谈话情况时还补充说：这是指世界观的改造，不是指一般的表现，是指世界观里有较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完全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更难了。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首都人民共庆国庆节。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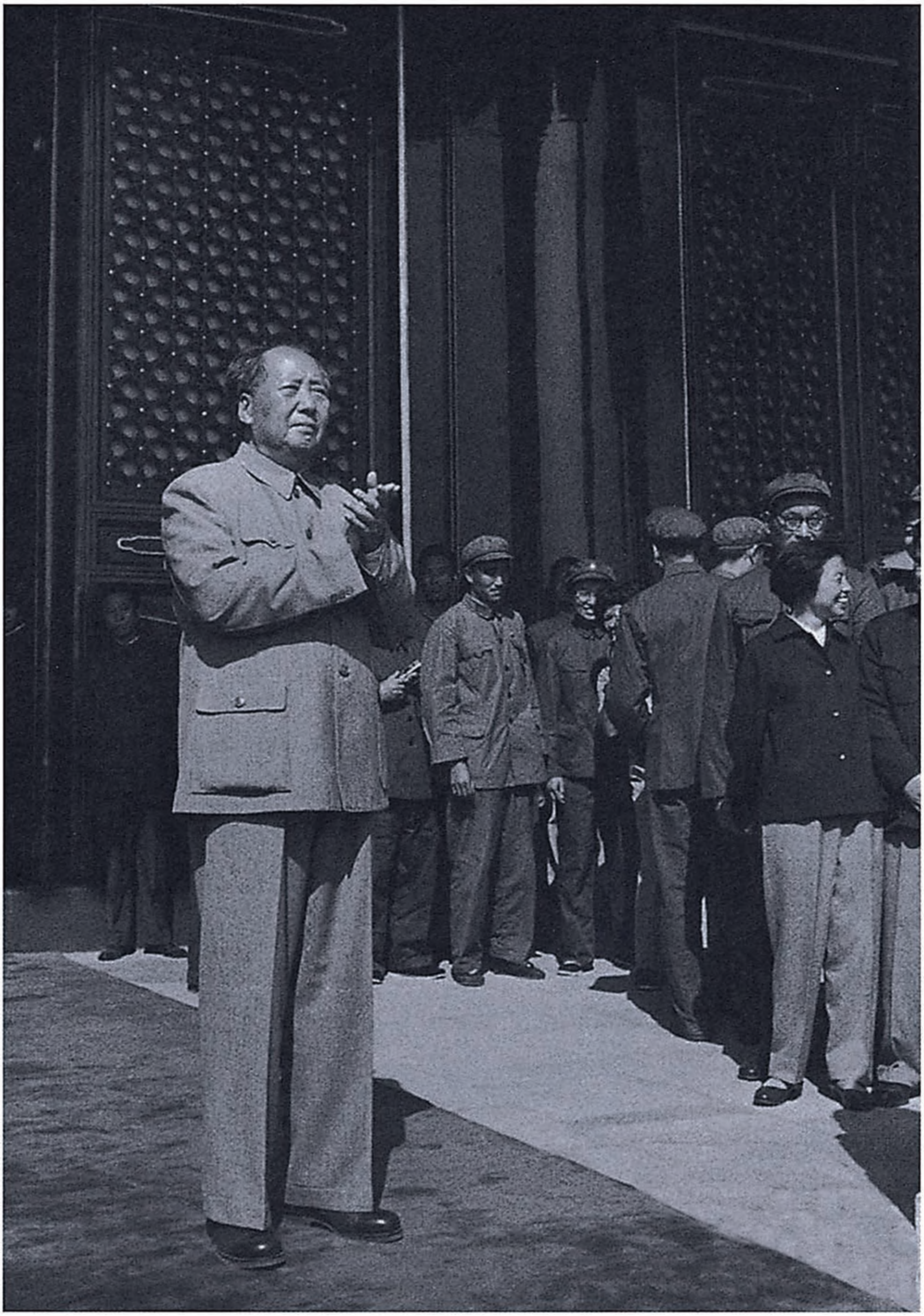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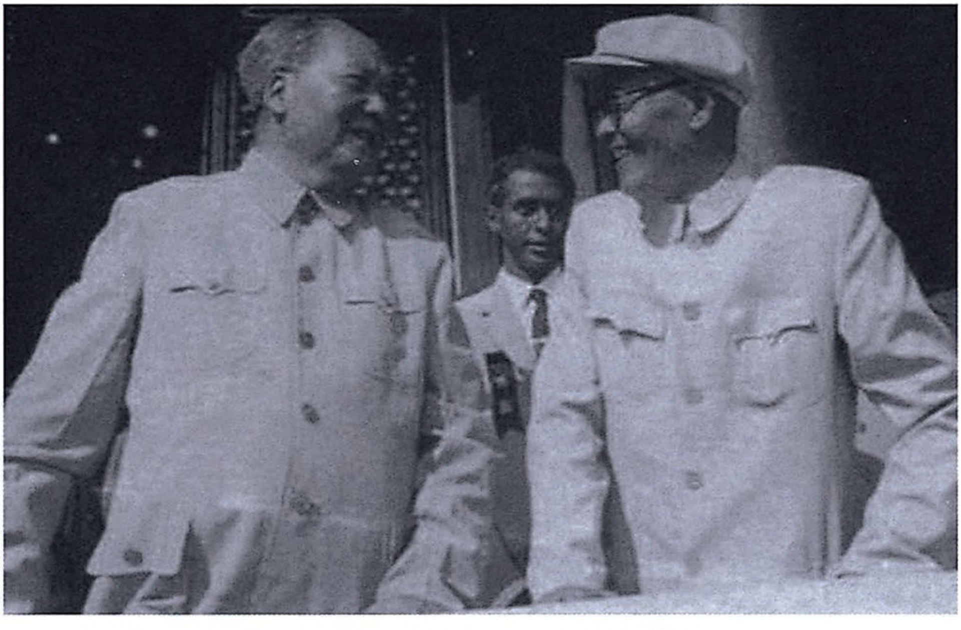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致意。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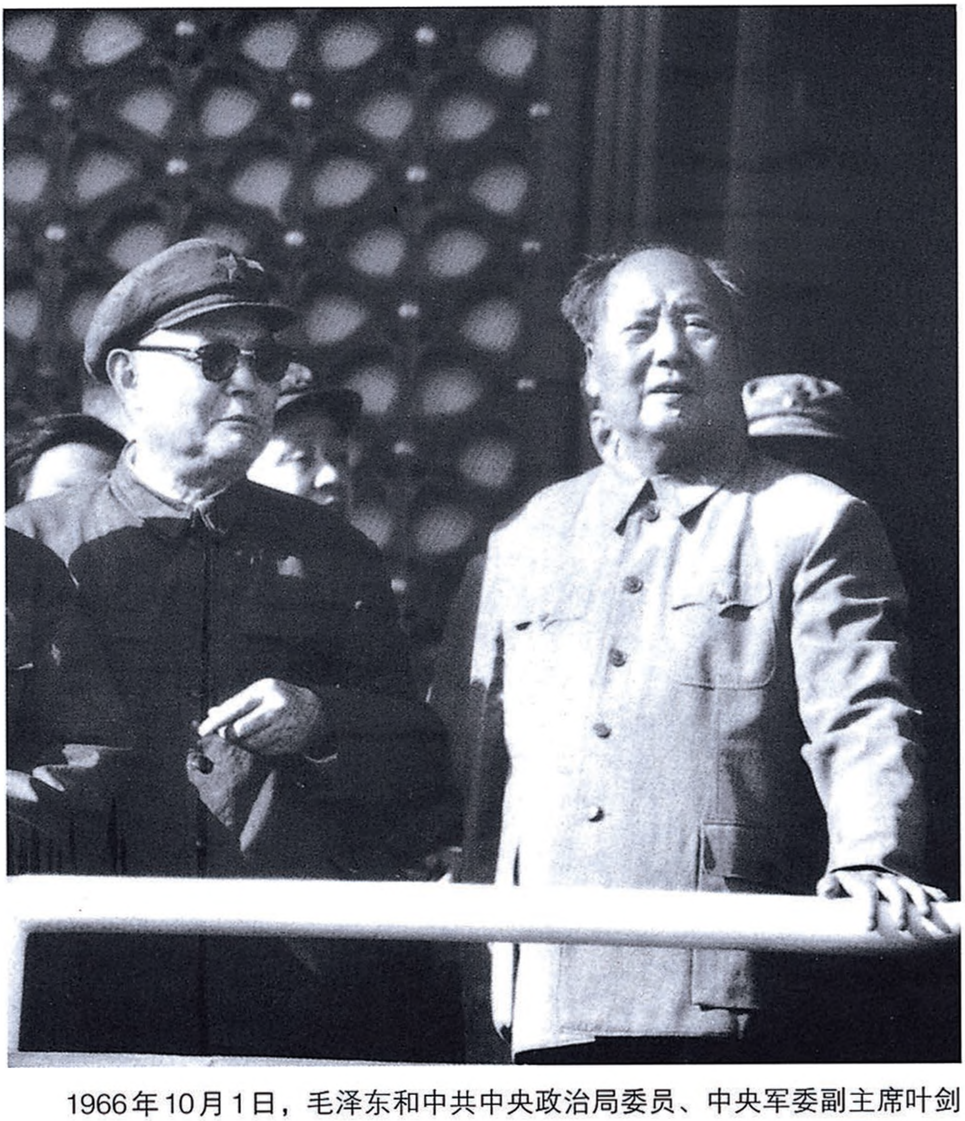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鼓掌致意。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宗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1966年10月1日，美国黑人作家领袖罗伯特·威廉在天安门城楼上，请毛泽东在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上签名留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日本朋友西园寺公一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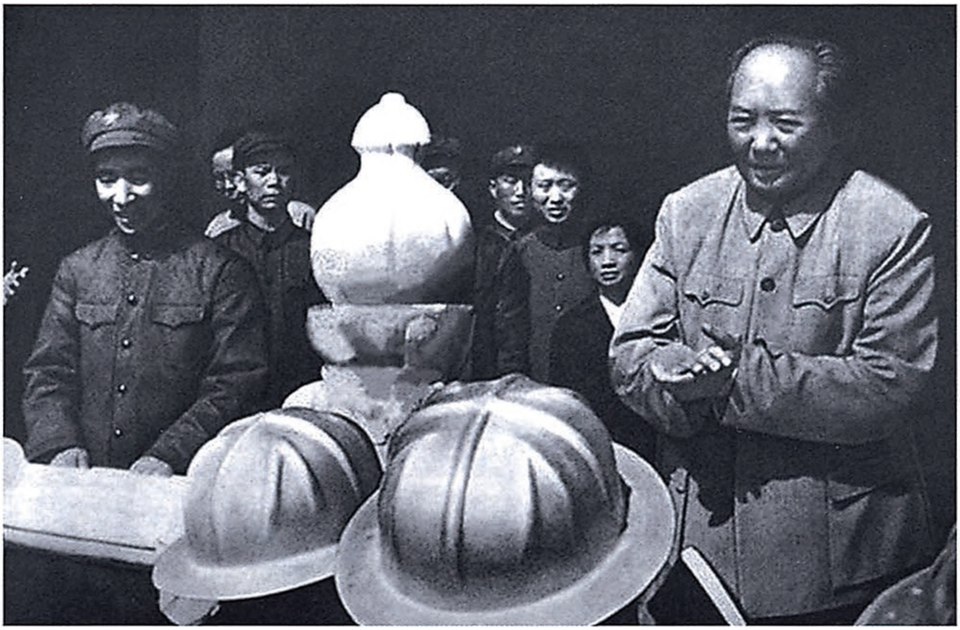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越南南方女战斗英雄谢氏娇时表示，坚决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正义斗争。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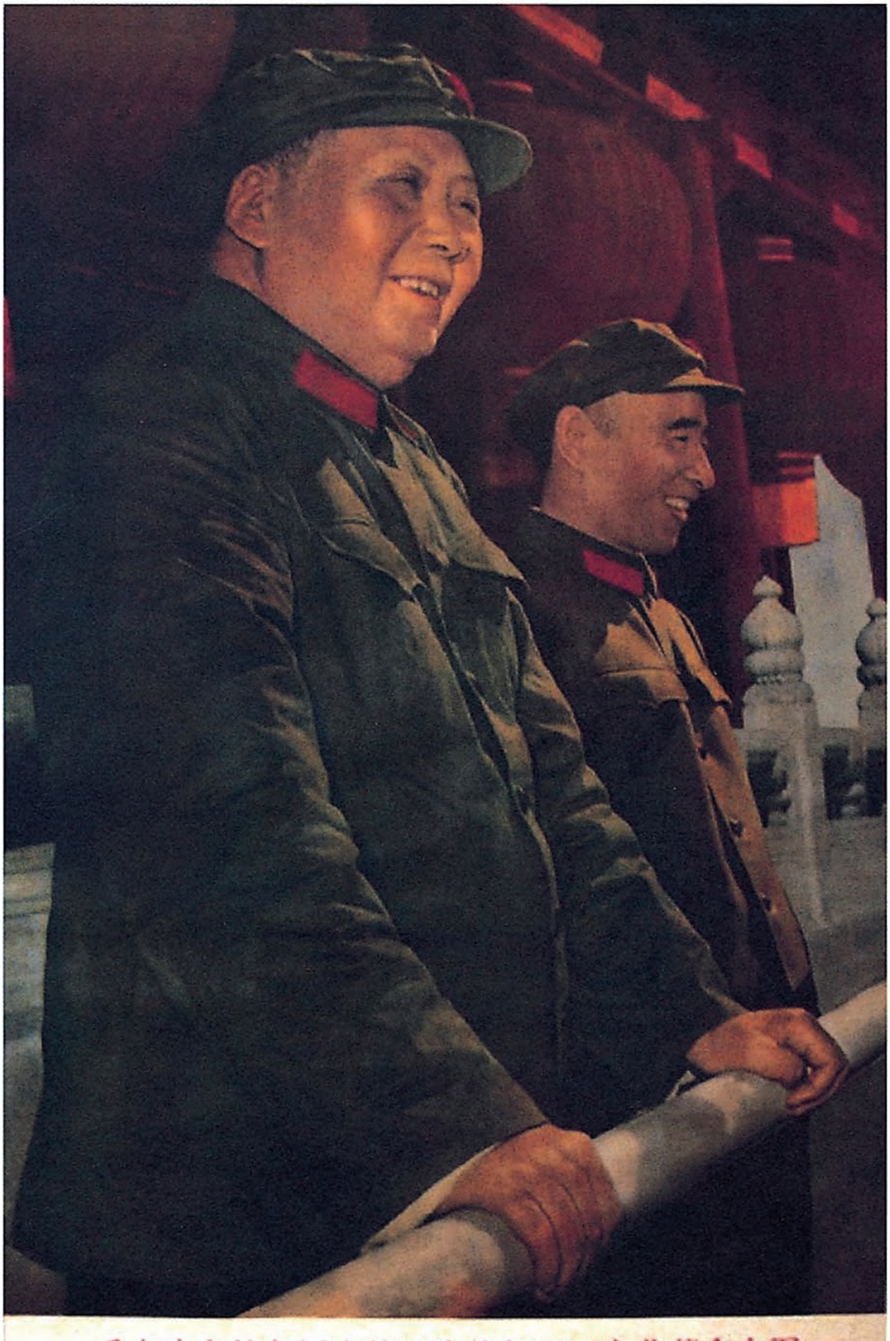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朝鲜领导人崔庸健。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李敦白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32111英雄钻井队的代表王有发亲切谈话。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大庆工人。


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第四次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

毛泽东和林彪同志第四次检阅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和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等在一起。

毛主席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部队观礼代表。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少数民族和红卫兵代表。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红卫兵代表握手。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顾阿桃。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群众代表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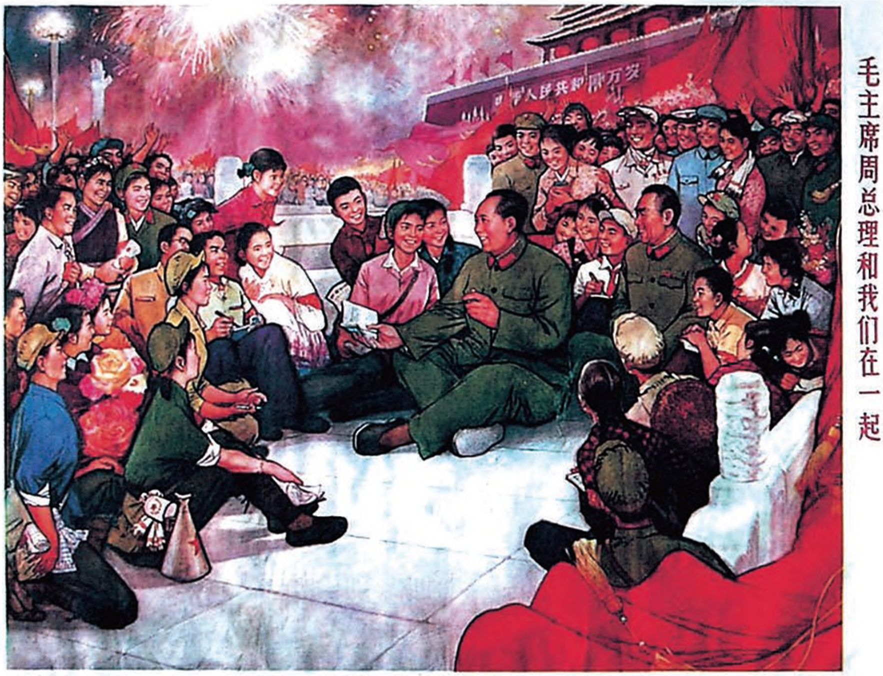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陈少敏。

1966年10月1日，国庆游行结束时，毛泽东来到群众队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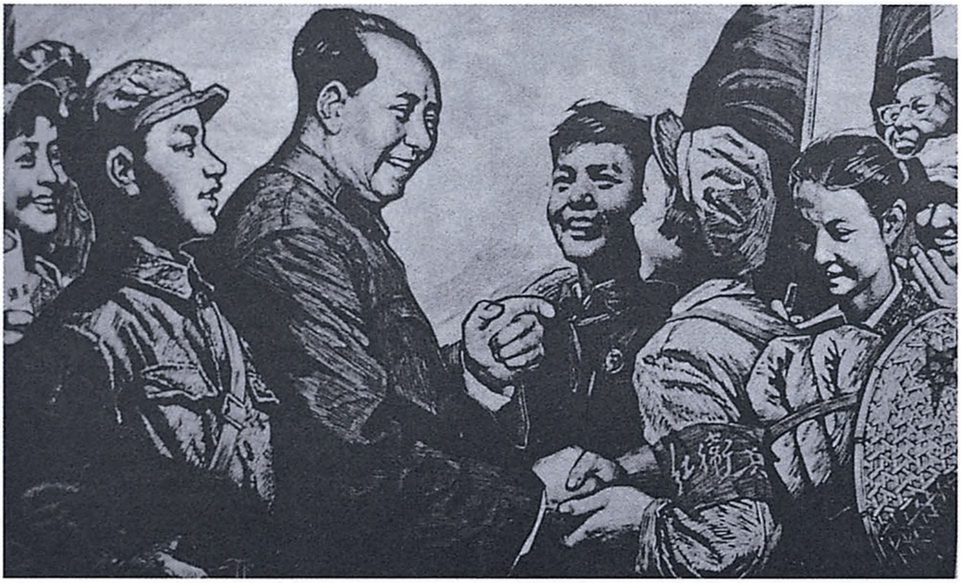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来到群众中。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和群众一起观看焰火。

196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和群众一起观看焰火。


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红卫兵心向毛主席》（版画）

关于按期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批语[1]

（1966年10月7日）

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毛泽东

十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6年10月7日11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就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于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接见在京部队时的指示

（1966年10月13日）

下次接见，采取阅兵式的办法。不管多少人，解放军要统统包下来，经过训练，把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三八作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带到全国各地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人人要会唱，我也要会唱。

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6年10月、11月）

一

即送陈伯达同志：

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下午八时半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共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1966年10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这个讲话稿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陈伯达在大会上发了言。1966年11月9日，中央办公厅将几经修改后的这个讲话稿印发至县团级。本篇一是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的讲话草稿前三部分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个讲话草稿最后一部分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10月24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四是对陈伯达11月5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

二

退陈伯达同志：

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1]。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夜

三

即送陈伯达同志。

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2]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廿三时

---

[1] 陈伯达1966年10月15日午夜送审的讲话草稿第四部分第二页说：“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这种谬论的人，他们利用小孩子们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毛泽东审阅时把其中的“小孩子们”改为“一部分年轻人”。

[2] 1966年10月25日，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在讲话修改稿第三部分的末尾加了一段话：“我们各地区各部门的同志，广大工农群众，广大青少年，都必须掌握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注意‘决定’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而在工作中尽自己的最大革命义务。”

四

退陈伯达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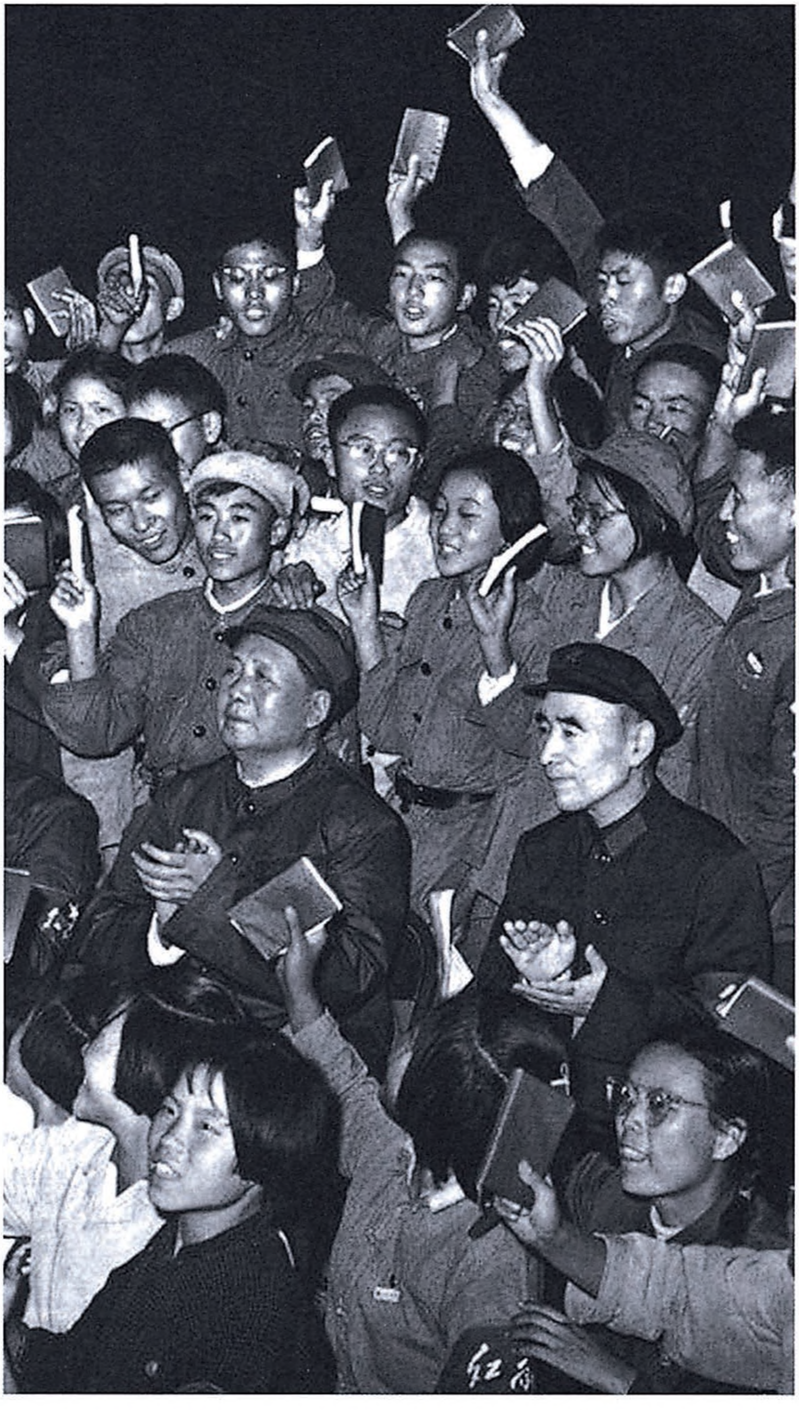
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和林彪第五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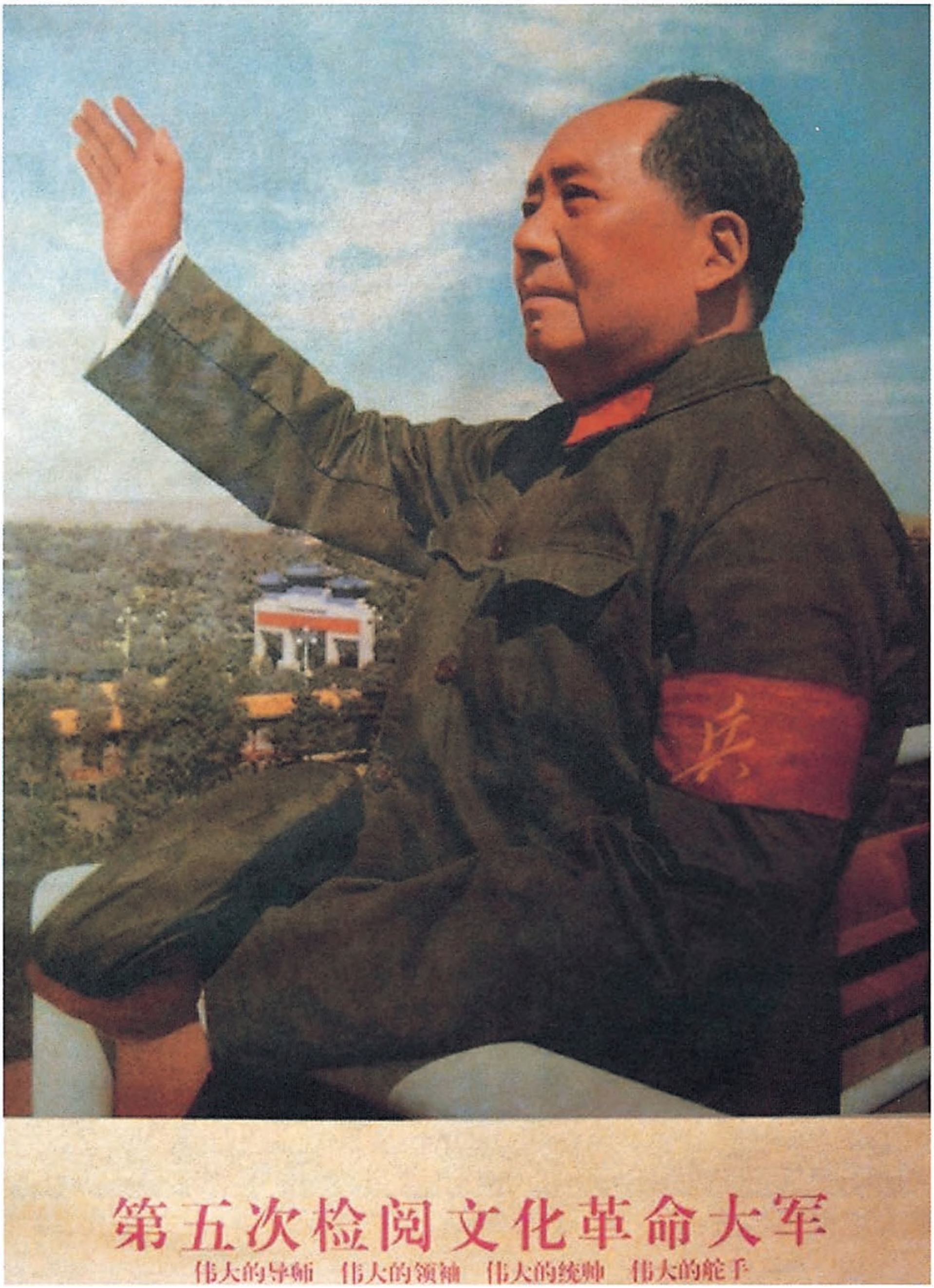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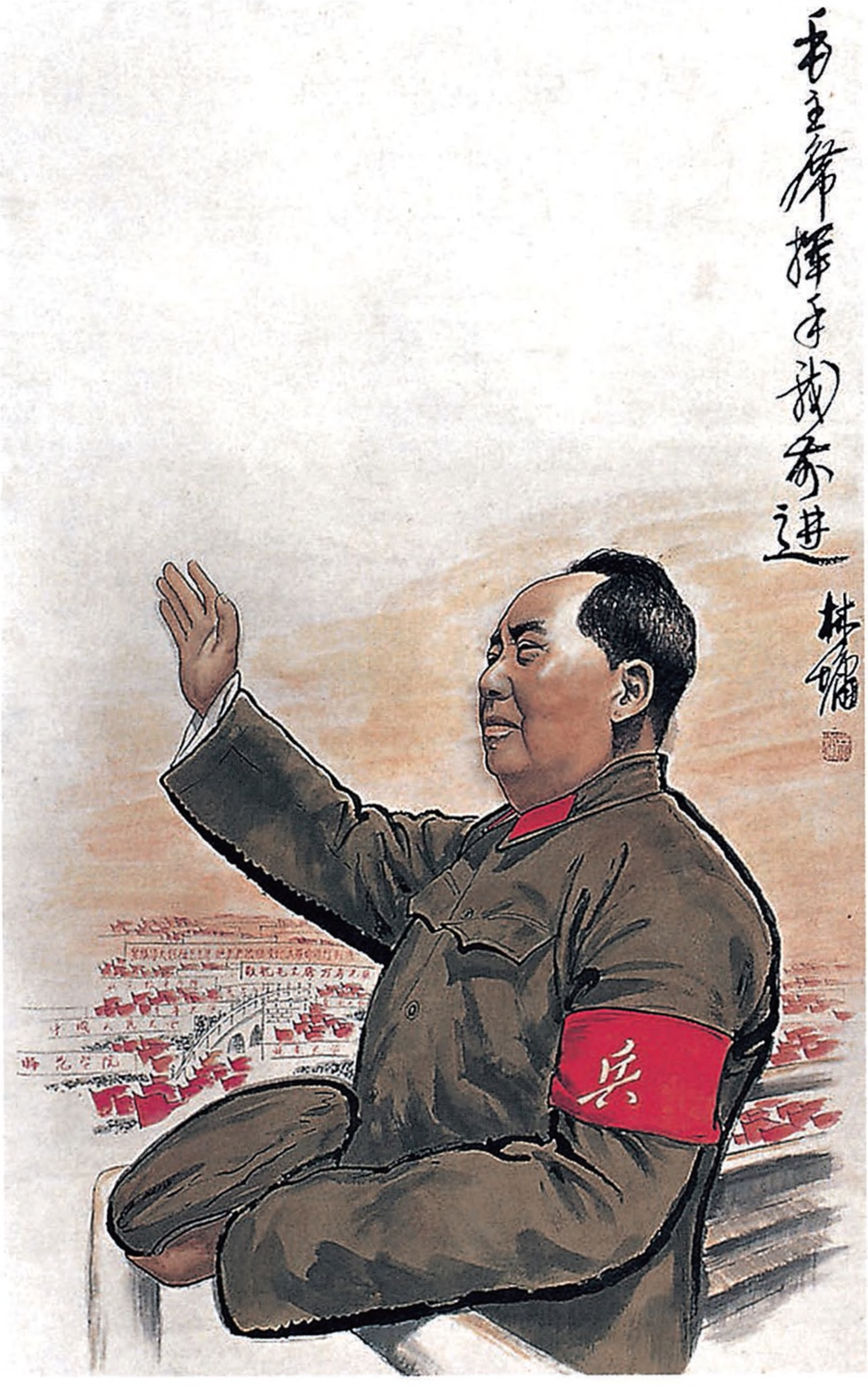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林彪和“革命小将”们在一起。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伟大领袖毛泽东。


兵
第五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舵手

第五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林墉
兵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中国画）

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1966年10月24日）

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1]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搞串连，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我们又没打你们。”你们就是不检讨！伍修权[2]有四个孩子，分为四派。有很多同学到他家里去，有时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接触多了，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觉得他们很可爱。自己要教育人，教育者应先受教育。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说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少奇给江渭清[3]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他自己就聪明了？

刘澜涛[4]：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太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

刘澜涛：回去看看再说。

---

[1] 李雪峰，当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 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3] 江渭清，当时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

[4]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

（毛泽东问周恩来会议情况）

周恩来：会议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半天，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问李井泉[1]）

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2]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开始不大通，全会后一段时间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军区去住。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搞。但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

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人家革命，允许改嘛！让红卫兵看看《阿Q正传》。

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十七年，文化革命只搞了五个月，最少得五年才能得出经验。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3]，谁也没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

---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2] 廖志高，当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3] 一张大字报，指的是聂元梓等人写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一个红卫兵，指毛泽东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一个大串联，指毛泽东主席曾在天安门8次接见红卫兵，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300多万。

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

（问李先念[1]）

你们今天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财经学院说，他们明天要开声讨会。我要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你明天还去检查，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明天我要出国。

你要告诉他们一下。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不足。他们不听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2]。为什么分一、二线呢？一是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马林科夫[3]不成熟，在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次会议都只是敬酒、吹吹捧捧。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没有想到反面。

陶铸：大权旁落。

---

[1] 李先念，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2] 一、二线，1953年底，中央常委分一线、二线，毛泽东为二线，其余常委为一线，刘少奇主持常委会。八大时，中央设立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1959年，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分一线、二线后，中央日常事务由一线领导处理，主要是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3] 马林科夫，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斯大林死后，一度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夺了权。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1957年6月被撤职。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社、否定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议就好了，可是他（刘少奇）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1]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后来，四个人又回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2]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3]，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三八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那些事情（皖南事变、百团大战）都不打招呼。七大后中央没有几个人，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分一线、二线后，就更分散了。一九五三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中央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与彭真不

---

[1] 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当时都任国务院副总理。

[2] 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对一线领导提出了严厉批评，批评了高指标、浮夸风、穷过渡、作假等现象，要求将指标调下来，但阻力很大。

[3] 北京开会，中共中央于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没有让毛泽东参加，制定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几个重要问题的说明》，中心内容是“钢产量达到二千万吨，是必须力争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不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1]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没有好下场。

犯路线错误的要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没改。不管什么小集团，什么门头，都要关紧关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

要允许刘、邓革命，允许改。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七大时，陈奇涵[2]说不能把犯王明路线的选为中央委员。王明和其他几个人都选上中央委员了。现在只走了一个王明，其他人还在嘛！洛甫[3]不好，王稼祥我有好感，东崮一战他是赞成的。宁都会议洛甫要开除我，周、朱他们不同意，遵义会议他起了好作用，那个时候没有他们不行，洛甫是顽固的，少奇同志是反对他们的，聂荣臻也是反对他们的。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

你们有错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这次会议是我建议开的，时间这样短，不知是否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想到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来了这么大的事。学生有些出身不太好的，难道我们出身都好吗？不要招降纳叛，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如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去接近几

---

[1] 陆定一，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

[2] 陈奇涵（1897－1981），号圣涯，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

[3] 洛甫，即张闻天。

个右派，那怎么行呢？哪有那么干净？接近他们就是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那天在天安门上我特意把李宗仁[1]拉在一起，这个人不安置比安置好，无职无权好。

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学校党组织不能恢复太早。一九四九年以后发展的党员很多，翦伯赞、吴晗、李达都是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都那么坏？我看民主党派比彭罗陆杨就好。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领导搞起来的，反康、反梁、反帝制。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样纪念呢？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我的分一线、二线走向反面。

康生：八大政治报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

报告我们看了，这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工厂、农村还是分期分批回去打通省、市同学的思想，把会议开好，上海找个安静的地方开会，学生就让他们闹去。我们开了十七天会，有好处。像林彪同志讲的，要向他们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讲阶级斗争熄灭了，一九三九年又搞肃反，这还不是阶级斗争？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做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

邓小平〔虽然〕耳朵聋，〔但〕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说他有能力吗？

聂荣臻：这个人很懒。

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

---

[1] 李宗仁（1891年－1969年）字德邻，民国时期军事家、爱国将领，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总负责人，国民党高级将领，曾任国民政府副总统、代总统。1965年7月20日回国定居。

“怕”字当头的是多数。真正“反”字的还是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薄一波、何长工、汪锋，还有一个李范五。

真正四类干部[1]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现在已经大大超过了。

多了不怕，将来平反嘛！有的不能在本地工作，可以调到别的地方工作。

河南一个书记搞生产，其余五个书记搞接待，全国只有刘建勋[2]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

聂元梓现在怎么样？

康生：还是要保。

李先念：所有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要保护。

对！

（谈到大串联问题时）

周恩来：需要有准备地进行。

要什么准备，走到哪里没饭吃？

对形势有不同看法，天津万晓棠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以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李富春休息一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

[1] 四类干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干部分成四类：（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类干部是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2] 刘建勋，当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1966年10月25日）

我讲几句，讲两件事。

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识方面的事情。

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2]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我处在第二线，别的同志处在第一线，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那么集中了。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3]对一线、二线的问题，就做了改变。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以前的意思是那样。大家也赞成这个意见。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

---

[1] 1966年11月1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送审的这个讲话记录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并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就照这样吧，我改了几个字。暂不发出。”

[2] 马林科夫，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1957年6月被撤职。

[3] 指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度已经改变了。但红卫兵还不知道已经改变了。

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

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1]那个时候。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2]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3]，就是在上海发表的。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我要说的再一件事，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4]；再就是，给清华大

---

[1]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纪要内容共23条，因此简称“二十三条”。

[2]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这一冤案彻底平反。

[3] 指《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密谋策划，由姚文元执笔起草的。

[4]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1]；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2]。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没有送出，但是他们已经知道了，传出去了。

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

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3]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

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

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

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才胜利，开始谁也不知道怎么革法，包括我自己在内。从一九二一年起到一九四九年，二一、三一、四一到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年。我们自己也是逐步地在实践中间总结经验，找出道路来的。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也搞了十七年了。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

---

[1] 指毛泽东1966年8月1日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

[2] 指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3] 这句话是毛泽东1966年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的。

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

自从去年十一月批判吴晗开始，许多同志也没有看文章，也不大去管。京戏改革，批判《武训传》[1]，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2]，批判胡适[3]，等等，更不用讲了。

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又发了一个“通知”[4]，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林彪同志讲，要做政治思想工作。很对。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

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原则上你又理解，具体问题又不得

---

[1] 指1951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2] 指1954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判运动。

[3] 指1954年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

[4]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5月1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

解决，是什么道理？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比如上次开会回去以后，就没有开好会，有些地方就根本没有开，有些地方开了，也不是那么充分，被红卫兵一冲就乱了。假如有十个书记，就要有七个或者八个去接见红卫兵。接见慢了要冲进来。学生们生了气，自己还不知道，又没有准备回答什么问题，以为表面上一应付，表示欢迎，就解决问题了。人家有一肚子气，几个问题一问，不能回答，就处于被动。这个被动也可以改变的，可以改变为主动的。

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我就不讲上次会议讲过的话了，说这一次会等于不开，回去还是老章程，维持现状，跟红卫兵对立，跟一派红卫兵对立，利用另一派红卫兵保驾。这种状况，我看会改变，情况开始好转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中央局、省、地、县这几级，还不讲县以下广大的干部，全部都那么快地就通了，不一定。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

我讲这么两件事。一件事是历史，讲一线、二线的问题。第二件事，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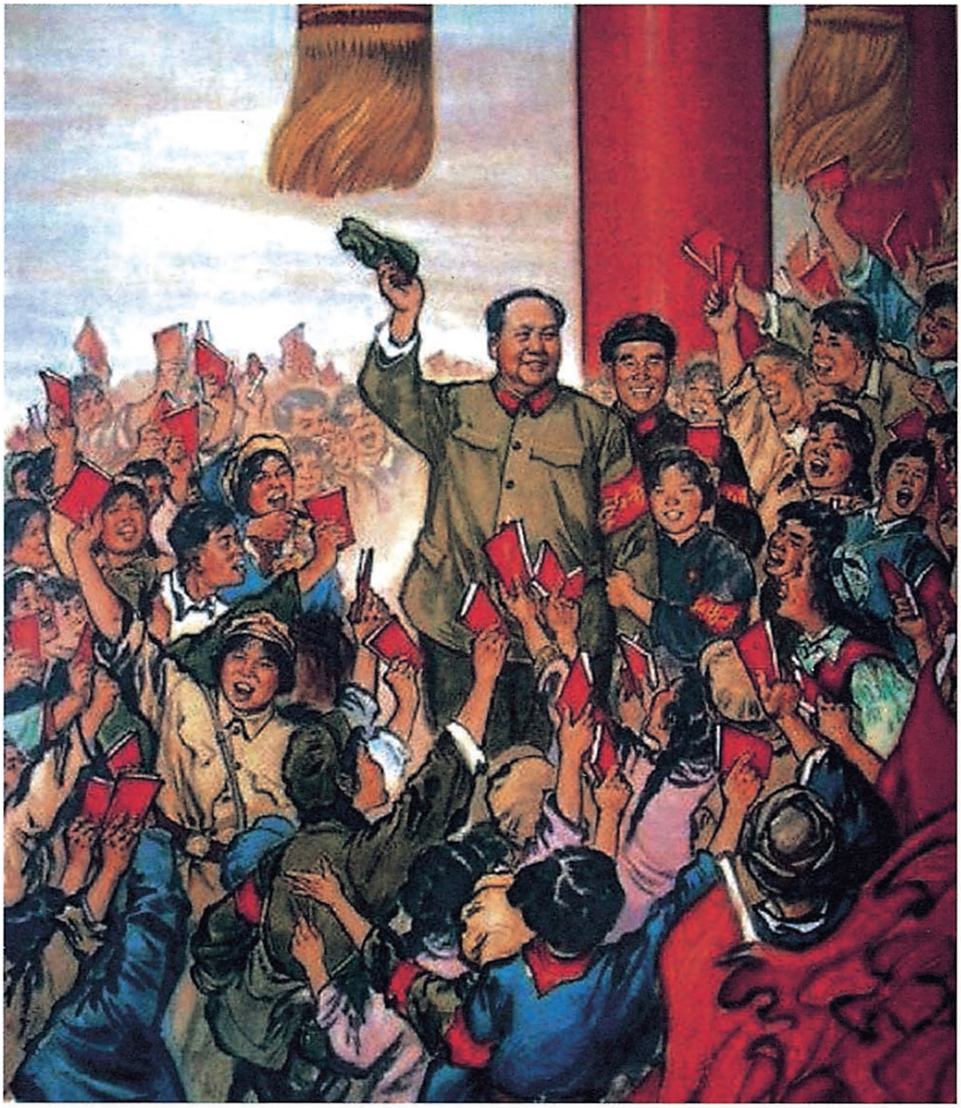
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有两个红卫兵说，他们到全国跑了一趟，他们没有料到有些老前辈这么害怕红卫兵。他们说，红卫兵有什么可怕的？有一位同志，他家里有四个红卫兵，就是他的儿女，分成四派，还有他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到他家来，大概有十几个二十个吧！他接触了那么一点人。另外也有接触几十个人的，也有接触一二百人的。我看小接触很有益处。大的接触，一百五十万人，我们一个钟头就搞完了。这也是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各有各的作用。

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1]。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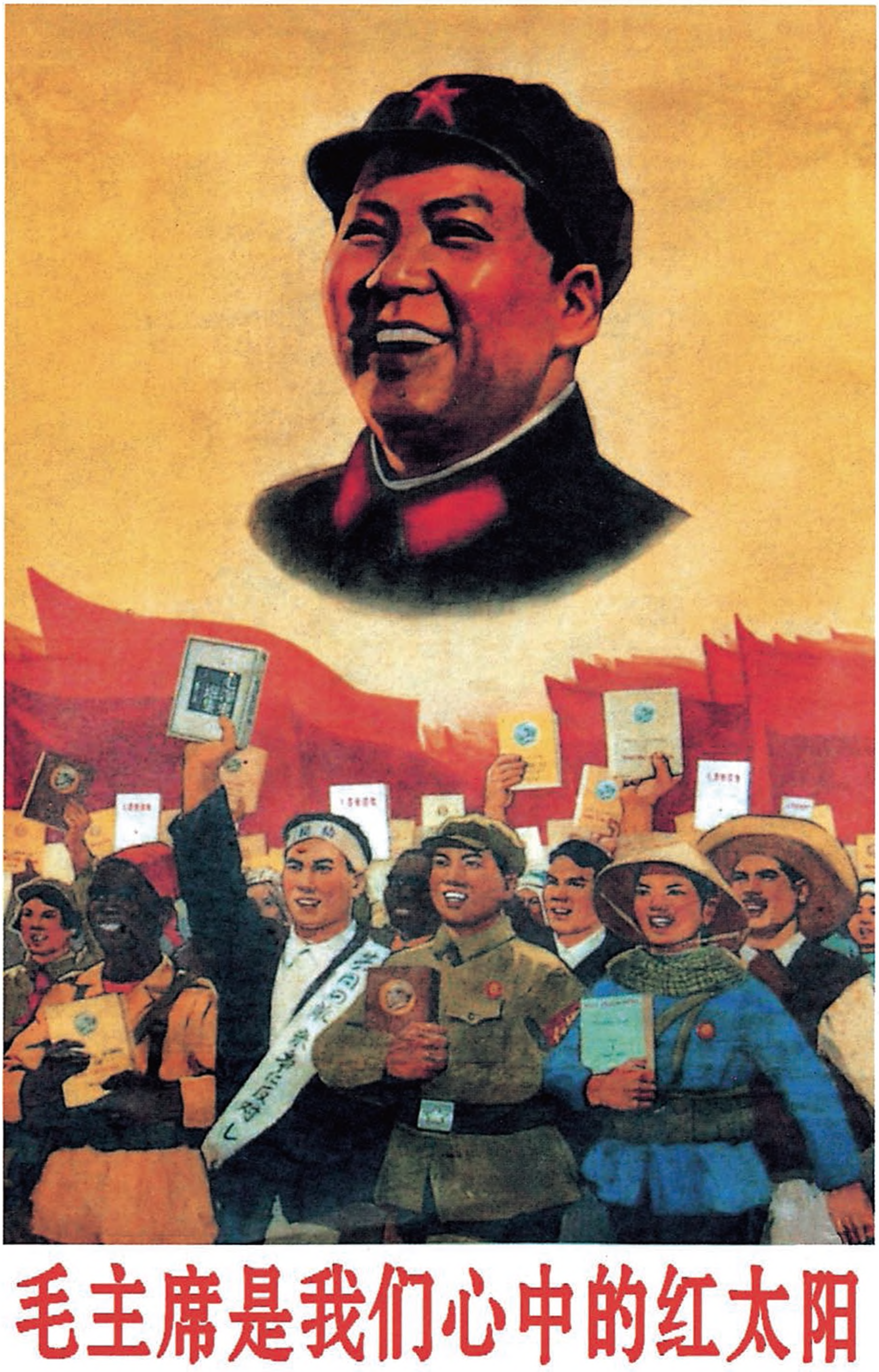
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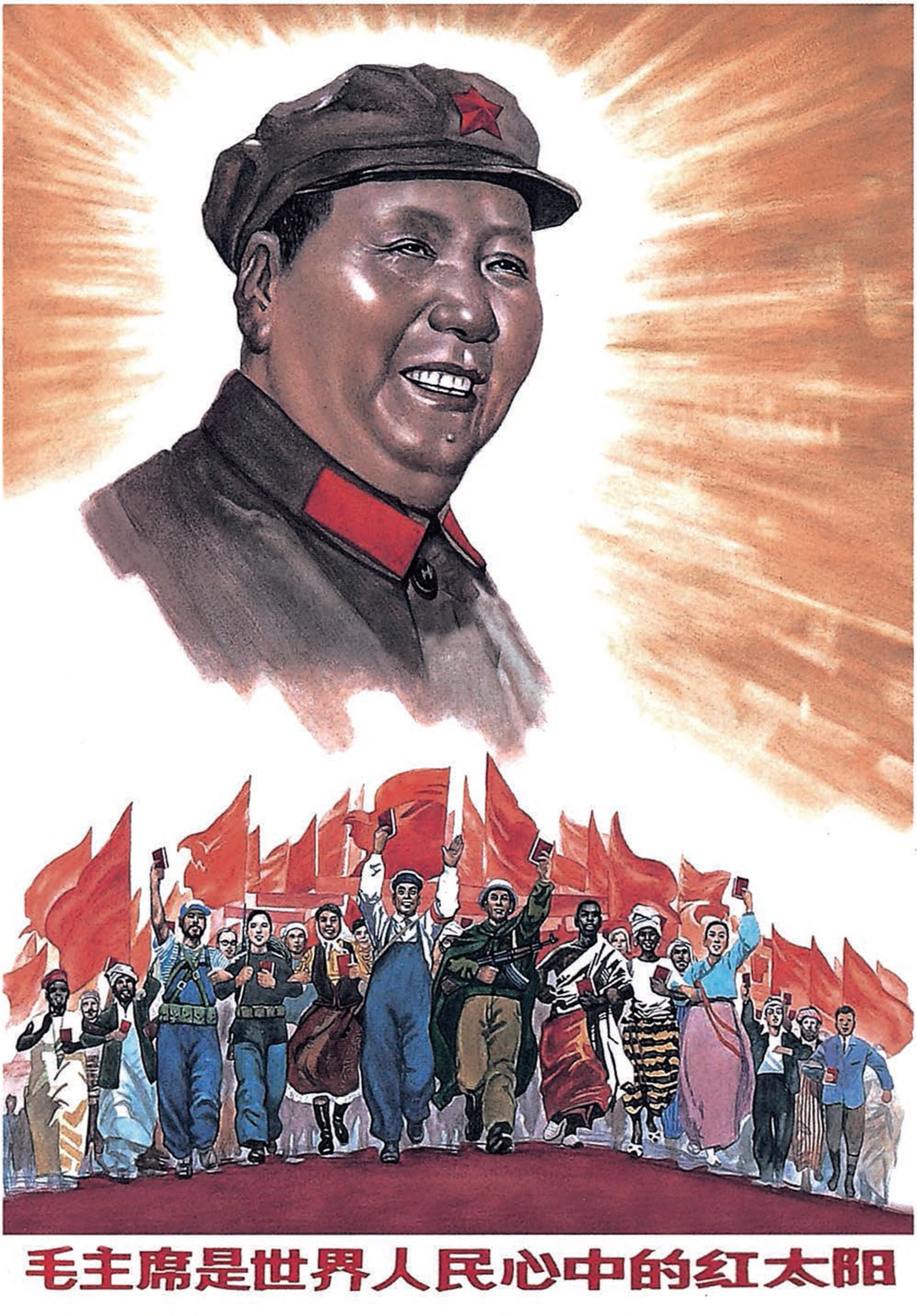
[1] 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和刘少奇一起向一些单位派工作组，被指责为制定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错误的批判，后来被错误地当作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受到批判和迫害。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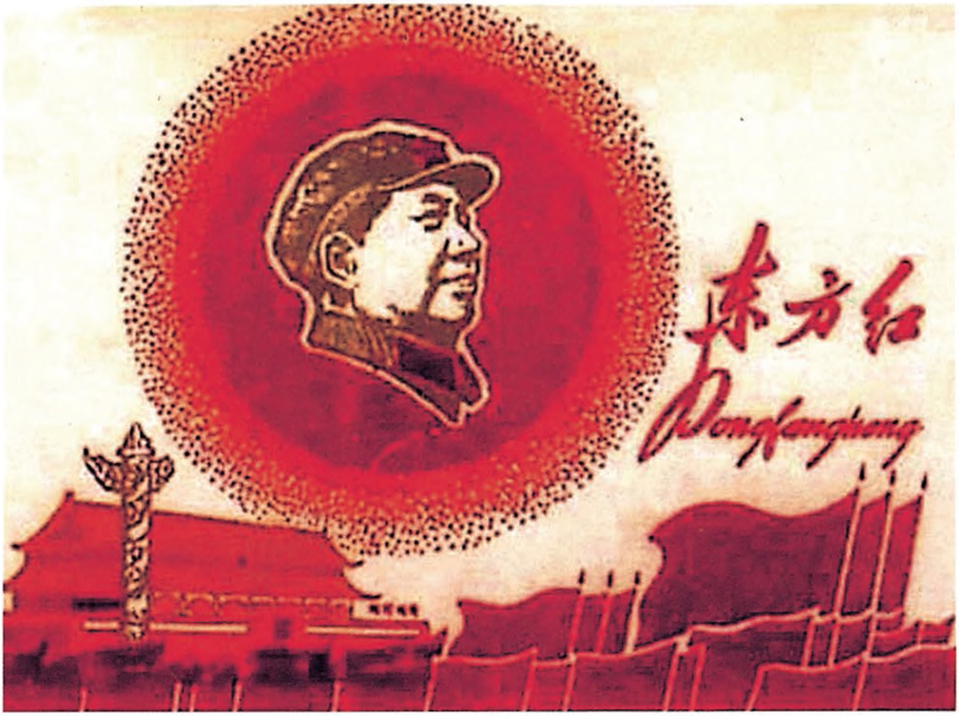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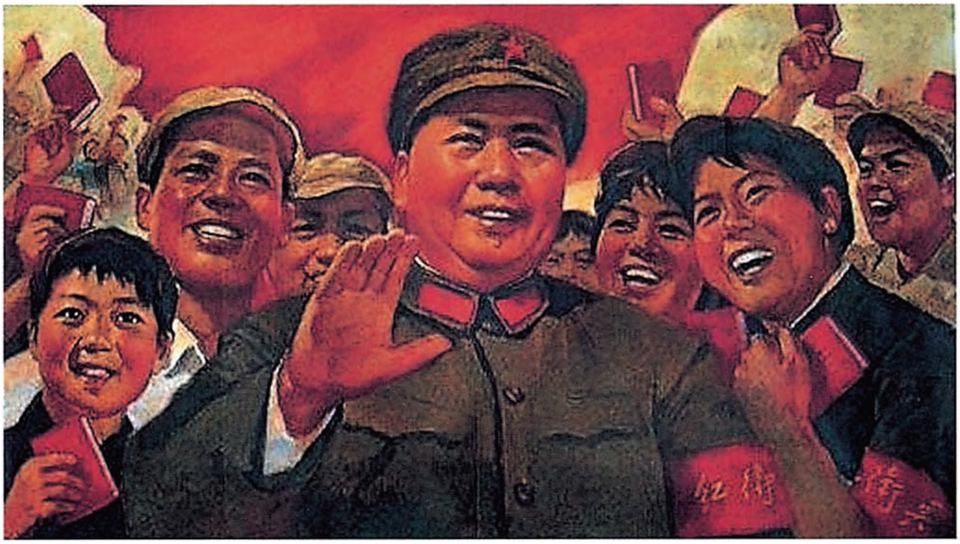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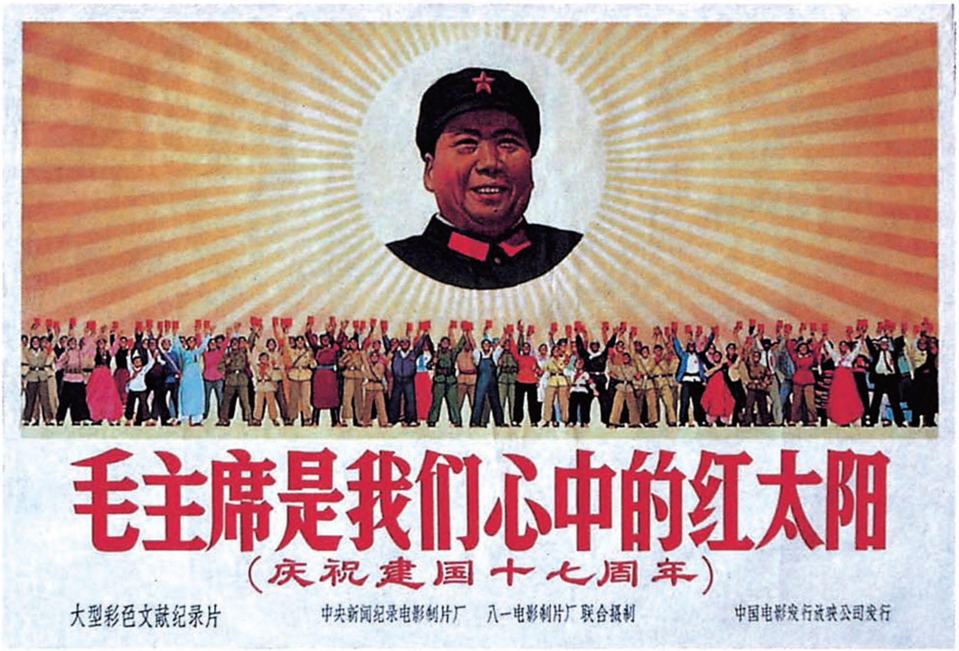
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东方红
Dongfang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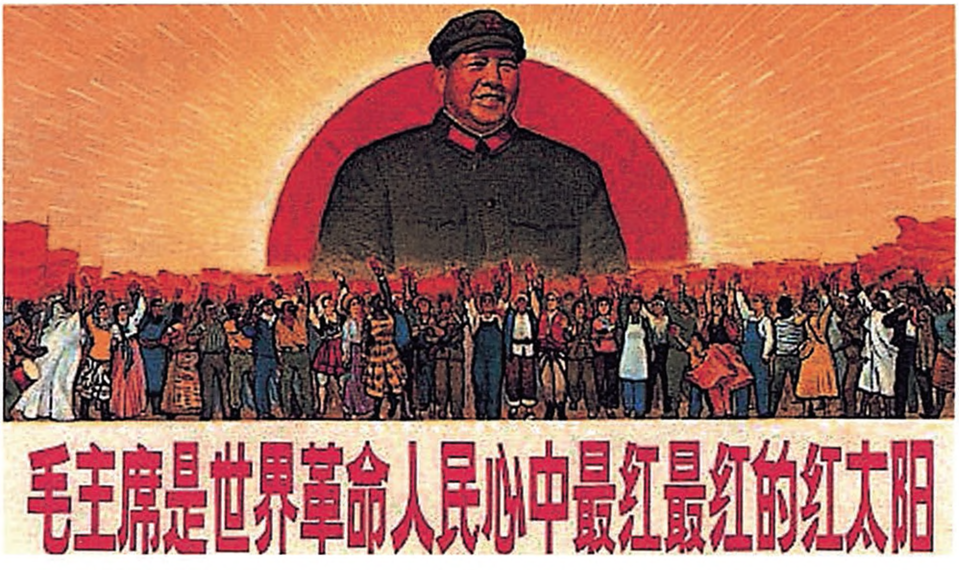
东方红（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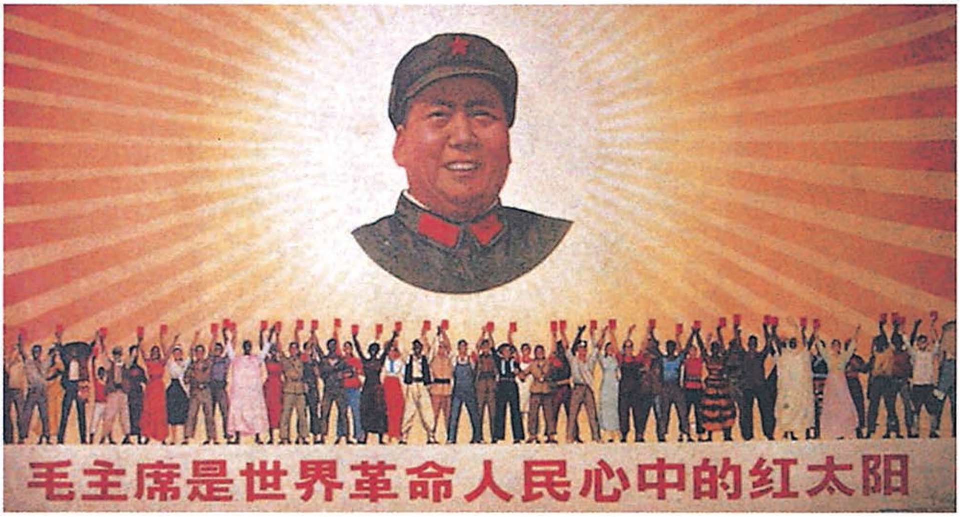
颗颗红心向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庆祝建国十七周年）
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 联合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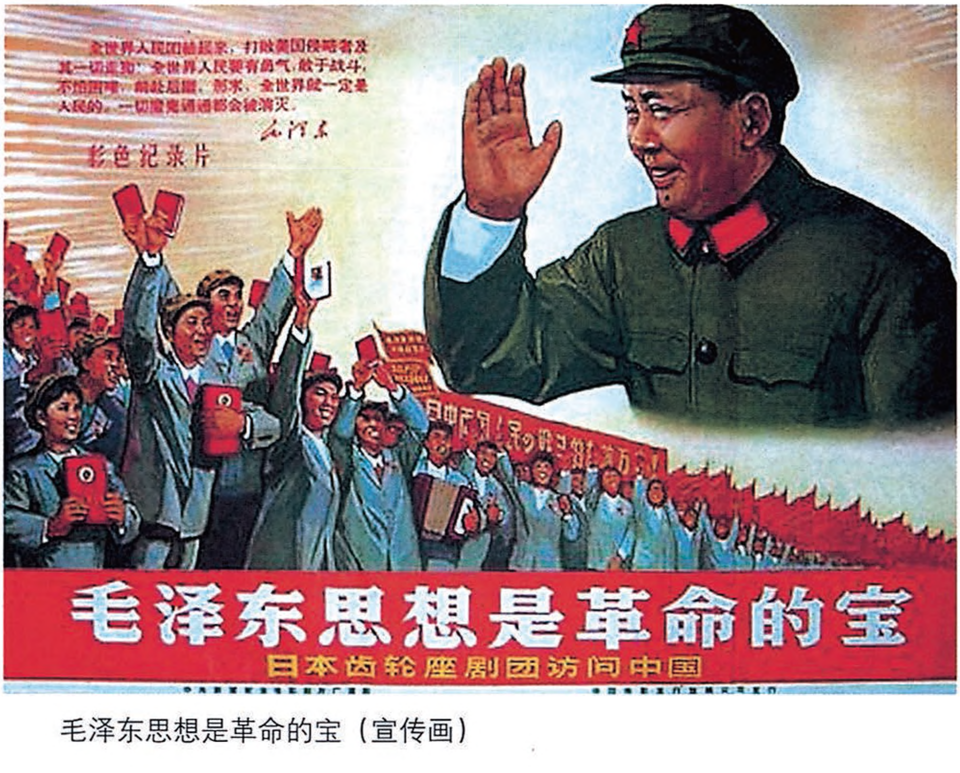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宣传画）


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

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宣传画）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
毛泽东
彩色纪录片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
日本齿轮座剧团访问中国

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宣传画）

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1]

（1966年10月25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祝贺你们的代表大会圆满成功！

以恩维尔·霍查[2]同志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坚定地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

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3]集团，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贼集团，比起你们来，他们都不过是一抔黄土，而你们

---

[1] 这份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贺电，是由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1966年11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宣读的。

[2] 恩维尔·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3]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

是耸入云霄的高山。他们是跪倒在帝国主义面前的奴仆和爪牙，你们是敢于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战斗、敢于同世界上一切暴敌战斗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国家，已经或者正在改变颜色，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英雄的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这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逆流。你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你们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你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们也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们和你们都不是那种口蜜腹剑的假朋友，不是那种两面派。我们之间的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经历过急风暴雨的考验。

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一小撮反华、反阿尔巴尼亚的可怜虫，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正处在新的觉醒之中。美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害人虫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掘墓人，

他们被埋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当然，我们前进的道路绝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请同志们相信，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一定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在聂荣臻同志去指挥发射导弹时的指示

（1966年10月27日）

你是常打胜仗的，这次可能打败仗，要准备两手。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各大区同志的一段谈话

（1966年10月）

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关于组织外地来京革命师生进行政治军事训练的指示

（1966年10月）

由军队负责将外地来京革命师生，按解放军的编制，编成班、排、连、营、团、师。编好后，进行训练，学习政治，学习解放军，学习林彪同志和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学习编队队形，学习队列基本动作，学习步法，每个人都要学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子，使外地的革命师生有秩序地接受检阅。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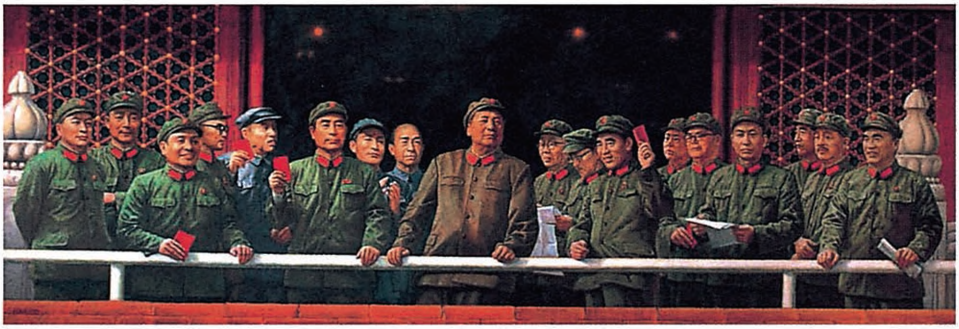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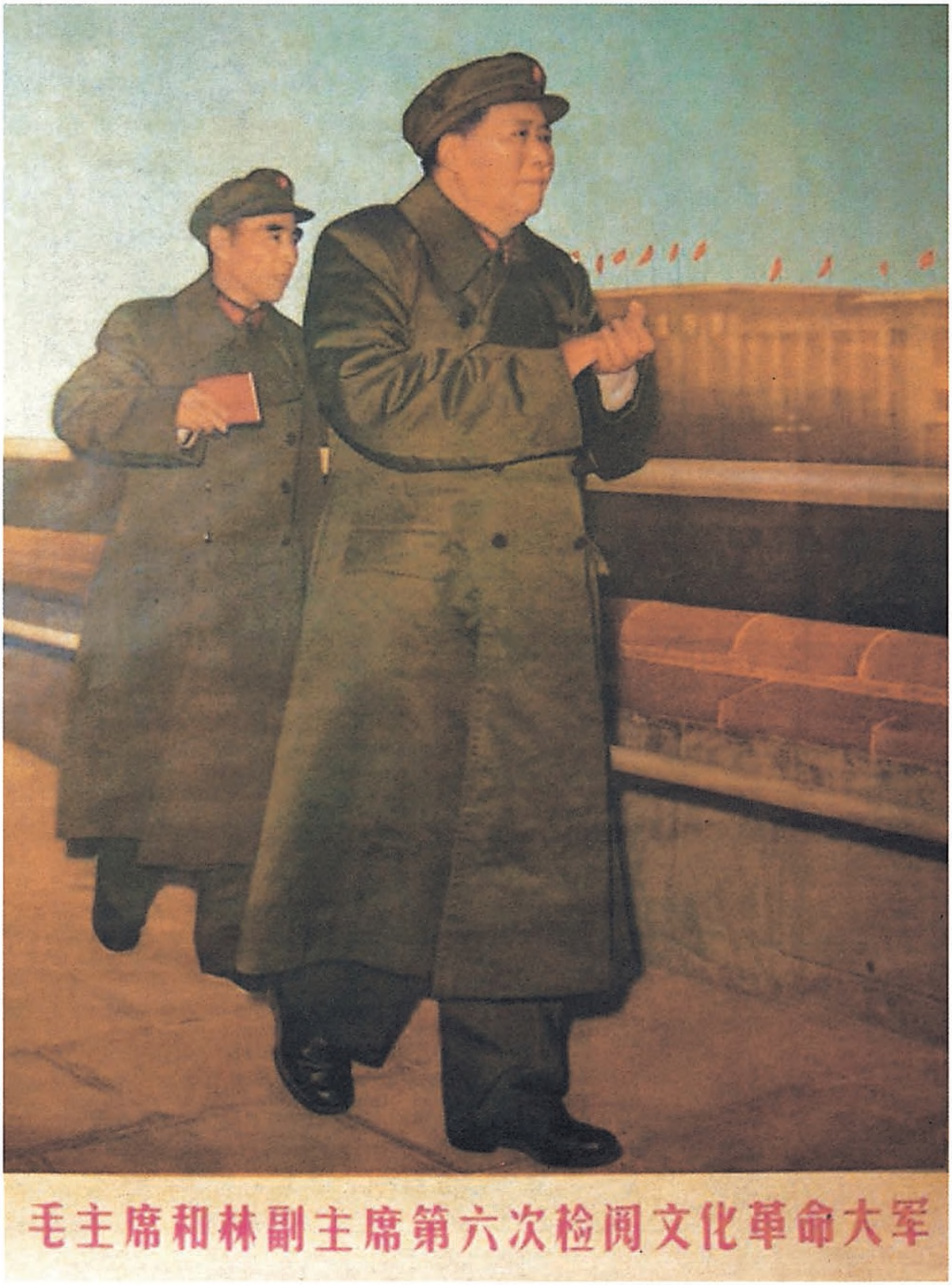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3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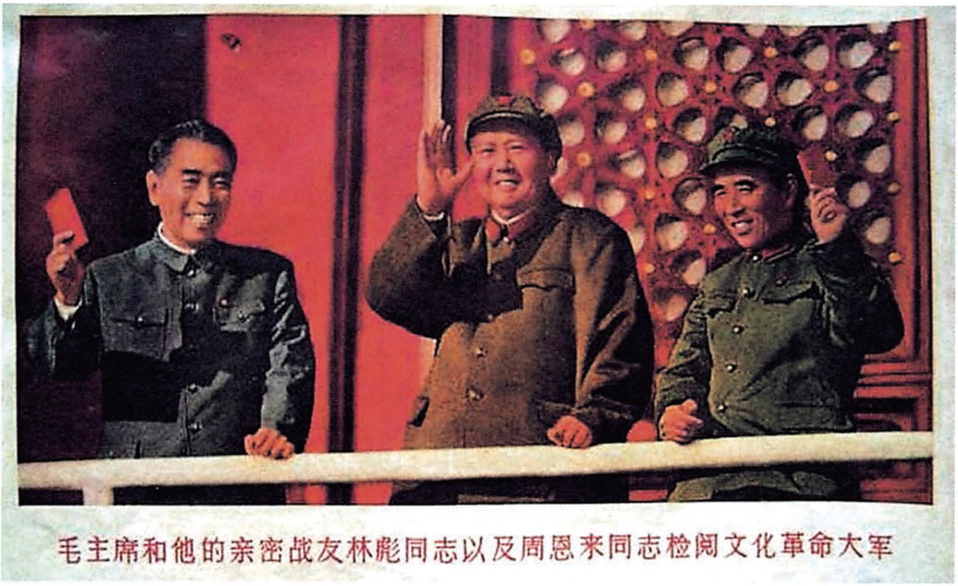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在天安门城楼上》（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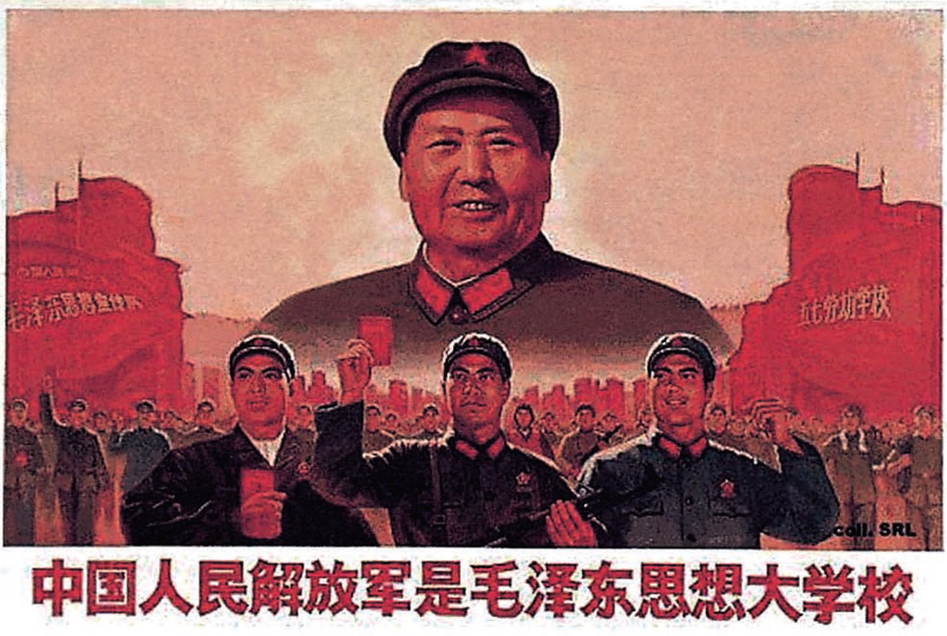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coll. SRL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宣传画）

对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6 年 11 月 4 日、7 日）

一

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联用。

二

同意这样修改[2]。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3]，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四日上午

三

去掉十一字有利。

四

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

五

对冯定[4]的批判我没有与闻。

六

林彪同志：

同意这样修改[5]。在第6页、第10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6]，请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下午六时半

---

[1] 毛泽东对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二是写在林彪11月3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本篇三至六是写在最后付印前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的批语。11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个讲话稿印发到县团级。

[2] 林彪1966年11月3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修改的。主要修改之处是在第12页上加写

了以下两段话："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什么抽象的、独立的个人，是没有的。只记得自己，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是损人利己。他们为了自己发财，自己得利，而不惜让千百万人破家荡产。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出发来看世界，就是从资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看世界。""我们就是需要培养为公的人。为公也有不同的阶级性。我们所说的公，是人民的公，无产阶级的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在修改稿上，陈伯达向林彪报告说："根据主席的指示，十二页作了重要的修改，请审阅，并请报告主席。"林彪向毛泽东送审时写道："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是对加写的这两段话说的。

[3] 林彪1966年11月3日夜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中，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均作了修改，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为此，他还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对于这个修改稿，他所作的文字改动还有：在第11页，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在第13页，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在第14页，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在第15页，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4] 冯定，1957年由毛泽东提名从上海调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哲学系教授，1964年受到错误批判。

[5] 林彪讲话修改稿在最后付印前曾再次送毛泽东审阅。这个稿子除照毛泽东1966年11月4日审改稿进行修改外，又作了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毛泽东对此表示同意。

[6] 林彪讲话修改稿第6页写道："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重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经典的观点，把它当成国家大事，当成政

治问题。”毛泽东阅审时，删去了其中的“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11个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四；在其中“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之前，加上了“同意”二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五。在第10页讲到“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的批判”处，毛泽东删去了冯定的名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六。

对参加接见全国各地师生、红卫兵的一些负责人的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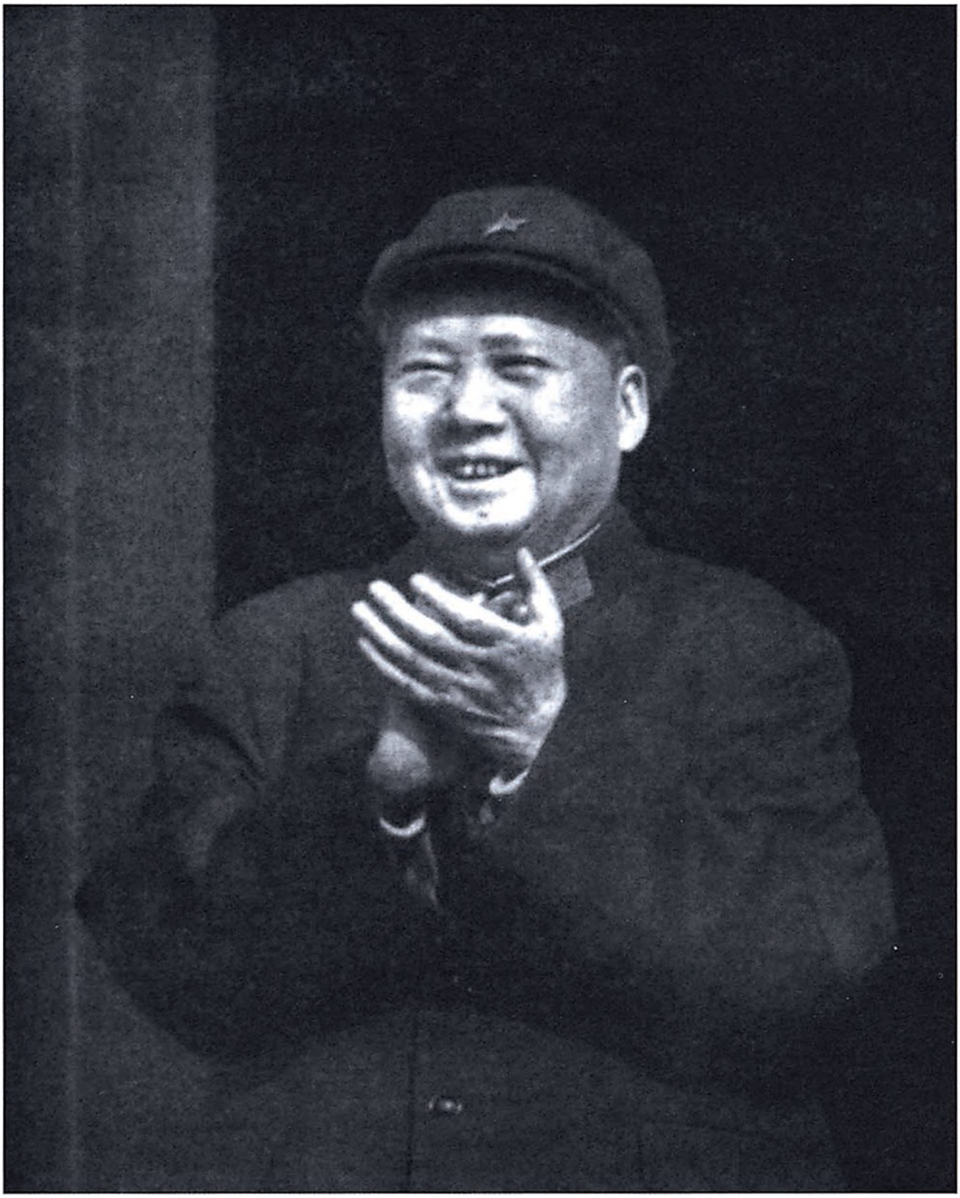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10日）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1]

---

[1] 1966年11月10日和11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这是他11月1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的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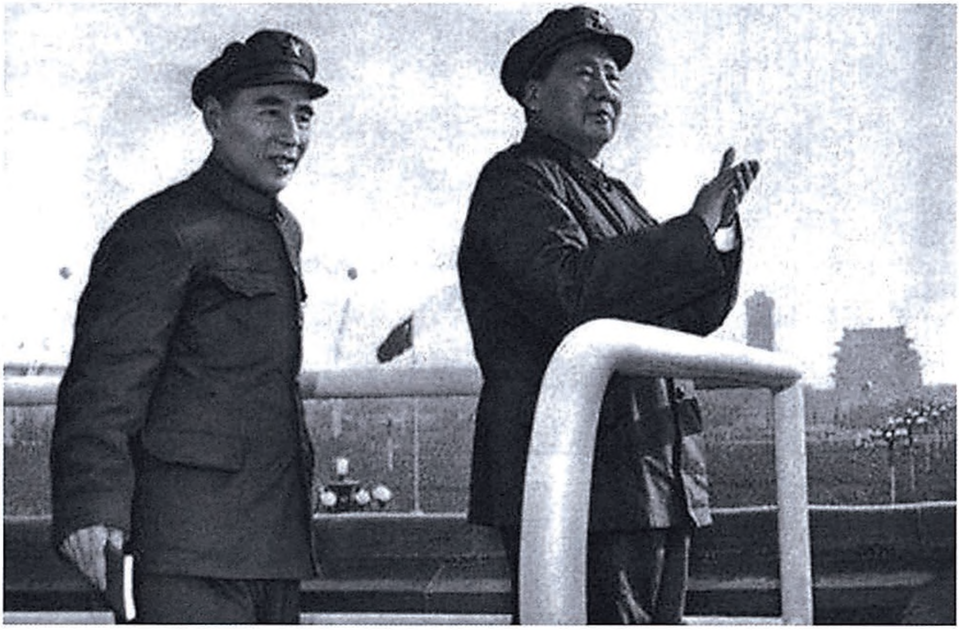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群众和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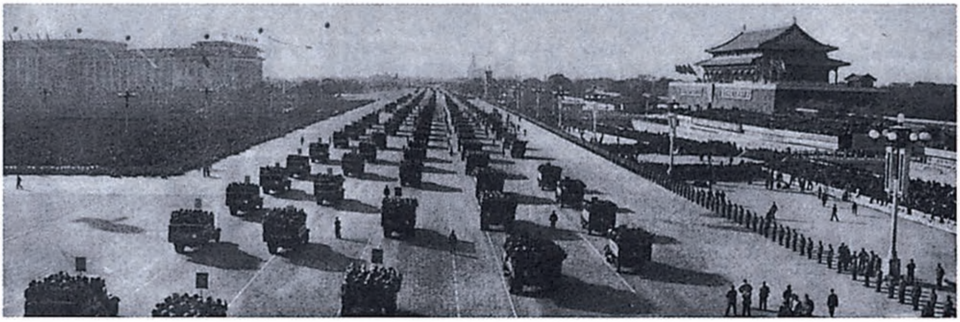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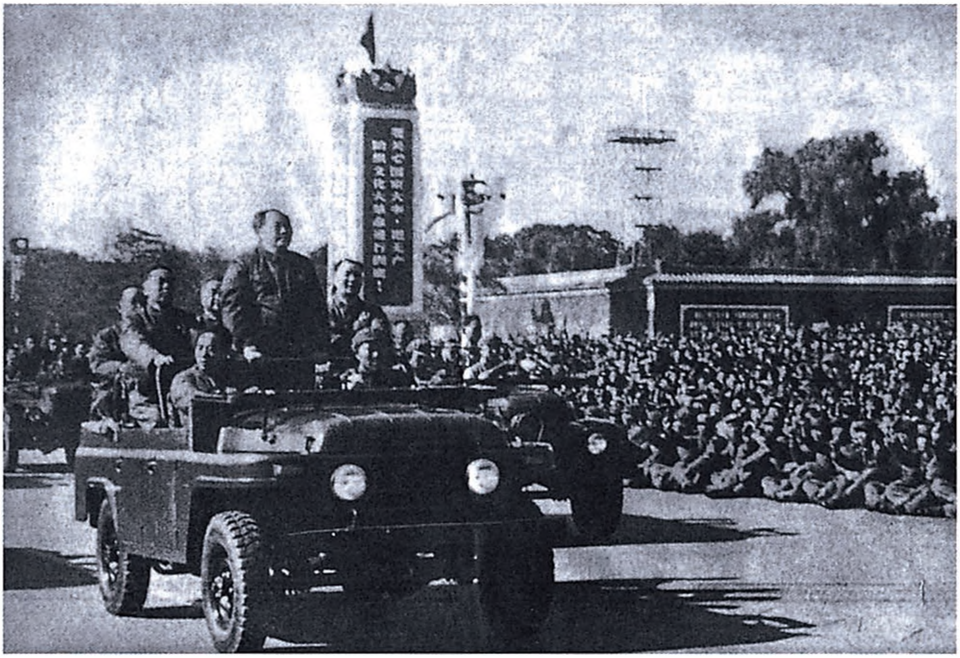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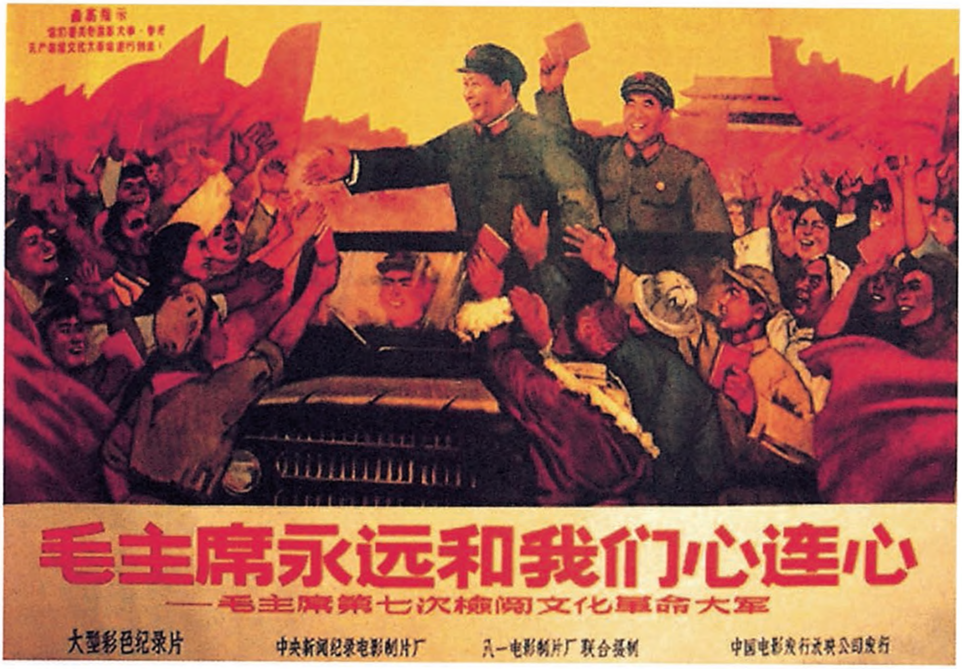
1966年11月1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最高指示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
—毛主席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大型彩色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 联合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毛主席第七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串连问题的通知稿和补充通知稿的批语[1]

（1966年11月16日、12月2日）

一

退总理照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廿四时

---

[1]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1966年11月16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稿上。通知稿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通知。本篇二写在周恩来12月1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上。补充通知稿在11月16日通知的基础上，对外地来京和在外地串连的师生、红卫兵离京与返回原地问题作出了4条具体的补充规定。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删去。

二

退总理照办。

毛泽东
十二月二日

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学校师生的谈话[1]

（1966年）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2]，学三八作风[3]，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1966年12月31日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中，在“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之后，引用了这段话。

[2] 四个第一，指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3] 三八作风，指“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

[4] 三大纪律，指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指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对江青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6年11月）

一

改了一点[2]，供小组同志们参考。

二

退江青：

又有点修改[3]，似较妥当些。

毛泽东

十一月廿八日一时

三

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

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毛主席则在二十多年前，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出了推陈出新的问题。推陈出新，就是要有新的、人民大众的内容，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

四

这时，我才充分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队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他们不是把锋芒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反动的学术权威，而是对准革命的学生。同志们，朋友们，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据说我们的毛主席早在今年六月间，就提出过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的问题，可是有的同志没有请示毛主席，就急急忙忙地派出去了。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

---

[1]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的这个讲话稿有过多次批语和修改。本篇一是他对江青1966年11月24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11月27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24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四是对27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本篇三、四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1月28日，江青在北京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发表了这个讲话。

[2]　除本篇三外，毛泽东对江青1966年11月24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此稿第六至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的同志们，朋友们，你们给我的信，我倒是都看了。只是因为工作太忙，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亲自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始终是关心的，重视的。"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后一句话改为："只是因为工作忙一些，身体也不太好，没有能够到你们团去，但是，你们团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关心的。"第七页写道："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这是你们团里一批想革命的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和我一块努力的结果。"毛泽东审阅时，在其中的"和我一块努力"后面，加上"在别人首创的基础上加工或改制"14个字。此外，毛泽东对这个送审稿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3]　除本篇四外，毛泽东对江青1966年11月27日送审稿还作了一些修改。在第一页，将"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文学艺术"改为"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在第三页，删去了"忠于毛主席"5个字；在第七页，将"北京京剧一团是首先接受我提出的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改为"北京京剧一团是北京首先接受京剧改革光荣任务的一个单位"；在第十页，将"对于我们党内的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改为"对于我们党内以反对毛主席为首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外，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方面的修改。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

1966年11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毛泽东思想研究会负责人西泽隆二。

1966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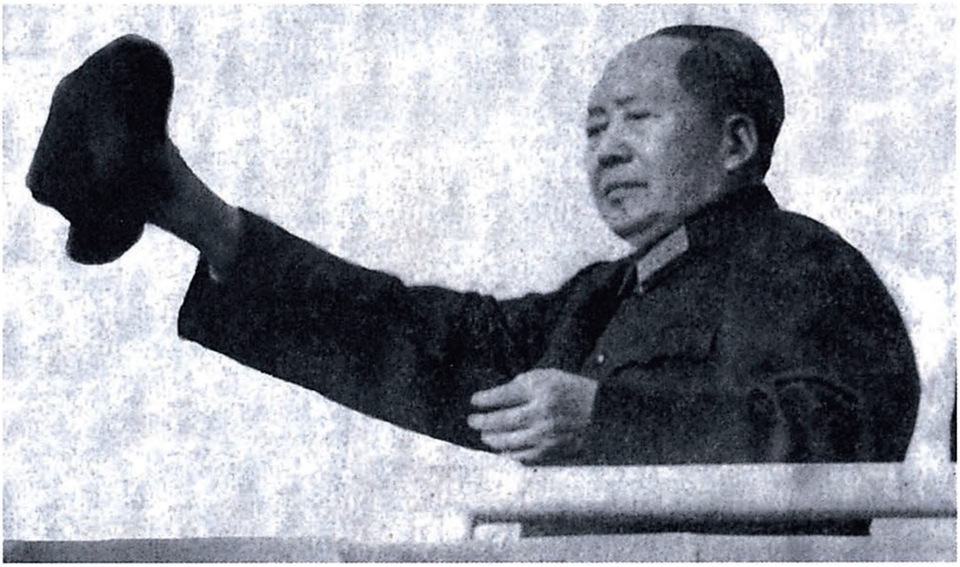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和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966年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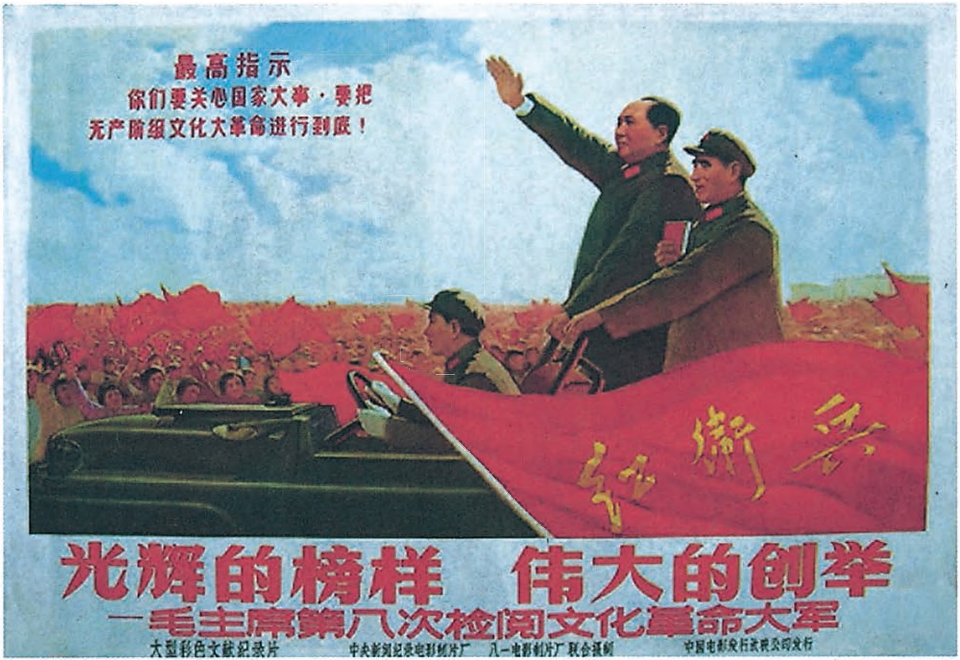
1966年的毛泽东。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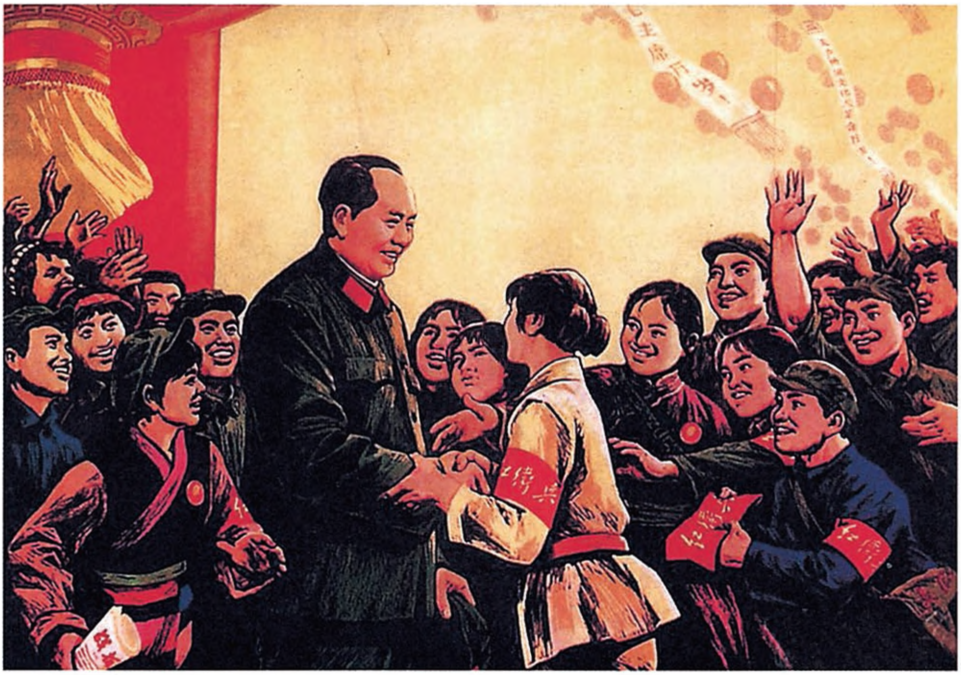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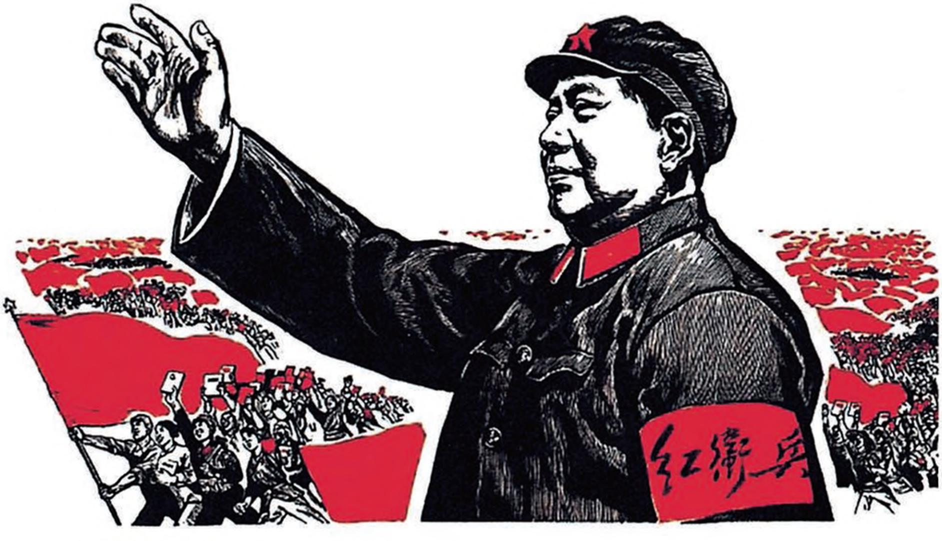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衛兵
光辉的榜样 伟大的创举
—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八一电影制片厂 联合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

光辉的榜样　伟大的创举——毛主席第八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宣传画）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油画）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宣传画）

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6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具有现代工业、集体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任务和制定的宏伟纲领，为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沿着劳动党所指引的方向，英勇地向前迈进。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

党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坚决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共同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起，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坚决进行到底。

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

（1966年11月）

这是很重要的事，应该大搞，没有了不起的问题，要支持群众的革命串连，要搞就大搞，不会没地方住的。

对中央关于刘澜涛[1]出狱问题的复电稿和张闻天有关证明材料的批语[2]

（1966年11月、1967年2月）

一

照办。

二

张闻天[3]关于一九三六年处理北方局领导人，要求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以便早日释放关在北平监狱中的干部，给中央的信及附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军委常委及中央文革小组）。

汪[4]办。

---

[1] 刘澜涛，1931年在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同薄一波等共61人履行简单手续后集体出狱。“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8年被平反。

[2] 周恩来1966年11月24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送上西北局来电和刘澜涛来信”，“因这一集体自首案牵连人甚多，而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现拟电

如另纸。如妥，请批发”。周恩来代拟的中央给西北局复电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本篇一就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本篇二写在张闻天1967年2月18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张闻天在信后附送了一份证明材料。材料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3] 张闻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负总责。

[4]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新闻稿的批语[1]

（1966年12月3日）

退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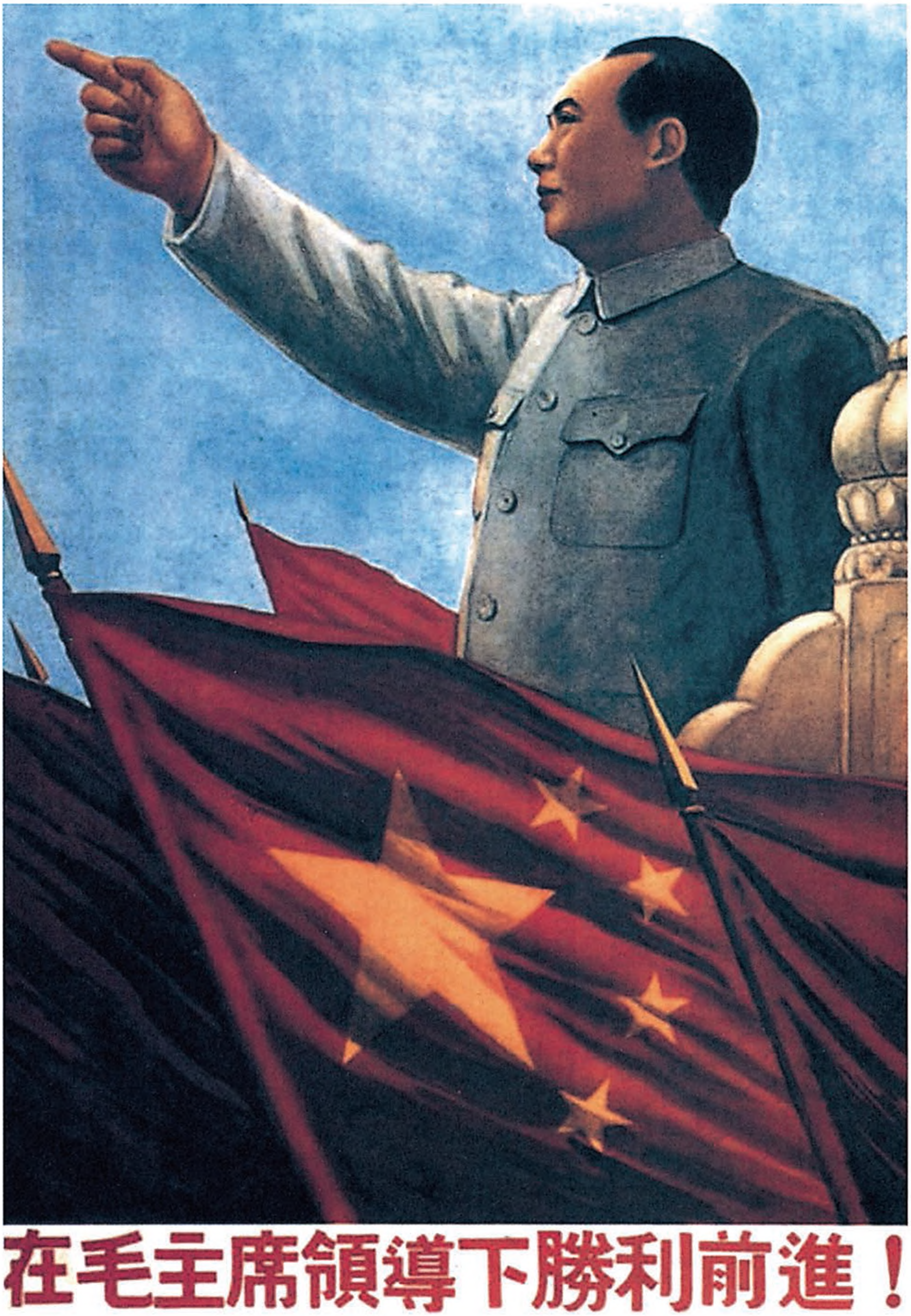
已作修改，请再酌。

毛泽东

十二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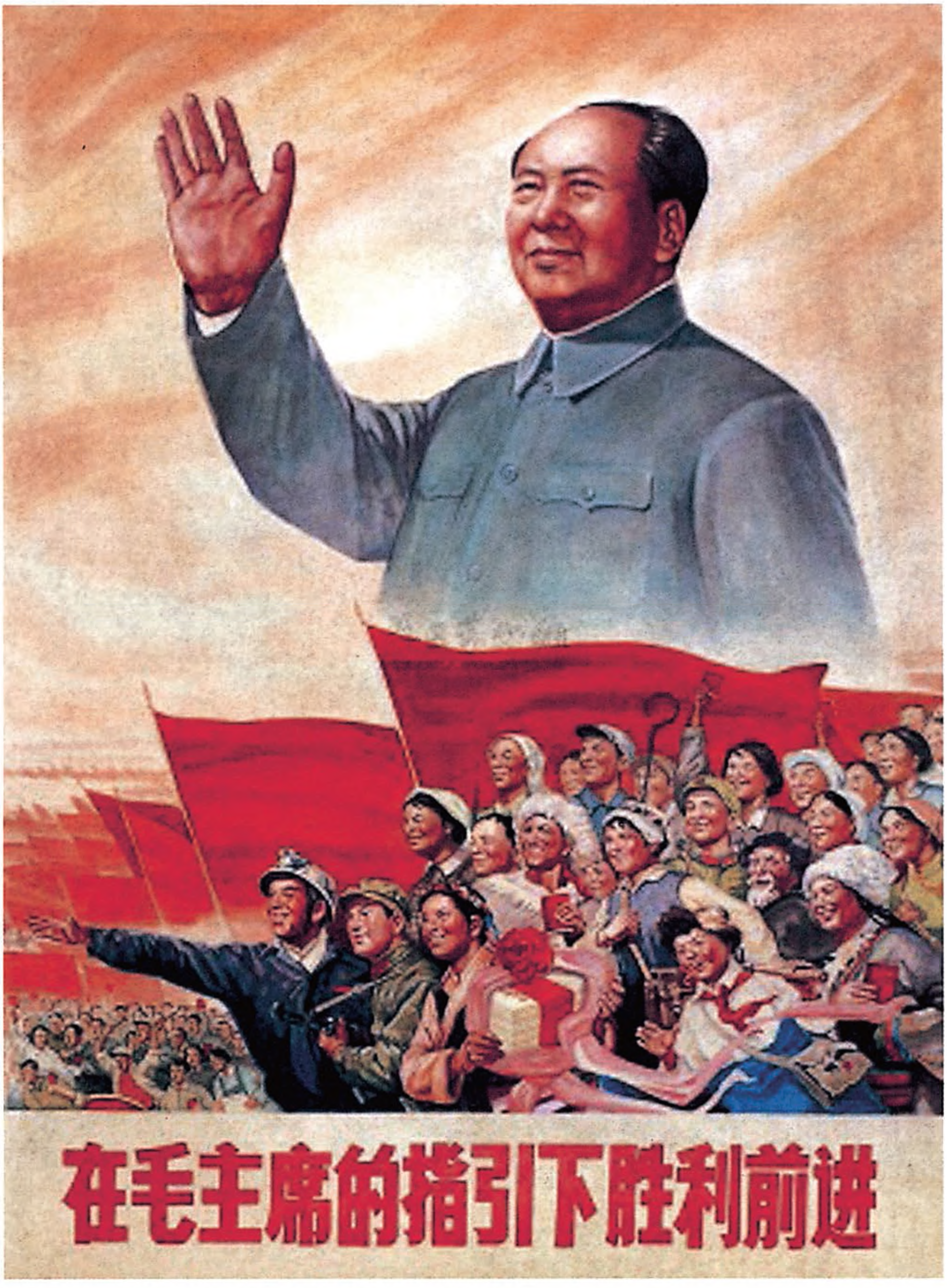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6年12月2日送审的新闻稿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7、9、13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部门的一些领导人的名字。这篇新闻稿发表在1966年12月4日《人民日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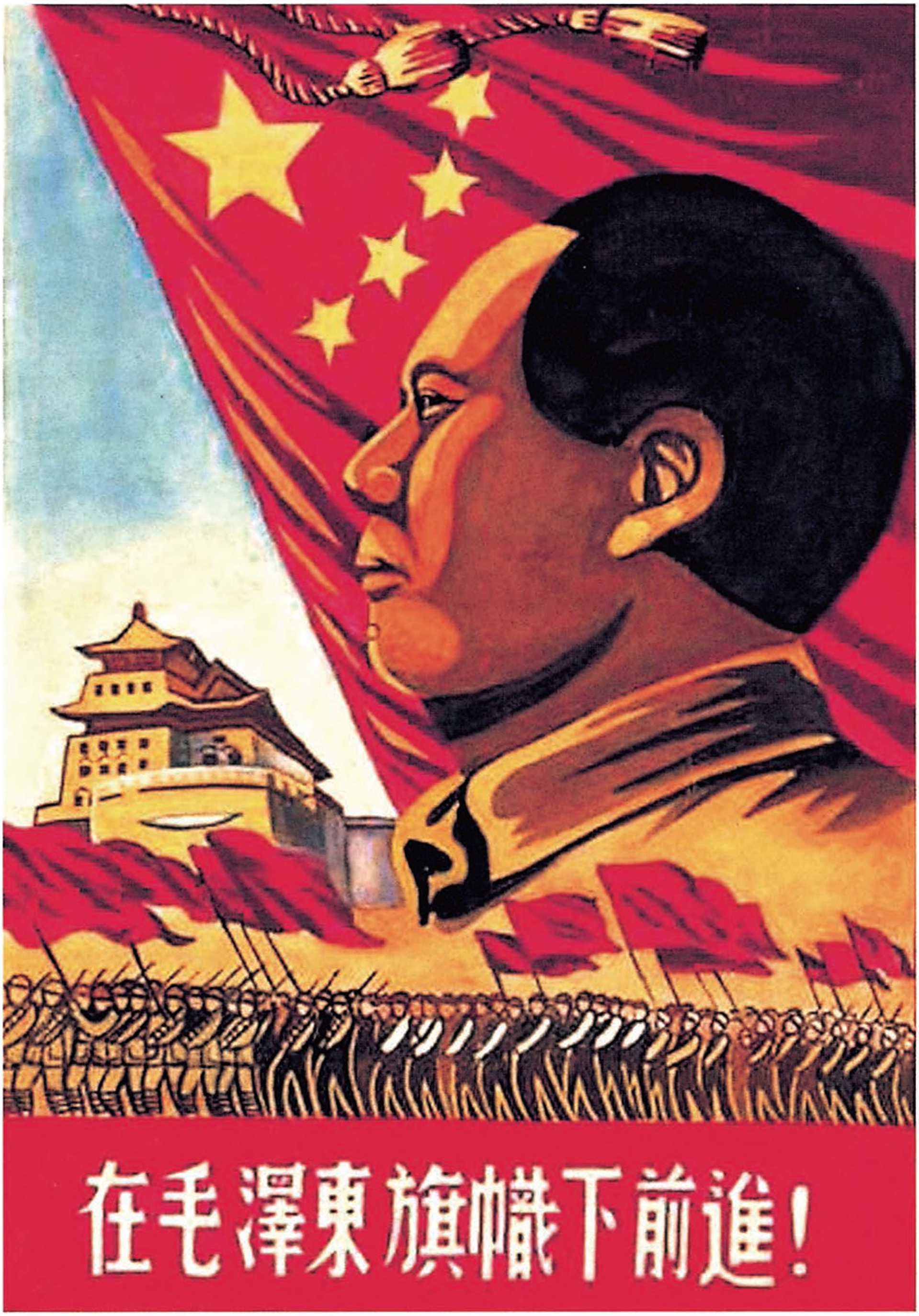


在毛主席領導下勝利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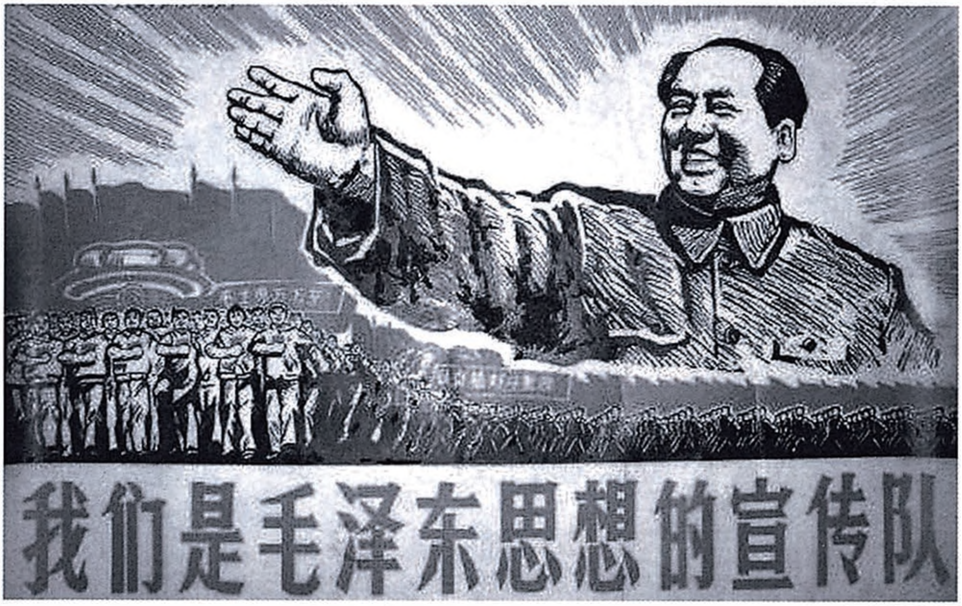
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前进！（宣传画）


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胜利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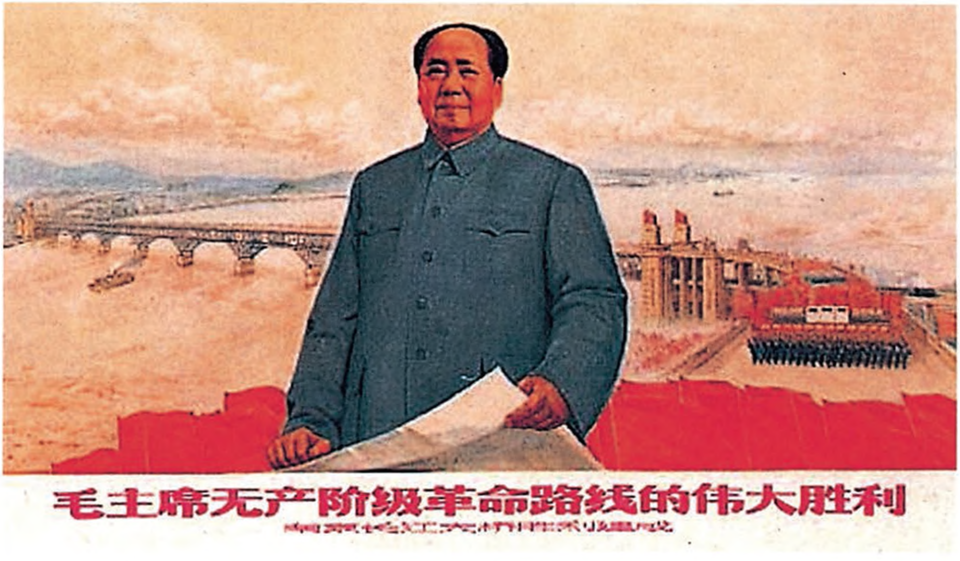
在毛主席的指引下胜利前进（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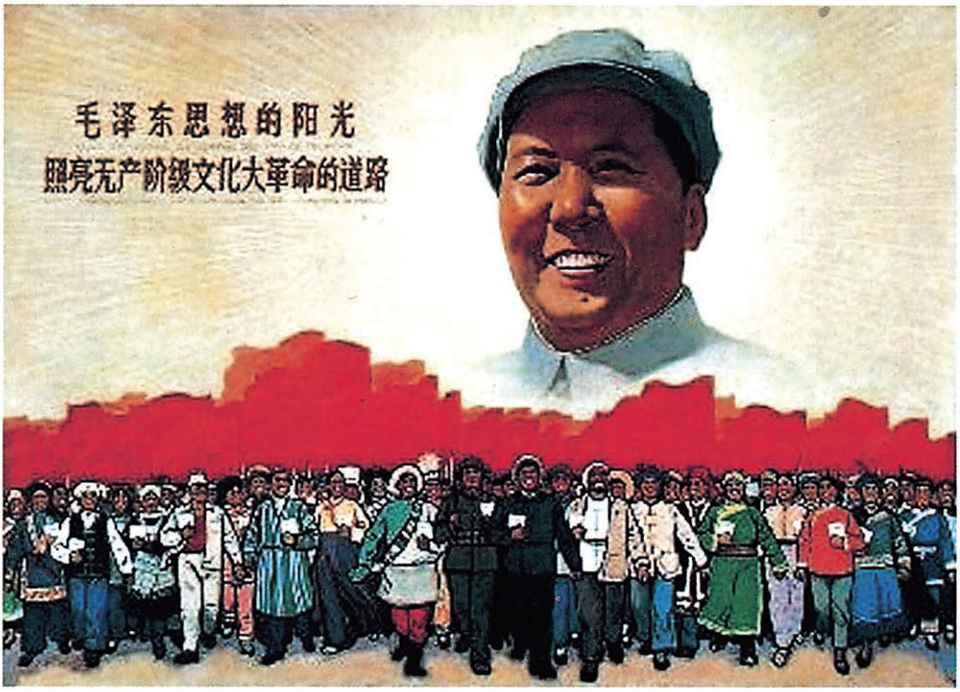
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宣传画）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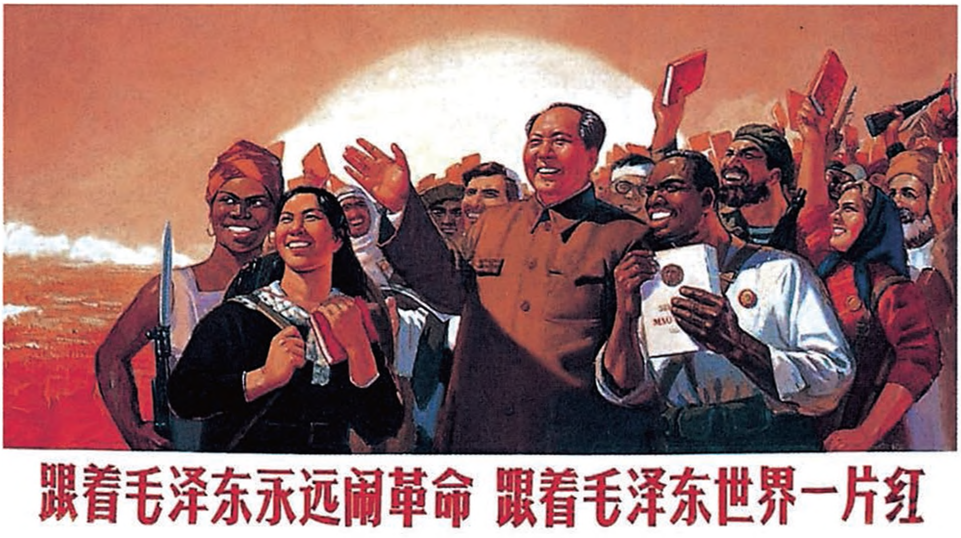
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宣传画）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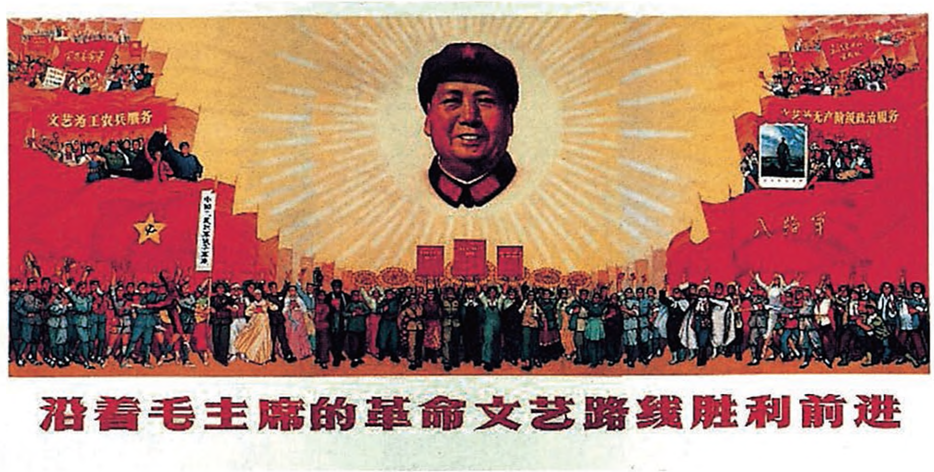
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画）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
照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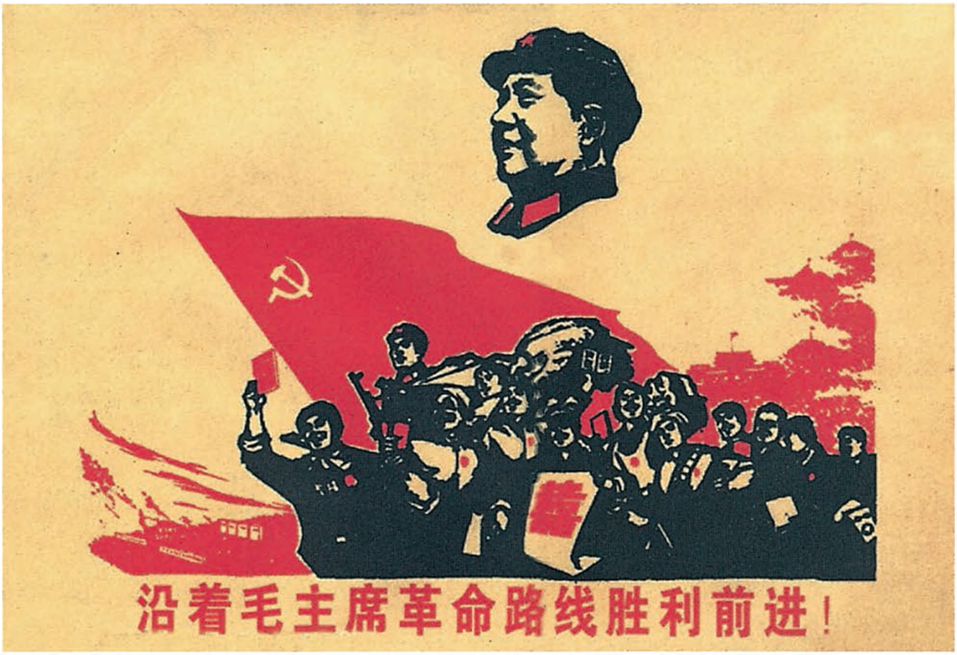
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宣传画）


跟着毛泽东永远闹革命 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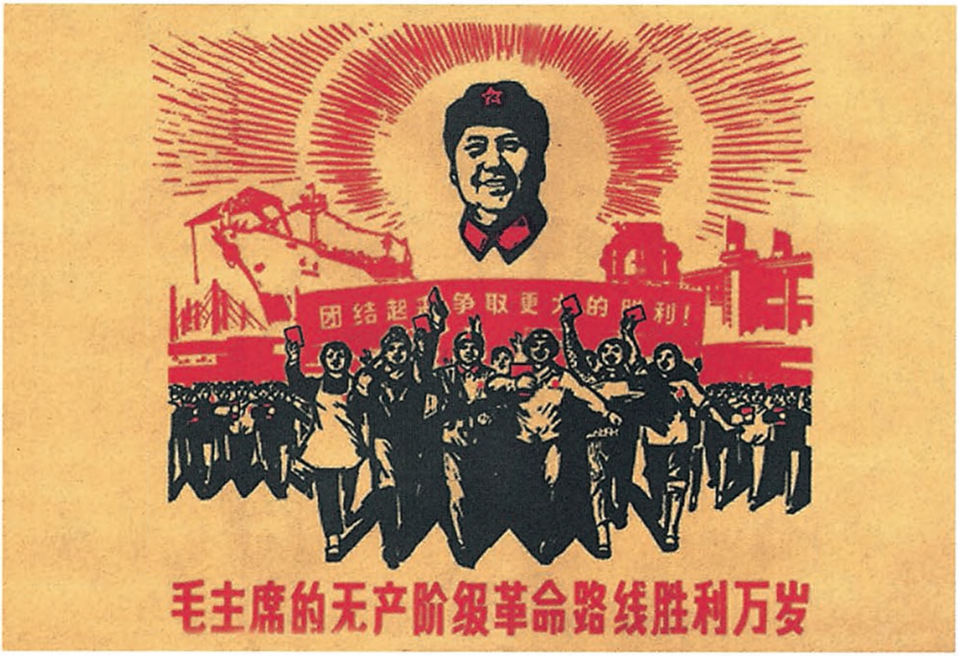
跟着毛泽东永远闹革命　跟着毛泽东世界一片红（宣传画）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八路军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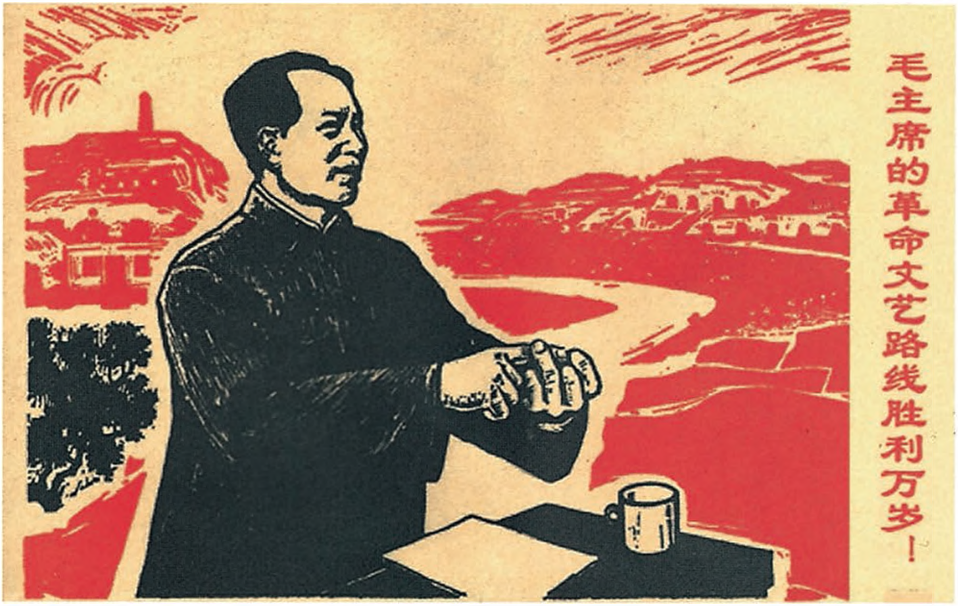
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前进（宣传画）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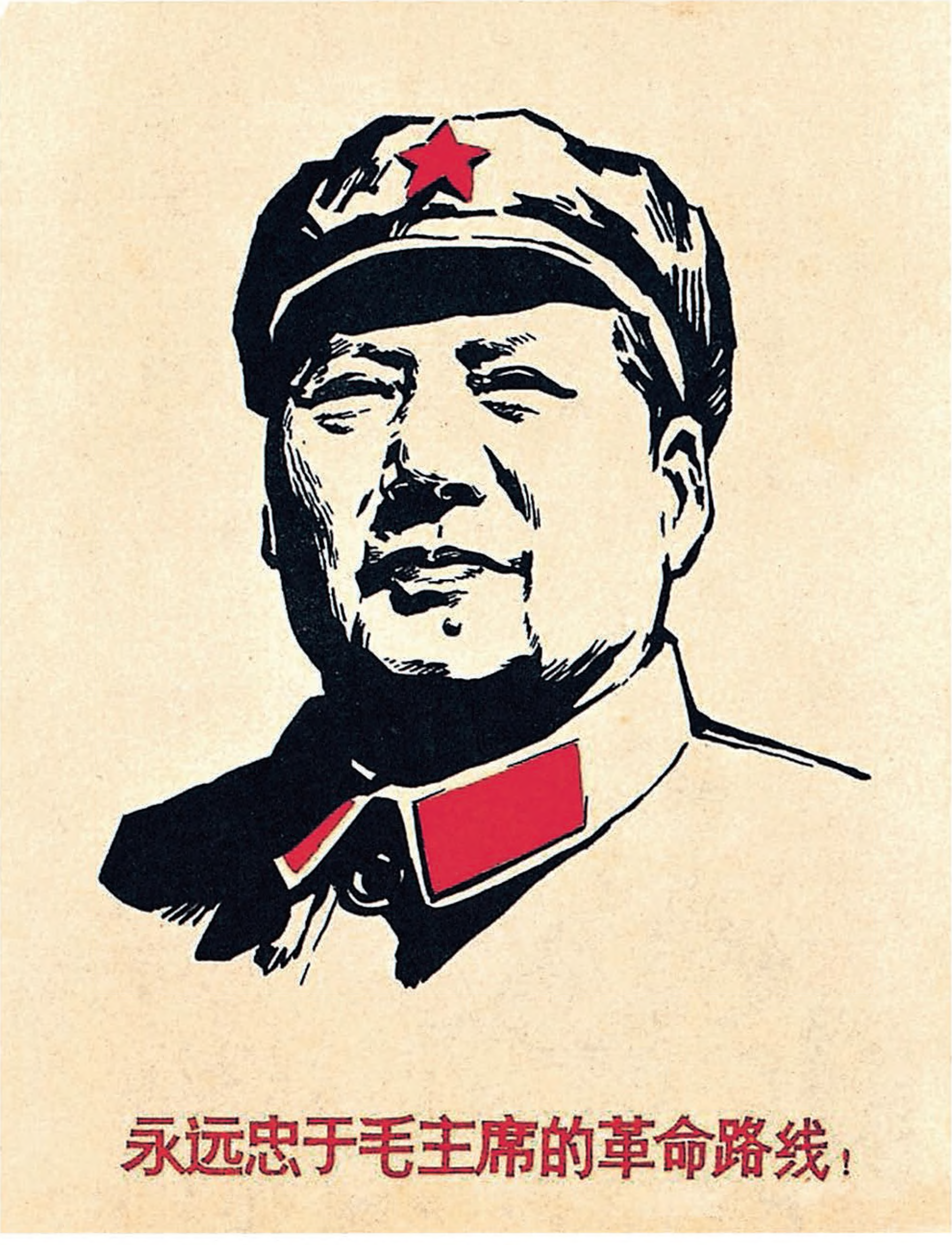
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宣传画）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宣传画）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宣传画）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宣传画）

讨论“工矿十条”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6日）

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和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对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稿的批语[1]

（1966年12月15日）

退总理办。

请林彪[2]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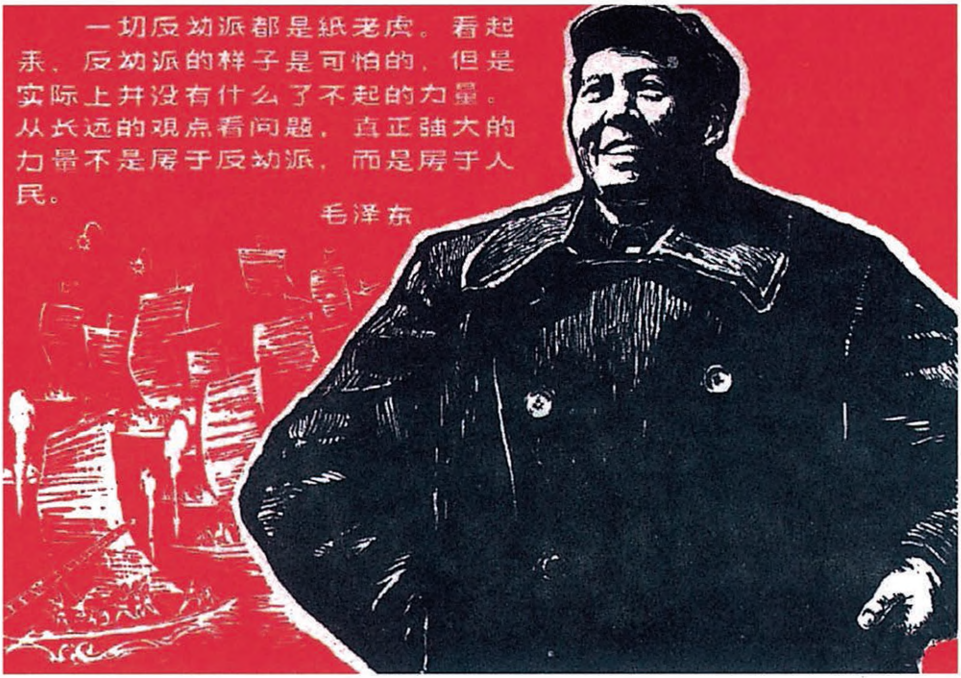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五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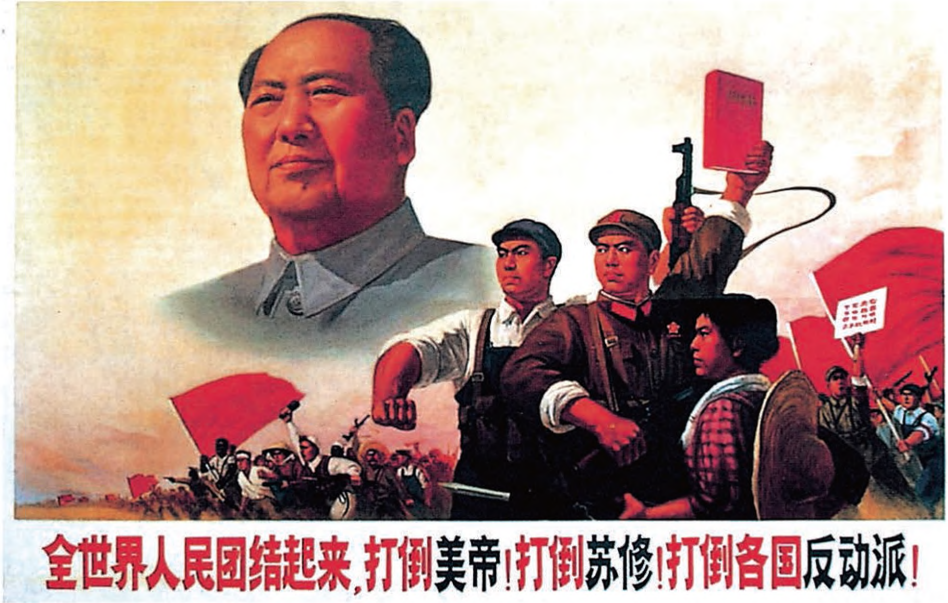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6年12月13日给毛泽东、林彪的送审报告上。周恩来写道："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周恩来送审的中共中央意见共十条：一、坚决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狠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二、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二十三条的原则进行。必须是群众当家做主、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一般不派工作队。可以考虑派些少而精的观察员。三、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解决“四清”问题和“四清”复查的问题。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文化大革命也要纠正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贯彻实行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四、在农村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定地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逐步做到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五、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六、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时那样，采取回避政策。七、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坚持文斗，不要武斗。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八、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因为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破坏分子”等的革命群众，应当平反。地富反坏右分子是专政的对象，绝不允许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绝不允许他们造贫下中农的反。九、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半农半读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应当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妥善安排。农村小学的文化革命，和所在社、队一起搞，由所在社、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统一领导。十、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经过文化大革命，把农村变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文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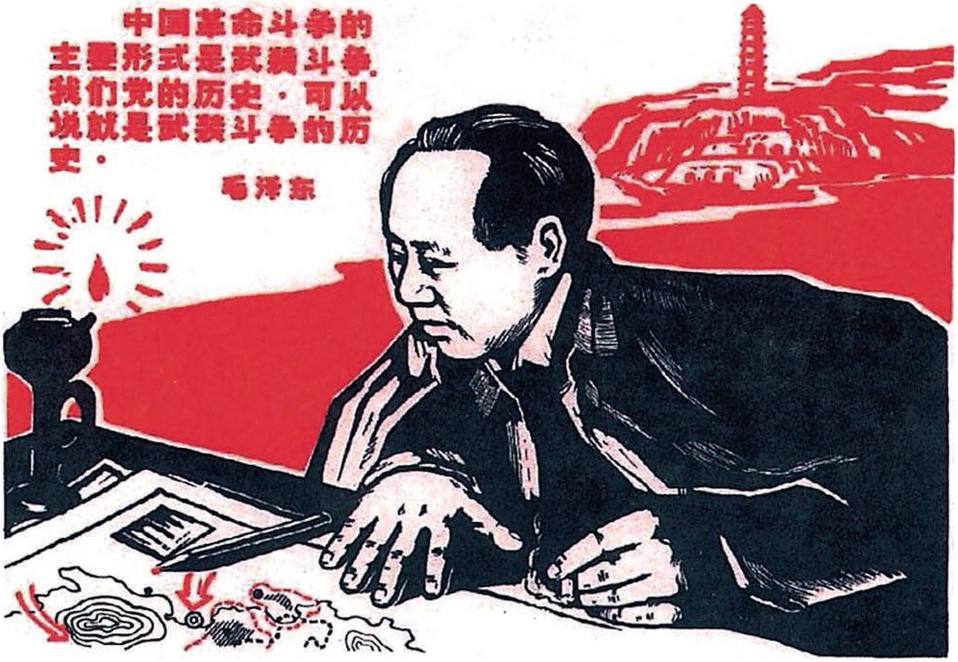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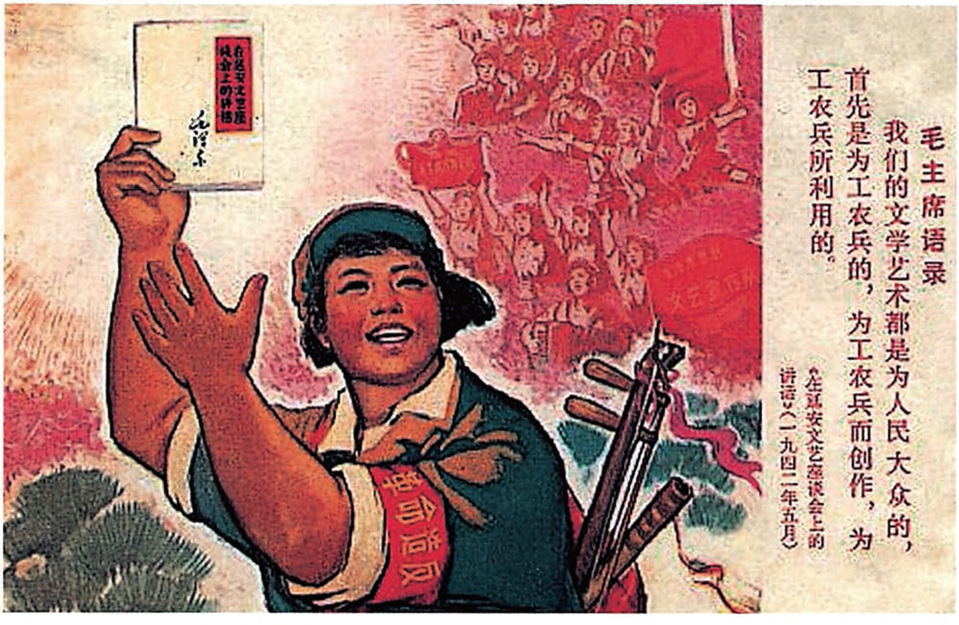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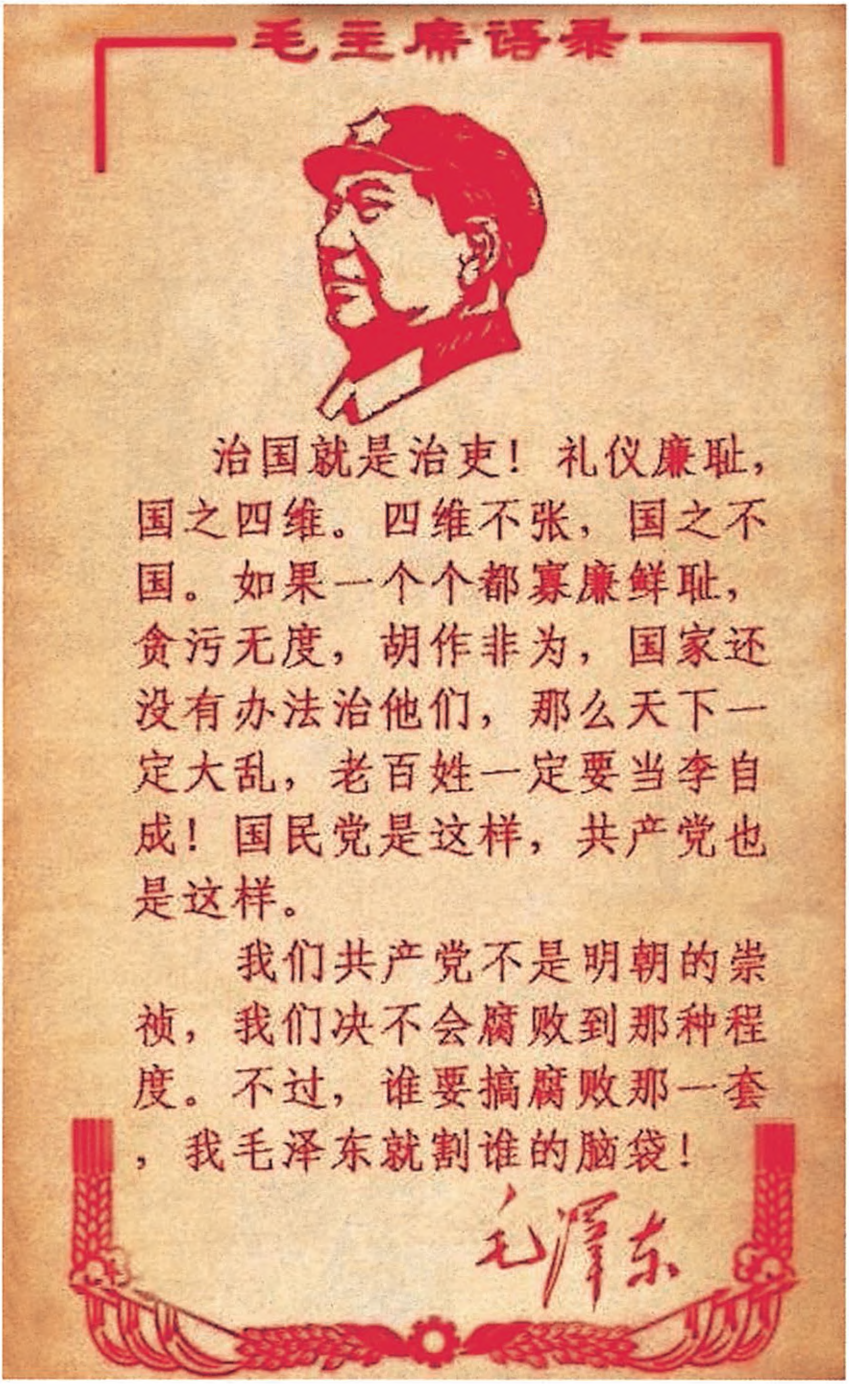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中国革命斗争的
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
我们党的历史·可以
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
史·
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
革命造反
毛主席语录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
工农兵所利用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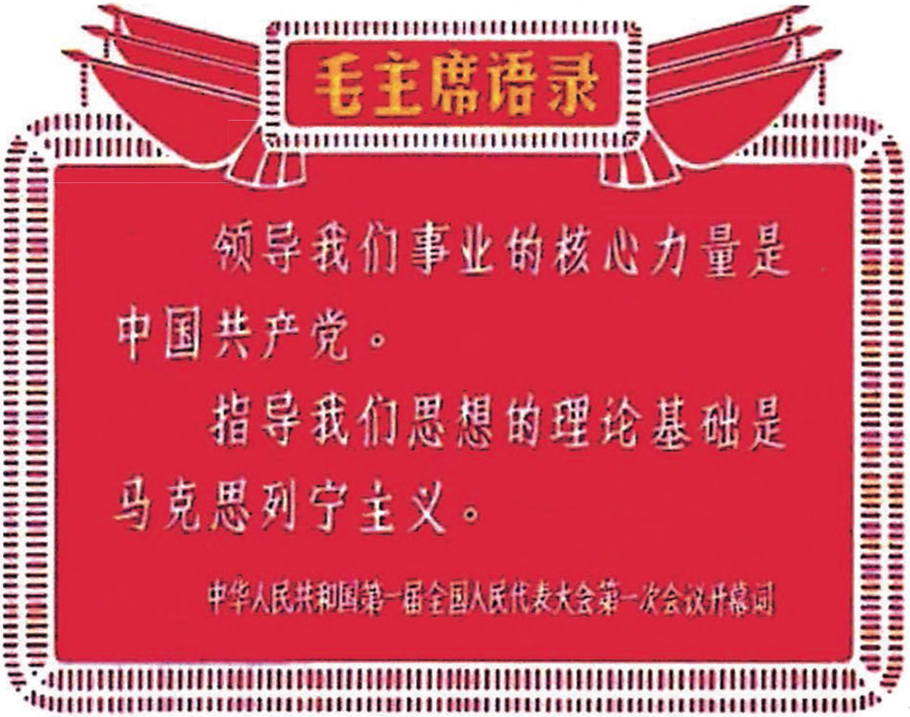
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

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

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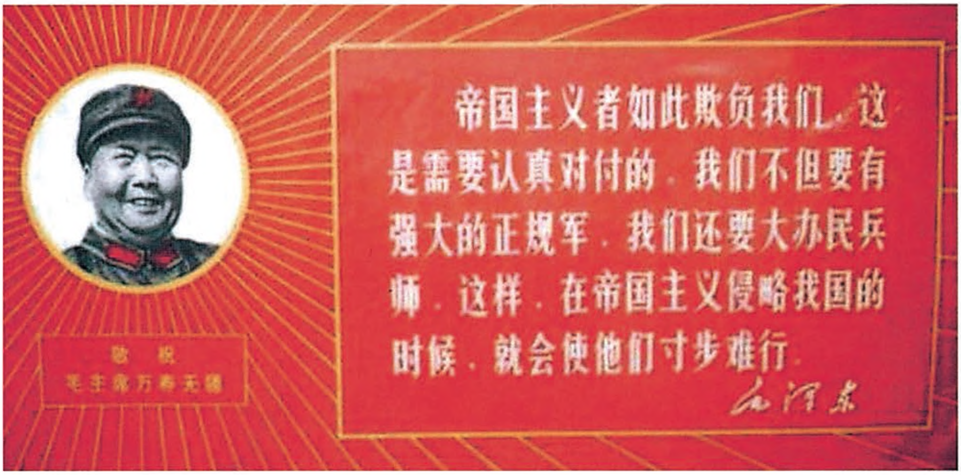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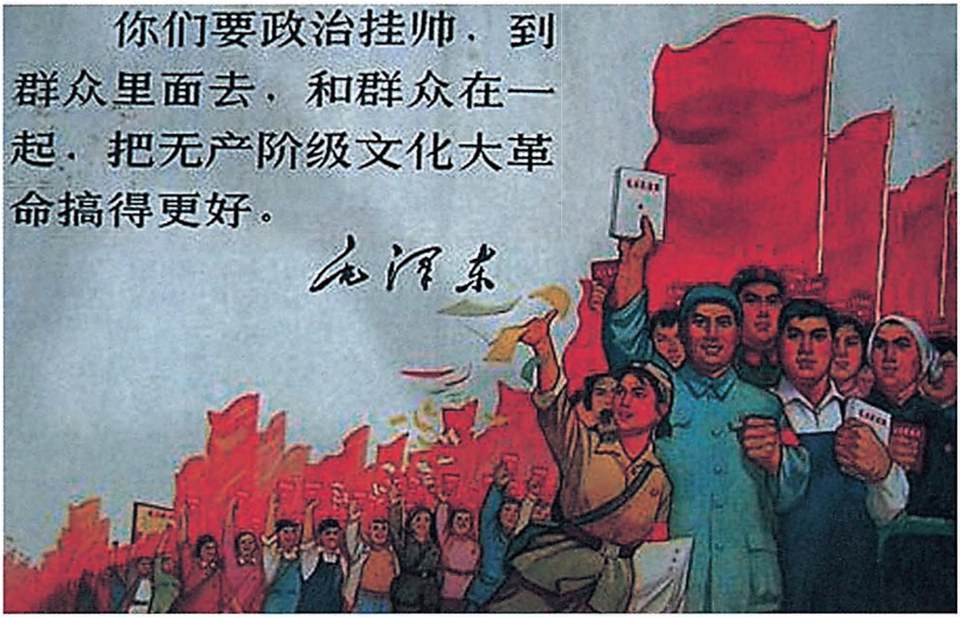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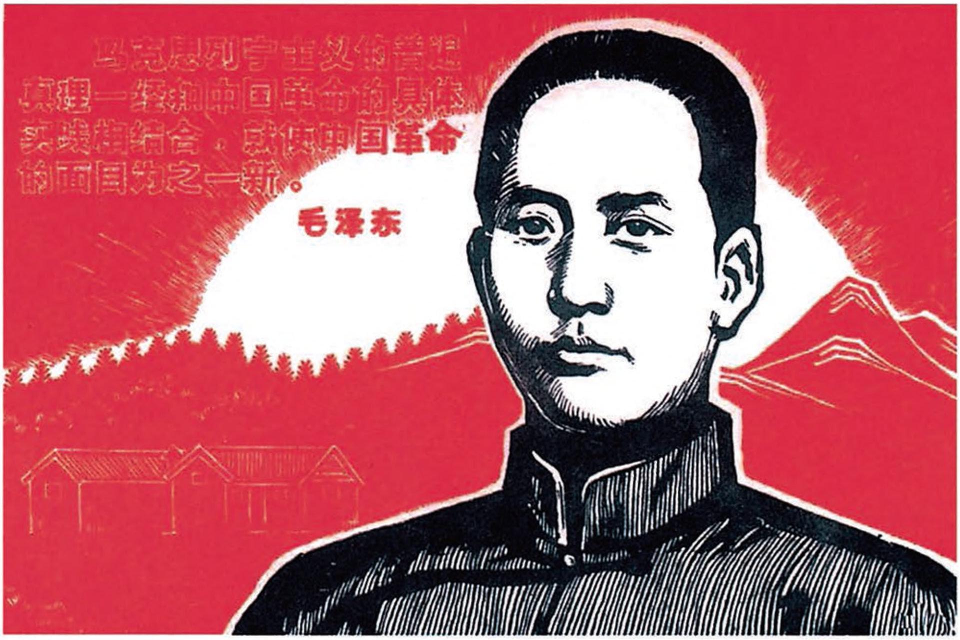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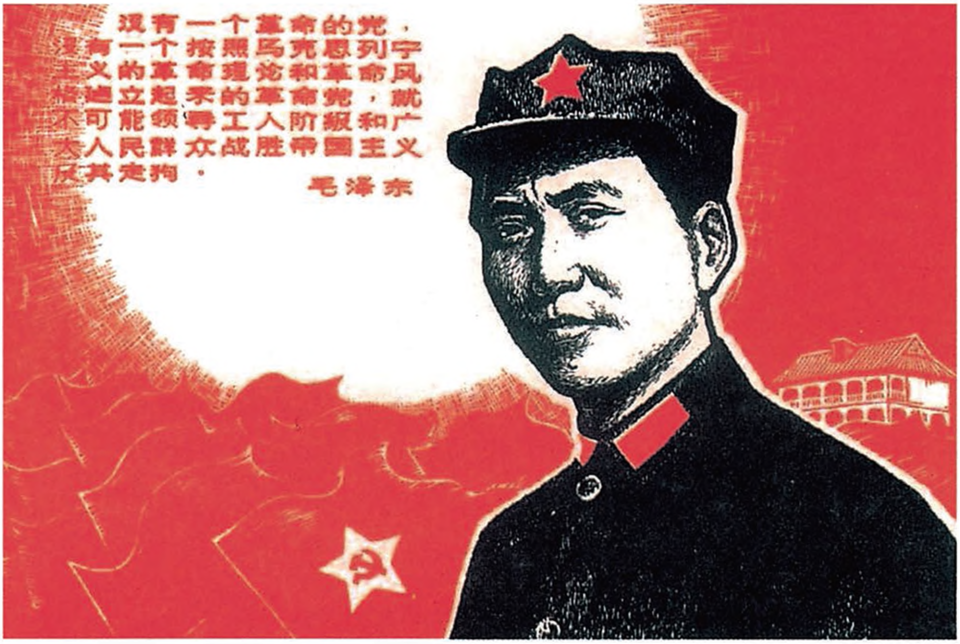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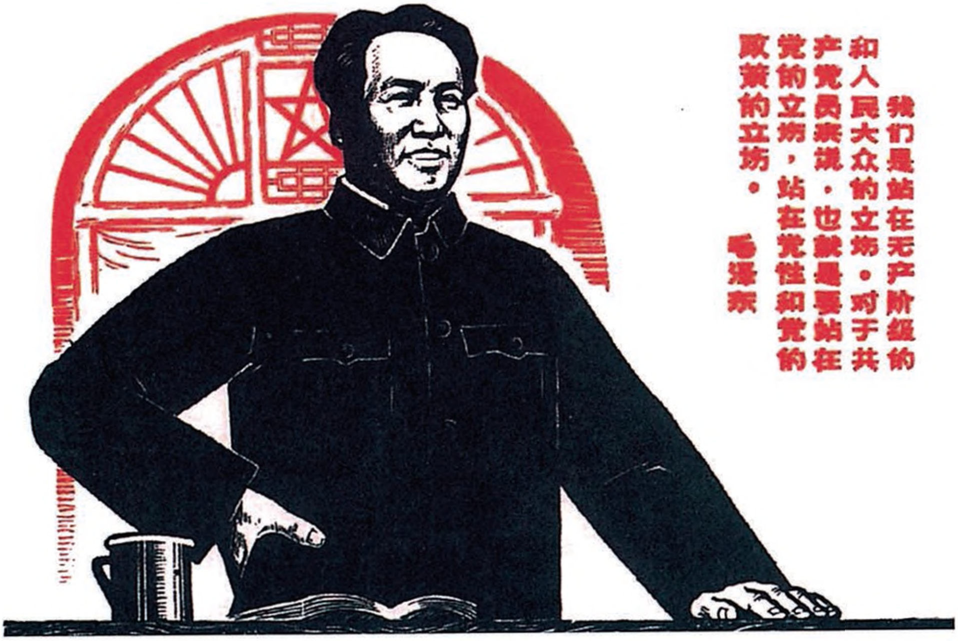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
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
的面目为之一新。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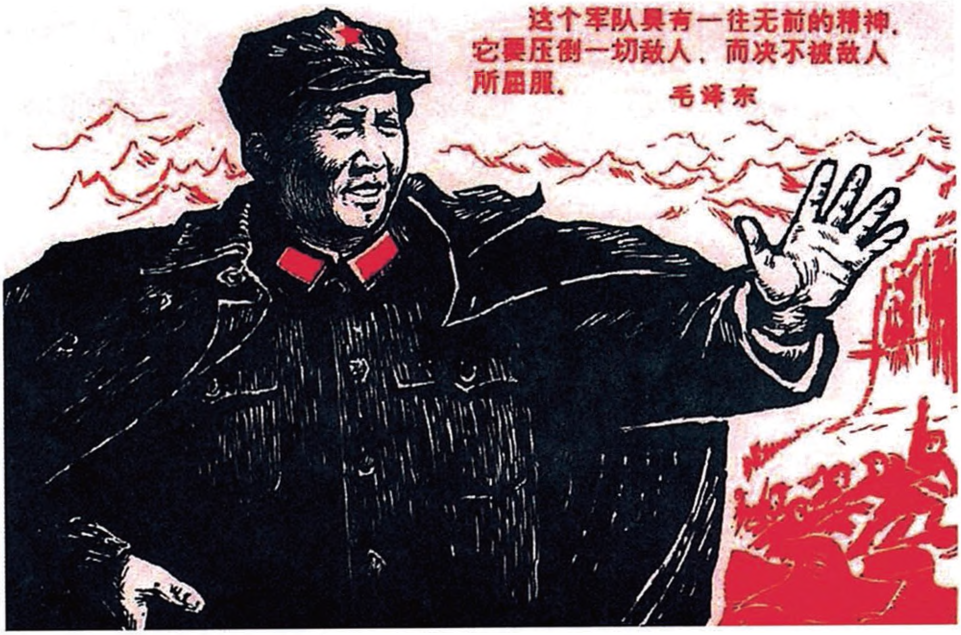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没有一个革命的党，
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
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
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
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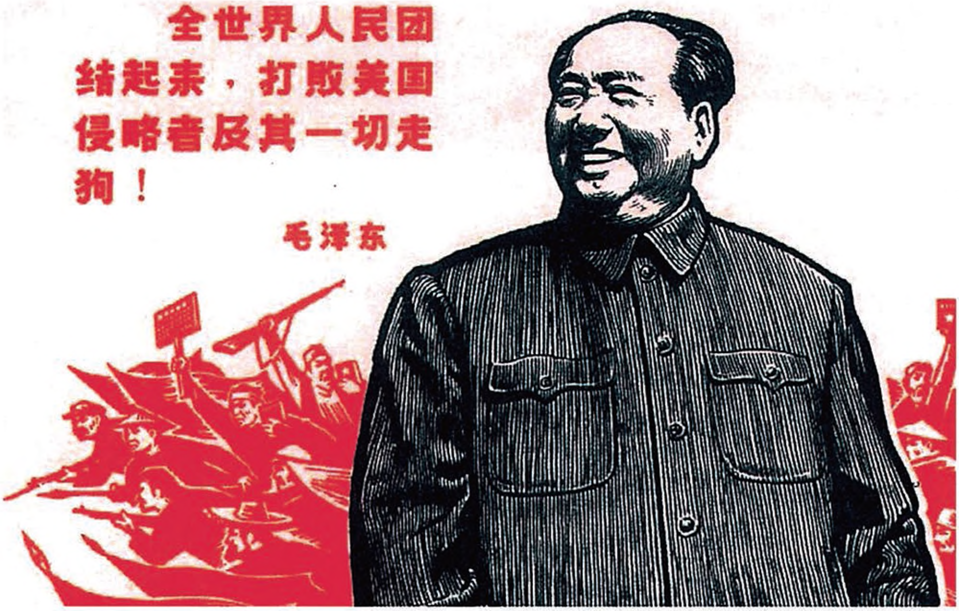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
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
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
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
政策的立场。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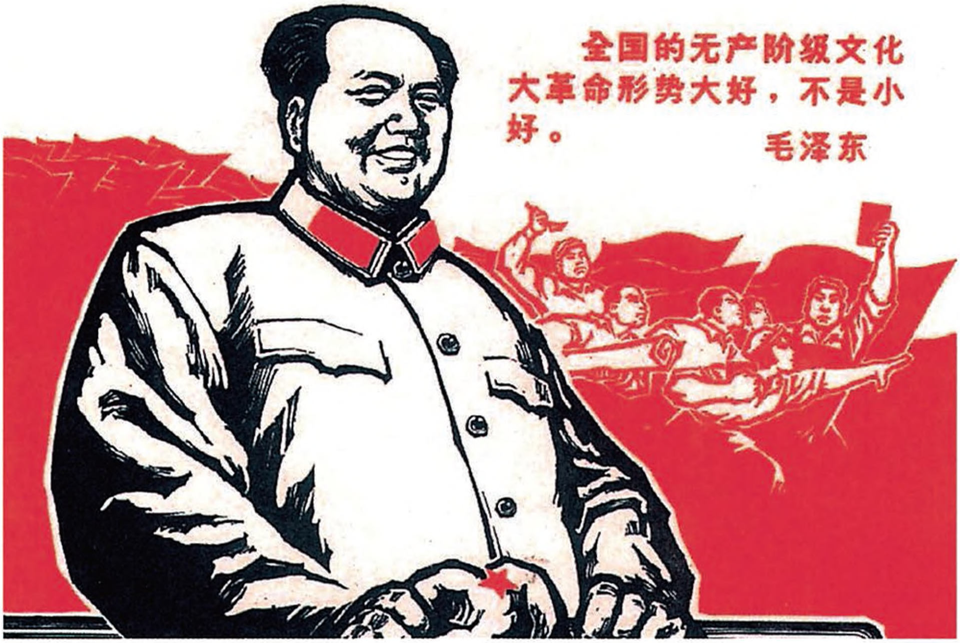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
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
所屈服。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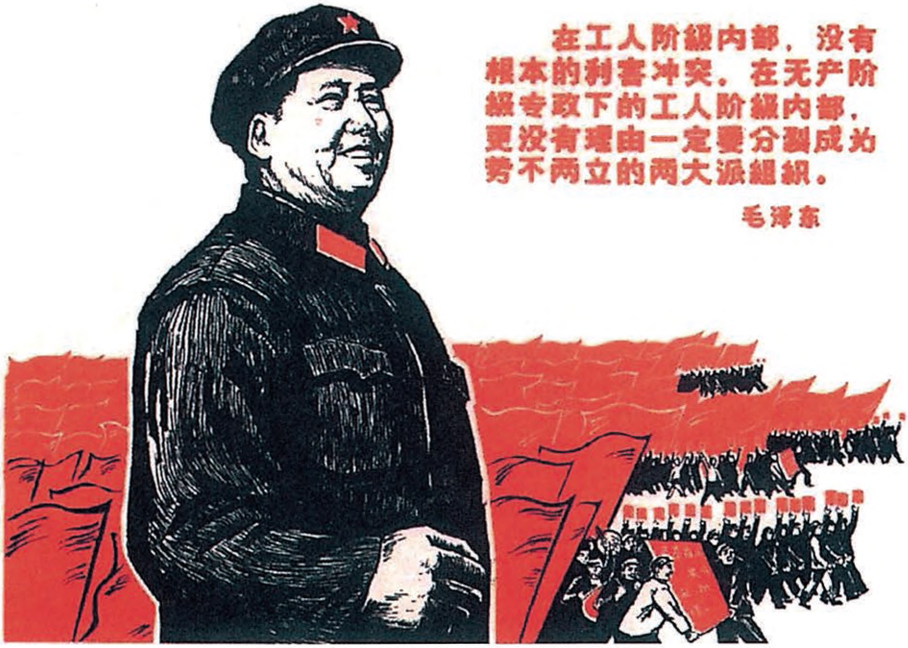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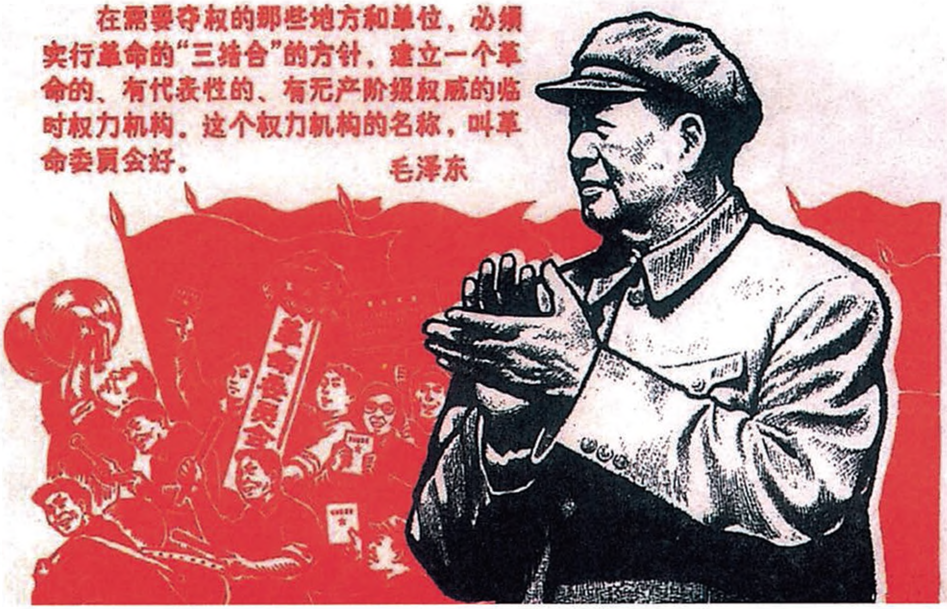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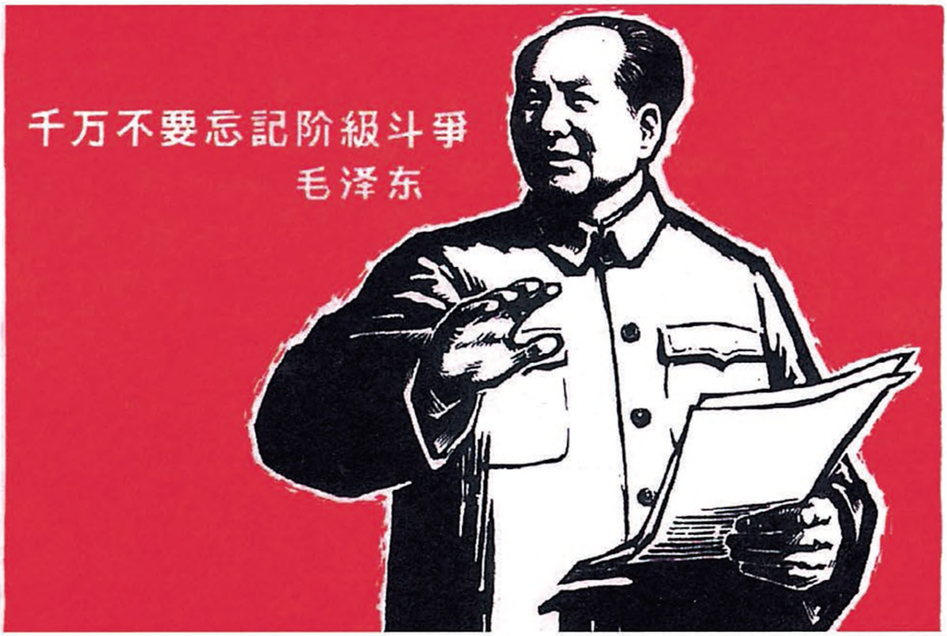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在工人阶級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級专政下的工人阶級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組織。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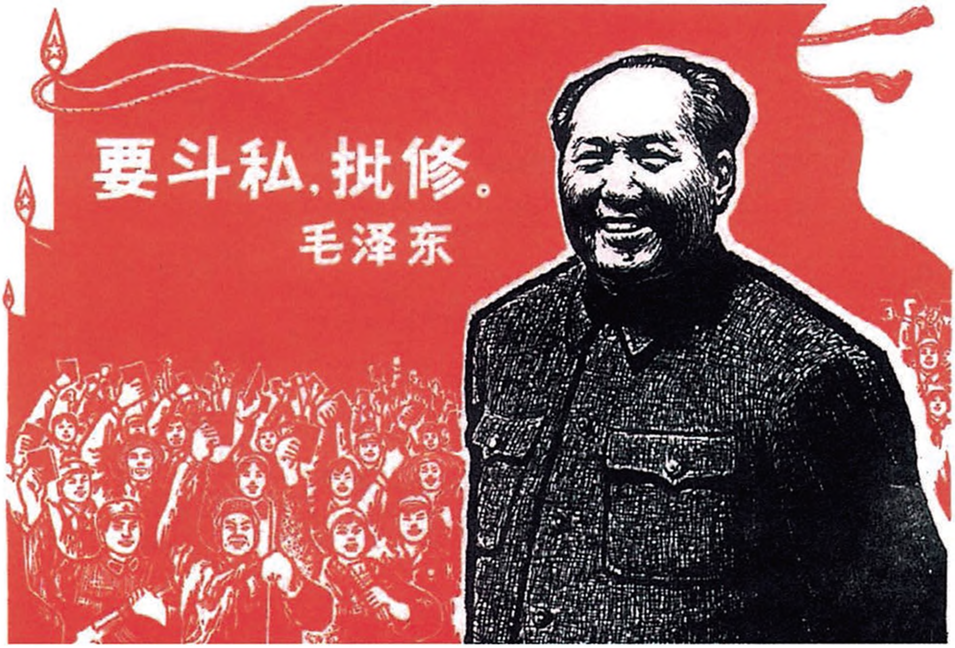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員会好。
毛泽东
革命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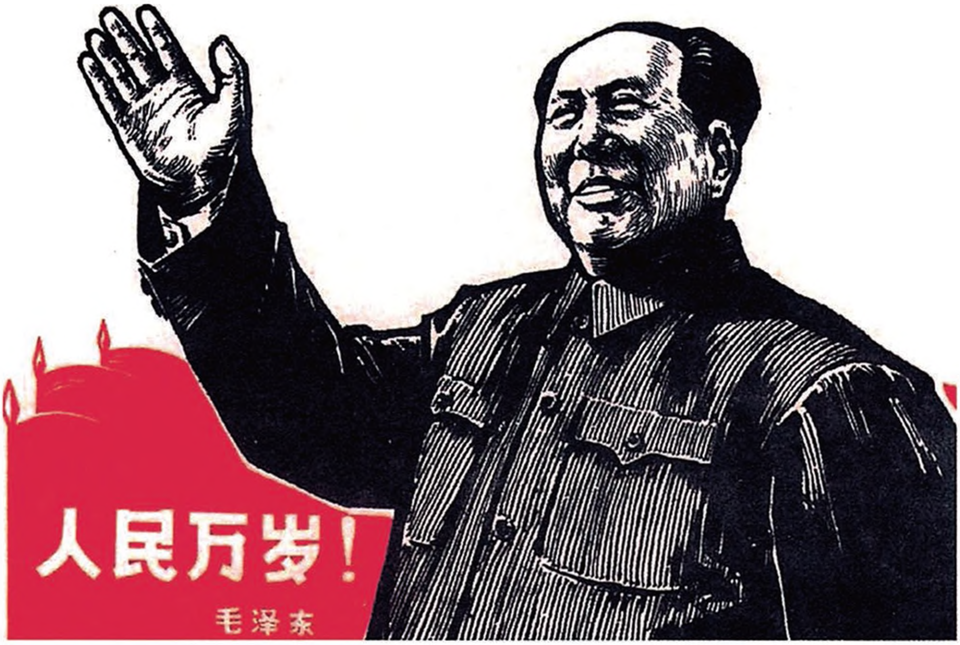
毛主席语录（宣传画）


千万不要忘記阶級斗爭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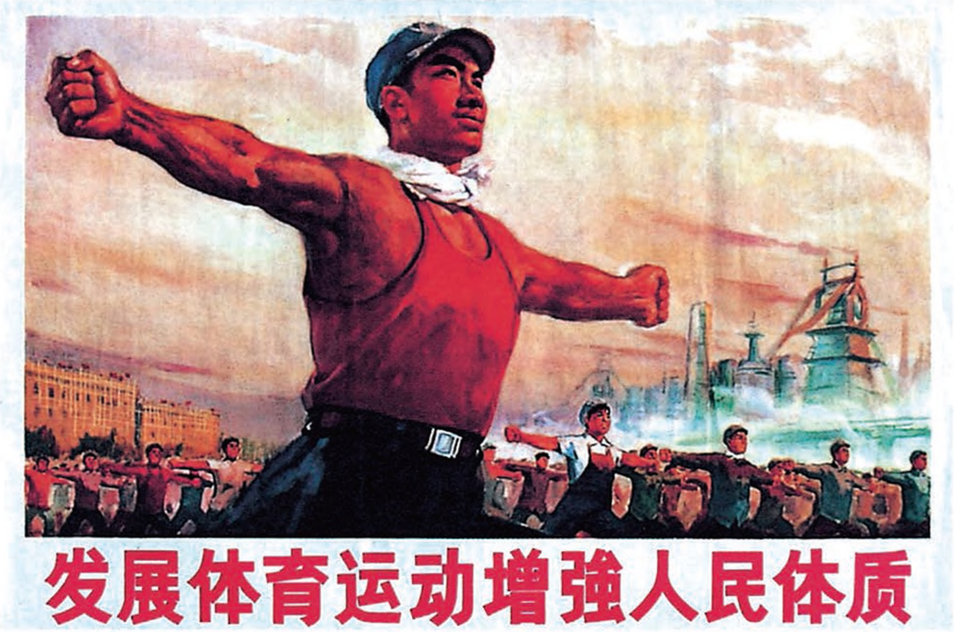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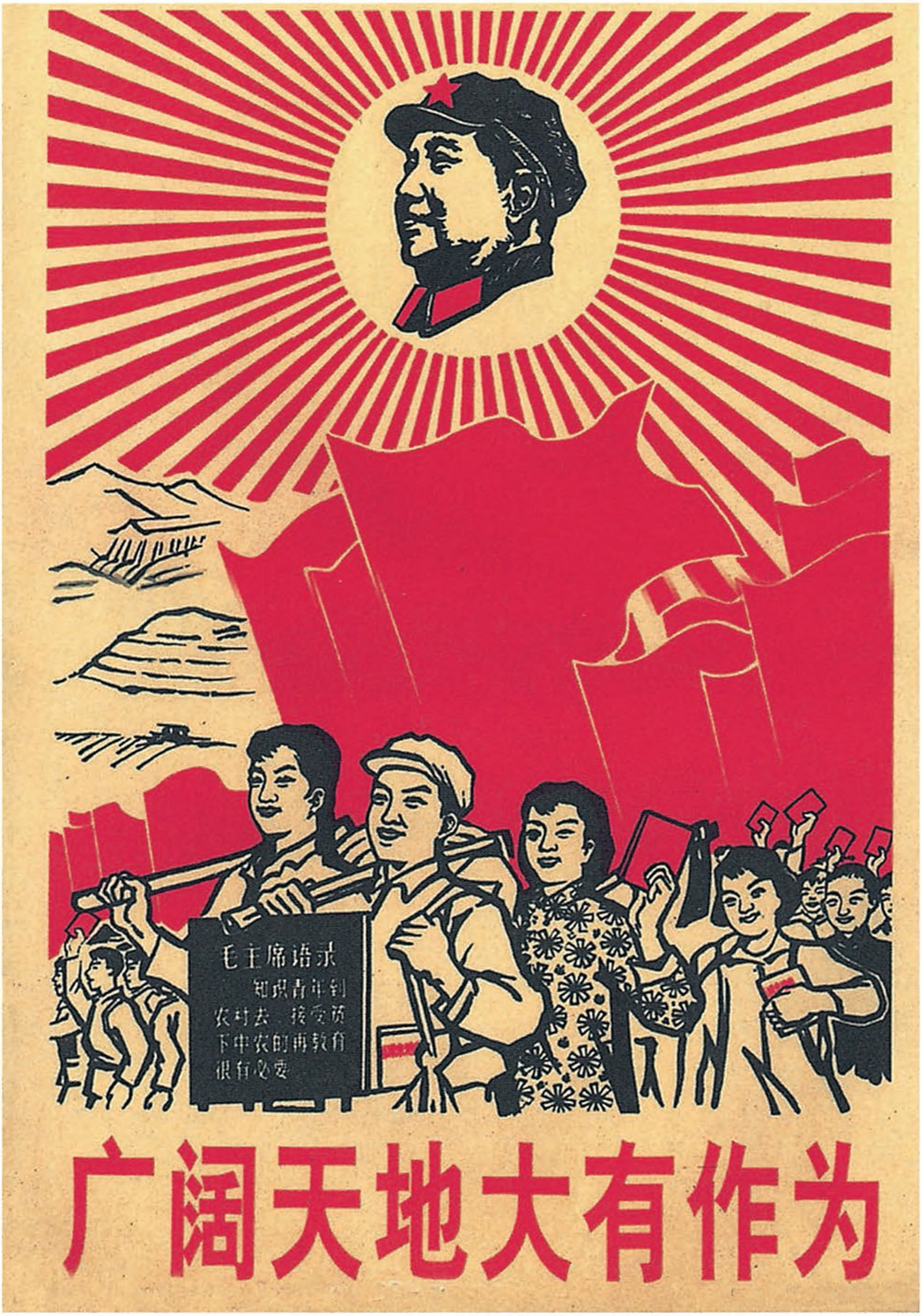
要斗私，批修。（宣传画）



人民万岁！（宣传画）


发展体育运动增強人民体质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宣传画）


毛主席语录
知识青年到
农村去，接受贫
下中农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宣传画）

关于不要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等的批语[1]

（1966年12月25日）

关锋同志：

都不要引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五日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1966年12月24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写信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请您考虑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关锋的这封信上。《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发表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没有引用毛泽东的大字报和批注。

对李雪峰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1]

（1966年12月26日、28日）

一

伯达[2]同志：

此件[3]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六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1966年12月16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的批语；本篇二是在李雪峰12月27日送审的这个检讨要点修改稿上的批语。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3] 指李雪峰1966年12月16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主要是检讨他从6月初至7月中旬大约50天时间内，在领导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谓方向、路线错误。12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李雪峰的这个检讨要点。

二

退李雪峰同志：

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对黑龙江省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6年12月26日）

陈伯达同志：

请你和小组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1]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2]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3]还未收到。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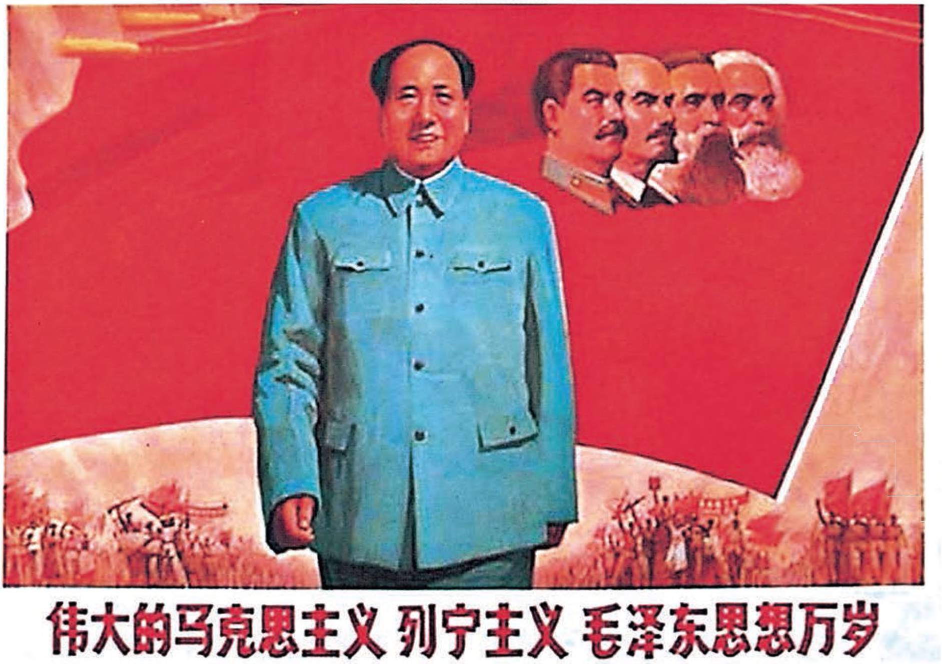
十二月二十六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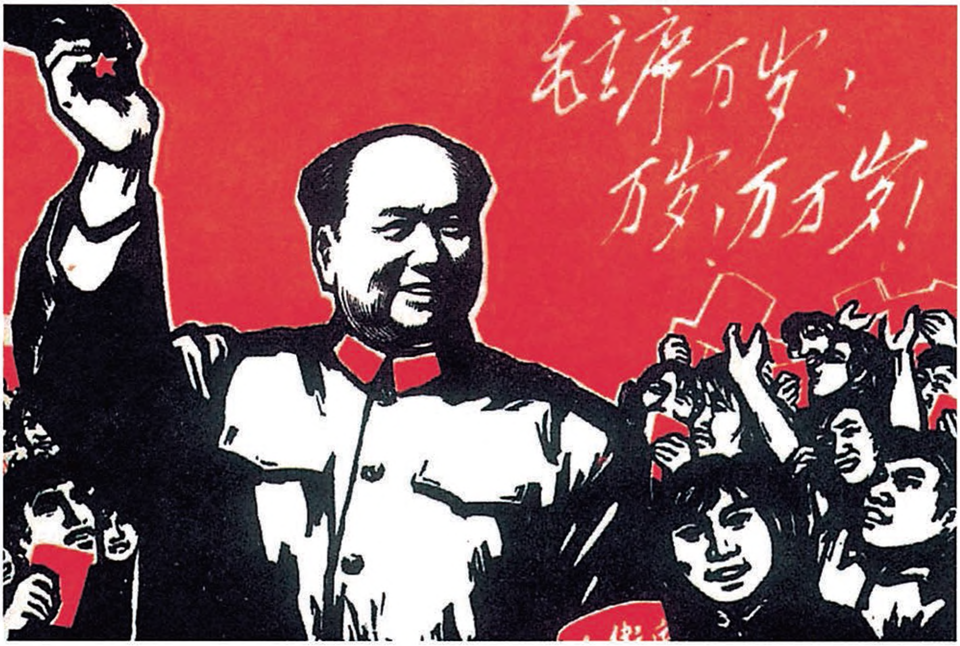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1966年12月23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报告中说，我省于11月14日到12月7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会议分为四段：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发扬民主，鸣放辩论；打通思想，统一认识；总结会议，安排工作。每段各有重点又互相联系，步步深入。打通思想，挽救干部，纵贯会议始终。整个会议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12月29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到县团级党委参考。

[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1966年12月16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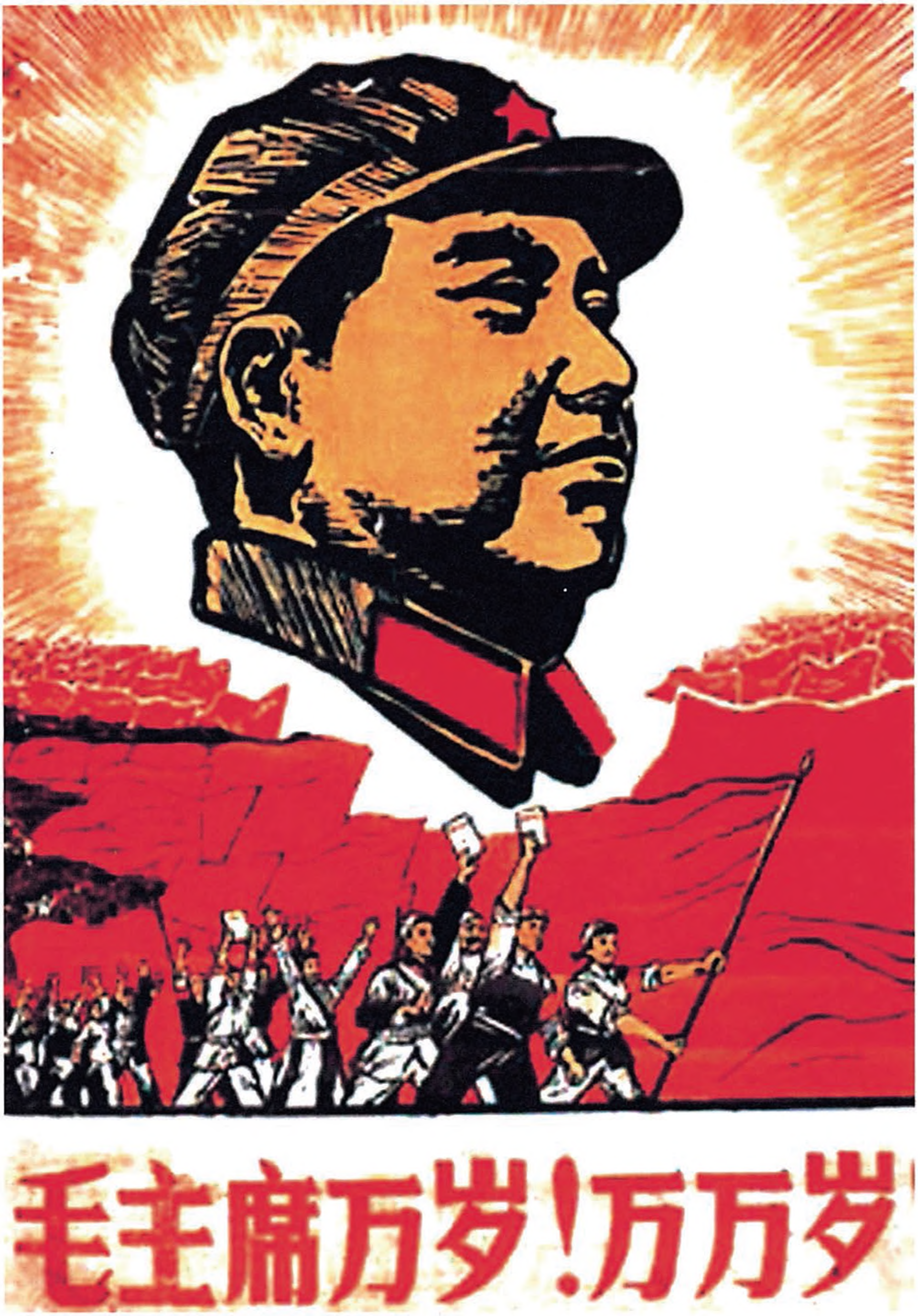
[3]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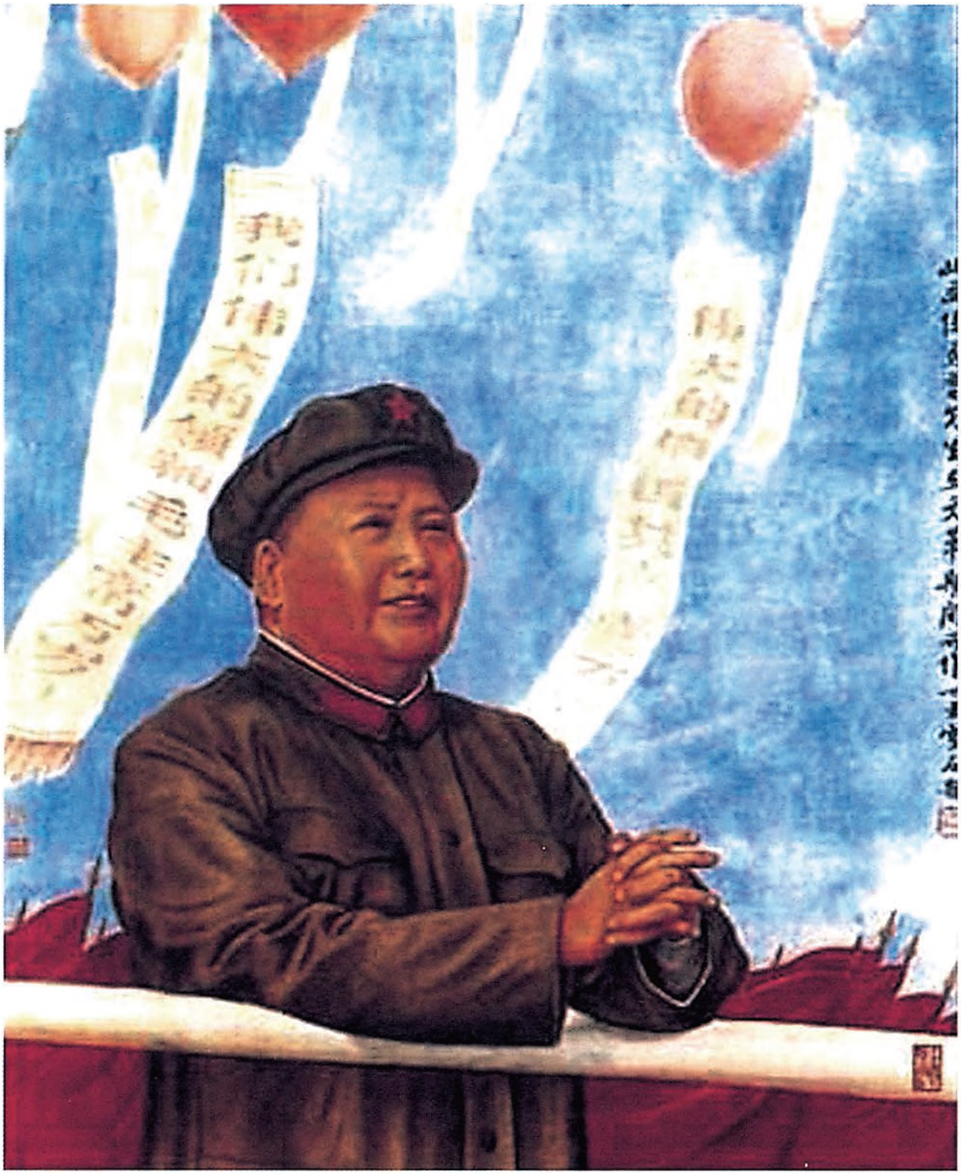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宣传画）


毛主席万岁：
万岁，万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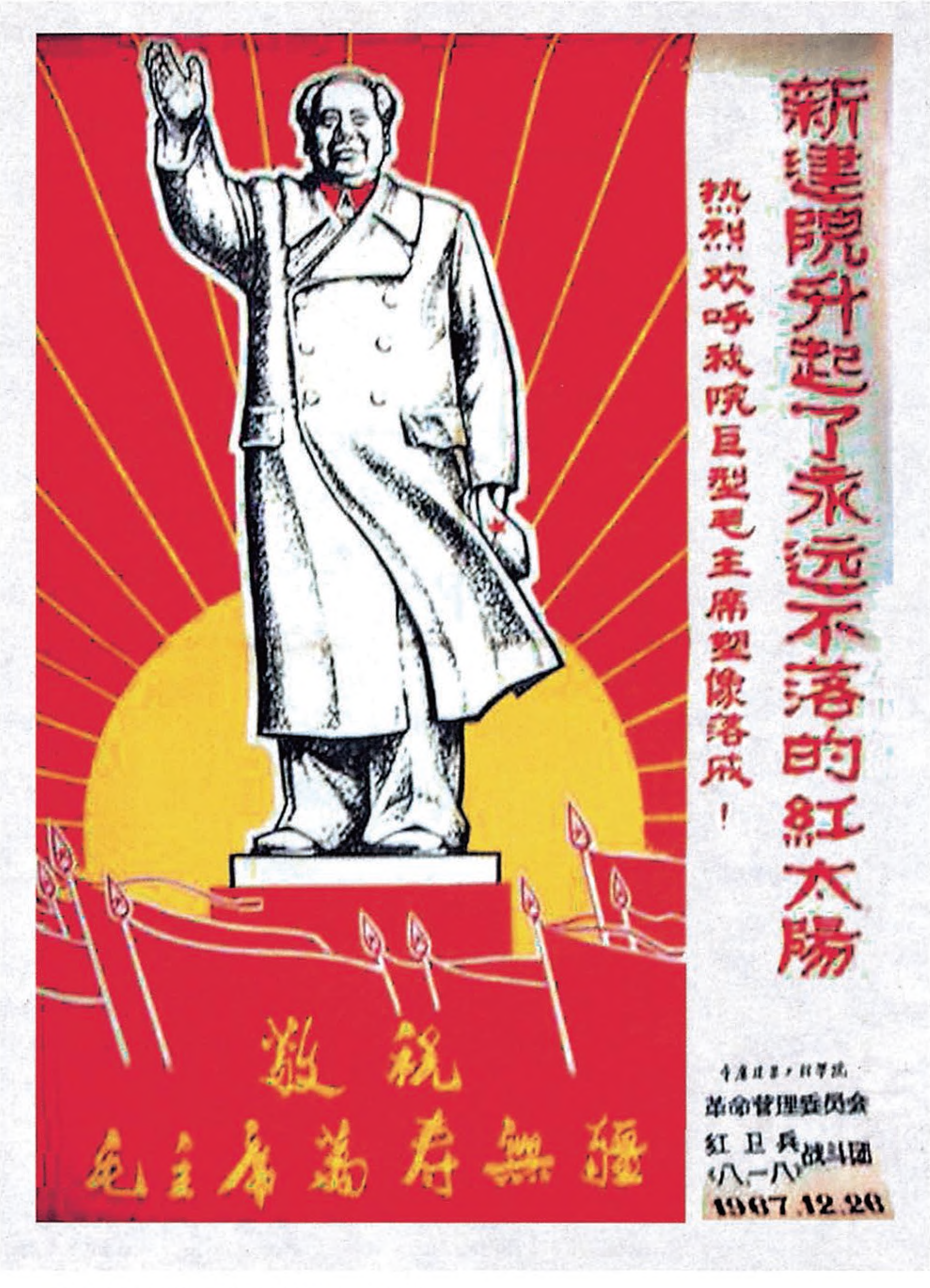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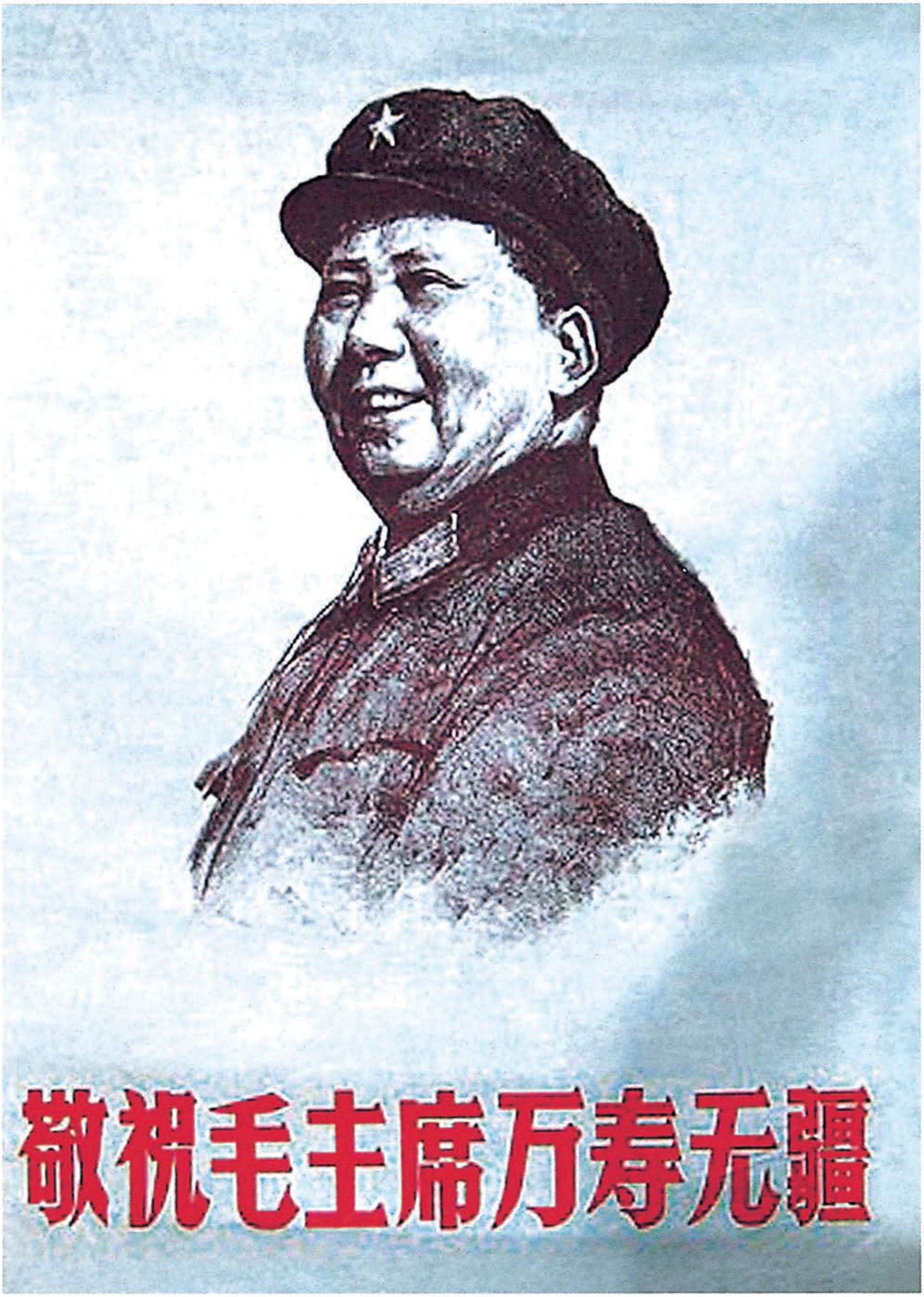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宣传画）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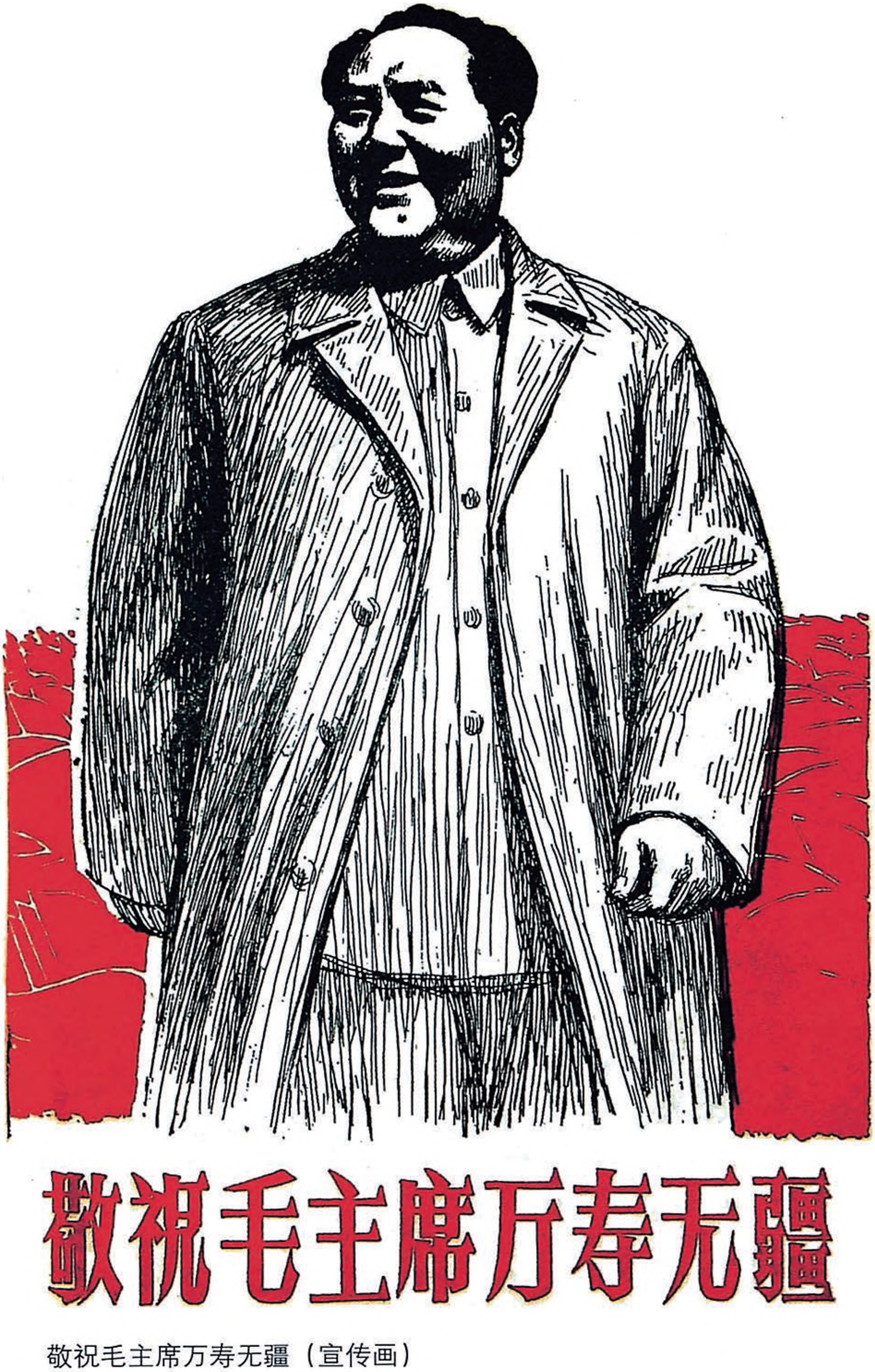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宣传画）


新建院升起了永远不落的紅太陽
热烈欢呼我院巨型毛主席塑像落成！
敬祝
毛主席萬寿無疆
革命管理委员会
紅卫兵《八一八》战斗团
1967.12.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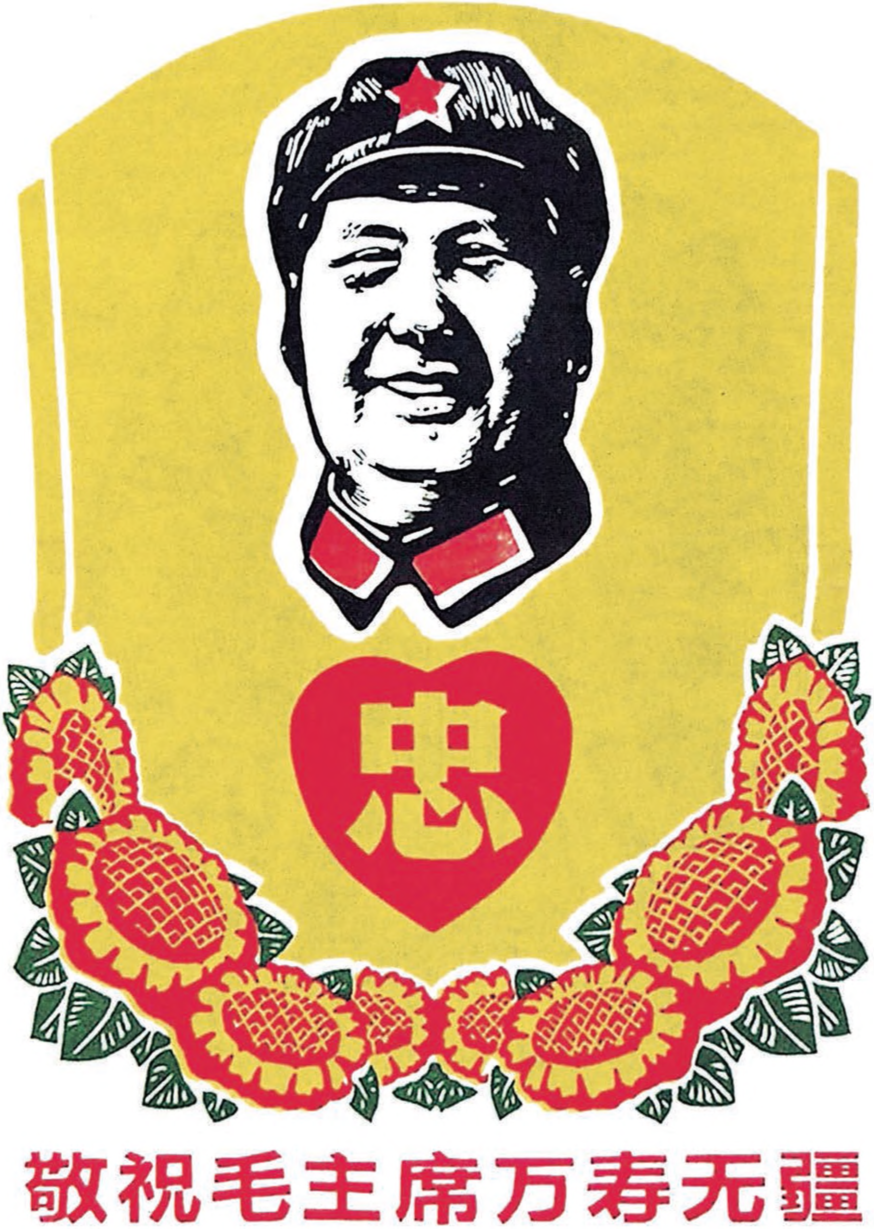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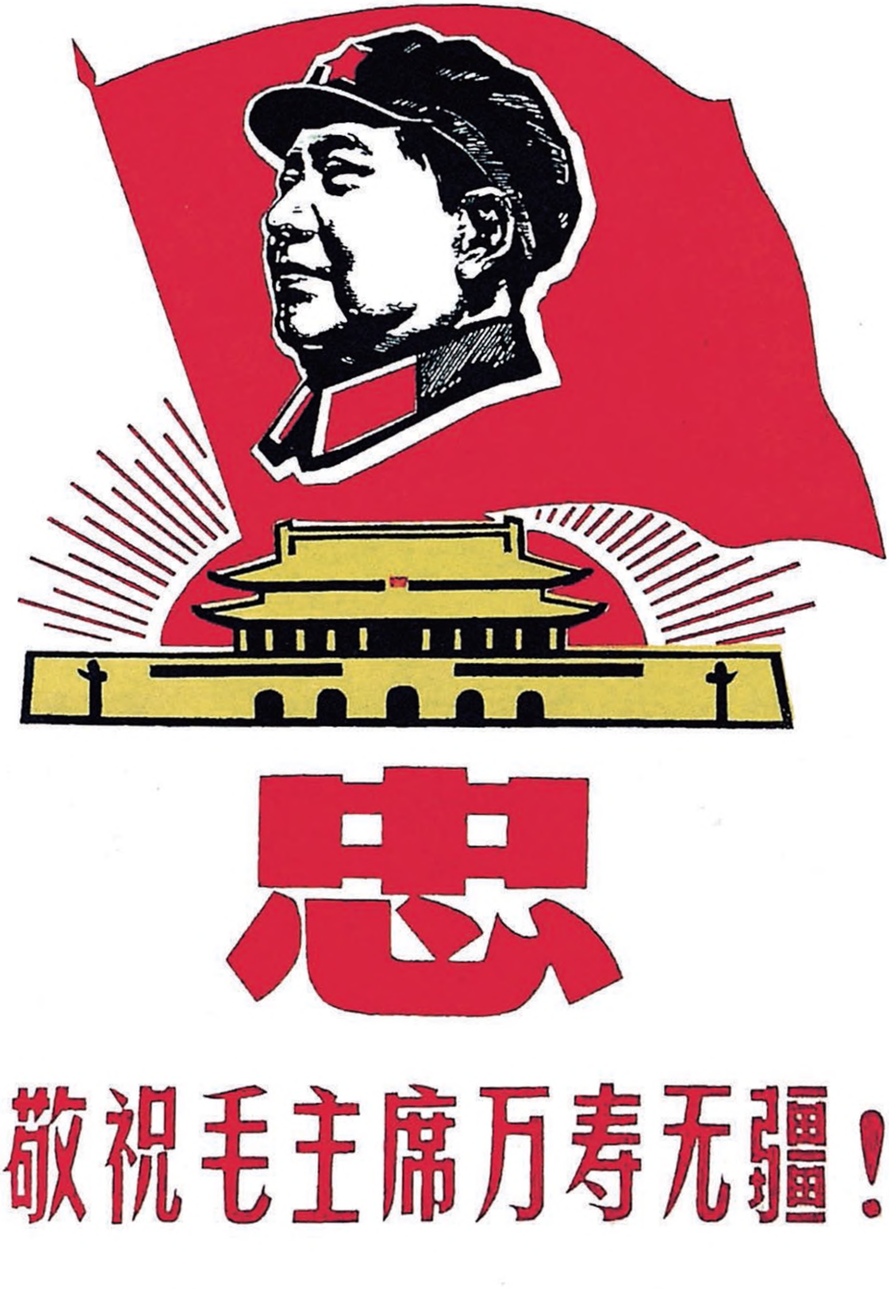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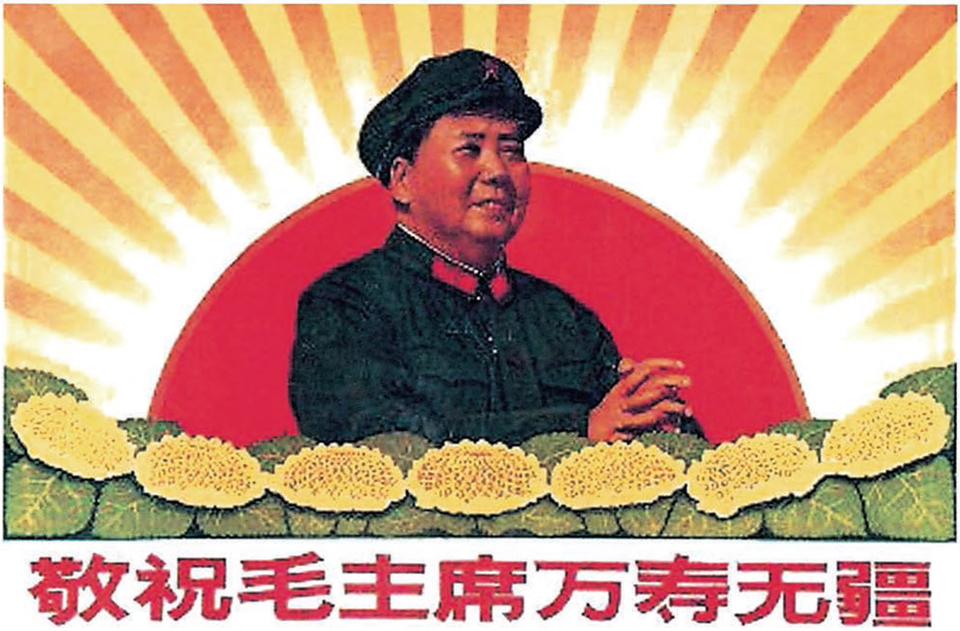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忠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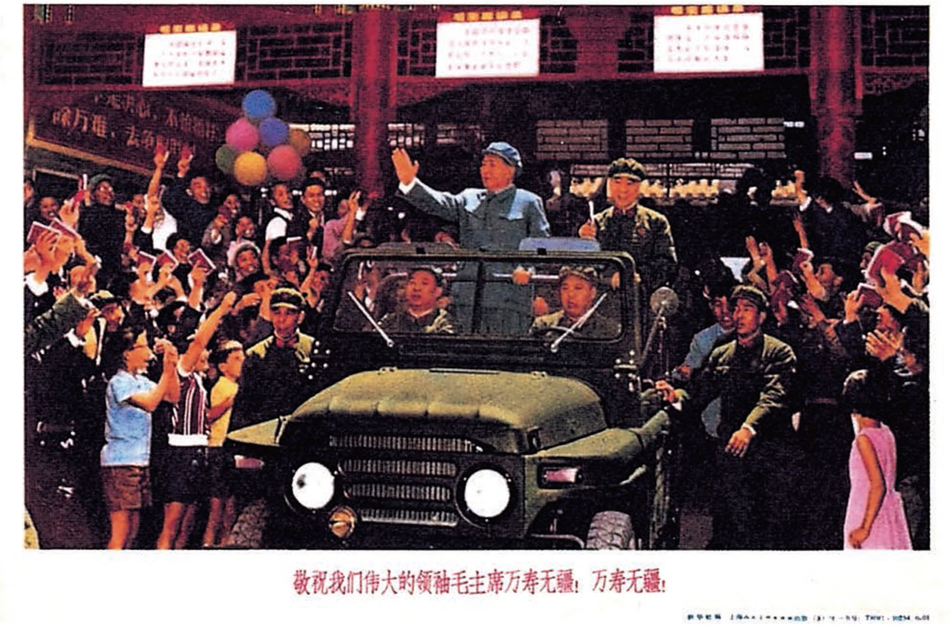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忠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宣传画）

给周恩来的信

（1966年12月27日）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对黑龙江省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66年12月28日）

伯达同志：

（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

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十二月廿八日

---

[1] 指中共黑龙江省委文革办公室1966年12月25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给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当前随着城乡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多数城市街道的文化大革命也将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有许多问题急需明确。主要是：一、街道运动的重点。我们意见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二、街道居委会的主任，我们认为不能算作当权派。三、在街道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认为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四、街道文化大革命要结合“四清”进行，市委、区委可以派人巡视，了解情况，但不予干涉、领导。五、街道中的阶级情况比较复杂，其中有些不良分子已参加并把持了群众组织，对他们采取什么政策为好？

对《林彪同志给浙江省军区的指示》的批示

（1966年12月29日）

此件应发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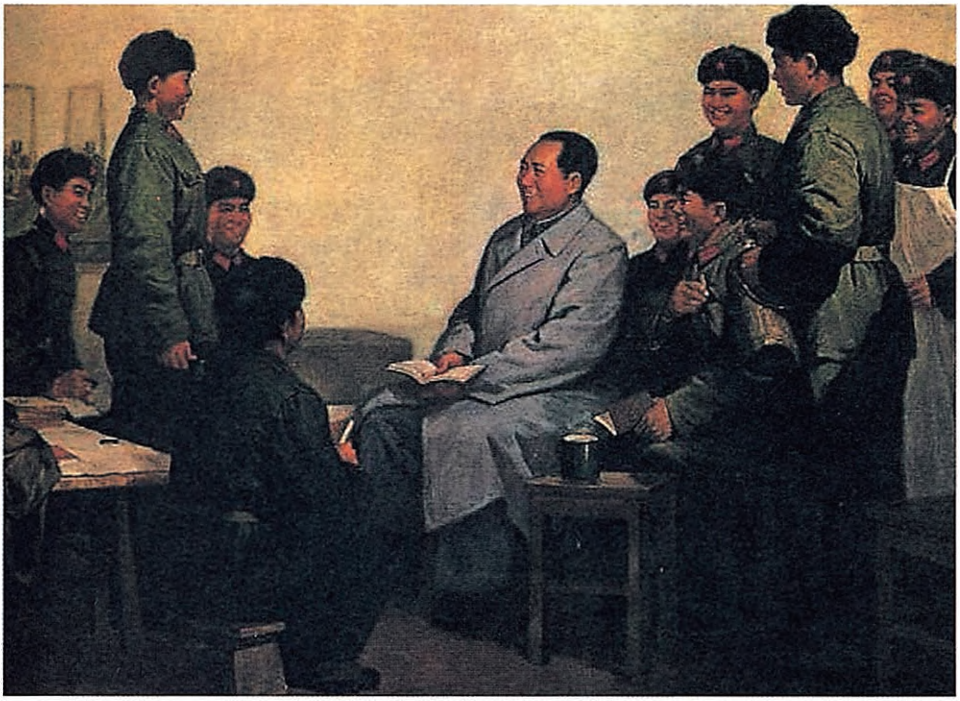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赞扬参加接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解放军指战员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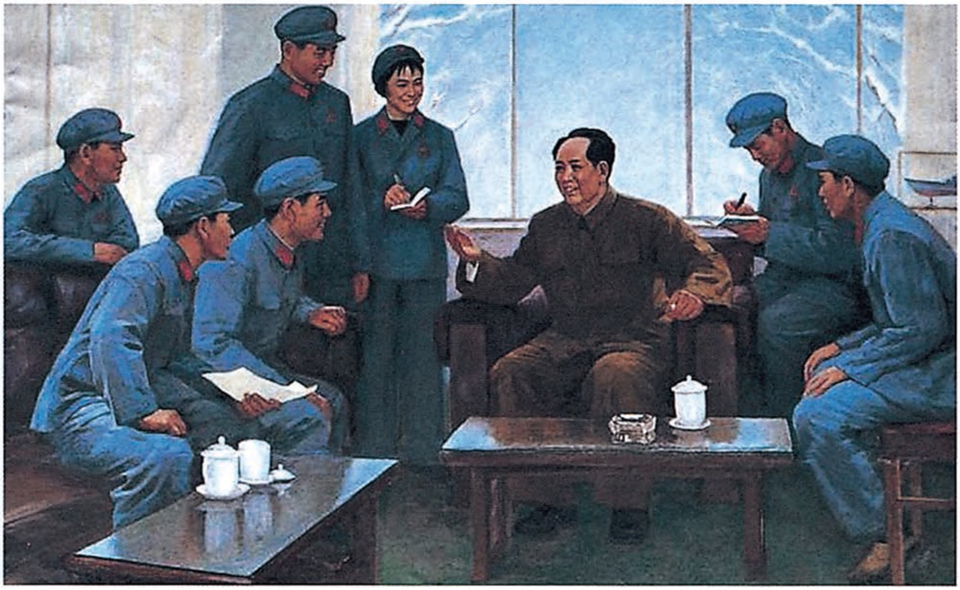
（1966年12月）

你们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做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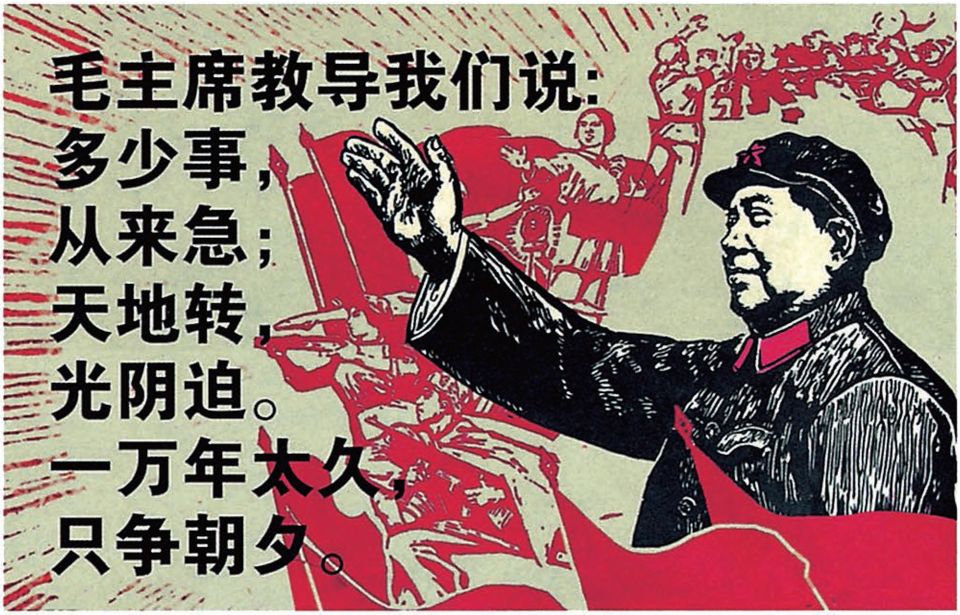
《毛主席指示我们大办民兵师》（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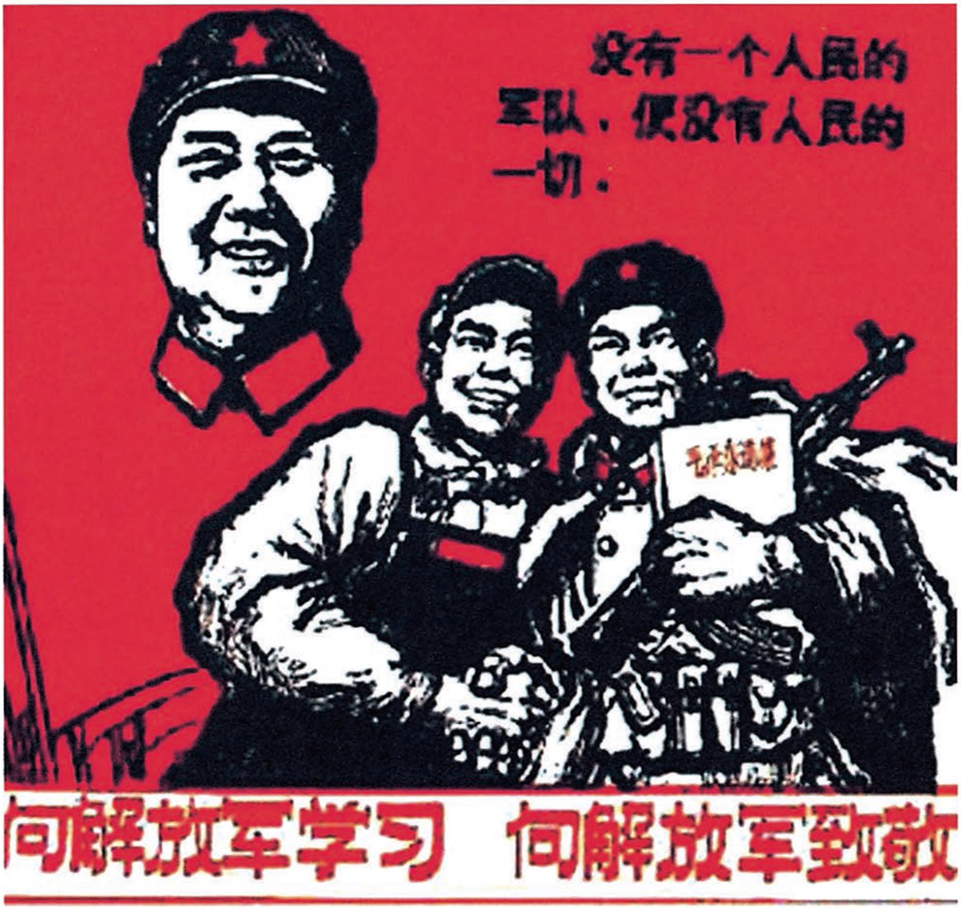
《谆谆教导》（油画）



《亲切的教导》（油画）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宣传画）


没有一个人民的
军队，便没有人民的
一切。
毛主席语录
向解放军学习　向解放军致敬

向解放军学习　向解放军致敬（宣传画）

关于复员转业军人参加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指示

（1966年12月）

（一）一切复员转业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和其他名称的单独组织，只能参加所在单位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进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转、复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的四点指示

（1966年12月）

一、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并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二、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政策。戴高帽子、抹黑脸的，脱帽洗脸，立即上班工作。

三、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还得挽救他，使之改过自新。不然，怎么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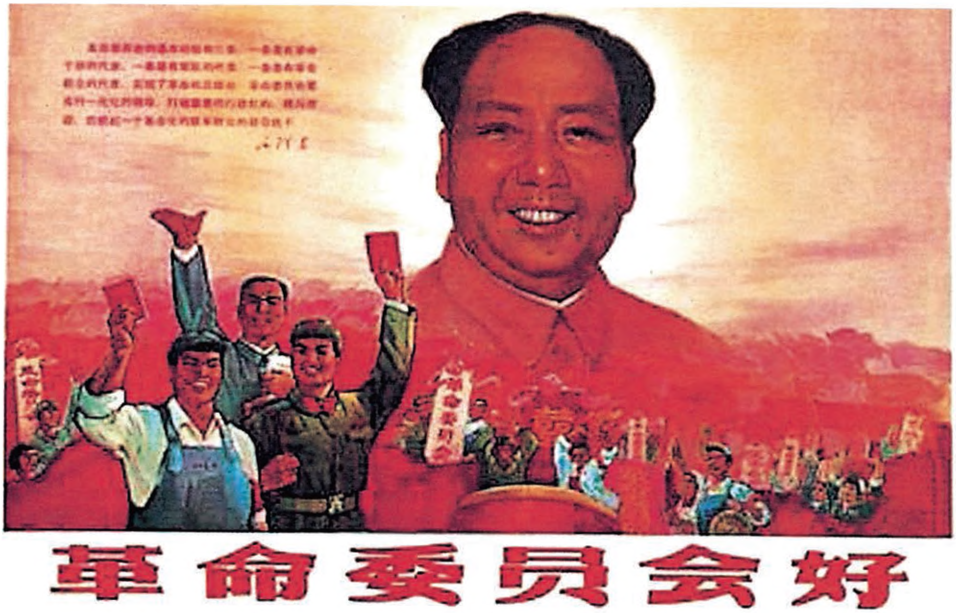
四、说服干部，使他们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要怕字当头。敢字当头，最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大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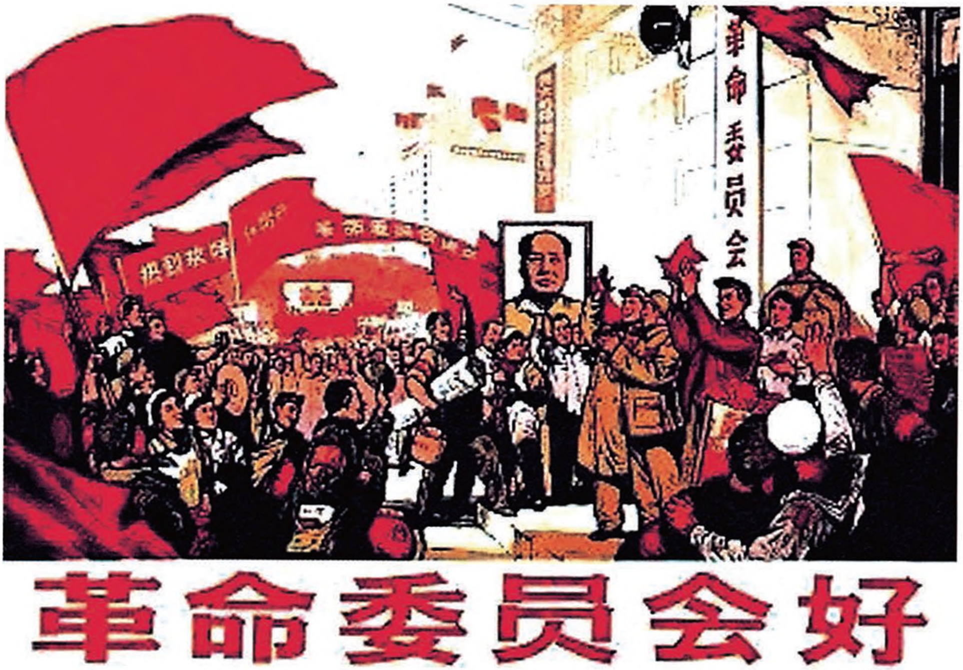
（1966年12月）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我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要学会大民主。

资料图片



革命委员会好（宣传画）


革命委员会
革命委员会好

革命委员会好（宣传画）

要保护和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1966年）

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1]

---

[1] 《人民日报》1967年6月11日发表《〈二月提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黑纲领》（署名任立新）的文章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文中说：“毛主席在开始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多次指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

和林彪的一段谈话（摘录）

（1966年）

林彪（以下简称林）：现在全国都在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不愿照抄照传，要突破，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创造。

林：要以毛泽东思想做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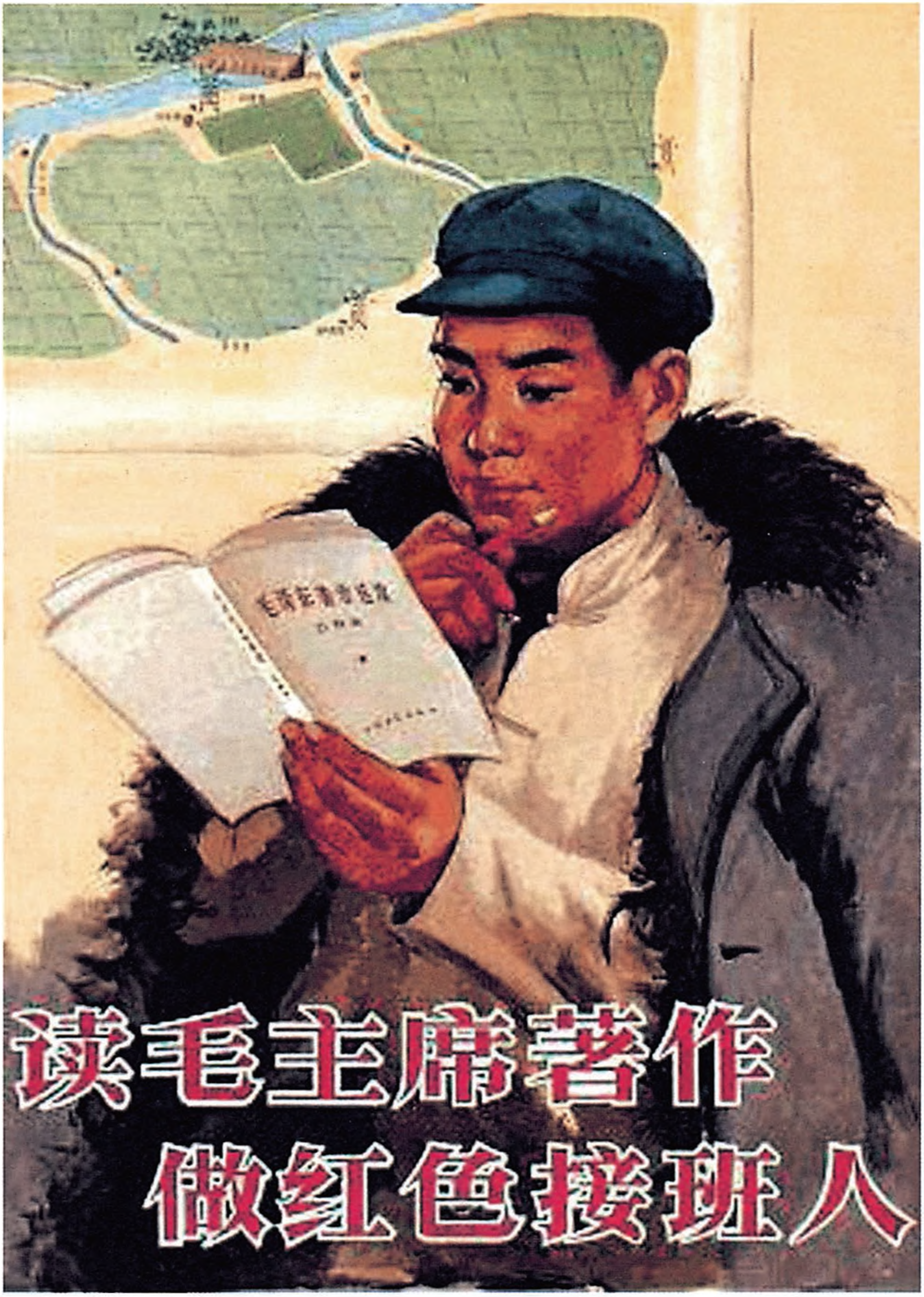
毛：好。

林：不能满足于经济建设，要搞精神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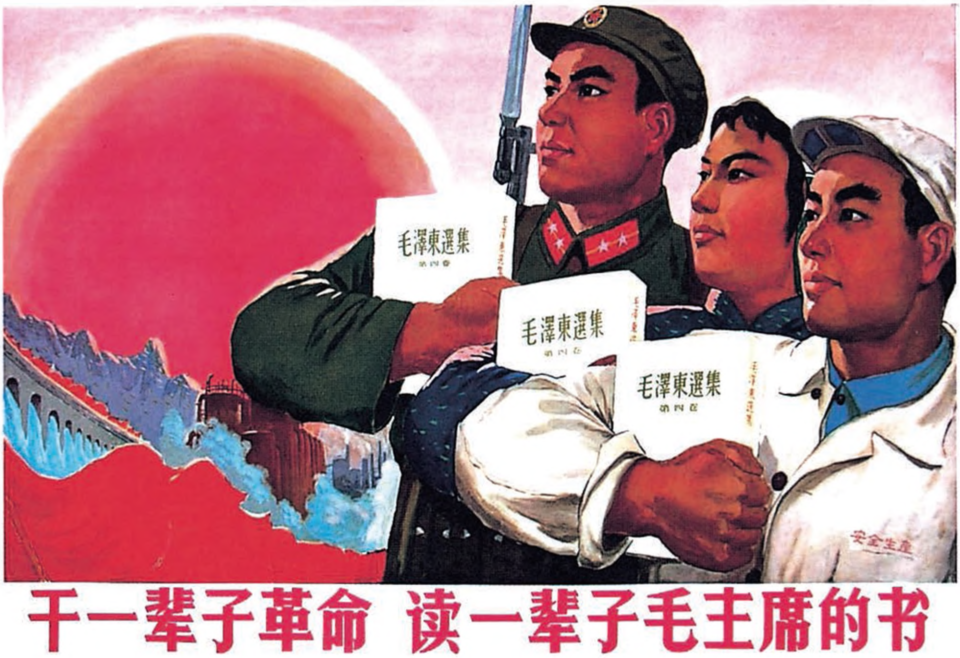
赠叶剑英联

（196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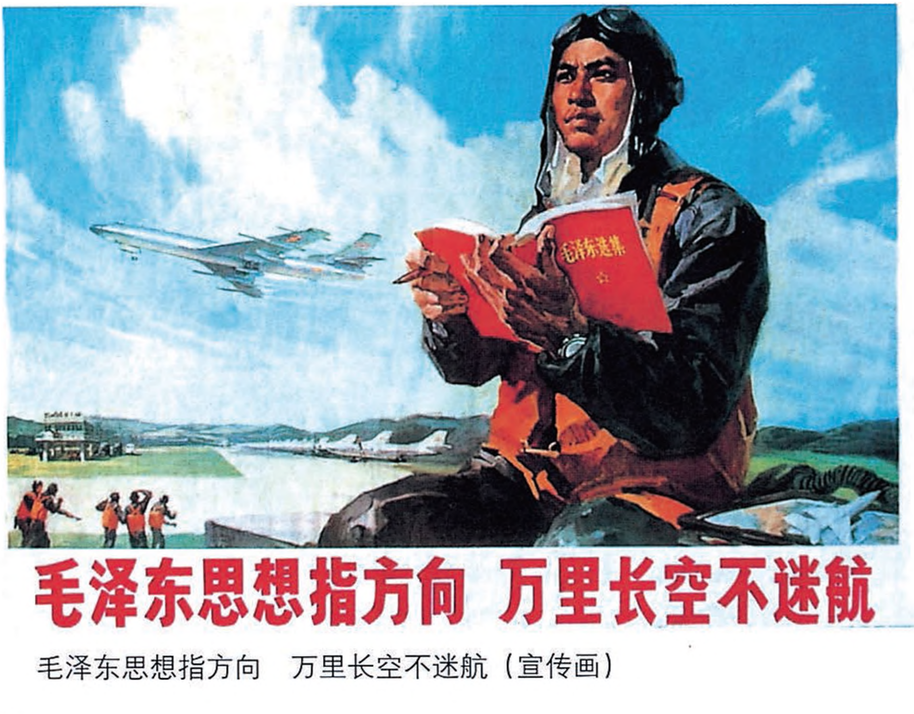
诸葛一生唯谨慎；
吕端大事不糊涂。


读毛主席著作
做红色接班人

读毛主席著作　做红色接班人（宣传画）


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安全生產
干一辈子革命　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

干一辈子革命　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宣传画）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思想指方向　万里长空不迷航

毛泽东思想指方向　万里长空不迷航（宣传画）

1967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1日）

1. 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展开全面的阶级斗争。

2. 要抓四个重点。北京、上海、天津、东北。责任是在造反派身上，要团结多数，造反派队伍要超过一倍以上。

3. 上海很有希望，许多学生、工人、机关干部起来了，这是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4. 红卫兵要向解放军学习，一定要朴素。

祝你们明年过社会主义关！

对刘少奇关于北京建工学院红卫兵要他去公开检查的信的批语[1]

（1967年1月6日）

总理：

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2]。

毛泽东

一月六日

---

[1] 1967年1月5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1月7日4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7年1月7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关于陶铸问题的指示

（1967年1月8日）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上，在报纸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的镜头是陶铸安排的。（有人插话：陶铸到处开空头支票，每次接见都讲，来京都想见毛主席，很好。我想主席会见你们的。今年不见明年一定见。用这个来将主席的军，搞两面手段，自己落好。）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干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也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能管了。（有人插话：陶铸非常坏，新华社去年十七周年有一张照片，有五个人，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邓小平的身子是陈毅的身子，把陈毅的头割掉，换上邓小平的头。）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1]

（1967年1月9日）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号造了反，《解放日报》六号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告全市人民书》[2]，《人民日报》可转载，电台可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导，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纸，依我说封了好，但报还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定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中央派了工作组，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我不同意另起炉灶，但要夺权，唐平铸换了吴冷西[3]，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

---

[1] 这是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文汇报、解放日报两个报社夺权问题的谈话。1967年1月4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文汇报》；1月6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在该报发表《告读者书》，宣布接管《解放日报》。

[2] 指1967年1月5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上发表《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9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3] 吴冷西，1957年6月至1966年5月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被夺权后，由唐平铸接任。

《人民日报》过去骗人[1]，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

我们报纸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让那些人住那里吃饭，许多事宣传部、文化部都管不了，你[2]我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〇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与各种人，左、中、右都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样干净，我向来不赞成。（有人反映吴冷西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他们舒服了，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留在岗位上让群众监督。

我们开始搞革命，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青年时

---

[1] 《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期间发表了一系列浮夸和错误的文章，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到了（一九五八年）五月间的八大二次会议，解放思想、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

[2] 指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文革组长。

《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搞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是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

（1967年1月9日）

我们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只有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没有机关干部积极投入运动是不行的，好多重要问题靠机关干部亲自揭露。揭发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由上面派去的少数干部和下面的绝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

（1967年1月10日）

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

（一）此两件[1]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2]，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毛泽东

一月十日上午五时

---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1967年1月10日报送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文汇报〉〈解放日报〉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这两篇电讯稿发表在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等报刊上。

[2] 这个贺电1967年1月11日发出，载于1月12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1]不要发了，上海这个[2]就很好。但需要写一篇解释文章[3]。又及

---

[1] 指陈伯达、江青1967年1月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个通知后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1967年1月13日印发，所署日期为1月11日。

[2] 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造反派组织1967年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紧急通告》。

[3] 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

对《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份材料的批语

（1967年1月11日）

一

总理、伯达、江青同志：

两件[1]及另三件[2]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上午二时

---

[1] 指周恩来等1967年1月11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均发表在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上。

[2] 指陈伯达、江青1967年1月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这三件的日期均署为1月11日，1月13日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发出。

二

同意这三个文件[1]，一并在今天或明天的政治局会议通过。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二时

---

[1] 即本篇一中提到的另三件。

对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等三个文件[1]的批语

（1967年1月12日、13日）

---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代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的三个文件：一、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通知稿写到，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主要的工具，它担负着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伟大任务，担负着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有一些地方党委，借保证党和国家机密安全及党内文电正常传递为名，把文化大革命中整革命群众的材料塞进军事机关，甚至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事机关，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党纪国法绝不允许的。1967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规定稿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为此，作出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项具体规定。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这个规定。三、中央军委1967年1月7日关于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通知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甚至有的参与了压制、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各级党委对此必须引起严重注意，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

一

同意。

二

恩来[1]同志：

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2]

毛泽东

一月十二日下午五时

三

已请总理酌处。[3]

毛泽东

一月十三日

---

[1] 恩来，即周恩来，当时任国务院总理。

[2] 本篇一、二两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1月12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林彪的报告上。

[3] 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江青1967年1月12日为送审这三个文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

CHINA IN CHAOS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CHAIRMAN MAO

1967年1月13日，“文化大革命”正在神州大地上风起云涌。毛泽东第七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对《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批语[1]

（1967 年 1 月 14 日）

伯达同志：

写得很好。

毛泽东

一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1967年1月14日送审的这篇文稿上。陈伯达送审时在文稿上写有："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后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在1967年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1967年1月16日)

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

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

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

关于将贵州各方代表找到北京研究问题的批语[1]

（1967 年 1 月 21 日）

总理[2]：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 1967 年 1 月 20 日给总政治部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反映了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2] 总理，指周恩来。

在延边自治州党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去电制止冲突报告[1]上的批语

（1967年1月21日）

总理[2]：

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3]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

[1] 中共延边自治州委1967年1月19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东北局、吉林省委的这个报告说，18日下午3时，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系统同延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军”因为《延边日报》的接管问题发生武斗，已造成伤亡，规模很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州委三次派人到双方做工作，要求他们派出代表协商解决，均未成功。现在他们不信任州委，州委无法进行工作，事态发展又十分严重，急请中央文革给双方来电话或电报，制止冲突。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

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支持造反派的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67年1月21日）

林彪同志：

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廿一日

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2]，以前命令作废。请酌。又及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党委1967年1月21日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并中央军委报告说，“顷接安徽军区报告，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向安徽军区提出，廿二日到廿三日，在合肥召开15万到20万人大会”，“要安徽军区派出三百到五百名部队警卫会场。他们提出，如派部队就是支持文化大革命，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并限安徽军区廿一日十四时前答复。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

[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月23日发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对广播系统夺权的指示

（1967 年 1 月 23 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内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结主义，不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和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合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歧，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权

（1967 年 1 月 23 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对张春桥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

（1967年1月23日）

如果权落在右派手中，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的批语[1]

（1967年1月）

照发。

---

[1] 这个批语写在1967年1月21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上。决定稿根据毛泽东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精神，作出了五条指示：（一）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二）积极支持广大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当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三）坚决镇压反对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们动武，军队应当坚决还击。（四）重申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防空洞的指示。（五）在全军深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决定。

要节约闹革命

（1967年）

一

要节约闹革命。[1]

二

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2]

---

[1] 《人民日报》1967年1月26日发表的社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2] 《人民日报》1967年8月26日发表的社论《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社论写道：“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最近又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

关于研究军队夺权范围问题的批语[1]

（1967年1月26日）

林彪同志：

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2]。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全军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1月25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上。

[2] 1967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在这些单位中，哪些要夺权，哪些不需要夺权，要看党委领导存在问题的性质。（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

对军委八条命令稿和中央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1月、2月）

一

所定七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六日

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

又及

二

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毛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

三

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四

总理：

同意，照办。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

五

照办。

---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1月25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共七条。1月26日，毛泽东审阅时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一。1月28日，根据毛泽东批示修改为八条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对这次命令稿中根据毛泽东1月26日批示内容写成的第五条，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文字，即本篇三。经毛泽东两次批示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指出：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

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2月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四。在这个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机关名单中，毛泽东加写了“各级银行”。2月22日，周恩来又将中共中央通知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五。中共中央通知下发时，日期署为1967年2月21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为此，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并要求各地将此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67年1月27日）

一、军队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在运动开始时是不介入的，但实际上已介入了（如材料送到军队上去保管，有的干部去军队）。在现在的形势下，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不能不介入，介入就必须支持左派。

二、老干部的多数到现在对文化大革命还不了解，多数靠吃老本，过去有功劳要很好地在这次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要立新功，要立新劳。要坚决站在左派方面，不能和稀泥，坚决支持左派，之后在左派的接管和监督下，搞好工作。

三、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夺权后报国务院同意。

四、夺权前的老干部和新夺权的干部要共同搞好业务，保守国家机密。

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27日）

一、我认为十三个军区不要同时搞，要有先有后。

二、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剧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分开。

三、现在国际上帝、修、反正在利用我们文化大革命继续大搞反华活动，如苏联在镇压学生，新疆边界飞机活动多了，地面部队也在调动。凡是前线的大军区要警惕，要有所准备，如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昆明等地区，所以文化大革命要稍推一下，将来一定要搞的，顾大局。

在章伯森反映湖南问题报告[1]上的批语

（1967年1月27日）

总理：

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2]。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

[1] 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1967年1月25日，他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写报告说，我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向中央反映两点情况：一、目前湖南文化革命运动形势越来越好。造反派在政治上已完全取得优势，保守派正在分化瓦解中。但省委工作暂时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依靠造反派，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自1月中旬以来，要求开除党籍的更是络绎不绝，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章伯森在电报中还请求中央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并请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

[2]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给周恩来的批语中指出，应将贵州有关各方的代表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

关于外国朋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月28日）

外国朋友真正革命的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对谭震林[1]关于国务院农口几个单位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7年1月30日）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3]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指谭震林1967年1月28日给毛泽东等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报告。报告对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1月30日）

一

林彪同志：

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
一月卅日

如有修改，请告伯达。又及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1967年1月29日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陈伯达在送审稿上写道：“王力、关锋二同志为红旗杂志准备了一篇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请审阅！”王力、关锋，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本篇二至七是毛泽东对社论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发表在1967年2月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上，《人民日报》1967年1月31日提前转载。

二

必须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克服自己头脑中和自己团体中的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所有这些违背毛主席教导的、妨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都是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这些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做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三

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

四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

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1]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五

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

六

在当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一小撮代理人决战的阶段，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坏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美蒋特务，都纷纷出笼。这批牛鬼蛇神，造谣惑众，欺骗、拉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组织，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例如，所谓“中国工农红旗军”，所谓“荣复军”

---

[1] “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这句话，在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中，作为毛泽东的话用黑体字排印。

“联合行动委员会”以及其他一些被修正主义分子组织起来的名为“革命派”，实是保字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反动组织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中断交通，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趁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种反动组织，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一旦被群众识破，就会立即土崩瓦解，一小撮头头就会被群众揪出来。

七

毛主席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1]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热烈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

---

[1] 这句话在《红旗》杂志社论中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关于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等的批语

（1967年1月31日）

恩来[1]同志：

这个通告[2]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3]，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

毛泽东

一月卅一日

---

[1] 恩来，即周恩来。

[2]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载于1967年1月26日《新贵州报》。通告宣布“毛泽东思想贵州省红色工人战斗团”等40个造反组织，以“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名义，于1月24日接管了中共贵州省委、省人委和中共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人民日报》1967年2月1日转载了这个通告。

[3] 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后来发表在1967年2月5日《人民日报》上。

和周恩来谈夺权问题

（1967年1月）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夺权怎么样？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才夺权一天多。

毛：要抓典型。

周：市局委开了会，夺权有几种形式，干部是当权派：（一）受黑帮影响很坏，变黑帮；（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四）承认错误，但还有严重错误；（五）有个别一般错误（这种人为多）。

毛：前两种要划小，要孤立打击极少数，接管本身就是革命。建立新的，根据不同情况，也有不同形式：（一）全部改组（上海：张春桥、姚文元）；（二）接管后对当权派不同形式处理，边检讨边工作，监督留用（根据指示工作）；（三）停职留用；（四）撤职留用；（五）撤职查办。

周：那种办法好，撤职一面斗争，一面留用，有了对立面，就可壮大队伍。把许多事压在身上（指革命造反派）也很被动，留用一面斗争，一面工作。科学院左派队伍壮大了，抓革命促生产搞得很好。让那些当权派扫街，扫完了就休息，睡大觉，太便宜他们了，便宜事都叫他们办了。不要把自己陷入事务之中，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掌握大权监督他们。一个单位几个战斗队观点不同不奇

怪。有事商量比不商量好。

毛：接管是大事情，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动。要解决接管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接管办公，遇到问题怎么处理要有具体政策（局、科、部、科员等怎么办）。现在夺权了，也许还会夺走。有的单位夺过来夺过去，是个锻炼，要巩固住，主要靠左派力量壮大。左派力量小时，夺权小，夺过去很快要夺走。左派要壮大。我支持夺权，夺权后要抓革命促生产。

和外宾谈如何看大字报

（1967 年 1 月）

看大字报要一分为二，大多数是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不革命的大字报，有的是坏大字报；有的是符合事实的大字报，有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大字报。

关于接管的指示

（1967年1月）

接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了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了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富治[1]：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

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谢富治：昨天向主席谈到，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

这是阶级斗争。

---

[1] 谢富治，当时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应说服红卫兵让王任重[1]就医的批语[2]

（1967年2月2日）

林、周[3]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

毛泽东

二月二日

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

---

[1] 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67年1月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

[2] 这个批语写在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1967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2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

[3]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的批语[1]

（1967年2月2日）

此件不用，退周。

---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给陈伯达江青的信的批语。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提议今后每星期一、二、五晚10时起在钓鱼台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其他有关同志按问题性质临时通知参加。明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提议今后每星期二、星期六下午会议室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聂、谢）和剑英参加。务请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

1967年2月，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一批老干部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痛斥江青、陈伯达等人。会后，江青等人诬陷这些老干部发动“二月逆流”。图为中南海怀仁堂。

斗争要文明些，坚持文斗，不用武斗[1]

（1967年2月3日）

斗争要文明些，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高姿态，要高风格。北京街头上标语水平不高，到处都是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的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搞喷气式飞机照相片，登报贴在大街上被外国记者搞走了。现在要将斗争水平提高，现在水平太低。

八月初，也没这凶嘛，斗倒斗臭要在政治上斗臭，要对后代进行教育。不然他们将来掌权了，也这样干，这就太简单化了。他们认为这样斗臭了，还有把别人生活上的问题摆出来也叫斗臭了，我看不合适。主要是政治上斗臭。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斗争问题给周恩来的一段指示。

在西藏军区党委一份电报[1]上的批语

（1967年2月7日、8日）

一

林彪、恩来、叶、聂、徐[2]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3]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

---

[1] 中共西藏军区委员会1967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说，“拉萨革命造反总部”及其所属组织认为张国华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群众因不明真相，动荡很大，军区机关一部分干部和驻拉萨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也出现了思想混乱。此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为此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2月12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2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又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复电，指出中央军委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望军区党委同志向革命群众做些工作。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叶，指叶剑英，聂，指聂荣臻，徐，指徐向前，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3] 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处书记。

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

毛泽东

二月七日

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又及

二

已办，存案。

毛泽东

二月八日

和卡博、巴卢库的谈话[1]

（1967年2月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什么时候谢胡[2]同志到中国来的呀？

周恩来：去年五月。

毛：去年五月我就向他讲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也说，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

---

[1] 这是毛泽东1967年2月8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斯尼·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贝基尔·巴卢库等时的谈话。

[2] 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一九六二年，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比如十七年来，就有和高岗、饶漱石[1]的斗争，他们一个集团，我们把他整下去了，这是一九五三年冬到一九五四年春。然后是一九五九年，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2]这个集团整下去了。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3]，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

卡博（以下简称卡）：受毛泽东同志指示写的？

毛：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

---

[1] 1953年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高岗和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相互勾结，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揭露和批判了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将他们开除出党。

[2]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3]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了吴晗的《海瑞罢官》。

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现在还要改组。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决定[1]时，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现在北京有三个陆军师，一个机械化师，一共有四个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才能到处走。原先那两个师是好的，但是，分散得一塌糊涂，到处保卫。

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比如像贺龙、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的子弟。所以，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把罗瑞卿的问题处理了，那是前年十二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是去年五月。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你们有人不是见了北京大学聂元

---

[1] 1966年6月4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内容如下：新华社三日讯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梓[1]吗？谁人去见的呀？

卡：什图拉同志。

毛：她在去年五月二十五号写了一张大字报，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到六月一号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这一下大字报就满天飞了！

巴卢库（以下简称巴）：大字报就发出信号。

毛：也不是我写的，是聂元梓他们七个人写的。红卫兵是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两处搞起来的，他们有一篇材料给我看到了。到了八月一号，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两个学校的红卫兵，后来就大搞起来了。八月十八号我接见了红卫兵几十万人。接着八月上旬到八月中旬就开了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负责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学生，反对无产阶级，搞白色恐怖。这才揭露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才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2]不听。一个《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人民日报》是夺了两次权的，第一次是去年六月一号，第二次是最近一月

---

[1] 聂元梓，北京大学学生运动领袖之一。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7人，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

[2] 指刘少奇，当时任国家主席，文革前主持一线工作。

份。过去我公开声明，我说，《人民日报》我不看。当着《人民日报》总编辑也说，我不看你的报纸。讲了好几次，他就是不听。我的这一套在中国是不灵的，所有大中学校都不能进去。因为控制在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宣传部、周扬的文化部这些人手里，还有高等教育部、普通教育部这些人的手里，毫无办法。

我们党内暴露出许多人，大概可以分这么几部分：

第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他的目的是民主革命，要搞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他是赞成的；打倒官僚资本主义，他也赞成；实际上打倒民族资本主义他就不赞成了。分配土地，他是赞成的，分到农民手里，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一部分人，就是一批所谓老干部。

第二部分人就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进党的。其中有一部分人当了干部，支部书记、党委书记，甚至更高的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还有中央委员，这么一批人。

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收容下来的国民党的这些人，其中有些过去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去，然后叛变了，在报上登报反共。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反共，不知道他们所谓“履行手续”是一些什么东西。现在一查出来，是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第四部分人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解放以后他们进了学校，甚至进了大学，掌了一部分权。这些人也不是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是，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比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国民党等等，顶多有百分之五。那么，七亿人口里面也不过是三千五

百万人。他们也分散，分到各个乡村、各个城市、各个街道。如果三千五百万人集中到一起，手里有了武器，那就是一股大军了。

巴：尽管合在一起也是一个没有思想的军队。

毛：他们是灭亡的阶级，他们的代表人物，在三千多万人里顶多有几十万人，也分散，分到各城市、各街道、各农村、各学校、各机关。所以，大字报一出来，群众运动一出来，红卫兵一出来，他们吓得要死。

另外，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也搞得很乱，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有人建议保留一个Teacher（教师），我是个小学教员嘛，就是一个普通教员多好。至于什么Professor（教授）谈不上，我没有进过大学，你们都进过大学吧？

卡：一个都没有。

毛：马克思是大学生，列宁是大学生，斯大林读了中学，我也是只读了中学。大学生，有很大一部分人我是怀疑的，特别是读文科、社会科学的。这些人如果不进行教育，不搞文化大革命，很危险，这些人将来就是修正主义。搞文学的不能写小说，不能写诗；学哲学的不能写哲学文章，也不能解释社会现象。还有学政治的、学法律的，都是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没有搞出什么好的教科书。还有学经济的，修正主义分子可多了。但是，现在看来有些希望，斗得厉害。

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什么坏东西都可以扔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是乐观的。从去年，我和谢胡同志谈话时，比较乐观些了。

卡：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巨大胜利。

毛：取得了相当的胜利，巨大的现在还没有。在明年这个时候

也许可以讲。但是，我们还不能断定。也许我们这批人要被打败，我时刻准备着，打败就打败，总有人起来继续战斗。中国这个国家有人吹牛皮说是什么“爱好和平”，才不是那样，爱斗争，动不动就打，我也是一个。好斗，出修正主义就不那么容易了。

卡：不搞斗争是不行的，不然革命怎么实现呢？

毛：就是吆！中国搞修正主义不像苏联那么容易，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受压迫一百多年。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学校原封未动，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有的是委派去的，如曹荻秋、陈丕显[1]不是派去的吗？（□□：以后选举的。）选举我是不相信的，中国有两千多个县，一个县选举两个就四千多，四个就一万多，哪有那么大的地方开会？那么多人怎么认识？我是北京选的，许多人就没有看见我嘛！见都没见怎么选呢？不过是闻名而已，我和总理都是闻名的。还不如红卫兵，他们的领导人还和他们讲过话呢，不过红卫兵也在不断地分化。在去年夏天左派是极少数，站在我们这边，受压迫，他们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到了冬季起了变化，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你们到过清华大学吗？

卡：去过。

毛：“井冈山”，过去是少数派，是受打击的；北大的聂元梓也是少数派，受打击的。现在变成多数派。过去受压迫，他们少数派很革命，一到了冬季变成多数派，

---

[1] 曹荻秋文革前原任上海市市长，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在“一月风暴”中被夺权打倒。1932年曹荻秋在上海被捕，5年后履行一定手续后被释放，在文革中被定为叛徒。1930年陈丕显被敌人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涂应达审讯后被敌人杀害，而匪军营长却收陈丕显当了义子。在文革中陈丕显被隔离审查。

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1]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不过，闹起来总会有好人在里头。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你们看，北京街上有打倒我的标语，打倒林彪同志的标语。什么打倒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等的标语都有。至于要打倒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肖华的标语就更多一些。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打倒肖华是北京军区司令员[2]挑起来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肖华，过了一两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国第二大军区呀！一个军区司令、一个政委还有个副政委张南生几个都倒了。但是，有一条真理永远是真理，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

巴：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力量。

毛：虽然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肖华、王树声一点缺点，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

巴：工作上可以犯错误，可以改呀。

毛泽东：可以改嘛！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

---

[1] 蒯大富，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的领袖。

[2] 指杨勇，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至于犯了一些什么具体的错误，现在没有时间，你们如果多呆几天可以跟你们讲，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1]。我们都是斯巴达克，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被看不起的小人物，受压迫，组织共产党。

---

[1] 陈胜、吴广，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战争。

对《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2月9日）

一

有一些修改。

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上午

---

[1] 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2月7日送审的这个规定稿，毛泽东作过两次修改。本篇一写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本篇二是写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本篇三是经毛泽东两次修改后的中央军委规定稿，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林彪同志：

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

毛泽东

二月九日下午

三

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

各军区、各军兵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民解放军在支持真正的（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已经遇到各种复杂情况，以至发生武装冲突事件（如新疆、内蒙）。因此，特作如下规定：

（一）对徒手的群众，不管属于哪一派，都不能开枪。

（二）对徒手的保守派、右派、反革命派，可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开展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在必要时，可以逮捕他们的头目，但不要开枪。

（三）略

（四）对杀人、放火、放毒、抢劫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确实查明无误者，如敌人拒捕、顽抗和武装暴乱，在说服无效时，可开枪

镇压。

（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

（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

以上规定，大部分要向全军指战员认真进行宣传教育。但第三条（诱敌深入、迂回包围）只能临战时下达，事先必须保密。[1]

中央军委

一九六七年二月九日

---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1967年2月11日给林彪写信说："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我们把六条作为五条发出，第三条只在会议上念了一遍（发稿呈上），会后各军区请〔求〕将第三条单独发给他们再读一遍，以便掌握，我们已单独打印发给他们，说明看后收回（已经收回）。请报主席。"

关于播发《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批语[1]

（1967年2月9日）

伯达同志：

请与小组同志研究，此文可否公开发表，并予广播？是否有要修改的地方，也请酌处。

毛泽东

二月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三九〇期上。这期简报登载了一篇题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的材料。材料说，黑龙江省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的经验是：一、根据当地的具体斗争情况，鲜明地体现党的方针政策，团结省委内部执行毛主席正确路线的主要负责人和军队主要负责人，三位一体，联合夺权。二、在夺取省委的领导大权之前，首先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报社、电台和专政机关公安局掌握在左派手中，为最后夺取省委大权作好舆论准备，坚决镇压反革命，保证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三、坚决地依靠被夺权单位内部的左派力量，团结中间力量，打击反动力量，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四、夺权斗争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左派队伍，左派队伍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夺权斗争。这篇材料发表在1967年2月10日《人民日报》上。

对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和补充规定稿的批语[1]

（1967年2月）

一

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

二

照发。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1967年2月9日送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审阅的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上。叶剑英在送审报告中写道：“遵照主席在上次常委会上的指示，起草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今天上午召集32人参加的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特呈上请审查批示。”2月10日，林彪将这个规定稿转送毛泽东审阅。经讨论修改后，中央军委规定于2月11日发出，共七条：一、中央军委1月28日的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充分

发动群众，深入学习讨论，认真抓好活思想，务使大家深刻认识颁发这个命令的伟大意义，提高执行命令的自觉性。二、军以上机关（各总部、军种、兵种，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区空军、海军舰队）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由军委决定已经开展四大的单位，除因必要暂停进行的以外，要继续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真正的而不是假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团结大多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军委决定暂时不开展四大的单位，必须进行正面教育，何时开始，必须听候军委命令。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海、空军的飞行学校，北京卫戍区，上海、天津、旅大警备区，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四、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帝、修、反加紧反华，我军更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保持高度集中统一和不间断的指挥。因此，各级军事领导机关（包括司、政、后及其他领导部门）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五、根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党委个别成员问题严重的，可以撤换，党委不能领导的，可以改组，但都必须经过上级批准。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这些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对党委有批评和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六、坚持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到群众中去，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同群众紧密结合，一道闹革命，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应该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别对待。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凡是没有上级命令停职、罢官的领导干部，应该坚守岗位，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七、在运动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要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本篇二写在林彪1967年2月25日送审的《关于执行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稿上。中央军委2月27日下发的这个补充规定指出，为了保持军队领导机关严密、完整的指挥体系，进一步贯彻军委指示，特决定：凡继续开展四大的单位的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应以基层行政单位进行改组，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如有线广播、宣传车、印刷用具等，应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对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年2月12日、18日）

一

二月至四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这三个月中，文化大革命要看见眉目。

上海的工作总的方向是很好的。

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2]的时候，你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两千人吗？现在已经到了一百多万人啦！说明上海的工人发动得比较成功。

二

你们那个时候学生都不是到了码头吗？现在那些学生是否还在

---

[1] 这是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的谈话纪要。

[2] 1966年11月9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上海市委拒绝承认其合法性。10日，王洪文率领数千人要上北京告状，被上海市委限令停在上海安亭火车站，于是他们卧轨拦车。张春桥代表中央去处理“安亭事件”，认为“工总司”是革命行动，并要求市委检查错误。

码头上啊?

（张、姚答:“还在。”）

那很好。以前学生和工人结合没有真结合，现在才是真结合了。

三

我们现在这个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

这是因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间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

四

一定要三结合。福建的问题不大，贵州问题也不大，内蒙古问题也不大，乱就乱一些。现在山西省有百分之五十三是革命群众，百分之二十七是部队，百分之二十是机关干部。上海应向他们学习。一月革命胜利了，但二、三、四月更关键、更重要。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人一定要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单位，连副科长都不要。这种副科长都不要的人，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

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占的数量很大。城市里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以至于小业主，这个数量相当大。只要我们善于领导，他们也是会跟着我们走的。我们要相信大多数。

一个大学生，领导一个市，刚刚毕业，有的大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管一个上海市是很难的。我看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学校很复杂，你是一个刚刚毕业或还没有毕业的人，学校情况很复杂。照我看，当一个系主任也不行。系主任总要有一点学问吧！你这个学问还没有学完，大学刚刚毕业，学问还不多，而且没有教书的经验，没有管理一个系的经验。搞个系主任，我们已经培养了一批助教，讲师，原来的领导干部，总要选些人出来。这些老的人，也不能够都不要。恐怕周谷城[1]不行了吧！周谷城再教书不行了吧！

五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那据我看，现在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再一个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从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

---

[1] 周谷城，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原任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研究历史。

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王国比较印度好点，就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们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我们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名称，是一个词，好象校长就低得多，总统就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

名称不宜改得太多。还有历史上的王莽，这个人是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如现在有人不喜欢那个“长”啊，都统统改了，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有点像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他改了后仍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王莽皇帝下诏书都困难了，改得连县名都不知道了，那么下诏书他就要写上，譬如咸阳是陕西一个县，改成祁西，诏书里就写上“祁西即咸阳”，把老名称写在诏书里面，这样，使公文来往非常麻烦。

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苏维埃。也可以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如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字，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苏联一样，他都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这个问题主要是看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所以，是不是咱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改名字了。

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这样就发生改变政体、国家体制、国号问题。是否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出来这个问题，紧跟着改。不但出来这个问题，如大小都要改，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这个问题，我估计苏联是不会承认的，他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中国出了个中华人民公社问题？资产阶级国家可能承认。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呢？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1]也好，它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将来还是要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大学里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好，因为这是十六条[2]所规定的。

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啊！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你们是不是回去商量一下，想几个办法，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仍用“人民公社”，这个办法有好处，也有缺点。好处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缺点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那不是很孤立吗？现在

---

[1] 一贯道，在中国现代史上，一贯道是组织最严密、流传最广、信徒最多、活动最猖獗、危害最严重的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1950年被取缔。

[2] 十六条，指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又不可以在《人民日报》上登载。一登，全国都要叫。否则，人家有意见：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不好办。第二种是全国都改，那么就要发生上面的问题，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旗号，承认不承认的问题。第三个办法，上海改一下，和全国一致了。可以早一些改，也可以晚一点改，不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不想改，那么你们就叫一些时候吧！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

对王明昆关于成立“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等情况汇报[1]的批语

（1967年2月14日）

林彪、恩来同志：

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12日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的电话汇报。王明昆说：（一）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二）西安东郊二八工厂10日被该厂保守派破坏，估计半年可能修复生产。今晚又有一二万人开大会，可能是要砸八〇三厂或者冲击省军区机关。有谣传说，要在20日以前把东郊的工厂都砸掉。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处理，请中央文革迅速予以指示。

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语[1]

（1967年2月14日）

林彪同志：

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1000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

毛泽东

二月十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1967年2月1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登载的《北京两个中学进行军训的情况》一文旁。文章说，驻京部队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两个学校的军训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挖私心，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对谭震林给林彪的信的批语[1]

（1967年2月17日）

已阅。

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

[1] 林彪将此信送毛泽东阅，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这是毛泽东对谭震林这封信的批语。

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1967年2月18日）

我听说二月十六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满口放屁。

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九十七分。你们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

你们都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康生充军，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下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

谭震林算什么老革命，还有我呢！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答应么？谭震林、陈毅都是老党员，为什么要站在资产阶级立

场上说话呢！

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解决！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的批语[1]

（1967年2月18日、22日）

一

退总理：

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2]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下午八时

二

照发。

---

[1] 《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1967年2月17日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18日由周恩来

转报毛泽东的。本篇一写在周恩来2月18日的送审稿上。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一些修改。社论稿第八页讲到对犯错误干部的使用问题时写道："有的干部，还可以吸收他们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将其中的"有的干部"改为"有许多干部"。在社论稿的末尾，毛泽东删去了以下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此外，还有一些文字方面的修改。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王力2月22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等在这次送审稿上写道："总理主持下开会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又作了一次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人民日报》2月23日提前转载。

[2]　周恩来1967年2月18日在向毛泽东转送这篇社论稿时写道："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在社论稿第二部分《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中的三段文字旁，周恩来画了竖线，并批示："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22日的送审稿上，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两段文字。一段文字是："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另一段文字是："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

对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大、中学开展军训的两个总结报告的批语[1]

（1967年2月19日、3月23日）

一

林彪同志：

（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

---

[1] 根据毛泽东1967年2月14日关于派人调查总结北京两所中学军训经验的批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2月18日写出了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政训练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2月19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写在林彪送审的前一个报告的首页上。3月4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王力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大中学的军政训练，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同志主张在报上发表。主席批示的两个关于北京的军政训练的文件，他们也主张修改后发表。请主席决定。”本篇二就写在陈伯达、王力的报告上。北京卫戍区的这两个总结报告，后来既没有由中央转发全国，也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此两件总理[1]阅后送林彪同志。

二

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三日

---

[1] 总理，指周恩来。

在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闻稿上的批语[1]

（1967年2月20日）

伯达、王力[2]同志：

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上〕一律改过来。

毛泽东

二月廿日

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3]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1967年2月17日报送的新闻稿共4件，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陈伯达报送的第一篇新闻稿上。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3] 1967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对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的批语[1]

（1967年2月20日）

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照办。

毛泽东

二月廿日上午十一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67年2月20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信稿上。信中指出，贫下中农是农村中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军。当这春耕开始的时候，毛主席号召你们，党中央号召你们，希望你们认真地抓革命，促生产，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善于同贫下中农一起商量，同一切劳动群众一起商量，掀起一个春耕生产的高潮。党中央相信，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贫下中农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对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挑动宗派纠纷。他们必须在贫下中农监督下，认真地继续进行劳动改造。在“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必须积极参加劳动，改造自己，不许反攻倒算。建议你们考虑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布置春耕生产工作。建议你们开好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同时，还建议人民解放军驻当地部队和各级军事机关大力支持、帮助春耕生产工作。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封信，要求在农村中宣读和张贴。

关于了解广东省委领导干部情况等问题的批语[1]

（1967年2月24日、28日）

一

总理：

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2]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3]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毛泽东

二月二十四日

二

总理：

同意这样做。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一时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1967年2月23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等的报告后写的批语。1967年2月27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当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区梦觉等7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

[3]　陈郁，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关于公开报道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搞联合等问题的批语[1]

（1967年2月27日）

伯达、王力[2]同志：

此件似可公开报导。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3]，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25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上。这期快报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的材料说，贵阳棉纺厂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作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1967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材料，题目改为《用毛泽东思想做为大联合的灵魂！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搞联合，组织纪律性大大加强，革命和生产出现新面貌》。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的社论。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3] 指《文汇报》1967年2月18日发表的社论，原题为《造反不分先后》，《人民日报》已于1967年2月20日转载。社论指出，革命有早有迟，造反有先有后。我们的态度是：不管革命迟早，不分造反先后，真革命、真造反，我们总是热忱欢迎的。今天造反，今天欢迎；明天造反，明天欢迎。对于一切愿意革命的干部来说，应该遵循毛主席“只争朝夕”的教导，立即起来造反。任何歧视、排斥干部起来造反的论调都是错误的，必须痛加驳斥。

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

毛泽东
二月二十七日

对张日清《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的批语[1]

（1967年2月27日）

林彪同志：

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

毛泽东

二月廿七日十时

---

[1] 张日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67年2月25日，《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王力、关锋将这篇文章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审阅时写道：“这篇文章，是红旗杂志约张日清同志写的。我们认为很好，拟最近发表，并想建议军委把此文印发军级干部会议各同志参考。”林彪阅后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陈伯达等的送审稿上。张日清的文章，发表在1967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

关于夺权的提法的指示

（1967年2月27日）

不同意“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建议把大夺权的“大”字去掉：“大联合夺权”。

今后斗争矛头应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句话是对当年形势提的，今后不要再提了。

关于要注意反革命复辟现象的批语[1]

（1967年2月28日）

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泽东
二月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2月25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二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题为《北京政法公社在天津小站公社支持了谁?》的材料。材料说："1月26日，北京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天津小站公社坨子地大队，支持以四清运动中下台干部为背景的'燎原红色战斗队'抢走大队的大印，从此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实行反攻倒算。"196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把这期《快报》报送毛泽东时写道："这是一个闹资本主义复辟的例子。革命群众要记者给主席反映情况。现在把材料送上，请顺便一阅。"

关于宗派主义问题的指示

（1967年2月）

凡是闹宗派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最后都是搞不成的。

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

（1967年2月）

五四运动风流人物，有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的右翼是胡适，后来他成了美帝的走狗，五四运动的陈独秀也成了反革命。当时的李大钊，写的文章也不多，但他埋头工作，后来成为革命的左派。还有鲁迅，当时他重视社会调查，独立思考，后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从历史当中吸取教训，不做昙花一现的人物，要埋头工作，善于思考，密切联系群众。中国历次的革命及我们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想问题的人，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会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在沈阳军区组织机关干部到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67年3月3日）

林彪、恩来同志：

此件[1]可印发军级会议[2]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三月三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1967年3月2日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等的报告。报告说，沈阳军区领导机关及驻沈各军事机关，于2月下旬共抽调780名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沈阳市122个大、中型工厂和部分大专院校，运用有线广播、口头讲解等办法，反复宣传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十六条、工业十条、八项命令以及中央、军委的其他有关通知、指示，党的政策一经讲清后，部分工厂由于少数人闹事而产生的不正常现象，逐步得到纠正，生产普遍上升，武斗基本制止。

[2] 指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召开的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

在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7年3月7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等1967年3月6日关于天津市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给北京军区和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天津市延安初级中学在部队进校前，到校人数很少，组织多而乱，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月的军政训练，改变了面貌，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命委员会，整顿、巩固和发展了红卫兵组织。3月1日复课后，掀起了抓革命促教学的新高潮。3月8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转发给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1968年3月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拟题为《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指示》。因这个批语写于1967年3月7日，因此又简称为“三·七”指示。

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毛泽东
三月七日

对贵州省军区支援左派工作经验材料的批语

（1967年3月7日）

戚本禹[1]同志：

此件[2]看过，不错。但有些问题写得不具体，例如第一个问题没有举例，究竟怎样解决的，看不明白。是否请他们写一个较具体的可供发表的报导送来，请酌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

[1]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全军文化革命小组1967年3月2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十七号上登载的《贵州省军区关于怎样做好支援左派工作的经验》材料。材料说，贵州省军区党委在2月1日至3日召开了有各师、军分区主要领导和军区机关处以上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在讨论怎样搞好支援左派工作时，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中央已经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实行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过去由于认识不清，所以一接触实际，就迷失了方向。二、善于发现左派是我们采取支持行动的前提。具体方法是：（一）善于通过分析各派的特点来发现左派；（二）注意从各派与上面的联系来发现左派；（三）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意见，防止片面性。三、克服怕字，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广大群众夺权。

转发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的批语

（1967年3月7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

此件[2]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委1967年3月4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关于“首要的是从政治思想上支持左派”的经验报告。报告说，以铁五师为主组成的支左部队来到渡口后，把支持左派的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下功夫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在对左派的支持上，又坚持首先从政治思想上帮助他们成长壮大。具体做法是：1. 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2. 帮助他们抓好活思想，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3. 帮助他们保持清醒头脑，坚持斗争大方向。铁道兵党委在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首先要从政治上支持，这是一个正确的方法。3月8日，中共中央将渡口驻军的经验和铁道兵党委的批语一起转发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并指出：“渡口驻军支左联合指挥部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很重要的问题，并且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是值得全国全军学习的，各军区党委、各级党委都应参照执行”。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3月7日）

一

林彪[2]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

毛泽东

三月七日

---

[1] 这篇社论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撰写的。1967年3月2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将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革命的三结合方针和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得到广大群众拥护。同时，有些人也在利用这个问题，搞复辟活动。针对这种情况，王力、关锋同志拟了一篇社论，阐说主席的革命三结合方针，以便引起注意。”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的话。这篇社论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发表，《人民日报》3月10日提前转载。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二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

（1967年）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1]

---

[1] 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的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中，在“毛主席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人民日报》3月10日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这篇社论，并以语录形式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报告的批语[1]

（1967年3月9日）

总理[2]：

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

毛泽东

三月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等1967年3月5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几个人负责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协商，准备在最近成立90多人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如主席、中央同意，我们拟在本周召开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

[2] 总理，指周恩来。

关于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的批语

（1967年3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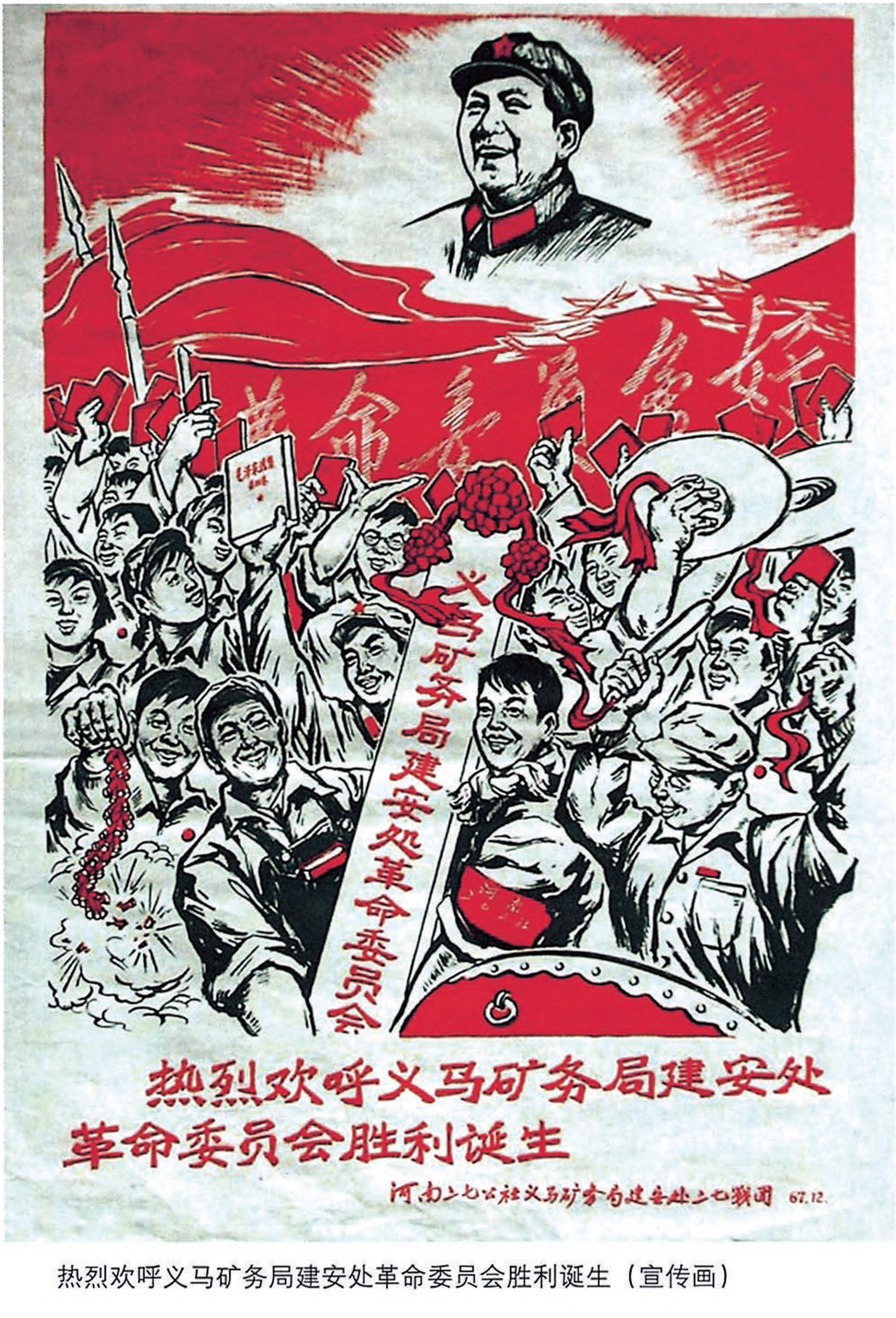
各省、市亦宜照此[1]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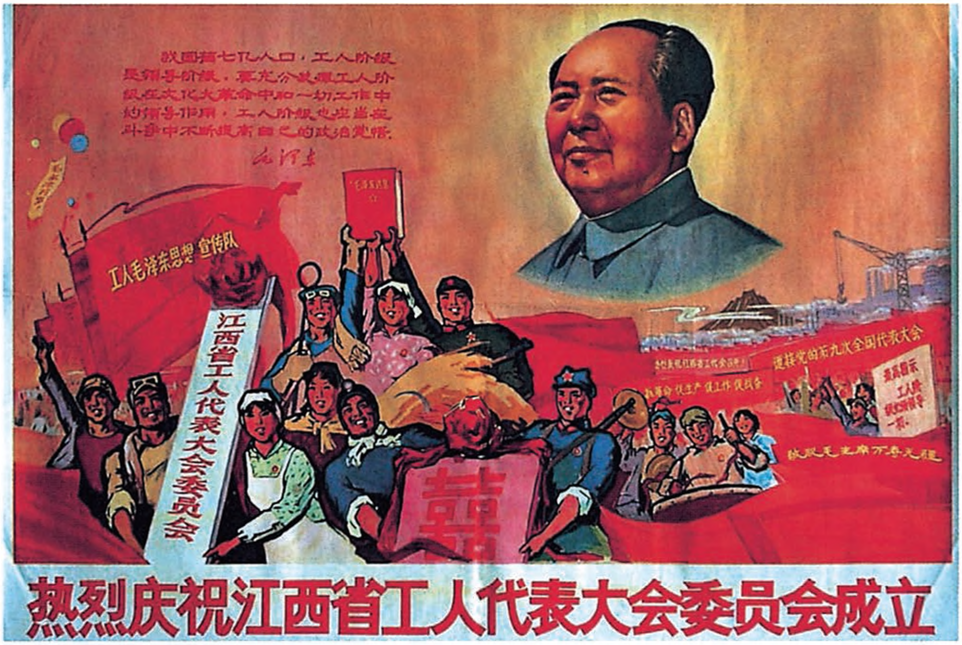
三月十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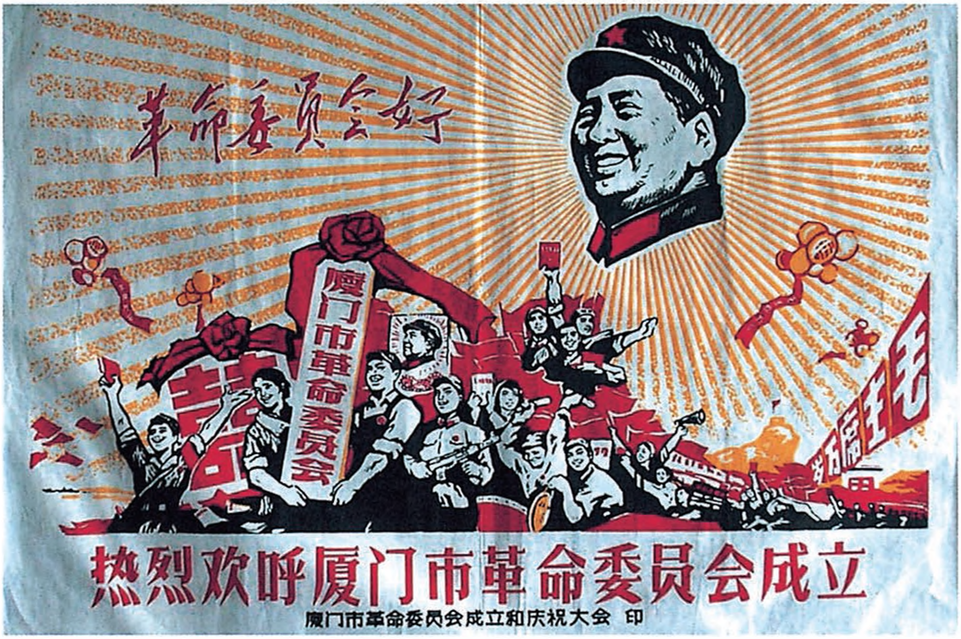
[1] 指周恩来1967年3月10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说，昨夜得到主席关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前要先开工人、农民、中学生代表会或群众大会的指示，我已告谢富治并给常委和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他们都很赞成。今早，我照此方针，以电话告天津解学恭（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程序。


革命委员会好
义马矿务局建安处革命委员会
热烈欢呼义马矿务局建安处
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河南二七公社义马矿务局建安处二七战团 67.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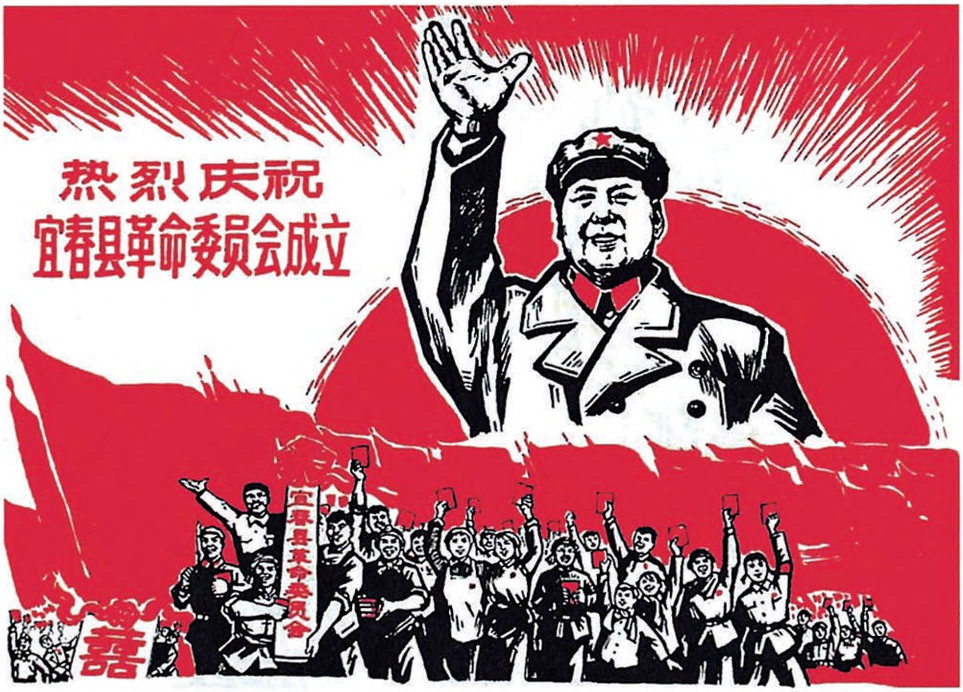
热烈欢呼义马矿务局建安处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宣传画）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毛泽东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
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抓革命 促生产 促工作 促战备
最高指示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热烈庆祝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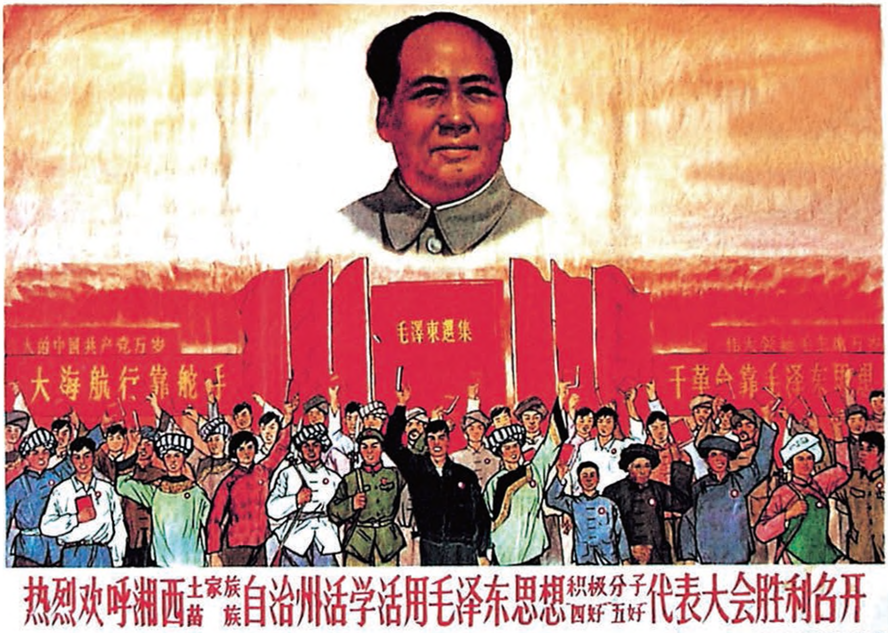
热烈庆祝江西省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成立（宣传画）


革命委员会好
厦门市革命委员会
热烈欢呼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印

热烈欢呼厦门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宣传画）


热烈庆祝
宜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宜春县革命委员会
囍

热烈庆祝宜春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宣传画）


毛泽東選集
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大海航行靠舵手
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热烈欢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五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热烈欢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五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传画）

关于推迟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批语[1]

（1967年3月）

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2]办理为宜。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7年3月9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天津市革命学生组织多已趋向联合，5日已开了红代会会议。工人革命组织已按口分系统组织，多已组成，达17万人。中学生革命组织较差。在本周内，他们拟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群众大会预定12日开，在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市临时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并发表宣言等。

[2] 1967年3月10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

对中央转发北京卫戍区布告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

照办。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67年3月起草了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布告全文如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对□□□厂（矿）实行军事管制，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成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特任命□□□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为副主任。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首先要从政治思想上支持。也就是要帮助他们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掌握党的政策，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壮大，依靠革命群众自己的力量，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二、厂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生产和业务工作，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应当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中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批转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的通知》和中央有关的政策规定。三、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岗位，积极生产，努力工作，遵守劳动

纪律，服从上级指挥。建立革命秩序，严格出入制度。四、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强调摆事实，讲道理，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五、坚决响应毛主席提出的‘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减少脱产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坚决同经济主义进行斗争，坚决同破坏国家财产的行为进行斗争。六、为了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提倡厂矿内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做到按生产系统和行政单位编组。七、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在本单位或本市内进行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必须在业余时间进行。任何革命组织联合厂矿外革命组织召开大会，必须经过军事管制委员会批准。八、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成立筹备组织，推动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九、厂矿一切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个月内回到本单位，如在规定时间内仍不回厂矿者，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十、厂矿全体革命同志必须提高警惕，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加强安全保卫工作，不许地、富、反、坏、右分子乱说乱动。对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破坏国家财产、破坏生产的人，要依法惩处。十一、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应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生产，从事群众工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发扬民主作风，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并参加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十二、厂矿全体革命同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厂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3月15日，周恩来将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报送毛泽东等时写道：“这一文件经过北京卫戍区起草、文革小组同志修改，并在今晚钓鱼台碰头会上修改通过。现在送上请予审阅，并请主席批准。在批准后，并拟发给全国参考。”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送审报告上。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卫戍区的这个布告。

对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3月16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信稿上。信中要求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该巩固劳动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应该按照党中央的规定，在文化革命中，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产品的高质量，要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财的不良现象作斗争。信中指出，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研究精兵简政的经验。既要大大减少脱离生产的人员，又要大大提高工作的效率。要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一切厂矿职工，都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高国家主人翁的伟大责任感，好好保护国家财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党中央号召，一切在厂矿中工作的革命干部，应该带头做好各项工作，为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和国家建设计划，尽最大的努力。党中央相信，一切厂矿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过错误的同志，应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

努力当好群众的小学生，在工作中改造自己，将功补过。犯过错误的干部只要这样做，工人群众就应该谅解他们，支持他们工作。对他们的批评，要采取毛主席历来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混进厂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绝对不许乱说乱动，破坏生产，破坏职工之间的团结，制造和挑动派别纠纷。对他们的处理，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立场、劳动态度和厂矿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党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大力协助地方，支持工业生产工作，你们应该很好地同人民解放军的同志合作。196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封信，要求在一切厂矿和基本建设单位中宣读和张贴。

1967年3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

对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

（1967年3月16日）

党、政、军、民、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的批语

（1967年3月19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的材料。材料说，齐齐哈尔铁路局管辖线路阻塞现象严重，每天都接到全国各地发来大批请求运送物资的告急书。要满足这些需要，每天必须运出5100多个车皮，而目前他们每天只能装运1700至1800个。外地运来的物资，每天也有200多个车皮卸不下来。铁路局的事故大大增加，到3月15日，已发生行车事故326起，比去年同期增加50%。这样短的时间内，事故之多，损失之重，是该局历史上罕见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纪律涣散，不听指挥；派别多（全局200多个组织），不但增加了脱产人员，而且经常争论，影响工作；有些人强调破框框，而把一些必需执行的规章制度随便破除了；领导干部“怕”字当头，放弃领导。3月18日，该局军代表介入文化大革命，成立了“三结合”的抓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并计划在各分局也成立指挥部，代替长期瘫痪的领导机构。但全局军代表只有40多人，困难仍很大，迫切希望驻军派更多的干部去加强领导。

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

对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19日）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3月19日送审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通知稿指出，目前各地各单位正集中力量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串连的学生、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大串连的计划，望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当日，中共中央即发出了这个通知。

对聂荣臻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67年3月20日）

退总理照办。

毛泽东
三月廿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1967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据了解，现在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按照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接管后，将遇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强烈提出的改变现行领导体制的问题，建议一面恢复生产，一面即着手将国防工业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结合批改，通盘考虑，进行一次全面的适当的调整和改组。报告中还提出了调整改组的五条原则。3月1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向毛泽东等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精神，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

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商定后将分别报批。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

关于“三相信、三依靠”的指示[1]

（1967年3月20日）

这是一个好报告。

一、依靠群众。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嘛！群众就是工农兵学商。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干部都是群众嘛！工作主要是群众做的，靠少数领导人是不行的，也是不够的。那样也不能离开群众，要有群众观点。

二、依靠军队。我们的军队不仅会打仗，而且会做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生产工作等。军队内的很多干部很小参加军队，很少读书，文化是在部队慢慢提高的，思想比较单纯。军队和地方不同，没有地权，没有财权，说走就走了。省里有地盘，军队没有地盘，军队还有条组织纪律性强，行动快。如沈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的经验，中央批转以后，全军在二十一天内就行动起来了。如果是地方传来传去，行动很慢。

三、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很快解放出来，要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群众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

[1] 这是毛泽东听了林彪3月20日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后的指示。

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3月23日）

一

戚本禹[2]同志：

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3]，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写在这篇文章送审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2]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 毛泽东对戚本禹文章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四外，还在第二页删去了“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二

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1]

三

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2]

---

[1]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有一处引用了义和团流传的一首歌谣：“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在这旁边，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根据毛泽东的批语，戚本禹在这首歌谣的前后各加写了一段话：“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震骇中外的‘红灯照’，就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艺，保卫祖国。她们着红衣，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这首歌谣生动地反映了‘红灯照’反帝的坚强决心。‘红灯照’英勇斗争的事迹，一直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他们说，‘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于枪林弹雨中，惟恐落后’，‘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

[2] 戚本禹的文章送审稿中有一处写道：“影片还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赵舒饶之口说：‘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就在此一举。’”毛泽东在文中“赵舒饶”的“饶”字下画了一道，并写了这个批语。赵舒饶，应为赵舒翘。

四

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的批语[1]

（1967年3月23日）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3月23日送审的决定稿上。决定稿的主要内容是：一、自1967年3月27日，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三、油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勇挑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现在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四、要迅速健全和改组各级生产业务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五、驻油田的外地师生和外单位职工，应立即回本校、本单位闹革命。六、大庆油田半工半读的学生，都要回原生产单位或本校复课闹革命。要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学为主。七、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八、职工家属应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这个决定。

在一份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1]上的批语

（1967年3月27日）

中央文革小组：

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2]也应来。请商总理[3]酌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二时

---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3月26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题为《四川宜宾革命派大批被关，斗争十分艰苦》。简报摘要登载了四川省宜宾县田禾3月14日反映宜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来信。

[2] 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3] 总理，指周恩来。

对《“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1]一文的批语

（1967年3月29日）

王力、关锋同志：

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

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

---

[1] 这篇文章是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名义写的，原题为《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现在的标题是毛泽东审阅时改拟的，原标题加上时间作为副题《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1967年3月28日，王力、关锋将这篇文章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此，我们过去调查不够，揭露不够，批判不够。似应在实现革命‘三结合’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充分揭露和批判。一些典型材料，似可发给党内领导同志看看。”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对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3月30日）

一

林彪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2]，是否妥当，请酌定。

毛泽东

三月卅日下午

---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3月20日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于3月30日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在林彪送审的讲话稿上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对讲话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除本篇四、五外，毛泽东还作了以下几处修改：在第16页，将“夺取政权很多国家都实现了，可是都保不住”一句中的“可是都保不住”，改为“可是大多数都保不住”。在第28页，林彪讲到：“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这样要传至万万世”一句，并将两处“永远的思想财富”中的“永远”二字删去。此外，还有几处个别文字的修改和删节。

二

此处应引几句列宁的原话。[1]

三

动物也不是孤立的个体，分为纲、目、属、种，故此句可删。[2]

---

[1] 林彪讲话稿的第2页讲到，列宁强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还有阶级斗争，改变了形式，有的地方变得更加激烈”。在这句话后面，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1967年4月24日印发的林彪讲话中，在此处加写了以下两段话：“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像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2] 林彪讲话稿的第4页讲到：“如果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人，那人同狗、牛、马、天上飞的鸟、水里边游的鱼，就没有区别了。”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四

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有些好的马列主义者也没有注意，更不用说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了。[1]

五

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说来，对世界革命说来，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什么中等国、大国，如果在这点上比较的话，无论如何，没有中国的作用大。只有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多数地方都修了[2]，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

---

[1] 林彪讲话稿中，这段话原为："我们主席就特别地强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是斯大林所不能比的，更不用说什么赫鲁晓夫、什么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头头，那就更不能比了。"

[2] 林彪讲话稿中，这句话原为"所有的地方都修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和林彪。

对《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1]一文的批语

（1967年3月30日）

王力[2]同志：

看过，照发。

毛泽东

三月卅日下午九时

---

[1] 这篇《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发表在1967年3月3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上，《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作了转载。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1]

（1967年3月）

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

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多年，仍是这个问题。

---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

（1967年3月）

全国粉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搞尚未揭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有什么理由放松警惕？在胜利中不要冲昏头脑，在胜利中要戒骄戒躁。

对报纸工作的指示

（1967年3月）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报纸上有三个不够，调查得不够，揭露得不够，批判得不够。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1967年3月）

我们总要有一个党，现在这样的状况是一种暂时现象，没有一个党是不行的。各个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怎么能代替党？革命委员会也不能代替党。

关于批判《修养》[1]的谈话

（1967年3月、4月）

一

千万不要再上《修养》那本书的当。《修养》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脱离革命，脱离政治斗争，闭口不谈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闭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宣扬唯心主义的修养论，转弯抹角地提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提倡奴隶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按照这本书去“修养”，只能是越养越“修”，越修养越成为修正主义。

二

这本书完全是欺人之谈。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到底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怎样夺取政权，对于这些基本问题，这个小册子（即《修养》）避而不谈。根本不谈夺取政权，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政权，离开了阶级，离开了阶级分析，离开了阶级斗争，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反动的、

---

[1] 指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不触及蒋介石一根毫毛的东西，是一株资产阶级的大毒草。

三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这是反马列主义的。我看大学生应该更好地研究一下，选几段写文章批判。要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邓小平多年来的讲话。

四

我从来就不同意“驯服工具论”。

关于《毛泽东选集》注释等问题的指示

（1967年3月）

一、注释现在不要修改，这些人名都不要删掉，这些都是历史。没有司马炎、司马师、司马昭，何以成为《晋史》?

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不好，可以不收。

三、《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刘少奇的一段话没有必要，可以删去。

四、新印《毛选》，仍用原来的日期。

五、《毛选》五、六两卷，一年以后再说，现在你们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

六、《语录》第二〇八页引用刘少奇的话的一段也删去；第二〇八页标题“思想意识修养”改为“纠正错误思想”。

关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的一组批语[1]

（1967年3月至1971年3月）

一九六七年以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和外事工作有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批示。毛主席的批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现将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事组、中联部和外交部等文电上的一部分重要批示和修改，汇总于后。

（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对澳共推荐来中国的大卫·库普反映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一张大字报的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大卫·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

---

[1] 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本篇是中共中央办公厅6月8日印发的会议文件之六。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7月1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曾将其中（五）至（十）（十三）（十四）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并在通知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对对外宣传工作，作了极为重要而严肃的批示。现将毛主席的多次批示，印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党、政、军、群革命领导干部和外事工作干部中进行传达。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正确理解，坚决执行。一定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武器，检查对外宣传工作，肯定成绩，纠正缺点，总结经验，提出改进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对外宣传工作，做得更广泛深入，更切合实际，更科学，更有效。”

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我们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毛主席在《桑穆加塔桑就发表主席内部谈话问题的一封信》[1]上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桑穆加塔桑在这封信中说：“现在，有人告诉我，（同主席）谈话的内容未经同意不得公布。”

（三）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四）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一日，姚文元[2]同志转达了毛主席对安斋等同志关于日本革命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批示。

姚文元同志说：首先我向同志们（安斋库治等同志）转告一个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向安斋库治等同志问候；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

---

[1] 指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1967年7月2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在中国访问后回国时在机场谈话和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信中说，这“完全不是故意的”。“如果你能够找个时间去会见康生同志或刘宁一同志，准确地解释一下产生这个错误的情况，我不胜感激”。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部长。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我在这里把毛主席批示的原文念一下。毛主席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就是指的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所写的那篇著名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论述的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节第一段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主席在第一节第二段中完整地、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武装起义的经验。在那一段的最后有这样的话：“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毛主席所说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就是指这篇文章中的整个这一段话。

（五）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毛主席在一个拟在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1]上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六）一九六八年三月十日，毛主席对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2]，作了重要批改。在“必须高举毛泽东思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1968年2月13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建议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上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原样移交给越方。

[2] 指1968年3月8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好1968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

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之后，增加了“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一句。

（七）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毛主席删去了我援外某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中的一段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八）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毛主席在关于答复新共威尔科克斯同志对我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1]上批示：“此事我已说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组员姚文元1968年3月16日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说，1967年3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来访时，对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提出批评，认为我们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1967年11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甚至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他认为，威尔科克斯提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而不仅是宣传形式问题。问题的中心是对毛主席在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作用作何评价。他认为，为了宣传毛主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不能不十分强烈地、始终一贯地、反复地进行宣传，这样做对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对西方世界，是非常必需的。康生等在报告中说，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三、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的。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

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

（九）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起草的致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作了重要修改和批示[1]。毛主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

（十）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2]（涉及在我报刊上发表兄弟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上批示：“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十一）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中，将“主要是宣传全世

---

[1] 毛泽东对这个贺电稿的批示全文是：“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毛泽东　1968年3月27日”

[2] 康生1968年3月28日给毛泽东的这个请示报告中说，缅甸共产党的声明，要求我们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不便给他们改，他们也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不登也不好，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这个声明后来照原文发表在1968年3月29日《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对康生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除（十）中所引用的一段外，在文中“一般地说”之前，还有一句：“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

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字删掉，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十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1]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十三）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作了重要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2]

（十四）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一个接待外宾的计划中，曾经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1968年5月14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415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毛主席接见。毛泽东审阅时，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下面画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这个批语除（十二）中所引用的一句外，紧接着还有一句：“此事请康老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1968年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2]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8年6月8日在转发毛泽东这个批语的指示中指出：“外国人关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国际革命运动的影响的材料，可由新华社刊登在内部《参考资料》上。”

规定过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批示：“不要。”

（十五）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关于处理某兄弟党要求发表它的一篇文章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删去了几个字”。报告中两处提到希望该党“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解决党内分歧，毛主席都把“毛泽东思想”这几个字删去了。

（十六）一九六八年八月，毛主席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和电报稿上批示：“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此件缓发。”[1]

（十七）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初稿《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2]上的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7月8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写报告说，我援外军事人员现在仍称“军事专家”，“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援外人员身份不相称。我们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工作组”，其人员按行政职务和工作性质，分别称组长、教员和翻译。如有“首席专家”，则改称工作组组长，下辖各军事工作小组。（十六）中的第一个批语写在这个报告上。8月6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再次给毛泽东等写报告，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组”。（十六）中第三个批语写在军委办事组8月6日的报告上。（十六）中第二个批语写在8月6日报告的信封上，在这个信封上，毛泽东还写有“林副主席、总理再阅”一句。

[2] 这篇社论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在196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

社论的有关段落如下（毛主席删掉的地方，下边画了横线；增加的地方，用｛｝括住）：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给日本工人朋友赠了亲笔题词：“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今天是这一光辉题词的六周年纪念，本报在头版位置上发表了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毛主席的这个题词，不仅对于日本人民的革命事业，而且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一旦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去推动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各国人民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反复地教导我们：“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实践相结合，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和实践相联系这件事，生动地比作为“有的放矢”。毛泽东同志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无产阶级专政

底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问题，从而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条原则适用于中国革命，也适用于日本和一切国家的革命。这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时，必须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那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即现代修正主义！

日共宫本[1]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借口日本“国内外条件”不同，标榜什么“独立自主”，其实都是鬼话。他们在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他们所起劲地攻击和反对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竭力歪曲和阉割马克思列宁主义，疯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武装夺取政权，鼓吹所谓“和平革命”，推行所谓“议会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革命，背叛革命，反对革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可耻叛徒，是日本革命事业的可耻叛徒。

今天，日本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日本人民的革命觉悟不断提高，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左派队伍正在日益成长壮大。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大造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反，把〔真正的〕马克思

---

[1] 宫本，即宫本显治，当时任日本共产党总书记。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垄断资产阶级、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武器。日本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派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光荣而严肃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认真地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体运用到日本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去，从日本的具体情况出发，解决日本革命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问题，把日本革命不断地推向前进。日本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必然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紧密地相结合的过程。

我们相信，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日本真正的革命党，一定会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诞生。它将领导日本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一九六八年九月，毛主席对中央文革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的批示：“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1]

---

[1] 周恩来等1968年9月25日送审的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名义下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共30条，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第11条，并写了这个批语。9月2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的通知中，标语口号共29条，删去了送审稿中的第11条。

送审稿的第11条是："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

（十九）一九六八年九月，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原文中有"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毛主席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一句删掉了，并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

原文附的《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十九条，毛主席批注："去掉三条"。（即：17.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十）一九六九年一月，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走投无路的自供状——评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1]上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2]。"

（二十一）一九六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稿[3]上批示："可用。略有修改。"

---

[1] 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上。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2] 1969年1月28日，《人民日报》以《一篇绝妙的反面教材，美帝新头目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为题，全文登载了尼克松1月20日的就职演说。

[3] 周恩来1969年5月19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这个声明稿，是为答复苏联政府3月29日声明的。内容共分六个部分：一、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政府蓄意挑起的。二、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都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三、中苏之间存在边界问题的事实是抹杀不了的。四、苏联政府破坏边界现状，挑起边境冲突。五、到处扩张领土的是苏联政府。六、中国政府主张和平谈判，反对诉诸武力。这个声明1969年5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毛主席在声明稿的“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一句中的“日期”之后加了“和地点”三字。并在“如果苏联政府认为中国政府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态度是软弱可欺，可以用核讹诈政策吓倒中国人民，用战争实现对中国的领土要求，那就完全打错了算盘。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一段中，将“不是好惹的”改为“是不好欺负的”，还加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句。

（二十二）一九六九年六月，毛主席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1]，批示：“可发。”

毛主席在社论的第二段“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四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毛主席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

（二十三）某拉丁美洲共产党总书记等人，从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十二月间，先后给我党中央和林彪[2]同志四次来信，承认过去追随苏修反华是错误的，要求同我“恢复两党关系”。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中联部抄印来信的文件上批示：“林彪同志：这些信看来似无恶意。他们被人抛弃，想寻出路。请转康生同志考虑是否可以同他们联系。”

---

[1] 这篇社论1969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发表。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二十四）一九六九年九月，毛主席对外交部《关于给日中友协（正统）各地组织庆祝我国庆集会发感谢支持电》中的“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三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句中的“使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为“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二十五）一九七〇年六月三日，中国红十字会《关于救济秘鲁地震的请示》，拟以该会名义慰问并捐给秘鲁红十字会现款人民币五万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毛主席口头指示，给秘鲁救济五万元人民币太少。给罗马尼亚救济了一百万元，秘鲁比罗马尼亚死人多，可否给秘鲁救济一百万或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请总理酌定。

（二十六）一九七〇年六月，外交部在“关于我救济匈牙利遭水灾地区居民的请示”中，建议我红十字会捐现款十五万元人民币。毛主席批示：“似太少，可赠五十万元，等于赠罗之一半。”

（二十七）一九七〇年九月，毛主席在中联部起草的我党中央致朝鲜劳动党成立二十五周年贺电稿上，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和中国人民”里的“毛泽东思想”五个字圈去。

（二十八）一九七〇年十月，毛主席在外交部起草的给日本社会党成田知巳[1]的复信稿上，作了修改。原复信稿中说，“社会党朋友

---

[1] 成田知巳，当时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更应继承和发扬浅沼[1]精神，为反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走狗、帮凶而进行斗争。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于十月中旬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毛主席将“社会党朋友更应继承和发扬”中的“更应”两字圈掉了，将“如先生同意这一意见，我们欢迎……”改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欢迎……”。

（二十九）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外交部在《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建议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南方解放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二百万人民币的物资。毛主席批示：“宜增至五百万。”

（三十）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联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2]

---

[1] 浅沼，即浅沼稻次郎，1955年至1960年任日本社会党书记长。1959年3月，率社会党友好使节团访华，在北京政协礼堂发表演讲，提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引起日本各界极大反响。1960年3月任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同年10月12日在东京日比谷公堂召开的三党党首讲演会上讲演时，被刺身亡。

[2] 中共中央1971年曾将这个批语作为《毛主席、林副主席最近批示的八个重要文件》之三印发，1994年编入《毛泽东外交文选》。

（三十一）一九七一年二月，旅游局在《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中说，一九七一年拟接收外国人来华旅行八百至一千人，对象以左派和对我友好的工农、学生、教职员为主，上层友好人士有计划、有选择地少量接收。毛主席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

（三十二）一九七一年二月，外交部办公厅编印的《外交活动简报》第二十九期《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中称，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提这两段历史事实不仅不会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相反人们会通过对当时的各种错误路线的了解，更加体会到毛主席路线的正确。对此，毛主席批示：“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三十三）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周总理给毛主席的报告中说，我乒乓球队拟仍前往日本名古屋参加三十一届国际乒乓球比赛。到日本后支持柬民族团结政府不承认朗诺[1]集团的球队为合法，并主张驱逐，对南越卖国集团派的球队，亦采取同一态度，对以色列也询问阿联、叙利亚的态度。如不成，就避开与他们比赛。我球队如去，当作好各种警戒准备。[2]毛主席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

[1] 朗诺，当时任“高棉共和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四星上将总司令。

[2] 周恩来的报告中还说到，日本群众得知中国乒乓球队拟参赛后，热烈欢迎，左派组织了500多人保护我球队，但右派也派人到名古屋企图挑衅，日本政府极为头痛，已派大批警察护卫我队预先分住的旅馆。这将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中国乒乓球队后来参加了这届世乒赛，并获得男子团体冠军、女子团体亚军。

在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加写的一段话[1]

（1967年4月1日）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

[1] 周恩来1967年3月30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讲到："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此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4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4月4日、6日）

一

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2]，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

毛泽东

四月四日

二

林彪同志：

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3]

毛泽东

四月六日

三

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4]

四

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4月2日送审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林彪4月5日送审的命令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林彪4月2日送审稿中第一条、第六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还将第三条中“对于确定实查明的反动组织”一句，改为“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删去第四条“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一般的概不追究”一语中“一般的”三个字；把第四条中“不能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来划分左、中、右”一句，改为“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这些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3]　中共中央军委1967年4月6日发出了这个命令。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十条命令是：（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做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中央批准。（四）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过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毛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斗争。广泛搜集揭露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事实，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八）对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来主持支左工作。（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用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的方式。（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命令中提到的赵永夫，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西宁驻军“联办”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2月，“联办”领导小组在支左工作中，将

青海省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确定了“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于2月23日调动武装部队夺占“八·一八”掌权的青海日报社，导致部队开枪的严重事件。赵永夫是当时夺占报社部队的组织者和现场主要指挥者。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指出“1967年2月，青海省军区内部发生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4] 林彪1967年4月2日送审稿中，这句话原为：“对未向我开枪的群众，无论革命的、反动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对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4月）

一

退江青。

可以，照办。[2]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

二

看过，删了一点。[3]

三

主席说，这篇文章[4]，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

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四

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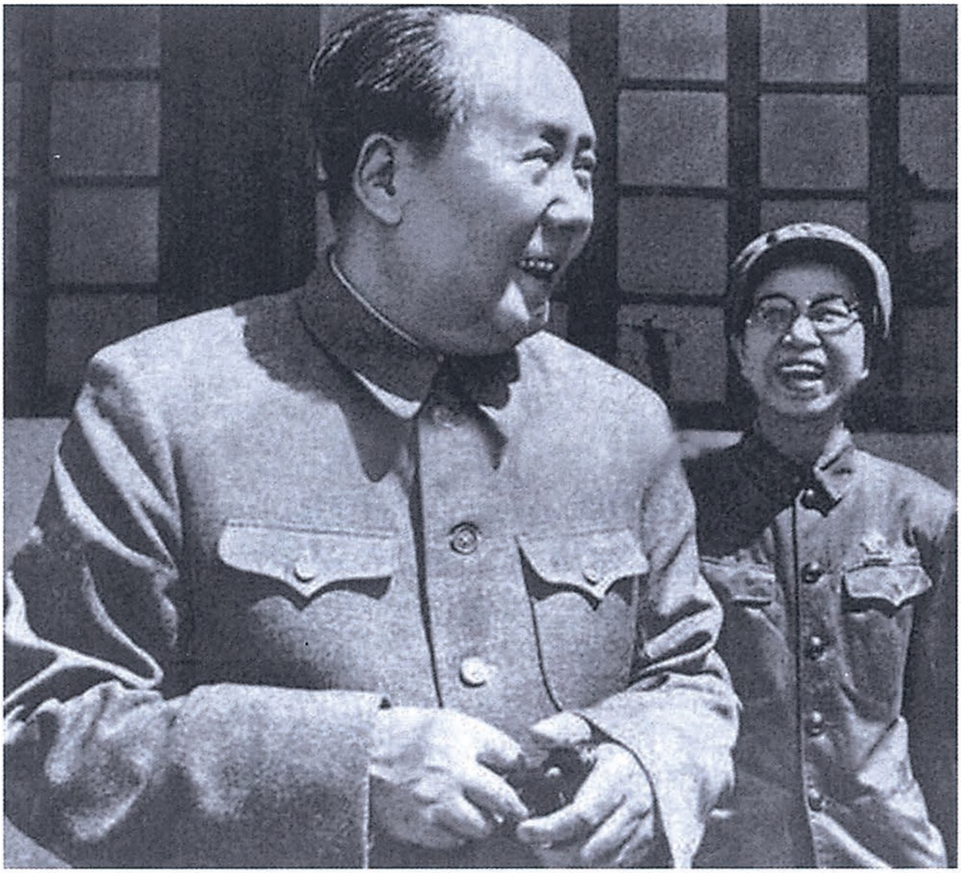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曾先后两次送毛泽东审改。本篇一是对江青1967年4月15日送审的讲话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江青4月17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江青4月17日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江青1967年4月15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说：“这是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改了几次，缺引证，不够典，因为没有发言稿。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对于这次送审稿，毛泽东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第5页，对江青讲的历史上“触詟说赵太后”的故事作了一些内容上的补充。在第7页，江青讲到军队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时说：“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实际上早已经介入了。”在其中“主席早就说过是假的”一句前，毛泽东加了“就许多单位说”一语。在第9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17年“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其中的“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一句前，加写了“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9个字。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增删。

[3] 毛泽东对江青1967年4月17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三、四外，

还有以下几处：将第4页上“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改为：“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删去第6页上“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一句中“学习主席的工作方法”9个字。在第7页，送审稿讲到广州市的文化革命情况时说：“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毛泽东把其中的“分化瓦解它那个组织”一句改为：“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在第9页上，送审稿讲到文化大革命前17年文艺创作和教育情况时写道：“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完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毛泽东把其中的“基本上是”改为“大量的是”，将“那完全是”改为“那几乎全是”。在同一页上，江青讲到她在建国初期辞去一些工作职务时说：“我自己思想上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改为：“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在第10页，江青讲到文化大革命前“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毛泽东把其中的“都是”改为“大量的是”。在第13页，江青讲道：“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毛泽东删去了这些话。在第14页，江青讲道：“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括号写了“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10个字。此外，对这个讲话稿，毛泽东还作了一些其他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增删。

[4]　指《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文。



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和江青。

接见谢富治时的谈话

（1967年4月19日）

我祝贺你，祝贺这次大会的成功。请代向全北京市革命造反派祝贺。

致敬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大宣言，就不要再搞宣言了。

青年人要参加你们的工作，使前辈人不脱离群众，使青年人得到锻炼。青年人不能脱产，这样会造成脱离群众的，要半官半民。北京的形势还有反复，无政府主义就是机会主义的惩罚。要不怕犯错误，各种反动的观点和反动的群众组织是极少数的。就是反动组织也要做工作，但是还得斗争。

印发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7年4月23日）

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1967年4月20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等人写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四川地区截至4月19日，已释放被逮捕、拘留、收容审查人员共27865人，占总数的85%。4月21日，周恩来批示将这个报告“印发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参加四川会议各同志”。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林、周[1]阅后办。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关于将河南两派领导人调来北京商谈解决问题等的批语[1]

（1967年4月23日）

林彪、恩来同志：

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2]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3]，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4]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

[1] 这个批语是毛泽东看了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1967年4月22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4000余名代表进京反映问题的报告后写的。

[2]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3] 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4] 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戴苏理，当时均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对《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材料的批语和注文[1]

（1967年4月23日）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4月21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〇号上登载的这个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4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革命派、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总会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同学们批评了部队在前段支左工作中，旗帜不鲜明，调查研究不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批评部队没有把训练内容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所以训练中几次出现贴军队大字报的高潮，说部队“在学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二）。部队负责人欢迎和感谢同学们诚恳、善意、坦率的批评，并因势利导地转入讨论如何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做好促进造反派大联合的准备工作。讨论中，“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在“李世英同学”5个字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三）。其中第七条意见是“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四）。第八条意见是：“在做好各院校思想工作的基础上，采取互相串连的方法，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在这一条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注，即本篇五）部队负责人认为，李世英提出的意见是对的，表示支持，并决定召集西工大等4校负责人，就如何紧紧把握斗争大方向，促进造反派大联合，作进一步协商和讨论。本篇一是印发这个材料的批语，写在这期《快报》的报头上。

一

林彪、恩来[1]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2]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三日

二

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毛注

三

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毛注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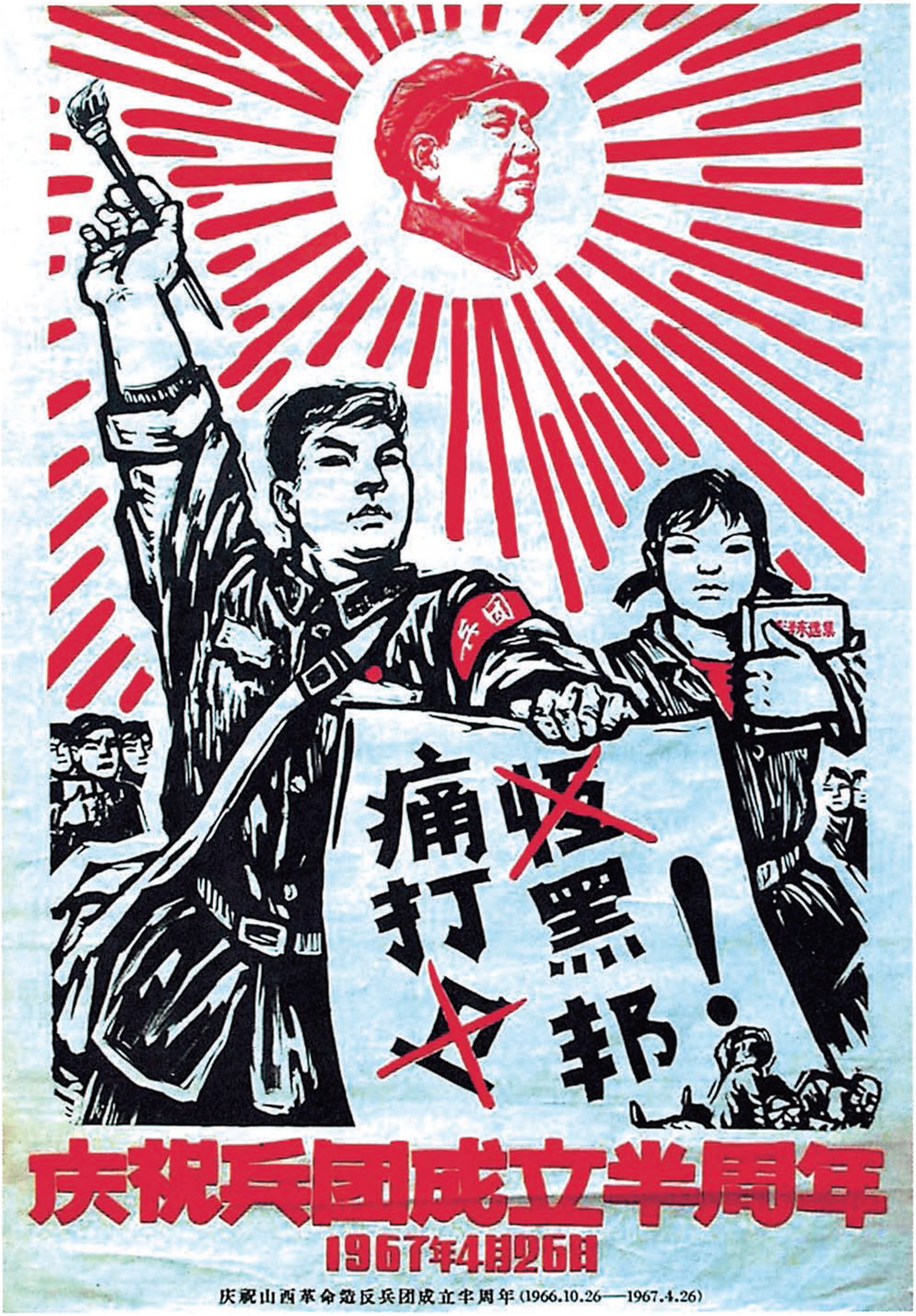
四

这是最基本的一条。——毛注

五

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注

1967年4月24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各省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兵团
泽东选集
痛~~恨~~
打黑
邦！
庆祝兵团成立半周年
1967年4月26日
庆祝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成立半周年(1966.10.26—1967.4.26)

庆祝山西革命造反兵团成立半周年（宣传画）

关于部队支左的指示

（1967年4月）

军队的威信必须坚决维护，不能有半点含糊。拥军爱民社论的发表是当前工作的中心。军队第一次支左、支工、支农、军训、军管是大规模的战斗任务，犯错误是难免的，问题在于当前主要危险是有人把解放军打下去。

支左支错，支到保守派方向去，改过来就行了，允许的嘛。我们在这五大工作中，三分之二做对了，三分之一做错了，就是很好了。

有的受老婆孩子观点的影响，有的是县委书记或地委书记，他们的孩子是那个地方的保守派，或者是老婆是那个地方当权派之一，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4月）

从宜宾问题的揭发，才开始揭开了四川阶级斗争盖子的序幕，才开始揭开李井泉的盖子。四川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困难，主要是刘、邓、李井泉搞的，他们把刘结挺打成反革命，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次才翻过来。以后要把这个材料印出来，发给每个党员。四川阶级斗争的揭盖子，两条路线斗争还未解决。

和某同志的一段谈话

（1967年4月）

毛泽东：你们说是北京的大学大联合了，成立了红代会，很好呀！那三个司令部呢？

答：没有了，都取消了。

毛泽东：啊，为什么要取消呀？我才不相信呢，已经取消了？

关于军管问题

（1967年4月）

军管太少了。

刘邓派工作组是压迫革命、反对群众，我们军管是支持革命的。

关于革命派的大联合

（1967年4月）

目前全国斗争形势很好，成绩很大，经验很多，全国都在前进中。革命派在优势情况下，可按系统、按部门、按单位。但要注意保守派把造反派吃掉，不要用解散革命造反派的办法实行大联合。

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1967 年 4 月）

过去的八条，现在的十条结合起来是对的。左派起来了，对立面也起来了，这也不要紧，有点反复有好处。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要走向反面。

要把所有的联动放出来。

（现在号召斗、批、改，有人屁股坐不住）要学生坐得，要到夏天。

关于干部问题的指示[1]

（1967年4、5月）

我们一定不要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是一条；另外一条就是不能脱离马列主义。

我们党在四九年、五〇年、五一年这三年当中，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是尊重我们的，因为当时是艰苦朴素的，吃小米，住帐篷。当时刚打完仗，还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二年以后情况就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干部在群众当中开始受冷落。当时，在干部当中实行了薪金制，军队住了营房，机关盖了高楼大厦，过去和群众在一起吃、穿、住，现在有些脱离群众了。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听我的话。刘少奇、高岗、彭德怀学习了苏联那一套。薪金制我是不赞成的。学苏联那一套我也是不赞成的。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它改变过来。

我们这些干部是经过长期锻炼的，还是要有些人站出来。现在的情况是：站出来就打。我们的事情总是要有人挂帅的。红卫兵能挂帅吗？今天上台，明天就会被打倒，原因是政治上不成熟。现在我们要做很多工作，使那些主要干部站出来，哪怕是黎元洪[2]式的

---

[1] 这是毛泽东在1967年4月29日至5月1日举行的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 黎元洪，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

人物也是好的，出来两年也好。红卫兵不行，没有经过锻炼，这样大的事情，信不过他们。

要依靠干部，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很多事是要让干部去办，政策靠他们去执行。有些省委书记要赶快解放出来，要让他们好好检讨。有的省委书记过去犯了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害怕群众，动员一些人去“保护”他们，结果害了自己。

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

要爱护干部，要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出来，革命小将现在叫他们挂帅还不行，有个培养的过程，但小将是可爱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现在要搞三结合，要使青年参加各方面的领导工作。不要看不起青年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都可以接受他们做事情，不把新一代搞上来怎么使他们受到锻炼？这个三结合就是老、中、小，就是二十岁以上就行了。

我们提倡青年人上台，有人说青年人没有经验，上台就有经验了。过去也提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是从形式上讲的，现在要落实在组织上。

三结合，老、中、小要三结合，不主张把老干部都打倒，老干部一天天见上帝了。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机构改革要适合

联系群众，不要搞官僚机构。

过去党团员受《修养》的影响脱离了群众，没有独立的意见，成了驯服工具，各地不赞成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过半年或一年后再恢复。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干部，而且也是对党团员的大审查，大多数一定是好的。有的干部群众意见较大，可过二三年以后再说工作，有些干部可以立即恢复工作。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以改正的机会。联动要放出来，没有右派，就没有左派。搞薪金制军衔我从来就反对。

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1]

（1967年5月1日）

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2]上曾经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负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去提醒大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中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

---

[1] 这是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因此这次大会又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书面报告。报告对新中国成立以来12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了总结。会议在进行过程中，不少与会者认为会议对反对官僚主义和发扬党内民主重视不够，要求给他们讲话的机会。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在1月30日的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突出强调和系统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会议遂开成了民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会。与会者对各省委、各中央局和中央国家机关提出了批评意见。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人作了自我批评。

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已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1]同志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2]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人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当时是有很多人仍

---

[1] 江青，文革前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50年曾主导对武训的调查并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63年起推动现代京剧的改革，其成果被称作“八个样板戏”，曾有著作《谈京剧革命》（1964年）。文革开始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2] 红色城市，指北京。

然不通的，李井泉[1]就不通，刘澜涛[2]就不通。伯达同志找过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

"一月风暴"[3]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后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

---

[1] 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

[2] 刘澜涛，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兼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担任西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

[3] 一月风暴，又称"一月革命"。1967年1月，以上海为开端，全国爆发了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为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以后，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个政治势力都还要顽

---

[1] 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强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地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的。北京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打得比较少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看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也还得改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现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几年来，文化教育界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现，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的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文化大革命出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以增强随时防修、

反修的能力。

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谓走资木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作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但既然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作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地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从自己话里说出去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个培养问题，不能在他们犯有某种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

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样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地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

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阿尔巴尼亚的军事代表团的同志亲切交谈。

“五一”节对中央首长的谈话

（1967年5月1日）

我们今天是老、中、小相结合的大会。（这时向朱德）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中年的四五十岁了，广场上是小将。今天的大会是个大联合。

我们看干部要从历史上全面地看干部。今天除刘、邓、陶之外，其他的都来了。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回去，还是要做工作，江□、江□□、谭□□不是三反分子。陈□□思想上、作风上蜕化，应很好改造。廖□□过关了没有？应让他过关。王震不是三反分子，是个粗人，建议谭□□同志去拜访他。余秋里讲假话，谷牧三六年被捕过，比较困难一些。

地质学院的一些红卫兵对老帅的一些历史一点也不懂。有人找我摸底，我说：“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怎么办？你们来做行吗？”打倒谭□□，今天还不是在这里开会吗？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徐说：我身体不好，请肖华代替我工作。）还是你搞吧！

邓和刘有区别，邓历史上闹独立王国，不理我，在中央书记处还临阵逃脱，以后反王明路线是我一派的。

刘少奇二五年被捕过，后来被人保出来了，住在北京。刘少奇一条路线，一个理论，一个班子。六人小组，谣言很多，完全是造谣。

联动大部分是好的，少数不好，有什么要紧啦！成都让他们承认错误就行了，他们不是承认了错误吗？不是改得很快吗？

（与王震在天安门城楼上握手）王胡子，我很久没有看到你了，有人要打倒你，能打倒吗？是打不倒的吧！你对打倒你的人要宽大嘛，宽大嘛！

“五一”节和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谈话

（1967年5月1日）

江青：这是国家科委张□，她们把韩光一伙打倒了，她们那里运动搞得不错。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应该祝科委同志们万寿无疆，应该祝人民万寿无疆！

毛：女同志也一样造反嘛！你们把反革命韩光打倒了，你们夺权夺得好！

毛：你现在担任什么工作？

张□：在国家科委革命委员会工作。

毛：是革命委员会主任吧？

周恩来：也就是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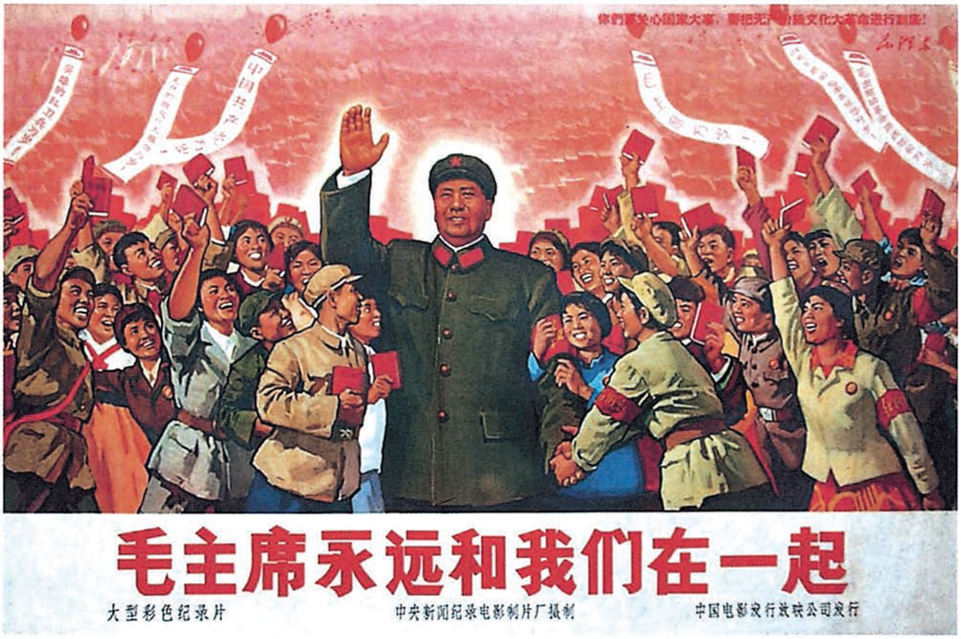
毛：她原来是个局长，和群众一起造反。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京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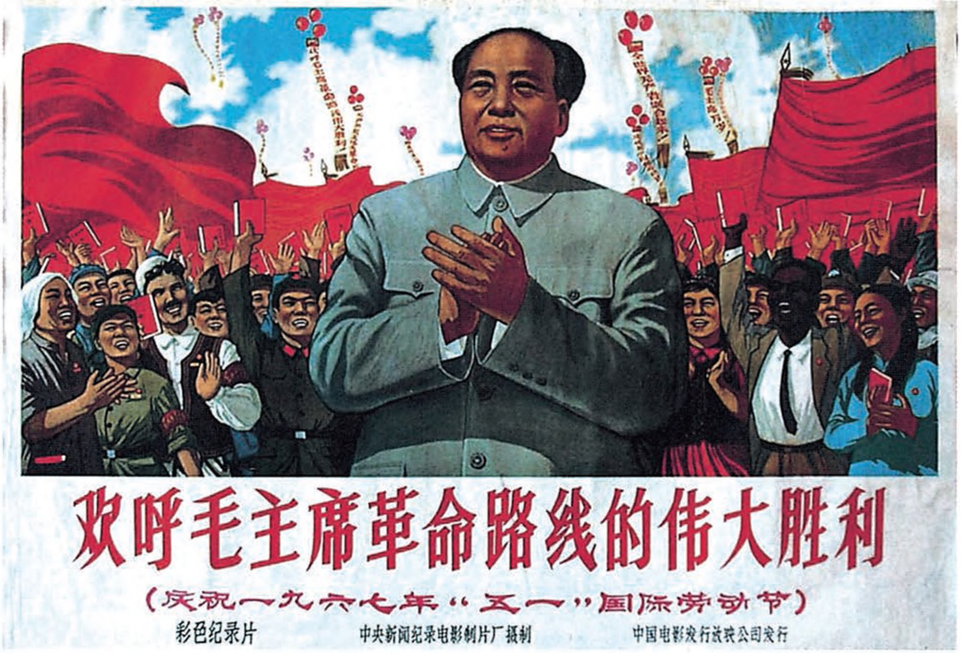
在阶级社会中 每
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
地位中生活 各种思想
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没
有这样一个核心 社会
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参加首都革命群众“五一节游园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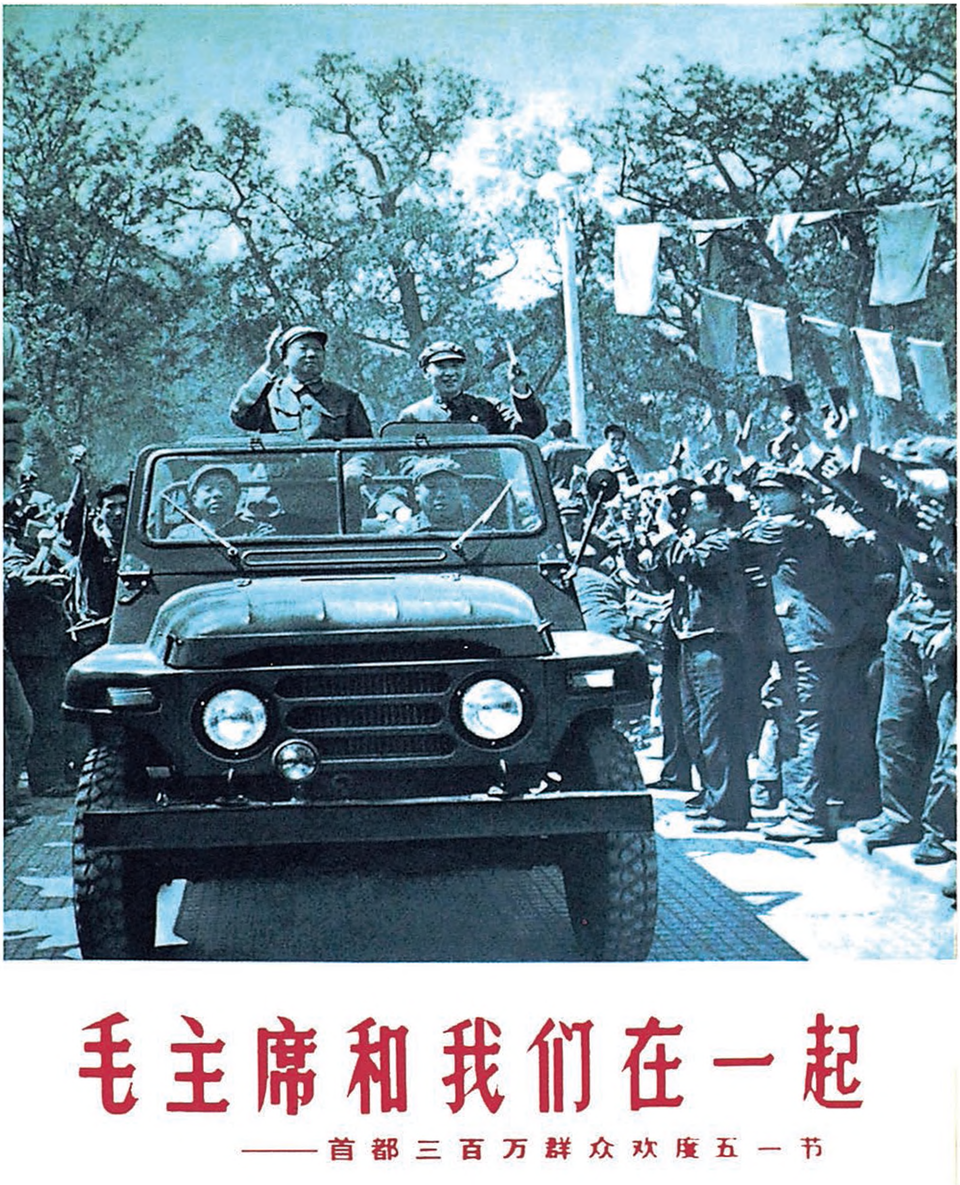
1967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大型彩色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庆祝一九六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
彩色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发行

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画）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
——首都三百万群众欢度五一节

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宣传画）

在“五一”节中南海晚会上的谈话

（1967年5月1日）

（毛泽东听到江青介绍京剧团有人被打的事后）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现在还打不打了？

演员：现在我们都团结一致了。

毛：不打了，好。

毛：现在还有没有反二簧、反西皮？

演员：在革命现代戏中，反二簧、反西皮可不可以用？

毛：我看可以用。

对棉粮工作的指示

（1967年5月1日）

必须把粮食抓紧，把棉花抓紧，把布匹抓紧，粮油征购工作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它首先是一个政治任务。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收、管、吃）抓得很紧，而且抓得及时。

不注意储备，铺张浪费，吃光用光，这些都是错误的，都是粮食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大批判问题的指示

（1967年5月2日）

批判文章不要像九评那样长，每篇一二千字，不要超过三千字。一篇一个中心，一个概念，明明白白。长了就没有人看，记不住。

同意。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

年纪大的、年纪中的、年纪小的也要“三结合”，不要看不起年轻人。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都能做工作。搞“三结合”，要老中小，老的都会去见上帝的。

今年形势好，布、粮还是要抓。社论要搞快一些。批判文章文字要短。彭、罗、陆、杨可以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其他人都称修正主义分子。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章中提，在标题上要提。

大批判要慎重，要确实，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批判才有力量，否则就会一风吹。引他（指刘少奇）的话不能只顾头不顾尾。批判要站得住。“托拉斯”这个名词，不能一概驳，主要驳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些旧名词要赋予新的意义。

“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有无产阶级纪律。服从、团结，那是有条件的。

写文章要琢磨，要准确，要尖锐明确。

对《〈修养〉[1]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1967年5月4日、6日、7日）

一

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四日

---

[1]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这是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1939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并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1949年经刘少奇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1962年刘少奇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2]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力、关锋起草，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修改，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7年5月8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和5月8日《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曾多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是毛泽东对5月2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5月5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5月7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四、五是毛泽东在送审稿中加写的两段话。

改后应送小组[1]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又及

二

退文革小组。

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2]，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毛泽东
五月六日

三

照此发表。

毛泽东
五月七日下午七时

四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

---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2] 即本篇四。

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1]，有陶潜的《桃花源记》[2]，有康有为的《大同书》[3]，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五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

[1] 《礼运》是战国时期至西汉初期儒家思想及礼仪著作选集《礼记》中的一篇，其中所讲的“大同”是指一种“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2] 陶潜，即陶渊明，东晋诗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记》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没有祸乱的“世外桃源”。

[3] 康有为，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他的《大同书》将《礼运》中的“大同”说与儒家公羊学派的“三世”说结合起来，提出自己的“大同”思想，认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

对张香山[1]关于《矛盾论》中一段引文翻译问题的请示报告[2]的批语

（1967年5月4日）

如何处理，请康[3]、王、关三同志酌定。

毛泽东

五月四日

---

[1] 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

[2] 张香山1967年4月24日给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王力、关锋写报告说，主席《矛盾论》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就是矛盾……。”这段话没有引全，因此主席用了删节号。我们原来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时，照主席引文译出。但这次在北京出版再译本时，英方认为这样有问题，译者给补全了。这样，如果中英文对读，就会发现中英文不符。为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建议应照主席引用的文字翻译，不必补足。但外文出版局专家艾德勒来信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样处理曲解了恩格斯的原意，并说恩格斯的这段话原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不是指矛盾的普遍性。艾的理解可能是正确的。问题是主席引用这段话，乃是为了说明矛盾的普遍性的，因此即使引全了，也还不能解决艾所说的问题。对此应如何处理，请你们批示。在后来出版的英文再译本中，是按恩格斯这段话的全文翻译的。如照此译成中文，应为：“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

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3] 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在山东省军区关于山东地区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的报告上的批语

（1967年5月7日）

林彪、恩来[1]、文革小组各同志：

此件[2]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五月七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山东省军区1967年5月4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了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主要表现是：一、到处张贴、散发攻击解放军的大字报、标语、传单，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几乎都被公开点名，成为打倒的主要对象。二、冲击军事机关，围攻、绑架部队人员。三、侮辱、殴打和斗争解放军干部、战士。以上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使许多军分区、县市武装部无法进行工作，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各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已有不少处于瘫痪状态。这种事态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使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54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1]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2]诸同志共同商处。

毛泽东又及

---

[1] “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造反组织。

[2] 梁，指梁兴初，张，指张国华，甘，指甘渭汉，韦，指韦杰，当时分别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第一政委、第四政委和副司令员。

对广东省军管会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7年5月7日）

林彪同志：

此件[1]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

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

毛泽东
五月七日

---

[1] 指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5月5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说，最近，我们对派出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1700多名干部，分两批进行了集训（第一期10天，第二期8天），并通过集训调整了一些干部。这次集训的主要经验是：一、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针对干部的活思想，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中央军委转发到团级以上党委。

关于发表《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材料等的批语[1]

（1967年5月7日）

文革小组各同志：

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2]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3]，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

毛泽东

五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5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〇期上。这期简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的材料。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京师范大学搞军训期间，“坚决和革命派站在一起，对保守势力和中间派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瓦解了保守组织，提高了中间派的阶级觉悟，壮大和巩固了左派队伍”。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同时还发表了题为《军政训练好》的社论。

[2] 谭厚兰，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掌权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公社”的负责人。李庆林，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造反派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的负责人。

[3] 指中共中央1967年5月7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干部的大多数

（1967 年）

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1]

---

[1] 1967 年 5 月 8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发表的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4 月 28 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了《红旗》杂志的这篇社论，并在第一版单独发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对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意见的批语[1]

（1967年5月9日）

退陈伯达同志：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1967年5月8日送审的意见稿上。意见稿建议，5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各报重新发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和自1951年批判《武训传》以来毛主席有关文学艺术的重要指示。

（二）发表纪念《讲话》的社论和文章，有重点地组织几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并组织工农兵群众座谈。

（三）发表并出版革命样板戏的剧本和其他的革命文艺创作。组织革命文艺工作者写些学习《讲话》的心得体会，大力宣传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

（四）发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和江青1964年在全国革命现代京剧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

（五）5月23日召开纪念《讲话》的群众大会。

（六）5月10日至31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组织庆祝活动，演出革命样板戏和革命电影，并广泛开展群众性业余文艺演出活动。

（七）将一批毒草影片拿出放映，供批判之用。

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毛泽东
五月九日一时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着新中国（宣传画）

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67年5月10日）

一

此件送总理阅后，交文革小组一阅，退林彪同志存。

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伯承1967年4月30日转报的一封署名为“济南军区机关全体革命群众、济南驻军全体支左工作人员”的来信的批语。这封写于1967年4月29日的信中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我们天天挨骂，任人逮捕、扣押，干部家属也被殴打、辱骂，军区的干部子弟也天天挨打。我们支持的工厂、企业单位，都一个个被砸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从他们夺权以来的一系列情况说明，他们不是在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而是按什么“王效禹思想”办事。也许是我们解放军未跟着他们那样做，他们就怀恨在心，欺骗中央，掀起了这股反对解放军的大风。我们不禁要问：他们还要不要解放军，要不要工人阶级，要不要贫下中农，要不要广大党团员？这到底是在对谁专政，是谁在专政？刘伯承在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转报这封信时写道：“昨廿九日晚廿时，一自称是济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的来人说，此刻我们的部队正受到王效禹的红卫兵攻打，形势非常紧张，要我们迅速离开济南，同时要我给毛主席、林副主席转交一封信等情。”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加了着重号，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6月被免职。

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毛泽东
五月十日

二

这是张春桥、姚文元[1]同志未到济南时学生、工人们表现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

---

[1] 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对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支左工作中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

（1967年5月11日）

林彪、恩来[1]同志：

此件[2]很值得一阅，是山东两军〔区〕的同志写的。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同样情况在全军内，在许多人身上都存在，当然不是多数。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1967年5月9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一七八期上登载的《济南、山东两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材料。材料中说，济南军区政治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两位干部来信，反映济南军区、山东省军区在支左工作中“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一）认为济南军区“在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承认围绕在省革委会周围的革命组织是革命派，另一方面又承认一些保守组织也是革命派，或明或暗地支持他们，打击革命派。（二）说济南军区一些干部对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错误议论”。（三）说济南军区机关正在积极准备“打官司”，赴京告状。（四）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至今没有揭发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问题。（五）认为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已由过去对造反派感情不深发展到目前的公开对立。

在济南军区支左人员
秦厚德[1]来信上的批语

（1967年5月13日）

一

印《快报》[2]，文革办。

二

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3]，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毛泽东

五月十三日

---

[1] 秦厚德，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通信总站干部，1966年9月被免职后安排转业，因地方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未被接收，1967年3月参加

济南军区司令部的支左工作。

[2]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

[3] 秦厚德1967年4月21日写给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并转毛泽东等的信中说：我于3月4日参加了军区的支左工作，根据一个多月的亲身体验和所了解的情况，感到驻济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在2月10日以前是完全正确的，自2月10日以后进入工厂、院校至今，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支持保守派打垮了革命派。解放军不是左派的后盾，而是成了保守派的后盾。二、搞“合二而一”，以保守派组织为核心去联合革命群众组织，如革命群众组织不同意时，即认为是搞分裂主义，破坏大联合。三、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四、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使人见了害怕。五、省革委会与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有分歧，部队支左的同志对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有意见，对省革委会其他成员的讲话更是对立，近来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六、部队的同志和“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等革命组织十分对立，这种对立现已公开化，双方支持的群众组织不断游行示威，有时还发生武斗。七、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成了保守派告状的地方，省革委会成了革命派告状的地方。

对北京市革委会重要通告的批语[1]

（1967年5月）

照办。

---

[1]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1967年5月11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的批语。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通过的这个通告的主要内容是：一、革命群众都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二、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坏人和情节严重的打人凶手，应该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不准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准调动人员参加外单位的武斗。四、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的指示。不许破坏劳动纪律，不许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五、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担负起维护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秩序、保卫国家财产、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神圣职责。六、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4月20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已经外出串连的北京学生和群众，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应当立即全部返回北京，外地来京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同样也应立即全部返回本地。5月14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了这个通告。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7年的毛泽东。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1]写的批语

（1967年5月14日）

一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分区，各人民武装部，各军各师各团，

---

[1] 指广东省军管会1967年5月13日关于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训和下一步的做法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和中共湖南省军区委员会5月12日关于贯彻广州军区首长指示给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广州军区的报告。广东省军管会的报告说，最近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检查，认为部队支左以来，虽然支持了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受到一些革命小将一针见血的批评。对于所犯错误，觉悟迟，改进慢，有些领导干部思想不通，患得患失，不敢承担责任，修正错误。为此，常委研究了今后改进的办法。湖南省军区党委的报告说，5月11日晚，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从广州来电话，传达了广州军区首长对湖南问题的指示，使我们清醒了头脑。大家决心做到：一、从上到下统一认识，把军区首长的指示精神迅速贯彻到各级领导中去，对照军委十条命令，检查前段工作。决定立即集训在基层支左的干部，机关干部与部队干部、战士，也相应集中五至七天时间（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条批注，即本篇三），搞两条路线的正面教育。二、纠正错误，做好工作。三、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要从上到下统一认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必须相信和依靠他们。四、加强领导。

直属各军种、兵种：

（一）现将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两件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二）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三）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

（四）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

（五）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

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小组
军委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

二

恩来、林彪[1]、中央碰头会阅发。

---

[1] 恩来，即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三

时间太少，应有十至十四天。——毛注

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5月18日）

一

即退王力[2]同志。

改了一点，请小组[3]酌定。

毛泽东

五月十八日上午二时半

---

[1] 《伟大的历史文件》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1967年5月17日公开发表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而写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分别发表在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和5月2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七期。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5月17日送审的文章修改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在送审稿末尾加写的一段话。

[2] 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3]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二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三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对黄永胜与“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摘要的批语[1]

（1967年5月23日）

林彪、恩来[2]同志，并告文革小组：

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1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上。这期快报登载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等5月10日与“广州工联”8名造反派代表座谈时讲话的一部分。黄永胜在讲话中检查了“前一段支左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表示彻底给被打击迫害的革命造反派平反，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江青不宜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批语[1]

（1967年5月26日）

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1967年5月18日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组成问题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建议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中央军委转发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7年5月27日）

一

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

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中央军委
五月二十七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1967年5月26日给成都军区并报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近几天，军队的领导同志全力以赴，在重庆先后十多次约见了工人组织、学生组织和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红总”等组织的负责人交谈，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此外，通过接待来访，对反对派的一般群众进行了工作，并同有的组织搞了军民联欢。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消除了一些误解，对立情绪有所缓和，思想感情较前有所接近。反对派表示拥护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愿意接受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原则上同意实现两派联合。但要真正实现两派联合，还需要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

二

林彪、恩来[1]同志阅发。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一些高干子弟参与抄家一事的批语[1]

（1967年5月28日）

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泽东
五月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5月26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上。这期《要事汇报》说，据云南省公安厅报告，22日晚，17个自称红卫兵的人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抄走手表、照相机等物和现款、存折，在取款时被抓获。参与者都是中学生，其中有6个是北京学生，其余11人，除两人外，都是高干子弟。

在唐闻生、王海容来信[1]上的批语

（1967年5月29日）

林彪、恩来[2]同志，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

五月廿九日

---

[1] 外交部翻译唐闻生、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王海容1967年5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攻击周总理的风气，同时也反映到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所属各战斗队内部，争论颇为激烈。""我们认为对总理的错误和缺点可用小字报或书信的形式向中央文革或直接向总理本人提出，或直接上呈您和林副统帅。对总理的指示有不同理解或在某些问题上与总理持有不同意见，可以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群众中展开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但不能借此炮打总理、攻击总理，把总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其后台。"并说："我们绝不能同意'炮打总理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这个提法，这种提法是错误的。"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关于甘肃实行军管和成立省革委会问题的批语[1]

（1967年5月、7月）

一

照办。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二

林彪、恩来[2]同志：

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3]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毛泽东

五月十四日二时

三

退林彪同志：

此件已阅，很好，照办。

毛泽东

七月三十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1967年5月12日《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批语。意见中说，“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省实行军事管制”。本篇二是对《兰州军区请示表态支持“红三司”报告》的批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1967年5月13日12时给中共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电报说，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速指示。本篇三是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7月29日转发《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的通知和纪要的批语。这个纪要是根据毛泽东5月14日批示，将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冼恒汉、詹大南等20多名负责人和胡继宗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后产生的。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甘肃省军区司令员。

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1]

（1967年5月）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5月28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决定（试行草案）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业务和生产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昨（廿七）日常委碰头会上通过这一决定（试行草案），现送上，请予审批。"决定（试行草案）指出："为了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真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根据毛主席关于'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以及'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等重要指示，特决定自即日起对□□部（委）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或军管小组，任命□□□为军管会主任或军管小组长，□□□、□□□为副主任或副组长。""军管会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对部（委）的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军管会下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的两个班子，把革命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革命统帅生产，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掀起生产的新高潮，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不久，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这个决定（试行草案），对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实行军事管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7年5月）

多少派也是两大派，不是反革命就要做工作，慢慢观点就会越来越近的，不会越远的。

搞供给制、共产主义生活是马列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卅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就不行了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也忘掉了。是不是由部队带头恢复供给制？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者工资高，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

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这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的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卅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从几十万人增加到几百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体过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

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指示

（1967年5月）

机构不要庞大，要粉碎旧的官僚机构，旧市委继承了官僚的机构，官僚机构容易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利用，所以建立革命委员会很必要。要破坏旧北京市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的机构。搞了几个月了，这个经验是逐步取得的，要总结几条。

1967年，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上海市和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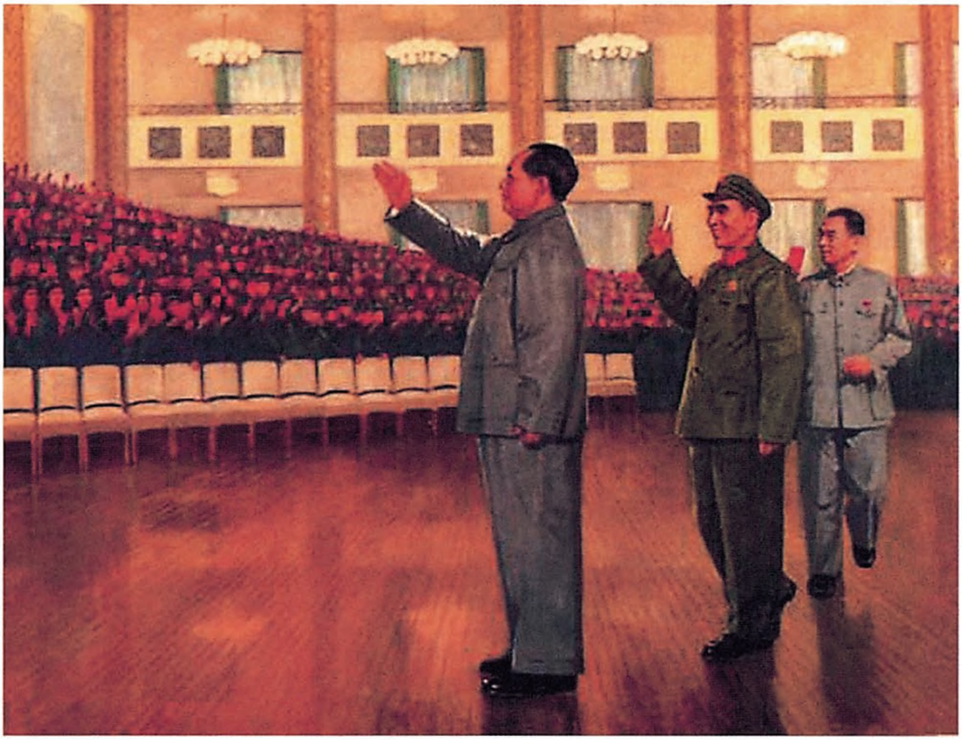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

1967年的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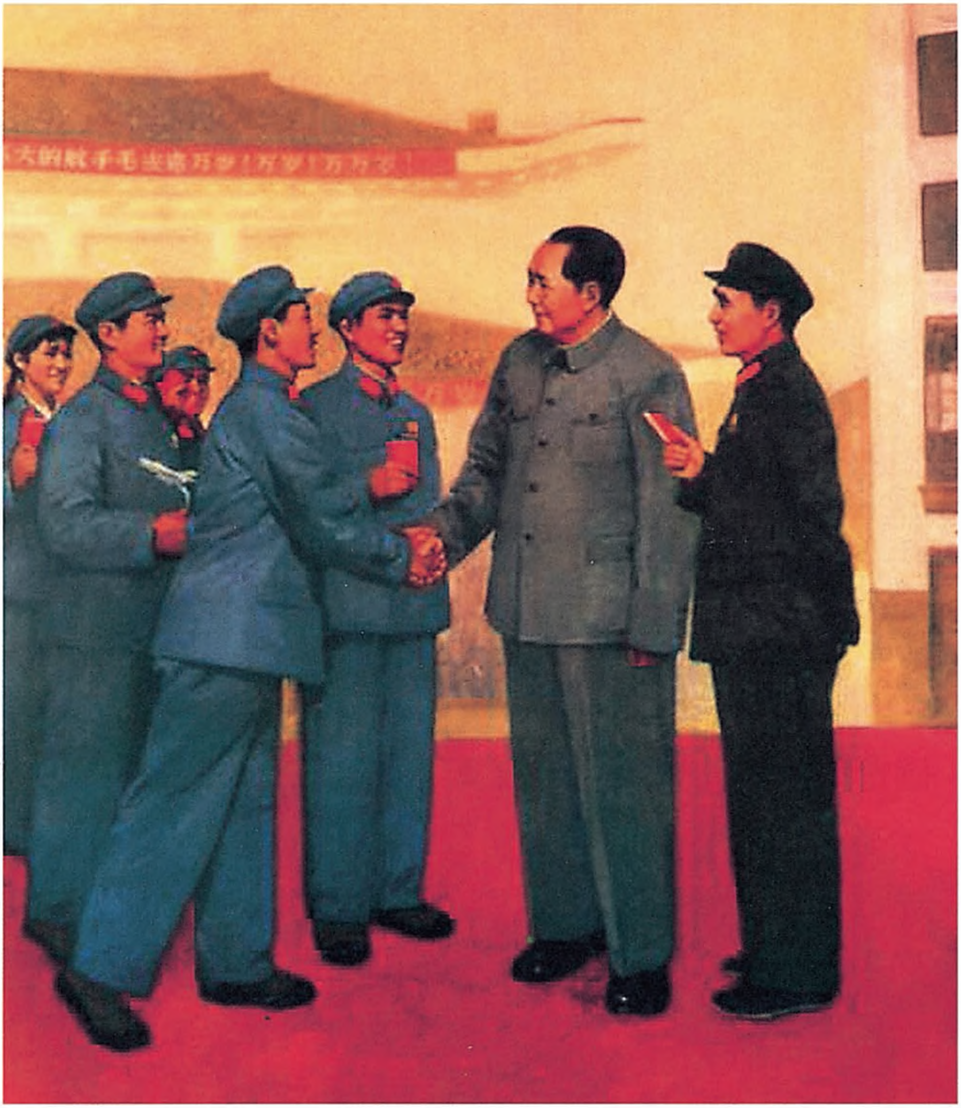
干革命要有阶级感情

（1967年5月）

要搞好文化大革命就要和工农相结合，要有无产阶级感情，要有工农兵感情。



《最幸福的时刻》（油画）


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高荣誉》（油画）

对上海革命派的号召

（1967年5月）

希望你们成为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模范。

希望你们成为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模范，成为反对小团体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经济主义，反对自私自利的模范。

对上海市革委会的号召

（1967年5月）

一、这次双方都有经验，这股风不会刮得很大，我们要遵守八条，解放军得遵守十条。

二、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是个大方向问题。办法是否好，同志们可以提出来。

关于国际形势的指示

（1967年5月）

有人说，美苏战略中心转移，我不赞成。他们是注意远东，但中心还在欧洲。欧洲七个师的兵力，并没有减少，只是调了几万老兵到远东。

关于处理军民关系的几点指示

（1967年5月）

现在师军区、军分区较多，这个问题不要紧，不要怕。有些地方报纸封了，我们向来不主张办那么多报纸。绝食不要紧，这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为什么如此？是因为我们支左支错了，认错不干脆，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扭扭捏捏。错了没关系，改了就好了。

为什么要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还有坏人，有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意志衰退。绝食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要去做工作，不要把人饿死，要想办法。可以送开水，水里可以放些葡萄糖。开枪的地方大体是军队，不是军队支持，也是民兵，如青海、内蒙。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对军队的一次考验。有些地方把情况报告得很严重，如江西、两湖、河南。是不是那样严重？过去东北比较平静，如今东北局和军队各支持一派。

北京也在分裂为两派，打乱架。乱了就可以乱出个名堂来。四川、贵州最乱，主要是贺龙、罗瑞卿、李井泉搞的。……和稀泥，有时也是必要的。各地的问题各地自己去解决，报中央批准。中央文革最近讲得太多了，不要到处讲，讲多就不灵。现在到处在骂保皇派，保皇狗，什么四三派，四四派，还有不三不四派。现在军队较紧张，联动放了么？为什么不让□□派参加红代会？大学生各地

串连的一律回校闹革命。北京市的大学生要全部撤，在中学、工厂、农村的要回来。农村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有的武装部有问题。要采取坚决态度，要坚决支持左派。错了就改，不要扭扭捏捏，要干脆。对保守派要做思想工作，采取教育、团结、争取的方针。屁股要扭过来。如果现在不纠正这个问题，让保守派继续发展，我们就要犯错误。要同左派站在一起，做好保守派的工作。有些武装部很顽固，如果这样下去，要犯极大错误，要注意做好武装部的工作。

老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1967年）

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1]

---

[1] 《人民日报》1967年6月1日发表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作者任立新）一文，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并写道："一切革命干部都要响应毛主席的这个伟大号召。"

关于夏收的指示

（1967年6月3日）

积极行动起来夏收夏种，目前正进入两夏大忙季节，南方已开始收割。今年全国夏收作物生长很好。今年的夏收，各级领导同志应特别重视，立即投入夏收夏种。各地要组织学生、机关干部、工人、解放军，以劳力、畜力、技术力量，大力支持人民公社，做到颗粒归仓。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后接见演员。

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接见《智取威虎山》剧组人员。

1967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观看京剧《智取威虎山》后和演员合影。

1967年，毛泽东在北京观看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后和演员合影。

关于对外宣传的指示

（1967年6月18日）

有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虚，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虚一点，当然就不要失掉原则。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我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也不是百分，也不是千分，而是万分，我一分也不要，统统勾掉了。

对一封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讲阔气、讲排场等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67年6月21日）

文革小组各同志：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6月19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上。这期快报刊登了陕西师范大学文革筹委会景险峰等4人的来信。信中说，最近，西安有几个学校的造反派庆祝成立革命委员会，其规模之浩大，场面之豪华，实在令人惊讶。他们不是节约闹革命，而是大搞铺张浪费。西军电、西工大两校联合开庆祝大会，成立革委会，参加者达37600人，几乎是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大会参加人数的4倍，筹办大会花了近万元。冶院成立革委会，在讲排场、讲阔气方面比前者更甚。一些中等专业学校也学起了“老大哥”的样子。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学校一个地区的问题，它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若不予以纠正，是很危险的。1967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将这封信转发到各军区，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和群众组织。通知中说，中央认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充分认识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个同志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必须懂得，当权以后，地位发生了变化，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很容易滋长和发作，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灰尘也迎面扑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高度自觉，不断地用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武器，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抵制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

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

毛泽东
六月廿一日

关于绝食静坐的问题

（1967年6月29日）

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食静坐可以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因为无产阶级内部有一小撮敌人，有官僚主义。他无非要让你答应几个条件。所以绝食静坐，允许，但不能提倡，一般不赞成。绝食可以开水放糖、放盐、打葡萄糖，可以轮班。

必须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1967年）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1]

---

[1] 1967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文汇报》6月21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对八三四一部队支工工作的指示和支工情况报告等的批语[1]

（1967年6月、11月）

一

1. 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

---

[1]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组织支工部队，于1967年6月26日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本篇一是毛泽东在支工部队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1967年11月11日，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给毛泽东写来报喜信，汇报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该厂成立了革委会。11月13日，八三四一部队也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我们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后，坚决遵照主席在我们临行前所作的三点指示进行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大力宣传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要斗私，批修”的号召，促进了该厂两派群众的大联合，组成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支工过程中，我们老老实实地做工人群众的小学生，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同他们交心，了解了很多情况，学习了很多东西。此外，还组织医疗小组，为职工及其家属看病近2000人次。本篇二是对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的来信和八三四一部队报告的批语。11月17日，中共中央将来信、报告和批语一起印发全国各地区、各企业、各机关、各学校，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2. 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

3. 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二

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看到西安师院造反派两张大字报和给中央文革的信后的批示

（1967 年 6 月）

现在有的人是“铺张闹革命”“大少爷作风”“掌权开始，是浪费开始”。如果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批评人家宽一些，批评自己严一些。

关于中央各部运动的指示

（1967年6月）

全国的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慢，中央各部要慢。比预料的晚了一个季度，不是三、四、五月了，而是六、七月了。与其估计快一点，不如估计慢一点，与其估计很容易，不如估计困难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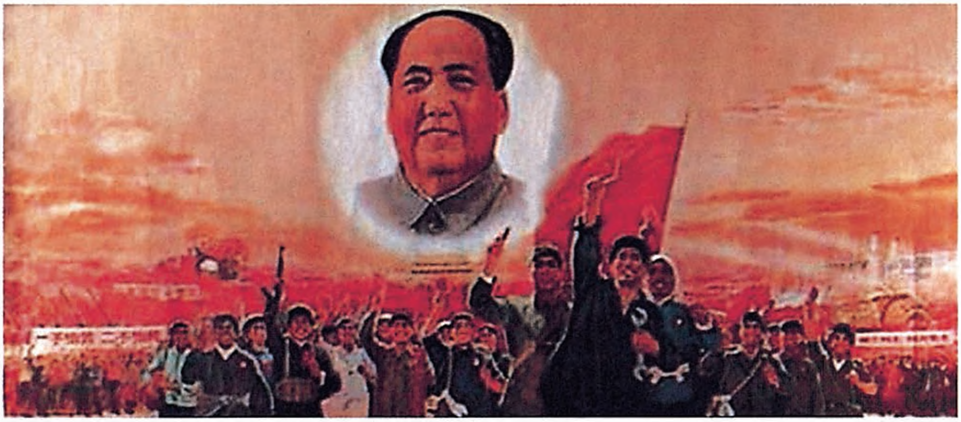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的伟大世界意义

（1967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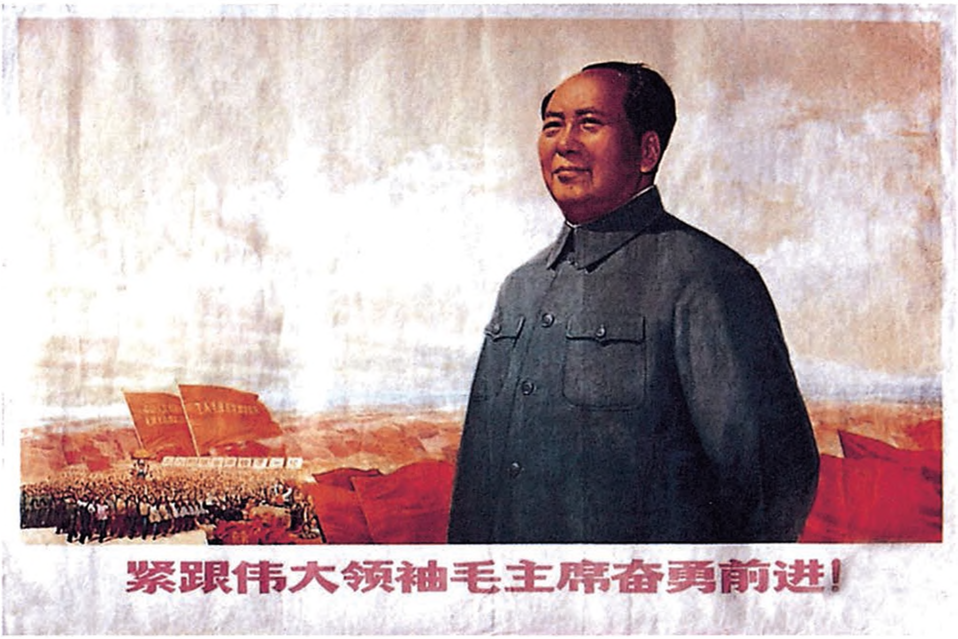
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搞地下斗争，而是武装斗争。

就是全世界都黑了，只要中国是光明的，那世界就有希望，没什么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把北京、上海、天津这几个地方搞好。上海就是工人这个队伍比较好，所以上海的局势中央也比较放心。



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夺取更大胜利（宣传画）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宣传画）

有了错误就改

（1967年6月）

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

关于叛徒问题的指示

（1967年6月）

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出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以接待。但不能重新入党。

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的谈话（节录）

（1967年6月24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欢迎你们，第一次到中国来吗？

卡翁达（以下简称卡）：我们中有三位曾来过。我本人、我的夫人和其他几位都是第一次来。

毛：赞比亚在热带，各种畜牧业和农业可以搞起来。

卡：是的。赞比亚潜力很大，过去受帝国主义控制，很多事不能做。现在各地区都在发展养牛场。

毛：赞比亚有七十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中国几个浙江省。

卡：我国主要问题是交通问题，所以我们要通过坦桑尼亚搞铁路。

毛：要勘察吧？要下决心干，开始干就好了。

毛：坦桑尼亚还没有确定究竟由谁帮忙吧？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坦桑尼亚已确定由我们帮忙勘察。

卡：我是顺便提到铁路问题。我已和周恩来总理详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回去和尼雷尔总统商谈后就通知你们。我们和坦桑尼亚铁路的铁轨宽窄不一样，赞比亚的铁轨宽一些，坦桑尼亚的窄一些。

毛：将来非洲国家都独立了，把帝国主义赶走了，就可以发展铁路了。

周：非洲被帝国主义分割了。

卡：很对。非洲很多民族都被人为地分割开来。

毛：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

卡：我们只有通过帮助其他地区的自由战士，使他们获得独立，才能报答你们的帮助。

毛：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

卡：是的，我完全同意主席先生所说的。我的说法可能粗糙一些，我的意思是，只有这样才能表达我们真正欣赏你们援助的心情。

毛：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

卡：对。

毛：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

卡：很感激主席先生。

毛：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

毛：总有一天帝国主义是要到我们这里来的。我们是有经验的，帝国主义也好，国内反动派也好，都可以赶走。他（指赞比亚合作、青年和社会发展部部长班达）一九六三年来时你们不是还没有独立嘛，如果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独立了十八年，你们的国家建设、文化教育就会有很大的进步。你们到我们这个时候，还有十五年。到那个时候，你们的铁路早就通车了。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一千七百公里，投资也只有一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卡：很希望有机会能和毛主席多谈谈，但因为主席先生很忙，我们有些过意不去。

毛：不要紧。和你们谈，我很高兴。

1967年6月6日，毛泽东和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桑穆加塔桑交谈。

修改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去阿尔巴尼亚的发言稿[1]

（1967年6月）

一、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下……

二、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哺育下……

三、在以〔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恩维尔·霍查为首的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四、领导阿尔巴尼亚青年胜利前进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及其敬爱的〔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领导下……

五、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

[1] 〈〉内为毛泽东修改时删去的内容，〔〕内为毛泽东添加的内容。

对姚文元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指示

（1967年6月）

这次出去要注意谦虚啊！这不是一个代表团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红卫兵问题。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容易出修正主义的谈话

（1967年6月）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钻进了无产阶级内部。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关于缅甸问题的指示

（1967年7月1日）

缅甸问题不怕断交，不怕决裂，甚至于这个时候断交更好，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放开手干。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1]

（1967年7月5日、13日）

一

林彪、恩来[2]及文革小组各同志：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1967年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〇期上刊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材料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期简报上刊登的一则简讯写的批语。这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某群众组织过去曾在北京印售未经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讲话，受到有关方面的制止。但是，他们最近又收集了毛主席的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派人赴长沙编印。希望中央制止。本篇三是对周恩来7月13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指示稿的批语。中央指示稿将毛泽东7月5日的批语（即本篇一）转发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的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出现这种事情，也请你们加以制止”。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

二

此事也请制止。

三

照办。

关于派部队制止赣州武斗的批语[1]

（1967年7月6日）

林彪、恩来[2]同志：

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1967年7月4日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上。这期摘抄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7月4日的电话汇报，反映赣州武斗情况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两种《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1]

（1967年7月6日、12月6日）

一

退陈伯达同志：

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

毛泽东

七月六日

二

陈伯达同志：

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毛泽东

七月六日

三

陈伯达同志：

作了一点修改[2]。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

毛泽东
十二月六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67年6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批语。这本小册子分为9个部分：一、政治挂帅；二、阶级斗争；三、教育目的；四、教学革命；五、教学内容；六、教学方法；七、师生关系；八、办学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九、学校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6月27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将这本小册子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政治研究室编出《毛主席论教育》小册子，打算发给大家，作为正面教材，作为教学制度革命的指导方针，让大家讨论，结合调查研究，以便提出大、中、小学校的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供中央考虑。"本篇二写在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1967年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的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15个部分：一、党的领导；二、教育方针；三、教育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四、教育要革命；五、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六、群众路线；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八、教学方法；九、知识分子的改造；十、青年；十一、群众办学，勤俭办学；十二、理论联系实际；十三、论知识；十四、破除迷信；十五、批判继承。后面还附有《陈伯达、戚本禹同志与北京大学革命师生代表座谈有关教育改革问题》的材料。本篇三是对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义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批语。该书由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共收录了毛泽

东1927年至1967年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50余条，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1967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将此书下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军区、各地大中小学校。

[2] 毛泽东对《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一、第9页摘录了毛泽东1958年5月1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长会上的一段讲话，其中讲到，“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毛泽东在文中“我这些材料”后面加括号写了一个注：“当时印了一批古今中外发明家的材料。”二、第11页摘录了毛泽东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谈话，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一句后面，加写了一句：“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一句后，加了“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在讲到经学时删了以下一段话：“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金刚经》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三、第13页摘录了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其中讲道：“我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毛泽东审阅时在这后面删去了以下一段话：“《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四、第14页摘录了毛泽东1964年7月5日与毛远新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以下一段话：“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是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五、第16页摘录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在“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段话后面，加了一句：“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除上述几处外，毛泽东在这本书的个别地方，还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要集中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7年7月7日）

我个人觉得目前存在这样一个苗头，就是放弃对敌人斗争，对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上次在这儿座谈的时候，曾经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讲过应该上纲，这个纲针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现在这个矛盾不集中，很分散。这样就难批臭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听了氢弹工作会议汇报后的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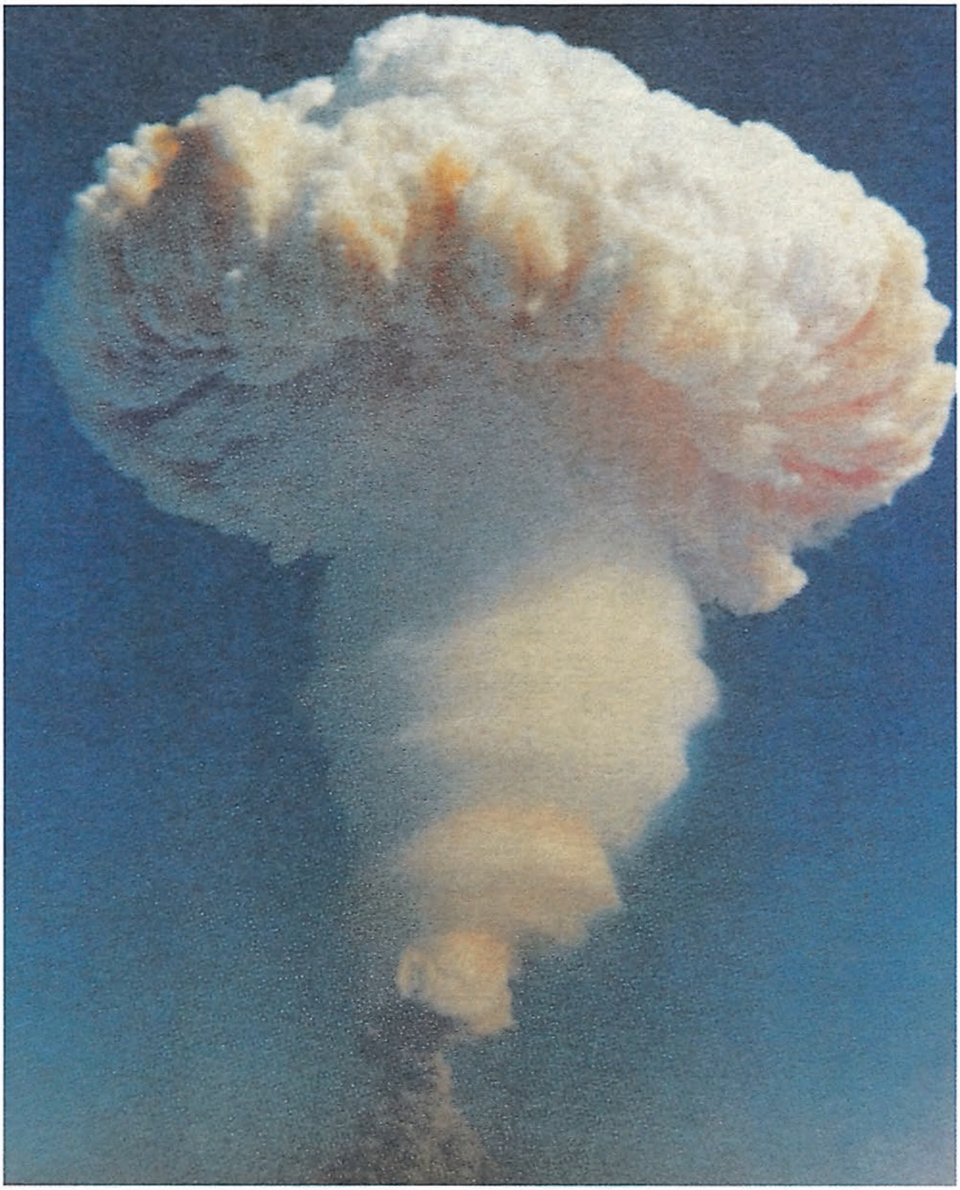
（1967年7月7日）

新武器、导弹、原子弹搞得很快，二年零八个月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四位。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了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现在形势很好。印度拉加族反对国大党，搞武装斗争。印尼共产党清算了修正主义，又起来了。缅甸游击队有很大发展，比泰国武装斗争还有基础，已搞了几十年，过去党不团结（红旗党、白旗党），现在统一起来了。反对奈温是一致的，武装活动地区已占缅甸地区百分之六十。缅甸比南越的地理条件还好，回旋区大。泰国的地理条件也很好。缅甸起来，泰国起来，这样就把美国完全拖在东南亚。当然我们还必须着眼在我们国土上早打、大打。缅甸政府反对我们更好，希望他同我们断交，我们就可以更公开地支持缅甸共产党。亚洲形势如此，非洲、拉丁美洲武装斗争也有很大发展。美帝国主义更加孤立，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是战争祸首。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都反对他。苏联修正主义也更加暴露，特别是这次中东事件，苏修还是采取赫鲁晓夫那一套。本来他派往阿联军事专家两千多人，先是采用冒险主义，把军舰开了去，说服阿联不要先出击，同时用热线告诉了约翰逊（赫鲁晓夫那时还没有用热

线）后，约翰逊很快就告诉了以色列，实行突然袭击，把阿联百分之六十的飞机都消灭在地面上。苏联援助阿联一共三十三个亿。打掉了廿亿，最后阿联投降停了战。这是出卖民族的又一次大暴露。对苏联，不仅是阿拉伯国家，亚洲、拉丁美洲都反对。苏联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自杀，就是一种不满。中东战争不久，苏联召集了三次东欧国家会议，罗马尼亚不签字，也未和以色列断交。后来毛雷尔跑到中国要和我们搞全面经济协作。单项经济协作可以，全面协作我们不干。帝、修更加孤立。越南战争坚持下去。目前许多地方反华，形式上好像我们孤立，实际上他们反华是害怕中国的影响，怕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怕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反华是为了镇压国内的人民，转移人民对他统治的不满。这个反华是美帝苏修共同策划的，这不表示我们孤立，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大大提高。他越反华越促进人民的革命，这些国家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道路是求得解放的唯一道路。我们中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政治中心，而且在军事上、技术上也要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要给他们武器，现在可以公开给他们武器，就是刻了字的中国武器（除了一些特殊地区），就是要公开支持，要成为世界革命的兵工厂，但是我们许多技术还未解决。

还要把□□、□□□、□□□□狠狠地抓一下。总理批评“四机部落后”，四机部要大大赶上去。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氢弹。

毛泽东等悼念阮志清[1]逝世的唁电

（1967年7月8日）

胡志明[2]主席同志：

惊悉阮志清同志突然因病逝世，至为哀痛。阮志清同志是您的、也是我们的好同志、好战友，也是世界革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好战友。他为越南的革命事业，为中越两国、两党、两军的团结战斗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但是，他的光辉的榜样和影响是永远不会消逝的，是会继续发扬光大的。务望节哀，保重您的身体健康。

毛泽东　林彪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

[1] 阮志清，原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67年7月6日因病逝世，享年53岁。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对总参、总政关于执行林彪[1]指示建造毛泽东大型全身塑像的通知稿[2]的批语

（1967年7月12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3]。

毛泽东
七月十二日

---

[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1967年7月1日的这个通知稿写到，林副主席于6月28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7月10日，林彪将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上面写了这个批语。

[3] 指中共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对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通知稿[1]的批语

（1967年7月13日）

一

照办。

---

[1] 周恩来1967年7月13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戚本禹起草的，主要内容是：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武器一律收回。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律由挑动者负责。五、从本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二

不宜称为坏人。[1]

---

[1] 中共中央指示稿的开头有一段话，说到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地“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不要“开快车”的指示

（1967年7月13日）

开快车要翻车，要打招呼。当前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坏人挖出来，牛鬼蛇神挖出来。党组织要恢复，各级党代表大会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我看大体要到明年这个时候，大家不要有疲劳的感觉，不要想脱身。

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的讲话

（1967年7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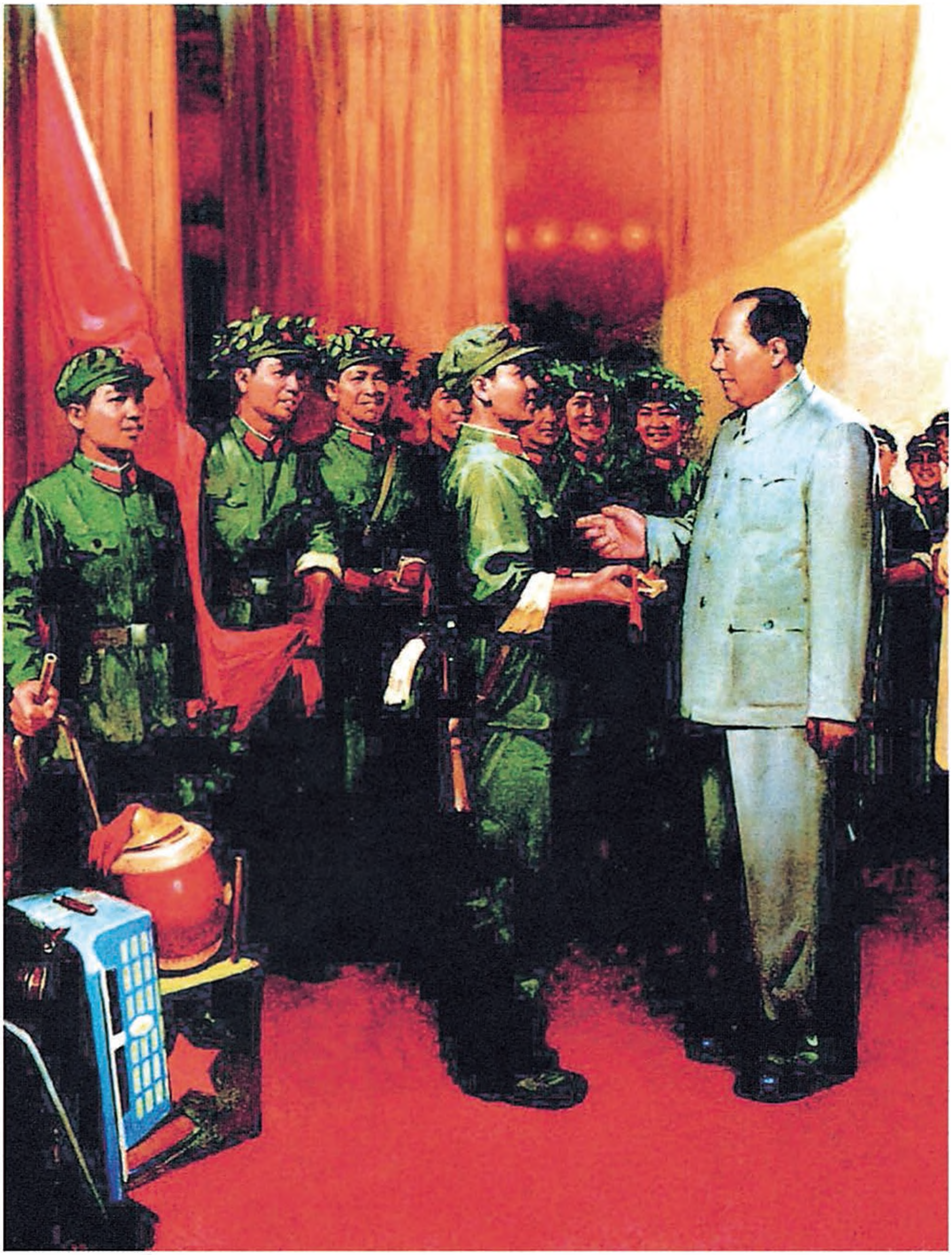
不要怕闹，闹得越大、越长，越好。七闹八闹，总会闹出名堂来的，可以闹清楚。不管怎么闹，不要怕，越怕鬼越来。但也不要开枪，什么时候开枪也是不好的。

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要爆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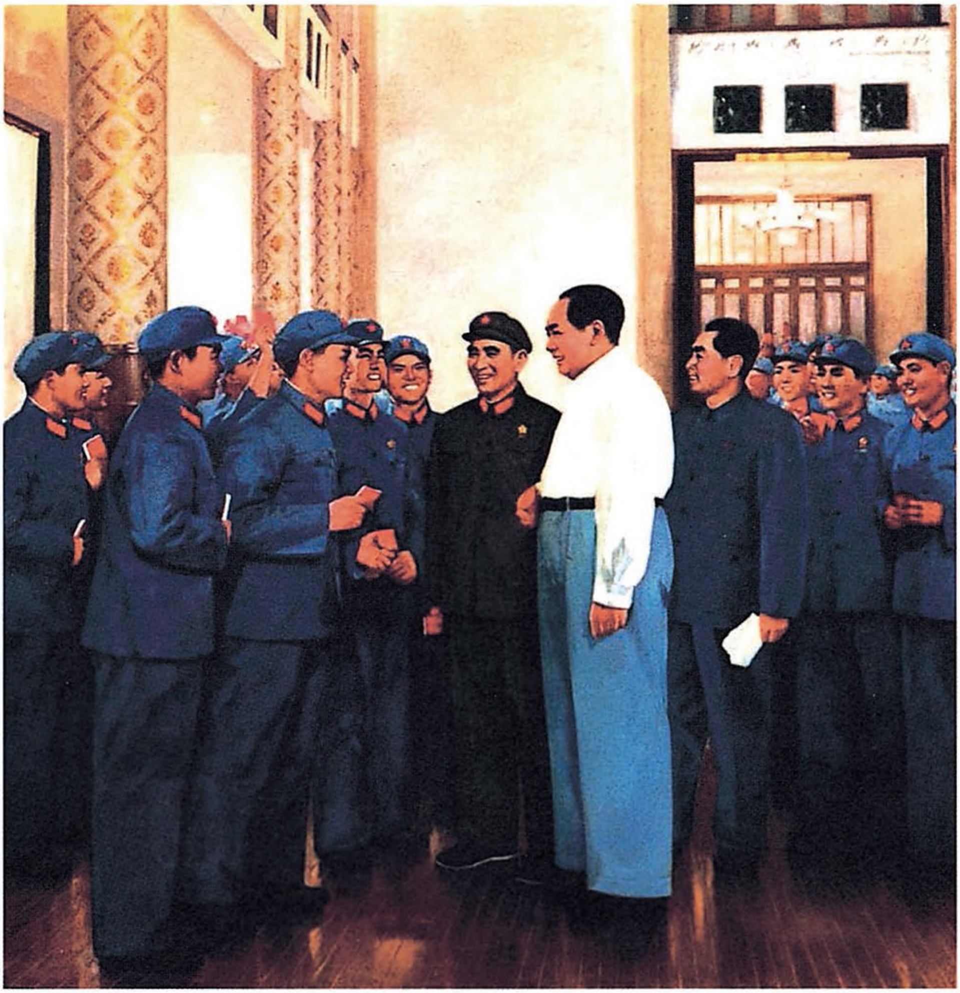
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第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

（张春桥：有人讲第三派是走第三条道路的。）

哪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呀，人家要大联合、大批判。你要诱导嘛！



《向毛主席汇报》（油画）



《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汇报》（油画）

中央关于武汉“七·二〇事件”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

（1967年7月25日）

一

林、周[1]、文革小组及中央各同志：

代拟复电如下，请讨论酌定。

毛泽东
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

二

中共武汉军区党委：

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2]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3]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

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4]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

中央
七月二十五日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党委常委1967年7月24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的电报和所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公告说，7月20日，在武汉市发生了冲击毛主席派来武汉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代表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王力（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住地的“严重政治事件”。这一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陈再道等人“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我们军区领导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公告于7月26日公开张贴，7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过长期调查，证明‘七·二〇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们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事件发生后，林彪、‘四人帮’对抗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把‘七·二〇事件’说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利用所控制的一切宣传工具，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武汉地区广大军民实行反革命围剿。他们栽诬王任重、陈再道同志是‘七·二〇事件’的‘后台’，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党

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八二〇一部队诬蔑为‘叛军’，武汉军区主要领导同志被打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许多部队同志的家属也被诬蔑为‘叛军家属’；把‘百万雄师’诬蔑为‘百匪’‘反革命组织’，这个群众组织的领导人被打成‘一小撮坏头头’，不少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家属被诬蔑为‘百匪家属’；甚至连同情八二〇一部队和‘百万雄师’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惨遭迫害。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有的被长期关押，还有的被打伤、打死。”“省委、省革委会和武汉军区党委对‘七·二〇事件’作了多次研究，一致认为这个事件是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而制造的阴谋事件，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的，应公开宣布彻底平反。凡因‘七·二〇事件’强加于解放军和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全部推倒；遭受迫害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昭雪；被打伤、打死的人员，应按照党的政策，继续处理好抚恤等遗留问题。”

[3]　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4]　“百万雄师”，是当时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9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0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7月25日）

对军队同志的教导……………………………………………………2

（1967年7月）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4

（1967年7月）

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的指示………………………………………5

（1967年7月）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6

（1967年7月）

对武汉事件的指示……………………………………………………7

（1967年7月）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8

（1967年7月）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加写的一段话 ………10

（1967年7月）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11

（1967年7月）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 ……………………………12

（1967年7月至9月）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 ……………16
（1967年8月4日）
关于《毛选》正文中的一些人名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 …………17
（1967年8月4日）
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18
（1967年8月4日、7日）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的批语 ………20
（1967年8月11日）
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 ……………………………………21
（1967年8月11日）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 ……………………22
（1967年8月16日）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的批语…23
（1967年8月18日）
对《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 ……………………24
（1967年8月、9月）
对《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的批语 …………………28
（1967年8月25日）
八·二七指示……………………………………………29
（1967年8月27日）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30
（1967年8月）
关于大串连的指示 ………………………………………31
（1967年8月）
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 ……………32
（1967年8月）

对天津与河北问题的指示 ……………………………………………………33
（1967年8月）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34
（1967年8月）
关于武斗的指示 ……………………………………………………………35
（1967年8月）
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 ……………………………………………………36
（1967年8月）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 …………………………………37
（1967年8月）
对公安工作的指示 …………………………………………………………38
（1967年8月）
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39
（1967年8月）
七律·将革命进行到底* ………………………………………………………40
（1967年夏）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41
（1967年9月1日）
对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命令稿的批语 …43
（1967年9月5日）
在戚本禹检讨信上的批语 ……………………………………………………44
（1967年9月7日）
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和修改 ………………………45
（1967年9月13日、10月11日）
对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48
（1967年9月16日）

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52
（1967年9月18日）
视察河南时的指示 …………………………………………………57
（1967年9月22日）
视察武汉时的指示 …………………………………………………59
（1967年9月23日）
对《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 …………………………………………………60
（1967年9月23日）
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61
（1967年9月27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批语 ……………………………………………………………69
（1967年9月28日、30日）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 ……………71
（1967年9月29日）
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72
（1967年9月）
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73
（1967年9月）
对庆祝国庆的指示 …………………………………………………74
（1967年9月）
接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86
（1967年10月3日）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 ……………89
（1967年10月9日）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90
（1967年）
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
电稿的修改 ……………………………………………………………………91
（1967年10月24日、27日）
对聂荣臻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报告的批语 ……………94
（1967年10月25日）
为李志芬题词 …………………………………………………………………95
（1967年10月29日）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 ……………………………………………………96
（1967年10月）
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 ……………………………………………………98
（1967年10月）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的批语 …………………………………………………………………………99
（1967年10月、11月）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102
（1967年）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03
（1967年11月5日）
转发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谈话的批语……………………110
（1967年11月7日）
对云南省各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简报的批语…111
（1967年11月15日）
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的经验的批语……………………113
（1967年11月16日）

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话……………115
（1967年11月19日）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批语……117
（1967年11月20日）
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118
（1967年11月22日）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120
（1967年至1970年）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的电报…………………126
（1967年11月28日）
对《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的批语……129
（1967年11月）
对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31
（1967年11月）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32
（1967年）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133
（1967年12月17日）
在《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上的批语………………135
（1967年12月17日）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136
（1967年12月19日）
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的批语…………………………………………………………………138
（1967年12月29日）

对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的批语……………………143
（1968年1月6日）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 ………………144
（1968年1月16日）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146
（1968年1月30日）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147
（1968年）
越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148
（1968年2月7日）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的
批语和修改………………………………………………………150
（1968年2月10日）
对周恩来等关于采取措施制止破坏铁路问题报告的批语………152
（1968年2月）
对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53
（1968年2月）
对广东问题的指示* ……………………………………………154
（1968年2月）
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155
（1968年2月）
对反映欧阳毅情况来信的批语…………………………………156
（1968年3月2日）
对香港《大公报》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的批语……157
（1968年3月23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的批语和修改……………159
（1968年3月25日、28日）

对康生关于审阅祝贺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电报问题的检讨的批语 …161
（1968年3月28日）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语……163
（1968年3月30日）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165
（1968年）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166
（1968年4月6日）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 ……………………………169
（1968年）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71
（1968年4月16日）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的批语………………174
（1968年4月29日）
对追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命令稿等
的批语………………………………………………………………………175
（1968年4月）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176
（1968年4月、5月）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177
（1968年5月8日）
和林彪等人的一段谈话 …………………………………………………178
（1968年5月11日）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送审稿的批语 …………179
（1968年5月16日）

对电讯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语……180
（1968年5月19日）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181
（1968年5月20日）
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的批语……182
（1968年5月21日）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183
（1968年5月）
在一份《外国专家情况反映》上的批语……184
（1968年6月8日）
对“七·三”布告的批语……185
（1968年7月）
对国务院业务组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的批语……186
（1968年7月8日）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谈话……187
（1968年7月12日）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的批语……188
（1968年7月18日）
对“七·二四”布告的批语……189
（1968年7月）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90
（1968年7月）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的批语……192
（1968年7月24日）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时的谈话……………………194
（1968年7月28日）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228
（1968年7月）
对解放军报社《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等的批语……………229
（1968年8月5日）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批语…………………………………230
（1968年8月5日）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简报的批语……………………232
（1968年8月13日）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236
（1968年）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报告的批语………237
（1968年8月16日）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批语和修改…………………………………………239
（1968年8月20日）
对电讯稿《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批语…240
（1968年8月25日）
对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242
（1968年8月25日）
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244
（1968年8月31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批语和修改……247
（1968年8月）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49
（1968年8月）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批语……257
（1968年8月）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258
（1968年8月）
对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的批语和修改……259
（1968年8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261
（1968年9月1日）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263
（1968年9月3日）
建议普遍开拥军谈心会……265
（1968年9月4日）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266
（1968年9月4日）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批语……268
（1968年9月6日）
对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269
（1968年9月）

对《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一文的修改和批语……………271
（1968年9月10日）
对姚文元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调查会情况报告的批语…273
（1968年9月17日）
毛泽东等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275
（1968年9月17日）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的批语………………278
（1968年9月20日）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279
（1968年9月23日）
给周世钊的信…………………………………………………………280
（1968年9月29日）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报告的批语…………281
（1968年9月29日）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282
（1968年9月、10月）
对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请示报告的批语……………284
（1968年9月）
对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286
（1968年9月）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的批语…………287
（1968年9月）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292
（1968年10月13日、31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300
（1968年10月14日）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301
（1968年）
祝贺霍查六十寿辰的电报……302
（1968年10月15日）
对发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的批语……304
（1968年10月）
对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305
（1968年10月）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的批语和修改……307
（1968年、1969年）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311
（1968年）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312
（1968年10月30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320
（1968年11月4日）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321
（1968年11月10日）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的批语……323
（1968年11月14日）
在反映慕中岳编著中国历代战史的《要信摘报》上的批语……324
（1968年11月15日）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326
（1968年11月17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的电报……………………330
（1968年11月28日）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333
（1968年11月28日）
同意转发北京军区贯彻执行“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338
（1968年11月）
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339
（1968年）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340
（1968年12月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342
（1968年12月19日）
在中央军委一份复电稿上的批注……………………………………344
（1968年12月）
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调查报告的批语…………345
（1968年12月）
对国防科委关于发射“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请示报告的批语…346
（1968年12月）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的批语…347
（1968年12月）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348
（1968年）

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349
（1968年12月）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意见……351
（1968年至1969年）
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355
（1969年1月3日）
对中央转发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报告的批语……357
（1969年1月28日）
打仗就是要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358
（1969年1月28日）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360
（1969年1月）
如梦令·韶山冲*……361
（1969年1月）
在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报告上的批语……362
（1969年1月）
关于陈奇涵宜提名做中共九大代表的批语……363
（1969年2月）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365
（1969年）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366
（1969年）
在听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情况汇报时的谈话……367
（1969年3月15日）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关于总结经验》的批语……………………371
（1969年3月）
要认真总结经验…………………………………………………………372
（1969年）
对林彪中共九大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375
（1969年3月、4月）
在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上的批语……………………382
（1969年3月31日）
对周恩来关于苏联要求与我通话的处置意见的批语…………………383
（1969年3月）
在周恩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384
（1969年3月）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385
（1969年4月1日）
和谢富治等的谈话………………………………………………………397
（1969年4月5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401
（1969年4月11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三）…………………406
（1969年4月13日）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四）…………………416
（1969年4月14日）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425
（1969年）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426
（1969年）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五）··················427
（1969年4月23日）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432
（1969年4月28日）
对陈伯达在中共九大发言稿的批语·····························442
（1969年4月）
关于抓好典型和面上工作问题··································443
（1969年4月）
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的意见·····························444
（1969年5月、1970年2月）
对新当选中委的基层干部的要求·······························446
（1969年4月）
对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政策材料的指示稿的批语······448
（1969年5月）
清平乐·警觉苏修*···449
（1969年5月）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的批语···························450
（1969年6月6日）
要把空降兵认真搞起来···451
（1969年6月26日）
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批语········452
（1969年6月）
对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的批语·························456
（1969年7月3日）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报告上的批语········457
（1969年7月21日）

对中央“七·二三”布告的批语 ……………………………458
（1969年7月）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的批语………………460
（1969年7月）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军组织纪律性指示稿的批语……………461
（1969年8月）
对中共中央命令稿的批语……………………………………462
（1969年8月）
对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的批语………464
（1969年8月31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465
（1969年9月1日）
对国庆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469
（1969年9月）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476
（1969年10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五周年的电报…………………477
（1969年11月28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480
（1969年12月19日）
对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稿的批语…………………………………………482
（1969年12月25日）
关于江青不必担任北京五·七艺术学校名誉校长的批语 …………485
（1970年1月）

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486
（1970年1月）
对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487
（1970年1月）
念奴娇·长征*……………………………………………488
（1970年1月）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的批语…………489
（1970年2月4日）
对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稿的批语…………………490
（1970年2月）
对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通知稿的批语…………491
（1970年2月）
对设立国务院文化组请示报告的批语……………………493
（1970年3月13日）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报告的批语…………494
（1970年3月14日）
关于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的批语……………………………495
（1970年3月）
关于修改宪法等问题的批语………………………………496
（1970年3月）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的批语…………………………………498
（1970年3月）
对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通知稿的批语 …………499
（1970年3月）
献给斯特朗的花圈上的挽词………………………………501
（1970年4月2日）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502
（1970年4月3日）
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批语……506
（1970年4月12日）
对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请示报告的批语……507
（1970年4月24日）

对《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7月25日）

一

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2]。

毛泽东
七月廿五日下午十时

二

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

[1] 本篇一写在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1967年7月24日转送的这封信稿上；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这封信。

[2] 即本篇二。

对军队同志的教导

（1967年7月）

有了错误就检讨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只要讲三句话就行了。一句话：错了；二句话：是什么错就是什么错，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是方向错了就承认这个问题上方向错了；第三句话：就改正。这样就好了。公开检查比不公开好，高姿态检查比低姿态好，早检查比晚检查好。

军队这几年群众工作做得少，错了改了就好，也不给处分，也不要治罪。

张爱萍陪同毛泽东接见部队指战员。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口号

（1967年7月）

现在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口号是反动的。过去革命条件下，提出这个口号是对的。但现年的情况变了，城市住的无产阶级，你用农村包围城市干什么？包围城市就是包围无产阶级，包围革命造反派。

关于湖南军区的龙书金的指示

（1967年7月）

这个人是否还可以用？你们要讲究斗争策略，你们水平怎么这么低，也不研究一下？据我了解，这个人打仗很勇敢，我对打仗很勇敢的人还是很尊重的。他犯了错误当然可以批判，但既然他表示愿意改，就应给他机会，不要太过分。你们这样做，不能争取别人同情。

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

（1967年7月）

上海的形势是好的。大学、中学、小学如何搞好教学改革，上海是否可以了解一些情况，搞些调查研究，创造一些典型材料。

（大学斗、批、改）一种可能是彻底翻身，一种可能是走回头路，一种可能是改良，能否在下阶段打硬仗了？

斗、批就是破，改就是立。这次教育革命一定要彻底改革，否则是改良，和过去一样，到后来是搞不下去的。

过了夏天屁股要坐下来。

中学文化大革命要走向正规。军训还要搞，中学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比较严重，复课闹革命，有的单位搞得好，有的单位搞得不好。这是关系到革命的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讲，是关系到把青年人培养成接班人，变不变色的问题。

对武汉事件的指示

（1967年7月）

本来军内的问题没有机会解决，武汉问题发生了，就有机会解决了，机会是他们给的。

全国都应该从武汉事件中学习。全国支持武汉地区，武汉地区的斗争推动了全国的工作。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也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这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了就好解决。

武汉一小撮人的叛变行为可以使全国的解放军、革命造反派、群众组织从中得到教育。

这次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

对“百万雄师”一个也不抓，几个坏头头让他们自己检举。

关于“八一”建军节的指示

（1967年7月）

“八一”不能改，这是很重要的一天。我们打响了第一枪，为井冈山的斗争揭开了序幕。

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历史问题是不容颠倒的。

1967年，毛泽东在南京长江摆渡口。

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各大军区领导时和王恩茂在一起。

为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社论加写的一段话

（1967年7月）

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

关于党组织的指示

（1967 年 7 月）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

（1967年7月至9月）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

---

[1]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本篇是毛泽东视察这些地区时谈话要点的记录整理稿。10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整理稿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

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

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67年8月4日）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2]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3]的道路。

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毛泽东

八月四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1967年7月27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上。张际春在信中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中最后写道："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际春受到错误批判，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1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2] 徐悲鸿，著名画家，擅长油画、中国画，尤精素描。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3] 齐白石，著名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尤精国画。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关于《毛选》正文中的一些人名在翻译时不宜删改的批语[1]

（1967年8月4日）

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

毛泽东
八月四日

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张香山1967年7月25日给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王力、关锋的报告上。报告说：“今年一、二月间《毛泽东选集》各翻译组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发现的问题，纷纷提出，要求修改或删去《选集》正文、题解、注释中出现的一些人名。”经请示主席后，“决定仍照原文翻译（当时中央同意删除刘少奇的两段话和《历史问题决议案》）”。最近，我们曾请示删去“王明同志”的“同志”两字，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同意。同时，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同志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或把他们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你们转报中央批示。

对中央关于湖南问题若干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8月4日、7日）

一

改了一点，其余都好。

毛泽东

八月四日

---

[1]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共四条，主要是：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础上加强团结，开展革命的大批判，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中央决定稿曾两次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二是分别对这两次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这个决定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决定。

二

已阅，同意。

毛泽东
八月七日下午六时

三

除了军区负责之外，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错误的，“湘江风雷”是一个群众人数较多的革命组织，在大发展中混入了极少数的坏人，造成内部成分不纯，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但是不应该因此否定这个组织。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

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的批语[1]

（1967年8月11日）

一

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

毛泽东
十一日下午五时

二

退陈伯达、江青照办。

毛泽东
八月十一日

---

[1] 本篇一、二均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8月11日送审的这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上。这篇文章后来分别发表在8月15日《人民日报》和8月17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

关于陈毅的几点指示

（1967年8月11日）

材料不黑，性情直爽。

陈毅是个好同志，对陈毅要一批二保。

要保他，他是第三野战军司令，外交部长现在没人搞，还要他来搞。

陈毅怎么能打倒呢？陈毅跟了我四十年，功劳那么大。陈毅现在掉了二十斤肉，不然我带他接见外宾。

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一封信》的批示和修改[1]

（1967年8月16日）

一

已阅，照办。

毛泽东

二

信的开头，“广大的职工群众们”一句是主席加的。

信的第七段，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职工必须把国家利益”一句后加了“工人阶级利益”几字。

信的第八段“凡是坚持下去、坚持生产，做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哪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整段都是主席新加进去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本篇二是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的批语[1]

（1967年8月18日）

照办。

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

毛泽东
八月十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8月17日送审的意见稿上。意见稿中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要办好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训练班的指示，我们设想训练的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请中央负责同志讲话，请革命左派介绍斗争经验，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训练步骤可配合中央解决各省问题的步骤分四批进行，每批暂定两个月，可交错进行。训练工作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直接领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协助进行。各省的训练班都要组织一个小的领导班子，挑选一批军队的造反派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参加工作。8月19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文件。

对《评陶铸[1]的两本书》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1967年8月、9月）

一

文元同志：

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

---

[1] 陶铸，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67年年初，因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攻击和诬陷而被打倒。他的两部著作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出版）、《思想·感情·文采》（广东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也因此而受到错误的批判。1969年年底，陶铸被迫害致死。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2] 《评陶铸的两本书》原题为《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是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炮制的。本篇一写在姚文元1967年8月17日送审稿上；本篇二写在姚文元8月26日送审稿上；本篇三写在姚文元9月3日送审稿上；本篇四、五是在姚文元9月3日送审稿中写的两个批语；本篇六是在姚文元8月26日送审稿中加写的一段话。这篇文章发表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等报刊。

加或显得太长。究应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毛泽东
八月二十日

二

姚文元同志：

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1]，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2]，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

毛泽东
八月廿八日上午八时

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3]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又及

---

[1] 即本篇六。

[2] 毛泽东当时在上海。

[3] 刘，指刘少奇。

三

文元同志：

已看过，除个别修改外，均照办。

毛泽东
九月五日

四

根据春桥同志意见，此段以删去为宜。[1]

---

[1] 姚文元1967年9月3日送审稿中原有以下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9月3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杨成武（当时陪同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转报毛泽东：“姚文元批陶的文章中，有一段批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第八页），这个问题涉及总理同陆定一的争论，是否在此文中不提这个问题，请主席考虑。”毛泽东在姚文元的送审稿中删去了这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五

不要用黑体字，应与上下文一律。[1]

六

这个反动组织[2]，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

[1] 姚文元1967年9月3日送审稿中，将毛泽东8月28日加写的一段话（即本篇六）用黑体字排印。对此，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时，这段话未用黑体字排印。

[2] 指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1965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对《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1]的批语

（1967年8月25日）

很好，照发。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五日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8月25日下发的这个文件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保卫我国国防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支柱，为着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就需要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更亲密地团结起来，就需要全国各地军民更大规模地展开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文件要求各方必须根据当地“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情况，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新的公约必须体现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一系列指导思想。

八·二七指示

（1967年8月27日）

一、许世友要帮助过关，他是一个战将，文化革命以来，落后了，跟不上；

二、要出马恩列斯语录；

三、文化大革命要搞三年，一年发动，一年胜利，一年扫尾；

四、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了一篇好文章（指《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红卫兵小报是好东西；

五、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

六、群众组织提以我为核心，这样提是极蠢的；

七、依靠青年人；

八、依靠群众，加强专政，新疆办大型劳改农场不一定好，要研究；

九、要抓学习，把工作做好，要精兵简政。

关于大联合的指示

（1967 年 8 月）

最大的运动必须有最大的联合。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倒批臭，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前途和世界命运的前途的大事。因此我们必须最广泛地联合。每个革命组织、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在思想上引起充分的注意，在大批判中求得大联合，否则就会亲者痛、仇者快。

革命派互相攻击，刘少奇坐山观虎斗的现象，再也不能下去了。

关于大串连的指示

（1967年8月）

去年走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倒忙。

对《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二期社论的批语[1]

（1967年8月）

还我长城。

---

[1] 这篇社论的题目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是由林杰起草，王力、关锋批准发表的。社论中错误地提出了“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从而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毛泽东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对天津与河北问题的指示

（1967 年 8 月）

天津、河北应该搞得好一些，因为天津、河北离北京近，特别是天津，容易影响北京。

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

（1967年8月）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暗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这一部分进行革命。从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整体来说，它们是不占统治地位的，但是必须打倒他们，才能巩固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关于武斗的指示

（1967 年 8 月）

对武斗不要看得太紧张，对形势不能看得太严重，不要急。那里有武斗，必然有后台，让他多表演一下，越表演越孤立，使群众看得更清楚，群众孤立他，就好办了。乱是暂时的，可以转化为好的。打架是支流，是暂时的支流。决不能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关于军队支左问题的指示

（1967年8月）

小资产阶级当权，大资产阶级就要上台。军队支左有很大好处，就是使军队本身受到教育，他们从实际斗争中会体会到这个问题。支左不仅支革命群众，支左派组织，不仅看到社会各方面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同时也能看到军队里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看到阶级斗争也反映到军队里边，军队通过支左也同样把问题暴露在社会上，从而加强军队，提高我们军队的思想水平，这才是唯物主义辩证法。

不能把我们的军队搞乱了，解放军内部的问题，可以一个省一个省地来谈判。

行动要愈快愈好，工作不要太急，要做到家。[1]

---

[1] 这是对增派往温州的六二九九部队的指示。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走资派打倒

（1967 年 8 月）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快要结束，而是要更深入。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要集中力量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要宣传八届十一中全会，要好好讲讲成绩，讲讲方向，要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不仅要从组织上，而且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打倒。这是国家大事，世界大事。不打倒修正主义，他们就要搞复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要向前看，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对公安工作的指示

（1967年8月）

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掌握不好，就容易伤害自己。这把刀子要是被坏人抓走了，那就更加危险。所以，公安工作只能由党委直接领导，不能由业务部门垂直领导。

要把斗争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1967年8月）

在这一场伟大的斗争中，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向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中有些钻进党内居领导地位，他们是一些牛鬼蛇者和包庇者。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常常以马列主义的词句做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那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更加阴险得多，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七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夏）

古今多少苍茫事，
前车历历未能忘，
鸿门宴上宽纵敌，
乌江边头何仓惶。
秀全空坐失良机，
天京终于烟灰场，
急世英雄行大劫，
莫顾尘界百创伤。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1967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消灭了美国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所面临的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美国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越南人民的胜利

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已经陷入越南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它还要作最后的垂死挣扎。当前，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并且继续玩弄和谈阴谋，妄图挽救它的失败。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在加紧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力图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但是，英雄的越南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正如胡志明主席所指出的，越南人民“团结一致，不怕艰苦、牺牲，坚决战斗到彻底胜利”。我们相信，越南人民必将粉碎敌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克服各种困难，将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越南人民。

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决心不惜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七亿中国人民，是更加强大了，更有力量支援兄弟的越南人民。中国人民决心同越南人民并肩战斗在一起，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

对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命令稿的批语[1]

（1967年9月5日）

总理：

已阅，照办。

毛泽东

九月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67年9月4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稿上。命令稿指出，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群众组织、任何人。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今后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下发了这个命令。

在戚本禹检讨信[1]上的批语

（1967年9月7日）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

九月七日

---

[1] 戚本禹，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9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1968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戚本禹进行隔离审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依法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对林彪接见曾思玉、刘丰的讲话记录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9月13日、10月11日）

---

[1]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67年8月9日在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的讲话中讲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取得了伟大辉煌的胜利。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二是解放军的力量。有了这两个条件，坏事就可能变为好事。各地区的同志有的犯错误，能挽救的还要挽救，现在没有垮台的，都不希望他垮下去。要不垮，办法有三条：第一，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第二，紧紧掌握底下的情况。对左派、右派和各群众组织都要调查研究，听取两方面意见。第三，现在左派、右派阵线分明，你们绝不能以是否冲军区来划分左派、右派，而要以是否拥护“文化大革命”、是否拥护毛主席作为划分的根据。搞好“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靠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要避免犯错误，就要多请示主席、中央。另一方面，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治挂帅，学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统率一切，朝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前进，不要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后退。对林彪的这个讲话记录稿，毛泽东先后作过两次批示（即本篇一、二）和修改。他加写的文字，即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他删去的文字，除点名批判的几处人名外，还在林彪讲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一句。此外，还有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一

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

毛泽东
九月十三日

二

林彪同志：

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1]诸同志一阅。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2]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

[1] 恩来，即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1967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指出：“林彪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的讲话很重要。这篇讲话，运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并且对今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

三

过去的革命也是仓促上阵的。北伐战争、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各根据地的建立、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都是仓促上阵的。

对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年9月16日）

南萍（以下简称南）：主席！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南萍，你就是南萍吗？你的祖宗是不是南霁云啊？你就是南霁云的后代，你处理这些事情[2]有经验。

南：我是照主席指示办。

陈励耘（以下简称陈）：主席！

毛：陈励耘，你应该是在以南萍为中心的领导下，你的空五军比南萍的力量大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陈：是。

毛：空五军和二十军要互相学习；二十军向空五军学习，二十军为主嘛，空五军要服从。

毛：你服从不服从啊？

陈：服从。

毛：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就是互相学习进行自我批评，搞好上下级关系；另一种是训人

---

[1] 1967年9月16日中午11点，毛泽东的专列抵达杭州。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应召前往汇报。参加接见的还有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

[2] 指温州武斗和全省支左问题。

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士兵怕连长。要教育连排长，一个村子里出了一个排长、一个连长都是了不起呀，如果出了一个营长那就更了不得啦！

我那个村子里出了个师爷就了不得了。我们的一些元帅，总是训人骂人，如果你真有理就不要训人了。现在我们的干部都是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我在上海就反复讲这个上下级关系问题。一个人挨整，一种是自己犯了错误，挨了整；一种是坏人整好人，好人挨了整。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是一大缺点。南萍，你挨过整没有？

南：没有。

毛：这是一大缺点。

毛：你挨过整没有？

陈：三反时挨过整。

毛：好！红卫兵、工厂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一个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犯个错误好。南萍你们为什么要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

南：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的工作。

毛：越瘫痪越好，烂透了的就好解决。

（听了南萍对温州形势的汇报后）

毛：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

南：“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如何对待另一派，在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的态度对待“温联总”。

毛：分区司令、政委不要在那里层层挨斗，可调到军区来。对龙潜和张秀友不要这样搞，什么喷气式、罚跪。人家犯了错误就很难过，你又这么地层层斗，不好！不要这么搞。我们对黄伯韬、王

耀武、杜聿明都不这样搞嘛！我们不要这样搞。上海斗陈丕显、曹荻秋，说比较文明，但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人家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二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了的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被搞乱了，被破坏了。

毛：你们对两派的意见都要听。红暴的观点在一家就有斗争，有的儿女是红暴观点，有的儿女是革联观点……要一分为二，一家也分两派，两派意见都要听。我家里就有两个孩子是造反派，两个孩子是保守派，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过去八条命令中就有一条要教育好孩子，教他们不听，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教育他们。

（毛泽东要南萍、陈励耘转达他对二十军和空五军军长、副军长的问候，他们向毛泽东反映空五军的黄军长表现不大好时）

毛：不要只看他一时一事，他打过仗的嘛，一个同志犯了错误，能帮你们一定要帮，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红卫兵一风吹不好。对一些干部不放过，也不能搞得太苦了，什么喷气式、挂黑牌、罚跪、抄家，这些要禁止。

毛：江西有几个山头，什么中央苏区了，湘赣、闽浙赣了，等等。我就生怕一、三军团有的同志犯错误，生怕四方面军同志犯错误，结果出了陈再道。至于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红卫兵要打倒去打他的，我保是保我的，这是一个大局。矛盾是有的，统一还是要统一。七次大会选中央委员，八次大会选中央委员都选了王明。现在我们要恢复那个传统，人家犯了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现在打倒一个人太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主要还是要搞训练。

毛：张闻天当了十年的天子，他当总书记的时候他要管军事。

我告诉他：你不要管。结果呢？他到下边去煽动，后来他又和高岗搞到一起，他又批准六十二个叛徒自首。他在瑞金时，他们内部分化，他和王稼祥是受排挤的，不站在项英一边的，但遵义会议没有他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这个传统。他们提出什么戴高帽子、挂牌、罚跪、抄家，他们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是对地主、土豪劣绅嘛！现在这是干部嘛！几十年的干部他是做了一些好事。

毛：陈毅打过仗不怎么突出，比较右。姚登山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他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英国就钻这个空子，给照会给陈毅本人。现在又搞北大，并牵扯到蒯大富、韩爱晶，有些学生和工人领袖不稳定。

（谈话过程中，说到了南霁云时）

毛：你南萍是不是南霁云的后代呀？

毛：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是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

（毛泽东将身体仰到靠背上，吸着香烟，带着结束的口吻讲了几句话）

毛：孔明都有七擒孟获，我们共产党不仅可以搞七擒，还可以搞八擒嘛！一次反围剿杀张辉瓒我就不赞成，主要是彭德怀要杀。张辉瓒不仅是个师长而且是个总指挥。

对湖南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年9月18日）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立足于政治攻势，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湘潭的经验很好。

毛：这样多的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当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打造反派时）

毛：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不容易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打一仗一百元钱，打死了给一百元钱，没打死也给一百元钱。

（当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

毛：泥木工人有些行会思想，怕乡里人进城，那时候入会每个人要交六块大洋。

---

[1] 1967年9月18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章伯森，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时，对湖南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当谈到内战问题，有人反映有的组织大，认为人多就要以它为中心时）

毛：那也不一定。

（当谈到抢枪时）

毛：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发的，政治干校就把枪发给造反派了嘛。

（当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武装保护解放军，解放军战士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

毛：这也是一个经验。

（当谈到极“左”思潮时）

毛：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当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

毛：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当谈到“高司”问题时）

毛：“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

毛：不是还有个姓万的吗？

（当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

毛：等一段嘛。

（当谈到军队有一段不能拿枪时）

毛：解放军有“五不”了。

（当有人请示解放军游行可不可以拿枪时）

毛：开大会军队可以武装参加。

（当谈到军区问题时）

毛：过去军区派巡逻队摩托车出去，被拦住，没有威信嘛。现在□□军组织巡逻队，很好嘛。□□军是大军嘛。

（当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

毛：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当谈到火车不通时）

毛：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毛：那一年我到湘潭，地委有个王治国，现在他在哪里？

华国锋：在长沙，被斗得很厉害。

毛：为什么要斗得那么厉害呢？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他有高血压。

（当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也影响到县人武部，省委、省人委，地专、市机关瘫痪了时）

毛：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带头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种田嘛！

张春桥（以下简称张）：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这证明以后可以大精简。

（当谈到公检法的问题时）

毛：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很高兴。

（当谈到干部问题时）

毛：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

毛：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向群众作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犯过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

毛：军队的、党的机关都要训，不光是犯过错误的，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吸收红卫兵参加，要帮助他们学习。

（当谈到湖南的“红旗军”问题时）

毛：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

张：林彪同志去年批过一个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

（当谈到湘潭成立临时领导小组时）

毛：临时领导小组在九、十月份要搞起来。

张：江西也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驻军召开了全省会议，情况很好。

毛：开会也是训练。

（当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

毛：都要作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过去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作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嘛！

张：主席语录中有这么一段。

毛：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是上头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

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希望了，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二万五千里长征。

（当谈到拿枪时）

毛：抢枪不要怕，民兵就有□□万条枪。

（当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

毛：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

杨成武：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视察河南时的指示[1]

（1967年9月2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斗争。

毛：你说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大有好处。

毛：那是文敏生、赵文甫、何运洪他们搞的。

毛：（问王新同志）是什么时候到河南来的？

毛：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了一张大标语叫“大局已定，二七必胜”。

毛：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汇报到各地都站出了一些革命干部时）

毛：这是何运洪干的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要武装干部到北京集训时）

毛：集训也要去好人。

（当汇报到开封的情况，化肥厂主张打，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时）

---

[1] 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接见了刘建勋、王新、纪登奎，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这是刘建勋1967年9月26日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

毛：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的意思。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开枪，有时打死人时）

毛：群众都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反对，就收场了。

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香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王新：主要要从理论上把他们的错误思想批倒。

毛：对！

视察武汉时的指示[1]

（1967年9月23日）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大斗争、大联合，尽快地实现三结合。

希望你们成为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的模范，希望做大联合的模范，希望做反对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自私自利的模范。

中国历次革命，以我亲自经历看来，真正有希望的是想问题的人，不是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物。

---

[1] 这是毛泽东视察武汉期间，听取关于武汉军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后，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的指示。

对《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

（1967年9月23日）

照办。

九月二十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7年9月22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紧急通知稿上。通知稿指出，在北京和外地串连的学生和上访人员，应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迅速返回原地、原单位欢度国庆节，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促进本单位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联络机构从9月28日起一律撤销。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通知。

对江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

（1967 年 9 月 27 日）

（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说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四万多支枪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

答：军分区人武部保守派发的。

毛：噢。

（当汇报到抚州问题时）

毛：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

（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

毛：从这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答：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是军事叛乱。

毛：你们确定了没有？

---

[1] 这是毛泽东等在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等做出的一些重要指示，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和余立金等同志。

答：定了。

毛：批了吗？

答：总理批了。

毛：噢，性质是叛乱，是要袭击，说中国没有内战，我看这就是内战，不是外战，是武斗，不是文斗。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毛钱。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作用时）

毛：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当汇报到王景义的问题时）

毛：要保。在关键的时候，他起了作用。我看还应该从教育入手。坏人总是少数，人武部总是好人多，军分区有很多人是受蒙蔽的。有些人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

毛：六·二九事件时，支左部队来了没有？

答：还没有。

毛：他们估计中央会支持他们吗？

答：他们先拿下南昌，全国不赞成也不成。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逼中央承认。

毛：噢。王景义，造反派骂他，《火线战报》登了。《火线战报》总讲刘培善、林忠昭罪责难逃，没有吴瑞山。为什么不提周子韬呢？

答：周子韬是个副参谋长。

（当汇报到《32·111》已经基本瓦解时）

毛：听说有些散兵逃到了宁昌、广都，结果如何？

答：已经散了。

毛：噢，已经散了。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报复情绪时）

毛：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这些造反派的群众要很好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会完全听。杀人总不好，人家杀你不好，你杀人家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高帽子、挂牌子，还有一个喷气式啰，这不好。

毛：你们这里有个钢铁厂吗？

答：有个南昌钢铁厂。

毛：《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

答：收复了。

毛：庐山有个姓娄的吗？

答：叫娄□□。原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毛：这个人哪一派的？

答：是保守派的。

（当汇报到前一个时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时）

毛：噢，还出现这样一件事，恐怕不只是江西。

（当汇报到夏绍林的问题时）

毛：对夏绍林的处理也要注意，坏是坏，和王景义有区别。

（当汇报到李胜的问题时）

毛：李胜，就不用汇报了。

毛：工厂、学校现在还有辩论吗？

答：保守派都瓦解了，造反派里面还有辩论。

毛：到九江的火车通了吗？

答：通了，公路、航运也通了。

毛：江西还有没有？大县还有，小县没有了。

毛：有人说，公社、区、县、专区已经瘫痪，什么叫瘫痪呢？总有人在那里吧，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九江军分区好像好一些。

答：多数人比较好。

毛：还有钟福昌吧！

答：现在改名叫钟光。

毛：他是个好人，是个老实人。

毛：你们回来多久？

答：一个月了。

毛：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儿，一个个地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了，让他们自己去搞，看他们搞出个什么花样来。你们江西也是自己搞出来的嘛。现在那一派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

答：联络站已经瓦解了。

（当汇报到程明远他自己回来了，写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时）

毛：把程明远放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紧张了。

毛：黄知真、白栋村怎么样？他们有无希望？

（在汇报了黄、白的情况后）

毛：如果能保，能多争取几个人也好嘛。

张春桥（以下简称张）：原来省委把黄知真摆在第一线。

毛：我看他做了很多工作，他在那里顶着。

毛：过去省委是不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组织来保护自己？

答：组织了工人赤卫队。

毛：干部垮掉这么多，是好事还是坏事，你们研究了这个问题没有？总要给他们时间，来认识和改正错误，要批评“打倒一切”的思想。

张：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南昌串连。

（当汇报到他们这些人又在搞反右倾、反复辟时）

毛：哪有那么多复辟呀，他们已经垮了，不能再复辟了。有一种说法，说是垮就垮了。其实天下不会乱了，天也不会塌下来。

（当汇报到《文汇报》写了一些好文章，影响很大时）

张：人家还反我们右倾，说我们变右了。

毛：是教育左派的问题，不是右倾的问题。比如，过去有多少山头呀，江西有中央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闽赣苏区还有鄂豫皖苏区、□□□、陕北，抗战的时候根据地就更多了。我们用一个纲领团结起来，管他哪一派，不能只要一个山头，不要别的山头，只有派怎么行呢？过去我只知道陈昌奉同志、杨得志同志在井冈山当兵，后来到了这里，到了陕北以后我才认识的。杨成武同志在长征时当团长，他说长征时在那里见过我。我忘记了，杨成武同志也是后来才认识的，在座的过去都不认识，你们当师长的也不一定认识好多人，你们当军长恐怕也认识不多，有的只知道姓，不知道名，战士也只知道某某团长、某某师长、某某军长，也叫不上名字，我还倾向于多保一些人，能挽救的还是挽救。只要我们争取了多数，极少数顽固下去也可以嘛，我们给他们饭吃好了。

（当汇报到支左部队被保守派打了四五百人时）

毛：有没有伤亡？

答：部队进驻抚州时，在路上遭到夏绍林他们的三道伏击，我们的战士都在汽车上，打的都是头部和胸部，牺牲五人，五十六人受伤。

（当汇报夏绍林叛乱时，他首先把密码、电台搞走了，主席很惊讶地啊了一声。）

毛：过去江西省委说江西没有军队，要我向中央说一说，批一个师。

毛：（问陈昌奉）你们那个师有多少人啊？

陈：（略）

毛：是个小师。

（当汇报到□□师李文忠支左爱民事迹时）

毛：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轻。现在这个排还有多少人？

答：还有十七个人。

毛：江西还站出来一批干部嘛。你们是省一级的，省级要多站出一些人，还有市的，能站出多少干部？

（这时主席还问黄光、刘瑞森、郭光洲同志是哪里人，郭光洲回答是吉水县人）

毛：有人说，文天祥是吉安人，其实文天祥是吉水人！

毛：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军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

答：有些留下在地下活动。

毛：现在有人挑拨战士反对官长，说你们每月只有六块钱，当官的钱多，还坐汽车。农民是愿意当解放军的，解放军很光荣，他们每月还有六块钱，家里还有优待，农民是愿意当兵的。我看是挑拨不起来的。

毛：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遏止不住，一斗就是戴高帽子、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戴高帽子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不能不教而诛，诛就是杀人。不能不教而处罚人，过去就是吃了这个亏嘛，没有叫军区、军分区的干部到北京去受教育。你们先把武装干部训练一下。

杨成武：我们在北京开训练班，集中了几个省的干部集训。

毛：中央应该开，主要是各省开，不仅军队开，地方党政文教也要集训。过去开干部会议，公社大队没有人来，都来也行，江西多少个县?

答：八十二个县。

毛：可以分三批，训比不训好，时间顶多二个月，久了不行。过去黄埔五个月入伍期，四个月训练。林彪同志只住了五个月的黄埔嘛。有些军事学校，学的时间越长，学得越糊涂。

（当汇报到准备在十月间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

毛：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练。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造反派人很多，一期不行，可以训练二期、三期。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古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保的，反对中央对内蒙古问题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都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还支左，不支右，独立

营、独立师，训一下就转过来了。

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样看死，有坏人是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有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一提到立场问题就上了纲，一辈子不得翻身。难道立场问题就不能变吗？对大多数人来说立场是能变的，对极少数坏人是不能变的。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要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江西抓什么了？

答：红卫兵抓刘培善、吴瑞山、林忠昭，还有人到福建抓□□□，总理叫我们打电话回来。

毛：你们打电话也不一定灵吧？

毛：要保护，不要使人下不来台，要使他们改正错误。你们现在有理，但做过分不好。

汪东兴：现在十一点半了，谈了一个半小时。

毛：就这样吧！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批语[1]

（1967年9月28日、30日）

一

可用。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

二

应引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

---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而写的。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7年9月28日凌晨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本篇三是对陈伯达9月30日凌晨送审的社论修改稿的批语。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10月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五期。

三

即退陈伯达同志照办。

修改得很好[1]。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2]，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十二时

---

[1] 根据毛泽东1967年9月28日批示的意见（见本篇二），陈伯达9月30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引用了列宁以下两段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同时，社论修改稿上还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以下一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此外，还有4处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 陈伯达1967年9月30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引用了毛泽东不久前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讲的两段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对其中的第二段话，毛泽东作了文字上的修改，修改后的这段话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对林彪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1]的批语

（1967年9月29日）

退林彪同志。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下午九时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的这个讲话稿，是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张春桥起草，经周恩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以及小组其他成员讨论修改而成的，后发表在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上。

关于“五·一六”集团的谈话

（1967年9月）

中国历次革命及我亲身经历的革命，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而不出风头的人。现在大吵大闹的人，一定要成为历史上昙花一现的人。革命学生应该联合起来，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对新闻工作的指示

（1967年9月）

新闻单位要树立严肃作风、科学作风、战斗作风，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风格。

对庆祝国庆的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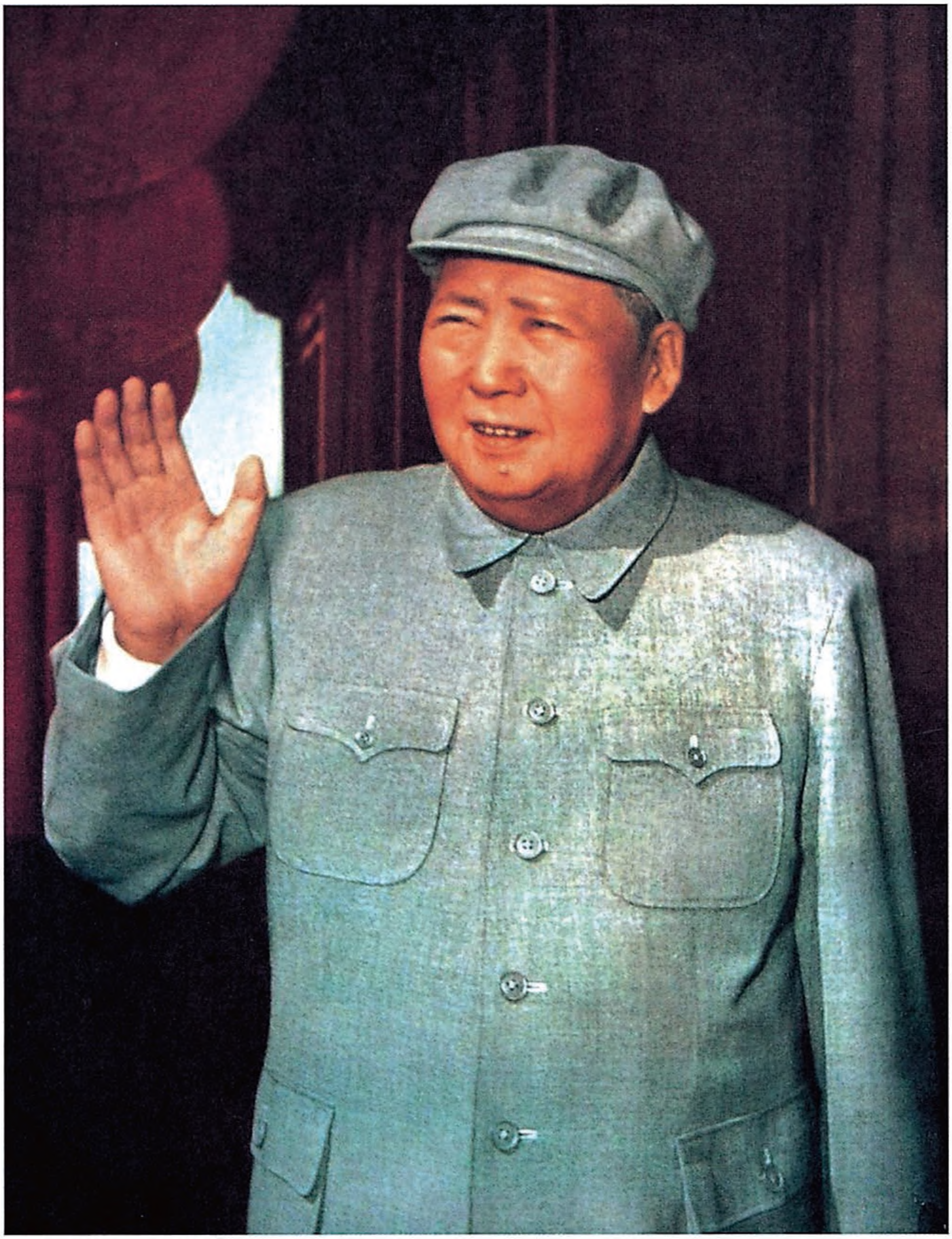
（1967年9月）

今年的国庆要充分地宣传文化大革命的成就。

游行不单是游行，也是大批判。用文艺武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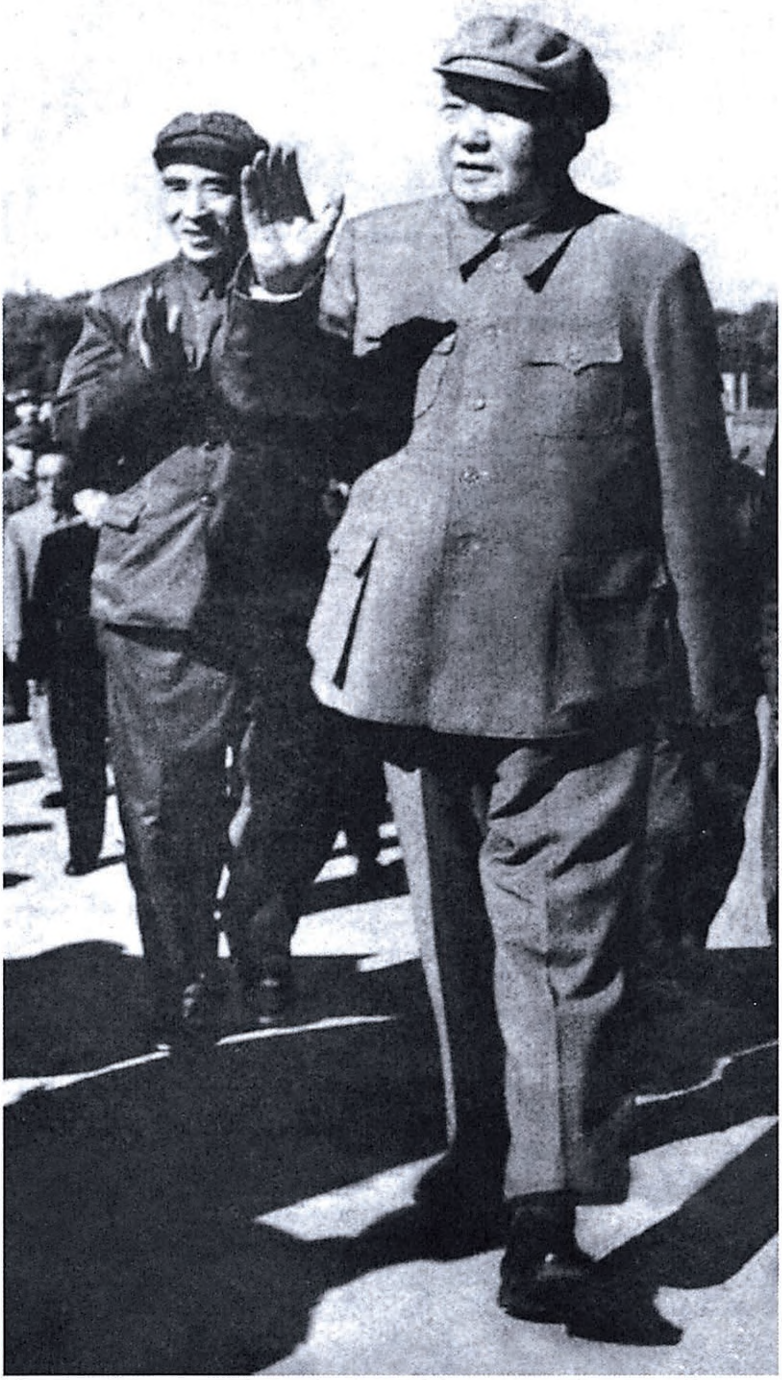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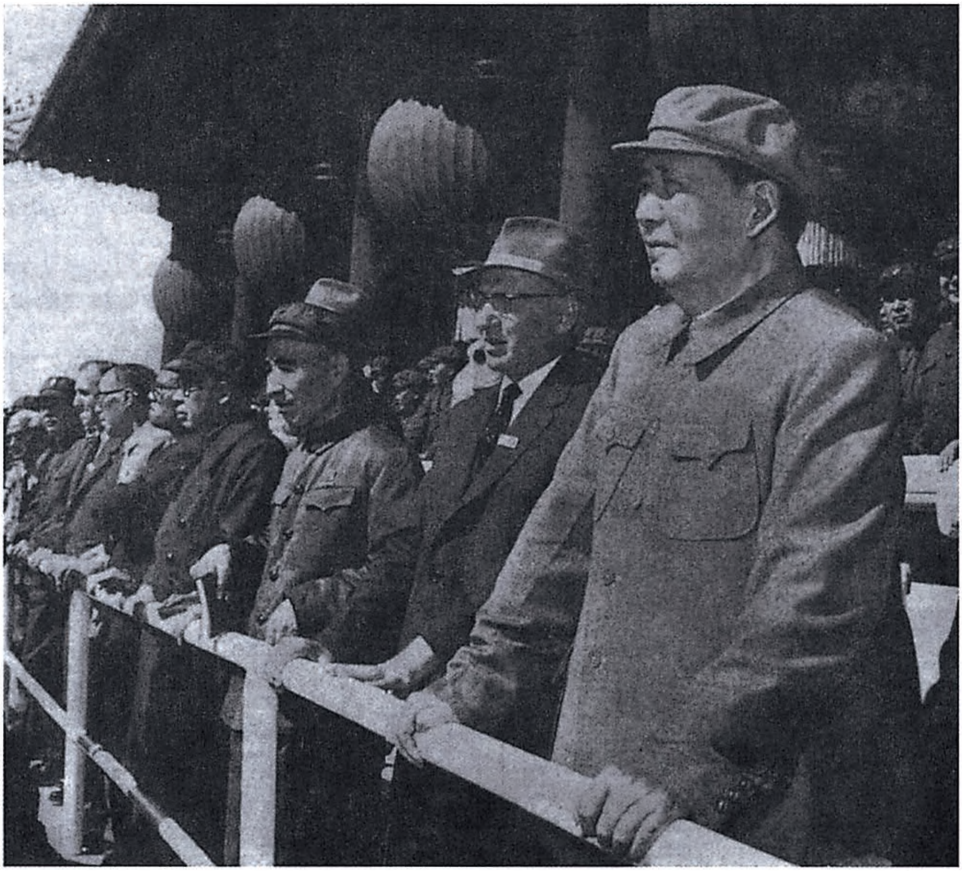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7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见刚果（布）[1]总理努马扎莱的谈话

（1967年10月3日）

努马：我看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

毛：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

努马：也许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些。

毛：有那么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教育。

努马：你们的干部很谦虚。

毛：非谦虚不可，否则群众斗他们。

努马：你们的干部与我们的干部有很大的区别。

毛：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官大了，薪水多了，坐小汽车了。大官还得有人做，大官没人做还得了！薪水多一点，房子好一点，坐汽车也可以，但不要摆架子，和工农群众平等相待。不要动不动就训人，骂人。有的大队书记，薪水不多，房子不好，没坐小汽车，官也不大，就是官架子不小。运动一开始，结果把他们吓了一跳。

努马：外国讲中国很乱，我们怎么没看到？

---

[1] 1884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将刚果河以东地区划为比属殖民地，即今扎伊尔，以西地区划为法属殖民地，即现在的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1960年8月15日，刚果获得完全独立，定国名为刚果共和国。1964年2月22日，中刚两国建交。

毛：乱一点，你们可以到处走走，乱了以后就不乱了，不闹够就不行。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再乱一年。

努马：什么叫越乱越好呢？

毛：不乱胜负不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除安徽省外都好。到中国得一条经验。湖南煤矿动刀动枪了。生产几万吨下降到几吨，现在已产二万吨。

努马：这样的矛盾，怎么解决得这么好呢？

毛：后台揪出来了，群众打够了，这时中央讲几句话就行了。□□□吹中国怎么好，不要听那一套，非洲人架子小，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来。欧洲、亚洲就不行。

努马：我们也开始反官架子。

毛：我不建议你们也搞文化大革命。我们建军四十周年，建国十八周年，打了二十二年，拥有打了几十年仗的解放军，所以搞文化大革命。

努马：我们不搞文化大革命，但我们要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世界意义。

毛：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改变国家部分机构，包括军队。恩克鲁玛[1]那次来，没有料到推翻他政权的就是他的军队。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

努马：我们家里还有人，但我尽量早点回去。

---

[1] 恩克鲁玛，加纳独立运动领袖，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加纳，他被选为总理。1960年7月1日加纳共和国宣布成立，他当选总统。1966年2月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恰逢国内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后来流亡并定居几内亚。

1967年10月，毛泽东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

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语[1]

（1967年10月9日）

林彪、恩来[2]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3]

毛泽东

十月九日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10月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为了适应当前广大革命群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需要，我们选编了批判资料——《刘少奇言论》。"报告中讲到，关于出版单位，"有几个方案，请择定：（一）中央文革办事组；（二）中央办公厅；（三）红旗杂志社；（四）人民出版社"。报告附送了关于此书的《出版说明》。毛泽东审阅时，把说明中的"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3] 《刘少奇言论》后来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名义出版，《出版说明》中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字。

按照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1967年）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1]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1967年10月17日发出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通知还指出：“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196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中，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青海省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和中央复电稿的修改[1]

（1967年10月24日、27日）

一

中央文革各同志：

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

毛泽东

十月廿四日

二

应当这样做。

三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

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

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中共中央
中央文革小组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

四

林彪、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

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

毛泽东
十月廿七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1967年10月19日给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上。电报中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组织处理的党团员，有的要求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并写了

一个批语，即本篇二。本篇三是对陈伯达10月27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当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即发出了这个电报。本篇四写在周恩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年10月27日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报告上。由陈伯达执笔起草的这个报告说：“主席批示小组应该讨论青海核心小组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小组在26日讨论了，但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谨此请主席严厉批评或处分。”“附电话原稿。这个电话已经按照主席指示通知撤销。”电话是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于10月26日3时打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的。张春桥在电话中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对聂荣臻[1]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报告的批语

（1967年10月25日）

聂荣臻同志：

此件[2]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

[1] 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2] 指聂荣臻1967年9月20日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根据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提出：一、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合理调整改组，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11月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聂荣臻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

为李志芬题词[1]

（1967年10月29日）

好好学习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

[1] 李志芬，当时是人民大会堂服务人员。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写在她随身带的《毛主席语录》上。

造反派要听周总理的话

（1967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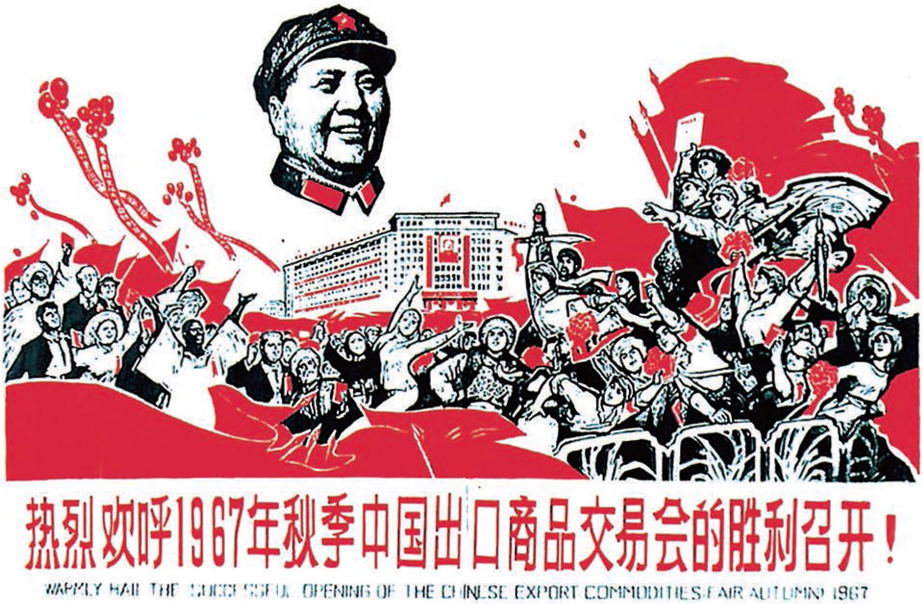
造反派不听周总理的话，还叫什么造反派？矛头对准周总理，就是对准我、林彪。

1967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北京。

关于机关革命化的指示

（1967年10月）

不要调人。二十多个人就够了。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呢？人少了，多下去，会也开得短一些，在下面解决问题，少搞些小报。


热烈欢呼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胜利召开！
WARMLY HAIL THE SUCCESSFUL OPENING OF THE CHINESE EXPORT COMMODITIES FAIR AUTUMN 1967

热烈欢呼1967年秋季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的胜利召开！（宣传画）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批语[1]

（1967年10月、11月）

一

内件不看了。[2]

二

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3]

毛泽东
十一月三日下午五时

---

[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的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而写的，发表在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11月23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六期。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0月27日送审第三次稿的信封上；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姚文元11月3日送审第六次稿的信封上。

[2] 陈伯达、姚文元1967年10月27日将编辑部文章第三次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前送社论稿，字体太小。现送上大字本一份，请审阅。"对这次送审稿，毛泽东未作任何修改。

[3] 陈伯达、姚文元1967年11月3日将编辑部文章第六次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这篇社论，又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经充分引了。文章对苏修的打击，有一定作用。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修改。"这里说的"关于主席思想六条"，指送审稿中概括的"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共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

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原文是黑体字，即“作了新的整理”的毛泽东有关论述。在这次送审稿中，还大量引用了列宁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对这次送审稿中说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是改造人们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字，此外未再作任何文字的修改。

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7年）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1]

---

[1]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方案》为题，加编者按发表了《同济大学教育改革的初步设想》《北京林学院取消教研室，组织专业连队领导教学和教改》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改组对改革考试、升留级和招生的设想》。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的谈话[1]

（1967年11月5日）

今天还是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

各地对整党问题，有些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

不少地方的意见还没有反映上来，因为那里还乱着。

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

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

过去，一是听话（做驯服工具），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一个支部书记说了就算，什么事情都不同大家研究，不商量，不向大家征求意见。支部作决议是要征求党员意见的，一次不够，再征求，要让党员讲意见，征求一次不够再征求。但是过去有很多地方不是这样，是个死党，一塘死水。

过去青年人入团可困难啦，比入党更困难。党团组织被一些人把持着。老党员把持党支部，老团员把持团支部。支部书记就像个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谈话。

皇帝。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1]就是这样，他把持全大队的党、政、财大权，搞贪污，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只有沙石峪是这样？我就不信。

有些党员官大了，架子就大了，不讲民主，不跟下级商量，遇事不先征求人家意见，自己说一通，喜欢训人。陈老总[2]就喜欢拿自己多少年的经验包括反对我的经验，去训人。

党员要那种朝气勃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有些人二三十岁，年岁不大，暮气却很大，到处住休养所，小病大养，无病也养。这次文化大革命，群众一冲，病没有了，坐喷气式飞机，反而治好了他的病。现在到医院去的很少了，起了很大的变化。才不要都听医生的话，我多少年没量血压了，前几天发烧三十八度五，医生要听心脏，我不让听，吃两片药就好了。当然，有的人是真有病，如心脏病，要治。

我把李大夫放下去支工，可有点意思。他们到北京针织厂。去的时候我就交代了几条，一是先做调查研究，当群众的小学生；二是不轻易表态；三是推动工人群众在革命原则基础上实行大联合。跑到一个地方就哇啦、哇啦干什么？那个厂有两派，斗得很厉害，开始两派都说他们搞阴谋，但他们顶住了，一直做调查研究。后来

---

[1] 沙石峪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贵顺（1914—1999），河北遵化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近20年。

[2] 陈老总，指陈毅。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前委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解决当时存在的“是否取消军委”争论，毛泽东明确反对取消军委，会上，陈毅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后在实践中认识到错误，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当年10月份，3次写信请毛泽东回来担任前委书记。

我说了几句话，就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救了他们，否则，人家要赶他们走。现在两派联合起来了。那个厂一派一千二百多人，一派八百多人。八百人的一派说一千二百人的那派保得厉害。两派争位置，结果人多的一派采取高姿态，问题反而解决了，一派六个，一派七个，无派的出二人，共十五个人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还有一些人去化工厂，这个厂比较复杂，知识分子多，去的人被围攻。人家出了一条标语，我们去的人乱加评论，讲错了话，结果被人家抓住了。

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张本[1]这个人，谁知道她历史有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搞出了很多问题，当然一次搞不干净，但搞出了不少。

我赞成康生同志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

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朝气。

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十二月再发一指示。

---

[1] 张本，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任。《科研批判》1968年四、五期合刊发表国家科委齐向红《同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场殊死搏斗——彻底清算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张本的滔天罪行》，历数张本的反革命罪状。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说要恢复组织生活，他们又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

这样的人都不要，就太多了，但要做检讨。有的人，不想当党员，就算了嘛。

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

党纲要修改。我在看联共党史，他们建党，建了几次。也不要像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从政治经济学、商品二重性一直到剩余价值，写得很长，烦琐得很。我们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横直是废话，会一散，就完了。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

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做陈独秀、瞿秋白的驯服工具就是不行。八七会议我们反陈独秀时，就没有做陈独秀的驯服工具。

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不行。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就讲了三个前提。如果你是革命的，政治路线正确，人家自然就会服从。打了胜仗以后，战士都高兴，对领导上不讲闲话，打了败仗，闲话就多。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纪律就是建立在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解放军战士也有个别犯纪律的，不是绝对的。

现在报上都讲好的，内部情况报导困难多，才不要相信。我就

不相信天下都黑了。

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经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六三年搞了个十条[1]，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2]，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两件事：

关于九大，第一批反映材料综合一下，通报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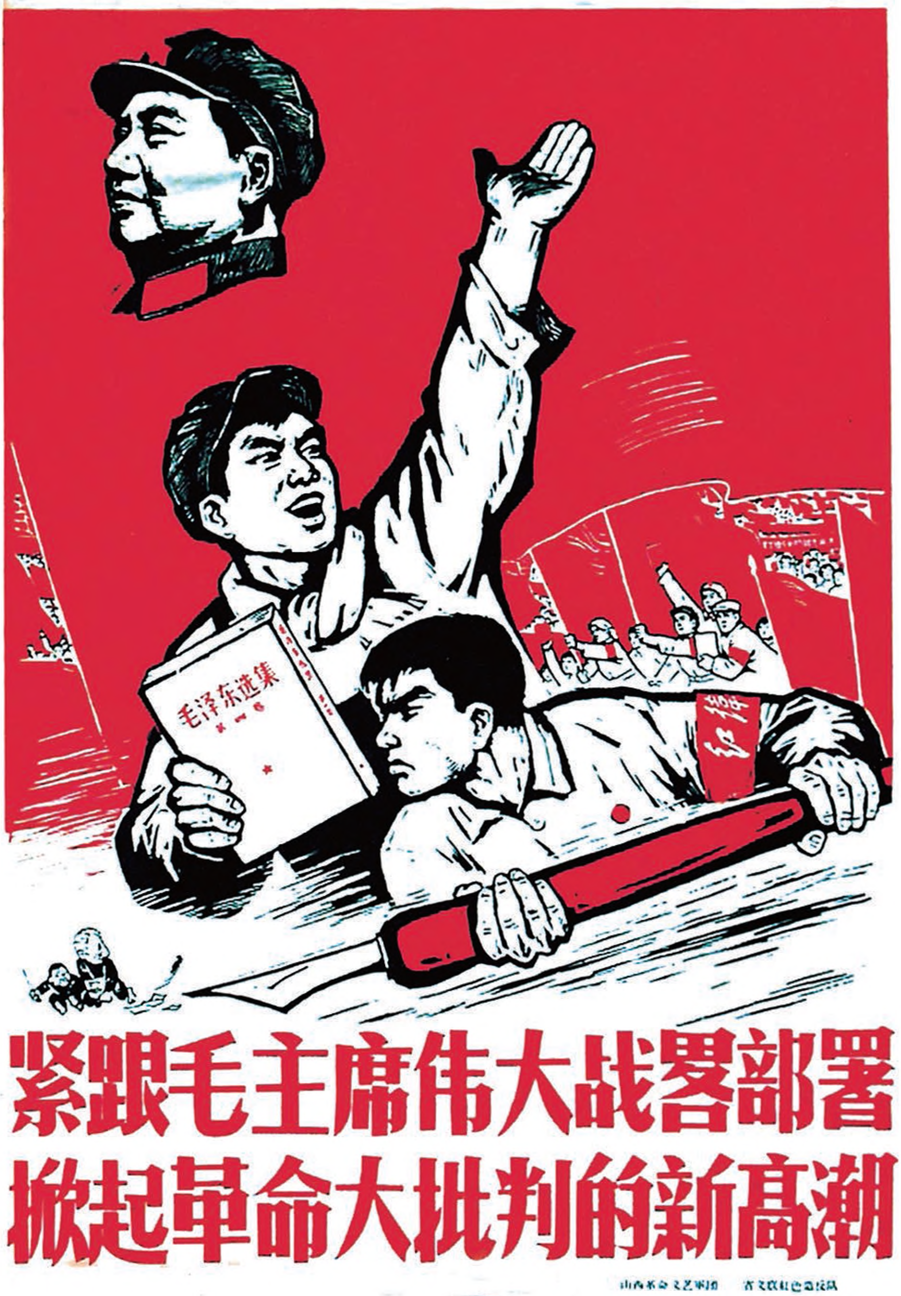
关于整党，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样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恢复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这些问题怎么办，搞几条办法出来。

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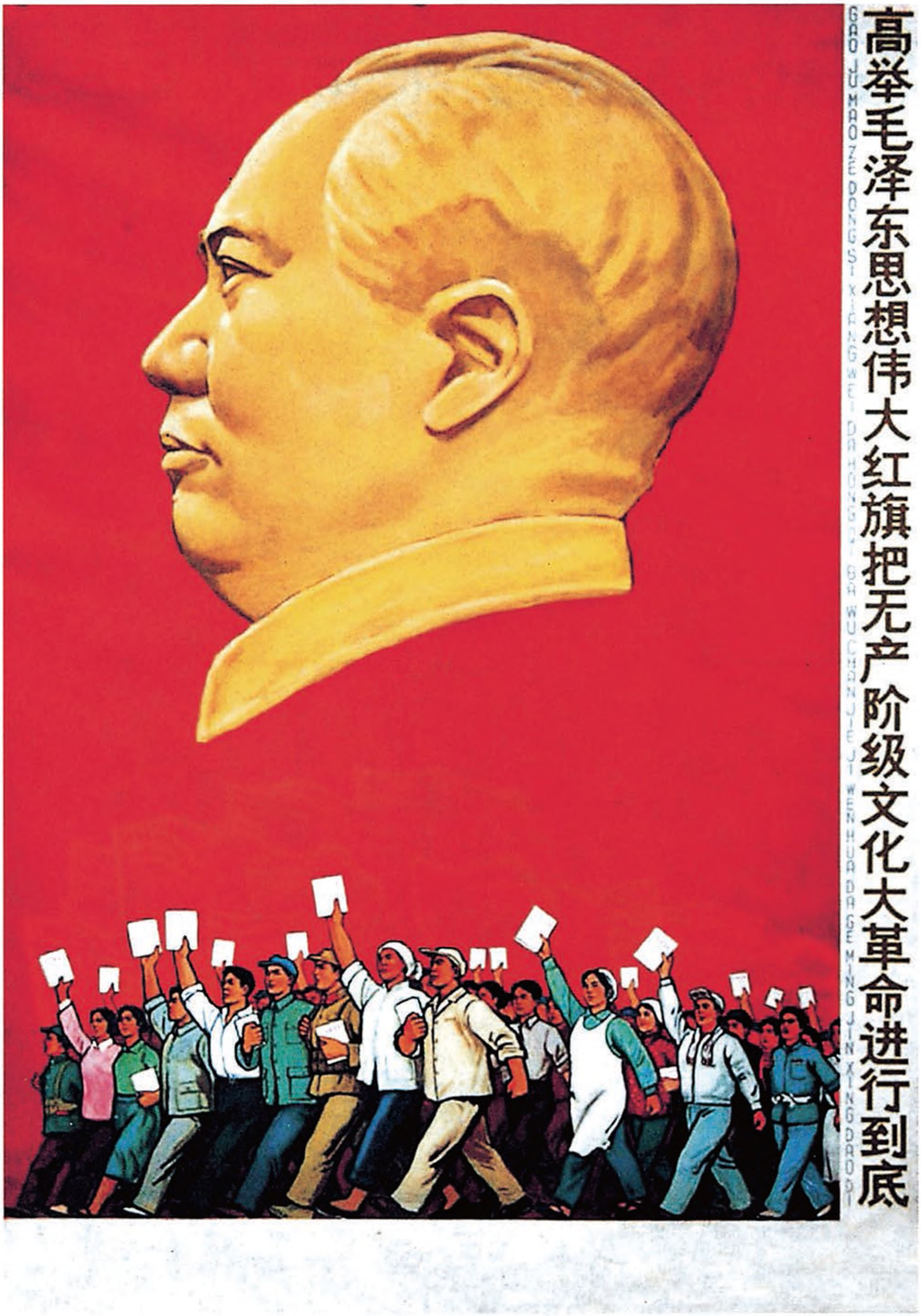
---

[1] 十条，指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毛泽东主持制订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2] 后十条，1963年9月20日，刘少奇主持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毛泽东选集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畧部署
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

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宣传画）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GAO JU MAOZE DONGSIXIANG WEIDA HONGQI BA WUCHANJIEJI WENHUADAGEMING JINXING DAODI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宣传画）

转发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谈话的批语[1]

（1967年11月7日）

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

毛泽东

十一月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11月5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〇号上。这期《快报》登载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永贵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谈话，共5个部分。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二、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五、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196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转发了陈永贵的谈话。

对云南省各专（州）县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67年11月15日）

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

---

[1] 这个批语写在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1967年11月1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我省各专（州）县正在贯彻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号召。一个多月来，各地部队党委、各级军管会、支左机构把这一工作列为重点，加强了领导。据不完全统计，至10月底，已办和在办的各种形式学习班共356个，参加学习的有1.3万多人。这批学习班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不同程度地检查和克服了在干部问题上的“私”字。三、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各地对学习班正在总结经验。滇南地区一些学习班总结的初步体会是：一、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当前运动中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二、必须始终以毛主席的“老五篇”和最新指示为主要学习内容，带着大联合、干部问题和三结合等方面的问题，反复认真地学，不断加深领会，对照检查。要抓大节，抓大方向，防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三、要掌握重点。结合实际，扎扎实实解决一两个关键问题。四、贯彻群众路线的方针，始终要应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各自多作自我批评，不指责别人，不强加于人。五、加强领导。要同学员一道学习，把群众中先进萌芽的东西加以扶植培育，总结推广。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转发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的经验的批语[1]

（1967年11月16日）

一

姚文元[2]同志：

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1967年11月30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上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的批语。文章说，江西省革筹小组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若干决定的过程中，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注意工作方法。其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在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采取了用典型带动一般的方法。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抓群众的活思想。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合中心任务，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在这一句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自己革命化。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二

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

对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的谈话

（1967年11月19日）

这个像章[1]好，有海军又有空军，又有这么多群众，我就放心了。

---

[1] 指海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敬献给毛泽东的像章。

1967年，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接见出席海军首次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1]的批语

（1967年11月20日）

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日

---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第十六期上。

关于对浙大“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的批语[1]

（1967 年 11 月 22 日）

林彪、恩来同志阅。

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2]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

---

[1] 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 1967 年 11 月编印的《快报》第五五一〇期上登载的《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材料的批语。材料中说，11 月 16 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11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2] “百万雄师”，是武汉市的一个群众组织。在 1967 年的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组织”。1978 年 11 月 26 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请示报告》，为“百万雄师”这个群众组织进行了平反。

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二日

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

（1967年至1970年）

一

康生[1]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2]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二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3]

（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

---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2]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写的批语。

[3]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援外飞机喷刷毛主席语录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三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1]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二日）

四

此事我已说了多次。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2]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七日）

五

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

---

[1] 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其中“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修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2]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批评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1967年3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中国的对外英语宣传，内容很好，但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同年11月，威尔科克斯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他对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1]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六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2]

（一九六八年四月六日）

七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3]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人民日报》发表缅甸共产党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这个声明涉及缅甸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2]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1个字删掉，并写了这个批语。

[3] 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他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下面画了两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八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1]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九

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

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

此件缓发。[2]

（一九六八年八月）

---

[1] 这是毛泽东对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写的批语。

[2]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报告上写的批语。报告中说，“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外人员身份不相称。

十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1]

（一九六八年九月）

十一

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2]

（一九六八年九月）

十二

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情况的自己吹擂。[3]

（一九六九年六月）

---

[1] 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初稿）时写的批语。

[2]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送审稿时，删去了其中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写了这个批语。

[3] 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八周年》的送审稿时，在“二十年来，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中的“繁荣昌盛”前边加了“有了初步”4个字，将“强国”改为“国家”，并写了这个批语。

十三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1]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写的批语。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1967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三周年伟大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一贯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通过武装斗争，打败了法西斯帝国主义，建立起人民的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解放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自力更生的方针，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和颠覆活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

重大的措施，在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深入地开展了革命化运动，为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创造了新的经验。这个革命化运动，不仅对于保证阿尔巴尼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为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一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和坚持革命的外交路线，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这种反对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博得了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高度赞扬。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和人民，始终站在反修斗争的前列，坚决同以苏共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铁托[1]叛徒集团进行了尖锐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将永远铭记阿尔巴尼亚在这场关系人类命运的反修斗争中所建立的不朽的历史功勋。

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欧洲坚强的社会主义堡垒。

亲爱的同志们，战友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是真正的同志和战友的关系。这种关系一年比一年更加亲密、更加深厚。我们愿借此机会，向你们表示我们的信念：不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

---

[1] 铁托，当时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南斯拉夫总统。

情，不管什么时候，中国人民永远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为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对《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1]稿的批语

（1967年11月）

一

删掉了几句。[2]

请林彪[3]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4]。

二

不要这两句。

三

删去不好，也不必改写。[5]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五日下午二时

---

[1] 这个通报汇集了中共中央《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下达后第一批反映的意见，主要内容包括“九大”最根本的任务，以毛泽东思想建党和修改党纲党章，总结路线斗争经验和开展路线斗争教育，整顿党的组织和改革领导机构，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条件和标准，“九大”的开会时间、规模、代表产生和开会方法等几个方面。1967年11月21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将这个通报稿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遵照主席月初指示，康生、文元两同志收集和阅读了各地、各单位报来意见，起草了这一通报，并在20日晚小组扩大碰头会上讨论和修改通过。现送上修改后重印稿，请予审阅批示。”这个通报于11月27日下发。

[2]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报稿时，作了两处删改：一、在关于“九大”的最根本任务部分，删去了“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等语，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二、在这一部分，还删去了“‘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4个字。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主要是在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改革领导机构部分，将“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一句改为“使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队伍，成为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3]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5] 这个批语写在林彪办公室1967年11月25日整理的电话记录稿上。记录稿说，“林彪同志电话交代：他主张把第二页第三段全文删去，或者改写得轻淡一些为好。他认为，原文对他的评价太高”。中共中央通报稿第二页第三段的全文是：“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林彪看到的是毛泽东审改过的稿子，这一段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后面“和好学生”4个字已被毛泽东删去。

对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7年11月）

一

照办。

二

经过一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夺得了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

---

[1]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1967年11月8日送审的中央指示稿上；本篇二是对指示稿中第一条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1967年12月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题目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967 年）

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1]

---

[1]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12日在“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用黑体字发表了这句话。

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等的批语[1]

（1967年12月17日）

林、周[2]、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

---

[1] 这个批语写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7年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泽东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问题向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报告中说，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今年12月26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省革筹小组经研究，同意在12月26日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特请示以下3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并请中央、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派人来韶山参加庆祝活动”。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一）“大会名称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二）“大会名称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会上举行塑像落成及通车典礼。”“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我们除组织省报和有关宣传部门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外，希望新影能派人来摄制新闻纪录片。”12月2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在《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上的批语[1]

（1967年12月17日）

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七日

---

[1] 周恩来等1967年12月16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写道："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3处"无限"和2处"非常"，并写了这个批语。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决定。

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电报

（1967年12月19日）

阮友寿[1]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战斗中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你们打得好！你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打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

你们的胜利又一次表明，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2]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而革命人民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必然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都

---

[1] 阮友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2]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是可以克服的，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革命人民的前进。坚持下去就是胜利。我深信，越南人民坚持持久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从越南赶出去。

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兄弟的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可以相信，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在我们两国人民坚强的战斗团结面前，美帝国主义的任何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毛泽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对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批语

（1967年12月29日）

姚文元[1]同志：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2]，请你们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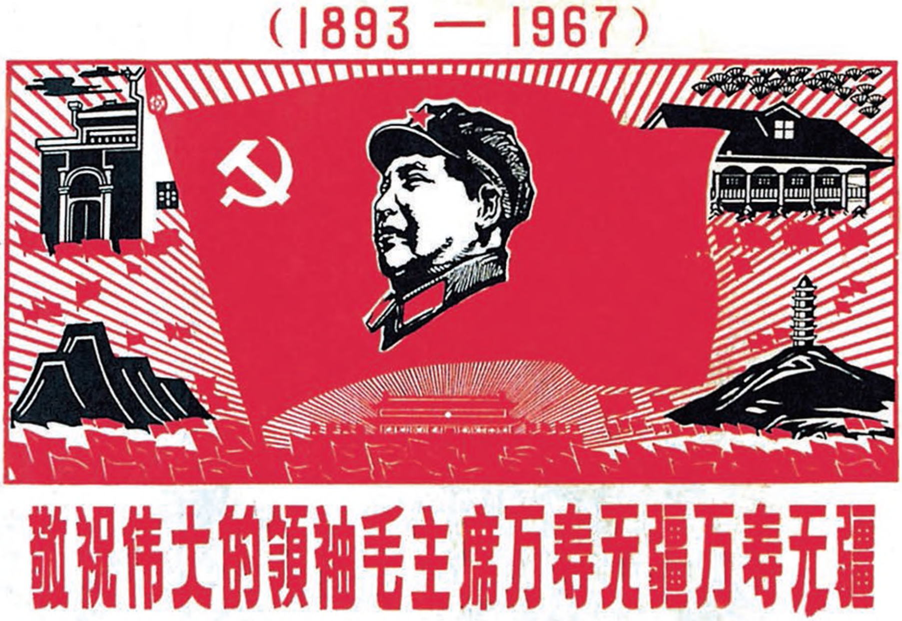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二月廿九日上午四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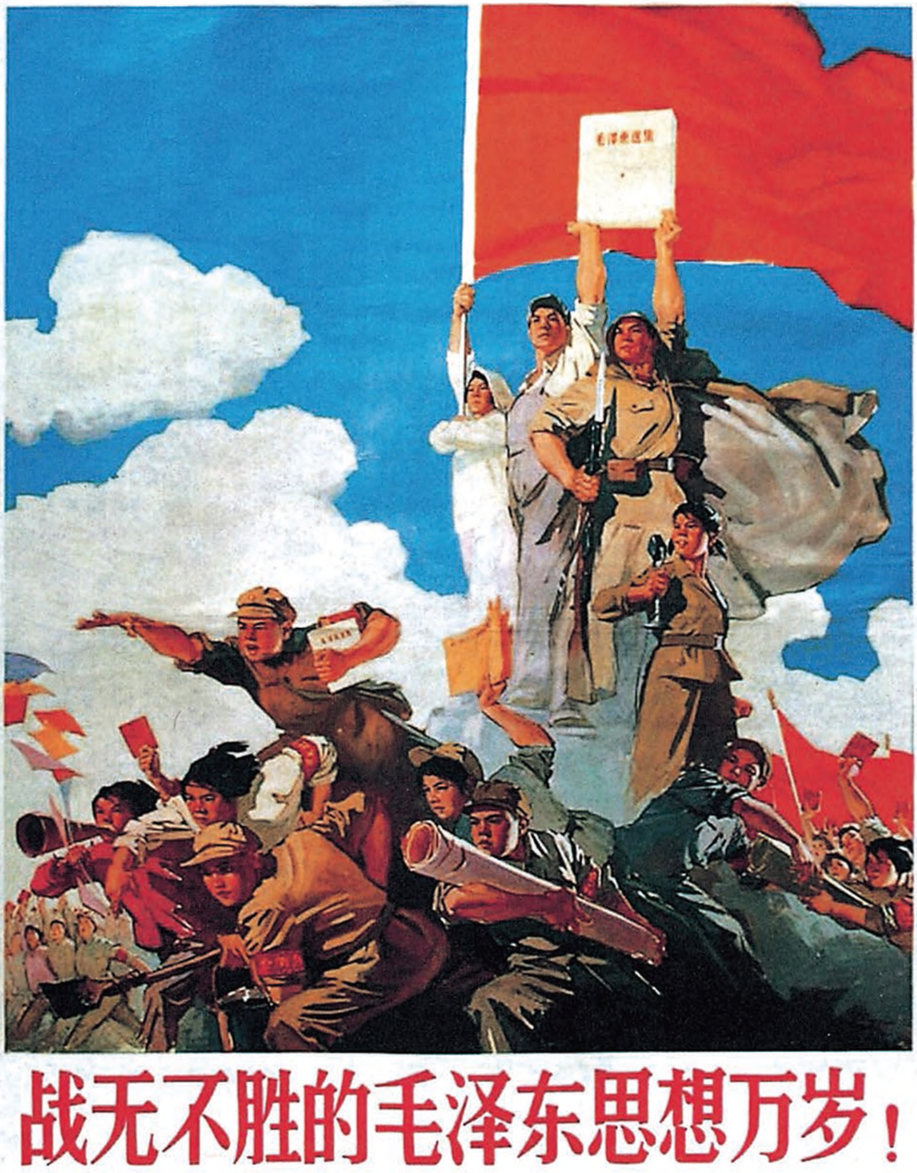
---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1967年12月28日，他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68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元旦社论，已经碰头会讨论通过（谈了两次），现送上，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这篇社论在1968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

[2] 在姚文元送审的社论稿上，毛泽东删去了"衷心祝愿我们的伟大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一句中"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和后一个"万寿无疆"，删去了"用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一句中"最高水平的"五个字。


（1893 — 1967）
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宣传画）


毛泽东选集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宣传画）

1968

196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对成立江西省革委会的新闻稿和社论稿的批语

（1968年1月6日）

退姚文元[1]同志：

两件[2]可用。

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3]。

毛泽东

一月六日下午三时

---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姚文元1968年1月6日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两篇稿子均发表在1月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3] 在新华社新闻稿中，毛泽东删去了“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中，毛泽东删去了“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这句话，并将“他们步步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句中的“步步”两字删去。

对北京大学一学生反映“伍豪启事”来信的批语[1]

（1968年1月16日）

此事早已弄清[2]，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毛泽东

一月十六日

---

[1] 196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他在1932年的《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发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材料。毛泽东的批语，写在这封来信的摘要上。伍豪，周恩来的别名。

[2]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而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报馆对于伍豪等的更正启事（照他们的章程纳广告费的），竟完全拒绝登载。这些报馆显然是利用反革命的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帝国主义工部局的庇护，而积极实行这种危害革命反对工农兵士群众，并且间接帮助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民众革命的行为。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最高革命法庭根

据这个理由，宣布时事新报、时报、申报以及一切登载所谓‘伍豪等’的启事而又拒绝登载更正启事的报馆总经理的死刑!”1967年5月17日，江青曾把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报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为此，他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写信报送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8年1月30日）

康生[2]同志：

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各同志一商。

毛泽东

一月卅日

---

[1] 黑龙江省革委会1968年1月25日送审的这个报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初步发现，叛徒特务的线索，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有的在中央干校、北京公安部门，有的混入了军事机关。

[2]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

（1968年）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1]

---

[1] 1968年2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越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1]

（1968年2月7日）

过去有许多人总认为，越南打不赢美国。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越南人少、物质差，美国工业大、军队多。表面上一看似乎是对的，但实际上不对。美国的武器多，没处用。比如一个越南人同一个美国人靠近了打，它的飞机去轰炸，难道只炸死越南人而美国人不受伤？所以一打近战它那些武器就没作用。比勇气，比战斗力，他们就更比不过你们了。一个国家去侵略人家，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就不喜欢它。越南人民不喜欢美国人，连伪军都不喜欢美国人，因为他们控制人家。这样，他们就脱离人民，十分孤立。这个战争，你们胜利是肯定的，就是还需要一点时间，不过时间也不长了。

一九五四年搞日内瓦协议时，划了个十七度线。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九年这五年中，他们杀了你们十几万人。你们又不得不拿起武器来搞武装斗争，从开头十几个人的游击队，经过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逐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从前以为大城市敌人防守严密，不好打进去，这次你们一打，看来也还是可以到里边去打的。现在很有利，可以利用这个条件扩充些兵员，在农村扩大些地区，多歼灭点敌人的有生力量。大城市可以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时谈话的一部分。

放到后头，如过去抗法战争时河内、海防都先不动，放到后头来解决。

南越战争发展到目前阶段，在军事上，建议你们组织几个野战兵团。每个野战兵团三四万人，每仗歼灭敌人四五千人。一仗打下来之后，又补充些兵员、弹药、粮食、药品等，然后再打。一个野战兵团一年打三四仗（三个月打一仗），歼灭敌人成建制的有生力量。这些兵团要能远离家乡作战，可以在这个战术区打，也可以到另一个战术区打。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歼灭敌人成建制的有生力量。打孤立之敌，可以采取挖坑道接近敌人、进行近战和夜战的办法，使敌人飞机、大炮的火力失其作用。坑道可以在三四个方面挖。这些坑道不同于地道，有开掘式的，要能供部队运动和输送弹药。还要组织一定力量打敌之增援。所以一个野战兵团兵力要多一点，要有三四万。就是说，打接近奠边府那样的仗，目的在于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

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由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决定。相信越南劳动党中央会在新的情况下找到新的办法。

对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教育部队经验批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2月10日）

一

送林、周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

毛泽东

二月十日

---

[1] 周恩来等1968年2月9日给毛泽东、林彪写报告说：“遵照主席批示，碰头会于今（9日）晚通过代中央起草的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示，现送上，请予审批。”中央批示稿中指出，江西省军区党委“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一些在支左中曾一度犯了错误的部队，在提高认识、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到新的地区担负支左任务，经受锻炼，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收效很好”。“中央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为部队改正错误、立新功创造了条件。”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省军区、各军下发了这个批示。

二

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对周恩来等关于采取措施制止破坏铁路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68年2月）

完全同意。

退总理办，并告林彪[2]同志。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为报送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反映了徐州等地铁路遭到破坏的严重情况，指出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的批语[1]

（1968年2月）

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68年2月14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紧急通知稿上。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讲道：“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否则，即由上级派军管人员或由上级革委会（革筹小组）、军管会派人来掌握生产和业务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条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了这个紧急通知，注明可以在一切基层单位宣读，在内部张贴。

对广东问题的指示*

（1968 年 2 月）

广东形势大好，省革筹要抓紧关键，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带动广西、云南、福建、湖南等地区。因为此国防前线，有三条黑线。

关于革命委员会等的指示

（1968年2月）

大办学习班。用学习班的方法斗私批修，提高认识，解决问题，狠抓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应该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应该总结经验，应该解放大批革命干部，干部只要不是三反分子、走资派、投敌叛变分子、特务分子，而是在运动中犯了路线错误认真检查，认识错误就可以三结合。在三结合中应该注意成分，但不能唯成分论，不要把坏人也结合进来。三结合要体现老、中、少，光小娃娃不行。

一般大学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不结合进去，特殊情况下要结合，须经过市革命委员会批准。要警惕坏人，防止破坏。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应该爱护她、尊重她、帮助她、保卫她、维护她的无产阶级权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不是三支两军[1]工作的完成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巩固和发展革命委员会的无产阶级权威。

---

[1]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布《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支左”。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即“三支两军”。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三支两军，即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此后，以1月23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对反映欧阳毅情况来信[1]的批语

（1968年3月2日）

林彪[2]同志：

此件请你看看，是否交成武他们查明处理。

毛泽东

三月二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原副政委欧阳毅的妻子陈民1968年2月22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炮兵机关斗争欧阳毅的情况。信中说，最近对欧阳毅的批斗更甚，武斗体罚严重，人已不像样子，恳求主席及中央首长能急速挽救他的生命，给他以活动自由。信中还说，欧阳毅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他绝不是坏人，恳请中央能详细调查他的问题。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68年3月2日，他批示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请遵照主席批示，认真查明处理，俟有结果，盼告。"

对香港《大公报》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1]的批语

（1968年3月23日）

一

林彪、恩来[2]、中央文革各同志阅。

毛泽东

三月廿三日

---

[1] 香港《大公报》1968年3月18日刊载的这篇文章，介绍了资本主义世界1929年经济危机的情况，认为当前西方的金融恐慌，很有些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模样了。而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通常是以战争寻找它们的出路的。文章最后说："从四十年前看现在的局面，说相同也相同，说不同也不同。西方经济大恐慌山雨欲来，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从大规模的战争上寻找出路，却大有疑问。这是因为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新中国屹立在东亚大陆上，成为世界灯塔，任何侵略者妄想碰上一碰，势必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而全世界的大好革命形势，尤其是美军已在越南一败涂地的事实，也使美帝国主义有所忌惮。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边吵边打，今后势将继续；但是，它们要是敢向全面战争的道路迈进，妄图借此解救危机，那么，它们彻底舒服的日子，必将更加提早来到！"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恩来，即周恩来。

二

结论不一定对，还是会打的。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3月25日、28日）

一

等几天，加以修改，即可发表。

毛泽东

三月廿五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2月19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送审稿上写道："送上社论一篇。其中引用了您的最新指示，是否妥当，请审阅批示。"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参见《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之二。本篇二写在陈伯达、姚文元3月28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上。陈伯达、姚文元在这个送审稿上写道："这篇文章改了一下，可否即于最近发表，可以说明大好形势，可以起正面引导作用。"本篇三是对陈伯达、姚文元3月28日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1968年3月3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一期上。

二

照发。

在第2页上有一点修改[1]。

毛泽东
三月廿八日

三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是把毛主席总结群众的经验以后所提出的这三个方面在组织上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更加适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

---

[1] 即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部分。其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一句，原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对康生关于审阅祝贺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电报问题的检讨的批语[1]

（1968年3月28日）

一

注意到了，就好了。对外刊物和出版方面似有不少问题，可否请康生、伯达、文元[2]三同志主持召开一二次座谈会，研究改善办法。

毛泽东

三月二十八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1968年3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中联部代中央起草的对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贺电，这个稿子我看过，而且经我批发送审的，我有责任。""读了主席对电文的修改和严肃的批语，我深自谴责，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多次的教导，又一次犯了错误，这是不能允许的。希望主席予以严厉的批评。今后起草对外文件定当严加注意，坚决遵照主席的指示办事。"本篇一写在康生的这封检讨信上；本篇二写在这封检讨信的信封上。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二

送林、周[1]、伯达、文元同志亲启。

退康生。

---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1]的批语

（1968年3月30日）

总理、伯达[2]同志：

我看这个文件好，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

---

[1] 黑龙江省革委会1968年3月19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总结了从1967年9月开始进行的1966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大专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使毕业生真正和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二、在毕业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活学活用“老五篇”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最新指示，并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打破过去那种少数人冷冷清清坐在屋子里，大搞神秘化的分配办法，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毕业生分配、调配工作机密的原则下，将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群众，然后用各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四、在毕业生分配权力机构问题上，在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同时，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保证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黑龙江省革委会的这个报告。

[2] 总理，指周恩来。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

毛泽东

三月卅日

关于国家机关的改革和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1]

（1968 年）

一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二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

[1] 《人民日报》1968年3月30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段话。其中第一段话又在4月1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第二段话又在3月30日《人民日报》“毛主席最新指示”专栏中发表。

在中央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稿上的批语[1]

（1968年4月6日）

退周[2]再阅。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3]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请酌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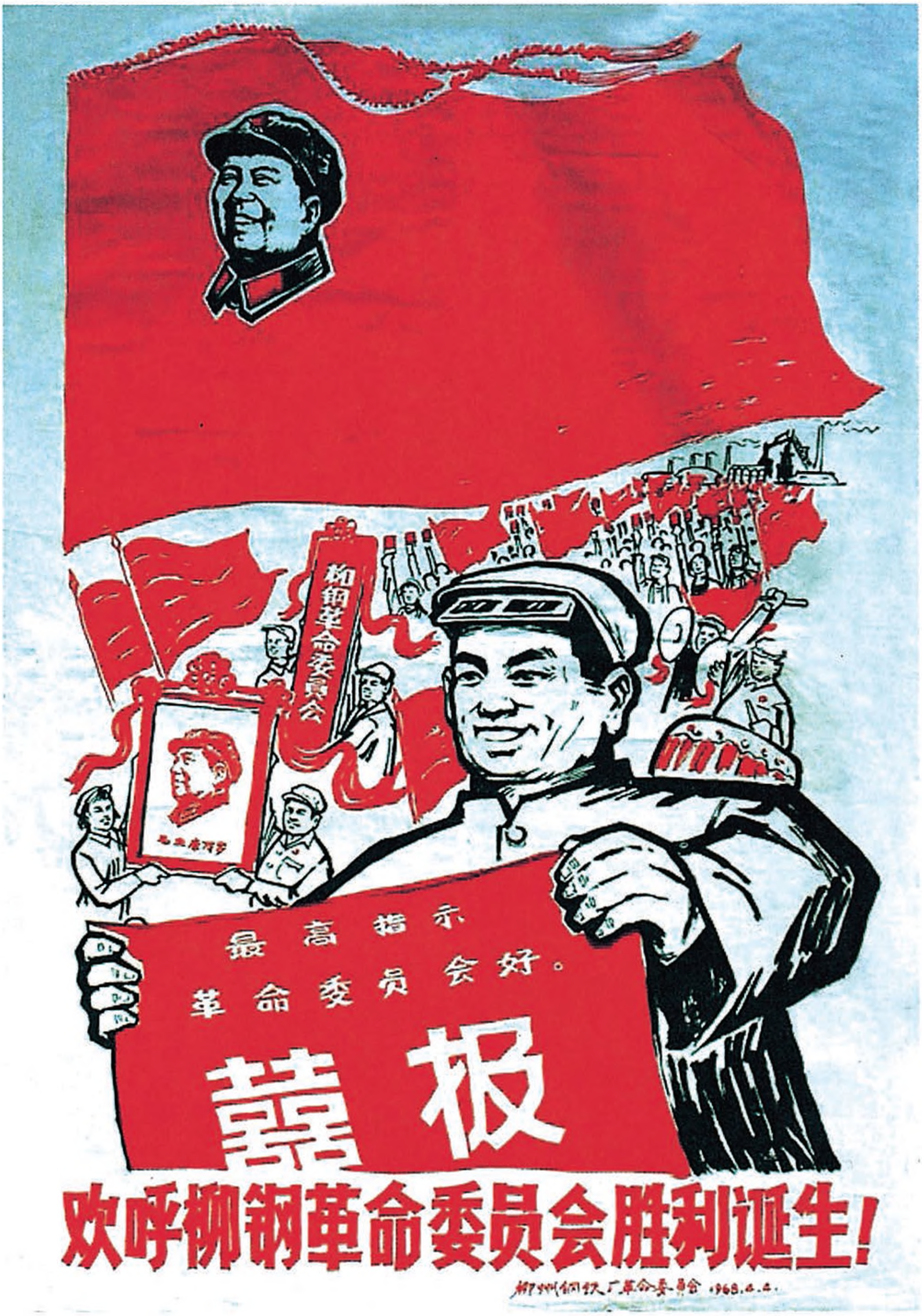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四月六日

---

[1] 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968年3月30日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给毛泽东等的请示报告中，在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处，分别点了杨成武、张平化等人的名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3月30日同意湖南省革筹小组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周恩来送审时在中央批语稿上加了一个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第五页还有两处，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3处点的人名，并写了这个批语。周恩来等将中央批语稿及其附件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还写道，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取和讨论湖南省革筹小组军、干、群代表共8人的汇报时，曾提议结合龙书金同志，并任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4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请示报告。

[2] 周，指周恩来。

[3] 杨成武，原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1968年3月，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崇碧（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重大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彻底平反。张平化，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调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1971年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


柳钢革命委员会
毛主席万岁
最高指示
革命委员会好。
囍报
欢呼柳钢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
柳州钢铁厂革命委员会 1968.4.4.

欢呼柳钢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宣传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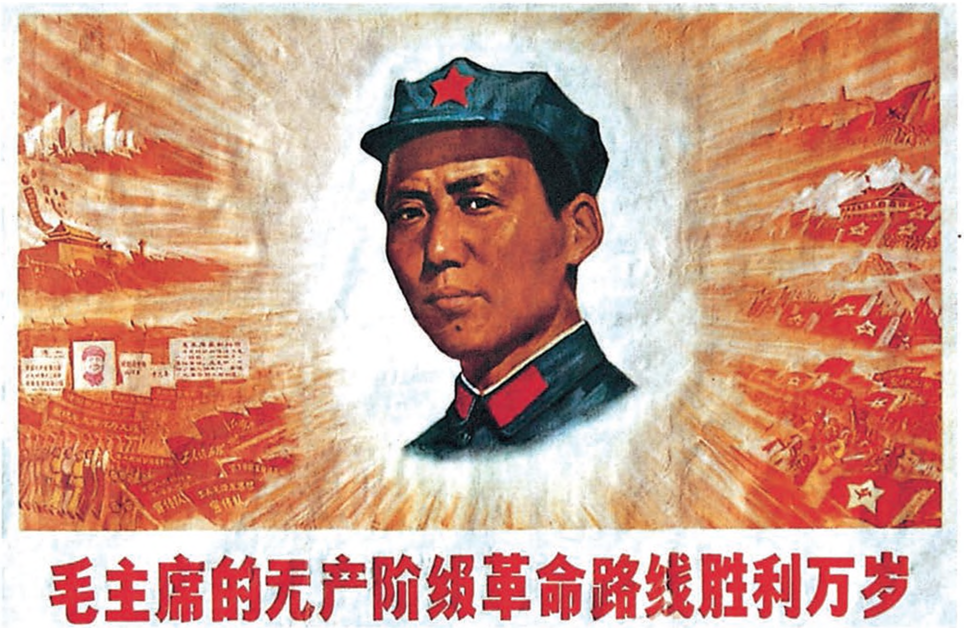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的一段话

（196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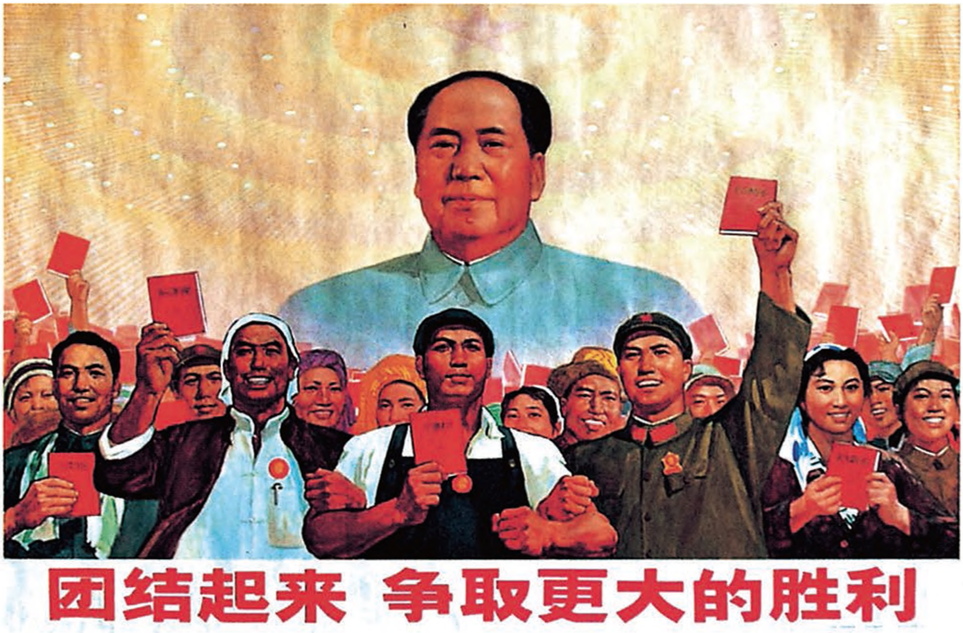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1]

---

[1] 1968年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又深刻地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宣传画）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宣传画）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1]

（1968年4月16日）

一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2]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8年4月16日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发表在4月17日《人民日报》。本篇二是写在周恩来4月16日中午送审的声明修改稿上的批语。

[2] 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曾获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遭种族主义分子枪杀，由此触发美国100多个城市的黑人抗暴斗争。

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1]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

---

[1] 毛泽东这篇声明发表的时间是1963年8月8日，载于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

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二

送林彪[1]同志阅，并请在碰头会宣读通过，可能还有修改之处。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下午四时

“文革”期间，毛泽东和江青、林彪、周恩来在一起。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对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的批语[1]

（1968年4月29日）

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下午三时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4月29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上。这篇稿子后来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在5月1日发表。

对追授门合“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命令稿[1]等的批语

（1968年4月）

有点修改。[2]

---

[1] 门合，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四团二营副教导员。1967年9月5日，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用炸药装置土火箭驱云防雹，当炸药发生意外爆炸时，为保护在场的其他27人免受伤害，用身体扑在炸药上，英勇牺牲。196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毛泽东等报送了代拟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追授门合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称号的命令》稿及《门合同志英雄事迹的简要材料》。4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这个命令。

[2] 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命令稿和中央军委办事组送审报告的修改，主要是将两件中的“忠于毛主席”改为“忠于人民忠于党”，将两件中的“无限忠于毛主席”改为“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几段最新指示

（1968年4月、5月）

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1]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2]

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是这样。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3]

---

[1] 196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中引用了这句话。

[2] 1968年4月26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中引用了这句话。

[3] 1968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社论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

（1968年5月8日）

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1]

---

[1] 这句话是毛泽东1968年5月8日在接见北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说的。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熳——热烈欢呼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和林彪[1]等人的一段谈话

（1968年5月11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2]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这是毛泽东1968年5月11日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等人谈话的一部分。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划时代的文献》[1]送审稿的批语

（1968年5月16日）

可发。

---

[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为纪念《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而写的这篇文章，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5月16日晨送毛泽东审阅，5月17日发表。

对电讯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1]的批语

（1968年5月19日）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五月十九日

---

[1] 新华社1968年5月12日编印的内参特刊《文化革命动向》上刊载的这篇电讯稿说，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革命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经验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1968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一段谈话[1]

（1968年5月20日）

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2]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

[1] 这段话原载于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6月22日《关于在全军深入传达坚决贯彻伟大统帅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五月二十日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毛泽东和林彪"五月二十日对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重要指示，已经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批准向全军指战员进行传达教育，这对于加强我军集中统一的领导，促进我军的思想革命化、组织革命化，具有伟大的深远意义，对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光荣任务，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

对《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1]的批语

（1968年5月21日）

最后一句口号可以去掉[2]，中间有几句自吹的话也去掉[3]。

---

[1] 指北京革命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北京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1968年5月21日关于坚决支持法国工人和学生革命斗争的声明稿。这个声明发表在5月22日《人民日报》。

[2] 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声明稿中最后一句口号“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声明稿中讲道：“当今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给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极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力量。”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一段中“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世界革命的新时代”及后面的文字都删去了。

机关工作人员要学点生产知识[1]

（1968年5月）

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

[1] 这段话是毛泽东1968年5月讲的，载于中共中央1972年9月7日转发的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

在一份《外国专家情况反映》上的批语[1]

（1968年6月8日）

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毛泽东

六月八日

---

[1] 国务院外国专家局1968年6月4日编印的这份情况反映中说，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外国专家对他们的住所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没有人在政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有意见。有些意见确实是由于我们的工作跟不上和一些服务人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引起的，有些是由于他们对一些具体问题不理解，有些则是对我进行攻击指责。6月7日，周恩来将这份材料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我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对“七·三”布告[1]的批语

（1968年7月）

照办。

毛泽东

---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第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第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第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第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第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第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对国务院业务组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的批语[1]

（1968年7月8日）

先念、富春同志：

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

毛泽东

七月八日

---

[1] 国务院业务组1968年7月5日的这个简报说，目前我国粮食形势虽然越来越好，但总的说，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紧紧依靠和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以无产阶级政治统率业务，继续努力，做好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一定要坚决、全面落实主席关于粮食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进一步注意搞好合理负担，清除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要在发展生产、厉行节约的基础上，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进一步减少农村销量，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要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要实行一般分散、适当集中的保管方针，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7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写信将这个简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他们的信上。

关于大学教育改革的谈话[1]

（1968年7月12日）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

[1] 这是毛泽东1968年7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时谈话的一部分。《人民日报》1968年7月22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而写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编者按发表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其中的引文作了修改。本篇即是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

关于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1]情况》的批语

（1968年7月18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2]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

---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的布告。

[2]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1968年7月15日关于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给中共中央等的报告。报告中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7月3日发出的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各单位很快形成了一个大学习、大宣传“七·三”布告的群众运动，收到了日益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从实践中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入手，充分发动群众。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的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对“七·二四”布告[1]的批语

（1968年7月）

照办。

---

[1] 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24日的布告。布告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7月）

一

照发。

二

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

三

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7月2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您的提示，我们组织新华社、文汇报记者就上海机床厂培养工程技术人员道路问题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加了一个编者按，引

用了您的最新指示。现送上，请审阅、修改、批示！”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中引用的“最新指示”原文是：“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改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本篇一是对陈伯达、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调查报告中所说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这句话后面加括号写的一条批注；本篇三是对调查报告中一句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此外，毛泽东还将编者按中“奉劝少数患有近视症而还不是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一句，改为“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将调查报告中“破除框框”改为“破除不适用的框框”；将“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劳动实践经验的高初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一句，改为“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发表在7月22日《人民日报》。

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8年7月24日）

一

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阅。

---

[1] 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1968年7月16日给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的这个报告说，遵照中央、中央文革指示，我们于6月11日至7月6日，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开展大摆、大颂、大批、大挖的“四大”活动，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非改不可。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二

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毛泽东
七月廿四日

接见首都红代会“五大领袖”[1]时的谈话

（1968年7月28日）

（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泽东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都是一些年轻人！

江青（以下简称江）： 好久不见了。你们又不贴大字标语。

毛： 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以下简称谢）： 恐怕是不肯来。

---

[1] 1968年7月28日凌晨3点，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毛泽东接见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五大领袖”。“五大领袖”：清华的蒯大富、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历时5个多小时。陪同接见的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林彪夫人叶群，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团负责人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谢富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

韩爱晶（以下简称韩）：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1]，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北大）井冈山”？[2]

聂元梓（以下简称聂）：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我们还在门口摆了茶水，他们骂我们二流派，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

[1] 1968年夏季，“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全面夺权的任务基本完成，北京几所大学的两派武斗却战火不断。为了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北京数万名工人组成了“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然而进驻遇到阻力。7月27日上午，当数千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收缴武器、拆除工事、制止武斗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遭到了顽强的武装抵抗。特别是在清华东校，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用长矛、枪支和手榴弹袭击了工宣队，死5人，伤数百人，他们在高音喇叭里呼喊的口号是：“打倒镇压学生运动的黑后台！”“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

[2] 北大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指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另一个是“井冈山兵团”，负责人是牛辉林、侯汉清、杨克明。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新北大（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公社”，老佛爷（聂元梓的外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王大宾（以下简称王）：那几个反对谢富治的跑了。

谢：他的二把手聂树人[1]要夺权，说他右了。

毛：他就那么左，马克思？

---

[1] 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是王大宾、聂树人等。

王：那是他们挑拨关系。聂树人是一个好同志，出身又好，苦大仇深。这个人很正直，革命干劲也大，革命性强，就是急一些，不大会团结人，工作方法生硬一些。

毛：你能团结他吗？一个左，一个右，很好团结嘛！你坐过来，到我这里来。

林彪（以下简称林）：来嘛！

谢：去！去！（王大宾坐到毛身旁）

毛：坐下，坐下。事情要留有余地，都是学生。他们也没有搞黑帮，最近有些学校斗了黑帮，画了像。“新北大公社”搞了几十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么点黑帮。就是关键在于两派，忙于武斗，心都到武斗上去了。现在不搞斗批改，就搞斗批走。学生不讲了嘛，斗批走，斗批散。现在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的坏话多起来了。聂元梓的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有时三百人，有时候一百五十人，哪像林彪、黄永胜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是三万多。

林：哪有黄永胜那么多。

毛：天下大事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聂元梓，他们叫你“老佛爷”“佛爷老巢”。还有你这个谭厚兰同志，梳两个小辫子，你要求下放，在学校里读了十几年书，大家都同意你下放，我怕你走不开，你走了，谁代替你呢？

谭厚兰（以下简称谭）：都安排好了。

毛：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抓黑手的蒯大富。我们有偏向。“（北大）井冈山”（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的反对派“井冈山”）、“四·一四”（蒯大富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反对

派“四·一四”组织)、“兵团”(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井冈山公社”的反对派“造反兵团”)就会对我们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1]，理论家何必抓他？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写篇文章你抓他干什么？把他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会说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我说你老佛爷，也大方一点，你北大“井冈山”几千人，那一河水放出来，大水冲了龙王庙，你受得了受不了？你这个老佛爷，不然就实行军管。第三个办法，按着辩证法，不要住在一个城里，就一分为二，或者你搬到南方，或者“(北大)井冈山”搬到南方，一个南，一个北，根本不见面，打不起来，各人清理自己内部，一统天下。不然你也害怕，把你老佛爷老巢一捅，捅得你睡不着觉。你怕，他也怕。稍微留一手，是必要的，何必那么紧张呢？怕人家打，你不留点后手，人家一冲怎么得了啊？听人家说了，不是有个凶手要戳你吗？知道了凶手是谁也不一定要抓，算了，明明知道是他也不要说了。不过你以后要注意一点，不要一个人到处乱跑。

江：她有人保镖。

聂：没有。

---

[1] 周泉缨，清华大学当时有两个相互对立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一个是蒯大富、鲍长康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个就是沈如槐等领导的“四·一四”组织，简称“四派”，周泉缨是“四派”的理论家，曾写出《“四·一四”思潮必胜》的大字报。井冈山兵团的天安门纵队在清华《井冈山》报上发表《谁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和他拼命——评〈四·一四思潮必胜〉》。

毛：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那个娘家就是不好嘛。哥哥不好是哥哥嘛，姐姐不好是姐姐嘛，为什么一定要牵连妹妹呢？（有人报告找不到蒯大富）蒯大富是不愿来，还是来不了？

谢：广播了，点名中说中央文革要找，请蒯大富开会。他就是不肯来。

江：是他不肯来，还是出不来？

谢：我估计有人控制他。

姚文元（以下简称姚）：有可能。

毛：蒯大富这个人我看是好人，出面多。操纵他的人是坏人，蒯大富以及出面的人是好人，这个经验很多。王大宾，你那里没有打架？

王：没有。六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与保守派干了一架，是伯达同志派人救了我们，以后我们取得了胜利。

毛：那就好，以后一个你，一个韩爱晶不要打架。韩爱晶，你是韩信的后代，很会打主意，是个谋士啊！

韩：我们学校工农子弟多，比较朴实，有不同意见，但没有分裂为两派。

姚：我才不信呢？你们那里就没有不同意见，纯之又纯？

康生（以下简称康）：韩爱晶，不是你说的那样吧？

毛：你们不要把韩爱晶说得那么坏，人家很难受。

韩：蒯大富周围有一批人，里边比较复杂。运动初期靠写大字报起家的人数极少了，武斗这批人多了，要求改组总部，蒯大富控制不了。

毛：谭厚兰，文化革命两年了，你那个一二百人的兵团也弄得睡不着觉。你暂时还不能走，你是一个女皇。今天到会四个，有两

个女的，真了不起！我看你暂时不能走。你要给他们粮吃，出入无阻，那些人也够惨的。北师大“造反兵团”是个湖南“省无联”[1]式的大杂烩，因为他夺权[2]嘛！别的有些学校都参加了，你（指韩爱晶）、蒯大富都有份。

韩：我也参加了。

江：那是韩爱晶去颠覆人家谭厚兰。

毛：你有份，我们的蒯司令也有份。年轻人就是要做些好事，也会做些坏事。你们说中央文革没打招呼，林彪同志、周总理在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七日讲了话，又开了十万人大会。这次黄作珍同志、温玉成同志都讲了话，可是下面还打，好像专门和我们作对。我们这个道理，第一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如果你们要打，也可以。越打越大，两方都有土炮，你们算什么打嘛！你们的打法算不了啥，把卡宾枪、大炮都使出来，像四川一样把高射炮对天上打。

江：败家子。

毛：你这个老佛爷那么大神通，调起兵来也只有那么两三百，你的兵跑哪里去了？还得依靠工人、复员军人作主力，没有那个你还不行，林彪同志兵多，给你几千几万，可把“（北大）井冈山”通通消灭嘛。这问题也不要在这里答复，商量商量，也可以开会讨

---

[1] “省无联”正确全称是“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其简称，只是个省会组织，不是全省组织，它只是部分群众造反组织的一个派系联席会议式的松散集合，而其对加入者并无任何约束力。

[2] 1967年9月7日，在蒯大富、韩爱晶的支持和参与下，北师大谭厚兰的反对派“井冈山造反兵团”的头头们趁开大会之机，搞突然袭击，把谭厚兰反剪双手押上了主席台，批斗了谭厚兰，并宣布夺权。这就是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北师大革委会事件，又称“九·七事件”。事后，蒯大富、韩爱晶等人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严厉批评，并被迫向谭厚兰道了歉。

论讨论，但是首先还是要联合。

林：首先还是要联合。主席讲了四个方案：第一是军管；第二，一分为二；第三，斗批走；第四，要打就大打。

毛：一分为二，因为结了仇，双方紧张得很，两方都睡不着觉。搬家可是个问题，找地点，在北京就会争起来。我看，这个大会堂很空的，中南海地方很大，可容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还不行？或者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叫“杀牛宰猴炖羊肉”嘛？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人都是聂的反对派北大“井冈山”负责人）。这三个人我只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轻人嘛！还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指《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杨克明还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会料到这么打起来？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不行再延长一年、二年、三年。我说，如果不行，要多长时候给多长时候，反正人是会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再搞两年、四年、八年的，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斗批走也是个办法，谭厚兰不是想走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生呢？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七·二一指示”）是留有余地的，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高中重复初中，大学重复高中，基础课都是重复。这专业课，先生都不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还学什么？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我不是哲学家。

毛：这个哲学有什么学头呢？这个哲学是能够在大学里学出来的吗？又没有做过工人、农民，就去学哲学，那个哲学叫什么哲学？

林：越学越窄，是“窄学”。

毛：如果学文学呢？就不要搞文学史，但要学写小说，每周给我写一篇稿，写不出来就到工厂去当学徒，当学徒就写当学徒的过程。现在学文学的，写不出小说。上海的胡万春[1]原来还写了很多东西，以后就没有看到什么了。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还有高玉宝[2]，都进了大学，后来头脑就僵化了。

毛：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列宁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一年半，

---

[1] 胡万春（1929—1998），浙江鄞县人。从小失学，13岁当童工，17岁进上海钢铁厂当工人。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担任过工厂工会委员、副主席，党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等。1952年开始创作，1955年发表短篇小说《青春》，描述青年男女的新型恋爱关系。1956年写了自传体小说《骨肉》，描述旧社会一个工人家庭家破人亡，骨肉分离的悲惨遭遇，受到好评，并在1957年世界青年联欢节举办的国际文艺竞赛中获荣誉奖状。在当时成为全国知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2] 高玉宝，1927年生，辽宁瓦房店人。8岁上小学1个月，9岁当童工，15岁当劳工，17岁学木匠，1947年参加解放军，1954年他才上学读书，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历任文艺干事，师职创作员，辽宁省民间文学协会理事，沈阳军区创作室名誉主任，所著短篇小说《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曾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著有长篇小说《高玉宝》，1955年4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高玉宝》在国内用7种民族文字出版，并被1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15种外文翻译出版，仅汉文出版的就达450多万册，并被改编为24种连环画，他被周恩来称为“战士作家”。

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他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八年，根本没有进过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六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

叶群（以下简称叶）：江青同志自学很刻苦。

毛：你不要吹她。学问才不是靠学校里学来的。从前我在学校里是不守规矩的，只是以不开除为原则的。考试嘛，五六十分以上，八十分以下，七十分为准。好几门学科我是不搞的，要搞有时没办法，有的考试我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

林：我读中学读了四年，没毕业就走了，自动退学，没有中学文凭，就去当小学教员，喜欢自学。

毛：现在办的军事学校害死人，黄埔军校你们知道多长？三个月、六个月！

林：第一、二、三期只有三个月，第四期起加长了。

毛：就是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观点。至于有什么学问，不那么多，实际学习一些军事教练。

林：有一点，学了就忘了。学几个礼拜的东西到军队几天就一目了然，百闻不如一见。

毛：我就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我就没有读过什么兵法。人家说我打仗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我说，《孙子兵法》我没看过，《三国演义》是看过的。

林：那时候你叫我给你找，我没给你找到。

毛：遵义会议的时候，跟□□辩论，他问我《孙子兵法》看过

没有？我问他《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他也不知道。我问他第一篇是什么题目，他还是不知道。后来我写什么战略问题，才把《孙子兵法》粗望一遍。

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米尔》就是兵法。这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亏了。学外文要赶年轻的时候学好。谭厚兰，你学什么？（分别问了每人，王大宾学俄文）学地质没有外文不行，还是学英文好！学外文要从小学学起。

韩：主席，文化革命完了，就叫我当兵去吧。

毛：当兵半年就够了。当那么长干什么？当半年一切就范，再当一年农民、二年工人，那是真正的大学校啊！真正的大学校就是工厂、农村。你说林彪同志还算个知识分子，上过中学，黄永胜、温玉成算什么知识分子啊？算土包子。黄永胜同志，你念过几年书？

黄永胜：一年半。

毛：你家是什么成分？

黄永胜：算下中农。

毛：温玉成，你念过几年书？

温玉成（以下简称温）：三年。

毛：你家是什么成分？

温：算贫农。

毛：都是土包子，就这么点学问。黄永胜那么点学问，当总参谋长，你信不信？

林：黄埔军校有个□□□，蒋介石奖他一只表，后来在南京，打仗就是不行。

叶：他是反对主席的。

毛：在世界上不被人反对还行？反对就让他反对。

林：□□□在南京军事学院，很多学科都能考五分，就是不能打仗。

毛：斗批走也是办法，是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现在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学文学的要写点小说、诗歌，学哲学的要写论文，论述中国现在的革命斗争过程。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听说天派[1]是反谢富治，不了了之，天派又不反了。“砸烂公检法，砸烂谢富治”，实际上砸烂公检法是谢富治第一个提出来的。北京公安局三万人，才弄出几百，几十个地、富、反、坏、右。因此提出砸烂公检法，公安部只留下几十人，其余办学习班。你们也提口号，谢富治是中央的人，一定要打倒，匆匆忙忙地抓。人大三红总部不讲话，以小战斗队的名义出大字报打倒谢富治，一去追究责任呢，就说“我们总部没有打倒谢富治，只是一个战斗队”。他提出打倒赵桂林。赵桂林，我不认识。你们那点材料我看了，赵桂林怎么反革命呢？聂元梓、侯汉卿你们还没有提反革命吧？

聂：他们在社会上搞了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

毛：我们这些人诬蔑些也不要紧。牛辉林的纲也上得不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之一），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法律也不一定要否定。政法学院，一个政法公社，一个政法兵团，他们听了要不高兴吧？

鞍钢有个审讯侦缉的案子，由群众办，消息灵通，多少年没查

---

[1] 天派，“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的组织。所谓天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主要领导人为韩爱晶，是和天有关的，所以称为天派。

出来的案子搞出来了。公安局预审，没有别的办法，打人。由侦缉得来的材料不确切。

军管会还不是丘八？温玉成这个人不认识几个人，就根据侦缉，能行吗？我们说学习群众，说一不要杀，二不要判刑太长，判他两年、三年算了。军队过去也关禁闭，现在有没有了？逃兵你们还抓吗？

温：禁闭取消了，逃兵不抓了。

毛：人家想逃，你抓回来干啥？斗批走，要走就算了。为什么要走呢？还不是斗了他，批了他，打了他，不舒服？或者家里有事，或者军队太苦了，他受不了。逃兵不抓，不关禁闭，反而比过去少了，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现在学校里抓了人就当俘虏，逼供，不供就打。打死了，打伤了。我看知识分子是不文明，你说什么知识分子最文明，我看最不文明。我看老粗最文明，黄永胜、温玉成他们就不抓逃兵，不关禁闭。现在发明了一种喷气式，这个罪魁祸首就是我。我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讲“戴高帽子游街”，但我可没讲坐飞机。我是罪魁祸首，罪责难逃啊！

今天怎么样，以为抓你们来关禁闭吗？井冈山他们这个做法不好，我说的是蒯司令的井冈山，打死了四个人，打伤针织总厂五十个人，就是这个社会影响。我也不是看一个人，损失就最小最小最小。

林：值得，损失最小。

周：林副主席说得好，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

毛：如果以后有工人到你们那里去，应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不要采取蒯大富这个方法。

周：六六年下半年，去工厂串连，人家欢迎你们，就没有打

你们。

毛：让他们宣传嘛，不要开枪，是工人嘛，是中央派去的嘛。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吗？工人阶级专政，专你们学校里少数坏人的政。你们都是知名人士，你们要专学校坏人的政，不能专工人的政，包括蒯司令在内。

现在还在搞串连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四川的反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不要搞这套。

林：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

周：也没有开十二中全会。

毛：还说什么中央开十二中全会，闹得一塌糊涂，斗争很激烈，什么“社会斗争是中央斗争的反映”。不是社会斗争反映中央，应当是中央斗争是社会斗争的反映。

周：北航开什么国防系统会议，开了没有？

韩：一吓没敢开。

周：不要开了。你知道的嘛，国防机密嘛！

毛：我为啥子不找你们的反对派呢？今天找你们来谈这事，使你们有准备啊！我是历来不搞录音的，今天录了，不然你们回去各取所需。如果你们各取所需，我就放我这录音。你们先去讨论讨论。这么一搞多人都被动。搞了这么多天不算数。开了这么多天会，开始黄作珍讲话不算数，找蒯大富也不算数，一定要让中央直接表态。除了开始管一下，后来事多，也就管不上了。北京有谢富治来管嘛。过去召集你们开会，我也不到的，林彪同志也不到的，当官僚了。这次怕你们把我开除党籍。官僚主义就开除，我早就不

大想当了，我又是黑手镇压红卫兵。

林：昨天我开车子，我说去看看大字报，我问怎么没有北大、清华的大字报啊？人家说：他们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要求制止武斗的呼声很高。

毛：群众就是不要打内战。

林：你们脱离了工农兵。

毛：有人讲，广西布告[1]只适用于广西，陕西布告[2]只适用于陕西，在我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性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造反，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

林：现在有的是真正的造反派，有的是土匪、国民党，打着我

---

[1] 广西布告，即“七·三”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的布告。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2] 陕西布告，即“七·二四”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24日的布告。主要是严厉制止日益蔓延的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大规模武斗。

们的旗号造反。广西烧了一千间房子。

毛：在布告上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就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

林：广西烧了一千间屋子，还不让救火。

毛：国民党还不是这样！这是阶级敌人一种垂死挣扎。烧房子要犯大错误。

林：我长征进广西，和白崇禧打仗，他也用此计，先放火冒充共产党。现在是旧计重用。

韩：蒯大富是骑在虎背上下不来。

康：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毛：骑虎下不来，我把老虎打死。

周：广西佬躲在你北航。国防科委系统你怎么召集会议？

毛：你们把广西四·二二藏起来了。广西学生住在北航。

康：他们想控制全国运动。

韩：那个会不是我们召集的。可以调查，是广东武传斌召集的。我有病，住院前在体院。学校里打来电话，接待两个省革委会常委。别人讲“上有天堂，下有北航”。五四学代会，好多外省造反派头头我没有热情接待，大家说老大作风，骄傲自满，又说我们是富农，不革命了。于是我说接待了。送行时他说要开全国形势串连会，我说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北京还有天派地派[1]之分，很复杂。

---

[1] 地派，“文革”时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与地派相对立。所谓地派，是因为这一派的主要组织之一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就取它的“地”字，称为地派，天地相对，用天派、地派来称呼北京对立的两大派很形象，也很通俗，于是很快就流行开了。“五大领袖”中聂元梓（女）、蒯大富、韩爱晶是天派的，谭厚兰（女）、王大宾是地派的。

我同意找几个可靠的造反派头头，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聊聊，只搞情况，不谈办法。我、蒯都去。后来我住院了，会议一开，大家都感到不妙，地质参加了筹备会就不参加了，蒯大富听了一会儿吓跑了，井冈山也吓跑了。同学纷纷给我反映情况，我说赶紧写报告，谁知批评已经下来了。

毛：你们对韩爱晶讲得太多了，他才二十三岁嘛！

江：在运动初期，北航也好，北大也好，外地上访，你们接待他们，做了很多工作。你们把他们藏起来，我们也委托。现在变了，要认识到现在再搞这个不行了，他们反对的是各省革命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谭厚兰，“九·七”是谁给你稳定局面的？

谭：是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谢：是江青同志。

江：对师大兵团我也不一定有多大好感。这么大热天，断水、断电、断粮，三伏天三个月不见阳光，亏你们做得出来！我听了就要流泪。他几百个、几十个人也是群众嘛。开头是韩爱晶不对，去颠覆人家。

韩：我错了。

毛：相当有点无政府主义。世界上无政府主义是跟有政府相对的。世界上只要有政府，无政府就不能消灭，这就是过去说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的走向反面，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是对中央右倾机会主义的惩罚。

江：我对你们那个对立面并没有好感。据说兵团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不是替他们说话，你们把他们放了吧！无产阶级要讲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就是几十个反革命，也是年轻人。绞死我，我不怕别人油炸，北大井冈山说要油炸江青。

姚：油炸也只是说一说。

毛：还有什么绞死蒯大富。

谢：牛辉林不好。

江：牛辉林可能有点问题，也可以教育嘛！聂元梓，我还有点发言权没有？我躲着为你们难过！你们现在都是群众斗群众，坏人藏了起来。我说过四·一四必胜吗？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文革，也反对总理、康老，可是它是群众组织啊！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绞死就绞死，要油炸就油炸好了，我们都是一同患难过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治国平天下？我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的。

毛：可以不提了。“杀牛、宰猴、炖羊肉”。牛宰了干什么，可以耕田嘛！你们列举的无非是攻击江青、林彪，我可以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讲嘛，又没有到外面贴大字报。

江：贴大字报我也不怕。

毛：前年，那是什么人啊，反对林彪同志？

周、叶：是伊林、涤西吧。

毛：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公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要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玩弄一个女人，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周、姚：不好，她的父母很坏，与伍修权搞在一块儿。

江：四·一四是专门反对中央、中央文革的，但他们是群众组织。

毛：他们几千人是搞不掉的。北大井冈山几千人也搞不掉。有坏人自己揪，“杀牛、宰猴、炖羊肉”不要再提了。牛可耕田，猴宰它干什么？

江：我们对你们是有政治责任的。在政治上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井冈山下山一千多，正在办学习班。

毛：你那下山的人都靠不住。你那井冈山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上山，有自由。我们不勉强，不要污辱人家，你们过去犯过很多错误。你们初犯，也怪不得你们。

江：樊立勤怎么样？

聂：没搞他，他和彭言反革命集团搞在一起。

毛：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侯汉卿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是研究生，他父亲在六三年投机倒把。

江：最坏的不是他们，他们是几个组织联合起来的，里边有坏人，外围有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毛：这作风不好。

你们今天来了两个地派、两个天派。地派支持清华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天派的保护蒯司令、老佛爷。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大将我们是清楚的，就是一个

叫聂元梓（女将），一个叫谭厚兰（女将），一个叫蒯大富，一个叫韩爱晶，一个叫王大宾。其他各个学校都有领袖，著名的就这五个。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不管你们工作有多少缺点错误，都要护着你们，你们工作也确实有很多困难。文化革命我没有经历过，你们也没有经历过。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打，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所以为什么这么多逍遥派，炮灰那么少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谢：主席爱护你们是红卫兵小将，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同志关心你们。这个事情说起来主要责任在于我，帮助你们不够，我可以向你们检讨。

毛：首都大专院校的学习班，又不向中央报告，引起聂元梓他们不满。你们又开学习班，又不让串连，人家就开大串连会。不准串连不对，不过你们打倒谢富治也不对。

谢：对我帮助很大。

毛：北京有个习惯，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林：一场大雨，就把打倒的大标语吹了。

毛：小孩子搞大字报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

谢：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

毛：我才不相信那一套哩。中国人有个好处，有意见他要讲出来。讲不让串连是对的，但一点也不让串连也不好，人家还在串连。砸三旧派在串连，反砸三旧派也在串连。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天派、地派串连一下为什么不行？我讲串连一下可以，实际在串连。你不让好人串连，坏人在串连。多数人是好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的。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大富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

手，江青笑了）

蒯大富（以下简称蒯，一边哭一边告状）：主席救我，主席救我！“杨余傅”[1]黑后台调几万工人突然把清华包围。我们跟工人讲理，他们也不讲。我们学生一出去，他们就把学生抓到卡车上拉走。我们打不过工人，我们的人现在都在大街上……

韩爱晶：（流泪）不要胡说！工人、解放军是毛主席派去的。

蒯大富：不可能！主席每次派解放军制止武斗，都是不带枪、不打人、不骂人，把人隔开。这次怎么抓我们的人？

毛：（对谢富治、温玉成）是不是抓人了？谁让你们抓人！统统放了！

蒯大富：我们二把手鲍长康也被抓了。

毛：（对谢富治）把所有的人都放了！把鲍长康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

（蒯大富嗯嗯地哭。整个气氛被蒯大富的情绪所影响，毛泽东是极重感情的人。毛泽东流着眼泪，江青也哭了）

江青：蒯大富，安静点，不要激动。蒯大富，你不要激动。你坐下来。

毛：（对黄作珍）你叫黄作珍，哪里人？

黄作珍：江西宁都人。

毛：老表嘛，久闻大名。黄作珍同志讲话不算数，谢富治同志讲话也不算数，市革委会开会也不算数，不晓得我们中央开会算不算数？我变成了黑手，把我抓到卫戍区去吧！

---

[1] 杨余傅，杨，指杨成武，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姚：伸出红手，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都紧跟。

毛：四个办法，是哪四种？

姚：军管，一分为二，斗批走，要打大打。

毛：一是军管，二是一分为二，三是斗批走，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一直打了几个月？

周：去年开始。

毛：第四再大打，打它一万人。工人撤出来，把枪还给你们大打，像四川一样。

江：败家子。

毛：我才不怕打哩，一听打仗我就高兴。北京算什么打，无非冷兵器，开了几枪。四川才算打，双方都有几万人，有枪有炮，听说还有无线电。以后布告出来要广泛宣传。再不听的，个别的抓起来，个别的包围消灭，反革命嘛！

江：广西围了快两个月了。

周：你们也不想一想，广西布告为什么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说关心国家大事，你们五个也不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态度，做做工作。

毛：他们忙啊！

周：这就是国家大事嘛！

毛：不要分派了。

江：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不要分天派、地派，什么张家派、李家派，都是毛泽东思想派！

毛：不要搞两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困难是有的。

陈伯达（以下简称陈）：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教育革命搞不上去，我们也搞不上去，何况你们。这是旧

制度害了你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的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吗？我看无非是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逍遥派那里得点消息！现在我们来管这些事情，我看不公道，打一点内战无关紧要嘛，所以四条中有一条要打就大打。

姚：我倾向有些学校斗批散，斗批走。

毛：地球一转一年，十转十年。两派这样下去，我看不走也得走，要打就让他们大打，空出地盘来。让人家写小说的去自修，学文学的你要写诗，写剧本。学哲学的你给我搞家史、历史，写革命的过程。学政治经济学的不能学北大教授，北大有什么出名的教授？这些东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这是个害人的办法。组织个小组，自己读书，自修大学。来来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试，考试不是办法。一本书考十题，一本书一百个观点，不只是十分之一吗？就考对了，对其他百分之九十怎么办呢？谁考马克思？谁考恩格斯？谁考列宁？谁考林彪同志？谁考黄作珍同志？群众需要，蒋介石当教员，我们都是这样，中学要教师，小学要教师，教材要删繁就简。

姚：办好几个图书馆。

毛：让工农兵都有时间去，到图书馆读书是个好办法。我在湖南图书馆读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读了半年。自己选择图书，谁教啊？我只上了一门新闻学。大学不要办得那么死，这个大学应该比较自由一些。

江：现在是搞武斗。

毛：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个好处是暴露了坏人。对武斗要作全面分析，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十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

江：我们真痛心你们，瞎说什么不要大学生啦，我们是要你们的。你们有的有时还听我们一些，有的听，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们后头的东西我们也搞不清。

毛：背后不听，我们这里有个办法，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去干涉，无产阶级去干涉。

（聂元梓要求派解放军去北大）

毛：你要合你胃口的，一定要六十三军，别的你又不要。三十八军可以不可以？如果“（北大）井冈山”三十八军真支持，我就给你派六十三军。你应该去做三十八军的工作。

江：聂元梓应该去做三十八军的工作，你们欢迎三十八军行不行？

毛：去一半三十八军，一半六十三军。三十八军不像你们讲得那么坏，根子在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开了两个会，第一个会不太好，第二个会就比较好，郑维山[1]作了检讨。谭厚兰，其实你的炮位一直是在聂元梓身上，你谭厚兰这么女将轰了一炮，郑维山够紧张的。郑维山正好不在北京，到保定、山西解决问题去了，我们不是没见他吗？各军都不知道这个军长是好是坏，把将军们都吓坏了。他找你（指谭厚兰）的麻烦没有？

谭：没有，同学对他有意见。

毛：过去是有历史原因，有点历史，这些事情不是偶然的，不是突如其来的。

---

[1] 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陈：六六年上半年比较好，北京大专院校在全国煽风点火，搞革命风暴是对的。现在脑子膨胀了，自以为了不得，想要统一天下。蒯大富、韩爱晶到处伸手，又没有知识学问。

毛：二十几岁嘛，不能轻视年青人。周瑜出身起兵，才十六岁，你们不要摆老资格。

江：我们十几岁参加革命。

毛：不要膨胀起来，全身膨胀，全闹浮肿病。

陈：你韩爱晶对毛主席的思想，对中央意见没有好好考虑、思索，凭小道消息开秘密会议，个人第一，要走到危险道路上去。

毛：第一条是我官僚主义，一次未见你们。人家不要抓黑手，我还不会找你们哩。让蒯大富猛醒过来。

陈：蒯大富，你应该猛醒过来，悬崖勒马，道路是危险的。

林：悬崖勒马，承认错误。

毛：不要说承认错误。

陈：蒯大富不尊重工人群众，再不听就是不尊重中央，不尊重毛主席，这是危险的道路。

毛：是相当危险，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主席早就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林：蒯大富，我们对你的态度是通过卫戍区和市革委会的，你说你不了解中央的态度，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作了最重要的、最正确的、最明确的、最及时的教导，这次还置若罔闻，要犯很大的错误。你们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全国很多学校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联合问题，你们有些学校落后了，要赶上去，你们没有看到运动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

毛：谭厚兰那里对立面只有二百多人，一年还不能压服。其他

学校对立面更大了，怎么能征服呢？曹操用武力征服孙权，赤壁打了败仗。刘备要用武力征服孙权，也打了败仗。孔明想征服司马懿也不行，失了街亭，司马懿要征服诸葛亮也不成，头一仗打得很长，张郃只剩了个马。

林：打走资派是好事情。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也必须斗。现在有些人不是搞这个，而是搞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他们大多是工农子弟，被坏人利用。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是开始革命，慢慢革命性少了，走向反面。有的主观上要革命，但客观上行动是相反的。有一小撮人主观客观都是反革命。你们脱离群众。

毛：工农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几。你们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比较好的，打内战的比较少，北京只有六所。

谢：清华二万人，参加武斗的不到五千人。

林：那些不参战的人就是不同意。

毛：他们也是上了老虎的背，想下也没个好办法下。蒯大富可以下来嘛，下来照样当官作老百姓。蒯大富应该欢迎工人。

谢：工人手无寸铁，只带三件武器：一是毛主席语录，二是毛主席最新指示，三是“七·三”布告。

康：清华的枪是北航给的，支持清华两汽车枪。蒯大富是司令，韩爱晶是政委。

韩：没那回事，根本没那回事。卫戍区到我们那里去检查了好几次，枪一支不少。

谢：就都是你正确，又全是你对。我批评了你几次你都不接受，你毫无自我批评。

陈：是否把他的枪给收回来？

韩：主席，我有一个要求，给我派一个解放军监督我。很多事

情不是那么回事。我是很爱蒯大富的，我也知道，跟他很多事情要受牵连。但我觉得，要努力保他，不让他倒台。他的命运与全国红卫兵的命运是有联系的。给我派了解放军，这样什么事情都清楚了。

陈：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江：我有错误，宠了你。谢富治，你比我还宠，宠坏了，现在下点毛毛雨，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毛：不要老是批评。杨成武搞多中心，国防科委搞多中心论。全国可以搞几千个几万个多中心。都是中心就没有中心。各人皆以为自己天下第一，还有什么中心？

江：韩爱晶，我批评了你好几次，你就一直没给很好表个态。

毛：不要说他。你们专门责备人家，不责备自己。

江：我是说他太没有自我批评精神。

毛：年轻人听不得批评，他的性格有点像我年青的时候。孩子们就是主观主义强，厉害得很，只能批评别人。

江：蒯大富有点笑容了。轻松一下，别那么紧张。（蒯报告，“（清华）井冈山”总部陈育延是女同学，被工人抓了。）陈育延出来没有？陈育延是个女孩子，要保护。

蒯：陈育延在北航睡觉呢！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

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清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北大）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聂：王、关、戚[1]插了一手。

毛：你们反王、关、戚好嘛。你们搞串连，我也禁止不了。韩爱晶、蒯大富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两个以后还要做好朋友。韩爱晶以后要帮助他，政策上做得好一些。现在“四·一四”高兴，认为“（清华）井冈山”要垮了。我就不信，我看井冈山还是井冈山。前年我就上了井冈山，我不是说你的老佛爷的“（北大）井冈山”。

姚、谢：革命的井冈山！

江：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

毛：有很多打工人的，不是你们，听说是外地来的。

周：你们那里还有没有人呢？

蒯：有。

毛：今天晚上睡觉。你们都还没有睡觉呢，蒯大富你没有地方睡觉到韩爱晶那里去睡，韩爱晶好好招待。韩爱晶，你要好好招待他。你们几个人找到一起，都到韩爱晶那里去，休息一下，然后开个会。

---

[1] 王、关、戚，指的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1966年后，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相继成为《红旗》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曾为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被任命为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成为总政副主任、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受林彪委托兼管《解放军报》，而戚本禹则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

周：韩爱晶，你能帮他想点办法。

毛：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革命，制止武斗。宣传多大，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清华直接没打招呼，间接是打了招呼的。

吴：昨天我找蒯大富谈过，他不听。

毛：“四·一四”欢迎工人，你们“（清华）井冈山”很蠢，很被动。我才不高兴那个“四·一四”。

江：“四·一四”是骂我的。

毛：他们抬尸游行，他们搞砸电缆。在这个时候，“四·一四”也没有知道，为什么他们欢迎？这一次你们很蠢，让“四·一四”欢迎工人。

江：就是“四·一四”的群众，他们也说蒯大富偏左，沈如槐（“四·一四”的负责人）偏右的。清华搞大联合，没有蒯大富还是不行的。

毛：蒯大富，你能不能当校长？“（清华）井冈山”二人，“四·一四”一人，沈如槐当副校长。

蒯：我不能当了，当不了。

毛：还是要联合，是要蒯大富，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蒯大富是偏左的，“（清华）井冈山”两个。“四·一四”是右倾的。

江：现在你们五个先做起来，反正先不要打。

毛：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四·一四”分一个，你蒯大富分一个。第三斗批走，这就是提出来的，他们不愿干了。你们一不

斗，二不批，三不改，集中精力打内战，当然打内战是几个月。第四把工人撤出来，把枪都还给你们，无非是大打，要打就大打。文科要不要办呢？文科还是要办的。至于如何办法，研究出另一个办法，过去的办法是培养修正主义的。

谭：师范大学要不要办？

毛：不办，谁教高中？谁教中专？外语学院不办怎么行？一风吹不行，吹那么几年也可以，天塌不下来。欧洲大战一打几年，不但大学没有办，其实中学、小学也都没办。鸡飞狗跳的。

江：改是个艰苦的工作，你们屁股坐不下来。

毛：学问不是在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讲了吗？他们学文，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幸运的，你上了三年了，你是黄岗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段斗争，历史就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

江：读那些厚本本，几十种。而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书都成了参考资料，辅助材料，他们老师的书才是正式教材。

毛：小学六年太长，中学六年太长，荒废无度。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一样不考才好哩！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谢富治同志，把他们〔学生〕统统都招回来，统统回学校，可能有些生了气，不勉强，把

“四·一四”留在学校里，“（清华）井冈山”反而在外面，这样不好，“（清华）井冈山”统统到人大会堂来。对“四·一四”的头头要有所区别，分别对待。

韩：主席，我问一个问题。如果几十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中国打起内战来，你也说是毛泽东思想，我也说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

毛：这个问题问得好，韩爱晶你还小，不过你问我，我可以告诉你，出了也没啥大事嘛！一百多年来，中国清朝打二十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什么刘少奇，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有毛泽东思想。

毛：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文化大革命好，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你看朱成昭[1]刚当了几天司令，就往外国跑或者“保爹保妈”，就不干了。聂元梓，攻她哥哥姐姐的不好来攻她。你那个姐姐也不那

---

[1] 朱成昭，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早期负责人，其女朋友是叶剑英之女叶向真，曾在1966年12月组织人将彭真从家中抓走批斗，把彭德怀从成都抓到北京。1967年年初，朱成昭当副局长的父亲在上海也被打成了黑帮，朱成昭思想开始保皇，反对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2月4日，公开炮打中央文革，由王大宾接任“东方红公社”的一把手。1967年7月，朱成昭和叶向真准备偷渡香港，被周恩来派人抓回，8月20日，朱成昭和叶向真被公安部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正式逮捕。

么坏嘛，聂元梓，哥哥、姐姐为什么一定和她联系起来呢？

周：我的弟弟周永爱跟王、关、戚混在一起，我把他抓送到卫戍区去了。

毛：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坐喷气式。

林：鲁迅的弟弟是个大汉奸嘛。

毛：我自己也不高明，读了哪个就信哪个。以后又读了七年，包括在中学读半年资本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马克思，只知道拿破仑、华盛顿。在图书馆读书实在比上课好，一个烧饼就行了，图书馆的老头都跟我熟了。

陈：韩爱晶过去就提过这个问题，有林彪同志这个毛主席的好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我不怕出修正主义。

毛：不能保证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后就不搞文化革命了，还是会有波折的。不要讲什么新阶段，好几个新阶段，我讲上海机床厂，又是什么新阶段。一次文化革命可能不够。

姚：这个问题，主席已经讲过了。

周：林彪同志主席著作学得好，包括苏联在内对马列著作都没掌握好，林副主席掌握了。

毛：党内出了陈独秀，党就没有啦？党犯错误，党还是有的，还是要革命的，军队还是要前进的。第四次王明路线那么长还不是纠正了，张闻天搞了十年也不高明。灾难多了，解放后又是多少次？我们这个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不要因为出了刘少奇、王明、张国焘，我们党就不伟大了。你们年轻人就是没有经验，上帝原谅你们。韩爱晶你问起我，我答复你了，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了不起，不要以为有我们这些人在就行，没有我们这些人天就掉下来了。

江：韩爱晶给我写几次信，讲这个问题，韩爱晶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脱离工农，二是脱离实际。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说几十年以后的事。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想得远好。这个人好啊！这个人好啊！我们有几种死法：一是炸弹炸死，二是病死，被细菌钻死，三是被火车、飞机砸死，四是我又爱游泳，被水淹死，无非如此。最后一种是寿终正寝，还是细菌嘛！薄一波差点死了，听说刘少奇也救活了，一种肺炎，一种心脏病，还有肾感染，四个医生和两个护士抢救，可以说脱离危险期了，你们听说了吗？[1]

大家说：没听说。

姚：历史发展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韩爱晶，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

韩：我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如果我对共产主义没有信心，我就不会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可是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波浪式的，不可能是条直线，难道中国革命，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共产主义就是一条直线走向胜利吗？不会出现反复吗？不是波浪式吗？按照辩证法肯定有曲折。

毛：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前进总是曲折的。一九二七年受挫折，二三次受挫折，胜了以后，又出现高饶反党联盟，庐山会议以后，出了彭德怀。现在有走资派，像蒯大富那个“彻底砸烂旧清华”，“四·一四”就不赞成，“四·一四”就说，教员也有好的，可你

---

[1] 抢救刘少奇，指1968年7月中旬，刘少奇病危，经过10多天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四名医生是指陶桓乐、黄宛、董长城、顾英奇，两名护士指李留壮和马小先。

们说的彻底砸烂，不是砸烂好人，而是一小撮坏人，你把含义讲清楚，他就驳不倒了，赶快把六七个领导找来，集中起来，你们今天晚上睡个觉，明天再开会，散会算了，以后再来。

韩：（握着主席手）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蒯：（握着主席手）主席，谢谢您，祝您万寿无疆。

毛：（走了又返回来对中央领导）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

在中联部一个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

（1968年7月）

删去了几个字。

---

[1] 马来西亚革命者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马来西亚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为此在1968年7月2日给中央、中央文革写请示报告，认为“我们不便发表”。报告中两次提到马共内部的路线分歧问题，希望“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得到党内解决。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两处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解放军报社《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等的批语

（1968年8月5日）

林彪同志阅后，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一阅。然后退还解放军报总编小组。此件[1]可以试行，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人民日报也要试作计划。而要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非征求若干基本读者的意见不能成功。

毛泽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

[1] 指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1968年8月5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七条：一、突出宣传军队帮助革委会的巩固和发展；二、大力宣传全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抓好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三、深入宣传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的伟大胜利；四、宣传国内外大好形势；五、加强对革命大批判的宣传；六、紧密结合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宣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十六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两周年，以及大办民兵师题词十周年；七、加强言论，写好社论等文章。与这份宣传要点一同报送毛泽东的，还有报社临时总编小组8月1日《征求对报纸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的意见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简报说，最近我们邀请了10个单位的14位同志到报社座谈，征求他们对报社最近一个时期宣传要点的意见。今后每3个月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

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1]的安排意见的批语[2]

（1968年8月5日）

（一）完全同意。

（二）郑维山[3]应参加领导小组。

（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毛泽东
八月五日下午九时

---

[1] 毛泽东最新指示，指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

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中央两个布告，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1968年7月3日的布告（即广西布告）和7月24日的布告（即陕西布告）。

[2] 这个批语写在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68年8月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周恩来对这个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参照广西等地的经验，我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如下安排：一、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10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二、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三、抓好典型。四、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五、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六、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

[3] 郑维山，当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对解放军报社两个座谈会情况简报[1]的批语

（1968年8月13日）

一

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

[1] 指解放军报社总编室1968年8月10日编印的《军报生活》第二九二期上登载的《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和《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两份简报，分别介绍了解放军报社1968年7月28日邀请部队10个单位代表，就今后怎样把《解放军报》办得更好的问题举行座谈会，和8月2日邀请西藏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一些同志，就同一主题举行座谈会的情况。

二

如恢复，此四字宜重写。[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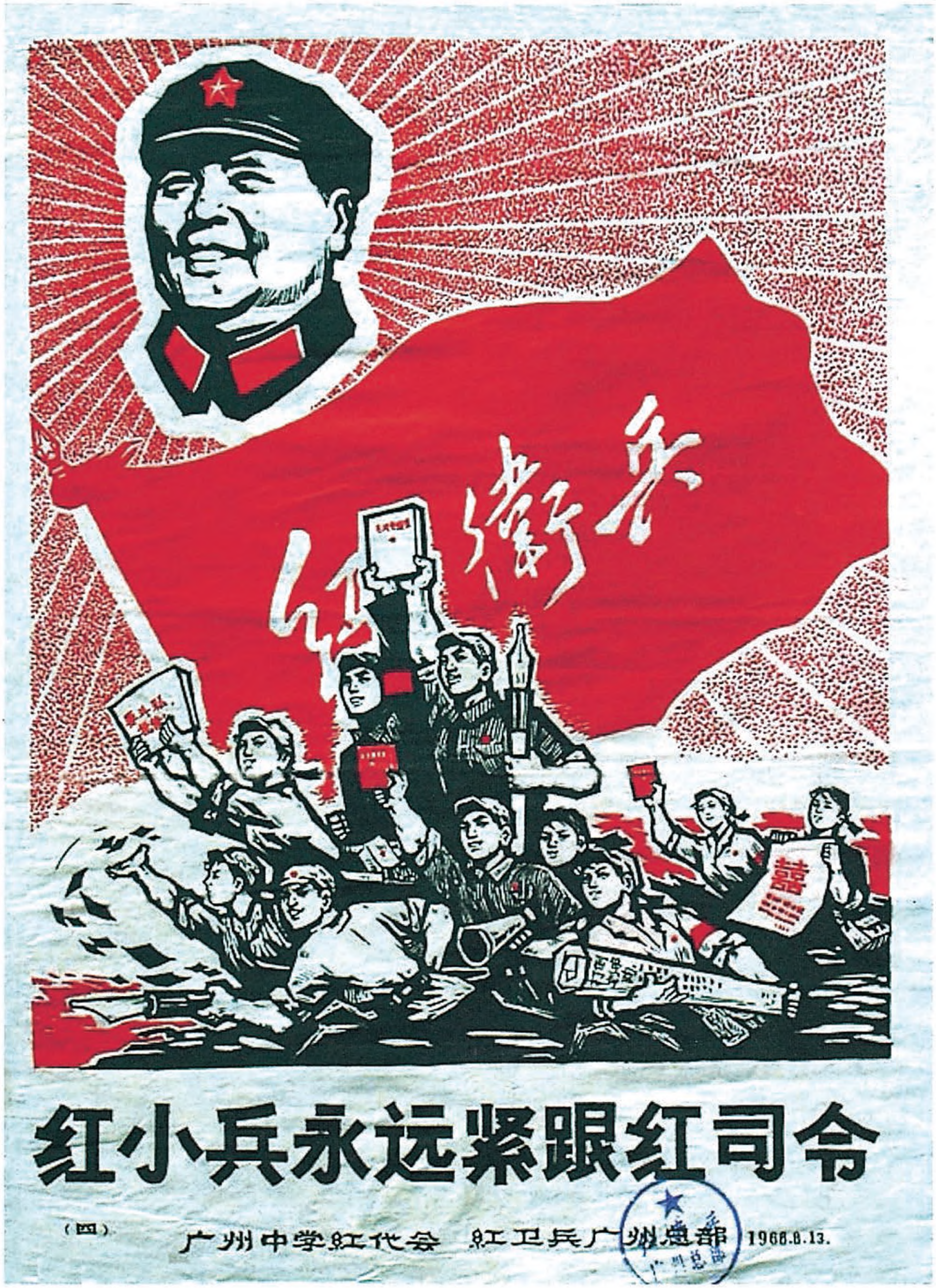
三

官僚主义问题。[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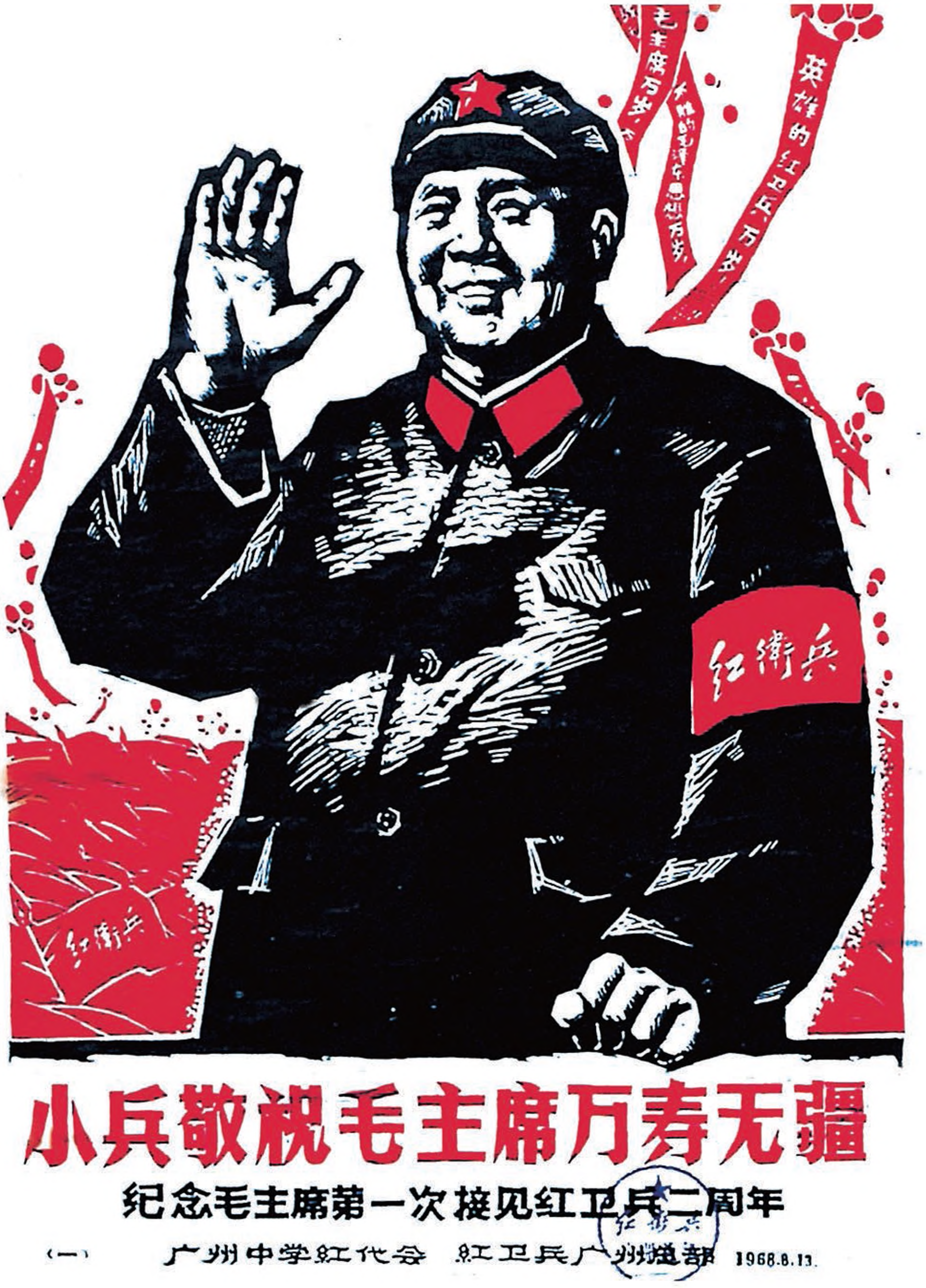
---

[1] 《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一条说道：“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在“思想战线”四个字下面，毛泽东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思想战线”是《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一个栏目，后来停办了。“思想战线”四个字是由毛泽东题写的。

[2] 《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中有两条讲道，“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在这两条下面，毛泽东都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红衛兵
红小兵永远紧跟红司令
（四）
广州中学紅代会　紅卫兵广州总部　1968.8.13.

红小兵永远紧跟红司令（宣传画）


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红衛兵
红衛兵
小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纪念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二周年
（一） 广州中学紅代会 紅卫兵广州总部 1968.8.13.

小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宣传画）

关于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一段话

（1968年）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1]

---

[1] 《人民日报》1968年8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社论还写道：“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完成面临的各项任务有重大的意义。”8月14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姚文元将这篇社论稿送毛泽东审阅时，曾在毛泽东的这段话旁注明：“这段引文第一次见报。”毛泽东审阅时，对这段话作了一点文字的修改，并批示：“照发。”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报告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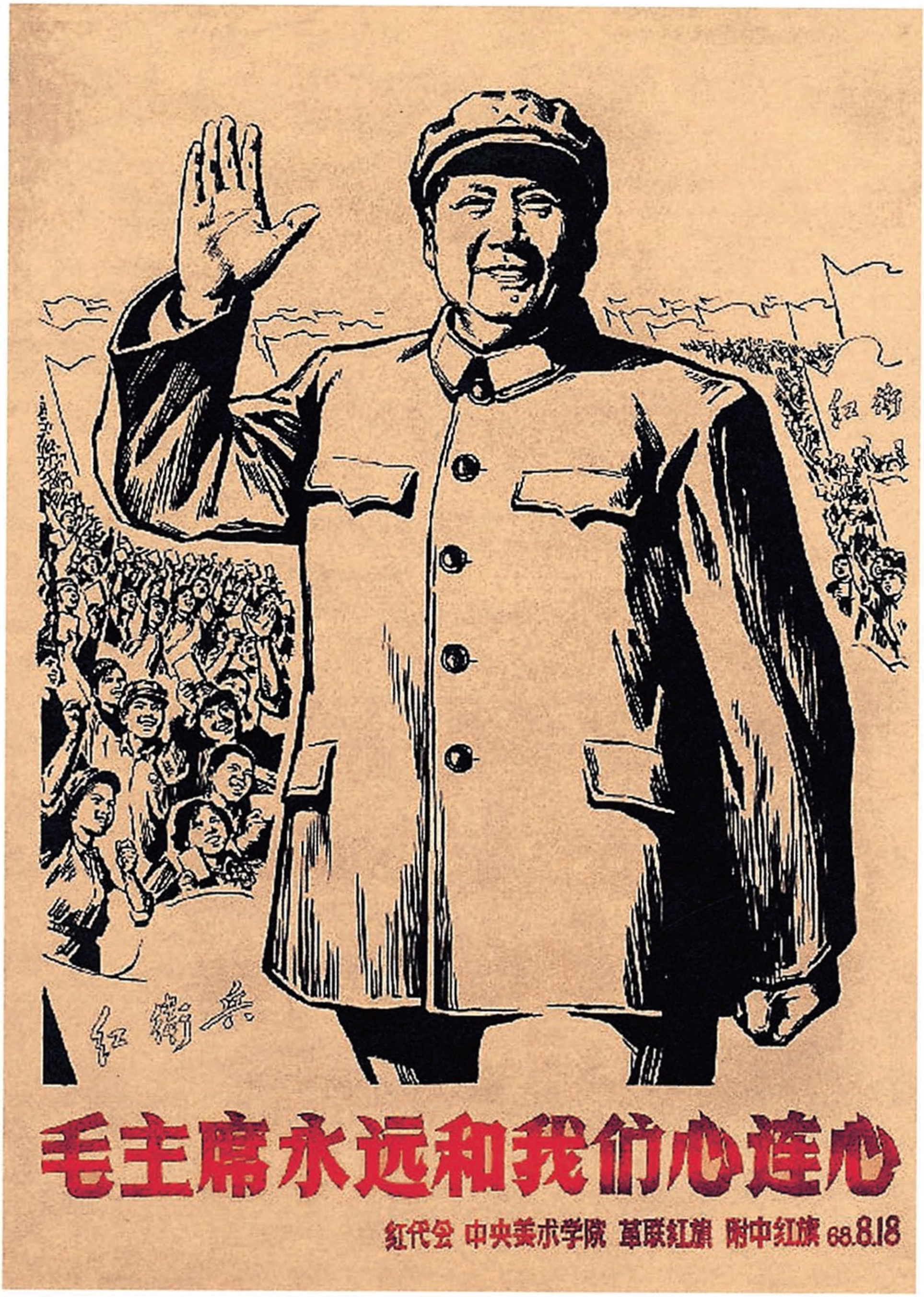
（1968年8月16日）

这个材料[1]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

[1] 指上海市革委会1968年8月14日关于落实两个布告、解决400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在宣传、学习、贯彻和落实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的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一、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要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二、解决“老大难”单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起来促头头。三、对“老大难”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要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妥善处理。四、注意发扬“老大难”单位中的先进因素，促使其改变落后面貌。8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红卫兵
红卫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
红代会 中央美术学院 革联红旗 附中红旗 68.8.18

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心连心（宣传画）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20日）

一

照发。

二

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工人为主体的、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认真搞好斗、批、改，就是根据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而来的一个革命的创举。

---

[1] 这篇社论稿是为祝贺福建省革委会的成立而写的，原题为《团结对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20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这篇社论在8月21日发表。

对电讯稿《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批语

（1968年8月25日）

一

康生、文元[1]同志：

二七工厂材料[2]，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

毛泽东

八月廿五日

---

[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题为《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的新华社电讯稿，载于新华社1968年8月24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这篇电讯稿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是去年10月成立的老革委会和各车间的革委会，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是今年6月20日重新成立的新革委会和各车间的党支部，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由于工厂两派分歧的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

二

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1]

三

既然车间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了核心作用，又要支部加强领导，岂不矛盾？[2]

---

[1] 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说，据“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开展大批判，也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匆匆忙忙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60%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无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二七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毛泽东在这两段话旁边画了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2] 新华社的这篇电讯稿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来加强领导，结果形成了两个中心”。在这段话下面，毛泽东画了线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派工宣队进学校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25日）

---

[1] 周恩来等1968年8月25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请主席予以批示。"本篇一写在周恩来等的报告上，本篇二是对周恩来等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周恩来等送审的通知稿写道，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的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进校前后，都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掌握毛主席的政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促进那里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有武斗的地方，坚决制止武斗。对两派组织，先作调查研究，不要匆匆忙忙地轻易表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后，要善于发现和团结那里面的学生、教师、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共同工作，推动教育革命。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军委、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

一

照发。

二

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那些还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以及那些还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的工人不要参加。

为准备发表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1]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1968年8月31日）

---

[1] 指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1968年8月29日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这篇调查报告说，最近，我们调查了上海工业战线工人技术人员的情况，发现有一大批工人技术人员分布在上海大、中、小工厂中，其中在数量众多的小型厂中，工人技术人员要占本单位技术人员总数的80%。他们和广大工人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力军。这支强大的工人技术人员队伍，将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理工科大学师资队伍的主要来源。学校要进行教育革命，必须改造现有的师资队伍。上海这支工人技术人员队伍，有很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有丰富的三大革命运动经验，懂得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此，完全可以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优秀者来担任大学教员。最近进大学的工宣队中，就有一批工人技术人员。可以肯定，随着学校斗、批、改的深入开展，工人阶级在教育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将愈益显著。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讲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句中的“史无前例的”5个字删去；将由工人技术人员来领导科学技术工作“为我国进行人类历史上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一句中的“人类历史上”5个字删去。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编者按，后来都没有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一

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对于这种人，也要从教育入手，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红旗杂志编辑部

一九六八年九月

二

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1]及文革各同志阅，退姚文元[2]同志办。

三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阅，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的批语和修改

（1968年8月）

一

照发。

略有修改[2]。

二

本报七月二十二日编者按[3]中说："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说错了吗？完全不错。这里说的是

---

[1] 这篇社论稿是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而写的，由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16日送毛泽东审阅，8月1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即本篇二，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此外，他还将文中"挑动工农斗学生"改为"挑动群众斗群众"。

[3] 指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所加的编者按。

“轻视工农”又有架子的那一小部分大学生，而不是指那些重视工农、愿意向工农学习的大多数大学生。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吗？

对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

一

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2]。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毛泽东
八月廿二日下午八时

---

[1] 本篇一、二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22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三、四是对姚文元8月23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五是对姚文元8月24日送审稿的批语；本篇六至十五是对这三次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姚文元1968年8月22日将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文中整理的毛泽东的两段讲话，毛泽东审阅时又作了一些修改，即本篇十一、十四中带引号的文字。这篇文章送审时，原题为《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加上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

二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1]

三

大体可以了。

四

除已写明是我讲的两段话以外，其余都不用粗体。[2]

五

照发。

---

[1] 姚文元1968年8月22日送审稿中说道：“正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才能发动这样一场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史无前例的”5个字，并写了这个批语。

[2] 姚文元在1968年8月23日送审稿上写有：“这是准备提交碰头会宣读的稿子。您加的一些段落，都用了粗体，以便同志们了解学习。如认为有的地方在发表时不宜用，请注明。”毛泽东在“不宜用”3字下画了一道杠，并写了这个批语。批语中所指的两段话，即本篇十一、十四中的两段引文。

六

一个伟大的斗、批、改的高潮正在到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有领导、有步骤地开进学校和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是这个高潮到来的信号。这个高潮，是经过成立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等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出现的，它将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引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七

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

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九

这个“独立王国”[1]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十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

---

[1] 指上文中提到的所谓“旧北京市委”的“独立王国”。

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十一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毛主席这个指示，指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和道路，是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锐利的武器。广大青年学生，要热烈欢迎工人阶级占领学校阵地，参加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十二

一切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当作人民群众中最先进、最有觉悟的一部分人。工人、战士、学校中革命的积极分子"三结合"，就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那种把工人当作"自己"以外的异己力量的人，如果不是糊涂，他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阶级异己分子，工人阶级就有理由专他的政。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

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十三

在这个过程[1]中，工人阶级本身会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充实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级革委会里去，不但管理学校而已。

十四

毛主席最近指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主席的这段话，是对斗、批、改阶段群众运动发展的总结，为我们完成工厂企业斗、批、改的任务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

---

[1] 指上文中提到的“工人宣传队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到大、中、小学去”“促进那里的斗、批、改”的过程。

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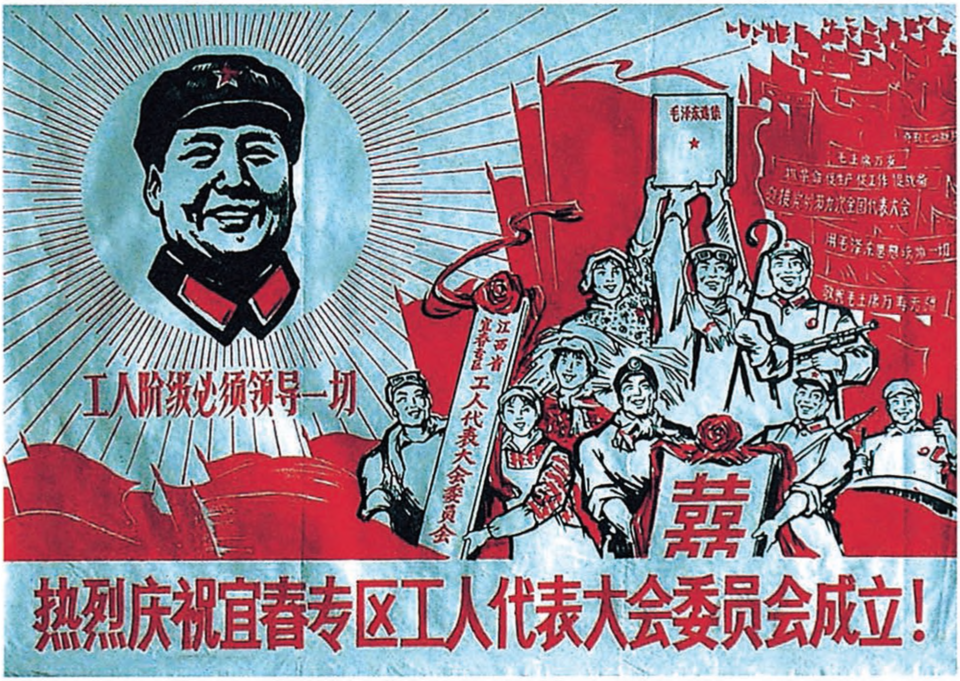
十五

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为整党创造了最好的条件。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阶级斗争的严格考验，广大党员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同群众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进，党内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了，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核心，这样，我们就能整顿好党的组织，我们就能实现毛主席指出的伟大整党目标："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1]

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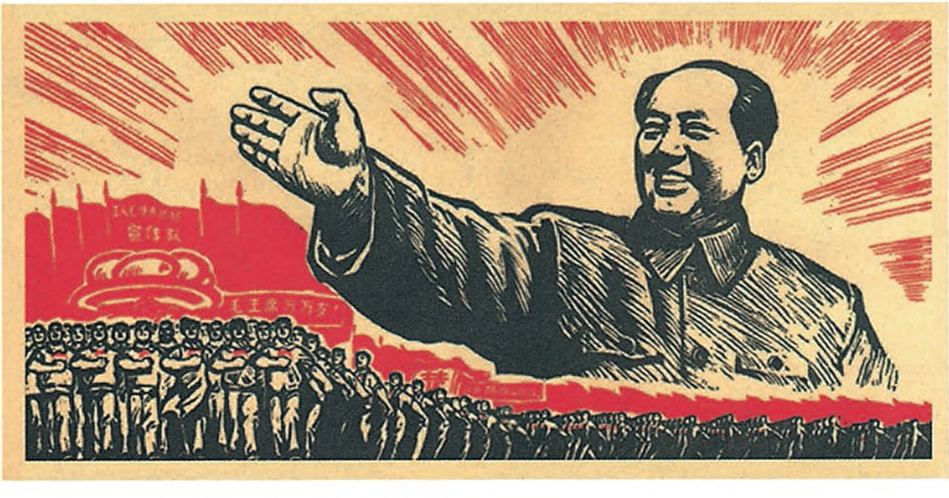
---

[1] 引号中的文字公开发表时用黑体字排印。



毛泽东选集
毛主席万岁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迎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江西省宜春专区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
囍
热烈庆祝宜春专区工人代表大会委员会成立！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宣传画）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批语[1]

（1968年8月）

此文可用。但从13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懵，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8月18日送审的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共分5节。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第四节中以下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发表在1968年8月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和9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毛泽东批语中说的“从13页起的两节”，指这篇文章的第四、五两节，发表前作了一些删改。

关于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驻军队院校的批语[1]

（1968年8月）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8月20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上。报告建议，对目前还“没有成立革委会，没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长期打‘内战’，存有不少严重问题”的53所军队院校实行军事管制。军管除派领导干部及一般干部参加外，拟从部队抽调一批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部分五好战士参加，组织强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学校。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并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对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8月）

一

照办。

二

辽宁省营口县水源公社各学校的教育革命，搞得比较出色。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

---

[1] 这篇《人民日报》批判组的调查报告载于人民日报社总编室1968年8月2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五九三期。8月31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将这篇调查报告报送毛泽东时说道：“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毛泽东审阅时，将调查报告的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本篇二是对调查报告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改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1968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越南人民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坚持人民战争，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作出了贡献。

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分割越南民族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在进一步扩大侵越战争的同时，大搞和谈阴谋。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中配合，力图使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的头号帮凶。

但是，美帝、苏修加在一起，也挽救不了美国侵略者在越南必然失败的命运。它们互相勾结、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企图，正在遭到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美帝、苏修越是勾结在一起，世界人民就越看清楚他们是一丘之貉。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大好。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深信，久经战争考验的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只要发扬彻底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必将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为发表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1]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

（1968年9月3日）

---

[1] 这是上海市革委会继1968年8月29日报送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之后，又报送的一个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说，上海机械学院的前身——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创办时，第一届招收的2000余名学生全是从工人、农民和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中选拔的。这批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的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阶级觉悟高，学以致用，冲击了旧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近，部分当年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这个学校附属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师生，在总结建校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后，对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一、理工科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必须解决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二、理工科大学的学制以二年至三年为宜。三、理工科大学还要担负起办好业余技术教育的任务。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今后的教师队伍，应当采取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工农学生和革命知识分子三结合的形式。社会上一大批在实践中有发明创造的工人、技术人员，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深入学校讲课。学生们也都有实践经验，可以走上讲台，互相交流。现有的教师应该分期分批地到工农中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均发表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

一

红旗杂志编者按：

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二

姚文元同志：

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

毛泽东

九月三日

建议普遍开拥军谈心会

（1968年9月4日）

建议将此件[1]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

毛泽东

九月四日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8月28日整理的一份信访摘报。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四川内江、福建福安和厦门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或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1968年10月4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信访摘报转发全军，要求凡担任“三支”“两军”的部队，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普遍开谈心会，对持不同观点的群众诚恳对待，多作自我批评，进一步密切军民关系，更好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对北京市召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8年9月4日）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
九月四日

---

[1] 指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68年9月3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北京市59所大专院校已于8月29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8月31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对重要问题表态必须经过集体讨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与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而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

三、在革命大联合问题上，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确是坏人的，要实行群众专政；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1]的批语

（1968年9月6日）

照发。

---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贺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而写的，经毛泽东审阅后，在1968年9月7日发表。

对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9月）

一

照发。

二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1968年9月3日将这份调查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时说道：“上海送来了几份调查报告，我看了之后，觉得这份较好。教育、文艺之外，卫生系统的革命也是一大问题。可否登下期《红旗》?”本篇一写在姚文元送审的调查报告上。本篇二至四是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加写的话。此外，他还将调查报告的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人民日报》9月14日予以转载。

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1]

三

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2]

四

整个教育制度[3]

---

[1] 调查报告中写道，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段话。

[2] 调查报告中写道，另一位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面，毛泽东加写了这句话。

[3] 调查报告在对江镇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进行对比后指出：“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几个字。

对《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1]一文的修改和批语[2]

（1968年9月10日）

一

建立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同时，还必须对大量从过去旧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争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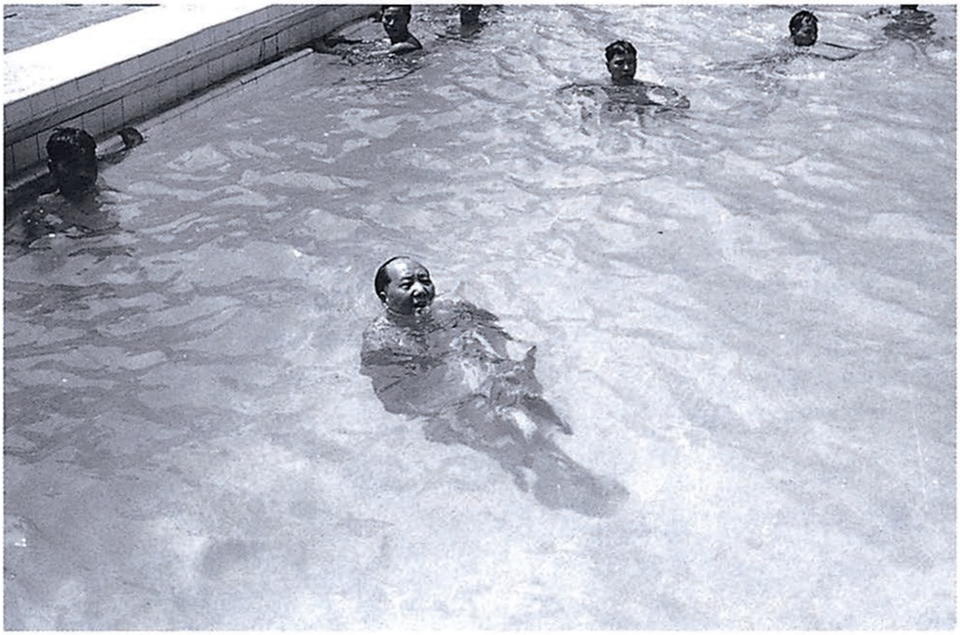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是为配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红旗》杂志编者按”而写的，原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发表在1968年9月10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2日《人民日报》。

[2]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二是他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9月10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目录页上的批语。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道：“送上第三期《红旗》杂志见报目录，请审批。评论员文章如不适用，请勾去。‘赤脚医生’一文中有一段主席重要文字，拟用粗体，附上一并请批。”评论员文章，即《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赤脚医生”一文，即《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都发表在《红旗》杂志1968年第三期上。

和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

二

照发。



1968年，毛泽东工作之余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

对姚文元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调查会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8年9月17日）

一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他要回电，请用文革名义给他去一个电话，说十五日信已收到，同意他们的意见。

毛泽东

九月十七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1968年9月1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今天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同我到了国棉十七厂，开整党建党问题调查会。这个厂是上海一个重要的革命阵地，领导成分已有很大更新。过去7个党委委员，有4个被打倒，2个被结合，1个靠边站。现在的革委会13个常委，有10个是党员，其中7人是从一般党员中起来造走资派的反，经过运动考验，被群众选入革委会的。因为领导核心经过补充新鲜血液，他们找的发展对象就较好。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要求入党的新党员由什么人批准？春桥同志和我都认为："像这样条件的单位，经过市革委会同意，革委会中的党组织（即13个常委中的10个党员）可以执行党委或临时党委的职能，有权批准新党员入党。不知可否这样试验一下，请予指示。"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

二

可以吧。——毛注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毛泽东等对霍查、谢胡电贺我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复电

（1968年9月17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我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你们热情洋溢的贺电，这是对正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的巨大鼓舞和巨大支持。我们对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最大的敬意。

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正在开展一场具有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意义的革命化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今年，恩维尔·霍查同志提出的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监督，丰富了这个运动的内容，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取得越来越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发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1]的决定和法令。这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的又一沉重打击，是对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斗争的巨大鼓舞。华沙条约早已成为赫鲁晓夫[2]修正主义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控制和掠夺东欧各国人民的工具，早已成为苏修叛徒集团用来同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3]作交易、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工具。最近，苏修叛徒集团纠集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修正主义伙伴，公然利用华沙条约的名义，武装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暴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和反动性。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集团，对侵略者采取了卖国投降的政策，可耻地背叛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其杰出的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对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华沙条约从事的种种罪恶活动，久已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十分钦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在这一斗争中所表现的马克思列宁

---

[1] 1968年8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3] 北大西洋公约，指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冰岛、意大利、葡萄牙12国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年8月24日起生效。希腊、土耳其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相继加入。1949年8月，根据公约规定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权力机构为部长理事会，最高军事机构为防务计划委员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设有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大西洋盟军最高司令部等，还设有核防御军务委员会和核计划小组等辅助机构。

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原则性。

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阿两国人民在革命的暴风雨中建立起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战斗友谊，是经受得住严峻考验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得更加坚强的七亿中国人民，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始终如一地站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边。如果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胆敢动阿尔巴尼亚一根毫毛，等着他们的只能是彻底的、可耻的、无可挽回的失败。

亲爱的同志们，苏修、美帝狼狈为奸，做了这么多的坏事、丑事，全世界革命人民是不会饶过他们的。世界各国人民正在起来。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红旗，在反对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紧随美帝、苏修的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携手前进吧！

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阿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七日于北京

对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报告[1]的批语

（1968年9月20日）

请林彪同志先看，我再看，然后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委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毛泽东

九月二十日

---

[1] 指周恩来和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8年9月19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中汇报了9月15日晚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其中讲到，这次全会的议程之一是推选中央革命委员会，在“九大”前作为党和国家的临时最高权力机关；参加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人数，连同能出席全会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在内300人左右。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68年9月23日）

林、周[1]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2]请碰头会议复。

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量办理。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三日

---

[1]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2] 指上海市革委会1968年9月22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经过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有条件并有必要在造反派中吸收一批优秀分子入党，使党增加新鲜血液。根据毛主席关于“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的指示，我们决定首先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吸收入党的人，必须是认真学习和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具备两条路线斗争觉悟，能够同革命群众一起向党内外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必须坚持斗私批修，进行自我批评，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断改造自己。196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望各地革命委员会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整党及发展新党员的有关指示，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各地具体情况，酌量办理，并作出适当的规划，上报中央。”

给周世钊的信

（1968年9月29日）

惇元兄：

此信今天收读，甚慰。前两信都未见，[1]可惜。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2]我不同意为个人作纪念，请告附小。对联更拙劣，不可用。[3]就此奉复，顺祝康好！

毛泽东

九月二十九日

---

[1] 前两信都未见，一次是1945年周世钊写到重庆给毛泽东的信未收到，另一次就是1968年周世钊寄到北京给毛泽东的信未见，以致毛泽东表示可惜。

[2] 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指1968年，周世钊读到各种毛泽东诗词注释本，致函毛泽东，请问应作何处理，哪些注释本比较好。

[3] 对联更拙劣，不可用，指1918年，毛泽东任湖南一师附小主事时手书，由学生刻在竹子上，悬挂在大礼堂的一副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1968年，有人建议再写，刻上。毛泽东表示不愿意为个人作纪念。遂此作罢。

对上海市革委会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报告的批语

（1968年9月29日）

此件[1]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2]及文革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
九月廿九日

---

[1] 指上海市革委会1968年9月27日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9月5日至12日，我们组织了3.1万余名产业工人，进入10个区的513所中学和1249所小学。在工宣队的领导下，全市中小学于9月16日开学，广大师生纷纷到校。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革命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此外，工宣队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目前，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正在组织工宣队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开展“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同时深入调查研究，为开展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作准备，摸索经验，树立典型，逐步推广。196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2] 林，指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周，指周恩来。

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

（1968年9月、10月）

一

姚文元[1]同志：

此件[2]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

---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

[2] 指《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载于《人民日报》总编室1968年9月29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文章说，今年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批语的主要内容。

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二

可用。[1]

---

[1] 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1968年10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为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而写的编者按语稿上。按语稿中说，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对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队员大会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68年9月）

太多。

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

[1] 周恩来等1968年9月11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写报告说，我们看了些材料，觉得似有必要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向他们打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请主席考虑，开这样的大会，是否必要，是否及时”。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37923人，拟在4个人中抽1人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的批语是对此而写的。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等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代表。

对林彪在国庆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1]

（1968年9月）

一

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

二

这一句不要。

---

[1] 周恩来等1968年9月28日送审的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第二页末段说道："全国成千成万的产业工人组成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配合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或者正在开进大、中、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并写了两条批语，即本篇一、二。10月1日，林彪根据这个讲话稿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上讲话。讲话发表在10月2日《人民日报》。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1]的批语

（1968年9月）

照发。

---

[1] 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而写的。其中讲到，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这篇社论在196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上发表。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革命群众一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来到工人阶级代表中，和他们一起欢度节日。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和华国锋等在一起。

1968年10月1日，毛泽东和西哈努克在一起。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
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8年10月13日、31日）

会议大概开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形势问题：一个国内，一个国际。国内要总结上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两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两种意见，一是不错，基本上是正确的；二是也有人说，不见得。十一中全会时我就说过，我在十月工作会议上，也打过招呼：不要认为会议通过了都能执行，在会上举手是一回事，真正闹意见是另外一回事。后来证明还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问题。

有一位同志叫张鼎丞[1]也没有发现有叛徒、特务、反革命问题，为什么没有来开会？是什么原因？邓老[2]你是很熟悉的。

（周恩来：大连会议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徐海东他们四个人，徐海东同高岗抱头痛哭，说中央亏待了他，没有他在陕北打胜仗，中央就站不住脚，这正是公布高岗当副主席的时候，他同高岗联盟有勾搭，值得审查。）

---

[1] 张鼎丞，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 邓老，指邓子恢，与张鼎丞曾长期在华中、华野共事，相互熟悉。当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

山东谭启龙[1]，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错误。山东不谅解他，现在还不能解决问题。山东要揪他回去斗，我们不让。

（周恩来：揪回去了，现在在济南。）

山东的同志要做说服工作。

湖北张体学[2]，是好同志犯了错误。回湖北检讨得好，群众就谅解了。群众都欢迎他。他还要检讨，群众说不要再检讨了。王任重[3]是内奸、国民党。陶铸也是历史上有问题。

湖南王延春[4]，这个人不行了。邓小平还没有发现他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就是发现他在七军开小差那回事。

（张云逸：他在红七军当政委时，情况紧张了，他藉口到中央去汇报工作，在崇义地方开了小差，叶季壮同志死前也揭发过此事。）

主要问题还是到北京后搞独立王国，他不服气，他说他不揽权，实际上他是刘少奇那个司令部里摇鹅毛扇子的。但是有时我还找他说几句话的，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是打敌人的。又没有查出来他历史上投敌叛变自首这一类问题。这个人一个是错误不小，一个是自己写了个自传检讨[5]，可以给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开除党籍，最好还是找点工作。一说工作，许多同志摇头。很大的

---

[1] 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2] 张体学，当时任湖北省省长。

[3] 王任重，原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4] 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及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5] 邓小平的自传检讨，1968年七八月间，邓小平写了一封检讨书《我的自述》，转给中央及毛泽东，全文分为“红七军工作时期”“在中央苏区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时期”“在北京工作时期”四部分。

工作也很难做了，我说给点室内整理材料之类的工作还可以吧！

同志们经验很多。可以设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还是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议议。比如浙江问题，“红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也是一个工作问题。

福建问题很大。韩先楚[1]你那里不是天下大乱吗？

（韩先楚：现在形势很好。）

看到了。你们的报告很好。工作一做，还不是解决了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怎么不能解决呢？

要总结经验。过去南征北战，解放战争好打。秋风扫落叶，一扫三年半扫完了。那时候敌人是比较清楚的。现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难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总比过去快一点。过去打了二十二年，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文化革命只打了两年半。

问题就是有思想错误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比如辽宁省三大派[2]，打了八个月，天下大乱。不是解决了吗？还是能够清楚的。

自己要多负担些责任，使下面轻一点。主要是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内部也夹一些敌人，是少数，是做好工作的问题。

肖克还是打过仗的，国庆节上了天安门，这次没有去，他是什

---

[1] 韩先楚，当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8月19日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

[2] 辽宁三大派，当时辽宁分为三派，“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八三一”），后经过联合，于1968年5月10日辽宁成功成立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是陈锡联。

么问题，我也不清楚。

（周恩来：他有段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县一个村庄打了一仗，向敌人交了枪，还成立了一个党。这次被造反派查出来了。）

哪个是李德生[1]？你们安徽的事件办得不错，你们整芜湖整得不错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舆论造得好。）

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就是要造舆论。好像一个发明，搞了几十年，不懂得造舆论。搞了几十年，就是造舆论嘛。不然哪里能搞起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群众，哪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群众，没有军队，谁收你这个党？

十一中全会讲，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结果他们就要武斗，不要文斗。一个学校两派斗，各有武器，一个工厂两派斗，两个中

---

[1] 李德生，当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8年4月18日安徽成立革命委员会。

心，一个部也是两派斗。

基本群众还是工农兵，兵也是工农。然后才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缺点是容易动摇，主要是没有和工农兵结合。

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军事院校，谁知道办了一百一十个“幺幺幺”，其中确实有“妖”。只怪我们自己，办那么多干什么呀？又没人管，叶剑英你不是管吗？搞四清不行，还是统统开进工人，开进解放军去。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是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工厂不整你们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么得了？比如北京一个木材厂，有那么千把人，是两个资本家合起来的。有的厂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还有新华印刷厂，北洋军阀时期它给印票子，日本来了给日本人印报纸传单。国民党接管的，共产党来了也吃得开，它都吃得开，有一部分三开、四开干部，其中有的是隐藏的反革命。我们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状态、精神状况也不好。隐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厂究竟是谁的呀？

按说农村要好一些，也有问题。没有搞好的公社、大队，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军、省地县革命委员会。有一个省组织了一

百万人的宣传队，解放军只有几万，百分之九十是贫下中农，就是广东。江西也不错。江西是个中等省，两千二百万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196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1968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的批语[1]

（1968年10月14日）

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2]。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0月14日送审的社论稿上。社论稿的副标题为《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现送上，请审阅。"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

[2] 姚文元1968年10月14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文排在第四篇，毛泽东审阅时，将它改作第一篇。

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968年）

一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广大群众，确立无产阶级对少数资产阶级分子的全面统治。[1]

二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2]

---

[1] 在1968年10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中，这句话用黑体字排印。

[2] 《红旗》杂志这篇社论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1968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社论；10月17日，《人民日报》又在第一版发表了这段话。

祝贺霍查六十寿辰的电报

（1968 年 10 月 15 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敬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在您六十寿辰的时候，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衷心的、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您是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缔造者，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阿尔巴尼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和您的正确领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阿尔巴尼亚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您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自力更生地建设社会主义，深入地持续地开展革命化运动，同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您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恩维尔·霍查同志，您的光荣的历史证明，您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英勇战士。

中阿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经过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考验的。这种友谊所产生的力量是无穷无尽和真正无敌的。让我们两

党、两国人民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各国革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彻底埋葬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苏修而并肩战斗！

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胜利和新的成就。祝中阿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祝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健康长寿。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

对发表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调查报告[1]的批语

（1968年10月）

照办。[2]

---

[1] 指黑龙江省黑河地区革委会、爱辉县革委会、爱辉公社革委会1968年9月15日写的调查报告《从三个大队教育革命的实践看贫下中农怎样管理学校》。报告说，爱辉公社拉腰子、松树沟、外三道沟3个生产大队的贫下中农，“于去年十一月开进了学校，一举夺回了农村教育大权，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他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们管理学校的做法是：一、高举一面旗帜——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坚持一条道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三、建立一支队伍——整顿、改造、重建了农村教师队伍；四、实行一元化的普及教育——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大开方便之门；五、组成一个班子——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2] 这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0月25日送审的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报告中说：“黑龙江送来两篇材料，挑选了这一篇，我觉得内容、写法都较好，准备再过三四天在《人民日报》用。”《人民日报》为发表这篇调查报告写的编者按指出：“这篇报告写得很生动，有对比，有材料，有总结，使人们对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毒害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好处，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贫下中农说：现在‘学校是咱们的学校’了，这不是对教育革命最大的赞美吗？”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发表在10月28日《人民日报》。

对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1]

（1968年10月）

一

印发全会各同志讨论。

二

此句此地不用为宜。[2]

---

[1] 本篇一、二写在1968年10月28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稿上；本篇三写在10月30日送审的公报稿上。这个公报10月31日经全会通过，11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2] 1968年10月28日送审的公报稿中写道：“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一句，并写了这个批语。此外，公报稿的这一段中还讲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唯一”二字。

三

有一点修改。[1]

---

[1] 毛泽东对1968年10月30日送审稿的修改，主要是删去了以下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1969年）

一

印发十二中全会[2]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有一点修改[3]。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1968年10月12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主席指示和各地各单位的意见，我们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两次，我们又作了多次修改。中央文革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先送主席看看，是否基本可用？请主席审查、修改、批示。”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写在康生等10月12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三是写在周恩来等10月26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上的批语；本篇四是写在周恩来等11月2日送审的这个决定稿上的批语；本篇五是写在周恩来等1969年3月1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六是写在康生1969年4月9日送审的党章草案上的批语；本篇七是对1968年10月12日、1969年4月9日送审的党章草案所作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改写的文字。《中国共产党章程》1969年4月14日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4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2] 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

[3] 毛泽东对康生等1968年10月12日送审的党章草案的修改，除本篇七外，还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3个副词；在两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二

已印发，让大家讨论为宜。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三

有一些修改[1]，待议。

---

[1] 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10月26日送审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稿的修改，主要是将决定稿中的“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指示”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对同时送审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毛泽东也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删去了“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一句中的“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删去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再次删去了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3个副词。此外，还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一词前，加上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四

在第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1]，因为托洛茨基和瞿秋白也谈不断革命[2]。

五

已阅。退康生同志。

---

[1] 指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修改。草案写道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革命来解决”，毛泽东审阅时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在1968年10月31日通过，11月3日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一起印发全党。

[2] 托洛茨基，原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05年提出“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六

在第七页上增加了三个字。

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1]，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

[1] 这句话原为："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

论述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一段话

（1968年）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

---

[1] 1968年10月3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中，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这个公报11月2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1968年10月30日）

大家有什么意见？有意见就发表。我没有什么话说了，林彪同志都讲了，同志们讲了很多。这次会议我看开得可以，开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不了解，经过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过去高级干部也不清楚，我们没有透风。过去各省来解决问题，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事情。在这次会上有犯错误的同志说明问题，同志们质问他答复。质问再答复，比较清楚了。这件事要说小嘛也不算小，要说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种自然现象。他们有意见嘛，总是要讲嘛。几个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讲一讲也是允许的。党的生活也是允许的，是公开讲的。两个大闹就是公开讲的嘛。有些细节，过去我也不太清楚。细节如来往多少次，有过什么交往，不要过分注意这些，不要把党内生活引到细微末节。不注意大问题就不好了。这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天就塌下来?! 地球就不转了?! 照样转，还能不转吗?! 我倒是佩服邓老，一直顶住。要是我，就不理，结果你还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评。他早就有自我批评了，比如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就有自我批评了，有些老同志将来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谭启

龙、江渭清[1]，过几年以后，大家气消了，也可以做点工作嘛。不做主要工作，还有其他一些人，身强力壮，将来总得给点事做吧！邓华[2]来了吧？（邓站起来）好久不见了。在四川几年没有人说他不好，不晓得红卫兵又把他关起来了，你这个人跟彭德怀犯了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黄克诚、谭政[3]。犯错误的人，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要给他时间，直至多少年。因为群众还要看他的表现嘛。

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稳、准、狠嘛？稳，有右的，稳就不稳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过了火。重点就是“准”字。否则，不准，稳也稳不了，狠也狠不起来。要调查研究，要注重证据，不要搞挂黑牌子、喷气式，不要打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写了湖南一篇文章，对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乡，其实几十年都不搞了。红卫兵就按

---

[1] 谭启龙，1970年复出后历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1972年4月起历任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江渭清，1974年年底复出，中央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历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2] 邓华，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邓华因彭德怀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0年转业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业机械工作。

[3] 黄克诚，1959年8月，庐山会议上，黄克诚与彭德怀等人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被解除军委总参谋长职务，1965年，黄克诚任山西省副省长，分管农业。谭政，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60年9、10月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定性为“在总政结成反党宗派集团”，1961年1月后，被撤销了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65年1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1975年8月复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

那个办法逐步升级，挂黑牌子、搞喷气式，还有各种各样的。对特务、汉奸、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要调查研究，注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喷气式那一套。这样结果并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1]嘛。过去对敌人俘虏也不搞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冯友兰[2]你不叫他搞唯心主义一套，我看也难。还有一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对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办法。如薪水每月只给二十四元，最多的给四

---

[1] 杜聿明，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1959年被特赦，其女婿为美籍华裔诺贝尔得主杨振宁博士。王耀武，著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军事才能突出，在济南战役中被俘，1959年被特赦。两人都被粟裕将军所俘。

[2]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年末至1949年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39年到1946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6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十元，不要扣得太苦了。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吴晗，可能还有某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一问他们。在坐的范老[1]，也是搞帝王将相，郭老[2]也算一个吧。那时没有别的书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类的。要反帝王将相，还要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不然人家问你答不出来。我可不是劝你们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将相。你们还是按总理讲的，按那几个文件去搞。我也不赞成青年学生去搞。少数人去搞。比如范老，你不搞，帝王将相不就绝种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将相，而是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阶级队伍，对这些人你们要注意，有好的，中间的，极右的三种。我说的对右的，应当如何对待他们。世界上总有左中右。没有右，你左从哪里来呀？没有那么绝。统统是左派，我不赞成。哪有的事？那样纯也不见得。我们的党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较纯了。从来没有这样搞过。但太纯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不参加就是缺点。所以我们还是推荐各地把他们选作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派嘛。你对九大代表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不那么符合，可以协商嘛。有少数人参加有好处。

现在情况同两年前十一中全会时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运动还没有完，就是九大开过了，运动也不见得马上就完。因为这涉及到每个工厂、每个学校、机关。我今天就讲这么一点。

注意政策，注意稳、准、狠中的准字。总还有一些不那么准的，狠过了头的，也有太稳了狠不起来的。

比如上海同志讲，还存在有“老大难”的问题。几百万人的城

---

[1] 范老，指范文澜。

[2] 郭老，指郭沫若。

市，不平衡的状态哪里都存在，不平衡是自然现象，北京也是。

对学术权威不要搞得过分。

对老同志犯错误的，条件不那么符合，用协商的方法，选他们当九大的代表。一个代表大会有不同意见，是好事。基本部分能反映工农兵意见就好了。你们谁有话，谁就讲。（当时李、朱、陈表态，略）滕代远搞湖南农民运动，你当什么县的委员长，叶得会就是在你手里杀掉的嘛。这个人是前清的翰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我看杀掉不那么妥当。你们各省都有，我总想找个机会给同志们讲讲，就这一次讲吧。

对大知识分子，要给他们出路。翦伯赞、冯友兰是放毒的，我们对他们就是批。批是要批的，也是一批二保，给他们碗饭吃，叫他们受工农兵再教育。

还有□□□，也是权威。这些人我们是保的。对这些人不要过分，会议上讲一讲。个别讲不行，报纸写社论也不行，一写他们就过关的。不批不行，批还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校长不一定当了，官不能做了，教授的头衔还得有，好领薪水。广东有个杨国荣、赵吉安，这两位是尊孔夫子的。拥护孔子的，在座的还有郭老。我看范老你基本上也是尊孔的，你那个书上还有孔子的像。冯友兰也是拥护孔夫子的。我这个人有点是新兴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是代表奴隶主的。我同郭老在这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我不赞成。范老把孔子也作为新兴阶级的代表。这是古董，我劝同志们不要研究这一套。

人家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不赞成。天津有个杨□□说老子是唯心论者，我就注意了这个人，调查一下什么人。原来是个大右派。上海周谷城、刘大杰，刘著一部中国文学史，周写了中国通

史。谭家祯是搞遗传学的，你们斗得很厉害吧？这个人是搞摩尔根学派，改了可以用，不改也可以。资产阶级的遗传学家，全国也没有几个。苏步青，复旦大学教授，数学家，对这些资产阶级学者也不要太过分了，我讲的就是这一点。

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准字。对老同志，一批二保三看。保就是帮助，看就是观察他的表现。我看改也可以，不改也可以。不能强迫人家改。地球照样转，胡弦不能拉得太紧了。对学术权威要注意，交给学生七斗八斗他就没命了。薪水扣了之后，有的只给二十元，多的四十元，他一家老小要吃饭嘛。我们无产阶级对旧社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还得养一批。

至于民主党派，有人提议不要，为甚不要？不如要一些好。因为问题决定不在民主党派，而在共产党里边。民主党派就是有问题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不出刘邓陶之类，民主党派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与其要他秘密地搞，不如让他公开地搞。对政协、民主党派现在还没有取消。至于是否要，这次还来不及讨论。这次有人提不要，考虑一下，下次会议再议。要不要，你们考虑考虑。我们派出做工作的人，也不太好。比如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少数人研究帝王将相，为了反帝王将相，要搞一点，比如科学院、大学等。关于大学开社会科学学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经济学、哲学、文学之类，这些东西十八九年还没有解决，没有什么好结果。读四五年大学，搞社会科学却不懂得马列主义，不懂阶级斗争，还不如劳动锻炼几年。先搞阶级斗争，再回去搞两年。大学还有两三年，不是五年吗？已经两年了，再搞两三年就走光了。我相当赞成斗、批、走。总要走吧。这批他们的方法。他们没做工，也没有种地，大学两年不招生让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

上海的同志有什么意见？还有北京的？

此人叫王洪文，站起来看看。上海工总司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长。前年安亭事件是他搞的。这次会，有年轻的同志参加很好，但太少了，还有尉风英（尉站起来后问了年龄）哪一位是刘殿英呀？（刘站起来）你多大年纪？（刘答：三十二岁。）你好像是个军人，他还是青年嘛，年轻的是你们三位代表了，还有年轻的没有？（周恩来：还有青海的达洛三十八岁，藏族。）你会讲汉语吗？（达洛站起来答：会。）你是真藏族还是假藏族？（达洛答：真藏族。）

新疆，我讲过你们那里团结起来，你们那里还有些问题。哪个是龙书金？（龙站起来）你还是我的老乡咧。还有王恩茂。你有些做法很笨，到飞机场搞欢迎那一套干吗呀？结果搞得一派赞成，一派反对。总有人给你出主意，摇鹅毛扇子的。

还有陈永贵（陈立即站起来），你那个打扮还是农民的本色，大寨也有灾难，每天一万人参观，不影响粮食生产吗？（陈答：很好，对我们是个促进。）

冼恒汉，广西佬吧？你认识韦国清吗？（冼答：不认识。）你们都是红七军的吧，怎么不认识？（冼答：都是兵。）不要老死不相往来。

青海的张江霖，久闻大名，未见其人。你在哪里？（张答：四川达县。）多大年纪？（张答：五十二岁。）没有那么大吧，虚报年龄。

不要认为四方面军出了一个张国焘，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谁说四方面军就没有好人？在座开会的就有很多四方面军的嘛，没有那回事。

不要以为中央出了个陈独秀，就没有好人了，陕西出了个高岗就没有好人了。共产党出了个陈独秀，认识他的人不少，总理认识

吧？（周恩来：康老也认识。）将来写党史没有陈独秀的名字不好。

开始是他，后来不好，他整个思想是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不要以为我们这个党出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贺龙等人，就说我们党不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看不能这样说。坏人是有的，开始不是以坏人面貌出现的。井冈山两个师长范□□、杨□□，还有两个团长都叛变了，有这么多叛变的，井冈山矮了一截吗？没有。我前几年去过，还是那个老样子，还是那么高。

这次又清出了刘邓陶、彭罗陆杨这些人。邓小平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应该说，邓小平同刘少奇有区别。事实上也有点区别。要开除一个人很容易，我们这些人一举手还不容易！你们要开除，将来开除好了。我是有保留的。至于怕他造反，我看不要怕。他造不起来。邓小平的特点是太脱离群众了。我这个思想可能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我给他讲几句好话。邓不过是摇鹅毛扇子的，真正决策的还是刘少奇。八大时搞招降纳叛，七大时审查代表，是刘少奇、彭真他们搞的，他们在延安召开了一个白区工作会议。

过去说对贺龙是一批二保，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代表。现在看来不能保了，因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从成钧、许光达、廖汉生等的揭发材料看来，他是破坏我们这个军队的。他背地搞篡军反党企图是有的，但是没有来得及。有贺龙、刘震、王尚荣、许光达这些人。不要扯远了，就到此为止，散会。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1968年11月4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1]

---

[1] 这是毛泽东1968年11月4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的一部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用黑体字引用，载于1968年11月2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和11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1]

（1968年11月10日）

一

一个是钢铁，一个是机械，一个是军事工业。原料不够的，还要有些进口，但主要是靠自己。有了钢铁，就可以搞机械工业；有了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就可以搞军工厂。一个国家的武器专靠外国是很危险的。

二

自己搞，有个十年八年，最多十几年，就可以有个初步基础。要树立自力更生的思想。什么都靠外国顾问，什么都要进口，我看不是个办法。我们的国家吃过这个亏。蒋介石那个时代，他是什么都不搞，一切靠外国。那个时候，包括清朝末年，几十年只搞到年产几万吨钢。所以他丧失人心。他跟日本人打仗也好，跟我们打也好，主要靠美国。过去是靠英国，后来靠美国。他现在呆在台湾，有时也骂美国，但实际上离了美国，他一天也不能活。

---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三

我们现在比蒋介石统治的时候有些进步，但是和别的工业国比较，还差得很，在许多方面还不行，更不要说工业产值按人口比例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美国、加拿大和苏联等比了。有些方面有所前进，有些方面我们还要赶路。如果发生战争，那也没有办法，只好打了再说。

四

希望你们几十年后，不仅政治上，而且经济上、军事上都不靠外国，不靠任何外国，靠自己，我是说基本上靠自己。要是十几年做不到，更长一些时间也可以。

有帝国主义存在，总要出乱子的。你们的外长来的时候，我对他说，你是搞外交的，什么叫全面彻底裁军，有这么一回事没有啊？事实相反，叫全面彻底扩军，全面彻底裁军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情。

对军委办事组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1]的批语

（1968年11月14日）

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

---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11月13日向毛泽东等转报的这份情况简报，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五连在某地“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的情况。1972年五六月份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曾将此件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在反映慕中岳编著中国历代战史的《要信摘报》上的批语[1]

（1968年11月15日）

一

送黄永胜[2]同志酌办。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1968年11月14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四〇八号上。摘报说，武汉市参事室研究员慕中岳（原国民党政府军少将，起义于川西）致毛泽东一信称："我有不少危害人民的罪行。为了对党立功赎罪，从一九五七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止，把东周晋楚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作战的镇戎战役，其间每个朝代的主要战役写成了初稿，共三十一卷，二百七十万余字。"他还说，"战役初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小将撤走。现将自己所记忆的每卷情况制成表和汇编成'中国历代战史'编著情况简介，向主席汇报"。毛泽东阅看时，在这句话旁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2] 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

如可能，可找来看看。

赞成越南又打又谈的方针[1]

（1968 年 11 月 17 日）

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可以谈，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它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是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

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日本从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还得到了发展。

---

[1] 这是毛泽东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谈话的一部分。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匀，内部就要闹乱子。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如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到别的陷阱里去。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一九六六年，我在杭州同胡志明主席谈话，那时美国对北越已经又打起来了，但还没有恢复轰炸。我说美国大概打到今年就差不多了，因为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不管哪个总统上台都有这个问题：它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现在退出？我看继续打下去它的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的国家都没有参加打，这同朝鲜战争时的情况不同。日本大概不会参加打，它经济上帮一点儿忙是可能的，制造军火它是赚钱的。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它不但在美洲、欧洲把兵力分得这么散，就是在亚洲也是把兵力分散的。我原来不相信它会打北越，后来它轰炸北越，这话不灵了。现在它不轰炸了，这话又灵了。也许它又要恢复轰炸，我的话就又不灵了。但总有一天要灵的，它又要停止轰炸。所以你们做几种打算，我看是好的。

总而言之，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是没有进攻北越的，它也

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它是留了一手的。它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它也不“穷追”。所以它那是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它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它是知道的，但它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至于我们在你们那里的现在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可以撤回来，你们讨论过没有？如果它再来，我们再出去嘛！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这和你们的飞机利用中国的飞机场一样，需要利用时就利用，现在不需要了就不利用。大体就是这样。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美国人说话不算数。约翰逊[1]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一百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

还有一点，是南越傀儡政府非常害怕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美国有人说，真正有效的，在南越人中有影响的，不是西贡政府，而是解放阵线。这话不是在美国的国会里讲的，而是记者报道的，但谁说的又不讲名字，只说是所谓美国官方人士。这话就提出这么个问题，在南越谁是真正有威信的政府？是阮文绍还是阮友寿？所以，名义上美国吹阮文绍怎么了不起，并说他不去巴黎参加谈判，实际

---

[1] 约翰逊（1908—1973），美国民主党人，1963年至1969年任美国总统。

上不是那么一回事。美国知道没有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参加谈判，就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8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在你们英雄的国家解放二十四周年光辉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伟大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四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发扬了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精神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种种阴谋诡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近几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持续地开展了群众性的革命化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阶段。这个运动，大大地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的革命，加速了生产的发展，加强了国防，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

级专政。你们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大旗，坚决支持世界革命，坚持不懈地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全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苏修叛徒集团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你们无情地揭露了苏修的侵略面目和美苏勾结的罪恶阴谋，毅然地宣布退出苏修一手控制的、已经变为侵略性的、反社会主义的华沙条约[1]。这一革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苏联人民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苏修叛徒集团。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伟大的社会主义明灯，放射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强堡垒。中国人民对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的英雄气概表示无限的钦佩，热烈地祝贺你们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亲爱的战友们！世界革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世界人民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发动猛烈的进攻。美帝和苏修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我们坚信，中阿两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被美帝、苏修和他们的走狗所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结成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必将粉碎美帝、苏修妄图霸占世界

---

[1] 华沙条约，指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八国1955年5月14日在华沙签订的条约，同年6月4日起生效，有效期20年。条约宣称将致力于“国际和平和安全”，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条约生效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1968年8月，苏联以华沙条约组织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的阴谋，必将推翻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胜利是一定属于全世界革命人民的。

中阿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的伟大战斗友谊，是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经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我们再次向你们表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七亿中国人民，誓作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坚强后盾，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的反帝反修斗争。让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国军队在反对美帝、苏修及其走狗的共同斗争中，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学习，携手前进！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关于战争与革命的问题[1]

（1968年11月28日）

一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阵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

希尔（以下简称希）：我看它们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它们现在面临极大的困难，看来它们一时不会打，至少它们现在还没有这么一个力量发动这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大多数人是有这种看法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由于它们已失去判断的能力，有发生很大冲突的危险性。但是总的来看，它们暂时还发动不了这场大战。

毛：要打仗，美国、苏联这两个大国可以打，其次是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战败国。至于英国和法国，它们不大想打。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戴高乐[2]的军事预算还减了一点。

毛：就是日本和西德，现在也看不出它们想打仗。西德想吞并东德，统一德国，日本想收回冲绳。其实日本还没有独立。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主席希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戴高乐，当时任法国总统。

周：美国在军事上控制它们，在那里有那么多军事基地。

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不晓得这些看法对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政治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搞几年后就起来了。

周：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

毛：他不承认凡尔赛条约。当时这些国家的工人、知识分子、学生还听政府的话。德国那么大的一个共产党一下就垮了。

周：意大利的共产党垮得更早。

毛：社会民主党也完了。希特勒成立了国社党[1]、冲锋队。

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了两年后才动手，才参战。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二十万兵，主要是在西德。美国在南越有五十万兵，在南朝鲜有两个师共七万多人，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也有。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它的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一个是在欧洲，一个是在亚洲，打些小仗。当然垄断资本家还是有它的打算的。

周：可以赚钱。

毛：长期不打仗，垄断资本家就不高兴，包括澳大利亚的垄断资本家在内，也希望出点兵，但兵却不很多。

---

[1] 国社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二

毛：这样看，它们正在准备扩大战争，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的国家。从这些情况来看，似乎是要打仗了。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也不强加于你很快回答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可以观察这个问题？在一年之内，我们再会面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但是，人民的觉悟也要估计到。

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在南越的美国军队很高兴，还欢呼，这说明他们的士气不那么很高。

日本从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经二十三年了。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它们不但有常规武器，而且有原子弹。这个东西不大好碰，它们自己也知道。赫鲁晓夫[1]的理论是核战争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胜利者。美国也这么说。这两个大国是核国家。我们这个国家，还可以说是无核国家，这么少一点核武器不算数，要打只能是用常规武器。因为我们既不是美国的参谋长，也不是苏联的参谋长，搞不清楚它们究竟要干什么，只能从一些表现来看问题。这两个国家的人口相当，真正要打大仗还会感到人力不足。现在打个中等规模的仗，比如今天在越南打的仗，美国都感到人力困难，特别是飞行员。

---

[1] 赫鲁晓夫，曾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三

毛：从你们国家到香港要多少时间?

希：飞行要十多个小时。从澳大利亚到香港有四千五百英里，大概七千多公里。

毛：这个世界我看要统一。又是英里，又是海里，又是公里，又那么多语言，但语言一下统一不容易，只要世界统一了就好办了。这个地球总有一天要统一的。

过去的蒙古、西方的罗马、亚历山大、拿破仑、大英帝国，现在的美国跟苏联，都想统一世界。希特勒也想统一世界，日本人想统一太平洋，都没有得逞。这种可能我看还没有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强迫世界各国人民接受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统一方式。第二种，世界各国人民起来革命，然后联合起来，我看会统一得了的。由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来统一世界恐怕也不容易。打一场世界原子战争，把世界人口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由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来统一世界？但是这两个国家人口少，一分散就不够用了。它们也怕打原子战争。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怕消灭本国的人口。第二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法国、西德、日本、意大利，恐怕也不愿意打。最后恐怕还是得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由各国人民革命，然后自由联合。什么美元、英镑、澳元、法郎、马克、卢布，都统一起来，还搞这些差别干啥呀?

越南战争跟朝鲜战争有个不同之处，整个欧洲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英国、法国、土耳其、比利时都参加了。

我只出这么个题目。我也考虑一下，是不是请你也考虑一下这

个世界问题，战争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

同意转发北京军区贯彻执行“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68年11月）

可转发。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党委1968年10月29日的这个报告中说，我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使部队进一步锤炼了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发挥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勤俭节约取得了新成绩。其中，今年全军区共冻结、压缩、削减经费7300多万元，去冬今春节约取暖用煤9万多吨，高速度、高质量地兴建了一批中小工业。11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时写道：“军委办事组讨论，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拟转发全军。”毛泽东在这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语。

对《人民日报》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等文章的批语[1]

（1968年）

此件照办。

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2]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3]似也可发表。

---

[1]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经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姚文元的这个报告上。12月5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湖北省宜昌地区革委会、长阳县革委会、长阳县人民武装部调查组《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一文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

[2] 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即开辟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从1968年12月2日专栏第七期起，增加了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开始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这个讨论专栏后来一直延续到1976年8月，共一九七期。

[3] 指著名教育家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

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1]的批语

（1968年12月1日）

一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新华印刷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新华社记者关于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报告说，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对全厂已揪出的六十八名阶级敌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反复调查、反复研究、反复核实的基础上，根据阶级敌人罪恶的轻重，坦白交代的好坏和悔过自新的表现，做出恰如其分的定案处理，给予他们不同的出路”。1968年11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将这个报告报送毛泽东等。本篇一是毛泽东写在北京市革委会送审报告上的批语；本篇二、三是毛泽东在新华印刷厂经验报告中加写的两条注。12月3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发给各地参考。关于北京新华印刷厂揪出所谓“六十八名阶级敌人”问题，中共中央1979年9月28日批准的北京市委、国家出版局关于为北京新华印刷厂问题彻底平反的报告指出，“四人帮”1968年在北京新华印刷厂炮制的那个假经验文件，应予否定；强加给该厂广大干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所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应予平反昭雪。

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二

这个厂[1]有三千工人，连家属共一万人。

三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毛注[2]

---

[1] 指北京新华印刷厂。

[2]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中讲到，这个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过去在运动中被当成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而这个人出身很苦，旧社会曾经要过饭，大家认为他本质上还是好的。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各连队派代表参加的会上，他进行了检查，绝大多数同意解放他。革委会还准备在全厂范围内让他作检查”。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注。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

（1968年12月19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站在反美斗争最前线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八年来，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发扬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战争，消灭了美伪军和仆从军大量有生力量，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打下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在越南的失败，正在大肆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垂死的挣扎。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帮助美帝扑灭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正在加紧同美帝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但是，美帝、苏修的一切阴谋诡计，在久经考验的越南人民

面前，是不会得逞的。

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我们相信，三千一百万英雄的越南人民，在其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国侵略者赶出越南国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

[1]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在中央军委一份复电稿上的批注[1]

（1968年12月）

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毛注

---

[1] 中共中央军委1968年12月关于同意核试验中使用飞机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的末尾，写有“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口号，并写了这个注。

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农村社队领导班子调查报告的批语

（1968年12月）

建议将此件[1]转发各地参考。

---

[1] 指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1968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报告说，为作好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准备，军区各部队组织1100多个调查组下去调查。从已调查完的34个县的3598个社、队领导班子情况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好的，占20%左右；二类是中间状态的，占60%左右，这类班子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三类是不好的，大体上占13%～15%，这类班子严重不纯，基本上是坏人掌权。调查情况表明，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领导班子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重点。支农部队应根据领导班子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突出重点，集中力量打歼灭战。12月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了这个报告。

对国防科委关于发射“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68年12月）

照办。

---

[1] 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秉璋等1968年12月7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写报告说，遵照毛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4月批准的“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计划，应继续用两发试验弹进行全射程飞行试验。绝大多数工人和技术人员确信可以保证总装质量，要求尽快进行飞行试验，向“九大”献礼。特此报告，请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中央军委办事组12月12日转送的送审报告上。

对《人民日报》转发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1]的批语

（1968年12月）

可发。[2]

---

[1] 指《甘肃日报》1968年12月10日发表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说，甘肃省会宁县部分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纷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决心把自己锻炼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目前，全县已有178户932人分别到13个公社的生产队安家落户。12月22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了这个报道。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2月19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姚文元在报告中写道：“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以执行‘来一个动员’。”姚文元送审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话说得很对。”“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道：“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参加农业生产，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文中的“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一句。《人民日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

（1968年）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1]

---

[1]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为转载《甘肃日报》一篇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而发表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8年12月）

一

有一点修改，付讨论。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姚文元1968年12月17日送审的通知稿上。通知稿第二条写道："在提到敌人的名称时，应遵照中央历来文件中所明确规定的用语，如：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句话，即本篇二。通知稿第四条中写道："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犯错误的人的子女，也要多做思想教育工作，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使其中少数坚持与人民为敌者孤立起来。"在这后面，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三。1968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下发了这个通知。

二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三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关于徐州两派群众组织要大联合的意见[1]

（1968年至1969年）

一

徐州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要大联合。

二

徐州已经翻了几个个了，再也不能翻个了。

---

[1] 本篇是毛泽东1968年至1969年针对江苏徐海地区革命大联合迟迟不能实现的情况连续作出的4条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党委1969年7月26日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委会的请示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4条指示。这个报告后作为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附件《关于改组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7月29日，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六十八军党委《关于贯彻落实“九大”精神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附件。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批语稿时曾批示：“照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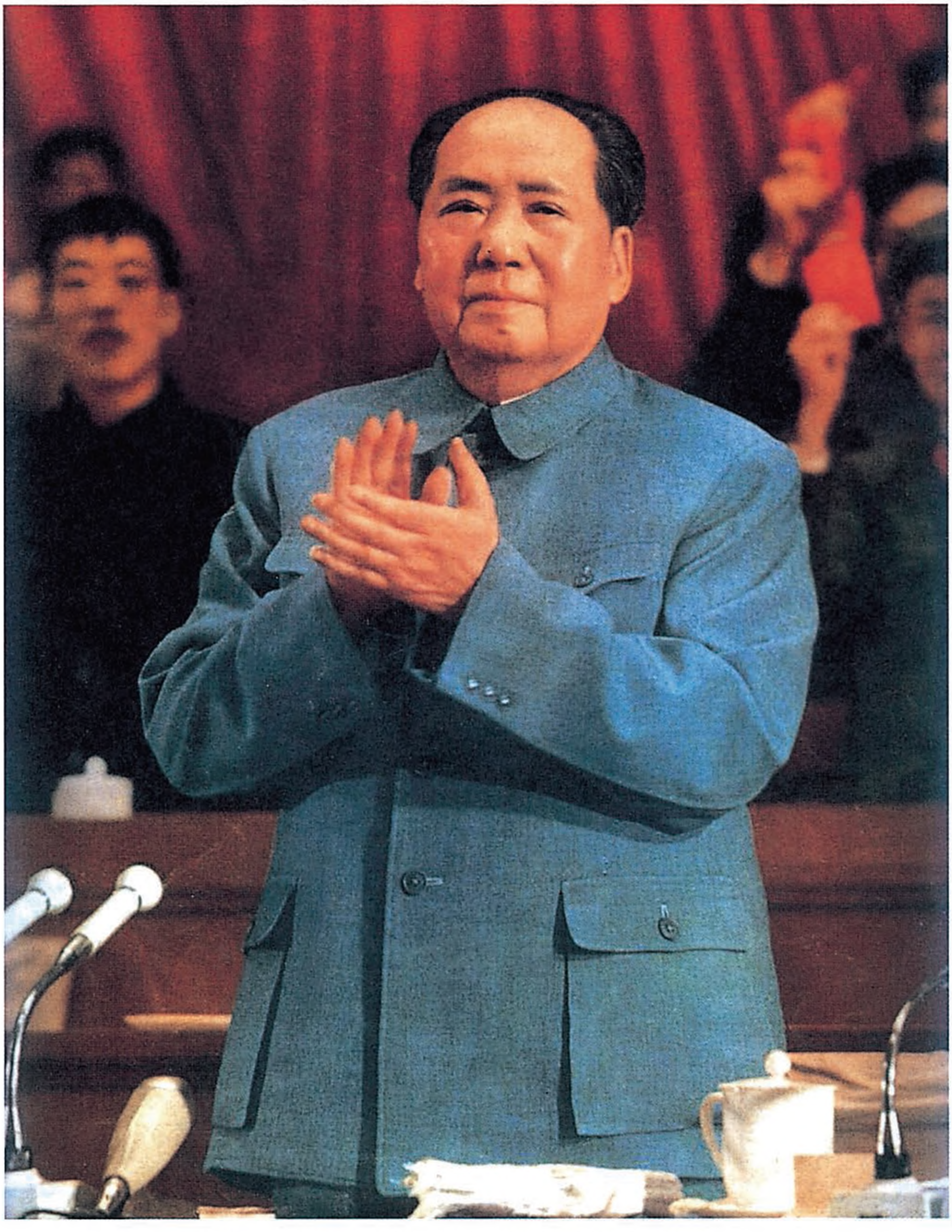
三

一派不灵，两派才灵。一派掌权不行，两派联合才行。

四

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1969



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关于不要批判所有与“二月逆流”[1]有关的老同志及家属的批语

（1969年1月3日）

一

内有批语[2]，请黄永胜[3]同志办理。

二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

---

[1]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一些会议（主要是2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稍前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上，代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意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人员时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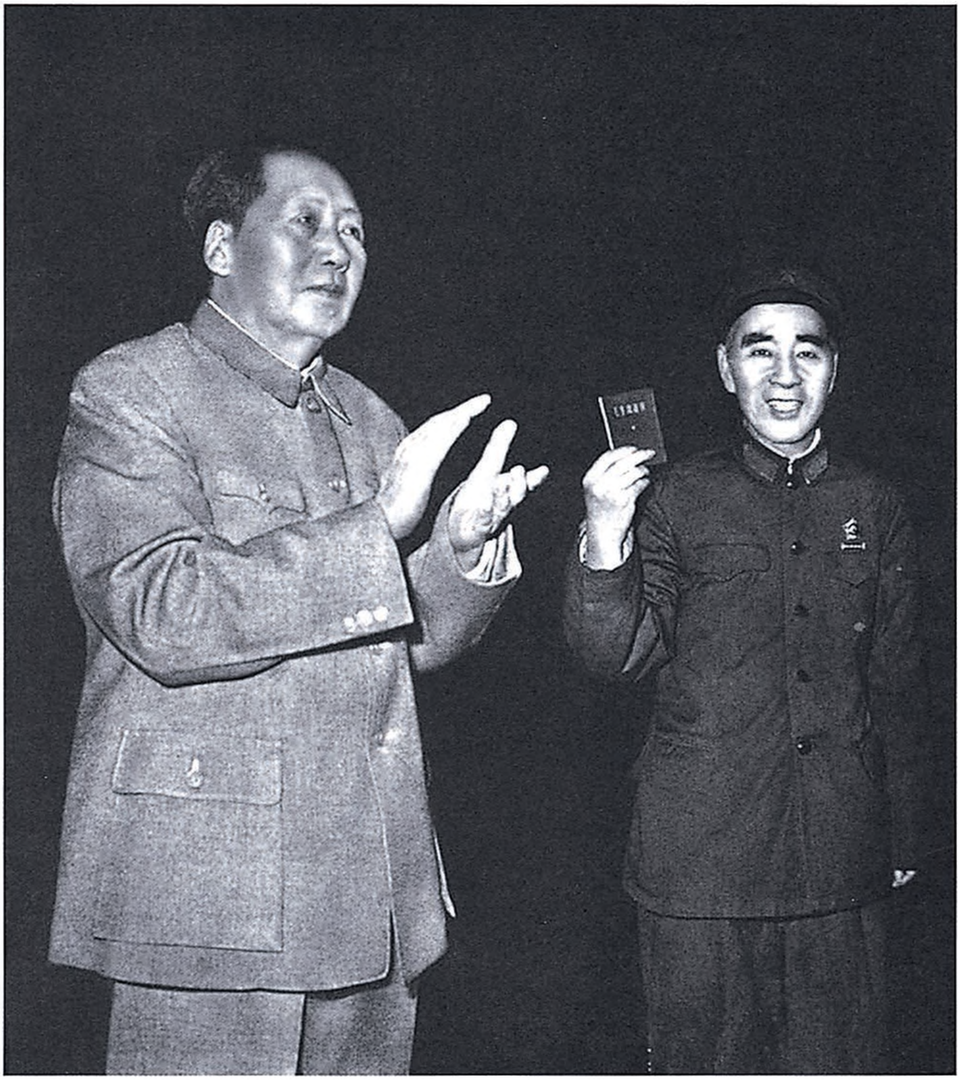
[2] 即本篇二。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8年12月26日报送的反映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当前情况的材料上。

[3]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系搞好。

毛泽东

一月三日



1969年1月25日，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战士”。

对中央转发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报告[1]的批语

（1969年1月28日）

照发。

---

[1]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9年1月20日写的这个报告主要内容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1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将这个报告报送毛泽东等。1月28日，毛泽东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那五条不错，可以转发。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打仗就是要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1]

（1969年1月28日）

现有的这些设防一大半可能无用，打起仗来不依照这个道理。马其诺防线不是突破了吗？也没有起什么作用。把许多兵力陷进去了，机动兵力减少了。

有些人对敌人的空降、空袭向来是不注意的。现在是立体战争，敌人要打你的后方，做工事还要防空降、防空袭。

工事也许有些用，也许用处不大。有些工事在一两个星期内挡一下可以，有的工事可以挡久一点，挡半年，下半年怎么办？还是要撤。工事有两种，一种是临时挡一下，一种是可以挡久一点，其余的大部分没有什么用。敌人从哪里都可以来，为什么要往钉子上碰呢？比如，苏联出兵东北，走白城子这条路的，敌人毫无抵抗；走东边那一路的，打到临江附近时，在牡丹江吃了亏。

我们打仗从来就不顶，敌人要来就来，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第五次反“围剿”顶了，顶掉了一个中央苏区。

我们的工事做得多了，将来大部分没有用，势必要放弃。你守着工事等半年他也不来，结果在别的地方来了。把主力摆在那里，等半年、一年不来，怎么办？英雄无用武之地。

南方有草还好些，北方可没有草，不过七八年有些工事可能就

---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汇报时谈话的要点。

垮掉了。

敌人来打仗干什么呢？从来打仗就是要消灭有生力量，消灭军队，然后再占领地方。苏联进东北，就是要消灭日本关东军。无论哪个国家都是一样，首先消灭军队，然后再占地方。不消灭军队就毫无办法。

打仗不是工事问题，而是战斗力问题，集中兵力消灭有生力量的问题。在战场上要占领制高点，做点工事就可以了。

在一封要求选江青[1]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来信上的批语[2]

（1969年1月）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

又李讷、毛远新[3]二人不宜为代表[4]。

---

[1]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2]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摘报说，1月10日收到河南省地方国营五三农场某人给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要求“提江青同志为‘九大’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并说希望“江青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长”。

[3] 李讷，毛泽东的女儿。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

[4] 指中共九大代表。

如梦令·韶山冲*

（1969年1月）

扶桑，丰田，龙潭，
幼年凫游星汉。
而今何处循？
梦不见横须贺。
何处？何处？
无奈石灯阑珊。

在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报告上的批语[1]

（1969年1月）

要理解情况，就要耐心看材料。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9年1月1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席批示，要我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的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并签注意见。我在十四日晚召集上述部门及相关部门的军管人员、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大联委负责人共三十多人座谈了这一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和信用两合作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收购均通过社队的购销服务社、站经营，国家商业只在县市城镇设立批发、收购站和国家商店。粮食、油料的购销，在农村拟晚一步下放。”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报送了国务院值班室1969年1月11日关于农村商业和信用社下放问题座谈简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业务组1968年12月6日关于供销合作社系统人员机构的基本情况（汇报材料）和商业部军代表1968年12月19日关于讨论“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好（调查报告）”的综合报告等3份材料。

关于陈奇涵宜提名做中共九大代表的批语[1]

（1969年2月）

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

[1] 周恩来1969年2月5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关于八届中委、候补中委曾出席十二中全会、现被提出或未被提出作‘九大’代表问题，本拟在会谈中面报主席和林副主席，请作最后决定。现因会议推迟，特先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已审定的书面文件送呈一份请阅，便于主席预作考虑。”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陈奇涵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曾出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9年2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参加“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指战员。

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

（1969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1]

---

[1]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发表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订计划要留有充分的余地

（1969年）

在订计划的时候，必须发动群众，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1]

---

[1] 《人民日报》1969年2月21日发表的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在听取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

（1969年3月15日）

一

沈阳怎么样？要准备苏联占沈阳。把沈阳、哈尔滨、长春都让给它，我们准备住乡下，不给它一点面子它是不来的。它打仗无非是要点面子。要作准备。平时常备军太多了，打起仗来兵力又不够。东北每个县都应组织一个营，两个营以至三个营，打仗时，这些营可以变为独立师。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三个营。全国两千一百多个县，平均每县两个营，就有四千多个营。打起大仗还要继续提高生产，因此兵力不要太多，太多了没有用处。我们的国家这么大，苏美一口吃不下。我们给他们一点面子，让他们占一些地方。他们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打进来几百公里，几千公里，让给他们东北、华北、西北，让他们都去占领。给他们一点面子，要他们多进来一点，多占领一些地方，进来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他们吃掉。

---

[1] 本篇一至四是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关于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等情况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地方武装要像割韭菜一样。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三个营，可以不断地生长力量，生长主力部队。它进来了，就说明它的领土野心。你到我这个地方来了，我没有到你那里去，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样政治、军事都有利，有充足的理由，这是形式逻辑。我们的文斗办法是以理服人，说理斗争。不让它进来，不让它占领我们的大城市，力争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我没有打到你的海参崴，没有打到你的伯力、赤塔，你打到了我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你就没有理由了。你占领你的，我打我的，地球总是照样转，你进来它转，你不进来它也转，人是搞不干净的，消灭不了的。你不可能从地球这边打进去，那边打出来，把地球都打穿了。苏联现在搞珍宝岛是出于他们国内的需要，全国可以搞游行示威。如果真正打你，他们就不搞游行了。他们的炮打进我国土七公里，我们何必也去打他个七公里呢？给他们一点面子嘛！

二

不抓紧机会准备，真打起来怎么办？要看哪个地方。有的地方可以先搞起来。不要把兵扩太多了，有碍生产。首先把东北搞起来。

三

南方各省都要准备两手，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打仗。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他们没有来，我们作好了准备；他们真的来了，我们也不吃亏。没有准备就要吃亏。

四

美苏勾结，扩军备战，想重新瓜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是二十三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二十二年。

尼克松[1]一上台，就到欧洲去，实际上是搞扩军备战。

总感到要打仗。美国的国防预算今年是八百五十四亿美元，是历年来最高的，占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苏联今年的国防预算是一百七十七亿卢布（去年一百六十七亿），也是历年来最高的。搞那么多军事费用干什么呢？总感到要打仗就是了。日本呢？它利用这个不扩大现役军队，所以它的国防预算只百分之一、二、三，这么一个小比例。美国就对它施加压力，希望它成为作战的伙伴。

尼克松现在进一步说了，由于中国强大，对中苏的反导弹基地必须要建立。尼克松到欧洲压迫西德，派人到日本压迫日本，好便于美苏勾结扩军备战，他们好指挥一切。我们看既然这样扩军备战，那总是有目的的。

世界革命运动蓬蓬勃勃，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亚非拉，从学生到工人，到一部分农村，像意大利这样。

摆在我们面前的前途有两个。要么是促使世界革命运动高涨起来，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把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统治埋葬了；要么是他们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像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一样，使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失败，接着他们自己的统治被推翻。这

---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是两个前途。我们是支持世界革命运动的，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备战。第三个五年计划，甚至第四个五年计划，要立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

至于苏联现在在乌苏里江的挑衅，还不能联系到大战，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就是了。但我们看了这样一个行动，就可以看到前途，看到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它甚至想首先消灭中国的原子基地。

苏联从来也没有在边界冲突上丢过这样的脸。现在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怎么能让它得逞呢？但是它总想挑衅，想占点面子，不仅是今年，几年来都不断地发生。

大敌当前，就是最好的动员。

对《红旗》杂志社论稿《关于总结经验》的批语[1]

（1969年3月）

在碰头会上讨论后再发表。

---

[1] 《红旗》杂志这篇社论稿原题为《总结经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关于总结经验》，并写了这个批语。此外，他还对这篇社论稿作了一些文字的修改，主要是将“革命在前进。形势是很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很高的”，改为“革命在前进。形势是好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高的”；将“毛主席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和智慧，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从理论上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了群众中根本性的、有普遍意义的先进经验”一句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天才”10个字删去；将“毛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高度的重视，认真学习，认真执行”一句，改为“毛主席这个指示，应当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同志的重视，认真学习，认真执行”。这篇社论，发表在1969年3月1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合刊，《人民日报》3月15日转载。

要认真总结经验[1]

（1969 年）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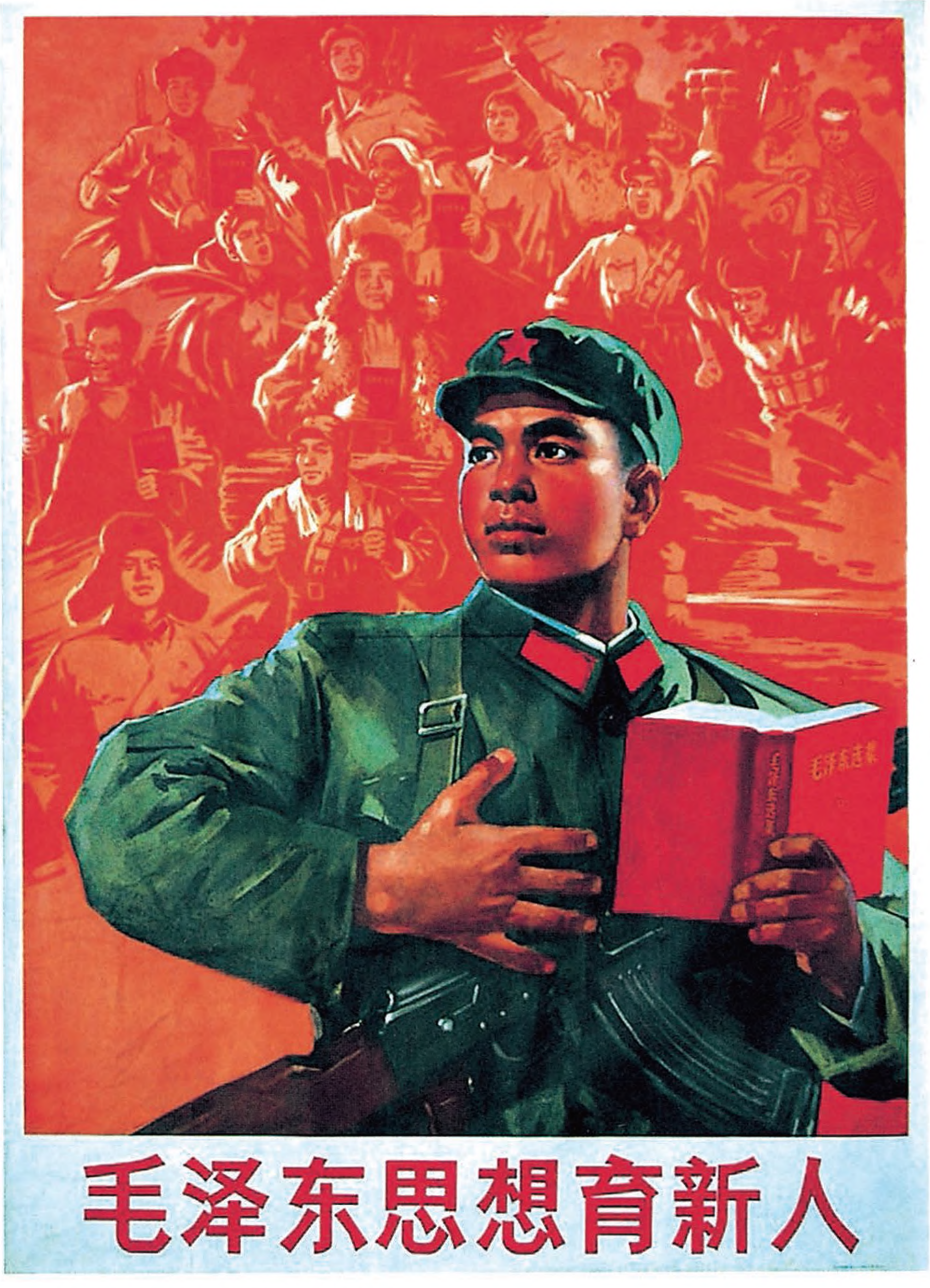
要认真总结经验。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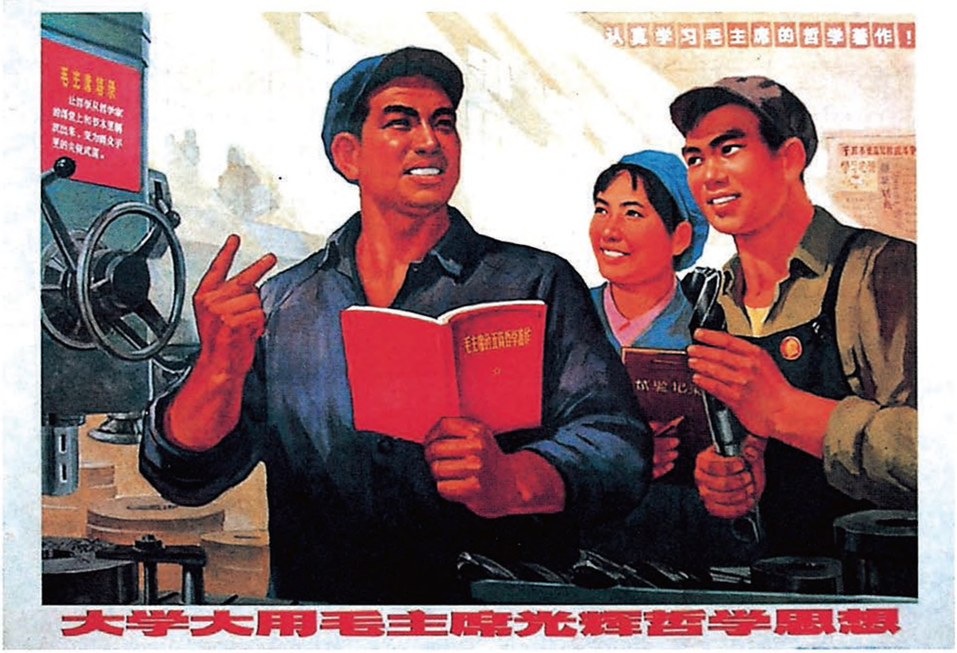
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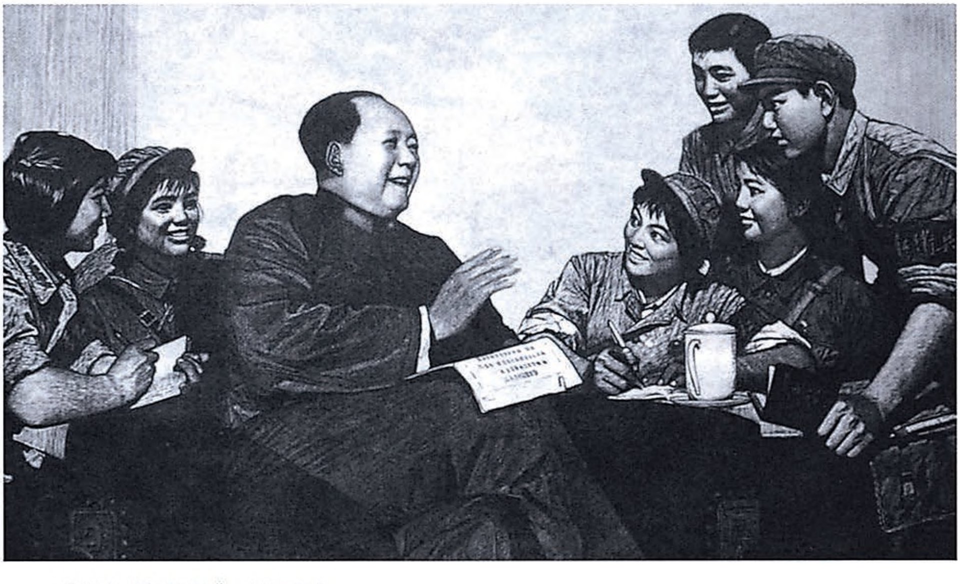
[1] 1969 年 3 月 14 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合刊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在“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本篇一、二中的话。《人民日报》3 月 15 日转载了《红旗》杂志这篇社论。


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思想育新人

毛泽东思想育新人（宣传画）


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
毛主席语录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大学大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

大学大用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宣传画）



《亲切地教导》（版画）

对林彪[1]中共九大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2]

（1969年3月、4月）

一

看了一遍，写得好，只需要个别词句的修改。

---

[1] 林彪，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被称中央副主席。

[2]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1969年3月16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一部分上；本篇二写在3月21日送审的报告草稿第四、五部分上（第二、三两部分已在此前送审）；本篇三写在3月25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稿上；本篇四、五分别写在3月28日送审的两份报告修改稿上；本篇六写在3月31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稿上；本篇七写在4月7日送审的修改稿上；本篇八写在4月10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稿上；本篇九写在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康生等4月25日送审的报告和党章的文字校正稿上；本篇十至十七是对历次送审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1969年4月1日，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4月14日，中共九大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报告全文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发表在4月28日《人民日报》。

二

一、四、五部分问题较少，略作修改就可以了。二、三部分问题较多，需要大修或重写，缺点是**论点过多**，**近于集纳**，可以考虑两部分合起来，把重复的删掉，不要去描述许多阶段，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也不要提。

三

看了一遍，略有修改[1]，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

四

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2]。

毛泽东

三月廿九日下午四时

---

[1]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25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十七外，其余都是个别文字的删节。

[2]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28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十、十一外，还删去了以下一段话："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的气魄，是这场革命能够发动、能够克服各种阻力、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五

此件看过，另有批语[1]已先送阅。

六

林彪同志：

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2]，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3]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

毛泽东
三月卅一日下午二时

---

[1] 即本篇四。

[2] 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31日送审稿的修改，除本篇十二至十六外，还删去了以下一段话：“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地开幕了。”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这次送审稿中的第三节与第四节，分别讲的是关于我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问题，经毛泽东调整顺序后，在公开发表时，分别为第六部分和第七部分；被毛泽东改为第五节的末尾一小节，在公开发表时为报告的第八部分，小标题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3] 郭沫若，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七

林彪同志审阅。我看这样修改较好。只在第24页上作了一点修改[1]。新排本[2]留下待看。此件请你阅后退还张、姚二同志。

毛泽东
四月七日廿三时

八

已阅。

九

可以。

---

[1] 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4月7日送审稿第24页上写道："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除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都应当采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对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查出的坏人"改为"对于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查出的坏人或可疑分子"。

[2] 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4月7日的送审报告中写道："这里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把修改处注明或剪贴上去的本子，一种是修改后新排出的本子。"

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

十一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1]。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

十二

三年来，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企图破坏我们这一支伟大的人民军队，没有能够得逞，就是因为人民拥护了军队，军队保护了人民的缘故。

十三

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好人，在他们提高了觉悟，并得到群众的

---

[1] 指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谅解以后，应当及时解放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并鼓励他们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世界观。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十四

阶级敌人如果再兴风作浪，发动群众把他们再一次斗倒就是了。

十五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1]

---

[1] 这是毛泽东1968年10月5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中的一段话，毛泽东审阅时作了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的文字。引号中的全部文字在公开发表时都用黑体字排印。

十六

在这里，我们还要着重地说一说我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1]

十七

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2]。

---

[1] 这是毛泽东在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31日送审稿第三节前加写的一句话，第三节后被毛泽东改为第四节，公开发表时又改为第七部分，题为“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

[2] 在张春桥、姚文元1969年3月25日送审稿上，这句话原为“把美帝、苏修送进坟墓”。

在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上的批语[1]

（1969年3月31日）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2]，请考虑酌定。

---

[1] 周恩来1969年3月31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徐海东，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参加主席团，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2]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董老，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朱德、陈云，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开幕时，他们都在主席台上就座。

对周恩来关于苏联要求与我通话的处置意见的批语[1]

（1969年3月）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

[1] 周恩来1969年3月22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从21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主席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我方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移动，并侦知苏后方在催他们前沿行动，“估计敌今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经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面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外交部的备忘录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报告上。

在周恩来关于九大准备工作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69年3月）

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

[1] 周恩来1969年3月29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汇报了中共九大准备工作的情况和安排。报告最后说："在廿七日晚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九大'中委人数草案（中委115人，候补中委95人，共210人），请大家考虑，然后再考虑具体人选或范围。"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出中央委员170人和候补中央委员109人，共279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一）[1]

（1969 年 4 月 1 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四十八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就是董老[2]，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3]，湖北的代表陈潭秋[4]，湖南的代表何叔衡[5]，上海的代表李汉俊[6]，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7]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8]，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头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9]、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10]。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11]，恩来同志、伯承同志[12]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13]

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同志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14]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少奇[15]呀，什么彭真、薄一波[16]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本篇和毛泽东1969年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5月9日印发各地，要求“向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以上，军队排以上干部宣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2] 董老，指董必武，1921年7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3] 王尽美、邓恩铭，1921年7月以济南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山东的中共组织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1925年8日因病逝世。邓恩铭1928年年底被捕，1931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4] 陈潭秋，1921年7月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9年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1942年9月陈潭秋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逮捕，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

[5] 何叔衡，1921年7月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何叔衡留在南方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转赴上海途中他被敌人包围，突围时壮烈牺牲。

[6] 李汉俊，1921年7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他自动脱党。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汉俊对蒋介石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愤怒声讨。7月在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李汉俊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12月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汉口。

[7] 陈公博，1921年7月以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陈公博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行政院院长、代主席等职。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公博逃往日本，后被押解回国，1946年4月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被处决。周佛海，1921年7月以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随汪精卫投降日本侵略者，任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45年9月被国民党军统局软禁，1946年被国民党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3月蒋介石下特赦令，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2月病死狱中。张国焘，1921年7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危害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1979年死于加拿大。刘仁静，1921年7月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后参加托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从事翻译工作。1987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同年8月因车祸去世。

[8] 李达，1921年7月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随后脱离党组织。此后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坚持宣传马列主义，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一些革命活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6年8月含冤逝世。1980年被彻底平反昭雪。

[9]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30多人。

[10]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80多人。

[11]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

[12] 恩来，即周恩来。伯承，即刘伯承，出席中共九大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13] 瞿秋白，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1930年9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的打击，被排斥于中央领导机关之外。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6月18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李立三，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67年6月含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明，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统治长达4年，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在中共七大上，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做工作，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56年1月去苏联后，长期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1974年病死在莫斯科。

[14] 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作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1976年7月含冤逝世。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王稼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会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56年中共八大后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74年1月逝世。

[15]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文化大革命”前夕和初期，由于当时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认定党内存在一条与中央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把刘少奇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且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错误的方针和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凭借其所窃取的权力，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虚构的、牵强附会的材料，伪造证据，于1968年9月向中央报送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于10月由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这次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

决议。1969年10月，刘少奇在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同年11月12日被迫害含冤逝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根据复查结果，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们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议认为原审查报告给刘少奇强加的“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状以及其他各种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的蓄意陷害。八届十二中全会据此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16] 彭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顺直省委代理书记。1929年被捕。1935年刑满出狱。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关进监狱。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指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下，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薄一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后在顺直省委指导兵运工作，后被捕入狱，在狱中任中共支部书记。193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履行简单手续集体出狱，后到山西主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工作。1945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他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使他得到了平反昭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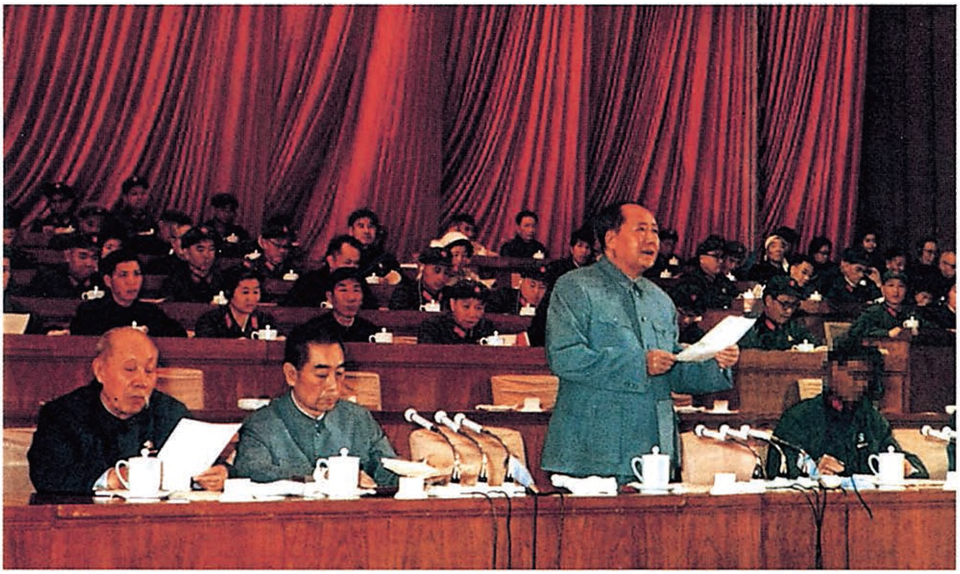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图为大会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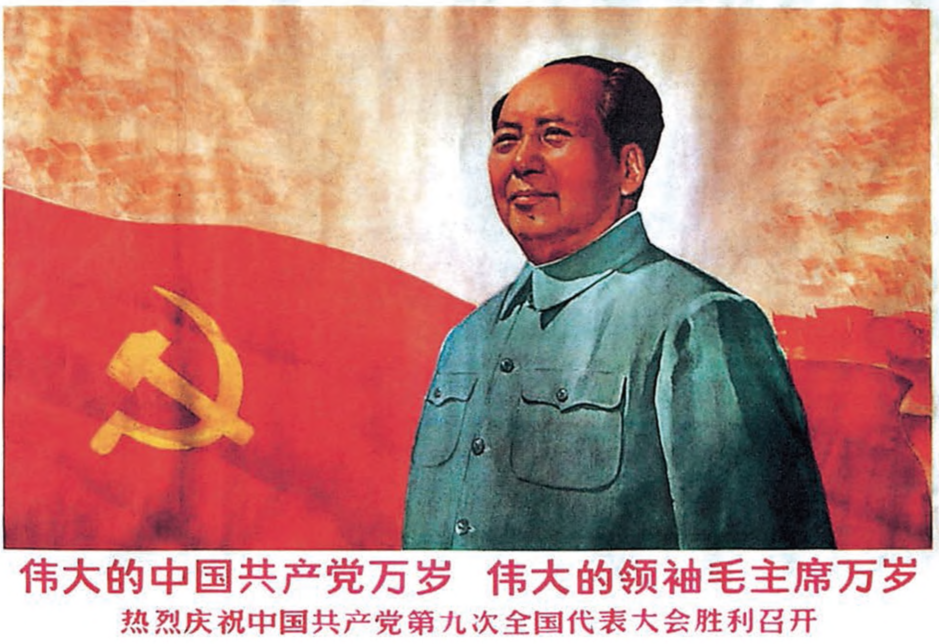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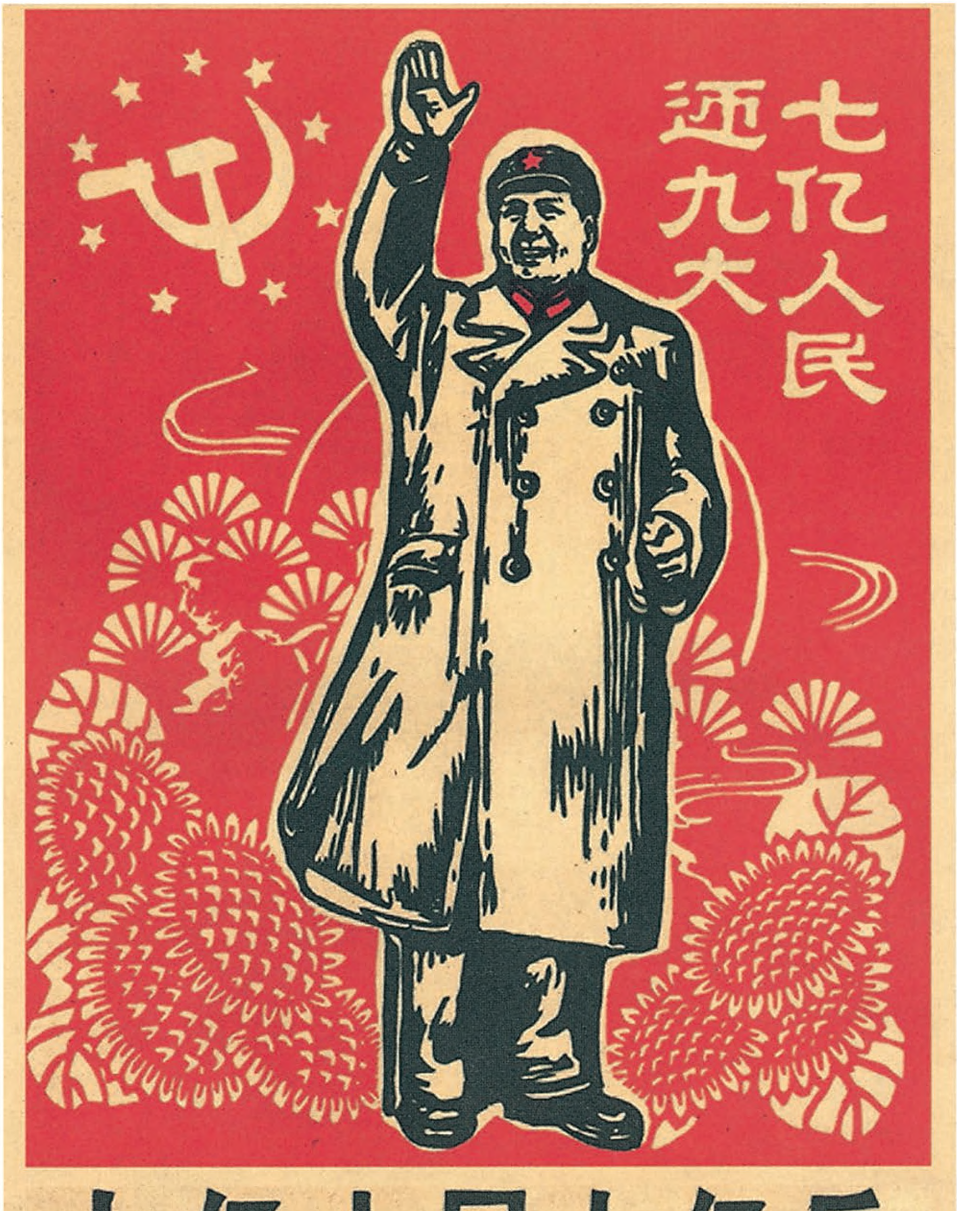
1969年4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讲话。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宣传画）


七亿人民
迎九大
七亿人民七亿兵
1969 上海复旦大学红卫兵《东方红》造反总部

七亿人民七亿兵（宣传画）

和谢富治等的谈话

（1969年4月5日）

第一，历史问题。

在一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后，只讲合作，就不讲独立自主。讲国共合作，就不讲和国民党作斗争。有一个倾向问题。有时讲倾向，有时讲潮流。有时讲思潮，有时讲浪潮。在一个倾向下就蒙蔽许多人。只想到合作，没想到分裂。破裂了，一九二七年又来了一个倾向：只要工人农民，不要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共产党是革命的，其他党派就不行了。

教条主义主张，对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小党派比国民党还坏。这就是还有欺骗性，不承认有第三势力。在这种势力下，又产生了“左”，其中也有右。这是十年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又来了一个高潮。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戴国民党的帽子。很多人不理解，想不通。其实我们是独立的。以后王明回来了，带来了国防路线，形“左”实右。（□□插话，当时主席提出：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时彭德怀很坏，对资产阶级的东西，很感兴趣，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在太行实行了土改，三起三落。后来，马歇尔来了，搞三人小组，说什么和平，实际上他们是帮国民党、蒋介石的。我们就准备打，我们准备一段时间。）其中的就是准备打。皖南事件，有

人认为是主流，实际不是主流，主流是抗日。八年抗战我们没上当，有困难……还有斗争。全国胜利以后，请程潜到北京谈判，他怕把他整垮。我去接他，出他意料之外。我到北京只接过这样一个人。

一个时期总要有一个倾向，要掩盖另一个倾向，分裂中掩盖着联合，联合中掩盖着分裂。

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赎买政策。没收资产阶级不会敲锣打鼓。赎买政策列宁早就提出来了，列宁逝世得早，在苏联没有实行。

第二，落实政策。

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事情都上纲很高。北京有个工厂，有八个人的专案组，说他们的厂长是狗特务。经过群众审查，这个厂长是好人。有些专案组我就不太相信。北大一万多人，抓了几百人。宣传队进驻以前，不交代任务，进驻以后，没总结经验，不找他汇报。北大三进三出，这样，对军队也不好嘛！六十三军就不要了。这主要是领导不下去，层层听汇报，刘兴是六十三军政治部副主任，七个月来还没听他们汇报过一次。我原以为远的不好抓，没近的地方工作好做。但也不一定了，蒯大富下放以后，表现不错嘛！

现在不是讲对准刘邓一小撮吗？北大是否抓一小撮？抓千分之一、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就可以了，其余的都放走。教授、讲师、副教授手无寸铁，造不起反来，造反再抓嘛。

第六条第七个问题，我就只加了一句：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予依法处理外，其他一个不抓，一个不杀，一个不关。有些专案组不分

青红皂白，关人容易，放人难，就是怕人家说右倾。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不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嘛！周兴抓了很多人，不是都放了吗？但是很被动。重大特务案件，也是大部不抓，抓一两个就行了。右派分子不要随便戴帽子，帽子在我们手里，他要造反再戴嘛！戴帽子不是右派一个人的问题，是一家人的问题。为什么把他们推到敌人那里去呢？外调的太多了，收获不大。你关的人太多了，统统放出来，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过一两年也会好的嘛！聂元梓改了，就不错了嘛！

“二月逆流”的几个干将，我就恨不起来。不是这几个嘛！其他地方也有的。有个别搞，他们是公开搞的，不是阴谋。他们反对中央，实际上是反对我和林彪同志。九大不要写上了，不像杨成武搞两面派。他们还是一肚子气呢。

每个时期总有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资产阶级是否要搞反复呢？要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学校，一个公社、一个公社，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搞：搞的时候目标要小，要集中，要具体，抓典型。当然有个过程，关人才不是好办法呢。我们历来不赞成。军队有禁闭，现在还有没有？（答：没有了。）不见得。北京部队还有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讲讲自己，如实行对犯错误的人分配适当的工作。对延安整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少数人翻案，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来是否有人翻案呢？资产阶级作为阶级总是反对我们的。资产阶级人数虽少，但他们的能量很大，特别是他们的知识分子。

第三，准备打仗。

要准备打仗，东北、西北、华北都要准备。准备好了，不打也

没有坏处嘛，要准备敌人飞机轰炸我们的原子反应堆。日本投降时是他们没有根据地，国小。二是政府投降了。我们的领导都被他们打完了，但是我们下面的人还要打。

苏修兵很穷，纪律不好。苏军进东北时，纪律坏透了。苏修兵一年只发一套衣服，还要人家拿钱。他们一是要东西，二是要女人，三是要面子。珍宝岛，他们的炮打进我们后方七公里，我们不反击，给他面子。打进七十、七百、七千公里，到郑州才好呢。我们就有办法了。割韭菜，但不是拔韭菜。打起来，我们发动，他们也发动，但他们不会发动。红卫兵很勇敢，很听话，凡是过去学校打得厉害的，这些学校红卫兵就听话。这次分配工作，军队不要，工厂不要，地方也不要。到军队开始不会出早操，睡不起嘛！后来比谁都起得早。开始他们不肯背背包，训练两个时期体力也有了。

加强地方武装，小县一个营，中县两个营，大县一个团——平时搞生产、搞训练，打起来编到野战军。义务兵打起仗来就来不及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二）

（1969年4月11日）

我们这个会，是这样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全体会议？

开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先通过不发表，好不好？

…………

北京小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好多会议上讲了几次。

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有些地方搞得好一些，有些地方就差一些，不太准，扩大化。抓了一些人，不应抓的也抓起来了。群众起来了，多抓了一些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搞的，规定了要搞的，一搞就扩大化了，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为了在七大把两条路线搞清楚，我在大会上批评了犯错误的人，所以七大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过会后，确实团结了、胜利了，比中央苏区内战时期更加团结了。

中央苏区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头头是瞿秋白、李立三、王

明。在当时情况下，犯错误也是难免的。因为那时候，要与国民党斗争。国民党政府杀人，我们拿起枪对付国民党，所以出现了“左”。七届四中全会后更左了。王明的《为中央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说李立三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搞得更“左”，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那时候，他在莫斯科。红军有五十万，后来只剩三万，他就舒服了。

三次“左”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抗日时期，王明回过来搞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有一个情绪，国共合作，就不要独立自主了。王明从苏联回来了，就领导了这种投降主义情绪，犯了错误。国共合作的民主潮流掩盖了独立自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搞根据地。

延安整风批判了王明路线，纠正了王明的错误路线。现在有人说“整风是错误的”，将来还可能要出，不奇怪。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还在。那时也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也行。有的喊，有的不喊。当时河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就不喊。（林彪：李维汉就不喊打倒土豪劣绅。）当时独立自主也是有的。有广大群众运动、土改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湖南、湖北、江西、广西、广东都有。过了一个时期，掩盖的矛盾突出了，蒋介石杀人，我们拿起枪杆，当时没想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的人跟着刘少奇在武汉缴枪投降，有的地方打败仗。南昌起义不知道到农村去。我们到乡下去，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里呆不住，蒋介石要杀人。打起来了，一切都打了，资产阶级……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城市作坊也打倒……民主革命一句话，资产阶级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民族资本家。

内战时期犯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为什么不犯右倾路线而犯“左”倾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打仗。第二次国共合作出现了右倾。现在合作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不要独立自主，不要发动群众，不要军队，不要党的领导。

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庆谈判。我在重庆时，刘少奇在延安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说“和平民主新阶段”到来了，结果还向各地发了电报。（董必武：我在重庆就没听说。□□□：晋察冀在张家口传达了。黄永胜：听说给东北发了电报。林彪：东北也收到了电报。我们没有传达，发了一个电报说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的开始”。）谈判没有结束我就回来了，准备打仗。后来总理康老去了，写了个协议，签了字。这个协议算不算数呢？按道理说应该算数的，实际上没有算数。

七大是团结的大会，也是胜利的大会。三年多蒋介石打败了。进城后又胜利地把许多人团结起来了，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后来查明是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薄一波、安子文与国民党有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天起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开始，当时我们没有宣布，一直到土改后才宣布。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和平土改，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是利用、限制、改造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公开和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但有些人在那里讲利用，不讲限制、改造。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不叫文化大革命由历史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管叫什么名字，总

能触及上层建筑，从中央到机关、学校、工厂、农村……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要搞典型、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林彪：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在北京抓了几个典型。）我管不了那么多，要你们抓。过去北京市委管不了，现在可以了。我只抓了典型，统统去管搞不过来。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搞典型。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单位去抓。（毛问黄永胜的清队工作）我们军队要谨慎。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南口有个八个人的专案组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交群众一查，不是特务是好人。搞专案的人搞材料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搞得越多越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抓虱子，抓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判案是不容易，要翻案是有领导的错误，我不搞专案。

北京有个大学，九千多人，抓了九百多人，十分之一。把人家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就得讲个理由，为什么抓我？为什么放我？有的推一推可以下去，拉一拉可以上来。有的关在牛棚里面扫厕所。（问张春桥）□□□干什么？（张答……）知识分子扫扫厕所是可以的。

王明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知识分子。秦始皇焚书坑儒，杀了四百多人我们没有杀，搞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扫厕所，是一时现象。（康生：苏联报上登了彭真戴高帽子的照片。）戴高帽子是打土豪劣绅的，我在一篇文章里写的。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翻出来，又给戴上高帽子，土豪劣绅能戴高帽子，彭真为什么不能戴高帽子？我们反对戴高帽子，反对戴黑牌，反对搞喷气式，反对乱抓人。抓了就要放，无非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各个时期，主要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使同志们彻底了解我党的历史经验，避免犯错误。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屎急了，才挖坑。事先挖好坑的也是有的。

我们过去行军，到宿营地就挖茅厕。现在住了营房，茅房不搞一点是不行的。在老百姓那里住久了，群众会讨厌我们。我们这次“三支”“两军”，又使军队与群众的关系融洽了。你们说“三支”“两军”，外国人不懂。

搞形“左”实右，“左”是形式，掩盖了右的本质。

我提议几个老同志都选进去，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函、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王明大家不会选他了。王稼祥犯了错误，还是做了工作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三）

（1969年4月13日）

有什么消息呀?（周恩来：准备今晚传达主席上次的讲话，开大组会。）

这要传达干什么?（周恩来：主席的话不传达，说咱们封锁。）

不是，我讲的事是否符合事实。（周恩来：都符合的。）（康生：叫他们翻一翻《学习和时局》。）

四个问题，还有一个文件。一个党的大会，我作过一次报告，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国内矛盾降为次要矛盾，讲完后，然后讲民族统一战线。发给刘少奇、彭真等不赞成。我说蒋介石抗日了，过去他们不抗日，不发动群众。（李雪峰：苏区党代会，有个学生叫杨诚说，抗日抗日，民主民主。）（康生：是十二月会议。）（程世清：我们发现，主席未发表过的三篇文章，一个是《告前线将士书》。）那恐怕不对。（程世清：报上发表过。）（陈伯达：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也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农村调查序言》《论政策》两篇文章写入了。）这个《论政策》有吗?（陈伯达：有。）总结我们过去几十年翻来覆去犯的错误，就是一切联合，否定斗争；一切斗争，否定联合。如湖南李维汉下去，他们赞成把农民关在班房里。如湘乡比较好。一个李维汉，一个夏曦。那是一种倾向，既与

国民党联合，还与他们批评作斗争。如果要批评，批国民党那是不行的。比如武汉那时，我已离开武汉去长沙了，当省委书记。

总工会刘少奇。（周恩来：留下的还有向忠发、项英。）所谓联合，是联合资产阶级，所谓资产阶级和蒋介石、汪精卫，当买办资产阶级也是逐步当起来的，也不是一下子的。他们被群众吓坏了。党内也有被吓坏的。有个华北代表团敢提民主的口号，不到时机也提不出这个口号。南昌暴动以后，到了城市蹲不住了，往乡下跑，这就是过去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就是被国共合作掩盖着的一个矛盾，其实从中山舰事件就有。（周恩来：有个人姓蒋，叫什么先，还有个特务营。）他相信蒋介石的话，蒋介石有篇校长训词，因为这个人我熟悉，他在长沙师范，后来又在安源。不仅武汉，连广东的陈延年，这些同志都在学，所以这些情况就很值得注意。一个时期有一股风，这股风是正确的。如合作呀，但这股风掩盖另一股风。独立自主呀，发动群众呀，就不提了。

第二次不同了，民族斗争掩盖了阶级斗争，以后总有暗潮，如现在反修不算又引起反苏。中国过去对外国人不分好坏都反对。几十年直到共产党成立，才懂得把外国人分为两种，一种是劳动人民，与他们接触少，所以还是这一套。老同志搞了几十年，总懂得点吧！王洪文同志，你就没有经过几个时期。（王洪文：很多事情我就不懂。）所以等到南昌暴动，“八·七”清算陈独秀，有时呢，也有右的，但主要是“左”的。

我说的是江西AB团，他提出几个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彭德怀聪明，马上发表声明，说是敌人挑拨。要把我捉起来杀掉。这个送信人叫朱□□，他躲在山上，现在内务部的曾山，当时是江西苏维埃主席，不赞成这个口号，所以也

把他打倒。恐怕各根据地都有一点。（周恩来：有的。）军队我就不相信就那么平安无事，那么太平吗？太平只能太平一个时候。既与国民党决裂，就决裂吧，就一切斗争，没有联合了。如城市里的小作坊都得没收。富农该联合，也不分阶层。资产阶级要分阶层，空喊反帝反封建，打倒帝国主义。对资产阶级我们不打倒，还在城市，只要不反对，一概不论。

筹款还是要筹的，帝国主义、洋行它不来了，口号喊喊而已，我们住在乡村也像城市，政策方面是瞿秋白、李立三，都没有搞几天，主要是王明。瞿秋白、李立三这两个人都不是苏联赏识的，现在苏联吹瞿秋白了，还有李大钊……我看党内最危险的主要有三次，一次陈独秀，二次王明，三次刘少奇，其他是局部的，如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彭德怀，高、饶也是带全党性的。张国焘是局部的，在军队自搞一套，他不看方针正确与否作标准，只看势力大小，他看四方面军大，一方面军小，出发时大了，那时三万，他看不上眼。以后基于我们党不要分裂，罗章龙湖南人哪，我相当熟的。不晓得怎么搞的，在上海另立中央。中央这么坏，你在中央搞嘛，一次张国焘，一次罗章龙，罗章龙没有军队，群众也不多，罗章龙没有搞几天嘛。（周恩来：对，张国焘也没有搞几天。）（许世友：他三〇年末去的。）

那是以后了，我认识他很早。这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相当熟。他在长辛店，五四运动以前教职工夜校，他当教员，我跟他发生关系。一九一八年一次大会，湖北英山，刘元震。（江青：张国焘很早是叛徒，有大印。）那可能是真的，但影响是大的。这个人历来有大少爷味道。

第三次大会，他是反国共合作的，蔡和森都到了，他不到，刘

元震当他的代表，那时反的不少，刘元震、李立三、张国焘，一个在武汉，一个在安源，一个在北京，总的在北京。那个反对是不对的，当中央一查，不少独立性，有没有？（董老：本来独立性就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偏偏不搞军队，军队里也派了代表，实际上这个权在军阀手里，现在还要增为营教导员，连支部、团、师都有政委。在土地革命时，犯“左”的错误是有原因的。你决裂吗，不管你小资本家一概打倒。列宁说富农都没敢……但中国的富农不发达的，雇、贫、中农也赞成按人口分地，按人口平分，后头“六大”就按人口平分，是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好办法，我很欣赏这句话，但“六大”也未解决把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未解决乡村包围城市，重点在乡村。有些城市，大点的小城市如吉安、赣州等。但两次打，两次打不开。可以不打了。我说，把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犯错误的人，他们也属于二十八个半，但在苏区吃过苦的，王稼祥在二、三次反围剿帮过忙的。一个时候红卫兵大字报一贴，现在段安选作中委也难，其实他们与朱德、陈毅差不多，就是没让进。

朱德、陈毅、许世友说，他们反了几十年，其中也有不反的。于红军“七大”后，他们领导开了八次代表大会总想夺军权，想当前委书记才满意，夺了军权又不会指挥，他心里也不踏实。要到中央，到中央去请示，请不回去……可见是要夺军权了。第二次是项英，他又不指挥，又不想张打。要到后边去，搬到苏区就搞五次围剿那套，总是听洋人的。这样军队又遭遇不少灾难。只有王明他没到过任何一个根据地。以前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也没有搞过，又没有打过仗，横直要说二十八个半，吃得开，成了一股风。我们这些人就成了右派，黄永胜不知道这些事，你那时干什么呀？（黄永胜：当排长。）项英来后当营长，（黄永胜：当团长了。）升得那么快呀！

（黄永胜：是个小团，等于营。）许多人如黄永胜，我就不认识。到北京才认识你。认识一个人呀要谈一次话，不谈不晓得他的历史。这是那个时期了。以后就抗日时期了，又一个浪潮，民族矛盾把阶级矛盾掩盖了，一个打仗的时期，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年初，项英还未转过来，皖南事变发生了，这是得到许多教训。打摩擦仗。有华北朱怀冰、张荫梧，华东韩德勤，山东李仙洲，河北石友三，还有鹿钟麟，这些人教育了我们，我说，单是马克思不行，还受帝国主义国民党教育，然后就决裂了。

农民进城抓地主，工商业许多是地主办的，中小城市那就破坏了，那些小市镇要注意保护，不然对工农都不利。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个麻烦事呀！不能不利用它、限制它。你跟它就办五六年敲锣打鼓搞公私合营，我与陈叔通说……他小贸不赞成，以后分歧比较大了。《人民日报》一篇社论下去，有计划把他们牛鬼蛇神都放出来了，有什么都在报上放。这次文化大革命，一些群众中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放毒，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包括战斗。所有的材料我都看了，都不如四川张国华那里。双方几万人，穿上群众衣服，实际上是退伍军人，改换过衣服指挥，这些都没有啥大事。好像很不得了，以为军队不得了，对于军队就是地方军和野战军，如保定、浙江、江西、四川是不是这样？（江青：是。）贵州、云南也是一样，野战军和地方军都是我们自己经过的，这些矛盾过去没有暴露过，这次暴露出来，我看是好事。这些同志我看是可以讲清楚的，转过来了由他们自己讲，我是怎么想把你消灭。

现在讲，和我看有些干部，将来有些干部犯了错误群众谅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杨勇。当然他也有错误。是哪里下的命

令？至今我还不知道。（江青：几个老帅下的命令，叫郑维山执行的。）他们倒打一耙，嫁祸中央文革，我们哪里能下命令抓人呢？至于肖华是有问题的，杨成武有问题的，不在其内。杨、余、傅，杨、余大一些，不过傅也不是老实人，不讲真话。这三个人都不讲真话，所以这场斗争不是讲落实政策吗？在全国恐怕还要一个时期，不过你不要搞宽了，搞一个、两个，搞三分之一就了不起了。

一个学校一下就团结起来不行，有三分之一教授、学生就了不起了，经过一个时期就三分之二嘛！剩下的他就站不住脚了。但所有军队宣传队、工人宣传队都不能压。工人阶级叫领导一切不是叫压倒一切嘛！（大家笑）说我是工人阶级，不然你就是反工人阶级领导，反军代表。有几个学生，说过几句怪话，人家现在冲也敢冲了嘛。反一下有啥要紧呀？你们武汉曾思玉，恐怕你们也得罪了他们，不过多数人不赞成他闹的。如果标语打倒，你就倒了吗？那就该倒了嘛。张春桥去年不是打吗？有打张国华的，你们打了半天张国华还在这里开会。结果打了半天还拥护你，比原来拥护的那些还好些。

现在又有一股浪潮，又掩盖了。（张国华等人介绍情况）还有个江西，也搞“二月逆流”，宁拉八河一带（指湖北），还有江西九江三省交界，跟我们搞根据地一样，哪个地方闹得厉害，哪个地方就好一些。（张国华：重庆就好一些。）工人可以控制局面吗？（张国华：基本上可以，他们现在在偏僻的边界上。）（程世清：有个问题，江西的私人工商业现在没有了，我看是个好事。不知对不对?）我在北京看过一个工厂，二百家名为资本家，叫小业主，有的还雇过工人，现在也现代化了嘛。另外一个化工厂十家，恐怕各地方都有。是不是按上次计划明天开大会？（周恩来：今天传达主席上次的

讲话。）我不谈了，谈了十几次了。现在还扩大，扩大化。（大家笑）（周恩来：一点不透风也不好。）你们试试看，闹了几十年革命，我讲的还不是你们的经验。

大革命破裂，“七大”团结胜利。进城后对资产阶级还是利用他，但是包括一个问题。有些干部搞不清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定息。（周恩来：六七亿。）七八亿还不是用到中国增加购买力，结果还搞了李先念那里，他要进工会，我说不行，拿定息是可以，进工会是不行的，这讲的是资本家。你抓几个工厂试试看，实质上没有解决。你们抓几个点试试看，形式解决了，形“左”实右。例如木材厂，李先念蹲点的，修配厂徐向前蹲点的。权实际上还在资产阶级手里，当然有共产党员，但是走资派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扣、罚。管不管工人阶级。我看实质还没有解决，只能说大部分，不讲全部的话，学校大部分，机关有些是走资派，有些知识分子成堆，这些可以改造。过去是实行用群众改造他们。（许世友：也不赞成的呀。）你那么多工厂管得了吗？要搞发个公布嘛！并找一个时间不是几个人讲话吗？（周恩来：都是谁讲呀！纪登奎搞了喷气式。）（叶群：身体、精神都好了。）可见病也可以治好了。还有一个更惨。几个负责人，康老、伯达讲不？（答：讲。）不要讲长了。你们一讲就长了。（周恩来：有稿子。）（康生：是不是讲呀？）你说第二天再来，人家几分钟，不要那么死。康老、总理、黄永胜，你们讲话不要太长了。（康生：不超过十分钟。）我有个办法，一天开不完两天、三天，我每一天不超过三个钟头。（康生：党章读不读？）不要。那是形式主义。

明天还是讲基本通过，还要翻译、翻印。我当过校对的，小报越小越容易错字，那是几年的事了。搞《湘江评论》时，那时资产

阶级世界观。（周恩来：还是那些人坐前头呢?）要，还让他们坐前面，你们不要，群众不那么看的。我们知道他们的老底，他们不知道。就不要作检讨了，他们一检讨，徐向前在铁路工厂，李先念木匠出身到北郊木材厂，聂荣臻到新华印刷厂，陈毅到南口，以后再不好说了。

刚才说了，王洪文你们说负责得了不?（王洪文：很难呀!）明天将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我有啥办法呢？好人我是不提名的，我就提这些人，你们一定不赞成吗?我有啥办法？一个陈其康，他不选王明，“七大”时，还有蒋光鼐……是黄埔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兴国，躲在刘乡村，消极了。我们红军下井冈山，到兴国后，请客吃饭，又出来了。“七大”时还有几个人联名写信，不选王明他们。我说，选他。（郑维山：主席、林副主席说了就行。）也不一定，许世友、王洪文一老一青就不通，我还是赞成你们这一点的。（大家笑）

王维同志，（王维：主席讲的传达了。）可以，有一期报（张国华：没有听清楚是什么报，可能是国民党的报。）是国民党十全大会，叛徒其中□□□、□□□选上了。我知道这两个人，我们提的这些人，在他那里可以是评议会的。我们又没有评议会，只好到一起。不晓得怎么没有傅□□。（国民党开了十全大会，那儿有几个叛徒，是有的，但有些人没有，还不知道有个傅□□。）（□老：可能死了。）也没有叶青。（周恩来：主席今天又提出了一下闻天、王稼祥。）（康老、董老：烂了。）（周恩来：还有杨勇。）杨勇他就是跟彭德怀跟得紧，又不是叛徒，当然在北京不好了。上次，许世友提王景山、周志坚打仗好，我还交给许世友。（许世友：好！这人很能打仗。）取一技之长。

请康老注意一下，与河南谈一下。（康老：曾思玉注意一下。）（许世友：王景山开除了党籍。）（黄永胜：康□是他提的。）（许世友：王景山能打，过得硬。）这些人啊，这些人有功。（江青：杨勇是几个老帅搞的。）那时也是多中心，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三人，但是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指杨勇）。在北京军区不太好了，你们政委是谁？（郑维山：谢富治、李雪峰同志。）（周恩来：陈先瑞做实际工作。）你（指李雪峰同志）是不是挂名？你不过问一下？（李雪峰：也参加会。）（郑维山：不是挂名，重要的会议都参加。）不要说了！没有新话，还是那天的老话。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四）

（1969年4月14日）

（毛泽东和林彪健步登上主席台，全场热烈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不要喊口号了。今天的议事章程有三项：

第一，要通过林彪同志的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二，要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章；第三，还有几个同志讲话。今天报名发言的有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先通过，通过了再发言。）这个要通过什么？不要通过。你们发言了以后再通过，谁也可以报名发言嘛！报名发言的有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尉凤英、孙玉国这么多名字。（周恩来发言后，林彪发言。五时二十七分）怎么又喊口号了！陈伯达同志讲话。（五时三十五分）康生同志讲话。（五时五十八分）再请一位同志讲话吧，黄永胜同志。（六时十二分）一个挨一个，王洪文同志。（六时十九分）怎么办呀？同志们（指摄影记者），别那么忙，你们都是很忙呀，叫作争分夺秒、你追我赶。

（第一位记者进来了）那么就请陈永贵同志讲话。

（六时二十九分）陈永贵，你有四十几了？现在请一位同志讲话，孙玉国同志，这位是珍宝岛的，前次战斗，就是三月十五日战

斗，就是他在那里指挥的。（孙玉国向毛泽东敬礼时，毛泽东、林彪起来鼓掌。六时三十八分，孙玉国讲完后，毛主席、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起立鼓掌）你多大年纪？（孙玉国：二十九岁。）二十九岁，你是哪里人？（孙答：东北人。）东北人呀？你老呢？（孙答：河北。）河北啊，他的名字叫孙玉国。孙，是赵、钱、孙、李的孙。玉，是玉石的玉，王字加一点。国，国家的国。他是副营长。负伤以后，珍宝岛十五号的自卫反击战就是他指挥的。（孙玉国讲话以后）怎么尉凤英也是辽宁的？尉凤英同志请讲话。（六时五十分）怎么办？别忙。（看表）不到两个钟头嘛。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周恩来：是河南的。）请你，我的老朋友。他是河南的，他本人是山西人，一向在河南工作，也受到一些灾难啊，就是嘛。你讲。（七时两分）七点多了，要吃饭了吧？看来今天各位同志发言时政治报告、党章都是赞成的，全党同志再看一下。但是，还没有发言的多，不晓得你们赞成不赞成？（全体代表：赞成！热烈鼓掌）我们代表表决好不好？第一个林彪同志所作的政治报告，赞成不赞成？（热烈鼓掌）赞成的就举手。（全体举手）（毛泽东看看会场后）都赞成，有希望了，通过。这个党章草案是不是赞成呀？赞成的举手。（一致举手）看来也有希望了，通过。关于这两个文件，可能还有些文字上要斟酌的地方，还要翻成外国文，怎么办？再开一次大会？有同志建议，由秘书处来完成这个任务，可不可以？（全体代表：可以！热烈鼓掌）今天的工作就告一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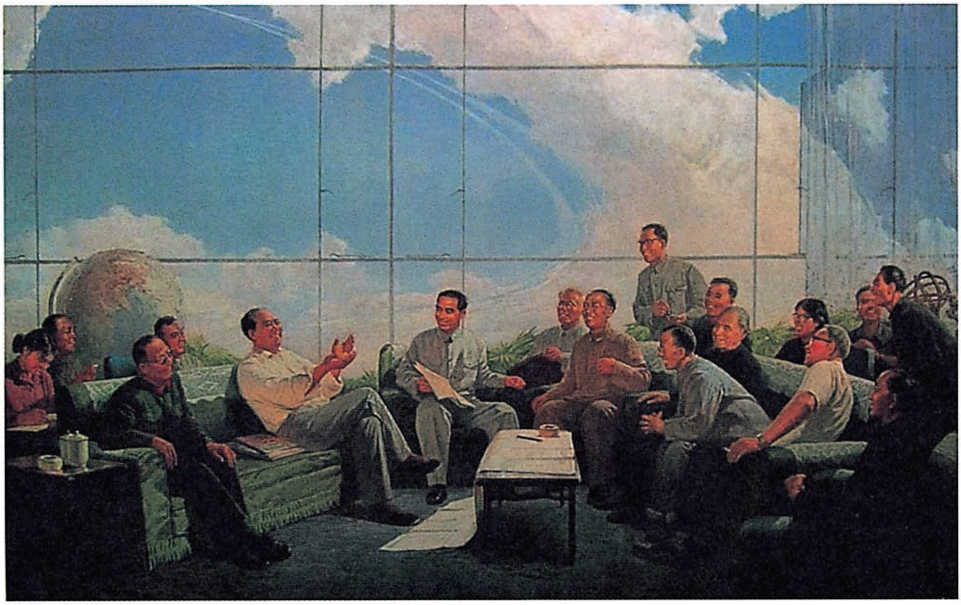
吃饭，散会！（七时五分，结束）

1969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投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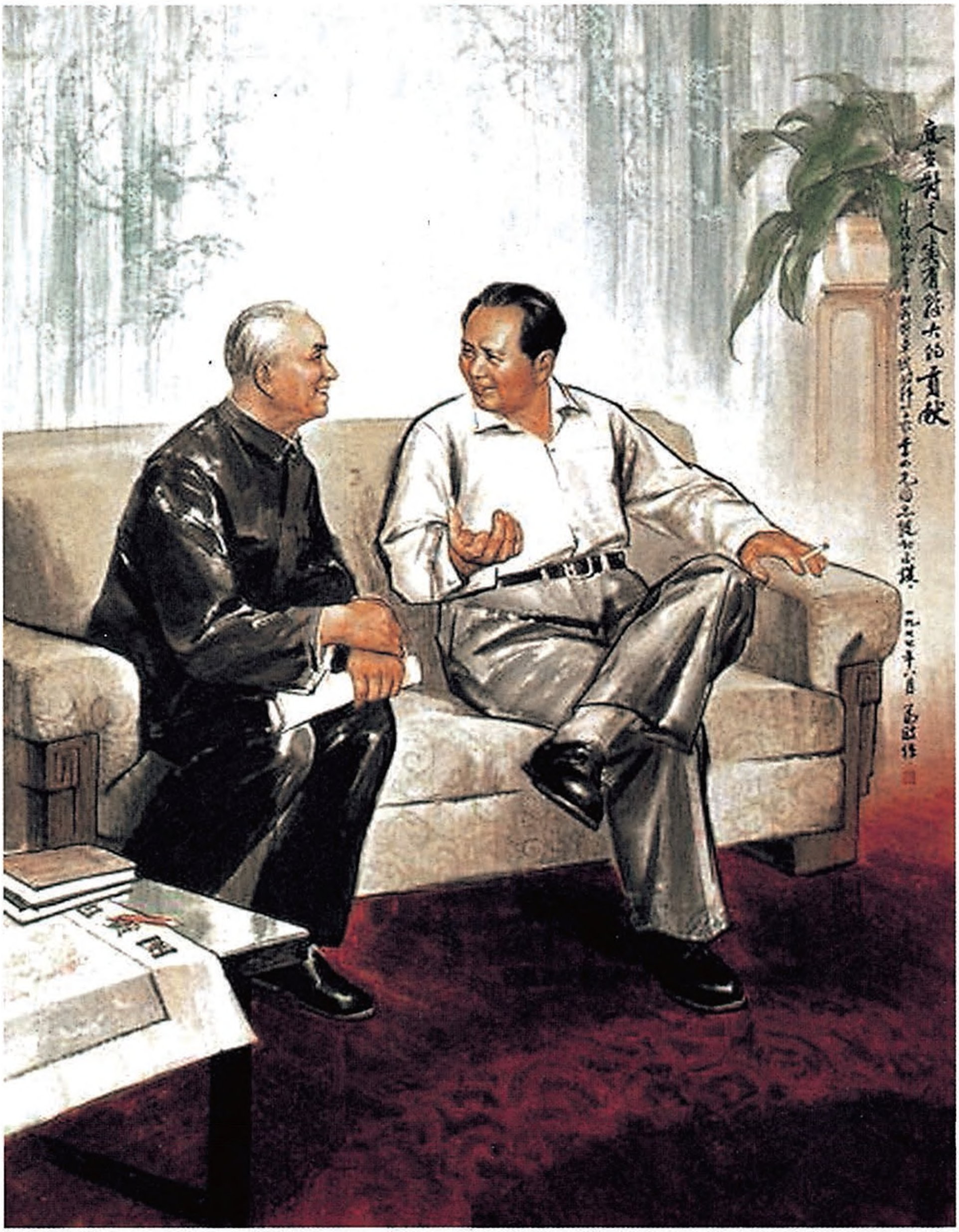
1969年4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69年4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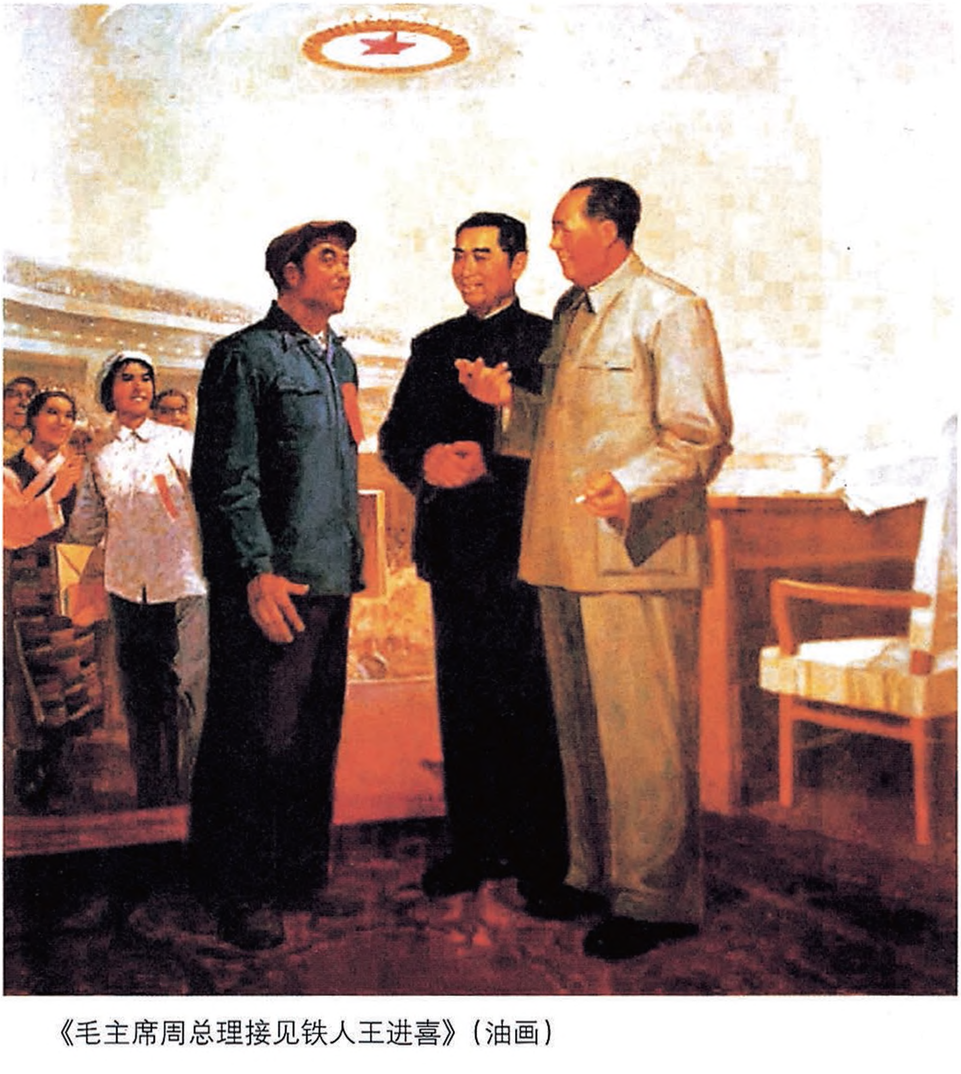
1969年4月，毛泽东和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亲切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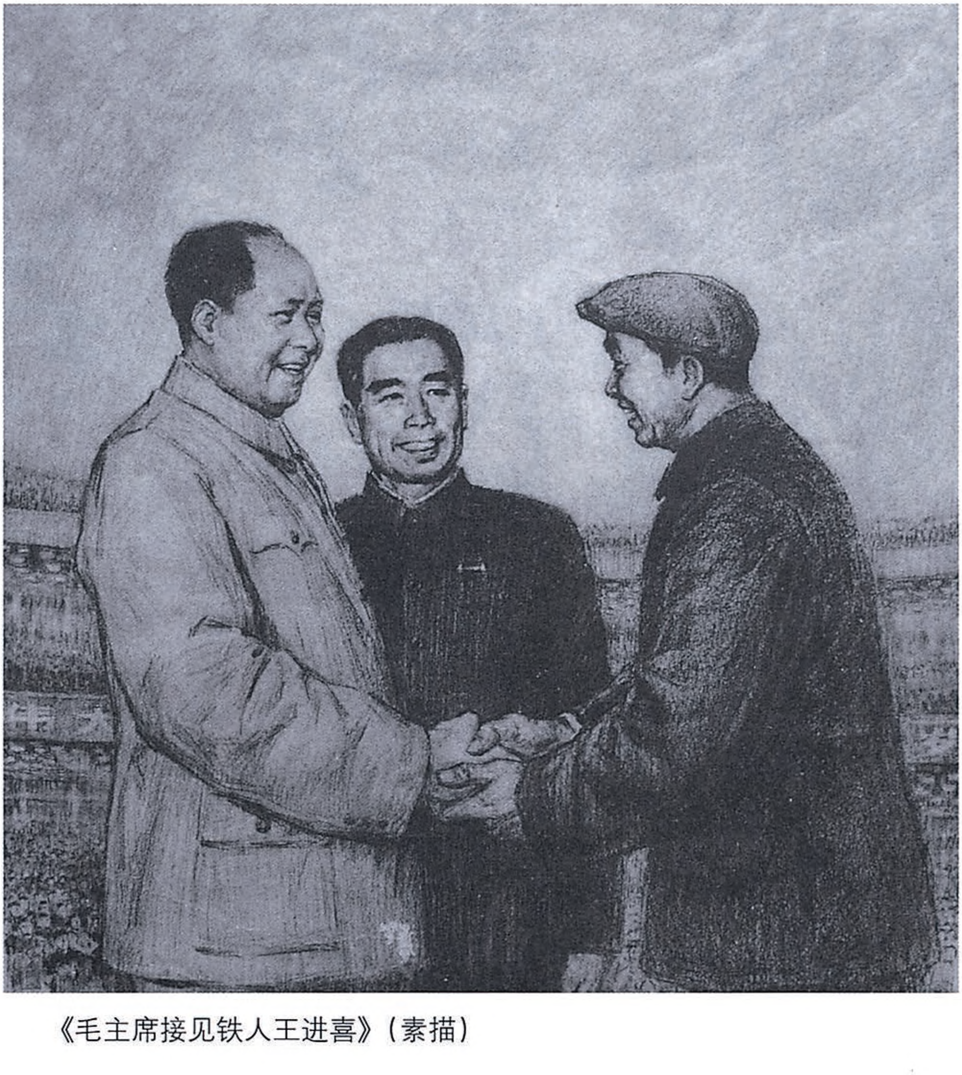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油画）


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画）



《毛主席周总理接见铁人王进喜》（油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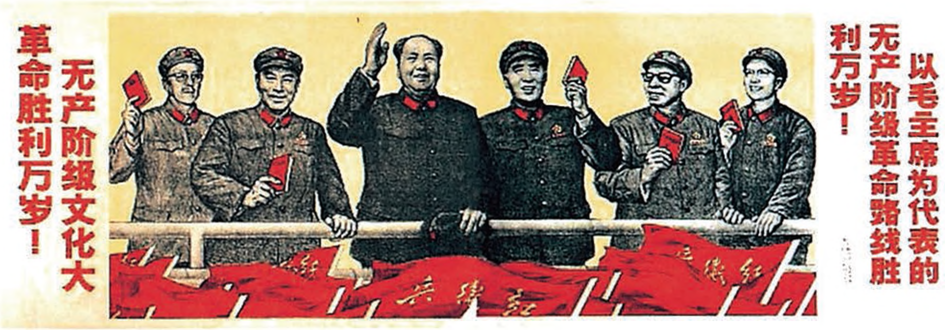


《毛主席接见铁人王进喜》（素描）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

（1969 年）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宣传画）

---

[1] 林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林彪的报告4月14日在大会上通过，4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世界大战的两种可能性

（1969年）

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1]

---

[1] 林彪1969年4月1日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中，在“毛主席最近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林彪的报告4月14日在大会上通过，4月2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1968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时曾经讲道：“请你考虑一下，世界上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五）

（1969年4月23日）

李旭英这个人过去好得很。这里有山东同志没有？野战军、华北有几个？（有人说：六个。）六个军只出了一个曾三圣，三圣有请……。其他已“支左”。山西还有张日清。有的军队没有一个，并不意味着别的军队差一些，而是已兼了革委会主任。再说明，没有利用的好人还多。有的如好几个老同志，反而上了名单，恐怕那一个时期也会有的。比如程其康、张云逸这两位老同志，也就是因为资格老。总而言之，排上了的，大多数是好的，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但不一定太神秘，都那么理想。如八位到十位在中央工作，犯过错误，过去也犯过严重错误，你说不排入能行吗？头一次进中委的占大多数，这是第一次。“七大”没有，“八大”没有。八届的老人占五十三，新排上的两百多，老的五分之一不到，则产业工人与农民增多了。

请各位同志注意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有的在地、县、社、队、工厂，如长期脱离生产就与我们一样，叫机关工作人员了，要叫他们不要脱产。他们只了解那个单位，不了解全国，犹如我们不了解他们一样。他们在本地方很活跃，但一到中央，到处记者采访，作报告，半年一年就差不多垮台了。要认真负

责，我党历史上有过，“六大”以来农民没有过，军队中有。

现在是大苏维埃，工农兵嘛。如黄永胜算农民算工人呢？（黄永胜：算农民。）听说打张辉瓒你当团长了。（黄永胜：小团。）我也不认识你，听说你认识我。如到场镇，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晓得谁到哪里了。还有很多没有选上。如刚才说的华北张日清，之所以提名，因为是政委。河北一个也没有。一个没有提，就因为张日清与刘格平打仗，一是现在仗打得不清楚，恐怕各地区都会有，至于会不会变呢？一种是变好，一种是变得不好，那有啥办法呢？再一个，新选进的，我就担心他们脱产，脱离群众。（周恩来：农民只搞两头，免去中间，如吕玉兰。工人好办，规定劳动时间，张富贵到处跑，到处检讨，没有劳动。）（康生：他也执行了刘、邓路线，也反了红卫兵，看到天安门上主席接见红卫兵，他赞成了。）

斗完就劳动，群众谅解了。一方面需要这些同志，工厂农村同志，一方面我们需要这些积极分子。有的省提不出人，他不熟悉，证明工作有问题，忙于事务。事务工作要做，其实有些事务不管也可以。太多了也不好，不到三百人，二百七十九人也可以。剩下五百人就扩大化了嘛，公道不公道，我也不清楚，大体如此。要说完全公道，我也说不清楚，说不出个道理来。你们提得有理嘛。（有同志插话：五本也难摆平。）一个组几本够吗？一个人发一本不好吗？人家当一个代表嘛。如湖南长沙提了个工人，但大产业基地在株洲，我不关心我这个家乡。（大家笑）

胡康呢？（有同志插话：刚加入党。）四川有，四川那么大个省，你们提了几个呀？（答：十个。）山东五千万人，（有同志说：两个江苏哩。）恐怕困难的还是这三四个老同志。要选他的话，如朱德检讨也检讨不清楚，不要写了，写了人家不满意。

（有人插话：是董老给他解了围。）不能怪他了，他都忘记了，八十几岁了。如陈毅写了上十次，到了上海又犯了。世界上有这些同志，你有啥办法呢？功劳也有，错误不少，检讨甚多。我看就差不多了，看以后的行动，他们也要看我们的。如在延安整风，提出治病救人，人家不信，也有理由。“七大”一选就相信了，但你尽管选他，王明、李立三都坏了，我看地球照样转。苏联不会写文章，还不如王明呢，他说我们革命委员会搞军事化。王明写的，《共产党人》登的，登了三期。如果那时不选他，他还反得快一些。八七会议没选陈独秀，也没有请他到会。

（周恩来：“六大”请他去。请他去，他不去，我给他谈的。他说你八七会议都丢了我了。）只有李维汉大革命搞农民运动，痞子运动他是右的。但是四中全会就很“左”了。一个他，一个瞿秋白，长征的时候，不带他走，他是组织部长，书记处负责。至于瞿秋白是书生，“左”掩盖了右的实质。实质是本质，形“左”实右，“形”是形式，右是本质。怎么办？你们去议吧，我没有睡觉。

（周恩来：除主席外，按笔画排……）共产党比别的党好一些，他不花钱买〔选〕票，谭言方两边都送票子，还是选省议员。一个省议员要花多少钱呀？我有一个亲戚四五个人花钱，买一个税务局长，时间三个月，所以赶快刮，把钱刮回来。有这么一个亲戚，也使我长见识。共产党不要买票，不要运动，不要抬棺游行（南京国大选举，抬棺游行）。目的在保证了领导，就是中央委员会，则有时选举，有时没有。过去经常有的，“六大”我当选了，我并没有到莫斯科去。共产党比较纯洁，政治纲领适合要求的，王明十年之后开除，不深入那时情况。后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了嘛，不只是不买票嘛，党员嘛，总是要准备牺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

各根据地，无论是豫、鄂、皖，还是井冈山，活的不多了，抗日以来就多了。此外还有一些问题未解决，如山西、贵州、山东要谈一谈。还要谈一谈，山东军队和省可以合并起来开一个会嘛，所以有的代表团冲一下，我也赞成。一个山东，一个山西。至于黑龙江，工作不错嘛，比如贵州你自我批评也不干，批一下不可以？至于选举还是要选举，一个张日清，一个南萍。

我觉得这次大会，总结这几年的经验，总之，没有刘少奇这伙人了，要翻案就翻这。他们是一批“精华”，我们是一批“糟粕”。行了。还有两句，邓小平和刘少奇要有区别。邓做了许多坏事，一条是弃军逃跑，一条是到北京后与刘少奇、彭真搞到一起。也有些好事，如苏联的二十大，他不同意，也未查出叛徒。有人说打仗，也不怎么样，总打过些仗。苏区邓、毛、古、谢，（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博古）王明是反对的。

差不多了吧？还要选个政治局，又要个常委，中央委员还没选出来嘛。我想还是由下而上的办法比较好。只提一个数目，不提名单。这又要时间，还是想几个问题，你们想一想政治局怎么组成？常委怎么组成？群众路线方法比较好。一个名单叫选苏联的办法，由上指定人叫下面画圈圈，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由下至上提名。今天能搞完预选吗？预选时间可以交头接耳。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

（1969年4月28日）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

现在苏修攻击我们，什么塔斯社的广播，王明的材料，以及《共产党人》的长篇大论，说我们现在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叫做“小资产阶级的党”。说我们搞一元化，回到了过去根据地那个时代，就是讲倒退了。什么叫一元化呢？他们说就是军事官僚体制，按照日本人的话叫体制，按照苏联的话叫做“军事官僚专政”。他们一看我们这个名单里头，军人不少，这就叫“军事”；还有什么“官僚”，大概就是我呀，恩来呀，康生呀，陈伯达[2]呀这批“官僚”。总而言之，你们凡是不是军人，都属于“官僚”系统就是了，所以叫做“军事官僚专政”。这些话嘛，我看让人家去讲！人家怎么讲，就怎么讲。但他有个特点，他就是不骂我们叫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叫“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呢，就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专政，恢复

---

[1] 本篇和毛泽东1969年4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5月9日印发各地，要求“向工厂、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革命委员会委员以上，军队排以上干部宣读，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执行”。

[2] 恩来，即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资产阶级专政。

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

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

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有关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现在有些工厂已经把他们解放出来了，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有些工厂还没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比如二七工厂，就是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是一个大工厂，八千工人，连家属几万人，过去国民党有九个区分部，三青团有三个机构，另有八个什么特务机构。这个里头当然就要分析了，因为那个时候不加入国民党那个东西是不行呀！有些是老工人了，老工人都不要了吗？那也不行。应该分别轻重，有些人是国民党的挂名党员，不得不加入，只要谈一谈就行了；有些比较负些责任的；有少数，就是钻得很深的，做了坏事的。要分别几种情况。做坏事的，也要分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他现在检讨得好，那还应该让他工作，当然不是给领导工作。不让这些人工作，他在家怎么办呢？他的子女怎么办呢？并且老工人一般都是有技术的，虽然技术有些并不那么高明。

1969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所以整个中央的同志，包括候补中央委员，请你们注意，要过细地做工作。对于这种事情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你抓多了人，抓起来干什么呢？他也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又没有放毒，我说只要没有这几条，就不要抓。至于犯

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人家犯了错误，无非是过去犯的，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做了些坏事，或者是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要他们跟群众一道，如果不让他们跟群众一道，那就不好了。有些人关了两年，关在“牛棚”里头，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了，出来一听呀，讲的话不对头了，他还是讲两年前的话。他脱离了两年的生活。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讲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过程的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所以，在林彪同志报告[1]里头讲，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党支部，一个一个单位地搞。还有一个一个团支部，整团的问题，也提出来了。

此外，过去讲过的了，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他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我这里讲的不包括专政对象，什么地富反坏那套人。因为那套人是很高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打来的，他以

---

[1] 指林彪1969年4月1日代表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

为打来了，这个世界就翻身了，他就可以翻身了。还要准备这一条。社会主义革命过程还要革这个命。

人家打来，我们不打出去。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中国这个地方不小。他不得点好处，我看他也不会进来。要使全世界看到我们打仗是有理的，有利的。他进来了，我看比较有利，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他陷在人民包围中间。至于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经验证明，可以对付。

为了胜利，就是要人多一点了，是不是呀？各方面的人，不管你是哪个山头或者哪一个省的，或者是北方、南方的，是多团结一点人好，还是少团结一点人好呢？总是多团结一点人好。有些人的意见不一定跟我们一致，但是，不是敌我关系。我就不相信，比如具体来讲，说是什么杨得志[1]跟王效禹[2]是敌我关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敌我关系，还是人民内部的关系呀？据我看是人民内部吵吵架。中央也是有点官僚主义，没有大管你们，你们也没有提向中央来讨论。山东这么一个大省，是人民内部矛盾，乘此机会，你们谈一谈嘛，好不好呀？我看华东也有这个人民内部问题。还有山西，也是人民内部，你支一派，我支一派，何必那么尽吵干什么！还有云、贵、川的问题。各地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就是了，那比较

---

[1] 杨得志，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2] 王效禹，当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委，1970年6月被免职。

去年跟前年好多了。你这个同志不是叫许世友[1]吗？前年我们在上海那个时候可不得了，七、八、九三个月。现在日子总好过一点嘛！我说的是整个局面。你那个南京跑出一个什么“红总”，做工作之结果，还是合作了嘛，一个“八·二七”，一个“红总”[2]，还不是合作了嘛。

我说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工作。过去不是讲过两句话吗？地方的问题在军队，军队的问题在工作。不是生死冤仇，那何必呢？要讲个人恩怨呀，那个账算不了那么多。总而言之，我看都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碰在一块儿，有些意见不对头。人家或者是搞什么批评了自己，反对了自己，自己又反攻一下，结果就发生矛盾了。反对自己的人不一定是坏人。北京经常要打倒的人物之一就叫谢富治[3]。后头他采取的方针是这样：凡见要打倒他的那些团体，他都说你们无事。而拥护他的，不一定都是好的。

所以，我讲的还是那几句老话，无非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里头有具体内容的，干什么事，什么具体的胜利，怎么个团结法。

我相信过去犯错误的一些老同志。原先有个大名单三十几个，我们认为都要选举到政治局委员就好。后头有人提出个小名单，十几个，又觉得它太小了。大多数人是个中间派，反对这个大名单，也反对小名单，主张二十几个人的中等名单，这就只好选代表啰。并不是说候补中央委员就比正式中央委员在政治水平上、工作能力

---

[1] 许世友，当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2] “八·二七”“红总”，是当时南京的两个群众造反组织。

[3] 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上、德才资各方面差，并不是这个问题。在这个里头有个不公平。你说那么公平哪，我看就不那么公平，不那么公道。

196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

大家要谨慎小心，无论是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都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间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

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皮定钧[1]同志，你那个鄂豫皖那个时候多少人？后头剩了多少人？那个时候人可多啦，现在存在的就不那么多了。那个时候，江西苏区，井冈山苏区，赣东北，闽西，湘鄂西，陕北，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至于菜呢？大军所过，哪里能够到处搞到菜吃呀？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所以，有些外国人、新闻记者说，我们这个党在重建。现在我们自己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事实是需要重建。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个别实在不行的，劝他退出。极少数的人，可能要采取纪律的处分了，党章规定了的，是不是呀？还要经过支部大会，上级批准。总而言之，要采取谨慎的方法。要做，一定要做，但是要采取谨慎的方法。

这次全国代表大会，看起来开得不错。据我看，是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采取发公报的办法，现在外国人捞不到我们的新闻，说我们开秘密会议。我们是又公开又秘密。北京这些记者，我看也不大行，大概我们把他们混到我们里头的什么叛徒、特务搞得差不多了。过去每开一次会，马上透露出去，红卫兵

---

[1] 皮定钧，当时任福建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小报就登起来。自从王、关、戚[1]、杨、余、傅[2]下台之后，中央的消息他们就不知道了。

差不多了，那就散会！

---

[1] 王，指王力，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案犯。关，指关锋，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案犯。戚，指戚本禹，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他隔离审查。1980年7月北京市公安机关以反革命罪依法将他逮捕。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2] 杨，指杨成武，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指余立金，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委。傅，指傅崇碧，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员。1968年3月，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在军队的职务。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指出这一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对陈伯达在中共九大发言稿的批语[1]

（1969年4月）

第二页说得太过分，宜删去。你可以另外写一些你自己的见解。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1969年4月12日，他将自己准备在中共九大通过政治报告和党章前发言的稿子送毛泽东审阅。这个发言稿的第二页写道："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毛主席经历了五十多年的长期斗争，具有最丰富的经验，是历史上仅见的所向无敌的创造性人才。毛主席紧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起来。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在思想、理论各方面战线上，在工、农、兵各方面战线上，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等等，总是大无畏而又细心地工作，不断地总结经验，不断地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我们从一个胜利到一个胜利。""毛主席在理论工作上和实践斗争中，都是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辩证的。"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些话，并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抓好典型和面上工作问题[1]

（1969年4月）

一

一定要抓好典型。

二

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期间讲的两条意见。1970年1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条意见。

关于清查“五·一六”[1]问题的意见[2]

（1969年5月、1970年2月）

一

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其他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我说的放毒，是食物放毒，不是政治上的。

---

[1] “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清，最后不了了之。

[2] 本篇一是毛泽东1969年5月3日在谈到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问题时说的一段话；本篇二是毛泽东1970年2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的一段话，都引自中共中央1972年9月7日转发的《中央警卫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曾对中央转发这个座谈会纪要批示：“同意。”

二

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

对新当选中委的基层干部的要求

（1969 年 4 月）

要注意，要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1]

1969 年 5 月 1 日晚，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九大代表以及首都 50 万革命群众一起欢度劳动节。

---

[1] 这是毛泽东 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大期间谈到新当选中央委员的一些基层干部时说的一句话，同年 11 月 21 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发表了这句话。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

对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政策材料的指示稿的批语[1]

（1969年5月）

照发。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69年5月7日为批转《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材料给毛泽东等的送审报告上。报告中说，主席交办的这份材料，我们于5日晚宣读和讨论了一次，商定核实修改后由中央转发各地参考，并希望主要城市进行试点。中央批语稿及附件现送主席审批。中央批语稿指出，这个材料“对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现将这个材料发给你们参考。希望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结合具体情况，调查研究，进行试点，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并将你们认真落实毛主席政策的试点经验报告中央”。毛泽东审阅时，将文中“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后面的“等地”两字改为“及其他大、中城市”。5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材料。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项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一、对资本家中的大多数，坚持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政策；二、对资本家中的极少数反动分子，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区别对待，给予出路；三、对不够资本家的，把他们划出来；四、对小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在斗、批、改的群众运动中进行自我教育和改造。

清平乐·警觉苏修*

（1969年5月）

穷发之北，
海波泛荒垂。
熊罴向我蹲且嚎，
懦者肝胆破碎。

勇士团结一心，
暂缓同室搏命。
苏修贼心不死，
我辈岂是南明。

对空军部队技术革新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69年6月6日）

看了之后，很感兴趣。对每一具体技术改革说来，称为技术革新就可以了，不必再说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指历史上重大技术改革，例如用蒸汽机代替手工，后来又发明电力，现在又发明原子能之类。

六月六日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1969年5月4日给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的这个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空军部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已完成较大革新项目230项，正在研究的80多项，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报告分5个方面介绍了具体情况，包括对现用歼击机的重大改进，地空导弹反干扰电路与高射炮性能的改进，反干扰性能强的机上雷达、地面雷达与通信保密技术的研制，通用化、小型化、机动化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利用废旧器材勤俭节约搞科研等。报告在开头和结尾两次把“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并用，一处说“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空前活跃”，另一处说“以革命带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工作”。毛泽东的批语，是对此而写的。

要把空降兵认真搞起来[1]

（1969年6月26日）

空降兵要认真地搞起来，搞就要搞得像个样子，不充实的把它充实起来。你们要很好总结经验。

---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治委员刘丰等谈话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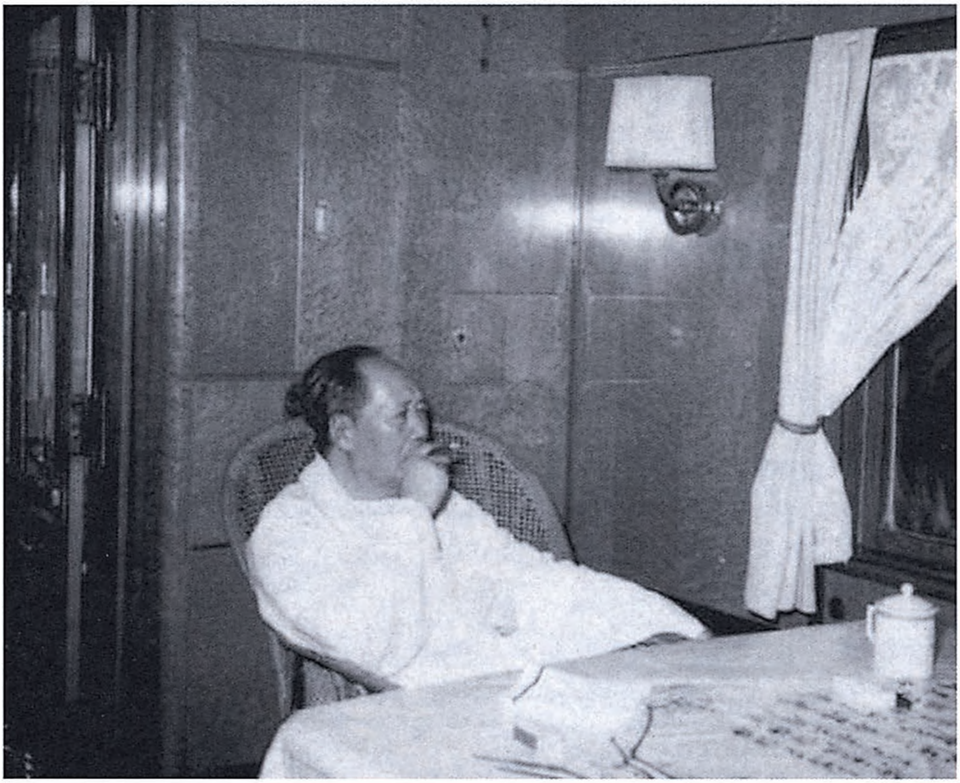
对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1]的批语

（1969年6月）

照办。

---

[1] 中共中央1969年6月12日发出的这个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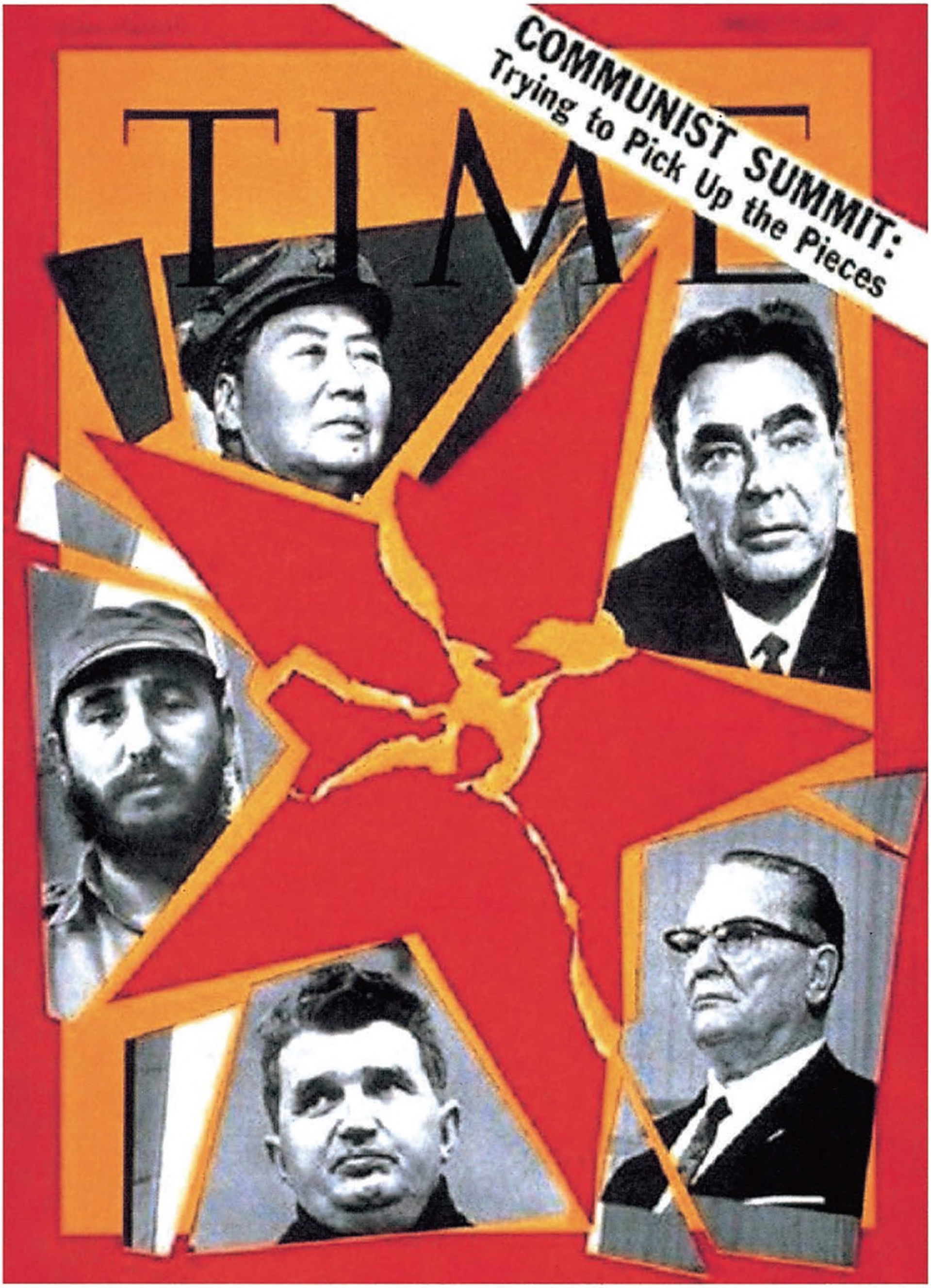


1969年，毛泽东外出视察在火车上。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
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
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
起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

1969年6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和青年学生交谈。

1969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门前和工作人员的合影。


TIME
COMMUNIST SUMMIT:
Trying to Pick Up the Pieces

1969年6月13日，毛泽东和布里兹涅夫、铁托、齐奥塞斯库、卡斯特罗等一同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对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的批语[1]

（1969年7月3日）

原则同意。

七月三日下午六时

---

[1] 周恩来1969年7月3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在主席临行前，曾报告过国务院业务组改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取消和精简，准备成立各单位的革委会及其领导小组等问题，并连带提出了党中央各部委如何改革的问题。当时主席指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对于党中央机关，拟保留中央文革（后未作为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办公厅、组织部、联络部等，宣传部、调查部、监察委员会等部门拟下放、合并或撤销。国务院业务组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9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刘西尧列席。国务院所属62个部门拟合并为21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计21万人。遵照主席指示，将统战部、人大、政协、民族事务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各民主党派机关6个单位的军管负责人合并组成一个小组，由我派一人与之联系。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的这个报告上。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成立解放军报社领导小组报告[1]上的批语

（1969年7月21日）

肖力已下放，不应任此职。

七月廿一日

---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9年7月3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根据当前解放军报社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我们考虑，有必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对报社革命和生产实施一元化的领导。为此，解放军报社经过反复酝酿，充分协商，提出十五名同志为领导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关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我们建议仍以肖力同志为好。”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原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当时已下放到基层锻炼。

对中央“七·二三”布告[1]的批语

（1969年7月）

照办。

---

[1] 中共中央1969年7月23日的这个布告说，当前，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和晋中、晋南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犯下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为此，中央决定：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他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他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销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

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资金。”六、“对杀人放火和其他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对两报一刊社论稿《人民军队所向无敌》的批语[1]

（1969年7月）

一

照发。

二

这个形容词太长，可以去掉。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组员姚文元1969年7月23日送审的社论稿的批语。这篇社论稿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四十二周年而写的，原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所向无敌》，毛泽东审阅时改为《人民军队所向无敌》，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这篇社论1969年8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

对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军组织纪律性指示稿[1]的批语

（1969年8月）

用军委名义发。

---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69年8月16日送毛泽东等审阅的《关于加强我军组织纪律性的指示》稿指出，目前全军形势大好，但“有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为此，提出如下要求：一、全军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反对破坏集中统一、破坏组织纪律、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行为。二、要在全军普遍进行组织纪律和法纪教育，提高全体人员对纪律的重要意义的认识，澄清各种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三、对个别严重违法乱纪、屡教不改的人，必须给以必要的纪律制裁。四、各级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加强领导，带头遵守纪律，维护纪律。认真贯彻严格管理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五、要把加强组织纪律性问题，作为部队革命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经常抓紧，反复落实。毛泽东审阅时，将这个指示的署名由“军委办事组”改为“中央军委”，并写了这个批语。8月22日，中央军委发出这个指示。

对中共中央命令稿的批语[1]

（1969年8月）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69年8月22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报告中说，根据最近边疆各省、区和各地区发生的情况看来，需要继中央“七·二三”布告之后，再发出这样一个命令，将对稳定局势有利。周恩来等送审的命令稿指出：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边疆军民，尤其担负着直接的责任。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向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发布这个命令。

对江青关于京剧《智取威虎山》改名等问题请示信[1]的批语

（1969 年 8 月 31 日）

牵动太大，至少暂时不要改动戏名和主要人物名字，地名暂时也不宜改动。对小说作者[2]的批评也宜从缓。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1969年8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把《智取威虎山》改名为《智取飞谷山》，因为现在才确知作者是写自己，真人真事。”“《林海雪原》的倾向主要方面也是不好的，主要表现在：不突出党的领导；不分战争的正义性质与非正义性质；侦察工作神秘化；把杨子荣写得比土匪还土匪等等。”信中还提出把“杨子荣也改名为梁志彤”。

[2] 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1969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越南人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致以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近几年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坚持人民战争，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抗击着世界上最凶恶的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美帝国主义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但是，它的侵略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当前，尼克松[1]政府正在加紧推行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企图用政治欺骗和所谓战争非美化的手法达到它永

---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远霸占越南南方的目的。

苏修叛徒集团一贯同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破坏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赫鲁晓夫[1]是这样，勃列日涅夫[2]之流更是这样。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实现其同美帝国主义称霸和重新瓜分世界的狂妄野心，最近一个时期，更加紧了同美帝国主义的勾结，露骨地施展假支持、真出卖的阴谋，妄图把越南人民的革命烈火扑灭下去。苏修叛徒集团做尽了坏事，他们同美帝是一丘之貉，是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我们相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力更生，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国土上全部赶出去。

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越南人民进行的这场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中，中国人民坚决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2]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1969年9月22日，毛泽东在天津。

1969年9月22日，毛泽东和汪东兴、张玉凤等在天津。

1969年9月23日，毛泽东和跟随南巡的警卫人员合影。

对国庆二十周年口号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69年9月）

一

增加了一句口号，请酌定。

二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

[1] 周恩来等1969年9月8日送审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共28条，毛泽东审阅时，在第21条后加写了一条（即本篇二），作为第22条，原来的第22条至第28条依次改为第23条至第29条。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上。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工农兵观礼代表。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工农兵观礼代表。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工农兵观礼代表。

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全国工农兵观礼代表。

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1]

（1969年10月14日）

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

---

[1] 这是毛泽东针对苏联对我核战争威胁下关于战备疏散的指示。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1969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满怀胜利的豪情欢庆祖国解放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五年前，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拿起武器，前赴后继，英勇不屈，经过长期斗争，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了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占领者，解放了自己的祖国。这是阿尔巴尼亚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伟大胜利。

解放二十五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不怕艰险，不畏强暴，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破坏和捣乱，捍卫了祖国的独立，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江山。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化运动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阿尔巴尼亚人民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修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对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今天，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已经成为支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一座坚强堡垒。

阿尔巴尼亚人民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是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以自己光辉的革命实践，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为自己的亲密战友——阿尔巴尼亚人民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伟大胜利，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两党、两国政府、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经历了暴风骤雨的考验。中阿友谊的不断发展，必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

当前，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管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如何疯狂挣扎，都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让我们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紧密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万岁！

中阿两国人民永恒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1969 年 12 月 19 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阮友寿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站在抗美斗争最前线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九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光荣的旗帜下，团结一心，不畏强暴，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使它陷入了孤立和困难的境地。越南南方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完成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战争虽然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它还没有最后失败。尼克松[1]政府上台后，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它口头上侈谈“和平”，宣传要从越南南方逐步撤出美军，借以欺骗美国人民，实际上却在加紧强化侵越战争，企图用所谓越南战争“越南化”，即加强伪军和傀儡政权的办法，来挽救它必然失败

---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的命运。事实证明，尼克松政府的侵越政策，和他的前任约翰逊[1]政府并无区别，而是一脉相承的。不论他们玩弄什么样的花招，他们是决不会放弃妄图永远霸占南越、分割越南的狂妄野心的。

我们相信，久经锻炼的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领导下，遵循胡志明[2]主席的遗训，发扬“决战决胜”的革命精神，坚持持久战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持久制胜，一定能够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同伙的阴谋诡计，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亲密的兄弟和战友。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人民将永远同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

[1] 约翰逊，1963年至1968年任美国总统。

[2]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69年9月逝世。

对中央转发湖南省革委会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检查报告的通知稿的批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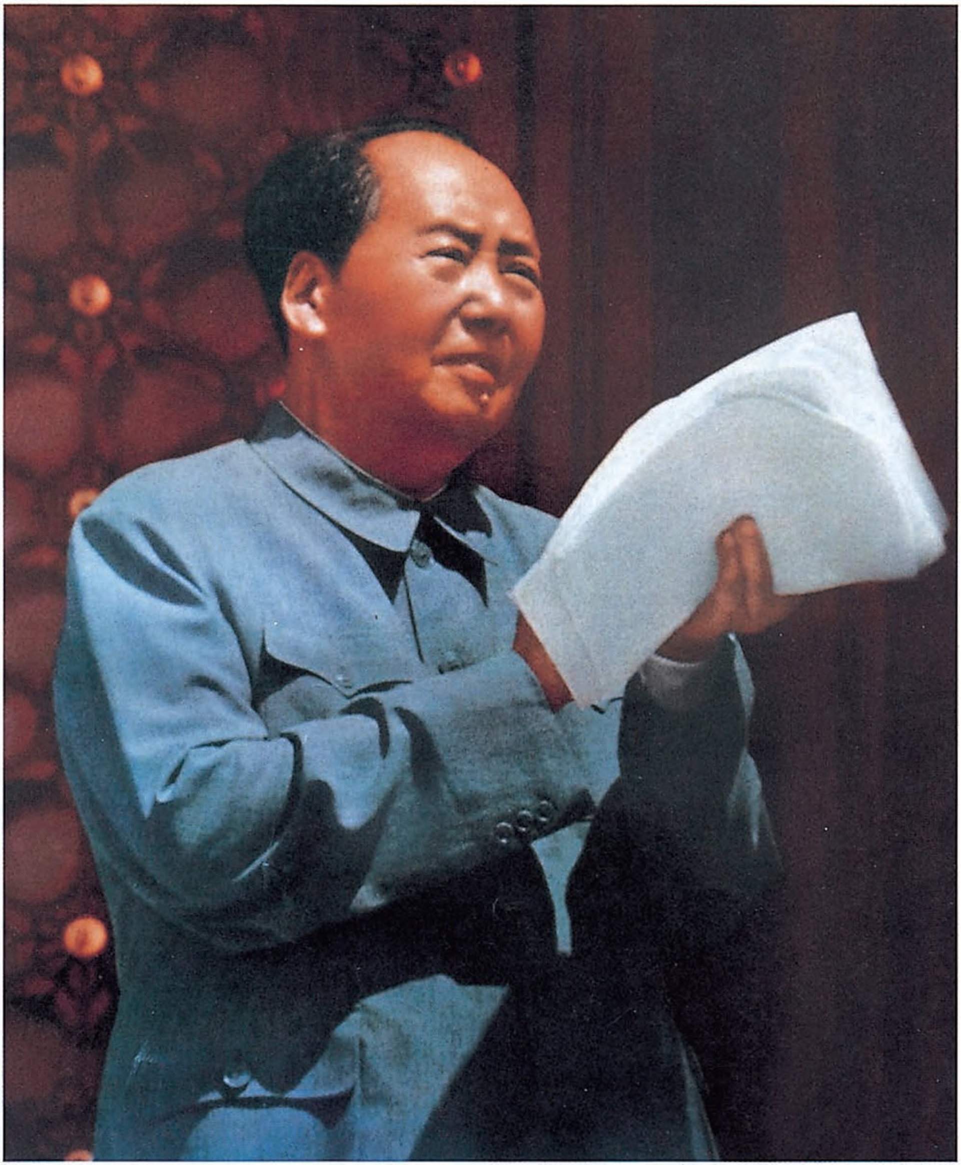
（1969年12月25日）

照办。

---

[1] 周恩来等1969年12月25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未经请示，擅自印发毛主席对湖南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是错误的，是违背中央历次的通知和决定的。中央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和散发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视察谈话和中央其他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有关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他同志的传记、抄件、文件、书籍、诗词、画册、图片等等。凡属以上谈话记录和文书、图片、画册，各地都应采取措施，立即收回，予以销毁。以后如再有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的，即应执行纪律，严予处分。对于那些为达到反革命目的的造谣惑众、招谣撞骗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分别予以判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必须严格控制各地区、各单位所属的印刷厂，严格控制纸张的分配、使用。毛泽东的批语，写在周恩来等的送审报告上。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通知。

1970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关于江青不必担任北京五·七艺术学校名誉校长的批语[1]

（1970年1月）

江青[2]不必任名誉校长。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1月22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信中说："根据江青同志送来的两份信件，昨（廿一）日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进行了商谈。江青同志并说明，现在筹办中的五·七艺术学校拟设在北京，以原劳动大学作校址，附近有农田四百多亩，可兼习农业劳动。同时，还拟在上海筹办一个上海五·七艺术学校。""北京五·七艺术学校的组织机构，学科学制，招生计划和领导成员，拟同意两份报告中所提意见。妥否，请主席予以批示。"周恩来附送的五·七艺校临时筹委会1月21日报告中提议，江青为艺校荣誉校长，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为荣誉政委。

[2]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康生转送陈垣来信的报告上的批语[1]

（1970年1月）

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1970年1月25日将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陈垣的一封来信转报毛泽东时写道，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4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保留，以照顾他的生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对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1]

（1970年1月）

照办。

---

[1] 周恩来等1970年1月30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一、要放手发动群众。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四、要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六、要加强领导。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

念奴娇·长征*

（1970年1月）

万里气势，
不逶迤，
烽烟五津动摇。
雪山绝境，
荒草地，
四散溃逃几国焘。
娄山关后，
不为人知，
阴谋出年少。

回首如今多劳？
看我宝刀，
永无宁日好。
早年空空多浪费，
而今点石金。
老骥伏枥，
变本加厉，
做事要彻底。
江山已定，
谁人敢论功高？

同意印发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的批语[1]

（1970年2月4日）

康生同志：

此件可以照你的意见办理。其中颂圣写成烦圣，请改正。

毛泽东

1970年2月4日

---

[1] 这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1970年1月30日写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的批语。康生在报告中说：“去年编毛选五卷时，我记起在一九四一年政治局九月会议时主席曾写了一个批判王明投降主义的讲话大纲。”“今年一月二十六日政治局会议上，我报告了这件事，各同志听说有这样一个大纲，一致要求印几份给政治局同志们看看。”“现在排了一份清样，送主席审阅，并请示是否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一阅，希望得到主席的批准。”1941年，毛泽东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迁就倾向，曾写道：“不知迫蒋只知颂圣，提不出任务。”“不作阶级分析，全无列宁精神。”“群众原则，又妥协又斗争原则。”康生送审的讲话大纲上，将其中的“颂圣”印成“烦圣”，毛泽东审阅时作了改正。

对中央关于反对铺张浪费通知稿[1]的批语

（1970年2月）

照办。

---

[1] 周恩来等1970年2月1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中央重申：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的非生产性建筑、生活设施必须从简；四、一切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等，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电影，不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此铺张浪费；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2月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并附发了西安市、柳州市等几个地方铺张浪费、大兴土木搞非生产性建筑的材料。

对中央关于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2月）

照办。

---

[1] 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1970年2月5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中说，中央决定于2月下旬召开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有关指示，推广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经验，研究“吐故纳新”政策，统一思想，加强领导，进一步搞好整党建党工作。通知稿中附有中央组织部业务组郭玉峰关于当前各地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通知。

1970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设立国务院文化组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0年3月13日）

同意。

三月十三日

---

[1] 周恩来等1970年3月11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昨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一、在国务院之下设立一文化组，管理有关文艺、电影、出版、图书、博物等方面的工作。二、文化组的思想政治领导属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分工归中央文革；文化组的行政领导属国务院，党中央对该组的指示和决定，由国务院组织实施。三、文化组设组长、副组长和组员若干人，提议吴德为组长，刘贤权为副组长，石少华等7人为组员。四、文化组设一小的工作机构。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等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70年3月14日）

同意中央的部署。

三月十四日下午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3月1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汪东兴回京后，传达主席关于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指示，政治局在京同志一致拥护，立即着手进行。工作分几个方面：第一，关于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由恩来等5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现起草好了一个决定稿，并作了修改，13日晚已在政治局有关会议上讨论通过。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有些不便写入这一文件的，拟与各省来京同志面谈。周恩来送审的决定稿包括四届人大的指导思想，四届人大代表的条件、名额、比例、选举方法等5个部分。第二，关于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已由康生等5人组成，拟在3天后将修改要点写出，待讨论、送审后再着手修改文字，准备一个月完成这项工作。第三，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拟在各地同志来京协商后，再组织人动手起草。第四，关于筹备工作，待汪东兴回程时再请他面报。

关于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的批语[1]

（1970年3月）

照总理意见办。

---

[1]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0年3月8日将铁道部军管会关于湘黔铁路方案比选情况报告送毛泽东等审阅时写道，湘黔铁路选线问题，经铁道部仔细研究和比较，并经过踏勘和审查资料，又征求湖南、贵州两省革委会和军区意见，均认为“贵阳接轨方案”较“遵义接轨方案”为好。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亦同意这个方案。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关于修改宪法等问题的批语[1]

（1970年3月）

同意第一项所提修改问题的意见。同时请各地方提修改意见。附件留阅。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3月17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3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了两项工作。“第一项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现呈上请主席审阅后予以批示，以便着手修改。”第二项通过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来京协商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负责人名单。

1970年，毛泽东和护士长吴旭君在一起。

关于中美会谈日期的批语[1]

（1970年3月）

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0年3月2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说，美国“由于中东紧张、柬埔寨政变、美苏紧张而我们又直接提出要其来京谈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弄得它不好回答，又不便在三月间约见，故迟至三月二十三日提出四月初会谈。”“可以料知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它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所以先有叶海亚转达准备开辟直接渠道的谈话，后有美使馆在四月初会谈的通知”。为此，“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日、十二日或十三日，既在中国总理访朝之后，又在美苏核会谈（四月中）之前。这种想法，不知妥否，请主席批示”。

对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问题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3月）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70年3月25日送审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上。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有4条：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

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3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献给斯特朗[1]的花圈上的挽词

（1970年4月2日）

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

[1] 斯特朗，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从1925年起多次访问中国。1946年第五次来中国时访问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毛泽东在接见她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1958年她到中国定居，1970年去世。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送审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70年4月3日）

一

此文写得较好，已看过，另一篇待看。用这一篇似乎就够了，可用两报一刊的名义。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2]，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有用的话，不至于引起反感的话，保留了几段，并未全删。以上请酌。

毛泽东

1970年四月三日

因为删掉几段，注脚的号码请重新排一下。

二

但是历史是有曲折的。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3]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4]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现在在苏联正是由这样一个人主持“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

三

老沙皇的“斯拉夫帝国”早已成为泡影，沙皇统治本身，在一九一七年，早被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消灭了，老沙皇的统治完蛋了。在今天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时代，新沙皇妄图重新建立一个更大的称霸全世界的大帝国，也只能是一场迷梦。

---

[1] 《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是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而写的。周恩来等1970年4月1日送毛泽东审阅的修改稿上，原题为《列宁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送审稿的批语；本篇二是他在送审稿中加写的两段话；本篇三是他对送审稿中一段话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他加写和改写的文字。这篇文章后来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在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5月1日

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

[2] 毛泽东在1970年4月1日送审稿第一、二页上，删去了以下一段话：“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世界观（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许多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有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列宁有七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在第二、三页上，删去了以下4段话：“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毛泽东思想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正是由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节节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激烈。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洞察到现代修正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道，一次又一次击退现代修正主义的逆流，保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第五页上，删去了以下3段话：“毛泽东同志还精辟地指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言兴邦；赫鲁晓夫讲三无世界、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言丧邦。’”“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兴邦、丧邦，就是指的社会主义之邦。有无产阶级专政，才有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天才地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揭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

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这是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划时代的伟大贡献。”

[3] 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右派首领，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他公开篡改马克思主义。1896年以后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修正”。1902年起多次任国会议员。考茨基，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二国际理论家。早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后转向改良主义。长期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主编，多次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第二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从1910年起公开转向中派主义。1917年参与创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1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派和中派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社会化委员会主席。

[4]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关于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批语[1]

（1970年4月12日）

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

[1] 197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泽东再担任国家主席。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1971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的由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毛泽东审阅中央转发的这个材料时，曾批示："照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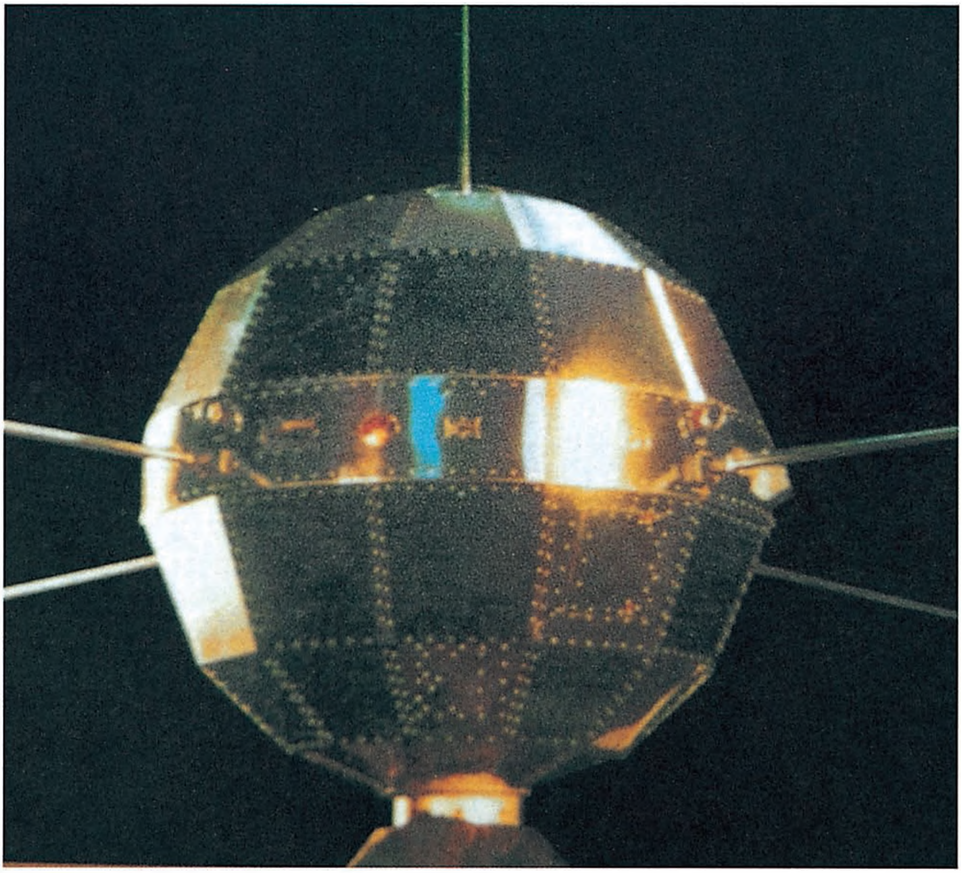
对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0年4月24日）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4月24日7时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我国以三级火箭试放第一颗卫星，早在1968年年初得到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直到今春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3月底，运载火箭和卫星已运至基地，经检查测试，认为可行。4月中旬在京开会，经各方论证，认为可以发射。目前，火箭和卫星已在发射阵地竖起，经检查测试，对发现的问题，均已解决。现拟同意于今夜发射，请主席批示。周恩来还向毛泽东报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4月23日的请示发射报告。4月24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共度节日。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和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焰火。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外国朋友一起欢度节日。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和谢胡在天安门城楼上。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50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星
策　　划：树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苹　杨健桉　听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颖　杨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浍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口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口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和黎笋的谈话……………………………………………………………1
（1970年5月11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8
（1970年5月20日）
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的批语 ……………………………21
（1970年5月）
对中央转发北京二七机车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 ……………………………………………………23
（1970年5月）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稿的批语 ………………………24
（1970年5月）
对理工科大学教学改革两份材料的批语 ……………………………25
（1970年6月5日）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 ………………………………………………26
（1970年6月11日）
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 ……………………28
（1970年6月24日）
转发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和煤炭工业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30
（1970年6月）

暂不发表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谈话整理稿的批语 ……………32
（1970年6月26日）

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题词 ……………………………………33
（1970年6月27日）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 …………………………………………35
（1970年7月11日）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 ……………………………………37
（1970年7月13日）

要研究海军落后的原因 ……………………………………………40
（1970年7月29日）

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 ……41
（1970年7月）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42
（1970年8月22日）

我的一点意见 ……………………………………………………46
（1970年8月31日）

对政治局讨论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示草案情况报告的批语 ……………………………………………………………50
（1970年8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51
（1970年9月1日）

对江西找到大盐矿报告的批语 ……………………………………53
（1970年9月2日）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54
（1970年9月6日）

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 ……………………………………58
（1970年9月6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59
（1970年9月8日）
对中央关于组织群众广泛讨论宪法修改草案通知稿的批语 ………61
（1970年9月）
在南京军区等单位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情况摘要上的批语 ……62
（1970年9月）
关于海上作战等问题 ……………………………………………………64
（1970年9月25日）
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批语 ……………………………………66
（1970年9月27日）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 …………………………………………………78
（1970年10月10日）
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 …………………………………………81
（1970年10月14日）
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 ……………………………………………86
（1970年10月15日）
对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通知稿的批语 ………………91
（1970年10月）
关于同意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批语 ……………………………………92
（1970年10月）
悼念戴高乐逝世的唁电 …………………………………………………93
（1970年11月11日）
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谈话 …………………………………………94
（1970年11月13日）

同意印发《我的一点意见》的批语 ……………………………96
（1970年11月）
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 …………99
（1970年11月、12月）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电报………………103
（1970年11月28日）
不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国人的思想……………………………………105
（1970年12月6日）
对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稿的批语…………………………106
（1970年12月）
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107
（1970年12月16日）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08
（1970年12月18日）
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批语……………………………………………129
（1970年12月19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的电报…………131
（1970年12月19日）
在《参考消息》第四三七七期上的批语……………………………133
（1970年12月22日）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134
（1970年12月29日）
转载英国《卫报》有关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文章的批语…135
（1970年12月30日）
关于同意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语…………………………136
（1970年12月）

对江青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的批语……………………………141
（1971年1月）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143
（1971年1月8日）
对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的批语…………………145
（1971年1月）
对张秀龙来信的批语……………………………………147
（1971年1月）
关于批陈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148
（1971年2月19日）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学习讨论毛主席“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49
（1971年2月）
在外交部关于美国人来华问题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51
（1971年2月）
应对南昌起义和朱毛两军会师作正确解说……………………152
（1971年2月）
对军委办事组传达毛泽东批陈整风指示报告的批语…………153
（1971年3月1日）
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的两个文件送审稿的批语…………154
（1971年3月）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送审稿的批语··155
（1971年3月15日）
对成功发射“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新闻稿的批语…………157
（1971年3月16日）

对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信的批语……158
（1971年3月24日）
毛泽东等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报…159
（1971年3月29日）
对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等问题的批语……161
（1971年4月）
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165
（1971年4月11日）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167
（1971年4月24日）
对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请示报告的批语……169
（1971年4月）
对周恩来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讲话提纲的批语……171
（1971年4月）
对周恩来的信和报送材料的批语……172
（1971年5月）
会见齐奥塞斯库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的报道……174
（1971年6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电报……176
（1971年7月10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电报……178
（1971年8月22日）
对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指示稿的批语…180
（1971年8月24日）
清平乐·视察*……181
（1971年8月）

对中央转发《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批语……………………182
（1971年8月）
对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批语…183
（1971年8月）
在外地巡视期间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84
（1971年8月至9月）
在武昌和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196
（1971年8月25日）
在长沙和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199
（1971年8月27日）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201
（1971年8月28日）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的谈话…207
（1971年8月30日）
在南昌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的谈话 ………………214
（1971年8月31日）
在杭州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216
（1971年9月3日）
在丰台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219
（1971年9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电报……………223
（1971年9月1日）
毛泽东等对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的慰问电………………………225
（1971年9月2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227
（1971年9月8日）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等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229
（1971年9月）
对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自取灭亡通知稿的批语………………230
（1971年9月）
对中央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通知稿的批语…………………………232
（1971年9月）
对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稿的批语……………………………………233
（1971年10月）
对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通知稿的批语……………………………234
（1971年10月）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235
（1971年10月26日、11月8日）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谈话（节录）…………………245
（1971年11月14日）
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上的批语…248
（1971年11月）
对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的书面讲话稿的批语……………………249
（1971年11月）
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的批语………………………250
（1971年11月）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电报……………………251
（1971年11月28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通知稿的批语…………………………………………253
（1971年12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一周年的电报………254
（1971年12月19日）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稿的批语……………………256
（1971年12月）
四言诗·题折扇 ………………………………………………………258
（1971年）
七绝·戏改李攀龙《怀明卿》 ………………………………………259
（1971年）
七言诗·戏改杜甫《咏怀古迹》其三 ………………………………260
（1971年）
七绝·读《红楼梦》 …………………………………………………261
（1971年）
对陈毅悼词的批语……………………………………………………265
（1972年1月）
对吴冷西来信的批语…………………………………………………268
（1972年1月29日）
对李卓然、何长工来信的批语………………………………………269
（1972年1月、9月）
悼念斯诺逝世的唁电…………………………………………………270
（1972年2月16日）
会见尼克松时的谈话…………………………………………………271
（1972年2月21日）
四言诗·赠尼克松总统 ………………………………………………286
（1972年）
对苏振华来信的批语…………………………………………………287
（1972年3月5日）

对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通报稿的批语……………………288
（1972年3月6日）
对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的批语…289
（1972年3月6日）
对杨成武家属来信的批语……………………………………290
（1972年3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六十寿辰的电报………………………291
（1972年4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四十周年的电报…………293
（1972年4月24日）
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295
（1972年5月31日）
对李克如来信的批语 …………………………………………296
（1972年6月15日）
对贺诚来信的批语……………………………………………297
（1972年6月28日）
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299
（1972年7月7日）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 ………………………………………301
（1972年7月10日）
对陈云来信的批语……………………………………………302
（1972年7月22日）
对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303
（1972年7月）
为王季范题挽词………………………………………………304
（1972年7月）

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305
（1972年8月11日）
对邓小平来信的批语…………………………………………306
（1972年8月14日）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308
（1972年8月22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电报……………310
（1972年9月1日）
在赠周世钊《两般秋雨庵随笔》一书封面上的题字………………312
（1972年9月4日）
给周世钊的信…………………………………………………313
（1972年9月4日）
对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的通知稿的批语……………………………………………………314
（1972年9月）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315
（1972年9月8日）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日方还是靠自民党政府……………………317
（1972年9月27日）
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327
（1972年）
对国防工业院校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的批语……………………328
（1972年10月15日）
在反映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情况来信摘要上的批语…329
（1972年10月至12月）

对华罗庚来信的批语……331
（1972年11月4日）
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封来信摘报上的批语……332
（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
在周培源关于六六至七〇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上的批语…334
（1972年11月12日）
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335
（1972年11月12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周年和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336
（1972年11月27日）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338
（1972年12月10日）
对反映国防科研单位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339
（1972年12月11日）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当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电报…340
（1972年12月29日）
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外长阮氏萍谈话的报道……342
（1972年12月29日）
对刘建章家属来信的批语……343
（1972年12月）
在王稼祥来信上的批语……345
（1972年12月）
赠刘兴元联……346
（1972年）
对谭震林来信的批语……349
（1973年1月2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正式签订的电报…………353
（1973年1月29日）
对反映李一氓、舒同、林铁情况来信的批语…………………357
（1973年1月至6月）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359
(1973年2月、11月）
对周恩来送审的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
理职务决定稿的批语……………………………………………377
（1973年3月）
五绝·呈郭老 ……………………………………………………380
（1973年春）
给李庆霖的信……………………………………………………382
（1973年4月25日）
七言诗·外交家风采联句 ………………………………………383
（1973年4月）
对谭政来信的批语………………………………………………384
（1973年5月）
会见外宾几次谈话的报道………………………………………385
（1973年6月至11月）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389
（1973年6月22日）
对叶飞来信的批语………………………………………………391
（1973年6月25日）
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392
（1973年7月4日）

七言诗·戏续李白《梁甫吟》 ……………………………………397
（1973年7月4日）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398
（1973年7月5日）
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400
（1973年7月7日）
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406
（1973年7月15日）
和恩古瓦比的谈话…………………………………………………408
（1973年7月29日）
对郭化若来信的批语………………………………………………410
（1973年8月4日）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412
（1973年8月5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414
（1973年9月8日）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417
（1973年）
对罗瑞卿来信的批语………………………………………………420
（1973年11月20日）
对批评江青的一封信的批语………………………………………421
（1973年11月25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九周年的电报………………425
（1973年11月28日）
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427
（1973年12月9日）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428

（1973年12月9日）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429

（1973年12月12日）

赠邓小平联…………………………………………………………………439

（1973年12月）

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443

（1974年1月）

为广西大藤峡题字…………………………………………………………444

（1974年1月）

给江青的信和批语 …………………………………………………………446

（1974年2月至11月）

给叶剑英的信………………………………………………………………451

（1974年2月15日）

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452

（1974年2月22日、25日）

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457

（1974年3月25日）

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稿的批语…………………………………460

（1974年4月4日）

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466

（1974年5月25日）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473

（1974年至1975年）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三十周年的电报……………………………478

（1974年8月22日）

以安定团结为好……480
（1974年、1975年）
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成员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482
（1974年8月27日）
浪淘沙·赠王洪文同志*……484
（1974年8月）
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485
（1974年9月17日）
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一点意见……489
（1974年10月20日）
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492
（1974年11月12日）
对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的批语……494
（1974年11月20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周年的电报……495
（1974年11月28日）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497
（1974年11月）
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498
（1974年11月）
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的批语……499
（1974年12月21日）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500
（1974年12月）
关于民兵不要参与两派对立的意见……503
（1974年12月）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504
（1974 年）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506
（1974 年）
诉衷情………………………………………………………………………508
（1974 年）
给江青的信…………………………………………………………………513
（1975 年 1 月 4 日）
印发张春桥、姚文元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的批语…517
（1975 年 2 月 2 日）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518
（1975 年 2 月 27 日）
毛泽东等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的电报…520
（1975 年 4 月 17 日）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523
（1975 年 4 月 20 日）
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524
（1975 年 4 月 23 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525
（1975 年 4 月 30 日）
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527
（1975 年 5 月 3 日）

和黎笋的谈话[1]

（1970年5月11日）

一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你的？

黎笋（以下简称黎）：一九六四年。我们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感到很高兴。目前，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形势比较复杂，也存在一些困难。

毛：困难哪一国都有，苏联也有，美国也有。

黎：我们很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我们中央和政治局知道毛主席给我们的工作提意见的话，一定会非常高兴。

毛：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你们是越做越好。

黎：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工作。我们所以能把工作做好，也是按照毛主席以前对我们讲到的三点去做：第一，不怕，不怕敌人；第二，要各个击破；第三，要长期地打。

毛：对，是持久战。你们要准备打持久战，但是如果打短一些不是更好吗？

---

[1] 这是毛泽东在会见越共第一书记黎笋时谈话的一部分。黎笋（1907—1986），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胡志明逝世后，黎笋取得了北越的领导权并随后统一了越南。当时任越共第一书记。

究竟谁怕谁呢？是你们越南人、柬埔寨人以及东南亚人怕美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怕你们呢？这是个问题，值得考虑，值得研究。还是大国怕小国，风吹草动他都惊慌失措。一九六四年北部湾事件[1]你们是整了他一下，但也不是有意想打美国海军。实际上，你们并不是真的打他，但他们自己紧张起来了，说越南的鱼雷艇来了，开炮就打。后来美国人自己也讲不出来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美国各地的新闻记者肯定那是假的，是场虚惊。既然打起来了，那就只好打了。对军火商是有利的。〔从那时起〕美国的总统每天晚上睡觉很少。尼克松[2]自己讲，他的主要的精力是对付越南。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人，西哈努克亲王，他也不好惹，你惹他，他就要跳出来骂娘。

我们有些大使馆，我看要整顿一下。我们中国一些大使馆有大国沙文主义，尽是把人家的缺点看得多，不顾大局。〔中国〕驻越南的上任大使是谁？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朱其文。

毛：朱其文跟你们搞得很僵。事实上朱其文是个国民党，他要

---

[1] 北部湾事件，也作东京湾事件，1964年7月底，美国军舰协同西贡海军执行“34A”行动计划，对越南北方进行海上袭击。8月1日，美第七舰队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为收集情报，侵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海，次日与越南海军交火，击沉越南鱼雷艇。美国政府迅即发表声明，宣称美海军遭到挑衅。4日，美国宣称美军舰只再次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鱼雷艇袭击，即所谓“北部湾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5日出动空军轰炸越南北方义安、鸿基、清化等地区。7日，美国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在东南亚使用武装力量。这一事件是美国在侵越战争中推行逐步升级战略，把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的重要标志。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跑到外国去。我们不知道他是国民党，你们跟国民党打交道，他为什么不捣你们的乱呀？那时我们也不知道，但我们看到〔他发回的〕那些电报是不高兴的。

黎：我们越南人民心中牢记着毛主席的恩情。在九年的抗法战争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我们为什么能坚持打持久战，尤其是在南方坚持长期抗战？我们为什么敢于长期打下去？这主要因为我们依靠了毛主席的著作。

毛：不一定。

黎：当然，这是事实。我们还要善于在越南的实际环境中运用。

毛：你们有你们自己的创造。怎么能说你们没有创造，没有经验呢？吴庭艳一杀十六万，我是听的报告，不晓得准不准确，但我知道杀死了十几万人就是了。

黎：是的，十六万人被杀害了，而且许多人被投入监狱。

毛：我看这就好了。你来杀我，我不可以杀你呀？

黎：正是这样。单是在一九六九年我们就打死打伤敌人六十一万人，其中二十三万是美国人。

毛：美国人的人力分配不够，因为他们在全世界铺得太广了。所以，当他们的人被杀死时，他们的心都碎了。死个几万人，对他是一件大事。你们越南人，不论北越、南越，我看死人是要死的。

黎：我们现在的打法死伤很少。不然，我们就不能长期坚持下去。

毛：是啊。恐怕老挝困难一点。老挝族在中国有没有啊？

周：有一些。

毛：他们住在哪儿？

周：在云南省，同老挝交界的地方。

毛：在西双版纳吗？

黄永胜：西双版纳也有一些。

周：我们的壮族跟他们非常相像。

毛：将来老挝决胜的时候，可以到广西招一些壮族人，到云南招一些傣族人。壮族人很能打。过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就是靠壮族人。壮族人现在有多少？八百万？

周：现在多了，有一千多万人了。

毛：这是韦国清[1]那一族，他自己不承认。我曾问过他，他是哪一族的。是少数民族吧？他说他是汉族。后来他才承认他是壮族人。

周：太平天国的战士都很善战，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是壮族人。

毛：太平天国也有一部分军队是广西的。

黎：越南的侬族也很能打仗，他们和广西的壮族人都属于同一个民族。

毛：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东南亚的人民一天天在觉醒。有些和平主义者认为无非是公鸡好斗。哪有那么多公鸡呀！现在母鸡也好斗了嘛！

黎：不斗就没有出路。

毛：是啊，不斗不行了。你逼得人家没有路走了嘛，欺负人嘛！

黎：柬埔寨人和老挝人本来都信佛教，不好斗。现在他们也好斗起来了。

---

[1] 韦国清，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毛：就是呀，你也不要说信佛教的人就不好斗，中国也是信佛教的，辛亥革命打了十七年，后来是内部两派打，这样教育了人民。然后是北伐战争，然后就有红军了，然后日本人侵略中国，日本人投降以后就是蒋介石同我们打，打了不到四年，他就不干了，跑到台湾去了。他现在在联合国里说他代表整个中国。他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可密切了。我跟蒋介石算是见过几次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会的时候见过。我是一个国民党，是个跨党分子，我又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又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参加了，我们的总理是蒋介石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第一军的代理党代表。林彪同志就不用说了，他是蒋介石的学生，他在黄埔读了九个月。在中国，老一辈的人没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很少。

二

黎：最近，尼克松宣称说，在过去一百九十年里美国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意思是他这次也不愿意被越南打败。

毛：没有被打败过?

黎：实际上它被打败好几次了。在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抗法战争中，它给法国人开支百分之八十的军费，结果它仍然被打败了。

毛：就是呀！你刚才讲的第一点是不要怕帝国主义。究竟谁真怕谁？小国，部分小民族存在这个问题。他慢慢试，试几年就理解了。

三

毛：……那时我还告诉你，如果美国人不到中国边境来，你们不请我们去，我们是不出兵的。

黎：我们也这样想。当我们还有能力打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后方”更稳固一些。在我们越南人民打美国人的时候，中国是我们的“大后方”。因此，我们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即使我们的飞机受到攻击，也不要到中国机场降落。

毛：可以嘛，我们不怕。如果美国空军要来打越南空军的“庇护所”，就让他来嘛。

黎：虽然我们下了这样的命令，但我们仍然需要依靠你们的支持。那时，你们派来的几个师在越南同样打美国飞机。

毛：就是嘛。美国人就是怕打，他们没勇气。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两次日内瓦会议是谁破坏的？你们和我们都是老老实实遵守〔会议协议〕，但是他们不干嘛！不干更好。

因此，甚至苏联总理柯西金在他发表公开讲话时，也不得不说只要召开国际会议，就必须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商量。他们现在的领导人好多我不熟悉，不认识。柯西金我认识，并且同他谈过话。西方报纸总是造他们的谣，说他们的领导层怎样不和。我也闹不清楚。听说老百姓对柯西金这位领导人比较感兴趣。

黎：我们也听说了。

毛：你们也听说了？我看斯大林又活起来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包括整个世界。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主要是两个大国，现在都

说三大国，中国不算。中国的原子武器还刚开始研究，还在研究阶段，这有什么可怕呀？中国人多，因此他们怕中国。但是我们也怕，因为人多要吃饭，要穿衣，那个问题可多了。所以我们现在也研究节制生育，使人口少一点。

四

黎：我们能够继续我们的战斗，是因为毛主席讲了，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美国害怕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毛：有什么好害怕的？你侵略人家，我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你去几十万海、陆、空军欺负越南人民，中国做个后方都做不得呀？哪个法律上有这条规定？

黎：美国人说他可以动员一千二百万军队，可是他只能派五十万军队到越南，如果越过了这个界限，他们就害怕了。

周：中国人多他也怕。

毛：人多还有一个不怕，打就打。横竖我跟你没有关系。你占了我的台湾，我没有占领你的长岛[1]。

---

[1] 长岛是一个位于北美洲大西洋岸的岛屿，行政上属于美国纽约州的一部分。长岛长190公里，宽约20公里至30公里，它从纽约港伸入北大西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1]

（1970年5月20日）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及其追随者不断地发动侵略战争，各国人民不断地用革命战争打败侵略者。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美国侵略者在越南、老挝打不赢，阴谋策动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反动政变[2]，悍然出兵柬埔寨，恢复轰炸越南北方，激起了印

---

[1] 这是毛泽东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所发表的声明。1970年5月19日，周恩来等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声明稿由人民日报、新华社、外交部几位同志起草，在十七日晚政治局会议上经过讨论，大家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要突出主席同黎笋同志谈话中的思想。”毛泽东审阅时批示：“照办。”这个声明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于5月21日在北京召开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宣读，载于当日《人民日报》，已编入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

[2] 1970年3月18日，原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大臣、柬埔寨王家武装部队总司令朗诺和副首相施里玛达在美国的策动下，乘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外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废黜”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立郑兴为柬埔寨国家元首，从而使柬埔寨的国家权力转移到亲美派朗诺—施里玛达—郑兴集团手中。

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愤怒反抗。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1]，热烈支持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排除万难，取得彻底胜利。

美帝国主义屠杀外国人，也屠杀本国的白人和黑人。尼克松[2]的法西斯暴行，点燃了美国革命群众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国人民坚决支持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相信，英勇战斗的美国人民终将得到胜利，而美国的法西斯统治必然失败。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群众运动席卷全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不到十天，就得到近二十个国家的承认。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朝鲜、日本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斗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北美、欧洲、大洋洲人民的革命斗争，都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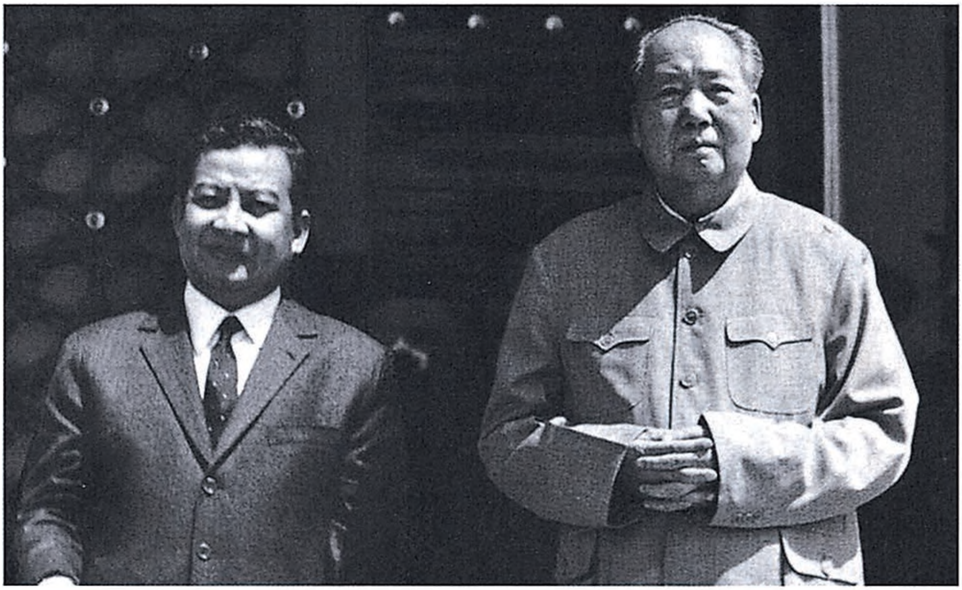
[1] 1970年4月24日至25日，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中国、老挝和越南边境地区举行，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国四方领导人各自率代表团出席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扩大对越南和老挝的侵略战争，在柬埔寨发动政变，重申四方领导人对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严正立场，号召印度支那人民团结起来，捍卫民族权利，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使印度支那成为真正符合三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愿望的独立和平地区。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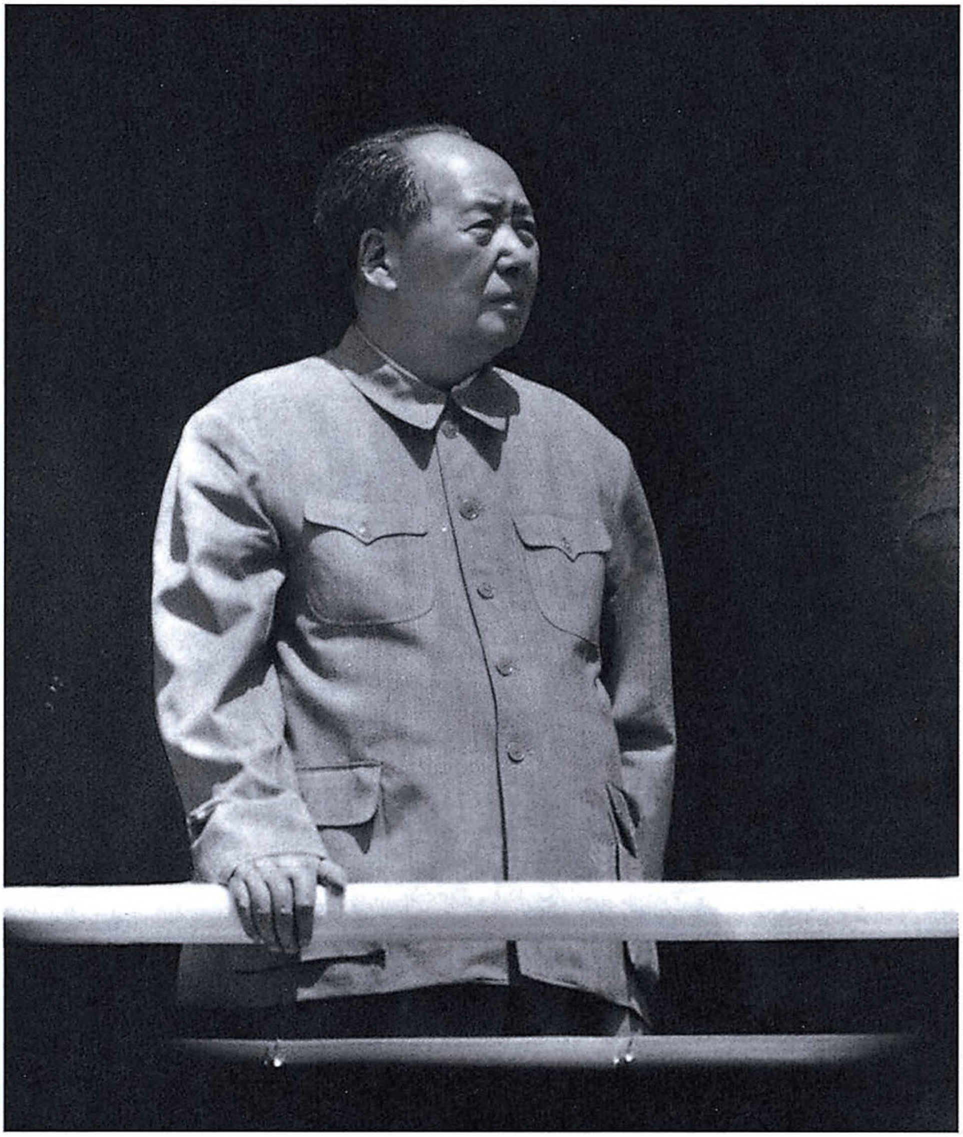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等在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上。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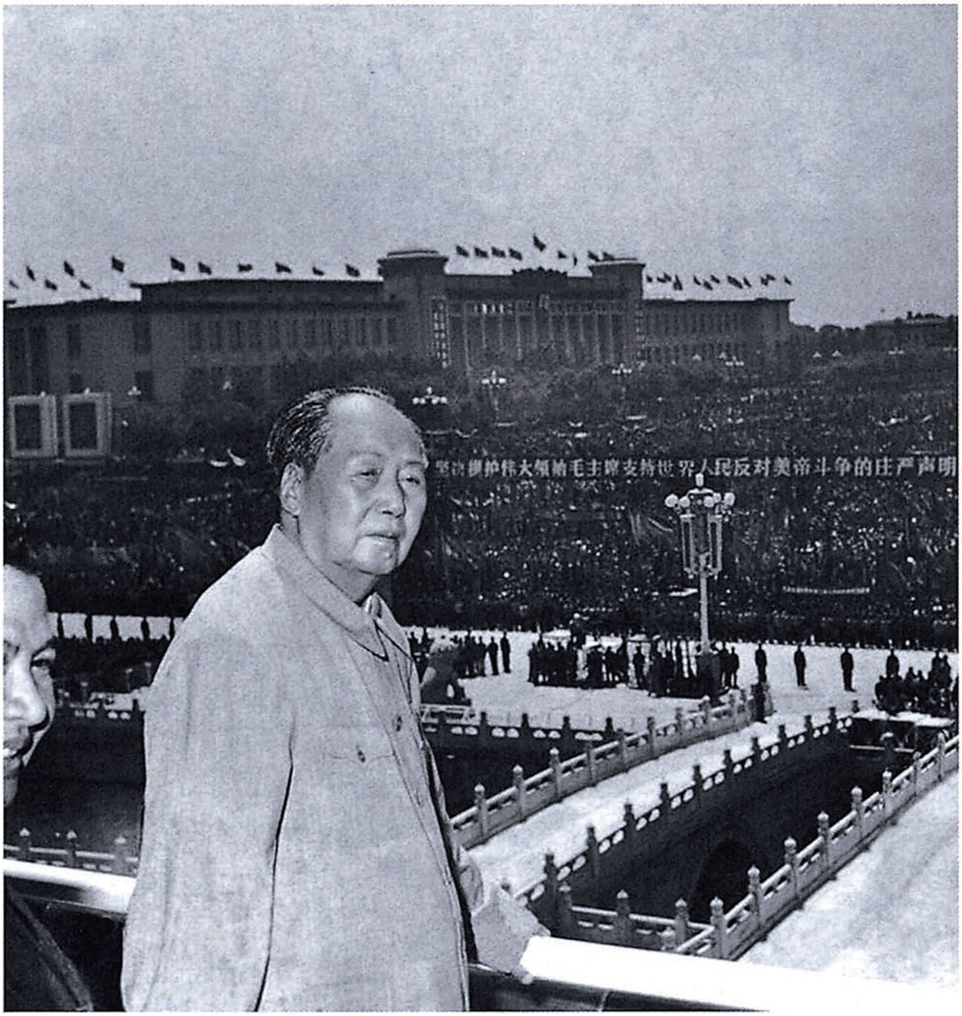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资料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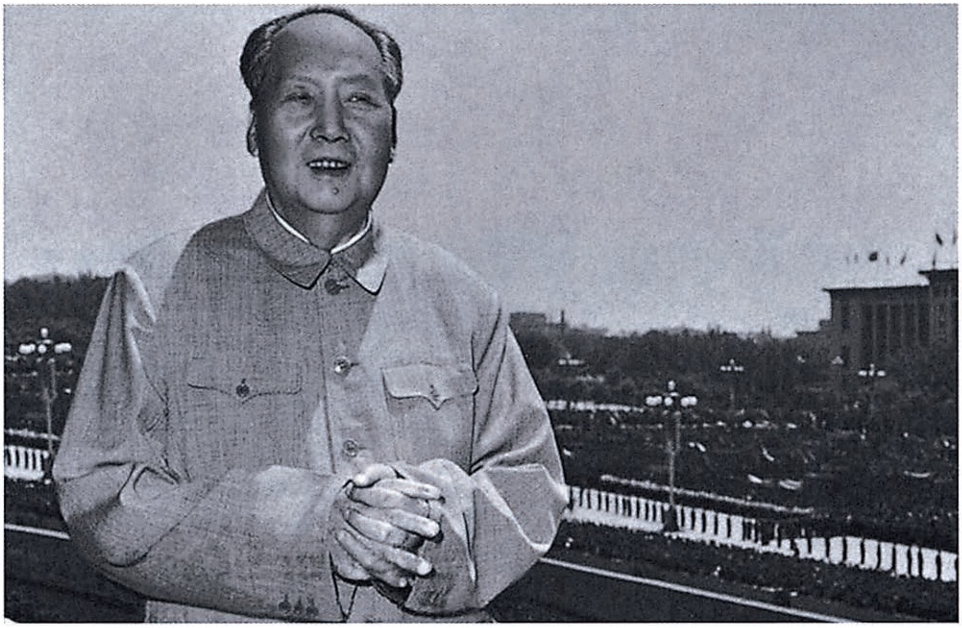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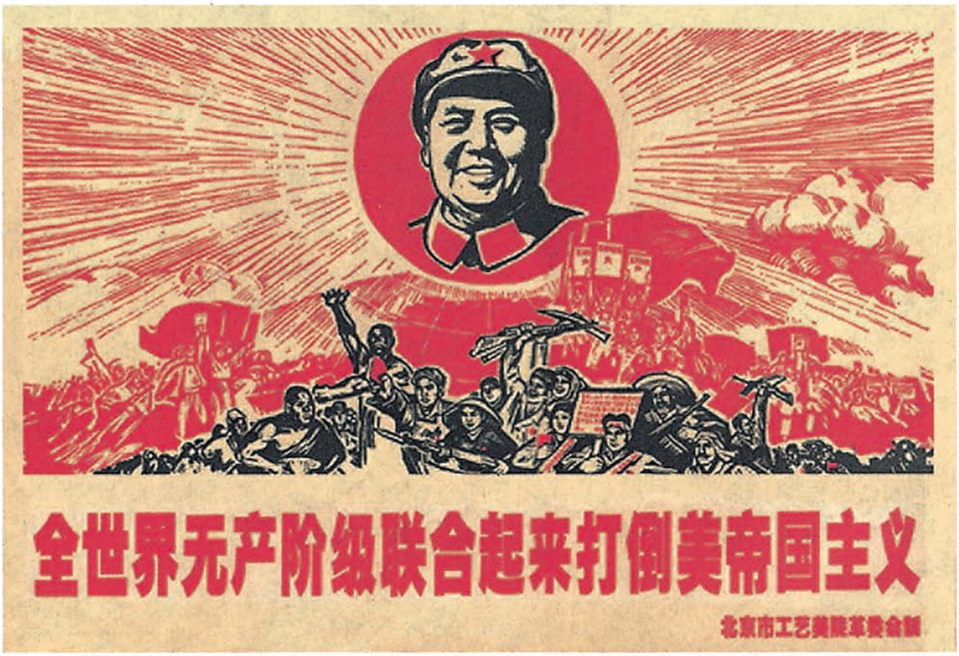

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的庄严声明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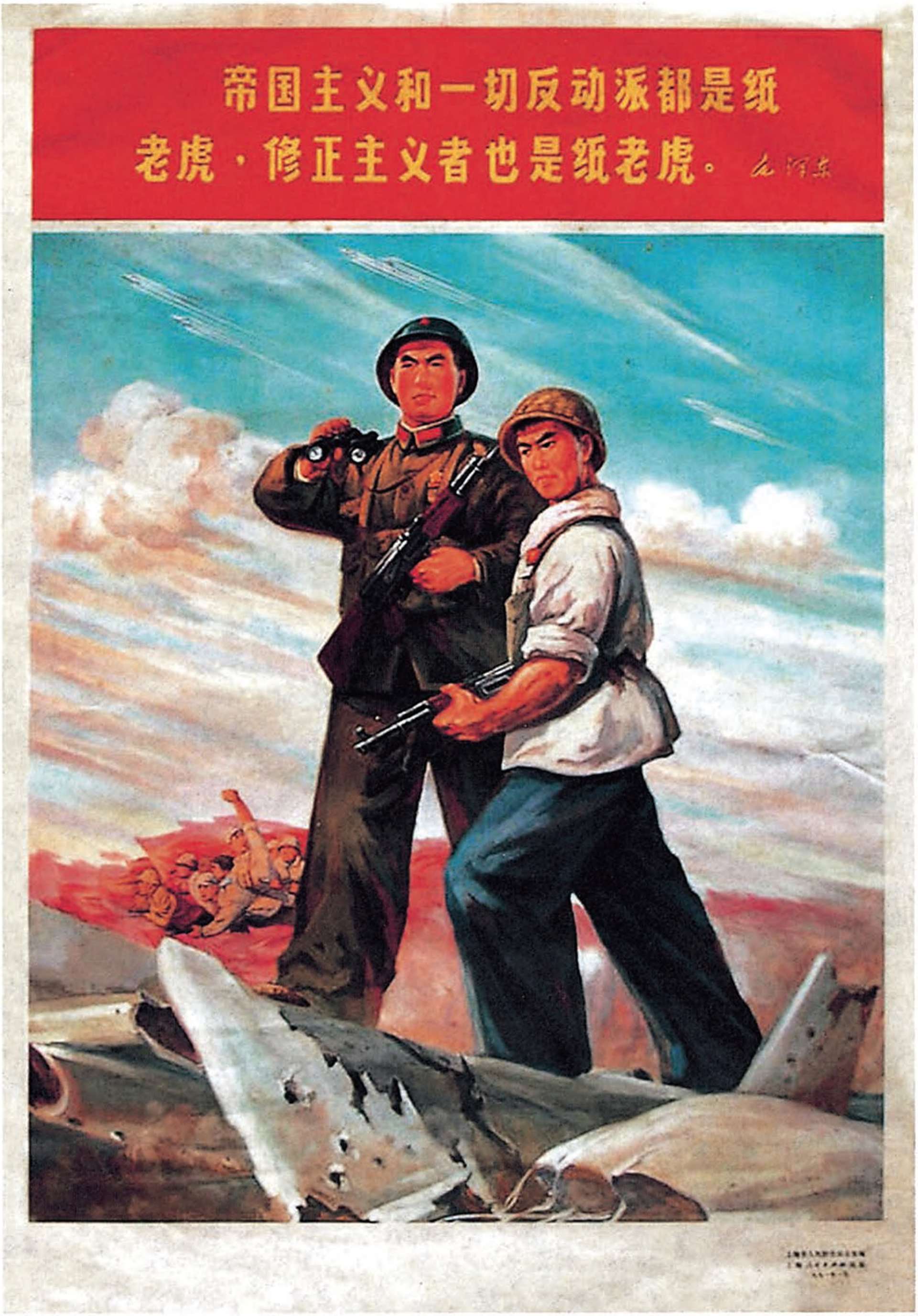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1970年5月21日，毛泽东出席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
北京市工艺美院革委会制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宣传画）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
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纸老虎。
毛泽东

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修正主义也是纸老虎（宣传画）

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70年5月）

一

湖北试点经验，似可转发各省参考。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1970年5月14日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的批语。报告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抓好典型”的教导，我们从去年6月开始抓了武重、武锅、武船、武钢机总厂、国棉一厂、二汽、武大等六厂一校。除二汽外，这几个单位都是武汉地区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抓点前，其中5个工厂斗、批、改搞不下去，生产处于瘫痪状态。军宣队进驻各点后，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持政治建厂、建校的道路，宣传、落实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和党中央各项号召，团结、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孤立、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群众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改变了这些单位过去“老大难”的面貌。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一、常委亲自抓；二、学习、落实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三、总结经验，以点带面；四、建设军宣队。本篇二是对周恩来1970年5月26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指示稿要求各省、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党委在阅读武汉军区党委的报告后，把各自的试点经验也写一份总结报告给中央。如未试点，可以参照北京六厂二校和湖北六厂一校的经验，进行试点和点面结合，以利推广。

二

照发。

对中央转发北京二七机车厂、上海国棉十七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1]的指示稿的批语

（1970年5月）

照办。

---

[1] 指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革委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0年3月12日的报告和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4月2日的报告。两个报告强调，整党建党要“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搞好吐故纳新”“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整党建党”。中共中央5月29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转发前将中央指示稿和两个报告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

对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指示稿[1]的批语

（1970年5月）

照办。

---

[1] 中共中央1970年5月29日发出的这个指示中说，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具体要求是：1.努力增加生产；2.基本建设工程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形成生产能力；3.大搞综合利用；4.提高劳动生产率；5.大力降低消耗定额；6.提高运输效率；7.提高产品质量；8.改善经营管理；9.大抓清仓查库，注意修旧利废，节约代用。指示说，上述各点主要是讲工业战线，同样适用于农业、财贸和其他各条战线。

对理工科大学教学改革两份材料[1]的批语

（1970年6月5日）

两件均阅，很好。待你回来后，将清华经验与上海纪要，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看过，并经讨论修改后，即可发表。此外，文科教改怎么办，上海是否可以找些人开一次座谈会，请你与春桥[2]同志酌定。

毛泽东

六月五日

---

[1]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姚文元报送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和《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两份材料。由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写的前一份材料，中心内容是讲如何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办好社会主义的理工科大学。《上海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纪要》介绍了1970年6月2日上海召开理工科大学教育革命座谈会的情况。这次会议主要座谈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对清华大学教育革命总结材料的感想和意见；二是上海有关大学和工厂的教育革命经验、体会以及需要研究、讨论的问题。这两份材料后来发表在1970年7月21日《红旗》杂志第八期和7月22日《人民日报》。

[2] 春桥，即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革委会主任。

现代化武器吓不倒人民[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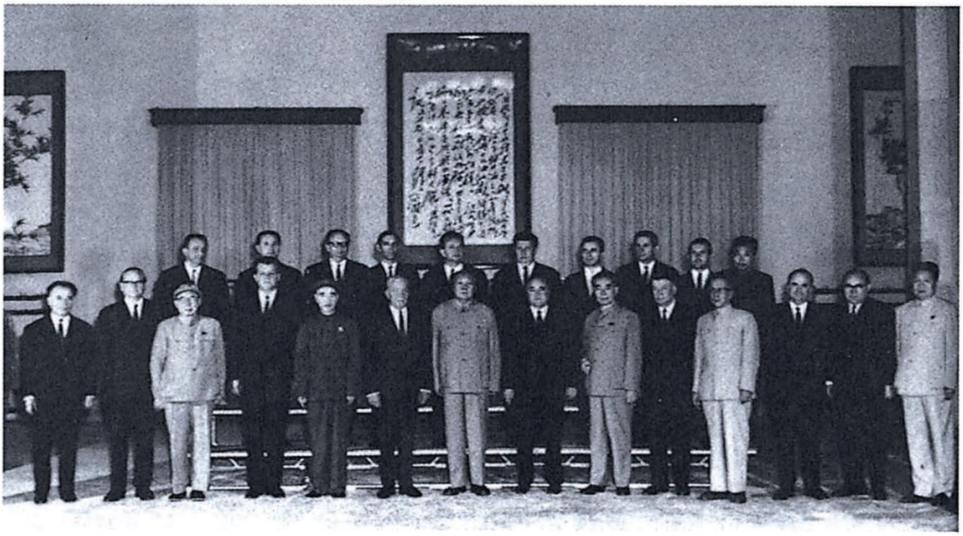
（1970 年 6 月 11 日）

小国只要能反击，大国就怕，小国如果不反击，他就不怕你。你看越南、柬埔寨、老挝嘛，他们也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他们就是用轻武器打，能够打下飞机来。

过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出现坦克，那个时候吓得不得了。现在不同了，什么坦克、什么空军这一套，吓不倒人民。我们现在在准备。如果敌人把我们的空军搞光的话，我们就是靠步兵。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一半，我们还有一半。如果你占领我们中国的交通要道、大城市，我们还有乡村、中等城市、小城市。第一条，我们没有打你嘛，而是你打我们嘛。第二条，这很能锻炼我们的人民，二十年没有打仗了。你打我就打。我所讲的打是打防御战。我们现在到处修地洞，到处修地道。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五位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

和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马哈古卜谈话纪要[1]

（1970年6月24日）

马哈古卜部长说，在英国还没有完全从苏丹撤走前，美国又进来了。但是由于人民的团结和斗争，英国的星辰已经落下去了，美国的星辰也要落下去。

毛主席对苏丹朋友的这个讲话表示赞赏。毛主席说，这个世界上怕英国人、怕美国人的很多，这几年慢慢地都不大怕了，并敢于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你们苏丹人民了不起啊！

毛主席说，对美国人民和美国的统治者是要分开来看待的。我对美国人民是寄予希望的，就是美国的工人以及其他穷苦的人。他们总有一天要站在你们和我们这个战线的。

毛主席说，美国独立时，只有三百多万人口。那时英国有近两千万人口，是全盛时代，可是打了败仗。打了八年啊。还不就是一些比你们现在还要差的武器。你们苏丹有一千四百多万人口。

马哈古卜部长说，人民已经起来，毛主席的教导在全世界已经

---

[1] 1970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了由苏丹财政部部长曼苏尔·马哈古卜率领的苏丹政府友好代表团。6月2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这次会见的谈话纪要送毛泽东审阅，并写道：“与苏丹代表团谈话纪要，已经外交部同志整理出来。我和康生同志看了”“我们认为可以送给对方，并表示如发表请用全文”。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总理。”本篇是这个谈话纪要的节选。

传播开了。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理解了毛主席的话，懂得真理应当属于自己，所以人民一定会起来。

毛主席说，中国的经验可以作参考，要结合各国自己的经验。我们也是找外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经验，譬如巴黎公社的经验、十月革命的经验等等。

毛主席说，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农业，不要依靠外国。可以进口外国技术，利用外国的技术人员帮助你们训练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但是要自己搞。如果没有这个决心，帝国主义还是要整你们的。

马哈古卜部长感谢中国向苏丹提供友好援助，特别是在谈判中贯穿的友好精神。

毛主席说，物质援助，要到了手，见了效，那才算数。不到手，工厂没有建立起来，那不能算数。你们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家没有培养出来，中国人不撤走，也还不能算数。那么，什么叫帝国主义呢？它就是不帮助人家建设的，它赖着不肯走，那没有办法，只好革命了。

毛主席说，非洲可沸腾起来了，闹起来了，大闹起来了！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培养了反对它的人，另外培养一批走狗拥护它自己。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世界人民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这个美帝国主义专门团结那些各国人民认为是不好的人。它喜欢那类人做朋友，我们就喜欢我们这类人。

在讲到帝国主义对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施展阴谋活动时，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要对非洲各国人民的领袖和著名政治家进行暗害阴谋活动的，要提高警惕。

转发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和煤炭工业会议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70年6月）

两件很好，可以转发。

---

[1] 指冶金部1970年6月10日关于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纪要和煤炭部军代表6月4日关于全国煤炭工业会议情况报告。冶金部报送的会议纪要说，5月13日至6月10日，冶金部召开了全国重点钢铁企业座谈会，传达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落实1970年的钢铁生产和建设计划，研究1971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的钢铁工业发展设想。今年钢产量要确保1700万吨，到1975年达到4000万吨，基本上建成大三线钢铁基地，并在各经济区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不同水平和各有特点的钢铁工业体系。为此，提出了要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继续狠抓经济领域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下放企业，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加快大三线建设，切实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和自力更生的方针等15条措施。煤炭部军代表的报告说，4月10日至22日，我们在江西萍乡安源矿区召开了全国煤炭工业会议，讨论了1970年煤炭工业的增产节约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经反复讨论研究，1970年煤炭生产计划定为31800万吨，比国家计划增产3300万吨；到1972年，煤炭产量将有更大幅度的增长，大三线煤炭基地将基本建成，江南九省煤炭可以基本自给；力争1975年煤炭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为此，要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和增产节

约运动，具体抓好经济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挖掘现有矿井潜力，提高煤炭产量，狠抓当前生产中的薄弱环节，加快建井速度等13项工作。6月26日，中共中央在转发这两份材料的批语中指出：“钢铁和煤炭生产，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关系到备战。望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省军区加强对钢铁和煤炭企业的领导，进一步发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实现会议提出的1970年增产指标。”

暂不发表毛泽东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谈话整理稿[1]的批语

（1970年6月26日）

暂不发表，将来再说。

毛泽东
六月廿六日

退东兴[2]同志存。

---

[1] 周恩来1970年6月26日给汪东兴写信，要他将毛泽东1965年6月26日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谈话的记录整理稿报送毛泽东审定。整理稿的主要内容是："医学教育要改革""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医疗卫生机关"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医生、护士要下去参加四清"。

[2] 东兴，即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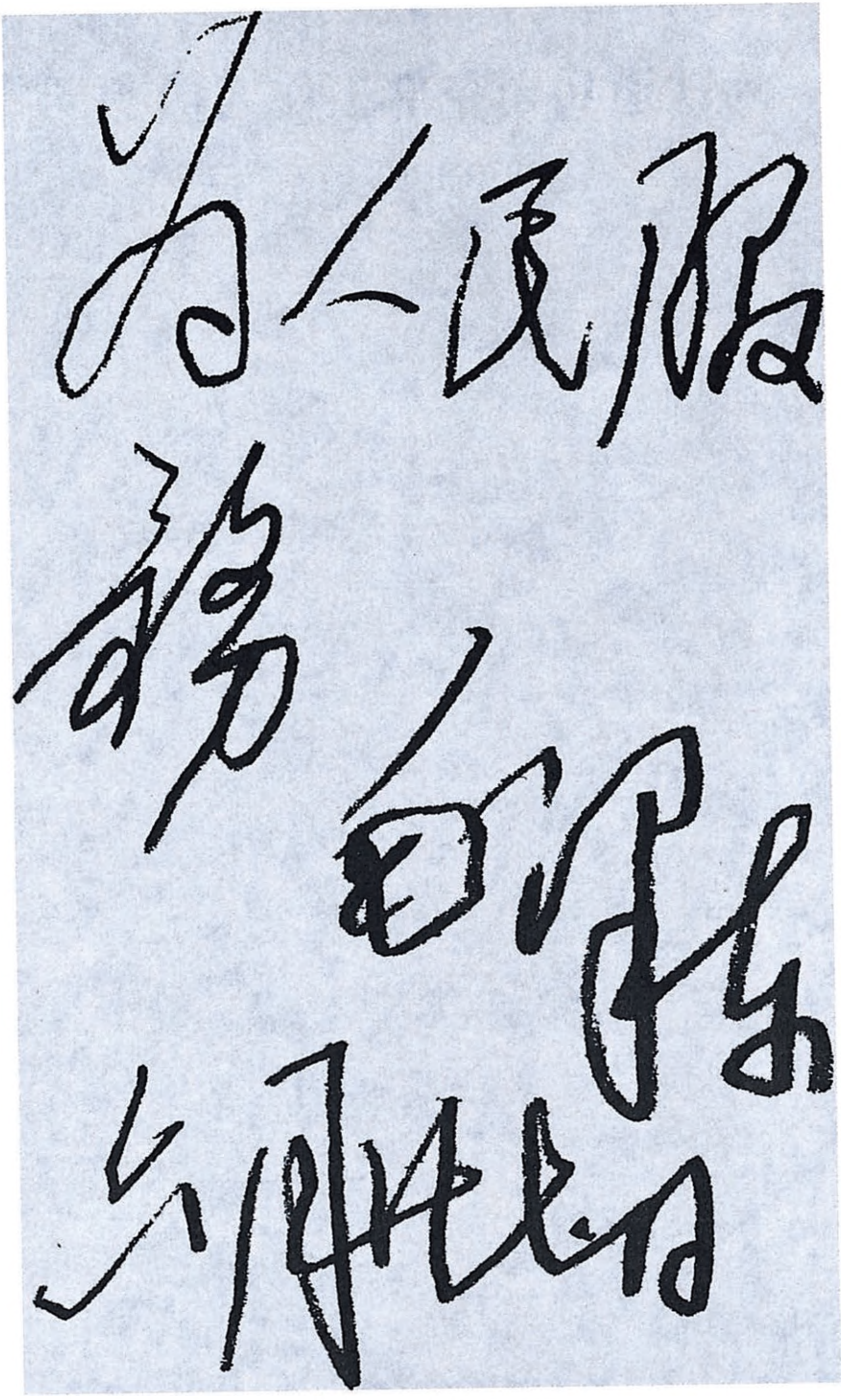
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题词

（1970年6月27日）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

六月廿七日

毛泽东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的题词。

帝国主义怕第三世界[1]

（1970年7月11日）

英联邦像是个俱乐部，中国过去也是这个俱乐部的。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顾不了了，把中国让给了美国。所以，日本投降之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我们。而我们这些人就被叫做共产党“匪徒”，跟普通的土匪不同，是共产党“匪徒”。这样，我们就没有资格进那个联合国。哪有“匪徒”能够进联合国的？我们也想了一想，我们这个国家也算个联合国嘛！我不到你那个联合国去也可以嘛！我们这些人，帝国主义都是不高兴的。无论是你们的两位总统也好，还是我们这些人也好，都不大中它们的意。那有什么办法呢？你们到北京来也没有通知英国、美国吧？

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帝国主义的日子不大好过。它们怕第三世界，既怕你们这些人，也怕我们这些人。要破除迷信，不要迷信那个什么帝国主义。当然，我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要反对，也不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不可以学习，而是说对帝国主义的政治的迷信，对它们那套欺骗，要破除。要破除对帝国主义的这种迷信不容易，它在一些人中根深蒂固。你看，帝国主义多了不起，它们有那么多原子弹、氢弹，飞机到处飞，海军到处跑，到处占领别人的国家，比如美国出兵柬埔寨。但它们那个办法是老牌帝国主义

---

[1] 这是毛泽东和坦桑尼亚政府代表团及赞比亚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英国的做法。英国不是到处占领吗？现在它比较乖乖的了。

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1]

（1970年7月13日）

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大安宁。你热爱独立是一件事，别人总要干扰你又是一件事。上回我就跟你们讲过，世界上就有那么少数几个国家，喜欢干涉别国的独立。你们说希特勒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法国独立了，中国也解放了。但现在世界还是不安宁啊！当然，现在没有人侵犯你们法国；除了台湾以外，也还没有人侵犯中国。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要准备打仗，不是自己打出去，而是当别国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消灭它。现在已不是几十年前那样，谁人都可以在中国头上拉屎拉尿。

我劝你们除了搞马其诺防线[2]之类以外，搞原子弹以外，还要准备搞什么民防那一套。你晓得世界怎么变化？我们又不是那几个大国的参谋长。你们也是受别国的气的。

欧洲现在的形势，不仅你们，就是英国，要想打一场战争看来是困难的。所谓同盟国，现在也难说。它们在有一些问题上谈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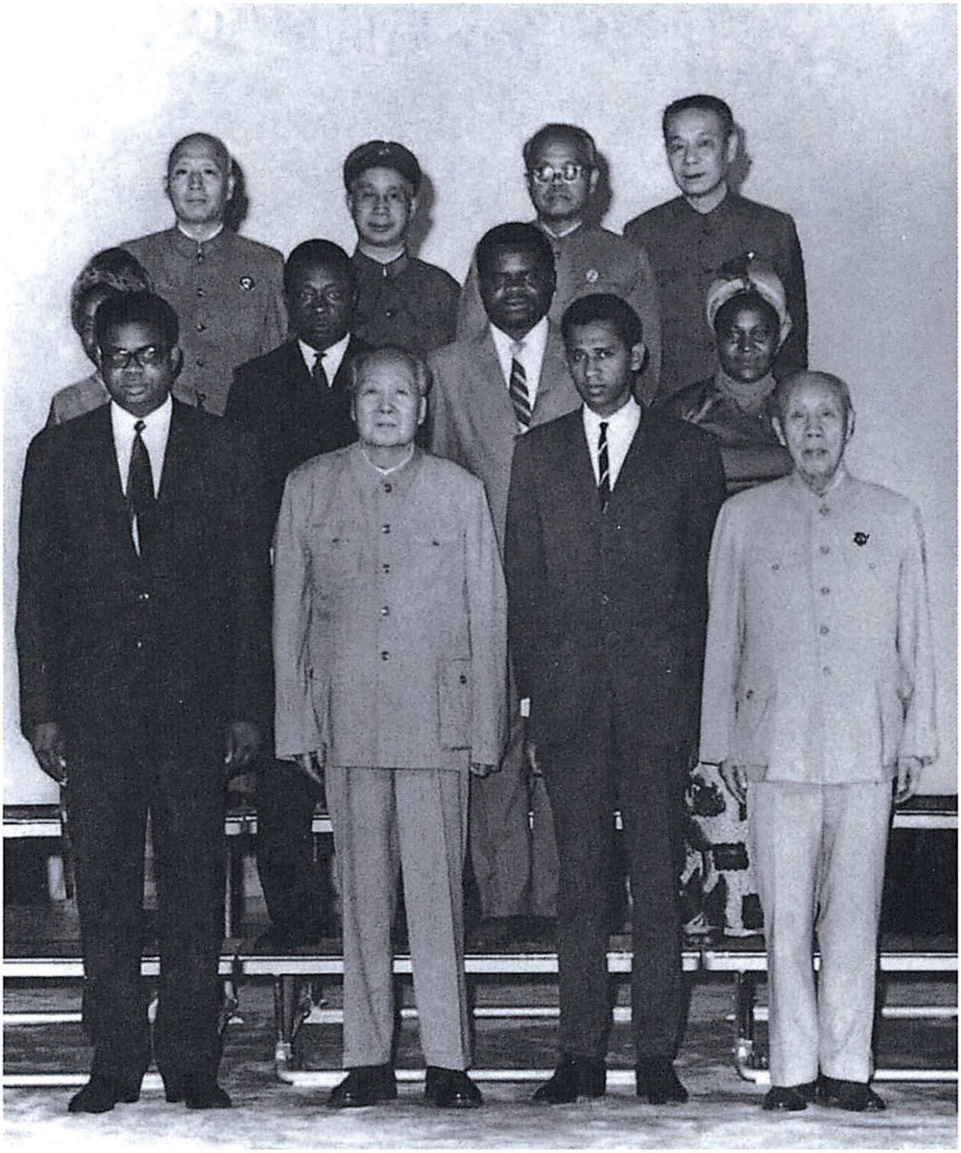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和法国政府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2] 马其诺防线是20世纪30年代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在东北部边境构筑的防御阵地体系，以其主要设计者、当时的陆军部长马其诺的名字命名。1940年5月，德国军队从比利时绕过这条防线攻入法境，使防线失去作用。

来，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又谈不来。我们之间谈就比较容易，跟美、苏它们谈就比较困难。你们法国没有占领我们中国什么地方，我们中国也没有占领法国的科西嘉岛。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要由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



1970 年 7 月 13 日，毛泽东、董必武和来访的刚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阿尔弗雷德·拉乌尔（前排右二）率领的国务委员会代表团合影。

要研究海军落后的原因[1]

（1970年7月29日）

我们的海军不像样子，大概要一百年才能赶上某些国家。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刚才讲的这个造船厂[2]也不行。同样的规模和日本比较，就是不能造那么些船。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要研究一下，找出原因来。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2] 指江南造船厂。

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1] 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的报告的批语[2]

（1970年7月）

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请中央一议。

---

[1] 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专门为审理刘少奇、王光美而成立的调查组。

[2] 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关于王光美处理意见报告的批语。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1970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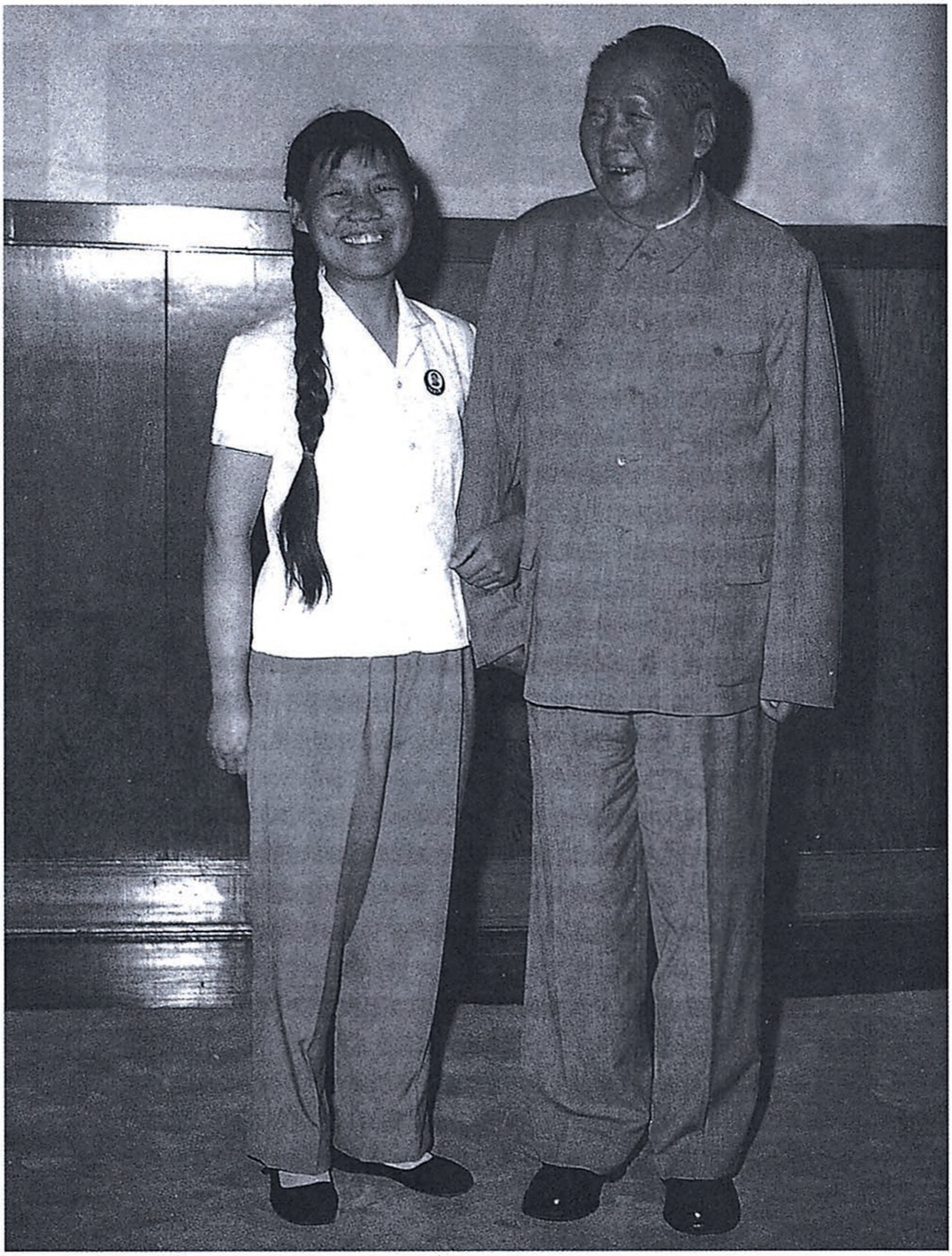
在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二十六年前，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光荣的“八·二三”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反动统治，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以来，勤劳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建设自己祖国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罗马尼亚人民不畏强暴，坚决反对外来的控制、干涉和侵略威胁，英勇地捍卫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不久前，罗马尼亚遭受了空前严重的水灾，罗马尼亚各族人民团结一致，顽强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抗洪救灾的重大胜利。中国人民对于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胜利感到非常高兴，并衷心祝愿罗马尼亚人民今后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罗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支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我们两党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正日益加强和发展。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

中罗两国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1970年，毛泽东和人民大会堂服务员合影。

1970年夏天，毛泽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1970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杭州“汪庄”一号楼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我的一点意见[1]

（1970年8月31日）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2]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3]，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4]。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5]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6]那里去了。第二次，讨论工业七十条[7]，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8]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9]，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10]我同

林彪[11]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陈伯达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上，题目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批语的抄清件时加写的。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同时发了这个批语。

[2]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3]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评价该书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4]　陈伯达摘录的这5条分别是：1.“当你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在亲自听取这位天才思想家讲话一样。”（列宁《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中对马克思对于各个作家的评论的评价）2.“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3.“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4.“这真是多么天才的预见!”（列宁《预言》中对恩格斯谈未来世界大战一段话的评价）5.“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列宁《怎么办?》）

[5]　三次庐山会议，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6]　彭德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9年8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错误地定为所谓以他为首的“反党集团”。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7]　指《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共70条，简称工业七十条。

[8]　指唐代诗人李白。

[9]　指陈伯达摘录的毛泽东《实践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

[10]　在毛泽东手稿中，这后面还加括号写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八〉条，如获至宝。”中共中央转发《我的一点意见》时，删去了这句话。陈伯达摘录的林彪8条讲话分别是：1.“毛主席个人天赋很

高。他理解力很强，记性很强。他理解力很强，无论读书的理解力，或对事物的理解力，从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都很强。他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天资很高。”（1959年9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2. “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3.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五十四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六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哪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全世界有最高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1966年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4. “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最伟大的天才，有最高的革命责任感，最现实的革命精神。”（1966年8月8日接见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时的讲话）5. “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1966年9月18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6. “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1966年9月18日关于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7. “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966年12月16日《〈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8. “不能离开中心。中心就是太阳，九大行星围绕太阳旋转，一切工作围绕太阳转。毛主席就是太阳。毛泽东思想就是太阳。”（1970年5月19日接见总政治部副部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11]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对政治局讨论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指示草案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70年8月）

这样好。

---

[1] 周恩来等1970年8月8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中央关于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草案，经政治局有关会议讨论，大家认为，为慎重起见，拟由中央派出两个小组，并由成都军区、西藏党的核心小组各参加数人，到西藏各去两个公社（一个在内地、一个在边境；一个老的、一个新的）蹲点调研，看这个指示草案能否解决当地公社中有关方针政策问题。蹲点调研以两个月为期，今年国庆节前后再回到中央讨论一次。如适用，即正式下发；如需增改，在修改后再经中央讨论、主席批准下发。11月22日，周恩来对这个指示稿作了修改，提出“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也不算慢”“应当把步子放得稳一些，把工作搞得扎实一些”，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规模的划定“要因地制宜”。12月7日，周恩来向毛泽东等报告了对指示稿讨论、修改的情况。1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指示。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1970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独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五年来，越南人民经历了光荣的战斗历程。在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越南人民不断用革命战争打败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越南南方人民发扬了革命的英雄气概，抗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最野蛮的侵略战争，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越南北方人民胜利地抗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

---

[1]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69年逝世。

胜利，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

目前，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势越来越好。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战斗号召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紧密团结，越战越强，在整个印度支那战场上，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不断取得新胜利。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一个反对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斗争新高潮。

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在印度支那的困境，正在更加露骨地推行反革命两手策略，一面坚持扩大战争，一面策划种种阴谋诡计，妄图扑灭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烈火。但是，久经锻炼的越南人民、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是吓不倒、骗不了的，美帝国主义的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中国人民一向把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相信，越南人民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把美国侵略者从印度支那全部赶出去。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是兄弟和战友，我们将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一日

对江西找到大盐矿报告的批语[1]

（1970年9月2日）

一

江西找到了大盐矿，储量十九亿吨，可能还不止此数。印发全会各同志。

毛泽东

九月二日

二

即纯盐，盐是由这两种元素化合的。

---

[1] 本篇一是对江西省革委会的一份报告的批语。报告中说，江西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和九〇九地质队职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报矿、找矿、探矿，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今年3月30日在会昌县周田公社找到了一个大盐矿，地质储量初步计算为19亿吨。化验结果，质量较好，氯化钠97.7%。从见矿到出盐，只用了47天，结束了江西无盐的历史。目前已形成年产1.5万吨的制盐能力，并生产出食盐近千吨。在报告中“氯化钠”一词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1970年9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毛泽东的批语和江西省革委会的报告一起印发给在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的同志。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

（1970年9月6日）

（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

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2]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

---

[1] 本篇摘自中共中央1971年12月11日转发的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材料的通知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2]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今译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中，引用了恩格斯写的这个序言中的一句话：“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哪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

“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1970年，毛泽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毛泽东、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1970年，毛泽东、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

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1]

（1970年9月6日）

第三页去掉完全二字。其余无意见。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等1970年9月6日为送审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周恩来等在报告中写道：“十一时后，约集各大组长、副组长，传达了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做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午后，各大组一致通过公报草案和基本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和一九七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现将公报草案呈上，请予审批。”公报稿第三页写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几个月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最后一句中“完全”二字。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于9月6日通过，9月1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

（1970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朝鲜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二十二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光辉的历程。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三年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朝鲜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战，打败了美国侵略者，不仅保卫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和安全，也为世界人民反帝革命斗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朝鲜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兄弟的朝鲜人民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衷心祝愿朝鲜人民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更

大的成就。

当前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内外交困的处境，正在同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勾结，疯狂地推行它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东南亚和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不断加强中朝两国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以及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紧密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种革命的团结力量是无敌的，是战胜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阴谋的可靠保证。

中国人民一向十分珍视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并将一如既往，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这种友谊和团结继续作出努力。中国人民最坚决地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实现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如果美日反动派胆敢在朝鲜发动新的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将坚决支持朝鲜人民打击侵略者，直到取得彻底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以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组织群众广泛讨论宪法修改草案通知稿[1]的批语

（1970年9月）

照发。

---

[1] 中共中央1970年9月12日为组织人民群众广泛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给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和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这一宪法修改草案是1954年宪法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在1970年3月提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提出了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从3月开始进行修改宪法的准备，7月12日成立了以毛主席为主任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起草委员会详细研究了全国人民对1954年宪法的修改意见，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并于8月23日提交九届二中全会审查，9月6日全会基本通过了这个草案，并决定动员全国人民进行讨论和修改。请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中央军委将群众意见集中起来，于9月底报告中央。

在南京军区等单位传达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情况摘要上的批语[1]

（1970年9月）

一

第五页上所提处理意见很好，应该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

[1]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1970年9月22日向毛泽东报送了《关于南京军区党委等单位传达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报告摘要》。这个摘要说，南京军区等3个军区的党委和江苏、贵州等7个省、区党的核心小组在9月11日至14日分别向军区党委常委和省、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传达了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摘要第五页讲到，贵州省在讨论团结问题时，“到会的军队干部一致认为，部分参加‘三结合’的军代表，滋长了骄傲情绪和急躁情绪，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决定分期举办军队干部学习班，重点解决这个问题，以进一步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林彪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线，并注明：“此类问题已告军委办事组作为专题研究，以便改正三支两军人员中所出现的不良倾向。”本篇一是对林彪的这个意见而写的。本篇二写在林彪报送这个摘要的信封上。

二

周、康[1]阅，退林[2]办。

---

[1] 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2] 林，指林彪。

关于海上作战等问题[1]

（1970 年 9 月 25 日）

一

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比如在海军、空军这些方面。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中国原是一个穷国，过去没有工业，现在搞起了一点，也不很多。大概再过十五年左右，或者二十年左右，可能就好一些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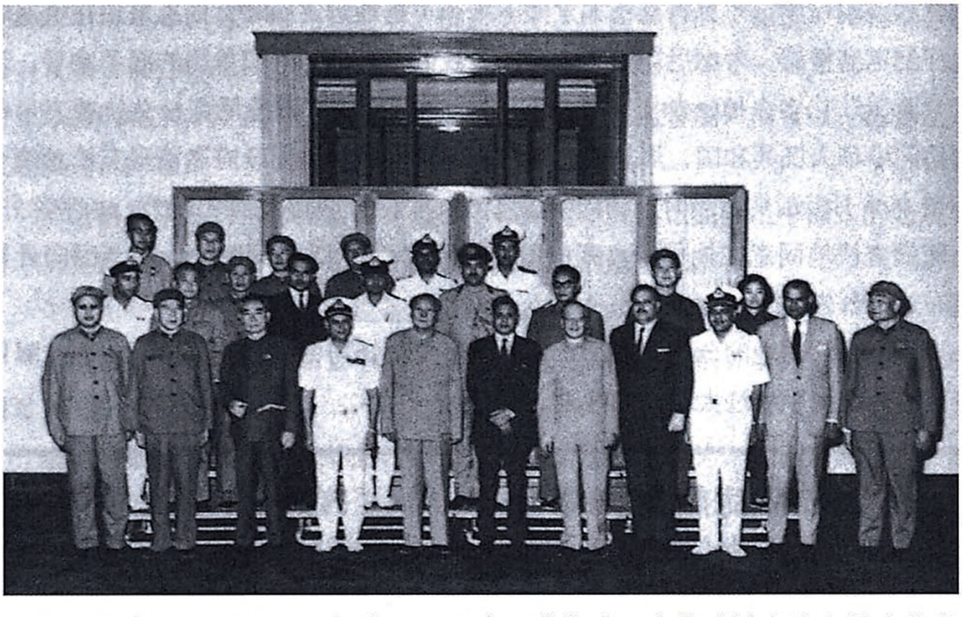
帝国主义并不可怕。我们自己的经验，你们的经验，以及现在东南亚作战的经验，都证明这一点。这些经验证明，帝国主义是很强大的，但它怕小国，也怕那些中等国家。有些国家说我们国家是大国，我说不是，是中等国家，跟你们一样。他们怕我们，是怕我们的将来，不是怕我们的现在。这就是所谓“潜在力量”。所谓“潜在”嘛，就是“力量”还在那里睡觉。不晓得哪一天醒了，他们就紧张了。

---

[1] 本篇一至三是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穆扎法尔·哈桑时谈话的一部分。

三

我们的海军、空军，都是从陆军抽出来的人去组建的，因此也不内行，没有搞过嘛。现在还没有敌人进攻，敌人一攻，怎么办？打游击战争嘛。陆军打游击战争，我们过去是有经验的，其办法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就是这两句话，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一跑，敌人就追，到适当的时候，好打了，就是打得赢了，就打。中国地方比较大，老百姓又站在我们这方面，敌人侦察也困难，没有法子，到处驻兵，驻多了，展不开，驻少了，我们就吃掉它。我看海上也是用这个办法。就是这个军港不行，军港没法子跑，要想另外的办法。



1970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和巴基斯坦海军司令穆扎法尔·哈桑中将及其随行人员合影。

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批语[1]

（1970年9月27日）

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2]）。

九月廿七日

---

[1] 周恩来等1970年9月18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现送上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关于选读马、恩、列、斯著作的三十二本书的批示和目录。我们从中选了九本，又在毛主席著作中选了五本”“请予审批”。周恩来等挑选的9本马、恩、列著作是：一、《共产党宣言》；二、《哥达纲领批判》；三、《反杜林论》；四、《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五、《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六、《国家与革命》；七、《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九、《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挑选的5本毛泽东著作是：一、《实践论》；二、《矛盾论》；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的评语，写在周恩来等的送审报告上。1970年11月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经毛泽东审阅的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并指出，“最近，毛主席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指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2] 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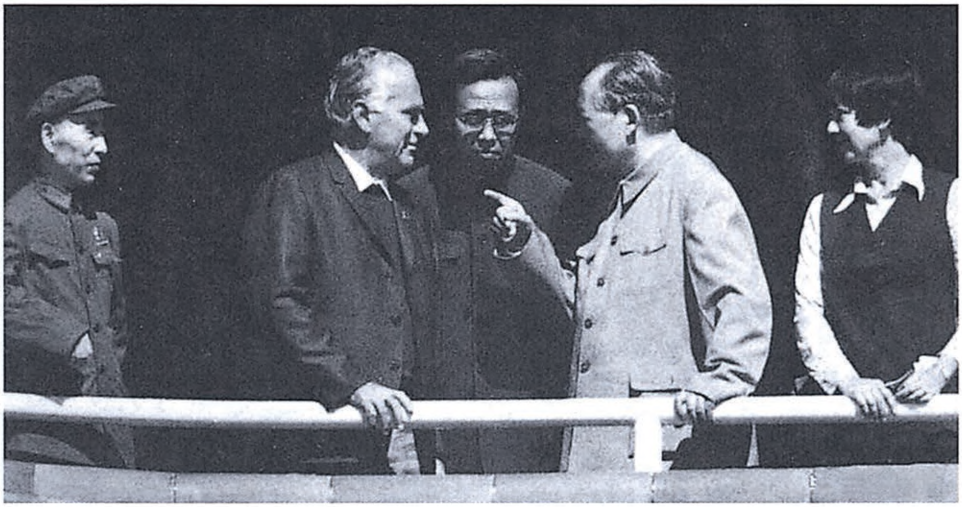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来到天安门城楼参加首都军民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一周年大会。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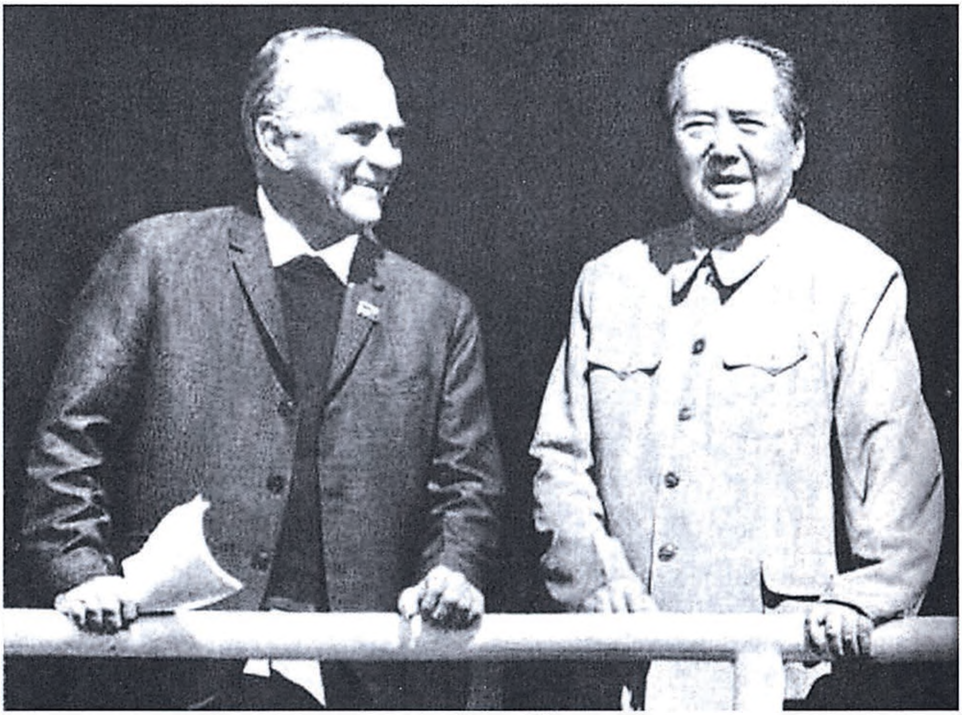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首都军民共庆新中国成立二十一周年。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交谈。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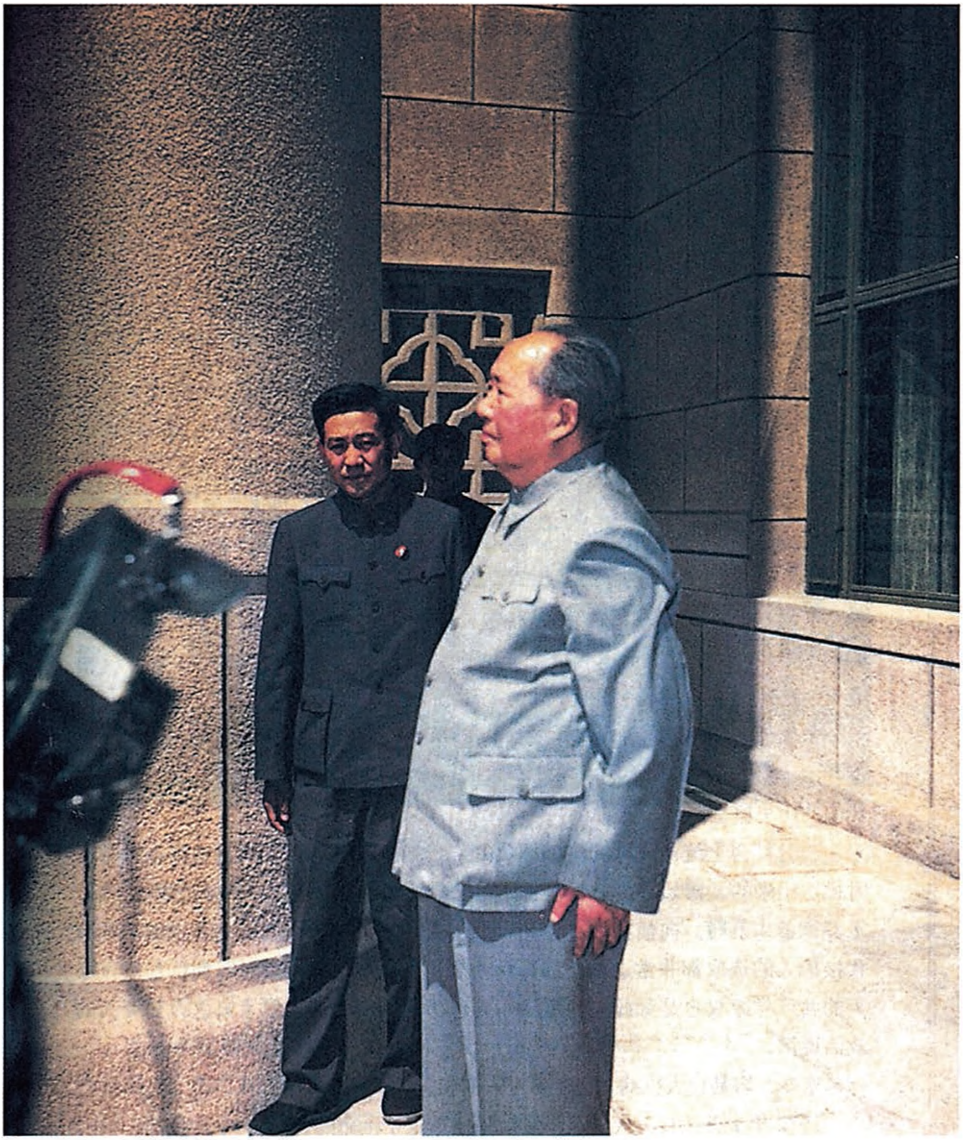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会见来访的挪威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保尔·斯泰根。

1970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送别客人。

1970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客人。

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送别客人。

1970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对抗美援朝决策的回顾[1]

（1970年10月1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当初你们的军队退到北边，这个损失也相当大，剩下的力量不很多。那个时候，我好像记得跟你们说过，你们现在更强了，比过去强。

金日成（以下简称金）：是这样讲的。

毛：那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不仅你们没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

过去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

再有呢，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我们总还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再可以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时谈话的一部分。

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这就是那第一批。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这是根据他们当地的调查。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愿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除了这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愿意打，这不是百分之八十了吗？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

毛：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能理解了，加上头一仗又打胜了。

所以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1]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2]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

---

[1] 这里指周恩来。

[2] 莫洛托夫，1950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所以亚洲人同美国人打，可以说是有了一些经验的。至于苏联那时候不想打仗，也是有理由的。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损失太大，单是壮丁就两千万。恐怕不单是壮丁，因为妇女不包括在壮丁之内。

对吴法宪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1]

（1970年10月14日）

---

[1] 吴法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70年9月2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对他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言行进行检讨。信中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是一篇最精辟的马列主义的光辉文献”“一针见血，深刻地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动本质，学习后，我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使我猛醒过来，认清了陈伯达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假马克思主义者的真面目和他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党中央的权的罪恶阴谋”“明白自己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信中补充揭发了陈伯达在庐山的一些反党活动。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本篇一、十是毛泽东对吴法宪这封检讨信的批语；本篇二至九是毛泽东在这封检讨信上写的批注。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政变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吴法宪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一

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二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1]

三

这些话似乎不真实。[2]

---

[1]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引用的论天才的材料，“没有查证核实，没有同对方正式商量交谈，又没有准备稿子，由于我有错误的认识和错误的情绪，话匣子打开后，越讲越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并说：“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在后一句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他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四

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1]

五

办事组[2]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3]

六

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4]

---

[1]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这次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揪出了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陈伯达”。毛泽东在其中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批注中所说的“个别同志”，指林彪。

[2]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当时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3]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将陈伯达在电话中告诉他的7条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天才方面的论述”“打印了几份，给了办事组几个同志”。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4]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1970年8月26日打电话给他，说主席要陈伯达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谈。谈话中陈伯达说主席批评了他，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当时陈伯达神态异常，说话支支吾吾。”在这些话下面，毛泽东画了杠，并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写了这个批注。

七

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1]

八

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2]

九

这样对。[3]

---

[1] 吴法宪的信中讲到，陈伯达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曾问他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没有。毛泽东在其中的“伟大谦虚”4个字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吴法宪的信中讲道，他在1970年8月27日晚上看到陈伯达的发言稿上“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吴法宪的信中讲道，陈伯达1970年8月24日晚上打电话找他，要他的秘书转告：陈伯达“想把他对宪法的修改意见划一份出来送呈主席看”。吴法宪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毛泽东在“不要答复他”几个字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十

林、周、康[1]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存中央办公厅。

---

[1] 林，指林彪。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叶群检讨信的批语和批注[1]

（1970年10月15日）

一

此件已阅。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

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2]

---

[1] 叶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1970年10月13日，叶群给毛泽东写信，检讨她在此前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支持陈伯达鼓吹“天才论”、设国家主席等活动。本篇一、十一、十二是毛泽东对叶群这封检讨信的批语；本篇二至十是他在这封检讨信上写的批注。“文化大革命”期间，叶群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1971年9月随林彪叛逃时机毁毙命。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叶群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2] 叶群的信中说：“我这次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泽东在“是路线性的”几个字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三

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1]

四

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2]

五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3]

---

[1] 叶群的信中讲到黄永胜、吴法宪1970年8月中旬给林彪和她打电话，反映中央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关于“天才”问题的争论情况时说：“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他们当时是出于热爱主席向林彪同志反映。”毛泽东在“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的电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叶群的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泽东在“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了。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1]

六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2]

七

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3]

---

[1] 叶群的信中写道：“主席讲过‘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掩盖矛盾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由于自己没有提到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来认识这个问题，总以浮浅之见劝林彪同志不生气，和稀泥，力求息事宁人，结果帮了倒忙。”毛泽东在其中的引文和“结果帮了倒忙”一句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叶群的信中讲到1970年8月24日晚她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的讨论时说，“在那天到会时，刚好接到办事组同志寄给我的一份论天才的语录。”“在发言时为了省事，部分地引用了几句。”“讲完回家后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是陈伯达连夜搞的。”毛泽东在第一句话和“才从办事组同志的电话中知道”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叶群的信中写道，“自己虽然没有参与搞那个语录”“但由于自己嗅觉不灵，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它，这就间接地被坏人陈伯达利用了，上了他这个反革命假理论家的当”。毛泽东在文中“不加分析地”和“间接地”几个字下面画了杠，在“间接地”3个字旁边打了一个问号，并写了这个批注。

八

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1]

九

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2]

十

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3]

---

[1] 叶群的信中写道，“由于自己路线觉悟政治水平低，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毛泽东在“过去对他的斗争是不够有力的”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2] 叶群的信中写道，“据最近揭发材料，陈伯达可能是个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他1970年8月23日未打招呼就来见林彪，“现在看来他这次闯来是别有用心的，是想趁机搞阴谋的”；陈伯达的老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坚决拒绝参加严慰冰专案组的工作，这件事也是很可疑的”。毛泽东在这几句话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3] 叶群的信中写道，“今后我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尤其是主席的哲学著作），并按主席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在“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下面画了杠，并写了这个批注。

十一

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1]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十二

林、周、康[2]及其他有关同志阅。阅后退中办存。

---

[1] 指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都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对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10月）

同意。

---

[1] 周恩来等1970年10月18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指出，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认真地完成整党建党任务，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为此，各地一方面要狠抓基层支部的整顿和建设；另一方面，要按新党章的规定，及时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通知稿还对召开地方各级党代会的具体问题作了规定。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0月28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个通知。

关于同意会见美国作家斯诺的批语[1]

（1970年10月）

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10月12日送审的外交部关于毛泽东接见斯诺的安排建议上。周恩来在送审时写道：“建议在最近几天，主席接见斯诺一次。斯诺原定十月十五日外出，如主席同意在最近几天接见，也可推迟斯诺夫妇外出。主席哪天接见，是否让他夫人参加，哪些人陪见，可否照像，均请主席决定示知。”毛泽东和斯诺的这次会见，后来安排在1970年12月18日。

悼念戴高乐[1]逝世的唁电

（1970年11月11日）

巴黎

夏尔·戴高乐夫人：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毛泽东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于北京

---

[1] 戴高乐，法国将军、政治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率部抗击德国侵略军。法国沦陷后，在英国伦敦领导“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运动，先后组织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海外和国内的抗德斗争。1944年6月任法国临时政府首脑。1958年6月出任法国总理。1958年12月至1969年4月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1970年11月9日逝世。

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的谈话[1]

（1970年11月13日）

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

---

[1]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这是毛泽东和叶海亚·汗谈话的一部分。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6月4日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1970年，毛泽东和红色高棉三号领导人英萨利握手。中为波尔布特。

同意印发《我的一点意见》的批语[1]

（1970年11月）

一

请林[2]再阅后，退周恩来、康生[3]。

---

[1] 周恩来等1970年11月7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在办理陈伯达专案工作中，我们发现如不使更多负责同志和办专案的同志知道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一文，就不容易得到多的真实的揭发和检举材料，而现在党内外和国外舆论都已渐渐觉察到陈伯达从九届二中全会后即不再出面，可能出了问题。因此，我们提议将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的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各一份，并将陈伯达反党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和个人野心家的阴谋活动传达到上述各单位的领导同志中，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本篇一写在周恩来等的这个报告的信封上；本篇二写在这个报告上；本篇三写在周恩来等11月14日送审的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稿上。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3]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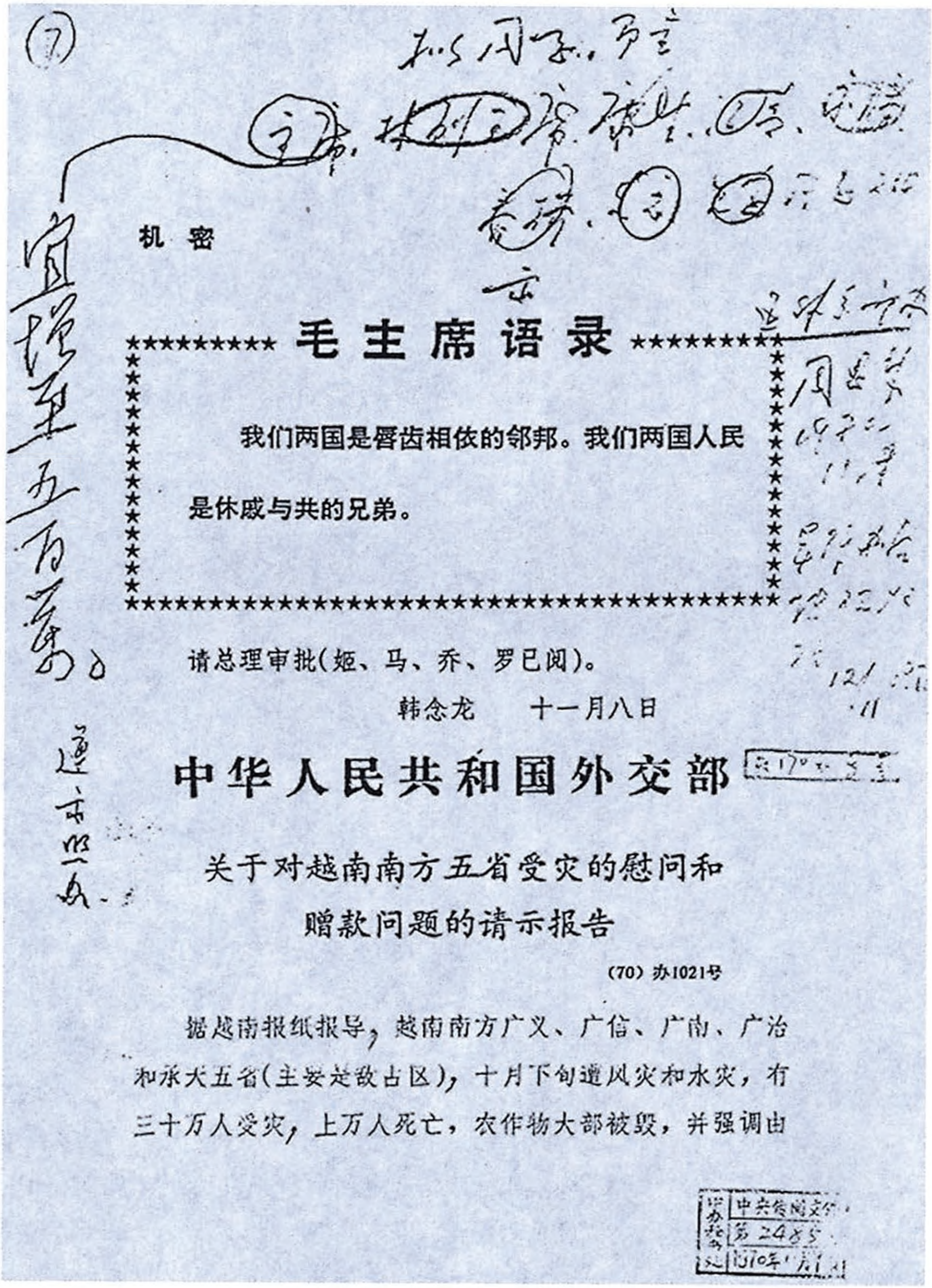
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1]下达。

三

照发。

---

[1]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稿指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中口头传达过陈伯达反党的问题。为了教育干部，让较多的同志了解这个问题，中央决定印发《我的一点意见》，请立即向党的地区级核心小组成员、部队师级党委委员和同级党员负责干部以及中央各专案组人员宣读和传达。传达内容主要以《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为准。指示稿还指出，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中央正在审查他的问题。各单位在传达时要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



宜增至五百万。

机密

毛主席语录

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

请总理审批(姬、马、乔、罗已阅)。

韩念龙　十一月八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关于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的慰问和赠款问题的请示报告

(70) 办1021号

据越南报纸报导，越南南方广义、广信、广南、广治和永大五省(主要是敌占区)，十月下旬遭风灾和水灾，有三十万人受灾，上万人死亡，农作物大部被毁，并强调由

1970年10月下旬，越南南方部分地区遭受水灾和风灾，外交部请示拟通过红十字会向越南捐赠价值200万元人民币的物资。毛泽东批示，要求赠款数增至500万元。

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语[1]

（1970年11月、12月）

一

林彪[2]同志：

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永胜[3]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1970年11月17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说，卫戍区自去年7月至今年8月，先后分4批组织了13个团进行1000里和2000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6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本篇一、二都写在这个报告上；本篇三是对周恩来12月8日送审的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实行野营训练重要批示的中央通知稿的批语。中央通知稿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要以毛主席十一月二十四日重要批示为纲，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

[2] 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3]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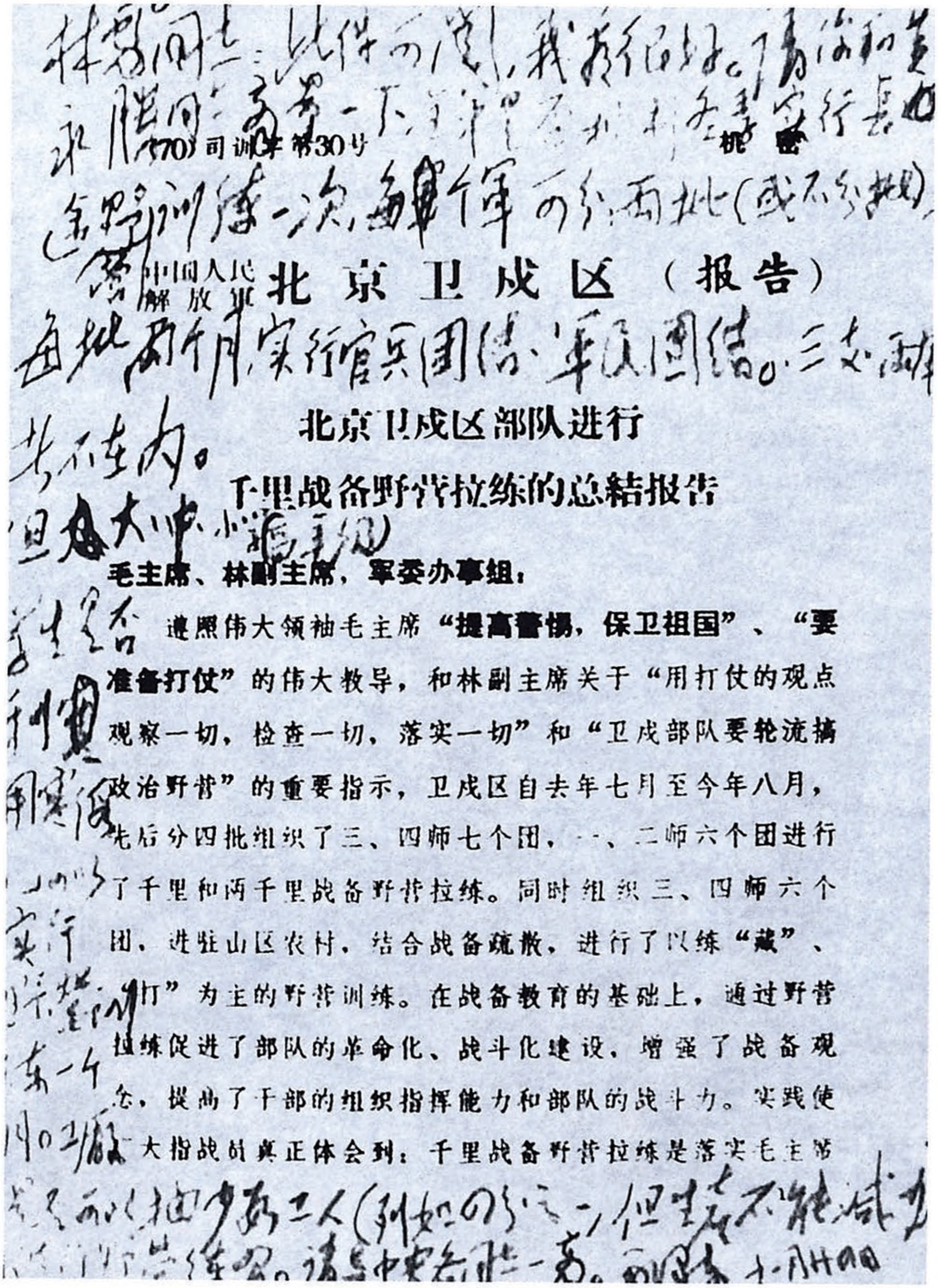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二

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三

照发。



林彪同志：此件可阅，我看很好。请你和黄
邱陈同志商量一下，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
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
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
者不在内。
但各大、中、小城市
[illegible]
[illegible]而以抽少数人（例如四分之一），但其余不能减少
[illegible]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70）司训字第30号　　　机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 北京卫戍区（报告）

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
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军委办事组：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和“卫戍部队要轮流搞政治野营”的重要指示，卫戍区自去年七月至今年八月，先后分四批组织了三、四师七个团，一、二师六个团进行了千里和两千里战备野营拉练。同时组织三、四师六个团，进驻山区农村，结合战备疏散，进行了以练“藏”、“打”为主的野营训练。在战备教育的基础上，通过野营拉练促进了部队的革命化、战斗化建设，增强了战备观念，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斗力。实践使广大指战员真正体会到：千里战备野营拉练是落实毛主席

1970年，毛泽东倡导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图为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野营拉练总结报告上的批示。

1970年，部队正在进行长途野营训练。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1970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光辉节日到来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表示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解放以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经受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走过了一条充满战斗的光辉道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原则，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大大地鼓舞了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为世界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阿尔巴尼亚人民克服了帝、修、反所设置的重重障碍，坚定不

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过去的一年，是阿尔巴尼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大发扬的一年，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更加辉煌成就的一年。英雄的阿尔巴尼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

当前，世界上是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新高潮正在兴起。美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勾结、互相争夺、妄图瓜分世界的丑恶面目越来越暴露。它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被全世界人民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让我们中阿两党、两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而共同奋斗！

热烈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六周年！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不要求外国人承认中国人的思想[1]

（1970年12月6日）

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上的批语。

对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稿的批语[1]

（1970年12月）

照发。

---

[1] 周恩来1970年12月7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说，今年以来，特别是下半年以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重大事故，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带来不良影响。为此，通知提出了加强安全生产的5条具体要求。周恩来送审时写道，这一文件是11月份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修改通过的，现在各地对安全生产仍注意不够，事故仍继续发生，发这个通知，仍有必要。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2月11日，中共中央将这个通知发到县团级和企事业单位。

在三十八军检举陈伯达[1]反党罪行报告上的批语

（1970年12月16日）

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

此件[2]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六日

---

[1]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8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他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 指中共第三十八军委员会1970年12月10日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

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

（1970年12月18日）

斯诺（以下简称斯）：我经常想给你写信，但我真正写信打扰你还只有这一次。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怎么是打扰呢？上次，一九六五年，我就叫你找我嘛。你早找到我，骂人，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all-round civil war，我也学了这句话了。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斯：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2]的时候？

---

[1] 这是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作家、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谈话纪要，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本篇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编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删节。

[2] 1970年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决定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并进行示威游行，随后又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放火烧毁代办处办公楼和汽车。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就"火烧代办处事件"对英国公开道歉。

毛：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1]。

斯：有一个问题我还不大清楚，即主席对我讲这些，是供公开发表用，还是作为介绍背景材料，还是朋友之间的交谈，还是三者兼而有之。

毛：不供发表。就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嘛。我看你发表跟周恩来总理的谈话比较好，同我的不要发表。意大利杂志上的这一篇[2]我看了，我是看从外国文翻译成中文的。

斯：你看写得可以不可以?

毛：可以嘛。你的那些什么错误有什么要紧?比如，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

斯：每个州里面还起码都有一个名为华盛顿的市镇。

毛：可讨嫌了！科学上的发明我赞成，比如，达尔文、康

---

[1] “五一六”，原是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反动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解决。但到1968年，又成立了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在清查中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一些地方和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指责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情况混乱不堪，最后不了了之。

[2] 指斯诺1970年12月13日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的《同周恩来的谈话》（国际部分）。

德[1]，甚至还有你们美国的科学家，主要是那个研究原始社会的摩根[2]，他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欢迎。从此才知道有原始社会。

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

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3]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

---

[1]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他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康德，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把太阳系的形成看成是物质按其客观规律运动发展的过程。

[2] 摩根，今译摩尔根，美国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他在《古代社会》中第一次论述了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存在与发展的规律以及婚姻、家庭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3个时代。马克思对该书作过详细摘录和批语。恩格斯也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用其大量资料，阐述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赞誉他“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3] 尼克松，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1972年2月首次访问中国。访华期间就中美关系问题同中方举行谈判，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你说，我的政策正确，五年之前就决定不出兵，所以尼克松不打中国。我说不是。我们在朝鲜出了一百万兵，名曰志愿军。麦克阿瑟[1]打定主意要轰炸满洲，就是东北，结果杜鲁门[2]就把他撤了。这个麦克阿瑟后头又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怪不怪。所以世界上的人就是这么变来变去的。也有不变的，比如我们两个就不变。

我看你这次来访问比较前几次要深。你接触了工厂、农村、学校，这就是研究社会。

斯：现在中国的农业情况很好。

毛：中国的农业还是靠两只手，靠锄头和牛耕种。

斯：这次来，我去看了一些我十年前参观过的公社。这些公社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毛：现在有些进步了，但还很落后，识字的人还不多，女人节育的还不多。

斯：还是很不错，同十年前或五年前相比较。

毛：说有所进步，我赞成；“很大的”，不能讲。要谨慎。

斯：但是现在没有人反对节育了。

毛：你这个人受人欺骗哟！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是个女孩，就想要个男孩子。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子。……一共生了九个，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四十五岁了，只好算了。

斯：是啊，但是现在反对节育的人不多了，年轻人不反对了。

---

[1] 麦克阿瑟，1950年6月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指挥侵朝战争，并极力主张进攻中国。1951年4月被解除一切军职，仅保留五星上将军衔。

[2] 杜鲁门，1945年至1953年任美国总统。

毛： 重男轻女。这个风俗要改。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斯： 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毛： 你要完全平等，现在不可能。

今天是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这两国的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第一是亚非拉啰，第二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美国如果能出现一个领导的党来进行革命，我高兴。美国的产业高于世界各个国家，文化普及。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1]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

---

[1] 指中美大使级会谈。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7月25日，中美双方就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于8月1日在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1958年8月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9月15日在波兰华沙复会。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136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你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我说不然，有所进步。美国革命有进步，我高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当然，不是说没有进步。三十五年前同现在比较，总进步一点吧，三十五年啊！

那时落后得很，只有八千军队。那时候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还没有会合。会合后招兵买马，在陕甘才闹了两万五千人。我说是走了两万五千里路，剩下两万五千人。但是比长征前的三十万人、几个根据地要强。政策改变了，王明[1]路线被批判了。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

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

[1] 王明，即陈绍禹，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明路线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都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1]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2]，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3]。尼克松当过副总统[4]，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几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这个世界你看怎么样？

斯：我同意主席说的，是一个控制的问题，一个美国要保持权利的问题。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有十五亿，再加上印尼、日本等，亚洲的人口恐怕超过了世界人口的半数了。日本正在迅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它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个工业大国了。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中国，如果在生产能力方面能够赶上日本，那么中国同日本加起来，其生产能力会远远地超过美国和欧洲。

毛：这个要看政策。你们美国的华盛顿一百九十多年前革命的时候，只有三百万人口，但能够打败拥有近三千万人口的世界第一

---

[1] 艾奇逊，1949年至1953年任美国国务卿，和杜鲁门一起制定了不承认中国和援助台湾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

[2] 指艾森豪威尔，1953年至1961年任美国总统。

[3] 肯尼迪，196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1963年遇刺身亡。

[4] 尼克松在1953年至1961年期间连任两届美国副总统。

大工业国大英帝国。只有几根烂枪，几个游击队，几个民团。华盛顿是个大地主。他生了气了，打游击。这个英国人找不到美国人，而美国人在这个墙角里，那个墙角里，嗵！嗵！嗵！从一七七五年起，打了一年以后，到一七七六年才开了一个十三个州的会议，才正式选举华盛顿为总司令。[1]兵也是稀稀拉拉的，没有多少，财政困难得很，发票子，但是打败了英国人。

你看我们呢？我们，你那时是看到的了。南方的根据地都丢了的嘛，只有三万人不到，一块一百五十万人口的地方。噢，还不到呢，因为那时候延安还没有占领呢。蒋介石可厉害了。以后马歇尔帮助他，就是杜鲁门时代。

你看中国人那个时候，稀稀拉拉，只有两万多兵，保安为根据地。这次你又去看了，那时候只有二百户人家。谁想到我们能够占领大陆啊？

斯：你想到了。

毛：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领还不知道啊。要到占领的那一天才算数嘛。后头日本人又来了。所以我们说尼克松好就是这个道理。那些日本人实在好，中国革命没有日本人帮忙是不行的。这个话我跟一个日本人讲过，此人是个资本家，叫作南乡三郎。他总是说：“对不起，侵略你们了。”我说：不，你们帮了大忙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本天皇。你们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全都起来跟你们作斗争，我们搞了一个百万军队，占领了一亿人口的地方，这

---

[1] 毛泽东这句话中所说的年份有不准确的地方。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同年5月，北美13个州参加的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对英国进行武装革命的“宣言”，把北美民兵整编为大陆军，6月即一致推选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

不都是你们帮的忙吗？

你们美国有个记者叫卡诺，过去在香港，现在在苏联，他引了这段话，他说美国人很蠢，煽动全世界人民觉悟。

斯：我过去报道过这样一句话，许多人加以引用。

毛：就是要宣传这个。没有蒋介石，日本人，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我们就不能胜利。

斯：前几天我见到西哈努克[1]时，西哈努克也曾对我说：尼克松是毛泽东的一位好的代理人。

毛：我喜欢这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

斯：尼克松在南亚陷得越深，就越是发动人民起来反对他。

毛：好！尼克松好！我能跟他谈得来，不会吵架。

斯：我不认识尼克松，但如果我见到他的话，是否可以说……

毛：你只说，是好人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这个勃列日涅夫[2]不好，勃兰特[3]也不算怎么好。

斯：我记得你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毛：就是啊。什么叫民族啊？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上层、剥削阶级、少数，这一部分人可以讲话，组织政府，但是不能打

---

[1] 西哈努克，1960年当选为柬埔寨国家元首。1970年朗诺发动政变后，西哈努克在北京组成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任民族统一阵线主席。

[2]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3] 勃兰特，当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联邦德国政府总理。

仗、耕田、在工厂做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些人就不能组成民族。

斯：我想向你简单地介绍我的经历，作为背景材料，可能你会感兴趣。……[1]

我的经历在我的这一代人中间可以说是典型的，即一边读书，一边工作。

毛：但是你的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长期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开头相信孔夫子，后头相信康德的唯心论。什么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华盛顿，相信拿破仑。后头还是蒋介石帮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杀人了。当然，还在一九二一年就搞了七十个[2]知识分子，组织了共产党。共产党组成的时候只有十二个代表，七十个人选举了十二个人当代表。这十二个人中间，牺牲了几个，死掉的几个，不干的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个，董必武[3]一个，毛泽东一个。

斯：我认为，你强调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重要的。

毛：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就是百分之一、二、三，就让他们在那里，年纪老了，不能干事了，养起来了。其他的都保存，但要跟劳动相结合，逐步逐步来，不要忙，不要强迫，不要强加于人。

那个讲堂上讲课的方法我不赞成。你先生写了讲义，发给学生看嘛。然后，不懂的再去课堂上问先生。学生往往是调皮得很。如

---

[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2] 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员只有50多人。

[3]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果学生出一百个题目，先生能答出五十个就很不错了。剩下那五十个题目怎么办呢？就说：我不懂，跟你们一样。然后大家研究，你们研究，我也研究。然后就说：“下课！”你看，多好啊！我讲课就是这样，不许记笔记。如果想睡觉就打瞌睡，想跑就退席。这个打瞌睡实在好。与其正正经经坐在那里，又听不进去，不如保养精神。

毛：你这个记者才不怎么样呢！何必当个记者呢？写个什么书，出个什么名呢？你那本《西行漫记》是出名的。还有一本什么人写的书可以和你那个《西行漫记》相比的，是一个海员写的，他那时候在广州上了岸，看到了日本人的侵略。他可能没有到解放区去，叫作什么Belden（贝尔登[1]）。

斯：噢，对了，我知道那个人，他现在还在。

毛：那个拉提摩尔[2]怎么样了？

斯：他现在也还在，他原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在麦卡锡[3]时期及以后的时期受到了迫害，现在住在英国。

斯：前两年我到远东来，见到一些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总是

---

[1] 贝尔登，美国进步记者。1933年以海员的身份来到中国，9年后回国。1946年12月第二次访问中国，在华北解放区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后，写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向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革命。

[2] 拉提摩尔，又译拉铁摩尔，美国东方学家。1941年7月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名义被派驻中国。1942年被召回国，任美国新闻处中国部主任。后任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1952年遭参议员麦卡锡弹劾。1963年赴英国，任利兹大学汉文教授。

[3] 麦卡锡，1946年起任美国参议员，以反共著名。1951年至1954年，他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并利用其他机构，对许多人和组织机构进行所谓的“忠诚调查”，采取非法审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在美国国内制造恐怖。

问他们中间是否有任何人曾经写过关于《海瑞罢官》[1]一文的分析文章，并指出过该文的双重含义。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人当时曾经看出这篇文章有什么意义。因此他们就没有能够预见到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它。

毛：就是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2]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第二个是现在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李瑞山，原来

---

[1]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1960年年底完成，1961年年初开始上演。

[2] 指江青1965年年初在上海同张春桥秘密策划，后由姚文元执笔写成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北京各大报纸开始都没有转载。《人民日报》11月30日才予以转载，并加了经周恩来修改的按语，强调作为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的操纵下，将对《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很快发展为政治批判运动。这场政治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直接导火线。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等人平反。

也是湖南省的一个书记；第三个是甘肃省的第二把手胡继宗。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1]。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斯：我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即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

毛：那就早啰。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三条”[2]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在那以前，他出的书黑《修养》[3]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

斯：是新版吗？

毛：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

---

[1] 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确定两国将在3月1日互派大使。

[2] 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23条。中共中央1965年1月14日印发了这个文件。

[3] 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原载于1939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期至八十四期，同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1949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1962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在《红旗》杂志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重新发表，并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文化大革命”期间，该书和它的作者一起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攻击。1980年3月，人民出版社重印1962年修订本，1981年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上卷。

产党不夺取政权干啥啊?!

斯：那么，你是不是在那时感到必须进行一场革命的?

毛：嗯。一九六五年十月就批判《海瑞罢官》。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决定搞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了十一中全会，“十六条”[1]搞出来了。

斯：刘少奇是不是也反对“十六条”?

毛：他模模糊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出了那张大字报了，他就不得了了。他实际上是坚决反对。

斯：就是《炮打司令部》[2]那张大字报吗?

毛：就是那张。

斯：他也知道他是司令部了。

毛：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

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

---

[1] 指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16条。

[2] 即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1]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

你们的尼克松总统不是喜欢Law and order（法律和秩序）吗？他是喜欢那个law（法律），是喜欢那个order（秩序）的。我们现在的宪法要有罢工这一条，“四大”的自由之外，还要加上罢工，这样可以整官僚主义，整官僚主义要用这一条。

斯：是不是新的宪法里要写上罢工？

毛：新宪法要写上。

所以我说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

斯：对于人们所说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须由一位个人把国家的力量人格化。在这个时期，在文化革命中间，必须由毛泽东和他的教导来作为这一切的标志，直至斗争的终止。

毛：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

---

[1] 指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树立陈独秀[1]，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李立三，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不打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多灾多难啊，我们这个党。

斯：你觉得党现在怎么样？

毛：不怎么样。

斯：是不是好一点了？

毛：好一点，你说好一点我赞成。你说中国怎么怎么好，我不赞成。两个东西在斗，一个进步的，一个落后的。

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啊？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

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

---

[1] 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6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革命失败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1932年10月被国民党逮捕，1937年8月出狱。1942年病死在四川江津。

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所以许多的兵士在我们的感化下，一个星期就过来了，一个星期就参加我们的队伍打仗了。

毛：你回美国去，我希望你作点社会调查研究。对于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资本家、各个阶层作调查，看他们的生活，看他们的情绪。去调查一个工厂，我是说中等工厂，千把人的，用一个星期够了吧？

斯：够了。

毛：如果调查两个工厂也只有两个星期。调查一个农场，一个星期也够了吧？

斯：够了。

毛：调查两个农场也是两个星期。加起来四个星期，也只有一个月嘛。再调查两个学校，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半个月时间。

调查一次也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的。第一，别人不一定讲真话。第二，自己对于了解来的情况不一定能够理解得好。这是我几十年搞调查研究的经验。当个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谈话很不容易。谁跟你谈啊？他们怕你调查他的秘密。跟工人、农民交朋友很不容易。你们这些人跟知识分子、小官僚、小资产阶级交朋友比较容易，跟工人、农民交朋友不容易。不信，你试试看嘛。如果你有决心，你就试试看嘛！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今天的美国处在更大的动荡之中，主要是因为越南战争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因为今天的青年人受到了比他们的上一辈更为良好的教育，国家的科学也在发展，而行政机构所执行的政策和他们的言谈之间的差距日益被人们所认识，以至于大多数公众对他们所认定的行政机构失去了信任。

毛：就是不讲真话。一个人不讲真话建立不起信任。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比如我们三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到现在，总没有变嘛，还是没有变嘛，总是以朋友相待嘛。官僚主义是有一点，但是我自己作自我批评嘛。

斯：你们跟俄国的问题打算解决吗？

毛：俄国的问题总也要解决嘛。世界上各国的问题都总是要解决的呀！

斯：那是。

毛：总要双方都愿意才行，只一方愿意不行。

斯：俄国到底要干什么？

毛：不大懂，也搞不清。

斯：俄国是不是怕中国？

毛：中国有啥好怕?！中国的原子弹只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小手指比划），俄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大拇指比划），美国的原子弹有这么大（主席伸出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来比划），它们两个加起来有这么大（主席把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你看。

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怕不怕呢？

毛：听说是有点怕。一个人的房子里有几个老鼠，也有点怕，

怕老鼠吃掉他的糖果。几个老鼠在房子里钻来钻去，他就睡不着觉，闹得不安宁。有些惊慌失措，比如中国挖防空洞，他们也害怕。这有什么好怕的呢？挖防空洞是防你来嘛，我钻洞嘛，又不打出去。中国批评他们的修正主义，他们也怕。那么是谁先批评我们的呢？这场战争是谁开始打第一枪的呢？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叫他修正主义。我们不怕他叫我们教条主义。我们把他批评我们教条主义的文章在我们的报上发表。他们就不敢发表我们批评他的文章，他们就怕。你说我是教条主义，你总有一个理由嘛。教条主义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嘛，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就要批倒。可是他不。他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1]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2]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行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他对我说，那次谈话的结果不错。

这些俄国人他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许多国家的人，他以为只

---

[1] 柯西金，当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4年10月被解除领导职务。

要他一句话，人家就都会听。谁知道，也有不听的，其中一个就是鄙人。

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我想简单地谈谈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想法。……[1]

毛：你说的那个城乡人民冲突的问题不严重。基本上是修正主义跟反修正主义的问题。要搞修正主义就要跟苏联妥协。

至于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那是当然要发展的，现在还在发展。

中国是贫农多，占百分之六七十，还要加上中农，要团结中农。至于富裕中农，他们每日、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这是列宁说的话，不是我们创造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农民这么多啊。工人阶级人数不那么多，工人阶级也年轻。工人阶级好也好在这里。在你们那些国家，搞革命也比较困难，垄断资本厉害得很，它的宣传机器那么多。中国不同，比如宗教，真正信教的很少。几亿人口里面只有八九十万基督教徒，二三百万天主教徒，另外有近一千万的回教徒，穆斯林。其他的就信龙王，有病就信，无病就不信，没有小孩子就信，有了小孩子就不信了。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

斯：粮食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毛：过去叫南粮北调，现在各省市逐步在解决。

再一个就是北煤南运，说是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

---

[1] 中共中央文件上原文如此。

还有江苏的南部没有煤炭，所以要从北边运来。现在都有了。就是两个积极性，中央的积极性和地方的积极性，就是要有这两个积极性！让他自己去搞，中央不要包办，你自己去找嘛！结果到处去找，每个公社去找，每个县去找，每个省去找，七找八找都找出来了，找出煤和石油了。所以统统抓在我手里不行啊，我管不了那么多啊！要学你们美国的办法，分到五十个州去。

斯：我这次来，注意到有很大的变化。

毛：就是这两个积极性，中央一个积极性，地方一个积极性！讲了十几年了，就是不听，有什么办法？现在听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斯：有时候还要走O形，然后再设法冲破这个圈，重新开始。

毛：总而言之，我跟你反复讲的一句话就是，三十五年前到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对我也是不讲假话的。

关于开好华北会议[1]的批语[2]

（1970年12月19日）

照办。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3]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4]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

[1] 指即将召开的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

[2] 周恩来1970年12月19日给毛泽东等写报告说，昨晚政治局会议传达和讨论主席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参加会议的还有华北地区和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负责同志。会上，大家一致拥护主席要北京军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的建议，认为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北京军区和华北地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人要多一些，时间要长一些。为开好这个会，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同意在人到齐、开大会之前，先以3天时间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初步统一认识，利于接受大家批判；同时，由黄永胜、李作鹏找三十八军到会同志谈话，指出他们的报告是好的，起了推动作用。在会上，要通过揭发批判来达到团结。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3]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年1月兼任北京军区第二政委。

[4] 永胜，即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作鹏，即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1]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

[1] 指当时所说的在战争年代立下的“战功”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的“新功”两个包袱。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1970年12月19日）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阮友寿主席，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黄晋发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战斗在反美前线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走过了十年光辉的战斗历程。它代表了越南南方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越南南方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旗手，为解放南方、保卫北方、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坚持了整整十年伟大的人民战争，把美帝国主义这个超级大国打得晕头转向，一筹莫展。你们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小国人民敢于反抗大国侵略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全世界人民感谢你们。

美帝国主义虽已日暮途穷，但还在垂死挣扎。最近，它疯狂袭击越南北方，不断发出战争叫嚣，加紧准备新的军事冒险。这丝毫不能挽救它必然覆灭的命运。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已经结成了坚强的反美统一战线。你们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打出了

一派大好形势。我们相信，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一定能够把美国侵略者赶出印度支那。

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应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前进的道路上，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也不论美国侵略者进行怎样疯狂的军事冒险，七亿中国人民坚决与你们站在一起，全力以赴地支援你们，直到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在《参考消息》第四三七七期上的批语

（1970年12月22日）

姚文元[1]同志：

这篇文章[2]很好，可以全文转载，并翻成外文广播。另将哥穆尔卡[3]下台及一星期斗争过程写一详细报导发表。

毛泽东

十二月廿二日

---

[1] 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

[2] 指新华社1970年12月22日编印的《参考消息》第四三七七期上转载的《坦克的履带镇压不了波兰人民的愤怒和仇恨》一文，原载于12月19日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文章对12月14日、15日发生在波兰北部城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的罢工和示威情况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人民日报》1970年12月22日转载了这篇文章。

[3] 哥穆尔卡，原任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20日正式宣布辞职。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1]

（1970 年 12 月 29 日）

都同意。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姚文元1970年12月2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自己最近除学习中央指定的经典著作外，还很粗浅地读了一点历史和自然科学，想逐步改进自己知识贫乏的状况。”“赫胥黎为达尔文主义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乱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自觉的能动性以及这种能动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对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这个问题，他只回答了一半。此书在普及达尔文学说上有特殊的功劳。一种新的进步的学说要普及，不经过这种剧烈的批判，大约是不可能的。”1971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全国高、中级在职干部，“认真照主席的指示学习”。这个通知稿下发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转载英国《卫报》有关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文章的批语[1]

（1970年12月30日）

送总理[2]及外交部研究，此文可否可以在人民日报转载。[3]

---

[1] 《参考消息》1970年12月30日摘登了英国《卫报》12月18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争夺东海的石油》。该文指出，日本、南朝鲜和台湾当局正在忙着出让深海开采权，其中有些深海开采权在法律上是有争执的。这种开采活动是在中国的大陆架进行的，但是却没有同中国商量。中国人本月终于打破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强烈声称他们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这是北京第一次公开表示这样的态度。中国人不能说同日本和南朝鲜毗连的地区的整个大陆架都属他们所有，因为日本和南朝鲜作为沿海国家也享有类似的权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从理论上说应当通过相互之间达成协议来分配这种权利，像在北海做的那样。此外，还有一些远离日本和朝鲜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区，只有中国才可以合法地被认为是沿海国家。1958年关于大陆架的日内瓦协议规定，沿海国家对“水深二百米或超过这个深度而水深允许开发天然资源”的大陆架行使主权。东海大部分地区是在200米的深度以内，何况协议的规定还超过这个深度。毛泽东阅报后，写了这个批语。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1970年12月31日登载了这篇文章的内容摘要。

关于同意兴建
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语[1]

（1970年12月）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0年12月24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给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批复稿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去年10月，主席在武汉曾对修建三峡大坝的提议说道在目前备战时期不宜作此想。后来他们转而设想修建下游宜昌附近的葛洲坝低坝。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今年10月就此提出报告，请求列入“四五”计划。中央政治局11月会议讨论原则批准。周恩来送审的中央批复稿说，中央同意你们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报告，责成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主持，由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有关方面参加，组成坚强的施工指挥部，进行现场设计，在今年年内提出设计方案报国家建委审定。为争取时间，你们可即组织力量进行施工准备。

人民领袖毛泽东。

人民领袖毛泽东。

1971

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江青在华北会议[1]上的讲话的批语[2]

（1971年1月）

一

照办。江青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

---

[1] 这次会议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4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但又说李雪峰、郑维山“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

[2] 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在华北会议上，曾先后两次发表讲话，未经中央讨论，随意点名批评他人。1971年1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华北会议问题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中，对落实毛泽东关于开好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和有关指示，作了6项具体安排。其中第六项讲道，为集中大家注意力，拟印发毛主席、林副主席12月16日、19日两次批示和有关报告，及中央有关文件，编印华北会议的材料7件。“另拟将江青同志两次讲话录音，加以删减，给大区同志放听。”毛泽东阅后，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1月11日，周恩来将江青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稿报送毛泽东时写道，“七日晚得主席批示，于次日告江青同志”。昨晚商定“将整理原稿划有我们拟删节处送主席审阅。现送上，是否在会上放听，请主席审定”。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二

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71年1月8日）

一

林、周、康[2]三同志：

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3]除军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毛泽东

一月八日

二

改为充沛的精力较好，因为人的精力并不是无限的。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政治部1971年1月5日给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写报告说，我们在学习贯彻毛主席关于“军队要谨慎”的指示中，主要抓了以下问题：一是破“一贯正确论”，立一分为二的世界观。使一些自以为“一贯正确”的同志认识到，“一贯正确”本身就是不正确的，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辩证法；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目的是为了争功，表现是个“骄”字，实质是个“官”字，根子是个“私”字。二是破“领导高明论”，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针对有的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明”，好摆官架子，动辄批评训斥，大小事都要他说了算的问题，用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决不许可摆架子”的指示武装干部的头脑，引导大家从谈“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入手，看官气十足的危害。三是破骄傲有“资本”论，立为人民要立新功的思想。通过学习毛主席关于“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立新功，立新劳”的教导，进行小整风，展开思想交锋，在灵魂深处搞斗、批、改，自觉放下“战功”与“新功”两个包袱。“许多同志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半截子革命思想，决心在有限的年龄里，用无限的精力加倍为人民立新功。”在“无限的精力”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一个批注，即本篇二。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3]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1971年1月11日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1月8日重要批示的通知指出：“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我们的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通知下发前，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发。”

对周恩来在华北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的批语[2]

（1971年1月）

一

已看一遍，大体可用。明天可能谈一次。

---

[1] 华北会议，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北京军区、华北各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4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这次会议揭发、批判了陈伯达的反党罪行，但又说李雪峰、郑维山“参与”陈伯达的反党活动。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李雪峰、郑维山平反。

[2] 本篇一是对周恩来1971年1月22日送审的讲话提纲初稿的批语。1月23日，毛泽东约周恩来等谈话，商议周恩来的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意见对提纲作修改后，周恩来于当夜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在送审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在信封上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提纲，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全体大会上作总结讲话。这个讲话提纲后作为中共中央1971年第六号文件印发。

二

同意。

三

完全同意。

对张秀龙来信的批语[1]

（1971年1月）

请林[2]交军委一议。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原司令员张秀龙1970年11月17日给毛泽东等的信上。信中说，您1967年9月视察浙江时讲：张秀龙犯了错误应帮助他站出来。可是数年来我都在靠边站，现在湖北省军队农场锻炼已有年余。我认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主客观原因很多，主要是自己跟不上您的思想，路线觉悟不高，世界观改造不好，有私心杂念，一切由自己负责。但我认为自己是好人犯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可是将我长期靠边站，不让过问政治，不准夫妻双方来往（我爱人有病，不准我请假去探望），我想不通，所以写信，请您要军委办事组了解一下我在此地锻炼的情况，指出我的努力方向，并允许我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探家走动。1971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将张秀龙的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后，军委办事组提出对张秀龙问题的处理意见：应住院治疗，准许与家人团聚，恢复组织生活并待分配工作。张秀龙后来复出担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后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2]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关于批陈[1]整风运动重点在批陈的批语[2]

（1971年2月19日）

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3]，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4]主持时期那样。

---

[1] 陈，指陈伯达。

[2]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1年2月19日关于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情况等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讲道，为广泛深入地听取意见，今晚拟开政治局会议，约大区和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见面，征求他们对今年计划和各项工作的意见。同时，“还拟谈谈‘批陈整风’的传达问题，现在华北各地各军区按主席批准的北京军区党委建议的范围传达，效果甚好，全国亦拟在他们明后日回去后照华北传达范围办理”。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谈到了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的其他几个问题。

[3] 指1971年1月9日开始的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从9日起，出席这次座谈会的人员都参加了华北会议。

[4] 李，指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指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71年1月24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平反。

在军委办事组关于学习讨论毛主席“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71年2月）

---

[1]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71年2月2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二月十九日晚，周总理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批示，我们今天专门开会进行了学习和讨论，一致认为，主席对我们的重要批评完全正确，这是主席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和教育，表示坚决拥护，诚恳接受。”本篇一是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写的批语。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中写道：“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此，在‘批陈整风’时，对‘批陈’没有作为重点来进行。这是个严重错误。”毛泽东在文中“由于我们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下面画了杠，并写了一条批语，即本篇二。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搞好全军的‘批陈整风’。我们已将主席关于‘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重要指示，向正在开会的各总部、各军兵种作了传达，要求他们首先切实抓好‘批陈’，坚决把反党分子陈伯达从政治上、思想上、路线上、理论上批深搞臭，彻底肃清其流毒，提高全军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在这段话旁，毛泽东画了一条杠，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本篇四写在中共中央军委报送军委办事组报告的信封上。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成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陈伯达一起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一

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

二

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

三

这些话好。

四

周、康[1]阅后，退军委。

---

[1] 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在外交部关于美国人来华问题请示报告[1]上的批语

（1971年2月）

大体可以。凡没有主动申请访华者不邀。

---

[1] 外交部1971年2月17日《关于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美国人来华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说，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两年来美国已约有830余人通过各种途径申请访华（此外，尼克松曾通过几个途径私下向我示意愿派代表来北京谈）。鉴于美国国内要求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美苏在继续勾结的同时争夺激化，尼克松政府陷入比上台时更加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处境等国际新形势，毛主席高瞻远瞩地发出了“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的重要指示，改变了过去一般不允许美国人来华的作法，这是带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决策。为贯彻这一重要指示，在处理美国人来华问题上，拟遵循以下原则：以我为主，有选择、有计划、有步骤地批准一些美国人来华，除对我友好的进步人士和有声望、有影响的中间派人士外，还可视情况批准某些有作用的右派人士来访。在1971年，初步设想可批准若干起（大体30名左右）美国人访华。一般根据对方申请，必要时我方可从旁推动。报告还根据上述原则，提出了具体的批准对象和接待计划。

应对南昌起义和朱毛两军会师作正确解说[1]

（1971年2月）

第四条[2]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师作正确解说。

---

[1] 这是毛泽东在1971年2月第二十九期外交活动简报上写的批语。

[2] 指第二十九期外交活动简报刊载的《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四条。其内容是：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这两段历史提出意见，说这两段历史应该提，不提中国人容易理解，外国人就不容易理解。

对军委办事组传达毛泽东批陈[1]整风指示报告[2]的批语

（1971年3月1日）

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

---

[1] 陈，指陈伯达。

[2]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1971年2月28日给毛泽东等的这个报告，汇报了2月22日晚召集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委直属院校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讨论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指示的情况。报告说，从1月9日开始的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对全军的政治思想建设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结果造成被动，一错再错。“这几个同志在这次传达会上，对自己过去对反党分子陈伯达有迷信，上了他的当，受了骗，引用了他搞的语录等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在‘批陈整风’运动中认真检查自己。”当时中央军委办事组的组长是黄永胜，副组长是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是成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陈伯达一起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是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

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的两个文件送审稿的批语[1]

（1971年3月）

可以提出征求越方意见。他们可能认为这样说好，也可能认为说得较隐晦一点好，我还看不清他们的主意。

---

[1] 周恩来1971年3月3日将他准备在越南河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越两国党和政府联合公报（中方草稿）送毛泽东审阅，并提出：两个文件中画有红杠处是新的提法，请考虑。周恩来在河内市群众大会上的讲话稿中画红杠的一段话是：“越南、老挝、柬埔寨是中国的近邻，我们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那里为所欲为。如果美帝国主义硬要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全力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至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中越两国党和政府联合公报（中方草稿）中划红杠的一段话是：“中国人民决不允许美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地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如果美帝国主义沿着扩大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道路走下去，中国人民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甚至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周恩来的讲话和联合公报分别在1971年3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发表。

对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1]送审稿的批语

（1971年3月15日）

看了一遍，觉得可用。

只在18页上去掉一个词[2]，以便突出马列。17页上已有了这个词[3]，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

---

[1] 这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是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作的。主要内容分为六大部分：一、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二、革命人民掌握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三、革命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四、要有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五、现代修正主义是巴黎公社革命原则的叛徒；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争取更大的胜利。这篇文章在197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4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

[2] 这篇文章送审稿第18页写道："要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最锐利的武器为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所掌握。"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3] 这篇文章送审稿第17页写道："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越来越深刻地结合起来，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伟大的力量。"

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1]。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三月十五日九时

---

[1] 指1970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陈伯达等搜集整理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使不少人上当受骗一事。

对成功发射“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新闻稿的批语[1]

（1971年3月16日）

照办。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1年3月16日关于发表我国成功发射“实践一号”科学实验卫星新闻报道的请示报告上。新闻稿写道，1971年3月3日，我国发射了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卫星在3月3日至15日运行过程中，成功地向地面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现仍在继续进行预定的科学实验工作。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新闻稿中以下一段话：“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这篇新闻稿1971年3月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对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1]的检讨信的批语

（1971年3月24日）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

[1] 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邱会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发动政变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们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并分别判处他们有期徒刑18年、16年、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毛泽东等祝贺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电报

（1971年3月29日）

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苏发努冯亲王，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最近一个时期，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在各个战场上打得很好。尤其是九号公路战役，打了一场很出色的歼灭战，成建制地消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胜利。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兄弟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这次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你们发挥了人民战争的无比

威力，打出了新的水平，取得了新的经验。你们打痛了美国侵略者，打败了它的侵略计划，使尼克松[1]政府处境更加困难，日子更不好过。你们的胜利充分表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是不可战胜的。

现在，印度支那的形势空前大好。我们坚信，英雄的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越南人民在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旗帜下，团结一致，继续坚持人民战争，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对召开批陈[1]整风汇报会议等问题的批语[2]

（1971年4月）

---

[1] 陈，指陈伯达。

[2]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4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上。通知稿概述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各地、各军和中央直属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情况，提出为了总结和交流经验，以利于批陈整风运动的深入和向前发展，进一步认识陈伯达反动罪行的本质，“中央决定从四月十五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日期暂定五天”。毛泽东审阅时，将其中的“五天”改为“七天”。这次会议在1971年4月15日开始，4月29日结束。本篇二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18日晚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各小组会议除表态外，多数联系到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受骗上当的错误。”“这些发言只要属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拟一律登简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实现团结。如其中有别有用心的，也正好暴露；如属认识错误的，仍应进行教育。这样做法，妥否，请主席批示。”本篇三、四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1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写道：“反党分子陈伯达罪行第二批初稿，已经多次修改，现拟作初稿印送政治局同志审阅。”“现分呈主席、林副主席各一份，请予亲阅，看是否可以在二十日晚先印发会议备用。”（在引号内的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这两天（19、20两日）仍先集中揭发、讨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问题，以加深认识和检讨，并利团结。妥否，请予批示。”在这段话旁，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四。

一

照发。(时间暂定七天为好，实际上可能延长)

二

同意。会议时间（原定七天）不够，应延长。

三

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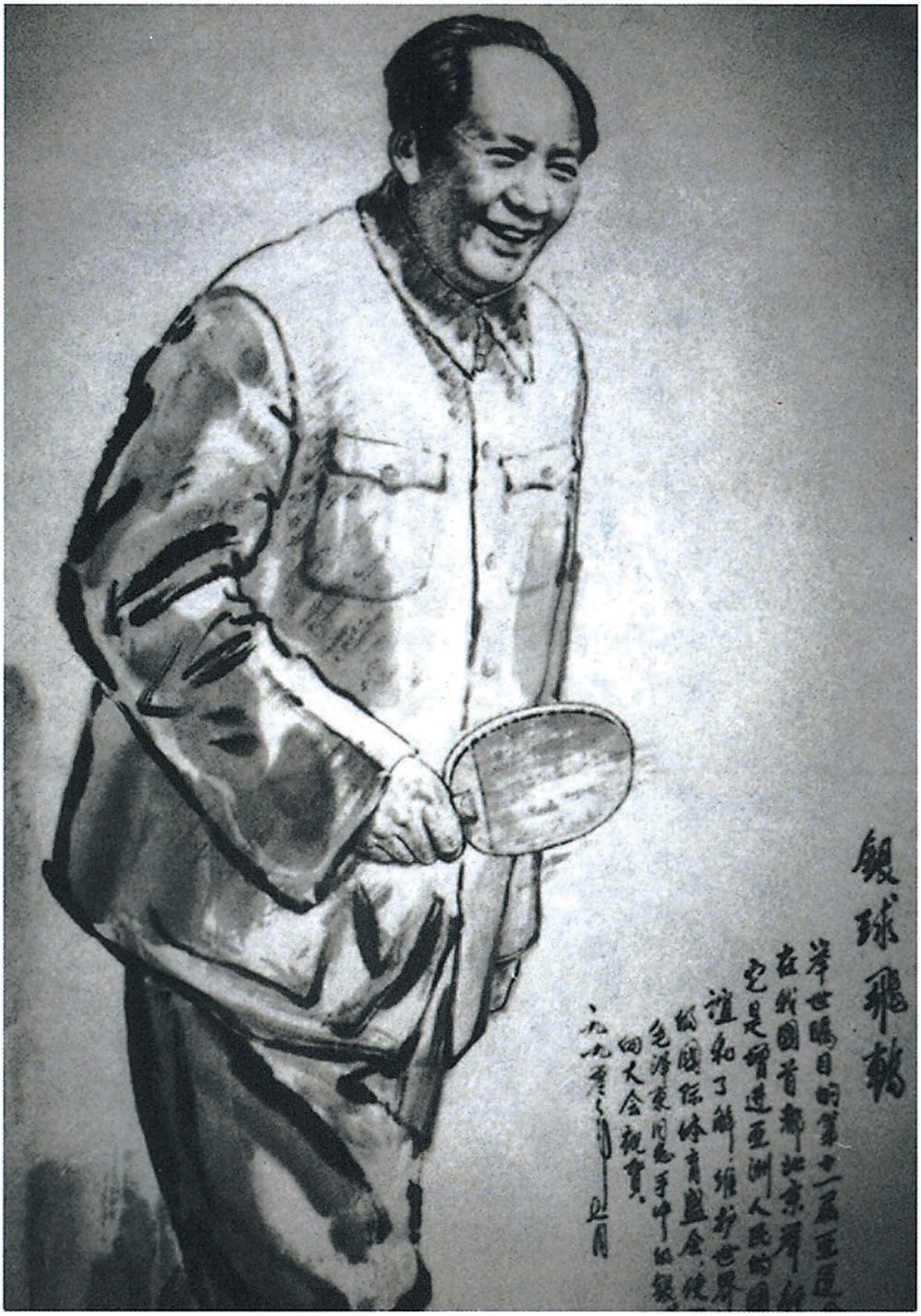
十九日廿时

四

这样好。如不够，时间延长。

1971年，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被誉为“乒乓外交”，用“小球”转动了“大球”。图为美国乒乓球队在长城的合影。

1971年4月，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队。


銀球飛轉
举世瞩目的第十一届亚运
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它是增进亚洲人民的团
谊和了解，维护世界
的国际体育盛会，使
毛泽东同志手中的银
向大会献宝，
一九九〇年

《银球飞转》（局部）（中国画）

关于黄、吴、叶、李、邱[1]的自我批评的批语

（1971年4月11日）

恩来[2]同志：

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

---

[1] 黄，指黄永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指吴法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指叶群，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李，指李作鹏，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邱，指邱会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1971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后经查明，"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吴、叶、李、邱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叶群随林彪叛逃时毙命。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们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并分别判处黄、吴、李、邱有期徒刑18年、17年、17年、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2] 恩来，即周恩来。

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

在李德生报告上的批语[1]

（1971年4月24日）

一

这样就好。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1971年4月23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遵照您的指示，4月20日上午，我向许世友同志转达了主席关于请他抓一下浙江舟山问题和军队之间团结问题的指示。他听了很高兴，表示坚决照主席的指示办。同时也谈了他过去没有抓这两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为了避免嫌疑。一是怕被别人说成黑手，二是怕被别人说成想抓华东的大权，所以不想管，也不愿多说有关这方面的话。他要我同浙江的同志谈一下，我已经同南萍、熊应堂同志谈了，他们说早就有这个愿望，当即表示希望许世友同志遵照主席指示抓一下。本篇二写在李德生报告的信封上。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萍，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熊应堂，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司令员。

二

林、周、康[1]阅后，退李德生同志存（可转许世友诸同志一阅）。

---

[1] 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指周恩来。康，指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

对周恩来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1]请示报告的批语[2]

（1971年4月）

---

[1] 这次会议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陈，指陈伯达。

[2] 本篇一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24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已开了9天，各组同志均已多次发言，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表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的愿望。军委办事组5位同志均有检讨。总的方面看，会议加深了认识和检讨。拟从今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并讨论回到各地、各方面如何深入向基层传达。在结束会上，拟由政治局出面讲一讲这次会议的收获，归纳几个问题，好向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以及中央直属的党政军相应组织传达，特别是向各地、各直属单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传达。同时，要商定“批陈整风如何向基层党员传达”在引号内的文字下面，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不过大家又说，不要因此要求，干扰主席、林副主席出席‘五一’纪念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在这段话旁，毛泽东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三。上述各项设想，不知妥否，请主席予以批示。“如主席还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在这句话旁，毛泽东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四。

一

已阅。基本同意。

二

暂时似还不必向基层党员传达。

三

我这几天不出门。

四

可以不要谈了。

对周恩来批陈整风汇报会议[1]讲话提纲的批语[2]

（1971年4月）

看了一遍，觉得可以。先同六人小组[3]商酌，再同政治局各同志（包括各大组负责人及犯错误的五同志[4]）商酌，取得同意，或加修改，然后去讲。

---

[1] 批陈整风汇报会议，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

[2]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1年4月28日给毛泽东的送审报告上。报告中说，花了两天工夫，起草了代表政治局的发言提纲。“如主席能在今天上午翻阅一下，告我在批评的火候上大体可用，我即将在六人小组会上提出讨论；如措辞太重不宜提出，亦请告我，以便重写；如还不足，得示后当在讨论时加重。”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上，按照这个讲话提纲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总结讲话。

[3] 1971年4月22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6人起草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这里所说的六人小组，即指由上述6人组成的会议总结大纲起草小组。

[4]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

对周恩来的信和报送材料的批语[1]

（1971年5月）

一

这样好。

二

已过细看了一遍。

---

[1] 周恩来1971年5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2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中美会谈问题的情况。信中说，“廿六日晚上政治局会议已开过，大家发表了一些意见。我将写出带方案性的报告，经大家审议后，再送主席、林副主席考虑”。毛泽东在文中“经大家审议后”一语下面画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一。5月29日，周恩来根据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写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毛泽东审阅后批示：“同意。”周恩来5月27日还随信向毛泽东报送了以下几份材料：一、中共中央联络部1971年5月10日编印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华简报》之三，其中第二页登载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希望到中国来谈事的一个口信；二、周恩来5月11日同由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会谈纪要；三、周恩来5月12日关于同黎笋会谈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本篇二是毛泽东看了周恩来报送的这几份材料后写的批语。

1971年5月1日，毛泽东和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上。

会见齐奥塞斯库[1]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的报道

（1971年6月3日）

毛主席高兴地对罗马尼亚同志说：“同志们，你们好，祝你们更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

[1] 齐奥塞斯库，当时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

1971年6月3日，毛泽东和林彪等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

1971年6月3日，毛泽东会见齐奥赛斯库及其夫人。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电报

（1971年7月10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基础上签订的，充分体现了我们两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个条约，对于全面发展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利于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正在使用更加阴险狡猾的手法，继续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扶植下复活起来的日本军国主义，野心勃勃，加紧扩张军备，

已经成为亚洲地区一个危险的侵略势力。美日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和侵略活动，正在遭到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中朝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是久经考验、牢不可破的。如果美日反动派胆敢把侵略战争强加给中朝人民，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同朝鲜人民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彻底打败侵略者。

中朝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为尼克松访问中国作了准备。图为周恩来接见基辛格。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电报

（1971 年 8 月 22 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罗马尼亚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了长期英勇的斗争，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武装起义，开创了罗马尼亚历史的新纪元。解放后，二十七年来，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的道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战胜了重重困难，改变了祖国的面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目前，罗马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胜利完成新的五年计划，实现罗共中央最近提出的改进政治思想工作的各项措施而努力奋斗。我们衷心祝愿你们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罗马尼亚人民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侵略威胁，勇敢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我们对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这种正义的立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表示支持和赞扬。

中罗两国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这几年来有了新的发展。不久前，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我国，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相信，在建设各自国家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中罗两国人民将一如既往，互相同情，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中罗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指示稿的批语[1]

（1971年8月24日）

同意试行。

---

[1] 周恩来1971年8月24日送审的这个指示稿写道：中央收阅了云南和新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牧区划分阶级成分问题的请示报告，原则同意你们在没有划过阶级成分或过去虽然划过但没有划清的少数民族地区，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充分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可参照1970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精神，以及附发的西藏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农林部党的核心小组请示报告中所提原则执行。要严格注意控制打击面。划为地主、牧主、富农、富牧的户数，不要用内地的比例硬套。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打击面要小的教导，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按照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政策，有多少就划多少，但最多不要超过总户数的8%。鉴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情况复杂，我们了解情况甚少，建议你们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先在一两个、两三个县的范围内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并对你们所拟划分阶级成分的具体规定作必要的修改之后，再行铺开，并望将试点情况报告中央。当日，中共中央即下发了这个指示。

清平乐·视察*

（1971年8月）

南巡万里，
不觉忆古帝。
威加海内有余风，
秦皇，隋炀，康熙。

彼辈功业为己，
我今操劳社稷，
踏破官僚机器，
挥斥资产阶级。

对中央转发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1]的批语

（1971年8月）

同意。

---

[1]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7月27日，经迟群（当时任国务院科教组领导小组成员）主持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我国教育战线的形势提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纪要还提出，为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当前必须着重抓好10个方面的问题：一、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二、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三、要批判资产阶级；四、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五、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六、教材要彻底改革；七、高等院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八、中小学教育革命中的几个问题；九、办好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十、军队院校的教育革命问题。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的报告，撤销了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否定了“两个基本估计”。

对中央转发《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1]的批语

（1971年8月）

照发。

---

[1] 中共广州军区委员会1971年8月5日向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报送这个纪要的报告中说：最近，我们召开了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会议检查和讨论了在三支两军人员中深入进行路线教育，继续反对骄傲自满、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问题，以及适应地方各级党委已经成立的新情况，改进对三支两军人员的组织领导和管理等问题，起草了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是否妥当，请审查批示。这次座谈会在1971年7月15日至31日举行，有广州军区师、军分区以上单位及南海舰队、广州空军的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中共中央1971年8月20日转发这个纪要的批语指出："这个《纪要》指出的问题，符合当前三支两军的实际情况，改进措施较好。望你们认真研究，参照执行。"中央批语中"认真研究"4个字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在外地巡视期间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

（1971年8月至9月）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2]以

---

[1]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972年3月16日将这个谈话纪要整理稿和中共中央转发这个谈话纪要的通知稿一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有少许修改。”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2] 指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1]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2]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3]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

---

[1] 彭述之，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兼《向导》主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执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因与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进行反党的小组织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后成为托洛茨基分子。

[2] 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就曾在瞿秋白等主持的八七会议上讲过“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1月9日至10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从而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14日印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湖南省委却把它“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说湖南省委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职务。

[3]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瞿秋白同志所作的历史评价，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1]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2]，想夺权，没有

---

[1] 罗章龙，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

[2]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他们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

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1]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2]，还有李雪峰、郑维山[3]。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

---

[1] 指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揭发和批判了陈伯达，吴法宪等人在会上也受到了批评，挫败了林彪有计划有预谋地抢班夺权的阴谋。

[2] 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参见《关于黄、吴、叶、李、邱的自我批评的批语》注。

[3] 李雪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委。郑维山，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会议前期由他们共同主持。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971年1月24日，他们被宣布“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197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为他们平反。

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1]。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2]，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3]，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4]。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

---

[1] 周恩来1970年8月23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是：1. 讨论修改宪法问题；2. 国民经济计划问题；3. 战备问题。

[2]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3个副词。

[3] 指林彪1970年8月23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4]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发言的记录。

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

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1]，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谈[2]，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3]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

---

[1] 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这期简报登载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1970年8月24日下午讨论林彪讲话的情况。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宣讲了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简报称林彪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大家衷心赞成“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8月25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2] 指中共中央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出席了会议。

[3]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5人。

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1]，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2]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3]，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

---

[1] 指中共中央1971年8月20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2] 欧仁·鲍狄埃，法国无产阶级诗人，巴黎公社活动家，《国际歌》歌词作者。1887年11月逝世。

[3] 指列宁1913年1月写的《欧仁·鲍狄埃》一文。

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1]，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

---

[1] 即《我的一点意见》。

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1]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2]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场，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3]，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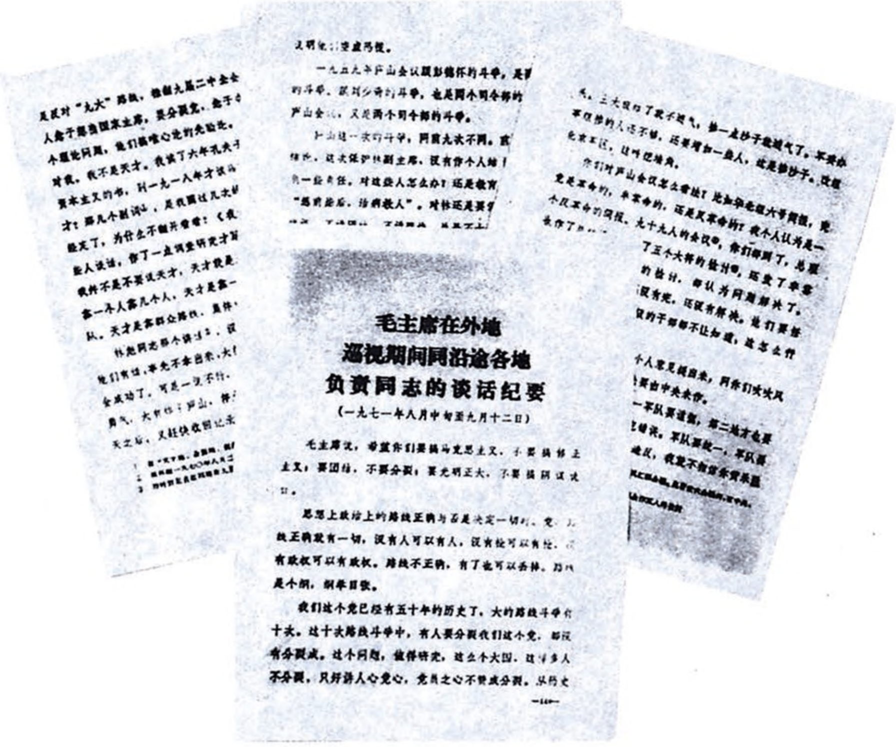
[1]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4人。

[2] 彭，指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指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杨，指杨尚昆，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1978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彭真彻底平反的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的种种罪名和一切不实之词，均予以推倒。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为罗瑞卿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平反昭雪。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杨尚昆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3] 指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主席在外地
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
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

1971年8月、9月间，毛泽东巡视南方，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指出林彪有野心。图为毛泽东巡视期间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纪要。

附录一：

在武昌和华国锋、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25日）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八十一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茨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住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召开了两次中央全会，即第四次、第五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正式管事是遵义会议后十年，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才当选主席。出了两本书，《两条路线斗争》《六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三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

我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四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

这个简报（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六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

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的，是说假话嘛。

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时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甩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你兼任广州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

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附录二：

在长沙和华国锋、卜占亚、汪东兴的谈话（摘要）

（1971年8月27日）

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一个是要认识一下，还有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有人说不要了，也不给利息了。我说不行。有的小资本家不要利息，大的资本家是不愿意的。应该拿一点利息。

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你们湖南有个人叫周世钊是个名人，是我的老同学。五一节周世钊来了，上了天安门。我问他民主党派还要不要，这个人算是个老实人，他说民主党派里也有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些历史上有一点反革命行为。这是对个人讲的。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但作为民主党派内部某个人来说，有的人是有问题的，少数人问题很严重。他们中间也有左派，也有中派，也有右派。不要笼统地说民主人士都好或都不好。

有些民主人士挨了斗，挨了批，有的拖了一两年了，问题也没有解决。不仅民主人士没有解决，什么“五一六”啊，他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啊，有的是挂起来了嘛。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

来，因为我们国家在搞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的还不正规，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

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你们找几本《国际歌》看看，《国际歌》里边什么都有了。你们明天就把《国际歌》念一念，议一议，谈一谈。不要每一句都搞对照，找日前最需要的要求去做。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结果我们党内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活动。这次不做结论，也是分裂行动了。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性质可能有变化，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但是那个时候文化水平高了，犯错误的人觉悟比较快，能及时认识改正。对犯错误的人，不管他怎么样，不要杀人。搞斗、批、改，也要搞得温和一些。

附录三：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28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对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同志，我比较熟悉。你们两位，我不怎么熟悉。

毛：（问韦国清）韦拔群和你都姓韦，是不是一家子呀？

韦国清（以下简称韦）：是五服以外的，不是五服之内的。韦拔群到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接受过主席的教育。

毛：不能说他向我学习了什么。名义上，我是先生，他是学生，实际上，他是先生，我是学生。要做先生，先要当学生。广西的事，他比我知道得多。可惜这位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对他很怀念。

毛：彭湃是广东海丰县人，家里是个大地主。他在海丰地方工作时，有一次几万群众朝拜观音菩萨，有人问他去不去参加，他说去参加。这样做是对的。他参加朝拜后，就对农民说，观音菩萨靠不住，还得靠自己才行。于是，就拿起了棍棍棒棒闹革命。他这个人善于鼓动，不善于搞组织工作。搞群众工作不怎么扎实，搞得不怎么好，后来牺牲了。他发动群众时，曾经拿自己家里的钱发给农民来搞群众运动。

（毛泽东把话题转到历史上的路线斗争）

毛：你们了解党的历次路线斗争吗？我们这个党有五十年的历史。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毛泽东谈起井冈山时期的斗争）

毛：当时，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撤了。不知道怎么传到了井冈山，说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于是，有人就不服气，要向中央写报告。我说不要写，开除有什么要紧。我既然被开除了党籍，就不能当代表了。但他们说可以当师长。到后来又说我可以当党代表。那时，我们只有两个团，一个是秋收起义军编成的三十一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以后，成立四军了，朱德同志当军长，陈毅同志当政治部主任，我当党代表。在闽西开会，叫我下台。后来有人又叫我上台，我就上台了。再有就是李立三搞了那么一阵子。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夺了权，搞了四年。中央五中全会，我是政治局委员，说是不让我参加会议。1935年1月，开政治局扩大会，张闻天、王稼祥和我主持的，这就是遵义会议，张闻天作报告。我是好比个菩萨，被放在尿缸里，沉过几下，臭得很。这次会议以后，我管事了。前面讲的这五次，我都无能为力，他们不听我的。

毛：以后出了个张国焘，搞分裂。叶剑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立了一大功，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

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那时军队如果不到西北，哪里还有根据地，后来怎么能搞到华北地区、东北地区的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又逃跑了。他是很害怕胡宗南的，后来又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去了。张国焘如果不跑，要给他当政治局委员，你们信不信？

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

毛：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方针有三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起来，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办法也有三条，就像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个是甩石头。头一块石头是批陈伯达搞的语录。第二块石头是批三十八军的报告。他们整三十八军实在是恶劣，对自己的队伍怎么能那个样子的整法。整二十四军、整三十一军、整六十九军、整三十八军，为什么要整？第三块石头是批济南军区的报告，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毛：（问刘兴元、丁盛、韦国清）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样看法？

毛：犯了错误，就作检讨。你们犯的错误不就是拥护我这个天才，要我当主席。我怎么能是天才呢？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一九一八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可不简单呢！一个月的薪水八块大洋。不过宿舍很小，冬天很冷，没有

煤炭烧炕。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不能平着身子睡，只能侧着身子睡，面积不够。那七个人都是要出国留学的，到法国搞勤工俭学。那时图书馆里有暖气，我晚上就到那里去睡觉，又取暖又看书，开始看马列主义的书。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毛：（问韦国清）我看你这个人太文了一些。打莫边府的时候，你是坚决主张打的。开头他们不听你的，你很厉害，他们就听了。

韦：我是根据主席的指示办的。

毛：（问韦国清）你们那个民族（指壮族），人口增加了一些吗？得有四五千万人了吧。可以编几十个师。南方几个省能打仗的，第一是广西，第二是广东，第三是湖南，你（指汪东兴）那个省（即江西）算第四。

（刘兴元汇报完工作后）

毛：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他不同意，后来说同意啦。我说，那就请你通知招生吧。开始招生的名额当中，他说农民比例太大，工人比例太小，不行。其实那时农民四万万人口，工人只有二百万，应该多培养农运干部。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讲到延安整风时）

毛：延安整风时，提出来要编书。后来叫王首道负责编书，编出来后，不行。改由胡乔木编，这个人有点知识，他收集和研究了那么多的文件，编了两大本，印出来让大家讨论。通过学习，这才把问题弄得比较清楚了。

（讲到打锦州时）

毛：我们在苹果园里面，不摘苹果吃。我就说，我们的部队有希望。

毛：到了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给部队增加军饷，说资本家吃大米、馒头，我们的部队吃酸菜，生活太苦了。增加军饷才能和资本家比。我说我们的军队只吃酸菜，又能打仗，这就很有希望。为什么要增加军饷呢？提这个意见的人，是代表吃酸菜阶级的人说话的。

毛：军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要犯错误。我很久没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抓军队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要讲团结这些事情。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时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上也要谨慎。军队要谨慎，首先不要搞山头主义。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的那些语录，李德生同志就有意见。我说李德生这个人好蠢，你不是那个山头的，别人的山头可以给你呀？好的宝贝怎么会给你呢？

（毛泽东沉思一会，把谈话转向“天才论”）

毛：《国际歌》里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全部的立场、观点。你们看，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你们都讨论了吗？《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

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个歌，你们要注意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毛：要认真读书。罗瑞卿当参谋总长的时候，让他和陈伯达商量，搞个读书目录，搞出来了三十本书。我看可以。以后又提出来说这样会妨碍学语录，把学理论的事停下来了。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也是有办法的，可以请先生帮。

你们（指广州军区）写的三支两军的文件，我看了，一些问题解决得不算彻底，但还可以。我在中央的批语上加了四个字：认真研究，就是要引起大家重视。我们的干部，大多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不好的要给予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就颠倒了吗？地方没有成立党委以前可以，地方已经有党委了，就不能那样办了。

毛：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附录四：

在长沙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及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30日）

（当谈到林彪一伙人的问题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九十九人的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作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家也都认为陈伯达做得不对，搞了一个称“天才”的语录。什么论“天才”，二中全会做了相当的结论，《我的一点意见》就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能靠一个人吗？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嘛。

（在谈到党的状况时）

毛：我们党有二千多万人，坏人不过是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呢，叫做“吐故纳新”。还要挂起来一点，不过不多了，清理和挂起来的，就算百分之三。党内还有落后的分子，或者比较而言的。这些问题几年之后，或者十几年之后才能做结论。因为现在不打仗，没有陈独秀。那个时候是天天打仗，是疾风暴雨式的革命形势，很

快就表现出来了。陈独秀他们八十一个人跑出去了，发表了声明。八七会议前，采取南昌暴动的政策是对的，南昌暴动基本上是正确的，后来是路线上犯了错误，但是取得了经验也是好的。城市不那么搞了，靠外援靠不住的，还得靠自己。没有兵怎么样办？靠发动群众，还有俘虏兵嘛，他们也是群众，因为他们是国民党抓兵抓来的。我们把他们俘虏过来，就是把他们从敌人那里分裂出来。

毛：听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不注意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第五条，都很重要。这是重点。没重点就没有政策。没有政策怎么样做工作呢？要很好地抓住重点，学习和讨论，不借鉴历史和政策，怎么行呢？当然现在你们还不能向战士们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啦。

庐山会议他们为什么要搞这个，收场又这么样快，我们也不懂。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搞了三天，从开始的那一天，他们就搞起来了。

如果你们有理，你可以坚持，为什么那股妖风刮了三天就不刮了呢？为什么要收得那样快呢？各大组组长都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说要收回简报。

总而言之，将来要把简报发给大家看。大家评论，是革命的，是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不要受群众落后议论的影响。这些落后的包括你们在内。不然的话，为什么被人家一股台风一卷，就把你们卷进去了。

毛：军队历来就是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谁有道理听谁的。我历来就没有什么意见的，我的意见都是下边来的，下边是供应站。陈伯达给我几条语录，三十八军给了我一个报告，汪东兴那个自我

检查，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刘子厚也给了我一点材料。我有什么东西呀？我是向他们学的，然后我就甩石头。

看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你们有什么学问呢？我不清楚。无非是找工人、农民开上两个会，然后总结一下。有些人一总结就说什么英明、伟大呀！英明领导啊！其实我算什么英明领导，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上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

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在报纸上登。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

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我看《参考资料》可以多印一点，看的人多一点。如果有的人不看，由他们去。

（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时）

毛：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

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

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一千三百人的会上作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

我说的这些，超过了九十九个人的会议总理作的总结了，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的。比如华北组的简报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还应该讨论。总而言之，它是不大好的就是了。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往回收呢？有几位大将，在各组放风，也不是那么妥当的吧。后来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以后，又赶快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网呢？

我们的高级干部不成熟。那次庐山会议也不过是二百几十个人，我本人也是二百几十个人中间的一个，还有一些高级干部，这次我给我们的高级干部吹一吹风，有中央委员，卜占亚他不是中央委员，我也跟他吹了，跟一个军区的政委吹吹风，还不行吗？华国锋同志，你满脑子的农业，当然，你也讲了农业路线问题，可是光有你的农业也不够，还要考虑到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回去能吹的就吹，不能吹的就守纪律，试试看。我一个人不能作决定。不要普遍搞，你们要个别地吹一吹风。

（谈到各地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

毛：过去，积代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北京开的有缺点。首先是总参谋部召开的那个积代会，他讲“大树特树”，别人一句也不能讲。听说他那里有一个护士，说了一句不赞成的话，他们就不饶她。“大树特树”，不妥当。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实是树他自己。我还要他来树吗？现在我已经树得了不得了嘛。

后来，国防科委开的积代会也不好。国防科委开积代会，有人

还打电报祝贺，其实这是造声势，找一班人拥护自己。

毛：（对刘兴元、丁盛）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边井冈山的独生子。

黄永胜是湖北咸宁人，十七岁就当兵，原是叶挺部队警卫团的一名战士，这个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在江西修水参加了秋收暴动，然后上了井冈山。

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二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

话，稍微大了一点吧？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毛泽东看了看表）

毛：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九十九个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还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斯大林搞雅尔塔协定，他们要瓜分世界，把中国的蒙古划出去，把新疆、东北划给苏联的势力范围，别国不能去；把日本划给美国的势力范围，你们知道不知道呀？

（谈到中苏关系时）

毛：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定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入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

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我讲党的十次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拉是拉了他们一下。

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毛：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附录五：

在南昌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8月31日）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和路线斗争问题）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中国共产党的十次路线错误，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

毛：（对许世友）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

陈独秀搞分裂，有八十一个人组成“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头一名是陈独秀，第二名是彭述之，第三名就是刘仁静。他们还发表了文告。

毛：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

南昌起义后，由于在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起义军南下广东

潮汕地区与敌人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最后余部又被迫返回到江西、湖南一带。

南昌起义以后，指挥上、路线上有错误，想依靠外国人，朱德同志当时到了桂东地区，他有一个同学、朋友，姓范，叫范石生，关系不错，搞到一起，范送了他一点枪、钱、衣。

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长征时，同我们一起的右路纵队，有四军、三十军，这两个军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他们当时把枪丢给干部团的学生，我还是要他们把枪带上，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张国焘有命令嘛。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也欢迎。当时不能帮忙，军队不能帮忙，都拿着枪啊。张国焘打电报！让他们回去，他们也愿意回去，那就回去吧！李先念和许世友都是和我们一起过的草地，后来还是回去了。

毛：（对许世友等人）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

附录六：

在杭州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汪东兴的谈话

（1971年9月3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那份简报[1]影响最大，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我看他们是恐惧。

毛： 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

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

（在谈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时）

毛： 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

---

[1] 指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

次了。

毛：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我没有同你们讲过路线问题，过去见面，吹的都是些鸡毛蒜皮，无非是同南京的关系的事，谁知后边还有一个庐山会议，过去我就讲过，一个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主要倾向，谁知三支两军掩盖着一个庐山会议的主要倾向！

听话要分析，不要听小道的话，不要尽听，人家一吹就听了，受蒙蔽了，不了解情况。所以要调查研究，听话要分析。

（再次讲到他对“天才”提法和“伟大”提法的态度时）

毛：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

（谈到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时）

毛：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

（最后又谈到军队问题）

毛：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

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时）

毛：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二十四军，又整了三十一军、六十九军，最后整了三十八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二十一军调到陕西时，胡炜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六十六军就说不服，他们的前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戍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

毛：对林要保。

（同时，又批林的讲话）

毛：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

（谈话快结束时）

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

附录七：

在丰台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汪东兴的谈话

（1971 年 9 月 12 日）

（毛泽东先问李德生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李谈了阿党对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态度和意见）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他们是左派，我们是右派。

怕美帝从亚洲撤出来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要我们把美帝拖住。他们[1]只有两亿人口，经不起伤亡嘛，所以他们要撤军。撤军，不一定就会增加对他们的压力。

（接着，毛又谈起党的历次路线斗争）

毛：我们的方针是路线决定一切。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的路线。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路线不正确，有了人和枪也可能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什么是纲？你们会打鱼吗？纲就是穿鱼网的那根绳子，目就是鱼网上面的一个个眼，你们讲的那个目，三天也讲不完。我今天是讲纲。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开头是陈独秀，“八七”会议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八十一人签名的“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

---

[1] 指美国。

说我们是坏人，红军是破坏分子，以后他们就搞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后头就是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的，李立三神气起来，搞了三个月，那时总理还未回来。李立三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李立三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李倒台是在三中全会。王明倒台是在遵义会议。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把总理封为调和主义，出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我们党五十年的经验，中国人不喜欢分裂，我们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没有一次把党给分裂了的。

（毛谈了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成功）

毛：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通，搞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

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刮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

毛：（对李德生）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

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

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

毛：（对汪东兴）他沾了一点边，在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作了几次检讨。

汪东兴：正式地作检讨是三次。

（毛在谈到汪东兴在中央办公厅和中央警卫团作检讨时）

毛：只有七千兵，连婆娘、娃娃都算上，他也没有倒呀，你把心里话说出来，倒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说这次汪东兴下不了台了，但是多数人还是说他检讨得好。五个人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检讨，承认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但他们的检讨里面是吞吞吐吐，因而使人怀疑他们能否改好。

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要掺沙子才行。李先念同志过去也是搞军队打仗的嘛，可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还要从各大军区选一些人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工作。北京军区也要从符军调一些人，把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捣烂。华北会议派了李德生、纪登奎同志到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的办法就是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

毛：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

纪登奎：算！

毛：还要看一看。黑手不止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

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电报

（1971年9月1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六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南亚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二十六年来，帝国主义侵略者不断地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伟大领袖胡志明[1]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首先赢得了抗法战争的辉煌战果。近十多年来，越南人民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最野蛮的侵略，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越南北方人民边战斗、边生产，以坚强的毅力和自力更生的精神，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获得了巨大成就。越南人民的伟大

---

[1]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69年逝世。

胜利，有力地支持了正在进行反帝革命斗争的各国人民，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目前，英雄的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高举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战斗旗帜，正在为夺取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英勇奋斗。印度支那形势空前大好。美国侵略者推行的所谓“尼克松主义”[1]和战争“越南化”的阴谋已经破产。傀儡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尽管美帝国主义还在竭力挣扎，但是，它的失败已成定局，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胜利一定属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

中越两国人民是久经考验的同志和战友。我们之间的友谊和团结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全力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

[1]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他在任内提出并实行的对外政策，被称为“尼克松主义”。主要内容是：以伙伴关系为“核心”“分摊负担和责任”；以实力为基础，建立“现实威慑力量”；以谈判为重要手段，在“五大力量”“三角关系”中推行“均势外交”。

毛泽东等对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的慰问电[1]

（1971年9月2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获悉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我们对此极为关切。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和兄弟的越南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在这次抗洪斗争中，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坚强领导下，英勇顽强、日夜奋战，表现了无比的革命气概。中国人民对此十分钦佩。

中越两国是亲密邻邦，中越两国人民是战友和兄弟。中国人民一贯把越南人民的困难看成是自己的困难，当尽一切可能，大力支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副主席林彪、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联名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的电报。对越南北方遭受严重水灾表示深切的慰问。

援兄弟的越南人民战胜这次水灾。

我们坚信，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英雄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困难，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电报

（1971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三年来，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反帝革命旗帜，走过了光辉的道路。英雄的朝鲜人民抗击了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打败了美国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朝鲜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朝鲜人民正在为实现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勇前进。中国人民为朝鲜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且衷心祝愿兄弟的朝鲜人民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美帝

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美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它的内外交困的处境，正在加紧勾结日本军国主义，把侵略矛头指向亚洲各国人民。但是，在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团结力量面前，美日反动派的一切侵略阴谋都必然要遭到失败。

美帝国主义至今仍然霸占着南朝鲜，并且伙同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朝鲜人民为反对美日反动派的侵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坚信，四千万朝鲜人民统一祖国的民族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中朝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我们的这种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在今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兄弟的朝鲜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林　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等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71年9月）

都同意。还要补选常委。

---

[1] 周恩来1971年9月10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在四届人大召开前有几件事要请主席批示，方好着手准备：一、国庆节前是否需先开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二、可否在三中全会宣布将陈伯达永远开除党籍？三、三中全会上可否补选几名中委？当时预定要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因林彪9月13日叛国外逃事件发生，没有召开。

对中央关于林彪[1]叛国出逃、自取灭亡通知稿[2]的批语

（1971年9月）

照发。

---

[1]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 周恩来1971年9月17日送审的这个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专机折戟温都尔汗。

对中央关于黄永胜等离职反省通知稿[1]的批语

（1971 年 9 月）

同意。

---

[1] 中共中央 1971 年 9 月 29 日发出的这个通知指出，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

对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稿[1]的批语

（1971年10月）

同意。

---

[1] 中共中央1971年10月3日发出的这个通知指出，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专案组由周恩来等10人组成，下设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对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通知稿[1]的批语

（1971 年 10 月）

同意。

---

[1] 中共中央1971年10月3日发出的这个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谈话[1]

（1971年10月26日、11月8日）

一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小唐[2]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主席本来指示……[3]

毛：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

---

[1] 这是毛泽东在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对有关同志的谈话。本篇一是1971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唐闻生、姬鹏飞、乔冠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荣时的谈话；本篇二是1971年11月8日晚8时，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唐闻生、章文晋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驻苏大使刘新权时的谈话。

[2] 小唐，指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唐闻生和王海容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

[3]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诉周恩来：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会）的席位，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此事时，毛泽东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周：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只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1]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

毛：那倒不必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我们就派代表团去。让乔老爷[2]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3]嘛。派谁参加安理会，你们再研究。

周：就让黄华[4]作副团长，留在联合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

毛：黄华到加拿大当大使不到四个月，现在就调走，人家可能不高兴咧。

周：做做工作，加拿大政府会理解的。

毛：好，那就这么办。

毛：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这两大胜利，我都没有想到。林彪搞鬼，我有觉察，就是没有想到他跑外国，更没有想到他坐的那架“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折戟沉

---

[1] 熊向晖，当时任周恩来的助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王牌间谍，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1937年，奉周恩来指示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1939年3月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新中国成立后从事外交工作。

[2] 乔老爷，指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老爷”之称源于20世纪60年代喜剧影片《乔老爷上轿》。

[3]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

[4] 黄华，当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

沙”。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1]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是她说对了。我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还有那么多的迷信呢。

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意大利，都当了“红卫兵”，造美国的反，在联合国投我们的票。葡萄牙也当了“红卫兵”。欧洲国家当中，只有马耳他投反对票，希腊、卢森堡和佛朗哥[2]的西班牙投弃权票。除了这四国，统统投赞成票。投赞成票的，亚洲国家十九个，非洲国家二十六个，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只有古巴和智利同我们建交，这次居然有七个国家投我们的票。美国的“后院”起火，这可是一件大事。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七十六，十七票弃权，反对票只有三十五。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恩来解释说：在会场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还没有看到，不过是一篇“吊丧文”。

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

---

[1] 指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自1953年至1974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1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日夜坚守在护理毛泽东的第一线，兼做部分国际问题秘书的工作。

[2]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1982—1975），西班牙政治家，军事家，法西斯主义独裁者，西班牙大元帅，西班牙长枪党党魁。1939年3月21日，佛朗哥军队占领马德里，推翻共和政府，对西班牙进行了长达36年的独裁统治。

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总理挂帅，抓紧准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

一九五〇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2]跟伍修权[3]去了趟联合国。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概。

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提案国要一一列举。

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就是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4]讲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要讲点历史，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战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

---

[1] 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11月15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2] 指乔冠华。

[3] 伍修权，1950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审议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会，在联合国讲台上慷慨陈词，严厉驳斥美国及其同伙对我国的种种诬蔑和诽谤，痛斥了美国对我国领土台湾的入侵和战争威胁，维护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

[4] 公报，指后来尼克松访华时1972年2月27日在上海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简称《上海公报》。

但是都没有一九四五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这次同基辛格谈公报的许多话可以用。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各国人民的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

还要讲些什么，请总理考虑。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势如破竹”是晋主司马炎的“三军总司令”杜预讲的，此人号称“左传癖”。他带兵占领武昌，准备进攻东吴的首都建业。一个“二杆子”参谋向他建议，现在长江涨水，等明年再打。杜预说：“今兵威大振，如破竹之势，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有着手处也。”果然一举成功，“三分天下归一统”。做文章就要“势如破竹”，才能说服人。

曹操是大军事家。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称赞他：“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时也批评他打过败仗。怎么批评的？请“参座”讲讲。

（叶剑英：困于南阳，险于乌巢，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

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郃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郃，夏侯渊分兵一半亲自援助张郃，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1]的拿手戏。你们看看《魏书》的夏侯渊传。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二十三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票赞成我们的五十四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十七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当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三十五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

[1] 谭鑫培、谭富英，谭家是著名京剧世家，谭鑫培是谭富英的祖父，京剧史上第一个老生流派谭派创始人。谭富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须生之一。

二

毛：“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者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说话，永远不能办事。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我一向反对下车伊始，哇哩哇啦的人，那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光想当先生，不愿当学生。有的人打过仗，有点功劳，或者自以为有点功劳，吃饭、拉屎、睡觉、做梦，都念念不忘他那点功劳。说他没有什么功劳，他就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是低级趣味。这几年，部队有些人的思想被林彪搞乱了。济南军区提出“反骄破满”，提得好，我就让全军学习。我最近常讲，军队要谨慎，这是有的放矢。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仗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过去我们说以苏联为首，因为它是老

大哥，为了对付帝国主义，必要的时候让它牵个头，开会的时候让它当主席。但是它要掌握领导权，搞父子党、父子国，这就完全错误了。美国总是要别的国家听它的，这就是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应该被打倒。所以，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你们这次去联合国可以放心了，我的那个“亲密战友”不在了，在座的同志知道吗?

周：还没有告诉他们，主席谈完后，我们就到大会堂把文件[1]读给他们听，并介绍有关情况。“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暗害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纲领。

毛：等一会把这件东西念给他们听。要尽快全文印发到全国各

---

[1] 这个文件指《“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3月21日，林彪之子林立果连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在上海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但是可能逐渐削弱。“文人力量”（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在发展，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代替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一是林彪“和平接班”，二是林彪“被人抢班”，三是林彪“提前抢班”。他们提出两个办法：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直接干掉毛泽东，但毛泽东影响大、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五七一工程”计划。1971年3月23日至24日，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原稿后来被缴获。分九个部分：一、可能性；二、必要性；三、基本条件；四、时机；五、力量；六、口号和纲领；七、实施要点；八、政策和策略；九、保密和纪律。该纪要后来被原原本本地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干部手中。

个党支部。

周：这里面尽是恶毒诽谤主席的谰言，怎么能印发？

毛：怎么不能？一个字都不改，原原本本发下去，让所有的党员所有的群众都知道。

毛：安全问题很重要，去了上上下下要住在一起。

毛：（对周恩来）马上打电报给黄镇[1]的助手，让他转告基辛格，我们的代表团在美国期间，美国政府必须保证安全。如果出了问题，唯美国政府是问。

---

[1] 黄镇，历任印度尼西亚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法国首任大使。自1971年起，黄镇奉命秘密同美国展开外交沟通，负责美国代表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联络工作。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驱逐台湾当局代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图为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

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谈话（节录）

（1971 年 11 月 14 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

毛：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周：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是树他自己的。

周：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厉害了，简直说得不像话了。

毛：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

毛：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毛：杨勇是怎么一回事？

叶剑英（以下简称叶）：当时我也不清楚。

毛：廖汉生为什么要抓？

周：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

毛：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毛：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

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

叶：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

毛：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毛：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哪有那个事呢？

毛：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你（指张国华）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

周：后来是司号长。

毛：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哪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季振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

周：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

毛：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在外交部关于为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送行计划报告[1]上的批语

（1971年11月）

规格似宜高一点，今晚可谈一下。

---

[1] 外交部1971年11月6日的这个报告说：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预计11月9日离京经上海、巴黎去纽约。一、代表团离京时，建议请姬鹏飞、李耀文、马文波、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其他同志、有关司负责人，与外交有关的其他部门负责人送行。二、代表团抵、离上海时，建议请市革委会一位副主任、一位常委和外事组负责人迎送。三、因许多驻华使节主动要求为代表团送行，建议通知各国驻华使节、苏联边界谈判团和各国驻京记者。四、代表团离京和途经上海，拟发一综合消息。11月8日，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全体成员。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等党政领导人到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对中国代表团到达纽约机场的书面讲话稿[1]的批语

（1971年11月）

同意。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代表团团长乔冠华1971年11月11日到达纽约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我们代表团将遵循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这个讲话载于1971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

对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1]的批语

（1971年11月）

同意。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1971年11月15日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讲道，1971年10月25日，本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是敌视、孤立和封锁中国人民的政策的破产，是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政府妄图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的失败，是毛泽东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胜利。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这里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我们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我们一贯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全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这个发言载于1971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电报

（1971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二十七年前，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战胜法西斯，打出了一个红色的人民政权，开辟了阿尔巴尼亚历史的新纪元。解放后，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使阿尔巴尼亚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革命堡垒。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一向蔑视貌似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坚决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

权主义，在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支持各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正义的声音。你们的这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赢得了各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光荣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一切成就，看成是自己的成就，并为此感到欢欣鼓舞。我们衷心祝愿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为完成你们党的“六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阿两党、两国、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对中央关于传达、讨论《粉碎林[1]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通知稿[2]的批语

（1971年12月）

照发。

---

[1] 林，指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 中共中央这个通知在1971年12月11日发出。1972年1月13日、7月2日，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这两个材料经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一周年的电报

（1971年12月19日）

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阮友寿主席，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黄晋发主席：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兄弟般的诚挚感情，向战斗在抗美前线的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以来，高举抗美救国的大旗，领导越南南方人民，同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进行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赢得了无数的辉煌胜利，写下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篇章。你们的斗争，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今天，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外交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已经陷入重重的矛盾和深刻的危机。美帝国主义推行的“尼克松主义”[1]和“越南化”计划正在遭到破

---

[1] “尼克松主义”，主要内容是：以伙伴关系为核心，分摊负担和责任；以实力为基础，建立“现实威慑力量”；以谈判为重要手段，在“五大力量”“三角关系”中推行“均势外交”。

产，而且必将彻底破产。越南人民同兄弟的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加强团结，并肩战斗，一定能够“驱逐美帝，推翻伪政权”，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

中国人民一贯把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只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愿望一天没有实现，中国人民就全力支援你们的斗争，直到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于北京

对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稿[1]的批语

（1971年12月）

照发。

---

[1] 中共中央1971年12月26日下发的这个指示指出，为了进一步搞好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工作，必须切实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正确处理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二、认真搞好粮食分配；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四、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五、切实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六、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

1971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

四言诗·题折扇[1]

（1971 年）

各求各志[2]，
各行各路。
离凡离圣，
离因离果。

---

[1] 1971年林彪集团准备叛逃前夕，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林彪一伙准备叛逃的异常情况。毛泽东圈阅材料后沉思良久，提笔在一把白色丝绸折扇上题了这首四言诗。

[2] 各求各志，《史记·伯夷传》中有：“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

七绝·戏改李攀龙[1]《怀明卿》

（1971年）

豫章西望彩云间[2]，
九派长江九叠山[3]。
高卧不须窥石镜[4]，
秋风怒在叛徒颜[5]。

---

[1] 李攀龙（1514—1570），山东历城（今属济南市）人。字于鳞，号沧溟。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承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的遗说，主张复古，与谢臻、梁有誉、宗臣、王世贞、徐中行、吴国伦，合称“后七子”，为“后七子”的领袖。著有《沧溟集》。

[2] 豫章，古地名，其地在淮南江北之界。汉移其名于江南，置郡，属扬州。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隋平陈，改为县，属洪州，辖境逐渐缩小，故治所在今南昌市。故用来指江西或南昌。彩云间，唐代李白《早发白帝城》诗：“朝辞白帝彩云间。”

[3] 九派，指江西九江市北的一段长江。这里江水有九个支流，故叫九派。九叠山，江西庐山名胜之一，又名九叠屏，这里指代庐山。九派长江九叠山，李攀龙的诗意思是说远望江西方向，遥想那里有长江九派、庐山九叠，表示怀念吴国伦。毛泽东这里借指江西庐山。

[4] 高卧，高枕而卧，喻指隐居不仕。石镜，光亮明净，可以照人的山石。

[5] 毛泽东这里是说，林彪只宜高卧睡大觉，不须窥照石镜，因为他在庐山会议上妄图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已经败露。在秋风萧瑟之中，那种恼羞成怒的脸色一定是很难看的，辛辣地讽刺了林彪的叛徒嘴脸。

七言诗·戏改杜甫《咏怀古迹》其三[1]

（1971年）

群山万壑赴荆门[2]，
生长林彪尚有村[3]。
一去紫台连朔漠[4]，
独留青冢向黄昏[5]。

---

[1] 杜甫（712—770），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巩县人。后世尊称为“诗圣”，其诗歌显示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被称为“诗史”。《咏怀古迹》其三是其名作之一。毛泽东把杜诗中的“明妃”改作“林彪”。

[2] 荆门，山名。在湖北宜都县西北。

[3] 林彪（1907—1971），湖北黄冈人。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

[4] 紫台，帝王所居。南朝梁江淹《恨赋》：“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后汉书·袁安传》：“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单于反其北庭，并领降众。”

[5] 青冢，即昭君墓。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9公里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远望墓表黛色冥蒙，因此历代相传为青冢。

七绝·读《红楼梦》

（1971 年）

杰作红楼传千古，
影映封建斥王侯。
自古忠臣多逆子，
唯有宝黛入神州。

1972

1972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陈毅悼词的批语[1]

（1972 年 1 月）

一

基本可用。删去两段。

二

前面已作了结论，后两段均可不要。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

[1] 陈毅，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69 年 4 月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2 年 1 月 6 日在北京逝世。1 月 8 日，周恩来将对陈毅的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本篇一就写在周恩来的送审报告上。毛泽东审阅时，考虑到悼词中已有“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结论，删去了其后的两段评价陈毅功过的文字，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1 月 10 日，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前往参加追悼会，周恩来代表中央致悼词。毛泽东在同陈毅亲属的谈话中，对陈毅的一生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还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为邓小平复出定了基调。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到八宝山参加陈毅追悼会，在和陈毅夫人张茜的谈话中，充分肯定陈毅光辉的一生，并表示要请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现场。

对吴冷西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月29日）

此件已阅。欢迎进步。退人民日报存。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一月廿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吴冷西1971年12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吴冷西，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1966年夏被错误打倒。写信时在人民日报五·七干校。

对李卓然、何长工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月、9月）

一

总理[2]阅处。

二

何长工的信。

总理阅处。

七二年九月十三日

---

[1] 本篇一写在李卓然1972年1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上。李卓然，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我现在虽已年逾七十，但脑子未坏，很想抓紧晚年期间”“做些力能胜任的工作”。1979年，李卓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本篇二写在何长工1972年9月给毛泽东的信上。何长工，原任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揭发了林彪的反党罪行，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组织生活。1975年何长工复出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

[2] 总理，指周恩来。

悼念斯诺[1]逝世的唁电

（1972年2月16日）

斯诺夫人：

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

---

[1] 埃德加·斯诺，美国进步作家、记者。1928年第一次到中国。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后写了《西行漫记》等书。新中国成立后，在1960年、1964年、1970年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在瑞士病逝。

会见尼克松时的谈话[1]

（1972年2月21日）

尼克松（以下简称尼）： 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2]方面。（众笑）

尼： 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手指基辛格博士[3]）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 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手指基辛格博士）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家），哲学博士。

尼： 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以下简称基）： 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

---

[1]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当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打破了中美两国长期冷战的对峙局面，成为20世纪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最深远的事件之一。其间，毛泽东曾与尼克松秘密会谈，以上是会谈记录。

[2] 这里的“哲学”实际上是“战略”的同义语。

[3] 基辛格，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出生在德国，后移民美国。

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影师们）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1]。你见到啦？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一九二四年开始。

尼：是的，我知道。

毛：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指基辛格）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2]，公告发表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

[1] 指蒋介石2月20日“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

[2] “头一次来”，是指基辛格1971年7月9日至11日秘密访华。当时周恩来同他商定了“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的公告，由双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于7月15日同时发表。

尼：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周恩来大笑）

基：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作掩护的。

尼：利用漂亮姑娘作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你们的姑娘常被人利用啊？

尼：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大笑）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

尼：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的问题是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尼：是的。

毛：那位首相希思也是右派。

尼：戴高乐将军[1]也是。

毛：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尼：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像我这样的右派可以做那些左派只能口头上说说的事情。（毛泽东点头）

基：总统先生，我觉得那些左派的人是亲苏的，他们不鼓励我们向人民共和国这边靠拢，而且批评你这样做。

毛：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我们跟你们往来，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2]

周：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全世界的侦察就只有美国的比较准确，其次就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在外蒙古。

尼：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在印度一边。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亲印度，另一个是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得对——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总统指着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

[1] 戴高乐将军，曾任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于1970年11月9日去世。

[2] 1971年9月13日夜，林彪一家乘坐飞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

尼：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那就好。

尼：如果可能，我希望跟总理，以及以后跟主席除了讨论眼前的问题：台湾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而外，……

毛：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他（指周总理）跟你谈的事。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赞成我这次访问的，苏联不赞成；日本是怀疑的，它已经表示了这种怀疑；印度不赞成。所以，我们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并决定我们的政策，看就全世界来说，我们应如何发展，而不是看眼前的问题。当然，朝鲜、越南、台湾这些问题也要讨论。

毛：对，赞成。

尼：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个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他感到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那么问题是，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是来自美国的侵略，还是来自苏联的侵略？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

毛：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

的状态很奇怪，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1]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2]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3]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从杜鲁门[4]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

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5]，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

[1] 打乒乓球，指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事件，又称“乒乓外交”。

[2] 约翰逊，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当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就任总统，并在1965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1969年。

[3] 叶海亚，即叶海亚·汗，原任巴基斯坦总统，他曾利用与中国和美国都保持的良好关系，为中美秘密传话，建立了著名的“叶海亚汗通道”，并成功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

[4] 杜鲁门，1945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任期内逝世，当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就任总统，并在1948年正式当选美国总统，任期到1953年。杜鲁门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7日杜鲁门命令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不久，美国在台湾设立军事基地。1954年12月，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5] 1953年至1961年，美国由共和党执政，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尼克松任副总统。

周：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的政策。

毛：之前他（指周恩来）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但是他们（朝着周恩来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恩来笑）

毛：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在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毛：就是嘛。

尼：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

[1] 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1950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1954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他一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坚持不承认中国，非法排斥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明目张胆地进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

毛：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1]。

周：任何国家都不威胁。

尼：我们也不威胁别人，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于中国也没有领土要求。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认为你们也懂得美国不想统治中国。同时，我相信，当然你们可能不会相信，美国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它们都不想统治世界。正因为我们这两个国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态度相同，所以我们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因此，我们虽然有分歧，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一个我们都可以在其中安全地发展自己、各走各的路的结构。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谈不上这一点。

毛：你们下午还有事情？现在几点了？

周：四点半开全体会，现在是三点三刻。

毛：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毛：（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

尼：从个人的意义上说，你和总理对我都是不了解的，因此你们不应该信任我。但是你们会发现，我不能做的就决不说，但我做的比说的要多。我就是想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主席和总理坦率地交换意见。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

[1] 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笑）就没有靶子了。

尼：主席的一生我们都是熟悉的。你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到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我的背景，不那么被人所知，我也是出身于贫穷家庭，现在达到了一个大国的顶峰。我感到，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问题是，我们的哲学是不同的，但我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益于中美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全世界。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毛：你的《六次危机》[1]写得不错。

尼：（对着基辛格）他（指毛泽东）读的书太多。

毛：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好哇，太好了。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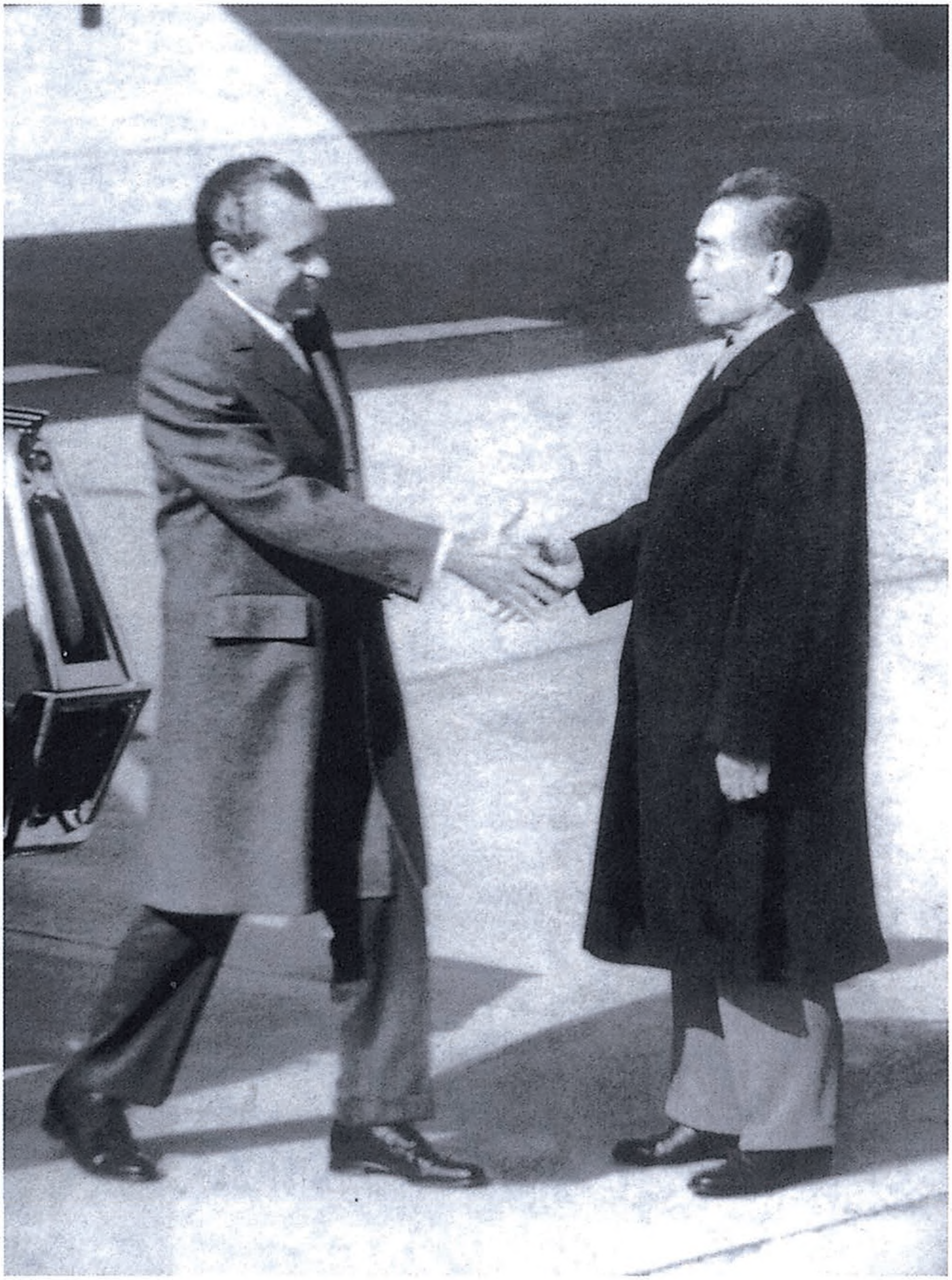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双方站起来）

尼：（握着毛泽东的手）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我就不送你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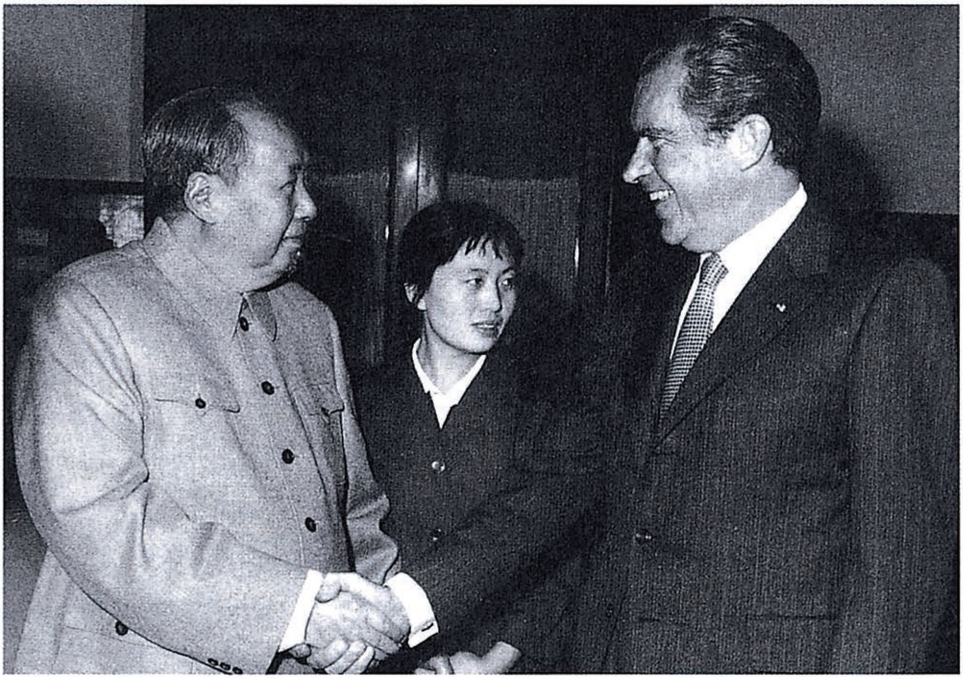
[1] 尼克松1962年写了《六次危机》一书，记叙他自己的生活经历，自道短长，自言甘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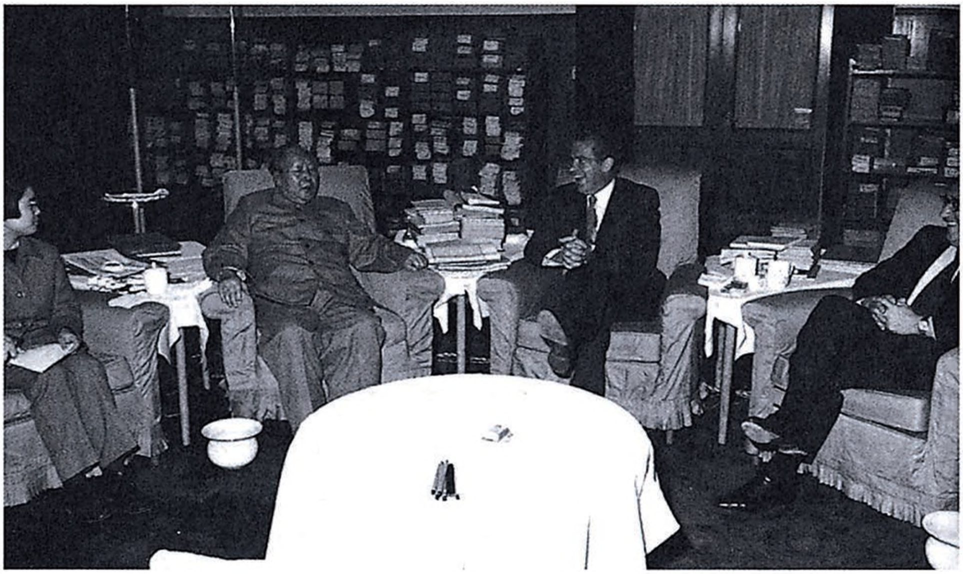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中国访问，周恩来在机场迎接。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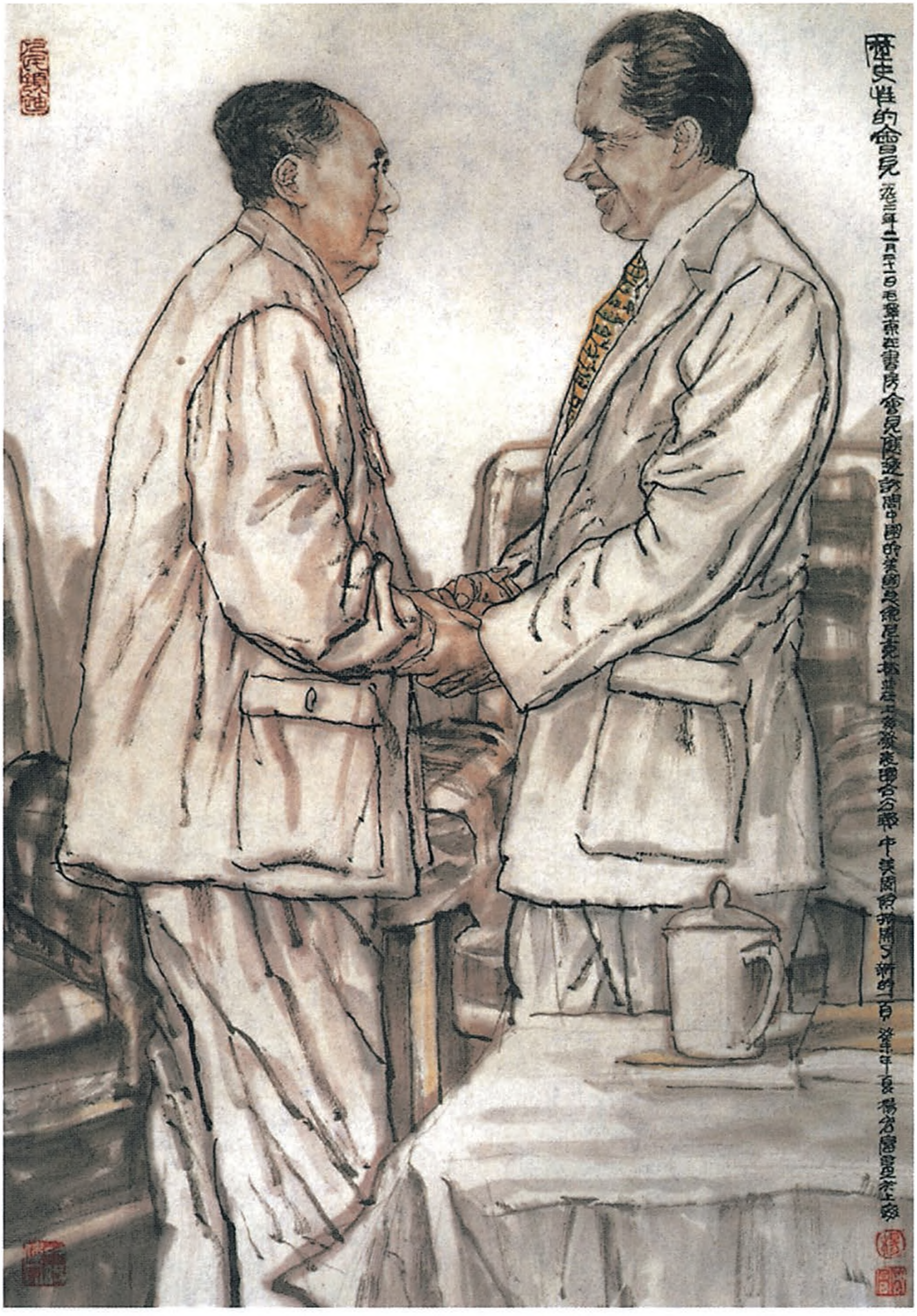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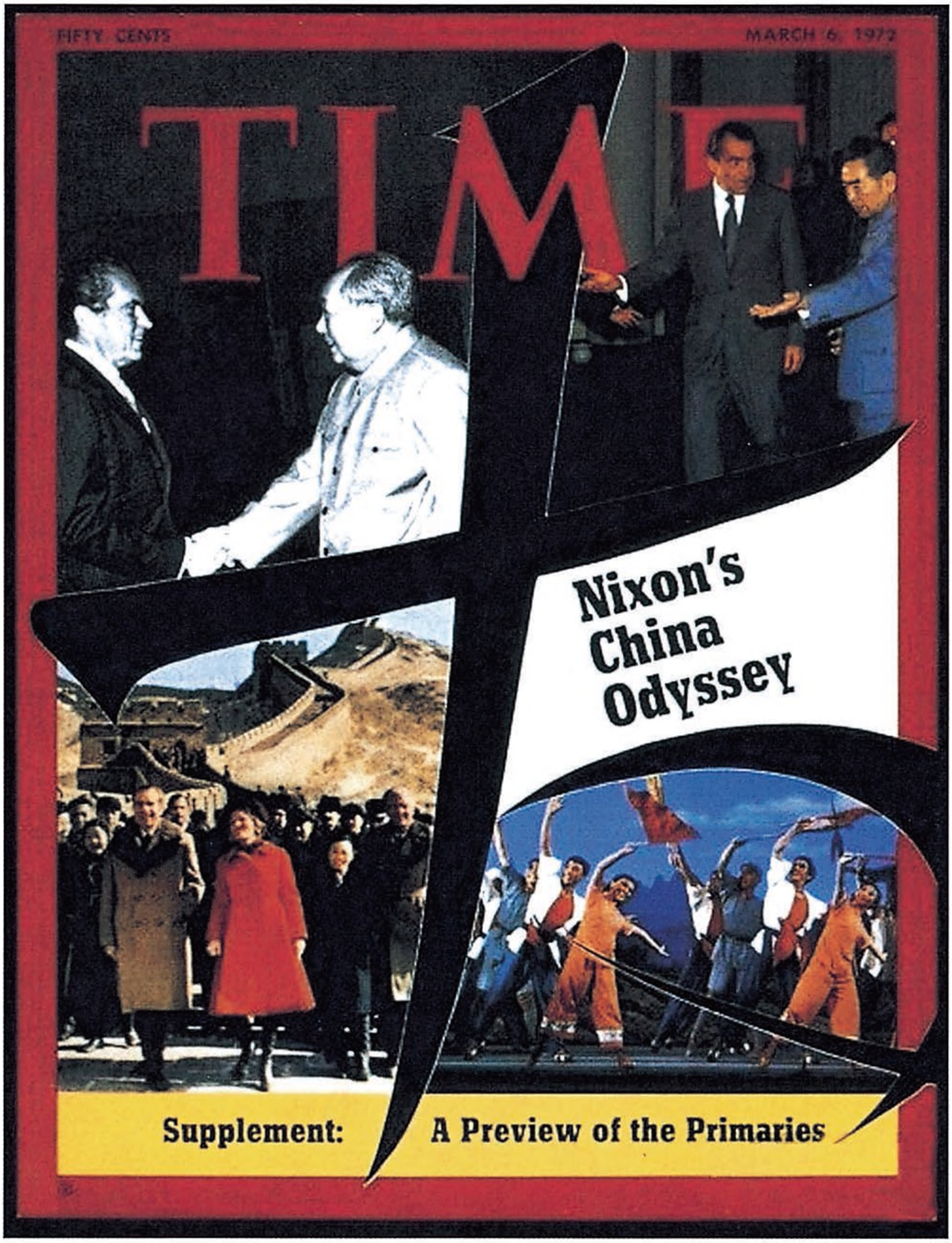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历史性的会见》（中国画）


FIFTY CENTS
MARCH 6, 1972
TIME
Nixon's China Odyssey
Supplement: A Preview of the Primaries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图为1976年3月6日《时代》杂志的封面。

四言诗·赠尼克松总统

（1972年）

老叟坐凳[1]
嫦娥奔月[2]
走马观花[3]

---

[1] 坐凳，即坐等。这句是隐喻中美关系的过去。多年来，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一直在谋求打破中美关系的僵局，但未得到美国方面的响应。这些领导人都年事已高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美国方面转变态度。

[2] 这句比喻美国方面在中美关系中的变化情况。尼克松曾把基辛格秘密访华称为“阿波罗行动”，尼克松在启程访华之前同国会领袖们告别时，引用了登月纪念碑上的铭文：“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嫦娥所以奔月，也是为了冲破禁锢。这句话是毛泽东风趣地称赞尼克松终于冲破了阻力。

[3] 这句概括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中美关系是一种既有分歧和矛盾，但又必须发展下去的关系。基辛格途经巴基斯坦秘密访华的安排，比起媒人安排的“走马观花”式的相亲喜剧更具戏剧性。从这个比喻中，我们可进一步体会到，只有正视现实，从国际关系的大局出发，求同存异，而不要干预别国内政，这种关系才能不断发展下去。

对苏振华来信[1]的批语

（1972年3月5日）

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三月五日

请汪[2]印发各同志。

---

[1] 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被解除职务。1971年12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1973年1月，苏振华复出任海军第一政委。同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通报稿的批语[1]

（1972年3月6日）

此件很好，国内似也适用，但应略作修改和补充。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1972年3月5日送审的外交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向驻外使领馆等的通报稿上。通报稿中写道，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来，对公报的反映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实际行动。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们必须有所准备。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同美驻外官方人员的接触，我不主动，也不回避，应掌握不冷不热、不亢不卑的精神，注意礼貌，落落大方。

对编发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国际反映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2年3月6日）

似可不必这样编发，近似张扬，并且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显出苏修和阿、越的不一致。如何请再酌。我们有内部刊物，可以弥补此缺点。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4个单位1972年3月3日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上。报告中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已成为当前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引起强烈反响，我们在新闻报道中拟适当反映这一形势。一、对反应要有选择地编发，既不要主动宣传是我们的胜利和尼克松的失败，也不能美化尼克松，更不能散布太平观念，好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二、着重摘发国际反应中如下的几项内容：1. 一般欢迎中美会谈和联合公报的言论。2. 关于尼克松访华是战后美国历届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破产的言论。3. 适当摘发指出中美之间存在原则分歧的言论。4. 敦促尼克松政府用实际行动履行联合公报的内容。5. 驳斥苏修对我造谣诬蔑的言论。三、编发时应注意首先编发美国人民和社会舆论的反应。稿件的面要广，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使我国人民能较全面了解左、中、右各方面的动态。

对杨成武家属来信[1]的批语

（1972年3月25日）

请汪[2]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3]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4]一面之词。

毛泽东

七二年三月廿五日

---

[1] 1972年3月18日，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给毛泽东等写信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陷害，请求让杨成武到阶级斗争的实际中去经受考验。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杨、余、傅事件”。

[4]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六十寿辰的电报

（1972年4月14日）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在您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您是朝鲜劳动党的缔造者和朝鲜人民久经考验的伟大领袖。您几十年来，在极其困难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应用于朝鲜革命的具体实践，取得了朝鲜革命的伟大胜利。在您的领导下，英雄的朝鲜人民高举反帝革命旗帜，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建立并保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您的领导下，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贯彻执行“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的方针，把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建设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挺立在反帝斗争的东方前哨，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中，以您为首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兄弟的朝鲜人民，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给了我们宝贵的支援，中国人民对此是永志不忘的。

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

凝成了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种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战胜共同敌人的可靠保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及其走狗，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

我们衷心祝愿您领导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在今后的革命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四日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四十周年的电报

（1972年4月24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在光荣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向您，并通过您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四十年前，由您亲自创建的朝鲜人民革命军，是代表着全体朝鲜人民民族希望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这支英雄的人民武装队伍，在您的直接领导下，高举反帝革命斗争旗帜，紧紧依靠广大朝鲜人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艰苦岁月里，英勇不屈、百折不挠，坚持抗日武装斗争，为朝鲜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

朝鲜解放以后，朝鲜人民和人民军继承和发扬朝鲜人民革命军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以千里马的气势阔步前进，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英勇斗争，不仅在朝鲜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而且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的宝贵支援。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种友谊是在艰苦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因而是牢不可破的。

祝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万古长青。祝朝鲜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年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于北京

对反映白坚情况摘报的批语[1]

（1972年5月31日）

送总理[2]阅处。

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毛泽东

七二年五月卅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5月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一一〇号上。摘报说，一机部原副部长白坚的儿子白克功给毛主席写信，说白坚系陕西靖边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隔离审查。白坚生前患有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硬化型心脏病，因得不到抢救在当年12月11日死于北京复兴医院。现在白坚已经死去4年了，但他的问题仍没有组织结论，家属在精神上、思想上负担很重，恳请中央早日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2] 总理，指周恩来。

对李克如来信的批语[1]

（1972年6月15日）

请中央组织部酌处。

毛泽东

七二年六月十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6月1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一三〇号上。摘报说，甘肃省农业大学原校长李克如来信称，他1926年入党，参加过秋收暴动。“文化大革命”中，因被人制造“叛徒”假案，受到冲击，政治生命中断。现在年近70岁，为党工作已到有限的晚年，迫切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并给他安排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李克如曾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对贺诚来信的批语[1]

（1972年6月28日）

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毛泽东

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

[1] 贺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1972年6月26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工作。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接到毛泽东批示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曾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于1973年1月17日上报中央军委，军委办公会议各同志圈阅后在1973年8月退回总政。1975年3月22日，贺诚的女儿贺礼荣再次写信，要求给其父分配工作。毛泽东阅后又写了两个批语。不久，贺诚出任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见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西丽玛沃·班达克拉夫人，并观看她赠送的礼物。

对廖汉生家属来信的批语[1]

（1972年7月7日）

送总理阅处。

我看廖汉生和杨勇[2]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3]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4]一阅。

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七日

---

[1] 原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的子女1972年7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廖汉生自1967年1月8日被隔离审查，至今已经5年多了。“我们听到主席曾几次提到要让父亲出来工作，我们非常高兴，都盼望父亲能尽早地出来为党和人民重新工作。但是，至今不见有任何动静。我们请求让父亲回到北京，回到家里，在外面等待组织结论，以便让他了解形势，熟悉情况，检查身体，治疗休养，好更早地回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岗位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7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四六五号上摘登了这封来信，毛泽东的批语，写在这一期《来信摘要》上。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2] 杨勇，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1972年5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3]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

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4]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德生，即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1]

（1972年7月10日）

你们欧洲现在比较乱吧？我讲乱，就是讲有六百亿美元在你们欧洲横冲直撞，又不兑现。哎哟，我看这个事也难了。美国它是一大霸哟，不过隔个大西洋。几个大国，总是闹别扭的。我们不希望你们欧洲那么乱。你们还要注意，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口里讲要打中国，实际上想要吞并欧洲，危险哟。

---

[1] 这是毛泽东和法国外交部部长莫里斯·舒曼谈话的一部分。

对陈云来信[1]的批语

（1972年7月22日）

一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泽东
七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二

请总理[2]办。

---

[1] 陈云，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被解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之外的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反映他在江西南昌下放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信中写道：“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可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动的时间。”本篇一写在陈云的这封信上；本篇二写在这封信的信封上。

[2] 总理，指周恩来。

对外交部关于向美国友人等谈林彪[1]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2]

（1972年7月）

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应发一个通知给国内各级党委和涉外人员及驻外使领馆。

---

[1]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 这个批语写在外交部1972年7月1日给周恩来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有一些来我国访问的美国友人和美籍华裔友人，在同我方接触中，都曾打听林彪的问题。我方接待人员仍都予以回避，极易产生消极效果。建议可相机吹点风，即承认林有问题，但不谈具体情节。

为王季范题挽词[1]

（1972年7月）

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

[1] 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也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老师。1972年7月11日下午，王季范病逝于首都北京。7月13日下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学生、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致悼词。毛泽东敬献了一个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在林枫家属来信摘要上的批语[1]

（1972年8月11日）

连原信一起，请汪[2]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8月10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五四五号上。来信摘要写道，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林枫的子女林梅梅等8月5日写信给毛主席，说他们8月4日去秦城见了林枫一面，林现患心脏病、糖尿病，神情呆滞，身体枯瘦，请求让他出来治疗休养。1973年7月7日，林枫给毛泽东写信说："在您和中央的亲切关怀下，我到阜外医院治病已经十个多月了。"信中请求早日恢复他的党组织生活，还揭发了林彪在东北的几个问题。7月10日，毛泽东阅信后批示："纪、汪酌处。"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邓小平来信[1]的批语

（1972年8月14日）

请总理[2]阅后，交汪主任[3]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4]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

---

[1] 邓小平，原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当时已被“疏散”到江西。1972年8月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批判林彪，同时提出愿做一点工作。1973年3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2] 总理，指周恩来。

[3]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4] 邓，指邓小平，1932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1933年3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1931年6月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3年3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1933年3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1933年3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1933年3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

天[1]。（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2]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

[1] 张闻天，1931年9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1月随同临时中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开始阶段，他直接参与了领导。后来他对这个问题多次作过检讨，并从中吸取了教训。

[2] 刘伯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邓小平等一起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和冀南、太岳、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邓小平一起率领所属部队挺进大别山，参与指挥淮海、渡江战役和解放大西南。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

（1972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扬·格奥尔基·毛雷尔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罗马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二十八年前的今天，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举行了英勇的“八·二三”武装起义，推翻了安东尼斯库的反动统治，从此罗马尼亚人民成了自己国家的主人。解放以来，勤劳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坚持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战胜重重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当前，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取提前完成新的五年计划而努力奋斗，我们衷心地祝愿你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为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对罗马尼亚人民的这种正义立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表示钦佩和支持。

近几年来，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革命友谊不断发展，各方面的互助合作关系日益加强。我们相信，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将一如既往，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祝中罗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电报

（1972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七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越南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七年来，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抗击了帝国主义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捍卫了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成果，为越南民族的解放事业写下了壮丽的篇章。越南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英雄业绩，对中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为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当前，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正在胜利发展，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大好。越南南方军民在各个战场上发动的猛烈进攻，沉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战争“越南化”计划，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帝

国主义企图加强海空袭击和布雷封锁来迫使越南人民停止战斗，这完全是妄想。美帝国主义的炸弹，过去没有、今后也决不能动摇越南人民的钢铁意志。英雄的越南人民遵循胡志明主席“宁可牺牲一切，决不愿亡国，决不愿做奴隶”的教导，团结一心，不怕困难，正以坚定的战斗步伐胜利前进。我们深信，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越南人民，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团结战斗，一定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

中越两国人民是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和兄弟。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中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越南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不论还会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中国人民都和你们站在一起，全力支援你们的正义斗争。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在赠周世钊[1]《两般秋雨庵随笔》[2]一书封面上的题字

（1972年9月4日）

两般秋雨庵随笔
惇元兄阅存。

毛泽东
七二年九月四日

---

[1] 周世钊，字惇元，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曾任湖南省副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2] 《两般秋雨庵随笔》，清代梁晋竹著，全书共八册。

给周世钊的信

（1972年9月4日）

惇元兄：

旅夜无聊，奉此书，供你消遣之用。此书写得不太好，但读来也还有味。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九月四日

对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1]的通知稿的批语

（1972年9月）

同意。

---

[1] 中共中央1972年9月8日转发的这个宣传提纲指出，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即将来华访问，与我国领导人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田中首相访华，一是当前国际大好形势的反映，二是中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标志，三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结果，四是日美、日苏矛盾进一步发展的表现。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的电报

（1972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年的历史，是充满战斗和胜利的历史。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举反帝革命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朝鲜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和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对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一贯坚持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确路

线，为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朝鲜人民在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取得的进展，符合朝鲜人民的民族愿望，受到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热烈祝贺朝鲜人民的巨大成就，并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兄弟的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胜利。

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这种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我们衷心祝愿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今后不断地得到加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解决中日复交问题，日方还是靠自民党政府[1]

（1972年9月27日）

（毛泽东与田中握手）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用日语）晚上好！

田中（以下简称田）：晚上好，毛泽东主席。

（就座后）

毛：你们吵完了吗？吵吵架对你们有好处。

田：吵是吵了一些，但是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不，不，我们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两位外长很努力。

田：是的，两位外长很努力。

毛：不打不成交嘛！

田：是，是。

毛：（对大平正芳）你把他（指姬鹏飞[2]）打败了吧？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谈话的一部分。田中角荣这次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2] 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部长。

大平正芳（日本外相）：没有，我们是平等的。

田：我们进行了非常圆满的会谈。

毛：那就好了，你们那个“麻烦/迷惑”[1]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田：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修改。

毛：一些女同志不满意啊，特别是这个“美国人”[2]，她是代表尼克松说话的。年轻人坚持说“添了麻烦”这样的话不够分量。因为在中国，只有像出现不留意把水溅到妇女的裙子上，表示道歉时才用这个词。

田：“迷惑”这个词汇虽然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可是日语“迷惑”是在百感交集地道歉时，也可以使用的。

毛：明白了。“迷惑/麻烦”这个词你们用得好。中日有二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田：所以，我们一直听说日中交流的历史有二千年。

毛：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捣什么鬼啊。

田：美国声明支持我们到中国。

---

[1] “迷惑/麻烦”的风波，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首相访问北京，当天晚上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上，田中发表祝酒词，有这样一句：“わが国が中国国民に多大な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たことについて，私は改めて深い反省の念を表明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方提供的中文稿将“迷惑”直译为“麻烦”，田中的这句话翻成如下中文：“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最后《中日共同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2] 唐闻生，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出生，是毛泽东晚年的重要翻译。

毛：基辛格也通知我们了，不设障碍。

田：是的，我同大平外务大臣一同去夏威夷见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因此，美国支持日中两国改善关系。

毛：美国好一点，但也有一点不那么舒服，说是他们今年二月来了没建交[1]，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

田：谢谢。

…………

毛：（指着在座的廖承志[2]）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

---

[1]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会见了他。他同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会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双方并未建交，直到1979年1月1日中美才正式建交。

[2] 廖承志，廖承志于190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父亲廖仲恺是国民党革命元勋，与廖承志母亲何香凝同为国民党内重要左派人物，1927年留学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府学习，新中国成立前多数时间在国统区工作，曾7次被逮捕，1952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主任。1958年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20世纪50年代亦曾两度出访日本，以其与日本的独特关系，建立民间中日交流渠道。“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审查其海外关系和被捕经历，1972年复出后，任外交顾问协助周恩来处理外交事务。

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要是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毛：你在日本竞选时，角逐很激烈吧？

田：二十五年内搞了十一次选举，每次选举都要搞街头演说。不和选民握手，是很难取胜的。

毛：到街头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啊！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我半个世纪前也曾在长沙经常这样做，可要当心啊！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

田：很费劲，一出差错，就得解散，进行重新大选。

毛：日本不容易呀。

田：我是否可以抽烟？

毛：（指着自己的雪茄）你抽不抽我的烟？

田：这个就行了，我本人已经戒烟了，但由于同周恩来总理谈判的时间长了，又抽上了。（用火柴给毛主席点烟）

毛：Thank you.（谢谢。）声明[1]什么时候发表啊？

周：可能明天，今天晚上还要共同研究定稿。要搞中日两种文本，还有英文本。

毛：你们速度很快啊。

田：是的，只要时机一成熟，就可以得到解决。只要双方不玩弄外交手腕，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毛：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他问是否彼此都有需要，我说是的。我说，我这个人现在勾结右派，

---

[1] 指后来于1972年9月29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名誉不好。你们国家有两个党，据说民主党比较开明，共和党比较右。我说民主党不怎么样，我不赏识，不感兴趣。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

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1]

田：按照日本宪法的规定，内阁有权处理外交事务，而且，内阁的成员要共同对日本国民负责。所以这次我们三人来中国，谈定联合声明后要报告内阁，取得内阁的承认。

毛：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

田：看来，毛主席身体很健康，今天能见到毛主席很荣幸。

毛：不行了，我这个人要见上帝了。

周：（指靠墙的书架）他每天读很多文件，你看有这么多书。

毛：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了书，你看（指周围书架及桌上的书）这是《稼轩》，那是《楚辞集注》，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楚辞集注》）送给你。

（田中首相、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都站起

---

[1] 1972年7月6日，田中角荣刚组阁完政府，便在东京永田町总理官邸二层办公室声称：“我要坚决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对手必须是可以依赖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是几十次死里逃生的创业者，从这一点看，他们是信得过的，也可以商谈的。因此，非在毛泽东、周恩来健在的时候一鼓作气实现不可。”田中角荣这次访华期间，中日双方就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了会谈，于9月29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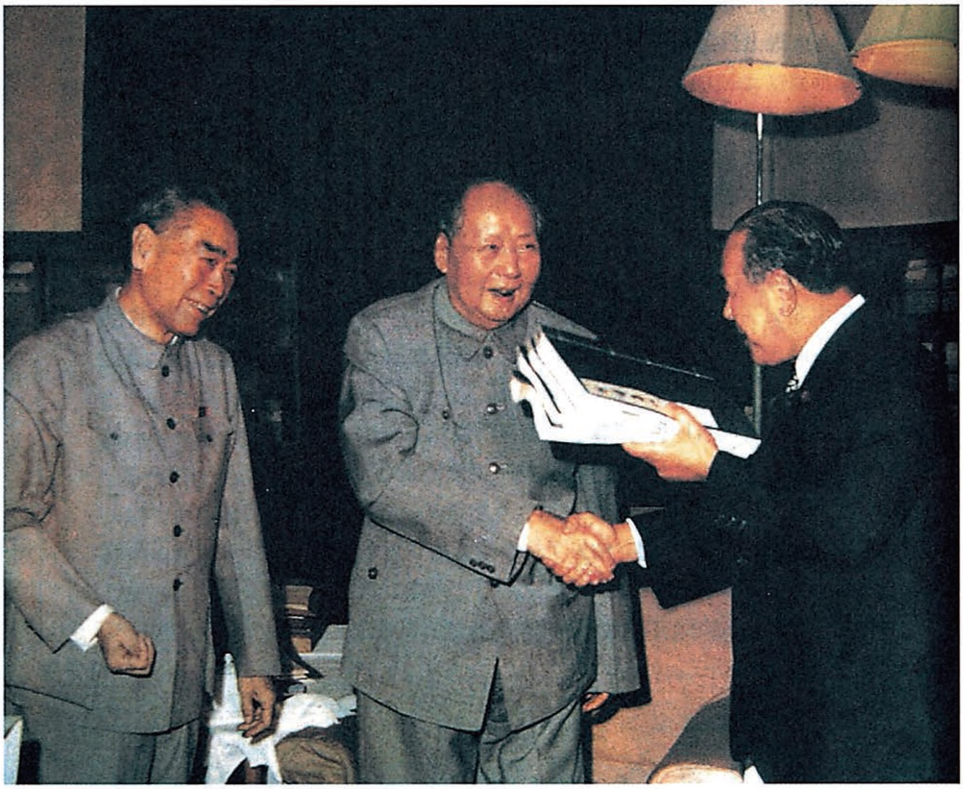
来，看毛泽东的各种书）

田：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祝你健康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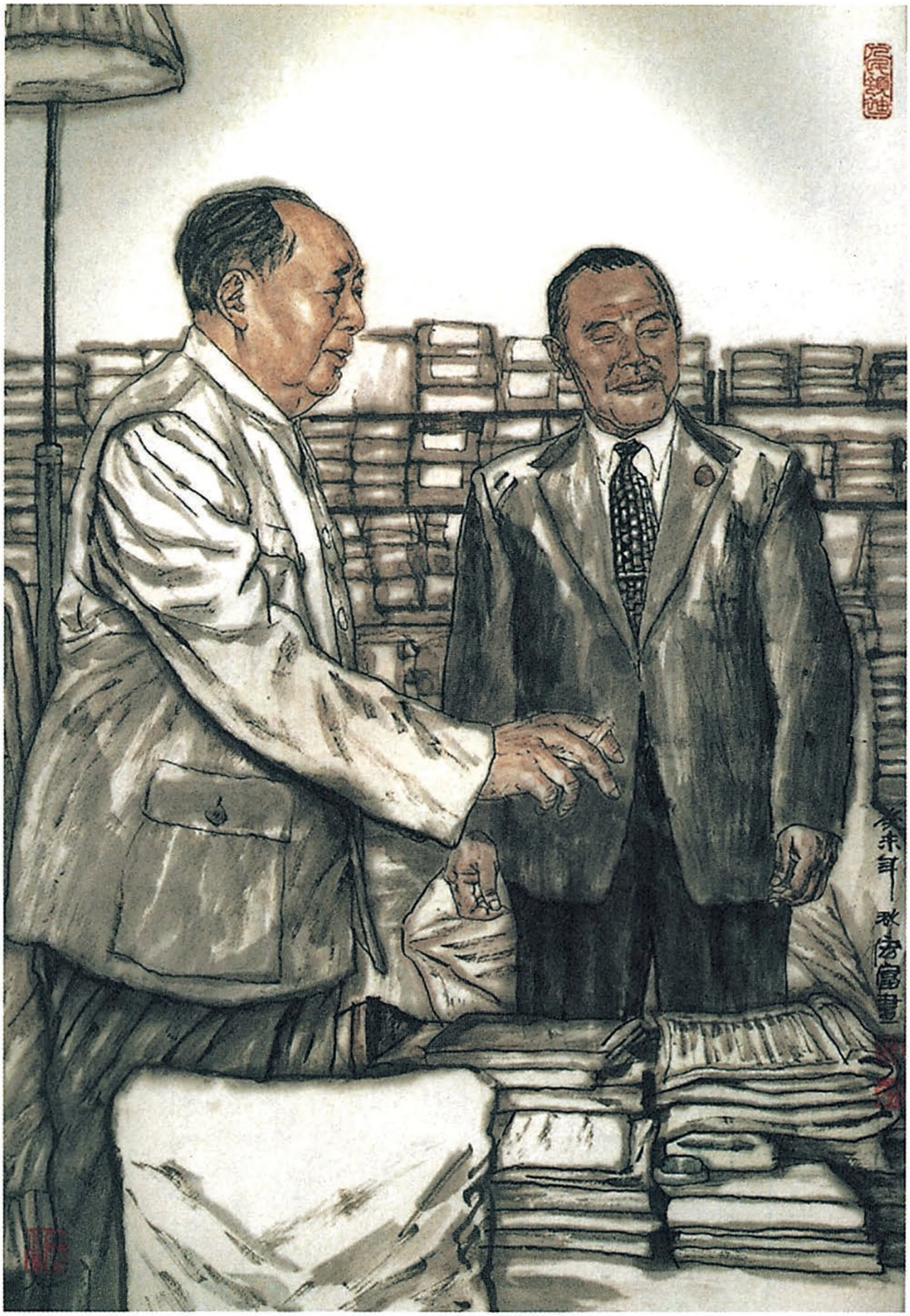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右）。

1972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972年9月27日，毛泽东向来华访问的田中角荣赠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线装宋版《楚辞集注》。



《会见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中国画）

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1]

（1972年）

一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

二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1972年7月至1973年2月举行的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提出的意见。1972年9月21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海军负责人谈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1973年2月24日转发的《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些话。中央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同意。”

对国防工业院校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的批语[1]

（1972年10月15日）

这个问题[2]很大。请汪主任[3]印发中央和军委各同志研究酌处。

毛泽东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

---

[1] 这是毛泽东对北京工业学院一位教员1972年9月27日送交的两份材料的批语。

[2] 北京工业学院一位教员送交的《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和《当前科技人员中存在的一个问题》两份材料认为：我国的10余所国防工业高等院校，原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1970年初划归各国防工业部门分别领导。这样搞，破坏了原来基础较好的学校，阻碍了国防系统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专业设置混乱繁琐，十分不合理。建议：一是恢复原来国防科委统一管理院校的体制，同时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使国防工业院校面向全国。二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鼓励。三是具体工作不能等。如科研、生产、教学系统的领导管理制度及各单位、各部门的业务范围和分工，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科研单位的业务方向等，都要尽快解决好。

[3] 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反映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情况来信摘要上的批语[1]

（1972年10月至12月）

一

纪、汪酌处。

毛泽东

72，10，16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许涤新的儿子许嘉陵1972年10月12日的来信摘要上。摘要中说，1967年12月，许涤新被关在部内实行“群众专政”，不准回家，失去自由，请求批准其回家治病。本篇二写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副主任范长江的妻子沈谱要求为范做出政治结论的来信摘要上。范长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诬陷和迫害，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本篇三写在中共福建省委原书记处书记、原省长江一真1972年11月1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上。信中说，1969年您在一次讲话中提到我还年轻，还可以工作，今年8月又解除对我的监护，使我的病情逐日好转。信中还控诉林彪、陈伯达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他的迫害，请求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尽快给他做出政治结论，让他回到党组织中来。本篇四写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对外贸易部监察组原组长李一夫的妻子张明辉1972年11月26日的来信摘要上。张明辉在信中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使她和孩子们探望了李一夫，并望能批准李住院就医。

二

纪、汪酌处。

毛泽东
1972，10，16

三

纪、汪酌办。

七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四

纪、汪处理。

1972，12，2

对华罗庚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1月4日）

此信及附件照片一本，退还给华罗庚同志保存，比放在我处为好。感谢华同志的好意。

毛泽东

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

[1]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华罗庚1972年10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交通部大连车辆工厂赠我一件宝贵礼物，却之，恐拂工人阶级迎归之意；受之，又太欠自知之明。饮水思源，别旧我，登新途，端赖您的指引教导，因此转献给您，表心意，代汇报。”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在反映柴沫情况的两封来信摘报上的批语[1]

（1972年11月4日、12月5日）

一

纪、汪酌处。

毛泽东

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二七〇号上。摘报说，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8人及该院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写信给毛主席。信中说，1966年5月，陈伯达曾3次来院讲话，说柴沫不听他的话，不走他的门子。陈勾结关锋、戚本禹等，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柴沫打倒。从此大会批斗，小会追逼，白天监督劳动，黑夜轮番审讯，使他精神、肉体上受到很大折磨，被迫自杀。后经对柴沫的历史和全部工作反复调查，证明他是党的一个好干部。现在陈伯达已揪出两年多，该院学习班也办了1年7个月，可是对陈迫害柴沫的罪行还没有得到清算，对柴沫也未做出正确结论。为此，恳请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做出正确结论。本篇二写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2月2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八五八号上。摘要说，王若林11月30日来信，对主席的批示无比感激。军代表已向她传达了关于柴沫问题的结论，肯定他是受陈伯达等迫害的，同时又指出柴系自杀，不够党员条件，应党内除名。王若林认为，柴沫是在陈伯达等的逼迫下自杀的，并非畏罪于党，故不应党内除名。

二

纪、汪处理。

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972，12，5

在周培源关于六六至七〇届大专毕业生转正定级问题来信[1]上的批语

（1972年11月12日）

此事关系很大。印发政治局各同志，国务院文教组及北京市委各同志研究。请中央考虑作出决定。

毛泽东

72年11月12日

---

[1] 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周培源1972年11月7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教育革命中，有一个问题急待解决，就是如何处置66届至70届的大专毕业生。66届已经毕业6年之久，至今仍未转正定级，常有人来信问及到底还算不算大学生和国家干部，是否准备给“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大学生降一级，将来新的工农兵大学生是否也是如此。现在一些大型国营企业工人的工资，已比同龄大学生高了，致使向此等单位招生，已有人不想上学。目前这些大学生全国有80万左右，来自各阶层、各地区，处理好他们的问题关系重大。为此，特向主席请示如下：一、鉴于我国科学文化急需加速发展，大学生还要继续培养，而且要培养质量更高的，他们的资格尤其是经济地位不能过低。二、老五届毕业生的待遇不能比65年以前的毕业生降一级。大学生待遇改革应从新招的工农兵大学生算起。三、根据老五届毕业生在校年限的多少划线，66、67届在校4年以上，按本科毕业生待遇，67至70届在校3年以下，按大专毕业生待遇。四、工资转正定级工作宜速完成，不要拖到参加工作七八年以后。

对中南海门诊部关于周恩来心脏病情况报告的批语[1]

（1972年11月12日）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毛泽东

1972，11，12

---

[1] 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1972年11月11日给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写报告说，昨晚再次组织了有关的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动脉硬化的情况，特别是主动脉硬化引起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的情况有所加重，导致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及心脏功能均较前为差，要及时严重注意。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考虑，并给以指示。毛泽东看到报告后写了这个批语。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周年和解放二十八周年的电报

（1972年11月27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阿尔巴尼亚独立六十周年和解放二十八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经过长期英勇的斗争，取得了独立和解放，并且跨进了伟大的社会主义时代。

二十八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红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决反对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你们的革命精神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伟大的、牢不可破的。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反对帝修反的斗争中，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祝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北京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

（1972年12月10日）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

[1] 中共中央1972年12月10日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各级领导同志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内外大好形势和我们所坚守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立场，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更加具体化了。"中央批语稿曾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照办。"197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新年献词》中，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对反映国防科研单位一些问题来信的批语[1]

（1972年12月11日）

连原信都送总理，交国务院有关组织研究。

毛泽东

七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2年12月编印的《要信摘报》第三〇七号上。这期摘报综合反映了五机部、海军第七研究院第七二四所和空军六十三团等单位一些干部、技术人员给毛泽东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来信。信中提出国防科研单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体制、任务多变，影响了科研项目的完成。二、有的单位几年来基本处于搬迁和基建状态，没有搞出一项新产品。搬来搬去，浪费严重。三、基本建设贪大求洋，摊子铺得很大，有些项目至今未建成。四、科技队伍比较混乱。有的地方不少科技人员至今仍处在人人自危状态，情绪消沉，不肯搞设计。有的来信建议，把武器装备研究的院、所统一起来，凡应留军队的院、所都列入军队编制。对国防科研单位，有的建议对口归军兵种领导，有的要求归国防科委领导。国防科研要搞好工人、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三结合和科研、生产、使用三结合，既抓当前急需的武器装备，又搞探索性课题、理论研究和技术储备等。撤销各军区的国防工办和航空工业办公室。国防工业在确保完成军工产品任务的原则下，尽可能生产一定品种和数量的民用产品。

毛泽东等祝贺金日成当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电报[1]

（1972年12月29日）

平壤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

欣闻您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热烈的祝贺。

几十年来，在您的英明领导下，英雄的朝鲜人民走过了光辉的战斗历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朝鲜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在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更加繁荣昌盛。朝鲜人民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以您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您当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再一次显示了朝鲜人民对您的无限热爱，显示了朝鲜人民坚如磐石般的团结。我们衷心祝愿您今后在领导朝鲜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联名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电报。1972年12月，朝鲜召开第五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新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金日成当选为国家主席。

祝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共同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不断加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1972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

会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外长阮氏萍谈话的报道

（1972年12月29日）

毛主席告诉阮氏萍外长说：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你们越南南方和北方，还有老挝、柬埔寨和朝鲜都是一家人。我们互相支持。

1972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了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

对刘建章家属来信[1]的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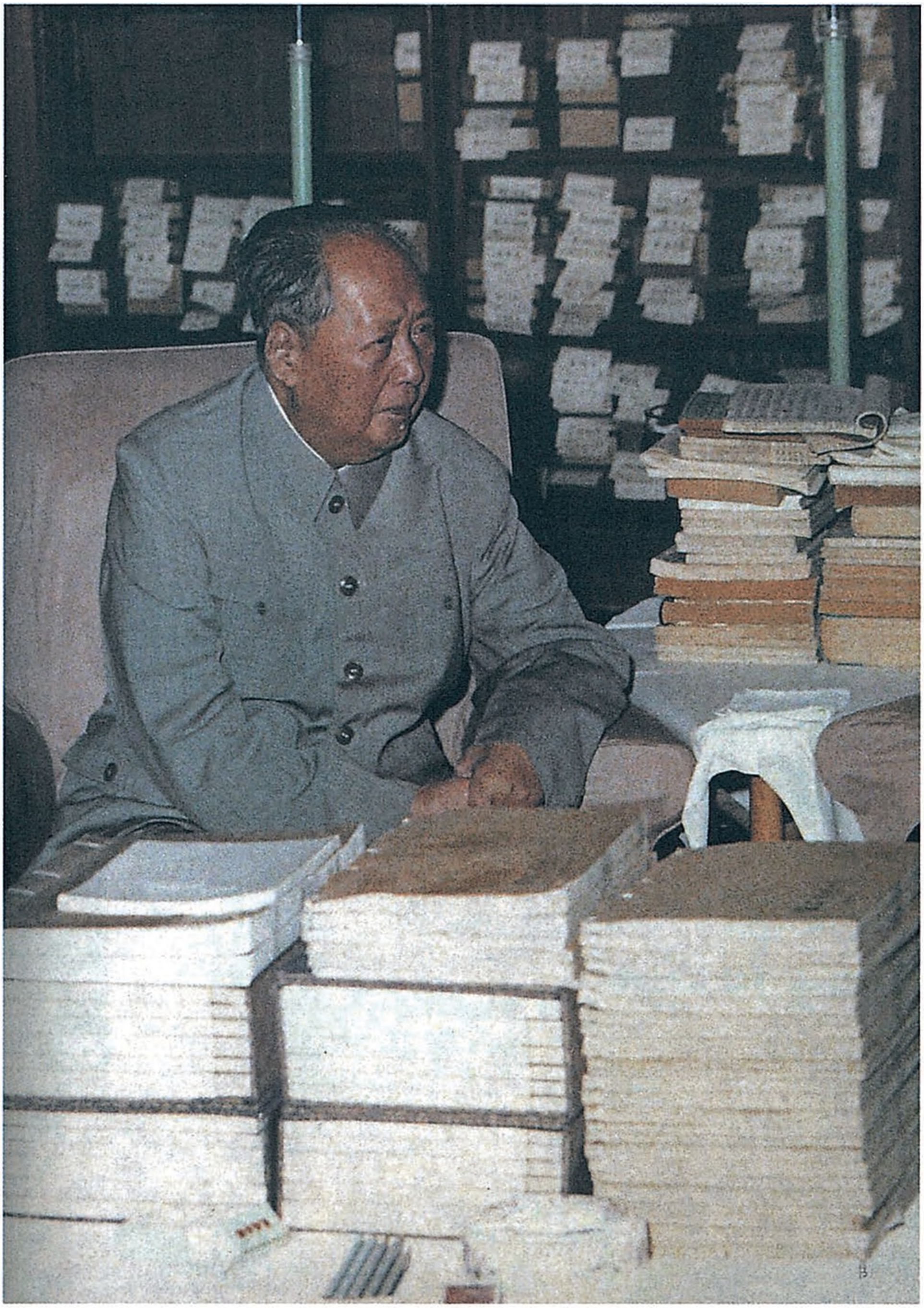
（1972年12月）

请总理办[2]。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

[1] 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1972年10月20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刘建章1926年入党，今年62岁，不知何故于1968年2月被拘留审查，至今已近5年。1972年6月8日，中央专案组通知我们家属到狱中探视，发现他体质很坏，面黄肌瘦，连说话有时也咬字不清。监狱生活条件差，每天饮水只有3杯的定量，每日“放风”也只有30分钟的时间，有关政治上的大事更是不得而知。信中请求改变目前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2]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于1972年12月18日作出3点批示：一、将刘建章保外送医院就医，并通知其家属前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提出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在年内再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



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

在王稼祥来信上的批语[1]

（1972年12月）

可试行。

---

[1] 王稼祥，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2年12月10日，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我想做一点点工作。我虽长期有病，听力又很差，但我脑力每天还能使用几个小时，阅读能力还有一些。解放后，我搞了一个时期的外事工作，而别的工作部门，我是一点都不熟悉。因此我特函请总理在万忙中考虑我的上述情况，能否分配给我一点外事调查研究的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将这封信报送毛泽东时写道：“我意，稼祥同志可以做外事调研工作，如主席同意，请批示，以便向中央报告。”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周恩来转报的来信上。1973年8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赠刘兴元[1]联[2]

（1972年）

一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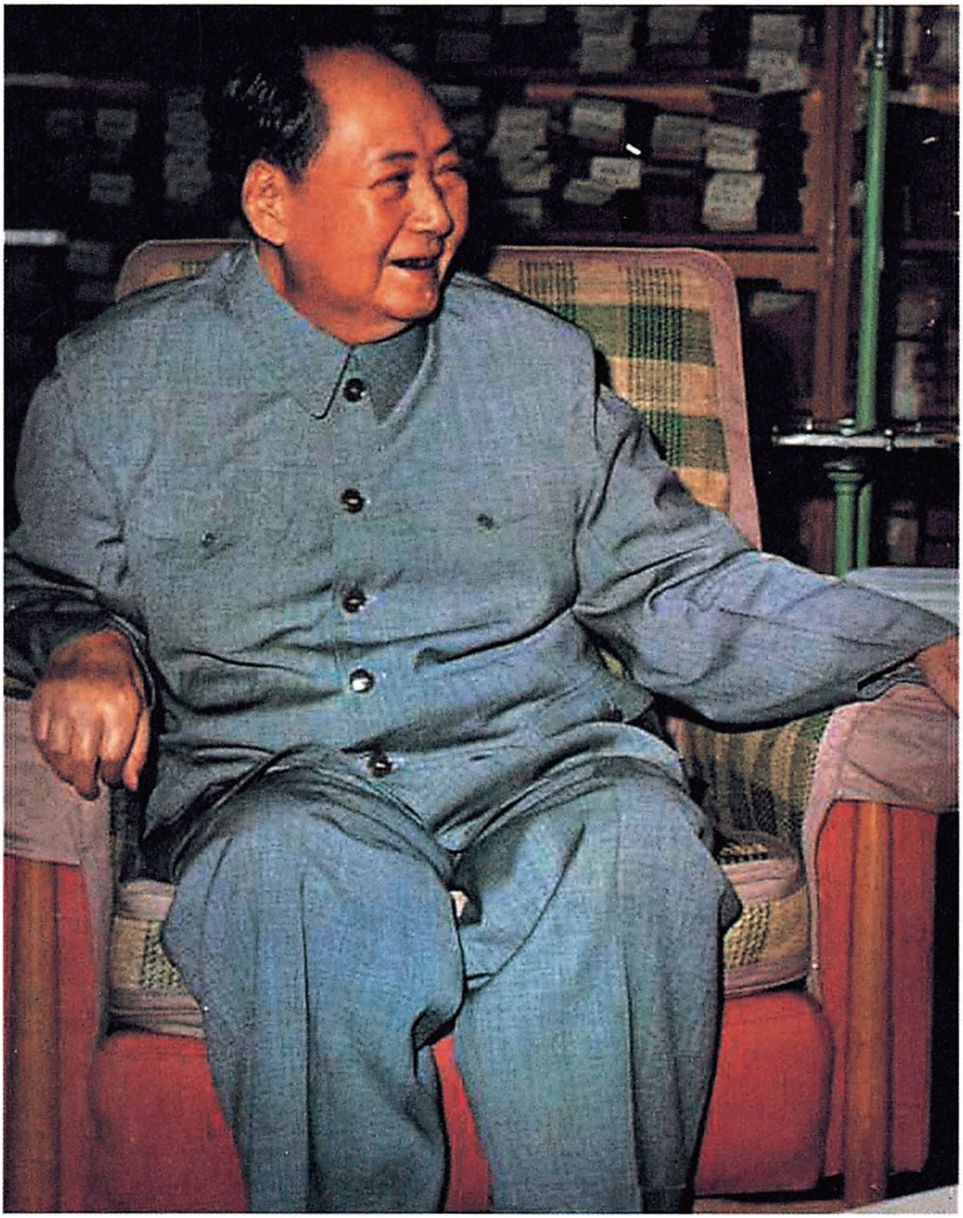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

[1] 刘兴元（1908—1990），山东莒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九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0年在北京逝世。

[2] 1972年，广州军区司令员刘兴元奉命调任成都军区，收拾“文革”残局。赴四川前，他先到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对他说：“你到四川去呀！成都有座武侯祠。你记住，武侯祠的第二道门有一副对联，你可以去看看，好好体会一下，我就没有多的话要说了。”毛泽东又说：“你到四川，先到成都武侯祠看一副对联。你再到新都县宝光寺看另一副对联。”四川成都武侯祠的一副对联，即本篇一，新都县宝光寺的对联，即本篇二。

1973



1973年，毛泽东在北京。

对谭震林来信[1]的批语

（1973 年 1 月 2 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第二信所提问题，请纪、汪[2]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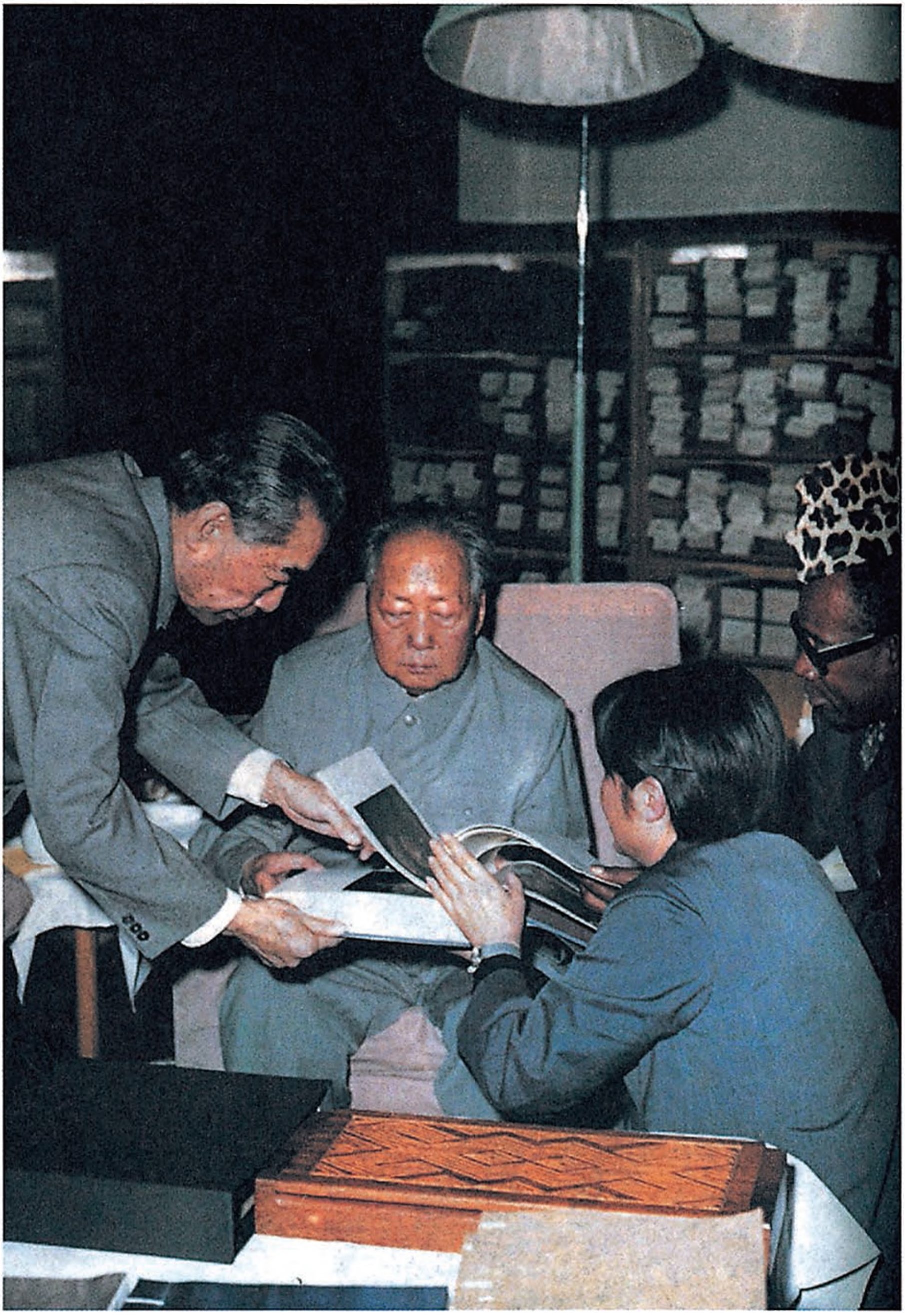
七三年一月二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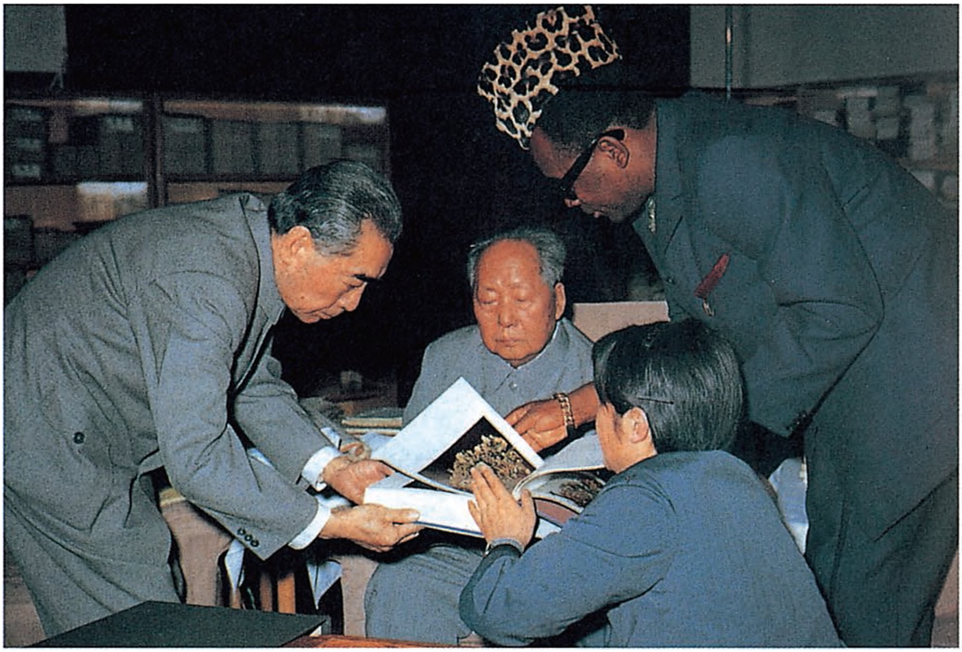
[1] 谭震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并下放到广西桂林。1972 年 12 月 26 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其中第二封信讲到他 7 月 24 日不幸把右腿跌断了，希望回京检查一次。同时提出他的妻子葛慧敏需要回京治疗，身边的两个小孩也要带回北京安置上学或就业。1973 年 8 月，谭震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2] 纪，指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3年1月13日，毛泽东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



1973年1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并和他一起观看画册。



1973年1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并一起观看画册。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1]正式签订的电报

（1973年1月29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值此《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在巴黎正式签订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

---

[1] 指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主要内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尊重1954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所承认的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美国承担义务，在协定签字后60天内从越南南方撤出全部美国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和军事人员，不继续其对越南南方的军事卷入，不干涉越南南方内政，保证尊重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越南南方人民将通过普选决定越南南方的政治前途；越南的统一将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

并通过你们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巴黎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越南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在长期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你们的光辉榜样，证明了小国能够战胜大国，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有力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你们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将作为当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史册。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中国人民一向把你们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斗争，把支援你们的正义事业当作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过去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仍将同兄弟的越南人民站在一起，同兄弟的印

度支那三国人民站在一起，给予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坚决的支援。

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北方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北方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旗帜下，同其他两种政治力量，迅速成立各级民族和解与和睦国家委员会，通过协商进行普选，决定南方的政治前途，在独立、民主和民族团结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1973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

对反映李一氓、舒同、林铁情况来信的批语[1]

（1973年1月至6月）

一

纪、汪酌处。

毛泽东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李一氓的妻子、女儿1973年1月4日的来信摘要上。信中说，李一氓年已七十，患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等，恳请主席批准其出狱就医。本篇二写在中共陕西省委原书记处书记舒同1973年3月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要求对他的问题早日做出正式结论，恢复组织生活，并能参加一定的工作。1977年，舒同复出后任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本篇三写在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林铁1973年6月11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上。信中说，我68岁，身体还好，希望党分配我力所能及的工作，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继续工作。1978年，林铁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

二

纪、汪酌处。

73，4，2

三

总理[1]酌处。

---

[1] 总理，指周恩来。

接见基辛格时的谈话[1]

（1973年2月、11月）

一

基辛格（以下简称基）： 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转头朝洛德说话）你真年轻。

洛德（以下简称洛）： 我渐渐老了。

毛： 在座的要属我最老了。

周： 我是第二老的。

毛： 当年英军有人反对你们国家独立。蒙哥马利[2]元帅则是反对你们政策的人士之一。

基： 是的。

毛： 他也反对杜勒斯[3]的政策。不过，他大概不会再反对你们

---

[1]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接见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总理、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海容、翻译唐闻生、翻译沈若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洛德。这是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的一部分。

[2] 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盟军指挥官之一。后曾任英军总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军最高副总司令。

[3] 杜勒斯，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至1959年任美国国务卿。

了。当时，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大笑)

基：以前的敌人。

毛：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这是我们的感想。

毛：也正是我说的。

基：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的坦白和开放。

毛：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加·斯诺）[1]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因为，当你们下令时，譬如说，你们的总统下令，你需要关于某些问题的信息，情报单位的报告却像雪片般飞来。我们也有情报局，情形也一样。他们做得不好，(周恩来在一旁笑了）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周继续笑着）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

毛：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

---

[1]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进步作家、记者。1928年第一次到中国。1936年到陕北革命根据地访问，见到了毛泽东等中共和红军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在1960年、1964年、1970年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

题[1]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对的。

基：基本问题都解决了。

毛：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 in hand（手携手）。

基：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

---

[1] 1973年1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伪政权四方代表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称《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根据规定，美国政府必须在60天内撤走全部军队，从而为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由于基辛格对这份协定的贡献，1973年10月16日，挪威议会选出的诺贝尔和平奖五人委员会宣布基辛格与黎德寿（越方领导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他们不团结。

基：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对毛）帮助蓬皮杜，他（指基辛格）同意。

基：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两家联合。

毛：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像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1]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

---

[1] 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或联邦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东德）和联邦德国（西德），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两德统一，称德国。

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毛：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沈若云：Mode of acton（行动方式）.

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泽东开始抽雪茄，并试着递雪茄给基辛格和洛德，洛德表示他不抽烟。）

基：我们并未计划在未来四年大量裁减驻扎在欧洲的美军。

（毛泽东望向周恩来）

周：说到裁军，你的意思是最多裁百分之十到十五。

基：完全正确。

毛：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有多少？他们大都是导弹部队吧。

周：大概在三十至三十五万间，包括地中海的驻军。

毛：这大概不包括海军在内。

基：不包括海军。在欧洲中部约有二十七万五千人，但这不含

部署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

毛： 你们部署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军队散布很广。你们在南朝鲜[1]有军队，我听说大约有三十万人。

基： 大约四万。

毛： 蒋介石那儿大约有八到九千人。

周： 在台湾吧。

毛： 听说日本还有两地驻军，四万人在琉球、二至三万人在日本本土。我不知道菲律宾有多少美军，但现在越南的美军只有一万多人。

基： 但他们很快都会撤回。

毛： 对，我听说你们在泰国有四万人。

基： 对的。但主席你刚才说的大都是空军部队，所以恐怕不能光以人数衡量。

毛： 你们也有地面部队，例如在南朝鲜。

基： 我们在南朝鲜确有地面部队。

毛： 你经过日本时，最好多花点时间和他们会谈。你只和他们谈一天，他们的面子很挂不住。

基： 主席，我们希望此行的重点是北京的会谈。稍后我会单独再去一趟东京。

毛： 很好。对他们说清楚些。你知道日本对苏联的感觉也不是很好。

基： 他们有点爱恨交加。

毛：（比手势）一句话，这是日本田中首相告诉周总理的，苏联

---

[1] 南朝鲜，今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做的事就像看到有人要上吊，就立刻把人家脚下的椅子抽走。

基：是的。

毛：也可以这么说，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周恩来轻轻地笑了）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1]

基：他们还夺走当地所有的工业。

毛：对呀。他们还抢走库页岛和千岛群岛[2]。

基：日本被苏联的经济发展性所迷惑。

毛：（点头）他们希望从苏联那儿拿回些什么。

基：但我们将加强日本和美国关系，同时也希望和中国加强关系。

毛：我们认为，要是日本和苏联加强关系，不如和美国加强关系，这样会比较好些。

基：日本和苏联如果形成紧密政治关系是很危险的事。

毛：这在现实上，似乎不可能成真。

周：（对毛泽东）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3]和白宫的联系。

---

[1]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20年间，苏联趁中国内乱无力北顾，逐渐蚕食中国领土，利用二战日本入侵中国、国共相争的时机，逼迫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并取得了在新疆和东北的一系列特权。外蒙古独立是指外蒙古于20世纪前期从中国独立出去的一直影响到现在中国的巨大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

[2] 1945年2月，苏美英关于战后日本问题的《雅尔塔协定》规定，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日本方面所说的“北方四岛”择捉、国后、色丹和齿舞群岛，都划归苏联。

[3] 黄华，当时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

毛：（对周恩来）重要性何在？

周：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大使的管道处理。

毛：黄华命苦，（周大笑）他在你们那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还扭伤。

基：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医生。

毛：好啊。（周大笑）黄华好像在你们那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笑声）对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笑声，尤其是女士们）有人说，如果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

毛：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

毛：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周：非常少。

基：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是的，还有治外法权。

毛：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

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毛：只有以这种方法我们才能消除敌意，改善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要化解中日人民间的敌意比化解你我之间的敌意困难。

基：是的，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没有任何敌意，相反的，我们之间现在只有一个判断性问题。

毛：对。

基：未来几年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很快就会开始运作。

毛：是吗？

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

毛：你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是什么？是指台湾？

基：是指其他有这种意向的国家。

周：你是指苏联？

基：我是指苏联。

周：沈小姐了解你说的意思。

毛：（看着翻译沈若云）这个人的英文能力很好。（对周恩来说）她是谁？

周：她是沈若云。

毛：我们的翻译实在太少了。

基：不过，我们遇到的翻译，他们都做得很称职。

毛：你遇到的翻译和我们现在的翻译现在只有二三十岁，如果他们老了以后，就无法翻译得像现在这么好了。

周：我们应该送一些人出国。

毛：我们应该送一些像这样高的小孩（用手比了一下）出国，

年龄不要太大。

基：我们准备设立一些人员交换计划，让你们送学生到美国。

毛：一百个学生当中如果有十个人学好外语，那就非常成功，即使有十多个学生不想回国，例如一些女孩想留在美国，那也没关系，因为你们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排外。过去，中国到外国却不肯学当地语言，（看着翻译唐闻生）她的祖父母就拒绝学英语，他们就是这么顽固。你知道中国人是非常顽固和保守，许多老一代华侨不肯说当地语言，但年轻一代好多了。

毛：（比个手势并指着他的书）假如苏联丢了炸弹并杀死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那将会帮我们解决问题，因为像我一样的老人不会学英文，我们只会读中文，我大部分的书是中文，只有少数的字典是外文，其他大部分的书是中文。

基：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词，但不懂文法。

唐：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笑）

毛：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周恩来笑了）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笑）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笑）

毛：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他们说他们

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也是社会主义者，那么苏联进攻中国就是社会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者。

基：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将是一件好事。

基：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毛：（笑）那会怎样？因为自从深陷越南后，你们遭遇这么多的困难，你想如果苏联深陷在中国，他们会感到舒服吗？

基：苏联？

唐闻生：苏联。

毛：那时候你们可以让苏联深陷在中国，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或四年，戳苏联的背后，那时候你们的口号将是寻求和平，你们将以和平之名瓦解社会主义帝国，也许你们将以做生意帮助他们，并向他们表示可以提供一切协助反对中国。

基：主席先生，我们了解彼此的意图实在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会联手攻击中国。

毛：（打断基的谈话）不，不是这样，你正在进行的目标是瓦解苏联。

基：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笑）

毛：（用两手做势）苏联的目标是占领欧亚两个大陆。

基：我们希望吓阻苏联的攻击，而不是击败他，我们希望阻止他。

（周恩来看表）

毛：世事难料，我们宁愿事情如此发展，这样的发展对世界来说比较好。

基：哪种方式？

毛：那就是苏联进攻中国并且被击败，我们必须作最坏的考虑。

基：那是你的必然性推论。

毛：无论如何，老天已经送给我一封邀请函。

基：我真的发现主席今年气色比去年好。

毛：是的，我的情况比去年好。请代我向尼克松总统致意，同时也向尼克松夫人致意，很抱歉无法与她及罗杰国务卿见面。

基：我一定会转达。

二

毛：我们现在来讨论讨论台湾问题。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应当和我们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分开来处理。

基：原则上……

毛：只要你们跟台湾切断外交关系，就可以来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之间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就相当的复杂。我看没办法和平解决。

他们[1]都是一伙儿反革命分子，怎么会跟我们合作？我说我们可以暂时不要台湾，过一百年再去管他。对世事不要太急。有什么好急的呢？那只不过是个千把万人口的小岛罢了。

周：他们现在有一千六百万人。

---

[1] 指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毛：至于你们跟我们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处理。

基：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不过这是你们自己要决定的事情，我们也不会催你们。要是你们觉得有必要，我们就配合。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在我们而言，我们希望能够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困难在于我们不能马上就切断与台湾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都跟我们的国内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一九七六年之前，或者在一九七六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找到某种方式，来建立外交关系，也可以当作贵我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就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处[1]用处非常大。

毛：这是可以的。

基：什么可以？

毛：可以照现在的办法来做，因为现在你们还需要台湾。

基：这不是需不需要台湾的问题，而是实际上可不可行的问题。

毛：都一样。（大笑）我们现在对香港也不急。（大笑）我们甚至不会碰澳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碰澳门，顶多也只碰一点点。因为葡萄牙从明朝就开始紧紧地掌控着澳门。（大笑）赫鲁晓夫也骂过我，说为什么我们连香港和澳门都不要[2]。而且我也跟日本说过，我们

---

[1] 1973年5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资深外交家、原驻法大使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美国资深外交家布鲁斯任驻华联络处主任。

[2]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提出：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收回由于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落入葡萄牙和英国帝国主义监督之下的澳门和香港不感兴趣，而却对与印度的边界怀有敌意呢？

不只赞同他们（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而且还包括历史上，苏联自中国割去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基：主席，我觉得外交关系上的问题就是这个。在台湾问题上，我想我们都很了解各自的立场。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而且联络处也发挥了应有的功能。所以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都认为，或者在某一个程度上认为，应该象征性地显示，中美关系在各方面说来都是正常的。果真如此，我们就应该想个办法来做，不过这不是非做不可。

毛：我们也有和苏联与印度建交啊，不过关系也不怎么样，甚至还没有我们与你们的关系好。所以这不是很重要，整个国际情势才真的重要。

基：我完全同意主席的说法，也同意我们必须彼此了解，我相信我们对彼此都有实质的了解。

毛：我们联络处主任已经跟你们说过大原则，也提过当年乔治·华盛顿反抗英国的故事。

基：对，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对我作过精彩的演说，我以前也从总理那里听过。

毛：那套说法可以不用再提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我们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建国运动，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美国在当地阻止苏联的做法表示欢迎，以免苏联控制中东地带。我们黄镇大使提过我们支持阿拉伯世界，不过他不了解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重要性。

基：嗯，我那时的说法让他很惊讶，而他也重述了联合国的官式立场。（大笑）而我了解你们必须公开地采取某些立场，这些并不违反我们的共同立场。不过，事实上，我们会进一步解决中东问

题，但我们也想显示这不是因为苏联施压才使然。

所以，每当苏俄施压，我们必须抗拒，除了争执本身有其优点之外，我们可说是为了抗拒而抗拒。然后当我们击败他们时，我们甚至有可能朝同样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是反对阿拉伯国家的想法，我们只是反对借着苏联施压来实现他们的愿望。

毛：没错。

基：而且我们现在的策略正是如此。

毛：下次你再到中国来，除了政治，还可以同我谈一点哲学。

基：我很乐意，主席先生。哲学研究是我的初恋。

毛：或许当了国务卿后就比较难研究哲学了。

基：是的。

毛：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他一九五九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决裂。他们一九五八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军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的时候，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笑）在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那就是他说的。那时候，他口气还很大，因为他见过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沾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同我夸口，说他认识美国总统，讲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布鲁斯大使：你知道这回事吗？）

布鲁斯：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毛：还有一些消息。从此以后，赫鲁晓夫没有再来过。但他曾到过海参崴，他是从中国到海参崴的。

周：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反中国的演讲。

毛：现在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一个到过像海参崴那么远的东边。柯西金自己说过，他对西伯利亚的事情不太清楚。

（中方查看时间）

周：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毛：我本来还想同你谈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用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我想讨论的是，我很怀疑，如果民主党掌权，他们会采用孤立主义。

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主席先生。我认为目前的知识分子和一些民主党，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不过，现实状况会让他们了解，我们目前的政策就是唯一的选择。目前我还不知道，在他们了解这点以前会产生多大伤害，还有，他们是否将继续同样错综复杂的战术。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偏离现在的轨道。

毛：那你和我似乎是同一类的。我们好像多少都有点疑神疑鬼的。

基：我是怀疑，我对某些领袖也有些疑问。但是我想形势所需，使我们只有回到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政策。

不过，主席先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趁着大家都还在位，而且都了解这情势的时候，尽量加强关系，不要让其他政策有机可乘。

毛：这个主要从一点上就可以证明，就是主张从欧洲撤军。

基：是的。

毛：这是帮苏联的大忙了。

基：我们将不会在我们尼克松总统任内执行。只有两种可能的

情形：军队从欧洲撤退，如遇挑战，也不太愿意极为粗暴、极为迅速地解决。

毛：你所说的“粗暴”意思是指可能开战。

基：如果有必要，但……

毛：我不喜欢你同我耍外交辞令。

基：如果有必要，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只要他们知道我们将发动战争，他们就会松手。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很怕我们。

毛：因为我也认为最好不要开战。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说我是个好战分子。（笑）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觉得不要。如果你们真的打，最好只用传统武器，核武器只是备用，尽量不要碰。

基：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那就好。我听说你们以前这个方法是为了争取时间。

毛：我们是想争取时间，可是，我们还有另一个立场，如果苏联攻击我们刚刚讨论过的任何一个重要地区，我们要能反击。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毛：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强。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美国特使基辛格。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国特使基辛格。

对周恩来送审的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决定稿的批语[1]

（1973年3月）

同意。

---

[1] 周恩来1973年3月9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周恩来送审的中央决定稿写道，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这个决定。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12月14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谈话时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月15日，毛泽东在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时，向他们介

绍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还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决定的通知。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副总理。

1973年3月，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

五绝·呈郭老[1]

（1973年春）

郭老从柳退[2]，
不及柳宗元[3]。
名曰共产党[4]，
崇拜孔二先[5]。

---

[1] 呈，恭敬地送上去。郭老，对郭沫若的尊称。

[2] 从，由。韩，指韩愈。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昌黎先生集》传世。

[3] 不及，比不上。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

[4] 曰，叫作。名，名称。共产党，这里指共产党员。

[5] 崇拜，尊敬钦佩。孔二先，即孔二先生，对孔子的谑称。这里因字数、韵律的关系，略去“生”字。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名丘，字仲尼。排行第二。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由鲁国中都宰升任司寇，摄行相事。后又周游列国，终不见用。弟子相传先后有3000人，其中著名的有70余人。孔子曾大力宣传“仁”的学说。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政治上提出“正名”的主张。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自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2000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尊为“圣人”。现存《论语》一书，记有孔子的谈话及孔子与门人的问答。

1973年4月20日，毛泽东会见墨西哥合众国总统埃切维里亚。

给李庆霖[1]的信

（1973年4月25日）

李庆霖同志：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2]

毛泽东

1973，4，25日

---

[1] 李庆霖，当时是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1972年12月20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在莆田县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的孩子生活上遇到的困难。信中说，当国家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口粮供应和生活费停发后，孩子劳动分得的口粮年年不够吃，每年都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要靠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加上又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因此生活很困难，请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信中还反映了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

[2] 中共中央1973年6月10日印发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对5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和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进行讨论，准备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人来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个问题。1973年6、7月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拟定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

七言诗·外交家风采联句

（1973年4月）

八重樱下廖公子[1]，五月花中韩大哥[2]。（乔冠华[3]）
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毛泽东）

---

[1] 廖公子，指廖承志（1908—1983），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广东惠阳人。

[2] 韩大哥，指韩叙。1973年5月至1977年11月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副主任（大使），1985年5月任中国驻美国大使。

[3]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和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3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著有《国际评论集》等。

对谭政来信[1]的批语

（1973年5月）

纪、汪[2]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

[1] 谭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林彪陷害，被撤职、降级。“文化大革命”中进一步受到迫害。1973年4月28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年已六十有七，身体日见衰老，病痛日见增加。希望对我的问题从宽处理，于最近期内把我解放出来。1975年，谭政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2] 纪，指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会见外宾几次谈话的报道

（1973年6月至11月）

一

越南是越南人民的，不是越南反动派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1]

二

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祝你们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整个非洲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2]

---

[1] 这是毛泽东1973年6月5日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黎清毅时谈话中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6月6日《人民日报》上。

[2] 这是毛泽东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特拉奥雷上校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上。

三

我们总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两国人民和第三世界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总是要团结的。请你回国以后代我问候萨达特总统和你的其他同事们。[1]

四

我们也很高兴接待你们。祝贺你们非洲都发展起来，你们发展起来对整个世界都有好处。非洲人民总是要起来的。[2]

五

我们应该支持你们，尽我们的所能支持你们。我们还应该感谢你们越南南方人民，因为你们战斗了多年。[3]

---

[1] 这是毛泽东1973年9月23日会见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9月24日《人民日报》上。

[2] 这是毛泽东1973年11月7日会见塞拉勒窝内（今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和外长卢克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11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

[3] 这是毛泽东1973年11月19日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阮氏萍时说的一句话，发表在1973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上。

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

1973年，毛泽东会见老挝访华代表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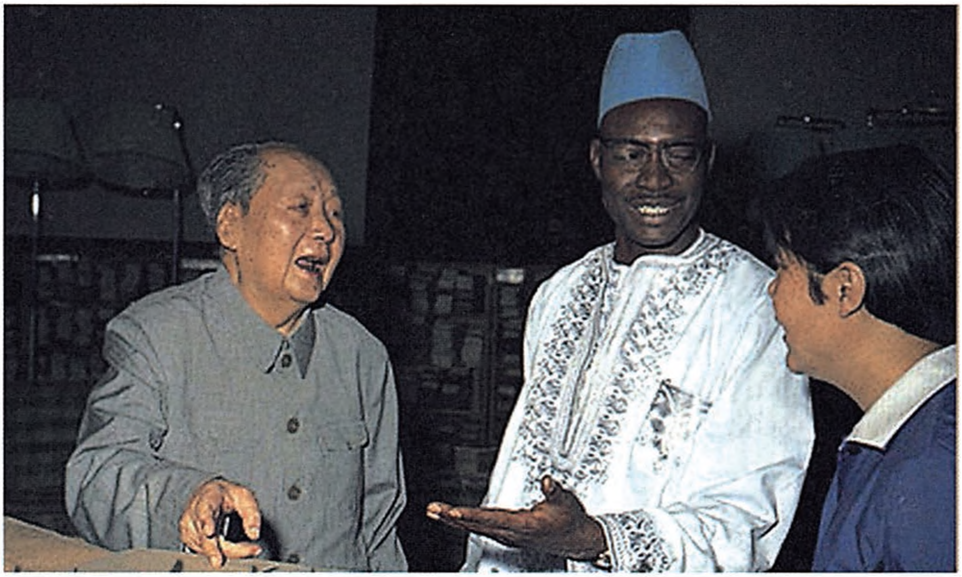
1973年，毛泽东会见黎德寿。

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的谈话（节录）

（1973年6月22日）

我们都是叫作第三世界，就是叫作发展中的国家。你不要看我国有什么展览会啊，其实啊，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说，I say（英文：我说），越穷越好！就会革命啊。西方国家呢，不大行了。

无论怎么样，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创造了文化，创造了科学，创造了工业。现在我们第三世界可以利用他们的科学、工业、文化——包括语言——的好的部分。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理特拉奥雷。

1973年6月22日，毛泽东会见马里共和国总理特拉奥雷。

对叶飞来信[1]的批语

（1973年6月25日）

纪、汪[2]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73，6，25

---

[1] 叶飞，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1973年6月18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中央批准解除对他的监护，允许阅读党内文件。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75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

[2] 纪，指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1]

（1973年7月4日）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

---

[1] 这是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美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

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

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

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茨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两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像尼克松讲的。

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

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X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不能杀人？鲁迅在《阿Q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七言诗·戏续李白《梁甫吟》

（1973年7月4日）

不料韩信不听话[1]，
十万大军下历城[2]。
齐王火冒三千丈[3]，
抓了酒徒[4]付鼎烹。

---

[1] 韩信（？—前196），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人。初属项羽，继归刘邦，被任为大将。汉朝建立，封楚王。与萧何、张良合称汉初三杰。后有人告他谋反，降为淮阴侯。又被告与陈豨勾结在长安谋反，为吕后所杀。不料韩信不听话：指当时为刘邦手下大将军的韩信引兵东向，欲攻齐国时，为刘邦所用的郦食其抢先说降了齐王，不料韩信仍率兵攻齐，齐王以为是郦食其以缓兵之计欺骗了自己，便把郦食其抛入油锅烹死了。

[2] 下，攻陷。历城，故地在今山东省济南市郊。

[3] 齐王，指田广。田广（？—前203），狄（故地在今山东高青）人，战国齐王族后裔。其父田荣、叔父田横，秦末随从兄田儋起兵反秦。田儋自立为齐王，与秦军作战败死。秦亡后，田荣攻灭项羽新封之三齐王，自立为齐王，旋即被项羽击杀。于是，田横乃立田广为齐王。田广后为汉将韩信擒杀。火，怒气。三千丈，极言恼怒之甚。

[4] 酒徒，指郦食其（？—前203），秦汉之际陈留高阳乡（今河南杞县）人，家贫落魄，为里监门吏。人皆谓之狂生。秦末农民战争时归刘邦，献计克陈留，封广野君。楚汉战争中，说齐王田广归汉，已定议，罢守御。韩信从蒯通计乘机袭齐，田广以为被郦食其出卖，把他烹死。

在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的一封信上的批语[1]

（1973年7月5日）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毛泽东

73，7，5

---

[1] 1973年6月25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26日，毛泽东在看了周恩来这个谈话的纪要后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该文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特点是"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7月3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各同志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

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新情况》上这篇文章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7月5日，他又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写了这个批语。7月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二字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对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稿的批语[1]

（1973年7月7日）

原则同意。

毛泽东

73，7，7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7月7日送审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7月6日中央政治局修改稿）上。8月24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宣读了这个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关于九大路线；二、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三、关于形势和任务。8月28日，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9月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1973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对廖静文来信的批语[1]

（1973年7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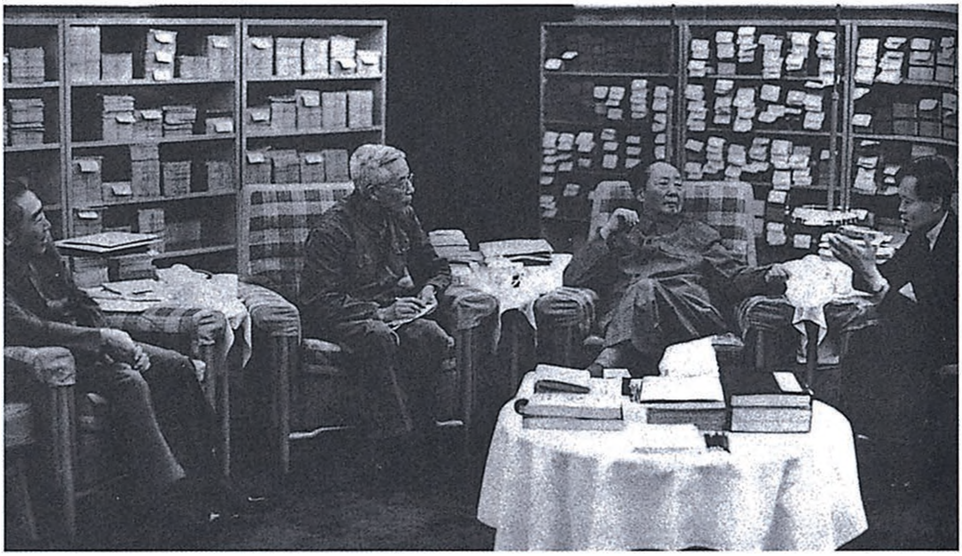
请总理派人查明恢复。

73，7，15

---

[1] 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1973年7月6日给毛泽东写信说，1965年夏，因修地下铁道，徐悲鸿纪念馆被拆除。由家属捐献的1000多幅悲鸿的作品，2000多件美术收藏，1万多件美术图片都被尘土覆盖，分散几处。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悲鸿墓碑也被捣毁。我曾多次向有关部门请求修复，但至今无人过问。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7月1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廖静文写信说："你给毛主席的信，主席于7月15日已批交我，要我派人查明恢复。"同日，周恩来又给吴庆彤（当时是国务院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德（当时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写信，请他们分别查清廖信中所说情况，议定恢复方案，进行筹办。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



1973年7月，毛泽东等在书房。左起：周恩来、周培元、毛泽东、杨振宁。

和恩古瓦比的谈话[1]

（1973年7月2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中国跟你们非洲国家差不多，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压迫我们，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我们叫它社会帝国主义，因为列宁说过，披着社会主义外衣，实际上是帝国主义。

毛：我们希望你们非洲国家和地区一个个统统独立。第二，团结起来，逐步，急了也不行，逐步统一起来。还有拉丁美洲、亚洲——日本除外的一切国家——我们也是这么希望。日本为什么除外呢？它不属于所谓的第三世界。

毛：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大使馆在非洲各国犯过错误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新殖民主义。如果中国人在你们国家，一切非洲独立国家，在那里称王称霸，自以为了不起，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不对的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叫新殖民主义，我不大清楚。

周：就是像美帝国主义那样，没有殖民地，但有特权，实际上，苏联也是，即不是像老殖民主义那样直接统治。

因为共产党如果不支持世界人民革命，那还算共产党？我说，你（指恩古瓦比）也要采取这种态度，就是要站在各国人民方面。

---

[1]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谈话的一部分。

恩古瓦比（以下简称恩）：是这样。

毛：总而言之，应该偏向代表多数人的政府。如果偏向代表少数的人，那就不大妥了。

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譬如美帝国主义，它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叫帝国主义。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

毛：现在这个世界，不要相信是平安无事。

周：天下大乱，毛主席常说是大乱。

毛：现在的局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是这个山雨要来，还没有来呢。可是风来了，而且风很急啊！不晓得你们非洲人感觉怎么样?

恩：我们要保持警惕，因为现在有表面和平，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大家都谈“安全”，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所以我们对世界和平持怀疑态度。

毛：我们根本不相信，什么“和平”啊，“安全”啊。

对郭化若来信[1]的批语

（1973年8月4日）

总理、剑英[2]同志：

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毛泽东

73，8，4

---

[1] 郭化若，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3年7月20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讲到自己“在介绍《孙子兵法》时写了错误严重的《代序》”“任意夸张《孙子》，把《孙子》现代化”“又不积极修改赶早改版”。信中还向毛泽东请求分配工作。同年，郭化若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2] 总理，指周恩来。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73年8月，毛泽东和五四时期的朋友、美籍医学家李振翩亲切握手。

1973年8月，毛泽东接见李振翩、汤汉志夫妇。

七律·读《封建论》[1]呈郭老[2]

（1973年8月5日）

劝君少骂秦始皇[3]，
焚坑[4]事业要商量。
祖龙[5]魂死秦犹在，
孔学[6]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7]不是好文章。

---

[1] 《封建论》，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的史论文章，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

[2]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

[3] 秦始皇，即嬴政，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公元前221年，在消灭割据称雄的魏、赵、韩、齐、楚、燕六国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4] 秦始皇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和思想控制，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和民间私藏的《诗》《书》等书籍，并将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460多名坑死在咸阳，史称“焚书坑儒”。

[5] 祖龙，指秦始皇。

[6] 孔学，指由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创立的儒学。

[7] 十批，指郭沫若所著《十批判书》，收入有关中国古代先秦诸子批判的文章共10篇。毛泽东在1973年7月的一次谈话中，曾讲到《十批判书》尊孔反法。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1]返文王[2]。

毛泽东
1973、8、5

---

[1] 子厚，即柳宗元。

[2] 文王，指周文王，姓姬名昌。是中国历史上开始推行较完备的封建制（即分封制）的国君。

毛泽东等祝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电报

（1973年9月8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金一同志：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二十五年来，英雄的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朝鲜人民高举反帝革命旗帜，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为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为朝鲜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伟大胜利和成就感到欢欣鼓舞，为有朝鲜人民这样英雄的人民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感到自豪。

在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中，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合理主张，是符合全体朝鲜人民的民族愿望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因而受到了世界各国人

民的同情和支持。任何制造“两个朝鲜”、妄图使朝鲜的分裂永久化的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

中朝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是鼓舞我们两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力量。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这种友谊和团结，必将不断得到加强和发展。衷心祝愿兄弟的朝鲜人民今后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于北京

1973年9月12日，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学习班

（1973年）

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1]

---

[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3年10月1日庆祝国庆24周年发表的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中，在“最近，毛主席又一再指出”后面，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1973年10月13日，毛泽东会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973年11月2日，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爱德华·高夫·惠特拉姆。

1973年11月7日，毛泽东会见塞拉勒窝内（今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史蒂文斯。

对罗瑞卿来信[1]的批语

（1973年11月20日）

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毛泽东

1973，11，20

---

[1] 罗瑞卿，1973年11月1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现在满身是病，两腿伤残，恳求主席和党解除对我的关押，给我一定限度的自由。毛泽东批示后不久，罗瑞卿即被解除监禁。1975年6月，罗瑞卿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并担任中央军委顾问。

对批评江青[1]的一封信[2]的批语

（1973年11月25日）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

1973. 11.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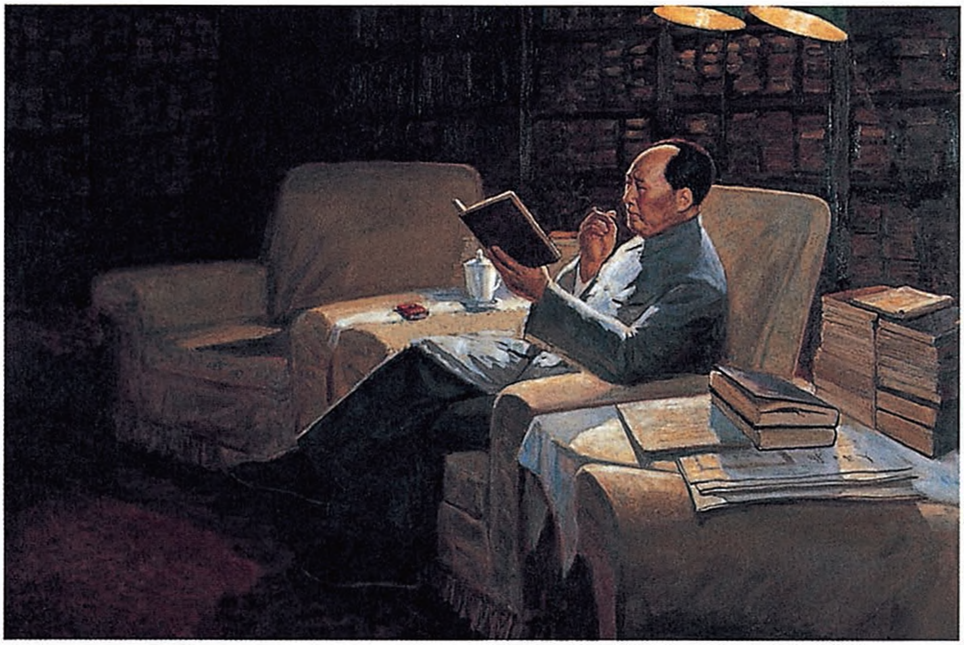
---

[1] 江青，曾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在毛泽东病重和逝世以后，无所顾忌，更加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她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她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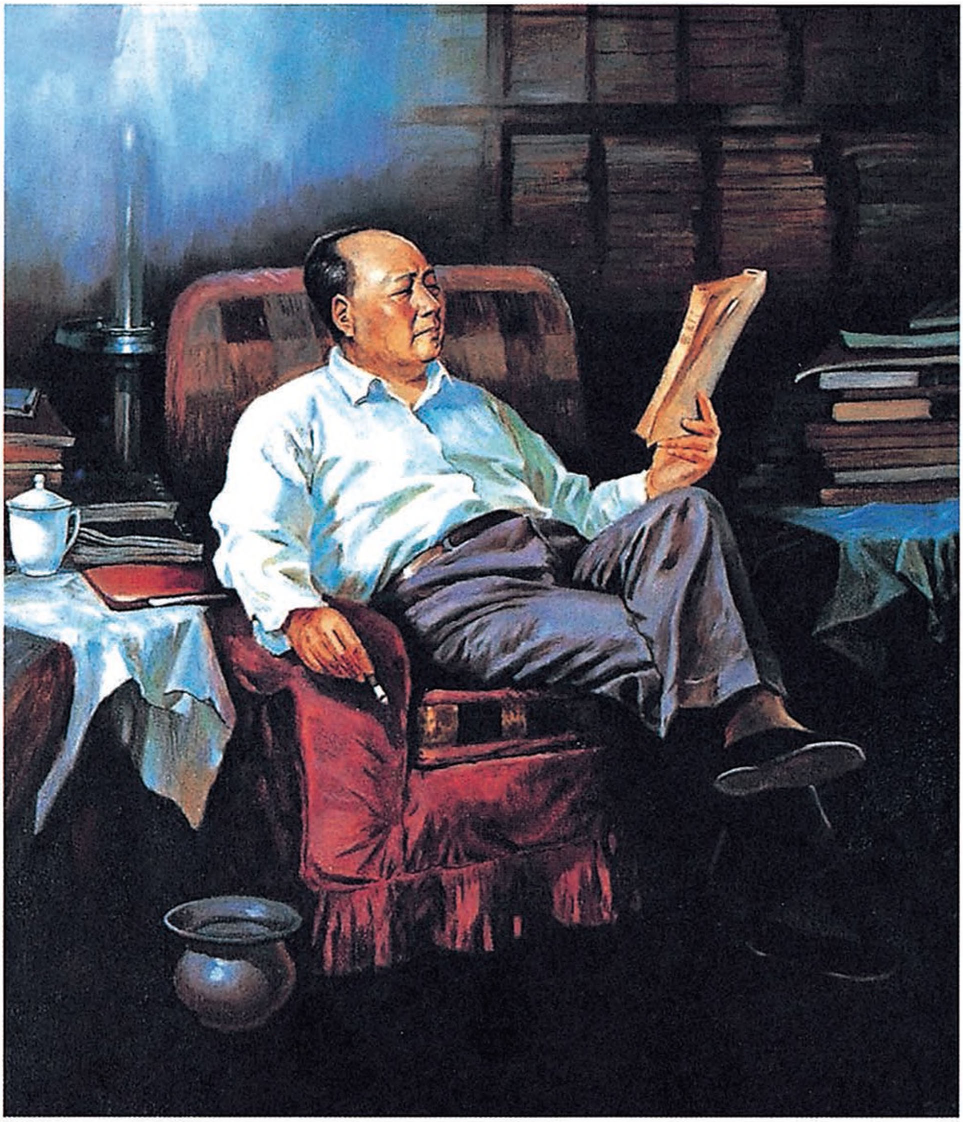
[2] 这封署名“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

1973年，毛泽东在书房批阅文件。

毛泽东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



《毛泽东在书房》（油画）



《毛主席在书房》（油画）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九周年的电报

（1973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二十九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谨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二十九年来，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反对苏修、美帝和支持各国人民革命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正满怀革命豪情，为贯彻执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努力奋斗。我们衷心祝愿阿尔巴尼亚人民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帝修反的长期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这种友谊是建

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在今后的共同斗争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同你们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对江青诬陷周恩来的批评[1]

（1973年12月9日）

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2]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3]才是迫不及待。

---

[1] 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错误的会议上，江青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和唐闻生、王海容两人谈了话。

[2] 指周恩来。

[3] 指江青。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1]

（1973年12月9日）

中国将修建青藏铁路，不仅要修到拉萨，而且还要与尼泊尔接轨，通到加德满都[2]去。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

---

[1] 这是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谈话的一部分。青藏铁路，1958年，在毛泽东指示下，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格尔木段）动工修建。从1961年3月开始，因连续3年困难时期，青藏铁路全线停建。1974年，为落实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的谈话精神，1974年3月和1975年3月，铁道兵第十师和第七师共6.2万人，奉中央军委命令先后开进青海，开始了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段的建设。1979年铺轨到格尔木，一期工程完成，1984年通车。由于当时没有攻克高原冻土和高寒缺氧两大难题的把握，青藏铁路格尔木—拉萨段在1978年7月被叫停。直到1998年，高原冻土地区修筑铁路的技术问题获得了重大进展，青藏铁路再次提到日程上来，2000年11月11日，江泽民批示修建青藏铁路十分必要，2001年6月29日，青藏铁路二期格拉段开工，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目前青藏铁路三期工程拉萨—加德满都段还没有立项。

[2] 加德满都，尼泊尔首都。

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问题的谈话要点[1]

（1973年12月12日）

一

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无非是开个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我主张找各大军区的人，找司令员来。议什么事？要议军。

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

---

[1]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13日、14日、15日和21日，毛泽东又对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等问题，作了一系列指示。本篇一是毛泽东在197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12月13日，毛泽东同政治局几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三是12月14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谈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问题时的谈话的一部分。本篇四是12月15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的一部分。本篇五是12月21日，毛泽东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们谈话的一部分。

你[1]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2]、王洪文[3]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呢。

陈锡联[4]同志当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5]同志到沈阳军区去；杨得志[6]同志跟曾思玉[7]同志对调；许世友[8]同志跟丁盛[9]同志对调；韩先楚[10]同志跟皮定均[11]同志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他们都刚去，不要动。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你们还要工作呢，还要保持晚节。

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

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你[12]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吧，参加议军。

---

[1] 指叶剑英。

[2] 这里指周恩来。

[3] 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4] 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

[5] 李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

[6] 杨得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

[7] 曾思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

[8] 许世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

[9] 丁盛，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

[10] 韩先楚，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

[11] 皮定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

[12] 指叶剑英。

二

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三

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大好了。一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就会批你（指陈锡联），那也不要紧。辽宁“八三一”“辽联”是两个小团体，彼此要照顾一下，不要偏了。“辽联”“八三一”，不要批呢。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

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包括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不然，“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大好呢。要开个军长、政委，师长、政委见面的会吧。不认识一下呢，也不大好吧。比如东北吧，要他（指陈锡联）在场介绍他（指李德生）。比如华北，要他（指李德生）在场介绍他（指陈锡联）。还有政治委员。

（毛泽东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再一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们（指各大军区司令员）到了，开门见山，讲互相对调，不要吞吞吐吐。对共产党员不要吞吞吐吐。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吞吞吐吐呢？就是直说。

四

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大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

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起梗子，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比如那个“八三一”“辽联”，他不要贴你的大字报？你那个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

我们还有一位李司令，到了没有呢？司令常来常往嘛！如果到那边不顺手，我们也可以商量一下。

（李德生说，一定顺手！）

靠不住。你不从坏处着想，单从好处着想。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

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

垓呢！动不动就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嘛，中国人有那么多，有那么几万，几十万坏人，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

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

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

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

人家的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不过他有个大使馆在这里，也要消灭呢。我估计，他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选了两个小城市打，一个广岛，一个长崎，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他不打。

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这时，毛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选妃子遍及全国，某一个省就选了三百人，这也是共产党干的事啊！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杨得志同志带一个旅到延安，我才认识他。他是要抓逃兵的。我说逃兵不要抓，他不喜欢在你那里，让他走了算了，如果要抓，请他吃一顿猪肉，因为他不满意嘛。捆绑不能成夫妻嘛，捆绑能够革命吗？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1]。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

---

[1] 这里指邓小平。

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1]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那就要当老百姓。那个乡村里头，工厂里头批起来也厉害。

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了回信。辽宁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

我看，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他们总是看不起学生。

现在好多人又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要准备打仗！

五

不要相信那些屁话！我们在旧社会，国民党的报纸那么多，广播电台天天吹，又没有把我们就变成国民党了嘛。我们还是共产党。现在贴两张大字报，不要紧呢。

---

[1] 指邓小平。

总是两面的。你们说了什么四川不行，有些不听话，不听调。这也是常事，养着嘛！有一个能办事的就好了嘛。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对韩先楚）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这个会差不多了吧。明天一天就“聋子放炮竹”了。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你（指许世友）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绛、灌分别为汉朝的随何、陆贾、周勃、灌婴）“鄙”字改为“恨”字。你能够看懂《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

“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1]这个人也是少文。

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

---

[1] 指许世友。

（许世友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

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慢慢来，就会顺手。

还有什么话讲啊？明天开一个大会就散了。

（周恩来说：还要起草一个命令，鼓励大家一下。）

噢，这个好。你们带个头。底下的政委、参谋长、总部、省军区、军、军分区，还有什么人武部，人也很多。这个问题不要紧。

世界上总是这样的，（把两只手合起来）总有两面。有廉洁必有贪污，有贪污必有廉洁。只有廉洁，没有贪污，也不行啊，那就只有一只手。这个手（举左手）是廉洁，这个手（举右手）是贪污。是对立统一。

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1]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苏联现在跟我们又在拉关系。最近有个什么文化部的招待会上，他们跟我们驻苏联武官处的人谈话。我们的条件，主要是两条：一要撤兵，撤到赫鲁晓夫时候那样。二要承认错误，从布加勒斯特会议开始。

你陈司令[2]，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位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太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头呢，省军区、军分

---

[1] 指苏联。

[2] 指陈锡联。

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

（这时，周恩来提议唱个歌，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第一段）

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毛泽东又亲自指挥，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后鼓掌。毛宣布散会。）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诚恳地说：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就是不好使，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吧。图为“文革”期间的毛泽东。

赠邓小平联[1]

（1973年12月）

柔中寓刚；
绵里藏针。

---

[1] 这是毛泽东送给邓小平的两句话，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召见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他把邓小平拉到自己的面前宣布说，我们现在请来了一位总参谋长，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又对邓小平说，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1974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客厅亲切握手。

对王洪文、江青报送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1]

（1974年1月）

同意转发。

---

[1] 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4年1月12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封来信上。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为广西大藤峡题字[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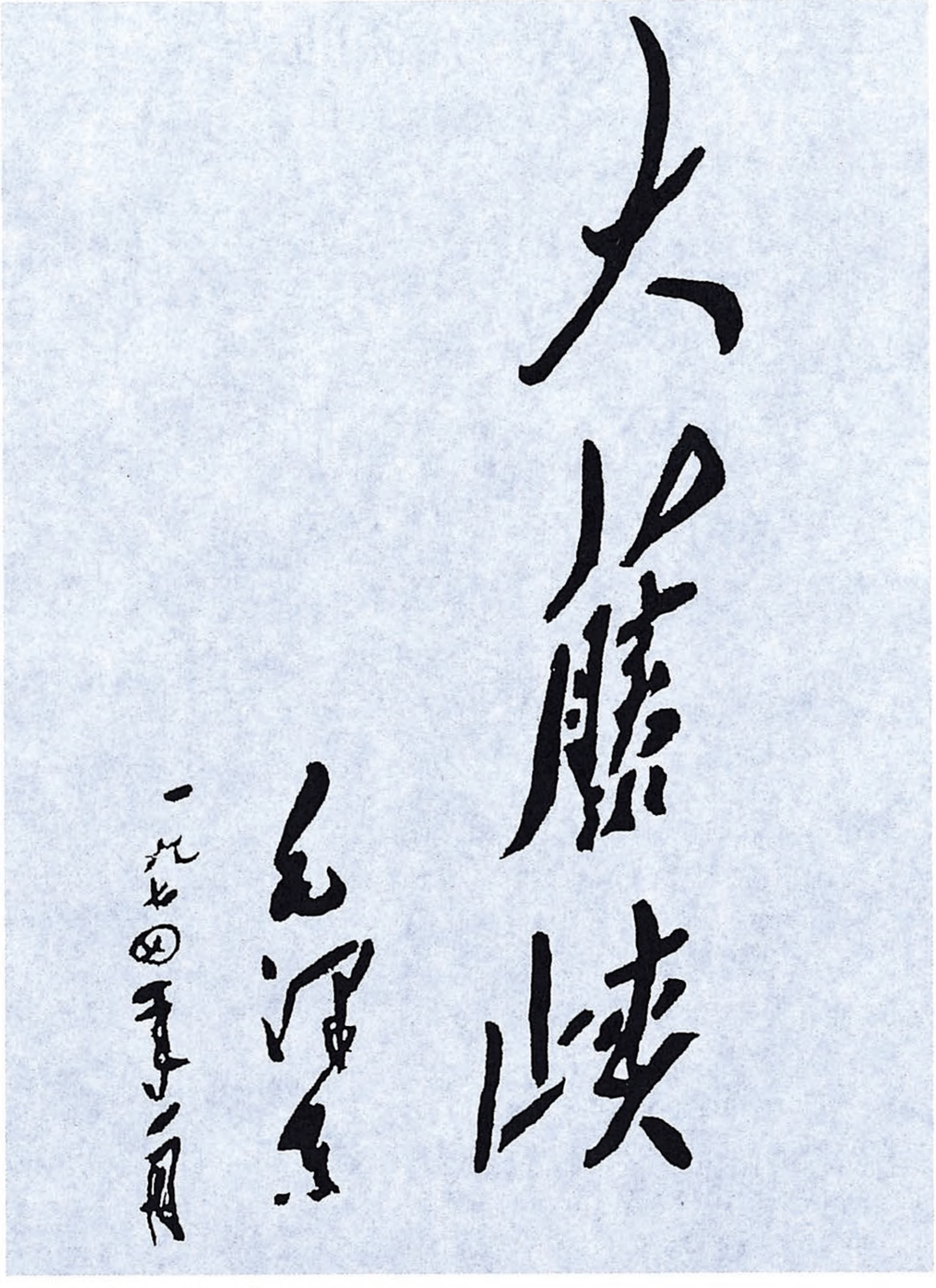
（1974 年 1 月）

大藤峡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一月

---

[1] 大藤峡位于桂平城区西北约8公里的黔江下游，是广西境内最大最长的峡谷。1974年，对中国农民起义历史十分精通的毛泽东细询了大藤峡情况，并亲笔写下“大藤峡”三字。



大藤峡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一月

毛泽东为广西大藤峡的题字。

给江青[1]的信和批语

（1974年2月至11月）

一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2]

毛泽东

九日

---

[1] 江青，曾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代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与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在毛泽东病重和逝世以后，无所顾忌，更加迫不及待地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宣布对她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她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

[2]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2月6日给毛泽东来信的信封上。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请求审阅。

二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1]

毛泽东
74. 3. 20

三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2]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

[1] 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发出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封信。《人民日报》1976年12月7日选发了这封信的部分内容。

[2] 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4年4月6日率中国代表团去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他在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阐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

四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观〈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1]

毛泽东

74，4，17

五

江青：

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毛泽东

74，4，17

---

[1] 这封信和本篇五都是对江青“两信”的复信。这封信可能没有发出。

六

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1]

毛泽东
一九七四年六月廿四日

七

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2]

毛泽东
十月廿日

八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6月23日给毛泽东的信上。江青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到，“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

[2]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10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上。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1]此嘱。

毛泽东
七四，十一月廿日

---

[1] 江青1974年11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给叶剑英[1]的信

（1974年2月15日）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2]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
七四年二月十五日

---

[1]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2] 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74年1月25日，他们适应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需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借介绍《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之机，大谈所谓“反复辟”问题，鼓吹“批林批孔”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批“走后门”，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1976年10月后，谢静宜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8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认罪态度较好，被免予起诉。1977年8月，迟群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迟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1]

（1974年2月22日、25日）

一、毛泽东对卡翁达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对布迈丁也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二、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毛泽东说，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

---

[1]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2月25日，会见了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3月12日，外交部就毛泽东这两次会见时的谈话内容发出《外交通报》。3月21日，中共中央将这个《外交通报》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并“请各单位负责同志向广大干部传达”。

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毛泽东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泽东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三、毛泽东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当卡翁达谈到赞

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四、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毛泽东对布迈丁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缺点。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1]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做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五、和布迈丁谈话时，毛泽东指出，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六、毛泽东还对卡翁达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

[1] 尼雷尔，当时任坦桑尼亚总统。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

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1]

（1974年3月25日）

一、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毛泽东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并说：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

---

[1]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等外宾。外交部4月13日发出《关于毛主席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的通报》。通报说：“现将毛主席最近同尼雷尔总统谈话的主要内容摘告如下，请将本期通报与毛主席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结合起来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领会。”5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通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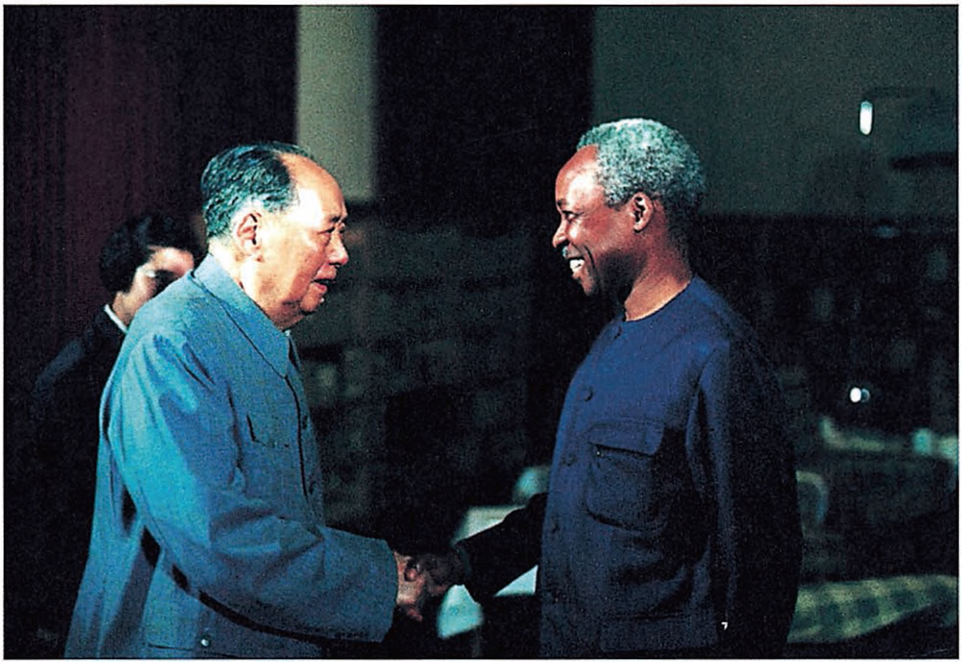
战争来吧。

二、毛泽东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毛泽东说，也怕呢。尼雷尔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毛泽东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三、毛泽东问到：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尼雷尔回答的过程中，毛泽东插话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毛泽东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四、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毛泽东说，帮助很小。当尼雷尔称赞中国医疗队时，毛泽东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毛泽东说，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并问：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尼雷尔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毛泽东说，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尼雷尔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毛泽东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1974年3月25日，毛泽东和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握手。

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发言稿的批语[1]

（1974年4月4日）

好，赞同。

毛泽东

74年四月4日[2]

---

[1] 这个批语写在周恩来、邓小平1974年4月4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第六稿）上。邓小平的发言稿中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指出，目前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发言稿讲道，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他们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发言稿中还阐明了包括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内的中国政府的六项主张。其中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这个发言。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邓小平的发言“是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会精神，贯彻执行”。

[2] 毛泽东手稿如此。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

1974年4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全面阐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宗旨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4年5月18日，毛泽东和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握手。

1974年5月，毛泽东和乔冠华亲切握手。

1974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朱光亚。

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1]

（1974年5月25日）

一、毛泽东问希思，尼克松水门事件[2]能过关吗？希思认为尼可以幸存下来。毛泽东说，那个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希思问水门事件是否使中国建立同美的关系及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政策更困难？毛泽东说，倒不。希思问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尼克松访华[3]后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毛泽东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在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毛泽东又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

---

[1]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了英国保守党领袖、前首相希思。外交部5月31日发出《关于毛主席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通知指出：“现将外交部《关于毛主席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级以上单位的党委常委和负责外事工作的同志。”

[2] 尼克松，当时任美国总统。1972年6月17日，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1974年7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劾尼克松的条款。8月尼克松被迫辞职。

[3]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希思开玩笑地说，中国对美国帝国主义要当心！毛泽东说，但是我们比较对美国人放心。

二、毛泽东问希思，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1]哪一年搞成功啊？当希思说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时，毛泽东说，对，我们的意见一致。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

当希思谈到苏联下了很大决心并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毛泽东反问，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并说，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及我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毛泽东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2]，包括达

---

[1] 指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参加的有31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加拿大。1964年12月14日，苏联通过波兰外长在第十九届联大会议上建议召开“欧安会”。1972年11月下旬到1973年6月初，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筹备会议。正式会议自1973年7月开始，分3个阶段进行，先是外长会议，接着专家会议，最后首脑会议，至1975年8月结束。会后签署了“最后文件”，内容分4个部分（也叫4个篮子）：欧洲安全问题；经济、科学、技术和环境方面的合作；人员、思想和文化交流；续会问题。文件内容空泛，没有约束力。1977年10月14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欧安会”后续会议。

[2] 指亚瑟·涅维尔·张伯伦，英国保守党领袖，1937年至1940年任英国首相。1938年9月，代表英国政府同法国、德国、意大利政府首脑签订《慕尼黑协定》，采取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张伯伦下台。

拉第[1]，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毛泽东说，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中苏争吵要从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五五年赫鲁晓夫[2]就找阿登纳[3]说，中国不得了了。希思说，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毛泽东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丢了埃及，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也有些影响，林彪[4]就是他们的人呢。

希思说，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5]订了一个条约，但它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毛泽东说，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

当希思说一个强大的欧洲很重要，可以使俄国发愁时，毛泽东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并且说，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希思问我对日本比较放心吗？毛泽东点头并说对。希思又问我是否相信日本

---

[1] 指爱德华·达拉第，1938年至1940年任法国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在此期间，执行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1938年9月，代表法国政府签订《慕尼黑协定》。1940年德国侵占法国后被监禁，1945年获释。

[2] 赫鲁晓夫，1955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3] 阿登纳，1955年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4]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5] 即英迪拉·甘地，1966年至1977年任印度政府总理。

人的和平意图。毛泽东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三、毛泽东说，英国能够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还是希思办的呢，所以我称你为首相先生。当谈到因为希思不是现任首相所以我未安排他在机场检阅仪仗队时，毛泽东说，我看要，不怕得罪威尔逊[1]。（对希思）我是投你的票的！

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方面能向我提供我所需的帮助时，毛泽东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希思表示始终乐于帮助，毛泽东说，好，很好。

毛泽东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2]。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青同志）的事情了。

---

[1] 指詹姆斯·哈罗德·威尔逊，英国工党领袖。1964年至1976年任英国首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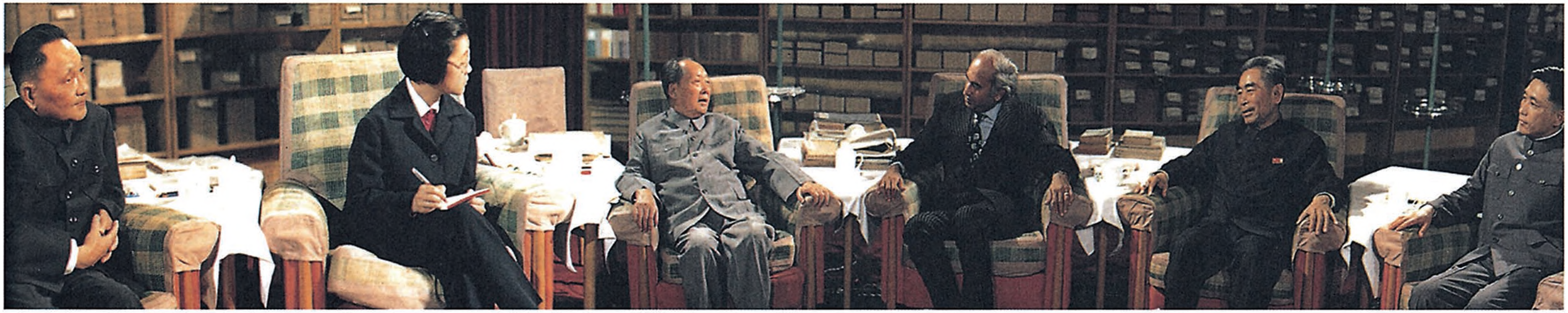
[2]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1898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3个不平等条约。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和随行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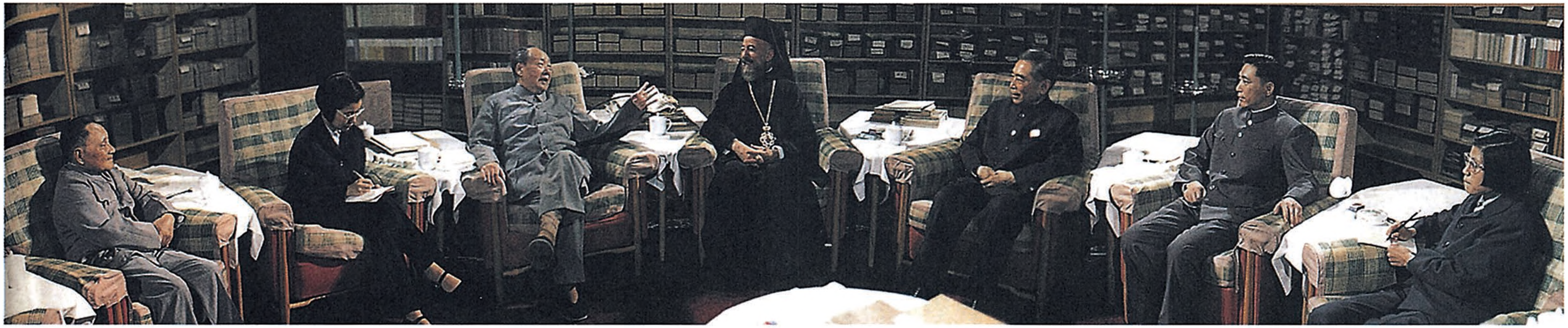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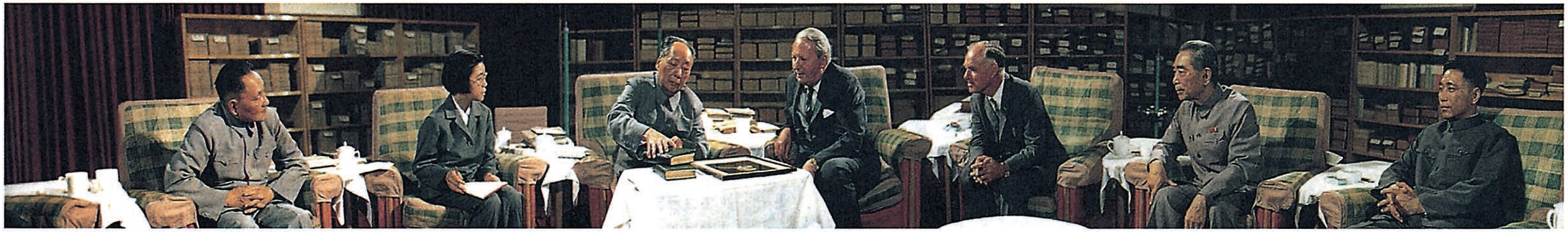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1974年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来华访问。图为毛泽东等在书房接见布托。



1974年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马卡里奥斯。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王洪文在中南海书房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与随行人员。希思向毛泽东赠送达尔文签名的照片及著作。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1]

（1974年至1975年）

---

[1] “四人帮”，指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4人为核心的一个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江青、姚文元，当时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毛泽东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从而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确认他们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宣布：依法判处张春桥、江青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本篇一至四和六、七摘自中共中央1976年10月18日下发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本篇五摘自中共中央1976年12月10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本篇八摘自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二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

三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11月12日给毛泽东的信上。

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五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1]

六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

---

[1] 这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公布的原外交部唐闻生、王海容1976年10月17日揭发材料。

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1]“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七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

[1] 在这句话之后，毛泽东当时还说了一句：“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八

一九七五年九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毛主席批准的议题是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江青却在大寨大讲什么《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周总理[1]，和邓小平同志“架空毛主席”，并且无理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知道以后，愤怒地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2]，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3]，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

[1] 周总理，指周恩来。

[2] 王海容、唐闻生1976年12月17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信中说，1975年9月24日，毛主席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之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要求汇报一些问题。当他谈到江青在大寨会议的讲话时，毛主席说：放屁！文不对题！然后接着说：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没有多少人信她的。

[3]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的汇报时作的指示。

毛泽东等祝贺罗马尼亚解放三十周年的电报

（1974年8月22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马尼亚·曼内斯库同志：

在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欢庆祖国解放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罗马尼亚共产党、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三十年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罗马尼亚人民，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英勇的“八·二三”武装起义，推翻了法西斯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揭开了罗马尼亚历史的新篇章，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解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罗马尼亚人民紧密团结在以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周围，独立自主，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目前，罗马尼亚人民正满怀信心地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和用新的成就迎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而努力奋斗。罗马尼亚坚决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勇敢地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

支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斗争，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对罗马尼亚人民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祝愿你们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国和罗马尼亚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一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亲密的合作关系。一九七一年齐奥塞斯库同志访问中国以来，这种友谊和合作关系又有了多方面的发展。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是经得起考验的。今后，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兄弟的罗马尼亚人民的革命斗争，并为加强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而继续努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于北京

以安定团结为好[1]

（1974年、1975年）

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二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

[1] 本篇一是1974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八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4年10月11日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本篇二是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周恩来汇报时说的一句话。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2月10日转发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197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

对外交部关于美议员访华团成员问题请示报告[1]的批语

（1974年8月2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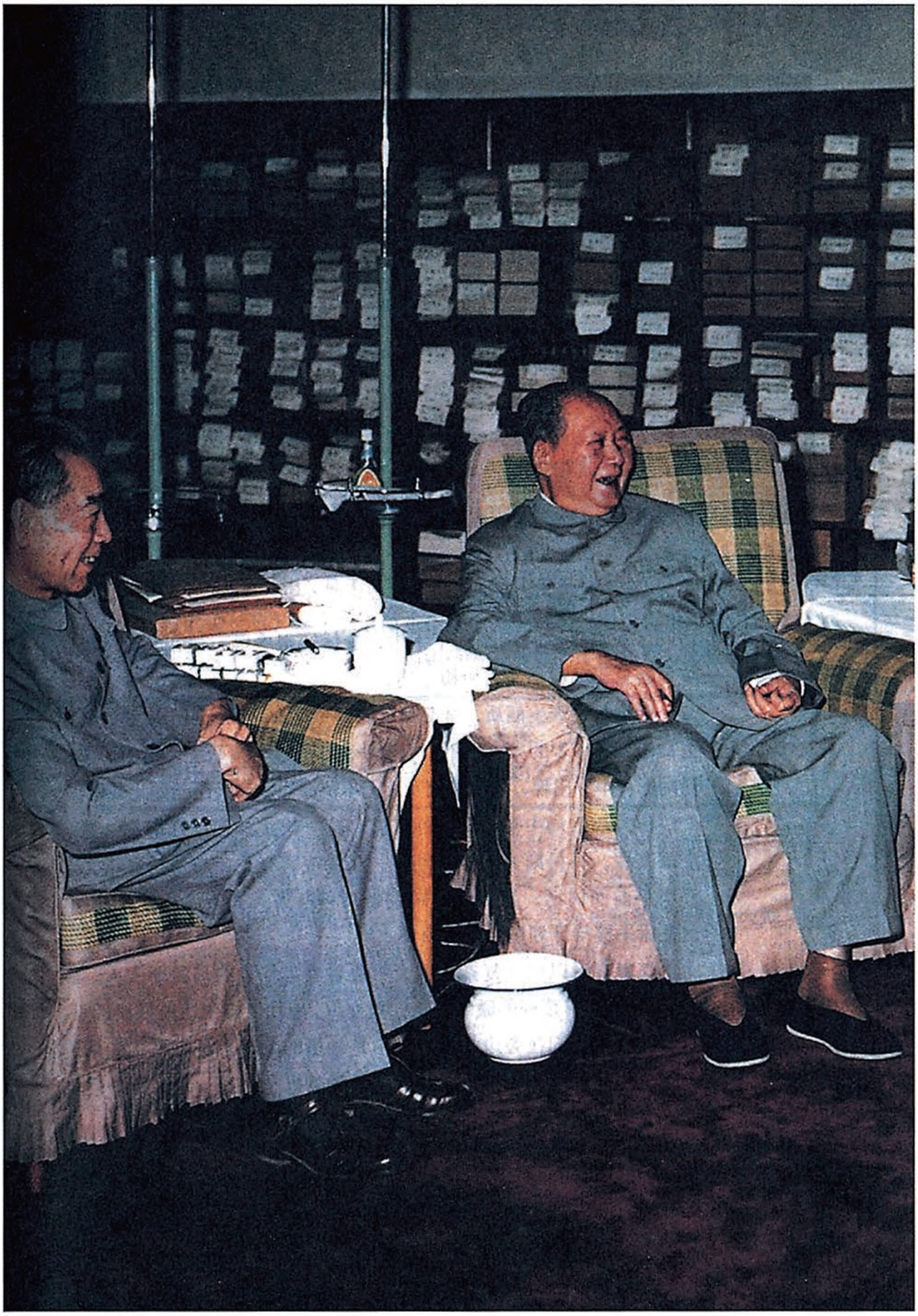
都可以来，多做工作，表示欢迎。

毛泽东

八月廿七日

---

[1]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4年8月26日报送的这个外交部请示报告中说，美议员团定于9月2日至14日访问我国。美方原在8月14日通知我方说，该团由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兹任团长。8月22日又通知我方，团长改由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担任，团员有参议员2人，众议员4人。经查，在4名众议员中有2人是众议院的亲蒋派，他们于今年2月和4月两次访台，发表亲蒋言论。我们考虑，对美方有意塞进两个亲蒋派应做出必要的反应，以使美方今后有所收敛。据此我们草拟了给我驻美联络处的电报稿，请一并审核。



1974年，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

浪淘沙·赠王洪文同志*

（1974年8月）

中南海色青，
碧碧盈盈。
深居其间非一人。
民众亿万反潮流，
皆是我兵。

今日从头行。
八亿群众，
喜见民兵成新军。
唯有经久鱼水情，
堪托重命。

对陈丕显来信[1]的批语

（1974年9月17日）

洪文[2]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毛泽东

七四年九月十七日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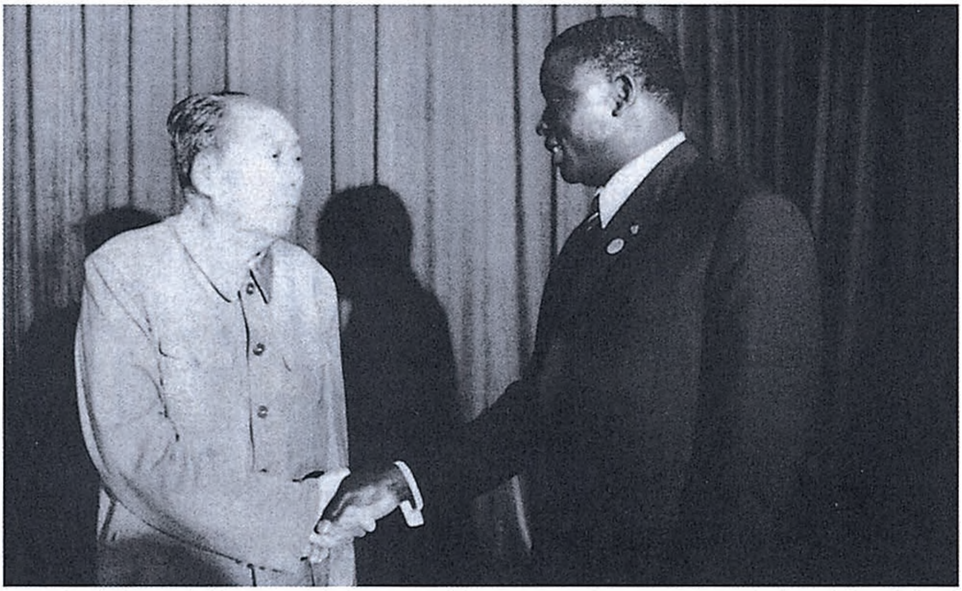
---

[1] 陈丕显，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后被打倒。1974年9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给一点可以做的工作。1975年9月，陈丕显复出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2] 洪文，即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4年9月，毛泽东和李先念等在中南海书房。

1974年9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一起。



1974年9月5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梅岭1号会见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

1974年9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多哥总统时和邓小平握手。

1974年10月5日，毛泽东、邓小平在武汉会见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

1975年10月8日，毛泽东和来访的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比耶迪奇握手。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陪同下于长沙接见丹麦首相哈特林。

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一点意见[1]

（1974年10月20日）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0月20日听取外交部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的反映后，让她们回京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转达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时说的一句话。1978年2月26日，华国锋（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来华访问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博士。

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

（1974年11月12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 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以下简称邓）： 主席也知道了。

毛： 好！

邓： 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 我赞成你！

邓： 她[1]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2]都不高兴。

邓： 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 这个好。

邓： 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

[1] 指江青。

[2] 指当时在谈话现场的王海荣和唐闻生。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

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李政道。

对外交部《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的批语[1]

（1974年11月20日）

叶帅[2]已多次见基，我应邀请美国防部长来访。请酌。

毛泽东

十一月廿日

---

[1] 外交部1974年11月17日的这个请示报告中说，美国国务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基辛格将于11月25日至30日第七次来华访问，并说：“美出于同苏争霸的全局，在战略上有求于我，所以，福特急于在今年内让基再来一趟，以保持中美关系的势头。”毛泽东审阅时，写了这个批语。

[2] 叶帅，即叶剑英元帅，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

毛泽东等祝贺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周年的电报

（1974年11月2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同志，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
亲爱的同志们：

英雄的阿尔巴尼亚解放三十年了。在兄弟的阿尔巴尼亚全国人民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阿尔巴尼亚政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的三十年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英勇斗争的三十年，是阿尔巴尼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三十年。

三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开展革命化运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天阿尔巴尼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已经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

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贯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坚决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霸权主义，特别是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赢得了各国人民的敬佩和赞扬。

中阿两国人民是亲密的战友和兄弟。中国人民为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并衷心祝愿你们今后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中阿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在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这种友谊和团结是鼓舞我们两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任何人都破坏不了的。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同阿尔巴尼亚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董必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北京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4年11月）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

---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1月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时说的一句话。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第四号文件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1974年11月）

我看是出好戏。[1]

---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1月在湖南看了电影《园丁之歌》后说的一句话。在此之前，“四人帮”污蔑《园丁之歌》是一株“大毒草”，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进行批判。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1]的批语

（1974年12月21日）

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毛泽东
十二月廿一日

送汪主任酌办[2]。

---

[1] 地质部原副部长刘景范的嫂子同桂荣（刘志丹烈士的妻子）1974年12月17日给毛泽东等写信说，今天我去看望刘景范，发现他身体很坏，精神不好，患有肝病、十二指肠溃疡病，手脚浮肿，肚子膨胀，可能是肝硬变，如果不及时治疗，担心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特此请求：一、他的问题已经审查8年了，如果已经审查清楚，能否赶快把他释放出来治病？二、如果他的问题还不能下结论，是否可以把他放出来一面治病，一面继续审查？

[2]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1974年12月21日指出："同桂荣同志写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有批示。此件请印发在京中央政治局同志。并送两份给中央专案组一办，遵照批示办理。"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

（1974年12月）

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2]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

---

[1] 1974年12月23日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的汇报。12月26日，他与周恩来单独长谈，其中讲到理论问题。1975年1月7日，周恩来将这次关于理论问题谈话要点整理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1月8日，周恩来将这个谈话要点送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传阅。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的这个谈话要点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要求“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在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和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编者按中公布了毛泽东这个谈话的主要内容。

[2] 春桥，即张春桥，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元，即姚文元，原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姚文元与江青、王洪文结成“四人帮”。

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1]。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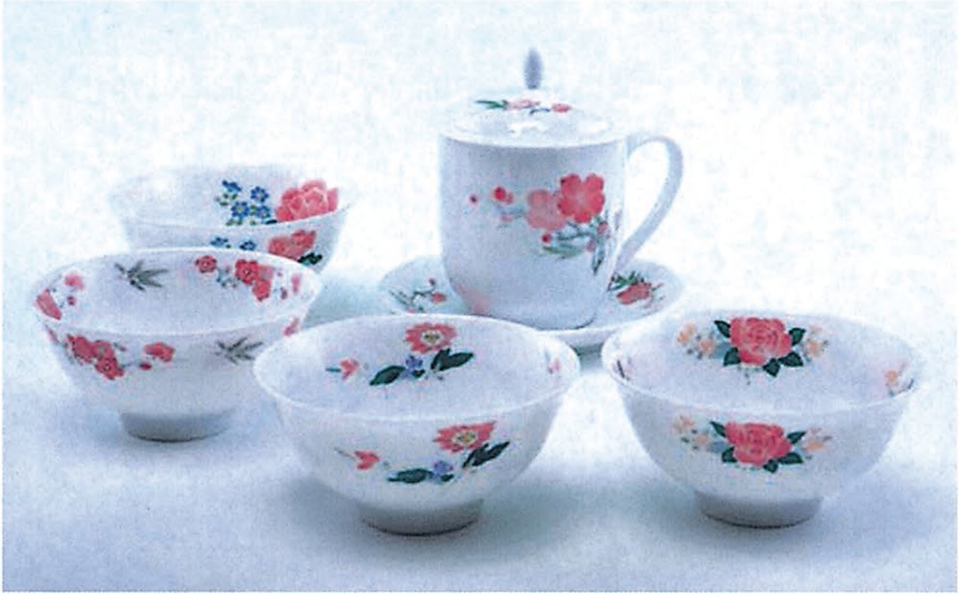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

[1] 《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1974年，毛泽东在书房。



1974年，为庆祝毛泽东82岁生日，湖南醴陵专门烧制的釉下手绘双面花五彩瓷。

关于民兵不要参与两派对立的意见

（1974年12月）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1]

---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12月在听取周恩来、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汇报时说的一句话。经毛泽东圈阅的中共中央1975年1月17日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句话。

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1]

（1974年）

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2]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作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

---

[1] 这是毛泽东1974年会见外宾时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曾作为中央讨论文件（1974年第三号），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2] 指基辛格。

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主席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毛主席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1974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孟博托·塞塞·塞科。

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1974年）

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一、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1]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时，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

---

[1]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1]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

[1] 勃列日涅夫，当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诉衷情[1]

（1974年）

父母忠贞为国酬[2]，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就，
身躯倦，
鬓已秋[3]。
你我之辈，
忍[4]将夙愿，
付与东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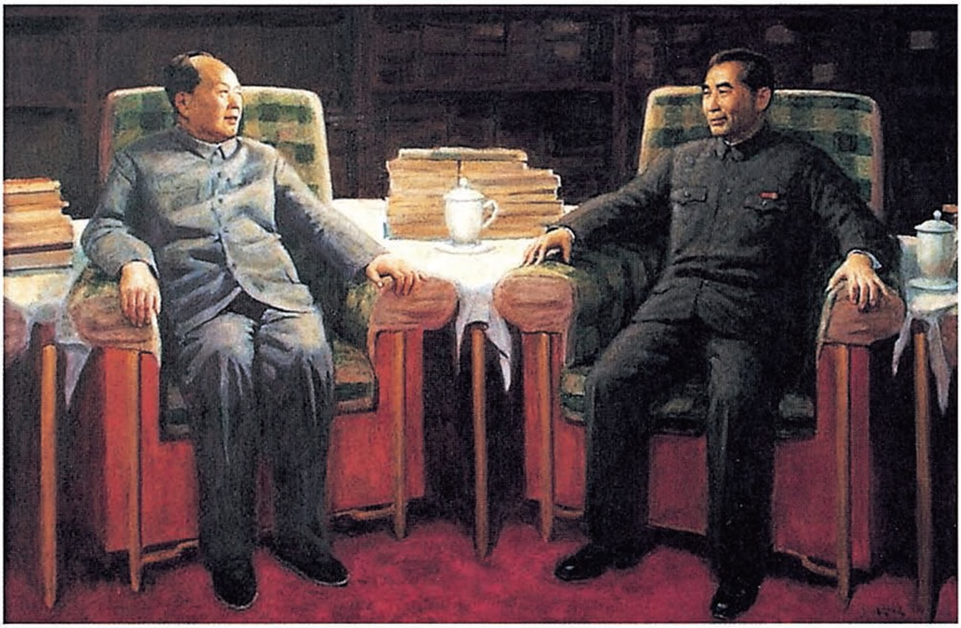
---

[1] 这是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一首词。当时，毛泽东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周恩来患有癌症，亦在重病中。这首词，字数虽不多，但周恩来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豪情，却跃然纸上。毛泽东已经预感到，革命将发生曲折，他和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夙愿将要“付与东流”。他问自己，也问周恩来：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究竟“靠谁守”？此词情感真挚，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2] 酬，报答。为国酬，就是“为酬国”。

[3] 鬓已秋，两鬓发白如同秋霜，喻年事已高。

[4] 忍，岂忍。夙愿，平素的愿望。



《毛泽东和周恩来》（油画）

1975

1975年，毛泽东在北京。

给江青的信[1]

（1975年1月4日）

江青：

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

毛泽东
一月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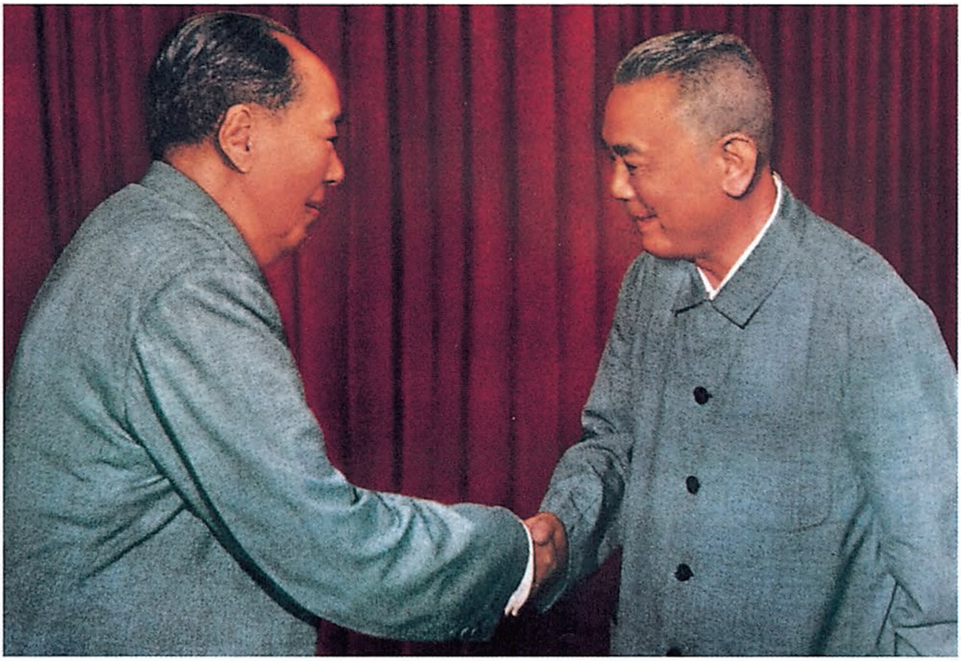
---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4年12月3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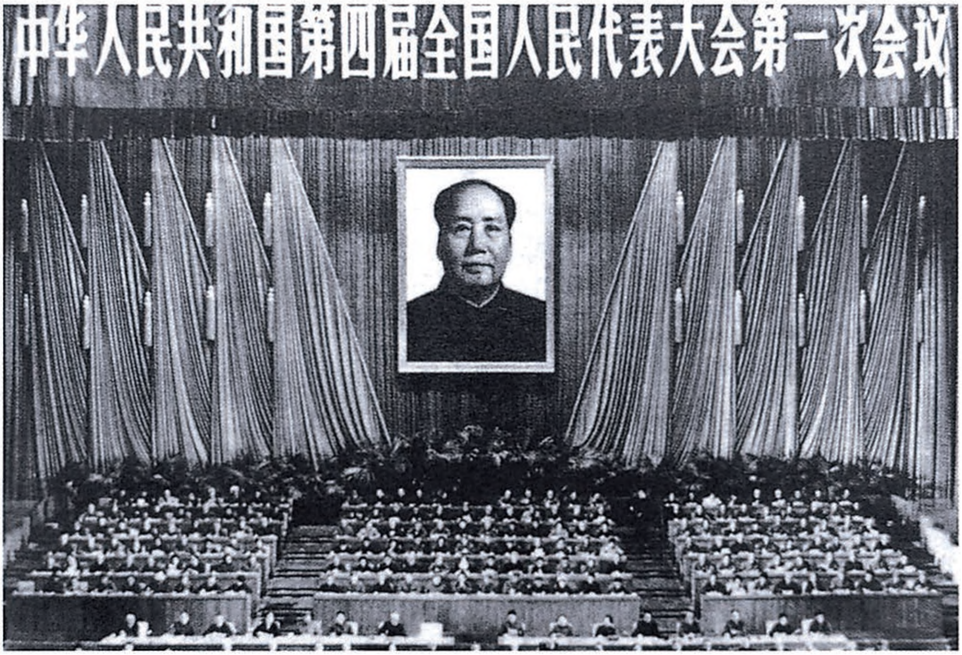
1975年1月9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马耳他共和国总理多米尼克·明托夫。

1975年1月，毛泽东会见德国客人施特劳。

1975年，毛泽东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



1975年，毛泽东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1975年，毛泽东在长沙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

印发张春桥、姚文元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论述的批语[1]

（1975年2月2日）

同意印发。

毛泽东

二月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张春桥、姚文元1975年1月2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送上我们摘录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共20条，5000字，不知是否符合主席的要求。如果这次摘录的不行，我们可以再摘录一次，如果基本可用，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参考，也请批示。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语录33条，其中列宁的语录（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此次报送的20条在内）23条。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1]

（1975年2月27日）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2]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3]有

---

[1] 本篇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2月28日印发，分送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意见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并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所作的说明。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3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在《人民日报》上公布。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战犯管理所召开大会，宣布特赦释放的在押战犯293人名单，并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至此，在押的战犯全部处理完毕。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文件上原文如此。这句话似指锦州等地还有一些战犯没有列入当时送审的一份特赦释放在押战犯的名单。

[3] 当时送审的一份有关释放在押战犯的报告中讲道，拟给释放的每个战犯发15元零用钱，但不开欢送会。另有13名罪大恶极的战犯拟继续关押，不予释放。

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泽东等祝贺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完全解放金边的电报

（1975年4月17日）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亲王，
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总司令乔森潘先生阁下：

在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攻势下，金边已经完全解放。捷报传来，人心振奋。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英雄的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和全体柬埔寨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五年前，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了朗诺叛国集团的反动政变，甚至悍然出兵柬埔寨，妄图把一个独立、和平、中立的柬埔寨变为它的殖民地。富有光荣反帝革命传统的柬埔寨人民不畏强暴，揭竿而起，团结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周围，进行了整整五年英勇顽强的战斗，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柬埔寨人民通过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要坚持正确的道路，弱国就

一定能够打败强国，小国就一定能够打败大国。

柬埔寨人民在长期武装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世界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赢得了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扬。柬埔寨人民的伟大胜利，不仅为印度支那人民的反帝斗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和推动着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

中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兄弟。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斗争中一贯互相同情、互相鼓舞、互相支持，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柬埔寨人民的胜利就像对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可以相信，在今后的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同你们站在一起，共同前进。

金边的解放，标志着柬埔寨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深信，柬埔寨人民在以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为主席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旗帜下，加强整个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大团结，继续英勇奋斗，就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柬埔寨将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于北京

1975年，毛泽东会见柬埔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尔布特。

1975年4月18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和中东[1]

（1975年4月20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欧洲人来，我都劝他们要注意苏联。现在的世界不太平，不安宁。你们不要怕我们，我们不会侵略到你们欧洲去。

莱奥·廷德曼斯（以下简称廷）：我正是接受了你们的友好邀请才来访问的。

毛：我希望你们团结起来。

廷：我们两个人都在致力于实现欧洲团结。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欧洲、西欧的统一，实现欧洲一体化。

毛：这个好，我们赞成。

廷：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主席先生曾两次去过莫斯科，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能再和苏联友好下去的？

毛：他们骂我们，毁了合同，撤了人员。他们偏袒印度人，反对我们。他们要来，我们就不客气。现在是打舌仗。

他们现在还不敢侵略中国。我看他们主要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中东。我不是吓你们，我是希望你们注意，不然会吃苏联人的亏。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比利时首相莱奥·廷德曼斯时谈话的一部分。

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5年4月23日）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送审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新华社1975年4月20日的这个报告中说，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们要大力报道各级干部认真读书，刻苦钻研，决心弄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对学习中不求甚解的作风。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这个报告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1975年第一二六号文件印发。《人民日报》1976年11月19日发表的《“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黑纲领——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反经验主义为“纲”》一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

（1975年4月30日）

西贡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阁下，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阁下，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南方军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南越傀儡政权，终于解放了西贡。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喜讯传来，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欢欣鼓舞。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越南南、北方全体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崇高的敬意。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

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越南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西贡傀儡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巴黎协定、拒绝实现民族和睦、疯狂屠杀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战，终于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反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解放越南南方的辉煌胜利。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和兄弟。中国人民一向把越南人民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斗争，把越南人民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在过去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在今后的岁月里，中国人民仍将坚定不移地同越南人民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们衷心祝愿越南南方人民在继续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一个独立、自由、统一、繁荣的新越南一定实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于北京

关于知识分子的两句话[1]

（1975年5月3日）

一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

二

老九不能走。[2]

---

[1] 本篇一、二是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说的两句话。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句话。

[2] “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把知识分子贬称为“臭老九”，毛泽东在这里借用“老九”指知识分子。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51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2卷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 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2卷

润 东 出 版 社

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52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

（1975年5月3日）

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8

（1975年5月17日）

对苏振华关于海军建设报告的批语 ……………………………10

（1975年5月23日）

对白云涛关于农产品应实行不同收购价格来信的批语 …………11

（1975年5月25日）

给加蓬总统邦戈的信 ……………………………………………16

（1975年6月27日）

关于原林办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 …………………………18

（1975年6月30日）

对嫌疑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 ……………………………………19

（1975年7月1日）

对林默涵来信的批语 ……………………………………………20

（1975年7月2日）

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 …………………………………21

（1975年7月）

对《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批语 ………………………………22

（1975年7月13日）

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和批语 ……………………………………………23
（1975年7月14日、11月15日）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 ………………………………………………28
（1975年7月至11月）
对红线女关于降低山区农村食盐价格来信的批语 ………………35
（1975年8月13日）
关于《水浒》的评论 …………………………………………………36
（1975年8月14日）
对姚文元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等的批语 ……………38
（1975年8月、9月）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41
（1975年9月1日）
对陈永贵关于农村工作几点建议的批语 ……………………………44
（1975年9月3日）
对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的批语 ………46
（1975年9月9日）
对《化石》编辑部张锋来信的批语 ……………………………………48
（1975年9月16日）
对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请示报告的批语 ……………………………49
（1975年9月）
对社队办企业的三份材料的批语 ……………………………………50
（1975年9月27日）
对陆定一家属来信的批语 ……………………………………………53
（1975年9月28日）
对文年生家属来信的批语 ……………………………………………54
（1975年9月28日）

对邓小平关于陈丕显工作调动报告的批语 ……………………………55
（1975年9月30日）

对华罗庚来信的批语 ……………………………………………………56
（1975年10月5日）

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 ………57
（1975年10月16日）

对邓小平关于早日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和补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报告的批语 ……………………………………………………………59
（1975年10月22日）

关于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的批语 ……………………………61
（1975年10月27日）

对邢燕子、朱克家等十二名知识青年代表来信的批语 ……………62
（1975年10月27日）

对王恩茂来信的批语 ……………………………………………………63
（1975年10月28日）

对曾志等要求给陶铸甄别的来信的批语 ………………………………64
（1975年10月30日）

毛主席重要指示 ………………………………………………………66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关于接待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的批语 …………………………………72
（1975年11月）

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74
（1975年11月13日）

对李素文要求多到基层接触实际的来信的批语 ………………………75
（1975年11月14日）

关于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批语 ……………………76
（1975年11月15日）
对李维汉审查结论的批语 ……………………………………………78
（1975年11月、12月）
对王曼恬要求免掉文化部工作来信的批语 …………………………80
（1975年11月18日）
对张伯恒来信的批语 …………………………………………………81
（1975年11月19日）
关于打招呼会议的两个批语 …………………………………………82
（1975年11月22日、23日）
对乐天宇来信的批语 …………………………………………………84
（1975年11月24日）
在苏振华关于拟到东南沿海视察的报告上的批语 …………………85
（1975年11月）
中美关系会一点点好起来 ……………………………………………86
（1975年12月2日）
毛泽东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电报………………102
（1975年12月5日）
对王世英家属来信的批语……………………………………………104
（1975年12月13日）
对袁血卒来信的批语…………………………………………………105
（1975年12月18日）
对叶剑英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报告的批语………………………106
（1975年12月20日）
对江青来信的批语……………………………………………………108
（1975年12月27日）

对周恩来丧事安排请示报告的批语……………………………………111
（1976年1月9日）
对周恩来悼词的批语………………………………………………………112
（1976年1月）
毛泽东等悼念波德纳拉希逝世的唁电…………………………………114
（1976年1月25日）
对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116
（1976年1月31日）
贺新郎·改张元幹《送胡邦衡谪新州》　……………………………117
（1976年初）
关于知识青年问题宜专题研究的批语…………………………………119
（1976年2月12日）
给刘大杰的信………………………………………………………………120
（1976年2月12日）
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121
（1976年2月23日）
对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123
（1976年2月25日）
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批语……………………………………………125
（1976年3月10日）
对中央关于劝阻强行登车来京人员的通知稿的批语…………………127
（1976年3月24日）
对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的批语……………128
（1976年4月7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决议稿的批语…129
（1976年4月7日）

对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稿的批语……………………………131
（1976年4月7日）
对天安门事件的指示……………………………………………………132
（1976年4月7日）
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中诗文原件的批语……………………………136
（1976年4月13日）
对毛远新请示报告的批语………………………………………………138
（1976年4月）
改《诗经·小雅·采薇》断句……………………………………………139
（1976年春）
毛泽东等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的电报………………140
（1976年4月16日）
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142
（1976年4月30日、6月25日）
和部分政治局委员的谈话………………………………………………150
（1976年6月15日）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全国实现统一的电报……………………………151
（1976年7月3日）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153
（1976年7月10日）
五绝·咏梅*………………………………………………………………191
七绝·咏菊*………………………………………………………………192
五律·春夜渡海*…………………………………………………………193
水调歌头·归舟迎日出*…………………………………………………194
沁园春·再访十三陵*……………………………………………………195
七律·雷电*………………………………………………………………197

七绝·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198
西江月·赠天津团市委*……199
清平乐·赠张志坚*……200
七律·别友人*……201
七律·跨东海*……202
七律·答友人*……203
七律·捷报*……204
读《古诗源》批语……205
读《初唐四杰集》批语……207
读《甲乙集》批语……213
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语……214
读《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批语……219
读《历代诗话》批语……222
读《分甘余话》批语……223
读《明人百家小说》批语……225
读《智囊》批语……229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246
读《聊斋志异》批语……249
读《李氏文集》批语……256
读《古文辞类纂》批语……258
读《两般秋雨庵随笔》批语……274
读《楹联丛话》批语……275
读《史记》批语……278
读《汉书》批语……281
读《后汉书》批语……285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291
读《晋书》批语……308
读《宋书》批语……312
读《隋书》批语……315
读《南史》批语……316
读《北史》批语……338
读《旧唐书》批语……341
读《新唐书》批语……352
读《旧五代史》批语……369
读《新五代史》批语……379
读《宋史》批语……387
读《明史》批语……392
读《资治通鉴》批语……397
读《通鉴纪事本末》批语……400
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批语……412
读《宋史纪事本末》批语……416
读《元史纪事本末》批语……418
读《明史纪事本末》批语……420
读《十六国春秋》批语……427
读《读通鉴论》批语……428
读《王湘绮全集》批语……432
毛泽东主要著作写作地点……435
毛泽东自传……436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494
1893年……494

1902年~1909年 ……………………………………494
1910年 ……………………………………494
1911年 ……………………………………494
1913年 ……………………………………495
1914年 ……………………………………495
1918年 ……………………………………495
1919年 ……………………………………495
1920年 ……………………………………496
1921年 ……………………………………497
1922年 ……………………………………497
1923年 ……………………………………497
1924年 ……………………………………498
1925年 ……………………………………498
1926年 ……………………………………498
1927年 ……………………………………499
1928年 ……………………………………500
1929年 ……………………………………500
1930年 ……………………………………501
1931年 ……………………………………501
1932年 ……………………………………502
1933年 ……………………………………503
1934年 ……………………………………503
1935年 ……………………………………504
1936年 ……………………………………505
1937年 ……………………………………506

1938年 ……………………………………………507
1939年 ……………………………………………507
1940年 ……………………………………………508
1941年 ……………………………………………509
1942年 ……………………………………………510
1943年 ……………………………………………510
1944年 ……………………………………………511
1945年 ……………………………………………512
1946年 ……………………………………………513
1947年 ……………………………………………513
1948年 ……………………………………………514
1949年 ……………………………………………515
1950年 ……………………………………………516
1951年 ……………………………………………516
1952年 ……………………………………………517
1953年 ……………………………………………517
1954年 ……………………………………………518
1955年 ……………………………………………518
1956年 ……………………………………………519
1957年 ……………………………………………520
1958年 ……………………………………………521
1959年 ……………………………………………522
1960年 ……………………………………………523
1961年 ……………………………………………523
1962年 ……………………………………………524

1963年 ······························524
1964年 ······························525
1965年 ······························525
1966年 ······························526
1967年 ······························526
1968年 ······························527
1969年 ······························527
1970年 ······························528
1971年 ······························528
1972年 ······························529
1973年 ······························529
1974年 ······························529
1975年 ······························530
1976年 ······························530
韵目代日表······························532
地支代月代时表······························533
后记······························535

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1975年5月3日）

毛泽东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到会者一一同毛握手。

（在和周恩来握手时）

周：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

毛：怎么样？还好吗？

周：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和叶剑英握手时）

毛：老帅呀。

（在和邓小平握手时）

毛：小平呀。

（在和陈锡联握手时）

毛：你要挂帅呀。

（在和纪登奎同志握手时）

纪：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和吴德握手时）

毛：吴德有德呀。

（在和陈永贵握手时）

毛：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

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在和吴桂贤握手时）

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我不认识你啊。

吴：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不知道。

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你是延安人哪？

周：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和苏振华握手时）

毛：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比小指）。

苏：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用无名指作比）。

（在和谢静宜握手时）

毛：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

谢：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

毛：试试看吧，搞不好就卷铺盖。（毛做了一个卷铺盖的手势）

毛：多久不见了[1]，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2]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3]，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

---

[1] 毛泽东自1974年7月去南方休养了10个月，刚刚回到北京。

[2] 文元，即姚文元，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3] 指江青等呈送的上海机床厂搞的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

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1]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2]，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

---

[1] 小谢，即谢静宜，当时任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2] 林彪1934年6月17日发表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提出了27条实施措施和注意事项，文章最后说：最后让我引用华夫同志的话来结束我这篇文字吧！“我们要特别指出最危险的简单化及机械化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的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因此我们必须估计每次战斗的经验，来补足及变更我们的战术。在这创造的工作中我们应造成最后的胜利最重要的前提之一。”

古。邓是你（邓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邓小平）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即要批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嗯。

毛：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毛：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斗争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

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1]。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〇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曰锡矿，其实没有锡。

无锡锡山山无锡

---

[1] 1931年7月15日，王明实际主持当时临时中央工作，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照搬苏联经验，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1932年4月4日，当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毛泽东要叶剑英念了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周：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毛泽东与到会者一一握手告别）

（在和周握手时）

毛：还是三句话。

（在和王洪文握手时）

王：按主席的指示办。

毛：你不要（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

江青：听主席的。

张春桥：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照主席的指示办。

（在和陈锡联握手时）

毛：司令官呢。

吴桂贤：主席保重。

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

（1975年5月17日）

一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印发中央同志。

毛泽东

一九七五．五．十七日

---

[1] 1975年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贺诚的女儿贺礼荣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信，要求给她的父亲分配工作。本篇一、二是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军委1975年5月16日建议贺诚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其附件的批语。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毛泽东的批语及附件作为1975年第一四四号文件印发。6月12日，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向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时写到，贺诚已分配工作，对于傅连暲，责成总后勤部党委作出平反报告。

二

傅连暲[1]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毛泽东

一九七五．五．十七．

---

[1] 傅连暲，原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1968年3月去世。

对苏振华关于海军建设报告[1]的批语

（1975年5月23日）

同意。

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毛泽东

一九七五．五．二十三．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1975年5月22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5月8日，我根据个人追记，向海军党委常委传达了主席5月3日晚对海军的指示。昨晚政治局同志学习主席这个指示时，发现我追记的有些出入，根据核对记录，主席指示为："管海军靠你，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是否准确，请主席审示。我们拟将主席的这个重要指示向海军部队和有关工业部门传达（第一句不传达），是否得当，请指示。主席早在1953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曾指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建设一支强大海军。但是，海军建设经过20多年时间，现在仍然很小。目前，我国已自力更生建成了相当规模的造船工业基础，可年产5万吨左右军用船只，并将逐年提高造船能力。我们一定要遵照主席指示办，努力把海军各项工作搞好，力争在10年左右建成一支较强大的海军。中共中央办公厅曾将苏振华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作为1975年第一四六号文件印发。

对白云涛关于农产品应实行不同收购价格来信的批语

（1975年5月25日）

此件[1]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

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

请先念主持办理[2]。

毛泽东

一九七五．五．二十五．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干事白云涛1975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目前国家在对集体所有制征购同种类粮谷时，没有完全考虑到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等等不同的情况，一律按同一价格收购，这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是造成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我设想，国家目前实行的同一征购价格，能否加以变更，即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调整价格后，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小农村社、队之间的差别和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伐。同时，还可以从经济上限制小生产者的产生和发展。这封来信和毛泽东的批

语，曾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2] 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他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9月份又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召开几次座谈会进行讨论研究。最后由调查组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白云涛同志建议的区别穷队与富队实行两种收购价格，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富队拼命生产但价格低，穷队生产未搞好反而价格高，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治上造成农民之间的对立。而且形成穷队与富队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与人们的主观努力也有很大关系。生产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对不同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两种价格，实际上是“鞭打快牛”，在具体工作上也难以操作，因为商品可以在队与队之间流动，国家的收购站是难以区别对待的。

1975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子女。图为毛泽东和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亲切握手。

1975年6月，毛泽东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

1975年6月，马科斯及其夫人来华拜会毛泽东。

1975年6月，毛泽东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

给加蓬总统邦戈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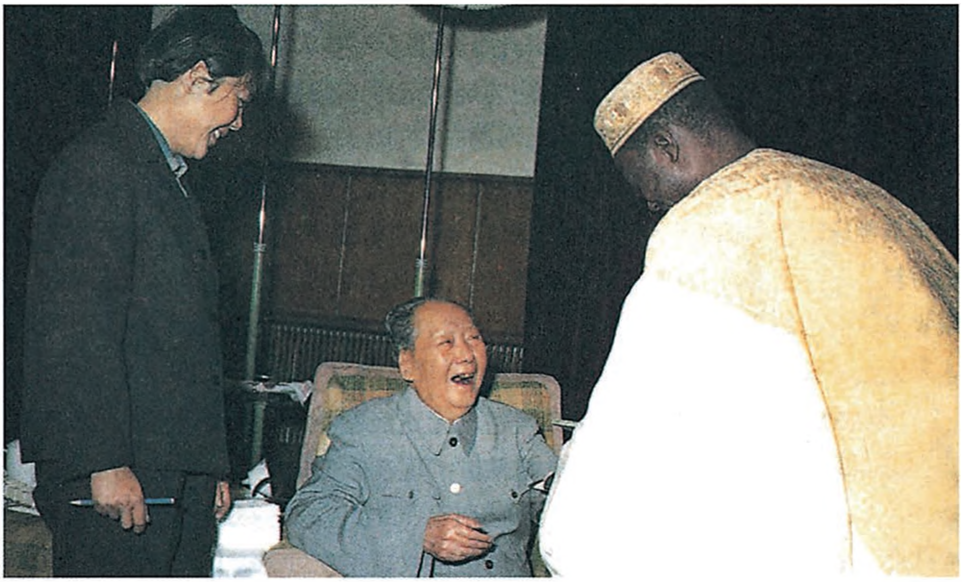
（1975年6月27日）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倚枕

1975，6，27



197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

关于原林办[1]工作人员处理问题的批语[2]

（1975年6月30日）

中央：

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

请讨论决定。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六月三十日

---

[1] 林办，指林彪办公室。

[2] 这是对蒋葆生1975年6月24日来信的批语。信中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原系北京医院医生，“九一三”事件前被组织派往林彪处做保健工作。“九一三”事件后，组织上决定我参加学习班，集中学习，到现在已近4年，而我的问题如同其他学员一样，至今仍未作出正式结论。当前，全国正遵照您的指示，认真落实政策，我感到十分鼓舞，渴望自己也能早日回到原工作单位，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其他学员同志的问题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

对嫌疑人员[1]处理问题的批语

（1975年7月1日）

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

---

[1] 可能指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

对林默涵来信[1]的批语

（1975年7月2日）

中央：

周扬一案[2]，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附林默涵来信。

毛泽东
一九七五. 七. 二日

---

[1] 林默涵，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1975年6月2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5月底中央宣布对他解除监护、恢复自由，使他深感党是真正爱护干部的，希望继续留在党内。他表示有决心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

[2] 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197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等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彻底平反。此后，周扬即被放出。

对“四人帮”文艺政策的批评[1]

（1975年7月）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

[1] 这是毛泽东1975年7月初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谈话的一部分。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两段话。

对《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批语[1]

（1975年7月13日）

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三日

---

[1] 1975年7月13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胡乔木（当时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一文送毛泽东审阅。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邓小平的报告后面还附送了胡乔木7月12日《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一九五六年五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毛泽东审阅后，写了这个批语。这篇讲话后来编入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第五卷出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

关于文艺工作的谈话和批语[1]

（1975年7月14日、11月15日）

一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那时被攻击，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

我们怕什么？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75年7月14日和江青谈话的记录整理稿，毛泽东11月15日审阅时曾作了一些修改。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三）》中引用了这篇谈话。本篇二是在王洪文1975年11月14日为报送《关于上海召开大型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简报》给毛泽东的信上写的批语。王洪文的信中说："最近听到下面有些人在传抄主席与江青同志七月十四日的谈话内容。因此我建议是否可以将主席这次谈话精神传达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有关文化单位。"

话登在报上，最后还是被我们打退了。

以前的《万水千山》[1]没有二、四方面军，这不好。现在听说改好了。

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反杜林论》，柏林大学撤了杜林[2]的职，恩格斯不高兴了，争论是争论嘛，为什么撤职？杜林这个人活了八十多岁，名誉不好。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林彪[3]不跑，我们也不会杀他，批是要批的。

蒋介石的时候，报纸、广播、学校、电影都是他们的，他们蒙蔽人民。我们都是从那儿来的。我学孔夫子、资本家十三年，就是不知道马列，十月革命后才学马列，过去不知道。反动派没有多少威力，靠剥削过生活，他的兵都是靠抓壮丁，所以我们不怕他们。

---

[1] 《万水千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话剧团1955年首演的反映红军长征的十幕话剧。毛泽东1964年观看了演出，肯定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提出了修改意见。后经反复加工修改，1974年10月1日再次公演。

[2] 杜林，即卡尔·欧根·杜林，德国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曾任柏林大学讲师。他曾扬言要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行“全面的变革”，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1876至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对杜林的理论体系作了系统的批判。1877年，杜林因公开指责柏林大学物理系教授赫尔姆霍茨，被取消了讲师资格。

[3] 林彪，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文革”中伙同陈伯达等组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互相争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1973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开除林彪的党籍。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怕死的是林彪，叫他打锦州，他不打，最后两天他去了，俘虏十万人。又消灭了廖耀湘[1]。长春沈阳解放。

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

二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请讨论一次。

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2]，请文元[3]同志找出此文印发，以供讨论之用。

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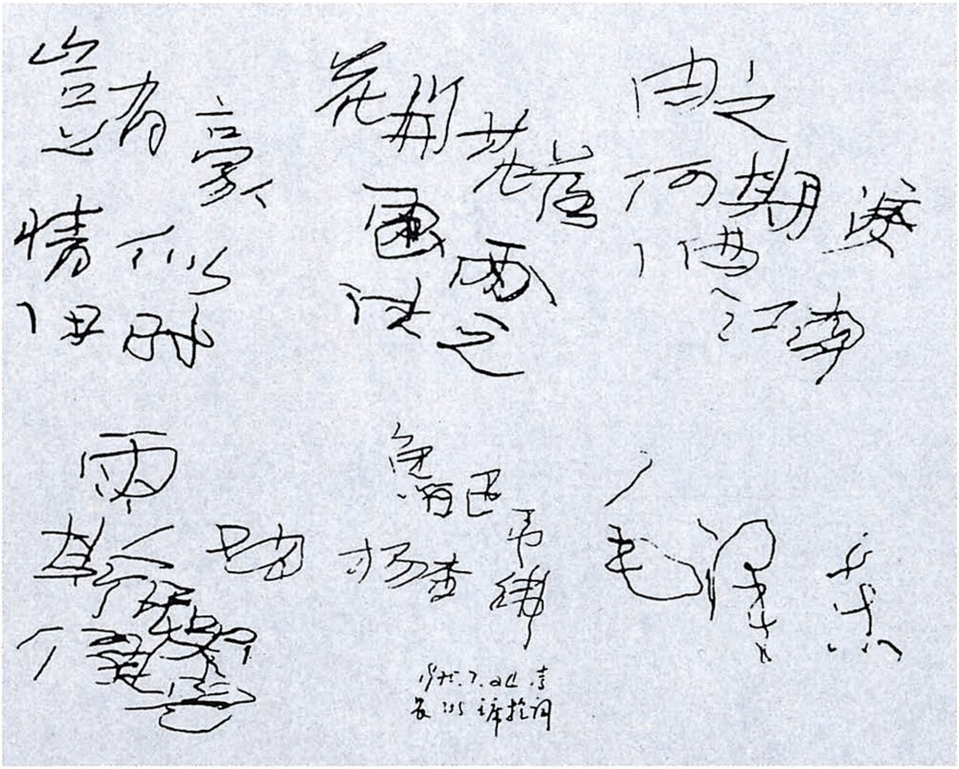
十一月十五日

---

[1] 廖耀湘，原任国民党军第九兵团中将司令。1948年10月底，在辽沈战役第二阶段中全军覆没后被俘。

[2] 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参见鲁迅杂文集《准风月谈》中《关于翻译（下）》。鲁迅在文章中以有烂疤的苹果作比喻，批评那种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在文学批评中对作者、作品、译作求全责备的做法，希望批评家不要因为苹果有烂疤就一下子抛掉，而应做些削烂苹果的工作。

[3] 文元，即姚文元。



豈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鲁迅悼杨铨
毛泽东

1975.7.24 书
[illegible]

1975年7月24日，毛泽东盲书鲁迅《悼杨铨》诗作赠唐由之。

197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和中国眼科专家唐有之（左三）等医护人员合影。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组批语[1]

（1975年7月至11月）

一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信[2]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来信的批语；本篇二是对电影《海霞》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来信的批语；本篇三是对山东省章丘县明水公社侯家学校教工谢革光来信的批语；本篇四是对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青年教师李春光的一张大字报的批语；本篇五是对冼星海夫人钱韵玲来信的批语；本篇六是对鲁迅之子周海婴来信的批语；本篇七是对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来信的批语。

[2] 张天民1975年7月18日分别给毛泽东、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当时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批判故事片《创业》、指责它“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所谓“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建议重新上演该片。毛泽东看信后写了这个批语。197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毛主席语录”专栏内发表了这个批语的主要内容。

二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1]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三

同意。[2]

毛泽东
九月十九日

---

[1] 电影《海霞》是根据黎汝清的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1975年初摄制完成。当时主管电影的文化部提出几十条意见，令摄制组检查创作思想。1975年6月15日，影片经修改后再次送文化部审查，仍然受到刁难。为此，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7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海霞》修改后，全厂普遍认为比原来有改进。谁知就因为我们保留两点意见，文化部便决定：‘完全按原来（即第一次审查之前）的上演，新改的镜头一概不用。’理由是修改了就不好批判了。”7月29日，毛泽东看了来信后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审查了这部影片，决定按创作者修改过的片子上映。中央办公厅将这封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作为1975年第一八三号文件印发。

[2] 谢革光1975年7月20日给红旗杂志社的信中写到，由于各种文艺书刊相继复刊或创刊，因此《诗刊》的复刊已成为广大群众热切盼望的一件事。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将这封信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张春桥的报告上。

四

此件有用，暂存你处。[1]

五

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2]

---

[1] 1975年8月2日和4日，李春光在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对电影《创业》批示的会议上，先后3次发言。会后，他将发言整理成文，于8月8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大字报尖锐地批评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炮制“十条罪名”，扼杀《创业》，后又消极抵制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认为“不批判‘十条’，不利于领会主席‘批示’”，并对“十条”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大字报中，李春光还提出了解放干部、落实政策的问题；批评文化部负责人在理论研究上“不讲马克思，不讲列宁，不讲主席，不讲鲁迅，专讲一些伟大发现”；在办刊物、抓创作上“事情没有办好”；好责怪别人，没有自我批评，压制不同意见等。当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的邓力群看到这张大字报的抄件后，写了一个二三百字的简报，连同抄件一起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小平将这份大字报转报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

[2] 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1975年9月27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今年10月30日是星海逝世30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10周年、20周年，聂耳逝世20周年、30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日本藤泽市民都召开了纪念大会，而我们国内却没有表示。”“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

六

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1]

毛泽东
十一月一日

七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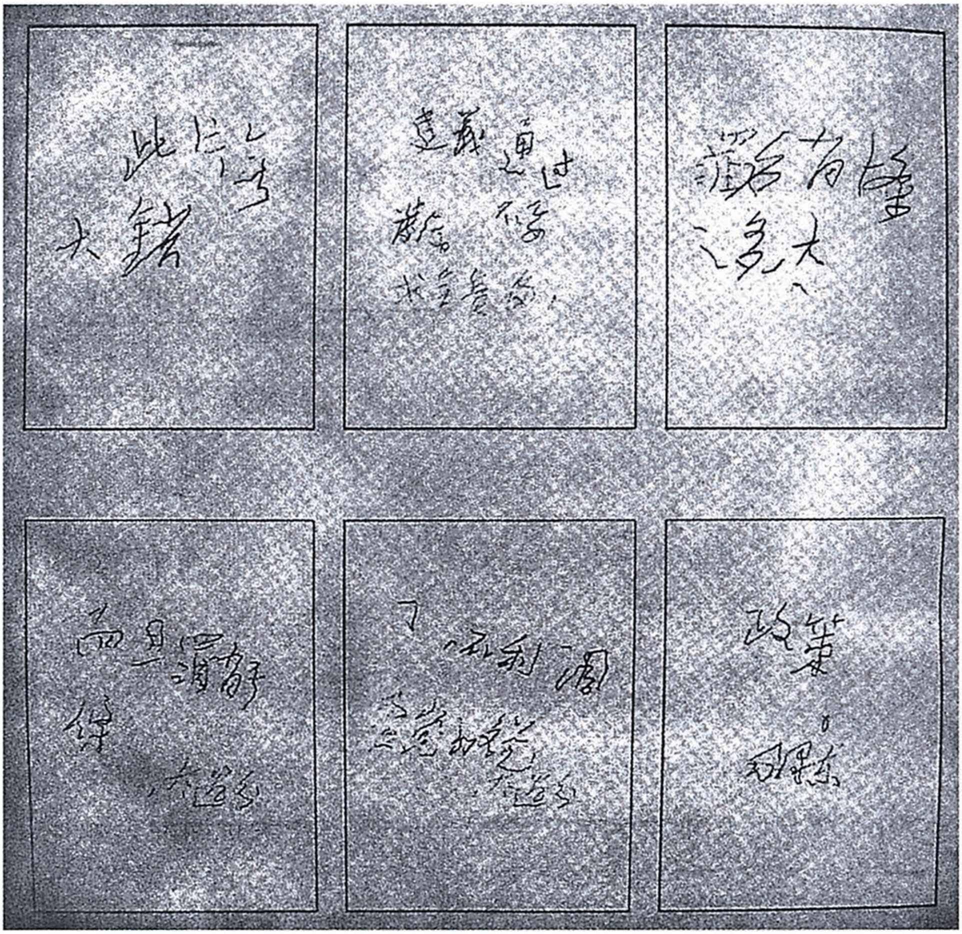
---

[1] 鲁迅之子周海婴1975年10月28日给毛泽东写信说："出版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始终是母亲多年的愿望。"母亲去世"至今七年多了，书信集的出版仍然毫无消息。我非常希望书信手稿能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以便于做两件事：一是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供研究工作者使用；二是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包括鲁迅给日本友人的信等），供广大读者阅读"。信中还请求毛泽东指示出版局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对于开展鲁迅研究也提出了看法和建议。11月1日，毛泽东阅信后写了这个批语。不久，国家出版局即作出规划：立即着手出版包括现存全部鲁迅书信的《鲁迅书信集》；新注鲁迅著作单行本26种，1977年年底前出齐；新注《鲁迅全集》十五卷（正式出版时为十六卷），1980年年底前出齐。12月5日，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国家文物局、国家出版局关于贯彻毛泽东批示的报告。

五卷。[1]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语的手稿。

---

[1] 姚雪垠1975年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帮助解决他写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出版问题。10月23日，胡乔木将姚雪垠的这封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胡乔木的报告上。

1975年，毛泽东会见客人。

1975年，毛泽东会见国际友人。

1975年，毛泽东会见国际友人。

对红线女关于降低山区农村食盐价格来信[1]的批语

（1975年8月13日）

印发政治局在京各同志，并议一下。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

---

[1] 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1975年8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我到延安、大寨、红旗渠参观学习，发现那里的食盐卖得太贵了。太原食盐是一角一分一斤，林县卖一角三分，昔阳县臯落大队卖一角六分，其他有的地方还卖到了一角八分。山区的盐比城市贵那么多，我觉得这是对待山区，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态度问题。像食盐、布匹这类人人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照主席历来关心群众生活的教导去办。因此，僻野山区的盐价，就是要比城市低廉才对。这封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曾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关于《水浒》的评论[1]

（1975年8月14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

---

[1] 本篇是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的谈话，曾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第一九六号文件印发。《人民日报》9月4日发表的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引用了其中的第一、二段文字。中共中央1977年9月23日转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篇谈话全文。《水浒》，即《水浒传》，又称《忠义水浒传》，明初小说家施耐庵根据《大宋宣和遗事》及有关话本与民间流传的水浒故事加工整理而成。主要版本有明嘉靖年间武定侯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一百回本；明杨定见刻本《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清金圣叹评点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七十一回本。这3种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后来都出过重排本。

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对姚文元关于开展对《水浒》评论的报告等的批语[1]

（1975年8月、9月）

一

同意。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1975年8月14日给毛泽东的报告的批语。报告中说，接到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后，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的需要看，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是很需要的，对于反修防修，是有积极意义的。为执行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情：1. 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市委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报告。2. 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达落实主席指示，做好三种版本印上鲁迅评论的工作。3. 在《红旗》上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段落，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订一个规划。8月18日，姚文元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本篇二是对姚文元9月2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批语。姚文元在送审稿上写道：“《人民日报》拟发一短社论，引用主席的一段评语，现送上，请审批。”这篇社论发表在1975年9月4日《人民日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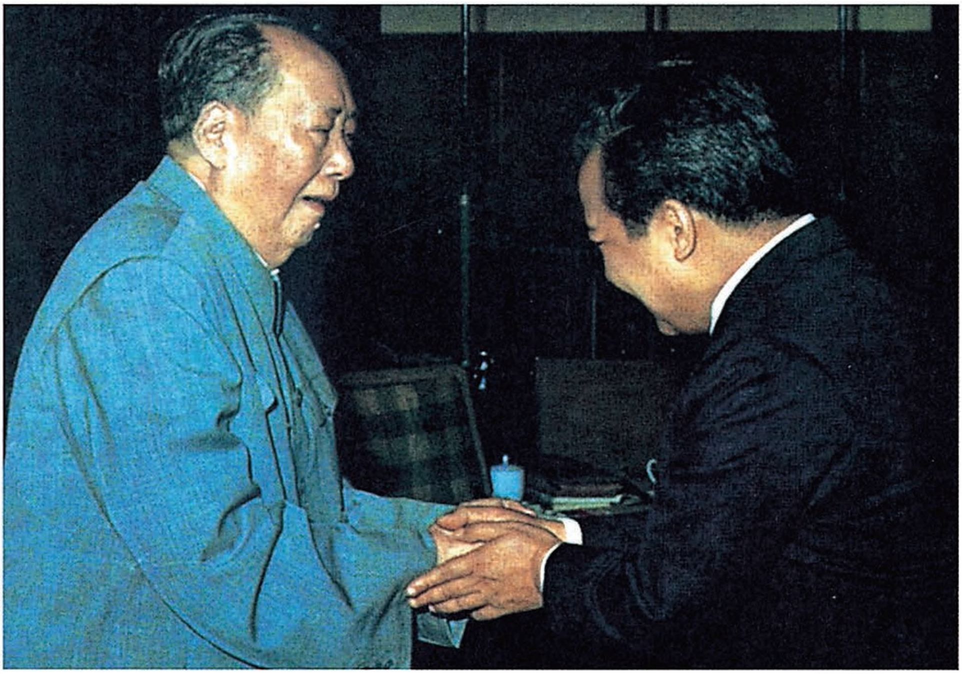
二

送小平、春桥[1]阅。这样，可不发内部指示了。

毛泽东

九月二日

退文元同志。



1975年8月，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春桥，即张春桥。

1975年8月27日，毛泽东会见柬埔寨首相宾努亲王。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电报

（1975年9月1日）

河内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越南劳动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越南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1]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胜利地举行了“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十年来，为捍卫自己民族的独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越南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特别在近十几年来，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越南人民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不怕牺牲，艰苦奋战，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终于赶走了侵

---

[1] 胡志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1969年逝世。

略者，摧毁了傀儡政权，完全解放越南南方，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越南人民的胜利，不仅在自己民族解放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同时也是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又一例证，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革命实践雄辩地证明，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拿起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挫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解放，成为自己国家命运的主人。

目前，越南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越南北方人民怀着胜利的喜悦，积极开展劳动竞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努力。越南南方人民以主人公的姿态，正在重建家园，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我们相信，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越南人民，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一定能够把越南建设成为一个和平、统一、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兄弟邻邦。我们两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向都是互相支持、互相鼓舞的。祝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团结和革命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1975年，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

对陈永贵[1]关于农村工作几点建议的批语

（1975年9月3日）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

---

[1] 陈永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3] 指陈永贵1975年8月24日报送的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主要内容是：一、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经过几年生产的发展，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二、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问题。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沿用的还是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弱点一是搞工分挂帅，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三、关于用什么办法照顾穷队的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用国家出钱提高分值的办法，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从加速发展穷队的生产着手。四、关于盖社员住宅问题。集体盖比单户盖好。这是防止扩大社员之间差别和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措施。五、关于社员欠集体的粮食问题。我觉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免了比欠着好，这样能大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毛泽东

1975、9、3

对清理在押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5年9月9日）

建议一律释放。本地不能就业的，转别地就业。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1975，9，9

---

[1]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5年9月7日报送的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的这个报告说，我们对各地在押的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进行了调查摸底，并于最近召开了清理工作会议。现将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一）全国现押的这类人员有三百四十一名，刑满就业的有六百一十二名。（二）在现押的这类人员中，拟对其中以历史罪或主要以历史罪判刑的二百三十二名予以清理释放。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一百零九人，这次不予清理。（三）对清理释放人员，要给予妥善安置。1. 发给释放裁定书，同时宣布摘掉帽子，给公民权。2. 有家的回家，无家可归的、自愿留下的由原劳改单位安置。愿回台湾的可准予回去，并提供方便。3. 释放时发给衣被和零用钱，安置回家的发给路费，回家后生活有困难的酌情予以补助。4. 生活和教育问题由当地民政部门和基层组织负责，其中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的，由统战部门负责，并酌情安置工作。（四）对刑满就业的人员，拟同时清理。除表现很坏的以外，均可摘掉帽子，给公民权。清理后的去路同对待在押犯的原则一样。（五）对因历史罪判刑在押的三千三百多名和已刑满就业的一万名

相当于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清理，将经过调查研究，参照上述精神予以考虑。毛泽东的批语，写在邓小平的送审报告上。9月9日，邓小平进一步批示：“拟照主席批示，由公安部照办。即（四）项的一〇九人，也予释放。县团以上的三千多名，也照此原则办理。”批语中“（四）项的一〇九人”，指因现行罪逮捕判刑的109人。1975年12月15日，司法机关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上党政军特人员一律宽大释放。15日至18日，各地司法机关先后召开了宽大释放大会。

对《化石》编辑部张锋来信的批语

（1975年9月16日）

小平、文元[1]同志：

请考虑，可否将此信[2]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

九月十六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文元，即姚文元。

[2] 指《化石》杂志编辑部张锋1975年9月6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研究所的一名编辑，科普刊物《化石》创办3年来虽然得到工农兵的初步好评，但却受到出版部门个别负责人的排斥、压制和少数权威的挑剔，至今仍为半年刊，且只有一名编辑。听到中央8月27日关于《动物学杂志》《化石》两刊出大字本的指示后，知道我们的刊物得到了毛主席的关注，社、所已同意改《化石》为季刊，编辑增至4人。信中还对科普工作提出了几点具体意见。毛泽东批阅时，为这封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

对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5年9月）

已办，退小平。

另，江青不要参加对越活动。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5年9月16日为送审外交部、中联部关于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方案和接待计划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要求就此问题及几个重大的人事变动问题向毛泽东当面请示。随报告附送的外交部、中联部的接待计划中讲到，拟请江青等出席欢迎越南党政代表团的宴会和专场文艺晚会。越南党政代表团9月22日抵达北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对社队办企业的三份材料的批语

（1975年9月27日）

小平[1]同志：

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2]及一篇报导[3]）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指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1975年9月5日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和华国锋（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74年12月28日给中共湖南省委的一封信。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的来信说，目前我省广大农村的社（队）办企业，如烂漫的山花，冲破种种阻力，到处开放。但省内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致使一些地方的社（队）办企业自由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了弯路。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就千方百计要把它们转变体制，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并说："社办企业转大集体专业社、厂，大集体专业社、厂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大方向。"如不转变体制就不分配原材料，不安排产品销路。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最近中央即将召开

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恳请党中央对这方面作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一些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华国锋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取得了可喜成绩，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但有一些同志对此却瞧不起，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我们劝这些同志要坚决丢掉错误思想，热情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加强领导，全面规划。这样社队企业就会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3] 指《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登载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这篇报道同上述两封信一起，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9月23日至10月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

197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

对陆定一[1]家属来信[2]的批语

（1975年9月28日）

请小平[3]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

九月廿八日

---

[1] 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残酷迫害。1979年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他平反昭雪。

[2] 陆定一的子女1975年中秋节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转交他们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转达了陆定一被关押之前对毛泽东所表达的坚定信念，并期望毛泽东再次挽救他们的父亲。

[3] 小平，即邓小平。

对文年生家属来信[1]的批语

（1975年9月28日）

请汪[2]转小平、春桥酌处。

毛泽东
九月廿八日

可能是冤案。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文年生的妻子苏枫1975年9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年生长征时曾在您身边任军委教导队队长；1942年在延安任关中警一旅旅长兼马兰分区司令员时，您曾亲笔书赠“生产教育二者兼顾”奖励他；1945年他任南下的第三游击支队司令员，是您亲自讲话并为部队送行。他是在您和党的长期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位老干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他以党委副书记身份主持军区党委工作，因不同意黄永胜等人镇压群众的做法，于1967年3月被撤去军区文革小组长职务，后又被撤销了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及其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遭到残酷斗争，于1968年6月6日含冤逝世。去年，我曾向军区复查小组提出给他作出政治结论、公开平反的要求，遭到拒绝。我和我的孩子们以极其悲愤而又沉痛的心情向主席写这封信，盼望着文年生同志遭受的不白之冤早日昭雪。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1975年9月28日，他建议将“毛主席批示和原信印发在京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常委，抄广东省委、总政等有关单位”。中央办公厅后来将苏枫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一起作为1975年第二三六号文件印发。

对邓小平关于陈丕显工作调动报告的批语[1]

（1975年9月30日）

同意。

九月卅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5年9月2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陈丕显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为市革委会副主任。我的意见，他还年青（不到六十），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虑：先调来北京，然后分配到哪个省去工作。是否妥当，请示。”1977年2月，陈丕显调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

对华罗庚来信的批语[1]

（1975年10月5日）

退华罗庚同志。

意思很好[2]。大病新愈，宜多休养一时期，待全好后再去，较为适宜。

毛泽东
十月五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两个孩子1975年10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这是我父亲在病榻上给您的信，因他有病写得很草率，嘱我们抄写清楚呈上。并附原稿。”

[2] 华罗庚1975年10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中，主要谈到他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的情况及其身体状况。

对《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的批语[1]

（1975年10月16日）

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2]。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1975年10月9日编印的《政工简报》第三十一期上。简报登载了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材料。材料说，学部有21人出席了邓小平副总理主持的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庆祝国庆26周年。他们在招待会上听了邓副总理的祝酒词，看到一片朝气蓬勃、团结胜利的景象，非常兴奋。外国文学所原所长冯至说：“宴会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宗教所原副所长任继愈说：“宴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出席的有老年的、中年的，也有青少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大家谈到，宴会充分体现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精神。经济所原副所长严中平说：“参加这次招待会，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文学所原所长何其芳说：“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大家听邓副总理讲要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宏伟目标，极为振奋，都表示要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贡献自己的力量。

有的同志还认为，一些与国民党上层有过联系的人物出席这次招待会，对于党的统战工作有积极的影响。10月13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将这个材料报送邓小平，邓小平10月15日转报毛泽东。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并嘱送政治局各同志。

[2] 梁漱溟，原任全国政协常委。

对邓小平关于早日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和补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报告的批语[1]

（1975年10月22日）

同意。

十月廿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5年10月2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政治局近日会议讨论主席在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国庆宴会反映简报上的批示时，谈到党内党外有一批人需要在政治上早点安排，都同意积极准备，早点召开全国政协会议。另外，政治局一致意见，拟于近日召开一次人大常委会议，补选两位副委员长，一为主席和中央已决定的李大章同志，一为邓颖超同志。

1975年10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

1975年10月，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及其夫人。

关于江青不要下去“蹲点”等问题的批语

（1975年10月27日）

改一改

不要蹲点[1]

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

特别在**北京**

我在北京没有去个〈过〉任何一个地方

说话不要冲口而出。

不要管

要顾大局

不要打电话

不要来看我

有事写信

---

[1] 这句话是针对江青当时到北京等地的一些基层单位以个人名义干扰下面的工作，结党营私、树立假典型等行为而说的。

对邢燕子、朱克家等十二名知识青年代表来信[1]的批语

（1975年10月27日）

应发表。

可惜来的人太少，下次应多来一些。

十月廿七日

---

[1] 邢燕子、朱克家等12名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知识青年代表1975年10月20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说，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12名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全国千百万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回去之后，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转达给广大知识青年。我们一定行动起来，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去，为普及大寨县经验，实现农业机械化，贡献自己的青春。我们还要求各级党委给我们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减少外出参加一些会议，让我们当了干部的知识青年能有更多的时间战斗在基层，扎扎实实地干，带领群众学大寨，决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1975年10月23日将这封信报送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邓小平10月25日转报毛泽东时写道："建议这封信全文或摘要在报上公布，以鼓励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0月28日，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对王恩茂来信的批语[1]

（1975年10月28日）

汪[2]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3]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

毛泽东
十月廿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5年10月2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六六三号上。这期《来信摘要》讲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革委会副主任、新疆军区原第一政委王恩茂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说他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甚为想念，当此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之际，特向主席问好。信中还说，他从红军时期就在部队工作，对部队工作有点经验，现在年龄也不算大，只有62岁，打起仗来还可以上前线，想回部队做点工作。毛泽东批示后不久，王恩茂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政委。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3]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春桥，即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对曾志等要求给陶铸甄别的来信的批语[1]

（1975年10月30日）

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

请汪东兴[2]同志酌处。

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

[1]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妻子曾志、女儿陶斯亮1975年10月分别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陶铸生前对个人历史问题的态度，对专案组关于陶铸所谓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质疑，希望能换一些同志对陶铸进行甄别工作，并在中央讨论、主席审批前将历史结论向家属说明。中共中央办公厅将这两封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作为1975年第二六二号文件印发中央政治局。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陶铸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使他的冤案得到平反。

[2] 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5年10月，毛泽东和新华社记者王殊握手。

毛主席重要指示[1]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

[1] 1975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时是毛泽东的联络员）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此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主要三个方面：1. 阶级斗争为纲；2. 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3. 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正。"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12月21日，毛远新将他整理的毛泽东指示稿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并"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1976年2月2日，毛远新再次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12月21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当日，毛泽东又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以"。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根据毛主席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3月3日6时，毛泽东在审阅这个中央通知稿时曾批示"同意"。本篇根据当时下发的这个中央文件刊印，有个别段落的删节，标题为原标题。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2]。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3]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

---

[1] 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22日的报道说，清华大学党委经调查研究证明：1975年8月和10月，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位同志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合理合法，信中内容属实，根本不是什么“诬告信”。校党委决定公开纠正这个错案，恢复他们的名誉。

[2] 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78年8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76年10月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8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3月起，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也因此触怒了“四人帮”。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他的这些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从此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这次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

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

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 打倒一切，2. 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1]、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

[1] 周荣鑫，当时任教育部部长。1976年4月12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画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

是，蒯大富、聂元梓[1]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2]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3]的《论孔丘》，冯天瑜[4]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5]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

[1] 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68年12月分配到宁夏三〇四厂工作。1970年被送回清华大学隔离审查，后送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1978年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聂元梓，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贴出由她领衔的“第一张大字报”，引起全国性混乱，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1978年北京市公安机关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逮捕她，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2] 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3] 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4] 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5]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关于接待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的批语[1]

（1975年11月）

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

---

[1]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5年11月5日向毛泽东报送外交部关于缅甸总统吴奈温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报告时写道，“奈温已表示希望会见春桥、江青、文元同志，故我请外交部提出由我和春桥两人之一出面接待的方案”，请主席考虑指示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审批。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邓小平报告中“江青同志会见已有安排”一句，并写了这个批语。此外，他还将外交部请示报告中讲到吴奈温抵达和离开时，“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等迎送，改为“请邓小平、张春桥副总理”等迎送；将“由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欢迎宴会，改为“由邓小平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将“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改为“请邓小平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话；将如对方祝酒，“请邓小平或张春桥副总理祝酒”，改为“请邓小平副总理祝酒”。11月11日，吴奈温总统一行抵达北京，邓小平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欢迎宴会并讲话。

1975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缅甸联邦总统、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

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

（1975年11月13日）

过去只有河南同80%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1]、胡[2]、刘冰、李井泉[3]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

---

[1] 周荣鑫，当时任教育部部长。李昌，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耀邦，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

[2] 原文如此。据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1975年11月13日的记录，“胡”指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要负责人胡乔木。

[3] 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李井泉，原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对李素文要求多到基层接触实际的来信[1]的批语

（1975年11月14日）

似可同意。请登奎[2]同志商李素文同志酌处。

十一月十四日

---

[1] 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1975年11月1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长期在基层做财贸工作，最近又接触一些上层的财贸工作，深感现在财贸战线上的形势虽然很好，但桥梁还不那么畅通，纽带联得不那么紧，总想在这方面做点工作，认真执行主席关于实行三个三分之一的指示，扎扎实实地搞些调查研究。今年调我到中央抓财贸工作，这是党对我的信任，但是我担心在上边时间长了会陷到文件堆里，忙于送往迎来。希望能多给我一些机会到基层接触群众，接触实际，多做些调查研究，把财贸工作做好。另外，现在一些妇女工作也让我出面，对这一工作我实在不熟悉，建议由其他熟悉的同志担当，使我集中力量搞好财贸工作。

[2] 登奎，即纪登奎，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组员、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暂时仍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批语[1]

（1975年11月15日）

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三时

---

[1] 1975年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对此，毛泽东写了这个批语。中共中央办公厅将邓小平的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一起作为1975年第二七〇号文件印发。

1975年，毛泽东、邓小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中南海书房合影。

对李维汉[1]审查结论的批语[2]

（1975年11月、12月）

---

[1] 李维汉，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62年、1964年两次受到错误批判，1964年被撤销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9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问。1980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李维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指出中央统战部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的批判，“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组织上是违背毛主席关于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的教导的”。中共中央批准将在这两次错误批判中送中央的有关批判李维汉的几个报告，连同1964年12月25日中央决定撤销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的通知，一并撤销。

[2] 本篇一是对李维汉1975年11月7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来信的批语。李维汉的信中说，我于5月底下放到湖北咸宁温泉镇干休所，几个月来，时常盼望得到审查结论，尤其离开党组织生活已经8年，心情痛苦。希望能留在党内继续学习，并尽可能地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本篇二是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1975年11月18日关于李维汉的审查结论的批语。本篇三是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后于12月13日再次送审的关于李维汉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批语。结论中提出两种处理方案：（一）清除出党，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保留公民权，每月发200元生活费，安置到湖北省养起来。李维汉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二）保留党籍，保留原工资，安置到湖北省养起来。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同意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第一方案。12月1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将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的结论送毛泽东审阅，并写道：“政治局同志也考虑到此人在党内的影响，主席对他的处理，有何考虑，拟请主席定夺。”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2月21日，邓小平将《关于李维汉的审查结论》退中央办公厅时注明：“政治局已按主席批示，照第二方案处理。”

一

请汪[1]查一下此人审查情况，结论如何，告我为盼。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二

印发政治局，讨论确定。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三

可考虑照第二方案处理，请再议。

毛泽东
十二月十四日

---

[1]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王曼恬要求免掉文化部工作来信[1]的批语

（1975年11月18日）

请汪[2]酌处。我看可以同意她回天津。

十一月十八日

---

[1] 王曼恬，毛泽东的表侄女。当时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11月16日，她给毛泽东写信说："全国正在进行组织整顿，我有一个要求，希望在这次整顿中，免掉文化部的工作，而集中精力在天津，深入基层做点工作。""我目前的情况，太特殊了，一个地方干部，又兼文化部部分工作，别的部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作为您的亲戚，深感影响不好。加上我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很低，专业水平很低，非常不适应文化部的工作。""我已六十二岁，能力很差，两头跑，既做不好工作，也有点吃不消，集中精力在天津，可能为党还能做点工作。"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张伯恒来信的批语[1]

（1975年11月19日）

此类事件应归何处处理，请汪酌处[2]。

十一月十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国防科委资料研究所干部张伯恒1975年11月10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我是一个停职隔离审查多年的干部，直到最近国防科委党委才作出决定，解除对我的停职隔离审查，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并向中央军委写了一份审查报告。我对这份报告中的结论部分基本同意，但对其中康生的批示部分是有意见的。信中分六点对康生的批示提出质疑，并写道："绝对地肯定和绝对地否定都不是马列主义的态度，尤其在肃反问题上更不宜先入为主地下结论。如康生同志的批示中说我'肯定与苏修是有关系的'，我认为像这样的结论式文字，倘无充分根据，最好不这样写。"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2月，病死在北京。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他进行审查。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的审查报告，指出康生"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犯下严重罪行"。中央决定把他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1975年11月21日，他将张伯恒的信转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等时写道："毛主席对此信有批示，送上批示和原信，请你们阅后指定同志调查处理。"11月22日，叶剑英批示："建议请总政复查酌处。"

关于打招呼会议的两个批语[1]

（1975年11月22日、23日）

一

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2]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

---

[1] 本篇一写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5年11月21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谈话要点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这个谈话要点在11月24日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读，11月26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这个谈话要点的下达，标志着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对于这场运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予否定，指出它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本篇二是毛泽东11月23日写给邓小平的批语。

[2] 可能指1975年11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毛泽东
十一月廿二日

二

小平同志：

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毛泽东
十一月廿三日

对乐天宇来信的批语[1]

（1975年11月24日）

请汪[2]查一下此人情况。

毛泽东

十一月廿四日

---

[1] 乐天宇，农林科学家。早年在长沙读书时同毛泽东相识，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11月18日，他给毛泽东等写信，反映原林业系统一些有派性的人要开除他的党籍的情况。信中说，“我全部历史，已于1972年经农林科学院派专员核实，并无任何历史问题”，请求中央“让我返回原借用单位（由中国科学院借调到林业部）工作，使我能于晚年尽绵薄于党的事业”。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乐天宇的信上。

[2]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1975年11月25日，他将毛泽东的批语和乐天宇的来信报送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等时写道：“建议请国务院政工小组调查报告。”

在苏振华关于拟到东南沿海视察的报告上的批语[1]

（1975年11月）

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退苏振华。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1975年11月3日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并转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为贯彻落实主席对海军的重要指示，我和肖劲光同志，还有几个管专业的副司令，拟最近出去到东南沿海了解海军部队贯彻执行军委扩大会议情况，研究港湾码头十年建设规划，检查部队装备维修和训练情况。出去时间一个月左右。

中美关系会一点点好起来[1]

（1975 年 12 月 2 日）

福特（以下简称福）：主席先生，我们今天早上有一次很不错的讨论。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们讨论什么？

福：我们讨论了我们同苏联之间的问题，还有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对策，以及我的国家和你的国家有必要合作，去实现那些对我们两国都有利的目标。

毛：我们没有这种本事，我们只能放放空炮。

福：我不相信，主席先生。

毛：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一点。

福：我们也能。

毛：你们也能？那么我们应该达成一项协议。

福：我们还可以使用武力，对付那些制造麻烦的国家。

毛：这个不坏。那么我们可以达成另外一项协议。

福：今天早上，我们讨论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讨论目标。

毛：除了苏联帝国主义者，不可能是别人了。

福：主席先生，今天早上，我们使用了一些很强硬的语言。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福特时的谈话。

毛：（指着邓小平[1]）你们批评他了？

福：我们强烈批评的是另外一个国家。

毛：那个在北面的国家。

福：对。

毛：（对驻美大使黄镇）黄镇[2]同志，事情怎么样了？你还回美国吗？

黄镇：我听从主席的指示。

毛：总统先生，你们要他吗？

福：我们当然要他回去。我们的关系好极了。大使先生回美国是很重要的，就像（驻华大使）布什[3]先生要是留在北京一样。

毛：（对布什）你留在北京吗？

布什：只有几天了。

毛：你升职了。

福：对，他升职了。我们将在一个月里，提名继任者。

毛：我们不想让他走。

福：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所以我要他回美国。但我们会找一个同样好的人来接替他。

毛：那样挺好。我觉得，黄镇同志返回美国更有利。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黄镇，1973年5月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互建联络处，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黄镇任驻美联络处主任。

[3]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又称老布什，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后在1989年1月至1993年1月期间，担任美国第41届总统。

黄：我将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我确实想回国，因为我驻外太久了。但是我将按照主席说的做。

毛：你应该再在那里待一到二年。

黄：好的，我肯定会回去，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

毛：有一些年轻人批评他（指黄镇）。这两个年轻人（指在场的两个翻译唐闻生、王海容）对乔老爷[1]也有一些批评。不能忽视这些人啊，否则你会在他们身上吃苦头的。这是一场内战。现在外面有很多大字报出来。你不妨去清华和北大看看。

福：我不太明白这些东西。主席先生，我希望，你让大使回美国再待两年，意味着我们还能继续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

毛：对，对，我们之间的关系还要继续发展。我觉得，现在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今年、明年、后年，可能都不会有大问题发生在我们两国之间。以后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一点吧。

福：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应对来自诸如苏联那样国家的挑战。

毛：对，我们对苏联一点信心也没有。邓小平同志也不喜欢苏联。

福：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在全世界扩张，掠夺领土和经济资源。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挑战。

毛：好。我们也要面对挑战。

福：我们希望从明年开始，我们的双边关系可以得到改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

---

[1] 乔老爷，指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长。

毛：你是说我们两国之间?

福：对。

毛：那样很好。

福：主席先生，如果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一起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那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就会在我的国家得到支持。

毛：很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苏联到底怎么行动，还需要观察。

福：主席先生，我们必须让苏联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留下深刻印象，言辞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有实际行动。我们将不断对他们施加压力。我希望，来自您的压力，和我们的压力一样强大。

毛：我们就是放放空炮，骂骂人而已。

福：主席先生，我们将要做的就不止于此了，过去也是如此。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坚强有力。我们将来就会这样行动，而不是只说不做、放空炮。

毛：你们有实心炮?

福：对，我们将一直准备火药，如果他们来挑战我们，那么我们的火药就不会闲着。

毛：很好，那样也不坏。不过，现在你们是和平共处。

福：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任何扩张主义行为坐视不管。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应对这些挑战了，并将继续如此。

毛：那样很好。我们需要签署协议吗?

福：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到同样的效果。你从东边施加压力，我从西边施加压力。

毛：可以。这是君子协定。

福：这是最好的取得成功的方法，对付那些不是君子的小人。

毛：他们是小人。

福：我们今天早上用的词，比这个还要强烈。

毛：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

福：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三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它。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

毛：好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福：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

毛：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

福：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毛：举例来说，我们和苏联之间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间这样的谈话。我去过苏联两次，赫鲁晓夫[1]到过北京三次，没有一次谈话是真的令人满意的。

福：主席先生，我与勃列日涅夫[2]先生见过两次。有时谈得很

---

[1] 赫鲁晓夫，原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下台。

[2] 勃列日涅夫，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顺利，有时谈得不好。我想这正是我们坚定态度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没法同意他们的有些提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们将保持坚定，维持军事力量。他们理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两国最有利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起采取坚定立场。这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毛：好的。

毛：你们现在同日本的关系怎么样？比以前好吗？

福：对，比以前好。主席先生，正如你所知，我大约一年前访问了日本。这是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访问日本。大约一个月，日本天皇和皇后访问了美国，这也是他们的元首第一次来我们的国家。我们感到，美日关系正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好时期。

毛：日本也受到苏联的威胁。

福：我同意这一点，因此，主席先生，我认为中日关系的不断改善很重要，就像美日关系在不断改善一样。事实上，美日关系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

毛：对日本来说，同你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同我们的关系是第二位的。

福：你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吗？

毛：不算很糟，但也不是很好。

福：你们希望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对吗？

毛：对。他们国内有亲苏派，反对谈论霸权。

基辛格[1]（以下简称基）：也可能是害怕谈论。

毛：正是这样。

福：你们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怎么样，主席先生？

---

[1] 基辛格，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毛：比起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好太多、太多了。

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西欧以及你们同西欧都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才能应对任何苏联在西欧的扩张。

毛：对，对，这是我们同你们的一个共同点。我们同欧洲国家没有利益冲突。

福：主席先生，事实上，我们中有些人相信，中国比有些欧洲国家更能使得欧洲保持团结，使得北约加强力量。

毛：他们心不齐。

福：有些欧洲国家不像表面上那样强大和坦率。

毛：我觉得瑞典不坏，西德也不坏。南斯拉夫也很好。荷兰和比利时就稍微差一点。

福：很正确。苏联正在设法利用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弱点。我们必须阻止它，我们打算这样做。

毛：对，现在葡萄牙看上去更稳定一些了。形势好像在朝好的方面发展。

福：过去四十八小时里，形势发展很令人鼓舞。我们支持的一方正在得势，采取行动稳定局势。我们同意你的看法，南斯拉夫是重要的，在抵抗苏联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很关注，铁托[1]逝世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

[1] 铁托（1892—1980），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铁托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他反对大国垄断国际事务，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为南斯拉夫赢得了国际尊重1991年，南斯拉夫四个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联合成立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解体。

毛：对。也许铁托之后会是卡德尔[1]。

基：但是，我们关注的是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反应。我们正在着手做这件事。不同的因素都会对外部集团产生影响。

毛：对，南斯拉夫有许多省，它是由很多以前的小国家组成的。

福：主席先生，今年夏天，我到罗马尼亚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旅行。我对齐奥赛斯库[2]总统的力量和独立性，留下深刻印象。

毛：很好。

福：主席先生，我们对西班牙的局势也很关注。我们支持西班牙国王。我们希望，他能够处理好那些破坏西班牙王国的因素。我们将和他一起工作，在这个转变时期，争取对局势最基本的控制。

毛：如果欧洲共同体[3]吸纳西班牙，我们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欧洲共同体想要西班牙和葡萄牙吗?

福：主席先生，我们正在敦促北约对西班牙更友好一些，哪怕法国反对这样。我们希望，在新国王的领导下，西班牙能够更容易被北约接受。此外，我们感到欧洲共同市场应该对西班牙政府有更多的回应，朝着西欧一体的目标努力。我们将在这两个方向上，尽我们所能。

基：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不够激进。

---

[1] 爱德华·卡德尔，南斯拉夫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当时任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2] 齐奥赛斯库，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3] 欧洲共同体，西欧国家推行欧洲经济、政治一体化，并具有一定超国家机制和职能的国际组织。1965年4月8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称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欧洲联盟的前身。

毛：是这样吗？对了，以前他们总是打来打去的。还有，以前你们不骂法国。

福：对，我们支持西班牙新国王。因为西欧的南部必须保持强大，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如果我们要抵御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些国家都必须得到增强。

毛：好的。我们认为希腊应该变得比现在好。

福：对，他们经过了一段困难的日子，我们感到新政府正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我们会帮助他们的。我们希望最终他们会回到北约，成为一个成员国。

毛：那样不错。

福：当然，希腊有一些激进的想法，从我们的观点看，不是很好，会削弱北约，给苏联以可乘之机。

毛：是吗?!

福：让我们看看中东地区，主席先生。我们认为西奈协议[1]有助于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必须尽快实现该地区的广泛和平。等到下一次美国大选一结束，我们就将努力争取实现该地区广泛的和持久的和平。

毛：持久和平很难做到。

---

[1]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此后，美国为了排除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致力于撮合埃及和以色列进行关于西奈半岛问题的和平谈判。1975年9月2日，埃及和以色列关于西奈的协议签字。这是继1974年1月埃以达成两国军队脱离接触协议之后，关于西奈问题的第二项协议。在协议中，双方都作出了让步。以色列将从西奈部分领土上撤走并放弃了结束战争状态的要求。埃及则同意对以色列的非军事物资开放苏伊士运河。

福：对，几百年来他们都无法实现和平。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实现它，一旦成功，就将消除苏联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影响。如果局势保持停滞，那么苏联就有机会制造麻烦。因此，我们相信必须不断前进。西奈协议有助于我们同埃及实现良好关系。在下一次大选后，如果我们继续前进，争取更大范围的和平，这对将苏联的影响赶出该地区就会有重大影响。

毛：我不反对那样做。

福：关于南亚次大陆，我们希望通过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保持我们的影响。当然，我们将不断改善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我们已经取消了对他们的武器禁运，所以他们自己可以想办法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印度相信，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值得尝试。

毛：那样很好。

福：主席先生，你对孟加拉国的局势有何看法?

毛：那里的情况正在变好，但还不稳定。我们准备派个大使过去。也许他需要不少时间才能到那里。

福：你是否感到担忧，印度可能会插手，对孟加拉国采取军事行动，取得主导权?

毛：有这种危险。我们必须警惕。

福：主席先生，印度总是会做一些不明智的事情，反对其他国家。我希望他们不会在孟加拉国上面犯错误。

毛：确实如此。如果他们在那里采取行动，我们将会反对他们。

福：我们正在同巴基斯坦和伊朗合作，阻止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将谴责任何印度的此类行动。

毛：好，我们又达成了另一项协议。

福：我肯定你同我们一样，很关心苏联在印度洋的存在，以及他们在东非的活动。这一类举动，我们都强烈反对。我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安哥拉[1]，我们正在那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防止苏联在那里得到一个在非洲大陆上的据点。

毛：你们看上去没什么办法，我们也没有。

福：主席先生，我想我们双方都可以做得更好。

毛：我赞同把苏联赶出去。

福：如果我们一起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毛：可以通过刚果和扎伊尔的金沙萨。

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对毛泽东）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南非，它会卷进来。这会触怒整个黑非洲。这使得整个事情都变复杂了。

毛：南非名声不好。

福：但是他们正在阻止苏联扩张。我们觉得这是令人钦佩的。我们给了赞比亚和扎伊尔许多钱。我们想象，如果我们自己采取行

---

[1] 安哥拉，从20世纪50年代起，安哥拉人民为反抗葡殖民统治，先后成立了三个民族解放组织：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安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并于20世纪60年代相继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爆发了“康乃馨革命”，推翻了萨拉查法西斯专制统治，新政府宣布放弃殖民主义政策。1975年1月15日，上述三个组织同葡政府达成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并于1月31日同葡当局共同组成过渡政府。不久，安人运、安盟和安解阵之间发生武装冲突，过渡政府解体。同年11月11日，安人运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安解阵和安盟则成立了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日，安两派三方武装冲突扩大为全面内战。安人运受苏联支持，另外两个派别受美国与南非支持，国内仍持续呈现战争状态，直到2002年4月4日签订停战协定，才结束了长达27年的内战。

动，并且中国和其他国家也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防止苏联获得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防止他们控制安哥拉的主要资源。我们强烈反对古巴的介入。现在，他们在安哥拉有五六千人。我们觉得这不是好事。我们也是这样看待苏联。

邓：你的意思是，你们钦佩南非？

福：不。他们强烈反对苏联。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件事美国没有插手。

邓：在安哥拉。

福：南非反对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福：刻不容缓。

毛：我觉得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不会成功。

福：我们也希望他们不会成功。

基：如果其他两个派别足够训练有素，我们就可以提供他们武器。这样我们就能防止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获胜。那两个派别需要得到训练，需要理解游击战。我们可以提供他们武器，但是需要其他人训练他们。

毛：过去，我们通过坦桑尼亚支持他们。但是坦桑尼亚会扣留某些东西。也许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扎伊尔。

邓：可能还是通过扎伊尔比较好。

基：那就通过扎伊尔。中国方面也许可以使用它和莫桑比克的影响。对于非洲来说，如果莫桑比克反对苏联集团和安哥拉人民解放军，那么就有巨大的象征意义。

福：但是，你知道，莫桑比克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军。这可能很难吧。

邓：不可能的事。

基：我知道。不过他们可能不理解他们正在干什么，因为他们非常尊敬中国。

毛：我们可以试一下。

基：我不觉得莫桑比克理解安哥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提建议，他们更愿意听中国的话，而不是我们的话。

毛：我们可以试一下。

邓：我们可以试，但是不太可能成功。

基：确实如此。

毛：扎伊尔可能更可靠一些。

基：扎伊尔应该成为一个提供支援的基地。我们从莫桑比克得不到帮助，但是也许他们会置身事外。我们不指望从莫桑比克得到帮助，但是可能他们至少会保持中立。

毛：我们试一下。

福：我要再说一次，刻不容缓。因为其他两个派别需要得到支援。直到不久前，他们都做得很好。目前，局势陷入僵局。如果在我们、你们和其他国家做出努力之后，安哥拉人民解放军依然占据优势，那将是一场悲剧。

毛：这很难说。你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了？

福：我可能会说，对于安哥拉就是这样。在动身离开华盛顿前，我刚刚批准对那两个派别提供三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将面对苏联的挑战，击败安哥拉人民解放军。

毛：好的。

福：主席先生，我要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讨论世界局势，表达了我们发展双边关系、在许多问题上一起合作、解决许许

多多世界冲突的愿望。

毛：对，现在有一些记者说，我们两方的关系非常坏。也许你应该向他们透露一些消息，给他们一些内幕。

基：这需要双方努力。他们在北京也打探到了一些消息。

毛：但是这与我们无关，是一些外国人透露出去的。

福：主席先生，我们不相信报纸上的话。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国家要一起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关系很好。当我返回美国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们有很好的关系。我希望你的人也这样做。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两方关系好，而是还要让世界相信我们的关系好。

毛：我们会一点点来的。

福：我们也会努力的。

毛：那就这样吧。

1975年12月，毛泽东会见福特和基辛格。

1975年12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总统福特。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之女）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之子）。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接见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

毛泽东等祝贺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电报

（1975年12月5日）

万象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主席

老挝最高人民议会主席苏发努冯阁下，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凯山·丰威汉阁下：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及你们荣任共和国主席、最高人民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老挝人民革命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老挝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是老挝人民长期英勇斗争的光辉成果。几十年来，英雄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坚持武装斗争，经过艰苦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国内极右反动势力，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老挝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你们的胜利，不仅对印度支那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而且有力地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正义斗争。

中老两国是亲密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帝革命斗争

中同甘苦，共患难，结成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中国人民对老挝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相信，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下，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必将把老挝建设成独立、民主和繁荣的国家。我们祝愿，中老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五日于北京

对王世英[1]家属来信的批语[2]

（1975年12月13日）

请汪酌处。[3]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

[1]．王世英，原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康生的诬陷迫害，1968年3月含冤逝世。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2] 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1975年12月8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自1927年入党后，对主席、对党一直是热爱的”。我身体一直不好，近年来患了半身不遂。“希望能在我生前见到王世英的结论，请主席在百忙中能过问一下。”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2月12日印的这封来信摘要上。

[3] 汪，指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1975年12月13日，他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提出“送中央专案一办报审查结论”。

对袁血卒来信的批语[1]

（1975年12月18日）

送天津市党委酌处。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

[1] 袁血卒1975年12月13日给毛泽东写信说，我1927年入党，1931年初受中央军委委派到二十六路军搞兵运，组织了宁都暴动，成立红五军团。从中央苏区突围后，在上海曾两次被捕。1937年到延安，经4年审查，恢复了党籍。1958年转业到天津化工学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又经过反复调查，再次证明我在两次被捕中没有暴露党员和红军指挥员身份，是执行了而不是违背了党的隐蔽政策。1974年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但至今没有工作。我在军队工作几十年，热爱军队，请求批准我回部队工作。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2月17日印的这封来信摘要上。1978年，袁血卒被任命为民政部副部长。

对叶剑英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报告[1]的批语

（1975年12月20日）

很好。

十二月二十日

退叶剑英同志。

---

[1]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1975年12月18日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说，遵照您6月23日对孔从洲关于加强电子对抗工作建议信的批示，我要总参牵头，请孔从洲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先后研究4次，写出了专题报告。12月8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军委常委联席会议专门听取了有关部门的汇报，并进一步作了讨论研究，拟先采取以下措施，迅速加强这一工作。一、拟在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成立电子对抗和雷达管理领导小组。二、设一机构负责全军电子对抗和雷达归口管理工作。三、加强电子技术情报工作。四、加强和调整电子对抗的科研、生产力量，迅速改善我军电子装备的抗干扰性能。五、积极培养电子对抗技术人员。

197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曼努埃。

对江青来信的批语[1]

（1975年12月27日）

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大局是好的。

十二月廿七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江青1975年12月27日给毛泽东的信上。

1976

1976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一起。

对周恩来丧事安排请示报告的批语[1]

（1976年1月9日）

同意。

一月九日一时

---

[1]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6年1月8日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现送请审批。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邓小平的报告上。

对周恩来悼词的批语[1]

（1976年1月）

同意。

---

[1]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6年1月12日将中共中央对周恩来悼词送毛泽东审阅时写道：“悼词是由政治局会议审定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1月15日，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1976年清明前夕，北京近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

毛泽东等悼念波德纳拉希逝世的唁电

（1976年1月25日）

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

我们沉痛地获悉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埃米尔·波德纳拉希同志逝世的消息。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

波德纳拉希同志是罗马尼亚党和国家的杰出活动家。他为罗马尼亚民族和社会解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对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捍卫自己祖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加强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波德纳拉希同志曾多次访问中国，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他对发展和加强中罗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友谊和战斗团结做出了重大的努力，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波德纳拉希同志的逝世是罗马尼亚党、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我们深信，罗马尼亚人民将化悲痛

为力量，紧密团结在以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同志为首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周围，战胜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为完成党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对毛远新[1]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2]

（1976年1月31日）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3]同志谈一下。

一月卅一日下午五时

---

[1]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北京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江青反党集团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拘留审查，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2] 这个批语写在毛远新1976年1月31日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上。报告说，我已和王洪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并建议向政治局传达后，政治局应指定专人分别向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和军委常委、各总部负责人传达。我个人考虑，确实需要。这样做也等于向下打个招呼：小平同志有错误。如主席同意，可否这样讲：1. 在国务院副总理、部长范围讲，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国务院的工作，由华国锋同志主要负责。2. 在军委常委、各总部负责人范围讲，经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同意，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谋长。

贺新郎·改张元幹《送胡邦衡谪新州》[1]

（1976年初）

梦绕神州路[2]，
怅秋风连营画角，
故宫离黍[3]。
底事昆仑倾砥柱，
九地黄流乱注[4]，

---

[1] 张元幹（1091—1160），字仲宗，号芦川居士，长乐（今属福建）人，南宋爱国词人。曾任将作监丞。在秦桧专权时，致仕回乡，相传后因作《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词，遭投降派迫害，除名削籍。著有《芦川词》等。胡邦衡，名铨，原任枢密院编修。曾在绍兴八年（1138年）上疏反对南宋统治集团所推行的投降卖国政策，并请斩秦桧及其同伙王伦、孙近，被贬监广州盐仓，调任签书威武军判官。绍兴十二年，秦桧又指使其党羽弹劾胡铨“饰非横议”，把他贬谪到新州。新州，今广东新兴县。这首词作于胡铨自威武军任所（在福州）赴新州之时，相传当时就流传很广。

[2] 神州，中国的别名，这里指当时被金人占领的中原地区。战国时代，邹衍称中国为赤县神州。梦绕神州路，在路上连梦魂也萦绕中原。

[3] 故宫，指北宋故都汴京宫殿。故宫黍离，汴京宫殿变成废墟，长满庄稼，一片凄凉景象。改“黍离”为“离黍”，是为了押韵。

[4] 九地，九州之地，即谓中原各地。黄流，黄河水。黄流乱注，黄河洪水到处泛滥，比喻金兵横行中原，造成灾祸。

聚万落千村狐兔[1]。
天意从来高难问，
况人情易老悲难诉。
更南浦[2]，送君去！

凉生岸柳催残暑[3]，
耿斜河疏星淡月，
断云微渡。
万里江山知何处？
回首对床夜语。
雁不到，
书成谁与[4]？
目尽青天怀今古，
肯儿曹恩怨相尔汝[5]！
君且去，
休回顾。

---

[1] 狐兔，指金人。聚万落千村狐兔，形容金兵所至，千村万落被毁，狐兔出没，一片荒凉景象。

[2] 更，加上。浦，水口，江边。南浦，送别的地方。

[3] 催，催促。一作“摧”，驱散。凉生岸柳催残暑，凉气从河岸柳树上散发出来，催走残存的暑气。这句意思是说，送别时，残暑已尽，凉秋即至。

[4] 书，信。与，给。书成谁与，信写好了，交给谁呢？另有一说，当时主战派人士受到投降派的打击和排挤，流放远方，朋友间多不敢通信。这两句暗示高压之下，通讯有困难。

[5] 肯，这里是“岂肯”“怎肯”的意思。儿曹，小孩子们，年轻人们。尔、汝，都是你的意思。相尔汝，彼此都以尔汝相称，表示亲昵。这句意思是说，怎肯像那些年轻儿女们亲昵地谈一些恩怨和感情呢？也就是说，不应该只为朋友之间的离别而怨伤。

关于知识青年问题宜专题研究的批语[1]

（1976年2月12日）

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2]，给以解决。

二月十二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1976年2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上。信中说，今收到陕西省咸阳市北杜公社周荣光等两位知识青年给主席和党中央的信，反映陕西省计委下达文件，开始在全省大批招工，对象是下乡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回乡青年则一律不招。本来，咸阳地区1968年下乡的知青已经在七〇年以来的连续三次招工中基本走完，去年招工，下乡两年的知青又大都返城，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有的生产队也怕知青靠不住，对他们的安置、培养工作不作长远打算，致使整个知青的再教育工作受到影响。

[2] 1978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毛主席批示要召开的关于知识青年问题的会议，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会议的筹备工作，以致未能在毛主席健在时召开。中央决定在今年10月份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同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

给刘大杰的信[1]

（1976年2月12日）

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愈[2]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3]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泽东

二月十二日

---

[1] 这封信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1975年8月7日编印的《来信摘要》第五四〇号上。这期摘要登载了刘大杰8月3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他的文学史修改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关怀，衷心铭感。现在报刊文章，对韩愈全部否定，说得一无是处。他认为韩愈以道统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严加批判，但细读他的文章，发现其思想确有矛盾之处。如赞扬管仲、商鞅之功业等，都与儒家思想不合，而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语法合于规范，文字通畅流利，为柳宗元、刘禹锡所推许。对这些如果全盘加以否定，似非所宜。刘大杰认为，在批判韩愈儒家主导思想的基础上，应给他在文学史上一定的地位。对于李义山的无题诗，他认为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刘大杰还将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首词，随信呈送毛泽东。

[2] 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3] 李义山，即李商隐，晚唐诗人，著有《李义山诗集》等。

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1]

（1976 年 2 月 23 日）

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和平就是政治。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

---

[1] 1976 年 2 月 23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这是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一部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1977 年 8 月 12 日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段话。这个报告 8 月 18 日在大会上通过，8 月 23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尼克松。

1976年2月23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对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打招呼会议上讲话稿[1]的批语

（1976年2月25日）

同意。

二月二十五日七时

---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1976年2月25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这个讲话中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为此，讲话提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

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1976年3月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华国锋的这个讲话发至县团级，要求“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关于“风庆”轮问题[1]的批语

（1976年3月10日）

一

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2]

三月十日

---

[1] 指“四人帮”借“风庆”号货轮挑起事端，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难的事件。“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一艘用国产主机和雷达等五大件装备的万吨轮。开始，交通部远洋局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1974年9月30日，“风庆”轮首次远航归来。江青借机攻击交通部，并于10月14日在新华社关于“风庆”轮远航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作了批注，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

[2]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1976年3月3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华国锋的报告中说：“风庆轮问题，前已按江青同志的提议，我同意将国内动态清样（有江青同志批注），印发到会同志参阅。”“现江青同志把3月2日她在十二个省区座谈会上所作进一步说明，提议除印报毛主席、在京政治局同志外，下发来京开会的同志，并补发上两批来开会的同志，因内容涉及到政治局同志的批件及提到送主席看过，所以我没有把握批印，可否印发请主席批示。”

二

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197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

对中央关于劝阻强行登车来京人员的通知稿[1]的批语

（1976年3月24日）

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

[1] 中共中央1976年3月24日发给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这个通知说：“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劝阻，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这里所说的“运动”，指当时正在开展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对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1]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稿[2]的批语

（1976年4月7日）

照发。

七日十七点半

---

[1]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中共中央1976年4月7日的这个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对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决议稿[1]的批语

（1976年4月7日）

照发。

七日十七时半

---

[1] 中共中央1976年4月7日的这个决议指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76年4月，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

对吴德[1]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稿的批语[2]

（1976年4月7日）

照发。

七日十七时半

---

[1] 吴德，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 这个批语写在华国锋1976年4月7日送审的吴德讲话稿上。吴德的这个广播讲话中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对天安门事件的指示[1]

（1976年4月7日）

（毛远新汇报了四月五日、六日北京市的情况，谈到原来是打不还手，吃了亏，性质变了，应还手，并配备了木棍时）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谁人建议的？陈锡联[2]？

毛远新（以下简称远）：好像不是他，他是赞成的，他说战士只能挨打不行。政治局好几个同志一直在大会堂注视广场事态变化，和北京市委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吴德[3]去发表演说是大家的主意，动员一般群众离开，人少了才好动手。

毛：好。

远：目的是区分两类矛盾，一讲事件的性质，好人都离开了，当然也有坏人聪明点的跑了，剩下人少了，我们的力量占优势再下

---

[1] 这是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5年9月后，毛泽东病重，毛远新到中央担任“联络员”，负责与政治局的沟通。

[2] 陈锡联，当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3] 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卫戍区党委第一书记。

手。）

毛：（点头）嗯。

（当毛远新谈到政治局六日晚上研究的几件事，提到华国锋[1]同志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2]通报全国，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发个文件时）

毛：公开发表。

远：登报？

毛：是。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指了指桌上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三份）、吴德讲演[3]等。

远：市委报告不发了？

毛：不发。并据此开除邓[4]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远：太好了！将来召开三中全会时补手续。

毛：（点头）嗯！

远：由中央作决议，也公开发表？

毛：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远：好。上次会议，春桥[5]同志当邓小平面说：你看看天安门

---

[1] 华国锋，当时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2] 北京发生的事，指天安门事件。

[3] 吴德讲演，指1976年4月5日下午6时广播的《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1976年4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这篇讲话稿。

[4] 邓，即邓小平。

[5] 春桥，即张春桥，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前的情况，人家要推你出来当纳吉[1]。

毛：（点头）是的。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用力挥手）[2]

远：应该赶出去了！我马上找国锋同志去。

毛：小平不参加，你先约几个人谈一下，不要约苏振华[3]。

（毛远新把除邓、苏以外的政治局同志的名单列出，送主席看。）

毛：叶[4]不找。

（毛远新把叶剑英划掉。）

远：除这三人外，其他同志都参加？

毛：好。华国锋任总理。

---

[1] 纳吉，1956年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数十万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匈牙利进行全面改革、纳吉重新出任政府总理和苏联驻军撤离匈牙利等要求。当晚，这场示威游行演变成群众武装暴动。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出任总理。纳吉政府坚决要求苏联立即撤军和恢复多党制。苏军出兵镇压。匈牙利十月事件很快被全面镇压下去。纳吉被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于1958年6月16日被绞死。

[2] 中共中央1976年4月7日通过决议《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3] 苏振华，当时任海军第一政委、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上将，在解放战争中参与了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是邓小平的老部下。1975年积极配合邓小平的工作。

[4]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1973年邓小平复出的倡议者，1975年积极配合邓小平的工作。

远：和上面决议也一起登报。

毛：对。

远：我马上去通知国锋同志开会传达。

毛：（挥手）快，谈完就来。

（下午）

毛：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1]

---

[1] 中共中央1976年4月7日通过决议《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对选印的天安门事件[1]中诗文原件的批语

（1976年4月13日）

天下已定。此件[2]杂乱无章，近于画蛇添足，不宜发表。

毛泽东
十三日

---

[1] 指1976年4月5日发生的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又称“四五”运动。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等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4月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4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错误地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要北京市委写成材料通报全国。毛泽东根据毛远新的书面报告同意中央政治局的这个决定。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时，作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错误决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

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2] 指以北京市公安局名义搜集整理的所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反动诗文原件选印》，由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1976年4月13日送阅。毛泽东认为天安门事件已经解决，不想再扩大此事，因此写了这个批语。

对毛远新[1]请示报告的批语[2]

（1976年4月）

一

第三条不好。

二

此计不妥。

---

[1]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在北京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江青反党集团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拘留审查，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2] 本篇一写在毛远新1976年4月13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中说，12日晚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八件事，其中第三件事是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报告准备转发全国，报告“要进一步修改充实，除介绍北京的经验外，要把这次事件的罪证选择一些影印附上，使全国干部更清楚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在引号内这段文字下面，毛泽东画了横线，并写了一个批语，即本篇二。

改《诗经·小雅·采薇》断句

（1976年春）

今我来兮，杨柳依依[1]。

---

[1] 《诗经·小雅·采薇》共六章，末章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悲伤，莫知我哀。

毛泽东等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的电报

（1976年4月16日）

金边

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主席乔森潘阁下，

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波尔布特阁下，

柬埔寨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农谢阁下：

在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民主柬埔寨政府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一年前，柬埔寨革命军民经过长期英勇的武装斗争，一举解放首都金边，夺取了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柬埔寨革命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解放后，柬埔寨人民在正确路线指引下，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坚决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全民动员，大力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在短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新胜利。中国人民非常高兴地看到，柬埔寨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革命变化。我们相信，经过战争烈火考验的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革命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事业中，必将战胜各种困难，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是在长期的共同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今后，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于北京

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几句话[1]

（1976年4月30日、6月25日）

一

慢慢来，不要招〈着〉急。

二

照过去方针办。

三

你办事，我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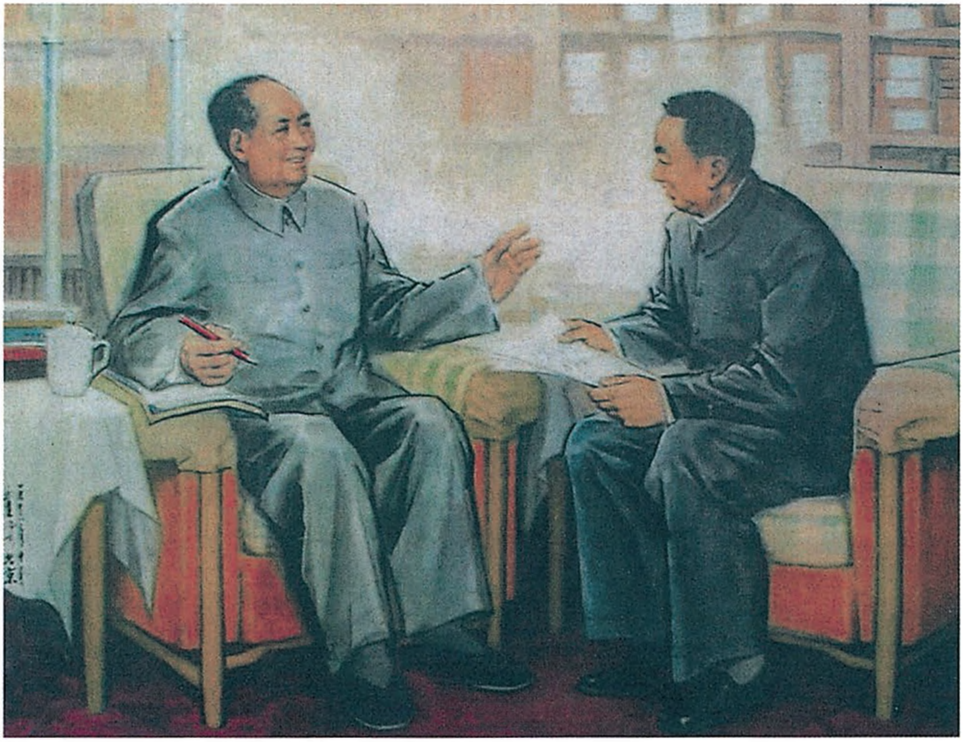
---

[1] 本篇一、二、三是毛泽东1976年4月30日晚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谈话时写的三句话。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中，用黑体字引用了这三句话。本篇四是毛泽东1976年6月25日下午3时同华国锋谈话时写的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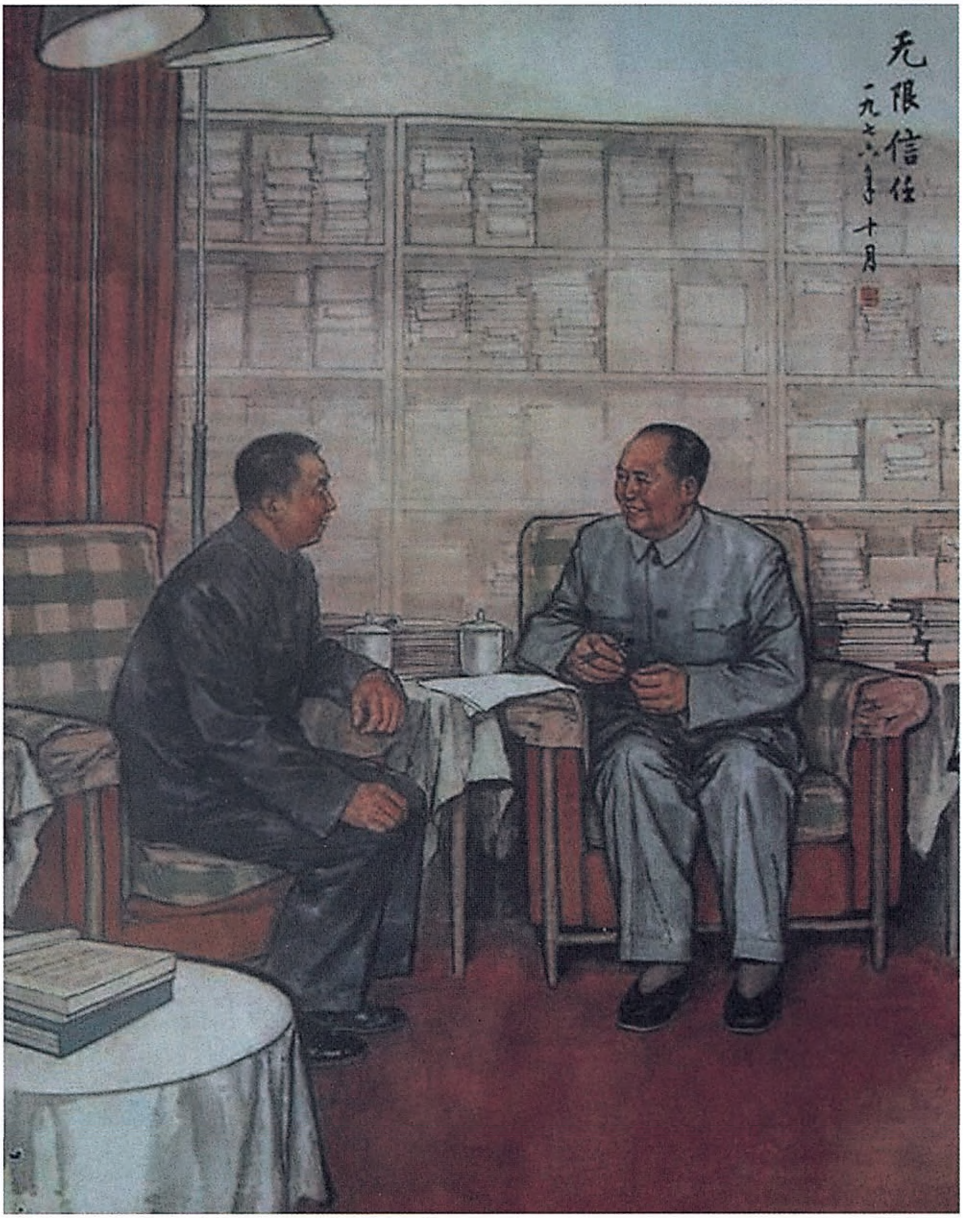
四

国内问题要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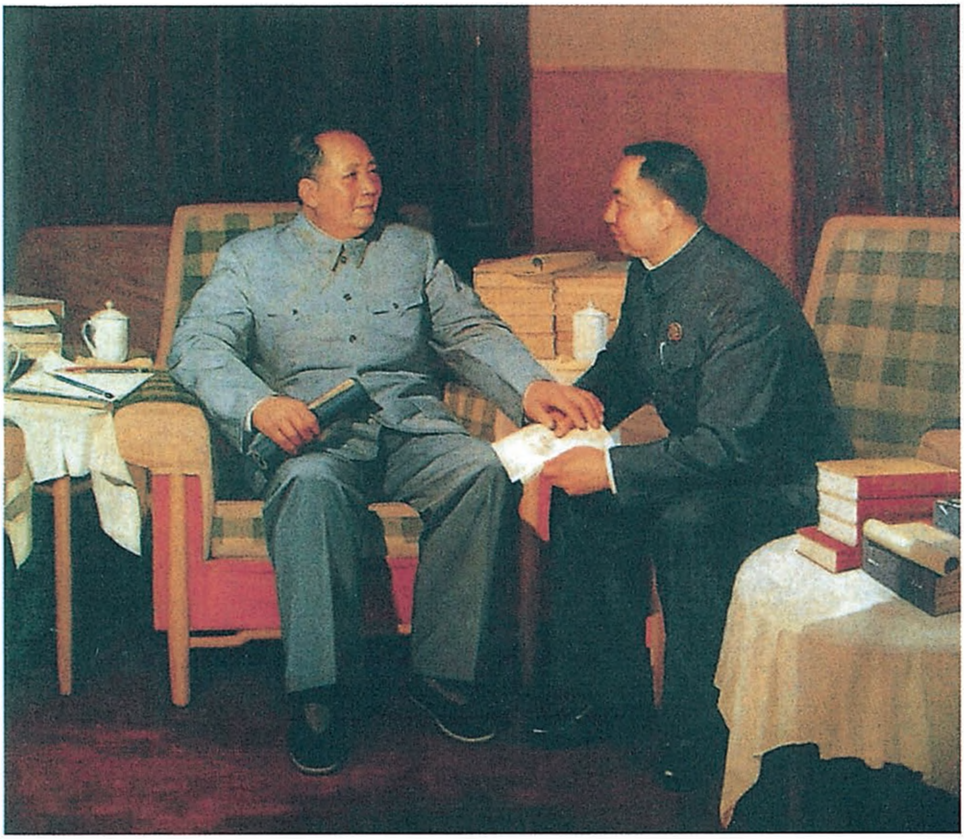
1976年，毛泽东和华国锋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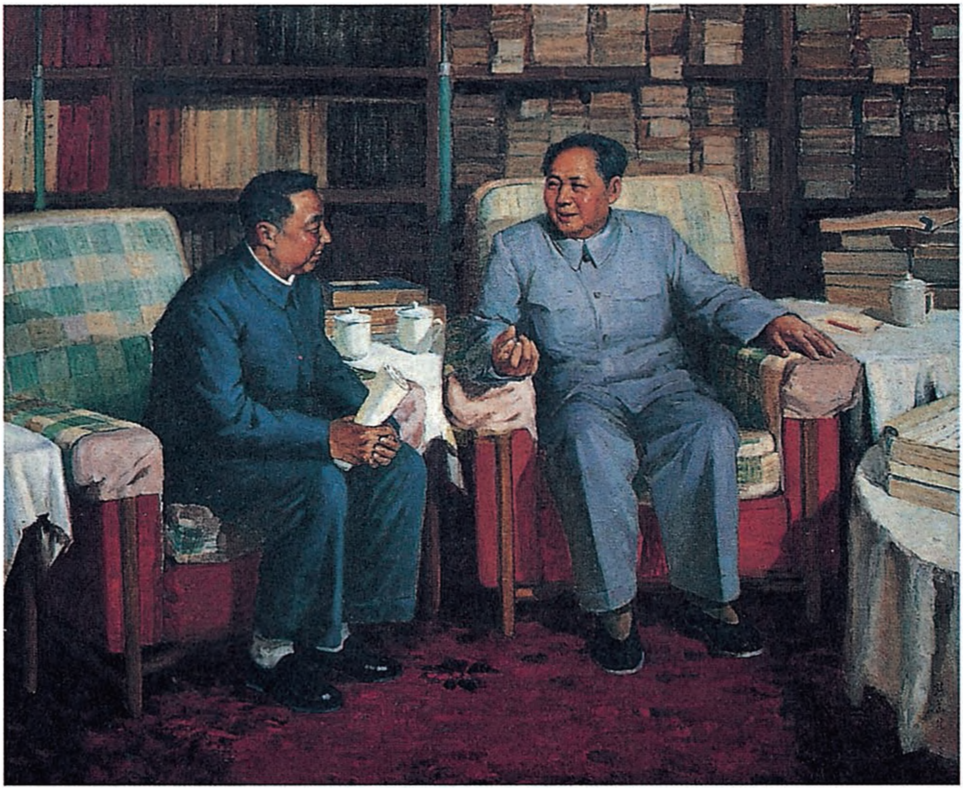
《你办事，我放心》（中国画）


无限信任
一九七八年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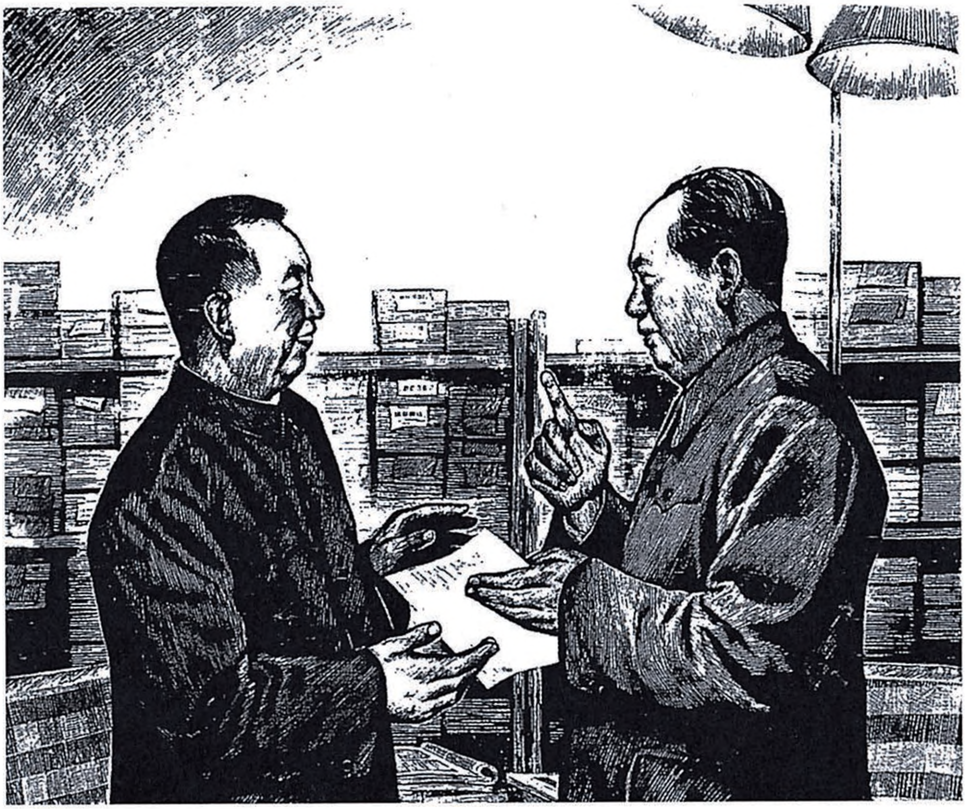
《无限信任》(中国画)



《你办事，我放心》(油画)



《你办事，我放心》（油画）



《无限信任》（版画）

1976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再次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

和部分政治局委员[1]的谈话

（1976年6月15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2]。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

[1] 当时在场的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

[2] 1976年10月6日，拥护“文革”的左派力量发生分裂，华国锋和叶剑英发动“十月政变”，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和《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复出后三年中，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影响，并在1980年12月5日发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批评华国锋，“并认为改变他的现任职务是必要的”，“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下台。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全国实现统一的电报

（1976年7月3日）

河内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同志，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同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同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同志：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六届国会庄严宣告，越南全国实现统一。这是越南南、北方人民长期英勇奋斗的光辉成果。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向越南劳动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和兄弟的越南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并热烈祝贺你们分别荣任共和国主席、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和政府总理。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领导下，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反帝斗争，终于赶走和推翻国内外反动势力，赢得了全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完成了统一祖国的大业。越南国家的统一，是当前越南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国人民对兄弟的越南人民的每一个胜利和成就，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我们深信，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

越南人民，在建设一个和平、独立、统一和社会主义的越南的事业中，必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祝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繁荣昌盛。

祝中越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不断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于北京

毛泽东等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

（1976年7月10日）

平壤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朴成哲同志：

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朝鲜劳动党、朝鲜政府和兄弟的朝鲜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朝两国人民是战友和兄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充分体现了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伟大团结。条约签订以来，中朝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得到了全面和深入的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团结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中国人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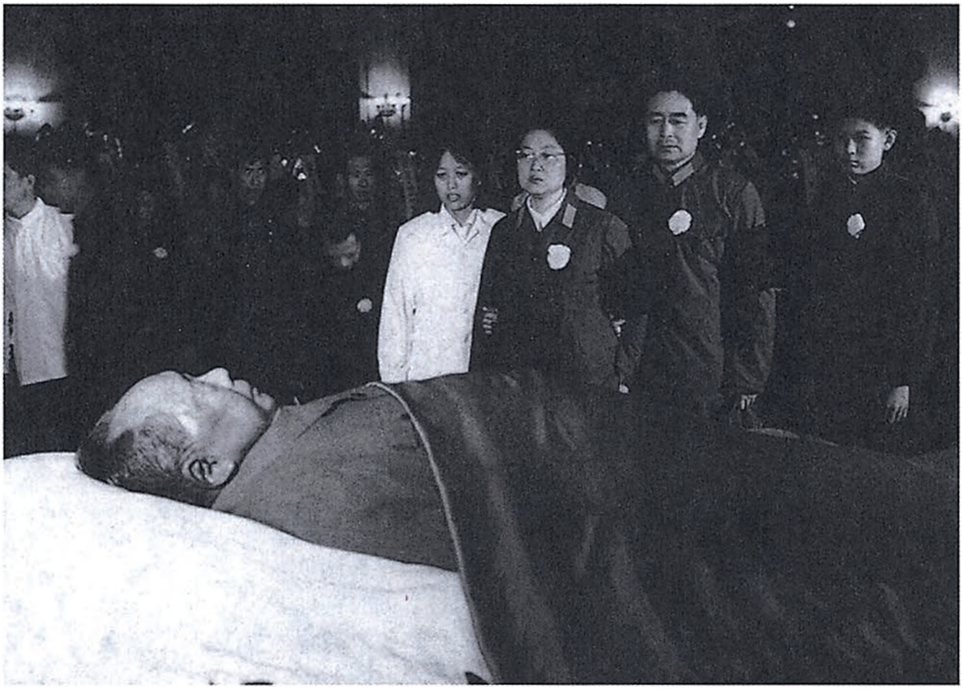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热烈赞扬兄弟的朝鲜人民在自己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各条战线上取得的光辉成就。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正义斗争，坚决谴责任何制造“两个

朝鲜”的阴谋活动。我们相信，英雄的朝鲜人民必将排除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完成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实现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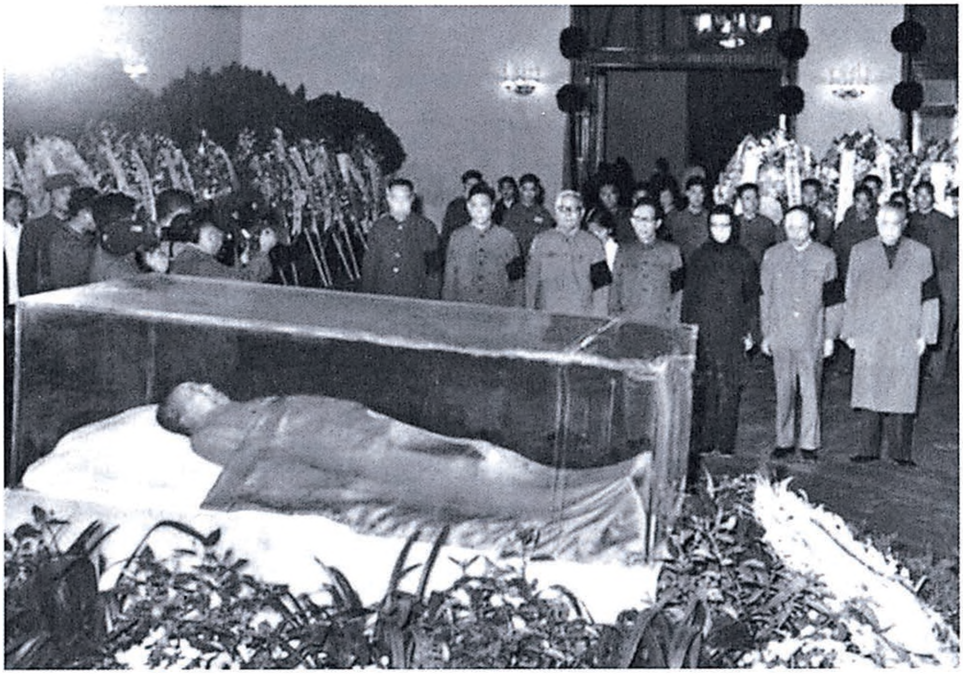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岸青、邵华携子毛新宇在毛泽东遗体前默哀。



李敏、孔令华携子孔继宁在毛泽东遗体前默哀。

1976年9月11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毛泽东遗体前默哀。



1976年9月11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李先念等在人民大会堂吊唁毛泽东。

李先念、乌兰夫、江青、张春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吊唁毛泽东。

1976年9月11日至19日，各界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1976年9月11日，毛泽东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毛泽东灵柩前悲痛欲绝。

极其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各界群众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首都各界代表前来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首都各界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解放军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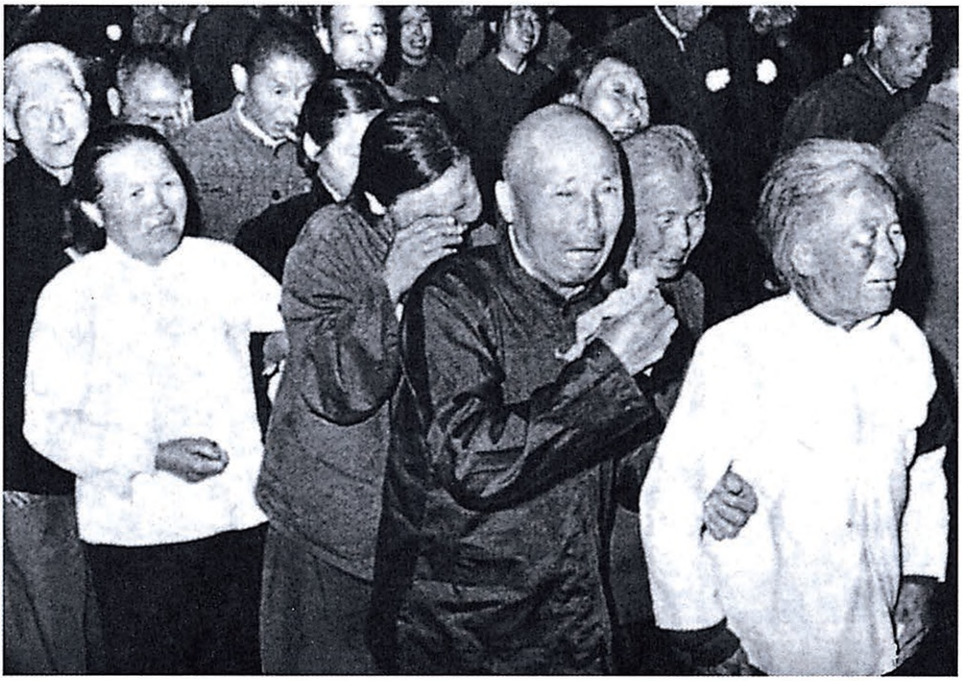
解放军代表向毛泽东遗体告别。

少数民族代表瞻仰毛泽东遗容，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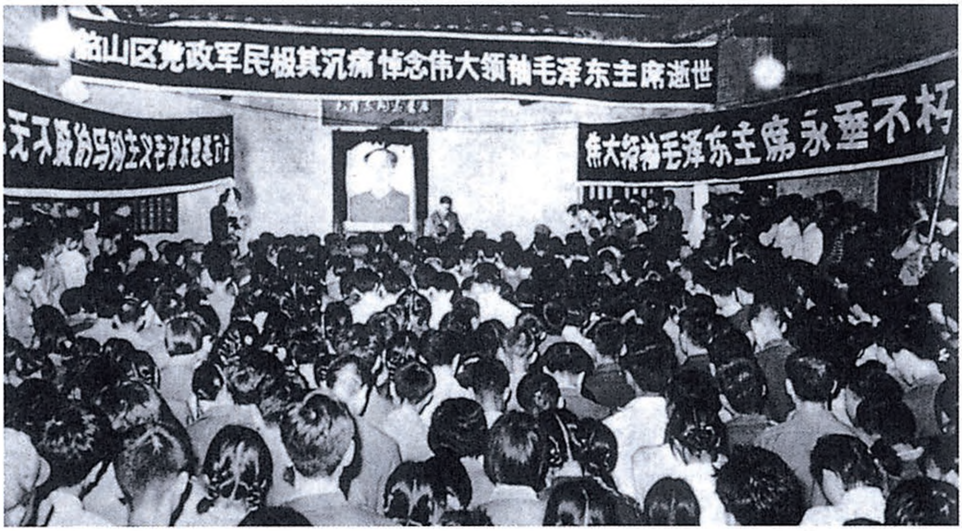
少数民族代表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在毛泽东遗体前悲痛的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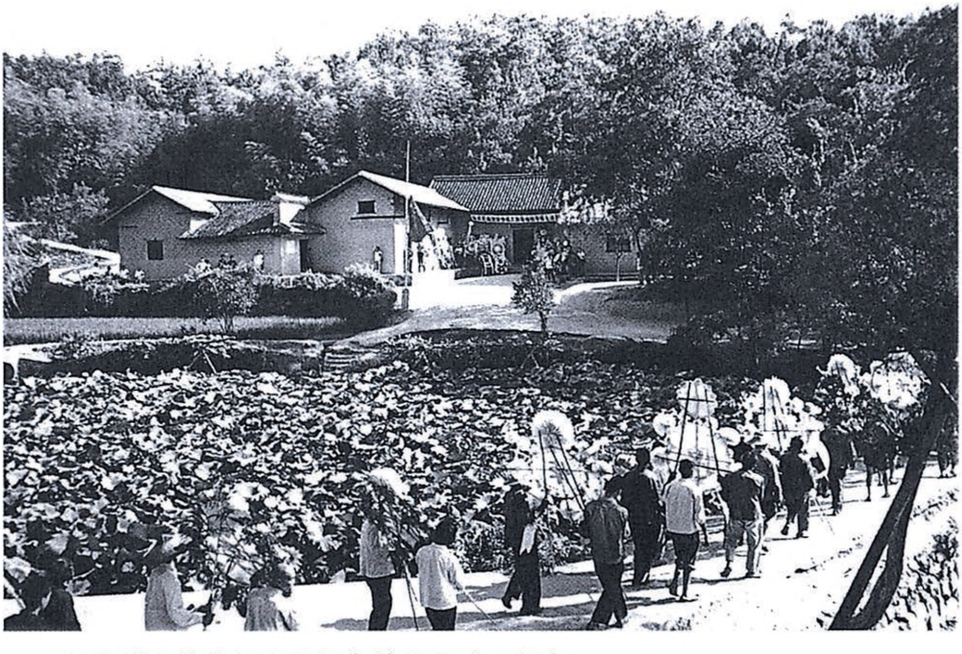
首都群众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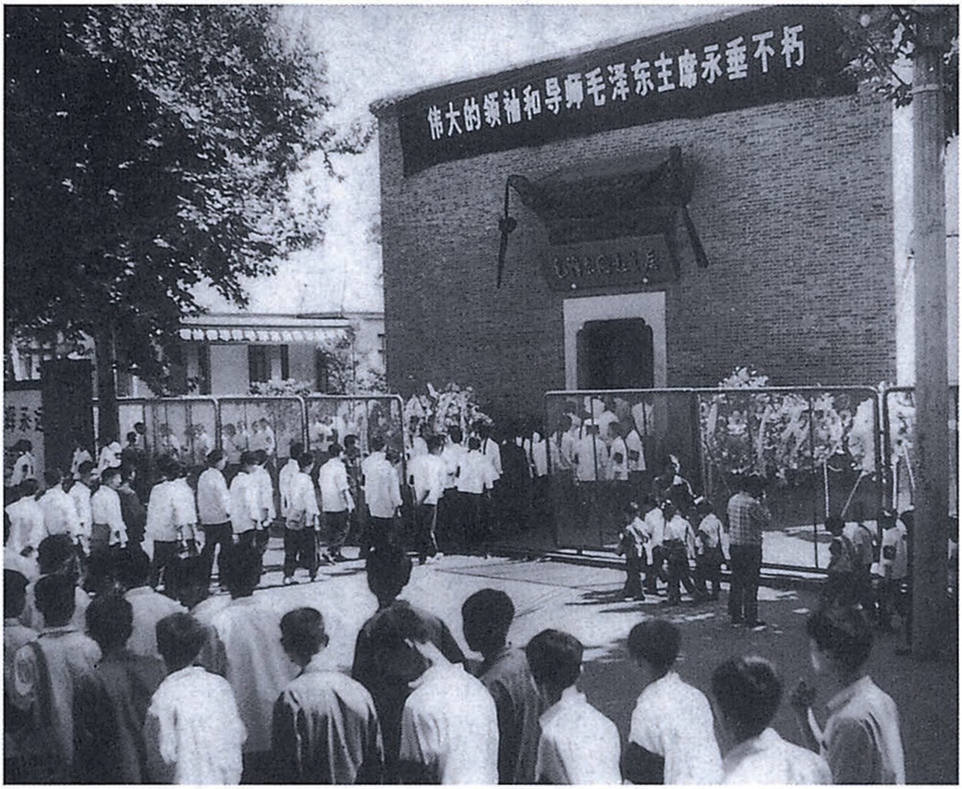
首都群众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韶山区党政军民极其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韶山区党政军民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



各界群众前往韶山毛泽东故居吊唁毛泽东。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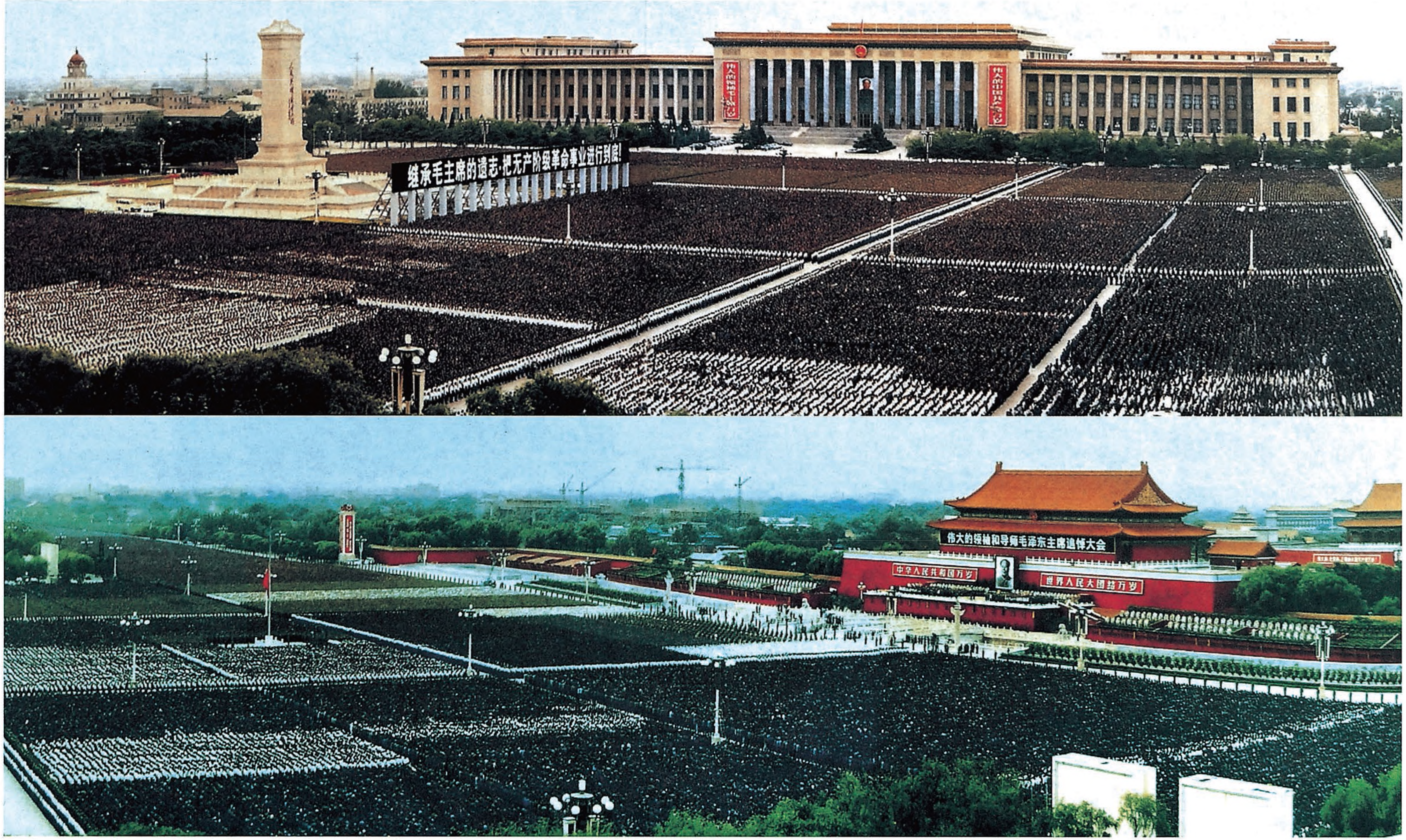
武汉人民到毛泽东故居吊唁毛泽东。

参加悼念活动的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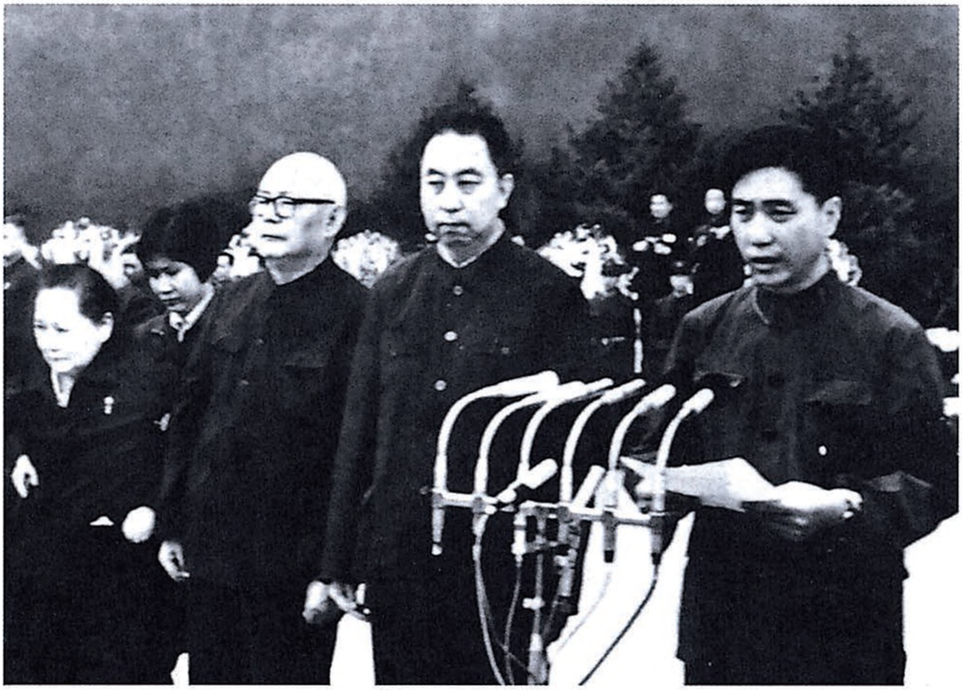
1976年9月18日，江青一身黑衣走进追悼大会会场。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图为追悼大会现场。



1976年9月18日，王洪文主持毛泽东追悼大会。

1976年9月18日，华国锋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1976年9月18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追悼大会现场。

1976年9月18日，邓颖超、乔冠华等人在毛泽东追悼大会上。

1976年9月18日，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各族群众。

HITACHI
COLOUR TV SET

香港一黑白电视机销售店，人们正在收看北京电视台有关毛泽东逝世的新闻。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逝世的噩耗在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各国报刊纷纷在显著地位刊登有关消息、社论和文章，图为世界一部分报刊的版面情况。

平壤各界群众代表前往我驻朝鲜使馆悼念毛泽东逝世。

毛沢東主席国民追悼会

日本各界人士举行追悼大会，悼念毛泽东逝世。

万象学生到我驻老挝使馆悼念毛泽东逝世。

旅居蒙古的侨胞举行追悼会，悼念毛泽东逝世。

坦桑尼亚群众在毛泽东遗像前默哀。

秘鲁一剧团1976年9月12日晚在首都利马演出前，演员举着毛主席遗像和红旗，同观众一起，为毛泽东逝世默哀三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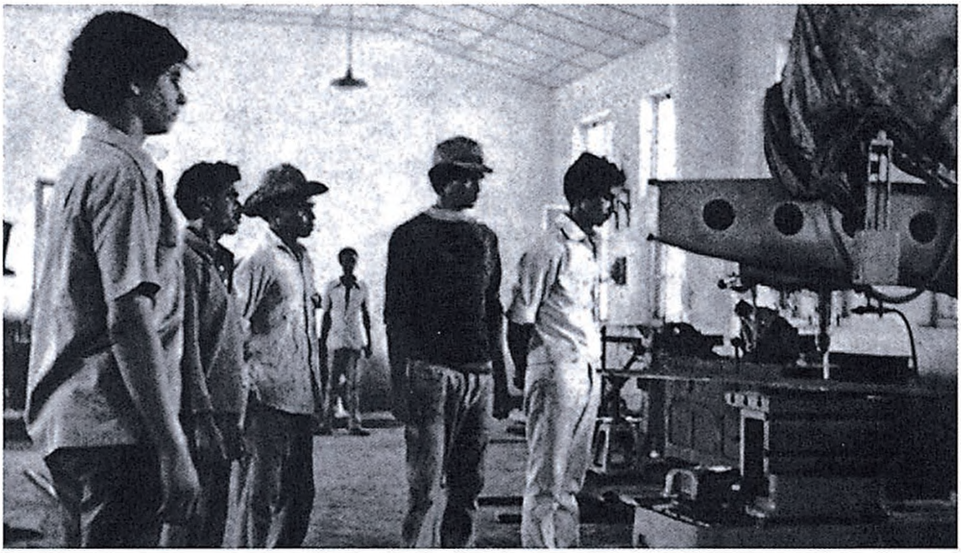
ማኦ፡ቢሞቱም
ሥራቸው፡ለዘለዓ
ለም፡ይኖራል ።
ጨርቃ ጨርቅ
ፋብሪካ ሠራተኞች

埃塞俄比亚首都的群众1976年9月12日在纪念埃“革命日”两周年时，用汽车载着毛泽东遗像游行，对毛泽东逝世表示哀悼。

坦桑尼亚一位失掉了双腿的朋友，坐车和群众一起到我使馆吊唁毛泽东逝世。

赤道几内亚政府1976年9月15日在首都马拉博举行追悼会后，与会者数百人列队到我使馆送花圈。

瑞典群众1976年9月17日晚，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火炬游行和大会，悼念毛泽东逝世。图为游行队伍走向会场。



民主也门亚丁盐厂工人在1976年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为毛泽东逝世默哀三分钟。

刚果国家领导人和群众一千余人，在布拉柴维尔举行五公里的静默游行，前往我使馆吊唁毛泽东。

比利时青年和第三世界国家在比利时的留学生，举着毛主席遗像前往我使馆吊唁毛泽东。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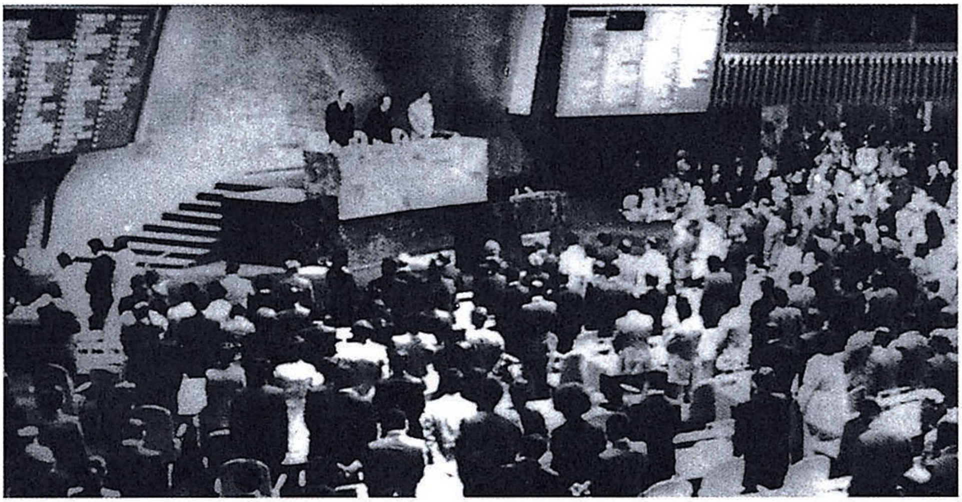
芬兰一些朋友全家到我使馆吊唁毛泽东。

越南河内市各界群众到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吊唁毛泽东。

河内各界代表到我驻越南使馆悼念毛泽东逝世。

仰光青年到我驻缅甸使馆悼念毛泽东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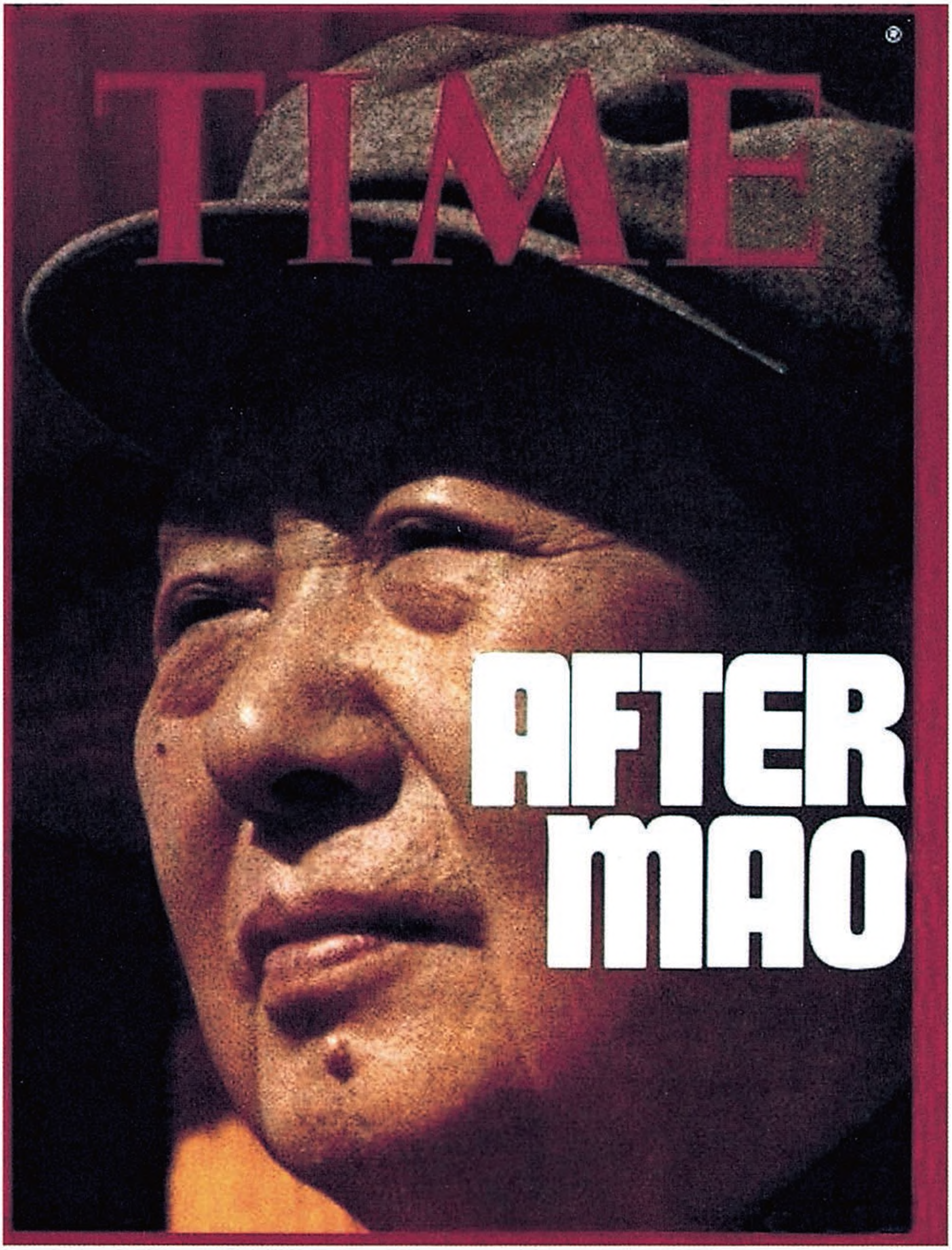
意大利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21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全体会议，各国代表肃立默哀，悼念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东方巨人毛泽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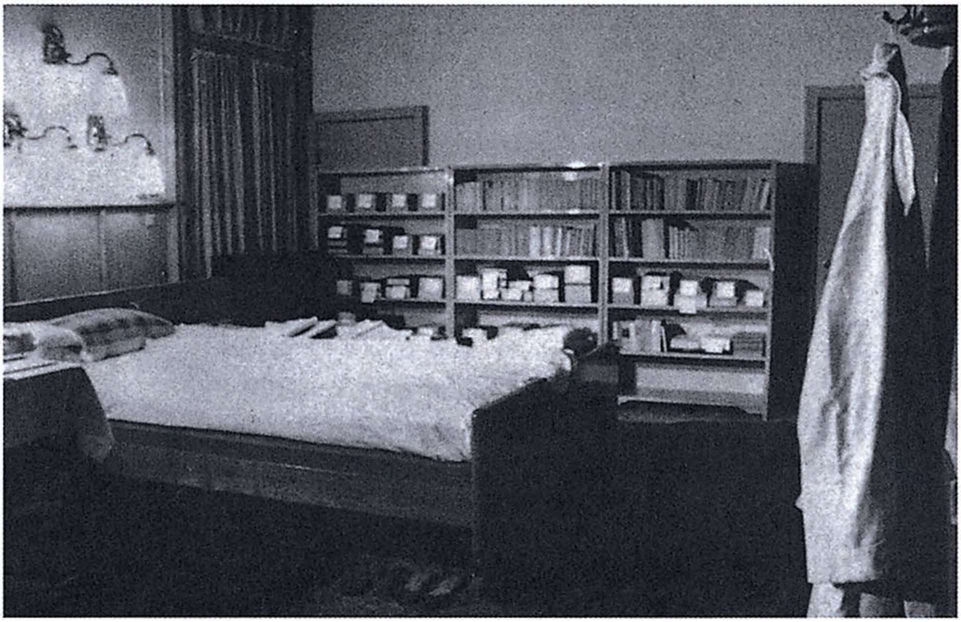
1976年9月21日，联合国第31届会议开幕，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毛泽东。

1976年9月，联合国下半旗哀悼毛泽东。


TIME
®
AFTER
MA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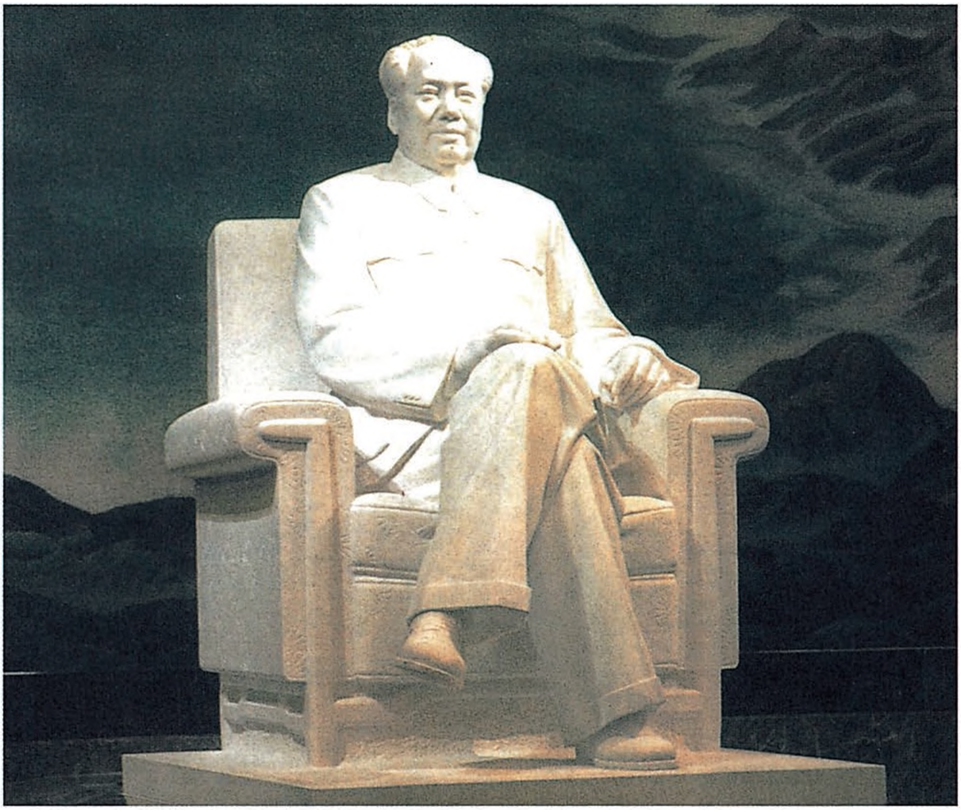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图为1976年9月20日《时代》杂志的封面。

毛泽东生前在中南海住所——丰泽园已开放供人们瞻仰。人们看着他的遗物，追忆他的功绩，研究他的思想，表示对他深深的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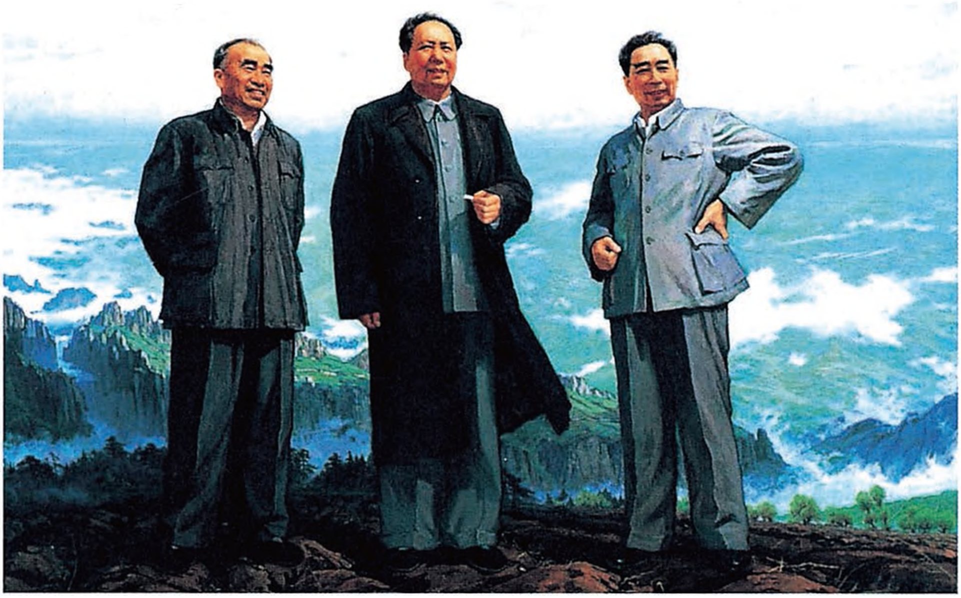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室。

毛主席纪念堂。



毛主席纪念堂汉白玉像。

时间不详



《伟人归来》（油画）

五绝·咏梅*

月下夜风寒，
雪里梅花笑。
春意侬先知，
花开伊独早。
频传天地心，
岂论高格调。
幽香寄深情，
洁身非自好。

七绝·咏菊*

不期青女忍相欺，
老圃新枝竞吐奇。
秋色不如春色好，
西风漠漫撼东篱。

五律·春夜渡海*

平生爱大海，
披月趁风雷。
脚踩惊涛涌，
心追鸿雁回。
千番战水怪，
一笑见灯台。
挥手迎朝日，
火球花盛开。

水调歌头·归舟迎日出*

星谱凯旋曲，
水拍自由诗。
琼花脚底飞舞，
惊喜却痴迷。
今夜携春同至，
播下晨风万里，
太白绣云旗。
闪闪清眸子，
霞染海魂衣。

透心亮，
遍身赤，
探穹低。
胸涛奔涌呼啸，
激浪与天齐。
愿把此心炽烈，
化为融融光热，
四季赛春时。
温暖流环宇，
永世未终期。

沁园春·再访十三陵*

百侣游踪，
歌翻碧浪，
舞引东风。
念平生所爱，
红岩翠柏，
少年壮志，
海阔天空。
水库情深，
陵园恨重，
血汗浇来春意浓。
惊雷动，
将山川洗净，
笑引长虹。

青春烈火正熊，
春岂在温房草木丛？
愿耿耿丹心，
耀如赤日；
铮铮硬骨，
强似苍松。

一往无前，
万难不屈，
偏向悬崖攀绝峰。
仰头望，
把红旗高举，
直上云中。

七律·雷电*

积云忽作闷雷声，
雨弹光刀欲杀人。
岂向瑶台追幻梦，
还从烈火识真金。
几枝玉叶化灰蝶，
再度铁梅成赤心。
稳似泰山同携手，
陶然一笑友情深。

七绝·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云崖雾霭出英豪，
激荡磅礴腾九霄。
千钧霹雳轰河汉，
万里风焰照天烧。

西江月·赠天津团市委*

国内蛙鸣鸟叫，
国外锣鼓齐鸣。
革命烽火满天红，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摧毁证据，
更加守口如瓶。
□□□□黄粱梦，
瞒天过海不行。

清平乐·赠张志坚*

白昼梦呓，
满嘴胡放屁。
叫人可笑又可气，
滑天下之大稽。
小口径上刺刀，
叫人大牙笑掉。
如何来上请教，
不知是焊是铆。

七律·别友人*

树种安能伴井蛙，
雄鹰送我海天涯。
血飞星岛镇狂浪，
汗涌塔丘化碧霞。
风暴险关思闯道，
冰封绝顶要开花。
火旗挥舞冲天笑，
赤遍环球是我家。

七律·跨东海*

烟笼大海入氤氲，
赤羽飞传时可闻。
暮色重重已合壁，
雁声阵阵不离群。
千钧霹雳开新宇，
万里东风扫剩云。
贯日长虹应起舞，
笑看人字出乾坤。

七律·答友人*

问君何日喜重逢，
笑指沙场火正熊。
庭院岂生千里马，
花盆难养万年松。
志存胸内跃红日，
乐在天涯战恶风。
似水柔情何足道，
堂堂铁打是英雄。

七律·捷报*

长空又放核红云，
怒吼挥拳显巨身。
横眉南天震虎口，
寄心北海跃龙门。
敢同恶鬼争高下，
不向狂魔让寸分。
先烈回眸应笑慰，
擎旗已有后来人。

读《古诗源》批语

登池上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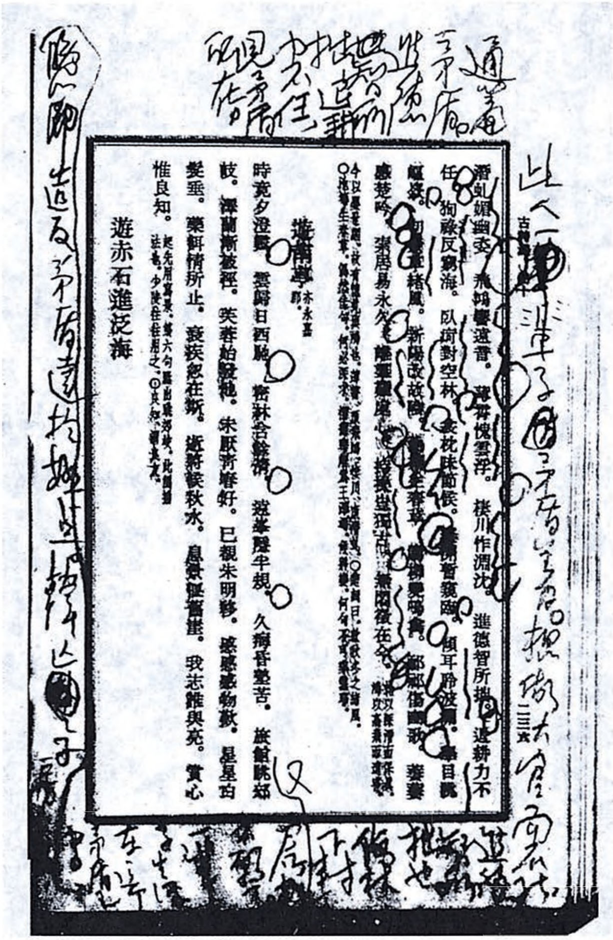
谢灵运

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

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第235～236页]

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1]



毛泽东读《古诗源》批注的手稿。

---

[1] 谢灵运在刘宋朝先做太子左卫率（太子手下属官），后做侍中，只作为文学侍从，不做大官。后出外做临川（在江西）内史（地方长官），游山玩水，被弹劾，朝廷派人去逮捕，他拘执去逮捕的人，起兵反叛，作“韩亡子房奋”的诗。朝廷派兵把他捉住，流放广州，在广州被杀。

读《初唐四杰集》批语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1]。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

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

上元二载，高旻八月。人多汴北，地实淮南。海气近而苍山阴，天光秋而白云晚。川涂所亘，郢路极于崤潼；风壤所交，荆门洎于吴越。凭胜地，列雄州，城池当要害之冲，寮寀尽鹓鸾之选。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穷愁；山曲淹留，属群公之宴喜。披鹤雾，陟龙门。故人握手，新知满目。钦崔公之盛德，果遇攀轮；慕郝氏之高风，还逢解榻。接衣簪于座右，驻旌棨于城隅。临风云而解带，眄江山以挥涕。岩楹左峙，俯映玄潭；野径斜开，傍连翠渚。青萍布叶，乱荷芰而动秋风；朱草垂荣，杂芝兰而涵晚液。舣仙舟于石岸，荐绮席于沙场。宾友盛而芳樽满，林塘清而上筵肃。琴歌迭起，俎豆骈罗。烟霞充耳目之玩，鱼鸟尽江湖之赏。情盘乐极，日暮途遥。思染翰以凌云，愿麾戈以留景。嗟乎！素交为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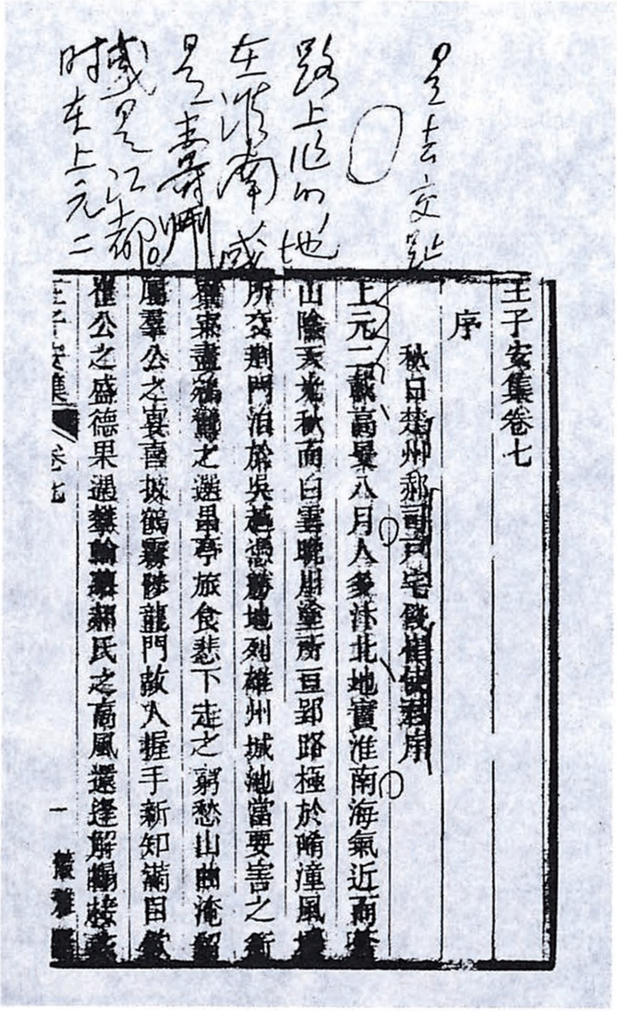
---

[1] 此处手稿为“二十四岁”。

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做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

觉老幼之同归；朱绂傥来，岂荣枯之足道。且欣风物，共悦濠梁。齐天地于一指，混飞沉于一贯。嗟乎！此欢难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见何期，惆怅南溟之路。请扬文笔，共记良游。人赋一言，俱成四韵云尔。[《王子安集》卷七]

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时，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



是去交趾路上过的地

在淮南或

是寿州

或是江都

时在上元二

王子安集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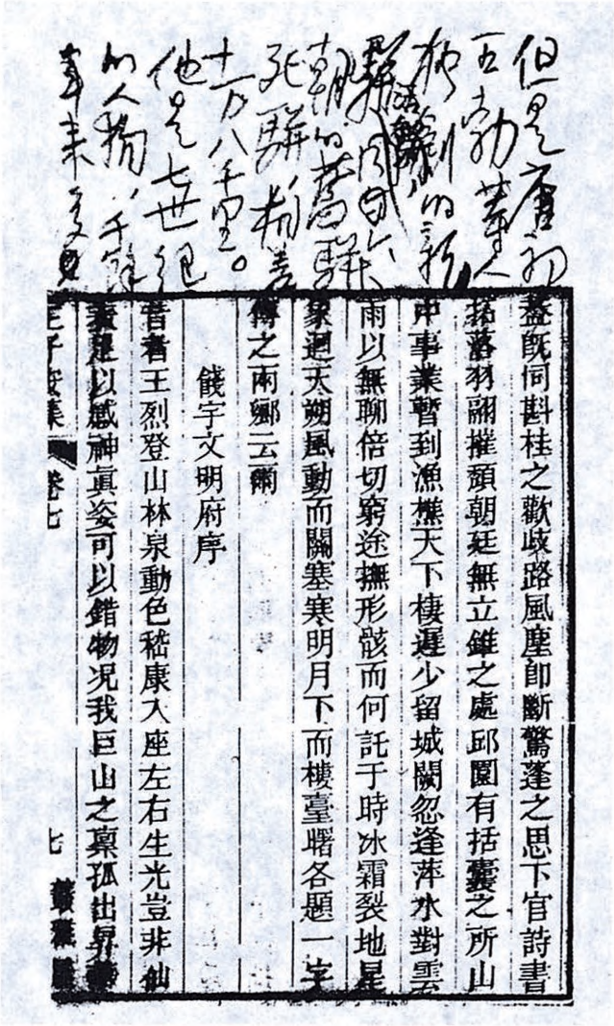
序

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

上元二載高秋八月人多汴北地實淮南海氣近而

毛泽东读《王子安集》批注的手稿。

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1]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



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獨創的新駢、活駢，同六朝的舊駢、死駢，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紀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

蓋既伺斟桂之歎岐路風塵卽斷驚蓬之思下官詩書
搖落羽翮摧頹朝廷無立錐之處邱園有括囊之所山
中事業暫到漁樵天下棲遲少留城闕忽逢萍水對雲
雨以無聊倍切窮途撫形骸而何託于時冰霜裂地星
象迴天朔風動而關塞寒明月下而樓臺曙各題一字
觴之南鄉云爾
餞宇文明府序
昔者王烈登山林泉動色嵇康入座左右生光豈非仙
表是以感神眞姿可以錯物況我巨山之稟孤出昇[illegible]

王子安集　卷七　七

毛泽东读《王子安集》批注的手稿。

---

[1] 此处手稿为“王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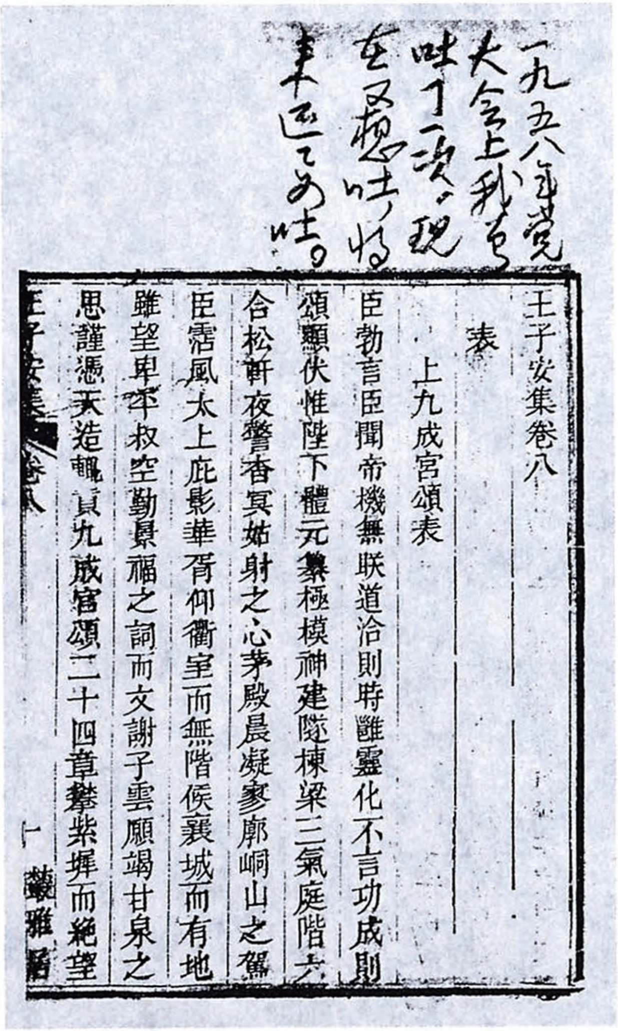
完淳[2]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

---

[1] 此处手稿为“夏淳融”。

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1]



一九五八年党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王子安集卷八

表

上九成宮頌表

臣勃言臣聞帝機無眹道洽則時雝靈化不言功成則頌願伏惟陛下體元纂極模神建隧棟梁三氣庭階六合松軒夜警杳冥姑射之心茅殿晨凝寥廓峒山之駕臣霑風太上庇影華胥仰衢室而無階候襄城而有地雖望卑平叔空勤景福之詞而文謝子雲願竭甘泉之思謹憑天造輒貢九成宮頌二十四章攀紫墀而絕望

王子安集　卷八　一

毛泽东读《王子安集》批注的手稿。

---

[1] 这篇批语末尾略有删节。

读《甲乙集》批语

偶　　题

十上不中第[1]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卷八第9页]

---

[1] 唐代文学家罗隐，曾十举进士不中第。

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语

琵琶行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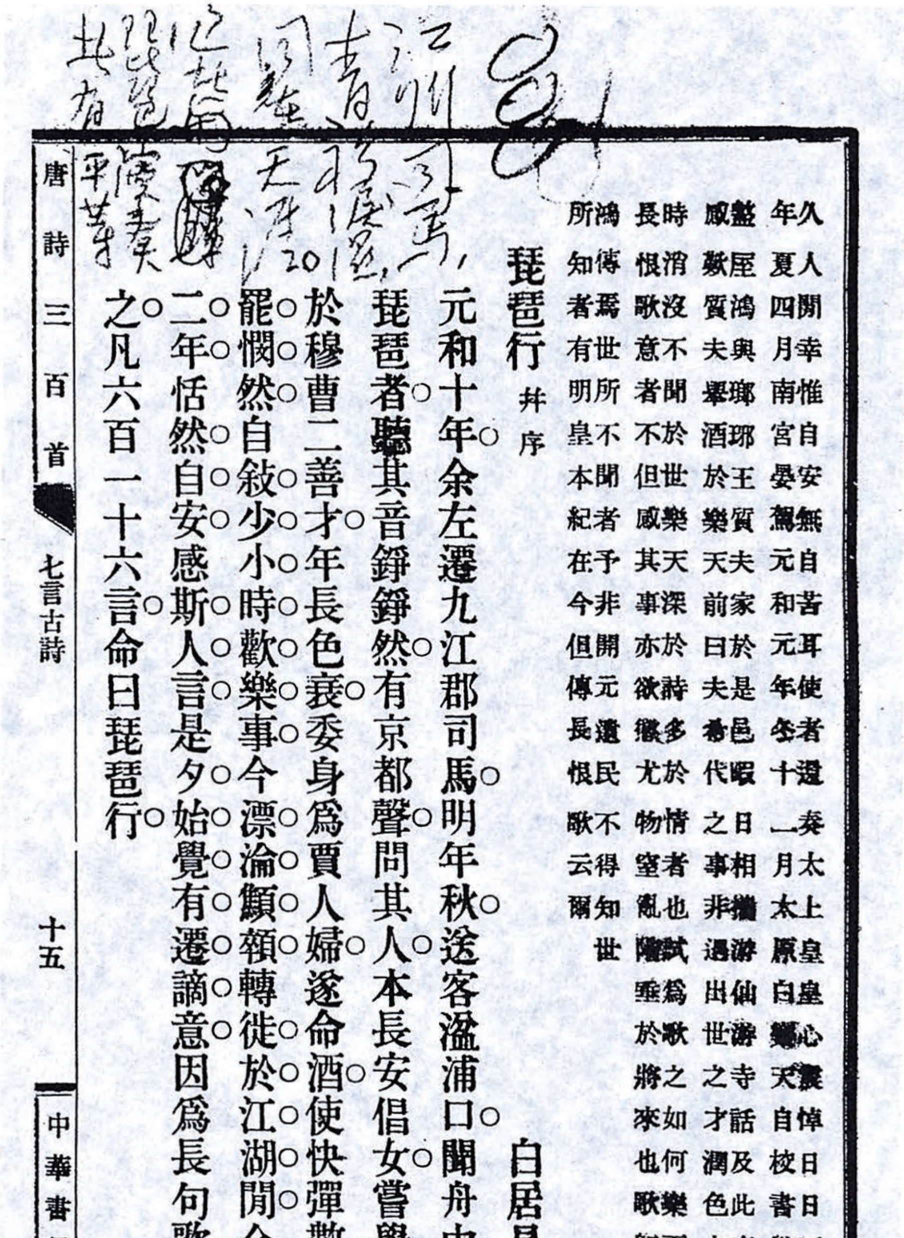
白居易

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1]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元和十年，余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卷二　七言古诗　第15～16页]

---

[1] 《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又：“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江州司马，
青衫湿，
同是天涯、201
沦落
琵琶演奏
此有平等

（久人間幸惟自安無自苦耳使者還奏太上皇皇心震悼日日不豫其年夏四月南宮晏駕元和元年冬十一月太原白樂天自校書郎尉於盩厔鴻與琅琊王質夫家於是邑暇日相攜遊仙遊寺話及此事相與感歎質夫舉酒於樂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於世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試爲歌之如何樂天因爲長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也歌既成使鴻傳焉世所不聞者予非開元遺民不得知世所知者有明皇本紀在今但傳長恨歌云爾）

琵琶行（幷序） 白居易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彈琵琶者○聽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倡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顦○顇○轉徙○於○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唐詩三百首
七言古詩
十五
中華書局印行

毛泽东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注的手稿。

将　进　酒

李　白

好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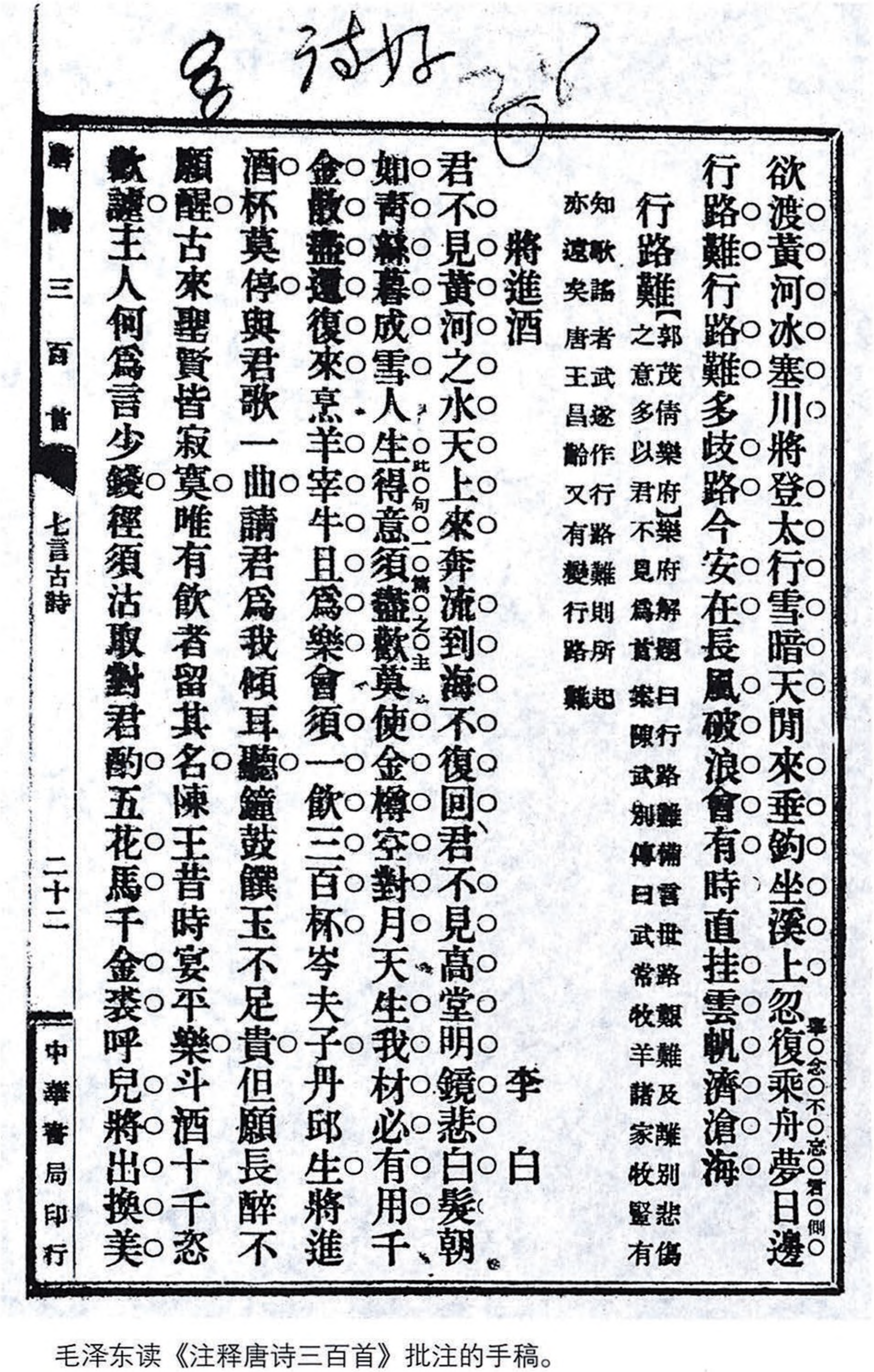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卷二　七言古诗　第22页]

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　勃

好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卷三　五言律诗　第1页]



多诗好

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暗天閑來垂釣坐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事念不忘君側）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挂雲帆濟滄海

行路難【郭茂倩樂府】（樂府解題曰行路難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案陳武別傳曰武常牧羊諸家牧豎有知歌謠者武遂作行路難則所起亦遠矣唐王昌齡又有變行路難）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此句一篇之主）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邱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

唐詩三百首　七言古詩　二十二

中華書局印行

毛泽东读《注释唐诗三百首》批注的手稿。

早寒有怀

孟浩然

略好

木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乡泪客中尽，孤帆天际看。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卷三　五言律诗　第8页]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韦应物

好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发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卷三　五言律诗　第10页]

蜀先主庙

刘禹锡

略好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卷三　五言律诗　第11页]

读《近三百年名家词选》批语

江城子·咏史

纳兰性德

巫嵩之类

湿云全压数峰低，影凄迷，望中疑。非雾非烟，神女欲来时。 若问生涯原是梦，除梦里，没人知。[第70页]

蝶恋花·出塞

纳兰性德

看出兴亡

今古河山无定据，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 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榆园本“据”作“数”，下阕首句作“幽怨从前何处诉？”）[第72页]

悼亡

菩萨蛮四首

纳兰性德

问君何事轻离别？一年能几团圆月？杨柳乍如丝，故园春尽时。　春归归不得，两桨松花隔。旧梦逐寒潮，啼鹃恨未消。[第74页]

催花未歇花奴鼓，酒醒已见残红舞。不忍覆馀觞，临风泪数行。　粉香看欲别，空剩当时月。月也异当时，凄清照鬓丝。[第74页]

晶帘一片伤心白，云鬟香雾成遥隔。无语问添衣，桐阴月已西。　西风鸣络纬，不许愁人睡。只是去年秋，如何泪欲流？[第74页]

乌丝画作回纹纸，香煤暗蚀藏头字。筝雁十三双，输他作一行。　相看仍似客，但道休相忆。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第74页]

清平乐

纳兰性德

赠女友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倦倚玉阑看月晕，容易语低香近。 软风吹遍窗纱，心期便隔天涯。从此伤春伤别，黄昏只对梨花！[第74～75页]

临江仙·寒柳

纳兰性德

悼亡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 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第75页]

读《历代诗话》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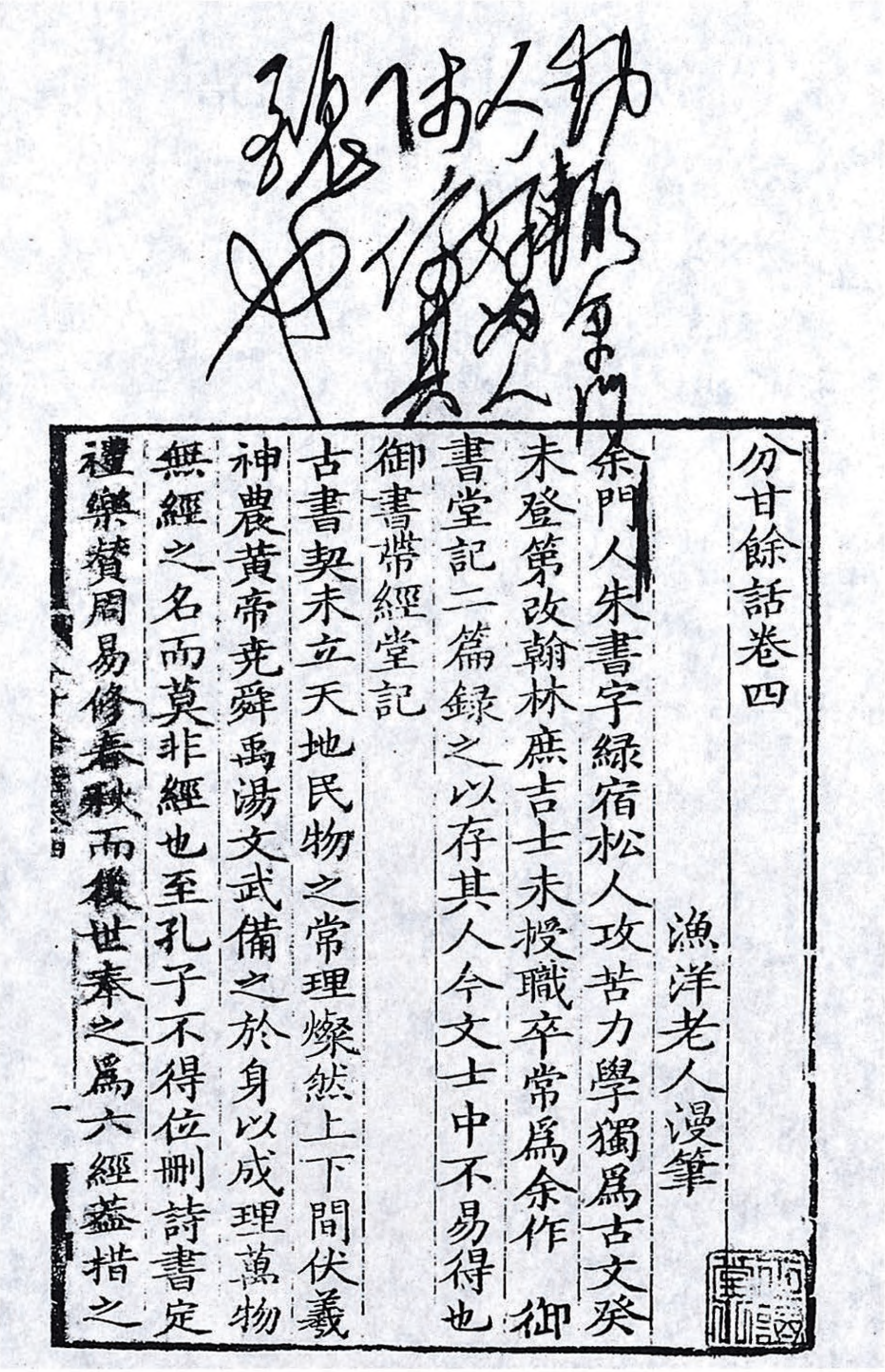
此说亦迂

如《乌江亭》云：“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余以牧之数诗，俱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谢叠山所谓“死中求活”也。《渔隐丛话》云：“牧之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四皓》，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则好异而叛于理。项氏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呜呼，此岂深于诗者哉？[话五十二庚集七]

读《分甘余话》批语

余门人朱书，字绿，宿松人。攻苦力学，独为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职卒。尝为余作《御书堂记》二篇，录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卷四第1页]

动辄余门人，好为人师，何其丑也。



孙[illegible]余門
人[illegible]為之
不[illegible]其
張中

分甘餘話卷四

漁洋老人漫筆

余門人朱書字緑宿松人攻苦力學獨爲古文癸未登第改翰林庶吉士未授職卒常爲余作御書堂記二篇録之以存其人今文士中不易得也

御書帶經堂記

古書契未立天地民物之常理燦然上下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備之於身以成理萬物無經之名而莫非經也至孔子不得位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後世奉之爲六經蓋措之

毛泽东读《分甘余话》批注的手稿。

读《明人百家小说》批语

德必有位

可疑

明王既嗣王位，久之，嫡母生男，至周晬时，英王巡边在外，家事先决于嗣王。有司以周晬礼请，乃命以世子例行之。有司以王故，难之。王曰：“何疑乎？初以嫡嗣未生，故我权在此位。今既生矣，待长复辟何难？”曰：“此事前古多危，请慎思之。”王曰：“顺义行之，安危何足虑也！”卒以世子例行之。期年而嫡嗣殁，王甚哀之。君子谓明王诚心不顾于安危，让德克光于今古。传曰：有德者必有其位，其斯之谓欤。[黎澄《南翁梦录》第5页]

记学

劣语

马实曰：“幸生圣明之世，免砖瓦之资。托为丈夫，当建名千载，不可为空生徒死之物，秽天地之间。”

无所谓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方大镇《田居乙记》第1页]

其实二者都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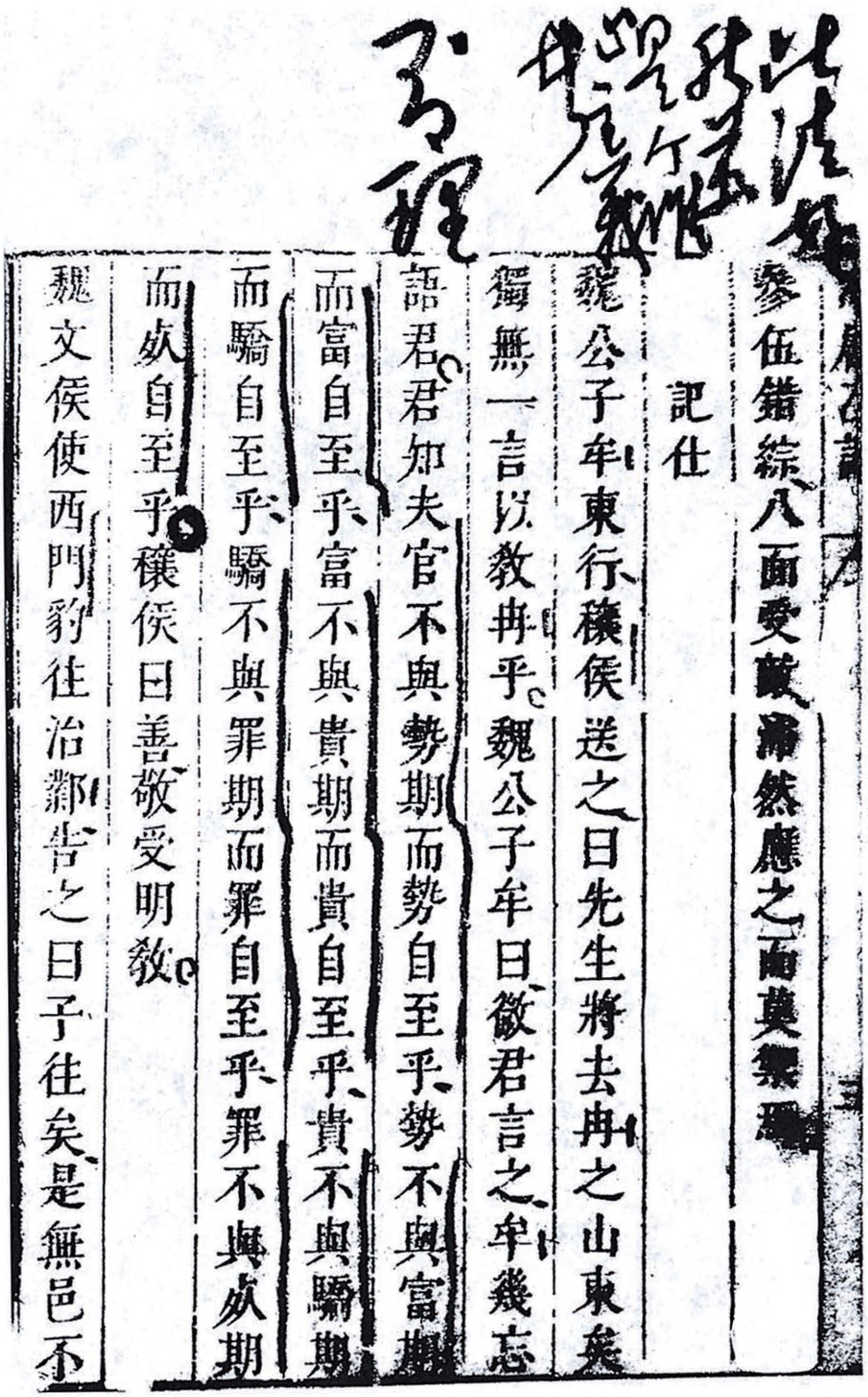
枚皋文章疾敏，长卿制作淹通，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庙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方大镇《田居乙记》第2～3页]

此法好。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

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方大镇《田居乙记》第3页]

记仕

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



此法好
我們行之
只是
世人
不理

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窺[illegible]

記仕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

毛泽东读《明人百家小说》批注的手稿。

有理

“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亡期而亡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此有唯物论思想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邺，告之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贤豪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善、蔽人之恶者因而察之，不可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很难做到

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方大镇《田居乙记》第3～4页]

读《智囊》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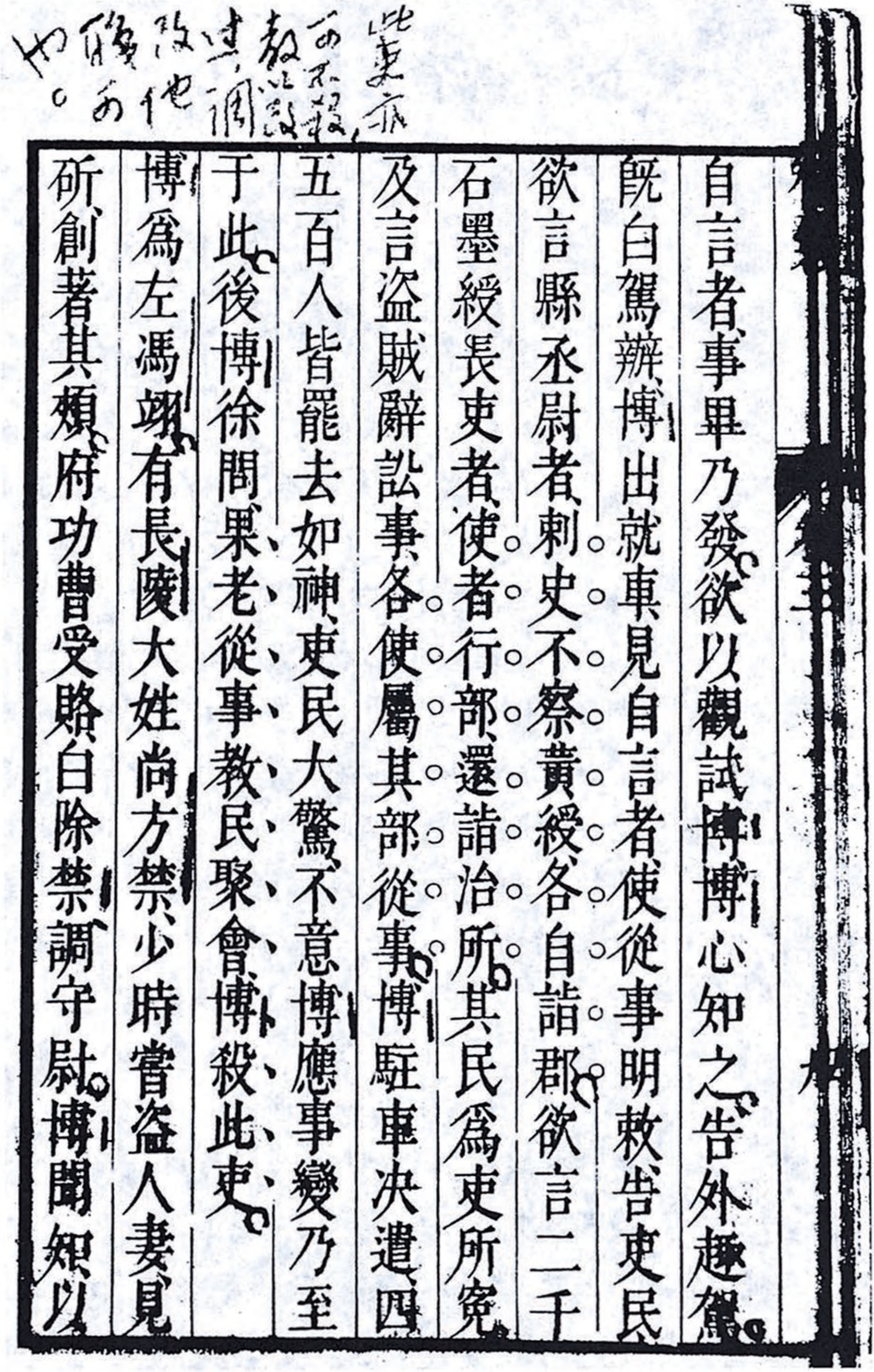
朱博

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冀州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

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

博为左冯翊，有长陵大姓尚方禁，少时尝盗人妻，见斫，创著其颊。府功曹受赂，自除禁，调守尉。博闻知，以他事召见，视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问禁，是何等创也。禁自知情得，叩头服状。博笑曰：“大丈夫固时有是。冯翊欲洒卿耻，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惧，对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语，有便宜辄记言，因亲信之，以为耳目。禁晨夜发起部中盗贼及他伏

使人改过自效



此吏亦而不必殺，教之以說責，調改他使而也。

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于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博爲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

毛泽东读《智囊》批注的手稿。

奸，有功效，博擢禁连守县令。久之，召见功曹，闭阁，数责以禁等事，与笔札，使自记，积受一钱以上，无得有匿，欺谩半言，断头矣。功曹惶怖，且自疏奸赃，大小不敢隐。博知其实，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拔刀使削所记，遣出就职。功曹后常战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卷三　《上智部·通简》第9～10页]

韩裒

周文帝（宇文泰）时，韩裒为北雍州刺史。州多盗，裒至，密访之，并州中豪右也。裒阳不知，并加礼遇，谓曰："刺史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乃悉召桀黠少年，尽署主帅，与分地界，盗发不获，即以故纵论。于是诸被署者，皆惶惧首伏，曰：前盗实某某。具列姓名。裒因取名簿藏之，榜州门曰："凡盗可急来首，尽今月不首者，显戮之，籍其妻子以赏前首者。"于是，旬月间盗悉出首。裒取簿质对，不爽，并原其罪，许自新。由是群盗屏息。[卷三《上智部·通简》第11页]

使人改过

程明道

劳动改造

明道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类，得数十人，不复根治旧恶，分地而处之，使以挽舟为业，且察为恶者。自是境无焚舟之患。[卷三《上智部·通简》第11页]

朱胜非

此南宋事

苗、刘之乱，勤王兵向阙。朱忠靖（胜非）从中调护，六龙反正。有诏以二凶为淮南两路制置使，令将部曲之任。时朝廷幸其速去，其党张达为画计，使请铁券。即朝辞，遂造堂袖札以恳。忠靖顾吏取笔，判奏行给赐，令所属检详故事，如法制造，二凶大喜。明日将朝，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事，速命延入。宿曰：“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顾执政秉烛同阅。忽顾问曰：“检详故事，曾检得否?”曰：“无可检。”又问：“如法制造，其法如何?”曰：“不知。”又曰：“如此可给乎?”执政皆笑，宿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退。[卷四《上智部·迎刃》第13～14页]

徐阶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怨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彍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迨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

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卷八下《明智部·经务》第21～23页]

崔思竞

崔思竞，则天朝或告其再从兄宣谋反，付御史张行岌按之。告者先诱藏宣妾，而云妾将发其谋。宣乃杀之，投尸洛水。行岌按略无状，则天怒，令重按，奏如初。则天怒曰："崔宣若实曾杀妾，反状自明矣。不获妾，如何自雪？"行岌惧，逼思竞访妾。思竞乃于中桥南北多置钱帛，募匿妾者，数日略无所闻。而其家每窃议事，则告者辄知之。思竞揣家中有同谋者，乃佯谓宣妻曰："须绢三百匹，雇刺客杀告者。"而侵晨伏于台前。宣家有馆客姓舒，婺州人，为宣家服役，宣委之同于子弟。须臾见其人至台，赂阍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称崔家欲刺我。思竞要馆客于天津桥，骂曰："无赖险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谋，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遗汝五百缣，归乡，足成百年之业。不然，亦杀汝必矣！"其人悔谢，乃引至告者之家，搜获其妾，宣乃得免。

一个馆客尚然，彼食客三千者，何如哉！虽

未必

然，鸡鸣狗盗，因时效用则有之，皆非甘为服役者也，故相士以廉耻为重。[卷九《察智部·得情》第1～2页]

孔镛

广西早已植麦

镛曰：“我馁矣，可具食。”众杀牛马，为麦饭以进。镛饱啖之，贼皆惊服。[卷十二《胆智部·识断》第10页]

陆文裕

封建主义

自学宫多假借，而贱妨贵、仆抗主者，纷纷矣。得陆公一扩清，大是快事。[卷十二《胆智部·识断》第12页]

吾见其人矣

冯子曰：“成大事者争百年，不争一息。然而一息固百年之始也。夫事变之会，如火如风，愚者犯焉，稍觉，则去而违之，贺不害斯已矣。今有道于此，能返风而灭火，则虽拔木燎原，适足以试其伎而不惊。尝试譬之足力，一里之程，必有先至，所争逾刻耳；累之而十里百里，则其为刻弥多矣；又况乎智之迟疾，相去不啻千万里

者乎！军志有之：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夫速而无巧者，必久而愈拙者也。今有径尺之樽，置诸通衢，先至者得醉，继至者得尝，最后至则干唇而返矣。叶叶而摘之，穷日不能髡一树；秋风下霜，一夕零落。此言造化之捷也，人若是其捷也，其灵万变，而不穷于应卒，此惟敏悟者庶几焉。呜呼！事变之不能停而俟我也，审矣。天下亦乌有智而不捷、不捷而智者哉！”[卷十三《捷智部·总叙》第1页]

王羲之

此事似误，待查。

王右军幼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逆节事，都忘右军在帐中。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半，方悟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纵横，信其实熟眠，由是得全。[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第4～5页]

周文襄

一云：己巳之变，议者请烧通州仓以绝虏望。于肃愍曰：“国之命脉，民之膏脂，奈何不惜！”传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数日粟尽入城。……自古攻守之策，未有不以食为本者，要在敌未至而预图耳。若搬运不及，则焚弃亦是一策。古名将亦往往有之，决不可赍盗粮也。[卷十三《捷智部·灵变》第22页]

赍盗粮亦何所不可，地不能毁，民不能迁，皆赍盗粮也。

张恺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时征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恺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已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棉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过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

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卷十四《捷智部·应卒》第4～5页]

小知识分子有用

尹见心

此即造桥柱新法

尹见心为知县。县近河，河中有一树，从水中生有年矣，屡屡坏人舟。见心命去之。民曰：“根在水中甚固，不得去。”见心遣能入水者一人，往量其长短若干，为一杉木大桶，较木稍长，空其两头，从树杪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尽涸其水，使人入而锯之，木遂断。[卷十五《捷智部·敏悟》第5页]

杨一清　张永

武宗时事

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兵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动永。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嘱永曰：“公班师入京见上，先进宁夏疏，上必就公问，公诡言请屏人语，乃进内变疏。”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公言，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万一不信公，公可顿首请上即时召瑾，没其兵器，劝上登城验之。‘若无反状，杀奴喂狗。’又顿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诛，公大用，尽矫其所为。吕强、张承业与公，千载三人耳！但须得请即行事，勿缓顷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

已而永入见，如公策，事果济。[卷十六《术智部·委蛇》第6页]

李允则

调查研究，平等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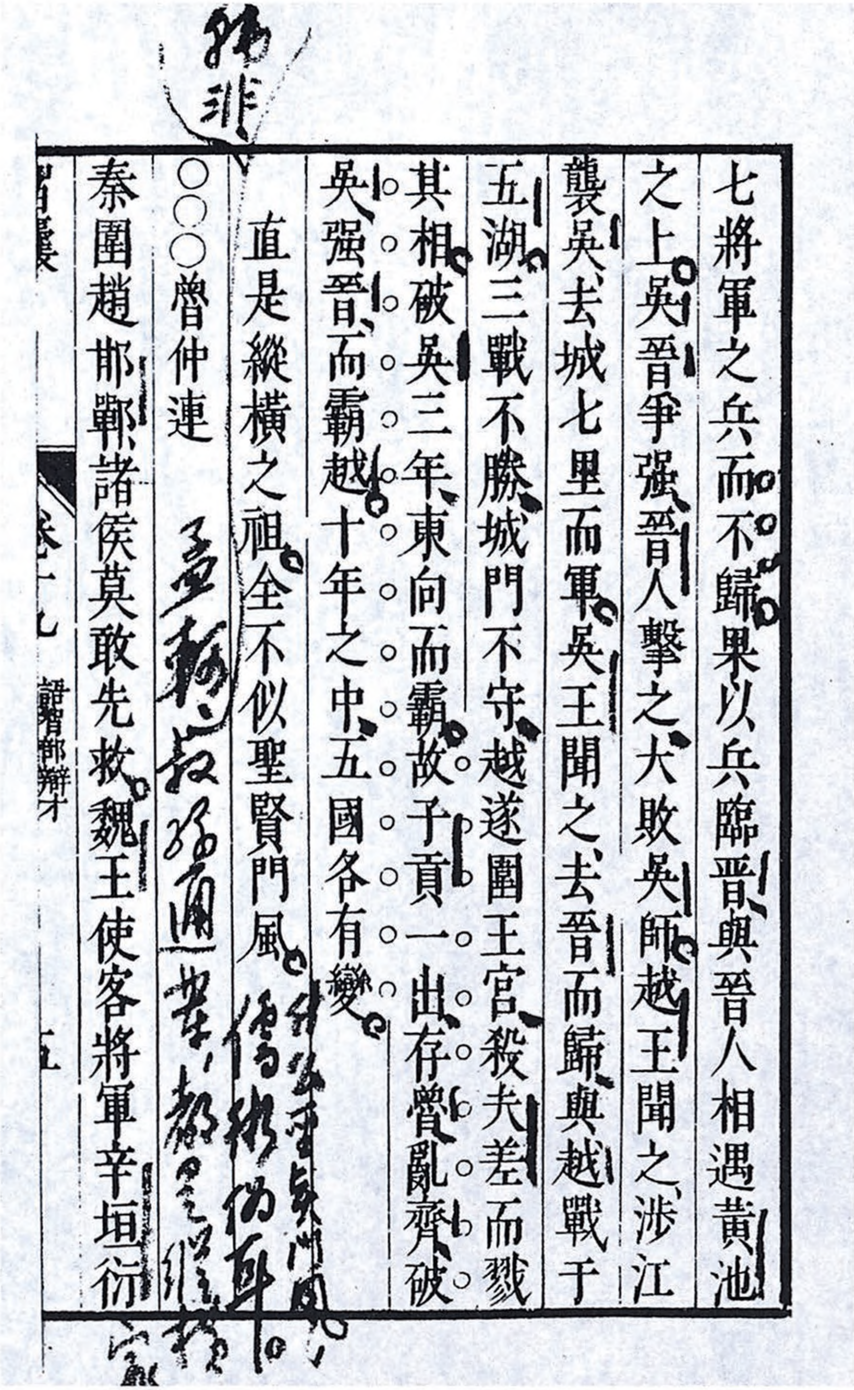
按：（刺史）允则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有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此洞知人情。子犹曰：即此便是舜之大智。今人以矜慢为威严，以刚愎为任断；千金在握而不能摄一谋臣，百万在籍而不能得一死士；无事而猴冠，有事则鼠窜。从自及矣，尚何言乎？[卷十七《术智部·谬数》第13页]

子贡

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卷十九《语智部·辩才》第5页]



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直是縱横之祖全不似聖賢門風

什么圣贤门风

儒术伪耳。

韩非

孟轲、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曾仲連

秦圍趙邯鄲諸侯莫敢先救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

智囊　卷十九　雜智部辯才　五

毛泽东读《智囊》批注的手稿。

孙膑

孙子同齐使之齐，客田忌所。忌数与齐诸公子逐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马有上中下，乃谓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胜。”忌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五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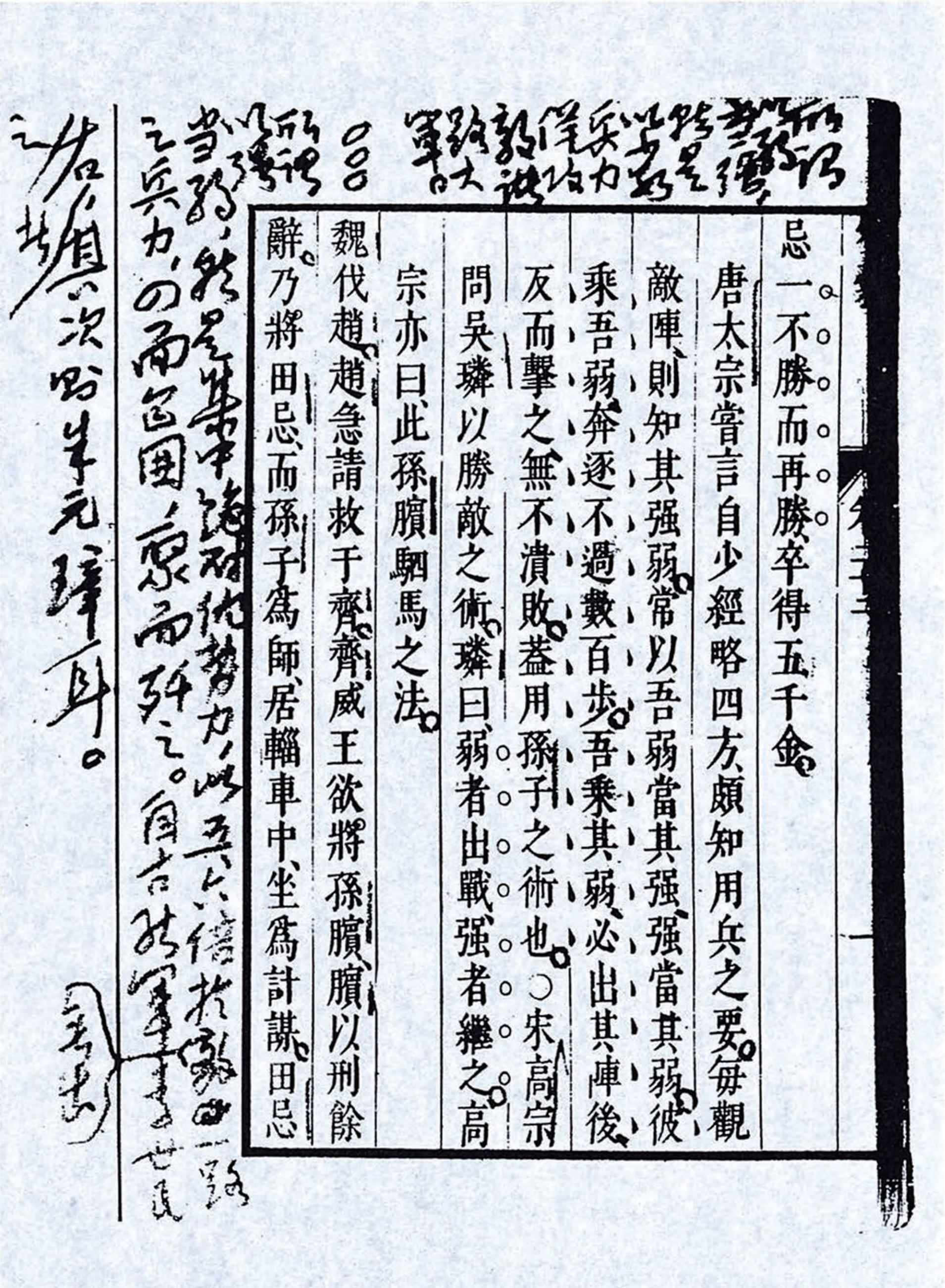
唐太宗尝言：“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过数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而击之，无不溃败。”盖用孙子之术也。〇宋高宗问吴璘以胜敌之术，璘曰：“弱者出战，强者继之。”高宗亦曰：“此孙膑驷马之法。”

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膑，膑以刑余辞。乃将田忌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救赵，孙子曰：“夫解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尽于外，老弱罢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冲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困，而收弊于魏也。”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第1～2页]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



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五千金。

唐太宗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陣、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奔逐不過數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陣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蓋用孫子之術也。宋高宗問吳璘以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亦曰此孫臏駟馬之法。

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以刑餘辭、乃將田忌、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

所謂[illegible]是以少兵力佯攻[illegible]大軍[illegible]。所謂以強當弱，就是集中優勢兵力，以兵力倍於敵之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圍，聚而殲之。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毛泽东读《智囊》批注的手稿。

高手。

赵奢

秦伐韩，军于阏与。赵王……乃遣奢将而往。去邯郸三十里，而令军中曰：“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军武安西，鼓噪勒兵，屋瓦皆振。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斩之。坚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复益增垒。秦间来入，奢善食而遣之。间以报秦将，秦将大喜曰：“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阏与非赵地也。”奢既遣秦间，乃卷甲而趣之，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阏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人闻之，悉甲而至。军士许历请以军事谏，奢曰：“内之。”许历曰：“秦人不意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厚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奢许诺。许历请就诛，奢曰：“胥后令，至邯郸。”历复请谏，曰：“先据北山者胜，后至者败。”奢许诺，即发万人趋之。秦兵后至，争山不得上。奢纵兵击之，大破秦军，遂解阏与之围。[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第2～3页]

老师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

赵威后

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书未发，威后问使者曰：“岁亦无恙耶？民亦无恙耶？王亦无恙耶？”使者不悦，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问王而先问岁问民，岂先贱而后尊贵者乎？”威后曰：“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有舍本而问末者耶？”乃进而问之曰：“齐有处士钟离子无恙耶？是其为人也，有粮者亦食，无粮者亦食；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是助王养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叶阳子无恙乎？是其为人，哀鳏寡，恤孤独，振困穷，补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业也？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撤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不业、一女不朝，何以王齐国、子万民乎？于陵子仲尚存乎？是其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此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乎？”[卷二十五《闺智部·贤哲》第1页]

不应在杀例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卷二十五《闺智部·贤哲》第7页]

李畬应自科罪

婴母　陵母

东阳少年起兵，欲立令史陈婴为王。婴母曰：“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婴乃推项梁。

王陵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愿为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剑而死。

婴母知废，胜于陈涉、吴广、田横、英布、陈豨诸人。陵母知兴，胜于亚父、蒯通、贯高诸人。[卷二十五《闺智部·贤哲》第9页]

废话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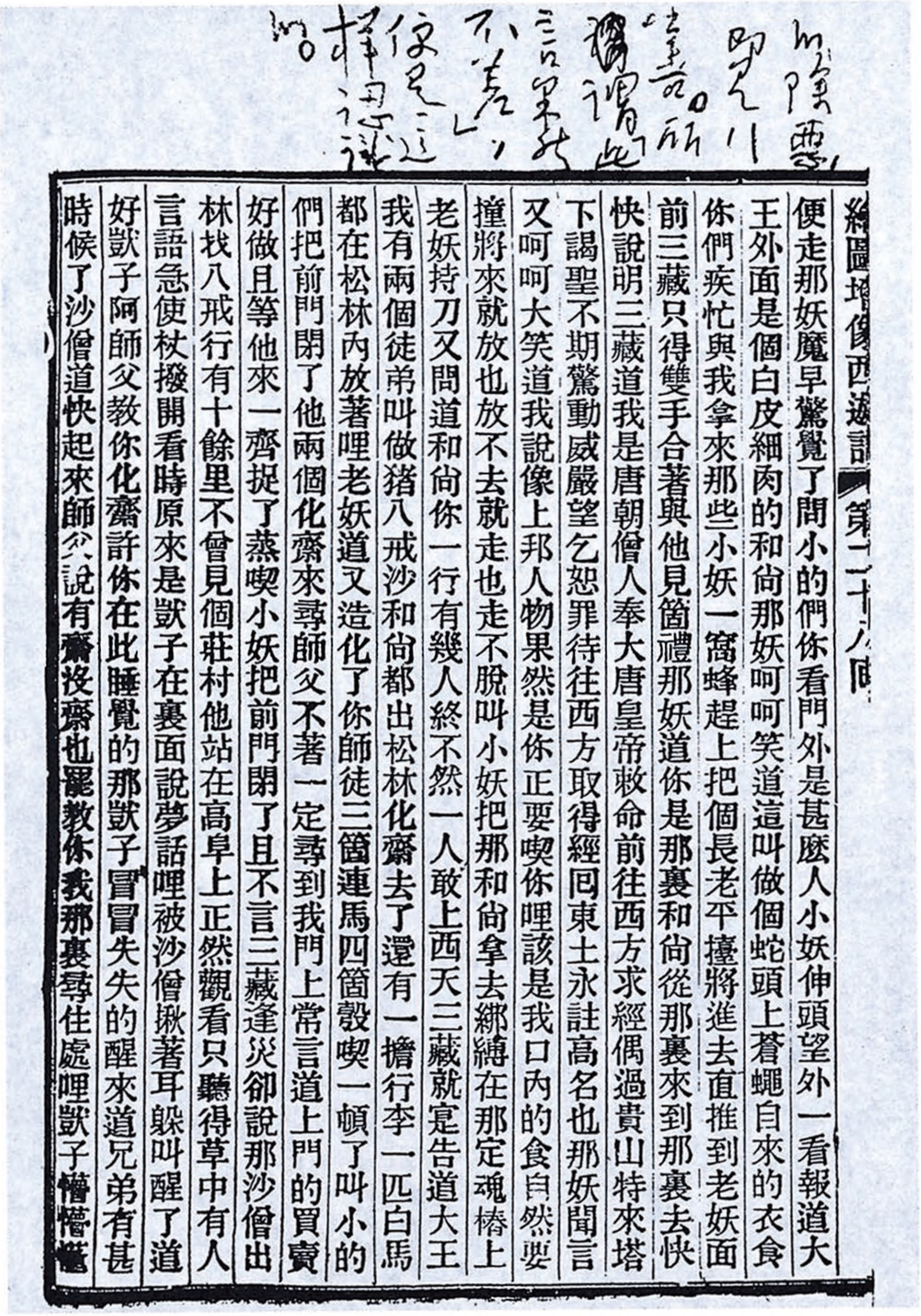
高老道："我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个女儿。……止有小的想要招个养老女婿，不期三年前有一个汉子，模样儿倒也精致，他说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愿与人家做个女婿，我老拙就招了他，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谁知他会变嘴脸。"行者道："怎么变?"高老道："初来时是一条黑胖汉，后来就变做一个长嘴、大耳朵的呆子，脑后又有三溜鬃毛，就像个猪的模样。食肠却又甚大，喜得还吃斋素，若再吃荤酒，老拙这些家产几时早也罄净。"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吃得。"高老道："吃还是小事，他如今又会弄风，云来雾去，走石飞沙，唬得我一家并邻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小女关在后宅子里，半年也不得见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个妖怪，要请个法师退他。"[第十八回《观音院唐僧脱难，高老庄行者降魔》第2页]

只因做得多，所以分配应当多，多劳应当多得。反过来，只因吃得多，所以才有可能做得多。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

大圣分付众猴，把那山上的碎石头搬将起来堆着。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

大圣上山看处，只见那南半边鼓响锣鸣，闪出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奔上他的山来。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遂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枪刀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拆洗，总斗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囤粮。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清青了。仍栽花种树，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题。[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松林三藏逢魔》第 1 页]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似隱喻，即人們常言所稱謂「此言果然不差」，便是這樣認識的。

繪圖增像西遊記　第二十八回

便走那妖魔早驚覺了問小的們你看門外是甚麼人小妖伸頭望外一看報道大王外面是個白皮細肉的和尚那妖呵呵笑道這叫做個蛇頭上蒼蠅自來的衣食你們疾忙與我拿來那些小妖一窩蜂趕上把個長老平擡將進去直推到老妖面前三藏只得雙手合著與他見個禮那妖道你是那裏和尚從那裏來到那裏去快快說明三藏道我是唐朝僧人奉大唐皇帝救命前往西方求經偶過貴山特來塔下謁聖不期驚動威嚴望乞恕罪待往西方取得經囘東土永註高名也那妖聞言又呵呵大笑道我說像上邦人物果然是你正要喫你哩該是我口內的食自然要撞將來就放也放不去就走也走不脫叫小妖把那和尚拿去綁縛在那定魂樁上老妖持刀又問道和尚你一行有幾人終不然一人敢上西天三藏就寔告道大王我有兩個徒弟叫做豬八戒沙和尚都出松林化齋去了還有一擔行李一匹白馬都在松林內放著哩老妖道又造化了你師徒三箇連馬四箇彀喫一頓了叫小的們把前門閉了他兩個化齋來尋師父不著一定尋到我門上常言道上門的買賣好做且等他來一齊提了蒸喫小妖把前門閉了且不言三藏逢災卻說那沙僧出林找八戒行有十餘里不曾見個莊村他站在高阜上正然觀看只聽得草中有人言語急使杖撥開看時原來是獃子在裏面說夢話哩被沙僧揪著耳躲叫醒了道好獃子阿師父教你化齋許你在此睡覺的那獃子冒冒失失的醒來道兄弟有甚時候了沙僧道快起來師父說有齋沒齋也罷教你我那裏尋住處哩獃子懵懵懂

毛泽东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注的手稿。

读《聊斋志异》批语

马介甫

杨万石，大名诸生也。生平有季常之惧。妻尹氏，奇悍。少迕之，辄以鞭挞从事。……兄弟候试郡中，见一少年，容服都雅。与语，悦之。询其姓字，自云：“介甫，姓马。”由此交日密，焚香为昆季之盟。既别，约半载，马忽携僮仆过杨。……（杨）妾王，体妊五月，妇始知之，褫衣惨掠。已，乃唤万石跪受巾帼，操鞭逐出。……妇亦随出，叉手顿足，观者填溢。马指妇叱曰：“去，去！”妇即反奔，若被鬼逐。裤履俱脱，足缠萦绕于道上，徒跣而归，面色灰死。……益羞怒，遍挞奴婢。呼妾，妾创剧不能起。妇以为伪，就榻搒之，崩注堕胎。……妇在闺房，恨夫不归，方大恚忿；闻撬扉声，……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狰狞如鬼。……巨人乃以利刃画妇心而数之曰：“如某事，谓可杀否？”即一画。凡一切凶悍之事，责数殆尽，刀画肤革，不啻数十。……妇叩头乞命，但言知悔。俄闻中门

个性斗争，此妇虽坏，然是突出典型。

启闭，曰：“杨万石来矣。既已悔过，姑留余生。”纷然尽散。无何，万石入，见妇赤身绷系，心头刀痕，纵横不可数。……由是妇威渐敛，经数月不敢出一恶语。马大喜，告万石曰：“实告君，幸勿宣泄，前以小术惧之。既得好合，请暂别也。”遂去。……妇一夜忆巨人状，瑟缩摇战。万石思媚妇意，微露其假。妇遽起，苦致穷诘。万石自觉失言，而不可悔，遂实告之。妇勃然大骂。……妇曰：“欲得我恕，须以刀画汝心头如干数，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万石大惧而奔，妇逐之。犬吠鸡腾，家人尽起。……一日，马忽至。……妇益恚，顾寻刀杖，万石惧而却步。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开箧，出刀圭药，合水授万石饮，曰：“此丈夫再造散。……”饮下，少顷，万石觉忿气填胸，如烈焰冲烧，刻不容忍。直抵闺闼，叫喊雷动。妇未及诘，万石以足腾起，妇颠去尺有咫。即复握石成拳，擂击无算。妇体几无完肤，嘲哳犹詈。万石于腰中出佩刀。妇骂曰：“出刀子，敢杀我耶？”万石不语，割股上肉，大如掌，掷地下。方欲再割，妇哀鸣乞恕。万石不听，又割之。家人见万石凶狂，相集死力掖出。……少间，药力渐消，嗒焉若丧。……月余，妇起，宾事良人。久觉黔驴无技，渐狎，渐嘲，渐骂；居无何，旧态全作矣。[第485～492页]

白莲教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

白莲盗首徐鸿儒，得左道之书，能役鬼神。小试之，观者尽骇，走门下者如鹜。于是阴怀不轨。因出一镜，言能鉴人终身。悬于庭，令人自照，或襆头，或纱帽，绣衣貂蝉，现形不一，人益怪愕。由是道路遥播，踵门求鉴者，挥汗相属。徐乃宣言：“凡镜中文武贵官，皆如来佛注定龙华会中人，各宜努力，勿得退缩。”因亦对众自照，则冕旒龙衮，俨然王者。众相视而惊，大众齐伏。徐乃建旗秉钺，罔不欢跃相从，冀符所照。不数月，聚党以万计，滕、峄一带，望风而靡。后大兵进剿，有彭都司者，长山人，艺勇绝伦。寇出二垂髫女与战，女俱双刃，利如霜，骑大马，喷嘶甚怒，飘忽盘旋，自晨达暮，彼不能伤彭，彭亦不能捷也。如此三日，彭觉筋力俱竭，哮喘而卒。殆鸿儒既诛，捉贼党械问之，始知刃乃木刀，骑乃木凳也。假兵马死真将军，亦奇矣。[第519～520页]

小谢

一篇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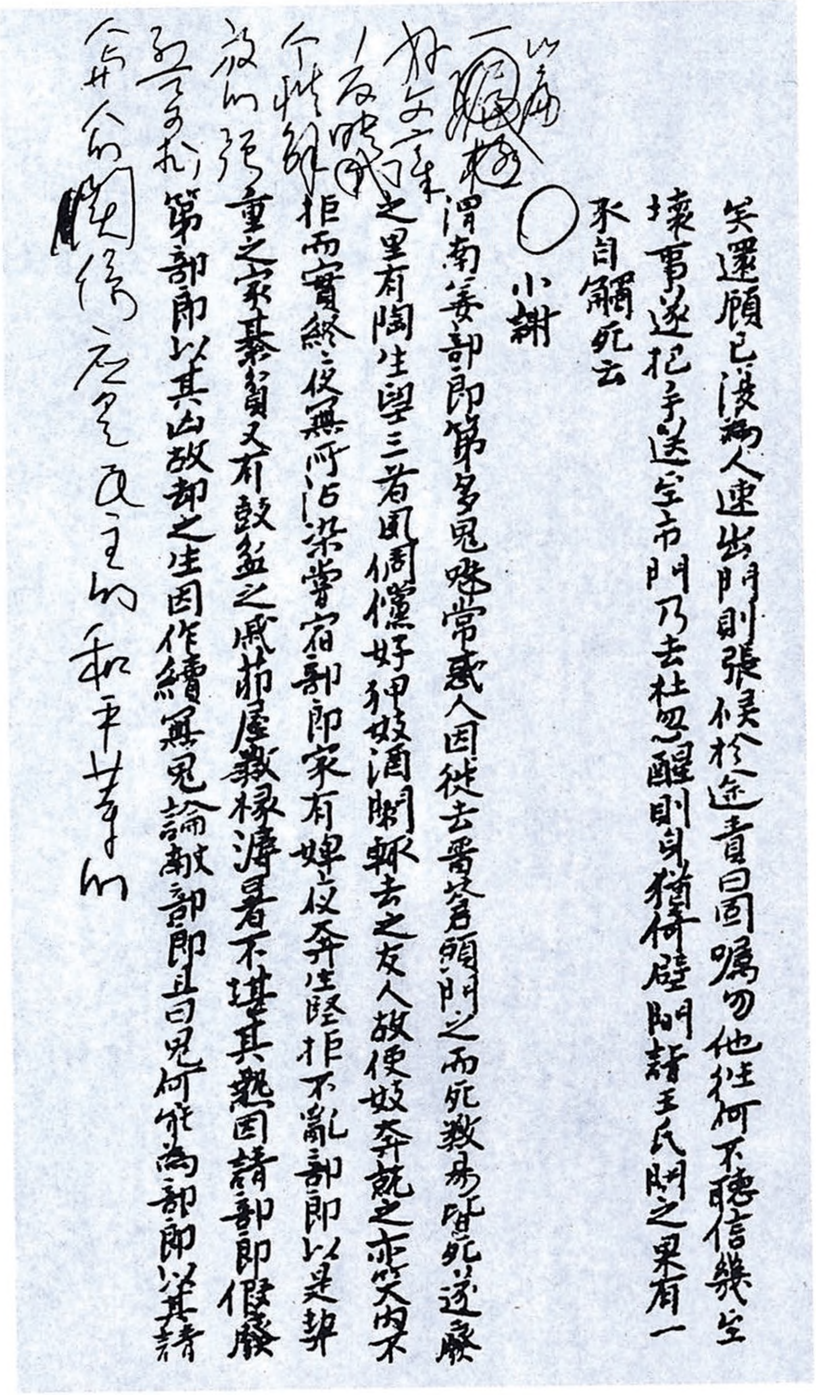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

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1]

留苍头门之而死，数易皆死，遂废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傥，好狎妓，酒阑辄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内不拒，而实终夜无所沾染。……茅屋数椽，溽暑不堪其热，因请部郎假废第。……诺之，生往除厅事。薄暮，……仰卧榻上，……见二女自房中出，……一约二十，一可十七八，并皆姝丽。……日渐稔，接坐倾语，审其姓名。长者云：“妾秋容，乔氏；彼阮家小谢也。”……一日，录书未卒业而出，返则小谢伏案头，操管代录。见生，掷笔睨笑。近视之，虽劣不成书，而行列疏整。生赞曰：“卿雅人也，苟乐此，仆教卿为之。”乃拥诸怀，把腕而教之画。秋容自外入，色乍变，意似妒。……生喻其意，伪为不觉者，遂抱而授以笔，曰：“我视卿能此否？”作数字而起，曰：“秋娘大好笔力！”秋容乃喜。生于是折两纸为范，俾共临摹。……仿毕，祗立几前，听生月旦。……二女由此师事生，……与生竞读，常至终夜。……一日，生将赴试，二女涕泪相别。……先是，生好以诗词讥切时事，获罪于邑贵介，日思中伤之。阴赂学使，诬以行简，淹禁狱中。……忽一人飘忽而入，则秋容也，以馔具馈生。……忽小谢

---

[1] “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当指二女的由鬼变成人，由害人的鬼变成爱人的人，由无知愚昧变成竞读终夜，由被拘囚到得释放。“人与人的关系”指陶生与二女鬼的关系“是民主的和平等的”。



矣還顧已渺囑人速出門則張候於途責曰固囑勿他往何不聽信幾至壞事遂把手送至市門乃去杜忽醒則身猶倚壁門諸王氏問之果有一豕自觸死云

小謝

渭南姜部郎第多鬼魅常惑人因徙去留蒼頭門之而死數易皆死遂廢之里有陶生望三者夙倜儻好狎妓酒闌輒去之友人故使妓奔就之亦笑內不拒而實終夜無所沾染嘗宿部郎家有婢夜奔生堅拒不亂部郎以是契重之家綦貧又有鼓盆之戚茆屋數椽溽暑不堪其熱因請部郎假廢第部郎以其凶故却之生因作續無鬼論獻部郎且曰鬼何能為部郎以其請

以后写阴
一团和气
好女子未
人与鬼战
介绍经
[illegible]
到了手扎
[illegible]的阴间[illegible]应是人民的和平世界

毛泽东读《聊斋志异》批注的手稿。

至，怆惋欲绝，言：“秋容归，经由城隍祠，被西廊黑判强摄去，逼充御媵。秋容不屈，今亦幽囚……”……部院……提生面鞫，……悟其冤，释之。……更阑，小谢始至，惨然曰：“……秋容久锢，妾以状投城隍，又被按阁，不得入，且复奈何？”……不觉四漏将残，秋容飘然忽至。两人惊喜，急问。秋容泣下曰：“今为郎万苦矣！判日以刀杖相逼，今夕忽放妾归，曰：‘我无他，原以爱故；既不愿，固亦不曾污玷。烦告陶秋曹，勿见谴责。’”生闻少欢。……会一道士途遇生，……因书二符付生，曰：“归授两鬼，任其福命：如闻门外有哭女者，吞符急出，先到者可活。”生拜受，归嘱二女。后月余，果闻有哭女者。……秋容直出，入棺而没；……俄闻棺中有声，息肩发验，女已顿苏。……忽开目问陶生。郝氏研诘之，答云：“我非汝女也。”遂以情告。……忽闻呜呜然鬼泣，则小谢哭于暗陬。……秋容曰：“道士，仙人也。再往求，倘得怜救。”……一日晨兴，有少女搴帏入，明眸皓齿，光艳照人。……小谢至，女遽起迎抱之，翕然合为一体，仆地而僵。道士自室中出，拱手径去。拜而送之。及返，则女已苏。[第526～534页]

细侯

资本主义萌芽

……细侯曰："妾归君后，当长相守，勿复设帐为也。四十亩聊足自给，十亩可以种黍，织五匹绢，纳太平之税有余矣。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第544～5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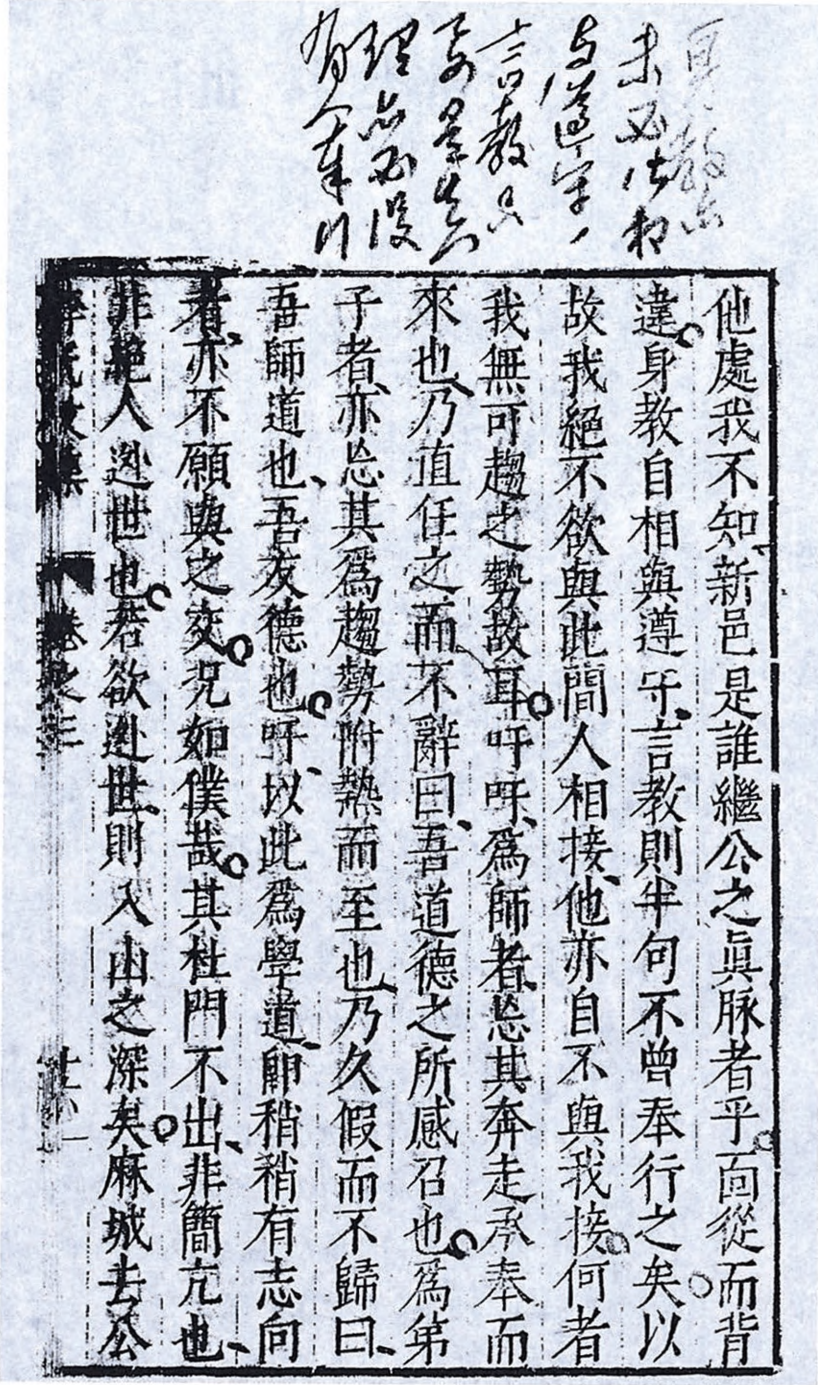
读《李氏文集》批语

在一定条件下

……以善下不争为百谷之王，以好战为乐杀人，以用兵为不得已，以胜为不美，以退为进，以败为功，以福为祸，以得为失，以无知为知，无欲为欲，无名为名。孰谓无为不足以治天下乎？世固未知无为之有益也。[卷十第8页]

身教亦未必皆相与遵守，言教只要是真理，亦〔未〕必没有人奉行。

自公倡道以来，谁是接公道柄者乎？他处我不知，新邑是谁继公之真脉者乎？面从而背违，身教自相与遵守，言教则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故我绝不欲与此间人相接，他亦自不与我接。何者？我无可趋之势故耳。[卷三第16页]



[illegible]
未必如此
与遵守，
言教只
要是[illegible]
理[illegible]必须
有[illegible]

他處我不知新邑是誰繼公之眞脉者乎向從而背
違身教自相與遵守言教則半句不曾奉行之矣以
故我絕不欲與此間人相接他亦自不與我接何者
我無可趨之勢故耳呼呼爲師者怨其奔走承奉而
來也乃直任之而不辭曰吾道德之所感召也爲弟
子者亦怨其爲趨勢附熱而至也乃久假而不歸曰
吾師道也吾友德也吁以此爲學道即稍稍有志向
者亦不願與之交況如僕哉其杜門不出非簡亢也
非絕人逃世也者欲逃世則入山之深矣麻城去公

李氏文集 卷之三 [illegible]

毛泽东读《李氏文集》批注的手稿。

读《古文辞类纂》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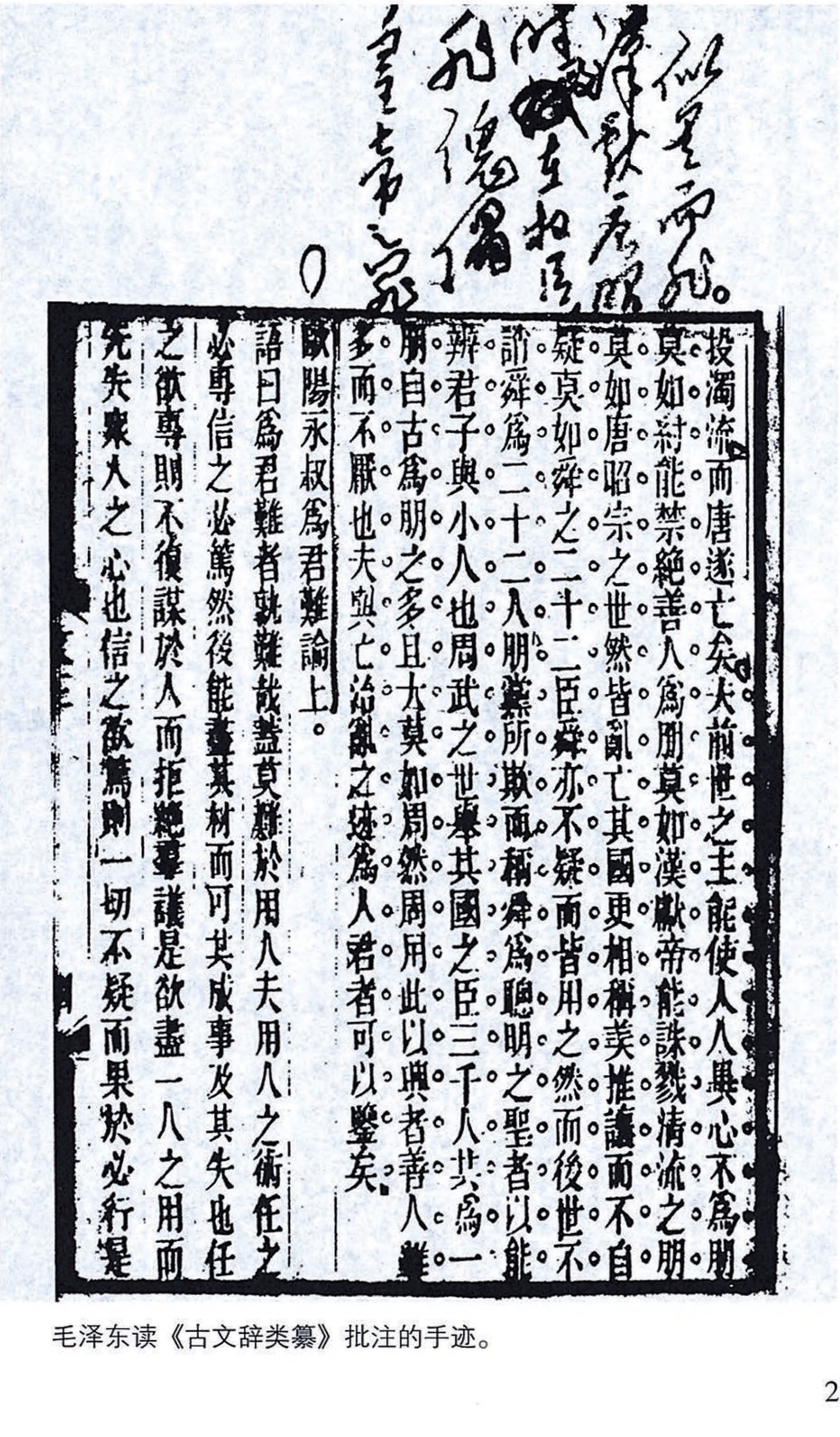
在献帝以前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论辨类，欧阳永叔《朋党论》]

错在倾巢而出。若一二十万

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不可以遍举，请试举其一二：昔秦苻坚地大兵强，有众九十六万，号称百万，蔑视东晋，指为一隅，谓可直以气吞之



似是而非。[illegible]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絶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

毛泽东读《古文辞类纂》批注的手迹。

人更番迭试，胜则进，败则止，未必不可为。

耳。然而举国之人，皆言晋不可伐，更进互说者不可胜数，其所陈天时人事，坚随以强辨折之，忠言谠论，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听；太子宏、少子诜，至亲之言也，不听；沙门道安，坚平生所信重者也，数为之言，不听。惟听信一将军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询朝臣以乱圣虑。”坚大喜曰：“与吾共定天下者惟卿尔！”于是决意不疑，遂大举南伐。兵至寿春，晋以数千人击之，大败而归。北至洛阳，九十六万兵亡其八十六万，坚自此兵威沮丧，不复能振，遂至于乱亡。近五代时，后唐清泰帝患晋祖之镇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议欲徙之于郓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与谋枢密直学士薛文遇，问之以决可否。文遇对曰：“臣闻作舍道边，三年不成，此事断在陛下，何必更问群臣？”帝大喜曰：“术者言我今年当得一贤佐助我中兴，卿其是乎？”即时命学士草制，徙晋祖于郓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后六日而晋祖反书至，清泰帝忧惧不知所为，谓李崧曰：“我适见薛文遇，为之肉颤，欲自抽刀刺之。”崧对曰：“事已至此，悔无及矣。”但君臣相顾，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祸败乱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坚欲与慕容垂共定天下，清

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汉元帝语，也是一句空话。[1]

泰帝以薛文遇为贤佐，助我中兴，可谓临乱之君，各贤其臣者也。或有诘予曰：然则用人者不可专信乎？应之曰：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生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不闻举齐、蜀之臣民非之也。盖其令出而举国之臣民从，事行而举国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专任而不贰也。使令出而两国之人不从，事行而两国之人不便，则彼二君者，其肯专任而信之以失众心而敛国怨乎？[论辨类，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上]

呜呼！用人之难难矣，未若听言之难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辩纵横而可喜，忠言质朴而多讷，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明暗也；谀言顺意而易悦，直言逆耳而触怒，此非听言之难，在听者之贤愚也：是皆未足为难也。若听其言则可用，然用之有辄败人之事者；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后为听言之难也。请试举其一二：战国时赵将有赵括者，善言兵，自谓天下莫能当。其父奢，赵之名将，老于用兵者也，每与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终不以括为能也，叹曰：“赵若以括为将，必败赵事。”其后奢死，赵遂以括为将。其母自见赵王，亦言括不可用。赵王不听，使括将而攻秦，括为秦军射

---

[1] 指“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一语。

死，赵兵大败，降秦者四十万人，坑于长平。盖当时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败者也。此听其言可用，用之辄败人事者，赵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问其将李信："用兵几何？"信方年少而勇，对曰："不过二十万足矣。"始皇大喜。又以问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万不可。"始皇不悦曰："将军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为可用，即与兵二十万，使伐荆。王翦遂谢病，退老于频阳。已而信大为荆人所败，亡七都尉而还。始皇大惭，自驾如频阳谢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万不可。"于是卒与六十万而往，遂以灭荆。夫初听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听计于人者宜如何？听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辄败事；听其言若不可用，舍之宜矣，然必如其说则成功：此所以为难也。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入也。若赵括者，则又有说焉。予略考《史记》所书，是时赵方遣廉颇攻秦。颇，赵名将也。秦人畏颇而知括虚言易与也，因行反间于赵曰："秦人所畏者赵括也，若赵以为将，则秦惧

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1]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

[1] 指战国时秦将白起、王翦，赵将廉颇、李牧。

矣。”赵王不悟反间也，遂起括为将以代颇。蔺相如力谏以为不可，赵王不听，遂至于败。由是言之，括虚谈无实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赵之诸臣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敌国亦知之，独其主不悟尔。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独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祸乱败亡由此者，不可胜数也。[论辨类，欧阳永叔《为君难论》下]

成、康殁而民生不见先王之治，日入于乱，以至于秦，尽除前圣数千载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归于汉。汉之为汉，更二十四君，东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闻虽美矣，而当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汉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晋与隋虽能合天下于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为不足议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法莫尽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

此文什么也没有说

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与先王并者，法度之行，拟之先王未备也。礼乐之具，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备也。躬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万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从，天下莫不以为盛，而非先王之所务也。太宗之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汤之治；由汤之治，五百余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余年而始有太宗之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备也，不得与先王并而称极治之时，是则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余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后者，千有余年而未遇极治之时也。非独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凯之于舜，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文、武，率五百余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后千有余年，虽孔子之圣，孟轲之贤而不遇，虽太宗之为

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时也，是亦士民之生于是时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独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鉴矣。[论辨类，曾子固《唐论》]

认识论

言物可认识，但不能全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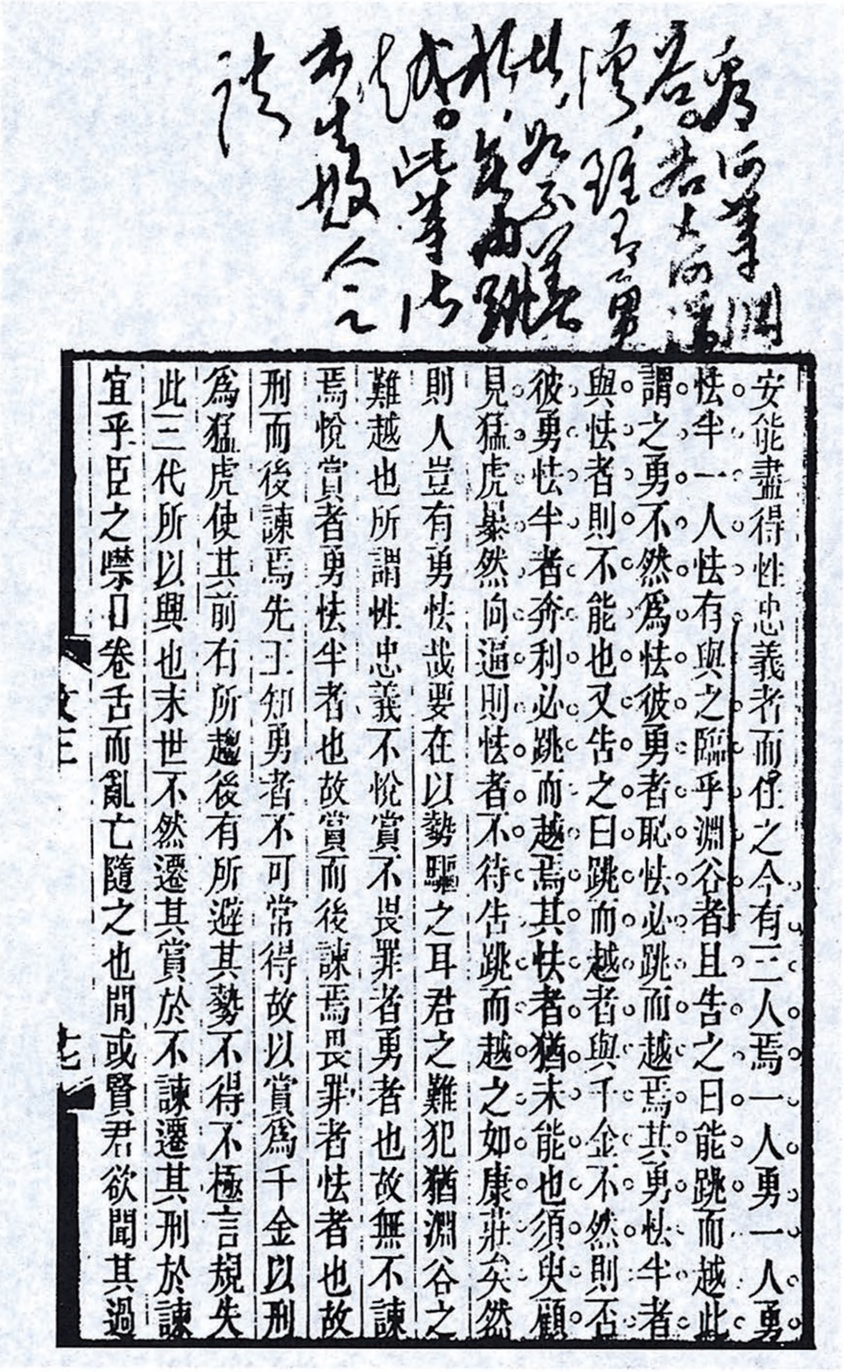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虑有所及，有所不及。圣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贤人以其所及而济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丧其所及。故圣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贤人之治天下也以时，既不能常，又不能时，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后可以常，以其所及济其所不及，而后可以时。常也者，无治而不治者也；时也者，无乱而不治者也。[论辨类，苏明允《明论》]

空话连篇

夫臣能谏，不能使君必纳谏，非真能谏之臣。君能纳谏，不能使臣必谏，非真能纳谏之君。欲君必纳乎，向之论备矣；欲臣必谏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触神、忤雷霆，亦明矣。圣人知其然，故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犹惧其选耎阿谀，使一日不得闻其过，故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风丧心，未有避赏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谏哉！赏与刑不设，则人之情又何苦而抗

看何等渊谷。若大河深溪，虽有勇者，如不善水，无由跳越。此等皆书生欺人之谈。

天、触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谁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尽得性忠义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与之临乎渊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谓之勇，不然为怯。彼勇者耻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与怯者，则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与千金，不然则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犹未能也。须臾，顾见猛虎暴然向逼，则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庄矣。然则人岂有勇怯哉？要在以势驱之耳。君之难犯，犹渊谷之难越也。所谓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者，勇者也，故无不谏焉；悦赏者，勇怯半者也，故赏而后谏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后谏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赏为千金，以刑为猛虎，使其前有所趋，后有所避，其势不得不极言规失，此三代所以兴也。末世不然，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呜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渊谷乎？此无他，墨刑之废耳。三代之后，如霍光诛昌邑不谏之臣者，不亦鲜哉！今之谏赏，时或有之；不谏之刑，缺然无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无，则谀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诚如是，欲闻谠言而不获，吾不信也。[论辨类，苏明允《谏论》下]



看何等渊，若大而深，虽有勇 [illegible] 此等 [illegible] 人之 [illegible]

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

毛泽东读《古文辞类纂》批注的手稿。

书不足信，诚然。

且吴起与武一体之人也，皆著书言兵，世称之曰孙吴。然而吴起之言兵也，轻法制，草略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辞约而意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然吴起始用于鲁，破齐，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复霸；而武之所为反如是，书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隶，内治一妾，是贱丈夫亦能，夫岂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军之众，阖营而自固，或且有乱，然则是三军之众惑之也。故善将者，视三军之众与视一隶一妾无加焉，故其心常若有余。夫以一人之心，当三军之众，而其中恢恢然犹有余地，此韩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辨也。故夫用兵岂有异术哉，能勿视其众而已矣。[论辨类，苏明允《权书》六　孙武]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与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

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赵尝五战于秦，二败而三胜，后秦击赵者再，李牧连却之。洎牧以谗诛，邯郸为郡。惜其用武而不终也。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战败而亡，诚不得已。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量。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论辨类，苏明允《权书》八　六国]

凡势强力敌之联军，罕有成功者。

此论未必然

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

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且彼未尝见大险也，彼以为剑门者，可以不

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亡也。吾尝观蜀之险，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安，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汉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乌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剑门者而后曰险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帛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论辨类，苏明允《权书》十　项籍]

言科举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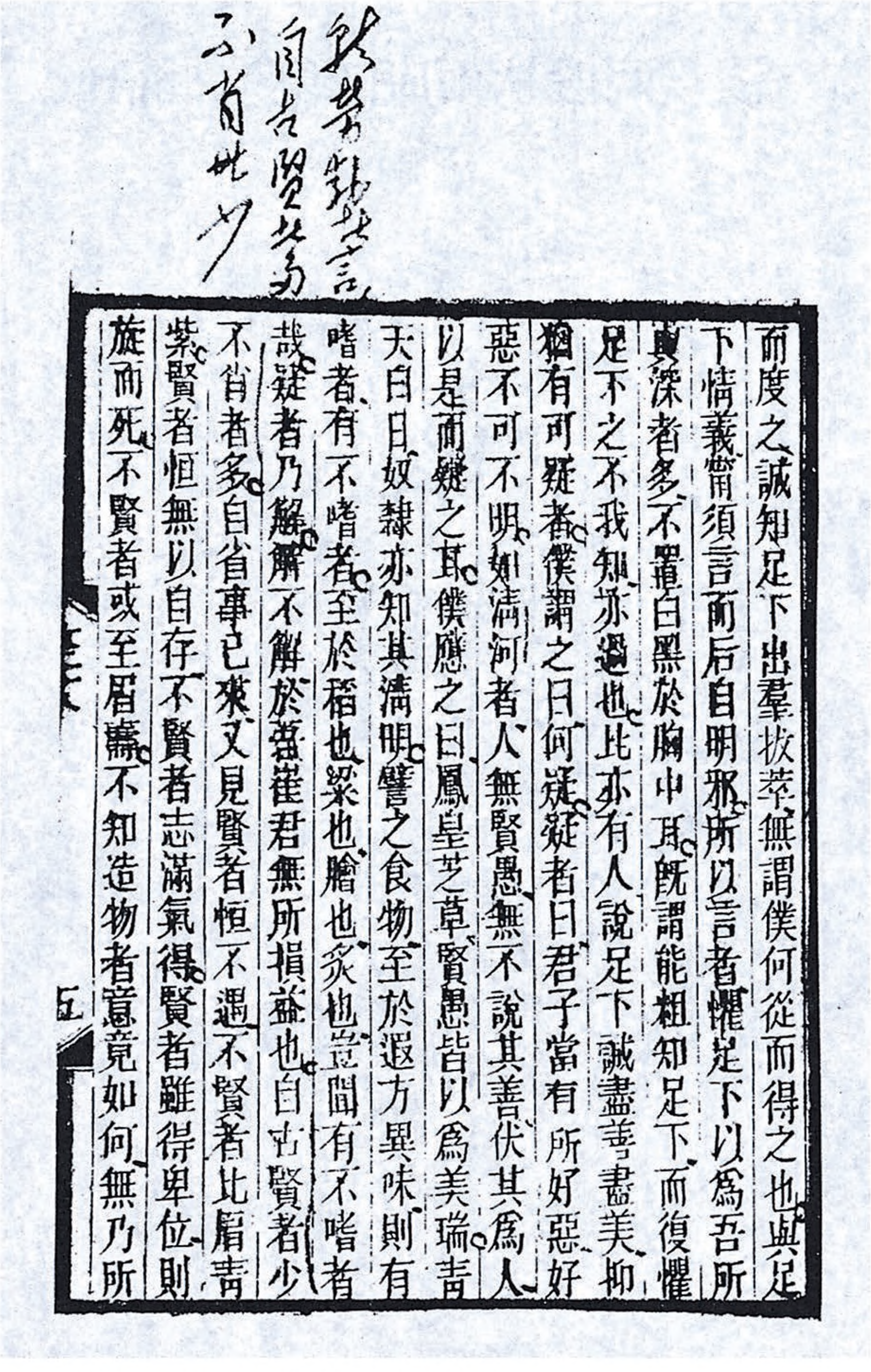
其大者非臣之所当言，欲默而不发，则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圣特达如此，若有所不尽，非忠臣之义，故昧死复言之：昔者以诗赋取士，今陛下以经术用人，名虽不同，然皆以文词进耳。考其所得，多吴楚闽蜀之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盖自古豪杰之场，其人沈鸷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声律，读经义，以与吴楚闽蜀之人，争得失于毫厘之间，则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礼义之士，虽不得志，不失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余者，困于无门，则无所不至矣。故臣愿陛下特为五路之士，别开仕进之门。汉法郡县秀民，推择为吏，考行察廉，以次迁补，或至二千石，入为公卿。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故得士为多。黄霸起于卒吏，薛宣奋于书佐，朱邑选于啬夫，邴吉出于狱吏，

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唐自中叶以后，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往往积功以取旌钺，虽老奸巨盗，或出其中，而名卿贤将，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趋，百川赴焉。蛟龙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则鱼鳖无所还其体，而鲵鳅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无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书，治刑狱钱谷，其势不可废鞭挞。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愿陛下采唐之旧，使五路监司郡守，共选士人以补牙职，皆取人材心力有足过人，而不能从事于科举者。禄之以今之庸钱，而课之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自公罪杖以下听赎。依将校法，使长吏得荐其才者，第其功阀，书其岁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异者擢用数人，则豪杰英伟之士，渐出于此涂，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取也。[奏议类，苏子瞻《徐州上皇帝书》]

就劳动者言，自古贤者多，不肖者少。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

死。不贤者或至眉寿。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无乃所好恶与人异心哉！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记，任其死生寿夭邪？未可知也。[书说类，韩退之《与崔群书》]



敖若鬻技者言，自古賢哲多不肯出此也

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靑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靑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

毛泽东读《古文辞类纂》批注的手稿。

读《两般秋雨庵随笔》批语

此阮元改笔，非尽原文。

云南昆明池大观楼对联，每联长至九十字，孙髯翁所题。其句云：“五百里昆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走长蛇，南盘舞鹤。骚人韵事，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烟鬟雾鬓。更𬞟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倾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临风，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绩丰功，费煞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尽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霜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叶扁舟。”长句硬盘，如僧绰之棋，累而不坠，真杰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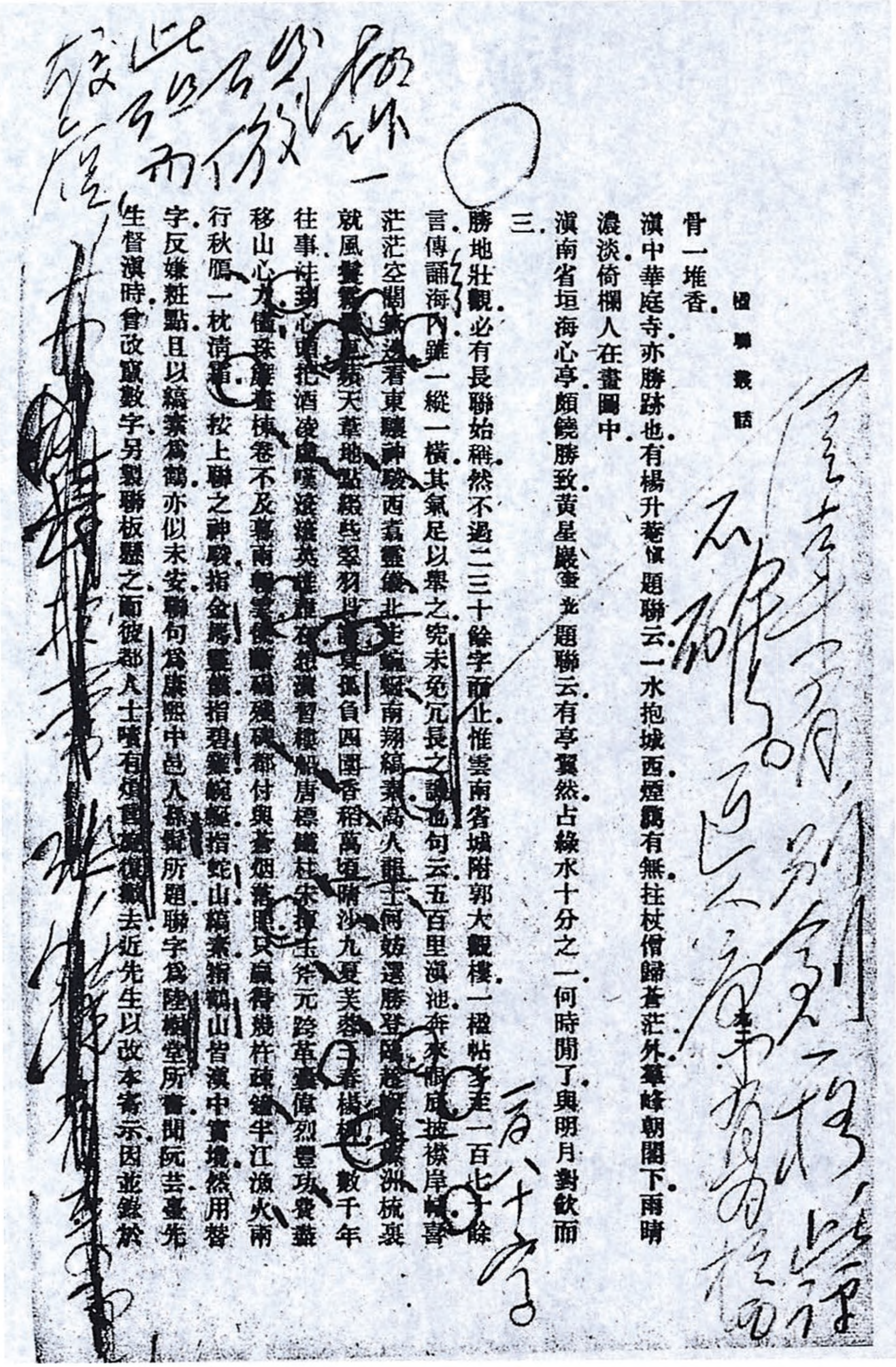
[卷四《昆明池对联》第37～38页]

读《楹联丛话》批语

胜地壮观，必有长联始称，然不过二三十余字而止。惟云南省城附郭大观楼，一楹帖多至一百七十余言，传诵海内。虽一纵一横，其气足以举之，究未免冗长之讥也。句云：“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𬞟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按上联之神骏指金马，灵仪指碧鸡，蜿蜒指蛇山；缟素指鹤山，皆滇中实境。然用替字，反嫌妆点。且以缟素为鹤，亦似未安。联句为康熙中邑人孙髯所题，联字为陆树堂所书。闻阮芸台先生督滇时，曾改窜数字，另制联板悬之。而彼都人士啧有烦言，旋复撤去。近先生以改本寄示，因并录于右，以质观者。“五百

一百八十字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记其下联云：“霸业烟销，雄心止水，饮山水绿，坐忘人世，万方同慨顾何之。”康有别墅在西湖山上，联悬于湖中某亭。



楹聯叢話

骨一堆香。

滇中華庭寺亦勝跡也。有楊升菴慎題聯云：一水抱城西，煙靄有無，拄杖僧歸蒼茫外；華峰朝閣下，雨晴濃淡，倚欄人在畫圖中。

滇南省垣海心亭頗饒勝致，黃星巖釜光題聯云：有亭翼然，占綠水十分之一；何時閒了，與明月對飲而三。

勝地壯觀，必有長聯始稱，然不過二三十餘字而止。惟雲南省城附郭大觀樓一楹帖，至一百七十餘言，傳誦海內，雖一縱一橫，其氣足以舉之，究未免冗長之譏。聯句云：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贏得幾杵疎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按上聯之神駿指金馬，靈儀指碧雞，蜿蜒指蛇山，縞素指鶴山，皆滇中實境，然用替字反嫌粧點，且以縞素爲鶴，亦似未安。聯句爲康熙中邑人孫髯所題，聯字爲陸樹堂所書。聞阮芸臺先生督滇時，曾改竄數字，另製聯板懸之，而彼都人士嘖有煩言，旋徹去。近先生以改本寄示，因並錄於

從古未有，別創一格，此評不確，近人康有爲

一百八十字

[illegible]

毛泽东读《楹联丛话》批注的手稿。

死对，点金成铁。

里滇池，奔来眼底。凭栏向远，喜茫茫波浪无边。看东骧金马，西翥碧鸡，北倚盘龙，南驯宝象。高人韵士，惜抛流水光阴。趁蟹屿螺洲，衬将起苍崖翠壁。更蘋天苇地，早收回薄雾残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鸥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爨长蒙酋，费尽移山气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藓碣苔碑，都付与荒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鸿雁，一片沧桑。”[第92～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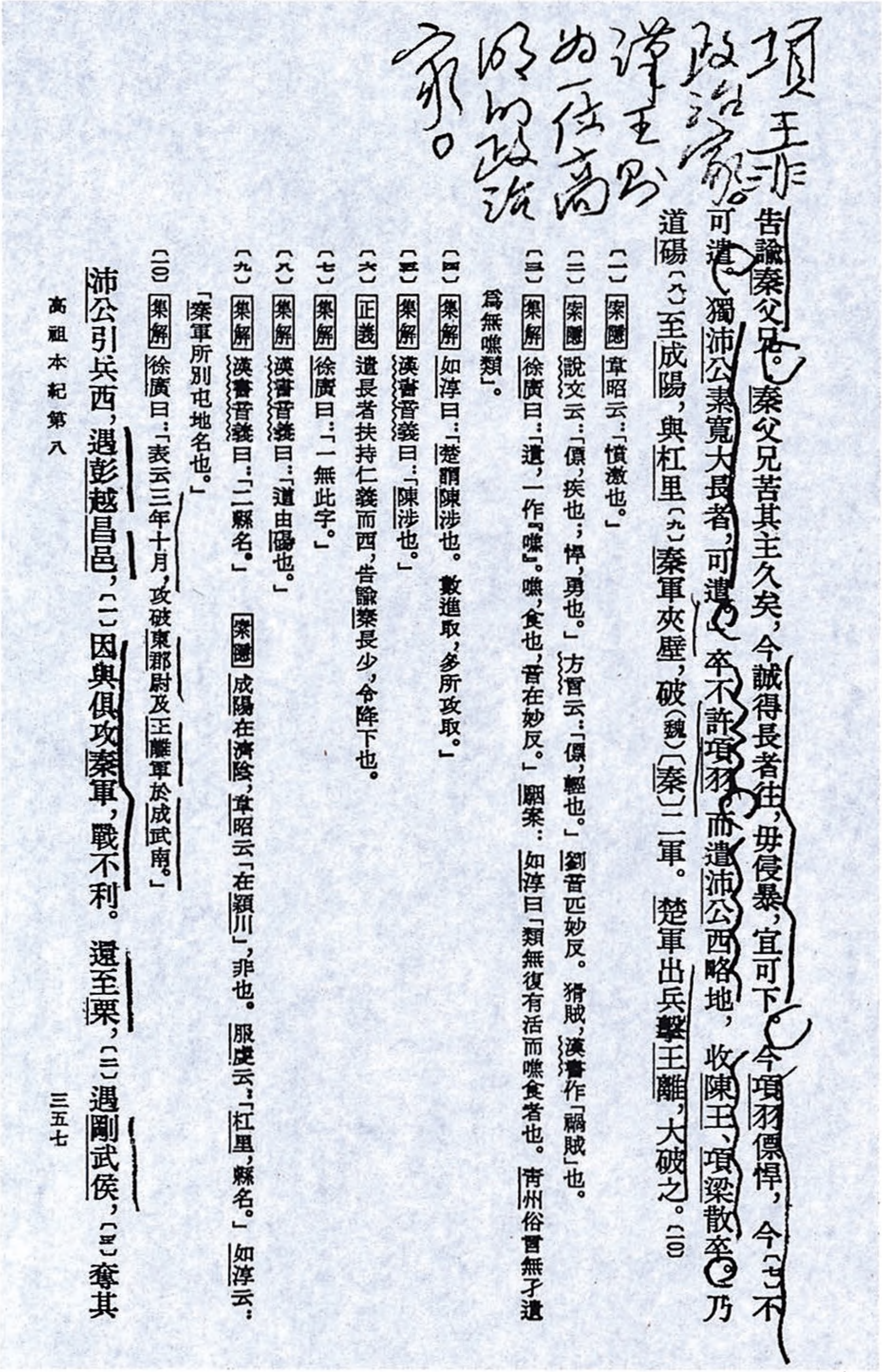
读《史记》批语

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第一版，第356～357页]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一误

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



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七〕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八〕至成陽，與杠里〔九〕秦軍夾壁，破(魏)〔秦〕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一〇〕

〔一〕索隱韋昭云：「憤激也。」

〔二〕索隱說文云：「僄，疾也；悍，勇也。」方言云：「僄，輕也。」劉音匹妙反。猾賊，漢書作「禍賊」也。

〔三〕集解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駰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孑遺爲無噍類」。

〔四〕集解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

〔五〕集解漢書音義曰：「陳涉也。」

〔六〕正義遣長者扶持仁義而西，告諭秦長少，令降下也。

〔七〕集解徐廣曰：「一無此字。」

〔八〕集解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

〔九〕集解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索隱成陽在濟陰，韋昭云「在潁川」，非也。服虔云：「杠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別屯地名也。」

〔一〇〕集解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

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一〕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二〕遇剛武侯，〔三〕奪其

高祖本紀第八　三五七

毛泽东读《史记》批注的手稿。

二误　　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8~9页，乾隆十二年武英殿板，同治八年岭南葄古堂重刻]

读《汉书》批语

七天[1]

充国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衔枚先渡，渡辄营陈。会明毕，遂以次尽渡。……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因陈兵利害曰："……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4～9页]

说服力强之效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宋祁曰："议臣字下当更有一议字。"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第16页]

哀帝时至王莽时

两龚皆楚人也，胜字君宾，舍字君倩。二人相友，并著名节，故世谓之楚两龚。……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荐胜。哀帝自为定陶王，固已闻其名，征为谏大夫。引见，胜荐龚舍及亢父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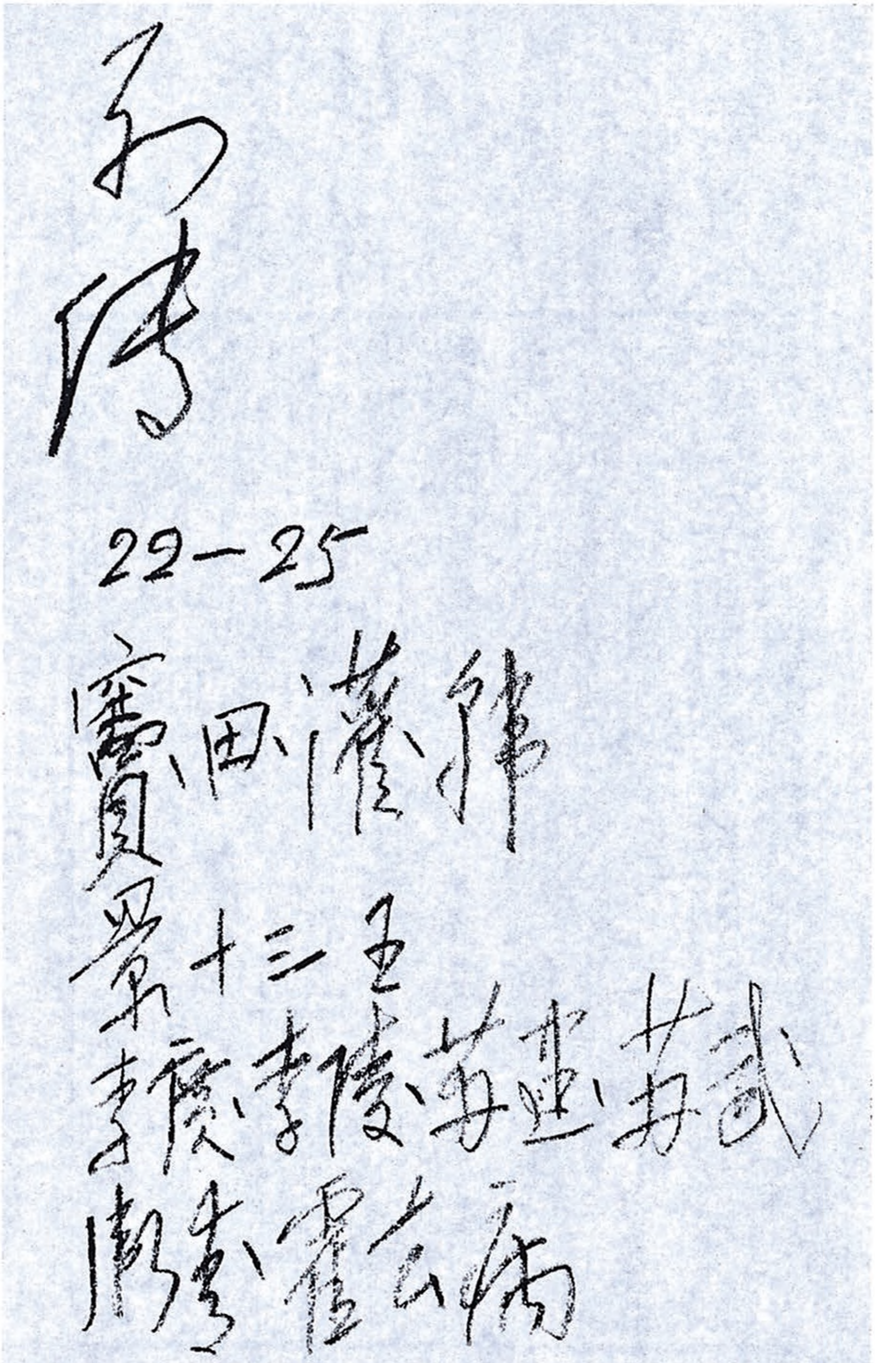
[1] 赵充国在六月戊申日上书给汉宣帝，从金城送到长安，汉宣帝批示后，在七月甲寅日从长安送到金城，来回只有七天，极为神速。

> 寿、济阴侯嘉，有诏皆征。……会哀帝崩。初，琅邪邴汉亦以清行征用，至京兆尹，后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胜与汉俱乞骸骨。……于是王莽依故事，白遣胜、汉。……于是胜、汉遂归老于乡里。……莽既篡国……明年，莽遣使者即拜胜为讲学祭酒，胜称疾不应征。后二年，莽复遣使者奉玺书，太子师友祭酒印绶，安车驷马迎胜，即拜，秩上卿。……胜辄推不受。……胜自知不见听，即谓（门人高）晖等："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胜因敕以棺敛丧事，……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卷七十二《两龚传》第18～23页]

列传22—25
窦、田、灌、韩
景十三王
李广、李陵、苏建、苏武、卫青、霍去病。[1]

---

[1] 此批语写在《前汉书》卷五十二至五十五封面上。



列傳

2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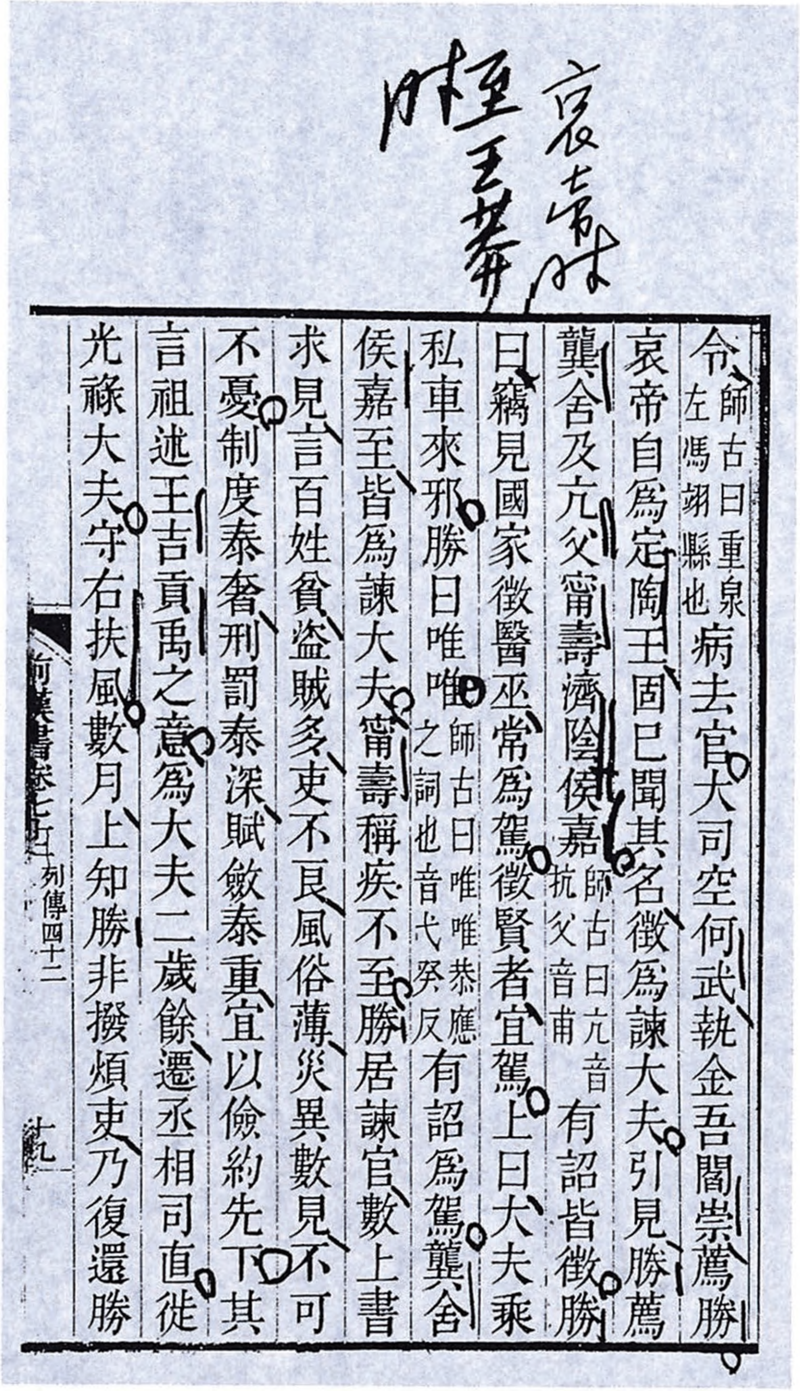
竇田灌韓

景十三王

李廣、李陵、苏建、苏武

衛青、霍去病

《汉书》卷五十二至五十五封面上的批语。



哀帝时
胜王莽

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前漢書卷七十二　列傳四十二　十九

毛泽东读《前汉书》批注的手稿。

读《后汉书》批语

李贤好。[1]

刘攽好。[2]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3]，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4]，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又洛阳宫阁名有却非殿。臣贤按：“俗本或作御北殿者误。”……十二月丙戌，至自怀。赤眉杀更始，而隗嚣据陇右。○刘攽曰：“按《史记》事事有相连，则用‘而’字。今赤眉自杀更始，隗嚣自据陇右，明此‘而’字衍文。”[卷一《光武帝纪》第一上第17~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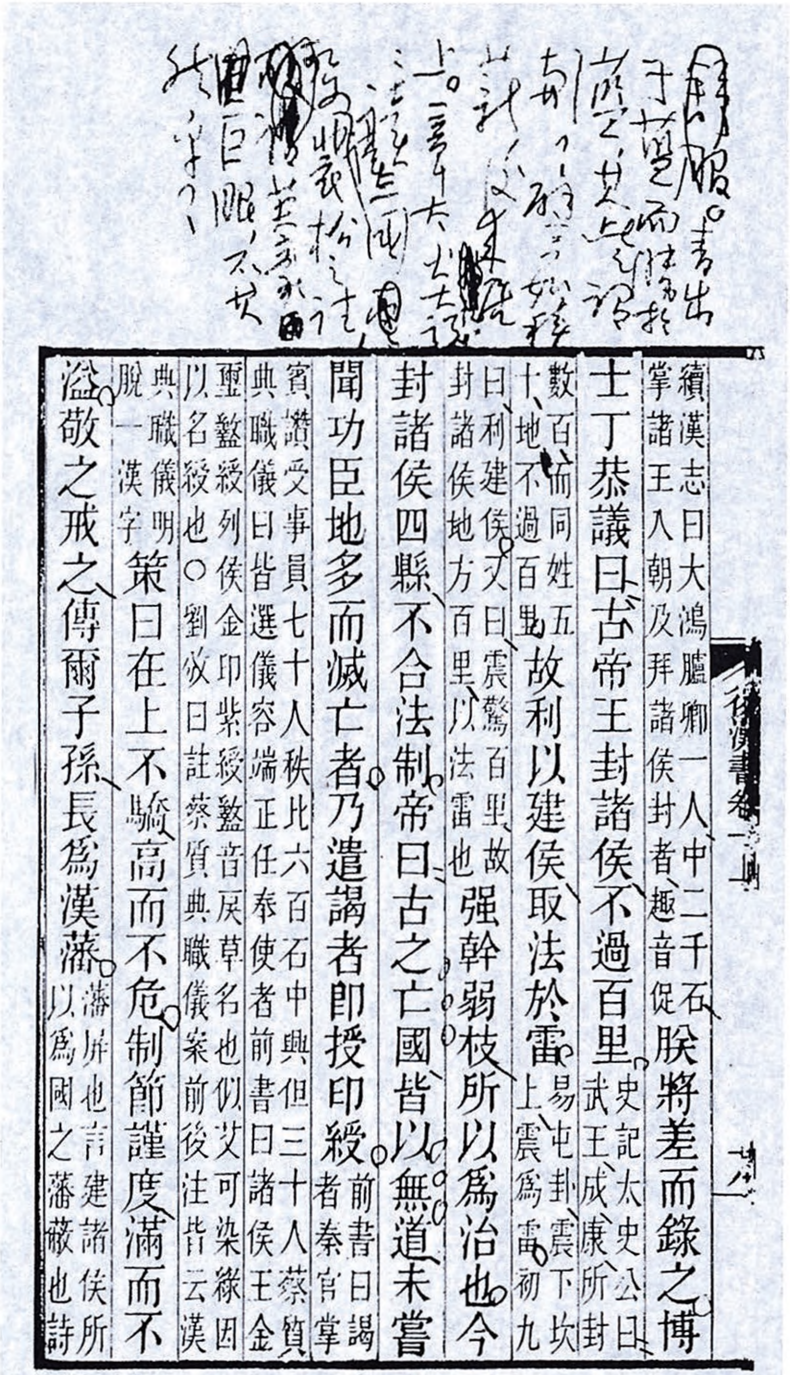
---

[1] 李贤好，指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注得好。

[2] 刘攽好，指宋刘攽对《后汉书》作的按语作得好。刘攽按语，后附入《后汉书》注中。

[3] 李贤《后汉书》注胜过唐颜师古《汉书》注。

[4]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搜集极丰富的资料，对《三国志》补缺、订误。他所引的书，多已失传，极有资料价值。



[illegible]

（續漢志曰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王入朝及拜諸侯封者趣音促）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史記太史公曰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地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易屯卦震下坎上震爲雷初九曰利建侯又曰震驚百里故封諸侯地方百里以法雷也）强幹弱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前書曰謁者秦官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中興但三十人蔡質典職儀曰皆選儀容端正任奉使者前書曰諸侯王金璽盭綬列侯金印紫綬盭音戾草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名綬也○劉攽曰註蔡質典職儀案前後注皆云漢典職儀明脫一漢字）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藩屏也言建諸侯所以爲國之藩蔽也詩

後漢書卷一下

毛泽东读《后汉书》批注的手稿。

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云上书："北虏既已和亲，而南部复往抄掠，北单于谓汉欺之，谋欲犯边。宜还其生口，以安慰之。"诏百官议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谲诈，求欲无厌。（谲亦诈也。）既得生口，当复妄自夸大。不可开许。"安独曰："北虏遣使奉献和亲，有得边生口者，辄以归汉。此明其畏威而非先违约也。云以大臣典边，不宜负信于戎狄。还之足示中国优贷，而使边人得安，诚便。"司徒桓虞改议从安。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励虞曰："诸言当还生口者，皆为不忠。"虞廷叱之，伦及大鸿胪韦彪各作色变容。司隶校尉举奏，安等皆上印绶谢。肃宗诏报曰："久议沈滞，各有所志。盖事以议从，策由众定，訚訚衎衎，得礼之容，（訚訚，忠正貌。衎衎，和乐貌。）寝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谢。其各冠履。"帝竟从安议。[卷七十五《袁安传》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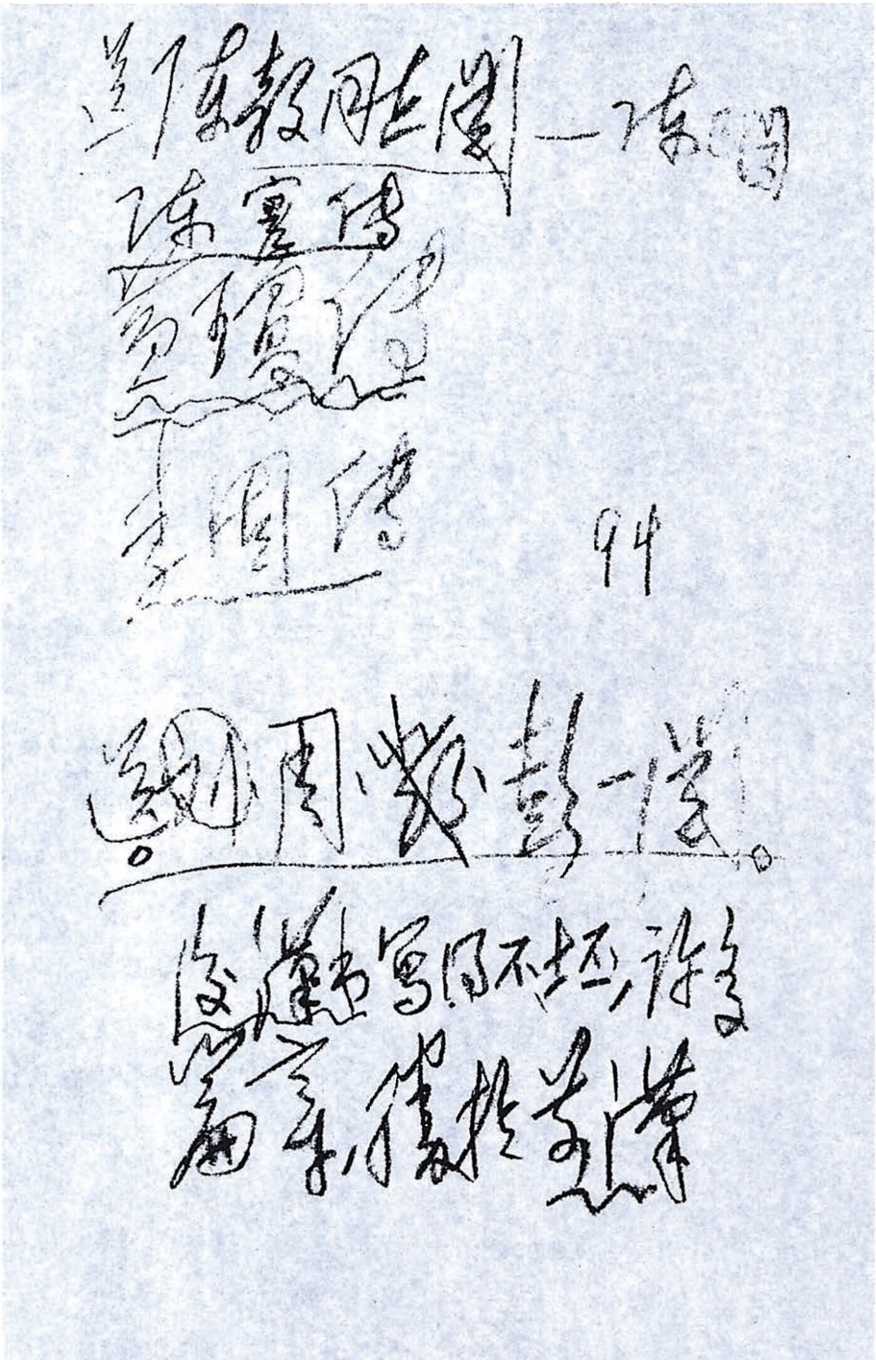
可以争论

送陈毅同志阅——陈已阅

陈寔传

黄琼传

李固传



送陈毅同志阅——请阅

陈寔传

黄琼传

李固传

94

送刘、周、邓、彭一读。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
篇章，值得选读

毛泽东在《后汉书》卷九十一——九十四封面上的批语。

送刘、周、邓、彭一阅。

后汉书写的不坏，许多篇章胜书前汉〔书〕。[1]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人也。出于单微。自为儿童，虽在戏弄，为等类所归。少作县吏，常给事厮役。后为都亭刺史佐，而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县令邓邵试与语，奇之，听受业太学。后令复召为吏，乃避隐阳城山中。时有杀人者，同县杨吏以疑寔，县遂逮系，考掠无实，而后得出。及为督邮，乃密托许令，礼召杨吏。远近闻者，咸叹服之。家贫，复为郡西门亭长，寻转功曹。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以沛相赋敛违法，乃解印绶去。吏人追思之。及后逮捕党人，事亦连寔。余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乃请囚焉。遇赦得出。灵帝初，大将军窦武辟以为掾属。时中常侍张让权倾天下，让父死，归葬颍川，虽一郡毕至，而名士无往者，让甚耻之。寔乃独吊焉。及后复诛党人，让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乡闾，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

章炳麟学陈仲弓一事。

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

[1] 此批语写在卷九十一至卷九十四第二十一册封面上。

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卷九十二《陈寔传》第13～14页]

（皇甫）嵩、（朱）俊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俊前与贼波才战，战败。嵩因进保长社。波才引大众围城。嵩兵少，军中皆恐。乃召军吏谓曰：“兵有奇变，不在众寡。《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者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今贼依草结营，易为风火。若因夜纵烧，必大惊乱。吾出兵击之，四面俱合，田单之功可成也。”[卷一百〇一《皇甫嵩传》第2页]

正,原则性。
奇,灵活性。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

明末事不能与汉末比

青州黄巾众百万，……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何焯曰："光武击铜马于鄡。贼数挑战，光武坚营自守。有出卤掠者，辄击取之，绝其粮道。积月余日，贼食尽，夜遁去。追至馆陶，大破之。此成败之可参质者也。明季与流贼相持者，皆不知此谋，督促出战，遂皆为刘岱之续。"[卷一《魏书》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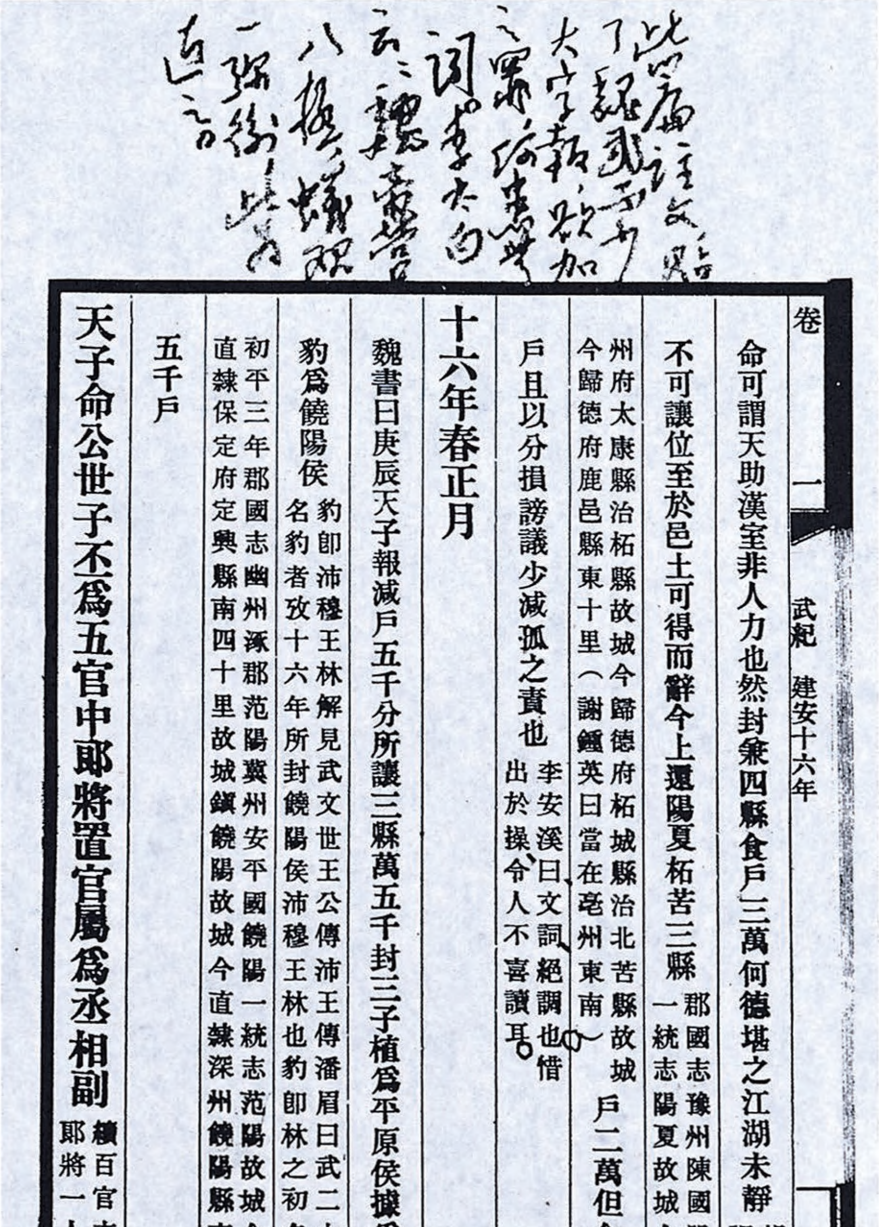
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己酉，令曰："《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史记》："赵王将使赵括为将，其母上书曰：'括不可使将。'王曰：'母置之，吾已决矣。'母曰：'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坐乎？'王许诺。"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何焯曰："始犹乌合，故多宽假，至此乃议罚，为立国经久之计。"[卷

一《魏书》第54页]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曰：“……又刘表自以为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却，以观世事，据有当州，孤复定之，遂平天下。何焯曰：“孙刘方睦，而云‘遂平天下’，盖其器限之也。史家评操攻伐，至克绍而止，过此即鼎足虎争，非复所能戡定矣。”……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胡三省曰：“言其将篡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过于三世矣。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欲明心迹，何至令妻妾改嫁。择言不慎，一至于此。然临终遗令，卖履分香，登台奏伎，闺房恋恋，至死不忘，乃知汝曹出嫁之言，为奸雄欺人之语。……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上文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之言，皆欺人语耳。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黄恩彤曰：“方操夷袁绍，下荆州，天下大势骎骎乎折而入于己。惟其丧师赤壁，十年精锐，付之一炬。孙权既雄据江东，刘备复奄有荆楚。鼎足势成，始知大物不能骤致，邺中下令，鳃鳃以臣节自明。其令中所云：‘人见孤强盛，言有不逊之志。’此乃其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陈志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



此處注文點了疑問號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此為近之

卷一　武紀　建安十六年

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胡三省曰謂孫劉也）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郡國志豫州陳國陽夏柘苦一統志陽夏故城今河南陳州府太康縣治柘縣故城今歸德府柘城縣治北苦縣故城今歸德府鹿邑縣東十里（謝鍾英曰當在亳州東南））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李安溪曰文詞絕調也惜出於操令人不喜讀耳）

十六年春正月

魏書曰庚辰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范陽侯豹爲饒陽侯（豹卽沛穆王林解見武文世王公傳沛王傳潘眉曰武二十五子無名豹者攷十六年所封饒陽侯沛穆王林也豹卽林之初名平原見初平三年郡國志幽州涿郡范陽冀州安平國饒陽一統志范陽故城今直隸保定府定興縣南四十里故城鎭饒陽故城今直隸深州饒陽縣東）食邑各五千戶

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續百官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批注的手稿。

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然则汴水之战，何以为流矢所中？濮阳之围，何以坠马烧掌？淯水之难，何以丧昂及安民？乌林之役，何以狼狈北归？潼关北渡，何以为马超所困？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卷一《魏书》第78～81页]

此等语竟被利用

袁宏《汉纪》载汉帝诏曰：“……炎精之数既终，行运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树神武之绩，今王又光曜明德以应其期，是历数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故唐尧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无穷，朕羡而慕焉。今其追踵尧典，禅位于魏王。”[卷二《魏书》第13页]

“尧幽囚，舜野死。”[1]

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夫大人者，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时已至，而犹谦让者，舜、禹所不为也。故生民蒙救济之惠，群类受育长之施。今八方颙颙，大小注望，皇天乃眷，神人同谋，十分而九。以委质义过周文，所谓过恭也。”[卷二《魏书》第21页]

虚有其表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也。少知名，号八

---

[1] 李白《远别离》：“或云尧幽囚，舜野死。”此言曹丕说的禅让，同于篡夺。

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以大将军掾为北军中候。[卷六《魏书·刘表传》第78～79页]

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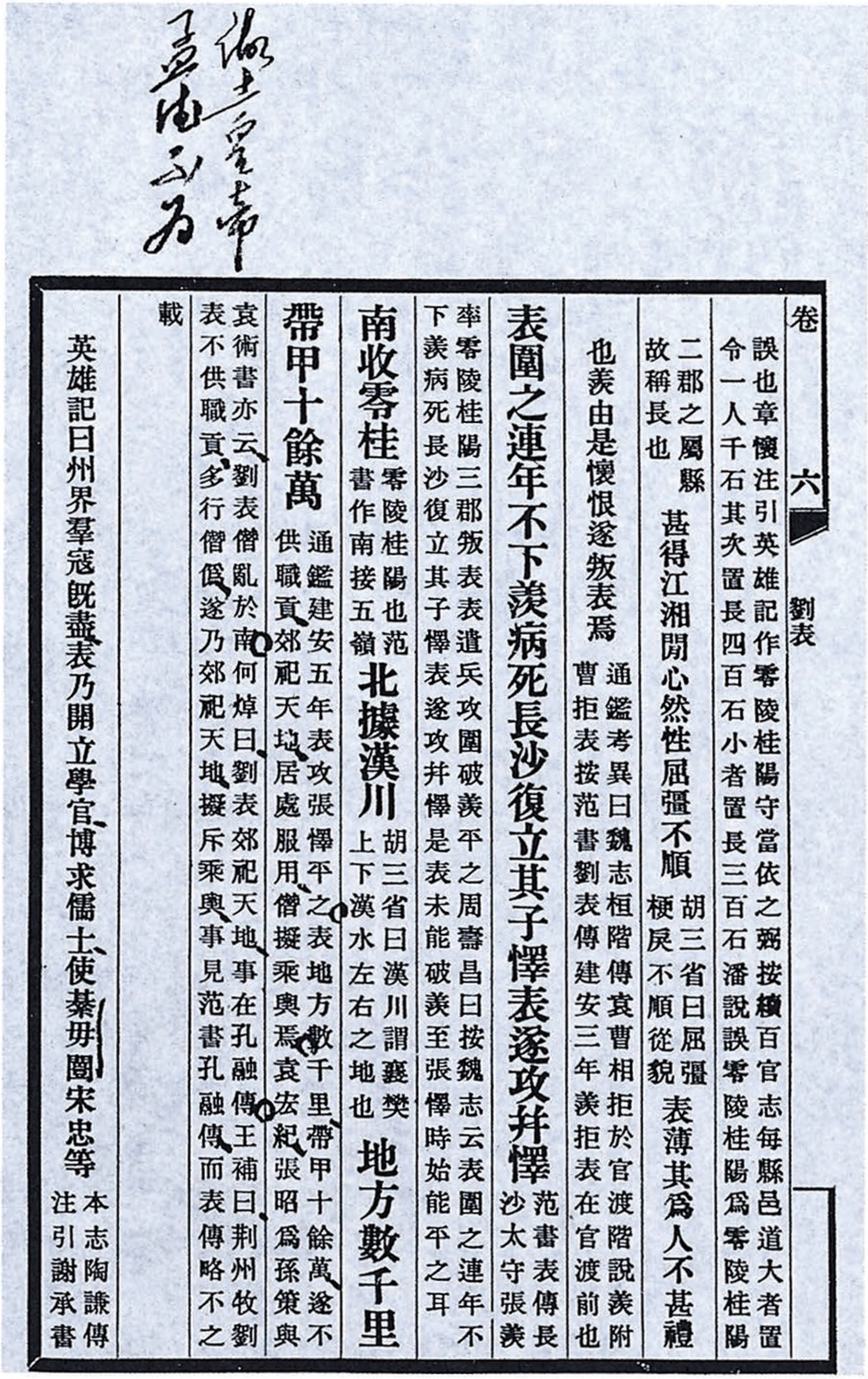
司马彪《战略》曰：“刘表之初为荆州也，江南宗贼盛。遂使（蒯）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范书作“诱宗贼帅，至者十五人”。皆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0～82页]

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表为援，乃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天子都许，表虽遣使贡献，然北与袁绍相结。治中邓羲谏表，表不听。《汉晋春秋》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大义也，治中独何怪乎？’”何焯云：“此曹操所谓乍前乍却，以观世事者也。”[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2～83页]

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长沙太守张羡叛表。表围之，连年不下。羡病死，长沙复立其子怿。表遂攻并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通鉴》：“建安五年，袁攻张怿，平之。表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遂不供职贡，郊祀天地，居处服用，僭拟乘舆焉。”袁宏纪：“张昭为孙策与袁术书，亦云：‘刘表僭乱于南。’”何焯曰：“刘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传》。”王补曰：“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事见范书《孔融传》，而《表传》略不之载。”[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3页]



湘土皇帝
孟德亦为

卷六　劉表

（誤也章懷注引英雄記作零陵桂陽守當依之弼按續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潘說誤零陵桂陽爲零陵桂陽二郡之屬縣故稱長也）甚得江湘閒心然性屈彊不順（胡三省曰屈彊梗戾不順從貌）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羡由是懷恨遂叛表焉（通鑑考異曰魏志桓階傳袁曹相拒於官渡階說羡附曹拒表按范書劉表傳建安三年羡拒表在官渡前也）

表圍之連年不下羡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幷懌（范書表傳長沙太守張羡率零陵桂陽三郡叛表表遣兵攻圍破羡平之周壽昌曰按魏志云表圍之連年不下羡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幷懌是表未能破羡至張懌時始能平之耳）**南收零桂**（零陵桂陽也范書作南接五嶺）**北據漢川**（胡三省曰漢川謂襄樊上下漢水左右之地也）**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通鑑建安五年表攻張懌平之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袁宏紀張昭爲孫策與袁術書亦云劉表僭亂於南何焯曰劉表郊祀天地事在孔融傳王補曰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僞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事見范書孔融傳而表傳略不之載）

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本志陶謙傳注引謝承書）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批注的手稿。

中立

太祖与袁绍方相持于官渡。绍遣人求助，表许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卷六《魏书·刘表传》第84页]

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刘晔字子扬，淮南成德人也。汉光武子阜陵王延后也。父普，母修，产涣及晔。涣九岁，晔七岁，而母病困。临终，戒涣、晔以普之侍人，有谄害之性。身死之后，惧必乱家。汝长大能除之，则吾无恨矣。晔年十三，谓兄涣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涣曰："那可尔!"晔即入室，杀侍者，径出拜墓。舍内大惊，白普。普怒，遣人追晔。晔还拜谢曰："亡母顾命之言，敢受不请擅行之罚。"普心异之，遂不责也。汝南许劭名知人，避地扬州，称晔有佐世之才。

扬士多轻侠狡桀，有郑宝、张多、许乾之属，各拥部曲。宝最骁果，才力过人，一方所惮。欲驱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晔高族名人，欲强逼晔使唱导此谋。晔时年二十余，心内忧之，而未有缘。会太祖遣使诣州，有所案问。晔往见，为论事势，要将与归，驻止数日。宝果从数百人赍牛酒来候使，晔令家僮将其众坐中门外，为设酒饭；与宝于内宴饮。密勒健儿，令因行觞而斫宝。宝性不甘酒，视候甚明，觞者不敢发。晔因自引，取佩刀斫杀宝，斩其首以令其军，云：

“曹公有令，敢有动者，与宝同罪。”众皆惊怖，走还营。营有督将精兵数千，惧其为乱，晔即乘宝马，将家僮数人，诣宝营门，呼其渠帅，喻以祸福，皆叩头开门内晔。晔抚慰安怀，咸悉悦服，推晔为主。晔睹汉室渐微，己为支属，不欲拥兵，遂委其部曲与庐江太守刘勋。勋怪其故，晔曰：“宝无法制，其众素以抄略为利，仆宿无资，而整齐之，必怀怨难久，故相与耳。”时勋兵强于江、淮之间。孙策恶之，遣使卑辞厚币，以书说勋曰：“上缭宗民，数欺下国，忿之有年矣。击之，路不便，愿因大国伐之。上缭甚实，得之可以富国，请出兵为外援。”勋信之，又得策珠宝、葛越，喜悦。外内尽贺，而晔独否。勋问其故，对曰：“上缭虽小，城坚池深，攻难守易，不可旬日而举，则兵疲于外，而国内虚。策乘虚而袭我，则后不能独守。是将军进屈于敌，退无所归。若军必出，祸今至矣。”勋不从。兴兵伐上缭，策果袭其后。勋穷踧，遂奔太祖。

太祖至寿春，时庐江界有山贼陈策，众数万人，临险而守。先时遣偏将致诛，莫能禽克。太祖问群下，可伐与不？咸云：“山峻高而溪谷深隘，守易攻难；又无之不足为损，得之不足为益。”晔曰：“策等小竖，因乱赴险，遂相依为强耳，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将资轻，而中国未夷，故策敢据险以守。今天下略定，后伏先

诛。夫畏死趋赏，愚知所同，故广武君为韩信画策，谓其威名足以先声后实而服邻国也。而况明公之德，东征西怨，先开赏募，大兵临之，令宣之日，军门启而虏自溃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将在前，大军在后，至则克策，如晔所度。太祖还，辟晔为司空仓曹掾。

太祖征张鲁，转晔为主簿。既至汉中，山峻难登，军食颇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国耳，何能为有无？吾军少食，不如速还。”便自引归，令晔督后诸军，使以次出。晔策鲁可克，加粮道不继，虽出，军犹不能皆全，驰白太祖：“不如致攻。”遂进兵，多出弩以射其营。鲁奔走，汉中遂平。晔进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太祖不从，大军遂还。晔自汉中还，为行军长史，兼领军。延康元年，蜀将孟达率众降。达有容止才观，文帝甚器爱之，使达为新城太守，加散骑常侍。晔以为“达有苟得之心，而

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新城与吴、蜀接连，若有变态，为国生患。”文帝竟不易，后达终于叛败。

黄初元年，以晔为侍中，赐爵关内侯。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后备果出兵击吴。吴悉国应之，而遣使称藩。朝臣皆贺，独晔曰：“吴绝在江、汉之表，无内臣之心久矣。陛下虽齐德有虞，然丑虏之性，未有所感。因难求臣，必难信也。彼必外迫内困，然后发此使耳，可因其穷，袭而取之。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不可不察也。”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欲兴众伐之，晔以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帝不听。五年，幸广陵泗口，命荆、扬州诸军并进。会群臣，问：“权当自来不?”咸曰：“陛下亲征，权恐怖，必举国而应。又不敢以大众委之臣下，必自将而来。”晔曰：“彼谓陛下欲以万乘之重牵己，而超越江湖者在于别将，必勒兵待事，未有进退也。”大驾停住积日，权果不至，帝乃旋师。云：“卿策之是也。当念为吾灭二贼，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状。晔以为公孙氏汉时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而世权日久。今若不诛，后必生患。若怀贰阻兵，然后致诛，于事为难。不如因其新立，有党有仇，先其不意，以兵临之，开设赏募，可不劳师而定也，后渊竟反。[卷十四《魏书·刘晔传》第21~22页]

卢注亦不确

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人也。临淮郡见《步骘传》。东城见《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陈登为东城太守。”胡三省曰：“东城县，前汉属九江郡，后汉省，当是袁术复置也。”弼按：《郡国志》下邳国有东城，即临淮之东城，下邳本临淮也。胡注误。[卷五十四《吴书·鲁肃传》第13页]

《一统志》明指凤阳

《吴书》曰：“肃体貌魁奇，少有壮节，好为奇计。天下将乱，乃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一统志》：“凤阳县西三里有西鲁山，相传为鲁肃屯兵处。”[卷五十四《吴书·鲁肃传》第14页]

《魏志》此时操在汉中，因夏侯渊之败正不

（孙）权深纳其策，又聊复与论取徐州意。蒙对曰：“今操远在河北，新破诸袁，抚集幽、冀，未暇东顾。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

得志，闻襄阳围急，东归到洛阳即死，非在居巢也。[1]

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权尤以此言为当。及蒙代肃，初至陆口。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后羽讨樊，留兵将备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众还建业，以治疾为名。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赴襄阳。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第27～28页]

何不并其党赦之

时有盗官物者，疑无难士施明。明素壮悍，收考极毒，惟死无辞。廷尉以闻。（孙）权以（陈）表能得健儿之心，诏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实。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设酒食，欢以诱之。明乃首服，具列支党。表以状闻。权奇之，欲全其名，特为赦明，诛戮其党。迁表为无难右部督。[卷五十五《吴书·陈武传》第9页]

此事翻不如禁

《吴书》曰：“后权与魏和，欲遣（于）禁还

---

[1] 《通鉴》：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将黄忠击斩夏侯渊。3月，曹操至汉中，与备相守积月。5月，操还长安。7月，孙权攻合肥，操仍在长安，未去居巢。关羽攻曹仁于樊。8月，关羽破降于禁七军。10月，操至洛阳。次年黄初元年1月，操死于洛阳。

归北。翻复谏曰：‘禁败数万众，身为降虏，又不能死。北习军政，得禁必不如所规。还之虽无所损，犹为放盗。不如斩以令三军，示为人臣有二心者。’权不听。群臣送禁，翻谓禁曰：‘卿勿谓吴无人，吾谋适不用耳。’禁虽为翻所恶，然犹盛叹翻。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注第6页]

买壮丁

振古如斯[1]

统上疏曰：“……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笃，除患贵其未深。愿殿下少以万机余闲，留神思省，补复荒虚，深图远计。育残余之民，阜人财之用，参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统之大愿，足以死而不朽矣。”[卷五十七《吴书·骆统传》第32～33页]

诸将并曰：“攻（刘）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衔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

---

[1] 《诗·周颂·载芟》：“振古如兹。”振，自也。

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营，不利。诸将皆曰：“空杀兵耳。”逊曰：“吾已晓破之之术。”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尔势成，通率诸军同时俱攻。斩张南、冯习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余营。钱振锽曰：“陆逊破先主，无他奇策，只令军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连营，皆伐山木为之，故易火；若土石为之，逊其如之何？”[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6页]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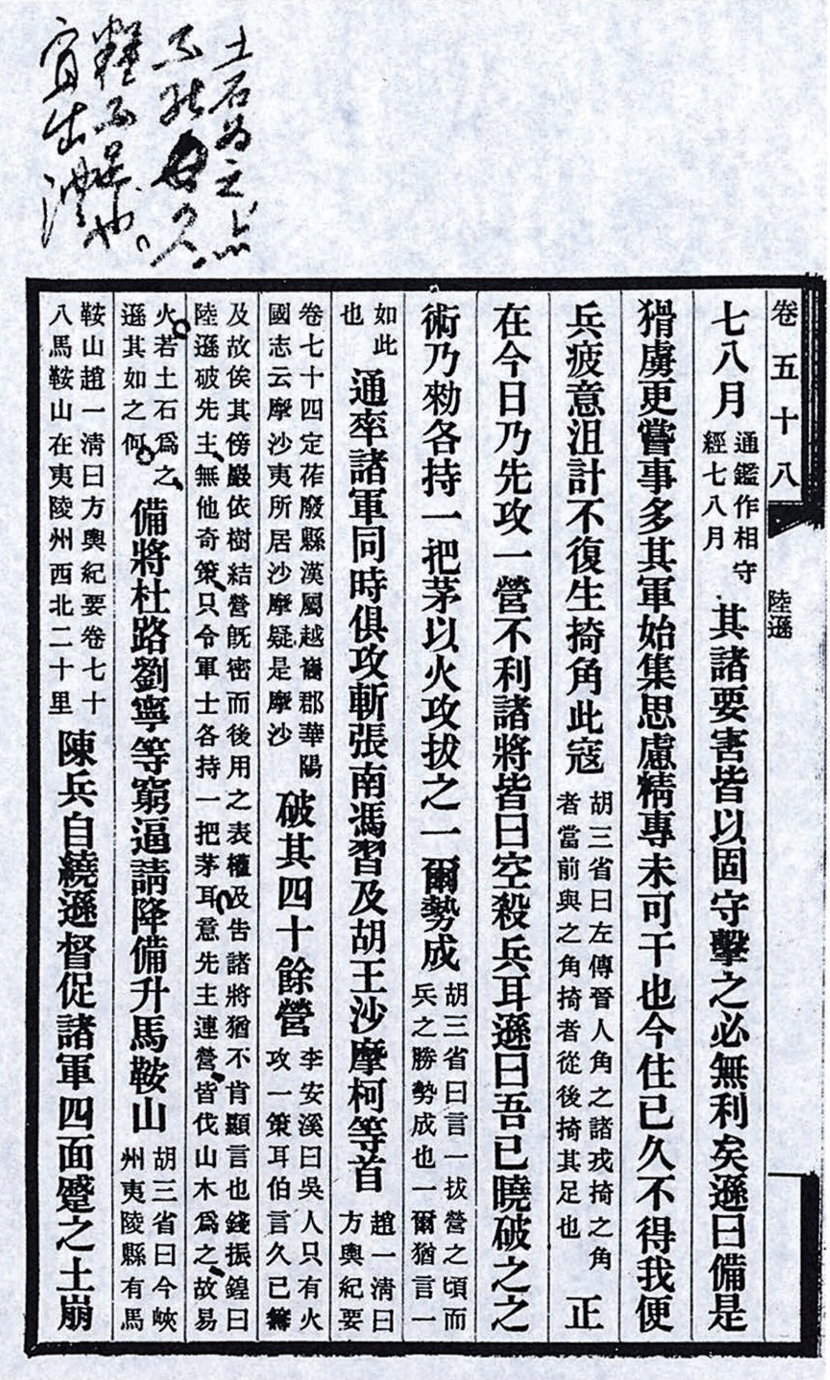
当御备时，诸将军或是孙策时旧将，或公室贵戚，各自矜恃，不相听从。逊案剑曰：“刘备天下知名，曹操所惮。今在境界，此强对也。诸君并荷国恩，当相辑睦，共翦此虏，上报所受；而不相顺，非所谓也。仆虽书生，受命主上。国家所以屈诸君使相承望者，以仆有尺寸可称，能忍辱负重故也。各任其事，岂复得辞！军令有常，不可犯矣。”[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7页]

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1]

又备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

---

[1] 《通鉴》魏青龙二年八月：“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守百余日，亮数挑战，懿不出。亮乃遗懿巾帼妇人之服。懿怒，上表请战。帝使卫尉辛毗杖节为军师以制之。”借君命来压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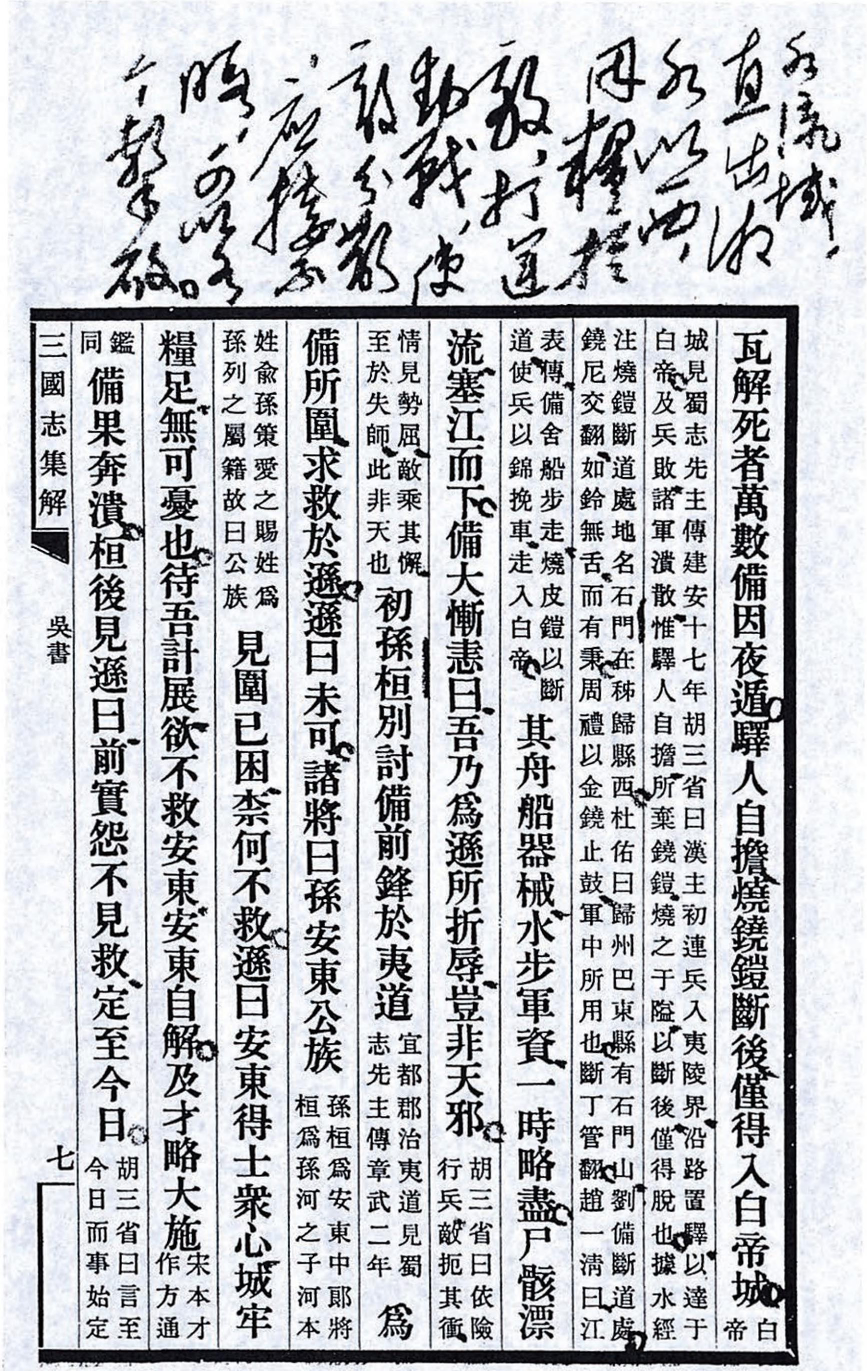


土石为之，亦不能持久，粮不继也。宜出降。

卷五十八　陸遜

七八月（通鑑作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胡三省曰左傳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角者當前與之角掎者從後掎其足也）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胡三省曰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勢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四定莋廢縣漢屬越嶲郡華陽國志云摩沙夷所居沙摩疑是摩沙）破其四十餘營（李安溪曰吳人只有火攻一策耳伯言久已籌及故佚其傍嚴依樹結營既密而後用之表權及告諸將猶不肯顯言也錢振鍠曰陸遜破先主，無他奇策，只令軍士各持一把茅耳，意先主連營，皆伐山木爲之，故易火。若土石爲之，遜其如之何。）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胡三省曰今峽州夷陵縣有馬鞍山趙一清曰方輿紀要卷七十八馬鞍山在夷陵州西北二十里）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批注的手稿。



孫據城，有出[illegible]，所以兵因糧[illegible]，殺打道，動戰使，諸分散，應援[illegible]，時而[illegible]，[illegible]擊破。

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白帝城見蜀志先主傳建安十七年胡三省曰漢主初連兵入夷陵界沿路置驛以達于白帝及兵敗諸軍潰散惟驛人自擔所棄鐃鎧燒之于隘以斷後僅得脫也據水經注燒鎧斷道處地名石門在秭歸縣西杜佑曰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劉備斷道處鐃尼交翻如鈴無舌而有秉周禮以金鐃止鼓軍中所用也斷丁管翻趙一清曰江表傳備舍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邪（胡三省曰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憊至於失師此非天也）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宜都郡治夷道見蜀志先主傳章武二年）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孫桓爲安東中郎將桓爲孫河之子河本姓俞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故曰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宋本才作方通鑑同）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胡三省曰言至今日而事始定）

三國志集解　吳書　七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批注的手稿。

何评有理

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何焯曰：“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卷五十八《吴书·陆逊传》第8页]

都是废话

《江表传》曰：“权使子登出征，已出军，次于安乐。群臣莫敢谏。琮密表曰：‘古来太子，未尝偏征也。故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今太子东出，非古制也。’”[卷六十《吴书·全琮传》第8页]

杀降不武

（士）徽闻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斩送其首。[卷六十《吴书·吕岱传》第12页]

读《晋书》批语[1]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由是素论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论十二篇。先是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于旧注外而为解义，妙演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以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卷五十《郭象传》第8～9页]

郭象无行

庾纯字谋甫，博学有才义，为世儒宗。郡补主簿，仍参征南府，累迁黄门侍郎，封关内侯，

---

[1] 毛泽东在此书封里附记批读情况为：1975年8月，阅第五十至五十六卷，再阅第三十四卷《羊祜传》《杜预传》；9月再阅第七十九卷《谢安传》《谢琰传》《谢玄传》。

此公骂也

历中书令、河南尹。初，纯以贾充奸佞，与任恺共举充西镇关中。充由是不平。充尝宴朝士，而纯后至。充谓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后?”纯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来后。”世言纯之先尝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纯以此相讥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纯行酒，充不时饮。纯曰：“长者为寿，何敢尔乎?”充曰：“父老不归供养，将何言也?”纯因发怒曰：“贾充，天下凶凶，由尔一人!”充曰：“充辅佐二世，荡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为之凶凶?”纯曰：“高贵乡公何在!”众坐因罢。[卷五十《庾纯传》第9页]

道家言

尼少有清才，与岳俱以文章见知。性静退不竞，唯以勤学著述为事，著《安身论》以明所守，其辞曰：“……君子则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后外其身；知有欲之伤德也，故远绝荣利；知争竞之遘灾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为私，故身正而私全；慎言而不适欲，故言济而欲从；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谨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则立乎无私之域，行则由乎不争之涂，必将通天下之理，而济万物之性。天下犹我，故与天下同其欲；己犹万物，故与万物同其利。……用天时，分地利，甘布衣，安薮泽，沾

体涂足，耕而后食。苟崇乎德，非不进也。虽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秘，功盖当时，势侔人主，不得与之比逸。遗意虑，没才智，忘肝胆，弃形器，貌若无能，志若不及。苟正乎心，非不治也。”[卷五十五《潘尼传》第17～19页]

老氏

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人也。……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孟观西讨，自擒氐帅齐万年。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其辞曰：“……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地。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卷五十六《江统传》第1～7页]

迁亦乱，不迁亦乱。在封建时代非乱不可。千数百年后，得化为不乱始辑耳。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导之从子也。……又与会稽王笺，陈（殷）浩不宜北伐，并论时事曰：

虽圣人亦如

此，况无圣人耶！

“……传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外不宁，内忧以深。古之弘大业者，或不谋于众，倾国以济一时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诚独运之明，足以迈众；暂劳之弊，终获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拟议乎？”[卷八十《王羲之传》第4页]

读《宋书》批语

此时檀道济尚未死[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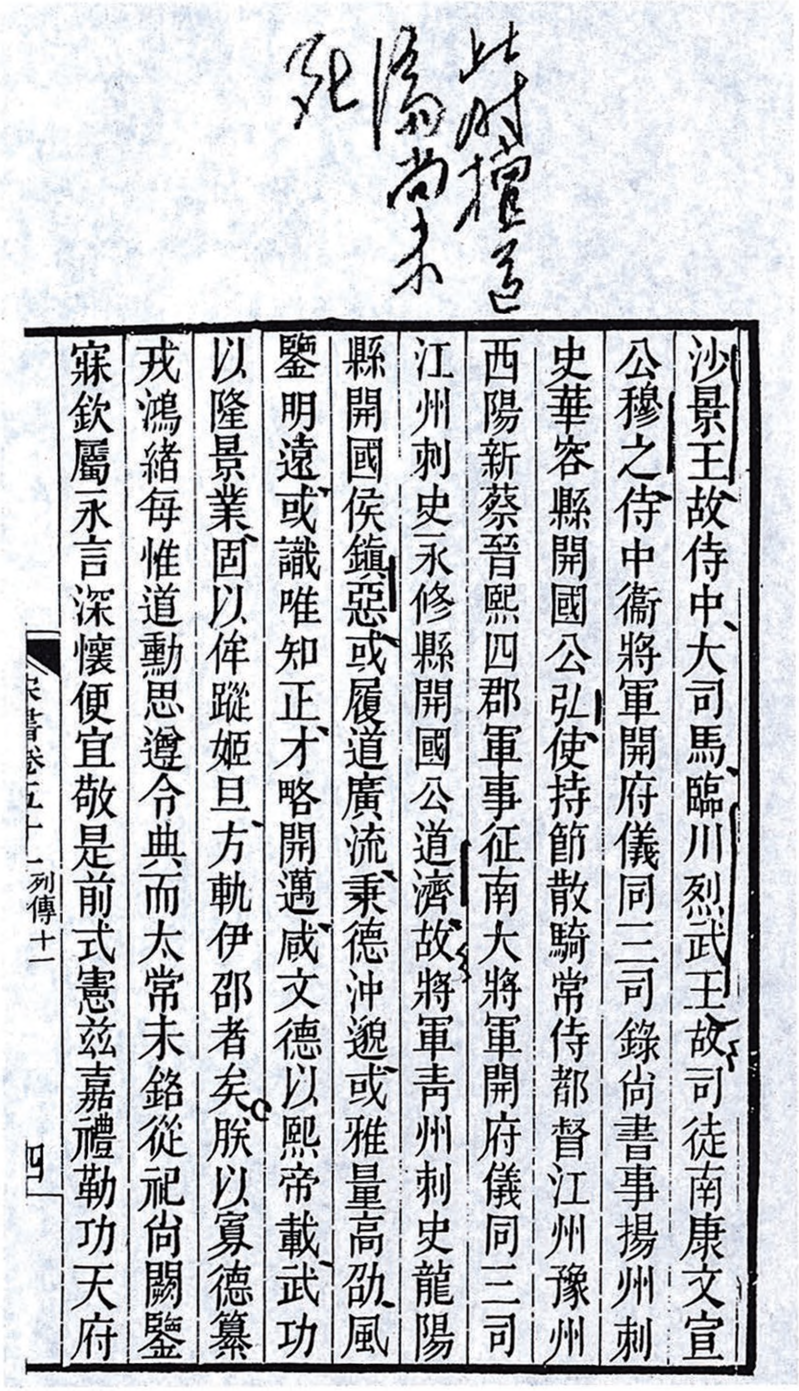
太祖元嘉九年，诏曰："古者明王经国，司勋有典。平章以驭德刑，班瑞以畴功烈。……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县开国公弘，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道济，故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恶，或履道广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唯知正，才略开迈。"[卷五十一《宗室刘道怜传》第3～4页]

叛徒

王僧达，琅邪临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锡，质讷乏风采。太祖闻僧达蚤慧，召见于德阳殿。问其书学及家事，应对闲敏。上甚知之，妻以临川王义庆女。少好学，善属文。年未二十，以为始兴王濬后军参军，迁太子舍人。坐属疾，于杨

---

[1] 《宋书·宗室传》中的诏书发于元嘉九年，檀道济在元嘉十三年被杀。



此时檀道济尚未死

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勳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憲茲嘉禮勒功天府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十一　四

毛泽东读《宋书》批注的手稿。

列桥观斗鸭，为有司所纠，原不问。性好鹰犬，与闾里少年相驰逐，又躬自屠牛。……先是南彭城蕃县民高阇、沙门释昙标、道方等共相诳惑，自言有鬼神龙凤之瑞，常闻箫鼓音，与秣陵民蓝宏期等谋为乱。又要结殿中将军苗允、员外散骑侍郎严欣之、司空参军阚千纂、太宰府将程农、王恬等，谋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宫门，晨掩太宰江夏王义恭，分兵袭杀诸大臣，以阇为天子。事发觉，凡党与死者数十人。僧达屡经狂逆，上以其终无悛心，因高阇事陷之。[卷七十五《王僧达传》第1～8页]

读《隋书》批语

蕴藏大乱

上性严重，有威容。……自强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实，虽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称近代之良主。然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故忠臣义士莫得尽心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又不悦诗书，废除学校。唯妇言是用，废黜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不常，过于杀戮。尝令左右送西域朝贡使出玉门关，其人所经之处，或受牧宰小物，馈遗鹦鹉、麖皮、马鞭之属，上闻而大怒。又诣武库，见署中芜秽不治，于是执武库令及诸受遗者，出开远门外，亲自临决，死者数十人。又往往潜令人赂遗令史、府史，有受者必死，无所宽贷。议者以此少之。[卷二《高祖本纪》下　第22～23页]

读《南史》批语

守大岘亦无用

（义熙）五年二月，伪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讨……超大将公孙五楼请断大岘，坚壁清野以待，超不从。初谋是役，议者以为贼若严守大岘，军无所资，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鲜卑性贪，略不及远，既幸其胜，且爱其谷，必将引我，且亦轻战。师一入岘，吾何患焉。”及入岘，帝举手指天曰：“吾事济矣。”众问其故，帝曰：“师既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军无匮乏之忧，胜可必矣。”[卷一《宋高祖本纪》第9页]

赵宋祖此弊法

论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难结凶竖，虽祸生非虑，盖亦有以而然。夫尽人命以自养，盖惟桀纣之行；观夫大明之世，其将尽人命乎？虽周公之才之美，亦当终之以乱。由是

言之，得殁亦为幸矣。[卷二《宋太祖本纪》第27页]

还是来年二月

永元二年冬，（萧）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长史王茂、中兵吕僧珍、别驾柳庆远、功曹史吉士瞻等谋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于听事，告以举兵。……（萧颖胄）仍以南康王尊号之议来告，且曰：“时有未利，当须来年二月。遽便进兵，恐非庙算。”帝答曰：“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义而动，天时人谋，有何不利？……”三年二月，南康王为相国，以帝为征东将军。戊申，帝发襄阳。[卷六《梁高祖本纪》第7~8页]

打援

（永元三年）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萧颖达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汉南。……甲寅，东昏遣宁朔将军吴子阳、光子衿等十三军救郢州，进据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帅军主曹仲宗、康绚、武会超等潜师袭加湖，将逼子阳。水涸不通舰，子衿喜。其夜流星坠其城，四更中无雨而水暴长，众军乘流齐进，鼓噪攻之，俄而大溃，子阳等窜走，众尽溺于江，王茂虏其余而旋。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卷六《梁高祖本纪》第8页]

时来天地皆同力，远去英雄不自由。

论曰：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箓，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卷七《梁高祖本纪》第19~20页]

使贪

镇恶性贪，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帝以其功大，不问。时有白帝，言镇恶藏姚泓伪辇，有异志。帝使觇之，知镇恶剔取饰辇金银，弃辇于垣侧，帝乃安。[卷十六《王镇恶传》第3~4页]

会魏太武帝围汝南，戍主陈宪固守告急。文帝遣质轻往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等救宪。后太武率大众数十万向彭城，以质为辅国将军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过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广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质求酒。质封溲

此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便与之，太武怒甚，筑长围，一夜便合。质报太武书云：“尔不闻童谣言邪？‘虏马饮江水，狒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复人事。寡人受命相灭，期之白登，师行未远，尔自送死，岂容复令尔飨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杀尔，尔由我而死，尔若有幸，得为乱兵所杀，尔若不幸，则生相锁缚，载以一驴，负送都市。尔识智及众，岂能胜苻坚邪？顷年展尔陆梁者，是尔未饮江，太岁未卯故耳。”时魏地童谣曰：“轺车北来如穿雉，不意虏马饮江水。虏主北归石济死，虏欲渡江天不徙。”故答书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铁床，于上施铁镵，云“破城得质，当坐之此上”。质又与魏军书，写台格，购斩太武，封万户侯，赐布绢各万匹。魏以钩车钩垣楼，城内系絙，数百人叫呼引之，车不能退。质夜以木桶盛人，县出城外，截其钩获之。明日又以冲车攻城，土坚密，每至，颓落下不过数斗。魏军乃肉薄登城，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死者与城平。如此三旬，死者过半，太武乃解围而归。上嘉质功，以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监四州诸军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质率见力向潼关。质顿兵不肯时发，又顾恋嬖妾，弃军营垒，单马还城，散用台库见钱六七百万，为有司所纠，上不问。元凶弑立，以质为丹阳尹。质家遣门生师颛报质，具言文帝崩问。质使告司空义宣

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

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此是妄想

及孝武帝，而自率众五千，驰下讨逆，自阳口进江陵见义宣。时质诸子在都，闻质举义，并逃亡。义宣始得质报，即日举兵，驰信报孝武，板进质号征北将军。孝武即位，加质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江州诸军事。使质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门入，与质同会太极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质留守朝堂，封始兴郡公。之镇，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六平乘并施龙子幡。时孝武自揽威权，而质以少主遇之，刑政庆赏，不复咨禀朝廷，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始闻国祸，便有异图。以义宣凡暗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时义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计不行。……会义宣有憾于孝武，质因此密信说诱，陈朝廷得失。……义宣意乃定。……孝武遣抚军将军柳元景，统豫州刺史王玄谟等屯梁山洲，两岸筑偃月垒，水陆待之。元景檄书宣告，而义宣亦相次系至。江夏王义恭书曰：“昔桓玄借兵于仲堪，有似今日。”义宣由此与质相疑。质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玄谟，必不敢轻动。质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略也。”义宣将从之。义宣客颜乐之说义宣曰：“质若复拔东城，则大功尽归之矣。宜遣麾下自行。”义宣遣腹心刘谌之就质陈军城南。玄谟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战。薛安都骑军前出，垣护之督诸将继之，乃大溃。质

求义宣欲计事，密已走矣。质不知所为，亦走。至寻阳，……队主裘应斩质，传首建邺。[卷十八《臧质传》第21～24页]

略似荀彧[1]

宋武帝召补镇军咨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累迁太尉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都，讽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乃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卷二十一《王弘传》第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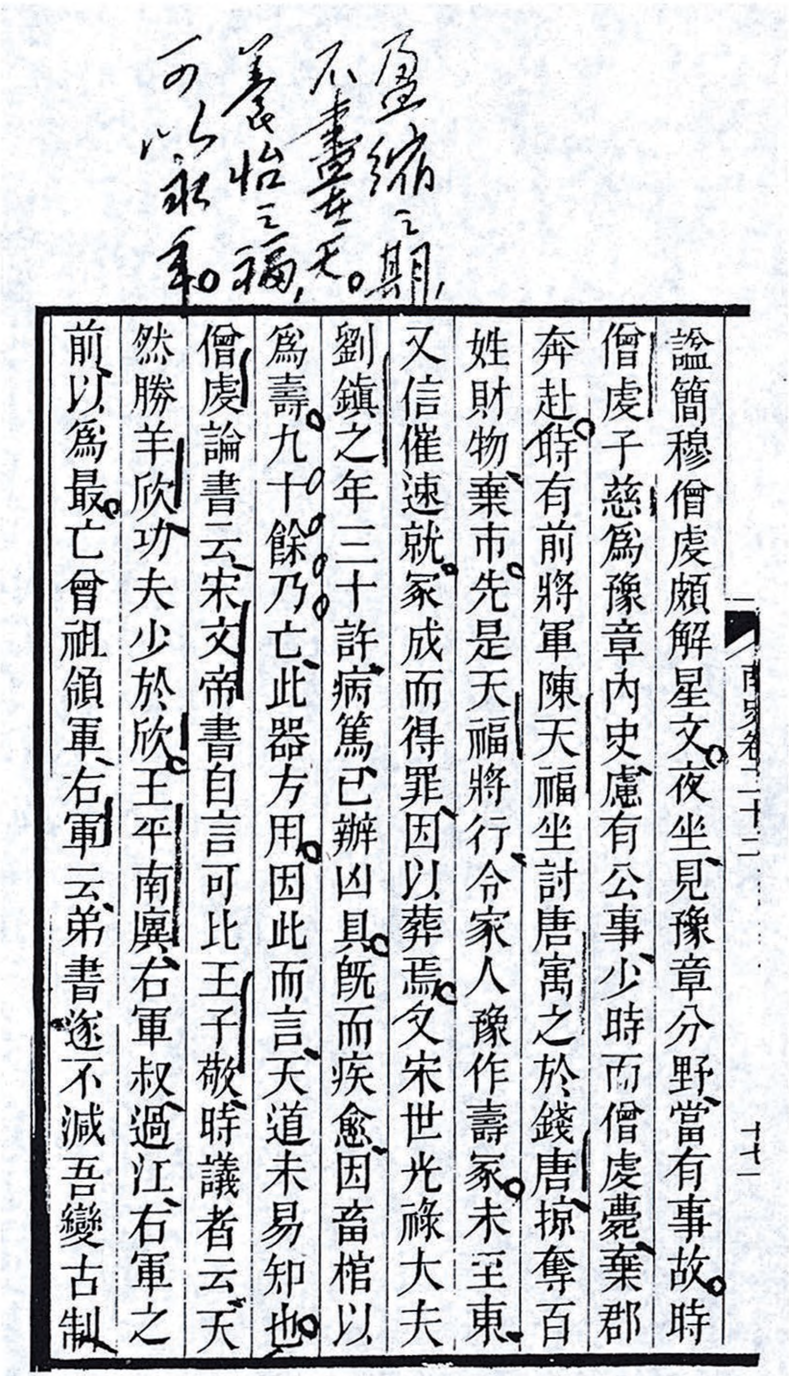
盈缩之期，不尽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

时有前将军陈天福，坐讨唐寓之于钱唐，掠夺百姓财物弃市。先是天福将行，令家人豫作寿冢，未至东，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禄大夫刘镇之，年三十许，病笃，已办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为寿，九十余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卷二十二《王僧虔传》第17页]

𫖮字国章，初为豫州主簿，累迁晋陵太守，袭南昌县五等子。大明末，拜侍中，领前军将军。时新安王子鸾，以母嬖有盛宠，太子在东宫

---

[1] 《后汉书·荀彧传》：“董昭等欲共进操爵国公，九锡备物，密以访彧。彧曰：‘曹公本兴义兵以匡汉朝，虽勋庸崇著，犹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寝。操心不能平。会南征孙权，……彧病留寿春。操馈之食，发视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



盈縮之期，
不盡在天。
養怡之福，
可以永年。

南史卷二十二　十七

諡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滅吾變古制

毛泽东读《南史》批注的手稿。

袁颢无能

多过，上微有废太子立子鸾之意，从容言之。颢盛称太子好学，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入，颢亦厉色而出。……即以颢为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及至襄阳，使刘胡缮修兵械。会明帝定大事。……颢反意已定，……颢诈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驰檄，奉劝晋安王子勋即大位。……颢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议而已，不能抚接诸将。刘胡每论事，酬对甚简。由是大失人情，胡常切齿恚恨，……及刘胡叛走，……（颢）因又遁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领数千，步取青林，欲向寻阳。……伯珍请求间言，乃斩颢首，诣钱溪马军主襄阳俞湛之降。[卷二十六《袁颢传》第3～5页]

粲字景倩，洵弟子也。……明帝临崩，粲与褚彦回、刘勔并受顾命。……后废帝即位，……二年，桂阳王休范为逆，粲扶曳入殿。……时兵难危急，贼已至南掖门，诸将意沮，咸莫能奋。粲慷慨谓诸将帅曰：“寇贼已逼，而众情离阻。孤子受先帝顾托，本以死报，今日当与诸护军同死社稷。”因命左右备马，辞色哀壮。于是陈显达等感激出战，贼即平殄。……时齐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顾托，不欲事二姓，密有异图。……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齐

高帝自诣粲，粲称疾不见。……时齐高帝入屯朝堂。……粲克日谋矫太后令，使（王）韫、（卜）伯兴率宿卫兵攻齐高帝于朝堂，（黄）回率军来应，（刘）彦节、（任）候伯等并赴石头。事泄。……齐高帝以报（王）敬则，敬则诛韫并伯兴，又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助薛深。……粲还坐，列烛自照，谓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义至此耳。”……僧静乃并斩之。[卷二十六《袁粲传》第5～10页]

袁粲死节

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琇之有吏能，仕齐为吴令。有小儿，年十岁，偷刈邻家稻一束。琇之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县中皆震肃。[卷二十七《孔靖传》第3页]

好反而不好胜，古今一轨。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册封面批语]

（孔）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驾，当由骨肉相残。江州应出天子。”以为义康当之。……大将军府史仲承祖，义康旧所信念，屡衔命下都，亦潜结腹心，规有异志。闻熙先有诚，密相结纳。丹阳尹徐湛之，素为义康所爱，虽为舅甥，恩过子弟。承祖因此结事湛之，告以密计。承祖南下，申义康意于萧思话及晔。……

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右将军南平王铄出镇，上于虎帐冈祖道。晔等期以其日为乱。许耀侍上，扣刀以目晔，晔不敢视。俄而坐散，差互不得发。十一月，徐湛之上表告状，于是悉出檄书选事及同恶人名手迹，诏收综等，并皆款服。[卷三十三《范晔传》第6～7页]

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大，欲专政事，每为（刘）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领军将军殷景仁以时贤零落，白文帝征湛。八年，召为太子詹事，加给事中，与景仁并被任遇。……明年，景仁转尚书仆射，领选护军将军。湛代为领军。十二年，又领詹事。湛与景仁素款，又以其建议征之，甚相感悦。及俱被时遇，猜隙渐生。以景仁专内任，谓为间己。时彭城王义康专执朝权，而湛昔为上佐，遂以旧情，委心自结。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倾黜景仁，独当时务。义康屡言之于文帝，其事不行。义康僚属及湛诸附隶，潜相约勒，无敢历殷氏门者。湛党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诣景仁求郡，敬文遽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由敬文暗浅，上负生成，合门惭惧，无地自处。”敬文之奸谄如此。义康擅权专朝，威倾内外。湛愈推崇之，无复人臣之礼。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善论政道，并语前代故事，听者忘疲。每入云龙

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殷景仁与文帝密谋

门，御者便解驾，左右及羽仪随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为常。及晚节，驱煽义康，陵轹朝廷。上意虽内离，而接遇不改。上谓所亲曰：“刘斑初自西还，吾与语常看日早晚，虑其当去；比入，亦看日早晚，虑其不去。”湛小字斑兽，故云斑也。迁丹阳尹，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上与义康形迹既乖，衅难将结，湛亦知无复全地。及至丁艰，谓所亲曰：“今年必败。常日赖口舌争之，故得推迁耳。今既穷毒，无复此望，祸至其能久乎?”伏甲于室，以待上临吊。谋又泄，竟弗之幸。十月，诏收付廷尉，于狱伏诛，时年四十九。子黯等从诛。[卷三十五《刘湛传》第2~4页]

曹孟德、徐世勣、郭雀儿、赵玄郎亦用此等人。[1]

及（梁武）帝起兵，景宗聚众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帝）以景宗为军锋，道次江宁。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镇新亭，景宗被甲驰战，居士弃甲奔走，景宗皆获之。又与王茂、吕僧珍犄角，破王珍国于大航。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申号令，然后

---

[1] 《文选》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曹操用了盗坟的无赖。徐世勣，即李勣，以避太宗讳，去世字，赐姓李。《新唐书·李勣传》说，年十七，从翟让为盗，翟让劫公私船取财，由是兵大掠，李勣也是用无赖抢劫的。郭雀儿，即后周太祖郭威。据《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载，郭威起兵入汴京，纵兵大掠。他用了杀人争物的无赖。赵玄郎不详。

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此时梁武，犹知军机。

稍息。城平，封湘西县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监元年，改封竟陵县侯。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钟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武帝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豫州刺史韦睿亦援焉，而受景宗节度。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敕而进。遇暴风卒起，颇有沉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第4~5页]

景宗亦豪杰哉

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卷五十五《曹景宗传》第6~7页]

韦睿字怀文，京兆杜陵人也。世为三辅著姓。祖玄，避吏隐长安南山。宋武帝入关，以太尉掾征，不至。伯父祖征，宋末为光禄勋。父祖归，宁远长史。睿事继母以孝闻。祖征累为郡守，每携睿之职，视之如子。时睿内兄王憕、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祖征谓睿曰：“汝自谓何如憕、恽?”睿谦不敢对。祖征曰：“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睿俱行。梁土富饶，往者多以贿败。睿虽幼，独以廉闻。……睿多建策，皆见用。大军发郢，谋留守将，上难其人。久之，顾睿曰：“弃骐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
善守　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盈满。睿料简隐恤，咸为营理，百姓赖之。梁台建，征为大理。武帝即位，迁廷尉，封梁都子。天监二年，改封永昌，再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魏遣众来伐，睿率州兵击走之。四年侵魏，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
躬自调查研究　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睿曰：
以众击少　“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

机不可失	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
	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
决心	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
	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先是
	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睿案行山
躬自调查研究	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
	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
	东西小城，夹合肥。睿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
	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睿
	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
	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
以少击众	军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
	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睿堤下。军监潘灵祐
	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睿怒曰：
以少击众	“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树之
将在前线	堤下，示无动志。睿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
将在前线	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
	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与合肥城
	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
不贪财	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
	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
	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
干部需和	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
劳谦君子	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
	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

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合肥既平，有诏班师。去魏军既近，惧为所蹑。睿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于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睿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睿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睿缓行。睿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睿，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睿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虑城中危惧，乃募军士言文达、洪骐驎等赍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城中战守日苦，始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睿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睿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

虽众，何所用之。

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1]。

此别一城，非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

---

[1] 《通鉴》更始元年，王莽军43万，号百万，攻昆阳。6月，刘秀与敢死者3000人，冲王莽军中坚，城中亦鼓噪而出，莽军大败。建安十三年，曹操率水步军称80万，与周瑜军3万相持于赤壁。10月，周瑜用火攻大破曹操军。

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睿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睿不许。军中惊，睿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通道。睿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睿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逋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睿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书郎周舍劳军于淮上。睿积所获于军门。舍观之，谓睿曰：“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矣。”以功进爵为侯。七年，迁左卫将军。俄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会司州刺史马仙琕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蹑，三关扰动。诏睿督众军援焉。睿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睿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睿至乃退。帝亦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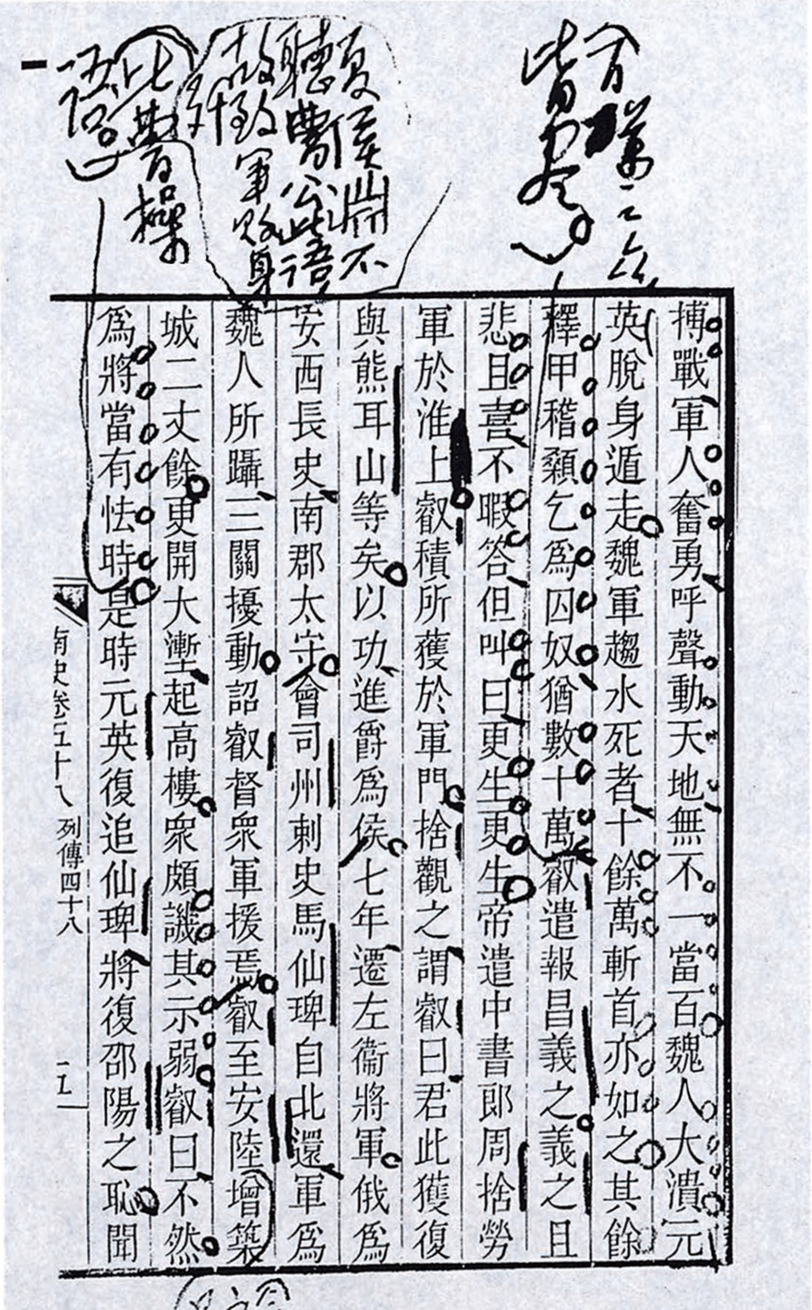
百万之众，皆尽。

今湖北安陆县

此曹操语[1]。夏侯渊不

---

[1] 《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初，渊虽数战胜，太祖常戒曰：‘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



今勝之[illegible]皆是乞[illegible]

夏侯淵不聽曹公此語，故致軍敗身殲。比諸葛高樓一語

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七年遷左衞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

南史卷五十八　列傳四十八　一五

合淝之[illegible]

毛泽东读《南史》批注的手稿。

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

仁者必有勇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罢军。十三年，为丹阳尹，以公事免。十四年，为雍州刺史。初，睿起兵乡中，客阴双光泣止睿。睿还为州，双光道候，睿笑曰：“若从公言，乞食于路矣。”饷耕牛十头。睿于故旧无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十五年，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征拜护军，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睿每坐，使棱说书。其所发擿，棱犹弗之逮。武帝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睿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哭甚恸，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睿，请曹景宗与睿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睿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

使曹景宗胜

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睿兄纂、阐，并早知名。纂仕齐，位司徒记室、特进。沈约尝称纂于上曰：“恨陛下不与此人同时，其学非臣辈也。”阐为建宁县，所得俸禄百余万，还家悉委伯父处分，乡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韦放有父风

睿子放，字元直，身长七尺七寸，腰带八围，容貌甚伟。……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领军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总兵会之。魏大将军费穆率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尔！”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逐北至涡阳。[卷五十八《韦睿传》第1～7页]

《陈庆之传》

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陈庆之，字子云，义兴国山人也。……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贼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筑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仗节军门

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魏左仆射杨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众七万据荥阳拒颢，兵强城固。魏将元天穆大军复将至，先遣其骠骑将军尔朱兆、骑将鲁安等援杨昱，又遣右仆射尔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罴据虎牢。时荥阳未拔，士众皆恐。庆之乃解鞍秣马，宣喻众曰：“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义不图存，须平其城垒。”一鼓悉使登城。壮士东阳宋景休、义兴鱼天愍逾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阵外合，庆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鲁安于阵乞降，天穆、兆单骑获免。进赴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走。[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第5～7页]

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受敕责琛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日闻听览。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阘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

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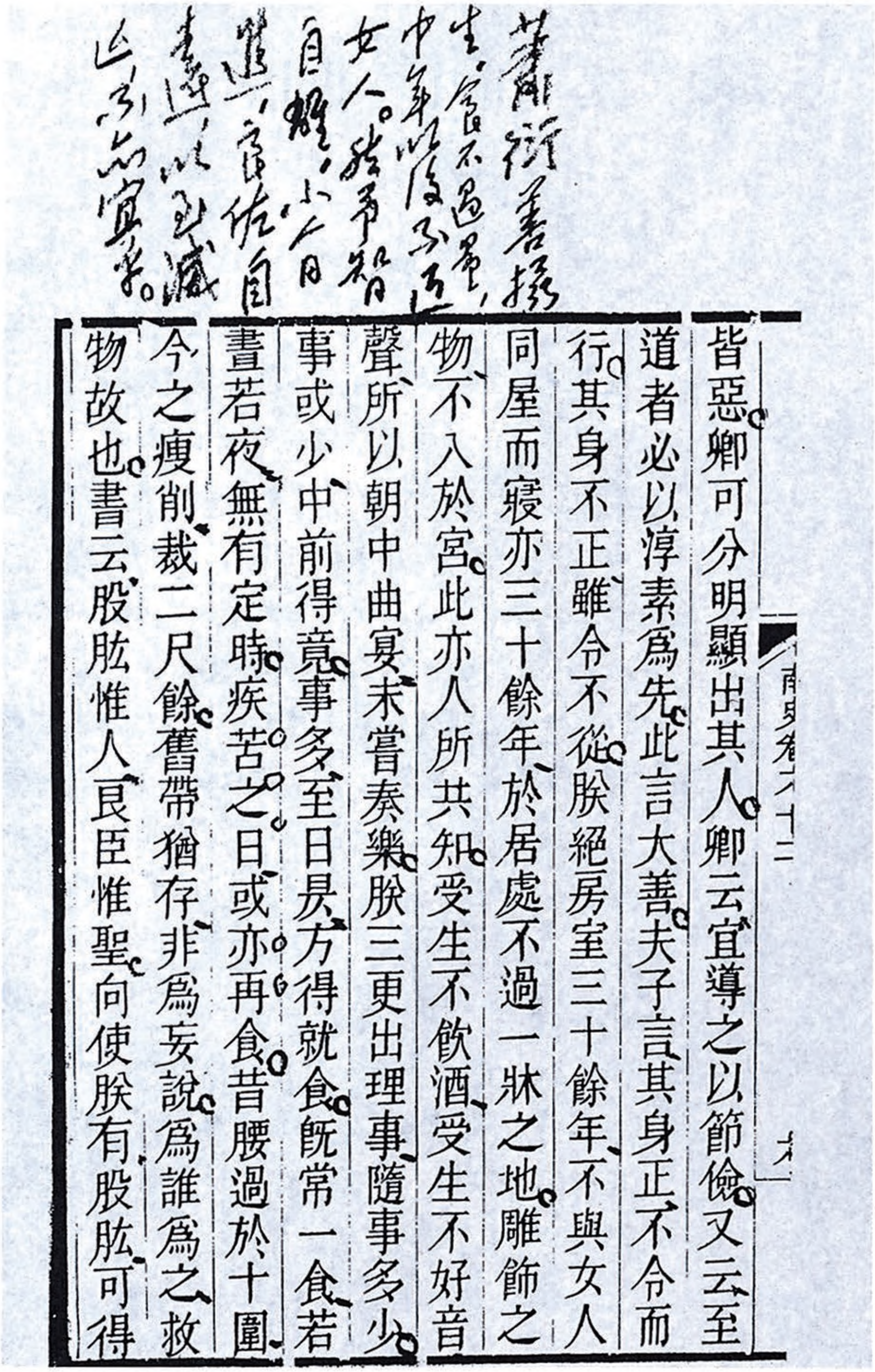
---

[1] 《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诏曰：‘朕以不德，应期践运，王涂未一，奸宄充路，夙夜战惧，不遑鉴寐。惟君天资聪睿，明德显荣，统任上将，匡国弭难。……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绩，敬服王命，绥靖四方。’”

能受。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人失安居，牧守之过。’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能皆恶。卿可分明显出其人。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救物故也。……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今不许外人呈事，于义可否？以噎废餐，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独任成乱。’何者是宜，具以奏闻。”［卷六十二《贺琛传》第6～7页］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蕭衍善攝生，食不過量，中年以後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進，良佐自疏，以至滅亡，亦宜矣。

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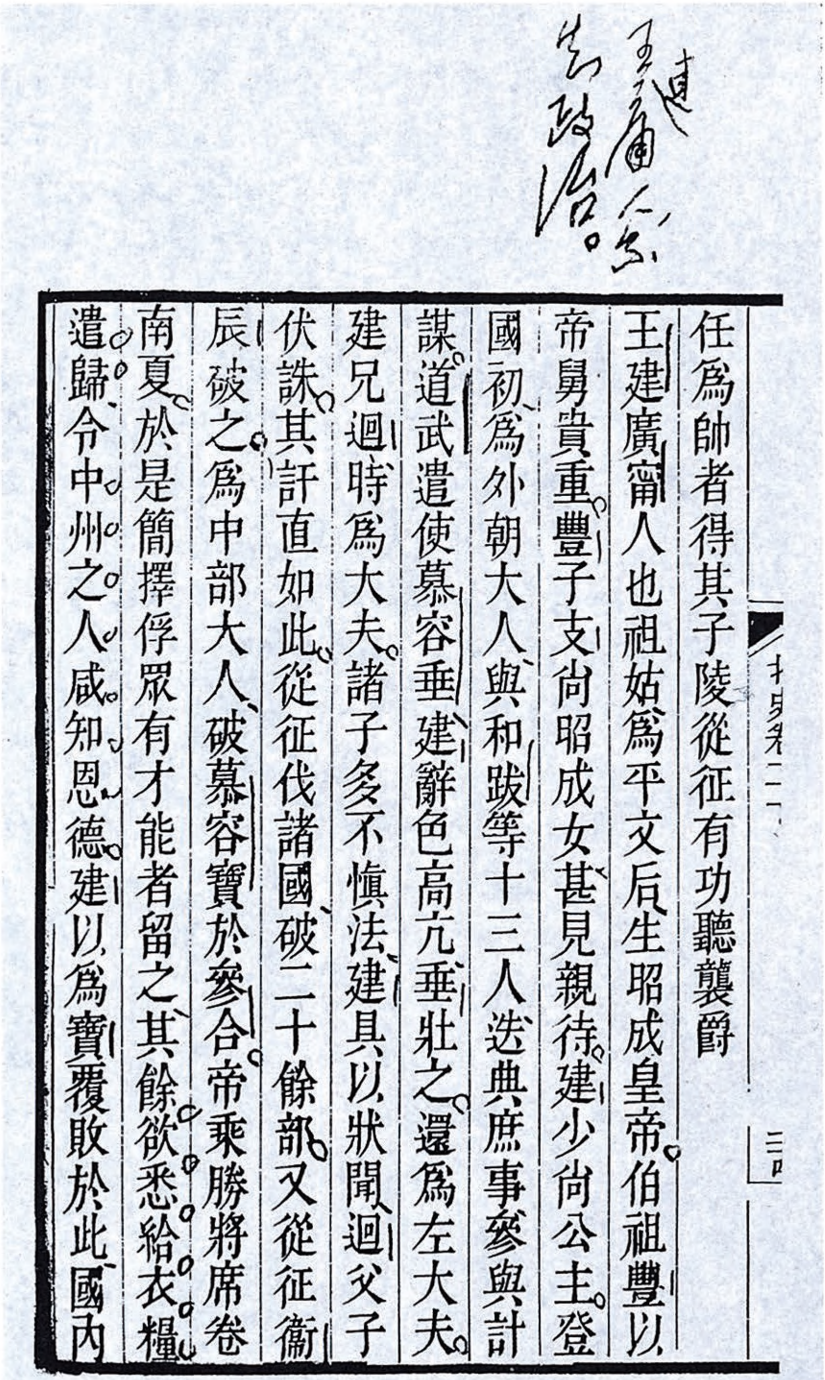
毛泽东读《南史》批注的手稿。

读《北史》批语

（大统）三年正月，东魏寇龙门，屯军蒲坂，造三道浮桥度河。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高昂围洛州。帝出军广阳，召诸将谓曰：“贼掎吾三面，又造桥示欲必度，是欲缀吾军，使窦泰得西入耳。且（高）欢起兵以来，泰每先驱，下多锐卒，屡胜而骄。今袭之必克，克泰，则欢不战而走矣。”……庚戌，帝还长安，声言欲向陇
中间突破 右。辛亥，谒魏帝，而潜军至小关。窦泰卒闻军至，陈未成。帝击之，尽俘其众，斩泰，传首长安。高昂闻之，焚辎重而走。齐神武亦撤桥而退。帝乃还。[卷九《周本纪》上第10页]

（开皇）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诏曰：“吴、
商业发展 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
此不可能 丈以上，悉括入官。”[卷十一《隋本纪》上第25～26页]

王建，广宁人也。……建少尚公主。登国



王建當念先政治。

任爲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爲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豐以帝舅貴重豐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爲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與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爲左大夫建兄迴時爲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爲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爲寶覆敗於此國內

毛泽东读《北史》批注的手稿。

王建庸人，不知政治。

初，为外朝大人。……又从征卫辰，破之，为中部大人。破慕容宝于参合；帝（魏道武帝）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为宝覆败于此，国内空虚，获而归之，纵敌生患，不如杀之。帝曰：“若从建言，非伐罪吊人之义。”诸将咸以建言为然。建又固执，乃坑之。帝既而悔焉。……车驾幸钜鹿，破宝众于柏肆坞，遂围中山。宝弃城走和龙，城内无主，将夜入，乘胜据守其门。建贪而无谋，意在虏获；恐士卒肆掠，盗乱府库，请候天明，帝乃止。是夜，徒何人共立慕容普驎为主，遂闭门固守。帝乃悉众攻之，使人登巢车临城，招其众。皆曰：“但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命耳。”帝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卷二十《王建传》第24～25页]

冤哉枉也

王建位遇既高，讦以求直。参合之役，不其罪欤！罗结枝附叶从，子孙荣禄。楼伏连、闾大肥，并征伐著绩，策名前代。奚牧、和跋、莫题、贺狄干、李栗、奚眷，有忠勤征伐之效，不能以功名自卑，俱至诛夷，亦各其命也。[卷二十《王建、罗结、楼伏连……》列传第八　第30页]

读《旧唐书》批语

高祖以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及长，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

遇事无断制

史臣曰：……然而优柔失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裴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衽。不有圣子，王业殆哉！[卷一本纪第一《高祖》第1～17页]

（乾封）三年，……九月癸巳，司空英国公勣破高丽，拔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建等以归。境内尽降。其城一百七十，户六十九万七千。以其地为安东都护府，分置四十二州。[卷五本纪第五《高宗》下第2页，《四部备要·史部》，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英殿本校刊]

近三百万人，当不包括新罗、百济。

平阳公主，高祖第三女也，太穆皇后所生。……六年，薨。及将葬，诏加前后部羽葆鼓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太常奏议，以礼，妇人无鼓吹。高祖曰：“鼓吹，军乐也。往者公主于司竹举兵以应义旗，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周之文母，列于十乱，公主功参佐命，非常妇人之所匹也。何得无鼓吹！”[卷五十八《平阳公主传》第11～12页]

李元昌与李承乾谋反

汉王元昌，高祖第七子也。少好学，善隶书。武德三年，封为鲁王。贞观五年，授华州刺史，转梁州都督。十年，改封汉王。元昌在州，颇违宪法，太宗手敕责之。初不自咎，更怀怨望。知太子承乾嫉魏王泰之宠，乃相附托，图为不轨。十六年，元昌来朝京师，承乾频召入东宫夜宿，因谓承乾曰：“愿陛下早为天子。近见御侧有一宫人，善弹琵琶，事平之后，当望垂赐。”承乾许诺。又刻臂出血，以帛拭之，烧作灰，和酒同饮。共为信誓，潜伺间隙。[卷六十四《李元昌传》第13页]

盛彦师者，宋州虞城人。大业中，为澄城长。义师至汾阴，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拜银青光禄大夫、行军总管，从平京城。俄与史万宝镇宜阳以拒东寇。及李密之叛，将出山南。史万宝惧密威名，不敢拒。……彦师笑曰：“请以数千之众邀之，必枭其首。”万宝曰：“计将安

出?”对曰：“军法尚诈，不可为公说之。”便领众逾熊耳山南，傍道而止。……或问之曰：“闻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师曰：“密声言往洛，实走襄城就张善相耳，必当出人不意。若贼入谷口，我自后追之，山路险隘，无所展力，一夫殿后，必不能制。今吾先得武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陕州，以为余不足虑，遂拥众徐行，果逾山南渡。彦师击之，密众首尾断绝，不得相救，遂斩李密，追擒伯当。……会徐圆朗反，彦师为安抚大使，因战，遂没于贼。圆朗礼厚之。……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卷六十九《盛彦师传》第12～13页]

盛彦师名将，冤死。

刘世让字元钦，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征仕郎。高祖入长安，世让以沛川归国，拜通议大夫。……高祖问以备边之策，世让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如臣所计，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多储金帛，有来降者，厚赏赐之。数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践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当无食，马邑不足图也。”高祖曰：“非公无可任者。”乃使驰驿往经略之。突厥惧其威名，乃纵反间，言世让与可汗通谋，将为乱。高祖不之察，遂诛世让，籍没其家。[卷六十九《刘世让传》第14～15页]

刘世让冤死

李君羡者，洺州武安人也。初为王世充骠骑，恶世充之为人，乃与其党叛而来归。太宗引为左右。……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武连郡公）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卷六十九《李君羡传》第16～17页]

李君羡冤死

陛下（李世民）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虑，恐妄劳中国，以事远方，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已。[卷七十二《李百药传》第12～13页]

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太宗将幸九成宫，思廉谏曰：“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固非尧、舜、禹、汤之所为

可能是支气管炎

也。”言甚切至。太宗谕曰：“朕有气疾，热便顿剧，固非情好游赏也。”[卷七十三《姚思廉传》第7页]

不确，比于隋时，大约五分之一。

（贞观）十一年，周又上疏曰：“……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卷七十四《马周传》第10页]

可惜

时校书郎王玄度注《尚书》、《毛诗》，毁孔、郑旧义。上表请废旧注，行己所注者。诏礼部集诸儒详议。玄度口辩，诸博士皆不能诘之。郎中许敬宗请付秘阁，藏其书，河间王孝恭特请与孔、郑并行。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乃条其不合大义，驳奏请罢之。诏竟依仁师议，玄度遂废。[卷七十四《崔仁师传》第15页]

许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礼部侍郎善心子也。……高宗将废皇后王氏而立武昭仪，敬宗特赞成其计。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并直言忤旨，敬宗与李义府潜加诬构，并流死于岭外。……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

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咸亨）三年薨，年八十一。[卷八十二《许敬宗传》第1～4页]

老而不死，年八十一。

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卷八十二《李义府传》第7页]

笑里藏刀李义府

苏定方，冀州武邑人也。……随李靖袭突厥颉利于碛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去贼一里许，忽然雾歇，望见其牙帐，驰掩，杀数十百人。颉利及隋公主狼狈散走，余众俯伏。……从左卫大将军程知节征贺鲁，……定方正歇马，隔一小岭，去知节十许里，望见尘起，率五百骑驰往击之。贼众大溃，追奔二十里，杀千五百馀人，获马二千匹。……又征贺鲁，……定方率回纥及汉兵万余人击之。贼轻定方兵少，四面围之。定方令步卒据原，攒矟外向，亲领汉骑阵于北原。贼先击步军，三冲不入，定方乘势击之，贼遂大溃，追奔三十里，杀人马数万。……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卷八十三《苏定方传》第4～8页]

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举进士，累转司列大夫。……则天临朝，迁太中大夫、鸾台侍郎，

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纳言，封钜鹿男。玄同素与裴炎结交，能保终始，时人呼为耐久朋。[卷八十七《魏玄同传》第6～11页]

魏玄同，裴炎党也。

时学校颓废，刑法滥酷。嗣立上疏谏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是以教洽而化流，行成而不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学而成者也。”[卷八十八《韦嗣立传》第5～6页]

小学七年，大学包括中学在内。

朱敬则字少连，亳州永城人也。……敬则以则天初临朝称制，天下颇多流言异议。至是，既渐宁晏，宜绝告密罗织之徒。上疏曰：“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之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伏愿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

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朱敬则政治

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岂不乐哉！”则天甚善之。……景龙三年五月，卒于家，年七十五。敬则尝采魏晋以来君臣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又以前代文士论废五等者，以秦为失，事未折衷，乃著《五等论》曰：“昔秦废五等，崔寔、仲长统、王朗、曹冏等皆以为秦之失，予窃异之。……而王司徒屡请于当时，曹元首又勤于宗室，皆不知时也。”[卷九十《朱敬则传》第4～9页]

杨再思佞人

再思自历事三主，知政十余年，未尝有所荐达。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必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誉之。然恭慎畏忌，未尝忤物。或谓再思曰：“公名高位重，何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艰难，直者受祸。苟不如此，何以全其身哉！”[卷九十《杨再思传》第10页]

刘幽求能伸

刘幽求，冀州武强人也。圣历年应制举，拜阆中尉。刺史不礼焉，乃弃官而归。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范、敬晖等虽诛张易之兄弟，竟不杀武三思。幽求谓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恐噬脐无及。”桓、敬等不从其言，后果为三思诬构，死于岭外。……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郁怏于散职，兼有怨言。”贬授睦州刺史，削其实封六百户。岁

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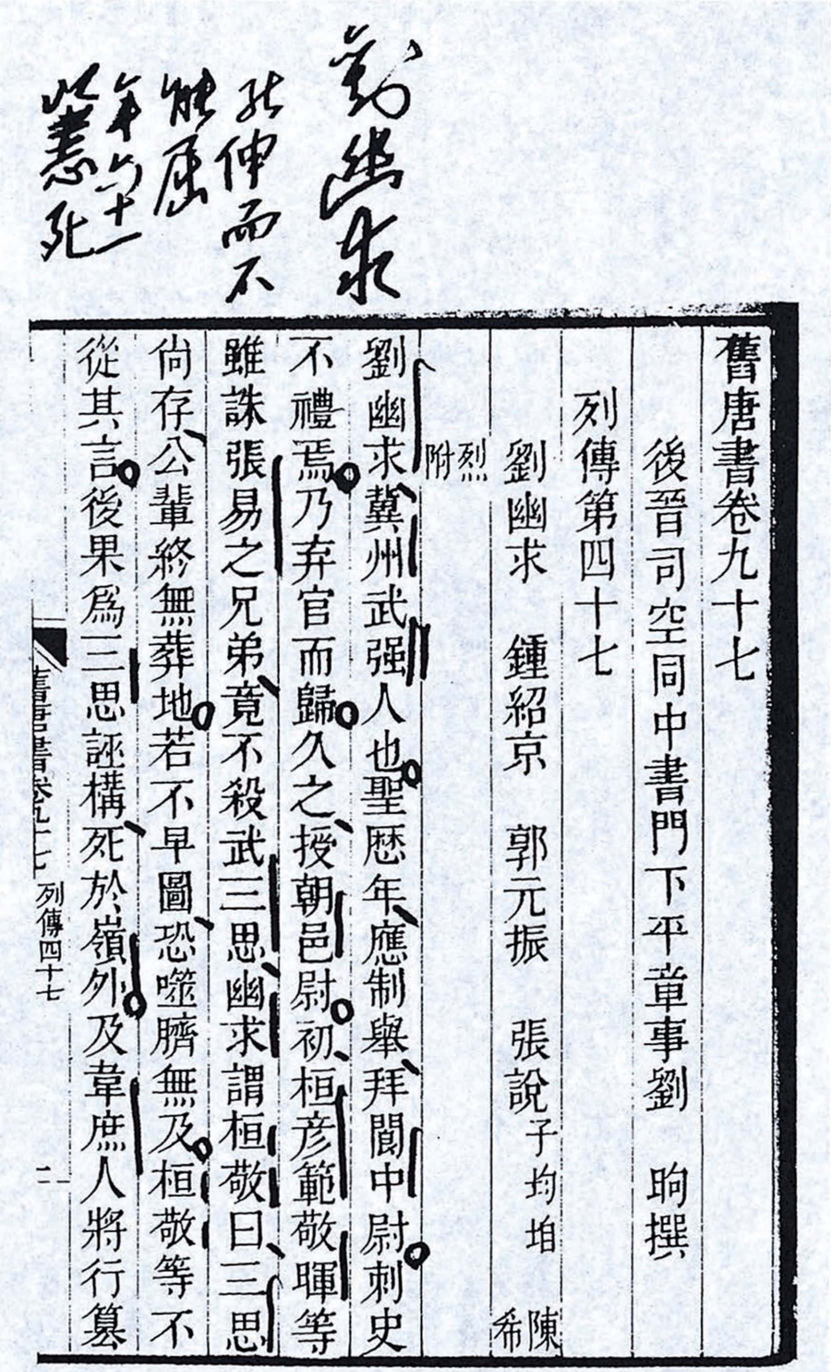
余，稍迁杭州刺史。三年，转桂阳郡刺史，在道愤恚而卒，年六十一。[（卷九十七《刘幽求传》第1～3页]

钟绍京，书法家，年八十余。

钟绍京，虔州赣人也。初为司农录事，以工书直凤阁，则天时明堂门额、九鼎之铭，及诸宫殿门榜，皆绍京所题。……年八十余卒。绍京雅好书画古迹，聚二王及褚遂良书至数十百卷。[卷九十七《钟绍京传》第3～4页]

起特奇

文宗即位，恭俭求礼。太和二年，策试贤良曰：……时对策者百余人。所对，止循常务。唯蕡，切论黄门太横，将危宗社。对曰："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旅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况逢陛下，以至德嗣兴，以大明垂照。询求过阙，咨访谟猷，制诏中外，举直言极谏者，臣既辱斯举，专承大问，敢不悉意以言。……伏惟圣策有思先古之理，念玄默之化，将欲通天人以齐俗，和阴阳以煦物，见陛下慕道之深也。……伏以圣策有求贤箴阙之言，审政辩疵之念，见陛下咨访之勤也。遂小臣屏奸豪之志，则弊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济之心，则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则理



刘幽求
非伸而不
能屈
年六十一
以恚死

舊唐書卷九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四十七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説（子均垍）　陳希烈

附

劉幽求冀州武强人也聖歷年應制舉拜閬中尉刺史不禮焉乃弃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桓彦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桓敬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恐噬臍無及桓敬等不從其言後果爲三思誣搆死於嶺外及韋庶人將行篡

舊唐書卷九十七　列傳四十七　二

毛泽东读《旧唐书》批注的手稿。

古可近。礼乐之方著，而和气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权，严尤所陈，无最上之策。元凯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绩。叔子之所务，不若重华之舞干。且俱非大德之中庸，未为上圣之龟鉴，何足以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系安危之机，兆存亡之变者，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谓哲王之理，其则不远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终始不懈而已。……”［卷一百九十下《刘蕡传》第9～11页，《四部备要·史部》，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英殿本校刊］

以上导语，以下条对。

读《新唐书》批语

李汉，道玄六世孙。

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1]，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淮阳壮王道玄性谨厚，习技击，然进止都雅。……六世孙汉。汉字南纪。少事韩愈，通古学，属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擢进士第，迁累左拾遗。[卷七十八《李汉传》第5～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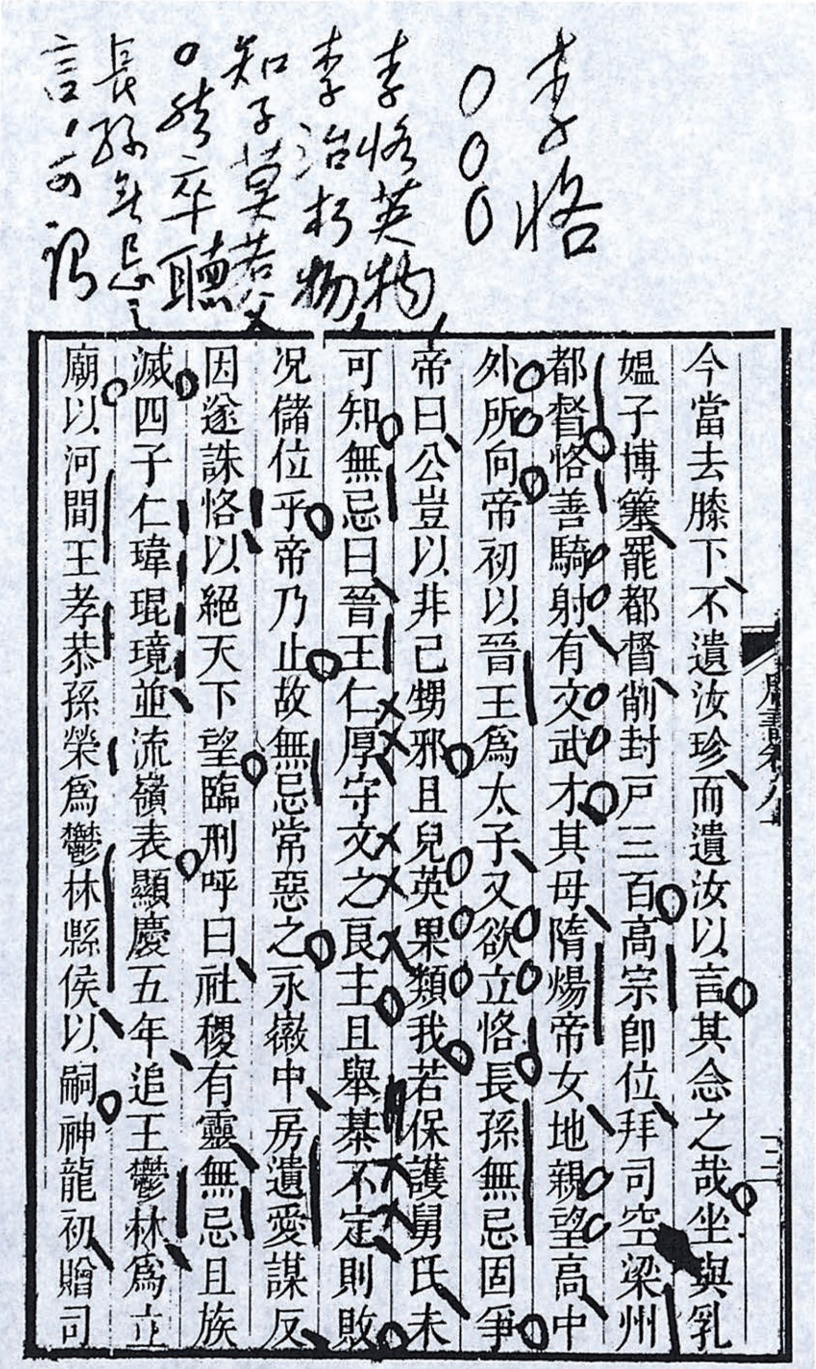
李恪

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郁林王恪始王长沙，俄进封汉。……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卷八十《李恪传》第3页]

---

[1] 李汉《昌黎先生集序》：“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得蜀本韩文于随州李氏。”



李恪
○○○
李恪英物
李治懦物
知子、莫若父
○然卒聽
長孫無忌之
言，何也

今當去滕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坐與乳媪子博簺罷都督削封戶三百高宗即位拜司空梁州都督恪善騎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煬帝女地親望高中外所向帝初以晉王爲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邪且兒英果類我若保護舅氏未可知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舉棊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故無忌常惡之永徽中房遺愛謀反因遂誅恪以絕天下望臨刑呼曰社稷有靈無忌且族滅四子仁瑋琨璄並流嶺表顯慶五年追王鬱林爲立廟以河間王孝恭孫榮爲鬱林縣侯以嗣神龍初贈司

毛泽东读《新唐书》批注的手稿。

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少孤，家窭狭。嗜学，善《诗》、《春秋》。资旷迈，乡人以无细谨薄之。武德中，补州助教，不治事。刺史达奚恕数咎让。周乃去，客密州。赵仁本高其才，厚以装，使入关。留客汴，为浚仪令崔贤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丰逆旅，主人不之顾。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独酣，众异之。……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卷九十八《马周传》第8～14页]

饮酒过量，使不永年。

周上疏曰："……臣伏见诏宗室功臣，悉就藩国，遂贻子孙，世守其政。窃惟陛下之意，诚爱之重之，欲其裔绪承守，与国无疆也。臣谓必如诏书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贵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尧、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袭封嗣职，兆庶被殃，国家蒙患。正欲绝之，则子文之治犹在也；正欲存之，则栾黡之恶已暴矣。必曰与其毒害于见存之人，宁割恩于已亡之臣，则向所谓爱之重之者，适所以伤之也。"……又言："臣历观夏、商、周、汉之有天下，传祚相继，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岂无僻王，赖先哲以免。自魏、晋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仁化，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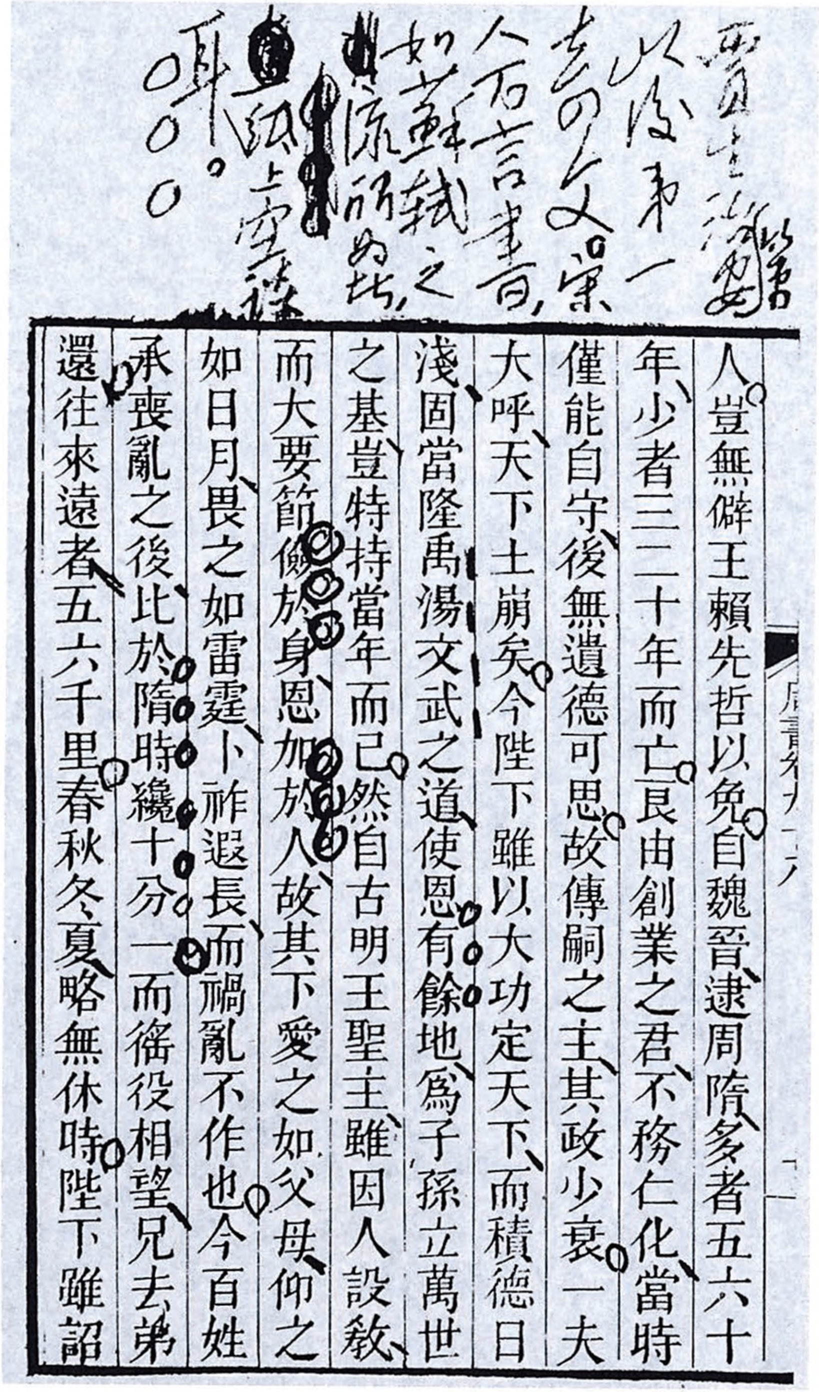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

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隆禹、汤、文、武之道，使恩有余地，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岂特持当年而已。然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今百姓承丧乱之后，比于隋时，才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还，往来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四五年来，百姓颇嗟怨，以为陛下不存养之。……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圣虑之所当忧也。臣窃寻自古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悔，未有重能安全者。……”疏奏，帝称善。[卷九十八《马周传》第8～13页]

赞曰：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卷九十八《马周传》第15页]

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皆纸上空谈耳。

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

毛泽东读《新唐书》批注的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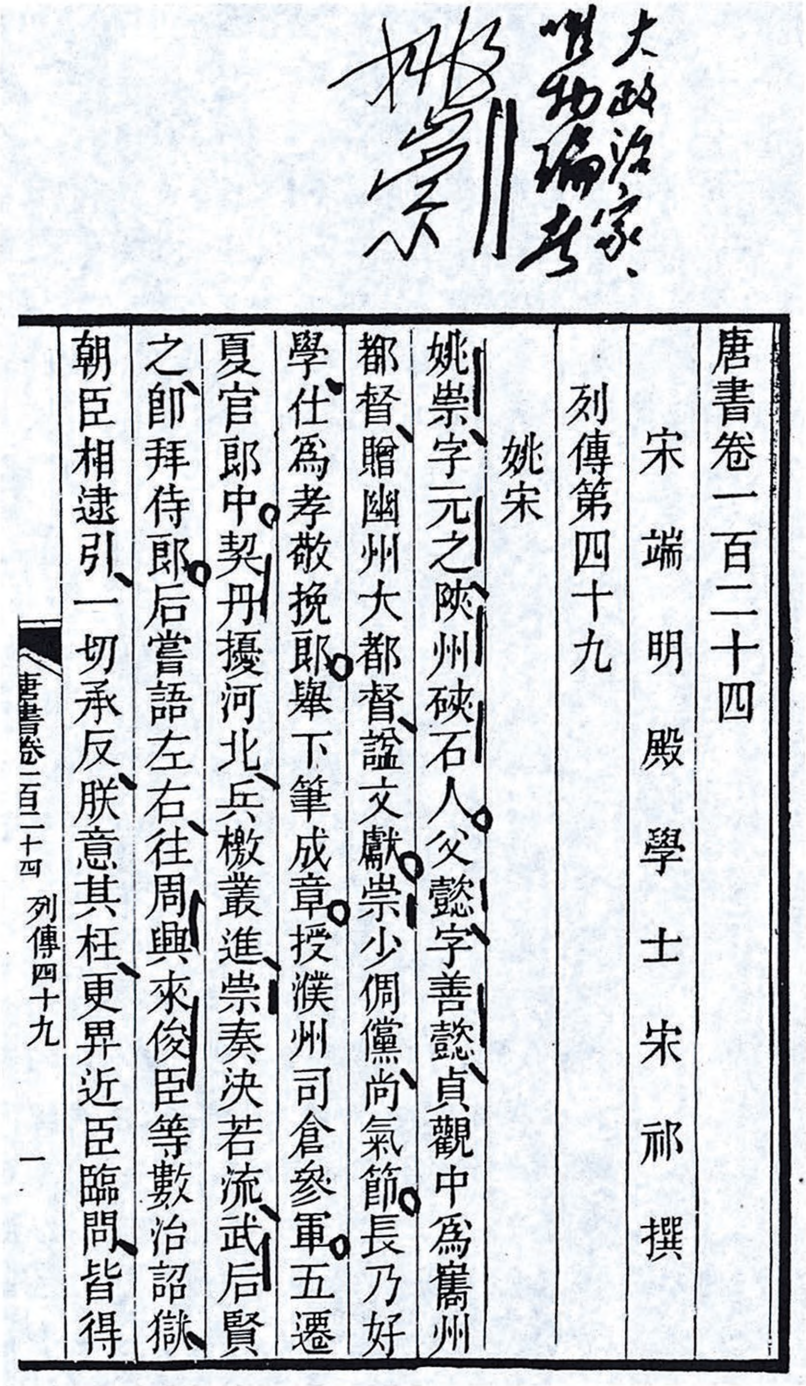
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为人诬构，有功争不能得。秋官侍郎周兴劾之曰：“汉法，附下罔上者斩，面欺者亦斩；在古，析言破律者杀。有功故出反囚，罪当诛，请按之。”（武）后不许。犹坐免官。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卷一百十三《徐有功传》第7页]

“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姚崇

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崇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仕为孝敬挽郎，举下笔成章。……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密召崇。崇至，……帝曰：“卿宜遂相朕。”……崇因跪奏：“臣愿以十事闻，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辞。”帝曰：“试为朕言之。”崇曰：“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来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宠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姚崇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四十九

姚宋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嶲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謚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敬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奏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

唐書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四十九　一

毛泽东读《新唐书》批注的手稿。

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巨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莽、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顿首谢。……

中宗时，近戚奏度僧尼，温户强丁，因避赋役，至是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苍生安稳，是谓佛理，乌用奸人以汩真教？”帝善之，诏天下汰僧伪滥，发而农者余万二千人。……开元四年，山东大蝗。民祭且拜，坐视食苗不敢捕。崇奏：“《诗》云：‘秉彼蟊贼，付畀炎火。’……”乃出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自坏。……帝以问崇。对曰：“臣闻隋取苻坚故殿以营庙，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况木积年而木自当蠹乎？但坏与行会，不缘行而坏。且陛下以关中无年，输饷告劳，因以幸东都，所以为人不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既具，请车驾如行期。旧庙难复完，盍奉神主，舍太极殿，更作新庙，申诚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1～6页]

韩愈《佛骨表》祖此

“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邪？缘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6～7页]

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赞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已。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呜呼！崇劝天子不求边功，璟不肯赏边臣，而天宝之乱卒蹈其害，可谓先见矣。[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第14～15页]

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

张说字道济，或字说之。其先自范阳徙河南，更为洛阳人。永昌中，武后策贤良方正，诏吏部尚书李景谌糊名较复，说所对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书郎。迁左补缺。……太平公主引

萧至忠、崔湜等为宰相，以说不附己，授尚书左丞，罢政事，为东都留守。说知太平等怀逆，乃因使以佩刀献玄宗，请先决策。帝纳之。至忠等已诛，召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朔方军大使王晙诛河曲降虏阿布思也，九姓同罗、拔野固等皆疑惧。说持节从轻骑二十，直诣其部，宿帐下，召见酋豪，慰安之。副使李宪以虏难信，不宜涉不测。说报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马，不畏其刺。士当见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晙后讨兰池叛胡康待宾，诏说相闻经略。时党项羌亦连兵攻银城。说将步骑万人，出合河关掩击，破之，追北骆驼堰。羌胡自相猜，夜斗，待宾遁入铁建山，余众奔溃。说招纳党项，使复故处。副使史献请尽诛之，说不从，奏置麟州以安羌众。……时庆州方渠降胡康愿子反，自为可汗，掠牧马，西涉河出塞。说进讨，至木槃山禽之，俘获三千。……时卫兵贫弱，番休者亡命略尽，说建请一切募勇强士，优其科条，简色役。不旬日，得胜兵十三万，分补诸卫，以强京师，后所谓彍骑者也。[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第8～12页]

玄宗能容韩休

……休峭鲠，时政所得失，言之未尝不尽。帝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差，必视左右曰："韩休知否？"已而疏辄至。尝引鉴，默不乐。左

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瘠，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讦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用休，社稷计耳。”[卷一百二十六《韩休传》第21页]

此篇写得不错

湖南观察使李巽故与参隙，以状闻，又中人为之验左。帝大怒，以为外交戎臣，欲杀参。（陆）贽虽怨，然亦以杀之太重，乃贬驩州司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没入赀产奴婢。帝又欲杀申、则之及属人荣，贽固争：“法有首从，首原则从减。荣与参虽善，然初无邪僻，数激愤有直言，晚颇疏忌，请贬荣远官，申、则之除名流岭南。”诏可。时宦侍谤沮不已，参竟赐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杀申，免荣死，诸窦并逐云。[卷一百四十五《窦参传》第21页]

这一篇写得好

吴通玄者，海州人，与弟通微皆博学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诏授太子诸王经。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德宗立，弟兄踵召为翰林学士。顷之，通微迁职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并知制诰。凡帝有撰述，非通玄笔未尝慊。与陆贽、吉中孚、韦执谊并位。……贽

与窦参交恶，参从子申从舅嗣虢王则之方为金吾将军，故申介之，使结通玄兄弟，共危贽。而通玄以宗室女为外妇，帝知，未及责。则之飞谤云：“贽试进士，受贿谢。”帝恶诬构，大怒，罢参宰相，逐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又衔淫汙近属事，自诘之，不敢答，赐死长城驿。贽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于门，帝宥之。内惧祸，不敢行丧服。[卷一百四十五《吴通玄传》第21～22页]

多藏厚亡

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财，广第舍田产。殁数年，子孙骄纵，赀产皆尽。世言多藏者以叔明为鉴云。[卷一百四十七《李叔明传》第10页]

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

咸通中，南诏复盗边。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不许。即擅斧库，劫战械，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长，勒众上道。……次潭州。监军诡夺其兵。勋畏必诛，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收银刀亡卒，艚匿之。及徐城……遂入徐州。……又徇下邳、涟水、宿迁、临淮、蕲、虹诸县，皆下。遣伪将屯柳子、屯丰、屯滕、屯沛、屯萧，以张其军，乃露章求节度使。……勋以张玄稔守宿州，张儒、刘景助之，自称统军，列壁相望。……承训攻贼，十遇皆

内部分裂，因而败亡。

胜。遣辩士以威动玄稔。玄稔，贼重将也，以帛书射城外，约诛勋自归，使张皋献期。俄与二将会柳溪，伏士于旁。玄稔驰骑呼曰：“庞勋首已枭仆射寨矣。”伏兴，斩刘景、张儒。玄稔率诸将肉袒见承训，自陈陷贼，不早奋，久暴王师，愿禽贼赎死。承训许之。[卷一百四十八《康承训传》第9～14页]

田弘正，好将军。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学，不乐军旅，与承嗣为从昆弟。……弘正幼通兵法，善骑射，承嗣爱之，以为必兴吾宗，名之曰兴。季安时，为衙内兵马使、同节度副使，封沂国公。……季安死，子怀谏袭节度，召还旧职。怀谏委政于家奴蒋士则，措置不平。众怒，咸曰：“兵马使吾帅也。”牙兵即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纳，众哗于门，弘正出，众拜之，胁还府。弘正顿于地，度不免，即令于军曰：“尔属不以吾不肖，使主军。今与公等约，能听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举六州版籍请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请吾旂节者死，杀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诺。”遂到府，杀士则及支党十余人。于是图魏、博、相、卫、贝、澶之地，籍其人以献，不敢署僚属，而待王官。[卷一百四十八《田弘正传》第16～17页]

青年将军王承元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谋。年十六，劝承宗亟引兵共讨李师道。承宗少之，不用，然军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发丧，大将谋取帅它姓。参谋崔燧与诸校计，以祖母凉国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诸将牢请，承元曰：“上使中贵人监军，盍先请?”监军至，又如命，乃谢曰：“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从我乎?”众曰：“惟所命。”……徙承元鄜坊丹延节度，俄徙凤翔。凤翔右袤泾、原，地平少岩险。吐蕃数入盗。承元据胜地为障，置守兵千，诏号临汧城。府郛左百贯州聚，异时为虏剽夺，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缭之，人乃告安。[卷一百四十八《王承元传》第22～23页]

国营商业

赞曰：生人之本，食与货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权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虽挐兵数十年，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偾而振，晏有劳焉，可谓知取予矣。其经晏辟署者，皆用材显。循其法，亦能富国云。[卷一百四十九《刘晏传》第14页]

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

靴，刜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毡得不死。……议者欲罢度，安二镇反侧。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罢之，是贼计适行。吾倚度，足破三贼矣。”度亦以权纪未张，王室陵迟，常愤愧无死所。自行营归，知贼曲折，帝益信杖。[卷一百七十三《裴度传》第1～2页]

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宝乱，客鄱阳。大历初，数举进士不入第。元载取纶文以进，补阌乡尉。累迁监察御史，辄称疾去。坐与王缙善，久不调。浑瑊镇河中，辟元帅判官，累迁检校户部郎中。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中孚，鄱阳人，官户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阳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终中书舍人。起，吴兴人。天宝中举进士，与郎士元齐名。时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终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广平人。从韦皋于剑南，终虞部郎中。发，晋卿子，终都官员外郎。峒终右补缺。湋右拾遗。审侍御史。端，赵州人。……终杭州司马。[卷二百〇三《卢纶传》第9～

大历十子

十子中只钱起为进士

10 页]

脑溢血，或心肌梗塞，或毒癌，终绝。

王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沉，难对。医家告术穷。胤宗曰：“饵液不可进。”即以黄耆、防风煮汤数十斛，置床下，气如雾，熏薄之。是夕语。[卷二百〇四《许胤宗传》第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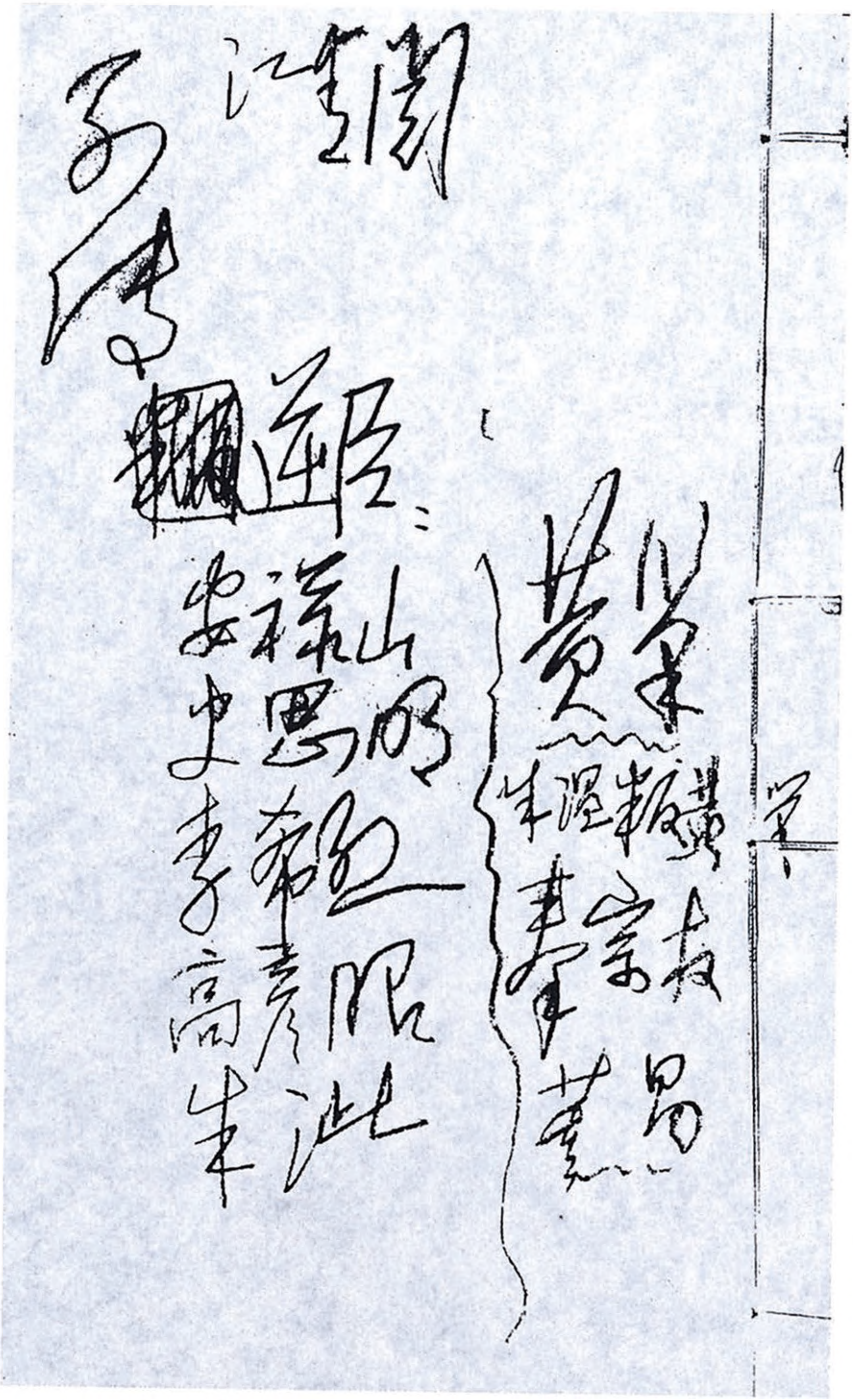
列传

逆臣：安禄山　史思明　李希烈　高彦昭　朱泚　黄巢　朱温叛黄巢　秦宗权　董昌

江青阅[1]。

---

[1] 这个批语写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的封面上。



江[illegible]阁

子[illegible]

~~[illegible]~~逆臣：

安禄山

史思明

李希烈

高彦[illegible]

朱泚

黄巢

朱温叛黄

秦宗权

董昌

毛泽东在《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封面上的批语。

读《旧五代史》批语

才数百人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讳晃，本名温，宋州砀山人。……（广明）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令候收复京阙，即得赴镇。四月，（黄）巢军自蓝关南走，帝与诸侯之师俱收长安。乃率部下一旅之众，仗节东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时帝年三十有二。[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1～2页]

唐宗失计平蔡州[1]

龙纪元年……二月，蔡将申丛遣使来告，缚秦宗权于帐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丛为淮西留后。未几，丛复为都将郭璠所杀。是月，璠执宗权来献，帝遣行军司马李璠、牙校朱克让槛送于长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楼受俘，即斩宗权于独柳树下。蔡州平。……三月，又加帝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进封东平王，赏平蔡之功也。[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8～9页]

---

[1] 蔡州本属唐朝，平蔡后，落入朱温手中，朱温又因此加封，参与朝政。

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

（大顺）二年春正月，魏军屯于内黄。丙辰，帝与之接战，自内黄至永定桥，魏军五败，斩首万余级。罗弘信惧，遣使持厚币请和。帝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弘信由是感悦而听命焉。乃收军屯于河上。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饶，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败之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10页]

万骑不实

又是万骑

（乾宁）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帅师复伐兖，遂堑而围之。……二月己酉，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以为友恭之援。四月，濠、寿二州复为杨行密所陷。是时，太原遣将史俨儿、李承嗣以万骑驰入于郓。朱友恭遂归于汴。……三年正月，河东李克用既破汾州，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莘县，声言欲救兖、郓。[卷一《梁书·太祖本纪》一第11～13页]

以为任子

魏博罗绍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勋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为郎。恩命既行之后，二子亦就班列。绍威

乃上章，以齿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从之。[卷三《梁书·太祖本纪》三第9页]

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瘗于寝殿，秘不发丧。遣供奉官丁昭溥驰诣东都，命均王友贞杀友文。己卯，矫诏称："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中，赖郢王友珪忠孝，将兵诛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韩勍为友珪谋，多出府库金帛，赐诸军及百官以取悦。辛巳，丁昭溥还，闻友文已死，乃发丧，宣遗制，友珪即皇帝位。友珪葬太祖于伊阙县，号宣陵。[卷七《梁书·太祖本纪》七第5～6页]

不书死而书葬，盖阙文也。

光启元年，蔡贼秦宗权遣将孙儒来攻。罕之对垒数月，以兵少备竭，委城而遁，西保于渑池。蔡贼据京城月余，焚烧宫阙，剽剥居民。贼既退去，鞠为灰烬，寂无鸡犬之音。罕之复引其众，筑垒于市西。明年冬，诸葛爽死，其将刘经，推爽子仲方为帅。经惧罕之难制，自引兵镇洛阳。[卷十五《梁书·李罕之传》第4页]

此等作法项羽有之[1]

雷满，武陵洞蛮也。……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筵于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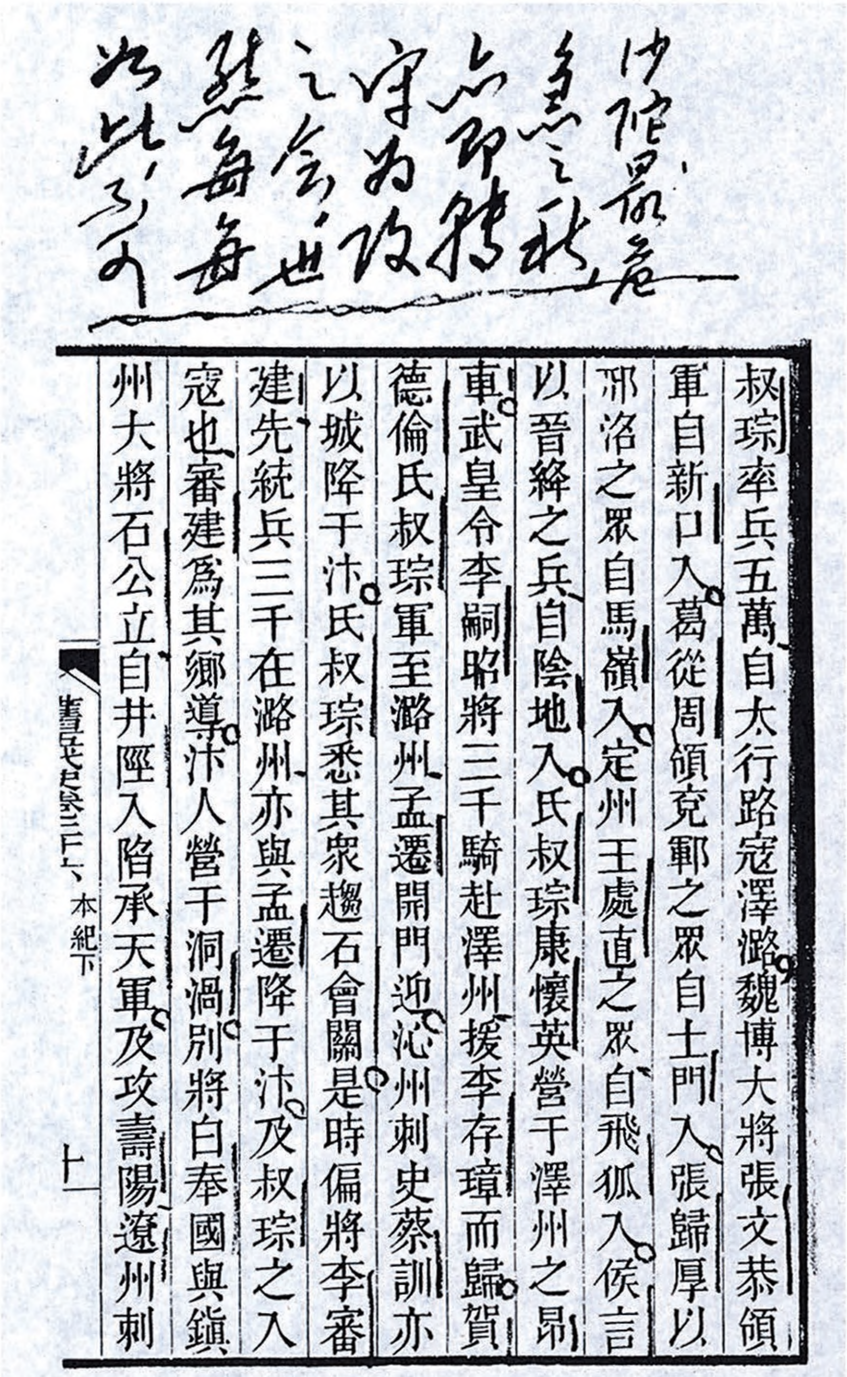
[1] 《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

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客，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裭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底，遍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坐，其诡诞如此。[卷十七《梁书·雷满传》第8页]

此人习水是好事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世态每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天复元年）四月，汴将氏叔琮率兵五万，自太行路寇泽、潞，魏博大将张文恭领军自新口入，葛从周领兖、郓之众自土门入，张归厚以邢、洺之众自马岭入，定州王处直之众自飞狐入，侯言以晋、绛之兵自阴地入。氏叔琮、康怀英营于泽州之昂车。武皇令李嗣昭将三千骑赴泽州，援李存璋而归贺德伦。氏叔琮军至潞州，孟迁开门迎，沁州刺史蔡训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众趋石会关。是时，偏将李审建先统兵三千在潞州，亦与孟迁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审建为其向导。汴人营于洞涡，别将白奉国与镇州大将石公立自井陉入，陷承天军。及攻寿阳，辽州刺史张鄂以城降于汴，都人大恐。时霖雨积旬，汴军屯聚既众，刍粮不给，复多痢疟，师人多死。时大将李嗣昭、李嗣源每夜率骁骑突营掩杀，敌众恐惧。五月，汴军皆退。氏叔琮军出石会，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骑五千蹑之，杀戮万计。[卷二十六《唐书·武皇本纪》下第10～11页]



沙陀、最危急之秋，亦即转守为攻之会也，熟每每如此乃尔

叔琮率兵五萬自太行路寇澤潞魏博大將張文恭領軍自新口入葛從周領兗鄆之衆自土門入張歸厚以邢洺之衆自馬嶺入定州王處直之衆自飛狐入侯言以晉絳之兵自陰地入氏叔琮康懷英營于澤州之昂車武皇令李嗣昭將三千騎赴澤州援李存璋而歸賀德倫氏叔琮軍至潞州孟遷開門迎沁州刺史蔡訓亦以城降于汴氏叔琮悉其衆趨石會關是時偏將李審建先統兵三千在潞州亦與孟遷降于汴及叔琮之入寇也審建爲其鄉導汴人營于洞渦別將白奉國與鎮州大將石公立自井陘入陷承天軍及攻壽陽遼州刺

舊五代史卷二十六、本紀下　十一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批注的手稿。

（天祐五年）四月，帝召德威军归晋阳。汴人既见班师，知我国祸，以为潞州必取，援军无俟再举，遂停斥候。梁祖亦自泽州归洛。帝知其无备，乃谓将佐曰：“汴人闻我有丧，必谓不能兴师。又以我少年嗣位，未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若简练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愤激之众，击彼骄惰之师，拉朽摧枯，未云其易，解围定霸，在此一役。”[卷二十七《唐书·庄宗本纪》一第4～5页]

先退后进

天祐十五年……十二月……癸亥，次胡柳陂。迟明，梁军亦至。帝率亲军出视，诸军从之。梁军已成阵，横亘数十里，帝亦以横阵抗之。时帝与李存审总河东、魏博之众居其中，周德威以幽、蓟之师当其西，镇、定之师当其东。梁将贺瑰、王彦章全军接战。……帝军辎重在阵西，望见梁军旗帜皆惊走，因自相蹈籍，不能禁止。帝一军先败，周德威战殁。是时，陂中有土山，梁军数万先据之，帝帅中军至山下。梁军严整不动，旗帜甚盛。帝呼诸军曰：“今日之战，得山者胜，贼已据山，吾与尔等各驰一骑以夺之！”帝率军先登，银枪步兵继进，遂夺其山。梁军纷纭而下，复于土山西结阵数里。……于是李嗣昭领骑军自土山北以逼梁军，王建及呼士众

胡柳陂正面突破不成，乃从

东向南打大迂回，乘虚而入，卒以成功。

曰："今日所失辎重，并在山下。"乃大呼以奋击，诸军继之，梁军大败。[卷二十八《唐书·庄宗本纪》二第12～13页]

此种诏书好笑，冤论李琪。

天成末，明宗自汴州还洛，琪为东都留司官班首，奏请至偃师奉迎。时琪奏中有"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之言，诏曰："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李琪罚一月俸。"[卷五十八《唐书·李琪传》第10页]

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谓朱邪
用石勒事
狂药谓酒

其年十二月，师还太原，王珂为浮梁于夏阳渡，袭吉从军。时笮断航破，武皇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天复中，武皇议欲修好于梁，命袭吉为书以贻梁祖，书曰："……比者，仆与公实联宗姓，原忝恩知，投分深情，将期栖托，论交马上，荐美朝端，倾向仁贤，未省疏阙。岂谓运由奇特，谤起奸邪。毒手尊拳，交相于幕夜；金戈铁马，蹂践于明时。狂药致其失欢，陈事止于堪笑。……"[卷六十《唐书·李袭吉传》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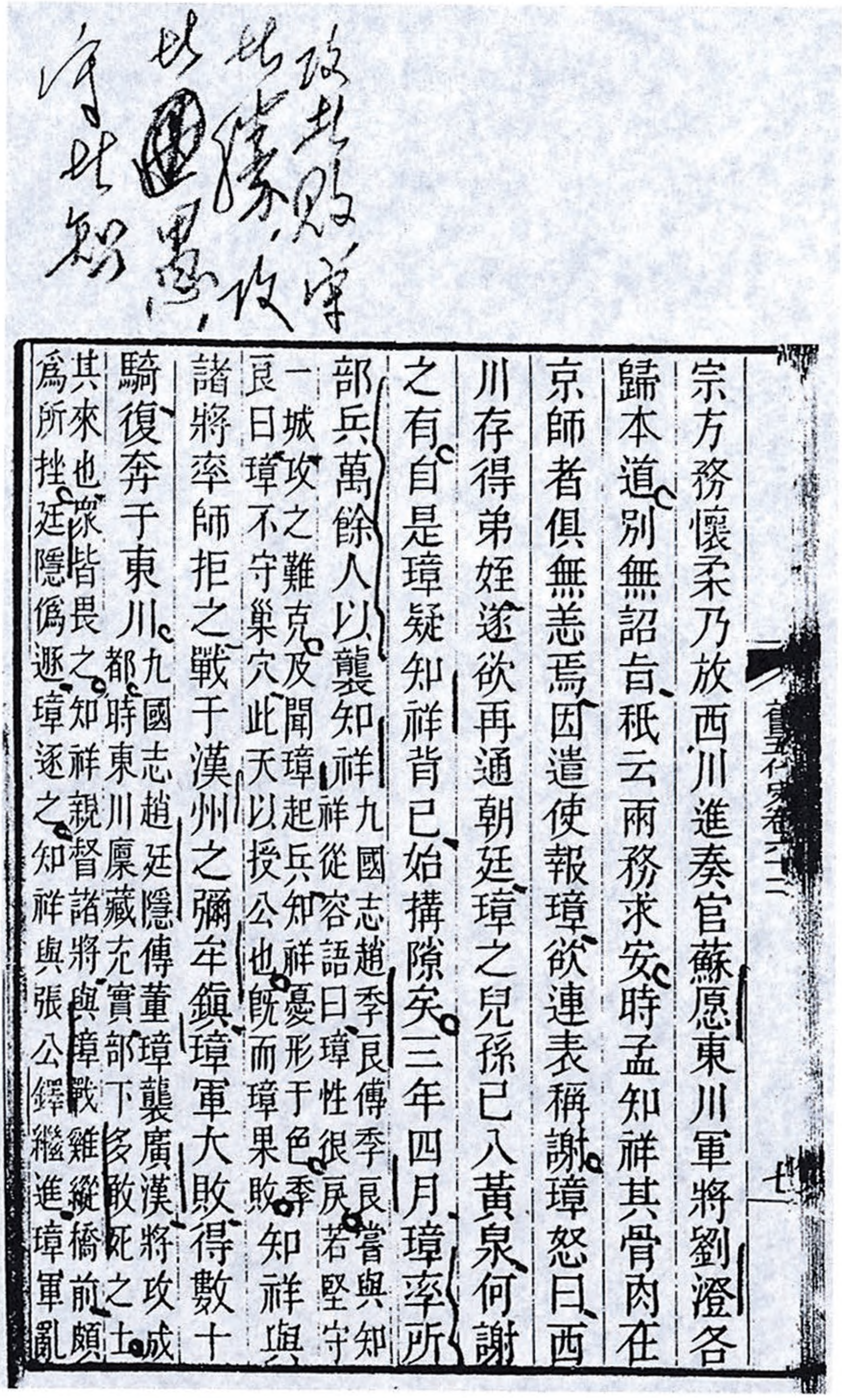
先是，璋欲谋叛，先遣使持厚币于孟知祥，求为婚家。……时知祥亦贰于朝廷，因许以为援。……其年秋，诏削夺璋在身官爵，……璋之子宫苑使光业并其族，并斩于洛阳。……时孟知

祥其骨肉在京师者俱无恙焉。因遣使报璋，欲连表称谢。……自是璋疑知祥背己，始构隙矣。（长兴）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万余人以袭知祥。《九国志·赵季良传》："季良尝与知祥从容语曰：'璋性狼戾，若坚守一城，攻之难克。'及闻璋起兵，知祥忧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既而璋果败。"知祥与诸将率师拒之，战于汉州之弥牟镇。璋军大败，得数十骑，复奔于东川。[卷六十二《唐书·董璋传》第7～8页]

攻者败，守者胜，攻者愚，守者智。

契丹寇洺、磁，犯邺都西北界，所在告急。壬子，王师与契丹相拒于相州北安阳河上。皇甫遇、慕容彦超率前锋与敌骑战于榆林店，遇马中流矢，仅而获免。是夜，张从恩引军退保黎阳，唯留五百人守安阳河桥。既而知州符彦伦与军校谋曰："此夜纷纭，人无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桥！"即抽入相州，婴城为备。至曙，贼军万余骑已阵于安阳河北，彦伦令城上扬旗鼓噪，贼不之测。至辰时，渡河而南，悉陈甲骑于城下，如攻城之状。彦伦曰："此敌将走矣。"乃出甲士五百于城北，张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当皇甫遇榆林战时，至晚，敌众自相惊曰："晋军悉至矣。"戎王在邯郸闻之，即时北遁，官军亦南保黎阳。[卷八十三《晋书·少帝本纪》三第7～8页]

事有如此之怪



攻其败，守其懈，攻其虚，守其知

舊五代史卷一三六　七

宗方務懷柔乃放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歸本道別無詔旨秪云兩務求安時孟知祥其骨肉在京師者俱無恙焉因遣使報璋欲連表稱謝璋怒曰西川存得弟姪遂欲再通朝廷璋之兒孫已入黃泉何謝之有自是璋疑知祥背已始搆隙矣三年四月璋率所部兵萬餘人以襲知祥（九國志趙季良傳季良嘗與知祥從容語曰璋性很戾若堅守一城攻之難克及聞璋起兵知祥憂形于色季良曰璋不守巢穴此天以授公也旣而璋果敗）知祥與諸將率師拒之戰于漢州之彌牟鎮璋軍大敗得數十騎復奔于東川（九國志趙廷隱傳董璋襲廣漢將攻成都時東川廪藏充實部下多敢死之士其來也衆皆畏之知祥親督諸將與璋戰雜縱橋前頗爲所挫廷隱僞遯璋逐之知祥與張公鐸繼進璋軍亂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批注的手稿。

桑维翰，字国侨，洛阳人也。……性明惠，善词赋。唐同光中，登进士第。《洛阳缙绅旧闻记》：“桑魏公父珙为河南府客将。桑魏公将应举，父乘间告齐王张全义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齐王曰：‘有男应举好，可令秀才将卷轴来。’魏公之父趋下再拜，既归，令子侵早投书启，献文字数轴。王请见，魏公父教之趋阶。王曰：‘不可，既应举，便是贡士，可归客司。’谓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终以客礼见。王一见奇之，礼遇颇厚。是年，王力言于当时儒臣，由是擢上第。”[卷八十九《晋书·桑维翰传》第1页]

如不力言，则下第举子耳。

……庄宗率精兵骑蹑其后，每经安巴坚野宿之所，布秸在地，方而环之，虽去，无一茎乱者。庄宗谓左右曰：“蕃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庄宗至幽州，发二百骑侦之，皆为契丹所获。庄宗乃还。[卷一百三十七《外国列传》第一第4页]

太少

读《新五代史》批语

后汉李固之言[1]

鸣呼，自古治世少而乱世多！三代之王有天下者，皆数百年，其可道者，数君而已，况于后世邪！况于五代邪！[卷六《唐明宗本纪》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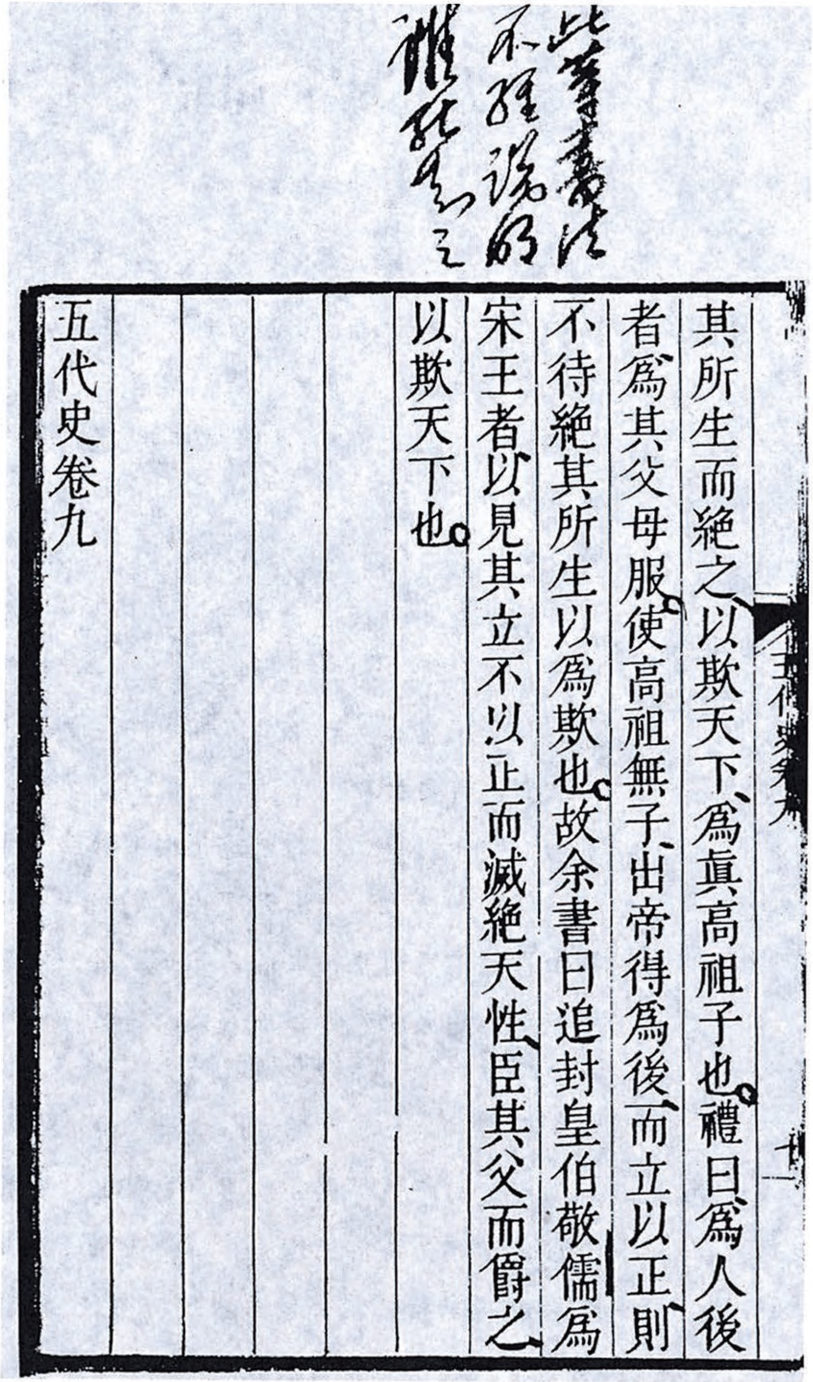
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敬儒，出帝父也，书曰“皇伯”者，何哉？出帝立不以正，而绝其所生也。……方高祖疾病，抱其子重睿，置于冯道怀中而托之，出帝岂得立邪？晋之大臣，既违礼废命而立之，以谓出帝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为真高祖子也。……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立不以正，而灭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卷九《晋出帝本纪》第7页]

隐帝与李业等谋，已杀史弘肇等，诏镇宁军节度使李弘义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于澶州，又诏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杀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

---

[1] 《后汉书·黄琼传》（李固与黄琼书）：“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



此等議論不理說的借題發揮之

其所生而絶之以欺天下爲眞高祖子也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絶其所生以爲欺也故余書曰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以見其立不以正而滅絶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

五代史卷九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批注的手稿。

旧史无此

诏书先至澶州，弘义恐事不果，反以诏书示殷，殷与弘义遣人告威。已而诏杀威、峻使者亦驰骑至。威匿诏书，召枢密使院吏魏仁浦谋于卧内。仁浦劝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诏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第3页]

所谓允明反弑，明是诬词。[1]

（乾祐三年）十一月……庚辰，威至滑州，义成军节度使宋延渥叛于汉来降。壬午，犯封丘。甲辰，及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彦超战于刘子陂，彦超败，奔于兖州。郭允明反，弑隐帝于赵村。丙戌，威入京师，纵火大掠。[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第3页]

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是时，庄宗在魏，数以劲兵压鄩营，鄩不肯出，而末帝又数促鄩，使出战。庄宗与诸将谋曰："刘鄩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乃声言归太原，命符存审守魏，阳为西归，而潜兵贝州。鄩果报末帝曰："晋王西归，魏无备，可击。"乃以兵万人攻魏城东。庄宗自贝州返，趋击之。鄩忽见晋军，惊曰："晋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庄宗与符存审为两方阵夹之，鄩为圆阵以

---

[1] 《通鉴·后汉纪》四隐皇帝下《考异》："刘恕曰：'允明，帝所亲信，何由弑逆？益郭威兵杀帝，事成之后讳之，因允明自杀，归罪耳。'"

御。晋人兵再合，鄩大败，南奔，自黎阳济河，保滑州。[卷二十二《刘鄩传》第4～5页]

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彦章至递坊，以兵少战败，退保中都又败，与其牙兵百余骑死战。……彦章伤重，马踣，被擒。……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于忠义，盖天性也。庄宗爱其骁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谕彦章。彦章谢曰：“臣与陛下血战十余年，今兵败力穷，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报，岂有朝事梁而暮事晋，生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庄宗又遣明宗往谕之，彦章病创，卧不能起，仰顾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 我岂苟活者?”遂见杀，年六十一。晋高祖时，追赠彦章太师。[卷三十二《王彦章传》第3～4页]

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仁赡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杨行密，为濠、滁二州刺史，以骁勇知名。仁赡为将，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事南唐，为左监门卫将军、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称治。[卷三十二《刘仁赡传》第4页]

食谁人之禄?

呜呼，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卷三十二《死

节传》第6页]

何谓伪国？[1]

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卷三十二《死节传》第6页]

“色而已”吗？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卷三十八《宦者传》第4页]

此人能泳

雷满，武陵人也。为人凶悍狝勇，文身断发。……满尝凿深池于府中，客有过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龙水怪，皆窟于此，盖水府也。”酒酣，取坐上器掷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复坐，意气自若。[卷四十一《雷满传》第2～3页]

此人必略知水性

华温琪字德润，宋州下邑人也。世本农家。温琪身长七尺，少从黄巢为盗。巢陷长安，以温琪为供奉官都知。巢败，温琪走滑州。顾其状貌魁伟，惧不自容，乃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卷四十七《华温琪传》第1页]

---

[1] 《死节传》以王彦章出身军卒，忠于梁；裴约忠于后唐，刘仁赡忠于南唐，以南唐为伪国。

张桓侯之流[1]

廷蕴武人，所识不过数字，而平生重文士。尝从明宗破梁郓州，获判官赵凤，廷蕴谓曰：“吾视汝貌，必儒人，可无隐也。”凤以实对，廷蕴亟荐于明宗。[卷四十七《张廷蕴传》第10页]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为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从唐明宗征伐，事唐为武胜军节度使。……晋高祖时，历义武、昭义、建雄、河阳四镇，罢为神武统军。……开运二年，契丹寇西山，……南至邢州。……乃遣北面行营都监张从恩会马全节、安审琦及遇等御之。从恩等至相州，阵安阳河南，遣遇与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前视虏。……为虏所围。……张从恩与诸将怪遇视虏无报，皆谓遇已陷虏矣。已而有驰骑报遇被围，安审琦率兵将赴之，从恩疑报者诈，不欲往。审琦曰：“成败天也，当与公共之。虽虏不南来，吾属失皇甫遇，复何面目见天子?”即引骑渡河，诸军皆从而北，距虏十余里。虏望见救兵来，即解去。遇与审琦等收军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时契丹兵已深入，人马俱乏。其还也，诸将不能追，而从恩率遇等退保黎阳，虏因得解去。[卷四十七《皇甫遇传》第12～13页]

晋时事

---

[1] 《三国志·蜀书·张飞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追谥飞曰桓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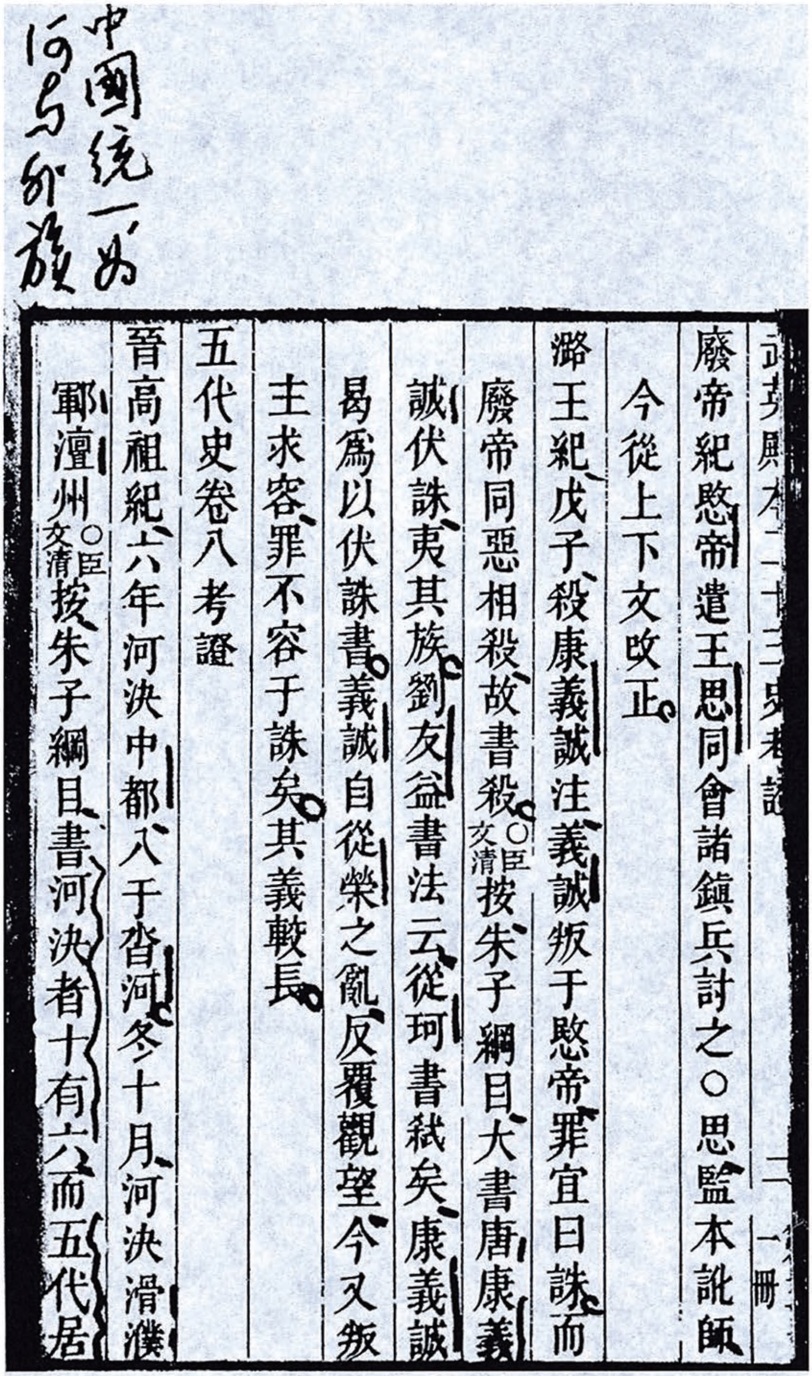
注意此等事

晋亦不复遣使，然数以书招赵延寿。延寿见晋衰而天下乱，尝有意窥中国，而德光亦尝许延寿灭晋而立之。延寿得晋书，伪为好辞报晋，言身陷虏思归，约晋发兵为应。而德光将高牟翰亦诈以瀛州降晋，晋君臣皆喜。（开运）三年七月，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为延寿应。……德光闻晋出兵，乃入寇镇州。重威西屯中渡，与德光夹水而军。德光分兵并西山出晋军后，……重威等被围粮绝，遂举军降。……晋出帝与太后为降表，自陈过咎。[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第13页]

五代史卷八考证

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

《晋高祖纪》："六年，河决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决滑、濮、郓、澶州。"按《朱子纲目》书河决者十有六，而五代居其九，皆朱梁决河为二，以疏河涨之罪也。然《梁本纪》失载，附记于此。[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证第2～3页]



武英殿本二十三史考證　一冊

廢帝紀愍帝遣王思同會諸鎮兵討之○思監本訛師

今從上下文改正

潞王紀戊子殺康義誠注義誠叛于愍帝罪宜曰誅而

廢帝同惡相殺故書殺○臣文清按朱子綱目大書唐康義

誠伏誅夷其族劉友益書法云從珂書弑矣康義誠

曷爲以伏誅書義誠自從榮之亂反覆觀望今又叛

主求容罪不容于誅矣其義較長

五代史卷八考證

晉高祖紀六年河決中都入于沓河冬十月河決滑濮

鄆澶州○臣文清按朱子綱目書河決者十有六而五代居

中国统一好

何与外族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批注的手稿。

读《宋史》批语

说不杀士大夫，伪也。

（乾德四年）五月……甲戌，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八月……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卷二本纪《太祖》二第3页]

不书病，年五十。[1]

（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卷三本纪《太祖》三第11页]

（太平兴国四年）六月……庚申，帝复自将伐契丹。……丁卯，次东易州，刺史刘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契丹军城北，帝率众击走之。壬申，命节度使定国宋偓、河阳崔彦进、彰信刘遇、定武孟玄喆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铁林厢主李札卢存以所部来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诸将进兵，获马三百。幽州神武厅直并乡兵四百人

---

[1] 指宋太祖无病而死，暗指被赵匡义害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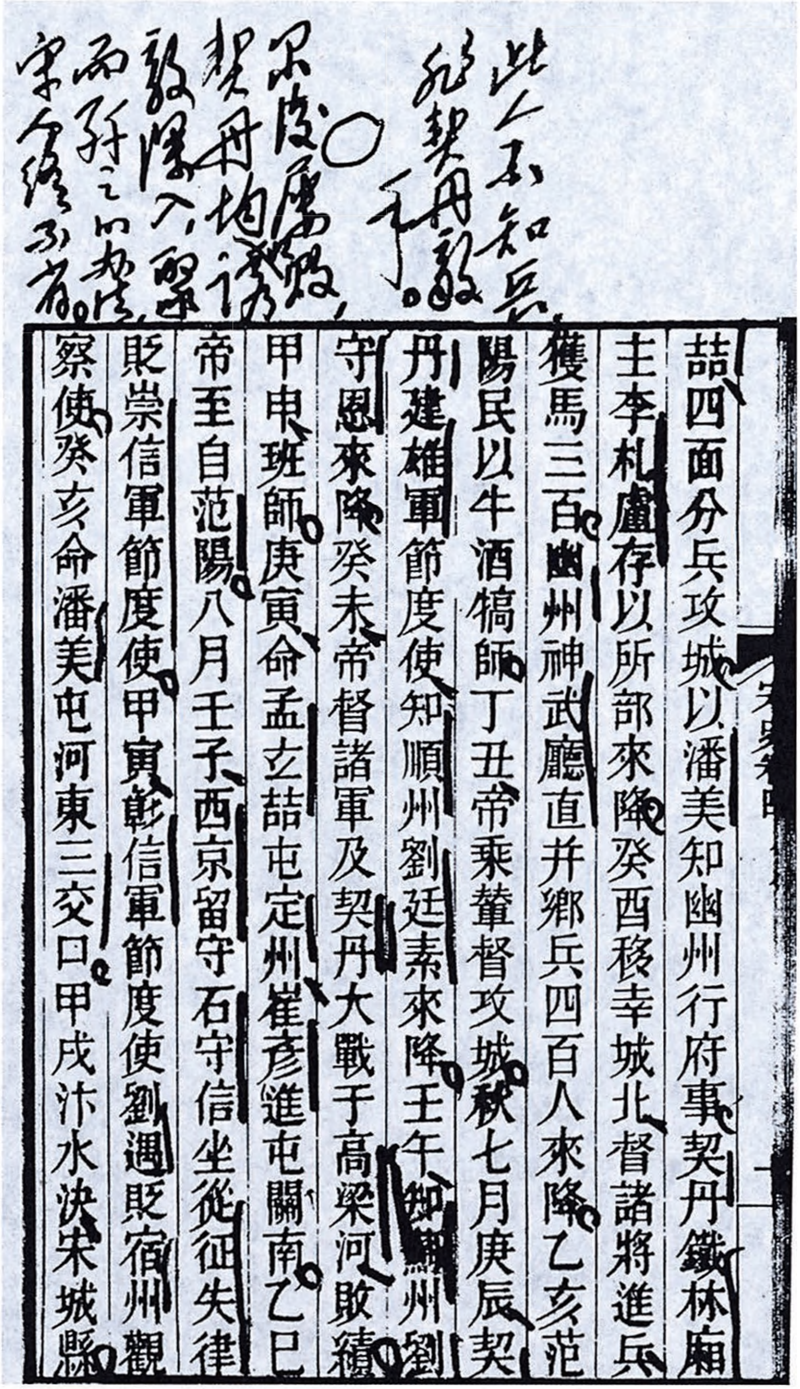
来降。乙亥，范阳民以牛酒犒师。丁丑，帝乘辇督攻城。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来降。壬午，知蓟州刘守恩来降。癸未，帝督诸军及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甲申，班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彦进屯关南。乙巳，帝至自范阳。……五年……十一月……己酉，帝伐契丹。壬子，发京师。癸丑，次长垣县。关南与契丹战，大破之。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戊午，驻跸大名府。诸军及契丹大战于莫州，败绩。[卷四本纪《太宗》一第10～13页]

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北伐。……二月壬子，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出雁门。三月癸酉，曹彬与契丹兵战固安南，克其城。丁丑，田重进战飞狐北，又破之。……辛巳，曹彬克涿州。……夏四月辛丑，潘美克云州。田重进战飞狐北，破其众。壬寅，曹彬、米信战新城东北，又破之。己酉，田重进再战飞狐北，再破之，杀二将。乙卯，重进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许彦钦杀大将萧啜理，执其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以城降。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丙子，召曹彬、崔彦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宋辽屡战，契丹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以势，宋人总不省。

喆四面分兵攻城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鐵林廂主李札盧存以所部來降癸酉移幸城北督諸將進兵獲馬三百幽州神武廳直并鄉兵四百人來降乙亥范陽民以牛酒犒師丁丑帝乘輦督攻城秋七月庚辰契丹建雄軍節度使知順州劉廷素來降壬午薊州劉守恩來降癸未帝督諸軍及契丹大戰于高梁河敗績甲申班師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乙巳帝至自范陽八月壬子西京留守石守信坐從征失律貶崇信軍節度使甲寅彰信軍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察使癸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甲戌汴水決宋城縣

毛泽东读《宋史》批注的手稿。

杨业战死

进、米信归阙，命田重进屯定州，潘美还代州。徙云、应、寰、朔吏民及吐浑部族，分置河东、京西。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十二月……壬寅，契丹败刘廷让军于君子馆，执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死之。[卷五本纪《太宗》二第2～5页]

雍熙三年败于契丹

雍熙……三年……五月庚午，曹彬之师大败于岐沟关，收众夜渡拒马河，退屯易州，知幽州行府事刘保勋死之。……十二月。……壬寅，契丹败刘廷让军于君子馆，执先锋将贺令图，高阳关部署杨重进死之。[卷五本纪《太宗》二第5页]

但无能

赞曰：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既即大位，陈洪进、钱俶相继纳士。未几，取太原，伐契丹，继有交州、西夏之役。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其故何也？帝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恻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

登之效。是以青、齐耆耋之叟，愿率子弟治道请登禅者，接踵而至。君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帝之谓乎？故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号称贤君。若夫太祖之崩不逾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卷五本纪《太宗》二第24～25页]

幽州之败

不择手段，急于登台。[1]

---

[1] 《续资治通鉴》卷八注：“《考异长编》因《湘山野录》存‘烛影斧声’之说。“烛影斧声”，指宋太宗害死宋太祖而即帝位。

读《明史》批语

（至正）二十三年……夏四月壬戌，友谅大举兵围洪都。……秋七月癸酉，太祖自将救洪都。癸未，次湖口，先伏兵泾江口及南湖觜，遏友谅归路，檄信州兵守武阳渡。友谅闻太祖至，解围，逆战于鄱阳湖。友谅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丁亥，遇于康郎山，……杀伤略相当。……己丑，友谅悉巨舰出战，……会日晡，大风起东北。乃命敢死士操七舟，实火药芦苇中，纵火焚友谅舟。风烈火炽，烟焰涨天，湖水尽赤。友谅兵大乱。诸将鼓噪乘之，斩首二千余级，焚溺死者无算，友谅气夺。辛卯，复战，友谅复大败。于是敛舟自守，不敢更战。……八月壬戌，友谅食尽，趋南湖觜，为南湖军所遏，遂突湖口。太祖邀之，顺流搏战，及于泾江。泾江军复遮击之，友谅中流矢死。张定边以其子理奔武昌。[卷一本纪《太祖》一第9～10页]

此役打了两月余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长等

率群臣劝进，不允。固请，乃即吴王位，建百官。以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谕之曰：“立国之初，当先正纪纲。元氏暗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今宜鉴之。”立子标为世子。二月乙未，复自将征武昌，陈理降，汉、沔、荆、岳皆下。[卷一本纪《太祖》一第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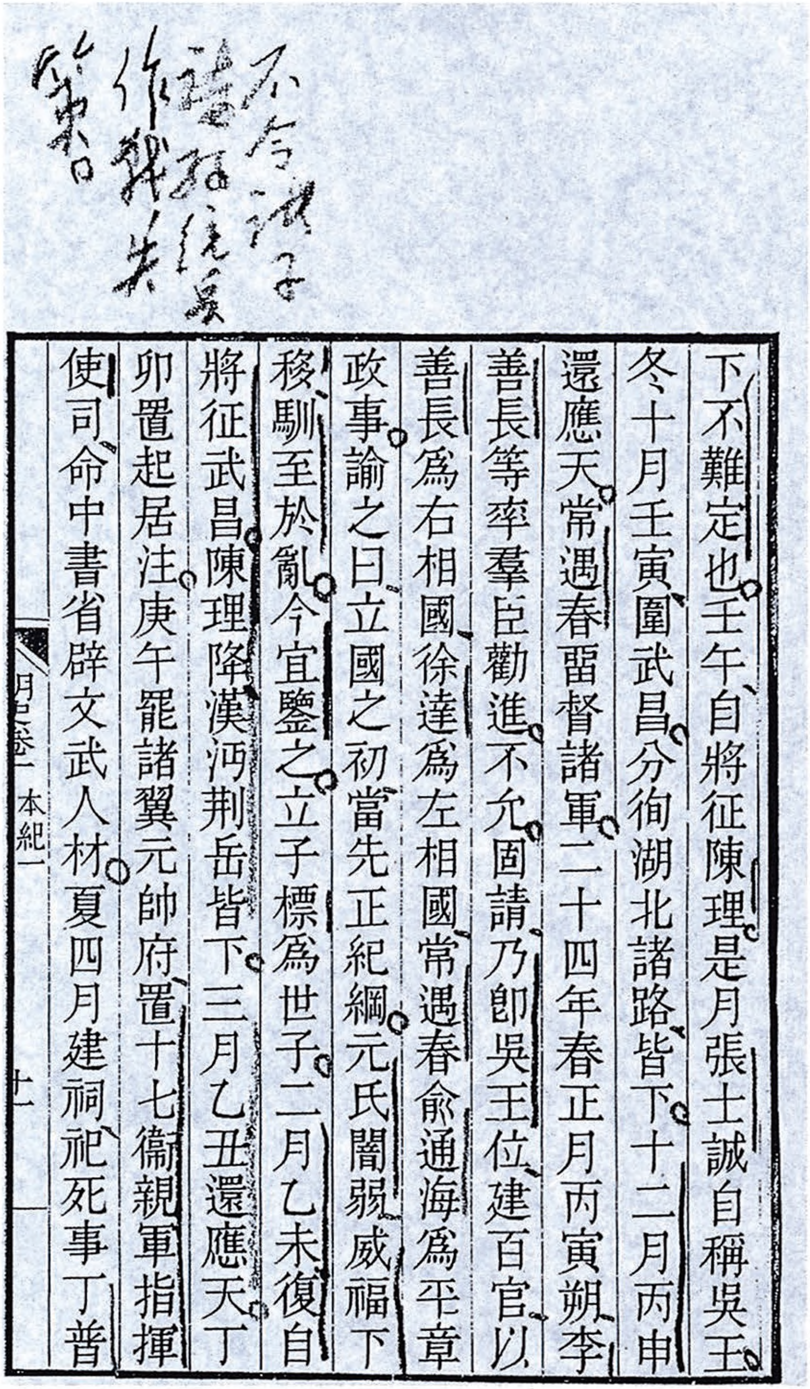
不令诸子诸孙统兵作战，失策。

（宣德）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贺。癸酉，大祀天地于南郊。二月甲午，以春和谕法司录囚。三月庚申，下诏行宽恤之政。辛酉，谕礼部曰：“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卷九本纪《宣宗》第8页]

今犹存此弊

杨爵，字伯珍，富平人。……（嘉靖）二十年元日微雪，大学士夏言、尚书严嵩等作颂称贺。爵抚膺太息，中宵不能寐。逾月，乃上书极谏曰：“……陛下即位之初，励精有为，尝以《敬一箴》颁示天下矣。乃数年以来，朝御希简，经筵旷废。大小臣庶，朝参辞谢，未得一睹圣容，敷陈复逆，未得一聆天语。恐人心日益怠媮，中外日益涣散，非隆古君臣都俞吁咈、协恭

靡不有初



不合读了
这种总要
作战方针
策略

下不難定也壬午自將征陳理是月張士誠自稱吳王冬十月壬寅圍武昌分徇湖北諸路皆下十二月丙申還應天常遇春留督諸軍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等率羣臣勸進不允固請乃即吳王位建百官以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諭之曰立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闇弱威福下移馴至於亂今宜鑒之立子標爲世子二月乙未復自將征武昌陳理降漢沔荆岳皆下三月乙丑還應天丁卯置起居注庚午罷諸翼元帥府置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命中書省辟文武人材夏四月建祠祀死事丁普

明史卷一　本紀一　十一

毛泽东读《明史》批注的手稿。

图治之气象也。”[卷二百〇九《杨爵传》第8～10页]

沈炼，字纯甫，会稽人。……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多嫚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炼是之。吏部尚书夏邦谟曰：“若何官？”炼曰：“锦衣卫经历沈炼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炼愤国无人，致寇猖狂，……遂上疏言：“……今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因并论邦谟谄谀黩货状，请均罢斥，以谢天下。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既至，未有馆舍。贾人某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卷二百〇九《沈炼传》第18～19页]

今有新保安，此是旧保安，在张家口、怀来县之间。

白莲教史

先是，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其徒有大小传头及会主诸号，蔓延畿辅、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森居滦州石佛庄，徒党输金钱，称朝贡，飞竹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万历二十三年，有司捕系森论死，用贿得释。乃入京师，结外戚中官，行教自如。后森徒李国用，别立教，用符咒召鬼。两教相仇，事尽露。四十二年，森复为有司所摄。越五岁，毙于狱。其子好贤及钜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辈踵其教，徒党益众。至是，好贤见辽东尽

失，四方奸民思逞，与鸿儒等约，是年中秋并起兵。会谋泄，鸿儒遂先期反，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胜元年，用红巾为识。五月戊申陷郓城，俄陷邹、滕、峄，众至数万。[卷二百五十七《赵彦传》第5～6页]

不负责任

陈新甲，长寿人。……帝既以和议委新甲，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外廷渐知之，故屡疏争，然不得左验。一日，所遣职方郎马绍愉以密语报，新甲视之，置几上。其家僮误以为塘报也，付之抄传。于是言路哗然。给事中方士亮首论之。帝愠甚，留疏不下。已降严旨，切责新甲，令自陈。新甲不引罪，反自诩其功。帝益怒。至七月，给事中马嘉植复劾之，遂下狱。新甲从狱中上书乞宥，不许。……遂弃新甲于市。新甲为杨嗣昌引用，其才品心术相似。军书旁午，裁答无滞。旁初甚倚之，晚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杀之不疑。[卷二百五十七《陈新甲传》第20～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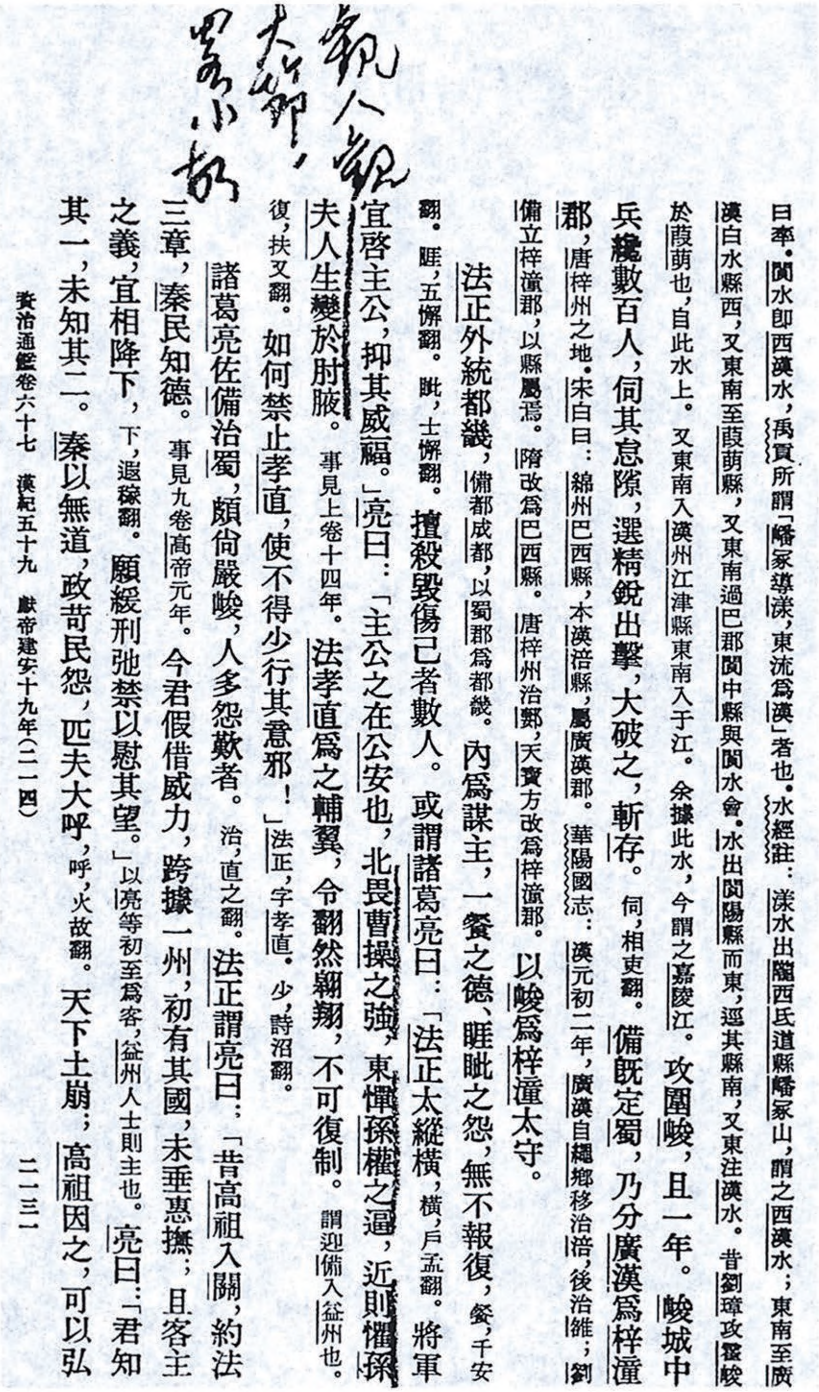
读《资治通鉴》批语

法正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第2131页]

观人观大节，略小故。

刘晔曰：“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少缓之，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操不从。居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操问晔曰：“今尚可击不？”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乃还。[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九第2140页]

不可信



日率•閬水即西漢水，禹貢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水經注：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謂之西漢水；東南至廣漢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與閬水會•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余據此水，今謂之嘉陵江。）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伺，相吏翻。）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唐梓州之地•宋白曰：綿州巴西縣，本漢涪縣，屬廣漢郡。華陽國志：漢元初二年，廣漢自繩鄉移治涪，後治雒；劉備立梓潼郡，以縣屬焉。隋改爲巴西縣。唐梓州治郪，天寶方改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

法正外統都畿，（備都成都，以蜀郡爲都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餐，千安翻•睚，五懈翻。眦，士懈翻。）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橫，戶孟翻。）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事見上卷十四年。）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謂迎備入益州也。復，扶又翻。）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法正，字孝直•少，詩沼翻。）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治，直之翻。）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事見九卷高帝元年。）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下，遐稼翻。）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以亮等初至爲客，益州人士則主也。）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

親人親，大人大，畧小故

資治通鑑卷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獻帝建安十九年（二一四）　二一三一

毛泽东读《资治通鉴》批注的手稿。

初战亮宜自临阵

初，越巂太守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诸葛亮深加器异。……及出军祁山，亮不用旧将魏延、吴懿等为先锋，而以谡督诸军在前，与张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措烦扰，舍水上山，不下据城。张郃绝其汲道，击，大破之，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收谡下狱，杀之。[卷七十一《魏纪》三第2241页]

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

（太和五年）六月，亮以粮尽退军，司马懿遣张郃追之。郃进至木门，与亮战，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乱发，飞矢中郃右膝而卒。[卷七十二《魏纪》四第2268页]

此古人一贯谬论

魏主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阖门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魋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卷一百四十《齐纪》六第4404页]

读《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复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卷七十《石勒寇河朔》第5～6页]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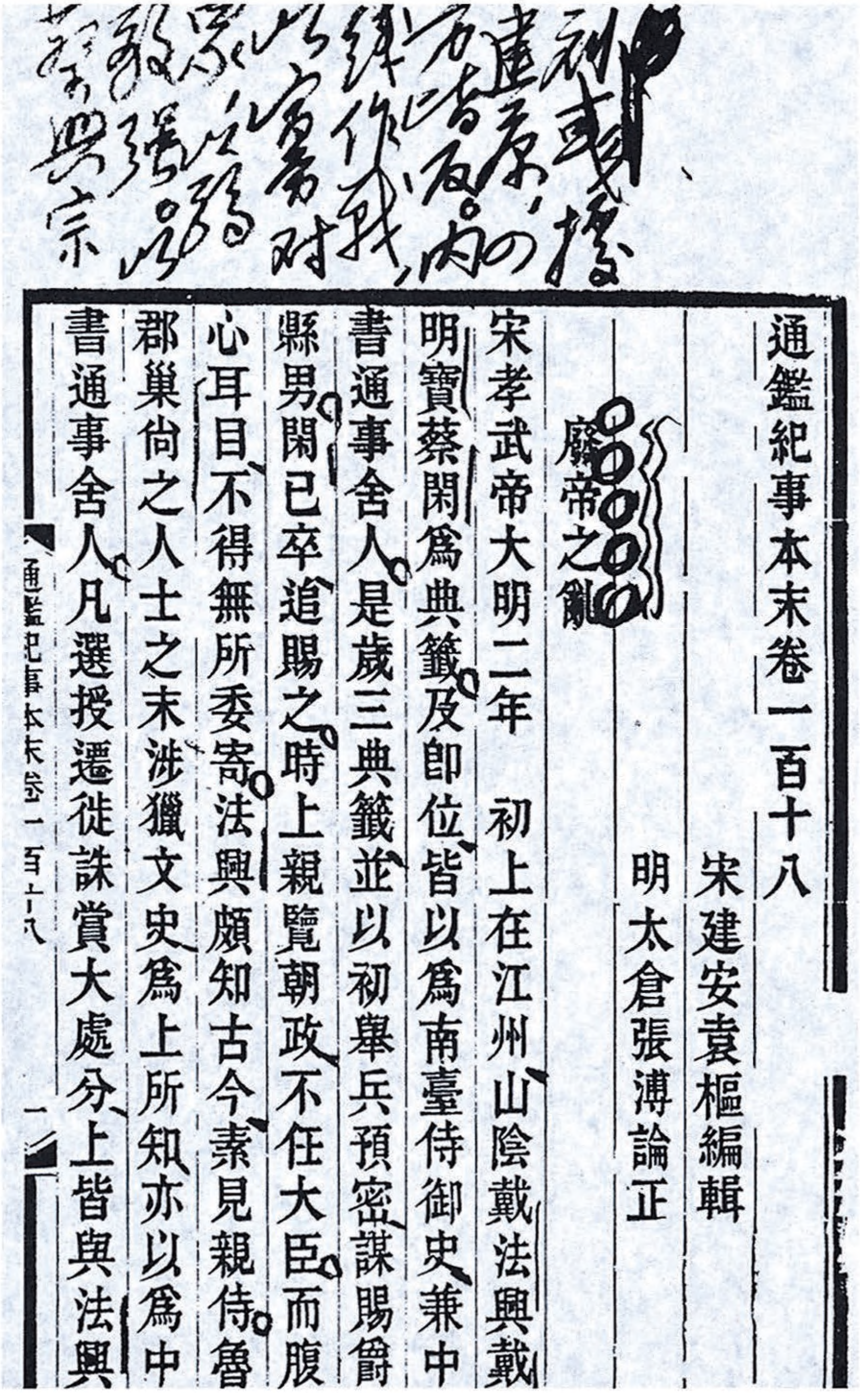
刘毅、何无忌、刘道规、下邳太守平昌孟怀玉帅众自寻阳西上。五月癸酉，与桓玄遇于峥嵘洲。……玄挟帝单舸西走。……己卯，玄与帝入江陵。……壬午……益州督护汉嘉冯迁抽刀前，

欲击玄。玄拔头上玉导与之，曰：“汝何人，敢杀天子！”迁曰：“我杀天子之贼耳。”遂斩之。……时桓谦匿于沮中，扬武将军桓振匿于华容浦。玄故将王稚徽戍巴陵，遣人报振云：“桓歆已克京邑，冯稚复克寻阳，刘毅诸军并中路败退。”振大喜，聚党得二百人，袭江陵，桓谦亦聚众应之。闰月己丑，复陷江陵，杀王康产、王腾之。振见帝于行宫，跃马奋戈，直至阶下，问桓升所在。闻其已死，瞋目谓帝曰：“臣门户何负国家，而屠灭若是！”琅邪王德文下床谓曰：“此岂我兄弟意邪？”振欲杀帝，谦苦禁之，乃下马敛容，致拜而出。……义熙元年春正月……己丑，刘毅等诸军至马头，桓振挟帝出屯江津。……振留桓谦、冯该守江陵。……刘毅等击破冯该于豫章口，桓谦弃城走。毅等入江陵，执卞范之等斩之。桓振还，望见火起，知城已陷，其众皆溃。振逃于涢川。……三月，桓振自郧城袭江陵。……建威将军刘怀肃自云杜引兵驰赴，与振战于沙桥。刘毅遣广武将军唐兴助之，临阵斩振，复取江陵。[卷九十《伪楚之乱》第33～37页]

有毒必发，毒尽方止。桓振之类是也。

刘彧据建康，四方皆反。内线作战，以寡

（泰始元年）十二月……癸亥，以建安王休仁为司徒、尚书令、扬州刺史，以山阳王休祐为荆州刺史，桂阳王休范为南徐州刺史。丙寅，湘



中[illegible]

刘或楼

建康、[illegible]

[illegible]及内

[illegible]作我，

[illegible]当对

[illegible]路

[illegible]张[illegible]

蔡兴宗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八

宋建安袁樞編輯

明太倉張溥論正

廢帝之亂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爲典籤及即位皆以爲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時上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侍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爲上所知亦以爲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十八　一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批注的手稿。

对众，以弱敌强。以蔡兴宗为谋主，以刘休若、刘休祐、刘休仁、吴喜、任农夫、张永、萧道成、王道隆、刘勔、沈攸之、黄回、吕安国、张兴世、刘嗣祖诸人为将帅，终于全胜，可谓奇矣。

东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二年春正月……甲午，中外戒严，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讨诸军事，车骑将军王玄谟副之。休仁军于南州，以沈攸之为寻阳太守，将兵屯虎槛。……邓琬称说符瑞，诈称受路太后玺书，帅将佐上尊号于晋安王子勋。己未，子勋即皇帝位于寻阳，改元义嘉。……帝召寻阳王长史行会稽郡事孔觊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马庾业代之。……觊遂发兵驰檄奉寻阳。……益州刺史萧惠开，闻晋安王子勋举兵，集将佐谓之曰："湘东，太祖之昭，晋安，世祖之穆；其于当壁，并无不可。但景和虽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犹多。吾荷世祖之眷，当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费欣寿将五千人东下。于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广州刺史袁昙远、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阳太守程天祚，皆附于子勋。元怙，元景之从兄也。是岁，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朝廷所保，唯丹阳、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东兵已至永世，宫省危惧。上集群臣以谋成败，蔡兴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叛者亲戚，布在宫省，若绳之以法，则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其势相万耳。愿陛下勿忧。"上善之。建武司马刘顺，说豫州刺史殷琰，使应寻阳。……丙午，上亲总兵，出顿

中堂。辛亥，以山阳王休祐为豫州刺史，督辅国将军彭城刘勔、宁朔将军广陵吕安国等诸军西讨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将军吴兴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诸军东讨孔觊。……东军闻义兴败，皆震恐。上遣积射将军济阳江方兴、御史王道隆至晋陵，视东军形势。孔觊将孙昙瓘、程扞宗等列五城互相连带。扞宗城犹未固。……道隆率所领急攻，拔之，斩扞宗首。永等因乘胜进击昙瓘等，……遂克晋陵。吴喜军至义乡，……喜入吴兴。任农夫引兵向吴郡。顾琛弃郡奔会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吴喜，使统沈怀明等诸将，东击会稽，召张永等北击彭城，江方兴等南击寻阳。丁卯，吴喜军至钱唐，……晏乃斩之。……子勋加（孙）冲之左卫将军，以陶亮为右卫将军，统郢、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万人，一时俱下。……邓琬遣其豫州刺史刘胡帅众三万，铁骑二千，东屯鹊尾。……薛索儿将马步万余人，自睢陵渡淮，进逼青、冀二州刺史张永营。丙申，诏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统北讨诸军事，进据广陵。又诏萧道成将兵救永。……张永、萧道成等与薛索儿战，大破之。……龙骧将军张兴世建议曰：“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虽持之有余，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制

贼之奇也。……”沈攸之、吴喜并赞其策。……庚子，刘胡自将水步二十六军来攻钱溪，……兴世命寿寂之、任农夫帅壮士数百击之，众军相继并进，胡败走。……张兴世既据钱溪，浓湖军乏食。……（刘）胡阴谋遁去。……至夜，𫖮方知之，……因亦走。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𫖮营，纳降卒十万，遣沈攸之等追𫖮。𫖮走至鹊头，与戍主薛伯珍并所领数千人偕去。……伯珍请屏人言事，遂斩𫖮首。……张悦诈称疾，呼（邓）琬计事。……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斩琬。……沈攸之等诸军至寻阳，斩晋安王子勋，传首建康，时年十一。[卷一百十八《废帝之乱》第12～30页]

沈庆之既发颜、柳之谋，遂自昵于帝，数尽言规谏。帝浸不悦。庆之惧祸，杜门不接宾客。……兴宗往见庆之，因说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伦道尽，率德改行，无可复望。今所忌惮，唯在于公。百姓喁喁，所瞻赖者亦在公一人而已。……如犹豫不断，欲坐观成败，岂惟旦暮及祸，四海重责，将有所归。……”庆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仆所能行。事至，固当抱忠以没耳。”青州刺史沈文秀，庆之弟子也，将之镇，帅部曲出屯白下，亦说庆之曰：“主上狂暴如此，祸乱不久，而一门受其宠任，

沈庆之前振后衰，无能为矣。

万物皆谓与之同心。且若人爱憎无常，猜忍特甚，不测之祸，进退难免。今因此众力图之，易于反掌。机会难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于流涕。庆之终不从，文秀遂行。及帝诛何迈，量庆之必当入谏，先闭青溪诸桥以绝之。庆之闻之果往，不得进而还。帝乃使庆之从父兄子直阁将军攸之赐庆之药，庆之不肯饮。攸之以被掩杀之。时年八十。[卷一百十八《废帝之乱》第6～8页]

夏烧野草，随烧随长，况烧可尽乎？

夏闰四月癸酉，任城王道宗败吐谷浑于库山。吐谷浑可汗伏允悉烧野草，轻兵走入碛。诸将以为马无草疲瘦，未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曩者段志玄军还，才及鄯州，虏已至其城下。盖虏犹完实，众为之用故也。今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从之。[卷一百七十二《太宗平吐谷浑》第2页]

多此一举

裴度以马总为彰义留后。癸丑，发蔡州。上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诛吴元济旧将。度至郾城遇之，复与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尽如诏旨，仍上疏言之。[卷一百九十八《宪宗平淮蔡》第22页]

初，孙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钱镠爱其骁

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行军司马杜棱谏曰：“狼子野心，它日必为深患，请以土人代之。”不从。……丙戌，镠临飨诸将，绾谋杀镠于座，不果。称疾先出。镠怪之。丁亥，命绾将所部先还杭州。及外城，纵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挥使许再忠以迎候兵与之合，进逼牙城。镠子传瑛与三城都指挥使马绰等闭门拒之。……武安都指挥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徐绾聚木，将焚北门，建徽悉焚之。建徽，棱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彦闻难，遣其子渭将兵入援，至灵隐山，绾伏兵击杀之。初，镠筑杭州罗城，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掌书记余杭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卷二百二十《钱氏据吴越》第11～12页]

昭谏亦有军谋[1]

……日向晡，贺瑰陈于山西，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诸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曰：“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诸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战自溃。凡决胜料敌，惟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力取胜，纵收余众北归，河朔非王有

此战必不可少

---

[1] 《唐才子传》：“罗隐字昭谏。”

也。”……王建及擐甲横槊而进曰：“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几误计。”嗣昭、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卷二百二十七《后唐灭梁》第3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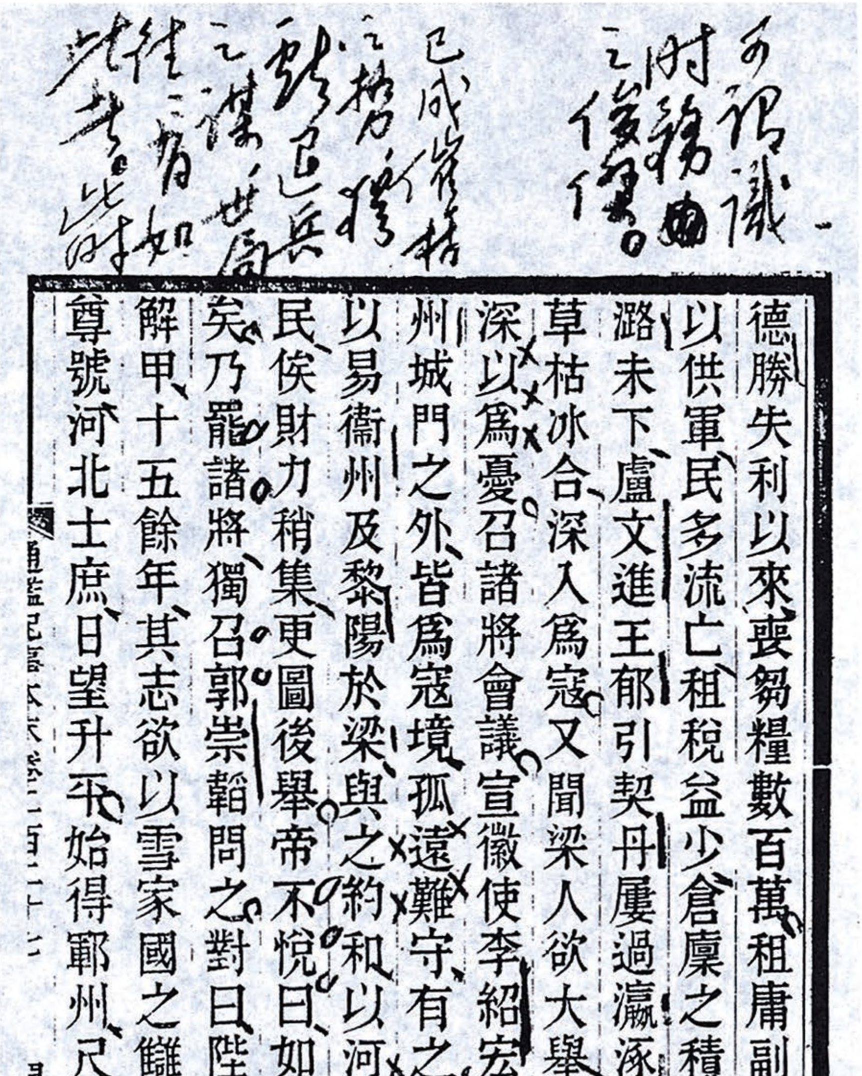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帅百余骑来奔，帝解所御锦袍、玉带赐之，以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帝屏人问延孝以梁事，对曰：“梁朝地不为狭，兵不为少，然迹其行事，终必败亡。何则？主既暗懦，赵、张兄弟擅权，内结宫掖，外纳货赂，官之高下，惟视赂之多少，不择才德，不校勋劳。段凝智勇俱无，一旦居王彦章、霍彦威之右，自将兵以来，专率敛行伍以奉权贵。梁主每出一军，不能专任将帅，常以近臣监之，进止可否，动为所制。近又闻欲数道出兵，令董璋引陕、虢、泽、潞之兵自石会关趣太原，霍彦威以汝、洛之兵自相、卫、邢、洺寇镇、定，王彦章、张汉杰以禁军攻郓州，段凝、杜晏球以大军当陛下，决以十月大举。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帝大悦。

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进至临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胜失利以来，丧刍粮数百万。租庸副使孔谦暴敛以供军，民多流亡，租税益少，仓廪之积，不支半岁。泽、潞未下，卢文进、王郁引契丹屡过瀛、涿之南。传闻俟草枯冰合，深入为寇。又闻梁人欲大举，数道入寇。帝深以为忧，召诸将会议。宣徽使李绍宏等皆以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帝不悦曰："如此，吾无葬地矣。"乃罢诸将，独召郭崇韬问之，对曰："陛下不栉沐，不解甲，十五余年，其志欲以雪家国之仇耻也。今已正尊号，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郓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弃之，安能尽有中原乎？臣恐将士解体，将来食尽众散，虽画河为境，谁为陛下守之？臣尝细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败之机，决在今岁。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据我南鄙，又决河自固，谓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复为备。使王彦章侵逼郓州，其意冀有奸人动摇，变生于内耳。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诸将自降矣。不然，今秋谷不登，军粮将

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仍康延孝之意



一

可謂識時務之俊傑。

已成僵持之局，打破僵局，敢於出兵之謀，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好。

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爲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衞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

毛泽东读《通鉴纪事本末》批注的手稿。

尽，若非陛下决志，大功何由可成！谚曰：‘当道筑室，三年不成。’帝王应运，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则为王，失则为虏，吾行决矣。”[卷二百二十七《后唐灭梁》第48～49页]

……王彦章引兵逾汶水，将攻郓州。李嗣源遣李从珂将骑兵逆战，败其前锋于递坊镇。……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己巳，命将士悉遣其家归兴唐。冬十月，帝遣魏国夫人刘氏、皇子继岌归兴唐，与之诀曰：“事之成败，在此一举。若其不济，当聚吾家于魏宫而焚之。”……[卷二百二十七《后唐灭梁》第50页]

生子当如李亚子[1]

夏四月，东川节度使董璋会诸将谋袭成都，皆曰必克。……孟知祥闻之，遣马军都指挥使潘仁嗣将三千人，诣汉州诇之。璋入境，破白杨林镇，执戍将武弘礼，声势甚盛。知祥忧之。赵季良曰：“璋为人勇而无恩，士卒不附，城守则难克，野战则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锐皆在前锋，公宜以羸兵诱之，以劲兵待之，始虽小衄，后必大捷。……[卷二百三十三《孟知祥据蜀》第12页]

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

---

[1] 李亚子，李存勗小名，即本篇中之帝。

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批语

丙子，中书舍人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虞允文，督舟师败金兵于东采石。允文未至采石十余里，闻鼓声振野。允文见官军十十五五坐路傍者，问之，众曰：“王节使在淮西声鼓，令弃马渡江。我曹皆骑士，今已无马，我曹不解步战也。”从者皆劝允文还建康，曰：“事势至此，皆为他人坏之。且督府直委公犒师耳，非委督战也，奈何代人任责。”允文不听，策马至采石，趋水滨，望江北敌营，不见其后，而权余兵才万八千人，马数百而已。……南师已为遁计。允文召其统制张振、王琪、时俊、戴皋、盛新等与语，谓之曰：“敌万一得济，汝辈走亦何之。今前控大江，地利在我，孰若死中求生。且朝廷养汝辈三十年，顾不能一战报国。”众曰：“岂不欲战，谁主者？”允文曰：“汝辈止坐王权之缪至此。今朝廷已别选将将此军矣。”众愕，立曰：“谁也？”允文曰：“李显忠。”众皆曰：“得人矣。”允文曰：“今显忠未至，而敌已过江。我当身先进死，与诸君戮力决一战。且朝廷出内帑金

伟哉虞公，千古一人。

帛九百万缗，给节度、承宣、观察使告身，皆在此，有功即发帑赏之，书告授之。”众皆曰：“今既有主，请为舍人一战。”允文即与俊等谋，整步骑陈于江岸，而以海鳅及战船，载兵驻中流击之。……敌舟将及岸，南军小却。允文往来行间，顾见时俊，抚其背曰：“汝胆略闻四方，今立阵后，则儿女子耳。”俊回顾曰：“舍人在此。”即手挥双长刀出阵。[卷六十六下《金主亮南侵》第9～10页]

从黄河（潼关至葭县）船式学来

江风忽止，南军以海鳅船冲敌舟，舟分为二。南军呼曰：“王师胜矣。”遂并击金人。金人所用舟，底阔如箱，行动不稳。且不谙江道，皆不能动。其能施弓箭者，每舟十数人而已，遂尽死于江中。有一舟漂流至薛家湾。薛家湾者，采石之下数里，有王琪军在焉，以劲弓齐射，舟不得著岸，舟中之人往往缀尸于板而死。[卷六十六下《金主亮南侵》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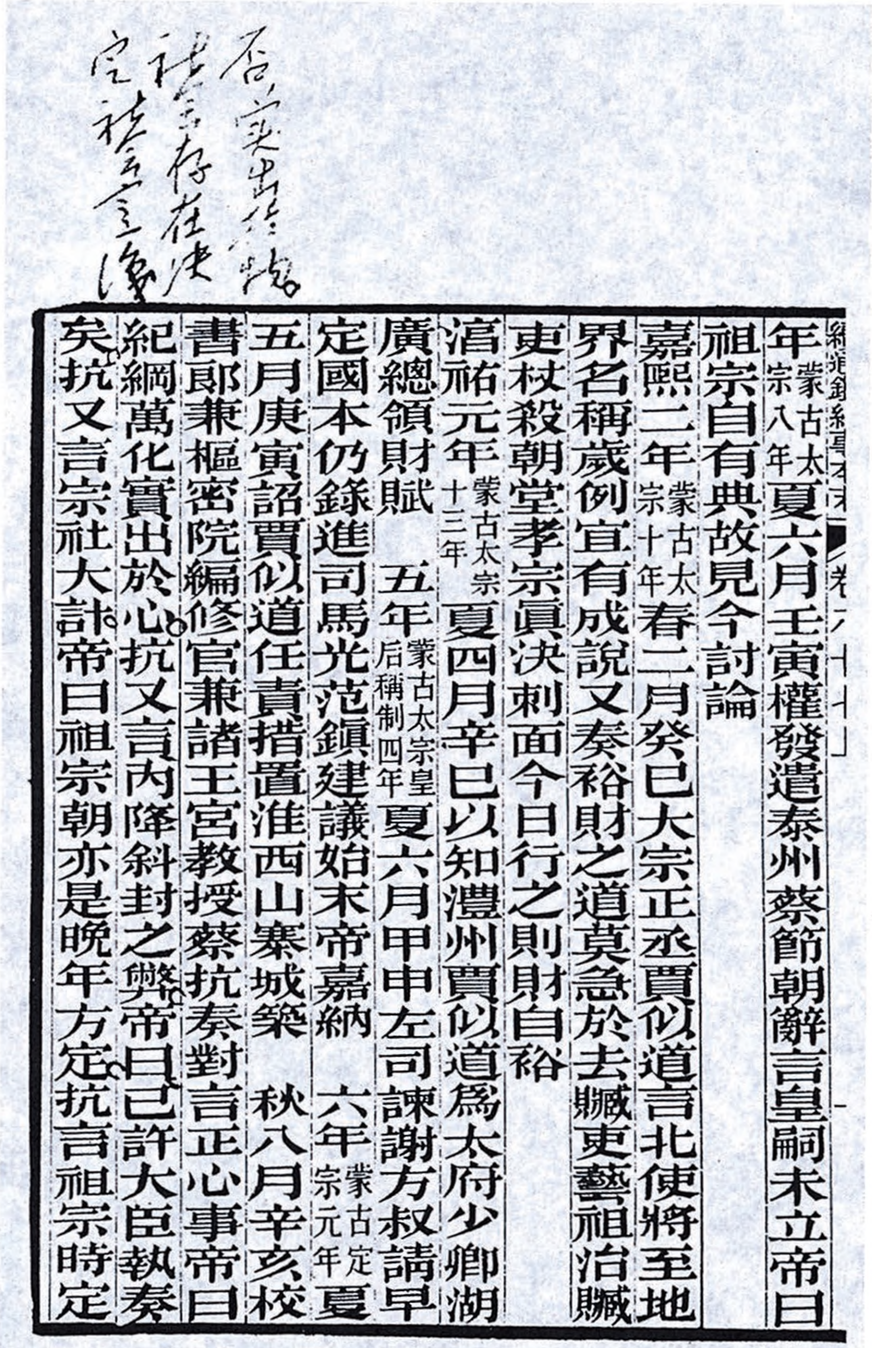
蒋州即光州，即今河南光山县。

方敌舟未退，会淮西溃卒三百人，自蒋州转江而至。允文授以旗鼓，使为疑兵。敌既败去，允文即具捷以闻。且椎牛酒以劳军。夜半，复布陈待敌。[卷六十六下《金主亮南侵》第11页]

秋八月辛亥，校书郎兼枢密院编修官兼诸王

否，实出于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宫教授蔡抗奏对，言正心事。帝曰：“纪纲万化，实出于心。”抗又言内降斜封之弊，帝曰：“已许大臣执奏矣。”[卷八十七上《贾似道误国》第1页]



否实出于物
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

續通鑑紀事本末　卷[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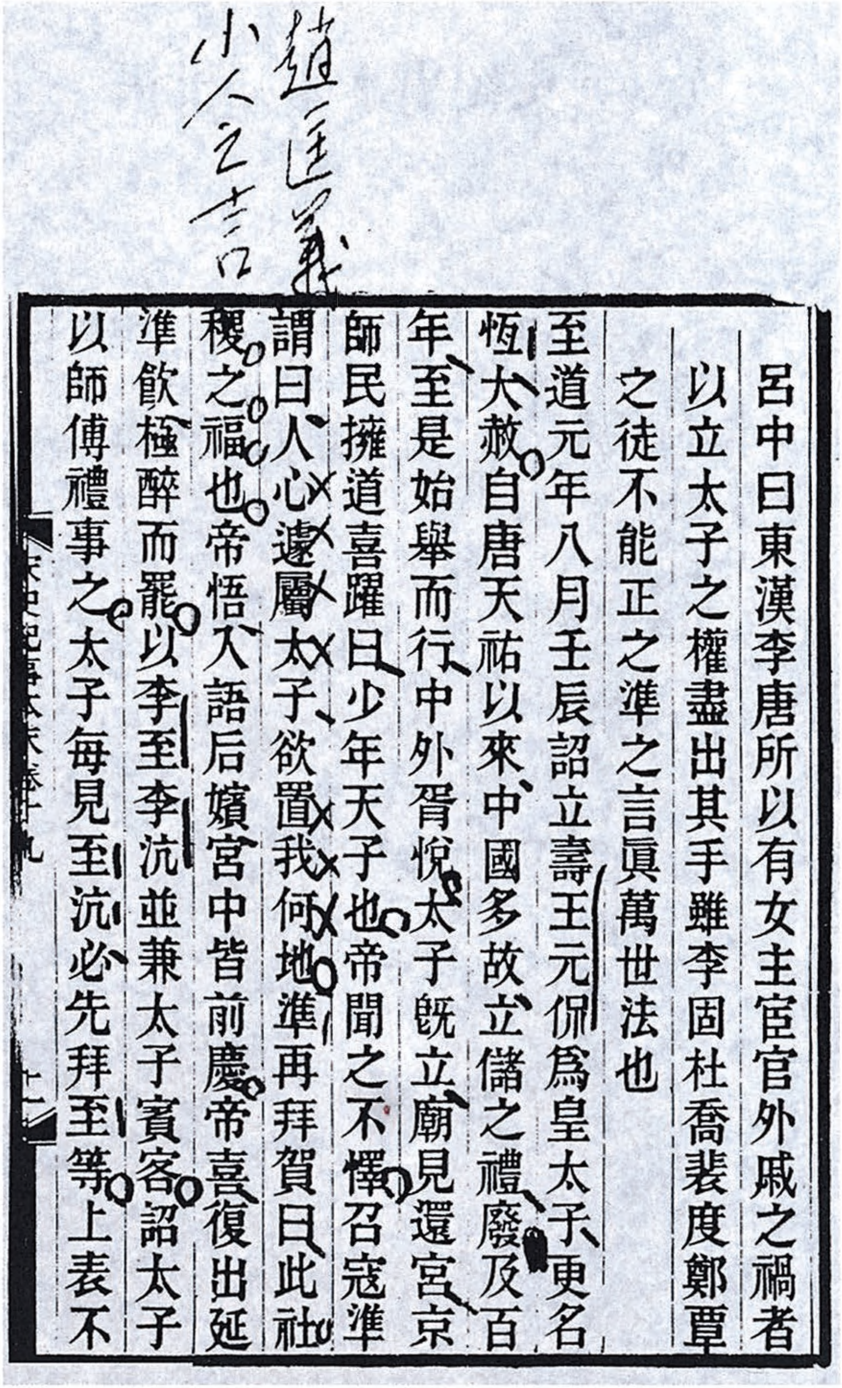
年（蒙古太宗八年）夏六月壬寅權發遣泰州蔡節朝辭言皇嗣未立帝曰
祖宗自有典故見今討論
嘉熙二年（蒙古太宗十年）春二月癸巳大宗正丞賈似道言北使將至地
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贓吏藝祖治贓
吏杖殺朝堂孝宗眞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
湻祐元年（蒙古太宗十三年）夏四月辛巳以知灃州賈似道爲太府少卿湖
廣總領財賦　五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四年）夏六月甲申左司諫謝方叔請早
定國本仍錄進司馬光范鎭建議始末帝嘉納　六年（蒙古定宗元年）夏
五月庚寅詔賈似道任責措置淮西山寨城築　秋八月辛亥校
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諸王宮教授蔡抗奏對言正心事帝曰
紀綱萬化實出於心。抗又言內降斜封之弊。帝曰已許大臣執奏
矣。抗又言宗社大計帝曰祖宗朝亦是晚年方定。抗言祖宗時定

毛泽东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批注的手稿。

读《宋史纪事本末》批语

赵匡义小人之言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诏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更名恒，大赦。自唐天祐以来，中国多故，立储之礼，废及百年，至是始举而行，中外胥悦。太子既立，庙见还宫，京师民拥道喜跃曰："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寇准谓曰："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准再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语后嫔，宫中皆前庆。帝喜复出，延准饮，极醉而罢。[第十九卷《至道建储》第2页]



趙匡義

小人之言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眞萬世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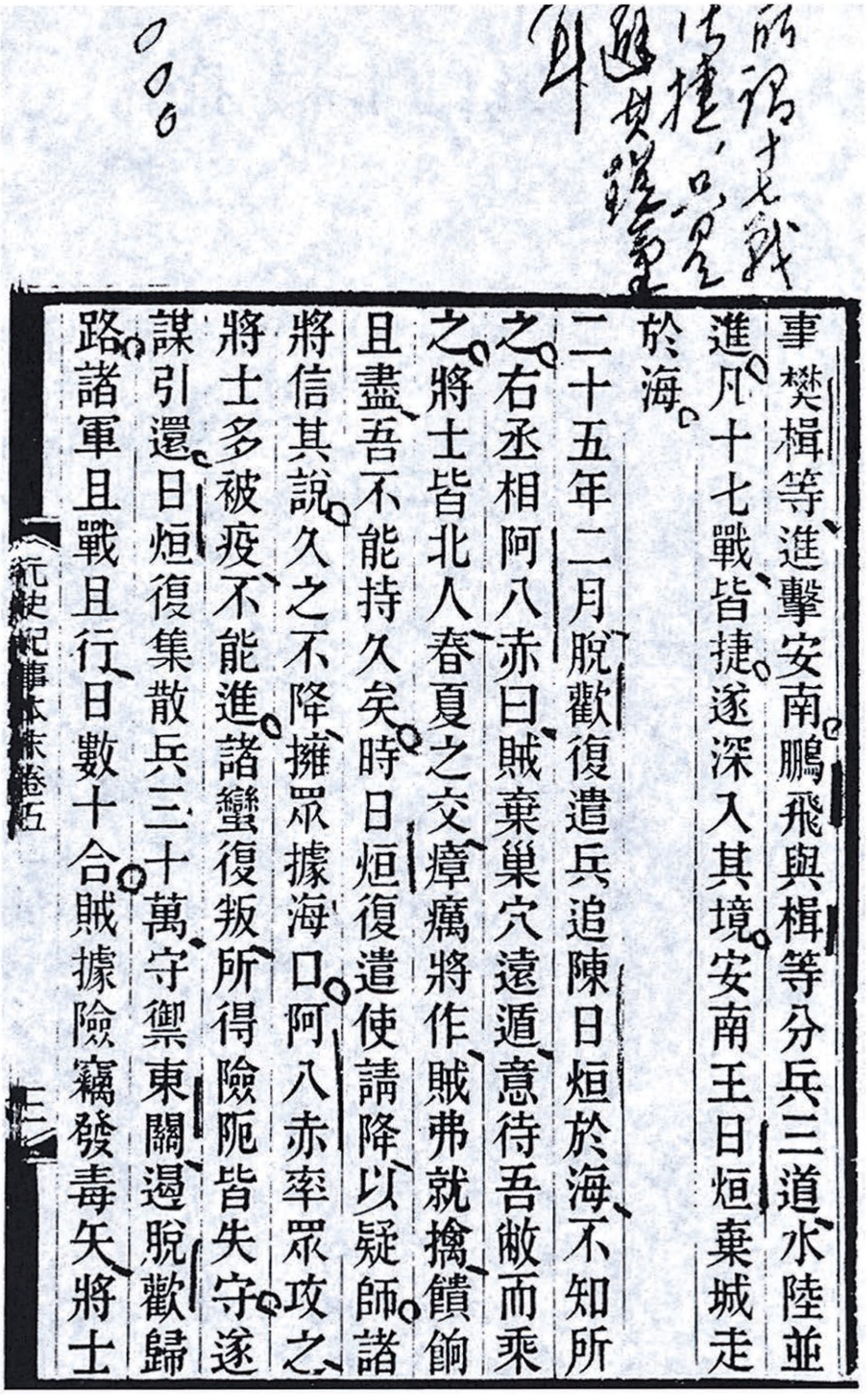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恆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旣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

毛泽东读《宋史纪事本末》批注的手稿。

读《元史纪事本末》批语

所谓十七战皆捷，只是避其锐气耳。

（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复诏脱欢督右丞程鹏飞、参知政事樊楫等进击安南。鹏飞与楫等分兵三道，水陆并进，凡十七战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弃城走于海。[卷五《占城安南用兵》第2～3页]



所謂十七戰皆捷，只是過其蠻境耳

事樊楫等進擊安南鵬飛與楫等分兵三道水陸並進凡十七戰皆捷遂深入其境安南王日烜棄城走於海

二十五年二月脫歡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右丞相阿八赤曰賊棄巢穴遠遁意待吾敝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賊弗就擒饋餉且盡吾不能持久矣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疑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眾據海口阿八赤率眾攻之將士多被疫不能進諸蠻復叛所得險阨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散兵三十萬守禦東關遏脫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竊發毒矢將士

元史紀事本末卷五　三

毛泽东读《元史纪事本末》批注的手稿。

读《明史纪事本末》批语

（建文）二年……夏四月……景隆自德州进兵北伐，军过河间，前锋将至白沟河。郭英等过保定，期于白沟河合势同进。燕王率诸将进驻固安，燕王谓丘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无能为，惟恃其众耳。然众岂可恃也！人众易乱，击前则后不知，击左则右不应，将帅不专，政令不一，甲兵粮饷，适足为吾资耳。尔等但秣马厉兵以待。"张玉请先往驻白沟，以逸待劳。王从之，命率众先往。既至三日，景隆前锋都督平安至白沟河。……己未，李景隆及郭英、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百万，次于白沟河，列阵以待。平安伏精兵万骑邀击。……安骁勇善战，锋初交，安奋矛率众而前，都督瞿能父子亦奋跃，所向披靡，杀伤燕兵甚众。……王亲率兵夹击，杀数千人。……是日也，两军互相杀伤。……燕王既收军还营，……使张玉将中军，朱能将左军，陈亨将右军为先锋，丘福将骑兵继之，马步十余万。黎明，燕军毕渡。瞿能率其子捣房宽阵，平安翼之，宽阵披靡，擒斩数百人。……（王）即麾精

白沟河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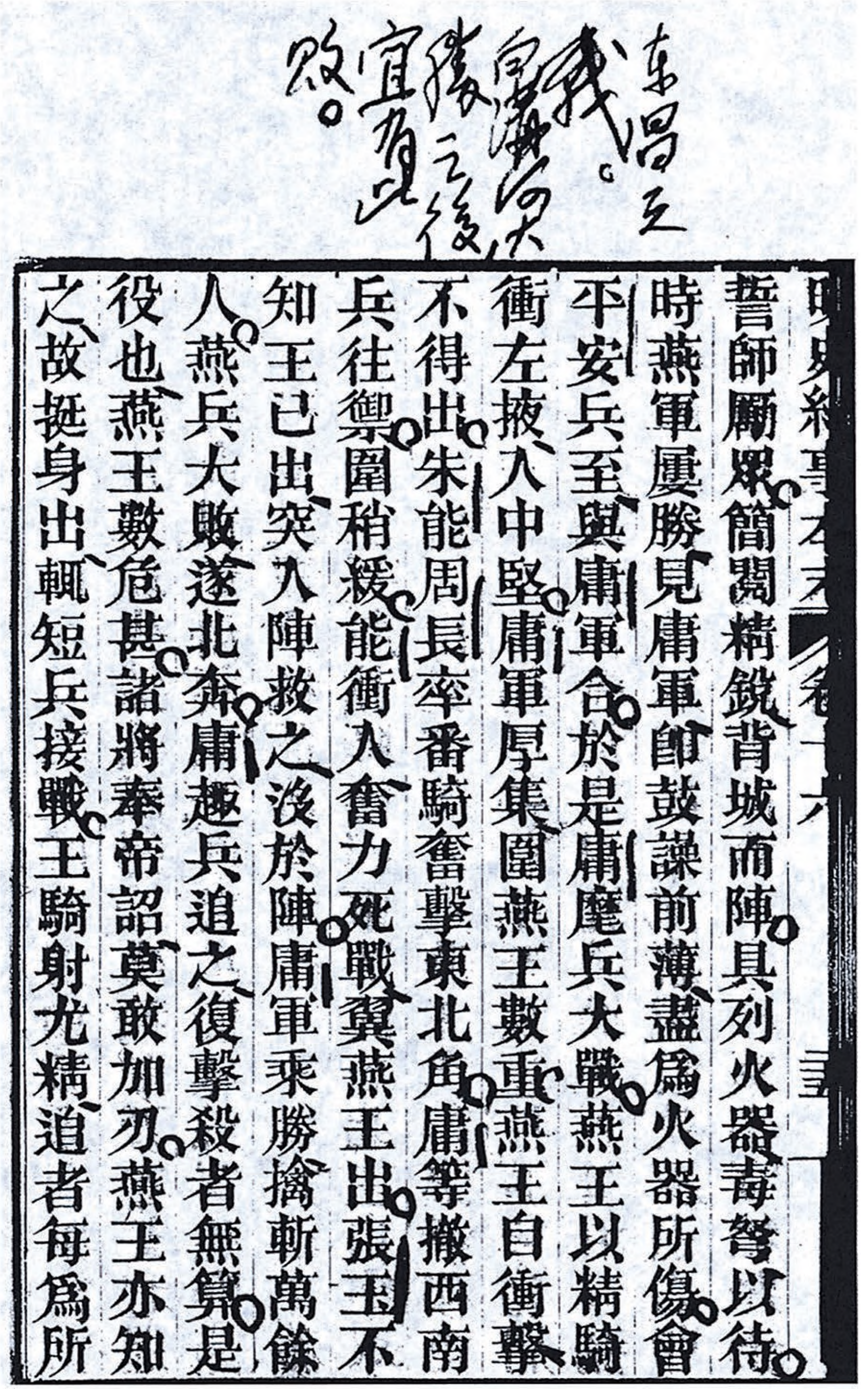
锐数千突入左掖，高煦率张玉等军齐进。……平安善用枪刀，所向无敌。北将陈亨、徐忠皆被创，已而安斩亨于阵。……高煦见事急，帅精骑数千，前与王合。高煦接战，彼此相持。……会旋风起，折大将旗，南军相视而动。王乃以劲骑绕出其后，突入驰击，与高煦骑兵合，杀瞿能父子于阵。平安与朱能战，亦败。于是列阵大崩，奔走之声如雷。……燕兵追至其营，乘风纵火，燔其营垒。郭英等溃而西，李景隆溃而南，委弃器械辎重山积，斩首及溺死者十余万。[卷十六《燕王起兵》第18～21页]

东昌之战

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

乙卯，燕师至东昌（盛）。庸与（铁）铉等闻燕兵且至，宰牛，宴犒将士，誓师励众，简阅精锐，背城而阵，具列火器毒弩以待。时燕军屡胜，见庸军，即鼓噪前薄，尽为火器所伤。会平安兵至，与庸军合，于是庸麾兵大战。燕王以精骑冲左掖，入中坚。庸军厚集，围燕王数重，燕王自冲击不得出。朱能、周长率番骑奋击东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御，围稍缓。能冲入，奋力死战，翼燕王出。……庸军乘胜擒斩万余人，燕兵大败，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复击杀者无算。[卷十六《燕王起兵》第25页]

……方孝孺请令诸王分守城门，……遣李景



东昌之战。白沟河之战张之后宜有此段。

明史紀事本末　卷十六

誓師厲衆簡閱精鋭背城而陣具列火器毒弩以待時燕軍屢勝見庸軍卽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會平安兵至與庸軍合於是庸麾兵大戰燕王以精騎衝左掖入中堅庸軍厚集圍燕王數重燕王自衝擊不得出朱能周長率番騎奮擊東北角庸等撤西南兵往禦圍稍緩能衝入奮力死戰翼燕王出張玉不知王已出突入陣救之沒於陣庸軍乘勝擒斬萬餘人燕兵大敗遂北奔庸趣兵追之復擊殺者無算是役也燕王數危甚諸將奉帝詔莫敢加刃燕王亦知之故挺身出輒短兵接戰王騎射尤精追者每爲所

毛泽东读《明史纪事本末》批注的手稿。

隆及兵部尚书茹瑺、都督王佐往龙潭，仍以割地讲和为辞，观虚实以待援兵。景隆、瑺至龙潭见燕王，伏地叩头而已。燕王笑曰：“勤劳公等至此，有言乎？”景隆等惶恐叩头，稍稍及割地事。燕王曰：“公等说客耶？始吾未有过举，辄加之大罪，削为庶人，云大义灭亲。吾今救死不暇，何用地为？且今割地何名？皇考裂土分封，吾故有地矣，此又奸臣计也。凡所以来，欲得奸臣耳。公等归奏上，但奸臣至，吾即解甲，谢罪阙下，谒孝陵，归奉北藩，永祇臣节，天地神明在上。”景隆、瑺还报命。帝令景隆再如师，言罪人已窜逐，候执至来献。景隆趑趄。帝令诸王与偕。既至，燕王见诸王相劳苦。诸王具述帝意。燕王曰：“诸王试谓斯言诚伪。”诸王曰：“大兄洞见矣。”燕王曰：“吾来，但欲得奸臣耳，不知其他。”遂宴诸王，遣归。……[卷十六《燕王起兵》第46～47页]

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

（成化）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陕西至荆、襄、唐、邓之间，皆长山大谷，绵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为梗。刘千斤之乱因之，至李胡子复乱，流民无虑百万。都御史项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胜计。祭酒周洪谟乃著《流民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

周洪谟《流民说》

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都御史李宾深然其说。至是流民复集如前。宾乃援洪谟说，疏上之。上可焉，命杰往莅其事。[卷三十八《平郧阳盗》第6～7页]

（正德）六年春正月，霸州巨盗刘六、刘七聚众攻安肃县，劫取系狱盗党齐彦名。时穷民响应，旬日间，众至数千，劫掠畿南州县。霸州文安生员赵风子者，名鐩，有勇力，好任侠，每大言自负。……为刘六、刘七所擒，说使降，许诺。归家，与弟镭、镐聚五百人，会于河间。由是贼党益繁，自畿南达山东，倏忽来去，势如风雨。……六月，流盗赵鐩、刘三、邢老虎、杨虎分掠河南，刘六、刘七、齐彦名分掠山东。……七年春正月，刘六等复攻霸州。何鉴续调宣府边兵在涿州者遏之，贼遁去。……二月……邢老虎病死。鐩并其众，号十三万，骑五千，转掠襄阳、樊城、枣阳、随州、新野，破泌阳。……夏四月，……湖广佥事郭韶败刘三、赵鐩等于应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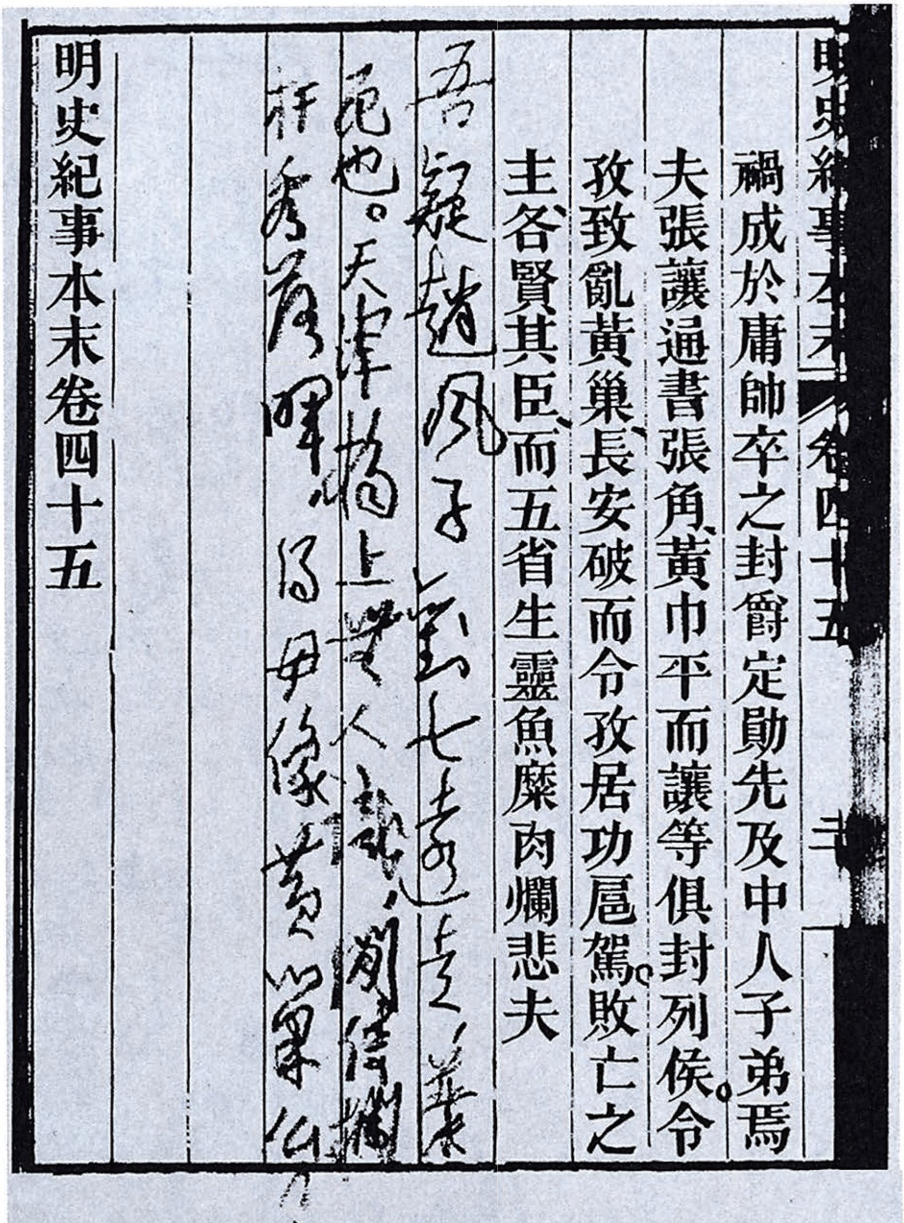
县二郎畈、广水店，追逐悬崖溺水者千余人。彭泽同巡抚刘丙督各路军马，追杀鐩等于应山井子铺、随州蓬甑山等处。……闰五月……刘六为湖广官军所追，风折帆樯，击死于水。……八月，刘七等既泊狼山。……丁丑，……飓风大作，……乃登山团聚。……跻山巅古垣。官军方奋勇直前，……遂夺其垣。贼坠崖死者无算。其余先具艅艎山下，以备逃窜。至是，觅婴谷下山，争船不得入。刘晖立崖下，百矢齐发。刘七势迫，遂赴水死。彦名为宣府游兵十旗张鉴斩首。[卷四十五《平河北盗》第2～18页]

吾疑赵风子、刘七远走，并未死也。“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中日大战

神宗万历二十年五月，倭酋平秀吉寇朝鲜。……倭遂渡大同江，绕出平壤界。是时，倭已入王京，……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请援之使，络绎于路。……十二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二十一年正月，平壤大捷。……十九日，李如松进复开城。……朝鲜郡县，如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援师既连胜，有轻敌心，……如松……将轻骑趋碧蹄馆，去王京三十里，驰至大石桥，马蹶伤额，几毙。倭猝至，围之数重。将士殊死战，……会杨元援兵至，砍重围入，遂溃，而师精锐亦多丧失。……（如松）闻倭将平秀嘉据龙山，仓粟数十万，从间道纵火尽焚之，倭乏食。东师议

款，……倭果于四月十八日弃王京遁，如松及应昌整众入城。[卷六十二《援朝鲜》第1～6页]



明史紀事本末　卷四十五　三

禍成於庸帥卒之封爵定勛先及中人子弟焉夫張讓通書張角、黃巾平而讓等俱封列侯。令孜致亂黃巢長安破而令孜居功扈駕。敗亡之主各賢其臣、而五省生靈魚糜肉爛悲夫

吾疑趙風子、劉七輩是義民也。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倚欄杆看落暉，得毋像黃巢乎？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五

毛泽东读《明史纪事本末》批注的手稿。

读《十六国春秋》批语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山人也。……永嘉之际，天下大乱。石勒为刘渊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观诸将多矣，无如此胡将军者，可与共成大事。”乃提剑诣军门大呼请见，勒亦未之奇也。后数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为谋主。………肃清百僚，屏绝私昵，以身帅物，入则尽规，出则归美，勒甚重之。每朝，必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常叹曰：“吾每临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亲临哭之，哀恸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卷二十二　后赵《张宾》第1页]

非君臣，乃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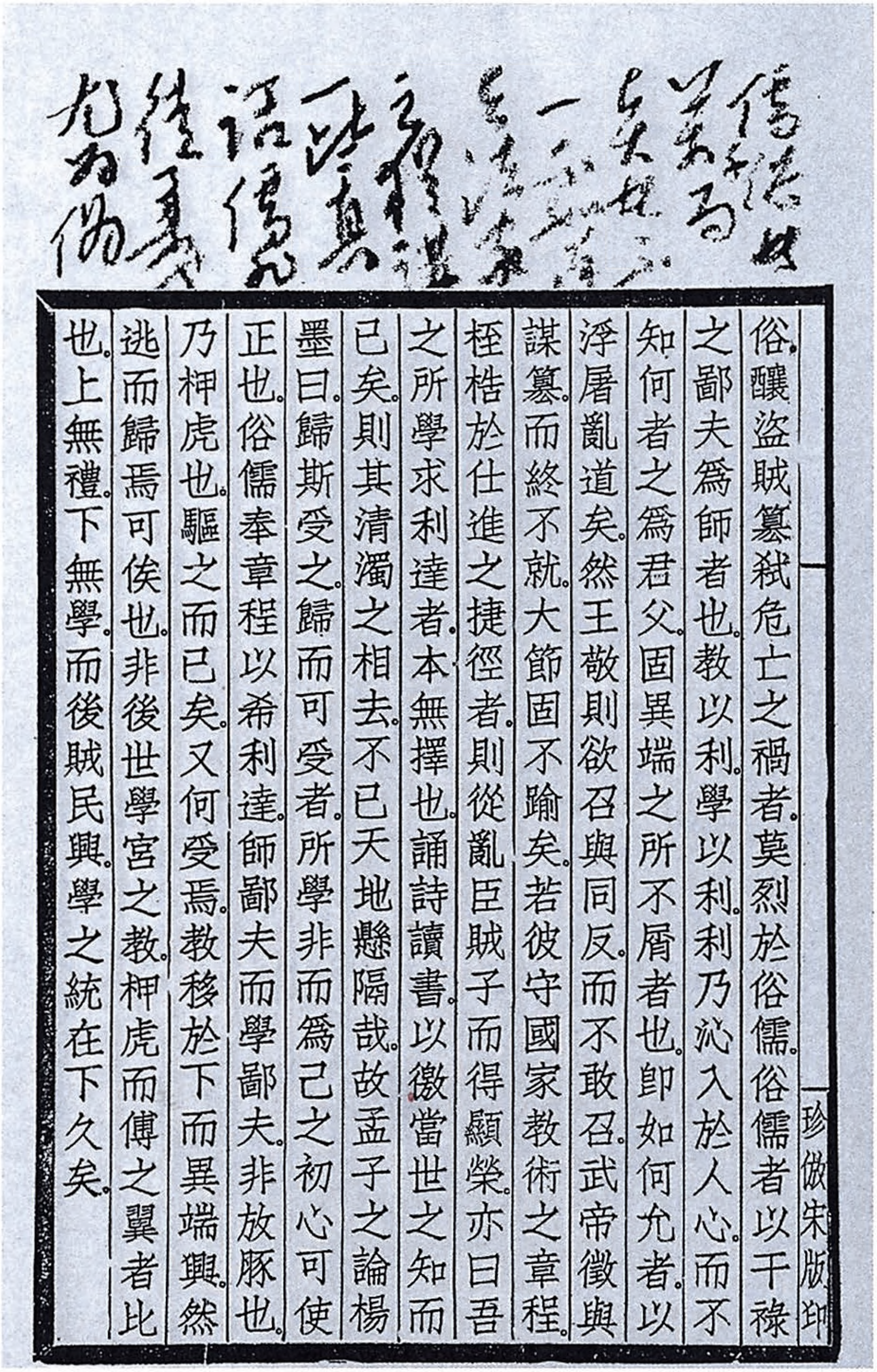
读《读通鉴论》批语

拓拔宏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宏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术。其欲逊位于子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卷十五《宋明帝》第35页]

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卷十七《梁武帝》第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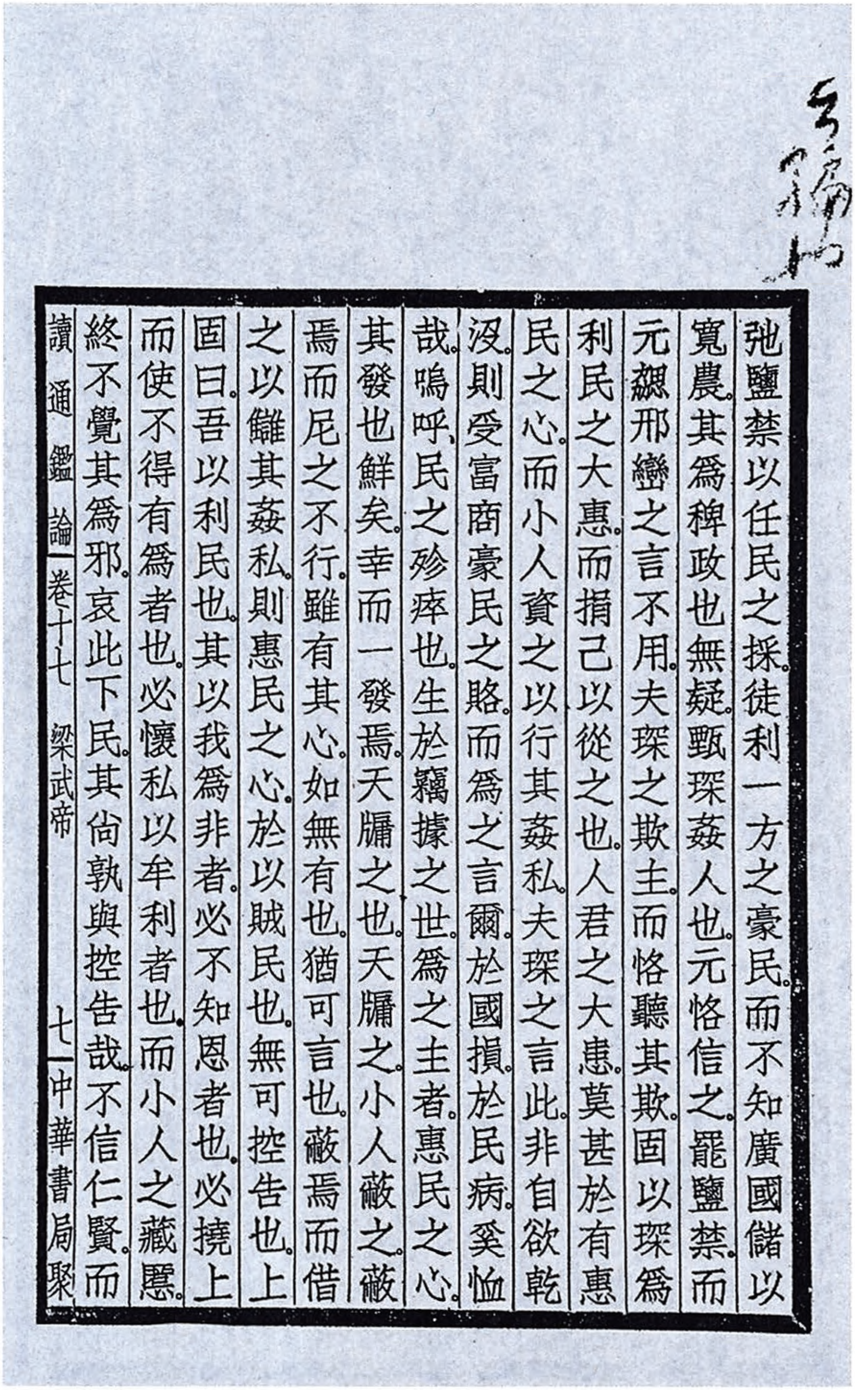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



珍倣宋版印

俗。醜盜賊篡弒危亡之禍者。莫烈於俗儒。俗儒者以干祿之鄙夫爲師者也。教以利。學以利。利乃沁入於人心。而不知何者之爲君父。固異端之所不屑者也。卽如何允者。以浮屠亂道矣。然王敬則欲召與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徵與謀篡。而終不就。大節固不踰矣。若彼守國家教術之章程。桎梏於仕進之捷徑者。則從亂臣賊子而得顯榮。亦曰吾之所學求利達者。本無擇也。誦詩讀書。以徼當世之知而已矣。則其清濁之相去。不已天地懸隔哉。故孟子之論楊墨曰。歸斯受之。歸而可受者。所學非而爲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達。師鄙夫而學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驅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於下而異端興。然逃而歸焉可俟也。非後世學宮之教。柙虎而傅之翼者比也。上無禮。下無學。而後賊民興。學之統在下久矣。

毛泽东读《读通鉴论》批注的手稿。



至論
深刻

弛鹽禁以任民之採。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廣國儲以寬農。其爲稗政也無疑。甄琛姦人也。元恪信之。罷鹽禁。而元勰邢巒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聽其欺。固以琛爲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從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於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資之以行其姦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沒。則受富商豪民之賂。而爲之言爾。於國損。於民病。奚恤哉。嗚呼。民之殄瘁也。生於竊據之世。爲之主者。惠民之心。其發也鮮矣。幸而一發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雖有其心。如無有也。猶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讎其姦私。則惠民之心。於以賊民也。無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爲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撓上而使不得有爲者也。必懷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慝。終不覺其爲邪。哀此下民。其尚孰與控告哉。不信仁賢。而

讀通鑑論　卷十七　梁武帝　七　中華書局聚

毛泽东读《读通鉴论》批注的手稿。

其教孔孟，其法亦必申韩。

佛老之于申韩，犹鞶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卷十七《梁武帝》第24页]

读《王湘绮全集》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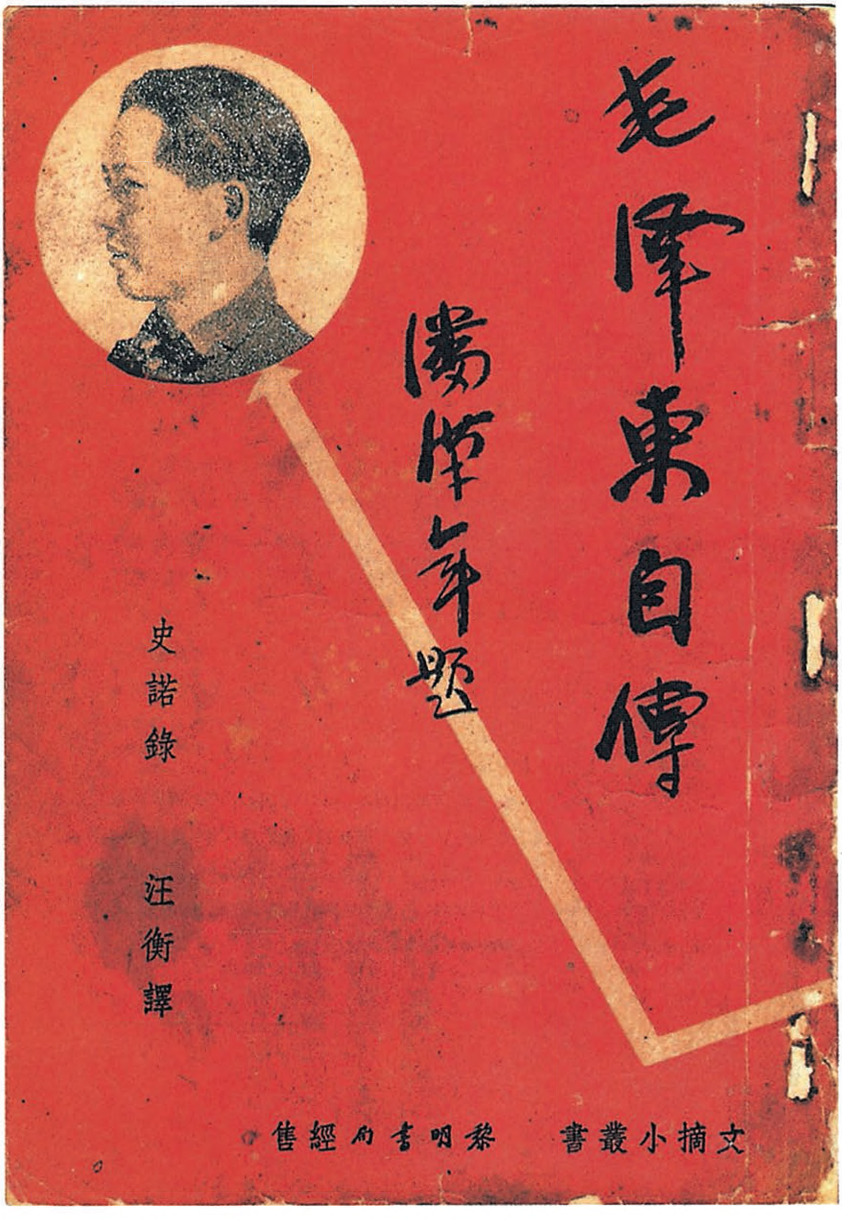
湘军水师名天下。……湖南在籍官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概等始捐资设船局，而黄冕专制炮以应征军。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锋锐，深入要利，卒以至败。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大，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寇既见官军水战法，亦并力于水战，多造小艇，依大舟以出。……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其筏上作木楼，凭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泅而走，其坚悍若此。[《湘军志》六《水师篇》第六第7～8页]

水军应学游泳

双脚走路

要学游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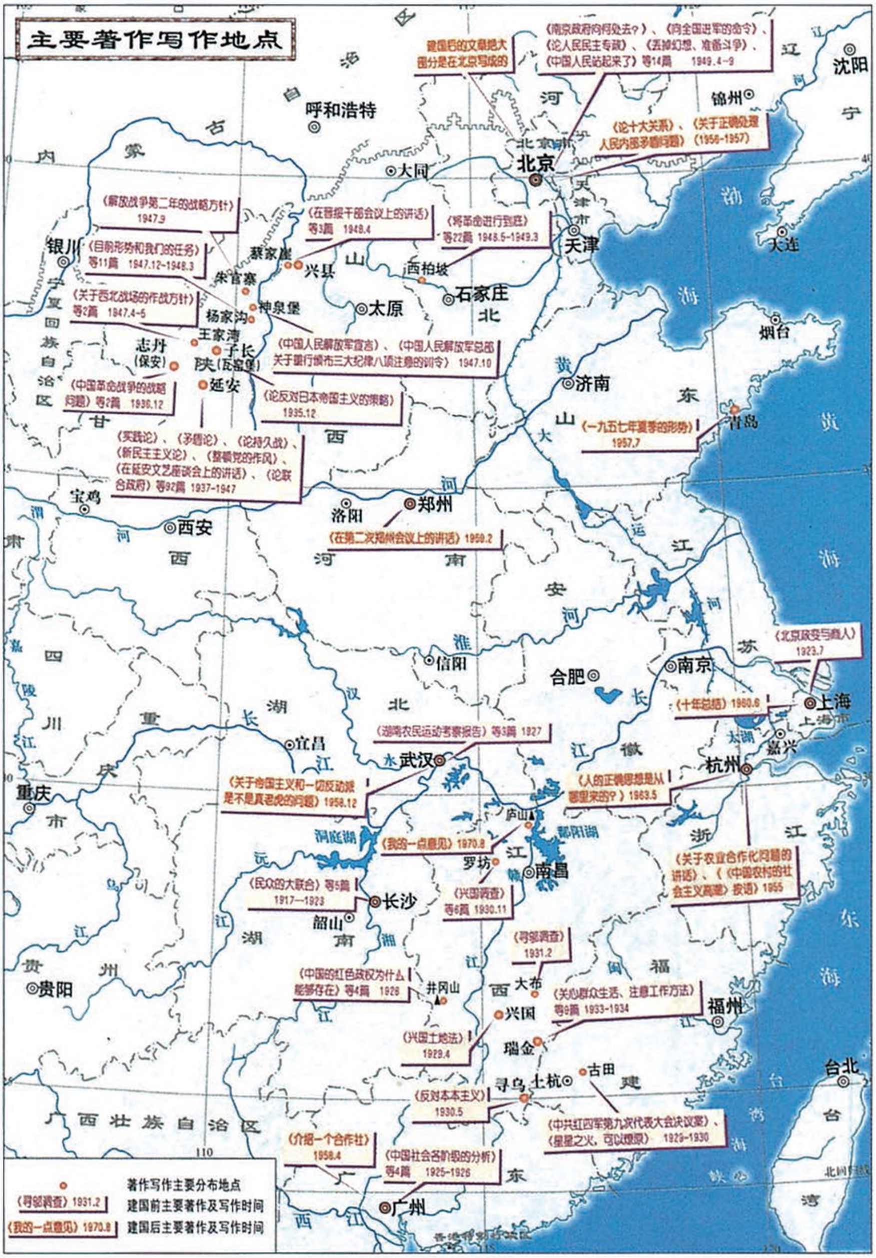
附录


毛澤東自傳
潘漢年題
史諾錄
汪衡譯
文摘小叢書
黎明書局經售

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毛泽东自传》。

附录一：

毛泽东主要著作写作地点


主要著作写作地点
建国后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在北京写成的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14篇 1949.4-9
《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6-1957）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 1947.9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3篇 1948.4
《将革命进行到底》等22篇 1948.5-1949.3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11篇 1947.12-1948.3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等2篇 1947.4-5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1947.1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2篇 1936.12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12
《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92篇 1937-1947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1957.7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1959.2
《北京政变与商人》 1923.7
《十年总结》 1960.6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3篇 1927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1958.12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1963.5
《我的一点意见》 1970.8
《民众的大联合》等5篇 1917—1923
《兴国调查》等6篇 1930.11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1955
《寻邬调查》 1931.2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4篇 1928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9篇 1933-1934
《兴国土地法》 1929.4
《反对本本主义》 1930.5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9-1930
《介绍一个合作社》 1958.4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4篇 1925-1926
呼和浩特
大同
北京
北京市
天津
天津市
沈阳
锦州
大连
烟台
青岛
济南
石家庄
西柏坡
太原
兴县
蔡家崖
朱官寨
神泉堡
杨家沟
王家湾
子长（瓦窑堡）
志丹（保安）
延安
银川
宝鸡
西安
洛阳
郑州
信阳
合肥
南京
上海
嘉兴
杭州
宜昌
武汉
重庆
庐山
南昌
罗坊
长沙
韶山
贵阳
井冈山
大布
兴国
瑞金
福州
古田
寻乌
上杭
台北
广州
内蒙古自治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河北
山西
陕西
甘肃
山东
河南
江苏
安徽
湖北
四川
重庆市
湖南
江西
浙江
福建
贵州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东
辽宁
台湾
渤海
黄海
东海
台湾海峡
黄河
渭河
淮河
汉水
长江
大运河
洞庭湖
鄱阳湖
太湖
香港特别行政区
北回归线
著作写作主要分布地点
《寻邬调查》 1931.2 建国前主要著作及写作时间
《我的一点意见》 1970.8 建国后主要著作及写作时间

附录二：

毛泽东自传

第一章　一颗红星的幼年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1]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2]。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当我十岁，我家只有十五亩田的时候，一家五口是：父亲、母亲、祖父、弟弟和我自己。在我们增加了七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不过我们每年仍有三十五担谷的剩余[3]，因此，我家一步步兴旺起来了。

---

[1] 据斯诺著《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父亲叫毛顺生，母亲“在娘家的名字叫文其美”。

[2] 据《西行漫记》载：“他当了好多年的兵。”

[3] 据《西行漫记》载：“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

这时，父亲还是一个中农，他开始做贩卖粮食的生意，并赚了一点钱。在他成为“富”农之后，他大部分时间多半花在这个生意上。他雇了一个长工，并把自己的儿子们都放在田里做工。我在六岁时便开始耕种的工作了。父亲的生意并不是开店营业的。他不过把贫农的谷购买过来，运到城市商人那里，以较高的价格出卖。在冬天磨米的时候，他另雇一个短工在家里工作，所以在那时他要养活七口。我家吃得很节省，但总是够饱的。

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的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面的。我飘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家约八里。

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我这次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罢课）”[1]。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

[1] 此处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了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引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1]，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

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起来了。辩证的斗争在我们的家庭中不断地发展着。（在说话的时候毛很幽默地引用这些政治术语，他一面笑一面追述这些事件——史诺[2]）有一件事，我特别地记得。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

---

[1] 据《西行漫记》载：“我父亲年纪比我大两倍多。”

[2] 史诺即埃德加·斯诺。括号内文字是斯诺笔录时附注的。

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在这个情形之下，双方互相提出要求，以期停止“内战”。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这样结束了这场“战事”。从这一次事件中，我明白了当我以公开反抗来保卫我的权利时，我的父亲就客气一点；当我怯懦屈服时，他骂打得更厉害。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苛刻，结果使他失败。我渐渐地仇恨他了，我们成立了一个真正的“联合战线”来反对他。这对于我也许很有益处，这使我尽力工作，使我小心地记账，让他没有把柄来批评我。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能够记账。我的母亲则完全不识字。两人都出身农家。我是家庭中的“学者”。我熟读经书，但我不欢喜那些东西。我所欢喜读的是中国古时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我年轻时，我不顾教师的告戒，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1]，而教师则深恶这些不正经的书，说它们害人。我总是在学校里读这些书的，当教师走过面前时，就用一本经书来掩盖着。我的同学大多也是如此。我们读了许多故事，差不多都能够背诵出来，并且一再地谈论它们。关于这类故事，我们较本村的老年人还知道得多。他们也欢喜故事，我们便交换地讲听。我想我也许深受这些书的影响，因为我在那种易受感动的年龄时读它们。

---

[1] 此处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最后我在十三岁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然而我还继续求学，找到什么书便读，除了经书以外。这使父亲十分生气，他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当他有一次，因对方在中国旧式法庭中，引用了一句适当的经书而使他官司打败以后。在深夜，我常把我室中的窗门遮盖起来，使我的父亲看不见灯光。我这样读了一本我很欢喜的书，叫做《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该书的作者们都是主张革新的老学者，他们以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由于缺少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并想将它们介绍到中国来。我的父亲认为这一类的书是浪费时间的。他要我读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的如经书那类的实际东西！

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这件事使我奇怪了两年，于是我便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发现这些故事都是赞美人民的统治者的武士，他们用不着耕种田地，因为他们占有土地，显然是叫农民替他们工作的。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2]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

---

[1] 此处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2] 《西行漫记》载：“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

生关系。

不过，我的读书渐渐地对我发生影响：我自己愈来愈怀疑神佛了。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醒世良言》（《盛世危言》）[1]引动我继续求学的欲望。我也已经厌恨田里的工作了。这自然是父亲所反对的。我们为了这事发生争执。最后我从家庭中出走。我到一个失业的法律（法科）[2]学生家里去，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我在一位老秀才面前攻读了更多的经书，并读了许多当代论著和几本书。

在这时候，湖南发生一桩影响我的一生的事件。在我们读书的小小私塾的房屋外面，我们一班同学看见许多从长沙回来的米商（豆商）[3]。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大家都离开长沙。他们说是城中发生了大乱子，并把这件事告诉我们。

原来那年发生一个大饥荒，在长沙有好多万人没有东西吃。嗷嗷待哺的老百姓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巡抚，请求救济，但他却傲慢地回答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粮食？城里多得很，我向来就没有缺少过。”当他们听到巡抚的回答，大家都十分愤怒。他们召集民众大会，举行一次示威运动。他们攻进满清衙门，砍倒作为衙门象征的

---

[1] 此处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2] 此处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3] 此处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旗杆，并把巡抚赶走。过后，布政使骑着马出来了。他告诉老百姓，政府准备设法救济他们。他这话显然是诚恳的。但皇帝（或许是慈禧太后吧）不高兴他，责备他与“暴徒”发生密切关系，并将他撤职。一位新巡抚来了，马上下令捉拿为首的乱党。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

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站在旁观的立场。他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做一个具有刺激性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永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

此后不久，“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种秘密结社）的会员和当地的一个地主发生冲突。他在法庭上控告那些会员，他是一个很有势力的地主，判决自然是有利于他的。“哥老会”会员失败了。但是他们并不屈服，他们向这个地主和政府反抗，他们退到一个山[1]上去，在那里建筑了他们的山寨。官兵派来打他们，同时那地主散布一个谣言，说他们揭竿造反的时候杀死了一个孩童来祭旗。当时叛徒的领袖叫做“磨刀石彭”[2]。叛徒最后战败，彭被迫逃亡。结果他被捕砍头。然而在我们这般学生的眼光中，他是一位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这次造反。

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食粮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

---

[1] 据《西行漫记》载，这个山叫“浏山”。

[2] 据《西行漫记》载：“起义的领袖，是一个叫彭铁匠的人。”

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同时，我以为村人的方法也是错误的。

这时，还有一件事对我发生影响，即一个小学校中有一个“激烈”的教员。他之所以被目为“激烈”，是因为他反对神佛，想把神佛取消。他教人民把庙宇改为学校。他成为一个被大家议论的人。然而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密切发生在一起的事件，给予我这已经有着反叛性的青年头脑以一个永久的印象。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某种程度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在我读了一个谈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甚至现在还能记得这小册子的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它讲到日本的占领高丽与台湾，中国的失去安南、缅甸等。[1]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祖国的将来痛心，开始明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我的父亲要我在一个与他有关系的米店做学徒。最初我并不反对，以为这也许是很有趣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一个有趣的新学校。于是不顾我父亲的反对，立志进那个学校。这学校在我外祖母的县城里[2]。我的一个姨表在那里当一个教员[3]，他将这个学校告诉我，并将“新法”学校的变迁情形讲给我听。那里是不大注重经书的，西方的“新知识”教授得较多。教育方法又是很“激进”的。

于是我与我的另一个表弟进了那个学校，注了册[4]。我自称为

---

[1] 据《西行漫记》载：“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的宗主权的丧失。”

[2] 即湘乡县。

[3] 据《西行漫记》载：“我的一个表兄就在那里上学。”

[4] 据《西行漫记》载：“我随表兄到那所学堂去报了名。”

湘乡人，因为我知道那学校只收湘乡籍学生。但后来我发现各地人都可以进去，我才把我的真籍贯说出来，我付了十四吊铜板，做我五个月的膳宿费及购买各种文具用品之用。我的父亲终于让我入学了，因为朋友劝他，说这种“高等”教育可以增加我赚钱的本领，这是我第一次远离家乡，离家有五十里。这时我是十六岁。

在这个新学校中，我读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的新课程。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教员中有一位日本留学生，他戴了一个假辫子。假辫子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每个人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未看见过那么多的儿童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子弟，穿着华丽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将他们的子弟送到那样一个学校去读书。我穿得比旁的学生都蹩脚。我只有一套像样的袄裤。一般学生是不穿长袍的，只是教员穿，至于洋装，只有“洋鬼子”才穿。许多有钱的学生都轻视我，因为我常穿破烂的袄裤。但是，在这些人之中我也有几个朋友，而且有两个是我的好同志。其中有一个现在成了作家，住在苏联。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在这学校里有很大的进步。教员都喜欢我，尤其是教经书的，因为我古文作得不错。然而我的志趣并不在经书。我正在读我表兄送给我的两本关于康有为改革运动的书。一本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

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当时我以为他是非常前进〈进步〉的，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变成一个劣绅，并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间的大革命时代参加反动工作。

许多学生不欢喜“假洋鬼子”，因为他的辫子是假的，但我很欢喜听他谈日本的情形。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过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记得当中几句很美的句子：

麻雀唱歌，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野何等可爱。
石榴花红，杨柳叶青，
正是一幅新鲜的图画。

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日本的美，我又从这歌曲中感觉到它对于战胜俄国的光荣和武功的发扬。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我们今日所知道的野蛮的日本。

这一切，都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学到的。

我又记得在这个时候，在新皇宣统（溥仪）已统治了两年的时候，我才最初听到皇帝（光绪）与慈禧太后都死去的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反君主的人。老实说，我认为皇帝以及大多官吏都是诚实、良好，和聪明的人。他们只需要康有为的变法就行了。我心醉于中国古代的著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于他们的书籍。同时，我还读了一点外国的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论美洲革命的文章里，我初次听到美国，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八年之苦战后，华盛顿胜利而造成其国家。”在一本《世界大英雄传》的书中，我又读到，拿破仑，俄国喀德琳（叶卡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登（惠灵顿），葛拉德斯吞（格莱斯顿），卢

梭，孟德斯鸠，及林肯。[1]

我开始渴想到长沙去，那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的省会，离我家有一百四十里，我听说这城市是非常大的，有许许多多居民，许多学校和一个巡抚的衙门。这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地方！这时我很想到那里去，进那个为湘乡人办的中学。是年冬，我请求我在高小时的一位教员介绍我前去。他答应了，于是我步行到长沙，心中极端地兴奋，一半生怕被摒，几乎不敢希望真入那个伟大的学校做一学生。而使我惊异的，我很容易地就录取了。但是政局变动得很厉害，我在那里只读了半年。

第二章　在动乱中成长起来

当我在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一次读到报纸，报名《民力》[2]，是民族主义派的革命的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3]领导下的七十二烈士就难的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感动，并发现《民力》里面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这时，长沙正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异常，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可是有点糊里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我不很明了他们和新领袖的区别。所以在我的文章中，我主张应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

---

[1] 此段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2] 《民力》应为《民立报》。是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余教仁、于右仁等主编的进步报纸。

[3] 湖南人，即黄兴。

为任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其时“反对外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成立议会制度的要求也普遍地展开，但结果皇帝只是下诏组织“咨议会”。于是同学们越来越激动了。他们以反对留辫的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毅然剪去发辫，但约好相继剪去的一般人却不履行他们的诺言。因此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并强力剪去他们的发辫，结果有十个人做了我们剪刀下的“牺牲者”。这样，在短期内，我已经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发辫进步到要求普遍地剪发了。政治观念是如何地可以转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关于蓄辫我和一个法律学校的朋友发生争论，各人执持了相反的理论。这法科学生引用经书上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话来辩论。可是我和反对蓄辫的人们在反满的政治基础上造成了相反的理论，使他开口不得。

武汉起义（一九一一年十月）之后，湖南宣布戒严。政局在急遽地变动。一天，有个革命党得了校长允许，到一个中学里面作煽动的演讲。当场有六七个学生起来声援他，痛斥满清并号召大家起来建立民国。每一个人都专心一意地听着。

听过这个演讲四五天之后，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

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我回到自己的学校，那里已在军队的看守下了。

第二天，一个都督政府成立，但新都督和副都督并未做得长[1]，一般地主和商人不满意他们。不到几天后，我去访问一个朋友时，看见他们的尸首横陈街上。作为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谭延闿打倒了他们。

现在有许多学生参加军队了。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清帝尚未逊位，这正是奋斗的时候。

我的饷银是七元一月——不过，已经多于目下我在红军的饷银了——其中我每月要用去两元吃饭。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都要从城外挑水进来，而我是学生，不屑做挑水的工作。

此外多余的饷银都用在报纸上，我变成它们的热心读者了，在当时与革命有关的报纸就是《湘江日报》。其中讨论到社会主义，我从这上面初次知道这个名词。我也和其他学生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其实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答表示同意。

我同队中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极欢喜他们。其余的人都是平庸之辈，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又劝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队长及一般弟兄都合得来。我能写，读过一点书，他们很佩服我的“博学”。我能够帮助他们做写写家信之类的事情。

革命的结局还没有决定。满清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国民党内

---

[1] 据《西行漫记》载，新都督和副都督分别是“哥老会”的两名首领焦达峰和陈作新。

部又发生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在湖南听说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有许多军队都组织起来反对满清和袁世凯。湘军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正当湘人准备起事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

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

我发现在这新学校中的困难就是一大半课程都是用英文教的，而我和一般同学一样，英文程度很坏，简直只认识字母。此外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校中没有英文教员。我讨厌这种情形，就在月底退学，并继续阅读广告。

我在学业上的第二次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了一块钱报名，应了入学考试，以第一名被录取。这是一个大学校，有许多学生，毕业的也很多。校中有一个国文教员十分地帮我，因为我有文学的倾向。这位先生借了一本《御批通鉴辑览》给我，其中有乾隆的诏谕和批评。

这时，一个政府办的刊物在长沙出版。这是一个巨大的烽火，我们学生觉得它非常有意味。不久，谭延闿被袁世凯赶走了。现在袁执掌着民国的政务，同时准备他的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

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1]。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混合起来。[2]

那时，我住在湘乡县同乡会馆里。那里还有许多士兵——都是“退伍”或被解散的人，没有事做，也没有钱。会馆中的学生和兵士总是在吵架，有一夜，他们之间爆发了武力的冲突。兵士们攻打学生并且要杀死他们。我逃到洗澡间里去躲避，一直等到打完。

这时我没有钱用，因为家里不给我金钱，除非我进学校。又因为会馆不能再住下去，我开始寻找新的托身之所。同时，我恳切地考虑了我的“职业”，并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现在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个动人的广告，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两个朋友也劝我进去。其实是他们要我帮他们预备入学论文。我将自己的意志写信给家里，得到他们的同意。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自己做了一篇。结果一齐录取——实际上，是我被取了三次。那时我并不以为抢替[3]是一件不好的事，这仅仅是一种友谊。

在这个师范学校中，我做了五年学生，并且居然拒绝了此后一切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真的毕业了。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

---

[1] 舆图，即地图。

[2] 此段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3] 抢替，就是代替的意思，替别人捉刀。亦说“枪替”，即现在流行的“枪手”之说。

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新校中有许多规则，只有极少几条我是同意的。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中的必修课程。我希望专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并无特殊兴趣，我不读它们，于是这些课程的分数大都很坏。我最讨厌的就是必修的静物写生。我以为这是透底的愚笨。我总想画简单的东西，快快画完就离开课室。记得有一次画一幅“半日半石”（是李太白的一句名诗）[1]，我用一条直线和上边半个圆圈来代表。还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就算数了，我称之为鸡蛋。结果画图得到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的分数都非常好，这样和其他课程的坏分数扯平。

这里有个国文教员、绰号“袁大胡子”，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品。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通。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杨昌济），过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伦理学。他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心力》（《心之力》）。那时我也是一个观念主义（唯心主义）者，我的文章大受杨教授的赞赏。给我那篇文章一百分。[2]

另外有一个教员常给我看旧的《民报》，我总是十分高兴地读

---

[1] 据《西行漫记》载，李白的这句诗为：半壁见海日。

[2] 此段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它。从这上面我愈加清楚同盟会的活动和会纲了。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次年夏，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

我感觉自己需要几个亲密的同道。一天，我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热心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前来和我接触。我指明要坚强不屈，愿意为国牺牲的青年。广告登出后，我得到三个半答复。一是罗章龙，他后来加入共产党随后又背叛党。其余答复是两个青年的，后来变成极端的反动分子。“半”个回答是一个不加可否的青年的。他叫李立三。李听完我所讲的一切话，然后一声不响地走开，过后我们的相识并且进而成为友谊。[1]

但是，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2]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

---

[1] 此处《西行漫记》中有不同记载为：“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2] 这个团体即后来建立的新民学会。

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普通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1]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用人[2]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我们又是热心的体育家，在寒假中，我们在田野里，山上山下，沿着城墙，跨越溪流地行走。天雨时我们就脱去衣服，名之为“雨淋浴”。阳光灼烁时，我也剥去衣服，名之为“日光浴”。春风和暖时，我们又算是一种新运动，叫“浴风”。在已经结霜的天气，我们还露宿田陌间，或是十一月，我们还在寒溪中游泳。凡此种种，都算是“体格训练”。也许这对我的身体大有裨益，后来我是何等的依靠它！在我屡次横越华南，和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的时候。

我和其他城镇里许多学生和友人建立了广大的通信关系。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一个有着更密切联络的组织的必要了。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3]。会员的大部

---

[1] 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谈论女人，通常是当时那个年龄的青年人生活中的一件占有重要位置的事情。

[2] 用人，即仆人。

[3] 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李维汉）、夏曦、何叔衡、郭亮、萧子暲、蔡和森、萧铮等。

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同时，在中国其他部分，像这类的激进团体都由那时在中国政治上占有势力的战斗青年纷纷组织起来。

这许多团体大半都是在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影响下组织起来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阅读这本杂志了。并且十分崇拜陈独秀和胡适所作的文章。他们成了我的模范，代替了我已经厌弃的康有为和梁启超。

在这个时期，我的头脑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有趣的混合物。我模糊地景仰“十九世纪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坚决地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

我是一九一三年入师范学校的，于一九一八年毕业。[1]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我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连所有学费在内！在这个数目里面，一定有三分之一是用在报纸上面的，因为经常订阅书报费每月约需一元，此外我还时常向报摊购买书籍和杂志。父亲责备我，说是浪费。他说这是在废纸上花钱。不过我已经养成了读报的习惯，而且从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七，当我和中国最初的红军一部分爬上井冈山时，我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末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更打断我回家的心向。是夏，我决定到北平——那时叫北京——去。当时，许多湖南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工读，在大战时，法国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招募中国青年的。在出国以前，这般青年预备先在北平读法文。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在这一群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

---

[1] 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是1912年进湖南师范学校的。

学生，后来大半都变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我陪了几个湖南学生到北京去，不过，虽然我帮助他们实现这个计划，并且他们受新民学会的帮助，但我本人并没有到欧洲去，我认为我对于本国还未能充分了解，而且我以为在中国可以更有益地花去我的时间……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和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大半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都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我服务北大时所遇的人中，有两个现在是南京的高级官吏，一个是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还有个加入共产党随后又成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再有一个则后来加入加利福尼亚的“三K党”。[1]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她是我的好友杨教授的女儿。

我对于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高，同时我的头脑愈来愈激烈。至于所以会如此的背景则上面已经讲过了。不过，当时我还在彷徨，还在“找出路”。我读了几本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和一

---

[1] 据《西行漫记》载，这几个人依次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谭平山和康白情。

个常来看我的北大学生[1]，时时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

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不过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旅途中，我在曲阜下车访孔子墓。我去看了孔子和门徒濯足的溪水，圣人幼时所居的小村，我看见孔子手植的树。我又访问颜回的住处和孟子的生地。在旅途中，我还登游过泰山，就是冯玉祥将军退隐时写爱国诗的地方。

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

回转长沙以后，我就在政治上做更积极的活动了。自五四运动以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湖南学生报纸

---

[1] 据《西行漫记》载，这个北大学生名叫朱谦之，原文为Chu Hsun-pei。

《湘江评论》的编者，这个报纸对于华南的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在长沙，我帮助成立文化书社，这是一个研究新文化和政治动向的团体。这个书社和新民学会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大混蛋张敬尧。新民学会更是厉害，领导了一次学生大罢课来反对张。要求将他撤换，同时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去煽动反对张敬尧，当时孙中山在西南活动。张为报复起见，就禁止《湘江评论》出版。

这件事过后，我代表新民学会到北平去，并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反军阀的运动，新民学会将反张的斗争扩大而为普遍地反军阀的运动了。在北平我做了一个通讯社的社长，来推动反军阀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得到了相当的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打倒，并在湖南成立了一个新政体。这时，学会中开始分成两派，左翼和右翼——左翼主张实行一个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彻底改革的纲领。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一度碰到陈独秀。我和他第一次相见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给我的影响也许比那里任何人所给我的都大。那时，我也见过胡适，访问他，要他援助湖南的学生斗争。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的计划，组织一个“湖南建设协会”。随后我回长沙，开始组织这个协会。[1]我在那里得到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里的活动，那时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计划。

一九二〇年冬，我第一次将工人政治地组织起来，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苏联革命史的影响下领导他们。我第二次到北平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

---

[1] 在《西行漫记》中这个协会叫“改造湖南联盟”。

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资基[1]的《阶级斗争》和吉古柏[2]的《社会主义史》。一九二〇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与杨开慧结婚。

第三章　揭开红史的第一页

一九二〇年夏，我赴沪参加会议，共产党就在这个会议上成立。[3]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中，陈独秀和李大钊占着领导的地位，无疑地，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灿烂的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我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这个历史的上海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一共十二人。是年十月，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其中的一员。当时在其他省县中也有组织成

---

[1] 一译考茨基。

[2] 一译柯卡普。

[3] 《西行漫记》记载为：“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

立……[1]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几乎同时成立……在德国也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不过较迟，党员中有朱德。在莫斯科和日本也有支部成立。[2]

到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支部已经在矿工、铁路工人、公务人员、印刷工人及造币厂工人中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工会，当时我是支部的书记。是冬，猛烈的劳工运动开始。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学生和工人之间，在农民中的工作极少。多数大矿山和全部学生实际上都已组织起来。在学生和工人的战线上都有许多斗争。一九二二年冬，湖南赵省长（赵恒惕）[3]下令处决两个工人领袖（一个叫黄爱，一个叫庞人铨），结果引起了一个广大的激动，开始反对他。在这两个被杀的工人中，有一个是右翼劳工运动的领袖（即黄爱）。右翼运动的基础是工业学校的学生，而且是反对我们的。不过在这一次和许多次其他的斗争中，我们援助它。在工会中，无政府主义者也有相当势力，当时各工会已经组织到“全湘劳工组合”（湖南全省劳工会）[4]里面。可是，我们和他们妥协，并且用协议的方法阻止了他们许多次鲁莽而无用的举动。

我被派到上海来帮助组织反赵运动。是冬（一九二二年）共产

---

[1] 据《西行漫记》载，当时其他党中央组织的成员有：上海的陈独秀、陈公博、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李达和李森；湖北的董必武、许白昊、施洋；陕西的高崇裕；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广州的林伯渠、彭湃；山东的王尽美和邓恩铭等。

[2] 据《西行漫记》载，在法国，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罗迈（李维汉）和蔡和森；在德国，有朱德、高语罕和张申府；莫斯科支部的创始人有瞿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3] 此文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4] 此文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会议。我心中想去参加，可是我忘掉开会地点的地名，找不到任何同志而失去参加的机会。我回转湖南，并竭力推动工会的工作。是年春，发生许多次罢工，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较好的待遇，和争取工会的承认。多数罢工都是胜利的。五月一日湖南发动了一次总罢工，这件事指出了中国劳工运动空前力量的成功。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一九二三年在广州召开的，通过了那历史的决议案：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并组织联合战线以反对北洋军阀。我跑到上海去，并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次春（一九二四年）我到广州去，并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三月间回沪，将我在共产党执行部的工作和我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中的工作合并起来。当时部中还有的几个人，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起工作，调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步骤。是夏，黄埔军官学校成立，加伦（现在叫伐西里·布留契尔将军，任苏维埃远东红军总司令之职）担任顾问，还有其他从苏联来的苏维埃顾问。国共的合作开始采取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是年冬，我回湖南休养——在上海时，我生了病。可是回到湖南后，我组成了本省伟大农民运动的核心。

在以前我还未充分了解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以后，和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活动的大浪中，湖南农民变成十分地活动[1]了。我利用我所休养的家庭，发动一个农村组织运动，在仅仅几个月内，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同时引起了地主的怨毒，要求将我逮捕。赵省长派兵来抓我，我逃到广州。到达广州时，黄埔学生刚打败了两个著名的军阀[2]，全城

---

[1] 这里的“活动”应该是活跃的意思。

[2] 这两个军阀即云南的杨希闵和广西的刘震寰。

和国民党都充满了乐观的空气。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后，蒋介石先生被任为总司令，汪精卫任政府主席。

我成了《政治周刊》的主编，这是一个国民党的刊物，后来曾极力攻击国民党右翼。我同时又成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者的负责人，并开了一个训练班来训练他们。听讲的有二十一个省份的代表，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在我到广州后不久，我成了国民党宣传部的部长。

我写作越来越多了，同时在共产党农民工作中负有特殊责任。根据我的研究和在组织湖南农民的工作中所得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层〈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在第一本小册中，我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施激进的土地政策和积极地组织农民，陈独秀反对这个意见，并拒绝以共产党中央机关的名义出版。后来，它在广州的《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上发表。至于第二本书则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在湖南出版的。这时我开始不满意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渐渐远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最高峰。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中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一九二六年春，在国民党左右翼和解而国共也重行合作以后，我回到上海。是年五月，国民党在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开第二次大会。在上海，我指导着共产党的农民部，并被派到湖南做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共合作之下，于一九二六年秋开始这历史的北伐。

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1]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次春初旬，当我抵武汉

---

[1] 这五个县即：长沙、醴陵、湘潭、衡山和湘乡。

时，那里正在举行各省农民代表会议，我就去参加并讨论建议我的主张，即实行广泛的土地分配。大会决议把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但党中央将它否决了。

当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时，党还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反对，还是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时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今日之下，我想假若当时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作反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现在的情势就要大大地不同了。中国苏维埃的势力必定较现在大为强盛。

可是陈独秀十分不同意我的见解。他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任务，并将当时农民的前途估计过低，因此，在大革命的危机前夜所召开的第五次大会上，不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策。我的意见，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竟不加以讨论，因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为陈独秀所把持，拒绝将它提出考虑。大会将“地主”定为拥有五百亩以上的人——要在这种基础上发展阶级斗争，是全然不适合和不切实际的，而且忽视了中国土地经济的特质——这样就撇开了土地问题。不过，在大会过后，一个“全中国农民协会”组织起来，我成了它的第一任主席[1]。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农民运动在湖北、江西、福建，尤其是湖南，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军事力量，虽然共产党的态度对它很冷淡。高级官吏和军事长官开始要求镇压它，说农民协会是“流氓协会”[2]，它的行动和它的要求都是非分的。陈独秀将我调开湖南，因为那里发生了几桩事件，他要我负责，并且猛烈反对我的观念。

---

[1] 在《西行漫记》中，“第一任主席”译为“第一任会长”。

[2] “流氓协会”在《西行漫记》中译为“痞子会”。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了反共的运动。在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五月二十一日，湖南发生了一次暴动，有几十个农人和工人被杀。此后不久国共就分裂了。

许多共产党领袖现在都奉命离开武汉，到苏联或上海或其他安全的地方去。我奉命到四川，我请求陈独秀派我到湖南去，任省委员会的书记，但是十天之后，陈命我速回，责备我组织一个反对当时统治湖南的人的运动。[1]党里的事务现在是一塌糊涂了。几乎每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国共合作的解体不久也使他没落。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贺龙和叶挺的部队，与朱德合作，领导了历史的“南昌暴动”[2]，并组成了后来变成红军的第一个部队。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的中央委员会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罢免陈独秀书记之职。自一九二四年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大会起，我一直是党的政治局中的人员，并促成了这次决议（罢免陈独秀）。党采取了一个新路线，放弃所有合作的希望。开始了长久的公开的争夺政权的斗争。

我被派到长沙去组织一个运动，就是后来叫做“秋收暴动”[3]的。我在那里的计划是要实现五点：共产党省党部完全与国民党脱离；组织农工革命军；没收大中小地主的财产；脱离国民党，在湖南建立共产党政权；组织苏维埃。当时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才进展成为一个口号。

---

[1] 在《西行漫记》中，此处为：“指责我组织暴动反对当时在武汉当权的唐生智”。

[2] 即南昌起义。

[3] 即秋收起义。

到了九月，靠了湖南的农民协会，我已经组成一个普遍的暴动，并成立农工军第一队。我的部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农民本身，安源的矿工和国民党中叛变的军队。这个早期的革命军队叫作“第一农工军第一师”[1]，是经过省委员会批准后组织起来的。但是湖南省委会的和我部队的总纲领为党的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它好像只采取一种观望的政策并未作切实的反对。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军之间时，我被几个民团捕获。那时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枪毙。他们命令将我解到民团总部，要在那里杀死我。不过，我曾向一个同志借了几十块钱，我想用它贿赂护送兵来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雇佣的兵，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兴趣看我被杀，所以他们同意释放我。但是那个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应，因此我决定还是逃走，但是一直到我距民团总部二百码的地方才有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挣脱了，跑到田野里去。我逃到一块高地，在一个池塘的上面，四周都是很长的草，我就躲在那里一直到日落。士兵们追赶我并且强迫几个农民一同搜寻。好几次，他们走到非常近的地方，有一两次近得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可是不知怎样地没有发现我，虽然有七八次我抛却希望，觉得一定再要被捕了。最后，到了薄暮的时候，他们不搜寻了。我立即爬越山岭，走了整夜。我没有鞋子，我的脚伤得很厉害。在路上我碰到一个农民，他和我很要好，给我住宿，随后又领我到邻县去。我身上还有七块钱，拿它来买了一双鞋子、一把伞和食物。当我最后安抵农民自卫军的时候，我的衣袋中只有两个铜元了。

---

[1] 这个军队在《西行漫记》中称作“工农第一军第一师”。

随着第一师的成立，我成了它的前敌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不过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1]不久，他就弃职加入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手下，供职南京。

这个小小的军队，领导着农民暴动，向湘南移动。它冲破了成千成万军队，作了许多次战争，吃了许多次败仗。当时的军纪很坏，政治训练的水准很低，而官兵中有许多动摇分子，所以“开小差”的人很多。在第一届司令逃走后，军队改组，剩下来的队伍约有一团人，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2]也叛变了。但是在最初的团体中有许多人还是忠诚到底，到今天还在军队中。[3]当这一小队人最后爬上井冈山（一个近乎不毛的山寨，以前为盗匪盘据）时，军队的数目只有一千左右了。

因为“秋收暴动”[4]的计划没有被中央委员会批准，又因为部队受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从城市的观点看来这个运动好像一定要失败的，现在中央委员会坚决地排斥我了。将我从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中革出。湖南的省委会也攻击我，称我们为“劫掠运动”[5]。可是我们依然带着我们的军队，留在井冈山上，一面确切觉得我们在执行正确的路线，而以后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我们的正确。新的兵士添加进来，这一师又补充起来了。我成为它的司令。

---

[1] 《西行漫记》中，这个“前敌委员会的主席”译作“前敌委员会书记”，而那个“武汉军校的学生”名叫余洒度。

[2] 此人叫陈浩。

[3] 例如：罗荣桓、杨立三等将领。

[4] 即秋收起义。

[5] 《西行漫记》译为“枪杆子运动”。

从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秋，第一师以井冈山为根据地。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初的苏维埃，成立于茶陵，在江西、湖南省边境上，同时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也选举出来。[1]在这个苏维埃，及以后几年中，我们依据了迟缓但是有规律的发展，建立了一个民主的纲领，伴随着一个温和的政策。这使井冈山备受党中央“盲动主义者”谴责，他们要实施一个恐怖政策，劫掠和杀戮地主并焚烧他们的财产以摧毁他们的胆量。第一师的前敌党委会拒绝采用这种策略，于是被一般盲动者戴上了“改良主义者”的帽子。我备受他们的攻击，因为不实行一个更“激烈”的政策。

一九二七年冬，两个以前盘据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三团左右。这两个人[2]虽然以前是盗匪，曾率领部下投效国民革命军，现在更准备与反动势力斗争。当我留在井冈山上的时候，他们始终是忠实的共产主义者，执行党的一切命令。可是到后来，到他们单独留在井冈山时，他们又回复了昔日的强盗脾气，结果被农民杀死。因为那时他们已经组织起来，已经苏维埃化，能够保卫自己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井冈山，我们的力量合并起来了。我们共同拟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六县的苏维埃区，我们要稳定和加强湘赣粤三省接境区域的共产党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渐发展到更广大的区域中去。这种策略与党中央办法相反，他们有着迅速扩展的妄想。在军队本身，朱德和我不得不与两种倾向搏斗：第一，要想立即进攻长沙，这我们以为是“冒险主义”；第二，要想退

---

[1] 据《西行漫记》载，这个苏维埃政府“主席是杜修经”。

[2] 据《西行漫记》载，这两个人就是王佐和袁文才。王、袁都被任为团长，毛泽东任军长。

到广东省境之南，这我们以为是“退却主义”。当时我们的见解，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二：平均地权和建立苏维埃政体。我们要武装群众以加速这种过程。我们的政策要实现自由贸易和善遇被俘的敌军，一句话，就是民主的中庸。

一九二八年秋，一个代表会议在井冈山召开，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的苏区代表。当时各苏区的党员对于上述的政策还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这种异点彻底地消除了。一小部分人以为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大多数人信仰这个政策，因此，党决议提出，宣布苏维埃运动一定会胜利的时候，很容易地就通过了。不过党中央还没有对这个运动批准。一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当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的决议录的报告到达井冈山时，才得到批准。

关于在那个会上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时起，党的领袖和在乡村中从事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争点完全消除，而党的调和与一致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综括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经验，南昌、广州和秋收暴动的经验，决定应该强调土地革命运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其他部分出现，贺龙在西面，徐海东在东面，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农工红军。同时，在一九二七年冬，在邻近福建的江西省东北境上，也发动了一个运动，后来并由此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一些红军部队都跑到海陆丰去，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苏维埃，但因为它信奉盲动主义，很快地就被破坏了。一部分部队从那个区域里出来，

与朱德和我取得联络。[1]

当我们在井冈山上“对冒险主义斗争”的时期中，我们击败了两次军队夺山的企图。井冈山证明了是我们所建立的这一种流动部队的绝好根据地。那里有很好的天然防御，并出产足够的收成来供给一个小小的部队。它的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在当地，它的名字是另外一个，叫“大小五镇”（真正的井冈山是附近的一个山）[2]。

山上的情况，因来了这样多的军队，变得十分恶劣了，军队没有冬季制服，食粮也极度稀少。有几个月，我们简直靠南瓜过日子，士兵们喊出一个他们自己的口号：“打倒资本主义，吃尽南瓜!”——因为在士兵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和地主的南瓜。留下彭德怀在井冈山，我和朱德冲破了军队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在这个久经战阵的山上所造的第一个居留地就算是终结了。

现在红军开始在江西一带作战，并且顺利地迅速发展起来了。我们在闽西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并和当地的红军联合起来。我们分出军力，继续占领三县并建立了苏维埃。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先，那里已经有了武装的群众运动，这样，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并且使我们能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很快地加强了苏维埃政权。

第四章　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

---

[1] 据《西行漫记》载，江西的运动是由方志敏和邵式平领导的，海陆丰的运动是彭湃领导的。“广州暴动”即“广州起义”。

[2] “大小五镇”在《西行漫记》中称作“大小五井”，“五井这个名称是从山麓五口大井得来的，即大、小、上、下、中五井，山上的五个村就是以这五口井相称”。

红军的情况在物质和政治两方面，都开始有进步了，但其中还有许多恶劣倾向。例如，“游击主义”就是一个弱点，这反映了训练的缺乏、民主政治的夸大观念和组织的松懈等等。还有一个倾向不得不与之搏斗的，就是“流氓性”[1]——不喜欢在政府的严重工作中安身，喜欢变动和新的事物。还有一种是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官长虐待甚至殴打弟兄，并且随意反对自己个人所讨厌的人，而对其余的表示好感。

许多这些弱点，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闽西的一个会议召开后，都一一克服了。会议中讨论了各种改进的思想，消除许多误解，并采用新计划，这样奠定了红军中崇高的意识领导的基础。在这以前，这些上面提过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并且为党中“托派”和军事领袖所利用以削弱这个运动的力量。这时我们展开了对“托派”的猛烈斗争，好几人被剥夺了他们在党中和军队中的职位。我们发现了他们在战时常领导红军陷入艰难的地位，企图毁坏红军；在几次败仗以后，他们的计划是十分明显了。经验显示了他们的错误，将他们从负责的职务中革除，并且在这个会议后他们就失势了。[2]

福建会议开辟了建立江西苏维埃政权的道路。次年，赣南全部掌握于红军手中。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一个重要的地方会议在赣南召开，讨论苏维埃以后的纲领。到会的有党政军的地方代表。会中，土地政策经过长时期的辩论，而对“机会主义”（为反对重新分配土地的人所领导）的斗争是克服了。大会决议实施土地分配和加

---

[1] 这里的“流氓性”，即指“流寇思想”。

[2] 这次会议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即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托派”即“托洛茨基派”。

速苏维埃的建立。当时，红军只是成立了地方苏维埃和县苏维埃。在大会上，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兴国。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援助。

渐渐地，红军对群众的工作进步了，军纪加严，而组织群众的新技术也在发展起来。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已经对战斗员订下了三条简单的规则，即：服从命令；不没收任何贫农的财产；将一切没收地主的物品立即交给政府处置。在一九二九年的会议后，对于取得农民帮助的工作异常努力，在上述的三条之外，另加了八条规则：

一、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

二、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

三、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

四、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

五、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

六、和农民以诚相待；

七、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

八、讲卫生，尤其是要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1]

这八点的施行，愈来愈见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规律，要他们记忆并时时复诵。另有三种任务要教给红军，当作它的基本宗旨的：第一，誓死与敌人斗争；第二，武装群众；第三，捐钱帮助战争。

除开这种运动的政治基础不算，红军的战术也进步了，这是顺利的军事发展的原因。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口号

---

[1] 此八条即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主要内容。

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了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一般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红军战术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在攻击时集中它的主力，而随后能加以迅速地分散。这就是说，要避免阵地战，而在运动中要用尽各种方法和敌人的部队接触并且击溃它。根据这种方策，虽然许多有经验的军人不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一般苏维埃区的发展中，红军是偏于一种“波浪式”的发展的，而不是那种不平衡的前进——以“飞跃”获得的前进，并不巩固所占领的土地的前进。这种政策是切乎实际的，正和上述的战术一样，是从多年所积聚的军事政治的经验而来的。这些战术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书记李立三的严厉批判，他说红军的方法是一种“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李立三希望攻击而不要防御，前进而不要巩固后方；对大城市加以惊人的攻击，伴随着暴动和极端主义。当时，李立三路线把持了苏维埃区以外的党部，并且势力很大，并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

一九二九年秋，红军移到赣北，攻击和占领了许多城市并击退敌军多次。当红军距南昌极近时，它突然折向西面进取长沙。在这次进军中，我们和彭德怀的部队会合。彭已经占领过一次长沙，不

过终因受强大优势敌人的包围而退却。彭是一九二九年四月退出长沙的，此后，即在赣南一带活动，结果大大地增加了他的军队。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重与朱德和我会合，并在一个会议后，决定他应该在湘赣边区活动，而朱德和我则移到福建去。一九三〇年六月，我们重新建立了联络。并开始第二次进攻长沙。我们的军队都合并为第一方面军，以朱德为总司令，我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这时，中国农工革命委员会已经组织起来，我被选为主席。当时红军在湖南的势力很广大，在江西也差不多。我的名字流传湖南农民之间，因为捕获到我有十万重赏，不论生死，被悬赏缉捕的还有朱德和其他共产党。我在湘潭的土地（靠了这个地租我在大革命时代曾用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现在为政府没收了。我的妻妹被处决。其余的后来都释放了。[1]

红军的威信在农民中大为增高，而且竟达到我的家乡湘潭。因为我听说当地的农民都相信我不久就要回转家乡，并有一天，一架飞机飞过家乡时，他们断定这就是我。他们警告耕种我的土地的人，说我已经回来视察我的旧田庄，看看有没有树木被砍伐。假若树木被砍伐的话，他们说，我要向蒋介石先生索偿！

不过第二次进攻长沙失败了。大批援军开到，城中驻扎了大军，此外，在九月间，新的军队更源源开来攻击红军。在这次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主要的战争，此役我们消灭敌军两旅。不过，我们并没有能攻下长沙城，在几周后，我们就退回江西去了。

---

[1] 据《西行漫记》载，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和妹妹，还有其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两人的妻子，以及毛泽东的儿子，都被何键逮捕。其中毛泽东的妻子和妹妹被杀害。

这次失败，帮助我们毁坏“李立三路线”，并拯救了红军，使它没有向武汉进攻，这是当时李所要求的。当时红军的主要工作是招募新兵，开辟新的苏维埃区，尤其是巩固整个已经掌握在红军手中的区域的苏维埃政权，因为这一类计划，如进攻长沙等并非急务，而且含有机会主义的元素。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是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

但李立三将当时红军的战斗力量和民族政治背景的革命因素估计过高，深信革命已接近成功，而且不久就可以取得全国的政权。这种信仰更因受了当时的久长而疲竭的内战的鼓励，它使前途好像大大地偏护李立三。可是红军的意见以为：敌人正在准备大举进攻苏维埃，只要内战[1]一停止；而且现在不适于艰险的“盲动主义”和冒险。

在湖南事件之后，红军回到江西，尤其是占领吉安之后，在军队中，“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本人的错误已经证明，不久他更失去在党中的势力（李现在莫斯科“研究”）。不过，在“李立三主义”确定地埋葬以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危险的时期。一部分军队倾向李的路线，并要求与其他军队脱离。不过，这一部分的指挥员——彭德怀猛烈地与这种倾向搏斗，并能维持他部下的统一和对高级指挥的忠诚。但有一些红军部队公开叛乱了，并逮捕江西苏维埃的主席和许多官吏，并根据李立三路线从政治方面攻击我。这件事

---

[1] 此处的“内战”是指“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战争”。

在富田发生，就叫“富田事变”[1]。富田靠近吉安，是当时苏区中心，这件事产生了一种激动，许多人都以为革命的前途全要看这次斗争的结局如何了。但，因了党部的健全，红军部队的忠诚和农民的拥护，这次叛变很快也就镇压下去了。为首的被捕，其余叛徒都经缴械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加强，坚决地镇压“李立三路线”。结果，以后的苏维埃运动获得了重大的进展。

现在南京政府彻底感觉到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之大了，在一九三〇年底开始对红军的第一次的“围剿”。国军总共有十万人，开始包围红苏区，分五路进犯，当时红军共动员两万人来对付这些军队。靠了巧妙地利用计策战术，我们冲破了第一次“围剿”，获得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敌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敌军的人数对与大军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使我们可以暂时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我相信假若红军在这以前没有能得到以下三个条件，胜利是不可能的。三个条件是：在集中指挥下的我们力量的巩固；“李立三路线”的清算；党部对肃清红军及苏区中的“AB团”及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休息了只有四个月。第二次“围剿”开始了，由现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做最高指挥。他的军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攻苏区。一时苏区的情势好像很危险。因为苏维埃政权非常弱小，资源有限，而且国军的物力几乎各方面都远胜苏区。但红军仍抱定了前此得胜的同一战略应付这一次进攻。让敌军的纵队深入苏区后，我们的主力

---

[1] 据《西行漫记》载，“富田事变”的哗变者是第二十军的刘铁超。

突然集中在敌军第七路（第二路），打败好几个团，并摧毁了它主要的进攻的力量。在我们攻击以后，马上接二连三地依次击败了第三、第六和第七路。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一部分被击溃。在十四日之内红军作战七（六）次，行军八日，以决定的胜利结果这次战争。随着六路的溃崩或退却，第一路，蔡廷锴是指挥之一，没有大打就退了。[1]

三（一）个月后，以三个最有能力的指挥为辅，蒋介石先生率领三十万人作“赤区最后一次的清剿”。蒋企图以狂风骤雨的方法扫荡“赤匪”。他开始以每天八十里的行军进入苏维埃领土的心脏。这恰恰给予了红军所最擅长的战斗条件，它立即证明了这个战术的严重错误。以仅有三万人的主力，靠了一串灿烂的战略，我们的部队，在五日之内攻击了五个不同的纵队。在第一战，红军俘获许多部队和大量军火、大炮和军需品。到了九月，第三次“围剿”已经失败，十月间蒋撤回他的军队。[2]

现在，红军进入了一个较为平和及成长的时期，很快地扩展起来了。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召开，建立了苏维埃中央政府，以我为主席，朱德被选为红军总司令。同月，“宁都暴动”[3]发生，万余政府军叛变而加入红军……

现在，红军开始采取它自己的攻势，占领了好几个城市。从一九三二年起一直到长征西北为止，我个人的时间几乎全部限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军事指挥交给朱德和其他人。

---

[1] 此段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2] 此段括号中的文字根据《西行漫记》校订。

[3] “宁都暴动”，即宁都起义，是由董振堂、赵博生领导的，国民党二十八路军两万余人起义后参加红军，从而建立了五军团。赵博生后来在江西作战时牺牲，董振堂曾任红五军军长。

长征胜利达到陕北后的毛泽东（原载于美国《亚细亚》杂志）。

一九三三年四月，第四次“围剿”开始，也许是最艰险的一次。在第一战，敌军两师被缴械，两个师长及三万人被俘。另一

师，当时最精锐的一师，接着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重伤。这些捷战证明了战略有着决定的作用，第四次“围剿”不久就结束了。[1]

到第五次——最后一次“围剿”，蒋动员了近百万的军队并采用了一个新的战略和战术。在第四次“围剿”时，蒋已经采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开始利用封锁和堡垒制度了。到第五次“围剿”，他把全部信赖都放在这上面。用他的军队来实施严密的封锁和整个地包围苏区，他谨慎地推进。一面建造汽车路、堡垒和壕沟，避免主力和红军接触，并且仅仅在堡垒的后面作战，只是完全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之下，作短短的推进。

这时期，我们铸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一九三三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战略，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的结果，和国军的采取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一九三四年进行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在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移到西北去活动的决议。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

---

[1] 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先后歼灭了国民党第五十九师、第五十二师和第十一师。蒋介石当时曾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职业”，也是一种“无期徒刑”。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陈诚的总司令职务立即被解除。

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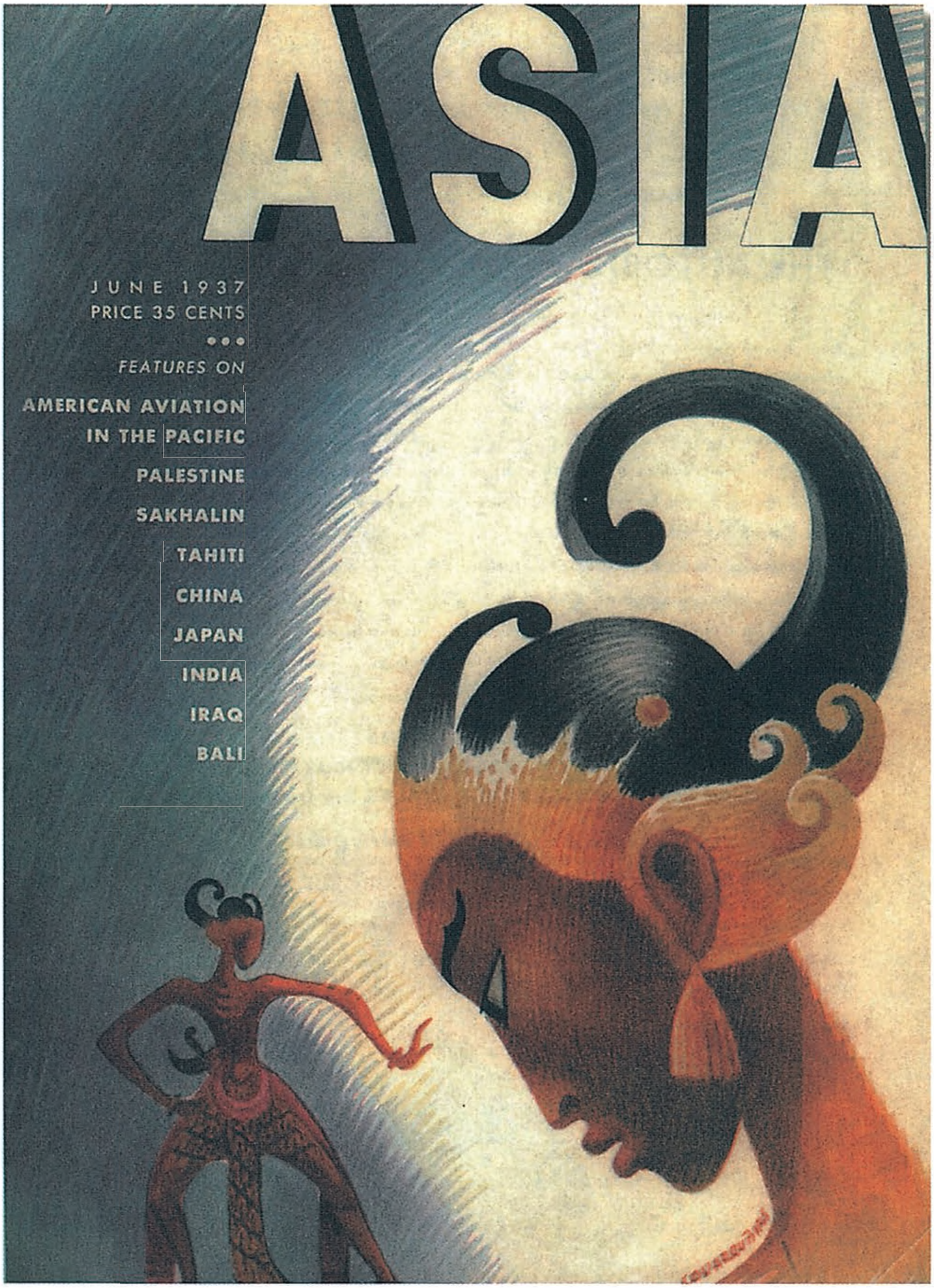
这个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围剿”，开始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在苏维埃首都——瑞金召开，对过去革命的所有成就加以检讨。会中我作了一个长报告，并且会中选出了今日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体人员，如今日存在着的。不久长征的准备开始了，这是在一九三四年十月着手的，恰在发动第五次“围剿”一年之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力抵贵州遵义。接下去四个月，红军几乎一直在流动之中，并发生了最激烈的战争。经过许许多多困难，跨越几个最高最险的山道，经过凶恶土番所居的地方，经过无垠的草原，经过严寒和酷热，经过风雪和暴雨，背后面对着全部国军的一半的追击，经过所有这些天然的障碍，沿途并与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和陕西的地方军队作战，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红军到达了陕西，并建立了在中国伟大的西北的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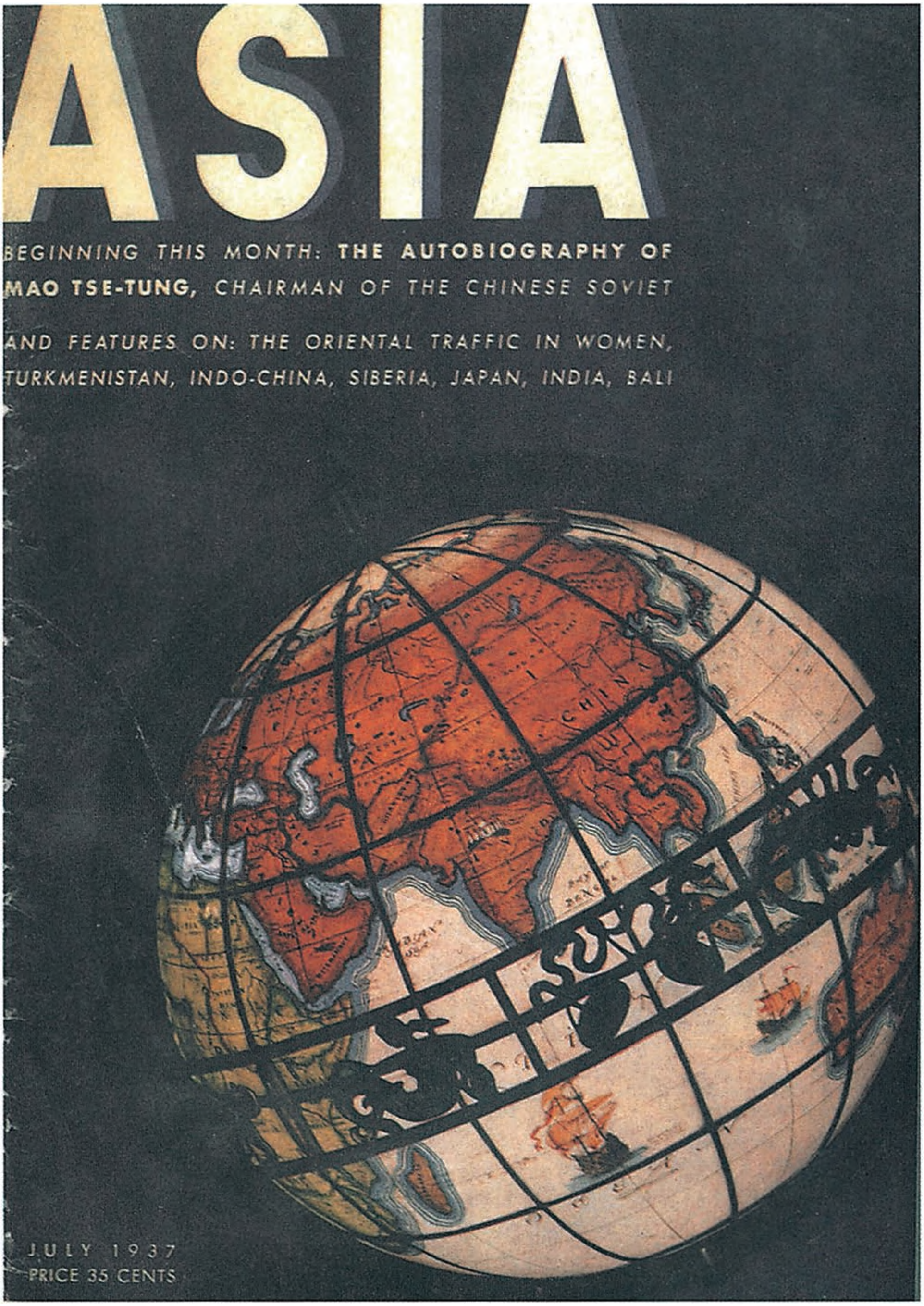
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到达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材的特别精干、

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ASIA
JUNE 1937
PRICE 35 CENTS
FEATURES ON
AMERICAN AVIATION IN THE PACIFIC
PALESTINE
SAKHALIN
TAHITI
CHINA
JAPAN
INDIA
IRAQ
BALI

刊行《毛泽东自传》之预告：蒋介石悬赏25万银元捉拿毛泽东的美国英文杂志《亚细亚》1937年6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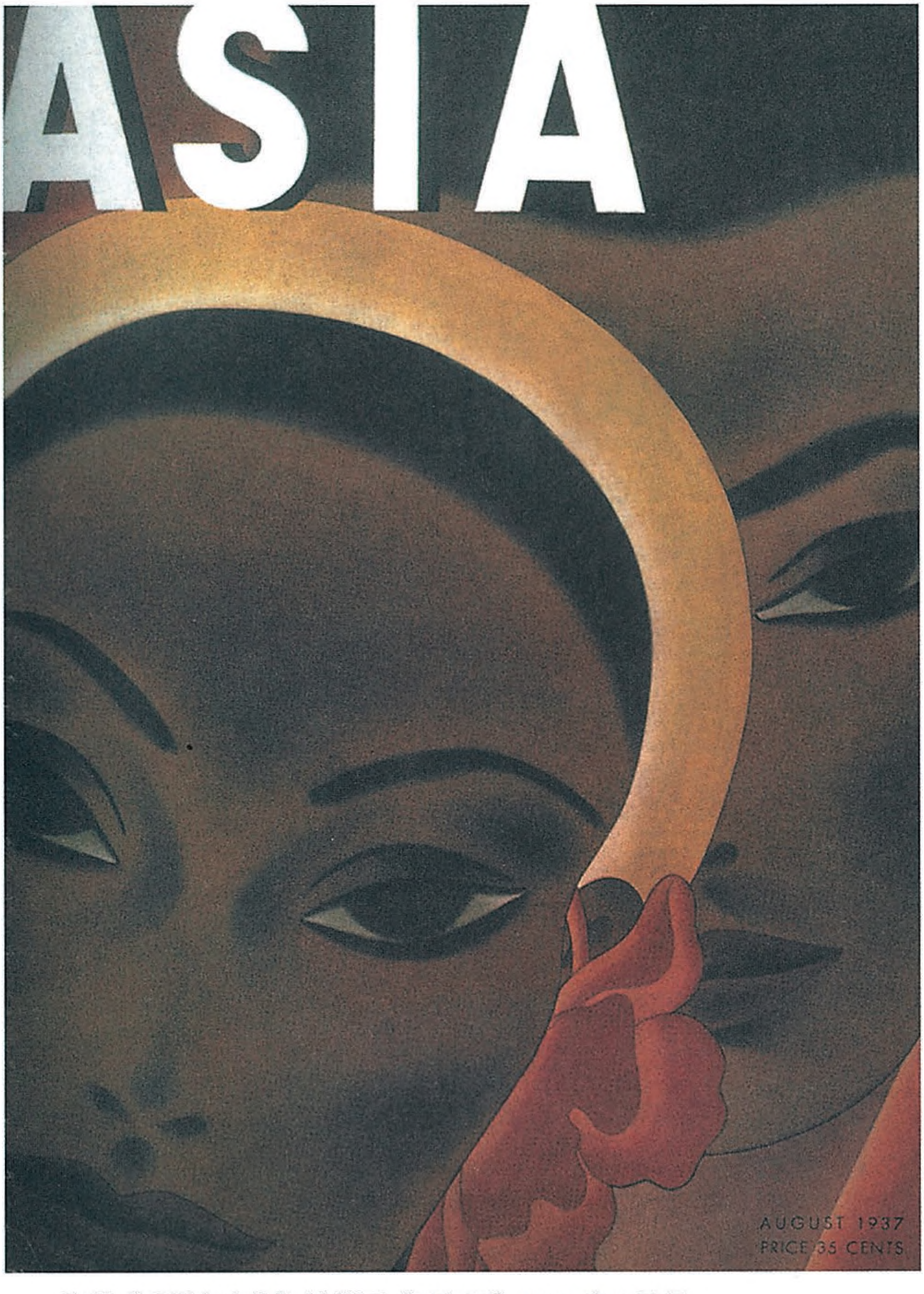
ASIA

BEGINNING THIS MONTH: **THE AUTOBIOGRAPHY OF MAO TSE-TUNG,**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SOVI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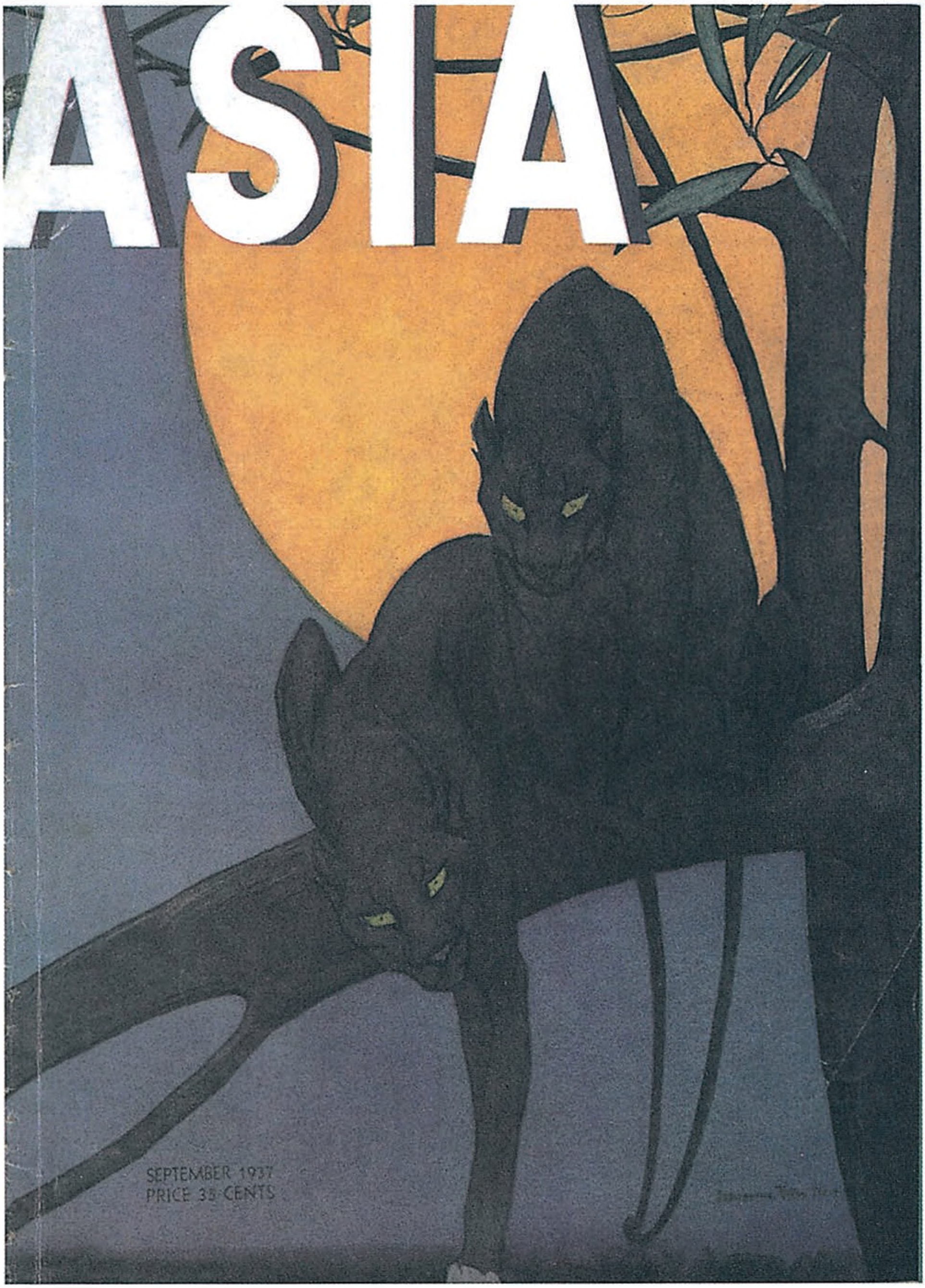
AND FEATURES ON: THE ORIENTAL TRAFFIC IN WOMEN, TURKMENISTAN, INDO-CHINA, SIBERIA, JAPAN, INDIA, BALI

JULY 1937
PRICE 35 C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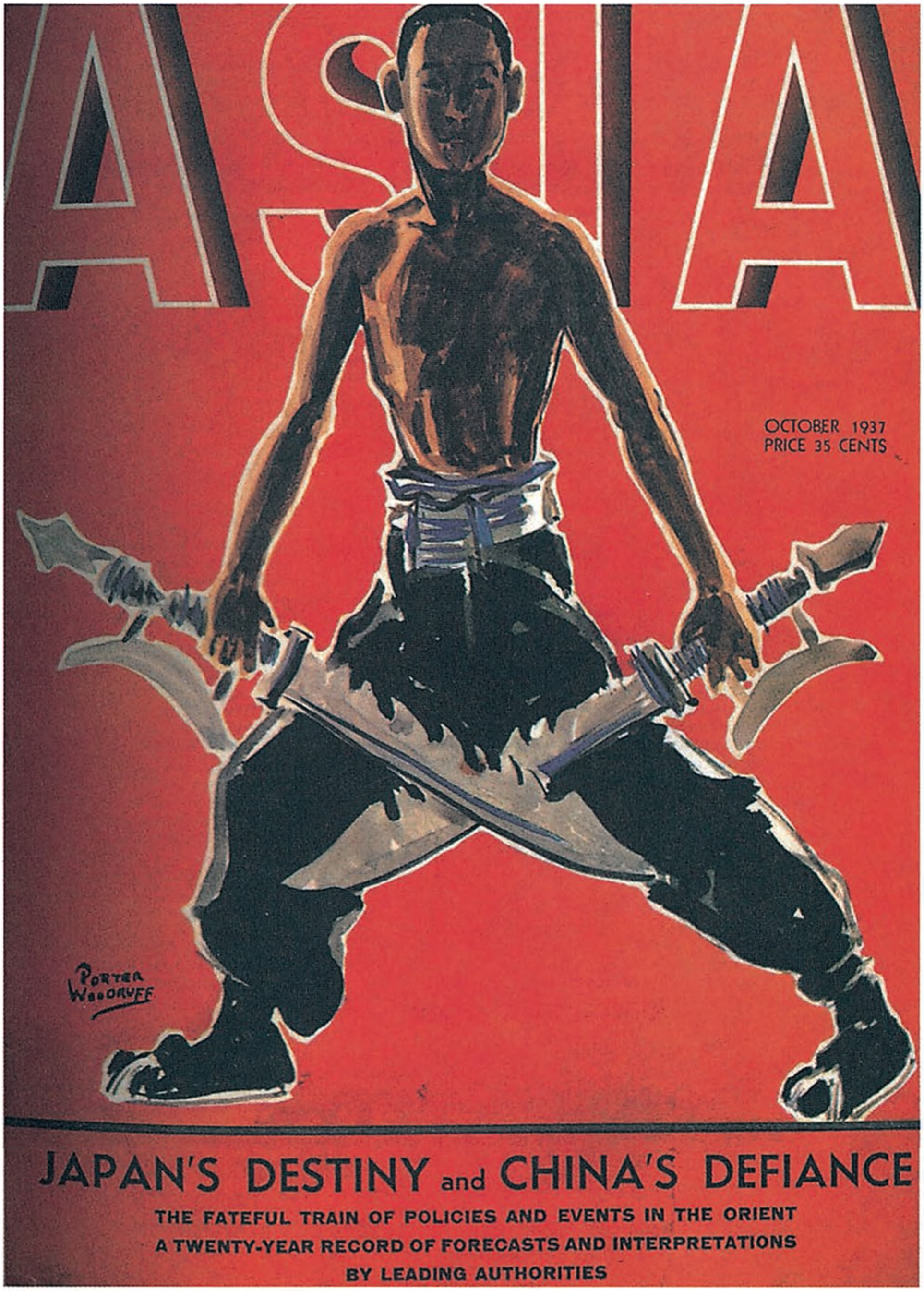
最早连载《毛泽东自传》的美国《亚细亚》1937年7月号。


ASIA
AUGUST 1937
PRICE 35 C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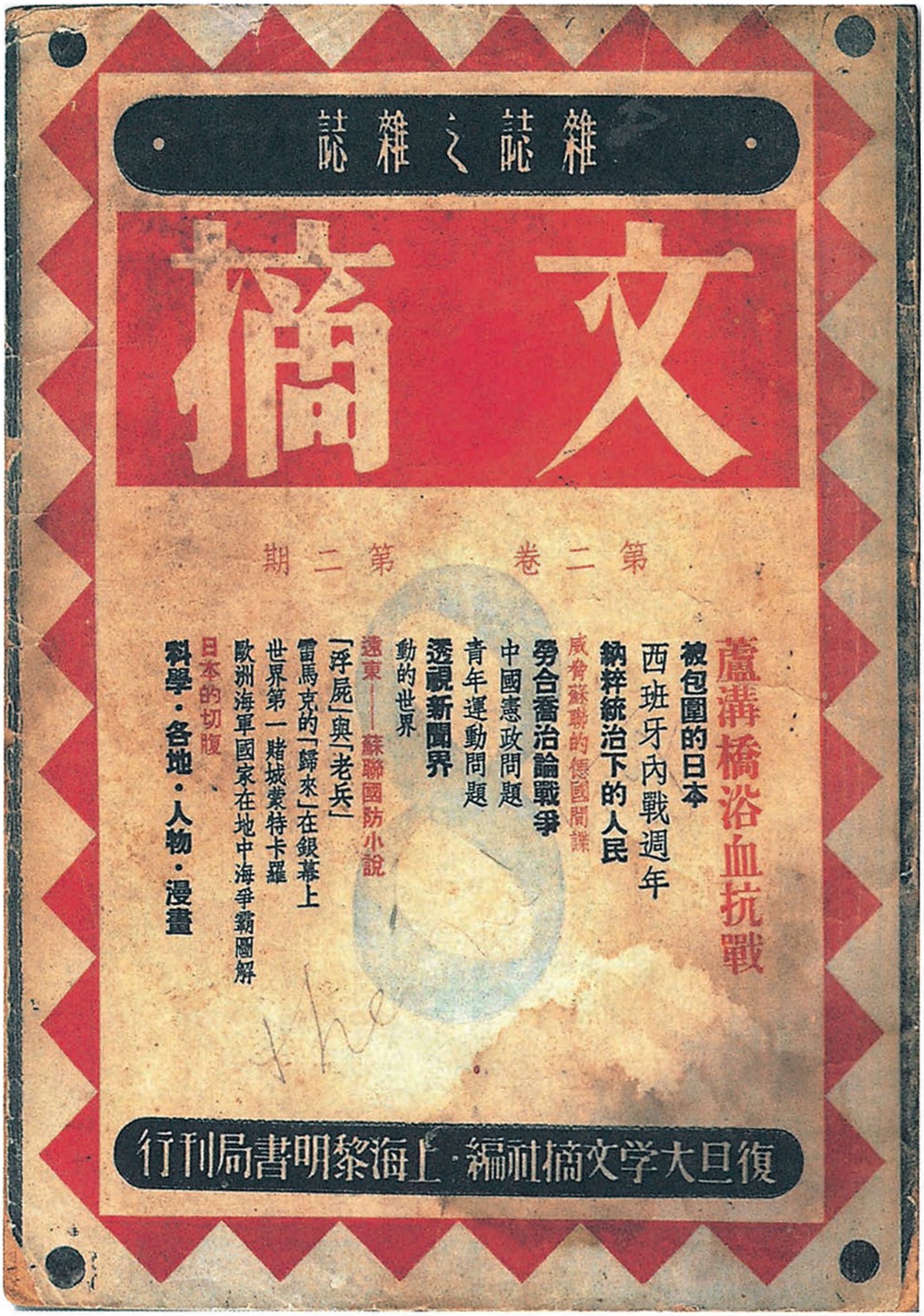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美国《亚细亚》1937年8月号。


ASIA
SEPTEMBER 1937
PRICE 35 CENTS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美国《亚细亚》1937年9月号。


ASIA
OCTOBER 1937
PRICE 35 CENTS
PORTER WOODRUFF
JAPAN'S DESTINY and CHINA'S DEFIANCE
THE FATEFUL TRAIN OF POLICIES AND EVENTS IN THE ORIENT
A TWENTY-YEAR RECORD OF FORECASTS AND INTERPRETATIONS
BY LEADING AUTHORITIES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美国《亚细亚》1937年10月号。



雜誌之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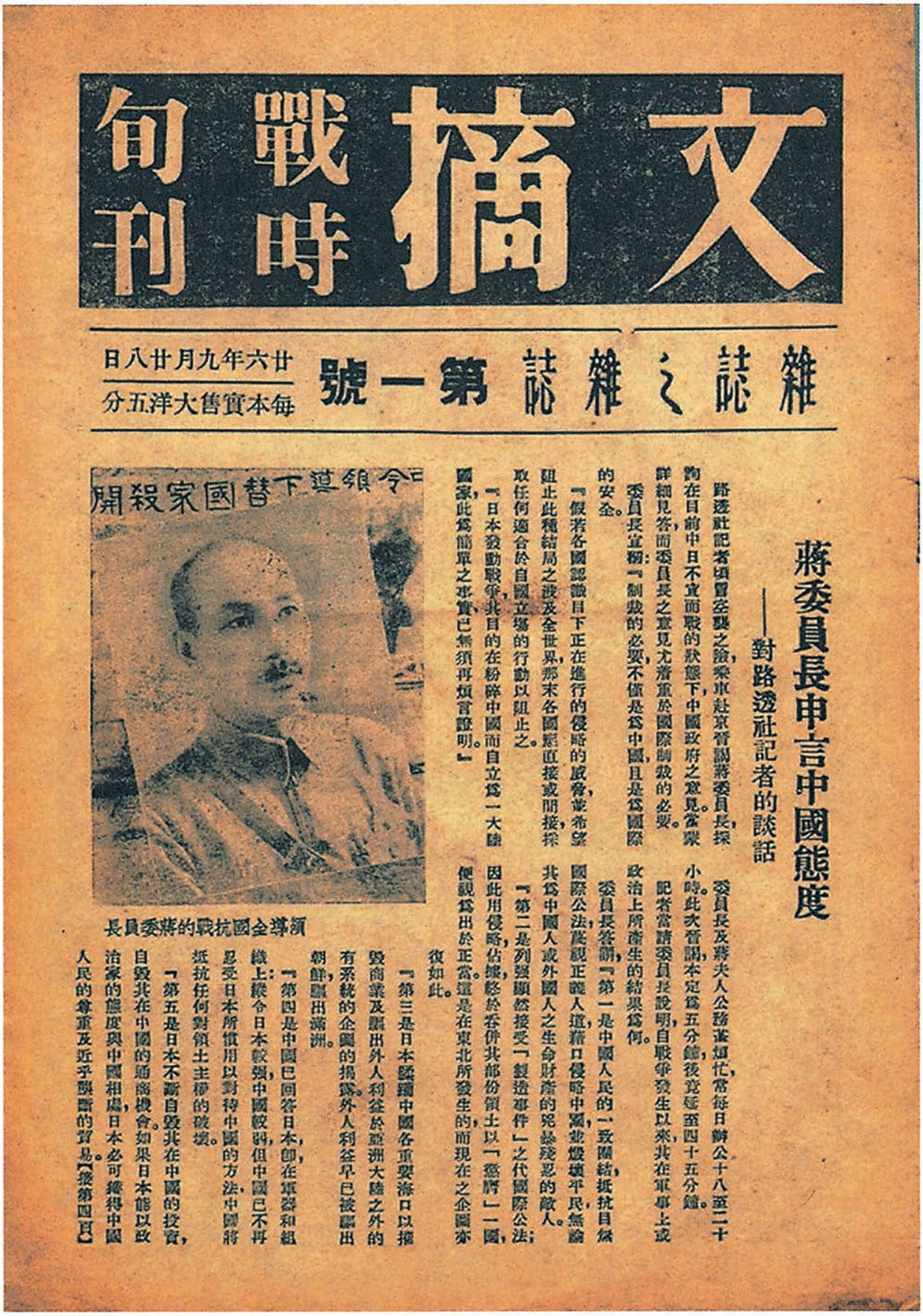
文摘

第二卷　第二期

蘆溝橋浴血抗戰
被包圍的日本
西班牙內戰週年
納粹統治下的人民
威脅蘇聯的德國間諜
勞合喬治論戰爭
中國憲政問題
青年運動問題
透視新聞界
動的世界
遠東——蘇聯國防小說
「浮屍」與「老兵」
雷馬克的「歸來」在銀幕上
世界第一賭城蒙特卡羅
歐洲海軍國家在地中海爭霸圖解
日本的切腹
科學·各地·人物·漫畫

復旦大学文摘社編·上海黎明書局刊行

国内首次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月刊。



文摘 戰時旬刊

雜誌之雜誌 第一號

廿六年九月廿八日

每本實售大洋五分

蔣委員長申言中國態度

——對路透社記者的談話

路透社記者頃冒空襲之險，乘車赴京晉謁蔣委員長，探詢在目前中日不宣而戰的狀態下，中國政府之意見。當蒙詳細見答，而委員長之意見尤着重於國際制裁的必要。委員長宣稱：『制裁的必要，不僅是爲中國，且是爲國際的安全。

『假若各國認識目下正在進行的侵略的威脅，並希望阻止此種結局之波及全世界，那末各國應直接或間接，採取任何適合於自國立場的行動以阻止之。

『日本發動戰爭，其目的在粉碎中國而自立爲一大陸國家，此爲簡單之事實，已無須再煩言證明。』

委員長及蔣夫人公務叢忙，常每日辦公十八至二十小時。此次晉謁，本定爲五分鐘，後竟延至四十五分鐘。

記者當請委員長說明，自戰爭發生以來，其在軍事上或政治上所產生的結果爲何。

委員長答稱，『第一是中國人民的一致團結，抵抗目無國際公法，蔑視正義人道，藉口侵略中國，並燬壞平民無論其爲中國人或外國人之生命財產的兇暴殘忍的敵人。

『第二是列強顯然接受「製造事件」之代國際公法；因此用侵略，佔據，終於吞併其部份領土以「懲膺」一國，便視爲出於正當。這是在東北所發生的，而現在之企圖亦復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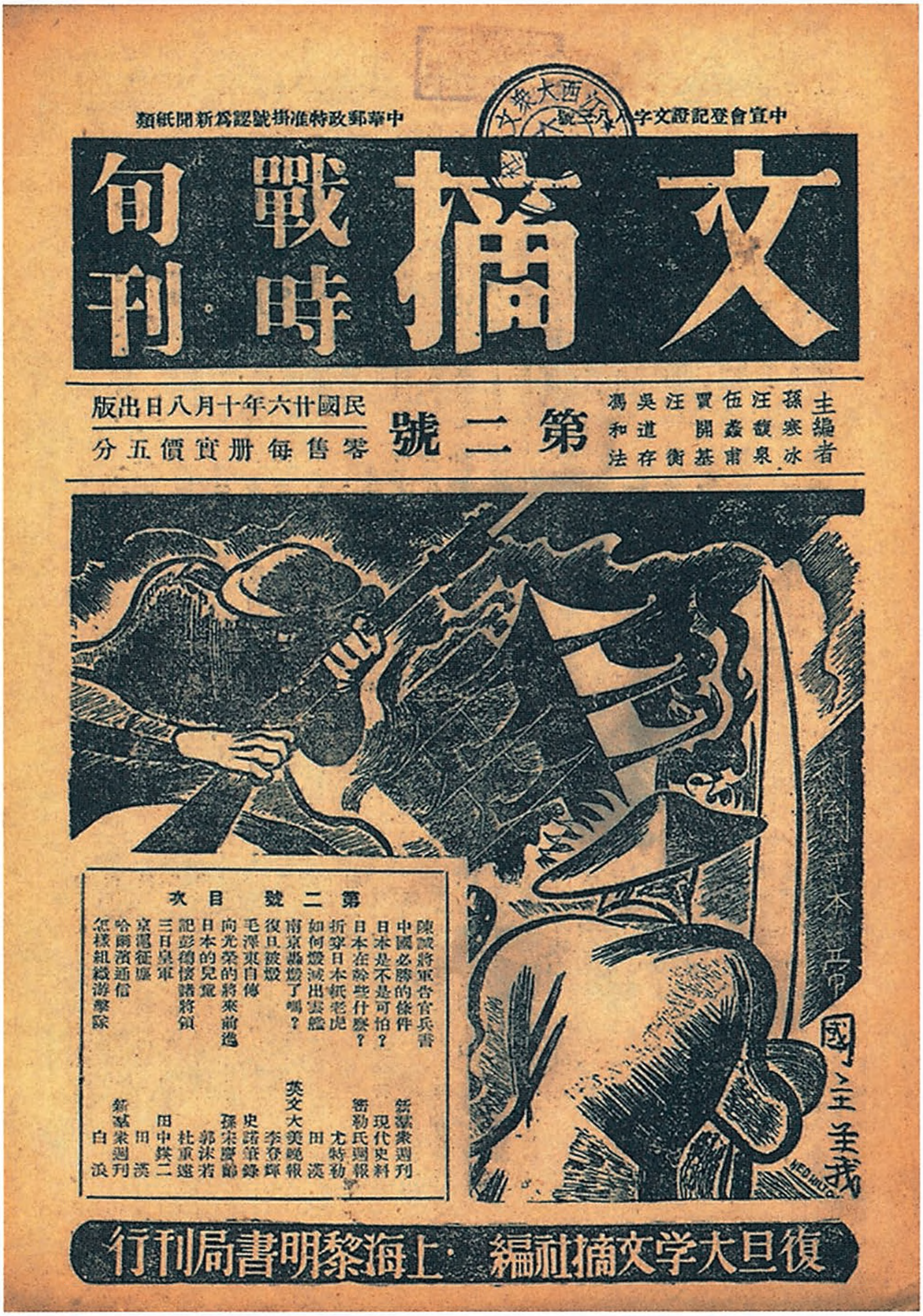
『第三是日本壟斷中國各重要海口，以摧毀商業及驅出外人利益於亞洲大陸之外的有系統的企圖的揭露。外人利益早已被驅出朝鮮，驅出滿洲。

『第四是中國已回答日本，即，在軍器和組織上：縱令日本較强，中國較弱，但中國已不再忍受日本所慣用以對待中國的方法，中國將抵抗任何對領土主權的破壞。

『第五是日本不斷自毀其在中國的投資，自毀其在中國的通商機會。如果日本能以政治家的態度與中國相處，日本必可獲得中國人民的尊重及近乎壟斷的貿易。【接第四頁】

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战时旬刊》（原《文摘》月刊更名）第一号。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八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文摘　戰時・旬刊

民國廿六年十月八日出版

零售每冊實價五分

第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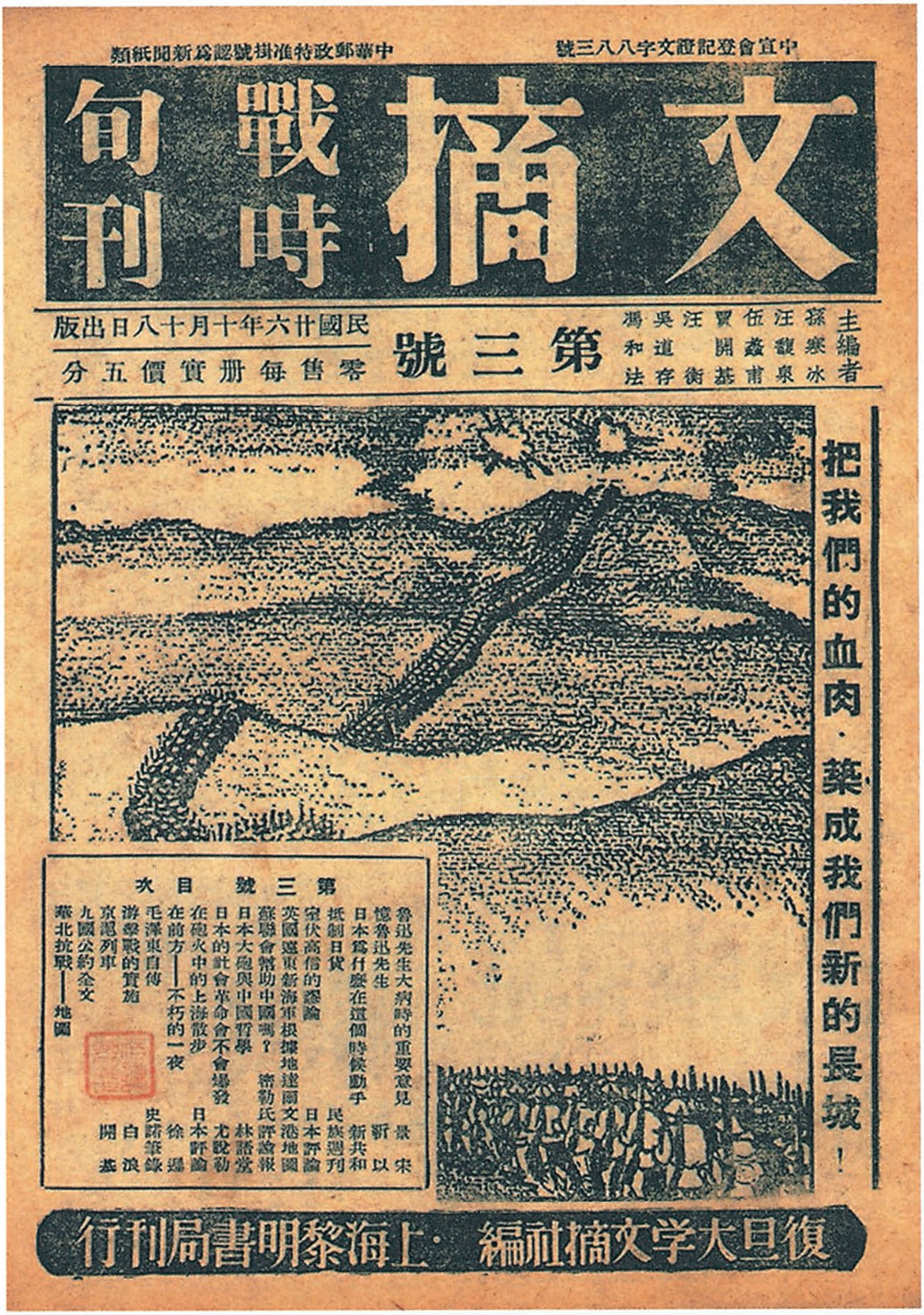
主編者　孫寒冰　汪馥泉　伍蠡甫　賈開基　汪衡　吳道存　馮和法

第二號目次

陳誠將軍告官兵書	
中國必勝的條件	新羣衆週刊
日本是不是可怕？	現代史料
日本在幹些什麼？	密勒氏週報
拆穿日本紙老虎	尤特勒
如何殲滅出雲艦	田漢
南京轟燬了嗎？	英文大美晚報
復旦被燬	李登輝
毛澤東自傳	史諾筆錄
向光榮的將來前進	孫宋慶齡
日本的兒童	郭沫若
記彭德懷諸將領	杜重遠
三日皇軍	田中鐵二
京滬征塵	田漢
哈爾濱通信	新羣衆週刊
怎樣組織游擊隊	白浪

復旦大学文摘社編・上海黎明書局刊行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战时旬刊》第二号。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八八三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文摘 戰時旬刊

主編者
孫寒冰
汪馥泉
伍蠡甫
賈開基
汪　衡
吳道存
馮和法

第三號

民國廿六年十月十八日出版

零售每冊實價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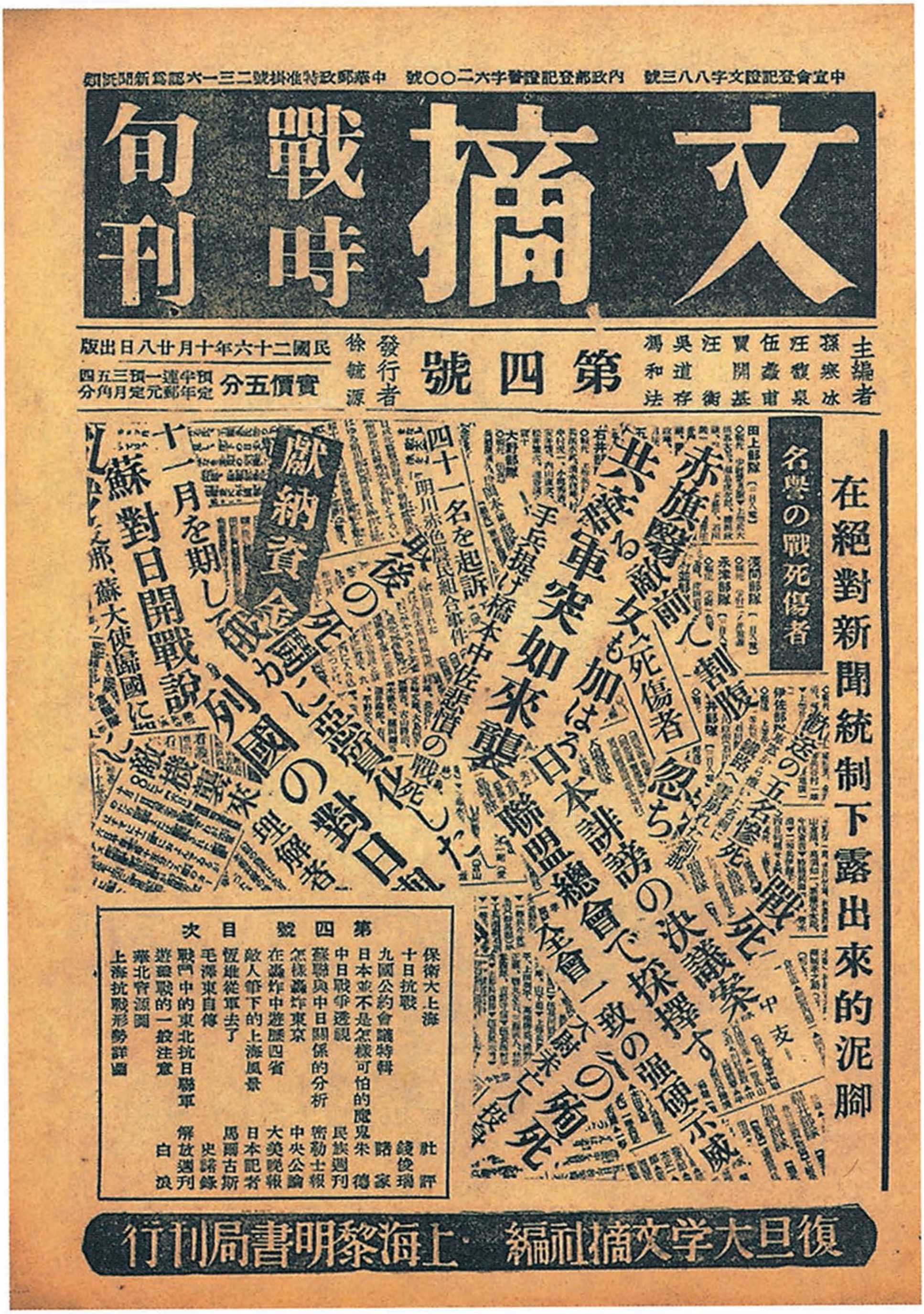
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第三號目次

魯迅先生大病時的重要意見　景宋
憶魯迅先生　靳以
日本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動手　新共和
抵制日貨　民族週刊
室伏高信的謬論　日本評論
英國遠東新海軍根據地述聞　文港地圖
蘇聯會幫助中國嗎？　密勒氏評論報
日本大砲與中國哲學　林語堂
日本的社會革命會不會爆發　尤脫勒
在砲火中的上海散步　日本評論
在前方——不朽的一夜　徐遲
毛澤東自傳　史諾筆錄
游擊戰的實施　白浪
京滬列車
九國公約全文
華北抗戰——地圖　開基

復旦大學文摘社編·上海黎明書局刊行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战时旬刊》第三号。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八八三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二〇〇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二三一六認爲新聞紙類

文摘

戰時旬刊

主編者　孫寒冰　汪馥泉　伍蠡甫　賈開基　汪衡　吳道存　馮和法

第四號

發行者　徐毓源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廿八日出版

實價五分

預定半年連郵一元　預定三月五角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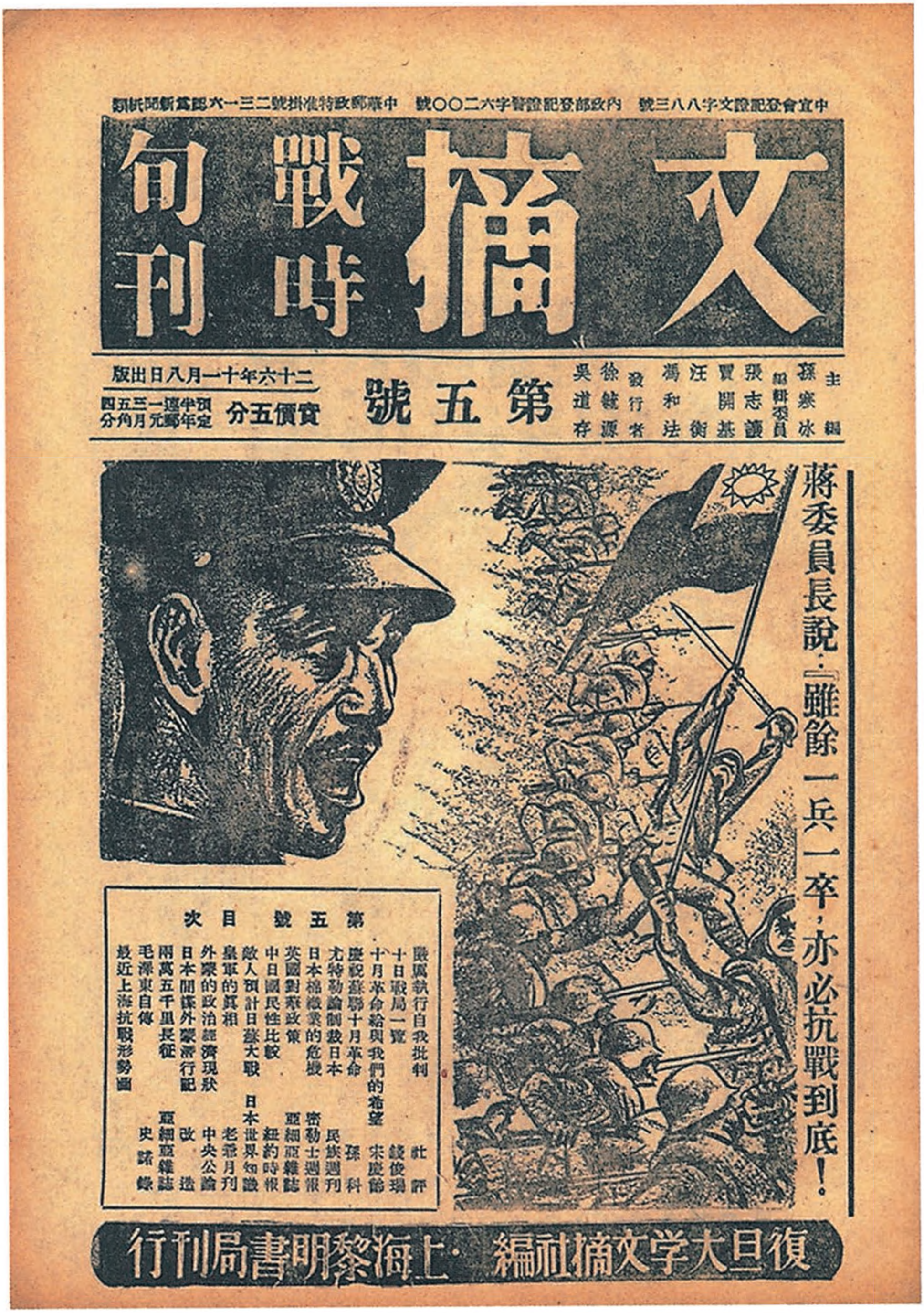
在絕對新聞統制下露出來的泥腳

第四號目次

保衛大上海　社評
十日抗戰　錢俊瑞
九國公約會議特輯　諸家
日本並不是怎樣可怕的魔鬼　朱德
中日戰爭透視　民族週刊
蘇聯與中日關係的分析　密勒士報
怎樣轟炸東京　中央公論
在轟炸中遊歷四省　大美晚報
敵人筆下的上海風景　日本記者
假使從軍去了　馬爾古斯
毛澤東自傳　史諾錄
戰鬥中的東北抗日聯軍　解放週刊
遊擊戰的一般注意　白浪
華北資源圖
上海抗戰形勢詳圖

復旦大學文摘社編・上海黎明書局刊行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战时旬刊》第四号。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八八三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二〇〇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二三一六認爲新聞紙類

文摘 戰時旬刊

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版

實價五分　預定半年連郵一元三月五角四分

第五號

主編　孫寒冰
編輯委員　張志讓　賈開基　汪衡　蔣和法
發行者　徐鉞源　吳道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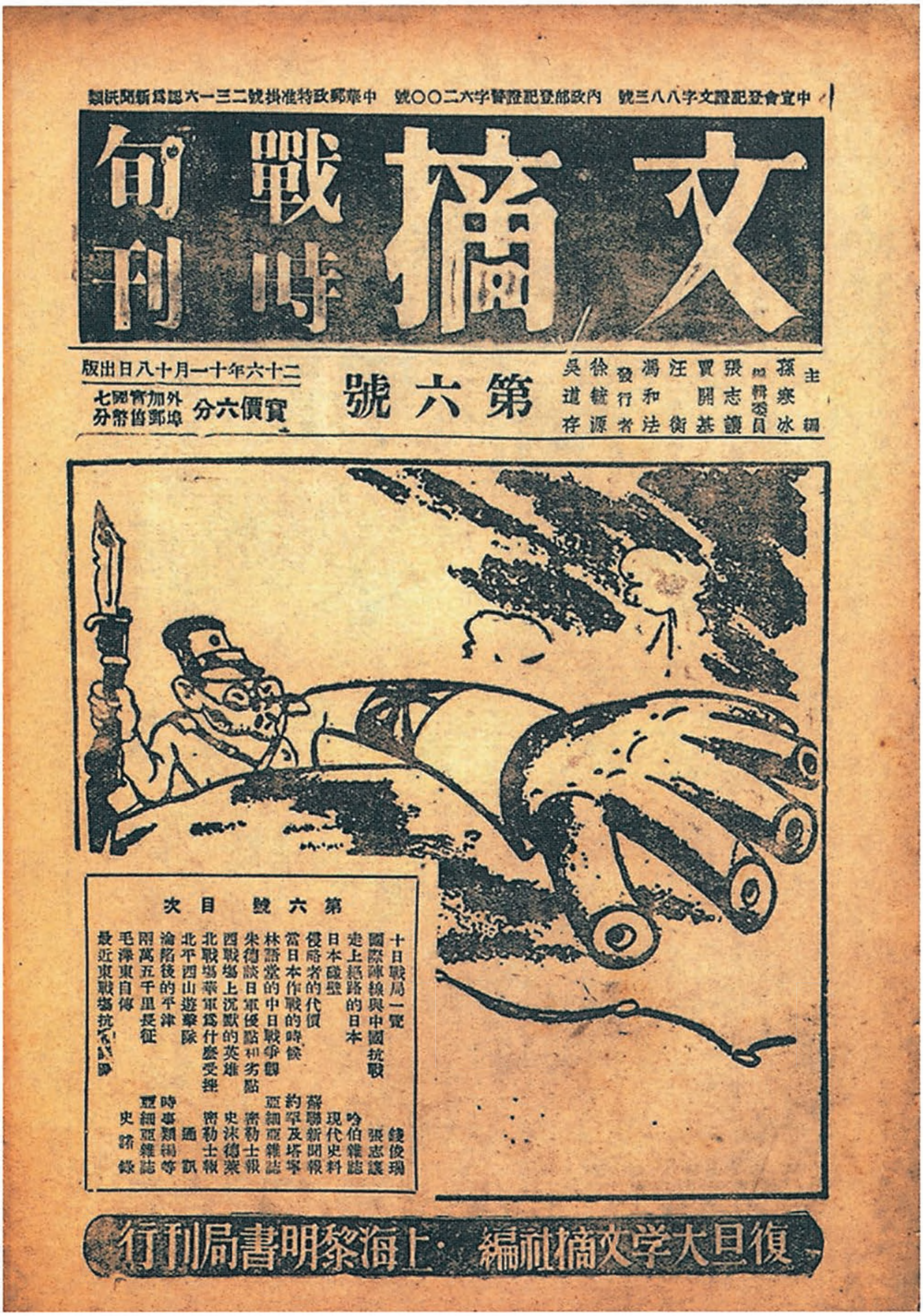
蔣委員長說：「雖餘一兵一卒，亦必抗戰到底！」

第五號目次

嚴厲執行自我批判　社評
十日戰局一覽　錢俊瑞
十月革命給與我們的希望　宋慶齡
慶祝蘇聯十月革命　孫科
尤特勒論制裁日本　民族週刊
日本棉織業的危機　密勒士週報
英國對華政策　亞細亞雜誌
中日國民性比較　紐約時報
敵人預計日蘇大戰　日本世界知識
皇軍的真相　老爺月刊
外蒙的政治經濟現狀　中央公論
日本間諜外蒙滯行記　改造
兩萬五千里長征　亞細亞雜誌
毛澤東自傳　史諾錄
最近上海抗戰形勢圖

復旦大学文摘社編・上海黎明書局刊行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战时旬刊》第五号。



中宣會登記證文字八八三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六二〇〇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二三一六認爲新聞紙類

文摘
戰時旬刊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版

實價六分　外埠加郵寄費國幣七分

第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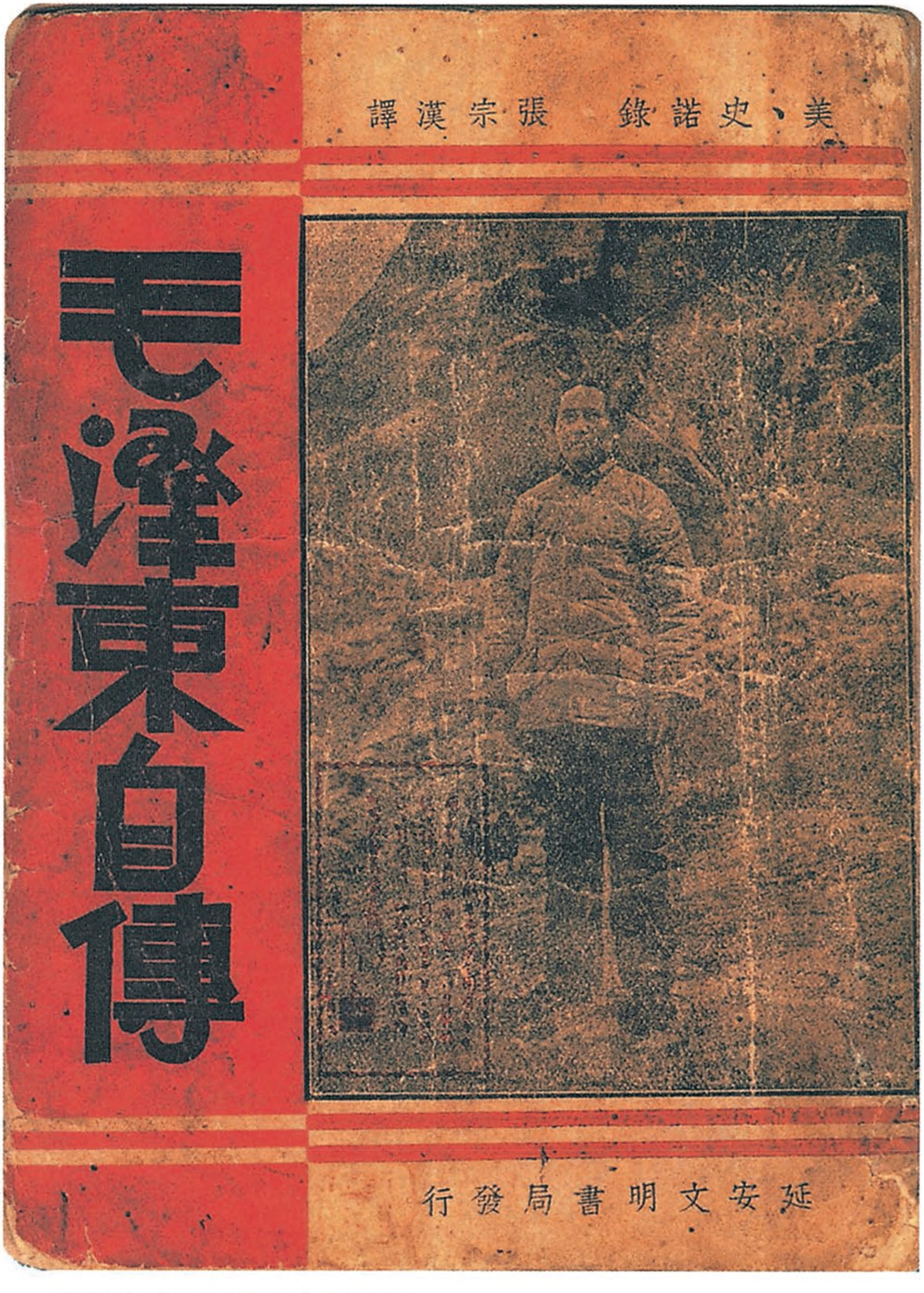
主編　孫寒冰
編輯委員　張志讓　賈開基　汪衡　馮和法
發行者　徐毓源　吳道存

第六號目次

十日戰局一覽　錢俊瑞
國際陣線與中國抗戰　張志讓
走上絕路的日本　吟伯雜誌
日本碰壁　現代史料
侵略者的代價　蘇聯新聞報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約翰及塔斯
林語堂的中日戰爭觀　亞細亞雜誌
朱德談日軍優點和劣點　密勒士報
西戰場上沉默的英雄　史沫特萊
北戰場華軍爲什麼受挫　密勒士報
北平西山遊擊隊　通訊
淪陷後的平津　時事類編等
附萬五千里長征　亞細亞雜誌
毛澤東自傳　史諾錄
最近東戰場抗戰論

復旦大學文摘社編・上海黎明書局刊行

连载《毛泽东自传》的《文摘战时旬刊》第六号。



美、史諾錄　張宗漢譯

毛澤東自傳

延安文明書局發行

最早的《毛泽东自传》单行本。

附录三：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

1893年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先后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在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年

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其间，读到同盟会创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

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佐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讯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冬，同杨开慧结婚。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同日，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

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年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

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保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

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保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

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春，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

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

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

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

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

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其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道：“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夏秋，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

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

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

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52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